外研社百科通识文库

（世界万象大套装）

· 共114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总目录

建筑与文化
走近世界音乐
神话密钥
埃及神话
解码畅销小说
走近艺术史
文艺复兴简史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走近现代艺术
走近当代艺术
古代战争简史
探秘古埃及
罗马帝国简史
揭秘北欧海盗
美国简史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中世纪英国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18世纪英国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19世纪英国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20世纪英国
简析荣格
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
梦的新解
情感密码
破解意识之谜
浅论精神病学

恐龙探秘
人类进化简史
走出黑暗：人类史前史探秘
达尔文与进化论
密码术的奥秘
时间简史
认识宇宙学
全球灾变与世界末日
释迦牟尼：从王子到佛陀
《圣经》纵览
《旧约》入门
《新约》入门
死海古卷概说
世界贸易组织概览
欧盟概览
女权主义简史
解读后现代主义
解读苏格拉底
解读柏拉图
读懂莎士比亚
存在主义简论
解读欧陆哲学
动物权利
谈谈方法（外研社双语读库）
我的知识之路（外研社双语读库）
爱弥儿（上）
爱弥儿（下）
常识
沉思录
大学的理念（上）

大学的理念（下）
关于英吉利国的书信
教育论
教育漫话
理想国
妇女的屈从地位
论公民的不服从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论生成与消亡
面包与自由
民主与教育（上）
民主与教育（下）
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
真理的意义：《实用主义》续篇
语言：言语研究导论
学术的进展
人口论（英汉对照）
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形成之原理及其应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上）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下）
英国工业革命演讲稿
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给这最后来的
文艺复兴（外研社双语读库）
乌托邦
太阳城
悲剧的诞生
道德原则研究

第一哲学沉思录
高尔吉亚篇
会饮篇
论灵魂
人类理解研究
社会契约论
诗学
式样哲学
新工具
修辞学
政府论（上）
政府论（下）
政治论
政治学
法律之路
普通法（上）
普通法（下）
财富的分配
国富论（英汉对照）
科学管理原理
通货原理研究
论利润
富兰克林自传
伦敦蒙难记
精神分析引论（上）
精神分析引论（中）
精神分析引论（下）
乌合之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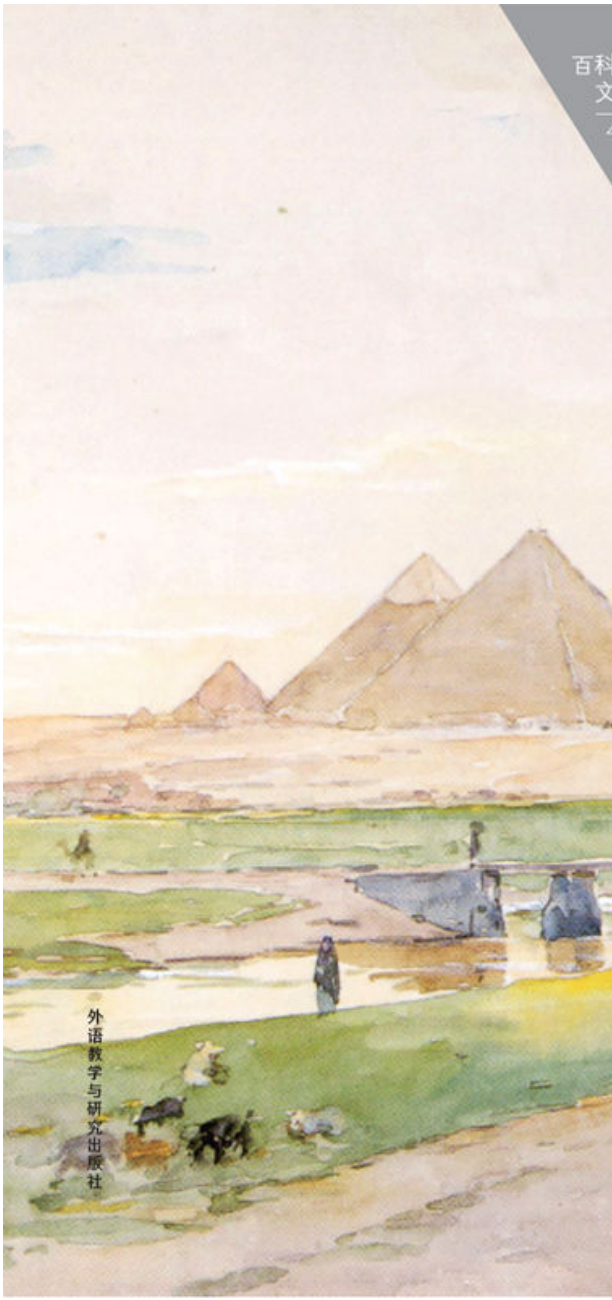

百科通识文库

49

建筑与文化

安德鲁·巴兰坦 著

王贵祥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建筑与文化

安德鲁·巴兰坦 著

王贵祥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71**

Architectur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2.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2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Andrew Ballantyne 2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与文化 / （英）巴兰坦（Ballantyne, A.）著；王贵祥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20-2

Ⅰ．①建… Ⅱ．①巴… ②王… Ⅲ．①建筑艺术 - 世界 - 普及读物 Ⅳ．①TU-8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18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20-2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绪论
第一章　有意义的房屋
第二章　西方传统的兴起
第三章　建筑如何变得伟大
年表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安德鲁·巴兰坦原是一位颇具水平、经验丰富的建筑师，后进入学术界。他先后在谢菲尔德、巴斯的大学中任教并从事研究工作，现为纽卡斯尔大学建筑学教授。已出版的著作有《建筑、景观与自由》及《什么是建筑学？》。

译者简介

王贵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曾到英国、美国访学多年。研究方向为建筑历史与理论。主要译著有：《文艺复兴建筑》、《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和《建筑理论》（上、下）等。

图　目

图1　美国电报与电话公司大楼，纽约；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
图2　传统农舍，年代不确定，但应建于20世纪前；没有经过建筑师设计
图3　皇家亭阁，布赖顿，英格兰；建筑师：约翰·纳什
图4　胡夫大金字塔，吉萨，开罗附近，埃及；建筑师：未知
图5　威斯敏斯特宫，伦敦，英国；建筑师：查尔斯·巴里爵士和A.W.N.普金
图6　昌迪加尔，旁遮普，印度；建筑师：勒·柯布西耶
图7　帕提农神庙，雅典，希腊；建筑师：伊克蒂诺和卡利克拉特与雕刻家菲迪亚斯共同合作完成
图8　圣艾蒂安大教堂，博格斯，法国
图9　施罗德住宅，乌得勒支，荷兰；建筑师：盖里·里特维尔德
图10　流水别墅，熊跑谷，宾夕法尼亚；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图11　威斯朝圣教堂，斯特因豪森，巴伐利亚，德国；建筑师：多米尼克斯·齐莫尔曼
图12　蒙蒂塞罗，夏洛茨维尔附近，弗吉尼亚；建筑师：托马斯·杰斐逊
图13　方形大厦，尼姆，法国；建筑师：未知
图14　万神庙，罗马，意大利；建筑师：匿名，但在哈德良皇帝的指导下进行的设计
图15　圆厅别墅（卡普拉别墅），维琴察，意大利；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
图16　奇斯威克别墅，伦敦，英国；建筑师：伯灵顿伯爵
图17　朱诺·索斯皮塔神庙模型，拉努维马姆，伊特鲁里亚神庙，据

维特鲁维
图18　西格拉姆大厦，曼哈顿，纽约；建筑师：密斯·凡·德·罗和菲利普·约翰逊
图19　歌剧院，悉尼，澳大利亚；建筑师：约翰·伍重
图20　芝加哥论坛报大厦，芝加哥，伊利诺伊；建筑师：约翰·迈德·豪威尔斯和雷蒙德·胡德
图21　地铁出入口护拦及雨篷，巴黎，法国；建筑师：赫克托·吉马德
图22　圣家族赎罪教堂，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西班牙；建筑师：安东尼·高迪
图23　泰姬·玛哈尔陵，阿格拉，印度；建筑师：乌斯塔德·伊萨
图24　古根海姆博物馆，毕尔巴鄂，西班牙；建筑师：弗兰克·盖里
图25　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巴黎，法国；建筑师：伦佐·皮亚诺和理查德·罗杰斯

绪论

一位来自古国荒原的人与我相遇
他说："有两只巨大而没有身躯的石腿
在沙漠中站立。在这双腿旁，在沙砾中
半露出一张残破的石刻的面庞，那眉头紧锁，
嘴唇瘪翘，透出威严而轻蔑的嘲笑，
诉说着那雕刻师，
遗存在这岩石上的激情与热望，
他仍然活着，在那些冰冷之物上留下痕迹，
那捏塑它们的手，那获得满足的心；
在那基座上还留有铭记：
'我的名字是奥西曼德斯，王中之王，
看看我的功业吧，即使是强者，也无与伦比！'
此外就是空阔的虚无，环绕着残骸，
那巨大的断石，那茫茫的四野，
暴露无遗，孑然孤立，蔓延的荒沙无边无际。"

（珀西·拜舌尔·雪莱[1]，《奥西曼德斯》[2]，1818年）

在各种文明的产物中建筑应该是最为昂贵之物了。如果要使得它们可与竞争对手或历史上的伟大建筑相媲美，那么，有再多的金钱与气力也都可以全部花于其上。既然造价如此之高，那么力图胜过他人的建筑似乎就是错误的做法，然而没有人记得那些认为这是错误做法的文明，至少在建筑史上它们默默无名。相反，像古埃及和古罗马这样大兴土木、奢华成风的文明，我们却似乎避无可避。那些不朽的建筑似乎总是伴随着不朽的声名，而这种声名一直就是吸引有权势者建造纪念建筑的原因所在。然而，在经历了岁月长河的浸润侵蚀后，任何人类的造物也难逃破碎的命运。雪莱的著名诗篇《奥西曼德斯》既表现了那不朽石雕的诱人魅力，也揭示了其标榜的永恒荣耀是多么具有欺骗性。建筑之所以重要，一个原因是它能透露给我们一些线索，从而使得我们了解历史上的统治者真正看重的事物。另外一个原因是建筑还能告诉我们，它如何使我们——活着的人——以特定的方式生活成为可能，并且让我们能够向彼此和自己证明什么才是我们关注之

事，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这一整体。究竟是考虑人们当前的需求，还是超越人们眼前的需求以建造出名垂青史的建筑，这两者之间如何平衡，不同的文明有着不同的答案。

这本小书想要做的就是向读者解释建筑是如何为其所为的。房屋使我们远离寒冷与潮湿，并深深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建筑”这个词，只要我们加以留心，就会发现它永远存在一个文化的维度。本书第一章谈的是建筑如何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紧密相关。第二章探讨建筑建造得彼此相仿的方法，这样，建筑就负载了对特定文化中“熟知”该文化的人来说正确的信息。第三章要告诉人们的是一些建筑在文化层面上比另外一些建筑显得更为重要的原因。

建筑之所以能够特别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原因之一是它们负载了如此多的生活层面的信息。如果我们能够搞清楚哪些人被带到一处，哪些人被分隔开，那么建筑的布置方式就会告诉我们人们在建筑中是如何互动的。建筑物的建造材料以及处理这些材料的方法也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信息。如果建造房屋的石头来自很远的地方，那么，我们就知道要么当时存在一种有效的交通运输体系，要么就是这些石头十分特殊，值得人们去大费周章。如果一座建筑用了钢铁的构架，那么，我们就知道它是现代建筑，因为古人根本不懂钢铁构架。要想了解遥远古代的历史，建筑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证据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建筑还能告诉我们许多今天的人真正关心的事。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允许建造高速公路穿越郊区，那是因为我们对郊野的关注远不如我们对便利交通的渴求来得强烈。作为个人，我们可能作出不同的选择，但是，作为社会这一个整体，考虑到流通中的货币的流动和聚集，考虑到调停斡旋各种决定的政治过程，于是我们周围就出现了各种建筑。作为个人，我们绝大多数人一般无力左右周围的建筑环境，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财富与权力的集中也会使个人引发巨变成为可能。据说，当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初到罗马之时，罗马是用砖建造的，而当他离开的时候，那里已经是大理石的世界。很显然，奥西曼德斯（拉美西斯二世）也曾大兴土木。建筑可以是漂亮而振奋人心的，然而，一旦它们被建造（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想象中），就包含了

经济和政治层面，当然，也包括美学层面。此外还有其他层面，例如建造技术的层面。比如说这座房屋能否立起来？它能否做到遮风避雨？房屋的室内能否温暖如春？抑或它会燥热难忍？我能否在这座房屋里过我希望的生活？或者，我想要成为在这样的房屋中生活的那种人吗？

假设一座建筑包含了以上所有层面，那么以突出某一层面的方式来探讨建筑就成为了可能。有关建造技术的历史会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它讲述的应该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因为在技术上更为成熟的建造方式总会取代较为原始的建造方式。还会有一些重要的技术飞跃，如混凝土和拱券技术的引入以及新技术革新出现后推出的一系列新的建筑类型。如果以这种方式来描述建筑史，我们会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可能很难有几座建筑能够在技术方面算得上领先。大多数建筑都只是一些平平之作，不会倒塌，也不会在出现新技术时就丧失实用性。就像许多欧洲人仍然生活在100多年前或更早时代建造的房子中一样，同样，在古罗马，那些我们谈起古罗马时就会联想到的穹隆式建筑并不是这座城市的主要建筑；事实上，几乎所有著名的罗马古建筑，其建造时间都在罗马帝国时代的晚期，因而，对于大多数古罗马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建筑的存在。更具意味的是，这些建筑甚至不为维特鲁威（Vitruvius）——我们所知的古罗马唯一在建筑学方面有过著述的作家——所了解，因为维特鲁威生活在较之更早的时代。

我们可以把技术问题搁置一旁，或者将这些问题置于背景层面上，那么建筑历史就会成为讲述建筑的不同风格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类建筑造型会逐渐转变为另外一类建筑造型。这一房屋造型史听上去就像是在说建筑造型存在着进化与发展的意愿。传统日益成熟，建筑师则始终在努力尝试新的可能。有些尝试被视为革新，并为其他建筑师所模仿，直到它们自身又被革新。这种研究角度可能导致对风格分析的执着与专注，从而忽略这个事实：建筑背后存在着一种实践理性。它还可能导致对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忽视，而这些问题原本就非常有趣，有时甚至是一座建筑最重要的层面。另外一个非常

复杂的问题是，近在眼前的事物与那些远离自己的事物在我们的眼中会有所不同。在我们看来是历经若干世纪的渐进变化，在当时看起来更可能像是一个相当不平静的过程。让人们改变自己固有的行事方式总是一件不同寻常之事，当一种新的思想渐成气候时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代人已经老去，缺乏活力，受到新思想熏陶的年轻一代承续了接力棒。这种变化是渐进的，还是突变的，这可能取决于我们距离变化发生的时间有多久。走近了观察时悲剧亦是喜剧。

在世界各地，从古至今的建筑可谓琳琅满目。将所有这些建筑都搜罗到一起并展现在读者的面前，特别是以这样一本概论性的小书的形式来展现，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因而有必要进行选择，而究竟选择哪些建筑，则取决于应该给读者讲述一段什么样的历史。本书的主旨是要为读者提供有关建筑的多种思考方式，并向读者展示这一主题下的内容是多么丰富，其丰富程度有时甚至会使建筑学难以理解。本书后面各章讨论了不同的主题。为了帮助说明文中的观点，我列举了一些建筑实例，因而作为图示的建筑实例并不是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的，读者可以参考书末的年表以了解这些建筑建造的年代顺序。读者会注意到，在所遴选的例子中，现代建筑比古代的要多一些。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现代建筑比古代建筑遗存显然要多很多；另外一个原因是人们往往对距离自己时间较近的事物更感兴趣。如果我把金字塔看作代表了持续3,000年的文明，那么，从宏观的视野来说，我会觉得这样的涵盖是充分的；但如果说金字塔代表了过去3,000年的建筑，那么我会觉得这样的涵盖滑稽可笑，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仅以一座纪念碑来概括欧洲建筑听上去会令人感觉失之严肃，具有讽刺意味。中世纪教堂是所讨论的那个时期中期的宏大纪念性建筑，但若将其作为唯一重要的建筑呈现，这就会令我感到担心了。

显然，作者的观点暗含在所作的选择中，而我所作的选择是受西方文化的浸润与熏陶的结果。其他的观点当然也是可能的，而且也有其合理性，并将导致不同的选择。尽管如此，这并不是说本书所表达的观点只对个人具有意义。这些观点与一个传统紧密相关，后者经历了很多发展变化，而那些与我们的时代最为接近的发展变化似乎最为

重要。也许计算机、电视和电话为我们提供的不仅是新的生活方式，还有在全球化网络系统中作为人的新的方式。然而，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最近的这些发展或许可以看作是过去200年，甚至是500年来一个持续发展的趋势的延续。

一般年代学

建筑历史的语言包括定义不同建筑风格的词汇，这些词汇与不同的地区与时代相关联。将人类文化史划分成一些宽泛的时间段提供了许多便利。虽然这些划分是否适当，可能会引起争论，但是它们已经在我们的语言系统中扎根，而且对于确立某人的认知坐标来说，这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从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文明开始，它们以其文学、哲学与宏伟的建筑遗迹而闻名于世。这两种文明被称之为“古典”文明，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称谓。它们被视为艺术领域中权威与经典的基础，因此，这两个文明社会的产物一般都被称为是“古典的”。《牛津英语辞典》指出这个词表示此义最早可以追溯到1607年（指文本，而不是建筑）。另外一个重要的古典时代距离我们的时代较近，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文化的再生时期，又被人们称为“文学复兴”。这样，我们就有了关于世界历史的四个阶段的划分——两个文明时代，两个黑暗时代。首先是原始时代，古埃及属于这个时代；然后是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时代。接着，在罗马帝国的衰亡与文艺复兴的出现之间有一个中间时代，这一时代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事物，这就是所谓的“中世纪”。然后就是文艺复兴，理性与进步的近代时期。当然，这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划分，然而这一划分对于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类型的建筑为什么有不同的名声非常有用。古典时期的建筑曾被景仰与模仿，中世纪建筑则较少受到重视。然而自这些划分时期的术语出现以来，一切已发生了改变。关于“中世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也不会想要将这一时代的建筑一笔抹杀。尽管如此，这样的一个时期划分依然存在。我们仍然谈论“中世纪”，尽管在使用这样一

个词时已不再暗示它不应该受到重视，也早已忘记居于两个古典文明之间这一时代原来该是怎样。

如果我们视野更开阔些，这种时间划分就会出现问题，因为这一划分所标识出的文化变迁并不能与世界历史的变化相匹配；它只反映我们选择构建的西欧文化的变迁。不仅亚洲与美洲走的是完全独立的发展之路，即使是东欧，其发展历程也大不相同。古希腊当然应该被包括在西方文化的传统之中，因为希腊文化影响了罗马人对精美建筑的看法。但是谈论“中世纪希腊”却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尽管拜占廷帝国建造了令人难忘、精巧复杂的建筑，但是却未发生过文艺复兴。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拜占廷文化是一连串的复兴，那些希腊裔皇帝们的自我意识建立在与古代世界的联系的基础上。1453年，正当我们试图称之为希腊“中世纪”的时代接近尾声时，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陷落；文化的突变改变了现在被称为伊斯坦布尔的这座城市的传统，它由此成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这一历史事件造成了大量希腊学者逃往西方，并且是掀起古籍研究高潮的原因之一，而古籍研究对于促成文艺复兴的发生又至关重要。由此可见，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概念具有地域性。美洲没有中世纪，因为那里没有出现过古典文明。东欧也没有中世纪，因为那里没有出现过古典文化的再度复苏。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文艺复兴，我们是仅仅在谈论艺术领域的变化，还是在谈论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领域里的变化，这仍然是一个存在疑问的问题。在建筑史上，一般认为文艺复兴始于1420年，这一年伯鲁乃列斯基[3]（Brunelleschi）开始了他的佛罗伦萨大教堂穹隆顶的建造。这座穹隆顶不仅超越了古罗马穹隆建造者的成就，而且伯鲁乃列斯基应该在开始他的伟大尝试之前就对古罗马的建筑遗迹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在艺术史上，类似的突破被认为与几何透视的发现有关，伯鲁乃列斯基的圆形穹顶中也运用了几何透视法。然而，另外还有一个一直在逐渐发展的、影响深远的变化，那就是随着商业贸易者所积聚的财富大大超过世袭贵族，封建势力日渐衰落。伯鲁乃列斯基的这个艺术上冒险的计划之所以具有新意，或许更多的是因为这一工程的经费来自新富，而不是因为它标志着他对于前辈艺术家成就的任何激进

背离。我并不想证明与封建主义的决裂和几何透视学的发明可能源出一辙，这对我来说，似乎过于形而上学。对我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新艺术被新兴的富有阶层所采用令其显得与封建主义的决裂更为彻底。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从电影、音乐和计算机行业获取的巨大财富正渐渐与从前人那里继承而来的财富平起平坐，这种生活方式带来了对风格的不同认识。富人及名人的住宅常常不遵照上流社会既有的审美趣味所确立的原则来建造；虽然这些建筑现在可能没有得到建筑史学家的认真对待，但是，在许多年之后再回头看时，这些建筑会像18世纪建造的贵族邸宅一样令人惊奇赞叹，一样不可复制。而且，尽管说来奇怪，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建筑史书上用来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都是那些“怪异”的建筑创作，似乎与我们现在的生活经验完全没有关联。从一个批判性角度来写这可能会被称为“后资本主义与庸俗艺术的狂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写，由于浸透着新时代的价值观，同样是这些建筑，它们也可以作为“你的梦想能够成真”的证据而加以表现。

在这里我竭力想说清的是：在观察建筑的时候，不同的视角是如何影响我们对眼前建筑的看法的。建筑与无数的文化与技术因素相关，而且关系复杂，因而它们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层面的意义。更有甚者，当我们试图为建筑分类归档时，我们发现这样做并不能包含所有建筑。我们建立了这一套分类系统，随即却又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仔细推敲，这种分类方式并不准确，其中还有交叉的地方。我们对某种文化了解得越多，对该文化的表述就有越多听起来像是泛泛之言。远观像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一个痛苦的理想破灭过程。相反，那些看似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断层，实际上或许是一个相当温和的过程，跟其他许多变化一样并未对西方文化产生什么损害。不管怎样，如果要理解我们在这一主题中的定位，我们就需要某种框架，而这就是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框架。不过也不必把这个框架看得过重。

更近距离的考察

在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宽泛的时期中，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划分。例如，若从非常笼统的角度来理解古代世界，那么将希腊建筑与罗马建筑统称为“古典建筑”是十分恰当的，但若要再作更为详细的讨论，这样的说法就没什么助益了。古希腊建筑本身就有一个古典时期，即公元前5世纪，这一时期之前为初创时期，之后则为希腊化时期。罗马也有自己的初创时期，接着是共和时期，然后是帝国时期。这样一种划分既考虑了艺术上的变化，又考虑了政治上的变化。初创时期的作品未及后来的作品成熟，但是，希腊化时期以及罗马帝国时期都是政治意义上的时期，而政治活动对建筑产生了影响，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中，财富都在日益增多，这就意味着一些建筑可以比以往建得更为奢华。

在中世纪，许多不同的建筑风格得到了发展。那些试图模仿罗马穹隆与拱券的教堂现在被称为“罗马风”建筑。后来使用了尖拱券和更富于装饰性的花饰窗格的教堂被称为“哥特式”建筑。哥特式建筑又进一步细分成不同的地方风格。在英格兰，我们发现有早期英格兰式、盛饰式与垂直式等风格。在法国，则存在盛期哥特、火焰纹哥特以及辐射式哥特风格。这些地方风格的名称大多源自描述建筑效果的概念，或是花饰窗格的式样。“罗马风”也将我们引回到建筑形式，而这些建筑形式又让人想起了古罗马的建筑。在英格兰以及法国的北部，“罗马风”建筑可以被称为“诺曼式”建筑，这是以兴建它们的诺曼底的那些领主来命名的，因而是对同一种建筑风格所起的“政治性”称谓。同样，“哥特式”这个名称也是政治性的，因为这一名称与一个族群，也就是摧毁罗马的“哥特人”有关。这个名字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这一建筑风格的任何有用信息，但是，它却告诉了我们在这个名称被创造出来的17世纪，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一类建筑的，虽然教堂建造者已经早已不再使用这种方式建造大教堂了。

同样，认为我们自己生活在文艺复兴的晚期这样一种想法已经不再能够令人满意了。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这样一个时代已经结束

了，但是，结束的时间却难以确定。在伯鲁乃列斯基与阿尔伯蒂[4]（Alberti）冷峻严肃的作品之后出现的是伯尔尼尼[5]（Bernini）和博洛米尼[6]（Borromini）等的更具装饰效果的作品。后者是一种在古典的背景上覆盖了丰富装饰的作品，我们称之为巴洛克风格。它在18世纪的法国与德国达到了发展的顶峰（图11）。虽然巴洛克风格肯定是同一个传统的一部分，但是其中存在着一类不同的艺术目的，因此也就有了一个不同的风格名称。当建筑被剥去繁复的细部装饰外衣，古典风格又再一次清楚地显现了出来时，人们对这种过分装饰的做法作出了反应。这场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运动还受到在希腊的考古发掘中所获得的新知识的滋养。这些考古发掘使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了古希腊的建筑形式，这些形式一直为官方所推崇，尽管那时它们还不是广为人知。

接着，到了18世纪末，一些与之前的古典主义成竞争之势的古典风格流行开来，这些风格以对希腊与罗马建筑的不同理解为基础，从主张造型严谨的多立克神庙那种纯正的简单性，到亚当兄弟[7]（the Adam brothers）那些高度装饰化的作品，不一而足。同时，还有一种日益增强的复兴中世纪建筑的复古情绪，后来演化成了19世纪中叶的哥特式复兴这一态度严肃的建筑风格（图5）；各种异域风情的尝试也层出不穷，如布赖顿皇家亭阁[8]（Brighton Pavilion，图3）就是一例。自此而始，折中主义风潮开始兴起，在某些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能在建筑上花费巨资的那些阶层的审美情趣不再是统一的了。如果说文艺复兴标志着社会权力从封建阶层转移到了商人阶层，那么折中主义的出现则标志着工业巨富的到来。那些通过东印度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的人，那些从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种植园赚得大笔钱财的人，或者那些从英格兰的工业生产中发大财的人，不再受已有的贵族审美趣味的束缚，而是进行着各种个性化的尝试。尽管在瑞士建筑师勒·柯布西耶[9]（Le Corbusier）的倡导下，始自1928年，CIAM（*Congrès internationaux d'architecture moderne*，国际现代建筑协会）试图在20世纪中叶为现代建筑推行一种国际化的统一风格，但已不再有什么众口一词的统一标准。勒·柯布西耶对机

器、轮船以及谷仓具有的诗意品质着迷，并将这些都作为他心目中新型建筑的原型。然而，尽管现代建筑运动（也叫“国际式风格”）推崇的建筑成为建筑杂志中的主流，这一风格却很少被（例如）住宅开发商采纳而应用于大众市场，在大众市场上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是各种版本的乡土化建筑、仿都铎风格的建筑以及概念上的英国摄政时期风格的建筑。国际现代建筑协会把对现代建筑持不同看法的声音排斥在外，这才取得了一致意见，然而，这种一致意见在1959年也完全不存在了，因为从那时起，当代建筑在形式上的变化已经是五彩斑斓（图18，19，24，25）。

用来指称过去几十年建筑的术语的意义一直在不断变换，因为出现的新建筑似乎需要打上新的标签。“后现代”这一术语被用来描述勒·柯布西耶后期的一些建筑作品，如朗香朝圣小教堂；这是一座具有显著的雕塑性质的建筑，也是一座明显摆脱了他早年所提倡的“机器美学”思想的建筑。然而，这一术语起初在建筑学界并未广受欢迎，直到后来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出版了他的《后现代建筑语言》（1977）一书之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詹克斯将后现代主义与对建筑的意义的关注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后现代这个词在使用过程中却不是那么精确。建筑界一度流行在现代建筑中利用显而易见的历史形式，特别是采取破坏这些历史形式原初效果的方式，例如，使用轻质的材料，运用夸张的巨大尺寸，或采用十分鲜亮的色彩；这一风尚使用了这个词来指代。这种类型的商业建筑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中（图1）。自那时以来，建筑领域又出现了其他一些口号与宣言，但是它们直到如今还未具有能够给广大公众留下永久印象的名称。弗兰克·盖里[10]（Frank Gehry）设计的位于毕尔巴鄂[11]（Bilbao）的艺术博物馆可以被看作是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建筑的一个实例（图24），但是，要对这个术语作出解释确实超出了我们这样一本有关建筑学的提要性入门读本所能覆盖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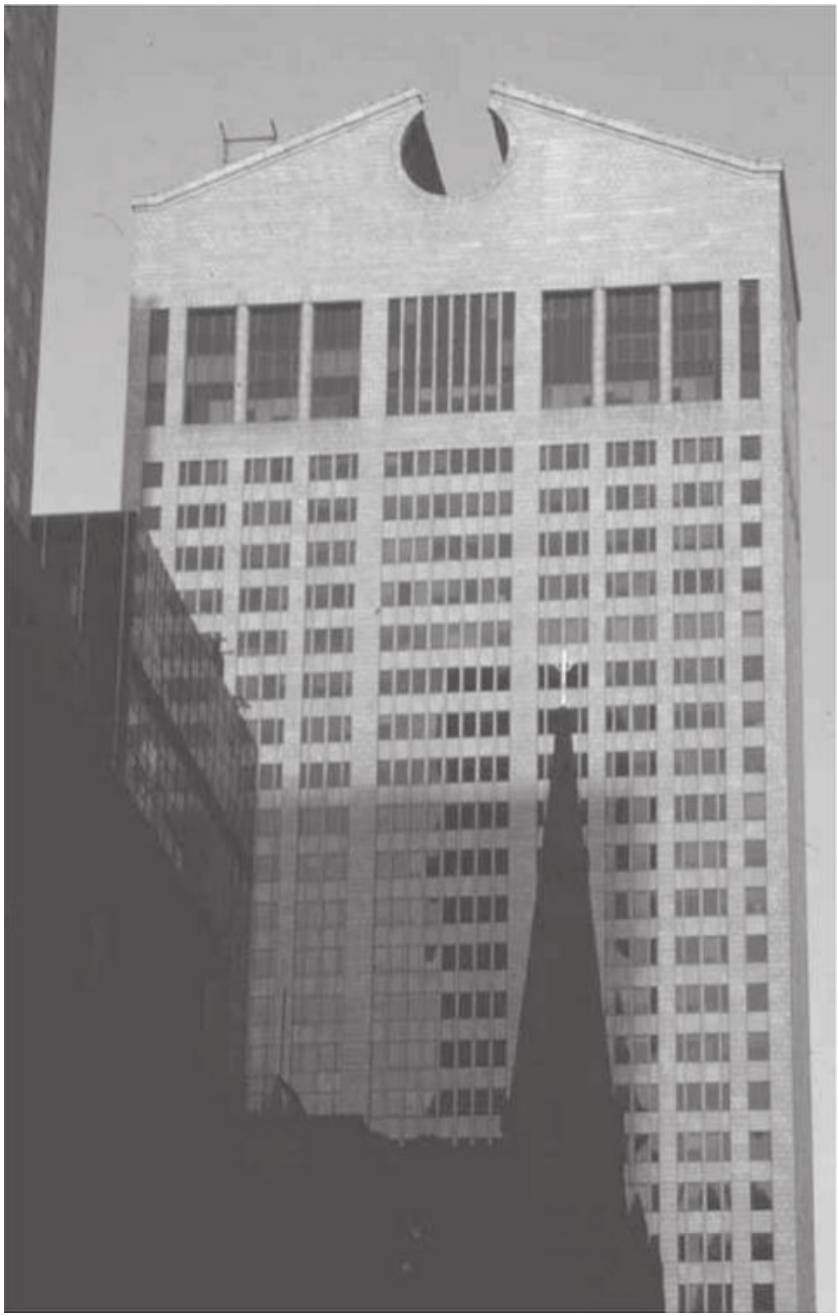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电报与电话公司（AT&T）大楼，纽约（1978—1980）；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1906年生）。菲利普·约翰逊曾参加过一个大获

成功的名为“国际式风格”的展览，这个举办于1932年的展览将现代主义建筑引入了美国。他与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一起参与了具有权威性影响的现代建筑西格拉姆大厦（图18）的设计工作。他的著述从整体上看推动了现代主义运动的发展，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嫌隙。他为美国电报与电话公司所做的设计采用了古典主题，如以天际线为背景的断裂的山花，这在当时看起来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这一作品引起了轰动，建筑师本人还成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这座建筑被认为是标志人们对建筑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这无疑是正确的。在随后的岁月里，出现了许多更为色彩斑斓、更为花哨的设计，使得美国电报与电话公司大楼（现在归索尼公司所有）看起来反倒显得庄重与朴素。

关于后面的章节

本书后面各章以漫谈的形式展开，把人们对所选建筑实例的不同层面的不同看法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在行文中的不同地方说明不同的观点时，总是尽可能地提及书中所包括的建筑实例，这可能会造成一种错觉，即夸大了这座建筑的重要性。书中所讨论的建筑并不是按照其建造时间的顺序，但是本书末尾有一个年表（此处 ）供大家参考。值得注意的是，表中所列建筑并不是按照年代序列均匀分布的，它们大多是离我们这个时代较近的建筑，故而分布不成比例。

第二章从一系列距离我们这个时代相对较近的建筑开始向前回溯，将古典传统拼合起来，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有悖常理的组织材料的方法。事实上，这反映了我们拼合自己的传统的方式。我们以一座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建筑为开端（在本书中是蒙蒂塞罗 [12] ［Monticello］，杰斐逊的故居，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建筑之一），在历史上寻找这座建筑的原型。然后，我们再追寻原型的原型，一直向前追溯。接着，通常出现的情况是这一时序被反转了过来，我们开始向前推进，这就产生了一种叙事的原动力，并且这种原动力伴随着向前运动的思想，似乎整个传统的着力点都是为了促使最后的、最为成熟的创作之花的绽放。我们可以用这种历史叙述产生的效果来说服我们相信某种类型的建筑对将来或是对现在是正确的选

择。如果我们从某一特定角度切近现在，那么，我们下一步将走向何处会很明显；如果我们换一个不同的角度，那么，我们下一步将走向别的地方。我在本书中竭力避免这一倾向，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未来的建筑会是什么样子，那么我的回答是，未来的建筑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样化。

从中世纪末以来，商业活动日益兴盛。生产能力与生产效率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经过了工业革命以及后来的无线电通讯与信息革命之后。无论是什么商品，我们预料它以比100年前或10年前更快的速度进入我们的生活。无论是什么任务，我们预料它能够完成得更快、更省力。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将复杂的任务进行分解，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更为专业。这就引起了知识的分解。我们的文化也有分解的趋势，以至于即使像电视之类的大众媒体，现在面向的也是更小众、更专化的受众，因为现在的电视频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如果在建筑领域能够取得新的共识，那倒会令人称奇。建筑的通则与任何特定“高雅文化”的品位标准从来都不是一致的。建筑中的高雅文化传统是从精选出来的高品质建筑中拼凑出来的，这些建筑提醒我们：如果付出了卓绝的努力，就能够取得非凡的成就。一想到我们不必向另一个时代的考古学家解释我们周围实际拥有的为什么是那样一些建筑，我们就感到欣慰，而且我们对其中的大多数都视而不见。建筑总是在诉说真理，但其表达方式却很模糊，令人们有许多种可能的解读。曼彻斯特有一座新建的商业中心，其中庭的空间非常巨大，古典的柱子柱头镏金，看上去奢华无比，就像是古罗马最后时刻的一个场景。在我看来，建筑将和各种各样的精英传统与大众传统相关联，我们也会继续发现一些与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紧密相关的建筑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种趋势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地方就是新加坡，我在那里见到一个蒙古小餐馆，旁边是一家意大利-美国比萨饼店，对面是一座爱尔兰小酒馆。这些小店都位于一座商业休闲综合建筑里，而这个综合建筑由一座老式的殖民地建筑——圣婴基督女修院改建而成，其中的小礼拜堂至今仍在使用，尤用来举行婚礼，一排排闪亮的枝形吊灯把整个小礼拜堂照得灯火通明。

注释

〔1〕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浪漫派诗人，一生追求个人爱情与社会正义，其作品包括《西风颂》（1819）、《致云雀》（1820）、抒情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20）以及为约翰·济慈作的挽歌《阿多尼斯》（1821）等。——译注，下同

〔2〕 奥西曼德斯（Ozymandias），古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的名字。

〔3〕 伯鲁乃列斯基（1377—1446），意大利建筑师，其作品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享有盛名，其经典作品是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大穹隆顶，被建筑历史学者誉为“文艺复兴的报春花”。

〔4〕 阿尔伯蒂，莱昂·巴蒂斯塔（1404—1472），意大利建筑理论家、音乐家、数学家与作家，他的《建筑论》是继维特鲁威以后第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西方著作，他关于绘画、建筑和雕刻的论述将古典文艺的理念引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

〔5〕 伯尔尼尼，乔瓦尼·洛伦佐（1598—1680），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家，巴洛克风格艺术的杰出代表，以其流畅、动感的雕塑，以及包括圣彼得大教堂在内的许多教堂的建筑设计而著称。

〔6〕 博洛米尼，弗朗切斯科（1599—1667），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著名建筑师与雕刻家。其经典作品是罗马的四喷泉圣卡洛教堂。

〔7〕 指18世纪英国著名建筑师罗伯特·亚当与詹姆斯·亚当兄弟二人，他们主张一种“尚希腊”风格但具英格兰人欣赏趣味的建筑。

〔8〕 布赖顿皇家亭阁是位于英格兰的一处海边皇家建筑，19世纪初由摄政王乔治四世的御用建筑师约翰·纳什参照印度式样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改造而成。

〔9〕 勒·柯布西耶（1887—1965），瑞士裔法国建筑学家及建筑理论家，原名夏尔-爱德华·让纳雷，勒·柯布西耶是他的笔名。他是现代主义国际式建筑最有力的倡导者，提出了“房屋是居住的机器”的著名论断，并设计了大量功能主义的建筑，其最重要的建筑学著作是《走向新建筑》。

〔10〕 弗兰克·盖里，著名解构主义建筑师，1929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多伦多，先后毕业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与哈佛大学，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11〕 毕尔巴鄂，西班牙北部一港口城市，位于比斯开湾附近，始建于公元1300年，是西班牙的重要港口和工业中心。

〔12〕 蒙蒂塞罗，美国城市，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的家乡，那里有他为自己设计建造的罗马复兴风格的别墅。

第一章

有意义的房屋

家（和路）

当我们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时，我们会从家里出发，并会将遇到的那些新奇的事情与我们熟知的事情相比较。家负载有意义，因为家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与我们生活中最为私密的部分密切相关。家目睹了我们所受的羞辱和面临的困境，也看到了我们想展现给外人的形象。在我们最落魄的时候，家依然是我们的庇护所，因此我们在家里感到很安全，我们对家的感情惊人地强烈，虽然大多数时间这种感情并没有为我们所察觉。其他事物也可以让人有相同的感受，它们也能让我们有一种“在家里”的感觉。只要我们认为是熟悉的事物，即使是一些非物质的物品，如一首曲子，也会以某种方式在我们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熟悉的物品就会提醒我们身在何处；如果这个物品方便携带，像一支曲子，或者是像小说中的某个难忘的情节，或是像人应该如何行事才算得上得体这样的看法，那么，这些物品也就说明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带上”这些非物质的物品，也带上了对家的看法。我们把那个被称之为家的房子留在了某个地方，当我们漂泊时，我们从家开始漂泊。带着帐篷四处迁徙的游牧部落对家的理解则完全不同，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房屋的我们）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时，如果周围环境有一些熟悉的特征，我们也会有一种在家的感觉，无论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不是像我们生活的地方。如果我内心深处期待家人或街坊邻居就在我的身边，希望听到他们咿咿唔唔地忙着各自的营生，那么，当我在一座孤寂的房子里，周围静得可怕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烦恼；或者晚上那大梁发出的不熟悉的吱嘎声、管道那奇怪的咚咚声、猫头鹰的叫声或夜晚那急匆匆的脚步声都会让我忧心忡忡。家包含许多方面的内容，坚固的房屋只是家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家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了解它，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不会去想这一点，只是在某些事情发生变化的时候才注意到，例如当我要搬家的时候，或是当家

里来了陌生的客人，我不能够像往常一样自由自在行动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当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如果我不想进去打搅他们，那么，客人所住房间的房门（暂时）就变得不一样了。商业旅馆尽量将房间布置成一个样子，这样，我们在整个连锁旅馆中，而不只是在某个旅馆中就会有一种在家的感觉，即使是身处遥远的陌生国度。我们知道自己希望在旅馆中找到些什么，也多少知道会在哪类旅馆中找到它，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怎么受干扰地继续我们的生活，并与当地人的接触也是有限的，之后回到旅馆就像回到了一个临时的“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直觉来找到它，直觉会起作用。身处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之中时总会有一些瞬间令人感到晕头转向，比如，一个衣衫不整的人在酒吧里称玛格丽特·撒切尔[1]（Margaret Thatcher）是他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他这样说似乎只是在向你表示友好），或是一辆摩托车飞驰到你身旁来个急刹车，然后令人摸不着头脑地问，你为什么不坐出租车——在欧洲是不会有人问你这种问题的。这些瞬间非常有意思，往往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它们同时也在提醒你，你正身处一个远离家门的陌生之地，周围一切都不熟悉。难怪最出色的游记作者原来都喜欢超现实主义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转换成幽默、焦虑或狂喜，但这都是经历了就过去了的一种心境，永远也不是家让人想到的那份宁静与安详。

外出旅行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因为你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发现，会有什么样的新鲜刺激；回家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那却是另一种快乐。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回不了家，那比起我们从未打算要外出旅行来说会更让人忧伤，因为家 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参照点。如果失去了家，我们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烦恼与困惑，直到我们找到一个新的庇护所。搬家会让人产生一种不对劲儿的感觉，这种感觉很模糊，但却又挥之不去，这种感觉与知道要去一个陌生之地，但明天就能回来的感觉颇为不同。搬家意味着要熟悉新环境，形成新的习惯，这就意味着你与过去的你有所不同。房屋只是引起这种情绪的一部分原因。房屋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既有实实在在的事，也有我们的心理活动，这些事影响了我们对那座房屋的感受。建筑就是指房屋的这

一文化层面，这一文化层面既可以是非常私人的、独特的东西，也可以是大家都一致认同的东西。我们受到生长于其中的文化的影响，也受到我们参与其中的文化的影响，无论我们是不是想过这一点——大多数时间，我们根本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家的时候我们最不会想的就是这一点。然而当我们外出旅行，看到别人全然不同的做事方式，我们会感到惶恐不安。在西方国家的购物中心，我们不希望与别人有身体接触，但若是在北非的露天市场，店主有时会伸出手来轻轻地拍拍你的肘，或是干脆揽住你的臂膀以吸引你的注意。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感到惊慌失措。这彻底颠覆了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有关得体举止的看法。由于所有店主都会这样做，就好像他们是串通好了似的，加上他们彼此说着那种我根本听不懂的诡秘语言，这更让我心疑。这种浅薄的多疑其实只需要很少一点知识或思考就可以化解，但是，内心深处的固有直觉总是会先于理性思考影响人的感受：我觉得受到了威胁，虽然我知道应该没有人会威胁我。我只得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要那样想。过一会儿之后这种感觉会逐渐减弱；反之，如果我是在那样一种文化中长大的，很明显这种行为就是自然而然 的。同样，当我来到一座西方国家的购物中心时，我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躲着我：他们觉得我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在建筑学中，如同在其他文化中一样，我们对事情应该如何 的认识是从我们的经验中发展而来的。我们的每一个姿势都有意义，至于说这些姿势意味着什么则取决于理解这一姿势的文化。建筑就是房屋作出的姿态。

多样的文化

一种文化，就其在本书中的意义而言，并不需要涉及许多人。文化可能很含糊，又很博大。如果人们想要把欧洲文化与某种文化，如拉丁美洲文化相对比的话，就会发现欧洲文化的博大。同样，文化可能只涉及到有某些共同之处的几个人，因此，当一位教师或一位年长的亲戚说了些并没有低俗含义的话，但在这几个人看来却是一语双关

时，他们不能笑出声，只会交换一下眼神，彼此会心地一笑。这里，同样一句话，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听来就有不同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与不同的人交往时，我们就会遇到不同的文化。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一般都会有不同的举动，这种不同并不是刻意而为。当处于熟悉的环境中时，我们知道应该怎样行事。我们对待非常熟悉的人的方式与对待陌生人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坐姿与在自家沙发上的坐姿也截然不同。对朋友，我们会轻松而惬意地谈一些事情；对父母亲，则会谈论另外一些话题。对自己的行为是否得体我们会有一种把握，对建筑的处理也有一种度的把握。[2] 一些建筑显得非常得体，我们在看到这些建筑或进入其中时会觉得十分舒适，即使我们并没有太多地关注这些建筑。其他一些建筑则会显得古怪和荒谬。比如，如果一座私人住宅看起来像是热闹街道上的一家商铺，似乎是在吸引路人跨过门槛进去一探究竟，这就会令人感觉到这座住宅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问题并不只是停留在路人老是走进这座私人住宅这个层面，因为如果不想让人进到房子里，只需将房门一锁便可解决问题。然而，这座建筑的问题是文化层面上的问题：作为住宅而言，这座建筑向人表错了情。

建筑变得复杂的一个原因是建筑对我们来说在各种不同的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我所住的房屋，也就是我称之为家的那所房子，对于我来说就负载了某种特殊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对于那些不住在这所房屋中的人来说就不存在。我对此表示理解，也不指望他们对我家的感受同我自己的感受一样，虽然我可能希望他们像我对待自家的房屋那样对待他们自己的房屋（当然，有时我可能错了，因为事实上每一个人的感受都是不同的）。其他建筑似乎特别漂亮，或是从某方面来说特别壮观。如果我被这些建筑深深吸引，那么我可能会以为其他人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就某些个例来说，我可能又错了，但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建筑学领域公认的名作，人人都知道这些建筑好。如果我并不觉得这样的建筑有什么好，那么，我觉得应该保持沉默，因为好像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座不同凡响的建筑，如果我不表示赞同，那么，人们或许就会认为我的判

断是错误的。这些经典 的作品将在第三章讨论。第二章将探讨建筑建造得彼此相像的方法，这样，建筑就负载了对特定文化中“熟知”该文化的人来说正确的信息。第一章，即本章，主要探讨建筑是如何与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建造房屋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但是，通常房屋不止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而当房屋确实不止解决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称其为“建筑”，因为这些房屋具有了文化的维度。当然，只要我们稍加注意，任何房屋都可以有一个文化的维度，只是我们通常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些房屋罢了。例如，当我给汽车加满油的时候，我不一定会把这座加油站想成是建筑 ，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还算有用的地方。但是，如果我认为加油站是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建筑，有关加油站的设计也值得研究，那么，我就可以开始把加油站看作是建筑了，因为它能够教我们如何看待汽车，让我们明白汽车是何等重要。

附加的价值，文化价值

在设计房屋的时候，建筑师不仅要注意房屋的实用性，而且还要关注房屋的文化价值，尽力设计出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合适的造型。什么样的建筑才是合适的建筑呢，这得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取决于周围的建筑、使用的建构方法以及建筑的用途。一幢与郊区环境相得益彰的房子如果搬到市中心，就可能显得怪异。一座同样造型的建筑，若是用木料来建造，有可能给人简洁洗练的感觉，但若是用混凝土浇注而成就会显得不伦不类。一座功能完善的游泳馆建筑不一定会成为一座不错的图书馆——即使它可以当作图书馆来用，因为游泳馆的外观会令人产生误解。作出不同决定时需要考虑的不同因素就像是施加在建筑物上的力，把它往各个方向拽。如果建筑材料是决定建筑外形的最重要因素，那么建筑会是一个样子，但如果主要考虑的是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好地表现造型，那么建筑又将是另外一个样子。所有这些因素可以独立起作用，也可同时作用于一座建筑，因而，关注

了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意味着其他因素会受影响。有时候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复杂，因为有些因素似乎比其他因素更重要。这里举一个大家常常购买的、比房屋小的东西——家具为例。

家具陈列于建筑物中，具有这样一些暗含之义：它似乎就是一件便携式的小型建筑作品。一些建筑师也设计家具。当我们装饰自己的住宅与公寓时，我们选择的东西会透露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些信息。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电影制作人和小说家尤其擅长利用这一点，即通过描述人物的居住环境来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憾事一桩》中对人物住所内昏暗场景的描述暗示了人物的心境，这种心境使他在爱情突然降临时一口拒绝了它：

他那没有铺地毯的房间里高高的墙上没有挂一张画。房间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是他亲自买的：一副黑色铸铁床架，一个铁制的脸盆架，四把藤椅，一个挂衣架，一个煤桶，一个火炉围栏和熨斗，一个方桌，上面摆放一个带有斜面盖子和抽屉的写字台。在一个凹室中嵌了一个白木板做的书橱。床上罩了一幅白床单，床尾铺着一块黑色和猩红色相间的毯子。脸盆架上方挂着一面小镜子，白天的时候，壁炉架上摆放的唯一装饰物是一盏有着白色灯罩的灯。白木书架上的书是按照部头大小自下而上地摆放的。（詹姆斯·乔伊斯，引自《都柏林人》里的《憾事一桩》，1914年英国第一版，伦敦，密涅瓦，1992年，第93页。）

在电影《搏击俱乐部》中，那位没有名字的主人公完全淹没在消费社会中，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自己公寓的精心布置中看出来：

每一样东西，包括你那套有些小气泡、瑕疵和沙粒的人工吹制的绿色玻璃器皿，说明它们是由不知什么地方的那些诚实、简朴、勤劳的当地土著人手工制作的，然而，这些器皿都在爆炸中毁了……

一枚炸弹，一枚巨型炸弹，把我那些精巧的Njurunda牌咖啡桌给毁了，这些咖啡桌是用柠檬绿色的阴与橙黄色的阳拼合成的圆形咖啡桌。可是，现在这些咖啡桌都变成了一堆碎片。

我的那套Haparanda牌组合沙发以及橙黄色的沙发套，都是埃里卡·佩卡里

（Erika Pekkari）设计的，而现在这些都成了垃圾。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爱给自己的家买这买那的人。我认识的那些常常在入厕时看黄色书的人，现在看的却是宜家的家具目录。

我们都有同样的Johanneshov牌扶手椅，上面带着Strinne绿色条纹图案，我的那把椅子燃烧着掉下了15层楼，掉进了下面的喷水池。

我们都有式样相同的Rislampa/Har牌纸罩灯，用金属丝和没有经过漂白的环保纸做成。我那盏灯的灯罩用的是五色彩纸……

买这些没用的东西花了我一生的时间。（查克·帕拉纽克[Chuck Palahniuk]，《搏击俱乐部》，纽约，诺顿，1996年，第43—44页。）

在大卫·芬彻（David Fincher）这部改编自小说的电影中，通过对人物居住环境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这一点被迅速、充分地表达出来。在影片中，爱德华·诺顿（Ed Norton）扮演的无名人物环顾了一下公寓，通过他的视角我们看到了这套公寓，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各种各样的家具，一件又一件，还带着家具说明，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房间里的每一件东西被定价、被挑选并为之付了款。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这些家具不只是实用的家具，在上述实例中这些家具被加以精确描述，因为它们的确不只是实用的家具。在一部电影中，一把椅子决不仅仅是一把椅子，还是了解人物内心的一个途径。同样，如果小说里有对椅子的描述，那么，这把椅子肯定不只是让人坐的。当然，爱德华·诺顿在他的公寓中也有椅子。如果没有特别提到这一点，我们也会想当然地觉得肯定有椅子。在《搏击俱乐部》中的那个人物是个病态的自省者，总是在问自己一个正常人一般不会问，但广告商和小说家经常问的问题："用什么样的餐桌椅才符合我的身份？"这个问题并不荒唐，但是，通常不会有人这样问自己。当然，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神经质，但也并不是毫无意义。能反映出总统或皇帝身份的餐桌椅和反映保险公司职员身份的那种批量生产的餐桌椅完全不同。但

是，保险公司职员问的问题往往会更实际或更含糊，他们会这样问：“这件家具适合我的公寓吗？这件家具摆在身边，我会感到愉快吗？它给人的感觉对吗？”如果我是一位皇帝，那么这个问题与私人品位没有太大关系，我更可能会这样问：“我怎样才能通过家具来证明我不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职员呢？”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该拥有一张保险公司职员想都不敢想的豪华餐桌。这样的餐桌在功能上可能比普通餐桌好不到哪儿去，但它除了是一张餐桌外，还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让人敬畏。人们可以想象，某个跨国公司的总裁渴望拥有一张曾经属于拿破仑的桌子，如果有地方出售，那么他会准备很多很多的钱来买下这张桌子。人们也可以想得到在他看来这些钱花得值。

姿态的创造

找到事物的姿态特点从而提升自己的身份并非只有追求奢华一个方法。一位苦行僧式的哲学家想要一张明显比普通餐桌更不起眼的餐桌，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低，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尚情操。一位民主政府的总统需要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现，如在招待来访的国家领导人时需要表现王者风范，但在向选民表示亲善时要表现出绝对的平民气质。如果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住的公寓里放的是廉价的、批量生产的家具，我们会感到没有面子。但如果政府花巨资装饰高标准住所我们也会感到愤愤不平。建筑的内部装饰会对人们的感觉产生影响，使人知道自己在建筑中怎样行事才是适当得体的，并且还能暗示居住者的身份与抱负。如果我们不在乎别人的想法，那么，建筑的内部装饰完全可以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只要装饰适合自己就行了，或者也可以是一件公开的事，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建筑的意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农夫建造的自用房屋并没有被看作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只被当成是可以遮风避雨的遮蔽物而已（图2）。然而在浪漫主义诗人的眼里，这些乡村贫民那简简单单的农舍表现出了一种品质，那是在恶劣环境中顽强生存的优秀品质，这

就意味着这些农舍被看成是具有了姿态。到了18世纪末，追求小尺度的乡村居所（cottages ornées）成为一种时尚。这些按照乡村农舍的样式设计的居所无疑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艺术表现，而且是故意这样设计的。将农夫看作是美德与浪漫的象征有着久远的传统，应该始自古代的某个时候。当公元前1世纪的维吉尔（Virgil）在创作《田园诗》时就有这个传统。对农业的这种浪漫诠释那时就已存在，这种诠释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存在着这样一个阶层，他们不必每日从事农业劳动，因而可以不用近距离地看清农业活动，因而认为农业活动让人羡慕，单纯而不世俗。在“现代”世界，这种感受在建筑上最为著名的表现当推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委托修建在凡尔赛的小村舍，在这个村舍里她不再是世界上那个最金碧辉煌的宫廷里处理事务的王后，而是可以假扮为一位普通的挤奶女工，这样，她可以亲近自然，释放真性情。建筑表达出了一种清纯、天真与顽皮皆有的姿态。另外一个例子是布里斯托尔附近的一个叫布莱斯的小村落，由建筑师约翰·纳什（John Nash）为布莱斯庄园的退休员工设计。这里的住宅刻意建得很漂亮、管理得很好，充分体现了庄园主的诚意和爱心。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纳什还承担着一个要建成史上最奢华的王室宅邸的设计，这就是位于布赖顿的皇家亭阁（图3）。即使是在这样小的插图中，图2与图3也清楚地说明了两座建筑的居住者的地位。即使没有任何建筑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也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些符号。即便我们认为布赖顿皇家亭阁比较普通，很明显的一点是它的造价绝不会低。实际上从风格上看，布赖顿皇家亭阁新奇而富于异国情调。皇家亭阁不仅奢华无比，而且它也愿意表现这种奢华。直到今天，参观者仍然会为布赖顿皇家亭阁表现出的对奢华的肆意追求所折服。皇家亭阁无视传统的得体风格的做法很有意思，与其居住者摄政王乔治四世无视传统的狂欢派对倒是十分相称。皇家亭阁的造型和功能结合之紧密让人惊讶。

图2　传统农舍，年代不确定，但应建于20世纪前；没有经过建筑师设计。这间小屋是19世纪以前的贫苦农民自己建造的那类住宅建筑的典型实例。他们的生活环境无疑很恶劣，但是，那些最糟糕的农舍是用土坯建造的，早已不存于世。如本图所示，石头垒砌的屋子所用的石头或是当地开采的，或是从田野中搬回来的。这种屋子太狭小了，无法满足现代人的需要，但是，许多稍大一些的类似房屋通了电、装了现代化的管道后至今仍在使用，这就使得这样的房屋与过去大不一样了。在英国，大多数这样的农舍里住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靠耕种农舍附近的土地生活，他们或是在城里上班，或是从城里退休下来。因此可以说大多数农舍已经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虽然这些房屋看起来仍然具有田园诗般的村野情趣。

图3　皇家亭阁，布赖顿，英格兰（1815—1821）；建筑师：约翰·纳什（1752—1835）。这是史上修建的最刻意追求异国情调的建筑物之一。这座位于布赖顿的“亭阁”最初是为当时的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后来的摄政王、乔治四世）建造的，规模要小许多，风格也更传统。“亭阁”这个名称来自法语中的一个古老词汇，意为“帐篷”。现在，该词通常指一些规模较小，并与室外活动有着密切联系的建筑物，因而，用这个词表述最初建造的那座建筑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这座在原址上向四处蔓延扩展的宫殿建筑并不能称得上真正的亭阁（虽然其中的一些屋顶仍采用了帐篷一样的造型）。约翰·纳什还设计了最初的伦敦摄政王大街以及白金汉宫（但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个临街的外立面）。这座亭阁建筑的造型主题取自大英帝国的边远地区，它在室外用了印度式的穹顶和阳台，内部则用的是西化了的豪华中式装饰风格。

奢华铺张也是古埃及大金字塔给人深刻印象的主要原因。建造这些金字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下令修建这些金字塔的统治者是多么强大、多么有权。我们有理由对金字塔建造者的独出心裁与高超技艺表示叹服，但是，如果不是建造得如此巨大

（图4），这些金字塔也只是些无足轻重的纪念性建筑，只为业内人士所知。对那些我们觉得自己也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不会有过多的印象，金字塔之所以被看成是世界上的一大奇迹是因为从纯粹的建造费用的角度来看，金字塔很难被模仿。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仅仅能够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就不可能建造尺度这样宏大的建筑物。而且，如果这个国家的财富在社会中平均分配，那么，这样的纪念性建筑也不可能建成。一定是把国家的很大一部分财富投入到了这些建造工程中，这种意志的一致性意味着当时的政治结构允许一个人独揽大权。金字塔的建造是为了死后的生活与荣耀，因而可以看作是整个社会对未来的投资。布赖顿皇家亭阁的建造是为了现世的享乐。这两座建筑的共同点是它们都非同寻常，与各自社会中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都没有什么关联。金字塔和皇家亭阁对生产食物或有用商品之类的生产活动没有任何直接的帮助。这些生产活动一定是在各自所处社会的某个地方进行，但决不会在这两座耗费了无数资源的建筑中进行。金字塔与皇家亭阁给人深刻印象是因为这两座建筑清楚地表明它们耗费了大量资源——各种建筑材料被仔细地加工以实现精心设计的效果。

建筑 常常指上述例子中给人深刻印象的房屋。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凡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房屋都可以被称作是建筑 ，而那些不能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的房屋只能被称作构筑物 。事实上，我们也许完全不需要给这些房屋取名字，因为它们可能都不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我想说明的是，建筑 与好房子 并不是一回事，建筑 指的是所有房屋的文化属性，不管是好房屋还是差房屋。将材料堆砌在一起属于房屋的范畴，而这些房屋所表露出的姿态——铺张浪费、异国情调和勃勃生气——却属于建筑的范畴。如果简洁和粗犷就是房屋的特质，那么简洁和粗犷也属于建筑范畴。想一想乡土建筑 ，这一点就很容想明白了。乡土建筑 这一术语指的是普通人修建的普通房屋，传统上是指农民给自己或邻居建造的普通房屋。如果我们以18世纪的庄园主的眼光来看这些房屋，那么我们会觉得这些房屋“简陋不堪”，只能吃饭、睡觉，没什么舒适性——虽然对于居住者来说，这些房屋包含

了“家”这个词所具有的全部复杂内涵。如今当我们作为旅游者来到湖区[3]时，我们会将这些房屋看作是“乡土建筑”，是迷人风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受到法律保护。虽然这些房屋的实际构造没有太大变化，但人们的感受却起了变化，这种感受源于浪漫派诗人的影响，尤其是华兹华斯[4]（Wordsworth）的影响。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这些房屋在当时建造的时候根本不是“建筑”，但是现在这些房屋成为了“建筑”。那些（建造房屋的）石头未曾移动过，是文化发生了变化。建筑不是房屋本身的一个属性，而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中接触到的房屋的属性——当我们遇到一座房屋的时候总会使它带上这样或那样的文化色彩。这并不是说所有房屋都一样好，或同样重要，只是说每一座房屋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属性，如果我们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把那幢房屋看成是建筑。要是没有一些文化直觉，我们就感觉不到在一间小农舍中围着火炉吃饭的农民与在布赖顿皇家亭阁的宴会厅中狂欢享乐的贵族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不同——只是更多的食物、更多的噪音和更多的人而已。关于什么样的餐桌能够体现他们这类人的特点，那些农夫可能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意识的判断，但是他们吃饭的样子，或者说狼吞虎咽的样子都充分说明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建筑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通过对建筑的解读，我们可以对住户的生活作出推测。反过来说，我们要么刻意选择一种能够反映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的环境生活，要么发现自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它透露出的我们的性格特征远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多。

图4　胡夫大金字塔，吉萨，开罗附近，埃及（公元前2723—前2563）；建筑师：未知。埃及金字塔曾经令古代世界感到震惊，在现代世界则是神秘事物的代名词。这些金字塔建造在埃及的北部，是统治古代埃及的神王——法老的陵墓建筑。本图所示的金字塔是金字塔中最大的一座，是作为胡夫（Khufu）的陵寝而建造的，胡夫也以希腊人给他取的名字基奥普斯（Cheops）而著名。所有大金字塔都建自埃及的古王国时期，在那之后，埃及被南面500英里外的底比斯统治，法老被葬在帝王谷的洞窟式陵墓中。大金字塔巨大无比，消耗了当时社会无以数计的人力、物力——建设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滑轮或铁质工具之类的先进技术。那时的普通建筑是用土坯和木头建造的，早已灰飞烟灭，但金字塔却是为了流传千古而设计的。

地方性地标建筑

我们之所以认为周围环境给人的感觉对，一个原因是出于对它们的熟悉。我们逐渐适应周围的环境并形成了自己的习惯。即使周围环境与我们想做的事情相冲突，我们也都习惯去处理这些问题。作为我们每日都会看到的景象的一部分的建筑具有意义只是因为这些建筑一直就在那里。对许多人来说，一座没有什么艺术特色的房屋也有可能

变得有意义且十分重要，其原因仅仅是因为它陪伴了他们一生。同样，在我自己的居所我感觉轻松、自在，当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地标时我会有一种熟识的感觉，一些建筑在设计时就考虑到要引起人们的这种感受。例如，对于费城的居民来说，那座非常显眼的市政厅就让人有一种熟识感。从艺术的角度而言，费城市政厅相当古怪，并没有引起其他地方的建筑师的广泛模仿。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地方性上，而在当地它的确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多年来，这座市政厅一直都是该市的最高建筑——市政厅塔楼的顶端立着费城的创始人威廉·潘（William Penn）的雕像。人们认为出于其象征意义，其他建筑的高度不应超过这位创始人的高度。市中心的街道是棋盘式布局，但这一布局却被建在市中心的市政厅打破——正是这座屹立于城市中心的建筑中断了狭长的街景，从老远的地方就能够看到这个市政厅。古怪的设计成就了这座建筑的唯一，让这个市政厅在世界上能够一下就被认出来。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建筑，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与其他地方的建筑互换，只是碰巧出现在了费城。费城市政厅是一个象征性的定位点，费城以这个定位点为中心发展了起来。因此，这个市政厅就成了费城乃至整个宾夕法尼亚州的身份象征。

国家性纪念建筑

在国家的层面上，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只是规模更大。作为国家象征的建筑应该更宏大，更为大众认可，因为这些建筑象征着这个国家，担负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区别的重任。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白宫以及沿国会大厦前中轴线及两侧布置的纪念性建筑，都具有这种象征意义，它们的作用就是要反映该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在英国，起着同样作用的纪念性建筑是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白金汉宫和沿着怀特霍尔〔5〕大街一直延伸到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政府办公建筑。巴黎的纪念性建筑则明显不同，最具象征意义的纪念性建筑不是政府办公楼，而是一些文化建筑。从卢浮宫到凯旋门的香榭丽舍大

道以及埃菲尔铁塔已成为比国民大会大厦和爱丽舍宫更能在海外代表法国形象的标志物。如果一个国家的首都没有历史上留下来的纪念性建筑，那么它就会特地设计一座，如在布达佩斯就有一个建筑作品成为各种文化的象征——基督教文化、异教新古典主义的文化和历史文化——以显示匈牙利人是野蛮剽悍的游牧民族的后代，但现在是文明世界中的一员。直到19世纪，意大利的各个城邦才统一成了一个国家，罗马那巨大的维克托·伊曼纽尔〔6〕纪念碑就是为纪念这一事件而设计的，以此来提醒所有意大利人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新身份，这个新身份与罗马帝国的历史有关。这些纪念性建筑分布在各国的都城中，它们不仅是首都人民的象征，更是全国人民的象征。

像威斯敏斯特宫这样的建筑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议会所在地它必须满足议会集会的功能，另一方面，它还必须能够恰当地象征该国政策制定者这个团体的身份。威斯敏斯特宫所起的象征作用一般人都十分熟悉，人们也不难意识到这座建筑是伦敦“一景”（图5），但是，人们对其内部布局就不那么熟悉了。它的室内空间布局既复杂又十分合理——如果考虑到修建时人们对它的用途的设想的话。威斯敏斯特宫建成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本身并没有促成这些变化的产生。这座建筑是沿中轴线布置的，在轴线的一端是英国国会上议院，而在轴线的另一端则是英国国会下议院的所在，两院之间有一个壮丽的拱形屋顶大厅。在沿（泰晤士）河的那一侧布置着一条很长的廊道，通向一排委员会的房间。这些房间都是自然采光、自然通风，因为在建造威斯敏斯特宫时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因此，为了实现自然采光与自然通风，威斯敏斯特宫布置了内院和采光井。规划是否理性会影响这座建筑作为议会大厦的功能，但是却与它的象征意义没有关系，这种象征意义让人联想到中世纪，从而表明这是对历史的一种延续。如此设计威斯敏斯特宫并不是要让人们把它看成是一座“创新性”的建筑。这座建筑取代了较早的一座具中世纪风格的议会建筑，然而，之所以在重建中延续这种风格，除了习惯使然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哥特式建筑风格是在北部欧洲的基督教大教堂的建造中发展起来的，因此，相对于其他一些容易想到的形式，如古典主义的某

些形式来说，哥特式建筑更像是本土建筑，因为这些古典形式都源自实行异教的希腊，是由古罗马的入侵者带到不列颠来的。在这里威斯敏斯特宫旨在用来帮助英国人确立自己的身份，这种身份根植于本土，表现了英国人的虔诚。由于我们还能认出其中许多的建筑姿态，象征意义似乎仍在起作用，虽然威斯敏斯特宫建好之后又经历了许多社会与文化的变迁。

图5　威斯敏斯特宫，伦敦，英国（1836—1868）；建筑师：查尔斯·巴里爵士（Sir Charles Barry，1795—1860）和A.W. N. 普金（A.W. N. Pugin，1812—1852）。英国议会举行会议的老威斯敏斯特宫于1834年焚毁。在原址上修建了目前这个建筑，整座宫殿的布局由查尔斯·巴里爵士设计，奥古斯塔斯·普金不仅把建筑的外观设计成中世纪风格，连家具与壁纸也都是中世纪风格。整个宫殿的外部形象大家非常熟悉：具有浪漫色彩的侧面轮廓线和用嵌板覆盖的墙体，嵌板上的雕刻精细而复杂，但却是机械地重复。这个设计是通过竞赛选中的。竞赛规定设计必须具有中世纪的特征——从原有古建筑的残存部分，如威斯敏斯特厅中获得灵感。巴里获得了普金的帮助，因为普金对中世纪建筑非常感兴趣，他认为中世纪建筑是本土化的基督教建筑，与具有异教起源的古典主义建筑恰好形成对比。

一座建筑要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并非一定要考虑到该国对其古代

身份的认识。当苏格兰需要一座新的建筑来召开国民大会时，它选择了恩里克·米拉利斯（Enric Miralles），一位来自巴塞罗那的前卫建筑师。这一选择旨在表明苏格兰并不保守、狭隘，而是在国际舞台上也拥有一席之地，是着眼于未来的。当勒·柯布西耶接受了他最大的项目委托，为旁遮普[7]邦设计首府昌迪加尔（图6）时也有类似考虑，即把旁遮普邦定位为现代世界的一员。从这个角度看，这项委托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为昌迪加尔做设计前，勒·柯布西耶就对人们在如何进行城市建设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最著名的城市设计构想是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巴黎的林阴大道被推平，为网格式的巨型塔楼住宅让地方。不用说，这一构想是不会实现的。他的这些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响更为直接，因为那里有快速崛起的城市以及可以使这些想法得以实现的中央集权式权力结构。但是，这些城市是由其他人设计的，而不是柯布西耶设计的。昌迪加尔是唯一一座由勒·柯布西耶设计并建成的城市，因而，全世界的人都对它期望甚高。柯布西耶在建造过程中遇到了某些挑战——一方面他要找到一些方法使他的设计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建筑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另一方面他只能使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和工人，这就使得这座城市深深地植根在了这片土地上。

图6　昌迪加尔，旁遮普，印度（1950—1965）；建筑师：勒·柯布西耶（1887—1965）。勒·柯布西耶给这个新的行政首府做了一个总体规划，并设计了主要行政办公楼：邦政府办公厅大楼、高等法院和议会大厦。由于要考虑当地的某些气候问题，建筑中主要突出的就是一些遮阳设施，如在整座高等法院的上部悬着一个伞一样的屋顶。尽可能使用遮阳板环绕建筑物，同时促进通风也是必要的。一条河流被大坝拦腰截断，创造出了一个湖泊来帮助调节当地的气候。建筑物的组成仍然是勒·柯布西耶习惯使用的将方格网形式与自由雕刻元素相互交错的处理模式，并且使用的是当地工人浇注的混凝土。

现代世界中的古埃及

设计者赋予一座建筑的象征意义与看到这座建筑的现代人所理解的象征意义并不总是一致。其所在的文化离你越远，这种不一致的情

况越容易出现。例如，金字塔被看成是远古之谜的象征符号，这并不是因为金字塔设计者的设计意图就是如此，而是因为金字塔距离现代的理性主义是如此遥远，我们对它知之甚少。伏尔泰[8]（Voltaire）曾嘲笑过古埃及人对猫和洋葱的崇拜。在西方文化中表现金字塔时人们刻意渲染它的神秘色彩。在18世纪，共济会设计了“埃及人”的仪式。古埃及认识问题上的一大飞跃出现在19世纪，因为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那时才第一次得到破解。埃及的考古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古埃及社会的一些层面现在已经了解得比较清楚。在一个延续了数百年、且在其间没有任何明显的文化变迁的社会，其文化习俗（无论在我们看来有多么怪异）无疑是被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当成最平淡无奇的事来经历。当然，祭司把自己扮成神的样子，不过这是祭司分内的事。显然，一些神圣的仪式在深夜举行——他们认为这是举行这类仪式的适当时间。然而，在今天，大众的想象继续围绕过去对超自然力、咒语和神秘知识的认识展开，并常常将这些认识与未来的技术成就相联系。这样做的基本“原因”在于：既然古埃及人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他们一定是得到了先进技术，如激光束或造访地球的宇宙飞船的帮助，由此人们很容易想到也许古埃及人已经找到了起死回生之术。这类充满想象力的传说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被当成了事实（这类书比那些学术研究著述要畅销数十倍，或成百上千倍），而且还以一种完全虚构的方式出现在《夺宝奇兵》、《木乃伊》、《星际之门》和《第五元素》等多部电影中。这种形象对吸引现代观众来说显然十分有效，但是这些故事中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思想并不为古埃及人所认同。但这并不是什么问题，至少算不上大问题，只要我们没有糊涂到认为可以通过观看这些电影来了解古埃及的地步。然而，这是一个容易犯的严重错误。这些电影告诉我们的只是现代人的白日梦，而不是古埃及的真实历史。法老的建筑当然有其意义，这一点从这些建筑建得如此用心、精确这一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来。法老的建筑绝不是粗疏与偶然之作。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些建筑的原始意义已经不为我们今天的人所了解，试图重现这些意义只能算是一种臆测，永远也不可能像原来的建筑师那样有直觉感染力。原来的建筑师

可能觉得他们在建造这些建筑的时候已经将特定的意义赋予其中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文明的衰亡，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法老的建筑中蕴含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意义不仅仅取决于那些石头，同时也取决于对法老的建筑加以解读的文化。

古典与哥特

那些长期以来始终如一地与西方传统中的美德和高贵思想密切相关的建筑就是古希腊的建筑，特别是雅典的帕提农神庙，因为帕提农神庙（图7）一直被视为艺术成就的一大高峰。雅典之所以在文化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中一个原因是雅典是许多伟大思想的发源地，这些思想至今仍为我们所接受——如民主思想、哲学思想等。建于雅典黄金时代的纪念性建筑，即公元前5世纪的纪念性建筑与西方社会的基本信念有关，正是由于这种关联，这些建筑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威性，即便是在这些建筑的实际形式还没有广为人知的时期，如18世纪，就是如此。在18世纪，这座古代的神圣殿堂被土耳其人用作军事用途——不是随便哪个人就可以进入军事基地的。在那之前，这些古代建筑的外观就不是十分清楚，因为人们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扩建——如一些高塔和防御工事等。再来看古代，古典建筑被罗马人接受，罗马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建造的古典建筑遍布罗马帝国的广袤大地——横贯欧洲，并延伸到非洲与中东地区。许多世纪以来，古典建筑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古典建筑，因此我们发现受到为新独立的美国制定宪法的理念的启发，托马斯·杰斐逊[9]在设计弗吉尼亚大学校园时就借鉴了古典主义建筑，因为他看到了古典建筑中蕴含的民主与哲学思想；而阿尔贝特·斯皮尔[10]（Albert Speer）在为希特勒的柏林做设计时却极力渲染古典建筑中表现出的帝国的辉煌和盛大。在19世纪较早时期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中，对希腊古典主义的向往成为了一种时尚，因为他们感觉到在为独立而斗争的过程中与他们心心相印的不是古希腊人，而是现代的希腊人[11]

图7　帕提农神庙，雅典，希腊（公元前447—前436）；建筑师：伊克蒂诺[12]（Ictinus）和卡利克拉特（Callicrates）与雕刻家菲迪亚斯[13]（Phidias）共同合作完成。帕提农神庙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古典”时期）以来所建造的规模最宏大的希腊神庙。从帕提农神庙精美的装饰与精巧的处理来看这是一座奢华的建筑，但在一般的照片中，那些装饰与精巧的处理是看不到的。当时请了最伟大的雕刻家菲迪亚斯来创作女神雅典娜的雕像，也许还请他指导了建筑工程中的工作。神庙中有一些非常精美的雕刻装饰，表现的是希腊人与半人半马的怪物以及强悍的亚马孙人摔跤的情景，这些雕刻刻在方形嵌板上，从围绕整个建筑的列柱上方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的独特之处在于神庙的墙体上也有一个刻有浅浮雕的中楣，表现的是一个盛大的行进队伍。整个建筑用可以精确加工成型的坚硬的大理石建造而成。这座建筑中精致的视觉调整处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明显。所有的建筑线条看起来都是直线，而其实这些线条略微有些弯曲。

在西方建筑历史上，古典柱式及其装饰细部的使用频繁地被加以复兴，因此，直到相当晚近以来，是否拥有这些柱式与装饰或多或少成为是否属于西方建筑的标志，至少曾被认为是这样。即使另外一种

主要传统——我们现在称之为哥特式建筑的中世纪建筑——也是在人们试图与罗马人在纪念建筑上取得的成就一比高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北部欧洲那些建于10世纪至12世纪的带有拱券的教堂被称作“罗马风”建筑，这些建筑的建造受到了留存在比如勃艮第的罗马拱门与神庙建筑的遗迹的启发，正是在勃艮第的图尔尼，我们发现了中世纪的第一座拱券式教堂。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世纪建筑的含义经历了最意想不到的变化。中世纪最为壮观的纪念性建筑是宏伟的法国大教堂，如博格斯[14]（Bourges）大教堂，这些教堂建筑看上去就好像它的结构已经消隐，只有彩色的光在闪烁一样（图8）。对石头复杂、精巧的排列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这些石头切割之精准，令人惊奇，切割完之后再由那些技术熟练的工匠砌筑在适当的位置。这些工匠会在建完一座大教堂后又赶往别处去建另外一座大教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积累了经验，而且技艺日益提高。虽然哥特式风格的各种要素都能够在“罗马风”教堂中找到，但人们通常认为大约是在1137年，哥特式风格以一种新的景象在巴黎附近极其富有的圣德尼教堂得以确立，当时的修道院院长絮热[15]（Suger）正在主持重建工程。当他被这座教堂那镶嵌着宝石的装饰与彩色的光影所环绕时，他描述了自己那欣喜若狂的心情：“我看到了我自己的栖身之所，仿佛是在宇宙间的某个奇怪的地方，既不属于这污浊的大地，也不完全属于纯净的天堂。”从13世纪到15世纪，也曾出现过一些模仿这座教堂的建筑作品——一些尺度较小的教堂和更为朴素无华的建筑，没什么名气。

图8　圣艾蒂安大教堂，博格斯，法国（1190年始建）。在所有中世纪大教堂中，这是一座最能够表明建筑物是由一个光的栅笼所构成之思想的实例。教堂的西端相当坚实，几百个小雕像围绕着5个大小不等的出入口。在这些入口上方是两座不对称处理的塔楼。然而，教堂的其余部分却给人一种精确重复的印象——一个标准的开间形式，沿着教堂的完整长度不间断地排列，用最细微的差别来加以调整，以使其能够转到建筑物西端形成半圆。中殿的空间十分高敞，有39米（125英尺）之高，中殿的两侧是两个侧廊。阳光透过绘有《圣经》故事的彩色玻璃照进来，教堂内部十分敞亮。教堂外用以支持建筑物主体的扶壁柱很是显眼，看起来就像是一排气势恢宏的支柱：正是这些扶壁柱使得教堂内部给人一种失重而轻灵的幻觉效果。

“哥特式”建筑的得名是在17世纪，但这却是一个侮辱性用语。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匈奴人这几个日耳曼部落洗劫了罗马，并在公元5世纪摧毁了西罗马帝国。将这种建筑称作“哥特式”，就如同说它是“野蛮式”一样——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对文化进行野蛮摧残的形式。毋庸置疑，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人们不会以认同的态度去看待这种建筑，也没有人对它进行过仔细分析。人们把所有非古典的建筑风格混在一起，认为它们只是一些杂乱无章、毫无品位的大杂烩。Gothic这

个词的这层含义在Gothic horror（哥特式恐怖）这种用法中保留了下来。的确，人们对中世纪的整个看法都与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有关。人们认为中世纪是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参见此处 ）之间的一个时代。最早对中世纪建筑进行研究的是那些古物爱好者，他们开始意识到历史上存在着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这些不同风格的建筑建造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后来在19世纪，一些建筑师使用了哥特式手法，例如为威斯敏斯特宫做细部设计的普金，但是，他更愿意把这种风格称为“尖拱券式或基督教式”，而不是“哥特式”，以便消除这一名称带来的负面联想。对像普金这样的建筑师来说，哥特式风格代表了一种极富理性的设计方法，它不仅仅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装饰风格，还是在建筑中体现道德和宗教的一种行事方式。在普金看来，哥特式建筑不仅是最好的，而且对具有高尚的基督教道德情操的设计者来说它也是唯一正统的建筑形式。

建筑的价值

人们可能会问“哥特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但是，这个问题却没有一个令大家都满意的答案。当我遇到一座建筑时，如果我对它有某种反应，那么，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反应是真实的，而我的反应方式将取决于我以往的经历。比如说，如果我是第一次走进一座哥特式教堂，我可能会感到迷惑或感动，会将这座教堂看作是一个神奇而又神秘的地方。如果我之前已经到过许多类似的教堂，那么我可能会觉得很熟悉，我会认为这座教堂与别的教堂差别不大，令人心里踏实。我不一定要知道设计者希望我有怎样的感受，但这并不是说经验对我一定没有意义。这一点值得详细说明，因为建筑师往往对此有不同看法。如果一位建筑师认为建筑设计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那么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他会认为把真诚与信念带入设计中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在设计过程中猜测观众对作品的反应就没那么重要。事实上，如果设计时要考虑到人们的反应，这似乎意味着这种设计不太可靠。把设计当成是

创造活动的建筑师设计出来的作品将深深地打上建筑师本人的烙印，因为他们设计出的建筑就是建筑师心中认为本该如此的建筑，而对别人观点的任何妥协与折中都是对其设计作品的弱化和损害。通常也只有这样的建筑师才会受到其他建筑师的尊重和仰慕。但对不赞成此观点的人来说，这种观点看起来有点傲慢与偏执，但对赞成此观点的人来说，这样的建筑师充满了灵气。反之，一位建筑师如果紧盯着观众的反应进行创作，他承担的风险可能会少一些，往往会对文化的变迁采取保守态度，因而委托人可能认为这样的建筑师值得信赖，然而，他们却不会取得艺术上的成就，赢得荣誉。这一类建筑师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另一类建筑师，但我们在建筑学书籍上见不到他们的影子，因为，尽管他们也能满足社会对他们的总体要求，但在其他建筑师看来，他们充其量算得上诚实、能干，但不是特别突出，或者说，他们只是圆滑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取巧者。全部的赞美留给了这样的建筑师：为了实现自己的设计，他们设法将自己的思想倾注于建筑之中，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说实话，这决不是一般的成就，因为出钱造房子的人通常最有决定权，因此，建筑师需要具备的一项重要实践技能就是要有说服力。

如我前面所说，房屋常常是非常昂贵的。一个人或一个机构委托建造房屋时总是希望能够确保所花的钱是经过了精打细算的，以期实现预期效果。如果一所学校委托建造一座游泳池，设若建成后能不用作游泳池，那么学校将会大失所望，肯定会提起诉讼。假如一个富豪要在花园的小山丘上建造一座无关紧要、但吸引眼球的建筑，如果这座建筑被设计得庄重而富有纪念性，那么这位建筑师也就算是失败了。建筑师怎样才能够说服他的委托人相信自己的设计没有超过预算呢？通常建筑师要用图片或模型向委托人解释这座建筑将是个什么样子，这样委托人就可以结合周围环境加以想象。在这个阶段，设计仍然可以修改，且不需要太多的花费。另一个办法是按照设计进行施工，如果需要的话再对房屋进行修改，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样做在花费上是惊人的。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16]（Ludwig II of Bavaria）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建造的那座并不很宏大却装饰华丽的

宫殿建筑——林德霍夫[17]（Linderhof）时就是这样。但是，他的名字决不是审慎的代名词，他的会计师最后认为他疯了。一座建筑常常与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有所不同，或许这是因为我们的邻居不允许有那样的设计存在，或者是因为某些更根本的原因，如受到材料强度的限制，或是因为物理学上的因素而使结构无法实现。在说服委托人相信自己的设计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它的功能时，建筑师主要有3种劝说技巧。

推理

第一种技巧就是要有经过推理的论据。不可能仅仅通过推理就能做出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在某个时候总有一个创造性的飞跃，除非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我们可能会决定把自己的房子建得跟我们知道的其他所有住宅一样。即使是那时，人们这么做的原因并不真的是推理的结果，而是因为对经验的重复。推理，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指从一致同意的前提出发，得出必然的结论，但它并不是进行建筑设计时唯一的思考方法，但如果要评价一个设计的优点，推理却是不可或缺的。要说出一个设计出色的理由应该是可能的，这就相当于证明这样设计出的房屋将满足委托人的要求。在技术问题占统治地位的建筑中，推理可能是为你的设计赢得认可的主要劝说形式。然而，建筑常常是复杂的，有许多彼此影响的因素在共同起作用。例如，如果我将一些窗子设计得大一些，以便室内有更多的光线或能看到更多的景观，那么这座建筑就更容易散热，因而也就有必要安装一个功率更高的加热器。这种情况就出现在里特维尔德[18]（Gerrit Rietveld）为施罗德夫人（Mrs Schröder）在乌得勒支所做的住宅设计中（图9）。这座建筑所使用的中央供热系统通常用于工业厂房的加热。该设备的花费就相当于当时乌得勒支建造一座普通住宅的费用，这就使得施罗德住宅的造价是当时与它同样大小的普通住宅造价的两倍。安装这一加热器的决定一定是逻辑推理的结果，因为没有其

他更明显的原因了。考虑到这所住宅的新颖造型、向室外异常大的开敞和因而产生的热量损耗，安装这台加热器的决定无疑是合理的。然而，同样清楚的一点是，施罗德住宅的整体造型并不仅仅是靠推理就能设计出来的——否则人们可能会决定采用较小的窗子，从而拥有一座造价和日常维护费用都不那么高的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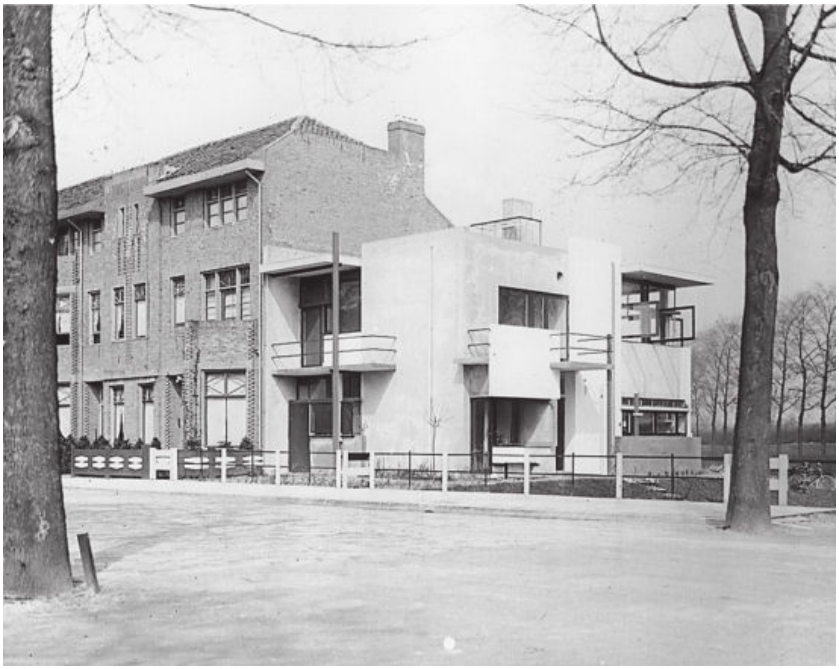

图9　施罗德住宅，乌得勒支，荷兰（1924）；建筑师：盖里·里特维尔德（1888—1964）。这座小住宅在建造之初坐落在乌得勒支的边缘地带，位于一排相当传统的住宅建筑的尽头，向外可以看到周围十分平阔的乡村景观。这是为带着孩子的、寡居的施罗德夫人建造的，她委托里特维尔德——一位家具设计师来进行设计，设计方案要与她的生活方式相符。住宅的上层布置了一系列可折叠与滑动的隔断墙，这样既可以形成一个大的开敞空间，也可隔成小间给个人一些私密空间，当然只是视觉上的私密空间，因为这些隔断并不隔音。里特维尔德与风格派艺术家关系密切，这座住宅的设计与风格派艺术家对形式的看法有关，却与有关建筑或住宅的传统认识没有多少联系。施罗德住宅的外观新颖、独特，但是，其建造手法却相当传统：墙是用砖砌筑的，抹灰打底后再加以粉刷。

信念

施罗德住宅在其建成之后的数十年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建筑师眼里，这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20世纪20年代的建筑之一，虽然施罗德住宅尺度很小，又坐落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在一个小国的一个外省的市中心之外。如果当初人们就知道这座建筑可以令施罗德的名字流芳百世，那么，这可能会成为如此建造这座建筑一个理由，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建筑物的声誉无法事先估计。这种形式的理由在施罗德夫人决定建造这座房屋的那个时代是缺乏理性的。说服她接受这一设计的原因更可能是因为里特维尔德个人对设计的确信不移。这位委托人对于自己应该在这座建筑中过什么样的生活有着很明确的看法。每一间卧室可以用作一间小的起居室，如果将薄薄的隔板做成的隔墙平折起来，所有的房间就可以变成一个大的空间。当这一大间屋子被分隔成小间的时候，每一间屋子都有一个通向外面的门，屋内也都有一个盥洗池。这不只是一座设计者进行艺术冒险的普通住宅——做这样的设计是为了适应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管怎样，施罗德住宅之所以建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里特维尔德受到了风格派艺术家（其中包括画家蒙特里安[Mondrian]）的影响，并且把他在家具设计方面的经验带到了建筑中：他遵循将线条与块面以直角的方式相互交错以及使用单纯的原色的设计原则。这些设计原则看起来很古怪，不能采用，但里特维尔德就采用了这些原则。我们在这里不必详述他这样设计的理由，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相信通过这些方式一个人可以直接影响灵魂的状态。施罗德夫人很可能也有这些信念，这样她可能已经被逻辑推理说服而接受这一设计。但是，如果她没有接受里特维尔德的种种前提，而是被他那坚定的决心所打动，并且相信他能够有所成就，那么说服她的是另一种更为常用的方式，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罢了。事实上，这种方式与说服别人相信自己是处理这件事的权威有一样的效果，这种方式一般表现为“相信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比你有更好的判断力”。

诱惑

第三种劝说方式也有所不同，因为它不需要权威，而是要迷住委托人让他们将批评搁置一旁。委托人被吸引也许是因为这个设计非常有吸引力，或是因为这位建筑师很有魅力。事实上，建筑师诱惑了委托人或委托人妻子的事例并不鲜见。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9]（Frank Lloyd Wright）就与他的一个委托人的妻子私奔了，其结果是不得不放弃了家庭以及他成功的建筑设计事业。像他这样的事不止一件。其实里特维尔德与施罗德夫人关系也很密切，他在她住宅的车库中建了一个工作室，并在那里展出他的家具设计。诱惑者实际上会说“听我的吧，这是我想要的设计，你会喜欢的，因为这是我的作品”。权威和魅力之所以具有说服力是因为权威能够教导委托人停止推理、接受建议，魅力则以更温和的方式劝说委托人停止推理，接受建议。个人比委员会更容易受到影响，相应的，由委员会委托建造的建筑就没那么有个性，理性成分更多。一个住宅委员会决不会委托施罗德住宅这样的设计，除非这个委员会是专门为推广风格派艺术理想而组建的。

意义的多样性

这座小住宅充分说明了一座建筑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其意义。对于在这座房子中长大的孩子们来说，它虽然不同寻常，但这里是家，是上了一天学后可以回去的舒适、安稳的地方。对于寡居的施罗德夫人来说，这是她重新开始的地方，是在英年早逝的丈夫去世之后新生活的开始。对于里特维尔德来说，这是一个机会，让他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尺度上实现他与他的艺术家朋友们一直在探索的理念，该做的他也都做了。在周围的邻居们看来，这座住宅一度显得十分古怪，无法解释，甚至在刚开始的时候这座房屋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但是，施罗德住宅成为小镇边缘面对着一片平坦的开阔地带（如它当时那样）的一座地标性建筑，这样他们才逐渐熟悉了它。无论施罗德住

宅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21世纪的今天它看起来“领先于它的时代”。如果我们认为可以根据建筑的风格猜出其建造年代，那么看到这样一座建筑，我们当然会猜其建造年代应该是在1924年后的某个时间，并且也会为它明确无误的先见之明所叹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或许会考察这座建筑的燃料消耗水平，从环保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批评这座建筑。施罗德住宅只是一座小小的住宅建筑，却引发了如此多的不同反应，因此人们对它的感情也不同。当我们遇到一座房屋，并赋予了这座房屋一种文化时建筑就产生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样一座房屋归属于或是产生了许多建筑，因为这座房屋不止在一种文化语境中表了态。如果我们将施罗德住宅看作是一个有关家的建筑作品，那么它就是使住户感到自由和解脱的一种姿态，在这里住户可以创造他们的生活，把自己从中产阶级家庭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将施罗德住宅看作是乌得勒支城市建筑中的一个元素，那么我们会认为它的这种姿态是为了吸引人注意，就像是过去城门口立的门柱那样起着标志性的作用，这种做法在这座建筑的所在地——小镇边缘是受欢迎的。如果我们将施罗德住宅看作是现代主义建筑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那么，这座建筑的姿态极其重要，标志着突显建筑物的艺术性的重要时刻的到来，尽管施罗德住宅的造型并不是从更早的建筑中发展而来的，而是从一些更为抽象的思想中衍生出来的。这些意义之中哪一个才是施罗德住宅的真实意义呢？可以说，它们都是，但是其中没有哪一种含义与建筑师直接相关。如果我们想知道施罗德住宅对于那位建筑师的意义，那么，我们需要让自己沉浸于神智学的文学作品中去了解布拉瓦茨基夫人[20]（Madame Blavatsky）有关精神世界的描述。当今时代，没有多少人会这样做，但是，即使我们确实能够重新找到里特维尔德对这座建筑最原初的理解，也不能因此说其他解读无效、没有意义。

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复杂，文化也更加多元化，事先理解一座建筑对于将要使用这座建筑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建筑师与这座建筑的使用者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那么人们对建筑姿态的理解很可能与建筑师的理解相一致。然而，任何一个公共建筑

的使用者都来自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背景，因此他们对建筑的反应就会不同。只要这些反应都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么存在着这些不同并不是问题，但是，假如一个现代社会的公务人员打算修建一个像布赖顿皇家亭阁那样的房子，那么，无论这钱是由政府出，或是从什么地方借来的（如当时的威尔士亲王建造布赖顿皇家亭阁时所做的那样），现在肯定会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对，因为很难弄清楚后殖民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东方式样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布赖顿皇家亭阁或可被看作是某种重要的少数族裔文化的体现，也可以被看成是对失落的帝国的怀念，但是，无论怎么看布赖顿皇家亭阁现在都暗含了强烈的其他意义，这些意义是在建造皇家亭阁时所不曾具有的。皇家亭阁所具有的某些暗含之义在今天看来是不可原谅的，但对于当时接触这座建筑的人来说则可以接受。但是，假如皇家亭阁是今日所造，则会引起骚乱和某些人的辞职。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讨厌皇家亭阁以及它所代表的女王形象。这种厌恶情绪不仅仅是因为皇家亭阁的建筑风格，还因为它旨在代表的生活方式——那是一种奢侈夸张与放浪不羁的生活，这种生活与维多利亚女王决心要表现的君主制形象大相径庭。正是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作为公正与虔诚的象征的威斯敏斯特宫得以重建，与她所希望看到的那种政府的形象相符。最近威斯敏斯特宫的上议院大法官套房进行重新装修，所花费的金钱对于大众媒体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但如果考虑到币值的变化，那么那次装修的花费还没有最初建造时的花销大。而威斯敏斯特宫的初衷就是要表现宏伟壮丽，而不是简朴节约，这样才与它扮演的角色相符。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公共建筑更有必要向普通民众证明自己的存在是合理的。我们仍然承认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对建筑的意义与价值的感受还具有一定价值，但是，随着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看来也有必要让普通大众发表对建筑的看法与感受。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2000年至2001年斯特林奖（Stirling Prize，这种奖可能还会颁发）的颁奖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次获奖的建筑作品是由专家组成的评议组评定的。评奖结果在电视这个典型的平民媒体上进行了公示——电视台对观众进行了民意调查，让人们从备选建筑中选出自己最喜欢

的作品。接着发生的事是：当宣布了大众的评选结果后不久又宣布了由专家选定的“真正”的获奖者，这两个结果完全不同。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文化之中，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来确定我们——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看法就正确。在一个公开的地方对两种彼此对立的方法所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是罕见的，因为这两种方法互不相容，其中一种方法往往会使另一种方法变得无效。在审美趣味方面，我们不太可能像上一代人那样对专家的意见言听计从，从民主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件好事情，但对艺术而言就未必，因为这会造成判断上的粗俗化，是对庸俗的支持。我知道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最大众化的东西就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大众化的东西也有影响力，因为大众化的东西往往拥有市场，当然，有时稀有的、非同寻常的东西的确能够获得公众的赞同与喝彩。那么，我们讨论的对象，不论是凡·高（Van Gogh）的《向日葵》，还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流水别墅”（图10），不仅本身令人愉悦，也赋予其所有者地位，因此，如果将其投放入市场，它的价值就会高于它的造价。

图10　流水别墅，熊跑谷，宾夕法尼亚（1936—1939）；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867—1959）。一定要有非同寻常的信心才能相信建造这样一座建筑是可行的——这座建筑凌空飞跃于森林深处的瀑布上方——委托这项设计的是一个富有的商人，意欲把此地作为度假别墅，但他也有些犹豫是否要按照赖特的设计在出挑的阳台上贴满金箔。起居室感觉与自然景观十分接近，既体现在流水的声音无处不在，还体现在主起居室内有高低不平的岩石。从前门看过去，这座房屋与周围的自然景观浑然一体，但是，从瀑布下面这个角度望去的景观是最知名的。赖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混凝土的特点，这座建筑物有些下陷，需要大量修复工作以使其保持良好的视觉效果。流水别墅对住宅设计的大胆探索一直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每个人以前遇到的建筑都不同，因此我们对建筑的确切反应也各不相同。由于接触的文化不同，不同的建筑给我们的感受也不同，有的可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有的可能让我们惊愕，但姑且不论这些建筑的风格与审美品位，我们还会对建筑暗含的生活方式作出反应——不论这种生活方式让人感到充满生气，还是令人沮丧，还是感到卑贱或是没有安全感，也不论这种生活方式是让人燃起新的希望，或是让人想起一些曾经有过美好回忆的地方。我们既对建筑这些方面的内容作出反应，虽然这些内容并不是建筑本身所固有的，也对我们看到的抽象造型作出反应。

注释

〔1〕　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年生），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英国首相（1979—1990），在她执政期间以推进私有化进程，反通货膨胀，马岛战争（1982）以及通过广受争议的征收人头税等为特征。

〔2〕　古罗马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所提出的有关建筑美的6条标准中，有一条即是“得体”，得体是涉及建筑造型与装饰的重要美学范畴之一，这里作者是将其与人的行为得体相譬喻。

〔3〕　湖泊地区，指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风景区，包括坎布里亚山脉和大约15个湖。这一地区与19世纪英国湖畔诗人如著名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密切相关。

〔4〕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诗人，为建立英格兰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做了贡献，于1843年被授予桂冠诗人称号。

〔5〕 又译作白厅，是伦敦的一条南北向大道，位于特拉法尔加广场与议会大厦之间，根据怀特霍尔宫而命名（1529—1698），是英国法庭的主要所在地，以其为政府办公机构所在地而著名。

〔6〕 这里指意大利国王。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将意大利统一，而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是意大利最后一位国王，二战时曾屈从于法西斯的淫威，在盟军登陆西西里岛时，他将墨索里尼逮捕。他于1946年逊位后流亡国外，后客死埃及。

〔7〕 旁遮普，印度西北部的一个邦，与巴基斯坦相邻，史前印度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莫卧儿人统治时期文化十分繁荣，公元1799年到1849年间被锡克教信徒控制。旁遮普邦首府昌迪加尔的城市规划及其中一些重要建筑，是由著名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规划设计的。

〔8〕 伏尔泰（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法国哲学家和作家，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常常攻击不公正和不宽容。他著有《查理十二世》（1731）和《路易十四时代》（1751）等。

〔9〕 伊克蒂诺，古希腊雅典著名建筑师，雅典卫城的主要建筑师，创作时期在公元前5世纪，作品除了雅典卫城的帕提农神庙外，还有巴赛的阿波罗神庙和伊壁鸠鲁神庙。

〔10〕 菲迪亚斯，古希腊雅典的著名雕塑家，曾负责监督帕提农神庙的建设工程，并承担殿内雅典娜神像的雕塑，他所塑造的奥林匹亚宙斯雕像是当时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

〔11〕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有影响的政治家与哲学家。

〔12〕 阿尔贝特·斯皮尔（1905—1981），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建筑师，投靠了纳粹集团，曾任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1934—1945），并担任过纳粹的军备部长（1942—1945）。

〔13〕 19世纪初仍然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希腊，在欧洲的支持下，开始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斗争，这场斗争旷日持久，直到1832年，希腊的独立才获得正式承认。

〔14〕 博格斯，法国中部城市，位于奥尔良东南偏南地区，曾是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首府。

〔15〕 絮热（1081—1151），巴黎附近的修道院院长，曾任法王路易六世与路易七世的顾问，并主管圣德尼教堂的重建工作，为哥特式建筑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16〕 路德维希二世（1845—1886），1864年成为德国巴伐利亚国王，计划中有许多城堡建造的设想，但多没有实现，现代迪斯尼乐园中的“睡美人城

堡”就是从他的故事中得到的灵感，1886年官方宣称他患有精神病，从而剥夺了他的权力，他也于当年逝世。

〔17〕 林德霍夫，路德维希二世建造的隐蔽的打猎用的建筑，是一座具有法国式样的洛可可风格建筑，建于1878年，是他所建造的3座城堡宫殿中最小的，也唯一完成了的建筑。

〔18〕 里特维尔德（1888—1964），20世纪初著名荷兰建筑师，风格派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建筑与家具设计方面都有较大的影响。

〔19〕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867—1959），美国著名现代建筑师，以其20世纪初在美国设计的“草原式住宅”而闻名于世，曾提出“广亩城市”和“乌索比亚”住宅及有机建筑等思想，其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流水别墅”。

〔20〕 布拉瓦茨基，海伦娜·彼得罗夫娜·哈恩（1831—1891），俄裔女通神学者，1875年在纽约创立通神学会，著有有关超自然学说的书，如《揭开面纱的伊希斯》（1877）。

第二章

西方传统的兴起

一些特殊的地方

在古希腊，坐落在帕那塞斯山[1]（Mount Parnassus）山脚坡地上的德尔斐[2]（Delphi）神庙是最为神圣的地方之一。这座神庙是阿波罗神（Apollo）和9位激发了艺术家灵感的缪斯神（Muses）的栖居之所。这座神庙还能让人产生其他更为遥远的联想，自从蛇被看成是神圣之物的远古以来它一直被用作拜神的地方。这里没有城市，但建筑却日益增多，其中许多建筑都是构成希腊联盟的各个城邦赠送来的礼物。讲希腊语的人从各个地方来到这里求神谕：这是一个神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名女祭司从燃烧的月桂树树叶中吸入迷醉人的烟雾，口中呜呜咽咽地发出一连串声音，这些声音被在场的祭司转换成简短却含义隐晦的预言。这里还同时存在着一组非同寻常之物。外面，坐落在那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景中的是一些在艺术上很成熟的建筑、优雅的雕像和附属于神庙的娱乐性建筑——一座露天体育场和一个剧场。但是，神庙内部却有一种宗教的神秘感，使得理性要屈从于疯狂的幻觉。人们认为这座神庙的基址是大地的肚脐，很久以前与一条脐带相连，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座神庙就是世界的中心。神庙里保存了一块古老的刻石，叫作“中心石”（omphalos），它竖立在地上，被雕刻出来的“绷带”束缚住，显然是在模仿一块更为古老的、曾在庄严的仪式中被真正的绷带缠绕过的石头。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一个朝圣之地。这意味着在供奉阿波罗的神庙还在建造的古典时代到来之前，德尔斐的祭司们对于整个希腊语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有着异常深入的了解，因此能够提供政治方面的建议。祈求神谕的迷信做法之所以有效，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解释那些神秘怪异的呜咽之声的人对时事了如指掌。这里的建筑，包括一些非常优秀的建筑，具有各种各样的功能——标出地球的中心，为神秘的神谕传达者提供住所，保证来自各个城邦的祭品的安全（许多建筑本身也是祭献之物），为来访者和祭司提供住所，并开展体育运动和上演戏剧使他们得到娱

乐。

现在，最著名的希腊神庙保存在雅典卫城——耸立在宽阔的河谷地带上的一块岩石台地。在远古的时候，卫城是一个筑有防御工事的要塞，但是在古典时代到来之前，卫城已经变成了一个宗教圣地。与德尔斐一样，卫城也出现了许多建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帕提农神庙（图7），这座建筑名闻天下，代表了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帕提农神庙用大理石块砌筑而成，其建造之精确令人称奇，其造型非常优雅而精准，它是雅典卫城的一座艺术高峰。然而，卫城中最为神圣的建筑是伊瑞克先[3]（Erechtheion）神庙——一座颇为奇特的不对称造型建筑，它看上去就像是被向上推挤而成的，这是因为它不得不考虑其所在基址各种不可改变的地形特征。比如，一位古代雅典国王的墓坐落在这里，岩石上还有一道“伤痕”，那是海神波塞冬（Poseidon）与女神雅典娜（Athena）打斗时用他的三叉戟和一个霹雳，劈落在大地上留下的。有的故事讲这座古老的城市受到大海的眷顾，也得到了雅典娜这位战争女神所赐予的橄榄树的恩惠。当要决定这座城市究竟应该属于谁时，两位神打了起来，结果当然是雅典娜获得了胜利，这也是雅典城得名的原因。伊瑞克先神庙有一个院子，院里有棵橄榄树，据说这棵树是雅典娜带到这座城市的那棵橄榄树繁衍而来的。院子里还有一个由发明家代达罗斯（Daedalus）制作的折叠凳。代达罗斯曾经在克里特岛建造了迷宫，迷宫中住的就是那位半人半牛的弥诺陶洛斯[4]（Minotaur，这个怪物的形象是由代达罗斯设计的）。后来，代达罗斯和他的儿子伊卡洛斯[5]（Icarus）被囚禁在迷宫中。代达罗斯为自己和儿子制作了能够让他们飞走的翅膀才得以逃出迷宫。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这个故事中关于伊卡洛斯飞得太高以至于最后遭遇不幸的情节广为流传，而代达罗斯自己成功逃脱牢狱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对于我们来说，这完全是神话故事，并不是历史事实，但是，伊瑞克先神庙里却有一个制作精巧的折叠凳，这显然是某个人做的。还有其他一些类似遗存——非常古老、起源具有神话色彩——这就使得伊瑞克先神庙成为物藏非常丰富的宝库，可以证明这座城市神圣且在文化上具有权威。神庙所处位置的自然特征使这座神庙非同一

般，而神庙内部那些可移动的文物遗存则提升了神庙的地位，自然特征与可移动的文物相得益彰。正是放置在这座特别不寻常的神庙中的那些文物进一步彰显了它的崇高地位。

当一块基址以这种方式受到推崇时，人们常常会认为有必要在其上建造造价昂贵、设计精美的建筑，唯有这样才能突显该场所的重要性。沙特尔[6]（Chartres）大教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不过出现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文化中罢了。沙特尔大教堂建于12世纪的法国，建筑基址坐落在一眼圣泉上，这显然是早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一个礼拜场所。教堂布置在圣泉之上，但是教堂的权威性却因一个可以移动的古代遗存的存在而提高，那就是教堂珍藏的一段丝绸织物，由圣母马利亚（Virgin Mary）诞下耶稣基督（Christ）时所穿。今天，这段丝绸织物仍然陈列在大教堂中，虽然它不再像中世纪时那样在文化上具有重要性。建在这里的建筑非同寻常。人们曾经试图重建教堂，但在工程完工之前发生了一场火灾，当局得出结论说，那是因为教堂建造得不够宏伟华丽，于是，人们又考虑重建，最后落成的教堂更为奢华。这就是“哥特式”风格大尺度建筑物的最早实例之一，建筑中使用了尖拱券和大面积的彩色玻璃窗。尖顶塔楼的做法就是在这座大教堂中发明的——这在当时标志着人类的想象力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这里，创造一个巨大的、用石板瓦铺饰屋面的、直插云霄的尖锥顶——远远高于该镇其他建筑，从方圆几十英里外的农田都可以看到——这似乎不仅具有技术上的可能性，而且还值得为之去努力。这一建造思想传播开去。尖顶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实际用途，但这却是能够令人们感到震撼与惊叹的一种新手法。沙特尔的自然景观原本就足以令人陶醉，但却没有什么值得惊叹的地方，是建筑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来为神圣之地加盖遮蔽之所，从而帮助弥补了这部大自然舞台剧中的缺憾之处。沙特尔大教堂的室内空间也同样不平凡，采用了一群工匠在为巴黎的圣德尼修道院院长絮热工作时所制定的设计思想。（现在的圣德尼地区以其作为法兰西大球场的所在地最为著名，1998年法国人在这里捧起了大力神杯，坐地铁可以很容易到达此地。）据说，圣德尼修道院的奠基之地是巴黎的第一任主教丹

尼斯（Denis）选中的地方：他因为信仰而被杀害于蒙马特的山上，之后提着自己的头颅走到了这个地方——他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走的这段路程确实是很艰难。同样圣德尼修道院也有非常古老的渊源，但是它得到了极其丰厚的捐赠并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却是因为很多法兰西国王死后葬在这里。正是在这座教堂中采用的石头拱券砌筑方法，使得大面积的彩色镶嵌玻璃画成为建筑中的控制性景观，并在建筑物之外使用飞扶壁，使拱券凌空而起依托在建筑物之上，从而托扶住建筑物的主体，使其孑然屹立。通过采用这些支撑物，墙体中的大量石材可以省略不用，却并不会对墙体的稳固性造成任何致命的伤害。这些支撑物在博格斯的圣艾蒂安大教堂（图8）中运用到了极致，从某些角度望过去，圣艾蒂安大教堂就像是完全由飞扶壁构成的一样。这样的结构产生的室内景观令人叹为观止，因为整个教堂内部充满了透过彩色镶嵌玻璃倾泻进室内的光线。圣艾蒂安大教堂里彩色玻璃画中的形象尤其清晰，画面中讲述的熟悉的故事一眼就能够被认出、理解，非常清楚，就好像这是一本画着人物对话框的连环画册。教堂的室内空间也是空阔宏敞的，沿着建筑物布置有两排侧廊，每一排侧廊都有一排窗户，使光线泻入室内，另外还有一组窗户直接用于位于中心的中堂的采光。这些巨大的竖直形窗户与位于窗户之间向上伸展的坡屋顶叠加在一起，使得建筑显得极其高大隆耸。在你仰望这空间的时候，这一幕令人震撼的景象使人不得不承认，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些石头本来只能用于砌筑低矮的石墩。而在这里，那些石头已听话地跃向半空之中，而且（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石头居然就留驻在了那里。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博格斯的这片基址毫无特色，颇为平坦，博格斯之所以特别主要是因为建筑。这座大教堂所承袭的将室内空间充满光亮的传统在两代人以前建造的圣德尼教堂中就已经开始了。圣德尼教堂优雅、壮观，却没有后来修建的巴黎圣母院、沙特尔大教堂以及博格斯的圣艾蒂安大教堂那样宏大。因此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些建筑，注意这些教堂建造的先后顺序，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建造思想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又是如何随着人们信心与胆量的增强最后被付诸实践的。对于一位古希腊石匠而言，他不可能决定建造一座像圣艾蒂安

大教堂这样的建筑。首先，这样一座建筑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因为古希腊工匠不可能有这些建造思想。这样的建筑取决于想象力的几次飞跃，每一次飞跃在当时都像发明第一座塔楼尖顶的设计一样伟大。此外，即使古希腊工匠可能产生那样的建造思想，他也不可能想出建造方法。即使他能够想出方法，他也没有办法说服同时代的人相信他，并拿出钱来支持他这样做，（在那些人看来）他这样做无异于花费了巨资，最后却落得个只见到一堆坍塌的碎石块的下场。像博格斯的圣艾蒂安大教堂这样的建筑不可能是一个人心血来潮一夜之间想出来的，而是依赖于文化与技术的背景，使得想象与实现这样的建筑成为可能。需要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在欧洲南部，人们对哥特式风格的建筑一直都不怎么热衷。在意大利北部的米兰有一座漂亮的哥特式教堂，但那是一个孤例，那些建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的带有尖拱和拱券的教堂往往不会采用大型玻璃窗，而是保持了较早的罗马风式建筑中所采用的平面墙，并常常在这些平坦的墙上绘制彩画。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中使用如此多的玻璃窗，在夏天会造成室内过热而令人不适。博格斯的圣艾蒂安大教堂是真正采用大玻璃窗做法的教堂建筑中最靠南的一座了。

巴伐利亚的威斯朝圣教堂（图11）建造于较晚的时代，始建于18世纪。它属于另一种建筑文化，但与催生了沙特尔大教堂的宗教文化相似。虽然这里的宗教团体的受教育程度并不是很高，他们关注的是将神秘的数字象征体现在建筑的结构之中，但是，他们却是一个更受欢迎的团体。威斯朝圣教堂的建造源于一位农民亲眼目睹的奇事。他将破碎雕像的碎片一点点地粘起来，用皮革制成可以转动的关节，如此拼接完成的基督造像更像是一尊木偶。这并不是一件出色的艺术品，但却可作为虔诚的宗教礼拜对象被供奉在一座壮观的巴洛克风格教堂的圣坛之上。这座巴洛克风格的教堂有许多功能都与哥特式教堂相同，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从建筑外观看，威斯朝圣教堂显得十分平白和简单，除了在入口处之外，没有什么装饰，窗户看起来就像是直接在墙上开凿出来的一样。从外观上看，很明显的一点是这座教堂并不像是一座普通建筑，因为它是周围建筑中最大的一座——坐落在

田野之中，一眼望去别无他物。人们可能会以为教堂内部多少像一个设备完善的大谷仓。对于朝圣者来说，（这座教堂内）戏剧性的室内效果肯定会让他觉得手足无措，因为这座教堂的内部装饰模仿的是当时宫殿建筑的奢华风格。教堂内有着极其丰富的装饰，还用了金色的饰面，那涡卷形的云朵以及帷幕的造型看上去就像是被向上的风吹飘卷起来了一样。每一处都被当成艺术品来设计，表现出一种灵动与流畅的感觉，但是事实上这一切是实实在在的、静止的。这种效果的实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点画的运用，使得柱子看起来就像是大理石柱一样。彩画画在平整的表面上以营造出梦幻空间的建筑效果，从而也使谷仓一样的空间范围变得难以界定。一些柱子一根叠压着一根，装饰着看上去非常逼真的身披长袍的人物，这些人物由同样逼真的云朵所托起。建筑的这种围合造型很适合绘制这种彩画。天花的边缘呈曲线状，与墙体连为一体，两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如果有这条僵硬的线，人们一眼就能看到，也就能准确地找到房间的界线了。反之，我们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对这个建筑实体作出了反应，还是对彩绘造成的幻觉作出了反应。即使我们希望超越这种幻觉来观察教堂的空间，也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越是努力那么做，越看不出所以然。这里的每一处设计都是为了取得夸张的效果，因此每一处细部都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加以考虑的，没有为任何标准的配件与装置留下空间。布道的讲坛似乎焦躁不安地飘浮在半空，甚至教堂内的靠背长椅也用了华美的雕刻，以便与室内宏大华丽的整体视觉效果保持一致。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艺术作品——这种做法在德语中叫做“合成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这种对于繁雕缛饰的喜好以及消解建筑实体形式的做法与中世纪十分相像，只是这里用的是不同的建筑语言和技术手段。在所有这些装饰的下面，或后面，仍然存在着一种古典柱式的思想——教堂中一些地方矗立着的罗马式柱子与柱楣定下了一个基调，然后对这些柱式进行拉伸、变形并饰以花彩。这是在17世纪的皇宫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建筑风格，这种风格透着浮华与绚丽，若非高贵之辈难以与之匹配，因为这种风格的建筑建造起来花费巨大。但是这种风格依然受到农民的欢迎，因为在他们看来它表

现了一种能够令人逃避现实的虚幻的魔力。我们有必要再次回顾一下布赖顿皇家亭阁（图3），它曾属于这种传统——迷人，透着皇家气派，现在它已向普通大众开放，但前来参观的人都惊叹不已。皇家亭阁的风格与威斯朝圣教堂的风格不同，但是，促使这种风格产生的原因却是相同的，因此对风格产生的一些反应也相同。

图11　威斯朝圣教堂，斯特因豪森，巴伐利亚，德国（1745—1754）；建筑师：多米尼克斯·齐莫尔曼（Dominikus　Zimmerman，1681—1766）。这座朝圣礼拜堂坐落在田野之间，教堂的外观朴实无华，但是教堂内部却相当夸张、华丽，令人叹为观止，一眼望去似乎只剩灰泥抹塑的装饰性泡沫。这种第一印象遮掩了其中丰富的技术成就与表现技巧。这座建筑标志着追求建筑之华丽效果的传统的结束，这一传统历史悠久，是以古典装饰中蕴含的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的确，在纷繁复杂的装饰中可以看到古典的柱子与柱顶线盘。但是，这些装饰要达到的整体效果就是要让这座建筑给人一种它已经摆脱了重力束缚的印象，那些灰泥抹塑的装饰看起来就像是被一阵大风吹出来的，这阵风在细部形成了涡流，造成了飘逸、灵动的整体效果。光线不仅仅通过设置在显眼处的窗户照射进来，还从一些看不见的地方照射进来，其产生的效果就像是聚光灯一样。在设计决策过程中，剧院显然对设计产生了影响，这从让人产生幻觉的天花到被彩绘所包裹的看起来像大理石一样的抹灰与木构件中可以看出来。令人难忘的是教堂原有的一切物品都进行了改造，以达到同样的幻觉效果，因而，那布道讲坛、那诵经台以及教堂内的所有靠背长凳都用同样的装饰风格加以塑造与雕刻，这样它们看起来就与建筑物一样充满活力、富丽堂皇。修建这座教堂时，在凡尔赛的皇家礼拜堂——一座在许多方面都与威斯朝圣教堂十分相似的礼拜堂——担任过神职的修道院院长洛吉耶（Laugier）发表了一篇在建筑上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文，他呼吁回归建筑的简洁本质与明晰的结构。对此人们可以理解，但是，没有什么能够与最优秀的巴洛克作品强烈的戏剧效果相媲美，而这些作品仰仗那些富有的资助人——宫廷和教堂的支持——他们需要富丽堂皇的、仪式性的陈设。在19世纪的剧院装饰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种风格的魅影。

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托马斯·杰斐逊的邸宅蒙蒂塞罗也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朝圣圣地（图12）。杰斐逊建造蒙蒂塞罗是为了他自己住，这座房屋也完全满足他的需求。然而，人们来这里参观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这是一座设计良好的住宅，而是因为杰斐逊在这里做过的其他事，例如他在这里撰写了《独立宣言》，宣言掷地有声地向世人宣布，美国不再是殖民地，而是一个自由国度。杰斐逊那辉煌的政治生涯使他成为美利坚

合众国最重要的缔造者之一。然而，他的住宅并不是一位总统的府邸，而是一位种植园主的家宅。正是在这里他经营着自己的庄园，用欧洲的标准来衡量，他的庄园可谓辽阔，而且一派兴旺景象。杰斐逊曾在欧洲游历，对建筑特别感兴趣，他不仅设计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围绕着大草坪的）中心建筑群，还设计了弗吉尼亚州的州议会大厦——他雇了一些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士来帮他建造这些建筑。我们从他在建造自己的房子过程中所作的决定可以对他了解甚多，了解他的所思所虑及目标理想。首先，蒙蒂塞罗不是一座浮华奢侈的住所，它比许多住宅都要大一些，但若按那些富丽堂皇的宅邸的标准来看，它也不算大。而且从房屋的设计和家具陈设的整个思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杰斐逊并不希望将自己的住宅建造成一座华美的宫殿，而是试图建造一座更为坚固、朴实无华的住所，同时又要体现优雅和舒适。蒙蒂塞罗特意避免用华丽的装饰，从风格上讲，我们可以称其为新古典主义，因为它和其他后巴洛克式的尝试一样，也是要回归古典主义建筑的基本原则。不止他一个人这样做，但杰斐逊的这座建筑体现了他的抱负，因为这与他试图通过对基本原则的思考得出一个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一个理想社会应遵循什么规则的努力相一致。杰斐逊的庄园可以被看作是这个崭新国家的缩影，而蒙蒂塞罗则是这个庄园的治事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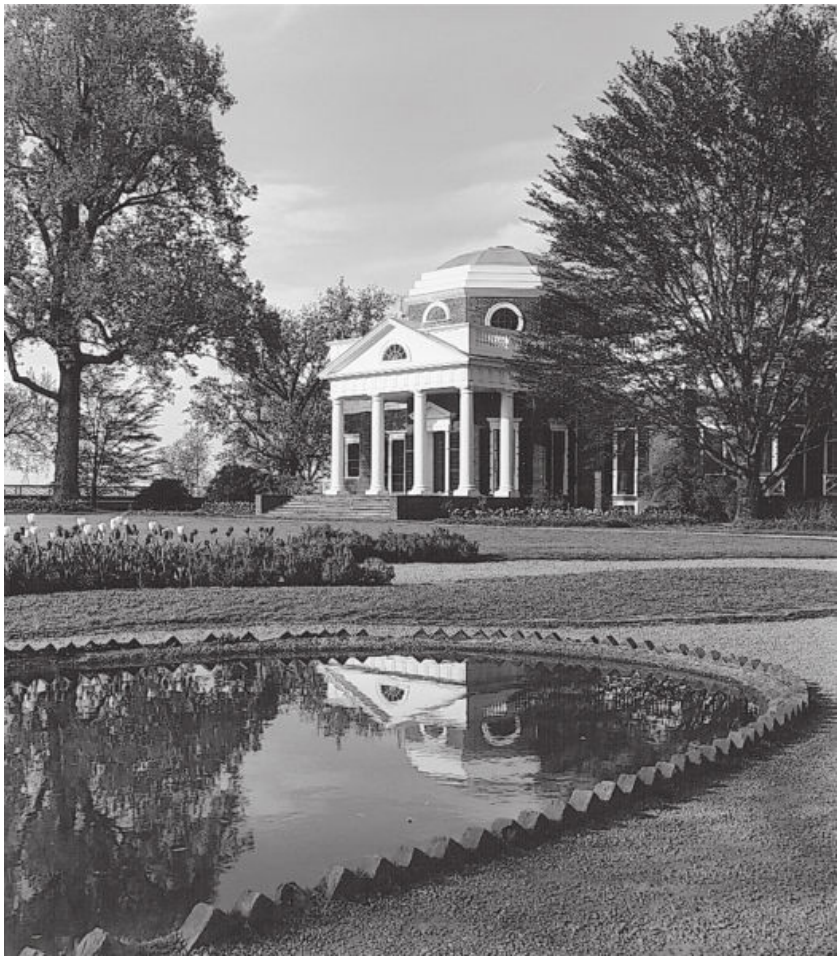

图12　蒙蒂塞罗，夏洛茨维尔附近，弗吉尼亚（1796—1808）；建筑师：托马斯·杰斐逊（1743—1836）。托马斯·杰斐逊以其于1776年撰写《独立宣言》并且在其中满怀激情地号召全国人民支持“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最为著名。他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三位总统（1801—1809）。他在蒙蒂塞罗建造了一座住宅（1770—1779），后来又对这座住宅加以扩建与改造（1797—1808），这座建筑在当时获得了美国最漂亮的住宅建筑的美誉。这座建筑物居高临下，俯瞰开阔而肥沃的平原。杰斐逊取得的成就更加让人吃惊，因为他从未受过任何正式的训练，有关建筑的知识都是他在美国与欧洲游历时学到的。他在建筑方面的修为也是在与国外的专业建筑师的交往中成型的，因而，他有着艺术精英的思维方式，而这是他在国内的同时代人不可比的。

蒙蒂塞罗有许多有趣的地方，许多东西都经过了重新设计，脱离了已有的传统方法。他把所有主要房间都布置在一个单一的平层上，当时的建筑一般都有一个极占空间的礼仪性大楼梯，但杰斐逊却没有这么设计，房屋中通向私人卧室的楼梯狭窄而局促，只是体现了楼梯的实用功能。杰斐逊自己的卧榻布置在一个凹进墙壁的小室中，小室的一侧向卧室开敞，另一侧则通往他的书房。从文化层面上看，住宅内部的这种细部安排非常有个性，但这座住宅给人的总体印象却又是非常高贵、亲切。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杰斐逊特意在他的住宅中采用了古典的建筑语言，使他置身于根源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中。从杰斐逊的住宅中能看到属于西方传统的其他建筑的影子。他为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所做的设计简直就是法国尼姆的方形大厦（Maison Carrée）的翻版，方形大厦是所有古罗马神庙建筑中保护得最好的一座（图13）。坐落在弗吉尼亚大学大草坪上的中央建筑物采用的是另外一座古罗马纪念性建筑的式样，那就是罗马的万神庙（图14）。我们可以对杰斐逊在设计自己的住宅时所综合运用的种种可能的原型建筑进行分析，也可以只是对其进行欣赏，不必深入了解其中蕴含的信息。即使没有任何深入的或特定的知识，我们也能够看出这是一座具有某种权威的建筑，属于我们熟悉的高品位建筑传统，因而，这样的建筑让我们感受到的是稳定与威严，而不是对抗与挑战。从景观建筑学的角度来看，蒙蒂塞罗所表露出来的并不是某种急切或高亢的情绪，而是表现得十分平和，好像它生来就是权力的所在。鉴于蒙蒂塞罗的设计者革命性的政治主张，建筑的这种表达方式可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希望通过这样描述蒙蒂塞罗来说清楚一点：对一座建筑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如果我自己并不归属于这种“西方文明”，那么我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特别是如果我的祖先从前就在这个庄园上劳作过，在这里住过，但却无权拥有这里的土地，这时蒙蒂塞罗就不会令人感到权威而亲切了，而是让人感到有点像是舶来之物，还给人以傲慢之感。如果我是一位曾经在这个庄园做过工的奴隶的后代，那么我可能会将它看成是剥削、压迫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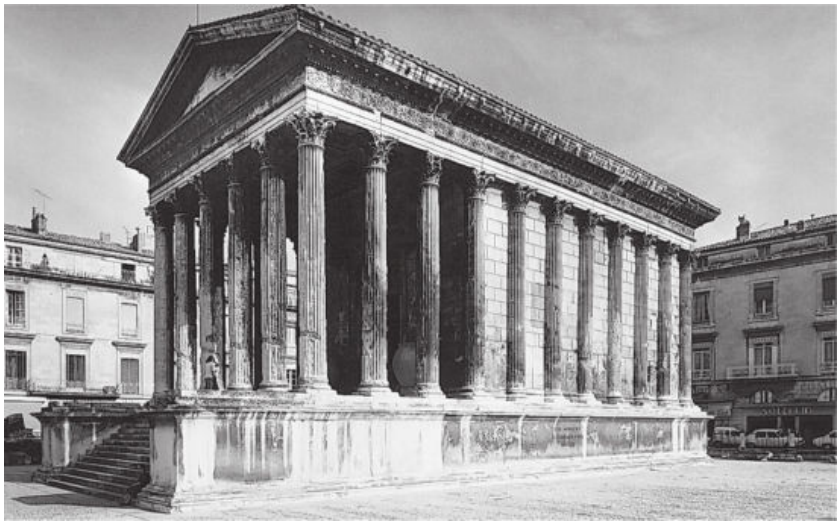

图13　方形大厦，尼姆，法国（1—10）；建筑师：未知。这是一座相当典型的神庙建筑，位于古罗马一个外省城市的中心。比起许多类似的罗马神庙来，这座建筑获得了更高的评价，但是，在建造这座建筑的年代，它至多不过是一座地方性的标志物。现在，这座建筑的重要性已是今非昔比，因为大多数罗马神庙早已毁圮不存，而这座建筑是保存最好的罗马神庙，因而，慕名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方形大厦对建筑欣赏品位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它影响了18世纪的那些到欧洲大陆游历的英国贵族的建筑审美。方形大厦的处理是典型的罗马神庙风格。其内部空间由内殿组成，应该是供奉祭祀用的神像的所在，从神像所处的位置通过开敞的门可以看到室外专供节庆时供奉牺牲的圣坛。这个房间（内殿）比周围街道地面高出许多——大约4米（12英尺）——在建筑物的一端有一跑踏阶可以直通内殿。在踏阶的顶端是一排非常典型的柱子支撑着屋顶。这些柱子采用的是“科林斯”柱式，因而柱头上是惯常所用的叶形花瓣装饰，非常华丽，引人注目。这是罗马建筑中享有声誉的建筑物的典型处理手法，但是，使用有凹槽的柱子在罗马建筑中却并不常见——大多数罗马柱子都用圆柱形截面，这样的柱子比起人们所崇尚的希腊经典建筑中有竖直棱的柱子来说，雕刻起来更快也更容易。围绕建筑物的大部分是由墙体支撑着屋顶，墙上有装饰性的半柱，这些柱子没有功能上的意义，但是它们保持了希腊神庙所特有的视觉韵律。许多罗马神庙都用了简单大方的侧墙，不惜工本地为这些柱子加上雕刻使人感觉到这座建筑物的奢华与地位。

图14　万神庙，罗马，意大利（118—125）；建筑师：匿名，但在哈德良皇帝（Emperor Hadrian）的指导下进行的设计。万神庙不是一座典型的罗马神庙，虽然它的设计汲取了传统范式的营养，但却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它前面的入口在构思上就没有什么特别不同寻常之处，虽然这个入口比“普通”神庙建筑的入口更大、更宏伟。像帕提农神庙（图7）一样，它在前立面上有8根柱子，而不是更为常见的6根柱子（即是所谓的八柱式建筑而不是六柱式建筑）。入口门廊两侧有两个小壁龛，曾经放有雕像。值得注意的是分隔内外两个世界的两扇古代青铜大门依然立在那里。室内景观宏伟壮观，超乎想象：一个环形穹隆覆盖的空间，巨大的方格式天花，光线从屋顶中央完全开敞的孔洞（小圆窗）中泻入。这座穹隆顶是古罗马工程技术成就的一个标志，它用混凝土浇注而成，跨度很大。在后来的1,000多年中，在伯鲁乃列斯基于1420年建造的佛罗伦萨大教堂穹隆顶出现之前，没有比它更大的穹隆顶了。最初，天花的每一块方格子中都镶嵌有一个镏金的玫瑰花饰，使得整个穹隆顶具有天国的意象。作为一座神庙建筑，万神庙的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对室内空间的充分利用，这也说明了在这里举行的宗教仪式会更多地使用内部空间。正是由于这样一个特点，这座建筑尤其适合用作教堂，在罗马帝国正式接受基督教后不久万神庙就被改成了教堂，这也是它得以保存如此完好的原因。曾经覆盖在屋顶上的镏金青铜瓦被送到了君士坦丁堡（“新罗马”）——君士坦丁在东方建立的基督教

首都，在那里，随着旧罗马的衰落，一些宝物被堆放在拜占廷的宫廷中。在中世纪的时候，罗马的人口也大为减少。

教导人们熟知公认的经典之作常常是艺术教育的传统方式。虽然在艺术审美上“经过培养的审美趣味”与“大众审美口味”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并不意味着“经过培养的审美趣味”需要有不自然的、矫揉的感觉。对于那些浸润在某个传统中的人来说，他对讨论中的建筑产生的反应是本能自然的，即使这种传统是从书本上学到的，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无意习得的。在特定情形下，无论是经过培养的审美鉴赏力占了上风，还是大众化的欣赏趣味占了上风，这都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与文化政治的关系更大。

杰斐逊的蒙蒂塞罗能够让人想起西方传统中的哪些早期建筑呢？杰斐逊的这座宅邸是置身于优美环境中的别墅建筑的经典实例：这是一座对称布置的亭阁，有一个中央入口，入口处布置有古典式样的柱子。这一类建筑在18世纪的北部欧洲随处可见，但是在这里——弗吉尼亚，杰斐逊建造了体现自己的风格的建筑。他曾经研究过的建筑实例大部分来自意大利，这些实例是从书本上看到的，因为年轻时候的杰斐逊游历并不广泛，他只能通过阅读来学习。他自学了意大利语，并且有一本意大利文的帕拉第奥（Palladio）的《建筑四书》，他称这本书为他的建筑学“圣经”。杰斐逊还有其他一些插图版的建筑学书籍，是由英国的建筑师们写的。当沙特吕侯爵[7]（Marquis de Chastellux）于1782年访问蒙蒂塞罗时说，这座住宅在美国仅此一处，并且称“杰斐逊先生是美国第一位了解美术，并知道如何为自己建造栖居之所的人”。换句话说，杰斐逊建造房屋时遵循了一种被沙特吕侯爵认同的建筑传统，即欧洲精英的传统。

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杰斐逊选择遵循帕拉第奥著作中提倡的那种审美趣味与得体的感觉，并且认为设计建筑要考虑比例与均衡，而不是试图堆砌一些巴洛克风格的华而不实的盛大排场与繁缛装饰。杰斐逊的蒙蒂塞罗以简洁为特征，而且通身散发着静谧的气息，这与巴洛克建筑热烈繁杂的内部形成鲜明对比（如图11中威斯朝圣教堂或图

3中的布赖顿皇家亭阁。后者一般并不归在巴洛克建筑之中，但是，因为布赖顿皇家亭阁使用了与巴洛克建筑相同的手法——综合了建筑、雕刻与具有幻觉效果的绘画——因而具有许多类似的效果，我倾向于认为布赖顿皇家亭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座巴洛克建筑，虽然在细部处理上它采用的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建筑手法）。蒙蒂塞罗并不是从某个意大利建筑或英国建筑中复制出来的，而是吸收了帕拉第奥别墅建筑中的那些一般思想。通过运用那些基本的原理，杰斐逊设计了一座满足自己需求的、相当具有独创性的建筑，但它明显属于帕拉第奥的传统。事实上，杰斐逊最初设计并建造的是一座“英国式帕拉第奥风格”的住宅，然后，过了许多年，在他游历了许多地方（特别是法国）之后，他开始按照法兰西式的精致与优雅来改造他的住宅，比如，穹隆顶的应用。他曾在巴黎一座十分重要的居住建筑（萨尔宾馆）中看到了这种处理手法，于是在自己的住宅中也作了如此处理。

帕拉第奥和他的《建筑四书》

什么是“英国式帕拉第奥风格”的传统呢？这是受安德烈亚·帕拉第奥的启发而形成的一种建筑风格。帕拉第奥是16世纪意大利的一位建筑师，他不仅设计建筑，而且也为所设计的建筑著书立说。1570年，他出版了4本配有优美插图的建筑方面的书，其中包括他自己绘制的罗马纪念性建筑的木刻版画。这些纪念建筑在书中并不是以其废墟的形象示人，而是一些带有推测意向的复原设计图，这反映了帕拉第奥想象中的这些建筑的本来面目。除了这些古代建筑之外，书中还包括了一些当时受到古代建筑启发的建筑师创作的建筑作品，例如伯拉孟特[8]（Bramante）的作品，当然最多的是帕拉第奥自己的作品。在将这些作品，包括那些通过考古发现的古代建筑与他那个时代所创作的建筑作品归集在一起的时候，帕拉第奥提出了一套有关古代罗马建筑知识的权威大纲以及贯穿古罗马建筑的原则，同时他还加入了一些设计案例，以证明那些原则以及古代的经典建筑是如何运用到诸如教

堂和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别墅等现代建筑之中的。帕拉第奥是在他建筑师生涯的晚期写的这些书，他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也令人信服。他是一位多产的建筑师，其作品主要分布在维琴察[9]（Vicenza）和威尼斯一带。威尼斯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它与东方世界的贸易往来——威尼斯一度牢牢控制着与东方的贸易。威尼斯共和国控制了东地中海的交通，拥有一连串防御工事坚实的港口，这些港口保护并维系着商业活动的进行，使来自君士坦丁堡以及更远地方的商品能够不受海盗的侵扰而源源不断地运来。威尼斯的统治阶层不仅在威尼斯大运河两岸拥有宫殿，而且在陆地上的庄园里也拥有别墅，他们会去那里消夏。这些别墅多少有点儿农舍建筑的味道，因为他们在别墅里经营着自己的庄园。这种别墅集多种功能于一身：既有用于农业用途的若干房间（如像谷仓一样的阁楼），也有农场工人、农民以及仆役住的房间，此外还有带着礼仪性特征的贵族用的大套房。帕拉第奥那些透着熟练的设计技巧的作品将所有这些要素综合于优雅而高贵的古典形式之中，从而使这样一个集中了各种实用功能的庞大建筑呈现出宏伟、壮观的特质。

帕拉第奥设计的最为人称道的别墅之一却与这种模式有些不同，那就是位于维琴察附近一座平缓小山丘顶端的圆厅别墅（图15）。圆厅别墅不是一座独立的居所，因为它在设计之初就是要与房屋主人在维琴察的主要住所结合使用。圆厅别墅离城不远，主要用于娱乐。在帕拉第奥的作品中它之所以显得独具一格，是因为圆厅别墅的四个立面完全相同，每一个立面都有一个用古典柱廊形成的入口，那是一个门廊，通过台阶踏步可以到达，门廊使用的是罗马风格的柱子。别墅中部有一个穹隆，当门都打开时，可以看到四个方向的乡村景色，因而这座别墅看起来就像是这个小山丘的延伸与终结。地面的坡度在踏阶上得到了延续，站在室内就好像是站在一个隆起的坚实台座上，台座上方还覆盖着彩绘装饰的穹隆顶。杰斐逊的蒙蒂塞罗也有相同的基址形式——坐落在小山丘的顶端，但他只设置了两个入口，门口同样是由罗马风格的柱子形成的门廊。位于弗吉尼亚的小山丘要略高一些——“蒙蒂塞罗”在意大利语中就是“小丘陵”的意思——然而，在考虑

建筑在景观环境中的位置的时候，两者的做法相似。比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就决不会将一座建筑建在小山丘的顶端，即使是流水别墅这座从瀑布下方向上仰望时看起来如此生动的建筑（图10）也是掩藏在森林之中，从一个较高的地方才能接近，因而流水别墅看起来像是要将自己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之中，而不是要凌驾于这个环境之上。只有当人们走进流水别墅室内，或是站在较低的地方，别墅的空间大戏才会上演。

图15　圆厅别墅（卡普拉别墅），维琴察，意大利（1569）；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1508—1580）。帕拉第奥发表了一篇配有插图的论文，图中有他自己的设计，也有他为一些伟大的古代遗迹所做的复原设计，如万神庙（图14）。他在维琴察和威尼斯做设计，为威尼斯的贵族设计了别墅与教堂，这些贵族在威尼斯有宫殿，还在人称威尼托区[10]（Veneto）的大陆上拥有农田，维琴察就位于威尼托区。帕拉第奥所设计的别墅大多数都是用作管理庄园的基地，这就使得这些别墅多少有点像农村邸舍，只是还有几间富丽堂皇的、讲究的房间以供贵族消夏时使用。圆厅别墅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并不作贵族的日常起居之用，而是变成了距离维琴察很近的一个归隐静思之地。圆厅别墅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从而可以从四处向周围的田野眺望。圆厅别墅从来就不是一个主要的居住场所，而是用作休闲之地。典型的帕拉第奥别墅在主入口设有一个带柱子的门廊，但是，圆厅别

墅在他的设计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有四座完全相同的门廊，在四个方向上都可以眺望田野。别墅中央有一个环形的房间，从这里人们可以随意踱步到任何一个门廊，并步入自然景观之中。

帕拉第奥的4本书从观点上看都非常实用，条理也十分清晰，是写给建筑师和他们的捐资人看的，而不是作为学术著作来写的。在17世纪时，英格兰的伊尼戈·琼斯[11]（Inigo Jones）拥有了这几本书。他曾经去过意大利，为帕拉第奥的思想所倾倒，并在其影响下设计建造了一些非同寻常的建筑，如格林威治的女王宫、伦敦怀特霍尔大街的宴会厅等。这些建筑最不寻常之处是它们的建造时期，那时欧洲大陆的王公贵族们正忙于建造越来越精美的巴洛克宫殿，而在英格兰，巴洛克风格最为繁盛的时期还没有到来——例如，由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12]（Sir Christopher Wren）设计的圣保罗大教堂直到17世纪末才构思出来，这已经是君主制复辟以后重又追求壮丽繁华以及伦敦大火将一切扫荡殆尽之后的事情了。伊尼戈·琼斯的建筑由一些简单的体块构成，并且体现了对和谐比例的关注，而比例和谐正是帕拉第奥所倡导的。这种和谐的比例关系在音乐当中也会产生优美的共鸣，受此影响，帕拉第奥喜欢体量在各个向度上具有简单的比例关系，这样，当一间房屋的高度与宽度相等，而其长度是宽度的两倍时，它可能令人感觉愉悦。按这样的比例建成的建筑会是一个双立方体，琼斯为查理一世[13]（Charles I）设计的怀特霍尔宴会厅用的就是这种比例，然而正是在这座宴会厅的外面，查理一世被处以死刑。怀特霍尔宴会厅也有一些巴洛克建筑的味道，如天花板上是鲁本斯[14]（Rubens）所绘的华丽彩画，但是与法国的凡尔赛宫相比，这座建筑的总体风格相当庄重、简朴。

英国式帕拉第奥建筑

琼斯那些受到帕拉第奥影响而设计的建筑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孤例，并非代表性建筑。英国式的帕拉第奥主义与18世纪联系得更为紧

密，那时，这种样式的建筑在伯灵顿伯爵（Earl of Burlington）的赞助下，引领风潮而成为那个时代标准的现代建筑。伯灵顿伯爵在自己位于伦敦西部奇斯威克（Chiswick）的住宅旁边建造了一座小巧而精致的亭阁（图16）。他对帕拉第奥推崇备至，搜集和收藏帕拉第奥的绘画，并将自己与好友威廉·肯特（William Kent）擢举为建筑审美的评判者。位于奇斯威克的这个艺术沙龙由伯灵顿伯爵夫人主持，她也是唯一的一位在这座别墅中住过的人。毫无疑问，伯灵顿夫人在确保沙龙的和谐氛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氛围可以让人们自由交换思想。奇斯威克别墅成了艺术创造的中心，而这是这座建筑产生巨大影响的一部分原因。如果没有这些影响，英国的巴洛克建筑之风很可能也会像法国和德国一样持续很长时间。身在远离欧洲大陆的弗吉尼亚、通过书本来获得知识的杰斐逊也可能接受帕拉第奥的思想，然而，杰斐逊就不会被来访的沙特吕侯爵看成是有审美趣味的人，而会被认为是一个古怪的人。审美潮流的改变不会完全因为一小群人而改变——一定有一批愿意倾听并接受伯灵顿圈子的看法的人——但是不管怎样奇斯威克别墅在建筑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它的尺度小。除了这座别墅建筑本身以及伯灵顿夫人的沙龙的深远影响以外，建筑师科仑·坎贝尔（Colen Campbell）也以他不朽的学术著作——《英国的维特鲁威》一书在英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套三册本的书，书中插图所示的建筑作品都得到了坎贝尔的认可——所有作品都是古典风格，其中许多是坎贝尔自己的设计，有些付诸了实施，有些则是凭空的畅想而已。伯灵顿曾经聘用过詹姆斯·吉布斯（James Gibbs），因为吉布斯意大利式的建筑设计风格显然符合伯灵顿的审美趣味，当伯灵顿旅游归来的时候，他要吉布斯重建自己在皮卡迪利[15]（Piccadilly）大街的住宅。然而，坎贝尔取代了吉布斯，因为他使伯灵顿相信他坎贝尔才是受过正规教育的、有真才实学的帕拉第奥式建筑师。（这座建筑碰巧与现位于皮卡迪利的皇家学会的所在地伯灵顿住宅在同一个基址上，但已是不同的建筑。）坎贝尔的书帮助确立并推广了一种思想，即简洁、比例和谐的建筑才是杰出的典范，这与粗陋不堪、毫无价值可言的巴洛克建筑总是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书

中坎贝尔认为巴洛克建筑繁复的装饰过多，是靠这些装饰来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掩饰其对建筑基本原则的忽略。

图16　奇斯威克别墅，伦敦，英国（1725）；建筑师：伯灵顿伯爵（1694—1753）。伯灵顿伯爵在伦敦西部有一座詹姆士一世时期的邸宅，他是一位充满热情的业余建筑师，也是帕拉第奥的崇拜者，他着意搜集帕拉第奥的绘画作品。本图所示的这座别墅建筑与他的那座大邸宅相毗邻，是用于款待宾客的建筑中的佼佼者，以招待艺术家最为有名，其中一些艺术家受到伯灵顿伯爵的赞助与支持。因此，这座别墅规模虽不大，但影响却很大。这里有伯灵顿伯爵夫人的卧室，她是唯一一位在这座别墅中生活过的人，这座别墅是伯爵邸宅的附属建筑（那座邸宅建筑已经毁圮不存）。伯爵夫人和威廉·肯特（1685—1748）都对这座建筑的室内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肯特就像是伯灵顿伯爵家的一员，负责许多家具与花园的设计。在设计这座别墅时，伯灵顿主要从两座别墅中获得灵感，一是帕拉第奥的圆厅别墅（图15），另一座则是由帕拉第奥的学生温琴佐·斯卡莫齐（Vincenzo Scamozzi，1552—1616）所设计的位于罗尼戈（Lonigo）的洛卡·比萨尼（Rocca　Pisani）别墅。洛卡·比萨尼别墅采用了帕拉第奥的设计，但却将门廊的数量减少为一座，并将中央的圆厅处理成一座八角形的大会客厅（或沙龙）。伯灵顿也步斯卡莫齐的后尘而做了这些改动。

伯灵顿在奇斯威克的别墅确立了时尚建筑的思想，这一思想主导了我们对18世纪建筑的看法。对于伯灵顿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时尚建筑究竟意味着什么？顺便应该提起注意的一点是，只有社会最富有的阶层才会有建筑方面的时尚。修建房子始终是一件花费巨大的事情，只有那些有成群结队的仆人侍候的富人才花得起钱使用打磨、雕刻过的石头来精心设计建造建筑。大多数人并不刻意追求住在一座时尚的住宅中，而是有一个坚固、安全的栖居之所就满足了。在理解一座建筑对于其设计者的意义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从某个特定的视角来观察世界，这个角度可以概括为精英的角度，因为站在这个视角看问题的人从来不必为柴米油盐劳心费神。对劳动人民来说，如果他们有艺术追求，其结果就是产生一批吃不饱饭的艺术家，他们找到了进入精英文化的途径，却没有财力维持基本的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那些有天分却没有财力的人也可以设法获得成功，只要找到一名资助人就行，虽然对于一位有钱的男子来说，资助一名女子的做法会被认为不妥，因此很少有女性成为艺术家，除非是在演艺界，而演艺行业又很难说得上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业。威廉·肯特得到了他的资助人伯灵顿伯爵的慷慨资助，并且与他家关系亲密融洽。科仑·坎贝尔却不是这样，因为他那红火的建筑设计事业带给他不菲的收入，不需要依附伯爵大人。因此，坎贝尔和肯特承接的设计项目在类型上颇为不同，因为坎贝尔需要时刻关注生意，而肯特却可以更为自由地进行设计尝试，不需要靠吸引委托合同过活，只要资助人同意即可。时尚建筑，无论采取什么造型，都具有意义，因为时尚建筑自动表明其所有者属于上层社会。可以说，这一点对时尚建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甚至这有可能是人们想建造这种建筑的主要原因。然而，对于那些像伯灵顿伯爵这样肯定属于最上层社会的人来说，有没有一座时髦的别墅不是问题的关键。相反，对他来说，关注建筑就是赋予建筑社会地位。

艺术成就则是另外一回事，只有通过熟悉文化、发展技术才能取得。建筑经常通过在艺术上与较早的建筑——那些受人尊敬的原型建筑——遥相呼应来获得意义，就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这里要说的范例有圆厅别墅和帕拉第奥的学生斯卡莫齐设计的别墅——位于

罗尼哥的比萨尼要塞。这座别墅的设计发表在斯卡莫齐的著作《建筑理念综述》（1615）上。科仑·坎贝尔已经参照圆厅别墅的样式建造了一座别墅，即米尔沃斯城堡（Mere-worth Castle，1722—1725）。奇斯威克别墅的每一个立面都不同，而不是像圆厅别墅一样四个立面完全相同。不管怎样，奇斯威克别墅的所有元素都可以在帕拉第奥或斯卡莫齐的别墅中找到先例，因此这座建筑是正宗意大利式的。为什么意大利建筑就被认为是出色的建筑呢？因为当时的英国贵族都知道意大利是艺术与文化的摇篮，只要有机会，他们都会去意大利游览。游历欧洲大陆这种教育旅行是一个重要的学业成就，因为这么做可以让人拥有社会地位，在上流社会能从容应对。这种旅行的目的地通常是法国和意大利，而且作这种旅行的通常是思想易受影响的青少年。那些教育旅行者中的贵中之贵者会带一队仆人作扈从，并有一位家庭教师陪伴左右，然而，当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也会拜访当地的艺术家与学者。事实上伯灵顿就是在意大利游览的时候遇到肯特的。教育旅行可能要持续数年之久——其目的是吸取文化精髓，而不是以所走的距离来衡量。年轻人所受的学校教育就已经使他们受到拉丁文学的熏陶，因而他们也学会了欣赏古罗马建筑的遗迹、意大利艺术的瑰丽以及郊野风景的五彩斑斓。这也是他们长大成人的一个重要环节。远离家乡使他们感觉无拘无束，有机会做浪漫式的冒险，而不必担心要承担冒险的后果，他们回到英国之后所津津乐道的是意大利女性在性道德方面是如何的自由与开放。回到英国之后，家人希望他们找一份工作或参与家族庄园的经营，成年人的种种责任接踵而至。因而对意大利建筑的热爱在一定程度上与青春、自由、宜人的气候以及无拘无束的生活等让人愉快的想法相关。在教育旅行途中也会有一些固定的学习安排，进入沿途各地的上流社会，这样，当他们回国之后就成了见过世面的举止优雅的绅士淑女了，只是心中萦绕着对意大利和古迹的怀旧情绪。建筑的这一层面触及了个人的记忆与体验，很难说清楚，也不可能固化为规范，但是它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情绪表达肯定是存在的。像詹姆斯·吉布斯和科仑·坎贝尔这样的建筑师确实设法订立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推出了一种看起来罗马风格强

烈并会引起资助人阶层的感伤情绪的建筑，而这些建筑师自己可能并没有这种感受。

罗马复兴

地位崇高的西方建筑的整个历史几乎就是试图恢复和重现古代，主要是古罗马的辉煌的历史。古罗马留下了一些宏伟壮观的建筑遗迹。最壮观的建筑遗迹之一是万神庙（图14）——由哈德良皇帝建造的有大穹隆顶的神庙建筑，后来这座建筑在君士坦丁之后的基督教时代变成了一座教堂。帕拉第奥发表了万神庙的平面与剖面的版画，据说伯鲁乃列斯基1420年在考虑如何建构佛罗伦萨大教堂的穹隆顶之前曾经对万神庙以及其他罗马遗迹进行了研究。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设计出与古代作品相媲美的建筑，许多中世纪的建筑师也有同样的目标，只不过当时能够参照的例子或许有些不同。这在被称为“罗马风”的中世纪教堂建筑中特别明显，因为它们正是以罗马建筑实例为原型。例如，在勃艮第的奥坦（Autun）的圣拉扎雷（St Lazare）罗马风教堂，沿着中厅有一排拱洞形结构，穿过拱洞可以进入侧廊，同时，在上方还有一排较小的拱洞，其作用相当于窗子（高侧窗），使阳光能够进入室内。同样模式的这种在大拱之上加小拱的做法在城内尚存的古罗马门道建筑中也可以见到，只是门道建筑要比教堂小许多。（教堂建筑所采用的）尺度似乎来自一座矗立在城外一块低地上的不同寻常的罗马神庙的遗迹——用罗马砖石和混凝土砌筑。神庙的外形很久以前就已经毁坏了，因而只剩下了一堆歪七扭八的碎石，但是这座神庙却大得惊人。如果我们将这座神庙的尺度与门道建筑那成熟的技术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可以十分容易地用于大教堂的模式。大教堂的中厅有一个穹隆，这种手法是从罗马建筑中学习而来的，例如万神庙和由后来的皇帝建造的大型浴场建筑群。在16世纪时，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将罗马戴克里先〔16〕（Diocletian）浴场的穹隆式空间形式应用到了圣玛利

亚天使教堂（Santa Maria degli Angeli）之中，而从11世纪开始，在勃艮第建造的新教堂都用了穹隆顶形式，最开始使用这种形式的是位于图尔尼的圣菲力伯（St. Philibert）教堂（约950—1120）。勃艮第的罗马风教堂将位于克吕尼（Cluny）的大修道院看成是其权威的中心，这座大修道院沿着中厅使用了尖拱。这些尖拱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出现在了奥坦——中厅上面有尖拱，中厅上部的穹隆顶上也有尖拱——在勃艮第，有尖拱的建筑并不一定就是哥特式建筑。

我们认为伟大的工程建筑是典型的罗马建筑。这些工程包括道路、输水道以及军事防御设施，如从西到东横贯大不列颠岛的哈德良长城。工程的规模令人震惊，特别是考虑到当时可用的资源非常有限——没有电子通讯工具，没有比锄头和铁铲更大的挖土、运土的设备，只能靠成千上万的人组成纪律严明的工作团队来完成。许多工程都只考虑了其实用性，以方便使用为目的，并不指望有什么艺术价值。例如，尼姆附近的加尔桥（Pont du Gard）是一个蔚为壮观的输水道，将水输送到陡峭河谷的另一端（输水道下面是加尔河）。这座桥是用大块的石料砌筑而成，这些石料都没有经过打磨处理。在制作拱券时需要临时性的木构支撑物，但是，一旦拱券完成，支撑物就被拆除了，以拱券来支撑自身的重量，而更多是靠拱券的两侧支撑。一些石头砌体凸出在外以支撑那些临时性的木结构，当这座桥建成之后，那些凸出的石头也就留在了那里，一直留到了今天。加尔桥地处偏僻的乡下——今天人们来这里探访是因为对桥本身感兴趣，同时也因为人们喜欢到这里的河流中沐浴，而不是因为这座桥距离小镇的中心不远。当加尔桥刚刚建成的时候，当然会令来这里参观的人感到惊异与震撼，虽然来访的人并不多，但是，当时来这里参观的人就像我们今天去参观一座新建的大坝一样，是因为它的壮观，而不是因为它的艺术成就。如果加尔桥建在市中心，那么人们一定会精心建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马的皇帝浴池和万神庙都有十分精美的装饰，石料也经过了精心打磨。在基本的工程结构之外覆盖有大理石嵌板、经过雕刻的装饰件以及马赛克。表明这些建筑具有很高地位的装饰源自于古希腊人发展起来的神庙建筑，这一点可以非常清晰地从尼

姆的方形大厦（图13）中看出来。方形大厦乍看上去与帕提农神庙（图7）颇有几分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这两座建筑不仅属于单个的神庙建筑，也属于它们各自所代表的神庙建筑群。例如，希腊神庙的柱子都是圆形的，矗立在一个台座之上，台座的每一侧都有三步台阶（台阶相当大，这是出于视觉效果上的考虑，而不是为了方便上下——在建筑的尽端有一段石坡道专门用来上下台座）。相反，罗马神庙只是在正面设有柱子，也只在正面设有一跑踏步（这些踏步是专门设计用来上下的）。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罗马神庙从更早的、我们称为伊特鲁里亚（Etruscan）神庙类型发展而来，这也是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其论文《建筑十书》中对这种神庙（图17）的称呼。这一名称让人想起了罗马的古往时代，当时这个聚落是伊特鲁里亚[17]（Etruria）的一个行省之城。这个聚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已不为人所知，但是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成为伊特鲁里亚的首都之后它扩展了疆域——最初只是将临近的地区揽入怀中，接着环地中海的其余大部分地区以及部分更远的地区也都尽入其彀。按照维特鲁威的说法，伊特鲁里亚人的神庙建在一个石筑的高台上，在神庙的正面用木柱子建造了一个门廊。神庙的墙体是用晒干的土坯砌筑的，这种材料一旦遇水就会变得松软，甚至会被大水裹卷而去。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一座高台将神庙托在地面之上，以及为什么神庙屋顶的屋檐向外悬挑的原因。柱子的间距比起希腊神庙的柱间距要大得多（只是从比例上看起来更大），这是因为柱子和两柱之间的梁枋都是木结构。这些神庙从尺度上看是相当的小，木结构与土坯结构都容易糟朽，而希腊神庙，在罗马人开始接触它们的时候，在尺度上就相当巨大，而且是用石头建造的。不仅如此，希腊人还形成了一套对柱子与梁楣进行精雕细刻的规则体系，这一体系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其比例之精细，调整之细微令人赞叹。比如说，柱子的造型用了起伏的长棱（凹槽），这些长棱都是现场雕凿的，因而不会在运输途中遭到破坏，柱身与凹槽有收分，因而柱子的顶部就比柱子的基础部分显得细一些。收分并不是沿着一条笔直的直线进行，而是微微地有一点向外鼓出，然后再沿直线向上收分，因此并不明显。这样一个鼓出的部分（柱中微凸线[18]

）是经过精心处理的，其目的是希望用肉眼看过去时柱子显得很直——如果没有这个微凸的处理，柱子中部给人的感觉会明显偏细。由此可见，希腊人为他们的神庙建筑不惜工本，或者说，至少在那些重要的神庙建筑，如帕提农神庙上是如此——人们用精美的雕刻精心装饰帕提农神庙。神庙内部不仅有按照传统做法用青铜铸造并用金子和象牙加以装饰的神像。神像由菲迪亚斯塑造，他还负责塑造了著名的奥林匹亚[19]（Olympia）的宙斯神像（宙斯神像总是与金字塔一起被列为古代世界的“奇迹”之一）。这些雕像现在早已不知所踪，但是，那些装饰帕提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刻大部分还在（许多大理石雕刻保存在大英博物馆，被人们称为埃尔金大理石雕刻[20] [Elgin Marbles]）。帕提农神庙影响深远，它给古罗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罗马人采用了希腊人的建筑语言，加以简化后应用在整个罗马帝国广阔土地上的建筑中，使得这一古典建筑语言成为装饰欧洲、北非与中东地区的建筑的最常用语言。

图17　朱诺·索斯皮塔神庙模型，拉努维乌姆，伊特鲁里亚神庙，据维特鲁威（公

元前5世纪）。本图所示的建筑是按照维特鲁威在他的《建筑十书》中的第四书第七节中所描述的伊特鲁里亚人的神庙制作的模型。因此，这是古罗马建筑师心目中的罗马帝国之前的罗马神庙的古代形式。内殿的墙是用晒干的土坯砌筑的，易受到水的侵袭，因而这座建筑建在石制的台座上从而得到抬高，这样墙体不受地面上的水的冲刷。柱子是木质的，用后世的标准来看，这类建筑并不大，但其柱子之间的间距却比后来典型的柱间距要大很多。后来的建筑物是用石头建造的，但它们需要更为稳定、坚固的比例关系，因为对石头房子施加向下的压力时，它们会很坚固，但是如果它在侧面受到推力或拉紧时，石头房子很容易坍塌。房子的屋顶有一个很宽的出檐，这同样是为了防止水的侵蚀——这回是防止雨水的侵蚀。在内殿中有3个房间，并排布置在墩座上。这就是古罗马人的神庙建筑类型，那时他们还没有学会用希腊的砖石结构和艺术技巧来建造纪念性建筑。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尼姆的方形大厦（图13）——这座保存得最好的典型古罗马神庙建筑，我们从中会看到对古老的伊特鲁里亚神庙的文化记忆，只不过披上了一层希腊神庙建筑的精致外衣。在高台座的一端有一间封闭的房间，应该是放置神像的所在，透过门廊向外可以望到公共坛台——供人们奉献祭品的地方。然而，这间（被称作内殿的）房屋的外墙上有雕刻，让人联想到围绕希腊神庙的一排柱子。

记忆

建筑自身能够负载关于过去建筑的文化记忆，当需要赋予一座建筑某种得体感或权威性的时候，西方文化中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建造这样的房屋——它们在某些方面能够让人回想起过去的建筑——常常是古代的建筑。因为西方文化一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像蒙蒂塞罗这样建造在偏远地方的建筑，凭借从有限的几本书上获得的知识就能与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整个建筑传统相呼应。每一次建筑的古典语言出现复兴的时候，古典建筑的不同层面就会突显，并成为关键性的属性，因而古典建筑就会有许多不同的阐释方式，并可以指许多不同的事物——其中一些完全是水火不容的。例如，阿尔贝特·斯皮尔为纳粹

设计柏林的建筑时使用了古典主义的某种形式，我们认为这种古典主义形式看上去是专制与压迫的体现，但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大学所使用的古典主义形式看起来则是亲切的，是自由与乐观的体现。古希腊的古典主义常常被视为民主的象征，因为民主的思想就产生于雅典；但是，当这种古典主义形式为罗马人所使用时，它体现的是一种不同的秩序，就像是一个跨国公司的“企业形象”工程。有时候会存在某些说法，认为古典建筑超越了时间与文化变化的限制，代表了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正确形式。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虽然建筑的造型没有太大变化，但建筑的意义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在公元前5世纪按照古典方式建造房屋与在公元3世纪按古典方式建造房屋的意义就有很大不同，到了16世纪又有所不同。看待建筑时我们总是把建筑置身于一个由我们以前看到的建筑组成的大背景中，这影响了我们对建筑的真实感受——事实上，这意味着我们注意到了建筑的不同层面。建筑的造型可能多少变化不大，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文化中我们会认为这些建筑是不一样的，甚至每个人眼中的建筑都不同，这取决于我们的经历和学识。

注释

〔1〕 帕那塞斯山，希腊中部的一座神山，海拔约2,458米，位于科林斯海湾的北岸，古希腊时是阿波罗神、狄俄尼索斯神和缪斯神的圣地，德尔斐就在这座山的山脚下。

〔2〕 德尔斐城，位于希腊中部的一座古城，其年代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7世纪，那里有阿波罗神庙等建筑，曾是希腊著名而神圣的聆听神谕之所。

〔3〕 雅典卫城内偏北的一座神庙建筑，是由古希腊建筑家菲狄亚斯等人建造的，建筑立面上使用了著名的女像柱。

〔4〕 弥诺陶洛斯，希腊神话中牛首人身的怪物，据说住在克里特岛的迷宫中，并将雅典城进贡来的童男童女一一吃掉，这个怪物最后被忒修斯杀死。

〔5〕 伊卡洛斯，古希腊发明家代达罗斯的儿子，他用他父亲制作的人工翅膀逃离克里特的迷宫时，由于离太阳太近而致使粘翅膀用的蜡熔化而掉进了爱琴海。

〔6〕 沙特尔，位于法国北部巴黎西南方的一座城市，城内建造于12世纪的

大教堂为法国哥特式建筑中的佼佼者，以其彩色玻璃和不对称的钟塔尖顶而著名。

〔7〕 沙特吕侯爵（1734—1788），法国军人，13岁进入军队，1772年因其著作而成为法兰西学会成员，1779年成为赴美国的远征军将领之一，并参加过约克城战役，战争结束回到法国后出版了回忆录《北美游记》，1784年袭其兄之爵位而成为侯爵。

〔8〕 伯拉孟特（1444—1514），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师，曾作为教皇朱利叶斯二世的建筑师主持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设计，他设计的罗马的坦比哀多小礼拜堂是文艺复兴的经典之作。

〔9〕 维琴察，意大利东北部城市，位于威尼斯以西，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1164年成为自由城，1797年被奥地利攫取，1866年加入意大利王国。

〔10〕 威尼托区，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地区，濒临亚得里亚海。从15世纪初以来一直是在威尼斯的统治之下，于1797年曾转让给奥地利，并于1806年归还给了意大利。

〔11〕 伊尼戈·琼斯（1573—1652），英国建筑师，把帕拉第奥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带到了英国，主要作品有格林威治女王行宫及伦敦怀特霍尔街宴会厅。

〔12〕 克里斯托弗·雷恩（1632—1723），英国建筑师，曾为伦敦设计过50多座教堂建筑，最为著名者是圣保罗大教堂（1675—1710），此外还设计了牛津谢尔顿剧院（1664—1669）和剑桥三一学院图书馆（1676—1684）等建筑。

〔13〕 查理一世（1625—1649），娶法国路易十四姑母为后并倾向天主教，1638年因为在苏格兰推行英国国教而引起叛乱，1642年内战爆发，1649年国会以叛国罪将查理一世判处死刑。

〔14〕 鲁本斯（1577—1640），荷兰画家，巴洛克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创作了许多肖像画和历史、宗教题材方面的作品。

〔15〕 伦敦的一条繁华大街。

〔16〕 戴克里先（284—305），罗马皇帝，在任内将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个部分（286）。他试图恢复罗马的固有宗教，从而导致了对基督教徒的严酷迫害（303）。

〔17〕 伊特鲁里亚，位于意大利中西部，曾是一个古代国家，其范围包括现在的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的部分地区，这里曾是伊特鲁里亚文化的中心，公元前3世纪被罗马文化取代之前，这种文化分布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

〔18〕 柱中微凸线，为了抵消因为直线可能造成的柱中部凹陷的感觉，在柱子的某个高度位置上雕凿出来的微小隆凸曲线，其效果类似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梭柱”。

〔19〕 奥林匹亚，位于伯罗奔尼撒西北，是希腊南部的平原地区，古代希腊

祭拜宙斯的宗教中心，同时也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旧址。

〔20〕 埃尔金大理石雕刻，专指英国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古希腊大理石雕刻艺术品。

第三章

建筑如何变得伟大

一些特殊的建筑

有一些建筑比其他建筑更为重要。例如，写一本关于古希腊建筑的书，却不提帕提农神庙（图7），那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即使不提位于基西拉岛的阿芙洛狄忒[1]（Aphrodite）神庙，倒也不一定会影响这本书的权威性。阿芙洛狄忒神庙在当时是一座重要的神殿，但是它的遗迹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事实上，真正的古希腊神庙遗存现在非常稀少，弥足珍贵，因此，一本书就可以提及所有这些遗存，或者至少提及所有这样的遗存——考古发掘帮助人们进行复原设计，这样原遗址上的那座巨型建筑就呈现在了世人面前。在古代，神庙建筑远比现有遗存要多得多，其中一些神庙可能用的是容易糟朽的材料，现在早已损毁，无迹可寻。随着时间的流逝，留存下来的希腊神庙屈指可数。有些时期、有些地方留下来的希腊神庙甚至更少。例如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罗马人离去与1066年诺曼人到来之间的这个时期），大多数建筑都用的是木结构，这些建筑早已朽毁，没留下一点线索供人们探寻。留存下来的建筑——很不寻常——是用石头建造的，而且留下来的也只是断壁残垣，因为这么多年来，人们在这些建筑上进行扩展或重建。整体上说，那时的住宅很少用石头，但是，有时教堂用的就是石头；在有些地方，教堂是一个聚落繁荣与发展的一部分，在上千年或更长的历史长河中，教堂在某个时候被改造或重建。因而，我们所知道的为数不多的盎格鲁 - 撒克逊时期的建筑都是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聚落中的教堂。因此，那些要建更为恢宏的哥特式教堂的公民自豪感在这里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近几十年来，对建筑的认识得到了其他信息的补充，这些信息来自于对朽烂在地下的木构遗存的发掘分析。腐朽的木料改变了木料所在地土壤的颜色与密实度，如果这期间这块基址上没有反复建造房屋，也没有用现代平铲深推过，那么就有可能推测出建筑物当时的样子。因此，如果我们试图展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建筑，那么我们发现颜色发生变化

的土壤样本所在的位置是我们的重要依据，如果流传下来的一座建筑被证明是盎格鲁 - 撒克逊时代的建筑，我们肯定不会忽视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座建筑具有重要价值，即使它很不起眼。

如果我们试图写一部有关现代建筑历史的书，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恰恰相反。要提的现代建筑太多，无法逐一提及，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一切都不得不略去。一个现代大都市中最大的现代建筑往往是商业建筑——办公大楼、购物中心、多层停车场等等。在一本讲述建筑历史的书中，这些建筑往往不会入选，因为它们似乎不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性。当然也有一些少有的特例，像纽约的西格拉姆大厦（图18）就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原因将在后面解释。即便是非常著名且视觉效果良好的建筑（如费城市政厅）也不具备足够广泛的文化意义，很难入选一般性的建筑综述，而一座小型住宅，如施罗德住宅（图9），不显眼地隐于乌得勒支的中心之外——乌得勒支市远比费城小——却是20世纪最知名的建筑物之一。在建筑师眼中，施罗德住宅无疑是20世纪最著名的荷兰建筑。事实上，在非荷兰籍的建筑师看来，施罗德住宅很可能是有史以来人们最熟悉的荷兰建筑，尽管在乌得勒支的中心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有一座大约与施罗德住宅建于同一时期的邮局大厦，非常壮观。这座邮局大厦在材料的使用上颇具尝试性，它用传统的荷兰砖砌筑了一系列抛物线形的拱，并在拱洞之间设置了玻璃窗，从而使中央大厅阳光充足，气势颇为壮观。这座邮局大厦更为宏伟，在技术上也更为高超，它的室内空间同样令人震撼，然而，只有业内人士知道设计人是谁。这座邮局大厦充其量不过是一座地方性建筑。

图18　西格拉姆大厦，曼哈顿，纽约（1954—1958）；建筑师：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和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1906年生）。密斯·凡·德·罗是一位非常严肃的建筑师，他曾是培养新型设计人才的设计学校——位于柏林的包豪斯的教务长。他于20世纪30年代离开德国移居芝加哥，在那里他加强了对曾认真思考过的钢骨框架建筑的关注。他在美国获得的比较早的设计委托都位于芝加哥，或芝加哥附近，其

中包括一座为伊迪丝·范斯沃斯（Edith Farnsworth）设计的一座透明得令人吃惊的钢框架住宅（1945—1951）和一组位于芝加哥湖滨大道第845-860号的可以俯瞰密歇根湖的公寓建筑（1948—1951）。本图所示的西格拉姆大厦也全部用玻璃作外壳，并且分成了绝对规则的钢构网格。西格拉姆大厦是一座享有更高声誉的设计项目，这既是因为它所处的显著位置，也是因为它的造价预算十分高昂。这座建筑的玻璃是青铜色的，窗子之间竖直方向的直棱是暗青铜色的。西格拉姆大厦没有像一般的建筑物那样为了符合当地的建筑设计规范而让上部各层从人行道线上后退，而是将一大片用地基址处理成了公共的开放空间，从而使得这座建筑从广场边缘到屋顶都采用了垂直的造型，而不必将直棱的竖直线条打破。这是一个非常铺张的做法，如果在一个地价较低的城市，这样的做法也许没有那么具有轰动效应，也更容易模仿。西格拉姆大厦已被看作是一个范例，可以教大家如何设计出一座经典的钢骨框架结构的高层写字楼。西格拉姆大厦被大量模仿，而它的神秘感却并没有因此而削弱。

声望与愉悦

文化的影响力在这里起了作用。对于普通事物我们往往觉得没有解释的必要，因为它们太普通，不值得关注。我们一次只能关注一件事，因此把注意力投向与众不同的、特别的事物才是明智之举。因而，我们注意到了帕提农神庙和悉尼歌剧院（图19），但是，对于普通希腊人或普通澳大利亚人的住宅，建筑史书上则着墨不多，当然，如果我们要对这些住宅进行研究，我们对生活其中的人的生活方式肯定会了解得更多。而古希腊可供探究的住宅建筑遗存不多，因而不可能肯定地说人们是如何使用它们的，但是现在人们尝试着去推测，然而在对古希腊进行研究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值得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因为能够使讨论深入的证据几乎是少之又少。当人们来到悉尼现代化的郊区时，看到那里的住宅并不像悉尼歌剧院那样令人赏心悦目，但是这座住宅却能够让我们了解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住户的生活，正是这种文化产生了悉尼歌剧院，这就使得悉尼歌剧院得以建造更加不同寻常——不同寻常本身是确定无疑的。有无数文化上

的和建筑实践方面的理由来说明修建悉尼歌剧院几乎是不可能的。澳大利亚人在国际上更多地以其对冲浪运动与野餐烧烤的热爱出名，而不是以其对歌剧的热爱而著名，但是他们为寻求一个好的设计而举行了一项大规模的国际竞赛，结果丹麦建筑师约翰·伍重（Jorn Utson）以他富于吸引力的草图赢得了竞赛。伍重并不知道如何实现他的设计，因此为了使设计蓝图变成现实，他对设计方案作了重大修改。这项工程的造价一直很高，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实验性的创新设计，人们没有预料到造价逐步攀升，澳大利亚人不得不去寻找新的资金来源（为了获得经费还专门设立了一种彩票）。建筑师伍重受到了攻击，并且被解雇了，于是澳大利亚人又请了其他人来完成建设工作，并让他找到一个方法使这个花费高得惊人的庞然大物能够满足歌剧院的使用功能。悉尼歌剧院已经建成，并已经嵌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景观中，在我们眼里，它似乎天生就是世界的奇迹，是整个澳大拉西亚的象征，这一形象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悉尼歌剧院是最新奇瑰丽的现代建筑之一，但是，它在现代建筑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因为很难从中看到建筑的传承发展。悉尼歌剧院看上去气势非凡、风格独特，但它显然不是翻开建筑史新篇之作。

图19　歌剧院，悉尼，澳大利亚（1957—1973）；建筑师：约翰·伍重（1918年生）。丹麦建筑师约翰·伍重在1957年的一次国际竞赛中以一些潦草但却优雅的草图赢得了悉尼歌剧院的设计委托。这座建筑的设计随着工程师欧维·

阿鲁普（Ove Arup）及其合伙人的深化而有所改变，因为他们要与建筑师合作以找到实现这些设计思想的方法。早在悉尼歌剧院的内部装修完成之前它已成为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最常使用的象征符号，悉尼歌剧院的修建可谓是充满了传奇色彩。建筑之较低的部分是一些几乎无法开窗的体块，伸出到悉尼港之中，看起来就像是大陆的一部分，并构成了建筑的基座，在基座上展现的是适于拍摄的贴饰有瓷砖的混凝土壳体部分，壳体覆盖之下的部分就是观众大厅的所在。

而纽约的西格拉姆大厦（图18）却掀开了建筑史新的篇章。这座建筑由密斯·凡·德·罗〔2〕设计，他曾经是德国著名的激进设计学院包豪斯的最后一任教务长。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纳粹的当权，许多人离开德国移居美国。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各不相同。一些人知道他们留在德国会有生命危险。密斯试图留在德国，但是他发现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创作，因为希特勒对设计颇有兴趣，并决定倡导一种更为传统的建筑类型，但现代主义建筑却因其非德意志性而遭到了禁止。因而，几经周折，密斯中断了自己的事业，移居美国，落脚在芝加哥，成为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一名建筑学教授，并设计了这所学院的校舍。（沃尔特·格罗皮乌斯〔3〕[Walter Gropius]，包豪斯的第一任教务长也同样移居美国，成为耶鲁大学的建筑学教授。）密斯有很大的个人影响力，他也将这一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他在艺术上的目标是消除建筑创作中个人风格的影响，发展出以理性的方法表达建筑的钢骨架结构的建筑类型。芝加哥的高层建筑都是钢骨架结构，但是，较早时期的高层建筑采用的是历史上的装饰手法，以使其披上一层文化上受尊重的外衣。这一处理手法与古罗马人用传统的希腊建筑装饰来包裹他们大胆而新颖的穹隆式结构的做法如出一辙。例如，胡德设计的芝加哥论坛报大厦是一座引人注目的漂亮建筑，它用石头进行贴饰，具有哥特式的装饰风格，因此它表现出了非常优美的建筑外观，与历史上的纪念性建筑相媲美（图20）。其实，芝加哥论坛报大厦的所有者希望产生这种效果，为了实现这一效果，他们把从世界各地著名建筑上“切割”下来的石头嵌于其中。当然，这些石头并不是真的从著名建筑中切割下来的，否则那些著名建筑就会遭到破坏。人们称这

些石头来自金字塔所在地吉萨或泰姬·玛哈尔陵（Taj Mahal）的所在地这样的地方。这些石头残片所起的作用是提醒我们将芝加哥论坛报大厦与历史上的伟大建筑成就相比较。相反，密斯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历史装饰，而是力图使自己的建筑看上去就是由钢框架做成的，而事实上支撑他那些建筑的也正是钢框架。要达到这种效果听起来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密斯以在设计上的独具艺术匠心而著称，因此他设计出的建筑作品看起来十分简洁。用他的话说，“少就是多”。有一种传统的说法是“魔鬼藏于细部之中”，意思是某些宏大的想法常常因为一些小的技术障碍而不能实现。密斯却反过来说：“上帝存在于细部之中”，意思是说一座建筑之所以特殊是因为细部经过慎重的推敲，并圆满解决。密斯首先在芝加哥的湖滨公寓，接着又在纽约的西格拉姆大厦中确立了现代高层建筑的模式，自那以后，西格拉姆大厦作为简洁的办公大楼的典范而被人们大加模仿。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照片中的它显得有点乏味的原因——因为西格拉姆大厦所具有的影响，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座普通的办公建筑。事实上，它比普通的办公楼建筑要特殊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开创了这类建筑的先河。西格拉姆大厦的玻璃窗是青铜色的，直冲顶端那简洁明晰的暗直棱线条用的也是青铜色，使整座建筑显得颇为高贵、深不可测。这座建筑造价十分高昂，这就意味着其模仿者建造出的建筑往往明显会比西格拉姆大厦低劣、粗糙，但是，西格拉姆大厦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倒不是主要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如此多的人模仿。这就是西格拉姆大厦在文化上重要的原因，也是建筑历史总要提到它的原因所在。相形之下芝加哥论坛报大厦可能也得到了同样多的赞美，但模仿的人却少得多，因此我们不能说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芝加哥论坛报大厦值得赞美，但是它没有改变建筑师看待办公楼的方式，因此，它在历史上就没那么重要，即使它可能算得上是一件更好的艺术作品（可能有争议）。我们倾向于认为某些建筑“伟大”是因为它们改变了建筑史发展的进程，掀开了建筑历史新的篇章，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回顾历史时，这些建筑看起来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这与假设那些力图显得超前的建筑就是具有重要历史

意义的建筑全然不是一回事。建筑发展的方向不可能预测，因此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预言哪些建筑将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建筑要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取得一定的成就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周围的建筑是如此之多，因而，我们讲述的建筑历史不可能将所有这些都还算好的建筑包括在内。

图20　芝加哥论坛报大厦，芝加哥，伊利诺伊（1923—1925）；建筑师：约翰·迈德·豪威尔斯（John Mead Howells，1868—1959）和雷蒙德·胡德（Raymond Hood，1881—1934）。1922年，《芝加哥论坛报》的所有人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设计竞赛，以期找到一个设计方案能使自己的总部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办公大楼。这一竞赛吸引了全世界许多著名建筑师的参加，并且举办了一个参赛作品的巡回展览，因此，由雷蒙德·胡德所做的获奖设计即刻变得尽人皆知，极具影响力。这座建筑位于芝加哥一个十分重要的基址上，芝加哥是在一个十分平坦的地方建立起来的城市，这使得几乎每一座建筑的基址似乎都没什么变化。这座塔形建筑坐落在芝加哥的重要街道——密歇根大街上，濒临芝加哥河——该城唯一的一个自然特色，河岸与建筑之间有一个广场。这一方案将所有的思路都集中在建造一座高塔建筑上，它运用了哥特式建筑的装饰，以使整座建筑看起来像是要飞到那用复杂的砖石结构建成的独特的大厦顶部——这个顶部的原型是建造于13世纪的鲁昂大教堂（Rouen Cathedral）的巴特塔（Butter Tower），但却比其原型要宏大得多。正是钢骨框架的运用使得芝加哥论坛报大厦的建造成为可能，但人们却看不到钢架的存在，因为整个结构都被石灰石所包裹。因此可以说这座建筑在风格上相当保守，在技术上却相当先进。为了赋予建筑高耸、飞腾的效果，豪威尔斯与胡德向历史上的建筑寻找答案，他们显然注意到了哥特式建筑，因为表现这种升腾之势与垂直线条也是哥特式建筑的目标。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设计纽约的渥尔华斯大厦（Woolworth Building）时也采用了一种多少受哥特式建筑启发的风格，渥尔华斯大厦在举行竞赛的那个时候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豪威尔斯与胡德初次相识于非常传统的巴黎美术学院，他们都在那里学习。豪威尔斯在纽约执业，并确立了自己的声誉，所以成为获邀参加竞赛的10位美国建筑师之一。他获得了胡德的帮助，因此一般认为胡德也是芝加哥论坛报大厦的设计者。当然他是一个更为浮夸的人，在竞赛之时，他正债务缠身。当他们的事务所赢得了这次竞赛时，胡德的妻子埃尔希（Elsie）借来了支票，雇了一辆出租汽车，绕纽约一圈把支票拿给各位债权人看。

走向新建筑

早在19世纪时，人们就呼吁要创造一种属于19世纪的新建筑，这并不包括要用源于更早时代的建筑的风格来装饰建筑。为什么不能创

造一种独特的“19世纪”的建筑风格呢？例如，维奥莱-勒-迪克（Viollet-le-Duc）就主张新建筑应该从新的建构方法中产生。但是，直到进入20世纪，创造新建筑这件事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像密斯和勒·柯布西耶发明了一些让建筑看上去像是摆脱了历史装饰手法的束缚的建造方法，这样他们就采取一种现代的建造方式，那就是采用新材料——钢骨框架与混凝土板。这一切看上去好像他们成功实现了19世纪的预言，这类预言那时早已深深地植根于建筑文化之中。到了20世纪中叶，密斯和柯布西耶的思想方式在建筑界已经成为主流。他们之前的那一代人的建筑特别有意思，因为那时的人们试图重新创造一种建筑，但却没有想到建筑走上了向正统现代主义的发展道路，由此似乎每个人对于应该如何进行建筑设计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勒·柯布西耶的一大创举就是主张大批量生产的物质产品是风格名正言顺的风向标，因为机器生产已经取代了传统手工工人的劳作。在1925年的巴黎博览会上，他设计了一座小亭子，称作“新精神之亭”——这一名称源于一本叫做《新精神》的刊物，在这本刊物上勒·柯布西耶发表了他宣言式的著述。这座小亭子据说是为一座由许多这样的单元组成的大城市所设计的原型式公寓，这些单元可以叠加成一座座塔形的建筑。柯布西耶在亭子内部布置的都是大批量生产的家具，并配上他自己绘制的受到立体主义风格影响的绘画。如果说这座亭子如今看起来相当平淡无奇，那就说明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与前一代建筑师如维克托·霍塔（Victor Horta）和赫克托·吉马德（Hector Guimard）一贯推行的那种基于植物形态的新艺术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霍塔作品的手工工艺尤其繁复——精细的涡卷形状有时看起来好像建筑和家具已软化或倒塌，有时又像是要向外伸展出刚长出的枝叶条蔓。木头和石头并不是取其自然的形态，必须对其加以雕琢，因此霍塔和他工作室的成员制作出新式的石膏模型，然后再由建房的细木工匠和石匠对其进行复制。这是一个耗费金钱的过程，因此霍塔的新艺术作品最初只是为能够支付得起这笔费用的超级富人创作的——那时新兴的比利时贵族——他们希望资助一种新建筑作为比利时的民族风格。赫克托·吉马德以其为巴黎地铁站所做的入口设计最为闻名，这座地铁入口建

筑使用了下垂而沉重的头状花序，并发出昏暗而神秘的红色光亮，似乎在召唤行人进入一个梦幻的世界，而不是进入到一个高效的交通系统中，但是这些入口建筑的制作却非常理性，并不依赖个人的手艺，而是依靠用模具翻制的不断重复的铸铁构件。地铁入口建筑看起来可能令人困倦，然而其生产方式却是高效的。

在建筑中批量生产方法的使用为勒·柯布西耶举办大批量生产的家具展览作了准备，但是在柯布西耶活动的这个先锋派圈子中，另外一个具有关键影响的实践是“煽动分子”马塞尔·杜尚[4]（Marcel Duchamp）将大批量生产的现成用品搬进艺术陈列馆进行展览。他是从1914年开始这样做的，当时他用了一个令人惊异的沥干酒瓶的架子，但是，他最著名的“现成品”是一个白色陶瓷小便器，他在1917年将其以《泉》为标题进行了展览。今天，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件雕塑展出的时间——1917年，若是当代艺术家做了类似的事情，仍然会令小报记者感到吃惊，虽然在现在的艺术规则下，这样做已经了无风险。建筑史上也有一件作品可与杜尚的小便器或名为《泉》的作品相提并论，那就是在1928年建成的勒·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Villa Savoye）走廊中显眼位置上摆放的白色陶瓷盥洗盆，他把盥洗盆摆放在这里似乎具有某种仪式性的意义，就好像是放置了一个圣水钵[5]一样。在这两个作品案例中使用的这种大批量生产的物品都是为了取其雕塑效果，而其所在的非一般的位置使其具有了某种姿态意义。很明显的一点是，它摆放在那里并非偶然，但是，它不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人们往往会把它看成属于艺术王国和高雅文化的一种姿态，而不是将其看作世俗生活中的一件实用品，虽然这两种物品都是实用品。这类物品要表现的一部分意义是：它们是大批量生产出来的，没有感情，这赋予了它们机器美学的特征，然而这与吉马德用机器生产的装饰板并不是一回事，因为他看重的是价格因素，机器生产是以合理的价格生产装饰板的最有效方式。事实上，吉马德的装饰板并不是标准化的产品，而是他本人精心设计的，并按他所设计的建筑中的需要进行限量生产（不给别人使用）。吉马德为地铁入口所做的设计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除了新颖、引人注目外，这些入口在本质上都是一样

的，作为地下交通系统的入口，它们显然被想象成一种建筑“类型”，而不是独一无二的个人创作作品。当勒·柯布西耶和密斯·凡·德·罗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兴趣点在于发展新的居住建筑类型和钢框架结构建筑时，人们还不能马上将吉马德作品的个性化外形与建筑生产的理性主义进程联系在一起。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这些入口建筑与它们所通向的交通系统一样是高效的、理性的，虽然这不是单个的入口建筑所要表达的意思。

图21　地铁出入口护拦及雨篷，巴黎，法国（1899—1905）；建筑师：赫克托·吉马德（1867—1942）。巴黎第一条地铁线路开通于1900年7月19日，从一开始人们都是通过一个名叫赫克托·吉马德的年轻人所设计的出入口进入地铁——他得到这些出入口的设计委托时仅有32岁。他到过布鲁塞尔，参观了维克托·霍塔所设计的流苏宾馆（Hôtel　Tassel，1892），这座建筑将流行的新艺术风格带进了建筑中。在地铁车站的设计中，吉马德将这种风格融进预制铸铁件中，这些出入口可以用极快的速度出现在街坊之中，就好像是一夜之间从地下冒出来似的。一些出入口装有玻璃雨篷，另外一些没有装，但是所有入口都使用了标准的预制件。当这些出入口刚刚建成的时候，媒体一片叫好，但当新艺术运动的风潮过去后，这些出入口被移走了，而不是得到维修。1927年到1962年间，最初建成的地铁站出入口都被拆除了，仅仅留下了两个，一个在道芬（Dauphine）站，另一个在艾比斯

（Abbesses）站。现在的许多地铁出入口都用的是复制品。

用艺术的眼光来看，地铁似乎就是一个感性的梦幻世界，于是地铁就笼罩在一种远离我们所熟知的地上的日常生活的气氛之中。乘坐地铁被描述成落入阴间一般，然后再像俄耳甫斯[6]（Orpheus）一样从阴间返回了人间。这种氛围并不影响地铁成为实用的交通系统，但是其实用性并不是地铁入口建筑所要表达的意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为毕尔巴鄂地铁系统所做的设计则尽可能做到合理，力图让乘客在走近地铁站台的时候保持方向感。他采用的方法是从街道地面直接连接下来，在行进途中几乎没有转角。相反，巴黎地铁各线路之间的连接部分如同迷宫一样，步入其中的乘客肯定会感觉像是在地狱一样，这进一步加强了失去知觉的联想，这种感觉或许还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地铁在巴黎人的叙事故事中一直扮演着某种角色，从雷蒙·凯诺（Raymond Queneau）的《地下铁中的扎齐》（1959），到让-皮埃尔·热内（Jean-Pierre Jeunet）的《阿梅莉·普兰的神奇命运》（2001）都是如此。

回归基本原理

对于吉马德那一代的前卫建筑师来说，通常大自然是他们的出发点。在格拉斯哥[7]（Glasgow），查尔斯·兰尼·麦金托什[8]（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画了一些热情奔放的花卉画和风景画，而他的建筑作品则利用蜿蜒的线条和几何图案。在芝加哥，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发展了他的“草原式住宅”类型，使用了宽广的飘檐，据说这是为了与草原辽阔平坦的地平线相呼应，尽管这些建筑就位于芝加哥郊区。在巴塞罗那，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í）通过研究骨架和蜂窝形成了他那极具个性的建筑处理方式。他的建筑作品中最能体现他的抱负的例子就是圣家族赎罪教堂（Sagrada Familia），他把塔楼设计成像石笋一样的古怪式样，这座建筑高迪终其一生也未能建成（图22）。这些建筑师都试图从基本原理出发重新创造建筑的形式，

试图找到一种反映新生活的新的设计方式和建造方式。从风格上讲，这几位建筑师彼此之间各不相同，因此，用同一个名字来称呼他们的建筑作品，（不管是新艺术风格建筑还是别的什么名称），这对于理解这些建筑并没有什么帮助，但是，这些建筑师所具有的共同点是他们的设计都十分具有个性，明显是在刻意追求创新。他们之前的几代建筑师都习惯于追求某种“正统”思想以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权威性。这样建筑看起来会与历史上那些令人赞叹的经典建筑相似，当然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也会对其进行创新，但是这种创新是一定范围内的创新，是在已确立的以得体为框架的创新。即使是彻底的创新，也可以通过祈助于已有的先例而具有权威性，如果这位建筑师是向遥远的古代而不是近代学习并探求经典建筑的创作方法。在15世纪初的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人们周围的建筑都是些具有中世纪特征的建筑，具有探索精神的建筑师，如阿尔伯蒂和伯鲁乃列斯基就是通过对罗马建筑的关注而使建筑产生了变化。18世纪中叶，巴洛克建筑在华丽与奢侈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时出现了回归简洁的呼声，并要求表现出建筑的基本建构原理。这一呼吁由马克-安东尼·洛吉耶率先提出，他当时是凡尔赛宫小礼拜堂的牧师，这座小礼拜堂的巴洛克风格之典型，装饰之繁复，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出其右。1753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设想了一座利用尚在生长的几棵树搭造而成的原始棚屋，以此作为纪念性建筑的源起。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发掘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古希腊的纪念性建筑，以转向纯净、简洁、优雅的名义要求回归古希腊的审美趣味成为可能。然后在19世纪，虽然在一些特殊场合也建了一些其他风格的建筑以彰显异域情调，但是古典建筑是主流，这时哥特式建筑得到了复兴，特别是普金，他将哥特式建筑表现为真正的基督教建筑，丝毫没有受到哥特式建筑与异教历史有关联的影响（图5）。这些例子说明时下的审美趣味与建筑实践的每一点变化，都是通过与近代建筑的决裂、对古代建筑的回归实现的。

图22　圣家族赎罪教堂，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西班牙（1882年始建）；建筑师：安东尼·高迪（1852—1926）。这座教堂并不是巴塞罗那的主教堂，主教堂是位于古城中心的一座漂亮的中世纪建筑，而圣家族赎罪教堂的建造是由巴塞罗那书商约瑟·博卡比拉（Josep Bocabella）发起的，他指导过“圣约瑟夫祈祷者联盟”（成立于1866年）的工作，这个组织的成员一度发展到了50万人，包括教皇和西班牙国王。工程的第一位建筑师很快就放弃了这个项目，高迪于1883年接手工作，那时工程还未露出地面。这座教堂建造得十分缓慢，主要依赖私人捐款，至今仍未完工，但是，建设工作按照高迪的总体思路仍在继续，而高迪对造型独特的、惊人的认识是建立在对结

构原则和实用建造技巧的深入理解与再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建筑师获得声誉的一个方法是设计出某种意义上的原创作品，这样人们一看便知这是谁的作品。高迪的建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没有人像他那样设计与建造房屋。然而，这并不是说建筑越独特越好，或越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帕提农神庙是具有最高质量的建筑，但是，它看起来却与当时所有的希腊神庙非常相似，如果帕提农神庙与希腊神庙建筑大相径庭，那么，它就不会比现在的帕提农神庙更出色（图7）。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它缺乏创新：帕提农神庙并不是早前那些神庙建筑的简单重复。首先，帕提农神庙比大多数神庙建筑都要宏大，所用石料也更好，神庙的装饰性雕刻在创意上更为新颖，在工艺上也更为精美。这座建筑的不同寻常之处还在于，它在正立面上设置了8根柱子，而不是普通神庙建筑所设的6根柱子，并在立面设计中作了视觉调整的处理，这种调整几乎看不出来，但是，对石头造型的要求比普通建筑对石头造型的要求更高，需要更加小心，技巧更加纯熟，这标志着这一类建筑对精准、细腻程度的关注。除了在神庙周围的柱子上用了装饰性的中楣之外（这种做法在这类神庙建筑中颇为常见），在围绕着中室的外墙之上也设置了一条中楣，透过两柱之间的空隙可以看到它，这样的处理在以前的建筑中从来没有过。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帕提农神庙根植于希腊神庙建筑传统之中，但是，它比之前建造的任何神庙都要宏伟和辉煌。假如菲迪亚斯、伊克蒂诺和卡利克拉特合作建造的不是这座帕提农神庙，而是像圣家族赎罪教堂那样的建筑，只要稍微想一下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建筑不可能建成。若是如此，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公民会如何看待它？它看起来会让人觉得十分怪异、粗俗无比。它向雅典公民传达出的信息是设计者不了解、也不关心雅典人的文化。假如雅典公民看到这样一座古怪的建筑，他们看不到建筑里有任何东西让他们产生熟识之感，让他们觉得自己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其实我们所使用的barbaric（粗俗）一词就源自希腊语，表示“外国人”的意思，这就告诉了我们古希腊人对异族人的看法。

熟悉的和异域的文化

如果说比起古希腊人来，我们更欣赏异族人和他们的建筑作品，那么，我们也会对属于异域文化的建筑中蕴含的符号加以解读或误读。一座纪念性建筑，如泰姬·玛哈尔陵（图23），就像帕提农神庙一样，根植于它自己的传统之中，了解那些传统也就理解了这座建筑。泰姬·玛哈尔陵是古往今来众多陵墓建筑中的一座，以其无与伦比的华丽、高雅超越了其他陵墓建筑。泰姬·玛哈尔陵的形象已经为全世界的人所熟悉，但是，在世人看到它的形象时，很少有人依据其所在地的文化去解读它。在旅游遍及全球的国际文化中，泰姬·玛哈尔陵是作为整个印度次大陆迷人的异域风情的象征出现在世人面前，就像悉尼歌剧院被看作是澳大利亚的象征一样。这些形象为全世界的人所熟悉，是旅游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当其他国家的旅游者追寻这些著名景点而来并为这些建筑拍照的时候，他体验到的倒不是面对某种新奇、神秘的东西而产生的对立情绪，相反，他有一种熟识的感觉。拍摄经典的旅游照片（“我来了，正站在埃菲尔铁塔前面”）并不是了解世界建筑的方法——在旅游指南中有更为清楚的照片和更为详实的说明——而是证明他属于能够周游世界的特权精英阶层的一个方法。现在能够到世界的另一端去旅行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这样做并没有很大的困难，也不需要出具任何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新闻和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更为容易，也更为迅速，因为我们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已经全球化了。如果我们想对泰姬·玛哈尔陵及其重要性有更多的了解，那么我们就需要对印度北部以及波斯的伊斯兰建筑进行研究，因为泰姬陵的建筑师就来自波斯。如果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悉尼歌剧院的建筑形式中蕴含的意义与所具有的重要性，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找不到答案，而应该到丹麦，或许应该到地中海地区去寻找答案，因为约翰·伍重曾经在地中海地区为自己建造了一座住宅。文化影响与建筑所在地的关联不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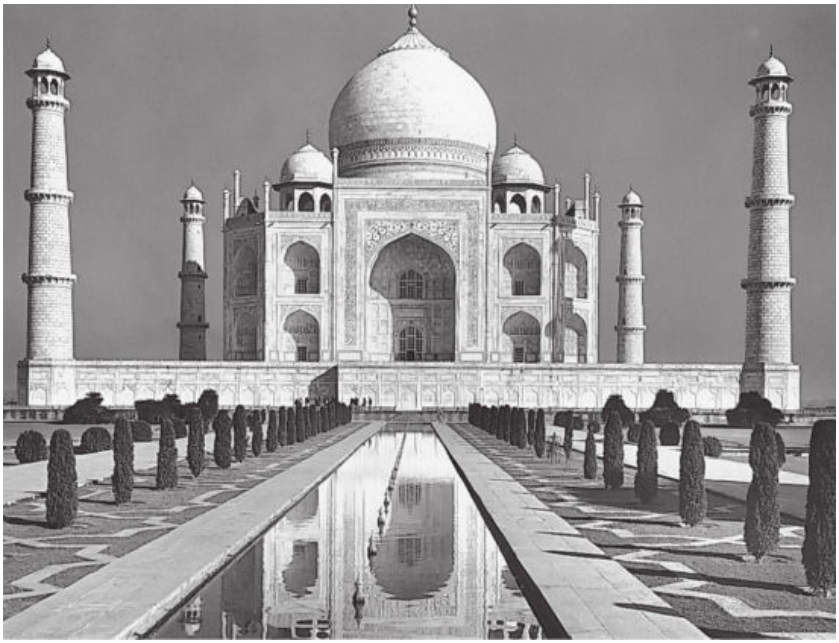

图23　泰姬·玛哈尔陵，阿格拉，印度（1630—1653）；建筑师：乌斯塔德·伊萨（Ustad‘Isa，生卒年月不详）。以美丽著称的泰姬·玛哈尔陵是沙阿·杰汉（Shah Jehan）——印度莫卧尔王朝的一位皇帝为了纪念他的妻子蒙塔兹·玛哈尔（Mumtaz I-Mahal）建造的。建筑师的名字本已被忘却，但却在20世纪30年代找到的文献中重新发现。他来自波斯，泰姬·玛哈尔陵的设计浓缩了几个世纪的伊斯兰传统。这是一个集中式构图的纪念性建筑群，包括了一座红砂岩的清真寺和种有植物的花园以及可以映射建筑倒影的水池。这座陵寝建筑完全用白色大理石包裹，使得泰姬·玛哈尔陵给人一种飘渺似仙境的感觉，无论是强烈的阳光与阴影的交相映射，抑或是黯淡的月色与光影相依相伴，还是伴有落日余晖的五彩斑斓，它都给人这种感觉。这座建筑的优美姿态感动了所有评论者，对其极尽赞美之词，它累积了许多无法证实的浪漫神话。

选择勒·柯布西耶为昌迪加尔（图6）的建筑师同样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他不是当地的建筑师，而是一位在西方建筑文化中确立了自己的重要地位的建筑师。他所属的文化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远去的殖民国家的文化，而这个新独立的邦希望与这种殖民国家的文化有所区别。通过当地的工人来建成高品位的现代建筑，这个邦显示了自己意

欲跻身现代世界的雄心。考虑到旁遮普邦的雄心，如果要修建一座看起来像是新德里的帝国建筑那样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可能就不适当。昌迪加尔的这些设计出自权威的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师之手，表明旁遮普邦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若不是前殖民统治者的代表人物（麦克斯韦·弗赖伊[Maxwell Fry]和简·德鲁[Jane Drew]）一直在努力说服当局和勒·柯布西耶本人，说只有他才能胜任这项工作，那么，勒·柯布西耶根本就得不到这个设计委托。这是一个后殖民主义特征鲜明的设计，它既能够赢得前殖民地居民的尊敬，大概也能够满足当地社区的需求。昌迪加尔的设计在许多方面完全颠覆了布赖顿皇家亭阁（图3）体现出的我们对印度文化的态度，皇家亭阁表现的印度被幻化成了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仙境。而在昌迪加尔，我们看到了印度的形象，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旁遮普的形象——一个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现代化邦。

图24　古根海姆博物馆，毕尔巴鄂，西班牙（1997）；建筑师：弗兰克·盖里（1929年生）。弗兰克·盖里生于加拿大，最初是以学生的身份来到加利福尼亚，然后在那里定居，并开始了他的建筑实践。他最初做的设计都颇为

传统。他在位于圣塔莫尼卡的家中开始的实验性工作把他带向了另一个方向：他设计的建筑在外形上更多地符合雕塑造型的传统。他为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所做的设计既宏伟壮观，又引人注目，并帮助这座西班牙的偏僻城市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并在世界文化地图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古根海姆博物馆是用钢骨架建造的，表面贴饰的是钛板，而其内部是用于艺术品展览的美术馆这一点倒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座建筑是在建筑领域绽放的烟花。

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 24图）肯定属于全球性的旅游文化。这座建筑将毕尔巴鄂市变成了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从而在改变这个小城市的命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古根海姆博物馆为毕尔巴鄂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它的造价，虽然这造价看上去相当高。古根海姆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如果收藏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当然也可以看清楚。古根海姆博物馆所属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多少其所在地——西班牙北部的因素，反而更多地带有洛杉矶——其设计地的许多元素。它的造型是弗兰克·盖里在他那非比寻常的、个性化十足的工作室里发展出来的一组造型中的一部分，显然，这属于盖里自己的个人传统，这一传统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古根海姆博物馆的造型也属于从艺术世界发展而来的前卫传统，这使得它非常适合收藏和陈列前卫艺术作品，我们再一次注意到，这些前卫艺术作品并非本地艺术家之作，而是国际上认可的艺术界明星们的作品。因此，这所博物馆的收藏与美国大城市博物馆收藏的当代艺术藏品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与附近地方小镇中的当代艺术藏品的共同点却不多。通过与国际艺术界的全球化文化的交融，毕尔巴鄂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才能够吸引来游客和投资。古根海姆博物馆成功地被两种文化（前卫艺术文化与旅游文化）所接纳，在这两种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它才获得了成功。

我们再一次看到，建筑师自己的文化是另一种东西。盖里的创作灵感可能是从将纸板折皱，然后再松散地摆放在一块基址平面之中获得的，但是，将折皱的纸板粘结在一块板上与将一个能够用于展览艺术品的艺术陈列馆建造在西班牙的用地基址上，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

之别。一系列技术问题会接踵而至，如果要在建设过程中保证设计思想不受影响，那么，处理这些技术问题时就必须要敏感，而且需要高超的技巧。例如，如果这些造型无法建成，那么就不得不改变造型，因而必须找到建造方法。在这座建筑中，钢骨框架被用来形成基本的形状，然后用可以曲折变形的镀钛板来覆盖钢骨框架。在电子计算机成为工程师日常必备的设施之前，要认真考虑这种建筑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涉及的数学运算太复杂。钢板和钛板没有在工地上切割成型，而是在工厂加工的，因为构件的切割成型在工厂做得更为精确。后来，这些构件被运到施工现场并逐一安装到位就丝毫不足为奇了。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所在地与盖里创造了这一建筑造型的工作室完全不同。他曾经将瓦楞纸板黏结成了一个大的体块而做了一把扶手椅，然后又用链锯进行塑造成型。

构架与体块

那些看着自己设计的建筑顺利建成的建筑师必须关注建造的过程，因为他们常常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建筑作品的最终表达方式。例如，可能要把砖用在体现砖的特性的地方，如墙体和拱券，而钢则要用在能够体现钢的特性的地方，如格网框架。一座钢结构房屋通常需要墙体与窗户以便为人们所用。用墙体包裹钢构架并使钢构架隐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的做法是可能的，这样可以使建筑看起来坚实、稳固。然而，建筑师可能把这种处理方式当成原则：巧妙布置墙体的实体部分以造成是钢骨架在支撑建筑的感觉，而墙体则仅仅是非结构性的屏风，密斯就是这样做的。如果建筑师极其注意结构的细节处理，那他有可能设计出能够得到其他建筑师崇敬的优秀建筑，但是，这种对结构的细节处理在缺乏经验的建筑师看来很像是普普通通的工业劳动。即使西格拉姆大厦，虽然它名望高，具有不可低估的里程碑似的意义，但它从来没有被当作旅游景点来宣传，当然建筑设计界除外。事实上，这里说的“表现方式”这一概念并不像开始那样直接，因为在

垂直与水平方向均匀布置的结构网格并不是建筑结构的全部。一座建筑还需要使用交叉的斜撑，以防止建筑的整体结构在强烈的风荷载下向侧面倒塌（第20层的风力要比地面的风力大得多）。密斯并没有让这些位于对角线上的斜撑表现出来，但是，其他建筑师就表现了这些斜撑（例如，斯基德摩·欧文·梅利尔设计事务所[Skidmore Owings and Merrill，简称SOM设计事务所]在芝加哥的约翰·汉考克大厦[John Hancock]就是这样处理的）。将高层建筑中的钢构架暴露出来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建筑结构需要比钢结构更耐火。因此，在密斯设计的建筑中，钢柱有时不得不用保护性的材料包裹起来，如混凝土。为了表现建筑结构，他随后将柱子用钢套起来，使得建筑看上去就像是被更大的钢柱支撑着一样。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即使建筑师决定让建筑表现它自身的结构，那也并不是说设计过程本身就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建筑师要作出许多常常关系到改变建筑外观的决定。例如，建筑师为什么着力表现抵御重力的结构，而不表现低御风力的结构呢？建筑师为什么不表现柱子已获保护从而使建筑在防火方面更为安全这一事实呢？房屋居住者可能会觉得那样做更让人放心。毫无疑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考虑到深厚的文化传统。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西方传统认为柱子在建筑物中具有特殊价值，它们被看作是建筑的美学效果的基础。重要的建筑都有大尺度的柱子。地位崇高的建筑的柱子选料上乘、精雕细刻。在希腊语中，柱子被称作stylos，这个词是英语中style（风格）一词的词根。围绕着希腊神庙排列的柱列被称为peristyle（围柱式）。一座没有柱子的建筑被称为astylar（无柱式），也就是没有风格。

传统与创新

西方的这一传统受到了挑战，因为有的人试图表现建筑的其他重要方面，诸如供热与通风设备，这些设备可能在总造价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且很难隐藏。例如，巴黎的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Centre

Georges Pompidou）就将各种服务性管道和循环系统——楼梯、自动扶梯和电梯——都布置在了十分显眼的地方，这些设备在建筑结构中穿梭，使这座建筑别具一格（图25）。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的结构处理非常巧妙，因此那些巨大的柱子大部分都隐藏在了建筑内部，于是从主要立面上看到的结构几乎就是一个看上去像脚手架的优质钢制网格架。当人群蜂拥而至的时候，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看起来不过就像是一个专门为其内部、周围举办的活动而搭建的支架，而这正是这座建筑要表现的意义。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是被当成一台“设备”，而不是一座纪念建筑来设计的，它为人们举行活动提供场所，而不是决心拥有一个漂亮的、满足所有功能的造型。通过照片看到这座建筑的人会将其看成一个钢构桁架的装配体，让人联想到炼油厂，但是，来这里参观过的人记得更清楚的则是顺着自动扶梯向上的过程，站在屋顶向外眺望看到的开阔景观，以及屋顶咖啡厅、各样的展品或街头艺人。对这样一座五彩缤纷的庞大建筑来说，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的含蓄令人惊异，但是，它的实现方式与其他建筑如帕提农神庙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会怀疑“建筑”这个范畴都用于这两座建筑是否合适。

图25　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巴黎，法国（1977）；建筑师：伦佐·皮亚诺

（Renzo Piano，1937年生）和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1933年生）。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是一座文化综合体建筑，其中有图书馆、美术馆和相关的服务设施。它建在巴黎中心地区的一个日趋没落的区域（比欧堡），由于这座建筑成为了人们参观游览的热点地区，这一地区得到了复兴。它对于必须将这一类建筑建造成纪念性建筑的倾向提出了挑战，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看起来不过是一个脚手架，让各种充满活力的活动都有各自合适的位置。在设计的早期，几乎每一样东西都可以移动——即使楼板也不例外——但是，随着设计的深入，人们发现这样一种设计思想花费过高，难以实现。在夏天，中心外面通常会有一群群人，有的在中心前面的广场上欣赏街头表演者的表演，横贯整个正立面那醒目的电动扶梯上，几乎总有参观的人流不断地向上涌动，而在人们随着扶梯向上的过程中，巴黎开阔的景象也渐渐尽收眼底。

尽管如此，事实上这两座建筑都隶属于相同的传统，并具有某些共同之处。当然，它们在姿态或氛围上又有许多不同，这些不同是如此明显，无需逐一指出。然而，这两座建筑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展品，也都收藏有艺术珍品。就帕提农神庙来说，备受尊崇的雅典娜神的雕像占据了大部分室内空间，但是，更为神圣的文物则被珍藏在距离帕提农神庙不远的伊瑞克先神庙。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在不断变化的展览中展出主要艺术作品，但是，那些最为人景仰的艺术珍品却都收藏在距此地不远的卢浮宫。每一座建筑都主导了一个室外的空间，就帕提农神庙来说其外部空间被更为正式地称为神圣场所，而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的外部空间则是一个划分明确的公共广场。每一座建筑的室内最为隐秘的部分都限制使用，专供沉思之用，不管这个最隐秘的地方是一位神灵的雕像的所在，还是那些收藏了极具价值的艺术作品的地方。每一座建筑的室外空间都同样充满了喜庆气氛。在祭献的日子，没有物质实体的众神只要闻到刚屠宰出来的牛肉的香味就十分满足了，而雅典公民就要享用这丰美的肉食——那一套套分布在柱廊之中的餐厅曾经是希腊圣殿的一个特征。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广场有街头娱乐表演，还有咖啡馆。在帕提农神庙的柱楣上雕刻有一队行进中的人物，而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则避免使用任何雕刻性的装饰，但是，当参观者络绎不绝地顺序进入横穿建筑正立面的自动扶梯时，他

们就成了行进中的队伍。而且这一行进队伍在这两座建筑中所处的位置几乎是相同的，也就是在室内与室外之间的某个地方：在帕提农神庙里这个位置在神庙周围的柱廊之中，在柱子之间可以看到；而在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这个位置位于一个玻璃管道中，从广场上可以看到。这两座建筑之所以这样处理可能是因为它们关注建筑结构的表现。有一个传统（关于这一点还存在争议），即神庙建筑的多立克式柱楣，如帕提农神庙中的柱楣，是对用木头建造神庙的那个时代的记忆，那些几何化的三竖线花纹装饰板表现的就是木构大梁的尽端。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的各个部分连在一起，而且这些连接手法十分显眼，于是这些构件本身的装配方式就成为了建筑的装饰。另外，这两座建筑都有非常清楚的矩形平面，这绝非偶然：但就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来说，这个矩形平面似乎不那么直观，因为建筑的一些部分延伸到一个下沉式广场的下面。也许这些比较没什么意义，相对于这两座建筑的差异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看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时无疑会想到其他建筑，无论是伟大的文化纪念建筑还是炼油厂。但是，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就不是这样，它的造型不同于我们见过的大多数建筑，其差别之大令人惊异。古根海姆博物馆看起来既不像一座权威的纪念建筑，也不像是一座炼油厂，也不像其他美术馆建筑，但是，随着它的形象日益为人们所熟悉，我们逐渐承认它是一座美术馆。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座建筑呢？创新并不是建筑的终极目标，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彻底的创新完全没有意义。事实上，古根海姆博物馆并非毫无意义，因为它与另一种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考虑到这座建筑的功能，这种关联非常合适：它看起来像是一组雕塑。我们往往透过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我们也愿意因为这些造型的缘故来欣赏其造型，尽管在事实上这些造型并没有反映出建筑内部的使用情况，也没有清晰地表现其建构方法。钢结构框架被完全包裹了起来，因而人们不需要注意钢结构的存在。室内空间与建筑外观全然不同，就像布赖顿皇家亭阁的中国风室内与其印度式外观截然不同一样。与大多数雕塑不同，古根海姆博物馆有一个室内空间，但是，如果从外部看过去，它更像是一个可以居

住的有用雕塑，而不像是一座建筑。如果熟悉盖里的其他建筑，这一印象需要加以纠正，因为从那些建筑中可以看出盖里的个人传统平稳发展的脉络，在这个发展脉络中，每一座新建筑都是盖里个人传统的新发展，这种发展不可预测，但若是回顾过去，这种脉络发展又是清晰的。

当我们遇到建筑时，我们的感受是自然流露的，但是，这种感受经过了文化的过滤。这种文化是在前往这些建筑的所在地的旅程中习得的，其中一部分是刻意学习的结果，一部分则是无意中习得的。我们无意中习得的那些文化将是我们所处文化中的点滴事物，而我们的出生以及我们活动的圈子也会产生文化。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感觉最舒服、自在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我们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因此我们遇到的事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它们的熟悉。不时也可以有一点新鲜感，这样我们就不会有无法排解的乏味之感，但是，我们对周围环境的熟悉就像朋友那可以预见的态度一样令人放心。如果某个我们认为很了解的人开始以难以预料的方式行事，我们就会开始感觉不安。

经过培养的审美趣味

我们文化的另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刻意获得的文化。显然，我们能够刻意培养自己的审美趣味。但是，我们愿意这样做的原因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因为在开始阶段，我们为此付出的努力要远远多于立刻获得的快乐。我们必须坚信我们付出的努力必然会有好结果。举一个音乐方面的例子，很少有人在第一次听一首曲子的时候就认为这是最好的曲子，如果越听越觉得它不好，那么我们肯定会认为这是一首很糟糕的曲子。我们需要让自己熟悉音乐的声音世界，这样我们就对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声音序列有一定了解，然后，我们在聆听音乐的时候就会对自己的第一反应感到愉悦，因而一个人能够通过了解莫扎特创作的其他曲子来欣赏一曲莫扎特的音乐；但是如

果要在第一次听巴托克[9]（Bartok）的曲子时就能够喜欢他的音乐，只熟悉莫扎特音乐中的高雅是不够的，因为巴托克的音乐中伴有复杂而晦涩的和声以及匈牙利民间舞蹈中充满活力的不规则韵律。只有当一个人对巴托克的声音世界更为熟悉之后，他的音乐才能打动人。建筑领域也是这样，有一些建筑仿效的是人们一眼就可认出的经典建筑——西方文明发展史上最常见的建筑就是各种各样的古典主义建筑。也有一些地方性传统以及最近兴起的现代主义的国际化传统及其各种变体，这些传统能够变成建筑师的个人传统，如弗兰克·盖里以及在世界各地设计“标志性”建筑的其他建筑师。建筑之所以在世界上享有声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识别的建筑设计师的作品，而且可以被对当代建筑感兴趣的人认出来。一座城市可以通过汇聚这一类建筑而获得声誉，因为这些建筑表明该市在这个国际性的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可能是通过偶然的机会了解我们当地的建筑，特别是如果我们经常使用这些建筑，我们就会对它们产生强烈的看法，这些看法是我们对这些建筑是在生活中帮助了我们还是使我们感到惊愕作出的反应。不用特地去想，我们可能暗自感到高兴，因为这些建筑依然立在那里，就像是参照点，通过它们我们可以设计一条穿越熟悉的城市的行进路线。当然这些作为参照点的建筑可能非常普通，或者，如果我上班时要经过威斯敏斯特，那么，我可能发现我把国家纪念性建筑，如威斯敏斯特宫当成地标性建筑在对待。我们对建筑的反应既取决于我们对这些建筑的看法，也取决于这些建筑本身，假设它们依然还在那个位置上。但是，这种对建筑的看法只具有地方意义，将不会促使任何人前来拜谒这些建筑。因此，我们需要确认一点，即讨论中的建筑确实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非常特殊。在一些情况下，这座建筑可能非常宏伟，引人注目，不同于我们曾经看到过的任何建筑，或者就像西格拉姆大厦和帕提农神庙一样——是某个广泛运用的建筑类型那极具艺术成就的原始实例，这就使得这样的原始实例具有了某种权威。这样的建筑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为它们精美、漂亮，而且还因为它们是讲述了各个时代建筑发展的建筑历史的一部分。在建筑发展的历史上，关键性的建筑“经典”——但凡有一定文化

修养的人都应该知道。在德语中，用“教养”（Bildung）一词来指这种水平的文化修养，这个词在英文中没有十分精确的对应词，但是不管怎样，人们仍然有一种感觉，即人们应该 了解某些建筑。如果我在与一位声名显赫的建筑史学家对话时发现他没有听说过帕提农神庙，那么，拿我来说，我就会认为这位仁君是浪得虚名。一些建筑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如此频繁地被用作参照点，因此，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这些建筑，那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参与这种文化。这里所讨论的文化不是地方性的文化，而是国际性的文化——这并不是说这种文化在所有的地方都是整齐划一的。如果回顾本书所选的建筑实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是从西方传统的角度来写这本书的。图2所示的那座农舍是作为低层次的传统建筑的典型实例选进本书的，没有人指望建筑史学家能够准确地认出它。这座农舍名不见经传。而本书插图所示的其他建筑都非常有名，专业性更强的伊特鲁里亚神庙除外，但是，在我介绍那段建筑史时配这幅插图是必要的。所选的大多数建筑都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并且已经证明自己是对建筑进行讨论和分析时的有用参照物。一些我个人极其喜爱的建筑，如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以及路易·康（Louis Kahn）设计的金贝尔艺术博物馆（Kimbell Museum）并没有被纳入到本书的讨论范围之中，这使我感到惊讶。如果我来自世界的另一个地方，那么我会试图举一些别的例子来介绍建筑。我选择的西欧建筑可能较少，而如果我植根于另一个传统，那么对于什么是重要的建筑，什么是边缘的建筑，我会有不同的理解。然而，若是换了其他人来选择，本书所选的许多建筑无疑也会被选中，因为选择这些建筑的目的是介绍一批具有重要意义的建筑，任何一个对建筑感兴趣的人都会熟悉其中的大部分。如果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建筑史，那么想象另外一些经典建筑是可能的，那么所选择的建筑就会有所不同。这样做无异于对本书目的的彻底背离，因为本书旨在介绍一些大家公认的杰出建筑。一旦一座建筑成为经典，作为一名初学者而质疑其地位绝不是明智之举。人们对帕提农神庙或博格斯大教堂的价值不会有疑议，如果我们四处说这些建筑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那么这就相当于对我们的理解力——而不是对建筑

本身进行了宣判——我们的审美有问题，而这些建筑将继续被看作是特别出色的建筑。这就是那些优秀建筑变成伟大建筑的方式。它们超越了极限，变得无懈可击，而任何毁坏这些建筑声誉的企图只不过是损害了批评者自己的可信度罢了。如果一个人对金字塔没有印象，那么他最好学着被金字塔打动。我们依然会不自觉地发出惊叹，那些使我们不自觉地发出惊叹的建筑无疑应该受到重视。盖里在毕尔巴鄂的建筑就能够让人发出惊叹。那座建筑令人吃惊，使人陶醉，一开始它并没有给人一种熟识的感觉，而是让人觉得不可理解，正是这种不解才能引起人们的惊叹和好奇。然而，这种不解的感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能过多，一部分原因是，即使是最古怪的建筑，如果它是你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你也会很快熟悉它们；而另一部分原因是，如果我们有太多的惊讶，那么我们什么事也做不了。

房屋与文化造就了建筑

我们喜欢认为经典建筑具有永恒的价值。所谓永恒的价值就是不会因人类历史的改变而改变的价值，但是，走近了观察却发现这种观点站不住脚。毫无疑问，有些建筑一直受到人们的珍视，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珍视它们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以帕提农神庙为例，说它没什么伟大价值简直就是白痴，但是帕提农神庙之所以在不同的时代都受到人们的珍视是因为它似乎表现着不同的东西，例如，它表现了战胜了敌人之后的雅典的辉煌，或者象征着民主的起源。这种价值一直备受重视，但其所受重视的内容极易变化。房屋是实实在在之物，有其固有的属性。当一座房屋与一种文化相遇，并以产生某种价值的方式相结合，建筑也就产生了。一座建筑可能让我们感到震撼、平静，或者感受到了某种挑战，或者为之倾倒，但若我们对这种种的反应毫不注意，而且也不是有意识地培养这些反应，那么建筑就会离我们而去，人们所建构的世界就会变成一片乏味的荒漠。但是，一旦人们对建筑有所了解，那么房屋也就有了活力，无论去到什么地方，人

们都有可能从建筑中看到技巧与智慧的无意识表达，其中可能也表现了空虚、贪婪和无所作为。我们喜欢把世界各地的伟大建筑看成是这样或那样的崇高理想的最为清楚、明确的表达。我们把这些伟大建筑看成是永世常存之物，代表永恒之中的短暂瞬间，促使我们走遍世界去拜谒它们。但是，在离家较近的地方我们也会感到快乐，这种快乐的强烈程度可能丝毫不亚于我们面对伟大建筑的快乐，其中包含了对一个地方的认同和理解，这种认同和理解可能包含一系列令人惊讶的矛盾情绪，而这种矛盾情绪存在于任何一个长期关系中。

注释

〔1〕 阿芙洛狄忒，古希腊神名，是代表爱与美的女神，又称为维纳斯神。

〔2〕 密斯·凡·德·罗（1886—1969），德国建筑师，著名现代建筑大师之一，曾任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的教务长，后移居美国芝加哥，在现代建筑中提倡“少就是多”的理论，并有较大影响。

〔3〕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1883—1969），德国建筑师，著名现代建筑大师之一，曾任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的教务长，后移居美国，是现代国际式建筑的代表人物之一。

〔4〕 马塞尔·杜尚（1887—1968），法裔美籍现代艺术家，纽约达达主义绘画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是第一位将日常用品作为艺术品展出的艺术家，其绘画作品包括《走下楼梯的裸体人》（1912）等。

〔5〕 圣水钵，指放置在基督教教堂入口处的盛有圣水的盆或钵。

〔6〕 俄耳甫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传说中的色雷斯诗人和音乐家，他的音乐的力量甚至可以打动没有生命的物体，他几乎要成功地从地狱中救出他的妻子并返回人世。

〔7〕 苏格兰城市，位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西部，与东海岸的爱丁堡东西相对，濒临不列颠岛西北海岸，是苏格兰第一大城市。

〔8〕 麦金托什（1868—1928），苏格兰新艺术派建筑师，其具有影响力的新艺术派设计强调优雅、连接清晰和造型合理，在家具设计上也很有影响。

〔9〕 比拉·巴托克（1881—1945），匈牙利作曲家，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其音乐中揉和了匈牙利民间音乐及当代音乐的影响和他个人的独特风格，1945年9月他于纽约逝世。

年表

第一金字塔：塞加拉的多塞尔王阶梯式金字塔，埃及（公元前2773）；建筑师：伊姆霍特普（Imhotep）

胡夫大金字塔，吉萨，开罗附近，埃及（公元前2723—前2563）；建筑师：未知（图4）

具有轮辐的最早的车轮（约公元前2000年）

铁器在地中海地区的最早使用（约公元前1500年）

帕提农神庙，雅典，希腊（公元前447—前436）；建筑师：伊克蒂诺与卡利克拉特与雕刻家菲迪亚斯合作完成（图7）

朱诺·索斯皮塔神庙，拉努维乌姆，伊特鲁里亚神庙（公元前5世纪）（图17）

复合滑轮的发明，归之于阿基米德[1]（Archimedes，大约生于公元前287年）名下

通过转动前轴前进的第一批有轮交通工具（约公元前50年）

方形大厦，尼姆，法国（公元1—10世纪）；建筑师：未知（图13）

万神庙，罗马，意大利（118—125）；建筑师：佚名，但是在罗马皇帝哈德良的指导下完成（图14）

罗马风建筑：第一座后罗马时期的石造穹隆顶教堂，图尔尼，勃艮第，法国（约950—1120）；建筑师：未知

第一座哥特式建筑：圣德尼修道院教堂重建，巴黎（1137年始建；在修道院院长絮热［1081—1151］）的主持下

盛期哥特式建筑：圣艾蒂安大教堂，博格斯，法国（1190年始建）（图8）

最早的冠状玻璃在鲁昂制成（1330）

文艺复兴：佛罗伦萨大教堂穹隆顶建成，意大利（1420—1434）；建筑师：菲利波·伯鲁乃列斯基（1377—1446）

第一座使用了分层处理的古典柱式的后罗马式立面：鲁切拉伊宫邸，佛罗伦萨，意大利（1455）；建筑师：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1404—1472）

圆厅别墅（卡普拉别墅），维琴察，意大利（1569）；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1508—1580）（图15）

怀特霍尔大街宴会厅（1619—1622）：建筑师：伊尼戈·琼斯（1573—1652）

泰姬·玛哈尔陵，阿格拉，印度（1630—1653）；建筑师：乌斯塔德·伊萨（生卒年月不详）（图23）

圣保罗大教堂，伦敦，英格兰（1675—1710）；建筑师：克利斯托弗·雷恩爵士（1632—1723）

平板玻璃第一次在法国生产成功（1688）

奇斯威克别墅，伦敦，英格兰（1725）；伯灵顿伯爵（1694—1753）（图16）

威斯朝圣教堂，斯特因豪森，巴伐利亚，德国（1745—1754）；建筑师：多米尼克斯·齐莫尔曼（1681—1766）（图11）

蒙蒂塞罗，夏洛茨维尔附近，弗吉尼亚（1796—1808）；建筑师：托马斯·杰斐逊（1743—1836）（图12）

皇家亭阁，布赖顿，英格兰（1815—1821）；建筑师：约翰·纳什（1752—1835）（图3）

哥特复兴：威斯敏斯特宫，伦敦，英格兰（1836—1868）；建筑师：查尔斯·巴里爵士（1795—1860）与A.W.N.普金（1812—1852）（图5）

铸铁的早期应用：水晶宫，海德公园，伦敦（1851）；建筑师：约瑟夫·帕克斯顿（1803—1865）；作为一个临时性展览建筑而设计

以利沙·G.奥蒂斯[2]（Elisha G. Otis）获得专利的蒸汽动力升降机（1861）

维尔纳·冯·西门子[3]（Werner von Siemens）制成了第一台电力升降机（1880）

圣家族赎罪教堂，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西班牙（1882年始建）；建筑师：安东尼·高迪（1852—1926）（图22）

铸铁结构框架的早期使用：家庭保险办公大楼，芝加哥，伊利诺伊（1883—1885）；建筑师：威廉姆·勒·巴龙·詹尼（1832—1907）

和威廉姆·B.蒙迪耶（1893—1939）。这是一座杰出的10层办公大楼。

埃菲尔铁塔，巴黎，法国（1889）；建筑师：古斯塔夫·埃菲尔[4]（Gustave Eiffel，1832—1923）

钢筋混凝土于1892年由比利时工程师弗朗索瓦·埃纳比克（François Hennebique，1842—1921）发明

新艺术运动：地铁入口，巴黎，法国（1899—1905），使用了预制铸铁嵌板；建筑师：赫克托·吉马德（1867—1942）（图21）

机器拉制的圆柱玻璃第一次在美国生产（1903）

第一座真正的摩天楼：渥尔华斯大厦，纽约（1910—1913）；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1850—1934）。在1930年以前，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芝加哥论坛报大厦，芝加哥，伊利诺伊（1923—1925）；建筑师：约翰·迈德·豪威尔斯（1868—1959）和雷蒙德·胡德（1881—1934）（图20）

施罗德住宅，乌得勒支，荷兰（1924）；建筑师：盖里·里特维尔德（1888—1964）（图9）

新精神亭，巴黎，法国（1925）；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夏尔-爱德华·让纳雷，1887—1965）

萨伏伊别墅，普瓦西，法国（1928—1930）；建筑师：勒·柯布西耶（1887—1965）

帝国大厦，纽约（1929—1931）；建筑师：施里夫（Shreve），拉姆（Lamb）和哈蒙（Harmon）

流水别墅，熊跑谷，宾夕法尼亚（1936—1939）；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867—1959）（图10）

西格拉姆大厦，曼哈顿，纽约（1954—1958）；建筑师：密斯·凡·德·罗（1886—1969）和菲利普·约翰逊（1906年生）（图18）

昌迪加尔，旁遮普，印度（1950—1965）；建筑师：勒·柯布西耶（1887—1965）（图6）

歌剧院，悉尼，澳大利亚（1957—1973）；建筑师：约翰·伍重

（1918年生）（图19）

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巴黎，法国（1977）；建筑师：伦佐·皮亚诺（1937年生）和理查德·罗杰斯（1933年生）（图25）

古根海姆博物馆，毕尔巴鄂，西班牙（1997）；建筑师：弗兰克·盖里（1929年生）（图24）

注释

〔1〕 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古希腊数学家、工程师及物理学家，古希腊智慧的代表人物之一，发现了不同几何形体的面积和体积公式，将几何学应用于流体静力学和机械学，设计了许多灵巧装置，如阿基米德螺旋泵，并发现了浮力定理。

〔2〕 以利沙·格雷夫斯·奥蒂斯（1811—1861），美国发明家，第一座载人电梯（安装于1857年）的发明者。

〔3〕 厄恩斯特·维尔纳·冯·西门子（1816—1892），德国工程师，在电报与电子设备方面做出过显著的改进工作，并发明了第一台靠电力驱动的升降机。他的弟弟卡尔·威廉，即后来的查尔斯·威廉·西门子爵士（1823—1883），发明了一种回热蒸汽发动机，并设计了一种铺设长距离缆绳的汽船。

〔4〕 亚历山大·古斯塔夫·埃菲尔，法国工程师，为1889年的巴黎博览会用铸铁结构设计了埃菲尔铁塔，该塔位于巴黎的塞纳河南岸，高300米（984英尺），是当时巴黎最高的建筑。

为什么不同的建筑蕴含着不同的意义？为什么有些建筑如此特别？哪些建筑可以名垂青史？

从古埃及金字塔、悉尼歌剧院到普通的农舍，作者深入到建筑的背后，探寻其中的经济、政治因素和美学意义，揭示出建筑自身所负载的文化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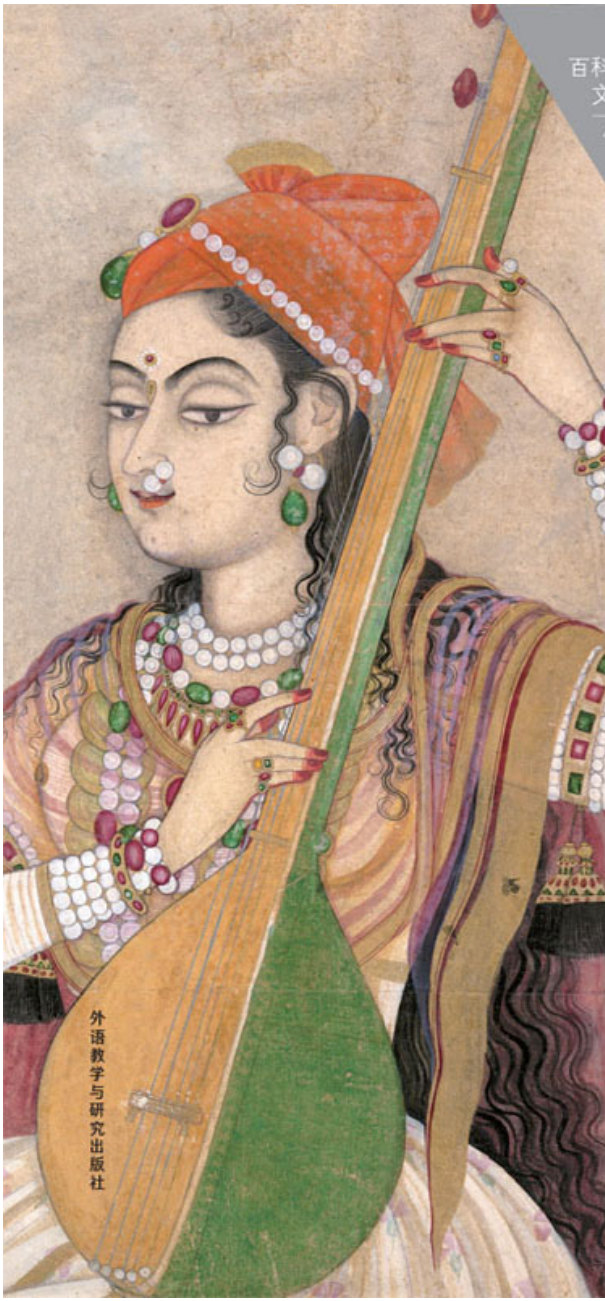

百科通识文库

49

走近世界音乐

菲利普·V.博尔曼 著

汤亚汀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走近世界音乐

菲利普·V博尔曼 著

汤亚汀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15-5162**

World Music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2.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2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Philip V. Bohlman 2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世界音乐 / （美）博尔曼（Bohman，P.V.）著；汤亚汀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42-4

I．①走… II．①博…②汤… III．①音乐欣赏 - 世界 - 通俗读物 IV．①J605.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796号

地图审图号：GS（2007）第442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执行编辑　韩丽霞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42-4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插图目录
地图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开端……世界音乐的神话和意义
第二章　西方与世界
第三章　神话与历史之间
第四章　民间的音乐
第五章　世界各国的音乐
第六章　流散地
第七章　殖民地音乐，后殖民世界，世界音乐的全球化
译后附论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菲利普·V.博尔曼，芝加哥大学音乐与犹太学教授，擅长世界音乐研究，研究课题涉及美国的民间音乐和族裔音乐、欧洲少数族裔和难民音乐、中东和南亚音乐、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中音乐的意识形态特点和政治特点等。他是1997年英国皇家音乐学会登特勋章获得者，编著了17部与世界音乐相关的著作。

｜译者简介｜

汤亚汀，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及译审，著译颇丰，研究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音乐与社会现代性的冲击。代表性著作为《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2007）和《上海工部局乐队史》（2014）。译著有《二十世纪音乐》（1992）等。主编音乐英语教材两种。

插图目录

图1　奥地利一家音像店展示的苏非音乐CD唱片
图2　弗朗西斯·登斯莫尔与山区酋长（1916）
图3　路易·潘克与老妈妈蒂尔克
图4　芳族的葬礼安魂曲（1913）
图5　突尼斯“艺术歌曲”
图6　贝拉·巴托克在一个斯洛伐克村落里收集民歌
图7　贝拉·巴托克和留声机
图8　布加勒斯特一条商业街里的街头乐手
图9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次现场录音
图10　2001年埃斯基卡戈印第安人的帕瓦仪式

地图目录

地图1　欧洲凯尔特边缘地带
地图2　波尔卡地带

前　言

21世纪初始的今天，人们若要界定世界音乐，免不了会陷入赘述的窘境。世界音乐是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遇到的那种音乐。世界音乐可以是民间音乐、艺术音乐，也可以是流行音乐；其从业者可以是业余的，也可以是专业的。世界音乐可以是宗教的、世俗的，也可以是商业的；其表演者可能强调本真性，同时也可能需要倚重媒介的作用将音乐传播到尽可能广大的市场。世界音乐的消费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消费这样的音乐，他们可能将其看作自己的音乐而加以颂扬，也可能沉迷于其异国情调。往日的定义和特点不再适用，世界音乐可以是西方的，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可以是原声的，也可以是混合了电声的。世界音乐的世界没有界限，因而人人皆可进入世界音乐之门。人们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将任何音乐都称为世界音乐。

世界音乐必然要牵扯到另外一个同样难以界定的时代现象——全球化。到2001年年底，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以后，人们再也不可能否认全球化的冲击，这样的冲击甚至见于各地街头巷尾的现实生活里。全球化依然难以确定，更何况界定，但很少有人不承认这一点：全球化在话语中和现实中是自相矛盾的。全球化好坏参半，它是一种可贬可褒的世界观，是一种可以包容世界的力量，同时其发展也必定需要外力的牵制。我们可以认为全球化有两层意义，或者说，全球化确实开辟了面对世界的两条道路，大多数人都要择一而行。

全球化的两层意义象征了当今人们理解“世界音乐”的两种互相矛盾的方法。在本书中，我借助了这两重意义来考察当今什么是世界音乐，以及相关的种种悖论等问题。对许多人来说，世界音乐确实表现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正面事物，即表现了通过音乐与音乐创作而将人们凝聚到一起的可能性。世界音乐的声音——在广播里，在CD唱片中，在因特网上，在大学课堂里，在有不同读者群的书本中——从未如此响亮过。每当人们颂扬全球化时，总能听到世界音乐。

世界音乐也有阴暗的一面。它可能让人们担忧，担心我们正在失去许多本土的东西。在赋予地球村空间以特权的同时，世界音乐同质化的后果威胁到乡村的习俗。世界音乐的全球传播，靠的是跨国唱片

公司对资源的挪用，其主要兴趣在于盘剥文化资源。融合与跨界也许丰富了世界音乐的一些风格，但也使另外一些风格枯竭。21世纪伊始，人们对全球化的话语和现实就议论纷纷，令世界音乐遭人诟病。

就本书而言，我试图采取中间立场。一方面，我鼓励读者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音乐家和经纪人从事世界音乐活动时是如何挪用、盘剥传统音乐的，另一方面也希望读者意识到当今丰富的世界音乐是如何为我们提供机会，让我们体验到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多样性的。我所持的中间立场并不回避全球化这一措辞或世界音乐话语中明显的二元意义，相反，这一立场努力描述相遇的空间，那也是世界音乐的历史发展的空间。因此，本书的中间立场也给了我机会来尽力解决本套丛书所有作者都面临的困境：在人为设置的局促篇幅里探讨宏大的题目。

倘若曾有“全球化”真正遍及全球的那一刻，那似乎是在2001年的夏季和秋季，当时我完成了本书的最后修订。全球化这一措辞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该词本身已经家喻户晓。在学术界，它已经成长为高级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很少有学科能够避开它的那种诱惑性。无疑，2001年一系列大会的关键词是全球化：例如，2001年5月18日到19日，我所在的大学举办了一次活动，称作“第三届年度全球化大会”。全球化当时似乎取得了成功，为形形色色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提供了理论和话语，这样他们便能够着手解决现代的重大问题。

更令国际社会的普通民众好奇的是，全球化这一措辞能够多大程度上鼓动他们同阶层的众多民众采取行动。2001年夏季，对全球化的争论可以说是“涌上了街头”。突出事件发生在七月中旬“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举行之际，按惯例这一峰会将一个既定集体——“全世界七个最富裕的国家加上俄罗斯”——的代表聚到一起。2001年的峰会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会议招致了成千上万名抗议者，他们代表了广泛的政治主张，现在都归结到“反全球化”的类别之下。全球化这一措辞以其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变化组合，裂变成无数时髦词语。人们谈论“全球贸易协议”和“全球变暖”，“全球市场”和“全球经济”。然而，这一措辞一旦用于解决眼下问题，便显得无能为力，当反全球化主义者在当

地街头引发骚乱时，他们同聚集起来捍卫全球化事业的警察发生冲突，渐渐演变成一场招致破坏与死伤的对抗。

在“9·11”事件之后的一段时期，全球化这一措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那些袭击本身针对的是全球化的“象征”——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罪犯是“全球恐怖网络”的成员，人们要求组织“全球反恐联盟”以遏制他们的发展。世界文化与世界历史处于危机之中，因此有必要进行“全球规模”的反恐战争。全球化这一措辞在发展，但是关于其真正的意义也有越来越多的解读。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认为，自己更加直接地感受到了全球化在他们生活中的存在，但几乎很少人能更清楚地知道，全球化是带来安逸的东西，还是令他们已知的世界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2001年，关于全球化的各种观点不可遏制地滋生，这也让人们对世界音乐所具有的迥然不同的各种意义有了进一步了解。世界音乐这个术语本身相对较新，可以说是只有20年。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描述世界各地音乐的涵盖性术语还很少见，人们偏好以地域或体裁名称来描述音乐；人们所研究和撰述的是“非洲音乐”或“民间音乐”，而不是世界音乐。20世纪80年代，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转向我们所谓的大问题，并将比较法用于研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被更有意识地使用，其结果是令世界音乐更加引人注目，正如在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极其有影响的著述里所呈现的那样。也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音乐进入大学音乐课程，这同样是由于人们意识到研究全世界的音乐的必要性。世界音乐最初是用来代替“西方艺术音乐”的，它在大学音乐课程里涉及了越来越多的领域，广泛地激励人们重新思考音乐本身应该如何教学的问题。

世界音乐也是人们在大音像店新设楼层，或在书店CD部的“国际”唱片货架中见到的现象。这种世界音乐，无论何时我们走进咖啡连锁店，都能见到，其中有几家除了卖国际口味的混合咖啡外，还兜售自己制作的混搭世界音乐CD。简而言之，这种世界音乐是通过将传统音乐重新包装成流行音乐而销售的。同样，这种世界音乐的起源也可以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唱片公司的主管和广告专家断定，英

美和欧洲主流之外的流行音乐需要一个独特的名称。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唱片业在其他几个名称中犹豫不定，如世界节拍、世界融合乐、民族流行乐，甚至是部落音乐和新世纪等。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音乐这个名称得到最为广泛的流传。该名称本身是否真正具有全球的含义，依然有争议。也许这种世界音乐确实局限于挪用传统音乐，将之改为流行音乐的做法，但是其声称全球化，无疑也是理由充分的。

既然受到关注的“全球”这个字眼暗含着“世界”的几层意义，人们便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探讨一个如“世界音乐”这样似乎漫无边际的主题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倾向，力图要描述其广泛性和多样性。人们也许认为，世界音乐所汇聚的奇妙元素终究会吸引读者。然而另外还有一种同样强大的相反倾向，促使人们去发现一种全球现象中独特而单一的因素，从而去简化它，使它容易为读者所驾驭。在这本小书中，我的目标是平衡这两种方法。一方面，我以一个音乐人类学家的身份在写作，因此对我而言，世界音乐是世界上所有的音乐。我写作时心里抱有这样的态度，故本书也许会让读者体验到差异性，也许会鼓励他们追问人类使用音乐的方法为什么如此多样：关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世界音乐告诉了我们什么？另一方面，21世纪伊始的世界音乐具有全球化的所有烙印，全球化的理论家努力去解释文化现象日益表现出趋同性的原因。世界音乐长期以来得到这两个阵营的支持，无论他们是强调文化相对主义还是文化普同主义，都在为新理论提供证据。对世界音乐的两种看法都没有错，但这两方面都不完整。为此，这本小书试图协调现实中的世界音乐和想象中的世界音乐。

读者有可能感到我在世界音乐的定义上含糊其辞，认为我只是默认所有可能的定义都正确，那么我理应先来揭示我所认为的世界音乐的几种意义，这些意义形成了我在本书探讨它的思路。世界音乐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由航海大发现、启蒙运动、殖民扩张以及民族国家兴起所引发的与世界的相遇和对世界的解释。因此，声称音乐在全世界无处不在乃是一种西方的观念，即便这是由于西方同世界的相遇而产生的一种观念。“相遇”（encounter）是贯穿本书的一个关

键概念。相遇标志着重大的历史关头的出现；相遇带来了变化，甚至革命；相遇创造了交流的条件。文化相遇本身绝非专属西方，然而过去500年中有一种日益增强的观念是西方的，这种观念认为相遇不是孤立的，而是会对世界历史产生影响。

到了21世纪初，世界音乐就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异国情调的“他者”了。我们同世界的相遇已经成为家常便饭，音乐是相遇的桥梁，无论我们是否感受到。与世界音乐相遇不仅仅是指南亚和西非的鼓经常被用于电视广告；也不只是将其曲调改编成电影配乐；它并非仅仅是新教赞美诗日益显示出多元文化的性质，或天主教弥撒曲为大都会里所有少数族裔社群所熟悉这样的现实；也非伊斯兰教苏非派禁欲神秘主义借助于世界音乐的中介作用而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派别的现象；音乐所有权的法律诉讼或因特网对音乐下载的限制也不是它的最终意义。实际上，世界音乐汇聚了所有这些现象，而这些现象也必须看作是西方想象中及其作用下的相遇。无论我们是否理解其含义，世界音乐已成为无法回避的日常经历。在这本小书里，我要尽力证明，通过理解世界音乐的确切意义，人们可以有许多收获。

本书以一系列主题展开，每一个主题就是一章。虽然每章的主题各不相同，但探讨它们的思路是类似的，因此即使有局限性，这样的方法仍有可能更大程度上涵盖研究对象。所有各章结构相同，换言之，各章均有六个部分，以相同的结构阐释各自的主题。每一章以一次相遇开始，接着进行历史的、理论的、美学的探讨，穿插相关音乐家和学者的简介，最后论述流行音乐和当下现状。因此我努力保持每一章的内在一致性，新的章节均回到一个新起点，这样每一章也许就成了一种叙事，为读者叙述相遇的故事。下列纲要总结了各章的结构：

i　与世界音乐相遇

ii　历史或理论附论

iii　简介一位音乐家

iv　美学问题，重点探讨意义与身份认同

v　简介一位音乐人类学家或一组世界音乐的学者

从某种程度而言，书中的许多相遇都是我的亲身经历。这些相遇可能或多或少直接来自我的田野调查；这些相遇也许更间接地代表了我通过理论研究而经历的音乐实践，例如我特别关注宗教与音乐的关系；这些相遇可能也来自我自己的努力，想要形成一条路径，使得我本人——我希望也使得其他人——能够理解世界音乐整体中的某些因素。可以说，这条路径意在鼓励读者以亲身体验 的方式更直接地参与世界音乐。

不能不说的是，本书所运用的章节结构有助于我在论述全世界的音乐的问题时，既有代表性，又能均衡涵盖。读者即刻就会注意到，本书并没有列举所有的世界音乐；他们也会发现，我反复论述世界的某些地方和某些曲目，而对另外一些地方和曲目只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事实上，我觉得没有必要找借口或不承认本书没有涉及某些音乐。装门面并不能解决代表性的问题，而只会将问题搞糟，在篇幅这样短小的介绍性的著述里更是如此。更为关键的是，照我理解，本书许多部分只是抛砖引玉，或者更确切说，是引导那些希望将自己最初的相遇变成亲身游历和体验的读者。21世纪初始，我们日常与世界音乐的相遇使得这样的亲历非常有可能实现。

本书最初不是我的创意，而是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的创意，他是牛津大学出版社VSI丛书的项目负责人。乔治相信我能驾驭这个课题，我希望他能够在这一最终成果里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虽然这并足以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我非常幸运，能有四位背景完全不同的读者愿意对本书的终稿提出意见和建议，他们是：安德烈亚·博尔曼（Andrea Bohlman），在读的音乐专业大学生；陈碧燕（Pi-yen Chen），芝加哥大学博士生，现任教于台湾成功大学；马丁·斯托克斯（Martin Stokes），值得信赖的芝加哥大学同事；马丁·克莱顿（Martin Clayton），英国开放大学的优秀教师。在此特别感谢他们四位花费的时间和提供的深刻见解。在撰写一部关于世界音乐的著述时，你总会有这样的认知：各种社群和集体以各自的方式定义世界音乐，有地方的角度，也有全球的角度。多年来，我的学生们组成了一

个特别有意义的集体，不断地帮助我形成关于世界音乐的想法。我非常愿意将此书献给我的学生们，以感谢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按照惯例，最后还要感谢安德烈亚（Andrea），本（Ben）和克里斯蒂娜（Christine），他们是迄今为止最棒的世界音乐家，是世界级音乐家的一个集体。感谢他们，因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在跨越边界之处，还是在音乐会舞台上，每当我们有机会与世界音乐相遇时，他们总是在场。

菲利普·V.博尔曼

第一章

开端……世界音乐的神话和意义

最初的相遇

最初与世界音乐相遇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我们有些人远行万里，遇到的音乐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家乡认识的任何音乐。而其他一些人最初发现世界音乐的地方就在家乡附近，这种相遇的发生也许是因为人们所熟悉的本土音乐有明显的变化，也许是人们突然意识到那些熟悉的音乐并不是他们曾经所想象的那样。还有一些人，他们与世界音乐最初的相遇是通过录音、录像，或各式各样的表征，这些表征能立刻让人们注意到家乡与外乡的距离，也能够弥补那样的差距。如果我们能够专注于并去认识某个有意义的局部，世界音乐的整体有可能得以呈现。因此，初次相遇也将局部同整体联系起来。初次与世界音乐相遇常常是个人的，乃至私密的经历，经常使地方性知识突然闯入人们的意识。我们很难对这种意识无动于衷，反而会被其改变，甚或深刻地改变。我们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迎接世界音乐，既敬畏又好奇，既担忧又尊崇；我们可能会折服于其朴素之美，也可能会惊叹其复杂性所产生的不和谐音；我们可能发现自己迷失在意义的探索中，这些意义不是即刻而明了的，也不会因意想不到的启示而发生变化。无论最初相遇以何种方式、在何处发生，它们都深刻改变我们对音乐的理解以及我们对音乐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和功能的解读方式。最初与世界音乐相遇从来不是孤立的、一时的事件。

最初的相遇成为故事和历史的素材，因此在本书中，它们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神话里充满了最初相遇的故事。正如神话讲述自然和超自然或人与神的交错，它们也讲述了音乐如何在这些交点上出现。在神话中，超自然的生灵常常将音乐作为礼物馈赠人类，这种礼物可以是抽象的，属于感知和交流的一部分，比如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可以是具体的，例如用人类或动物的身体部位等具体的物质制造乐器，乐器以此获得了形而上的意义。在世界各种宗教的神话中，音乐起源的多样性，更多表现在级别层次上，而非宗教神话的类别上。

音乐可以明显地表现在小鸟的歌唱中，或表现在来自神的意旨中，音乐亦可就在“外界”，即所谓的天体音乐中。音乐似乎等待着相遇，即等待人类的一种超然状态，这种状态是通过感知和表征由音乐编码的某种神的意旨而获得的。关于音乐起源的故事几乎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宗教里，表明了神话中的相遇也许是最初产生世界音乐的环境之一。

关于最初相遇的这些故事，也被我们编织到宏大叙事之中，正是这样的叙事形成了我们所谓的世界音乐的各种历史。且让我们短暂地回溯这类故事中最早的一则。新旧世界的音乐之间的第一次相遇发生在1557年，在胡格诺派传教士让·德·莱里（Jean de Léry）逗留在图皮南巴人中的那段时间。斗转星移，当初相遇的地方如今被称为里约热内卢海湾。莱里在1578年的叙述中，详尽描述了图皮南巴人的音乐，甚至记录了用于特定仪式的旋律和歌词，还翔实描述了那些仪式的背景。莱里去新世界并非为了撰写一部不带偏见的民族志观察报告，而是去宣传福音，劝服人们皈依基督教，因而他叙述了自己为传教热情所激发的那些观察。图皮南巴人是食人族，与他们食用自己族类相关的习俗引起莱里的注意不足为奇。他们也引起了当时其他著述者的注意，蒙田（Montaigne）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的《论食人部落》（*On Cannibals*）对莱里的著述有一系列思考，虽无心插柳，这却使莱里对第一次相遇的描述广为传播。这样，莱里关于图皮南巴人音乐的记述以及这些记述所引发的反响便开创了书写世界音乐的一种传统，这一传统在航海大发现时代和现代初期加速发展，它在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8世纪末的民歌集里，以及无数有关初次相遇的描述中达到了鼎盛（见第二章）。对我们而言，重要的甚至并不是莱里的记述将第一次相遇变成一种民族志的场合，而是他意识到图皮南巴人的仪式音乐同他所属的音乐传统并非那么不同，他认为自己的音乐传统（西方的音乐——译注，下同）始于古希腊人，然后发展成一部真正的西方音乐史。莱里记述了自己对图皮南巴人的音乐越来越感到亲近的过程，他经历了自己的审美转化，最初认为图皮南巴人的歌曲毫无意义，继而他觉得这些歌曲和西方的

歌曲有相近之处，甚至可以看到亲缘关系：

> 在女巫祭典开始的时候——我当时在这些女人家里——我有点害怕了；这时，听着这一群人有节奏地和声吟唱，尤其是在歌曲的终止和副歌部分，我得到了回报，感到非常快乐……现在无论何时回想起来，我的心都会震颤，好像她们的声音还在我耳畔回响。
>
> （莱里，1990：142，143）

由最初相遇促生的相关记述为数众多，也很复杂，因而肯定可以从这些记述展开本书。这样做的理由不仅在于这些记述包含大量的信息，也在于它们描述了这些经历的特质。我们已经在莱里的第一次相遇中见证了那些经历：他以第一人称陈述，但他描述了他自己的变化。无可否认，这第一次相遇是亲临的，莱里通过记忆回到了那次相遇，而这一记忆则通过他的身体而对他产生了意义。

初次与世界音乐相遇的特质在于我们对这些相遇的记忆令我们几乎等于亲临相遇本身。这就是音乐民族志的特质：他人在创造音乐时，研究者通常亲临现场。这样的惯例，贯穿于音乐人类学、流行音乐、民歌研究，以及其他世界音乐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之中。每当我们参与田野调查时，每当我们力图弄懂不同于我们所知的音乐现象时，我们都会回到自身的最初相遇，有时是追索信息，但更多是再度回忆起当初第一次体验世界音乐时的意义。在这层含义上，我们继续拥有最初相遇，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整个世界音乐的感觉日益拘囿于我们无数局部的经历。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无论是当我在自己从未去过的地方着手新的研究项目时，还是当我重新研究老的项目时，开始的时候我都要重温自己的最初相遇，并且让新的体验加入到这些过去的相遇中去。我初次遇到美籍爱尔兰农民查尔斯·班能（Charles Bannen）时，他用客厅里的风琴自伴自唱了100多首口传的歌曲和民谣，悦耳动听。这一相遇形成了我的方式，我以此方式在以色列遇到了集中营幸存者，还以同样方式遇见过不愿忘记自己朴实的意第绪语歌曲曲目的罗马尼亚老人。最近，我初次遇到的是街头音乐家和朝觐

者，他们以音乐共同重塑了新欧洲的景观。

重要的是，我想让读者意识到最初相遇对我意味着什么，尤其因为本书中会有些片段主要不是论述我自己的研究，即不是利用我自己的民族志经历。也许更多时候我所描述的相遇带有比较普遍的性质，意在用它们来打开世界音乐的空间，这样读者自身可以有更多亲近的、多样化的相遇。这样的相遇实际上最能说明我们体验世界音乐时发生了什么，因为如同让·德·莱里在16世纪中叶的情况，我们与自己世界以外的音乐相遇的时候，就会出现将其美化的现象，有时甚至将其改头换面，那意味着把陌生的音乐转变为世界音乐。

世界音乐的最初意义

与世界音乐相遇时，我们最先弄明白的一件事情是，“音乐”在世界其他地方有不同的意义。一方面，音乐参与文化活动，并以我们不熟悉的方式与世界发生联系。另一方面，人们对“音乐”本身的理解也可能千差万别，或者我们对音乐的理解也许并不被他人认同。事实上，知道音乐是什么以及音乐做什么，可能无关乎我们看来完全自然生存的音乐类别。因此，当我们与世界音乐相遇时，如果我们还想了解世界音乐——几乎有无穷类——可能具有的意义，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借助不同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必要性。

所谓借助音乐认识论，意思是说，音乐能够成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因而能够在同其他活动的关联中获得意义。以跨文化的方式研究音乐，我们认识到，音乐在诸多方面被赋予了宗教意义。音乐也许可以作为承载某个神的声音的载体；音乐可以划定时间界限，这样它对仪式表演更有意义了；音乐可以作为宗教仪式中众多点缀之一，使其更具吸引力；音乐创造的某些领域（例如许多宗教里的器乐）也可能让人联想到巫术和不道德行为，这使得一些宗教在敬神活动中禁止音乐。音乐同宗教的所有这些关系，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揭示了关于音乐认识论的某些方面。如果我们要研究其他类别的文化活动，如生命

周期的习俗、食文化、物质文化、性文化等，音乐也许具有认识论的其他特质。音乐的认识论常常在音乐习俗中表现出来，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世界音乐里这一类认识论问题，音乐人类学采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人类学的方法，其基本的关注点在于文化背景。

世界音乐的本体论——音乐作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而具有的特性——更有可能表现在音乐习俗的文本中。本体论的基本问题仅仅是：音乐是什么？如果问题简单，答案可不那么简单。事实上，世界音乐有非常独特而又互相矛盾的各种本体论。例如，根据特定体系，西方的音乐本体论赋予音高结构以特殊地位，换言之，我们练习乐器时所学的音阶和调式地位突出。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诵读《古兰经》是音乐，因为其广泛使用了阿拉伯古典音乐的调式马卡姆（*maqa-m*），我们则将一种西方本体论强加到不属于它的领地。

从西方的立场看，世界音乐的本体论似乎通常不可翻译，这主要是因为从西方最基本的本体论范畴来看，音乐如同一件东西，这件“东西”的意义由其本身反映出来，也是其本身所具有的。我们谈论音乐的语言，以及我们解读音乐的方法，都加强了我们将自己的音乐客体化的本体论。我们以作品形式解析音乐，将其分为乐章和段落，最终分为越来越小的多样化单元，从而将音乐看成由小东西构成的大东西的集合体。将音乐理解为一件东西的本体论，对世界许多音乐文化而言都是陌生的，例如，这些文化里可能没有对应言辞来描绘作品的本体特征。

世界音乐本体论之复杂性最极端的例子是，有些音乐文化缺少对应的词汇来描述西方关于音乐的概念。尼日利亚北部信仰伊斯兰教的豪萨人的音乐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本体论的经典例子，它含有大量词汇可以区分音乐家、音乐实践和乐器，但对音乐本身反倒没有一个词来描述。显然，世界音乐整套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表现在我们谈论音乐的方法和我们用来赋予音乐意义的词汇里。下框所列，只是具有世界音乐本体论意义的无数术语中的几个。这里重要的不是要表明这类术语可以对应于西方的“音乐”，而是要鼓励读者质疑，为什么寻找对应的本体特征往往阻碍发现深层的意义。

世界音乐本体论

巴隆冈（***balungan***）：爪哇音乐旋律的基本音高，其特征在于佳美兰乐队（gamelan）不同乐器的演奏和即兴变化，以及与乐队合作的歌手的表演和即兴发挥。

康董布雷（***candomblé***）：巴西黑人宗教，广泛使用仪式化的音乐，融合了来自非洲人的流散地的各种宗教信仰，例如来自西非约鲁巴人的宗教。音乐无处不在，因而该术语几乎等同于音乐习俗和宗教习俗。

克里蒂（***kriti***）：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古典音乐的旋律框架。可以说，它有两种本体论：一种理想化地呈现为一首创作乐曲，以乐谱表现；另一种通过卡纳塔克邦音乐重要的即兴习俗来实现。

玛（***ma***）：日本音乐美学的空与静，其本身被看作本体论实体，而非发声的音乐之间的留白（例如“休止”）。

宇宙音乐（***musica mundana***）：天体的音乐，一个新柏拉图概念，哲学家用来解释宇宙中有序的音乐和声。

穆西加/穆西吉（***mūsīqā/mūsīqī***）：借自希腊语的术语，指输入伊斯兰社会的音乐实践。

吉拉阿赫（***qirā'ah***）：《古兰经》吟诵，直译为“诵读”或“召唤”。在伊斯兰教里从不被看作是音乐。

拉撒（***rasa***）：印度音乐中一种情绪或精神状态，喻意为“人们品尝的味道”，可以通过各种性质的恰当表演而达到，有些是与音乐相关的，有些是音乐以外的，比如与印度教神话或一天中时间相关的某些情绪。

萨玛（***samā‘***）：阿拉伯语，可以译作“听见”或“聆听”。

伊斯兰教音乐体验，取决于对声音的感知和接受，而非声音的产生。

僧吉塔（***saṅgīta***）：梵语，大致可以译作“音乐”，但在早期理论专著里，用以包含一系列实践，其中有婆罗门仪式、歌曲、器乐、舞蹈，以及某些类别的戏剧。

塔阿美哈密卡（***ta'ameh ha-mikrah***）：“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尤其是《托拉》（*Torah*）的诵读。在犹太教里从不被认为是音乐。

威克鲁（***wai khruu***）：泰国佛教表演的仪式化音乐和舞蹈，跨越并调和宗教范畴和审美范畴。

齐克尔（***zikr***）：阿拉伯语，可译作“记忆”和“记得”。苏非派的宗教仪式，穆斯林通过情绪的逐渐强化来诵唱真主的名字，从而使身心更加接近真主。

世界上音乐的多样性促生了各种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既有音乐本质上是宗教性的这样的观念，也有音乐是普遍性的语言这一类共识。此类问题在本书从头至尾都是我们的关注点，不是因为我们要证明这些问题正确与否，而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一种愿望，即赋予音乐以全球性的意义。音乐人类学家一般都断言，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没有音乐，因而他们将普遍性归之于基本的认识论层面。一种现代学术传统，持比较怀疑的态度，不去寻求实证以证明音乐是普遍性语言，相反去颂扬多样的音乐语言所展示的差异性，并认为这些差异共同构成了世界音乐。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对世界音乐极感兴趣，对其普遍性不那么怀疑，往往更喜欢这样的可能性：某些普遍的因素成为本体论的黏合剂，令世界音乐成为一种现实。

世界音乐可以打通通往普遍性的道路，作如是观的愿望非常强大，以至可以产生夷平差异那样的反向效果，换言之，这种观念可以创造一种幻觉：我们体验为世界音乐的东西，更多具有相似性，而非

差异性。可是，我们也还要问问自己，随着民族志相遇而来的分析和翻译，是否也没有研究相似性，即便仅仅是为了解释我们竭力赋予意义的差异。21世纪初始，研究共同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对我们感知世界音乐的意义的方法而言，既有正面含义，也有负面含义。或者，我也许应该将“世界音乐的意义”表述为“多种世界音乐的多重意义”？这种表述的差异不仅仅是文字游戏，因为世界音乐是通过个人与集体的特性、地方和全球的特性而获得意义的，梳理这些特性绝不容易。然而，本书的任务是要表明，为什么对它们的梳理十分重要。

最早的音乐家

为数众多的音乐家，常常出现在关于宗教、历史起源以及音乐起源的神话和宗教–哲学的著作里。如同之前小节，当我们思考在人类其他活动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中音乐存在的复杂状况时，几乎总是不出意料，音乐家也出现在其中，实际上他们就是我们此处所谓的“最早的音乐家”。这些音乐家处于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过渡空间，作为音乐家他们以两种面目出现：首先作为表演者；其次作为匠人，用地球上的物质或曾经存在的生灵的身体来制作自己演奏的乐器。我们正是在那些神话盛行的时刻见证了这些最早的音乐家的存在，那时的身份认同，尤其是区分宗教与世俗、自然和人为的身份认同，受到最严厉的质疑。最早的音乐家常常具有天赋的能力，能够引发人们注意身份认同的关键问题，然后以音乐作为可能的解决手段。正是以此方式，最早的音乐家将音乐铭刻在历史上和全世界各种宗教的奠基神话里。

在音乐起源之时，人类的介入决非那么简单。在犹太传统里，有两个起源神话，都是在《托拉》第一卷，即《创世记》（*Genesis*）中。在第四章，音乐的出现与两类乐器相关，一类取材于动物身体而后打造成类似人类的形状，另一类用地球上的元素铸造。音乐的一个发明者犹八（Yuval）与第一类有关，另一个发明者土八该隐（Tubal Cain）同第二类有关。在《创世记》中，我们还在《以撒的牺牲》

（*Akedah*）的象征意义核心遇到音乐本体论。《以撒的牺牲》又名《燔祭以撒》（*Binding of Isaac*），是意义最深远的圣经故事之一。在这个故事里（《创世记》第22章），亚伯拉罕表明自己愿意执行上帝的圣训，献祭自己的儿子以撒。正当亚伯拉罕要杀儿子时——他已经在祭坛上对儿子举起了刀——上帝的声音来干预了，这个声音告诉亚伯拉罕他可以用一只公羊作为替代品，那只羊的羊角卡在了附近的灌木林里。亚伯拉罕将公羊献祭焚烧后，发现公羊的羊角没有烧掉，就把羊角留下作为羊角号（*shofar*）。羊角号作为仪式的主要乐器由他传给犹太人。吹响羊角号便是赋予时间与历史以意义，它以声音表征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甚至今天，这种认同仍然可以回溯到《创世记》里最早的音乐家。

男女众神，以及男人女人，都在印度教的整个伟大史诗性组诗里呈现多变的形态，我们也许可以推断，最早的音乐家也扮演着许多角色，这八九不离十。最早的音乐家出现非常频繁，不仅在印度教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ārāta*）中，时至今日依然存在于音乐的代表性图像里。这个音乐家就是克利须那（Krishna，黑天）。他代表了一类神性，其中有神圣的爱与美（*prema* 和*rupa*）。然而，他最早音乐家的身份更多展现在他一生中的许多经历中。从他的童年开始，他就同女牧牛人（*gopīs*）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进一步象征了灵魂同神的关系。这种关系以多种方式展现：克利须那为女牧牛人吹笛的众多形象中；伴随着印度调式拉加（*rāga*）的叙事中；描绘神圣之爱的图像中。克利须那作为最早的音乐家处处可见，我们可以说其具有普适性；相比之下，娑罗室伐底女神（Sarasvatī）的存在更具地方性。在印度教著作里，她代表人类理解力的一种本体论，即“真知灼见”（*vidyā*），这种本体论使人类超越再生的轮回。她将这种本体论带入了印度最古老的乐器——维纳琴（*vīṇā*）。维纳琴对印度教的意义处于非常基本的层面，它的琴首像人的头部，琴弦如同声带，而葫芦共鸣箱则类似人类身体，因此它的形态被认为高度抽象地象征着人类。我们也许可以将“真知灼见”解释为人死前和死后生命形态的轮回；为了扩大娑罗室伐底女神对“真知灼见”的影响，她经常出现在维

纳琴琴身上的图像中。事实上，卡纳塔克邦古典音乐中的“维纳琴”常常被称为“娑罗室伐底女神的维纳琴”。虽然娑罗室伐底女神是最早出现的音乐家之一，但今天她仍然出现在印度音乐里，提醒人们音乐的原初意义。

何者为先：宗教，传统，还是审美？

《古兰经》可以作为书面文本，也可以作为口头表演，还可以作为听觉体验。意义遍布于《古兰经》的许多不同层面：词以及词所在的文本，诗歌形式以及语言节奏，诵读和聆听（无论是大声朗读还是内心默念）的调式型和旋律型。显而易见，《古兰经》是一部“音乐”作品，也就是说，表演和感知取决于音乐背景，尤其是吟诵（*qirā'ah*，也解释为“诵读”或“召唤”，二者都是对表演行为的相关描述）的调式传统和旋律传统。经文常常是表演背景的本体论体现。《古兰经》的审美功能，依宗教意义而发生，就本体论而言，也非独它所有，而且这些功能令其自身易于同其他经文比较（见第三章）。

诵读《古兰经》也揭示了关于世界音乐审美中一些非常基本的因素，这些因素将如一个主导动机那样贯穿本书。在我们与世界音乐相遇的时候，审美问题不能孤立看待，也不能排除在外不予考虑。如果认为音乐具有审美独立性，只在音乐本身寻求意义，往好里说，这样只能产生不完全的答案，往坏里说，这样会违背音乐的本意。世界音乐复杂的审美深植是其与西方音乐大相径庭的许多方面之一。在宗教音乐里，审美深植非常明显，即音乐的意义常常取决于其能否履行职责、引发变化或者达到超验。不仅仅只是因为音乐被转换成歌词或仪式叙事，音乐才获得宗教意义，宗教音乐还［直接］将歌词、叙事和仪式转变成意义。音乐拥有审美能力（power，亦即“权力”）来实现这样的转换。德博拉·王（Deborah Wong）在她对泰国小乘佛教的研究里，认为被称作威克鲁的整套仪式中存在这样的审美深植。王指出：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威克鲁仪式中，表演的转化特性一再展现：师傅被表现为妖怪和神仙，孩子被变成舞者和乐手，从一开始，每一位名师都展示其作为圣人的另一张脸。

（王，2001：xxiii）

在东亚大乘佛教里，音乐将仪式转变为寺庙生活的政治结构，僧人和俗人在里面表演他们在宗教与世俗两界交叠的领域里所遇到的意义。正如陈碧燕详细记录的寺庙仪式音声景观所展示的，音乐将个体同几个世界共处的方法具体化，允许信徒同时表演这几个世界。我们也许认为，所有这一切是对音乐的过度要求，但实际上音乐的审美深植允许我们，甚至告诫我们，去要求音乐通过表演转变意义。佛教里音乐的权力，或者大多数宗教里音乐的权力，在于音乐的意义如何引发转变。

通常，我们不会认为权力具有审美特性，但在本书中——其主题是世界音乐——权力一再呈现审美功能。在相遇的时刻，音乐具有权力，它给那些探索意义的人以权力。音乐履行某些职责的能力，取决于音乐在不同层面的审美深植中所获得的权力。此外，正出于这样的原因，与世界音乐的频繁相遇才引发了对权力的争相挪用。而恰恰因为权力得失攸关，音乐才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西方与他者的相遇之中。比如在殖民主义时代，在传教士同他们力图劝服皈依的那些人相遇的过程里，宗教音乐常常成为主要的文本。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敏锐地意识到音乐如何带来权力，为此他们专门创作了曲目，为的是开拓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通过音乐转变精神意义，以使皈依能够在其中发生。皈依的空间经历了各种仪式化的过程；虽然人们可能期望剥夺音乐的基本要义，但更常见的是，音乐乐于接受新的意义，而这些新的意义因审美差异，其权力在不断增强。

安第斯山原住民们的仪式也持续见证着音乐意义如何增加，而意义的衍生产生了多元的叙事，每一种叙事都撰写了一段漫长的相遇史。安第斯山地区现代节日的音乐表演不仅包含一层又一层意义，也

提供了仪式化的空间，产生这些意义的历史相遇在这个空间中再次得到表演。同样，在各种传教背景下使用的新教赞美诗也经历了转变，在转变中，新的意义使权力屈从于本土化并因遭遇抵制而妥协。许多北美土著的赞美诗为保留当地的音乐风格和表演背景提供了新的可能，因而挪用不应看作是欧美文化霸权带来的结果，而应看为北美土著的一种抵制形式。传教圣歌在非洲转变为国歌是又一个例子，揭示了音乐的审美深植如何转变了意义。埃诺克·曼卡伊·桑汤加（Enoch Mankayi Sontonga）的《上帝保佑非洲》（*Nkosi Sikelel'i Afrika*）起先是一首圣歌，但是一路经历了许多变化，而后成为一首抵抗殖民霸权的泛非洲主义颂歌，1964年成为坦桑尼亚国歌，1995年成为南非国歌。在《上帝保佑非洲》的发展历史中，它的歌词使用了各种当地语言，也用了英语和南非荷兰语，这些语言共同加强了其后殖民的意义。

世界音乐所引出的复杂的审美问题，反映了我们解读世界音乐同全球化关系的几种方法。从其中一种角度解读，世界音乐通过全球相遇而形成，它某种程度上丧失了我们也许视为原初的意义。然而，相遇也是一个起点，世界音乐因为启动了审美转变而获得新的意义。随着我们对世界音乐审视视角的扩展，我们可能开始意识到，产生世界音乐的相遇，主要不是创造一种一方赢、他者输的状况。世界音乐的审美体系需要有一套不同的视角。如果允许我玩弄文字游戏，那么我以美国棒球打个比方，“谁是一垒手”（即“何者为先”）可能不成问题，关键是审美制造了“满垒”后（即“审美产生了新的意义”），比赛应该如何推进（即“如何发展”）。

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世界音乐的形而上学派

为什么选择查尔斯·西格作为我们论述的第一位音乐人类学家？毕竟，他不仅仅是音乐人类学家，虽然他有强烈的音乐人类学倾向，可相比音乐人类学，他更喜欢用涵盖更广的学科名称“音乐学”，借此表

明自己不愿意从一个涵盖广泛而“统一”的音乐研究领域排除任何一类音乐。事实上，要想在查尔斯·西格的思考和研究中发现共通的脉络并非易事，但最终我选择他，正是看中所有脉络中最为共通的一条：在他几乎所有的音乐论著中，在他作为教师的活动中，在他作为公众知识分子的事业中，他都关注世界音乐的认同问题。

查尔斯·西格在方法论上，在哲学观上，在音乐上，无比地兼收并蓄。他所受的音乐教育使他成为作曲家，而他早年对教书育人的喜爱又促使他在一套宽泛的大学文科课程里创设了音乐课。他初次与世界音乐相遇时已近晚年，显然是在他发现民间音乐是“人民的音乐”之后。他在田野调研中也兼收并蓄，一点也不亚于他从事的其他事业。虽然他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深入地进行民间音乐收集，然后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撰写拉美音乐民族志，可是他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将其主要精力从田野调研转向了系统探索，对他的“发明”记谱仪——一种用于记录音乐录音的乐谱的装置——进行实验。虽然查尔斯·西格的著述以晦涩难懂而著称，而且他本人从未将自己多样的著述汇编成集，但是他在二十世纪对音乐人类学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

实际上，西格的思想有一个可以识别的核心，他多样性活动中兼收并蓄的路径，始终如一地通向那一个核心。在其著述里，我们发现他极度关注有关音乐的一个最基本的本体论问题——音乐同词语的关系。说到底，这是对音乐意义的关注，换言之，这是对一种两难境地的关注。这种两难境地的产生是由于词语无法传达音乐意义，但我们仍然必须用词语谈论音乐。音乐人类学必须面对这样的困境，尽管几乎或根本没有克服它的希望。西格的答案不是放弃，而是不断探求其他手段来理解音乐的意义。如：将社会背景的重要性等同于音乐文本；将价值归于不同的音乐，同时还可以去衡量这些音乐具体的、结构上的特质；即使认识到表征体系不适用，也绝对没有理由为了表征与音乐相近的认知过程而去打造抽象的模式。西格并没有用历史和地理的界限来限制音乐，从而为研究世界音乐打下基础。他对当今音乐研究的影响，证实了他的远见，即随着人们对世界音乐多样性认识的日渐提升，许多人也许意识到他们成为第一批音乐人类学家的可能

性。

回到最初：流行风格与世界音乐相遇

世界音乐已经促生了相当多的流行音乐明星，其中获得神话般地位的不在少数。事实上，明星制很可能形成于若干神话和神话故事的交汇点（crossroad，当今世界节拍语汇中一种标准术语），这些神话和神话故事在21世纪初共同强化了世界音乐的流行。在世界节拍明星里，努斯拉特·法塔赫·阿里汗（Nusrat Fateh Ali Khan，1948—1997）也许最能表现世界音乐的传统神话和后现代神话的交汇点了。他是巴基斯坦的卡瓦里（*qawwali*）歌手，卡瓦里是印度斯坦（印度斯坦指印度北部地区或整个印度半岛；此处指印度北方和巴基斯坦）的一种祈祷音乐，传统上是在苏非派穆斯林圣人的圣殿里演唱的。有关阿里汗的神话大量涉及他同传统的联系。其父也是音乐家，阿里汗整个一生都同家人一起表演，虽然情况确实如此，但并没有确切事实可以证明，他的家族是一个延续了六个世纪的卡瓦里歌手世家，可以追溯至苏非派禁欲神秘主义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的兴起。他对卡瓦里音乐的音乐结构和形式诗学的理解，充分体现在他的许多早期录音里。然而，在他后期融合了不同风格的实验唱片中，在他为电影进行的配乐，如为电影《死囚漫步》（*Dead Man Walking*）和《基督最后的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进行的音乐创作里，上述那种理解似乎丧失了意义，而这两部电影音乐却大大有助于提升他的明星地位和卡瓦里的流行度。

转变是努斯拉特·法塔赫·阿里汗职业生涯中所有阶段的特点：从宗教音乐转向世俗音乐，从古典转向流行，从传统转向风格融合，从祈祷音乐转向大众音乐。他的歌唱生涯似乎证明，作为穆斯林祈祷音乐的卡瓦里和作为流行世界音乐的卡瓦里之间的距离日益拉大，乃至全球化消除了地方性。然而，这样的解读也许会错失关键之处。阿里汗并没有摒弃卡瓦里的祈祷性质，他意识到，音乐会表演传达了与圣

殿表演不同的意义。在访谈中，他非常清楚地表明自己意识到传统与流行之间的差异。他在巡演中针对宗教氛围较浓的地区举办另类音乐会的做法也引起人们的关注。他深知，在苏非派禁欲神秘主义和“苏非音乐”这两个范畴内，音乐发挥功用的方式存在着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将提供一个主导动机，可以借以解读贯穿本书的世界音乐的流行曲目和表演实践。

作为伊斯兰教内的一个教派和教团实践的体系，苏非派禁欲神秘主义经过历史性地发展，成为了世界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伊斯兰教传播到何处，苏非教派都会随之形成，而大部分受到同化的地方音乐都在穆斯林礼拜仪式中得到运用。苏非派禁欲神秘主义美化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伊斯兰教主张基本信仰和经文的集中统一，身处其中的苏非派禁欲神秘主义形成于边缘处，能接受他异性和变化。20世纪末，一方面，作为后殖民主义背景下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政治势力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因为宗教的全球化，苏非派禁欲神秘主义其本身自然地演变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宗教派别。换言之，苏非派禁欲神秘主义不再独独是伊斯兰教内的一种教派实践，而成为一种遍及全世界的表达体系，其信条和惯例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能接受。这种转变中颇为典型的是，作为世界音乐中独立的、审美范畴的“苏非音乐”这一说法日渐频频出现，它作为流行音乐被宣传，得以在市场推广并为人们消费（见图1）。苏非音乐逐渐表达了全球化的苏非派禁欲神秘主义的审美核心，但是在这样做的同时，它舍弃了苏非派许多传统的惯例。苏非音乐通过自己与苏非派禁欲神秘主义的分离，以及对宗教惯例的美学批判，获得了有影响力的一套新意义。它从音乐风格和宗教功能的严格限制里解脱了出来。作为21世纪初的流行音乐，苏非音乐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意义，本质上是审美的。

图1　奥地利萨尔茨堡一家音像店展示的苏非音乐CD唱片（1996）

我们再次见证了，在对全球化和世界音乐的两种不同反应中，明显存在着矛盾。其中一类视角欢迎流行的苏非音乐的兴起和传播，将其看作一种伴随着许多积极因素的历史进程，比如宗教的普遍复兴。另外一类视角在同样的历史进程中看到的却是消极的含义。苏非音乐究竟是一种新音乐，一套带有传统基础的创新实践，还是通过加入世界音乐市场而否定传统的声音和功能的实践？在近十五年，这两种反应都促生了大量的理论。然而，有关世界节拍的许多理论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把紧随挪用传统和传播世界音乐而变化了的音乐看作仅有单一方向的流行音乐。还是阿里汗，他的表演恰恰证实了多元化而非单一性，因为实际情况是，他表演的卡瓦里仍旧带有深厚的

伊斯兰意义，他甚至将卡瓦里与其在音乐会上表演的其他音乐区分开来。我在20世纪90年代采访过一些美国穆斯林，他们在作为世界节拍的卡瓦里音乐中发现了深层次的精神意义，而同时他们对卡瓦里的挪用和市场推广也有清醒的认识。对这些穆斯林而言，作为流行音乐的卡瓦里，其表现出的吸引力并没有消除伊斯兰教的精神力量。完全相反，流行的卡瓦里将他们引回到那种力量之中。

21世纪初，谈论世界音乐的历史和历史真实性已经成为可能。世界音乐历史轨迹的主要特点是回归和复兴。世界音乐语境下的“苏非音乐”毫不犹豫地参与到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中，或坚定地回归到对圣人谱系的敬奉，这其中的许多圣人在确立音乐传统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如13世纪的诗人、音乐家和苏非教徒阿米尔·库斯劳（Amir Khusrau）。存在于阿米尔·库斯劳和阿里汗之间七个世纪的历史–谱系的距离，由苏非音乐弥合了。无论在何处，只要我们审视从传统语境产生的流行的世界音乐，都会发现回归和复兴。例如，在伊斯兰世界的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流行的土耳其音乐阿拉贝斯克（*arabesk*，阿拉伯风格曲）以怀旧姿态回归到早期的流行风格，同时也回归到来自乡村的地方民间音乐风格以及带有伊斯兰语境的宗教传统，以此对现代土耳其社会进行了批判。正是作为新的审美而形成的所有这些音乐之声，成就了阿拉贝斯克今天的广泛流行。

因此，世界音乐的历史传统，与西方艺术音乐的目的论的历史——实际是欧美普遍的主流——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艺术音乐史的进程是通过风格发展和“伟人”谱系而推进的，传统的火炬通过这些“伟人”中的每个人代代相传。在世界音乐里，传统一再回归，不会耗尽，也不会简单归同于过去，而是在当下以新的意义加以恢复。由此而产生的历史真实性，堪比20世纪对现代性的几种批判，这些批判中最突出的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历史中的重复（*Wiederholung*）的观点，以及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传统进行的哲学解构（*déconstruction*）。当世界音乐变成流行音乐的时候，它挪用了过去和传统，以达到同它们彻底决裂的效果。本书将对一个大的悖论进行讨论：流行音乐的历史真实性以回归为标志，由复

兴所刺激，因此流行音乐重建了相遇的环境，而且向人们还原了相遇；而地方音乐家依靠全球的音乐产业，传统旋律和功能必须经历转变，为的是在西方的和声中能有一席之地，也是迎合全球的消费习惯而进行重新包装的需要。

然而问题是，这一后殖民和后现代的相遇所产生的效果是否与早先的相遇不同。从另一个角度说，地方音乐家认为颠覆霸权或抵制霸权只有通过相遇才能达成，这是世界音乐最深层的意义之一，那么流行的世界音乐的爆发，是否更新了这层意义？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必须沿着历史的轨迹，回到过去的那些相遇，因为那些相遇对当今的世界音乐最有意义。

第二章

西方与世界

世界音乐之留声

在民间音乐研究和音乐人类学的早期历史中，做田野调研的学者在收集素材和进行录音时，常常被拍下照片。有几个突出事例的照片已经成为收集和研究世界音乐的代表性图像。在照片里，当今音乐人类学家和世界音乐表演者的先辈们正在相遇，他们被定格在文化知识的交流中（见第七章）。在图2中，杰出的音乐人类学家弗朗西斯·登斯莫尔（Frances Densmore）同一位黑脚族印第安人的山区酋长坐在一起，酋长正要为她唱歌，时间是1916年，地点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登斯莫尔收集资料的范围最大可能地囊括了所有的北美土著，她也将会把酋长的歌归纳到美国土著的音乐地图上去。图3是发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一张明信片，图中几近百岁的老妈妈蒂尔克（Türk'）正在对着蜡筒式留声机演唱“古老的歌曲”，法国民歌收集者及牧师路易·潘克（Louis Pinck，1873—1940）在为她录音，当时是1938年4月29日，地点在阿尔萨斯–洛林的施泰因比德多夫。

这类照片是世界音乐历史上民族志相遇的某个瞬间的表征，人们对其提出了无数问题。它们是不是意在说明田野调研者和被调研者共享某种平等？区分二者的录音设备是不是让我们确信本真性的存在？有关这种民族志相遇发生的“田野”，媒介技术的在场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是不是目睹了所有权从音乐家向录音和记谱的转移？最后，这里现实的问题难道不是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吗？换言之，难道不是那些不拥有这样的音乐，但确实拥有技术来占有它的人，运用技术表征的手段剥夺“土著”的音乐并挪用来为自己欣赏、研究和消费吗？

关于权力的两个问题——运用和妄用——是本章的中心。第一个问题涉及的范围特别广泛，因为关于权力运用的问题是：在过去和当下，世界音乐的概念如何不仅反映，而且鼓励人们区分出两个世界，即有权力者和无权力者。这个问题切中世界音乐的历史中一个两难境地的要害：世界音乐为什么那样频繁地将西方和其他地方割裂？第二

个问题似乎要求我们在更加地方性的层面寻找答案，因为它所关注的工具和产物，使人们想象和研究世界音乐成为可能。它迫使我们面对所有权的两难境地：把他人的音乐记录为乐谱或录制成唱片作为世界音乐呈现，究竟是一种什么景象呢？谁从表征的行为中获得权力？谁丧失了权力？这类问题全然不是什么新问题了。实际上，这些问题可能无法脱离与世界音乐的历史的联系，更令人困扰的是，它们无法脱离于世界音乐的方法论。

图2　弗朗西斯·登斯莫尔与一位黑脚族印第安人的山区酋长（1916）

图3　路易·潘克与老妈妈蒂尔克

现在，我转向一组相关的个案研究，它们为本章提出的两个有关权力的问题提供了答案。虽然与这组案例相关的人物都是德国比较音乐学的老前辈埃里克·莫里茨·冯·霍恩波斯特尔（Erich Moritz von Hornbostel，1877—1935），但是他的两套唱片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世界音乐模式，这些不同模式很明显地表现在最早出版的世界音乐集子里（如赫尔德的两卷民歌集）以及最近推出的世界音乐集子里，后者以CD形式或通过因特网发行，因教育和娱乐的价值取向而成为消费品。在我们论述获得格莱美大奖的世界音乐之前，我们应该先看一看将世界音乐录制为唱片的那些最初尝试。

这里讨论的两个集子，都是一位音乐人类学家回应我称之为“结

集冲动”的最早尝试：将多样性集中于唱片上，为的是以整体的方式表征世界音乐。虽然霍恩波斯特尔组织和编辑了这两个项目，确切说应该是选编成集，它们各自却非常独特，很不相同。最根本的不同是，两套集子各有不同的听众，也可以说是各自有不同的使用者和消费者。在本章开篇处，我想提出，世界音乐集一直表现出这种基本差异，这一特点延续至今。基于此，世界音乐集就意味着一种基本的两难境地，甚至是矛盾，那正是我们在世界音乐的研究和教学中所面临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霍恩波斯特尔的《示范集》（*Demonstration Collection*，1963）和《东方音乐》（*Music of the Orient*，1979，第一版1934年）看作“最早的唱片集”，那就是要将结集冲动的意义扩展，让其作为世界音乐历史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该主题让我们注意与“协调”相关的若干方面：收集者和被收集者；无法表现自己的人和有经济及技术资本表现自己的人；学者和外行；个人实践和公开展示；人文魅力和异国幻想。霍恩波斯特尔的集子在结集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他的结集活动不仅仅是要获得实地录音，而是要使录音得以传播：（1）让学者能够研究它们；（2）让更多普通听众能够消费它们。

学界和大众常常由一个分水岭一分为二。在分水岭一边，我们目睹了早期比较音乐学家的初始关注点。这些集子中所包含的音乐曲例显然可以作为理解音乐起源和本真性的途径。听众用一幅比较地图导航，徜徉在音乐集中。在每一个新的疆界，世界音乐的旅行者都会对音乐内在的多样性增加一些新的认知。比较音乐学家早期的其他关注点也在起作用，例如音乐作为文化实体的传播以及“文化区域”（德语*Kulturkreise*，20世纪初期一个人类学思想学派的基础）的形成。用音乐重新绘制世界地图，这是选编者的目的。

在分水岭的另一边，我们见证了19世纪末异国情调幻想的表征性语言。说得简单点，这些集子也是储存奇异性的宝库，它们给人们的陌生感是其吸引力之所在。霍恩波斯特尔的两个集子所形成的世界音乐的地图表面上看似很不相同。《示范集》是自下而上看世界音乐；

《东方音乐》则是自上而下看世界音乐。在《示范集》里，我们遇到了一堆（42则）非常简短的音乐曲例，这些音乐常常由民族学所研究的最边缘地区的佚名表演者表演。即使来自欧洲的音乐，其曲目也被看作是非常古老的或有历史记载之前的（例如第一曲是瑞士的约德尔［真假声交替］唱法，第三曲来自高加索）。《东方音乐》则将“东方”区分出来，这是艺术音乐的惯例，需要更大型的合奏曲和更长的作品展现出更为复杂的音乐。《东方音乐》虽然也有两张慢转唱片，但音乐曲例仍旧较少（24则），而且许多曲例是大作品的片段或其中的乐章。

两个集子都是历史概念的证明，但我们还是发现在《示范集》里最开始主要呈现的是最古老的，甚至于最本真、最具异国情调的曲例，而后朝着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而在《东方音乐》里，霍恩波斯特尔遵循历史研究的东方学模式，这种模式是黑格尔（G.W. F. Hegel）和19世纪欧洲史学家加以系统化了的，在该模式中，“文明”从东向西移动（即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因此，《示范集》里的世界音乐史包容性强，包含大洋洲最偏远地区的音乐文化和欧洲诸传统中“时间悠久的”（*longue durée*）音乐文化。但是音乐为东方叙述了一部独一无二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沿着单行道发展，在这条道路上，进步是区分有历史的民族和无历史的民族的固有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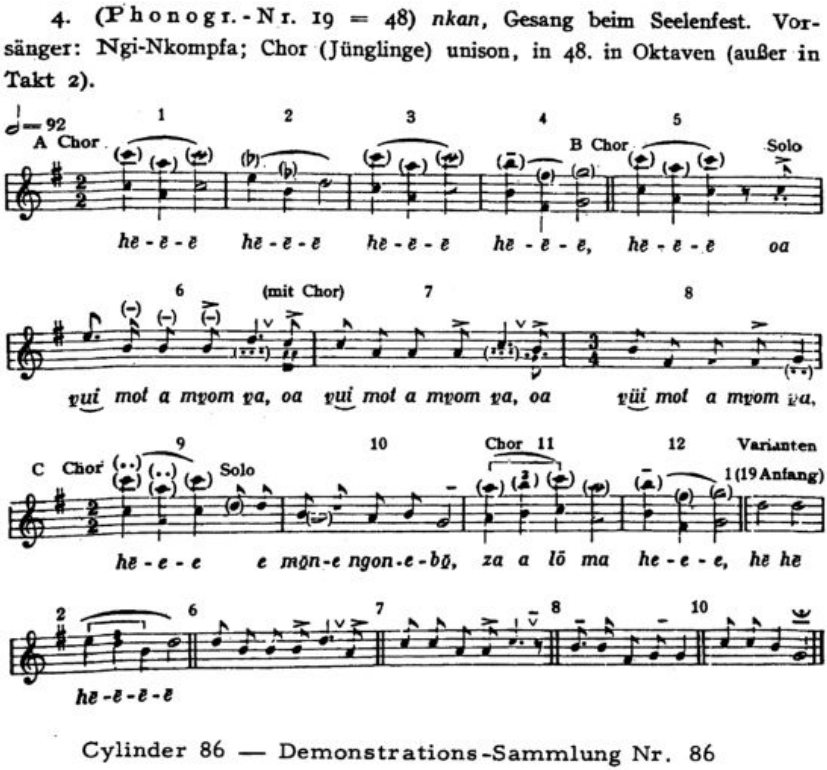

图4　芳族的葬礼安魂曲（1913）

《示范集》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示范集》也非常有包容性，这同我们在本书中所探讨的世界音乐的独特性并非不相干：该集子包括了学者的研究曲目，也包括了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的研究曲目，他们致力于记录最早的音乐形式，然后将这些形式转化成全面的科学话语。尽管该集子涵括的历史跨越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并且也被用来做人物研究（集体的历史），这些研究既涉及音乐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早期学派（柏林学派），也涉及20世纪最杰出的学者，可是事实也表明了想要揭示这个集子本身的细节并非易事。《示范集》的曲例全部录制于1900至1913年间，它利用了表征和修辞的语言，既系统又具比较

性，一句话，它是科学的。注意图4的这首曲子，它选自《示范集》德文版第86张唱片（1963年民风［Folkways］唱片公司再版，慢转唱片第二张，B面，第四曲），记谱带有严格的民族志特征以及音乐细节。

《东方音乐》

《东方音乐》与《示范集》的目标不同，这是毋庸置疑的。到20世纪30年代初，人文主义学术研究普及开来，受此推动，世界音乐的专论和更为通俗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始大量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唱片也在公共领域赢得一席之地，从而造就了家中拥有留声机的新观众群体。由高亭（Odeon）唱片公司和帕洛风（Parlophone）唱片公司（当时德国和英国的两家跨国唱片公司）发行的《东方音乐》，刻意在音乐消费中利用上述这些转变。

《东方音乐》一出版，先前出版的《示范集》的整个销售量就大跌，如果《东方音乐》只是在经济方面取得了《示范集》从未取得过的成就，那么这两个集子的故事就要简单得多了。可是《东方音乐》讲述了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世界音乐史，这种不同是由不一样的编选方式产生的。如图5所示，那是来自突尼斯的一首“艺术歌曲”，用了马卡姆调式。

在对非洲音乐的展现方式方面，这两个录音集在地理上、本体论上、历史上完全不同。《示范集》的关注重点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个地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殖民主义欲望的一个目标区域，而《东方音乐》只考虑北非。《示范集》的曲目收集地是“田野”和“传教站点”，这些地方促生了具体的文化研究类别，而比较音乐学则与它们进行合作研究。北非的收集点是“城中”，即都市中心，在那里安达卢西亚（即类似中世纪的欧洲）和现代欧洲（以小提琴为例，霍恩波斯特尔向读者保证它是“欧洲的”）的影响与“古代的生活观”相互混合。收集者不是霍恩波斯特尔本人，而是他在柏林的音乐人类学同事

罗伯特·拉赫曼（Robert Lachmann）。这些居住地迥异的音乐他者，似乎不能更多地相互对比。果真如此吗？事实上，我们在两个实例里都目睹了音乐家沿着历史的轨迹旅行，无论是通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部分人群皈依基督教的行为，还是借助突尼斯艺术歌曲对欧洲与北非界限的拆除，这一轨迹都使他们向西方接近。欧洲与北非界限的打破则将在1932年召开于开罗的阿拉伯音乐大会上起到重要作用（见第三章）。

突尼斯

23. 艺术歌曲；马卡姆调式

The ancient view of life places the life of man as well as all earthly events—microcosmos—in counter-relation to a path of deified stars, seasons and hours of the day—macrocosmos. The music, too, is included in the harmony of the cosmos; the harmony adopts the personality of the planetary deity represented in the leading tone; this type of composition demands a proper time and occasion of delivery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bliss and not destruction. Maqām Mezmūm calls the demons—but woe if the call resounds inside the house!

The ancient faith and customs have, in the "Andalusian" style—originating in the Moorish Period of Granada—been more purely preserved in the north-western towns of Africa than in the East. This Tunisian recording belongs to this style. A European violin alternates with the vocalist in the melody, a lute ('Ud) accompanies (see recording 19). The metrically timed song is preceded by a rhythmically free structure, which displays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the Maqām: the leading tone at the base of the structural treble (Do-Modus), the accentuated "Neutral" third (halving the treble) and principally the fundamental the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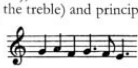

Tonal structure *:

Town Players. Photo: Dr. R. Lachmann.

图5　突尼斯“艺术歌曲”，用马卡姆调式

两个不同的非洲也揭示了两种不同的话语以及两种不同的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类型。在《示范集》里，霍恩波斯特尔将其同事们的研究成果编入其中，他们共同为比较音乐学铸造了表征工具，这些工具依靠科学方法，进而又产生了科学方法，同时也催生了世界音乐是文化差异的产物这样一种意识。科学方法的痕迹在《东方音乐》里也十分明显，但它是以另外的方式而得到利用的。《东方音乐》强调视觉和音乐戏剧，其本身成为观众猎奇之所，而通过取悦都市消费者，它也成为娱乐性世界音乐的所在。21世纪初始，上述这两大类别的集子对世界音乐曲集的决定性影响，丝毫不亚于其在20世纪30年代初所发挥

的作用。

录音，收集，选编他者

含有代表性民歌的早期作品集

◆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歌曲中的人民之声》（*Stimmen der Vőlker in Liedern*）和《民歌》（*Volkslieder*）（1778年和1779年）。收集了世界各地的民歌，两卷本（见第五章）。

◆ 阿希姆·冯·阿尼姆（Achim von Arnim）与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少年的魔法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1806年和1808年）。“民间诗歌”集，没有旋律，但其文本成为19世纪中欧民歌的典范。

◆ 约翰·菲利普·苏萨（John Philip Sousa），《各国的民族曲调、爱国曲调及经典曲调》（*National，Patriotic and Typical Airs of All Lands*，1890）。“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队领队”苏萨于美洲殖民地日益扩张的历史时刻编写了此歌曲集，并出版了单本集，集子中有详细的记谱和编曲，从而绘制出世界的音乐版图（见第五章）。

使用录音技术收集世界音乐的早期尝试

◆ 1893年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即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是为了庆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举办的，故名“哥伦布纪念博览会”）。使用蜡筒录制不同音乐文化的音乐的最早尝试。103首乐曲录音包括爪哇、土耳其/黎凡特（地中海东部）、夸扣特尔印第安人（Kwakiutl，北美洲西北部沿海的一个印第安部族）的音乐，以及在芝加哥世博会

展出的“南太平洋诸岛”的曲例。

◆ A. Z.伊德尔松（A. Z. Idelsohn），《希伯来–东方旋律宝库》（*Thesaurus of Hebrew-Oriental Melodies*）第1—5卷（1913年—1929年）。利用来自奥匈帝国科学院的录音设备，收集、改编各流散地的犹太音乐。

◆ 威廉·德根（Wilhelm Doegen）（编辑），《在异族中——一种新的人类文化学》（*Unter fremden Vőlkern ——Eine neue Völkerkunde*，1925）。由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俘营里对歌曲、故事、语言实验进行的记录和分析。

由早期的音乐人类学家率先进行的录音

◆ 弗朗西斯·登斯莫尔，成套录音和多卷本记谱，大多由美国民族学办公署和国会图书馆出版。长达半个多世纪（1901年，直至她1957年去世）的时间里，她用录音系统地收集了一个又一个美国土著的音乐，涵盖他们所代表的完整的音乐文化（见图二）。

◆ 埃里克·莫里茨·冯·霍恩波斯特尔，《示范集》（1963）和《东方音乐》（1979，第一版1934年）。录音集代表了世界音乐的交融。

◆ 1932年开罗阿拉伯音乐大会。来自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音乐录音，从西面的摩洛哥到东面的伊拉克。录音集是音乐人类学的分类法的实证，尤其是因为引入了罗伯特·拉赫曼的概念（见第三章）。

20世纪末世界音乐的系列唱片

◆ 民风唱片。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期，摩西·阿施

（Moses Asch）的民风唱片公司（也作“少数族裔民风”公司）向全世界的音乐家和音乐收集者打开大门。阿施用录音扩大了世界音乐的普及度，因为他能够让远超过1000种的唱片不断再版和传播。民风唱片的部分业务由史密森学会支持，该学会再版了一些早期录音，并继续发行新CD 唱片。

◆ 新世界唱片。一套意在包容所有的美国音乐的录音。第一套100张唱片在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前后发行，之后继续出版直至今日。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音乐集。一个录音项目，相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的扩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录音一般是来自单一民族或地区的音乐集子，由不同的唱片公司出版发行，引发一种以民主方式灌制唱片的意识。经典和传统音乐得到重视，许多濒危的曲例得以保存。

中央航路的音乐家

本章行文过半，我在此处所要讨论的世界音乐家一般都是佚名的：我别无选择，只能将他们集体称作“中央航路的音乐家”。中央航路是地理指称，指奴隶从非洲被贩卖到南北美洲，以及欧洲及其殖民地的线路。它标志着西方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历史和文化距离的显露，这种距离初显于航海大发现时期，一路经过启蒙时代，穿过现代和后殖民时代，再继续出现于非洲流散地的文化景观中（见第六章）。中央航路是一种空间的象征，不仅通过运用权力来构建他异性，而且将他异性强加于人。它自身也是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世界音乐曾被打造出来，现在以种族想象的方式继续得以打造。

现代学者并不是没有中央航路音乐家的记录，只是这些记录几乎

清一色地由有名有姓且有权力的人物所做，例如船长、殖民地官员以及在本书第一章开头提及的传教士。相比之下，虽然音乐家看似有音乐创作的天性，因而时常引人注目，但他们本人反倒没名没姓，而且千人一面。中央航路音乐家没名没姓的事实，说明了西方在历史上是如何通过强使他者佚名而实行主宰的。中央航路的音乐也一直是没有名称的，相关记录中呈现出的是音调缺乏细微差别、乐章程式化的特征。一些欧洲人需要正面描述奴隶的音乐，强调其积极的特点，因为他们希望非洲人能在欧洲人创造的新世界里改变信仰。即便如此，奴隶的音乐之所以被歌颂也是因为其旋律“简朴而有活力”，这是亚历山大·巴克利（Alexander Barclay）在1826年的描述，他说道：“一切都充满了生命力与欢乐，这理所当然是可以想象的最令人愉悦的景象之一。”

然而经常被赋予更多权力的那些人记录了西方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如黑格尔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也有论述，他认为非洲人无法理解西方的地位：

> 非洲人，因其无差异性和集中统一性，还无法区分作为个人的自我性与作为普罗大众的必然性，因而他们对与自身不同、层次更高并且有至上权力的人群一无所知。
>
> （黑格尔，转引自Eze，1997：127）

非洲音乐确实未毁于中央航路，在世界音乐史的进程中，这种音乐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实际以西方流行音乐的形式存在，它对世界音乐的作用和影响也许超过任何其他音乐。对于被迫进行中央航路旅程的许多人而言，他们被允许携带的为数不多的财物中就有乐器，这些乐器用来弥合非洲和西方之间的差异。非洲音乐离析出独特的我者性标志，并创造性地与他者性混合，从而发展出无穷的体裁和形式。早期的某些历史时刻，中央航路的音乐家们表演过这些音乐，音乐的名称在本书几乎每一页上都可见到，它们肯定会成为任何一个世界音乐术语表的主要部分。中央航路音乐家的最大遗产可能就是消除佚名，代

之以一种权力形式的做法，这种权力形式是由世界音乐及世界音乐的现代史所赋予的。

西方，以及“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分裂

音乐人类学自发端以来，就受到西方及其他者之间的空间的困扰。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学科领域的发展，靠的就是试图将发生于这个空间内的相遇加以归类，并由此界定这一空间。依托历史相遇时刻与学科焦点，音乐人类学成为“高”文化和“低”文化、“口传”文化和“书面”文化、“大众”与“精英”、“有历史”民族和“无历史”民族、“前现代”和“现代”之间的空间，或者在我们的时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空间。所有这些名称，以及它们形成的概念对子，显然都来自西方，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这里的似是而非就更令我们困惑了。在这些对子里，一个名称可以为观察者所用，以此将另一个名称归至被观察者所占据的空间。

我者和他者之间的这一分裂给音乐人类学造成的困境实在太明显，尤其是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伦理道德含义的困境。音乐人类学表征的权力是否取决于它所遇到的他者？表征的敏锐度和本真性是否取决于强化他异性的程度？而这种他异性的程度，即使不靠夸大分裂，也得依赖于扩展分裂。一套基于他异性的表征语汇是否确实有助于创造“他者”？

就音乐人类学而言，这个分裂的含义确实极具影响力。音乐人类学家不能仅仅观察和描述我者和他者之间的空间，而是必须进入这个空间，研究发生于其中的各种复杂形式的相遇。这个空间是作为田野调研的场所而打开的。本章所描述的表征行为重新塑造了我者和他者之间的空间。音乐人类学家常常不是独自在田野里，同样，他们下田野的动机也并不单一。只有获得权力，才有可能进入我者和他者之间的空间。然而，音乐人类学的历史很独特，因为人们已经达成普遍的共识：权力关系到实践的开展。

面对由西方及其他者之间的分裂所带来的困境，音乐人类学在历史进程中努力弥合分裂，甚至试图弥补这种分裂时而造成的人类劫难。这里的意图不是要推卸责任，不承认分裂所造成的权力妄用，而是要指出，音乐人类学之所以引人注目，也许是因为其承认弥合分裂不仅有智识方面的好处，而且也是道德的义务。学者个人或某些研究方法能否达到这样的目标，则另当别论。

重新界定西方及其他者之间的空间的努力，引起了史学研究方法的一系列转变，实际上也是范式的转变，由此引发了与世界音乐新的相遇以及对它的诠释。影响最广泛的早期范式转变之一直接来自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发表于1778年和1779年的两卷民歌集。在他对“民歌”的系统阐释中，赫尔德认为，所有的人通过音乐的交流，如同通过言语交流一样自然。他尽可能延伸收集民歌的范围，这样便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世界上的音乐的一种共同性会将人类——赫尔德是指经过启蒙的人类——聚合到一起。

民歌的普遍性概念所能表征的空间，极大地影响了赫尔德以后的几代人。然而，在19世纪，他的后继者试图收集和发表民歌来填补这个空间，他们加固了空间的边界，尤其是将民歌归于语言领域和民族主义理想。民歌中的*Volk* 一词不再指“人民”，德国人开始代之以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它的复数形式*Völker* ，从而开始用其特指“民族”。虽然对于他自己的18世纪的民歌概念，赫尔德不冠以政治–地理的名称“德国的”，可是到了19世纪，用这样的名称成了惯例，而非例外。赫尔德曾雄心勃勃地去解决西方和其他地方之间的困局，而在他以后的几代人中这种困境又再次出现。

利用机械复制作为录制世界音乐的手段，最初也弥合了这种差异。几乎从最早在蜡筒上录制世界音乐的尝试开始就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录音手段介入我者和他者之间的空间，重新界定了这一空间。人们能够把“田野”带到世界博览会和国际展览会上的蜡筒式录音机里，也能够把蜡筒录音机带到田野里。虽然同今日的数字录音带（DAT）和迷你光盘录音机相比，蜡筒录音机显得很笨重，但正是因其可携带性而在当初显得很有特点。从理论上讲，它们能够录下世界上任何地

方的音乐，从而应该可以消弭西方与他者之间的空间。

便携式录音设备瓦解我者和他者之间差异的这种权力（power，亦即能力），是全球化反复念叨的东西之一。然而，我们再次见证了这一挥之不去的关键词“权力”。21世纪初始，挥之不去的“权力”对于新一代音乐人类学家来说依旧存在，这些人本身并非来自西方，他们的视角汇聚在田野调研和音乐人类学领域的新方法里，这些方法不断批判西方顽固的偏见里所负载的含义。被人们一再称呼为“他者的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对于音乐人类学愈合这类分裂的可能性并非特别有信心。西方及其他者之间的空间持续存在，不是因为全球相遇所面临的流动的地理环境，而是因为地方性的权力不平衡。如果这个空间因其无法弥合而继续存在，那么音乐人类学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仅要批判这一空间所包含的音乐，也要批判我者性这类概念，正是这些概念塑造了音乐人类学家与他者的相遇。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及世界音乐的发明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发明了世界音乐，可那只是一次简单的命名行为而已。正是他杜撰了民歌（*Volkslied*）这个词，不仅用来指他在当地听到的音乐，也用来指他在整个启蒙时代的欧洲世界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曲目。赫尔德关于音乐的大量著述围绕三大主题：民歌、语言和历史。他把民歌想象为互不关联的东西，正如他所出版的两卷有深远影响的集子中的歌曲，第一卷（1778）题为《歌曲中的人民之声》，第二卷（1779）简单命名为《民歌》。不仅如此，他还把民歌想象为人类交流的基本工具。在赫尔德早期有关语言的最具影响的著述之一中，他认为，言语和歌曲具有同一起源，这也就意味着全人类都把音乐当作自我表达的一部分，同时也把音乐看作人类彼此分享的各种文化的独有特征。此外，言语与歌曲的共性也大大有助于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二者的交互促进了读写水平的发展，影响了宗教习俗的形成，并且增进了人们同其他文化的交流。

把赫尔德称为音乐人类学家会不会显得夸张？但至少他是个博学家，他精通神学、哲学、语言学，并通晓历史和文化的启蒙思想研究。此外，他对音乐的兴趣，超越了他作为博学家对所研究的其他学科的兴趣。他是东普鲁士一个乡村的新教教堂乐师（*Kantor*，即领唱）的儿子，幼年就培养了对教堂歌曲，尤其是对当地圣咏演唱的爱好，这种唱法既靠口传，也靠谱传。赫尔德不仅仅是业余音乐家，在他一生中，他亲自作曲，并与作曲家（较为著名的如J. S.巴赫［J. S. Bach］的儿子J. C. F.巴赫［J. C. F. Bach］）和宫廷音乐家合作，为他们写歌词，而且他还把音乐主题纳入到自己的抒情诗歌里，之后有许多作曲家为这些诗歌谱曲，其中包括贝多芬（Beethoven）、舒伯特（Schubert）、布拉姆斯（Brahms）和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赫尔德养成了一种民族志式的敏感性，这一说法显然有据可考。例如，他对民歌持久的兴趣，在他1770年同歌德（Goethe）在斯特拉斯堡的会见之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那时歌德正在收集阿尔萨斯民歌，这些民歌后来被收录成集，德国民俗学家认为这是最早的田野调研成果。赫尔德在里加的一个教堂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职位，他本人对收集欧洲德语区边缘地带的民歌特别感兴趣，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民歌传统在他的民歌集里占据非常明显的地位。

作为世界音乐的发明者，赫尔德的作用也因之获得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角色影响了启蒙思想的几个重要领域，继而影响了启蒙思想引发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发展。有几种基本的民族主义批评范式也被认为是由赫尔德确立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学者将他关于民间音乐的观点引申到民族音乐和族群音乐方面。作为世界音乐的发明者，赫尔德因之提出了关于西方和非西方的问题，以及民间音乐是反映了欧洲史还是反映了世界史的问题。事实上，赫尔德关于音乐的著述因其涉及广泛而意义非凡。在他看来，德国民间音乐，显然不如欧洲边缘地带和欧洲以外地区的许多音乐那样重要。这里不是针对赫尔德的质疑者和误读者进行的辩护，而是想要表明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即在赫尔德之后，西方对民间音乐和世界音乐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如果说，他为自己的历史哲学所描画的地图，原本出自他身为

中欧知识分子这样的有利地位，那么这幅地图已经延伸到了整个世界，所展示出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世界的人民、民族和国家所共有的音乐语言所提供的那些细节。赫尔德鼓励他的读者通过这些人民、民族和国家的音乐去更好地了解他们。

获得格莱美大奖的世界音乐：两幅写照

自从赫尔德以来，世界音乐不断得到创新、再创新。人们重新命名相关术语，并以细微的差别表征新的乐调和曲目。收集和录制更加高效，话语讨论的网络也更加有效。赫尔德之后的两个世纪，如同我们在本书通篇所见证的，有大量的音乐以世界音乐的名目呈现出来。再者，本章以精选的例子表明学者们坚持不懈地出现在“田野”，从早期的博学家到当今的音乐人类学家，他们的旅行和民族志旅程使得他们能够接触那些他者；他们记录他者的音乐，并为留下记录而设法保存这些音乐。

人们进入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空间之旅，以记录和传播世界音乐为动力，但这样做的群体不仅仅是学者。我们在与中央航路音乐家相遇的过程中见证了这一现象，即船长、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同样描述了这些音乐家的生活和音乐。这个故事到了20世纪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20世纪生产和消费录音制品成为规模巨大的商业活动。事实上，如果说世界音乐的录音制品的销售在20世纪前半叶只是牛刀小试，那么在20世纪中叶，世界音乐的唱片生产则加速了，而在20世纪最后25年，世界音乐则跨入了录音产业的商业化发展时期。世界音乐的销售，起先是以商业性的慢转唱片的样式，大约自1990年起以CD唱片样式发行，遂演变成为规模巨大的商业活动。如此一来，世界音乐的销售便带来了新的环境，对收集和录音以何种方式制造西方及其他者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带来影响。如同启蒙运动时代，杜撰的新词为世界音乐最新的重新想象提供了证据。如果赫尔德新创的“民歌”一词包含了很多内容，那么“世界节拍”、“全球流行曲”，还有“世界音

乐”也都可以为录音产业提供丰富的内容。

本章的开始部分对两种最早的世界音乐集进行了对比性描述，本章的结束部分也同样是对两个集子的比较。较之霍恩波斯特尔的两个集子，我完全不可能宣称，用来结束本章的两个录音集是世界音乐的“最新集子”，因为我们根本跟不上新的世界音乐集子的生产速度。然而，我在这最后一节所探讨的两个录音集，却因各种原因而有助于进行这样的比较。两个集子都从历史角度探索世界音乐，以至若不采用历史主义倾向的角度，也许就完全不可想象它们所包含的世界的范围。两个集子都收录了许多不同音乐家的表演，虽然这样的收集出自不同理由；两套录音集都揭示了关键词“各类艺术家”的不同侧面，这个关键词甚至（或者说，尤其）伴随着最商业化的世界音乐录音。最后，把两套录音集放在一起研究，还有一个更加基本的理由：它们都赢得了格莱美大奖，因而它们都有助于理解录音产业本身如何逐渐将其产品定位于西方及他者之间。

《圣地亚哥》——1997年最佳世界音乐专辑

在航海大发现之前，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象征着欧洲人所知的世界的西部边缘。尽管有各种意图和目的，但人们到圣地亚哥的朝觐活动界定了西方，这个界定的达成是通过提醒欧洲基督徒，越过西方就是未知之地。在整个中世纪的西方，朝觐者们经过长途跋涉后汇聚于圣地亚哥，这类旅程以歌曲和崇拜为标志或者作为衡量标准，朝觐的中心是现今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因而这里也曾经是世界音乐的一个发生地。尽管是处于中世纪世界的西部边缘，伴随着中世纪朝觐者们的那些音乐习俗，依然被结集成册，这些集子也体现了世界音乐的典型特征和整合本色。

著名的爱尔兰传统乐队“酋长”（Chieftains）决定录制一个专辑献给圣地亚哥的朝觐之旅，他们既遵循，又偏离去往世界西部边缘的中世纪之路。“酋长”乐队属于世界节拍的凯尔特风格（见第四章）的最

初倡导者之一，他们用凯尔特音乐描绘了一次20世纪末的旅程，从而将圣地亚哥转变成了凯尔特世界的中心。圣地亚哥所属的加利西亚是一个文化区，它不断地为凯尔特风格的想象开拓新的疆域，从而将欧洲的凯尔特边缘延伸进这一疆域中去，实际上是将欧洲西部从北向南的海岸界定为凯尔特地区。然而，“酋长”乐队的《圣地亚哥》音乐之旅并没有只沿着一个集中的方向通往圣地亚哥，而是偏离出去，进入加利西亚和凯尔特音乐的世界，并邀请其他世界音乐的驻足者加入其中。在墨西哥的瓜达卢佩，当今世界最大的朝觐中心，加入“酋长”乐队音乐之旅的有罗斯·罗伯斯乐队（Los Lobos）和琳达·朗丝黛（Linda Ronstadt）（第8曲）。爱尔兰尤宁风笛（uilleann）和加利西亚的盖塔（*gaita*）风笛的乐手加入了波尔卡舞曲的演奏（第6曲），这首曲子为中世纪的吟诵（第1曲）和西班牙的阿斯图里亚斯的宗教歌曲（第3曲）提供了世俗风格的对位。第12和13曲来自古巴，莱·库德（Ry Cooder）手持大曼陀林琴（*mandola*），编织着古巴黑人的声音，他传达这些声音的地方是中世纪朝觐者们在西行旅程中未曾想象到的领地。

《圣地亚哥》具有赢得1997年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大奖的所有必要特征。它结合了传统与流行风格；参与其中的多个民族的艺术家象征着同整个世界的密切结合。除了圣地亚哥之路上参与表演的无名民间音乐家，还有一些大牌跨界明星受到了美国录音艺术与科学学会的高度赞扬，该学会认为他们拯救了世界音乐的人才，使这些人不至于因不灌唱片而遭遗忘；莱·库德已经两获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大奖，分别是1993年与V. M.巴特（V. M. Bhatt）的合作以及1994年与阿里·法卡·杜尔（Ali Farka Toure）的合作，这对《圣地亚哥》在格莱美获得高票肯定产生了影响；同样，“酋长”乐队于1992和1993年两获格莱美最佳传统民谣录制奖，对《圣地亚哥》获奖也功不可没。中世纪朝觐者的赴圣地亚哥之路，在“酋长”乐队和世界音乐的其他音乐家于20世纪90年代年代中期重拾旧途之时，几乎已无神秘可言；这条音乐之路已经牢牢为西方录音产业所掌控，同时，它将一种凯尔特幻想刻录在唱片上，对人们而言这种幻想既有熟悉之感，又具异国情调，足以

成为西方及他者之间的世界音乐空间的缩影。

《美国民间音乐集》（*Anthology of American Folk Music*）——1998年最佳历史录音

1997年，史密森学会将哈里·史密斯（Harry Smith）的《美国民间音乐集》重新企划、编排、发行，从而为世界音乐的历史贡献了重要的篇章。在20世纪50年代由民风公司发行的首版录音中，史密斯所指的“美国”与世界音乐中的“世界”，可以说既是同义词，也不是同义词。哈里·史密斯这个录音项目的首版与许多人的录音集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些人相信摩西·阿施对世界的看法，投向他的录音室。哈里·史密斯是一个非凡而又怪异的博学家，他编辑这个录音集，靠的是收集旧日的商业录音，收集的范围有少数族裔的和“种族”唱片公司的录音，也有无名的地方公司的录音以及78转唱片，差不多都是无价值的制作。

在诸多方面，哈里·史密斯都是赫尔德在20世纪的智识翻版。史密斯用“美国民间音乐”这样的措辞，意图是吸纳已经进入美国的所有类别的俗乐。如同赫尔德，他有志于冲破世界的界限。同样，他对录音所具有的潜能的热衷也使他成为埃里克·莫里茨·冯·霍恩波斯特尔的智识翻版。史密斯对他自己收录到集子里的歌曲的兴趣，也许还稍次于他在包容性方面的兴趣；他所关注的重点是要让音乐重绘美国的文化历史和地理，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打破美国民间音乐和世界之间的边界。许多话语在《美国民间音乐集》里交汇，但这些话语都为复杂的录音手段的应用所统一。作为一个集子，这个项目用录音手段录制其他录音制品中的声音；史密森学会重新发行的版本又为录音历史增添了一笔色彩，新版本以CD唱片形式存储音乐，附加了学术性解说和相关逸事，以及重新刊印的哈里·史密斯本人为这些录音所写的“手记”。学者和文化英雄都贡献了自己的声音，为的是描绘该“音乐集”所可能表征的音乐领域。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音乐开始渐渐斩获格莱美最佳历史专辑大奖。布鲁斯（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1990年）和爵士（比利·霍利迪［Billie Holiday］,1991年）的专辑获得了此奖项，经典再版虽然仍旧是提名大户，但正在失去对奖项的掌控。1998年史密森学会再版的哈里·史密斯的“音乐集”获得格莱美大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利用了录音所提出的技术问题，并提醒音乐人类学家重新考虑这些问题同民族志相遇和田野调研的空间所具有的关系。录音本身似乎首先取代了田野，虽然在唱片说明小册子和唱片封套文字里，哈里本人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非理论家出现。他为唱片尽力搜集音乐，他坚持认为，尽可能全面地录制唱片，是所有对世界音乐感兴趣的人的一个共同目标。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说，格莱美奖不是颁给了音乐，而是颁给了录音；以更加客观的眼光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正是在我者和他者之间的空间里与世界音乐相遇及表征世界音乐所呈现的基本特性。

第三章

神话与历史之间

飞跃——1932年开罗阿拉伯音乐大会

1932年春天有一个月的时间，埃及的开罗成为辩论阿拉伯音乐在世界音乐中的地位问题的焦点。作为马赫穆德·阿赫马德·希夫尼（Maḥmūd Aḥmad al-Ḥifnī，1896—1973）的设想，阿拉伯音乐大会聚集了来自欧洲最伟大的学者和音乐家，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西起摩洛哥、东至伊拉克——最知名的音乐家。希夫尼担任埃及教育部的“音乐督察员”，得到福阿德（Fu'ād）国王的强力支持和东方音乐学会在行政事务方面的协助。如拉西（Racy）所描述的，此次大会将是一盛大事件，是在音乐与音乐学最高层面上的“东西方相遇”。此次大会筹备多年，是真正国际性范围的大会，它将对阿拉伯音乐过去对世界音乐历史的巨大贡献予以肯定，并打算为其将来对世界音乐做出更大贡献打下基础。大会也会对阿拉伯音乐在世界音乐史册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给予认可。

1932年的阿拉伯音乐大会设有宏伟的目标，像是一次相遇，具有可能改变世界音乐史进程的所有外部特征。欧洲人被请到了大会上，不仅为见证过去，也要为适合阿拉伯音乐发展的未来道路提出专家级建议。与会的音乐界和音乐人类学界的人物的确声名显赫，包括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和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等作曲家，卡拉·德·沃男爵（Baron Carra de Vaux）和亨利·乔治·法默（Henry George Farmer）等东方学家，库特·萨克斯（Curt Sachs）、埃里希·莫里茨·冯·霍恩波斯特尔等音乐人类学家，以及罗伯特·拉赫曼。来自北非和黎凡特的代表团带来了民间音乐团和艺术音乐团，他们的音乐会证明了从摩洛哥政府到黎巴嫩政府的全力支持，支持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进入各个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音乐家中也有著名人士，如伊拉克歌唱家穆罕默德·克班吉（Muḥammad al-Qubbānjī），还有与会者不熟悉的一些未来之星，突出的有埃及的乌姆·库尔图姆（Umm Kulthūm），关于她，我们稍候再述。大会的确

标志着世界音乐相遇中一个兴盛的时刻。

一切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但是也许这种结果本该在预料之中。尤其是，欧洲人和阿拉伯代表对于阿拉伯音乐在未来如何定位，给出完全不同的前景。我们原本或许预计欧洲人可能提出一个求变的历史性计划；难道当时不正是大好时机，将阿拉伯音乐从其过去的荣耀里解脱出来，以便它能再度繁盛？同样，我们也许预想着，阿拉伯代表会利用这次大会展现过去，并为保留传统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可是情况正相反。欧洲人承认欧洲音乐在中世纪受惠于北非和地中海东部的伟大传统，采取支持传统的态度。然而，传统意味着欧洲音乐和阿拉伯音乐在世界音乐史上是互相分离的；它意味着二者的不同，但更意味着它们分属两个独特的历史时期，阿拉伯音乐属于现代史之前的时期，而欧洲音乐则与现代性本身同时代。欧洲人作为人文主义者、音乐家、音乐人类学家，其职责是尊重和维持那种独特性。

埃及人欢迎欧洲人尊重传统的姿态，但那种姿态并没有推进他们的事业，也并非是他们一直希望得到的反应。虽然阿拉伯人为其伟大的过去而自豪，这在大会主题中显而易见，但是更加受他们关注的议程是现代性。过去怎样才能成为未来的起点？现代西方乐器可以怎样改造以用于阿拉伯音乐？（比方说，如何将钢琴重新调作微分音调式体系？）录音和出版计划怎样才可以发展？怎样利用它们来向世界传播阿拉伯音乐？

显然，欧洲和阿拉伯代表团心目中的世界完全不同。对欧洲人而言，那是过去的世界，可以认为是阿拉伯音乐主宰的世界，但也是一个远离当下已冻结的世界。欧洲的立场具有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所谓的“东方主义”的所有特征。在欧洲人的眼中，东方学家所谓的“东方”被转变成了一种或许令人由衷称奇的客体，但也是一种无法抵抗西方干预的客体。因而，阿拉伯音乐的辉煌在于其历史的停滞，在于其叙事已经被终止这样的事实。

阿拉伯代表团想重新与世界历史发生密切关系，他们不愿接受东方学家所谓历史终结的说法。他们希望面对的世界音乐，可以变化，

而不是坚决不离开过去。在他们对变化的兴趣背后，是历史与民族国家的相互作用。埃及的政府机构，从福阿德国王往下，都承认现代民族国家对民族文化的主控权，而这些文化推动了国际对话的形成。民族主义的议程在音乐代表团里也很明显，这些代表团代表的是“国家”，不是“文化”，甚至也不是“传统”。音乐代表团是代表国家的一个集体，他们是作为团体而非个人来参会的，因而他们的出席反映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策。

在20世纪的世界音乐史里，1932年的开罗阿拉伯音乐大会是一个分水岭，尽管那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分水岭。对许多阿拉伯音乐的学者而言，大会标志着阿拉伯音乐史重新进入世界音乐史的转折点，他们用出版物和录音项目来庆祝这个令人瞩目的转折时刻。可是大会也提醒了人们，任何时候，是否被承认为真正的世界音乐，不但取决于商业和学术的决策，也取决于政府的决策。

形成中世纪——世界音乐史中的北非

在世界史的想象中，北非历来是中介地带的典型代表（*locus classicus*）。从地理上看，北非通过地中海连接着欧洲，但是撒哈拉沙漠将其同非洲其余部分隔开。从历史上看，为欧洲提供文化基础的许多因素都始于北非，例如古埃及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影响。从神学上看，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因历史悠久的神话和神秘主义而始终受惠于北非。北非也作为“他者性”开始的边界，介于欧洲所了解的因素和陌生的因素之间。北非是相遇的经典之地，其能够在世界音乐的形成中发挥作用，应该理解为那是不断相遇带来的结果，这几乎已不令人意外。

在中世纪，可以声称主宰世界历史和文化舞台的，是北非而不是欧洲。确实，是北非伊斯兰教，而非欧洲基督教，支持了文化进步，这些进步体现在科学、医学和艺术领域，真正波及到了全球范围，大致始于公元9世纪，直至文艺复兴时代的开始。世界史是将世界，实

际上是将天地万物作为主题的史学，其发明者是北非人——14世纪伟大的博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1332—1406）。今天我们知道他是思想家和作家，完全有能力发明世界史。他是外交官，他的职位将他从西班牙送到了大马士革，因此他的游记成为丰富的民族志。他是虔诚的神秘主义的穆斯林，或称作苏非派信徒，因此他的宗教观特别富有伊斯兰教的启示。他是历史的著述者，在14世纪70年代就努力撰写一部世界史，这项任务所涉的范围太广，因而他后来只完成了三卷绪论部分：《历史绪论》（*Muqaddimah*）。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他也关注到了音乐，确切说是世界音乐。从今天音乐人类学角度看，伊本·赫勒敦实际上表现得非常现代，即使我们不一定接受他所有的研究成果。例如，他提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音乐，他提到很多原因，其中包括气候的影响。他认为，音乐能够以深刻的方式影响人类的行为，如激励人们去打仗。音乐发挥了强有力的影响，但是音乐扎根于周详的理论体系之中，其规则和结构是学者们能够感知和理解的。伊本·赫勒敦作为苏非派信徒，也还是承认，音乐有许多方面是人类所不能理解的，换言之，音乐的力量也源于其神圣性。在整个《历史绪论》里，音乐似乎同伊本·赫勒敦对世界历史本身的看法不可分割。

不管中世纪北非的音乐在世界史的存在是什么状况，它对欧洲音乐史的形成都是必不可少的。用阿拉伯语和拉丁语写作的穆斯林理论家，比如法拉比（al-Fārābī）和伊本·西拿（Ibn Sīnā，其拉丁语的名字阿维森纳［Avicenna］更为人所知），他们的著述深深影响了欧洲基督教修道院关于音乐的思考。北非对音乐及音乐科学影响如此深远，以至后代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因而忽略了阿拉伯音乐在欧洲音乐中的存在。比方说，阿拉伯音乐理论里的测音工具乌德琴，它的弦能够呈现最接近人声的听觉特征，理论家可借以判断音阶结构、解释声音的物理学特性。我们可以从地中海东部追溯到这种乐器，在那里它的名称是*al-ʻūd*（意为“木头”；在阿拉伯语里，al-是冠词），该乐器以这样的名称，随着伊斯兰教穿越北非，到达伊比利亚半岛，在那里的它的名称被改为了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式的*la-ute*（la是冠

词），接着在日耳曼语系中进一步被改成*Laute*，在英语里变成了lute。

作为中介性的地带，北非的音乐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这些文化所形成的多种音乐的汇聚，对于该地区在世界音乐中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除了存在产生了器乐和声乐经典的古典阿拉伯音乐外，北非也是俗乐中无数地方性变种和混合变种之乡，或者说是民间音乐的发源地之一。例如，柏柏尔人的音乐与阿拉伯古典传统大不相同。这个地区的游牧民族，如柏柏尔人，长期以来拥有自己丰富的叙事传统，尤其突出的是其中的伟大史诗组歌“西拉里”（*hilali*）。在北非西部（“马格里布”［Maghred］，具有阿拉伯特征的西方化名称），伊斯兰音乐混合着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产生了所有混杂的古典传统中最伟大的一种，即安达卢西亚音乐。经过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15世纪90年代犹太人和穆斯林被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出去。由此，北非很快又产生了新的古典混杂的传统，尤其是赛法迪（Sephardic，西班牙系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的通用语拉地诺语（*ladino*）是西班牙语的一种旁系语言。

如果将北非定位于欧洲边缘，许多欧洲学者当时不会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在那里可以发现自己过去残存的音乐，乃至完整的曲子。因为在航海大发现时期，欧洲思想开始对世界开放，北非就在近旁，因此，现代欧洲之初的音乐思想家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地区，将其看作是一个实验场所。北非当时也许是一个他者性质的世界，但它又不完全陌生。那时人们不一定将现代之初的凝视目光对准那么精细的一个目标，因为尚无证据表明，这个目标可以进一步作为观察欧洲历史的透镜，然后越过欧洲的过去而追溯到地中海东岸音乐本身的开端。人们对音乐世界史的兴趣日益增长，不能从这一趋势中排除北非音乐，因为北非音乐确实造成了这一历史。

从18世纪至今，与伊斯兰世界、北非和中东的相遇，在欧洲音乐里比比皆是，以至有时候我们会再次忽略这样的可能性，即没有“他者”的音乐，也许就不会有某一种西方音乐。无论是在从莫扎特（Mozart）到威尔地（Verdi）的歌剧脚本里，还是在现代管弦乐队

的管乐和打击乐声部里，西方音乐都集合了伊斯兰世界的元素，似乎要抹平这些元素所带有的差异。然而，差异并没有被抹平，因此一些音乐学者开始捉摸北非究竟给了欧洲什么。例如，音乐学者纪尧姆-安德烈·维约托（Guillaume-André Villoteau）跟着拿破仑派遣的科学考察队去了埃及，后来发表了关于那个地区的百科全书式的两大卷著作。随着欧洲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强化其殖民入侵，音乐学者也出现在那里，收集更多证据并将其系统化，那些证据可以让他们把“他者”的音乐塑造成他们自己的音乐。学者和各种著述者把凝视的目光转向北非，常常给我们带来对音乐的一些最透彻的描述，例如出现在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小说里和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的故事里的那些细节。北非音乐的中介性也见其笔端，这主要是因为在审视那种中介性时，他们自身也是关键性的因素。

乌姆·库尔图姆——一个明星的诞生

有些人会说，乌姆·库尔图姆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一位歌手。从统计数字来看，可能很难驳斥这样的说法。乌姆·库尔图姆作为一个录音艺术家非常成功，一生录制了300个左右的录音作品。在伊斯兰世界，有一种人们司空见惯的情况，不管你去何处购买录音，无论是北非的城镇市场，纽约、伦敦、巴黎的穆斯林社区的CD商店，还是巴基斯坦或印度尼西亚机场电子音像商店，都会有大量的乌姆·库尔图姆的录音作品。此外，她在埃及的职业生涯的后期，最负盛名的也许是她参与的电台和电视台节目。当她的声音传播时，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在某种程度上，这成了埃及的一个民族神话。在乌姆·库尔图姆参与或有关她的电影里，她是偶像，也是女人、音乐家以及埃及人，她的这些身份所传达的意义逐渐超越了埃及社会而成为世界音乐。她和她的音乐，在她去世后依然声名远播，并随着世界节拍的日益兴盛而从后殖民主义的神话构建中获益。

乌姆·库尔图姆的明星地位和她在世界音乐中偶像般的存在并不是

没有矛盾的。作为歌手，她的一生在许多方面都是传统的。虽然处在一个严格的伊斯兰背景内，但她的演唱生涯很早就开始了。她的父亲是当地的伊玛目（*imam*），即乡村清真寺领袖，五岁时，她就开始上乡村宗教学校。在这样的学校，学习是以听《古兰经》吟诵为基础的，这也就意味着学习吟诵的规则。不久乌姆·库尔图姆就可以和父亲一起参加婚礼和其他宗教活动了，在这些活动里，她父亲的演唱已经属于半职业性质了。她就是以这样的方法学习演唱并学会宗教歌曲曲目的。

在各个方面，传统歌曲都为乌姆·库尔图姆往后一生的风格和曲目打下了基础。那么我们也许会问，她是否不顾传统的作用和限制而成为世界音乐舞台上一位著名歌手？她所用的调式——马卡姆——与《古兰经》的吟诵方式密不可分。韵律和诗歌格律的形式和功能得益于经文。甚至她的声音和她的乐队伴奏之间的关系也表明她不愿意抛弃基本的穆斯林的审美观，这从她生命最后数十年间一直使用小乐队可见一斑。

研究乌姆·库尔图姆的杰出学者和其传记作者弗吉尼亚·丹尼尔森（Virginia Danielson）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辩驳，她指出，正是因为传统背景以及不愿意违背这些背景的做法，才使得乌姆·库尔图姆成为国际人物。丹尼尔森写道："成为乌姆·库尔图姆的听众，就是要和其他许多人一起证实存在一个共同的社会领域。"因而，乌姆·库尔图姆的歌曲所反映的世界主要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地方性的。虽然这个世界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形式和意义，但在全世界听众的生活中，它是可以触摸得到的，是有关个人的。它既是个性的，也是共性的。它既在当下实现了宗教歌曲的审美共鸣，也为传统在一个变化中的世界开拓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新的可能性。正是因为这样，她在世界音乐的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改变了这个舞台让女性发出心声的方式，也改变了现代埃及和伊斯兰世界里大众的文化精神。

伊斯兰教和音乐的意义

如果我们是1932年开罗大会的旁观者，聆听各个阿拉伯代表团讨论他们的议题，聆听试图发现一种共同的科学语言的欧洲人的发言，聆听乌姆·库尔图姆同她的伴奏乐手谈论哪些歌曲最能代表他们的传统，我们很可能会感到好奇，他们是否在谈论同一件事。这里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将不同的术语用于同一主题，还包括避免使用或者刻意地倾向使用某些术语。乌姆·库尔图姆很可能不愿意称其歌唱为“音乐”，她可能只用这个术语来指为她伴奏的器乐合奏。如果欧洲人竭力要求阿拉伯音乐家为理论概念提供实例，这些音乐家很可能出于礼貌而演奏一些曲子，可是他们会纳闷，这些外国人这样混淆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何在。我们当然不是开罗大会的旁观者，但是我们确实知道，那次大会，尽管其相遇具有历史意义，却几乎没有就任何议题达成一致。一方面，这样的结果是相遇中特有的。另一方面，在1932年的开罗，这样的结果也无法避免，那是因为在伊斯兰教里人们可以用复杂的方式讨论音乐——或者更准确地说，讨论的不是音乐。

北非和地中海东岸关于音乐的话语之所以复杂，问题出在伊斯兰教对音乐的态度上。这些态度中，既有伊斯兰教完全谴责音乐这样的论点，也有伊斯兰教著述对音乐习俗充其量只抱有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样的判断。要阐明是否可以接受音乐，传统上有两种主要的文献作为证明，即《古兰经》和“圣训”（*ahādīth*），后者是关于先知穆罕默德教导的许多诠释性著述。两种文献对音乐的态度都不太明确。《古兰经》的有些章节（*surat*）似乎容忍同音乐相关联的活动，也有些章节被当作穆罕默德谴责音乐的证据。然而，即使这些重要著作也并不涉及音乐本身，而只是涉及同音乐可能相关的文化活动，诸如诗歌和舞蹈。伊斯兰教早期神学家很少详细讨论艺术。即使涉及到艺术的早期伊斯兰教著作，也很少提出任何可以称作美学理论的教义。因此，几乎不奇怪，现代伊斯兰教对音乐的立场（例如阿富汗前塔利班政权所下的禁令）各不相同。我们只能偶然读到提及音乐的早期著作，而且其中的音乐一定连带着伊斯兰教所不容忍的其出现之前的信念和社会现象。“圣训”也常常来自一些在伊斯兰教传播期间被征服的国家，因而其中最初涉及文化活动时，总是特意用一种说教的口气。

随着伊斯兰教在北非传播，音乐在它所关注的事物中是无关紧要的，而非内在需要的。

在阿拉伯音乐史的进程中，对于伊斯兰社会内外的区别，何是何非的区别，音乐术语日益构筑了相关的表述。它们根本不把吟诵《古兰经》和宣礼（*adhān*）看作是音乐活动，而是看作被称为“诵读”的习俗。经文诵读中音乐的作用是，通过净化提升意义。正是这一作用为乌姆·库尔图姆提供了“音乐”教育的基础。西方人听似音乐的东西，在伊斯兰背景里，无疑比不上诸如经文表达和宗教发声这样的东西。因而，在北非，纯声乐体裁比器乐体裁更受欢迎。

一旦关注同器乐体裁有关的意义，音乐话语的术语马上就表现出其外来概念的特征，表现出伊斯兰教本身所具有的他者性。例如，人们遇到广泛使用的“音乐”（*mūsīqā* 或*mūsīqī*）这样的术语，它借自希腊语。“音乐”一词的正确使用，从来不指“诵读”或“宣礼”。在繁盛于中世纪的伊斯兰科学中，“音乐”表明外来性质的存在，用来作为文化距离的明确标志。术语的区分使那种文化距离得以标准化，如把严格意义上声乐形式的世俗音乐称为“歌曲”（*ghinā'*），这样去除了其同乐器的可能联系。正如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中所做的，他在描述歌曲和器乐时，分别将二者置于书中完全不同的部分，排除了任何有关二者相关的概念。20世纪的开罗大会上，各国代表团发现他们所谈论的现象差异如此巨大，这不足为奇。这样的差异在现代殖民背景下甚至更大，因为在殖民背景下，西方的“音乐”更多地让人联想到外来性或器乐（例如在印度）。从一种伊斯兰教的角度看，这样的差异本就是谈论世界音乐的先决条件。

音乐人类学的凝视——罗伯特·拉赫曼在北非

1932年的开罗大会对所有与会者而言，并不是东方学家们第一次涉足北非。罗伯特·拉赫曼，柏林普鲁士国立图书馆音乐部高级馆员，比较音乐学最权威的德语刊物的编辑，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在马格里

布进行过几次学术之旅。正是因为这一经历，他被选定为官方记者，报道出席开罗大会的欧洲音乐家、作曲家和学者的活动。

拉赫曼在他的音乐人类学之旅中，改变了自己对马格里布音乐世界的理解。20世纪20年代，他初访北非时，想象自己是在欧洲的过去旅行。他认为自己会发现几百年来并没有发生变化的音乐遗产，他还认为，如果他的民族志时间之旅使他远远脱离地中海北岸现代城市的世界，他也许能够记录欧洲音乐的史前状况。

罗伯特·拉赫曼期待发现的与他实际发现的，是两种不同的历史现象。他在一次漫长的突尼斯田野之旅中，决定专注研究杰尔巴岛上那些古老的犹太社群。杰尔巴岛在地中海突尼斯海岸附近，它具有一个“孤立的”音乐文化的所有外部特征，对于一个20世纪20年代的比较音乐学家而言，那似乎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室。这些犹太社群很古老，而且实际上只有两个村子，各自只有几百号人。因而，杰尔巴岛也许能算得上是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伊德尔松和其他犹太音乐学者当时正在创立的理论，即耶路撒冷第二圣殿被毁之前（公元70年）的音乐得到了保存。与其说它是音乐史从古至今“缺失的一环”，也许不如说它是音乐史的引言式篇章。

然而，罗伯特·拉赫曼在杰尔巴岛所收集的音乐，几乎确凿无疑是现代的音乐，而非古代音乐。首先，虽然大多数宗教音乐，比如杰尔巴岛村庄里犹太会堂的音乐，因其使用希伯来经文并有仪式功能，显然属于犹太音乐，然而这些音乐听上去如同该岛和突尼斯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村落里的音乐。其次，许多世俗音乐的乐器和调式结构无法区别于其他马格里布风格的音乐。第三，杰尔巴岛犹太妇女的音乐几乎无法同穆斯林民间曲目区分开来。拉赫曼不可能称杰尔巴岛的音乐仍旧是“犹太”音乐，也不可能说犹太音乐在北非海岸附近的一个孤岛上幸存了下来。

可拉赫曼并没有退却，他想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一混杂的状况。他仔细聆听并分析了这些音乐，找到了答案。杰尔巴岛虽然地理位置偏远，但它在一条穿越北非直达地中海东岸的重要朝觐路线上。朝觐路上的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曾逗留岛上，他们离开时，也留下了他们音

乐的痕迹，其中一些被整合到当地音乐中。更重要的是，犹太人、穆斯林和杰尔巴岛以及突尼斯本土的其他民族，具有共同的音乐生活，交流是常事而非例外。杰尔巴岛犹太音乐不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而是活生生的当下的证据。

罗伯特·拉赫曼人生最后十年经历了降临在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头上的许多悲剧事件。纳粹1933年在德国掌权，他被解除了图书馆馆员的职位。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他被剥夺了一切未来的希望。由于他作为学者和编辑的活动，以及随着他在1932年开罗大会的重要作用而来的国际联系，拉赫曼获得年轻的希伯来大学的支持，得以将他的研究档案和音乐人类学实验室搬迁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他成功地为现代以色列的音乐学打下了基础。在他的出版物和1939年去世前的公开演讲里，拉赫曼把北非和地中海东岸的音乐世界描述成现代甚至是文化多元的，在那些地方，变化和对当代的反应产生了混杂的现象，而这是早先几代音乐人类学家所不敢想象的。北非音乐显现的主要不是同过去的联系；相反，开罗大会和拉赫曼对杰尔巴岛的研究，将它同当下联系起来。

雷乐（*raï*）及千年的中介作用

在后殖民、后现代的夹缝中，北非流行音乐的生存岌岌可危。流行音乐家的歌唱虽反对政治强权机构，然而又依靠这样的机构与以前对其殖民过的那些国家发生联系，尤其是巴黎和伦敦的录音产业。流行音乐鼓动了沉默的群体，但是在沉默者借助伊斯兰势力加强这种动员时，他们却不能同时接受流行音乐。流行音乐从传统的边缘地带进入北非大都市，但是必须牺牲过去才能进入城市社会中心的公共领域。矛盾现象无处不在：在社会背景里，在流行音乐诗歌化的歌词里。正是因为这种矛盾现象，流行音乐才如此有力地将几个世纪长的传统同世界音乐最近的潮流联系起来。

在后现代的想象里，没有任何其他北非流行音乐能够与雷乐的地

位相比。雷乐意指“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或“一种观点”，它是北非城市里被剥夺权利者的音乐，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东部尤为流行。这种音乐的根基和早期特征在许多方面都很特别。在法国统治马格里布的殖民时期，雷乐是城乡之间亚文化的音乐。雷乐的音乐家在城市边缘地区演出（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市奥兰），它的表演地点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其音乐家是混合的群体，其中许多人，尤其是妇女，也包括来自少数族裔和少数教派的音乐家，本来得不到正统伊斯兰教的批准，不能在公众场合演唱。

因为这种边缘地位，雷乐作为一种依赖混合杂交的音乐而繁盛起来。其歌词主要是方言，因而与古典阿拉伯语或城市里精英使用的法语形成对比。具有典型性的是，这些歌词凭借多层次的意义，将政治意义和性感意义缠绕在一起。在音乐层面，雷乐任意吸取各种风格，包罗万象：马格里布古典和半古典音乐；西方，尤其是地中海和法国流行风格，如法国香颂（*chanson*）；阿拉伯流行风格，如卡西达（*qasīda*）和拉亚利（*layālī*），它们由于乌姆·库尔图姆的传唱而在整个北非家喻户晓；乐队既有用传统阿拉伯乐器的，也有极其电声化的。

阿尔及利亚的许多雷乐歌手的生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歌手的继续生存，也为了以一种世界音乐风格继续存在，雷乐需要的是这样的能力：能够并置截然不同的意义，并且能够表达某种意义，让后殖民时期的北非各地都认为雷乐是属于自己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能力是雷乐传统性中所固有的。它反映了我们在伊斯兰美学原理中所发现的对音乐的那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歌词的意义优先，乐器伴奏则在其次；其诗歌化完全取决于阿拉伯语，尤其是马格里布诸方言。如马克·沙德-皮尔森（Marc Schade-Poulsen）所言，雷乐的兴起类似于伊斯兰教在阿尔及利亚的兴起，就好像这种音乐如同伊斯兰激进主义那般满足了后殖民斗争的政治诉求。

我们也可以从典型的东方学家的角度来解读雷乐的吸引力。它传统的传播场所是在社交俱乐部里，对公开表达性吸引并不避讳；歌词不但有深深的怀旧风格，而且赋予人们政治力量；雷乐作为世界音

乐，让人想起了伊斯兰城市的市场、闺房、宫廷以及表演有禁忌内容的社交场合。1997年的科幻电影《第五元素》（*The Fifth Element*）的制作者需要一段电影配乐，所配场景是布鲁斯·威利斯（Bruce Willis）在电影营造的错综复杂的未来大都市飙车。哈立德（Khaled）——也许是最出名的雷乐明星——演唱效果很好。雷乐所吸收的各种杂乱风格，形成了夸大的东方风格。在通过世界节拍而想象的媒介世界里，雷乐的制作者抵挡不住成熟的东方主义的引诱。

那么雷乐的歌手和乐手又如何呢？还有观众和那些感到歌曲的信息仍旧有意义的人呢？这些意义是用他们自己方言里那细腻而富有诗意的声音传达的。当雷乐如流星般上升到世界音乐的舞台上时，他们有没有因之而被抛弃？答案既肯定也否定。雷乐继续针对北非的后殖民政治发声，这在阿尔及利亚郊区和巴黎某些社区最清楚不过了，在那些社区，雷乐明星再次找到了自己的老观众。无论从字面含义还是从比喻意义而言，这种音乐依旧处于边缘，但是仍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听音乐会而挤满体育场，或者专心聆听那些述说流放和往昔不再来的歌词。对他们而言，雷乐仍旧是非常个人化的。它表现了阿尔及利亚在后殖民世界里如何努力获得一席之地。雷乐一直是真实的，其信息也是尖锐的。

现代北非和地中海东岸的流行音乐家，对他们在世界音乐里的地位已经做出回应，其态度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传统的模棱两可。例如，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乌姆·库尔图姆或哈立德以及其他雷乐歌手曾经拒绝过西方乐器，就此而言，或者可以说他们没有对西方乐器所产生的和声结构、曲式和公开演出方式等挑战退避三舍。也几乎没有例子说明，北非流行音乐明星把他们的传统全权交由唱片制作者和巡演组织者去安排和处理。最后还有一点，这些流行音乐家并没有避免相遇，因为对他们的公开演出非常关键的音乐及其意义，也取决于他们自己如何协调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相遇。他们的我者性意识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无限渴望世界音乐中的他者性。

第四章

民间的音乐

贝拉·巴托克和从未离开家乡的妇女们

布达佩斯是中欧东部老牌帝国大都会中最高雅的都市，在那里，民间音乐总是享有最重要的地位。在匈牙利国王和奥地利皇帝合二为一而形成奥匈帝国的几个世纪就是如此；在冷战衰落的岁月里，匈牙利实验自由共产主义的时候亦是如此；在匈牙利泰然自若地响应全球化经济召唤的新欧洲时代也是如此。从美学思想家到民间音乐学者和音乐人类学家，再到文化营销专家，这些匈牙利人都把民间音乐置于历史快车道上，从边缘到中心，从村落仪式到资本文化，从神话叙事到历史长河。

2001年夏，布达佩斯为迎接文化旅游者的大量涌入而进行自我完善，这时，几乎毫不奇怪，民间音乐以表征边缘而再度界定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布达城堡区，该区俯瞰多瑙河和佩斯的商业区，沿着多瑙河的冲积平原延伸而去。为2001年“布达佩斯夏季之夜汇演”做开幕表演的是一个叫做“军队（Honvéd，意为“军队”）舞剧院”的团体，它长期收集、表演和复兴匈牙利民间音乐。这个“军队”团体同军队的联系似乎只有名称而已，因为歌手和舞者实际并没有在军队服役。然而，他们之间到底有无联系，依旧是个疑问。在城堡区军事历史博物馆周边进行的开幕表演的主角是卡塔琳·西沃拉克（Katalin Szvorák），2000年权威的弗朗茨·李斯特荣誉奖最佳音乐奖获得者，她在20世纪80年代所接受的音乐训练差不多完全是在军队里进行的，在那里她和当时这个团体的其他演员一起在民间合唱团和民间乐团里表演。

在1989年以前，这些民间音乐家一起在剧场和电视台表演，曲目来自匈牙利国内的文化区以及邻国的匈牙利语文化区，尤其是罗马尼亚、（前）捷克斯洛伐克、（前）南斯拉夫。20世纪80年代的官方民间音乐是负载信息的音乐，尤其是一种关于民族和边界移动的历史信息，以及在由布达佩斯生成的文化圈子的中心，民间音乐何以能够引发这类移位的信息。

2001年，军队舞剧院依然用民间音乐表征了边界的移动或移位。名为《婚礼》的节目被选作“布达佩斯之夏”的表演项目，它本身曾是获奖节目，由约兰·福尔廷（Jolan Foltin）和费伦茨·基什（Ferenc Kiss）编舞，以舞蹈形式表现乡村婚礼。《婚礼》将民歌和民间舞蹈作为主要素材，其本真性人人能听见、能看见。音乐、舞蹈和服装都来自斯洛伐克西部尼特拉周边的匈牙利语社区。表演的叙事风格抓住了本真性的边缘，尤其在开头和结尾处，电子声轨伴随着“新世纪”音乐的混响，表现了进入及离开梦境中一系列婚礼程式化仪式的过程。梦一开始，仪式就被本真性所控制，因为正是在表演的核心处，卡塔琳·西沃拉克和海盖德什（Hegedös）歌舞团的配乐响起，军队舞剧院的团员则以舞蹈展示了斯洛伐克乡村的一场匈牙利婚礼仪式。

民间音乐之所以能够在匈牙利享有盛誉，是因为在民间音乐里广泛投入了象征资本。民间音乐家在全国享有知名度，随着这种知名度的提升，它可能带来的潜在输出资本也在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匈牙利音乐家借以进入了世界节拍之门的是民间音乐，通常是集中化的匈牙利曲目中的一套二元性曲目，其传统来自历史和地理的边缘地带，那样的地带可以动摇和更改原本地方性的边界。甚至最成功的匈牙利世界节拍的明星，穆日考什（Muzsikás）乐队及其歌手马尔塔·谢拜什真（Márta Sebestyén），也一直坚持匈牙利民间音乐传统，即使偶尔尝试边界以外的音乐风格，也可以看到匈牙利传统的影子（例如《特兰西瓦尼亚消失的犹太音乐》［*The Lost Jewish Music of Transywania*］）。

匈牙利民间音乐的学者也获得了民族文化英雄的地位。在20世纪上半叶，作曲家贝拉·巴托克和佐尔坦·科达伊（Zoltán Kodály,1882—1967）是人们熟知的音乐人类学家及作曲家，借此双重身份，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观点得以连接到单一的文化认同上。在对民间音乐抱有积极而激进态度的匈牙利作曲家中，巴托克和科达伊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与他们不同，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几乎没有在匈牙利生活过，但他写了一本颇有影响的书，论述罗姆（Rom，吉普赛人的自称）音乐对西方传统的影响。民间音乐体现了

匈牙利性的音乐话语，也从那一话语发展而来，而那种话语的利害关系确实不小，因为其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涉及族群认同，也涉及种族纯粹和民族整合。

匈牙利大音乐家群像里所描述的巴托克——通常处于群像中心——总少不了两幅照片中的一幅（图6和图7）。第一幅里，我们看到巴托克在一个斯洛伐克村子里，身边有他的蜡筒式录音机，农民们排成一列等着为他唱歌。第二幅里，巴托克坐在写字台前，这时他的耳朵对着留声机录音喇叭。民歌进入一个喇叭，从另外一个喇叭出来，通过巴托克详尽细微的记谱，进入到匈牙利民间音乐经典曲集和匈牙利现代主义作品集里。两个录音喇叭象征着本真性的现代性，但是它们也更加清楚地表明：意识形态的干预牺牲了本真性。干预的舞台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歌曲出自那些从未离开过村子的妇女之口，她们除了本真性外一无所知。在国家中心，在现代匈牙利的高雅文化里，本真的东西得以恢复，但那只是在经历一系列表征之后而发生的。自相矛盾的是，正是在国家中心，村落的世界才能成为现实，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中心，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机构才能够向传统村落注入新的生命。

图6　贝拉·巴托克在一个斯洛伐克村落里收集民歌（1907）

图7　贝拉·巴托克和留声机

2001年6月，在“布达佩斯之夏”上演的福尔廷和基什编排的《婚礼》，初看似乎是此类露天活动的典型旅游节目。然而，也许很难知道，旅游者会如何反应，因为组织者基本上没有做任何使表演“对旅游者更友好”的努力：除了匈牙利语，没有其他语言的解释，没有翻译，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印刷文本。没有试图说明，斯洛伐克的匈牙利语村庄里“特别本真和美丽的”传统，何以同21世纪初的布达佩斯仍然有历史关联。不需要去做任何这样的事情，因为观众中任何人都明白，民间音乐和舞蹈并没有丧失力量，它们还能将历史重新撰写在新匈牙利的面孔上，而新匈牙利正是在老匈牙利的精神堡垒里得到表演的。

从神话向历史转型中的民间音乐

在对民歌的所有解释中，有一个被引用最多，但又被轻视的解释来自大比尔·布隆齐（Big Bill Broonzy）：“我认为所有的歌曲都是民歌（folksong，意即人唱的歌曲），从来没有听到过马儿唱这些歌”。这是一个避免定义的定义，也是在个人层次上对共性的认识。民歌和民间音乐无处不在，可能属于每个人，似乎它们很普通，无需再讨论。它们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主要同从前的时代相关，但它们存在于当下，受当代的事件所影响，反过来又对这些事件进行回应。可我们还是不知道，如果马儿不唱民歌，那么谁唱？如果比尔·布隆齐所言非虚，“所有的歌曲都是民歌”，那他倒是很会选择同伴，而事实是，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听到我们身边有人唱民歌，哪怕是多多少少唱一点。

可以说，民歌和民间音乐构成了初始的世界音乐，成为将音乐与全球现象相联系这一历史传统的主源头。想象世界音乐的冲动，激发了民间音乐的话语。当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在启蒙运动的中心写作，杜撰了“民歌”这个词的时候，同时也有意记录了他所知道的全世界的相关例子。他收录了传教士在拉丁美洲殖民地收集的歌曲，将它们同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诗歌并置。赫尔德的民歌具有民族特性，它们既加固也超越了语言界限。赫尔德不如比尔·布隆齐那么简洁，可是他想象的作为世界音乐的民歌，其传播同样广泛和丰富。

如果民间音乐使人们可以从音乐角度想象世界，那么这样的想象依据的是特定的欧洲角度。欧洲学者的研究，包括赫尔德的开创性著作，认同欧洲以外的民间音乐，可这样的音乐往往类似欧洲的民间音乐。流动性是民间音乐最常见的特性之一，使学者们能够在全世界搜寻伴随各个民族迁移的音乐变体。同时，绘制民间音乐的世界地图带有殖民主义的所有特征，而且并非偶然，人们拿民间音乐的概念来为欧洲的扩张辩护。如果说收集民间音乐涉及欧洲在全世界与他者的相遇，那么民间音乐便渐渐反映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殖民主义，还有民族主义，以及对本真性的本质主义的探求。民间音乐对政

治左派的吸引力不亚于对政治右派的吸引力；它成为现代性的一种象征，为不满现状的人提供了一套词汇。

民间音乐如何成了最初的世界音乐？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人们需要如那些避开真正定义来为民间音乐下定义的人那样，采取回避态度。因缺乏定义，有必要考虑民间音乐如何成为一种隐喻——实际是各种隐喻汇聚之所——不断地将音乐同世界联系起来，并通过音乐将世界各个部分联系起来。民间音乐作为“联系”的隐喻特别有用。在许多传统的意义上，民间音乐占据着一种文化空间，其中音乐成为引发联系的结合点。

民间音乐的文化空间关注两套宏大构想的隐喻，第一是时间，第二是空间。究其本性，民间音乐文化空间的时空隐喻互相依存。民间音乐的时间维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其无数的叙事 特性，换言之，是因为民间音乐讲故事的能力。这些故事可以是关于个人或社群的，可以使共同形成人类生活叙事的那些瞬间具有普遍意义。它们用幻想制造比现实生活夸大的人物和事件，或者将特定的历史事件当作出发点。有些民歌的曲目适用于人生仪式，另一些则将历史事件中的人物移出，创造一个叙事空间，让过去存在于当下。如同这些叙事特性之间有差异一样，这些曲目也将民歌和民间舞蹈转变成不同的舞台表演，在那里表演的复杂事件，可以界定一个社群、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

通过唤起舞台隐喻，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民间音乐的时空隐喻互相依存。然而民间音乐的叙事特性不同于地理 特性。民间音乐以许多不同方式相当响亮地宣称自己是关乎地方的。通常，在歌词的第一二行便显示出其发生地的特征，而舞蹈形式也用动作概括自己的来源或发生地。阿尔卑斯山区典型的乡村民间舞，连德勒舞（*Ländler*）不仅来自*Land* 这个词——它有许多地理意义，可是在连德勒舞里，它是指阿尔卑斯山区的文化地理——而且这种舞蹈的原型，使舞者能以“舞步型”或程式化的姿势，表现出他们同中欧山区生活的关系。匈牙利军队舞剧院的舞者和卡塔琳·西沃拉克，代表了斯洛伐克尼特拉州操匈牙利语的村落的空间，而不仅仅是可以举行传统婚礼的任

何地方。

通过对地域的具体说明，叙事和历史——连同它们在当下的政治和民族主义的意义——也得到具体说明。叙事性和地理性交汇，使人们能够使用民间音乐的文化空间来要求拥有那个空间，进而证明有充分的理由拥有它。民间音乐的叙事性和地理性如此合而为一，因而它们允许一个集体通过表演，以隐喻的方式进入由民间音乐所激发、打开而后表征的文化空间。巴托克在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匈牙利语地区收集民歌时，对这一点的认识，不亚于军队舞剧院。几代德国学者也有这样的意识，他们描绘了所谓的“言语岛”（*Sprachinseln*）的“民歌景观”地图，借此也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向外扩张、控制欧洲大多数国家，描绘了可能的路线。

常常在一首歌或一支舞蹈的文本里，欧洲民间音乐的文化空间不断受到争议，现在和过去都是如此。真实的和想象的空间出现，歌曲中的人物奋力占据这些空间，以隐喻方式，在许多不同层面上表征对地方和历史的争夺。我们以一首意第绪语民谣《在波兰的另一边生活着一个犹太人》（*Hinter Poilen Wohnt a Yid*）为例。即使在最地方性的层面，这首歌曲的叙事性和地理性也揭示了对空间的争夺。一个奉守教规的犹太家庭的女儿，要求超越传统社区生活，进入公共空间，以此挑战父母和她所属的社区。她的父母和欧洲的历史都拒绝进入那个公共空间。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犹太人才得以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这一带有非犹太变体（如德国第一部经典民间诗歌《少年的魔法号角》和布拉姆斯的一首配曲）的一首民谣里，少女的追求者是一个抄写员，他讲述他人的故事，也为他人讲故事，这个民谣凸显出的一个更加地方性的问题是，抄写员强行向少女提出了要求，如果她要作为自己的妻子留在公共领域，她必须改变信仰。真实空间和无法成为现实的空间之间的这一冲突，揭示了一个两难境地，这首民歌几乎没有一个变体可以解决这个困局；在许多变体里，这位犹太姑娘选择跳海自杀，而非改变宗教信仰。在《犹太女》（*Die Jüdin*）（上述意第绪语民谣的德语变体）里那些有力的隐喻，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意第绪语民歌的复兴中几乎都保留了下来，当时欧洲民歌手再次努力

为大屠杀之后的欧洲犹太文化创造一个空间。犹太民歌不能恢复或再创造那些空间，但是因为它们的那种叙事能力，要把它们从欧洲现代性的历史中抹去，可能更加困难。

在波兰的另一边生活着一个犹太人

在波兰的另一边生活着一个犹太人，
他有一个非凡的妻子；
她的头发编织得很美丽，
就如同她天生丽质；
她舞也跳得很好。

妈妈，亲爱的妈妈，
我头痛得厉害；
让我出去一会儿，
在马路上走走！

女儿，亲爱的女儿，
不许你一个人去；
带上小妹妹，
你可以同她一起去！

妈妈，亲爱的妈妈，
我妹妹还是小孩儿；
她会撕碎
沿街生长的花儿！

妈妈，亲爱的妈妈，

我头痛得厉害；
让我出去一会儿，
在马路上走走！

女儿，亲爱的女儿，
不许你一个人去；
带上小弟弟，
你可以同他一起去！

妈妈，亲爱的妈妈，
我弟弟还是小孩儿；
他会撕碎花儿，
那可真丢脸！

妈妈上床睡觉，
女儿跳出窗外；
她越过铁栅栏，
抄写员正在那儿等他。

抄写员，亲爱的，
抄写员，你是我的，
那怎么成为可能？
——如果你去洗礼，
你就叫做玛丽·玛格达莱纳，
你就成了我的妻子！

《在波兰的另一边生活着一个犹太人》是高地德语歌谣

《犹太女》（*The Jewish Woman*，DVldr 158）的意第绪语的一个变体，发表于最早的俄罗斯犹太民歌集（金斯堡［Ginsburg］和马列克［Marek］，1901: 313-14）。

利德贝利（**Leadbelly**）和一个民间音乐家的造就

这确实是一种儿童音乐；这是一个民族的音乐；这是民间音乐。

摩西·阿施描述20世纪40年代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场利德贝利的音乐会

（阿施和洛马克斯［Lomax］，1962:6）

20世纪上半叶，对于提高美国民歌的形象，谁的贡献都比不过民间音乐家赫蒂·莱德贝特（Huddie Ledbetter，1885—1949），一般称其为利德贝利。利德贝利是民间音乐形象的符号，这里的民间音乐既指现代化之前，19世纪美国南方非裔美国人文化中的民间音乐，也指后来被收集者、学者和唱片公司所发现的民间音乐。利德贝利出生于路易斯安那的乡村，早年便掌握了音乐技能，学会了12弦吉他，他为500首曲目编了号，用吉他伴唱。他年轻时漫无目的地游走于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的各种职业之间，既在棉花地里工作过，也在兴隆的油田干过活，我们也可以相信那些编造的故事，里边老是说他在不合时宜的过去和不堪忍受的当下之间挣扎。他还在各种监狱里服过刑，不只是因为行为不端，还因为好几桩重罪，其中有谋杀（1918—1925服刑）和谋杀未遂（1930—1934服刑）。他因第二次重罪在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服刑时，约翰·洛马克斯（John Lomax，1867—1948）“发现”了他，洛马克斯认为他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布鲁斯歌手，无需雕琢便可向国会图书馆展示了。

无疑，在非裔美国人的民间音乐转变成世界音乐的过程中，利德贝利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反映在20世纪中叶他作为公众人物的15年职业生涯里，也反映于民间音乐在以后几代人的全球范围的

复兴里。如他的两个名字所象征的，利德贝利转换于几种身份认同之间。作为“利德贝利”，他能演唱、演奏布鲁斯，以及各种体裁的南方民歌和民间舞曲。作为利德贝利，他吸引了学者，不仅是洛马克斯们（下文讨论）和西格们（见第一章），还有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乔治·赫尔佐克（George Herzog）这样的音乐人类学家；他还引起唱片制作商的注意，较为著名的是民风唱片和民风音乐出版公司的摩西·阿施。较之“利德贝利”，“赫蒂·莱德贝特”这个名字更古老也更现代，明显同口传的南方农村歌曲有根基很深的联系，也是他作为歌手–词曲作者身份的正式署名，他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如：《摇滚岛之线》［*Rock Island Line*］，《特殊午夜》［*Midnight Special*］，《朝阳之屋》［*House of the Rising Sun*］，《晚安，艾琳》［*Goodnight, Irene*］），这些歌曲在当时成为流行曲，在以后几十年成为复兴的圣歌。在利德贝利的传记里，根本无法区分神话和历史。

然而，我们为什么要区分神话和历史？不言而喻，利德贝利表演的“民间音乐”既是神话，也是作为神话而创建的。作为完美的表演者，他欣然接受人们要求他扮演的各种角色，他意识到，民间音乐能够穿越神话与历史的模糊边界。他还意识到，他那不合时宜的布鲁斯风格也许最吸引北方的白人自由派，但是若更兼收并蓄地融合黑人歌曲风格，也许会为他在纽约的爵士夜总会赢得观众。他能以他的音乐唤起，甚至体现整套的文化空间，有些代表他自己人生中见证的事件，如移民大潮、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可以与那些承认他能够创造神话和记录历史的人对话，并能够通过他们与外界对话，因此，对洛马克斯们、西格们和民间音乐复兴，他允许他们想象神话，在他们的想象里，他成为神话的符号。在利德贝利一生中，神话和历史无论如何混合，民间音乐都因为他那样的一生在这两方面皆赢得了更大的空间。

凯尔特音乐及绘制民间音乐的区域图

民间音乐何以变成了世界音乐？民间音乐一旦全球传播，它是不是就会丧失自己作为民间音乐的特性？要更直接地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没有任何音乐比凯尔特音乐更胜任。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无论在世界音乐景观内还是在其外——都有凯尔特音乐的存在。很难想象，世界上哪一个大都会，会没有一个安排了凯尔特音乐现场演出的小酒馆或旅店；在如维也纳、悉尼和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几乎每个晚上，你都能从海量的凯尔特曲目里挑挑拣拣。凯尔特音乐是世界音乐节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过去十年，凯尔特音乐节急剧增加，几乎无法遏止。可是，凯尔特音乐非凡的成功，却取决于其保持自身民间根基的能力。

神话和历史在凯尔特音乐里交错，这种交汇如此频繁，以至正是神话，才具备最直接通向世界音乐的历史之路。凯尔特音乐呈现出世界音乐的全球形式，其存在依赖于它所叙述的关于自己的神话。我们也许可以说，神话是非常现代的，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以各种方式构建凯尔特音乐的多元历史的结果。凯尔特音乐的神话形成于遥远的过去。基于考古学长久的科学传统，学者们长期以来认为凯尔特人是铜器时代的文化，遍布整个欧洲；他们是原始欧洲时代的欧洲人，这个事实来源于古代，也支持现代性的主张。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当罗马人向北推进，而后各个不同的亚洲民族向西推进到欧洲的时候，凯尔特部落起初顽强抵抗，然后撤退到欧洲北部和西部的边缘地带，这些地区一直是凯尔特人的地区，甚至至今仍是欧洲土著的地区。

凯尔特各族群和地区的不同历史强调的是他们的统一，这种统一已经成为了神话的组成部分。语言是最经常受到赞扬的有关统一的神话之一，它也进入了凯尔特音乐的现代神话。两大凯尔特语族，戈伊德尔语和布立吞语，证实了文化的延存，操这些土著语的人能够保存这些语言，恪守它们，因而未曾脱离那个可能是他们起源的较久远的时代。宗教也混合了神话和历史以强调统一，因为“凯尔特宗教”获得了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基督教之前的异教传统，从考古学得知，它保留在崇拜习俗的石器证据里，另一方面是基督教的历史习俗，这些习俗在中世纪走过了独特的音乐发展路线。现代抵抗英国统治（在爱尔

兰和不列颠群岛）和法国统治（在布列塔尼）的历史，更有助于构筑统一的凯尔特边缘地带（见地图1）的神话；随着爱尔兰人、布列塔尼人和威尔士人由于艰难的政治经济状况而被迫移民海外，几个世纪以来形成了一个凯尔特流散地，这些神话的范围因而得以扩展。复兴提供了加强凯尔特统一神话的文化黏合剂，因为复兴和对复兴的迫切需要——以考古介入过去，在当下重新包装——在书写凯尔特历史时，成了无所不在的主题。

演绎凯尔特音乐和发动其复兴的音乐家，巧妙地确定了如何将统一因素编织到音乐里去以及如何向观众表达，因为观众希望听到运用最典型语汇的凯尔特风格。音乐应该如何利用统一因素的宝库，凯尔特语的歌词显然为之提供了一种方法。关键问题不是理解爱尔兰语、苏格兰的盖尔语、威尔士语或康沃尔语，而是要确保让这些语言为基于凯尔特音乐的神话提供叙事的语境。

乐器也是凯尔特音乐统一性的标志。最常用来表征凯尔特音乐古代特性的乐器是竖琴，这是伟大的游吟诗人传统的象征，据说游吟歌手在所有的凯尔特地区漫游，歌唱表现口传历史的史诗。从北面的苏格兰，到欧洲凯尔特边缘地带最南端的西班牙境内的加利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为凯尔特舞曲伴奏的乐器配置也呈现高度的统一性。从理论上讲，凯尔特音乐不应该缺乏某些乐器类别，例如风笛，这类乐器有各种地方性变体，就像苏格兰高地风笛不同于爱尔兰尤宁风笛那样。人们努力整合西班牙加利西亚的音乐传统，强调风笛也延存在西班牙的这个西北省份，如鼓励加利西亚风笛乐队自行组织起来参加凯尔特音乐节，以此提升这种乐器的存在感。对于音乐家本身和凯尔特音乐审美观，也必须将它们看作是统一了神话和历史的因素。一方面，强调本真性，另一方面，通过复兴有意识地将本真性重新融入语境，这样，音乐家才能让人相信自己是凯尔特人。

地图1　欧洲凯尔特边缘地带

凯尔特音乐传遍了将欧洲凯尔特边缘和世界连接起来的地理区域，借此将这种地理区域转变为世界音乐的背景。凯尔特音乐创作的地理区域扎根在各个地方性场所，例如小酒馆和旅店，一小群音乐家聚集在里面，表演爱尔兰民间音乐的核心曲目，这就是所谓的“爱尔兰传统音乐即兴表演集会”。这一地理区域的外部界限表征了某个流散地的移民历史；这个流散地通过增加音乐出现的场合，获得了自己的统一，因为在这些音乐场合中，凯尔特风格将被驱散的因素重新集结起来，正如20世纪90年代遍布北美的无数凯尔特音乐节所做的那样。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地理区域，则将当地同流散地的音乐创作的场所联系起来，这样有助于大范围地重新绘制作为世界音乐的民间音乐地图。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是历史上整个欧洲基督教朝觐的最古老的地方之一，当人们认为圣·詹姆斯在公元一世纪到达圣地亚哥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成了已知世界的终点的标志；因此，去圣地亚哥——加利西亚最大的城市之一朝觐，获得了凯尔特的意义。从隐喻的角度看，这使得音乐家有可能沿着凯尔特边缘地带，重循去圣地亚哥的朝觐之路，以形成凯尔特宗教和音乐的后现代式的汇聚（见第二章）。

对于凯尔特音乐从民间音乐明显地转变为世界音乐，三言两语很难讲清其缘由。然而，人们可能要说，有无数种传统——神话的和历史的——形成了民间音乐因素和世界音乐因素之间的结合点。不管各自对各种不同曲目和风格的审美态度如何，凯尔特音乐的从业者和乐迷，对凯尔特音乐不再是民间音乐这样的说法，都会愤愤不平。凯尔特音乐的捍卫者认为，这种音乐从来都不适宜于简化到只剩一种声音、一种风格、一套曲目，但它总是能适应变化。凯尔特民族被迫移居到欧洲西部边缘地带，他们的生存不仅依靠他们的共性，也依靠他们共同的贸易，他们沿海岸跋涉，进行各种交换，既有商品，也有音乐器物。那么，为什么要让融合和混杂减弱凯尔特声音最基本的那些特点呢？而所有那些特点中最有力的正是包容性。北美蓝草音乐和乡村音乐中存在的凯尔特潜在元素，不仅仅是非洲–凯尔特音乐或“电子凯尔特”音乐产生的全球性尝试的见证，更证明了流散地民间音乐的

复原力。融合和复兴以历史的角度形成了一种互补，交替于本真性和实验性之间，围绕着一个仍然明显是凯尔特的中心而聚合起来。正是民间音乐形成了那个中心的实质，无论是在后现代世界，还是在前现代世界。

洛马克斯家族和美国民间音乐学术谱系

正如民间音乐家有谱系一样，民间音乐学者也有谱系。是否一派模仿另一派，没有最终答案，但无疑，民间音乐研究极其推崇音乐的代际传播，以及家族旁系间的横向传播。谱系隐喻充斥着以口传为特征的话语（如英美民歌的“曲调族”）。在20世纪的进程中，民间音乐家和民间音乐学者的两个家族，在收集、出版、传播美国民间音乐方面起到了特别的主导作用。一个家族以查尔斯·西格为其“王朝”的领头人，另一个家族的奠基人是约翰·洛马克斯。我们可以大致地了解一下洛马克斯家族，以帮助我们理解在一个快速现代化的世纪里，谱系的动力如何维系广大公众对民间音乐的支持。

约翰·洛马克斯、艾伦·洛马克斯（Alan Lomax，1915—2002），以及贝丝·洛马克斯·霍斯（Beth Lomax Hawes，1921—2009），都将一生贡献给了民间音乐研究的各个门类。虽然洛马克斯·霍斯有十多年（1941—1952）都是著名的民间复兴团体“年鉴歌手”（Almanac Singers）的一员，但洛马克斯家族作为学者和民粹主义者还是进行了大量的民间音乐研究。如果说整个家族具有共同的理论特征，那便是：民间音乐属于创造它的人，但是必须与广大民众共享，这样便编织了一个文化之网，其形成依靠民间音乐的传播。洛马克斯家族在意识形态上属于自由派，时时表现得很激进，然而他们从不回避与政府机构合作，实际上，他们做过政府机构的带头人，愿意支持民间音乐。1933年，约翰·洛马克斯担任国会图书馆美国民歌档案馆馆长，1977年至1992年，贝丝·洛马克斯·霍斯担任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民间艺术项目主管。最重要的是，洛马克斯家族认为，民间音乐是一项资

源，其公共性意味着，它应该得到共享，应该被赋予民族集体的价值观。

洛马克斯家族的出版物反映了20世纪的一段历史，开始只限于美国本土，21世纪初始，日益朝全球化的方向扩展。这一历史开始于美国西部，为民间音乐无数集子和专著所记录，其中有约翰·洛马克斯对牛仔歌曲的先驱性系列研究，这个系列开始几卷是对非裔美国人和受压迫人群的研究，继而转向更广阔的领域，显示出全球化的理论视角。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洛马克斯家族的研究项目所涉及范围都是如此广泛，因而有几个项目，尤其是根据艾伦·洛马克斯的《民间和原始音乐世界图书馆》（*World Library of Folk and Primitive Music*）而制作CD　唱片的项目，持续多年，规划直至将来。一个世纪的民间音乐收集和出版的影响如此巨大，其价值很难评估。洛马克斯家族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出版物为对布鲁斯的现代诠释打下了基础，而这些伟大的“美国人的”集子也成了20世纪50年代民间复兴的典范。

民间音乐无论是否真正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的层面叙述了历史，那不是洛马克斯家族争论的问题。民间音乐当然叙述了这些历史，即使没有其他原因，人们也能够迫使叙事的权力有利于民间音乐。民间音乐所体现的权力是强烈意志的权力，是“受伤害者（演唱）反击的歌曲”（“hard hitting songs for hard-hit people”，此为洛马克斯所编的歌集标题）的权力，或者是可以自行将其归于美国最好的歌谣和歌曲的权力。对洛马克斯家族而言，他们不可能相信，民间音乐可能丧失其权力，或有任何衰退的可能，即使有曲目不再流行或传统歌手去世等变故。民间音乐之存在，就是给予人们权力抓住时机，在历史上留下印记。人们对民间音乐所能要求的，不能再比约翰和艾伦·洛马克斯以及贝丝·洛马克斯·霍斯当初所要求的多了。

波尔卡地带：世界民间音乐的一个场所

世界音乐能够变成民间音乐吗？在上面有关凯尔特音乐的章节开

始处，我们提出过与此相反的问题。本章论述至此，这个问题已过于平庸了，更别提在21世纪初始的世界历史的语境里了。甚至最乐观、意识形态最自由的民间音乐收集者和表演者，往往都会哀叹民间音乐的衰落，表达对其岌岌可危状况的关注。随着世界音乐的爆发和流传，民间音乐似乎即将再次沦为自己曾大力推动过的霸权力量的受害者。

然而，关于民间音乐与世界音乐的关系，波尔卡却讲述了一个大不一样的故事。波尔卡作为国际民间舞蹈所具有的复杂性，模糊了民间音乐和世界音乐的区别，让人无法以现成的风格类别和文化类别将其分类。一句话，波尔卡见之于——同时舞之于——世界各地，那些地方皆被西方音乐以民间音乐、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等形式加以渗透。波尔卡的地理中心在今天捷克共和国北部，这种舞蹈曾经传遍奥匈帝国，通过移民、巡演音乐家，后来甚至通过欧洲殖民者的沙龙音乐而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无论到哪里，波尔卡音乐家都把它本土化，使它适应当地社会功能、合奏结构和审美因素。无论在哪里演出，波尔卡都能地方化；在它周游世界后，再次披上民间音乐的外衣。波尔卡一旦到了新地方，重新地方化之后，其作为民间音乐的功能就会增加。它可以通过一个新名称而进行新的认同；它必定经历了文化变迁的过程，产生了新的变体；它影响了其他风格，丰富了其他风格的地方特色；它可能赢得新听众，尤其重要的是，赢得新的舞者。

单一的解释无法说清波尔卡超强的可塑性和适应性，因为它坚持重申民间性。然而，有两个普遍的视角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把第一个视角看作是自上而下的，因为它让人们注意波尔卡作为多族群、多文化、多类别的音乐所具有的包容性。按照这个视角，与其说波尔卡是来自一种舞曲形式的风格——两拍子，常为三部曲式（ABA的变体）——不如说它是一种文化和声音的美学，如同一把撑开的大伞，包容了表达集体认同的各种音乐。那些支持这一自上而下的视角的人以一些名称的流行作为佐证，比如“波尔卡音乐”，这类名称吸纳了比波尔卡多得多的风格和曲目。相比之下，另一些视角自下往上探

讨波尔卡。在波尔卡风格的中心，其具有的某些特征允许任何一个人参与表演，可以作为音乐家、作为舞者、作为听众，或一般的乐迷。波尔卡因此是集体的或者民间的音乐，这样它便表达了集体的意识。

两种视角都揭示了称之为“波尔卡地带”的地理构成，这是一个由波尔卡音乐界定的文化区域，从美国的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以及加拿大大草原诸省，一直延伸至东部多族群的城市中心（见地图2）。波尔卡地带包含大片的地理区域，这一区域内文化和族群的多样化是常态。音乐风格沿着波尔卡地带流动，从一个节点到另一节点，各种风格通过交流和相互得益的过程而交融。有很多因素推动了这样的过程。音乐风格和族群风格在特定的节点上共同表现了波尔卡的独特性，例如，波尔卡流行的“推进风格”（push style）是在芝加哥发展起来的，其之主导来自波兰裔美国人，如埃迪·布拉宗齐克（Eddie Blazonczyk），或者来自克利夫兰——弗兰基·扬科维奇（Frankie Yankovic）的家乡——厚重的斯洛文尼亚手风琴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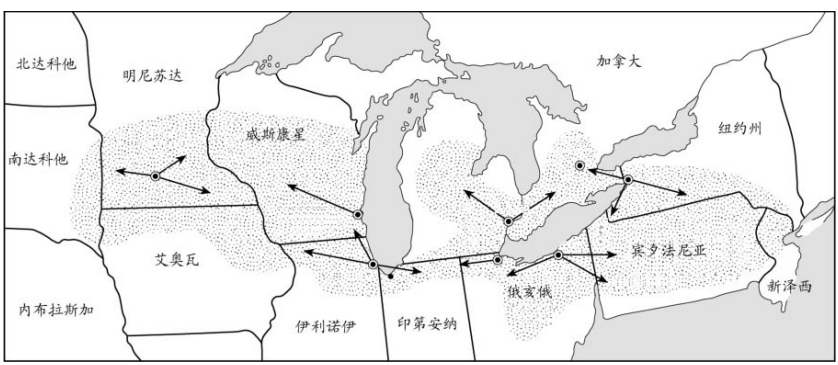

地图2　波尔卡地带

波尔卡风格在每一节点上都被纳入体系，如被舞厅以及赞助音乐会和舞会的社会机构接纳。波尔卡的社会活动地点可以是当地的少数族裔的俱乐部和教堂，甚或是波尔卡俱乐部自身，这些活动还可以将当地景观和国际景观联系起来，例如通过国际波尔卡协会（IPA）举办的活动或《波尔卡新闻》（*The Polka News*）这一类报纸杂志上通告的活动。我们必须既把波尔卡看作是民间音乐，也看作是流行音

乐，波尔卡音乐在历史上的流行依靠的是各种媒介的作用。乐队分谱和活页乐谱的出版商、广播电台以及地方和国家的唱片公司，都生产和再生产波尔卡音乐，并将其广泛传播，同时将运作基地保留在波尔卡地带的节点上。媒体一直很有效，因为它们能够将流行音乐的全球化媒介平行化，例如可以在1986年年度格莱美大奖上为波尔卡争取一个波尔卡奖项。

最后，波尔卡地带与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以及与邻近的加拿大多元族群的省份，也绝非无关。波尔卡界定的其他地理区域出现在世界音乐的地图上，例如得克萨斯州和墨西哥边境区域，在那个区域各种康汗托（*conjunto*，源于得克萨斯州和墨西哥边界的流行舞曲，以使用手风琴、鼓和12弦低音吉他为特征）的融合形式改变了波尔卡，同时也保留了波尔卡的基本特征。21世纪初，波尔卡地带的城市随着墨西哥移民的涌入发展起来，新的波尔卡风格沿着各少数族裔和工人阶级群体之间的都市新边界正在形成。

世界音乐是民间音乐可以自得其所的地方之一。通过探讨由地方、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面形成的民间音乐景观，诸如波尔卡地带，或中欧东部的华尔兹与连德勒舞曲的混合体裁，或加萨抒情诗（*ghazal*，一种流传于中东和印度的韵律诗，常认爱情为主题并可吟唱）在西亚、中亚和南亚的伊斯兰文化圈的传播，我们见证了全球实际上如何充实了地方。理解民间音乐和世界音乐的关系，可能要求我们不只是消除谬误，这种错误的观念认为世界音乐所产生的文化模糊性吞噬了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和世界音乐显然互补；在世界有些地方，二者甚至可能互相依赖。民间音乐的延存和复兴都得益于世界音乐的传播，而超乎任何人预料的是，世界音乐也表明了自己非常乐意接受民间音乐。

第五章

世界各国的音乐

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

一首歌曲能否在国际文化政治舞台上代表一个国家，似乎并不令年度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组织者、表演者和观众费心。奖金设置太高，令人不能不认可世界音乐的民族主义潜能。自1956年以来，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年年举办，聚集了欧洲广播联盟的所有成员国的代表，以及因其他理由支持流行歌曲中泛欧文化政治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从一开始，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组织者就强调，这一事件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促进欧洲统一。当时处在由冷战造成欧洲分裂的政治气候下，几乎没有统一可言。然而，此项大赛的政治理想主义制造了一种美学两难境地：一首流行歌曲如何能激发国民的精神，同时又抑制一切民族主义的迹象？正是这个问题——曾在全球化的音乐图景中日益彰显——令世界音乐和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

进入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可通过几个渠道。对参赛音乐家来讲，他们要在当地和区域内通过一系列比赛，这种比赛可以是小型音乐节，也可以是由有抱负且已颇有建树的歌曲创作者担任评审的初选赛。经过筛选，最后，通常是在冬末，获胜的参赛者在一场全国电视转播中再竞赛，按照民主的评审体制，从中遴选出最终的获胜者，这些人就承担起代表国家的责任。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渠道遍布整个欧洲，每逢五月的一个周六傍晚，在主办国——前一年的获胜国——的一个大音乐厅进行直播。国家广播机构本身的这些渠道可能是公众最无法理解的，但是正是这些机构，决定了欧洲的统一进程在任何特定历史时刻所要前进的方向。处于最高层的是国家广播网——欧洲广播联盟的成员——由它们协调直播和组织电话投票；大赛的优胜者由观众投票决定。

历经数月的炒作和游说活动后，表演者才等到了正式比赛的那个傍晚。在这几个月里，各国参赛者在整个欧洲大陆的电视节目里无数次亮相，给欣赏世界音乐的最终评审者——欧洲的公民——早早决断

的机会。最终，在直播的那个周六傍晚——欧洲和欧洲电视网的黄金时段——各国的参赛代表进行一系列的表演，每场表演都要让观众有机会进一步熟悉他们。那个晚上最终以投票结束，各国委员会接二连三打来电话报告自己国家的票数，然后点票，选出新的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冠军。

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是唯一国际级别的最大规模的流行歌曲竞赛。虽然仅局限于欧洲，无论如何广义界定，比赛实在没有世界其他地方的参赛者，但仍使得人们有可能将其看作一种流行歌曲的奥林匹克。在其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无论如何推进也总越不过欧洲的国际边界。在冷战时期，只要可能，就吸引东欧国家（事实上很难做到），或向支持欧洲文化政治的地中海国家开放其舞台，或做出种族和族群包容性的姿态，例如法国从其加勒比的海外省份——或曰半自治领——选送参赛者那样。

因而比赛所描绘的欧洲的音乐与政治图景不断在变化。然而，获胜者如何变化，乃至于民族歌曲的公共形象如何变化，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主导参赛曲目的结构和内容的规则几乎年年不一样。多年来，如果某民族语言被认为不是国际语言，那么参赛曲目就不能用这个国家的语言，因此大多数获胜曲目要么用英语，要么用法语，可能这就使得讲英语和讲法语的国家获胜最多（在该赛事最初的45年里共获胜30次）。有时，这些规则表面上看似无伤大雅，如早年的比赛，不允许或不提倡用伴唱歌手；最红的国际流行曲，多梅尼科·莫杜尼奥（Domenico Modugno）1958年的《飞翔》（*Volare*）由于该限制而未取得好名次。尽管规则变化，获胜曲目就音乐角度而言听起来往往很相似。结构上，许多曲目用标准的正歌与副歌交替，其间插入一个“中间八小节”，歌曲在这一部分飞速变得有意思起来。规则并不要求参赛曲目在音乐上一定要同其所代表的国家相关；如2001年获一等奖的曲目，爱沙尼亚的《人人》（*Everybody*）（塔内尔·帕达尔［Tanel Padar］，戴夫·本顿［Dave Benton］，以及“特大号乐队”［2XL］），运用了泛加勒比的舞厅音响，从头到尾是呼应式的唱法，不时用美国南方的感叹词点缀一下。歌词表面上也无伤大雅，这

就又导致频繁插入无意义的音节（《飞翔》这首歌的令人难忘的副歌“飞翔，沃，霍，霍，霍，歌唱，沃，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读者也许很熟悉）。

因此，国家在何处？或者，也许这样问更好，国家是什么？要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也许首先要审视一些获奖和未获奖选手。可能，两个最著名的继续走向国际演唱生涯的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获胜者是ABBA乐队（1974年）和席琳·迪翁（Céline Dion，1988年）。ABBA的获奖曲目《滑铁卢》（*Waterloo*）完全遵循70年代中期获胜的模式，它是一种摇滚风格的歌曲，且能够毫不费力地登上英语流行曲排行榜。席琳·迪翁，加拿大人，1988年表演的是瑞士参赛曲目《等我来了再开始》（*Ne partez pas sans moi*），风格上偏离了凯尔特风格的曲目，并挪用、虚构了凯尔特移民社群，如在电影《泰坦尼克号》（*Titanic*）里那样，很大程度上，她就是以这样的曲目，开创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然而，对她而言，民族主义的问题深深印在代表瑞士参赛的法语曲目里，这可以解读为魁北克法语区的加拿大人表达民族愿望的象征。

我们接着也许会问，谁的国家？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历来是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最有竞争力的选手——问题更加明确，虽然答案从未那么明确。在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获胜，给以色列人一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声张他们的西方性的方式。几乎毫不奇怪，在比赛的当晚，全以色列几乎都停止了其他活动，以色列的CD市场也充斥着过去和未来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获胜者的专辑。以色列在地理位置上同欧洲并不相连，在音乐上却同世界节拍密切相关，这可以见之于其从大赛中脱颖而出的最著名的国际明星奥芙拉·哈扎（Ofra Haza），1982年她以一曲《查依》（*Chai*）险获亚军。哈扎以该曲开始了其演艺生涯，令她越来越远离也门–以色列歌手的悠久传统，他们强调的是以色列流行歌曲的东方性（*mizrakhiut*），而她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末逆转了这个方向，在她2000年英年早逝之前，她重新开始整合也门传统。

一首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参赛曲目为国家构筑了什么样的空

间？关于极其政治化的国家空间，有几个突出的例子，例如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那一年，当时南斯拉夫作为少数东欧竞争者之一，选送了里瓦（Riva）的《摇滚我》（*Rock Me*）。这样就给了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投票者一个机会，让他们公开表明对横扫东欧的政治动荡的看法。出现在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舞台上的各个国家，一直以来（很少例外）是单一文化的，主要是因为，大赛要求参赛国首先必须认同多元文化主义。可是大赛慢慢发生了变化，也许有证据表明，人们渐渐接受了多元文化的国家，例如1999年在耶路撒冷举办的大赛中，德国参赛选手是土耳其裔德国人的“惊喜乐队”（Süpriz），那是对该国几代劳动人群——包括土耳其外来工人的承认。该乐队经努力以《耶路撒冷之旅》（*Kudüs'e seyahat*）而获得第二名，那本身是一首德国的儿童游戏歌曲《前往耶路撒冷》（*Reise nach Jerusalem*）。在这首歌曲的众多翻唱版本中，该乐队混合了多种语言（土耳其语，德语，希伯来语，英语）以及世俗与宗教的符号，例如：德国儿童游戏中争夺的音乐椅子，朝觐主办国犹太人心目中的圣城耶路撒冷，这首参赛曲目中的基督徒，该乐队土耳其的穆斯林祖先。这首歌曲拥有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参赛曲目的许多特征，然而精心制作那样一首歌曲，与其说是为了获胜，不如说是为了对民族问题的重新审视，而这些问题正是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基础。面对现实，大赛并没有掩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也没有掩饰世界音乐——即使聚集起来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服务——无法轻易脱离国家或民族主义这样的状况。

歌唱的国家

每个，每一个，所有，整个。这些无处不在的形容词表现了音乐有这样的力量：它能够把一群人同国家联系起来。每个国家都希望发现和收集自己的音乐；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享有歌曲所给予的文化遗产；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把本民族的音乐送到国际舞台上，以此颂扬音乐的普世性。个人对世界音乐的认同之路要通过国家；超越了地方

层面的文化与历史的十字路口服从于全球的层面。在国家的十字路口上产生的障碍，也是世界音乐地理上的障碍，因为国家既认可形容词的包容力，同时也屈从于形容词的排斥力。在一个国家，并非每一个居民都有机会接触到所有的歌曲。每个族群可能更喜欢自己的音乐，而非整个国家的音乐。一个国家的所有音乐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可以为每种音乐提供足够的空间。国家在十字路口的地位常常得到颂扬，但也会陷入困境。

无论怎么看，国家都处在十字路口。确实，描述世界音乐没有比国家更具共同性的标志和符号了。将世界音乐作为民族音乐来分析，其历史与国家本身一样久远，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与民族主义本身一样久远。赫尔德（见第二章）最早制定了一套词汇来描述世界音乐，他当时就利用了国家的概念。他的词汇很关键，因为那确立了一种正式记录世界音乐的程序，利用这套书写程序，将其从一种口头现象转变为一种民族语言。21世纪初始，记录世界音乐的过程在技术上可能已经很复杂，但是这些过程仍然看重国家，将其看作是世界音乐地图上最稳定的空间。《概览》（*Rough Guides*）的世界音乐系列丛书，是使用最广泛的全球流行音乐风格手册，以国家作为其组织原则，逐页带着读者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参观世界录音产业（见第七章）。在本世纪之初，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的工具书——比如说10卷本的《加兰世界音乐百科全书》（*The Garland Encyclopedia of World Music*）和29卷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第二版）——扩展了了解世界音乐的概览工具，同时这些工具书可能增加了概念的类别，但是它们坚决拒绝放弃国家这个概念。

在世界音乐的研究中，国家是本体论的客观事实，即便是在民族主义的含义已经变化的时代亦是如此。当然，民族主义常常可能并不是民族音乐的薄弱软肋。民族主义，无论是积极或是消极构筑的，都加强了民族音乐的排他性。民族主义的音乐不是将国家表征为一个整体，达到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目的，而是要获得更加特定的功能，也许传播有局限性的一套意识形态价值观，或扩大一个统治的族群或精

英寡头集团。音乐以一种保存过去、书写当下历史的方法来展示国家。我们见证了“保存国家”的行为，如日本和韩国将其音乐家称作“国宝”，他们的表演和教学必须得到支持，以防止民族音乐传统消失。表现为民族主义音乐的民族音乐可能将一个国家引向战争，或夺走属于别国的领土和历史。学者和政府机构将民族主义的情绪注入民族音乐集，事实上，二者都为一个国家的某些居民创造了空间，同时夺走了其他一些人的空间。民族主义的阴暗面也说明了为什么在世界音乐中国家的概念挥之不去。

并不只有国家才塑造民族音乐。音乐，因其表演性（performativity，也译作“述行性”），也能有力地塑造国家。为了说明音乐的这一表演性功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杜撰了术语“齐唱性”（unisonance），即来自全国的人聚到一起共同表演音乐的音乐时刻。安德森齐唱性概念中最重要的是，各个歌手不可能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和全国其他人一起歌唱。齐唱性的时刻可能发生在国家仪式上唱国歌的时候。关于安德森的民族主义，我们可以再加上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参赛曲目在各个国家广播网上播放的例子，播放这些曲目能鼓励每一个人（例如，各种公交上的乘客）一起歌唱。齐唱性有效连接了描述民族音乐的那些形容词，让“每个”人和“所有”其他公民歌唱“整个”国家的音乐。

国民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歌唱的国家。音乐创造所具有的共同经历产生了一种文化亲密感，迈克尔·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称之为民族国家的“社会诗学”。重要的是，有助于文化亲密的，不只是某种音乐体裁（例如民间音乐）或曲目，而几乎是所有种类的音乐：流行音乐，宗教音乐，古典音乐，声乐和器乐，最受尊崇的历史曲目和新近创作的流行曲等。当国家加入它认为是自己的音乐风格的表演时，它便有效地打破了相互排斥的曲目间的樊篱。因为这些理由，民歌进入了交响诗，圣歌变成了国歌。国家的音乐激发了文化的流动性，让人们围绕着共同的经历而消弥了等级差别。

齐唱性和文化亲密感这样的概念说得很清楚，民族音乐根本上也是集体性的。几乎毫不奇怪，合唱团常常以演绎一种彰显民族主义的

音乐为己任。例如威尔士合唱团长期以来保留了注重威尔士特性的曲目和音乐会习俗。合唱为使用威尔士语提供了固定的公共场合。威尔士合唱团同时面向蓝领工人和知识分子招收团员，从而代表了威尔士人口的一个横断面。而且，定期表演的场合，如将四季和年度周期仪式化的节日和比赛，获得了独特的威尔士特性，那些特性一直延伸到海外流散地的威尔士社群，如在美国的社群。那里的合唱团成为维持——以及表演——威尔士裔美国人身份认同的主要载体。

合唱运动塑造了国家，但不仅仅是表征国家的问题。合唱运动还能够——在民族主义极度紧张的局势下也能够——动员国民采取行动。在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从苏联独立出来前后，合唱音乐在政治行动中都发挥了特别明显的作用，既有象征作用，也有实际作用。波罗的海地区的合唱运动很强大，以至于常常被描述为“歌唱革命”。民族历史与民族神话交错，令合唱能够凝聚革命力量。人们对歌唱节的记述也许夸大了，但是节日所表达的由齐唱性点燃的革命的社会诗学，则是明白无误的。有一张广泛传播的世界音乐CD唱片，来自“后天鹅绒革命”的东欧，其中的文案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典型的：

> 你们正在倾听20,000名爱沙尼亚人歌唱。每年都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举办歌唱节。参加者数目庞大：据知有四分之一的爱沙尼亚人参加在塔林举办的这个节日。观众常常参与进来，以四声部和声演唱，将合唱团扩大为好几千人。
>
> （《未封锁》［*Unblocked*］，1997年，CD1，第12曲介绍）

能否将国民动员起来，也取决于合唱团的流动性。国家合唱团最富特色的活动是巡回演出和参加比赛。民族主义孵化出合唱“运动”，这几乎不是巧合。在比赛中，国家合唱团与其他合唱团一起更新自己的音乐资源，并与志同道合的合唱团员一起参与国家的文化工作。新欧洲的合唱运动的流动性也服务于无国家的少数族裔群体和民族群体。例如，德国的土耳其外来工常常公开表演为合唱改编的曲目，虽

然合唱音乐不是土耳其的传统。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场犹太合唱运动在欧洲发展起来，合唱团常常围绕着一座会堂或犹太社会组织的联盟而形成。犹太合唱团因其受关注的程度和流动性而显得很突出。他们四处巡回演出，重新追溯被大屠杀所灭绝的犹太人生活的各大都市在历史上的联系。新德国的土耳其人合唱团和新欧洲的犹太人合唱团并不是试图去鼓动国民。相反，这些合唱团激发了一种对民族主义的反思：无论是包容性的还是排他性的。这些合唱团还提醒我们，无国家的那些族群的合唱音乐也大大有助于塑造国家。

达纳国际（Dana International）：没有边境的民族音乐

我们成了两个国家，确实，对许多人说，我渐渐代表了自由、民主和按个人意愿生存的权利。

（达纳国际，1998年1月，值当选欧洲电视网歌曲大赛以色列代表之际）

1998年5月9日，这位以色列参赛选手在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上赢得第一名。那年比赛从英格兰伯明翰直播。达纳国际演唱的是《迪瓦》（*Diva*），达纳是一个以色列人，她的也门和赛法迪犹太人的混合血统将她定位在以色列人所熟悉的流行歌手谱系内。这一谱系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贝拉查·泽菲拉（Beracha Zephira），最近由奥芙拉·哈扎所维系。哈扎同达纳一样，也代表以色列参加过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并有出色表现，可是与达纳不同，她在1983年没有获胜。然而，时代变了，达纳国际所具有的国家形象，与早先普及“东部音乐”（*musica mizrakhit*）的以色列明星很不一样。

一方面，达纳表现得很爱国。她公开表示，自己不仅渴望代表以色列，还要为以色列获奖。另一方面，达纳是著名的变性人，她对自己复杂的性征毫不避讳。在一个宗教国家——其正统和极端正统的教徒掌控着非同一般的国家的权力——人们也许以为，体现多元性征的一个国家其形象不会特别受欢迎，尤其在转播最多的世界音乐比赛的舞台上更是如此。达纳国际生为男性，但作为女性而生活，中东伊斯

兰国家称其为萨义达·苏丹（Sa'ida Sultan），以演唱阿拉伯语歌曲和希伯来语歌曲而出名。另外使她出名的是其早年在特拉维夫俱乐部演唱感伤的情歌时已经具有的潜在同性恋倾向，以及她最近的高技术电子音乐的录音中对多元性别的暗示色彩。在国际竞技舞台上，她坚定地支持自己的国家。到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时候，她已经成功地征服了整个国家。

国家——既普遍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在中东又是一种政治形态——在达纳的音乐里有许多特性。如果有一种风格和文本的主题统一达纳的歌曲的话，那就是国家——多元形式的国家。例如，1998年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获胜曲目《迪瓦》所拥抱的，正是那个国家。“迪瓦”这个名字有多种身份认同，“因为她与众不同”，她出现在许多著名女人的生活中，如玛利亚（Maria），维多利亚（Victoria），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在其标志性曲目《达纳国际》里（出现在1993年的两个同名版本的CD中），达纳塑造了自己作为世界旅行者的身份，从沙特阿拉伯到摩纳哥、巴黎、墨西哥，一路直奔旅程终点特拉维夫。这首歌所肯定的国家，可以有多种身份认同；同时她加强了自己的这些认同，音乐上靠的是交替使用高技术电子音乐节拍和塔赫特（*takht*）小合奏的器乐间奏，以此将传统的阿拉伯音乐（*mūsīqā al-‘arabiyya*）标示到国家的地图上。达纳的歌曲反复混合了国家的概念，抽取的是构成以色列过去的多元历史及其当下的多元认同的元素。这样一来，这些元素肯定——而非否定了——在达纳自己对世界音乐的理解里，有一个民族的现实存在。她在1998年的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上的胜利所确认的也正是这种理解。

国歌

特别命令：

特指令约翰·菲利普·苏萨，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队领队，为本部演奏之用，编辑世界各国的民族和爱国曲调。

B.F.特蕾西（B.F.Tracy），海军部秘书。

海军部，
华盛顿，
1889年10月18日。
（引自苏萨一题辞，1890：xi）

在我们最深层的流行文化潜意识里，演唱国歌都有一个共同的景象：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颁奖仪式。在国际媒体的全程注目下，获胜者站在领奖台上，一面强忍着眼泪，一面轻声唱着国歌的歌词。那是由音乐构建的民族自豪感的瞬间。这样的瞬间常常令人难忘；而国歌本身反倒不那么令人难忘。对于了知世界各国音乐剧本的观众而言，奥林匹克颁奖仪式在音乐方面最令人难忘的，可能是国歌演奏偶然出错的情况。

是否有人真的在听，有人真的在意？要回答这些问题，在本节我将探讨世界音乐所有类别中传播最广泛的一种，即国歌。在国家构建的历史上，有许多人实际上非常关注国歌。许多国歌具有悠久的历史；许多国家记录自己历史的方式极其复杂，即在各种民族危机的时刻，挑选、废弃、修改、重谱自己的国歌。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袭击之后的余波中，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Spangled Banner*）渐渐成为几乎所有公众活动的开场歌曲，不仅包括纪念性的仪式和通常的体育赛事，还有大多数管弦乐团的音乐会，甚至乐团国外的巡回演出等场合。国歌是严肃的，正因为如此，国歌才在表现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的最庄严的时刻奏响。

我们听到各国国歌的时候——且不论我们确实注意听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这些国歌听上去不是都很相似吗？在公开表现爱国自豪感的时刻，当国家认同确实存在争议的时候，也许会听到一些突出的差异。甚至更为突出的是，亚非后殖民国家最新创作（或选中）的国歌，听上去同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的国歌并无明显不同。令人更加不解的是，不同国家的国歌，实际上是相同的，还有些国歌有意识借用了其他国歌的主旋律和词句。看来几乎有一种潜意识，即在某种层面上，国歌应该 听似相同。

例如，如果人们追溯国歌的历史，显然，许多国歌之所以问世，其创作系由破裂与危机所激励。当罗得西亚1965年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时候，它自然废弃了英国国歌《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暂时借用过属于国际通用的贝多芬/席勒（Schiller）的《欢乐颂》（*Ode to Joy*）。然后，在其独立十多年后，改称津巴布韦的这个国家在1994年采用了《神圣之国津巴布韦》（*Yumi i glat blong talem se*，英文译作*Blessed Be the Land of Zimbabwe*）。各国国歌听上去可能很相似，这里既有文本的原因，也有语境的原因。首先，许多新国歌以从前的国歌为基础，即使人们只是打算用这些老国歌作为创作新国歌的过渡。最常见的范例是英国的《天佑女王》，法国的《马赛曲》（*La Marseillaise*）和弗朗茨·约瑟夫·海顿（Franz Joseph Haydn）的《皇帝赞美诗》（*Kaiserhymne*，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匈帝国，以及1922年以来的德国国歌的曲调）。国际歌曲（见本章最后一节）也是国歌的楷模，突出的如《国际歌》（*Internationale*）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其次，虽然各国国歌具有不同的体裁（例如赞美诗、进行曲或号声曲），但表演方式往往呈现一种高度的同质性，例如管乐合奏的国歌，要用庄严风格演奏。第三，国歌听似很相像，因为它们演奏的场合更多是相似，而非不同。比如，在国家庆典或体育赛事上，在影剧院里，或为了加强国家、国际电台和电视台节目播送效果。最后，是马尔科姆·博伊德（Malcolm Boyd）坦陈的审美问题，即歌词和旋律普遍比较乏味。

国歌的历史类似民族主义的历史，通过一系列史学阶段展开，即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经过19世纪的浪漫民族主义（尤其在欧洲和拉美），到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殖民扩张，再到从20世纪中叶至今的后殖民主义。在上述每一个阶段，国歌分别表示不同的意义，它被精心创作，以不同方式象征国家。非常典型的是——这里我用了一个副词（typically），因为它同用于国歌的最常见的形容词“典型的”（typical）相关——最早的国歌保留了民歌的一些声音和功能。民族的歌曲向往的是宗教体裁和军事体裁。在后殖民阶段，国歌试图独特地体现现代国家的历史，那既反映了长期的斗争，也反映了

最近的斗争。

国歌以两种不同方式呈现，这两种方式共同表现了多元的意义，那是一个国家在通过歌曲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所汇聚的意义。第一种方法可能表面上看似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国家决定通过歌曲宣称其民族性，它让一个作曲家，或常常还有一位作词者，来担当这个任务。虽然我们可以想象，国歌不会很容易赢得普遍的认可，但我们不一定能想到，最终产品是争议、实验（经常遭拒），或最后妥协（劣中择优）的产物。问题部分出自以下事实：试图精心创作一首国歌的群体，可能更倾向意识形态，而非音乐；而更加倾向于音乐的群体，因为缺乏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可能当即就会遭到断然拒绝。

国歌生成的另外一种方式也许可以比作大型吸尘器的使用，指向任何想象得到的可以满足国民的某种特点的东西。我们注意到这种方法，因为它的开始阶段常常是出版集子和曲目，这些出版物共同来表征国家。在这类集子里，“我们的”民族旋律常常混合着“他们的”民族旋律，如此将自我和他者锁定在相互的风格界定区分的过程中。例如，1854年，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Elisabeth）同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皇帝的婚礼之际，皇后收到了一册镌刻精美的歌曲集，那是一册帝国的“民族旋律”，这些旋律共同描绘了东欧复杂的语言和文化区域。举办国际活动，例如世界博览会或文化大会，通常发行民族歌曲集。本节开头的“特别命令”也启动了一个收集项目，后来出版了一卷本的全世界的民族歌曲集，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队领队苏萨向美国海军部呈递，乃至于向美国人民呈递。我们也许对这样一个项目感到惊奇，并且可能想作为海军部秘书“特别命令”而完成的只是一种非常肤浅的旋律集成。但事实上，这本283页的集子编辑得非常详尽，配以精致的和声和改编曲，添加了大量的脚注和民族志信息。例如最后6页收入了威尔士、瓦拉几亚、雅浦岛、三宝颜半岛、桑给巴尔等地的民族歌曲，这些材料也许很难进入现代音乐人类学的集子，无论是历史的或是其他的。

关于国歌，问题就不简单了，为了准确说明这一点，我想简短地概述一段模糊的历程，沿着这一历程发展的是所有现代国歌中意义承

载最清楚的一首国歌，它名为《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lied*），但无论操德语和不操德语的人都称之为《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在本节我们已经知道了《德意志之歌》，因其旋律来自《皇帝赞美诗》，该曲首先被用于奥匈帝国国歌。《皇帝赞美诗》是1797年海顿所作一部弦乐四重奏作品的一个乐章。他多年来担任匈牙利埃斯特哈奇（Esterhazy）家族的宫廷乐师，该家族的夏宫在艾森施塔特，这是匈牙利西部克罗地亚地区以犹太人为主的一个城市。不管怎么说，《皇帝赞美诗》的旋律源自一首克罗地亚民歌，其变体今天还存在于奥地利的一个州——布尔根兰（艾森施塔特是其首府）的克罗地亚地区。讨论奥匈帝国的《皇帝赞美诗》，我们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可是此刻，我要跳过这一段而进入到1841年，当时一个来自西里西亚（西里西亚是中欧奥得河中、上游地区的总称，目前，该地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波兰，小部分则属于捷克和德国；此处指波兰西南部）的学校老师奥古斯特·海因利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写下了这首诗歌《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当时他因政治原因被流放在北海的黑尔戈兰岛（那时还属于英国）。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后来注定要成为德国国歌的这首歌里有什么德国成分？似是而非的说法是，很可能，这首歌的国际起源更重要，至于人们如何以民族主义的态度接受它，这方面的作用则在其次。问题不在于它是否是狭义的世界音乐，而在于作为最容易辨认的、常常用以复制的国歌，它是如何进入世界音乐史的篇章的，而这些篇章由国歌清晰，但有争议地表现出来。

国际民间音乐学会/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每个国家/地区各有自己的音乐

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以下简称ICTM）历来认为，其名称的模糊性不亚于其“官方的”研究目标：“帮助研究、实践、记录、保存、传播

传统音乐和舞蹈，包括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民间音乐、流行音乐、古典音乐和城市音乐”。1947年，在其建立之时，自称为国际民间音乐学会（以下简称IFMC），1981年改名为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放开了其主题的分类界限，拆除了许多会员看作是欧洲中心论的学科方法的界限。这些举措无论对概念重组多么彻底，还是完整保持了这一研究世界音乐的最野心勃勃的国际协会的政治结构。广泛界定的音乐目标——从民间音乐到古典音乐再到城市音乐——必然发现其处于“所有国家/地区”之中。在ICTM 的文化政治核心的一直是地区，采取的机构形式是“民族委员会”。ICTM的国际政治活动也发生在国/地区与国/地区的边界上，尤其通过附属于国际音乐学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机构。无论某个会员个人选择何种方式研究世界音乐，ICTM都将其定位于国家/地区，或曰“所有国家/地区”。

对ICTM 做出贡献的学者（以及音乐家和舞蹈家），无论是以交纳会费的会员身份，还是以大会与会者或“研究小组”的身份，或以ICTM的组织体制里选任或委任成员的身份，他们都会代表自己的国家/地区以及他们国家/地区的世界音乐。在IFMC成立之初，某个国家/地区内的世界音乐宽泛地归于“民间音乐”之下，那是该组织出版物再造的一个指称。《国际民间音乐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Folk Music Council*），后改为《国际民间音乐学会年刊》（*Yearbook of the IFMC*），1981年又改为《传统音乐年刊》（*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最初几期发表了一篇又一篇文章，确定民间音乐在国家/地区的位置，显然试图包含二战后尽可能多的国家/地区。合作的项目——诸如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出版一系列世界音乐录音，包括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的慢转唱片——稳固了其他音乐体裁和习俗的民族界限，最初是古典音乐（如在亚洲），20世纪最后几十年则是杂交音乐和流行音乐（如在拉美）。再到世纪之交，在ICTM的出版物里，全球化理论的词汇日益充斥着地理学的范畴，但是只是质疑，而非拆解国家（例如1999年的《传统音乐年刊》，全球化松散地构成一个特别的主题）。

然而，ICTM源于国家的历史编纂学，并不是民族主义。在这层

意义上，它见证了我们本章一直在追溯的矛盾现象。如同“世界音乐”，“民间音乐”和“传统音乐”的目的在于体现音乐国际性或跨国界的某种特性。但是从音乐本体论范畴来讲，它们过于宽泛、过于通用，试图穿越民族界限——甚至有时被称为国际界限——它们提醒人们注意这些界限，实际是提醒人们注意共同围绕着这些界限的政治问题。ICTM 全力对付那些问题，积极寻求财源资助社会主义国家的会员，尤其是东欧的会员与会。ICTM广泛的越界拓展了其概念范畴，增加了世界音乐在一个学术团体内存在的机会，而这个团体起初是在国家/地区的格栅内描绘民间音乐和舞蹈，每一个国家/地区的音乐都同其全球的邻居的音乐是平等的。

超越国家——超民族颂歌，超国家颂歌和国际颂歌

>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
> （《国际歌》，原合唱，1871年）

因审美、本体论和政治等原因，民族音乐局促不安地停留在国家的边界上。民族音乐使得国家与世界音乐的关系变得复杂了，产生了民族主义的极端民族化和超民族状态，并创造了一些——因本书之例——可以称作“国际颂歌”（international anthem）的体裁。国际颂歌的存在，与民族歌曲形成复杂对应的关系。有时二者互补，如在奥运会某些时刻，《奥林匹克颂歌》（*Olympic Anthem*，施皮罗·萨玛拉［Spiro Samara］作于1896年）代表由全球各国和各地区组成的共同体，而国歌或会歌则代表该共同体的成员。一些国际颂歌在历史上曾被借用到国歌中，有时权做国歌——常常如苏联《国际歌》这样的情况——时而僭称是因国家原因，时而政治化为国际原因。国歌与国际颂歌不一样，但互相依存，只有合在一起，二者才能完全将国家同世界音乐联系起来。

歌曲一般不会一夜之间就变成国际颂歌。国际颂歌不会这样诞

生，而是诞生于编造的神话，编造者把这些歌曲描述得注定一夜就会成为国际颂歌那般。分析国际颂歌的音乐和歌词特征，不一定能说明，作为风格构建元素，哪些特征表明了（或没有表明）自己很有效。旋律也许（也许不）包含一些反映国际性的特点。同国歌相比较，国际颂歌也许更多使用调性和声。一方面，一些最广为使用的国际颂歌的旋律结构相当复杂，难以演唱；《国际歌》就是这样，要求歌唱者的旋律音域相当宽广，即使这样的歌手也会发现很难驾驭复杂的节奏和宽广的音程。另一方面，国际颂歌都是合唱作品，很少有例外。虽然它们要求一群人协同表演，但这群人的文化和音乐差异也许极大，这样它们又不那么容易通过歌曲来表现世界。也许问题就在于此。

特定的历史时刻通常引发一连串的事态发展，这些事件又塑造和重新塑造了一首国际歌曲。一首颂歌本身也许不一定直接参与那些时刻。如《国际歌》本身和发生的事件是不可分离的。其歌词来自欧仁·鲍狄埃（Eugène Pottier）的笔端，他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被法国政府镇压时写下这首诗歌的，那时第一个共产主义的伟大实验被摧毁了。这首歌曲的旋律和原配曲是皮埃尔·狄盖特（Pierre Degeyter）所作，他是来自里尔的纺织工人与合唱指导；据传他发现了鲍狄埃的“革命歌曲”集。这首由鲍狄埃作词、狄盖特作曲的歌曲很快就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首颂歌，对于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言，工人和音乐家这样的渊源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上意味着，这首歌来自斗争，也能够发动斗争。

《国际歌》的历史确实从一开始就是国际的。劳工联盟采用了它，各种社会主义组织也采用了它。它象征了无发言权的人群的斗争，它经过了无数的翻译和配曲，很快让无发言权的人群发出了声音。《国际歌》就是一首关于相遇的歌曲，传统与现代性的相遇，也是在殖民主义扩张时代，西方和位于西方帝国最远角落的那些人之间的相遇。《国际歌》出现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转变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出现在这些运动激励了革命的时候，出现在政治行动的前沿。对试图团结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理想而言，《国际歌》在欧洲、南美、

非洲和亚洲以音乐而实现了这个理想。

由《国际歌》联合起来的世界是一个松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联盟，这首歌曲部分效应的产生，也许是由于它能够不那么过紧地束缚那个联盟。也有些国际的歌曲，在松散的联盟层次上生发出来，但接下来朝着民族主义的道路越走越窄。《希望之歌》（*Ha-Tikva*）这首歌就是如此，在其从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歌曲走向以色列国歌的这一路上，注入了好几路音乐和歌词。在19世纪末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希望之歌》已经登上了一个国际犹太组织（当时还不太成熟）的文化舞台。这首歌曲改变了一切，因为通过鼓励代表（一群来自全世界的合唱队员）一起唱这首歌，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声音。这首歌曲本身诞生的环境被层层笼罩起来——那可能使该运动无法认识到这首歌曲是混合的产物（最早是1886年由纳夫塔里·赫尔茨·伊姆贝尔［Naphtali Herz Imber］创作的一首歌曲）——这一事实更多同音乐而非意识形态相关。这首歌曲混杂的旋律和调性结构令其可以表现无数的历史，从民歌到民族歌曲到东方性（因此，通常让人想到捷克作曲家贝德里赫·斯美塔那［Bedřich Smetana］的《伏尔塔瓦河》［*Moldau*］）。《希望之歌》后来成为以色列国歌，那也是其象征力量的自然结果，因此这首歌能够在以色列聚集来自全世界移民的过程当中，从国际层面转向国家层面。

在我们的世纪之初，许多人试图创造区域和全球统一的政策，打造国际颂歌便成为他们专注的事情。如同以前那样，试图将国家绘制到世界版图上，而同时又模糊国家的界限，合成后现代的国际歌曲，则要求融合神话与历史，并将二者重新虚构。试图打造一首歌曲来歌颂国际性，也许最贴切的例子是编造这样的故事，即可以创造一首颂歌来表征欧洲的统一。例如，正是这样创作——实际是完成——一部《欧洲统一协奏曲》（*Concerto for the Unification of Europe*）的过程，成为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电影《蓝》（*Bleu*）主要的叙事情节。泽贝纽·普瑞斯纳（Zbigniew Preisner）为这部电影创作的音乐又把这首颂歌彻底打乱并重新组

合，因而最终这首宏伟的欧洲合唱得以唱出其来自《圣经》的歌词（选自《新约·哥林多书》12:1—13）。可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正在完全偏离事实。

但关于欧洲颂歌的故事还是有若干事实的。欧盟没有官方的文化政策，只有官方不干预的政策。《欧洲联盟条约》第128条如是陈述："本共同体应该努力繁荣成员国的文化，同时尊重他们的民族和地区的多样性，并突出共同的文化遗产。"而许多国际音乐活动是由欧盟非官方赞助的，这也是事实。使用贝多芬/席勒的《欢乐颂》作为盟歌是否属于其中之一，这个问题则处于事实和虚构之间，即在神话和历史交织之处。《欢乐颂》是席勒在启蒙运动中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感的赞美诗，贝多芬为之谱曲，成为其第九交响曲的一部分；事实上，对于选用《欢乐颂》，有种心灵共识。曾有人建议，使用《欢乐颂》作为联合国会歌。1972年，赫伯特·冯·卡拉扬（Hebert von Karajan）已经着手为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改编《欢乐颂》。但在那时，委员会几乎无法达成共识，尤其是因为卡拉扬曾是纳粹文化活动的参与者。事实再次呈现出神话的形态。风格问题也出现了，例如有关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末乐章里的国际风格的真正性质，也因其东方主义风格而显得突出，尤其是插入了一首土耳其进行曲；这是否会表征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欲望，抑或代表中欧的土耳其外来工？

那么，问题仍旧存在，国际颂歌可能统一谁的国家、谁的世界？民族音乐的政治目的将是包容性的，还是排他性的？就欧盟而言，当东欧的新成员加入的时候，是否有必要重新考虑欧盟盟歌的包容性？贝多芬/席勒的《欢乐颂》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肯定提出了这些问题。民族音乐和音乐的民族主义历来是极其公开的现象，因为它们占据了历史舞台，也许是以引发政治运动的合唱运动的方式，也许是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争夺当下和未来叙事这类遗产的方式。以音乐要求占有国家这个舞台，确实得失攸关。

第六章

流散地

流散地的再度相遇，1492—1992

1492年这一年最终生发出一个又一个海外流散地。当然，正是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不久之后就几乎成为按它自己的他异性所界定的一个殖民空间，他异性是指它不是旧世界这样的现实。随着新世界为殖民化开放门户，引发了移民定居的新机会，相对于旧世界而言，它的一些有利之处——建立新的贸易网络或逃避宗教迫害——对来自其他“世界”的每一个人却非常不利，因为他们并不享有欧洲在航海大发现时代轻易获得的那种历史特权。曾激励哥伦布、其他探险者和那些资助全球地理发现的贵族的那些共同因素却对已占据欧洲土地数个世纪的他者尤其不利。1492年，收复失地运动——从非欧洲人、非基督徒手中重新夺回伊贝利亚半岛（那些人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个世纪）——也终于有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局，所有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被强行赶出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492年之后的那个世纪，人类被迫大规模地向世界各地迁移。因之，流散地便被公认为早期现代主义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现代早期及之后几个世纪，几个“92年”——自西班牙历史性地生发了流散地之后，那些年份标志着过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引发了诸多纪念活动，但同时对我们后来称为流散地的被迫移居现象的反思却显然较少。例如，这几个92年见证了世界博览会，从世界各地汇集并展示各种文化。虽然只是因为这样几近平凡的事实——1492年是世界历史第一次引发历史意识的时刻——可是这些年在文化上的努力，引发了在几个92年所进行的纪念活动，其规模都绝对是全球性的。用来纪念和庆祝92年活动的音乐，那就是世界音乐。1893年芝加哥举办的哥伦布纪念博览会（其规模庞大，以致主办者需要另一年来筹办），有无数次世界音乐表演，其中至少有多达103次的表演录制在该博览会有关世界音乐的第一批系统录音里。1892年（或1893年）那一年，几乎没有讨论流散地本身，而更多是讨论自1492年的征

服以来西方对世界的主宰。

1992年的纪念活动声势浩大，声满全球。新世界为自己庆生，在旧世界，尤其是西班牙，几乎不失时机地宣称其500年来扮演的全球角色。然而在1992年周年纪念上，审慎地提到了被迫移居和流散地的问题。甚至于在“第三世界”的国家——那是批判从前“新”“旧”二分法的一种说法——还在与继承自“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后殖民遗产斗争的时候，现代的殖民主义时代基本已告结束。正是在1992年，对驱逐犹太人的历史进行了评判，态度更加开放。被驱逐的犹太人的名称——赛法迪人——再度流行，即使很少有人意识到，希伯来语的“赛法迪”（*Sephard*）恰恰是指“西班牙”。可是，在对赛法迪文化的历史重估中，人们充分意识到，那种文化的痕迹遍布流散地的景观之中，大致在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区。赛法迪犹太人一直生活在地中海沿岸，只有必要时才迁徙，但这样的必要却常常发生。

赛法迪文化是流散地式的，因为它来自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后被迫形成的流散地，因此就更加具有流散性质。在犹太人流散地的历史记载中，相比较中欧和东欧的亚实基拿（Ashkenazic，原义“德系犹太人的”）犹太人的历史以及现代民族国家以色列的历史，在一个流散地内的赛法迪流散地相对不为人们所知。1992年发生变化的只是，作为再度与1492年相遇的一种方式，赛法迪人的历史占有了一席之地。由于赛法迪音乐被提升到世界音乐的地位，修正历史记载的这一行为几乎一夜之间发生。赛法迪音乐有助于重新发现，恰恰是因为它是流散地的音乐。因为可以随身携带，它得以幸存了下来。赛法迪民间音乐是叙事性的，将历史叙述通过浪漫曲（*romance*）和罗曼采罗（*romancero*，谣曲）等体裁编织到歌谣故事里。1992年是复兴的时刻，歌手——无论是否是赛法迪人或其他犹太人——利用赛法迪歌曲集，将它们录制下来，作为流散地过去的踪迹，例如作为“巴尔干的往事”，当时因为内战遍及南斯拉夫各民族，那里的赛法迪社群正在快速消失。对赛法迪音乐而言，1992年标志着它向世界音乐过渡的时刻。

赛法迪流散地决不是最早具有世界音乐潜质的流散地。“流散

地”这个措词本身长期流行，最初它是指希腊古典文明从中心的城邦散布到边缘的岛屿和殖民地。犹太历史也从犹太人的和非犹太人的角度解读为流散地的历史。1992年依然标志着一条分水岭，而重新发现赛法迪音乐，仅仅是那一分水岭最明显的痕迹之一。几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一点，许多不同的文化和人群被迫迁移之地获得了流散地的特点以及名称。例如，非洲、爱尔兰和南亚的流散地。对本书我们所考虑的因素重要的是，这类流散地的音乐开始展示流散地的特点。它们是流动的，它们的历史记录了形成流散地的移民过程中的那些界限和路线。流散地的音乐特征使其可以要求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那种地位成为世界音乐的一个必要背景。流散地成为相遇、移民和融合的音乐背景。

20世纪90年代的流散地以不同但独特的方式，反映了1992年和之前的几个92年的历史主义。在本章，将以三个流散地为主题，每一个都将现代性和全球化形成的相遇的不同时刻加以历史化。尤其因为前面以重新相遇为题已经说得很充分了，赛法迪流散地的形成，是欧洲驱逐犹太人的直接结果，这是第一个主题。非洲流散地的形成，经历了来自西方征服新世界的一系列不同的历史断层，因为非洲人的被迫迁移是由于西方使用奴隶为殖民主义的经济发动机加油。早在现代全球化初期，就已基本不可能遏制非洲音乐对世界音乐最初形式的影响。南亚流散地则利用音乐来表征后殖民世界的历史性聚爆。该流散地被迫迁移的过程和相遇的地点，在某种程度上是高度地方化的，尤其是在曾经由大英帝国主宰的那些文化里，但是南亚流散地的音乐越来越多地对世界音乐做出贡献，并从世界音乐里吸取有用元素。

流散地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政治、历史和音乐的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看来几乎不可遏制。在某种层面上，若要否认一种文化——无论其迁移与否——具有流散地那样的地位，就是否认这一文化在一种全球文化中也具有一席空间。那样，流散地本身成了世界音乐的一种背景，它逐渐起到塑造世界音乐的作用，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了。在21世纪，流散地本身就是世界音乐的发生之地，孕育并强调了世界音乐的那种失位感。

流散地，地方，世界音乐中的失位感

流散地处于失位的状况，这样它变成了世界音乐最彰显的地方之一。流散地的音乐既描述了人们从家园被放逐的状况，也记录了放逐文化与家园的历史和地理的连接，或至少与据称是家园的那个地方的连接。流散地的音乐所涉及的是已存在的地方和正在生成的地方，还涉及到把现在的失位之地同过去及将来联系起来的地方，而地方则可以想象为真实的。想象一种地方感以取代失位感，这样的过程必定由并置曲目而产生混杂和融合；那些曲目正是顺着流散地的路径沿途收集而来的。

流散地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形态，但是可以归纳出三种非常普遍的强制力，这些强制力使人们不得不离开自己所属的地方。首先，宗教的原因导致人们被驱逐出原籍。离开原籍的旅程表现得很神圣，尤其是因为上天要求该旅程最终回归原籍。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些流散地，突出者如犹太人的流散地，正是因为回归的希望，才表现得极度神圣。其次，有些民族和文化没有可称为故乡的地方，因而必须不停地迁徙。关于这类流散地也有典型的例子，如众所周知的罗姆人和辛提人（Sinti，东欧的罗姆人）的流散地。第三，社会经济原因产生了更多现代的流散地。随着各个帝国的解体和民族主义冲突而来的移民和移居大潮，是这一类流散地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保罗·吉尔罗依（Paul Gilroy）利用W. E. 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关于非裔美国人双重意识的概念，富有启示性地创立了“黑色大西洋”理论，将之看作一种概念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带有非洲渊源和无非洲渊源的文化特征相互影响而产生流散地的历史和地理。双重意识，也许甚至是多元意识，使群体既有可能维持那些同历史家园相联系的文化习俗，同时也对新家园做出回应。无论杜波依斯所指称的美国黑人，还是吉尔罗依的“黑色大西洋”，他们的诸种音乐，既能够相互明显区分，又有共同特征，这些特征转而成为一部共同历史的素材。双重意识完全不是历史精神分裂症，因为有一种关键的意识因素一直固植于共同的传统中，而这些传统来自于统一的认识——对

流散地经历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正如吉尔罗依以及多元意识的其他理论家迅速给出的答案，音乐是最有力地象征共同传统的一种形式。如果音乐作为家园的痕迹幸存下来，它也提供了一种手段，可以在流散地环境里同其外界的文化相互协商（negotiation，即协调、妥协而后变化以求生存）。简言之，音乐在两种意识的地图上描绘自身，成为清晰表现流散地的一种方式。

乐器常常是流散地渊源最明显的痕迹。在非洲流散地，乐器伴随奴隶贩运，穿过中央航路，奴隶和曾经的奴隶利用音乐回忆自己和祖先共同的过去，因之对乐器习俗和合奏的记忆在美洲各国得到恢复。用木条和金属条组成的木琴类乐器，长期以来就作为证据，来证明出自西非的合奏乐器得到了保留。木琴类乐器还提供了经验证据，即如何将非洲的节奏和拍子概念同非裔美国人和非裔加勒比人的音乐联系起来。在东亚和东南亚，乐器和乐器合奏也为记录流散地的经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丝竹乐队在东南亚的流传，所循的是中国人贸易和东南亚拓居的海上之路。东南亚的金属琴乐队（如爪哇佳美兰乐队）也反映了流散地的格局，因为它们遍布该地区，表现出语言、经济和音乐的关联。

乐器的流散地格局不仅仅是散布和传播的问题。多元意识的跨界交流常常更有意义。南亚流散地的乐器配置是交流的一个最复杂的例子，也是联系家园和流散地的共同网络。在跨越南亚的宗教、语言和社会等界限的历史过程中，乐器起过重要的作用，见证了南亚文化复杂历史意识的形成。随着殖民时代的到来，全新的、明显外来的乐器输入印度。虽然许多乐器很快进入印度音乐习俗，但总的来说，那并不是将这些乐器硬塞进去的结果。小提琴和单簧管进入了卡纳塔克邦的古典音乐，而簧风琴进入了印度斯坦的古典轻音乐和祈祷音乐。紧随后殖民时代产生的流散地，使乐器得到广泛的输出。因此，来自印度斯坦音乐的锡塔琴（sitar，长颈拨弦鲁特琴）和塔布拉鼓（tabla，双小鼓）很快进入西方爵士乐和摇滚乐（我们只需要看看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在《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中的伴奏就可以了解这个情况），以及南亚世界节拍这样的体裁。簧风琴尽

管起源于西方，但现在也可以用来描绘南亚流散地的状况，甚至全球的簧风琴制造中心是加尔各答。

在这一整章，实际上也是在全书，我们都见证了世界音乐的爆炸如何与流散地的急剧增加同步。若问及原因，我们就会发现所得答案非常复杂，其中很多答案也相当令人不安。首先，有更多的群体有意识地将几乎不相关的移民格局单一化，其方法是将这些移民格局一律重新描述为流散地。例如爱尔兰海外族裔越来越多地开始将自己所处的地区称作爱尔兰流散地。一些新流散地很可能是杜撰出来的，例如凯尔特流散地，可是它们表明了人们对承认双重和多元意识的深切关注。显然，在各种民族主义相互竞争的时代，这些离散地也表明了世界碎片化的状态（fragmentation，指将前现代的有机整体加以解体的思想风格和社会状态）使得失位感得到惊人的传播。世界音乐为流散地的叙事提供了一个音乐空间，无论叙事是民族的还是宗教的，或是由违反人权而引发的。例如，正当“新欧洲”出现了“新流散地”之时，这些新流散地的音乐也如世界音乐那样最容易听到，也最有效力。这无疑是中欧穆斯林流散地、英国南亚流散地、西班牙和法国的北非流散地的情况。对许多无国家的民族而言——例如库尔德人，他们的家乡跨越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三国边界——世界音乐暂时将流散地的失位感转化成表达共同历史的一个空间。在流散地本身经历全球化的这个时代，世界音乐结合了反映多元意识的结构，以至世界音乐越来越多地反映失位感和回归的问题。

鲍勃·马利（Bob Marley）：编织流散地之网

在鲍勃·马利的职业生涯中，流散地如同心圆那样展开。马利在流散地圆环的中心，有意识地将在加勒比交汇的各种音乐风格编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综合体。这个综合体是一张流散地之网，这一网络从音乐、历史、意识形态和宗教等来源吸取各种元素，将牙买加和加勒比同非洲和欧洲连接起来，并直面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奴隶主和

奴隶之间的相遇。马利混合了斯卡（ska）和雷盖（reggae），他同样影响了摇滚和说唱，他唤起了拉斯特法里信仰以及对压迫的抵抗，但是如若他当初没有找到可以连接这一切的一个共同主题——流散地，那么在上述各元素自身的折衷主义的重压之下，这一切很可能早已崩溃。

鲍勃·马利的生平本身展现出神圣之旅的特性。他的短暂一生有多个站点，每一站他都能利用交织在他个人生活中和牙买加音乐的公共舞台上的那些复杂历史。他的母亲来自牙买加农村，混血的父亲来自市政管理阶层，鲍勃·马利年轻时，培养了牙买加式的双重意识。他性格形成的关键期是在牙买加农村度过的，但在十几岁的时候移居到金斯敦。在他18岁时，他已经为自己的“哭泣者乐队”（Wailers）找到了核心成员。在1965年制作他的第一张斯卡专辑之前，他已经推出了几首流行曲，最出名的是《别激动》（*Simmer Down*）和《放下它》（*Put It Down*）。马利生平的大致情况基本上大家都了解了。乐手从他的“哭泣者乐队”进进出出，但是马利及“哭泣者乐队”的组合形态，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几乎没有变过，那时他们制作了一系列专辑：《拉斯特法里派教徒的震动》（*Rastaman Vibration*，1976），《幸存》（*Survival*，1979），《津巴布韦》（*Zimbabwe*，1979）和《起义》（*Uprising*，1980）。马利长期与癌症斗争，于1981年逝世，自那时起，作为加勒比流散地音乐的符号，他的巨大影响力便无可争议。

鲍勃·马利通过创造同非洲的几种不同联系，象征了流散地的双重意识，但是每一种联系的主要特性都是要强调牙买加人和非洲人的共性。他们都加入了斗争，一方面是反对历史压迫、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势力，另一方面是反对全球经济策略。马利也介入流散地的宗教领域，特别是他积极参与拉斯特法里运动，拉斯特法里派的符号逐渐形成一条隐喻之路，这条路是回归之路，通往最早的黑人基督徒所在的那个非洲。那种回归的音乐之路，在鲍勃·马利的音乐所预示的风格转变中，从隐喻走向了真实：最早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斯卡节奏里重新采用非洲阿凯泰鼓（*akete*）；接着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慢拍摇

滚乐中保持统一的非洲特性；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雷盖乐中充分表达牙买加化了的拉斯特法里派教义。马利通过再次采用拉斯特法里派的象征表象，重新绘制了牙买加流行音乐的路线，把雷盖乐描绘为一种流散地音乐。

音乐在南亚流散地的地位

> 但是一个拉贾斯坦人演唱［拉加］芒德（Maand，拉贾斯坦邦著名的演唱风格），或一个旁遮普人演唱［拉加］辛迪·拜拉维（Sindhi Bhairavi，蒂鲁吉拉帕利著名演唱风格）的时候，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对他而言，那是一种受四季影响的特定景观，一种特定的穿着和说话的方式，一种人际往来和节庆活动的网络。
>
> （阿米特·乔杜里，《下午的拉加》，1993：217）

本节开头的引文选自一本有关流散地的小说——阿米特·乔杜里（Amit Chaudhuri）的《下午的拉加》（*Afternoon Ragg*），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孟加拉学生在牛津的故事，以一系列生动的短文将这个学生同英国教育以及其他许多在英国学习和生活的印度人的关系展现出来。连接这些短文的叙事线索是音乐，一个个叙事片段共同构成了一部“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下文将主人公称为叙事者）与朋友和情人的邂逅故事，穿插其中的还有他在老师家中上音乐课的情景，这位老师是他在印度的宗教导师（*guru*）的兄弟。小说标题中传递出拉加的概念，拉加是印度斯坦的旋律调式体系。叙事者对拉加的叙述满载着心灵之旅，每一堂课上，每一次他在下午的合适时间排练拉加时，这一旅程都能够让他更加接近印度。叙事者所思考的拉加存在于带有一种失位感的流散地，也存在于印度本土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以每一种独特的拉加——“一群自创的独特音符”——为标识。对于叙事者而言，拉加有双重指涉，既表达旅程的不确定性，也将印度斯坦和孟加拉音乐的实体核心定位于家乡。下午音乐课对拉加的体验之旅，也是回归家

乡之旅。下午的拉加，其传统性存在于牛津这样的现代之所，象征的是家乡与流散地两个地方。

确切说来，南亚人的散居所产生的流散地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流散地见证了无数起源的发生，如：19世纪的契约苦役，主要引起了加勒比和英属东非和南非殖民地的印度人口的增长；20世纪中叶南亚次大陆的政治内乱；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为寻求其他地方的经济机会而向外移民；人才外流，南亚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涌向西方（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几乎没有减退的迹象）。就文化而言，南亚流散地非常成熟。它有自己的文学，如著名作家V. S.奈保尔（V. S. Naipaul）和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已经成为备受年轻一代尊重的前辈，他们往往是在流散地出生和接受教育的。这些作家编织到自己小说和评论中的那种成熟的自我反思，对南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流散地的语言是英语，可以说，英语也已成了南亚当地文学的主要语言。

就音乐而言，南亚音乐在流散地也很成熟。许多印度和巴基斯坦音乐家在外国和在本国的时间差不多，他们既表演又教学。对出生在流散地的孩子而言，尤其是那些出生在城市和学术中心，也就是流散地网络节点的孩子，学习传统印度音乐或古典舞蹈形式婆罗多舞（*bharata nāt.yam*）并不是特别困难。老一代南亚音乐家的慢转唱片在西方有一定的知名度，如拉维·申卡尔（Ravi Shankar）和阿里·阿克巴尔汗（Ali Akhbar Khan）的唱片，而年轻一代的CD 唱片也同样受到欢迎，这些年轻人几乎完全生活在西方，例如谢拉·钱德拉（Sheila Chandra）和扎基尔·侯赛因（Zakir Hussein）。南亚流散地“音乐上的成熟”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音乐在如此众多不同的场所描绘了流散地，而正是这些场所共同构成了流散地。音乐，即阿米特·乔杜里所说的“一群自创的独特音符”或更多其他内容，也连接了那些场所，为在流散地的旅程铺平了道路。我们现在来简短地描述其中一些场所。

起点与归点

初看南亚流散地音乐，我们也许会发现其自相矛盾之处，南亚流散地的音乐，只要可能，总是具体地指认自己的起源地，而不是仅仅泛泛指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或斯里兰卡。邦戈拉舞（*bhangra*，见下文），无论其如何广泛地融合其他的世界音乐，它的根都在旁遮普。确定起点对宣示本真性非常关键。再者，指明了起点，回归就变得更为可行了。南亚的起点也把几个并存的流散地关联到了现代的南亚流散地，甚至其中有罗姆人的历史与音乐旅程，那一旅程始于拉贾斯坦，如同在电影《一路平安》（*Latcho Drom*）中所呈现的，旅程本身被构建为一种由音乐所描绘的历史之旅。

神话与宗教叙事

南亚音乐里宗教与世俗的故事，沿着流散地之路促进了这一旅程。《罗摩衍那》（*Rāmāyana*）的故事和《摩诃婆罗多》的史诗组诗，为印度教神话中众圣人的旅程打开了叙事的空间，而音乐显然用歌词和形式结构，吸收了这些故事。在流散地，神话和宗教叙事进入了新的背景，例如在北美市郊的印度教神殿里，年轻人学习珀金（*bhajan*，印度教的祈祷歌），或者在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苏非派的神殿里，驻殿的和流动的团体表演卡瓦里，以此赞颂新老圣人。

古典音乐团体

殖民地印度的体制结构常常为印度古典音乐提供了组织模式，首先在印度，然后出境到流散地。21世纪初，在整个流散地，有些组织支持南亚古典音乐。古典音乐团体有志愿人士的支持，也常常得到政府艺术基金的支持。一方面，古典音乐团体具备了地方性功能——在一个城市和小区域内组织音乐教学与表演；另一方面它也具备了国际功能——为音乐家提供巡回演出的机会。在音乐方面，古典音乐团体已经成为流散地的产物，它们经常依靠，而且也促成了跨越印度和巴

基斯坦地区和宗教界限的表演习俗的联合。海报上题为“南北相遇”的音乐会，成为流散地音乐团体的标准特征，无论是在英国、新加坡，还是在开普敦都是如此。

印度电影院

印度电影院是南亚音乐生产和消费最全球化的地方。各种数据常常将“宝莱坞”描述为世界最大的电影产业基地，它十分依赖电影音乐，那种音乐从音乐戏剧发展而来，并扩展成为涵盖印度所有主要语言的音乐电影。音乐结合到印度电影里，若非兼收并蓄，就会表现得毫无特色，因此，它成为流散地主要的音乐娱乐形式之一。印度电影和电影音乐定期出现在几大国际媒体网上。可是在流散地更具当地特色的中心，录像带可以在杂货店和报摊上销售和出租，如此一来，印度电影的音乐就被带入到家家户户。

媒介与中介作用

印度电影业的录像带销售，仅仅是一种方法，可以将音乐转换成一种家园和流散地的中介语言。南亚次大陆的录音产业是世界上最早的录音产业之一，其主要依靠的是早期跨国唱片公司（例如“主人之声”［HMV］和百代［EMI］公司）的国际潜力，但同时也开发了当地的和区域的发行网。20世纪南亚流散地扩大之时，正是录音和其他媒介网络扩张之际。因此，在任何有南亚社群的地方，南亚音乐都很容易听到。

流行音乐，融合与越界

从整体上看，南亚流散地音乐的空间所形成的景观，是鼓励而非阻碍变化的。音乐界定地域，不是靠孤立它，而是靠打开其边界，这

样不同体裁、风格、曲目，有的属于南亚，有的不属于南亚，便能越界，互相丰富对方。例如，正是在流散地的越界，才产生了热辣歌（*chutney*）和邦戈拉舞，我将在本章最后一节讨论这些体裁。音乐的空间丰富了变化过程的环境，这些环境开始叙述流散地本身的历史。而这些变化过程又常常产生流行音乐。

A. Z.伊德尔松及其犹太流散地的音乐丰碑

将流散地的音乐集于一卷并作为流散地的代表性丰碑作品而发表，看来也许是一项难以完成且徒劳无功的事业。可是，这正是亚伯拉罕·兹维·伊德尔松在1907年为自己设立的任务，其时他从奥匈帝国科学院带着一台蜡筒式录音机来到耶路撒冷。在之后几年，他将在耶路撒冷工作和教学，以此支持他来这里要进行的研究：系统录制所有流散地的犹太社区居民——从西面的摩洛哥到东面的布哈拉和达吉斯坦——唱奏的音乐，这些社区居民曾经定居于地中海东岸的“定居点”（*yishuv*）。伊德尔松面临的这项任务，是要想办法记录各种理论，即音乐如何表征流散地本身。一个极端是，有些人认为音乐保存了过去，特别是因为流散地的犹太社区相对孤立的生活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过去传统的精髓。另一个极端是，人们需要收集经验例证，这些例证也许可以说明那些人们已经较为熟悉的流散地各个地区的犹太音乐习俗之间的差异，尤其是亚实基拿和赛法迪这两种传统。

在接下来的25年伊德尔松一直进行流散地项目研究。无论如何，这个项目决定了他的研究和著述框架，以及他在欧洲、美国和南非的教学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和排犹主义兴起，加上他本人几度移民，这些动荡的环境并没有阻挡他发表自己有关犹太流散地的音乐巨著，即10卷本的《希伯来–东方旋律宝库》（以下简称《宝库》）。《宝库》逐卷系统地覆盖犹太流散地。前五卷包含的犹太传统来自也门（卷一）、中亚（卷三）、北非（卷五），以及其他地区。伊德尔松在后五卷所列的传统，更接近于自己所属的传统遗产。

他出生于拉脱维亚，在德国做过犹太会堂领唱，并在德国学习了音乐学。后五卷的内容中含有：18世纪的德国犹太会堂唱诗（卷六），东欧犹太人的民歌（卷九），哈西德（Hassidic）犹太人的歌曲（卷十）。《宝库》从各方面看都是一座丰碑。伊德尔松将自己用蜡筒式录音机所录的音乐记谱并发表，他从好几代犹太会堂领唱员传下来的手稿文本里提取出旋律。他建立了历史联系，并将这些联系绘制到系统分析表里。他运用来自历史音乐学和比较音乐学的理论模式，从中推测音阶结构和文化习俗，那些方面揭示了（抑或没有揭示）流散地是由音乐统一起来的。然而，伊德尔松提出的问题有许多他自己也回答不了，但若要承认犹太音乐是基于流散地的世界音乐，那这些问题就至关重要了，而且就自他以来的犹太音乐学术而言，流散地甚至被公认为是那些问题的基础。

流行音乐和流散地的混合

流散地形成的世界音乐词汇选

阿拉贝斯克（***arabesk***）：土耳其流行音乐的主要风格，形成于民间与古典两种传统的交汇处，以及各族裔、地区、国际传统交汇处。代表了土耳其境内各种流动方式，从东到西、从农村到城市，也作为土耳其流散地社区，尤其是在欧洲的“客籍工人”的土耳其性的象征。

邦戈拉（***bhangra***）：来自旁遮普（印度西北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民间舞蹈，据说保留了农业习俗的象征性手势语。在全球范围，是南亚流散地的一套流行风格，主动与其他风格融合，例如同雷盖乐和牙买加舞厅风格的交流。

热辣歌（***chutney***）：混杂的加勒比流行音乐，主要在特立尼达岛，结合了来自南亚和非洲流散地的风格。它接受

了多种不同的声音和曲目，同时在公共活动和节日的地图上描绘南亚乐器，具有非裔加勒比文化的意义。

当杜特（***dangdut***）：印度尼西亚流行曲风，从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宗教伊斯兰教里吸取自己的伦理内容，但音乐风格来自印地语电影歌曲。作为现代体裁，见证了印度尼西亚几个流散地的交汇。

加萨（***ghazal***）：诗歌体裁，通常用对句，该体裁遍及伊斯兰世界，从西部的巴尔干和土耳其到东部的南亚和东南亚。它依靠古典形象，但歌词常常用书面白话文，因而允许广泛的风格越界。

嘻哈乐（***hip hop***）：泛指非裔美国人的流行音乐，批判美国城市黑人受压迫的状况。它沿着接受融合的路径发展，由舞厅调音师和说唱歌手通过变化慢转唱片和其他录制声源而形成。也广泛称为说唱乐。

克莱兹墨（***klezmer***）：犹太流行音乐，同东欧和北美的意第绪语社区的婚礼仪式和舞蹈有历史关联。该音乐进入自己的流散地，那一流散地以历史的真实性再现了毁于大屠杀的欧洲犹太人的世界。

梅斯蒂萨赫（***mestizaje***）：泛指存在于西班牙裔美国人的流行音乐中的奇卡诺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因素。强调复杂的混合型，如墨西哥–得克萨斯音乐、康汗托舞曲、“越界风格”等；促进了西班牙裔美国人的音乐成为北美流行音乐的主流。

东部音乐（***musica mizrakhit***）：以色列犹太人“东部”社区的流行音乐，也是北非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流行音乐。有意识地结合具有强烈东部特性的乐器、音乐结构和歌词，因此成为一种对西部霸权——以色列的亚实基拿系犹

太文化——的文化抵制形式。

雷乐（*raï*）：北非城市流行音乐，主要来自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商业中心，它成为北非阿拉伯流散地的一种音乐规范（见第三章）。

雷盖乐（*reggae*）：牙买加舞曲，源自当地舞曲风格，如斯卡，通过舞厅调音师在调音台对这些舞曲的调节而形成。这种独特的牙买加声音为加勒比各种流散地音乐提供了样板。

祖克乐（*zouk*）：加勒比法语地区主要的流行舞曲风格。祖克音乐家利用当地录音室和电台混合来自整个加勒比的流行风格，这些风格反过来又随着音乐家传播到法国的流散地社区，混杂了更多的风格后又回到加勒比。

2001年仲夏，亚裔流散地以狂轰滥炸之势上了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头条。一方面，在美国中西部，亚裔流散地第一次宣告他们能和其他各族群公平分享文化舞台，这些族群利用世界音乐启动了“节庆化”的进程，那是美国的移民和族裔文化转变为流散地文化的主要症候之一。“第一届年度亚裔美国文化节”插入到芝加哥夏日节庆季里，由亚洲之声电台和几个流散地社群主办，这些社群有几个歌舞团要在7月最后这个周末表演。亚裔美国人的活动安排既有“骑骆驼”和“土著时装秀”，也有孟加拉和巴基斯坦民间舞蹈，还有“菲律宾舞蹈团”和“印度蛇舞”的表演。这个文化节在德文街小区举行，那里历史上是无数流散地的聚集之地：曾是东欧犹太人社区，近些年吸引了韩国、西班牙和中东人在此建立社区，现在多是亚裔。两周后的“旁遮普体育节”的重点节目是“邦戈拉舞健身操”，与之对照，亚裔美国文化节强调的是用音乐和舞蹈表现流散地。这些表演团体因缺乏独特性反而显得很独特。他们的共性在他们表演的根基处，而他们所共有的正是流散地。

英国境内的流散地在2001年夏季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占据了国际新

闻的头条。“亚裔”和“青年”历来的紧张关系发展到极点，导致了“动乱之夜”和“骚乱”。给这些名词加引号是为了改善一连串更加令人不安的文化环境，具体点说，这些“亚裔”是英国北部城市的居民，这些城市里他们生活的社区，系由最古老和最广泛的南亚流散地之一所形成。“种族”这个词也不时地加上引号，如是，它也用来象征流散地，或象征相关历史问题——绝非仅限于英国。这类流散地既表现了由失位状态所造成的那种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也表征了种族以及对作为他者的种族的恐惧感。

节日和表演，骚乱和巴尔干边界冲突（如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之间），都足以将种族和流散地搬到2001年夏天的一个共同舞台上。种族和流散地常常相互交错，而且这种交错极度频繁，这主要是因为二者都竞相对空间提出要求，而且二者都关乎失位状态的结果。确实，种族和种族主义主导了三类流散地的历史，即犹太、非洲和南亚三类流散地，正是它们构成了本章的主线。通观全章，我们看到了，流散地日益成为后殖民世界的一种文化和政治状况，它已经成为世界音乐最为全球性的背景之一。我们希望，这些背景继续成为颂扬流散地和世界音乐的沃土。然而，颂扬不会抹去流散地的种族因素，也不会掩饰持续不断出现在流散地的种族主义思想。来自流散地的世界音乐应该，而且确实促使我们面对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并提醒我们，体验世界音乐，对于为流散地的族群展现的那些空间，具有非常严肃的意义。

第七章

殖民地音乐，后殖民世界，世界音乐的全球化

新东欧的街头乐手

平时每一天以及周六，大清早商贩们就聚集在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的市场推销商品。克卢日市场周围是枯燥乏味、摇摇欲坠的水泥建筑，那些建筑使罗马尼亚人难以忘记二战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主导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市场里的商贩什么都卖，旧东西、新东西、本地货、舶来品。一种旧日的气息和民俗的本真性弥漫在市场中。在许多摊子上，有奢华的皮革和皮货待售，服装堆积得如山高，有些悬挂在各个摊位之间的绳子上，很是抓眼球，因为人们觉得这些五颜六色的手工刺绣服装是出自喀尔巴阡山脉，主要是特兰西瓦尼亚（克卢日被看作是这个历史地区的非官方首府）中部的手艺人之手。旅行指南也会把这些商贩描述为“形形色色的”和“类似民间的”。显然，许多人白天从周围的村子里来，当天晚一些时候市场关门便离开这座城市。如果我们按照字面理解旅行指南，“形形色色的”和“类似民间的”也许是指市场里大量存在的族裔和种族差异。人们在进行交易时，至少有四种语言主导了沟通：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鲁塞尼亚语”（喀尔巴阡山脉中部的斯拉夫语，在众多方言里混合了乌克兰语和斯洛伐克语），罗姆语（吉普赛人的语言，一种“印欧语”）。这个市场里没有通用语（*lingua franca* ），虽然能听到德语和英语，但它们也不是通用语。

克卢日市场里，音乐无处不在，很大程度上音乐也成为商业文化的参与因素。扩音喇叭的声音很响，商贩们也让自己的收音机加入到电子多声部里。一些商贩出售卡带和CD　唱片，还有不少商贩售卖手工制作的乐器，主要是木制和土制的长笛，也有更精致的弦乐器。乐手们在通道里走来走去，左拐右拐地通过迷宫般的摊位。他们也把市场作为初次进入克卢日市中心的中间站，市中心主要有一个大教堂广场和这座大学城里一度辉煌的巴洛克建筑。街头音乐通过这个市场进入了克卢日的日常世界。乐手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可以在何处搭

起轻便的舞台吸引到最慷慨的看客。他们也知道，对克卢日许多学生来说哪些曲目最好卖，他们很注意操罗马尼亚语和操匈牙利语的两个族群居民之间长期的嫌隙，小心翼翼不出差错。街头乐手们更加在意城里的新观众，自20世纪90年代齐奥塞斯库政府被推翻以来，到特兰西瓦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游客日渐增多。20世纪90年代，东欧进入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过渡时期，罗马尼亚的街头乐手很快就充分利用了这种形势。

克卢日–纳波卡的街头音乐是最具现代意义的世界音乐。它是在地方表演的全球音乐。其多元并置和无可逆料的混合是后现代性的。若长时间地观看和聆听，你会从中发现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痕迹。街头乐手们善于推销自己；他们是职业的，他们的资本在于其能够使自己适应多元文化社会中变化的潮流的能力。克卢日的街头音乐也都是传统的，我们所谓的“传统”，在任何意义上都说得通。白天在城市街头表演的许多乐手，晚上或周末就回村子里去了，回去后他们为舞蹈、婚礼或传统民间文化的其他仪式表演。虽然许多乐手依靠新近的技术，比如说制作自己的卡带和CD唱片，但他们仍然演奏当地乐器工匠制作的乐器。除了当地，他们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找到堪比当地风笛制造者那样的高超手工技艺和调音技能呢？

这些街头乐手既是 世界音乐家，又是 传统民间音乐家，这倒并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瓦解了二者的差异。他们没有被迫进入一种经济上的两难境地，要他们在地方性和全球性之间做抉择，相反，作为音乐家，他们能够找到调适二者的方法。对这些音乐家而言，当地市场和全球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什么两样。克卢日街头乐手的复杂作用应该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克卢日–纳波卡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其过去历史的产物，即其文化适应的产物：适应奥匈帝国；适应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之间的文化争议；适应林林总总的少数族群，其中，犹太人、罗姆人及德国人在该城市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城市过去在文化方面非常复杂，因而该市甚至在今天都还有三个名称：克卢日–纳波卡（罗马尼亚语），科洛斯堡（匈牙利语），克劳森堡（德语）。这里的传统音乐已经是，也仍旧是一

个世界都市的音乐，既与众不同，又处于不断的变迁中。从历史角度看，其日常的文化所呈现的世界性，正是形成今天——后现代的全球时代——世界音乐的那种世界性。

21世纪初始，同世界音乐的相遇已经成为日常的经历，主导着新世纪——“我们的世纪”——的声音景观。我甚至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共处于新世纪的初始，与人人共有的世界音乐相遇，这种相遇将我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相遇产生了全球化，然而，有一条悖论潜伏在相遇的形式里。如果我们真的是通过与世界音乐在全球的相遇而共享它的，那么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与它相遇的，这些不同的世界的形成方式，由于经济、族裔、种族、政治和历史等的差异，也大相径庭。同以往相比，今天更加多样的技术手段使我们与更多的世界音乐相遇，但问题是，这些技术是便利了这样的相遇，还是令其复杂化了。说得更确切些，尽管媒介专家宣称CD唱片、因特网以及跨国录音产业无处不在，可是并非世界上每个人都同样能够得到世界音乐的技术，实际上大多数人是得不到的。世界音乐所处的世界增多了，原因是我们能够更加直接得多地与这些世界相遇。因而，我们越发禁不住要问：世界音乐所处的各种日常世界究竟属于何人？

全球城市和世界音乐史

城市是贸易中心，可以在一个后现代世界里与世界音乐相遇。纵观历史，城市在音乐景观中占有一个独特地位，因为它能容纳“百川”，还能聚合权力，这种权力能使“百川”努力朝着共同的政治目标汇聚。城市的各种音乐强调城市占据着音乐景观的中心地位。前现代城市的音乐生活也许可以说是具有前世界音乐的特征。在一个由贸易主导的城市，比方说，在地中海沿岸或丝绸之路沿途，路过的商人之中无疑有音乐家，而且音乐“货物”也可能是重要的代售品，包括表演者和音乐的物质文化，如乐器。随着前现代城市转变为现代城市，城市从世界音乐的音乐市场，发展为更加广泛的生产与消费的场所。随着

印刷文化对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生产的影响，尤其是在航海大发现的时代和16世纪到18世纪末欧洲殖民扩张的时期，专业化的新形式逐渐对培育城市音乐生活的多样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正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城市文化经历了真正世界范围内的大爆发。城市数量成倍增加，规模也大大扩展。城市不再独独是拥挤的欧洲的现象，殖民地和欧洲扩张之处也开始复制欧洲的城市结构。各个殖民帝国在20世纪初期开始瓦解，之后加速瓦解，而国际大都市——我们现在称为“全球城市”，或以更加地方性的角度，称为“世界级城市”——作为持续相遇的场所而继续生存了下来，占据了世界音乐地图的重要位置。

在全球城市里没有单一类型的相遇，我们所遇到的世界音乐的类型几乎无限，人们不应该为之感到惊讶。现代城市给个人以更大的自由，使人们可以游走于大都市的各种公共空间之中，最常见的相遇形式之一是发生在个体与其可以自由走动的公共空间之间。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运用拱廊式商场的隐喻，将个人与城市文化的相遇给予理论的说明，拱廊式商场在20世纪初的巴黎、法兰克福和柏林获得了特别的意义。游走于城市商业大街上的个人，凝视橱窗，听到过路人交谈的片言只语，渐渐了解了该城市的文化。音乐也是拱廊式商场可能提供的那种相遇之一，因为沿着这类商场内的走道行走，人们会经过播放着音乐的咖啡馆的门前，路过剧场，还会遇到街头乐手。初看之下，这类个人相遇也许很随意，但本雅明提出，是城市本身将这些相遇置于一定的格局中，而这些相遇也有助于城市形成反映自己时空的方式。

大都市具体的地形特征也加强了相遇的可能性，当今无人能比街头乐手更能认识到这一点了。街头乐手的世界流动性极大，然而还是局限于街头以及城市居民和游客行走的其他线路。街头乐手依靠的是流动。他们的观众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街头音乐必须适应流动的观众。各种规定使人们可能只能短暂地逗留在一个地方，但这不一定对乐手不利，因为他们有机会为新的观众表演，换言之，为那些还没有给钱，或没有购买卡带和CD唱片的人表演。街头音乐，越来越多地进入地铁、公交站点和步行街商业区，很少仅仅在街头表演。街头

音乐不是少数族裔社区的音乐，而更多是从外面输入到城市里的音乐。街头乐手得益于游走在各个城市间的那种可能性，通常，乐队（如在欧洲的安第斯山区乐手）建立了巨大的网络，连接各个城市中心，似乎这些中心就是全球街头音乐文化的一个个节点。

图8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一条商业街里的街头乐手（1998）

后现代城市不符合人们所断言的全球文化“模糊”的状况，因为今天音乐的多样性也许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移民文化的旧模式中，“故国”的痕迹，三代人之后便消失了，显然，这种旧模式过于简单化了。城市为文化移入和音乐杂交品种的形成提供了许多机会，也为颂扬多样性提供了其他更多机会。后现代城市的音乐家不仅在公众

场合与私下场合表演，也不仅仅在单一族裔社群或阶级结构里发挥作用，而是形成了复杂的归属关系，跨越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宗教和族裔界限。

今天城市的各种音乐文化都展示了多样性的族裔、种族及宗教的不同格局，但这些不同格局的产生，是各个城市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适应外来移民、城内迁居以及新老居民区不断混合的结果。“孤岛声音”的隐喻也许有效地表征了纽约市的拉丁与加勒比音乐，而在芝加哥，该市与墨西哥之间的持续交流证明了去瓜得卢佩——16世纪末圣母玛利亚显灵的圣地——进行宗教朝觐的特别意义。伦敦和巴黎不同的殖民主义历史，同样把这两个城市转变为有很大差异的世界音乐之都，随着后殖民主义被后现代主义和全球文化变迁的其他过程所取代，二者的差异显得更大。

我在本节开头提到，城市是世界音乐的一个“贸易中心”，这一说法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究其原意，“贸易中心”是一个仓库，是堆积待售货物的地点。在城市里与世界音乐的相遇，也以复杂的方式联系着世界音乐的市场营销。在前现代城市，音乐完全就是在市场上获得多样性的。排列在本雅明拱廊式商场里的商店也是商业场所。街头乐手何时何地进行表演，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城市音乐路线上每一个结点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世界音乐的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因素，也会贯穿于本章其余各节的讨论中，因为音乐旅游业的产生和世界音乐节的举办，说到底就是由经济所驱动的。若非如此，它们就不会遍布于21世纪的全球音乐景观，并更加彰显这一景观里城市的主导地位了。

马努·迪班戈（Manu Dibango）：世界音乐的自传

我走自己的路时，感到被推向别人。对我而言，这样来填补差异还比较容易，我既不是外乡人，也没有完全融合到我自己原来的世界里去。我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一座断桥。

（迪班戈，1994:2）

马努·迪班戈1933年出生于喀麦隆，其音乐生涯同西非的后殖民历史、同这段历史所交织着的非洲流散地的世界音乐不可分割。虽然他的西非之根得到法国和大型跨国唱片公司的宣扬，但也许他始终既是非洲音乐家，也是西方音乐家。正如迪班戈在传记里所证实的，作为音乐家，他的生活在诸多方面都是平凡无奇的，他的世界音乐生涯是他的生活缩影；若非如此，迪班戈的世界音乐生涯倒很可能是后殖民相遇的非凡一例。

马努·迪班戈在喀麦隆的港口城市杜阿拉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父亲是那里的一个公务员，这使得他从法国殖民地政府得益不少。马努·迪班戈小时候可以上教会学校，15岁时他获得法国奖学金，从而可以去法国继续学习。虽然他的童年是和杜阿拉的其他孩子一起度过的，但这些经历在自传里写得比较模糊，显然只被当作偶然的痕迹编织在过去的形象中，尽管这些痕迹对于一位如迪班戈这样的世界音乐家今天所具备的形象是必不可少的。在另一方面，与西方音乐相遇伴随着他最初的记忆。他写道，通过参加教会仪式，“我发现了仪式和歌曲的重要性”。他的母亲是教堂女声唱诗班的指导，可正是男声唱诗班指挥“让我不可思议地迷上了音乐”。这场相遇如此普通，以至迪班戈几乎很少感到其之存在和影响。“教会的旋律不是我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利用了这些旋律，它们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我后来听到巴赫的《圣经赞美诗》（*Canticle*）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曾在教堂里学过这首曲子，我肯定那是来自家乡的音乐，一首来自我的祖国的歌曲。”

马努·迪班戈职业生涯的进程与非洲法语区的后殖民历史同步。1948年在法国学习后不久，他就以新遇到的音乐取代了喀麦隆殖民地社群的音乐，这一次他遇到了非裔美国音乐家，包括爵士和布鲁斯音乐家，还遇到了法国流行音乐和地中海的香颂歌曲。他开始比较正规地学习音乐，到将近20岁，他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学习中音萨克斯管，这很快使他转轨到美国黑人音乐，一发而不可收拾。也许人们禁不住要说，这样的轨迹可能会毁掉移植到法国后所剩无几的非洲音乐

的痕迹，但事实是，爵士和布鲁斯的吸引力为与非洲音乐的相遇开启了新的机遇，或者说，为与二战后法国流行音乐景观中非洲人的殖民地现实的相遇开启了机遇。迪班戈在非洲法语区以及法国与比利时的美国黑人移民中，建立了一张音乐关系网。他的音乐圈子不仅——也非主要——包括喀麦隆，还包括扎伊尔以及其他法国和比利时殖民地。他可以同非裔美国音乐家和白人音乐家一起表演，以此开启自己的国际性演艺生涯。前者包括哈里·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阿特·布莱基（Art Blakey），唐·彻里（Don Cherry），赫比·汉考克（Herbie Hancock），后者则有保罗·西蒙（Paul Simon）和约翰尼·克莱格（Johnny Clegg）。

喀麦隆决不会从迪班戈的音乐活动里消失，尤其是他需要依靠来自喀麦隆的演出邀请来获得更稳定的收入。然而，他的职业生涯走上一条日益国际化的道路，这条道路得到法国和国际唱片公司的支持。他在世界音乐上的重大突破发生在1974年，那一年他的流行曲《灵魂玛阔沙》（*Soul Makossa*）获格莱美大奖提名；从那一刻起，成功和大奖纷至沓来。

20世纪末，马努·迪班戈成为世界音乐中多元文化精神的倡导者。他成长于法国和后殖民世界，较之以往，它们更有能力为世界音乐可能的形态提供样板。音乐本身获得了一种潜力，可以加速西方与其殖民地之间最终的和解。迪班戈在自传里如是写道：

> 巴黎正在变成种族混合之地……颤音琴和（西非）巴拉风（balafon）木琴一起进入学校，丰富了学校音乐。（东方的）平锣加强了成套鼓钹的配备。由于这些突如其来的创新，（非洲）大陆和巴黎之间的音乐误解消失了。
>
> （出处同前：129）

后殖民时代之后的黎明预示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无需牺牲来自世界的任何音乐。“非洲音乐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相遇的音乐；其魅力就在于此。”

录音和全球化的技术

想想看，音乐人类学家田野工作的陈列室里可能有什么。一面墙上可能是音乐人类学家所研究人物的照片。另一面墙上也许是来自田野的人工制品，当然是乐器，很可能还有其他类别的仪式器物。然后很可能在第三面墙的前面有一块地方，用一些展柜集中展示“音乐本身”，如乐谱、磁带、录像带，并用以往对该地区进行记述的田野研究者的成果来充实这些展柜。最后，可能还有一块地方是技术手段的展示，正是这些技术使得开展田野工作成为可能，展柜里尽是录音设备和照相机。还有一面墙上挂着音乐人类学家为一些人录音的照片，那些人是他们请教的对象，换言之是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人”。

这是想象中的一座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博物馆吗？还算不上。那么这是殖民主义时代田野工作的一个回顾展吗？确实如此，但还有更多的含义。音乐人类学家总是喜欢展示自己行业的工具，喜欢提供那些使他们得以将田野变为实验室的技术的资料（见图2和图3）。你若是访问一所国立音响档案馆或科学院的民族学分部，你可能会发现其中有几个展区是展示田野工作者和田野技术的。大学音乐人类学系也展示录音设施，至少会展示那些不再适用于最近田野工作的器材。音乐人类学家为歌手和乐手录音的照片，以及为收集资料进行采访和收集表演资料时的照片，可以填满有关这个领域的历史书卷。1916年，弗朗西斯·登斯莫尔坐在美国民族学办公署的门前，为美国黑脚族人的山区酋长录音（见图2）。贝拉·巴托克站在斯洛伐克一个村子里，村民们正对着他的蜡筒式录音机的话筒唱歌（见图6）。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德国战俘营，卡尔·施通普夫（Carl Stumpf）和乔格·许内曼（Georg Schünemann）与来自全世界的战俘坐在一起，录制他们的歌曲，以对音乐进行全球的分类（见图9）。音乐人类学家工作照的主体是机器本身，而非人的方面，这些照片彰显机器是为了记录下音乐人类学家遇见世界的那些方法中关键的东西。录音设备出现在那里是为了说明本真性、权力以及学者个人作为音乐人类学家进入田野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想要追溯该领域对某种技术进步的反应，以此来写一部音乐人类学的历史，可能不会有任何困难。作为一门学科，现代音乐人类学逐渐依赖瓦尔特·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的确，本着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精神，音乐人类学相关技术的历史也许会给我们提供书写历史的策略，那种策略可能要求学科具备科学性的所有外部特征。技术是同世界音乐相遇的中介，每一种技术进步，都可以让音乐人类学家感觉到，他们能够通过相遇收集到关于世界音乐更多的细节。这是一个颇有诱惑力的想法，没有一个音乐人类学家能够理性到去抵制它。可以说，音乐人类学威望的增长，是因为进步的技术使该领域可以声称其具备了更严格的科学基础。事实上，在音乐人类学内有一些分支学科，它们几乎完全依靠技术让音乐成为数据，从而达到客观诠释的目的。系统音乐学学者把自己的智识谱系追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学者，如亚历山大·埃利斯（Alexander Ellis）和施通普夫。埃利斯设计了一套体系，将音阶划分为对频率的平均测量，即“音分”；施通普夫是德国心理学家，他在柏林大学建立了第一个致力于分析世界音乐录音的实验室。

音乐人类学在系统性方面的冲动绝非仅仅只为了科学地描述声音。建立本真性的参数同样也是一个动机。分析声音本身能否揭示更多有关我们所听到的并解释为音乐的东西？音乐物理学，将音乐表征为声波形态和音色表现，能否转变我们对音乐形而上的理解？录音技术允许我们——甚至需要我们——以不同方式思考什么是本真性。本真性与技术改变如影随形，技术的改变产生了音乐人类学历史，那一历史揭示出本真性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人们还面临的问题是：对录音和技术伦理的讨论是否能够跟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进步。20世纪90年代充斥全球音乐市场的数码技术，几乎使得任何人都可能进入与世界音乐相遇的现场。世界音乐在CD唱片和因特网上无处不在，纷繁芜杂的录音颠覆了法律的障碍（版权限制），这种限制原本也许能使听众认真考虑因特网文化语境下与世界音乐相遇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我提出这些伦理困境，并非打算采取反对的立场。作为已经引发争议和行动的伦理困境，它们和关于权

力、挪用和文化冲突的困境相比，仅仅是类别不同而已，这后三者也总伴随着同世界音乐的相遇。如果这些困境来自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技术方面，那么它们同样旗帜鲜明地要求音乐人类学家担负起当今学术的道德责任。

图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施通普夫和乔格·许内曼在一个战俘营为鞑靼音乐家做现场录音

《世界音乐概览》及当今音乐人类学与世界音乐的相遇

世界音乐随着21世纪而成熟，可是人们似乎一直对此抱怀疑态度，而《世界音乐概览》（以下简称《概览》）从一开始就驳斥这样的怀疑。《概览》毫不含糊地宣扬自己的全面性：世界音乐有无数，并且没有边界，“正合时宜，新版……正逢新千年的开始，因为它介绍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以及最新的音乐”。即使《概览》所言听上去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它所记述的同世界音乐的后现代相遇如此广泛，因而很少有音乐人类学研究者，从业余的到学院的，从爱好者到积极分子，会不合理性地拒绝这套书。一方面，《概览》是广告，宣传进

行世界巡演的音乐家及其唱片公司，更不必说对旅游业的宣传了，而旅游业也是《概览》的资助方，因为《概览》是以介绍活跃的世界旅游业为其品牌特色的；另一方面，《概览》声称其主题是音乐现象的多样性，它也是对音乐现象多样性的真正指南。最后，《概览》更加关注如何促进与世界音乐的相遇，远远胜过关注世界音乐本身。通过书中各页内容及其所介绍的大量CD唱片和网址，《概览》里“新千年”的音乐人类学家进入了虚拟相遇的世界。

在涉及本学科及其学者的最后这一节里，讨论音乐人类学研究世界音乐的状况，可能很容易突出悲观和听天由命的调子。我用“虚拟相遇”这样的措辞，也许会引发技术失控的联想，也许会让人们觉得音乐沦为了仅仅是中介的地步。查阅《概览》的人都会很快找到理由，让人们注意书中的一些缺陷。即使在学院的音乐人类学圈子里，我们也往往不喜欢《概览》将世界音乐及其话语处理成蹩脚的广告式简介的做法，但我们几乎没人否认，这些简介常常便于查阅。我们都承认，我们最受尊重的几个同行正在为《概览》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即使我们对那些经常大量充斥版面的粗糙报刊文章不忍卒读。《概览》也许在学术上并不完美，但它仍旧象征了音乐人类学当今与世界音乐相遇的方式。

打开《概览》翻阅到任何一页，都可能见证当今音乐人类学与世界音乐相遇的状况。《概览》的两卷本首先是有关录音制品以及因其传播和消费而获成功的音乐家的指南。当今音乐人类学家无需考虑录音制品是否将音乐剥离其语境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录音制品都是如此。然而，这些录音制品确实建立了新的语境，而这些新语境正在日益吸引音乐人类学家审视的目光。随着民族主义在世界许多地方的蔓延，录音制品成为支持它，也是抵制它的一个重要语境。从全球范围来看，录音制品及其交流也许是与流散地相遇之中最重要的话语。

《概览》——也许是无意识之中——也成为对音乐人类学最新方向的一个导引。最明显的是，它主要是对流行音乐的导引，毫无疑问，在20世纪90年代，音乐人类学中没有一个领域发展得如同流行音乐研究那样迅速，那样具有影响力，我甚至会将流行音乐研究称为一

个分支学科，因其有明晰的理论和方法。接受并分析诸如混杂、融合及越界这类话语，换言之，接受并分析当今无法避免的全球化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从《概览》对流行音乐给予的特殊关注发展而来的。没有人会把《概览》误认为是纯粹主义者的圣经，但这套书也传递了一个信息，涉及到当今生成世界音乐的那一类相遇，那也许对坚持古老教义的纯粹主义者是一个痛苦的信息。最后，无疑的是，相遇的各个地方本身极其不同。世界音乐在移民和流亡社群得以强化；它还有助于在整个政治权力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操控；它借助民间音乐复兴，不亚于借助先锋派；它也成为节日文化的内容与旅游项目。世界音乐证明了全球文化无处不在，因此与世界音乐相遇，在今日已经同我们的日常世界密不可分。

世界音乐节：全世界的舞台

民族志现场：2001年9月22日。世界音乐，如我在自己居住的城市芝加哥所遇到的，也如我在本书最后一章最后这一节所写的。“2001年芝加哥世界音乐节”才进行了两天，但整个城市都变成了世界音乐的一个舞台，这已经是芝加哥第三年举办世界音乐节了。看看今天安排的活动日程——在官方节目单上总共有17项活动——我们便大体知道自己所理解的“世界音乐的一个舞台”究竟是指什么。

这个大都市成为世界的隐喻，通过绘制其音乐和音乐文化的地图，使得任何一个人都能参与这场相遇。音乐节的地图有意延伸到这个城市的所有区域，所有的“居民区”——芝加哥人习惯用“居民区”指称他们文化地理的区域划分。每场音乐会的地点都标以两个字母所代表的居民区地址，如HP代表海德公园，这是芝加哥大学所在的居民区。也许并非偶然，居民区地址如同标明国籍的车牌，如GB（英国）或PL（波兰）。芝加哥这些居民区因其要求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归属而闻名，以至于城市大多数居民都知道，皮尔森是墨西哥人区，西北部是波兰人区。然而，再仔细看一看这个城市世界音乐节的地图，可以

发现它不只是复制居民区的族裔和国家认同。也许有一半地址不仅仅是作为世界音乐的舞台而重构的居民区，而是作为世界音乐的舞台（恕我罗唆）而重构的真正舞台，例如芝加哥交响乐中心今晚将主办一场巴勒斯坦乌德琴演奏家西蒙·沙欣（Simon Shaheen）的演出；宣传上说阿尔及利亚的雷乐明星哈立德将于9月30日在里维埃拉剧场举办“闭幕音乐会”。居民区“中心”通常主要是为居民区提供广泛的社会及市政服务，如今也成了舞台。最不出所料的是，民间音乐和传统音乐的堡垒也成了舞台，主要如“老城区民间音乐学校”，还有许多本城的跨国文化中介场所，如博德斯音像书店。

只要你愿意，你尽可以对“2001年芝加哥世界音乐节”不屑一顾，认为那只是娱乐和旅游活动。有不少著名的世界节拍团体，他们大多在高消费的地点表演。音乐节主办者是市长特别公众活动办公室，在举办了集中在市中心的格兰特公园的各类夏季音乐节后，他们对秋初吸引游客来芝加哥信心满满。夏季的几个月里，布鲁斯音乐节、爵士音乐节、福音音乐节、凯尔特节、万岁拉丁节，你方唱罢我登场，虽然这些节日本身不收取入场费，但事实证明世界音乐为这个城市带来了财源。由于“9·11”事件的震惊带来了一种不确定性，吸引进行文化之旅的游客来芝加哥，在“2001年芝加哥世界音乐节”期间显得更为重要。

同样，任何人若希望批评世界音乐，认为那是同质化的全球流行乐、文化帝国主义制造的音响，他们都能很容易找到目标。然而这样的批评可能误读世界音乐重新描绘城市、回应多种多样的当地因素的方法。例如，居民区地图上分布最密集的是布鲁斯音乐家。之所以说密集，是因为音乐节地图仅仅让人们注意一种分布已经很密集的世界性音乐文化，即以“芝加哥布鲁斯”或“城市布鲁斯”而闻名全世界的那种音乐文化。相比之下，最后这一节所论述的这个周末，为人们提供了与世界音乐相遇的机会，也安排了许许多多美国印第安人的活动，其中主要的是埃斯基卡戈印第安人的帕瓦仪式（Eschikagou Indian Powwow）。这个帕瓦仪式季最后的大集会，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它始于美国西部各州和加拿大一些省份，横越北美大陆，最终直达芝

加哥，因而要将这些背景理清楚非常困难。这些表演始于“美国印第安人昼夜平分庆典”，而今天正是春分点的表演。帕瓦仪式在历史上是北美大平原各族群之间相互认同和抵抗的一种本地化仪式，它将在芝加哥地图上占据的地方，正是1893年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的原址，世界音乐最早的民族志录音就是在这个场地上完成的。为了这个周末的表演，埃斯基卡戈印第安人的帕瓦仪式做了颇为高调和引人注目的宣传，响应了为21世纪北美的身份认同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它通过音乐表演而再现了历史上一场未加遏制的相遇，那一相遇将印第安人从自己的家园驱赶出去，而2001年帕瓦仪式季又重走了那些相遇之地。

全球化不加遏制，牺牲本土和当地的音乐家，为的是支持世界节拍的制作者的权力，难道本次世界音乐节又重现了这样的事例？并非如此，除非人们希望将这个节日看作一个整体，即看作一场单纯的活动，认为其只是反映了西方霸权的一个隐喻。在全书，我所反对的正是上述这样的单一眼光。一个音乐节不仅仅是集中的世界音乐的表演时间，而是许许多多不同历史的汇聚时刻。赋予世界音乐节以结构的那种历史性框架至少由三个不同层面组成。在第一个层面，尽管有世界音乐节，音乐家和听众却继续呼应当地少数族裔、民族和宗教等群体的诉求。这个层面的音乐表演与音乐节其他活动交汇，如是建立的联系超越了当地的话题范畴。音乐本身主导着舞台。聚光灯聚焦爵士，或非洲与古巴的融合音乐，或凯尔特舞曲，或雷乐。在第二个层面，人们庆祝一个节日或历史事件，通过复兴而有效地将音乐重新连接到从前的语境中，这一复兴视音乐节为其生命线。最后一个层面，无疑，世界音乐节显然试图重构音乐本身，将之作为重绘无边界世界地图的手段，借此绘制一个乌托邦世界的地图，其中地方的、少数族裔的、种族的和宗教的差异全部消解。那个乌托邦世界不剥夺任何人与世界音乐相遇的机会。

图10　宣传2001年埃斯基卡戈帕瓦仪式的明信片，以印第安骑手为特色，这个骑手形象出自于竖立在密歇根大街和国会大道交汇处的格兰特公园入口处的一个纪念碑

在这最后一节的民族志现场里，世界音乐节无处不在，这也是其日常之态。本书读者用不着去远方寻找，也用不着等待很久，就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音乐节。虽然我对21世纪初世界音乐的节日化进行了个案研究，但我仍要提醒读者，不要把节日化看作世界音乐历史长河中的终极目标。一次世界音乐节所产生的相遇的类别并不新颖，这些类别肯定不是新千年各种历史趋势不可避免的汇聚。某些形式的相遇消失了，但另一些相遇形式的数量和种类却增加了。几乎没有——据我看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与世界音乐相遇的丰富方式在当今有减少的迹象。当今的世界音乐节充斥着各种相遇，如果我们——作为音乐人类学家，也作为21世纪的全球公民——更多地以民族志的方式对这些相遇加以考察，那么我们便会认识到，每一次活动，只要置于一个重归世界的大都会舞台上，都会见证一种不同的相遇。它也许需要我们参与，也许不需要；也许会改变我们——自我和他人——之间互动的方式，也许不会。然而，世界音乐产生于相遇，相遇的历史脚步

不会停歇。我们每一个人——音乐人类学家、音乐家、业余爱好者、被动的听众——都会越来越多地同世界的音乐相遇，而且相遇的方式日益增多，这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带入到这样一个世界里去，这个世界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再也无法同我们自己的生活分开。

译后附论

世界音乐语境下的后现代空间意义：文化地理学概念解读

一、音乐人类学中的文化地理学轨迹

虽然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但是音乐里充满了地理空间概念和想象。音乐怎样给予我们地域感？按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说法（1990，转引马丁·斯托克斯，《族群性，认同与音乐：音乐的地域构筑》，1994）：

> 地域（place），或地点（locate）“指社会活动具体的地理背景”。他还指出，现代性一个明显的结果是“幻觉般地”将空间从地域中分离出来，因为地域已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力量所完全渗透，并按这种力量来塑造自己”（出处同上）。这一错位要求一种摆脱焦虑的重新定位过程，或者用吉登斯的措辞“重新植入”（reembedding）。在我们“重新定位”的无数种方法中，音乐无疑起到重要的作用。音乐事件——从集体舞蹈到播放卡带或CD唱片——唤起并组织集体记忆，展现地域的经历，其强度、力量和简单是任何其他社会活动所无法比拟的。通过音乐构筑的“地域”，涉及差异和社会界限的概念。地域也构成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等级。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音乐也表现出这样的特点，顾名思义，其“世界”的定语以地理范畴界定，正如《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2006版）所下最新定义：

> （世界音乐是）结合来自非洲、东欧、亚洲、南美和中美、加勒比，以及非主流的西方民间音乐的多种风格的音乐体裁。最初杜撰该名称主要是对20世纪80年代英美发行的非英语的音像制品的激增的一个回应，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音乐已经成为真正的音乐体裁，成为西方流行音乐日益混合的音响的对应乐种。起初，非洲音乐就等同于世界音乐……至21世纪，世界音乐更加无所不包：既有巴基斯坦歌手努斯拉特·法塔赫·阿里汗的歌唱，法国组合“吉普赛王”的流行弗拉明戈舞曲，也有用最新水准的节奏编程的融合少数族裔人声的“氛围–全球”（ambient-global）音乐。

世界音乐的上述定义开宗明义的关键词是“结合……多种风格的音乐体裁”，上述例子里隐含着不同层次的地理空间：一个国家的传统与现代空间（如巴基斯坦），一个大洲的空间（非洲），跨地区的空间（法国、吉普赛和西班牙），跨族群的想象空间（“氛围–全球”音乐）。

研究世界音乐的主要学科称作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亦译“民族音乐学”），该学科里也充满了文化地理学的范畴与概念。在评述手头这本《世界音乐》之前，有必要对其母学科的背景，尤其是其中的文化地理学的倾向，做一概要式的综述。对世界音乐的记录和描绘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散文家蒙田1580年的文章《论食人部落》（见其散文集），也许是现代欧洲第一篇关于世界音乐的民族志记载，评述了巴西（当时是法国殖民地）里约热内卢海湾一小岛上美洲土著的歌曲，材料来自加尔文派传教士让·德·莱里（参见本书第一章）1578年的记述。而最早杜撰“世界音乐”这一名称的是德国博物学家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的巨著《世界音乐》（1650）。基歇尔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充满了科学好奇心和神秘性，其目的是汇聚一个音乐的世界。如同收集、展览古玩那样展示音乐珍奇，结合美洲土著及各国的音乐资料，展示各民族地区的仪式舞、乐器图像、音程表、记谱、音阶结构的数学图表，表现出以普同主义概括世界音乐的意图。

欧洲人研究世界音乐，其理论依据则源自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主将之一、百科全书派的领袖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音乐辞典》（1768）反映了18世纪的这种时代精神。该辞典系统地使用了世界音乐的材料，目的是完整地概括音乐的定义。“为了让读者能够判断不同民族的不同音乐方言”，卢梭在论音乐的条目中展示了世界音乐的谱例，包括中国、波斯、加拿大的所谓“蛮族”歌曲以及瑞士放牧调。他由此得出音乐现象中的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二元论，即文化普同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理性思想。

18世纪是启蒙运动发展的时期，也是西方地理探索的时代，崇尚

实地考察的时代，因此“田野工作”兴盛起来，出现了许多基于第一手资料的著述，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利用自己在中东、土耳其、印度和中国的经历，撰写了许多关于东方音乐的第一手专著。启蒙运动对世界音乐研究最深刻的影响就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他者”（other）的概念，即非西方世界，有着不同于欧洲的历史与文化。通过观察“他者”的音乐来影射、重新审视欧洲自己的音乐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学术界，这类对殖民地文化与社会的研究首先是地理学范畴的，之后又分化出一门新的学科——人类学，那是西方为了殖民地统治和治理而新建立的学科，以别于先前已有的研究西方自己社会的社会学。同时，在音乐方面还孕育了19世纪发展起来的东方主义音乐学（尤其是阿拉伯音乐文化）和比较音乐学。在19世纪，我们也看到了地理学、人类学、音乐学等多门学科的相交融合。

1885年，维也纳音乐学家阿德勒以比较的概念创立了一门新学科——比较音乐学，其核心也是从地理学不同层次的地域空间的范畴研究世界的音乐文化，即“比较音乐作品，尤其是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民歌，并按其不同特点分类、整理”。比较音乐学以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组织有关世界音乐的知识，时间方面吸取了地质学和进化论的思想，空间方面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即是地理学。1860年，德国人类学家巴斯蒂安（Adolf P.W. Bastian）首先提出“地理区”的概念，即在一个地区的地理条件的制约下，“原始观念”形成为具体的“民族观念”，此即“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思想影响了另一位德国人类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他创立了文化地理学，指出地理环境造成了各民族文化间的差异，此即文化传播理论的基础之一。20世纪初的一位德国人类学家格雷布纳（Robert Fritz Graebner）由此提出了“文化圈”、“文化层”以及“传播论”学说。他认为具有相似物质、精神文化的民族同属一个文化圈，圈与圈的相叠就构成了文化层；每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个地域一次产生并向四周传播的，这种传播的过程便是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基本内容，这就是德奥文化史学派的基本观点。这一学派也援引音乐为例来证实文化传播的理论。如德国人类学家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考察了非洲的鼓，划分出四个文化区：黑人

区，马来黑人区，印度黑人区以及闪族黑人区，各区都有自己的一类鼓。音乐学内则有萨克斯结合时空维度提出的世界乐器三大区理论，即初期层（旧石器时代，遍布全世界），中期层（新石器时代，仅分布于几大洲）以及近期层（新石器时代晚期，仅局限于几个地区）。

20世纪初，欧洲的比较音乐学家以文化普同主义的精神——进化论和文化圈理论，通过对有限资料的分析，雄心勃勃地试图绘制全世界的音乐风格、乐器和音体系的地图，与此同时，以博阿兹（Franz Boaz）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则切切实实地在自己“家里”做长期、深入的田野工作，用留声机录下即将消亡的一个又一个印第安部落的音乐。他们引入了欧洲文化地理学、比较音乐学的“文化区”概念。博阿兹的弟子赫尔佐克和罗伯茨（Helen H. Roberts）借此概念，通过比较乐器，对整个北美大陆的印第安风格区进行了界定。

随着二战的结束，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诞生了音乐人类学，最初的研究目标是，“所有非欧洲的音乐和乐器，包括所谓的原始民族和东方文明国家”（孔斯特［Jaap Kunst］，《音乐学》，1950）。之后将近40年，音乐人类学内部由社会文化学派（以梅里亚姆［Alan Merriam］为代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学派先是以静态的文化共时主义关注封闭空间的地域性音乐文化，20世纪80年代起又倾向于时间的维度——音乐文化的变化，即动态的历时性；其间又出现了共时性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多元主义的后现代思潮介入，与新历史主义同时出现了新文化地理学的空间理论。在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为音乐人类学所下的最新定义里可以发现这样的空间范畴，即“在地域与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音乐的社会和文化方面”。这方面的典型著作如谢勒梅（Kay Kaufman Shelemay）的《声音景观：在变化的世界中探索音乐》（2006），运用了文化地理学的景观框架——空间背景中的声音及其意义——来探讨世界音乐，尤其是音乐的空间传播，涉及移民（时空变迁）、记忆（想象的空间），以及全球的市场（实际与想象的空间），凸显了当今世界音乐的空间流动性（fluidity）。其中音乐与移民的关系——时空变迁与音乐文化的互动——成为近十多年来的

热点课题。“音乐不仅局限于单一地域，音乐的含义也不止一个地理来源”，音乐人类学“对静态的封闭的地域文化研究，转变成了对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音乐人类学里重要的文化地理学理论的研究学者还有图里诺（Thomas Turino），他结合了多重地域说（“同心圆背景”）与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音乐实践理论。他认为，政治、经济的历史与现实背景的变化首先改变了人们的“主观习性”（habitus，存在及认知方式），于是造成了音乐实践的变化。这里涉及国际–国家–地区这样三个层次的空间背景。音乐实践最高一层是国际的背景，即世界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以及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的帝国主义方针（经济、文化入侵）；中层背景，即第三世界国家，面对西方这类入侵进行西方化的经济、政治、教育改革，再加上人口增长和土地短缺，助长了移民和城市化；在底层背景里，城市化吸引了来自农村的大量移民，造成农村人口锐减，乐手流失。面临新的变化了的条件，人们有策略地灵活行事，对音乐实践做出相应变化，既维持又变化了传统。

另一更为重要的空间理论体系，可见于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斯洛宾（Mark Slobin）在《西方的微观音乐：比较研究法》（“Micromusics of the West: A Comparative Approach”，*Ethnomusicology*，1/1993）提出的世界音乐的文化空间的三种视角：（1）借用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全球文化经济”的“景观”（-scape）体系（2）“可见性”（visibility）（3）文化三分法：亚文化（subculture），主文化（superculture），和跨文化（interculture）。

空间流动性景观（landscape），即人口景观、技术景观、经济景观、传媒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人口景观叙述“旅游者、移民、难民、流亡者、外籍工人及其他流动群体和个人”，已不再仅仅叙述民族志作者用作标准单位的比较传统的稳定人口，因为流动群体比以往更突出可见，更有影响；即使在国内，人口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异化也“打破了地域界限”。技术景观的特征是“技术超常的传播”。

金钱的离奇运作则产生了不稳定的经济景观。意义深刻的传媒景观“往往围绕形象，以叙述说明事实”。意识形态景观即各种概念领域，源于欧美启蒙运动，现流行于全世界。以这套世界景观看音乐，音乐在技术与传媒的运动中漂泊不定，并为音乐创造者不断地打破地域界限而困惑。音乐被编入文化织体之中，由日益发展的技术所创造，由媒介传播，通过市场销售，表现出人们自律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人口迁移的控制。

世界音乐是一系列流动的风格、曲目与实践，地域上能伸能缩，不再是一系列历史地理渊源单一的有界实体，因而斯洛宾提出了有关全球音乐的另一种不同的关系体系，即“可见性”——观众的“可知性”——的分析角度。该体系分为地域、区域、跨区域这样三个层次。地域音乐是一定的小范围观众所知的音乐。这一类音乐是所有音乐人类学传统上研究的，即“族群”（ethnic group）的音乐，但这类音乐正日益减少，可是它们是音乐宝库的地域性话语，是身份认同的标志。区域音乐不易界定，若“地域”指一个村子，那么“区域”就再大些，如斯堪的纳维亚也可算一种区域，因为该地区几个国家都有一种波尔什卡（*polksa*）的舞曲形式。区域音乐也出现在与“流散地”——远离祖国却有类似音乐的群体——的联系之中。如美国的波兰波尔卡区域即是由一个个相距很远的城市连接而成。跨区域音乐能量很大，也许会成为全球音乐。

最后是音乐文化的三分法：主文化，即主导文化，可再分为工业主文化和国家主文化；亚文化是指弱势群体的非主流文化（如下层阶级，少数族裔，女性）；跨文化再可分为工业跨文化和流散地跨文化。这里既有实际空间，也有想象空间。

二、世界音乐的后现代空间概念：关键词解读

博尔曼的这本《世界音乐》，涉及后现代空间理论的多个概念，了解这些概念有助于对本书内容的理解。文化地理学和空间理论之所以成为显学，是由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推动。虽然福柯的理

论大多建立于历史的角度（他的理论谱系结合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文化再生产与表征，解构主义的互文性），但在他晚年（1976年）又在他的知识–权利批判中加入空间维度，并认为20世纪是空间的时代。可以说“空间范畴和空间逻辑主导着后现代社会，就像时间主导着现代主义世界一样”（哈维［David W.Harvey］1990，转引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2001）。尤其是全球化的现状，进一步将空间理论和文化地理学推向了学术中心。这也暗合了音乐人类学的发展进程：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是注重历时性的比较音乐学，20世纪下半叶以来更注重共时性的空间。

首先是关于“地域”（place，而site和venue多译作“场所”和“地点”）和“空间”（space）这些地理景观——人类任何活动都离不开的范畴，因而这样的范畴也必定带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即有待解读的文本。如前所述，相对于动态的时间维度，先前人们普遍认为空间维度是静态的，但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颠覆了这一陈见，他认为，空间是社会的构建物，而社会构建物本身又是按空间组合的，因此空间是由一系列动态的过程——权力和象征——构筑的。地域可以理解为，由权力的社会关系有意义地构筑的，由身份认同或情感投资的一个场所或位置（location）。由是，地域表现了在空间里的意义生产。虽然空间更具涵盖性，但二者有时也有区分，地域强调面对面的实际相遇（encounter），而空间更多是指虚拟的接触（contact）。因此空间/地域可以指人类的经历、记忆、愿望、认同等的焦点所在。（参见《SAGE文化研究辞典》，2004）也可以说，空间/地域可以分为实际的空间（或地域，客观维度）和表征的空间（隐喻的空间，主观维度），前者是可感知的物质环境，后者是特殊的抽象符号，这样生成空间的过程称作“空间生产”（production，来自马克思的“社会/精神生产”），既生产了物质化的空间，也生产了不同群体的空间认同感。（参见《文化研究关键词》，2007）研究一种“景观”，是指研究一个空间/地域及其外观是如何获得文化/社会意义的，既有现实的，也有表征的。（参见《文化研究导论》，2004）

其次，本书各章还涉及一系列若虚若实的其他空间范畴，如：西方与非西方（他者），神话与历史，民间，国家/民族，流散地与家园，全球等等，大多属于历史人为构建的话语空间，不一定指称具体的实体存在。虽然非西方可以指向具体的国家/民族、地区、族裔、社群（也都是人为的范畴认定），但所谓的“他者”则完全是西方的东方主义想象所制造的幻觉或曰话语，这些话语反过来又主导了人们对上述地理范畴的想象，造成了更多的主观而不真实的话语空间和不同层面的身份认同。神话和历史经常没有严格的界限，因为历史也是人为想象的构建，难免掺杂着神话因素，不存在完完全全的所谓“史实”；如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的，神话是大众文化中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是文化政治的表征空间，受到权力的操纵。其实，所有的空间范畴也都是如此。

这些空间范畴的意义和内涵都随着历史而变化，突出者如nation的意义。（本书按照上下文分别译作“国家”或“民族”，有时也并列二者“国家/民族”，而台湾地区则有译作“国族”的，见林语堂《远东英汉大词典》1977）

在12世纪的欧洲，nation原指民族，即某一个人类群体，其成员由于复杂的历史过程而有着诸如语言、习俗和信仰等共同的属性。然而近18世纪末，文化的意义几乎完全被北欧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新兴的政治经济观念所取代。地理与政治的准则成了决定因素，产生了nation的另一个定义——国家，指一个国家所控制的空间，或延伸开来指人类群体，其成员同国家融为一体，在自己领土内获得政权和自治。一个多世纪以来，两种意义都在使用，有时指政治实体，有时指文化实体，也有二者兼而有之的。然而政治意义似乎占先（如加拿大的魁北克）。（Grenier & Gebault，"Representation of Music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Representation"，*Ethnomusicology* 34/3，1993）

至于folk一词的内涵及所涉及的地理空间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古撒克逊语–高地德语里仅泛指“人们”，在古英语里变成了“民族”和“普通百姓”，20世纪中叶才出现了“民间音乐”的说法，指“大众（popular）或传统的音乐”（参见《牛津英语大词典（简编本）》

2004）。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发明了世界音乐，可那只是一次简单的命名行为而已。正是他杜撰了民歌（*Volkslied*）这个词，不仅用来指他在当地听到的音乐，也用来指他在整个启蒙时代的欧洲世界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曲目”，也就是说，这个词当初指的是德国和欧洲的大众和传统音乐，而现在其所涉及的地理空间延伸到全球，联系着社会各个层次的身份认同，大到一个民族/国家，小至一个族裔/社区，可以指所有口传的音乐，几乎与民族音乐或传统音乐同义。

还有同祖国家园相对的“流散地”（diaspora，源自希腊语），如本书作者指出的，该词原来指“希腊古典文明从中心的城邦散布到边缘的岛屿和殖民地。犹太历史也从犹太人的和非犹太人的角度解读为流散地的历史”。现在扩展到指所有的海外移民社群。这个地理空间同样是由历史——古希腊文明，以色列文明，现代文明——构建的话语空间，如《圣经·旧约》所言：“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必在天下万国（diaspora）中抛来抛去。”（《申命记》28：25）在人们的脑海里，这样的话语形象地将流散地构建成失败者流亡漂泊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的空间，这正是当初犹太移民以及后来其他民族中部分移民的景观。

最后是全球化的空间，那是经济一体化、移民运动和传媒网络令各种文化相遇、混合或并置所带来的结果，涉及后现代文化地理学意义阐释中的一个共同点，即“时空压缩”，造成了两个相反的结果，一个是跨越空间的时间急剧缩短，“使时间空间化”，即并置多元文化符号；另一个结果是“全球村”的形成得以“通过时间消灭空间”，造成了文化的同质化，这样便使得区域性的身份认同日益减弱，乃至消亡。两种结果的历史性的紧张关系，造成了文化产品的易变性和短暂性，因而人们为身份认同而不断地构建新的符号与意象，乃至混杂性大行其道，不断创造出不稳定的新的异质的文化形态，而这种混杂性就是在重复中变化，在变化中重复，所形成的“第三空间”消解了本真性和本质性，开启了生产新意义的话语和身份认同的全新空间。（部分参见《文化研究关键词》）上述各种层次的意义空间话语构建都可称之

为“表征”（representation）。

文化研究中的“表征”在认识论上是对纯客观性的颠覆，在艺术或文化中是对现实主义的颠覆，因为我们无法“按照事物的本来样子呈现它”，即使照相也不能精确复制，我们只能以我们的想象，以符号或意象（称为“话语”［discourse］）重新呈现或代表它，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主观性，因而经过表征的产物已经不是原来的事物，而只是变体之一。也可以说，理解文化景观不是简单地理解在某个空间里可以发现的“客观现实”及其单一意义（比如发现某些具有特征的“文化区”），而是要了解多重“现实”以及阐释多重意义，每个群体都可以通过各种媒介——艺术或大众媒体——“表征”某个空间，从而声称自己发现了该空间里的“真实”，这些呈现某种事物或空间的方式即是“诗学”（poetics）。“通过表征体验所有这些空间、地域和景观，而表征则以各种形式被大规模再生产，在想象的共同体内广为流传”。（参见《文化研究导论》）

在这一表征中，什么得到表征？什么被排除在外？什么被改变、争夺、商榷？为什么如此？这样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联系着文化政治，即社会群体间和个人间充满权力的关系。“权力”（power）也是福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力量，个人和群体可以用之压倒和反对他人而达到自己的目标、获得自己的利益”（参见《SAGE 文化研究辞典》）。权力更多地指的是一个庞大的网络，各种关系力量的集合，不能单独存在，只存在于差异关系中（参见《文化研究导论》），如体现在阶级、种族、性别和年龄的各种相互对立的不平等关系中，还有如本书在空间的范畴里所探讨的西方与“他者”、民族国家与全球化、流散地与家园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反映在表征里，则是对意义的挪用（appropriation）、争夺（contest）、商榷（negotiation）或抵制（resistance）。在表征上述空间景观中关于权力的斗争及其意义的差异和矛盾时，我们还遇到了一连串的地理学概念：位置、地形、并置、边界、流动、跨界、错位、复位、融合、杂交。这些概念塑造了各种意义之间不同的文化关系。

三、本书各章导读及述评

为便于读者理解，以下拟就各章内容做一概述。全书隐含着时间–空间的顺序框架，在时间维度上，按照世界音乐形成的历史过程论述，即初始–前殖民时代、殖民时代、民族国家时代、后殖民–全球化时代；在空间维度上，按照世界音乐形成过程中地理范畴的逐步扩大来论述，即区域、国家、海外流散地、全球。大体上，第一章属于引言性质；第二章和第三章着重于从时间维度上论述西方与他者，主要涉及非西方的区域音乐，如北非音乐；余下四章则置于空间维度，第四章论述民间音乐，第五章论述民族–国家的音乐，第六章论述海外流散地音乐，第七章论述全球化的世界音乐。作者在论述世界音乐的同时，也顺便介绍了音乐人类学的方法和历史。

第一章紧扣“初始”论述。最早与世界音乐相遇的故事和最早的音乐家是在神话空间里，最早的真实相遇见之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民族志叙述的空间里；世界音乐最初的意义空间是相对主义的本体论（音乐本体的意义），但意义的生成也离不开宗教的背景空间（宗教曲目成为引发感知并促成皈依的一个微型空间），最早的音乐接受也在宗教的审美空间里产生（宗教音乐的审美能力或曰“权力”，在于音乐的意义取决于其功能，即能够直接将歌词、叙事和仪式转变成宗教或世俗意义——再现现实世界或引发皈依，达到超验）。

而在当下，流行音乐重构、再现了原初与世界音乐相遇的环境空间，传统在当下以新的意义得到回归，构建了现代神话的空间。这里的“神话”是广义的，即“一个社会反观自我的最清晰的文化表达形式”（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语）或“意义的象征导引或地图”，“意义内涵层次的自然状态”，“类似于意识形态的概念”（《SAGE文化研究词典》）。如世界著名的巴基斯坦伊斯兰教苏非派卡瓦里歌手努斯拉特·法塔赫·阿里汗所制造的现代神话的意义：

> 苏非音乐逐渐表达了全球化的苏非派禁欲神秘主义的审美核心，但是在这样做的同时，它舍弃了苏非派许多传统的惯例。苏非音乐通过自己与苏非派禁欲神

秘主义的分离，以及对宗教惯例的美学批判，获得了有影响力的一套新意义。它从音乐风格和宗教功能的严格限制里解脱了出来。

第二章以媒介空间里的世界音乐为对象，围绕“东方主义”关于东西方权力关系的问题及其所产生的意义展开，涉及权力的手段、话语和机制。我们发现权力既可以制造，也可以瓦解差异。作者首先尖锐地指出西方用技术手段占有、剥夺、挪用东方音乐：

这里现实的问题难道不是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吗？换言之，难道不是那些不拥有这样的音乐，但确实拥有技术来占有它的人，运用技术表征的手段剥夺“土著”的音乐并挪用来为自己欣赏、研究和消费吗？

本章涉及世界音乐中关于权力的两个问题——音乐的运用和妄用（abuse）：（1）运用音乐来“区分出两个世界，即有权力者和无权力者”（2）妄用音乐则是“把他人的音乐记录为乐谱或录制成唱片作为世界音乐呈现”，它引发的问题是：

谁从表征的行为中获得权力？谁丧失了权力？

接着作者论述了殖民时代臭名昭著的“中央航路”这一“以权力构建他异性”（或“他者性”，otherness）的空间。“中央航路音乐家没名没姓的事实，说明了西方在历史上是如何通过强使他者佚名而实行主宰的”。东方主义不仅是描述的过程，也是权力和支配的问题，由此一个群体通过特定方法界定东方的身份，也界定西方自我。（部分参见《文化研究导论》）作者反思了音乐人类学中的这一类界定，提出了权力在西方“我者”和非西方“他者”之间所构建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对应话语分类：

音乐人类学成为“高”文化和“低”文化、“口传”文化和“书面”文化、“大众”与“精英”、“有历史”民族和“无历史”民族、“前现代”和“现代”之间的空间，或者在我们的时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空间。所有这些名称，以及它们形成

的概念对子，显然都来自西方，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这里的似是而非就更令我们困惑了。在这些对子里，一个名称可以为观察者所用，以此将另一个名称归至被观察者所占据的空间。

这样一套基于他者性的二元表征语汇确实有助于西方区分出一个劣等的“他者”，从而得以反衬出优等的西方的“我者”，构建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一个想象中的我者–他者空间。

而作为权力表征的“录音手段介入我者和他者之间空间，重新界定了这一空间”，即非我非他的所谓的“第三空间”；或曰，录音手段具备“瓦解我者和他者之间差异的这种权力”，如本章最后的凯尔特音乐专辑《圣地亚哥》，“牢牢为西方录音工业所掌控，同时，它将一种凯尔特幻想刻录在唱片上”，它挪用了一个想象中的凯尔特世界的空间形象（主要是风笛元素），加上世界流行风格（波尔卡，古巴元素）和中世纪宗教吟诵风格，“对人们而言这种幻想既有熟悉之感，又具异国情调，足以成为西方及他者之间的世界音乐空间的缩影”。因而“具有赢得1997年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大奖的所有必要特征”。在这里格莱美大奖和录音工业成为主宰文化的权力机制和手段。

第三章，以世界音乐并置神话和历史的方式，继续论述西方与他者的关系中神话与历史的意义空间，主要以北非为例。北非历来是东西方的地理中间地带或文化混杂之地，是一个典型的第三空间，因其地理位置邻近欧洲而成为他者性开始的边界。作者回顾了中世纪阿拉伯辉煌的历史、传统上伊斯兰教对音乐的态度，以及1932年开罗阿拉伯音乐大会上东西方的思想交锋，在那次大会上，西方坚持认同传统阿拉伯的东方主义的“他者”形象，而阿拉伯各民族国家面对现代化的世界，则要求重构新的阿拉伯传统。这种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在当今全球化–后殖民语境下最终得以实现，即通过世界音乐制造了东方的后殖民新神话空间，如埃及女歌星乌姆·库尔图姆结合传统和流行风格的演艺生涯，在世界音乐的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继承了“基本的穆斯林的审美观”，同时“也改变了现代埃及和伊斯林世界里大众的文化精神。”

另一个现代神话的典型例子是北非的新乐种“雷乐”，它之所以能“以一种世界音乐风格继续生存”，依靠的是能够并置截然不同的意义这样的能力，以及在伊斯兰美学原理中“对音乐的那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如一方面继承了已成定式的东方主义，“让人想起了伊斯兰城市的市场、闺房、宫廷以及表演有禁忌内容的社交场合”，即西方想象的阿拉伯他者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阿尔及利亚在后殖民世界里如何努力获得一席之地”，即现代的民族国家的神话。在这样的历史–神话并置的空间里，雷乐“协调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相遇”，其“我者性意识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无限渴望世界音乐中的他者性”。这里的我者性是指阿拉伯特性（地中海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古典风格），他者性是指世界的流行风格（地中海地区阿拉伯和法国流行风格），这样便颠覆了西方原来对“我者–他者”的所指。

第四章以“民间”这一空间来探讨世界音乐。作者首先强调了民间的边缘性，同时指出后现代语境下，民间反而在民族–国家的中心得到复苏。民间音乐“传统来自历史和地理的边缘地带，那样的地带可以动摇和更改原本地域性的边界”，表征了民族边界的跨国流动性，如捷克境内的匈牙利语区，它作为主流文化里的一种边缘文化，为了生存必须在自己的音乐里投入“象征资本”，即民族表征–认同的符号，因而

> 民间音乐体现了匈牙利性的音乐话语，也从那一话语发展而来，而那种话语的利害关系确实不小，因为其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涉及族群认同，也涉及种族纯粹和民族整合。

民间音乐是赫尔德这样处于欧洲中心的学者所杜撰的，将其表现为处于历史边缘的一个范畴，它现在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一种象征，亦是一个现代神话。因为这是西方自己所杜撰的“一个‘权威性’的原始样式来迎合自己关于民间音乐的观念。音乐可以与归属感相连，用于加强某一地区特有的特征”（克朗［Mike Crang］，《文化地理学》，1998）。西方人认为“人们可以从音乐角度想象世界”，因为如本书作

者所言：

流动性是民间音乐最常见的特性之一，使学者们能够在全世界搜寻伴随各个民族迁移的音乐变体。同时，绘制民间音乐的世界地图带有殖民主义的所有特征，而且并非偶然，人们拿民间音乐的概念来为欧洲的扩张辩护。如果说收集民间音乐涉及欧洲在全世界与他者的相遇，那么民间音乐便渐渐反映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殖民主义，还有民族主义，以及对本真性的本质主义的探求。

民间音乐亦是一种隐喻，占据着一种文化空间，不断地将音乐同世界联系起来。这一“文化空间关注两套宏大构想的隐喻，第一是时间，第二是空间”，而且时空隐喻互相依存，即叙事性与地理性交汇，用“发明传统”（以庆典节日杜撰历史时刻）与“想象共同体”（以象征性景观创造空间）这样的机制来维护区域认同。首先是时间，即民间音乐有对历史的叙事能力；其次，也可以离开历史事件，创造了一个表征空间或舞台空间，让过去存在于当下，“这些曲目也将民歌和民间舞蹈转变成不同的舞台表演，在那里表演的复杂事件，可以界定一个社群、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歌词和舞步既表征了地区的文化地理特性，同时也表征了对地域和历史空间意义的争夺，如本章中所提到的意第绪民谣《在波兰的另一边生活着一个犹太人》，便表征了那位犹太少女“要求超越传统社区生活，进入公共空间，以此挑战父母和她所属的社区。她的父母和欧洲的历史都拒绝进入那个公共空间”。

本章最后再次回到神话和历史的空间，也再次以凯尔特音乐为例，论述它如何从民间音乐变成世界音乐，即它如何在神话和历史的空间里往返交错。神话是非常现代的，它是以各种角度——语言、宗教和音乐等——构建想象的凯尔特特性及其多元历史的结果，移民海外则进一步扩展了凯尔特的现代神话空间。总之，这一章将民间音乐意义的探讨分别置于中心与边缘、叙事与表征（即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神话、地区与全球这样四对不同的空间之中。

第五章论述的空间再上升一个层次，论述占据国家这个空间的民

族音乐。相对于民间–族群，民族–国家是人们身份认同的一个更加稳定而实在的领土/空间（如“国际传统音乐学会”这样的学术机构和《世界音乐概览》这类工具书都按照国家分类，从而巩固了国家的概念），更能够给现代人一种身份意识和安全感。保持民族–国家稳定的区域特征的机制包含两个方面，分别为“想象的共同体”和“发明的传统”。“想象的共同体”由在一个共同领土边界内具有共同特性的各个地区，乃至多元群体组合而成，名曰国家。而这样的“共同体”（community，亦可译为“社群”）需要一个中介在其公共空间里传递–表征族群的共同认同，从而满足这个“想象”，民族音乐就是构筑或表征国家这个空间的中介。

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的音乐可以构筑多重的意义空间，尤其是政治意义的空间，如文中所举的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获奖歌曲《耶路撒冷之旅》回答了三个问题：国家是什么？国家属于什么人？国家构筑了什么样的空间？（类似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问题：“谁是德国人？”）这首歌曲混合了多种语言（土耳其语，德语，希伯来语，英语），以及世俗与宗教的象征意义，包括德国儿童游戏、德国犹太人心目中的圣城耶路撒冷、德国基督徒以及土耳其穆斯林祖先。歌曲反映了德国是一个多元民族–文化的国家的现实存在。这首歌曲与其说是为了获奖，不如说是为了再检验上述民族与宗教问题。

> 面对现实，大赛并没有掩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也没有掩饰世界音乐——即使聚集起来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服务——无法轻易脱离国家或民族主义这样的状况。

因此可以如是回答上述问题：国家是政治化或民族主义的空间；国家属于每一个公民，无论其来自什么民族或群体；国家构筑了多重空间，表征了多重意义。音乐可以塑造国家还因为其具有表演性（performity），这一表演性具体表现为齐唱性（unisonance）和文化亲密感（intimacy），这种共同的文化经历又体现了民族–国家音

乐的集体性，即形成了合唱运动，彰显了民族性，因而音乐成为民族认同和塑造国家形象的载体。

保持民族–国家稳定的区域特征的机制的另一个方面是“发明的传统”。新欧洲的合唱运动即是一例，其中突出的如德国土耳其移民的合唱音乐和犹太人的合唱队，虽然合唱音乐不是这两个民族的传统，但发明这样的传统都有助于彰显这些少数族裔存在的现实空间，进而也有助于表征–塑造那些多元民族存在的国家形象。

民族–国家的歌曲因政治或认同等原因可能会超越国界而成为超民族或超国界的民族（犹太民族）的世界歌曲，如《国际歌》最初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歌曲，后来越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歌曲，其间也一度成为苏联的代国歌；也有反向的运动，如《希望之歌》原先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歌曲，随着各国犹太移民汇聚巴勒斯坦而建立以色列国，遂成为该国国歌。因而国家与国际的音乐其表征的地域范围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伸缩的。

第六章将空间移出国家领土界限之外，探讨海外的移民流散地（流动并散居）的空间。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Clifford Geertz）提出了所谓的“旅行文化”，认为文化不应该被限制于某一特定地域，而应该看作是家园与旅行地之间的关系纽带，旅居的文化世界是一种杂交和混合的体验。“地点不能理解为限定的实体，而应理解为这些流动的相交”，“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的，而所有的文化产品都是混合的”（参见《文化研究导论》）。流散地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政治、历史和音乐的状态，其音乐的历史也记录了在形成流散地景观的移民过程中的那些界限和路线，构建了相遇、移民和融合新的音乐文化空间，释放出新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即绘制了流散地和世界音乐的新地图。如果说民间音乐和民族–国家的音乐孕育并强调了地域感（sense of place）（如第四、五章所述），流散地音乐则孕育并强调了世界音乐的那种失位感（placelessness），但在杂交混合的过程中又形成了新的“全球化的地域感”（global sense of place）——一种超越国界的认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范畴的分类与分析联系着现代性，而范畴的混合杂交与解构诠释则联系着后现代性。如作者所言：

流散地处于失位的状况，这样它变成了世界音乐最彰显的地方之一。流散地的音乐既描述了人们从家园被放逐的状况，也记录了放逐文化与家园的历史和地理的连接，或至少与据称是家园的那个地方的连接。流散地的音乐所涉及的是已存在的地方和正在生成的地方，还涉及到把现在的失位之地同过去及将来联系起来的地方，而地方则可以想象为真实的。想象一种地方感以取代失位感，这样的过程必定由并置曲目而产生混杂和融合；那些曲目正是顺着流散地的路径沿途收集而来的。

保罗·吉尔罗依利用杜波依斯关于非裔美国人“双重意识”的概念，将“黑色大西洋”上升为一种概念空间，使特定群体“既有可能维持那些同历史家园相联系的文化习俗，同时也对新家园做出回应”。以文化协商（或商榷）的方式，让“音乐在两种意识的地图上描绘自身”，清晰表现了流散地的文化地理景观。对于虚构的想象的离散地，如凯尔特民族的空间，以及“对许多无国家的民族而言——例如库尔德人，他们的家乡跨越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三国边界——世界音乐暂时将流散地的失位感转化成表达共同历史的一个空间”，即将虚拟的共同空间转化成历史–神话的共同空间——一种新的虚拟的地域感，亦是一个跨国界的“想象的共同体”。在这个过程里，他们的世界音乐也即是一种维护虚拟疆界的“发明的传统”。

失位感往往伴随着回归感。如文中讲述了在英国的南亚流散地的学生，如何通过下午的印度音乐课，而使其信仰回归之路由隐喻转变成真实。演唱拉加便是回到了故国家乡，音乐之旅成为想象的回归之旅或民族认同之旅：

音乐界定地域，不是靠孤立它，而是靠打开其边界，这样不同体裁、风格、曲目，有的属于南亚，有的不属于南亚，便能越界，互相丰富对方。

伊德尔松所收集、编撰的犹太流散地的音乐巨著，10卷本的《希伯来–东方旋律宝库》则说明了流散地空间可以由音乐（如犹太教会调式及其富有特色的小二度音程）统一起来，即使是凯尔特世界这样

虚拟的流散地空间，也是靠一些共同的音乐因素（如五声音阶、风笛、竖琴等）加以统一的。换言之，音乐构建了一种千年流散后重新聚合回归的意义空间。之所以产生这种文化的回归感，是因为身份主体意识的复苏，那在宗主国已经淡化，乃至完全丧失（这种现象称为“属下性”［subalternity］），这样的复苏策略是要跨越国界横向联系同一民族的群体，以建立认同感，但无论如何，所谓的文化共性历经千年的流散混杂后已经模糊，更多是差异而非共性了。

第七章在后殖民–后现代的全球化语境下考察世界音乐，主要在城市的空间，因而世界音乐也是城市的一个隐喻。后现代城市是当代文化杂交产生跨界的文化人、音乐人以及所谓“第三空间”的杂交文化产品的地域，如文中以德国思想家本雅明著名的城市拱廊式商场这样的流动公共空间隐喻来探讨世界音乐。

音乐也是拱廊式商场可能提供的那种相遇之一，因为沿着这类商场内的走道行走，人们会经过播放着音乐的咖啡馆门前，经过剧场，还会遇到街头乐手。初看之下，这类个人相遇也许很随意，但本雅明提出，是城市本身将这些相遇置于一定的格局中，而这些相遇也有助于城市反映自己时空的方式。

大都市具体的地形特征也加强了相遇的可能性，当今无人能比街头乐手更能认识到这一点了。街头乐手的世界流动性极大，然而还是局限于街头以及城市居民和游客行走的其他线路。街头乐手依靠的是流动。他们的观众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街头音乐必须适应流动的观众。各种规定使人们可能只能短暂地逗留在一个地域，但这不一定对乐手不利，因为他们有机会为新的观众表演，换言之，为那些还没有给钱，也没有购买卡带和CD 唱片的人表演。街头音乐，越来越多地进入地铁、公交站点、步行街商业区，很少仅仅在街头表演。街头音乐不是少数族裔社区的音乐，而更多是从外面输入到城市里的音乐。街头乐手得益于游走在各个城市间的那种可能性，通常，乐队（如在欧洲的安第斯山区乐手）创造了巨大的网络，连接各个城市中心，似乎这些中心就是全球街头音乐文化的一个个节点。

随着国际大都市成为世界的隐喻，世界音乐又可称为世界的隐喻，它也主导了城市音乐节的分布地图，这个地图不仅仅是复制居民区的族裔和民族认同，而且也是作为世界音乐的舞台而重构的真正舞

台。在音乐节里很容易找到“同质化的全球流行乐、文化帝国主义制造的音响”，“反映了西方霸权的某个隐喻”，“然而这样的批评可能误读世界音乐重新描绘城市、回应多种多样的当地因素的方法”。音乐节汇聚了多重的历史，构筑了多重的意义空间。

这样的多重性具体如作者所述，世界音乐节的历史性框架至少由三层不同的结构/意义空间组成：（1）地域性空间：呼应当地少数族裔、民族和宗教等群体的诉求，但这样建立的联系却往往超越了地域性的空间（2）历史性空间：颂扬一个节日或历史事件，通过复兴而有效地将音乐重新连接到历史的空间中（3）全球性空间：世界音乐节试图重绘一个无边界的乌托邦世界的地图，消解地域的、少数族裔的、种族的和宗教的差异。

本章中作者也论述了虚拟空间，认为在城市音乐地图中，如《世界音乐概览》这样的工具书和音像制品中的世界音乐，构筑了虚拟的相遇空间以及世界音乐的新语境。但他同时哀叹新媒介空间的弊病，即当今因特网的技术和文化语境颠覆了法律障碍——版权限制，这样便产生了伦理困境和关于权力、挪用和文化冲突的困境，这都是我们与世界音乐相遇中无法避免的状况，因而作者旗帜鲜明地呼吁音乐人类学家“担负起当今学术的道德责任”。

四、结语：权力机制，世界音乐，地理景观三者的互动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权力机制、世界音乐和地理景观之间存在着如下的互动：西方权力机制（主要包括西方杜撰的东方主义神话和音乐工业）直接挪用非西方族群音乐（ethnic music），以流行风格将其改造成世界音乐；抑或非西方族群或民族国家屈从于西方霸权话语，以西方的“他者”形象构建非西方的自我（即所谓的无权力者通过有权力者的眼光看自己，如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通过他者眼光看自我”）；或者甚至于反其道而行之，以混杂的全球化风格抵制/颠覆西方霸权话语，这样来表征地理景观、构筑文化政治的意义。

本书各个章节（除导引性的第一章外）的内在联系还可作这样的

解读：西方如何以媒介音乐杜撰了东方主义的神话，建立了西方的话语权力（第二章）；以北非的“史实”和现代神话为例（第三章），世界音乐的表征分别在余下的四章里按照地域逐步扩大并生产相应的意义：民间–族群（边缘性，流动性，时空交汇性），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和发明的传统），流散地–家园（混杂性，失位感，回归感），全球景观（流动的城市公共空间，音乐节的地域–历史–全球多重空间，虚拟空间）。

音乐人类学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开始于19世纪比较音乐学的历时性，新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音乐学（即早期的音乐人类学）的共时性，20世纪90年代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后现代时期，即历时–共时的结合，也就是新文化地理学思想和新历史主义思想两股潮流的合流。而本书各章也大致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第二、三章涉及比较音乐学，第四章涉及音乐民俗学和民族音乐学，最后三章表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当下学术状况。当然，各章也处处结合对比世界音乐的现状。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说，菲利普·V.博尔曼借世界音乐为题，实际上为的是向公众普及有关音乐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其历史和现状。他将世界音乐——音乐人类学当下学术一个主要方向——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中，以后现代文化地理学和空间理论的视角，阐释了当今世界音乐不同层次的生存空间、话语现状，及其所反映的人们对身份认同的诉求。本书不失为一部反映西方音乐人类学和当下世界音乐研究学术路径的新经典之作。

最后，还要感谢作者菲利普·V.博尔曼教授，在翻译过程中，他对于译者的求教电邮每信必复，不但翔实地解释了一些美国英语语词和短语的特殊用法，也介绍了有关学科学术的背景情况，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本译著的可信度。

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各种音乐，你了解所听到的音乐吗？你听说过世界音乐吗？什么音乐是世界音乐——宗教音乐，民歌，“嘻哈”，还是街头音乐？

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跟随作者进行一次世界音乐之旅吧！在这一旅程中，我们会看到世界音乐是怎么产生和传播的，可以认识更多的音乐、音乐家和音乐研究者，还可以了解世界音乐的“本真性”和“普同性”。

百科通识文库

49

神话密钥

罗伯特·A西格尔 著

刘象愚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神话密钥

罗伯特·A. 西格尔 著

刘象愚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47**

Myth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4.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4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Robert A. Segal 2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话密钥 / （英）西格尔（Segal, R. A.）著；刘象愚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00-4

I．①神… II．①西… ②刘… III．①神话 - 文学研究 IV．①I1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10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徐　宁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00-4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绪论：神话理论种种
第一章　神话与科学
第二章　神话与哲学
第三章　神话与宗教
第四章　神话与仪式
第五章　神话与文学
第六章　神话与心理学
第七章　神话与结构
第八章　神话与社会
结语：神话研究的未来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罗伯特·A.　西格尔，现为英国阿伯丁大学宗教研究专业教授，曾执教于兰开斯特大学。他的著述包括《约瑟夫·坎贝尔》（1997）、《神话的理论化》（1999）。编著有《诺斯替教的荣格》（1992）、《神话与仪式的理论》（1998）、《英雄神话》（2000）。

译者简介

刘象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西方文论和英美文学。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著述有《比较文学概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外国文论简史》等；译著有《文学理论》、《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乔伊斯精选集》、《爱伦·坡精选集》等。

图　目

图1　《维纳斯和阿多尼斯》，鲁本斯作
图2　E. B. 泰勒，G. 博纳维亚作
图3　《西绪福斯在塔耳塔罗斯》，18世纪版画，B. 皮卡尔作
图4　米尔恰·伊利亚德，巴黎，1978
图5　小约翰·F. 肯尼迪，八卦杂志《我们周刊》封面，2000年6月
图6　《乔治·华盛顿前往约克敦》，1824—1825，伦勃朗·皮尔作
图7　北美米纳塔利人的甜玉米丰收舞，19世纪插画，乔治·卡特林作
图8　猎捕卡莱敦野猪，塞尔韦特利出土的拉哥尼亚希腊酒杯上的饰画，公元前6世纪
图9　婚礼当天的温莎公爵与夫人，1937年6月，爱德华逊位之后
图10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图11　C. G. 荣格
图12　克劳德·列维 - 施特劳斯
图13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1935年左右

绪论：神话理论种种

请允许我首先说明一点：本书不是讲述种种神话，而是阐述神话研究的种种方法，或者说神话的种种理论，并且是限定在现代神话理论的范围之内。神话理论和神话本身一样古老，其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然而，只是到了现代，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神话理论才仿佛具有了科学的形态。这是因为，只是从那时以来，才出现了尝试着提出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神话理论的种种专门学科：即社会科学诸学科，其中又以人类学、心理学（在较小程度上还有社会学）对科学神话理论的提出贡献至大。某些社会科学的神话理论之前可能有过类似的形态，但是科学的理论化与早先的理论化还是存有差别的。早先的理论化主要是思辨的、抽象的，科学的理论化则主要建立在材料积累的基础之上。人类学家约翰·贝蒂（John Beattie）概括了在人类学上两者间的差别，而他的概括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

> 正是18、19世纪到非洲、北美、太平洋等地区的传教士和旅行者所记叙的内容，为19世纪后半叶撰写的第一批人类学著述提供了最基础的原始材料。在此之前当然也存在着［许多思想家的］大量推测，讨论人类的制度及其起源……尽管这些思想家的思辨充满真知灼见，但他们毕竟不是经验主义科学家；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并非基于能够得到证明的证据；恰恰相反，这些结论是根据一些原则推导和演绎出来的，而这些原则在其自身的文化之中也往往隐含不露。他们实际上是欧洲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而不是人类学家。
>
> （贝蒂，《他者文化》，第5—6页）

有些现代神话理论来自哲学和文学之类古老的学科，然而它们也同样受到了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影响。即便是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他的理论基于宗教研究，并且与那些源自社会科学的理论针锋相对），依然不能不从社会科学诸学科中获取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每一门学科都蕴涵了多样的神话理论。严格说来，关于神话的理论是某种涵盖了更广阔领域的理论，而神话只是其中的一个子集。例

如，人类学的神话理论实际上是运用于神话这一个案的文化理论。心理学的神话理论是关于心理的理论。社会学的神话理论是关于社会的理论。神话理论本身并不存在，因为神话这一学科本身就不存在。神话不像文学；文学从来——或至少传统上如此宣称——都要求人们把它作为文学而不是历史学、社会学或其他非文学的学科来研究。但是，却不存在将神话作为神话的研究。

将各学科中的神话研究统合起来的是它们共同提出的问题。这其中，三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神话的起源、功能和主题。所谓“起源”，即是说，神话为什么会产生，又是怎样产生的。所谓“功能”，即是说，神话为什么能够代代相传，又是怎样传承的。对于起源与功能的这两个为什么，答案通常是某种需求：神话产生以满足某种需求，并且代代相传以持续满足这种需求。至于这种需求是什么，则随理论不同而不同。所谓“主题”，即是说神话的所指对象。某些理论完全从字面上来解读神话，那么，神话的所指对象就是直截了当和显而易见的，譬如诸神。另外一些理论从象征意义上来解读神话，象征化的所指对象可以是任何事物。

种种理论不仅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同，而且提出的问题也不同。有些理论，或者说有些学科，集中思考的是神话的起源；另外一些理论或学科集中思考的是神话的功能；还有一些理论或学科集中思考的则是神话的主题。只有少数几种理论试图解答所有这三个问题。一些集中思考起源或功能的理论则或探讨“为什么”，或探讨“怎样”，却并不同时探讨这两个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19世纪的理论着重于神话的起源问题，20世纪的理论则着重于神话的功能和主题问题。但是这一划分混淆了历史起源与重复起源的分别。专事研讨神话起源的理论声称，不可能说明神话最早是在何时何地产生的，然而不论何时何地，只要神话产生了，它就能说明神话为什么会产生，是怎样产生的。20世纪的种种理论像19世纪的理论一样，普遍关注神话的重复起源问题，而19世纪的理论也同样对神话的功能和主题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

不过，19世纪的神话理论与20世纪的理论之间确实存有一个差

别。19世纪的理论倾向于认为神话的主题是物质世界，而神话的功能则或是对这一物质世界的字面解释，或是对它的象征描述。神话往往被看作是科学的“原始”对应物，而科学则被认为是完全现代的。科学不仅令神话成为累赘之物，而且与其绝对不能相容，因此，被定义为具有科学属性的现代人就不得不摒弃神话。相反，20世纪的理论则倾向于认为，不论就其主题还是功能而言，神话绝不是科学的过时对应物。因此，现代人无须为科学而丢弃神话。

除了起源、功能和主题之外，关于神话人们常常提出的问题还有：神话是普遍存在的吗？神话是真实的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源自于对前文所述三个问题的回答。认为神话的产生和功能是要解释物质过程的那种理论很可能会把神话限定在尚未出现科学的社会中。相反，认为神话的产生和功能是为了统合社会的那种理论则会把神话看作是对一切社会形态来说均可接受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那种认为神话的功能是解释物质过程的理论，在其解释与科学的解释相互抵牾时，就会判定某一神话的荒谬。那种认为神话的功能是统合社会的理论则可能会绕过真实性的问题；它声称只要社会的成员相信 他们应该遵守的法规是远古的祖先确立的——不论事实是否如此——社会就得到了统合。这样的理论避开了神话真实与否的问题，因为它对神话起源与功能的解答避开了这一问题。

神话的定义

我曾参加过许多学术会议，听到过发言者热烈讨论某小说或某剧作或某电影的“神话性质”，殊不知这类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话的定义。现在，让我来解说一下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首先，我提议把神话定义为一个故事。不论一则神话是否还是别的什么事物，它首先是一则故事，这一点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毕竟，当被要求列举一些神话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古希腊、罗马诸神和英雄的故事 。然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神话还可以被看作

一种信仰或信条，譬如，美国的“一夜暴富神话”和“西部拓荒神话”就属于此类。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1] 写了数十部通俗小说，内容都是描述白手起家的致富故事，但是这一信条本身并不依赖于某一个故事而成立。“西部拓荒”神话也是如此。

本书论及的所有理论都把神话看作故事。诚然，E. B. 泰勒（E. B. Taylor）将故事转变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概括，但这一概括依然要由故事来承载。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超脱于故事以寻求神话的“结构”，但同样的，结构要由故事来承载。从象征意义而不是字面意义来解读神话的理论仍然把神话的主题——或者说意义——看作是故事的展开。

如果说神话被看作是故事，那么，这故事讲述的是什么呢？对于民俗学家来说，神话首先讲述的是世界的创造。因此，《圣经》中只有两则创世故事（《创世记》第1—2章）、伊甸园的故事（《创世记》第3章）和挪亚方舟的故事（《创世记》第6—9章）可以算作神话。所有其他的故事只能算作传说或者民间故事。例如，《圣经》之外的俄狄浦斯“神话”就被当作只是传说。我并不提倡像民俗学家们这样机械，并且认为应该将神话定义成具有深远含义的故事。这故事可以发生在过去——如伊利亚德和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观点，也可以发生在现在或未来。

对产生于宗教研究的神话理论来说，神话中的主要人物必须是神或近似于神的存在。这里我同样不提倡如此机械。倘若那样机械，就必须将希伯来《圣经》中的绝大部分篇章排除在神话之外，这是因为，虽然可以说其中所有的故事都涉及到 神，但除了《创世记》的开篇两章之外，其余所有故事中人类至少是和上帝同等重要的。我坚持认为，只要主要人物为人格化的形象即可，就是说，神、人、甚至动物皆可。需要排除在外的是种种非人格化的力量，譬如柏拉图（Plato）所说的“至善”。在所有的神话理论家中，泰勒是最关注神话的人格化性质的，不过，本书要讨论的其他理论家也持同样的观点，只有列维-施特劳斯是个例外。此外，神话中人格化的形象既可以是行动的执行者，也可以是行动的对象。

除了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和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之外，本书要讨论的所有理论家都关注神话的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更是几乎可以说只谈功能，不及其他。神话的功能究竟是什么，理论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各持己见，众说纷纭。对此我不想妄下断言。我只想指出，对所有理论家来说，神话的功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与之相比，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功能便意义浅显许多。因此我认为，神话对其信徒来说成就了某些意义深远的东西，但它成就的究竟是什么，我并未给出定论。

在今天的语境下，神话是虚假的。神话“只不过”是神话。举例来说，1997年历史学家威廉·鲁宾斯坦（William Rubinstein）出版了《拯救的神话：为什么民主政权未能从纳粹手中拯救更多的犹太人？》。这书的标题说明了一切。一般人相信，如果当初盟国下更大的决心拯救犹太人，那么许多犹太人是可以免于成为纳粹屠杀的牺牲品的。鲁宾斯坦对此提出了挑战。他质疑这样一种假设：即盟国因为反犹而对欧洲犹太人的命运无动于衷。在他看来，“神话”这一术语比起“错误的信念”和“流行的错误观念”之类说法更能全面深刻地体现这一错误信念的力量。“神话”作为一种信念，它是虚假的，但同时又是冥顽不化的。

与之相反，“一夜暴富神话”的说法则是从肯定的意义上使用“神话”这一术语的，但它依然传达了抱持一种信念决不放手的态度。完全虚假的信念看起来可能比正确的信念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因为即使其谬误是如此显而易见，这一信念依然故我，岿然不动。不过，人们抱持的正确信念也可以表现得和虚假信念一样不可动摇，尤其是当这一信念具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仍然信奉“一夜暴富”信条的美国人不再把它称作是“神话”，因为“神话”已经变得 含有了虚假的意味。我认为，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当然也可以表达某一信念）只有得到其信奉者坚定不移的拥护时，才可称为是神话。至于这个故事究竟是否必须真实，在此我并无定论。

阿多尼斯神话

为了阐明各家各派的理论之差异，我将采用一则大家熟悉的神话——即阿多尼斯神话——并且通过我们将要讨论的各派理论从不同角度来解说它。我之所以选择这则神话，首先是因为它拥有相互之间差别甚大的各种版本，由此体现了神话的可塑性。这则神话的主要底本取自古希腊学者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的《神话全书》（第3卷，第14章，第3—4段）和古罗马作家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第10卷，第298—739行）。

阿波罗多罗斯的故事引自史诗诗人帕尼亚西斯（Panyasis）的版本。按照他的讲述，阿多尼斯的母亲斯密耳娜无法自拔地迷恋上了自己的父亲，并且怀上了他的孩子。当她的父亲发现夜夜与他同床的竟是自己的女儿时，便立即拔出宝剑要杀死她。斯密耳娜仓皇逃走，他在后面紧追不舍。就在即将被父亲追上时，她祈求众神让她隐身，众神可怜她，将她变成了一棵没药（即斯密耳娜）树。十个月过后，没药树开裂，阿多尼斯降生。

婴儿时期的阿多尼斯就俊美绝伦，一直留意着他的爱神阿佛洛狄忒情不自禁爱上了他，同斯密耳娜当年热恋她父亲没什么两样。为了完全独享他的爱，阿佛洛狄忒将他藏在了一个箱子里，交给冥后珀耳塞福涅保管，但没有告诉她里面装的是什么。珀耳塞福涅打开箱子，看到阿多尼斯，也爱上了他，于是拒绝将阿多尼斯还给阿佛洛狄忒。她们两人各不相让，都要独占这位美少年，只好由众神之王宙斯出面调停。宙斯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阿多尼斯一年中四个月与珀耳塞福涅在一起，四个月与阿佛洛狄忒在一起，四个月独处。阿多尼斯将属于自己的那四个月时间也让与了阿佛洛狄忒，因此一年到头都置身于女神的保护之下。有一天打猎时，他被一只野猪的獠牙戳伤致死。根据阿波罗多罗斯的叙述，还有一种来源无考的说法，即阿多尼斯的死是战神阿瑞斯设计的；阿瑞斯本是阿佛洛狄忒的情人，结果却让阿多尼斯夺了所爱，于是他一怒之下决定报复。

奥维德故事的开场与此类似，也从阿多尼斯的母亲密耳拉与其父

（这里成了）喀倪剌斯的乱伦讲起。密耳拉痛苦不堪，准备上吊自尽时被她的老乳母救下。老乳母打探出她绝望的根源，悄悄地让她和她父亲同床（这与阿波罗多罗斯讲的一样）。但是到了第三夜，父亲要点灯看看究竟是谁这么爱他，结果发现真相，便拔出宝剑要杀她，她逃走了（这与阿波罗多罗斯讲的也一样）。怀了孕的密耳拉东躲西藏了九个月，疲惫不堪，走投无路，便祈求众神帮助她，于是众神将她变成了一棵树。这里的叙述与阿波罗多罗斯的讲述也大致相同，不同的只是密耳拉变树不是在怀孕之初，而是在孕期即将结束之时。密耳拉在变身为树之后仍不停地哭泣，她留下的眼泪便成了没药这种香水。她肚子里的婴儿不得不在树中左冲右突，最后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奥维德的叙述与阿波罗多罗斯所不同的是，维纳斯（与阿佛洛狄忒相对应的罗马爱神）是在阿多尼斯长成为一个年轻小伙之后才遇到他，但她也同样即刻就爱上了他。这个故事中没有别的女神与她争风吃醋，因此，维纳斯一直独享阿多尼斯的爱。他们一起出去打猎；尽管维纳斯一再告诫他只打小猎物就好，他却没有听从她的警告，冒失地去追踪大型的猎物。结果，和阿波罗多罗斯的版本一样，他被野猪的獠牙戳伤致死。不过不同的是，这只野猪并非是他的任何情敌所派来的。

阿波罗多罗斯的故事以阿多尼斯的死亡结束，奥维德的版本则继续讲述维纳斯对他的哀悼。为了纪念他，她将众神的美酒洒在了他的血泊处，于是从那里长出了银莲花。和阿多尼斯一样，这种花的生命也是转瞬即逝。

图1　《维纳斯和阿多尼斯》，鲁本斯作

在阿波罗多罗斯的故事中，每岁死而复生的循环在前　，阿多尼斯“最终”的死亡在后；而在奥维德的笔下，每岁死而复生的循环表现为鲜花的开放与凋谢，并且发生在阿多尼斯的死亡之后 。而且，在阿多尼斯的血泊处长出鲜花这一情节，预示了与这则神话相关的仪式。这一关联在阿波罗多罗斯的叙述中是没有的。

在阿波罗多罗斯的叙述中，推动情节发展的是怒火，而在奥维德笔下，推动事件进展的却是爱情。阿波罗多罗斯的阿多尼斯是争斗的父母和敌对的女神的无辜牺牲品，而对奥维德来说，伤心欲绝的爱神和阿多尼斯一样，也是受难者。

阿波罗多罗斯力图呈现故事的真实性，奥维德则表明了故事的虚构性。阿波罗多罗斯的叙述是直截了当的，奥维德的叙述却是迂回曲折的，目的是要使之切合更为宏大的主题，特别是变形的主题：譬如，密耳拉变为一棵树、阿多尼斯变成一种花。阿波罗多罗斯意在要求人们从字面来理解他的故事，奥维德却旨在期望人们读出其中的隐

喻来。阿波罗多罗斯的叙述是严肃的，奥维德的叙述则是戏谑的。

我之所以例举阿多尼斯神话，不仅是因为这则神话天差地别的各种不同版本，还因为现代神话理论家们全都很熟悉它。弗雷泽（J. G. Frazer）分析过它，当时还属于列维-施特劳斯学派的马塞尔·戴田（Marcel Detienne）分析过它，荣格（C. G. Jung）及其追随者们也分析过它。

运用理论分析神话

分析神话必须从某种特定的理论出发。运用理论在这里是不可避免的。例如，许多古典神话的解读指南将阿多尼斯每年一度前往珀耳塞福涅居处的拜访和他返回阿佛洛狄忒身边的旅程与植被的荣枯联系起来，并把这当作不争的事实，这就假定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神话是科学的原始形态。对任何一种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抱持怀疑态度是一回事，但要完全避开神话理论就是另一回事了。

理论也需要神话，正如神话需要理论一样。倘若说，理论阐释了神话，那么神话则证实了理论。当然，某一理论适用于一则神话并不足以证实这种理论的正确性，理论的基本原则本身必须站得住脚。例如，当我们运用荣格的理论来解释阿多尼斯神话时，这本身并不能证明集体无意识的存在；相反，集体无意识的原则是在分析之初便被假定为成立的。但是，证实某一理论的方法之一——尽管这是一种间接的途径——便是在 假定其原则成立时 ，检验其适用的情况。当然，这种分析的基础是，如果不能适用，则表明该理论一定是错误的或有其局限的。

注释

〔1〕 霍雷肖·阿尔杰是一位19世纪的美国作家，他写的所有作品都是关于穷小子努力奋斗、最终成功致富的内容，因此凡是这一类由穷变富的故事都被人们称作“霍雷肖·阿尔杰神话”或“霍雷肖·阿尔杰故事”。在美国还有出身寒微、但经

过奋斗获得成功的人士组织的所谓“霍雷肖·阿尔杰协会”之类的团体。

——译注，下同

第一章

神话与科学

在西方，对神话的挑战至少可追溯到柏拉图，他特别从伦理道德的立场拒绝接受荷马式的神话。驳斥柏拉图对神话的抨击、起而捍卫神话的首先是斯多葛派哲学家，他们对神话作了寓言式的重新阐释。到了现代，对神话的主要挑战不是来自伦理学，而是来自科学。神话被看作是解释诸神如何操控物质世界的，而非柏拉图所认为的，是讲述诸神如何立身行事。柏拉图抱怨神话中的诸神行为不轨、缺乏道德，而现代批评家们则认为神话对世界的解释不符合科学原理，因而将之摒弃。

作为真正科学的神话

现代对神话的一种挑战形式是对神话的科学可信性提出质疑。世界的创造真的仅仅是在6天中完成的吗（《创世记》两篇创世故事中的第一篇如此宣称［1:1—2:4a］）？果真出现过世界范围的大洪水吗？地球果真只有六七千年的历史吗？上帝向埃及人降下十灾的事当真发生过吗？驳斥这种挑战的最顽固的观点宣称，《圣经》的记叙是正确的；毕竟，《摩西五经》是上帝口传、摩西手录的。这一观点一般被人称作“创世主义”，它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例如将世界的创造确切地说成6天，或者认为这6天其实指久长的“时代”。创世主义的产生旨在对抗达尔文（Darwin）的《物种起源》（1859），后者的观点是，物种是逐渐进化而来，并非分别地、几乎同时地被创造出来。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创世主义在坚持《圣经》对创世的解释方面，不是变得越来越灵活，而是越来越拘泥于经文的字面意思了。

同时，形形色色的创世主义者自诩他们的观点既是宗教的，也是科学的，而非只是宗教的，不是 科学的。在他们看来，“创世主义”即等同于“创世科学”；它歪曲挪用一切科学证据，既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也为了驳斥“进化论”之类敌对的世俗观念。毫无疑问，“创世科学家”会反对将他们为之辩护的观点定义为“神话”，原因只是因为，“神

话”一词已带有了虚假的信仰的意味。倘若这个词是中性的，意指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那么，创世主义就是自认为科学的一种神话。在创世主义者看来，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是进化论。在《圣经》与现代科学的任何冲突中，现代科学都必须给《圣经》让路，而不是相反。

作为现代科学的神话

应对现代科学的挑战、捍卫神话还有一种温和得多的观点，那就是使神话和现代科学相调和。这一观点要么将神话中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的成分剔除，要么更聪明地对其加以重新阐释，将其说成是现代的、科学的。神话在科学上是可靠的，因为它本身就是 科学，是现代科学。很可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挪亚，他能够凭借一己之力集合每一种动物，并建造一艘足以抵御海上最猛烈风暴的木船，从而使这些物种存活下来，然而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洪水却的确发生过。这样，神话中留存的内容就是科学的，因而也是真实的。这种方法与被称作“解神话化”的方法截然相反，后者将神话与科学相分离 。解神话化将在下一章加以讨论。

在评论十灾中的第一灾，即尼罗河水变血之灾（《出埃及记》7:14—24）时，《圣经》牛津注释本编者的说法便是这一以现代科学道理阐释神话的方法的典型例证。他们评说道：“水变血之灾显然反映了埃及的一种自然现象：尼罗河在夏天泛滥的高峰期之所以是红色，是因为它包含了大量的红土颗粒或者微生物。”说到第二灾即蛙灾（《出埃及记》8:1—15）时，这些编者作了类似的解释：“经过了季节性的泛滥之后，尼罗河的河泥成了青蛙繁殖的温床。如果不是食蛙鸟鹳的存在，埃及遭受蛙灾侵袭的次数可能会更加频繁。”当亚伦[1] 伸杖制造这一灾难时，那些食蛙鸟很可能都去休假了，而当亚伦要停止这一灾难时，那些鸟就都回来了，这真是太偶然了！这一方法不是要让神话与科学对立 ，而是策略性地将神话变成 科学——并非像今天流行的那样，将科学变成神话。

作为原始科学的神话

神话面对科学挑战最普遍的回应是抛弃神话，转投科学。在这一观点下，神话虽然依然是对世界的解释，但却只能是属于自己的一套解释，而不是在神话的形式下对世界的科学解释。由此，问题便不在于神话是否具有科学性，而在于神话能否与科学和谐共存。神话被看作是“原始的”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科学在前科学时代的对应物，而科学则只能是现代的。在这种情况下，神话属于宗教的一部分。神话之外的宗教其余部分提供的是对神的绝对信仰，神话则详述了诸神是怎样制造事件的。由于神话是宗教的一部分，科学的兴起及其对物质世界种种事件主导性的现代解释就必然导致宗教乃至神话的衰落。既然现代人的定义便是接受科学，他们就不能同时接受神话，所谓“现代神话”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神话是构建现代性之世俗化过程的牺牲品。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绝不是协调一致的，标题倾向性明显的著述——譬如《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的战争史》之类——便是这一观点的一种片面表现。不过，宗教与科学——进一步说，神话与科学——尽管在19世纪更经常地表现为相互对立，但到了20世纪，它们经常表现出的却是相互调和。

E. B. 泰勒

英国人类学家E. B. 泰勒（1832—1917）是人类学的先驱，他抱持神话与科学相互对立的观点，并且至今仍是这一论点的经典代表人物。泰勒将神话划入宗教之下，又将宗教与科学并置于哲学之下。他将哲学划分为“原始”哲学与“现代”哲学两种。原始哲学与原始宗教同一。原始科学是不存在的。相反，现代哲学却有两个分支，一是宗教，一是科学。这两个分支中，科学远为重要，并且是原始宗教的现代对应物。现代宗教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形而上学，一是伦理学，两

者都是原始宗教所没有的。形而上学研究的是非物质的实体，“原始人”对此是没有概念的。原始文化中并非没有伦理学，但它却并不包含在原始宗教之中：“伦理学与泛灵论哲学在较高一级文化中的结合是那样紧密，那样有力，然而在低一级文化中，这一结合似乎还未出现。”泰勒用“泛灵论”来指称宗教本身，无论是现代宗教，还是原始宗教，因为他对神的信仰源自他对灵魂的信仰（拉丁语*anima* 的意思即是“灵魂”）。在原始宗教中，灵魂居于一切物质实体之中，这首先便包括了人的躯体。神就是除人之外所有物质实体中的灵魂，而人却不是神。

原始宗教是原始社会中科学的对应物，因为二者都是对物质世界的解释。泰勒因此把原始宗教称为“尚未开化的生物学”，并认为，“机械天文学将逐渐取代低等种族的泛灵论天文学”，而今天，“生物病理学正逐渐取代泛灵论病理学”。宗教的解释是人格化的：诸神的决定是种种事件发生的原因。科学的解释是非人格化的：事件的发生源于机械法则。各门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取代了宗教，成为对物质世界的解释，因此，“泛灵论天文学”和“泛灵论病理学”只能指原始的、而不是现代的泛灵论。现代宗教将物质世界完全让给了科学，自己撤退到非物质世界之中，特别是躯体死亡之后灵魂的生活中。在原始宗教中，灵魂被看作是物质的，而在现代宗教中，灵魂却被看作是非物质的，而且只有人类才有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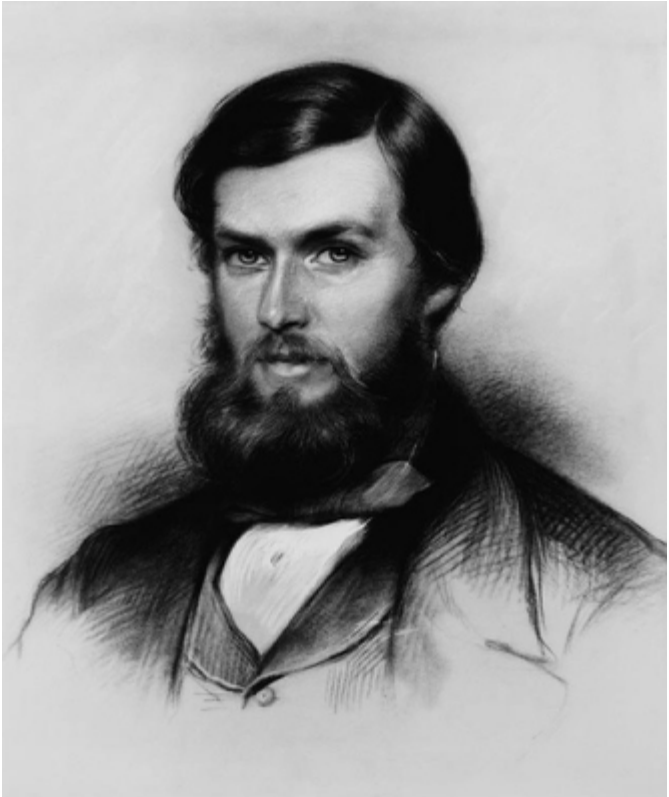

图2　E. B. 泰勒，G. 博纳维亚作

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国度里，我们看到，有关兽类拥有灵魂的观念已经消亡了。泛灵论似乎正在收缩它的前哨阵地，并将力量集中在其主战场，即人的灵魂的观念上。……灵魂已经放弃了它作为一种轻飘物质的实质，变成了非物质的实体，“阴影的影子”。它的理论与生物学以及精神科学分道扬镳，后二者现在探讨的是生命与思维、感觉与理智、情感与意志的种种现象，并以纯粹的经验为研究的依据。现在出现了一种理智的产物，那就是“心理学”，它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却不再与“灵魂”有任何关系。现代思想中灵魂的位置在宗教的形而上学中，它在那里的特别职责是为未来的宗教教义提供理智的一面。

（泰勒，《原始文化》，第2卷，第85页）

与此类似，在原始宗教中，神被看作是物质的，而在现代宗教

中，神却被看作是非物质的。因此，神不再是物质世界的使然力——泰勒认为物质的结果必然有物质的原因——宗教也不再能够解释物质世界。神从物质世界被重新定位在社会世界中。他们成为了人类的榜样，正如柏拉图认为他们应做的那样。人们现在转向《圣经》学习伦理道德，而不是物理学。人们阅读《圣经》时关注的不再是世界的创造，而是摩西十诫，正如柏拉图认为这是删去不道德内容的荷马作品应起的作用。耶稣不再是一个神迹的创造者，而是人们争相效仿的理想典范。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著作中。

这种有助于和解的立场与已故的进化论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观点很相似。在古尔德看来，科学——尤其是进化——和宗教是可以和谐共处的，因为二者之间没有交集。科学解释物质世界，而宗教规范伦理道德，赋予生命意义：

> 科学试图记录自然世界的事实特征，并提出理论以协调和解释这些事实。另一方面，宗教在同样重要但完全不同的领域起作用，它要处理的是人的目的、意义和价值。
>
> （古尔德，《万古磐石》，第4页）

在古尔德看来，宗教一直有着与科学全然不同的功能，但就泰勒而言，宗教是在因科学而成为累赘之后被迫重新定位的。它现在的功能大大降级了。这里泰勒与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观点接近，然而与泰勒不同的是，道金斯甚至连缩了水的功能都不愿赋予科学产生之后的宗教。

泰勒认为，作为解释物质世界的宗教之死亡，同时也就意味着神话之死亡，因为泰勒将神话置于原始宗教之中。尽管神话是基于对神的信仰而出现的一种精心建构，但在科学兴起之后，这种信仰能够留存下来，神话不知怎的却不能够。看来，神话与作为这个世界使然力的诸神关系太密切了，以致不被允许从形下世界向形上世界作任何可能的转化。因此，尽管宗教剔除了自己解释世界的主要功能之后仍能

转化为“现代宗教”留存下来，“现代神话”却不可能存在。

泰勒的观点浓缩了19世纪的神话观，即将神话与科学、以及作为一种解释的宗教与科学置于对立的位置上。到了20世纪，潮流发生了变化，人们致力于调和神话与科学、以及宗教与科学的对立，于是，现代人就得以将神话与宗教保留了下来。然而，泰勒的观点依然很流行，特别是对那些一提起“神话”便联想到希腊与罗马诸神故事的人来说，泰勒的看法仍旧为他们所认同。

在泰勒看来，科学让神话不仅成为多余，甚至是不可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神话与科学对物质世界的解释是水火不容的。这不仅在于神话的解释是人格化的，科学的解释是非人格化的，还在于二者的解释都是直接的，都是针对同样事件的。诸神行事并非是在那些非人格化的力量背后，或是通过这些力量，而是替代这些力量。譬如说，神话中的雨神把雨收集在水桶里，然后选择地上的某处，将水桶倒空。而科学则说，雨的形成是气象过程的结果。人们不可能将神话的解释置于科学的解释之上，因为雨神并没有利用气象过程，而是代替其行事。

严格地说，神话中的因果关系从来不是全然人格化的。雨神对地上某处倾倒雨水的决定也是以一定的自然法则为先决条件的，如雨水在天空的积聚、装雨的水桶的容量以及倾倒雨水的方向等。但是为了坚持其神话与科学完全脱节的僵化观点，泰勒无疑会说，神话本身无视物质过程，而把焦点放在神的决定上。

但是，即使神话与科学无法相容，为什么泰勒就认定神话是非科学的呢？答案必然是，人格化的原因都是非科学的。可是，为什么人格化的原因是非科学的呢？泰勒没有加以解释。可能的理由是：人格化的原因是精神的——是神性的使然力的决定——而非人格化的原因则是物质的；人格化的原因既不可预料，也无法验证，而非人格化的原因则既可预料，又可验证；人格化的原因是特殊的，而非人格化的原因是一般的；人格化的原因是终极的、目的论的，而非人格化的原因则是直接作用的。然而事实上，这些理由中没有一条能够真正区分人格化的原因与非人格化的原因，因此，也就很难说清楚泰勒坚信神

话并非科学的理由究竟何在。

泰勒从未对这一假设提出质疑，他想当然地认为，不仅原始人只有神话，现代人也只有科学。也正因此，他还提出了文化中“神话制造阶段”的说法。尽管米尔恰·伊利亚德、C. G. 荣格和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都郑重地宣称，神话是一种永恒的现象，但在泰勒看来，神话只是一时的现象，即便其消逝的过程相当漫长。神话令人赞叹地发挥了它的功能，但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紧抓着神话不放的现代人不是没有认识到神话与科学无法相容，就是不愿承认这一点。虽然泰勒并没有说明科学时代开始的日期，但科学时代与现代性是一同开始的，因而也就是几个世纪的时间。泰勒于1917年去世，他从未设想过现代之后会是一个怎样的阶段。近年来，持有泰勒观点的一个显例是美国人类学家戴维·比德尼（David Bidney）。

泰勒将神话与科学对立的一个原因是他把神话纳入宗教之下。他认为，宗教之外是没有神话的，而到了现代宗教，它本身也不再包含神话。因为原始宗教是科学的对应物，因此神话必定也是。因为宗教只能从字面理解，因此神话也必定得从字面理解。

泰勒将神话与科学对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只从字面来理解神话。他反对那些从象征的、诗的或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神话的人——他认为象征、诗、隐喻都是一回事，说法不同而已。他不赞成那些神话的“道德寓言论者”，对这些人来说，赫利俄斯每天驾四马战车驰过天空的神话 [2] 其实是灌输自我规约的一种方式。同样，他也反对那些“神话即历史论者”（即“欧伊迈罗斯论者”），这些人认为，神话不过是对某些地方或民族英雄的功绩作出添枝加叶、有声有色的描述而已。（欧伊迈罗斯［Euhemerus］是古希腊的一位神话搜集作家，他创立了为神话事件寻求真实历史依据的传统。）在泰勒看来，赫利俄斯的神话只不过是对太阳为什么升起落下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的功能要求 一种字面的阅读。但对寓言论者和历史论者而言，神话并非科学的原始对应物，因为在象征的层面上，神话讲述的是人事，而不是诸神和世界之事。寓言论者还认为神话是非科学的，因为在象征的层面上，它是规定人们应该如何行事，而不是解释人们为何如此行事。

从道德寓意和历史真实的角度阐述神话的方法都可以追溯到古代，但是泰勒认为，当代这类解释者的动机是要在现代科学的明确挑战面前保存神话。泰勒把将诸神解释为仅仅是人的隐喻的学者称作欧伊迈罗斯论者，并对他们不屑一顾；其实古代的欧伊迈罗斯论者习惯上把神就看作是神，只是他们认为这些神是来自 于对人的放大，而这一点是泰勒本人也赞同的。古代的欧伊迈罗斯论者主张，最初的诸神实际上是那些伟大的国王们，他们死后被神化了。欧伊迈罗斯本人则认为最初的诸神是生前就被神化了的国王们。

与泰勒截然相对的是他的同时代（维多利亚）人，在德国出生、于牛津大学治学的梵文学者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米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泰勒认为，现代人所采用的象征的解读方式是对神话的误读；米勒则认为，古代人逐渐注重字面的意义，最终导致了他们自己对神话或神话材料的误读。神话原本是对自然现象的象征性描述，却逐渐为人们从字面所理解，于是它们成为了对诸神属性的记叙。举例来说，大海“愤怒”了，原本是诗意的描写，可最终却被看作掌管大海之人格的特征，于是一则神话便被创造出来解释这一特征。米勒认为，神话源自古代语言中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抽象名词和中性词汇这一事实。这样，赋予太阳的任何一个名称——譬如说“温暖的给与者”——都毫无例外地将一个抽象的、非人格化的实体变成了一个人格的实体，随后的世代又接着创造了神话以填充这个男神或女神的生活。

若对阿多尼斯神话作泰勒式的分析，便会把这则神话看作是对观察到的某种引人注目的事项作出的解释。于泰勒而言，阿波罗多罗斯和奥维德对这一神话的不同叙述都对没药树的起源提供了解释。奥维德的版本还对银莲花的起源作出了解释，并且更进一步说明了这种花生命周期如此短暂的原因：因为它象征了阿多尼斯转瞬即逝的生命。倘若人们从银莲花推及一切鲜花和其他植物，那么这则神话还可以说是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实体不仅会死亡，而且可以再生。对泰勒来说，阿多尼斯一定是神，而不是人，这一神话是将鲜花与植物每岁的荣枯归因于他一年一度往返冥府的旅程。阿多尼斯最后的死则忽略不计。

泰勒眼中的这则神话强调的是阿多尼斯操控他对之负责的自然实体的能力。这则神话所起的作用完全是智识上的：人们将明白为什么庄稼的行为如此古怪：死亡又重生，并且不止一次，而是永远反复。

然而，事实上这则神话本身并没有将阿多尼斯一年一度的旅程与一切植物的荣枯联系在一起，与之相联系的仅限于在“阿多尼斯小花园”中栽种速生速枯花草的仪式[3]。即便这则神话确实指出了阿多尼斯的旅程与植物荣枯的关联，那也并非如泰勒所主张的，是出自于阿多尼斯自身的任何决定，而是源自于他的行为自动产生的结果。

进一步说，泰勒式的分析还遗漏了这则神话中的大量内容。他的理论根本不能覆盖乱伦、情爱、妒忌、性等问题。更确切地说，泰勒的理论在涉及这些内容时，只能从阿多尼斯这一人物的动机出发，而在神话中，这些其实是围绕阿多尼斯的其他人物的动机。阿多尼斯本身更多的是一个被动的对象，而不是行动的施与者。而且，不论阿多尼斯生命中的那些事件何等神奇，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总而言之，这则神话更感兴趣的似乎是阿多尼斯与其他人物的关系，而非他本人或其他人物对物质世界的影响。

泰勒的理论似乎适用于解读那些明确讲述创世故事的神话，更适用于解读从不间断的物质现象。譬如，《创世记》第一章，按照泰勒的标准无疑便是一则神话。我们不妨引述此章中的几段：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

（《创世记》1:9—10，标准本修订版）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的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创世记》1:20—21，标准本修订版）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创世记》1:26—31，标准本修订版）

泰勒的理论不仅适用于世界上那些一旦形成就固定下来的事物，譬如旱地与海洋之类，而且更适用于固定下来之后反复重现的现象，譬如下雨、季节的变换和（挪亚方舟故事中的）虹等。《创世记》第一章出现了许多反复重现的现象：日与夜、太阳与月亮、一切生物。尽管如此，泰勒的理论决定了这些反复重现的现象必须是来自诸神不断作出的决定。对泰勒来说，诸神之于物质世界正如人类之于社会一样：他们每次所作的决定都是新的，而他们决定要做的事却是同样的。他们并非确立起事物后便放手任其继续。而后者正是马林诺夫斯基和伊利亚德等理论家的观点。

那么，从未有人观察到的现象又如何呢，譬如海怪之类？神话该怎样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泰勒的回答必然是，《创世记》的作者认定有人看见或以为看见过！这里，海怪与飞碟之类的不明飞行物并没有什么两样。

尽管泰勒的理论十分贴合《创世记》第一章中的创世过程，这个神话仍然有许多问题处于该理论的认知范围之外。这个神话不只是解释了创世，它还对其作出了评价，不断宣称这一创造是好的。由于泰勒如此坚定不移地将神话与科学加以平行比较，他未在神话中给道德评价留有一丝余地，这一点从他对道德寓言论者的反对便可清楚地得到证明。在他看来，《创世记》第一章只是解释了创世，并未对其作出评价。同样的另一个问题是，创世故事不仅解释了人的创造，而且将人类凌驾于其他一切造物上，并相应地赋予了他们管理物质世界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说，假如造人所依据的神的“形象”并不仅仅是指解剖意义上的，那么泰勒的理论对这一点也是难以解释的。

最后，即使泰勒的理论适用于一切神话，那么它阐明了什么呢？一种理论适用于一则神话是一回事，由这种理论阐明它所适用的神话却是另一回事。有什么是没有了泰勒的理论我们便不能认知的事物呢？公平地说，我们不能要求泰勒回答神话意味着 什么，因为他坚持的是对神话字面的解释：神话的意思就是它说的意思。泰勒的贡献在

于其对神话的起源与功能所作的阐释。依据泰勒的观点，《创世记》第一章并非出自对世界的胡乱揣测，而是源自对那些要求得到解释的、反复重现（但可能仍然令人感到惊异）的自然过程的可靠观察。泰勒会在创世主义者中找到赞赏他的听众，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创世记》第一章是对世界起源的正确解释，而是因为他认为它是对世界起源的一种 解释，而且明显是一种宗教的解释。20世纪有些神学家试图让《圣经》适合现代人的口味，因此主张《创世记》第一章绝非是对创世的解释，如鲁道夫·布尔特曼就是这么看《新约》的，对此我们下一章将会讨论。相对于这些神学家的观点，泰勒的理论不啻是一剂矫正药。

J. G. 弗雷泽

泰勒的观点只是关于神话与科学，或者说宗教与科学关系的诸多观点中的一种，与他立场最为接近的是J. G. 弗雷泽。弗雷泽（1854—1941）是出生于苏格兰并长期在剑桥大学执教的古典主义学者，并且同样是一位人类学领域的先驱。和泰勒一样，弗雷泽认为，神话是原始宗教的一部分；原始宗教是哲学的一部分，而哲学本身是普遍存在的；原始宗教是自然科学的对应物，而自然科学本身则完全是现代的。弗雷泽还同样认为原始宗教与科学是相互排斥的。原始宗教是虚假的，科学则是真实的。不过，两人也有不同：泰勒认为，原始宗教——包含了神话——的功能是作为科学理论 的对应物，而弗雷泽却认为，原始宗教的功能更多地是作为应用 科学，即技术的对应物。泰勒认为，原始宗教旨在解释 物质世界的事件，而弗雷泽则认为，原始宗教更多地是促生 事件，其中显要的便是作物的生长。泰勒将神话看作自治的文本，弗雷泽则把它与仪式联系起来，认为仪式搬演了神话。

弗雷泽个人认为，所有神话中首要的神话是主神——即植物之神——的传记，阿多尼斯神话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例证。在弗雷泽看来，阿多尼斯神话会被表演出来，而人们相信这一仪式性的搬演将会

产生魔力，促成任何所表演之内容的发生。表演阿多尼斯从冥府归来会将阿多尼斯召唤回来，并由此促成庄稼的长出。这则神话不仅解释了庄稼为什么死去——因为阿多尼斯去到了冥府，所以庄稼也死了——而且能够促使庄稼的再生。对弗雷泽来说，神话的功效再实际不过了：那就是避免饥馑。弗雷泽对阿多尼斯神话的阐释将在第四章中作更为详细的讨论。

泰勒与弗雷泽把神话看作科学的原始对应物，这一观点的最大困境在于它显然无法解释神话为什么在科学出现之后依然能够留存。假如神话的功能并不多于科学，那它为什么还存在？当然，泰勒和弗雷泽可能会立即回答说，不管留存下来的是什么，都已不再是神话了，就因为它并不起到科学那样的作用。与之相反，当代德国哲学家汉斯·布卢门贝格（Hans Blumenberg，1920—1996）认为，神话与科学的并存，证明了神话从来没有 起过科学那样的作用。然而，不论是布卢门贝格还是泰勒和弗雷泽都没有解释，为什么神话，或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宗教，依然和科学一起 被人们用来解释物质事件。

例如，每当飞机失事，少数乘客幸免于难，人们接受飞机失事本身的科学解释，却相信少数人之所以幸存并不在于他们的座位位置特殊之类，而在于上帝的干预。泰勒和弗雷泽无疑会回应道，幸存者只是没有直面他们的宗教解释与科学解释水火不容的事实，某种更紧迫的需要，某种只有宗教的解释才能满足的需要，显然压倒了对二者协调一致的要求。

路西安·列维-布留尔

法国哲学家、空想人类学家路西安·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1857—1939）反对泰勒、弗雷泽，以及他不准确地称之为“英国人类学派”的其他成员的观点；他坚持神话与科学应有更广阔的分野。泰勒和弗雷泽认为，原始人的思维和现代人并没有太大不同，只是不及现代人缜密，可列维-布留尔却认为，原始人的思维与现代人并

不相同。前者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是符合逻辑的，只是并不正确，而后者却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是全然没有逻辑的，或者用他爱用的说法，是“前逻辑的”。

不同于泰勒，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人并不相信所有的自然现象都具有个体的、像人一样的灵魂或者神，但是，所有的现象——包括人类和他们的手工制品——都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神圣的或者“神秘的”领域的一部分，这个领域遍及整个自然界。进一步说，原始人相信一切事物都“参与”到这一神秘的现实中，这使得各种现象不仅神奇地相互影响，而且相互易形，同时又保留着自己的本质特征：“客体、存在、现象可以既是它们自身又有别于它们自身，尽管这是我们［现代人］所无法理解的。”巴西的博罗罗人〔4〕宣称他们是红色“阿拉拉斯”，即一种鹦鹉，同时又是人类。列维-布留尔称这种信仰是前逻辑的，因为某一事物既是它自身、同时又非它自身的观念破坏了不矛盾律〔5〕。

泰勒和弗雷泽认为，神话与科学——或者至少是他们心目中的科学——有着同样的观察、推理和概括的过程，可列维-布留尔却认为，神话思维和科学思维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前者认为，原始人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与现代人一样，只不过他们构想世界的方式与现代人不同，而后者却认为，原始人看到的、然后使之概念化的世界与现代人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与其自身相同。

列维-布留尔与泰勒和弗雷泽一样，认为神话是宗教的一部分；宗教是原始的；对于现代人而言，科学远比宗教重要。然而，泰勒与弗雷泽将宗教和科学都归于哲学之下，列维-布留尔却将哲学和摆脱了与世界神秘同一的思维联系在一起。原始思维是非哲学的，因为它没有与世界分离开来。原始人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整个心智，这种心智表现在他们的神话中。

即便在神话的功能上，列维-布留尔与泰勒和弗雷泽的观点也不相同，前者认为是情感介入，而后者则认为是理智超脱。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人使用宗教，特别是神话，并非为了解释或控制世界，而是为了与之契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恢复正逐渐消退的“神秘”契

合：

> 只要个人对社会团体的参与仍能直接感受到，只要团体与周围团体的互相参与实际上存在——也就是说，只要神秘的共生持续——神话便数量稀少，质素低劣。……当原始人的心智正努力实现一种已经无法再感受到的互相参与——当它转而诉诸旨在恢复契合的中介与手段，而这一契合已经不再是鲜活的现实时，此时出现的神话会不会也是原始人心智的产物呢？
>
>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330页）

倘若依据列维-布留尔的观点来阐释阿多尼斯神话，他必然会侧重讨论阿多尼斯与世界的神秘关系。奥维德的阿多尼斯全然不顾世上危险的一切警告，因为他设想自己在世界上如同在自家一样安全自如，而他的这种感觉源自于与世界的同一。他之所以无法抗拒女神们的诱惑，是因为在他看来，女神们就像他的母亲一样，和她们在一起，他要的不是性交，而是如同处于子宫中的接纳。在阿多尼斯与女神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始的同一状态，布留尔称之为“神秘的互相参与”（或译“神秘互渗”[6]）。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对列维-布留尔观点的一种回应是重申神话的哲学性质，这一态度将在下一章中讨论。持这一观点的主要理论家是保罗·雷丁（Paul Radin）和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另一种回应是，接受他将神话与哲学分离的观点，但却不接受他将神话看作是前哲学的或前科学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主要理论家是出生于波兰但早年便移居英国的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列维-布留尔声称，原始人寻求与自然的契合，而不是解释它，马林诺夫斯基则声称原始人试图控制而非解释自然。两人都将哲学的方法与解释的或理智主义的方法联系起来，又都认为这一观点出自英国学者；不过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它出自泰勒，而不是也出自弗雷泽。两人都将有关

神话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有关宗教的——这一生造的观点归因于有关原始人的生造的观念。

援引弗雷泽认为神话与宗教是应用科学之原始对应物的观点，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原始人忙于为生存奔波，根本无暇思索世界。然而，弗雷泽认为，原始人使用神话代替 现代的科学，马林诺夫斯基却认为，原始人使用神话作为科学的一种退路 。原始人不仅拥有科学的对应物，而且拥有科学本身：

> 如果科学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个实体，即它由法则与概念构成，以经验为基础并通过逻辑推理从经验中产生，体现于物质成就中，具有确定的传统形式且由某类社会组织执行，那么，毫无疑问，即便最低级的野蛮社会也有初始的科学，无论这种科学如何稚嫩。
>
>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与宗教》，第34页）

原始人利用科学来控制物质世界。科学不灵了，他们就转向巫术。

巫术不行了，原始人便转向神话；这并不是如弗雷泽认为的那样，为了进一步控制世界，而是恰恰相反，为了试图在那些无法控制的方面——譬如自然灾害、疾病、衰老与死亡——与世界达成和解。神话——在这里并不局限于宗教——将这些苦难根植于诸神或人类不可逆转的、原始的行动中。根据一则具有代表性的神话，正是由于人类的两位祖先做了蠢事，才将衰老引入人间：

> 人人渴望青春不老的能力，以免除衰败和老朽；这一能力却因为一个小小的过失而丧失了，而这种过失本来是一个小孩和女人都有能力避免的。
>
> （马林诺夫斯基，《原始心理学中的神话》，第137页）

举例来说，神话解释了大洪水是怎样产生的——是由某位神或某个人的行为所引致，原始科学和巫术则试图在洪水面前有所作为。与之相反，神话却说，我们对大洪水无能为力。这些旨在说服原始人顺从无法控制之力的神话关乎的是物质现象。旨在说服原始人接受能够

被抵制之事物的神话则关乎的是社会 现象，譬如习俗和法律，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八章中加以讨论。

马林诺夫斯基会怎样解读阿多尼斯神话呢？他大概会侧重讨论这则神话怎样表达了死亡对一切生命的不可避免性；他会把阿多尼斯看作一个人，而不是神，会把阿多尼斯对自己将要死亡之命运的枉顾看作对他人的教训。但是，只有在这则神话是解释　死亡而非预设死亡时，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我们将会看到，伊利亚德也持同样的观点——神话是讲述起源的。马林诺夫斯基会把奥维德的版本当作银莲花起源的加长解说版，他还必须表明银莲花对古希腊或罗马人生活的重要性。和泰勒一样，马林诺夫斯基也是从字面意义来阐释神话的。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1908—　）既反对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原始人更为实际而非理智的观点，又反对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人更多情感而少理智的观点，他大胆地力图复兴一种有关原始人和神话的理智主义观点。乍看之下，列维-施特劳斯似乎仅仅是回到了泰勒的立场。因为，正像泰勒一样，他认为神话既是仅存于原始时期的，然而却又是高度理智的。他宣称，原始人“有一种理解周遭世界的需求或渴望，受到这种需求或渴望的驱使……他们采用理智的手段，完全像一位哲学家那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像一位科学家那样行事”。从这一点看来，他与泰勒似乎没有差别。

然而事实上，列维-施特劳斯对泰勒却作了严厉的批评。泰勒认为，原始人创造神话而非科学，是因为他们缺乏现代人那样的批判性思维。列维-施特劳斯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他的看法是，原始人之所以创造神话而非科学，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与现代人不同，这里他与列维-布留尔也意见相左，因为他认为原始人仍然在思考，而且思维缜密。对泰勒和列维-斯特劳斯两人来说，神话都是原始思维的缩影。

在泰勒看来，原始思维是人格化的，而现代思维是非人格化的；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原始思维是具体的，而现代思维是抽象的。对各种现象，原始思维用定性的方法思考，现代思维则用定量的方法来思考。它专注于现象中观察得到的、感官的层面，而不像现代思维那样，专注于其不可观察的、非感官的层面：

对这些人［即原始人］来说……世界是由矿物、植物、动物、声响、颜色、结构、味道、气味构成的。……原始思维与［现代］科学思维的区别是十分清楚的——并非是对逻辑的渴望程度高低的问题。神话操控那些所感知的性质，而现代思维在现代科学诞生的那一刻就从科学中驱除了这些可感知的层面。

（列维-施特劳斯，《列维-施特劳斯访谈录》，安德烈·阿库恩等编，第39页）

可是，与泰勒相对立的是，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就科学性而言，神话一点也不比现代科学逊色。只不过神话是“具象科学”的一部分，而非抽象科学的一部分：

科学思维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它们并非人类思维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功能，而是在对自然作科学探索时两种战略层面上的不同功能：一种大体上适应于感知和想象的层面，另一种则远离它。

（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15页）

泰勒认为，神话是科学本身的原始对应物，而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神话是现代 科学的原始对应物。神话是 原始科学，但并不因此就是低级的科学。

假如神话由于处理具体的、可以触摸的现象，因而属于原始思维之一例的话，它也是思维本身之一例，因为它对现象加以分类。列维-施特劳斯认为，所有的人都以分类的方式，特别是以一组组对立物的形式来思考，然后再将它们投射到世界上。许多文化现象表达了这样的二元对立。神话在解决，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调和它所表达的二元对立方面是十分独特的。泰勒认为神话和科学相像，因为神话超越了观察而开始解释，列维-施特劳斯则认为神话是全然科学的，因为神话

超越了仅仅是记录观察到的矛盾而开始调和它们。这些矛盾无法在情节或神话中找到，而要在列维-施特劳斯著名的所谓“结构”中发现；由此而产生的研究神话的“结构主义”方法本书将辟专章（第七章）进行讨论，并对阿多尼斯神话作结构主义的详细分析。

罗宾·霍顿

泰勒认为神话与宗教对物质世界的解释是人格化的，而科学的解释是非人格化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在尼日利亚度过其职业生涯的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霍顿（Robin Horton, 1932— ）的挑战。霍顿在很大程度上追随泰勒，因此被人称作“新泰勒主义者”。这一标签原本意在贬损，可霍顿却自豪地接受了。和泰勒一样，霍顿也认为宗教和科学都是对物质世界的解释；他也认为宗教的解释是原始的，而科学的解释是现代的，不过他更喜欢用不那么具有冒犯性的说法“传统的”来取代“原始的”；他还像泰勒一样，认为这两种解释是相互排斥的。霍顿并非专注于研究神话，不过他和泰勒一样，都认为神话是宗教的一部分。

泰勒说宗教的解释是人格化的，科学的解释是非人格化的，霍顿并没有在这个层面与之纠缠。但他区别于泰勒之处在于，他将这个泰勒紧抓不放的问题置于次要的位置，称之为仅仅是“解释性探索中方式的不同”。与泰勒相反，霍顿认为，解释事件时采用人格化原因并不比使用非人格化原因更少经验主义色彩，尽管采用人格化的解释依旧是不科学的（这点与泰勒相同，但却与列维-施特劳斯相异）。

泰勒将人格化的解释归因于原始人思维方式批判性的不足。原始人总是接受手头的第一种解释；他们像儿童一样，用自己所熟悉的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来类比事物。霍顿也认为原始人倚赖于他们所熟悉的事物，但他同时也指出，现代人也是如此。在霍顿看来，熟悉的现象是那些表现出秩序与规律的现象。因为在“复杂、变化迅捷的工业社会中，人类世界总在不断地流动变化”，所以必须要“在无生命的世界

中”寻找秩序和规律。于是，“心灵在寻求用类比的方式作出解释时，必然地转向无生命的事物”。与之相反，非洲社会的情形则不同，在那里无生命世界中的秩序与规律性“远不如”人类世界中“来得明显”，在这一人类世界中，“不在家中与亲朋一起而与无生命的事物共处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心灵在寻求用类比的方式作出解释时，就自然地转向人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非洲宗教的以下观点——即认为事件的发生是像人一样的实体所决定的——在理论上便站得住脚了。

霍顿与泰勒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以情境 而非内容 为依据来区分宗教的解释和科学的解释。他借用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术语，提出宗教的解释在“封闭的”社会中起作用，而科学的解释则在“开放的”社会中起作用。在一个封闭的、不加鉴别的社会中，“对于已经确立的理论信条无法发展出取代的意识”。而一个开放的社会则是一个具有自我批判能力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取代的意识已得到高度发展”。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居于主流地位的信条由于从未受到挑战，因而具有神圣的地位，对其发出的任何挑战都会被认为是对神圣的亵渎。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现存的信条由于随时会受到挑战，因而不具有任何神圣的光环，能够得到合理的评价。

和泰勒一样，对于阿多尼斯神话，霍顿可能无话可说，而对于《创世记》第一章则可能有很多见解；他会像泰勒一样，将此章全然地看作是对物质世界起源的前科学解释，一种现代人在科学的解释面前无法保留的解释。现代人要保留它，只能重新界定它的功能或意义，而像泰勒一样，对这种重新界定他是不能允许的。

与霍顿相反，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特·古特力（Stewart Guthrie）把泰勒对宗教的人格化或者拟人化解释的关注又推到了前台。对于古特力和泰勒来说，拟人论是构成宗教（包括神话）解释的核心。不过，古特力与霍顿和泰勒都不同，他认为宗教中和科学中都有拟人化的解释。霍顿与泰勒认为拟人论是原始人所独有的解释世界的方式，而在古特力看来，拟人论是一种近乎普遍的方式。

卡尔·波普尔

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02—1994）出生于维也纳，最终定居英国；他与泰勒的分歧比霍顿与泰勒的分歧要深刻得多。首先，泰勒从未解释过科学是怎样产生的，因为宗教（包括神话）对物质世界的一切事件提供了一种综合的、似乎无法证伪的解释。其次，泰勒认为，科学并非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而只是取代了神话。但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从 神话中 产生的，不过它并非产生于对神话的接受 ，而是产生于对神话的批判 ：“由此，科学必然从神话开始，而且必然是从对神话的批判开始。”所谓“批判”，波普尔的意思是评价，而不是摒弃；当这种评价采取了对已认为是真理的命题证伪的形式时，它便具有了科学性。

波普尔进一步指出，除了宗教的神话外，还有科学的神话，这与泰勒的观点也是对立的，尽管波普尔从未引用过泰勒。科学神话与宗教神话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内容，而在于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宗教神话被人们教条地接受，而科学神话则随时可被质疑：

> 我的论点是，我们所谓的“科学”之所以区别于较早的神话，并不在于它本身与神话有什么不同，而在于它伴随一个二阶的传统，此即批判地讨论神话的传统。此前，只有一个一阶的传统。一则确定的神话故事不断地流传下来。当然，现在依然是一则故事流传下来，但却同时伴随着一个拥有二阶特征的无声文本：“我把这则神话传给你，可你要告诉我，你怎么看它。请仔细地思考。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正如宗教一样是在制造神话。
>
>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第127页）

波普尔甚至宣称，科学理论保有 神话特征，因为理论和神话一样，永远无法得到证明，只能被反证为不成立，因此“始终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或假设性的”。

我们不清楚波普尔会对阿多尼斯神话作何种阐释。引起他注意的都是创世神话，因为这些神话大胆地猜测了世界的起源，因此起动了

科学理论化的过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位波普尔写过一本书，题名为《框架神话》，这里的“神话”与威廉·鲁宾斯坦在其《拯救的神话》中使用的“神话”一词意义相同：一种坚定不移地所抱持的虚假信念，一种无须进一步检验、应该抛弃的信念！

和波普尔一样，英国古典主义哲学家F. M. 康福德（F. M. Cornford, 1874—1943）提出，古希腊科学是从神话与宗教中产生的，不过他的观点仅限于内容，完全不涉及态度。康福德认为，科学使宗教与神话的信仰得以留存下来，尽管是以世俗的形式。康福德主张，古希腊科学只是在后来才割断了与宗教的联系，变成了经验科学。不过他后来又称，古希腊科学从未割断过与宗教的联系，也从未变成经验科学。

泰勒本人确实曾将科学的可验证性与神话的不可验证性加以对比，但却从未具体说明这种验证的性质：

> 我们接受训练，以获取自然科学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可以反复地进行验证；当我们的头脑转向那些无法验证的古老记录、并看到各方面都显示它们包含了不可靠的陈述时，我们感到一种从高级验证层面的跌落。
>
> （泰勒，《原始文化》，第1卷，第280页）

然而，泰勒必须得赋予原始人一定程度的批判能力，不然怎样解释神话最终被科学取代的事实呢？难道不正是最后一代原始人创造了科学，以科学取代了神话，并铸就了现代性吗？

注释

〔1〕 《圣经》故事人物，摩西之兄，相传为犹太教第一个大祭司。他按照耶和华和摩西的吩咐，伸杖施行了十灾的前三灾。

〔2〕 赫利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相传每天驾四马战车自东至西驰过天空。后来人们逐渐把他和光明之神阿波罗视作一人。

〔3〕 在古希腊纪念阿多尼斯的阿多尼亚节期间，雅典人会在一些花盆中栽种生长与枯谢迅速的种子，称之为“阿多尼斯小花园”。塞浦路斯至今仍保留此俗。

〔4〕　南美印第安人的一族，分布在巴西马托格罗索州巴拉圭河上游及其支流一带，是现存的少数原始部落之一。博罗罗人操自己的方言，其生产仍处于刀耕火种阶段，社会仍是母系社会。

〔5〕　不矛盾律，又称矛盾律，逻辑学中的主要法则之一。其命题是：两个互相矛盾或互相反对的判断不同真，必有一假。

〔6〕　参见丁由译列维-布留尔著《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第69—71页。列维-布留尔的原文是：*participation mystique*。丁本是依据俄译本并参照英译本译出的。

第二章

神话与哲学

神话与科学、神话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会有所重叠，因此前一章讨论过的理论家很多也都可以放到本章之中。不过，对神话与哲学之关系所持的观点更加多样，比如说：神话是哲学的一部分；神话就是 哲学；哲学就是神话；神话产生于哲学；哲学产生于神话；神话与哲学相互独立但功能相同；神话与哲学相互独立，功能迥异；等等。

保罗·雷丁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泰勒与弗雷泽都认为，神话与科学均归于哲学之下；列维-布留尔则不赞同这一观点，他将神话置于科学与哲学的对立面。在他看来，神话中表现出的人与世界的原始同一，与科学和哲学所要求的人与世界的分离是截然相反的。

对列维-布留尔这一观点最激烈的反对来自于波兰出生、美国长大的人类学家保罗·雷丁（1883—1959）。他的重要著述是《作为哲人的原始人》，顾名思义，标题已经说明了他的观点。雷丁实际上又回到了泰勒的立场，并对其作了修订和延展，不过奇怪的是，他在此书中从未提到泰勒的名字。雷丁承认，大多数 原始人是远离哲学的，但他又指出，任何文化中的大多数人亦都如此。他对普通人与杰出人士加以区别，称前者是“行动者”，而后者是“思想家”：

> 对前者［即行动者］来说，只要世界存在，各种事件不断发生，他就感到了满足。至于解释，那是次要的事。他乐于接受轻易获得的第一种解释。说到底，这对他来说完全无关紧要。但是，他对某一类型的解释表现出明显的偏向：他偏好那种特别强调一系列事件之间纯机械联系的解释。他的心智节奏——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一说法的话——希望看到的是同一事件无穷无尽的重复，或者充其量是大体处于同一层面的事件无穷无尽的重复。……思想家的心智节奏则大不相同。仅仅假定事件之间存在一种机械的联系对他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坚持要说明从一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逐渐进步和进化，或是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
> （雷丁，《作为哲人的原始人》，第232—233页）

这两种“气质类型”在一切文化中都可找到，而且存在的比例也大体相同。依据这一观点，如果说列维-布留尔的错误在于认为原始人中并不存在思想家，那么泰勒的错误则在于认为所有原始人都是思想家。此外，雷丁认为这一部分原始人具有的哲学才能远比泰勒赋予神话创作者——他称呼他们为“野蛮的哲学家”——的才能更为敏锐。人们一般认为，如阿多尼斯之类的神话最多只能做到解释物质世界，而在雷丁看来，原始思辨在神话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它远远不止是解释物质世界的种种事件这么简单。神话涉及一切类型的形而上论题，例如现实的终极构成等等。与泰勒所认为的相反，更进一步来说，原始人还拥有缜密的批评能力：

> 声称原始人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或是系统地组织这些抽象思维的能力，或是对其自身和整个周遭环境作出客观批评的能力，这些显然都是不公正的。
>
> （雷丁，《作为哲人的原始人》，第384页）

卡尔·波普尔和罗宾·霍顿明确表示，批判的能力是思维的标志。雷丁很可能赞同他们的这一观点。

恩斯特·卡西尔

德国出生的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对列维-布留尔的态度要和缓得多。卡西尔完全赞同列维-布留尔的以下观点：即神话思维，或者说“神话创作的”思维，是原始的，是充满情感的，是宗教的一部分，并且是神秘的同一在世界上的投射。但是，卡西尔宣称，神话思维有自己的逻辑，他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和列维-布留尔判然有别。实际上，列维-布留尔也说过同样的话，他造出“前逻辑”一词就是为了避免给神话思维贴上“不合逻辑”或“非逻辑”的标签。卡西尔宣称自己与列维-布留尔的另一不同之处在于，他强调神话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自主性——他所认为的其他主要知识形式是语言、艺术和科学：

尽管将神话归属于某一大的符号形式体系似乎是势在必行的，这样做仍会带来一定的危险。……这很可能会削弱神话作为一种固有的［即独特的］形式与其他形式之间的差别。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把神话简化为文化生活的又一种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知识［即科学］、艺术，还是语言，并以此来解释神话的尝试不胜枚举。

（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第2卷，第21页）

但是，卡西尔同时又宣称，神话与科学是互不相容的，科学继神话之后诞生："科学只是在抛弃了一切神话的、形而上的成分之后，才获得了它自己的形式。"这一点与列维-布留尔并没有什么不同。对卡西尔和列维-布留尔来说，神话绝对是原始的，而科学绝对是现代的。不过，卡西尔将神话看作知识 的一种形式——即人类创造符号、创造世界活动的一种形式，这就将神话置于与科学同样的类属中；在这一点上，他与列维-布留尔的看法并不相同。

卡西尔后来认识到，神话不仅是原始的，也是现代的。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逃亡美国之后，他开始集中精力研究现代政治神话，特别是纳粹主义神话。在这里，神话等同于意识形态。从前他关注的是缥缈的、认识论的问题，现在则转向了严酷的社会科学问题：政治神话是如何站住脚跟、屹立不倒的？从前他嘲笑所谓的列维-布留尔对神话非理性的强调，现在则拥抱这一观点：

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关键时刻，抗拒古老的神话概念的理性力量变得不再自信满满。在这样的一些时刻，神话的机会再度来临。

（卡西尔，《国家的神话》，第280页）

卡西尔将神话与巫术相联系，又将巫术与不顾一切想要控制世界的企图相联系；在此他把（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对原始 神话的阐释运用到了现代 神话上：

［马林诺夫斯基］对原始社会中巫术和神话之作用的描述同样适用于人类政治生活的高级阶段。人类在绝境中总是诉诸于不顾一切的极端方式。

（卡西尔，《国家的神话》，第279页）

卡西尔与马林诺夫斯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无法控制的世界是人类社会，而非物质世界；他赋予了神话本身巫术的力量；而最为重要的是，他把神话看作是现代的。不过，这当中也有一个曲折：卡西尔把现代神话看作是原始主义复活的返祖现象。

卡西尔之前将神话看作是一种准哲学，现在他却斩断了神话与哲学之间的联系。神话绝不再是可以梳理出一套独特逻辑的知识形式。哲学的作用被边缘化，只剩下向政治神话提出挑战的功能：

> 哲学已经没有能力来摧毁政治神话。从某种意义上说，神话刀枪不入。理性的论证伤害不了它；逻辑的三段论无法将它驳倒。但是，哲学对我们来说有另一大用处：它能使我们理解我们的对手。……当我们初听到政治神话时，我们认为它们是如此荒诞不经、自相矛盾、异想天开、滑稽悖谬，以至认为自己不可能被说服来严肃认真地对待它们。可是，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应该仔细研究这些政治神话的起源、结构、方法和技巧。我们应该直面这些对手，以便懂得怎样和它们斗争。
>
> （卡西尔，《国家的神话》，第296页）

难以理解这里提出的研究政治神话的建议为什么会是哲学的任务，而非社会科学的任务。此时的神话已经不仅仅是前逻辑的，而是彻底不合逻辑的。比起卡西尔所批驳的列维-布留尔的观点，他自己的这一立场要极端得多！

法兰克福兄弟

在哲学中全面运用列维-布留尔和卡西尔理论的是1946年出版的一本书，《古人的智识冒险：论古代近东地区的思辨思维》，作者是一批研究近东的专家。1949年该书以平装本的形式再版时，主标题与副标题合并成了一个双重副标题，同时采用了一个语义显豁的新主标

题：《哲学之前》。提出这一理论的是亨利·法兰克福和H. A. 法兰克福（Henri and H. A. Frankfort）；依照他们的观点，古代近东各民族处在一个原始的文化阶段，这一阶段可以恰当地称作“前哲学”阶段。古人处于原始阶段的说法可以追溯到泰勒和弗雷泽。法兰克福兄弟认为，现代人的思维是“哲学的”，即抽象的、批判的、不动感情的。哲学仅是采用哲学思维的其中一个领域，真正采用哲学思维的范例是科学。泰勒、列维-布留尔和其他学者也同样如此广义地使用“哲学”一词，几乎把它当作“智识”的同义语；他们也同样认为科学是哲学最纯粹的表现形式。法兰克福兄弟坚称，古代人与现代人截然相反，他们的思维是“神话创作的”，即具体的、不加批判的、诉诸感情的。神话并非是神话创作思维的唯一表现形式，但也许是最丰富的一种。

事实上，哲学与神话创作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关于世界的概念，还在于它们对世界的感知。这一点列维-布留尔也持同样立场。在感知世界的方式上，二者“最根本的区别”是，对现代人来说，外在世界是“它”，而在原始人看来，外在世界却是“你”——这两个术语出自犹太哲学家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我 - 它关系是疏离的、理智的，而我 - 你关系则是相互影响的、情感的——撇开法兰克福兄弟这本书语义混乱的原主标题不谈。我 - 你关系的范式是爱。

说原始人感知的世界是“你”而不是“它”，就是说他们把世界看作人而非物。久旱逢甘露并非大气的变化所致，而是因为如神话所述，雨神战胜了他的敌人。将世界理解为“你”就擦抹掉种种日常的、我 - 它的特征。原始人无法区分哪些仅仅是主观的，哪些是客观的：他们看到了日出日落，却看不到地球围绕太阳运转；他们看到了颜色，却看不到波长。他们无法区分表象与真实：对他们来说，一根棍子在水中就是 变弯了，而不只是看上去如此；梦是真实的，因为感觉上它是真实的。他们无法区分符号与被符号化的对象：名称与名称的使用者是同一的；搬演神话就意味着它的再次发生——在第四章讨论弗雷泽的理论时，我们将会更清晰地了解到这一点。

法兰克福兄弟提出，古代埃及人与美索不达米亚人完全生活在一个神话创作的世界中。从神话创作思维向哲学思维的转化始于古以色

列人；古以色列人将诸神融混为一神，并将其置于自然之外。这样，古以色列人就为希腊人开创了道路，后者将这个人格化的神变形为潜藏于自然或表象之下的一个或众多非人格化的力量。当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想象向经验科学发生转变时，对自然最终的“祛神话化”便实现了。

法兰克福兄弟的论点存在不少问题。第一，他们的神话创作论有时看起来与泰勒的万物有灵论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后者认为原始人与现代人拥有同样的心智。第二，布贝尔的我 - 你关系并不包含将物 作为人的体验，而只包含将人 作为人的体验。第三，任何现象都既可被体验为“它”，又可被体验为“你”：譬如，一只宠物和一个病人。第四，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将自然绝对地看作是“你”，但同时又能与之疏离到可以进行栽种庄稼之类的活动。第五，将古代近东文化看作完全是神话创作的，把古以色列文化看作主要是非神话创作的，而把希腊文化看作是完全科学的，这样的划分实在过于简单化；对于这一点，F. M. 康福德在他对希腊科学的论述中说得很明白。

尽管如此，法兰克福兄弟试图将列维-布留尔的抽象理论应用到具体实例中，这是值得称道的。他们支持列维-布留尔和卡西尔的观点，本质上主张神话固然是故事，但却是独特的心智之产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对列维-布留尔最激烈的批评与卡西尔对后者的批评如出一辙，而且同样是找错了目标：正是列维-布留尔本人强调原始思维是独特的，但并非是不合逻辑的。若将法兰克福兄弟的理论运用于阿多尼斯神话，会得到和布留尔的理论一样的结果：这一运用的焦点将是阿多尼斯对世界的情感认同，以及因此造成的对世界的认识不清。

鲁道夫·布尔特曼和汉斯·约纳斯

尽管卡西尔——尤其是早期的卡西尔——运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神话，他却从未宣称神话即 哲学。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德国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1884—1976）和德国出生、后来移居美国的哲学家汉

斯·约纳斯（1903—1993）。他们两人不仅将哲学的意义即当作神话的意义——这是取自存在主义者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早期的观点，而且完全仅限于对意义问题的讨论。不论是神话的起源还是功能都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对他们来说，神话是非活动的一部分。就像某些空想人类学家一样，他们把神话看作一个自治的文本，但是不同于泰勒，他们对神话的起源和功能问题连空想一下都没有。

不可否认的是，布尔特曼和约纳斯两人都以存在主义的话语来转述神话，以期使它的意义更适合现代人的口味；可是，他们却没有探讨人们为什么需要神话的问题，尤其是在神话所传递的信息和哲学相一致的情况下。譬如，他们并没有提出，神话是传达抽象真理的一种更易让人理解的方式，就像文学之于亚里士多德。由于他们研究的神话是宗教的（布尔特曼研究的是《新约》，约纳斯研究的是诺斯替教[1]）而非哲学的，他们的理论我们将放在下一章“神话与宗教”中作更详尽的讨论。

阿尔贝·加缪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对古希腊西绪福斯神话的著名阐释，可以看作是将神话简化为哲学的一个更为具体的例证。根据这则神话，西绪福斯是英雄奥德修斯在塔耳塔罗斯遇到的人物之一（塔耳塔罗斯是冥府中囚禁触怒宙斯者的所在）；西绪福斯遭受的惩罚是，他须将一块巨石推上陡峭的山顶，而当他每次接近山顶时，巨石就会滚落下来，于是他只得再次推石上山，这样推而复坠，坠而复推，永无休止。奥德修斯这样描述他看到的景象：

> 我也看到了西绪福斯。他遭受着巨大的痛苦，
> 双臂搂抱巨石，挣扎着
> 手脚并用，试图将它往上推，
> 直到推上山顶。可是，每当他到达顶点，

要将巨石推落悬崖之时，重力的作用又把它拽回，
直到无情的巨石滚落山底。于是，他只得
再次推石上山，肌肉绷紧，汗流浃背，
大团的灰土罩于头顶。

（荷马，《奥德修纪》，第593—600行）

荷马没有告诉我们西绪福斯究竟犯了什么事，而古代的权威典籍在这一问题上也莫衷一是。不过，古人都对西绪福斯的遭遇表示同情。而加缪则认为，西绪福斯应该受到赞扬。他并非体现了敢于违抗神意的少数人类将会遭遇的命运，而是象征了必将生活在一个无神的世界上的全体人类的命运。西绪福斯之所以应该受到赞扬，是因为他接受了人类存在的荒诞性，这种荒诞性更多地是表现在无意义，而非不公正。尽管西绪福斯清醒地意识到他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徒劳，他依然选择了忍耐和坚持，而不是放弃和自杀。他的行为是这个无神的、因而是无意义的世界所允许的唯一一种英雄行为。加缪利用西绪福斯神话戏剧性地描述了人类的生存状态。

布尔特曼和约纳斯分析的那些神话曾是（就布尔特曼的情况而言，现在仍是）宗教的一部分，而西绪福斯神话也曾是如此。但是加缪像布尔特曼和约纳斯一样，也将神话看作一种自治的文本，与任何实践的、体制化的宗教都是分离的。对他们三人来说，神话是一种哲学故事，因为说到底，他们认为神话即 哲学。

图3　《西绪福斯在塔耳塔罗斯》，18世纪版画，B. 皮卡尔作

注释

〔1〕　一种融合多种信仰、把神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的秘传宗教，强调只有领悟神秘的“诺斯”，即真知，才能使灵魂得救。公元1至3世纪流行于地中海东部各地。

第三章

神话与宗教

在宗教研究的领域内对神话进行探讨，自然会将神话归于宗教之下，也因此神话所面对的科学的挑战就是宗教所面对的挑战。20世纪从宗教研究角度出发的诸种神话理论，都在寻求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以此达到调和科学与神话关系的目的。

调和二者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策略。一种是重新界定宗教以及神话的主题。这种方法提出，宗教不是关于物质世界的，因此它不受科学的任何侵害。在此种研究宗教的方法下探讨的神话都是传统神话，譬如《圣经》神话和古典神话，但现在对它们的解读是在象征意义上进行的，而非字面意义上的。这种观点宣称，神话之所以被认为与科学水火不容，是因为神话被误读了。泰勒激烈地反对“道德寓言”论者和“神话即历史”论者对神话超出字面意义的解读，这正代表了泰勒本人对神话的误读！

另一种策略是将那些看似世俗的现象升级为宗教现象。作为这种提升的一部分，神话不再仅被限定为带有显著宗教色彩的古代故事。世俗色彩明显的现代神话出现了。例如，讲述英雄业绩的故事表面上看来是关于凡人的，但这些凡人的地位被提升得如此之高，以至远远凌驾于普通大众之上，实质上成为了神。同时，这些“神”的行为又并非是超自然的，因此与科学并不存在冲突。这一方法维持了对神话的字面解读，但对神话中使然力的实际地位重新作了分类。

还有第三种策略，那就是用世俗神话取代宗教神话。这种策略通过将神话和宗教区别开来，拯救了神话，使其免遭宗教的命运。这一策略与第二种策略——即将世俗神话转变为宗教神话——是截然相反的。显而易见，由于这一策略将神话与宗教割裂，因此它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之内。

鲁道夫·布尔特曼

对传统的宗教神话从象征的角度加以解析，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是鲁道夫·布尔特曼和汉斯·约纳斯，上一章已经对他们作了简略的讨论。如前文所述，他们两位都局限于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即基督教与诺斯替教，但他们的研究毕竟运用到了神话理论。

若从字面意义来看，布尔特曼的所见与泰勒会完全一致：神话是对世界的一种原始解释，是一种与科学解释互不相容的解释，因此是只认科学的现代人无法接受的。若从字面意义加以解读，布尔特曼必然会像泰勒一样毫不妥协地摒弃神话。然而，与泰勒不同的是，布尔特曼是从象征的层面来解读神话的。用他广为人知（但却极易令人混淆）的说法就是，他要将神话“解神话化”；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是要消灭神话或者将神话“祛神话化”（即去除神话的神话色彩），而是要抽取出神话真正的、象征的意义。拿挪亚方舟的神话来说，一方面寻找发生过世界范围大洪水的切实证据，另一方面摒弃有关存在装载着所有生物的方舟的神奇说法，这就是所谓将“挪亚方舟神话”祛神话化 。但若将大洪水解释为人类生活危机四伏的一种象征性表述，那就是对这则神话的解神话化 。

解神话化之后，神话不再是对世界的描述，而变成了人类对世界的体验 。解神话化之后，神话不再是一种解释，而变成了一种表达，一种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感觉”的表达。神话不再仅仅是原始的，而变成了普遍的；它不再是虚假的，而变成了真实的。它描述了人类的状况。用布尔特曼的话来说就是：

> 神话的真正目的并非呈现一幅关于世界的客观图景，而是表达人类在其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对自我的理解。因此，神话不应从宇宙论的角度来阐释，而应从人类学的角度——或者更进一步，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阐释。
>
> （鲁道夫·布尔特曼，《〈新约〉与神话》，第10页）

拿《新约》这一典型例证来说，若从字面进行解读，它描述了善与恶的存在为争夺物质世界的控制权而展开的宇宙之战。这些超自然的力量不仅像泰勒所认为的那样干预自然的秩序，而且干预人类的生活。善的存在引导人们为善，而恶的存在则强迫人们作恶。若从字面

进行解读，《新约》描述了一种前科学的世界观：

> 世界被看作一个三层的结构：尘世居中，天堂在上，冥府在下。天堂是上帝和天神——即天使的居所。冥府即地狱，是永受折磨之处。即便尘世也不仅仅是自然的、日常的事件和平凡琐屑的劳作发生的场所。这里也是超自然活动发生的场所；一边是上帝和他的天使，另一边是撒旦和他的恶魔。这些超自然的力量干预自然的进程，也干预人类的一切思想、意愿和行为。奇迹时有发生，绝非罕见。人类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邪灵可以附身。撒旦可以向他灌输邪恶的念头。另一方面，上帝也会对他加以感化，指明他人生的目的。
>
> （布尔特曼，《〈新约〉与神话》，第1页）

解神话化之后，《新约》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指涉物质世界，但现在统治这一物质世界的是一个唯一的、非人格化的、超验的上帝；这个上帝并不具有人的形态，也不施行神迹来对世界进行干预：

> 神话表达了对人类存在的某种理解。它相信存在某种远远超出我们理解和控制的力量，世界和人类的生活都在这一力量的掌控之下，有其范围，有其界限。神话对这一力量的表述是不恰当的、不充分的，因为神话将它表述为一种尘世的［即物质的］力量。它［正确地］描述了代表着超越可见的、可以理解的世界之力量的诸神，［但］却将诸神描述得好像是人，将他们的行为描述得好像是人的行为。……可以说，神话赋予了超验的现实一种内在的、现世的客观性。
>
> （布尔特曼，《耶稣基督和神话学》，第19页）

解神话化之后，上帝依然存在，撒旦却变成为只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人类自身的种种罪恶倾向。被罚入地狱并非指向未来的某处，而是指向某人时下的心理状态——只要此人拒不接受上帝，这种被罚入地狱的罪恶感就会一直存在。获得拯救指的则是某人一旦接受上帝之后的心态。有形的地狱并不存在。地狱象征着因上帝缺场而产生的绝望。天堂并不是指天上真实存在的某处，而是指上帝在场时的欢乐。上帝的统治并非通过宇宙的剧变在外部世界中实现，而是产生于人拥抱上帝之后的内心。

总的来说，解神话化之后的《新约》呈现了对世界的两种截然相

反的体验：那些尚未发现上帝的人感到了自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异化，而那些发现了上帝的人则感到在这个世界上舒适自在。在那些不信上帝的人看来，世界是冷漠的、无情的、可怕的，而在那些信仰上帝的人看来，世界是温暖的、诱人的、安全的。

若从字面意义来看，神话作为对物质世界的人格化解释，与科学是不能相容的，因此也是现代人无法接受的：

> 通过科学和技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掌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以至任何人都不可能再认真地以《新约》的世界观来看待世界了——事实上也没有人这样做。……我们已不再相信被教义视为理所当然的三层结构宇宙。
>
> （布尔特曼，《〈新约〉与神话》，第4页）

然而，一旦解神话化之后，神话就可以与科学共存了，因为现在它一方面指涉超验的、非物质的世界——泰勒对不包含 神话的现代宗教便持这样的观点，另一方面更指涉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体验。

布尔特曼作为神学家不仅仅敦促现代基督徒接受《新约》，而且为他们指出应该如何接受它，那就是将《新约》转化成存在主义的话语。不过，他认为之所以有必要这样做，并非是因为不作这样的转化，现代人就不可能接受基督教《圣经》，而是因为《圣经》的真正意义从来都是存在主义的。

然而，说神话可以被具有科学头脑的现代人所接受，这并不等同于说它为什么应被接受。布尔特曼为神话提供了一个现代的主题 ，却没有提供现代的功能 。也许对他来说，功能是不证自明的：即描述人类的存在状态。可是为什么要劳神费力地去描述人类的存在状态呢？又为什么要使用神话来作这种描述呢？布尔特曼无法宣称神话揭示 了人类的存在状态，因为他本人是利用哲学来发现神话中的这一意义的。

进一步说，即便在解神话化之后，对现代人来说，只有在上帝的存在是可接受的情况下，神话才是可接受的。尽管布尔特曼急切地期望具有科学头脑的现代人接受神话，他却并不准备将上帝解释为不存

在，即将上帝祛神话化。人们要接受神话，就必须继续信仰上帝，不论上帝的概念是何等复杂。今天，神话要为人们所接受就必须与科学和谐共处，但仅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

布尔特曼会如何阐释阿多尼斯神话呢？毫无疑问，他会将阿多尼斯身处的不同世界进行比较。阿多尼斯的身边总是存在着一个溺爱的女神，他身处一个子宫般的世界中，处处得到关爱，远离一切危险。他沉浸于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以至于根本感觉不到“真实”世界的危险（在奥维德的版本中，维纳斯竭力地想要告诫他这些危险）。在解神话化之后，这则神话就成为了对世界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体验之描述——这里不是世俗的相对于宗教的，而是婴儿的相对于成人的。

需要指出的是，布尔特曼的观点事实上存在着前后矛盾。尽管他似乎将神话本身看作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象征性表达，但他对产生基督教的古代神话——犹太人的启示神话和诺斯替教神话——是从字面意义进行解读的。这样，他的解神话化似乎就仅限于基督教；但这又造成了另一个矛盾：他宣称自己的观点受益于同为存在主义者的约纳斯对诺斯替教开创性的解神话化研究！

汉斯·约纳斯

汉斯·约纳斯提出，对于人类的存在状态，古代的诺斯替教所呈现的根本观念和现代的存在主义——但他所指的是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而非布尔特曼所指的宗教存在主义——是相同的。诺斯替教和存在主义都强调了人类之于世界的激烈的异化：

> 存在主义的本质是某种二元论，即人与世界的疏离……［只是］在一种情形下……这种疏离的状态以灾难性事件般的猛烈强度得到了实现：这就是诺斯替教运动。
>
> （约纳斯，《诺斯替宗教》，第325页）

但是，不同于力求弥合基督教与现代性之间分歧的布尔特曼，约

纳斯承认诺斯替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差异。因此，他并不试图说服现代人皈依诺斯替教。古代的诺斯替教与主流的基督教教义不同，它将非物质性与物质对立起来；由此，人即使在发现了真正的上帝之后，依然和物质世界相疏离。事实上，只有在摒弃物质世界及其虚假的神之后，这个真正的上帝才能被发现。诺斯替教徒克服与世界之疏离的方式，只能是超越它。不过，对诺斯替教徒来说，这种疏离只是暂时的，而对现代人来说，这种疏离则是永恒的。然而约纳斯认为，诺斯替教神话仍然对现代人具有意义，而且是对现代的怀疑主义者具有意义，并非如布尔特曼所认为的，是对现代信徒而言。神话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神话探讨的不是世界的本质，而是人对这个世界的体验的本质。像布尔特曼一样，约纳斯通过重新界定神话的主题寻求神话与科学的和解。

为了使古代的诺斯替教更易为现代人所接受，约纳斯像布尔特曼一样，必须绕过神话中超出科学范围的方面，即表述世界起源或未来的那些内容。他指出，人类与世界相疏离这一事实 ，而非探讨其根源或寻求解决的途径，才是神话解神话化之后的主题。因此，诺斯替教关于神性、神性放射、造物主神和物质世界的描述通通被忽略，而首要被忽略的就是诺斯替教对从物质世界逃离的期待。简言之，诺斯替教神话的庞杂内容被简化为只剩下神话——它的某些内容被抛弃，某些内容被祛神话化，正如一切神话之于泰勒那样。

和布尔特曼一样，约纳斯也没有向现代人说明神话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即便说神话旨在表达人类的存在状态，为什么这种表达是必要的呢？更不用提既然哲学一直所起的就是这一作用，为什么还要通过神话来表达呢？约纳斯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他和布尔特曼一样，只局限于神话的意义或主题，不及其余。

布尔特曼和约纳斯的神话研究方法与泰勒的几乎完全相反。泰勒理所当然地认为，对神话认真严肃的研究只能是从字面意义出发的。对他来说，“道德寓言”论者和“神话即历史”论者对神话所作的象征意义上的阐释，其实是把神话琐屑化了。布尔特曼和约纳斯，以及其他一些理论家如约瑟夫·坎贝尔，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对神话认真

严肃的研究只能是从象征层面出发的。泰勒认为，神话对原始人来说是可信的，是因为他们只从字面来理解它；布尔特曼和约纳斯则认为，神话对早期基督徒和古代诺斯替教徒来说是可信的，是因为他们从存在主义的层面来理解它。泰勒提出，神话之所以对现代人来说是不可信的，正是因为他们正确地从字面来理解它；布尔特曼和约纳斯却提出，只有在现代人正确地从象征层面来理解它时，神话对他们而言才是可信的。不过，泰勒真正反对的是那些为原始人象征地解读神话的理论家，而非那些为现代人象征地解读神话的理论家。因此，他对布尔特曼和约纳斯的抨击主要集中在他们关于早期基督徒和古代诺斯替教徒的观点，而非他们关于现代人的观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泰勒、布尔特曼和约纳斯在他们的著述中都采取了捍卫神话的立场。其区别在于，泰勒表示在科学之后需要放弃神话，而布尔特曼和约纳斯则表示在科学之后需要对神话的真正意义作出解释。这一意义并非现代人为了拯救神话而现编出来的，而是神话从来就具有的，只是在没有受到科学的挤压和威胁前，它未曾被充分认识到罢了。通过迫使现代人回到古老的神话文本去发现神话一直在诉说的意义，科学将一种必要转变成了一种美德。

米尔恰·伊利亚德

著名人物的理想化传记往往将他们描述成近乎神的存在，而他们的传奇故事也成了神话。例如，第一次海湾战争甫一结束，被称作“暴风诺曼”的美军最高统帅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 Jr.）的传记便纷纷问世，狂热吹捧他为世界上最聪明、最勇敢的战士；他是如此地高于他人，以至于几乎已不是凡人。

研究这一现象的主要理论家是出生于罗马尼亚、生命中最后30年在美国度过的宗教史家米尔恰·伊利亚德（1907—1986）。与布尔特曼和约纳斯不同，伊利亚德并非通过从象征的层面阐释神话来调和神话与科学的关系；他像泰勒一样从字面意义解读神话。他不像布尔特

曼和约纳斯那样改动神话的功能；在他和泰勒看来，神话是对现象的一种解释，而且严格说来，是对其起源而非仅对其反复发生的状况的解释。他也不像布尔特曼和约纳斯那样试图将传统神话现代化；但是和泰勒不同，他也并非只是固守传统的、具有鲜明宗教色彩的神话，而是转向现代的、看似非宗教性的神话。不过，他不像布尔特曼和约纳斯那样力图调和这些神话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而是直接诉诸于这些神话存在的事实，指出它们与科学的相容性：如果现代人——伊利亚德和其他人一样认为他们拥有科学——也拥有神话，那么，神话与科学就必然是相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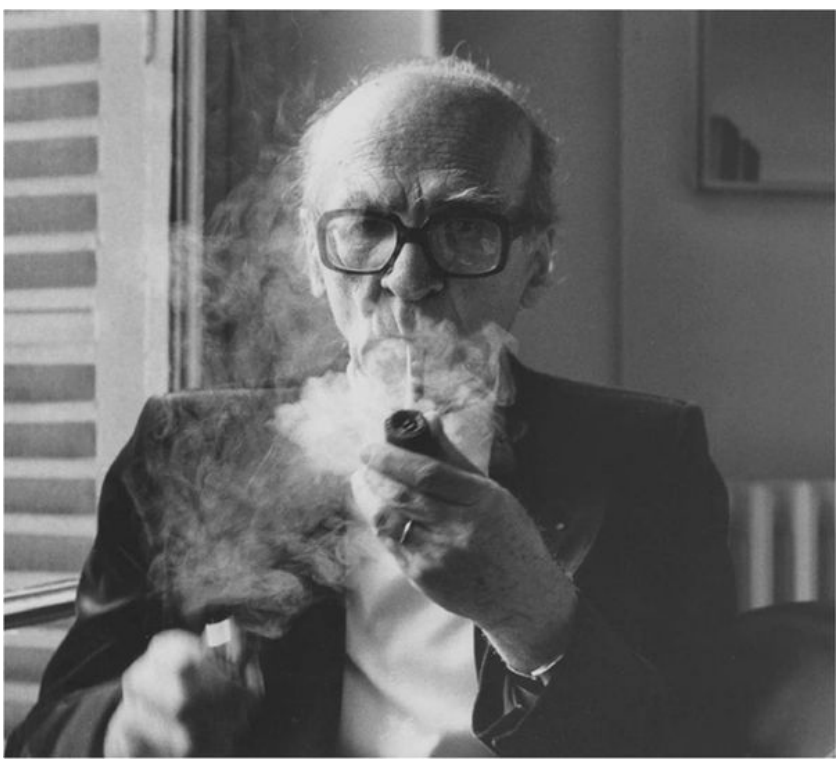

图4　米尔恰·伊利亚德，巴黎，1978

伊利亚德界定神话的标准是，如果一则故事将一项非凡的业绩归于其描述对象，以至将这个对象转变成了超人的形象，那么这则故事

就是一个神话。神话描述在远古的、“神圣的”时代，神和近乎神的存在如何创造出一种至今留存的现象。这种现象可以是社会的，也 可以是自然的，如婚姻或下雨：

神话告诉我们一种现实是如何通过超自然存在的作为而产生的；这种现实可以是整个现实，即宇宙，也可以只是现实的一个部分——如一个岛屿、一种植物、人类的某种特殊行为、一种习俗。

（伊利亚德，《神话与现实》，第5—6页）

真正的神被认为创造了自然现象，而“文化英雄”则被认为创造了社会现象。神话中的功绩就是创造。

对伊利亚德来说，神话的功能并不止于解释。解释仅是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而这个目的就是再生。聆听、阅读，特别是重演一则神话就是通过魔法的力量重新回到这则神话诞生的时代，回到这则神话所解释的现象起源的时代：

既然对宇宙起源神话的仪式性再现暗示着这一原始事件的再度发生，那么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一神话表演的观众将在魔力的作用下被投射“到彼时”，到“世界的原初”；观众变成了宇宙起源的见证人。

（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第82页）

神话就像一张魔毯，但是它只向一个方向飞。通过将人带回到太古蛮荒时代，神话使人与诸神重聚，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与神是最接近的，正如《圣经》中“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创世记》3:8）所示。这一“重聚”扭转了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与诸神分离的状态，使人在精神上获得更生：

简言之，这里所包含的是一种向太初时代的回归，其疗治的目的是令生活重新开始，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再生。

（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第82页）

神话最终的报偿是经验性的：与神性相遇。没有任何其他神话理论比伊利亚德的更植根于宗教之中了。

显而易见，科学不能提供再生的功能。科学只有解释的功能。因此神话能起到科学起不到的作用。然而，伊利亚德认为神话留存下来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它具有独特的功能，而在于神话的这一功能不仅对原始人起作用，而且对现代人同样起作用。伊利亚德指出，现代人自以为他们是极端理性的、智慧的、非感情用事的、具有远见卓识的——一句话，是科学的；然而即使是他们也同样离不开神话：

> 现代人欣赏隐藏在戏剧中的神话，阅读隐藏在书本中的神话，关于现代人的神话可以写成厚厚一大卷书。被称作“梦工厂”的电影承袭和借用了无以数计的神话母题——英雄与怪物的搏斗、成人仪式的战斗和试炼、范式的人物和意象（童贞的处女、英雄、天堂的景象、地狱，如此等等）。即便一般的阅读也包含了神话的功能……因为通过阅读，现代人成功地实现了“对时间的逃避”，这类似于通过神话实现的“在时间中的浮现”。……阅读将他从个人的时间绵延中投射出来，融合进其他的节奏，让他生活在另一种“历史”中。
>
> （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第205页）

戏剧、书籍与电影之所以和神话相像，是因为它们在日常的世界之外揭示了另一个、往往更早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中非凡的人物和事件与传统神话中所描述的那些人物和事件相似。而且，这些人物的行为对日常世界的现状作出了解释。最为重要的是，现代人沉浸在这些戏剧、书籍和电影中，以至想象自己回到了神话时代。布尔特曼和约纳斯提出现代人可以 拥有神话，羞羞答答，欲言又止，而伊利亚德宣称现代人就是 拥有神话，却说得理直气壮，毫不含糊。如果连无神论者也拥有神话，那么，神话就必然不像布尔特曼和约纳斯所称的那样，仅仅是可以为现代人所接受而已；它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泛人类的。泰勒和弗雷泽认为神话是世俗化过程的牺牲品，伊利亚德则提出，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化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宗教和与之相随的神话都留存了下来，只不过是“改头换面”了罢了。

对于好像远非讲述什么英雄业绩的阿多尼斯神话来说，伊利亚德

的理论如何得到应用呢？和伊卡洛斯、法厄同[1]等其他希腊神话中的反英雄一样，阿多尼斯也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而事实结果是，他和这些反英雄一样，无视这个世界的种种危险，由于自恋式的鲁莽而丧了命。

小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 Jr, 1960—1999）[2]就是一个现代的阿多尼斯；他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是女性无法抗拒的一个性象征。但是他作为一个飞行新手，在完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不顾维纳斯式的警告，不安分地坚持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飞行，结果丧失了生命。他从天上栽下地面殒命的过程更使他与伊卡洛斯和法厄同等同起来。全世界对小肯尼迪的哀悼正是人们为一个出师未捷的英雄所发出的，而不是为了一个功成名就的英雄。

图5　小约翰·F. 肯尼迪，八卦杂志《我们周刊》封面，2000年6月

更切合伊利亚德理论的一个人物应该是无可争议的英雄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他是所有美国人所尊崇的国父。他先是在独立战争中担任总司令，率领大陆军抵抗英军，并最终于1781年击败了敌人。随后他退出了公众生活，但后又回来主持制宪会议；由于他必不可少的支持，美国宪法才得以签署。1789年，他

被（总统选举团）一致推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后又再一次全票连任，而且假如他愿意的话，还会再度连任。人们对他是如此敬畏，以致许多革命者担心他或他的支持者们会建立起一个君主专制政权，从而断送独立革命为之奋斗的共和目标。他却抵制住了这一诱惑，这就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尊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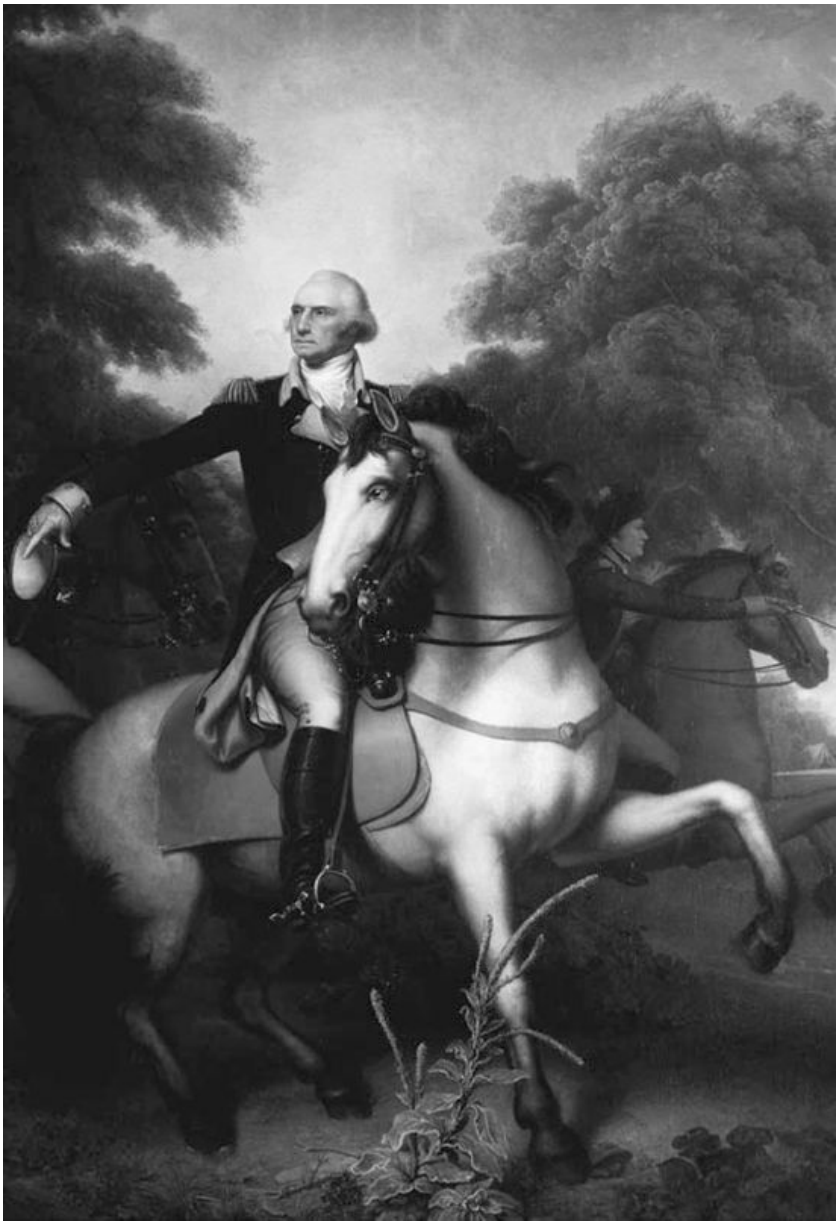

图6　《乔治·华盛顿前往约克敦》，1824—1825，伦勃朗·皮尔作

在华盛顿在世和他身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人对他的尊敬近于神化，形成了某种实质上的个人崇拜。不要说在他连任总统期间和

之后，甚至在他任职之前也是如此：钱币上印着他的头像；不可计的绘画与雕塑描摹他的形象；数不清的歌曲与诗篇歌颂他的业绩；县镇以他的名字命名；每逢他的诞辰都会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盛大的欢迎。在伊利亚德看来，神话膜拜的是其故事主体在物质世界或社会中确立起来并留存至今的成就——以国父华盛顿的例子来说，这一成就就是美国自身。一位历史学家描述了华盛顿任职总统期间人们庆祝他诞辰的盛况，从中可见对他的“狂热崇拜”：

> 到了1791年，在华盛顿就任美国总统两年之后，为他的诞辰而举行的带有“君主”色彩和“偶像崇拜”意味的庆祝活动已经成为了一项举国的习俗。这一日普天同庆，哪怕再小的市镇都没有不举行舞会和欢宴的。……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只有7月4日国庆日在热烈与铺排程度上堪与相埒。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的诞生与华盛顿的诞辰都已经成为了应该纪念的里程碑。……华盛顿诞辰的纪念活动具有宗教仪式的性质。……华盛顿的生日真正成了一个神圣的日子：这是人们团结一致的一天，这是国家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在这一点上所体现出的人民的力量再次得到确认的一天。
>
> （施瓦茨，《乔治·华盛顿》，第77—79页）

即使在华盛顿逝世很久之后，为他的诞辰所举行的庆祝活动其目的亦不仅是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更是为了重新赋予这些功绩和他本人以生命力（这一天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庆祝活动（即仪式）的一部分是再现他一生传奇（即神话）中的辉煌时刻。在美国，随处可见“乔治·华盛顿曾在此留宿”的标牌，它正表明了伊利亚德所提出的神话的终极功能：提供与神接触的机会。

当然，怀疑者会提出异议。一个人类英雄，无论他受到怎样的尊崇，可以和神相提并论吗？庆祝活动真的等同于膜拜吗？对于一个已故的英雄人物生平的纪念当真能使他死而复生吗？参加庆典的人们当真相信他们在现实中回到了历史的过去，而不认为这仅仅是自己的想象吗？既然社会科学解释了英雄持久的功绩，那么还有什么是需要留待神话来解释的呢？伊利亚德要为神话在科学的、现代的世界中赢得一席之地的努力颇具感染力，但他的观点真的是令人信服的吗？

注释

〔1〕　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中著名建筑师和艺术家代达罗斯的儿子。为了逃离克里特的迷宫，他和父亲用蜡将羽毛粘结成翼，飞出克里特，但由于他忘记父亲警告，飞得离太阳太近，蜡翼融化，堕海而死。法厄同是希腊神话中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儿子，他驾太阳神的四马金车出游，因不善驾驭，几乎将大地烧毁，因此被宙斯用雷击死。

〔2〕　美国总统肯尼迪之子，因驾驶私人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

第四章
神话与仪式

通常认为，神话是文字的组合，往往表现为故事的形式。我们可以阅读或者聆听一则神话。神话讲述了一些事情。然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研究神话的方法，它认为以上观点都是人为强加的。根据神话与仪式理论，或者说神话-仪式主义理论，神话本身并不存在，而是与仪式结合在一起的。神话不仅是一种陈述，而且是一种作为。这一理论中最不妥协的观点宣称，一切的神话都伴随仪式，一切的仪式亦都伴随神话。一些较为温和的观点则认为，某些神话可以在脱离仪式的情况下得以兴盛，反之亦然。换句话说，神话与仪式可能最初共同发挥作用，但后来却分道扬镳了。或者是，神话与仪式可能各有不同的起源，但其后却联合起来了。不论神话与仪式的关系究竟如何，神话-仪式主义理论探讨的重点就是这一关系，这一点与其他的神话理论相异，也与其他的仪式理论不同。

威廉·罗伯逊·史密斯

神话-仪式主义理论的开创者是苏格兰《圣经》学者和阿拉伯文化专家威廉·罗伯逊·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 1846—1894）。史密斯在其《闪米特宗教讲演录》中提出，对于现代 宗教来说，信仰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古代 宗教则不然；在古代宗教中，至关重要的是仪式。他认为，古代人施行仪式自然是有理由的。不过，这理由是次要的，甚至可能变来变去。这理由就是一则故事，即一则神话 ，而非正式宣告一种信仰或一个信条；这则神话就是对“在神的指示下或按照神的直接榜样，仪式最初得以确立的情形”的描述。

神话本身是“次要的”。仪式是强制性的，神话则是可选择的。一旦仪式确立，任何神话都可与之相合。甚至可以说，神话是在最初赋予仪式的非神话原因被遗忘之后，才得以产生的：

神话仅是对某种宗教用途的解释；一般来说，直到这种宗教用途的原初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被湮没，这一解释才可能产生。

（史密斯，《闪米特宗教讲演录》，第19页）

史密斯虽然是提出神话必须和仪式摆在一起来理解的第一人，但这绝不意味着在他的理论中，这一关系两端的神话和仪式是同等重要的。在史密斯看来，无论没有神话仪式会不会消失，没有仪式就绝对不会有神话。

由于阿多尼斯是一个闪米特神，因此史密斯在他的《讲演录》中谈到了阿多尼斯。史密斯有一个总的观点，即古代宗教没有罪的意识，因此献祭——仪式的主要形式——并非悔罪的表示；在此前提下，他从非道德的、神话的角度解释为死亡的阿多尼斯所作的仪式性“恸哭与哀悼”，并将之与较晚产生的、“耶稣基督是为人类的罪而死的基督教观念”加以对照：

对于一年一度的仪式的解释，如果除了某个神死而复生的故事之外，还提供了其他更多的描述（譬如阿多尼斯神话），那么这些额外的解释应是来源于自然界万物的枯朽与再生。迦南人的阿多尼斯——他们称之为坦木兹[1]……被其膜拜者看作是自然界万物生长与丰产的本源。他的死亡因此意味着自然界生命的暂时中断……膜拜者对这一自然界生命死亡的哀悼乃是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感同身受，并不包含任何道德的观念，正如现代人看到秋天树叶凋零时心生感伤一样。

（史密斯，《闪米特宗教讲演录》，第392页）

换句话说，最初存在的只是对阿多尼斯神的献祭仪式，以及施行这一仪式的不知什么非神话原因。这个仪式不仅包含了献祭的杀戮，还包含了对阿多尼斯的哀悼，以及对他死而复生的期盼。一旦施行这一仪式的原因被遗忘，阿多尼斯作为植物之神死而复生的神话就被创造出来，以此对原先的仪式作出解释。作为一则异教的而非基督教的神话，阿多尼斯神话不认为献祭的杀戮是有罪的。

史密斯理论的一个主要局限是，它只解释了神话而没有解释仪式，仪式被假定为当然的存在。其另一局限是，它显然使得神话受限于仪式——尽管史密斯在探索神话的后续发展时脱离了仪式。然而，

正如史密斯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即便把它当作是一种通常包含了神的作为的对仪式的解释，神话从诞生之日起也不仅仅就是仪式而已。

E. B. 泰勒

史密斯宣称神话是对仪式的一种解释，这就否定了E. B. 泰勒所主张的关于神话的经典的、标准的概念。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依照泰勒的观点，神话是对物质世界的一种解释，而非对仪式的解释，它独立于仪式之外发挥作用。神话是一种陈述，而不是一种作为；它等同于信条，并且只以故事的形式呈现。在泰勒看来，仪式之于神话是次要的，正如在史密斯看来神话之于仪式是次要的。史密斯的神话以仪式为先决条件，泰勒的仪式则以神话为先决条件。泰勒认为，神话的功能是解释世界，且这种解释本身就是目的；仪式运用这一解释来掌控世界。仪式是神话的应用，而不是神话的主题。神话的主题依旧是世界。在宗教中神话是比仪式更具重要性的一个方面，这既是因为仪式取决于神话，更是因为在泰勒看来，解释比掌控更为要紧。因此史密斯宣称“原始时代的宗教并不是一套有其实际应用的信仰体系”，而是“固定的传统习俗所构成的一个整体”，这可以被看作是直接针对泰勒的反驳。

但是，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史密斯与泰勒所持的观点相同。他们两人都认为，神话是完全属于古代的。现代宗教不包含神话，也不包含仪式。神话与仪式不仅是古代的，而且是原始的。事实上，他们都认为古代宗教只是原始宗教的一个实例，而从根本上说，原始宗教又是现代宗教的反衬物。泰勒提出，现代宗教不包含神话与仪式，是因为它不再关乎物质世界，而是成为了伦理学与形而上学的结合物；史密斯则认为，它是伦理学与信条的结合物。泰勒认为，由于缺少了神话，现代宗教从其古代和原始的崇高地位上跌落下来；史密斯则认为，由于割裂了与神话、乃至仪式的联系，现代宗教实现了自其古代与原始之起源的一次飞跃。在史密斯看来，现代宗教的缩影就是他本

人反天主教、因而是反仪式的长老会教义。泰勒和史密斯两人都将神话与仪式限定在古代的、原始的宗教中，这也是针对两人的主要批评的矛头之所向。

J. G. 弗雷泽

J. G. 弗雷泽的著述《金枝》本是献给他的朋友史密斯的，但他在此书的几个版本中发展出了一套远胜史密斯的神话-仪式主义理论。尽管《金枝》最出名的是将一切文化都分作巫术、宗教和科学三个阶段，这一巨著的主体关注的却是宗教与科学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亦即巫术与宗教相互缠结的阶段。这个阶段依然是古代的、原始的；也只有在这一中间阶段，神话 - 仪式主义才能被找到，因为只有在此时，神话与仪式才共同发生作用。

但是弗雷泽常常是前后矛盾的，他实际上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神话 - 仪式主义观点。第一种观点我们已经在第一章讨论过，即神话描述了众神中的主神之一植物之神的生活，仪式则将描述其死亡和复生部分的神话表演出来。仪式以巫术的相似性法则为基础发挥作用；依据这一法则，对某一行为的模仿即可引起该行为的发生。最能体现这类巫术的例证就是伏都教〔2〕。仪式直接操纵植物之神，而非草木本身；神若死去了，植物自然也就枯亡了。植物处于某一神灵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一态度是宗教的遗产；而植物可以被控制，即使只是间接地通过神来控制，这一态度则是巫术的遗产。神话与仪式的结合正是宗教与巫术的结合：

> 由此，关于季节变换的古老的巫术理论就被一种宗教理论所取代，或者不如说是为它所补充。因为尽管人们现在将一年四季的转换主要归因于神祇身上所发生的相应变化，他们依然认为，通过施行某种巫术仪式，自己能够在生命之神与死亡之神的斗争中对前者加以援助。他们认为自己能够使他失去的能量得以恢复，甚至可以使他起死回生。
>
> （弗雷泽，《金枝》，第377页）

当人们希望冬天结束——通常是在粮食储备将要耗尽——之时，这一仪式就会被施行。一个凡人——往往是国王——扮演神的角色，将他希望通过巫术引发的神的行为表演出来。

在我们一直没有提及的弗雷泽的第二种神话 - 仪式主义观点中，国王是最关键的部分。在这里，国王不仅扮演神的角色，而且他本人便是神性的：弗雷泽的意思是，神就居于他的身心中。正如草木的繁茂取决于植物之神的健康，这位神的健康现在取决于国王的健康：国王死了，植物之神也就死了，草木也就随之枯亡。为了确保充足的食物供给，部族群落杀死正当盛年的国王，由此安全地将神的灵魂转移到他的继任者身上：

> [原始人] 相信……国王的生命或精神与整个国家的繁荣休戚相关；假如他染上病症或是逐渐衰老，牲畜就要生病，不再繁殖，庄稼就会烂在地里，瘟疫会蔓延，导致人们大批地死去。因此，照他们看来，消除这些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国王依然身体健壮的时候杀死他，以便他从前任那里继承来的神灵能够在充满活力之际传给他的后任，而不致受到疾病与衰老的损害。
>
> （弗雷泽，《金枝》，第312—313页）

国王在一个短暂的任期结束或是一出现虚弱病征时就会被杀死。和第一种观点一样，杀死国王的目的是为了结束冬天，而冬天的来临现在被归因为国王的年老体衰。但是既然国王一旦出现衰弱征兆之时，或是甚至在这之前就会被杀死，为什么冬天还会持续呢？更不用说它每年都会来临了。对于这一点，弗雷泽从未作出过解释。

无论如何，事实证明，神话-仪式主义的这第二种观点产生的影响要深远得多，虽然依据这一观点，宗教神话与巫术仪式之间只存在着一种微弱的联系。仪式不再是对植物之神神话的搬演，而只是改变了这位神的居所。国王之死并不是对神的死亡的模仿，而是为了保存神的活力的一种献祭。神话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并不显见。仪式复活植物之神不是通过巫术的模仿，而是通过一个替换者来实现的。

按照弗雷泽的第一种观点，亦即真正的神话-仪式主义设想情境，神话起源于仪式之前，而不是像史密斯说的那样，起源于仪式之后。在巫术与宗教相结合的阶段被搬演的神话产生于宗教阶段，因此时间上早于应用它的仪式。在结合阶段，神话解释了仪式的中心要点（这和史密斯的观点一致），不过是从一开始就作出解释的（这一点和史密斯相异）。神话赋予仪式本源且唯一的意义。没有关于植物之神死亡与再生的神话，就绝不可能通过仪式搬演他的死亡与再生。弗雷泽仍然认为神话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是对植物生命进程的一种解释，这和泰勒的观点一致，而不同于史密斯所认为的，是对仪式的一种解释。不过，与泰勒不同的是，在弗雷泽看来，解释仅仅是实现控制的一种手段，因此神话是应用科学古代和原始的对应物，而不像泰勒所认为的那样，是科学理论的对应物。仪式依然是对神话的应用，但神话是从属于仪式的。

弗雷泽的神话 - 仪式主义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它不仅像史密斯的理论一样排除了现代神话与仪式，而且甚至将古代的、原始的神话-仪式主义也仅限于有关植物之神的神话——实际上是仅限于有关这位神死亡与再生的神话。

史密斯对阿多尼斯神话只是一笔带过，而弗雷泽却将其作为一个关键性的例证来探讨植物之神死而复生的神话与仪式。事实上，他在他所称的前科学的文化三阶段中——巫术的、宗教的、巫术与宗教相结合的——都留出了阿多尼斯神话的位置（且不论这样做是否前后一致）。

在第一阶段，也即巫术的阶段，弗雷泽指出了著名的栽种在花盆中的“阿多尼斯小花园”。在这一阶段，人类相信是非人格的力量——而非诸神的力量——引发了物质世界中的种种事件。古希腊人会在装满土的盆中播种，这不是为了恳求神让万物生长，而是通过巫术的相似律，迫使非人格的大地生长出各种植物：“因为无知的人们相信，通过模仿他们期望产生的结果，他们实际上帮助促成了这一结果的产生。”由于在这一阶段还没有诸神，阿多尼斯还不是一个植物之神。毋宁说，他就是草木本身。并不是植物象征着阿多尼斯，而是阿多尼

斯象征着植物。

在弗雷泽的第二个、亦即宗教的阶段，诸神取代巫术的法则成为了物质世界种种事件的根源，因此阿多尼斯至少在字面意义上成为了植物之神。作为植物之神，人们最直接的做法就是要求他保证作物的生长。这一要求亦可以通过服从神的仪式和道德指令来得到强化。弗雷泽自己写道，人们为阿多尼斯施行哀悼的仪式，是为了求取他的原谅，而不是像在下一阶段中那样，为了使他复生。这是由于阿多尼斯之所以死去，并非因为下一阶段中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他去到了冥府，而是因为在收割、碾压、磨碎谷物——在草木之中阿多尼斯具体象征的部分——的过程中，人类杀死了他。阿多尼斯的死亡不是“夏日的炎热或冬日的严寒所造成的草木的自然枯亡”，而是“人类对谷物暴力毁灭”的结果。然而，阿多尼斯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活着，并且有足够的能力惩罚人类，而祈求宽宥的仪式正是旨在避免他的惩罚。但是，由于阿多尼斯之死是因为植物之死，因此这里的神如同在第一阶段一样，实际上只是被认为由他所控制的那种元素的一个隐喻。只要植物枯亡，阿多尼斯也就死亡了。

在弗雷泽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巫术与宗教相结合的阶段，阿多尼斯终于看来好像是神了。如果说在第二阶段，随着植物枯亡，阿多尼斯也就死亡了，现在则是，由于阿多尼斯的死亡，植物似乎也就枯亡了。阿多尼斯的死是因为他进入了冥府，去和珀耳塞福涅呆在一起。弗雷泽假定，不论阿多尼斯进入冥府是否为自己的意愿，他都因为太虚弱而无法自己离开冥府。通过搬演他的再生，人类助他一臂之力。一方面，这一搬演利用了巫术的相似律。另一方面，这一搬演并不像在第一阶段那样，是强使阿多尼斯的复活发生，而是予以他支持；尽管此时的阿多尼斯处于死亡的状态，但他仍然有再生的力量，只是需要帮助才行。在这一阶段，诸神仍然控制着物质世界，不过，他们对物质世界的影响是自动的，而非特意的。搬演阿多尼斯的再生意在促使他复活，并通过他的复活促使草木的复苏。

图7　北美米纳塔利人的甜玉米丰收舞，19世纪插画，乔治·卡特林作

然而，即使是在这一阶段，弗雷泽也只探讨了阿多尼斯生命的一个方面：即与草木每岁的枯荣相对的他的死亡和再生。阿多尼斯的生命中非自然的 方面，即始自他乱伦的出生的那个方面被忽略了。被忽略的方面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阿多尼斯的最终死亡，即使撇开这一死亡的非自然的原因——被杀，甚至是被谋杀——不谈。弗雷泽这么做是必须的。假若阿多尼斯的生命象征了草木的枯荣，那么他就必须不断地死而复生。但是，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阿波罗多罗斯的故事中，不论阿多尼斯是怎样一年一次避开死亡的，他的复活最终没能继续。在奥维德的故事中，阿多尼斯从来没有死后又再复生，维纳斯郁郁不欢正是因为他的一去不返。那么，他短暂的、终有一死的生命如何象征永恒的再生呢？他又怎么能被称为神呢？弗雷泽从未给我们答案。

最后，弗雷泽再一次无视前后的矛盾，又宣称阿多尼斯的生命甚至在巫术与宗教的相结合阶段也只是植物荣枯本身的一个象征：关于阿多尼斯每年在冥府度过一段时间的神话

可以有以下最简单和最自然的解释，即认为他代表了植物，特别是谷物；谷物正是有半年埋藏于土壤之中，有半年长出地面的。

（弗雷泽，《金枝》，第392页）

这里，阿多尼斯并非造成植物荣枯命运的原因，而只是这一命运的一个隐喻，因此在第三阶段，正如在第二阶段一样，植物枯亡了，阿多尼斯就死亡了，而不是正相反。如果不再存在通过仪式能够得以复生的神，如果对植物一岁一枯荣的现象只存在描述而没有解释，神话 - 仪式主义还怎么可能站得住脚呢？这一点令人疑惑。这种将神话看作对自然过程的象征性描述的观点，使弗雷泽颇似19世纪一个以德国人为主的理论家群体；后者被恰如其分地称作自然神话学家。

简·哈里森和S. H. 胡克

神话 - 仪式主义理论发展至下一阶段要归功于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 1850—1928）和S. H. 胡克（S. H. Hooke, 1874—1968）；这两人是神话 - 仪式主义最初的主要团体古典主义学者和《圣经》学者在英国的领军人物。他们的理论立场是相近的，都大体上赞同弗雷泽的第一种神话 - 仪式主义设想；不过胡克几乎和弗雷泽一样自相矛盾，他有时也赞同弗雷泽的第二种设想。与弗雷泽不同的是，胡克与哈里森并没有提出存在明确的、较早的巫术和宗教两个阶段。两人的起始阶段相当于弗雷泽那个结合的第三阶段。和弗雷泽一样，他们认为神话 - 仪式主义是现代科学古代的、原始的对应物，现代科学不仅取代了神话 - 仪式主义，也取代了神话和仪式本身。哈里森与胡克对弗雷泽的追随最明显地体现在以下这一点：他们将当时而言更为高级的宗教——泛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和《圣经》时代的以色列的宗教——看作原始宗教。人们过去一贯、现在也依然常常主张的虔诚观点则是，希腊和以色列的地位远在其蒙昧无知、依然处于巫术阶段的邻邦之上。

哈里森还进入了弗雷泽与胡克未曾踏足的探索领域：她在植物更

生的仪式之外又加上了进入社会的成年仪式。她甚至提出，最早的仪式尽管也是每年举行一次，但却是完全成人仪式性质的。当时并没有神话。因此，与史密斯一样，她也认为仪式先行于神话。神仅仅是由仪式而产生的欣悦的一种投射。后来，神变成了植物之神，于是关于这个神死而复生的神话诞生了，成人仪式也变成了一种农业仪式。正如成人仪式的参加者象征性地死亡，又再生为完全成熟的社会成员一样，植物之神乃至庄稼是事实上地死亡然后复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一两者相结合的仪式中有关成人仪式的方面消失了，只有弗雷泽式的、农业的仪式保留了下来。

哈里森与胡克都激烈反对史密斯认为神话是对仪式的一种解释的观点。哈里森宣称："神话既不是对事实、也不是对仪式试图作出的解释。"但她和胡克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并没有比弗雷泽说的更多。神话仍然是对仪式中正在发生的事的解释，只不过不是对仪式如何产生的解释。神话就如同是一部电影中的声音或一场哑剧中的旁白。胡克写道："一般来说，仪式的言说部分是对正在进行中的事情的描述……我们所探讨的'神话'也就是在此意义上而言的。"哈里森则更是简洁明了："神话的主要意义……就是所表演的仪式、所做的事的言语关联物。"

哈里森与胡克都比弗雷泽走得更远。对弗雷泽来说，神话的力量只是戏剧的，而哈里森与胡克则认为，神话的力量完全是巫术的。胡克写道："言说的话语具有行动的效力。"哈里森写道："神话实际上变成了具有巫术意图与力量的一则故事。"这里我们看到了言语的巫术。当代的神话 - 仪式主义者——如美国的古典主义学者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诉诸口头而非书面文学的本质，提出神话原本与仪式或表演的关系是如此之紧密，以至它本身即是仪式性的：

> 一旦我们将神话看作表演，我们就可以看出，神话本身就是仪式的一种形式：我们不再分离地、对比地来看神话与仪式，而是将它们之间看作一种延续关系；神话是仪式的言说部分，而仪式则是神话的概念部分。
>
> （格雷戈里·纳吉，《神话能获得拯救吗？》，第243页）

这一观点是否是对哈里森与胡克的超越，现在还远远无法说清楚。

这一理论的应用

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F. M. 康福德和A. B. 库克（A. B. Cook）三位古典主义学者都为英国人或定居于英国；他们将哈里森的理论运用于悲剧、喜剧、奥林匹克竞赛会、科学以及哲学等古希腊文化现象。这些看似世俗的、甚至是反宗教的现象被解释为植物之神死而复生神话的隐性表达。

而在《圣经》学者当中，瑞典人埃万·恩内尔（Ivan Engnell）、威尔士人奥布里·约翰逊（Aubrey Johnson）和挪威人西格蒙德·莫温克尔（Sigmund Mowinckel）在以下的这个问题上观点相异：古代人，特别是古代以色列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遵循了神话 - 仪式主义模式呢？恩内尔认为他们是严格遵循的，比审慎的胡克所认为的更为严格；而约翰逊，特别是莫温克尔则认为他们所遵循的程度比胡克所认为的要弱。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他的理论我们在第一章讨论过）借助弗雷泽的观点，将自己施加了限制条件的理论运用于世界各民族的神话。和史密斯的观点一样，他提出神话解释了仪式的起源，赋予了仪式一个久远的过去，由此使它们获得了存在的理由。社会依赖于神话来促使人们遵循仪式。但是，对马林诺夫斯基来说，不仅所有仪式都依赖于神话，社会所倚靠的许多其他文化习俗也依赖于神话。它们都有自己的神话。因此，神话与仪式的范围并不相等。

米尔恰·伊利亚德（他的理论我们在第三章讨论过）所运用的理论与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形式相似，但是他却超越了后者，将这一理论同时运用于原始和现代文化。他同样认为，通过赋予它们一个太初的起源，神话使各种各样的现象（不仅仅是仪式）获得了存在的理由。

因此他也认为，神话与仪式的范围是不相等的。但是，伊利亚德在这里又比马林诺夫斯基更进一步，他强调神话的仪式性搬演对实现神话终极功能的重要性：被搬演的神话起到了一台时间机器的作用，将人们传送回神话时代，也因此使其更接近神。

这一理论在文学中的应用

在宗教领域之外，神话 - 仪式主义理论的运用最为显著的例证是在文学中。哈里森本人大胆地提出，不仅是文学，一切艺术均起源于仪式。她推断道，人们逐渐地不再相信模仿某一行动能够引发那个行动的发生。但是他们并没有抛弃仪式，而是将施行仪式本身就作为目的。为其本身而施行的仪式就变成了艺术，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戏剧。在这个问题上，默里和康福德的观点比哈里森要温和得多，他们将植根于神话 - 仪式主义的艺术形式专门划定为希腊史诗、悲剧和喜剧。默里此后又将这一理论延展到了莎士比亚的作品。

扛起这一理论大旗的学者还包括了将之应用于圣杯传说的杰西·韦斯顿（Jessie Weston）、应用于浮士德传说的E. M. 勃特勒（E. M. Butler）、应用于沙翁喜剧的C. L. 巴伯（C. L. Barber）、应用于沙翁悲剧和悲剧本身的赫伯特·魏辛格（Herbert Weisinger）、应用于悲剧的弗朗西斯·弗格森（Francis Fergusson）、应用于英雄神话和作为整体的文学的拉格伦勋爵（Lord Raglan），以及广泛地应用于文学的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和斯坦利·埃德加·海曼（Stanley Edgar Hyman）。可以理解的是，作为文学批评家，这些神话 - 仪式主义者更为关注的是文学的神话起源，而非神话本身。文学作品被解释为曾经与仪式相关的神话的产物。这些文学批评家绝大多数都受惠于弗雷泽，对他们来说，文学最终应追溯到弗雷泽神话 - 仪式主义的第二种设想情境。“国王必须死”成了一个概括性的名句。

对于神话 - 仪式主义的文学批评家来说，当神话割裂了与仪式的联系之后，它就变成了文学。与仪式相关联的神话是宗教文学，与仪

式相分离的神话便是世俗文学，或者说普通文学。当与仪式相关联时，神话可以发挥神话 - 仪式主义者认为它所具有的任何积极功能。一旦脱离了仪式，神话的功能就仅仅剩下评论了。

文学的神话 - 仪式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并非关乎神话与仪式本身——两者都被假定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关乎它们对文学的影响。不过，这种理论也不是文学理论，因为它拒绝将文学简化为神话。文学的神话 - 仪式主义是对神话与仪式转变为文学的一种解释；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详加讨论。

勒内·吉拉尔

拉格伦勋爵在其著述《英雄》（下一章中将对它详加讨论）中扩展了弗雷泽神话 - 仪式主义的第二种设想情境，将为社会群体而死的国王转变为一个英雄。出生于法国、其后定居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1923— ）尽管从未引述过拉格伦的观点，却在其《暴力与神圣》及随后的许多著作中对拉格伦的这一理论作了反讽式的解读。拉格伦的英雄是自愿为社会群体牺牲的，吉拉尔的英雄却是因为造成了社会群体的苦难而被其杀死或放逐的。实际上，“英雄”最初是被看作罪犯的，也是理当受死的。只是到了后来，恶徒才变成了拉格伦式的、无私为群体献身的英雄。拉格伦和吉拉尔都将俄狄浦斯神话作为最能充分说明自己观点的例证。（尽管借用了俄狄浦斯神话，但他们两人都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两人都对弗洛伊德不屑一顾。）在吉拉尔看来，俄狄浦斯从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俄狄浦斯王》中那个遭人唾骂的被流放者转变为同一剧作家《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那个受到尊崇的恩主，这一转变正象征了从罪犯到英雄的转变。

但是，这一转变对吉拉尔来说，仅仅是整个转变过程中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从无辜的受害者到罪犯的转变。最初之时，社会群体中爆发了暴力行为。其根源是人性固有的模仿他人的倾向，并由此造

成了模仿者与被模仿者渴望同样的对象。模仿导致了对抗，对抗导致了暴力。社会群体不惜一切代价想要结束这种暴力，于是便选择了一个无辜的成员，将混乱的责任全部推到他的头上。这个“替罪羊”可以是任何人，从社会中最下层、最无助的成员到最上层、最显要的人物（譬如俄狄浦斯王）都可能被选中。这个牺牲者通常都被杀掉，但有时也被放逐，如俄狄浦斯王即是如此。这一杀戮是仪式性的献祭。对弗雷泽来说，神话指导 仪式，而对吉拉尔来说，神话是在杀死牺牲者的仪式之后　被创造出来，以便为这一杀戮开脱　的。神话来源于仪式，这一点他和史密斯的观点一样，但是神话的产生是为了证明仪式的正当性，而不是为了解释仪式，这一点又与史密斯相异。神话将替罪羊变成了一个法理当诛的罪犯，然后又将这一罪犯变成了一位甘为社会群体的福祉牺牲的英雄。

吉拉尔的理论围绕着神话中的主角在社会中的地位展开，它似乎完全不适用于阿多尼斯神话。阿多尼斯的死说不上是自愿的，也说不上是无私的。他所居住的世界——森林和冥府——似乎完全远离社会。不过，在本书的第八章中，我们将从社会的角度阐释这则神话，而且还将论及吉拉尔本人对俄狄浦斯神话的阐释。

尽管吉拉尔从未引述过拉格伦的理论，他却经常引述弗雷泽。他赞同弗雷泽神话 - 仪式主义的第二种设想情境，并称赞弗雷泽为我们指出了弑君这一原始社会关键性的仪式；不过，他也批评弗雷泽忽略了弑君仪式真正的起源和功能。在弗雷泽看来，献祭仪式天真地应用了对世界蒙昧的、前科学的解释：国王被杀死和取代，这样，居于在位国王身心内的植物之神的灵魂就能够留住或恢复健康。献祭的功能完全是农业性的。人们对牺牲者并不怀有怨恨，他只是完成了自己作为国王的职责，而在整个过程中他的自我牺牲也是受到人们颂扬的。弗雷泽的这些观点在吉拉尔看来是对神话的掩饰手段信以为真了。仪式——以及随后产生的神话——的真正起源和功能是社会性的，而非农业性的；这一点将在第八章中加以讨论。

瓦尔特·布尔克特

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可能是修改神话与仪式不可分离这一教条的第一人。德国古典主义学者瓦尔特·布尔克特（Walter Burkert，1931— ）则又比克拉克洪更进了一大步；他不但认为神话与仪式在起源上相互独立是可能的，而且完全认定事实就是如此。他宣称，当神话与仪式最终走到一起时，它们并不像克拉克洪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在发挥同一种功能，而是相互补充强化对方。神话赋予单纯的人类行为一种神性的起源（因为神过去或现在这样做，所以我们这样做），以此支撑了仪式。反过来，仪式将单纯的故事变成为一种最恭顺的规定行为（如果不这样做，即使不招来惩罚，也会招来苦恼），从而支撑了神话。史密斯认为，神话服务于仪式，而布尔克特则认为，仪式也同样服务于神话。

和吉拉尔一样，布尔克特认为神话的根源在于献祭，而献祭的根源在于敌对行为；但他并不把献祭仅仅局限于人祭，而是认为献祭的根源在于狩猎——敌对行为原初的表达形式。进一步说，在布尔克特看来，神话的功能并不像吉拉尔所认为的那样，是要掩盖献祭的事实，而是正相反，是要使之留存，从而维持它的心理和社会影响。最后，布尔克特不仅将神话与献祭仪式联系起来，而且和哈里森一样，将它与成人仪式联系起来。在这里，神话具有的是和仪式一样的功能，即社会化。

在布尔克特看来，仪式是一种“仿佛”的行为。以他的核心例证来说，“仪式”的习俗和礼节并非发生在实际狩猎过程中，而是发生在戏剧化的狩猎中。其功能已不再是弗雷泽所说的获取食物，因为严格意义上的仪式是在农耕取代狩猎成为食物的主要来源之后才产生的：

> 一万多年前，随着农业的兴起，狩猎丧失了它最基本的功能。但是，狩猎仪式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以至无法被放弃了。
>
> （布尔克特，《希腊神话和仪式的结构与历史》，第55页）

因此，实际狩猎以及之后仪式化的狩猎的群体性质，其功能是减轻人们对自己的攻击行为以及无法避免的死亡的焦虑；与此同时，它也在参与者之间打造了一条起团结作用的纽带。它的功能是心理和社会性质的，而非农业性的。

对布尔克特来说，阿多尼斯神话可能会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阿多尼斯的狩猎不但是单独而非群体的，而且阿多尼斯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猎手，更不消说他也没有备受焦虑的煎熬了。对阿多尼斯来说，狩猎更多的是一项娱乐和消遣，绝不是什么攸关生死的交战。因此，狩猎在心理上或社会上都不可能为他带来任何帮助。不过他的传说仍然对他人具有警示作用，这一点也将在第八章中加以讨论。

图8　猎捕卡莱敦野猪，塞尔韦特利出土的拉哥尼亚希腊酒杯上的饰画，公元前6世纪

注释

〔1〕 坦木兹是美索不达米亚崇拜的化育之神，体现春天万物复苏的力量。

〔2〕 西印度群岛（特别是海地）和美国南部一些地区的一种信仰巫术的民间宗教。

第五章
神话与文学

神话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具有种种不同的形式。最显而易见的是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到神话。文学课程的一个常规主题就是在西方文学中追寻古典神话的人物、事件和主题；其研究对象始于早期基督教教会的主教和著作家（他们虽然激烈地反对异教，却在自己的著述中使用古典神话），中经彼特拉克（Petrarch）、薄伽丘（Boccacio）、但丁（Dante）、乔叟（Chaucer）、斯宾塞（Spenser）、莎士比亚（Shakespeare）、弥尔顿（Milton）、歌德（Goethe）、拜伦（Byron）、济慈（Keats）和雪莱（Shelley），直到乔伊斯（Joyce）、艾略特（Eliot）、纪德（Gide）、科克托（Cocteau）、阿努伊[1]和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对《圣经》神话的文学研究也大抵如此。这两组神话或从字面得到解读，或从象征层面得到解读，或被重新组织，或被完全地重新创作，并且在包括音乐与电影在内的所有艺术形式中都可以找到。弗洛伊德（Freud）使用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俄狄浦斯和伊莱克特拉的名字来命名人类最根本的两种冲动；他还从精神病医生处借用了那喀索斯这一神话人物来给“自恋”命名。

古典神话——或者说异教神话——的流行相比《圣经》神话是一件更加了不起的事，因为它2,000年前原属的宗教在随后的历史中已经消亡了，而古典神话却留存了下来。与之相比，《圣经》神话所属的宗教现今几乎是一统的存在，而《圣经》神话也一直得到它的支持。事实上，将古典神话保存下来的那个文化与《圣经》神话的宗教紧密相关，而正是这一宗教导致了古典宗教的灭亡。直到不久之前，“信奉异教”这个词还都一直带有负面的蕴意。古典神话留存了下来，而其所属宗教的其余部分却消亡了，这是泰勒关于神话与宗教命运的观点具有讽刺意味的逆转——尽管泰勒所指的是基督教的留存，而非异教，而且他指的是基督教面对现代科学而非另一敌对宗教的情形。

文学的神话起源

神话与文学关系的另一种形式前一章已经提及，那就是文学起源于神话；这一研究方法是由简·哈里森和她的古典主义同仁吉尔伯特·默里、F. M. 康福德开创的。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在《从仪式到传奇》中，英国中世纪问题专家杰西·韦斯顿（1850—1928）运用了弗雷泽的第二种神话 - 仪式主义观点来解读圣杯传说。她赞同弗雷泽的说法，宣称在古代人和原始人看来，土地的丰饶与否取决于他们国王的生殖力，因为植物之神居于他的身心中。然而，弗雷泽认为，最重要的仪式是取代病弱的国王，韦斯顿则认为，寻找圣杯的目的是使国王恢复青春活力 。此外，韦斯顿还为这一观点添加了一个缥缈的、精神的维度，从而超越了弗雷泽。她指出，寻找圣杯不是为了向神索要食物，而是寻求与神的神秘同一。正是这一传说的精神维度启发T. S. 艾略特在《荒原》中搬用韦斯顿的观点。韦斯顿不是把圣杯传说简化为原始神话和仪式，而只是追溯这一传说至原始神话与仪式。这一传说本身是文学，而非神话。由于弗雷泽的第二种神话 - 仪式主义设想情境并非关于搬演植物之神的任何神话，而是关于处在统治地位的国王的状况，因此，产生这一传说的并不是讲述阿多尼斯之类的神生平的神话，而是讲述圣杯国王本人生平的神话。

在《戏剧的概念》一书中，美国著名戏剧批评家弗朗西斯·弗格森（1904—1986）将弗雷泽的第二种神话 - 仪式主义观点运用于整个悲剧体裁。他提出，悲剧英雄受难和救赎的故事源自弗雷泽杀死和取代国王的设想情境。例如，忒拜国王俄狄浦斯为了他的臣民，虽然不必牺牲生命，但是必须牺牲王位。只有他的退位才能让瘟疫停止。但是和韦斯顿一样，对弗格森来说，寻求重生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而非肉体上的；在弗格森看来，俄狄浦斯寻求重生既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他的人民。

其他大多数文学的神话 - 仪式主义者主要关注戏剧的源头，即神话和仪式，而弗格森对源头和它的产物——即戏剧——给予了同等的

关注。他甚至批评哈里森和默里，特别是后者，将悲剧的意义说成是弗雷泽式弑王的搬演，而非自我牺牲的主题。弗格森和韦斯顿一样，都认为弗雷泽设想的情境只是为文学提供了一个背景，但它本身是神话与仪式，而非文学。

在《批评的解剖》中，著名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1912—1991）提出，不仅是某一种文学体裁，而是所有的文学体裁都来源于神话——具体地说，是来源于英雄生平神话。弗莱将英雄的生命周期与几个其他周期联系了起来：一年四季的变换、一日太阳的升沉、睡梦与清醒的交替。与四季更迭的联系出自弗雷泽。与太阳升沉的联系没有指明，可能是出自马克斯·缪勒。与梦的联系出自荣格。四季更迭与英雄行为的关联也没有指明出处，但可能出自拉格伦（下文将简短地专门对他进行讨论）。弗莱提出了自己的英雄模式，他称之为“追寻神话”；不过，这一模式只包括四个宽泛的阶段：英雄的出生、胜利、孤立和失败。

弗莱认为，每一种主要的文学体裁都同时与一个季节、一天中的一段时间、意识中的一个阶段、以及（最重要的）英雄神话中的一个阶段相对应。传奇对应的是春天、日出时分、醒来时的意识和英雄的出生。喜剧对应的是夏天、正午时分、清醒时的意识和英雄的胜利。悲剧对应的是秋天、日落时分、白日梦的意识和英雄的孤立。讽刺文学对应的是冬天、夜晚时分、沉睡时的意识和英雄的失败。文学体裁不仅与英雄神话相对应，而且起源于英雄神话。而根据弗雷泽神话-仪式主义中具有神性的国王被杀死和取代的观点，英雄神话本身又起源于仪式。

和大多数文学的神话-仪式主义者一样，弗莱并没有将文学简化为神话。相反，他是这些人中最不妥协的一位，坚持文学的自主性。他像弗格森一样，并未指责默里和康福德推断悲剧（默里）和喜剧（康福德）的神话-仪式主义起源，而是批评他们将悲剧与喜剧的意义解释为对弗雷泽式弑王的搬演；在这里，前者是一个非文学问题，而后者是一个文学性问题。

不过，接下来弗莱却不仅利用弗雷泽与荣格的理论来帮助分辨文

学的起源，而且还用来分辨文学的意义。因为在他看来，弗雷泽与荣格的重要著述本身就是文学批评，而非仅仅是——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人类学或心理学的著作：

> 《金枝》和荣格探讨力比多象征的著作［即《转化的象征》（《荣格全集》第5卷）］对文学批评家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因为它基于……这一事实，即这些著作主要是文学批评研究。……《金枝》实际上并非讲述人类在蛮荒的远古做了什么；它讲述的是人类的想象在最伟大的奥秘——生命、死亡和死后的世界的奥秘——面前，是如何试图表达自己的。
>
> （弗莱，《文学的原型》，第17页；《无意识的象征作用》，第89页）

弗莱同样也将荣格的《心理学与炼金术》（《荣格全集》第12卷）挑了出来，称它“并非仅仅是对一门死科学［即炼金术］和维也纳心理学派之一的似是而非的比较，而是一本文学象征主义的入门书，对所有严肃的文学研究者来说不仅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弗莱将弗雷泽和荣格在本质上划归为神话搜集家而不是理论家，这显然是走得太远了。弗雷泽和荣格二人都致力于解释神话的起源与功能，而不仅是神话的意义，他们所提供的神话的“语法”是作为象征符号的证物，而不是其汇编。弗雷泽声称，弑王的仪式确实发生过，虽然它后来逐渐淡化为纯粹的戏剧。荣格声称，原型的确存在于人的心灵中，甚至存在于世界上。

尽管弗莱并未将文学简化为神话，但由于他把神话与文学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他的文学批评被含混不清地称作“神话批评”，而他本人也常常被认为是“神话批评”最主要的实践者。他的文学批评还同样普遍地被人称作“原型批评”，因为他把文学的各种体裁称作“原型”，这一无意的举动让人们误认为他是一个荣格主义者；由此他又被认为是“原型批评”最重要的实践家。为此添乱的是，始自莫德·博德金（Maud Bodkin）的《诗歌中的原型模式》，确实存在一批彻头彻尾的荣格主义文学批评家，他们被称作原型批评家是完全恰当的。而

乱上添乱的是，存在一批称自己为“原型心理学家”而非荣格主义者的后荣格主义者。这其中最著名的是詹姆斯·希尔曼（James Hillman）和戴维·米勒（David Miller），他们就神话这一论题著述颇丰。

勒内·吉拉尔的理论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讨论过，他在《暴力与神圣》以及其他著作中为神话与文学画出了最为清晰的分界线。和弗格森、弗莱一样，他批评哈里森与默里将神话与仪式和悲剧混为一谈。但他对这两人更为严厉的指责则是他们将悲剧通俗化了。在哈里森和默里看来，神话仅仅是描述 弗雷泽式的仪式，悲剧仅仅是将其戏剧化。更糟的是，悲剧将一个真实事件变成为纯粹是一个主题。在吉拉尔看来，神话为仪式的正当性辩解 ，而悲剧——譬如索福克勒斯关于俄狄浦斯王的戏剧——则揭示 了真相。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吉拉尔的批评指向的是弗雷泽的第二种神话 - 仪式主义设想情境；依照这一设想，国王被杀死了。哈里森与默里采用的则是弗雷泽的第一种神话 - 仪式主义设想情境；依照这一设想，国王只是扮演了植物之神的角色。在这一情境中，神死了，国王却没有死，而神也不一定是被杀死的，如阿多尼斯一年一度下到冥府的旅程所示。吉拉尔抨击哈里森、默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抨击弗雷泽，指责他们忽略了构成一切悲剧基础的人祭，这显然是弄错了矛头的方向，有点令人哭笑不得。

作为故事的神话

在把神话当作文学的观点中，另一个研究角度是专注于两者拥有共同的故事线索。泰勒和弗雷泽的著述中都没有提及把神话作为故事。（这里我使用“故事”，而不用目下流行的更为花哨的“叙述”一词。）这并不是说泰勒或者弗雷泽拒绝承认神话是故事。事实上，他们都把神话看作是对事件的根源所作的解释，只不过碰巧采用了故事的形式罢了。若将神话与科学当作可相比拟的事物，就要求强调神话解释的内容，而弱化其故事的形式。当然，对他们两人来说，神话都讲述了赫利俄斯如何成为太阳升落的掌管者，又如何行使他的职责

的“故事”，但是令泰勒和弗雷泽感兴趣的是这一信息本身，而非它的表达方式。通常文学上的考量，诸如人物塑造、时间、叙述者、视点、以及读者的反应等等，都被忽略，正如这些问题在分析一条科学法则时都会被忽略一样。

由于泰勒和弗雷泽认为神话旨在解释反复发生的事件，因此神话在不同的措词下也可以被看作是一条法则。例如：不论何时下雨，都是因为雨神决定要让雨落下，而且都是出于同一原因。太阳每天升起，都是因为太阳神决定登上他的战车驶过天空，而太阳就连接在战车上；同样地，每次也都是出于同一原因。在弗雷泽认为诸神都是自然过程的象征的情况下，语言经过重新组织的神话就只能是描述性的，而非解释性的：它仅仅陈述下雨了（无论是否存在规律）或太阳升起了（规律性地），而并不说明为什么。

从字面解读神话的泰勒尤其强调神话绝对不是文学，将神话视作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对神话的矮化，是将其揭示真理的解释性主张转变成了词藻华丽的诗化描述。弗莱和其他人提出文学不能简化为神话，而泰勒则提出神话不能简化为文学。后现代主义诞生之后，包括科学与法律在内的所有领域的论点都被重新划分为故事，泰勒对神话的故事性质的无视便凸现出来了。

站在美国文学批评家肯尼思·博克（Kenneth Burke, 1897—1993）的立场来看，泰勒将神话与故事截然分离的做法同样是十分扎眼的。博克在其著述、特别是《宗教修辞学》中提出，神话是从玄学到故事的转化形式。神话通过时间的优先级象征性地表达了原始人无法通过字面表达的东西：形而上的优先级。用博克的名言来说，神话是“对本质的时间化”。例如，《创世记》中的第一则创世故事实际上以六天这一形式表达了将世上万物“分类”为六大范畴：

> 这样，我们就不说“这就完成了对我们的主题的第一大分类”，而是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
> （博克，《宗教修辞学》，第202页）

尽管在博克看来神话从根本上说是对非时间性真理的表达，但他仍然认为这一表达采用的是故事的形式，因此，即使需要将神话的意义从形式中抽离出来，故事依旧是使神话成其为神话的要素。博克在这里颇似列维 - 施特劳斯，后者将神话视作故事的研究方法我们将在第七章中加以讨论。博克称作“本质”的东西，列维 - 施特劳斯称作“结构”。

神话模式

放在一起来看，神话太过纷繁，并不具有相同的情节，但是有些研究者提出，对于某一特定类别的神话来说，共同的情节是存在的，这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在英雄神话中。其他类别的神话，譬如创世神话、洪水神话、关于天堂的神话、关于未来的神话等，其内部都差别甚大，因此只能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探讨共同点。泰勒只把讲述某一位神如何决定引发一个自然事件的神话作为具体讨论的对象，至于这神是什么样子的，是如何行事的，则不在他的讨论范围之内。弗雷泽将注意力集中在植物之神上，又进一步具体化为植物之神的死亡和再生这一事实，而不涉及死亡和再生是如何发生的。

不过，出人意外的是，1871年，泰勒曾经短暂地将注意力从关于诸神的神话转向英雄神话；他提出，在许多英雄神话中，主人公都在出生时被弃于荒野，接着被他人或动物所救，最终长大成人，成为民族英雄。泰勒寻求的只是确立一种共同的模式，他并无意将自己关于一般神话起源、功能和主题的理论应用到英雄神话上来。尽管如此，他诉诸这一模式的一致性，宣称不论英雄神话的起源、功能或主题是什么，它们在一切英雄神话中必然是相同的，由此才可解释英雄神话在情节上的相似性：

> 将不同地区相似的神话分类为可以比较的大组，就可以在神话中追寻由于精神活动法则明显的规律性而反复发生的想象过程的机理。
>
> （泰勒，《原始文化》，第1卷，第282页）

弗莱认为神话是不受束缚的想象力的产物，而泰勒则认为，产生神话的想象力受制于严格的认知限制——这一观点预示了今天的认知心理学。

1876年，奥地利学者约翰·格奥尔格·冯·哈恩（Johann Georg von Hahn）通过14个具体例子论证道，所有“雅利安”英雄传说都遵循一个“遭弃和回归”的模式，这一模式比泰勒的更为具体。在每一个例子中，英雄都是私生子；出于对预言中他未来伟业的恐惧，他被自己的父亲所抛弃；接着他为动物所救，被一对下层的夫妇抚养长大，然后参战，获胜荣归，打败迫害者，解救母亲，成为国王，建立城市，英年早逝。虽然冯·哈恩本人是一个太阳神话的研究者，但他像泰勒一样，只是试图为英雄神话确立一种模式。倘若他想要更进一步将这些传说理论化的话，相信他的理论会建立在共同情节的基础之上。

与之类似的是，1928年，俄罗斯民俗学家弗拉基米尔·普罗普（Vladimir Propp）力图证明，俄罗斯童话故事遵循一条共同的情节线索；故事中的英雄在冒险过程中建功立业，然后荣归家乡，成就婚姻，取得王位。普罗普的模式回避了英雄的出生和死亡。尽管普罗普本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这里、在他早期的形式主义阶段，除了为英雄故事确立一个模式之外，他并没有比泰勒和冯·哈恩提出更多。不过，由此我们再次看出，任何理论上的概括都是基于情节的共同性的。

在那些从英雄神话中归结出模式、进而又将之理论化的学者当中，最重要的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Otto Rank, 1884—1939）、美国神话搜集家约瑟夫·坎贝尔（1904—1987）和英国民俗学家拉格伦勋爵（1885—1964）。兰克虽然后来与弗洛伊德无可挽回地决裂，可是他在撰写《英雄诞生神话》时，却是弗洛伊德的弟子。坎贝尔虽然从来称不上是一个完全的荣格主义者，他撰写的《千面英雄》却与荣格一气同声。而拉格伦撰写他的《英雄》时则是一个弗雷泽主义者。兰克与坎贝尔的著述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神话与心理学时详加剖析。这里我们以拉格伦为例，着重谈谈情节的向心性。

拉格伦勋爵

拉格伦采纳了弗雷泽的第二种神话 - 仪式主义观点，并将之运用于有关英雄的神话。弗雷泽将国王等同于植物之神，而拉格伦则转而将国王等同于英雄。在弗雷泽看来，国王愿意为社群作出牺牲可以说是英雄行为，而拉格伦则更进一步，直截了当地给国王贴上了英雄标签。弗雷泽就神的神话呈现了一个简单明了的模式：神的死而复生。拉格伦则为英雄神话设计了一个22步的复杂模式，并将之运用于对21篇神话故事的研究。不仅如此，拉格伦还将神话与仪式联系起来。让我们回顾一下弗雷泽的第二种观点：仪式并非是对神死而复生的神话的搬演，而是将神的灵魂直接从一位国王转移到另一位国王身上。这其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神话。拉格伦则提出，英雄神话的核心不是王位的取得，而是王位的丧失，由此他将英雄神话与弑王的弗雷泽式仪式对应起来。在英雄神话中丧失王位、随后又丧失性命的国王和仪式中同时丧失两者的国王甚为相似。拉格伦所指与仪式相联系的神话并非关于神的神话，而是英雄神话——这些传说中人物的无私精神是人们期望真正的国王能够效仿的。因此，严格地说来，这神话并非如同在弗雷泽设想的第一种 神话 - 仪式主义情境中，是仪式的脚本，而是产生仪式的灵感。

1．英雄的母亲是一个王室的处女；
2．英雄的父亲是一位国王，而且
3．往往是其母亲的近亲，但是，
4．他母亲受孕的情形非同寻常，再者，
5．他也被人们认为是神的儿子。
6．他出生时有人想取他的性命，通常是他的父亲或外祖父，可是
7．他却被偷偷地救走了，而且
8．在遥远的国度中由养父母抚养长大。

9．我们对他的童年一无所知，但是
10．到了他成年的时候，他回到或来到了自己未来的王国。
11．在与国王和／或巨人、魔龙、野兽战斗并取得胜利后，
12．他与公主（常常是前任国王的女儿）结婚，而且
13．成为国王。
14．在他的治理下，一度国泰民安，而且
15．他还制定了法律，但是，
16．后来他失去了诸神的眷顾和／或臣民的拥戴，而且
17．被剥夺了王位，逐出了城市，之后，
18．神秘死去，
19．这往往是发生在山顶之上。
20．他的子女（如果有的话）不会继承他的王位。
21．他的遗体不会被埋葬，可尽管如此，
22．他会有一处或多处神圣的墓地。

拉格伦的英雄神话模式（见《英雄》）

拉格伦的模式不同于泰勒和普罗普的模式，也不同于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兰克或坎贝尔的模式。他的模式和冯·哈恩的一样，涵盖了英雄一生的所有阶段。

拉格伦将神话中的英雄与仪式中的神等同起来。首先，国王将英雄与神联系在了一起：英雄就是国王，而国王就是神。第二，英雄一生中的许多事件都是超乎凡人的，特别是（表中的）第5点和第11点。诚然，英雄必有一死，但他的死却成就了一项如神般伟大的功绩：使草木复活。第三，在神话与仪式中，弑王都确保了整个社群的生存，否则，他们都将挨饿而死。在神话与仪式中，国王都是人民的救星。

毫无疑问，拉格伦从未指望阿多尼斯神话能够符合他的模式。尽管第1点到第4点似乎颇为贴合，其余各点大都乖离。例如，他的父亲

想要杀死的是阿多尼斯的母亲，而不是阿多尼斯本人（第6点）。也许可以说阿多尼斯是由养母——阿佛洛狄忒和珀耳塞福涅——在遥远的国度抚养长大的（第8点），但他并不是被偷偷带走的（第7点）。最重要的是，阿多尼斯从未成为国王，因此也就没有什么王位可以失去。他确实丧失了自己的性命，但这并不是发生在他在位为王时，甚至不是发生在他身处社会之时。在拉格伦所选择的所有例证中，最符合其模式的是俄狄浦斯神话。同样基本符合的是《圣经》中的英雄以色列王扫罗。与弗雷泽不同，拉格伦怯于援引耶稣的例子。一个现代的例子则是英王爱德华八世（King Edward VIII），他生命中的核心事件就是他的逊位。

图9　婚礼当天的温莎公爵与夫人，1937年6月，爱德华逊位之后

本章的重点在于情节之于拉格伦理论的向心力。诉诸情节的共性，拉格伦提出：英雄神话的意义就在于其共同的情节中；共同情节的核心就是王位的丧失；英雄神话中对于推翻国王的一致强调只有通过与之相伴的弑王仪式才能理解其意义。拉格伦的神话 - 仪式主义并不仅仅是将情节当作为仪式设想的场景，更是力图证明仪式来自于情节。

注释

〔1〕 让·阿努伊（Jean Anouilh，1910—1987），法国当代知名剧作家。其剧作以使古希腊悲剧题材现代化并用现代服装演出而闻名，在当代法国乃至西方剧坛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六章

神话与心理学

每一个学科中都有形形色色的理论对神话研究作出了贡献。在心理学这一领域中，有两种理论几乎占据了垄断地位：一种来自维也纳医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另一种来自瑞士精神病学家C. G. 荣格（1875—196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尽管弗洛伊德对神话的分析贯穿于他的所有著述，但他对俄狄浦斯这一关键神话的讨论主要是出现在《梦的解析》（或译《释梦》）一书中；这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因为他（还有荣格）常常把神话与梦相提并论：

> 假如说《俄狄浦斯王》对于现代观众和对于当时的古希腊观众一样，具有同等打动人心的力量的话，那么解释只能是一个：其感染力不在于宿命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对立，而必须到例示这一对立之材料的特定本质中去寻找。一定存在着某种［潜在的］东西，它使我们内心的声音即刻认识到《俄狄浦斯王》中的命运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的［即俄狄浦斯的］命运之所以打动我们，是因为这有可能会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是因为在我们还未出生之前，神谕已将加诸于俄狄浦斯的相同诅咒加诸于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的梦使我们确信情形确是如此。俄狄浦斯王杀死了他的父亲拉伊俄斯，娶了他的母亲伊俄卡斯忒，这不过是向我们呈现了我们自己幼年时代愿望的实现。但是，我们比俄狄浦斯幸运得多，只要不患上精神神经症，我们一般都能成功地割断对母亲的性冲动，忘记对父亲的性忌妒。
>
>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4卷，第262—263页）

从表层的——或者说表象的——意义来看，俄狄浦斯的故事讲述的是这个人物对加诸其身的命运的徒劳抗争。然而从潜在的意义上说，俄狄浦斯最想做的正是表面上他最不想做的事情。他想要将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付诸行动。神话表象的——或者说字面的——层面掩盖了潜在的象征意义。在表象的层面上，俄狄浦斯是受到命运捉弄

的无辜受害者，但在潜在的层面上，他却是罪犯。对这则神话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它描述的不是俄狄浦斯如何未能避免那不可抗拒的宿命，而是他如何成功地实现了自己最热切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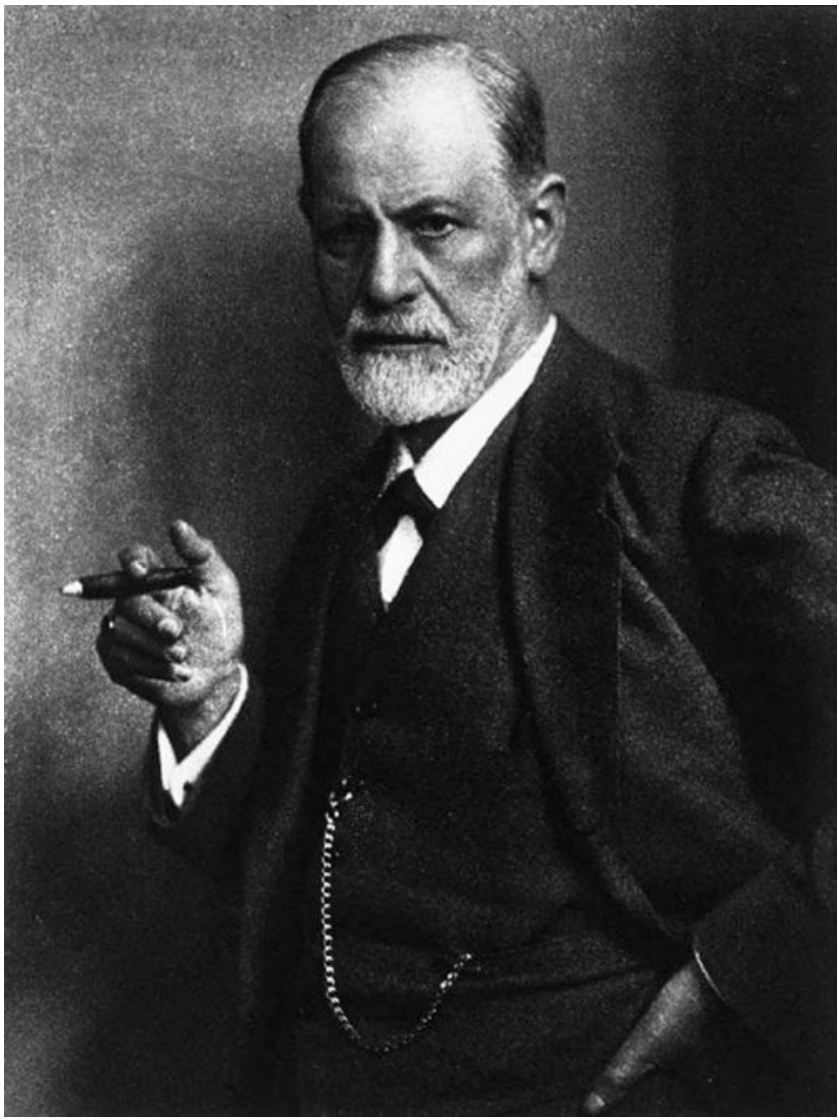

图10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不过，潜在的意义并没有到此就结束了。因为这则神话从本质上

来说根本就不是关于俄狄浦斯的。正如俄狄浦斯是受害者的表象层面掩盖了俄狄浦斯是施害者的潜在层面，后者又转而掩藏了一个更深的潜在层面；在这一更深的层面上，真正的施害者是神话创作者，以及任何一位受到这则神话吸引的读者。这里，这则神话是关于男性神话创作者或读者自身俄狄浦斯情结的实现；他们对俄狄浦斯产生认同感，并透过他实现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因此，从本质上讲，这则神话不是传记，而是自传。

那么，俄狄浦斯情结存在于谁的身上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存在于所有成年男性的身上，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摆脱自己在幼年时形成的这种欲望。但是，俄狄浦斯情结更显著地存在于那些患有神经症的成年男性身上，他们从未能走出自己的俄狄浦斯阶段。由于多种原因，他们无法直接实现自己的欲望。他们的父母可能已经过世，或者即便还活着，也可能不再那样令人畏惧或迷人。进一步说，即便是最纵容溺爱的父母也不可能欣然同意实现孩子的这一欲望。任何成功实现这一欲望的儿子都可能会被逮到和遭受惩罚。而杀死自己又恨又爱的父亲，对抗拒的母亲行使暴力，这样的罪恶感将会是难以承受的。然而，将这一情结付诸行动的最大障碍在于更为根本的原因：即人们并不知道这一情结的存在，它被压抑了。

在这种情况下，神话提供了实现这一情结的最理想形式。诚然，神话外在的那些层面掩盖了它的真实意义，因而妨碍了这一情结的实现，但它们又同时透露了这一真实意义，因而提供了实现这一情结的可能。毕竟，即使从字面的层面上来说，俄狄浦斯也是确确实实杀父娶母了的；只不过在这一层面上，他是于不知情的情况下这样做的。从下一个层面来说，有意行事的虽然是俄狄浦斯而不是神话创作者或读者，他的行为毕竟是有意的。因此，前一个层面总是一半遮掩又一半揭示下一个层面的意义。真实的意义总是存在于下一个层面，但也总是由上一个层面传达出来。通过对俄狄浦斯产生认同感，患有神经症的成年男性部分地实现了自己身上挥之不去的俄狄浦斯欲望，但与此同时又没有对自己的这些欲望产生意识。这样，神话就在以下两极之间达成了一种妥协：一边是要求这些欲望得到彻底的满足，一边是

甚至不愿知道这些欲望的存在。弗洛伊德认为，神话通过 它的意义来发挥其功能：通过呈现一个象征性地搬演俄狄浦斯欲望的故事，神话将这些欲望发泄出来。

在所有这些方面神话和梦都具有可比拟性，由此梦就为弗洛伊德和荣格提供了一个分析神话的模型，就像科学之于泰勒和弗雷泽。当然，神话和梦也存在相异之处。梦是私人的，神话是公共的。在弗洛伊德看来，神话仅限于神经症患者，而梦则是普遍的。不过对弗洛伊德和荣格来说，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意义更为重大。

奥托·兰克

对神话作弗洛伊德式分析的经典著述是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的《梦与神话》和奥托·兰克的《英雄诞生神话》。他们两人都追随老师弗洛伊德，将梦与神话相比较（从亚伯拉罕的书名就一望可知），并且认为两者都是在成年的神话创作者或读者身上一直存留的被压抑愿望——在极大程度上是俄狄浦斯愿望——的一种改头换面的、象征性的实现。不过，兰克在神话和梦两者中更为关注前者，并对其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析；最为重要的是，他还就某一类型的神话提出了一个共同的情节或模式：这一类型即英雄神话，特别是男性英雄神话。弗洛伊德主义者分析各种类型的神话，并不仅仅是英雄神话。尽管如此，他们常常将其他类型的神话转化为英雄神话。兰克本人就将出生和幸存看作是英雄业绩。甚至创世神话也被看作是女性和男性一起实现世界的诞生这一伟业。

标准的英雄传说可以被归纳为以下模式：英雄总是出身显赫，通常乃是国王之子。他母亲的受孕一般都要经历重重阻力，譬如，父母曾节制生育，或是长期不育，或者出于外部的阻碍而秘密地媾合。在母亲怀孕之前或孕期之中，会有预言以梦境或神谕的形式出现，警告他的出生会带来危险，通常是针对他的父亲（或其

替代者）。出生后的英雄一般会被置于一个箱子中，丢弃在水里。接着，他被动物或是身份卑微的穷人（牧人）救起，由雌性动物或是贫贱的妇人哺乳养育。当他长大成人之后，他会找到自己显赫的亲生父母，而这一过程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他向父亲复仇，另一方面他的身份也得到了确认。最终，他获得了地位与荣誉。

兰克的英雄神话模式（见《英雄诞生神话》）

追随弗洛伊德的兰克认为，英雄业绩是和荣格主义者所说的“前半生”相关联的。前半生由出生、幼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构成，它要求个人在外部世界中确立起独立的人格。这一独立性的获得具体是通过成家立业来表现的，而这两项中的任一项都要求个体与父母分离，并学会控制自己的本能欲望。脱离父母独立并不表示对他们厌弃，而是自食其力；同样地，不受本能欲望的束缚并不是说要否认它们，而是要控制它们。弗洛伊德说，检验幸福要看一个人工作和爱的能力，这显而易见指的是人生前半段的奋斗目标；在他看来，这也适用于人的整个一生。弗洛伊德学说所认为的问题是，一个人对其父母或本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依恋。以依赖父母或反社会的方式来满足本能的欲望，这是一直停留在心理发展的孩童阶段的表现。

兰克将他的模式运用于30多则英雄神话的分析中；这一模式的范围对应的是人的前半生。它始于英雄的诞生，止于英雄获得一桩“职业”，大致相当于我们曾在第五章中提及的约翰·格奥尔格·冯·哈恩的模式，不过对后者的模式兰克本人似乎并不知晓。

从字面或者意识的层面来说，兰克的英雄是一个像俄狄浦斯一样的历史或传奇人物。他之所以被称为英雄，是因为他于籍籍无名中脱颖而出，通常都能够登上王位。从字面来看，他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或不见容于父母，或为命运所捉弄。尽管他的双亲渴望有一个孩子，只是因为要保全父亲才决定牺牲他的性命，但是不管怎么说，他

们确实是决心要把他当作牺牲品的。由此，即使这位英雄的弑父是有意为之，他的报复也是可以理解的：谁不曾想过要杀死那个想谋害自己的人呢？

从象征的或者说是无意识的层面来说，这位英雄之所以是英雄，不是因为他敢于夺取王位，而是因为他敢于弑父。这弑父无疑是蓄意的，其原因也不是出于报复，而是出于性挫折。父亲拒绝让出他的妻子，而她其实才是儿子真正要夺取的对象：

> 一般来说，儿子厌恶父亲或者两兄弟之间相互仇视的最深层、并且通常是无意识的根源在于，他们对母亲温柔的心和爱的争夺。
>
> （兰克，《英雄诞生神话》，第66页）

这太可怕了，让人不敢面对，于是英雄神话的真实意义被编造的故事掩饰起来；在这个故事中，父亲——而不是儿子——成了罪犯。故事的模式实际上只不过是

> 孩子怀藏对父亲敌意的借口，并且这种敌意在虚构的故事中被投射到了父亲的身上。
>
> （兰克，《英雄诞生神话》，第63页）

英雄所追求的欲望——乱伦——被掩饰为权力。最重要的是，此处的英雄以第三方的身份出现：他是神话中有名有姓的英雄，而不是神话的创作者，或任何受到这则神话挑逗的读者。神话的创作者或读者将自己等同于这位有名有姓的英雄，对他的胜利感同身受，陶醉不已，因为事实上这英雄的胜利正是他自己的胜利。他 才是这神话真正的英雄。

在字面上，神话于英雄取得王位之时达到高潮。在象征的意义上，英雄还得到了自己的伴侣。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神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生前半段的目标。可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实现的愿望并非是远离自己的父母，远离自己反社会的本

能冲动，相反地，是达成与父母之间最为激烈的关系，以及最为反社会的欲望：弑父和乱伦，甚至强奸。取代父亲的位置、迎娶自己的母亲，这可称不上是脱离父母获得独立。

神话的创作者或读者是一个成人，然而神话所发泄的愿望却是一个3到5岁的孩子的愿望：

> 因此，神话是成人通过倒退到儿时的幻想创作出来的，神话中的英雄被打上了神话创作者儿时个人经历的烙印。
>
> （兰克，《英雄诞生神话》，第71页）

这幻想就是要实现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娶母的愿望。而神话则帮助创作它或利用它的成人实现他一直无法摆脱的这一愿望。这个成人在心理上永远都是个长不大的孩童。由于他从未能够发展出一个强大的自我，以控制自己的本能，因此他是一个神经症患者：

> 存在这么一类人，即所谓的精神神经症患者；依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尽管他们看起来已经成人，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永远停留在儿童阶段。
>
> （兰克，《英雄诞生神话》，第58页）

由于区区一个小孩无法制服自己的父亲，神话的创作者便设想他已经长大到能够这样做。简言之，神话表达的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生前半段的目标，而是一直未能实现的儿童时期便已驻留的目标。

当然，俄狄浦斯式愿望的实现是象征性的，而非实际意义上的；是改头换面的，而非公开的；是无意识的，而非有意识的；是精神的，而非肉体的；是替代性的，而非直接的。神话的创作者或读者将自己认同为神话中具名的英雄，在自己的心中搬演那些他永远不敢在现实世界中付诸实施的行动。即便是具名 英雄的俄狄浦斯式作为也是经过改头换面的，因为英雄模式是在表象的——或者接近表象的——层面上、而非于潜在的层面上发挥功能。尽管如此，神话毕竟提供了某种形式的满足，并且从神经症患者本能与道德之间冲突的角度来

说，它提供的是一种最佳的可能实现方式。兰克将神经症患者与“性变态者”作了对比；前者压抑了自己的本能冲动，因此需要一个间接的发泄出口，而后者将自己的本能冲动付诸行动，因此被认为不需要任何神话之类不彻底的解决方案。

雅各布·阿洛

自兰克的《英雄诞生神话》问世以来，主流的精神分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我心理学的发展将精神分析的范围从反常人格拓展到正常人格；在这一新的发展的导引下，诸如美国的雅各布·阿洛（Jacob Arlow，1912—2004）之类的当代精神分析学家将神话看作是对正常心理发展的促进，而非保持神经症的不绝。对这些学者来说，神话有助于人的成长，而不是让人像彼得·潘[1]那样，永远停留在孩童阶段。神话帮助人们适应社会和物质世界，而不是让人像孩童般逃离这两个世界。神话也许依然能够起到实现本我（人的心灵中产生本能冲动的领域）愿望的功能，但它服务于自我（防御和适应）与超我（克己）的功能远大于此。进一步说，在当代弗洛伊德主义者看来，神话不只是帮助神经症患者，它帮助每一个人。总而言之，经典弗洛伊德主义者看到的是神话的负面作用，而当代弗洛伊德主义者更多地看到了神话的正面作用。阿洛写道：

> 精神分析能够对神话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并非仅止于说明神话中存在的那些常常出现于神经症患者无意识思维中的愿望。神话是一种特定类型的集体经验，是共有幻想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某些共同需要的基础上，它帮助个人和个人所在文化群体的成员之间建立起关系。与此相对应，研究神话可以从它在精神整合中发挥的作用出发——它如何在防范罪恶感与焦虑的发生方面发挥作用，如何构成一种对现实以及个人所在团体的适应形式，如何影响个体身份的定型以及超我的形成。
>
> （阿洛，《自我心理学和神话研究》，第375页）

对经典弗洛伊德主义者来说，神话和梦相同，而当代弗洛伊德主义者则认为两者不同。梦依然起到满足人的愿望的作用，但神话的作用则是否定它们，或是将其升华。在经典弗洛伊德主义者看来，神话完全就是公共的梦，而当代弗洛伊德主义者则认为，由于 神话是公器，因此它起到社会化的作用。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

出生于维也纳、最终定居美国的著名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 1903—1990）在其畅销书《魔法的应用》中表达的许多见解与阿洛的相同，但他将这些见解归于童话，而非 神话；他不同寻常地将神话与童话对立起来，又以经典弗洛伊德主义的方式进行阐释。经典弗洛伊德主义者倾向于将神话与童话看作是同类，就像他们对神话与梦的看法一样。将神话与童话拿来作对比的是当代弗洛伊德主义者，不过他们通常更看重神话，因为他们认为神话服务的对象是自我或者超我，而童话服务的对象则是伊德，即本我。（在诸多认为神话与童话相类似的经典弗洛伊德主义者当中，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匈牙利人类学家盖佐·罗海姆［Géza Róheim, 1891—1953］；他将神话与童话或民间传说对立起来，是阿洛的观点的先驱。）

贝特尔海姆颠倒了阿洛的观点。诚然，他并不认为神话是实现愿望的途径。他甚至重复了阿洛的观点，宣称：

> 神话通常包含了超我的种种需求，它们既与本我激发的行动相冲突，又与自我的自我保存欲望相冲突。
>
> （贝特尔海姆，《魔法的应用》，第37页）

但是，与阿洛相反的是，贝特尔海姆认为，神话的超我是如此顽固，以致它所支持的成熟过程无法达成。童话也和神话一样宣扬成熟过程，但它的方式更为柔和，因此在神话失败之处，它却成功地达成

了这种成熟。神话中的英雄往往是神，他们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异于凡人。童话中的英雄却是普通人，他们的成功激励人们争相效仿。总之，对贝特尔海姆来说，神话最终阻碍了心理成长，而童话则培育了心理成长。

阿兰·邓迪斯

并非所有当代的弗洛伊德主义者都对研究神话的经典方法嗤之以鼻。杰出的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 1934—2005）就是一个挑战潮流的老派学者。在他看来，神话实现被压抑的愿望，而不是弃绝或者升华这些愿望。邓迪斯宣称：

> 民间传说的内容……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因此，它在极大程度上代表了本我，而不是自我。从这一角度来看，自我心理学绝不可能为民间传说的大部分内容作出解释。
>
> （邓迪斯，《民俗解析》，第xii页）

邓迪斯以指明神话所宣泄的潜藏的、反社会的愿望为乐——这些愿望是俄狄浦斯式的，也是肛欲的；是异性恋的，也是同性恋的，有时甚至是完全无性的。

后弗洛伊德时代的兰克

尽管弗洛伊德愿意承认“人出生的行为是第一次焦虑体验，因此也是焦虑这一自觉感情的根源与原型”，但他从未打算将出生当作焦虑和神经症主要的——更不用说是唯一的——根源。他拒绝将俄狄浦斯情结置于出生创伤之下；前者以父亲为中心，后者则必定以母亲为中心。兰克在这一问题上与弗洛伊德发生分歧，他认为婴儿在出生时的焦虑是此后一切焦虑的根源。与父亲的冲突仍然存在，但其原因是

父亲封杀了儿子回归母亲子宫的渴望，而不是因为他封杀了儿子的俄狄浦斯式渴望。对父亲的恐惧是对母亲的恐惧的误置；母亲抛弃而不是阉割了她的儿子。对母亲的性欲望同样也是回归子宫、而非获得俄狄浦斯式满足的一种手段。

兰克的《英雄诞生神话》已经显示出他的学术关注在前后期的裂隙；他接续的、后弗洛伊德时代的关注焦点是英雄的诞生，而他原初的、弗洛伊德时期的关注焦点则是英雄的行为。尽管这本书的书名明显把英雄的出生拈了出来，但在其模式中，英雄的出生却是从属于他的行为的：英雄的出生之所以具有决定意义，并非因为英雄和他母亲的分离，而是因为英雄的父母在他出生时试图阻止其弑父预言的应验。兰克确实指出，儿子的诞生因此构成了对父母的反抗，但反对儿子出生的是父母，而不是儿子本人。

兰克真正的转变是从《出生创伤》开始的；在这本书中，他系统地阐释了人的一生，以切合出生创伤。兰克仍然将神话视作愿望的实现，但现在所实现的愿望是消除出生这一行为，或创建第二个子宫，就像愿望在其余的文化中所实现的内容一样。在《英雄诞生神话》中，父亲是主犯，因为他反对 儿子的出生，而在《出生创伤》中，母亲是主犯，因为她造成 出生的事实。俄狄浦斯因为发现自己与母亲乱伦而刺瞎双眼，这并不代表他为自己的俄狄浦斯行径感到罪恶，而是代表

> 他回归到母亲子宫的黑暗中；而他最终穿过一块裂开的岩石进入冥府，消失不见，则再次表明了同样的愿望倾向，即回到大地母亲的体内。
>
> （兰克，《出生创伤》，第43页）

毫无疑问，阿多尼斯神话在这里会被归为前俄狄浦斯式的——而非俄狄浦斯式的——对母亲之依恋的一个例证。然而，阿多尼斯的例子具有更极端的性质：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出生，已经被抛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以为自己依然生活在子宫般的世界中。证明他失败的是他的死而不是他的生，而他的死也没有使他重返子宫。

C. G. 荣格

对弗洛伊德和兰克来说，英雄行为只发生在人生的前半段，而对C. G. 荣格来说，它更多地是发生在人生的后半段。对弗洛伊德和兰克来说，英雄行为与父母和本能冲动相关，而对荣格来说，英雄行为还与无意识相关。他认为，在人生的前半段，英雄行为不仅意味着与父母和反社会的本能冲动的分离，而且更多地意味着与无意识的分离：在荣格看来，每一个儿童对意识的成功塑造都是一项非凡的英雄业绩。和弗洛伊德主义者一样，荣格主义者同时分析所有的神话，而不仅仅是英雄神话；他们也同样对其他类型的神话作出英雄神话式的阐释。例如，他们认为创世神话象征了意识自无意识中的诞生。

图11　C. G. 荣格

对弗洛伊德来说，无意识是本能冲动被压抑的产物。对荣格来说，无意识是继承来的，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它所包含的内容也远远不止是被压抑的本能。因此，独立于荣格所说的无意识，其意义远远超过独立于本能。它意味着意识的形成，而意识的对象在人生的前半段则是外部世界。

荣格独一无二地提出了人生的后半段，这一阶段的目标同样是意

识；但它这时的对象却不是外部世界，而是荣格所说的无意识。个人与无意识的联系都曾毫无例外地被割裂，而这时他必须回归无意识。但是，回归无意识的目的并非割裂人与外部世界的纽带。恰恰相反，其目标仍然是回归外部世界。它的理想是在对外部世界的意识与对无意识的意识之间达成某种平衡。人生后半段的目标不是抛弃前半段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对其进行补充。

正如经典的弗洛伊德主义问题是关于人立身于外部世界的失败，荣格主义的问题同样特点鲜明，它关乎人内在地重建自身的失败。弗洛伊德主义的问题源自于对儿童世界的过度依恋。荣格主义的问题源自于对外部世界（即人在脱离儿童世界后所进入的世界）的过度依恋。割裂了与内在世界的联系就会感到空虚和迷茫。

约瑟夫·坎贝尔

荣格认为，英雄行为在人生的前后两个阶段都可以存在，可是约瑟夫·坎贝尔——他的《千面英雄》是与兰克的《英雄诞生神话》相对的经典荣格主义著作——却不这么看。兰克将英雄行为限定在人生的前半段，坎贝尔却将其限定在人生的后半段。

兰克的模式始于英雄的诞生，坎贝尔的则始于英雄的冒险。兰克模式的终了之时正是坎贝尔模式的开始之际：即成年的英雄于自己的家中安稳度日。兰克的英雄必须足够年轻，以便他的父亲——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他的祖父——仍然在位。坎贝尔没有明确说明他的英雄的年龄，但必然不会小于兰克的英雄神话结束时英雄的年龄，即青年时代。他必然已经进入人生的后半段。坎贝尔承认人生前半段存在英雄行为，他甚至还引述过兰克的《英雄诞生神话》，但他却将这种青年时代的英雄行为降格为对成年时代的英雄行为所作的准备。与荣格相反，坎贝尔将出生看作是非英雄行为，因为这是在英雄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

神话中英雄冒险历程的标准道路是呈现在通过礼仪 [2] 中的公式（分离—成人—回归 ，它可以被称为元神话的核心部分）的一种放大。

一位英雄踏上冒险的旅程，从日常世界进入到超自然的奇 境：在那里他遇到了种种神奇的力量，并获得了一场决定 性的胜利：英雄从这一神秘的历险归来，同时带回了为自 己的同胞带来福祉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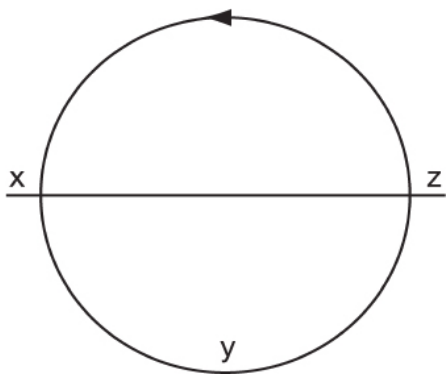

坎贝尔的英雄神话模式（见《千面英雄》）

兰克的英雄一定是皇家之子，至少也是身世显赫。坎贝尔的英雄则可以出身任何阶层。坎贝尔引证的英雄中女性的数量至少与男性相当，尽管其模式的第二阶段——英雄进入社会的成人仪式——一定要求英雄都是男性！同样地，尽管他的模式要求的是成年英雄，但他引证的一些英雄却正当青春！最后，尽管他的模式要求他的英雄是凡人，但他引证的英雄中有一些却是神！与之相反，兰克的模式则容许英雄既可为凡人，也可为神。

兰克的英雄最后回到他的出生地，坎贝尔的英雄则大步向前，进入一个他之前从未造访甚至不知其存在的陌生新世界：

命运召唤英雄，将他的精神重心从其所在社会转移到一个不知名的地区。这

个既藏有财宝又充满危险的宿命之地可以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态：遥远的国度，广袤的森林，地下、水中或天上的王国，神秘的岛屿，高耸的山巅，或是深沉的梦境。

（坎贝尔，《千面英雄》，第58页）

这一非同寻常的世界是诸神的世界，而英雄必须来自人类的世界，由此才能使得这两个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英雄于这个奇异的、超自然的世界所遭遇的一切中，最重要的是一位至高的女神和一位至高的男神。母亲般的女神是充满深情与关爱的：

她集万千美丽于一身，能够满足一切欲望，是每一位英雄尘世和非尘世冒险的极乐目标。

（坎贝尔，《千面英雄》，第110—111页）

相反，男神则是残暴无情的，简直就是一个“妖魔”。英雄与女神发生性关系并且娶她为妻。他与男神进行决斗，这可能发生在遇到女神之前，也可能在之后。但是，他是与这两者——而不仅仅是与女神——产生了神秘的同一，从而他自己也具有了神性。

兰克的英雄返 家直面自己的父母，坎贝尔的英雄则离 家去直面男神和女神；这男女二神犹如父母，却不是父母。然而，两个英雄的遭遇却惊人地相似：兰克的英雄杀死自己的父亲，并且（通常仅在潜在的意义上）娶了自己的母亲；坎贝尔的英雄也是一样，（即使常常是次序反过来地）娶了女神，并且与男神战斗（虽然未必杀死男神）。

然而，这两个英雄间的差异其实意义更为深远。由于女神并非英雄之母，因此与她之间的性关系并不构成乱伦。进一步说，他们二人不仅结了婚，还发生了神秘的同一。而且，尽管表面看来并非如此，对坎贝尔来说，英雄与男神的关系同样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英雄从这位父亲般的男神处寻求的其实是和他刚刚或即将从女神处获得的同样的爱。他寻求和解，即“赎罪”。

坎贝尔写道，伴随成人仪式的神话“揭示了父亲原型　慈爱的、自我牺牲的一面”；这里，他的“原型”一词使用的是荣格的概念。对于弗洛伊德主义者来说，男神和女神象征了父母；对于荣格主义者来说，父母象征了男神和女神，而男神和女神又象征了父亲和母亲原型；这两个原型是英雄人格的构成成分。英雄与男神和女神的关系并不像弗洛伊德和兰克所说的那样，象征了儿子与他者——即父母——的关系，而是象征了男性人格中的一个方面（自我）与另一个方面（无意识）之间的关系。父亲和母亲原型不过是构成荣格主义的无意识，或者说“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的其中两个。原型之所以是无意识的，并非因为它们被压抑了，而是因为它们从来没有成为意识。对荣格与坎贝尔来说，神话的起源和功能并不像弗洛伊德和兰克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满足无法公开表露的神经症欲望和冲动，而是为了表达人格中仍未获得机会实现的正常的方面。

通过将自己与神话中的英雄等同起来，兰克的男性神话创作者或读者在自己的心灵中间接地经历了一场冒险；这场冒险如果要直接获得实现的话，必将发生在自己的父母身上。与此相反，坎贝尔的男性／女性神话创作者或读者在自己的心灵中间接经历的这场冒险，即使直接获得实现，也必定依然是发生在心灵中的。因为英雄实际遭遇的正是心灵的组成部分。用吸毒的行话来说，坎贝尔的英雄冒险就相当于“神游仙境”。

在成功地摆脱了安全的、日常的世界，踏入了那个充满危险的新世界之后，坎贝尔的英雄为了完成自己的旅程，又必须回过头来摆脱他现已置身其中的这个新世界，返回日常世界。新世界是那般充满诱惑，要离开它比当初离家更加困难。我们不难看到，奥德修斯回家的途中，喀耳刻〔3〕、卡吕普索〔4〕、塞壬〔5〕、食落拓枣者〔6〕都拿无忧无虑、青春永驻的生活来诱惑他，让他几乎忘记了回家的使命。

荣格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其实他和弗洛伊德一样，都反对纯粹的无意识状态。他们都力图对无意识产生意识。他们的理想依然是意识。荣格既坚决反对弃绝无意识，以一般意识，或者说自我意识取而代之，也坚决反对弃绝自我意识，以无意识取而代之。他试图在自我

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在对外部世界的意识与对无意识的意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荣格来说，英雄倘若无法回归日常世界，便意味着他未能抵挡住无意识的诱惑。

坎贝尔与荣格截然相反，他寻求纯粹的无意识。坎贝尔的英雄从未回归日常世界，他向无意识缴械投降了。然而，坎贝尔本人是要求他的英雄回归日常世界的。那么，他的英雄为什么拒绝这样做呢？答案是，坎贝尔的英雄回归的是那个奇异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渗透于日常世界之中。独立的日常世界是不存在的。日常世界与新世界其实是一个世界：

> 这两个世界，神的［即新的］世界和人类的［即日常的］世界，犹如生与死、日与夜那样判然分明。……尽管如此……这两个王国其实同为一体。
>
> （坎贝尔，《千面英雄》，第217页）

如同电影《绿野仙踪》中的多萝茜一样，英雄根本就不需要离开家。荣格支持自我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平衡，而坎贝尔则支持二者的融合。他将对英雄神话的哲学阐释与心理学阐释结合起来，认为所有英雄神话都是在宣扬神秘的同一。

阿多尼斯

尽管荣格只是对阿多尼斯寥寥几笔带过，但他确实提到阿多尼斯是“永恒的男孩”（*puer aeternus*）原型的一个例证。对此原型，荣格也没有详加说明，不过他却对另一个相关的原型用相当大的篇幅作了探讨，这就是“伟大的母亲”原型。荣格最亲密的弟子玛丽 - 路易·冯·弗朗茨（Marie-Louise von Franz）有一本探讨“永恒男孩”原型的著述，但她主要讨论的是其他的例子，而不是阿多尼斯。

从荣格主义的观点来看，阿多尼斯神话的功能不仅是呈现“永恒男孩”原型，而且是要对这个原型作出评价。这则神话对那些将自己认同于这一原型的人提出了警告。像阿多尼斯那样过一个“永恒男

孩”的生活，就是要过一种心理上为婴儿、并且最终为胎儿的生活。神话中的“永恒男孩”毫无例外地都会夭折，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说，这意味着自我的死亡和对子宫般的无意识的回归——不过并非像后弗洛伊德时代的兰克所认为的那样，是要回到真正的子宫。

作为一个原型，“永恒男孩”构成了人格的一个方面，而既然它是人格的一个方面，那就必须被接受。“永恒男孩”人格则是一个人在这一人格方面走得太过的结果：他让“永恒男孩”原型成为了他人格的全部。他无法抗拒它的魅力，向它缴械投降，因此也就丢弃了自我，回复到完全的无意识状态。

“永恒男孩”人格无法抗拒“永恒男孩”原型的原因在于，他始终处在“伟大母亲”原型的魅力诱惑下，而后者最初是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无意识相等同的。由于无法挣脱她的束缚，他从未能够锻造出一个强大的、独立的自我，而没有这个自我，他也就转而对任何他所遇到的溺爱他的女性丧失了抵抗力。他向“永恒男孩”原型的投降意味着他向自己渴望回归的“伟大母亲”的投降。一个“永恒男孩”“只能依赖和透过母亲活着，无法自立根基，因此，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永恒的乱伦状态中”。荣格甚至称他只是“母亲的梦”，最终被母亲所收回。

从生理学的意义上来说，一个“永恒男孩”的年龄范围可以从青春期（这是表现最为激烈的时期）直到中年甚至老年。然而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说，一个“永恒男孩”就是一个婴儿。对弗洛伊德来说，被俄狄浦斯情结控制的人其心理年龄固定在3到5岁，而对荣格来说，一个“永恒男孩”的心理年龄在出生时就已经固定了。俄狄浦斯情结预设了一个独立的自我，它“极其自负地”试图将母亲据为己有，“永恒男孩”则包含了一个脆弱的自我，寻求向母亲缴械投降。“永恒男孩”寻求的不是主宰而是同化，因而甚至是对出生前状态的一种回归。

弗洛伊德和兰克、弗洛伊德主义者和后弗洛伊德主义者都认为，在任何阶段对母亲的依恋都意味着对自己的生身母亲或母亲替代者的依恋。荣格则认为，对母亲的依恋意味着对母亲原型的依恋，一个人的生身母亲或母亲替代者只不过是这一原型的表现形式。弗洛伊德认为，男孩子应该摆脱对自己母亲的渴望，不论这种渴望是婴儿期的，

还是俄狄浦斯式的。荣格则认为，男孩子应该摆脱将自己认同于母亲原型的倾向。在弗洛伊德看来，不能成功解脱意味着对自己母亲的永恒依恋。在荣格看来，不能成功解脱则意味着把自己的人格限定在内部的母亲原型之中。对弗洛伊德来说，寻求解脱的斗争是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儿子与母亲——之间进行的。对荣格来说，这种斗争则是在一个人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自我与无意识——之间进行的，而后者最初正是由母亲原型所象征的。

由于原型表达自己的方式从来不是直接的，总是通过象征的，因此，男孩认识到的母亲原型的方面只能是透过自己的生身母亲或母亲替代者获得的那些。一位拒绝对自己的儿子放手的母亲只能让儿子认识到母亲原型溺爱的、消极的方面。一位不论如何不情愿、最终能让孩子独立成长的母亲可以让孩子认识到母亲原型慈爱的、积极的方面。一开始，任何孩子都不愿离开母亲的怀抱。母亲若过分溺爱呵护孩子，只显示母亲原型的负面影响，就会诱使孩子永远依附在她的卵翼下。假若她懂得如何教养，显示母亲原型的正面影响，就能够推动孩子抵抗这一诱惑。作为一个原型，母亲原型的所有方面都是继承来的。一个人对母亲形象的体验决定的只是母亲原型的哪些方面被引出。一个从未体验过慈爱的母亲形象的男孩永远也发展不出潜藏在他身上的母亲原型的这一方面。

“永恒男孩”对自己的性格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当然，即便是意识到自己性格的“永恒男孩”也会将具有诱惑力的女性体验为“伟大母亲”原型的显现；但是，他至少能认识到，其他男性对女性的体验是不同的——即将她们作为可能的配偶来体验。他只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对他来说只要有神秘的合一就足够了。他对自己的这种不合常规的态度有着清醒的意识，并且颇感自豪。在具有清醒意识的“永恒男孩”的例子当中，最为人所知的应该是卡萨诺瓦[7]。

与之相反，无意识的“永恒男孩”以为所有人都和他一样。他以为所有的男性都寻求与女性的合一，除此之外便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关系。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8]；他是一个典型的“娇生儿”，在他生命中的最后20年像隐士一样生活在子宫般的婴儿

世界中，在那里他的一切愿望都即刻获得满足；然而，他却认为自己完全正常，事实上，他认为自己是“彻头彻尾美国式的”。

由此，“永恒男孩”既可以是一个真实的人，也可以是一个象征。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永恒男孩”甚至自身都变成了象征。尽管历史上的“永恒男孩”在生理上都是成年人，但象征性的“永恒男孩”却可能永远都不会长大，也因此精确地反映了真实的“永恒男孩”人格力图效仿的青春永驻的生命。象征性的“永恒男孩”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彼得·潘和小王子〔9〕。

正如“永恒男孩”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他与外部世界可以是相适应的，也可以是不相适应的。在外部世界中，他可能已在婚姻和工作中安顿下来，但却不能从这两者中获得满足。或者他甚至无法在外部世界中安顿下来，就好像唐璜和“永久的学生”〔10〕。

与“永恒男孩”原型相对的是英雄原型。“永恒男孩”失败的地方正是英雄成功的地方。在英雄的前半生，自我成功地摆脱无意识的羁绊，使自己立身于社会。英雄做到了成家立业，“永恒男孩”则两者任一都未达成。在英雄的后半生，现已独立的自我又成功地从社会中挣脱，在回归无意识的同时却不深陷其中。英雄在其前半生依据社会的规约安身立命，又在其后半生向这些社会规约提出挑战。但这时的英雄是具有清醒意识的挑战者；“永恒男孩”则只是一个无意识的挑战者。英雄为他的信念甘冒失去一切的风险，“永恒男孩”则不愿有任何担当，因此也就不冒任何风险。真正的英雄犹如代达罗斯，“永恒男孩”却犹如伊卡洛斯。〔11〕由于“永恒男孩”在其前半生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因此其后半生必然也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实际上，对他而言根本就没有什么后半生。

阿多尼斯是一个典型的“永恒男孩”，因为他从未婚娶，从未立业，在风华正茂时夭折。他实际上从来就没有长大。他为了使得自己能够出生，不得不裂树而出。在奥维德的故事中，他变成了树的母亲很不情愿让他出世。像其他所有的母亲一样，她为自己的怀孕欣喜若狂，但与寻常母亲不同的是，她想要将他藏在自己的体内。阿多尼斯需要自己找到出路。

在阿波罗多罗斯的故事中，阿多尼斯才刚刚破树而出，阿佛洛狄忒就把他又扔了回去——当然，不是扔回到树中，而是扔进一个箱子里。因此，她就抵消了阿多尼斯为自己的出生所作的艰苦努力。阿佛洛狄忒将箱子委托给珀耳塞福涅保管，却没有向她说明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当珀耳塞福涅打开箱子，发现了阿多尼斯时，同样爱上了他，并拒绝将他交还给阿佛洛狄忒。正像他的母亲一样，这两位女神都想要独占他。虽然宙斯的决定给了阿多尼斯一年中三分之一时间的自由，但阿多尼斯却宁愿将自己的三分之一也让给阿佛洛狄忒。这样，阿多尼斯就从未脱离过这些母亲原型形象的监护。

阿多尼斯无法抗拒这些女神，但这并不是因为她们激起了他的性欲。在他的眼里，这些女神并非无法抗拒的绝色佳人，而是犹如他的母亲一样；和她们在一起，他寻求的不是性交，而是同化。在他与这些女神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始状态的神秘同一；路西安·列维 - 布留尔（荣格常常引用他）称之为“神秘的参与”（见第一章）。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说，阿多尼斯所处的正是列维 - 布留尔和在他之后的荣格所认为的人类的“原始”阶段。他无视自己的生命与他人之间的不同，是“永恒男孩”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外倾的无意识的例子。坎贝尔可能会赞颂阿多尼斯对世界的认同是神秘的，而荣格则会批评这种认同是婴儿般的。

注释

〔1〕 彼得·潘是苏格兰作家詹姆斯·巴里同名童话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不愿长大也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2〕 人类学用语，指为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如出生、命名、成年、结婚、患病、死亡而举行的仪式。

〔3〕 能将人变为牲畜的女巫。

〔4〕 海上仙女，曾将奥德修斯截留于其岛上七年。

〔5〕 半人半鸟的女海妖，以美妙歌声诱惑过往海员，使驶近的船只触礁沉没。

〔6〕 奥德修斯在北非发现的部族，以懒散、安逸、忘却和不思不虑为特点。

〔7〕　卡萨诺瓦（1725—1798），意大利作家和冒险家，当过间谍和外交官，以对女性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和一生浪荡而闻名，著有六卷本《回忆录》（或译《我的生平》）。意大利著名导演费利尼曾将他的生平搬上银幕，突出了他一生作为“性斗士”经历的种种艳遇。

〔8〕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1935—1977），绰号“猫王”的美国著名摇滚乐明星，以杰出的歌唱天才、超凡的魅力和性感对人们、特别是女性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9〕　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1900—1944）的著名童话《小王子》中的主人公。

〔10〕　唐璜是欧洲民间传说中著名的浪荡子形象，以勾引女性、荒淫无度著称。拜伦等许多作家都写过以他为主人公的作品；“永久的学生”是指那种永远赖在学校、不肯踏入社会的人。

〔11〕　参见此处。

第七章
神话与结构

克劳德·列维 - 施特劳斯

克劳德·列维 - 施特劳斯对神话研究的贡献在第一章已经有所论述；他不仅复兴了泰勒认为神话是原始科学的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研究神话的“结构主义”方法。让我们回顾一下：列维 - 施特劳斯认为，神话是思维本身的一个实例，不论是现代思维，还是原始思维，因为它将种种现象作了分类。列维 - 施特劳斯提出，人类的思维活动是以分类的方式进行的，具体来说，就是将对立的事物和现象配对，然后将它们投射到世界上。列维 - 施特劳斯不仅将神话和科学看作是分类法，而且认为烹饪、音乐、艺术、文学、服装、礼仪、婚姻、经济学等也都显示出人类配对的冲动。

对列维 - 施特劳斯来说，在这种种现象中，神话的显著特点有三。首先，神话看起来似乎是其中最无序的：“在一则神话的故事进程中，似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好像］不存在逻辑，不存在连续性。”倘若连神话也能捉对配成一组组对立的事物，那就可以无可辩驳地证明，秩序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固有本质，而构成其基础的必然是思想。正如列维 - 施特劳斯在其探讨印第安神话的四大卷巨著《神话学导论》一开始就宣称的那样：

> 我现在将要着手对神话进行的实验，其结果将会是更具决定性的。……倘若通过这个例子也能够证明，思想貌似的随意性，以及它所谓自发流淌的灵感和看似无法操控的创造性暗示着在更深的层面上存在着运作法则的话，我们就无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思想只与自身、不再与实物达成契合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被简化为将自身作为实体来模仿……倘若人的思想甚至在神话领域中都表现为是确定的，那么，不用说，它在自己活动的一切领域中也一定都是确定的。
>
> （列维 - 施特劳斯，《生食和熟食》，第10页）

和泰勒一样，列维 - 施特劳斯诉诸于思想的有序性，以此证明神

话源自观察和假设等具有科学特征的过程，而非源自漫无边际的想象。

其次，在列维 - 施特劳斯所探讨的一切现象中，只有神话（再加上图腾崇拜）是专属于原始时期的。倘若证明神话是有序的，就能够证明它的创作者也是有序的，因而也是具有逻辑思维和理智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神话不仅凭借一己之力表达相当于二元矛盾的种种对立事物，而且还化解这些对立："神话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解决矛盾的逻辑模式。"神话化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辩证地"调和矛盾；它的方式有两种，或是提供一个折中的调解条件，或是提供一个类似的、但更易化解的矛盾。

神话中表达的矛盾和其他现象中所表达的矛盾一样，有着无以数计的类型。不过，所有这些矛盾似乎都可以简化为"自然"与"文化"这一基本矛盾的实例；它源自于这样一种冲突，即人类既将其成员体验为动物，因此也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又将其体验为人类，因此也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冲突是人类思想中的二元对立在世界上的投射。人类不仅用"二元对立"的方式来思考，而且也因此用"二元对立"的方式来体验世界。由此看来，列维 - 施特劳斯似乎与弗洛伊德、荣格一样，将心灵而非世界视为神话的主题。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与弗洛伊德、荣格不同，他力图识别这些投射并非为了将其收回，而只是为了追溯这些投射的本源。（同时，列维 - 施特劳斯宣称，世界本身就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因此人类的投射尽管只是投射，但与自然的本质是相吻合的。荣格在其关于"同步性"的概念中表达的也是相同的意思。）一旦列维 - 施特劳斯确实追溯到这些投射的本源时，他进而将它们视作对世界的体验，这样，列维 - 施特劳斯就和布尔特曼、约纳斯、加缪一样，认为神话的主题是与世界的遭遇——但是这里的世界是被体验为二元对立的世界，而非陌生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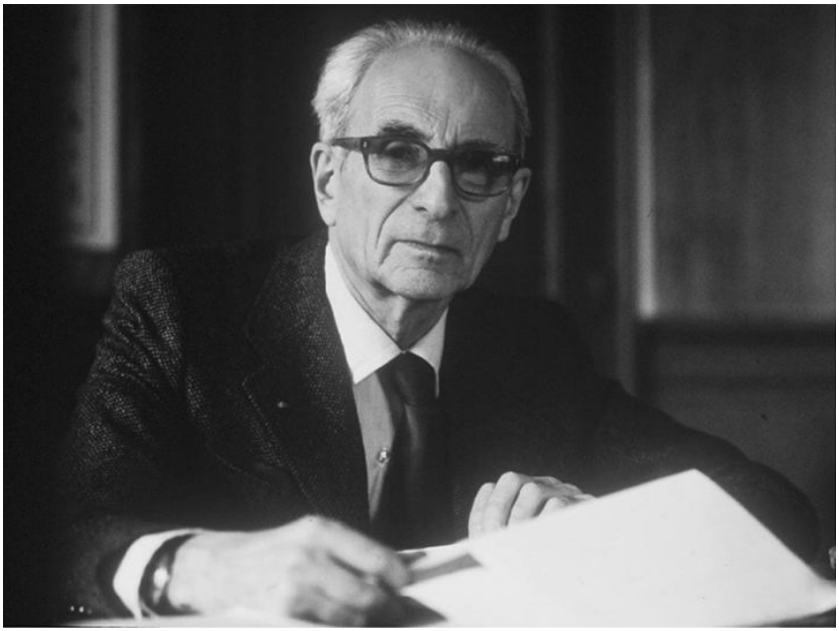

图12　克劳德·列维 - 施特劳斯

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冲突最显著的例证是列维 - 施特劳斯所发现的反复出现的二元对立：生食与熟食、野兽与家畜、乱伦与异族通婚。至于他所发现的其他二元对立——譬如日与月、地与天、热与冷、高与低、左与右、男与女、生与死——如何象征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分裂而非自然内部的分裂，则远不是那么清楚。而像姐妹与妻子之间、男入女族婚姻与女入男族婚姻之间的二元对立如何象征自然与文化的分裂，而非社会内部（因此也是文化内部）的分裂，同样也是不甚了了。

依照列维 - 施特劳斯的观点，俄狄浦斯神话调和了自然与文化的一个冲突实例，它的方法是指出人类对与这一冲突相似的一种情况是具有容忍度的：

尽管该问题［即该二元对立］显然无法获得解决［即化解］，但俄狄浦斯神话提供了一种逻辑工具，简单来说，就是用它替代原初的问题。……通过这样的并置对比［即原初的二元对立与一个类似的二元对立之间的并置对比］，对原生

性的逃避企图与这种逃避的不可能成功性这一二元对立［即需要化解的二元对立］就被对血缘关系的过分看重与着意轻视之间的二元对立［即一个更易被容忍的二元对立］所取代。

（列维－施特劳斯，《神话的结构研究》，第82页）

列维－施特劳斯并非按照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来组织神话元素，而是按照两组对立物反复出现的顺序来组织的；他提出，神话通过将一组对立物与另一组可与之比较的、且已被接受的对立物并置，来缓和前一组对立物之间的内部张力。在俄狄浦斯神话中，已被接受的对立是对“血缘关系”的“过分看重”和“着意轻视”。“过分看重”指的是乱伦（俄狄浦斯娶母）或以家庭的名义破坏某一禁令（安提戈涅埋葬自己的哥哥波吕尼刻斯〔1〕）。“着意轻视”指的是弑弟（厄特俄克勒斯杀死弟弟波吕尼刻斯〔2〕）或弑父（俄狄浦斯杀父）。“过分看重”代表了自然，因为它出自本能。“着意轻视”代表了文化，因为它是非自然的。列维－施特劳斯以俄狄浦斯神话为典型例证，集中探讨家庭成员间的性与杀戮，由此看来，他似乎是弗洛伊德的支持者；但事实上他却对弗洛伊德的分析不屑一顾，认为后者的分析只不过是这一神话的另一个版本而已，连比较粗劣的分析都算不上。

在俄狄浦斯神话中，要求获得接受的二元对立是对“原生根源”的“否定”与“肯定”。否定指的是杀死从土中生出的怪物，这怪物或是阻碍人的出生（卡德摩斯〔3〕杀死巨龙，将巨龙的牙齿拔下，种在地里，于是长出了人），或是威胁人的生存（俄狄浦斯杀死令忒拜人不敢外出、几乎要饿死的斯芬克司〔4〕）。“肯定”是指神话中一个普遍的意象，即从大地中诞生的人往往行走困难（俄狄浦斯名字的意思就是“肿大的脚”）。杀死从土中出生的怪物，意味着否定人与大地的联系；给人取带有行走困难的意思的名字，则意味着肯定人与大地的联系。“否定”代表自然，因为人事实上是父母所生，而不是从大地中生出的。“肯定”则代表了文化，因为神话宣称人是从大地中诞生的。列维－施特劳斯从未作出说明的是，为什么古希腊人较能容忍某一组对立物，而对另一组却并非如此。

然而，其他神话即使在这一限度内也无法像俄狄浦斯神话那样克服二元对立。相反，它们表明任何供替代的对立组合都只能更糟。以北美印第安蒂姆西亚人的阿斯迪瓦尔神话为例，它的作用是

> 使现实的缺点［即矛盾］合理化，因为各种极端的［亦即供替代的］状况被想象出来只是为了表明它们是站不住脚的。
>
> （列维－施特劳斯，《阿斯迪瓦尔神话研究》，第30页）

神话并未着手化解生与死之间的矛盾，而是令死亡显得比永生更优越：

> 北美印第安人对此所作的解释是，假如没有死亡，地球就将人满为患，无法为每一个人都提供立足之地。
>
> （列维－施特劳斯，《访谈录》，安德烈·阿库恩等编，第74页）

由于神话关乎人类对世界的体验，更不必说关乎对世界最深沉的焦虑体验，因此它似乎具有存在主义的意义，布尔特曼、约纳斯和加缪就都持这样的观点。但列维－施特劳斯和泰勒一样，认为神话只是一种冷静的智识现象：神话中所表达的二元对立构成的是逻辑谜题，而非存在主义困境。神话关乎思维，而非情感。同时，神话更多地是关于思维的过程，而非其内容。由此，列维－施特劳斯早在当代认知心理学家之前就提出了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列维－施特劳斯将自己研究神话的方法称作“结构主义的”方法，是旨在将其与神话研究中的“叙事性”阐释，即依附于情节的研究方法区分开来。本书所讨论的其他所有理论都是归于后一类的。不论他们是从字面或是象征的意义上阐释神话，他们都将神话视作有头有尾的故事。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这些理论家都对神话的情节怀有同等的兴趣。譬如列维－布留尔关注的就是构成神话情节基础的世界观，但是，他依然认为情节是神话的必然属性。泰勒则相反，对他来说情节是核心：通过情节，神话呈现了世界如何被创造或其如何运转的过

程。

只有列维－施特劳斯摒弃了神话的情节，或者说神话“历时的维度”，而在其结构、或者说“共时的维度”中找到了神话的意义。神话的情节表现为事件A引出事件B，事件B引出事件C，事件C再引出事件D；神话的结构则等同于二元矛盾的表达和化解，它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或是事件A与事件B构成一对对立物，并通过事件C得到调和，或是事件A与事件B所构成的对立关系，与事件C之于事件D的对立关系相类同。

每一则神话都包含了一系列的对立物组合，每一组合都由一对对立物构成；这对对立物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以化解。对立物组合之间的关系与每一组合内部元素之间的关系相对应。并非组合一引出组合二，组合二引出组合三，组合三再引出组合四；而是组合三调和了组合一与组合二之间的对立，或者组合一之于组合二的关系类同于组合三之于组合四。

神话的结构意义既是非累积性的，也是连结性的。非累积性指的是神话包含了对它所表达的对立物的一系列化解，而不是一种单一的、渐进的化解。每三或四组对立物提供了上述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化解方法，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神话并没有提供某种单一的方法。因此，神话的意义是循环的，而非线性的，是反复的，而非渐次的。每三或四组对立物的一个循环，就如同每组内在的三或四个元素的循环一样，代表的不是其前身的结果，而是它的“变形”，或者说是另一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神话的结构意义之所以是连结性的，指的是某一组对立物中任一元素的意义并不存在于其自身，而是存在于它与本组其他元素的“辩证”关系之中。同样地，任何一组对立物的意义也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它与其他对立物组合之间的“辩证”关系。任一元素或对立物组合本身都没有意义，不论这种意义是字面的，还是象征的。

就像一则神话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与其他神话也存在同样的连结性和非累积性关系。一则神话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它与其他神话之间的“辩证”关系。由这些神话构成的一组神话代

表的不是其前身的结果，而是它的“变形”。最后，作为一个整体，神话之于其他人类现象（包括仪式）的关系类同于各篇神话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列维 - 施特劳斯独特的神话 - 仪式主义观点中，神话与仪式共同发挥作用，但是它们是作为一对结构上的对立物来发挥作用的，而不是如同其他神话 - 仪式主义学者所认为的，是作为两种相似的事物。

弗拉基米尔·普罗普、乔治·杜梅齐尔和谢和耐学派

列维 - 施特劳斯并不是唯一、甚至也不是最早被称作结构主义者的神话理论家。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民俗学家弗拉基米尔·普罗普（1895—1970）和法国印欧学家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在列维 - 施特劳斯之前就有了这方面的独立著述。普罗普破译自俄罗斯民间故事的一条共同的情节线索——我们在“神话与文学”一章中曾作过归纳——就是他所说的结构。普罗普的结构停留在叙事层面，因此与奥托·兰克、约瑟夫·坎贝尔和拉格伦勋爵所称的“结构”并没有什么不同；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一结构与列维 - 施特劳斯的结构是大相径庭的，也正由于这一点，列维 - 斯特劳斯对普罗普的建树不屑一顾。与之相反，杜梅齐尔所揭示的结构和列维 - 施特劳斯的一样，都位于表层之下，但两人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杜梅齐尔的结构反映的是社会秩序，由三部分组成，而列维 - 施特劳斯的结构反映的则是心灵的秩序，并且由两部分组成。

被证明为列维 - 施特劳斯式的结构主义最忠实的追随者的是一批法国古典主义学者——不过即使是他们也对其理论作了适合自身的修订；这批学者以路易·谢和耐[5]为灵感源泉，以让 - 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 1914—2007）为领军人物。列维 - 施特劳斯常常受到猛烈的抨击，批评者说他将神话与其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性的种种语境相割裂。在他关于阿斯迪瓦尔神话的文章中，列维 - 施特劳斯倒是确实对这一神话作了详尽的种族志分

析，考察并整合了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宇宙论的种种因素。然而这却是一个孤例。韦尔南和他的同伴们——特别是马塞尔·戴田、皮埃尔·维达尔 - 纳凯（Pierre Vidal-Naquet）和妮科尔·洛罗（Nicole Loraux）——将列维 - 施特劳斯对阿斯迪瓦尔神话的分析作为他们的样板。作为列维 - 施特劳斯的后继者，这些古典主义学者致力于解析神话中深藏的、常常是潜在的模式，但他们接下来更进一步，试图将这些模式与广义文化中的模式联系起来。

马塞尔·戴田论阿多尼斯神话

法国古典主义学者马塞尔·戴田（1936— ）一度是列维 - 施特劳斯坚定的追随者；他曾写过一整本书来分析阿多尼斯神话，此书题为《阿多尼斯的花园》。对弗雷泽来说，阿多尼斯不是神，而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力量；对戴田来说，阿多尼斯也不是神，但却是人。弗雷泽认为，阿多尼斯象征了植物，而戴田则认为，植物的一种形态象征了阿多尼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阿多尼斯相类似。在弗雷泽看来，阿多尼斯和植物一样，岁岁死而复生；而在戴田看来，阿多尼斯和与他联系在一起的植物一样，迅速成长，迅速死去，其生死仅有一次。最为重要的是，弗雷泽认为，神话的意义在于其情节中——阿多尼斯的出生、少年时代、死亡和重生；戴田则认为，神话的意义在于其情节的诸种元素——人物、地点、时间和事件——的辩证关系中。

追随列维 - 施特劳斯的戴田认为，这一辩证的关系存在于多种层面上：饮食的、植物的、天文的、季节的、宗教的、社会的。每一层面都存在一个处于两极之间的中间立场。这些层面彼此类同，而并非相互起象征作用。举例来说，饮食层面各元素之间的关系与植物层面各元素之间的关系相类似。而饮食层面——香料为一极端，生菜和生肉为另一极端，谷类食物和熟肉则处于中间地带——同时紧密地与其他层面相互联系在一起。

戴田是将香料与神、谷类食物和熟肉与人、生菜和生肉与动物相

联系的第一人。在向诸神进献牺牲时要焚烧香料。香味达于诸神，诸神则吸入这些香味作为食物。由于肉类是被煮熟而不是被焚烧的，因此它为人类所食；人类同时还种植谷物。生肉则被动物食用，戴田还将生菜与动物联系在一起。香料之所以与诸神联系在一起还因为它们与太阳的关系，以及由此与希腊人想象中的地球之巅——奥林匹斯山——的关系。香料不仅因太阳而燃烧，而且生长在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和时间：地球上最炎热的地方、夏季最酷热的日子。与之相反，生菜是冷的，因此与最寒冷的地方和时间联系在一起：地下世界——深海与冥府——和冬季。吃生肉就是将肉“冷”吃。

谷类食物和熟肉处于香料为一极、生菜和生肉为另一极的中间地带。对人类而言，肉必须熟食，既不能用火直接焚烧，也不能生吃；谷类食物也是如此，它们的生长需要太阳，但是阳光又不能过于强烈：“在中间地带，在离太阳的光焰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生长着可食用的植物……谷类与水果。”因此谷类植物既不是生长在大地之上，也不是生长在大地之下，而是生长在土壤之中。香料一般在夏季收获，生菜大致是在冬季收获，庄稼则在夏冬之间的秋季收获。

香料之所以与诸神联系在一起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香料不需要怎么培植，只要采集即可，也不需要付出什么劳动，因而与神的生活相切合。在相反的另一端，动物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也不需要为自己的晚餐劳作。不同之处在于，诸神只吃他们想吃的食物，动物则只能吃它们找到的食物。因此，诸神不必劳作就比人类吃得更好。动物同样不事劳作，却比人类吃得差。人类再次居于中间。他们为了口粮必须劳作，不过，只要他们劳作，就可以有足够的食物，即使只是勉强糊口。在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所描绘的黄金时代中，人类生活得如同诸神一样，正是因为他们无需劳作即可丰衣足食。而将来他们则会像动物一样拒绝劳作，那就很可能不得不忍饥挨饿了。

香料不仅与诸神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性乱行为相联系。戴田并没有将性乱行为看作是诸神的特点，反而认为即便宙斯有着种种越轨的行径，他与赫拉仍然是完美的一对：“宙斯与赫拉这一对强调了仪式的圣化作用，正是这一圣化作用使得夫妇的结合为世人所承

认。”与性乱行为相关联的并非诸神，而是香料，以及香料那芬芳的、因而诱人堕落的气味：“它们［即香料］以油膏、香水以及其他化妆品的形式出现时，还具有激发性欲的功能。”因此，在最炎热的夏季举行的阿多尼亚节庆活动——这一节日因其性乱行为而臭名昭著——中随处可见香料的存在，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在相反的另一端，戴田将生菜与生肉，而不是动物，和不育与禁欲联系起来。因为血肉模糊的生肉或是腐肉——戴田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将两者视为等同——难闻的气味足以驱散情欲，因而也避免了性爱。因此，利姆诺斯岛上的妇女满身恶臭，遭到男人厌弃，同样并非事出偶然。〔6〕

以性乱行为为一端，不育或禁欲为另一端，居于中间的就是婚姻；戴田指出，忒斯摩福拉节庆仪式〔7〕就与婚姻有关。这一节日每年在雅典举行庆祝活动3天；尽管不准许男子参加，它实际上庆祝的却是婚姻。参加庆祝者皆为已婚妇女。庆祝仪式的气味居于阿多尼亚节的芳香与利姆诺斯的恶臭之间，稍微有一点难闻，目的就是要在节庆期间让男人避而远之。

戴田将上述所有层面与阿多尼斯的生命历程以及为了纪念他而种植的“阿多尼斯小花园”联系起来。戴田提出，在任一层面上，阿多尼斯总是处于两个极端中的一个，从不落在中间地带。事实上，阿多尼斯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绕过了中间的可能。阿多尼斯的命运代表了任何胆敢自诩为神的人类的命运：他将被贬为动物。同样地，当他胆敢乱交时，他却被证明是性无能者。

在作为结构主义者的戴田看来，每一层面上的两个极端都与阿多尼斯的生命历程相类同，而非象征了阿多尼斯的生命历程。每一层面的两个极端之于中间立场的关系就如同阿多尼斯之于常人的关系。在弗雷泽看来，神话利用人类来象征自然的非人格化力量，而在戴田看来，神话是利用自然的非人格化力量来类比人类的行为。

在阿多尼亚节期间栽种的“阿多尼斯小花园”并不需要什么劳作。所种的植物很快便能发芽长出。照料它们轻松闲适，就如同诸神无需辛苦忙碌的生活一样。事实上，这些“小花园”就如诸神食用的香料。对其中植物无需培育，只需采集，任它们在最炎热的时间与地方生

长。盛夏时节，人们把花盆摆在屋顶上。一般的庄稼要8个月才能成熟，这些植物却只要8天就长成了。种庄稼非男人不可，而打理这些盆栽花草却是女人的事。不过，与香料不同的是，这些小花园很快盛开，也很快枯萎；又与庄稼不同的是，它们枯萎却不生产任何粮食。它们在大地之上开始，又在大地之下终结——即被抛入大海之中。一言以蔽之，“阿多尼斯小花园”是想要不劳而食的徒劳之举。诸神可以不事生产，人类却必须劳作。当人们不思劬劳而想要“速食”时，他们就会什么食物都得不到。

阿多尼斯本人是通过其母密耳拉与香料联系在一起的，密耳拉最终变成了一棵没药树。阿多尼斯在树中孕育，他必须破开此树才能出生。在奥维德的故事中，山林女神还将婴儿泡在他母亲的眼泪形成的没药水中沐浴。更重要的是，阿多尼斯通过性乱行为与香料联系在了一起。阿多尼斯的母亲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欲，和父亲乱伦才产下阿多尼斯。而依照阿波罗多罗斯的故事版本，阿佛洛狄忒和珀耳塞福涅由于无法控制的情欲，争抢婴儿阿多尼斯。戴田认为，阿多尼斯本人并非是受到女神诱惑的无辜受害者，而是女神的诱惑者。

阿多尼斯是一个早熟的诱惑者。像“阿多尼斯小花园”一样，他迅速成长；但是同样地，和“小花园”一样，他过早夭折。正如“小花园”枯萎得太早，因而不能生产任何果实，阿多尼斯则死得太年轻，还来不及结婚生子。他的出生始自性乱，他的结局则是不育。与之相反，他的母亲开始时不育，或者至少是禁欲——她轻蔑地拒绝了所有的男子——最后却堕入性乱，甚至是比性乱更甚的乱伦。母子二人都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拒绝、甚至威胁到了处于中间地带的婚姻。

阿多尼斯的不育不仅表现为无子，而且表现为他柔弱的女子气。他被野猪的獠牙戳伤致死，这说明他根本不适合从事男性的狩猎活动。他没有成为猎手，反倒成了被猎取的对象：阿多尼斯是“赫剌克勒斯这样的英雄战士的绝佳对立面”，“是一个既软弱又可怜的牺牲品”。阿多尼斯的女子气象征着男女两性之间缺乏足够距离的状态，而他的母亲一开始拒绝所有男性则象征着完全相反的情形。理想的情

形仍然是在二者之间：男女两性应当相互关联，又保有各自的独特性。

正如戴田将阿多尼斯的性乱与香料联系在一起一样，他同样也将阿多尼斯的不育和死亡与生菜联系在一起；在这则神话的几个不同版本中，阿多尼斯曾试图躲在生菜丛中避开野猪，但却没有成功。正如没药“具有激发老者性欲的力量”，生菜同样具有“熄灭年轻恋人激情的力量”。生菜“造成了性无能，而性无能就等同于死亡”。

总而言之，阿多尼斯没有弄清自己的位置。他不知道自己既不是神，也不是动物，而是人，而人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婚姻。由于未婚而亡，他未能实现自己的人性。

对戴田来说，如果这则神话的意义 在于呈现一系列无尽的层面，那么这则神话的功能 则是社会性的。它主张婚姻作为一个中间立场，它的一端是性乱，另一端则是不育或禁欲。在下一章中，我将试图论证神话提倡婚姻，并将其当作城邦的支柱。

注释

〔1〕 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之女，不顾其舅克瑞翁的禁令为死去的兄长营葬，后被关入岩洞，自缢身死。

〔2〕 厄特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皆为俄狄浦斯之子，在七将攻忒拜的故事中，保卫城市的厄特俄克勒斯与攻城的波吕尼刻斯决战，双双战死。

〔3〕 又写作Cadmus，为腓尼基王子，曾杀巨龙，埋其齿，结果长出一批武士，相互残杀，最后剩下5人，与他一起建立了忒拜城。

〔4〕 带翼的狮身女怪，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者即遭杀害。

〔5〕 路易·谢和耐（Louis Gernet，1882—1962）是一位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6〕 利姆诺斯是希腊爱琴海北部的一个岛屿。根据希腊神话传说，利姆诺斯的妇女因为得罪了阿佛洛狄忒，阿佛洛狄忒便让她们有了口臭，因此，她们的丈夫都投向色雷斯女子的怀抱。为了复仇，利姆诺斯妇女杀死了岛上的每一个男子。

〔7〕 忒斯摩福拉节，又称立法女神节，是纪念农业女神得墨忒耳和她的女儿珀耳塞福涅的节日，她们也是创立婚姻与民事法制的女神。每年10月至11月中有3到5天，希腊各地都庆祝这一节日。参加者必须是已婚妇女，她们必须保持

贞洁数日，并禁食某些食物。

第八章
神话与社会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在泰勒和弗雷泽看来，神话关乎的完全是、或者说几乎完全是物质现象——洪水、疾病、死亡；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神话则更多的是关乎社会现象——婚姻、纳税，以及在第四章中已经讨论过的仪式。神话仍然在人类和生活中的不愉快之间起到调和作用，但是现在这些不愉快不仅并非不可改变，而且能够 被完全丢弃。这里，神话促使人们屈从接受那些不愉快——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那些不得已——的方式同样是对其追根溯源到久远的过去，并由此赋予它们“传统”这一光环所具有的力量：

> 当仪式、礼俗、社会或道德规则需要证明其合理性，需要古代的、现实的和神圣的证据时，神话就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
>
> （马林诺夫斯基，《原始心理学中的神话》，第107页）

举例来说，神话宣称社会阶级由来已久，所以理当如此，并由此劝服外籍居民顺从阶级现状。而关于英国君主政体的神话则会将这一制度描述得尽可能地古老，由此引出的结论就是，倘若损害它，就是损害了传统。又譬如，在今天的英格兰，人们为猎狐辩护的借口就是，它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社会神话宣称：“要这样做，因为人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就物质现象而言，神话的受益者是个人。就社会现象而言，神话的受益者则是社会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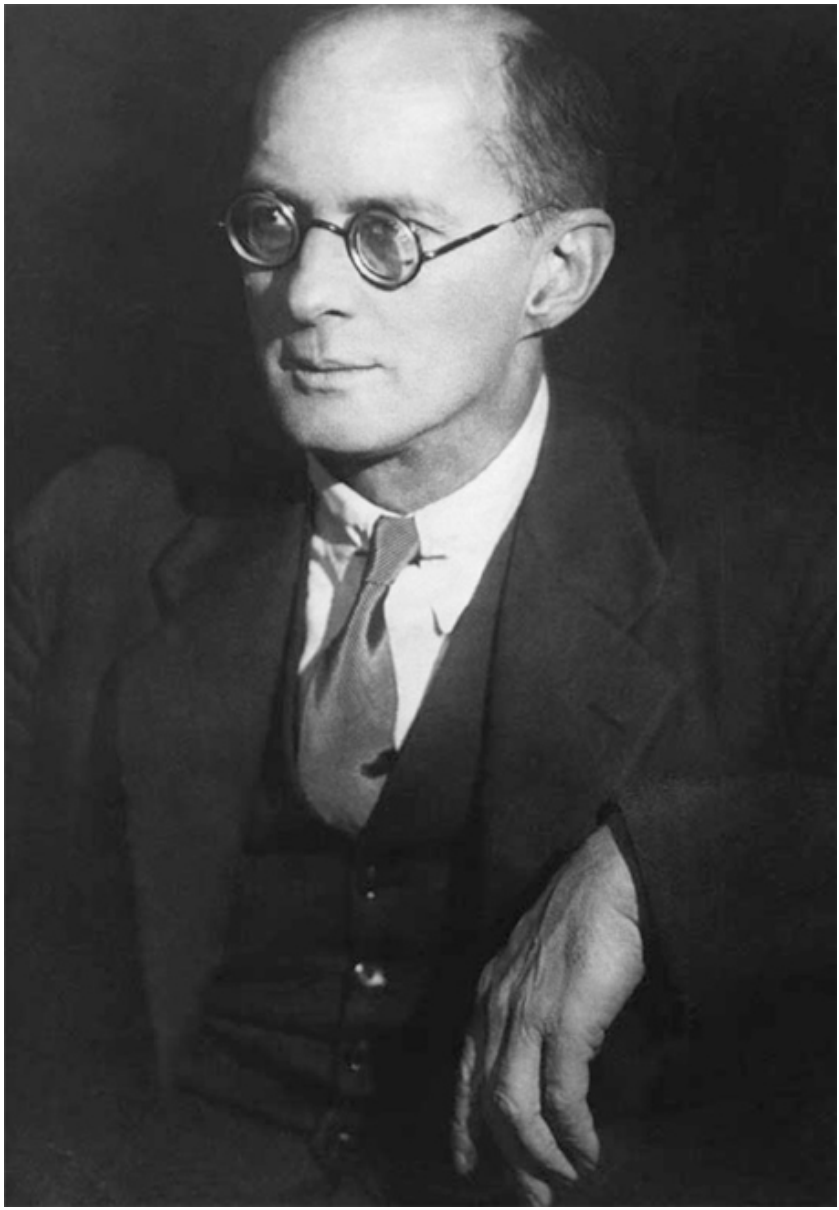

图13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1935年左右

说神话对现象追根溯源就等同于说神话对这些现象作出了解释。由此，当马林诺夫斯基抨击泰勒，并且宣称原始人“对出现在他们神

话中的任何事物并不想要进行‘解释’，并不想要弄‘清楚’”时，他其实是要表明，神话并非像泰勒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解释而解释。然而，神话必定依然是解释，因为它们只有通过对各种现象作出解释，才能发挥自己的调和功能。

马林诺夫斯基从未清楚说明现代人是否和原始人一样拥有神话。与原始科学相比，现代科学对物质世界的控制要强大得多，因此关于物质现象的现代神话自然就要少得多。即使没有关于物质现象的现代神话，那么应该还会有关于社会现象的现代神话。假如连关于社会现象的现代神话也是不存在的，那么即是说神话的地位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取代了。

乔治·索雷尔

关于将神话本身视作意识形态的观点，其经典论述见于法国工联主义者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 1847—1922）的著述《暴力论》中。索雷尔认为，神话不仅是原始的，而且是永恒的；与马林诺夫斯基的看法相反，他还认为，神话的作用不是支撑社会，而是颠覆它。索雷尔坚称，建立社会主义理想的唯一道路就是革命，而革命既需要暴力，也需要神话。所谓“暴力”，他指的是强制性行动，但又不仅仅是指流血。关键性的“暴力”行动是全体工人的罢工。所谓“神话”，他指的是一种指导性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宣扬现今社会的末日就在眼前，主张与统治阶级战斗到最后一息，树立反叛者为英雄，宣称胜利必将到来，并为未来社会确立一种道德标准：

> 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始终在我的脑海中徘徊不去……那就是，参与一场伟大社会运动的人们总会将他们即将展开的行动看作一场战斗，而他们的事业必将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这些建构……我建议称作神话；工联主义的“总罢工”和马克思的灾难性革命就是这样的神话。……即使在最艰辛的磨难中，天主教徒也从未丧失过信念，因为他们一直将教会的历史看作撒旦和基督支持的主教团的一系列战斗；每一个新出现的困难只不过是这场战争的一个插曲，而天主教

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索雷尔，《暴力论》，第41—42页）

在索雷尔看来，克伦威尔誓将英王查理一世赶下王位正是典型的神话。

索雷尔宣称，暴力与神话对革命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也就是合理的。他摒弃了一切对神话中性的、科学的分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将马克思主义本身转变为一种神话，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促使其追随者走向革命。和马林诺夫斯基一样，索雷尔对神话的真实性漠不关心。对他们两人来说，重要的是只要人们相信神话，神话就能发挥其作用。在索雷尔看来，神话的终极真实性——即革命的成功——反正是不可能提前预知的。

对马林诺夫斯基来说，神话与意识形态具有共同之处，即它们都将对社会的服从合理化了。对索雷尔来说，神话就是 意识形态，它的作用是为人们对社会的拒绝提供正当理由。索雷尔的理论完全无法用来分析阿多尼斯神话。因为阿多尼斯的行动是个人的；他不是积极的施动者，而是消极的牺牲品；并且他的行动并不为任何意识形态所驱使。他的理论倒是显然颇为切合当今的恐怖主义分子；这些恐怖分子的神话为“9·11”事件提供了正当理由，即把它看作击败妖魔化的美国这一国际霸权的第一步。然而，索雷尔的理论除了为此类神话贴上“神话”的标签之外，究竟还能对其起到多大的阐释作用，这一点似乎并不清楚。

勒内·吉拉尔

勒内·吉拉尔对弗雷泽神话 - 仪式主义的看法我们在第五章已经讨论过；他不仅转变了神话与仪式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转变了两者的起源与功能。神话与仪式之所以产生，并非为了获得食物，而是为了获得和平。将替罪羊——不论他是国王还是平民——献祭并非为了结束

冬季，而是为了结束暴力。在吉拉尔看来，暴力是终极的问题 ，而不像索雷尔认为的那样，是终极的解决方法 。神话与仪式不是应对自然的方式，而是应对人性——人的侵略性——的方式。

在《暴力与神圣》一书中，吉拉尔和拉格伦、兰克一样，援引俄狄浦斯神话作为其理论的最佳例证。吉拉尔认为，俄狄浦斯作为国王治理忒拜期间绝没有给忒拜带来什么瘟疫，他其实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忒拜的瘟疫或是根本就不存在，或是它绝非动乱的起因。或者瘟疫只是暴力的一个隐喻，因为暴力像传染病一样传遍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忒拜人之间的暴力行为在索福克勒斯剧中几个主要人物的紧张关系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几个人物是：俄狄浦斯、克瑞翁和提瑞西阿斯 [1] 。而结束这种暴力、使社会得以维系的唯一出路就是找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的成员作为替罪羊。俄狄浦斯虽然是国王，但是他身带双重耻辱，因而双倍地脆弱。首先，他是一个外来者：就人们所知，他并不是忒拜人；他取得王位靠的并非世袭，而是因为制服了斯芬克司。再者，他还是一个跛子，这是他出生时被刺穿了脚踝造成的。俄狄浦斯神话是在俄狄浦斯倒台之后才编造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将罪责推到俄狄浦斯身上，为整个社会开脱：即宣称是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弑亲和乱伦行为给忒拜带来了瘟疫。至少这是索福克勒斯笔下提瑞西阿斯的口中之词：

> 假如我们从字面意义来理解提瑞西阿斯的回答，那么他针对俄狄浦斯的那通弑父与乱伦的可怕攻击就并非来自任何超自然的信息源［因此也就并不代表是“真理”］。对俄狄浦斯的谴责只是一种报复行为，源自两人在一场悲剧性的激辩中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是俄狄浦斯无意中自己挑起了头，因为他迫使提瑞西阿斯不得不开口。他指责提瑞西阿斯有份谋杀［俄狄浦斯的父亲］拉伊俄斯；他激起了提瑞西阿斯的报复，后者掉过头来将指控对准了俄狄浦斯。……［两人］相互指责对方参与了拉伊俄斯的谋杀，是要将献祭危机的全部责任推到对方身上；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每一个人都要负上相等的责任，因为每一个人都参与了对一种文化秩序的破坏。
>
> （吉拉尔，《暴力与神圣》，第71页）

按照吉拉尔的说法，实际结果是，在究竟谁应为社会秩序的崩溃负责这一问题上，忒拜人不过是接受了提瑞西阿斯和克瑞翁的观点，而没有接受俄狄浦斯的观点。是之后产生的神话才将胜利者的观点变成了真理：

> 作为宗教信徒的忒拜人寻求解决他们灾祸的良方；他们的方式就是正式接受神话，使它成为对近来造成城邦灾难频仍的一系列事件的描述无可辩驳的版本，使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秩序的纲领——简而言之，就是使自己相信，他们的一切不幸都毫无例外地源于那场瘟疫。这样一种态度要求绝对相信某个代罪牺牲品所犯的罪。
>
> （吉拉尔，《暴力与神圣》，第83页）

事实上，问题的真正原因在于集体的暴力，而不在于俄狄浦斯个人，这一点已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证明。不错，瘟疫是停止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争夺王位的斗争，克瑞翁、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波吕尼刻斯和厄特俄克勒斯都卷入其中。吉拉尔宣称，索福克勒斯向这一神话提出了挑战，但同时又从未亮明其立场，因此，包括哈里森和默里在内，理论家们一直都将他的这部剧作看作是这一神话的戏剧化版本，只有吉拉尔自己更具洞察力，看出了这部剧作是对俄狄浦斯神话的一种挑战。

但是这一神话在《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2]中继续，此时它却不再仅仅是谴责俄狄浦斯给忒拜带来灾祸，而是将他变成了一个英雄。即使是俄狄浦斯在位时，他也不乏英雄行为：他将结束臣民遭受的瘟疫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发誓要找出带来灾难的祸首，而一旦发现自己就是罪魁祸首时，他便坚持自我放逐。然而，吉拉尔认为真正的英雄并非像拉格伦所认为的那样，是那个失去王位的、自我牺牲的俄狄浦斯，而是居于高位的俄狄浦斯。即使作为祸首，俄狄浦斯依然拥有拯救忒拜的力量：正如他的在场引发了瘟疫一样，他的离去则结束了瘟疫。他是罪犯的同时也是一个英雄。他已经具有了神一样的力量，既能够带来瘟疫，也能够使之结束。

但是到了《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时，俄狄浦斯的形象被进一步地拔高了。在经过若干年的流放之后，俄狄浦斯来到了雅典附近的科洛诺斯。此时，忒拜国王召他返回忒拜。正如当年忒拜的福祉依赖于他的流放一样，现在忒拜的福祉则依赖于他的回归。俄狄浦斯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我们得知，在《俄狄浦斯王》中的那些事件之后，他曾希望留在忒拜，但最终却受制于克瑞翁等人的逼迫，不得不选择自我放逐。于是克瑞翁准备把他抓起来并带回忒拜。这时雅典国王忒修斯为俄狄浦斯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俄狄浦斯宣布，他死后将埋葬在雅典，而他的墓地将保护雅典免受忒拜的攻击。简言之，俄狄浦斯始于《俄狄浦斯王》中像神一样的忒拜国王，终于《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像神一样的雅典的保护人。

阿多尼斯

古代希腊人将心理上的不成熟与政治上的不成熟联系在一起：阿多尼斯未能成年即意味着他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公民。阿多尼斯与专制暴虐的政府形式十分相合，即完全不承担任何责任、在政治上极端幼稚。他对那些母亲般的女神们言听计从又使他切合于母权制的社会。他所体验到的都是溺爱的女性，并将这些特性投射到所有的女性身上，因此便产生了对她们毫无条件的绝对服从。

家庭在个人人格和由男性公民治理的城邦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希罗多德〔3〕将古希腊的城邦与东方的专制帝国加以对照，指出在城邦制度下，即使统治者也要服从法律，而东方的统治者则置身于法律之上。就家庭生活而言，这样的对立在古希腊与东方之间同样存在。

为了说明东方君主的暴政，希罗多德记录了他们破坏家庭习俗的行为。萨迪斯〔4〕的坎道勒斯王命令他的贴身侍卫盖吉兹在王后脱衣时秘密窥伺她。她于是强迫盖吉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希罗多德，1.8—13）。梭伦告诉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5〕他所知道的最幸福的人是一个籍籍无名的雅典人，他的家庭父慈子孝，儿孙满堂。克罗伊

斯本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又聋又哑，另一个在猎杀野猪时——就像阿多尼斯一样——被自己的朋友杀死；他的这个朋友还失手杀了自己的兄弟，因此被父亲放逐（希罗多德，1.29—33）。米堤亚的阿斯提亚格斯王在外孙居鲁士出生后下令将他杀死，以防止他将来篡夺自己的王位。哈尔帕戈斯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于是阿斯提亚格斯出于报复，不仅杀死了他的儿子，还让他食自己儿子的肉。后来，居鲁士虽然没有杀外祖父，但最终确实推翻了他的统治（希罗多德，1.117—119）。[6] 居鲁士的儿子和继任者，波斯的冈比西亚王娶了他的两个姐妹，后又谋杀了其中的一个；他还谋杀了自己的兄弟。他最后陷于疯狂，无嗣而终（希罗多德，3.31—32）。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波斯的薛西斯王[7]统治时期，而薛西斯更是其中的登峰造极者。

希罗多德承认，希腊同样也出现过暴君，但他认为这些暴君都是一时的例外。至于说到他们的家庭生活，科林斯的佩里安德罗斯[8]曾杀害妻子，废黜岳父，并将自己一个极有天分的儿子赶出家门（希罗多德，3.50.3—3.52.6）。雅典的庇西特拉图[9]拒绝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发生“正常的”性关系，因为他害怕她的家族带有的一个诅咒（希罗多德，1.61.1）。

阿多尼斯不具备成为公民的能力，因为他和那些暴君僭主一样，不具备过正常家庭生活的能力。一方面，他没有建立任何家庭：他从未结婚，没有子嗣，年轻早夭。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出生在家庭之中：他是乱伦而非婚生的孩子，他的父亲试图杀死他的母亲。因此，他被双重地摒弃在公民群体之外：他不仅缺乏成熟特质，而且也没有门第家谱，而后者本身又是由于其母的不成熟造成的。如果说希罗多德想要表明的是创建家庭的政治必要性，那么，亚里士多德的《雅典人宪法》则试图表明家庭出身的政治必要性：“公民权属于那些父母是公民的人。”

直到公元前507年克莱塞尼兹[10]将雅典公民身份的基础从族亲制改为地点制以前，胞族和族亲关系都是获得公民权的先决条件。即使在居民点取代胞族成为主要的政治单位之后，胞族关系依然十分重要。例如，尽管一个4世纪的雅典人可以是一个公民，而不属于任何

胞族，但他的地位是“不自在的、成问题的”。再者，居民点成员的身份本身也是继承性的。由此，公民身份依然是一个出生的问题，正如《雅典人宪法》在说到克莱塞尼兹之后的时代时所宣称的那样。

希腊人不仅将不成熟与政治联系起来，还将它与狩猎也联系起来。阿多尼斯在狩猎中的不幸也象征了他无法长大成人的不幸。他本该是猎手，却成为了猎捕的对象。他对狩猎没有概念，也不知道狩猎的危险。他以为这个世界是充满母性的，或者他以为自己受到母性的女神的保护，可以避开世上的危险。维纳斯曾警告他，危险的野兽对青春和美貌并无敬意，但他却置若罔闻。

人与猎手之间的关联变成了人与公民之间关联的一个隐喻。皮埃尔·维达尔 - 纳凯（1930—2006）提出，根据《雅典人宪法》，雅典青年在成为公民之前必须服两年的兵役，而狩猎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活动。维达尔 - 纳凯认为，这两年是一种通过礼仪，因此它是青年男子，即青丁[11]在他们所知的以往的生活和将来的生活之间的一个间歇。也即是说，这些青丁将在边塞与战友们一起度过这两年，而不是在城市中和家人在一起。

维达尔 - 纳凯宣称，最重要的是，青丁所从事的狩猎活动与他们成年后成为甲兵时所从事的狩猎活动是完全相反的。作为青丁，他们在夜间的山林中单独狩猎，其装备不过是些网具之类，因此他们是依靠各种计谋来捕获猎物的。而作为甲兵，他们在白天的平原上集体展开狩猎活动，其武器是长矛，因此必须依靠勇气和技巧才能杀死猎物。青丁与甲兵的狩猎之间存在这种差别，其目的在于向青丁灌输甲兵的价值观。

维达尔 - 纳凯论证青丁制度与狩猎之间的联系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他首先诉诸与阿帕图里亚节[12]相关的神话；在阿帕图里亚节期间，雅典的父亲们将他们年满16岁的儿子领来登记入簿，在同一时间成为公民、胞族成员和服兵役两年的青丁。维达尔 - 纳凯断言，神话的主人公，雅典人梅兰索斯，或称“黑肤人”，就是青丁的一个反面典型：他是一个永远也没能成为甲兵的青丁。即便已经成人，他仍然采用诡计，而不是依靠勇气和技巧来战胜他的对手皮奥夏的桑索斯王

（即“金肤人”）。

再者，维达尔 - 纳凯又诉诸阿里斯托芬〔13〕笔下的“黑猎手”梅兰尼翁这一人物：

> 我想给你们讲一个我小时候
> 听过的故事：
> 有一个名叫梅兰尼翁的青年，
> 怎样躲避了婚姻，在山林中独自生活。
> 他带了一只狗，
> 布网设陷阱，
> 猎捕兔子。
> 他仇恨妇女，以致从不回家。
> 梅兰尼翁憎恶妇女，而我们这些聪明人
> 在憎恶妇女方面，一点也不比他差。
>
> （阿里斯托芬，《吕西斯忒拉忒》，第781—796行）

梅兰尼翁与青丁制度之间的关联有两方面，一是梅兰尼翁同样是一个黑肤的人物，他与雅典人梅兰索斯一样，让人联想到一切有关黑暗的事物；二是梅兰尼翁是一个从未结婚的青丁般的猎手。

假若我们从梅兰索斯是一个战士推断他也是一个猎手的话，那么他和梅兰尼翁一样，在狩猎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只达到了青少年的程度。不过，阿多尼斯比这两人还要糟糕：他在狩猎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形式的成功。因此，梅兰索斯和梅兰尼翁只是未能成年的青少年，而阿多尼斯与他们两人不同，他是个甚至未能进入少年期的婴儿。他距离猎手的水平之远象征着他距离公民的水平之远。阿多尼斯神话宣扬的是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只不过它是通过一个触目惊心的反例来实现其目的的。

注释

〔1〕 克瑞翁是俄狄浦斯之舅，曾代俄狄浦斯之父治理忒拜，又在俄狄浦斯被逐之后登上忒拜王位。提瑞西阿斯是忒拜的一位盲人先知。

〔2〕 在索福克勒斯写过的120多个剧本中，有两部以俄狄浦斯神话为题材，就是《俄狄浦斯王》（约公元前431年）和《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约公元前401年）。

〔3〕 希罗多德（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他所著《历史》描述了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是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

〔4〕 古吕底亚王国的首都（公元前7世纪），在土耳其马尼萨省境内，今伊兹密尔城附近。

〔5〕 梭伦，传说中的雅典立法者、改革家和诗人，曾于公元前594年任执政官，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创建者。克罗伊斯是吕底亚末代国王，大约公元前560—前547年在位。

〔6〕 米堤亚为伊朗高原西北部一奴隶制国家，约公元前8世纪建国。阿斯提亚格斯是米堤亚国王，约公元前585—前550年在位。据希罗多德记载，阿斯提亚格斯曾得一梦，说外孙居鲁士长大后会篡夺他的王位，于是他命令哈尔帕戈斯将婴儿弃于荒野，但哈尔帕戈斯却将婴儿交由一牧人收养。居鲁士长到10岁时，阿斯提亚格斯认出了他，出于恻隐之心，他没有再次下手。居鲁士成年后，果然起兵造反，阿斯提亚格斯派哈尔帕戈斯前去平叛，但后者却倒戈，站在了居鲁士一边。居鲁士最终推翻了外祖父的政权，成为居鲁士大帝，被波斯人尊称为“波斯之父”。

〔7〕 薛西斯一世（约公元前519—前465）是大流士一世之子。他继任波斯国王后，曾镇压埃及叛乱，血洗尼罗河三角洲。后又入侵希腊，洗劫雅典，最终在萨拉米斯大海战中惨败。晚年在宫廷阴谋中遇害。

〔8〕 佩里安德罗斯是古希腊科林斯的僭主，约公元前628—前588年在位。据希罗多德记载，他是一个惨无人道的暴君。但是这种说法大概来自科林斯的贵族，因为他们遭到佩里安德罗斯残酷无情的对待。事实上他是干练的统治者，促进城市商业繁荣，保护文化艺术，被称为“希腊七贤”之一。

〔9〕 庇西特拉图（约公元前6世纪初—前527），古雅典僭主，于帕伦尼战役获胜后巩固了其在雅典的统治，实行保护中小土地所有者及奖励农工商业的政策。

〔10〕 克莱塞尼兹（约公元前570—前508），雅典政治家，曾担任雅典首席执政官，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创建者。

〔11〕 青丁在古希腊可指到达青春期的任何男性，在雅典则是专门术语，指必须接受两年军事训练的青年男子。青丁尚无大部分公民权利。

〔12〕 古希腊的宗教节日。在雅典，每年10至11月举行3天。节日期间，阿提卡地区各胞族集会，讨论公共事务。

〔13〕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50？—前385？），古希腊诗人、喜剧作

家，有“喜剧之父”之称。

结语：神话研究的未来

倘若我们依据泰勒和弗雷泽的理论加以概括，我们可以说，19世纪的神话理论完全是关于物质世界的。神话被认为是宗教的一部分，宗教被认为是科学的原始对应物，而科学则被认为是完全现代的。到了20世纪，人们摒弃了泰勒和弗雷泽的理论，原因正是因为它们将神话与科学置于相互敌对的立场，因而排除了传统神话；又因为它们将神话归于宗教之下，因而排除了世俗神话；还因为它们认定神话的主题是物质世界，神话的功能是解释性的，神话是虚假的。

20世纪批驳泰勒与弗雷泽神话理论的核心在于否定其科学产生之后神话必然消亡的观点。20世纪神话理论在科学面前以反抗的姿态寻求保存神话的途径。然而，它们的做法并非是挑战科学在解释物质世界方面的权威地位。它们没有走任何捷径，亦即将科学“相对化”、“社会学化”或“神话化”。相反，它们重新界定了神话 。这就产生了以下观点：一种认为，神话依然是关于世界的，但却不是一种解释，因此它的功能与科学的功能相异（马林诺夫斯基、伊利亚德）；另一种则认为，神话应从象征意义上加以解读，它甚至不是关于物质世界的（布尔特曼、约纳斯、加缪）；还有一种是这两种观点的结合（弗洛伊德、兰克、荣格、坎贝尔）。在20世纪，神话与科学的和解是通过对神话自身、而非对科学的重新界定来实现的。只是到了20世纪末，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神话遵从科学的情形才遭到质疑。

既然20世纪的神话理论并没有对科学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挑战，那么何必劳神费力地去协调神话与科学的关系呢？为何不直接接受19世纪的观点，干脆摒除神话，独尊科学呢？20世纪神话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倘若将神话仅仅限制在对物质事件的字面解释（泰勒）或象征描述（弗雷泽）上，就无法对神话拥有的一系列其他功能 和意 义 作出说明。表明神话具有这些其他功能与意义的明显证据就是，神话至今依然存续。如果泰勒和弗雷泽是对的，那么神话早就已经消亡了。

D. W. 温尼科特

到了21世纪，神话研究的问题在于，在不轻易损害科学之权威的前提下，神话还能不能再被带回到外部世界中呢？作为实现这一可能的一种方式，我建议将英国儿童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D. W. 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 1896—1971）关于儿童游戏的分析运用到神话研究中。

温尼科特提出，游戏被接受 为是不真实的：孩子们承认自己就是在玩耍嬉戏。游戏赋予了自身这样的权利，即它可以将一把汤匙当作一列火车，而父母则不被允许就这把汤匙是否真是火车提出疑问。可是游戏一旦结束，汤匙仍然还是汤匙。然而，游戏并非仅仅是幻想或逃避现实这么简单。它在建构具有个人意义的某种真实。它从日常世界中抽取出某物——一把汤匙，又将它转变为另外的某物——一列火车。

温尼科特认为，游戏也延伸到成人的领域；他不脱典型英国人的方式，提出了园艺和烹饪两项，在这两个领域中，人们都利用外部世界的元素创造出了一个具有个人意义的世界。温尼科特还提出了艺术与宗教，在这两个领域中，人们都建构了一个具有更加深刻意义的世界：

> 这里我们且认为，接受现实的任务是从来不能完成的，没有人能够彻底摆脱确立内在真实与外在真实之间联系的重负的束缚，而缓解这一重负是通过一种居间领域的、不受挑战的体验（艺术、宗教等）来实现的。这一居间领域与“迷失”在游戏中的小孩子的游戏领域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
>
> （温尼科特，《过渡性客体与现象》，第13页）

用温尼科特的话来说就是，游戏是“过渡性”活动。它提供了一个从儿童时期向成年时期的过渡，从内在的幻想世界向外部的现实的过渡，以及从已知的外部世界向未知的外部世界的过渡。儿童会紧紧抓住一件物质客体不放——譬如说一只玩具熊，以便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并使他能够怀有信心地去探索外部世界；与此类似，成人则依恋于一种内化的客体——譬如说嗜好、兴趣、价值，或者（我提出再加

上）神话，这使他能够面对一个更加广大的世界。孩子明知玩具熊不是妈妈，但是仍然对它紧抓不放，就好像它是妈妈一样，成人则明知神话不是现实，但仍然执著于它，仿佛它就是真的一样。神话是“假信为真”。

毫无疑问，并非所有的神话都被看作是一种“假信为真”。有些神话可能被看作是无可争议的真理——例如关于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的神话。还有一些神话从这两方面看都是成立的，譬如，关于社会进步的信念、意识形态、诸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等等。在被看作是“假信为真”时，这类神话的作用是作为这个世界的指导原则，而不是对这个世界的描述。

假如我们大胆地将一个单纯的信念也视为一则神话的话，那么，“一夜暴富”神话也可以归于此类。当然，这一信念可以被视作是必然的教条，因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在全世界和在美国一样广为流传，并且一旦未能实现，还会导致挫折感和反责。不过，这则神话也可以被看作是“假信为真”——并非说它是对美国生活的虚假描述，而是说它是理想中的美国生活。这里，美国被看作好像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天堂。当今这一神话的典型是安东尼·罗宾斯[1]，他是成功这一理念的完美推销员。他的神话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他自己从潦倒的失败者变为富有的胜利者的故事。按照罗宾斯的看法，许多人未能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他们没有努力。

诚然，罗宾斯的神话仍然是关于社会的，而不是关于物质世界的。那么更好的例子或许是那些具有神一般力量的人——即名人——的生平故事。正是他们领导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不仅要消灭贫穷、种族主义和其他社会毒瘤，而且还要结束环境污染、抑制全球变暖的趋势、拯救濒危物种。他们能做成的事许多国家、甚至联合国都无法做成。

这类名人中最耀眼的是那些好莱坞明星们。如同荷马史诗、甚至希伯来《圣经》中民众关于神的概念一样，人们极少能看到这些好莱坞明星本人，而当他们出现在银幕上时，他们身形庞然，无所不能，千变万化，并且通过电影永生不灭。他们的品格被放大为超乎凡人：

不仅是勇敢，而且是无所畏惧；不仅是仁慈，而且是圣洁至善；不仅具有力量，而且无所不能；不仅具有智慧，而且无所不知。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诸神在私下里和公众场合都是神，而电影明星却只在银幕上才是明星，离开了银幕他们就是凡人。然而大多数影迷却不作这种区分。他们认为，银幕上出现的品格也就是银幕之外的品格。事实上，他们认定电影明星们就是在银幕上扮演自己，即他们只不过是把置身此类环境时自己会怎么做给“表演”出来。当得知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喜爱的演员达不到他们所扮演角色的高度时——拿身高并不突出的梅尔·吉布森来说，他是确确实实地达不到银幕上所见的“高度”——他们就会大失所望。罗伯特·米切姆〔2〕不得不告诉影迷们别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军事策略；葛丽泰·嘉宝不得不选择隐居，以维持自己青春永驻的形象；好莱坞的同性恋影星们不敢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唯恐没人再找他们饰演异性恋角色。汤姆·克鲁斯从职业的角度考虑，不能不对那些称他为同性恋的人提起诉讼。

可能有人会说，诸神是自然出生的，影星则是被创造出来的。并且尽人皆知，成为一个影星是多么机缘巧合的事情。可是大多数影迷都相信影星是天生的，而不是创造出来的。当拉娜·特纳〔3〕在好莱坞大道的斯瓦布杂货店天真烂漫地喝着奶昔时，她只是被星探发现了，而不是被创造了。

也可能有人会说，影星们并不像诸神那样能够随心所欲，无所不为。可是大多数影迷却相信，影星们不受那些我们常人必须遵从的法律的束缚。因此，当他们心中的偶像因诸种罪名——譬如吸毒（小罗伯特·唐尼）、商店行窃（薇诺娜·赖德）、甚至猥亵儿童（迈克尔·杰克逊）——被拘捕时，他们就会感到极度震惊。

说当代影星的类型更加宽泛，并且他们既是英雄，也是反英雄，这已经是陈词滥调了。但是最具票房价值的男女明星依然是那些看上去与他们在银幕上的角色相称的影星；而且令他们在银幕上倾倒众生的，是他们的相貌，而不是他们的演技。

用来形容影迷们崇拜之情的词语就说明了一切：影星们被视为“偶像”，受到影迷们的“膜拜”。他们中的最伟大者被称作银幕

之“神”。作为“明星”，他们于众人不可企及之处熠熠生辉。影迷们则“如中魔咒”。

反对我将电影明星看作现代诸神的人可能会合情合理地反驳说，现在已经没人相信影星的这些光环了。没人再相信好莱坞影星同你我有什么不同。他们可能收入更丰，但是他们会像我们大家一样，需要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和磨练。还有什么比“未经授权的”影星传记——让明星走下神坛、回归现实的传记——更好卖的呢？且不说其他，银幕上周旋于无数女子之间的硬汉化身洛克·赫德森和银幕下被艾滋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洛克·赫德森 [4] 所显现出的巨大反差（说“反差”还是轻了），已经足以令世人认识到银幕上的人格与银幕下的现实之间的泾渭分明。

然而，顽固不化地对当代影迷持有这种看法是过于天真的。影迷们仍然在“偶像化”和“膜拜”影星，对于影星们的缺陷，他们不是无知，而是无视。他们对影星们的这些缺陷要么一概否认，要么大打折扣。这并不是说影迷们不知道这些缺陷，而是他们不想知道，或者并不在乎。然而，他们对影星们的忠诚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意为之的。按照温尼科特的理论，这是一种“假信为真”，而不是轻信。它要求扫除挡道的相反证据。

去影院观影助长了对影星的神化。影院阻隔了外部世界，而以它自己的世界取而代之。电影越是具有感染力，观众就越是忘记自己身在何处，而是想象他们就生活在银幕上的时空中。在众所周知的“真实世界”中从来不会发生的事在电影中则得到允许。在电影中，就有如在天堂一样，一切皆有可能。人们常说的口头禅“只会在电影中发生”就是一个明证。去电影院就是要悬置怀疑，就是要同意“一起游戏”。观影的最终报偿就是与演员相遇，即使他们只是出现在银幕上。去电影院就像是去教堂——去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比的、自成一体的地方，在那里上帝最有可能被找到。去电影院将神话与仪式结合了起来，并且将诸神，因此也将神话，带回到世界中——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又没有摒弃科学。

注释

〔1〕 安东尼·罗宾斯（1960— ）是美国自助书作家和职业演说家。他强调每一个人都有内在成功的潜能，并据此写出挖掘人内在各种积极因素的畅销书，还为许多重要人物提供咨询，从而从穷困潦倒暴发为亿万富翁。

〔2〕 罗伯特·米切姆（1917—1997），美国电影演员，以扮演“黑色电影”角色闻名。1945年，他出演电影《美国大兵》（*The Story of G. I. Joe*），并在这之后不久应征入伍。他凭此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

〔3〕 拉娜·特纳（1921—1995），美国著名电影女演员，以美艳性感著称。她的私生活同样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据传她在一家杂货店买饮料时被星探发现。真实细节虽非完全一致，也相差不远。

〔4〕 洛克·赫德森（1925—1985），美国最著名的男影星之一，20世纪50至60年代出演了为数众多的浪漫影片，代表了经典的柔情硬汉形象。他于80年代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后罹患艾滋病去世。

爱神的宠儿阿多尼斯，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他们的神话故事缘何而生，又是怎样产生的？缘何代代相传，又是怎样传承的？

本书以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批评、哲学、宗教研究等不同学科为依托，阐述神话研究的种种方法，对神话的一系列功能和意义作出说明，为读者带来一次与神话理论的亲密接触。

百科通识文库

49

埃及神话

杰拉尔丁·平奇 著

邢颖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埃及神话

杰拉尔丁·平奇 著

邢颖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58**

Egyptian Myth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4.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4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Geraldine Pinch 2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及神话 / （英）平奇（Pinch, G.）著；邢颖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10-3

I．①埃… II．①平… ②邢… III．①神话 - 作品集 - 埃及 IV．①I41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791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10-3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绪论
第一章　埃及神话：想象中的埃及
第二章　神词：语言与神话
第三章　对于神本身的认识：神与神话
第四章　美丽的时刻：创世神话
第五章　黑土地、红土地：神话的地理环境
第六章　两土地之王：国家神话
第七章　一场大战：斗争与和解
第八章　天空之眼：双元性与连续性
第九章　个人的神话：神话与民间宗教
第十章　木乃伊的祝福：死亡神话
年表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杰拉尔丁·平奇拥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埃及学学位，并在这两所大学里均开设过古埃及文明和宗教方面的课程。她曾供职于“埃及探索协会”理事会和《埃及考古学杂志》编委会，目前是《古代近东宗教杂志》编委会成员，著有多部有关埃及神话、宗教等方面的书籍。

译者简介

邢颖，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曾于2003-2004年赴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系访学，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事世界上古史研究。

图目

图1　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克里奥帕特拉尖塔”（图特摩斯三世方尖碑）
图2a-b　“梅特涅石碑”上部的图画
图3　卢克索博物馆的索贝克–拉与阿蒙霍泰普三世雕像
图4　大英博物馆中的“夏巴卡石碑”
图5　医生古阿的外棺底部
图6　图坦卡蒙持鱼叉的镀金小雕像
图7　《彻斯特比提蒲纸本一号》上的《荷鲁斯与塞特的争斗》故事原文
图8　代表月亮和太阳之眼的三个护身符
图9　“房屋中的女士”塞涅波的河马长牙防护魔杖
图10　后王朝时期的一个谷物木乃伊

绪论

公元前4千纪后期，尼罗河谷和三角洲地区形成了两个王国：上埃及和下埃及。在之后3,000多年的时间里，埃及先后经历了32个王朝的统治（参见书末年表）。“法老”（意为“大房子”）是埃及国王的一个称号，因此埃及这段漫长的历史通常也被称为“法老时代”。

公元前3千纪到公元前2千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及是古代近东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埃及人最早建造了巨石建筑，他们创作出精美的雕塑和彩色的浮雕，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最美丽的书写形式之一——象形文字。即使埃及在公元前1千纪晚期丧失了政治独立，埃及的文化与宗教仍然保存了下来，并对希腊、罗马的文化与宗教产生了影响。

在埃及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神话是埃及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广泛存在于埃及的艺术、建筑以及文学作品之中。神话对国王和祭司主持的许多宗教仪式起到了支持作用。受过教育的埃及人都相信，神话知识是在和今生与来世的种种危险作斗争并战胜这些危险的必要武器。

对于埃及最早产生神话叙事的时间，埃及学家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他们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在于难以决定神话的定义。如今“神话”这个词通常用于表达负面的含义，形容某件事情是夸张的或者不真实的。但在古代文化中，“神话”并没有这一层负面含义，人们认为神话就是一些故事，其中包含了诗一般的事实，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事实。一些学者认为神话描写诸神的故事，以此与其他类型的口头传说相区别。这个简单的定义对埃及神话来说可能非常合适，但它并不适用于所有文化。

一般来讲，神话都被置于一个人神共存的遥远时空中，意义丰富，影响巨大，可以用来解释或判断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即使在现代，我们也承认神话具有自身的生命力，而且往往比它所基于的事实原型更具影响力。对于埃及人来说，神话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力量，可以作为连接人神世界的桥梁。

埃及神话从来不固化为一个标准的版本，它在3,000年的历史进

程中不断变化和发展。每个地方性神庙的主神都有他们自己的神话，而即使是被描述成“核心神话”（参见第一章背景知识1）的基本事件，也不断地被重新讲述，并拥有许多不同的人物和背景。

本书按主题编排，每个主题都有一个特定的古埃及艺术品作为插图。选择这些艺术品是为了强调埃及学家在研究工作中所使用的原始资料的多样性，希望它们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一种与现代西方思想形式相距甚远的文化形式。笔者不敢假设可以把有关埃及神话的一切都讲得简单明了，况且也正是该领域的复杂性才使得从事这项研究具有无限的乐趣。

第一章

埃及神话：想象中的埃及

记载着埃及神话的原始资料并不都是布满尘土的纸草卷。在伦敦市中心泰晤士河的北岸矗立着一座方尖碑，名为“克里奥帕特拉尖塔”（Cleopatra's Needle，图1）。虽然这座石碑精美的基座以及两边的斯芬克斯像都是维多利亚时期修建的，但“尖塔”本身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埃及方尖碑。“尖塔”这个绰号来源于阿拉伯语对方尖碑的称呼，它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观念，就是认为古埃及的一切都是规模巨大、超乎人的想象的。“克里奥帕特拉尖塔”有20多米（68英尺）高，是埃及最大的几座神庙内的巨型方尖碑之一，它高贵、神秘，符合西方人眼中埃及建筑的形象。埃及人具有一种天赋，就是能够创造出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象征物来表达复杂的观念，方尖碑就是一种表现神话世界的雕刻艺术。

图1　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克里奥帕特拉尖塔”（图特摩斯三世方尖碑）

一座方尖碑的历险记

“克里奥帕特拉尖塔”实际上是在图特摩斯三世（King Thutmose III）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479—前1425）建造的，这位国王的生活时间比人们熟知的克里奥帕特拉女王（Cleopatra，克里奥帕特拉七世）要早大约1,400年。图特摩斯的这个花岗岩方尖碑原本是一对方尖碑中的一个，它们在阿斯旺被开采出来之后沿着尼罗河溯流而下400英里，最后到达赫利奥波里斯（“太阳之城”），被竖立于太阳神拉神（Ra）的大神庙门前。太阳崇拜在埃及文化中至关重要，因此这座神庙是埃及最重要的神庙之一。赫利奥波里斯的祭司在古代以知识和智慧闻名于世，本书所探讨的许多神话都源于赫利奥波里斯。后来为了建造开罗城，拉神神庙遭到劫掠，如今在开罗现代化的城郊和飞机场的下面，仍然埋藏着少量神庙遗迹。“克里奥帕特拉尖塔”代表着一种悲伤的回忆，提醒着人们有多少埃及遗产已经丢失或被转移，而如今要想把这些分散于各地的文物拼合到一起又是多么困难。

通过在赫利奥波里斯建造这些方尖碑，图特摩斯三世执行了埃及国王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为太阳神每日重生宇宙的循环提供便利条件。方尖碑的塔尖上覆盖着一种金银熔合的金属，被称为金银合金。这些方尖碑的位置都是经过了选择的，这样太阳每天早晨都会把它们照亮。这些方尖碑共同代表了复活之地——天边的高山。“克里奥帕特拉尖塔”是西方的地平线，是日落与死亡之地；这对方尖碑中的另一座代表东方的地平线，是黎明与重生之地。如同埃及的大多数象征物一样，方尖碑同时代表多个物体。单个的方尖碑还代表原初土丘，也就是在万物诞生的黎明太阳第一次升起之地。方尖碑是神话时代的标志，是神话中宇宙运行模式的组成部分，但方尖碑的这一重要作用却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渐渐失去了。

公元前13世纪，著名的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把自己的名字刻写在这两座方尖碑上，它们在当时可能已被运到尼罗河三角洲，立于拉美西斯二世在那里修建或扩建的一座神庙之中。到公元前1世纪，方尖碑立在了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克里奥帕

特拉七世是这个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亚历山大里亚是希腊化世界的智慧汇聚地、科学与哲学的中心，而方尖碑的出现代表了更加难以参透的知识形式，这些知识不能为实验所验证，也不能通过理性的争辩来取得。一篇碑铭记载说这两个方尖碑被克里奥帕特拉的敌人、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转移到别的地方，立在了一座祭拜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神庙外。最终，亚历山大里亚频繁发生的地震使得位于西边的方尖碑轰然倒塌。

公元1801年，英国人在亚历山大里亚战役中打败了拿破仑（Napoleon）的军队，土耳其总督把这座方尖碑赠送给了英国。但“克里奥帕特拉尖塔”起初一直是一件无法运走的礼物，直到1877年，“克里奥帕特拉”号驳船将它运回英国，运输途中还有6个人为此丧命。方尖碑被成功地立于泰晤士河畔，这使得美国人羡慕不已，因此这对方尖碑中的另外一座于1881年被运到纽约，并竖立在中央公园。图特摩斯三世的方尖碑从此隔海相望，它们过去的作用和意义也从此不复存在，而这也是许多埃及方尖碑共同的命运，但在新的背景下，方尖碑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埃及的方尖碑最早是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被运往欧洲的，它们被用来陪衬不同的纪念建筑，包括奥古斯都的陵墓。这种做法激生了一种观念，即认为方尖碑主要用于纪念逝者，因此近几百年来，方尖碑多次被用于标记陵墓或纪念战争中的阵亡者。在人们的印象中，古埃及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对死亡世界着迷的社会，但实际上埃及人的思想并非如此病态，方尖碑最早的功能其实是庆祝生命战胜了死亡。

秘密的智慧

方尖碑上通常都雕刻着埃及的书写符号，也就是象形文字。到公元4世纪末，认识这种象形文字符号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一位名叫赫拉波罗（Horapollo）的埃及人写文章向人们灌输了一种观念，就是象形文字的符号是一种秘密的符号语言，其中隐

藏着伟大的宗教真理。实际上早在公元1世纪，罗马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就已经声称埃及人把他们最秘密的知识刻写在了方尖碑上，他说这种知识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宇宙的性质和生命的意义。于是人们相信埃及人拥有这种秘密，而这也成为有关古代埃及的重要神话。

随着埃及在公元4世纪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法老时代的那些“异教”文化被抛弃一边。《旧约》希伯来正典经书作出了埃及人的多神教不如犹太人的一神教的比较。早期的基督徒仍然相信异教神的存在，但却认为他们的地位很低，与魔鬼同级，一些讲述埃及神是如何暴虐纵欲的神话被用来支持这种观点。

穆斯林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征服了埃及，他们对古埃及的宗教同样持敌视态度。然而对炼金术感兴趣的阿拉伯学者确实保留了一些被称为《赫尔墨斯集》的文本，它们创作于希腊罗马时代的埃及，主要用希腊文写成。这些文本据说是伟大圣贤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的秘密教义，赫尔墨斯这个人物部分源于埃及智慧之神图特（Thoth）。《赫尔墨斯集》把希腊哲学与埃及神话融为一体，赋予巫术和炼金术比喻意义，并向初学者许诺只要他们听从赫尔墨斯的教导，就把不死的秘密传授给他们。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著作被再发现，这一伟大发现使得一些有关埃及神话的知识也为人所知。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许多著名的希腊作家都带着崇拜之情描写埃及的宗教。哲学家柏拉图（Plato）认为是图特神发明了文字、数学以及天文学。柏拉图还在他的对话体作品《蒂迈欧篇》（约公元前348年）中说，阿特兰提斯（Atlantis）神话是由一名睿智的埃及祭司所作，他了解混沌初开时的整个一系列毁灭事件。后来的古典传说声称大多数伟大哲学家都曾在赫利奥波里斯或其他埃及宗教中心学习过。

历史学家兼哲学家普卢塔克（Plutarch）可能曾在公元1世纪到过埃及，他的著作《伊西丝与奥西里斯》重新讲述并诠释了有关这两位重要神祇的许多神话。类似的资料使人们习惯于借助希腊人或罗马人的视角去认识埃及，这对于埃及的神话研究来说是特别地不利。虽然希腊和埃及的神话学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但它们在范畴和功能上有很大的不同。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错误地认为《赫尔墨斯集》在时间上要远远早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哲学家的作品。人们认为《赫尔墨斯集》阐述了最古老、最自然的宗教形式。当时的人们对已成为国教的基督教会的腐败和残暴日益不满，其表现之一就是希望回到那个已逝的宗教思想的黄金年代。到公元17世纪，学界已经证明《赫尔墨斯集》事实上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古老，但仍有许多人相信，在那些被带到西方的埃及文物上刻写的无法释读的象形文字中一定隐藏着远古的智慧。诸如蔷薇十字会和共济会之类的秘密社团组织都使用埃及的符号象征，由此给自己的信仰和实践伪造出历史悠久的印象。埃及的智慧还与激进分子和反权威组织联系在一起，例如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他们以“再生之泉”取代了大家深恶痛绝的巴士底狱，喷泉顶端立有埃及女神的雕塑。此外还有美利坚的缔造者，不论是印在美钞上的国玺背面的金字塔图案还是华盛顿纪念碑——世界上最大的方尖碑，都反映了他们与埃及智慧之间的联系。

18世纪晚期，更多的外国人得以来到埃及，于是大量的埃及古物被带往欧洲。先期到达埃及的学者，比如那些跟随拿破仑来到埃及的学者，出版了关于埃及古代神庙和陵墓的插图本书籍。埃及的雕刻与绘画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和美国的装饰艺术。争相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工作成为19世纪早期最大的智力挑战之一。福音派基督徒希望埃及铭文可以为《圣经》中记载的事件独立提供证明；而启蒙运动的支持者们则希望这些铭文可以展示一种与基督教对立的古代哲学。但结果令双方都不满意。

文字的破译与希望的破灭

刻写在方尖碑上的王名是最早被解读出的象形文字之一。许多国家的学者都为象形文字的成功破译作出了贡献，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则是才华横溢的法国语言学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他为理解古埃及文字的语法及其书写字体打下了基础。在19世纪的后半叶，大量的埃及文本首次被翻译成欧洲的语言。

人们很快就发现，与《圣经》或者《古兰经》不同，古埃及宗教并非以一部圣书为中心，这种宗教有许多赞美诗和格式固定的祈祷辞，但却很少有欧洲人所认为的神学或哲学文本。大部分的神庙铭文被证实都与国王向神祇奉献例行的供品有关，其中并没发现有国家神话的集成，也很少有大段的神话叙述。留存下来的神话叙述主要都穿插在可使死者更容易地过渡到冥世的葬仪文本集或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魔法咒文之中。在这些原始资料里，反复出现的只有少数几个神话主题（参见背景知识1）。

背景知识1

核心神话
造物主产生于努恩（*nun*，原初的海洋）之中
第一片土地（原初的小丘）从努恩中升起
太阳神出现／太阳之子诞生／第一次日出
太阳之子受到混沌势力的威胁，又被保护他的神祇们救出
造物主用体液／思想／语言／双手创造出生命
人类从愤怒的拉神之眼的眼泪中跃出
空气神分开了大地神和天空女神
埃及作为神界秩序的一部分被创造出来
伊斯菲特（*isfet*，混沌）和玛阿特（*maat*，秩序）之间的持续战争

造物主太阳神失去了他的眼睛／女儿／保卫者，但她最终被说服回归
神和人的叛乱使得太阳神毁灭了大多数人类，离开大地来到天国
埃及统治者奥西里斯（Osiris）被他的兄弟塞特（Seth）谋杀奥西里斯的姊妹（伊西丝[Isis]和涅菲悌斯[Nephthys]）寻找他被肢解的身体
伊西丝使奥西里斯的身体复活并孕育了儿子荷鲁斯（Horus）奥西里斯的身体被制成木乃伊，并被保护起来免遭塞特的攻击
神圣的母亲在沼泽地里生下荷鲁斯
小荷鲁斯被混沌生物下毒，后又被治愈
荷鲁斯和塞特为统治权而战
塞特的睾丸受了伤，荷鲁斯失去了他的一只眼／两只眼
荷鲁斯受伤的眼睛被另一位神复原，通常认为这位神是图特荷鲁斯为他的父亲复仇；塞特被打败或被安抚
荷鲁斯成为人间之王；奥西里斯成为死者的审判官以及冥界的统治者

太阳神每晚进入冥界
神祇与幽灵保护太阳神的身体，使之免遭混沌怪兽阿波斐斯（Apophis）的攻击
太阳神联合奥西里斯使死者复活
太阳神出现在黎明以更新万物

造物主倦了，回到了原初的海洋
世界回归混沌

虽然学者们对于神话是什么样的故事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但他们通常都一致认为神话是故事。在埃及的艺术和文学中，像“女神诞生

出非凡的婴儿”这样的个体神话事件经常独立出现。有许多不同的专业术语用于表达这些神话故事的要素或主题，例如：神话素（mythemes）、神话陈述（mythical statements）、元神话（monomyths）和基因文本（genotext）等。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涉及的是神话素而非神话叙述（mythical narratives），因为埃及文化的所有研究者都会遇到神话素的问题。

由于埃及神话很难脱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19世纪热衷于发展一般神话理论的思想家们都对埃及神话没有太多兴趣。然而，那些认为神话可以解释宗教仪式和习俗的学派则对埃及神话感兴趣，但他们主要关注的只是神话的“最初”起源问题，他们并不关心神话在埃及文明的鼎盛时期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神智学派、黄金曙光会等神秘宗教组织都积极地把埃及的神话和巫术加进他们的信仰杂烩之中，这可能也是学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埃及学家鄙视埃及宗教的一个原因。埃及宗教在当时被看作是不纯洁、不高尚的宗教信仰，在智慧上就逊一神教一筹，被巫术“毒瘤”所玷污。而备受古希腊人推崇的埃及祭司阶层此时也遭到指责，说他们主持无意义的宗教仪式并且干预政治。一些埃及神话由于其性爱内容而被认为是粗俗的，颇令人难堪。“克里奥帕特拉尖塔”上的铭文把敬献这座方尖碑的国王与神拉–阿图姆（Ra-Atum）联系在一起，而拉–阿图姆据传是通过手淫后把精子放入自己嘴里的方式创造出了第一个生命。正是由于这个神话，方尖碑也可以使人联想到造物主勃起的阴茎，难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要收集埃及的宗教艺术品！

权威埃及文语法书的作者阿兰·伽丁内尔爵士（Sir Alan Gardiner）指出，他所翻译的一些宗教文本“……在现代人看来是彻头彻尾的垃圾”。当他和他的同事们被指责“对法老时代的神话和宗教活动不感兴趣且傲慢无理”时，他回答说，这样做要好过只因为它们来自古埃及就“带着敬畏之情看待这些祭司文书”。

再后来，埃及学家们努力客观地看待埃及宗教。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以及宗教在许多人的生活中不再占有中心位置的现实情况推动了

这种认识方法。在欧洲大陆，神话学仍然被正经八百地视为一把开启民智的钥匙，欧陆学者热衷于对定义和学术名词进行辩论，这种倾向使普通读者很难对他们的研究感兴趣。在英语世界里，专门研究宗教和神话的埃及学家目前并不多见，一个原因是目前英语世界的埃及学家们的研究重点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高雅文化”的艺术、建筑和文学一般被作为精英文化而受到冷遇。与研究方尖碑在宗教和神话上的重要性相比，人们更愿意研究方尖碑的建造方法以及它的建造者。

为何研究埃及神话？

考古科学使人们的目标由从历史中学习转向研究历史本身，考古发掘出的所有物品和文本现在被认为同等重要，虽然这并不是大多数有知识的人对待他们那个时代出土的物品和文本的方式。神话是古埃及最有创造力的人以及最深邃的思想家们留下来的遗产，本书相信这是埃及神话值得关注的原因，而且本书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原因，因而不需作任何解释。古埃及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单一民族国家，古埃及文明也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埃及神话清楚地说明了古埃及的核心社会准则。

神话帮助各个阶层的人探索他们的内心世界，消除危机并忍受生活中的矛盾。毫无疑问，埃及人在思考什么、期望什么、梦想什么，这与他们吃什么、穿什么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神话是研究民族性的宝贵资料，仅举一个例子来说，诸神不得不在神界法庭上陈述各自的理由，这样的故事说明正义的概念在埃及社会是何等的重要。

在埃及文化的要素中，神话是对当代文明产生最大影响的元素之一。神话故事以及象征符号跨越了民族的界限，并被重新诠释以适应新的形势。有关伊西丝和奥西里斯的神话引起了一种国际性的宗教崇拜，它在罗马帝国时代是基督教的主要竞争对手。通过希腊、罗马的宣扬，埃及神话成为欧洲文化史与美国文化史的一部分，在不同的艺术作品中，如弥尔顿（Milton）的诗歌、莫扎特（Mozart）的歌剧以

及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中都可以找到它的踪影。

到了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异教，在异教的历史中探求精神上的启示。对于这些探寻者来说，神话中的埃及成为了一幅风景画，上面有金字塔、方尖碑、斯芬克斯像、长有动物头的神祇、消失的陵墓以及复活的木乃伊。要想知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幅图画，我们必须回到埃及人的文字之中。

第二章

神词：语言与神话

我们有关埃及神话的知识只能像拼图一样拼凑起来，这些拼图碎片包括上百个不同时期的书面的和视觉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都以不同的字体和语言来书写，这就使得事情更加复杂了。埃及学家们把埃及的语言发展分成5个主要阶段，而古埃及人共发明了4种不同的书写字体（参见背景知识2）。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埃及字体是圣书体象形文字，埃及人称其为*mdw nt rw* ——“神词”。“图像”（*twt* ）这个词语可被用作一个单个的象形文字，也可用来指一座神像，它们在古埃及都被认为是潜藏着生命的物体。

背景知识2

古代埃及使用的语言和字体
公元前4千纪
口头和书面语言：古埃及语
使用的字体：原始圣书体象形文字；圣书体象形文字（从约公元前3200年开始）

公元前3千纪
口头和书面语言：古埃及语
使用的字体：圣书体象形文字、僧侣体

公元前2千纪
口头和书面语言：中埃及语、后埃及语（从约公元前1400年开始）
使用的字体：圣书体象形文字、草书体象形文字和僧侣体

公元前1千纪
口头语言：后埃及语、世俗语和希腊语
书面语：新中埃及语、后埃及语、世俗语和希腊语

使用的埃及字体：圣书体象形文字、僧侣体和世俗体

公元1千纪
口头语言：世俗语、希腊语、拉丁语；科普特语（5种方言）；阿拉伯语（从公元7世纪开始）
书面语：新中埃及语、世俗语、科普特语和阿拉伯语
使用的埃及字体：圣书体象形文字、世俗体和科普特文

一座带有魔法的石碑

埃及人相信书面文字中蕴含着力量，这一点在1828年挖掘一口井时意外发现的一座保存完好的石碑（装饰有图像和碑文的石板）中可以得到证明（图2a–2b）。这块石碑是齐普斯类型石碑 [1] 中最大的一块，“齐普斯”这个名字来自一个希腊词汇“盾”。埃及的统治者把这块石碑赠送给奥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于是梅特涅将之安放在梅特涅宫，因此这块石碑后来就被称为“梅特涅石碑”。1950年，这块石碑被收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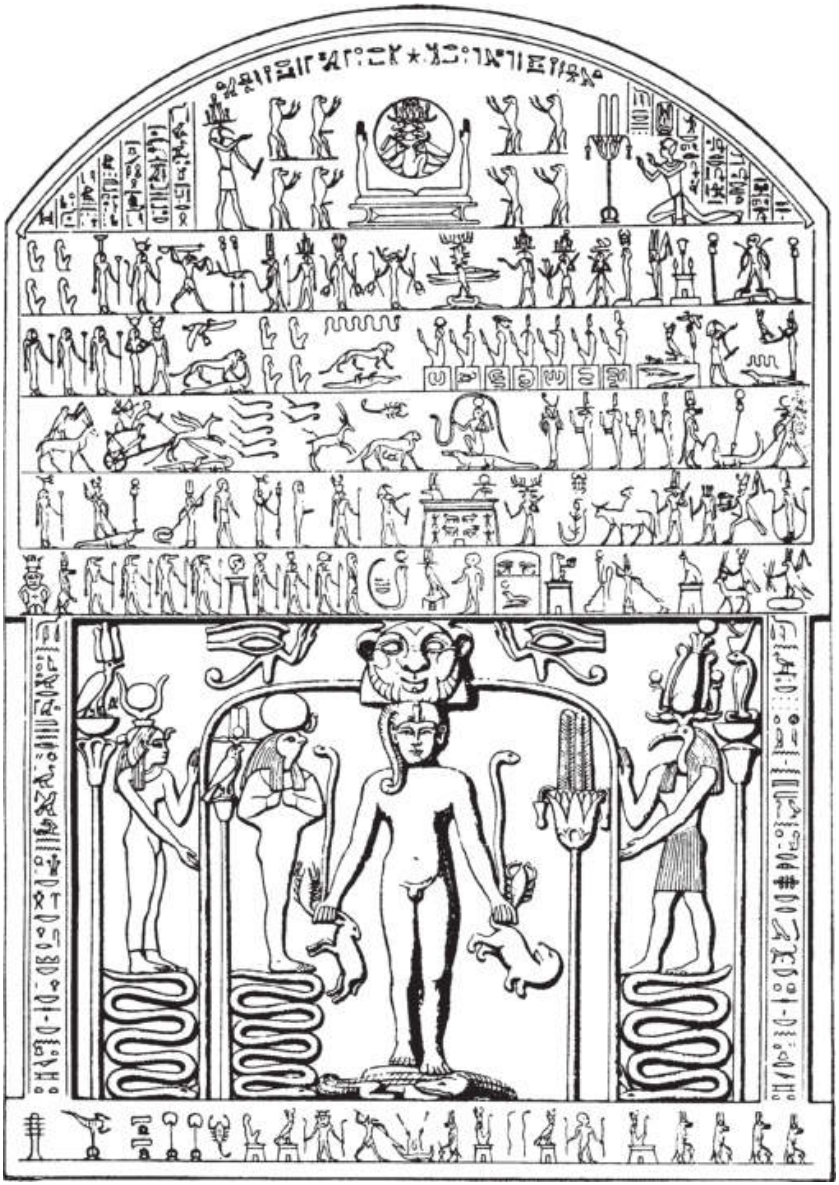

图2a “梅特涅石碑”上部的图画

图2b　“梅特涅石碑”上部背面

石碑的中心图板描绘的是埃及神话中5位重要的神：（图2a从左至右）伊西丝、拉–荷拉克提（Ra-Horakhty）——太阳在最高点的化身、小荷鲁斯、被谋杀了的神奥西里斯的象征、鹭头的图特。在图板

上方以及石碑的背面还列出了一些不常见的神。在这些神的名册的最上方，8只地平线上的狒狒和在位的国王正在祭拜太阳神的灵。石碑的主体和基座都布满了铭文，石碑背面和侧面也刻着铭文（参见图2b），它们都是用生动的圣书体象形文字写成的。

这块石碑发现的时间正值商博良刚刚宣布破译埃及文字后不久。这块石碑当时给人的感觉是几乎不可能从文本中辨别出图画，而这种印象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文本和图画以复杂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只翻译文本无法完全阐释石碑的意义。这块石碑上的铭文于19世纪70年代首次被编辑整理和翻译，它包含有13部咒文集，其中一些咒文包含了有关神被下毒又被治愈的神话故事。

一篇咒文讲述了伊西丝如何在沼泽诞下荷鲁斯的故事。伊西丝为寻找食物离开荷鲁斯后，小荷鲁斯得了很重的病，悲伤得近乎发狂的伊西丝请求生活在沼泽的人们来帮助她。当地一个博学的妇女判断小荷鲁斯是被蝎子或毒蛇咬伤了，于是伊西丝一遍又一遍地尖叫“荷鲁斯被咬伤了！”。她的哭喊声使正在天空巡游的拉神之船停下来，图特从太阳船上下来一探究竟。伊西丝向图特痛诉她无辜的儿子中毒的悲惨经历，于是图特用“生命气息”治愈了荷鲁斯，从而拯救了神界秩序的未来。他列出了所有可以保护荷鲁斯及其他中毒者的神秘神祇，比如“黑暗的狮子”和“高贵的圣甲虫”。这段咒文的结尾承诺，就像荷鲁斯曾经被治愈一样，所有患病的人和动物都会被治愈。

把大篇的象形文字文本刻入坚硬的石头是一项技术要求高且耗时长的工程，只有出现了重大原因人们才会进行这种工程。根据铭文记载，这个石碑是一位名叫尼萨图姆（Nesatum）的祭司让人建造的，以此表示对太阳神的化身穆涅维斯公牛（Mnevis bull）和涅克塔尼布二世国王（Nectanebo II，约公元前360—前343）的纪念。尼萨图姆声称石碑上的文本是古代魔法文，是他在赫利奥波里斯的神圣穆涅维斯公牛的墓地里发现的。对于这种说法我们通常应持怀疑态度，但从其中一些文本使用的语言来看，这些文本的创作时间比它们被复制在石碑上的时间要早大约1,000年。

尼萨图姆没有把这些有治疗作用的咒文藏匿在自己的私人图书馆

中，而是将它们展示于神庙的外区。他的石碑既神秘又实用：一方面，“梅特涅石碑”上的咒文和图画展现了秩序与混沌之间永恒的战争，而这是埃及神话的中心内容；另一方面，这些咒文和图画为日常生活中诸如毒蛇和蝎子咬噬等危险提供了治疗的方法。石碑上的许多神都被表现成在踩踏、用矛刺或掐死蛇、鳄鱼及其他危险动物的形象。任何一个埃及人都能够认出，这些奇形怪状的人物都是传说中太阳神的保护者，他们被唤来赶走邪恶和苦痛。

蕴含着力量的文字

如同中世纪的大多数基督徒无法阅读他们教堂中的拉丁铭文一样，大多数的埃及人也都无法阅读“梅特涅石碑”上的象形文字铭文。即使神庙的书吏把石碑上的铭文大声念出来，来访者也很难理解这些铭文，因为它们用的都是古老的语言。部分咒文中的故事所使用的语言更接近于普通人的口头语，这些故事可能已在神庙的节庆活动中被吟诵甚至表演出来。

埃及人认为石碑的文字和图画中蕴含有内在的力量，人们可以通过触摸这些文字和图画来获取这种力量，因而一些齐普斯石碑中心部位的图画几乎被一双双满怀渴望的手磨平。另一种获得力量的方法是向齐普斯石碑泼水，然后病人喝掉这些水或者用这些水洗浴，这样他们就能得到由这些水转化而来的生命能量。我们通常认为书面文字主要是要默默地、静静地阅读，但“梅特涅石碑”却提醒我们，在古代埃及，一切都是那样地不同。

神话常常被定义为“神圣的故事”，因此人们可能会设想神话一般都是用“神圣的”圣书体象形文字书写的，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埃及人认定这种文字蕴含着力量，因此他们在使用这种文字时非常谨慎。神话往往以神界的纠纷和斗争为主题，在描写一个邪恶的行为时，比如奥西里斯被他的兄弟塞特谋杀，将这种行为用象形文字描写就可能使它成为永久的现实，因此通常会避免对这种行为的直接描写

或表现。

“梅特涅石碑”保留下来的故事的确讲述了荷鲁斯被毒害的过程，但这件事以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告终，即便是这样，象形文字文本中描绘神遭受痛苦的部分还得用几十幅表现神祇战胜混沌兽的正面形象的图画来平衡。涅克塔尼布国王（King Nectanebo）出现在石碑上，作为联系神祇和寻求治疗方法的人们的中间人。圣书体象形文字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使国王能够代表人类与神和祖先进行沟通，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追溯埃及的书写历史。

书写与王权

象形文字既是交流的实用工具（参见背景知识3），同时也是一个划分世界的体系。单个的象形文字分别是神、人、动物、植物以及构成世界的各个物体的图画。这种文字很可能发明于公元前4千纪晚期统治埃及大部分地区的南部国王们的宫廷中，最早的象形文字出现在物账单上，用于记录税收、王室财产以及国王献给神庙的供品。到了公元前3千纪早期，更长的象形文字文本被刻在石制建筑、雕像以及石碑上。象形文字成为神庙和陵墓铭文以及王室向神祇或子孙发出布告的标准书写字体。男孩们在学校接受阅读和书写象形文字的训练，这些学校都附属于宫殿、王室墓地以及国家神庙。几乎所有受过这种教育的精英们长大后都会继续为政府工作，通常服务于诸如建造金字塔这种可以充分表现国王特殊地位的工程中。

到了旧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686—前2181），埃及人发明了一种由纸草制成的书写纸张，并发展出一种简化了的字体用于书写信件以及政府公文，这就是僧侣体文字。在石头上刻写圣书体象形文字文本是一项集体工程，而在纸草上书写僧侣体文本则通常只需要一个书吏就可以完成。僧侣体后来发展成沿横行而不再沿竖列书写，从那之后，它就成为医药、巫术以及文学文本的主要书写字体（例子参见第七章图7）。“梅特涅石碑”上一些咒文的早期版本就是用僧侣体书写

的。

旧王国时期并没有留下有关神祇的大段叙述，但是关于他们的传说却口口相传地流传了下来。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200年王室金字塔中的咒文集细致地描绘了大量的神的形象。这些《金字塔铭文》经常暗指一些神话事件，比如造物主阿图姆（Atum）吐出或打喷嚏喷出第一对神：舒（Shu）和泰富努特（Tefnut）。咒文集包括5大类咒文，其中一类就是“梅特涅石碑”上发现的抗击毒蛇的咒文。《金字塔铭文》并非是用来解释神的世界或者人神关系的铭文，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安葬在刻写有铭文的金字塔中的国王或王后实现转世，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宗教仪式把已故的王室成员与神界中的人物或事件等同起来。

背景知识3

象形文字介绍

象形文字并不是幼稚的图画文字，而是一个由几种不同类型的符号构成的成熟灵活的体系。单个的象形文字（符号）有时可用作一个表意符号来代表一个词汇，因此“牛”（ka）这个词就可以用一头牛后再加一笔竖杠 \来表示。象形文字也可以表音，表示1到4个发音，“猫头鹰” 写作“m”，“鳄鱼皮” 写作“km”。25个符号每个都代表一个辅音或者一个半元音，它们通常被称作“象形文字字母”，但这种字母从不独立使用。

以表音符号拼写的词语通常都以一个阐明词义或范畴的非表音符号结尾，例如，象形文字“眼睛”就被放在视觉或失明等词的结尾。这样的符号被称为限定词或类符。当象形文字“眼睛” 被置于词头时，这就是在书写埃及文“眼睛”*irt* 中的音*ir* 。词尾的 *t* 表明*irt* 是一个阴性名词，因此当造物主的眼睛被拟人化之后，它变成了一位女神而不是一位男神。文字的游戏也能够生出神

话，由于“人们”这个词的发音类似于“眼泪”这个词，因此据说人类是从眼睛女神的眼泪中诞生出来的。

语言的书写方式可以为神祇在神话中的角色提供证据。表示塞特神的怪兽 被用作“混乱”一词的限定词。所有女神的名字都用眼镜蛇作为限定词。“太阳圆盘”的象形文字 \拼作ra，这是埃及文中表示太阳以及太阳神的名字的词语，但作为限定词，它与和时间有关的词语连用。神的名字通常后面都跟着一个神的坐像 ，而这种情况在书写拉神时却很少出现，由此表明这个神与太阳光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拉神在神界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神，因此在短语或头衔中，他的名字即使从语法上讲应该放在末尾，在实际书写中也可以写在最前面。然而，在象形文字文本被翻译成英文之后，这种内在的细微含义就都丧失了。

虽然国王们宣称自己拥有神一般的地位，但旧王国的统治还是随着中央集权的衰落和瓦解而结束了。一些埃及学家认为，神话中秩序与混沌交战的主题来源于旧王国的瓦解给人们带来的震撼。

黄金时代

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分裂状态最终由一位来自上埃及底比斯城的国王结束，随后而来的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55—前1650）被普遍认为是埃及文学的黄金时代。大量用中埃及语创作的散文和诗歌留存下来。中埃及语作为一种文学语言被持续使用了约2,000年，这也就是像尼萨图姆这样的祭祀能够阅读和理解古代文本的原因，受过教育的埃及人并没有因为语言上的障碍而切断他们与其历史之间的联系。

在中王国时期，贵族墓葬的棺木上面可以刻写内容丰富的咒文，它们能够在冥界帮助死者（例子参见第五章图5），这些咒文统称为

《石棺铭文》。它们甚至比《金字塔铭文》包含更多对于神话事件的隐喻，其中一些咒文由神祇的演说组成，讲述他们曾做过的事或曾经遭受过的痛苦。在许多文化中，最古老的神话叙述都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这个形式由口头传说自然转化而来。《石棺铭文》中还包含有神与神之间的对话，这使得看待埃及的神话事件的视角多种多样。

对话体还特别出现在“教谕文学”或称“智慧书”的文学类型中，这些作品的内容都是一个权威人士（神、国王或父亲）教导一名少年如何按照玛阿特（秩序、真理、公正）的准则生活。这些作品中有一些是相当写实的，它们甚至承认那些与父辈没有共同信仰基础的年轻一代很可能会把这些教导抛诸脑后。这些作品通常被归为伦理文本而非宗教文本，但它们满篇都提到了神话的内容。

中王国时期只有少量故事保存下来，其中包括有关塞特试图引诱他的侄子荷鲁斯的神话的片断。这些古老的故事无法拥有像“教谕文学”那样高的地位，但它们绝不是简单粗陋的。《船舶遇难者的故事》（约公元前1900年）是一个战胜灾难的传说故事，用于鼓舞一位被国王冷落的官员。这个故事的梗概是一位水手被海水冲到一个偏僻的小岛上，之后被一条神秘的蛇所救，它改写了《石棺铭文》中有关世界末日的神话，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听故事的官员并没有振作起来，他拒绝接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神助善者的世界观。到中王国时期，埃及的作家们显示出的是一种疏远神话的态度，他们创造性地使用神话来表达对人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

《韦斯特卡尔纸草》（约公元前1700年）中保存下来的全套故事可能更接近于民间的口头传说，但它的结构很复杂。故事发生在建造大金字塔的国王胡夫（King Khufu，基奥普斯）的宫廷中，为了取悦国王，他的儿子们给他讲述了为胡夫王室祖先服务的伟大的巫师的故事，其中一位王子讲得最好，他讲述了一个名叫杰特（Djedi）的农民的故事，说他的巫术比以往任何一位巫师都厉害。当这位虽已110岁却还精力充沛的巫师来到宫廷之后，他与胡夫就巫术的正当使用问题展开了意志的较量。杰特预言将有3位非凡的婴儿诞生。然后这个故事的场景转到了一位祭司的家里，祭司的妻子鲁德杰特

（Ruddjedet）正在艰难分娩。太阳神拉似乎才是孩子们真正的父亲，他让一群神装扮成跳舞的少女和她们的挑夫来帮助鲁德杰特。在三胞胎出生之后，这些神祇留下3顶王冠隐藏在房子里。

早期的听众可能已经知道鲁德杰特的孩子们注定将成为接替胡夫王朝的国王。埃及悠久的历史使得埃及人可以把幻想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置于遥远的过去，为了起到教育的作用，他们也不需要用奉承的语言描绘历史上的国王。在《韦斯特卡尔纸草》时代，王室的权威又经历了一次衰落。在第二中间期（约公元前1650—前1550），外来统治者希克索斯人控制了三角洲。最终，底比斯王朝赶走了希克索斯人，埃及再次统一。

新王国时期的革新

在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50—前1069），埃及吞并努比亚和近东的一个帝国，在文化上也达到了顶峰。以“克里奥帕特拉尖塔”的奉献者、国王图特摩斯三世为代表的统治者花费了帝国所聚敛的巨大财富来修建大型神庙建筑。帝王谷中新王国时期王室的陵墓规模虽然不大，但装饰华丽，生活在戴尔美迪纳村的一群工匠和书吏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现在被称为《阴间地府书》的文本原本保存在神庙的图书馆中，当时都被复制刻到王室陵墓的墙壁上。《阴间地府书》的中心主题是拉神之旅，人们认为太阳神在夜晚会进入一个危险的领地，在那里神界秩序的敌人试图阻止太阳神在黎明时到达东方地平线重生万物。在大多数《阴间地府书》中，一系列附带说明的图画取代了文字的叙述。

新王国时期的殡仪咒文集现在被称为《埃及亡灵书》（以下简称《亡灵书》），其中的图画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许多拥有《亡灵书》的人无法阅读象形文字，但他们能够理解那些概括咒文内容的复杂小图画所代表的含义。到新王国末期，一些贵族的墓葬中出现了“神话纸草”，这种带有插图的神话叙述，例如天地分离，在过去很

少出现。

在公元前14世纪前后，一种新的书面语言形式进入到非正式的文书写作中。后埃及语更接近于当时的人的说话方式，它反映了埃及已成为一个民族成分更加多样化的社会。只有少量用后埃及语记载的故事流传了下来，但它们都非常有趣。其中一些故事保存在戴尔美迪纳工匠村的复制本中，这种情况说明文学为新兴的“中间阶层”所喜爱。一段有关荷鲁斯与塞特较量的生动叙述将在第七章中再作详细分析。后埃及语故事《注定厄运的王子》和《两兄弟的故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童话故事，因为它们包含了诸如公主被囚禁在高塔上或巫师把他的心脏藏在树里等主题，而这些内容在之后的各文化的民间传说中都能见到。《两兄弟的故事》属于一个独特的埃及文学类型，其中的神话事件似乎由人或半人的人物再次表现。

动乱的时代

随着埃及的国家权力被北部利比亚后裔的国王们和南部底比斯祭司集团瓜分，新王国时代结束。在公元前1千纪，埃及经历了内战以及一系列外族入侵（参见书末年表）。努比亚王朝的统治被亚述人的野蛮入侵推翻。公元前7世纪，亚述人又被来自舍易斯的一个埃及王朝赶走。大约在这段时期，一种叫做世俗体的新的书写字体被引入日常生活中，“世俗”一词本为希腊文（意为“普通的”），用在这里指埃及语言的一个阶段。大量使用世俗体书写的文学作品发展起来，其中的一些反映了希腊的影响。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集和史诗都得以保存了下来。

公元前5世纪，波斯人征服了埃及，但埃及的领导者在希腊雇佣军的帮助下予以还击。拥有埃及血统的国王一度恢复了统治，“梅特涅石碑”的建造时间就是在这些国王中的最后一位——涅克塔尼布二世的统治时期。在混乱的年代，埃及人往往会追溯他们辉煌的过去。尼萨图姆就强调他的咒文集年代非常久远，因而具有权威和力量，这

些咒文创造出一种对于过去状态的描述：玛阿特总是胜利者。尼萨图姆的石碑传达出一个讯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仍然掌权，他们可以使来到神庙的人获得古代的智慧。

“梅特涅石碑”建造完成仅几年之后，波斯人再次入侵埃及，涅克塔尼布二世溃逃，许多神庙被劫掠。后来埃及成为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前323）短命帝国的一部分，随后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将领之一托勒密·拉古斯（Ptolemy Lagus）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王朝，统治埃及将近300年。在托勒密时期，希腊语成为官方语言，但埃及的文化仍然活跃在各个神庙之中，托勒密王室还主持了大规模的神庙重建工程。在公元前30年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后，这项工程还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

最后的岁月

公元前400年到公元100年对于埃及神话的原始资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一些神话和传说被扩展成内容纷繁复杂的文学叙述，地方性神话配上插图被记录在纸草卷上，几个神话故事或戏剧用象形文字刻写在神庙的墙壁上。埃及文化受到外族人的威胁，埃及人对此感到恐惧，这刺激并推动了他们对本国神话的整理和保存。许多外国人也确实对埃及宗教感兴趣，但他们读不懂刻写在神庙墙壁上的文字，也读不懂保存在神庙图书馆内的书籍。因此，像普卢塔克这样的作家不得不依赖他本人或更早的古典作家从讲希腊语的埃及人那里听来的故事。

在大约公元l世纪，一种混合有希腊字母以及几个世俗体符号的书写字体得到了发展，一部分《赫尔墨斯集》和一些魔法文本就用这种科普特语书写，但大多数现存的科普特语写成的文学作品还是基督教文本。到公元4世纪，基督教在埃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虽然像“梅特涅石碑”上的铭文一样的咒文仍在使用，但其中的主角伊西丝和小荷鲁斯已被替换成马利亚（Mary）和耶稣（Jesus）。现代西方

有关神性的认识都是由像基督教这样的一神教塑造的，而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埃及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神的。

注释

〔1〕 一种魔法石碑，上面刻有神圣孩童战胜危险生物的图画。——译者，下同

第三章

对于神本身的认识：神与神话

人们所认识的古埃及的神多是他们的艺术形象，而非神话故事中的形象。卢克索博物馆所展示的艺术精品之中有一尊方解石材质的雕像，表现的是鳄鱼神苏美努王索贝克–拉（Sobek-Ra，Lord of Sumenu）拥搂着国王阿蒙霍泰普三世（King Amenhotep III，约公元前1391—前1353）（图3）。这尊7吨重的雕像是1967年在达哈姆沙（古代苏美努）一个密封的深坑中发现的，这个深坑在历史上可能是神庙饲养神圣鳄鱼的池子。大多数来博物馆参观的游客都会惊叹这尊雕像在雕刻技术上的完美娴熟，但雕像的主题却使许多人对埃及艺术感到费解。埃及国王的统治在今天看来就是向神谄媚奉承，政治上也很幼稚。现代的参观者和许多古希腊人、罗马人一样，通常认为兽头人身神的形象荒诞不经甚至令人心生厌恶。古典时期的艺术也有神和兽，但在埃及，兽似乎就是神。

图3　卢克索博物馆的索贝克–拉与阿蒙霍泰普三世雕像

人们持这种态度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对埃及艺术的误解。如同许多现代抽象艺术一样，埃及艺术也是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并用一个实实在在的形式表现复杂观念。阿蒙霍泰普三世并没有被真实地表现出来，而是被塑造成一个埃及人所需要的神一般的年轻人和理想化的统治者形象，这就意味着在一个世纪之后，拉美西斯二世能够把这尊雕像变成他自己的雕像，他只需要把雕像上阿蒙霍泰普的名字替换成他自己的名字即可。

索贝克–拉神是鳄鱼神与太阳神两位神祇的结合体。这个二元神被描绘成半兽的形象以表现他奇异而令人敬畏的神力，尤其是他具有鳄鱼的力量、诡诈和长寿以及制服母亲河——尼罗河的能力。他头饰上的太阳圆盘表现出拉神——赐予生命的日光之神化身成素贝克的形象来表现自己。他的半人形象使他可以与国王互动，从而使他得到生命的象征——“安可”[1]（ankh）。这尊雕像旨在展现，或通过这一展现形式引出：代表人的国王与代表神的索贝克–拉之间的理想友爱关系。

神话中描写的这些神具有怎样的天性？他们与犹太–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观念中的神有哪些差异？这些疑问或许可以通过对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得到答案。

神生活在何处？

埃及的神是生活在超越时空范畴的不可及的神界，还是生活在人类的世界？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回答。一些宗教文本把造物主阿蒙神说成是存在于宇宙界限之外的一种不可见、不可知的力量。另一些文本却强调说造物主的精髓存在于宇宙的构成要素以及他所创造的所有生物体之中。

对于神居于何处这个问题，一个答案可能是“居于过去”。在一位名叫布特哈蒙（Butehamun）的书吏写给他已故妻子的信中，他说拉神和他的“九神团”（Ennead），或顾问团像旧日的国王一样都已离

开。大多数现存的神话叙事都被置于一个遥远的时代当中，那时统治埃及的是一个神的王朝。这个黄金时代随着第一拨背叛和谋杀活动而终结（参见背景知识1），神逐渐退回到大地以外的地下神界之中，在那里他们以其神秘的真实形态生活，体形巨大、散发着光芒，而且带有强烈的香甜气息。大多数人只有在死后才能进入神界，但神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人间交流。

神可以通过自然现象来展现自己，比如风暴、洪水和瘟疫，他们的灵魂也可以“附体”在国王、侏儒等特殊的或不平凡的人身上，也可以出现在神圣的动物、树木以及物体上。埃及艺术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以雕像、绘画或象形文字的形式给神提供暂时的本体，在埃及神庙里举行的许多宗教仪式都以促使神在这些物体上栖居为目的，这样他们的存在可以惠及人类。因此像素贝克这样的神被认为可以同时生活在创世之前的原初海洋中、天边群山中的宫殿里、埃及湖泊和沼泽中的荒芜地带以及神庙里的雕像和神圣的鳄鱼身上。

古埃及有多少位神？

对于这个问题，研究埃及宗教的专家们给出了不同答案，从“一个”到“上千个”不等。埃及宗教被普遍认为是多神教的一种成熟形式。从一开始它就有许多不同性别的神，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向那些与自身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神祇形式祈祷祭拜，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依靠尼罗河为生，那么你祈祷的核心神可能就会是鳄鱼神。

在埃及历史上，大约有80位神祇拥有多处以自身的名义修建的圣坛和神庙。一些神很少成为大家顶礼膜拜的对象，比如天空女神努特（Nut），但他们在神话中的地位却非常突出。如果我们把宗教信仰和神话两方面的证据放在一起，那么大约有30位神可以称为埃及的主神（参见背景知识4）。

埃及语中的nt　r（神或能力）一词被用来称呼这些主神，同时也用于指许多不那么重要的生物，比如星辰神、拟人化的观念、神化的

国王、冥界的居住者以及“梅特涅石碑”之类的东西上显示的各种古怪的保护神。如果所有这类生物都被包含在埃及的众神谱中，那么我们叫得上名字的神就会有上百个。而如果每个像“苏美努王索贝克–拉”这样在特定地点祭拜的神祇形式都分别算作一个神的话，那么埃及就将有几千个神。因此，可以说埃及神话有一大群潜在人物。

一些埃及学家称，埃及宗教从一开始就向着一种一神教的形式发展。埃及的说教文中就用“神”这个词的单数形式来指代统治宇宙的力量，创世神话表明埃及人相信有一个原初的生物创造了无数的神、人和动物。从新王国时期起，一些文本把埃及的所有神都仅仅看作是这个原初造物主的灵魂或表现形式。宗教异端国王埃赫那吞（King Akhenaten，约公元前1352—前1336）曾尝试废除太阳神阿吞（Aten）以外的所有神，结果没有成功。他的继任者们认为在整个创世的循环过程中，造物主总是以无数男神和女神的形式出现。

这些神中的每一个神都可以分裂成为一对神或是一组神，或者与另一个神结合。一些埃及文本称赞索贝克–拉神力造物主；而另一些文本，例如被伽丁内尔摒弃为“十足的垃圾”的赞美诗，则罗列出了索贝克存在于埃及不同地方的多个表现形式。索贝克和拉可以结合成为太阳–鳄鱼–造物主，就像我们前面所展示的雕像一样，但他们分开来也可以行使各自的职责。在埃及人的思想中，神的形象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可能与叙事性神话的发展方向相反。

背景知识4

神话与宗教信仰中的主要神祇

阿蒙／阿蒙–拉：造物主，在底比斯被尊奉为众神之王

阿努比斯：豺神，木乃伊制作术的发明者，陵墓的守护神

阿图姆／阿图姆–拉：赫利奥波里斯的造物主，太阳神在晚上的表现形式

巴斯梯特（Bastet）：猫女神，拉神的守护者，丰产之神

盖伯（Geb）：大地之神，努特的丈夫，神界法庭的领袖
哈托尔（Hathor）：母牛女神，掌管出生、死亡以及宇宙的再生
荷鲁斯：天上的猎鹰，塞特的对手，埃及统治者的原型
伊西丝：奥西里斯的遗孀，荷鲁斯的母亲，魔法女神
凯普利（Khepri）：圣甲虫神，掌管黎明和再生
克努姆（Khnum）：公羊神，造物主，尼罗河水的控制者
孔苏（Khonsu）：造物主，月亮神，命运的掌控者
玛阿特：拉神的女儿，真理和正义女神
米恩（Min）/阿蒙–米恩：男性之神，掌管农业丰收
穆特（Mut）：复仇女神，在底比斯被尊奉为阿蒙–拉的妻子、孔苏的母亲
奈特（Neith）：造物女神，太阳神的保护者
涅赫伯特（Nekhbet）：秃鹰女神，南方的保护神
涅菲悌斯：伊西丝的姊妹，被强迫做塞特的妻子
努恩：原初海洋之神
努特：天空女神，奥西里斯、伊西丝、塞特、涅菲悌斯的母亲
赫尔摩波里斯的“八神团”（Ogdoad）：八位原初神，包括阿蒙和努恩
奥西里斯：冥界的统治者，庄稼丰产之神
普塔（Ptah）：孟斐斯的造物主，艺术家和工匠的保护神
拉：造物主，太阳神，宇宙的统治者
塞克美特（Sekhmet）：凶猛的狮子女神，太阳神
塞特：奥西里斯的敌人，荷鲁斯的对手，最强大的神
舒：空气和日光之神，分开了天与地
索贝克：原初的鳄鱼神，尼罗河之王
索卡尔（Sokar）：孟斐斯的死亡和再生之神
泰富努特：舒的姊妹，盖伯和努特的母亲
图特：月亮神，掌管智慧、语言和书写，表现为鹭和狒狒的形象
瓦吉特（Wadjyt）：眼镜蛇女神，北方的保护神

女神不如男神强大吗？

同时供奉男神与女神是古代宗教的一般模式，甚至在犹太教中似乎也存在过一位女神，她是耶和华（Yahweh，希伯来语中的“神”）的妻子，但后来从文本记录中被删除。把神分成两个性别是真实世界的反映。在当时的现实世界里，埃及的女性无法拥有男性享有的所有特权；但在神话中，女神的力量却似乎并不亚于男神。大多数埃及创世神话都把造物主说成是一位男性，但也有一些神话描绘了最初的女性造物主的形象，比如奈特女神——“世间万物的母亲和父亲”。从理论上讲，所有神都应该服从于神王太阳神拉，但到了新王国时期，拉神有了一个女性对手——赖耶特（Raiyet）女神。

在一些神话中，拉神似乎要依靠他残忍的女儿，也就是眼睛女神的力量。拉–阿图姆派他的一只眼睛在黑暗的原初海洋中寻找他丢失的孩子——舒和泰富努特时创造出的眼睛女神。但是当女神归来的时候，她发现拉神已经长出了另外一只眼睛，女神为此而落泪，人类就从这些眼泪中诞生出来。

人们通常都是根据与男神的关系来认识一位女神的，当他们被作为一对神祇来崇拜的时候，女神的名字一般都跟在男神的后面，这一现象与人世间的夫妻是一样的。然而，如果女神扮演的是母亲的角色，那么其子女的地位就要低于她，母亲角色对于女神的重要性要高于父亲角色对于大多数男神的重要性。埃及神话中几乎完全没有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母爱却一直被描绘成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宗教艺术的限制使得女神看起来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对女神地位的误解。在艺术作品中，伊西丝就是一个哀悼奥西里斯或者谦恭地站在他宝座后面的妻子形象，或是满脸甜蜜地哺育她的宝贝的母亲形象。但在神话中，她是一个强势人物，为了给丈夫报仇而战斗，为了把她的儿子推上埃及王位而不断谋划。在艺术作品中，女神似乎比大多数男神拥有更多的表现形式。她们变换外形的能力在神话中也得到了赞扬，在一段神话故事中，伊西丝就从上年纪的丑陋老妪变成了年轻姑娘，又变成了捕猎的猛禽（参见第七章背景知识9）。

眼睛女神既掌管生命也掌管死亡的双重身份可以通过她外形的突然变化表现出来。当拉神让他的眼睛去毁灭犯有叛乱之罪的人类的时候，她被变成了一头暴怒的狮子塞克美特，她吞下所有邪恶的人并在拉神的哄骗下放过了其余的人。她的整个狮子形象在神话中得到生动描述，但很少在艺术作品上有所体现。一般来讲，女神比男神要更可怕，在埃及的众神中可没有温顺的主妇形象。

埃及众神是否组成了家庭？

大多数古埃及人都不像今天的我们一样认为自己是独特的个体，他们更愿意把自己归属为某个家庭或某个等级组织的一员，并且要尊敬长者。埃及的神常常集体行动，当被赋予国王般权威的最高神拉神出现时，其他神通常都表现得像一群服从的朝臣一般。

血亲关系在埃及非常松散，因此当一位男神或女神被称为拉神的儿子或女儿时，他（她）也许只是他的后裔或者年龄较小的亲戚。埃及神祇中最有名的一组神是赫利奥波里斯的“九神团”，“九神团”将奥西里斯和荷鲁斯融合到拉–阿图姆神的谱系中，从而把宗教思想中的主要元素结合在了一起。这个家族谱系的4代，有时说是5代，跨越了从创世到王权建立的整个历史（参见背景知识5）。神也可能被组成像核心家庭一样的家庭组织，通常是父亲、母亲和孩子的三口之家。但我们不能把这些家庭关系太当真，因为这些关系很少有太多的连贯性。除了个别例子以外，埃及的神都不是有着固定生活经历的固定人物，最著名的一对夫妻神是奥西里斯和伊西丝，但奥西里斯有时又可能是他两个姊妹的丈夫，而伊西丝也可能成为她儿子荷鲁斯的性伴侣。

背景知识5

赫利奥波里斯的“九神团”

阿图姆 / 拉–阿图姆
舒–泰富努特
盖伯–努特
奥西里斯　伊西丝　塞特　涅菲悌斯
荷鲁斯
“九神团”的另一种组合形式是用奥西里斯和塞特的兄弟大荷鲁斯（Horus the Elder）取代伊西丝的儿子荷鲁斯。

大多数的神都扮演某个特定的人物角色，比如父亲、配偶或儿子，从而与其他许多神建立起联系。在神话中，索贝克通常都是造物女神奈特的儿子。在索贝克的一个崇拜中心，他被认为与蛇女神拉尼努特（Renenutet）是一对夫妻，而小荷鲁斯则成了他们的儿子。但在另一个崇拜中心，索贝克又被认为是女神哈托尔的丈夫，这个三口之家的孩子则是月亮神孔苏。后一种认识可能与尼罗河有关，因为人们认为哈托尔可以控制尼罗河水的泛滥以及沿河上溯所必需的北风。而当索贝克和拉神结合为一体时，他与哈托尔的关系就更复杂了，在神话中，哈托尔可以有拉神之母、拉神之妻和拉神之女这三重身份，她是太阳神永远的阴性补充体。

这些神都是什么神？

对于那些研究多神教体系的学者们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于认为神祇是某种自然现象的或是负责某一领域的男神或女神，例如宙斯（Zeus）被认为是天空之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是爱神。这种划分对于我们来说很有用处（参见背景知识4），但却未必符合最初的那些祭拜者看待神的方式。在埃及人看来，神首先是权力的拥有者，人们可以为任何事情祈求所有的神，但其中也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细化分工。神的类型可以通过他们的名字、称号、外貌以及在神话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现出来。

用地点作称号是最普遍的做法，比如苏美努之王索贝克。一些神，不论男神还是女神，其实就是某个城市、区域或某种地方风物的主神。一些较小的神，例如创造性思想之神西阿（Sia），仅仅是概念的人格化形式，而且这些概念在其他文化中一直都是抽象的。神界秩序的人格化形式玛阿特女神同样也是这样产生的，但她在神话中发展成为一个更丰满的人物，成了太阳神最宠爱的女儿。其他神与自然界的要素相关联，但关联形式并不简单。拉神战胜了死亡，把光和能量赐予万物，太阳只是拉神的光辉那看得见的表现形式。神话赋予拉神另一个形象——易犯错误的统治者，为人类的叛乱以及众神的密谋而悲伤。一些神还与人类生活的某些特殊技能和领域相关，比如图特与书写有关、伊西丝与哀悼和治病有关、哈托尔与爱情有关，这些关联也能够产生神话。

重要的神通常都有几个有趣的地方，有些甚至与其他神的有趣之处相交叠。索贝克的特征很少为他所独有，但这些特征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神的形象：他鳄鱼的外形与其他某些神相同，比如塞特和肯梯凯特（Khenty-khet）；他像塞特一样可被视为最强大的神；像米恩一样在所有神中性能力最强，可以满足许多女神；像哈匹（Hapy）一样是洪水（尼罗河每年的泛滥）之神，人们称赞他使沙漠“变绿”；索贝克还是法尤姆地区的保护神，因为那里有一个满是鳄鱼的湖泊；他也是那些在水上或水边劳作的人们的保护神，比如渔夫、捕鸟者、洗衣工等等；同时他也是使人猝死的命运之神的残暴工具；他还是表现原初海洋的生物之一；而如果他戴上“太阳圆盘”的帽子，那么他就是创造和延续了万物的神祇。

埃及的神是全能而不朽的吗？

在赞美诗和祈祷文中，埃及的神由于他们的智慧、力量和能力而为人们所赞美，但在其他文献中，他们的能力似乎是有限的。神也要遵守“玛阿特”的规定，他们或许会服从于命运的安排，并不总能预见

未来。埃及神话把神描绘得比人类更加长寿、更强壮、更有能力，但他们也会变老、也可能受到伤害。在故事《拉神的秘密名字》中，太阳神就遭遇了年老带给他的侮辱，同时还被他过去用来创造世界的力量之一“海卡”（heka，魔法）所伤害。那个世界就像混沌海洋中的一个小岛，混沌状态的各种势力构成了对神的不断威胁。

埃及的神在与混沌怪兽的战斗或者在神与神互相之间的斗争中也会受伤甚至死亡，但这种死亡似乎只相当于暂时的休眠，伊西丝在被斩首后复活，塞特多次被残忍地处死，但他总能再次苏醒。在这些例子中，死亡的通常都只是神的某个身体或表现形式，但奥西里斯的死亡似乎是永久性的，他无法再回到他在埃及的前生之中。一些《阴间地府书》指出，太阳神在每天晚上死去，然后又在每个早晨获得重生。时间就是由出生、生活、死亡以及复活这个无法回避的循环构成的。造物主最终将感到厌倦而回归混沌，直到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时刻的到来。

埃及的神都是善良的吗？

在大多数神庙铭文中，神似乎都是亲切而慷慨的，他们主动对人们的祈祷以及奉献给他们的供品作出回应，降福给国王和所有人。但那些保护人们不受这些神伤害的魔法文却说，并非所有的神都是甜美快活的。一些神的形象，比如七重形象的狮子女神塞克美特就非常可怕，但拉神的女儿塞克美特并不是一个邪恶的女神，她带来的瘟疫和战争通常都被看成是神所裁定的正当惩罚。

“善良的神”是奥西里斯特有的一个称号，这说明善良这个特征并不是每个神本身就具有的品质。最初这个称号可能是在提及一个令人恐惧的死神时所用的一种避讳方式，如同希腊人常常把可怕的复仇女神说成是“和善之神”一样。在一个用世俗体文字写成的故事集中，奥西里斯派两个魔鬼去挑起埃及的内战，这个计划被一位祭司兼巫师发现了，但他被阿努比斯残忍地杀害。

人们认定的伦理标准似乎并不适用于神，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把宇宙力量的相互作用变成了叙述故事，而且故事中的人物角色都与人类近似。神话中的神也具备人类的缺点，比如嫉妒、贪欲和坏脾气。地与天变成了一对多情的夫妻（盖伯和努特），在创世之前不得不用武力使他们分开。人类的种种动机有可能被掺杂在神话故事中，因此塞特有时被说成是出于性方面的嫉妒而攻击他的兄弟。

塞特犯了许多错误，但他的力量是拉神所需要的，他那不当的贪欲也能够带来有益的结果，例如月亮神的诞生。在《拉神的秘密名字》中，伊西丝用一条带魔法的毒蛇使拉神中毒，而她给拉神解毒的条件是要他真实名字中所具有的力量。但这个邪恶的行为似乎又是正当的，因为她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她的儿子荷鲁斯成为所有国王的表率。

在一些原始资料中，甚至造物主太阳神都是可怕的，他要定期吃掉所有其他生物。图中的雕像就描绘了这个循环的两个极端：索贝克–拉作为原初的神吞下了整个世界，而阿蒙霍泰普三世作为太阳神之子又复原了这个世界。然而，大多数的赞美诗、祈祷文和说教文都对造物主大唱赞歌，认为他是智慧、仁慈的神。我们在下一章中将探讨创世神话。

注释

〔1〕 古埃及生命的象征，为钥匙造型，只有神和国王才能以手持“安可”的形象出现。

第四章

美丽的时刻：创世神话

大英博物馆馆藏的“夏巴卡石碑”上的铭文在1901年被首次翻译出来，从那时起，埃及学家和神学家们就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块石碑以国王夏巴卡（King Shabaqo）的名字命名，是他于公元前8世纪命人建造的（图4），后来人们在孟斐斯普塔神庙废墟上的村庄里发现了它。这块玄武岩石碑在很长时间内都被用作石磨的下扇磨盘，因此它上面所刻的象形文字铭文有些已经被磨掉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块石碑本来是用于保存一卷已遭虫蛀的古代纸草卷上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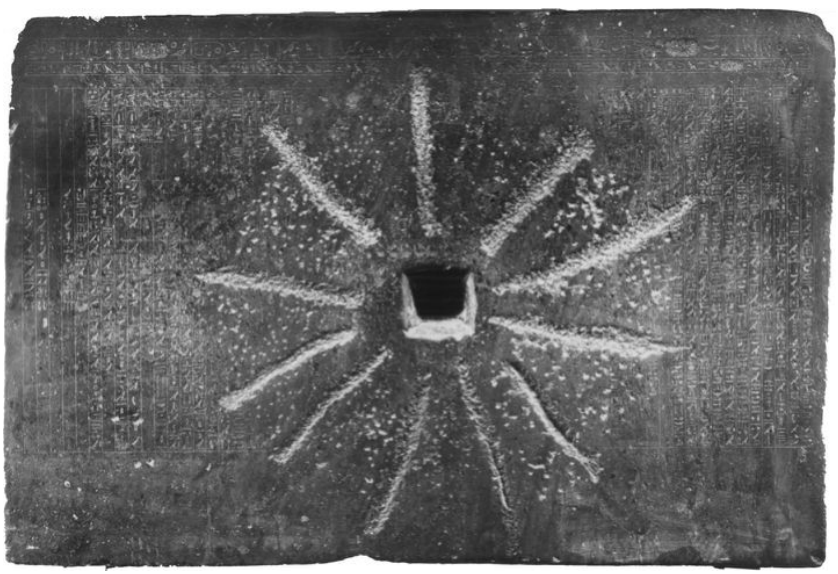

图4　大英博物馆中的“夏巴卡石碑”

这卷纸草文本现在被称为《孟斐斯神学》，它是埃及神话两个重要领域的主要史料来源：宇宙起源（创世故事）和奥西里斯神话。原始文本中的一部分在被复制到石碑上之前似乎就已散佚，而其他部分又由于石碑的磨损而被破坏。这说明埃及神话的原始资料能够保存下来是多么具有偶然性，因此我们千万不能认为已经对埃及神话有了完整的认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一个新的发现完全颠覆我们过去的观

点。

《孟斐斯神学》

《孟斐斯神学》包含不止一个创世神话，神话版本的多样性使得本来很有价值的埃及创世故事鲜为人知。《孟斐斯神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千纪早期，因为它所使用的语言看起来比《金字塔铭文》的语言更为古老。《孟斐斯神学》的发现曾令那些致力于探求一神教起源的学者们激动不已，因为它似乎提供了一个早期的例证来证明有一位超越宇宙的神用他智慧的力量创造了世界，但在证实了整个故事写于公元前8世纪并且不是真实的历史之后，神学家们对这个文本彻底丧失了兴趣。现在大多数的埃及学家相信《孟斐斯神学》中的创世叙述实际上大约创作于公元前13世纪，这个时期人们对于创世的神祇特别感兴趣。“夏巴卡石碑”的刻写者们或许用了一种非常古老的字体重新书写了《孟斐斯神学》，因为这样可以使之更具权威性。

夏巴卡是一位努比亚国王，使用武力将埃及重新统一于他的统治之下。夏巴卡王朝尤其崇拜阿蒙–拉，以他为造物主太阳神，他们崇拜并进一步装饰了卡纳克的阿蒙神庙和赫利奥波里斯的拉神神庙。夏巴卡利用这块石碑巧妙地尊崇了普塔神及其祭司们的主张，同时推广了一篇调和孟斐斯神话与赫利奥波里斯神话的文本。这块石碑是公元前8世纪起宗教与文化开始变得敏感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那么《孟斐斯神学》究竟讲了些什么？要把这部深奥的文本翻译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石碑上的铭文是诗歌和散文的混合体，用第三人称叙述，所说的话语都被刻在神像的口内。它可以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描写了国王夏巴卡如何复原古代文本，并以普塔–塔–泰纳（Ptah-Ta-Tenen）作为上下埃及的统一者兼国王的形式为夏巴卡创造出一个神圣的榜样。第二部分的内容与现存的一部中王国时期的手稿近似，这是一部为王室宗教仪式而创作的手稿，它把王权的历史

追溯到一场关于谁该继承被杀害的奥西里斯神、成为埃及统治者的大辩论中。盖伯以及神界法庭最初的决定是让塞特做“他的出生地”上埃及的统治者，荷鲁斯成为“他父亲被溺死之地”下埃及的统治者。而他们后来的决定是让荷鲁斯成为唯一的国王，从而使这个国家统一。

然后这个文本又陷入了典型的埃及范式，回溯荷鲁斯的父亲奥西里斯之死。但这个故事并不是呈直线地平铺直叙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穿插了起因和结果的一系列事件。这些重大事件都发生于孟斐斯城及其周围，因此最终获胜的荷鲁斯被认定为孟斐斯神普塔–塔–泰纳。铭文的第三部分描述了普塔神创造世界的过程，第四部分暗示了普塔神与复活的奥西里斯之间神秘的结合。其中有关宇宙起源的部分值得我们更详细地探讨。

“第一时间”

《孟斐斯神学》把普塔和代表原初世界要素的所有神都联系在一起。这些“产生于普塔之中”的神包括普塔–努恩（Ptah-Nun）和普塔–纳乌奈特（Ptah-Naunet），他们分别代表原初海洋里黑暗的混沌之水的阳性和阴性两个层面。在这片海洋内部潜藏着有智力的生命体，但直到造物主的灵魂拥有意识的时刻，这种潜力才被开发出来。神的名单已经被毁损，但名单之后的内容很可能是把普塔与“升起的土地”塔–泰纳（Ta-Tenen）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孟斐斯神学》的其他部分中，普塔就等同于“万物从中产生”的神塔–泰纳。第一片土丘得以从原初海洋中升起，这是埃及人称之为“第一时间”的重大事件之一。这片土丘为造物主的诞生提供了场所。

背景知识6

有关创世的想象
“第一时间”的地点和物质：

原初海洋
原初沼泽／芦苇丛
原初土丘
原初莲花
宇宙之卵
陶工旋盘
柳树

原初生物：
青蛙和蛇（“八神团”）
蛇（阿蒙–卡玛泰夫[Amun-Kematef]、阿图姆、奈特）
黑牛（阿蒙、普塔）
巴努鸟（*benu*）／不死鸟（阿图姆、拉、奥西里斯）
猎鹰（大荷鲁斯）
鹅——“伟大的讲话者”（阿蒙）
鹭（图特）
鳄鱼（索贝克–拉、蓬文悌[Penwenti]）
母牛（迈海特–维列特[Mehet-Weret]、哈托尔、奈特）
太阳之子（拉、涅菲泰姆[Nefertem]）
月亮之子（孔苏、图特）
拉神之眼（哈托尔、泰富努特、巴斯梯特、塞克美特及其他神）
阿图姆的手（哈托尔、尼布底泰派特[Nebethetepet]、尤萨阿斯[Iusaas]）
种子女神（哈托尔）
海赫诸神——天空的支撑者

在赫利奥波里斯，原初土丘与神圣的“奔奔石”相关联，在神庙建筑中“奔奔石”以“克里奥帕特拉尖塔”等方尖碑作为代表。另一个原初事件是由众神名单中列在最后的神——“拉神鼻子上的”涅菲泰姆引起

的。涅菲泰姆是原初莲花（或睡莲）之神。据说这朵香气扑鼻的蓝色莲花从原初海洋中冉冉升起，花瓣张开，内现一个金孩，这就是“美丽的时刻”，是第一次日出，造物主以小太阳神的形象出现。

在其他地方的创世神话中，地方神特有的形象被用于表达不可知的生命起源（参见背景知识6）。创世的第一项活动可能是一只闪闪发光的鸟儿要在原初海洋的中央寻找栖息之地，也可能是一只被称为“伟大的讲话者”的鹅正在下蛋，而太阳即将从这枚卵中诞生出来。埃及的宇宙起源说通常包括几个明显自相矛盾的原始事件，埃及人似乎也没有把他们的创世神话当真，其实，这些神话更像是源于自然界的充满感情色彩的隐喻说法。

创世行动

现在造物主准备开始创造世界的活动了，那么创造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孟斐斯神学》再次给出了多个答案。埃及人在设想生命的发端时，使用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各种创造模式：繁衍出人类和动物的性行为、生出庄稼的播种行为、人的思维能力和双手创造出物品的能力。普塔是手工业者和工匠们的保护神，但创世故事在一开始就把他与“用精子和手指”造物的赫利奥波里斯的阿图姆联系在了一起。

《金字塔铭文》和《石棺铭文》中的段落描写了阿图姆在原初的海洋中如何变得孤独寂寞。他既是父亲也是母亲：他使自己的阴茎勃起，然后把他的“精子”放进嘴里，随后吐出第一对神：舒和泰富努特。一些版本暗示阿图姆在性行为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快感是创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这似乎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原始神话，而且它还被详细绘制在纸草上，放入高等级男女祭司的墓中。造物主拥有阴阳同体的特征，这一点有时可以通过把阿图姆的手人格化说得更清楚：他的手变成了一位女神，她与阿图姆的阴茎结合创造出了生命。

《孟斐斯神学》运用以口为中心的关联词语重新叙述了这个神

话。阿图姆把他的口作为孕育生命的子宫，而他的口的一些部分也可以代表神之语言的力量。埃及人相信控制身体的智慧隐藏在心脏里，在《孟斐斯神学》中，据说普塔是在他的心里设计出神祇、人类和动物，然后用他的舌头为他们命名，从而最终将他们创造出来。在其他原始资料中，造物主的这些能力被人格化为洞察力／创造性思维的神（西阿）和发布命令性／权威性言辞的神（胡）。普塔的“神词”如同象形文字一样，可以使想法变成现实。正是这种更具智慧的创世方法使得人们把《孟斐斯神学》与《约翰福音》著名的开篇之语——“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相比较。

《孟斐斯神学》并没有否认赫利奥波里斯创世神话的真实性，而是用另一种说法取代了它，就是说阿图姆是普塔的心脏和舌头。希腊罗马时期的一篇创世文本给予普塔与他在赫尔摩波里斯的宇宙起源说中相似的地位，该起源说以神秘的原初生命为中心，总称为“八神团”。普塔用3种方式创造了“八神团”：思索（智慧的）、造卵（手工艺的）以及把他的精子洒在原初沼泽中（性方面的）。然后他使“八神团”联合，将他们转化成一个神：造物主阿蒙神。

《孟斐斯神学》没有特别强调人类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这也许是因为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的标准版本与拉神密切相关。一个版本说人类起源于太阳神之子在与他母亲分离时落下的眼泪，而神起源于他们母子团聚时他发出的笑声。在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人类就是被当作短命苦力而被创造出来的，替地球上的小神祇们做工。在埃及神话里，人类的创造似乎更具偶然性，但为神服务也是人类的一项任务。

《孟斐斯神学》强调普塔创造了道德秩序与社会秩序，其中包括宗教的概念，因为宗教将为人们所奉行。这主要是指人类对于神的生命力“卡”（*ka*）将要附体的雕像的崇拜。普塔还创造出了各种手工艺，比如雕刻技术，人们可以使用这些技术来模仿普塔的创造能力。作为造物主和统治者，普塔一直是控制万物的智慧，就如同从外面无法看到的体内的心脏一样。在荷鲁斯和图特神统治埃及的时代，他们都要具体表现出普塔的洞察力和支配力。

被创造出来的世界存在着缺瑕这一点并没有被否认，《孟斐斯神

学》简短的第四部分回到了奥西里斯溺水而亡的悲剧中，但却显示了这个悲剧是如何转化成了某种积极的东西。荷鲁斯确保他的父亲得以进入一个神秘的世界，在那里死亡之神与生命之神可以合为一体，复合神普塔–索克尔–奥西里斯（Ptah-Sokar-Osiris）负责复活那些被埋葬在孟斐斯坟墓中的死者。而在生者的世界里，造物主的力量通过荷鲁斯传给在孟斐斯统治埃及的历代神和国王们。

创世的神话与神庙

有关《孟斐斯神学》的性质问题，从事这个文本的早期版本研究及翻译的两位德国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一位学者认为这是一部带有释义的神话戏剧的剧本，但已被严重篡改；另一位则认为它是一篇连贯的神学论述文章，然而他也承认其中包含的演说可能源自于曾在神庙上演的改编成了戏剧的神话。创世神话是哲学思考的一种形式，但比起它不那么抽象的动机来说，这一点倒是没那么重要。

从某个角度来说，《孟斐斯神学》可以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神话。它赋予王权、祭司制度等神圣的起源，因而使它们的长期存在具有了合法性。当公元前8世纪民族认同受到了来自外部的武力威胁的时候，这种神话就变得格外重要了。给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公开表演创世神话具有承认普塔神庙及其祭司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的作用。愤世嫉俗者可能会把《孟斐斯神学》看作一篇宣传文章，旨在说服政府不要资助那些构成竞争威胁的神庙，而这也许确实是该文本的目的之一，但单单从这一个角度来认识这个文本则会忽视埃及神话所起的改造作用。

《孟斐斯神学》不论是被大声朗读出来还是刻写在石头上，都被认为具有改造现实的能力。创世叙述可以促进世界按照神意进行改造，《约翰福音》中有关创世的部分是许多基督徒圣诞节时都会在教堂朗诵的篇章之一。世界的被创造与救世主的诞生被表现成并行的事件。在埃及的宗教仪式上，创世故事常常与造物主太阳神或其代表

——国王战胜混沌势力的故事一同被讲述。创世神话能够被从容地刻在石头上，就是因为它们全都是正面的叙述，是庆祝神界秩序“玛阿特”建立的故事。

如同在其他许多古代文化中一样，创世神话与宗教神庙的建筑风格和功能紧密相关。一些早期埃及神庙的主要特征就是一堆沙子，这极有可能就代表着最早的创世行为的发生地——原初土丘。后来的神庙把土丘或方尖碑包含在内，或者抬高了神像所在的圣坛的地面，使其高于建筑物其他部分的地面。神庙文本并没有把这些特征视为带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改建，而是将之作为创世的实际发生地。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既然同一个上帝可以以面包和酒的形式出现在几千个不同教堂的圣餐礼中，那么大多数重要的神庙都认为自己是创世的发生之地的现象也就不再让人困扰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圣坛都是指同一个地点。

其他的创世之神

一个神庙的主神通常都等同于造物主，这意味着地方的男神和女神获得了造物主的地位。为了确立这个地位，就要在神庙的节庆活动中背诵或表演创世神话。在埃德富的荷鲁斯神庙中，创世随着对原初沼泽以及栖息在芦苇上的一只神圣的猎鹰的征服而开始。在卡纳克的孔苏神庙，孔苏被表现成长着公羊头的蛇的形象，是它，孵化出宇宙之卵。

在有两位主神的神庙里，这两位神都可能拥有自己的创世神话。在埃斯纳，公羊神克努姆和女神奈特各自的创造能力都在赞美诗中得到颂扬。克努姆用他的性能力创造生命，他释放尼罗河的洪水使庄稼生长，还用陶工旋盘制造出动物和人的躯体。人们认为创造活动在过去与现在都在一直进行着，因为新生命在不断产生。在一个人出生前，克努姆或奈特要造出他的身体，然后用“生命气息”赋予他生命。

如同《孟斐斯神学》中的普塔一样，据说奈特也使用神词来进行

创造活动。在关于她的神话的一些版本中，只需使用7个有力量的词语就可以把世界创造出来。奈特掌管婴儿的出生，她在她母牛形态的身体中孕育出太阳神，她的身体等同于原初海洋创造生命的力量。神身上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变成生命体，奈特的唾液和呕吐物变成了混沌兽阿波斐斯，他是太阳神的死敌，奈特还把太阳之子从原初海洋的混沌之水中托出，从而拯救了他。作为造物主，奈特似乎是一个中立力量，既创造秩序生物也创造混沌生物，但在“第一时间”末期，她最终选择了秩序一方。

太阳神常常被视为造物主在世界上的积极力量。在神庙的宗教仪式和《阴间地府书》中，每一次日落都被看作是世界的末日。太阳神在夜间的旅行把他带入黑暗的混沌世界，然后神话中的人物，比如神秘的“八神团”以及创造性思想和权威性言论的神祇们，在神话中的黎明时刻帮助太阳神再次升起使万物重生。明天并不只是另外的一天，还是另一个世界。对于埃及人来说，他们的国家就是那个世界的中心。下一章我们将考察物质世界对于埃及神话的影响。

第五章

黑土地、红土地：神话的地理环境

大英博物馆中有一套雪松木棺椁，棺木上面的装饰画是几幅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地图（图5）。这套棺椁的主人是一位名叫古阿（Gua）的医生，他生活在公元前19世纪，死后被葬在赫尔摩波里斯附近的艾尔–贝尔沙。据称这些地图所展现的是“度阿特”（*duat*）——太阳神以及已故者必须旅行经过的冥界。冥界中横贯着一条大河，还有毒蛇出没的沙漠、火之湖以及神秘的岛屿。这些地图是被称作《双路书》的《石棺铭文》片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一条穿越冥界的路是水路（用蓝色标记），另一条是陆路（用黑色标记）。

图5　古阿医生的外棺底部

与地图相配的文本描绘了看守火焰门或扼守河流转弯处的恶魔，因此古阿带着咒文，以使他能够躲过这些令人恐惧的守卫，在其中的一篇咒文里，他声称自己是被召唤去看护受伤的奥西里斯的医生：“噢，火焰呀！为我开出一条路吧，使我可以顺利通过！我要照

顾奥西里斯恢复健康。”这些地图为死者指出了安息的地点，比如“献祭之地”和“奥西里斯和图特之所”。古阿的最终目标是登上造物主太阳神的船，沿着大地和天空的“蜿蜒水路”航行。像古阿棺木之类的物品上之所以有神话般的地形图，这是由埃及独特的地理条件决定的。

原始地貌

现代埃及大概90%的土地都是沙漠，但在公元前5000年之前，尼罗河谷一直都是一片大沼泽，高地部分是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其间散布着季节性的湖泊。那时的古埃及人都是猎人或者牧人，过着半游牧生活。露出地面的岩石和形状类似后来的金字塔的圆锥形山丘都是陆地的标志，是人们聚居的地方。古代的岩石画表明这片草地上生活着大量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其中许多动物，如狮子、秃鹰、豺和瞪羚等，都与埃及的神联系在一起。

然而，这种富足的生活没能持续下去，气候上的重大变化使草地日渐干涸，缺乏经常性的降水迫使人们不得不去寻找永久的水源。于是一些人定居在了尼罗河谷的边缘地带，并冒险深入到鳄鱼、眼镜蛇、河马以及野牛活动频繁的沼泽地区。在公元前4千纪，大多数人都迁入了河谷，沼泽地区的水被排出，土地得到清理，开始大面积种植谷物。到了古典时代，人们用神话来解释这种变化，说奥西里斯在人间游历，教会人们农业种植的技艺。

生命之河

尼罗河这个名称是希腊人给起的，对于埃及人来说，它就是“河”，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一条河。每年，来自埃塞俄比亚群山上的融雪和雨水使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的水位增高，两条河汇聚成一条充满泥沙的洪流，淹没了尼罗河谷及其三角洲地区的所有低地，时间长达几个月。在三角洲地区，一些沙丘还可以一直保持不被全部淹

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赫利奥波里斯和北部地区，人们会说原初土丘完全是由沙子组成的。

背景知识7

埃及人的宇宙
宇宙区域：
外部的黑暗／原初海洋
上面的天空和天空之河／日间太阳的路线（可被表现为身上布满星星的天牛或赤裸身体的女神努特。上面的天空由舒及其帮手——海赫（Heh）神／荷鲁斯的儿子们／哈托尔之柱来支撑。）
空间／舒的地界
山脉／树木／天边的狮子（在一些图画上，努特的嘴部在西地平线，胯部在东地平线。）
圆形大地以埃及为中心，周围是沙漠和异国的土地。
“度阿特”冥界／内部天空／奥西里斯的王国
冥界之河／夜间太阳的路线（有时被认为在大地的下面，有时被认为在努特的体内。）
深渊／原初海洋
像古阿棺（图5）一样的棺椁可以表现微型的宇宙，棺盖内部绘有一个星辰时钟或一幅天空女神的画像，棺的底部绘有一幅冥界的地图。在某些时期，埃及神庙的设计旨在象征最新被创造出来的宇宙，神庙的围墙相当于环绕四周的原初海洋，地穴代表冥界，塔门[1]代表天边的山脉，屋顶代表上面的天空。

尼罗河控制着河谷定居者的生活，因此对埃及人来说，他们不可能设想出一个没有这样一条河流的王国。在埃及人的宇宙观中，天空中的天国以及冥界里都有一条贯穿的河流（参见背景知识7）。在其他文明中，人们想象的是太阳驾着马车穿越天空，而在埃及文明里，

太阳、月亮以及星星都是乘着船在天空中航行。埃及的一个名字就是“两岸”，因为尼罗河既统一了这个国家，同时也将这个国家分为两部分。

在许多地方，尼罗河谷都只有几英里宽，但河上没有架桥，因此要从河的一边到达对岸总是有溺水而亡或被鳄鱼吞没的危险，危险的水上航行就成为埃及神话的中心内容。太阳神所乘的船受到一群野驴或者混沌毒蛇阿波斐斯的攻击；载着奥西里斯尸首的船在太阳神再次升起之前不得不在一群敌人中间穿过。像古阿这样的死者要使用《双路书》作为他的向导，以便在冥界之河上航行。

尼罗河的东岸是日出之地，因此是生者的国界，最适宜建造城镇和神庙。西岸是日落之地，被认为是死者之所，适合建造坟墓和丧葬神庙，冥界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美丽的西方”。

海怪与风暴之神

埃及人还认为他们的领土被分成了两部分——泛滥平原上的肥沃“黑土地”与周围沙漠中的贫瘠“红土地”。奥西里斯、伊西丝和荷鲁斯与“黑土地”相关联，而塞特、涅菲悌斯和阿努比斯则与“红土地”联系在一起。在河水泛滥带来了水和淤泥之后，泛滥平原上的庄稼就可能会有非常好的收成。然而，宝贵的“黑土地”也不断地受到来自地中海和沙漠的威胁。

地中海被称为“伟大的绿色”（the Great Green），但对这个海洋更普遍的称呼是“环绕者”（the Encircler）。诞生了造物主的原初海洋仍然被认为是环绕着这个世界。埃及的北部海岸依靠淤泥的每年沉积而保持在海平面以上，但海边的城镇可能因为地震或海啸就被淹没在大海中，盐碱化的土地无法继续耕种。因此难怪有一则神话把大海比作一头贪婪的怪兽，以淹没整个大地相威胁，来索要越来越多的贡品，其中包括美丽的女神阿斯塔特（Astarte）。后来，最强大的神塞特在战斗中取胜，赶走了海怪。这个故事似乎改编自叙利亚的一则乌

伽里特神话，但它也与人们对于地势较低的东部三角洲的担忧有很大关系，在那里塞特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神。

埃及人认为尼罗河最根本的源头在原初海洋，河水的泛滥被描述为要使埃及回到它原初的状态。需要通过水渠和堤坝体系来对洪水进行谨慎的控制。当洪水水位高于平均值时，村庄就将被冲毁，人们会被淹死；但当水位低于平均值时，庄稼就将减产，人们就会挨饿。河床无情的变化可能会慢慢地摧毁定居点，这一切似乎已经在古代孟斐斯的大部分地区发生过了。

人们崇拜尼罗河的神圣的控制者，比如造物主和星辰女神，而并没有崇拜尼罗河本身。一些神庙中展示了16只花瓶或者16个表现洪水泛滥益处的人格化的哈匹神形象，以体现尼罗河完美的水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核心神话都被重新改造，以解释河水泛滥的现象并确保这一现象持续下去。伊西丝为她死去的丈夫所流下的眼泪、奥西里斯的躯体中渗出的物质，都被说成是引起河水泛滥的原因。河水泛滥带来生命和死亡的力量与“遥远女神”的神话联系在一起。“遥远女神”是拉神的女儿，与父亲争吵后前往沙漠居住，最后只得被劝说回来。

构成“红土地”的沙漠蕴含着宝贵的资源，比如矿藏和建筑石料，但是为了开采这些资源，人们要进行长途跋涉，其间要经历饥渴、沙暴、因炎热导致的疲惫或者暴雨导致骤发洪水的死亡威胁。沙漠中开垦出来的土地可能被猛烈的风暴完全吞没，据说这种风暴是由塞特神在天上打雷引起的，同时这些土地也可能被巨大的沙丘那缓慢但不停歇的移动所吞噬。有必要排除灌溉水渠中的沙子，这项任务对于埃及人来说非常紧迫，他们甚至期望在死后也能够继续做这项工作。古阿的外棺是《夏勃梯咒文》的最早史料来源之一，咒文召唤一名会巫术的人代表死者来排沙。正是考虑到了这些环境因素的作用，埃及神话把生命构建成为秩序与混沌之间不断的斗争就不足为奇了。在这场斗争中，要求所有人都恪尽职守。

进入沼泽

许多古代文化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中都有男英雄或女英雄离开家园、进入一片大森林或丛林之类的故事。他们在那里会有一番历险，遇到神奇的生物。这是一段富有开创性与变化性的旅程，美女可能遇到野兽，骑士可能杀死恶龙或找到真正的圣杯。然而，埃及人没有森林，也没有丛林，但他们可以把有序世界抛弃一边，进入一片沼泽或沙漠中。

尼罗河谷的边缘地带以及三角洲的部分地区仍有大片荒凉的沼泽。在埃及的艺术与文学中，沼泽被认为是欢乐与危险同在的地方，也是伟大的野牛神哈托尔–塞克海特（Hathor-Sekhet）、湖泊之神索贝克（Sobek）以及眼镜蛇女神瓦吉特的圣地。在坟墓中的壁画上，墓主人在这些神的领地渔猎。三角洲宁静的芦苇丛激发了埃及人对天堂的想象，所以天堂也称为“苇子的原野”。人们乐于想象在高大的纸莎草丛中隐藏着齐米斯浮岛，伊西丝在那里诞下她非凡的儿子荷鲁斯。“梅特涅石碑”上刻的一个故事讲述了伊西丝与她7只带有魔力的蝎子如何从塞特手中逃脱并在遥远的沼泽村避难。在被一位富有的妇人拒绝之后，伊西丝得到了一位渔妇的收留，于是作为报复，蝎子螫了那位妇人的孩子。当那位富有的妇人把她的财产给了渔妇之后，伊西丝治愈了她的孩子。这个故事很可能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三角洲是政治动乱时期受逃亡者欢迎的藏身之处。

在一篇中王国时期的文献残片中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一位牧人在浸水草甸放牛时，在湖边遇到了一位女神，这位女神的相貌非常恐怖，牧人见了她吓得头发直立四肢发抖，但他拒不离开这个地方。于是在他们第二次相遇时，这位女神又化身成为一位赤裸身体的迷人女子。残片到这里就截止了，因此我们无从知晓牧人是否接受了女神的性爱引诱，而这又是否导致他丢掉性命。塞特神就因为在类似情况下没有抵挡住他所遇见的女神的诱惑而遭受到严厉的惩罚。

走出河谷

尼罗河谷边的群山外同样也有危险的神兽。直到大约公元前1500年以前，沙漠都被说成是怪兽的家园，那里生活着狮鹫、长颈兽（蛇头猫科怪兽）以及混合了几种奇异动物特点的塞特生物，等等。吉萨的狮身人面斯芬克斯就是一种沙漠神兽，在战斗中代表秩序一方。图特摩斯四世国王（King Thutmose IV）——阿蒙霍泰普三世的父亲，声称当他躺在斯芬克斯的阴影中睡觉的时候，这个神兽曾跟他讲话，它抱怨沙子都快要掩埋它的身体了，使它无法保护王室的陵墓。随着离埃及最近的沙漠变得越来越贫瘠，艺术作品中的怪兽形象也越来越少，由于沙漠失去了绝大多数野生动物和植被，因而怪兽们也不愿再呆在这个空旷的家园里了。

在沙漠深处是"遥远女神”，或者被称为“远游女神”的领地。有关她的故事有时被认为发生在西部（利比亚）沙漠，有时在南部（努比亚）沙漠或者蓬特的遥远土地上。化身成为野猫、母狮或者母狮鹫的女神在这些地方漫游。那些被派去寻找她的神祇们在冒险接近她以前不得不化身为猿或猴。智慧神图特费尽口舌才说服这位被疏远的拉神的女儿离开寂寞的荒野，回到尼罗河谷的文明社会中。他告诉她在失去了她光芒四射的风采之后，埃及变得多么荒芜。他还给她讲了表现神界秩序运行情况的故事，在其中一个故事中，一只飞虫的死亡都得到了拉神的关注，最终由狮鹫——太阳神最厉害的使者，为这只飞虫报了仇。

在文学作品中，厄运往往会降临在那些离开埃及的人的身上：一位水手亲眼见到他的所有同伴都被淹死（《船舶遇难者的故事》）；无辜的巴塔（Bata）遭遇妻子的背叛和士兵的谋杀（《两兄弟的故事》）；一位王子遭到一条蛇、一条狗和一只鳄鱼的攻击（《注定厄运的王子》）；一位祭司受到海盗的劫掠（《温阿蒙航海记》）。而这些故事的正常结局都是男主人翁最终回到埃及，而且比当初离开时更加睿智，巴塔就是至少经历了3次生死关头之后得以活下来，并成为了埃及国王。

埃及文学中一个最受人欢迎的作品就是有关辛努（Sinuhe）的故事。在故事的一开始，辛努被卷入一场杀害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国王（King Amenemhet Ⅰ，约公元前1985—前1956）的阴谋中，于是逃离了埃及，被迫与“沙漠居住者”生活在一起，并娶了一位酋长的女儿为妻，还在一场格斗中战胜了敌方的勇士。但他始终渴望回到家乡，对于辛努来说，没有什么比他能够葬在故乡的土地上更重要的事情了。最终，新继位的国王满足了他的愿望。在埃及人的心目当中，他们国家所有的土地都是神圣的，但是，许多人还是感到与家乡的地方神祇有一种特殊的联系。

地方神祇与地方性神话

从很早以前开始，一个定居点不论有多大，它都会建起一个圣坛献给掌管这个地区的男神或女神。在一些时期，地区的长官也是地方神祇的高级祭司。最终埃及的42个诺姆（行政区划）都拥有了各自的一个或一组官方神祇，每个诺姆都使用类似于纹章图案的一个或一套符号来代表自己，这些符号可能与诺姆的神或诺姆最初的名称相关，例如，第十七个上埃及诺姆被称为“豺诺姆”，它被表现成带着一根羽毛的豺神坐像，而掌管这个诺姆的神就是豺神阿努比斯；第十五个上埃及诺姆被称为“野兔诺姆”，它被表现成一只野兔，但掌管该诺姆的神是图特和赫利奥波里斯的“八神团”。古阿就是为“野兔诺姆”的长官工作，这位长官名叫杰胡特霍泰普（Djehutyhotep，意为“图特是亲切的”），图特的住所可能已被标记在古阿的冥界地图上，因为图特是他的地方神。

地方性的传统常常被记录在列有圣灵、圣地以及圣物的名单上。人们在塔尼斯发现的一张纸草上就写有每个诺姆的节庆、禁忌、墓地、神圣的动物和鱼、蛇神、圣树、土丘以及湖泊。这些清单使人们在看到神庙艺术所体现的信仰一致性的同时，也了解到埃及人信仰的多样性。在一个诺姆中，猎杀鳄鱼可能是禁忌，因为鳄鱼代表着仁慈

的索贝克神；而在另一个诺姆中，猎杀鳄鱼就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宗教行动，因为鳄鱼是“塞特的追随者”，曾与善良的奥西里斯和荷鲁斯神作战。在一些保存至今的纸草上，这些清单被扩展成了地方神话。

最为丰富的史料来源是一部被称为《尤米尔哈克纸草》的插图纸草卷，它的年代可追溯到约公元前4世纪，其内容包括解释“豺诺姆”的独有特征的神话，例如地点名称、宗教仪式、不寻常的植物、矿藏或者地形特征。其中一部分内容讲述了一群“塞特追随者”曾经聚集在某一座山上，阿努比斯在夜间攻击了他们，一次进攻就割断了他们所有的头颅，这座山上洒满了鲜血，这也就是这个地区仍然出产红色矿物的原因。这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方神话，但它也是国家神话的一个部分：荷鲁斯与塞特之间的斗争。

《尤米尔哈克纸草》上几乎所有的神话都是核心神话的地方化的复述。“豺诺姆”的河岸、城镇以及山坡分别成为奥西里斯的埋葬地、塞特的战败地以及荷鲁斯和伊西丝的取胜之地。其他许多地方也有同样套路的神话。位于阿拜多斯的一座早王朝王室墓在中王国时期被重新解释成奥西里斯的埋葬之所。到公元前1000年，据说伊西丝把奥西里斯已被肢解的身体碎块分别埋葬在了埃及的各个诺姆中，他的头被认为葬在了北部的布塞利斯，一条腿葬在了埃及南端的比伽岛，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能够代表整个身体，使得其所在的地区神圣化。

不寻常的地形特征，如长有古树的一座山丘、或者与神话中天边的山脉相似的悬崖上的隘口，都可能会建立起这个地方与神话之间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联系又通过宗教仪式行为得到加强，这些行为可能是一个奠酒祭神仪式上所说的几个词语，也可能是用上千个演员对于神话素精心地反复表演。一旦一个圣地与一个核心神话关联起来并成为朝圣之地，那么它还将引出更多的神话联想。

这些联想可以通过对地形的人工改造而得到加强。山丘被建造起来作为原初土丘或者奥西里斯的栖息地；神庙里挖掘出湖泊或者池塘，如同素贝克–拉和阿蒙霍泰普三世这尊雕像所在的池塘一样，它们代表着原初海洋或代表着荷鲁斯与塞特发生水战的地点。埃及的主要神庙与政府之间有共生共存的关系，因此这样大型的改造工程必然

少不了王室的资助，下一章我们将讨论王室与神话之间的联系。

注释

〔1〕 古埃及神庙特有的庙门形式，因建在两座对称斜壁的巨塔之间而得名。一座座塔门将神庙的围墙隔断，通往神庙的主体建筑。

第六章

两土地之王：国家神话

在许多人看来，图坦卡蒙（Tutankhamun）的金面具就是古埃及人的脸孔。图坦卡蒙的短暂统治（约公元前1336—前1327）标志着在阿玛尔纳时期的“宗教改革”之后，王权又回归到了正统的模式。在阿玛尔纳时期，国王埃赫那吞废除了过去所有的国家神话与地方性神话，而代之以他的太阳神阿吞创造世界的故事。在这个神话中，阿吞似乎是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创造并统治了世界，奥西里斯惨遭谋害的黑暗神话以及秩序与混沌之间的血腥战争都被禁止再提。

图坦卡蒙墓中的珍宝可以使我们了解许多神话，包括那些以冲突为主题的神话。一个木制的圣龛中放置着一对镀金的小雕像，雕像表现的是年轻的国王站在一条由纸莎草根制成的小船上的场景。在如图所示的雕像中，图坦卡蒙戴着下埃及的红冠（图6）。王冠以及代表王权的其他重要物品被认为可以赋予国王神一般的权力，因此只要戴上这个王冠，图坦卡蒙就不再需要用富丽的长袍或者贵重的珠宝来强调自己的地位。

图6　图坦卡蒙持鱼叉的镀金小雕像

这位年轻的国王一手持着鱼叉，另一只手拿着一卷绳索，一幅欲投掷鱼叉的样子，如此呼之欲出的姿态在王室雕像中非常罕见。国王想要捕猎的目标是一匹公河马，但由于这种动物过于危险，因而被禁

止出现在王室的陵墓中。

捕猎河马

在图坦卡蒙下葬的前1,500年，国王扮作河马捕猎者的主题就出现在埃及早期国王的器物上。河马牙在过去是一种非常贵重的商品，但在易翻的小船上用铜制武器捕猎河马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活动。一位身强力壮的成年男子也得要刺许多下，才能使河马失血过多而变得虚弱，这相当于古埃及版的斗牛活动，传说中的埃及统一者美尼斯国王（King Menes）据说就是被一头河马害死的。

最早的埃及领袖可能要通过领导这种捕猎行动来证明他们的价值，但身体虚弱的图坦卡蒙很可能都没有获准接近过一匹真正的河马，医药史学家最近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手杖，这位年轻的国王几乎无法站立。从某种意义上讲，捕猎河马可能只是象征性行为，通过艺术表现或“切河马蛋糕”这样的宗教仪式行动都可以实现其主要目标——秩序对混沌的胜利。

河马的许多特征使人们将之与混沌势力联系在一起。在白天，河马就潜伏在水下，如同混沌水域中的原初怪兽；到了夜晚，它们上岸啃食、踩踏庄稼以及所经过之处的一切东西。雄性河马互相恶斗。许多河马都是粉红色的，而红色在埃及人的象征体系中是邪恶的颜色。在神话里，塞特化身为河马来攻击他的兄弟奥西里斯或他的侄子荷鲁斯，甚至反抗太阳神的统治。最终荷鲁斯神猎杀了塞特–河马神，用一根带有魔力的鱼叉刺得河马遍体鳞伤，这个行动与荷鲁斯用他的矛制服原初海洋从而使创世开始的神话相呼应。

持鱼叉者小雕像把图坦卡蒙理想为黄金荷鲁斯王，是杀死混沌怪兽并拯救世界的英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一场战斗胜利的天平会偏向河马一边，每位生活在尼罗河边的人对此都心知肚明。埃及人并不把秩序一方的胜利作为预料之中的必然结果，来自混沌的威胁是非常真实的，就像有关美尼斯的传说一样，故事的结局并不总是皆大欢

喜。埃及人的世界观使他们相信王权体系对于文明的延续是必不可少的。

国王与国家

美利坚合众国的创立者们虽然举起了反英国王权统治的大旗，但他们却非常钟情于古埃及的象征体系，这很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君主政治是古埃及社会的基本特征。人们认识古埃及的历史都要依照历史上国王名单的顺序，有时也把他们组合成王朝的结构。这些名单具有实际的功用，就是指明了那些要供奉的王室祖先。名单还为埃及创造出了一个连贯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非常遥远的时代，也就是埃及还是由造物主太阳神以及之后的一系列神王直接统治的时代，这些神王包括奥西里斯和荷鲁斯在内。荷鲁斯的统治为后世的所有国王树立了一个榜样，所有忠诚的臣民都是“荷鲁斯的追随者”而非“塞特的追随者”。

公元前4千纪晚期的几位上埃及国王的事迹似乎都被归于统一者美尼斯的传说之中。在这个时期的王室物品中，国王可以被表现为一只鹰、一头公牛或一头狮子的形象，战胜了似乎包括北方“沼泽居民”在内的敌人。到大约公元前3100年，世界上第一个大型民族国家建立。人们对世袭君主领导的中央政府的忠诚取代了对家族组织、部落酋长或者城镇领袖的地方性忠诚。这种转变是如何实现的？最近的非洲历史表明这样的国家不能只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来维持，还需要人们心理和情感态度上的巨大变化来支持。

早期的国王似乎使用了多种方法。首先，他们将书写和艺术系统化，从而为他们的新国家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形象，这非常类似于我们今天使用标识和商标来提升品牌影响力。其次，国王与所有的地方神祇都建立起关系，这样他就成为整个国家的宗教领袖。再次，埃及的精英阶层推广了“好的权力”这一概念，从而使中央政府被看成是神界秩序的一部分。

北方与南方的分歧并没有被掩饰，相反这种不同受到尊重，埃及被称为“两土地”，分别用两套符号标志来代表上埃及和下埃及，比如白冠与红冠、秃鹰与眼镜蛇、百合花与纸莎草。早期的王室记录主要记载国王参加节庆活动或者在地方神庙修建雕像的事情。当国王庆祝他的赫卜赛德节 [1] 时，上下埃及的神祇们都会附体在各自的雕像上来证明国王的权力。

王抑或神？

国王的权力是基于神的权威，那么人们会把国王认作是神吗？有关国王的“神圣性质”的说法很少在各个时期都同样适用。*nt r* 一词频繁使用于王室头衔中，人们为在位的或故去的国王举办雕像祭仪。加冕仪式以及许多王权的标识物都证明国王是不断更新世界的造物主太阳神在人间的代表，这使得国王在神界的统治集团中占有一个权威的位置。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认为，随着埃及国家的建立，神圣的国王成为了神王。他指出，在公元前3千纪的大部分时段内，“神话中的身份认同”（mythic identification）被“神话中的自命不凡”（mythic inflation）所取代，也就是国王个体原本要通过他所扮演的神圣角色体现出来，而在后来则是神要通过国王的身体体现出来。

在宗教艺术与文学中，国王能够扮演许多神话角色，比如支撑天空的舒，或者在沼泽中吮吸着母牛女神的乳汁的小荷鲁斯。这些场景通常要早于对神亲自做这些事的表现。图坦卡蒙作为持鱼叉的荷鲁斯的雕像在时间上就要先于其他任何物品，如“梅特涅石碑”，展现的情景是荷鲁斯本人刺杀化身为兽的塞特。王室统治似乎成为了一个限制叙事神话发展以及用图画表现神话的艺术形式发展的主要因素。

从第五王朝（约公元前2494—前2345）起，国王开始使用“拉神之子”这个头衔（参见背景知识8）。国王最多地被表现成神的可爱而顺从的儿子，他是人间唯一可以代表人类向神说情的人。“父子关

系”中的一类就是建立在国王在宗教仪式上等同于荷鲁斯的基础之上。在埃及宗教中，有两位重要的神都叫荷鲁斯：大荷鲁斯是一只宇宙之鹰，他的眼睛就是太阳和月亮；而小荷鲁斯是伊西丝的儿子，是与塞特作战、为父亲奥西里斯复仇然后继承王位成为埃及统治者的王室之后。埃及的国王与这两位神都有联系，但到了中王国时期，最具权威性的一个公式则为：健在的国王＝小荷鲁斯、已故的国王＝奥西里斯。《拉美修姆戏剧纸草》中有描写一个王室宗教仪式的内容，该仪式反复表现了奥西里斯死亡又复活以及荷鲁斯和他的儿子们战胜塞特的故事，但我们还不清楚这个中王国时期的宗教仪式是举行于新国王的加冕庆典上还是老国王的葬礼中。

背景知识8

国王的名字和头衔

早期的国王把他们的名字写在*serekh*（王宫门面）之中，这是一个矩形方框，上方有一只猎鹰，它表示这个国王等同于“王宫中的荷鲁斯”。后来，国王在登基时都使用5个名称。第一个是“荷鲁斯名称”，第二个是“两位女士名称”，第三个是“黄金荷鲁斯”名称。这些与荷鲁斯相关的名称显示出国王像荷鲁斯神一样强大、无敌。“两位女士”是涅赫伯特与瓦吉特，分别为上下埃及的守护女神，这个名称强调了国王在埃及统一中的地位。

第四个名字是国王的首名，被写于一个装饰框中，跟在衔名*nsw-bity*的后面，字面意思为“他是莎草和蜜蜂的”，上下埃及的另一对象征符号。它还被说成是代表了国王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是有限时间内的个体，另一方面是玛阿特永恒的拥护者。这个名字还经常与拉神的名字相结合，例如尼布–玛阿特–拉，意为“拉神是玛阿特的王”，它是阿蒙霍泰普三世的首名。

第五个名字是中间名，也被写在一个装饰框中，跟在短语“拉神之子”的后面。这个名字是家族名，我们今天仍然以此称呼埃及国王，比如阿蒙霍泰普（阿蒙神是亲切的）、图特摩斯（图特诞生）或者图坦卡蒙（阿蒙神在人间的形象）。这些名字有时还反映了一个王朝对其发源地的地方神的忠诚，例如塞提一世（Seti I，意为“他是塞特的”）家族就来自于三角洲东部的一个地方，塞特崇拜在那里十分盛行。

在这一时期，国王在宗教仪式上等同于神的概念通过精英阶层的传播，扩展到像古阿棺木上的咒文一样的丧葬咒文之中，甚至还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具有治病和保护作用的巫术中。这也许就是神和国王之间可以发展出一种更特别的关系的原因。记载在《韦斯特卡尔纸草》上的中王国后期故事集中有一个“王室出生神话”的早期例子。第五王朝的前3位统治者都被一位妇人说成是拉神的儿子，他们神奇诞生，那时伊西丝和涅菲悌丝这两个姊妹、青蛙女神海克特以及分娩女神迈斯克海奈特（Meskhenet）都在场，克努姆神还在他们出生时赐予他们3人健康。

人们认为克努姆在他的陶工旋盘上造出了人的身体和“卡”（ka）——一种生命力，新王国时期的神庙中描绘了他造人的情景，表现了统治者神圣的孕育与出生。卢克索神庙中的浮雕还表现了众神之王阿蒙–拉临幸一位王后诞生出一个非凡的婴儿的情景，这个孩子就是阿蒙霍泰普三世（参见图3）。当阿蒙霍泰普出生时，保护这个太阳之子、小荷鲁斯的神祇们都来向这位小王子及其母后致敬。

王室的“卡”似乎被视为一种永恒的力量，存在于每位国王的身体之中，而神的“卡”则被认为存在于宗教雕像中。“卡”这个词可能起源于埃及语“营养”一词，它的发音也很像“公牛”这个词，它们之间的联系在古代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国王的“卡”维系着他的所有臣民，据说每位国王都成为了“他母亲的公牛”，从而产生出他自身的另一种形式，接任为下一任国王以及秩序的永恒拥护者。

秩序与混沌的对抗

人们认为埃及的国王有责任在人间建立玛阿特，他们通过建造神庙、向神和死者的灵魂献祭、将公正降于人间及保卫埃及的边界等行为来完成这个使命。一篇文本说明国王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把玛阿特放置于伊斯法特（混沌）处”，这意味着伊斯法特被认为是事情的天然状态。国王所必须要战胜的混沌势力在图画中可以被表现为外国人、大群的候鸟或者不同的沙漠和沼泽动物，比如说羚羊、河马。在持鱼叉者小雕像中，国王的王冠上有一个盘绕着的眼镜蛇的标记，这个吐火的眼镜蛇女神被认定是每位合法国王的忠实伴侣，在神话中，她是拉神丢失了的眼睛，后来回到太阳神的额头上并化身成蛇的形象以击败太阳神的敌人。

混沌也并不被说成是完全邪恶的，像混沌的原初海洋之神努恩就被尊奉为造物主的“父亲”。这意味着混沌中的一些元素对于生存来说是必需的，因此要利用它们而不是除掉它们。当秩序势力面对贪得无厌的大海或者巨蛇阿波斐斯等怪兽的时候，他们也需要用到混沌神塞特的能量和力量。人被认为拥有在玛阿特和伊斯法特之间作出选择的能力。在《双路书》（《石棺铭文》1130）里的一篇咒文中，造物主说他命令人们不要做坏事，但这些人的心没有服从他。像造物主一样，人们有权通过他们的思想来创造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在神话《人类的毁灭》中，人们由于背叛了“神王拉”的权威而走上死亡之路。背叛好的权力从而导致恶果的暗示在埃及的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

一篇被称为《忠诚者教谕》的中王国文本赋予了在位国王两个神话角色：一个是把光、水和空气赐予人类的造物主太阳神，另一个是吞下了秩序敌人的可怕的狮子女神。这种跨性别的身份等同并不奇怪，因为狮子女神就是眼睛女神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眼睛女神最初就是太阳神的一部分。《忠诚者教谕》声称埃及需要严密的组织，目的是为了保卫国家、利用泛滥的河水以及生产出足够的食物以保证工匠的生产活动。但这种和平与繁荣的福祉需要以丧失个人及地方的自由

为代价来获得，协助国王进行统治的精英阶层享有的这种繁荣成果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因此很有兴趣延续这一体制。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一些由这个精英阶层创作的或是为这个阶层创作的文学作品却不满个别国王的统治。

做坏事的国王

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好的权力的通常都不是国王，而是诚实的官员或者博学的祭司和巫师。现存的埃及传说直言不讳地描绘了王室的种种劣迹。在《韦斯特卡尔纸草》中，一位农民兼巫师斥责国王胡夫想拿人做实验。在《尼斐尔卡拉国王和萨撒奈特的故事》中，国王与一位将军干了不合法的勾当。在《梵蒂尔纸草》中，一个国王为了苟活而牺牲了一位忠诚的臣民，之后他还霸占了这位臣民的妻子和财产。在《两兄弟的故事》里，一个国王抢走了别人的妻子，并允许他的新王后杀死一头圣牛。

到埃及旅行的古典作家记述了有关古代国王的更骇人听闻的故事，故事中说他们强暴自己的女儿，或者逼迫她们去做妓女，从而为他们的建筑工程积累资金。这样的一些故事之所以能够产生，就是因为神话素已经从神界变换到人间，但埃及人似乎已把圣洁的政府与掌管这个政府的易犯错的个人作了严格的区分。同样的态度似乎也出现在以埃及国王和王后身份进行统治的神祇们的故事中。

神本身被认为存在于两个类型的时间段：一个是通过宗教仪式可获得的不断持续的现在，另一个是与现在完全不同的遥远的过去。在前一个时间段里，神是强大的宇宙力量，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受微不足道的人类意识的左右；而在后一个时间段，神带有了欲望和情感，他们也会犯错误。在神话《拉神的秘密名字》中，太阳神中了伊西丝的毒，被哄骗着赋予了伊西丝超越太阳神的力量。在《人类的毁灭》中，神王拉对于如何处置叛乱的人类犹豫不决，甚至苦恼得无法继续呆在人间。在这两个神话中，拉神都向众神征求意见，这就如同

指望埃及国王在作出决断之前要听取他的大臣们的意见一样。

在记录于公元前1千纪晚期的一个神话中，盖伯神放逐了他的父亲舒神并逼迫他的母亲泰富努特做自己的王后，随后他被他王冠上的眼镜蛇女神烧灼。“他的母亲的公牛”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已被按字面意思理解，并被转变成为一个乱伦和子女叛乱的故事。图坦卡蒙持鱼叉小雕像蕴含了另一个神话情节，它以王位继承为中心主题：即荷鲁斯和塞特之间围绕谁应该成为国王这个问题而展开的斗争。在古埃及3,000年的历史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神话。在位的国王都被更密切地等同于荷鲁斯而非其他的神，然而这个斗争有许多不同的结果。下一章我们就将详细探讨这个神话的一个版本以及对它的多种解读方式。

注释

〔1〕 古埃及最古老的节日之一。传统是自国王登基30周年的纪念日开始，每3年庆祝一次，但实际上根据法老的个人爱好而有所变化。

第七章

一场大战：斗争与和解

在位于都柏林的彻斯特比提图书馆的珍宝中，有一部名为《彻斯特比提蒲纸本一号》的纸草卷，上面记载有大量诗歌和散文体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一个名为《荷鲁斯与塞特的争斗》（以下简称《争斗》）的神话故事（图7）。这个纸草卷曾经是一个私人图书馆的收藏，这个私人图书馆所属的家族在新王国后期西底比斯的王室墓地生活和工作。《争斗》是用僧侣体文字书写而成，这和《彻斯特比提蒲纸本一号》中的另一篇文本相同，那是一篇庆祝拉美西斯五世国王（King Ramesses V，约公元前1156—前1151）继位的赞美诗，书写这两篇文本的书吏可能也是它们的编创者。《争斗》中的许多事件都可以在更早的史料中找到蛛丝马迹，但这些事件的组合方式在其他的神话版本中是找不到的。

图7　《彻斯特比提蒲纸本一号》上的《荷鲁斯与塞特的争斗》故事原文

《争斗》是古埃及留存下来的篇幅最长的叙述故事之一，也是最具争议的作品之一。这个文本曾被视为一篇纯粹的娱乐作品或一篇睿智的讽刺作品或一篇情节复杂的小说或一个改编编过的神话故事。《争斗》还曾被用于阐释埃及国王的登基大典、埃及的统一过程、中王国时期王室力量的兴起、新王国晚期王室权威的衰落、两性问题以

及埃及法律体系的运作方式等研究主题。弗洛伊德学派、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都曾分析过这个故事，并得出多种结论。对于《争斗》的多样化的解读表明，任何一个埃及神话都没有一种标准化的解读方式。

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

宗教文本一般都用经典的中埃及语写成，但《争斗》的大部分却是以新王国晚期的通俗语言写成的。故事中的神常常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话，而不是用神庙铭文中的词藻华丽的语言，故事主人公的行事方式也不像神庙浮雕上的神那般得体、端庄。在埃及国家神话的这个版本里，太阳神无法下定决心去做正确的事情，而且在遭到反对时还怒气冲天；荷鲁斯，这位所有埃及国王的典范，竟然为赢得一场竞赛而采取了欺骗行径，而且在一气之下还砍了他母亲的头；塞特，一些新王国时期统治者的保护神，被描写成了一个暴虐而好色的小丑（参见背景知识9中的故事梗概）。

在《争斗》译本的导言中，E.F.温特（E. F. Wente）认为“一些伟大的神的行为在各方面都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很难想象其中没有调侃的意味。”一些学者相信调侃的元素使得《争斗》不能被视为神话，而只能是纯粹的娱乐作品；但另一些学者则指出，在许多文化中，提供有意义的娱乐元素也是神话的一项重要功能。

《争斗》的现代读者可能认为居于西底比斯的受过教育的埃及人已不再相信他们的神，但大量的考古证据都驳斥了这种观点。在大墓地工作的书吏们建造了他们的家族祭坛，修建并维护他们村落共同体的神殿，参加宗教节庆活动，并且还用神的图像装饰他们自己的坟墓。实际上，这篇文本中的批评之语针对的似乎更像是国王及其代表，他们把自己等同于太阳神及其顾问团的神祇们。荷鲁斯抱怨说他为获取正义而斗争了80年，这一定触动了当时的听众们的心弦，因为我们知道底比斯的一些法律案件也会拖上很多年。有关遗产继承的纠

纷也很常见，从现存的法律卷宗可以看出，寡妇与遗孤（比如伊西丝与荷鲁斯）要想获得他们的权利是多么地艰难，即使法律是站在他们这一边。

背景知识9

《荷鲁斯与塞特的争斗》故事梗概
荷鲁斯与塞特对于谁该成为国王的问题争论不休，他们之间的争吵惊扰了整个埃及。年轻的荷鲁斯出现在神的法庭上，要求继承他死去的父亲奥西里斯的王位。有几个神认为荷鲁斯所说是正确的，但万能之王（造物主太阳神）对于法庭没有咨询他的意见就作出判决的做法恼羞成怒。塞特提出应该通过一场决斗来解决这个问题。图特写信给奈特，咨询她的意见。奈特回信威胁说，如果不把王位给荷鲁斯，那么她就要使天空撞击大地。法庭赞同奈特的意见，但这使得太阳神更加愤怒。太阳神告诉荷鲁斯他不适合做国王，因为他还只是一个瘦弱的小男孩儿，这激怒了其他神，其中的一位神辱骂了太阳神。

太阳神被这件事搅得心烦意乱，他躺在他的帐篷里拒绝起身，直到他的女儿哈托尔把她的外阴展示给他看。然后太阳神让荷鲁斯和塞特分别为自己申辩。塞特称他应该成为国王，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强大到可以保护太阳神免受混沌巨蛇每日攻击的神祇。于是太阳神希望把王位给予塞特，但其他神都抗议说荷鲁斯的理由更充分。伊西丝变得非常愤怒，于是众神都尽力让她平静下来，这反过来激怒了塞特，他威胁说如果不禁止伊西丝进入法庭，他将每天杀死一位神。

众神同意在河中的一个岛上会面，他们命令神界摆渡者奈姆提（Nemty）不要载伊西丝到这个岛上来。伊西丝把自己假扮成一

个老妪，并用一枚金戒指贿赂了奈姆提。她一到岛上，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以使塞特为她着迷。她给塞特讲述了一个哀伤的故事，讲的是一个陌生人如何夺走了她儿子的牲畜（“牲畜”这个词在埃及语中的发音与“遗产”一词非常接近）。塞特宣称这个行为非常无耻，于是伊西丝告诉塞特他已宣判他自己有罪。其他的神都同意伊西丝的说法，但他们也答应了塞特严惩奈姆提的要求。

太阳神早上和晚上的两种形式都宣布荷鲁斯应成为国王，但塞特不接受这个裁决，他要求和荷鲁斯进行一场竞赛，内容是他们两人都化身成为河马，看谁能够在水下呆得更久。伊西丝担心荷鲁斯会溺水而亡，于是试着用她有魔力的鱼叉去刺塞特，第一下她刺中了荷鲁斯，而当她用鱼叉去刺塞特的时候，塞特提醒她他们两人本是姐弟，于是伊西丝放走了塞特。荷鲁斯跃出水面，砍下了伊西丝的头。太阳神让图特治愈了伊西丝并让荷鲁斯受罚。塞特找到了熟睡的荷鲁斯，挖出他的双眼并掩埋起来。哈托尔发现了已双目失明的荷鲁斯，并用瞪羚的奶水使他的眼睛复原，荷鲁斯那被掩埋的眼睛长成了莲花。

众神劝荷鲁斯和塞特和解，于是塞特邀请荷鲁斯来他家做客。晚上，塞特试图与荷鲁斯发生性关系，想以此取得优势地位，但荷鲁斯把塞特的精子抓在手中。荷鲁斯告诉了伊西丝这件事，于是伊西丝砍下他被玷污的手，又给他做了个新的。然后她摩擦荷鲁斯的阴茎，得到了他的一些精子，并将之洒在塞特花园中的莴苣上。当塞特吃了这些莴苣之后，他就怀上了荷鲁斯的孩子。在法庭上，塞特嘲笑荷鲁斯听命于他，荷鲁斯让图特分别召唤他自己的精子与塞特的精子，看看它们都在哪里作答。塞特的精子于水中应答，而荷鲁斯的精子则在塞特的体内作出了应答。图特召唤荷鲁斯的精子，它从塞特的头中出来，形成一个闪闪发亮的圆盘，图特把这个圆盘置于自己的头上。

法庭宣布荷鲁斯的主张有理，但塞特又提出了另一项比赛：在石头制成的船里进行较量。塞特用一个山顶造了一条大船，而荷鲁斯用木头制成了船，然后把它涂上石头的颜色，使它看起来是石头制成的。塞特的石头船沉没了，于是塞特变成了一匹河马来攻击荷鲁斯的船，荷鲁斯用鱼叉刺塞特河马，但被其他的神制止。荷鲁斯驶向舍易斯，向奈特抱怨说正义仍未获申张。

图特建议法庭写信给冥界的奥西里斯，咨询一下他的意见。奥西里斯读完信后就要求知悉为何荷鲁斯的长子继承权被骗走，他提醒法庭别忘了他可是创造出大麦和二粒小麦从而维持世界运转的人。太阳神回应他说，即使奥西里斯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庄稼也能生长出来。这激怒了奥西里斯，他回信指责太阳神一手制造了不公。奥西里斯指出，冥界的怪兽是不怕任何神灵的，它们可以把所有犯错误的人的心脏拿去审判。众神承认奥西里斯所说是真的，于是阿图姆让伊西丝把塞特五花大绑带上法庭。

塞特在被囚禁之后，终于同意让荷鲁斯当国王。当荷鲁斯登基的时候，他的母亲伊西丝高兴地大叫起来。太阳神让塞特与他同住在天空，使他成为雷雨之神。在荷鲁斯成为国王的那一刻，天地同庆。

故事中像伊西丝被砍头、塞特怀孕等最惊世骇俗的事件都在其他的一些史料中曾被复述过，这些史料包括魔法文以及与神话事件发生时间相关的日历。塞特曾试图勾引或强暴他的侄子荷鲁斯，这在埃及2,000多年的文学史上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争斗》的创作者表现了非常丰富的、包括后来记载于《尤米尔哈克纸草》中的地方性神话在内的埃及神话知识。

斗争的起源

在19世纪，对于神话起源的解释有几个主要的思想学派。神话被视为对于自然界的力量或者天体运动的描述，或被视为被曲解或理想化了的历史，抑或被视为是对古老宗教仪式的解读。到了20世纪，神话被认为是思维层面以及人类认识世界和形成语言的能力的反映。所有这些理论都曾被用于阐释荷鲁斯与塞特之间的敌对关系。

在埃及宗教的早期阶段，荷鲁斯似乎被尊奉为一位天神，塞特作为沙子神和暴风雨之神的证据出现得稍晚，但这还是使一些学者把荷鲁斯和塞特视为自然界的对立力量。塞特窃取荷鲁斯之眼的神话素经常被认为是埃及人对于月蚀现象的解读。埃及人一定是把荷鲁斯或者他的眼睛等同于各种天体，比如正午的太阳、满月或是晨星。天文观测对于埃及神话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理论现今非常流行。

神话将历史人物转变成为神祇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例如柏拉图就设想图特神曾经是远古的一个真实人物。这种理论在当代只有少数支持者，埃及学家们也认为除了荷鲁斯和塞特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神符合这个理论。最近的考古学证据已被拿来说明荷鲁斯与塞特神话起源于一场战争，也就是公元前4千纪晚期涅伽达（地方神是塞特）和希拉康波里斯（地方神是荷鲁斯）的统治者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并不是说荷鲁斯与塞特都以某个历史人物为原型，只是说一场以他们的名义开战的战争可能塑造了有关这两位神祇的神话。

神话与历史

为应对不同的政治形势，荷鲁斯与塞特之间的斗争不断地被重新想象。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大部分时间，这个神话的大多数版本都在强调通过调解来结束斗争。当“双王”中的每一位都拥有了统治的王国（荷鲁斯占有黑土地、塞特占有红土地）的时候，和平就得以实现，然后这两位神将联合他们的力量支持神界的秩序。这

似乎反映了解决内部纷争的一个实用而有效的途径。然而，当埃及在公元前1千纪经历了一系列毁灭性的被入侵和强占的命运之后，神话的重点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理想的斗争结局通常都变成了塞特被残忍地处决，他的追随者也被歼灭。

《争斗》所记载的这一特殊版本可能是受到了公元前12世纪麻烦不断的王位继承事件的影响，这个版本甚至可能就是对这些继承事件的评注。就在这个故事被记载下来的几年之前，一位王子躲过了他的一个兄弟的设计谋害，最终赢得了王位，这位王子的母亲就叫伊西丝。《彻斯特比提蒲纸本一号》的《赞美辞》称赞拉美西斯五世就是继承了他父亲奥西里斯王位的荷鲁斯，但却有证据表明他的继位引发了一场与他兄弟——也可能是侄子——拉美西斯六世（Ramesses VI）之间的内战。王室陵墓建造者们的生活可能被这些斗争严重扰乱，因此他们都希望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种继承危机，比如《争斗》最后分割权力的方法。

一位埃及学家指出，创作《赞美辞》和《争斗》都是为了在底比斯庆祝拉美西斯五世登基的节庆活动上诵读。《拉美修姆戏剧纸草》的存在显示了王权合法化是荷鲁斯与塞特神话的明确目标。那么王室的宗教仪式也是这个神话的起源吗？还是说这个神话被王室篡改以适应他们的目的？当我们问及神话和宗教仪式孰先孰后的问题时，每种情况都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判断。通常来说，已有的宗教仪式，比如说葬礼，似乎是通过与神话之间的关联地位逐渐得到提高的。

从神话中汲取知识

许多学者认为神话与宗教仪式在本质上是可以互换的，他们把神话视为“被口述的事件”，而把宗教仪式看作“被实践的事件”。然而结构主义创始人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则对此持不同观点，所谓结构主义就是解读和分析文化与人类经验的各个层面的一种方法。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当神话面对人类生活环境中的普

遍问题与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的时候，就要由宗教仪式来掩盖这些问题，好像它们根本不存在一样。具体表现荷鲁斯与塞特神话要素的王室仪式及丧葬仪式似乎都否认了存在于现实中的死亡与不和谐因素。在宗教仪式上，新国王总是荷鲁斯，这个可爱的儿子，继承了他父亲奥西里斯的王位。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争斗》故事中，要在荷鲁斯与塞特之间作出选择被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似乎代表了一对相对立的概念，比如文化与自然。结构主义者罗伯特·奥登（Robert Oden）指出，《争斗》中“存在着复仇的二元对立”。他认为这个神话的结构清楚地说明了这些对立，而且也并不打算调和这些矛盾。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结构主义的分析就与对荷鲁斯与塞特神话的许多宗教分析恰恰相反。

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者把神话与塑造孩童心智的早期性幻想联系在一起，他们可以在《争斗》中找到许多有待研究的问题。荷鲁斯不得不同时面对几个形象，一个是遥远而被动的父亲形象（奥西里斯），一个是残暴而且使用性暴力的父亲形象（塞特），还有一个是美貌但却盛气凌人的母亲形象（伊西丝）。在一些版本中，荷鲁斯是通过强暴伊西丝而非砍掉她的头来确立统治地位的，荷鲁斯的登基可以被解读成青年荷鲁斯终于长大成人。卡尔·荣格（Carl Jung）把奥西里斯视为为了个性化的实现而牺牲掉的或不得不改变的自我的一部分。在荣格有关埃及神话的著述中，荷鲁斯分别被说成是代表了光、人类、意识的觉醒以及完美的自我。

这些心理分析的方法可以使古代神话对于现代人来说也有意义，但对于公元前12世纪的埃及人来说，这些方法还是正确的吗？如同结构主义一样，这些分析忽视了特定文本已知的作用，比如使王权合法化的功能，同时也忽视了正在被解读的神话与讨论中的文化的“神话历史”之间的联系。如果单单从家族变迁的角度来解读《争斗》，那么就会使事件脱离它们发生的背景环境，例如，如果伊西丝与荷鲁斯关系中的性爱成分被视作一连串重复的神话事件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关系看上去就会有所不同了。

最基本的神话素是“女神挑逗男神以创造生命”。在被害的奥西里

斯已经失去知觉后，伊西丝使用巫术唤起他的性欲，并最终孕育出荷鲁斯。在一些创世神话中，手女神使原初形态的太阳神阴茎勃起，由此孕育出第一批神，创世也得以开始。创世的方式还包括造物主用他的“种子”使植物受精，比如原初的莲花或芦苇。在《争斗》中，一棵莴苣在伊西丝挑逗荷鲁斯之后受精，这次受精诞生出了一个太阳圆盘，有如产生了创世的第一次日出。荷鲁斯身体里的每一样器官，包括他的眼睛，都可以创造出生命，这标志着他是造物主太阳神的真正继承人。

上述说法并没有否认荷鲁斯与塞特神话可能是由人类思维的基本原理所创造。埃及人的确用象征性的手法来解释事件，甚至有一些证据表明他们使用自己的神话来说明人类的行为活动。与《彻斯特比提蒲纸本一号》一样来自同一个私人图书馆的一篇新王国文本把人分成了“塞特的追随者”和“荷鲁斯的追随者”两大派。“塞特派”被描述成脾气暴躁、淫荡好色、过于情绪化；而“荷鲁斯派”则相反，他们可能早就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绪，从而有效地行事。这篇文本后面还有一些梦的解析，而这些解析都以做梦者的“人物类型”为基础。

荷鲁斯的胜利

埃及学家米切尔·布洛兹（Michèle Broze）认为埃及人运用神话的方式异常复杂，她把《争斗》视为一部精致的文学作品。她指出，这篇文本并没有无意义的赘述，而是以逐渐确立荷鲁斯的继承权的双元事件为线索。其中有两个加冕礼场景，一个失败而另一个成功；像征求神谕一样征求两位神（奈特和奥西里斯）的意见；伊西丝经历了两次变身；女神哈托尔复活了两位神祇（太阳神和荷鲁斯）；两次涉及化身河马的战斗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它包含了带有正反两方面价值的双元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一种神裁法，两位神都化身成河马跳人海中。当荷鲁斯变成一个与毁灭相关的生物进入混沌之水的时候，他就变得狂躁

起来。他勃然大怒，砍下了他母亲的头，这可是违背事物自然秩序的罪行，最后他还没能证明自己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在第二次战斗中，只有塞特化身成河马，而荷鲁斯从船上用鱼叉刺他，这会使我们想起国王作为秩序一方击败混沌势力的传统景象，就像图坦卡蒙的持鱼叉小雕像（图6）一样。从故事的这一点来看，荷鲁斯要求当国王的主张显然是正当的。

这一篇文本引人关注的兴趣点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几乎所有的神话书都会以该文为内容。《争斗》可以单独成为一个有趣的传说故事，但如果把它看作埃及神话整体中的一部分的话，其意义就更加丰富了。埃及神话的一个特点就是各个事件环环相扣。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这些神话如何相互作用，仅仅一个形象又如何能够代表所有复杂的神话。

第八章

天空之眼：双元性与连续性

太阳崇拜和奥西里斯崇拜是埃及宗教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内容，它们被集中体现在一个形象中，这就是“神圣之眼”。国王被埋葬时都要带上一对对的神圣之眼手镯。贵族木乃伊的尸体切口上也常常覆盖着一个金属圆盘，上面有一只神圣的眼。不论生前死后，普通人都佩戴着神圣之眼护身符，如图8所示。神圣之眼还从埃及传播到其他文化中，是今天古埃及最有名的象征符号之一，它的一种形式就被美国药剂师协会用作代表其职业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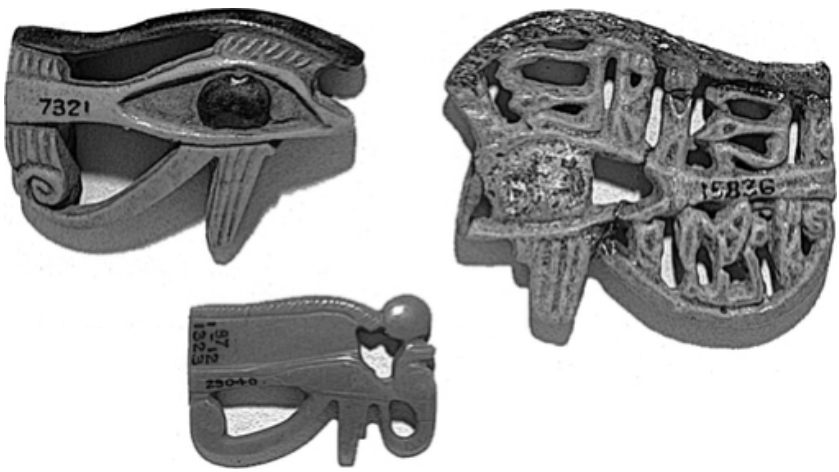

图8　代表月亮和太阳之眼的3个护身符

天空中的眼睛

神圣之眼结合了人眼的元素和猎鹰的斑纹，它常常被认为是猎鹰神“荷鲁斯之眼”。阅读至此的读者们即使听说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他们也不会感到惊讶。在一开始，荷鲁斯不止有一只眼睛，当他被视为宇宙生物的时候，他的右眼就相当于太阳或晨星，左眼相当于月亮或昏星。太阳圆盘也被尊奉为拉神在世界上的积极力量，也就是天空中可以洞察一切的眼睛。

许多埃及的女神，泰富努特、哈托尔、穆特、塞克美特和巴斯梯

特，都可以扮演“保护其父亲拉的拉神之眼”的角色。如同荷鲁斯之眼一样，拉神之眼可以单独起作用，并拥有它自己的神话故事。当拉神之眼回到她父亲拉神身边的时候，拉神把她放在自己的前额上，作为可以击败敌人喷火的眼镜蛇。她也就是我们在索贝克–拉和阿蒙霍泰普三世的王冠上（图3）以及在图坦卡蒙的王冠上（图6）所看到的眼镜蛇。

荷鲁斯之眼与拉神之眼都可以被表现成一个神圣之眼，有时还可以辨认出一个神圣之眼护身符到底是太阳之眼还是月亮之眼，这要看这个眼睛到底是面向左面还是右面，或者根据它所使用的材质，或是根据加在眼睛上的细部特征。图8中位于中央的护身符就显然是太阳之眼，因为它是由鲜艳的红玛瑙制成，并包含了一条头戴太阳圆盘王冠的眼镜蛇的形象，它们是拉神之眼的两种形式。

月亮荷鲁斯之眼作为护身符，主要代表着治愈和完整无缺；而太阳拉神之眼则代表权力与保护。在有些情况下，这两方面的性能可能都需要，例如神圣之眼护身符放在木乃伊上是为了使它保持完整，同时也保护它免遭有害势力的伤害。这些简单的意义来自于许多神话，这些神话后来逐渐形成更紧密、更复杂的联系。由于人们的性情不同，因此他们对埃及神话的连续性特点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或为之着迷或对之愤怒，那些持愤怒态度的读者就可以跳过本章后面的内容了。

创造神话的方法

埃及神话并不都产生于埃及历史的早期，然后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神话创造是一个连续的进程，一定有一些被普遍理解的准则辖制着这个进程，就像宗教艺术的创造也有普遍的规则一样。把最初多样化的元素聚拢在一起的重要方法是“词汇连接”以及把神按家族归类。我们已经在第四章见识过这些方法，它们把创世神话并入《孟斐斯神学》之中。通过调和汇总，最初仅仅属于一位神的神话可以被转移给

它们的神圣“伙伴”，就好像拉神与索贝克那样。

变化与发展的第四种途径是发明或改造一个神话素，使它能够与一个已有的神话素构成一对，或者能够适合一系列已有的平行事件。这使得神话可以被专门创造出来以满足公众或私人的不同需要，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第七章看到的基于神话素“女神使已死的男神勃起”的一组关联事件。另一个例子是几个神圣孩童从创世时代到有史时期的接连诞生。太阳孩童诞生自原初莲花，为原初母牛保护；小荷鲁斯出生于齐米斯的芦苇丛中，为沼泽中的野牛保护；像阿蒙霍泰普三世这样的统治者的出生过程都有神的参与，并被表现为由母牛女神喂养。

在太阳每日的循环中，太阳被想成是一个孩子每天早上从原初之水中出现或是诞生给母牛女神。太阳孩童从早期起就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与它相对的同样诞生自莲花的月亮孩童的概念则似乎直到新王国末期才被引入。这种重复并不只是一个文学手法，它反映了埃及的智者思考时间与因果律的方法。

历史的自我重复

一篇埃及文本记载说“一切的存在都是永恒的稳定和永恒的循环往复。”然而矛盾的是，稳定却要通过规律性的变化或转化来获得。例如，王权是神界秩序的一个永恒的组成部分，但它要通过老国王死去变成奥西里斯而新国王取代他的位置成为荷鲁斯这样一个循环反复的模式才能实现，像谋杀、背叛等可怕的事件都是这个模式的一部分，因为混沌会不断地出现，但这些骇人事件可以通过使世界获得新生的积极的转化来达到平衡。比如在“梅特涅石碑”上，神圣孩童不断遭遇威胁，但他总能死里逃生，打败秩序的敌人。

时间既可以被想成是直线般一直回溯到“第一时间”，也可以转圈循环，关键性事件在其间以每小时、每日、每月或者每年这样的循环不断地重复自己。《孟斐斯神学》这样的埃及创世神话文本就像造物主的个人时间表。最人性化的神话叙述属于一个遥远的时代，那时世

界由一组神直接统治，由于这些神话叙述的背景都被置于过去，因此它们对于现在的影响就有限。当相似事件在基于循环时间的作品中反复出现时，它们主要是通过图画以及神“组”的聚集来表现。如果把太阳循环变成一个过分人性或过分详尽的故事，那么就会破坏这个循环的“永恒循环往复”的能力，而且宇宙的整个运转也会随之受到损坏。然而，我们有可能观察到太阳循环与埃及神话的其他元素之间漫长、缓慢的关联架构过程，而且再对几个双元性和连续性的例子的分析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清这个过程。

双元性的神话素

我列出了8对神话素，它们都与神圣之眼或与这些眼睛关联的神的身体相关（参见背景知识10）。把这几对神话素看成是某一个神话的不同版本是不准确的，因为所发生的事并不是按非此即彼的方式发生，而是两种方式兼而有之。

所有未来事件的发生模式都被置于“第一时间”——宇宙被创造出来的时期，因此这几对神话素常常都包含着两个事件，一个发生在“第一时间”，一个发生在神统治世界期间（参见组1-2）。在其他组中，通常都有一个事件以直线型时间顺序发生，而另一个以循环型时间顺序（例如组7）发生。在每日的太阳循环中，黎明就等同于“第一时间”，夜晚等同于神话历史的末尾，造物主在那时回归混沌。被置于神话史上早期的事件似乎常常创作于埃及文化史的非常晚的时期，因为公元前1千纪是埃及人对“第一时间”以及之前的混沌时期最感兴趣的时期。

有两类主要的双元性神话素，分别是对称的与不对称的。当这些神话被剥离得只剩下基本要素的时候，对称型神话就是内容相同唯有主角不同的神话，例如，“神丢失眼睛后又找了回来”这样的故事概要可以同时用在拉神和荷鲁斯的身上（组3）。在不对称型的神话中，至少有一个元素是相反的，因此拉神之眼既可以是创造人类的工具也

可以成为毁灭人类的工具（组1）。各组中的每一个神话都因对另一个神话的了解而变得更加丰富。由于荷鲁斯那能赋予生命的眼睛曾经丢失后又找回，因此他作为太阳神化身的地位就清楚了。人类起源于愤怒和悲痛的眼泪，这预示了人类最终的命运。

一旦一对神话被创作出来，这两个神话之间就经常会有意象或角色的转换。很早以来，负责安抚、调解的神图特就被说成是归还了荷鲁斯之眼的神祇。在关于“遥远女神”回归的最初的神话中，将她带回的神似乎是奥努里斯（Onuris）或者奥努里斯–舒（Onuris-Shu）。但当这位女神被等同于拉神之眼后，对称性就要求图特神成为她的首要安抚者，据说图特化身成狒狒接近并安抚了愤怒的女神。到了中王国末期，狒狒持着一个神圣之眼的形象就可以代表这两个双元性神话素的一个或全部。后来，舒神有时仍被称为是从塞特手中要回荷鲁斯之眼的神。

背景知识10

8组眼睛神话

1
人类起源于拉–阿图姆之眼的眼泪
人类毁灭于拉神之眼

2
拉神之眼从原初之水中找回舒（和泰富努特）
舒神从遥远沙漠中找回拉神之眼（哈托尔–泰富努特）

3
拉神丢失了他的眼睛，后又失而复得
荷鲁斯丢失了他的眼睛，后又失而复得

4
图特（或舒神）治愈并归还了荷鲁斯丢失的眼睛
舒神（或图特）改造并归还了拉神迷失了的眼睛

5
拉神之眼回归后，拉神恢复活力
荷鲁斯之眼出现，奥西里斯获得新生

6
塞特化身为黑色野猪，吞掉了荷鲁斯之眼（月亮）
“母猪”努特吞掉了太阳圆盘（拉神之眼）

7
塞特“诞生”出太阳和月亮圆盘
努特诞生出早晨的太阳

8
塞特抠出荷鲁斯的一只眼睛或者是双眼
荷鲁斯扯下塞特的睾丸

图特的狒狒形象与他作为月亮神的角色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装饰有一小群猴子或狒狒的神圣之眼护身符（例如图8中的右图）可以反映出它是月亮之眼的性质，以及（或者）眼睛女神由化身成狒狒的神护送回埃及并得到猴子以及其他动物欢迎的故事情节。猿猴形成了与传统图画之间更进一步的视觉联系，传统图画就是指狒狒拜日（见图2a）。当丢失的眼睛回来之后，奥西里斯死而复活，太阳升起驱散了黑暗。

并行的事件

相同的神话素可以是几对双元性神话或者连续性神话的一部分，其重点将根据其他已经存在的元素发生变化。例如，图特把眼睛女神归还给拉神这一事件可以与图特带着拉神性情温和的女儿玛阿特加入太阳神这个事件相对应；玛阿特被引见给拉神这一事件也可以等同于把荷鲁斯之眼呈现给奥西里斯这个事件。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神都接受了某种必需的东西以便发挥作用，这种文学创作呼应了王室珠宝等艺术创作中象征符号的不同运用。

“神丢失眼睛又失而复得”的双元性神话素也可以构成一长串神肢体毁损事件的一部分（参见背景知识11）。肢体残缺对于埃及人来说是一个特别悲惨的遭遇，因为砍头或是被肢解都被认为会限制他在来世的能力，惩罚死者并使他不再为非作歹的一般做法就是破坏他坟墓中雕像的眼睛或是把墓中壁画上他的脸部涂抹掉。

背景知识11

一系列神肢体毁损的事件

塞特肢解了奥西里斯的身体——伊西丝和阿努比斯修复了奥西里斯的身体

塞特抠出了荷鲁斯的眼睛——图特恢复了荷鲁斯的眼睛

塞特抠出了荷鲁斯的双眼——哈托尔或伊西丝恢复了荷鲁斯的双眼

荷鲁斯扯掉了塞特的睾丸——图特修复了塞特的睾丸

荷鲁斯砍下了伊西丝的头——图特给伊西丝一个牛头

伊西丝砍掉了荷鲁斯的手／双手——伊西丝给他做了新的手，或索贝克恢复了荷鲁斯的手

荷鲁斯、阿努比斯或者伊西丝阉割并肢解了塞特

塞特、荷鲁斯以及其他神毁损了阿波斐斯以及拉神敌人的身体

埃及神话中最著名的肢体残缺事件就是荷鲁斯的一只眼睛或双眼受到伤害，因此荷鲁斯有时被尊奉为两个神，长着眼睛的仁慈的荷鲁斯和失去眼睛的想要复仇的荷鲁斯。像其他不吉利的可怕事件一样，荷鲁斯的肢体残缺也从未在艺术作品中直接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也很少有详细的描写。塞特似乎一直被认为是伤害荷鲁斯的罪魁祸首，有时他被说成是用手指毁损或挖出了荷鲁斯的眼珠。在《争斗》中，塞特挖出了荷鲁斯的双眼，并把它们埋在了一个隐秘之地。也有些故事称塞特吞下了荷鲁斯的眼睛。在少数几个文本里，荷鲁斯的眼睛似乎迷失在了黑暗的原初海洋之中，这个情节可能是借用了拉–阿图姆丢失了的眼睛的双元性神话。丢掉了神圣之眼就等于丢掉了光明与希望，使得世界陷入了绝望与黑暗之中。

可以肯定的是，荷鲁斯的眼睛不只是丢失了，而且被撕裂成许多碎块。在神庙所使用的太阴历中，荷鲁斯眼睛的丢失与复明就相当于月亮的亏缺与盈满。人们通常认为是图特神把荷鲁斯眼睛的碎块拼在了一起，但其中的一块一直未能找到。通过图特的巫术，荷鲁斯受伤的眼睛变成了*wedjat*（完整或健康的眼睛）。神圣之眼的各个部分可以用于圣书体象形文字中表示分数，如瞳孔表示1/4，眉毛表示l/8，等等。眼睛的组成部分总共是63/64，其中缺失的部分由图特用巫术补出。这些眼睛的组成部分最常见的用途是称量谷物，或者用在处方中指药物相应的比例。

从某个角度讲，奥西里斯死后身体被肢解的故事似乎是被改编的，目的在于使之与荷鲁斯的眼睛的遭遇更加相似。在最初的故事中，伊西丝不得不寻找奥西里斯被分解了的身体，然后用她的巫术将之复原。后来又产生了新的说法，称塞特把奥西里斯的身体撕成碎块并把它们分散到各地。最终就像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读到的，埃及42个诺姆中的每一个诺姆都有奥西里斯的一部分身体。伊西丝收集起这些身体碎块，还使用巫术造出一个替代品代替那个无法找到的碎块。

荷鲁斯完整无缺的眼睛拥有治愈病者、赠予王权、使死者再度变完整的能力；奥西里斯完整无缺的身体被认为可使尼罗河水泛滥、庄稼生长。荷鲁斯与奥西里斯的身体残缺似乎使他们的力量大增，甚至伊西丝被砍头的事件都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她在有了新的母牛头之后获得了母牛女神的力量。这些肢体残缺的故事似乎是太阳神每日在天上地下巡游时所经历的自主变形的一个暴力版本。

有关塞特肢体残缺的故事与上述故事有很大不同。在最早的史料中（塞特和荷鲁斯那时一般被认为是兄弟而非叔侄），有两对可赐予生命的圆形物体被毁损，分别是荷鲁斯的眼睛和塞特的睾丸，而图特为了维持均衡必须要把这二者的伤都治愈。然后最强大的神塞特就会加入持鱼叉者荷鲁斯、拉神之眼以及许多其他好战的神的队伍里，共同击败并肢解了终极敌人混沌巨蛇阿波斐斯。这个故事与把肢体残缺作为最终的有益转变的模式相一致。后来的史料通常写塞特被肢解是为了惩罚他的罪过，而且他最终也没有被治愈或是复原。

《尤米尔哈克纸草》记录了几个有关荷鲁斯的眼睛以及奥西里斯的身体被留在豺诺姆的故事。在其中的一个故事中，塞特由于想要破坏奥西里斯的身体而受到阿努比斯神的惩罚。塞特的肉被烘烤，香味甚至传到天上的拉神那里。赛特豹化身的皮被剥下、烙上印记后做成斗篷穿在阿努比斯的身上，这个神话为祭司在葬礼仪式上穿着豹皮斗篷这个传统提供了一种解释。到了希腊罗马时期，人们认为塞特在战败后身体被分解成许多块，42个诺姆中的每一个诺姆都埋着他的一部分身体，构成了奥西里斯身体各部分的负面对应物。

民间传说

埃及的一些民间传说中也常常有肢体残缺的主题。在一个新王国时期的故事中，一个弟弟嫉妒他的同胞哥哥，就如同塞特嫉妒奥西里斯一样。这两兄弟分别叫做玛阿特（Maat）和格莱格（Gereg），通常被译作“真理”和“谎言”。“谎言”诬告他的哥哥偷了一把子虚乌有的匕首，然后让“九神团”惩罚“真理”，弄瞎他的眼睛。在“真理”失明之后，“谎言”又吩咐他的奴仆把“真理”扔到狮群中，想让狮子将他撕成碎块，但狮子没有伤害“真理”，反而把他放到一片芦苇丛中。“真理”在那里被一位富有女子的奴仆发现，这个女子和“真理”发生了性关系，然后怀上了一个“如同神子一般的”儿子。当“真理”的儿子长大后，他设计让“谎言”说出他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就像《争斗》中塞特被引诱说出罪行一样。于是“谎言”遭受了惩罚，身上负有5处伤。这5处伤似乎是指他的双耳和鼻子被割掉、双眼被损毁，这种惩罚实际上都是在新王国时期用在贪污腐败的官员身上的刑罚。

另一个新王国时期的故事也描绘了两个同胞兄弟相争的故事，哥哥名叫安普（Anpu，阿努比斯）、弟弟被叫做巴塔（Bata），巴塔也是一个神的名字，这个神有时就等同于塞特。在《两兄弟的故事》中，巴塔被诬告强暴了他的嫂子，于是他割掉了自己的阴茎。然后“九神团”为巴塔造了一个配偶，但她背叛巴塔嫁给了埃及的一位国王。巴塔的不同化身都经历了一系列的死亡事件：包含有他心脏的花朵被摧毁，他的牛化身被宰杀并吃掉，他的树化身被砍伐并制成家具。最终巴塔转世为他前妻的儿子，两兄弟达成和解，正义的王权得到重建。

《真理与谎言》和《两兄弟的故事》可能不应该被视为假冒的或是被篡改了的神话，而应被视为这样一些神话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神话事件反复出现的模式通过人或半人的角色被表现出来。通过宗教仪式与巫术，现实生活中的埃及人的今生与来世也可以遵循神话事件的规律，本书的最后两章将探究埃及人如何实现上述愿望。

第九章

个人的神话：神话与民间宗教

神话从根本上讲是群体叙事而非个体叙事，它反映的是整个文化的价值取向而不是某个个人的观点。拥有特权的个人也许可以虚构或者修改神话，但这些活动通常都是匿名进行的。神话经常会与对整个共同体或其领袖有益的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正如对荷鲁斯与塞特的斗争的反复表演就是为了赋予王权合法性。在古代埃及，神话也可以以非常私人的方式来应用，从而改变个人的生活。

人们在宗教仪式上把生病的或者需要保护的人等同于拥有同样遭遇的神祇，医治者和*saw*（保护者）为达到特定的目的增添神话的情节，他们将标准版本的人物角色与背景环境相结合，比如“一个小神祇被毒害”或者“一个神为报答力量之语而给予医治”。通过这些咒语，个体的伤病被转移到秩序与混沌之战的战事之中。一些书面咒文只使用了神话的梗概，而在另一些咒文中神话因生动的细节和充满感情的对话描写而变得有血有肉。一些咒文还以视觉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公元前18世纪在底比斯制造的一个河马长牙魔杖，现今保存于大英博物馆（图9）。这个魔杖上的图画和文字把太阳神话与一个特定人物相关联，她就是“房屋中的女士”塞涅波（Seneb）。这种类型的魔杖是魔法防御体系中易受攻击者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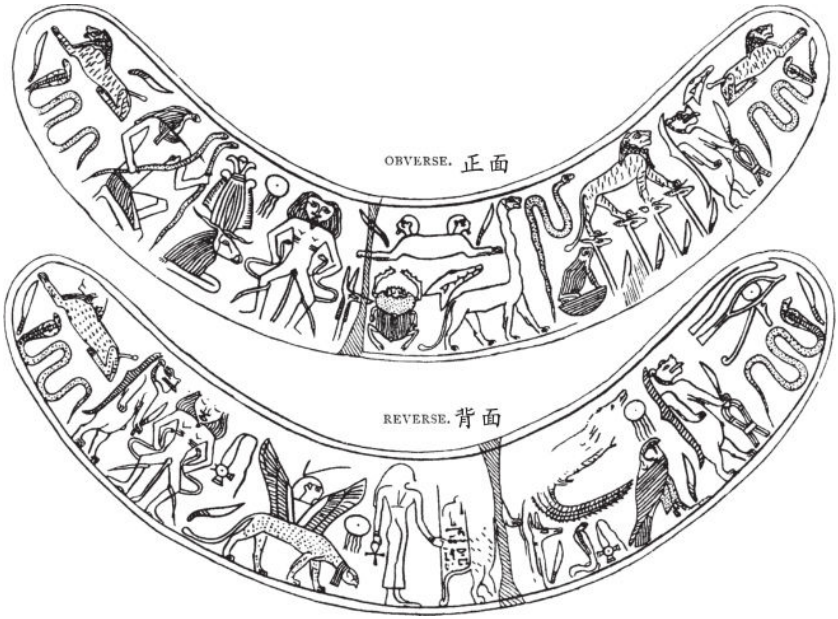

图9　“房屋中的女士”塞涅波的河马长牙防护魔杖

魔法武器

避邪魔杖或魔法匕首等物品通常都是用河马的长牙雕刻而成，这种原材料被认为会使这些物品蕴含着力量。塞涅波的魔杖为弧形，过去是用来猎杀或惊吓野鸟的武器，因为埃及人认为野鸟属于混沌生物。避邪魔杖上雕刻着面目狰狞、挥舞着匕首或火把的人物形象，刻写铭文的模板称这些人物为神、战士或是保护者，一段铭文记载说他们日夜都在尽守保卫的职责。几乎所有的雕刻魔杖都是为妇女和儿童准备的，阿拜多斯最近出土的诞生石上也雕刻着同样的人物形象。埃及的妇女都非常害怕在分娩时死去，而且当时婴儿的死亡率也非常高，因此这种魔杖的首要功能就是保护怀孕或哺乳期的妇女及其孩子免受恶魔、鬼怪和邪恶巫师等敌对势力的伤害。

根据魔杖的磨损以及修补的程度来判断，一些魔杖曾被多次使用，为生者召唤保护者；而另一些魔杖则被置于坟墓之中，以在来世

发挥保护作用并帮助死者的灵魂重生。塞涅波的魔杖在开始似乎只有普通的实用功能，直到魔杖上一个人物的上方被加刻上了一段铭文，这个魔杖才对她具有了保护作用（背面正中）。

塞涅波魔杖上的许多图画，比如太阳圆盘、太阳之眼、圣甲虫（黎明神）、带斑纹的天界狮子以及把守冥界出入口的双重斯芬克斯，都与太阳神在经历穿越黑暗王国的危险旅程之后的重生相关联。我们在第八章中已经看到，有一系列神话都与太阳孩童、他的神圣母亲以及那些帮助他们母子摆脱邪恶势力的神祇们相关。“拉神的敌人”在魔杖上只表现为几个头颅、被捆绑着的俘虏或正被矮狮阿哈（Aha，后来被称为贝斯[Bes]）等战斗神刺、咬或碾压的毒蛇。同样的创作原则也体现在“梅特涅石碑”上，石碑上的小荷鲁斯正在扼死或踩踏对他有威胁的危险生物（图2a）。

塞涅波魔杖接近中心的位置（背面）上的女性形象显然是一个女神，因为她拿着一个“安可”，有可能使用了一段口头咒语使塞涅波暂时等同于这位女神。在中王国时期，为减轻妇女分娩时的痛苦，医生或产婆必须要重复3遍咒语“现在正在分娩的是哈托尔”。在阿拜多斯出土的诞生石上，凡人母亲长着女神的湖蓝色的头发。跟国王一样，塞涅波也可以成为神话事件的重复模式的一部分，她的地位形成了神界与人界之间暂时的联系，这使得超自然的力量可以为凡间的母亲与婴儿而战，就如同他们为神界的母亲与孩子作战一样。孩子的出生与宇宙在每日日出时的重生相关联。通过魔杖上的图画，宇宙的命运与塞涅波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图画和故事

虽然塞涅波魔杖比“梅特涅石碑”要早大约1,400年，但它们上面有许多共同的保护神，比如狮子神、河马女神和青蛙话女神（比较图2a–2b与图9）。除此之外，“梅特涅石碑”上还有对于具体的神圣母子——伊西丝与荷鲁斯的叙述。在这些雕刻在石碑上的神话传说中，伟

大的女神伊西丝经历了一位普通埃及女人也要经历的困难：她被一个暴虐的亲戚欺负，剥夺了财产，力图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体系中获取正义。在其中一个故事里，伊西丝向距离她最近的村庄里的女性寻求帮助。这样的故事很可能是由村庄里的讲故事者讲述的，其目的肯定是为了吸引女性听众。

河马长牙魔杖上的文本都很短，但一些图画可能代表了某些特定的神话素。一只狒狒持着一个神圣之眼，这是众多魔杖上常见的一幅画面，就像我们在第八章中看到的那样，这个画面代表图特把已经复明了的月亮之眼归还给荷鲁斯，或把已被抚慰了的太阳之眼归还给拉神。许多魔杖都表现了可能代表“大猫”的猫科动物，传说“大猫”在赫利奥波里斯的一棵树下杀死了混沌怪兽阿波斐斯，或是杀死了正在四处流浪、处于狂乱状态的眼睛女神。在一些魔杖上有猫或狮子吞吃外国人的残忍画面，这可能暗指眼睛女神被拉神派去摧毁人类中邪恶群体的神话。

讲述这些“斗士”神祇的故事的活动似乎是具有保护功能的宗教仪式的一部分，魔杖就在这些宗教仪式上使用。需要保护的妇女和儿童如果了解可保护他们的神灵的一些情况的话，似乎会感觉更加安全。在埃及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这种“老婆婆传说”都被视为地位很低的神话，因此都没有书面的记载。这也就是为何矮人神贝斯、河马女神塔瓦莱特（Taweret）的图画在日常用品上经常出现，但在埃及文学中却很少记载的原因。我们很难估计有多少普通埃及人了解神话，因为宗教艺术和语言都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

民间宗教

埃及建筑和物品上表现的内容有严格的规定，即使是私人的建筑和物品也不能违背这些规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规定也逐渐变得不那么严格了。在公元前3千纪期间，神可以与国王一同出现，但几乎从未与更低等级的人在一起。旧王国的坟墓中装饰有许多表现日

常生活场景的图画，但在供奉神的神庙中很少出现人的画面。然而，旧王国时期埃及人的名字经常会与神的名字结合在一起（比如尼斐尔–塞舍姆–拉[Nefer-seshem-Ra]，意为“拉神的品行是美丽的”），陵墓里的铭文表明许多贵族男女在神庙中做兼职的祭司（女祭司）。

在中王国时期，同样兼任高级祭司的地方长官也在他们陵墓的壁画上绘制表现宗教节庆的图画，但其中涉及的神祇都只用神圣的物品来指代。这个时期在一些贵族墓葬里使用的《石棺铭文》（例子参见图5）形成了埃及神话的一大主要史料。在中王国后期以及第二中间期，神的图画开始出现在贵重的私人物品上，比如棺材、献祭的石碑以及河马长牙魔杖。塞涅波魔杖尤其耐人寻味，因为它很像一部已简化为两组图画的王室《阴间地府书》。

到了新王国时期，将生者绘制成向神的雕像或神圣的动物献祭的样子，以及将死者表现为冥界诸神的模样的做法已为人们普遍接受。在埃及的多神教中，每个人不论年龄、性别、地位或职业怎样，都能够找到一张似乎与自己相关的神祇的脸孔。埃及的智者不断寻找表现造物主与许多其他神之间关系的表达方式，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只信仰一个神似乎也并不被认为在精神上更崇高。理想而虔诚的埃及人追随伦理法则“玛阿特”，并尽可能尊奉更多的神，向他们献祭、参加节庆活动、做兼职的男祭司或女祭司、参加神殿的修复或建造工作。

戴尔美迪纳的神话

我们有关民间宗教的许多知识都来自于新王国的戴尔美迪纳——建造王室陵墓的工匠们的村庄。这个村子的成员有着非常高的识字率，比较富有的村民拥有自己的神话故事，例如《荷鲁斯与塞特之间的争斗》（图7）。一些村民绘制的图画似乎讲述了寓言故事，其中的主角是动物，这些图画比这些寓言已知最早的文字版本还要早几百年。

戴尔美迪纳的人们通过建造王室陵墓而熟悉了描述太阳神神秘旅

程的“秘密的”《阴间地府书》的内容，而且他们把这方面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在工匠们的工作生活中，被蛇咬到或者被蝎子螫到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拉神夜晚之船”摆脱阿波斐斯巨蛇进攻的壮丽神话图画就被用在书面咒文中以对付这种危险。在戴尔美迪纳发现的最详尽的防毒蛇的咒文包括《拉神的秘密名字》这篇故事，它讲述了伊西丝给太阳神下毒并使诡计诱骗他交出了隐藏于他真实名字中的能力。

戴尔美迪纳还使用以神话为基础的历法，这种历法似乎由神庙历法改编而来，但它们有类似的占星功能，根据人们所相信的神话事件发生的日期来推断这些日期或某一日期中的时刻吉利不吉利。根据《开罗历》，埃赫特（Akhet，泛滥季节）第一个月的第二十二日基本上是不吉利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荷鲁斯与塞特交战、伊西丝用鱼叉刺塞特、荷鲁斯对他的母亲发怒的日子，这些都是在《争斗》中详细描述过的事件。埃赫特的第三个月的第二十六日则是吉日，荷鲁斯和塞特在这一天和解，黑土地给了荷鲁斯而红土地则给了塞特。

一些历法中的预言具体得惊人。《萨利埃纸草四号》中描述“九神团”被创造（通过阿图姆的性能力）之日的条目就警告说那一天出生的人会在性交时死去。然而，戴尔美迪纳的工匠们并没有过于认真地对待这个历法，否则王室的陵墓永远不可能修建完成，他们可能只是把这些历法作为一个指导，来看何时采取巫术防卫措施，比如佩戴有防护作用的护身符。

历法中的一个警告是不要在“拉神安抚塞克美特”的节日里出门旅行，这暗指拉神在把他的眼睛化身成狮子女神塞克美特并派她去摧毁人类之后又改变主意的故事。另一个大致涉及此神话的故事出现在由一位名叫尼斐尔阿布（Neferabu）的绘图员奉献的石碑上，这位工匠于公元前13世纪在戴尔美迪纳工作。石碑类型是已知的忏悔石碑的一种，忏悔石碑的得名是由于碑上所刻的铭文都是请求神祇宽恕的祷文。在铭文中，尼斐尔阿布承认了他自己由于无知和愚蠢而无法辨别是非，因而对一位名叫美列特塞格尔（Meretseger）的地方性眼镜蛇女神犯下了罪行（未详细说明），女神惩罚了他，使他遭受了如同妇女分娩时的剧痛一样的痛苦。尼斐尔阿布警告其他人美列特塞格尔会

像凶猛的狮子一样袭击有罪的人，而她也可以通过祈祷和献祭来获得安抚。作为个人，尼斐尔阿布将自己置于应受惩罚的有罪之人当中，但就像在神话里所表现的那样，造物主富有怜悯之心，复仇的狮子女神被转换成一位亲切的女神，如同“热天里一缕清新的微风”那般受人欢迎。

护身符和青铜制品

希腊人和罗马人经常用神话的场景来装饰世俗的物品，而大多数埃及的艺术具有宗教或巫术的功能，但神话的主题却很少被采用。在第三中间期，反映神话主题的非王室物品在数量上和类别上都有很大的增长，这种变化所发生的时间正是祭司阶层尤为强大而埃及国家不再统一于强大王权之下的时期，这两方面的变化同时发生恐怕不能只用巧合来解释。

在这一时期，大地与天空分离等神话场景开始出现在私人的墓葬纸草和棺材上。神祇形态的护身符变得越来越普遍，最精致的神圣之眼护身符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如图8所示）。一些护身符的图案，比如荷鲁斯手持鱼叉、伊西丝和小荷鲁斯藏身于纸莎草丛中，所描绘的都是来自于神话的场景。为定居于三角洲的一位利比亚酋长制作的一个挂件表现了太阳神与其女儿哈托尔和玛阿特一同在日间太阳船上的情景。一篇铭文将太阳神命名为“阿蒙–拉–荷拉赫特”，铭文称他在天空中巡游以保护舍斯洪克（Sheshonq）。伟大的太阳周期性的循环被看作是为了救一人之命而发生的，就好像基督徒被说服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拯救他们每个人而死。

在后埃及和希腊罗马时期，比较富有的人都习惯于向神庙祭献青铜小神像。这些供奉的青铜制品中有一些包含着神话的场景，比如小太阳神从原初莲花中诞生、造物主集合“八神团”等。这些青铜像的奉献者不大可能选择那些他们一无所知的人物或场景，参加神庙节庆活动是他们了解神话的方法之一，因为在这些活动上会反复表演神话或

诵读神话。

神庙和节庆

“梅特涅石碑”和“夏巴卡石碑”提供了两个展示于神庙中的神话文本的范例。刻写在“梅特涅石碑”上的咒文里的故事可能是大声诵读给为被蛇或蝎子咬伤之后到神庙来寻求治疗的人听的；而《孟斐斯神学》中的创世故事则可能要在奠基仪式以及宇宙需要更新的新年节庆上诵读。我们尚不清楚这种诵读活动的公开程度如何。埃及神庙所举办的日常献祭和赞美仪式上并没有民众聚集观看，因为神庙的内区只允许处于宗教意义上的洁净状态的人进入，而要想接近人们认为的神祇所在之地——神的雕像，则只有国王和高等级的男女祭司才能做到。

在重要的节庆期间，神像也可能会放在一个小船模型上，置于神庙建筑中公众可以进入的区域，或者甚至被摆在另一个神庙中。再生神索克尔的节庆活动中会有一个拖着船舶神龛穿过孟斐斯的墓地的项目；而在与农业丰收有关联的米恩神的节庆活动中，神的雕像会被抬到稻田和莴苣地里去。这些节庆活动使当地人有机会接近神祇的物质表现形式，而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作为庆典的一部分，似乎经常会有食物和饮品分发到人群中。

位于埃德富的荷鲁斯神庙的墙壁上所刻的图画和铭文已被解释为一部“神秘剧”，其主题是荷鲁斯与塞特之间的斗争，其中的一些情节，如荷鲁斯用鱼叉刺塞特，似乎曾在神庙的湖上表演过，围观的人都可能有角色表演。许多神庙都有庆祝在外游荡的眼睛女神回归埃及的节庆活动，粗画和岩石上的铭文记载着人们进入沙漠帮忙把女神带回家的故事，就像神话中的图特和舒所做的一样。在《人类的毁灭》这个故事中，拉神为了不让眼睛女神杀掉余下的人类，他用染成血红色的啤酒把女神灌醉，而仿效女神酩酊大醉的状态似乎也是庆祝“醉酒女士”哈托尔的节庆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在拉神把塞克美特变

成哈托尔的节日当天不要出门旅行的警告可能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警示。

背景知识12

一些与神话相关的神庙节庆

节庆	神庙	神话
醉酒	穆特神庙，卡纳克；布巴斯梯斯	人类的毁灭
考伊阿克	阿拜多斯等	奥西里斯的死亡与重生
奥帕特	卢克索	手女神和造物主的联合／王室诞生神话
陶工旋盘	埃斯纳	克努姆创造生命
回归	迈达姆德等	“遥远女神”的回归
胜利	埃德富	荷鲁斯对塞特的胜利

一些重要的节庆，如底比斯的“瓦迪美丽节庆”，似乎并没有任何相关联的神话。在这个节庆活动中，阿蒙–拉的太阳船神坛会停靠在河的西岸与“尼克罗波里斯女神”哈托尔会合，为死者带来新生。据《梵蒂尔纸草》中的一个故事记载，一位勇敢的廷臣代替他的国王，志愿进入冥界女王哈托尔的地界。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根据与此节庆相关的神话改编的，但这个神话本身并没有以故事体的形式流传下来。

在三角洲的布巴斯梯斯，残忍的眼睛／狮子女神在一个节庆中被变成一个仁慈的繁育猫女神。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20）曾为我们生动地记述了这个节庆活动中的醉酒、奏乐和淫秽笑话等内容。他介绍说：乘船来参加这个节庆的妇女

会撩起裙子，向岸边的人展示她们的阴部——这与哈托尔女神在《争斗》中为挑起造物主太阳神的欲望而摆的姿势相同。普通的埃及妇女都非常乐意扮演神话中最重要的女神角色：她是神的伴侣，刺激了创造生命的活动和生命重生的活动。

希罗多德还讲述埃及的农妇们为使庄稼生长，会举着奥西里斯的阴茎模型围着当地的农田列队行进。在埃及的所有节庆活动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那些反复演出奥西里斯死亡、埋葬以及重生过程的节庆，因此死亡神话及它在埃及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就是本书最后一章要讨论的内容。

第十章

木乃伊的祝福：死亡神话

古希腊的文化和神话为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提供了灵感，而古埃及则主要为恐怖故事提供了素材。有关木乃伊复活的书籍和电影表现了人们对逝者的普遍恐惧，它们还提供了战胜这种恐惧的安全的方法。一个刻写在陶瓷碎片上的埃及鬼故事（约公元前1200年）可能曾被用作一篇咒文的一部分来驱除恼人的鬼怪，它讲述了一位勇敢的高级祭司如何与一个名叫尼布斯迈赫（Nebusemekh）的愤怒鬼共度一夜的故事。这位高级祭司答应为尼布斯迈赫重建他被毁坏了的陵墓，并定期给他的灵魂贡献祭品，从而改变他悲惨的生活。在这个故事中，木乃伊会是我们同情的对象。古埃及的木乃伊通常是死亡与生命、恐惧与希望的象征，这一点最为突出地体现在一类名叫谷物木乃伊的木乃伊模型上。图10中的木乃伊是用河里的淤泥制成的，埃及人认为首先是淤泥而非其他东西赐予了埃及生命。

图10　后王朝时期的一个谷物木乃伊

斜躺着的木乃伊象形文字符号被标在表示睡觉和死亡的词语的词尾，表示这两种状态都只是暂时的；而直立着的木乃伊象形文字则可以被用在表示转变、雕像或肖像的词语的词尾。埃及的木乃伊不只是一具保存下来的尸体，它是一个人曾经的形象的转化。给木乃伊涂上芳香的树脂或在木乃伊的脸上覆盖金面具等行为都可以帮助它转变为神。

在很多时期，不论男性或女性的木乃伊都被等同于奥西里斯——神话中的木乃伊原型。木乃伊模型具有奥西里斯或另一位代表死亡与重生的鹰头神普塔–索克尔–奥西里斯的特征。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后王朝时期的谷物木乃伊的脸是用绿蜡制成的。作为冥界的统治者，奥西里斯的皮肤通常都被表现成绿色或者黑色，这两种颜色后来被认为是代表农业丰收的符号，而最初可能用来表示腐烂物。

在《争斗》这个故事中，奥西里斯指出，即使是天上的星星也会死亡并在死后进入他的王国。《争斗》虽然充满了性和暴力的内容，但并没有触犯禁忌，因为它没有描述所有神话事件中最可怕的事情——奥西里斯被他的兄弟塞特谋杀。塞特想要毁坏或窃取奥西里斯身体的意图可以被详细描写，但导致奥西里斯死去的袭击过程却不能详述。在旧王国时期的《金字塔铭文》中，埃及统治者奥西里斯只被说成是“侧躺着”的，他和他的儿子向神界法庭提起诉讼，法庭宣判奥西里斯在对塞特的控告中是正义的一方，因此奥西里斯“被复活”，但他的命运就只是做冥界的统治者，他的儿子荷鲁斯将成为人间的统治者。正义得到了伸张，但对英年早逝的恐惧却不可否认。在《亡灵书》的一段对话中（咒文175），奥西里斯哀叹他被迫呆在一个冰冷的世界里，与他的挚爱天人永隔，造物主回应说奥西里斯拥有超越所有生物体的能力就算是得到了补偿。

《孟斐斯神学》记述奥西里斯是溺水而死，但随即又继续说明伊西丝如何从水中捞出他的身体。一篇新王国时期献给众神之王奥西里斯的赞美诗对于他的死讲述得很模糊，只是含糊地说是由于“扰乱者（塞特）的行为”。它集中笔墨说明伊西丝如何找到奥西里斯的身体，如何使他暂时复活以使她怀上荷鲁斯。照这样的想法，奥西里斯

的复活就是一次生理的勃起，使他的精子可以开始孕育的过程。这种解释生命再生的性的象征手法被普遍使用，在一些《阴间地府书》中，太阳的光芒使得善良的死者的木乃伊勃起，谷物木乃伊通常都有勃起的阴茎，像图坦卡蒙这样的显贵死者都会被制成阴茎直立的木乃伊形象。

在希腊作家普卢塔克（约46—126）有关伊西丝和奥西里斯的作品中，他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称伊西丝未能找到的奥西里斯被肢解后的一部分身体就是他的阴茎，因此她不得不给他做了一个假的。普卢塔克有关奥西里斯被谋杀的描写在现有资料中是最为详尽的，他描述了嫉妒的泰丰（Typhon，塞特）如何诱骗他的兄弟奥西里斯爬进一个敞开的棺材中，然后他用熔化了的金属密封这个棺材、把它丢进尼罗河中。棺材被冲进地中海，最终在黎巴嫩的毕布罗斯被冲上岸。一棵神奇的树长大并隐藏起了这口棺材，而毕布罗斯的国王让人砍掉这棵树，用来制造自己宫殿中的一根柱子。悲伤的伊西丝循着这口棺材的踪迹来到毕布罗斯，她在宫中找到一份工作，成为了一名理发师兼保姆，这样她就可以接近她遇害的丈夫。最终，伊西丝告诉了国王和王后她的真实身份，因此国王和王后把棺材还给她，让她带回埃及。但棺材回到埃及后被塞特发现，于是他把奥西里斯的身体撕成碎块。

这段叙述在埃及并没有完全类似的文献相对应，普卢塔克可能是吸收了地方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素材，例如在赫拉克利奥波里斯，已死的奥西里斯的“巴”（ba）被认为是出自于一棵神圣之树。早在中王国时期，人们称索贝克穿越了“伟大的绿色”（地中海）去寻找奥西里斯的遗体。伊西丝屈尊做女仆的情节与“梅特涅石碑”上所刻写的小荷鲁斯的故事中她的境遇非常相似。在所有这些故事中，伊西丝都被描写成经历了痛苦、孤独以及对未来恐惧的女性形象，这与现实生活中的寡妇很相像。这些情感在一些哀悼诗歌中也有所表达。在葬礼和奥西里斯节庆上扮演伊西丝及其姊妹涅菲悌丝的妇女会诵读或吟唱这些诗歌。

葬礼与节庆

在《金字塔铭文》中，已故的国王们像奥西里斯一样“被复活”。这种把自身的命运和奥西里斯的命运等同起来的做法通过贵族阶层得到了传播，直至后来每个死者都可以被认为是“奥西里斯某某”。到了新王国时期，给尸体涂抹芳香油以及葬礼仪式的许多要素都通过语言、姿势或者图画与奥西里斯神话关联起来。据说是阿努比斯把奥西里斯的身体变成了第一具木乃伊，而且这具木乃伊得到了图特魔咒的保护。葬礼纪念碑、棺材或坟墓墙壁上绘制的图景显示了死者由一个长着阿努比斯的豺头的人物服侍，这个人物有时似乎是戴着豺头面具的祭司，有时就被叫做阿努比斯。公元前4世纪开始放在墓葬中的《呼吸书》据说是由伊西丝和图特写给奥西里斯使用的。

在送葬的队伍中，死者的儿子或者一位葬礼僧侣会扮演荷鲁斯的角色，给予他父亲在冥界的新生命。给予死者的祭献品等同于复活奥西里斯的荷鲁斯生命之眼。两位哭泣的妇女会为木乃伊守夜并加入送葬的队伍中，她们相当于两姊妹——悼念逝去的丈夫／兄弟的伊西丝和涅菲悌丝。仪式与神话相互间的呼应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焦点在于是这些仪式被设计出来适应已有的神话，还是神话要素的出现是为了解释古老的葬礼习俗。也许有时是神话先出现，有时是葬仪先出现，但争辩双方的支持者都不接受这种中庸的答案，他们之间的争论就像荷鲁斯与塞特的矛盾那样难以调和。

一些埃及人还修建了衣冠冢、葬礼纪念碑，或在大型墓葬以及阿拜多斯的朝圣中心埋入他们自己的木乃伊小雕像，这使得他们的灵魂可以参加每年一次的奥西里斯节庆，在这个节庆活动中，神的死亡以及复活的片断会被反复地表演。中王国时代之前的王室官员在阿拜多斯留下的铭文清楚地表明公众会参加一个象征性的战斗。一艘载有奥西里斯神像的船舶神龛从他的宫殿（神庙）出发，到达他的“坟墓”之后再返回，这位神沿途会遇到敌人的攻击，而这些敌人随后会受到猛烈的还击。记录公元前1000年类似节庆活动的文本称人们会在这种战斗中受伤甚至死去。

到这一时期，大多数重要神庙都在自己的区域内建有一个奥西里斯的“坟墓”，当地的人们可以把谷物木乃伊或奥西里斯小神像埋在那里的微型墓室中，从而达到献祭的目的。神庙文本描述女神通过制造木乃伊形制的人物形象神奇地帮助奥西里斯复活。像图10所示的真正的谷物木乃伊都是用泥土或沙土制成，里面还混有大麦或二粒小麦的种子。这些木乃伊有时就被埋在沙漠边缘的沟壑中，在山洪爆发或下暴雨的时候，种子得到灌溉然后发芽，生命从死亡之中生成。

至少从中王国时期起，奥西里斯的死亡和重生就与农作物每年的播种和收获这一循环紧密联系在一起，据说大麦是从他肋骨中长出来的，而用蹄子脱谷粒并用背驮谷物的驴子则被辱骂成塞特一派的生物。使用“瓦吉特”眼睛称量谷物与认为庄稼来自于复活后的奥西里斯的身体的观念有关，因为他的身体是通过荷鲁斯之眼的出现复活的。由于谷物制成的面包和大麦酿成的啤酒是所有埃及人最基本的食物，因此奥西里斯的复活对于整个埃及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新王国时期开始，奥西里斯苗床（木头制成神的框架，里面填满土壤）以及谷物木乃伊也被放置于坟墓之中。有时在葬礼上会给这些苗床浇水，这样在坟墓封闭之后种子还可以发芽。这些象征手法有助于把死者纳入一个死亡与重生的大循环中，这个大循环是世界上的每种生物都必须经历的，在这个由造物之主创造的循环中，死者被寄以在保持这一大循环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希望。

一次可怕的大冒险

彼得·潘（Peter Pan）把死亡描绘成“一次可怕的大冒险”，所有古埃及人一定都能接受他的这个说法。像医生古阿这样的人已经预料到在死后的过渡时期会遇到许多危险，作为一个有钱的上等人，他负担得起装饰有图案并刻着文字的葬仪物品，这些物品可以帮助他化解这些危险。如同神一样，死者也被认为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这样他们可以同时出现在几处场所和几个身体里。当古阿的木乃伊还躺在保护

措施周全的棺椁之中的时候，他的像鸟一般的“巴”就已经穿越了“度阿特”。古阿有地图，这使他可以沿着太阳神夜晚旅行的路线（图5）前进；他还有咒文，使他可以通过守卫的怪兽并说服神圣的摆渡者载他去到他应该到达的地方。

《石棺铭文》等咒文集类似于死后世界的《最坏事件应对指南》，死者害怕他们会干渴饥饿、在黑暗中迷失、遭到毒蛇攻击、被神圣之火烧到、落入怪兽手中并被肢解或者被迫一边倒立行走一边吃屎喝尿。这些生动的假想的恐怖事件大多数都可以通过扮演神话中的角色而加以避免。一个像古阿这样的死者可以声称像图特那样归还荷鲁斯丢失的眼睛，像舒那样支撑天空或是像塞特那样驱赶怪兽阿波斐斯远离太阳船。这种可暂时等同于多个神的多样性被用于赋予死者在特殊场合下应该需要的能力和知识。如同神在他们的神圣旅行中获得成功一样，死者也会在他们的旅行中获得成功。

到新王国时期，更简明紧凑的咒文集，也就是如今被称为《亡灵书》的咒文集，取代了《石棺铭文》。在《亡灵书》中，神界法庭的神裁法占据了重要地位。42位法官坐在奥西里斯的设有王位的觐见室——“双重玛阿特之堂”中，死者必须要接受这个神界法庭的严格审查，就像奥西里斯和荷鲁斯曾经历过的那样。在死者宣布他无罪之后，他或她的心脏就要与真理女神玛阿特的一个雕像一起放在天平上称量，善良者被认为是像拉神一样，把玛阿特装在心中。考虑到即使是神在伸张正义时也会遇到重重困难，因此死者被允许使用巫术，一个刻有一篇咒文的圣甲虫可能会被放在木乃伊胸腔的上面或是里面，因为这篇咒文可以阻止心脏讲出任何藏于其中的坏事。理想的裁决是奥西里斯曾经得到的“言词真理”。如同奥西里斯一样，善良的死者也不能重回他们过去在人世间的生活，他们不得不以新的形象居住在一个新的王国中。

最终的命运

在《石棺铭文》中，死者可能被想象成生活在谷物长得很高大的“苇子的原野”里，他们在那里接受着“祭品之地”的一切美好东西，和图特一同居住在“月亮宫”之中，或者成为伟大的女神哈托尔的随从。《石棺铭文》1130描述了整个循环过程，从“万物之王”创造世界到最后造物主与“无生命之神”（奥西里斯）融为一体，在结尾处，它承诺任何了解这篇咒文的人都将像冥界的奥西里斯和东方的拉神那样，不被神圣之火伤害。与奥西里斯一同栖息、与拉神一同旅行，这是“无罪的”死者的两大的命运。

一个把死者的灵魂与拱极星联系在一起的早期信仰暗示了人们对于进入奥西里斯王国的恐惧，拱极星是那些并不按时落入地平线之下“与奥西里斯一同休息”的星星。在《争斗》故事中，奥西里斯的王廷里挤满了可怕的死亡使者，奥西里斯声称玛阿特已被迫来和他居住在一起，因为埃及已腐化堕落。从旧王国到罗马时期，很可能发现一些埃及文本，它们都在强调幸福的来世生活取决于合乎道德的行为，而不是依靠负担得起最为华丽的陵墓和葬仪陈设的能力。

一个可能创作于公元前1千纪的晚期的故事生动地表达了上述理念。故事讲述一位名叫塞特纳（Setna）的王子观看了两个送葬队伍：其中一名死者很富有，他将拥有最好的葬仪陈设；另一名死者则是个穷人，他将被埋到沙漠里，根本没有任何随葬品。塞特纳的儿子用巫术将他的父亲带入冥界，去看看这两个人最终的命运。结果两个人都在奥西里斯的法庭上受到审判：富人被判定在生前邪恶自私，因而将遭受永世的折磨；而穷人在生前则是一个好人，因此他得到了富人所有的随葬品，这帮助他成为追随奥西里斯的被赐福的灵魂。

随着这种来世道德观在民间逐渐受欢迎，奥西里斯和伊西丝在神话中的形象也日渐清晰。奥西里斯发展成为一位好统治者，是无辜的受害者和最终的正义的化身。伊西丝变成了贤妻良母，担负着拯救所有人类的任务，就像她曾经把她的丈夫和儿子从毁灭边缘拯救回来一样。

同一条船上的所有人

奥西里斯、伊西丝和荷鲁斯的神话强调了家庭的忠诚，这也反映了普通的埃及人对于死者的态度。每位死者都是一个潜在的*akh* ——理想中的具有半神能力的灵魂。写给死者的信件清楚地表明，这些个体被认为可以与坟墓之外的阳界以及家人保持联系。在《争斗》这个故事中，死去的奥西里斯帮助他的儿子获得了王位，这反映出埃及人期望死去的亲人运用自身的能力和影响力来帮助家庭成员的想法。

背景知识13

阴间地府书
《金字塔铭文》（公元前24世纪之后）、《石棺铭文》（约公元前22世纪之后）以及《亡灵书》（公元前16世纪之后）是葬礼咒文的不同合集，其中没有任何两部是相同的。带有图解的《阴间地府书》是以太阳神的旅行为中心的完整作品。被复制在王室陵墓、衣冠冢中的墙壁和天花板上的主要的《阴间地府书》包括：

《阿姆度阿特》（Amduat，“冥界中有什么”），公元前15世纪或更早
太阳神及其随从人员穿越12小时的黑暗。

《拉神的祈祷文》，公元前15世纪
太阳神在冥界的75种形式的祈祷。

《门之书》，公元前14世纪或更早
太阳神、西阿（创造性思想）和海卡（魔法）穿越冥界的12道门。

《夜晚与白昼之书》，公元前14世纪
太阳神及其随从人员穿越天空女神努特的身体。

《洞窟书》，公元前13世纪
太阳神穿越冥界的12个洞窟以和奥西里斯会合。

《大地书》，公元前13世纪
太阳神在冥界的形态变化。

这些书中的多部后来都被改编使用于非王室的坟墓墙壁、棺材以及葬礼纸草上。一些表现冥界的图画可能影响了早期基督教对于地狱的认识。

另一方面，法老文化也取决于将国王和国家置于家庭忠诚之上的埃及人。在与太阳崇拜有关的葬礼文本中，已故者被视为是更大的埃及社会和神界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死去的人们被分成“拉神的敌人”和“拉神的杰出灵魂”两部分，其中王室陵墓墙壁上的《阴间地府书》描绘的“拉神的敌人”都是被砍头、烧死或活煮了的形象。

在这些《阴间地府书》中，即使是最强大的国王也只是配角（参见背景知识13），他们死后的命运与在夜晚乘船航行于冥界中的太阳神联系在一起。宇宙的重生要依靠太阳船上的全体人员，这个船的也叫“无数人之船”。从中王国时期起，非王室成员的死者也可以成为这条船上的水手，参与做重要的工作——在从黄昏到黎明的过程中驾驶和保卫这艘船，有一些葬礼咒文就是为了“登上拉神之船”以及“成为拉神之船上最敏捷的划船手”。图文并茂的咒文表现了已故者扮演塞特或眼睛女神等强大的神的角色，以杀死威胁太阳船安全的混沌怪兽。来世成为了永远的航行旅程，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条船上。

据说太阳神在穿越冥界时发出的光芒可以把无罪的死者的木乃伊从昏睡状态中唤醒，但不幸的是，光芒只能维持一个小时，而对于死

者来说，这显然像是他们在“苇子的原野”中度过的整个一生的时间。人们假设存在着几种执行不同时间表的现实情况。

一些《阴间地府书》展现了拉神和奥西里斯生命和死亡实为一体的这一“秘密知识”。这两个神在夜晚的中点合并，于是死亡和重生的循环再次开始。黎明，这一个美丽的时刻将带来生命的再生，人们用多种多样的物品庆祝着这个时刻，其中有像“克里奥帕特拉尖塔”这样宏伟的方尖碑，也有家庭主妇塞涅波的魔杖。

年表

（公元前7世纪之前的所有时间都只是大致时间）

前王朝时期，公元前**5000**—前**3200**
岩石绘画
定居尼罗河谷
上埃及王权兴起

原王朝时期，公元前**3200**—前**3100**（第**0**王朝）
象形文字被创造出来
埃及统一，孟斐斯城建立（第0王朝）

早王朝时期，公元前**3100**—前**2686**（第**1**—**3**王朝）
第一部被连接起来的象形文字文本

旧王国，公元前**2686**—前**2181**（第**3**—**6**王朝）
在吉萨和萨卡拉建造巨型的王室金字塔（第3—4王朝）
建造太阳神庙（第5王朝）
在金字塔内刻写《金字塔铭文》（第5—6王朝）

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181**—前**2055**（第**7**—**11**王朝）
埃及分裂成相互敌对的区域
地方贵族的墓葬中使用《石棺铭文》

中王国，公元前**2055**—前**1650**（第**11**—**13**王朝）
尼布赫帕特拉孟图霍特普[1]重新统一了埃及（第11王朝）
埃及成为近东地区的一个大国（第12王朝）
埃及文学的黄金时代；保存下来的最早的用僧侣体文字书写的故事和“教谕”
关键物： 古阿棺、塞涅波魔杖

第二中间期，公元前1650—前1550（第13—17王朝）
埃及在外族入侵之后分裂
《亡灵书》最早的副本（第17王朝）

新王国，公元前1550—前1069（第18—20王朝）
埃及重新统一并在近东地区发展成为一个帝国（第18王朝）
大多数祭祀神庙得到重建。卡纳克的阿蒙神庙兴起（第18—20王朝）
阿玛尔纳时期，阿吞神短时间内取代了所有其他神。
图坦卡蒙统治下多神教恢复（第18王朝晚期）
拉美西斯二世长时间的繁荣统治（第19王朝）
《阴间地府书》装饰帝王谷中的王室陵墓（第18—20王朝）
用后埃及语写成的神话以及与神话相关的故事（第19—20王朝）
关键物： 克里奥帕特拉尖塔（图特摩斯三世方尖碑）、阿蒙霍泰普三世与索贝克–拉的雕像、图坦卡蒙的持鱼叉小雕像和《彻斯特比提蒲纸本一号》

第三中间期，公元前1069—前747（第21—25王朝）
埃及频繁分裂
利比亚裔的国王们统治三角洲（第21—23王朝）
与卡纳克高级僧侣集团关系密切的王朝统治南部（第21—23王朝）
努比亚的统治者入侵
关键物： 神圣之眼护身符

后王朝时期，公元前747—前332（第25—30王朝，第一、第二波斯时期）
埃及重新统一于努比亚王朝（第25王朝）
亚述人入侵并赶走努比亚人
来自舍易斯的埃及王朝得到了控制权（第26王朝）
通俗体文字的文学兴盛

波斯人征服埃及
埃及的领袖们为独立而斗争（第27—30王朝）
波斯人再次征服埃及
现存最早的地方神话集
关键物： 夏巴卡石碑、谷物木乃伊和梅特涅石碑

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332**—公元**395**（马其顿和托勒密王朝，罗马时期）
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亚历山大里亚建立
托勒密将军在亚历山大的帝国分崩离析之后掌握了埃及的控制权
托勒密家族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统治并重建了许多重要的埃及神庙
神话被刻写在神庙的墙壁上
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及其儿子凯撒里奥（托勒密十五世）被奥古斯都打败。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公元前30年）
《赫尔墨斯集》被创作出来
埃及逐渐成为基督教区
科普特语言和文学的发展

拜占庭（科普特）时期，公元**395**—**640**
埃及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
余下的异教神庙都被关闭
识读象形文字的知识失传
阿拉伯人入侵埃及

阿拉伯时期，公元**640**年至今

注释

〔1〕 尼布赫帕特拉是王位名，孟图霍特普是本名。

古埃及的神话复杂而神秘。著名的方尖碑、图坦卡蒙镀金小雕像、讲述诸神不端行为的故事……这些都代表着什么？人们是如何解释它们的？

本书作者以全新的视角、深入浅出的文字介绍了埃及神话中核心的人物和故事，概括、分析了埃及神话特有的结构和特点，揭示了埃及神话与古埃及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

百科通识文库

49

解码畅销小说

约翰·萨瑟兰 著

苏耕欣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
文库
49

解码畅销小说

约翰·萨瑟兰 著
苏耕欣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66**

Bestseller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7.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7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John Sutherland 20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码畅销小说 / （英）萨瑟兰（Sutherland, J.）著；苏耕欣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19-6

Ⅰ．①解… Ⅱ．①萨… ②苏… Ⅲ．①小说研究 - 世界 - 现代 Ⅳ．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06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夏　天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19-6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第一章　畅销书的定义
第二章　现代场景
第三章　领域与排行榜
第四章　美国畅销小说
第五章　英国畅销小说
第六章　畅销小说的未来：有吗？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约翰·萨瑟兰，伦敦大学学院现代英语文学荣誉退休教授、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已出版多部专著，内容涉及诸多领域，尤其是维多利亚时期及现代出版史、现代文学和通俗小说。曾任2005年布克小说奖评审委员会主席。

译者简介

苏耕欣，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哥特小说和文化研究。

图目

图1　《哈克贝利·费恩》
图2　关于《净价图书协议》的头条新闻
图3　《达·芬奇密码》
图4　《天路历程》
图5　“波特热”
图6　阿加莎·克里斯蒂
图7　《飘》
图8　《愤怒的葡萄》
图9　《杀死一只知更鸟》
图10　《皇家赌场》

事实上，我们找不到证据或理由足以表明莎士比亚或其他任何作家是“优秀”作家；也无法确证沃里克·迪平之流乃“劣等”作家。检验文学价值的最终标准是作品之流传状况而非他物，而流传本身就是多数人意见的某种标志。

——乔治·奥威尔，《李尔王、托尔斯泰和弄臣》

第一章

畅销书的定义

前言

人们为什么要去阅读——不管认真程度如何——那些并不算“好”（有时是一无是处）的、文学世界中的迪平[1]们涂抹而就的畅销书呢？这些书难道不正是德语中充满鄙夷不屑意味的那个词*Wegwerfliteratur*所指的“阅后即弃的垃圾文学”吗？文学史家们都坚决地弃之如敝屣，我们为何还要将其挑拣来研究品评？

任何一个研究畅销书的人都会同星巴克咖啡馆里专喝脱咖啡因咖啡、脱脂牛奶咖啡的顾客一样遇到同一个问题：“这又何必呢？”一个理由——也是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它们（即这些畅销书）都具有与众不同的诱人魅力。与历史上其他稍纵即逝的事物一样，畅销书（甚至包括奥威尔[2]不屑一顾的那个迪平所写的小说）有一种悦人的古旧感。人们现在哪里还能读到这样的句子——“我说，老爸，你真够朋友”（迪平的《索雷尔父子》中“儿子”在得到一张10镑钞票作为“奖赏”后如是对“索雷尔”说）。但畅销作品的生命力很短，一旦读完，即成明日黄花，被人遗忘。

回顾以往的畅销书单，人们会发现不少令人喜爱的、属于文化异类的作品。由格特鲁德·阿瑟顿[3]创作的、1923年美国销量第一的《黑牛》即为其中一例。要知道，那一年口味挑剔的读者们还有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4]、T. S. 艾略特的《荒原》[5]以及D. H. 劳伦斯的《亚伦的藜杖》[6]等重磅作品可以选择。

阿瑟顿的书名借用了W. B. 叶芝作品中的词句（“岁月如同黑牛踩踏着世界”）[7]。这样的借用表明作者在文学方面颇有点儿自命不凡，而且是毫无资本的自命不凡。不过，这本书的“返老还童”主题在那个年代还算符合潮流，也够吸引眼球，当然，这个“返老还童”指的是人，而不是牛。

故事从纽约的一个剧院开始。年轻有为的报人李·克拉弗林（该市“400个最杰出精英家庭”的成员）为观众中一位美貌女子所吸引。

通过调查，他发现这个女子同30年前一位名叫玛丽·奥格登的“美女”相貌特征完全一致。奥格登小姐嫁给一位匈牙利外交官扎蒂亚尼伯爵后，遂人间蒸发，致使谣言四起。后来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奥格登／扎蒂亚尼在维也纳接受了施泰纳赫医生新发明的X射线疗法治疗，自此返老还童。因为女人在更年期如果卵巢接受大量射线照射，自身的衰老过程将会逆转。

有关这一神奇过程的消息见诸报端后，“内战一触即发”。运气不佳的克拉弗林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年龄与自己母亲相仿的女人。与此同时，年龄足以做他的女儿的珍妮特·奥格尔索普又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而这个涉世未深的叛逆少女嗜饮私酿劣酒，还去参加年轻男女的“爱抚聚会”。故事情节由此变得极其错综复杂。

实际上这都是子虚乌有的胡扯——就跟在医学上施泰纳赫的X射线疗法奇迹也是胡扯一样。1922年，阿瑟顿自己曾接受过这位维也纳医生的“返老还童”治疗。从那些公开的照片来看，治疗对她所起的美容作用微乎其微。然而，虽然《黑牛》可能只是一部胡编乱造和宣扬伪科学的作品，它却的确与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而不属于其他时期。

阿瑟顿的小说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可能显得荒唐无比，但此书反映并表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妇女自由的焦虑，其准确与贴切不亚于《布丽奇特·琼斯的日记》[8]之于20世纪90年代。20世纪20年代是“随意女郎”——永远年轻的少女／少妇们的时代。经过多年斗争，英国妇女终于在这个年代获得了投票权，但条件是她们必须年满30岁。据信，妇女过了这一巅峰年龄后，头脑将变得足够冷静，可以作出理性的政治决定。而1923年出版的另一部小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9]的《漂亮的冤家》，则更为正面地记录了对于放浪形骸的狂热青春的崇拜——那种“宁死拒老”的追求。这本书也上了畅销书单，但远没有阿瑟顿的小说引人注目：此时的菲茨杰拉德正进行着一场漫长的文学长跑。

《黑牛》这部1923年名列榜首的畅销小说与其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这本书可以在15年后面世（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关

于“长生不老药”的小说——《多个夏天以后》[10]），但一旦脱离其原本的时空框架，《黑牛》便如无水之鱼，难以“施展拳脚”。在其他时代，这部小说也不会成为“时代之书”。是时代成就了这本书，正如当时发生的各类事件制造了1923年报纸的新闻标题一般。

这种与时代紧密相关的性质与畅销作品的短时性是密不可分的。一部占据销售榜榜首的小说可以算是一次成功的文学实验——它会像照相机闪光灯的闪烁一般转瞬即逝，同时也能够生动地定格某个历史时刻。如果（我们套用柯勒律治的话来说）人们看到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11]（“为耶稣而痴狂”[12]）在阿拉伯漫游，他们会大叫：“70年代嬉皮士”（或许还会加上一句：“哥们儿！”）。如果“斗牛狗”德拉蒙德[13]穿戴整齐，摇摇晃晃地闯入你的客厅，而他的“男仆”丹尼带着大酒杯、收起的雨伞和手枪紧随其后，你肯定会以为是20世纪20年代早期俱乐部区的暴徒穿越时空旅行而至。

伟大的文学作品，正如琼森[14]评价莎士比亚时所说的，“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一切时代”。而畅销小说中的最畅销者恰恰与此评价相反：它们只是一个时代的快像。

一本美国式的书

在书籍逐渐商品化的过程中，从报纸连载小说、一角钱小说，一直到廉价通俗杂志、面向大众的纸皮书和网络书店的出现，当然，还有畅销小说及其生产发行体系，每一次的发展进步都是由美国牵头发明和完善的。

美国社会特别适合通俗小说产业的发展，而这一产业最具活力的代表即为畅销小说。美国是个民主社会，建国之时适逢小说兴起。新国家的创立者们在其革命宣言中确立了公民言论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神圣权利。畅销小说的目标即在向民众提供这些好东西。

美国与欧洲不同，不存在国家控制文学或其生产者的传统。在美国自由宽松的文学氛围中，通过特权或垄断进行商业控制之事闻所未

闻。除了1915年曾经有过短暂的管制外，美国从未实行过任何零售价格管控制度。英国倒有个《净价图书协议》（根据美国反托拉斯法的规定应被视作非法），这个协议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20世纪90年代取消，旨在遏制“低价销售”或竞争性定价行为。“由他去吧”从来都是美国商业社会奉行的金科玉律。

美国拥有（通常也是由其发明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交通和通信技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美国图书业从其19世纪形成阶段到1891年4月，一直没有受到过国际版权协议的约束，书商们得以肆无忌惮地剽窃欧洲——主要是英国——成熟的文学作品。

在最初的100年里，美国图书业树起的是剽窃他国作品的海盗旗，而在此期间要数英国文学作品遭受到的侵害最为严重与广泛。其后果一目了然。F. L. 莫特就此写过一篇专题文章——《美国畅销书综述》。书中他以每10年为一个时间段，计算出某本书“在出版时所处年代的总销售量相对于美国本土总人口百分之一的比例”。通过这一精细计算方法，莫特列出了1776年至1900年124本最畅销的“美国”小说。在这些书中有74本其实是英国小说，15本来自欧洲大陆（主要是法国），只有55本是真正的本土作品。

案例研究：《哈克贝利·费恩》

欧内斯特·海明威 [15] 曾经发表高论道：“所有美国现代文学都来自马克·吐温 [16] 的一本书，此书名为《哈克贝利·费恩》。”然而，我们或许还要加上一句，抛开其表面上极具本土特色的语言不论（其美国色彩同派克县 [17] 一样浓厚），马克·吐温的这部长热不衰的小说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源自盗版的外国作品。小说的叙述就与非美国通俗小说存在诸多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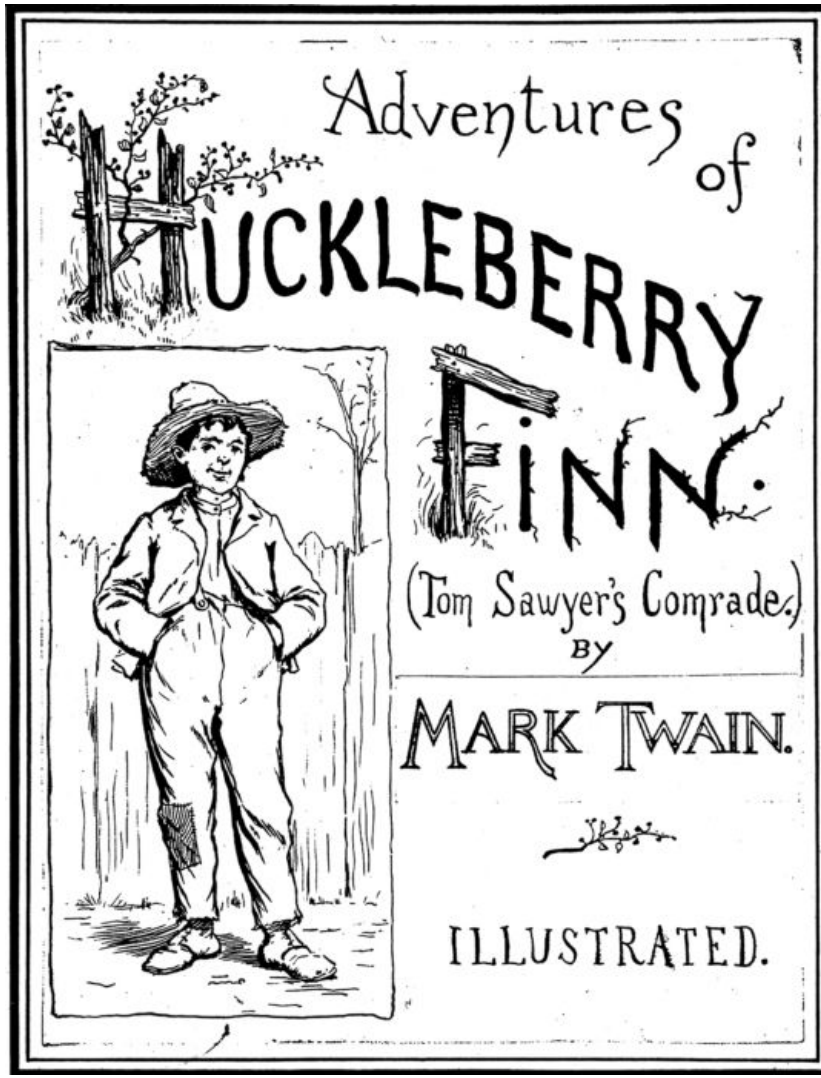

图1　《哈克贝利·费恩》1884年初版，插图作者为E. W. 肯布尔

例如，当汤姆打算用一个荒唐的方法把他的倒霉仆人吉姆从萨莉大婶囚禁他的小屋中解救出来时，这个捣蛋鬼不用说正是引用了《基度山伯爵》[18] 中的故事对将信将疑（明显所受教育较少）的哈克作了一番解释：

“蠢不蠢，这无关紧要，这是正经　的办法——这是按规矩办事……瞧瞧人家吧，有一个关在马赛港第夫堡底层地牢里的囚徒，就是这样挖了地道逃出来的：你猜他 挖了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

“嗯，猜猜看。”

“我不知道。一个半月？”

“三十七年　——他从地道那一头出来时，发现自己到了中国。这才是好样儿的。我巴不得这个城堡底下是硬邦邦的石头。”[19]

不过，贯穿于马克·吐温的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传奇因素是“北方的那个奇才”[20]，而不是大仲马。在故事之初，汤姆集结了一帮人马，他身上背负着《湖上夫人》[21]中燃烧着的十字架（这个故事恰巧也为三K党许多仪式和象征符号提供了借鉴[22]）。故事里有一艘名为“沃尔特·司各特”的蒸汽船。此船的翻没颇具深意，因为这是主人公的浪漫主义与作为痛苦渊薮的现实世界之间冲突的开始。

马克·吐温相信，司各特——该世纪遭受剽窃最严重的作家——毒害了美国人的灵魂，对于内战负有责任。不过，要说签署国际版权法可能使国家避免那场有史以来最为血腥的战争，即便对于马克·吐温本人而言，也是一个古怪的推论。

美国理想的销售环境

由于不必自己创作畅销小说，美国图书业把精力转向销售方面，而它所面对的销售对象是一个在社会各个层次上受教育水平普遍比英国高、对于图书更加渴望的群体。这是一个极为理想的销售环境，它能够催生也确实催生了新的销售技巧。

英国的图书业相对来说经济基础较小，（伦敦）文学界的构成更加简单自然，其读者群更小（岛国大小），因此更利于原创。同时，由于图书商品的初始成本很高，英国图书业界组成行业联盟以维持高昂的小说销售价格。19世纪，在英国购买一本新上市小说的费用比以

前或以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高。例如，汉弗莱·沃德夫人[23]那套印有史密斯–艾尔德出版公司[24]标识的三卷本小说《罗伯特·埃尔斯梅尔》（第一版），在1883年的价格是一个半几尼（以今天的货币价值算，差不多有100英镑）。这当然是假设在那个年代有如此阔绰或疯狂的人能够去花这么大一笔钱买书。（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笑话说，那时的确有一个人一次买了一套三卷本——但谁也记不起来这个家伙的名字了，见鬼。）

那些如饥似渴地读完沃德夫人的小说并同其主人公一起经历宗教怀疑之痛的众多英国读者，是从流通图书馆借读此书的（一般是一次一卷）。这种短期“租借”图书的方式大大降低了购买图书的巨额开支。出版商和中间商借此获得了利润（6个月之内售出3,500套三卷本《罗伯特·埃尔斯梅尔》）；同时，由于人们纷纷涌向图书馆借阅，大大增加了对图书的需求，书商们可以等上一年半载，到便宜的（不过，6先令也算不上绝对低廉）再版书上市后进货（廉价版本共售出60,000册）。这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没有打乱任何人的计划。阅读物静静地流向读者，巨额现金又静静地流回去，获得的利润又进了图书馆、书商和出版商的腰包（在此利益链的末端，图书作者们也不无收获）。

与此同时，《罗伯特·埃尔斯梅尔》在皮卡迪利大街[25]的哈查兹书店上架几个星期后，这本书在纽约百老汇大街的任何一家店铺都能以25美分的价钱买到。据估计，那一年这本书在美国共售出10万册，3年内卖出了接近100万册，而价格只不过是其在英国售价的零头而已。美国的图书文化是购书文化，而非借书文化，也因此更为纷杂。由于毫无约束，市场供求关系使书价一路下滑。在经济处于最低谷的时候，这位虔诚的英国女士的这本极度虔诚的小说是免费赠送的，而且还搭上几块肥皂——理由大概是，洁净之重要仅次于神圣。沃德夫人的小说在美国售出了几十万册，但她本人却连一个掺假的铜板都没拿到。

美国最终于1891年极不情愿地签署了国际版权法，至此，对英国“季节性作物”无所顾忌的剽窃方告终结。汉弗莱·沃德夫人是首批获

益者之一，美国为其在1894年出版的小说《戴维·格里夫》预付了巨额稿酬（7000英镑）。然而，旧有的惯例还是很难改变的。对于消费者而言，美国销售的图书比起英国仍然便宜不少。沃德夫人1894年出版的这部畅销书在英国作为新书发售时标价31至36便士，而此书在美国的价格仅为1美元（为英国价格的八分之一）。作为1891年《蔡斯法案》[26]之前那个时代的历史遗留物，这样的价差到今天也依然存在。一本精装畅销小说在美国仍然能以比在英国稍微便宜的价格买到手。

这个时期还留下了其他一些历史问题。美国图书业在这段时期未作耕耘却大获丰收，特别是在英国图书的“收成”上。就英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而言，没有哪个领域比通俗小说这一领域更为“特殊”。历史上有一些民族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重不小，但只要比较英国人在美国人口构成中相对于那些民族的绝对优势就能看出这种关系。例如，尽管美国有大量德国移民，这些人口在20世纪早期对于美国文化产生了较深的影响，但只有一部德国小说曾经令人艳羡地登上了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位置，这部小说就是埃里克·马里亚·雷马克[27]的《西线无战事》（1929）。二战以后，雷马克另一部与《西线无战事》主题类似的反战小说（在德国被认为也是反德小说）《凯旋门》于1946年进入了畅销书排行榜的前10名。有几本译自德语的小说也上过排行榜，如里昂·孚希特万格[28]的《犹太人聚斯》（1926）、维基·鲍姆[29]的《大饭店》（1931）、汉斯·法拉达[30]的《小人物，怎么样？》（1934）、弗朗茨·魏菲尔[31]的《穆萨山的四十天》（1936）和他的“卢尔德故事”《贝尔纳黛特之歌》（1941）。帕特里克·聚斯金德[32]的《香水》（1986）是最后一部占据美国畅销书榜前10名显著位置的德语小说。

“伊萨克·迪内森”（即卡伦·布利克森）[33]凭借其《七个哥特故事》1935年进入排行榜前10名。同样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芬兰人米卡·瓦尔塔里[34]20年后才在排行榜上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他的上榜作品是《埃及人》（1950年上榜，1955年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再次上榜）、《冒险者》（1951）和《流浪者》（1953）。安娜

玛丽·泽林科[35]是个长期旅居丹麦的德国流亡作家，或许也可归入这批作家之列。她的历史小说《黛丝蕾》[36]是1954年的畅销小说（一部关于拿破仑的电影就是根据此书拍摄，该片由马龙·白兰度[37]主演，多少有点儿不可思议）。

1942年，尼娜·费多罗娃[38]的《家》成为第一部进入美国畅销小说排行榜的俄国小说（该书上榜与其说与作者的国家背景有关，不如说因为故事发生在战乱的中国）。1958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39]的《日瓦戈医生》和由他的（已经美国化了的）同胞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40]创作的《洛丽塔》几乎交替占据畅销小说排行榜榜首位置。而随着冷战的“解冻”成为大势所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41]的《1914年8月》也在1972年挤进了排行榜。

法语背景的畅销小说明显稀缺，弗朗索瓦丝·萨冈[42]的《你好，忧愁》（1956）和西蒙娜·德·波伏瓦[43]的《风流名士》（1954）是仅有的代表。这两部小说的走红均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风靡法国的“新浪潮”电影。而意大利小说中唯一在排行榜上留下印记的是迪·兰佩杜萨[44]撰写的一部关于西西里某贵族家庭的小说《豹》（1960）——此书被普遍视为意大利最伟大的文学成就之一。澳大利亚小说则凭借考琳·麦卡洛[45]的浪漫传奇《荆棘鸟》在1977年登上排行榜榜首位置。

西班牙语在美国一些边境州已成为第二语言，然而只有3部来自西班牙语国家的小说曾经进入排行榜前10名。伊巴涅斯[46]的《乱世四骑士》于1919年荣登榜首（这一年人们仍然沉浸在兵连祸结的一战留下的创伤中）。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47]的《最后的清教徒：小说形式的回忆录》于1935年进入前10名。在曾经进入排行榜的*Bildungsroman*（成长小说）中，此书堪称最佳。而劳拉·埃斯基韦尔[48]的《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也曾在1993年的周排行榜上时断时续地占据首位。

除了以上屈指可数的几部著作，再无其他英国以外的作品进入美国畅销小说榜的上游位置。下表列出了1900至1999年间每个10年期间进入美国的畅销小说榜前10名作品的统计数据，根据来源国排列次

序。

年代	美国	英国	其他国家
1900—1909	86	14	0
1910—1919	76	23	1
1920—1929	71	28	1
1930—1939	68	28	4
1940—1949	85	11	4
1950—1959	82	11	7
1960—1969	83	16	1
1970—1979	71	27	2
1980—1989	84	16	0
1990—1999	94	6	0
总计	800	180	20

上表中数字的增减变化表明，该世纪上半叶英国作品的渗透更深（总共180部作品中占了104部），这也不足为怪。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排行榜却陡然呈现出一种美国小说占明显统治地位的势头。

“奇迹之年”

整个20世纪，虽然美国的畅销书目总体上是向本土作品倾斜，但英国作品时有复苏之态，甚至有卷土重来之势。以1924—1925年度这个“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为例，这一年出版了P. C. 雷恩[49]的《火爆三兄弟》、P. G. 沃德豪斯[50]的《吉夫斯》和伊迪斯·M. 赫尔[51]的《酋长的儿子》，而这些小说都排在1924年畅销榜的

前列。接下来的一年又出版了A. 汉密尔顿·吉布斯[52]的《试探》（该年美国排名第一）、玛格丽特·肯尼迪[53]的《专一的少女》（排名第二）、迈克尔·阿伦[54]的《绿帽》（排名第五）、拉斐尔·萨巴蒂尼[55]的《卡罗来那人》（排名第九）以及A. S. M. 哈钦森[56]的《人生目标》（排名第十）。沃里克·迪平的《索雷尔父子》于1925年在英国出版，次年在美国付梓（并占据了排行榜的榜首位置），从而开始了这个作家在美国畅销小说榜上长达10年的统治。英国小说在美国的骄人业绩也使出版界人士懊恼不已，大家都为本国文学的衰微扼腕叹惜。

1925年最了不起的“美国”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也难逃英国对美国殖民历史的深刻影响。故事的主人公盖茨比是凭借其“美国佬上了牛津”的显耀经历赢得了他所爱慕的女人黛茜的芳心。梦幻尖塔[57]和杰伊·盖茨比都很“了不起”，堪萨斯和詹姆斯·加茨[58]（我们从后来的叙述中了解到，农家小子才是他“真实”的出身）却没有什么了不起。如今，根据记录，《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中学中研读最多的小说，但此书在1925年并没有登上畅销书榜。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菲茨杰拉德正在进行一次漫长的文学长跑。

在这个世纪，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些英国成分特别突出的年份。1925—1926年度也被视为“奇迹之年”，这要归功于1917—1918年间两国建立的战时友好关系。在此期间，美国人来到英国这里，而英国小说则跑到美国那边去。1941年的情形也与此类似——那一年美国保持“中立”，但暗中与大西洋彼岸的亲戚结成同盟。欧洲战争第一年，最畅销的小说是理查德·卢埃林[59]的《青山翠谷》，讲述了一个关于生活、艰辛和坚毅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是威尔士的一个采煤村庄。这部作品的畅销多少有点儿出人意料（更加不同寻常的是，这部小说于1942年被拍成了由好莱坞演员出演的电影；结果人们发现，就连作者卢埃林——虽然他的名字可能会误导人——也不比“大鼻子”吉米·杜兰特更像个威尔士人[60]，但这并未阻止这部电影在那一年的奥斯卡奖评选中大获全胜）。

1940年美国畅销小说排行榜上的第三名是简·斯特拉瑟[61]的

《米尼弗太太》。1939年，此书开始以文章的形式连载于美国报纸，赞美英国人如何勇敢以及面对战火如何沉着、“能够承受一切”。英美间存在的特殊关系是这本书畅销热卖的最重要因素。在温斯顿·丘吉尔看来，这部书在反法西斯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一个舰队。当然，这位久经战阵的老兵还希望从他的盟友富兰克林·罗斯福那里得到他的“自由轮”[62]。

其他一些虽不出色但也算不错的年份也会时不时地冒出来。1937年，A. J. 克罗宁[63]的《城堡》排到了畅销书榜第三名的位置，弗吉尼亚·吴尔夫[64]的《岁月》位居第六（显然要归功于高层次人士的积极评价），而萨默塞特·毛姆[65]的《剧院》则取得第七名的成绩。

1977年的畅销状元是托尔金[66]死后发表的《精灵宝钻》，此书是他对其“魔戒”史诗的补充。同年上榜的还有约翰·勒卡雷[67]讲述尔虞我诈的间谍故事的《荣誉学童》，排第四；约翰·福尔斯[68]的半自传体小说《丹尼尔·马丁》排名第十。由于托尔金的巨大成功（其上榜作品的精装本销量达100万册），在排行榜前10名小说中，在美版扉页上标明英国国籍作者的作品，销量占到了总销量的一半以上。

畅销与反畅销

英美两国的图书业在实际内容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20世纪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却使两国图书销售业在手法上大相径庭。英国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净价图书协议》——在其后100年的时间里，这项措施使英国的图书销售得到了规范。该协议禁止图书售价低于或高于出版商在书上标明的定价，违反者将面临全行业的集体抵制。这样，顾客无论购买多少册，也无论从何地购买，任何零售商都不会打折或加价销售这些“净价”图书，其中自然包括新版小说。同时，该协议明显阻滞了购书俱乐部的发展。在美国，这类团体（包括每月一书俱乐部和文学工会）每年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向读者发售数百万册精装本小说。而在英国，购书俱乐部是到了几十年后的20

世纪60年代才开始发展壮大。

1 OCTOBER 1995 · THE SUNDAY TIMES

Novel opportunity: Penguin's Glover says there will never be a better time to buy books than between now and Christmas

Final chapter for book price fixing

Readers are the winners as the end of the Net Book Agreement puts bestsellers in the supermarkets and forces publishers and retailers to cut prices and margins. Report by Sarah Fairbairn

IT IS SAID that when the mainframe computer at the Foreign Office came close to crashing some years ago, the cause of the overload was found to be nearly 2,000 unfinished novels written by aspiring authors in their lunch hours.

True or not, the dismantling of the Net Book Agreement (NBA) and its fixed book prices spells the end of dreams for would-be authors as publishers and retailers respond to a mor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Large-scale discounting starts this weekend, with the newly announced Booker prize shortlist heading promotions. As the battle lines are drawn, with the action centred on bestsellers, the industry faces turmoil.

Trevor Glover, Penguin UK's managing director, says: "There will never be a better time than between now and Christmas to buy books."

For the big retailers such as WH Smith, its Waterstone's subsidiary, and Thorn EMI's Dillons, the dissolving of the 95-year-old pact that propped up book prices is likely to spark a price war.

WH Smith, with about 25% of the book market, kicks off this weekend with discounts of up to 50% on 60 titles, divided between HarperCollins, part of News Corporation, the ultimate owner of The Sunday Times, and Random House, two of Britain's top publishers.

Books, accounting for about 25% of WH Smith's sales, are its most important product and, for a time, are likely to be used as a loss leader to attract fresh customers.

Smith executives hope the increased footfall in the stores stemming from the price war, could push overall like-for-like sales up by as much as 5% in the next few months.

Peter Bamford, managing director of WHS retail says: "We can now use books to sell other products and help us revitalise our brand."

Dillons is planning its biggest price promotion, slashing the cost of 200 books, split between bestsellers, coffee-table books and specialist titles.

Stephen Dunn, the marketing director, reckons bestseller sales can increase fourfold when prices are cut by a third.

But Dillons, which is Britain's top academic bookseller, is not cutting academic-book prices, as its busiest selling period gets under way ahead of the new university year.

Dunn says: "We are trying not to react in the short term." He says the discount itself, not its size, attracts customers, adding that there is a floor under book prices below which no extra customers can be persuaded to buy.

While gross margins must come under pressure for retailers and publishers, the idea is that higher volumes will more than compensate.

Both will need to co-operate to extract maximum profits from initial print runs and, while retailers insist they will not put publishing houses under pressure to reduce prices unreasonably, power is likely to shift to the large retailers able to buy in bulk, knowing that they can now use price as a weapon to shift stock.

So publishers' margins will remain slim, with retailers scooping, on average, half the price of a hardback.

About 20% of the retail price is the manufacturing cost, 10% may go to the author, leaving slim pickings for the publisher, which will also have to pay for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An increase of about 60% in the price of paper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is adding to publishers' woes. With these pressures, publishers will have to become more focused in what they publish. The number of new titles is already declining after almost doubling to 89,000 between 1980 and 1994.

Random House has cut its list by about 600 to 1,200 since 1992 and Gail Rebuck, the chief executive, says there are further cuts to be made. She says the company has seen sales rise "significantly" in that period, reflecting a more focused approach to its titles.

Publishers and retailers agree the NBA's fall does not mean the demise of specialist new titles. About 10% of people buy 40% of books and this hardcore will not take price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buying.

Indeed, Sydney Davies, of the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believes many books, including academic titles, could rise in price. "Bestsellers may be cheaper but prices of other books may go up in compensation," he says.

The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has 3,300 members, ranging from giants to small shops. It wrote to members last week, offering pricing and negotiation courses to help small shops expand in the upheaval.

"The end of the Net Book Agreement could mean the end of the gentlemen bookseller," says Davies, pointing out that many rely on the cashflow generated by bestsellers and that this could be severely dented by price competition.

At Penguin, Glover says: "Small booksellers have reason to be concerned. They must concentrate on loyal customers to win through."

Independents will also face competition from supermarkets, led by Asda, a pioneer discounter. WH Smith's Bamford dismisses the threat posed by supermarkets, saying they carry about 10% of the 30,000 titles found in an average WH Smith store. But with supermarkets entering the fray and other retailers such as Kingfisher's Woolworths chain aiming to snatch as much as 10% of the market by the end of 1996, the British book industry is entering a turbulent time.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ahead of Christmas will cloud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NBA's fall. But, in the final chapter, it is almost certain that readers will be the winners, as the sector becomes more focused and commercial.

Glover says: "It is not a brilliant day for publishing. We will have to wait and see what this brave new world brings."

His caution is echoed by Rebuck. "It gave us no pleasure to withdraw from the NBA," she says. "But now we have responded to the change, we hope to sell more books to more people in more places."

Bamford says: "If you were a bookseller in the 1930s and had seen the coming of TV, video and computer games, you would have packed up then and there. Books are extremely resilient and nothing will change that."

THESE 3 FREE BOOKS COULD IMPROVE YOUR BUSINESS

PROPERTY REGISTER

INDUSTRIAL ESTATES REGISTER

PROFESSIONAL REGISTER

图2　报纸在1995年废除《净价图书协议》后对造成的产业混乱局面的报道

在英国，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从约翰奥格罗茨或兰兹角[69]的街边小店买一本书，还是在皮卡迪利大街上的哈查兹书店购买几百本同样的书，其单价都是完全一样的。其效果是制造出一种轻松从容的、“文明”的或“富有主顾”式的行业文化。另外，英国对零售商不提供“售不出即退”的便利，也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文化。在美国，一家大书店可以订购某本小说1,000册，假如卖不出去，可以原价退还999本。在英国，一旦订购，书就是你的了。这也使书店经理们在订购时十分谨慎。

美国在一战期间试行了短暂的零售价管制（美国法院很快裁定该做法属于“行业垄断”而加以禁止），之后再未引入“净价书”这个概念。美国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样做与美国的社会理念格格不入，几乎要与社会主义画等号。而购书打折的做法——无论是在书店还是通过购书俱乐部——则起到了为畅销小说榜“火上浇油”、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两个国家的图书销售体制只是在1995年英国废除了《净价图书协议》后才开始趋向一致——如今，两国的一些大公司实际上成了超国家的实体。

哈珀–柯林斯或蓝登书屋旗下的海尼曼、塞克–沃伯格等品牌，究竟是属于英国呢，还是归属美国？还是两者皆非，抑或二者兼属？你的答案可以发到伦敦、纽约、悉尼、多伦多或者柏林——因为母公司蓝登书屋现在归德国人所有（曾经出版沃尔特·司各特和简·奥斯丁[70]作品的约翰·默里出版公司，现在竟已归属法国人——这两人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困惑不已，因为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两位作家都是极其坚定的爱国者）。作家肯·福莱特[71]在英国出生并接受教育，但他在美国售出的书远比在英国多。他的一些畅销小说，如《一切归零》（2000年的畅销书榜第一名），故事发生在美国，人物也是美国人。那么他算哪里人？答案也许会在他存放于密歇根州萨基诺学院的文稿中找到。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100年间，英国的图书文化（同

时也包括欧洲国家的图书文化）在骨子里抵触畅销书这个概念，也完全鄙视任何官方的“排行榜”。这种做法在当时看来是美国式的野蛮行为，因为它扭曲了顾客的购买习惯。挑剔的读者“浏览”[72] 图书，就像英国草地上反刍的牲口慢慢咀嚼胃里的草料一样；他们不会像疯狂的牛群那样在平原旷野上“惊跑狂奔”。

人们觉得美国畅销书经营模式下的高销售压力限制了书店进货的品种范围。堆积如山的“热门图书”将那些有价值的图书压在下面，难见天日。图书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它们只是“不同”而已——1960年英国一桩涉及图书零售价格管制的官司中，成功胜诉的辩护方如是强调（法庭裁定《净价图书协议》“合法”，从而令辩方胜诉）。对于图书，没人说过“豆烤糊，人必烫伤”。那为什么还要像卖烤豆那样卖书呢？这就是英国图书业界的想法。

由于这种文化对抗，英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出现真实可靠的畅销书排行榜。这一时期《书商》杂志开始为图书行业收集制作图书榜单，而《星期日泰晤士报》则开始向读者公开这些榜单。此后数年里，这逐渐成为英国图书业的一大特色，可以说是变相效仿了美国的高压销售策略——在1995年废除了《净价图书协议》以后，这种特点更加突出，而传统的繁华商业街书店也逐渐变得与美国的超级书店几乎无甚区别。美国的超级书店包括巴恩斯–诺布尔书店、博德斯书店和亚马逊网上书店（Amazon.com）；在英国有沃特斯通书店、博德斯书店和亚马逊英国网上书店（Amazon.co.uk）。在两个国家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榜首的小说越来越趋于一致。

术语

任何图书都可能成为畅销书，甚至这本介绍性的小书——如果本人斗胆臆想——也有可能会忝列其中。其实，自畅销书排行榜诞生以来，这个术语就主要同小说联系在一起，小说——借用威廉·萨克雷[73] 的说法——就是滋润心灵的果酱馅饼。我们以下介绍的仅限于畅

销小说——那些文学世界中的甜蜜糖果。

使用“畅销书”一词的最早记载出现于1902年，即在最初的畅销书排行榜出现7年之后。从一开始，这就是个使用不当的词。“最”是个最高级形式的词[74]。严格说来，最畅销的书——借用电影《高地人》中的那句台词——“只能有一部”；而这本书是《圣经》，是莎士比亚作品，还是《道路交通法规》？这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是，周复一周发布的排行榜已清楚表明：所谓的最畅销书总是不止一本（在最近10年的畅销书榜单上有总共200本）。而且，人们可以确信，明年的畅销书目会更大，畅销作品质量还会更好。下一个10年情形也肯定会依然如此。

我们使用“畅销书”这个名词时，等于是相信了图书业的（善意）谎言。今天，人们一般称此做法为“宣传炒作”或“编造杜撰”，即善意的欺骗，此善意就是要向更多的人销售更多的书。而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销量较好的书”或“在更新的图书面市之前销量尚好的新书”。畅销书刚刚面世之时，正值出版业“黄金时代”的尾声。那时的出版业是一个绅士行业，业界人士颇引以为荣。今天的畅销书在那个时代，人们喜好称之为“有需求之书”。直到20世纪20年代，诸如哈钦森那本超级热销的《如果冬天到来》之类的图书，英国业界一直称之为“大卖图书”。这些名称虽然在语义上更受人偏爱，但在20世纪咄咄逼人的商业氛围里，它们毕竟显得过于温和。

不时有人建议，用“快销书”（fast-seller）这个词更为合适，因为畅销书的主要特征是其销售速度快，而非最终销售总量大。《天路历程》[75]和《达·芬奇密码》[76]相比，尽管作为一部宗教小说并不引人入胜，但其销售量是后者的几倍之多。不过这个销量是由500年来人们的虔诚阅读累积而来的。一个世纪以后，教会肯定还在，莱奥纳尔多[77]的画作还会在卢浮宫吸引大批参观者。我们可以自信地预言，班扬的基督教生活寓言仍会有读者，虽然人们可能只是为了欣赏其永恒不变的纯美文字。但丹·布朗反天主教的幻想作品还会有人读吗？很可能不会——文学考古学家除外——而且肯定不会为其语言而读。从2003年到2006年，《达·芬奇密码》的销量“超过”《天路历

程》之说只是在（短期内）它的销售速度更快这一意义上成立。那么，这两者当中，哪本更适合“畅销书”之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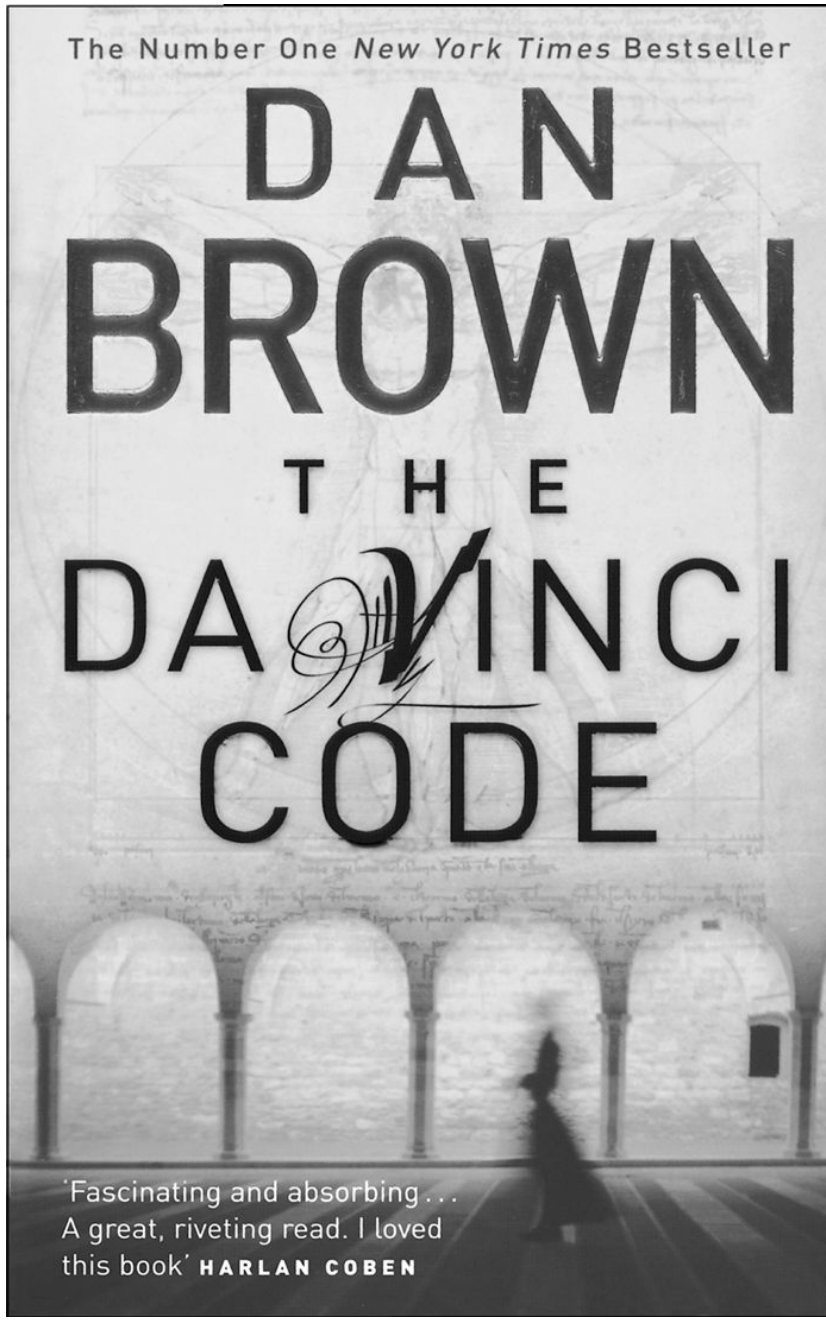
The Number On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DAN
BROWN
THE
DA VINCI
CODE
'Fascinating and absorbing . . .
A great, riveting read. I loved
this book' HARLAN COBEN

图3　《达·芬奇密码》：“畅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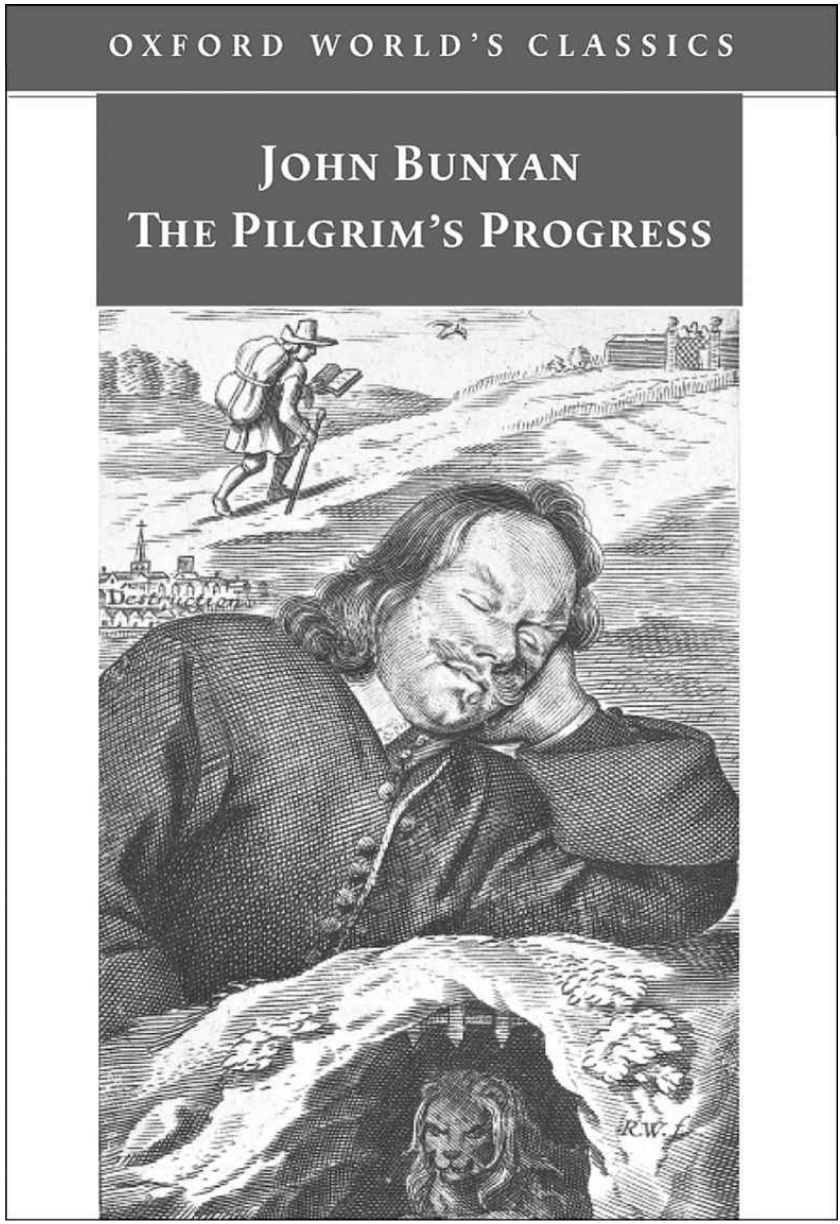

图4　《天路历程》：是畅销书吗？

文学畅销书

在每个畅销书排行榜上我们都应该加上一个劝人“及时行乐”（*carpe diem* ）式的标注：仅为今日之书；能读即读，阅后即弃。

首先我们必须对此作出谨慎限定。畅销书作为一个类别在内容和文学质量上都完全无法预测。没有人能够确定无误地预测市场的行情走势，久于此业的人对于图书销售有敏锐的直觉，但即便他们也无能为力。如果他们有这种本事，就不会有那么多出版商破产倒闭。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大多数小说的销量连成本都赚不回。但是，任何一本小说，或任何一种小说，都可能成功，其中甚至时有文学小说【78】。这种不确定性及其偶尔惊人的后果可以通过以下的问答测验显现出来：

问：米基·斯皮兰【79】和乔治·奥威尔有何共同之处？

答：他们在同一年创作的单本小说都卖出了600万册。

问：在什么地方能看到《1914年8月》和《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放在一起？

答：在1973年的畅销书榜上，作为排名前两位的畅销书。

问：以下这几本书——《日瓦戈医生》、《一个谋杀的解析》【80】、《洛丽塔》、《与马姆姑妈周游世界》【81】——有何共同之处？

答：这些书都曾是1958年不同时间段的当周最畅销小说，也是当年年终排行前四名（排序同上文所列先后顺序）。

这些畅销书单可制作成一个相当体面的教育课程，也可用来声讨英美两国业已堕落的大众趣味。Q. D. 利维斯【82】就曾在1932年以其《小说以及广大读者》一书对这种趣味进行过严厉批评。从销售情况图表来看，其实任何小说都堪胜此任：不管它是高雅文学（如E. L. 多克托罗【83】1976年美国排名第一的畅销小说《雷格泰姆音乐》）、内容血腥暴力的廉价通俗小说（如斯皮兰的《我，陪审团》，1946年纸皮本小说排名第一），还是愤世嫉俗却粗制滥造的劣质品（如埃里克·西格尔【84】的《爱情故事》，1970年出版）。

那些位居榜首的小说，后世的人们可能有一天会将其视作“经典文学”，如哈珀·李【85】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而当时在排行榜上与

其相邻的却是哈罗德·罗宾斯【86】那本几乎是色情小说的《提包客》（2007年2月，迈拉·欣德利称她和伊恩·布雷迪犯下那些臭名昭著的儿童谋杀案便是受了此书的教唆【87】）。是好是坏，这两本书都是1961年的畅销书。这一点——当然二者均为小说——是这两本书所有的共同之处。

以实际经验而论，畅销小说之所以成为畅销小说是因其畅销，而非其他因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潮流的起落，畅销小说可能会出现一些周期性的变化，但要从中找到重要的规律、倾向或对称性的变化，即便并非毫无意义，也是相当困难的。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三章详细讨论。

注释

【1】沃里克·迪平（Warwick Deeping，1877—1950），英国小说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出版大量畅销小说而闻名欧美。——译注，下同

【2】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代表作有《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等。

【3】格特鲁德·阿瑟顿（Gertrude Atherton，1857—1948），美国女作家，《黑牛》是其最著名的流行畅销小说。

【4】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现代主义小说家，以“意识流”手法及艰涩难懂的语言著称，《尤利西斯》是其代表作。本译文中部分作家和电影导演的注释出自《英汉大词典》相关条目，译者酌情稍作增删。

【5】T. S. 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英国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长诗《荒原》是其代表作。

【6】D. H. 劳伦斯（D. H. Lawence，1885—1930），英国小说家、诗人和批评家。

【7】叶芝的剧作《伯爵夫人凯思琳》中的句子。W. B. 叶芝（W. B. Yeats，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

【8】英国女小说家海伦·菲尔丁（Helen Fielding，1958—）于1996年出版的畅销小说，1999年又出版了续集《布丽奇特·琼斯：理智的边缘》。

【9】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美国作家，以描写“爵士乐时代”著称。

【10】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英国作家，著名的赫胥黎家族的杰出成员之一。《多个夏天以后》是其在1939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书名借用了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句“A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n”。

【11】 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是理查德·巴赫（Richard Bach，1936—）的同名童话小说中的主人公。

【12】 原文为Jesus tripping，tripping指吸毒后的巅狂状态。

【13】 “斗牛狗”德拉蒙德：英国小说家萨珀（即H. C. 麦克尼尔：H. C. McNeile，1888—1937）系列小说中的人物，是一名出身上流社会的富有退伍军人，相貌平平但勇武过人，具有斗牛狗的勇敢、忠诚等品质。

【14】 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英国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的朋友。

【15】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国小说家，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6】 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美国幽默小说家，《哈克贝利·费恩》（全名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其代表作。

【17】 指当时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县，据称马克·吐温的小说语言就是采用该县的方言。

【18】 下文提到的法国作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02—1870）所著经典冒险小说。

【19】 以上译文摘自成时译《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

【20】 指英国浪漫主义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司各特是苏格兰人，而苏格兰位于英国北部，故得此绰号。

【21】 指沃尔特·司各特的叙事长诗，诗中有传递燃烧十字架的情节。

【22】 三K党是美国奉行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组织，焚烧十字架通常是他们进行种族迫害和实施暴力行动的前奏。

【23】 汉弗莱·沃德夫人（Mrs Humphry Ward，1851—1920），英国小说家，代表作包括《罗伯特·埃尔斯梅尔》、《埃莉诺》等。

【24】 英国19世纪的著名出版公司。

【25】 英国伦敦西区的一条著名商业街。

【26】 美国的第一部国际版权法。

【27】 埃里克·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德国小说家，《西线无战事》和《凯旋门》是其代表作。

【28】 里昂·孚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1884—1958），德国犹太裔小说家。

【29】 维基·鲍姆（Vicki Baum，1888—1960），奥地利女小说家。

【30】 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1893—1947），德国20世纪著名作家。

【31】 弗朗茨·魏菲尔（Franz Werfel，1890—1945），德国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

【32】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1949—），德国小说家。

【33】 卡伦·布利克森（Karen Blixen，1885—1962），丹麦女小说家。

【34】 米卡·瓦尔塔里（Mika Waltari，1908—1979），芬兰历史小说家。芬兰和丹麦都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

【35】 安娜玛丽·泽林科（Annemarie Selinko，1914—1986），旅居丹麦的女小说家。

【36】 书名“黛丝蕾”是拿破仑的初恋情人的名字，国内通常译作《我与拿破仑》。

【37】 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1924—2004），美国电影演员，曾主演《教父》、《欲望号街车》等影片。

【38】 尼娜·费多罗娃（Nina Fedorova，1895—1980），俄国出生的美国小说家。

【39】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1890—1960），苏联诗人和小说家，所著《日瓦戈医生》为其赢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

【40】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生于俄国的美国作家。《洛丽塔》是他最有名也最具争议的作品。

【41】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1918—2008），俄罗斯小说家与历史学家，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42】 弗朗索瓦丝·萨冈（Françoise Sagan，1935—2004），法国女小说家。

【43】 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国女作家，著名女权主义者。

【44】 朱塞佩·迪·兰佩杜萨（Giuseppe di Lampedusa，1896—1957），意大利小说家。

【45】 考琳·麦卡洛（Colleen McCullough，1937—2015），澳大利亚女小说家，《荆棘鸟》是其最畅销的作品。

【46】 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Vicente Blasco Ibañez，1867—1928），西班牙小说家。

【47】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诗人和小说家。

【48】 劳拉·埃斯基韦尔（Laura Esquivel，1950—），墨西哥女小说家。《恰似水之于巧克力》是其最畅销的小说，曾被改编成电影《浓情巧克力》。

【49】 P. C. 雷恩（P. C. Wren，1885—1941），英国小说家。

【50】 P. G. 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1881—1975），英国幽默小说家、剧作家，后入美国籍。

【51】 伊迪丝·M. 赫尔（Edith M. Hull，1880—1947），英国女小说家。

【52】 A. 汉密尔顿·吉布斯（A. Hamilton Gibbs，1888—1964），英国小说家。

【53】 玛格丽特·肯尼迪（Magaret Kennedy，1896—1967），英国女小说家、剧作家。

【54】 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1895—1956），英国亚美尼亚裔小说家。

【55】 拉斐尔·萨巴蒂尼（Rafael Sabatini，1875—1950），英国小说家，生于意大利，主要创作历史小说。

【56】 A. S. M. 哈钦森（A. S. M. Hutchinson，1880—1971），英国小说家。

【57】 指牛津大学。

【58】 小说中盖茨比的原名。

【59】 理查德·卢埃林（Richard Llewellyn，1906—1983），英国小说家。

【60】 吉米·杜兰特（Jimmy Durante，1893—1980），美国意大利裔喜剧演员；这句话可能是说片中的演员都不像威尔士人。

【61】 简·斯特拉瑟（Jan Struther，1901—1953），英国女小说家。

【62】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应急建造的支援英国的货船。

【63】 A. J. 克罗宁（A. J. Cronin，1896—1981），英国小说家。

【64】 弗吉尼亚·吴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著名女小说家，是最早以“意识流”进行创作的作家之一。

【65】 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1874—1965），英国作家，以其短篇小说创作最为著名，长篇小说代表作包括《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

【66】 托尔金（J. R. R. Tolkien，1892—1973），英国语言学家和小说家。创作了著名的“魔戒”三部曲。

【67】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英国小说家，以写作间谍小说闻名。

【68】 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1926—2005），英国著名作家，小说

《法国中尉的女人》是其代表作。

【69】 约翰奥格罗茨和兰兹角分别是英格兰最北端和最西端的两个地方，这里用来表示英国各地。

【70】 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英国女小说家，以描写乡村中产阶级生活尤其是妇女生活著称，代表作有《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等。

【71】 肯·福莱特（Ken Follett，1949—），英国惊险小说和历史小说作家，代表作有《针眼》、《世界之柱》等。

【72】 原文为browse，也有“捡嫩草吃”的意思。

【73】 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1811—1863），英国小说家，作品多讽刺上层社会，代表作是《名利场》。

【74】 bestseller一词直译是“销售最好”的图书（或其他商品）。

【75】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的长篇宗教寓言小说。

【76】 美国小说家丹·布朗（Dan Brown，1964—）创作的一部宗教题材的畅销小说。

【77】 即莱奥纳尔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

【78】 指不同于通俗小说、具有较高文学研究价值的严肃文学作品。

【79】 米基·斯皮兰（Mickey Spillane，1918—2006），美国小说家，创作了以迈克·哈默为主人公的系列侦探小说。

【80】 美国作家约翰·D. 沃克尔（John D. Voelker，1901—1991）的法庭小说。

【81】 作者是美国小说家帕特里克·丹尼斯（Patrick Dennis，1921—1976）。

【82】 Q. D. 利维斯（Q. D. Leavis，1906—1981），英国女文学批评家。

【83】 E. L. 多克托罗（E. L. Doctorow，1931—2015），美国著名作家，《雷格泰姆音乐》（一译《褴褛时代》）是其代表作。

【84】 埃里克·西格尔（Erich Segal，1937—2010），美国畅销小说家。

【85】 哈珀·李（Harper Lee，1926—）美国女作家，《杀死一只知更鸟》是其自传体小说。

【86】 哈罗德·罗宾斯（Harold Robbins，1916—1997），美国著名畅销小说家，作品常以金钱、情欲等为主题。

【87】 迈拉·欣德利（Myra Hindley，1942—2002）和她的情人伊恩·布雷迪（Ian Brady，1938—）是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在20世纪60年代

绑架并虐杀了5名10岁至17岁的儿童和少年，后双双被判处终身监禁。迈拉·欣德利已在2002年病死，此处可能指2007年2月播出的关于她的电视剧中出现的相关内容。

第二章

现代场景

定义（续）

15世纪西欧发明了图书抄本印刷技术，而此时造价低廉的纸张也从东方传入。通过采用这种新技术，各种读物可以大批量地即时生产。同时，由于人们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城市化，社会已经具备了消费这些产品的条件。

复制一本手抄图书再也不需要花费数月辛苦抄写了。此时的问题已经不是书商能够以多快的速度生产出图书（这曾是寺院缮写室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是他需要多久才能把图书推向市场。

书籍和钱币都是历史上最先大规模生产的物品。如果不是因为铸币机和印刷机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和思想的流通——现代社会就不可能诞生。虽然我们无法知晓真实的情形，但企业主卡克斯顿的小说集、马洛里的《亚瑟王之死》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很可能就是早期书商鱼龙混杂的书单上最畅销的几部书。[1]

狂销之潮

印刷机具备同时大量印制书籍的生产能力，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反过来又刺激了他们的胃口——这种现象可以称作“文化躁狂症”：畅销书的热卖，正是利用了这种狂热追捧、这种“我现在就要”的急切心情。“现在”意味着此时此刻就要拿到手：下个星期再买就太晚了。

畅销小说的历史可以通过以下的这几个画面来概括。1819年，读者们像橄榄球运动员一样互相推搡，争购司各特的《罗布·罗伊》[2]，他们为看到书的内容而迫不及待地撕去其黄色包装纸，在伦敦大街上贪婪地读起小说的头几页。另外一个场景：货船驶入纽约港，码头工人对着即将停靠的船只大声询问：“小耐儿死了吗？”[3] 1960年11月13日，书店开门前几个小时，人们为争购刚被宣判“无罪”的“查夫

人”[4]，门口已经排起长队（“要放在普通纸包里吗？”店员礼貌地问道——劳伦斯的小说确实被判无罪，但也不是什么真正体面正派的书）。

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波特热”现象，已经达到了空前疯狂的地步。2005年7月19日午夜钟声刚刚敲响，J. K. 罗琳[5]就推出了她的魔法男孩系列传奇小说的第六部。

在发售时间到来之前，罗琳的新书像藏匿禁运品一样被严密封存看管。而当发售新书的魔法时刻即将到来之际，英国各地的人群开始聚集到大街上、书店前。很多人头上戴着高礼帽，手里拿着扫帚柄（店员们也因这股波特热忙得夜不能寐）。店门打开那一刻，顾客们不像是在千百种书籍中挑选罗琳的小说，而更像是着了火的电影院里往门口逃生的观众在奔窜的途中停下来买包爆米花的情景。开始发售后24小时之内，《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在全国书店售出100多万册，电子书店的销量也相差无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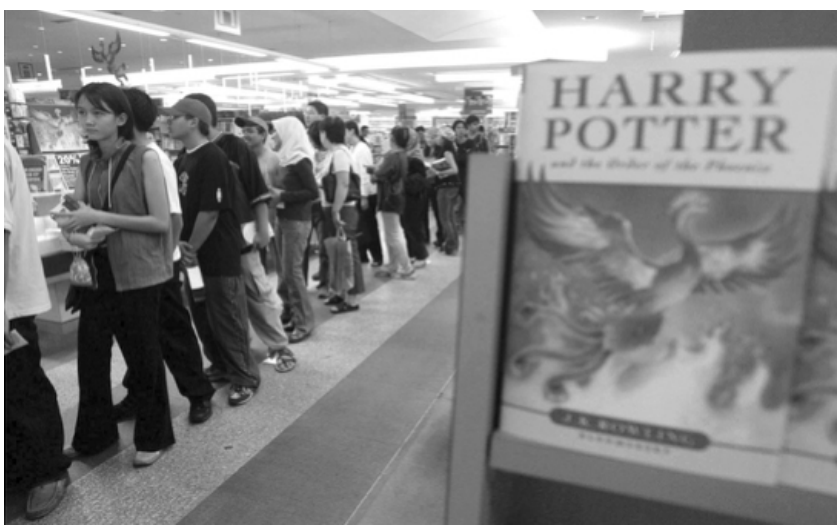

图5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五部全球首发日的当天，“波特热”席卷科隆坡

抢购之风

畅销小说的确不时会制造这种疯狂抢购的场面——但罗琳的小说所掀起的壮观场面却极为少见。问题是，既然如今阅读已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行为，为什么人们会同时去读一本“当下的书”呢？现在的图书种类如此繁多（还有那么多时间），足供口味挑剔的读者选择——拿电影、电视或实时剧场表演来说，图书的种类要远比它们丰富。小说读者的选择也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亚马逊网站新旧书目每周都在增加。敲几下键盘，输入一串印在信用卡上的数字，读者就可以挑选购买大约两百万种小说，而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长。小说实在太多，人的一生即使几乎全部花在读书上——甚至死时也手不释卷——最多也只能揭去书山顶上一层土。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读者在同一时刻集中读某一本，或某前10本，或（像最近几年）前100本书呢？他们为什么不理性地浏览一下摆在眼前的众多读物？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就想读小说，为什么不去读读10年、20年或100年前的畅销小说呢？

就类型小说而言，“忠诚”而非“狂热”是影响购买的主要因素。读者往往会“忠诚”于某一类别的图书（如科幻、浪漫或恐怖小说），或偏爱某个作家（如斯蒂芬·金或安妮·赖斯，[6] 看看数不胜数有关他们的网站就能知道）。小说营销成功的关键在于做到丰富种类和及时更新库存，从这一角度看，这种忠诚和造就某部轰动一时的畅销巨作的狂热一样令人费解。不过，哪里缺乏理性，哪里就会财源滚滚。

新是关键

畅销小说或许讲述的是最纯净的故事，因为它永远是“新”的。这类小说最为新颖，并且持续得到更新。一旦付印，一本畅销小说就像暴露在早晨阳光下的德拉库拉 [7] ，其新鲜感会迅速消退，更新的后来者将取而代之。

自美国出现畅销小说排行榜以来，只有很少一部分小说能在榜首之位呆上两年，而即便这很少一部分也主要是因为这些书都是秋冬季

上架的跨年出版物。这些小说包括《大地》[8]（1931—1932）、《安东尼·阿德维斯》[9]（1933—1934）、《飘》[10]（1936—1937）、《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1972—1973）和《达·芬奇密码》（2004—2005）。《塞莱斯廷预言》[11]从1994到1996年在榜首附近徘徊了3年之久，没人明白其中原因。

我们很难看出这几本书有什么突出的文学品质或特点，能使其在如此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维持这么长的生命周期。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再阅读10年前的畅销书（从中寻找乐趣），也不大会看上周的报纸（寻找新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想要证据的话，比较一下牛津饥馑救济委员会的慈善商店和隔壁那家沃特斯通书店就行，看看这边书架和那家的“畅销图书”展示区，一目了然。

从文化角度看，畅销书榜的顶端是最容易滑脱的位置。而在技术上存在着两个排行榜：精装本和纸皮本排行榜。前一种，由于上榜图书崭新出炉，作品地位往往更不稳定。在两个排行榜中，只有很少的作品能挺过几个月；大多数上榜书只是（短暂地）露一下脸，然后就会（永远）消失不见。

人们会发现畅销小说和经典小说之间存在着互相对立的关系，这很耐人寻味。经典小说是指“牛津世界经典小说”或“企鹅经典小说”书系中的“经典重印本”。但即便是这些精挑细选的书单也会因时尚和潮流的影响而出现变化（尽管这种潮流变化速度很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安东尼·特罗洛普[12]如日中天：他的全部作品洋洋47册，悉数再版重印（有的甚至以平价本形式单独出版达5次之多）。在20世纪90年代，威尔基·柯林斯[13]的“奇情”小说发行量超过了“巴塞特郡纪事”系列。其他一些读者口味方面的变化也有迹可循。与畅销小说相比，经典小说在图书行情图上的起伏变化要缓慢得多，但即便没有这些波动，经典小说也并非是一成不变，永远保持其经典地位的。

人口构成方面的因素显然也影响到图书的命运。教育系统内制定教学大纲的人在他们的位子上往往一坐就是40年——这对其间的图书发展有一种稳定作用。新一代的读者群体可能口味略微不同，但一般每隔15年左右才能达到成人的文化程度，而死亡会在另一头缩小老年

读者群的规模。大众读者群体的总体构成情况始终在不断变化。出于现实的考虑，人们一般不把读者视作一个单一整体，而是更加理性地把他们看作一个由多个小规模兴趣群体组成的、可变的集合体。一个50岁的人所受的是20世纪70年代教育体系的教育，他在假期里很可能随身带上一本乔治·艾略特【14】的书。一个30岁的人由20世纪90年代的教育系统塑造而成，他可能带上（那时更加流行的）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15】的小说。花甲老妪不太可能会读她们的孙女们爱不释手的少女文学，而其男性伴侣更倾向于选择约翰·勒卡雷，而非安迪·麦克纳布【16】。

图书业界已经推出了涉及不同地域和题材的畅销小说排行榜，但目前尚无针对某个年龄段或某代人而设计的畅销书榜（尽管以后肯定会有）。

死而复生的畅销书

想要在极其容易滑落下来的畅销书榜顶端呆过一年固然不易，但一部畅销小说试图“死而复生”更难如登天。一部小说一旦离开畅销书榜超过一年，绝少能够梅开二度。即使这种情况果真发生，一般也都有明显的外部因素作用。历史上首部克服困难两次登顶的小说是劳埃德·C. 道格拉斯【17】的《圣衣》。这部小说以情节剧的手法重述福音书故事，1943年成为排行榜排名第一的畅销书，1953年再度登顶。《圣衣》在沉寂10年后再度走红，完全应归功于1953年拍摄的那部场面宏大的塞西尔·B. 德米尔【18】式同名改编电影。

在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19】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的家世小说《福尔赛世家》同样因1967年改编成电视剧而重获新生。该剧曾令英国人为之痴迷。由于奥普拉·温弗瑞【20】读书俱乐部的推崇，赛珍珠的《大地》和约翰·斯坦贝克【21】的《伊甸园以东》在几十年后又再次上榜，成为龟鹤遐龄的畅销小说。最不可思议的是，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纸皮版竟然在1994年春天登上英国畅销书榜，并连续占据

榜首长达一两月之久，而这部书之所以能再度热销，仍然是因为受惠于安德鲁·戴维斯[22]那部广受欢迎的电视改编剧。

除非有上述特殊情况，畅销小说往往青春短暂，如同陈年的积雪，一旦消逝，再难重现。好奇心强的人会由此想到另一个令人长期思考的现象：为什么1925年“每个人”都在读《索雷尔父子》，又为什么1950年时在读《红衣主教》[23]、1971年又在读《汽车城》[24]？这些书如今都已绝版，人们想读还得到版权图书馆里去找。

要想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可以回溯到那些年月，寻找其时代精神（*Zeitgeist*），分析当时各种因素——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商业的因素——如何共同作用，这些因素可以使某部小说达到某个历史水平。以这种眼光看，畅销小说是一个为其时代服务的文学实验，但也仅仅是为其时代服务而已。细观畅销小说不难发现，这些作品都是为它们诞生于斯的那个时代量身定做的。

鉴于畅销小说丰富多样，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认真研究这些作品理应不无收获，不过通常情况并非如此。但畅销小说也非一无是处。这些作品短期内在某一社会环境下大受欢迎，可以为我们提供其所处社会阶段的一些情况，因此是信息最为丰富的文学史料之一。

纸皮本畅销小说

再版小说是对新书的一种补充，首创于亨利·科尔伯恩和理查德·本特利[25]在19世纪30年代设计的“标准小说”系列。这两位颇具胆识的伦敦书商发明了一种双轨制：一方面，新书以昂贵的价格上市（一个半几尼，令人望而却步），风险高，但单位利润率也高；另一边厢，出版商将少量“十拿九稳”的小说——其昂贵版本已获成功——以（售价6先令的）再版小说的形式投放市场，此时从售出的每本书中还能获取较少一些（但更为稳妥）的利润回报。

这种双轨制一直沿用到现在。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讲，这是一种最大利润（精装本）/最小损失（纸皮本）双管齐下的策略。相对而

言，如果一部小说并未先凭借其昂贵版本取得成功，那么之后则很少能在大众市场上以纸皮本的形式大有斩获。

英美两国大众市场上的纸皮书差不多是在20世纪30年代同时出现的，但具体情形迥然不同。在英国，大众市场纸皮书的先驱是艾伦·莱恩【26】，他在1935年创立了企鹅出版社。莱恩曾在伍尔沃思公司的“3便士和6便士”商店【27】尝试销售纸皮书，但很快失败。其后，他那些外观时尚、设计风格独特的再版书便开始在普通书店销售。企鹅图书从一开始就是当作精装书销售的平装本，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企鹅版的图书甚至更加体面。而对于一位作家而言，其作品如果能被“纳入企鹅丛书”，那就标志着其作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莱恩是英国首屈一指的纸皮本图书出版商，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始终避免使用图片封面。他认为这样的封面庸俗不堪。他要求编辑们在纸张质地、设计式样和印刷字体上多下功夫，力求推出制作最精美的再版小说，同时也体现出艾伦·莱恩一贯追求的品质。

在美国，大众化纸皮本图书的创始人是罗伯特·德格拉夫【28】。他的策略不是把他的图书放到传统书店中销售，而是整个儿绕过书店。德格拉夫的“口袋书”每本25美分，实质上是一种“杂货店”纸皮书。这种书的特点是封面图案吸引眼球，采用新闻纸（比卫生纸高一个档次）印刷，印刷质量一般都很粗劣。这些书的市场思路是当作生命短暂的杂志而不是书来卖（书是文明的物件），而且还不一定是较为体面的那种杂志。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及此后的“纸皮书革命”以来，英美两国的大众书市在外观和营销风格上已经趋于相同。美国的纸皮书在档次上有所上升，而英国的则有所下降。

总体而言，大众化的纸皮书至今仍然不具备学术批评价值——小说尤其如此。人们通常不会为其撰写书评，也不大会有人骄傲无比地把这些东西摆放在书店橱窗里。这种排挤对于某些“类型小说”来说是种遗憾。对于这种小说时有严肃评论，但通常出自书迷杂志或最近出现的网友杂志。

相较之下，“批评界的意见”对于精装本小说的成败通常至关重

要。

注释

【1】 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约1422—1491），英国印刷商和翻译家，英国第一家印刷企业的创办者；马洛里（Thomas Mallory，？—1471），英国作家；乔叟（1340？—1400），英国诗人，代表作是《坎特伯雷故事集》。

【2】 沃尔特·司各特发表于1817年的小说，讲述了18世纪苏格兰一个传说中的绿林英雄的传奇故事。

【3】 指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老古玩店》中的情节，该小说最初在英国一家杂志上连载，小说女主人公小耐儿的命运成为读者关注的话题。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英国19世纪著名小说家，著有《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和《双城记》等小说。

【4】 指D. H. 劳伦斯的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此书首次发表于1928年，但因包含多处性描写而被迫删节出版。1960年企鹅书店冒险出版了未删节版，遭起诉。在诸多著名作家的声援下，法庭作出无罪判决，此书获准全文出版。

【5】 J. K. 罗琳（J. K. Rowling，1965—），英国女小说家，从1997年到2007年共出版了7部“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她的小说在全世界引发了影响巨大的魔法故事阅读热潮，也使她成为第一位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作家。

【6】 斯蒂芬·金（Stephen King，1947—），美国当代作家，以其恐怖小说闻名；安妮·赖斯（Anne Rice，1941—），美国女小说家，以写作现代吸血鬼小说闻名。

【7】 德拉库拉是英国作家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1847—1912）同名小说中的主角，是一个吸血鬼伯爵，最后因暴露在阳光下而灰飞烟灭。

【8】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创作的反映旧中国农民生活的最著名的长篇小说。1938年赛珍珠凭借该作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9】 美国小说家赫维·艾伦（Hervey Allen，1889—1949）创作的长篇小说。

【10】 美国女小说家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1900—1949）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1939年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获得巨大成功。

【11】 美国作家詹姆斯·雷德菲尔德（James Redfield，1950—）最著名的畅销小说。

【12】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国小说

家，著有“巴塞特郡纪事”（巴塞特郡是虚构地名）系列小说，其中包括《养老院院长》、《巴塞特寺院》等。

【13】 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1824—1889），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包括《白衣女人》和《月亮宝石》。

【14】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909），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重要女作家，代表作有《米德尔马契》、《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织工马南》等。

【15】 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Mary Elizabeth Braddon，1835—1915），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小说家，所著小说《奥德利夫人的秘密》曾经轰动一时。

【16】 安迪·麦克纳布（Andy McNab，1959—），英国人，曾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服役，后将其经历写成小说。

【17】 劳埃德·C. 道格拉斯（Lloyd C. Douglas，1877—1951），美国牧师，《圣衣》和《伟大的渔夫》是他最著名的宗教小说。

【18】 塞西尔·B. 德米尔（Cecil B. DeMille，1881—1959），美国电影制片人、导演，其电影常以豪华壮观的场面和布景见长。

【19】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0】 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1954—），美国著名黑人脱口秀电视节目女主持人，是一个妇女读书俱乐部的组织者。

【21】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 1902—1968），美国小说家，作品多以农业工人为题材，196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愤怒的葡萄》是其代表作。

【22】 安德鲁·戴维斯（Andrew Davies，1936—），英国作家、编剧。他为英国广播公司改编的电视剧本《米德尔马契》拍成电视剧后大获成功。

【23】 美国小说家亨利·莫顿·鲁宾逊（Henry Morton Robinson，1898—1961）创作的小说，相关内容见本书第四章。

【24】 英国小说家阿瑟·黑利（Arthur Hailey，1920—2004）创作的反映汽车行业故事的小说。

【25】 亨利·科尔伯恩（Henry Colburn，1784—1855），英国出版商。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1794—1871），英国出版商。

【26】 艾伦·莱恩（Allen Lane，1902—1970），英国出版家。

【27】 伍尔沃思公司是英国的一家零售公司，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各地开设了多家销售3便士或6便士廉价商品的连锁商店。

【28】 罗伯特·德格拉夫（Robert de Graff，1895—1981），美国出版家。

第三章

领域与排行榜

领域介绍

我们这本介绍性的小书容量有限（长篇介绍也是如此），即便只介绍一下单单一周内出现的畅销书也难胜其任。肯·格尔德在他关于通俗小说的专著中，提出可以用两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并将其压缩精简至可以讨论的程度。

一种方法策略是分类法。应用这一方法，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分类目录。这个目录通常以时间顺序排列，条目都必然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比如，从《罗伯特·埃尔斯梅尔》到罗伯特·勒德勒姆[1]，每个条目都会加上注解文字——评论性文字或社会背景方面的说明——和一些起佐证作用的统计数据。格尔德对这种方法不无疑虑。

格尔德所支持推崇的方法是以当代文学理论——对他而言，这些理论主要来自皮埃尔·布迪厄[2]——为工具，“绘制出这个领域的文化地图”。格尔德认为“畅销小说”一词颇不合宜，因而更倾向于选择“通俗小说”这个名称。在格尔德看来，后一种提法把小说的创作意图摆在了首要位置。写作“文学小说”的（潜在）作家与通俗小说作家的创作动机大相径庭。当然，文学小说也可能成为通俗小说——甚至畅销小说——但一般并不以此作为其创作的出发点。

格尔德描述的两种方法存在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研究对象（“畅销小说／通俗小说”）的数量过大，种类过多。这个数量确实太大。一名学制3年或4年、修读英国文学高级课程的本科大学生在最后考试时也才需要掌握大约50部作品的内容。自从19世纪这个学科的学位课程开设以来，这个数目始终与那些亘古不变的古典文学作品的数量相当。这些古典文学作品从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流传至今，其内容加起来用两张3.5英寸的软盘即可容纳。

畅销小说数量众多，每年的出版数量都相当于又增加了一套经典文学全集。而如果要研究《项狄传》[3]这部作品，仅仅认真研读一年内发表的研究著作，即便是可以投入全部精力，也需要花费3年的

时间。

畅销小说／通俗小说研究期待有林奈 [4] 式的人物出现。摸清这一领域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也不是任何一个学者所能独力承担的，不管这个学者如何勤奋。而林奈这位伟大的瑞典植物学家研究的植物世界与此不同，它不会快速扩展，不必担心科学界来不及为那些植物样本想出名称。因此，实用主义加上点儿杰克·霍纳式（伸进大拇指，抠出些果干来） [5] 的自我陶醉仍然是最为明智有效的批评方法。

果真是“排行榜”吗？

某本畅销书得以被视作畅销是因为该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占有一席之地，但该排行榜本身的编排也很古怪奇特。比如，排行榜上的销售数字与出版商账册中的记录不尽相同，也不是“图书观察”之类的数字化汇编材料，这些材料业界如今已经能够通过国际书号识别和销售网点监控获得——现代新技术已能够跟踪记录图书购买的规律、潮流以及突然出现的急剧增长，精确程度可以达到个位。另外还可以通过公共租借登记（PLR）获取数据。公共图书馆因收费之需会有出租图书的登记信息。

畅销小说排行榜既是事前之物，又是事后之物，其存在既为记录销售，也为促进 销售。这样的排行榜不断变化，而非静止不动；是图书销售的引擎，而非简单记录的目录。在图书业界，图书排行榜方面的事务由公关宣传部门负责，而不属于财务会计部门的管辖范畴。

一旦某本小说占据令人垂涎的榜首之位，此书必然会因此销量大增。商品销量的这种动态变化记录首先是在通俗音乐领域发展起来的，也在这一领域得到最为有效的利用。在通俗音乐界，“排名第一”是极有价值的资本，为获此殊荣，一些音乐制作经理人常常把道德原则抛诸脑后，向唱片销售商店行贿送礼。同样，时常有人怀疑是美国的书商雇用书托们一窝蜂地涌到参与排行统计的那些书店购书。

出版商越来越愿意出钱买下书店（或网上书店）的黄金陈列位置。他们疯狂降价，与其说是为售出图书，不如说是为挤入前10名、前20名或前50名。因为一旦占据了排行榜上的这些位置，其上升势头往往势不可挡，推动销量不断提高。

排行榜（二）

完全无视其他因素，仅仅把销售速度和销售量作为依据对某些图书进行筛选和排名，这一做法始于1895年，其首创者是美国月刊杂志《书人》及其编辑哈里·瑟斯顿·佩克[6]。

佩克的杂志敢为天下先，首次“以需求量为序”选取一些新书进行排名——衡量需求量的标准是销售单位。最初的排行榜每月公布一次，有十余本书（均为小说），年底进行年度排名。在19世纪90年代这一排行榜出现的初始阶段，《书人》杂志的畅销小说排行榜主要被英国图书占据（“圈占”）。1895年的排行榜中，位列前10名的作品中有7部来自英国。

前面已经提过，这一局面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直到1891年，美国始终拒绝签署有关国际版权的法规协定。因此，美国的书商们要是盯上哪本新出的英国书，他们可以随意拿来出版，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因而他们对这么做都十分积极踊跃。

“畅销书”这个复合名词的使用，最早的记录是在1902年。1912年，美国行业杂志《出版商周刊》开始发布畅销书排行榜，这个排行榜自此始终颇具权威。一年后，该杂志开始将畅销书（通常是每周10本）划分为小说与非小说类，尽管“畅销书”这个词给人的第一感觉（就像在本书中）是某种小说。

从1913年开始，对畅销书又有了进一步的细分：主要的几类包括精装书和纸皮书、儿童图书和“指南”手册类书籍。地域差异甚至商店之间的差异都会被记录下来，汇总到一个中央监控数据库，以备分析。例如，沃特斯通书店在伦敦的一家旗舰店（伦敦大学学院旁边那

家，从前是迪伦大学书店）的销售规律就与皮卡迪利大街上的另一家旗舰店（从前叫辛普森书店）迥然不同。Epos（electronic point of sales：电子销售网点系统）获取的数据也使零售系统较以前大为敏感。这一系统正合出版商之需，就像手套，戴起来更加舒服合适了。如今，我们已经能够确定“某日”甚至“某时”之书了。

畅销的是书还是作者？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7] 在她56年的创作生涯中，只凭借《帷幕》（1975年名列第三）和《沉睡的谋杀案》（1976年排名第二）两次接近年度畅销小说榜首位置。上述两部小说其实早已写就，本来都是计划待其去世后作为遗作出版的。

克里斯蒂于1916年作为护士参加一战，她在短暂休假期间写就了《斯泰尔斯庄园奇案》（1920）一书。自那以后，据粗略估计，她创作的几十部侦探小说在全球范围内售出了约两亿册（举个例子，她在法国是作品最为畅销的小说作家，势头盖过乔治·西门农[8]）。如今，她的小说销量每年仍然数以百万计。《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还把她认定为史上“最为畅销”（确确实实 最畅销）的小说家。

“克里斯蒂案例”（借用其追随者埃勒里·奎因[9] 最喜使用的命名模式）凸显出“畅销书”这一术语在使用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尽管从小说在排行榜上的位置来看，克里斯蒂的哪本书从严格意义上讲都很难称得上是“最畅销小说”，但“侦探小说女王”克里斯蒂是“畅销作家”这一事实却无可争辩。玛格丽特·米切尔和哈珀·李都只写过一部小说，即《飘》和《杀死一只知更鸟》，这两本书分别于1936年和1961年荣登畅销书榜榜首位置，故成为“最畅销小说”，但人们不会称其作者为“畅销作家”。事实上，这两位作家的公共形象相当模糊。李的小说是学童的必读书籍，但许多孩子认为她是一个男作家。

图6　阿加莎·克里斯蒂

在类型小说领域，作家们推出的作品通常汗牛充栋，是书还是作者畅销这个问题也因此尤为复杂难解。畅销小说作家埃德加·华莱士【10】被誉为20世纪上半叶的“惊悚小说之王”，但除了《四侠士》，他的其余作品始终销量平平。当然，总体而言，这个称号他受之无愧。实际上，华莱士一年到头似乎都在靠一台口述录音机和几个速记员以诺菲尔德公司生产莫利斯牌摩托车的效率出版相同类型的小说。

芭芭拉·卡特兰【11】——在版权图书馆里，她的名下拥有600多本小说——也是在一批誊文工（人们想象，可能穿着招牌式的粉红色制服）的协助下创作了大量小说。她的书没有一本是“最畅销小说”，但她无疑是个“畅销作家”。

显然，工厂式大规模生产出来的文学作品，如同众多文学小玩意儿一样，都存在同类相似性。只要读一本卡特兰的摄政时期传奇，就等于读了全部。读一本华莱士的惊悚小说，下一本什么样基本已了然

于胸。但小说之于那个忠诚于品牌的读者大军，就如同酒之于酒徒，一本足矣，一千本也不嫌多。

并非像特威德尔德姆 [12] 说的那样，“畅销书是我觉得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们也需要持续关注创作者和创作产品、作家和作品以及个例与类型之间不断变化的对立关系，从这些方面对这个术语加以限定。

是否有反复出现的规律？

迈克尔·科达 [13] 在其相关专著《打造畅销书》中提出，美国的畅销小说有反复出现的规律模式。就像经济学中的拉弗曲线 [14] 或房地产市场中的繁荣 / 萧条周期一样，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相同类型的图书会以一定的规律反复出现。

科达的理论也许可以通过参考“宗教畅销书”的情况得到检验（或证明），这类小说常以弥尔顿式的昭示天道之任自命。那么在美国都有哪些年份这类图书销售量独占鳌头，成为那一年的最畅销图书呢？为此笔者设法将这些书编制成表，下面列出的就是这些包含耶稣及其门徒等人物的宗教小说在美国刚刚出版后销量超过其他小说的年份：

1855《大卫王室》约瑟夫·霍尔德·英格拉哈姆 [15]

1880《宾虚》卢·华莱士 [16]

1896《你往何处去》亨利克·显克微支 [17]

1897《追随他的脚步》查尔斯·M. 谢尔登 [18]

1943《圣衣》劳埃德·C. 道格拉斯

1948《伟大的渔夫》劳埃德·C. 道格拉斯

蒂姆·莱希和杰里·詹金斯 [19] 的《末世迷踪》系列小说是对《启示录》 [20] 的文学改编（已有多部成为畅销书榜排名第一的作品）。在该系列推出的最后一部《王国到来》（2007）中，救世主耶稣成了书中的一个主要人物。遗憾的很，这些作品更像小说而非预言。

宗教主题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很难看出有什么时间节奏或历史意

义。当然，这中间可能存在一些偶然因素，比如大灾难、世界大战、大规模移民以及现世主义与福音主义的潮流变化。人口问题可能也涉及其中。最终的结论还是困惑：那就是，小说变化的程式似乎确实来去无常，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但从长远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反复出现的主题。

迈克尔·克莱顿 [21] 在他于1990年出版的《侏罗纪公园》中大胆改写柯南·道尔 [22] 的《失落的世界》（1912）。他是否有意为之？这两部小说在各自的时代都大红大紫，这是否也纯属偶然？继《侏罗纪公园》之后，克莱顿（他向来是个乐于承认借鉴他人的作家）1995年又推出一部名为《失落的世界》的小说。他显然明白，他做的正是从（粗滥的）畅销小说原汁大汤锅中捞取一点素材，回锅重煮后再向大众推出。而读者们早已把这个问题抛诸九霄云外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8年后，“斗牛狗”德拉蒙德问世——一个笨拙的老派英国绅士承担起粉碎世界阴谋的重任。面对敌手卡尔森，德拉蒙德总是技高一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年后，詹姆斯·邦德现身小说世界，并开始与他的对头邪恶博士布罗菲尔德展开较量。创作007这个人物时，弗莱明 [23] 研究了萨珀（即H. C. 麦克尼尔）的惊险小说。两个极端英国式的超级英雄在那个年代如日中天，是否与当时战后出现的文化空档有关呢？

想法、剧情或叙述手法是没有版权的。一些（看似）原创性很强的畅销小说，用图书业内的行话说，往往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是有意为之，也许是无意巧合。在吹毛求疵的知识界，这叫做剽窃。但在这个一切免费的领域，重复利用司空见惯。这一现象是否会有什么模式或规律？这个论点促人思考，但在现阶段尚难证实。

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能用更为理性的方式将畅销小说划分类别，而不像现在这样用所谓“排行榜”把它们堆在一起，或粗略地将其圈进“情节剧小说”、“浪漫传奇”、“犯罪故事”等几个大类中。但在目前，我们仍无法做到。

节节攀升的销售量

清脆响亮地报出一系列的数字，特别是销售量的数字，可以充作畅销小说机制的背景音乐。看看这些数字不难发现，过去几十年间，“畅销小说”的销售门槛明显抬高了，虽然也不总是在直线上升。

一般说来，若以销售量而言，从前的畅销小说在今天已相形见绌。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安东尼·阿德维斯》4年内共售出60万册，这在当时是惊人业绩。70年后，这个数字不过尔尔。事实上，赫维·艾伦这部轰动一时的小说刚刚淡出排行榜，便被《飘》超越。《飘》在一年内卖出了100万册。如今，美国某些年份排名前5位的小说（以及英国的某些作品）销量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却也不足以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细观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畅销小说的详细记录，人们不难发现，畅销小说出自一部每年不断扩张的机器，其产量也在逐年相应增加。人口和收入在增加，公民受教育程度在提高，文化技术推陈出新，这些都是起作用的因素，但并不能完全解释小说销量的增长。关键的因素在于实施了垂直优化，通过这一手段，不同媒体之间建立了更为融洽的合作关系（和更加集中的所有权体系）。这部机器的工作效率因此得以大大提高。网上书店、连锁店和图书超市的问世，更使图书零售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发达程度前所未有。

且不论我们作何解释，畅销小说记录最为详细的那段历史，即20世纪和21世纪的美国畅销小说，其发展轨迹始终呈现上升趋势：销售量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

艾丽丝·佩恩·哈克特【24】在1945年研究分析了《出版商周刊》的相关记录，认为到那时为止最畅销的小说是查尔斯·门罗·谢尔登的基督教史诗《追随他的脚步》（1895），60年间此书共售出大约800万册（受一场因该书发起的“耶稣会怎么做？”运动的推动）。而《飘》（1936）的销量到1945年才达到350万册。

1965年，哈克特又作了一次类似调查，发现格雷丝·梅塔利尔【25】那部描写新英格兰近郊住宅区性丑闻的长篇情色小说《佩顿镇》

（1956）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售出将近1,000万册。1975年，哈克特发现，60年代的纸皮书革命后，有一些小说，如马里奥·普佐[26]的《教父》（1969）、彼得·布拉蒂[27]的《驱魔人》（1971）和埃里克·西格尔的《爱情故事》（1970）等，在5年之内销量竟达到上千万册。

由于调查的时间段较长（尽管在逐渐缩短），哈克特必须将首印书和再版书合并考虑，以此得出销售加速和大规模生产的一般性判断。查看一下一个世纪以内所有（美国）畅销小说的首年最大销售量，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根据单个因素来编制某种表单是有风险的，这在情况复杂的文学领域尤其如此。我们不想对以下所列作品的最高数值作过多解读，但作为某种潮流的反映，这些数字确实见证了一个势不可挡的增长模式：

1900：250,000	玛丽·约翰斯顿《拥有与占有》
1910：250,000	弗洛伦丝·巴克莱[28]《玫瑰园》
1918：500,000	比森特·伊巴涅斯《四骑士》[29]
1928：240,000	桑顿·怀尔德《圣路易斯雷伊桥》[30]
1936：1,000,000	玛格丽特·米切尔《飘》
1945：868,000	凯思琳·温莎《永远的琥珀》[31]
1951：240,000	詹姆斯·琼斯《从这里到永恒》[32]
1958：421,000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1968：300,000	阿瑟·黑利《航空港》
1969：418,000	菲利普·罗斯《波特诺的怨诉》[33]
1972：1,800,000	理查德·巴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
1976：250,000	E. L. 多克托罗《雷格泰姆音乐》

1977：1,000,000＋　　J. R. R. 托尔金《精灵宝钻》

1978：851,000　　詹姆斯·米切纳《切萨皮克》[34]

20世纪80年代以后，20万册这道销量门槛已不足为奇。例如，1983年，销售排名前25位的小说都过了这条线。1989年，共有63本小说销量超过10万。到了90年代，对于琼·奥尔、斯蒂芬·金、汤姆·克兰西、约翰·格里森姆和丹妮尔·斯蒂尔等作者[35]而言，首印百万册已是家常便饭。1986年是“精装本开始走向大众市场的一年”，畅销书榜前3名（奥尔的《猛犸象猎人》、米切纳的《得克萨斯》和加里森·凯勒[36]的《忘忧湖岁月》）的昂贵精装本首年销量均达百万册或更高。1991年，亚历山德拉·里普利[37]为《飘》写了一部续集《斯嘉丽》。这本书同原作一样，也成为该年的销售冠军，但销量是原作的两倍，突破了200万册大关。1994年，罗伯特·詹姆斯·沃勒[38]的《廊桥遗梦》销量又比《斯嘉丽》翻了一番，超过400万册。自此以后，首年销量达百万如同80年代过20万一样平淡无奇。

美国消费者愿意为精装本热门畅销新书支付的价钱（即书后标价），同销量或向作者预支的稿酬一样非同小可。金、格里森姆、斯蒂尔和杰弗里·阿彻[39]等人自90年代以来得到的稿酬都高达数千万美元。詹姆斯·克莱维尔[40]的《贵舍》是1981年的美国销售冠军（而克莱维尔是个英国作家），这本书洋洋1,200页，如果不打折需要花费消费者19.95美元。而接下来克莱维尔又在完成他的下一部小说《旋风》（1986）之前拿到预支稿酬500万美元。

对于销售方面的峰谷数字，我们不妨作几个假设。我们有理由相信，首年出版的精装本畅销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受到电影的挑战，50年代和60年代又面对来自电视的挑战，其销量一度有所下降。60年代，大众化纸皮书爆炸性增长，同样影响了精装书销量（“我等便宜的版本出来后再买”）。但到了80年代（一个强调“自我”的年代），人们似乎有一种类似于“我就想要，不能等了”的心态。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长以及日益敏感并已数字化的市场调查手段和广告也是推动销量上升的因素。由于实行了数字化和优化组合，从生产、发行到销售，从作者的文字处理系统到网络书店，整个

过程的成本大大降低。这让在维多利亚时代备受喜爱的精装本小说在如今变成了一种“廉价的奢侈品”。

注释

【1】 罗伯特·勒德勒姆（Robert Ludlum，1927—2001），美国小说家，作品以间谍小说为主，以“伯恩三部曲”最为著名。

【2】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社会学家，其理论对于文学、语言学和人类学产生过重大影响。

【3】 《项狄传》（又译作《商第传》）是英国18世纪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的作品。该作品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语言风格幽默诙谐，被视为最早的意识流小说之一。

【4】 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瑞典植物学家，创立双名法，最早阐明动植物种、属定义的原则。

【5】 杰克·霍纳是一首传统童谣里的男孩，他用大拇指从馅饼里抠出了李子或其他果实，还称自己是个好男孩。后来用Jack Hornerism表示耍小聪明自我欺骗。

【6】 哈里·瑟斯顿·佩克（Harry Thurston Peck，1856—1914），美国学者、作家和编辑，编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畅销书排行榜。

【7】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代表作包括《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等。

【8】 乔治·西门农（George Simenon，1903—1989），出生于比利时，后移居法国，是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

【9】 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美国小说家弗雷德里克·丹奈（Frederic Dannay，1905—1982）和曼弗雷德·李（Manfred Lee，1905—1971）合用的笔名。他们是一对表兄弟，二人用该笔名合作创作了大量畅销侦探小说。

【10】 埃德加·华莱士（Edgar Wallace，1875—1932），英国著名畅销作家，代表作包括小说《四侠士》和电影剧本《金刚》。

【11】 芭芭拉·卡特兰（Barbara Cartland，1901—2000），英国通俗浪漫小说家。

【12】 特威德尔德姆是英国小说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所著小说《镜中世界》中的一个人物。

【13】 迈克尔·科达（Michael Korda，1933—），美国作家和出版家，曾任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总编辑。

【14】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B. Laffer，1940—）1978年提出的一条曲线，用来表明税率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

【15】 约瑟夫·霍尔德·英格拉哈姆（Joseph Hold Ingraham，1809—1860），美国19世纪著名宗教小说家，创作了著名的基督教历史浪漫小说三部曲。

【16】 卢·华莱士（Lew Wallace，1827—1905），美国作家，代表作《宾虚》（全名为《宾虚：基督的故事》）是美国19世纪最畅销的图书之一。

【17】 亨利克·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波兰著名作家，190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8】 即查尔斯·门罗·谢尔登（Charles M. Sheldon，1857—1946），美国牧师和作家。

【19】 蒂姆·莱希（Tim LaHaye，1926—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牧师和作家；杰里·詹金斯（ Jerry Jenkins，1949—），美国多产畅销书作家。

【20】 《圣经·新约》的最后一章，内容主要是对世界末日的预言。

【21】 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1942—2008），美国著名畅销小说家和电影电视编剧、导演，作品多与科学和医学有关。

【22】 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失落的世界》是他创作的一部科幻小说。

【23】 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英国小说家，创作了著名的007系列间谍小说。

【24】 艾丽丝·佩恩·哈克特（Alice Payne Hackett），美国畅销小说研究者，详细信息参见英文部分的Further reading。

【25】 格雷丝·梅塔利尔（Grace Metalious，1924—1964），美国女小说家。

【26】 马里奥·普佐（Mario Puzo，1920—1999），美国意大利裔小说家，创作了著名的描写美国黑手党的《教父》系列小说。

【27】 彼得·布拉蒂（Peter Blatty，1928—），美国作家和电影制片人。

【28】 弗洛伦丝·巴克莱（Florence Barclay，1862—1921），英国女小说家。

【29】 即本书第一章提到的《乱世四骑士》。

【30】 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1897—1975），美国小说、戏剧作家。小说《圣路易斯雷伊桥》曾获普利策奖。

【31】 凯思琳·温莎（Kathleen Winsor，1919—2003），美国女小说家，历史言情小说《永远的琥珀》是其代表作。

【32】 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1921—1977），美国战争小说家，

《从这里到永恒》是美国战争文学经典作品。

【33】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美国著名作家，《波特诺的怨诉》是其最有名的作品。

【34】 詹姆斯·米切纳（James Michener，1907—1997），美国作家，长篇小说《切萨皮克》为其代表作。

【35】 琼·奥尔（Jean Auel，1936—），美国女小说家；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1947—）美国军事小说家；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1955—），美国犯罪小说家。丹妮尔·斯蒂尔（Danielle Steel，1947—），美国女小说家。

【36】 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1942—），美国作家、电台主持人。

【37】 亚历山德拉·里普利（Alexandra Ripley，1934—2004），美国女小说家，以《斯嘉丽》最为著名。

【38】 罗伯特·詹姆斯·沃勒（Robert James Waller，1939—），美国作家。

【39】 杰弗里·阿彻（Jeffrey Archer，1940—），英国当代畅销小说家。

【40】 詹姆斯·克莱维尔（James Clavell，1924—1994），英国小说家、电影编剧和导演。

第四章

美国畅销小说

“史前”概况

人们一般把苏珊娜·哈斯韦尔[1]的《夏洛特·坦普尔》（1794）视作美国第一部畅销小说（虽然作者本人出生并成长于英格兰）。这是一部与理查逊[2]作品类似的女子磨难小说，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纽约的故事，情节催人泪下。据已知的统计数字，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该小说大约发行了200个版本。哈斯韦尔的小说给美国的感伤浪漫小说烙下了难以抹去的最初印记，这类小说在“女性化的50年代”（即19世纪50年代）突然盛行一时。

19世纪的美国文坛拥有可以匹敌“《威弗利》作者”的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3]。库珀用皮袜子替代苏格兰短裙，用手枪替代苏格兰阔刀，用部落替代家族，把司各特的文学模式十分精明地改造成了本土化的美国故事。他的故事融合了古代苏格兰特色与“印第安故事”的传统及通俗成分（司各特的浪漫传奇为20世纪早期“西部文学”提供了更加深厚的文学基础）。

司各特的小说《罗布·罗伊》的影响在丹尼尔·P. 汤普森[4]的《青山男儿》（1839）中同样有迹可寻。《青山男儿》是一部讲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佛蒙特地区（美国的“苏格兰高地”）土地纷争和家族血仇故事的绿林强盗小说。20年间，汤普森的小说出版了大约50种版本。同库珀一样，在这个阶段，汤普森笔下的所谓“边疆”还只是美国东部的滨海乡村。

此时的文学还存在着南北地域的差异。马克·吐温曾经（半开玩笑地）声称，沃尔特·司各特给美国人看的传奇故事太多，因而“导致了”美国内战，但亚伯拉罕·林肯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这位总统说，他渴望与“那个发动了一场大战的小女人”握手。不管哈丽雅特·比彻·斯托[5]——而非哈珀斯费里突袭[6]——是导致美国内战的“原因”这一说法是否成立，《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都毫无疑问是第一部完全摆脱司各特和狄更斯的创作模式的美国畅销小说。当然，盖斯凯尔

夫人[7]的社会问题小说《玛丽·巴登》对这部小说的影响仍隐约可见——曼彻斯特的工资奴隶在这里变成了种植园奴隶。

斯托夫人的小说还是第一部“跑到”英国成为畅销小说的美国小说[8]，对于改变大西洋两岸文学交流的不平衡状况起到了些许作用。伦敦出版商乔治·史密斯[9]在他上班途中搭乘的头等车厢里发现有6个人在读他的那本（盗版）斯托小说，甚感惬怀。5年前，美国佬大量盗印由他出版的《简·爱》，这次他出手还击，总算是出了口气。

在美国，斯托的这本具有鼓动宣传作用的小说销量空前——需求量达每周1万本，令朱厄特印刷公司的印刷机疲于应对，也使波士顿的废奴主义情绪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通俗小说从未显示出如此鲜明强大的力量，即便狄更斯的作品也难以相比。斯托造就了一个长久发挥作用的纽带，这一纽带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把美国畅销小说和美国社会良知联系起来。“奴隶制何等可恶！”她的小说疾呼道。“失去家园是件何等可恶的事！”约翰·斯坦贝克在他的《愤怒的葡萄》（1939年排名第一）中如是呼应。“反犹太主义何等可恶！”劳拉·Z. 霍布森在她的《君子协定》（1947年排名第一；用约翰·安斯华斯[10]的话说，“这是一部禁书，一部销量排名第一的作品，一部未受足够重视的非主流现代主义大作”）中也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就这样，斯托的正义斥骂在她的国家出版的畅销小说中反复出现，不绝于耳。

不知是否与斯托有关，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部队中最为流行的读物是盗版的《悲惨世界》。苦役犯冉阿让的故事使这部小说成为了文学史上可能最饱含血泪的作品。事实上也的确悲惨无比，这本书的作者维克多·雨果[11]分文未得，而是划着他的文学木桨置身事外。

斯托是名女作家，这一点很值得注意。与英国小说相比，女性在19世纪中期美国通俗小说中留下的印记要深一些，这种差别在所谓的“女性化的50年代”尤为明显。这个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作品包括玛丽亚·S. 卡明斯小姐的《灯夫》（乔治·艾略特的《织工马南》故事的翻版）和玛丽·简·霍姆斯的《风暴与阳光》（1854）[12]。这些小说出自女作家之手，面向女性读者，又反映女性群体的兴趣与问题，体

现了与英国迥异的读者群特征，也不同于乔治·艾略特所说的“贵妇作家笔下的无聊小说”。女性群体在废奴运动中是个举足轻重的影响群体，对于美国的图书文化同样如此。

《汤姆叔叔的小屋》问世8年后，又一位女作家安S. 斯蒂芬斯[13] 脱颖而出，她是第一本“十美分”小说《马拉丝卡，白人猎手的印第安人妻子》（1860）的作者。当时流行的其他十美分小说还有广受模仿的“‘死木’迪克”和“‘野牛’比尔·科迪”[14] 等系列小说，这些作品由很多作家参与创作，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

从其书名不难看出，这些十美分小说是西部文学的原型。20年后，十美分小说又衍生出侦探小说的原型“尼克·卡特”系列。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个年轻侦探形象还频繁出现于廉价通俗小说、广播系列剧、连环漫画册和电影中——在这些作品中尼克仍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刑警，要是个真人，他已到了该由J. 埃德加·胡佛[15] 向他发贺电的年龄了。

尼克·卡特也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产物。而其中的一个创作者弗雷德里克·冯·伦塞勒·戴伊[16] 塑造了一千余个“卡特”形象，他通常描写这个英雄与其对手夸兹博士——那个顽固作恶、永不死去的恶棍——之间的殊死较量。

在美国畅销小说出现的初始阶段，妇女们的杰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其他的领域。一般认为，真正的美国侦探小说始于安娜·凯瑟琳·格林[17] 的《利文沃斯案》（1878）。这部罪案小说推出了一个广受喜爱的系列小说的主人公埃比尼泽·葛莱斯——一位性格同他的名字一样古怪的侦探。而侦探小说此后迅速成了男性作家占据统治地位的作品门类。

美国通俗小说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对于时事的反应已经相当迅速——有E. P. 罗[18] 的宗教传奇《焚毁屏障》为证。这部小说的背景就是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报纸时常为那些善于投机取巧的通俗小说作家们提供创作素材，这也使重大新闻事件经常在报纸和小说之间来回传递。

廉价通俗小说和报纸之间早在1840年就已经建立起了某种联系。

在19世纪40年代，一些小说开始以“增刊”的形式随报纸免费发放，这被称为美国畅销小说史上的“大革命”。这一创新做法据说来自两个纽约记者帕克·本杰明和鲁弗斯·威尔莫特·格里斯沃尔德[19]。

除了报纸订阅者外，其他读者的需求也需要得到满足，而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教堂会众。自立国之始，美国就是一个既爱阅读《圣经》又对小说手不释卷的国度，而卢·华莱士的《宾虚：基督的故事》（1880）就此而言可谓投其所好——这是一本可以在星期天读的小说[20]（无须遮遮掩掩）。

华莱士的这部著作卷帙浩繁（当时哈珀出版社[21]的定价是1.5美元，令人望而却步），内容翔实厚重（作者为写作此书放弃了律师的工作）。这是一部关于宾虚这个人物的史诗式作品，记述他从犹太王子、苦役奴工、马车手到最后成为基督徒的经历。小说一开始销售缓慢，后来由于星期日教会学校的推荐，销量猛增，到1913年销量已达百万册的水平。后来，哈珀出版社又一次性向西尔斯–罗巴克商店[22]卖出了100万册——这是历史上单本小说的最大订单。1925年，此书被拍成电影，由拉蒙·诺瓦罗[23]主演，该片场面恢宏，气势磅礴，再次掀起了《宾虚》的销售热潮。1959年由查尔顿·赫斯顿[24]主演（戈尔·维达尔[25]编剧）的重拍片引发了这部作品的又一次热销。

在宗教小说市场的边缘地带，有一些针对年轻读者的教育性读物，包括路易莎·梅·奥尔科特[26]的《小妇人》（1868）以及霍雷肖·阿尔杰[27]的说教意味更加浓厚、讲述“发迹致富”故事的布道小说。阿尔杰是唯一神教派牧师，他把传道热忱融入到了充斥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小说中，这些作品包括《衣衫褴褛的狄克或擦鞋工的纽约街头生活》（1868）、《卖火柴的男童马克》（1869）等，其强劲销售势头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纳撒内尔·韦斯特[28]在他的小说《冰凉一百万》中对这类小说给予了辛辣又不失兴味的讽刺，而电影《阿甘正传》的嘲讽则更具温情。阿尔杰始终深植于美国的精神文化；对他而言，美国精神既是一种理想，又是一味让人不适的刺激剂。

当欧内斯特·海明威宣称“全部”美国文学都滥觞于《哈克贝利·费

恩》时，他的意思是马克·吐温创造了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风格和语言。当然，有人会说此前已出现了一代通俗小说，比如爱德华·埃格尔斯顿的“山地人故事”[29]，这些作品对喜剧化方言的运用使它们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这些反田园文学作品采用正宗的印第安纳州方言进行创作，获得了巨大成功，其中尤以《山地人教师》（1871）最为突出。而此时在英国，“菜园派”（指苏格兰菜园）[30]同样大红大紫，其中，伊恩·麦克拉伦和J. M. 巴里对“德拉姆拓刻蒂”和“斯拉姆”（即“零乱的线头”）乡村生活颇带感伤的描写尤其引人注目。[31]

山地人小说针对的读者群体是家庭和青少年，而埃米尔·左拉[32]的作品则明显定位于成年读者。左拉进军美国大众文化之路可谓一马平川，但在英国，他的出版商亨利·维兹泰里运气不佳，坐了牢。[33]用当局的话说，他向英国读者当面泼了一瓶酸。人们认为，左拉小说过分之至，已经远远超出令少女面颊绯红的程度。而在美国，《娜娜》（1880）等书的翻译版销量大好（可能仅稍次于雨果的作品），美国本地的左拉主义也随着斯蒂芬·克莱恩[34]的《街头女麦姬》（1893）的出版而迅速崛起。克莱恩的这本书甚至比英国的左拉主义小说、乔治·穆尔[35]的《埃丝特·沃特斯》（1894）更加百无禁忌。美国的“自然主义”要到厄普顿·辛克莱[36]的《屠场》（1906年排名第六）问世时才发展至顶峰。《屠场》是辛克莱对芝加哥牲畜屠宰场的强烈控诉（*j'accuse*），因其“揭发黑幕”的犀利尖锐，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专门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往该市，核查小说所述是否属实。调查报告说，情况确实如此。

排行榜出现：1895—1910

畅销小说排行榜始于美国，这一点很合乎逻辑。由弗兰克·R. 斯托克顿[37]创作的《船长霍恩历险记》是文学史上第一个畅销小说排行榜冠军。这是一个内容轻松热闹的“黄金热”冒险故事，出版之时适逢美国的阿拉斯加淘金潮方兴未艾（杰克·伦敦当时正在冰雪覆盖的荒

地里挖掘；他最终会用畅销小说淘得更值钱的矿藏）。

斯托克顿已为文学史所遗忘。还有个据说是历史上首个作品销量达到上百万册并赚取了数百万美元的小说家，今天也已无人记起，此人叫哈罗德·贝尔·莱特（Harold Bell Wright，1872—1944），是个浸礼会牧师，他的首部畅销小说（总共有18部）是《尤德尔的那个印刷工》，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向其欧扎克教堂会众高声朗读。莱特评价他的这部成长教育小说是“给普通人的普通食粮”，而那位最平民化的总统罗纳德·里根[38]则称《尤德尔的那个印刷工》改变了他的生活：“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读完之后思考了几天，我去找我母亲，告诉她我想接受洗礼。”这位未来“邪恶之邦”[39]的死对头自此以后的人生走上了正道。

20世纪伊始，出版了一部（在当时）可称作史上销售最快的畅销小说——欧文·巴切勒[40]的《埃本·霍尔登》（1900）。这是一部关于移民的传奇，其出版可谓恰合其时，因为当时正有几百万人通过埃利斯岛[41]进入美国。巴切勒的小说也得益于广告的强力推动。随着20世纪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饥渴无比的市场需要快餐型的、强力“推销”的小说。

“美国的莫泊桑”欧·亨利（原名威廉·悉尼·波特）[42]是这种快餐型小说的成功践行者。藏在这个笔名（Nom de plume）后面的人于1901年因贪污罪而身陷囹圄，坐牢期间就开始创作那些富含机趣的短篇小说——他靠写作从一贫如洗到功成名就，起伏跌宕的人生经历连阿尔杰的小说也相形失色。

战争、廉价通俗小说和电影

在小说领域，某一种题材出现和某部畅销小说的问世在重要性方面往往不相上下——对于那些价格极端低廉的“廉价通俗”小说而言尤其如此。由F. A. 芒西[43]创办、定价10美分的《故事大观杂志》到1907年发行量已达50万份。这份杂志帮助赞恩·格雷[44]、埃德加·赖

斯·巴勒斯 [45] 和马克斯·布兰德等人走上了写作道路，并由此大大刺激了对“西部”小说（如《紫艾丛中的骑手》）、幻想小说（如《人猿泰山》）和犯罪小说（必定要出现侦探尼克·卡特）的市场需求。廉价通俗小说还同电影建立了一种互利关系。由于1903年拍摄的《火车大盗》（采用了一本十美分故事书的情节）取得成功，电影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第一部被买去改编成电影的小说是托马斯·狄克逊 [46] 的《族人》（1905），这是一部为“三K党”歌功颂德的作品，令人作呕。D. W. 格里菲思 [47] 为获得其改编版权支付了2000美元，结果拍成了《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此后很多年，它一直是美国毛利最高的影片。

20世纪早期，雷克斯·比奇（“穷人的杰克·伦敦”）的作品经常位居《书人》杂志的排行榜榜首。他的小说记述的是育空河流域的淘金故事，充满阳刚之气，《伙伴》（1905）是其中的首部作品。 [48] 为充分利用这份财产，精明的比奇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颇为巧合的是，这与杰克·伦敦的做法如出一辙。这就是所谓“新电影配套商品” [49] 的开始。

约翰·G. 考威尔蒂 [50] 认为，“情节剧”小说是美国通俗小说几十年来的主要组成部分（或许是最主要的部分）。温斯顿·丘吉尔（另外那个 [51] ）在利用全景式、宽画面的“情节”讲述故事方面获得了极大成功。小说《遥远国度》（1915年排名第一）使作者的受欢迎程度达到顶峰。此书讲述的是挥金如土的美国公子哥儿休·帕雷特从一个问题少年成长为成熟男子的故事。

后来，包括詹姆斯·T. 法雷尔、约翰·奥哈拉和赫尔曼·沃克等人 [52] 在内的一些作家也在其小说中采用了高度戏剧化（并且助其畅销）的风格。丘吉尔写作畅销小说的套路在他们笔下仍有迹可循。这种手法在那些伟大的经典美国小说中也许难觅其踪，但对销量巨大的美国畅销小说来讲则并非如此。

布思·塔金顿 [53] 没有丘吉尔的雄心，通过《彭路德》（1914）和《十七岁》（1916）等幽默有趣、富含嘲讽意味的畅销小说，他使青春期（在美国，这一人生发展阶段的说法是由G. 斯坦利·霍尔 [54]

在这一时期首先提出）的烦恼问题成为大众热点。在（公民文化程度更高的）美国，年轻读者的影响力一直比在欧洲更加明显。而在1914至1918年间，数十万年满18岁的青年战死在法国，这又给塔金顿那些田园诗式的作品平添了几分逃避世事的诱惑（《伟大的安伯逊家族》是他的又一部反映青春期成长烦恼的小说，由于奥逊·威尔斯[55]的原因，这部小说成为他影响力最为持久的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掀起了一股颇具声势的英国热。例如，1917年（美国介入一战冲突那年），H. G. 韦尔斯[56]那本讲述爱国父母痛失爱子的小说《勃列特林先生渡过难关》[57]成为占据美国畅销小说榜头名位置的作品。而在这段非常时期之外，韦尔斯基本上代表一种纯粹的“小不列颠”口味。

英美两国在文学方面的特殊关系在一些“奇迹之年”（详见第一章）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在书报页面和银幕之上满眼是优雅的外籍军团士兵、吉夫斯式的男仆[58]、蓝色的珊瑚礁和令人解颐的强盗酋长：所有这些都是用上好的英国墨水创造的。美国人还对英国的所有物什极度痴迷，因此，一些（可能）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作品也连带着进入了美国图书市场，迈克尔·阿伦那部包含“梅毒”这一大胆主题的世界主义喜剧《绿帽》（1925）和玛格丽特·肯尼迪于同年出版的《专一的少女》就是很好的例子。《专一的少女》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年方十五、在性方面不检点的少女，她为后来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小说中那位不太专一的（放荡）少女洛丽塔的出场作了诡异的铺垫，纳博科夫的那部作品是1957年的畅销小说。而沃里克·迪平的《索雷尔父子》则非常符合美国读者的阅读口味，与A. S. M. 哈钦森1921年出版的那本《如果冬天到来》（1922年的美国榜首小说）一样，这部小说讲述的也是退役军官未获好报的故事。

自1895年以来，英国人的阅读口味很少像这一阶段这样与美国畅销小说如此投契。在随后的10年间，英国小说继续向美国市场扩张，但势头略有下降，这些作品包括詹姆斯·希尔顿的香格里拉传奇《失去的地平线》（1935年排名第五）和《再见，奇普斯先生》（1934年排名第四）[59]。主要居住在大陆地区的美国人从英格兰公学教师的

退休中能看出什么来，只能由其想象了。相比之下，中国西藏对他们来说也许会显得更熟悉一些。

到了20年代末期，反战意识日渐浓厚，《西线无战事》（1929年排名第一）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该书是第一部赢得美国畅销书榜冠军荣誉的德国小说。它迎合了美国国内的反战孤立主义情绪。用通俗小说中常用的语言来说，这部小说相当于让牛津大学的学生投票表决，拒绝为国王和国家而死。这是大众对战争集体说“不！”而从德国街头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应该是“不，不能再来了！”

反映美国国家主题的小说销售势头仍然强劲。埃德娜·费伯【60】的《如此之大》（1925年排名第一）拉开了一连串沙文主义史诗的序幕。费伯还写有一部无比流行、更为洋洋大观的小说《演艺船》（1926）。此书后来被杰尔姆·科恩和奥斯卡·哈默斯坦【61】改编成一部音乐剧，其生命力较原作反倒更为长久。《壮志千秋》（1930年排名第一）是一部描写俄克拉何马“拓殖潮”的小说，情况与《演艺船》相同。大约30年后，小说《巨人》（1952）给费伯的畅销小说写作生涯画上了句号。这是一部讲述两代得克萨斯石油巨头的家世小说，1956年被拍成电影，由詹姆斯·迪恩和伊丽莎白·泰勒主演。事实上，费伯的12部小说和9部戏剧共被拍成20部“大”片，创了纪录。约翰·安斯华斯写道：

> 我认为，从跨越的年数算，她可能是20世纪上榜最久的作家。同时，她享有与哈里·霍迪尼和乔·麦卡锡【62】（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同乡之荣。她还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几乎是公开的女同性恋畅销书作家。费伯是一座金矿。

桑顿·怀尔德的《圣路易雷伊桥》是1927年的头号畅销小说，该作品既有文学造诣，又广受大众欢迎，在20世纪20年代显得与众不同。故事由1714年7月20日秘鲁一座大桥的垮塌（确有其事）开始，以娴熟老到的笔法，来回穿插，重现在此次灾难中死去的5名游客的（虚构）生活。

10年之后，怀尔德又重登畅销书榜榜首。这次的上榜小说是《天

堂是我归宿》。这部小说以伏尔泰式的讽刺手法对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埃尔默·甘特里》加以嘲讽。[63] 刘易斯的那部小说对所谓的“宗教生意”（即以传播福音为名大肆聚敛捐款的做法）大加挞伐，笔调奔放，与伏尔泰风格迥异，该书本身也是畅销榜冠军，1927年出版后第一周内即售出20万册。

20世纪20年代通俗小说诸多类型中较有味道的一种是所谓“艳情小说”。这是一种格调轻松的读物，集挑逗性、城市式的雅致和爵士乐时代的新潮女性文化于一体，其中以安尼塔·露丝[64] 的《绅士爱美人》（1926年排名第一）最为出色，历久不衰。此书改编自《纽约客》中的一个连载故事，半文半白，笔调诙谐风趣。露丝的这部小说起着开创先河的作用，带出一系列常盛不衰的模式化的两性形象。《绅士爱美人》于1953年被拍成电影，由玛丽莲·梦露主演（非她莫属）。露丝这部小说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此书是最后几部为成年读者配了插图的畅销小说之一。以后直到20世纪晚期才出现另一种插图小说——“连环漫画式小说”。

与《绅士爱美人》同享1926年榜首之位的是另一部笔法娴熟的喜剧式幻想小说——约翰·厄斯金[65] 的《特洛伊的海伦的私生活》。该书的主题是特洛伊式的新潮女性文化。这一时期相对冷门的艳情小说有维娜·德尔玛的《坏女孩》（1928）——讲述放浪形骸的接线员多特·黑利的故事——和唐纳德·亨德森的《等不及的处女》（1931）。[66] 这些小说的内容看看标题就一目了然。

这些有意识“大胆”描写敏感内容的小说表明，社会宽容度正在增加。厄斯金·考德威尔[67] 的《上帝的小块土地》（1933）和《烟草路》（1932）充斥色情内容和南方的肮脏故事。这两本书又强行拓宽了这种宽容度。

类型小说：传奇（浪漫）故事、西部小说、犯罪小说、科幻小说、恐怖小说

考德威尔的小说之所以引人瞩目，不仅仅是因为其内容露骨，还由于这些25美分的纸皮本是“新”书。换句话说，出版商是把这些书作为一种类型小说——无产阶级的小说[68]在市场上推广的。

20世纪的类型小说主要有5种，传奇（浪漫）故事是其中生命力最持久的一种。该种类型小说沿着一条直线发展，从苏珊娜·哈斯韦尔到丹妮尔·斯蒂尔，从密涅瓦出版社到米尔斯–布恩出版社[69]，始终畅销不衰。这种小说主要是满足女性读者的阅读口味。男性动作小说起源于十美分小说，主要是西部故事或牛仔传奇。《弗吉尼亚人：平原骑手》（1902年排名第一）的作者欧文·威斯特曾经宣称，美国西部是“年轻男子的庞大运动场”（和这个时期其他许多“肺病患者”一样，威斯特去西部不是为了玩乐，而是要养肺）。

这个地方对于所有年龄的男性读者都是一个理想去处。威斯特为赞恩·格雷提供了差不多200个西部故事的原型，其中最为有名的是《紫艾丛中的骑手》（1912）和《孤星牧人》[70]（1915）（这两部小说都在其出版当年进入排行榜前10名，确实了得）。在其创作巅峰时期，格雷可能称得上是英语世界里最炙手可热的小说家。据估计，他的小说总销量（根据小说改编拍摄的100多部电影也推动了图书销售）已达到2.5亿册，并且仍在增长。克拉伦斯·E. 马尔福德[71]带着他的“20号牧场”牛仔、“跳着走的”卡西迪沿着格雷开辟的道路紧随其后。他于1912年推出这一人物，在随后的20年间，威廉·博伊德为其创造了英雄般的银幕形象。最后，卡西迪更像是在“爬着走”，而不是“跳着走”。

斯特里特和史密斯的《西部故事杂志》创刊于1919年，其价格是那个颇有点儿魔力的10美分。正是这本杂志帮助马克斯·布兰德[72]打开了事业之门。20世纪30年代，他带着他那台（用他的话说）“热得发红的打字机”姗姗来迟，他是当时无可争议的“廉价通俗小说之王”。从1917年到1944年他去世为止，布兰德以20个笔名，写出总字数大约3,000万字的小说，其中，中短篇小说约有900篇，长篇小说将近600部，涵盖所有主要的小说类型（包括西部小说、神秘小说、医院故事、情节剧小说，甚至还有科幻小说）。布兰德的创作秘诀很简

单："你只要开头充满活力、结尾掷地有声就行。"布兰德的第一部小说是《野性未驯》（1919），他最为有名的作品是《德斯特里出马》（1930），后来被拍成电影，主演为玛琳·黛德丽[73]。

布兰德的桂冠后来传给了路易斯·拉莫尔[74]。他的首部风靡一时的作品是《杭都》（1952）[75]，约翰·韦恩[76]主演的同名电影大大促进了这部小说的热销。韦恩声称它是"我所读过的最好的西部小说"，并买下了这本书的改编版权。拉莫尔向来受右翼人士的青睐，罗纳德·里根为他颁发了国会荣誉奖章，并因未能像公爵[77]一样参演过拉莫尔的电影而万分遗憾。拉莫尔和布兰德（一辈子都是光鲜时髦的城里人）不同，他的确生活在西部。他一生创作的小说约有200种，在全世界的作品销量超过2.25亿册。

在该类型作品的舞台上，还有其他几位杰出人物，欧内斯特·海科克斯[78]即为其中之一。他的《前往洛兹堡的马车》（1938）后来被改编成约翰·福特导演的一部经典电影《关山飞渡》（1939），由约翰·韦恩饰演林哥小子。[79]在畅销小说的各种类型中，西部小说是最直接受到电影促进实现热销的品种。

第三种历久不衰的畅销小说类型是与犯罪有关的侦探小说。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是这一类型小说的黄金时代。S. S. 范·戴恩[80]笔下的贵族侦探菲洛·万斯（彼得·温西爵爷[81]的美国表亲）是该时期众多广受喜爱的系列小说主人公之一。范·戴恩为处于黄金时期的侦探小说规定了著名的"二十条法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后来却被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的那部著名的《罗杰疑案》公然颠覆，手法极其巧妙）。

1926年出版发行的《黑色面具》杂志使美国畅销书业得以蜕去其崇英色彩，或者说摆脱了奥威尔所说的那种"衣冠楚楚的窃贼"形象。该杂志的主编"上尉"约瑟夫·T. 肖[82]为达希尔·哈米特创作的惊险小说开辟了发表空间，这些惊险小说内容多涉及"冷血"犯罪、案件侦破和私家侦探。在1930年出版的《马尔他猎鹰》中，哈米特推出了萨姆·斯佩德这个人物形象的原型[83]。另外，肖还刊发了詹姆斯·M. 凯恩[84]的黑色小说名作《邮差总按两次铃》（1934）以及雷蒙德·钱德勒

【85】 的作品。钱德勒塑造的菲利普·马洛（“斯佩德的继承人”）这一人物在1938年发表的《长眠不醒》中首次出现。除了这些“冷血”犯罪小说，还有一种风格较为温和的侦探小说，包括雷克斯·斯托特【86】以尼罗·沃尔夫和他的助手 【87】 阿奇·古德温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及大量其他作品。

同西部小说的创作者们一样，该类型小说的几位主要作者也具有传奇般的写作效率。20世纪30年代，哈里·贝德福德·琼斯 【88】 以十来个不同的笔名创作，售出作品上百万册。1933年3月，在收到一本厄尔·斯坦利·加德纳【89】的小说赠本后，琼斯又将其“木纸浆之王”【90】的头衔体面地让给了加德纳。这本小说就是加德纳的第一部“佩里·梅森”系列探案小说《天鹅绒爪案件》。

在此后40年间，加德纳使用许多不同笔名创作，总共售出3亿多册犯罪小说和悬疑小说。他所创造的最著名的人物——那位永无闪失的刑事辩护律师佩里·梅森，又在1957年至1966年播出的电视系列剧中出场，使这个人物形象又被赋予了更为长久的生命。在加德纳最终搁笔时，他不仅是“木纸浆之王”，也成了电视剧制作界的宠儿。

科幻小说（连同与其相关的子类型，如幻想小说、恐怖小说和哥特小说）是廉价通俗小说大家庭中的第四个成员。这一时期该领域的最重要人物是埃德加·赖斯·巴勒斯。巴勒斯年轻时沉迷于达尔文的理论，这一兴趣激发了他的灵感，产生了他最著名的小说构思——于1912年问世的《人猿泰山》。这个故事描述了主人公人猿泰山与他的猿类祖先们在丛林中飞来荡去、欢唱嬉戏的情景。此前一年，巴勒斯已在芒西的《故事大观杂志》上发表了同样大受欢迎的《火星人约翰·卡特》系列小说。1914年，巴勒斯又开始创作他的讲述地心历险故事的“佩鲁塞塔”系列。在拿到这些畅销书的特许经销权后，作家本人于1923年组建了“埃德加·赖斯·巴勒斯有限公司”，每年收入1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笔数目惊人的巨款。巴勒斯后来又发表了约70部小说，可以说是类型小说界的亨利·福特【91】——大众市场上该领域创作效率最高的多产作家。

雨果·根斯巴克 【92】 在其1926年创办的杂志《惊奇故事》上提炼

总结出了一个更加纯粹的科幻小说定义。根斯巴克用“科学 + 幻想 = 科幻”这个等式来重新定义这一类型的小说。1937年，《惊奇故事》被约翰·W. 坎贝尔接管后，为该类型小说创作培养了一批新的人才，包括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因和西奥多·斯特金【93】。坎贝尔利用他的主编身份大力推崇在作品中灌输右翼政治观点——海因莱因在与《惊奇故事》杂志分道扬镳多年后，这一倾向在他的作品中仍清晰可见。他在小说《月亮是位严厉的主妇》（1966）中宣称，他的座右铭是“TANSTAAFL”（“没有免费的午餐”），如今这一名言已从小说领域移用到了美国的政治话语中。

对于类型小说／廉价通俗小说创作“工厂”开辟的巨大市场，“文学”界的心情可谓羡慕与鄙视兼而有之。威廉·福克纳【94】（后来获得诺贝尔奖）在写作《圣殿》（1931）一书时自问什么小说能够卖出1万本。随后，他“构思出自己所能想象出的最为恐怖的故事，在大约3个星期内写就”。这部描写性虐待与暴力的小说获得了预期中的销售量。欧内斯特·海明威（另一个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则显得不那么愤世嫉俗。他在小说中运用的那句俗语，与“冷血”犯罪小说作家们的那一句极为相似。

约翰·安斯华斯后来又把一种“黑帮小说”归入到通俗小说门类当中。他认为这种小说“与犯罪小说不同，在一些重要方面大有排挤西部小说之势。西部小说从《弗吉尼亚人》开始算起，就其典型情节而言，通常在法律与罪犯之间偏向维护法律（例外能反证规则），而黑帮小说恰恰相反。”安斯华斯还进一步指出，黑帮小说发展到马里奥·普佐的《教父》时已臻成熟，“差不多把电影和电视中的西部片一网打尽”，影响一直延续到《黑道家族》【95】。

轰动一时的畅销书风潮

某一小说类型往往将其能量分散于众多书目与风格中，而另一方面，通俗小说又在集中其惊人之力打造单部“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该

形象说法是拿炸弹爆炸作比喻）【96】。

造成这种风潮出现的主要因素在于，畅销书排行榜在美国越来越重要，图书传播系统（包括数量众多的读书俱乐部）效率日增，电影、杂志和图书之间的联动关系日益密切。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赫维·艾伦的《安东尼·阿德维斯》（1933年排名第一）的出版定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作品出现的标志。此书讲述18世纪公海上的海盗活动和冒险故事，洋洋洒洒1,200页，价格高达3美元。这本书的出版商、法拉–莱因哈特出版社在其广告中称，此书是“三本卖了一本的价钱”，是“出版史上最长的小说”：所以它既是一个大块头，又是一个消灭大块头的炸弹。

《安东尼·阿德维斯》上了每月一书俱乐部的推荐目录，而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又获得了1936年的奥斯卡奖。在这两个因素的推动下，该书占据美国畅销书榜头名位置达两年之久。《安东尼·阿德维斯》一个值得注意的创新之处在于其大胆露骨的性描写。书中有一些场景设在妓院，还口无遮拦地提及“勃起”和“高潮”（在有广大电影观众观看的电影版中，这类描写被小心谨慎地删除掉了）。这就是成人看的古装戏：拉斐尔·萨巴蒂尼与性的结合体——使广大读者领略到一种新奇与刺激相结合的阅读感受。

艾伦小说的成功为畅销小说设立了新的标杆（他后来再也未能达到这一成就）。不过，20世纪30年代，最畅销小说的主流仍是传统的上榜小说，即情节剧小说。赛珍珠的《大地》（1931年排名第一）是一部讲述华人苦工王龙自我奋斗的家世小说，这部小说在30年代初期使作者获利丰厚，在30年代末期的1938年又使她一举夺得诺贝尔奖（当时因日本侵华而引发的同情帮了她的忙）。

1935年，属于情节剧小说衍生类型的“医生故事”凭借劳埃德·C.道格拉斯的《绿灯》（1935年排名第一）受到了读者大众的喜爱。该小说讲述了一个“外科医生的困惑”。1940年，创作题材广泛的马克斯·布兰德发表了他的《找基尔代尔医生》，这种“白大褂＋听诊器”模式的小说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永远写不完的热门题材。《找基尔代尔医生》是布兰德一系列程式化的医院故事中的第一部，这些故事记录了

年轻的爱尔兰裔美国医生和他的睿智恩师伦纳德·吉尔斯皮医生以及他的一生至爱——护士玛丽·拉蒙特共同经历的磨难与艰辛。基尔代尔这个人物被搬上了当时新出现的电视媒体，后来又（在电视屏幕上及以小说形式）衍生出诸如《马库斯·威尔比》、《陆军流动外科医院》和《急诊室》等“肥皂剧”式作品。

通俗小说故事中，并非所有医生都是圣人。亨利·贝拉曼[97]1940年出版的畅销小说《金石盟》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个使用手术刀职业的矛盾复杂态度。在这个故事里，卑鄙的戈登医生将一个年轻人的双腿截去，原因是他认为此人配不上自己的女儿。这部小说于1942年被拍成电影，罗纳德·里根扮演那个失去双腿的不幸年轻人德雷克·麦克休。片中最为有名的一句台词是：（从手术台下来时）“我的其余部分在哪里？”

在《金石盟》的描写中，美国的小镇生活可谓邪恶无边。此书吸收了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1921年排名第一）和《巴比特》（1923年排名第四）的故事成分，同时也成为格雷丝·梅塔利尔1957年那部超级畅销小说《佩顿镇》的前奏。一个世纪以来，畅销小说比社会学家更为敏感地记录了美国大都市、乡村和郊区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一直延续到约翰·厄普代克[98]的《夫妇们》（1968年排名第二）；对此好奇的读者甚至可以看看斯蒂芬·金的《它》（1986年排名第二）来一探究竟。

现实与浪漫爱情之间，很少出现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畅销小说中那样严重对立的情况。达夫妮·杜穆里埃的《蝴蝶梦》[99]（1938年排名第四）是众多《简·爱》续作中最为出色的一部。这部小说备受瞩目，不仅仅是由于该书以英国小说为原型却在美国大获成功，艾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00]1940年拍摄的（原型为英国式的）好莱坞电影也是这部小说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玛格丽特·米切尔那本极富浪漫色彩的《飘》（1936年排名第一）流行势头甚至盖过《安东尼·阿德维斯》，在出版后第一年销量即超百万册。小说以全景式的宽广画面展现美国内战时期的生活。在当时欧洲已陷入混乱和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使全社会伤痕累累的背景下，

这部小说带有浓重的逃避主义色彩。这部作品当时（今天也是）以“史上最伟大的爱情故事”推出，是其沉默寡言的亚特兰大籍作者唯一面世之作，这给小说平添了不少神秘色彩。1939年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由费雯丽和克拉克·盖博主演。电影识趣地删去了米切尔书中对于三K党充满仰慕的描写，否则这个“最伟大（也最为种族主义的）爱情故事”恐怕也难以流传如此长久。

图7　彩色故事片《飘》：“史上最伟大的爱情故事”

1991年，获作者遗产继承者授权的《斯嘉丽》荣膺美国畅销小说排行榜冠军，这也使GWTW（《飘》的书迷对它的称呼）获得第二次畅销生命。米切尔的原作以“明天又将是一天”结束，呈现开放之态，

而亚历山德拉·里普利撰写的这部续作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与米切尔的历史情节剧小说同时代的还有约翰·斯坦贝克的抗议社会之作《愤怒的葡萄》。此书登上了1939年畅销小说排行榜的榜首位置。小说讲述乔德一家从干旱的俄克拉何马农场长途跋涉、流落到伪天堂南加州的悲惨经历。小说以一种鼓动宣传式的急迫调子推销罗斯福新政的理想主义，并夹杂着作者本人异于常人的新达尔文主义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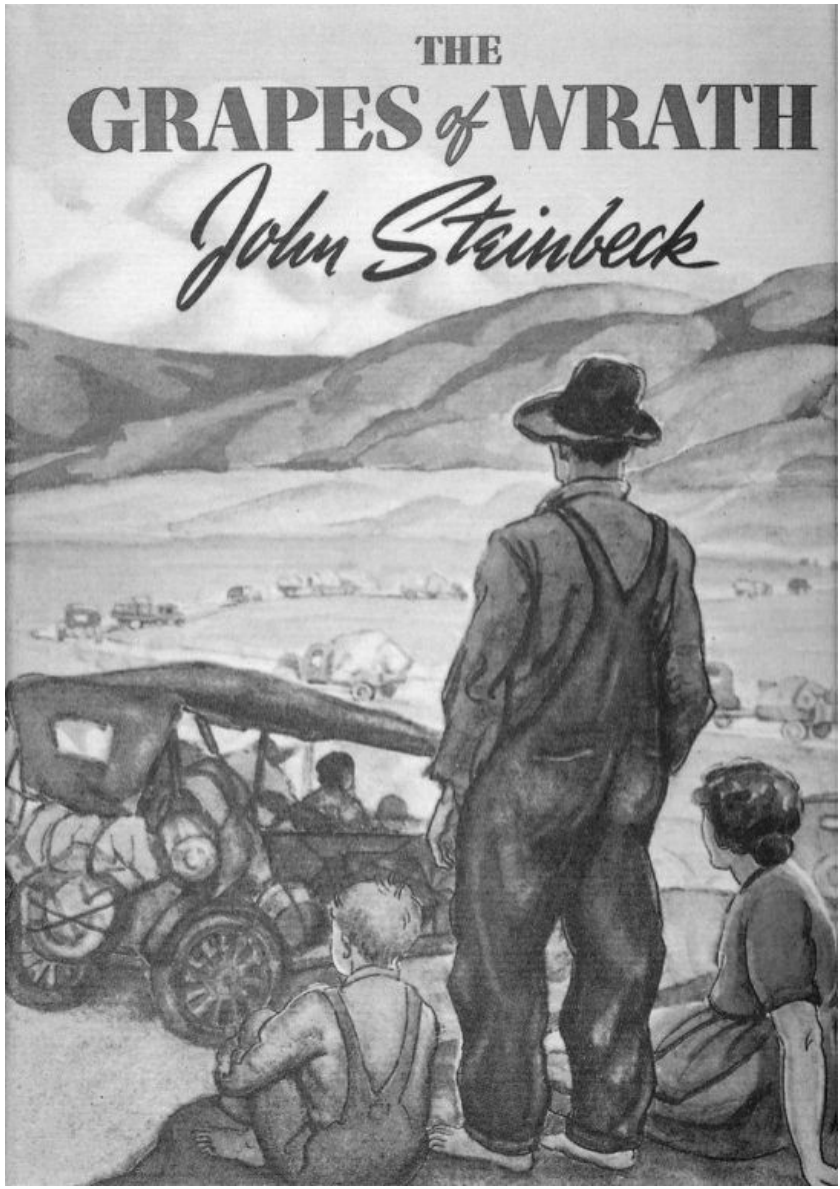

图8　《愤怒的葡萄》（1939）初版

斯坦贝克的小说于1940年被约翰·福特拍成电影，但该片结尾的乐观态度令人不安。乔德家那辆东倒西歪的卡车同塔拉或曼德利【101】相比毕竟有着天壤之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如同之前的一战一样，把A. J. 克罗宁和理查德·卢埃林等英国作家推到了美国畅销小说排行榜的顶端。战争也使社会氛围变得阴晦暗淡。一系列榜首小说延续了由斯坦贝克开始的严肃社会思考，如莉莲·史密斯的反私刑论战小说《奇异的果实》（1944年排名第一，后来因比利·霍利迪的同名爵士乐歌曲而长久流传）[102]以及贝蒂·史密斯那本讲述坚韧不拔成长故事的“德莱塞”式小说《长春树》（1943年排名第四）[103]。

《安东尼·阿德维斯》式的浪漫传奇巨作同样不乏继承者，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凯思琳·温莎那部反映英格兰内战时期生活的言情小说《永远的琥珀》（1944年排名第四）。该书女主人公安伯·圣克莱尔颇富进取心，她同所有人睡觉，甚至还同风流的国王本人上过床。她的座右铭是“通奸偷情不是罪过——是个乐事”。此书在波士顿遭禁，却也因祸得福。

弗兰克·耶比[104]的战前（即南北战争前）浪漫小说《朱门怨》（1946）使一种内容不太敏感（但非常好销）的古装历史小说风行一时。耶比是第一个登上畅销书榜的非洲裔美国小说家，因此令人瞩目。然而，提起这个名字，美国黑人历史学者难有骄傲之感，因为一直到1969年耶比的浪漫小说中才出现非洲裔主人公，而此时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已施行多年（詹姆斯·鲍德温[105]也早已成为广受尊敬的作家）。

战后岁月

罗伯特·佩恩·沃伦[106]（美国最著名的批评家之一，福克纳式“南方派”小说理论家）于1946年出版了小说《国王的人马》。在二战刚刚结束之后出版的小说中，此书很可能是质量最佳的“文学”类排名榜首的畅销小说。该作品是一部基于真人真事创作的小说 。小说情节以路易斯安那州的政治煽动家休伊·朗的生平为基础。看来这次世界大战开始让美国更加深刻地反思其公民为之而战的那些理想。

劳拉·Z. 霍布森【107】的《君子协定》（1947年排名第一）揭露了那些较不起眼的反犹太主义手法，以一种更为猛烈的方式拷问着国民良知。此书于当年被拍成电影，由格里高利·派克饰演记者菲利普·格林。故事中的格林通过假扮成犹太人来获取种族歧视的第一手证据。这部影片调子严肃，充满善意，获得3项奥斯卡奖。但电影也表明——由于战后《退伍士兵权利法案》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大众教育水平——美国畅销小说在民权方面比其政治体制超前几十年，足以成为一种社会启蒙力量。但只是足以，实际并未形成这种力量。不幸的是，40年代末发生了麦卡锡清洗运动【108】，使畅销小说这一媒介在今后几十年无所作为。

在诺曼·梅勒【109】的《裸者与死者》（1948年排名第二）出版之前，美国尚无一本真正从士兵角度描写二战的畅销小说，这一点颇为蹊跷。这位曾经当过步兵的作家把军营中无拘无束的风格带入美国通俗小说中——说得具体一点，他的小说中那个3个字母的脏字fug【110】俯拾皆是，以至于有了多萝西·帕克【111】对他的那句著名的问候语："哦，你就是那个连字都不会写的年轻人。"

梅勒打开了一扇泄洪闸。1951年，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成为当年的畅销小说冠军，赫尔曼·沃克的《凯恩舰哗变》排名第二。用琼斯的话说，这些小说目的在于"揭露战争的罪恶"；或许他应该说，"那场狗娘养的战争"。

劳埃德·C. 道格拉斯讲述使徒彼得故事的长篇传奇小说《伟大的渔夫》明显体现了对待一些重大问题更加深刻的思考。这部小说在1948年排名第一。在成为通俗小说作家以前，道格拉斯是个路德教派牧师。同先于他出道的赖特和华莱士一样，他利用畅销小说作为上帝赐予的向几百万信众布道的讲坛。以色列国的成立也连带提升了他的知名度。道格拉斯在1942年出版的畅销书《圣衣》讲述了关于耶稣受难时最神圣遗物的故事，后于1953年拍成电影，场面壮观宏大，采用了塞西尔·B. 德米尔所拍摄彩色影片的色彩风格。由于电影的推动，这部有些过时的小说再次登上了当年畅销书榜的榜首位置。

20世纪40年代中期，犯罪小说甚至比当年《黑色面具》杂志确立

该类小说发展潮流时更加冷血。德国解放的过程以及残酷的太平洋战争反映出人性已严重堕落，而其程度之甚在这一类型的小说中可见一斑。W. R. 伯内特[112]的小说《沥青丛林》（1949）以威廉·詹姆斯[113]的那句话开篇："人是所有捕食动物中最令人畏惧的，也是唯一系统性地残杀同类的一种动物。"

畅销小说所塑造的最为残忍的形象当数米基·斯皮兰的系列小说主人公迈克·哈默，该人物首次出现于《我，陪审团》（1947）中。这名治安维持会的私家侦探（前海军陆战队员）集陪审团和行刑者的角色于一身。在小说最后一页，他向一名妇女腹部开了一枪。"这很容易"，哈默在执行完他自行裁定的死刑后总会作这样一句简短的评价。几年时间里，斯皮兰的哈默系列纸皮本小说在销量上超过美国所有竞争对手（要是催得紧，他或许3天就能出一本新著）。对于嗜读其书者，许多人深感痛惜，雷蒙德·钱德勒更把其作品称作大猩猩小说。对这样的质疑，斯皮兰总是淡淡回答："大家喜欢这些书。"他们确实喜欢：年复一年，他的小说销量令所有对手黯然失色。

20世纪50年代

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人们对于那些内容充实、严肃对待道德困惑或某些"重大"问题、特别适合拍成电影的小说同样如饥似渴。亨利·莫顿·鲁宾逊取得1950年畅销书榜头名的作品《红衣主教》讲述了美国天主教会一位红衣主教的生活与磨难（主要涉及性方面）。1954年，鲁宾逊又凭借《并非陌路》二度登顶。这个故事由多个叙述线条组成，讲述一些年轻人接受医学训练的故事。这一情节模式在日后广受仿效——电视肥皂剧即为一例（肥皂剧和白大褂是天生的伙伴）。

安·兰德的资本主义颂歌《阿特拉斯耸耸肩》[114]与19世纪80年代爱德华·贝拉米的《回头看》[115]一样，使作者的"客观主义哲学"广为人知。对于这种哲学的主旨，我们可以用一种更为直白的方式归纳为"美元教条"。在这部小说中，一个大商人的联合会——"财富

创造者”——决定“罢工”，社会因此崩垮，这证明世界需要资本主义：你怎么也躲不开富人。

兰德的这部鸿篇巨制一开始销量一般（1957年排名第十，比《佩顿镇》落后八位），而到1984年已售出500万册（也为作者赚了不少教条美元），而且影响了美国许多重要决策者——其中就包括对艾伦·格林斯潘【116】的重大影响。自《汤姆叔叔的小屋》以来，还没有一部小说在政治上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兰德是60年代末期进入畅销小说排行榜的3个“俄国人”之一。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恋童幻想小说《洛丽塔》有数年时间被一些神经紧张的人士禁止出版，只能在巴黎地下流传，1959年终于在美国出版发行。该书出版后迅速登上排行榜首位，但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受到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的挑战。在作者所属的国家苏联，这部小说只有地下印刷版。纳博科夫赚得盆满钵丰，帕斯捷尔纳克却只得到一个安慰性质的诺贝尔奖（苏联政府禁止他领取此奖）。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讲述“自下而上”式的革命，充满鼓动性。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关部门的帮助下，小说在西方销量空前，洛阳纸贵。这一情况可谓独一无二。

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初，畅销小说排行榜为欧文·斯通【117】数量众多的传记小说所统治。其中的《痛苦与狂喜》（1961年排名第一）是一部基于米开朗琪罗的生平创作的作品。据作者记录，此书花去他6年时间的调研——足足顶得上一个博士学位。这部小说被拍成了电影，具有一种适度的虔诚恭敬，由查尔顿·赫斯顿主演。

斯通的传记式小说卷帙浩繁，而詹姆斯·A. 米切纳的地理小说与之相比也是篇幅惊人。他的首部长篇巨著《夏威夷》在1959年登上美国畅销书榜榜首，而恰恰是在那一年这处太平洋群岛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米切纳在小说致谢页中透露，他的写作得到了许多研究小组的帮

助。到后来，他似乎已经写尽了地球上值得写的地点，1983年，他的《太空》获得了畅销书榜第二名的成绩。自从费尼莫尔·库珀把老态龙钟的纳蒂·邦坡送到西部（《大草原》，1827）[118] 以来，不断会有新的地理区域出现在美国文学作品中，由作家们去穿越游历、探察勘界和讴歌赞颂。

从图书业界的角度看，1959—1960年间最重要的通俗小说，是那部由早已谢世的D. H. 劳伦斯写于30年前、描写英格兰林中私情的爱情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部小说因含有脏词和性描写段落而多年遭禁。而今时过境迁，劳伦斯那部老旧的主题小说 在经历一连串法庭听证后终获出版许可。由于不受美国版权法保护，此书再版后马上遭到大量盗印，盗版者们热情高涨，是自19世纪80年代那段昔日美好时光以来不曾见到的。大批廉价的再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铺天盖地般地向美国公众倾销，20世纪60年代的“纸皮书革命”似乎也是由此触发的。

劳伦斯之后的“宽容气氛”为一些探索性文学作品的问世创造了条件，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的怨诉》（1969年排名第一）就是这类作品，该小说歌颂了英雄般的犹太式自慰。但这种气氛也纵容了哈罗德·罗宾斯的系列超级畅销小说所展现的那种极其令人作呕的粗鄙残忍。该系列首部小说是《提包客》（1961年排名第五，其纸皮版更为畅销）。这部传记式小说记述了性情古怪的飞行家和电影制片人霍华德·休斯的故事，书中包含露骨的性描写以及更为露骨的性虐待内容。比如，书中有一段说，主人公通过一个烟袋发现了折磨和杀害其母亲的凶手——凶手用这个不幸女人的乳房做成了这个烟袋。这样的情节劳伦斯看了也会震惊不已。

其实读者也可以找到不那么淫秽下流的作品。阿瑟·黑利以《饭店》（1965年排名第一）为起点，开始创作一系列经过缜密调查后完成的小说。《饭店》重写了维基·鲍姆早年同样畅销的小说《大饭店》（1931）。黑利出生于英国，但已彻底美国化；他的小说内容还将涉及机场、银行、汽车厂、医院和发电站。黑利称，他花4年写一部小说：3年调研，1年撰写。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黑利成了个点石

成金的人，他的作品使美国人懂得了现代美国如何运转。

自二战以来，类型小说发展迅速，已经摆脱了其原来廉价通俗小说身份的局限，而其中的一些顶尖之作更是希图登堂入室，取得高雅文学作品的地位。这一变化主要应归功于这些“类别”小说通过设立评奖机制所实现的自我评价，这些奖项包括埃德加奖（以侦探小说之父埃德加·爱伦·坡命名）、雨果奖（以科幻小说之父雨果·根斯巴克命名）等。而法国知识界对于黑色犯罪小说（包括哈米特、切斯特·海姆斯、吉姆·汤普森【119】等人的作品）推崇备至，又为类型小说增添了一丝深刻高贵的色彩。

除了一些长盛不衰的经典作品（如埃勒里·奎因系列），类型小说还以一些非常规方式向多样化发展。海姆斯凭借其首部“棺材埃德·约翰逊和掘坟琼斯”系列警探小说《哈莱姆之怒》（1967）成功地将弗朗兹·法农【120】式的黑色风格和非洲裔美国人的黑人文化认同融于一体。而托尼·希勒曼【121】则在《赐福之路》（1970）中塑造了印第安纳瓦霍族警探乔·利普霍恩和杰吉姆·奇这两个人物，开创了一种更加另类的警探小说。在犯罪–冒险小说领域最受批评界推崇的作家是埃尔莫尔·伦纳德【122】。从1969年出版《大反弹》开始，他放弃了电影脚本写作，转而投入全新的小说创作，获得了巨大成功。

科幻小说也以类似的方式抬升自身地位（这令其铁杆读者深感不安）。雷·布雷德伯里【123】以《华氏451度》等作品摆脱了科幻小说的窠臼，赢得大量读者，并获取批评界的高度尊敬。《华氏451度》讽刺了一种新的由电视推动的市侩风气。有人酸溜溜地说，布雷德伯里是那些不喜欢科幻小说（或电视剧）的读者最为喜爱的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124】的《沙丘》（1965）源于作者为俄勒冈海岸的水土保持而作的研究。这些史诗式小说与阿西莫夫的《基地》三步曲（1951）一样，成了令人膜拜的经典，甚至上了美国的大学讲堂——这是至高无上的褒奖。

随着杰奎琳·苏珊的《玩偶谷》（1966年排名第一，一度以史上最畅销小说的身份被收录于《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25】的出版，女性爱情小说进入了新的无拘无束的自由乐土。《玩偶谷》讲述的是

3个嗜吃药丸（即“玩偶”）的年轻性感的女性（另一种意义上的“玩偶”）在纽约闯荡的复杂故事，苏珊的小说——她本人极具市场号召力、堪比时装模特的形象促进了其作品的销售——充当了后来众所周知的“紧身围腰撕裂”小说的开路先锋。英国作家莫莉·帕金【126】是这类小说的实践者，她不以为然地称之为“没有贞操裤的女性浪漫故事”。

60年代末的社会气氛带有明显的叛逆色彩，即使纯粹的剧情小说也不例外。一切都在撕裂，不光是紧身围腰，甚至包括美国梦在内。伊莱亚·卡赞【127】的《安排》（1967年排名第一）描写了一个——套用斯隆·威尔逊【128】1955年那部畅销小说的书名——“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卡赞塑造的这个灰衣男人是个香烟广告经理，他有步骤有计划地毁掉了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功成名就的生活。1964年，美国卫生局局长发布了关于吸烟和癌症关系的毁灭性报告，使小说的背景变得昏灰暗淡。

罗宾·穆尔【129】的《绿色贝雷帽》（1965年排名第五）等支持越战的小说在当时毁誉参半，也反映出当时一个国家被深深撕裂的状况。穆尔的小说被约翰·韦恩拍成电影，由韦恩主演，赢回了他的美国输掉的那场战争。

美国人也还有一致同意的事。迈克尔·克莱顿的科技惊险小说《安德洛墨达品系》（1969年排名第五）是第一部“真正”进入年度排行榜上游位置的科幻小说。这部小说对美国（尤其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技术大加赞扬；而美国为阿波罗登月计划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也大大促进了小说的销售。越共可能还没有被打败，但苏联却已在两国间的这场登月竞赛中被完全超越，该竞赛由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宣布开始进行。1968年，阿瑟·C. 克拉克根据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这部电影本身由这位英国科幻小说家的一部短篇小说改编而成）【130】而创作的那部小说，同样因受惠于阿波罗计划而大获成功。在随后的几年里，克拉克创作的从《2010》到《2060》【131】的“十年续集”系列作品都进入了畅销书排行榜，每部作品都洋溢着从他的师父、科幻乌托邦小说作家奥拉夫·斯特普尔顿【132】那里学来的

对于宇宙的乐观态度。

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精装本和纸皮本小说都明显呈现出新的销售规模。这种超级畅销书热卖局面的形成，源于马里奥·普佐的《教父》，它的面世畅销颇富传奇色彩。作者后来回忆道："那时我已45岁，欠了亲戚、金融公司、银行、各类赌注经纪人和高利贷者共两万美元债务，确实到了该成大器大赚一笔的时候了。"他的小说果真大赚了一笔，达到了一个新的畅销层次。《教父》之于黑手党犹如阿瑟·黑利之于机场，带来的好处或许更多；另外，为了避免得罪遵纪守法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小说或电影都从未直接称他们为犯罪团伙。

在其后的10年间，《教父》在美国售出1000万册，销量空前。理查德·巴赫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1970）、彼得·布拉蒂的《驱魔人》（1971）、彼得·本奇利的《大白鲨》（1974）、埃里克·西格尔的《爱情故事》以及埃丽卡·扬的《飞行恐惧》（1974年出版，是《波特诺的怨诉》的女权主义版）都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跨越了这道销量门槛。【133】有些小说，如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1960年重印），被视作模范公民教育的教材推荐给一代代美国学童，由于在学校销售，其累积销售总数可能也相差无几，但从来没有像这些畅销书这样卖得这么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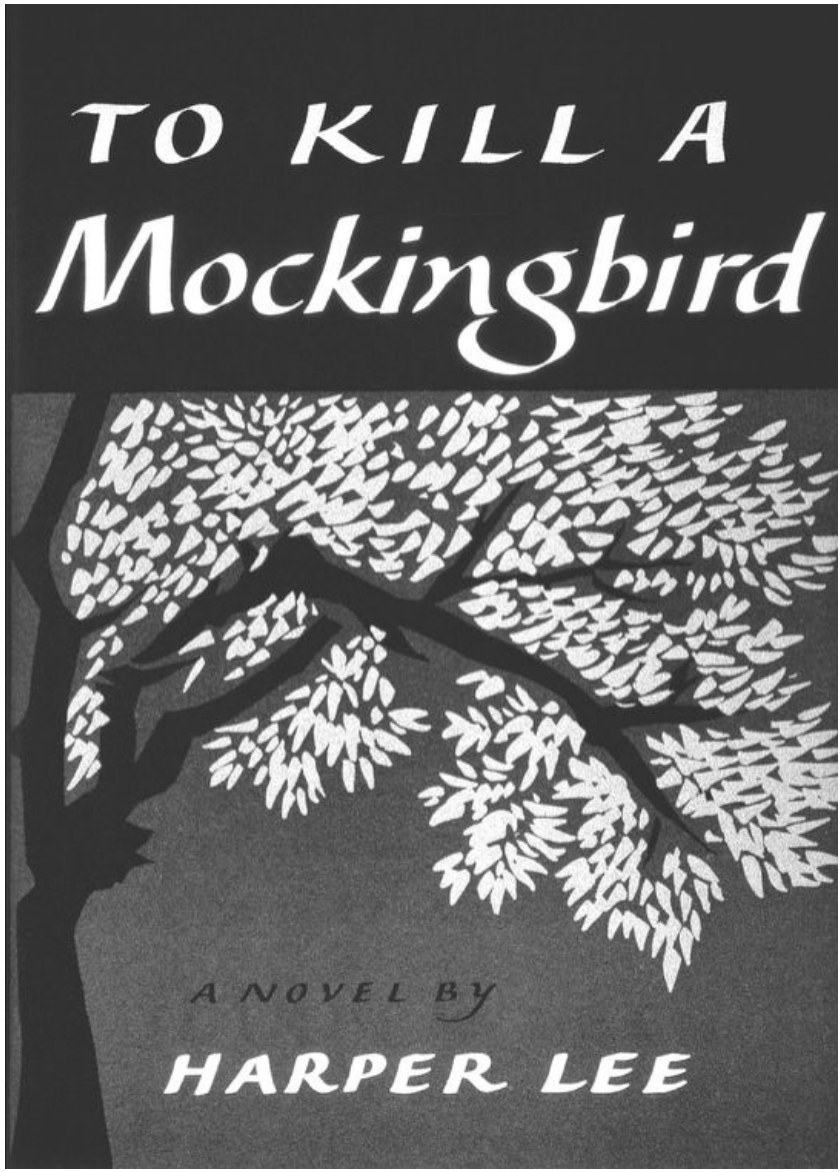

图9　《杀死一只知更鸟》（1939）初版

书卖得快，好书自然也多起来。里根（一贯喜爱畅销书）对此喜欢说：水涨船高。文学史家们视为经典著作的那些小说因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书市繁荣而获益匪浅。E. L. 多克托罗的《雷格泰姆音

乐》是一部布文谋篇机智巧妙的“反二百周年”小说 [134] ，1975—1976年度排名第一。除了荣获销量冠军外，这部小说还夺得诸多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 [135] 的《洪堡的礼物》也进入了该年度的前10名。同时上榜的还有朱迪丝·罗斯纳 [136] 那部宣称“贝蒂·弗里丹 [137] 误导了我们，女权主义要复杂得多”的情节剧小说《寻找古德巴先生》。

在其后几年，大众图书市场的一个基本特点是频繁出现“高质量的超级畅销书”，如威廉·斯蒂伦的《苏菲的选择》（1979年排名第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1986）、汤姆·沃尔夫的《名利之火》（1987）以及萨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1989）。 [138] 很显然，美国人的文学鉴赏力并未因通俗小说的日益走红或畅销小说的畅销而堕落沉沦。悲观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说错了。

新的严肃性

当这个国家正在逐渐接受首次输掉一场战争——而且是输给了穿黑色睡衣的“非正规军”——这一事实时，利昂·尤里斯 [139] 的《三位一体》于1977年成为排名第一的冠军小说。这本书也是朗凯什的爱尔兰共和军囚犯们最爱看的小说：1981年博比·桑兹绝食饿死前，还在向其狱友高声朗读此书。 [140] 他们后来回忆，这本书大大加剧了他们的痛苦，而杰克·希金斯 [141] 的“迪伦”惊悚小说更适合他们的口味。尤里斯那部描写爱尔兰自由战士的英雄传奇味同嚼蜡，但销量是哈罗德·罗宾斯关于杰奎琳·苏珊基于真 人真事创作的小说 《寂寞的少女》的两倍。题材“严肃”是当时的主调。就在同一年，约翰·勒卡雷的《荣誉学童》由于反映了冷战时期道德沦丧日益加剧这一严肃主题，在排行榜上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

20世纪70年代末，进口英国小说在美国势头看好，尤其是间谍和反间谍小说。1978年是又一个“奇迹之年”，销售成绩较好的小说有格

雷厄姆·格林的《人性的因素》、肯·福莱特的《针眼》和勒卡雷的其他几部作品。而身体更加强健、精神更乐观的弗雷德里克·福赛斯【142】在美国的售书数量远远超过英国国内。这类描写勇敢坚毅的间谍或特工故事的惊险小说基本上是一种符合美国人口味的英国特产。像《豺狼的日子》这样的书就很“符合”美国人的口味，这部小说的情节读起来显得非常真实，因此称其为“纪实小说”可能更为合适。而美国人罗伯特·勒德勒姆的“阴谋幻想惊险小说”充满对地下阴谋的奇思怪想，相较而言，实在有些不着边际。

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畅销小说创作群体的中心出现了一个核心作家群，他们一年能以全价售出一部精装本小说100万册，并且第二年又能以另一本新书重复这一业绩（同时，上一年的那本书又继续以纸皮本的形式再售出1,000万册），这在美国图书零售史上前所未有。这些作家中斯蒂芬·金当数翘楚。使他进入畅销小说领域的作品是1974年出版的《魔女嘉莉》，这本书开始的销售情况并不乐观，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下去【143】。在其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金的创作持续高产，从而确立了他作为20世纪的埃德加·爱伦·坡和恐怖小说大师的地位。同时他也成了一部无与伦比的赚钱机器，任何一个出版商如果能够争取到他，就能够击败其他对手。

这一时期的其他顶级畅销书作家还包括詹姆斯·米切纳（长于规模宏大的史诗式作品）、琼·奥尔（创作了一系列颇不寻常的史前传奇小说，首部为《洞熊家族》，1980年排名第一）、罗伯特·勒德勒姆（阴谋幻想惊险小说大师）和丹妮尔·斯蒂尔（创作男性读者同样爱读的女性爱情小说）。他们的精装本小说与60年代畅销作家的纸皮本小说一样畅销。

1984年，汤姆·克兰西以其冷战科技惊险小说《猎杀“红十月”号》崭露头角。小说讲述一艘苏联最新型潜艇叛逃到美国寻求庇护的故事。由于商业出版社怕这部小说技术成分过多而未敢问津，此书最初由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出版社出版。但实际上公众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包括里根总统在内。有些人甚至相信克兰西的小说激发了最高领导人的灵感，制定了“600艘舰艇”战略【144】，而这一计划是最终把苏

联拖垮的原因之一。此后克兰西出版的任何一部作品都能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通俗小说家有时似乎有一部神奇的雷达，通过这部雷达，克兰西在《总统命令》（1996年排名第二）中成功预言了9/11事件的发生。

这个黄金核心作家群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能够带来滚滚财源”。比如，在1987年，销售量位列前三的小说（精装本售价达20美元，均售出100万册）分别为：金的《绿魔》、克兰西的《爱国者游戏》和斯蒂尔的《万花筒》；此外，金和斯蒂尔还有《一号书迷》（排名第四）和《范恩家事》[145]（排名第八）做他们的最畅销小说的补充。在其后连续几年里，斯蒂尔、金或克兰西的一两本书同时出现在同一年的排行榜中实属司空见惯。倘就单本小说而论，奥尔同样是个重量级人物，但她的作品数量不够多。

媒体联动

1988年，《沉默的羔羊》上映后，托马斯·哈里斯[146]为其史上最为成功的与电影配套的惊竦小说的畅销铺平了道路。他刻画的恶魔般的惯犯汉尼拔·莱克特博士与德拉库拉和弗兰肯斯坦[147]一样，成为大众心目中著名的神秘人物。到2007年的《少年汉尼拔》（小说与电影同时酝酿）问世时，哈里斯塑造的精神变态恶魔（在1981年的《红龙》中以次要角色出现）被美国电影学院投票评为“电影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恶棍形象”，并已成为自歇洛克·福尔摩斯以来通俗小说领域最强大的赚钱机器。

哈里斯的创作慢得出名，约翰·格里森姆与之相比则显得驾轻就熟。从小说《律师事务所》（1991）开始，格里森姆把他的创作变成了一条法律惊险小说输送带。由这条输送带源源不断推出的小说，又无一例外地被改编成一部部取得巨大成功、票房收入极其丰厚的电影作品。他的小说中有一股自由理想主义暗流，吸引着众多本来无暇关注法庭斗士的读者。克林顿总统很喜欢这些小说，格里森姆就是他的

克兰西。对于非裔美国作家沃尔特·莫斯利 [148] 以洛杉矶为背景创作的侦探小说，克林顿读得同样津津有味。托妮·莫里森 [149] （1987年畅销小说《宠儿》的作者）称，克林顿是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从其床头阅读物看，这个称号名副其实。

到90年代末，在由他的作品改编的亿元票房电影的推动下，格里森姆的小说仅精装本就能卖出200万册，并且在其后一两年内又可售出5倍数量的纸皮本。2005年，格里森姆的《掮客》在精装本和大众纸皮本畅销小说两个排行榜上同时夺魁，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格里森姆与斯蒂芬·金不同，金尝试创作了狄更斯式的连载作品（《绿里奇迹》）、电子小说（《植物》）和一些饶有趣味、涉及旧有主题的作品（如《玫瑰疯狂者》中的配偶暴力问题），而格里森姆从未偏离自己的固有创作模式。他的中篇小说《逃离圣诞》（2001）是唯一例外——不可避免地，此书又成了一部占据排行榜头名的作品。

格里森姆是个精通业务的律师，而迈克尔·克莱顿则是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他运用相同的创作手法，成功推出了一批经过大量缜密研究完成的高科技惊险小说，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侏罗纪公园》（1990年出版，1993年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150] 拍成电影）。这是一部科学传奇故事，包括巴勒斯“人猿泰山”系列的通俗惊悚元素，间或涉及一些关于混沌理论及斯蒂芬·杰伊·古尔德 [151] 的间断进化模式的阐释说明。克莱顿的小说中还附有体现作者广博学识的文献条目，究其目的，恐怕炫耀多于宣教。

克莱顿不似格里森姆，时而马失前蹄。《侏罗纪公园》取得了空前成功，《刚果惊魂》（一部涉及同样的达尔文理论主题的幻想小说）则一败涂地。它与阿瑟·赫索格 [152] 的《杀人蜂》一起，共同造就了电影史上一直以来公认的两部最令人解颐的失败之作。

这3位畅销书榜头名作家的小说都因电影与图书之间的互相促进配合而销量倍增。这种效果如此明显，人们甚至怀疑有一种业内人士所说的“尾巴摇狗”效应在起作用，就是说，作家在构思小说时，已经将其想象成电影情节和剧本。

1976年《凶兆》的出版是20世纪美国通俗小说史上的突破性事件之一。戴维·塞尔策[153]在完成电影剧本的同时又出版了它的“小说版”：前者破了票房纪录，后者夺得畅销书排行榜冠军。将电影改写成小说这一领域已有艾伦·迪恩·福斯特[154]等诸多大师，塞尔策与之相比毫不逊色，他的小说版赢得了评论界的赞誉。

新的特点，新的市场

V. I. 沃肖斯基是萨拉·帕热茨基的小说《索命赔偿》（1982）中的人物，而金西·米尔霍恩则是苏·格拉夫顿同年推出的《不在场证明》里的主人公。[155]随着这些小说人物粉墨登场，女权主义开始在犯罪小说坚硬的外表上砸出一个凹痕。像柯克船长[156]一样，妇女已经开始大胆涉足以往只有男作家才进入的领域：大男子星球（“金西？——这不是男人的名字吗？”）

凭借小说《验尸》（1990）以及书中塑造的首席医疗审查官凯·斯卡尔佩塔这个人物，帕特里夏·D. 康威尔[157]成为美国图书业历史上作品销量最多、预付稿酬额度最高的女性小说家。斯卡尔佩塔一般不调查案件，而是（如作解剖一般极其仔细地）验看刑事犯罪案件中的死者遗体：她的故事就是关于验尸和福尔马林的传奇。新的世纪到来时，康威尔在多个排行榜上独占鳌头，这对于刑事犯罪小说而言并不多见。类型小说已经不再（或不完全）处于隔离状态。

20世纪末期，新的市场出现并得到开发与利用。此时年轻读者拥有的可支配收入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从1979年出版《阁楼里的花》开始，V. C. 安德鲁斯[158]针对年轻读者——主要是女性读者——成功推出了一系列将惊悚元素与家庭生活相结合的古怪作品。《阁楼里的花》就是一部融合安妮·弗兰克、萨德[159]、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等人的作品特色以及一些古怪猥亵成分的大杂烩。这种鸡尾酒式的小说大受欢迎。到90年代末，安德鲁斯的小说（作者于1986年去世，这些小说有的创作于此后，经特许授权以其名义出版）在全世

界共售出1亿册。

将威廉·考茨温克尔【160】小说版的《ET外星人》【161】推上1982年排行榜冠军宝座的是一群更为年轻的读者（或观众）；一年以后，他们又把《绝地大反击的故事》【162】送上榜首。不过，与这一题材的小说本身一样，读者也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群体，成年人也读这些书，就像他们与孩子们一起去麦当劳吃巨无霸汉堡、炸薯条和牛奶冰激凌一样。后来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及特里·普拉切特和菲利普·普尔曼的作品显现的也是同样的模式。【163】旧的分类在消失，新的类别在形成。一个初三学生或许在课上学了《麦田守望者》或《宠儿》【164】，回家发现妈妈在读《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罗琳受到大众的广泛喜爱，却也因此造成一些尴尬情况。2001年，《纽约时报》宣布为其全美最可靠的畅销书排行榜新增了一个全新的类别——“儿童图书”，其“目的是把哈利·波特系列图书移出小说类图书排行榜上第一、第二和第三的位置，它们已占据上述位置超过了一年的时间”。

新的千禧年色彩

随着新千年的到来，在畅销小说排行榜的顶端也呈现出崭新的千年色彩。1999年，杰里·詹金斯和蒂姆·莱希改编自《启示录》、共有12部的《末世迷踪》系列小说中的第五部《地狱军团》在排行榜上排名第七，销量超过100万册。这一系列的首部小说《末世迷踪》于1995年出版，全系列计划在末日来临的时候（即新千年）出齐，目的虔诚之至。这一系列的最后一部将在圣徒约翰所预言的耶稣二次降临之时出版（不过，为何不在这期间再赚一笔呢？）。

“数字教堂”的出现，汇集了新的宗教信徒，同时——和以前《宾虚》的情况一样——一些传道组织和教会同情支持作者坚定的末世论立场，大量购买和分发《末世迷踪》系列小说，从而大大促进了该系列小说的销售。乔治·W.　布什入主白宫后，右翼宗教势力也成为这种

小说的一个读者群体（也是一个政治游说团体），比起辛克莱·刘易斯在《埃尔默·甘特里》中所讽刺的笨蛋或尤德尔 [165] 需要说服的虔诚信徒，这些人显得更加老于世故。

詹金斯–莱希系列的业绩节节高攀，随着末日临近，其销量剧增。2000年这一年，有两部《末世迷踪》系列小说进入前十名（分获第二、四名），总销售量为450万册。2001年（一个不祥之年），《亵渎神灵》 [166] 夺得榜首之位，是该年美国人读得最多的小说。很遗憾，排队购书者中并没有我主基督，显然末日又未到来。

《末世迷踪》系列预言小说与阿瑟·C. 克拉克的技术乌托邦（和纯粹世俗）小说《2001太空漫游》构成了两个耐人寻味的极端。在克拉克这个宇宙人道主义作家看来，去往其他星球以及外部空间的“阿波罗计划”就如同是崇拜上帝的事业；而对于神学作家詹金斯和莱希而言，阿波罗（听上去）就是亚玻伦，就是魔鬼撒旦。 [167]

丹·布朗于2003年出版的《达·芬奇密码》同样是在宗教主题上做文章，内容更加荒诞不经。这部小说的情节有点怪异（当然是恰巧）地与盖伊·索恩 [168] 的畅销小说《黑夜来临时》（下章详述）有些相似。在布朗的这部惊悚小说里，一位哈佛大学的符号学教授肩负重任，必须对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进行破译，找出暗藏其中、能够证明福音书为满纸谎言的“证据”。他的对手是梵蒂冈的暗杀组织天主事工会 [169] ，该组织势力庞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布朗的书后来差不多成为自图书零售业引入准确会计机制以来本世纪内最畅销的小说。

21世纪的头10年，畅销小说业各个方面欣欣向荣。新书目和新题材层出不穷，销量持续上升，各种题材小说之间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变化不定。科幻小说略显颓势，而幻想小说则蒸蒸日上。至于西部故事，尽管70年代闪现过“新西部小说”的火花，但马背上的形象已经不再高大。犯罪小说倒是同犯罪本身一样，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并且两者都有多样化的趋势。

能够与“带来滚滚财源”的四巨头（指格里森姆、金、斯蒂尔和克兰西）比肩的还有詹姆斯·帕特森 [170] 和J. K. 罗琳。帕特森每年出一

部小说，通常有一位（不起眼的）合作者，2005年至少有5部小说上榜。他曾经解释说，他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让小说“流淌”出来。另一定期出版作品的大腕人物罗琳每隔几年就推出一部哈利·波特系列传奇小说，且每部必然打破销售纪录。汉尼拔·莱克特系列电影也票房火爆。但不时也有（以批评家的眼光看）非常不错的小说进入排行榜，令文化悲观主义者大惑不解。

从长远眼光看，现在能够肯定的只有：1）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畅销小说；2）这些小说会卖得更好；3）其走向难以预料。

注释

【1】 苏珊娜·哈斯韦尔（Susannah Haswell，1762—1824），美国女小说家。

【2】 理查逊指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英国18世纪著名小说作家，著有《帕美拉》和《克拉丽莎》等影响深远的书信体小说。

【3】 “《威弗利》作者”指苏格兰作家沃尔特·司各特；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是《皮袜子故事集》五部曲。

【4】 丹尼尔·P. 汤普森（Daniel P. Thompson，1795—1868），美国小说家。

【5】 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cher Stowe，1811—1896），即斯托夫人，美国女作家，著有《汤姆叔叔的小屋》，对反对奴隶制的斗争起过推动作用。

【6】 指1859年黑人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1800—1859）率领支持者攻占弗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联邦军火库这一事件。

【7】 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1810—1865），英国女小说家，其作品多反映工人阶级的生活。

【8】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逃黑奴的故事。

【9】 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1824—1901），英国出版商，史密斯–艾尔德出版公司的老板。

【10】 约翰·安斯华斯（John Unsworth），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详细信息参见英文部分的Further reading。

【11】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法国大文豪，著名浪

漫主义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代表作包括《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

【12】 玛丽亚·S. 卡明斯（Maria S. Cummins，1827—1866），美国小说家；玛丽·简·霍姆斯（Mary Jane Holmes，1825—1907），美国女小说家。

【13】 安·S. 斯蒂芬斯（Ann S. Stephens，1810—1886），美国女小说家。

【14】 “死木”迪克是美国19世纪小说家贾德森（E. Z. C. Judson，1823—1886）首先在其小说中塑造的人物，是一名为生活所迫打家劫舍的强盗；“野牛”比尔·科迪是贾德森根据南北战争时期的西部英雄威廉·科迪（William Cody，1846—1917）的事迹创作的一系列廉价小说的主人公，后来又出现在许多作家模仿贾德森创作的大量小说中。

【15】 J. 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 1895—1972），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1924—1972）。

【16】 弗雷德里克·冯·伦塞勒·戴伊（Frederic van Rensselaer Dey，1861—1922），美国通俗小说作家。

【17】 安娜·凯瑟琳·格林（Anna Katherine Green，1846—1935），美国女诗人、小说家。

【18】 E. P. 罗（E. P. Roe，1838—1888），美国小说家。

【19】 帕克·本杰明（Park Benjamin，1809—1864），美国记者和报刊编辑；鲁弗斯·威尔莫特·格里斯沃尔德（Rufus Wilmot Griswold，1815—1857），美国记者、编辑和评论家。

【20】 在西方社会，传统上星期天是人们停下工作向上帝祷告的日子。

【21】 指最早出版《宾虚》的Harper&Brothers出版公司。

【22】 美国20世纪初期最大的零售商店。

【23】 拉蒙·诺瓦罗（Ramon Novarro，1899—1968），美国默片时代著名演员。

【24】 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1924—2008），美国演员，曾出演《十诫》、《人猿星球》、《真实的谎言》等影片。

【25】 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1925—2012），美国作家。

【26】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美国女小说家。

【27】 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1832—1899），美国19世纪晚期最受欢迎的作家，创作了许多描述穷孩子成名致富故事的畅销小说。

【28】 纳撒内尔·韦斯特（Nathanael West，1903—1940），美国讽刺作家。

【29】 爱德华·埃格尔斯顿（Edward Eggleston，1837—1902），美国牧

师、小说家。印第安纳州人在民间俗称“山地人”。

【30】 “菜园派”之谓来自名称中的kail，意思是苏格兰卷心菜，用来指19世纪末用方言描写农民生活的一派作家。

【31】 伊恩·麦克拉伦（Ian Maclaren，1850—1907），苏格兰小说家和神学家；J. M. 巴里（J. M. Barrie, 1860—1937），苏格兰小说家和剧作家。“德拉姆拓刻蒂”和“斯拉姆”分别是麦克拉伦和巴里小说中虚构的苏格兰村镇。

【32】 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法国自然主义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系列小说《卢贡–玛卡尔世家》。

【33】 亨利·维兹泰里（Henry Vizetelly，1820—1894），英国出版家，1889年因出版左拉的作品而被判处3个月监禁。

【34】 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美国作家，20世纪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先驱。

【35】 乔治·穆尔（George Moore，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和剧作家。

【36】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1968），美国小说家，以创作“揭发黑幕”的小说闻名。

【37】 弗兰克·R. 斯托克顿（Frank R. Stockton，1834—1902），美国幽默小说家，杂志编辑，尤以其童话故事闻名。

【38】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美国第40任总统，政治上持右翼保守主义立场，早年曾做过演员。

【39】 里根在任（1981—1989）时称苏联为“邪恶之邦”。

【40】 欧文·巴切勒（Irving Bacheller，1859—1950），美国记者、小说家。

【41】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入海口处的一座小岛，1891—1943年间大部分移民通过此处设立的检查站进入美国。

【42】 欧·亨利（O. Henry，1862—1910），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是法国19世纪著名短篇小说家。

【43】 F. A. 芒西（F. A. Munsey，1854—1925），美国报刊出版家。

【44】 赞恩·格雷（Zane Grey，1872—1939），美国西部小说家。

【45】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1875—1950），美国小说家，创作了“人猿泰山”系列小说。

【46】 托马斯·狄克逊（Thomas Dixon，1864—1946），美国浸礼会牧师、作家，鼓吹白人至上主义。

【47】 D. W. 格里菲思（D. W. Griffiths，1875—1948），美国电影导演，因改进电影艺术技法而留名历史。

【48】 雷克斯·比奇（Rex Beach，1877—1949），美国小说家，以描写阿拉斯加淘金故事的探险小说闻名。育空河是北美地区第三大河，主要流经阿拉斯加地区。

【49】 原文为tie-in，指与上映的影视节目相配套的商品，如书籍和玩具等。

【50】 约翰·G. 考威尔蒂（John G. Cawelti），美国肯塔基大学英语教授。

【51】 此处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1—1947）是美国历史小说家，不是与他同名的英国首相。

【52】 詹姆斯·T. 法雷尔（James T. Farrell，1904—1979），美国小说家，代表作为《斯德兹·朗尼金》三部曲；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1905—1970），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1915—），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以其战争题材小说《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凯恩舰哗变》最为著名。

【53】 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1869—1964），美国小说家和剧作家。

【54】 G. 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1844—1924），美国心理学家。

【55】 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1915—1985），美国演员、导演，参演的影片中《公民凯恩》最为著名。

【56】 H. G. 韦尔斯（H. G.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幻小说《时间机器》等。

【57】 书名的英文原文为*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勃列特林暗藏“小不列颠”（Britling = Little Brit）的意思。

【58】 吉夫斯为美国作家沃德豪斯小说中的人物，现用于指理想的男仆。

【59】 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1900—1954），英国小说家。他在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描写了一个位于中国西藏的“世外桃源”式的地方——香格里拉；《再见，奇普斯先生》又译作《万世师表》，讲述了一位公学教师毕生耕耘于教师岗位的感人故事。

【60】 埃德娜·费伯（Edna Ferber，1885—1968），美国女小说家。

【61】 杰尔姆·克恩（Jerome Kern，1885—1945），美国流行音乐和音乐剧作曲家；奥斯卡·哈默斯坦（Oscar Hammerstein，1895—1960），美国音乐剧剧作家。

【62】 哈里·霍迪尼（Harry Houdini，1874—1926），美国魔术大师；乔·麦卡锡（Joe McCarthy，1908—1957），即约瑟夫·麦卡锡，美国共和党参议

员。

【63】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和哲学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美国小说家和社会批评家，代表作包括小说《大街》、《巴比特》等，193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64】 安妮塔·露丝（Anita Loos，1888—1981），美国小说家、电影编剧。

【65】 约翰·厄斯金（John Erskine，1879—1951），美国教育家和小说家。

【66】 维娜·戴尔玛（Vina Delmar，1905—1990），美国女小说家；唐纳德·亨德森（Donald Henderson，1887—1958），美国小说家。

【67】 厄斯金·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1903—1987），美国作家。

【68】 此处原文为prole-fic，prole为proletarian（无产阶级的）的缩写，fic是fiction（小说）的简写形式。由于售价便宜，这种小说比较适合劳工阶级。

【69】 密涅瓦出版社是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著名出版社，以出版浪漫言情小说和哥特式小说闻名；米尔斯–布恩出版社是英国著名出版商，主要出版浪漫言情小说。

【70】 得克萨斯州州旗上的图案是单独一星，因此常被称为孤星之州。本故事也确实发生于该州。

【71】 克拉伦斯·E. 马尔福德（Clarence E. Mulford，1883—1956），美国小说家，创作了一系列以一位跛足的西部牛仔——“跳着走的”卡西迪（或称霍帕朗·卡西迪）为主人公的西部小说。

【72】 马克斯·布兰德（Max Brand，1892—1944），美国通俗小说家。

【73】 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1901—1992），德裔美国女演员兼歌星。

【74】 路易斯·拉莫尔（Louis L’Amour，1908—1988），美国著名西部小说家。

【75】 又译作《蛮国战笳声》。

【76】 约翰·韦恩（John Wayne，1907—1979），美国著名演员，所演电影多数是西部片。

【77】 公爵是约翰·韦恩的绰号。

【78】 欧内斯特·海科克斯（Ernest Haycox，1899—1950），美国西部小说家。

【79】 约翰·福特（John Ford，1895—1973），美国电影导演，曾四度荣获奥斯卡奖。《关山飞渡》是福特与韦恩合作完成的经典西部片，林哥小子是片中的主人公。

【80】 S. S. 范·戴恩（S. S. van Dine，1888—1939），美国侦探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

【81】 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多萝西·L. 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1893—1957）一些作品中的业余侦探。相关内容见第五章。

【82】 约瑟夫·T. 肖（Joseph T. Shaw，1874—1952），美国出版家、文学经纪人，1926年至1936年任《黑色面具》杂志主编，昵称“上尉”源自其曾经在美国军队服役的经历。《黑色面具》是美国著名通俗小说杂志，创办于1920年。

【83】 萨姆·斯佩德这个私人侦探形象后来在多部由此书改编的电影以及作者后来写作的其他故事中出现。

【84】 詹姆斯·M. 凯恩（James M. Cain，1892—1977），美国记者、小说家和电影编剧。

【85】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1888—1959），美国侦探小说家，《长眠不醒》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86】 雷克斯·斯托特（Rex Stout，1886—1975），美国侦探小说家，一生出版了54部尼罗·沃尔夫系列侦探小说。

【87】 原文为Watson，原指著名侦探小说人物福尔摩斯的助手华生，这里用来比喻尼罗·沃尔夫和阿奇·古德温之间的搭档关系。

【88】 哈里·贝德福德·琼斯（Harry Bedford Jones，1887—1949），美国通俗小说家。

【89】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Erle Stanley Gardner，1889—1970），美国通俗小说家，以其系列探案小说闻名。

【90】 廉价通俗小说在英文中称为“纸浆”小说，故有此称。

【91】 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创立者，他采用大批量生产汽车的方式，改变了整个汽车工业。

【92】 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1884—1967），美国发明家和出版家，科幻小说先驱。

【93】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美国作家和生物化学家，以其科普读物和科幻小说著称；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1907—1988），美国科幻小说家，曾4次获科幻小说创作“雨果奖”；西奥多·斯特金（Theodore Sturgeon，1918—1985），美国科幻小说家。

【94】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小说家、现代主义作家，其作品多反映南方社会的历史状况，代表作有《喧哗与骚动》等。他是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95】 美国关于黑手党题材的电视剧集，从1999年到2007年共播出了6季。

【96】 “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原文为blockbuster，该词又有“重磅炸弹”的意思，即“可以炸毁一整个街区的炸弹”。

【97】 亨利·贝拉曼（Henry Bellamann，1882—1945），美国小说家，《金石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98】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以其“兔子”四部曲最为著名。

【99】 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1907—1989），英国女小说家，《蝴蝶梦》是她的代表作。

【100】 艾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899—1980），好莱坞著名导演，悬念电影大师。

【101】 塔拉为《飘》中女主人公斯嘉丽家的庄园，曼德利是《蝴蝶梦》中美丽的康沃尔式庄园。

【102】 莉莲·史密斯（Lillian Smith，1897—1966），美国女作家和社会批评家；比利·霍利迪（Billie Holiday，1915—1959），美国爵士女乐歌手，她根据埃布尔·梅罗波尔（Abel Meeropol）创作的诗歌录制了歌曲《奇异的果实》。该歌曲据说激发了莉莲·史密斯的创作灵感。

【103】 贝蒂·史密斯（Betty Smith，1896—1972），美国女小说家，《长春树》是她的处女作和成名作，曾被改编成电影。德莱塞指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其作品多以主人公的成长奋斗经历为主题。

【104】 弗兰克·耶比（Frank Yerby，1916—1991），美国黑人小说家。

【105】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美国黑人作家，黑人民权运动中的知名人物，其作品多反映美国的种族问题。

【106】 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89），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

【107】 劳拉·Z. 霍布森（Laura Z. Hobson，1900—1986），美国女小说家。

【108】 指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起的一场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很多作家的著作被禁或受到审查，严重打击了美国的文化出版事业。

【109】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美国著名作家，代表作包括《裸者与死者》、《夜间的军队》等。

【110】 即四字母脏字fuck的委婉说法。

【111】 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1893—1967），美国女诗人、短篇小说家。

【112】 W. R. 伯内特（W. R. Burnett，1899—1982），美国通俗小说家。代表作有《小恺撒》、《沥青丛林》（又译作《夜阑人未静》）等。

【113】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

【114】 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俄裔美国女作家和哲学家。她的代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后成为美国历史上销量仅次于《圣经》的超级畅销书。

【115】 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美国作家和社会主义者，他的小说《回头看》是一部描述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式作品。

【116】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926—），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

【117】 欧文·斯通（Irving Stone，1903—1989），美国著名传记作家，一生创作了20多部名人传记小说。

【118】 库珀的《皮袜子故事集》五部曲小说的主人公。

【119】 切斯特·海姆斯（Chester Himes，1909—1984），美国黑人小说家。吉姆·汤普森（Jim Thompson，1906—1977），美国小说家，以黑色犯罪小说闻名。

【120】 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著名黑人文化批评家，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先驱。

【121】 托尼·希勒曼（Tony Hillerman，1925—2008），美国侦探小说家。

【122】 埃尔莫尔·伦纳德（Elmore Leonard，1925—2013），美国著名犯罪小说家。

【123】 雷·布雷德伯里（Ray Bradbury，1920—2012），美国科幻小说家。

【124】 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1920—1986），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沙丘》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

【125】 杰奎琳·苏珊（Jacqueline Susann，1918—1974），美国女小说家，《玩偶谷》（又译作《迷魂谷》）是其最畅销的小说，出版6个月内就销售出680万册。

【126】 莫莉·帕金（Molly Parkin，1932—），英国女画家、记者和色情小说家。

【127】 伊莱亚·卡赞（Elia Kazan，1909—2003），美国电影、戏剧导演和作家。曾因导演影片《君子协定》和《码头风云》两获奥斯卡奖。

【128】 斯隆·威尔逊（Sloan Wilson，1920—2003），美国小说家，代表

作《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曾被改编成电影。

【129】 罗宾·穆尔（Robin Moore，1925—2008），美国小说家。代表作包括《绿色贝雷帽》、《法国贩毒网》等。

【130】 阿瑟·C. 克拉克（Arthur C. Clark，1917—2008），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科普作家和科学家。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28—1999），美国电影导演。电影《2001》全名为《2001年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脱胎于克拉克的短篇小说《岗哨》。

【131】 克拉克未创作过《2060》，此处疑为《2061》之误。

【132】 奥拉夫·斯特普尔顿（Olaf Stapledon，1886—1950），英国哲学家和科幻小说家。

【133】 彼得·本奇利（Peter Benchley，1940—2006），美国小说家，作品《大白鲨》曾被改编成电影；埃丽卡·扬（Erica Jong，1942—），美国女小说家，《飞行恐惧》是她的成名作。

【134】 这部小说出版于1975年，适逢美国独立战争二百周年前夕。当时美国社会陶醉于所谓美国价值，而小说调子较为伤感，与当时的社会气氛相左。

【135】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著名犹太裔作家，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36】 朱迪丝·罗斯纳（Judith Rossner，1935—2005），美国女小说家。

【137】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921—2006），美国女作家、女权主义者。

【138】 威廉·斯蒂伦（William Styron，1925—2006），美国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加拿大女作家、诗人和评论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1931—），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美国新新闻运动的发起者之一；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英国作家。

【139】 利昂·尤里斯（Leon Uris，1924—2003），美国历史小说家。《三位一体》是一部以爱尔兰为背景的历史小说。

【140】 朗凯什是设立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一座监狱，曾被用来拘押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博比·桑兹（Bobby Sands，1954—1981），是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在狱中当选为英国下院议员。

【141】 杰克·希金斯（Jack Higgins），英国小说家哈里·帕特森（Harry Patterson，1929—）的笔名，主要创作惊悚小说。迪伦全名为西恩·迪伦，是其1992年开始出版的系列小说的主人公。

【142】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1938—），英国国际政治惊险小说大师，《豺狼的日子》是其成名作。

【143】 《魔女嘉莉》刚刚出版时精装本只售出了13,000册，但第二年出版的纸皮本售出了100多万册。

【144】 指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为与苏联争夺海洋霸权而提出的海军建设战略。

【145】 又译《美好的事》、《最称心的爱》。

【146】 托马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1940—），美国犯罪小说作家。

【147】 弗兰肯斯坦是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148】 沃尔特·莫斯利（Walter Mosley，1952—），美国侦探小说家。

【149】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美国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50】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1947—），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和制片人，曾执导过《大白鲨》、《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影片。

【151】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美国古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

【152】 阿瑟·赫索格（Arthur Herzog，1927—2010），美国作家、记者和科幻小说家。

【153】 戴维·塞尔策（David Seltzer，1940—2010），美国电影编剧、制片人和导演。

【154】 艾伦·迪恩·福斯特（Alan Dean Foster，1946—），美国科幻小说家。

【155】 萨拉·帕热茨基（Sara Paretsky，1947—），美国女侦探小说家；苏·格拉夫顿（Sue Grafton，1940—），美国女侦探小说家，创作了多部以女侦探金西·米尔霍恩为主人公的“字母系列”侦探小说。

【156】 指美国科幻系列剧《星际迷航》中星际飞船“星舰企业”号的船长。

【157】 帕特里夏·D. 康威尔（Patricia D. Cornwell，1956—），美国女小说家。

【158】 V. C. 安德鲁斯（V. C. Andrews，1923—1986），美国女小说家。

【159】 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1929—1945），德国犹太少女，二战期间死于纳粹集中营，她被纳粹逮捕前写下的日记在战后发表，引起巨大轰动；萨德（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著名情色作家。

【160】 威廉·考茨温克尔（William Kotzwinkle，1943—），美国作家、编剧。

【161】 又名《天外来客》，1982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经典科幻电影。

【162】 根据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1944—）的“星球大战”系列科幻电影中的一部《绝地大反击》改编的电影故事。

【163】 特里·普拉切特（Terry Pratchett，1948—2015），英国幻想小说家，创作了著名的“碟形世界”（Discworld）系列奇幻小说；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1946—），英国奇幻小说作家，代表作为“黑暗物质”三部曲。

【164】 《麦田守望者》和《宠儿》分别是美国作家塞林格（J. D. Salinger，1919—）和托妮·莫里森的小说。

【165】 指前文提到的小说《尤德尔的那个印刷工》中的印刷厂老板，他促使主人公狄克皈依了基督教。

【166】 此书是《末世迷踪》系列的第九部。

【167】 英文中阿波罗（Apollo）与亚玻伦（Apollyon）两字在拼写上相当接近，而亚玻伦是魔鬼撒旦的别称。

【168】 盖伊·索恩（Guy Thorne，1874—1923），英国小说家。

【169】 天主事工会的名称Opus Dei是拉丁语，意为“天主的事工”，是天主教的一个自治社团，现实中的天主事工会与小说中的描写有很大不同，并不从事暗杀活动。

【170】 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1947—），美国惊悚小说作家。

第五章

英国畅销小说

“史前”概况

英国畅销小说发展的文化和商业环境与美国不同。英国始终保持较高的新书零售价格：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100年里，这种定价方式一直受净价图书协议的正式保护。教育和阶级体系的差异也是造成两国间不同的因素。

但两国畅销小说的大体畅销形态还是相同的。一次性的畅销小说，即那些销得最快的书，生命周期往往也很短。畅销小说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极：一极是孤立的、流行期短但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另一极指的是那些持续畅销的小说，这类作品有一批老读者对其保持“类型忠诚”，而且这种“忠诚”常常会持续很多年。

先有畅销小说，然后有畅销小说排行榜，正如先有小说，后有小说之谓一样。塞缪尔·理查逊的狂热崇拜者（“帕美拉迷”们）的出现是日后无数类似热情表达的一次预演。我们发现，围绕一些十分走红的小说，从一开始就会出现某些时尚崇拜行为，比如歌德[1]的《少年维特的烦恼》（1742年出版；引发淡黄色长裤的流行和少年自杀潮）、布尔沃[2]的《佩勒姆》（1828年出版；男士们以穿深色西服和模仿拜伦[3]式愁容为时尚）和杜穆里埃[4]的《软毡帽》（1894年出版；引起软毡帽的持久流行）。

随着沃尔特·司各特作品的面世，畅销小说向其现代体系即畅销小说“机器”的形成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在苏格兰出版商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5]的天才设计下，每一部《威弗利》式新小说的面市都制造了——用悉尼·史密斯[6]半开玩笑的话来说——“一个举国欢庆的节日”。

康斯特布尔采用一种绝顶聪明的销售“噱头”推广司各特的小说。在长达10年的岁月里，每当一部《威弗利》式小说问世（有时一年出3部），都会给人以出自“某位不知名的大人物”笔下的印象。这位神秘作者究竟是谁？要么是沃尔特·司各特，要么是魔鬼，玛丽亚·埃奇

沃思如此评价[7]。但谁能确定？无论好奇心会让猫怎么样[8]，它至少能卖出小说。

“说大话”之术（“互相吹捧”、“天花乱坠式的宣传”）应当是19世纪20年代的“大话王子”亨利·科尔伯恩的专利。比如，科尔伯恩会暗示，某本小说是某位“显赫人物的手笔”，而此人之名，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尚不能公之于众。又如，（此事更加有名），他竟然声称某本小说发现于一个带血的枕头上。

科尔伯恩“造就”了迪斯累里[9]（1827年出版《维维恩·格雷》）、摩根夫人[10]（1806年出版《爱尔兰野姑娘》）和布尔沃·李顿（各种类型小说的大师级人物）。尽管他们都因科尔伯恩大吹大擂的推销方法成就畅销之梦，但对此法3位畅销作家都鄙夷不屑，其中最后一位还曾想象，要是耶稣的使徒把福音书手稿拿到他在康多伊特街的宅邸，不知“大话王子”该如何处置。

在梅费尔[11]高级住宅区之外，贫民区里的广大读者们聊以自娱的是一些“廉价惊悚小说”。这些读物通常以劣质纸张印制，配以粗劣的木刻插图。此类连载读物在爱德华·劳埃德[12]等出版商手里，一次可售出100万册。廉价惊悚小说中的“经典”（并非严格定义）之作有J. M. 莱莫[13]的囚禁故事《被出卖的埃达》（1845）和托马斯·普莱斯特[14]的《一串珍珠》（1846），人们对根据后者改编的舞台剧《理发师陶德》（别吃那个肉馅饼）[15]更为熟悉。

到了19世纪中期，伴随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乔治·劳特利奇[16]出版的“铁路小说”使通俗小说得以通过国家运输系统向全国各地发送。尽管如此，中产阶级和受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仍然是规模很小的读者群体。当时那个“伟大的不可模仿的”狄更斯，他创作的连载小说平均每月的销量也只有5万册。

与美国相比，英国不仅人少地狭，普通读者大众的文化程度也较低，而读者群体中的精英阶层却更为强大。该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有一条明显的深刻裂隙将读者分割开来。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从缪迪先生或史密斯先生[17]处，或者到他们开办的地方流通图书馆借阅体面的精装本小说，而“人民”则饥渴地阅读半便士一本的贫民窟文

学，读完后把它们丢到茅厕里。

1870年颁布的《全民教育法》对于小说市场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同时也有一些类同化压力，但小说市场的阶层差别仍然存在。例如，19世纪90年代，中上层文化人士读的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该系列小说因在纽恩斯【18】创办的《海滨杂志》（定价6便士的时尚通俗杂志，维多利亚女王还订了一份）上刊登而家喻户晓。一本“新福尔摩斯小说”足以将发行量推向50万。

相比之下，下层文化人士读的是塞克斯顿·布莱克，用多萝茜·L.塞耶斯（塑造了“阔佬们的福尔摩斯”——彼得·温西爵爷）的话说，是“办公室勤杂工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布莱克的破案故事于1893年开始在《半便士奇观》【19】上出现。布莱克与福尔摩斯不同，他同某个作家的创作生涯没有必然联系。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还在继续他的破案工作，助手还是“华生”廷克和猎犬佩德罗。多年来，已有多达125个化名和匿名作者写过“布莱克故事”，年轻时的约翰·克里西【20】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个。

其实，“塞克斯顿·布莱克写作工厂”【21】（最后被诺思克利夫【22】的联合出版集团收购）的所作所为，与19世纪40年代爱德华·劳埃德手下的那批“索尔兹伯里广场”文人们剽窃狄更斯作品的勾当（比如炮制《尼克威克外传》【23】）没什么两样。不过，19世纪接近尾声时，威尔基·柯林斯所说的那个“不可知的大众”（“数量需以百万计的大众”）逐渐向文化程度更高、人口数量较少的中等教育阶层转移，那些受雇文人们的写作也随之更为高效。

通俗小说产业的销售额在上升，知名作家的报酬也在提高。到19世纪末，玛丽·科雷利、汉弗莱·沃德夫人、乔治·杜穆里埃和霍尔·凯恩等人凭借《软毡帽》、《埃莉诺》、《撒旦的悲伤》和《马恩岛人》等超级畅销小说收入可达1万英镑之多。【24】这些5位数收入相当于今天杰弗里·阿彻所能赚取的7位数收入。这是个赚钱的行业。

随着三卷本小说——又称“图书馆版”小说——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走向没落，英国的小说阅读明显经历了一次从借书文化向买书文化转变的过程。查托–温达斯、梅修因等“新”出版商开始在市场上大力

推广单卷本小说，新版售价为6先令一本，而更便宜的重印本往往紧随其后。这种“单层”[25] 小说的零售对象既有消费者，也有投机取巧的“两便士”街角租书店。

在19世纪90年代的顶级畅销小说家中，科雷利是最为张扬的一个，在与同行作家争吵时，她也最咄咄逼人，因为她怀疑他们对她鄙夷不屑（事实的确如此）。与汉弗莱·沃德夫人的《罗伯特·埃尔斯梅尔》相比，《巴拉巴》（1893）在当时更加轰动，书中塑造了一个性情乖戾的人物“犹滴·加略”；[26] 而在市场表现方面，此书比沃德高调宣扬宗教虔诚的作品更为出色。在《撒旦的悲伤》一书中，科雷利塑造了一个小说家主人公，他同魔鬼签定了一个浮士德式的协议，用其灵魂交换一两部畅销小说。果然如此的话，作家们再也不用像乔治·吉辛[27] 那样在《新格拉布街》（1891）中悲叹笔耕之艰辛了。

风格更为“现实”的霍尔·凯恩，其灵感来自维克多·雨果，而非科雷利的写作导师布尔沃·李顿。凯恩的《马恩岛人》（1894）表达了他对出生地的感情，此书到1900年据说共卖出50万册。1901年，凯恩乘着新千年的大浪[28] 推出巨作《永恒之城》。该书预言1950年将出现一个共和国，立国宪章将是基督教主祷文。一位评论者如是评价道：“走进凯恩先生的城池更像是跳进了一大锅原始大杂烩之中。”而这锅大杂烩卖得像热烧饼。《永恒之城》据称是英国通俗小说中的首部“快销书”，在一两年内就卖出了100万册。丰厚的稿酬使凯恩在他的岛[29] 上俨然帝王一般，他坐着专人驾驶的劳斯莱斯出入他的城堡，令马恩岛居民们惊羡不已。他于1931年去世时，留下25万英镑遗产。

霍尔·凯恩和科雷利的作品在美国销量巨大，而杜穆里埃的《软毡帽》同样表现不俗。《软毡帽》反映的是被作者悄悄打上英国烙印的波希米亚式生活（*vie bohème*）。“菜园派”作家向美国的出口也不负众望。该派的主要代表是伊恩·麦克拉伦，其作品《美丽野蔷薇旁》（1894）在1895年佩克的“史上首个”美国畅销小说排行榜上排名第一。麦克拉伦的这部小说是一组佩思郡“德拉姆拓刻蒂”的生活小品，时而伤感做作，时而俏皮滑稽。麦克拉伦的另一部菜园派小说《逝去

的美好时光》也上了1895年的排行榜（排名第六）。不写小说时，麦克拉伦的身份是约翰·华生牧师，一位不苟言笑的神职人员。

美国人对于苏格兰小说趋之若鹜，对英格兰作品则热情略淡。伦敦对于不那么故作虔诚的菜园派大师J. M. 巴里倒是情有独钟。巴里借助“斯拉姆”故事在小说创作领域脱颖而出，这些故事又被改编成戏剧登上了伦敦西区的舞台（后来又进军好莱坞）。

爱德华时代的热门书

英国人一边疯狂阅读美国畅销小说，一边也没冷落英国本土的热门小说，但这些作品在美国市场上并不看好。H. G. 韦尔斯的小说在美国从未有过大量读者；萨默塞特·毛姆早年（也是最好）的通俗小说也鲜有问津者。他的半自传体小说《人生的枷锁》（1915）在英国销售大好，而在美国，1934年的那部电影（巧合的是，这也是使贝蒂·戴维斯【30】在其电影生涯中崭露头角的一部电影）上映之前，此书在排行榜上几乎是影踪全无。

柯南·道尔以福尔摩斯、杰拉德准将和查林杰教授（如1912年出版的《失落的世界》）等人物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在美国大众市场上当然也深受青睐。道尔塑造的这些人物在民间家喻户晓，但他一直未能取得杰弗里·法诺尔、W. J. 洛克【31】和汉弗莱·沃德夫人1914年前在美国市场上那样的成功。

盖伊·索恩的《黑夜来临时》是1903年在英国获得巨大成功的畅销小说。小说中一个精通圣经考古学的教授被派往圣地破译一个文件，该文件“证明”耶稣复活从未发生。当时，社会（爱德华时代的人们认识的社会）已开始解体。（当代读者会因丹·布朗于整整100年后出版的《达·芬奇密码》（2003）而观察到两个时代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对于广大读者而言，在新千年来临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怪异之事相随而来）。

对于索恩的这部小说，当时的伦敦主教还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自以

为是地发表了一通高论。几十年后，指挥阿拉曼战役的蒙哥马利将军称赞这部小说改变了他的一生。（格雷厄姆·格林对玛乔丽·鲍恩[32]发表于1908年的浪漫小说《米兰的毒蛇》表达过类似看法。和蒙哥马利的情况类似，这部小说对格林成年后宗教信仰的形成产生过间接但深刻的影响。）

M. P. 希尔[33]的畅销小说《海王》（1901）同样有点儿古怪另类。那时正值大批犹太难民“涌入”英国，大有占据该国之势，小说在一种恐慌排外的癫狂气氛中下写就。小说主人公自封为“海上的理查国王”，在故事末尾，他组建了一个名为“海上堡垒”的庞大舰队，来保卫他可爱的绿色家园。主人公和那位“狮心”同名人一样[34]，在他的旗舰“布达”号上颁布反犹法令。英国人可以安稳地睡觉了。

种族歧视可以大大推动小说的销售，爱情和异域风情同样如此。爱德华时代销量最大的“大销小说”（那时的名称）是《蓝色珊瑚礁》（1908），该书的作者有个沃德豪斯式的名字，叫做H. 德·维尔·斯塔克普尔[35]。在这部鲁滨逊漂流记式的小说里，两个8岁大的孩子迪基和埃米琳因沉船事故而漂流到一个荒岛上。在岛上度过的那些（快乐的）岁月里，他们掌握了生存的技能，发现了（还未到承诺年龄[36]的）“长久亲吻”的乐趣，还品尝了为人父母的甜蜜，而个中缘由他们却从未弄清。

斯塔克普尔的南海田园诗式小说代表了爱德华时代逃避主义的最高境界（*ne plus ultra*），也是一部体现通俗小说之间彼此吸收借鉴的典型作品。这部小说情节的基本设定可以通过巴兰坦[37]的《珊瑚岛》回溯到克鲁索孤身一人流落到原始荒岛的故事。说得近一点儿，这部小说还吸收了E. 内斯比特[38]的《铁路边的孩子》（1906）中的成分——这个故事中有3个孩子被大人丢下，独自呆在“三烟囱小屋”里。詹姆斯·希尔顿在《失去的地平线》线中描绘的香格里拉是喜马拉雅地区的“蓝色珊瑚礁”。《蓝色珊瑚礁》的情节元素在《蝇王》[39]里再次浮现，不过意思正好相反。这些元素甚至在2004年的电视剧集《迷失》中仍然依稀可见。

在罗伯特·希琴斯[40]的小说《安拉的花园》（1905）中，读者

只需花上6先令就能逃离现实，到火热的东方沙漠游历一番。希琴斯的这部撒哈拉传奇弥漫着一股在许多爱德华时代的畅销小说中都能嗅到的宗教味道（该书的标题暗指一个阿拉伯谚语——当然也许不比腊肠和土豆泥更有阿拉伯味[41]——“沙漠是真主安拉的花园”）。

“流浪小说”提供的逃避却不那么遥远；从一家家排屋的前窗就能看到街道上的路人。“快乐浪子”这一情节模式由W. J. 洛克始创于《招人喜爱的浪子》（1906）。洛克书名中的浪子（比“流浪汉”一词顺耳得多）伯齐利厄斯·尼比巴德·帕拉戈是个“四处游荡的哲人”和一个贪杯嗜饮的加斯科涅人[42]。他喜好（无休无止地）大谈生活哲理，宣扬浪迹江湖之光荣与自由。（E. M. 福斯特[43]在其1910年出版的《霍华德庄园》里，在描写伦纳德·巴斯特月下散步时还不忘对这部小说冷言相讥。）

洛克在美国和在英国一样受欢迎，他的小说战前经常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他也因此收入丰厚，每年估计能赚15,000英镑。这可是在劳合·乔治[44]推行首个养老金制度的年代，那时，7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能领到5先令。韦尔斯后来在《波利先生传》（1910）等小说里对“快乐浪子”这个主题又进行了开掘，而杰弗里·法诺尔的《宽阔的公路》（同样出版于1910年）靠这一主题更是赚得盆满钵丰。法诺尔的小说以19世纪早期为时代背景，他的作品使后世所称的“摄政时期传奇”[45]家喻户晓。其后，这一类型的小说又因乔吉特·海尔[46]而享誉文坛，由于芭芭拉·卡特兰而流于粗鄙浅陋，到现在又被米尔斯–布恩出版社推向大众市场。

同洛克一样，法诺尔在美国也大红大紫。他的《宽阔的公路》是1911年美国最为畅销的小说。但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间，大西洋两岸最畅销的小说是弗洛伦丝·巴克莱的《玫瑰园》（1909）。巴克莱的丈夫是一名神职人员，她曾经热心于伦敦东区的慈善事业。19世纪90年代，巴克莱因病魔缠身而开始写作小说。《玫瑰园》的灵感来自一首流行歌曲。加莱斯是否真的爱她？简·钱皮恩百思不解。她在加莱斯双目失明后主动来照顾他，而他并不知道谁在照顾自己，在这期间，她找到了答案。《玫瑰园》第一年在英国卖出15万册，1910年

夺得美国畅销小说排行榜冠军。这部小说在美国所赚利润极其丰厚，该书的出版商帕特南公司干脆把他们的大楼重新命名为玫瑰园，而虔诚的巴克莱则把她的巨额收入悉数捐给慈善组织。

一战和通俗小说

与巴克莱相比，A. E. W. 梅森 [47] 明显不太符合美国人的口味（直到他受到好莱坞垂青）。他的《四片羽毛》（1902）记述了哈里·费弗沙姆在苏丹懦弱可鄙的表现以及后来他以自己的英勇行为完成自我救赎的过程。虽然梅森的小说让那片白色的羽毛成为某种象征性图像，醒目地出现在大后方，但在20世纪接下来的10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梅森所歌颂的那种“战死光荣”的尚武精神面临巨大的压力。数以百万计的费弗沙姆们战死疆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阵亡士兵的亲属不可能去问为什么。战争期间，维持士气的是伊恩·海 [48] 的纪实性小说《前线十万》（要是死亡数量停留在1914年的这个水平该多好）等作品。海对于不列颠民众全体动员准备战斗的描写在美国收效甚佳，英国作战部遂决定将他派往那里，与霍尔·凯恩一起为国家作宣传工作（霍恩报怨说这一任务让他少赚了15万美元，显得缺乏爱国心）。

A. S. M. 哈钦森那部空前成功的小说《如果冬天到来》（1927），反战情绪与战后失望感兼而有之。此书是德国人所谓的 *Heimatkehrliteratur*（返乡小说）的最佳代表。哈钦森的这本书出版第一年在英国即售出10万册，1922年在美国排名第一。书中人物退伍军官马克·萨布尔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充斥恶棍、花花公子、佛口蛇心的奸商、玩忽职守的官员和泼辣不忠的婆娘的世界。神职人员都以他的境遇作为例子向人们布道。

沃里克·迪平的《索雷尔父子》（1925）把这一题材的作品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这部小说讲述一个退伍军官为了让儿子接受绅士教育不惜到宾馆做搬运工的故事 [49] 。但没有什么勋章足以表彰这样

的英勇事迹。

士兵的故事，只要远离战壕，这个时期仍有其诱人之处。P. C. 雷恩的《火爆三兄弟》（1924）到1960年为止已经出了51个英语版本。这是“外国军团”小说中流行最久的一部，被拍成电影的次数也最多。该书借用了奎达【50】1867年的畅销小说《双旗下》的情节，又吸收了希琴斯“燃烧的沙漠”式的神秘元素——现实生活中的读者到不了撒哈拉，最多只能去马盖特海滩。而在伊迪斯·M. 赫尔那部大获成功的《沙漠情酋》（1921）里，撒哈拉的沙漠燃烧得更加激情火热，而雷恩在他的小说里又对这样的浪漫故事有所修正，增添了阳刚的现实色彩。

两次大战之间问世的英国畅销小说不少都带有些故意安于平庸的倾向，而雷恩是这类小说的典型代表。他曾沾沾自喜地说：“我的读者大多数是头脑干净、充满朝气的户外型人士，男女都有……我不是个‘专业小说家’，也不是个长发披肩的文侩。”在这种语气坚定的“正常”声明中，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19世纪90年代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对于社会产生的冲击。【51】

迈克尔·阿伦（原名迪科兰·库约乌姆德季扬）的《绿帽》（1925）使读者领略到了一种世界主义式的世故。小说颇为大胆的“上流梅毒”主题据说使他赚到了50万英镑。由于小说的巨大成功，阿伦于20年代中期移居好莱坞。要是还有人记得他，他就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里的那个“麦考利斯”【52】。

英国类型小说

20世纪早期，英国在不少类型小说领域足可以世界领袖自居。概括起来，这些类型小说有以下7种：

（1）家庭教师小说：在勃朗特之后最杰出的代表是维多利亚·霍尔特／琼·普莱迪【53】；

（2）撒哈拉传奇故事：代表作家为罗伯特·希琴斯和伊迪斯·M.

赫尔；

（3）鲁里坦尼亚浪漫传奇：由安东尼·霍普[54]首创，代表作为《曾达的囚徒》（1894），埃里克·安布勒[55]的《迪米特里奥斯的面具》（1939）把这种小说推向巅峰；

（4）化妆粉和假发套小说：这是一类男性摄政时期小说，因斯坦利·韦曼[56]而流行，而这一题材的创作者中最为成功的是休·沃波尔[57]，其代表作品是《恶棍赫里斯》系列小说；

（5）泥土与忧郁传奇：其先驱是玛丽·韦布（《躲入地下》，1917；《十足的祸端》，1924）。斯特拉·吉本斯的《难以令人宽慰的农庄》（1933）以一种不失温馨的方式模仿、戏谑了这类作品[58]；

（6）海盗传奇：拉斐尔·萨巴蒂尼是该类小说的创作大师，其作品包括《海鹰》（1915）以及更为著名的《布拉德船长传奇》（1922）。乔治·麦克唐纳·弗雷泽[59]认为后者是“20世纪未被认可的伟大小说之一”，但人们对此并不认同，1935年那部由埃罗尔·弗林[60]主演的电影可能在这方面也没给小说帮上什么忙；

（7）米尔斯–布恩爱情故事：这个出版商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版针对女性读者的小说，几乎每个故事都围绕那个永不过时的诱人话题——“伟大的寻夫运动”。在该公司旗下的众多作家中，鲁比·M. 艾尔斯[61]是出类拔萃的一个。她每年创作4部小说，一生共创作了150部作品（首作是1912年的《西班牙城堡》）。有人计算，艾尔斯共售出约1000万本小说。

在此期间，所有这些题材外加其他一些类型的小说均获得长足发展，吸引读者几百万，但在大战间隙英国最受好评的小说类型是“黄金时代”侦探小说。这种小说的主要构成元素包括乡间别墅、古怪的侦探大师、福尔摩斯式的业余侦探和茶叶里的氰化物。该类小说的“女王”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她的处女作是《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此书完成于1916年她参加战时护理期间的一个假期中，展现了她作为一名年轻作家的超常天赋。在这部小说里，一个从英勇不屈的小国比利时来英国避难的侦探赫尔克里·波洛首次登场。而在他的祖国解放后

很久，他仍留在英国清理乡间别墅。

有一个名为“侦探俱乐部”的小说作者组织，专司设计规则、制定写作及阅读的标准，在其运作下，那些“温馨舒适型侦探小说”（本指放在茶壶上的毛制保暖罩）变得越来越新颖独特。温馨舒适同样是多恩福特·耶茨的《贝里公司》（1920）的气候特征。在其之后推出的“贝里书”以一连串延伸故事的形式，续写“幸福家庭”普莱德尔一家在汉普郡乡间邸宅“白色夫人”的生活。这套贝里家世小说结构松散，语带讥讽，时间跨度是从1907年到1950年，颂扬了坚不可摧的英国绅士阶层以及他们先后战胜德国皇帝、世界大萧条和希特勒而生存下来的能力。可是面对工党政府呢？即便贝里家族，也非战无不胜。

惊悚（刺激）小说圈

耶兹也是“俱乐部区惊悚小说”题材的开拓者，他的系列小说主人公是威廉·钱多斯。该系列以小说《死角》（1927）开始。钱多斯与萨珀笔下的上层社会浪荡子“斗牛狗”德拉蒙德如出一辙，代表一种颇具英国特色的“暴力假绅士作风”。在耶兹的这套系列小说开始的时候，钱多斯刚刚被从牛津调来镇压共产党人，而斗牛狗式暴力行为一般是针对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与他们的直系后代詹姆斯·邦德一样，他们的伟大工程是把英格兰从非英格兰人手中拯救出来。

约翰·克里西——最为多产的俱乐部区小说作家，共创作了约600部小说——1938年在他的作品中引入了一个“公子哥儿”形象。这个人物与上文那两个派头十足的莽夫相比，“尊敬的”理查德·罗利森是个更招人喜爱的家伙，从外表上看是个有钱的花花公子，但表象后面的那个人并非救世主，而是个现代罗宾汉。莱斯利·查特里斯【62】笔下的侠盗圣徒（化名西蒙·坦普勒）更像奥切女男爵【63】所写的“红花侠”系列小说中的“绅士复仇者”。这个人物诞生于1928年，因受惠于广播、电视和改编电影的影响，在半个世纪以后仍然活力不减。

1928年，萨默塞特·毛姆的《阿申登》勾画了间谍惊悚小说的最

初轮廓。故事素材源于一战期间作者本人在新成立的军情六处的亲身经历。对此毛姆曾经语气平静地提到，他被单独派往俄国去“阻止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个任务也许007刚刚完成。

毛姆并没有将他具有高度原创性的（“秘密特工”）构思深入发展下去。早期间谍惊悚小说的积极践行者当中，作品畅销时间最为持久的是苏格兰人约翰·巴肯[64]。巴肯在法律界和官场飞黄腾达，工作之余抽空写了一些他所说的“骇人的东西”。《三十九级台阶》（1915）为他带来畅销作家之誉。另有4部“骇人之作”相继面世，其原始素材是理查德·汉内的英勇事迹，他是在南非工作的采矿工程师，也是一个时刻准备为国家效力的秘密特工。今天已经无人记得巴肯曾经担任的最高公职——加拿大总督，但他的“汉内”小说仍不绝于市，《三十九级台阶》还时常被改编成剧本搬上影视屏幕。

“惊悚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特产。而在俱乐部区小说体系之外还有一些惊悚小说作家，他们拥有更加广泛的读者群体，其中又数埃德加·华莱士的读者最众（根据有的算法，达到成年人口四分之一）。他的支持者们（如今已少了很多）宣称，华莱士的《四侠士》（1904）首开惊悚小说创作的先河，书中的4位侠士是4个无比高尚的国际斗士，为拯救文明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包括谋杀）。华莱士创作了大量小说，富有传奇色彩。他还创造了“河官桑德斯”这一人物形象。桑德斯是一个地区行政官，他用加特林机枪把文明带入黑暗的中心[65]。华莱士卒于1932年，此前他正计划如何把大猩猩金刚的故事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华莱士共创作了175部小说，有160部电影是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

如果华莱士是国王，那么30年代才登上文坛的丹尼斯·惠特利[66]就是“惊悚小说王子”。他也写了4个侠士，领头的是德·里奇洛公爵。比起华莱士的4位侠士，这些人怀有更加狂热的反布尔什维克情绪。在18部小说中，他们不知疲倦地打击共产主义者，并与纳粹分子展开较量。60年代，惠特利梅开二度，开始写作魔鬼惊悚小说，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主要得益于哈默公司拍摄的那些影片[67]）是《魔鬼出击》。一个关于惠特利的网页如是写道：“在惠利特[1977年]去世30

年后，他的书几乎从书店全部消失。以前，W. H. 史密斯零售店[68]里放满了他的作品，现在这些书已经踪影全无。”

格雷厄姆·格林（他的书在沃特斯通的书架还能找到，在史密斯书店未必常有）预见到了惊悚小说的潜在市场并在1932年出版的“娱乐小说”《伊斯坦布尔列车》中着手开发这一市场潜力。格林同埃里克·安布勒一样，在整个创作生涯中都努力为阅读经验更加丰富的读者开创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惊悚小说。

污水坑惊悚小说

也有不少小说，虽较逊色却更畅销。英国有自己的“冷血”犯罪小说——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是彼得·切尼[69]。切尼骨子里是个伦敦东区人（其父开过鱼档），他最有名的系列主人公是《此人危险》（1936）中首次亮相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美国佬）雷米·考蒂恩（意即“让我警告你”）。40年代，切尼如日中天，一年内著作销量超过100万本。尽管他为国内的文学界所不齿，在美国也湮没无闻，但在法国却得到知识界人士的顶礼膜拜。让–吕克·戈达尔[70]的“新浪潮”电影《阿尔法城》中的主人公就叫雷米·考蒂恩。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法国知识界对詹姆斯·哈德利·蔡斯[71]态度要比乔治·奥威尔好得多。蔡斯的《没有兰花给布兰迪希小姐》（1939）——包含关于美国黑帮的淫秽内容——为奥威尔提供了灵感，使他写下了那篇著名文章《废物与布兰迪希小姐》。在奥威尔看来，蔡斯的畅销小说是“纯粹的法西斯主义”：同希特勒一样危险，而且更难阻止。

以汉克·简森（很多匿名作者假托此名写书）名义出版的小说也属于伪美国货、冷血犯罪和穷人的斯皮兰这一套路，只是更为低俗。首部以此名登场的作品是《当夫人们变得厉害》（1947）。体面的书店不会经营这种货色，地方法官也频频过问，但“简森们”却能通过其他渠道售出几十万册此类小说。

大萧条时期的小说

1929年的经济崩溃以及其后的大萧条，对畅销小说以及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沃尔特·格林伍德[72]的《受救济岁月的爱情》（1933）等小说中清晰可见，在（笔调通常轻松乐观的）J. B. 普里斯特利[73]那部有关伦敦办公室生活的系列喜剧《天使人行道》（1931）中，也成了贯穿其中的阴郁基调。其实，通俗小说业绩不俗本身就是经济萧条时期的一个特征：对于那些闲暇有余、收入不足的人而言，小说是他们当时能所买到的最为廉价的奢侈品之一。《天使人行道》虽然调子有些阴郁，却为普利斯特利带来不少实惠，被他戏称为“我的喷金井”。在30年代，这样的喷金井寥寥可数。

《青山翠谷》（1939）被称为“英国的《愤怒的葡萄》”，该书的调子更加愤怒，涉及的社会阶层也更广。这部格调激愤的家世小说出自理查德·卢埃林之手，描写威尔士矿工的艰辛生活。此书在头一年即重印20次，似乎在重复着威尔士亲王那句绝望的感叹：“确实得采取点儿措施了”。

战前（英国）畅销小说的霸主是A. J. 克罗宁。《城堡》（1937）通过出版商维克多·戈兰茨[74]精明巧妙的市场推广，头半年就出了14版。根据记载，该书到1942年的时候在英国已售出了304,000册。《城堡》采用*Bildungsroman*（成长小说）的形式，讲述苏格兰医生安德鲁·曼森的职业生涯，他因为“渴求物质上的成功”而几乎丧失良知。那么安迪医生[75]会不会为了在哈雷街[76]和当红医生名录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出卖灵魂呢？在经历了许多痛苦煎熬后，他最后给出了否定答案。《城堡》这部小说，特别是书中那个英雄式的主人公，那个四面楚歌的年轻医生，使“医院情节剧小说”在英国广受欢迎。后来在无数米尔斯–布恩出版社出版的浪漫小说或电视肥皂剧中都能发现这一小说的影子，甚至在理查德·戈登[77]的战后喜剧《家有医生》中也能间接地找到这部小说的影响。克罗宁的这部小说，连同他一两年前推出的“芬利医生案例”系列故事，也许还为国民保健制度

的建立打下了某种基础。

20世纪40年代

二战时期英国人所读的书与战前差别不大，其后几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当时人们没有太多选择。受纸张定量供应和政府部门控制的影响，图书业只能原地踏步，而其中畅销小说这一块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处于停滞状态。畅销小说冒泡的“嘶嘶声”底气不足，而blockbuster一词令人想起的是从兰开斯特轰炸机（运气不好的话，会是海因克尔轰炸机）上扔下的炸弹，[78] 而不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格雷厄姆·格林的《恋情的终结》在头几章就已显现出当时文化生活凋敝的状况，而在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9年出版，写的显然是1948年的事）的开头部分，这种感觉更为真切。温斯顿·史密斯的胜利大厦里没有畅销小说，而在格林那本小说的开头，莫里斯·本德里克斯的风车酒吧也不会有麦芽威士忌酒。[79]

纸皮本小说——尤其是企鹅版和米尔斯–布恩出版社的纸皮本小说——在战争期间大行其道。艾伦·莱恩的公司在当时严格的“战时管制”下，推出了一批相当出色的重印本小说。女性爱情小说得到长足发展，填补了大量男性人口缺失造成的真空。40年代，乔吉特·海尔和芭芭拉·卡特兰成为分别统治两块领地的摄政女王：一块是高地，一块是低地。[80]

精装本小说在40年代是一批久负盛名的作家的天下。在W. H. 史密斯集团和业界发行物发布的排行榜中，克罗宁、希尔顿、杜穆里埃、惠特利、H. E. 贝茨[81] 和克里斯蒂等人的作品年复一年被评为全国各个商业大街的书店里“需求量最大”的图书。

该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可能与战时结盟有关）是，市场上出现了一批“文学”味道更浓的美国文学作品。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是英国1940年购买量最多的新书之一。他那本有关斯堪的纳维亚人抗击纳粹占领的《月落》（1943）同样受人青睐。欧内斯特·海明威因

《丧钟为谁而鸣》（记录另一场战争[82]的小说）之故，1940—1942年间作品销量在英国首次超越（比方说）丹尼斯·惠特利。劳埃德·C. 道格拉斯那部解释福音书的小说《圣衣》1943—1945年间在美国销量遥遥领先，在英国也很畅销；同样走红的还有凯思琳·温莎的《永远的琥珀》（1946），这部小说描写王朝复辟时期轻佻女子的轻浮故事（因与事实不符，显得滑稽可笑）。

同美国的情形一样，战争结束一两年后英国通俗小说才开始面对战争本身。英国本土小说中最早涉及战争的是内维尔·舒特[83]记录战俘生活的小说《爱丽丝城》[84]（1949）。据《史密斯新闻》称，此书“轻而易举地成为该年度最成功的小说”。也许这是因为英国人感觉自己也在遭受囚禁，尽管这也许没有被日本人的军队囚禁那样残酷。

美国的战争畅销小说通常集中描述步兵的经历（如诺曼·梅勒、詹姆斯·琼斯和欧文·肖[85]的作品），而英国小说的焦点则是皇家海军，这类作品包括尼古拉斯·蒙萨拉特的《沧海无情》（1951）和阿拉斯泰尔·麦克莱恩的《陛下之舰尤利西斯号》（1955）。[86]这些小说不遗余力地突出的是海上冲突毫无魅力可言。C. S. 福雷斯特[87]的“霍恩布洛尔”系列小说[88]以拿破仑战争为时代背景，讲述了一种虽然年代稍远但同样充满爱国情怀的海上生活。小说主人公霍雷肖在1937年是海军候补少尉，到40年代末，他已成为海军上尉，到后来他还会升为海军上将霍恩布洛尔，吸引上百万读者阅读他的故事。

50年代：公费救济小说

詹姆斯·邦德是在1953年出版的《皇家赌场》中首次登场，为英国读者所知晓。在加入英国谍报机关前，邦德已是一位高级军官。在准备创作007系列惊悚小说的过程中，伊恩·弗莱明认真研究了萨珀、巴肯、切尼和埃德加·华莱士等大师的作品。在他的叙述里可以发现，所有这些作家的作品片段都浮现其间。不过，《皇家赌场》的第一句话描述的倒不太像俱乐部区，而更像纯粹的势力小人区：“凌晨3点，

赌场里的香气、香味和汗味令人作呕。”在那个年代，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唯一可供选择的频道）每天晚上10点以《上帝保佑女王》音乐和好力克饮料画面结束节目。要想记起凌晨3点的生活情景，大多数公民还得将记忆推回到战争年代和灯火管制时期，而邦德会让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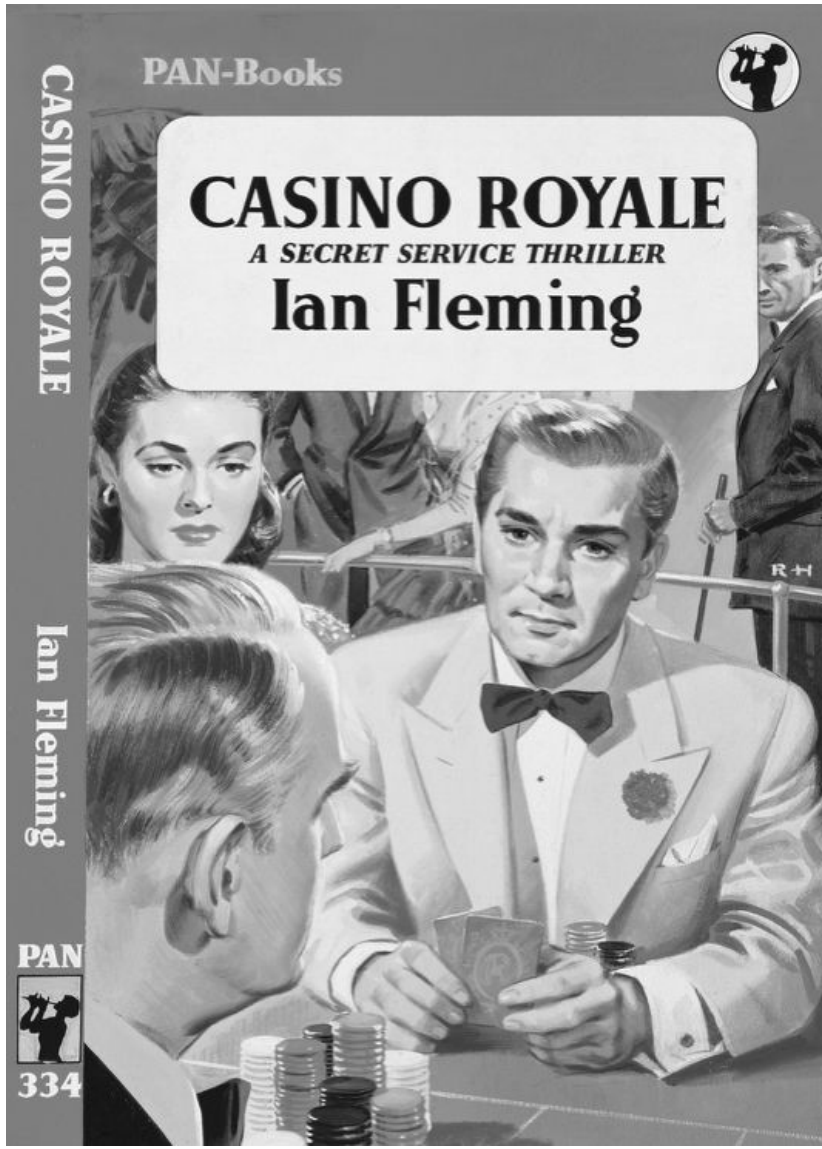

图10　《皇家赌场》：20世纪60年代大众市场纸皮版

肯尼迪总统曾经称他爱读弗莱明的作品（他可能企图以此区别于他那位喜爱赞恩·格雷的前任艾森豪威尔），邦德系列因此名声大振。首部邦德电影于1962年面世，一个圆球自此滚动起来，而且似乎再难停止，尽管英国现在仍有恶臭熏天、凌晨3点还在营业的超级赌场。

1954年12月是英国畅销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颇具预示性意义的时间点。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已在1949年出版，反响不温不火，5年之后，英国广播公司采用奈杰尔·尼尔【89】的改编剧本制作的电视剧产生了巨大轰动。据报道，该“恐怖剧”在叙述效果上饱含冲击力，一些心理脆弱的观众在看到101室里老鼠撕咬犯人的惨状后竟然因过度惊吓致死。【90】奥威尔的小说在社会上引发的抗议浪潮（包括议会质询）也造就了这部作品的名噪一时。尽管这部小说包含“恐怖”成分，因其有益公民教育，最终还是进入学校课堂。在其后几十年里，《一九八四》的销量甚至超过了“邦德”小说。

已经寿终正寝的畅销小说，时而会被重新发掘出来，并因电视改编而获得重生。高尔斯华绥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福尔赛世家》以一种更为形象的方式演示了这一重生过程。这部书于1967年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在每周日晚上播出，播出的时候整个国家几乎无法正常运转（为了让会众观看该剧，教堂的活动也被迫推迟）。到1970年，九卷巨作“福尔赛世家”重印本已经售出100多万册（令这位小说家的遗产继承人欣喜的是，这套书的版权恰好仍在有效期内）。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我，克劳狄乌斯》及其续作【91】重现了同样的畅销模式（与高尔斯华绥不同的是，格雷夫斯此时尚健在，还能从中获益）。

英国战后的福利制度所惠甚广，其中包括向民众提供消遣小说。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人们主要是从公共图书馆获取新出版的精装本小说，人们将这样获得的小说称作“公费救济小说”。1959年的《罗伯茨法案》更进一步确立了这一做法。该法案为在全国建立起一个“全面和高效”的图书馆服务系统提供了法律保证。这一制度对于社会的影响犹如一个世纪前的缪迪流通图书馆，通俗小说市场也因此开

始从购买为主向租借为主转变。

公共图书馆系统虽然可以提供丰富的读物（标准借书量是每两周6本）供人们选择，但也使读者的选择出现惰性。因为有获得大量新小说之便，读者往往会忠诚于某些作家。他们会从图书馆借出或“预订”克里斯蒂、福雷斯特、梅佐·德·拉·罗奇、阿拉斯泰尔·麦克莱恩或哈蒙德·英尼斯的新书，[92] 原因非他，只因他们喜爱这些作家以前发表的作品。作家们则以新书相报，大约每年出一部，每部与前一部大同小异。在这个体制下，几乎没有现在所说的P2P（即producer to purchaser：生产者对消费者）的广告压力。这也是英美两大系统之间的重大区别。在美国，广告中的一大块以购买图书的消费者为对象受众，而在英国，广告投放主要局限于行业期刊，出版商是要努力说服零售商和图书管理员该进什么书入库或上架。

温馨随意的作品风格甚至影响到最难驾驭的小说类型——科幻小说。约翰·温德姆[93] 凭借他在小说中创造的“温馨的灾难”（这一机智评价来自同为科幻作家的布莱恩·奥尔迪斯[94]）取得了众所瞩目的巨大成功。在《三裂草的日子》（1951）故事的开篇，大批英国人因一颗神秘的闪光卫星而致盲。这颗卫星可能来自俄国，也可能是美国。然而祸不单行，全国上下紧接着因为一种英国特有的灾难——形体巨大、经过基因改造的甜菜而惊骇失措。

在温德姆的《海妖醒来》（1953）中，斯塔克普尔《蓝色珊瑚礁》里描写的巨型乌贼被放大了一千倍，它从深海冒出，来完成希特勒所开创的事业。一般而言，按照温德姆的情节设计，最后存活下来的幸福家庭都会变得更加坚强和幸福。他的小说之于科幻题材，如同布雷德伯里在美国之所为：他使科幻小说摆脱了类型小说的局限。科幻小说迷们有点儿鄙视温德姆，原因是非科幻小说迷也喜爱他。J. G. 巴拉德[95] 那些极不温馨的灾难幻想小说——如《沉没的世界》（1962）——虽然被这一题材的鉴赏家们视作科幻小说中的上品，却不太符合大众的口味。令人叹惜的是，当今的生态与气候事件证明，巴拉德的这些作品要比温德姆的小说更具预见性。

愤怒的青年

由于50年代早期和中期“愤怒的青年”群体的闯入，原有的那种温馨和谐的文化氛围以及更为深层的文化遵从意识（战时集体主义的残留物）开始受到挑战。愤青们的作品或冷嘲热讽，如金斯利·艾米斯那部开潮流之先的校园小说《幸运的吉姆》【96】（1954），或牢骚满腹、义愤填膺，如约翰·布莱恩的《向上爬》【97】（1957年出版，首个星期即售出5,000册，令人惊叹）。这一运动具有一种蔑视一切的“顽强与叛逆”，但并未形成任何清晰的政治立场。阿瑟·西顿是艾伦·西利托【98】的小说《周日晚与周日晨》（1958）中的工人阶级主人公，他所说的一句话颇能概括这一激愤情绪：“我会有麻烦，每天斗争，直到我死”。

与“愤怒的青年”运动遥相呼应的是美国的“垮掉的一代”运动。二者的区别在于，美国的愤怒者往往会半途而废，而不能反叛到底，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1957）就是个例证。基思·沃特豪斯【99】的《说谎者比利》（1959年出版；1963年的电影和1970年的电视系列剧对其起了推销作用）末尾有一幕很能说明问题。此时主人公几乎已经鼓起勇气打算离开他所在的北方偏远小镇，南下去“烟城”【100】闯荡，但最后一刻他胆怯了。这种怯懦颇耐人寻味，萨尔·帕拉迪斯【101】不可能为这种怯懦压垮，阿瑟·西顿最后安顿下来，结了婚，而乔·兰普顿【102】靠出卖灵魂换取了保守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和美洲虎跑车。愤怒最终仅是一阵发作，并未带来任何有效的反抗或打破任何常规。但愤怒却能让书卖出去，吸引年轻读者。

特殊关系

在随后几十年中，有几个因素拉近了英美两国读者在通俗小说阅读方面的嗜好。一个基础性的因素是，将全球分割成几个国际版权垄断区域的“传统市场协议”逐渐解体，最终难免取缔之命运。这个协议实际上使英国出版业在一些较大的英语地区拥有优惠待遇。而随

着“传统市场协议”的消失，美国图书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更多市场，并开始大量输出到英国。

第二个因素是20世纪60年代（在“查特莱夫人”取得突破之后）的“纸皮书革命”，它使大量从美国进口的图书进入英国市场。

第三个因素是英美出版业呈现“集中化”趋势，最终形成规模更大的、跨国性质的出版集团。这一趋势导致了一系列企业合并与结盟，目前英国最大的出版公司（姑且如此称之）哈珀–柯林斯的成立就是这一趋势的标志。在地理概念上，“哈珀–柯林斯”这个名称同“伦敦–纽约”一样，似乎得了精神分裂症。

第四个因素——也是具有最终决定作用的因素——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图书零售业畅销小说排行榜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是在受到几十年的抵制排斥之后建立起来的。此时的英国人正在日渐世界化：人们可以自由旅行，也终于没有了“货币管制”；另一方面，进口的美国电视和电影已经渗透到英国文化之中。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两大主要英语区市场在通俗小说消费方面开始呈现出多元混杂、大西洋两岸双向趋同的景象。

然而，如同大多数情况一样，其中一方一定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80年代，美国最初的畅销书排行榜主要由英国进口小说占据。到了2000年，尽管罗琳或J. R. R. 托尔金（托尔金的畅销小说作家生涯在他去世之后才在美国开始，当时正是嬉皮士文化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等小说家在美国如日中天，但美国的每周排行榜上英国小说时常踪影难觅，而美国小说倒经常在英国排行榜上抛头露面。

在这几十年间，英国畅销小说的总趋势是泛美国化【103】。新世纪到来之际，斯蒂芬·金等畅销小说家前往英国就同去趟加利福尼亚一样习以为常。但英国仍然保持了在其出版强项上的畅销优势，其中之一是有动作打斗场面点缀其间的间谍或反间谍小说。约翰·勒卡雷的反邦德小说《冷战谍魂》（1936）使其一举成为走红于两大图书市场的畅销书作家；《伊普克雷斯档案》对作者莱恩·戴顿【104】来说也是同样的情形。肯·福莱特的《针眼》（1978年出版，一个德国间谍能否把“霸王行动”登录计划【105】偷偷送给他的主子们？）和杰克·希金斯

的《鹰从天降》（1974年出版；讲述德国计划通过突袭绑架丘吉尔）从美国的纸皮本市场上获得巨额附带版税，在大西洋两岸均业绩辉煌，而《豺狼的日子》（1971年出版；讲述针对戴高乐的暗杀计划）使弗雷德里克·福赛斯成为又一个美国人喜爱的（英国）惊悚小说作家。以上小说均被改编拍成了大制作影片，除一部以外均由好莱坞拍摄。

英国堪以称雄的另一畅销小说领域是儿童文学（成年人也是其目标读者群），作者包括罗阿尔德·达尔、理查德·亚当斯（著有《沃特希普草丘》，1973年出版）、特里·普拉切特、菲利普·普尔曼、苏·汤森【106】和J. K. 罗琳。

英国的“高品质小说”作家在美国也同样大受欢迎，而有些时候某些作家在家乡甚至还名不见经传。他们中间有约翰·福尔斯（著有《魔法师》、《法国中尉的女人》和《丹尼尔·马丁》等）、D. M. 托马斯（著有《白色旅馆》）和A. S. 拜厄特（著有《占有》）【107】。

人们常常发现，小说中的英国式古怪与电视喜剧一样，同样适合美国人的口味，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有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1978）【108】、乔治·麦克唐纳·弗雷泽那套机智博学、颠倒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弗莱希曼”系列小说（1969—）【109】以及包括尼克·霍恩比的《高保真》（1995年出版，2000年被拍成一部成功的美国电影）【110】在内的《小人物日记》【111】的新时代版本。在霍恩比的小说里，主人公罗布·戈登沉迷于编制每周音乐排行榜，作者似乎在通过这一人物讽刺畅销小说排行榜。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英美两国最为成功的类型小说作家是伊恩·兰金，他的畅销作品是以爱丁堡为故事背景的“雷布思”警察疑案小说。【112】兰金一度占有英国所有大众通俗小说10%的市场份额。兰金的模式极为成功，可以追溯到约翰·克里西那套20多部的“苏格兰场的吉迪恩”系列小说。该套颇具创新性的系列小说以克里西的众多笔名之一J. J. 马里克发表，从50年代中期（《吉迪恩之日》，1955）开始一直创作到70年代中期。与雷布思一样，乔治·基登厌弃人生，道德疲倦，但他仍是城市穷街陋巷里的斗士：用约瑟夫·温鲍【113】（与兰金相

似，创作了以洛杉矶为背景的系列警察疑案小说）的话说，他拥有“一条细细的蓝线”[114]。

英国通俗小说：现代规律

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畅销小说市场可谓是无所不包，这些作品风格多样，包括各种文学层次，目标读者老少皆有，作者背景涵盖国内国外。从W. H. 史密斯书店1960—1965年间的畅销小说记录中，即可窥豹一斑：

1960

《克利》，劳伦斯·达雷尔[115]

《佩顿镇》，格雷丝·梅塔利尔

《豹》，朱塞佩·迪·兰佩杜萨

《最高机密》，伊恩·弗莱明

1961

《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格雷厄姆·格林

《查普曼报告》，欧文·华莱士[116]

《砍下的头颅》，艾丽丝·默多克[117]

《白马酒店》，阿加莎·克里斯蒂

1962

《向上爬》，约翰·布莱恩

《吃南瓜的人》，佩内洛普·莫蒂默[118]

《热血青年霍克》，赫尔曼·沃克

《海里来的公牛》，玛丽·雷诺特[119]

《宿命》，迪克·弗朗西斯[120]

1963

《冒险家》，哈罗德·罗宾斯

《女王密使》，伊恩·弗莱明

《渔人鞋》，莫里斯·韦斯特[121]

《那一群人》，玛丽·麦卡锡[122]

1964

《冷战谍魂》，约翰·勒卡雷
《狂暴的魔术》，玛丽·斯图尔特[123]
《你只活两次》[124]，伊恩·弗莱明

1965

《权力走廊》，C. P. 斯诺[125]
《金枪人》，伊恩·弗莱明
《铁蹄少壮魂》，约翰·勒卡雷
《美国梦》，诺曼·梅勒

以上列举的书目如一包钉子[126]一般，毫无头绪，但其中始终有一条反映中产阶级（有人还会猜测是中年）趣味的坚实脉落贯穿其中（如格林、克里斯蒂、雷诺特、斯诺、斯图尔特和弗朗西斯的作品），并且还透射出一种虽相对较弱但令人刮目相看的高雅格调（如格林和兰佩杜萨）。看起来，在60年代这一节点上，畅销小说缺少的是青年读者的广泛介入——此时的小说就像10年前的流行音乐：被夹在两代人中间。

英美两国的排行榜在任何时候——即使在新的千年到来许久之后——都十分相似，并且日益接近，但两者从未完全一致。如果平行比较上世纪最后5年的排行榜，我们会发现这些榜单上的畅销书目始终呈现出一种纷繁多样的结构。以下排行榜出自同一来源，即W. H. 史密斯书店的年度畅销小说销售汇总：

1996

《热情》，吉利·库珀[127]
《夜课》，梅芙·宾奇[128]
《全力以赴》，迪克·弗朗西斯
《圣猪老爹》，特里·普拉切特

1997

《好战分子》，特里·普拉切特
《微物之神》，阿伦德哈蒂·罗伊[129]
《十磅之罚》，迪克·弗朗西斯

《猛禽》，威尔伯·史密斯[130]

1998

《夏洛特·格雷》，塞巴斯蒂安·福克斯[131]

《彩虹六号》，汤姆·克兰西

《塔拉路》，梅芙·宾奇

《起火点》，帕特里夏·康威尔

1999

《汉尼拔》，托马斯·哈里斯

《布丽奇特·琼斯：理智的边缘》，海伦·菲尔丁

《阿德里安·莫尔：卡普契诺岁月》，苏·汤森

《第五头大象》，特里·普拉切特

2000

《熊与龙》，汤姆·克兰西

《红羽毛》，梅芙·宾奇

《破碎》，迪克·弗朗西斯

《冬至》，罗莎蒙德·皮尔彻[132]

在以上排行榜中，美国作家的轰动性畅销巨作地位显耀（如克兰西、康威尔和哈里斯的作品），不过老书（此时弗朗西斯由骑师转为小说家已将近40年）和爱情故事（如宾奇的作品）同样受人青睐。此外，有几个看似年轻的人物，其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包括海伦·菲尔丁的少女文学公主布丽奇特·琼斯，已过少年（但尚未“成年”）的阿德里安·莫尔，以及普拉切特笔下碟形世界系列小说中无数次出现的角色。阿伦德哈蒂·罗伊那部获布克奖的《微物之神》反映出文学奖项对于小说的销量影响越来越大。畅销小说的“被面图案”[133]正在发生变化。

由于近年来的科技进步，人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准确度监测、记录和分析21世纪头10年里的英国畅销小说。2006年的纸皮本畅销小说排行榜在2007年1月公布，该榜显示，排名处于前列的小说种类繁多，既包括重量级美国进口小说（如畅销不衰的丹·布朗的作品）、销售势头很不错的爱情故事（如莫斯和希斯洛普的小说），也有——包括玛丽娜·柳薇卡的小说处女作在内——布克奖或其他奖项的获奖或提

名作品。

《达·芬奇密码》，丹·布朗：1,019,533
《迷宫》，凯特·莫斯[134]：865,402
《岛》，维多利亚·希斯洛普[135]：660,910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玛丽娜·柳薇卡[136]：631,898
《天使与魔鬼》，丹·布朗：589,761

看看这些排行榜以及对这一领域的一般调查就可以发现，通俗小说市场还将继续繁荣兴盛下去，这是明白无疑的。

注释

【1】 歌德（Goethe，1749—1832），德国著名诗人、作家，主要作品有《浮士德》和《少年维特的烦恼》。

【2】 布尔沃·李顿（Bulwer Lytton，1803—1873），英国政治家、诗人和小说家。

【3】 指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诗人，浪漫主义运动后期主要人物。

【4】 指乔治·杜穆里埃（George Du Maurier，1834—1896），英国漫画家和小说家。

【5】 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Archibald Constable，1774—1827），英国出版商，出版了司各特的大部分作品。

【6】 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1771—1845），英国牧师、作家。

【7】 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1767—1849），英裔爱尔兰尔女作家。

【8】 英语中有句谚语：好奇心杀死了猫。此处指好奇心驱使读者购买司各特的小说。

【9】 指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和小说家。

【10】 摩根夫人（Lady Morgan，约1776—1859），爱尔兰女小说家。

【11】 英国伦敦西区的高级住宅区，是上流社会的代名词。

【12】 爱德华·劳埃德（Edward Lloyd，1815—1890），英国出版商，他在伦敦的索尔兹伯里广场雇用一批文人炮制了大量抄袭模仿著名作家作品的廉价

低俗读物。

【13】 J. M. 莱莫（J. M. Rymer，1814—1884），英国小说家，主要创作廉价惊悚小说。

【14】 托马斯·普莱斯特（Thomas Prest，1810—1859），英国小说家。

【15】 小说中理发师陶德把顾客杀死，把他们的肉做成人肉馅饼出售，因此说“别吃那个肉馅饼”。

【16】 乔治·劳特利奇（George Routledge，1812—1888），英国出版商，创立了劳特利奇出版社。

【17】 此处的缪迪先生和史密斯先生很可能指查尔斯·缪迪（Charles Mudie，1818—1890）和乔治·史密斯，二人都是19世纪英国的著名书商和出版商，前者创立了缪迪连锁租书店。

【18】 纽恩斯（George Newnes，1851—1910），英国出版家，他创办的《海滨杂志》刊登了柯南·道尔创作的大部分福尔摩斯系列短篇小说。

【19】 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英国的廉价故事报。

【20】 约翰·克里西（John Creasey，1908—1973），英国著名犯罪小说作家。

【21】 指故事报《半便士奇观》。

【22】 诺思克利夫（Northcliffe，1865—1922），英国报业巨子，现代新闻业的奠基人，创立了出版多种期刊的联合出版集团。

【23】 显然抄袭了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

【24】 玛丽·科雷利（Marie Corelli，1855—1924），英国女小说家，《撒旦的悲伤》为其代表作；霍尔·凯恩（Hall Caine，1853—1931），英国通俗小说家，代表作《马恩岛人》以他的出生地马恩岛为背景。

【25】 原文为“single-decker”，本义为单层公共汽车，这里用来喻指单卷本小说。

【26】 《巴拉巴》是科雷利根据《圣经》人物巴拉巴的故事创作的长篇小说，书中描写犹大的妹妹犹滴·加略怂恿犹大出卖了耶稣。

【27】 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英国小说家和散文家，代表作包括《新格拉布街》和散文集《四季随笔》。

【28】 此处原文如此，疑为作者笔误。1901年代表新的世纪，而非千年。下文谈到盖伊·索恩的《黑夜来临时》提到新千年也与此类似。

【29】 指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海上岛屿马恩岛，凯恩成名后在岛上购买了一处城堡并长期居住在那里。

【30】 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1908—1989），美国女演员，曾两次荣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

【31】 杰弗里·法诺尔（Jeffery Farnol，1878—1952），英国浪漫小说家；W. J. 洛克（W. J. Locke，1863—1930），英国通俗小说家、剧作家。

【32】 玛乔丽·鲍恩（Marjorie Bowen，1885—1952），英国女小说家，《米兰的毒蛇》是她发表的第一部小说。

【33】 M. P. 希尔（M. P. Shiel，1865—1947），英国小说家。

【34】 同名人指英国国王理查一世（1189—1199年在位），他禁止犹太人入境。他在位期间，伦敦发生了屠杀和迫害犹太人的事件。一些犹太人被迫接受洗礼，入基督教。理查因此得名为“狮心理查”。

【35】 H. 德·维尔·斯塔克普尔（H. De Vere Stacpoole，1863—1951），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家。

【36】 这里指在西方男女双方互相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发生性行为的最低年龄。

【37】 巴兰坦（R. M. Ballantyne，1825—1894），苏格兰作家，著有儿童故事《珊瑚岛》。

【38】 E. 内斯比特（E. Nesbit，1858—1924），英国女儿童文学作家、诗人。

【39】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的代表作，小说讲述了一群因意外事故流落到荒岛上的男童自相残杀的故事。

【40】 罗伯特·希琴斯（Robert Hichens，1864—1950），英国小说家。

【41】 意思是这个谚语也许并非源自阿拉伯人。腊肠和土豆泥都是英国俚语中的词汇。

【42】 加斯科涅是法国西南部一地区，该地区的人喜欢夸口吹牛。

【43】 E. M. 福斯特（E. M. Forster，1879—1970），英国作家和散文家，代表作有《霍华德庄园》和《印度之行》。

【44】 劳合·乔治（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首相，自由派政治家，英语是其第二语言。

【45】 摄政时期指英国1811—1820年间乔治三世精神失常后由其子摄政这一时期。

【46】 乔吉特·海尔（Georgette Heyer，1902—1974），英国女小说家，尤以历史传奇小说闻名。

【47】 A. E. W. 梅森（A. E. W. Mason，1865—1948），英国作家，一战期间曾在英国军队服役，《四片羽毛》是其最著名的小说。

【48】 伊恩·海（Ian Hay，1876—1952），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

【49】 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有类似情节。曾经被流放澳大利亚的罪犯马格韦契通过暗中资助主人公“匹普”接受绅士教育来实现自己的绅士梦想。

【50】 英国女小说家玛丽亚·路易丝·拉梅（Maria Louise Ramé，1839—1908）的笔名，她主要创作爱情浪漫小说。

【51】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爱尔兰作家、诗人，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曾因其同性恋身份遭逮捕受审。

【52】 麦考利斯在小说中是查特莱先生的朋友、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为人自以为是、自私软弱。

【53】 勃朗特指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 Bronte，1816—1855），英国19世纪著名女作家，代表作《简·爱》中的同名女主人公是一名家庭教师；维多利亚·霍尔特（Victoria Holt）和琼·普莱迪（Jean Plaidy）都是英国女小说家埃莉诺·希伯特（Eleanor Hibbert，1906—1993）的笔名，她一生中创作了大量历史小说和浪漫小说。

【54】 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1863—1933），英国小说家，他在其最著名的传奇小说《曾达的囚徒》中虚构了一个东南欧浪漫王国鲁里坦尼亚。

【55】 埃里克·安布勒（Eric Ambler，1909—1998），英国小说家，作品以间谍小说和犯罪小说最为著名。

【56】 斯坦利·韦曼（Stanley Weyman，1855—1928），英国小说家，以其描写摄政时期故事的历史传奇小说最为著名，被誉为“传奇小说”王子。

【57】 休·沃波尔（Hugh Walpole，1884—1941），英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畅销小说家，作品以题材多样、善于细节刻画著称。

【58】 玛丽·韦布（Mary Webb，1881—1927），英国女小说家；斯特拉·吉本斯（Stella Gibbons，1902—1989），英国女作家、诗人。

【59】 乔治·麦克唐纳·弗雷泽（George Macdonald Fraser，1925—2008），英国作家。

【60】 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1909—1959），澳大利亚著名演员，主演了《侠盗罗宾汉》、《布拉德船长》等影片。

【61】 鲁比·M. 艾尔斯（Ruby M. Ayres，1883—1955），英国女小说家。

【62】 莱斯利·查特里斯（Leslie Charteris，1907—1993），英国小说家、编剧。

【63】 奥切女男爵（Baroness Orczy，1865—1947），英国匈牙利裔小说家和画家，代表作为《红花侠》及其后出版的一系列描写法国大革命时期故事的历史小说。

【64】 约翰·巴肯（John Buchan，1875—1940），苏格兰政治家和作家。

【65】 英国作家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与此有些类似。

【66】 丹尼斯·惠特利（Dennis Wheatley，1897—1977），英国小说家。

【67】 哈默电影公司（Hammer Film Productions）是英国的一家制作小成本电影的公司，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拍摄了大量惊悚恐怖影片。

【68】 英国出版物零售商W. H. 史密斯集团开设的连锁零售店，出售报纸、杂志、书籍、文具等，主要开设在英国各地的商业大街、火车站、机场等处。

【69】 彼得·切尼（Peter Cheyney，1896—1951），英国犯罪小说作家。

【70】 让 - 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1930—），法国著名电影导演，“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

【71】 詹姆斯·哈德利·蔡斯（James Hadley Chase，1906—1985），英国小说家，创作了大量犯罪小说。

【72】 沃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1903—1974），英国小说家。

【73】 J. B. 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1894—1984），英国作家，以小说和戏剧作品闻名，小说《好伙伴》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74】 维克多·戈兰茨（Victor Gollancz，1893—1967），英国出版商，创立了维克多·戈兰茨出版公司。

【75】 指安德鲁·曼森医生，安迪是安德鲁的昵称。

【76】 哈雷街是伦敦的一条街道，以汇集众多私人医院和著名医生而闻名。

【77】 理查德·戈登（Richard Gordon，1921—），英国小说家、电视编剧，早年曾做过麻醉师和外科医生，主要创作医疗题材的小说或剧本。

【78】 兰开斯特轰炸机是二战期间英军的一种大型轰炸机，海因克尔轰炸机是二战期间的德军轰炸机。

【79】 温斯顿·史密斯和莫里斯·本德里克斯分别是小说《一九八四》和《恋情的终结》的主人公。

【80】 海尔的小说多描写上流社会女性的爱情故事，而卡特兰作品的女主人公多是出身低微的平民女子，因此说她们一个统治了高地，一个统治了低地。

【81】 H. E. 贝茨（H. E. Bates，1905—1974），英国作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可爱的五月蓓蕾》。

【82】 指西班牙内战。

【83】 内维尔·舒特（Nevil Shute，1899—1960），英国通俗奇幻小说家。

【84】 《爱丽丝城》讲述的是盟军战俘在东南亚遭日本军队残暴虐待的经历。这些战俘中还包括后来成为著名小说批评家的伊恩·瓦特。

【85】 欧文·肖（Irwin Shaw，1913—1984），美国剧作家和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剧本《埋葬死者》和长篇小说《幼狮》等。

【86】 尼古拉斯·蒙萨拉特（Nicholas Monsarrat，1910—1979），英国小说家；阿拉斯泰尔·麦克莱恩（Alastair MacLean，1922—1987），英国小说家，《纳瓦隆大炮》、《血染雪山堡》是其最著名的作品。

【87】 C. S. 福雷斯特（C. S. Forester，1899—1966），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尤以表现英国海军生活的历史小说闻名，作品《非洲皇后》等曾被改编成电影。

【88】 以霍雷肖·霍恩布洛尔为主人公，共包括12部小说。

【89】 奈杰尔·尼尔（Nigel Kneale，1922—2006），英国作家，曾供职于英国BBC电视台，担任电视编剧。

【90】 101室是小说《一九八四》中描写的一间刑讯室。在这里，受刑者会遭老鼠撕咬。

【91】 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1895—1985），英国小说家、诗人。他的《我，克劳狄乌斯》及其续作以古罗马为历史背景，1976年由英国广播公司拍成电视连续剧后轰动一时。

【92】 梅佐·德·拉·罗奇（Mazo de la Roche，1879—1961），加拿大女小说家；哈蒙德·英尼斯（Hammond Innes，1913—1998），英国小说家。

【93】 约翰·温德姆（John Wyndham，1903—1969），英国科幻小说家。

【94】 布莱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1925—），英国科幻小说家。

【95】 J. G. 巴拉德（J. G. Ballard，1930—2009），英国作家，新浪潮科幻小说创作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包括《太阳帝国》、《撞车》等。

【96】 金斯利·艾米斯（Kinsley Amis，1922—1995），英国作家和诗人，《幸运的吉姆》是其代表作。

【97】 约翰·布莱恩（John Braine，1922—1986），英国小说家，《向上爬》是其最著名的作品。

【98】 艾伦·西利托（Alan Sillitoe，1928—2010），英国小说家。

【99】 基思·沃特豪斯（Keith Waterhouse，1929—2009），英国小说家、报纸专栏作家和电视编剧。

【100】 即伦敦。当时空气污染严重，整日烟雾弥漫，故有此称。

【101】 萨尔·帕拉迪斯是《在路上》中的主人公。

【102】 乔·兰普顿是《向上爬》中的主人公。

【103】 大众文化本身常被称为美国化的文化，因为大众文化涉及的技术和市场化过程均由美国牵头发展而来。同时，大众文化本身也代表文化的民主

化，与英国人马修·阿诺德的精英主义思想互相对立。

【104】 莱恩·戴顿（Len Deighton，1929—），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

【105】 指二战期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计划。

【106】 罗阿尔德·达尔（Roald Dahl，1916—1990），英国小说家和编剧；理查德·亚当斯（Richard Adams，1920—），英国小说家，创作的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小说最为著名；苏·汤森（Sue Townsend，1946—2014），英国女小说家。

【107】 D. M. 托马斯（D. M. Thomas，1935—），英国小说家、诗人和翻译家；A. S. 拜厄特（A. S. Byatt，1936—），英国女小说家、诗人，代表作《占有》曾获英国布克小说奖。

【108】 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1952—2001），英国喜剧科幻作家、广播剧作家和音乐家，他的科幻作品代表作《银河系漫游指南》最初以广播剧形式面世。后来又发展成小说，拍成电视连续剧和电影，都获得了极大成功。

【109】 乔治·麦克唐纳·弗雷泽（George MacDonald Fraser，1925—2008），英国历史小说家，他创作的“弗莱希曼”系列小说共有12部，主人公是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恶棍士兵哈里·弗莱希曼。该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出版于1969年。

【110】 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1957—），英国小说家和散文家。《高保真》又译作《失恋排行榜》，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111】 《小人物日记》是乔治·格罗史密斯（George Grossmith，1847—1912）写于19世纪晚期的一部喜剧小说，由其弟威登·格罗史密斯（Weedon Grossmith，1854—1919）配插图，是经典的幽默之作。

【112】 伊恩·兰金（Ian Rankin，1960—），英国犯罪小说家，“雷布思”警察疑案小说指的是以探长雷布思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

【113】 约瑟夫·温鲍（Joseph Wambaugh，1937—），美国小说家，他早年的警察生涯为其创作警察疑案小说提供了丰富素材。

【114】 “细细的蓝线”一语出自1988年的美国纪录片《细细的蓝线》中检察官的法庭控诉词。这名检察官称警察是将社会与无政府状态隔开的那条“细细的蓝线”。

【115】 劳伦斯·达雷尔（Laurence Durrell，1912—1990），英国小说家、诗人。《克利》是他的名作《亚历山大四部曲》（The Alexandria Quartet）的最后一部。

【116】 欧文·华莱士（Irving Wallace，1916—1990），美国通俗小说家，《查普曼报告》（又译作《洛杉矶的女人们》）是他的著名色情暴露小说。

【117】 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英国女小说家和

哲学家。

【118】 佩内洛普·莫蒂默（Penelope Mortimer，1918—1999），英国女小说家、新闻记者。

【119】 玛丽·雷诺特（Mary Renault，1905—1983），英国出生的南非小说家。

【120】 迪克·弗朗西斯（Dick Francis，1920—2010），英国小说家，早年是一位成绩卓著的赛马骑师，后因伤退休，以描写赛马故事的惊悚神秘小说闻名。

【121】 莫里斯·韦斯特（Morris West，1916—1999），澳大利亚小说家和剧作家。《渔人鞋》（又译作《风云英杰》）是其代表作。

【122】 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1912—1989），美国女小说家、评论家。

【123】 玛丽·斯图尔特（Mary Stewart，1916—2014），英国女小说家，主要创作历史奇幻小说。

【124】 又译作《雷霆谷》，是弗莱明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007系列小说。

【125】 C. P. 斯诺（C. P. Snow，1905—1980），英国小说家和物理学家，主要著作有《陌生人和弟兄们》系列长篇小说，《权力走廊》即为该系列中的一部。

【126】 原文a bag of nails是英语中的一句谚语。一包钉子指向各不相同，因此有杂乱无章的意思。

【127】 吉利·库珀（Jilly Cooper，1937—），英国女小说家。

【128】 梅芙·宾奇（Maeve Binchy，1940—2012），爱尔兰女小说家、新闻记者。

【129】 阿伦德哈蒂·罗伊（Arundhati Roy，1961—），印度女作家，《微物之神》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曾获1997年布克小说奖。

【130】 威尔伯·史密斯（Wilbur Smith，1933—），南非小说家，以其系列非洲探险小说闻名。

【131】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Sebastian Faulks，1953—），英国当代畅销小说家。《夏洛特·格雷》（又译作《乱世有情天》）是他讲述二战时期法国故事的历史传奇小说。

【132】 罗莎蒙德·皮尔彻（Rosamunde Pilcher，1924—），英国女浪漫小说家。

【133】 “被面图案”指各种颜色拼凑起来的图案，在这里指畅销小说排行榜的组成情况。

【134】 凯特·莫斯（Kate Mosse，1961—），英国女小说家。

【135】 维多利亚·希斯洛普（Victoria Hislop），英国女作家。

【136】 玛丽娜·柳薇卡（Monica Lewycka，1946—），乌克兰裔英国女小说家。

第六章

畅销小说的未来：有吗？

数字化

数字化已经影响到图书出版的整个流程，这种影响从作者在键盘上敲下的第一击开始，伴随了电脑排版、印刷和库存控制的全过程，一直延续到每小时更新一次排行榜的亚马逊电子书店。在“传统”的店铺式书店，销售终端也配备了监控设备，可以作出把脉式的反馈，随时随地调整改进需求、供应与消费这一销售循环。

我们的书本看上去似乎从来都是卡克斯顿印制的那些东西：白纸黑字，软硬不同的封面。但这些人们早已熟识的东西背后所涉及的方法500年来却已迥然不同。

在这种数字化杂萃中恐怕还得把书迷杂志的活动包括进去。从斯蒂芬·金的官方网站www.stephenking.com到www.readthewest.com（即“西部小说”），如今任何一个畅销作家或一部小说都有授权或非授权的网站——为其文字内容进行广告宣传、鼓动造势或解释说明。

在网上博客空间里，畅销小说所受关注与日俱增，并且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流言和天花乱坠的炒作。如今还新涌现出一些网络论坛，其讨论热度有促进小说销售的效应（也可能正好相反）。对某部作品口耳相传的评价，作为零售业最为有效的推销手段，如今在网络传播和数字化技术的驱动下更是力量倍增。

电脑芯片已经改变了传统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学规律和流转模式。在过去，图书生产与消费的运作都要依赖平面媒体广告、书评、逛书店浏览和公共图书馆等中间环节。

过去20年里，电子配送链的出现使图书产品的价格大幅降低，同时，顾客所拥有的可支配收入较之从前也有了大幅增长。畅销小说的总体以及个体销量以不可阻挡之势上升增长，这也是原因之一。

在这些新生事物中，有一种虽出现不久但影响力极大，这就是那些数量巨大的书迷群体的活动，尤其是针对波特系列图书以及普尔曼

和托尔金的作品。书迷活动或以传统的评论和讨论形式展开，或以更具探索精神的书迷自创小说（或刻意模仿之作）的方式进行，比如，卡桑德拉·克莱尔[1]的《魔戒私密日记》就是向托尔金的致敬之作。那些无心插柳、七嘴八舌的博客文章使电影《女巫布莱尔》成为轰动之作，但迄今尚未如法“造”出一本畅销小说来。尽管如此，人们还应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会成为现实。

有组织的博客文章（通过www.leftbehind.com和www.raptureready.com等网站）的发表——这本身显示了电子会众的力量——理所当然应被视为蒂姆·莱希和杰里·詹金斯的《末世迷踪》系列能够大获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末世迷踪》是一套改编自《启示录》的系列小说，作者显然有意在耶稣二次降临和大审判之际使其达到销售高潮（来自上天的伟大评论者会对小说作最终评判）。对于《末世迷踪》的大获成功，普通读者的第一反应与布奇·卡西迪一样。当卡西迪和圣丹斯小子被地方治安维持队紧追不舍时，他疑惑不解：“这些人是谁？”他们是从哪儿来的？[2]推动《末世迷踪》奇迹的不是读者，即传统意义上的“书迷”，而是新出现的一批电子会众。右翼宗教团体与新通信技术的联姻，改变了美国的政治面貌和DVD影碟的消费习惯（如梅尔·吉布森的《基督受难记》），而同样的结合也在改变着推动通俗小说产业发展的大众的兴趣领域。

与此同时，随着网上（特别是通过亚马逊网站的）销售的发展，网上商家根据顾客偏好为其“提供个性化服务”的能力也与日俱增。这一发展意味着20世纪消费中的“蜂拥而至的抢购”模式可能正在快速、急剧地发生改变。将来不会再有全国性的畅销书，而只有某些以网络相连的读者的“群体偏好”。具体数据将由密切关注这一群体阅读口味的网络零售商负责提供。这是一种乐观的“长尾”理论——反映出人们对于选择机制的认识变得愈加进步和成熟[3]；而这一机制将使“过时”的畅销小说连同其上世纪形成的一整套体制淘汰掉。未来，读者可以不断使自己的阅读趣味更加高雅（或成熟），供应商也能日渐清晰地掌握并越来越好地满足他们的个性需求。

电子畅销书

还有第三种因素会促成这一预期出现的转变，即书本自身的物质形态。在2004年《今日美国》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作者疑惑不解地问道："谁会去读电子书？"答案是"很少一部分人——但毕竟是有的 "。这项技术已经有了数额巨大的资金注入——索尼公司的投入最引人注目，该公司率先开发的"电子书"已于2005年上市。

在这一新技术的早期发展阶段，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各品牌的产品缺乏一揽子的通用标准，混乱无序：Adobe、Microsoft、Mobipocket和Palm这些品牌有的是执行多格式（开放）标准，有的是采用"安全"（经过加密、不可复制）版本。另一个问题是出版商过于谨小慎微，担心数字化的文字会大大方便盗版和私贩行为。谁也不想回到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

另外还有来自图书零售业界的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电子图书查询技术的变革与创新。如果从网上可以下传电子图书，图书零售商则完全可以被绕开。对消费者来说，阅读像素化的文字有伤眼睛，十分不便，这也抑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尽管有这些抑制因素存在，到2006年为止，电子商家还是能够放心宣布，电子图书销售量正以每年40%的速度递增。

谁在买电子书呢？我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肯定是使用iPod的一代人——那些从上托儿所时就开始玩电子玩具的年轻读者，而且大多数是男性，因为男人喜爱新技术。

那么年轻的奇客先生 [4] 到底会看什么书？当然是科幻小说。当下，科幻小说的确拥有一批电子阅读常客（去www.baen.com/library可以查看免费的电子科幻小说资料库）。但电子小说真正的增长点不在这里。哈勒奎图书公司的一位经理人马莱·瓦利克在2006年夏天的《美国爱情小说作家通讯》中写道：

现在有一种说法，似乎电子图书的读者是喜欢技术、酷爱电子玩意儿的人。但一个典型的电子图书读者更可能是急于满足其阅读欲望的嗜读之人；

她喜欢立即下传欲读之书，并希望能随身携带多部小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爱情小说是目前电子图书市场上增长最快的类别。

现在市面上有两大可以获得电子图书及其信息的电子平台："国际电子出版论坛"（www.idpf.org）和"小说专门网"（www.fictionwise.com）。两个网站都编制畅销小说排行榜，其排名也都印证了瓦利克女士所作的分析。在电子图书方面，女性似乎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在18世纪，是女性读者创造了小说兴起的基础。[5]

电子小说，特别是电子畅销小说，不仅代表一项新技术——一个优越的传播体系，这种图书更带来一种新的阅读与消费社会学。对于这一阅读和消费模式，排行榜的推动作用不如互联网明显。这一模式还代表一种新的鼓动宣传方式和新的读者群体。

我们有把握预言，人类还会继续读书，阅读之风将蒸蒸日上。对于写在书页（不管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的）上的通俗小说，人们的需求将一如既往，永难满足。"畅销小说"在19世纪晚期美国图书业的温室中发育成长，在20世纪渐臻完美。但在全新的电子化体制下，在不远的将来，这个东西可能会像内燃机一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场。

注释

【1】 卡桑德拉·克莱尔（Cassandra Claire），美国女小说家。

【2】 布奇·卡西迪和圣丹斯小子是电影《布奇·卡西迪与圣丹斯小子》（一译《虎豹小霸王》）中的人物，是两个被通缉追捕的银行抢劫犯。

【3】 长尾理论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由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提出。该理论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原因，过去人们只能关注重要的人或重要的事，如果用正态分布曲线来描绘这些人或事，人们只能关注曲线的"头部"，而将处于曲线"尾部"、需要更多的精力和成本才能关注到的大多数人或事忽略。而在网络时代，由于关注的成本大大降低，人们有可能以很低的成本关注正态分布曲线的"尾部"，关注"尾部"产生的总体效益甚至会超过"头部"。本注来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27983.html（2008年7月12日摘录）。

【4】 原文为Mr Geek，指爱好新技术、花费大量时间在电脑网络上的人。

【5】　据伊恩·瓦特等学者的研究，18世纪英国小说的主要读者为中产阶级女性以及上层社会的识字仆佣。

我们生活在畅销小说之中。各种媒体的广告宣传、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读者专家的口碑评论，都在促使我们去购买书店里堆积如山的最新畅销小说。但究竟什么是畅销小说？什么样的小说最畅销？为什么？

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到《达·芬奇密码》，从《罗布·罗伊》到“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引领我们走进英美畅销小说异彩纷呈的奇妙天地，追溯英美畅销小说发展的历史，回顾19世纪畅销小说排行榜诞生以来英美小说的众多佳作，为我们揭开畅销小说产业的神秘面纱。

百科通识文库

49

走近艺术史

达娜·阿诺德 著

万木春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走近艺术史

达娜·阿诺德 著

万木春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70**

Art Histor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5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Dana Arnold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艺术史 / （英）阿诺德（Arnold, D.）著；万木春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84-7

Ⅰ．①走… Ⅱ．①阿… ②万… Ⅲ．①艺术史 - 世界 Ⅳ．①J1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59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84-7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什么是艺术史？
第二章　艺术史的写作
第三章　艺术史的呈现
第四章　思考艺术史
第五章　读解艺术
第六章　观看艺术
附录
术语表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达娜·阿诺德，南安普敦大学建筑与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建筑历史教授。

译者简介

万木春，男，1972年1月生，美术史专业博士，现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著有《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并曾翻译瓦尔堡、波普尔和贡布里希等学者的论文和著作。

图目

图1　《卢昂大教堂：（阳光下的）入口》，1894，克劳德·莫奈
图2　饰有戴着头饰的显贵人物图像的玛雅圆形容器
图3　《超级玛里奥兄弟》中的玛里奥
图4　《麦田》，1826，约翰·康斯特布尔
图5　《博士来拜》，1423，泰梯利·德·法布里亚诺
图6　《宫娥》，约1658-1660，迭戈·委拉斯开兹
图7　《观景楼的阿波罗》，梵蒂冈，罗马
图8　《晚宴》，1979，朱迪·芝加哥
图9　《雅典学院》，约1509-1511/1512，拉斐尔
图10　立体主义拼贴《吉他》，1913，帕布罗·毕加索
图11　来自科特迪瓦的女性雕像，19世纪
图12　来自中国的黄绿色玉质骆驼，唐或宋初（约8-10世纪）
图13　《装扮许门像的三女士》，1773，约书亚·雷诺兹
图14　《回声》（第25号），1951，杰克逊·波洛克
图15　《圣母子、圣安妮和施洗者约翰》，约1500，列奥纳多·达·芬奇
图16　《倒牛奶的女仆》，约1658-1660，扬·维米尔
图17　《四使徒》，9世纪，来自德国亚琛教堂的一本卡洛林福音书
图18　复活节岛上的雕像
图19　大理石雕塑《上帝之手》，1896，奥古斯特·罗丹
图20　《圣母子》，14世纪，威尼斯画派
图21　《玛丽莲·梦露》，1962，安迪·沃霍尔
图22　《安格尔的小提琴》，1924，曼·雷

致谢

我在《艺术史》（*Art History*）杂志编辑任期将满之际，有幸得到撰写这本小书的机会。我深知艺术史这门学科的复杂性，其所涉范围，远非本书可以穷尽。正因如此，撰写一本简介性质的书，以此总结艺术史近年的发展、辨明艺术研究的新方向，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本小书将尽最大可能涵盖我们在美术馆和博物馆能见到的各类艺术。由此我必须在写作方法、资料和插图选取等方面悉心选择，而这也是撰写工作最惬意同时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在本书的准备过程中，我有幸得到来自多方面的启发和鼓励。我要感谢阿德里安·里夫金（Adrian Rifkin），他和我一同担任《艺术史》杂志的编辑，感谢他在我们共事期间营造出催人奋进的、平等的工作氛围。我还要感谢凯特·尼科尔森（Kate Nicholson）、依冯娜·杨（Yvonne Young）、汉娜·杨·麦克休（Hannah Young McHugh）和肯·海恩斯（Ken Haynes），他们在我选择插图时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我要感谢朱莉·施拉曼（Julie Schlarman），她为本书编订了索引。至于本书的疏忽和错误，当然应由我本人承担全责。我在洛杉矶格蒂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期间完成了本书的终稿。在此我要感谢格蒂研究院的全体员工、我的研究助手埃米莉·斯科特（Emily Scott）以及其他共事的学者，感谢他们为我提供如此亲切友好的学术环境，使本书得以完成。

达娜·阿诺德（Dana Arnold），伦敦，2003

前言

艺术史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确定艺术作品的归属，并对其进行分类、解释、描述和思考，本书旨在简单地介绍使艺术史成其为一门学科，以及源自于艺术史关注焦点的种种问题与争论。艺术史探讨上述问题的方式随时代而改变，而人们对艺术史的学科范围，以及如何在历史框架中质询视觉题材的态度亦在不断变化，这都使我们对以文字方式来呈现视觉艺术的历史，以及这样做时所受语言文字的限制，产生了疑问。近些年来，人们对于艺术体系中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观众所发挥作用的相对重要性也进行了重新评估。上述问题反过来对仅专注于作品归属、真伪鉴别，以及按时间顺序确定的艺术直线发展的做法提出了疑义，所有这些做法都影响到艺术史的传统规范，而这种传统规范可能只是看待艺术、分析艺术和撰写艺术的一种方式。

因此，传统艺术史强调分期与风格，并且专注于西方艺术作品生产，但同时可能会掩盖其他研究途径，比如按照主题归类艺术作品，可能还会影响探讨非西方艺术的方式。本书打算挑战这种看待与撰写艺术的传统方式，我将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中选取实例，以阐明那些我认为对艺术史学科至关重要的问题。迫于这本小书的篇幅，我在选择插图时不得不有所取舍，所选图片只是为了阐明有关问题。整体看来，这些插图代表的是“高雅艺术”，即博物馆和美术馆会收藏的那类艺术。这些材料使我们得以探讨艺术史涵盖的一系列社会与文化问题。

我首先对“什么是艺术史？”这个基本问题提出思考，这样我就能把艺术史与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区别开来，并能够讨论艺术史这门学科所包含的一系列手工制品及其随时代变迁的情况。尽管艺术是一门与视觉有关的学科，但我们更多地却是通过阅读来了解艺术，通过写作来表达我们的艺术观念。这便涉及到语言和视觉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将在第二章予以讨论。此处我们先看看艺术史在过去是如何撰写的，这么撰写又对艺术史自身的学科问题和研究对象产生了哪些影响。我们要考察的艺术史范例时间跨度很广，既包括普林尼（Pliny）、瓦萨里（Vasari）和温克尔曼（Winckelmann），也包括

贡布里希（Gombrich）、格林伯格（Greenberg）、诺克林（Nochlin）和波洛克（Pollock）等晚近史家的著述。对这些艺术史家的讨论揭示了我们对艺术史的预期，即把艺术史看作伟大的西方男性艺术家的编年故事。艺术史诠释中存在的偏见引出了准则在艺术史中的重要性问题，以及我们如何看待非具象艺术、原始艺术和稚拙艺术等问题。

第三章讨论了美术馆和博物馆的重要地位——或者更宽泛地说，艺术史的各种呈现方式的重要性，厘清了从博古架收藏到今天的私人及政府赞助与收藏的发展过程。同时，本章还讨论了收集活动本身对收集物价值和对艺术史的影响，以及对这些物品的描写本身又是怎样影响到了它们的“价值”。本章再度回到艺术史的准则问题，这回谈的是美术馆或博物馆对于艺术史准则或认可、或挑战的双重作用。在这部分讨论中，我特别关注艺术家身份在美术馆陈列中的重要性，并着意回答这个问题：“将艺术按其对主题的探索呈现给公众，或将艺术按编年顺序呈现给公众，这两种方式在呈现艺术史方面有何不同？”这也引出了另一个话题，那些“一鸣惊人”的展览是如何改变艺术史的方向的——比如后印象主义运动因之得名的1912年的后印象主义展览。

艺术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在第四章里，我会讨论各个哲学流派以及精神分析理论对我们认识艺术史的方式、认识艺术的角色、意义及对艺术的诠释的影响。我介绍了黑格尔（Hegel）、马克思（Marx）、弗洛伊德（Freud）、福柯（Foucault）和德里达（Derrida）这些主要思想家的观点，以说明他们的思想是怎样与艺术史相互作用的，尤其是对艺术社会史及女性主义艺术史的出现产生的作用。第五章接下来讨论艺术含义的概念，尤其注重历代艺术作品中的再现手法的质量和种类，以及历代艺术作品对图像志或象征主义的运用。第六章则专论艺术品创作的不同媒介和技法。

除了介绍思考艺术及其历史的方法，我还希望本书能够激发和增进读者对艺术作品本身的欣赏和理解。我一以贯之地强调艺术作品是艺术史的根基，是艺术史的立足点，所以最后一章又回到作品本身。

我着眼于通过作品的创作技法和媒介来读解作品物质性的方法，以及能够帮助我们读解作品视觉含义的其他方法。

本书是为一般读者、常去美术馆的人和一心向学的优等生写的。修读艺术史、考古学和文化研究专业的本科一年级学生也可以将本书作为视觉文化方面的基础读物。我在写作中尽力避免使用术语，但有些技术与专业术语是必须要用，也必须会认的，意识到这一点，再考虑到本书的介绍性质，我便在书后附了一整套术语表以及美术馆和博物馆的网址，这可以作为个人探询馆藏艺术品的出发点。

我意在对艺术史领域的复杂争辩进行清晰简明的论述，也想使读者拥有研究艺术史所必要的基础知识，为此，我从年代学和主题角度讨论了与这门学科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不过本书最重要的意图，乃是表达出我们可以从艺术中学到如此丰富的东西，并提出了欣赏艺术、思考艺术以及理解我们与艺术之间关系的多种方式。

第一章

什么是艺术史？

美的事物让人永远快乐

——济慈（Keats）

艺术能有历史吗？我们认为艺术是超越时间限制的，艺术之“美”富有含义，意味深长，吸引着从古至今的人们，这至少是我们对“高雅艺术”或者说是纯艺术，也即绘画和雕塑的认识。这类视觉对象可以独立于外物而存在——尽管不同时代或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对同一对象可能会有相反的看法，但我们可以只欣赏作品本身，而无需有关其背景的任何知识。

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

面对一件绘画或雕塑作品，我们常常会问：“谁创作的？”、“什么主题？”、“何时完成的？”，这些都是能够预见的实实在在的问题，在艺术书籍的插图说明中或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陈列标牌上都能找到答案。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信息就足够了。一旦对有关“谁”、“什么”、“何时”等问题的好奇得到满足，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欣赏作品了，或者就是喜欢端详它。而那些对“如何画成”也感兴趣的观众，有关作品技法的信息——比如油画或蛋彩（见第六章），可以帮助他们进一步欣赏艺术家的技法。不过像这样的艺术欣赏，请注意，是不需要艺术史知识的。单独一件作品其历史就含于作品本身，通过解答“谁”、“什么”、“何时”和“如何画成”的问题就可发现。博物馆和美术馆藏品目录上就印着这些信息。而在拍卖目录上，或许还会印上作品最初的赞助人姓名（如果相关的话），这便解答了“缘何而作”的问题。拍卖行、博物馆以及美术馆还强调作品的传承记录，即该作品曾经的主人和曾归属过哪些收藏品，算得上作品的家谱，可用于证明它是某位艺术家的真迹。上述信息对确定一件绘画或雕塑作品的货币价值非常重要，但对艺术史却不一定重要。

这样说来，艺术欣赏不需要了解作品的背景知识。“我知我所

爱，我爱我所见”的态度对参观美术馆来说足够了。而且这态度绝对没错。我们可以纯粹因为艺术本身而欣赏它，艺术也可融于所谓的流行文化之中。

不过艺术欣赏还包含更具挑战性的体验，即据其美学价值对某艺术品加以评判。这个过程通常要涉及风格、构图和色彩，更广泛一些还会涉及该艺术家的其他已知作品，或者同时代、同思潮或同风格的其他艺术家。

艺术鉴赏

与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相关联的还有艺术鉴赏。顾名思义，鉴赏这个词本身就暗示着它要比单纯的观看欣赏来得更为专业。鉴赏专家具有高雅艺术或装饰艺术方面的专业知识，接受过专业训练。鉴赏专家可能为拍卖行工作。我们都从《古董摊》一类电视节目中见识过鉴赏专家的本事，他们只消仔细观察藏品，再问藏品主人很少几个问题，就能立定真伪，估出价值，其鉴定范围不止是绘画，还包括各种器物。这一类艺术欣赏与艺术市场息息相关，需要具备识别特定艺术家作品的能力，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货币价值。

艺术鉴赏的另一方面是它与我们对品位的理解的关系。人们一般认为鉴赏专家的艺术品位高雅独到。艺术品位的概念相当复杂，它不可避免地与我们的社会等级观念联系在一起。让我花一些篇幅对这一点稍作说明。我刚刚谈到了艺术欣赏，在欣赏活动中艺术向所有人开放，为所有人观看并欣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鉴赏活动强制性地将品位分级。“品位”一词在这里具有两重含义：我们在美学方面作出明智判断的能力，以及我们对恰当与否和社会接受度的辨别力。从这些含义来看，品位是由文化和社会两方面决定的，因而美学角度的“好”以及社会角度的“可接受”，都会因文化和社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品位由文化决定这个事实我们必须明了于心，这一点也将贯穿本书始末。尽管如此，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品位的社会维度更多地与

艺术有关，而不是被视为社会排斥的过程——当我们不知艺术家为何人时，我们肯定会感觉受到了威胁，倘若我们竟无法为作品的“优雅”所打动时，这种威胁感就更加强烈。我们都读到或者听到过这些鉴赏专家们清楚明白的话语。不过幸运的是，他们的圈子并不属于艺术史的范畴。相反，艺术史是一门开放性的学科，凡是喜爱观赏艺术、思考艺术、琢磨艺术的人，艺术史都向他们开放。向大家介绍我们如何能够从上述角度参与艺术正是本书的宗旨。

进步的历史

要使艺术史得以成立，艺术不仅要具有超越时代的品质，而且还要具有某种次序或进程，因为既然称为历史，我们自会有这种期待。我们的历史著作中满纸都是往昔事件，它们要么被呈现为进步过程中的一系列行动，要么被呈现为伟人故事，要么被呈现为超乎寻常的传奇时代——比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若只是遵循这类历史框架去思考过去，那么艺术的历史倒不会令人失望。在历史和视觉体验这两条独立线索的汇合过程中，我们看到前者是怎样将后者重组，并赋予它们各种形式的。其中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从艺术家——通常是些“伟人”——的角度来撰写艺术史。而艺术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则是艺术史学家们致力于勾勒出艺术史上各个具有伟大风格的时代，如文艺复兴、巴洛克、后印象主义等。这两种各自独立的艺术史写作方式，构成了艺术史的主干。我在这里强调写作方式的多样性，是因为每种不同的写作方式都产生出不同的艺术史，有的侧重于艺术家，有的则侧重于作品或者是作品所属的艺术运动。

若史家的注意力集中于诸如风格这样的形式元素，艺术史的主题就会变成是风格而不是作品本身。既然我们全神贯注于分辨风格的变化，我们就不光要了解当前风格，还要了解风格在之后的变化。事后诸葛亮的益处在这儿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怎么能知道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对自然和自然主义的初始兴趣，将预示着盛期

文艺复兴艺术家们在艺术上取得的卓越成就？由现在倒推至从前就会得出一条发展主线，而其发展结果已为人所知。这样一来，往昔艺术的轨迹便会有利于某些特定风格——古典艺术及其不断地被重新诠释就是一例。

此外，艺术史若纯粹以风格为焦点则容易忽视作品的其他方面，比如说作品的主题或功能。以人体再现为叙述线索可以写出一部艺术风格史。这部历史可以从古希腊人开始，他们完美地表现了人体之美。但到了中世纪，艺术家对以自然主义方式描绘人体兴趣不再。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体解剖知识和自然知识的增长，艺术益发“逼真”起来。如若以对猫、狗的艺术再现来讲述艺术史，依然是行得通的，但在过去两千年中，家养宠物并不是艺术家关注的焦点。

然而风格在艺术史的形成过程中依然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且只是到了近些年，西方艺术中风格发展的观念才得到重新评估。对风格的强调确实让我们对艺术逐渐进步和持续发展的概念充满期待。如果我们想让艺术再现我们以为自己所见到的世界，那么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强加上一种期待：艺术不断地朝着自然主义发展。可是对那些无意于表现自然主义的艺术，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这类抽象艺术或观念艺术可以被打入另册，降为二等，有时它们被贴上“原始”艺术或“稚拙”艺术这类含有轻蔑意味的标签。现代艺术在很多方面就直面这一偏见，所以常常引起惊呼：“这也算是艺术？”

传记性历史一般要在作品中寻找艺术家早期、成熟期、晚期等不同时期的证据。对那些得享长寿的艺术家来说这样做行得通，而那些早逝的艺术家则不合于这样的叙述结构。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的早期作品《罂粟田》（*The Poppy Field*，1873）与他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于一天之内不同时刻就同一题材绘制的系列作品——比如《卢昂大教堂》组画（*Rouen Cathedral,* 1894，图1）和《干草堆》组画（*Haystacks*，1891）——大不相同。尽管在不同时期的绘画中莫奈始终以光影和色彩作为表现立体感的优先手段，但这些时期的作品与其晚期的作品，例如他以吉维尼的日式花园中的睡莲池为主题的巨幅画作，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像

这样的传记体写法把艺术家从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使我们常常忘记莫奈的晚期作品绘于20世纪初——恰是毕加索（Picasso）进行立体主义实验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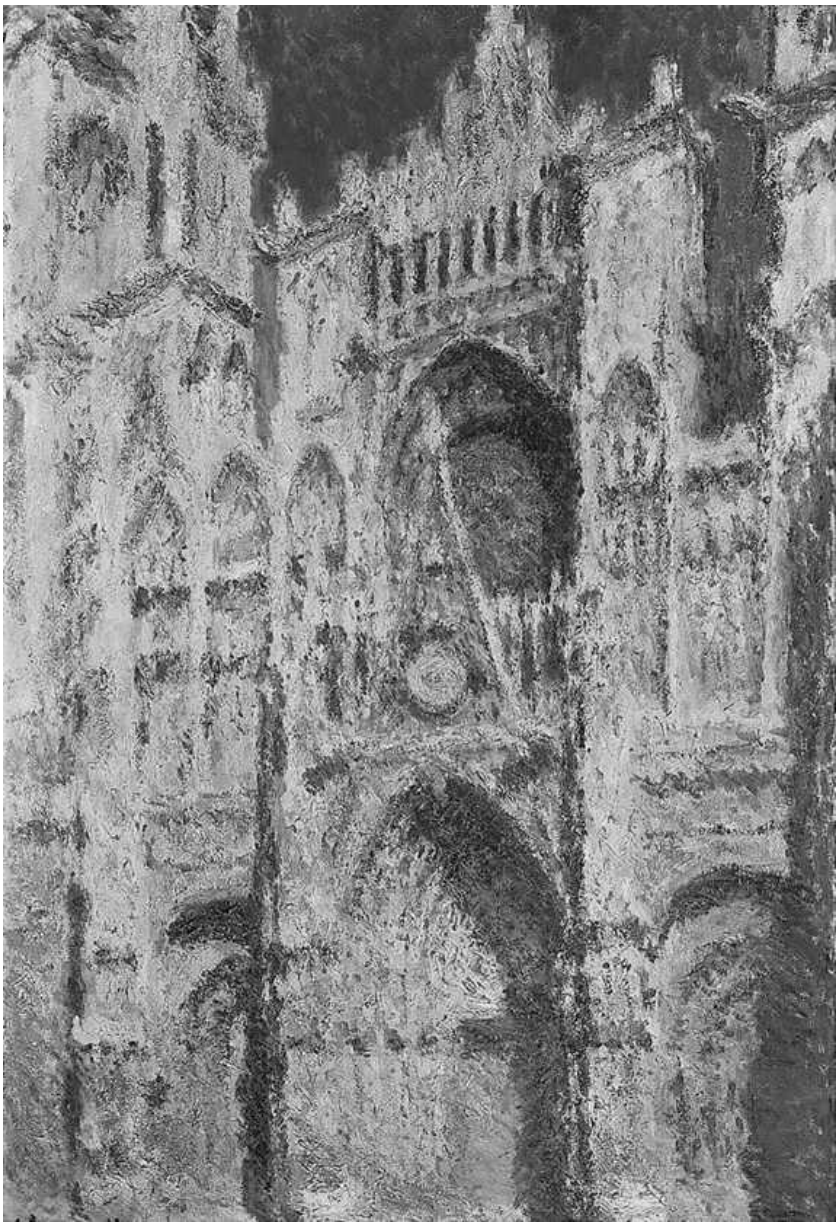

图1　《卢昂大教堂：（阳光下的）入口》，克劳德·莫奈（1894）。

那么，在艺术和历史的相互作用与艺术史这两者之间，究竟该不该有所区别？换句话说，艺术的历史既可单单以风格为焦点，也可以按艺术家生平来研究其作品，这样我们就把对逐渐进步的历史的期望强加在了视觉艺术上。我在这里的建议是把问题掉个过儿，把艺术放在主位，以艺术作为立足点，这样我们就能看清汇成艺术史的那许多股错综复杂的线索。这说明艺术史是具有独立意义的学术领域，而不只是将历史原则应用于艺术这么简单。在本书中我将不时重复这一观点。我的目标是要说明艺术的历史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并对促使我们把艺术视为一种历史结果的种种方式进行描述，此外还想介绍其他一些将视觉艺术置于其历史框架中进行思考的思想方式。

艺术史中的证据和分析

讨论艺术史可以利用哪些档案资料实属必要，因为建构艺术史的取材范围要大大超过艺术作品本身。比如，历史学有过去的文字记录作为文献，考古学专注于实物记录，即各种实物遗存，而人类学则通过观察社会仪式和文化实践来理解古今之人。艺术史可以利用所有这些学科的资料来作为自身最基础的史料——艺术作品——的补充。于是乎，艺术史便成为诠释和理解过去的各种途径的垫脚石。

与此矛盾的是，我们称之为艺术“准则”的东西却限制着我们对这些证据材料的理解和诠释。这里，准则是指那些被有影响力的个人——尤其是鉴赏专家——奉为极品的艺术作品。在艺术史上，准则通常与艺术的“传统”价值联系在一起，但不是唯一联系。从这种角度看，它为新作品的评判提供了参照，因而在艺术的制度化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于是乎，准则成为一种对一批艺术物品强制划分等级的手段。而等级秩序通常对个人天才和“杰作”另眼相看。另外，这种准则还倡导了一种观念，即某些文物或艺术风格更有（历史和金钱的）价值。本书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即是那些经典作品的影响——

人们认为那些作品在艺术史上是兼具品位和重大历史意义的作品范例。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交替使用“艺术”与“视觉作品”这两个词。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艺术史的主题是什么？从传统上说，艺术史谈的都是“高雅艺术”，但许多古代手工制品也被纳入艺术史的研究范围，而且所纳入的这些手工制品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比如，谈到文艺复兴时，艺术史很容易将关注的范围限定于诸如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和拉斐尔（Raphael）这等知名大家，将讨论的作品范围也限定于绘画、雕塑以及创作之前的准备草图之类。可是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期留传下来的视觉作品却品类繁杂，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诠释。我们都熟悉史前时期的岩画，可它们的作者和绘制动机却依然是个谜。我们在法国多尔多涅省的拉斯科洞穴壁画中可以看到狩猎的场景，那是日常生活的写照。可除此之外，岩画也包含抽象的图形。那么这类作品是否具有更为神秘的功能呢？有人认为这些图像出自萨满之手——他们是宗教团体的成员，会在拜神活动中运用致幻药剂，这些抽象图像则是在祭祀中无意识状态中留下的。

若把目光转向古希腊，我们面对的问题则又将不同。希腊文明的时代被看作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期。可是我们对绝大多数古希腊雕塑的了解都来源于罗马复制品，对此本书稍后还将进一步讨论。此外，我们对古希腊绘画也知之甚少。迫于无奈，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希腊陶瓶。早在公元前800年，希腊人就开始在陶瓶上进行装饰。从古风时期的几何图案到黑像风格陶瓶的剪影般的人像，再到红像风格陶瓶上那些更具描绘性、更为流畅的人体形象，流传下来的大量希腊陶瓶呈现出一系列风格变化。这些旧时的遗物不过是当时的日常用品，不过，可能是由于当时的高雅艺术作品极少流传下来，它们便成为备受尊崇的古希腊艺术样本。也许并不令人惊奇的是，它们的历史如今已与古希腊雕塑的历史照应起来，是在追求人体之美的完美表现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历史。

对于非西方的艺术，日用品——有时被称为物质文化，是某个社会艺术成果的最佳展示。一只玛雅花瓶（图2）不仅展现了当时的宗

教或社会仪式，也告诉了我们当时的艺术家选择再现其世界的方式。然而，在西方艺术的晚近阶段，花瓶——以及其他日用品——却并不总能受到这等关注。即便是塞夫勒工场出品的幼陶瓷上的精致图案，或是韦奇伍德花瓶上的古典场景，在面对同时代的高雅艺术时，也不得不避居次席——至少对艺术史家而言是这样的。不过可别忘了，在其生产制作的那个时期，相比绘画和雕塑而言，人们常常认为陶瓷和家具是更有价值、更受尊崇的财产。所以我们对高雅艺术的强调和重视实际上可能是曲解了当时人们的看法。至于艺术史如何歪曲其对象当时以及当下的含义和重要意义这一点，我将在下文多次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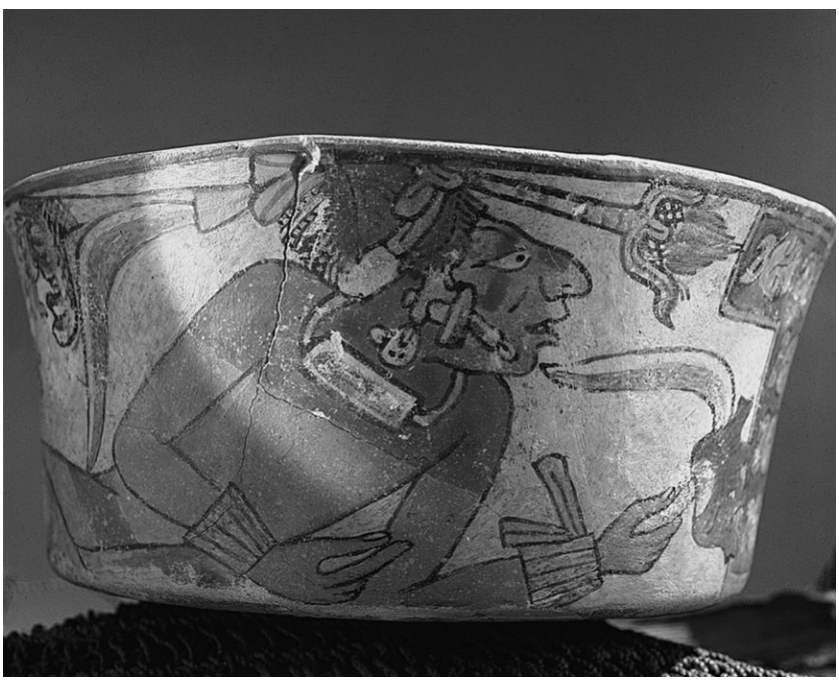

图2　饰有戴着头饰的显贵人物图像的玛雅圆形容器。

近年来，艺术史这个术语本身开始受到质疑，而所谓的新艺术史——现在也有大概三十年的历史了——则致力于重新评估我们思考和撰写视觉艺术史的方式。力图发掘出艺术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含义的种种理论性思考方式都对新艺术史影响极大。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

将讨论撰写和思考艺术史的各种方式，而此处我只想指出，认为艺术作品不仅仅在叙述艺术风格或伟大艺术家生平故事中发挥着作用，而且还具有历史性意义，这一看法是革命性的。历史性意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即使再过二十年，艺术史的主题也还是会有“新”、“旧”之别。

本书并不特别推崇某一种艺术史写法。两种方法各有优点，我特别想做的是质疑和挑战视觉对象，以探索其最广泛的含义和重要性。可是与此同时，我却不想让视觉对象本身——它的物质特性以及在很多时候其纯粹的美学感染力——淡出视野。我认为艺术史毕竟与历史不同——视觉对象是艺术史的基本材料，是任何艺术史探索的起点。能够说清一件艺术作品的外观固然重要，可是用词语来描述和分析视觉对象却并不是最终目的。何况以言辞对视觉对象进行分析也并不总像看上去那么轻松。艺术史自有其术语表，或者说是分类系统，借助它们我们能精确描述出眼前所见的视觉对象。术语表可参阅本书的附录部分。然而讨论或分析一件艺术作品的能力，哪怕分析者使用了复杂的分类系统，也还不是艺术史。当然，它的确是对作品的精确描述，这一过程与艺术鉴赏实践或有关涉，但是满足于明确地描绘出眼前所见之物大体上还只停留在艺术欣赏的层面上。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把描述作品的过程比作学习英国文学的过程，道理就不难懂了。我们不会认为朗读《李尔王》（*King Lear*）的文本或概述一下剧情就是对莎翁此剧的决定性分析。朗读或概述过程或许是分析的必要部分，但却不是分析的最终目的。同理，我们也不应把对一件艺术作品的描述视为研究过程的终结。

在语词与视觉对象的这种关系之间的确存在困境：它们都是相互独立的描述方式。这种紧张关系将在下一章进一步讨论。或许我们对用语言来描述艺术更为熟悉，其中一种表述系统被用来承载另一种表述系统。但我们必须牢记，这样的方式也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也可以借助视觉表述系统来描述和再现通常用语言来表达的现象。

艺术史和“视觉文化”

近来，“视觉文化”或“视觉研究”等术语开始被用来替代“艺术史”。一方面，这个更为宽泛的名称承认可用于历史分析的视觉材料非常广泛，鼓励我们将电影、摄影、录像和数码录像等媒介纳入其研究范围。在这种背景下，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被称为视觉文化的知识探索领域将视像作为研究主题和表现。于是乎，视觉观察和表述则优先于文字观察和表述。视觉文化既与“看”的生理过程有关，也与感知的本质有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近年来，这其中的某些观念被艺术史这门学科所接受，第四章将对此予以讨论。

视觉文化与艺术史在研究主题方面多有相同，比如两者都关注性别问题以及将艺术视作观察世界的一套体系等问题。而视觉文化和艺术史的本质区别在于视觉文化关心的是眼睛的运动，因而其研究对象包括我们两眼所见的一切——我们感知的周遭世界。视觉文化的研究范围超过了传统的“艺术”范围，将从广告到虚拟现实的一切视觉现象的运动、光线和速度概念都纳入它的研究范围，而尤其强调对日常所见的研究。我不否认这些图像的重要性，也不否认大众对其的喜爱。我甚至斗胆提议说《超级玛里奥兄弟》（*The Super Mario Brothers*，图3）中的玛里奥形象和蒙娜丽莎一样家喻户晓——对某些时代的人来说前者甚至更受欢迎。明确视觉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的区别也同样重要。艺术能够成为流行文化——不单单是以我刚才提到的方式，还可以通过将其自身转化为其他形式的方式实现。以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的《麦田》（*The Cornfield,* 1826，图4）为例，在伦敦国家美术馆最近举办的一次展览上，这幅受人景仰的表现英国乡村景致的作品被用于各种物品上，包括印刷在饼干罐、日历等物品上，并被制成海报和印刷图片。从这个角度来看，视觉文化可以说是将许多被高雅艺术排除在外的广大题材囊括进自己的领域。虽然视觉文化及其方法主要与现当代艺术作品联系紧密，但从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其研究方法在探询早期艺术制品时却同样有效。比如诞生于中世纪的许多艺术制品就未必能在高雅艺术的特有范畴中加以描述。因

此，尽管人们对高雅艺术在西方文化中的统治地位有不同看法，一旦将目光转向这一时期的视觉文化，分歧者之间就会产生共鸣。

图3　《超级玛里奥兄弟》中的玛里奥——任天堂开发的一款电子游戏中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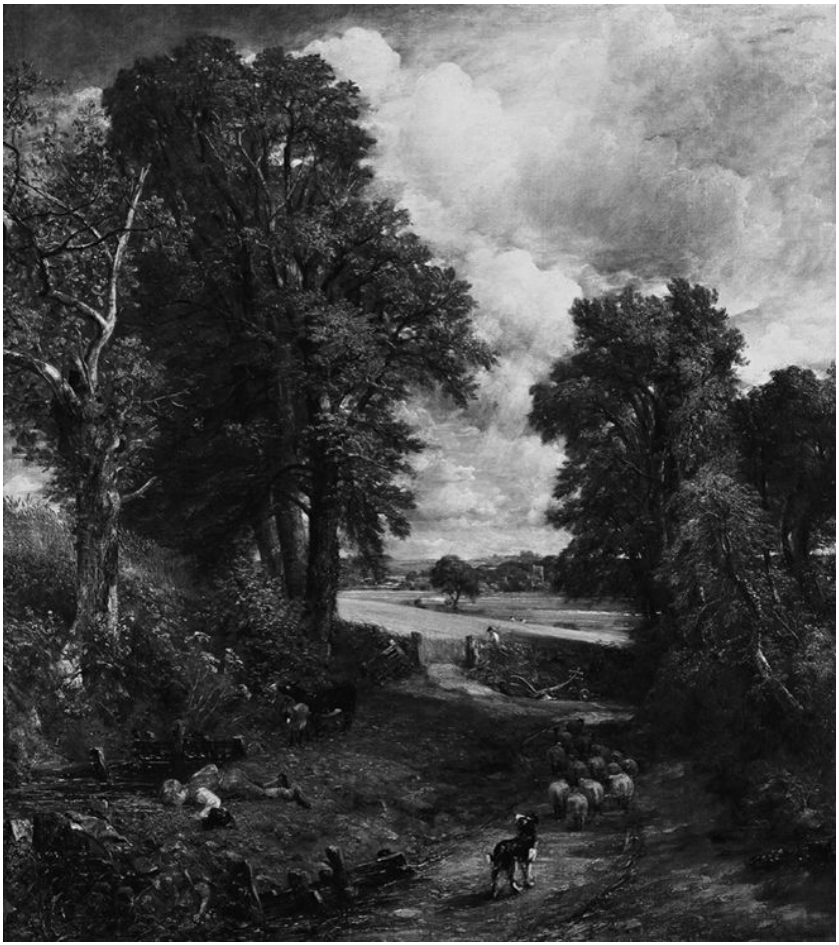

图4　约翰·康斯特布尔的《麦田》装饰了从日历到饼干罐的一系列物品。

作为一种批评活动的视觉文化还包含一层政治维度，因为它被许多信徒视为挑战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一个途径。视觉文化强调日常、大众消费和体验，其关注焦点确实主要集中于现代性研究——此处的“现代”指二战以后。这样，视觉文化的研究范围部分取决于所能获得的材料。我们对流行文化和早期历史上人们对视觉对象的感知方式知之甚少，因此要对其进行政治读解愈加困难。虽则如此，许多艺术史家还是将政治议题引入了自己的著作中，对此后文还将进行讨论。

视觉文化关心的问题并非都根植于20世纪晚期及以后。比如对观

看方式与光学理论的关系的探讨，肯定在16世纪和17世纪就流行起来，并为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和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这些杰出人物所阐明。光学理论借助暗箱的使用走进艺术实践中。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和欧洲北部对于透视的发现（第五章将对此进行讨论），这表明艺术家对由直线透视和空间透视的错觉所创造出的空间感饶有兴趣。正如第四章所云，视觉体验的地位是18世纪的思想家们——尤其是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殚精竭虑的首要问题。视觉文化引入政治议题并将美学降低到次于政治议题的地位，同时它涵盖的艺术产品范围也更为广泛，正是这些方面使视觉文化这门学科有别于艺术史。视觉文化最擅长的也许是对多媒体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分析，而这可以另写一本小书了。

艺术史实践

下面我将以实例说明艺术史是如何表述和研究各种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同时也对艺术史的各种功能进行说明。为此我挑选了四幅主题和创作日期都相距甚远的图像。第一件是泰梯利·德·法布里亚诺（Gentile da Fabriano）的《博士来拜》（*Adoration of the Magi*，图5），又名《斯特罗齐祭坛画》（*Strozzi Altarpiece*）。这幅画现藏于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它原先是一幅祭坛画，放置在佛罗伦萨圣三一教堂的斯特罗齐私家礼拜室中。这幅画位置的转移引出了观看艺术作品时会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这些作品常常都不摆放在原先的位置了，我们只是把它们当作美术馆按照历史顺序排列出的作品中的一个个片段来看待。一般来说，美术馆的各个展厅都按照时间序列来陈列作品，有时还根据类别、风格或主题作进一步分类。所以艺术史的首要研究资料——作品本身——其呈现已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在美术馆里观看一件艺术作品，可能会将重点放在作品本身的物质特性上，这与本章先前讨论过的艺术鉴赏背后的那些原则相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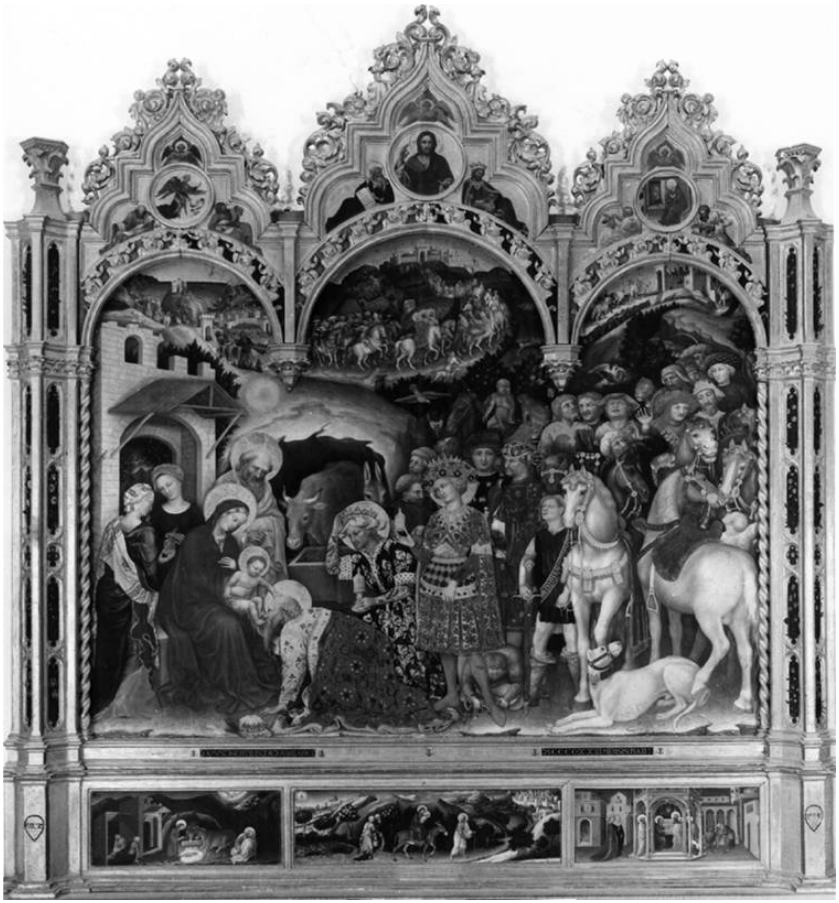

图5　法布里亚诺的《博士来拜》又名《斯特罗齐祭坛画》，它最初放置在佛罗伦萨圣三一教堂的斯特罗齐私家礼拜室中。

这幅画作引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赞助人的概念。此画作有两个名称：一个描述其主题，另一个则指委托制作画作的家族。有趣的是，在这个例子中艺术家明显排到了第三位，这显示出在艺术史写作中，当其他因素占据优先地位时，没什么名气的艺术家可能受到怎样的排挤。赞助人和画作之间的密切关系或许会引起人们的疑问：这幅画是做什么用的？此画的主题——博士来拜，讲述的是三位国王前来朝拜刚降生的耶稣，典故出自《圣经·新约》——乃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时刻。泰梯利的图画抓住了这一时刻，画中国王们跪在地上，表达他们

对圣婴的尊敬，这意在强调他们认同耶稣系上帝在人间的化身。的确，大多数西方中世纪艺术作品都是宗教性的，包括祭坛画、装饰礼拜堂的湿壁画以及精致的抄本插图。尽管这幅画创作于文艺复兴早期，但泰梯利的风格和所用材料都显示出他对中世纪传统的眷恋，这也暗示着在这两个艺术分期之间并无一刀两断式的分野。

繁复的金叶和艳丽的色彩使祭坛显得珠光宝气。不难想象它在绮丽的金框里，在私家礼拜室的烛光下，呈现出怎样神奇的图像。用真的金叶来增加画面的高光、装饰外框，用天青石这样珍贵的半宝石磨成饱满的青色颜料主宰画面，这些富丽堂皇的材料的运用向我们传递了许多信息。

首先，此画的赞助人必定十分富有，才负担得起这些昂贵的材料。这类绘画在当时被视作财富的象征，因为在艺术家和赞助人签署的合同中经常会有条款规定黄金和半宝石颜料用量。以佛罗伦萨富商斯特罗齐家族为例，我们知道他们先后数代都是热心的赞助者。（另有一件《斯特罗齐祭坛》，描绘的是基督在圣母和众圣徒的陪伴下就位于尊座的场景，由奥尔卡尼亚［Orcagna, Andrea di Cione］于1357年绘制。）这幅祭坛画现保存于佛罗伦萨新圣马利亚教堂，没有离开其最初的存放位置。

其次，泰梯利画作装饰效果整体上极大地加强了画面的华丽感。假如你的目光飞快地扫过画面，背景、前景还有画中人物似乎形成布满画面的富丽图案，就像是一幅织锦一样。画面的图案效果，奢华的材料连同图像的平面化（此画并未给人以空间或纵深上的错觉），都表现出一种被称为国际哥特式的绘画风格的特征。就像艺术史中的大多数情况那样，此处所谓“国际”其实仅指西方，而具体到此画又仅指欧洲，因为此画完成之际，美洲尚不为欧洲人所知。对于世界的这种认识使得我们开始发现，艺术史其实在极大程度上是从西方视角出发，以西方观念为基础写成的。它所强调的那些价值，乃是一个男性主宰的社会和文化愿意在作品中读解到、看到的那些价值。本书的一个宗旨就是要说明我们可以换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同一个视觉对象，以显示它们作为历史文献证据的丰富性和价值。

我用作例子的第二幅画名为《宫娥》（*Las Meninas*，图6），出自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之手（约作于1658—1660年间）。一画多名的情况再次出现，这件艺术作品也不仅有《宫娥》这一个名字，它其实是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King Philip IV）的家庭肖像画。直到1843年佩德罗·德·马德拉佐（Pedro de Madrazo）为王室藏画编写目录时，这幅画才有了《宫娥》（意为“待召的女官们”）这个名字。

图6　迭戈·委拉斯开兹的《宫娥》。画家把自己也画入了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肖像画中。

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本人的风头盖过了他笔下的人物，不仅因为我们确知此画是艺术家的杰作之一，而且还因为画家真的把他本人画进了画面中。我们看见他位于画面左方，站在画布后面，正朝我们看来。我们只能猜测王室赞助者对委拉斯开兹把自己的形象绘入王室肖像画的行为并无不满。画家的形象无疑是画面中的主要形象之一，而国王和王后的形象只能通过后面那道墙中间的镜子才能反射出来。把如此明显的自画像与王室肖像画融为一体表明了艺术家所能拥有的崇高地位。他们不仅是宫廷画师，正如此例所示，他们能获得近乎名流的地位，其声名能够代表甚至盖过其作品。这种情况延续至今。相对于作品名，而今我们更容易记住的是艺术家的名字。这方面的显著例子有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及特蕾西·埃明（Tracy Emin）。不过委拉斯开兹毫无疑问被视作西方艺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尤以对色彩的处理而为人所称道，其松散的笔触流露出些许印象主义的意味。法国印象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之一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确曾去过西班牙，并深受委拉斯开兹画作的影响。

还请留意这幅画对光线的处理：我们感到光线好像是从画面右侧的窗口涌入，聚焦在画面中央的女孩身上。另有一束光线从背景中敞开的那扇门透进来。《宫娥》这幅画还引出了关于绘画空间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必须记住，画面是扁平的，画面的任何空间感或纵深感都源于错觉。有些艺术家对创造立体景深——有人称之为“现实之窗”[1]——并无兴趣。回过头再看一下泰梯利的作品，他的画就不给人绘画空间的错觉，人物平板地堆在画面上。而委拉斯开兹的画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他利用线性透视这一标准工具营造出了室内空间的错觉。

但是这幅画值得一说的远不止此。我们假设自己看到的是委拉斯开兹从镜子里看到的景象——他本人及其描绘对象，他正是对着这面镜子完成了自画像。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光线是从右方而不是左方照过来——后一种情况在西方艺术中更为常见。这使我们觉得自己是在观看一个真实场景的镜像。但是国王和王后出现在画面后方墙中央的

镜子里。那么，委拉斯开兹究竟在画谁？我们可能会认为他在画那个女孩，因为她位于画面中心，是注意的焦点。可是艺术家的目光却越过了她，也许是望向只能从镜子中看到的国王夫妇。我们这些观众被拖进这复杂的空间和构图关系中，而艺术家则从画中看着我们，仿佛他在为我们绘制肖像，而我们则反观这一切，扮演了镜中反射出来的国王和王后的角色。《宫娥》反映出的这一点引出了艺术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这些问题中尤为重要的是艺术作为错觉的观点——其实我们看到的不过是画布上的笔触，而其余一切则由我们的认知和智力过程进行构建，正是这一过程赋予了图画以含义——这是从把它当作肖像画和其作用于我们的感知的各种方式角度来说的。《博士来拜》画在油画板上，画面上的织物和珠宝让我们产生了浮雕般的错觉，不过我们仍置身其外。艺术家的才艺蕴藏在流畅的画面和富丽的材料中。与之相反，绘于画布上的《宫娥》却创造出三维空间的复杂错觉，这个空间既邀我们入内，又拒我们于外。我们不仅要非常了解艺术家，同样也要了解阔大的笔触是如何将颜料施于布面上，从而创造出写实的效果的。

现在我要谈谈艺术对于世界的再现以及对以不同媒介表现的各种概念的再现。我选择了一尊古典雕塑和一件近期的装置作品为例。

《观景楼的阿波罗》（*Apollo Belvedere*，图7）恐怕是古代世界最知名的雕塑作品之一了。这尤其要归功于它引人注目的外表——它的高度超过两米（7英尺），通体由白色大理石雕成。它表现的是希腊之神阿波罗的形象。阿波罗是奥林匹斯山上的12位神祇之一，代表着古典希腊的精神，代表着人性中理性和文明的一面。

图7　古代世界最著名的雕塑之一——《观景楼的阿波罗》。它的高度超过两米（7英尺），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原作的罗马复制品。

尽管描述阿波罗事迹的神话故事众多，这尊雕像却是得名于它所陈列的场所。它陈列于贝尔维迪宫——1503年为教皇尤里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建设的宫殿（现为庇护–克莱门蒂诺博物馆的一部分），是首件陈列于此的教皇古代雕塑藏品。这是一件罗马复制品，其希腊原作制成于公元前5世纪。原雕塑可能出自列奥卡雷斯（Leochares）之手，普林尼曾提到他创作过一尊戴着花冠的阿波罗像。

作为阿耳忒弥斯（Artemis，亦称狄安娜［Diana］）的孪生哥哥，阿波罗代表着男性形体的完美，恰如他妹妹代表着女性体态的完美。这尊雕像当然充分利用了体形完美的概念。大理石表面的光滑处理增强了肌肤柔软的错觉，并愈发衬托出神祇丰满的肌肉和完美无瑕的脸庞。披风上的衣褶与光滑的肌肤形成对比，使两者的肌理特征更为突出，同时也显示出雕塑家技艺之精湛，能够用坚硬的顽石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质地。尽管这尊阿波罗像和古代其他许多男性雕像一样，都是为了赞美人体的完美，可是这里的阿波罗却因其私处平添的一片无花果叶而含蓄起来。希腊原作上不可能有这片小叶，只是后世对裸体和对人体、性征的表现的态度发生改变，要求增加无花果叶，从此雕像上便多了这一片无花果叶。

说来也怪，在这件再现人体之理想与完美的作品中，竟然掺杂着一段相当丑陋的树桩。与披风和肌肤之间的对比不同，树皮的肌理并未给雕像增色。细察之下就会发现，雕像的右前臂和左手都已亡佚。这便为我们解释树桩的存在提供了线索。雕像凭借其材料的延展力得以矗立。对于向外伸展的四肢，大理石并非最合适的雕刻材料，因为它容易断裂，正如这尊雕像所示。的确，披风不仅是构图的手段，而且还有实际用途，它支撑着阿波罗向外伸出的手臂。从平衡和石材的材质考虑，树桩应当是支撑整个雕塑的另一手段。从雕像右前臂的亡佚不难看出这尊雕像是多么地脆弱易损。树桩与构图的其余部分极不协调，它和无花果叶一样，都是后世添加的。就这尊雕像中的树桩来说，几乎可以肯定是罗马时代的复制者添加上去的，因为希腊原作当由青铜铸造。青铜具有比大理石强得多的延展力，是实现此类造型必

不可少的材料。弃青铜转用大理石的一个后果是让我们错误地认为所有古典雕塑都是白色的，进而只是去强调古典艺术静穆、单纯和具有永恒价值的观念。

《观景楼的阿波罗》向我们传递了艺术史方方面面的大量信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历代对古典形式的重新借用和重新诠释。我们满足于将阿波罗当作希腊雕塑的一件优秀样本。古希腊和罗马常被称为古典世界——这便精确划分出了一个时间段。可是“古典”这个词还有另一层含义，它意味着顶峰和杰出的典范——它遵从克制而雅正的风格、具有恒久的艺术价值。传世的古典时代艺术作品与这样的价值判断结合起来，确立了“古典”至高无上的观念。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古典艺术风格——就其最宽泛的意义而言——的兴趣是如何历经岁月而弥久不衰的。罗马人大规模沿袭了古希腊的艺术和建筑，我们对古希腊雕塑的认识的确大多来自于古希腊原作的罗马复制品。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典世界的兴趣得到广泛复兴，教皇在获得阿波罗雕像以后，逐渐建立起他的雕塑收藏。人们对古典艺术品的兴趣是如此高涨，以至于即使基督教会也不以收藏中包括异教神祇为过，甚至梵蒂冈的收藏中也有异教神祇。阿波罗像的姿态，连同其他许多古典雕塑的姿态，都被后继的几代艺术家、雕塑家、画家和线刻家模仿和借用。这便向我们展示了古典形式在不同时期是怎样被重新借用、重新诠释，甚至被否定的。阿波罗像的姿态是古典对立平衡的典范，即躯体的一侧与另一侧形成对应。阿波罗左臂伸出，右臂收拢，使他的左侧身躯朝向外侧，而他的重心只落于一只脚上，这也给人以运动之感。

《观景楼的阿波罗》还揭示出人们对收藏艺术和陈列艺术的兴趣与日俱增——这里甚至影响到这尊雕像的命名，它也告诉我们艺术品收集活动如何赋予某些艺术品类以声誉，并使之为艺术家们效仿和学习。梵蒂冈收藏在这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因为自16世纪以降，访问罗马已是艺术家接受专业教育的必由之路。

图像志是随《观景楼的阿波罗》出现的另一层面的艺术史问题。图像志是理解艺术作品含义的重要方法，第五章对此将作更详细的讨

论，此处只需说明，它研究的是艺术所描绘的故事主题，不管它是宗教题材还是世俗题材。我们已见识过这种方法在泰梯利的《博士来拜》中的运用，我们正是凭着图像志揭示出图像背后的故事。图像志还可以研究艺术作品中起着线索和象征作用的某些元素，这些元素为揭示主题和人物身份提供了线索。就阿波罗像这件作品来说，假如我们还不知道它再现的是阿波罗这位希腊–罗马神祇，我们也能通过雕像头戴的桂冠识别其身份，因为这顶桂冠正是为彰显阿波罗的艺术成就而授予他的。

我要列举的第四件作品是一件装置作品，出于一位身处女性运动前沿的女性艺术家之手。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的《晚宴》（*The Dinner Party*，图8）于1979年首次展出。表面上看它为的是引起公众对知名女性的关注，而这是令人称道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让艺术家本人介绍她的作品，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她的创作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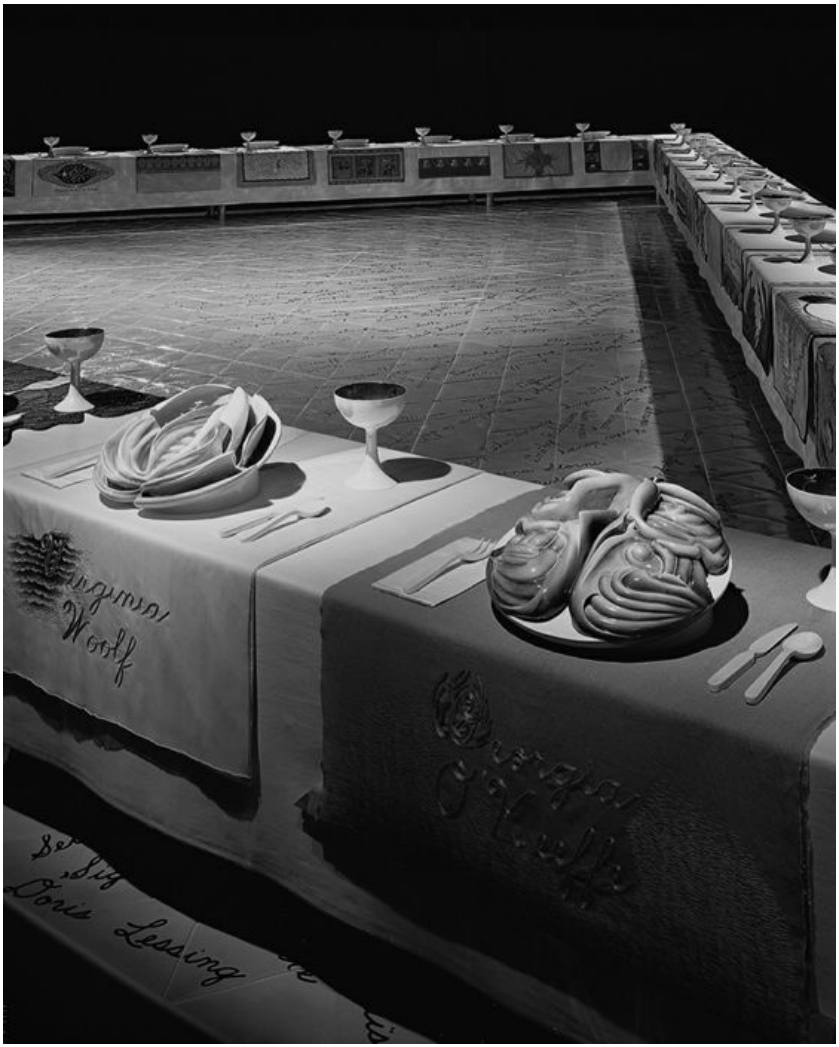

图8　朱迪·芝加哥的《晚宴》于1979年首次展出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

《晚宴》的想法产生于我对女性历史的研究，而这项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用下面这个故事来概括对女性历史的主流看法是最好不过的了。当我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本科时，我选了一门叫欧洲思想史的课。我的教授是位可敬的历史学家，他承诺将在最后一节课讨论女性对西方思想的贡献。我在热切的盼望中熬过了整个学期，到了最后一次课，教授跨进教室宣布说：‘女性对欧洲思想史的贡献是什么呢？她们什么贡献都没有。’

我为教授的断言深深撼动。后来我在研究中发现教授的断言经不起学术上的

检视，于是我开始确信，所谓女性没有历史的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自古就没有杰出女性艺术家的观念，只不过是上升成为了学术教条的偏见。我怀疑许多人之所以接受这些旧观念，主要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不同意见。

随着我对女性历史研究的不断展开，我发现自己渐渐打开了一个宝库，我获得了授权，心智备受启迪。我非常愿意通过自己的作品和大家分享我的研究发现，这使我想知道在扭转人们看待女性和女性历史的主流观念的过程中，视觉图像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朱迪·芝加哥，《晚宴》（1996），第3至第4页

芝加哥的三角形餐桌的每个餐位都布置着刺绣和陶艺等传统“女红”，每个席位还标出一位知名女性的名字，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等。这么做看上去是值得的，可是仔细观看就会发现，每只盘子里的水果和鲜花虽然乍一看并无不妥，但其实却是一个个女性生殖器的模型。用鲜花和水果来隐喻女性点明了艺术女性化的题旨，因为花果元素被认为是家居装饰的表征。对芝加哥这件作品的批评原已有之，而今也不乏其人。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件作品将描绘生理现象视作创作目标。而我以此为例是因为它引出了艺术史中更为重要的一些问题。最明显的是，这件作品显示了艺术如何能够搭载明确的政治目标，并成为传播观念的颇具煽动性的手段。在此，芝加哥运用了一种使观者不安的技巧——我们最初看到的东西外表俗艳，但很快熟悉之物让人不安起来。这件作品还引出了艺术中的女性及其他少数族群的问题。女性和少数民族极易成为艺术史中的次要范畴。这意味着艺术史的主要话题，不论主题、艺术家还是艺术史家，都围绕着西方白种男性而展开。本书接下来将对这一看法提出质疑。

《晚宴》还揭示了艺术作品的无常本质——它是一件没有固定摆放地点的装置，其存在岌岌可危。由于它传递的信息已经过时，为大多数人所不喜，于是便被打包起来，置于人们的视线之外。这又引出了时尚和品位的问题，以及在赞助人和美术馆都不存在的情况下，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问题。

以上列举的四件作品确立了本书接下来要谈的大部分话题。这四

件作品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艺术史并不只是对再现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世界的图像进行描述。艺术史的主题比这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通过艺术史，我们看到不同时代的文化和社会，看到我们是如何认识这些时代的，而我们的态度又是如何随时代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的。艺术史的主题无限广阔，我们因而得以借助艺术史来对与各种主题相关的问题进行思考，这些主题包括个人和公共生活、宗教和世俗艺术实践、抗议运动和文化主宰等等。以下各章将探索艺术史的不同方面，不过在最后一章中，我将重新回到起点，回到艺术对象本身，说明我们怎样才能根据本书所介绍的艺术史的各个层面，从艺术作品出发，去“读解”艺术史。

注释

〔1〕 现实之窗，文艺复兴绘画理论中一个著名的比喻是将再现性绘画比作窗户，画家借助线性透视和明暗法在二维平面上创造出具有深度错觉的空间感，宛如打开了一扇朝向三维现实世界的窗子。——译注，下同。

第二章

艺术史的写作

近年来，学界围绕艺术史撰写大做文章，研究的是艺术的历史，而不是研究艺术本身。艺术史撰写非常重要，它在某些方面与本章提出的问题有所交叉。在这里我想强调艺术史的不同叙述框架，以考察各种不同的艺术史撰写方式。这些写作模式在上一章已有所提及，当时我就指出，强调艺术家生平和强调作品风格这两种模式是艺术史最流行、最永恒的叙述框架。此外，我还介绍了如何对用语言描述的视觉对象作出反应的问题。现在，我打算就艺术史的写作方式进行探索，以便描述艺术和建构艺术的背景。以此为基础，我将在第四章讨论对艺术史的不同认识方法。本章和第四章之间，将有许多交叉点。

我在本章主要想谈三个方面。首先，我将从大跨度的时间范围内选取撰写艺术史的实例，以观察艺术史家之间是否存在着共同之处，如果存在，共同之处又是什么。同时我也会考察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其次，我将考察性别差异和性别歧视是怎样影响艺术史的发展的。第三，把我们对艺术进步、艺术演进的期待与艺术史写作模式联系起来思考，这是颇为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搞清楚艺术史的不同写作方式何以能够改变我们看待艺术作品的方式，何以能够改变我们对艺术史的认识方式。

历史上的艺术史家

盖乌斯·普林尼·塞昆德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是位罗马作家，人称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23/24—79）。他题献给提图斯（Titus）皇帝的37卷本《自然史》（*Natural History*）是有关古代艺术和建筑的最负盛名的著作之一。正如书名所示，这部巨著主要讲述的是希腊–罗马世界的自然历史，但艺术也包含其中。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有关古典艺术的文献资源受到极大关注。当时流传的文献数量相当巨大，种类繁多，但许多残缺不全，或者只是希腊语文本。相形之下，普林尼的百科全书式巨著毫发无损地保存下来，并在

1476年被译成意大利文，因而得以更为广泛地流传。结果，普林尼书中讨论艺术的部分受到超乎篇幅比例的重视，而统摄全书的主旨反倒被人置之不顾。不论如何，《自然史》对艺术史写作的发展及对艺术本身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普林尼对古代艺术作品的描述则为鉴别文艺复兴以降不断出土的古代雕塑提供了依据。倘若《观景楼的阿波罗》这类雕塑的主题无从鉴别，那会出现什么情景可真是难以想象。但是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之间，大量雕塑遗存唯有通过和传世文献的描述进行仔细比对才有可能得到鉴别。往昔的佚名残片在人们眼中是何等引人入胜而又令人费解，就像史前艺术那样叫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普林尼对艺术家的生平细节也很关注。最著名的是他对画家阿佩利斯（Apelles）的记述，这篇记述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价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艺术家变得有地位，艺术家的技艺成为一种脑力活动，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重要内容。这一变化同时也确保了古典传统的延续，因为艺术地位依靠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的认识而得到提升。

普林尼对乔尔吉奥·瓦萨里（1511—1574）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后者是声誉最为卓著、影响最为恒久的艺术史家之一。瓦萨里是佛罗伦萨的一位画家兼建筑师，常被视为史上首位艺术史家。他的著作《名人传》（*Lives of the Artists*）至今依然在出版，并且是了解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重要文献。瓦萨里注意到艺术写作的各种先例，其中包括普林尼的《自然史》。他曾说过：

> 我放弃了普林尼和其他一些作者的许多东西，那些我本来是可以利用的。只不过我想让每个人自由地、独立地——或许这会引起争议——在原始文献中去发现他人的观念。

但是瓦萨里所作的传记却堪与前代楷模比肩。1685年他的《名人传》首先被译成英文，随即成为后古典世界艺术史著作的典范。

人们一般都知道瓦萨里的《名人传》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记

述了艺术家契马布埃（Cimabue）和乔托（Giotto），他们活跃在被瓦萨里视为艺术在经历了黑暗时代之后的“重生”期。第二部分探讨了我们现在称之为早期文艺复兴的这段时期，记述了画家马萨乔（Masaccio）、波蒂切利（Botticelli）、建筑师布鲁奈列斯基（Brunelleschi）以及艺术理论家兼建筑师阿尔伯蒂（Alberti）。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这一时期建筑、绘画和雕刻这三门艺术之间并无大的界限，许多“艺术家”同时在这三个领域开展实践。（比如瓦萨里本人就亲自设计了位于佛罗伦萨、现为乌菲齐美术馆的建筑。）《名人传》的最后一部分从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开始，记述了现在称为盛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诸位艺术家。

瓦萨里对史料的选择安排对艺术史写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通过对“天才”和艺术家个人成就的再三强调，瓦萨里为本书首章论及的那种鉴赏式的艺术史奠定了基础。瓦萨里是首批对艺术进行品质判断的史家之一，他这么做为的是建立起伟大艺术家及其优秀作品的准则。在瓦萨里看来，艺术品质的基础是艺术家制造自然主义错觉的手法，以及为达到这一境界的理想之“美”而必须具备的技艺。此外，就如前文指出的那样，这种艺术史写作方式促使我们认为艺术作品打上了艺术家个人的烙印，或以风格上的相似性为基础认为艺术家会受别的艺术家影响——假如两件作品风格类似，那它们之间必有联系。

关于瓦萨里首先要说的是，反思这种完全基于艺术家生平的艺术史写作观念是十分重要的。这与其说是艺术史，不如说是艺术家的历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是，瓦萨里可能对某些艺术家了解颇深，而对其他一些知之甚少。并且，和我们一样，他也有个人偏好。就《名人传》而言，这一点决定了此书的写作方式及其对艺术史的影响。瓦萨里《名人传》的第一版于1550年出版，旨在颂扬米开朗琪罗的天才，这位气质超凡的雕塑家兼画家以其为西斯廷礼拜堂绘制的天顶画（1508—1512）和巨大的大理石雕大卫像（1501—1504）震撼了16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实际上，第一版《名人传》中收录的唯一一位当时仍健在的艺术家就是米开朗琪罗。米开朗琪罗卒于1564年，而《名人传》的第二版，也是更为大家熟知的一个版本，则于1568年出

版。

瓦萨里的艺术史轨迹中的一个问题简言之就是：在米开朗琪罗身后，艺术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是停滞不前了呢？还是日渐衰落了呢？完美的颠峰一旦达到，未来的艺术又将趋向何方？由此我们能够看出，确立艺术进步的观念，就暗示着艺术史有一个终结，不论这进步是朝向某位艺术家个人的卓越成就——就像《名人传》中的米开朗琪罗，或是朝向重现古典形式这一更抽象的观念，还是朝向对人这个主题的完美无瑕的再现。这一点引出了有关任何历史写作都会遇到的重要问题。历史是事后书写的。我们知道所论事件的前前后后。事件朝着早已预见的结果渐次展开，这种观念被称为目的论。可是历史将越过史家的笔端继续向前，我们也因此能够不断重构艺术史的过程和叙述——抱歉我已离题过远了。

关于瓦萨里要说的第二点是，他对约从1270年至1570年间意大利艺术发展的分期实际上从未受到过质疑。我们看到，被他收入《名人传》第二部分的艺术家，今天依然被划归早期文艺复兴时期，这只是揭示出被瓦萨里视为艺术重要方面的一个开端，这就是对古典艺术的重新借用和重新诠释。不过我们知道，瓦萨里的同时代人并不对早期和盛期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作这种区分。此外，瓦萨里对如今被称为哥特或拜占庭艺术的更早时代的艺术既无兴趣，也不欣赏。后世史家对这段艺术史的分期和瓦萨里的分期既有重叠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如乔托。乔托在《名人传》中被划入“第一缕曙光”（*prima luce*）时期，因为从他的作品中，瓦萨里看到了对自然的最早兴趣。但是更晚近的史家都把乔托归入哥特传统，因为他对属于哥特时代的那些程式化的姿态和构图模式感兴趣。

尽管瓦萨里没有看到艺术、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他却建立起可以用来评判艺术作品品质的标准。这标准有五个方面，它们为支持后代史家串联起艺术史的方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借着对瓦萨里标准的简短讨论，我也能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想新柏拉图主义稍加说明，指出它是如何影响当时的艺术哲学、作用于当时的艺术实践的。瓦萨里的五方面标准首先是素描（*Disegno*）——指良好的描绘技术

或构图技术。此处瓦萨里使用了新柏拉图主义的理念，认为艺术家所要表现的对象的理念（*Idea*）已被上帝先期植入艺术家的心灵。而艺术作品，不论是绘画还是雕塑，既与艺术家眼见的对象有关，也与仅存在于心灵之中的完美形式相关。瓦萨里的第二条标准是自然（*Natura*）——艺术作为对自然的模仿在15世纪还是一个新观念。这里瓦萨里再次引入了柏拉图的理念，认为借助对完美形式的认识，艺术家能够使自然更趋完美。第三条标准是优雅（*Grazia*）。这是艺术不可或缺的品质，它在米开朗琪罗之类的艺术家的作品的柔和中表现明显。第四条标准合适（*Decoro*）指的是艺术上的合宜或适合——比方说，圣人看起来就该像个圣人。这条标准还意味着形式的端庄，它要求雕塑或绘画中的人体皆不得暴露私处——有时需在作品完成后再加以遮蔽。瓦萨里的最后一条标准是风格（*Maniera*），它既指艺术家的个人风格，也指特定艺术派别的艺术家的风格。这五条标准直至今日大抵仍旧通行，足以说明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古典艺术的自然主义的兴趣长盛不衰。

瓦萨里写作艺术史的方式依然是以作品本身为焦点，以对作品细节的细致观察为基础，同时还参考艺术家的生平传记。我觉得在这里比较一下瓦萨里和另一位艺术史家对同一件作品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恩斯特·贡布里希是20世纪最著名的文化史家之一。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文艺复兴，他想通过观察“高雅”文化（或艺术）来证明当时更为宽泛的知识氛围。贡布里希对人类学和精神分析也深感兴趣，把它们当作揭示艺术的文化含义的途径。作为一名文艺复兴学者，贡布里希被指思想保守，强化准则式的艺术史。其实他在著作中还以卡通画和广告为论据探讨了艺术心理学。不论是讨论高雅艺术还是流行文化，贡布里希都深切地意识到图像功能的变化以及图像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的重要性，这使他的分析层次细腻、含义幽微，所以我很难把他看成一位传统主义者。可话说回来，我在这里还是必须举手反对贡布里希最畅销的一本书《艺术的故事》，它于1950年首次出版，至今仍在出版。这本书为艺术设定了一个线性发展过程，集中讨论权威艺术家，但对于他在其他著作中重点讨论的艺术的更广阔背景或理论方

法却置之不顾。就像瓦萨里的《名人传》，《艺术的故事》写的全是“伟人”和“风格”。假如读者现在还不理解我对此的否定态度，那么到了本书结尾，相信大家定会看清为什么我对按照“由洞穴人到毕加索”这种线性的、目的论的方式来叙述艺术会持否定意见。

比较贡布里希和瓦萨里对同一件艺术品的记述方式就可以看出他们研究艺术史的不同之处。我们用拉斐尔的《雅典学院》（*School of Athens*，图9）来作为比较的实例，因为它是一幅复杂的图像，具有持久的魅力。拉斐尔和其他一些艺术家一同受雇于教皇尤里乌斯二世，负责装饰梵蒂冈宫的一系列房间。这一系列房间常常被称为梵蒂冈之厅，其中签字厅、火警厅和康斯坦丁厅中的湿壁画，系由拉斐尔和他的学徒助手大约从1509年开始逐步绘成。一般认为签字厅是所有这些房间中最重要的一间，因为拉斐尔在此投入的精力最大。这间厅房的两幅主要湿壁画分别是《雅典学院》和有关圣餐礼的《教礼之辩》（*Disputa*）。它们的主题表现出世俗与宗教、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有趣对比。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对艺术赞助极为热衷，他在梵蒂冈的雕塑收藏包括前一章谈到过的《观景楼的阿波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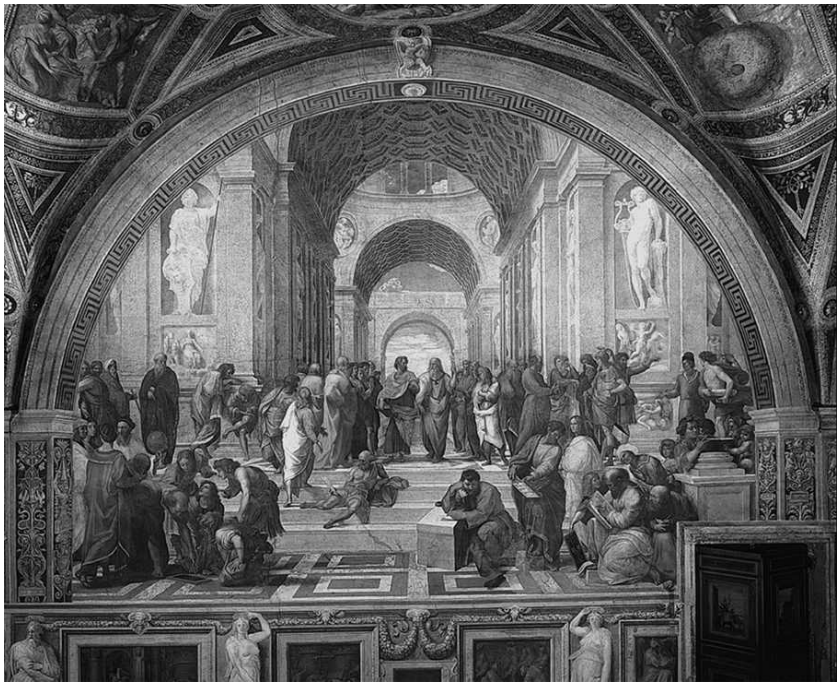

图9　拉斐尔的《雅典学院》——装饰罗马梵蒂冈宫签字厅的湿壁画之一。

瓦萨里对拉斐尔受托而作的这几幅重要作品作了如下记述：

那时正为尤里乌斯二世工作的乌尔比诺的布拉曼特（Bramante of Urbino）（告诉拉斐尔）他已经劝说教皇建造几间新房间，拉斐尔因此将有机会大显身手。

在受到尤里乌斯教皇的亲切欢迎后，拉斐尔开始在签字厅绘制一幅湿壁画，表现的是正试图把哲学、占星术和神学调和起来的神学家。画中有世上所有智者的肖像，他们正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辩论。站得稍开一些的是几位星相学家，他们在一些小手写板上画出了各种有关泥土占卜和占星术的图形符号。经过一些美丽异常的天使的手，这些手写板又被传送给使徒们去宣解。使徒中有狄奥根尼（Diogenes）斜卧在台阶上，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的身旁放着一只酒杯。这个形象构思巧妙，人物的美以及恰到好处地忽略了狄奥根尼的着装而值得高度称赞。画中还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他们一人持《蒂迈欧篇》，一人持《伦理学》。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是一群伟大的哲学家。占星家和几何学家正用圆规在手写板上画出无数图形符号，人物形象之光辉难以言述。

在1972年出版的著作《象征的图像》（*Symbolic Images*）中，恩斯特·贡布里希挑战并修正了瓦萨里的记述：

> 到达罗马以后……拉斐尔‘开始在签字厅绘制一幅关于神学家怎样用神学调和哲学和占星术的画，世上的智者都在画中出现，正以各种方式相互论辩。’这是瓦萨里有关记述的开篇之词……自然为后来几个世纪诠释这幅湿壁画定下了基调。瓦萨里不仅使人确信这一组画的主题是反映深刻的哲学含义，他还将此湿壁画从整所厅房理智的装饰语境中孤立出来，借此强化他的诠释……现在我们知道他犯错误的根源了：瓦萨里在记述这幅画时参照的是线刻复制品，（结果）就把使徒置于希腊哲学家中……（并且）这种诠释一直存在着……尽管学者对任何一种诠释都不完全赞同，但还是存在一种坚定的信念，相信诠释这组湿壁画的关键必定与16世纪的人文主义观念相一致。

贡布里希批评了因瓦萨里的误导性记述而对梵蒂冈诸厅壁画产生的图像志误解，也批评了后世史家只是孤立地关注厅室的各块墙面——天花、侧壁，而没有将厅室壁画的构图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做法。他认为，如果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那么这间混合着异教人物和基督教人物的房间“就不应使任何了解中世纪道德家习惯的人，或确切地说，是圣奥古斯丁的习惯的人感到惊奇”。天花板上的各个方位画着坐在宝座上的拟人形象，在每个形象对应的下方墙壁上，描绘着该形象所象征的场景。这些场景反过来又对天花上的拟人形象的象征意义作了阐释发扬。《雅典学院》和天花上的《哲学》（*Philosophy*）恰成一对，后者与天花上的法律、神学和诗学的拟人形象一道，代表着当时意大利大学中教授的文科七艺。

正如我们所见，瓦萨里研究艺术史的方法仍然流行，但是对它的质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不同的艺术史写作方式在18世纪出现了。约翰·约齐姆·温克尔曼是尽可能多地引用各种资料以将艺术置于历史背景中来理解的首批史家之一。把艺术置于文化背景中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因为这意味着艺术从此变得比艺术家更为重要。温克尔曼确实说过他的研究与艺术家个人没什么相干，他要通过研究提出更

加系统的方式来整理与艺术有关的知识。话虽如此，温克尔曼还是强调细察作品的必要性，并且他和瓦萨里一样，坚持把鉴赏放在优先地位，意在鉴别理想之美。不过瓦萨里因为米开朗琪罗身后的“艺术衰退”问题而陷于困境，而温克尔曼却将兴趣集中于古典艺术。在温克尔曼看来，始于公元前5世纪、被称为古典时期的古希腊艺术在美和完美性的再现方面，达到了艺术成就的顶峰。创作出这些作品的艺术家的生平细节极为匮乏，但温克尔曼对此却毫不在意，因为在他眼中，艺术史与美学有关而与艺术家无关。温克尔曼引入了一种系统的、编年的艺术史研究方式。古代艺术遗存被看作是忠实反映古典时代的留存，根据它们可以立即断定那个时代的人的状况（不过温克尔曼并不知道，许多雕塑并非希腊原作，而是罗马复制品）。将古希腊“发明”出来，或者说至少将古希腊的成就确立为人类文明的高点，这是温克尔曼这种欧洲中心式的理想和古典传统观念必不可少的元素。反过来，这一观念也对现世产生作用。在《对希腊绘画和雕塑的模仿》（*Imitation of the Painting and Sculpture of the Greeks*，1755）中，温克尔曼说道：

> 唯有一种方法能让现代人变得伟大甚至无敌……通过模仿古人……追随者在希腊作品中发现的不仅是自然，更有超越自然的东西：理想的美，思想产生的图像。

温克尔曼的观念受18世纪中期的语言理论影响很大。当时的语言理论认为可以通过发展词源来清楚地了解事物，但是极端风格和过分修辞最终使语言衰退。温克尔曼在艺术中追寻了相似的轨迹。他将古典希腊艺术视为顶峰，而将随后的希腊化时代艺术中的动感和活力视为“过分”和“衰落”。古代世界艺术这一发展和衰落的观念至今仍是编年艺术史的标准。温克尔曼的分析，或者按他本人的话称作历史系统，牢牢地植根于语言传统——将语言的批评手段移植到艺术中来。为了写作艺术史，温克尔曼依靠对作品的文本描述来辨别作品。别忘了，温克尔曼和瓦萨里都看不到他们所谈作品的高品质的、精确的实

例，而用这些高品质实例为证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不得不依赖质量参差不齐的版画和线刻复制品，结果常受误导。从贡布里希对瓦萨里关于《雅典学院》的分析的批评中，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缺乏高质量的视觉记录手段造成的影响更广泛，直到20世纪中期摄影技术发展足够成熟，方使近距离研究艺术作品成为可能，而不是只能到作品陈列地去作研究。显然，使用照片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但是它确实让我们认真思考记录艺术的语言系统和视觉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将在第五章中进一步阐发。

若论对艺术史写作的影响，温克尔曼提出的文化史观念足以与瓦萨里的传记式研究方法匹敌。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采用与温克尔曼相似的方式来撰写其两卷本《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The Civilisation of Renaissance Italy*）。此书于1860年首次在德国出版，并很快被译成英文。布克哈特将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牢牢地置于其文化背景中，以解释其“文明化”和“民众”特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对于重新激发起人们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兴趣，并认可留传下来的古典传统在西方艺术中的主导地位起了重大作用，至今仍被奉为圭臬。

温克尔曼还对艺术作品自动获得地位的方式产生了影响。他对作品而不是艺术家的强调帮助打开了探索艺术史的新思路。在19世纪的德国，西方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黑格尔提出，历史不是其兴衰早已注定的线性过程——这是温克尔曼和瓦萨里都遇到的问题之一。相反，黑格尔相信历史是“世界精神”起作用的结果，艺术是世界精神呈现自身的一种途径。时代精神（*Zeitgeist*）这个术语现已为英语世界所熟悉，它来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的体系不光是一种解释艺术作品的方法，而且是解释特定时代的一切文化产品的方法。如此一来，个人的行动——本书所指的艺术家的行动——就变得无足轻重，而产生艺术作品的社会背景也变得无关紧要。后者我将在第四章论及。按照黑格尔的视角对风格进行优先考虑，不同于瓦萨里的鉴赏式的艺术史写作方式。在黑格尔看来，风格是自由的，它随着时代向前发展，超乎人类行动的影响之上。这样黑格尔就对天才的观念进行

了压制，而天才的观念对其他方式的艺术史写作来说至关重要。恩斯特·贡布里希的文化史观念也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但是贡布里希认为艺术和图像的功能随其背景——贡布里希称之为“艺术生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艺术生态”这个术语借自社会学，意指艺术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

只是到了20世纪，我们才看到与作者（艺术家）和形式（风格）这两个优先原则的决裂。我们已看到古典艺术是如何主宰了艺术思想和实践，看到“古典”这个术语本身既表示一个历史时期，又表示对那个时期的艺术产出的正面价值判断。后世艺术史家几乎算得上卑躬屈膝，坚信他们自身时代的艺术无法与古代艺术匹敌。贡布里希及其同时代史家如鲁道夫·威特科尔（Rudolf Wittkower）、弗里茨·扎克斯尔（Fritz Saxl）等人的著作，均为哲学、历史和神学的绚丽荟萃，给我们奉献了*Kulturgeschichte*，也就是艺术的文化史，可这主要是就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及其派生物而言的。

新的艺术史写作方式确实在20世纪时出现过。此刻史家的目光更多地集中于自身所处时代的艺术上，而不是集中于研究古今关系、考校谁优谁劣。到现在为止，我讨论的主要是那些再现我们以为自己所见之世界的艺术。本章业已表明，不管是现实主义艺术、自然主义艺术还是理想主义艺术，迄今写成的艺术史一部分是根据艺术作为一种再现手段的胜任情况发展起来的。而非具象艺术的传统，即不以再现我们以为自己所见之世界为己任的艺术传统，则在20世纪初开始出现。

朱迪·芝加哥的装置艺术是向这种艺术的有益过渡。对于这种艺术，有人觉得它倒人胃口或是毫无魅力。“可这是艺术吗？”是人们经常问的问题。当我们在前一章仔细讨论《晚宴》时，我谈的是传记的概念——不光是艺术家的传记，还包括通过餐位陈设和文字再现的女性传记。我当时还花了些篇幅来解释作品背后的概念。而我在这里则要表明《晚宴》是关于一种理念：它是一个有关女性的社会政治宣言。从这方面说它与第一章讨论过的其他作品都颇为不同。芝加哥的装置诞生于20世纪，此时人们对艺术能做什么以及怎样做到等问题的

态度正在发生转变。艺术不再为黑格尔的精神力量或瓦萨里的古典时代的高峰循环论——它在文艺复兴时期又达到高峰——所限制了。20世纪初出现的现代主义使艺术史家第一次思考这样一个艺术运动——它不是经年累月的演变结果，也不是传统的反反复复。相反，现代主义横空出世，提出了一套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价值观和美学思想，要求我们作出新的回应。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是最著名的现代艺术批评家之一。不论是在艺术生产中还是在艺术史诠释中，格林伯格毫不考虑决定艺术的社会因素。前卫运动——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主义运动——是格林伯格关注的焦点。现代主义运动于19世纪中期在法国出现，一部分是艺术生产和艺术诠释日益要求自主的结果。毕加索、蒙德里安（Mondrian）和米罗（Miró）等抽象艺术家的作品把这一运动带进了20世纪。格林伯格相信这类“前卫”艺术是保持文化的活力所必需的。他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使他愈发相信需要以一种新文化来代替旧文化。

后来，格林伯格的观点进一步发展，认为对视觉艺术的讨论必须限定在视觉表现的范围内，因而不应涉及其他任何类型的体验。他坚持艺术的自主被视为他思想的转变，转向了维持现状（*status quo*），而不是挑战现状的政治立场。格林伯格未曾号召将艺术实践和欣赏彻底改头换面，相反，他致力于将女性艺术家、少数族裔的作品以及流行文化的元素排除出高雅艺术——准则的另一种说法——的特权领地。部分由于格林伯格的努力，现代主义成为男性保守价值的堡垒，这种价值由白种男性为白种男性提出，把其他群体排斥在外。

根据格林伯格的观点，艺术的本质在于它的纯洁性、它的自我定义以及它忠实于自身媒介的必要性（与借助语言等其他媒介相对）。既然如此，现代主义就必须排除一切再现性的元素，而代之以抽象的视觉体验。这一点在毕加索1913年的立体主义拼贴作品《吉他》（*Guitar*，图10）中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画面上的碎片，我们可以辨认出吉他的形象，但整个图像实际上是一系列用不同材料以显示不同质感的抽象图形。这些抽象图形表示它们可能与毕加索作画时眼前所

见的景象相关，包括吉他、墙纸——从画面上能看到明显的花纹，以及一张报纸。格林伯格确实指出了观看这幅抽象艺术作品的方法，但它不是认识立体主义拼贴的唯一方法。我们也可以认为空间的展平和重组，是为了能够将对象的多个角度同时展现在一个平面上。这不是格林伯格评论艺术的标准做法，因为“抽象”重又回到毕加索作品的主题问题上来。格林伯格式写作艺术史和评论艺术实践的模式与芝加哥在《晚宴》中所要表达的思想完全是南辕北辙，后者用“女红和女性技巧”手工制作的装置直冲现代主义给艺术设定的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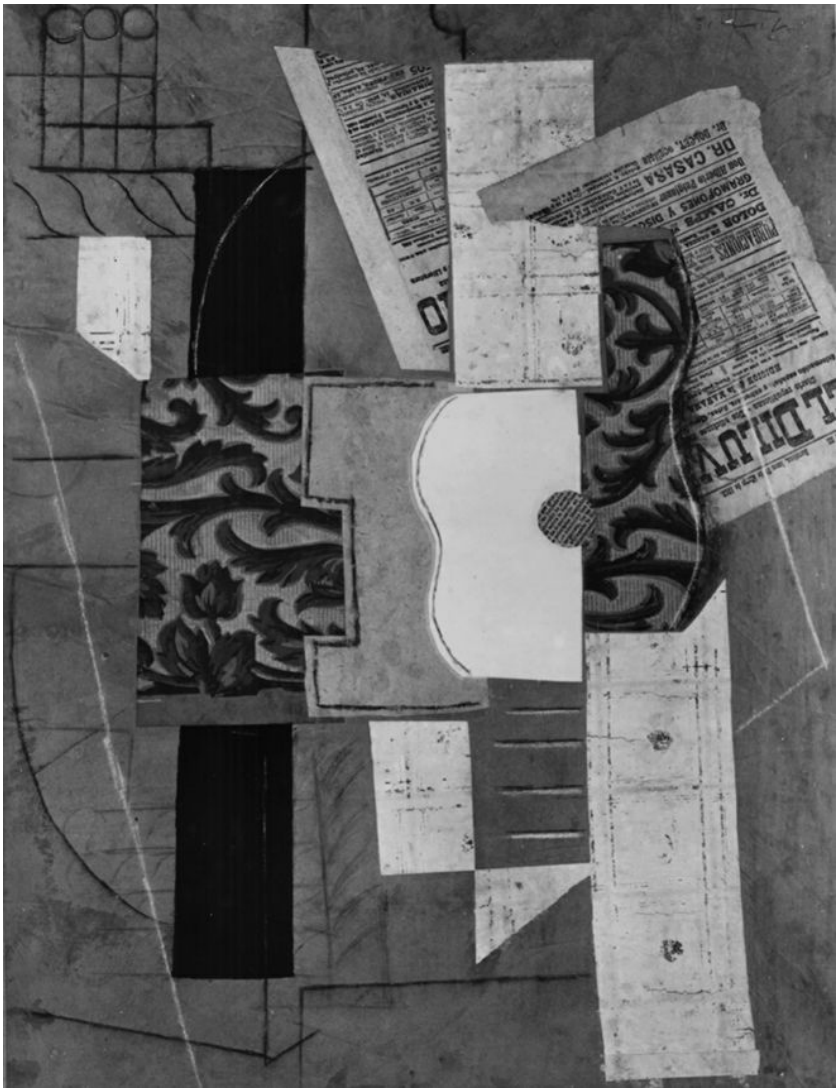

图10　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拼贴《吉他》创作于1913年。

有性别的艺术史

我现在要讨论的是艺术史写作中对艺术史的诠释偏向男性的问题，虽然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女性赞助人，也有许多以女性为主题的

艺术作品。只有女性艺术史家如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和林达·诺克林等人的著作能够对此偏见稍作纠正。从第一篇女性主义艺术史的出现至今已有二三十年，勾画出了看待和理解文化产品及其所表现出的社会关系的不同方式。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和罗茨西卡·帕克（Rozsika Parker）看出了艺术史写作中对待女性态度上的严重悖论，具体地说就是关于创造性的问题：

> 女性被刻画成负面形象，说她们缺乏创造性，没有重大贡献，对艺术的进程毫无影响。可与此形成悖论的是，为了否定女性不得不首先承认女性。女性在艺术史中被提及是为了把她们打入另册，并被边缘化。（这是）在艺术文化实践中建构男性主宰地位的主要元素之一。
>
> ——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和罗茨西卡·帕克《女大师》（*Old Mistresses*，1981）

林达·诺克林与波洛克和帕克一道为我们理解性别歧视问题作出了很大贡献。她的论文《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虽然写于1971年，但至今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标准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当诺克林写成这篇文章之际，正是女性解放运动达到颠峰之时，朱迪·芝加哥的《晚宴》也大概完成于此时。诺克林的论文既建立在什么是“伟大艺术”的一系列假设基础上，也建立在对“艺术家”一词背后的历史性和性别化假设的基础上。诺克林认为艺术不是天才个人的自主活动。相反，“艺术创作”发生在社会环境中，是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而这个社会结构又受诸如艺术学院、赞助体系以及艺术家作为“英雄”还是弃儿等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社会自己创造了围绕艺术观念和艺术家的神话，而这神话反过来也认同了那个社会的艺术现状。在女性主义者出现之前，艺术史本身也是那个神话——我们亦可称之为话语——的一部分。通过对艺术生产的条件提出不同的问题，我们就完全可能就艺术的性质、艺术实践和“伟大艺术家”提出一整套新理念。

虽然考虑的主要是女性，但女性主义艺术史却使我们注意到艺术史中性别、社会和文化差别的问题。现在我们得以从不同的历史视角

和美学视角来研究和撰写艺术作品及其再现模式。把所见到的一切都视为自然，不管是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体系方面都如此，这种倾向本来无可厚非。然而女性主义艺术史却第一次促使我们思考艺术史的准则问题，并向我们提供了认识艺术作品的不同方法。我将在第四章重提这个话题。

近年的许多研究拓宽了对视觉材料的控制问题，不仅把性别问题包含其中，还接纳有关同性恋的艺术问题，这有时被称为“酷儿理论”[1]。此外，关于后殖民世界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也被纳入其中。这些开拓性的研究，或者对艺术及其使用者和生产者之间不同权力关系的质疑都已成为艺术史学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非西方艺术在艺术史中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无疑是对艺术史写作方式重新评估的两个十年。我们已经看到林达·诺克林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如何对这门学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显然，艺术史的写作不仅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排斥的过程，而选择什么，排斥什么，通常都是根据西方艺术的准则作出的。我想先谈谈有关排斥的话题，看看艺术史是怎样将其他文化或群体的艺术、艺术家和女性一道排斥在外的。怎样才能将这些作品也纳入艺术史呢？

不过这么问或许不对。举例来说，非洲和中国的艺术都有大约5,000年的历史，比西方艺术的历史要久远得多。西方艺术史通常都从古希腊开始叙述，虽然有时也提到古埃及甚至更早的时期，但主要关注点还是近2,500年。然而我们是否认为中国艺术或非洲艺术也像西方艺术一样存在一部艺术史呢？我想是没有的——对非洲艺术深奥微妙的本质长达几个世纪的误解证明了这一点——非洲艺术常被描述成“原始”艺术或“稚拙”艺术，尤其是与准则艺术相比时。因为埃及艺术通常被单独拎出来讨论，我们差不多都忘了埃及也是非洲大陆的一部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具有浓厚的本土艺术传统，而且延续至

今。来自科特迪瓦的女像雕塑（图11）就是19世纪完成的作品。重要的不仅是承认非洲艺术的魅力，而且还要将其重新置于它原初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中。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非洲人创造、使用和接受他们艺术的方式。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撰写（和思考）非洲艺术史。

图11　来自科特迪瓦的女性雕像，创作于19世纪。

中国艺术拥有绚丽多彩的图像、器物和质料，包括玉器（图

12）、绢本卷轴画和团扇、水墨画和漆画、瓷器、雕塑以及书法等。而在对中国艺术的调查和历史研究中同样存在着我们西方人的偏见。我们倾向于赋予雕塑以更高的地位，而不惜以牺牲其他艺术门类为代价。近年出土的庞大“兵马俑”由7,000具真人大小的陶俑组成，罕有人不为其所动。而一件精雕细刻的玉器，就艺术家的技艺和玉质两方面来说，也同样引人注意。但是把传统中国对艺术的定义考虑进去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人认为书法才是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或许中国艺术史理应为书法独辟一章。

图12　来自中国的黄绿色玉骆驼可上溯至唐代或宋初（约8至10世纪）。

就像在西方文化中那样，在中国，艺术也具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功能，涉及死亡、宫廷生活和宗教等等。它也可以成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并成为可交易的商品。这里需记住一点，我们赋予某件物品的价值可能与创造此物的社会赋予它的价值有所不同。而当我们划分各种艺术媒介的等级优劣时，也应注意这一点。

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入本章的第三个话题。我想谈一下准则的问题

以及准则对艺术史写作的影响。方才在谈到女性主义和非西方艺术史——尤其是在谈到我们容易对这些艺术形式产生偏见时，我已经提到过准则的概念。而此处我关注的焦点是：我们是怎么来撰写那些所谓的原始或稚拙艺术的？主要有两种方式来看待和写作“原始”艺术。一种是把原始主义当作一种艺术风格，它指的是西方艺术家对非西方艺术形式的重新利用和诠释。对于“原始”这个提法及与之相关的原始主义现象的历史演变，我们能够从它于18世纪第一次出现在西方艺术史中起一直追踪到今天。写作原始艺术的另一种方法是以“原始”一词来判断非西方艺术的价值，态度轻蔑。其实我们应该对原始艺术作出定义——它是一种与西方文化建构无关的、自主的艺术表现形式。这里让我感兴趣的是当西方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传统更为悠久的非西方艺术时两者之间产生的冲突。实际上，中国艺术或非洲艺术说明，在西方准则之外，还有别的艺术史独立存在。

影响西方对原始艺术看法的不仅有艺术史家，也有艺术家，其中最有名的或许要算马蒂斯（Matisse）、毕加索和罗杰·弗莱（Roger Fry）等人了。原始主义在20世纪早期能够被提升到艺术风格的高度，这几位功不可没。西方艺术家、艺术史家与过去被称为原始艺术，即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洲本土传统艺术的相遇，始于20世纪初欧洲艺术家和艺术史家对这些艺术的“发现”。这些艺术形式是至关重要的催化剂，促使艺术家们重新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它比之于文艺复兴时期对透视法的发现，那时艺术家们逐渐掌握了精确再现空间的技能。原始艺术的深刻影响难以充分估量。不过须记住，因为现代艺术家致力于与艺术实践中的学院派准则决裂，所以他们对将现代艺术中的再现进行原始艺术化具有一种内在的兴趣。非西方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能吸引现代画家和雕塑家是有许多原因的。而辨清原始主义中的不同派别十分重要。首先有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的浪漫主义式的原始主义，他笔下的塔希提生活图像呈现出非工业社会的一派田园风光。还有以德国的桥社（*Brücke*）和青骑士（*Blaue Reiter*）为代表的情感式原始主义。他们的作品用抽象形式来表现情绪。与此形成对比，毕加索和莫迪里阿尼（Modigliani）的原始主义

则直接从非西方艺术中借用形式。毕加索的《阿维尼翁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1907）常常被视为现代艺术的开端。在这幅作品中，毕加索把少女们的脸画得像非洲面具一般。最后在超现实主义中还存在一种潜意识的原始主义。这里，人类的基本冲动与原始的自我联系起来，更进一步说明原始主义这个词语带轻蔑。

由上可见，原始主义更多地指20世纪艺术和现代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不是指某个具体的艺术家群体或运动。可是原始主义是否又是西方殖民利用的一个例子呢？其中是否存在跨文化影响的痕迹呢？西方和原始艺术的相遇确实发生在西方殖民主义的鼎盛时期。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有关原始艺术及其生产者的著作中，会有一些种族和政治问题或公开或隐晦地起着作用。近来，艺术史家受原始主义这个提法的困扰，开始对影响大洋洲、非洲和南北美洲艺术研究的各种与形式、人类学、政治和历史相关的问题产生质疑。但这未必就会产生一批被剥夺了意义的社会。相反，这些文化和西方传统的相互作用已经赋予它们全新的文化身份。

直到最近，西方人一直倾向于将大洋洲的艺术看作原始艺术。但是认真思考大洋洲的艺术对于太平洋居民的含义及其意义都十分重要。这些艺术形式是当地人民社会程式和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比如古代毛利人和塞皮克人雕刻的礼拜室，或者波利尼西亚的身体艺术，还有树皮衣等女性艺术形式。这里我们看到艺术史和人类学紧密相联，而“艺术”这个词在某些人类学家看来确实太过西方化了。

让我们离开欧洲舞台，来到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大量涌入的欧洲移民使这些国家的原住民失去了原先的生存环境。我们可以看到原住民利用本土艺术传统来强调自身的存在及其对土地的优先拥有权。原住民和欧洲移民之间最初的交流也包括各种艺术形式的交流，从树皮艺术到摄影，从岩画艺术到雕塑，都显示出澳大利亚艺术传统的丰富内涵。

现在我们把跨文化影响的问题颠倒过来看，想想由于移民和移民社群的影响，非西方传统被带到西方社会的情景。我想到的是奴隶制与美国黑人艺术的例子。自从18世纪早期发源于奴隶社区以来，美国

黑人艺术就对美国艺术作出日益重要的贡献。美国黑人艺术既包括陶瓷、家具、手工缝制的被单等民间艺术和装饰艺术，也包括雕塑、绘画、摄影等高雅艺术。这些艺术作品都是19世纪的美国黑人所作，他们中有奴隶也有自由人。美国黑人艺术显示出文化的多样性和综合性，是美国社会的整体反映。此外我们还应该想想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影响，想想20世纪20年代的新黑人运动的影响，想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黑人民族主义的影响，想想20世纪晚期出现的新黑人艺术家和理论家的影响。

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帝国建立者们准则式的作品，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殖民地臣民的，不管这些臣民是奴隶、奴隶的后代还是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人。像女性一样，这些群体大多被艺术史忽略，认为他们对欧洲艺术的“主流”毫无影响或无关紧要。这种看法首肯了一种观念，即认为高雅艺术是艺术家按照西方传统及其对天才的理解进行艺术实践的观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高雅艺术以特定材料、主题和方法为正统，并且当然要由白人男性艺术家来实践。非西方艺术大都根据西方的量尺来判断，它们起先被蔑视为“原始”艺术，而一经西方艺术家吸纳改造后，又摇身一变而为“原始主义”。

不过近年来人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意识到横加在非西方艺术上的殖民框架。一个显著证明是，非西方艺术的撰写现在都能尊重其自身的历史，哪怕由西方人来撰写也是如此。比如，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认为其现代艺术是由自身传统演变而来，又由西方人“赠与”他们的。不过，西方艺术——不论其现代与否——难道就不可能具备自身的民族特点吗？其实西方艺术不仅有形式上的特点，而且有主题上的特点。在本书的开头我曾举泰梯利·德·法布里亚诺的《博士来拜》作为基督教艺术的实例。这幅图像寄意仁慈，可是许多基督教图像描绘的则是圣徒的惨死或殉道，甚至基督本人的殉难。对那些身处西方基督教文化之外的人来说，这类图像看上去非常令人震惊。艺术史的写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艺术史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也总要受到艺术作品的生产者和观看者的影响。与此同时，思考主流博物馆举办的展览的政治性和美学价值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展览一度曾

被边缘化、被嘲笑，而今已获接受为艺术。这个问题接下来就会谈到。

注释

〔1〕 酷儿由英文queer音译而来，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

第三章

艺术史的呈现

当我们步入美术馆或博物馆时，我们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我想，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是为了寻求艺术，也是为了寻求历史。参观时我们经常面对按照线性的编年顺序陈列的艺术实物，通常由埃及和／或希腊–罗马时代开始，逐渐过渡到当代。当然，根据博物馆的专长不同，年代顺序也有所不同。但是要说年代学是组织艺术品陈列的主要工具之一也不为过，而且我们已经了解，年代学还是撰写艺术史的主要方式之一。

对大多数人来说，第一次接触艺术作品都是在美术馆或博物馆，而且常常是在国立或市立的大型博物馆。这类机构的存在使它们的所在地平添了一份文化名望。伦敦国家美术馆和大英博物馆都是公有公助的机构。其他知名的国家美术馆则由私人捐资成立，以后又靠公共资金获得扩充。例如，泰特美术馆的前身是制糖业巨头亨利·泰特爵士（Sir Henry Tate）的个人艺术收藏，后来他将收藏捐赠给国家。从那以后，泰特美术馆已发展成为系列美术馆——两家在伦敦，即泰特不列颠美术馆和泰特现代美术馆，其余的则在利物浦和圣艾夫斯。所有这些泰特美术馆的建立靠的都是公共资金，同时也为公众服务。

这些国家藏品及陈列它们的博物馆是城市中一道重要的风景线。阿姆斯特丹的国立博物馆、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还有巴黎的卢浮宫都藏有世间最精美的一些艺术作品，而这些博物馆本身也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欧洲博物馆的陈列品主要是本国绘画，但也反映出艺术收藏史的历代风尚，所以陈列品也包括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的艺术品，以及更晚近的来自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非西方艺术品。

美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的收藏显示出收藏史是多么重要。美国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度，许多博物馆中的精美藏品既是私人捐赠的结果，也是积极推行从欧洲艺术市场上购买的政策的结果。将个人收藏捐赠给国家的那些人，博物馆通常会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博物馆的侧厅或数间展室，以兹纪念。美国的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可能被看作权威机构，其实它们的历史都很短。这些机构拥有的文明魅力在华盛顿国家博物馆的建立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华盛顿国家博物馆于1937年

落成，距该城被确定为美国首都已有一个世纪。它最初由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以个人之资建立，此公曾在胡佛（Hoover）总统麾下出任财政部长。他认为首都没有一座国家美术馆实在令人尴尬，尤其是在接待来访的外国使团时不得不支吾：本国实未有此物。安德鲁·梅隆与自己主张建立的博物馆保持着适当距离，而一些收藏家将个人藏品置于美术馆和博物馆中并向公众开放，这些私人收藏与许多国家收藏在地位上是平等的。

位于洛杉矶的约翰·保罗·盖蒂博物馆不仅拥有无与伦比的艺术藏品，还收藏有艺术家的手稿和素描。凭着其亿万富翁建立者的遗赠，盖蒂博物馆的艺术品收购预算足以让许多国立博物馆汗颜。古根海姆美术馆也是一家私立博物馆，和泰特美术馆一样，也在四处成立分馆，它们分别位于纽约的博物馆大道（第五大道）、苏荷、威尼斯、毕尔巴鄂以及拉斯韦加斯。

盖蒂博物馆拥有两座馆所，一座是根据赫库兰尼姆出土样式复制的罗马别墅，一座是全新的博物馆综合建筑，雄踞在洛杉矶布伦特伍德山巅。由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设计的博物馆建筑群于此地蜿蜒展开，表面均覆以采自意大利南部的特拉维尔蒂尼大理石，洁白耀眼，堪与馆内收藏媲美。与此类似，第一座古根海姆博物馆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于1960年设计，他和迈耶一样，都是所处时代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这座博物馆坐落在曼哈顿最昂贵的街区之一，距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只有数百码之遥，其白色螺旋形建筑别具一格。再往后，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为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所作的那引人注目的钛块设计，在吸引参观者方面所起的作用堪与博物馆内的藏品所起的作用相媲美。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建筑本身超越了藏品，而是说明我们对博物馆这类机构的投入是多么巨大。在展示和消费艺术作品方面，在改善城市（它们通常位于城市）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私立和公立的博物馆、美术馆都扮演了同等重要的角色。这些机构对艺术品位的形成，对艺术史的表现方式，对普罗大众理解艺术史，也具有重要影响。

稍微回顾一下欧洲收藏的形成过程，我们就能看清艺术作品通过

赞助和收藏活动成为历史的途径。收藏的观念可以向上追溯到古代希腊。在古希腊，*Mouseion* 这个词的含义是“缪斯之家”，它是一座建筑，里面收集了能够彰显九位缪斯女神的荣耀的各种器物，而这九位女神象征着艺术和科学。博物馆这个词就是从这种宗教实践中产生的。罗马人热衷于收藏。他们收集大量器物以备庙宇和圣所的供奉之需，普通大众也可以看到这些器物。这个时期私家收藏的观念也开始出现，有些私家收藏，比如哈德良皇帝（Emperor Hadrian）在其位于罗马郊外的蒂渥利别墅的艺术陈设，就十分灿烂辉煌。

收集古今各类物品的观念在现代之初凸显出来。从16到17世纪，博古架成为必需品，凡有能力购置者几乎人手一架。博古架用于陈列小型私人收藏，陈列品从木刻画、素描到科学仪器，不一而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公侯和教皇藏有的古代及当时的伟大艺术作品被看作地位、财富和文化价值的象征。前文已谈到过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是如何从《观景楼的阿波罗》开始逐步建立起他的古代雕塑收藏的。除了有教皇的赞助，16和17世纪最著名的一些艺术作品也是在人们的推动下完成的——包括米开朗琪罗绘制的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画，拉斐尔绘制的梵蒂冈诸厅的壁画（见第二章），贝尔尼尼（Bernini）创制的圣彼得教堂里的华盖等。而圣彼得教堂本身则是由包括米开朗琪罗和贝尔尼尼在内的多位著名建筑师共同完成的（我们得记住，这一时期兼擅建筑的艺术家比比皆是）。从古代到文艺复兴的丰富的艺术收藏是吸引那些对艺术史感兴趣的人前往罗马参观的最主要原因，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收藏古代器物的观念到了18世纪更为风行。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一时期外出旅行的大量增加，尤其是大旅行的出现——年轻人通过遍游欧洲、参观文化胜地来完成教育。罗马是大旅行的焦点城市，英国旅行者常常聚集在英国咖啡馆交换来自家乡的消息。我们在参观游览时，大部分人都喜欢购买纪念品，而18世纪的旅行者在这方面也别无二致。他们把绘画、雕塑、素描等等纪念品购回家中，建立、扩充自己的个人收藏。古罗马雕塑尤其受欢迎，许多雕塑都是由不同来源的雕塑残片拼接而成，但热切的顾客对此要么毫无觉察，要么并不介

意。英国乡间别墅里的艺术作品就是这股收藏热情的见证，对这些收藏的指涉连同对古希腊、罗马艺术的知识成为我们所谓的18世纪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约书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于1773年为蒙哥马利姐妹所作的肖像《装扮许门像的三女士》（*Three Ladies Adorning a Term of Hymen*，图13）清楚地显示出古典往昔的典故是如何被用来给画作的委托者、同时也是画作主题的三姐妹突出地位的。这幅肖像于1774年在皇家美术学院展出。皇家美术学院成立于1768年，雷诺兹是奠基人之一，他坚持学院应是推动艺术作品展览的引擎。（伦敦皇家美术学院的夏季展览一直是当代艺术家销售作品的活跃市场。）雷诺兹的这幅画是肖像画和历史画不同寻常的结合。这一点对我们尤其重要，因为它显示了历史——或至少是对于古典往昔的迷恋——与18世纪精英社会的形象有多么紧密的关系。画面中央再现了一尊古典雕塑的轮廓，它是婚姻之神许门的像，这是对古罗马艺术及其神话文学的指涉。此外，这幅画还借用了另一个古典主题：美惠三女神（女性美德的拟人形象：纯洁、优雅和美丽）给自然作装扮。

图13　雷诺兹为蒙哥马利姐妹所作的肖像《装扮许门像的三女士》于1774年在伦敦皇家美术学院展出。

皇家美术学院是艺术家向同行及潜在赞助人展示作品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艺术家学习手艺的场所。绘画按照不同题材划分等级，根据对相应题材的精通程度，艺术家也被划分为不同等级。在这个学术体系中，最出色的艺术家描绘最重要的图画。历史画被看作艺术生产的巅峰，其题材通常都是古代历史和神话（正如雷诺兹的肖像画所示）。在新教国家比如英国中，圣经题材在艺术中的运用不如在其他欧洲国家中流行。不过在学院的题材等级划分中，对圣经故事的再现具有和历史题材同样高的地位。历史画比肖像画更具声望，而在肖像画以下，依次还有风俗画（取材于日常生活场景）和风景画。学院的概念对艺术史十分重要，因为学院是艺术家第一次把作品呈现给少数富裕公众的地方之一。瓦萨里——我们已知道他对艺术史写作的发展具有极大影响——于1563年在佛罗伦萨建立起第一所美术学院，而学院的名誉院长则是科西莫·德·美第奇大公（Grand Duke Cosimo de'

Medici）和米开朗琪罗。瓦萨里希望他的学院既能增进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也能为他们提供培训。其他意大利城市迅速效仿，1593年罗马建立起圣路加学院，博洛尼亚学院则成立于1598年。

1648年法国建立了自己的美术学院：皇家绘画和雕塑学院。它很快成为君主政体的宣传机器。像伦敦的皇家美术学院一样，它也提供培训并根据艺术家实践的艺术形式给他们评定等级。古典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那恒久的重要性得到了法国的认可，1666年在罗马成立了一家法国学院，它为艺术家直接学习重要作品提供了方便。

对收藏和旅游的热情，连同“大”18世纪（约1680—1830）期间美术学院在全欧洲的建立，确保了古典艺术的主导地位。学习艺术的学生通过精研雕塑追摹古代艺术。有时因为不能获得原作，有时则出于让学生接受更多古代杰作熏陶的考虑，学院从诸如梵蒂冈宫那样著名的收藏里选择雕塑作品加以复制以供使用。我们已经见识了古代世界对像温克尔曼那样的史家的影响，而现在我们又看到古典观念被引入艺术实践中。不过温克尔曼是通过文本来研究古代艺术的，而学院里的学习则是通过对原作或高仿品的直接体验来进行的，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在学院里，艺术史通过视觉方式得到呈现，加之学院对当代作品的陈列，这对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整个欧洲财富的增长和教育的提高对艺术爱好者的数量也产生了影响。这从艺术市场的增长中就可见一斑。在这些市场上，古今艺术作品被当作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在交易。显然，绘画和雕塑是地位最高的交易品，而且我们也看到古代雕塑（或由古典时代不同来源的残片拼接成的雕塑）的交易也极为红火。对那些口袋里缺钱的人来说，版画和素描是最理想的藏品。而这股收藏之风又因艺术品商人的日渐增多而盛行，他们在其商店的橱窗里陈列艺术品，还会利用报纸广告和销售目录推广宣传。

伦敦的皇家美术学院及欧洲的许多类似机构，如著名的巴黎沙龙都为其成员举办展览，展览作品可供销售。这一做法延续至今。不过比这更值得一提的是对艺术的兴趣普及到更广大的人群。到这时为止，不论私家博古架还是王室收藏都只向那些受到邀请的人开放。而

到了18世纪，公众对展览和博物馆的需求大增。艺术市场的繁荣改变了艺术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业余的私人收藏家连同他们的博古架逐渐让位于日益扩大的专业艺术市场，后者通过展览和国家艺术机构的不断开设促进了艺术家的事业。君主、亲王和精英们的捐赠帮助这些国家机构逐步积累下这些收藏，并确保了国家的声望。与此同时，他们的私家收藏也开始向越来越广的公众开放。私家收藏同样可以被看作是国家之宝，而能开放私家收藏的国家也被看作有个好政府。18世纪下半叶，包括巴黎、罗马、佛罗伦萨、德累斯顿、斯德哥尔摩等地的王公们都开始向全欧洲的公众开放其私家收藏。当然它们和今天常见的免费博物馆尚有不同，不过，品类如此繁多的艺术作品第一次能够为更加广大的观众所欣赏了。

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批公共博物馆之一就是巴黎的卢浮宫。它成立于1793年，正值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之际。王室收藏的艺术宝藏，连同王宫本身都向公众开放，这被视为反映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正是这些理想支持着大革命。但是与“高雅艺术”相伴的势利不久就表现出来：贫民阶层很少有人参观卢浮宫，他们对艺术作品的无知和不能对视觉作品作出得体的反应受到中产阶级“兄弟”的批评。卢浮宫是开放收藏的催化剂。伴随着收藏的开放，出现了新的希望，那就是对于博物馆和美术馆里展示的艺术作品，人们希望能了解它们的历史，读到关于它们的记述。此外，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已经被看作教育和提高大众心智的一种手段，因此在馆里呈现艺术史便成为实现此功能的重要途径。

在英国，因为害怕内乱（这是法国大革命和伴随工业革命出现的贫困和剥削带来的“积极”影响），所以特别鼓励工人阶级参观博物馆。通过国家收藏来激发爱国主义情绪成为维持太平的手段。英国博物馆的陈列品并不全是英国本土艺术作品，比如伦敦国家美术馆就是在安格斯坦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藏品大多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而很少有英国画家的作品。同样，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也大多是希腊–罗马时代的文物。不过它们仍旧被当作英国的骄傲。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是反映这股风潮的重要实例，它成立于1857

年，其馆藏包括从手工制品到批量生产的所有门类的艺术作品。这些艺术作品都被呈现给公众，以便确立品位的合适标准。与此同时，来自大英帝国全境的高雅艺术——绘画和雕塑——藏品不断增多。这些艺术作品的公开展示，既使人们想起大英帝国的辉煌，也向人们暗示帝国曾经统治的疆域。这样一来，我们便看出非西方文化的艺术史是如何被纳入到有关英国的重要性的叙述框架里的。这些展品的唯一功能就是美化英国的形象，它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这个艺术史上的问题我们曾在第二章讨论过。

伦敦的这些博物馆机构反映了整个欧洲的情况。在19世纪下半叶，除了公共博物馆机构外，世界博览会成为展现艺术和国家身份的重要手段。世界博览会颇为盛大，来自全世界的各种艺术作品都得到了展示，从而成为更宏大的艺术史叙述的一部分，这似乎是对工业时代的“帝国”和“进步”概念的认同。对物品如此刻意的安排，这与黑格尔的历史观念有关，根据他的观念，世界精神体现在艺术之中。

到目前为止，我对艺术史呈现方式的讨论集中于欧洲传统。很明显，在艺术的呈现方式、呈现内容和国家身份这三者之间存在着联系。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艺术收藏和艺术机构是怎样与这个欧洲模式相关联的。只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艺术才摆脱孤立边缘化的地位，登上世界舞台。

联邦艺术计划（1935—1943）始于罗斯福总统新政，新政是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采取的措施。该计划与几个世纪前欧洲建立的学院不无相似之处。通过参与该计划提供的公共艺术服务，比如为公共建筑绘制壁画等，许多艺术家获得了至关重要的经验并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杰克逊·波洛克和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都是联邦艺术计划的受益者。与此同时，纽约的私人画廊开始繁荣起来——他们出售欧洲重要画家如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和彼埃·蒙德里安的作品，这就为美国艺术家提供了足够的刺激。同时，人们可以从建立于1929年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接触到现代艺术藏品（主要是欧洲作品）。联邦艺术计划倡导的国家风格一开始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颇有几分相似，但是与超现实主义画家

的接触促使波洛克展开他的抽象表现主义实验。抽象表现主义是一场欧洲的艺术运动，旨在借助非具象的绘画性效果来抵制准则艺术的影响。虽然政府对艺术的直接资助于1943年停止，但是在后二战时期现实主义被认为太过左倾，而抽象表现主义——或说抽象表现主义的美国版本——却被看作自由世界的艺术，继续受到政府的扶持，只是扶持稍微有些含蓄罢了。杰克逊·波洛克的《回声》（*Echo*，1951年第25号，图14）张挂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它是波洛克滴洒绘画的一个实例，这种作画方式是将画布平铺在地板上，再用画笔或棍棒蘸取颜料滴洒而成。绘画者手臂的挥洒运动在画面上留下各种图形。这样的作画方式虽属即兴，但也可使波洛克对成品进行控制。这一技法来源于超现实主义的“自动主义”观念，它是一种随性的绘画，直接来自于艺术家的潜意识。这一技法表明传统学院派所依赖的情理和理性已从艺术创作过程中清除出去，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家的自我创作过程，而画布成为了艺术家心迹的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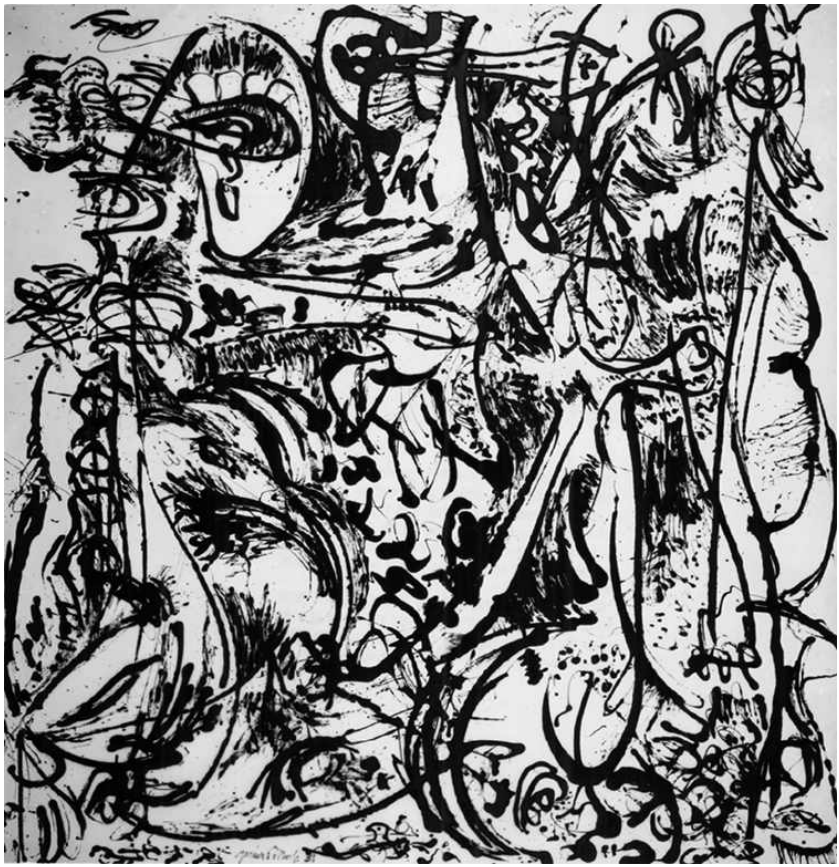

图14　杰克逊·波洛克创作于1951年的滴洒绘画《回声》（第25号）现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在对艺术史准则的认同或质疑中，博物馆和美术馆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理解其中的前因后果，有必要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来思考博物馆与历史的关系。假如我们认识到历史不仅包含我们的过去，而且也包含我们研究过去的过程，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博物馆和美术馆在民众与其历史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调解员的角色。博物馆的陈列在本质上是根据我们现在的态度来遴选或重新组织艺术作品，以便我们观看的。至于美术馆展览的空间安排，不论是依据艺术家、风格还是流派来进行，也都是按照我们确立的系统来划分的，而不是按照这些艺术作品在其诞生之初产生的联系来安排的。这一点对于理解在博

物馆和美术馆里呈现艺术史就是在呈现一个与现在紧密相关的往昔十分关键。通过这种方式，艺术在博物馆中得到纪念，而我们也可以像阅读一部完整的书那样阅读艺术。历史被理性地、有序地串联在一起，故事渐次展开，这在许多方面都像一部小说。于是，博物馆往往会通过将我们此刻的状态投射到对历史的呈现上，从而实现对社会和文化现状的认同。

以上对博物馆的分析可不光是枯燥无味的理论。常设展品陈列方式的变化，足以证明博物馆和美术馆是反映社会对艺术品及艺术收藏的态度的晴雨表。近期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泰特现代美术馆和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的新陈列。这两所美术馆的藏品不是按照时代和流派的年代顺序来陈列的，相反，它们是根据主题来陈列的。比方说，有一间展室陈列的都是女性人体作品，其作者来自不同的时代。这些作品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主题，当然，再就是它们都属于泰特美术馆。这些画过去被陈列在不同的艺术史“叙述”或呈现框架内，如今采取新的陈列方式并不是因为艺术史发生了改变，而是因为在我们这些现代观看者和历史之间出现了新的对话。继续以小说为比方，叙述线索告诉了我们当下的关注焦点。我们可以说，按照主题进行陈列说明我们对作品是由谁完成的——也就是对艺术家——不再像以往那么关心了，而且也突破了将艺术作品紧紧地和其作者相联系的传统。同样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像这样把女性题材集中起来陈列是对女性在艺术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新审视。女性主义者曾说过，女性要想走进美术馆就只能靠脱衣裸体。那么这一新的陈列方式是不是对男性艺术家和赞助人看待女性人体的方式的认同呢？是不是对随之而来的女性艺术家在艺术史叙述中的缺失的认同呢？

接下来我想组织——或者用大家更习惯的说法——“策划”几个“微型展览”，以说明本章观点。

第一个“微型展览”涉及的是“女性”主题。女性在所有时代、所有文化的艺术中都是常见题材。我从本书的插图中选出下列作品，包括列奥纳多的《圣母子、圣安妮和施洗者约翰》（*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St Anne and St John the Baptist* ，图15）、维米尔（Vermeer）

的《倒牛奶的女仆》（*Maid with a Milk Jug*，图16）、雷诺兹的《装扮许门像的三女士》（图13），最后还有来自科特迪瓦的一小尊19世纪木雕女像（图11）。我的这个选择最令人注目之处是它展示了女性能代表的各种角色。在列奥纳多的绘画中我们看到了作为母亲的“女性”角色。基督的母亲圣母马利亚慈祥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同时又被自己的母亲圣安妮（也就是基督的外祖母）注视着。维米尔笔下的“女性”是一位料理家务的女仆，是有关女性“持家”的典范。相比之下，雷诺兹为蒙哥马利三姐妹所作的肖像向我们呈现了分别作为处女、未婚妻和新娘的“女性”。画面右方跪在地上的那个姑娘尚未成婚，她正为编织花环而采摘鲜花，以装点许门塑像（再现婚姻之神的古典雕塑）。画面中间的姑娘似乎正要起身将花环递给另一位姐妹，这位姑娘新近订婚（这幅画就是受她的未婚夫委托所作）。而画面左侧的第三位姑娘站直身躯，把花环举过头顶。她已经结婚，她站在许门像的另一侧，这表明她身为人妻的圆满。画中的光线没有落在她的脸上，而是落在她的胸部和腹部，这更突出了她的性征。我们这个微型展览最后以来自科特迪瓦的小雕像结束。我们不知道这是一尊肖像还是只是对女性理想形象的再现，但不论是何种情况，女性的性征肯定是这件作品的主要关注点。

图15　达·芬奇的《圣母子、圣安妮和施洗者约翰》（约1500年）。

图16　《倒牛奶的女仆》由维米尔创作于1658至1660年间。

我策划的第二个“微型展览”是关于“男性”的。作品也从本书插图中选取。入选的作品有：《四使徒》手抄本插图（*Four Evangelists*，图17）、拉斐尔的《雅典学院》、《观景楼的阿波罗》以及来自复活节岛上的雕像（图18）。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这四位使徒是《圣经·新约》中《四福音书》的作者。他们的著作是基督教教义最基本的试金石，展示了男性作为宗教创造者的重要性。在《雅典学院》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古代哲学家和思想家，从古至今他们都因智力超群及为人类知识所作的贡献而受到称颂。这些人全是男性。《观景楼的阿波罗》代表男性之美，在第一章中我们对此已有所了解。他完美的身

体在希腊原作中是暴露无遗的，但后来在私处巧妙地加了一小片无花果叶以遮羞。最后，虽然复活节岛上的雕像之谜仍未解开，但近来的研究认为它们是部族酋长、武士首领或代表权威的神的肖像。

图17　9世纪的《四使徒》手抄本插图（从左上起逆时针分别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来自德国亚琛教堂的一本卡洛林福音书。

图18　复活节岛上的7尊雕像，它们可能代表的是部族首领、战士或神。

若对以上两个微型展览稍作总结，则“女性”图像表现的是母性、持家、婚姻状况和性征。与此相对，“男性”图像表现的则是宗教领袖、思想家、世俗首领、异教之神和武士。

强调一点很重要，即这类实验的取材范围不必限于本书的插图，也不必限于我所讨论的题材，而实验也很容易进行，因为因特网使我们得以走近大多数重要的艺术收藏机构。许多这样的机构都拥有出色的交互式网站（部分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网址列于本书附录）。只要用可以作为展览主题的关键词，比如“希腊神话”或“静物”在这些网站上搜索，你将搜索到一系列图像。而把这些图像联系起来的因素可能与

风格、作者或艺术发展的年代顺序完全无关。

艺术史的呈现除了具有反映当今社会的关注焦点的功能之外，我们也能看到博物馆是如何作为一种使新艺术合法成为西方传统准则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与此紧密相关的是进步的观念，即认为每一代都在继续着前一代的进程，使我们倾向于认同当前的现状。这样我们才能开始确定艺术成为艺术史的时刻，才能确定博物馆在影响和呈现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约翰·萨默森爵士（Sir John Summerson）的名字通常和建筑史联系在一起，1960年当他受命成为赫尔大学美术系的费伦斯美术讲座教授时，其就职演说对我们思考这一点很有帮助：

> 新艺术从开始拥有独特品质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历史了（参阅有关毕加索和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参考书目）。这于是就给人一种印象，仿佛艺术在不断地从现代生活中消退，仿佛艺术从来不曾为现代生活所拥有。它不断消退，似乎退向一片巨大的风景——大写的“艺术”风景中……我们透过观光车的车窗观看这片风景，其情形与透过博物馆橱窗观看艺术是何其相似！艺术存在于玻璃之后，存在于玻璃般的历史之后。

这是涉及艺术作品转变的重要问题，从当代文化风口浪尖的崭新创造物转变为当代文化的历史的一部分——不管这艺术作品的年代距离我们有多近。这个问题还与本书开篇提到的艺术批评的概念相关。艺术批评能够主宰当代艺术实践，成为讨论当代艺术、评估当代艺术的艺术价值和金钱价值的主要手段。可是一旦如达米恩·赫斯特或特蕾西·埃明之类的艺术家的作品为人收藏，不论是被公家还是被私人收藏，这些作品便超越了艺术和艺术史之间的界限。

我们往往会认为一件艺术作品如果被大博物馆收藏，它便平添了一道权威和崇高的光环。博物馆代表社会来认可艺术，将某些作品解释为艺术，进而把它呈现给公众。不过这一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艺术作品的收购经常引起争议。极简主义艺术家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便是一例。1967年，雕塑家安德烈用一层混凝土块覆满了洛杉矶道恩美术馆，随后他抽去了一些长方块，便在混凝土表面

上留下一些“负像”形状。他这件雕塑由裁减掉的空间所定义，而且还与露出来的美术馆建筑有关。对艺术品和美术馆关系的这种探索在1976年被安德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用耐火砖制成为数8件的系列雕塑《等介物I-VIII》（*Equivalent I-VIII*）。这些作品的形状与他先前在洛杉矶制作的那些负像形状相契合。当时的泰特美术馆购买了《等介物I-VIII》。由于不满美术馆斥资购买120块旧标准砖，公众的抗议声不绝于耳。此外，这一系列雕塑长度很长，又贴近地面，乍看几乎会错过，因而外观上也颇为缺乏美学吸引力。不过安德烈是在就传统对雕塑的期望——希望它是垂直放置的，是具象的——表明态度。此外，他的作品的形式得自美术馆的空间，而《等介物I-VIII》在泰特美术馆的展出更赋予这件雕塑以艺术的资格。

因此，博物馆和公众的关系真的是非常复杂。一方面，博物馆策展人和馆长们希望前来参观的都是那些“懂”艺术的人。但是那样一来博物馆还能叫公共博物馆吗？另外一些馆长则认为参观者事先不需要任何艺术知识也能理解和欣赏艺术品——这不过是任何喜欢观看艺术作品的人都能享有的一种美学上的消遣。这是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此外还有许多观点介于这两者之间。可是这些态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假如博物馆和美术馆想要扩大其吸引力，又应当采取哪种战略呢？

前文已经谈过，通常根据风格或流派，按照年代顺序来陈列艺术作品的方式，会强化已经主宰着艺术史的目的论体系。不过选择这样的陈列方式还有一个大众化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1986年当巴黎奥赛博物馆落成开馆时，博物馆便选择了历史性的陈列方式，因为大家认为这种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参观者。当陈列品具有清晰的历史进程叙述时，就更容易采取历史性的陈列方式了。以奥赛博物馆为例，从19世纪中期的法国学院派绘画起，到马奈和印象派画家，再到新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历史脉络整齐，而博物馆建筑本身乃由19世纪的一座火车站改建而成，因此更为体验那时的艺术增添了一份“真实的”历史感。

20世纪晚期以来的艺术有时会产生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处理

既需要考虑到接近一般大众，也要考虑作品的陈列方式。我这里所说的博物馆里“现代”艺术的陈列打破了奥赛博物馆、伦敦国家美术馆以及其他许多大馆中常见的传统陈列模式，其中一些方式我之前已提到过。从大约20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始用整间整间的展厅或陈列空间来专门陈列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展品的安排也突破了线性模式，转而营造出一种强调视觉效果的美术馆体验。这里不难看出现代艺术的陈列方式和现代艺术史的写作方式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在第二章中我曾讨论过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及其有关前卫艺术作品的地位的观点，而今在我们的美术馆里就上演着那种“英雄”崇拜。某些艺术家个人——他可能依然健在，依然在创作——有可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在美术馆中陈列，并与美术馆融为一体。

除了常设展览，博物馆和美术馆还举办特展。这些常常在国际间或洲际间巡回展出的特展，使一般大众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接近艺术品。在这些展览中，艺术史的呈现方式更是千姿百态。策展人或追寻主题，或追寻观念，或追寻特定艺术家的生平，他们能够调集世界范围内的有关藏品，只要藏家愿意借就行。这类展览提供了重要的艺术史呈现方式，也影响了我们对这一学科的认识方式。展览和艺术史互动的最佳实例之一是1910年至1911年由英国艺术史家、评论家罗杰·弗莱策划的展览。当时弗莱在出任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五年后刚刚回到英国。展览展出了凡·高、高更和塞尚（Cézanne）等人的作品，他们的风格虽相去甚远，但弗莱把这次展览命名为“马奈和后印象主义画家们”，从此为一场“新”的艺术运动定了名，直至今日“后印象主义”仍是艺术史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个新名字，或者称为新目类也可，甚至为法国人所接受并被译成法语*le post-impressionnisme* 。和印象主义或浪漫主义不同，后印象主义强调的不是艺术家在风格上的相似，相反，弗莱是想把那些热衷于艺术的形式化概念和那些强调主题的重要性的艺术家归为一类。“马奈和后印象主义画家们”这个标题引起了极大争议，但是从这类展览中却产生了展览可以“一鸣惊人”的观念。这类巡展或一次性展览是独特的体验，来自全世界的艺术作品使得艺术史得以呈现，而其中的作品——我们的基本证据——

依然位于舞台中央。

第四章

思考艺术史

艺术史最有趣的一个方面就是它给我们机会去思考诸多艺术史家和理论家提出的观点，反过来也用这些观点来观察他们的著作是怎样和视觉材料互动的。我想在本章简要说明艺术史将丰富的西方思想纳入到对视觉对象的分析中的各种方式。我这里特意用“西方思想”一词，只是为了限定我的讨论范围而别无他意。

本书首章曾讨论过艺术史这个词的意义，并把艺术史与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区别开来。我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要赋予艺术以一部历史，那么就必须有一种方式或方法能够把艺术史的叙述或故事串起来。换句话说，仅仅按照年代顺序或风格来编排艺术作品是不够的。各派思想和哲学观念都被用来串联艺术的故事，这是艺术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在此并非号召以牺牲作品本身为代价来盲目投身于理论，那样做与对艺术进行编年排序一样毫无意义。在第一章中我就提出艺术作品是我们的基本证据，而正是这些证据和探索方法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艺术史的基本内容。本章以第二章为基础，在那一章里我们讨论了艺术史写作的各种传统。而本章讨论的焦点将是艺术史的不同思考方式以及它的社会、文化及美学意义。显然，这些话题都是相互联系的，不过第二章着重对挑选出的作品和艺术史家进行了讨论，而本章则要看看艺术史怎样与阶级、性别这类问题的形成历史发生联系，又怎样被包括进这些更广阔的论题。

我们已经了解温克尔曼等艺术史家是如何帮助建立起艺术史这一学科的。然而在他那个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视觉体验的地位要低于人类思想的地位。这个悖论的根本问题在于，艺术史的地位要次于其他类型的历史——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次于其他类型的认识。主导18世纪的理性的、科学的知识观认为，思想高于感官知识。这是笛卡儿的观念“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延伸——人的推理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到18世纪中期，这种知识等级观念受到了挑战，于是人们对艺术史的重要性的思考方式也起了变化。一个关键的进步是出现了“美学”这个词——一种认为感官认知与理性或逻辑思维具有同等地位的思维模式。逻辑的基础是语言推理，而美学的基础则是感

觉，具体到我们的话题就是视觉。这便回到了本书开篇提出的一个有关视觉体验的语言表达的问题——我们靠视觉来体验艺术，可是却得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体验。而我们用来描述艺术作品的语言可能会与我们对艺术作品的视觉体验不一致。

亚历山大·哥特列博·鲍姆加通（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是最早思考这些问题的哲学家之一。他就这个问题用拉丁文撰写了一篇长文，题为《美学》（*Aesthetica*，1750—1758）。这篇文章首次把艺术置于一个没有任何等级之分的框架中。美等于完美，可是对美的感知和理解是通过品位的运用（在这一语境中品位指的是非常清晰的感知）获得的，而不是通过理性获得的。这便挑战了艺术是为了模仿自然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是温克尔曼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与此不同的是，鲍姆加通认为艺术应该通过模糊图像形成完美，进而创造感官知识。他的理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个人的美学判断或品位对他人也可以具有价值和意义。

而这便是伊曼纽尔·康德于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一书的基石。康德在书中分析了个人作出审美判断的能力，描述了他所理解的审美判断对“天才”观念的支持。判断一件艺术作品品质的标准在于它的美和目的。与温克尔曼的等级体系不同，康德相信多种美学品位可以共存，这一观点促使了认为美的事物能够像道德判断一样引发我们情感的看法的形成。就这样，美学和伦理学交织在一起，而天才、品位的概念也与艺术家或观众的道德品质之间产生了内在联系。康德的观念针锋相对地向温克尔曼维护的古典理想的权威地位提出了挑战。

可是康德的美学观念又受到19世纪早期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反驳，后者是对历史学影响最大，从而也是对艺术史影响最大的思想家。黑格尔有时被看作一个唯心论者或形而上学的思想家，因为他相信一切事物都处于通往自明的神圣精神的过程之中。在黑格尔看来，这个精神是世界的内在本质，它通过民族精神——在德语中称作*Volksgeist*表现出来。这种精神还表现在时代精神即*Zeitgeist*中，这在第二章已经谈过。这两个元素构成了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黑格尔想把历史的整体既理解为一个系统，又理解为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虽然他把感官体验看作知识的低级再现，可是他却依然认为艺术是观察和理解作为精神的历史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精神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象征时期、古典时期和浪漫时期。这三个时期与艺术史原先的传统分期非常吻合——首先是非西方艺术和早期艺术；接着是希腊 - 罗马传统，有时我们也称之为古典艺术；最后迎来了基督教艺术和德国浪漫主义艺术，后者恰于黑格尔著书立说之际走向前台。在黑格尔看来，艺术将在浪漫时期终结，因为这一时期终将归于基督教精神。尽管黑格尔的思想有着强烈的宗教气息，但是希腊–罗马艺术在黑格尔式的艺术观里仍占据中心位置。和包括温克尔曼在内的其他许多史家一样，黑格尔用古希腊艺术来给美下定义。在黑格尔的三个分期中，每个时期又有各自的开端、发展和终结期。到终结期时，艺术达到了完美，接着便走向衰亡。而在希腊–罗马艺术中，早在被称为古风时期的开端时期，完美就已实现，帕特农神庙雕带上那肃穆、宁静的雕像就是明证。随着希腊化时期的全面衰败，艺术也趋于衰落，此时的雕像显出更强烈的情感，并更富于动感。虽然黑格尔十分注重艺术史的宏观全景，但是他也认为认真研究作品本身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充分理解作品。话虽如此，黑格尔却认为鉴赏价值并非艺术史的全部内容，在他看来，艺术作品更多地属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进程。

黑格尔极大地影响了我们，使我们把艺术史看作对历史知识的系统探索。虽然他的精神或神的概念植根于基督教新教教义，但是他的观念却为后来的历史学家铺平了道路，使他们得以较少关注宗教艺术——那本是西方艺术生产的中流砥柱，转而思考进步的观念以及社会是如何在它所产生的艺术形式中得以再现的，也就是说，艺术是如何作为黑格尔“时代精神”——它是黑格尔对历史的解释——的一部分而起作用的。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和第三章讨论过的雷诺兹的《装扮许门像的三女士》一画联系起来，我们就能从18世纪晚期社会对古物的迷恋角度来思考这幅画，观察雷诺兹是怎样采纳了古代社会的价值，并以此作为自己绘画的楷模的。在那个自认堪与古人比肩的社会，这种

精神还通过建筑、文学、音乐及其他文化产品显现出来。

卡尔·马克思可能是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也深受19世纪的同时代人黑格尔的影响。马克思分析和研究历史的方式大体延续了黑格尔建立的模式。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形式随着历史发展和精神显现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对马克思来说，“精神”不是什么实体或理想，而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里指艺术）之间的关系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我们周围的一切都由社会阶级决定，因此许多历史“真相”都取决于观看者的阶级或文化视角。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引入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来检视我们和艺术的关系。意识形态与权力的操纵关系极大。在马克思看来，总是存在两个社会集团：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于是对马克思来说，艺术与这两个社会集团之间的权力运行动态有关。艺术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影响着我们和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它使我们按照特定的方式来思考自己——这一点且待我细加解释，同时为了证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联系，让我继续以雷诺兹的《装扮许门像的三女士》为例进行说明。请读者回想一下第三章提到过的大旅行，我们当时讨论了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作品如何成为了精英阶层必不可少的收藏品，而这一潮流又怎样促进了古典主义艺术的复兴。对古代艺术作品的兴趣可算是18世纪英国“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而这一“精神”体现在文化产品的所有形式中。例如，这一时期的许多乡间别墅在设计时都模仿了古罗马的建筑元素，于是这些别墅便成为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就与马克思关于信仰和价值体系的观念联系了起来。假如你欣赏这些别墅，理解它们，甚至于拥有其中一座，那你就是这个社会集团的一分子。在这个例子中，集团成员的资格是建立在财富基础上的。古典时代的艺术品当然价格不菲，所以这一文化活动的基础是金钱。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它的文化之间具有本质上的联系。重要的是艺术的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而不是艺术家或赞助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层意思，请让我再举一例。在第一章中我谈到了约翰·康斯特布尔的《麦田》，这幅画是对英国乡间风光的田园诗般的再现，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可是它的优劣还取决于其观者。

对19世纪早期因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而流离失所的那些人来说，这幅田园画必定与他们的实际体验相去甚远。《麦田》呈现出了乡村田园的意识形态，但是拥有这片土地的却是精英阶层。作为权力的基础，意识形态的概念在过去数十年中已成为艺术史写作的重要工具。对此本章稍后还将举例说明。

通过黑格尔和马克思，我们发现19世纪的人们对历史的两层含义都怀有极浓厚的兴趣——一层含义是指过去发生的事件，另一层含义是指对过去事件的研究。两位思想家思考艺术的方式都很重要，因为他们使我们在思考艺术时超越了艺术家和赞助人的个人语境，艺术更像是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力量的晴雨表。换句话说，也是外部压力和影响的晴雨表。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那样，19世纪是博物馆和美术馆逐渐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些机构在呈现艺术史时对历史和美学的态度，与上述思考艺术史的方式时而平行，时而交叉。

康德的形式主义美学批评与黑格尔、马克思提供的背景框架之间的分歧，至今仍构成艺术史的主干。在涉及我们对艺术品含义的关注以及这含义如何传达等问题时，上述分歧尤其显著。这些问题最后在艺术符号学的概念上趋于一致。符号学是具有悠久传统的哲学探索方法，原是用来研究语言和交流问题的。最早把符号学引入艺术史的是欧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以及第二章讨论过的贡布里希等学者。在这些艺术史家看来，符号学是与图像学对等相称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是艺术品内容的分析而非形式的分析。我将在第五章就此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在20世纪上半叶，图像学是非常突出的一种思考艺术的方式，它关注的焦点是视觉图像和其他文化产品之间的联系。再往后，图像学渐趋松散，更多地关注艺术作品的主题含义，而较少关心作品风格和更广阔的背景。

符号学已经成为现在通常所谓的批判理论的一部分。批判理论也就是批评的学院理论，它是一个集合名词，其名下包括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殖民主义等众多思潮。这些思想流派（分别）关注对绝对真理和真相概念的挑战，对人类潜意识的研究，以及在殖民主义势力不再享有权威地位的地方的文化产品和思

想。我还曾简短地提到过新艺术史，人们认为它最善于利用批判分析来思考视觉对象。批判理论对我们思考艺术史的方式产生了影响，在这里我想重点介绍批判理论产生影响的几种重要方式。

米歇尔·福柯的《作者是什么？》（*What Is an Author?*）一书可称得上近数十年来最重要的学术文献之一。这个看似不经意的问题直指核心，那就是长久以来我们把艺术家当作天才来关注的观念。福柯既被看作结构主义者，也被当成后结构主义者——这两种思想流派都强调研究文化中的系统和组织，进而再用这些系统去分析有关文化。福柯的论点直指我们对真迹、著作权问题的关注，而这些问题又与价值、品质相关。这不仅帮助我们将作品的含义与其作者分离开来，而且还允许我们将佚名作品和署名作品一样也看作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实践标志。艺术史并不仅仅是艺术家的个人传记。比如我们不知道是谁雕刻了复活节岛上的石像（图18），也不知道是谁在手抄本上绘制了使徒插图（图17），但这并不一定会影响我们对它们进行分析。而假如我们知道了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那分析也不会受到影响。假如现在证明列奥纳多·达·芬奇不是《蒙娜丽莎》的作者，那么这幅作品不会发生任何物质改变。要是我们对此画的艺术含义和文化含义的分析是有效的，那么这些分析肯定也不会因为作者的身份变得不明而受到损害。我们还得记住，许多艺术家都拥有大规模的工作室，在创作中借助助手或学徒之力。在雕塑这一行，有些艺术家并不亲自参与刻石或铸造。比如罗丹（Rodin）的大理石雕塑（图19）就是由其工作室助手参照青铜原作雕刻而成的。

图19　罗丹创作于1896年的《上帝之手》。罗丹的大理石雕塑由其工作室助手参照青铜原作雕刻而成。

18世纪一些醉心于美学和认知的美学哲学家的观点，比如康德的

观点，在20世纪下半叶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著作中重获新生。德里达一般被看作解构主义者，他最为知名的就是他对“读解”活动的解构。在读解过程中，我们被迫去探索那些看上去统一但同时又蕴含着一系列矛盾的事物的方式。这一解构实践对艺术史的影响相当深远。德里达于1978年出版的有关视觉艺术的第一部著作《绘画中的真理》（*The Truth in Painting*）总结了他的一些思想。和18世纪的先行者一样，德里达关心的问题是：审美对象（绘画、雕塑之类）是否是自主的？是否拥有它们自己的“代码”？在德里达看来，这一“代码”与思考艺术的其他方式一样也认为艺术本身具有含义，正如我们会思考艺术的社会或文化背景一样。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艺术作品的界限应该在哪儿。德里达的观念使我们得以思考作品的“内部”和“外部”，因而是一项非常有用的分析技术。

在《绘画中的真理》一书中，德里达质疑了艺术作品的各个方面。比如，一般所谓作品“外部”都包括画框和作者签名。但是这些分类不只局限于作品本身，还包括博物馆、作品档案，以及艺术品作为商品在公开市场上的买卖方式。对德里达来说，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作品的“内部”，即作品的基本性质和美学性质，因为它们不断受到外部因素的修正。于是，德里达把作品的内部和外部视为一体——两者都是文字或图形，都能被我们读解。通过这种方式，德里达就回到了康德的观点，认为自主的审美认知与纯粹的推理不同。和康德一样，德里达对审美认知不同于纯粹推理这一区分的论证，是艺术及其历史的重要检验标准，换句话说，艺术史可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中以感觉而不是理性为基础的美学具有合法的一席之地。看看莫奈的《卢昂大教堂》，我们就开始思考德里达观点的重要性了，虽然方式非常简单。这幅画的“内部”美学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感觉——作品的主题是显而易见的——正午的阳光照耀着教堂，但这件作品的“外部”则与莫奈作品高昂的市场价格、我们对莫奈作为艺术家的先入之见以及他在许多公共博物馆收藏中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而所有这些“外部”元素都影响着我们对作品“内部”的看待方式。

20世纪，尤其是最初的几十年，人们对人类心理日渐感兴趣，这

对于人们用全新的方式思考艺术产生了便利。精神分析是对无意识的研究，由维也纳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展起来。他运用自由联想（引发一连串相互关联的念头，但不作深思）和梦等方法来探索人类心理。他的主张现在已为我们所熟知——口误会暴露说话者隐藏的或受压抑的想法，这种口误常常被我们称为“弗洛伊德口误”——因而现在很难想象弗洛伊德的思想在他那个时代看起来是多么新颖，多么革命。弗洛伊德认为人类自我包含本我（id），即无意识的心理，和自我（ego），即意识的心理，这一术语我们或许最为习惯。他还提出儿童和他们的母亲之间的关系具有俄底浦斯情结，我们将看到，这一点也成为思考艺术的不同方式的试金石。为说明自己的理论，弗洛伊德借用了达·芬奇的《圣母子、圣安妮和施洗者约翰》一画进行分析。据弗洛伊德说，这幅画中两位女性的样子，即马利亚坐在母亲腿上的样子，是达·芬奇因自己是私生子这一事实而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精神分析让我们能够循着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和步调来思考艺术作品的含义。这很重要，因为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把艺术品和它的作者分离开来。大家可能还记得，艺术家和艺术品之间的紧密联系是我们从更具鉴赏意味的角度看待艺术史的标志，而黑格尔和马克思式思考艺术的方式则强调艺术的背景。这里，艺术的过程和实践被看作艺术家无意识的内在过程。我们曾在前文看到，杰克逊·波洛克的绘画技术便意在把无意识和艺术实践联系起来。

以上对各种思想理论的简短介绍，目的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些认识，了解视觉艺术何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知道我们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艺术以及视觉和语言这两种交流形式之间的密切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强调了我们思考艺术史的方式，以及这门学科能够给理解文化、社会乃至人类自身带来的帮助。

不同的艺术史思考方法，产生了有关视觉问题的各种思想流派或研究方法。每种思想或方法都有特定的关注焦点，并引导我们对视觉问题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这对打破横亘在观众和艺术之间的障碍十分重要，而这一障碍最初看起来是不可逾越的。同时，这些方法在打破艺术史准则的主导地位方面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非常有成效。

现在想必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理论已经很熟悉，至少名字不陌生。同样，我还在本书中多次提到过女性主义，它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艺术，了解艺术是怎样被当作一种手段来认同或挑战父权社会的。女性主义还让我们思考女性在社会中的各种地位以及她们的各种再现方式。我想在这两种艺术史的思考方式之间，即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现在日益清楚了。它们都依赖意识形态这一观念，都依赖由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一整套社会关系。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史来说，其基本关注点是阶级斗争，至少也是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而女性主义关注的是同一类原则，只不过重点是两性之间的关系。近来“同性恋理论”对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一个骗局，而不是男女两性的生物学宿命的观点提出质疑。这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各种社会关系和艺术的意识形态问题。我在第三章“策划”的两个微型展览表明，性别确实能够通过艺术来建构和决定。

对艺术史除了有上述不同的思考方式以外，我们发现还有一些方法，其基础不是建立在历史哲学的教义之上，而是建立在另外一些概念上。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便是精神分析理论，至于这些思想方式是如何用来分析艺术以建构社会和性别身份的，我们已在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的分析中有了些许了解。此外，我们还有符号学概念，它与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一样，都把艺术看作符号，关心怎样给艺术解码，从而揭示其含义。上述两种艺术史思考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把艺术从其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的过程，它们更多关注的是艺术的含义和对艺术的诠释。虽然遭到一些反对，但这些方法在艺术史学科中仍是有效的做法。艺术是一个丰富的话题，可以从许多角度向它提问。上述方法并非要取代艺术的其他思考方式，而是对不断扩展的艺术史思考方式的补充。

可是，所有这些思考艺术的方式都存在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待美学？美学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我在本书已经几次提起它。在我看来，它是艺术史的砥柱之一。没有美学，艺术不过就是通向历史的又一块垫脚石、又一道门径而已，不过就是我们探索往昔（说现在也可以）的社会、政治、心理和符号学环境的一个视觉手段而已。身为

艺术史家的我们，假如我们试图否认存在着美学这个目类，否认对大多数人来说的确存在的“伟大的艺术”——不论它是怎么定义的，那么我们就是在冒险，就可能把精华和糟粕一起扔掉了。

那么我们所谓的美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用相当抽象的康德式语言讨论了这个问题。不过一个外行对美学的定义可能会包含对艺术之中存在着美的认可。此外，为了鉴别出不同艺术家及其作品的质的差别，我们可能会承认作出判断是有优点的。再有就是：观看艺术可以是令人愉快的体验——这一观点我们也要纳入其中吗？对初次接触艺术史的“新”读者来说，艺术带给人的愉快恐怕是促使他们阅读本书的主要动机。我们愿不愿承认艺术是另一种意识形态，而美学只是它的一部分呢？我深知这种看法背后的那些强有力论据。印象主义画家的作品，或者毕加索和凡·高的作品卖出很高的价钱，这难道不是美学的快乐原则在起作用吗？或者这只不过是一个购买社会等级的过程，就像18世纪那些英国的贵族子弟曾经做过的那样？那些卖出如此天价并作为投资悬挂在公司保险库的绘画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穷奢极欲的实例吗？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拥有一件昂贵的艺术品是遥不可及的事，我们可能转而拥有印有艺术品图案的印刷品、鼠标垫或屏幕保护图案。

在下一章里我想介绍一些读解艺术史的方式，我们将从艺术品本身出发进行讨论。艺术史不同的写作方式、呈现方式和思考方式最后汇集到作品本身，这不光说明让作品本身保持在我们视线之内是多么重要，还要说明艺术如何又真的能拥有一部历史。

第五章

读解艺术

行文至此，我们会发现，当观看一幅绘画或一件雕塑时我们总有许多问题要问。而我想在本章讨论的就是如何回答“这张画有什么含义？”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是要探索一件作品不同层次的含义，考察理解它们的不同方式。本章将始终使用“读解”一词，以表明语言和视觉之间的相互作用。牢记艺术——一种视觉现象——却是用语言文字来描述、撰写和欣赏这一点很重要。视觉现象被翻译成语言，所揭示出的含义遂变成艺术史的一部分。为了使讨论回到作品本身，应强调我们能从作品中读到什么，而不是强调我们能在作品外读到什么或者能往作品里读进多深。本书前几章已对我们能从作品外阅读到什么和能往作品里读进多深有所讨论，这些观点为艺术史提供了知识语境，对人颇有助益。让我们回到作品本身，来看看在读解艺术的过程中，主题、材料和方法是怎样结合为一体的。

艺术作品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进行读解，而这些层面又源自于作品本身，对它们略作概括是十分有帮助的。首先要提到的、同时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艺术的再现含义的概念了。艺术再现的概念常常和我们对所见之世界的图像的感知联系在一起，因此本章讨论的主要是具象艺术，也就是那些再现了我们所见之物的作品，而非抽象图像。毫无疑问，抽象艺术或概念艺术也与这里所讨论的具象作品一样具有同样的再现品质，它也能用多种方式加以读解。但是为了介绍之便，我将讨论仅限定于一种具象再现——人体的再现。的确，人们在某些时期比在其他时期更关心现实的再现或人形的真实再现。比如，17世纪荷兰艺术在透视运用和对细节的密切关注方面极为写实，正如我们在维米尔的画中所见。同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对自然主义的兴趣，在当时的艺术家对人体和风景的处理中也表露无遗，两者都源自生活。

可艺术是种错觉——不论是布上油画、大理石雕还是用彩色粉笔画在纸上的画——都是观众的读解才使它们“呈现出”景象。显然，这种读解行为是由文化决定的——观看者自身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与读解过程密不可分。它对全球语境中艺术作品的呈现和诠释产生了怎样的

影响，我们在本书的开头几章已经看到。这里我想举几个精心挑选的例子来说明读解艺术在各个时期都是必要的，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我们能够读解艺术才赋予艺术以含义，而这已成为艺术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首先谈谈艺术的再现功能，其中我们之所见可与更宏大的叙事相关联。《观景楼的阿波罗》（图7）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首先注意到雕塑再现的是一具健美的男性人体。由于我们懂得雕塑再现的传统手法——尤其是桂冠与阿波罗神相联系，我们便能将这尊雕塑和阿波罗联系起来。于是一件作品的再现含义在某个层面总会保持其普遍性，因为这尊雕塑表现了理想中的男性人体美，而这种美具体来说又可指阿波罗。用雕塑来理解再现问题有几个优点，因为雕塑的物理特性从以下几个显著方面划定了其再现含义的界限。

首先，雕塑的意义仅限于其自身尺寸。我的意思是说，《观景楼的阿波罗》比真人大，但我们不知道艺术家是否有意要再现一位巨人，毕竟他是一位神。这件作品的尺度之所以这么大可能是因为最初的设想就是把它安放在大型壁龛中或者让它高高矗立。第二，这件作品没有再现空间，除了周遭所及，别无任何“背景”。此外，它也缺乏与肌肉和衣褶塑造水平相称的色彩。当然，不是所有雕塑作品都存在这些局限。雕塑是可以再现空间的。比如，亨利·摩尔许多作品上的孔洞，以及莫娜·哈图姆（Mona Hartoum）、朱迪·芝加哥的装置作品就再现了空间。此外，尤其是在20世纪，艺术家使用的材料多种多样，这一方面使再现问题变得简单，因为可以用真实材料——比如织物——进行再现；另一方面也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因为现在可以用多种材料来再现一幅图像和空间视觉观念，正如我们在立体主义拼贴作品中看到的那样。我想说明的是，再现问题是艺术中的普遍问题，而且也并不局限于某个时期，如文艺复兴或17世纪的荷兰绘画，虽然当时的人们对“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过多关注颇给人以误导。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可不仅是识别我们之所见那么简单。

其次，考虑艺术作品如何变成观念或故事的图解这一点也很重

要，因为图解常常以文本为基础。这些文本资料一般都能用多种方式来进行图解，因为比起视觉图像，语言描述通常更加宽泛。图解比文字要具体得多、详细得多。古代文学中对阿波罗或其他神话人物的语言描述早已经过后世各种形式的图解——大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有关收藏不计其数。对于这些文学人物，我们只需知晓构成图像和文本之间的联系的某些特点——比如此例中阿波罗和桂冠的联系，就能够加以辨认。假如观者从未听说过阿波罗，也不知道如何辨认他，那么对这尊雕像的读解就只进行了一半，其更全面的含义还有待发掘。

在语言描述和视觉描述的关系中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同一文本有多种图解形式的事实说明我们无法根据图像全面完整地重建文本。因此，尽管插图就其呈现的图像来说更为具体，但它们却不能脱离文本而独立存在。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知道文本才能读懂图像。其二，图解的多样性还会严重影响到图解本身的含义，因为这含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要受到观看者及其是否了解文本的影响。此外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具体而微的图像实际上也出于艺术家本人的想象。上述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使得艺术作品成为一种文献或档案，和文本、历史及受文化条件限定的观看者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艺术家的意图进行讨论，因为第四章中所讨论的精神分析实例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作品的含义可以超出其作者本来的意图——假如我们果真知道作者的本来意图的话。图像含义的不可预见性是艺术史引人入胜的因素。但假如我们承认艺术是观念得以交流的载体，那么图像的含义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稳定性。确实存在一种通行的艺术语言或一套通行的艺术象征手法，艺术家凭借它们就可以确定艺术品某个层面的含义。这就让我们认识了图像志，一门研究艺术的主题及其深层含义的学问，它是我讨论读解艺术的焦点话题。

生活在电脑时代，我们对图标这个词都很熟悉。可是这个词来历复杂，图像志的话头便可以由它开始。我且把三种截然不同的图标呈现给大家：拜占庭图像《圣母子》（图20）；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为女影星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所作的肖像《玛丽莲·梦露》（1962，图21）；电子游戏《超级玛里奥兄弟》中的玛

里奥（图3）。在拜占庭图像《圣母子》中，文本和图像之间的联系很紧密。要从妇女和婴儿的图像中看出宗教意义来，事先非得对《圣经》有所了解。我们或许能辨认出一些标志性特征，比如圣母的蓝色披风，或者小基督手中持握的卷轴——那象征或预示着他的牺牲。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圣母子呢？也许这图像再现的不过是神话中的一对普通母子。在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中，我们看到梦露这位好莱坞最著名的影星之一的图像反复出现。我们对这一再现如此熟悉，它在其他艺术品中又被如此频繁地引用，以至于它逐渐获得了“图标性”的地位，堪与梦露本人的地位匹敌。至于《超级玛里奥兄弟》中的玛里奥则展现了图标时效性的一面——对于迷恋电脑游戏和虚拟现实的一代人来说，我敢肯定玛里奥的形象比《蒙娜丽莎》更容易辨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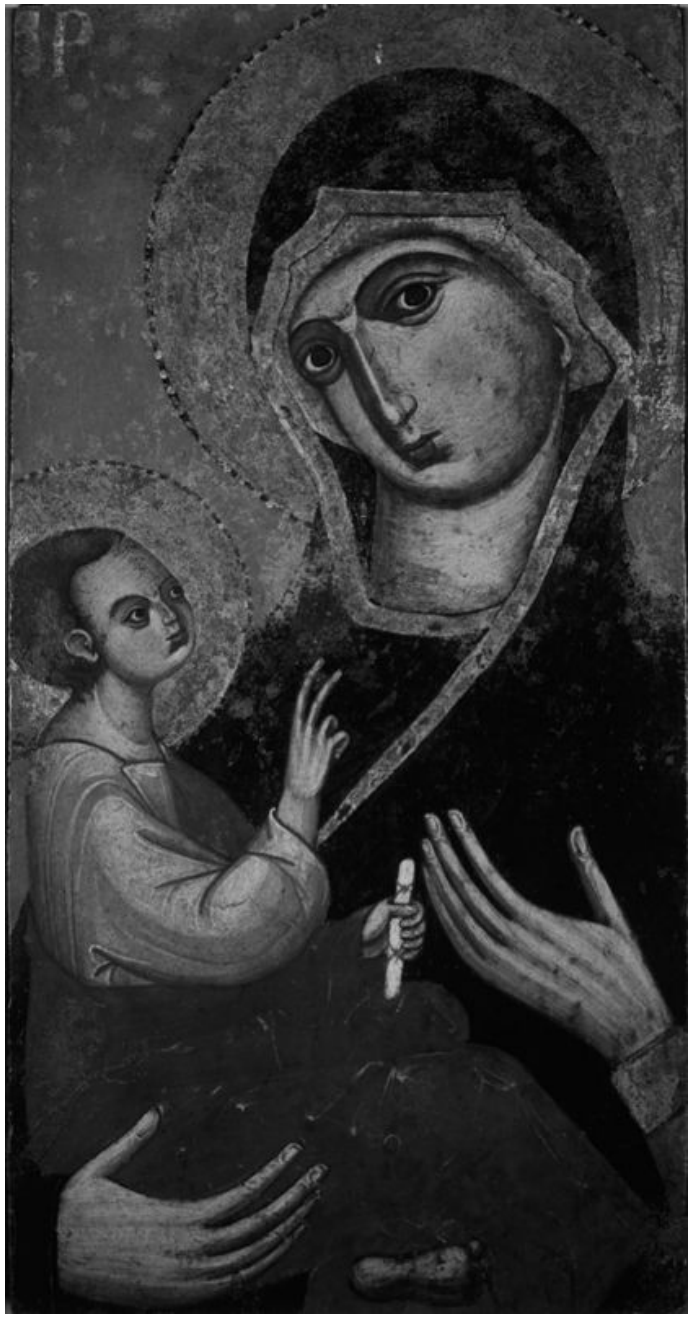

图20　拜占庭图像《圣母子》，威尼斯画派，14世纪。

图21　安迪·沃霍尔1962年对好莱坞影星玛丽莲·梦露的反复再现获得了图标性地位，堪与梦露本人的地位匹敌。

图标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eikon*，*eikon* 意为图像。这个词在西方艺术史中最常见的用法是指称那些为宗教礼拜而创制的单幅圣像。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圣像[1]（有时拼作Ikon）源于早期拜占庭时期的马赛克和壁画传统。终其整个历史，圣像在外观形式上基本保持不变。圣像通常被绘制或雕刻成便携物，常常以一种僵硬的、略带程式化的手法再现基督或圣母子。不论是制作圣像的无名艺术家还是使用圣像来辅助祭礼和祈祷的人，他们只关心对神明的象征性或神秘性特征的描绘。因此这些圣像与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绘画的主要关注点，即对空间和运动的再现大不相同。尽管圣像到5世纪末已被广泛使用，但是偶像争议——基督教会有关图解《圣经》是否适当的争论——导致大量圣像被毁坏。不过拜占庭仍然继续大量生产圣像，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攻陷为止。之后，圣像这一艺术形式东移至俄罗斯，并在那里一直保存到十月革命。而在希腊东正教艺术中，圣像传统至今仍在延续。

但是，从19世纪的德国艺术史学派开始，圣像这个词开始具有“题材”的含义。这批学者最初使用圣像一词暗指“图像”，后来演变为“图像志”——字面意思就是针对图像的写作——进而又发展为研究图像的“图像学”。这两个艺术史研究领域关注视觉分析。随着各种方法的发展，研究重点更加侧重于对题材的理解和诠释，而并非侧重于对形式的研究。

图像志和图像学同为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图像志的研究范围包括对一切人像再现的研究和诠释，不论其为个体的还是象征性的，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图像志的研究范围还包括一切图画再现，而不论其有无象征的、表面的含义。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18世纪，但当时它专门用于线刻版画的研究，线刻是书籍插图最普通的形式。然而不久以后，图像志就被专门用来指对各媒体中的基督图像和符号进行历史研究和分类。到19世纪，一个更加系统的艺术研究建立起来，这些研究涵盖了从史前到现代的艺术。通过对视觉材料更仔细的检查和编排，我们发现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再现图像明显有各自的图像志传统。因此，今天能够找到恰当的术语来指称所讨

论的领域，如埃及神灵图像志、罗马帝王图像志、基督教图像志、佛教或印度教图像志等，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像志是一种重要的学术研究方法，借助它我们得以探索产生特定再现手法的那些思想，特别是当这些手法呈现出符号的价值时尤其如此。因此，辨识主题的重要性是图像志诠释必不可少的内容。

基督教图像志品类繁多、极其丰富，在西方美术馆和博物馆中最为常见。基督教图像志主要关注人类灵魂在通往永恒救赎道路上所遇到的危难。《新约》和《旧约》中的人物被用来向每个人反复灌输基督教的道德目标和基本教义。到中世纪，《圣经》故事和人物的再现已几经转换和改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时的宗教艺术是一种神圣的“写作”，而每个艺术家乃至观众都必须学习它的文字系统——图像志。宗教艺术还受到神圣数学的控制，其中位置、分组、对称和数字都至关紧要，它们是图像志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最早的时代起，基督教图像志就起着某种代码的象征作用。比如鸽子代表圣灵，而在圣母领报的场景中，一瓶百合花象征着圣母的纯洁。圣徒也各有特征以帮助我们识别。如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St Catherine of Alexandria）传统上与一只棘轮一同出现。这只棘轮是她的特征，起到身份标志的作用，同时也象征着与她的牺牲相关的奇事。可是必须说明，传统手法、符号及其含义都随时间的流逝、观念的增加而变化。许多传统手法和符号都消失了，还有一些变得难于理解，后人只能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揭示其含义。图像学以此为基础，研究的是具体艺术作品中符号所蕴藏的含义。举例言之，在基督教艺术中倒上十字架的人物形象指的是圣彼得（St Peter），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与基督拥有同样的死法。因此，这一图像反映了基督教信仰以及圣彼得本人的信仰和谦逊。

所以说，图像志和图像学是得名于“标志”一词，进行视觉分析、读解图画的两种模式。这些象征符号传统上得自容易识别的、大众流行的文化或宗教体验。图像志和图像学领域最杰出的艺术史家有埃米尔·马勒（Émile Mâle）、阿比·瓦尔堡和欧文·帕诺夫斯基等人，他们都在读解艺术的各种方法方面著述颇丰。不过图像志和图像学的读解

方法并不限于读解基督教艺术，也不仅限于读解过去的艺术。

17世纪的荷兰艺术家维米尔采用了许多符号、特征、拟人化元素和寓言以使他的世俗画获得图像志含义。他的《倒牛奶的女仆》（图16）大约绘成于1658至1660年间。这幅画不仅适于说明我们对作品含义的读解，而且还适于说明对作品的物理特性的技术分析如何能够揭示出艺术家在构图过程中曾作出的重大修改。对这幅小油画（其尺寸只有45.5cm×41cm）的技术研究——包括X光照射以及对表面颜料的细致检查显示，维米尔除去了原先画面上的一些细节，以在主要人物和画面背景之间形成更为强烈的对比。比如，修改痕迹表明女仆身后的墙上原先绘有一幅地图或者油画。而现在放脚炉的地方原来画着一只洗衣筐。这些改动有构图上的原因，不过对这幅画的图像志作进一步研究告诉了我们更多信息。

首先，维米尔为什么要把原先的洗衣筐换掉？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洗衣筐显然暗示着厨房女仆的职责，而脚炉却与厨房女仆操持家务的角色没有多大关系，可是维米尔却用脚炉取代了洗衣筐。假如我们想越过这些图像的“表面价值”看得更深一些，那么了解有关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其他知识可能会很有裨益。就维米尔的这幅画来说，我们可以求助于当时的“象征手册”，在17世纪的荷兰这叫做*Embleemboek*。这些图解手册告诉我们各种日用品的含义，这些含义通常源于它们的功能或是与它们的功能有关。在寒冷的冬季，人们把火红的煤块放进脚炉以提供人们急需的热量，所以脚炉象征着温暖、爱和忠诚。若细察这幅画的背景，这一象征含义就变得更为清晰。背景中有些砖块上装饰着小丘比特，它们同样也象征着爱和温暖。虽然不清楚这是否暗示这位女仆正沐浴在爱河中，但通过观察画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像，这幅画在我们眼中已不仅是一幅普通的风俗画了。

图像学不仅是读解远古艺术的手段，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艺术中的象征含义。比如，华盛顿纪念碑是美国的象征。它采用的方尖碑形式暗示着古埃及和罗马的权威，从而成为这个新国家、新政府和新首都的有力象征。艺术家克拉斯·奥登伯格（Claes Oldenburg）通过其雕塑《唇膏》（*Lipstick*）颠覆了纪念碑的形象以抗议越南战

争。在这件作品中，他把方尖碑缩小为残酷荒唐的战争工具。奥登伯格是波普运动的一分子，这个艺术运动主要通过对日常流行图像和符号的使用，带给我们另一种读解艺术的方式。

波普艺术最初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它利用了消费主义和流行文化的图像和技巧。作为对抽象表现主义的对抗，波普艺术主要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在美国，波普艺术一般和二战后的财富、繁荣及消费社会联系在一起。这一运动消除了艺术品位上的“好”、“坏”之别，也取消了高雅艺术和商业艺术之间的技法区别。波普艺术家利用连环漫画、罐头盒和可口可乐瓶等日用品上的常见具象图像来表达形式上的抽象关系。借助这种手段，他们在艺术家和外行之间搭建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艺术家和外行可以对艺术达成妥协。诸如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和安迪·沃霍尔之类的波普艺术家将广告画、商业艺术的技法以及商业故事图像融入作品中，力图将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元素融为一体，消弥两者之间的界限。如果回想一下维米尔把日用品用作“符号”的做法，很显然，我们对图像的“读解”能力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文化和时代。我们对17世纪荷兰中产阶级商人的日用品不如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用品那样熟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维米尔在再现概念方面的感染力就比20世纪的艺术家要差。

虽然沃霍尔和利希滕斯坦两人使用的再现方法差别很大，但两人都以消费社会的批量生产技术为基础。可他俩的初衷本都是要批评消费社会的。安迪·沃霍尔以用丝网印刷名人肖像及日用品出名，而罗伊·利希滕斯坦则以连环漫画的风格来绘画，并使连环漫画的图解技术达到极佳的美学效果。安迪·沃霍尔具有远见卓识，其作品预示了一个由消费文化驱动的世界，那里的人们尊崇品牌和标记甚于尊崇个人。沃霍尔从诸如钞票、罐头盒、软饮料盒以及肥皂盒等寻常物品中选取他要的图像。他通过消除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的差别来试图嘲弄或赞扬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人们对此莫衷一是。他那多图像、大规模生产的丝网画以单调和重复为特征。这类作品，包括玛丽莲·梦露的肖像，许多都来源于报纸刊登的照片。梦露于1962年自杀，时年36

岁，身后成为好莱坞的传奇，举世闻名的性感偶像。沃霍尔的梦露像也创作于这一年。通过自己的技术和再现方法，沃霍尔对女影星的商品化及批量生产的图像的力量作出了自己的评论。

玛丽莲·梦露的逼真再现，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以照片为根据。但是面对艺术家的独特想象，即便机械复制的图像，其真实性和客观性也像对文本材料的任何图解一样虚幻脆弱。而且我们不要忘记，机械复制的图像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举例言之，早期摄影家曼·雷（Man Ray）借其摄影作品《安格尔的小提琴》（*Le Violon d'Ingres*，图22）表明了对图像的“逼真”的看法。照片上是背对我们的女人体。她的姿态和头巾都暗示着安格尔笔下的人体，特别是那些性感的浴女。这幅照片的真实性也与安格尔的写实手法相呼应。可是正当我们准备接受这一真实之际，曼·雷却跟我们开了个玩笑，因为女士的后背同时被再现为一把小提琴的形状。是谁在拉琴？又与谁在拉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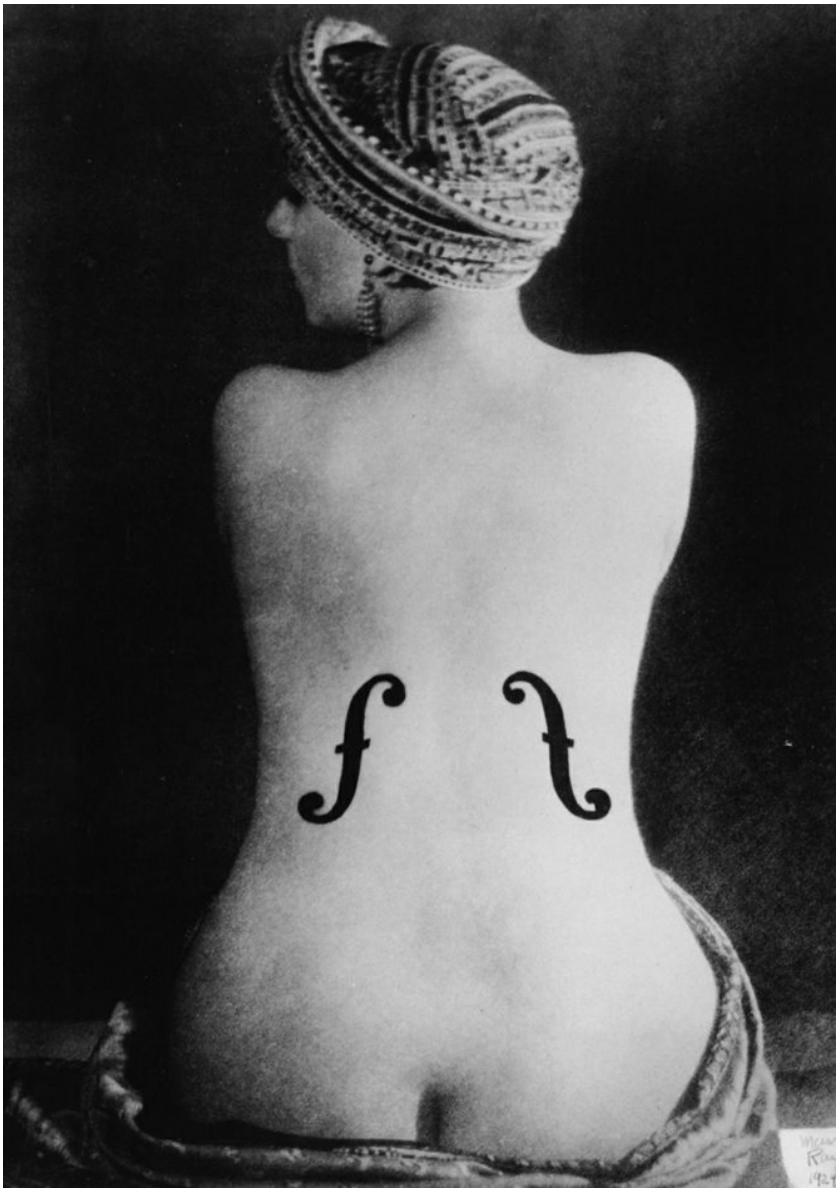

图22　曼·雷的《安格尔的小提琴》（1924），图中人物的姿态和头巾都暗示着他笔下的裸女，但其后背同时被再现为小提琴的形状。

艺术、艺术家和观众三者之间模糊不定的关系在虚拟现实中亦有所反映。虚拟现实是由电脑生发出来的环境，其中人机之间可以相互

交流。《超级玛里奥兄弟》将虚拟现实用于电子游戏中，在这个游戏中电脑程序将各种声音与图像显示器上的动画动作相配合。不论游戏技术多么神奇，它也像其他再现形式一样，都是由一些人创造给另外一些人看的。换句话说，不论我们面对的是拜占庭圣像、17世纪荷兰风俗画、波普艺术、一张照片还是一段电脑动画，正是观众和作品之间的互动赋予了其艺术含义，也决定着视觉对象的读解方式。

注释

〔1〕 Icon一词多义，前文译作“图标”，此处译作“圣像”。

第六章

观看艺术

艺术品的物理属性会严重影响我们对艺术品的理解。我想在这里举例概述艺术生产的几种介质和技法，以说明对这些因素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艺术史。下面所举的每一个例子都对说明物理属性怎样使艺术品获得新的含义起着补充作用。对每种技法的技术层面的讨论都可进一步参阅书后的术语表，这也为参观美术馆和博物馆提供了有益指南。

草图和素描

艺术品的准备过程常和最终的成品一样扑朔迷离。列奥纳多·达·芬奇绘于1500年左右的《圣母子、圣安妮和施洗者约翰》（图15）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幅用木炭和黑、白粉笔在色纸上画成的巨幅素描——或称草图——是一幅油画的原大预备草图。不过，这幅草图却从未被转移到画板上去，而这也是它得以流传至今的原因。为了把构图转移到最终的画面上去，一般会用针在草图上沿着构图扎出小孔，再用烟灰扑撒，烟灰便透过小孔在目标画面上留下轮廓。另一种转移办法是把草图上的轮廓刻透，镂空的轮廓线于是就成为艺术家绘画时的指南。这两种技法都会破坏草图。列奥纳多的这幅草图虽然有些地方故意没有完成，或是只有一些粗糙的轮廓线，但它本身还是有可能作为独立的艺术品保存下来，这可能是因为这幅草图的委托者是法王路易十二（King Louis XII），他委托列奥纳多画一幅油画。列奥纳多约于1508年开始画那幅油画，但至死也没完成，未完成的油画现仍藏于巴黎卢浮宫。不过现存油画的构图与这幅草图不完全一样，或许是列奥纳多在最后一刻改变了方案。

文艺复兴时期，纸张更容易获得，这使得一些准备性草图能够保存下来（之前的艺术家在可重复擦写的基底上绘制草图）。早期的艺术家常以色纸为中间调来绘制草图。色纸的颜色为褐色、灰色、绿色或粉红色，而最常见的是蓝色。这些颜色易于转移到画布上，并为确

定最终画面的色调起着相同的参照作用。用木炭、粉笔在色纸上进行各种调子实验，这对许多艺术家的工作过程都产生了影响。例如，在最终版的油画《圣母子、圣安妮和施洗者约翰》中，列奥纳多用极薄的、半透明的颜料进行绘制，有些区域还透出底层的素描。这反映出他对空间透视的研究达到顶峰，其理论载于其《论绘画》（*Treatise on Painting,* 1490—1495）中。

虽然我们现在承认素描本身就是艺术品，但是直到相当晚近的时代，不管画得多么细致、多么繁复，素描只是被看作艺术创作的准备阶段。马蒂斯和毕加索那富于冲击力的素描是他们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可是更早时期的艺术家的素描却远没有这么知名。素描的易损性决定了只有极少数素描才能进入常设展览（列奥纳多的草图显然是个例外），为确保不受损害，它们的陈列环境要求柔和的灯光和可控的条件。素描之所以不能在艺术史写作和艺术展览中占据主导地位，材料性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也是一个原因。

蛋彩画

蛋彩是最古老的绘画介质之一。古埃及、古希腊以及拜占庭帝国的圣像画家都使用过这种介质。实际上，东正教从未放弃这一传统，至今仍在使用蛋彩作画。蛋彩颜料由干颜料研成细末制成，其标准媒介是纯净的鸡蛋黄，完全不含蛋白，因为蛋白会加速颜料的干燥，使敷设颜料变得拖沓困难。蛋彩颜料可以用水来稀释，配制完成后不能久存，因此艺术家必须根据作画进程适量配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所用干颜料极其贵重时。完全干透后，蛋彩颜料相对来说可以防水。

蛋彩画的底材通常为质地柔软的木板，比如杨木或椴木。因为鸡蛋的黏合力稍显不足，蛋彩颜料需要略具吸收力的基底。普通的白垩底子表面光滑，上面可敷设颜料，但是相对较脆，需要牢固的底材。

干颜料和蛋黄的混合料经水稀释后薄薄地敷设于画面。用蛋彩技

法不可能堆积出肌理效果，那样做只会使颜料开裂剥落。相反，蛋彩画的表面非常平滑，每一笔的色调都基本不作调整。因此，使用蛋彩画来再现《圣母子》（图20）便与拜占庭圣像的终极目的和美学旨趣协调一致了。图像的僵硬感不是艺术才能缺乏或技术限制所致，只是因为拜占庭圣像的绘制者另有优先考虑。蛋彩画一般借用底色来处理造型和色调，比如肌肤部位常以绿色作为底色，而肌肤的色彩常被岁月磨蚀，结果就使蛋彩画中的许多人像脸孔显出非常不自然的绿色调。蛋彩颜料可以与白色颜料相调，绘制时依色调次序笔笔相接，而以不调白色的纯色作为最深的调子来表现阴影，于是就能相对自然地再现衣饰。

蛋彩画也是早期文艺复兴意大利画家爱用的介质。早期文艺复兴艺术家切尼诺·切尼尼（Cennino Cennini）在《艺人手册》（*Craftsman's Handbook*，1437）中对这项技法有着极为细致的描述。该书由克里斯蒂安娜·J. 海林汉姆（Christiana J. Herringham）于1899年译成英文，重又引发了人们对这项技法的兴趣。直到今天，蛋彩技法仍在使用。

油画

在油画技法中，用来调和干颜料的介质是干性油。通常用的是亚麻籽油，当它干燥后，在画面上形成一层密封的防水釉面。早在13世纪，油就被艺术家用来在蛋彩画上绘制细节。从切尼诺·切尼尼讨论油画技法的情况来看，那个时代的意大利艺术家都了解这项技法，但尚未广泛采用。

油画技法的完善一般归功于佛兰德的凡·艾克（Van Eyck）兄弟，他们活跃于15世纪上半叶。这项技法后来经安东奈拉·德·梅西纳（Antonella da Messina）传入意大利，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这些说法不管真实与否，但油画确实是发源于欧洲北部，并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阿尔卑斯山北的艺术家对山南艺术

家的这一重要影响引起我们对一个观点进行反思，即认为意大利人重新发现其古典历史就是文艺复兴的全部内容的观点。看来，沉醉于自然主义和光影效果之中的艺术家，诸如列奥纳多之流，是由于采用了北方的油画技法而非古代技法才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6世纪，作为新的绘画介质，油画实际上已经取代了蛋彩，因为它为艺术实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有些艺术家继续将油和蛋彩混合使用，利用两种技法的不同特点以达到最佳效果。直到20世纪丙烯画出现以前，油在绘画介质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油画的主要基材是木板和帆布，使用前都要打底。接着艺术家便将预备素描——也叫草图——转移到做好的底子上，有时艺术家也用红的或黑的粉笔直接在底子上起稿。初稿勾画出基本的构图，接着给整个画面上一层底色，底色的色调将会影响到整个画面的调子。例如，像浅灰色或浅褐色这样的中间调能够为艺术家提供色调中间值的参照基准，借助这样的底色，艺术家可以方便地画出半调、阴影或背景。维米尔的作品就是这么画的。他使用的底色主要有浅灰和浅褐——这在《倒牛奶的女仆》（图16）中是非常明显的。与维米尔不同，委拉斯开兹更喜欢浅灰和灰白色的底色，这有助于创造出《宫娥》（图6）一画中有趣的光和空间。

底色上完后，接下来就是敷设大的基本色块，后续的细部就是在这些色块上逐步深入完成的。油的使用使得色彩能够柔和地混为一体。颜料要么被调成釉质薄层，像凡·艾克的作品那样，要么也可以自由涂抹，如伦勃朗（Rembrandt）的作品一般。的确，委拉斯开兹即兴式的笔触（“涂绘性”）在17世纪广受钦佩，我们在第一章中也谈到过这一技法怎样令印象派画家着迷。油画完成后，最后要给整个画面上一层光油以保护画面不受灰尘、磨损和水的侵害。

油画草稿，或称一次完成的绘画，有时也叫*esquisse* 或*ébauche* ，本是学院派作画的准备阶段，但却成为印象派画家及其后继者的标准技法。莫奈的《卢昂大教堂》（图1）虽属他的晚期之作，但依然是这种技法的绝妙实例。颜料的涂抹挥洒自如，质感和光线相互映照，这都使得整幅作品更易于为视觉把握，尽管画面上尚有许多具体形象

的空缺有待观众自己去辨认、去填补。这种快捷的技法使艺术家能更有效地捕获光影效应。莫奈意识到这一点，他描绘了大教堂一天之内不同时刻的多幅图像，以展示所画对象是怎样随着光线和大气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些作品看似尚未完成的外观震惊了当时的学院，可是技法和再现模式的这一发展却是西方艺术一个勃兴的时刻。

雕塑：造型、雕刻与浇铸

雕塑是以三维来再现自然或想象形式的艺术。它包括适于从各个角度观看的圆雕以及在平滑表面上刻成的线刻浮雕。自从史前时代起雕塑就是表达思想的一种手段。我们对史前手工制品了解甚少，但我们可以确定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都曾创造出大量雕塑，这些雕塑常常由单块巨石雕成。这些雕塑既用在宗教仪式上，又以其外表的美观受到赞扬。同样，在古代美洲和亚洲，复杂的技法和风格也曾用来制作象征性的雕塑。

欧洲雕塑传统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立像和浮雕，它们很可能受过埃及艺术的影响。而在古典和希腊化时期，对人的形象进行理想化的再现，成为雕塑的主要题材。通过运用自然主义的处理手法，理想人体的概念得到完美实现，并成为后几个世纪欧洲艺术汲取的灵感。通过《观景楼的阿波罗》（图7）我们已了解这一点。这是一件希腊原作的罗马复制品，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品位以及希腊人对后继艺术传统的影响。雕塑艺术涉及多门技术，包括造型、雕刻和浇铸。每项技术都赋予最终完成的作品以显著的特色或审美价值。例如用黏土或蜡这样的材料来造型就非常灵活，因为这些材料可以随意增减。古代的黏土烧制技术产生了一些惊人之作，从简陋的陶器到釉质精美的瓷器，散布在各地和各个历史时期。与此相对，用材各异的雕刻作品，不论其为石材、木头、骨骼还是现代的塑料，都严格受到原材料体量的限制，非得靠艺术家削去不要的部分才能见其端倪。不过雕塑家巧妙地往雕塑主体部分添加相同或不同材料的配件，如今已司

空见惯。罗丹的《上帝之手》（图19）展现出在雕刻作品中形象随着材料的不断削去而逐渐“显露”出来的过程。大理石上的凿痕和鱼尾锤印历历在目，显示出雕刻过程中那只手是如何被修整磨滑，最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

浇铸是用来翻制原作的一种重复生产技术，不论原作是塑造而成、雕凿而成还是建构而成。但是浇铸也可以产生一些其他技术无法达到的效果。头重脚轻的作品如果用黏土或石材制作非得要外部支撑，但用重量较轻的中空铸材来做就可以稳稳立住。

青铜的张力使艺术家在构思青铜作品时多了很多自由。希腊人在青铜雕塑方面成就斐然，这从幸存下来的少数几件作品中就可看出，比如现藏雅典国家博物馆的《阿尔特米西昂的宙斯》（*Zeus of Artemisium*）和现藏德尔斐博物馆的《德尔斐的御者》（*Delphic Charioteer*）。回到《观景楼的阿波罗》这尊雕塑，它展示了用其他材料——在本例中是大理石——来复制青铜原作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材料性质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见于构图，也影响到作品的整体效果：静穆洁白的大理石（大多数古希腊雕塑都是以大理石的面目为世人所知）与希腊原作那闪亮的青铜形成对比。青铜原作可能还穿着真人的衣服，头戴花冠。古希腊人和中国人掌握了青铜铸造的“失蜡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复兴了青铜铸造技术，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为佛罗伦萨圣乔瓦尼洗礼堂铸造的青铜门可以为证。它们被称作《天堂之门》（*Gates of Paradise*）。有关文艺复兴时期青铜铸造的经典描述可见本纽委托·切里尼（Benvenuto Cellini）的《自传》（*Autobiography*，1558—1562）。

技术知识如何体现于艺术史中

上文极其简要地介绍了艺术品生产中的一些技术。我们看到，艺术家并不总是局限于介质。有时，艺术家会不顾材料和技术的限制作

出重大决定。理解艺术家的技法和制作过程十分必要，附于书后的术语表对此有更详细的说明。可是理解介质的性质、所采用的技法及艺术家的美学选择之间的交互作用同样十分必要。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把有关艺术史的各种思考方式、写作方式、呈现方式乃至读解方式和作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不会隔靴搔痒。

附　录

欧美部分艺术博物馆网址：

Metropolitan Museum, New York: www.metmuseum.org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www.moma.org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New York: www.whitney.org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hotography, New York: www.icp.org

Dia Center for the Arts, New York: www.diacenter.org

Brooklyn Art Museum, New York: www.brooklynart.org

Guggenheim Museum, New York, Bilbao, Venice, Berlin, Las Vegas: www.guggenheim.org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www.si.edu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www.nga.gov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Art, Washington DC: www.nmaa.si.edu

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 New Haven, Connecticut: www.yale.edu/ycba

Sterling and Francine Clark Institute, Williamstown, Massachusetts: www.clarkart.edu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Pennsylvania: www.philamuseum.org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www.mfa.org

Andy Warhol Museum,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www.warhol.org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www.artic.edu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Chicago: www.mcachicago.org

Walker Art Center, Minneapolis, Minnesota: www.walkerart.org

Contemporary Arts Center, Cincinnati, Ohio: www.contemporaryartscenter.org

Denver Art Museum: www.denverartmuseum.org

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 www.sfmoma.org

Berkeley Art Museum and Pacific Film Archive, California: www.bampfa.berkeley.edu

J. Paul Getty Museum, Los Angeles, California: www.getty.edu/museum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Los Angeles: www.moca.org

Tate Gallery, London: www.tate.org.uk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www.nationalgallery.org.uk

British Museum, London: www.thebritishmuseum.ac.uk

Louvre, Paris: www.louvre.fr

Musée d'Orsay: www.musee-orsay.fr

Centre Pompidou, Paris: www.cnac-gp.fr/english

Altes and Pergamon Museums, Berlin: www.smpk.de/ant/e/s.html

Stedelijk Museum of Modern Art, Amsterdam: www.stedelijk.nl

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 www.vangoghmuseum.nl

Museo del Prado, Madrid: www.mcu.es/prado/index_eng.html

Uffizi Gallery, Florence: www.uffizi.firenze.it

其他艺术史网站：

由弗吉尼亚大学开发和维护的网站：http://witcombe.bcpw.sbc.edu/ARTHLinks.html

以及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系的艺术史网页：

http://www.art-design.umich.edu/mother

术语表

注：粗体字表示本术语表中有相关词条

alla prima painting ［直接画法］：源于写生的油画，手法直接。指一步完成的油画，或者在颜料尚未变干前完成的油画。原本用于勾画草图，但被印象派画家采纳，用于在室外完成创作。

bronze ［青铜］：青铜是浇铸艺术品的理想材料。它能注满模子的所有间隙，从而完备地复制出哪怕是造型最精细的雕塑的每一个细节。青铜延展性好，易于加工，适用于压花 工艺。

canvas ［帆布］：亚麻编织的绘画基底 ，绷于框上。

carving ［雕刻］：数世纪以来刻工使用过各种锤子、凿子、钻子、量器和锯子。为了将小尺度的习作放大成纪念性的巨作，刻工们创造出各种技巧来尽量保持原作的比例。

chiaroscuro ［明暗法］：一种通过光线的强烈对比来作画的手法，通常是在深暗的背景上画出高光 。这个词也可以指任何绘画上具有这种手法的元素。这一技法最初出现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上。

cire perdue ［失蜡法］：一种青铜 浇铸法。在一个黏土芯外敷设蜡层，再置于模子中。蜡在模子中熔化流失，再让熔铜注入蜡流失后留下的空间，最后除去黏土芯，空心的青铜雕塑即告铸成。

gesso ［石膏底子］：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石膏底子由石膏粉（硫酸钙）混合动物胶制成，作为底子 敷设于木板之上。北欧的石膏底子与此类似，但骨料用的是白垩（碳酸钙）。首先敷设一层叫做“粗石膏底子”的粗糙底子，接着敷设一层叫做“细石膏底子”的平滑涂层，这一层可被打磨光滑。后来有些艺术家只涂一层细石膏底子。

glaze ［釉彩］：薄层透明颜料，敷设于干燥了的底层颜 料 表面。这一技法常见于提香（Titian）和鲁本斯（Rubens）的作品中。

grisaille ［单色画］：单色油画，通常用各种灰调子画成，其效果有如石质浮雕。这个词也指一幅画的底层颜料 ，其上再施以不透明、半透明或透明的自然色颜料。

ground ［底子］：供敷设颜料用的基层表面。通常指不透明的涂层而非基底 。传统的底子是施于帆布表面的一层不透明的油性底子，或是施于木板表面的白垩、石膏与动物胶的混合物。

highlight ［高光］：一幅画中最明亮的调子 。

impasto ［厚涂法］：用硬毛画笔或刮刀进行厚涂以制造画面肌理的技法。这一术语常用来描述印象派画家的技法，但也用于描述伦勃朗的作品。

imprimatura ［灰色底子］：一种油性底子 ，通常具有中性或灰色调子 ，用作油画的底色。

lapis lazuli ［群青］：一种异常昂贵、浓艳的蓝色颜料，系由天青石这种半宝石研磨而成。

medium ［媒介］：调和颜料以便敷设的液态添加剂，如亚麻籽油和蛋黄（参见蛋彩画 ）。不同媒介会影响颜料的干燥时间，也将影响颜料干燥后的表面弹性。

modelling ［造型］：在绘画中指利用不同调子 塑造描绘对象的三维形式——有时这被称作色彩造型，或指通过描绘光影效果创造出体积错觉——有时这被称作光影造型。在雕塑中这个词系指用黏土或蜡等可塑材料造型的技法。这一技法还体现在利用黏土模子浇铸青铜和石膏作品的过程中。模子是在失蜡法 过程中制作的。

palette ［调色板］：艺术家用以摆放、调和颜料的器具，通常是一块单手持握的平板。也指一组供某种油画技法之用的经过选取的颜料。“有限的调色板”系指艺术家仅使用有限的几种颜色或调子 。

paper ［纸］：早期艺术家常利用色纸（最常见的有棕色、灰色、绿色、粉色及蓝色）作为中间调子来作素描。列奥纳多等艺术家曾在蓝色亚麻纸上进行色调研究，这种纸称为“兰斯亚麻纸”。

parchment ［犊皮纸］：指经过褪毛、拉伸、刮削，并经白垩和浮石处理过的犊皮，使用时绷于木质基底 上。

pentimento ［修饰痕迹］：由于表层颜料日趋受损变薄而使底层线

条和颜色逐渐显露出来。它显示出艺术家对构图的调整。

prime ［底色层］：以准备性的颜料敷设于基底表面，是画面上作为基底和密封层的最初一层颜料或底料。“底色层”一词常用于指敷设于帆布或亚麻布之上的颜料及油性底子 。

relief ［浮雕］：在雕塑中指平面背景上的三维形体。高浮雕由平面向外突出很多，而浅浮雕只稍微向外突出。中浮雕则界于两者之间。

repoussé ［压花］：从内侧锤打出浮雕效果的金属工艺。

scumbling ［干拖法］：以硬毛笔通过擦、刮、拖在深色底 层颜料上敷设薄层不透明或半透明颜料，并保持底层颜料透出表面的技法。这一技法为康斯特布尔和特纳（Turner）采用，以在其风景画中创造出云的效果。

size ［底料］：用胶或淀粉做的用以封闭帆布或纸质基底 表面孔隙的胶状或糊状填料。也用作书籍装帧中黏附金箔的底子 。在绘画中用于封闭基底的表面，以防酸的侵蚀，并减低表面的吸收力。

support ［基底］：供敷设底料 和颜料等的材料。基底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活动的。制作固定基底的材料通常是木板，可用各种木料制作，包括杨木、橡木和红木。将多块木板按照纹理相反的原则以榫槽结合后用胶粘在一起，这样制成的木板比单块木板效果更好，因为单块木板更容易翘曲变形。活动基底系用帆布或纸张制成。帆布通常用亚麻制成，绷于木框或木板之上。帆布在绘画作品的保存中是最为脆弱的部分。但是帆布轻巧、易于携带和修复，这些优点使它成为长盛不衰的基底材料。

tempera ［蛋彩画］：将颜料溶入乳浊液，再用水稀释的绘画技法。蛋彩画最常用的传统媒介 是新鲜蛋黄。蛋彩画在古埃及、希腊和拜占庭帝国时期即得到应用。在欧洲中世纪及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用于精细的绘画。这一技法从15世纪开始逐渐被油画技法取代。

terre verte ［绿底色］：颜色非常浅的绿色透明颜料，传统上用作肌肉部分的底层颜料。

tone ［调子］：颜色的明暗程度。

toned ground ［有色底子］：调入白色的有色底子，为画面提供色调统一的不透明底子。

underpainting ［底层颜料］：初始勾画，常常以单色勾出构图，或者平涂出大块色区，以供施加后续的色层。

varnish ［光油］：保护性表面薄涂层，施于绘画表面使其具有亮光或哑光效果。通常敷设于完成的作品表面。有时在光油之上再施加一层釉彩。

vellum ［犊皮纸］：参见犊皮纸（**parchment**）。

verdaccio ［绿色底层颜料］：淡绿色的底层颜料，常用于蛋彩画技法（参见绿底色）。

什么是艺术史？语言文字与视觉艺术之间有什么相互作用？艺术与各种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博物馆和美术馆对于呈现艺术史起了什么作用？如何策展才能一鸣惊人？图像志对艺术史有何影响？

作者以举世闻名的古今艺术作品为例，对艺术史领域的这些复杂问题进行了清晰简明的论述，探讨了和消费主义、品位、宗教和政治等有关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提出了欣赏艺术、思考艺术及理解艺术的多种方式，引领读者进入一个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

百科通识文库

49

文艺复兴简史

杰里·布罗顿 著

赵国新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文艺复兴简史

杰里·布罗顿 著 赵国新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30**

The Renaissanc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6.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6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Jerry Brotton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复兴简史 / （英）布罗顿（Brotton, J.）著；赵国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98-4

Ⅰ．①文… Ⅱ．①布… ②赵… Ⅲ．①世界文学 - 文艺复兴 - 文学史 Ⅳ．①I10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48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徐 宁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98-4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绪论　一幅16世纪名画
第一章　全球性的文艺复兴
第二章　人文主义手迹
第三章　教会与国家
第四章　美丽新世界
第五章　科学与哲学
第六章　重写文艺复兴
年表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杰里·布罗顿，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文艺复兴研究中心高级讲师，主要著作有《领土交易：现代早期世界的地图绘制》、《全球性角度：东西方之间的文艺复兴艺术》（合著）等。

译者简介

赵国新，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文论，主要译著有《现代西方思想史》（合译）、《文化生产》和《自由及其背叛》等。

图目

图1　汉斯·霍尔拜因，《使节》，布面油画
图2　秦梯利·贝利尼和乔凡尼·贝利尼，《圣马可在亚历山大传教》，1504—1507，布面油画
图3　认为是科斯坦佐·达·莫伊西斯的画作，《坐着的抄写员》，约1470—1480，羽毛笔水粉画
图4　认为是比赫扎德的画作，《穿土耳其服装的画家》，15世纪晚期
图5　马丁·贝海姆，地球仪，1492，羊皮纸
图6　无名氏之作，比尼—葡萄牙风格的盐碟，约1490—1530，象牙
图7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伊拉斯谟画像，铜版雕刻，1526
图8　贝诺佐·戈佐利，《三贤颂》，1459，湿壁画
图9　罗歇·凡·德·韦登，《七宗圣礼》，约1440—1450，木板油画
图10　卡拉多索，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奠基纪念章，1506，铅铸
图11　拉斐尔工作室，《康斯坦丁的惠赐》，1523—1524，湿壁画，北墙
图12　克劳迪乌斯·托勒密，出自《地理学指南》的世界地图，乌尔姆，1482
图13　无名氏之作，《马格里布航海图》，约1330，纸墨
图14　皮里·赖斯，世界地图，1513，羊皮纸
图15　迪奥戈·里贝罗，世界地图，1529，羊皮纸
图16　尼古劳斯·哥白尼，日心体系，《天体运行论》，1543
图17　安德烈亚斯·维萨里，《人体结构》初版扉页，木刻，巴塞尔，1543
图18　乔治·阿米鲁提斯，托勒密的世界地图，约1465，羊皮纸
图19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绘图员描绘裸体女子，《测量法教

程》，1525

图20　列奥纳多·达·芬奇，斯福尔扎雕像的铸造坑试画图，约1498

绪论

一幅16世纪名画

说起“文艺复兴”，要想弄清这个词所指之意，毫无疑问，最应当去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凡是参观过伦敦国家美术馆的人大都会看到该馆收藏的一幅最著名的美术作品——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的《使节》，创作时间为1533年。在许多人看来，霍尔拜因的这幅画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永恒形象。可是，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人们从霍尔拜因的作品中认出了“文艺复兴”的形象呢？

《使节》这幅画描绘了两位衣冠楚楚之士，在他们的周围，摆放着16世纪生活中的种种物品。霍尔拜因以其煞费苦心的细腻笔触，准确无误地刻画了这两位文艺复兴人物所在的世界；画中人物带着一种自信的但同时又是探究性的自我意识反过来凝视着观者，可以说，这是此前绘画中从未出现过的一种形象。中世纪的艺术作品之所以让人感到比较疏离，是因为它未能创造出这种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个体性。像这幅作品一样的那些绘画，它们所表现的全部情感背后的动机尽管难以把握，我们还是能够认同这些情感，看出它们是属于“现代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观赏诸如《使节》这类绘画之时，我们看到的正是现代身份和个体性的兴起。

图1　汉斯·霍尔拜因的《使节》，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幅画像，然而直到19世纪它才为人发现。画面上令人费解的端坐者和器物提供了有关这一时期的诸多洞见

本书开篇伊始，即以霍尔拜因的绘画作为文艺复兴的艺术性表现形式，这种做法不无裨益。不过，本来就已云翳不清的一些术语也因此而累积渐增，需要加以解释澄清。“现代世界”是什么？它的含义是否与“文艺复兴”同样莫衷一是？类似地，对于中世纪的艺术，能否如此简单地加以界定（并不予理会）？“文艺复兴人”是怎么一回事？“文艺复兴女性”又是怎么一回事？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更加仔细地审视霍尔拜因的这幅画。

重视学识的文艺复兴

与这两位正襟危坐者的凝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中央的那张台案以及散落在台案上下两层的器物。台案下层的搁板上摆放着两本书（一本是赞美诗集，另一本是商人用的算术书）、一把鲁特琴、一个地球仪、一组风管、一只三角板、一副双脚规。台案上层摆放着一个天球仪和几件极为专门的科学仪器：扇形舵柄、日晷仪和扭矩测量仪（时计和航海仪器）。这些器物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的基本内容：文科七艺。三门基础学科——语法学、逻辑学和修辞学——就是有名的文科三艺（*trivium*）。它们与这两位正襟危坐者的活动有关。他们是使者，受过寻章摘句、引经据典的训练，不过最精通的还是论辩和劝说之术。四艺（*quadrivium*）指的是算术、音乐、几何和天文，这些都明白无误地体现在霍尔拜因对算术书、鲁特琴和科学仪器的精确描绘中。

这几门学科构成了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tatis*）的基础。人文学科是当时绝大多数年轻人学习的课程，它更为人知的名称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代表了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欧洲历史上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与研究古希腊罗马的语言、文化、政治和哲学典籍直接相关。人文学科高度灵活的性质促使人们研究各门新学科，例如古典哲学、文学、历史和道德哲学，这些新学科都是文艺复兴思想不可或缺的。

霍尔拜因要表现的是，他画笔下的这两位正襟危坐者都是“新人”，他们是学术人物，但也是有用世之心的人物，利用自己的学识猎取名望和实现抱负。右边那位名叫让·德·丁特维尔（Jean de Dinteville），他是法国派往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宫廷的使节。左边是他的密友拉沃尔主教乔治·德·塞尔夫（Georges de Selve）。画家特意摆放在台面上的器物表明，他们在政界和宗教界的地位与他们对人文主义思想的理解密切相关。这幅画暗示，这些器物代表的各门学问对于世俗的抱负和成就至关重要。

文艺复兴的阴暗面

然而，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细心观察霍尔拜因画中物品的话，就会发现文艺复兴的另一面。台案下层的那把鲁特琴断了一根弦，这是不和谐的象征。在鲁特琴旁边是一本打开的赞美诗集，看得出来，它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著作。在这幅画的右上角，帷幕略微拉开，露出一个银制的十字架。这几样东西让我们注意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纷争和失谐。就在霍尔拜因创作这幅画的时候，路德的新教思想正在欧洲各地蔓延，公然对抗罗马天主教会根深蒂固的权威。那把断弦的鲁特琴就是宗教冲突的强烈象征；霍尔拜因在画中将路德的赞美诗集与天主教的十字架摆放在一起，描绘出这场宗教冲突的特征。

霍尔拜因画中的路德赞美诗集显然是一本印刷书。在15世纪下半叶，印刷术的发明给信息和知识的创造、传播与理解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与耗时费力并且经常舛误失真的手抄本相比，印刷本图书以从前无法想象的速度、准确性和数量传播开来。不过，印刷品中的新思想、尤其是宗教新思想的传播，也会引发动荡、不确定和焦虑，使得主要艺术家和思想家进一步质疑自己的存在，质疑自己在一个迅速扩展的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辉煌成就与它造成的焦虑之间的这种关系，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典型特征。

在路德赞美诗集旁边还放着一本印刷书，乍一看，还很俗气，不过它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显著方面。这是一本教商人计算赢利和亏损的手册。它与其他更具“文化色彩”的器物同时出现在画中，这是表明，在文艺复兴时期，商业金融与文化艺术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尽管这本书暗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问中的文科四艺，然而，它也指明，人们意识到文艺复兴的文化成就是建立在商业和金融繁荣的基础之上的。随着世界逐渐扩大并且日趋复杂，这就需要运用新的技巧去了解越来越隐蔽的货币和商品流通，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利润、减少损失。结果，人们对数学等学科重新萌生了兴趣，以其为手段来理解在全球各地逐渐扩展的文艺复兴世界的经济情况。

商用算术书后面的那个地球仪印证了商业和金融业的大发展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明显特征：地球仪是这幅画中最重要的实物之一。旅行、探险和发现是文艺复兴时期活力四射、争议迭出的内容，而霍尔拜因的地球仪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因为它非常时新地再现了时人（1533年）眼中的世界。欧洲被称为“欧罗巴”。这件事本身意义重大，因为正是从15和16世纪开始，欧洲才被认为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在此之前，人们很少自称“欧洲人”。霍尔拜因还描绘了航海活动在非洲和亚洲、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自1492年开始的数次航行在“新世界”，以及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在1522年首次环球航行的最新发现。这些发现将欧洲带入一个迅速扩张的世界，改变了欧洲与它所邂逅的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与印刷出版和宗教动乱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样，这一全球性扩张留下了一份具有双重效果的遗产。后果之一是，由于战争和疾疫，许多土著文化和社会遭到毁灭，因为它们毫无准备或兴趣去接受欧洲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这一时期在取得文化、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宗教上的偏狭、政治上的无知、奴隶制度以及财富和地位的惊人不平等，这一切被称为“文艺复兴的阴暗面”。

政治与帝国

这就要说到霍尔拜因绘画所触及的文艺复兴的另一些关键内容，它们既界定了画中正襟危坐者，也界定了画中的种种器物，它们是：权力、政治和帝国。为了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如何在画中显现，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两位画中人物。1533年，丁特维尔和塞尔夫奉法王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I）之命来到英国。英王亨利八世已经与安妮·博林（Anne Boleyn）秘密成婚，他威胁说，如果教皇不允许他与首任妻子离婚，他就要脱离天主教会。丁特维尔与塞尔夫试图阻止亨利与罗马决裂，他们是弗兰西斯派来参予协商的中间人。所

以说，尽管这幅画与文艺复兴的大半历史一样，触及的是男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处于画像核心的却是一场为了一个女子而起的争执；虽说这位女子并未出现在画面上，不过，根据画面上的器物以及周遭的背景，还是可以强烈感受到她的存在。男性一再试图去压制女性的声音，这只会让人越发注意到她们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复杂地位：女性无权享用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诸多好处，但她们对于父权制社会的运转却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她们养育男性后代，以维护男性主导的文化继续存在。

丁特维尔与塞尔夫到伦敦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从中穿针引线，促成亨利、弗兰西斯和奥斯曼帝国苏丹、伟大的苏莱曼（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缔结新的政治联盟；苏莱曼是当时欧洲政治格局中另一股重要势力。在霍尔拜因的绘画中，铺在台案上层的那块毯子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设计并编织的，这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及他们在东方的国土，也是文艺复兴文化、商业和政治版图的一部分。塞尔夫和丁特维尔想拉拢亨利八世与弗兰西斯和苏莱曼结盟，原因在于，他们担心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股帝国势力——查理五世（Charles V）治下的哈布斯堡帝国——不断壮大。比较而言，英法两国都是帝国游戏中的次要角色：画中的地球仪说明了这一点。它显示出欧洲各帝国开始瓜分新发现的世界。霍尔拜因的地球仪复制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大帝国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确定的分界线。

这条分界线是为了解决两国在远东的领地纠纷而划定的。当时，两国都在争夺印度尼西亚群岛中盛产香料的岛屿——摩鹿加群岛，这里距离欧洲路途遥远，但香料生意获利丰厚。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自认为是地球的中心，但是，它渴求东方的财富，从奥斯曼帝国的纺织品和丝绸，到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香料与胡椒，都是它渴求的对象。霍尔拜因绘画中的许多物品都源于东方，从画中人物身上的丝绸和天鹅绒，到装饰房间的纺织品和图案，莫不如此。

在这幅绘画中，台案下层摆放的器物显示了文艺复兴的方方面面：人文主义、宗教、印刷、贸易、探险、政治与帝国，还有经久不衰的东方的财富和知识。台案上层的器物则与比较抽象及哲理性很强

的事物有关。天球仪是用于测量星体和衡量宇宙性质的一种天文仪器。放在天球仪旁边的是一组日晷仪，借助于太阳光线可用它来计时。两个比较大的器物是扇形舵柄和扭矩仪，它们可用于计算航船的时空位置。这些仪器大部分是阿拉伯和犹太天文学家发明的，它们之所以西传是因为欧洲旅行者需要海上远航的专业知识。它们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理解和掌握自然界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就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争论他们所在世界的性质之时，航海者、仪器制造者以及科学家开始把这些哲学论争引入解决自然问题的可行办法之中，其结果便是如霍尔拜因画中的器物。

最后，我们考察一下从画面底部横劈过去的那个倾斜图像。从正面看，不可能弄懂这个变形物的含义。然而，如果站在图画的侧面，观者就会看到，这个图像变形为一个画工完美的头颅骨。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时兴的透视窍门，被称为“歪像描法”，文艺复兴时期的好几位艺术家都用过。艺术史家认为，这是一个虚幻画派[1]（*vanitas*）图像，发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提示：尽管拥有这一切财富、权力和学问，死亡仍会降临到我们每个人头上。但是，头颅骨似乎还体现了霍尔拜因本人不顾主顾的要求而进行的艺术创新。这表明，他挣脱了自己作为一名技法娴熟的画匠的身份，坚持画家作为艺术家应享有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自主性来实验新的技巧和理论，例如光学和几何学，以创作出新颖的绘画形象。

文艺复兴起源的时间和地点

文艺复兴通常与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联系在一起，不过，意大利无可置疑的重要性往往掩盖了北欧、伊比利亚半岛、伊斯兰世界、东南亚和非洲等地新思想的发展。如果以更具全球性的眼光来看待文艺复兴的性质，那么，称其为席卷上述地区的一系列“文艺复兴”将更加贴近实际情况，每一地区的文艺复兴都有其独到和迥异的特点。其他地区的文艺复兴，与比较经典的、传统意义上的、以意大利为中心

的文艺复兴经常有重叠之处，并且相互影响。文艺复兴是一个相当国际性的、变动不居的现象。

今天有一种通行的共识，那就是“文艺复兴”这个术语指的是从1400到1600年间欧洲在文化、政治、艺术和社会等方面发生的深刻而持久的剧变和转型。这个词既可以用于指称一段历史时期，也可以用于描述较为笼统的文化复兴的概念。它源于法文“再生”一词。自从19世纪以来，它一直被用于描述欧洲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这一时期对于希腊罗马文化的智识和艺术重新萌生了欣赏态度，产生了现代个体以及在当代西方世界依然界定着许多人身份的社会和文化制度。

艺术史家经常认为，文艺复兴始于13世纪，以乔托（Giotto）和契马布埃（Cimabue）的艺术作品为开山，终于16世纪，以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和提香（Titian）等威尼斯画家的作品为殿军。英美世界的文学研究者采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他们集中关注的是16和17世纪以本民族语言创作的英国文学的兴起，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成就体现在斯宾塞（Spenser）、莎士比亚（Shakespeare）和弥尔顿（Milton）的诗歌与戏剧当中。历史学家则又是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称约1500至1700年这段时期为“现代早期”，而不称其为“文艺复兴”。在文艺复兴的时期确定和命名方面产生的这些分歧，已经愈演愈烈，以致于“文艺复兴”这个术语自身的有效性遭到怀疑。它现在还有其意义吗？能否把它与此前的中世纪或其后的现代世界截然分开？它是否证实了一种欧洲文化优越论的信念？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理解“文艺复兴”这个术语的形成过程。

16世纪的读者不可能认识“文艺复兴”这个词。意大利语单词*rinascita*（“再生”）在16世纪指古典文化的复苏。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描述历史阶段才专门用到法语中的Renaissance一词。最先使用这个术语的是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此人是民族主义者，笃信法国大革命倡导的平等原则。在1833至1862年间，米什莱发愤著书，写出了他最伟大的著作——多卷本的《法国史》。他是一位进步的共和派，高声谴责贵族和教会。1855年，他的《法国史》第七卷出版，这一卷的标题是《文艺复兴》。在他看来，文艺复

兴意味着：

> ……发现了世界和发现了人。16世纪……从哥伦布到哥白尼（Copernicus），从哥白尼到伽利略（Galileo），从地上的发现到天上的发现。人重新发现了自己。

与哥伦布、哥白尼和伽利略等探险家和思想家的科学发现并行不悖的，是一些富有哲理意味的个体性定义，米什莱在拉伯雷（Rabelais）、蒙田（Montaigne）和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中认出了这些定义。这种新精神与米什莱眼中的中世纪“怪诞和丑恶”的性质形成了对比。对他而言，文艺复兴时代体现了一种进步的、民主的状况，这种状况颂扬他很看重的几种美德：理性、真理、艺术和美。按照米什莱的说法，文艺复兴时代“认识到自己在本质上等同于现代”。

米什莱是第一位将文艺复兴界定为欧洲文化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思想家，这一时期代表了与中世纪的关键性决裂，产生了对人类以及人类在世界中地位的现代认识。他还宣扬说，文艺复兴既指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也代表某种精神或态度。米什莱的文艺复兴并非像我们想当然认为的那样，发生在14和15世纪的意大利。相反，在他笔下，文艺复兴发生在16世纪。作为一个法国民族主义者，米什莱热衷于宣称文艺复兴是一种法国现象。作为共和派，他也厌弃14世纪的意大利对教会和政治暴政的赞赏，认为这是完全背离民主的态度，因而不属于文艺复兴精神。

米什莱笔下的文艺复兴主要受其所在的19世纪环境的塑造。事实上，米什莱的文艺复兴价值观与他所珍视的法国革命的价值观有着惊人的相似：拥护自由、理性和民主等价值观，厌弃政治和宗教暴政，尊奉自由的精神和“人”的尊严。这些价值观在他那个时代未能实现，他在失望之余，就到历史上去寻找这样一个时刻：自由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大获全胜，并且预示了一个摆脱暴政的现代世界。

瑞士人笔下的文艺复兴

米什莱创造了文艺复兴概念，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则将之界定为15世纪的意大利现象。1860年，布克哈特出版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一书。他认为，15世纪晚期意大利政治生活的独特性导致了具有现代面貌的个体性的诞生。古代经典的复活，更广阔的世界的发现，以及对于教会的日益不满，这意味着“人成为一个精神个体 ”。布克哈特有意将这一新进展与个体意识的缺失作为对比，在他看来，个体意识的缺失恰是中世纪的特征。那时，“人认为自己仅仅是某一种族、民族、政党、家庭或团体中的一员”。换句话说，在15世纪之前，人们对于自己的个体身份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在布克哈特看来，15世纪的意大利产生了“文艺复兴人”，也就是他所谓的“现代欧洲的头生子”。结果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熟知的有关文艺复兴的论述：文艺复兴是现代世界的诞生地，以彼特拉克（Petrarch）、阿尔贝蒂（Alberti）和莱奥纳尔多（Leonardo）为开山，以古典文化的复兴为特征，到16世纪中期结束。

布克哈特几乎没有论及文艺复兴的艺术或经济变迁，而且，他高估了当时对待宗教的态度，在他看来，那种态度是怀疑性的、甚至是“异教的”。他关注的中心仅限于意大利，且并没有把文艺复兴与其他文化联系起来加以审视。他对“个体性”和“现代”等术语的理解也极为模糊。与米什莱类似，布克哈特想象中的文艺复兴就像是他个人境况的翻版。布克哈特是一名知识贵族，以新教和共和派的瑞士个体主义为荣。他害怕工业民主的发展，害怕他所认为的它对艺术之美的毁灭。他后来把文艺复兴想象成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艺术与生活是统一的，共和主义受到赞美但也受到限制，宗教受到国家的抑制，这听起来就像是对他所钟爱的巴塞尔理想化的幻想。尽管如此，由于他认为文艺复兴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布克哈特的这本书一直是文艺复兴研究的核心著作；虽说它经常招致批评，但从未遭到彻底忽视。

米什莱和布克哈特赞颂艺术和个体性是文艺复兴的界定性特征，

这种赞颂在英国人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的《文艺复兴》一书中得到了合理的结论，该书首次出版于1873年。佩特是牛津出身的大学教师和唯美主义者，他以自己的文艺复兴研究为载体，表现他“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信条。佩特摈弃了文艺复兴在政治、科学和经济方面的内容，认为这些东西无关宏旨；他在15世纪的画家例如波提切利（Botticelli）、莱奥纳尔多和乔尔乔涅（Giorgione）的艺术中看到了“一种反叛和反抗当时道德和宗教观念的精神”。这是对佩特所谓“感官和想象的快乐”的颂扬，是唯美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甚至是异教性的。他发现，这一“为了智识和想象而热爱智识和想象”的思潮，最早可上溯到12世纪，最晚可追溯到17世纪。许多人对佩特的这本书感到愤慨，在他们看来，这本书是堕落的和敌视宗教的。不过，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佩特的观点塑造了英语世界对文艺复兴的看法。

米什莱、布克哈特与佩特创造了19世纪的文艺复兴概念，这种概念更多地将文艺复兴视为一种精神 而不是一段历史时期。艺术和文化的成就显示出看待个体性的一种新态度，显示出“教养”的意义。这种界定文艺复兴的方法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对于15世纪以来发生的事件并未提供精确的历史论述，而看起来更像是19世纪欧洲社会的一种理想形式。这些批评家颂扬有限的民主、对教会的怀疑态度、艺术和文学的力量以及欧洲战胜其他所有文明。这些价值观加固了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的基础。历史上曾有这样一段时期，欧洲咄咄逼人地坚持自己有权支配美洲、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佩特等人创造出文艺复兴的一种幻象，似乎为欧洲支配世界其他地区既提供了起因，也提供了证明其合理性的理由。

20世纪人眼中的文艺复兴

关于文艺复兴，一个相当矛盾的观点出现在20世纪初。最早向布克哈特提出的挑战出现在1919年，以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中世纪的衰落》的出版为标志。赫伊津哈考察了先前对

文艺复兴的种种界定如何忽视了北欧文化与社会。他质疑布克哈特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时期划分，认为在布克哈特看来属于“文艺复兴”的风格与态度，实际上是中世纪衰退或没落的精神。赫伊津哈援引了15世纪扬·凡·爱克（Jan van Eyck）的佛兰德斯艺术为例证：

> 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理念上，它都是正在衰落的中世纪的产物。如果某些艺术史家从中发现了文艺复兴的成分，那是因为他们非常错误地混淆了现实主义和文艺复兴。这种一丝不苟的现实主义，这种准确地传达出一切自然的细节的强烈愿望，正是行将就木的中世纪精神的典型特征。

在赫伊津哈看来，凡·爱克绘画中复杂细致的视觉现实主义，代表的是中世纪传统的结束，而非强化艺术表现的文艺复兴精神的诞生。虽说赫伊津哈并不反对使用“文艺复兴”这个术语，但是他认为文艺复兴思想大多源于中世纪。赫伊津哈的著作对于19世纪前辈所颂扬的文艺复兴理想持有非常悲观的态度。这本书写于一战期间，因此，毫不奇怪，它鼓动不起热情来支持那种认为文艺复兴是欧洲个体性和“文明”优越性走向成熟的观念。

在20世纪中叶，一群来自中欧的移民学者对文艺复兴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重新评价。他们著书立说之际，正值极权主义崛起，威胁破坏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人文哲学价值观。在20世纪30年代，保罗·奥斯卡·克里施特勒（Paul Oscar Kristeller）、汉斯·巴龙（Hans Baron）和埃尔温·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等德国学者为了逃避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流亡到了美国。后来他们论述文艺复兴的著作受到这些事件的深刻影响，而且，他们的著述还在继续影响当代文艺复兴研究。

汉斯·巴龙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危机》中认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标志性阶段之一出现在佛罗伦萨，是第二次米兰战争（1397—1402）造成的结果。在巴龙看来，米兰公爵詹加莱亚佐·维斯孔第（Gangaleazzo Visconti）在1402年准备攻打佛罗伦萨，这很像“欧洲现代史上统一性的征服战争逼近之际所发生的事件”。巴龙将詹加莱

亚佐比作拿破仑（Napoleon）和希特勒（Hitler），他得出结论说，这种现代类比有助于理解“1402年夏季出现的危机，也有助于把握它对文艺复兴政治史产生的实质和心理意义，尤其是它对佛罗伦萨市民精神的发展所产生的实质和心理意义”。1402年9月，詹加莱亚佐感染瘟疫死去，佛罗伦萨得救了。以巴龙之见，在他所描述的市民共和主义战胜封建独裁过程中出现的大英雄，是学者兼政治家莱奥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按照巴龙的看法，布鲁尼在《佛罗伦萨城市颂》和《佛罗伦萨人民史》中，表达了一种“主张政治参与和积极生活的新哲学，这种哲学是为了反对学者式的退隐理想而提出的”。这体现了巴龙对市民人文主义的界定，即“努力去教育人，使之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一员”；市民人文主义还信奉共和制的种种优越性，巴龙认为，美第奇（Medici）家族统治的佛罗伦萨体现了这些优越性。

其时欧洲正受到政治极权主义崛起的威胁，此刻人文思想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巴龙的论点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它很引人注目，而且，它明确认为，佛罗伦萨和美第奇家族是文艺复兴发源的中心。不过，它也将布鲁尼的人文主义和佛罗伦萨的共和主义给理想化了。保罗·奥斯卡·克里施特勒采取了一种与巴龙不同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正是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的思辨哲学，尤其是他的《柏拉图神学》（作于1469与1473年之间）一文，明确了古典世界与基督教之间新的融合。对克里施特勒来说，菲奇诺的创新之处在于他相信：

> 现在哲学独立存在于宗教之外，而且与其地位平等，不过，它既不能也不会与宗教发生冲突，因为保证二者和睦共处的是它们共同的起源和内容。毫无疑问，这是菲奇诺用以指明未来道路的概念之一。

菲奇诺的柏拉图主义小心翼翼地协调哲学、宗教与国家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当克里施特勒发愤研究菲奇诺之际，这样的关系正充斥着欧洲。

二战结束之后，经过20世纪60年代社会与政治的动荡，尤其是人

文学科的政治化和女性主义的兴起，文艺复兴得到一次深刻的重估。一种影响尤大的反应来自美国。1980年，文学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出版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这本书依据的正是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的看法：文艺复兴是现代人诞生的时刻。格林布拉特借鉴了心理分析、人类学和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论证说，在16世纪，“有关人类身份塑造的自我意识增强了”。男人（有时还有女人）学会根据自己所在的环境去操纵或“塑造”自己的身份。与布克哈特一样，格林布拉特认为这是一个现代特有现象的开端。在格林布拉特看来，16世纪的英国大作家——埃德蒙·斯宾塞、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和威廉·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创造出的虚构人物，例如浮士德和哈姆雷特，开始自觉地去反思和操纵自己的身份。在这方面，他们的音容笑貌与现代人开始相像。格林布拉特用以引入其自我塑造理论的那幅画，正是霍尔拜因的《使节》。

格林布拉特总结说，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类主体本身开始显得相当不自由，这是特定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产物”。作为一个美国人，格林布拉特随后既探究了他对文艺复兴成就的钦佩，也探究了他对文艺复兴阴暗面的焦虑，在他看来，这些阴暗面尤指整个16世纪新世界的殖民化和欧洲的反犹主义。

尽管格林布拉特的书名中有“文艺复兴”的字样，但是，他与其他学者开始使用“现代早期”来界定文艺复兴时期。这个词源于社会史，与米什莱和布克哈特的理想主义论述相比，它对于文艺复兴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关系持有比较怀疑的态度。它也突出了文艺复兴是一个历史时期的观念，而不是像19世纪的著作家所提出的文艺复兴是一种文化“精神”。“现代早期”这个词还暗示，在1400与1600年间发生的事件对于现代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早期”这个概念并非集中关注文艺复兴自身如何回顾古典世界，而是表明这个时期持有一种向前看的态度，这一态度预见了我们所在的现代世界。

现代早期这个概念也促使人们探索此前被认为与文艺复兴无关而不适于探讨的话题和主题。格林布拉特和纳塔莉·泽蒙·戴维斯

（Natalie Zemon Davis）等学者（后者在她的《现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1975］一书中）探索了农民、手艺人、易装癖者以及“桀骜不驯的”女性的社会角色。随着人类学、文学和史学等智识学科相互借鉴对方的理论洞见，以往那些受排斥的群体和被边缘化的客体越来越受到关注。由于批评家试图从文艺复兴当中发现被忽视的或消失的声音，诸如“女巫”、“犹太人”和“黑人”等范畴重新得到悉心的审视。

格林布拉特和泽蒙·戴维斯这类批评家也受到20世纪晚期哲学和理论思想、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这些研究方法怀疑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现代性这段历史变迁的“宏大叙事”。诸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样迥然不同的思想家都认为，在他们看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人文的、文明的价值观，对于纳粹主义的政治实验造成的灾难、对于大屠杀的恐怖景象无动于衷，甚至还有可能是同谋。因此，20世纪晚期，很少有思想家热衷于颂扬文艺复兴时期取得的那些宏伟的文化和哲学成就。相反，许多历史学家开始在一个远为局部的层面上分析事物和对象。

同样地，对于日常生活很有意义、但后来遗失或损毁的日常器物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性。各个研究领域的学者不再关注绘画、雕塑和建筑，他们开始考察家具、食物、服装、陶瓷以及其他世俗性明显的器物所产生的实质意义是如何塑造文艺复兴世界的。这些研究方法看到的不是相似性，而是文艺复兴与现代世界之间的鸿沟。器物与个人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布尔克哈特在赞美“现代”人时所暗示的：它们是变动不居和不可预料的。

在21世纪，文艺复兴的遗产依然像以往那样充满了争议。自从2001年9月美国遭受袭击以来，有关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浮夸之词都在效仿以下臆断：文艺复兴代表了西方人优越的价值观在全球获得的胜利。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文艺复兴的起源所混合的文化成分比这些说法所暗示的要多得多，而且，文艺复兴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欧洲的范围。

注释

〔1〕 虚幻画派是17世纪荷兰的一个静物画绘画流派。——译注，下同

第一章

全球性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的各种经典定义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颂扬欧洲文明的成就，排斥其他文明的伟绩。“文艺复兴”一词发明之时，正值欧洲以前所未有的咄咄逼人态势在世界各地推行帝国支配行径，这并非是一种巧合。近年以来，从史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不同角度对文艺复兴进行的研究让这幅画面变得更加复杂，这些研究提供了其他理解文艺复兴的关键因素，而19世纪的思想家，例如米什莱和布尔克哈特，则认为这些因素无关宏旨，将之弃而不顾。本章将在比较广阔的全球视野下考察文艺复兴，认为贸易、金融、商品、恩主制、帝国冲突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都是文艺复兴的关键因素。集中关注这些议题可以让读者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是哪些东西塑造了文艺复兴。它也会让我们认识到文艺复兴的创造性不仅限于绘画、写作、雕塑和建筑。其他手工艺品，例如陶瓷器、纺织品、金属制品和家具同样塑造了人们的信仰和态度，尽管这些物品当中有很多一直遭受忽视、被损毁、被遗失。

图2　秦梯利·贝利尼和乔凡尼·贝利尼创作的《圣马可在亚历山大传教》（1504—1507）记录了欧洲对于东方文化、建筑和社会的迷恋

另一幅提出了上述许多议题的文艺复兴时期名画是秦梯利·贝利尼和乔凡尼·贝利尼（Gentile and Giovanni Bellini）共同创作的《圣马可在亚里山大传教》；在米兰的布雷拉美术馆所收藏的文艺复兴时期

作品当中，它最为引人注目。这幅画的主人公是亚历山大城基督教会的创始人圣马可（St Mark），公元75年左右，他在亚历山大城殉教，他也是威尼斯的主保圣人。画中的马可站在布道坛上，正在向一群白色披风裹身的东方妇女布道。在马可的背后，站着一群威尼斯贵族，在这位圣徒的前方，则是一排不同寻常的东方人物，他们与为数更多的欧洲人从容自在地在一起交谈。在这些东方人当中，有埃及的马穆鲁克人、北非的“摩尔人”、奥斯曼土耳其人、波斯人、埃塞俄比亚人以及鞑靼人。

动态的戏剧性情景呈现在画作下部，占到了画面的三分之一；画布的其余部分主要被亚历山大引人注目的风光所占据。一座穹顶的拜占廷式大教堂处于背景的支配地位，它是对圣马可的亚历山大教堂的想象性重建。在露天广场上，几个东方人在交谈，有的骑在马上，有的牵着骆驼和一只长颈鹿。面向广场的房子装饰着埃及式的格栅和瓷砖。伊斯兰风格的地毯和块毯垂于窗口。构成城市天际轮廓的光塔、纪念柱和支柱是亚历山大城的标志物与贝利尼兄弟个人创意的混合。这座大教堂折中了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和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筑风格，而远处的高塔和纪念柱对应着亚历山大城中一些最著名的建筑标识，其中有许多已被威尼斯建筑所仿效。

乍一看，这幅画似乎取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非常看重的古典世界，表现了这位基督教殉道者向一群“不信基督教者”传道的虔诚形象。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尽管圣马可的服饰为古罗马人的样子，以便符合他于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的生活实况，然而听众的衣袍却是15世纪末的样式，周围的建筑物也是如此。贝利尼兄弟描绘了不同人群和文化混杂在一起的场景，这个场景既让人想到西方的教堂，也让人想到东方的集市。这幅画综合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当代世界，另一个是古典世界。艺术家在描绘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城的世界以及圣马可生平的同时，还敏锐地描绘了威尼斯与当代的、15世纪晚期的亚历山大城之间的关系。贝利尼兄弟受托描画威尼斯主保圣人的一段生平；他们将圣马可放在当代背景下加以描绘，威尼斯的许多富人和权贵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出这个背景。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

术和文学为人熟知的一个特点：用过去的衣装打扮当代的世界，以此作为理解当下的手段。

西方邂逅东方

今天所谓文艺复兴的欧洲以东的那个世界的神话和现实，令贝利尼兄弟十分着迷。他们的绘画触及东方世界的特定属性，尤其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亚历山大——威尼斯长期的贸易伙伴之一——的风俗、建筑和文化。贝利尼兄弟并没有将埃及的马穆鲁克人、奥斯曼土耳其人或者波斯人视作野蛮人。相反，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文化所具有的许多东西，正是欧洲城邦国家所渴求的。这其中包括了贵重的商品、科技和艺术方面的知识，还有来自东方的经商之道。圣马可在亚历山大这幅画表明，欧洲文艺复兴并非是通过把东方当作对立面、而是通过广泛而复杂的思想与物质交流来界定自身的。

与贝利尼兄弟同时代的威尼斯人坦言他们对于这种交流的依赖。威尼斯正好处在商业中转站的位置上，它可以从东方市场输入商品，再向北欧市场输出。就在贝利尼兄弟创作这幅画作的同时，卡农·彼得罗·卡索拉（Canon Pietro Casola）以惊叹的口气记述了东方货物输入对威尼斯自身的影响：

> 事实上，就好像全世界都聚集到了这里似的，好像人类在这里积聚了全部的经商力量……备满货物的店铺就像仓库，一家家数都数不过来，里面卖的织物琳琅满目——各种款式的挂毯、锦缎和幔帐，各式地毯，各种颜色和质地的华丽毛织被单，各种各样的丝绸；还有许许多多充斥着香料、食品杂货和药材的货栈，以及那么多美丽的石蜡！这些东西让观看者目瞪口呆。

在整个地中海地区，东西方之间这类商品的贸易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在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后贸易量开始增加。从14世纪开始，威尼斯与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对手争夺这一段始自红海和印度洋、终于亚历山大的商路的控制权。威尼斯和热那亚在亚历山大、大马士革、阿

勒颇甚至更远的地方建立了贸易中心和领事馆。欧洲主要出口大宗货物，例如纺织品、木材、玻璃制品、肥皂、纸张、铜、盐、金和银，与此同时，它往往进口奢侈品和高价值商品。这些货物种类繁多，从香料（黑胡椒、肉豆蔻、丁香和肉桂）、棉花、丝绸、缎子、天鹅绒和地毯，到鸦片、郁金香、檀香木、瓷器、马匹、大黄和宝石，以及用于纺织品制造和绘画的鲜艳染料，不一而足。

从威尼斯到伦敦，它们对于各个社会的文化与消费产生了渐进性的、但却是深远的影响。从饮食到绘画，每个生活领域都为影响所及。正如国内经济因外国货的输入而发生变化，艺术与文化也是如此。像贝利尼兄弟这样的画家，他们调色盘的内容，也因增添了青金石、朱砂和辰砂等颜料而变得大大丰富。这些颜料都是由威尼斯从东方进口的，它们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提供了特有的鲜亮蓝染料和红染料。贝利尼兄弟在描绘圣马可的时候，以细腻的笔触再现了丝绸、天鹅绒、麦斯林纱、棉布、贴砖、地毯甚至牲畜，这反映出他们已经意识到，与东方的这些交流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眼界、嗅觉和味觉，以及艺术家再现它们的能力。

开罗、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东方集市在塑造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建筑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威尼斯的艺术史家朱塞佩·菲奥科（Giuseppe Fiocco）形容威尼斯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市场（*suq*）”，[1]而更为晚近的建筑史家已经注意到，这座城市的许多特点是以直接仿效东方图案和装饰为基础的。里亚尔托市场建筑物一字排开，与主干道平行，这与叙利亚的贸易之都——阿勒颇的城市布局惊人地相似。总督官邸和公爵宫的窗户、拱门和建筑物的装饰性门面都是从开罗、阿卡和大不里士等城市的清真寺、集市和宫殿那里汲取的灵感；威尼斯商人与上述城市从事贸易达数百年之久。威尼斯是一座典型的文艺复兴城市，不仅因为它是商业与审美奢华的结合，也因为它仰慕和仿效东方文化。

贷与借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特点是，财富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以及出现了与此相关的奢侈品消费。经济史家和政治史家一直在激烈地争论14世纪以来需求与消费发生变化的原因。认为文艺复兴精神在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看法与另一种普遍的看法凿枘不入，令人不可理解。后者认为，14和15世纪经历了一段严重的经济萧条时期，物价下跌，工资骤降。1348年爆发的黑死病造成的巨大影响更加重了这些问题。不过，四处蔓延的疾病与死亡，与战争一样，产生的后果之一经常是激烈的社会变迁和动荡。瘟疫过后，欧洲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除去疾病，战争也蹂躏了这一地区。西班牙和北非的穆斯林—基督教冲突（1291—1341）、热那亚—威尼斯战争（1291—1299，1350—1355，1378—1381），以及欧洲北部的百年战争（1336—1453）中断了贸易与农业的发展，产生了通货膨胀和紧缩的周期性模式。死亡、疾病和战乱产生的一个后果是，都市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财富集中到数量虽少但却富裕的精英人物手中。

正如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出现的情况一样，有些人经历了萧条和没落，有些人则看到了机会和运气。诸如威尼斯这样的邦国，利用了奢侈品需求不断增长的机会，发展出运输数量更多的商品的新办法。它们的老式桨帆船，那种细长的划船，逐渐被重型、圆底、带桅杆的船只，也就是方帆帆船所取代，在北欧港口之间用来运输大宗货物，例如木材、谷物、盐、鱼和铁。这些方帆帆船能够运载300多“桶”商品（1“桶”相当于900公升），装载量是老式桨帆船的3倍多。到了15世纪末，三桅的轻快帆船问世。这种船以阿拉伯人的设计为基础，能够装载最多400桶商品，速度也比方帆帆船快得多。

随着商品流通的数量和速度不断增长，商务处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国际间基本生活用品和奢侈品进出口的平衡，信贷、利润和利率的计算，这些错综复杂的事物在今天的人们听来如此熟悉，由此不难明白文艺复兴时期为什么经常被称作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地。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商人不但经营东方的舶来品，他们还因来往北非、中东和波斯各地的集市和贸易中心而吸收了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的生意经。

在13世纪，比萨商人莱奥纳尔多·皮萨（Leonardo Pisan），即斐波纳契（Fibonacci），在经商过程中接触到阿拉伯人计算盈亏的方法，他将印度—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商界。斐波纳契解释了从0到9这几个印度—阿拉伯数字的性质、十进位制的使用，以及如何运用它们去解决商业中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加减乘除，计算重量和尺寸，还有易货贸易、利息收取以及汇率换算。虽说这些在今天看来一目了然，可是，不要忘了，在15世纪之前，加减乘除（+、-、×、÷）这些符号在欧洲可是闻所未闻。

斐波纳契所借鉴的阿拉伯商业惯例，采用了阿拉伯人此前在数学和几何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例如，代数学基本原理源于阿拉伯语*al-jabru* 一词，意即“复原”。公元825年左右，波斯天文学家阿布·加法尔·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拉子密（Abu Ja'far Mohammed ibn Mûsa al-Khowarizmî）写了一本书，内容包括十进位制的算术法则，书名为《复原和化简的规则》（*Kitāb al jābr w'al-muqābala* ）。他的拉丁化名称为进一步研究现代数学的一块基石——算法——提供了基础。

斐波纳契的新方法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这些商贸中心得到采纳。那里的商人意识到，为了记录日益复杂和日趋国际化的商业交易事项，采用新的方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货款通常是用银条或金条来支付的，可是，随着销售额的增长，以及任何一项交易所涉及人员都超过两方，这就需要新的贸易方式。其中最有意义的一项创新是汇票——最早的纸币样本——的问世。汇票是现代支票的前身，它源于中世纪的阿拉伯文*sakk* 。签署支票意味着支取你的银行信用。当支票持有人用它来付款，你所在的银行就要承兑这张支票。与之相似，14世纪的商人会使用一个有势力的商业家族签发的纸制汇票来支付寄售商品的款项，在其后的某个特定时日或者货到之日，当那个商业家族收到汇票之时，自会承兑这张汇票。为这种纸面交易担保的商业家族不久就身兼银行家和商人两职。在这些交易之中，由商人转变而来的银行家根据支付汇票所需时间的长短来收取利息，并通过操纵国际间的汇差来赚钱。

中世纪的教会依旧禁止放高利贷，而通过放贷来收取利息，就被

认为是放高利贷。无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其教义都明确禁止高利贷，然而，在实践当中，这两种文化都找到了漏洞，将其金融利益最大化。商人银行家名义上用一种货币放款，再用另一种货币收款，借此掩饰收取利息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还要确立一种于己有利的汇率，允许商人银行家按照借款额的一定百分比来获利。因此银行家吸收其他商人的货币“存款”，作为交换，为他人建立起足够的“信用”，将他们的汇票当作货币本身来承兑。还有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雇请犹太商人来处理信贷交易，作为两种宗教的商业中间人；原因很简单，犹太人不受任何反高利贷的宗教禁令的限制。从这一历史偶然中衍生出反犹性质的犹太人原型，以及所谓犹太人喜好经营国际财务的臆断，这都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虚伪行径的直接产物。

商人银行家的财富不断增加，地位不断提高，这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特有的政治势力和艺术创新奠定了基础。在整个15世纪主宰佛罗伦萨政治和文化的美第奇家族就是依靠经营商业银行发家的。1397年，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Medici）在佛罗伦萨创办了美第奇银行，很快，这家银行就完善了复式记账法、存款和转账业务、海事保险以及汇票发行。美第奇银行在整个欧洲负责转移教皇的基金，从而成为“上帝的银行”。到了1429年，人文主义学者和佛罗伦萨掌玺官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认为，“金钱与维护国家的力量具有同样的必要性”，它“对共同的福祉和市民生活都很有利”。在考察贸易和商业对城市产生的影响的时候，他可以名正言顺地赞颂道，用美第奇家族赚的钱，“我们这个时代兴建了许多壮观的屋宇，辉宏的别墅，教堂、柱廊和医院”。

东方邂逅西方

在整个14和15世纪，国际贸易和新的财务惯例造就了商品的生产和消费。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和平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南北欧之间的贸易得到了加强。在欧洲的另一端，1453年发生了一个同样

重大的事件。就在这一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最终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军队之手标志着国际政治力量发生决定性转移。它印证了奥斯曼帝国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是随后文艺复兴艺术和文化的一个塑造者。

1453年春，超过10万大军围困君士坦丁堡。是年5月，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攻陷了这座城市。作为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古典罗马世界与15世纪意大利之间的最后一丝联系。它成为诸多有关古典文化的学问的复兴渠道，这最初得力于苏丹穆罕默德的鼓励襄助。此人熟知意大利君主的政治抱负和文化品味，这促使他雇请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这些人“每天向苏丹诵读古代史学家（例如拉尔修［Laertius］、希罗多德［Herodotus］、李维［Livy］和昆图斯·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等人）的作品，以及历任教皇和伦巴底诸王的编年史”。如果说文艺复兴与古典理想的重生相关，那么穆罕默德即是它的拥护者之一。他的图书馆超过了意大利美第奇和斯福尔扎（Sforza）家族的图书馆，如今大部分馆藏保存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珀宫，藏品当中包括托勒密（Ptolemy）《地理学》、荷马（Homer）《伊利亚特》的手抄本，以及其他古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的典籍。他公然将自己的帝业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帝业相提并论，自认为是凯撒第二，能够征服罗马，统一本书所提到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犹太教。

与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其他热衷于帝国权力的领袖一样，穆罕默德利用学术、艺术和建筑来伸张自己绝对的政治权威。他着手于一项雄心勃勃的建筑方案。这项方案的内容包括：令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向这座城市再移民；建立大型集贸市场，确立这座城市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将它重新命名为伊斯坦布尔。他改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把它变成了该城第一座皇室清真寺。与此同时，他雇请意大利建筑师协助兴建新皇宫托普卡珀宫。它体现了一种新的国际性建筑格调，借鉴了古典的、伊斯兰教的和同时代意大利的风格。这样的大兴土木其目的在于兴建“一座让先前所有宫殿都黯然失色，在外

观、规模、耗资和优雅方面都更加令人赞叹的宫殿”，奥斯曼帝国的一位评论者如是说。这种国际性的文艺复兴风格既能得到穆斯林的认可，也能得到基督徒的认可，正如威尼斯大使所证实的那样；他称赞托普卡珀宫是“世界上最漂亮、最舒适和最为神奇的宫殿”。与文艺复兴时期许许多多的建筑物与艺术品一样，托普卡珀宫既是独到的创造性行为，又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色彩。这两种冲动密不可分，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显著特色。

东西方的城邦与帝国之间的这种国际竞争激励了整整新一代文艺复兴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很多人主动为穆罕默德效力，他们当中的威尼斯画家秦梯利·贝利尼为穆罕默德绘制了一幅画像，这幅画现在还悬挂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贝利尼带着穆罕默德赠送的礼物和“一副按照土耳其样式精心打造、重量相当于250金克朗的链条”回到了威尼斯。在《圣马可在亚历山大传教》这幅画中，在圣马可布道坛的脚下，是秦梯利的一幅自画像，他的脖子上还挂着穆罕默德赠送的链子。贝利尼骄傲地显示穆罕默德的恩顾，并且运用他在伊斯坦布尔的经历为笔下的亚历山大添加了异国的细节。

这些交流很快就影响到了今天所谓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风格。当意大利艺术家科斯坦佐·达·莫伊西斯（Constanzo da Moysis）也前往伊斯坦布尔为穆罕默德效力时，他的油画和素描借鉴了波斯和奥斯曼艺术的传统手法。被认为是科斯坦佐所作的名为《坐着的抄写员》的羽毛笔和水粉素描是一幅以奥斯曼抄写员为主人公的娴熟习作，右上角有波斯文的题词。画家运用了鲜亮的、平涂的色彩，一丝不苟于服装、姿势和图案的细节，这些都表明科斯坦佐吸收了中国、波斯和奥斯曼帝国艺术风格的种种原则。影响的双向交流可见于一幅出色的模仿科斯坦佐素描的作品：《穿土耳其服装的画家》。据认为，这幅画出自15世纪波斯艺术家比赫扎德（Bihzad）之手，它比科斯坦佐的作品晚几年完成。比赫扎德师法了科斯坦佐，同时巧妙地将抄写员变成画家。画中画家所创作的那种伊斯兰风格的画像，正是科斯坦佐早先模仿的。两位艺术家都借鉴了对方的美学创新，结果，很难肯定地说哪一幅画是“西方的”或“东方的”。

图4　波斯艺术大师比赫扎德的《穿土耳其服装的画家》

图3　科斯坦佐·达·莫伊西斯精美的画作《坐着的抄写员》

1520年，奥斯曼苏丹伟大的苏莱曼即位，这更加强了艺术与外交的交流。苏莱曼委托佛兰德斯的织工编织豪华的挂毯，委托威尼斯的金匠制作珠宝和皇冠。1532年，他率军围攻维也纳时就戴着这顶皇冠。他委托奥斯曼帝国伟大的建筑家米马尔·科贾·锡南（Mimar Koca Sinan）兴建了一座又一座宫殿、清真寺和桥梁，要与意大利的君主

互争高低。锡南借鉴了土耳其—伊斯兰建筑传统以及圣索菲亚大教堂提供的拜占廷建筑遗产，在16世纪早期的伊斯坦布尔建造了一座又一座以穹顶为中心的清真寺。当教皇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雇请多纳托·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后来又请米开朗琪罗重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之时，他们的设计方案借鉴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半圆顶和光塔，还借鉴了锡南设计的清真寺和宫殿。奥斯曼帝国与意大利的建筑师借鉴了一个共享的智识和美学传统，争相重建他们的帝国城市。

这类交流和竞争表明，在文艺复兴时期，东西方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地理或政治分界。掩盖这两种文化之间在贸易和思想上自由交流的，是很久以后在19世纪出现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伊斯兰东方与基督教西方在文化和政治上截然不同。双方固然经常发生宗教和军事冲突，不过，重要的是，尽管存在这些冲突，它们之间的物质和商业交流持续进行，并且为双方取得文化成就都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它们从一个充满竞争的古典过去共同继承下来的文化遗产，促成了新成就的产生，这些新成就就是我们今天所认可的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成就。

风向的变化

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并没有切断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接触，它只是对这类交流活动征收税金。奥斯曼当局在通往波斯、中亚和中国的陆地商路上征收关税，可是，这种做法恰恰造就了新的经商之道。百年战争的结束极大地刺激了南北欧之间的商业流通，进一步强化了欧洲对东方舶来品的需求。这种形势促进了商业交易规模的扩大，促使欧洲基督教国家想方设法躲避沉重的关税。大部分东方商品都是用欧洲的金银来购买的。由于中欧的矿藏开始枯竭，而关税飚升，因此需要开拓新的收入来源：这直接导致了探险和地理发现活动的增多。

几个世纪以来，黄金通过北非和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路流入欧洲。苏丹金矿开采的黄金就是沿着这些路线被运到突尼斯、开罗和亚历山大。在这些地方，意大利商人用欧洲的货物交换黄金。15世纪初，葡萄牙王室和商人开始意识到，沿着非洲海岸航行可以深入黄金和香料市场原产地，这样就不必经过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陆地商路，以免支付税金。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需要组织和资本。到了15世纪中叶，德意志、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开始资助葡萄牙人沿西非海岸的航行，并向葡萄牙国王按一定百分比交付任何收益的一部分。

不过，从这些非洲商路回流到欧洲的不仅仅是黄金。威尼斯商人阿尔维塞·卡达莫斯托（Alvise Cadamosto）在塞内加尔南部途经一个名为“布多梅尔”的酋长国时用7匹马换了100名奴隶，这7匹马“最初只花了我300金达克特”。在这位威尼斯人看来，这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交易，基于当时普遍接受的交换比例，即9到14名奴隶换1匹马（据估计，在这一时期，威尼斯有3,000多名奴隶）。卡达莫斯托的记述写于1446年，据他估计，每年从阿尔金地区运走的奴隶有1,000名。他们给带到里斯本，再贩卖到欧洲各地。这种奴隶贸易体现了欧洲文艺复兴最黑暗的一面，它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奴隶贸易的开端。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奴隶贸易给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带来了悲惨和苦难的境遇。为文艺复兴伟大的文化成就提供资金支持的经济正是从这种无耻的人口贩卖中获利，指出这一点，可以让人头脑清醒一些。

回流到欧洲大陆的非洲黄金、胡椒粉、布匹和奴隶，连同那些购自东方的商品，也为从全球角度理解早期现代世界播下了种子。1492年，就在哥伦布首次驶向新世界的前夕，德意志布商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发明了一样东西；它融汇了全球各地的经济情况和艺术创新，而这种融合正日益成为这个时代的特色。它是目前所知世界上第一个地球仪。贝海姆的地球仪上标有1,100多个地名和48位君主及统治者的小画像，还有关于商品、商业活动以及商路的传说记载。这个地球仪是文艺复兴世界的商业地图，它的发明者既是商人又是地理学家。贝海姆记录了他本人1482到1484年在西非的经商经

历。这些经历多少表明了他数次航行的动机。他航行时“携带各种货物和商品，准备出售和从事易货贸易”，其中包括“准备赠给摩尔人国王的马匹”，以及“预备拿给摩尔人看的各种香料样本，以让他们明白我们想从他们国家得到什么”。香料、黄金和奴隶，这些商品托承起文艺复兴世界产生的第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形象。

图5　第一个现代地球仪于1492年在纽伦堡由从西非返回的德意志商人马丁·贝海姆制成

这类文化和商业的影响不是完全单向的。一位葡萄牙编年史家指出，“在塞拉利昂，那里的人非常聪明，能够制作极为美观的物品，

例如勺子、盐碟和匕首柄”。这里直接提到了“非洲—葡萄牙象牙制品”。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等地的非洲艺术家所雕刻的这些精美艺术品融合了非洲的风格与欧洲的主题，创造出对两种文化而言都别具一格的杂交性物品。盐碟和狩猎用的象牙号角在这类雕刻中尤为常见，并为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和美第奇家族这类人物所收藏。其中有一个盐碟尤为引人注目，其制作时间为16世纪初，盐碟上雕有四个葡萄牙人，他们头上顶着一个篮子，篮子上安放着一艘葡萄牙航船。一名水手从桅杆瞭望台向外偷看，平添了一丝幽默感。服饰、武器和缆绳方面的种种细节显然是源于制作者对葡萄牙海员的细致观察，以及同他们的交往。学者们认为，这些雕刻作品是为了向欧洲出口而设计的。当16世纪的葡萄牙开始兴建纪念碑、颂扬它在非洲和远东的商业力量的时候，这些刀法精致的美须髯、垂辫发和扭曲变形的人物面貌，深刻影响了其建筑风貌。

图6　16世纪初制成的一个比尼—葡萄牙风格的盐碟，由葡萄牙旅行者设计、非洲手艺人雕刻：其结果是一件全新的文艺复兴艺术品

注释

〔1〕 *suq* 源于阿拉伯语，指北非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露天市场。

第二章

人文主义手迹

1466年11月，特拉布宗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15世纪最负盛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之一——被教皇保罗二世（Paul II）降旨关入罗马监狱，备受苦楚。自从50年前他作为一名讲希腊语的学者来到威尼斯，在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家的启发之下，他已成为当时新的智识和教育技艺的一名卓越的实践者。他利用自己娴熟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出版修辞学和逻辑学教科书、翻译和注解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柏拉图（Plato）的著作而迅速跻身显赫地位。

在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的赏识之下，1450年，乔治担任教皇的秘书，并在罗马学园主讲新开设的人文主义课程，也就是所谓的“人文学科”。但是，年轻一代的人文主义学者起而批评乔治的译著。1465年，乔治前往征服者穆罕默德的新都城伊斯坦布尔，即从前的君士坦丁堡。了解到穆罕默德的学术兴趣，他为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写了一篇前言。在前言中他写道：“在当前的生活中，最美好莫过于侍奉一位贤明的、从哲理角度思考天下大事的君主。有鉴于此”，他将此书题献给苏丹。乔治还把自己比较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思想的论著题献给苏丹。回到罗马后，他一封接一封地给穆罕默德写信，声称“上帝赐予（穆罕默德）一统世界的机运如此宏大，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他辞气浮露的书信和献词之中可以看出，他显然将穆罕默德视为能够欣赏他学术才艺的恩主。当教皇得知乔治对苏丹的恭维颂扬，甚为不悦，把他关了起来。乔治入狱时间不长。他后来在布达佩斯呆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罗马。其时他的修辞学和论辩法著作再现勃勃生机，原因是，这些书籍通过一种新的发明——印刷出版术——得到广为发行。

本章考察最为复杂和最有争议性的哲学术语之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兴起，以及它与前现代世界最重要的一项技术发展——印刷出版术的发明——之间的密切关系。将这两项发展统一起来的正是书籍。15世纪初，有识字能力和有财力购书的都是各国极少数的精英人士，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君士坦丁堡、巴格达、罗马和威尼斯等中心城市。到了16世纪末，人文主义与印刷出版术已造就了一场精

英人士和普通民众两者都包括在内的对于阅读、写作以及知识地位的理解的革命；这一革命是通过书籍的印刷出版来实现的，而书籍的印刷出版越来越集中于北欧。

特拉布宗的乔治本人的生涯经历了智识思想与书籍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时期。就在这一时期，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借鉴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家，发展出一种新的学术方法，即所谓“人文学科”。这些学者将自身塑造为“人文主义者”，下大工夫理解、翻译、出版和讲授古代典籍，以此为手段理解和改造当下时代。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逐渐取代了它从中衍生的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它系统地提倡古典作品研究，认为这是培养成功的、有教养的、文明的个体人士所不可或缺的，而这些个体人士则凭借这些技能在日常的政界、商界和宗教界出人头地。

人文主义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声称能够为追随者提供两样东西。首先，它培养了一种信念：熟读经典可以让人更加出色，更有“人性”，让人得以反思个体所面临的有关个体所在社会的道德和伦理问题。其次，它让学生和雇主相信，学习古代典籍可提供将来在各级文官政府担任大使、律师、教士或文书等职的必要的实用技能；这样的文官政府是于15世纪开始出现在整个欧洲的。在翻译、书信写作和公共演说方面的人文主义训练，对于那些想跻身于社会精英阶层的人士而言，是一种奇货可居的教育。

这种情况听起来似乎与那种对人文主义者浪漫的、理想化的描述相去甚远；根据那种描述，人文主义者抢救出古典文化的巨著，从中汲取智慧，用以创建一个文明社会。可事实确实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其实用目的，它为职务晋升提供了框架，尤其为政府部门准备了人才。现代人文学科教育就是根据相同模式建立起来的（“人文学科”这个术语本身即来自拉丁文*studia humanitatis*）。它承诺提供同样的好处，也可说保留了同样的缺陷。它借重于这样一种假定：非职业性的文科知识学习能够增强教养，而且可以提供在工作中出类拔萃所需要的语言和修辞技能。然而，这个假定却暗含了持久不变的张力，这种张力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在这些冲突当中，有许多可见于特拉布宗的乔治的经历中。他的

经历显示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发展是一桩费人心血的实务，它需要悉心搜寻、翻译、编辑、出版和教授古代典籍。乔治将写作、翻译和教学结合在一起，这表明，人文主义主要是在课堂上取得了成功，它为学生就业提供了实用性准备。新的课程和传授要求于人文主义教育的高难技能的新方法被引入。人文主义依赖于讲授和传播其思想理念的学术群体的产生，然而，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员也经常就人文主义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发生争执，由此产生了种种恶性的争论和激烈的明争暗斗，这些乔治都经历过，他的生涯因此而受到损害。人文主义向统治精英兜售其技能，劝说他们重视人文主义教育在语言、修辞和行政管理等方面提供的专门知识。

然而，像这样宣扬人文主义经常可能遇到麻烦，当乔治试图将智识的效忠对象和人文技能从一位有势力的恩主（教皇保罗二世）转移到另一位（征服者穆罕默德）身上之时，他就发现了这一点。作为结果，人文主义开始依靠课堂和印刷出版这一革命性的媒介来集中精力传播自己的方法。人文主义与印刷结盟，使学者得以出版发行规格统一的著作，发行数量之巨大，远远超过手抄稿的复制能力。这一联合造成的影响是，识字率随之大幅提升，学校数量激增，人们前所未有地强调教育是社会化的工具。

劝导者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历史始于14世纪意大利作家兼学者彼特拉克。他与法国阿维尼翁的教廷关系密切，他父亲在那里当文书——精于管理大量教廷文件的学者。彼特拉克对于那些被忽视的古典罗马作家——尤其是西塞罗（Cicero）、李维和维吉尔（Virgil）——的修辞和文体特性很感兴趣，他借鉴了这些学术传统。他开始拼集诸如李维的《罗马史》这样的典籍，校勘各种手稿的残存片断，更正语言讹误，并且模仿它的风格，写出一手语言流畅、修辞雄辩有力的拉丁文。

彼特拉克还到图书馆和修道院搜罗古代典籍。1333年，他发现了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一篇演讲的手稿，《对诗的赞美歌》（*Pro Archia*）。这篇演讲探讨了“人文学科”的种种优点。彼特拉克称这篇演讲“充满赞美诗人的精妙之言”。西塞罗对彼特拉克和后来人文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他为有教养的个体如何将生活中哲理和沉思冥想的一面与积极进取和热心公共事务的一面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在他的名篇《论演说家》（*De Oratore*）中，西塞罗将修辞学和演讲术与哲学进行对比，提出这个问题。在西塞罗看来，“演讲术的全部技艺面向公众，并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共有的实践、风俗和言语相关”。另一方面，哲学与个人的深思冥想相关，远离“公共旨趣”，事实上，它脱离“任何事务”。彼特拉克在论著《孤寂的生活》（*De Vita Solitaria*）中探讨哲学家和演说家的角色时，采用了西塞罗的区分：

> 他们的生活方式千差万别，所致力的目的完全对立，这使我相信，哲学家的想法与演说家从来都不相同。因为后者努力争取听众的掌声，而前者力求做到——如果他们所宣称的是属实的话——认识自身，让灵魂反归本真，藐视空洞的荣誉。

这就是彼特拉克人文主义的蓝图：通过运用修辞和劝导，将哲学对个体真理的求索与有效发挥社会作用的实际能力结合起来。为了获得这种完美的平衡，有教养的个体需要接受各门人文学科的严格训练，这些学科包括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伦理学。

这条理由非常高明，它赋予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权力和名望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经院哲学家。中世纪经院哲学也教授学生拉丁文、书信写作和哲学，但是，一般说来，经院哲学的教师和思想家都要屈从于他们效力的当权者（通常是教会）。根据西塞罗的界定，有教养的人文主义者能够理性地思考人性，同时还能够向精英人士教授公开演说和劝导的技能。西塞罗的定义赋予人文主义及其实践者向社会及政治机构“兜售”他们的思想以更大的自主权。然而，人文主义绝不是一场

色彩鲜明的政治运动，虽说只要于某方面有益，有的实践者乐于看到它的方法被各种意识形态所用。人文主义者自称是演说家和修辞学家，是文体而非政治学大师。单从表面上看人文主义者的写作题材常常是个错误。这类作品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写作练习，目的是训练文字风格和修辞手法。对于特定的议题，它们经常喜欢采取辩证的方法，既赞同又反对。人文主义的胜利在于，它能够运用修辞、演讲和论辩的才艺，让一切潜在的政治主顾相信它的服务是有用的，不管这政治主顾是拥护共和政体还是赞成君主政体。

回到初始阶段

到了15世纪中叶，人文主义实践开始遍布于学校、大学和宫廷。它对修辞和语言的强调提升了书籍这一物质性和智识性实物的地位。人文主义对于拉丁文的说、译、读、甚至写的修正，都以书籍这一方便携带的实物为中心。这些思想都通过书籍得以传播。但这些人文主义理想在实践中怎样发挥作用呢？有一个极为生动的例子能够说明人文主义理论与课堂实践之间的鸿沟，这个例子源于一位最受尊敬的人文主义教师的经历，他就是维罗纳的瓜里诺·瓜里尼（Guarino Guarini of Verona，1347—1460）。瓜里诺受雇于费拉拉的埃斯特（Este）王朝，自1436年起，他就在那里担任修辞学教授。

瓜里诺作为一名教师，他成功的原因在于能够向学生和恩主推销出一种人文主义教育观，这种教育观将文明的人性价值与社会进步所不可或缺的实用性社会技能结合在一起。在一篇讨论西塞罗的导论性讲稿中，瓜里诺问道：

> 除了用以引导、命令和抑制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政府的艺术、规诫和研究之外，我们的思考和努力哪里还有更好的目标［？］……因此，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和绅士，要一如既往地致力于西塞罗式研究，这类研究令我们的城市有充足理由对你们怀有深厚希望，并且会给你们带来荣誉和快乐。

这是一群接受过修辞学和劝导术训练的教师和学者传播的一种看法；难怪它在当时一下子就被人们所接受，并且直到今天，它还在影响人文学科的学生。

然而，瓜里诺的课堂并非像他所承诺的那样，一定造就出人文气息浓厚、精英式的公民。他教育学生潜心学习语法和修辞，这主要依靠勤记笔记、死记硬背典籍，以及在一轮又一轮似乎永无休止的基础练习中进行修辞模仿。学生几乎没有时间从哲学角度反思所分析的典籍的性质，而且，学生的听课笔记表明，他们只是掌握了新的说写方式的一点皮毛，而瓜里诺等人文主义者认为，这些新的说写方式是人文主义教育的基础。这些语言和修辞的基础课程确实为学生日后在司法界、政界和宗教界谋取初级工作职位提供了预备性训练，尽管这与瓜里诺在他那些导论性讲演中所承诺的崇高境界相去甚远。

瓜里诺的方法甚得他的政治恩主的欢心。一遍又一遍训练学生掌握细枝末节的语法要点培养了学生被动、忠顺和驯服的性格。如果这样未能见效，就按照惯例施加规训和惩治。瓜里诺也鼓励学生顺从统治精英的政治，不管他们是共和派，还是君主派（例如他本人的恩主埃斯特家族）：

> 不管统治者颁布什么命令，都要心平气和、面带愉悦之色去接受，因为这样做会讨得统治者的欢心，令得自己和亲属飞黄腾达，占据高位。

对于大部分人文主义学生而言，人文主义针对新的个体观而提出的学习修辞学的要求，实际上让他们能够在新兴的文官政府机构中谋到职位。瓜里诺确保了政治顺从与这类职位所需要的实际技能之相称。这就保证了掌权阶层不断地资助那些传播人文主义理念的学校和大学。

女性在人文主义者家中的地位

人文主义的修辞学可能会令人产生这样一种期待，即它会给女性

带来新的智识和社会机运。实际上，人文主义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相当矛盾。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他的论著《论家庭》（1444）当中，界定了一种人文主义的家庭事务观，即家庭事务由男性主宰、女性经营：

> 至于家中琐事，我就交由我的妻子照料……如果我妻子抛头露面，出入市场，在男人堆里忙来忙去，就会让人看不起我们。而若当我需要与男人、公民同侪和值得尊重并且身份高贵的外国人一起，做男人该做的事情时，却被关在家里与妇女呆在一起，这也多少有辱我的身份。

能言善辩、忙于公共事务的男性与他那沉默寡言、照看家务、一直“关在家里”的妻子形成了鲜明对照。妻子所受的唯一训练是操持家务。为了确保家务被照管得妥妥帖帖，丈夫向妻子托付家中一切家当，只有一项例外：只有“我的书籍和笔记”秘不示人，“这些东西我的妻子不但不能读，也不能碰”。一想到“那些胆大妄为的女人千方百计想要了解家庭以外的事情，以及丈夫们和一般男性所关心的事务”，阿尔贝蒂就感到焦虑。

阿尔贝蒂的态度影响了人文主义者对精英阶层中那些挑战社会为她们指定的角色、想要通过人文主义学习获取才能的女性的反应。人文主义者并非全盘反对女性求学，但他们固执地认为，事情只能到此为止，不许她们再越雷池一步。按照市民人文主义的伟大英雄汉斯·巴龙的说法，莱奥纳尔多·布鲁尼在1405年前后的一篇演讲词中发出警告：让女人学习几何、算术和修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如果一个女子在讲话的时候猛挥双臂，或是声若洪钟，铿锵有力，她就会显得精神失常一般面目狰狞，需要加以约束”。女性可以学习修身养性、端庄稳重和持家技能，但是，人文主义者不赞成她们学习能够让人在社会上、职业上出人头地的应用学科正规专业知识。

尽管存在这类敌视态度，一些博学的女性还是想开创自己的智识生涯。法国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在《女性之城》（1404—1405）中认为，“那些出于嫉妒而对女性横加指责的

人，都是一些心地叵测的男人，他们看到并且认识到，许多女性智力上超过了他们，行为也比他们高尚”。15世纪30年代，维罗纳的伊索塔·诺加罗拉（Isotta Nogarola of Verona）回应了那些攻击女性多嘴饶舌的言论：“与其说是女性比男子多话，不如说是她们的口才和德行都在男子之上。”

然而，这种尝试出书和演讲的举动在当时人看来是新鲜事而非职业活动。1438年，一位匿名小册子作者诽谤伊索塔的“直抒己见”。他将她的博学与性乱行为混为一谈，粗俗猥亵地一语双关道：“拥有一条妙舌的女子绝不可能贞洁”。一旦女性跨越了界线，从一名学业有成的学生变成了公共领域的演说家，人文主义者的反应是，要么批评她们性欲过盛，要么把她们的智识对话当成恋人之间的絮语，而加以神秘化和轻视。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非一定为妇女创造了新的机会。它鼓励妇女受教育是把这当成一种社会点缀和自为的目的，而不是当成帮助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的手段。那些苦苦挣扎的男性人文主义教师和学生，确立起自己的社会地位、谋到工作职位已经殊为不易。女性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可能显然让他们感到威胁，还很可能感到尴尬，因而无法容忍。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修辞学颂扬了教育和雄辩的种种优点，而只要一有可能，女性就会试图利用这些发展所提供的机会。如果说女性的确经历过一场文艺复兴的话，那么，它通常是在无视男性人文主义者反对的情况下取得的。

印刷出版：一场传播革命

15世纪60年代中期，阿尔贝蒂写道，他“衷心地称许一位德意志发明家，此人最近制作了一些铅字印模，可以让3个人在100天内将一本原典印制出200多本，因为每模压一次，就会印出一页版面”。1450年左右活字印刷在德意志的出现，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技术和文化创新。正如阿尔贝蒂所表明的那样，人文主义很快就看到了利

用批量复制手段的实际可能性。不过，印刷术的革命性影响在北欧最为显著。

印刷术的发明源于15世纪50年代约翰·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约翰·富斯特（Johann Fust）与彼得·舍费尔（Peter Schöffer）在美因茨的商业和技术合作。谷登堡本是一名金匠，他运用自己的专长铸造出用于活字印刷的金属模。舍费尔是一名缮写员，写得一手好字，他利用自己抄写手稿的技能对印刷文本进行设计排版。富斯特则提供了资金。印刷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它主要是企业家为牟利而从事的一项商业活动。借助于东方人在更早时候发明的木刻印板和造纸术，谷登堡及其团队于1455年印刷了一版拉丁文《圣经》，又于1457年发行了一版《祷告诗篇》。

按照费舍尔的说法，印刷纯粹是“一门不使用芦杆或笔的人工书写艺术”。起先，这一新的媒介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重大意义。早期印刷的许多书籍利用那些学过手稿图案花饰设计的抄写员来模仿手稿特有的外观。这些半是绘制、半是印刷的书籍装帧豪华，这表明，这些书籍本身就被视为贵重商品，其内容与外观同样得到重视。财力雄厚的恩主，例如埃斯特家族的伊莎贝拉（Isabella）和征服者穆罕默德，一边购置比较传统的手稿，一边购置这类印刷本图书。

到了1480年，德意志、法国、荷兰、英国、西班牙、匈牙利和波兰的主要城市都已成功地建立起印刷出版机构。据估计，至1500年，这些出版机构已印刷了4万种、600万至1,500万册书籍，超过罗马帝国陷落以来书籍出版的总和。16世纪的出版数量更是惊人。仅在英国一地就印了1万种书籍，而当时欧洲人口还不到8,000万，发行的书籍册数却至少有1亿5,000万。

印刷品大量流传造成的结果是，知识与传播发生了革命，从上到下影响了整个社会。书籍发行的速度和数量表明，印刷品培养了新的读者群，他们急于消费出版机构印制的各式材料。印刷本图书容易获得，而且价格相对低廉，这也意味着，有购书能力的人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印刷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随着欧洲各国越来越多的人以本国的民族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作为言

说和书写的媒介，印刷出版业越来越倾向于出版以这些语言写就的书籍，而不是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书籍，后者只对少数读者有吸引力。各国民族语言逐渐标准化。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它们成为司法、政治和文学交流的主要手段。以日常语言印刷的大批书籍推动了使用同一民族语言的人们塑造其民族共同体的形象。这最终使个体根据民族关系而不是宗教关系或臣属关系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这种情况给宗教权威造成了严重后果，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遭到削弱，世俗色彩更浓的新教思想开始兴起。

印刷渗透到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印刷出版机构最初发行宗教类图书——圣经、祈祷书、布道书和教义问答，但是它们逐渐地也开始出版比较世俗化的图书，例如传奇故事、游记、小册子、大幅传单和生活指导手册，后者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吃药看病到妻子义务，都是它们提供咨询的范围。到了16世纪30年代，一本印刷小册子与一个面包同价，而一本《圣经·新约》的价格相当于一个体力劳动者一天的工资。以听、看、说为交流基础的文化逐渐演变成为以读和写为互动方式的文化。文学文化开始出现，它以半自主性的印刷出版业为中心，而不是以宫廷或教会为中心。它的内容由需求和利润决定，而不是由宗教正统观念或政治意识形态决定。印刷所将智识和文化的创造力转变成一项协作事业，因为印刷工人、商人、教师、抄写员、翻译者、艺术家和作家都把自己的技能和资源集中投入进去，以创造出最终的成品。15世纪末威尼斯的阿尔都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开办的印刷所被一位印刷史家比作集血汗工厂、包饭宿舍和研究机构于一体。这样的印刷出版机构借着印刷出版业大举开拓新市场的机会，创造了一个由印刷工、金融家和作家组成的国际共同体。

印刷也改变了人们理解和传播知识本身的方式。手稿具有独一性和不可复制性。然而，具有标准版式和字模的印刷术开始进行精确的批量复制。这就意味着，身处异地的两位读者能够就同一本书进行探讨和比较，他们研讨和比较的范围可以延及某一页上具体的某个词语。由于印刷本图书开始引入统一的页码、索引、按字母排序的方法

和参考文献（这些都是在手稿本中无法想象的），知识自身慢慢被重新包装。版本研究变成一门累积的学科，因为学者们现在能够搜集起某一典籍的各种手稿（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比较所有现有本子的基础上，印制出一个标准的权威版本。这也导致了新版和修订版现象的出现。出版商意识到，各种新发现和更正的成果可被吸收到作者的文集中。这样做不仅体现了智识的严谨，而且在商业上有利可图，因为个体有可能受到鼓动去购买已有图书的新版本。有关语言和法律等学科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参考书和百科全书声称采取了按照字母和年代先后排序的新方法，为知识重新进行了分类。

印刷出版机构不仅印制文字文本。印刷产生的革命性影响还包括威廉·艾文斯（William Ivins）所称的“可准确重复的图式表述”。先是采用木刻，后来又采用更为复杂的铜版镌刻，印刷业使得批量发行规格统一的地图、科学表格和示意图，以及建筑图纸、医学草图、漫画和宗教画像等成为可能。在社会天平的一端，耀眼夺目的印刷图像对不识读写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这些图像用于宗教目的之时。在社会天平的另一端，精确复制的图像革新了地理学、天文学、植物学、解剖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研究。印刷术的发明引发了一场传播革命，其影响绵亘数个世纪，能与其相提并论的只有国际互联网的研发和信息技术革命。

人文主义出版物

人文主义者很快就认识到，印刷出版具有传播他们的思想观点的力量。最负盛名的北欧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of Rotterdam，1466—1536）就以印刷出版为手段，传播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自觉地以“人文主义王子”自命。有人认为，早期人文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古典异教作家，而不是基督教，为了回应这类说法，伊拉斯谟着手于《圣经》的翻译和疏正，最终出版了以拉丁译文为对照的希腊文版

《新约全书》（1516）。一些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认为他的那套北欧人文主义“野蛮无文”，在《西塞罗的崇拜者》（1528）一文中，伊拉斯谟进行了反击。他奚落崇拜西塞罗的人文主义者讲求拉丁文风格的修辞的纯正，认为“西塞罗的崇拜者最应关注的是理解基督教的神迹，以西塞罗研读哲学家著作的热情去阅读圣典”。

伊拉斯谟致力于将他那种深受古典启发的道德教育与基督教哲学（*philosophia Christia*）融汇在一起；基督教哲学是一门以耶稣为中心、强调个人信仰的哲学。他的著作卷帙浩繁，其中有古典作品（包括塞内加［Seneca］和普卢塔克［Plutarch］的作品）的翻译和注疏、拉丁文谚语集、有关语言和教育的论著，以及大量的书信，这些书信都是写给欧洲各地的朋友、印刷商、学者和统治者的。今天人们读得最多的他的作品是讽刺性的《愚人颂》（1511）。这是一部“辛辣的讽刺之作”，它对教会腐化和自满的攻击尤为严厉。书中将教会描绘成以“诲人为难事，祈祷为烦事，眼泪为软弱和女人气，贫困为丢脸，温顺为耻辱”。

伊拉斯谟令人生畏的智识能量大部分都投入到了创建一个常在的学术群体和一种持久的教育方法中，处在这桩事业核心的是他本人的出版著作，以及他作为首屈一指的“文人”的地位。印刷出版对于伊拉斯谟操控其智识生涯、乃至操控其个人形象的传播至关重要。1526年，丢勒答应替他制作一幅版画画像。伊拉斯谟和丢勒利用这种新的印刷技术传播了这位人文主义学者令人印象深刻、具有纪念意义的肖像：他坐在书房中写信，周围都是印刷成册的书籍。这些书籍正如丢勒的希腊文题词所表明的那样，体现了伊拉斯谟经久不衰的声誉：“他的著作将为他勾勒出一幅更出色的肖像。”

1512年，伊拉斯谟出版了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箴言》（*De Copia*），这是一本练习拉丁文流畅表达的教科书。这本书最出名的地方是，它收集了“只要我活着，我就永远怀念你”这种情感的200种表达方式。《箴言》是为他的朋友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所写，此人是伦敦圣保罗学院的院长。在写给科利特的献词中，伊拉斯谟声称，他想“作一点文学贡献来充实贵校”，就选了“两种新的《箴

言》注疏，因这两本书适合男孩子们阅读”。《箴言》后来有几个版本被题献给欧洲很有影响的学者和恩主，以确保该书不仅可在伦敦使用，也可用于欧洲各地的教学。伊拉斯谟需要通过印刷媒介去推销一种全新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以此为15世纪人文主义的学术成就更添华章。

伊拉斯谟也充分体会到，人文主义在改良教育和宗教的同时，需要讨得政治当权者的欢心。1516年，他撰写了《基督教王子的教育》，题献给哈布斯堡的皇储、未来的皇帝查理五世。这是一本建言手册，它建议年轻的王子如何行使“绝对的统治权，以控制自由的和心甘情愿的臣民”。它还建议王子需要接受那些长于哲学和修辞学的人士的教育和忠告。换句话说，伊拉斯谟想成为这位年轻皇储的私人顾问和公共关系导师。尽管查理亲切有礼地收下了这本手册，却没给他安排什么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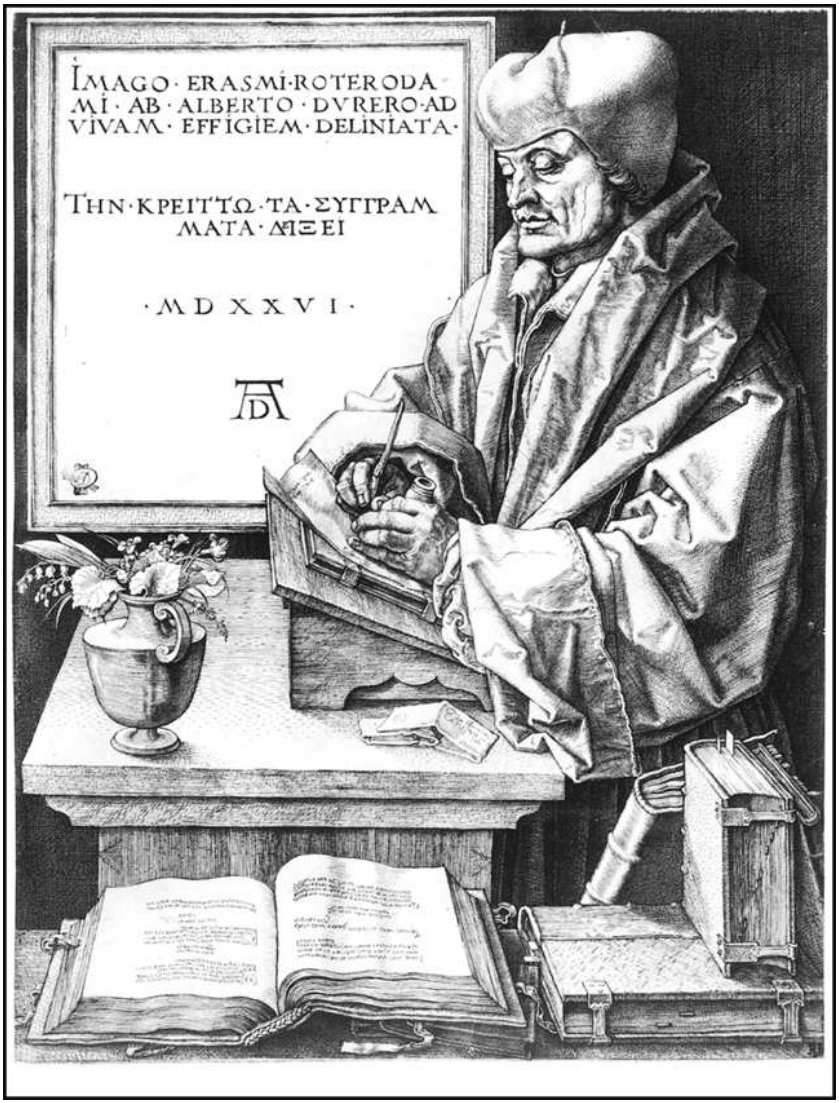

图7　丢勒的伊拉斯谟画像，刻于1526年，确立了伊拉斯谟作为伟大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声誉

对此，伊拉斯谟的反应是将另一本《基督教王子的教育》送给查理的政治对手、英王亨利八世。在1517年题写的献词中，伊拉斯谟赞扬了亨利，说他在万几宸翰之余总要想法“挤出一部分时间来读书”。伊拉斯谟认为，这令亨利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和更出色的君主”。伊

拉斯谟试图说服亨利，追求人文主义是治国的最佳方式；他暗示说，人文主义会把他造就成一个更高尚的人，还能为他提供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必要技能。把同一本书题献给两位君主，伊拉斯谟并没有觉得不妥，这件事本身即意味深长。他认定这两位君主都将会认识到，他可以运用自己的辩才去构建他们所需要的任何政治观点。

人文主义政治学

伊拉斯谟这一代人目睹了政治理论和人文主义发展史上两部最有影响的著作的问世。这两本书是尼古拉·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君主论》（1513）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1516）。今天，这两本书都被视为论述如何维护政治权力和创建理想社会的不朽经典。它们也是两位作者在16世纪上半叶各自对人文主义与政治之间关系体验的特定产物。

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写于佛罗伦萨共和国垮台（1512）、美第奇家族重掌政权之后。马基雅维利曾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任职14年，后来被卷土重来的美第奇家族解职，并一度入狱。《君主论》的意图在于，利用他的政治经验“探讨君王治国之术，并为其制定规则”。作者以犀利的笔触论述了统治者应如何攫取和巩固权力。马基雅维利作结道，如果他的建议被“巧妙地付诸实施，它们将会极大巩固新统治者的地位，迅速强化他的权力”。马基雅维利的人文主义训练背景以及他直接从政的经验让他发表了一系列声名狼藉的看法，这些看法既来源于古典作家，又受到当时的政治事件的影响。“要想维护自己的权力，统治者就要准备不按道德规则行事”；为了保住政治权力，他应当“撒谎成性、言行不一”，随时准备“背叛变节、冷酷无情或残忍无道，而且无视宗教戒律”。

马基雅维利写此书是为了个人获得政治起用（就他的情况而言，是再次起用）。他把《君主论》题献给佛罗伦萨新的寡头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Giuliano de'Medici）。作者称这本书是“我乐

于为您服务的象征”。马基雅维利在书信中承认，“我渴望这些美第奇统治者开始起用我”。《君主论》体现出马基雅维利企图向美第奇建言如何掌控绝对政治权力。马基雅维利推导出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必然的政治结论，对于如何保住权力提供了最具说服力和最为现实的论述，以供新统治者借鉴。他的人文主义准备迎合一切当权政治意识形态，不管它是寡头的，还是民主的。马基雅维利的悲剧在于，美第奇不为他的效忠表白所打动。他无缘再获政治高位，在他于1527年去世之际，《君主论》仍未付梓刊行。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也与他本人担任公职的经历密切相关。莫尔是伊拉斯谟的密友，是一位很有天赋的法律和希腊文学者。他翻译过琉善（Lucian）的作品，用英文和拉丁文写过诗。1517年，他进入了亨利八世的政务委员会，1529年担任大法官。在此期间，他为亨利写了许多政治和神学小册子。莫尔是西塞罗心目中有教养的人文主义者的典范——能够把个人的哲学冥想与公共演说和参与公民世界中的政治与外交事务结合起来。

这一微妙的平衡贯穿了《乌托邦》全书。这本书是以学者间的拉丁文对话形式写成的，直接模仿了柏拉图的那本人所共知的、论述理想国度的著作——《理想国》。它开篇写道，莫尔作为亨利八世的外交代表来到了安特卫普。他的朋友引见他结识了拉斐尔·希斯洛第，一位刚从乌托邦岛返回的冒险家。后者向他详细描述了乌托邦这个理想的“共和国”，在那里，“一切东西都是公有的”，“没有人当乞丐”，离婚、安乐死和公共医疗被视为天经地义。

莫尔本人真的相信他所虚构的理想社会景象吗？有几条原因使人认为，他对于自己笔下的乌拉邦持有矛盾态度。“乌托邦”这个词是一个双关语，是根据希腊文生造的，它既可表示“幸运之地”，又可表示“乌有之乡”。“希斯洛第”这个名字也有“空谈能手”的意思。莫尔认为，在乌托邦的“法律和风俗”当中，有许多“实在是荒唐”，但他也承认，“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特征，我虽愿意我们的国家也具有，但毕竟难以希望看到这种特征能够实现”[1]。这些内容严重限制了他对

这个想象中的社会的赞同。

纵贯全书，莫尔既不赞同也不反对那些他所探讨的有政治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范围广泛，从私有财产和宗教权威到政府公职和哲学玄思。这并不是因为他优柔寡断：在政治上，他不能让人看出他支持某一立场。作为一名老练的政治顾问，莫尔必须施展他的修辞本领，为那些经常互不相容或相互矛盾的说法和信念辩护，以便为国家服务。乌托邦只是一个背景，他借以讨论与他本人所在世界相关的一系列议题。如果他的分析遭到质疑，他总还可以辩解说，他赞成的是相反的立场，或者指出乌托邦说到底只是虚构出来的：它是子虚乌有之地。

《乌托邦》凸显出莫尔能够雄辩有力地论述一系列有争议的议题。这些议题时刻影响到他的雇主，他的雇主也期望他就此提出相关建议。莫尔写《乌托邦》之际，正值他政治事业的顶峰，因此他的见解需要相当地慎重，而且要有政治灵活性。这就是《乌托邦》的观点和风格如此扑朔迷离的原因。相形之下，赋闲在家的马基雅维利可以在《君主论》中比较明确地和基于政治现实去论述政治和权力。至于之后莫尔反对亨利离婚，这与其说是出于讲究原则的伦理立场，不如说是他基于宗教原因而作出的政治误算，结果令莫尔身首异处。无论是他的《乌托邦》还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都显示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政治机会主义。

从彼特拉克到莫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灵活地服务于任何在政治上于己有利的恩主。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政治哲学体系个个宣称《君主论》和《乌托邦》这类著作与它们自己对权力和权威的主张相吻合。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仍在对现代人文学科产生巨大影响，然而，正如本章所论证的那样，人文主义并不是像它经常自诩的那样，是对人性理想化的颂扬，而是有其坚实的实用主义内核。许多人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遗产问题上受到误导，而实际上它比这些人所认为的远为含糊矛盾，其部分原因即在于，它的言辞仍旧如此具有诱惑力。

注释

〔1〕 译文见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版，第119页。

第三章

教会与国家

1435年，人文主义学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来到那不勒斯，表示愿为未来的国王阿拉贡的阿方索（Alfonso of Aragon）效力。当时阿方索正在就那不勒斯的归属问题忙着与教皇犹金四世（Eugenius IV）进行政治角力。瓦拉于是开始下工夫研究在政治上与自己的新雇主直接相关的一份文本：《康斯坦丁惠赐书》。《惠赐书》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奠基性文献之一。它自称是公元4世纪康斯坦丁皇帝颁布的一份惠赠诏书，赐予罗马教皇至高的权力和广阔的领地。它是证明教皇合法拥有世俗权威最有力和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之一。洛伦佐·瓦拉揭露《惠赐书》系后人伪造。他利用自己在修辞学、哲学和语文学方面的人文主义技能证明，《惠赐书》中的年代误植、文字舛误和逻辑矛盾显示出它是8世纪赝品。

瓦拉在文本分析上表现出的机敏灵活，与他对罗马教会及其主教的尖锐抨击相得益彰，称他们要么“不知道《康斯坦丁惠赐书》是虚假的和伪造的，要么就是他们自己伪造的”。他指责这些人“侮辱了基督教，用谋杀、灾祸和犯罪混淆一切”。瓦拉嘲笑《惠赐书》中拉丁文的粗疏和年代误植，随之又铺张扬厉地反问道：“当我们意识到它是重罪的渊薮和万恶的根源，难道我们还能认为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信条是正当的吗？”这份措词典雅的抨击文字最后攻击了教皇对帝国的权利要求：教皇“因此可以收回《惠赐书》提到的其他权利，以邪恶手段从好人那里偷来的钱，他用更邪恶的手段花掉”。阿方索因瓦拉毁掉《惠赐书》的声誉而感到高兴。他采纳了瓦拉的观点，最终顶住了教廷的一致反对，成功地保住了那不勒斯王国。

瓦拉的这段揭秘故事体现出，在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政治与学问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诸如主权国家这类政治组织兴起之后，它们需要新的智识和行政技能来组建政治结构，并向教会等机构的权威成功地提出挑战。后来，教皇马丁五世[1]（Martin V）任命瓦拉为教廷秘书。以他曾经揭露《惠赐书》作伪一事而论，这项任命很是出人意外。不过，这倒暴露出教会对此类学者的态度（已知的魔鬼比未知的好）。它也表明，像瓦拉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在新机会的

引诱下，是多么具有政治机变性。

这段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文艺复兴时期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多么错综复杂。在1400至1600年间，宗教信仰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宗教与政治权力的行使、国际财经的运作以及艺术和学术的成就，也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在这一时期，随着天主教会竭力伸张它的世俗和宗教权力，它面临着连续不断的冲突、异见和分裂。这一情况于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席卷北欧各地之时达到顶点，给罗马天主教会带来了它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16世纪中期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永久性地改造了罗马天主教会，它与马丁·路德领导的新教改革运动一道，确立起了现存的基督教的基本形态。宗教改革也引发了一些复杂问题，这些问题关涉基督教与本书中另外两大宗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后二者都坚持认为它们在神学上比基督教更加优越，而其中的伊斯兰教更敏锐地利用了16世纪基督教会的分裂。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危机不断。怀疑、焦虑和内省一直是现代思想和主体性的基石，而它们的源头则可追溯到1400至1600年这一时期的宗教纷争。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种新情况改变了宗教权威，那就是各种新形式的政治权威的兴起。从15世纪晚期开始，各类政治组织逐渐控制了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伴随着15世纪商业与城市的不均衡扩张而来的财富和行政管理创新，为影响深远的政治激变和领土扩张创造了条件。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城市进行共和制政府的实验，而米兰、那不勒斯、乌尔比诺和费拉拉则由小公国君主统治。在北方，百年战争之后造就的和平与繁荣局面，使得财富和权力集中到法国和低地国家手中，孕育了哈布斯堡大帝国。在东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形成了一个全球性帝国强权的模式，其他各国都不得不与之抗争。到了16世纪中期，欧洲处在一系列主权国家和帝国的控制之下，它们是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它们的兴起与教会的世俗权力恰成此消彼长之势。

15世纪初，天主教会正处在危机当中。“天主教的”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普遍的”，然而到了1400年，无论怎么看天主教会也不像具

有普遍性。教会早在1054年就分裂为西派的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派的东正教会，后者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在此后的300年里，西派教会在内外的一片反对声浪中，竭力伸张其神学和帝国权威。教皇仰仗《圣经》的权威，自称是基督在世间的代表，可以在政治上支配世俗事务。

在整个14世纪，教廷分裂为势如水火的两派人马，争夺教皇权力，一方以罗马为中心，另一方则据守法国的阿维尼翁。教廷的分裂局面促使两派当中持有异见的红衣主教提出治理教会的公会议理论。这就使教会公会议的集体权威凌驾在两位分裂的教皇之上。1414年，教会的神父们召集了康斯坦茨公会议，以结束教廷分裂状态。这次公会议规定，“所有人，不论职务和身份的高低，包括教皇本人，在宗教信仰、消除分裂和改革教会的问题上，都要听从公会议的决定”。这使得公会议得以任命马丁五世为教皇，这是近100年来首位没有争议的教皇。

一次正统的联合

康斯坦茨公会议无意当中助长了教廷的独裁力量。教皇马丁五世及其继任者犹金四世都开始制订雄心勃勃的计划重建罗马和统一东正教会，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威。1437年，犹金召集佛罗伦萨公会议，讨论东正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的统一问题，并且转移公会议削弱教皇权威的企图。1438年2月，拜占廷帝国皇帝约翰八世帕里奥洛加斯（John VIII Paleologus）带领700名希腊随员与东正教会的首脑——牧首约瑟夫二世（Joseph II）——莅临佛罗伦萨。除了希腊代表团之外，与会的还有来自特拉布宗、俄国、亚美尼亚、开罗和埃塞俄比亚的代表团。与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宗教色彩鲜明的会谈一样，东西方之间这次重大的官方会议隐含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影响。约翰八世提出，基督教世界的东西两派应当统一，在奥斯曼帝国崛起之际，这是防止拜占廷帝国崩溃和君士坦丁堡陷落唯一现实的方法。而教皇急于统一

两派教会，则是想扩大他自身在意大利各地的政治权力。

参与正式的会议事务之余，各方代表热情洋溢地探索彼此的智识和文化成就。希腊人钦佩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的建筑杰作、多那太罗（Donatello）的雕塑，以及马萨乔（Masaccio）和安吉利科（Fra Angelico，Fra意为“弟兄”）的壁画。佛罗伦萨人惊叹于约翰八世及其学者随员自君士坦丁堡带来的那批罕见的古典书籍。在这些书籍之中，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欧几里得（Euclid）和托勒密的手稿，以及其他在意大利“这个地方见不到的”古代典籍，一位心怀艳羡的学者如是说。埃及代表团送给教皇一部10世纪阿拉伯文福音书手抄本。亚美尼亚代表团留下了13世纪的有关亚美尼亚教会的装帧华美的手稿，它反映出该教会糅合了蒙古、基督教和伊斯兰的遗产。埃塞俄比亚代表团也散发了15世纪东北非各地教会所使用的埃塞俄比亚文《诗篇》译本。

在这次公会议召开20年后，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在美第奇府邸完成了他颂扬美第奇在令东西派教会和解上所起作用的壁画。在戈佐利的壁画里，约翰八世、约瑟夫二世和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Lorenzo de'Medici）以三贤的形象出现[2]。出于政治原因，洛伦佐的先人、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Cosimo de'Medici）出钱赞助了整个会议。在整个15世纪30年代，美第奇家族一直谋求通过谈判与君士坦丁堡通商，但直到1439年8月协议才达成，这是约翰八世向科西莫致谢的表示，感谢他在佛罗伦萨公会议期间慷慨解囊、殷勤好客的豪举。科西莫为了教会的利益而牺牲金钱，这番虔敬的举动实际上是一种很高明的手法。至于教皇犹金四世，他欠美第奇家族的钱数量则更为可观了。戈佐利的壁画表明，美第奇家族认为，对于教会的统一，他们的参与之功要比教皇的居中协调更为重要。

1439年7月6日，东西派教会最终签署了《统一教令》。它高兴地见到“隔断东西派教会的墙壁已经推倒，和平与和谐业已回归”。然而，这股高兴劲儿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君士坦丁堡，在东正教神职人员的鼓动下，民众起来反对这份教令。与此同时，意大利各国一再拒绝提供军援以协助拜占廷人抗击奥斯曼人，这表现出它们也不太情愿

见到教会的统一。随着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5月被穆罕默德二世攻陷，教会的联合以血腥和耻辱的下场告终。

图8　贝诺佐·戈佐利的壁画《三贤颂》：美第奇家族以艺术的形式为自己邀取统一东西派教会的功劳

佛罗伦萨公会议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关键性事件。作为宗教最高首脑会议，它是失败的；它粉碎了教廷通过统一东派教会来巩固其帝国权力的希望。作为一桩政治和文化事件，它又是获得巨大成功的；它使得意大利各国向式微的教廷权威提出挑战，并加强了它们与东方的商业联系。占据统治地位的家族通过华丽的艺术品，巧妙地宣扬它们在公会议上的作用，就像戈佐利的壁画突出了美第奇家族在促成《统一教令》过程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在文化上，古典的著作、思想和艺术品通过佛罗伦萨公会议自东向西的传播，将对15世纪晚期意大利的艺术和学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民众

在欧洲各地，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认同自己为基督教徒，他们定期去教堂参加礼拜。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奉行宗教仪式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如果有人认为，针对教廷权威和经文诠释展开的争论严重影响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那可是臆想之见。对于大部分个体而言，教会是日常生活结构的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圣俗之间的区分经常是模糊不清的。教堂可用于节庆、政治集会、餐饮、马匹交易，甚至存放货物和贵重物品。神职人员数不胜数。到1500年佛罗伦萨6万人口中，神职人员超过了5,000人。这些人没受过什么教育，收入微薄，经常干砖瓦匠活，贩马，贩牛，养情人和孩子，随身携带武器。

在理论上，天主教会是基督化身在世俗的显现。它是上帝与个体的中介，通过各种圣礼专门负责向世人施予上帝的恩典；圣礼包括洗礼、坚信礼、圣餐、补赎礼、授圣职、婚礼仪式和终傅。根据圣餐变体论，教士有一种神力（也可以说是法力），可将圣餐上的面包和葡萄酒变成基督的真正血肉。要是没有教会和教士代人祈祷，个体无法与上帝直接沟通。在举行圣礼的时候，只有教士才能让上帝与俗人直接接触。正是这种中介作用让教会成为权势通天的机构。

在实践中，公众对宗教仪式最大的热忱，围绕着一位历史学家所谓“对神性的（热烈）追求”而展开。圣礼的种种“奇迹”经常被解释为魔法，导致了各式各样的民众习俗，从狂热地崇拜圣物、圣徒和偶像，到迷信式地使用圣水、圣餐和圣油。尽管这些巫术行为有悖于宗教的正统性，但是，对于这些越轨行为，教会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会热衷的是维护它的神秘力量和权威。

对于大部分民众而言，教会提供的是一种仪式化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套严格的神学信条。洗礼、坚信礼、婚礼和终傅等圣礼提供了个体经历人生各个重要阶段的仪式。其结果是，许多人一年当中只去一两次教堂，法庭记录也显示，参与礼拜活动的人数相当少，民众更是对基本教义极其无知。一位英国传教士讲过一个牧羊人的故事。当这个牧羊人被问及圣父、圣子和圣灵之时，他的回答是：“这

对父子我都很熟，因为我替他们放羊，可我不认识第三个家伙：我们村儿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往好了说，这种态度体现了民众对宗教的无知和漠视；从坏了说，它暗示了异端和无信仰，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这种异端和无信仰样式繁多，不一而足。

在15世纪40年代，图尔奈主教让·谢弗罗（Jean Chevrot）忧心于上教堂、遵奉圣礼的人数之少，于是他委托罗歇·凡·德·韦登（Rogier van de Weyden）绘制了一幅圣坛背壁装饰画，教育人们认识圣礼的仪式意义，这幅画的名字就叫作《七宗圣礼》。这幅三联画左边的画板表现的是洗礼、坚信礼和忏悔，右边的画板表现的是授圣职礼、婚礼和终傅，中间那一联留给了最重要的圣礼——领圣餐，这桩圣礼在基督受难像后举行。为了避免观者困惑不解，画家就让天使们来帮忙。他们盘旋在圣礼的上方，打着写有解释性诗句的条幅。凡·德·韦登的这幅三联画运用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普及化”技法。他使用了本时代的人物、建筑和服饰，将教会的种种神迹置于现代背景之下，以此加深会众与画中图像的密切认同感。画中场景于平静中见张力，全无教会生活的日常景象：推推搡搡、沿街叫卖、玩笑嬉闹、随地吐痰、恶声咒骂、编织衣物、要饭乞讨、闷头大睡，甚至随意开枪，这一点也很惹人注目。

图9　罗歇·凡·德·韦登的圣坛背壁装饰画《七宗圣礼》试图向15世纪的教众讲授圣礼的重要意义

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

1420年，当教皇马丁五世结束了教派分裂、返归罗马之际，“他发现罗马倾圮荒废得十分严重，简直不像一座城市”，更谈不上是先前的罗马帝国和未来的天主教帝国的首都了。马丁及其继任者因此采取对策，开始制订一项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颂扬新近中央集权化了的罗马教会的荣光。在接下来的150年中，由于这项方案的缘故，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建筑工地。用教皇尼古拉五世的话说，俗人们会发现他们的“信仰在宏伟建筑物身上不断地得到确证，每天都得到加深巩固”，这些宏伟的建筑物“就好像由上帝之手建造出来似的”。在参与罗马重建的诸多艺术家当中，阿尔贝蒂、安吉利科、布拉曼特、米开

朗琪罗、拉斐尔（Raphael）和波提切利只是其中的一些。

历任教皇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翻修崩塌的圣彼得大教堂，这座教堂是康斯坦丁于4世纪中期在这位圣徒的坟墓之上建造的。如前文所述，罗马已经开始与君士坦丁堡争夺基督教世界帝都的地位。当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落入苏丹穆罕默德手中之后，这场竞争变得越发激烈。罗马及其教皇不想落在伊斯坦布尔及其苏丹的后面。1506年4月，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为新的圣彼得大教堂奠基，此前他已任命布拉曼特为建筑师。卡拉多索（Caradosso）铸造的奠基纪念章表明，布拉曼特最初的设计对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仿效有多么彻底。在整个16世纪，历经拉斐尔、桑伽洛（Sangallo）和米开朗琪罗随后的不断修整，圣彼得大教堂得以完工，呈现出今天的样子。

图10　卡拉多索为纪念圣彼得大教堂于1506年动工而铸造的纪念章，显示该教堂的早期设计借鉴了拜占廷与奥斯曼的建筑风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建成这座颂扬教皇权威的标志性建筑物的花销引发了一场抗议，这场抗议最终向天主教会的核心内容提出了挑战，并且永久性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和政治版图。1510年，在圣彼得大教堂开工四年之后、米开朗琪罗正在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艰难地创作壁画之时，德意志僧侣马丁·路德来到了罗马。他因眼前的腐败和炫耀挥霍行为而理想幻灭，这种失望情绪激发他攻击天主教会的种种弊端——1517年10月，他开始发布反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当年3月，教皇发行赎罪券为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筹集资金。赎罪券是教廷发行的一种单据，它赋予购买者以豁免权，使之不必因其罪恶而悔过。由于教会急于为罗马重建筹资，以致于卖给个人的赎罪券竟然还包括未来可能犯下的罪行。教会开创了灵魂救赎的生意，允许个体买卖灵魂的拯救。路德被激怒了。他给美因茨大主教写信，在信中抱怨说：

> 教廷为修建圣彼得大教堂而发行的赎罪券正在假借您高贵的名义销售……人们从它们那里得到的是完全虚假的印象，我为此而痛心；那些不幸的灵魂相信如果他们购买了赎罪券，他们就会得救。

路德在整个维滕贝格尽人皆知的《九十五条论纲》中重复了他的抗议。路德写道：“今天的教皇富甲天下，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钱，而非要用穷苦信徒的钱去修圣彼得教堂呢？”欧洲宗教改革的第一枪已经打响。

信仰之战

与“文艺复兴”一样，“宗教改革”也是一个回顾性术语，用于表述路德思想造成的种种影响。路德的确是带着改革教会的想法开始的，

可是改革迅速演变为革命。路德抗议赎罪券的行动很快就定型为系统地反对天主教会赖以存身的一切宗教论断。路德认为，个体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而不能依靠教士、圣徒或免罪符为中介来获得拯救；个体若想获得拯救，只有绝对信仰一个不可测知、但最终是仁慈的上帝的恩典。软弱和邪恶的个体在上帝面前只有坚持信仰，这是上帝赐予的最根本礼物。想通过赎罪券和补赎来改变灵魂状态，这种世俗的企图毫无意义。正如路德本人总结的那样，“基督徒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信仰之中，他无需用善行来证明自己”。

这一切对于天主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路德抛弃教廷在上帝与个体之间的中介地位，这样一来，他一举否定了教皇和教士两者的权威。教会仪式的场所和物品遭到摒弃，正如神职人员与俗人之间的差别也遭到否定一样。除两宗圣礼之外，路德还谴责其他所有圣礼。他认为上帝直接赐予个体信仰，无需中介，无论这中介是教士还是圣礼仪式。

路德思想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但却是直接的。在他为了应对天主教会日益惊恐的反应而完善和拓展自己的立场的同时，“路德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在北欧各地传播开来，其产生的深远影响远远超出路德的控制。到1546年他去世之际，倾向于教会改革的公会议控制了维滕贝格、纽伦堡、斯特拉斯堡、苏黎士、伯尔尼和巴塞尔。路德主义的积极响应者是那些对天主教教义不满的俗人，他们以城市市民为主体。修道会和传统敬奉方式遭到废除，教会财产或被捣毁，或被没收，圣像在反偶像崇拜的骚乱中被毁坏。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敬奉场所和方式，以及充满理想主义的社会和政治改良实验。1524年德意志农民起义，他们从路德的教义中为自己的不满寻找依据。路德轻蔑地谴责这次反叛“可厌、有害”，暴露出他的激进主义在世俗事务上的局限性。

路德也无法控制他的许多观点造成的智识影响。到了16世纪40年代，日内瓦已在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神学控制之下。加尔文认为，人无力影响神圣的得救预定论。在加尔文看来，谁应入地狱，谁应得救，上帝早已作出决定。在英格兰，亨利八世于1533年作出政治决断，与罗马教会决裂，这最终导致亨利的女儿、女王伊丽莎

白一世（Elizabeth Ⅰ）被开除教籍，因为她信奉当时所谓的“新教思想”。

印刷《圣经》

人文主义和印刷术是路德思想兴起和传播的关键。路德及其追随者利用人文主义传授的语文学、修辞学和翻译的知识，创造出一种以“《圣经》（the Word）”和“经文自身”为依据的神学。令路德这类宗教改革者与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者联合起来的原因在于，他们都致力于《圣经》的严密阐释，即《圣经》诠释学，这向先前经院哲学思想表现出的无知和迷信提出了挑战。路德的学识不逊于教廷中的佼佼者，他在《论翻译》（1530）中自夸道：“论起辩证法与哲学，他们加在一起也不如我。”当他意识到人文主义在致力于变革方面具有局限性时，就与之分道扬镳。他对伊拉斯谟说：“无论什么地方的什么人，不论其信仰是什么，只要世界的平静不受破坏，对你来说就无所谓。”然而，人文主义已经为路德主义提供了改造宗教的智识工具。它也为路德提供了将其新思想传播到欧洲各地的实物：印刷出版术。

1522年，路德在论及其思想的流布之时声称：“我什么也没做；一切都是《圣经》之所为。”他说的对。传播《圣经》的正是印刷这一媒介。从前那些教廷权威的挑战者无力向更广大的受众传播他们的思想，然而，印刷出版技术使路德得以通过数以千计的印刷书籍、宣传单和小册子传播自己的思想。德意志各邦地处欧洲的地理和技术中心，也正是输出宗教革命的理想之地。到了1520年，有62个德意志城市拥有印刷出版机构。从1517到1524年，这些城市出版的印刷本书籍数量增长了7倍。印刷产品增长这么快的原因之一在于路德本人。他很快就意识到了印刷出版的激进潜力，称它为“上帝最高和最大的恩典，福音的事业借此向前推进”。1517到1520年间，路德写了30多本小册子，印数超过30万份。一位佩服他的朋友声称：“路德这个人能让两个同时操作两部印刷机的印刷工忙得不可开交。”路德还

认识到，真正有力量传播《圣经》的是本民族语言，而不是教会上层使用的拉丁语。到1575年，据估计，他印刷出版的德文《圣经》译本行销了10万册。有人进一步估计，在1518至1525年间，他著作的销售量占据所有德文书籍的三分之一。至1530年，路德已成为这段短暂印刷史上的第一位畅销作家。

路德主义产生于欧洲的贸易、金融和政治重心逐渐北移之际。到16世纪初，安特卫普正取代威尼斯成为欧洲的贸易之都，而诞生路德主义的德意志各邦也正打造其新的政治身份。到16世纪末，这些新的政治身份将造就出具有现代气象的欧洲版图。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通过王位世袭成为西班牙、那不勒斯、尼德兰和新世界的共主，到了1519年，奥地利也被纳入他的治下。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欧洲各地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政治角力；查理、弗兰西斯一世、亨利八世还有葡萄牙的约翰三世与苏丹苏莱曼相互争夺领土和政治控制权，意大利各城邦沦为任由各方讨价还价的筹码。民族主义起义的种子也开始在北欧萌发，而在东方，查理面对着苏莱曼势不可挡的帝国力量。1521年苏莱曼征服了贝尔格莱德，1529年围困维也纳。路德主义的兴起更加剧了查理的困境。

查理很精明，他不想因为开除一个僧侣的教籍而疏远他的德意志盟友。不过，在路德亲自向皇帝本人坚定不移地声称说“我不能而且不会收回自己说过的话，因为违背良知既有害也不正确”之后，查理骂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异端分子”。德意志各邦抵制教廷摧毁“新教”的要求。这始自1529年，当时一群德意志王公“反对”教廷号令他们谴责路德主义。查理的注意力被管理海外属地给分散了，同时他还得应付另一个难题：苏莱曼大帝的幽灵在敲击他帝国的大门。

1529年之时，苏莱曼的帝国疆域已经横跨北非、地中海和东欧大部分地区，而且他还与查理的敌人弗兰西斯一世结盟。就在奥斯曼土耳其人作为政治劲敌与查理分庭抗礼之际，他们的信仰也于16世纪20年代日益两极分化的宗教氛围下成为一个议题。与弗兰西斯一样，路德及其追随者考虑可否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结成战略联盟，以抗衡查理的哈布斯堡帝国。路德研究了《古兰经》，并参与出版了几部有关伊

斯兰教的德文著作。形形色色的路德派小册子作家发出“找敌人要去意大利，不要去东方！”的呼吁。路德对此谨慎地表示赞同：“如果我们一定要同土耳其开战的话，我们应当先与自己开战。”这就暗示说，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是上帝的旨意，是要令天主教皇帝和教皇不得安生。苏莱曼也认识到，路德主义可以牵制哈布斯堡王朝，使其无法全力应对东方的军事威胁，这对奥斯曼土耳其很有利。伊斯兰教和新教都意识到，在神学上，它们信奉经文自身的力量和反对偶像崇拜，在16世纪中叶那个变化无常的年代，这为它们政治修好提供了明显的可能性。

查理五世在意识形态上可没有这么灵活。他所承继的王朝遗产是以1492年犹太人和摩尔人被逐出西班牙为基础的。他和他的顾问们很快就深信，路德与苏莱曼是一丘之貉，都是必须加以铲除的“异端分子”。1523年，教廷派驻纽伦堡的使节写道：“我们正忙于谈判，准备向土耳其人全面开战，而且还要向那邪恶的马丁·路德开战；与土耳其人相比，此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危害更大。”1530年，红衣主教坎佩焦（Campeggio）在写给查理的信中说，（对于）路德的“邪恶与异端主张……应当遵照在西班牙对付摩尔人的规矩和做法，予以申斥和惩罚”。

随着宗教改革的热忱与掌控全球政治权力日益膨胀的野心发生碰撞，宗教迫害越来越激化。犹太社群在欧洲已经居住了数百年，虽说他们曾在1290年被官方驱逐出英格兰，又于149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然而，在当前宗教立场两极分化的时代，犹太人不久就发现，他们既受天主教徒的迫害，也受新教教徒的迫害；他们被指控犯下了种种罪行，从井水投毒到谋杀基督徒幼儿，不一而足。1555年，教皇保罗四世（Paul Ⅳ）颁布诏书攻击犹太人的信仰，声称教会之所以“容忍犹太人只是为了让他们见证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犹太人可以改宗天主教，否则不允许他们拥有财产，只让他们居住在犹太人隔离区，并且必须佩戴标志着耻辱的黄色标识。新教也不见得更宽容。1514年，路德声称：“犹太人将永远亵渎上帝和他所立的王——耶稣。”他后来又称：“我宁愿与土耳其人为敌也不愿以西班牙人为保护者：土

耳其人固然是野蛮的暴君，然而，绝大部分西班牙人一半是摩尔人，一半是犹太人，他们可都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反过来，西班牙天主教徒则认为新教徒是异端，可与穆斯林和犹太人相提并论。随着天主教对路德主义的威胁作出反应，以及新教试图在神学上与其他宗教划清界线，以此来界定自身，两者越来越多地攻击本书提到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后二者都反对耶稣是上帝之子这一信念。

这些冲突也改变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形态。随着罗马教廷感觉到它的政治权力逐渐被削弱，它的对策是，极尽铺张地炫耀艺术和建筑，试图以此重新确立它的权威。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的艺术作品中显示出了这种张力。米开朗琪罗受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委托，为装点西斯廷教堂绘制了壁画，画中场景取材于《圣经》中的《创世记》，它基于罗马天主教教义展现出了一幅完整的创世景象。画面体现出的那种优雅的动态，以及画中人物孔武有力、紧绷的肌肉，也理想化地描绘了罗马天主教的力量以及它受到质疑之时可能发出的愤怒。这种张力也见于拉斐尔为梵蒂冈的康斯坦丁美术馆创作的壁画。壁画描绘了康斯坦丁皇帝的生平，以及教会的权力从东方（康斯坦丁的帝都君士坦丁堡）转移到西方（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

这组壁画最后的场景题为《康斯坦丁的惠赐》，表现了东罗马帝国皇帝康斯坦丁将他的世俗和帝国的权力移交给教皇的场面。教皇头戴三重冕，显示出他的宗教以及世俗权力。就在拉斐尔于康斯坦丁美术馆开始壁画创作的几个月后，路德写道：

> 我手上有洛伦佐·瓦拉的证据，它证明《康斯坦丁惠赐书》系后人伪作。天哪，罗马该有多么黑暗和邪恶。这样一种毫无根据、粗俗无耻的谎言不仅存在，而且盛行几百年之久，这让人怀疑上帝的判断力。

瓦拉的这部辨伪之作于1517年首次在德意志付梓，加入了罗马天主教会日渐增多的攻击者行列。康斯坦丁美术馆的壁画对形象高大的教皇、纷争的教派的描绘，以及它表现教廷权威的戏剧性场面，是针对宗教和政治变迁所作出的咄咄逼人、人为矫饰和焦虑不安的反应。北

方的印刷“文字”[3] 正在战胜南方高耸入云的纪念碑和色彩斑斓的壁画。

图11 壁画《康斯坦丁的惠赐》由拉斐尔的工作室于1523至1524年间在梵蒂冈绘成。宗教冲突造就了它帝权的主题和人为矫饰、咄咄逼人的风格

帝国的反击

罗马教会很快就意识到，辉煌灿烂的艺术作品无法解决北欧新教异军崛起所带来的问题。1545年，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召集特伦托公会议，以改革教会和驳斥路德主义。在此后的18年中，公会议起草了许多教令，构成了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基础。这次会议重申了七宗圣礼、圣餐变体论、炼狱以及教廷权威的神圣性。它认可对圣徒、圣迹的尊崇，赞成购买赎罪券，但同时也改革了激怒路德的种种弊病。修道会进行了改造，培养教士的神学院建立起来，主教们被

要求在教区管理上更为积极主动。在这次公会议的支持下，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领导的耶稣会于1540年成立（它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耶稣会士修道会），搜捕异端分子和宗教改革者的罗马宗教裁判所于1542年成立。

这次公会议也将注意力转移到新教宗教改革最有害的载体——印刷书籍——上来。1563年，它发布了一份禁书目录，目录上的书都被视为“异端”。它宣称，“如果有人阅读或收藏异端分子的书籍，或者任何因为思想异端或有学说虚妄嫌疑而遭谴责和禁止的作者所写的著作，立即革除他的教籍”。禁书目录收入数以千计的书籍，以路德、茨温利（Zwingli）和加尔文的著作为开端，但也包括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和伊拉斯谟的部分作品。特伦托公会议间接承认了印刷书籍的力量（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资助天主教的印刷出版机构来出版正统典籍），可这一承认的代价却是现代大规模书刊审查制度的最早一次尝试。

特伦托公会议是改革、虔敬、好战和压制等成分狂热的混合，这一混合非常成功。据估算，到16世纪末，由于反宗教改革运动的缘故，罗马教会失去的几近三分之一的俗人信徒又返回了教会。然而，它对待宗教仪式、书籍乃至偶像的态度使得16世纪后半期的宗教版图进一步两极分化。特伦托公会议加深了新教与天主教的意识形态鸿沟，并在此过程中为这个世纪后半叶重新绘制了欧洲图景的宗教战争铺平了道路。

在1400年，欧洲还是轮廓模糊的、城邦与公国的集合，还谈不上“欧罗巴”实体，到了1600年，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民族国家与正在兴起的全球性帝国主导了政治议程，东西方之间流动性的宗教交往已经硬结为天主教、新教和伊斯兰教规划性的信仰体系。这标志着现代国家体制的诞生以及与之相伴的民族主义的崛起。在此后的300年里，欧洲的帝国列强将对全球新发现的大部分地区提出主权要求。不过，这一时期留给后世的遗产还有一系列看似无法解决的宗教和政治冲突，这些冲突发生的地域千差万别，从爱尔兰、巴尔干到中东，它们源头则在于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教会与国家的碰撞。

注释

〔1〕 此处应为教皇尼古拉五世（1447—1455在位），而非马丁五世（1417—1431在位），疑为作者之误。

〔2〕 三贤指《圣经》中由东方来朝见初生耶稣的三贤人，the Magi也可以翻译成“东方三博士”。

〔3〕 指《圣经》。

第四章

美丽新世界

1482年，德意志城镇乌尔姆的一家印刷出版机构出版了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新版。书中的世界地图记录了15世纪欧洲统治阶层眼中的世界面貌。托勒密于公元2世纪在亚历山大写出《地理学指南》一书。14世纪末，此书被译成拉丁文，在此之前，阿拉伯学者保存和修订了这个本子。中世纪基督教的地理学局限于使用简明示意地图，即“世界地图”（*mappae mundi*），这类地图是基督教神造论的宗教象征。它们以耶路撒冷为世界中心，极少或根本无意于理解或再现更广阔的世界。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改造了15世纪人对于地球的形状和大小的认识。他的著作罗列和描述了8,000多个地方，还解释了如何绘制区域性和世界地图。托勒密利用经线和纬线交叉形成的几何坐标方格来覆盖已知世界，这一网格为15、16世纪的商业贸易和地理发现航行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样板。这些航行开始塑造今日世界的现代形象，也构成了本章内容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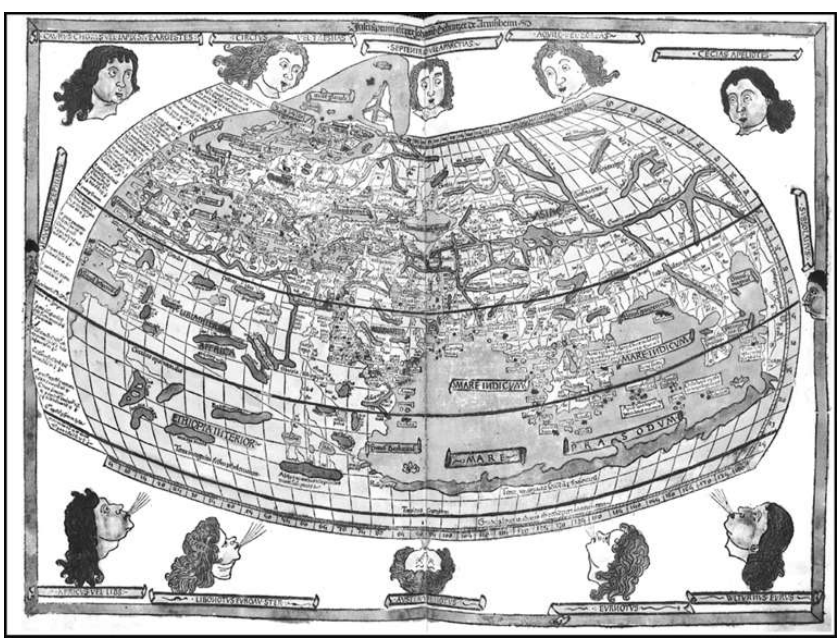

图12　托勒密的世界地图，出自1482年乌尔姆出版的托勒密经典名作《地理学指南》的一个新版

在15世纪末的统治者或商人看来，乌尔姆版的托勒密著作还算准确地再现了当时的世界。“欧罗巴”与地中海，“非洲”与“亚洲”都一目了然。今天看来，它的错误在于遗漏了美洲大陆、澳大拉西亚、太平洋、大西洋的主体部分，以及非洲最南端（没有它印度洋就给绘成了一个大湖）。托勒密的世界以地中海东岸和中亚、以君士坦丁堡、巴格达和亚历山大等城市为中心。这些地点体现了自公元2世纪一直到15世纪结束之际受教育人士眼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现实。

购置《地理学指南》的有王公贵族、神职人员、学者和商人。他们买下托勒密著作昂贵的手稿本，急于显示自己对地理学和旅行的认识。然而，14世纪保存下来的各种实用地图却表现了塑造文艺复兴世界的那个混杂文化传统。出自无名氏之手的《马格里布航海图》绘制时间大致是在1330年左右，它便是所谓“航海指南”图的一个实例，商人和航海者使用这种航海图航行于地中海上。地图上纵横交叉的“恒向线”有助于罗盘定向，让航海者可以沿着大致准确的航线航行。这幅航海图的制作地点要么是格拉纳达，要么是摩洛哥，显示了基督教与穆斯林社会在地理知识、航海技术和商业贸易方面的相互交流。在地图所标示的202个地名当中，有48个源于阿拉伯语，其余的源于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或意大利语。正是这类基于阿拉伯、犹太和基督教航海者与学者专业知识的实用性航海图促成了那些首批驶向欧洲之外的试探性航海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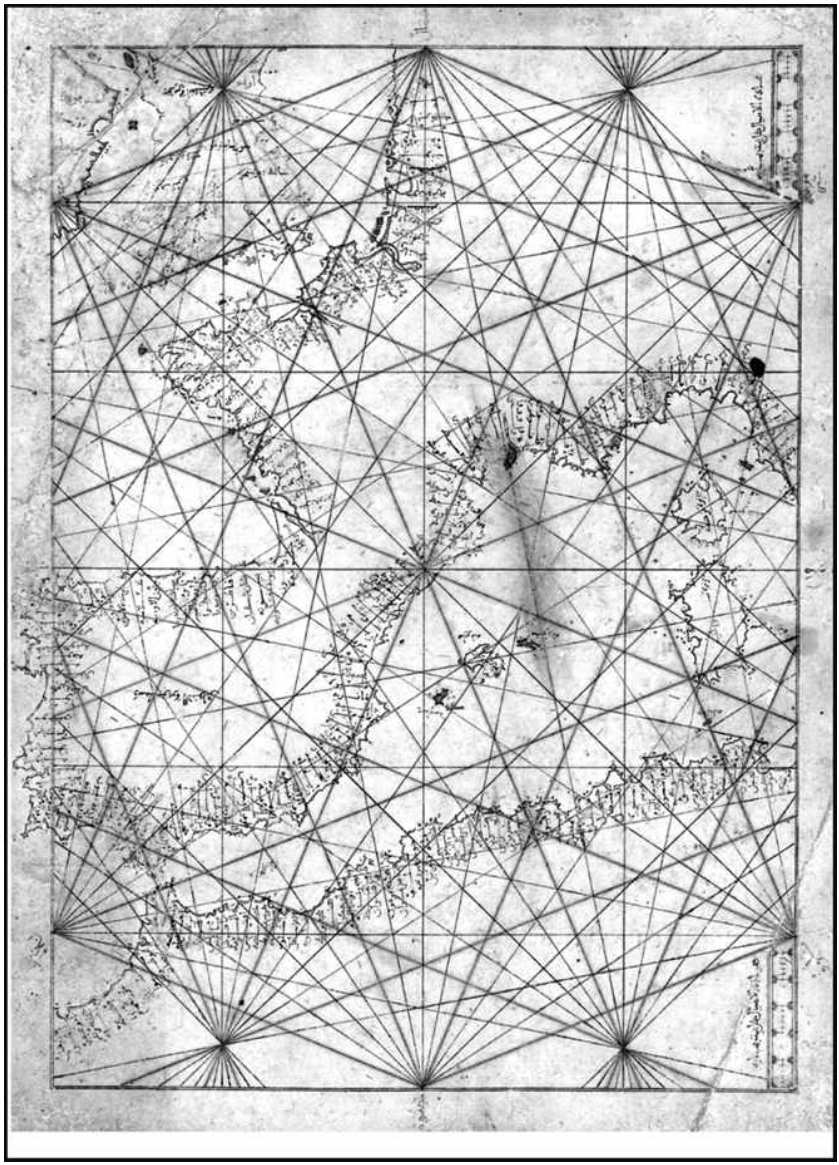

图13　这张航海图或所谓的“航海指南”《马格里布航海图》，大约是在1330年左右于北非绘成，显示东西方共享的航海知识是如何造就了地中海地区的航海活动的

绕过好望角

1415年，葡萄牙人攻占了摩洛哥境内的穆斯林城市休达。这一胜利为葡萄牙沿着西非海岸扩张提供了跳板。葡萄牙王室利用它面临大西洋的地理优势，试图打通穿越撒哈拉的商路，不再走从北非返回南欧的陆地和海上商路，从而避免支付沉重的关税。随着葡萄牙王室宣称拥有马德拉群岛（1420）、亚速尔群岛（1439）和佛得角群岛（15世纪60年代）的领土主权，诸如木材、蔗糖、鱼类和小麦等基本物资的贸易变得比充满冒险性的淘金活动更为重要。这就导致葡萄牙王室开始重新界定其航海发现与移民定居的目的。

葡萄牙人在亚速尔群岛一站稳脚跟就向南航行，进入航海图上尚未标明的地带，也就是托勒密地图上标注的“不明地区”。他们到达了地中海地区的航海与制图传统的极限之后，就雇用犹太学者为之效力，研制太阳升落表、星图、星盘、扇形舵柄和十字测天仪，根据太阳、月亮和星体的位置来计算纬度。到了15世纪80年代，这些科学发展如此之成功，以至葡萄牙人得以绕过塞拉利昂，沿着几内亚海岸建立起了贸易站（即*feitoria*）。

由这些科学发展而带来的商业接触明显影响到西非、葡萄牙以及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与经济。民众之间的交往融合使得西非产生了许多种族混杂的自治社群，它们被称为“兰萨多斯”（*lançados*）。铜、马和布匹也被欧洲人贩到这里，用于购买黄金、胡椒、象牙和乌木。到了15世纪末，运回里斯本的大量黄金使得葡萄牙能够发行第一枚全国通用的金币“克鲁扎多”（*crusado*），也让它得以启动一项雄心勃勃的公共建设计划；这一计划融合了古典的、莫卧儿的和波斯的主题，直到今天，在里斯本、果阿和澳门等天南海北的地方还可以见其踪迹。

1488年12月，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z）返回里斯本，宣称他已航行绕过了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同时代的一位葡萄牙地理学家记载说，迪亚斯意识到“这里的海岸转向北方和东北方向，指向埃及以南的埃塞俄比亚，进而指向阿拉伯湾，这就为发现印度提

供了绝大的希望”。因此迪亚斯“称之为‘好望角’”。这条消息让那些依旧重复托勒密世界观的地图显得日渐落伍。从这时起，欧洲航海者才真正驶入“不明地带”；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他们再也无法依赖古典的权威。

东方就是东方

有一位旁观者对这些发现的印象尤为深刻，他就是热那亚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当迪亚斯带着绕过好望角的消息返回之时，他正在葡萄牙的宫廷。哥伦布关注葡萄牙航海家的实际成就，也潜心研究过古典地理学，这一切促使他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哥伦布接受了托勒密和马可·波罗（Marco Polo）对亚洲面积远远过高的估计。但他也认识到，如果托勒密估算的世界周长是正确的话，那么，从欧洲向西至亚洲这段航程，要比葡萄牙人自南向东这条路线短得多。根据哥伦布的计算，从亚速尔群岛向西到日本的距离为3,000英里，而实际航程超过1万英里。托勒密对亚洲和地球大小的计算都是错误的。要是哥伦布知道这一点，他可能就永远不会在1492年踏上他的航程了。

1485年，哥伦布首先向葡萄牙宫廷提出这一想法，但他的计划遭到拒绝，因为里斯本已成功地找到了经由南部非洲通往东方的海路。于是哥伦布就向卡斯蒂利亚王室提出他的方案。当时卡斯蒂利亚正陷于与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持续不断的争斗中，财政相当紧张。垄断东方香料和黄金市场的可能性实在太诱人，绝不容失去，于是他们就向哥伦布提供资金支持。1492年8月2日，哥伦布带领90名船员和3艘船，从西班牙南部的帕洛斯出发，开始了他的首次航行。

船队横渡大西洋，向西航行将近两个月后，在10月10日星斯四，哥伦布看到了巴哈马群岛，他就在这里登陆上岸，遇到了当地人。这些人“身体健壮，身材漂亮，面孔很好看”，被视作“出色的仆人，而且头脑灵活”。哥伦布急于“动身前往另一个非常大的岛屿，根据我带在身边的印度人所做的手势语，我相信它一定是Cipangu（日本）；他

们称它为Colba”。哥伦布深信他行将到达日本。结果Colba其实是古巴。他沿着古巴和海地的海岸航行，后来他的旗舰失事，他就带着少量黄金和几个绑架来的“印度人”返航了。

哥伦布的返航在欧洲引起了一场外交风暴。这倒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他始终相信他向西航行到了东方。葡萄牙反对说，卡斯蒂利亚王室资助的这次远航破坏了两国先前签署的协议，这份协议保证葡萄牙独占“几内亚那一边”的所有发现地。然而，由于这一说法措词模糊，再加上一位同情卡斯蒂利亚王室的西班牙籍教皇出面斡旋，按照《托德西利亚斯条约》（1494）的条款，新发现地给了卡斯蒂利亚王国。该条约还规定，应当绘制一张地图，在地图上标出分界线，明确规定两家王室的利益范围。双方代表同意，沿着大西洋从北到南，“在佛得角以西370里格的地方，确定和绘制一条分界直线”。这条线以西的地方属于卡斯蒂利亚，这条线以东（和以南）的地方属于葡萄牙。卡斯蒂利亚得到了它所认为的通往东方的新航线，而葡萄牙人守住了他们在非洲的领地，以及经由好望角通往东方的航道。

王冠上的宝石

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被认为是失败之举。他似乎是发现了一个新的地理障碍，阻塞了一条更短的、商业上有利可图的通向东方的航线。由于哥伦布的航行以及后来的外交纠纷，葡萄牙人未能及时利用迪亚斯发现好望角这一成果，于是，他们这时派出另一支远征船队，绕过好望角，其目的很明确：到达印度。1497年7月，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170人，带着由4艘重型船只组成的船队，离开了里斯本，每艘船配备了20门大炮和各种货物。当他绕过好望角之际，达伽马发现自己进入了航海图上完全没有标注的水域。更糟糕的是，葡萄牙人的航海辅助设备主要仰仗天体计算，然而，在他们不熟悉的印度洋的天空下，这些辅助设备毫无用处。

在马林迪登陆之后，达伽马雇请了一位阿拉伯航海家兼天文学家为自己效力，此人被视为当时最出色的一位领航员：

> 瓦斯科·达伽马与他谈了一番话之后，对他的知识非常满意：主要原因是，当此人（领航员）向他展示一张根据摩尔人的方式绘制的、带着经线和纬线的印度海岸全景航海图之时……还有，当达伽马向他展示带在身边的一幅木制大星盘以及用于测量太阳高度的其他金属制星盘时，这位领航员并没有表现出吃惊的样子；他说，红海的一些航海者使用三角形的黄铜仪器和扇形舵柄来测量太阳高度，更主要测量北极星的高度，北极星是他们航海中最常用的标识物。

这些技术欧洲航海者闻所未闻。犹太人的天文知识带领他们远至好望角，现在伊斯兰的航海技术将最终帮助他们到达印度。

这位阿拉伯领航员不仅为达伽马提供了穿越印度洋所需要的航海知识，他还不知不觉地透露了阿拉伯人的科学与天文学成就有多么全面。正如托勒密有关地理学和天文学的典籍已从亚历山大传播到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德意志和葡萄牙，它们也经由大马士革、巴格达和撒马尔罕向东传播。征服者穆罕默德推崇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所体现的只是伊斯兰教天文学和地理学深厚传统的一个方面。1513年，奥斯曼帝国海军指挥官皮里·赖斯（Piri Reis）颁布了一幅世界地图，声称这幅地图的绘制“主要基于20幅航海图和世界地图，其中一幅绘制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通常叫作*dja'grafiye*。这里提到了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皮里·赖斯也参考了“中国和印度海域的新地图”，还有“阿拉伯人绘制的一幅印度地图、葡萄牙人按照印度和中国的几何学方法绘制的四幅新地图，以及哥伦布绘制的西方陆地地图”。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宫廷显然正密切注视着西大西洋的事态发展。

皮里·赖斯的地图只有西方部分保存了下来，然而，它的局部表明，该地图印度洋的那一部分，结合了葡萄牙的新版地图与伊斯兰、印度和中国的领航员与学者的天文学和航海知识，一定也同西方部分一样全面。皮里·赖斯的注解突出了当时文化交流与知识传播的广泛程度，而这正构成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基础。穆斯林、印度教徒和基督

教徒都在相互交流信息和思想，试图掌握政治与商业主动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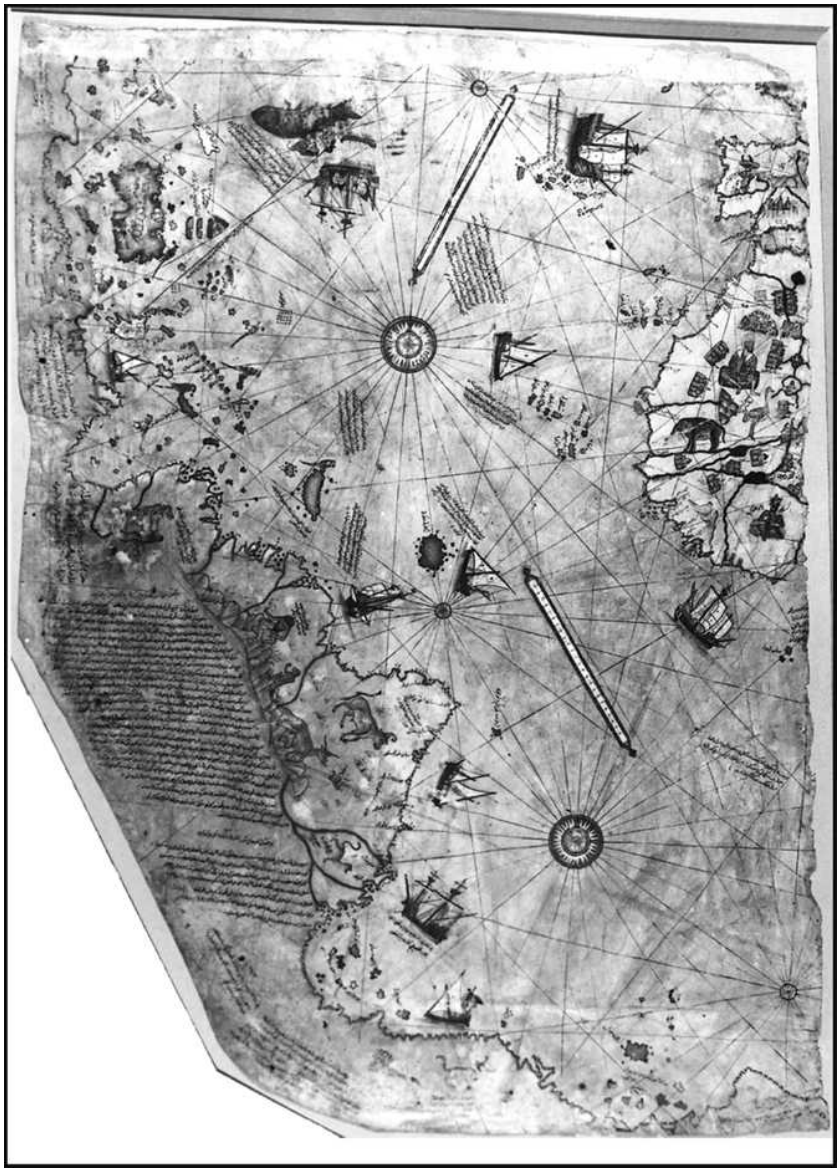

图14　皮里·赖斯的世界地图（1513）表明东西方之间地理信息的交流情况

就航海方面而言，达伽马和他的远征队都深信，他们正在驶入一

个新世界。他们很快就发现，就文化而言，他们正进入一个熟悉得令人吃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的人看来，他们肮脏、强暴而且科技落后。1498年5月，达伽马到达印度南部沿海的卡利卡特，然而，他携带的礼物更适合在几内亚进行交易，而不是礼节性地赠送给卡利卡特考究的萨莫林宫廷。当地的商人看到达伽马拿出布匹、珊瑚、食糖、橄榄油和蜂蜜等各色赠品时，“他们对此感到可笑，他们说，这可不是奉送国王的东西，从麦加或印度任何地方来的商人，哪怕是最穷的，出手都比这阔绰”。由于未能奉送合适的礼物导致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葡萄牙人受到限制，只能从事有限的易货贸易。不过，在1499年9月，当达伽马回到里斯本，向王室奉上数量虽少但却珍贵的肉桂、丁香、姜、肉豆蔻、胡椒、药品、宝石以及木材等货物时，葡萄牙宫廷确信他们最终打入了香料市场。

葡萄牙进入印度洋的贸易大市场，无异于一滴水落入汪洋。这一地区仪式化的商贸交易模式，以及其商品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令早年葡萄牙船队的供求量相形见绌。葡萄牙人的对策是，他们从实用角度出发，迁就和接受不同的交易方法，利用印度教与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分歧，更使用枪炮在整个地区建立起数量有限的商业立脚点。然而，欧洲的地图、书籍和外交会谈却传说达伽马的航行确立了葡萄牙垄断亚洲香料贸易的地位。

这位葡萄牙指挥官的航行产生的影响，将改变文艺复兴世界的政治版图。很快，威尼斯就试图暗中破坏葡萄牙人与印度香料商的会谈。印度香料商已经到了里斯本，准备洽谈葡萄牙在香料贸易中的角色。威尼斯还开始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埃及的马穆鲁克人商谈，打算外交与武力并用，捍卫自己的商业利益。1511年，葡萄牙作出反应。他们与波斯统治者伊斯梅尔（Shah Ismail）谈判，准备联手向埃及发动军事进攻。这一举动势将切断威尼斯的香料供应，并有助于伊斯梅尔同奥斯曼作战。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经常发生的那样，每当贸易与财富处于危难，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就涣然冰释。

全球探险之旅

到了1502年，海上航行的第一个重要阶段达到了高峰。托勒密的世界图景已被打碎，清晰可辨的世界现代形象已经开始浮现。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大陆，到达了印度；他们在前往东方的途中意外地发现了巴西（1500），并向马六甲（1511）、霍尔木兹（1513）、中国（1514）和日本（1543）推进。往西，哥伦布三次美洲之行开辟了兴旺发达的黄金、白银和奴隶贸易。从1497到1502年，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四次远航，他证明了哥伦布发现的是一块新大陆。阿梅里戈通过印刷出版物四处传播他的发现，由此令得欧洲人将他而不是哥伦布与这片新大陆联系在了一起，将之称为“亚美利加”。卡斯蒂利亚现在宣称自己占有了单独的一块大陆，还有一个有待打造的帝国，这个帝国足以抗衡它在伊比利亚半岛的邻居——葡萄牙。

就在欧洲人的地理想象遭到修正的同时，他们日常生活的构造也发生了转变。源源不断运回欧洲的香料影响了人们饮食的内容和方式，椰子、柑橘、山药和香蕉（从东方），菠萝、落花生、番木瓜和土豆（从美洲大陆）的输入，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香料”一词也可用于指一系列品种繁多、令人目眩的药材（包括鸦片、樟脑和大麻）、蜂蜡、食糖和化妆品。丝绸、棉花和丝绒改变了欧洲人的衣着，麝香和灵猫香改变了他们的嗅觉。靛蓝、朱砂、紫胶、藏红花和明矾等染料为欧洲增添了亮色，而瓷器、琥珀、乌木、檀香木、象牙、竹子和上漆的木制品，这一切都改造了富人公共场所和家庭的室内布置。欧洲也从东西方各地运回了诸多仅流行于小圈子、但备受珍视的货物，郁金香、鹦鹉、犀牛、象棋用具、性具和烟草只是其中的一些。里斯本摇身一变，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在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买不到的。王公的珍品室里陈列着珠宝、盔甲、雕像、绘画、牛黄石，甚至还有鹦鹉、猴子和马匹。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兴致勃勃地罗列了他弄到的非洲盐碟、中国瓷器、檀香木、鹦鹉以及印度的椰子和羽毛。

1513年，葡萄牙人最终于到达了摩鹿加，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群岛中由少数岛屿组成的岛群，专门出产丁香。这一发现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自从《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签定以来，葡萄牙一直在东方追求它的商业利益，而卡斯蒂利亚一心向西方扩张。按照显然为《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所使用的平面地图上绘制的界线，这样做还说得过去。可是，摩鹿加群岛的发现却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沿着地球仪环绕世界一圈来划界，那么这条界线应该落在东半球的何地。

这时葡萄牙领航员费尔南·德·马加良斯（Fernão de Magalhães）登场了，今天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费迪南德·麦哲伦。他猜想，如果向西开辟一条通往摩鹿加群岛的路线，这条路线是否会短于葡萄牙人环绕好望角的那条航线。可是，就在麦哲伦重新拾起最早由哥伦布提出的、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东方的想法之时，他遇到了一个问题：葡萄牙人反对这项计划；于是他向卡斯蒂利亚国王（未来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帝查理五世）呈递了这份方案。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业计划，需要对远航作出投资，它是体现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导致“地理发现”的航行动机的典型例证。麦哲伦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环游地球。他建议向西航行到摩鹿加群岛，再经由南美洲返回。根据外交和地理的先例，这样就可以宣称摩鹿加群岛归卡斯蒂利亚，切断葡萄牙上等香料的供应，从而将里斯本的财富转到卡斯蒂利亚的囊中。麦哲伦为拿到赞助资金所作的成功的游说是以地球是圆的为基础的。1519年他到达塞维利亚，随身带着“一个精心绘制的、显示了世界全景的地球仪，地球仪上还勾画出准备航行的路线”。此时，最能准确反映16世纪政治和商业地理面貌的，不是地图，而是地球仪。

麦哲伦很快就说服了卡斯蒂利亚王室。1519年9月他扬帆起航。在沿着南美海岸航行的过程中，麦哲伦不得不镇压水手哗变，而在寻找途径穿过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南美洲南端的海峡之时，他又损失了两艘船。他花上了数周时间穿越太平洋，这个大洋比他地图上标明的要大得多。船队最终于1521年4月到达菲律宾群岛的三描岛，就在这里，麦哲伦与当地人发生了一起小规模冲突，结果连同他的40名水手一起被当地人杀死。船队的剩余人员再次启航，最终到达摩鹿加群

岛，他们在此地将丁香、胡椒、姜、肉豆蔻和檀香木装满船只。由于无法按照原计划经由麦哲伦海峡返航，全体船员同意经过好望角返回，尽管这样做有被葡萄牙巡逻船只俘获的危险。他们的决定造就了世界历史。在1522年9月8日，最初的240名船员中只有18名回到了塞维利亚，他们完成了有历史记录的首次环球航行。

麦哲伦航行的消息在外交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查理五世立即将这次航行视为摩鹿加群岛属于他控制的半球之内的证明。他的幕僚们开始从外交和地理上寻找依据，以期获取这块属地的所有权。卡斯蒂利亚人聪明地利用了经典权威来支持自己的主权要求。托勒密对亚洲面积的过高估计让他们占了便宜。卡斯蒂利亚王室在他们的地图中重复了有失准确的亚洲的跨度，从而使摩鹿加群岛东移，落入应由他们掌控的半球。在卡斯蒂利亚人提交的地图和地球仪上，“托勒密的描述和数字，与那些从香料产地返回的人新近带回的描述和模型是一样的……因此，苏门答腊岛、马六甲群岛和摩鹿加群岛都落入我们的界内”。

1529年，正当两国王室在萨拉戈萨坐下来试图最终解决纠纷之际，卡斯蒂利亚王室雇请葡萄牙地图绘制员迪奥戈·里贝罗（Diogo Ribeiro）制作了一系列将摩鹿加群岛纳入卡斯蒂利亚王室控制的半球之内的地图和地球仪。从这时起，文艺复兴世界开始在比较明确的现代意义上具有全球性。麦哲伦远航产生的影响意味着地球仪对世界形状和面积的再现要远为具有说服力。

尽管这类地球仪并未流传下来，但是，出自里贝罗之手、标为1529年的世界地图却保存了下来，证实了这场以操纵地理现实为特征的纠纷。里贝罗把摩鹿加群岛置于《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所规定的分界线以西、西经172.5度的地方，只差7.5度就超出卡斯蒂利亚王室的势力范围。这张地图为查理五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谈判筹码。他把摩鹿加群岛的专属权回售给不幸的葡萄牙人。查理五世实际上已经意识到，眼前的现金要比长远的商业投资更为可取，因为向西建立一条通往摩鹿加的贸易航线需要巨大的成本和庞大的后勤供应。里贝罗成为卡斯蒂利亚王室最尊崇的地图绘制员；他早已料到，自己在地理上耍

弄的诡计绝不会被人戳穿，因为在无法精确计算经度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准确地锁定摩鹿加群岛的位置。

新世界，老故事

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源源不断注入查理的哈布斯堡帝国金库的金银开始令东方香料贸易的收入相形见绌。葡萄牙在东方各地建立需要新的商贸和交易机制的贸易站，西班牙则使用武力将美洲变成一个巨大的贩奴和采矿殖民地。

图15　迪奥戈·里贝罗于1529年绘制的球体投影图操纵了地理知识，将摩鹿加群岛置于哈布斯堡王朝所控制的半球之内

1521年，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do Cortes）到达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今天的墨西哥城）；他系统地摧毁了这座城市，杀死了其大部分居民，包括皇帝蒙提祖马二世（Montezuma II）。1533年，冒险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带领数目寥寥的一帮征服人马占领了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位于今天的秘鲁）。当地人几乎没有商业或军事力量来对抗西班牙人的残暴掠夺；西班牙人在他们征服的地区强制推行一种准封建性的管辖方式，即所谓的“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根据这种制度，人数不多的土著居民被分配给西班牙监护人管辖，西班牙监护人为他

们安排了残酷的剥削性质的“生计”（实际上是强迫性的无报酬苦工）和基督教教育。

据保守估计，在1500年全世界近4亿人口中，约有8,000万居住在美洲大陆。到了1550年，美洲的人口只剩下1,000万。在16世纪初，据估计墨西哥的人口有2,500万，到了1600年，骤降到100万。诸如天花和麻疹等欧洲传来的疾病灭绝了大部分土著人口，可是战争、屠杀和残酷虐待也是许多人死于非命的原因。发现金山银山的浪漫传奇很快转变为肮脏血腥的采矿和蓄奴勾当。

西班牙对美洲的剥削直接影响了欧洲经济。最初，殖民者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即海地岛）和中美洲将黄金源源不断地运回欧洲。然而，征服墨西哥和秘鲁很快就使得白银开采占据了上风。1543至1548年间，墨西哥城以北的萨卡特卡斯和瓜纳华托发现了白银矿床；1543年，西班牙人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发现了那座恶名昭彰的塔糖状银山。随着汞齐化法的发现，决定性的突破在1555年出现；用水银熔化白银矿石可以提炼出纯度高得多的白银。其结果是海量的白银流入欧洲。到16世纪末，每年有超过27万公斤的白银和近2,000公斤黄金运抵欧洲，令得通货膨胀加剧。由于工资水准和生活成本飙升，造成了经济史家所说的“价格革命”，为欧洲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框架。

美洲的矿山和种植园需要工人，而当地人口又大量死亡，很快地这就意味着西班牙人需要另辟劳动力来源。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奴隶。1510年卡斯蒂利亚国王费迪南德（Ferdinand of Castile）批准从非洲进口50名奴隶，运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矿山。1518年，阿隆索·苏亚索（Alonso Zuazo）从那里给查理五世写信，对印第安人的工作效率表示忧虑。他建议“进口黑奴（*negros*），他们是这里的理想干活人选，与土著形成明显对照，土著人衰弱无力，只适合干轻活”。从1529到1537年，卡斯蒂利亚王室颁发了360张许可证，允许从非洲往新世界贩奴。这些非洲奴隶，有的是被绑架来的，有的是葡萄牙“商人”以50比索一个的价格在西非买来的，他们被塞上船运往新世界，文艺复兴时期最可耻的特色之一由此而产生。在新世界，这些非

洲奴隶以高出购买价一倍的价格被卖到矿山和种植园干活。从1525到1550年，有将近4万名奴隶被从非洲运往美洲；奴隶贸易富了欧洲，却带给了非洲社会毁灭性打击。

并非所有的西班牙人都赞成在美洲的屠杀和压迫行为。方济各会修士弗雷·莫托利尼阿（Fray Motolinia）认为，“如果有人问我，造成这么多罪孽的原因是什么？我会回答：贪婪”。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也认为，“我不是说他们是出于憎恨想杀死他们（印第安人）；他们杀人是因为想要发财，想要得到许多黄金”。在哲学上，新世界的发现也改变了欧洲人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认识。人文主义者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1580年出版的《随笔集》中《论食人生番》一文里声称，他曾与几位巴西的印第安人详谈过。他的结论是，“在这些民族身上并没有不开化或野蛮的东西，只不过每个人都把自己不习惯的东西称作野蛮”。蒙田发展出一种具有高度怀疑精神和相对主义的方法来看待“文明”和“野蛮”；他认为，“根据理性的原则，我们固然可以称这些人为野蛮人，可是，与自身进行比较时我们却无法这么做；就每一种野蛮行径而言，我们都超过他们”。

美洲的发现给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世界图景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它使得根深蒂固的古典哲学和宗教信仰变得混乱；这些信仰与土著居民的文化、语言和信仰体系是凿枘不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界定了欧洲从中世纪世界向面貌更为清晰的现代世界的转变。然而，美洲的发现将欧洲人对未知新事物的变化无常的恐惧与追求无限财富的贪欲结合起来，这种欲望无视美洲土著人和奴隶承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和压迫。直到今天，它的影响还可见于许多南美国家的贫困和政治动荡之中，以及构成现代全球经济特点的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之中。

第五章
科学与哲学

来吧，靡菲斯特，我们再争论一次，
探讨一下神圣的占星术。
你说，月亮以上是否有许多星体？
是否所有天体均为球体，
正如这居于中心的地球的本质一样？

（浮士德语，见克里斯托弗·马洛《浮士德博士》，约1592年）

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浮士德博士》戏剧化地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与科学和思辨思想的兴起相伴而生的兴奋和危险。浮士德是一位博学的“占星家”，他对天文学、解剖学和哲学的研究已经登峰造极。为了寻求战胜死亡的魔法力量，浮士德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靡菲斯特。他虽有机会悔改，却不肯这么做。他对就有争议性的“神圣占星术”方面的话题向靡菲斯特发问更感兴趣。浮士德最终遭到天谴，下了地狱。然而，他倾心学问和轻视宗教的态度却生动地表现了文艺复兴晚期大众的想法。他的命运概括了现代人对于科学实验伦理的焦虑。这种矛盾态度（我们想知道，可是我们会知道太多吗？）捕捉到了15和16世纪大众科学与应用科学转型时期的氛围。由于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协作的复兴、不同文化之间的思想交流，以及新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个体与其身心以及环境之间的关系都得到了改变。

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

浮士德出卖了灵魂之后，他向靡菲斯特索要这样一本书，“从中我可以看到天空所有的特征和行星”。浮士德可以参看的最有争议性著作是波兰教士兼天文学家尼古劳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这本具有革命意义的著作最早在纽伦堡于1543年5月印刷出版，它推翻了中世纪的信仰：地球处在宇宙的中心。哥白尼的天体体系认为地球，连同其他所有已知的行星，都围绕着太阳运转。哥白尼细致入微地修正了古希腊和阿拉伯学者的成果。他认为，“他们并没有达成自己的

目标，但是，如果我们接受地球运动这一事实，我们则有望达成这一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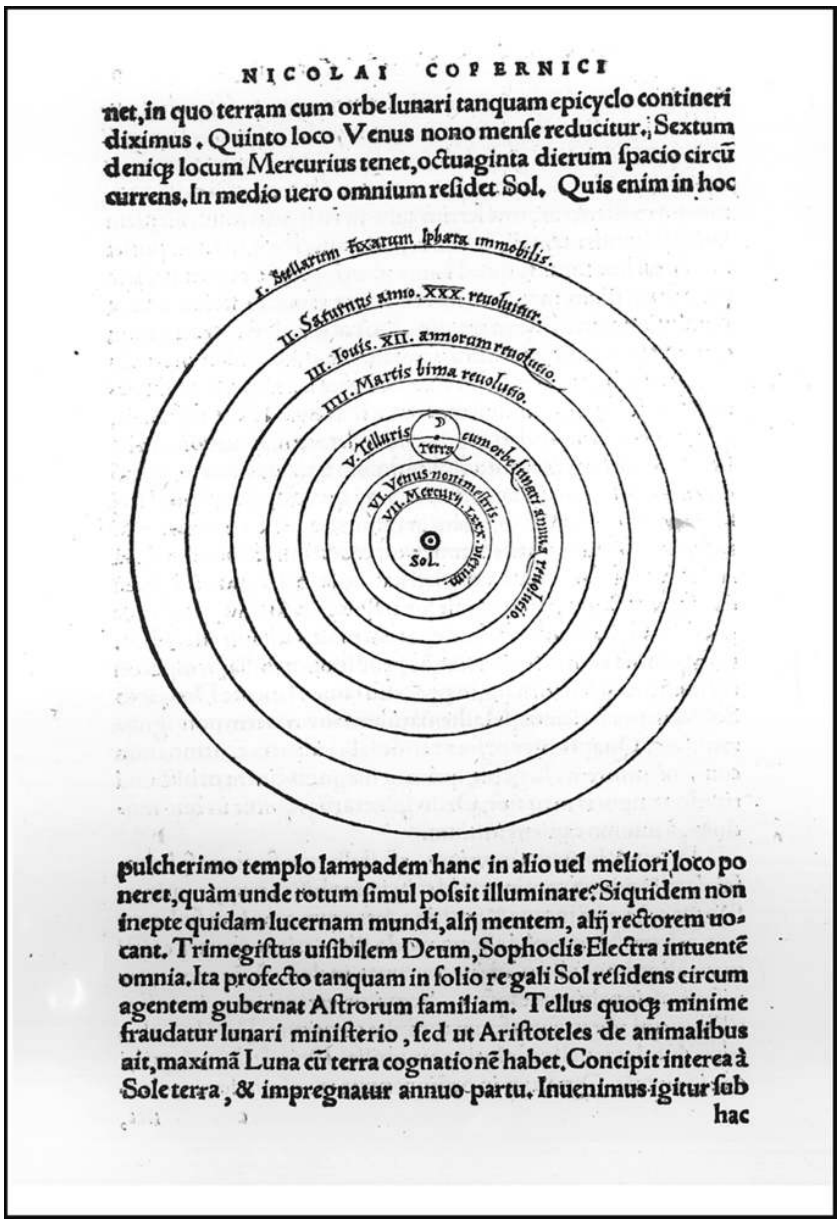
NICOLAI COPERNICI

net, in quo terram cum orbe lunari tanquam epicyclo contineri diximus. Quinto loco Venus nono mense reducitur. Sextum deinq; locum Mercurius tenet, octuaginta dierum spacio circũ currens. In medio uero omnium residet Sol. Quis enim in hoc

pulcherimo templo lampadem hanc in alio uel meliori loco poneret, quàm unde totum simul possit illuminare? Siquidem non inepte quidam lucernam mundi, alij mentem, alij rectorem uocant. Trimegistus uisibilem Deum, Sophoclis Electra intuentẽ omnia. Ita profecto tanquam in solio regali Sol residens circum agentem gubernat Astrorum familiam. Tellus quoq; minime fraudatur lunari ministerio, sed ut Aristoteles de animalibus ait, maximã Luna cũ terra cognationẽ habet. Concipit interea à Sole terra, & impregnatur annuo partu. Inuenimus igitur sub hac

图16　尼古劳斯·哥白尼的日心体系，见他的《天体运行论》（1543）；太阳

（Sol）首次位于宇宙的中心

哥白尼试图让自家的思想附会于古典科学传统，以此来限制它们的革命意义。但天主教会还是给吓坏了，他们起来谴责这本书。哥白尼的论点推翻了《圣经》中的信条：地球——还有地球上的人类——处于宇宙的中心。这是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但却很危险的思想。

哥白尼的论著出版不到一个月，另一本书问世，它将改变另一个科学领域，它就是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的《人体结构》。维萨里的这本书于1543年6月在巴塞尔出版，它标志着现代观察科学和解剖学的诞生。该书扉页描绘了这样一个情景：维萨里在绘声绘色地上一堂公开解剖课，课堂设在一个“剧院”里，他身边围满了学生、市民和同行医生。维萨里在读者的目光注视下剥开了一具女性尸体的腹部。这一姿态诱使读者打开书，追随解剖学家，看他如何将这具人体割得只剩下悬于解剖对象上方的那副骨骼。维萨里揭示了身体内部的奥秘；在他看来，身体内部仿佛是一幅由肌肉、血液和骨骼构成的复杂地图，对于它的研究可能永无止境。他对人体秘密的探索为16世纪下半叶对耳朵、女性生殖器官、静脉系统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在1628年提出的血液循环理论打开了窗口。

维萨里的解剖学研究建立在以实际经验为依据的井然的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对维萨里来说，这就得去偷盗死囚犯和病人的尸体。正如他所承认的：“我根本不怕在半夜里去攫取我急想得到的东西。”维萨里发现了人体的微观秘密，而哥白尼则探索了宇宙的宏观奥秘。这当中蕴含的意义是深远的。哥白尼瓦解了神造世界的观念，最终改造了对时间和空间的科学认识。世界不再被认为由神决定，相反，地球被视为浩瀚宇宙时空中的一个行星。维萨里将个体视为一种由血液、肌肉和骨骼构成的、无比错综复杂的结构；后来，在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称之为“泥土塑成的生命”[1]，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则称其为一台“移动的机器”。

图17　安德烈亚斯·维萨里《人体结构》（1543）一书的扉页；在扉页上，戏剧性的解剖场面仿佛发生在剧院

与哥白尼和维萨里的著作并行问世的有数以百计的出版物，它们开始界定那些科学探索中新兴的学科：数学、物理学、生物学、自然

科学和地理学。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的《算术、几何与比例法全书》（1494）是第一部论述算术与几何实际应用的著作，它是意大利在1472至1500年间出版的214部数学书中的一部。1545年，占星术士杰罗尼莫·卡尔达诺（Geronimo Cardano）出版了《大衍术》，这是当代欧洲第一部代数学论著。1537年，尼科洛·塔尔塔利亚（Niccolò Tartaglia）发行了《新科学》一书，论述了物理学；此后他又出版算术学著作《论数字和度量》（1556）。在自然科学方面，莱昂哈德·富克斯（Leonhard Fuchs）的《植物志》（1542）研究了500多种植物，而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的《动物志》（1551—1558）收入了数以百计的插图，这些插图重新界定了动物学。在地理学方面，采用新方法绘制世界地图的实验在赫拉德·墨卡托（Gerard Mercator）于1569年绘成的世界地图中达到顶峰：他采用的著名的投影法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创新始终与实际需要密切相关，这在军事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尼科洛·塔尔塔利亚论及机械学、力学和运动的出版物是现代弹道学研究的最早著作。他把《探讨与发明》（1546）一书题献给有志于武功的亨利八世，该书内容涉及弹道学以及火炮的制造和使用。塔尔塔利亚的著作回应并且进一步推动了武器和军事领域的新发明，从14世纪初使用火药作为推进剂，到16世纪骑兵作为武装冲突中的决定性因素异军突起，都在这些创新发明的范围之内。这类军事科学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解剖学和外科学的进步。1545年，安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é），维萨里的一位极大的崇拜者，根据他在16世纪40年代法国—哈布斯堡王朝战争中获得的经验，出版了外科学研究著作。帕雷反对当时盛行的枪伤有毒论，并且摈弃了用沸油处理伤口的方法，这一实用性的革新后来为他赢得了近代外科学之父的称号。

几何学和数学也为帮助人们理解商品和纸币在全球日益复杂并且常常是隐于无形的流通提供了新的方法。它们还使船舶设计、测量学和地图绘制取得新进展成为可能，这就造成了贸易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和数量增长。雷乔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的《论各种三角

形的五部书》成为16世纪地图绘制员和航海者的必备。它对球面三角学的复杂处理使得地图绘制员在制造地球仪和绘制地球投影的时候可以将地球表面的弯曲度计算在内。这部著作最早于1533年在纽伦堡印刷出版，这里是1522年环球首航之后开始兴起的早年地球仪制造行业的诞生地。

数学、天文学和几何学领域的科学创新为不论向东还是向西、抱负日渐远大的长途旅行和商业贸易提供了条件，而长途旅行和商业贸易既创造了新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随着在非洲、东南亚和美洲大陆各地接触到新的民族、植物、动物和矿物，欧洲人扩大和重新界定了其生理学、植物学、动物学以及矿物学的范围。这些学科的发展常常与商业有关。乔治·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的《金属学》首次出版于1556年，涉及“矿石采掘”、“熔化”、“从金中提炼出银，从金和银中提取出铅”，以及“制造盐、苏打、矾、硫酸盐、硫磺、沥青和玻璃”。化学、矿物学，还有阿格里科拉在德意志南部矿区的观察和经历，这三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给采矿技术带来了革命，并在16世纪后半叶美洲白银生产量和出口量的大幅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商人与金融家很快就意识到投资科学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1519年，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乌尔里希·冯·赫顿（Ulrich von Hutton）写了一本关于愈疮木脂的论著；愈疮木脂是美洲产的一种奇妙新药，据信可以治疗梅毒。作者将此书题献给美茵茨大主教；他在献词中写道：“我希望阁下未曾染上梅毒，可是，假如您已经染上的话（但愿不要这样，可这谁也说不准），我很乐意为您治疗，把您治愈。”人们曾经（错误地）认为梅毒源于新世界，是在1493年被哥伦布带回欧洲的。他们还认为，这种疾病的原发地一定能提供治疗办法。德国商业巨族富格尔（Fugger）垄断了该药材的进口，他们开始为愈疮木脂造势，开设一家又一家专门供应这种药物的医院。由于价格上涨和无效性开始显露，瑞士医师和炼金家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开始接连发文攻击愈疮木脂，指责它是一场商业骗局，并推荐服用令人痛苦的汞盐治疗梅毒。

帕拉切尔苏斯摈弃了古典的体液论信条；体液论认为人体内部的四种构成液体——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应当保持平衡。与此相反，他采用了炼金术色彩明显的方法来研究医学，认为自然的基本构成成分与特定的疾病相匹配，因此他在治疗梅毒等疾病的过程中采用了铁、硫磺和汞等元素。在借鉴实践性的试错法和化学的过程中，帕拉切尔苏斯与医学机构以及金融界的当权人士产生了冲突。富格尔家族针对他论述梅毒和汞盐的著作作出了反应。他们凭借雄厚的财力压制他的作品的出版，嘲笑他的科学信誉。这些冲突预示了现代制药业的兴起和专利医药的出现。

来自东方的科学

文艺复兴的科学也从东西方之间不断加强的知识传播中得到了额外的推动力。许多希腊文科学典籍在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希伯来文的译本中得以保存，而且，它们在西班牙的托莱多和9世纪建于巴格达的科学院等地经过修订。伊斯兰教的学术中心在推动以希腊学术和阿拉伯创新为基础的科学进步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尤其是在医学和天文学领域。早在12世纪40年代，阿拉伯文典籍的拉丁文译者桑塔拉的乌戈（Hugo of Santalla）写道："阿拉伯人尤其适合我们师法，因为他们现在和过去都是我们的老师和先驱。"

阿拉伯人的医学研究直接影响到知识在西方的传播。10世纪的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Avicenna）在撰写他那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医典》的时候，研究了加仑（Galen）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医学论著。他给医学下的定义是："我们借以了解人体各种状态的科学，何时身体健康，何时不健康；我们靠它维护健康，在身体失去健康之后，我们靠它恢复健康。"《医典》于12世纪被克雷莫纳的杰拉德（Gerard of Cremona）在托莱多译成拉丁文。从1500到1550年，随着阿维森纳的著作在欧洲各地成为大学指定的医学教科书，这个译本在意大利印行了30多版。1527年，威尼斯医师安德烈亚·阿尔帕戈

（Andrea Alpago）根据他本人曾为威尼斯驻大马士革领事馆医生的经历，出版了一部新版的《医典》。阿尔帕戈还研究了叙利亚医师伊本·纳菲斯（Ibn al-Nafis，1213—1288）的著作，此人对肺部血液运动的研究影响了16世纪欧洲对血液循环的探讨。维萨里指责说，那些学院派医师花费时间“无谓地去诋毁阿维森纳以及其他阿拉伯作者”。他本人为阿拉伯医学所折服，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并撰写评论赞扬拉齐（al-Razi，拉丁语作Rhazes）的治疗学和药物学论著。1531年，奥托·布隆费尔斯（Otto Brunfels），所谓的“植物学之父”，编印了9世纪伊本·萨拉碧云（Ibn Sarabiyun，即小塞拉皮翁［Serapion the younger］）的医学著作，这本书对他本人理解植物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天文学和地理学领域，阿拉伯学者在翻译希腊宇宙结构学家托勒密的关键著作方面，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他的《天文学大成》和《地理学指南》在托莱多、巴格达和撒马尔罕等地被从希腊文译成阿拉伯文，得到学者的研究评论，后来又被修订。当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之后，奥斯曼帝国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被证明是托勒密的热情拥护者。他委托希腊学者乔治·阿米鲁提斯（Georgius Amirutzes）修订托勒密著作的阿拉伯文本。1465年完成的世界地图综合了托勒密的估算与比较时新的阿拉伯、希腊和拉丁文的地理学信息。这幅地图将南方定位在上方，带有纬度的刻度，以及运用了复杂的圆锥形投影，这一切都表明，它是一幅处于科学进步潮头的世界地图。

东西方之间的科学交往也对哥白尼论述太阳系的日心性质作出了贡献。阿拉伯天文学和数学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是13世纪中期成立于波斯的马拉盖天文台，其领导人物为突纳西尔丁·图西（Nasīr ad-Dīn al-Ṭūsī[2]，1201—1274）；图西的《天文学忆往录》（*Tadhkira fi'ilm al'haya*）修正了托勒密关于星球运动的自相矛盾的研究。他对托勒密最重要的修正产生了“图西力偶”。这条定理确定，线性运动可由圆周匀速运动演化而成；图西利用一个球体在另一个半径是它一倍的球体内部滚动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天文学史家已经认识

到，哥白尼在他的《天体运行论》中重复了图西力偶，而且，这条定理对于形成他的太阳系日心观非常重要。过去没人去寻找阿拉伯对文艺复兴科学的影响，因为人们臆断，从那里找不到什么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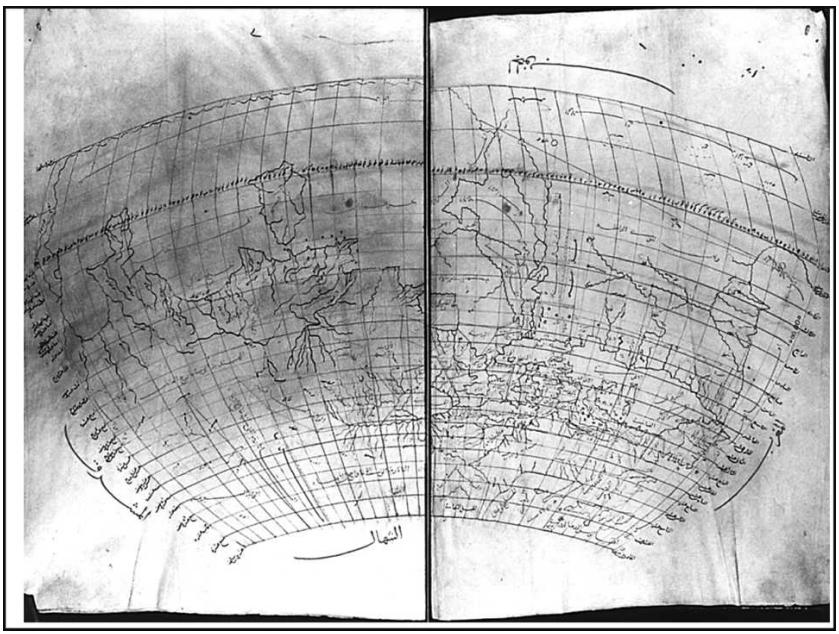

图18　征服者穆罕默德委托乔治·阿米鲁提斯于1465年修订的托勒密的世界地图；这显示出托勒密研究在东西方的发展情况

科学的艺术

印刷出版让艺术与科学史无前例地结合在一起，有一个人充分利用了这一形势，他就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他很快就掌握了新的铜板蚀刻技术，并且前往意大利“学习透视法的秘密”。他相信“这门新学问一定是以科学、尤其是以数学为基础的，在所有科学当中，数学是最精确、最具逻辑性和最能以图解形式表现的科学”。1525年，他出版了一部论述几何和透视法的著作，书名为《圆规与格尺测量法教程》，这“不仅遗惠于画家，而且遗惠于金匠、雕刻家、石匠、木

匠，以及所有离不开测量的人”。

丢勒的书解释了透视与光学这门新科学的应用。该书还收入了“绘图仪”的插图，使用“绘图仪”可以将透视网格投映在绘画对象身上。他绘制的一幅插图表现了这样一个情景：一位绘图员正使用观测器在纸上为绘画对象定位。艺术家平板上的网格状结构对应着绘图员与模特之间的那块玻璃隔板。绘图员要做的，就是将玻璃板上显现的光点都摹写在平板上相应的网格参照物上。丢勒的插图与维萨里《人体结构》中的女尸有许多相似之处；剖开女尸的腹部，是为了给一屋子男性带来医学启迪。以丢勒和维萨里之见，在这场艺术和科技革命中，女性除了充当解剖对象或者沉默无言可作为性对象的模特之外，起不到其他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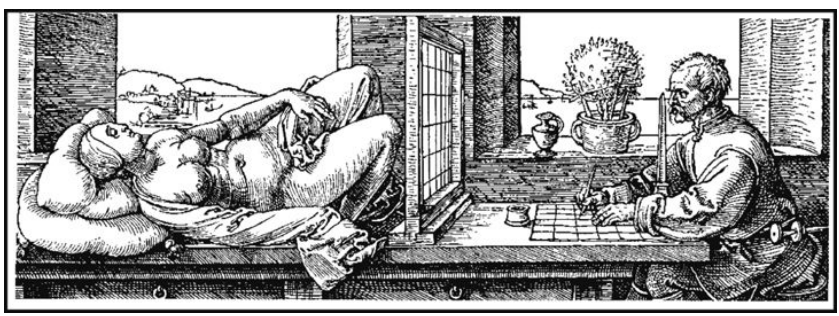

图19　丢勒书中的绘图师正透过“绘图仪”凝视一个裸体女人；出自丢勒印刷于1525年的《测量法教程》

早期影响过丢勒生涯的一个人，可说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科学关系的化身，此人就是莱奥纳尔多·达·芬奇。卢卡·帕乔利宣称，莱奥纳尔多是“最有价值的画家、透视学家、建筑师和音乐家，他在所有领域都登峰造极”；他利用自身精深的科学知识，向人推销自己在雕刻、勘测、军事工程和解剖学绘图等领域的才能。莱奥纳尔多能够将艺术技能与实用科学能力结合起来，这让好几位有权势的恩主都高度重视他的贡献。

1482年，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Duke Ludovico Sforza of Milan）根据他递交的一份简历，雇请他为军事工程师；他在简历中

突出了自己掌握的实用才能：

> 我有修建轻巧、坚固和方便携带的桥梁的计划……我有办法摧毁任何一座堡垒……我将制造加农炮、迫击炮和轻型火炮……我将装配弩炮、射石机、投石机以及其他器械……我相信我能在建筑学领域以及兴建公共和私人建筑方面让人十分满意……而且我能用大理石、青铜雕刻，用黏土雕塑。

卢多维科舍弃了莱奥纳尔多奇思怪想的军事科学，转而委托他铸造一尊巨大的骑士雕像。莱奥纳尔多声称这尊雕像“将记录显赫的斯福尔扎家族……不朽的光荣和永恒的荣耀”。莱奥纳尔多绘制的坐骑比例和铸造草图表明他运用了自己掌握的水力学、解剖学和设计的所有技能，为斯福尔扎设计了一座表现市民颂扬之情的雕像。

与他的大部分颇具技术雄心的工程一样，莱奥纳尔多的这座雕像从未动工。他改换了门庭，于1504年和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塞特二世（Bayezid II）洽谈，准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兴建一座350米长的大桥。他在写给巴耶塞特的信中说：“我要把它建得像一座高耸的拱门，这样一来，船只可以满帆从下面驶过。”莱奥纳尔多的设计不切实际，巴耶塞特给惹火了，撇开他开始与米开朗琪罗商谈。莱奥纳尔多有一大失算：他没有将自己的想法付梓。结果，与丢勒不同，莱奥纳尔多没有为后人留下具体的创新成果。直到19世纪，沃尔特·佩特将他从默默无闻的状态下发掘出来之前，他一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但却是谜一般的人物。

自然哲学

在15世纪，科学、哲学与法术不分家。三者都被归在“自然哲学”这个笼统的名称之下。对于自然哲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是古典作家的重新发现，而在这当中，又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最为重要。15世纪之初，亚里士多德依然是所有经院哲学的哲学和科学思辨的基础。他的思想保存在阿威罗伊（Averroës）和阿维森纳的阿拉伯

文译本和注疏当中，为人们看待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提供了系统的视角。他存留下来的典籍——例如《物理学》、《形而上学》和《气象学》——为学者理解创造自然世界的力量提供了逻辑工具。人类作为终有天年的“政治动物”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由于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远远超出其他动物，因此，他们注定形成社会群体。始自15世纪初，人文主义学者开始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而且发现了诸如《诗学》以及伪托亚里士多德的《力学》这类新文本。在建筑领域，工程师利用了《力学》对运动和机械装置的描述。在政治和家务管理领域，莱奥纳尔多·布鲁尼翻译了《政治学》、《尼可马亥伦理学》和《家政学》；后者研究了庄园和家庭组织，布鲁尼认为这对于15世纪意大利社会的市民组织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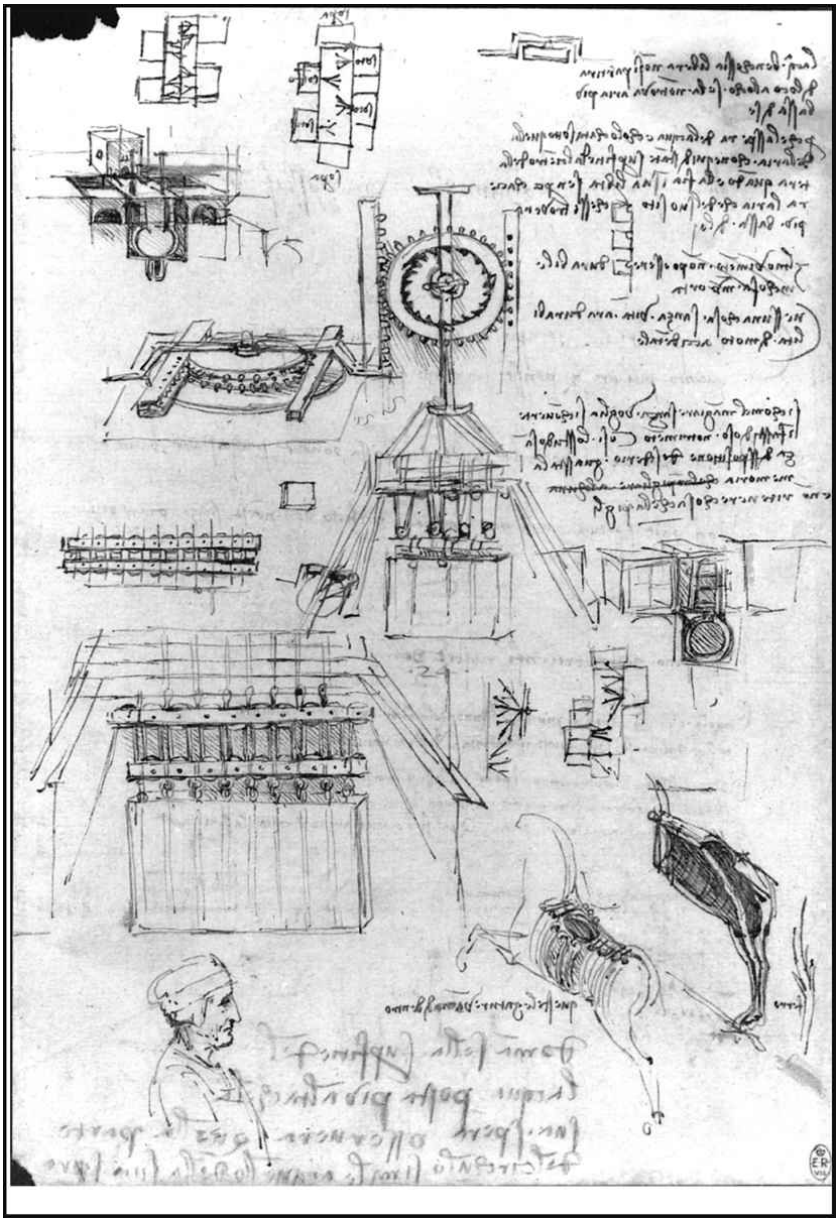

图20　列奥纳多为斯福尔扎骑马雕像试画铸造坑，完成于1498年；雕像始终未能建成

正当人文主义学者开始出版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新译本和注疏之

时，他们也重新发现了整整一大批被忽视的经典作家和哲学视角，其中以斯多噶主义、不可知论、伊壁鸠鲁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最为重要。他们取得的最重大的进展是重新发现和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的著作。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库萨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Cusa）和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等人的神秘唯心论的柏拉图主义认为，与亚里士多德的信条正相反，灵魂是不朽的，并且渴望宇宙的统一和热爱终极真理。根据菲奇诺在《柏拉图的神学》（1474）中的看法，禁锢在世俗肉体中的灵魂“试图把自己比作上帝”。菲奇诺认为，柏拉图

> 以为，人的头脑从上帝那里接收了一切，它应当将一切还给上帝，这是公正和虔诚的。因此，如果我们致力于道德哲学，他规劝我们净化自己的灵魂，这样，灵魂最终会明晰澄澈，能够看到上帝神圣的光芒和对上帝的崇拜。

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相比，这种柏拉图式的方法有两个显著优点。首先，它能够更轻易地融入15世纪基督教的灵魂不灭论以及个体对上帝的崇拜。其次，它界定哲学玄思为个体最宝贵的财产。菲奇诺的柏拉图主义巧妙地抬高了他本人作为哲学家的职业地位。它摈弃政治而倾心于神秘的冥思，这也适合他的恩主、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的政治哲学，后者在1463年任命菲奇诺执掌他的哲学学院。

后来的哲学家迅速扩充和改进了菲奇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在《结语》（1486）的导论中，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试图创造他所谓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和谐”，力求将古典哲学与基督教统一起来。皮科借鉴了神秘主义的犹太和阿拉伯典籍（他认识到阿拉伯哲学的意义，开始学习阿拉伯语），要确立自然哲学为形而上探讨最佳方法的地位。他声称，“自然哲学将会缓解那些折磨、扰乱和伤害精神的见解纷歧和冲突”。不幸的是，皮科的《结语》受到教廷委员会的调查，调查结果判定他的一些观点为异端。令后来的文艺复兴研究者更感兴趣的是皮科在《结语》中导论性的言论，他们认为这些言论提供了一种新的个体自我观。皮科借鉴了柏拉图的思想，他在导论中认

为，人是“你自己的制造者和塑造者”，具有“想有什么就有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自由。在19世纪的沃尔特·佩特等作家看来，皮科的导论已成为对个体性以及文艺复兴人诞生的经典论述；1882年，这一导论被赋予了一个英文标题《论人的尊严的演说》，这一说法皮科本人从未用过。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者都继续对16世纪的艺术、文学、哲学和科学产生巨大影响。新柏拉图主义启发了米开朗琪罗、伊拉斯谟和斯宾塞等各家大师的艺术和文学作品，而亚里士多德主义则包罗万象，允许科学家和哲学家根据他们所在的日益扩张的世界对它进行修正。然而，正当这个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这两位哲学家在智识上的首要地位都慢慢地、但确定无疑地遭到了削弱。美洲的发现让蒙田在1580年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无法应用于这些新的土地”。伽利略在17世纪初批驳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加速度和宇宙性质的理论，他以此得出结论：“我非常怀疑亚里士多德曾经通过实验检测过自己的理论。”

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与伽利略一样，也反对亚里士多德。他开始倡导在科学分析过程中进行经验观察。到了1620年，培根提倡学术的“伟大复兴”，于此复兴中令“哲学与科学不再漂浮在云端，而是建立在各种经验的坚实基础上，得到同样充分的检验和衡量”。培根的《新工具论》直接反驳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又名《理性思考的工具》），培根的书名即由此而来。亚里士多德主张在逻辑推理过程中使用三段论；根据三段论，从两个无可辩驳的前提出发，从逻辑上可以推导出一个特定结论（例如，所有人皆有一死，所有希腊人都是人，因此所有希腊人皆有一死）。根据这一程式，理论和言辞被认为比实践或经验更加可靠。培根将这一程式颠倒过来。他认为，对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那些基本的、公认的前提需要进行质疑，以及运用他所谓的

一种新逻辑、新学说，通过归纳法（因为发现三段论在自然科学上无能为力）进行发明和判断，从而让哲学和各门科学变得更加真实和活跃。

培根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以悉心收集自然材料为基础的科学知识论，而自然材料的收集又是建立在观察、实验和归纳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从特定的事实出发得出普遍的理论原则。它是对自然科学分类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造，在他去世之时，这项改造仍未完成，但它打破了文艺复兴时期学者所尊崇的古典论断，并且成为皇家学会在17世纪后几十年中所从事的实验科学的先行者。1626年，培根完成了他的《新大西岛》。这本书借鉴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描述了一个乌托邦世界，但在这个世界中，最受重视的市民不再是哲学家，而是实验科学家。这是一次将要影响现代科学以及它与哲学的分道扬镳的转变。

注释

〔1〕 译文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9页。

〔2〕 纳西尔丁·图西的英文拼写应为Nasīr al-Dīn al-Ṭūsī，疑为作者之误。

第六章

重写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这个术语与我们已接触的诸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这类说法同样使人产生误解，同样属于年代误植。彼特拉克、马基雅维利、莫尔和培根都是政治家和外交官，只是到了后来，他们的著述才被贴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这个标签，而如今全世界大学的文学系都在研究他们。直到16世纪末，随着戏剧在西班牙和英国等国的兴起，以及印刷业获利丰厚，诗人和小册子作家能够以专职创作为谋生之道，职业作家的概念才得以产生。不同类型的文学表达——诗歌、戏剧和散文——以各种方式对这些社会和政治变化作出了反应，而且在各个地区，反应的方式都有其独特的表现。现在人们所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主要由欧洲各国民族语言写成，这些民族语言包括：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在这类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作家放弃了精英人士所使用的国际通用的古典语言（古希腊语、阿拉伯语，特别是拉丁语），主动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由于难以穷尽这些具体的民族语言创作传统，因此在下文中，我的重点放在具体与英语语言相关的诗歌、散文和戏剧的发展。

诗歌

与史诗一样，抒情诗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创作的顶峰。意大利和北欧宫廷文化的兴起为抒情诗高雅的感情提供了发挥的机会；它主要聚焦于心爱的女性情人，但同时也反思男性情人—诗人的主观状态。抒情诗最具影响力的先驱之一是人文主义学者彼特拉克。彼特拉克的《抒情诗集》收诗365首，写于1327至1374年期间，借鉴了但丁的抒情诗集《新生》。彼特拉克完善了商籁体（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十四行诗），将其分为韵律谨严的两个部分（八行诗体和六行诗体，即十四行诗的前八行和后六行）。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将女性对象理想化的同时还探索了诗人对自身身份的复杂情感。他在一首十四行诗中

抱怨说："在这种状态下，由于你的缘故，我成了女士。"这种亲切的、内省式诗风，让诗人得以通过他的恋人或宗教（二者经常合二为一）探索自身的道德状况。它开始影响整个15和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文化和诗歌。

这一传统的发展在意大利见于枢机主教本博（Bembo）的诗歌，在西班牙见于加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的作品，在法国见于若阿基姆·迪·贝莱（Joachim du Bellay）和皮埃尔·德·龙萨（Pierre de Ronsard）的诗篇，在英国则见于托马斯·怀亚特爵士（Sir Thomas Wyatt）16世纪中叶彼特拉克诗集的英译本。英国的传统在莎士比亚十四行组诗（约1600年）中达到极致；诗中名句"我情妇的眼睛一点不像太阳"（十四行诗，第130首[1]）戏仿了彼特拉克的手法。除了描写诗人与情人的关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又添了第三者——男性情敌，从而超越了彼特拉克。这种三角关系，以灵活的英文双关语表达出来，这是史无前例的。它让莎士比亚得以探讨男性之间的竞争以及文学恩主制和家庭仆役等问题（"希求这人的渊博，那人的内行"［十四行诗，第29首］），还探讨色欲造成的有害后果（"把精力消耗在耻辱的沙漠里"［十四行诗，第129首］）。

在第134首十四行诗中，诗人承认自己的情人为他的男性朋友所得：

> 因此，现在我既承认他属于你
> 并照你的意旨把我当抵押品，
> 我情愿让你把我没收，好教你
> 释放另一个我来宽慰我的心。

诗人希望，他至少还能与情敌保持男性之间的友谊，但诗的结尾却说，就是这一点也不可能做到："我把他失掉；你却占有他和我/他还清了债，我依然不得开脱。"诗人把自己"抵押"给情人，为了保存友谊，他情愿让情人"没收"自己，但到最后，那位朋友也沉溺于情人的美色。诗人希望朋友还清债务，即偿还"全部"，但是，这里使用的双

关语“全部/洞”（whole/hole）是一个赤裸裸的性意象，显示了这个女子让两个男人“中圈上套”的本事。诗中语言借用了伊丽莎白时代对于司法义务和金钱债务的特有体验。它对韵律和双关语的运用尤其体现出英语的特性。莎士比亚已经摆脱了彼特拉克的拉丁式文风和古典式影响。他的诗歌预示了诸如玄学派等后世英国诗人的出现，标志着英国诗歌开始告别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语言风格，走向17世纪下半叶的本民族语言传统。

劫持语言：女性的反应

彼特拉克的诗歌赞美女性是理想化的、但却是沉默不语的、体现贞洁美德的杰出典范，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则反映出男性对于女性在他们主导的文化中的矛盾地位愈感焦虑。一些女性的反应是，她们充分利用人文主义教育的变革性质和印刷业的兴起，展现出另一种不同的女性气质。她们的作品表明，在有关两性关系的许多臆断上的争论，实际上要比男性把持的文学正典诱使我们所相信的要激烈得多。

在整个16世纪，一位又一位女作家取柏拉图和彼特拉克式的艺术手法为己用，质疑男性对女性的臆断，试图界定她们个人以及创作的自主地位。佩尔内特·杜·吉耶（Pernett du Guillet）在遗作《韵体诗集》（1545年出版于里昂）中，运用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和彼特拉克式的艺术手法确立起与情人在诗中的平等关系：“正像我是你的一样/（而且我愿意如此），你完全是我的”，她在一首诗中如是说。在另一首诗中，她又攻击彼特拉克式情感的变幻莫测和不平等；她安慰女性读者说：“切莫感到奇怪/如果我们的愿望发生了改变。”像这样摈弃男性诗歌传统手法的做法在路易丝·拉蓓（Louise Labé）的作品中更进一步。她的《诗歌全集》于1555年出版，出版地也是里昂。拉蓓运用了彼特拉克式十四行诗体批评彼特拉克将女性身体客体化的做法。她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设问道：“男人要讨人喜爱，得有多高的身材？”拉蓓并未向虚构的男性情人俯首帖耳，而是与之展开竞

争。她宣称："我要成功地运用我双眼的力量……这样很快就会将他完全征服"；这又一次颠倒了彼特拉克式的手法。

在性方面的这种直白态度，与那种坚持女性有权受教育和享受创作自由的态度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书信录》（1567）和《芳香花束》（1573）中，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伊莎贝拉·惠特尼（Isabella Whitney）主张，女性要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家庭生活的羁绊；她认为："我本愿意秉笔而书，无奈家务将我束缚。"有一位诗人摆脱了惠特尼所谓家庭事务的羁绊，她就是威尼斯的交际花韦罗妮卡·佛朗哥（Veronica Franco）。她在1575年出版的诗集《韵语》中，从一个风尘女子的视角出发，破除了彼特拉克式恋爱中理想主义的神话色彩，同时提出："要是我们女人也得到武装和训练/什么男人都能够抵挡得住。"诸如佛朗哥与惠特尼这样的作家，她们在16世纪中期欧洲日益严重的宗教迫害和政治动荡中挣扎，改写了男性文学传统，在看待女性本质方面呈现了一个迥异的视角。

传奇故事的印刷出版

作家们也利用相对较新的印刷媒介来确立他们独树一帜的文学声誉。随着印刷术在识字水平日渐提高并且以大城市居民为主体的读者群中创造出寻找新的样式来理解变幻的世界的需求，它改变了文学表达。1554年，多明我会的修士马泰奥·班戴洛（Matteo Bandello）出版了一本《小说集》，这是描写当代城市生活的一部短篇故事集。按照作者的说法，这本小说集"写的不是连贯的历史，而是对各种事件的杂录"。詹巴蒂斯塔·吉拉尔迪（Giambattista Giraldi）——他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钦齐奥（Cinthio）——在1565年出版了另一部具有同样影响力的小说集。他在《埃卡托米蒂》的引子中，借用了路德派士兵于1527年洗劫罗马那桩痛心往事。该书对暴力事件的描述，令人想起古罗马悲剧家塞内加。钦齐奥与班戴洛的小说故事启发了伊丽莎白与詹姆斯一世时代上演的一些最伟大和最血腥的悲剧，其中包括

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的《西班牙悲剧》（约1587年）、莎士比亚的《奥瑟罗》（1603）和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的《白魔鬼》（约1613年）。与散文体写作相似，戏剧的发展，尤其是英国戏剧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投资和利润，而不是宫廷赞助或宗教虔诚。这种情形有助于对社会和个体进行日益复杂的和自然主义倾问的再现。

印刷过程的灵活性还可以让像弗朗索瓦·拉伯雷这样的作家及时地就别人对他作品的批评作出反应，并在再版时穿插进当代事件。拉伯雷出版了《庞大固埃》（1532）和《高康大》（1534），书中描述了高康大和他的儿子庞大固埃这两位巨人富有喜剧性的历险。作者利用巨人的冒险经历来讽刺和戏仿世态万象，从教会到新兴的人文主义学术，都是他讽刺的对象。在描写庞大固埃的时候，拉伯雷用了一种虚幻怪诞、“繁复庞杂”的文字风格，学术语言和法国俗语杂糅并用，这种写法捕捉到了庞大固埃身上混合的多样风格。庞大固埃出生时，他母亲“死于生产”，因为“他块头极大，重得吓人，不把她憋死，他就无法来到世上”。这位小巨人吃整只的羊和狗熊，吓得一位学者屎拉在身上，还研究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书中的各式新学问，这些书包括《放屁的艺术》和《烟卤清扫工的占星术》。庞大固埃还解决了舔腚勋爵与吸屁勋爵的一场官司，最后他乘船去了“乌托邦之港”，这又是对航海发现和科学创新的戏仿。

拉伯雷生前出版的四卷本高康大和庞大固埃历险记销路极好；在《庞大固埃》的前言中，拉伯雷夸口说：“印刷商在两个月内卖掉的册数，要超过《圣经》九年的销售量。”巴黎索邦神学院的经院哲学家们一直是拉伯雷无情嘲讽的对象，从1533年起，他们开始报复他，谴责他的书都是淫秽亵渎之作。在他的余生中，他的作品一直遭受查禁。然而，其他作家采纳了他那率性的芜杂风格，这当中就有英国讽刺作家和小册子作者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e）。在《不幸的旅人》（1594）一书中，纳什描述了杰克·威尔顿，一位见习骑士，在16世纪欧洲各地流浪漫游的经历。在游历过程中，他卷入了战争、宗教冲突、谋杀、强奸和监禁等事件。与拉伯雷一样，纳什运用了相对

新颖的散文体写作形式，颠覆了抒情诗和史诗的艺术手法。纳什并没有遵循史诗诗人使用的传奇性叙事，他“虚幻怪诞的叙述文字”运用了莫尔和伊拉斯谟等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怀疑主义和遣词用句的机敏灵活（莫尔和伊拉斯谟本人也出现在叙事中），以反抗比较传统的文学手法中的道德束缚。纳什糅合了多种风格和叙事声音，就此而言，他的叙事声音接近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唐吉诃德》，预示了英国长篇小说的后续发展。在早期英国小说家中，有许多人很钦佩纳什的著作，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就是其中的一个。

史诗

与班戴洛、钦齐奥和纳什等人相对新颖和实验性较强的散文体小说相比，史诗的世系远为显赫。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提供了帝国建立和民族起源神话的经典模式，这些模式都是围绕着主人公的英雄式漫游构建起来的——荷马史诗的主人公是奥德修斯，维吉尔史诗的主人公是埃涅阿斯。15世纪意大利城邦的兴起，以及后来葡萄牙、哈布斯堡王朝和英国对全球霸权的争夺，为史诗诗人提供了在更具当代性的全球视野内重写古典史诗的机会。

最有影响的史诗实践者之一是卢多维柯·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他是常驻费拉拉公国埃斯特宫廷的大使，埃斯特王朝是15世纪最伟大的意大利王朝之一。在史诗《疯狂的奥兰多》（1516）开篇伊始，阿里奥斯托宣称：“我歌颂骑士与贵妇，爱情与战争，高贵的骑士品质，英勇的事迹——全都出自摩尔人从非洲跨海而来蹂躏法国之时。”这是一首回顾往昔、体现骑士精神的诗篇，描述了公元8世纪查理大帝（Emperor Charlemagne）麾下的基督教骑士与撒拉森人的冲突。阿里奥斯托未能提供一个当代色彩更为浓厚的背景，原因正在于到了16世纪初，埃斯特的国力已成强弩之末。埃斯特的贵族在阅

读和听人诵读这部史诗之际，可以幻想击败相当于当代的撒拉森人的土耳其人。但这纯粹是一种艺术幻想。到了16世纪，真正具有帝国影响力的不是意大利。

路易斯·德·卡蒙斯（Luís de Camões）的史诗《鲁西亚德》（1572）回溯到了年代不算久远的过去，另一欧洲强权葡萄牙帝国逝去的辉煌。卡蒙斯是一名军人和帝国行政官员，这部史诗创作于16世纪中期他在非洲、印度和澳门等地任职之时。《鲁西亚德》以瓦斯科·达伽马于1497年远航至印度一事为中心，神化了葡萄牙帝国在15世纪的崛起。与阿里奥斯托一样，卡蒙斯自称，他的史诗远在古人之上，因为该诗所涵盖的英雄业绩和地理范围——葡萄牙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从未发现的地方建立了功绩和勋业——远逾古典世界。卡蒙斯歌颂“那些著名的葡萄牙人/马尔斯和尼普顿曾为之折服”。这部史诗为文学帝国主义创造了一个文学样板，在整个18和19世纪、欧洲在世界各地从事殖民活动的时代，一直有人模仿它。然而，在16世纪70年代卡蒙斯创作这部史诗之时，葡萄牙帝国已经衰落。158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将其吞并，纳入扩张中的哈布斯堡帝国。与阿里奥斯托一样，卡蒙斯的诗歌利用的是昔日的辉煌。

在英国，埃德蒙·斯宾塞和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继承了史诗的传统，但赋予它清教特有的情感。两人都是雄心勃勃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廷臣，渴望通过史诗创作来迎合都铎王朝流行的欣赏品味，以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锡德尼的《阿卡狄亚》（1590）混合使用了叙事性散文体和韵律严整的田园诗——田园诗出自阿卡狄亚的牧羊人和乔装改扮的贵族英雄之口——来探讨各式各样的问题，从政治讨论到男女情事和王朝结盟所需要的厉行克制和激情抑制，内容十分广泛；这些问题对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政体是非常关键的。埃德蒙·斯宾塞与阿里奥斯托和卡蒙斯一样，也是政府里的行政官员，不过，他的史诗颂扬的是一个实际不存在的帝国。斯宾塞一边写《仙后》（1590—1596），一边代表他的英格兰君主——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满怀热情地在爱尔兰从事殖民活动。在他看来，这位英国君主是“聪明天纵之女神，/优雅风仪与神赐端庄之懿范，/海岛上

国之女主贵妇”。

斯宾塞刻意使用古体的英文，叙述一系列人物的冒险事迹，这些人物拟人化地代表了新教特有的价值观，例如信仰和节制。他把伊丽莎白变成了一位值得称颂的“仙后”，并且改造了东方出生的圣乔治为英格兰的主保圣人。但这不过是另一个光荣的神话。就在这部长诗完成之际，伊丽莎白在欧洲已经陷入政治孤立，而且她留下的唯一永久性殖民遗产是为后来几百年中爱尔兰的宗派暴力播下种子。尽管如此，在信奉新教的英吉利民族国家诞生之际，斯宾塞用本国语创作了一部世界性史诗，就此而言，他脱离了更为主流的欧洲传统，极大地影响了弥尔顿的《失乐园》。

戏剧

莎士比亚的戏剧很适合用来结束这部文艺复兴概论，因为他的创作生涯标志着从师法经典人文主义传统到更注重本土性和民族性的一个重大转变，前者从南欧和地中海的影响中汲取力量，而后者是文艺复兴结束的标志。在他最早的戏剧中，莎士比亚仍深受古典传统之惠。在《错误的喜剧》（1594）中，莎士比亚改写了古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Plautus）的喜剧《孪生兄弟》，将故事背景设在古典时代的以弗所。他初涉历史悲剧之作《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同样得益于罗马历史。该剧通过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这个人物，讲述了罗马帝国在衰落时期的挣扎；安德洛尼克斯眼看着“野蛮的”哥特人逐渐渗入和压倒了罗马“文明的”价值观。

这两出早期戏剧虽然显示出莎士比亚受惠于古典的过去，不过，它们也反映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所特有的关注。《错误的喜剧》中身份误解和金钱混乱造成的喜剧性，活化出英国人对于货币流动性以及远途商贸复杂性日渐不安的情绪，当时英国刚刚打入穆斯林控制下的地中海地区的世界市场。《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也表明莎士比亚一边书写一段不复重现的过去的历史，一边试图接受英国与异域文化

交往的现实。异域文化的化身是那个有吸引力但却阴险邪恶的人物——摩尔人艾伦，此人是奥瑟罗的前身。

莎士比亚对历史素材越来越娴熟的掌控使得他在随后的喜剧和历史剧中对于本土问题、特别是伊丽莎白时代的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他的历史组剧，从《理查二世》到《亨利五世》，开始远离宗教启迪下的编年史，对于英格兰的晚近历史以及这段历史与当前的关系有了比较含混和不确定的理解。尽管传统上认为这些戏剧充当了意识形态工具，用以证明都铎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然而，它们也揭露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祖先制造的周而复始的血腥暴力和篡位夺权事件。有证据显示，《理查二世》的上演，是为了支持一场针对伊丽莎白的未遂政变，《亨利五世》则因为它敏感地提到英格兰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政治困境而遭到审查。

喜剧则反映了莎士比亚表现在他的十四行诗中的越来越强烈的语言自信。在《第十二夜》中，小丑费斯特告诉女扮男装的薇奥拉："一句话对于聪明人就像是一副小山羊皮手套，一下子就可以翻了转来！"（《第十二夜》，第三幕第一场）[2]。从正反两方面遣词设句，对某种立场加以论证，这种本领是人文主义修辞学的遗产，可是，在伊丽莎白时代伦敦的商业剧场中，这种技巧被用于演出和展现那些与观众直接相关的事件，无论这些观众是富人还是穷人。在新修建的环球剧院上演的第一部莎剧《尤利乌斯·凯撒》，以戏剧的形式表现了罗马共和国随着凯撒的遇刺而衰亡，从而回溯到古典的过去。但是它也探索了雄辩术对政治行动的塑造。马克·安东尼与布鲁图斯两人针锋相对的悼词探讨了共和制的遗产，在伊丽莎白时代专制主义的背景下，这个话题具有潜在的危险性。然而，与他的许多喜剧一样，莎士比亚更感兴趣的是如何用语言去塑造和诱导观众，而不是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张目。一个挣扎适应信贷经济的农业社会所产生的希望和恐惧，对于妇女地位以及不断变化的家庭关系的关注，还有那些无时不在的、关于政治权威和个人拯救的宗教事务，这些议题都一再出现，塑造了莎士比亚的戏剧生涯。

"他不属于某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时代。"这是本·琼森（Ben

Jonson）在自己的伟大对手——莎士比亚——逝世之际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今天，许多人都会同意，莎士比亚笔下伟大的悲剧人物——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和奥瑟罗——确实是超越了创作时空的不朽的艺术产物。不过，我们应当记住，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能够自我塑造出一种信念，认为他们的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人的化身，一位复杂的、千面的现代性先驱，预示了马克思（Marx）和弗洛伊德（Freud）的洞见；同样地，这个人物形象产生于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特定的压力和焦虑之中。不难看出，他关于死亡的那段自省式言辞，以及他那令人迷惑不解的未能及时替父复仇的举动，反映了所有现代异化的男性青少年心中的希望和恐惧。然而，他的行动也受到英格兰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情感，以及由于担心拯救和来世而产生的持续的恐惧（“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3]）的塑造，理解这一点也十分重要。类似地，尽管奥瑟罗谋杀苔丝狄蒙娜一事似乎是对嫉妒所造成的有害并且具有潜在致命性的后果的永恒反思，该剧也把奥瑟罗当作一个外来者（“一个到处为家、漂泊流浪的异邦人”[4]）、一位改宗基督教的穆斯林来加以探讨，那些公开与摩洛哥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做生意的英国人对这样的人物并不陌生。

《暴风雨》为莎士比亚的创作生涯和这本文艺复兴研究作出了恰当的总结。传统上认为，这部剧是对艺术之力量的思考，是莎士比亚告别舞台之作。它也是莎士比亚最具古典特色的一出戏。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的一个海岛上，情节借鉴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那不勒斯国王阿隆索去突尼斯送女儿加布里埃尔出嫁，返航途中在地中海上普洛斯彼罗占据的海岛附近遭遇海滩；这一航行借鉴了埃涅阿斯从特洛伊经过伽太基到罗马的旅程。然而，这部剧也强烈地令人联想到欧洲人在美洲新世界的殖民活动。它审视了东西方两个世界，一边是东方地中海和古典的世界，它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另一边是西方的大西洋世界，它将加速塑造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启蒙思想。如果说文学观、智识观和国际观发生的这种转变标志着文艺复兴的特征宣告终结，那么它同时也提供了一种与

以往迥异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对文化与社会的认识。

注释

〔1〕 书中所引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文，均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梁宗岱译，《莎士比亚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2〕 译文见莎士比亚：《第十二夜》，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0页。

〔3〕 译文见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3页。

〔4〕 译文见莎士比亚：《奥瑟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83页。

年表

1333	彼特拉克发现西塞罗的《对诗的赞美歌》
1348	瘟疫遍及欧洲
1378	教廷开始分裂
1397	美第奇银行在佛罗伦萨建立
1400	布鲁尼，《佛罗伦萨城市颂》
1414	康斯坦茨公会议召开
1417	教廷分裂局面结束；马丁五世当选为教皇
1420	葡萄牙人在马德拉群岛开始殖民活动；马丁五世回到罗马
1438	费拉拉—佛罗伦萨公会议召开
1440	瓦拉揭露《康斯坦丁惠赐书》系伪作
1444	阿尔贝蒂，《论家庭》
约1450	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
1453	君士坦丁堡陷落；百年战争结束
1459	戈佐利创作壁画《三贤颂》；托普卡珀宫开始兴建
1474	菲奇诺，《柏拉图的神学》
1488	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绕过好望角
1492	哥伦布首航；征服格拉纳德；贝海姆发明地球仪；贝利尼兄弟开始创作《圣马可在亚历山大传教》（于1504—1507年间完成）
1494	《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签定；意大利战争；卢卡·帕乔利，《算术、几何与比例法全书》
1497—1498	达伽马到达印度

1500	卡布拉尔（Cabral）在巴西登陆
1505	莱奥纳尔多创作《蒙娜丽莎》；丢勒在意大利
1506	布拉曼特开始设计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
1509	亨利八世即英国王位（统治到1553年）
1511	伊拉斯谟，《愚人颂》
1512	米开朗琪罗完成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绘画；伊拉斯谟，《箴言》
1513	科尔特斯在墨西哥；葡萄牙攻占霍尔木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1515	弗兰西斯一世即法国王位（统治到1547年）
1516	查理五世即西班牙王位；伊拉斯谟，希腊文《新约》；莫尔，《乌托邦》
1517	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
1520	苏丹伟大的苏莱曼登基
1521	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召开；麦哲伦远航至太平洋
1524	德意志农民起义；拉斐尔创作《康斯坦丁的惠赐》
1525	帕维亚战役；丢勒，《圆规与格尺测量法教程》
1527	罗马遭受洗劫
1529	《萨拉戈萨条约》签定；迪奥戈·里贝罗绘制世界地图
1533	亨利八世与罗马决裂；霍尔拜因创作《使节》；雷乔蒙塔努斯，《论

	各种三角形的五部书》
1543	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维萨里，《人体结构》；葡萄牙人到达日本
1545	特伦托公会议召开（终于1563年）
1554	班戴洛，《小说集》
1555	《奥格斯堡和约》签定；教皇保罗四世颁布反犹太人的教皇诏书；拉蓓，《诗歌全集》
1556	查理五世退位；腓力二世成为西班牙国王；塔尔塔利亚，《论数字和度量》；阿格里科拉，《金属学》
1558	伊丽莎白一世即英国王位
1567	惠特尼，《书信录》
1569	墨卡托绘制世界地图
1570	伊丽莎白一世被革除教籍；奥特利乌斯（Ortelius），《世界概观》
1571	奥斯曼土耳其海军在勒班陀战役中被击败
1572	圣巴多罗买日大屠杀；卡蒙斯，《鲁西亚德》
1580	蒙田，《随笔集》
1590	斯宾塞，《仙后》
1603	莎士比亚《奥瑟罗》上演；伊丽莎白一世去世；詹姆斯一世即位
1604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
1605	培根，《学术的进展》

一幅16世纪的名画，暗藏多少文艺复兴的秘密？细品之，可见宗教的纷争与国家的碰撞、科学的革命与哲学的思辨；再品之，又可见东方与西方的竞争和交流、大航海时代的财富与血泪。

本书正是从这样一幅名画娓娓道来。将一个触得到、摸得着的全球性文艺复兴呈现到了我们的面前。

百科通识文库

49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杰拉尔丁·A约翰逊 著

李建群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杰拉尔丁·A约翰逊 著

李建群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42**

Renaissance Ar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5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Geraldine A. Johnson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 （英）约翰逊（Johnson, G.A.）著；李建群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97-7

I．①文… II．①约…②李… III．①艺术史 - 欧洲 - 中世纪 IV．①J150.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49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文雪琴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97-7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第一章　绪论：谁的文艺复兴？谁的艺术？
第二章　祭坛画艺术
第三章　文艺复兴艺术中的叙事
第四章　对自然与古风的挑战
第五章　肖像绘制艺术和“文艺复兴人”的产生
第六章　妇女经历了文艺复兴吗？
第七章　家庭私域的器物与人像
第八章　一个广场的故事：佛罗伦萨的艺术和都市生活
第九章　米开朗琪罗：艺术家和艺术史的诞生
术语表
返回总目录

| 作者简介 |

杰拉尔丁·A.约翰逊，牛津大学讲师，教授艺术史。主编《雕塑和摄影：展望第三维》并参与主编《文艺复兴及巴洛克时期意大利的妇女》等。

| 译者简介 |

李建群，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主攻外国美术史。已出版著作有《失落的玛雅》、《英国美术史话》、《20世纪英国美术》、《欧洲中世纪美术》等，译作有《失落与寻回——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艺术史的历史》等，并在美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图目

图1　拉斐尔·桑齐奥，《西斯廷圣母》，布面油画，约1512—1514年
图2　维托雷·卡尔帕乔，《卡斯特罗圣安东尼奥教堂修道院长奥托本的梦境》，布面油画，约1515年
图3　多米尼科·委内西亚诺，《圣路加教堂祭坛画》，板面蛋彩画，约1445—1447年
图4　乔凡尼·贝利尼，《圣约伯祭坛画》，板面油画，1478年前
图5　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伊森海姆祭坛画》，板面油画，约1513—1515年
图6　蒂尔曼·里门施奈德，《圣血祭坛》，褐釉椴木浮雕，约1499—1505年
图7　拉斐尔·桑齐奥，《基督下十字架》，板面油画，1507年
图8　维托雷·卡尔帕乔，《乌尔苏拉传奇：英格兰使者的到达和圣乌尔苏拉与她的父亲》片断，布面油画，15世纪90年代
图9　勃艮第的玛丽，《勃艮第的玛丽在阅读时间之书，出现圣母子在教堂的幻象》，羊皮纸彩饰，约1480年
图10　萨赛蒂礼拜堂：多米尼科·德尔·吉兰达约及其助手，《圣方济各的生平》湿壁画系列，祭坛画《牧羊人的崇拜》临摹，朱利亚诺·达·圣加洛（归属），弗朗切斯科·萨赛蒂和内拉·科尔西的黑色大理石墓1483—1486年
图11　圭多·马佐尼，《哀悼基督》，着色釉陶，1492—1494年
图12　乔凡尼·巴蒂斯塔·罗素·菲伦蒂诺，《宙斯化身金雨拜访达娜厄》，湿壁画，边框为灰泥浮雕，16世纪30年代
图13　法兰克福大师（活跃于安特卫普，可能是亨德里克·凡·乌鲁威？），《画家和他妻子的肖像》，板面油画，1496年

图14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亚当与夏娃》，版画（第二版），1504年

图15　安提科（皮耶罗·雅各布·阿拉里·伯纳科尔西），《观景殿的阿波罗小雕像》，部分镀金的青铜像，眼睛用银嵌入，约1497—1498年

图16　列奥纳多·达·芬奇，《人体手臂、肩膀和胸的四个连续的表面解剖图》，钢笔淡彩画，约1510—1511年

图17　列奥纳多·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壁画，1495—1497/1498年

图18　提香（提香·韦切利奥），《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乌尔比诺公爵》，布面油画，约1536—1538年

图19　杨·凡·爱克，《阿尔诺芬尼夫妇像》，板面油画，1434年

图20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自画像》，板面油画，1500年

图21　小汉斯·荷尔拜因，《大使》，板面油画，1533年

图22　洛伦佐·洛托，《卢克雷齐亚·瓦利尔》，布面油画（摹绘自板画），约16世纪30年代早期

图23　提香（提香·韦切利奥），《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布面油画，1538年前

图24　小马库斯·海拉特（归属），《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迪奇里肖像画）》，约1592年

图25　拉维尼娅·方塔娜，《有女仆、钢琴、画架和卡索奈长箱的自画像》，1577年

图26　桑德罗·波提切利，《春》，板面蛋彩画，约1478年

图27　巴伦西亚的佚名陶艺师，饰有叶形图案和美第奇家族纹章的双柄陶罐，上釉陶器，约1465—1492年

图28　佛罗伦萨的佚名艺术家，饰有圣克罗斯广场马上比武场景的卡索奈长箱，蛋彩画，镀金木箱，部分包银，约1455—1465年

图29　洛伦佐·吉贝尔蒂（设计），《圣母子》，着色陶，约15世纪20至30年代

图30　巴托罗米奥·蒂·弗鲁斯诺（归属），《有裸体男童坐像的生育盘》，蛋彩画，镶板上饰金和银，1428年

图31　老彼得·勃鲁盖尔，《伊卡鲁斯的坠落》，布面油画，约1555年

图32　佛罗伦萨的佚名艺术家，《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1498年在佛罗伦萨的西尼约里亚广场上被处死（市政厅前有“马尔佐科狮子”和“犹滴”雕像）》，板面油画，16世纪早期

图33　多那太罗（多那托·迪·尼科拉·迪·贝托·巴尔迪），《犹滴斩首荷罗孚尼》，青铜，15世纪中期

图34　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大卫》，大理石，1504年

图35　本韦努托·切利尼，《珀尔修斯手举美杜莎之头》，青铜雕像，青铜与大理石底座，1545—1554年

图36　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创造亚当》，湿壁画，约1508—1512年

第一章

绪论：谁的文艺复兴？谁的艺术？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1768年，当时还仅是一个攻读法律的学生、但很快就将成为德国最著名的诗人和哲学家的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首次步入德累斯顿新建的艺术博物馆，他描述了这样的情景：

> ……四下里深邃的静默令人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独特感受，仿佛人们进入上帝的殿堂时体验到的那种情感，而当观者看到展出的作品时，这种情感愈加强烈；这些作品，连同收藏它们的殿堂一起，是为神圣的艺术奉上的崇拜之物。

他可能驻足欣赏的作品之一是拉斐尔（Raphael）的《西斯廷圣母》（图1），1754年为德累斯顿的统治者萨克森的奥古斯特三世（Augustus III of Saxony）所购得；我们今天熟悉这幅画作则是因为不可计数的按照画中一对胖乎乎的小天使形象制成的圣诞卡、招贴画和小摆设。对于歌德来说，在德累斯顿画廊静谧的氛围中见到这样的作品，无异于一种类似宗教的体验；在这里，绘画被当作“半神”的艺术天才创作的美学圣物来拜谒。直到今天，当我们在神殿一般氛围的艺术博物馆中流连，虔诚地凝视着拉斐尔这样的文艺复兴大师的画作和雕塑时，我们仍然会将它们当作美学上的膜拜之物和几乎是神秘主义的视觉体验。

图1　拉斐尔·桑齐奥，《西斯廷圣母》，布面油画，约1512—1514年

但是，《西斯廷圣母》最早在16世纪的观者并不仅仅把宗教看作是一种艺术欣赏的隐喻，他们是在现实的宗教仪式背景下看待这些画作的。因为《西斯廷圣母》在当时其实并非歌德或今天的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它首先是用于祈祷的画像，有着明确的仪

式目的。简言之，它是一幅祭坛画。

在第二章中，我们会把祭坛画当作一种艺术形式来探讨。但是，眼下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理解，不论这样的作品在我们眼中是何等熟悉，都不应简单地认定，我们“看到”的作品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观者所看到的是相同的。相反，“艺术”这一概念本身必须放到15和16世纪观者的“历史眼光”中来理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对许多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绘画、雕塑和素描作品（现在在博物馆里展示，或在旅游手册中作为艺术杰作来推介）的评价，最初并不仅仅是——甚至并非主要是——从美学角度出发的；它们被看作功能性的物品，通过精心选择的意象服务于明确的宗教或世俗目的，而这些目的源自于古老的、往往仍然存在的传统。与此同时，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现代概念（Art, 首字母大写）首次出现，与它一同出现的还有如下一些与之相关的观念：艺术家作为创造天才的身份、评估艺术作品时独创性（而不是技艺）的重要性，以及评价中采用美学标准的重要意义——我们将在下文中简要探讨这些主题，并会在一些后续章节中有更详细的讨论。

重新审视文艺复兴

但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不仅仅是“艺术”这个术语。实际上，这本小书标题的前半部分——“文艺复兴”——也比乍看上去更为复杂。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再生”，但是它逐渐与更广泛意义上的复苏和革新联系在了一起，常用来指各种不同领域的此类现象。例如，我们说到“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纽约的非裔美国人社区在艺术、音乐、舞蹈和文学上新一波的繁荣浪潮，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等人之所以都被称为“文艺复兴人”，则是因为他们在诸多方面的兴趣和创新理念。

然而，如果我们想从历史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而不是从比喻

意义上，那么，我们需要了解它首次出现是在何时，又是如何出现的。大多数学者同意这样的观点：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纵令不是这个词本身——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意大利和人文主义的兴起。在这一时期，像彼特拉克（Petrarch）和薄伽丘（Boccaccio）这样的作家开始明确地表达对古希腊和罗马之古典世界的向往，并特别强调复兴这些早已消亡的文明的语言和智识传统。16世纪中期，画家和艺术史家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使用了意大利语的“文艺复兴”这个词（*rinascita*），不仅确指古典时代的艺术标准和文学典范的复兴，而且也将当前的艺术与刚刚过去的中世纪艺术区分开来。换句话说，对瓦萨里而言，“再生”不仅仅是复兴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视觉文化，也是要显示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紧临它的所谓“黑暗”、沉闷的艺术前身的差别。事实上，这种历史性的自我意识，这种把自己和自己时代的文化视为与过去（不论远近）不同、并独树一帜的意识，可能正是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最重要的标志。

自19世纪中期以来，通过像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这样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文艺复兴”被广泛认为是一个独特的和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如今（自我意识甚至更为强烈）的现代世界的直接先驱。同样是布克哈特，在他颇有影响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中首次明确指出文艺复兴是这样一个时期：即在此期间，兴趣广博的“全才”有意识地把古典的过去作为创造一个新的启蒙时代的灵感典范，这一启蒙涉及形形色色的领域，包括科学、艺术和政治；这个主题我们在第四章探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实践对自然的细致观察和对古代典范的采用时还会谈及。布克哈特关于理想的“文艺复兴人”是一个全能的人（*uomo universale*）这一观念也会在第五章再次涉及；在同一章中，我们会探讨这一时期个人肖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兴起。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在视觉艺术领域的地位和充当的角色则会在第六章中讨论。

但是，文艺复兴仅仅是关于发展出一种新的个体意识，展现出一种对复兴、变化和进步的有意识倾向吗？在字面意义上抑或是在比喻意义上，所有的欧洲人都真正经历了“文艺复兴”吗？与布克哈特和他

的许多追随者竭力说服我们的答案相反，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一个“否”字。对于一小批精英阶层的人文主义学者、艺术赞助人、作家和艺术家来说（他们14世纪首先活跃在意大利，后于15和16世纪逐渐遍及整个欧洲，这一时间跨度正是本书所聚焦的范围），他们确实怀有明确的愿望，想要利用从古典的过去中获得的灵感来创造一种当代新的智识、艺术和文学文化。但是，对于这一时期生活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意志、英国和低地国家的广大民众来说，在大多数方面，生活和从前没什么两样。因此，对于一个意大利丝绸织造工、一位英国农夫的妻子或一个法国铁匠而言，很难说他们的生活、信仰和体验中发生过任何意义重大的“文艺复兴”。

宗教是个极大的例外。直到16世纪早期为止，欧洲民众的宗教生活大体上仍然延续了长久以来的中世纪仪式和传统；虽有地方的差异和重心的偏移，但总的来说，它的基本内容在数个世纪内始终如一。不论对于上层精英人物，还是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众来说，情况都是如此。但是，到了16世纪初，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富有人格魅力的人物的领导下，新教改革运动对传统宗教构成了挑战；它标志着欧洲社会各阶层的宗教生活和观念发生了激进的变革。因此，人们可以认为，“文艺复兴艺术”或“文艺复兴文学”就是有意识地鼓励创新的、进步的、常受古典时代灵感激发而产生的风格和主题，并且与上层社会的赞助人以及他们所赏识的艺术家和作家紧密相关，特别是在世俗领域内。但是，考虑到直至16世纪初，这一地区的宗教总体而言与刚刚过去的时代保持了一致性，谈论“文艺复兴宗教”就未免有年代误植之嫌了。相反，在探讨宗教问题时，在“中世纪后期”和“后宗教改革时期”或“近代早期”文化之间作出分隔或许更为合适——“近代早期”是最近几十年间学者们所使用的术语，它用来约指从16世纪到18世纪这个时间段，而自布克哈特的时代以来，这个术语与“文艺复兴”一词及其假定的关联也许算是比较松散的了。

艺术、艺术家和赞助人

这一时期延续和变化之间的张力可见于15和16世纪欧洲许多不同类型的作品当中。尽管它们中有许多完全可以在当代的艺术博物馆或18世纪末歌德所参观的德累斯顿画廊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我们必须记住的重要一点是，所有这些作品最初都不是为在这样的环境中陈列而创作的。事实上，这些作品中的绝大多数压根儿并未被看作是“艺术品”，至少不是现代意义上这个词的意思。也就是说，它们不应被理解为某个艺术家个人信仰、情感和体验的某种具象化。相反，这些作品所要表达的是委托创作的赞助人的品位、期望和需要。

同样，当时的艺术家未曾被社会放逐，也没有在思想上离经叛道，他们并不会遇到由于传统社会不能欣赏他们的前卫眼光和天才而在阁楼上忍饥挨饿的情形。相反，成功的文艺复兴艺术家通常是一个被称为行会的保守行业团体的成员，或者，16世纪晚期的情况是，他们通常被国家艺术学院所接纳，这二者都向赞助人保证了艺术家确有一定的能力，同时也保障了艺术家合理的收入来源。为了从富有的赞助人那里赢得订单——赞助人既包括从教皇到王侯、再到贵族和殷实市民的个人，也包括市议会、行会、同业公会和宗教组织之类的较大组织——首要的一点就是艺术家必须顺应他们所服务的出资者的社会、政治和宗教期望。虽然，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中将会看到的，像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和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这样一小部分人的“超级巨星”身份确实使得艺术家作为一个远见卓识者、甚至是古怪天才的新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出现成为可能，但是绝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之所以获得成功正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足够稳健可靠，技艺足够娴熟，能够严格地按照赞助人的意图完成特定的订购作品。

类似地，评估创作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绝大多数作品时，评估标准主要并不在于审美的角度，也就是说，并非权衡它们的风格和结构，或者权衡相对于围绕严肃的艺术“进步”和“发展”的观点、按时间顺序组织起来的宏大艺术史叙事来说，它们是如何地切合。然而，这些标准正是今天的博物馆在决定如何展示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和素描作品时所采用的；在这些博物馆中，展厅按照艺术“流派”以

时间顺序陈列作品，墙上的标签目录仅列出艺术家的姓名、年代和作品的标题，通常不包括任何更详细的背景资料。正如在歌德的时代所见到的情形一样，博物馆本身寂静无声，避免了一切不必要的干扰，以此提升我们从审美的角度欣赏艺术品的能力，用19世纪放浪不羁的文化人泰奥菲勒·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的话来说，就是欣赏“为艺术而艺术”。

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情况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在整个16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少数赞助人和收藏家在购买以及展示绘画、雕塑和素描作品时至少部分地开始采用我们今天认可的美学标准（例如艺术家的声名或作品本身的创意和美感），但是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作品仍然是为了实现各种迥然相异的功能而创作的。例如，祭坛画是举行与弥撒相关的宗教仪式的标准“装备”之一部分，而素描则主要是完成画作的过程中实现目的的一个手段，而不是被当作一位伟大艺术家的风格或“手法”的真迹保存下来的。正如我们将要在第三章中见到的，就湿壁画、叙事性祭坛画和绘图手稿的情况来说，艺术技巧被用来帮助读者和观者理解历史事件，并且使宗教和世俗的典籍更容易为人所牢记。在公共场所展示的雕塑（我们将在第八章中讨论）是用来赞美教会和国家的权威和力量，而经过装饰的家具、陶瓷器、挂毯织锦、金属制品等（将在第七章中涉及），则是富有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用品。

当然，这并不是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男女对他们身边事物的美学特质视而不见。事实上，赞助人之所以会挑选著名的艺术家，并且愿意为他们的作品支付更高的酬劳，正是因为艺术家的能力、创新以及作品的美感备受重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16世纪以前，这样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从属于艺术的非美学功能——不论这些功能是社会的、宗教的、政治的，还是实际应用的——也从属于作品所描绘的意象和主题。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艺术制作

作为21世纪初的观者，我们还需要牢记的重要一点是，从15至16世纪的欧洲存留下来的那些艺术品在创作过程中包含着亲力为之的艰辛劳动。今天的我们在评价艺术家时习惯于关注他们的想法和概念是如何创新、如何打破传统，甚至是如何令人震惊，而不是看他们的技艺或技术是如何精湛，这使得我们很容易忽视包含在艺术品创作中的手艺和技能，以及艰辛的体力劳动：即使木制镶板上的一幅小型绘画都是如此，更不用提大教堂墙面上整套的湿壁画，或者等身大小的实心大理石雕刻或熔铸的青铜雕像了，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没有电力、发动机、批量生产的颜料和纸张、可控温度的熔炉以及摄影术的时代。

设想一下，如下情景该是多么困难：米开朗琪罗著名的大卫雕像所用的巨大的大理石料，必须人工从卡拉拉的山腰采石场采凿（这个雕像加上底座超过5米高，见图34）。在艰苦地凿下巨大的石料之后，还必须把它拖到几公里之外的阿尔诺河，装上驳船，沿河而上将它运到佛罗伦萨，接着只能依靠驴子将之拖运到雕塑家的作坊。虽然初始阶段的雕凿工作是由另一位艺术家进行的，但他和米开朗琪罗都仅能采用手动的工具来对雕像进行切割、雕凿和打磨。而在自然日光下的工作时间之外，若要依靠烛光继续工作，则必须保证在此条件下不会出错时方可进行。

同样，铸造一个等身大小的青铜雕像的过程让人炙热难耐、挥汗如雨，往往还会发生危险；16世纪中期，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对他制作珀尔修斯雕像（图35）的最后阶段进行的描述让我们对此有了清晰的认识：

> 我极其小心地慢慢将［模具］放到熔炉底部……将许多大块铜料和其他一些青铜碎料填入［模具］……然后［开始］熔化它……［但是很快］作坊就着了火，我们怕得要死，担心房顶会塌下来压死我们……［接着］我发现金属全都凝结了……等到我们刚把这一片混乱清理完毕……突然发生了一次爆炸，一道冲天的火光闪过，仿佛霹雳落在了我们中间……等到强光和巨响消逝之后，我们……意识到炉罩开裂了，青铜液流溢了出来。［于是］我匆忙……堵上两个塞子。接着，看到金属液仍未达到所要求的熔态，我意识到合金肯定是在可怕的高温中消

耗掉了。于是，我让人拿来了我所有的白镴盘子、碗和托盘……将它们……投入熔炉……这样，我的模具一下子就被填满了。我跪下来，衷心感谢上帝。

手绘湿壁画虽然没有这么惊心动魄，但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其中的步骤包括绘制实图大小的所谓“底图”（cartoon，来源于意大利语对特厚纸张的称谓*cartone*），这些底图再被拓画到仔细涂抹在砖墙上的薄薄一层湿灰泥上。接着，画家必须在灰泥晾干之前飞快地用颜料填满轮廓线。这项工作必须非常精确地完成，因为由于颜料是透明的（和水彩颜料的情况一样），湿壁画不能在已画的部分上涂盖来“作出更改”。绘制时画家经常得站在摇摇晃晃的脚手架上，没有电灯照明，还不得不连续数小时用手高举着画笔，难怪即使像米开朗琪罗这样著名的艺术家在绘制西斯廷教堂的穹顶画（图36）时，也会满腹怨气地抱怨说自己背疼脖子酸，更不用提还有小滴的颜料滴到眼睛里了。虽然关于他平躺着作画完成这一浩大委托工程的普遍传说并非事实，但真实的情况是，他必须站在潮湿和一直滴颜料的灰泥顶下连续作画数月不断，这似乎也舒服不到哪里去。

木镶板画——如多米尼科·委内西亚诺（Domenico Veneziano）的《圣路加教堂祭坛画》（图3）——的准备工作要求在木板上敷抹一层白色的灰泥状底料，以使其表面平滑，传统的蛋彩画颜料便是绘制在这上面的；这一过程相对来说费力较少，但它仍然要求有高度的专业技术水平。油画颜料则最早出现在北欧，随后逐渐流行开来，首先由像扬·凡·爱克（Jan van Eyck）这样的画家用于木板上，之后则用到更大尺寸的亚麻帆布上；它的使用令绘画的过程和必要时的修改都更加容易了，这一点可以从16世纪提香（Titian）和他的作坊所创作的帆布油画的尺寸和数量上得到证明（图18和23）。尽管如此，在没有摄影术可以借助的情况下进行筹备性素描，以及选择不会弯曲的木料、绷紧画布使它不致松弛、确保手工调和的蛋彩和油画颜料不会从画板表面剥落和流下等过程中所需要的技能，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依赖照相机、在本地的美术商店轻易便可获得大批量生产的统一品质的材料的人而言，这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

结语

虽然关于“艺术”的新观念和艺术家的地位在这一时期确实有所发展，对于赞助人和最初的观者而言，创作一幅画或一件物品所需的工艺，连同它的功能和意象，往往和它的美学价值同等重要，有时甚至更为重要。文艺复兴时期的视觉和物质文化也是由以下两者之间的平衡所构成的：延续中世纪晚期的艺术传统的意识和通过复兴古典世界的相关理念来促成创新的愿望。这些内在的张力大多在祭坛画——可能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艺术样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祭坛画正是我们下一章将要探讨的焦点。

第二章

祭坛画艺术

祭坛画，旧与新

位于威尼斯卡斯特罗的圣安东尼奥教堂的修道院长弗朗切斯科·奥托本（Francesco Ottobon）为了使他的僧侣同胞免遭瘟疫袭击而向上帝祈福，在祈祷过程中他睡着了。突然，他进入了一个生动的梦境，在梦中，一万个早期基督教的殉教者身着齐整的教会服装，手持十字架进入教堂接受圣彼得本人的祝福（图2）。队伍行进完毕之后，他听到了一个神秘的声音，这个声音告诉他："不要怀疑，继续忠实于上帝，我下令，所有这些［殉教者］都代你们祈祷，你们会在即将到来的危险中得以幸免。"后来他没有一位同事感染瘟疫，于是他要他的侄子订制一个气势堂皇的祭坛，并用昂贵的大理石作为框架，以感谢殉教者们的帮助。祭坛画的中央部分由维托雷·卡尔帕乔（Vittore Carpaccio）绘制，表现了天国圣徒们受磨难而死的场景。这个修道院长一定还请卡尔帕乔为这个新的圣坛创作了另一幅画，在这幅画里，完成于1515年的新祭坛画和他最初的梦境被合二为一，见图2（新祭坛画位于右起第三个拱门下）。

图2　维托雷·卡尔帕乔，《卡斯特罗圣安东尼奥教堂修道院长奥托本的梦境》，布面油画，约1515年

在这一教堂的内景中还能看到另一些虔敬的信徒送来的还愿供奉物，比如两只挂在屋椽上的航船模型，就是在海上遇险时经过祈祷而得到神助的海员供奉的。画中教堂的侧壁上还有另外两幅祭坛画，但不清楚这两幅画是作为对以往得到神灵恩惠的谢礼，还是捐赠者预料到自己大限将至，因此捐赠祭坛画以祈祷死后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三幅画的捐赠人都不会认为这些作品仅仅是静态的、装饰性的图画，仅因其美学特性而用来供人欣赏。相反，这些作品是用来积极配合定期举行的弥撒仪式的，仪式就在画前举行，通常这些弥撒活动正是由这些捐赠人给予经济支持的。换句话说，捐赠一幅祭坛画也意味着另外还要捐赠一笔钱，以资助神父在画前永久性地为捐赠者作弥撒——或者至少是在捐赠的钱用完之前。

根据修道院长奥托本的梦境所作的画引起了艺术史学家的特别关注，因为它从视觉上直观体现了15世纪时祭坛画在设计上的发展变化，虽然不是功能上的改变。这幅在16世纪早期由修道院长的侄子委托订制的祭坛画是一幅布面油画，它表现了一个单独、统一的叙事场景，画作被放置在典雅的仿古典建筑的框架中。两幅早期的祭坛画，可能创作于14世纪或15世纪早期，风格则截然不同。这些作品不是将人物放在自然景观中，勾勒单一中心的场景，而是在镀金背景上刻画多个圣人的半身或全身像，每个人像都画在单独的木制镶板上，可能是蛋彩画。不同于后来的祭坛画边框所采用的古典式几何圆柱、圆形拱顶、以及三角墙，这两个早期的多联画屏（这么称呼是因为它们由分成许多格的画组合而成）把人物放在单个的尖拱结构之下，类似于中世纪建筑（比如它们本来被安放的教堂）中的拱门。

在15世纪，不仅是祭坛画的结构有了改变，同时代人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方法也有了变化。虽然对于修道院长这幅画中的两幅多联画屏的委托和制作来说，艺术家的技巧显然是重要的，但这些作品当时的赞助人和观者同时还会看重制作材料的贵重，比如金箔的采用，或者

圣人形象的长袍上使用的从中东进口的青金石粉末制成的珍贵的群青色。的确，15世纪时赞助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契约往往详细规定了所要使用的昂贵颜料或黄金的质量和数量，但是，由于艺术家及其赞助人越来越渴望更自然地刻画人物和场景，镀金背景的采用显得越来越老气了。同时，以令人信服的写实方法描绘人物和背景的能力变得更为重要，加上人们对于风格和作品革新本身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些都意味着艺术技巧和独创性的价值在更有革新头脑的赞助人眼中开始变得高于所使用的材料本身。

15世纪早期佛罗伦萨的建筑家、雕塑家和艺术理论家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清楚地描绘了这一从材料到艺术本身价值的渐变：

> 有些艺术家在绘画中使用大量的黄金，因为他们认为这会使作品显得高贵：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即使你画的是维吉尔（Virgil）笔下的狄多（Dido）——她披戴着金箭，金色的头发上系着金色的发扣……她的套马索全都是金的——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赞成艺术家使用任何黄金，因为使用朴素的颜料刻画金子的光芒会给艺术家带来更多的崇拜和赞誉。

事实上，阿尔贝蒂最欣赏的艺术家确实只使用“朴素的颜料”来越来越精确地表现自然世界和人体结构，同时采用逼真的三维空间手法刻画建筑物和建筑空间，我们将在第四章中对此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

意大利的祭坛画

新风格祭坛画的一个有趣的早期例子是由多米尼科·委内西亚诺在大约1445—1447年间为佛罗伦萨的圣路加·德·马格诺里教堂绘制的镶板画（图3），可能是为了代替一幅旧的有着镀金背景的多联画屏。虽然作品的三跨建筑结构仍然有着老式的带拱门结构的三联画的痕迹，但艺术家显然想要表现与观者处在一个统一空间的场景，就如同

是对观者所在空间的延续。画面中的左起第二个人是施洗礼者约翰，他向外凝视的眼神以及手的指向进一步强化了画中人物形象与观者之间的联系，他似乎在亲自邀请我们去朝拜我们眼前的圣母马利亚和圣子。

图3　多米尼科·委内西亚诺，《圣路加教堂祭坛画》，板面蛋彩画，约1445—1447年

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画于1478年以前的《圣约伯祭坛画》（图4）对建筑空间的描绘甚至更为真切。这件作品的制作是为了满足赞助人在虔诚信仰和社会作用方面的需要，它的赞助人是圣约伯协会的成员，这是一个慈善组织，也是威尼斯富有市民的社交“俱乐部”。贝利尼在描绘这个几乎是三维的礼拜堂的闪光半圆屋顶时，没有用真正的金箔，而仅仅采用了阿尔贝蒂推崇的“朴素的颜

料”（尽管他使用了闪亮的油画颜料，而不是《圣路加教堂祭坛画》中那种更无光泽的蛋彩）。的确，贝利尼是那么坚持营造这种三维的感觉，他甚至在这一构图的上部画了一盏悬挂的灯。画中虚构的礼拜堂被神秘的圣光所照亮，这盏灯则在我们的空间和礼拜堂之间摇曳，似要湮没于黑色的阴影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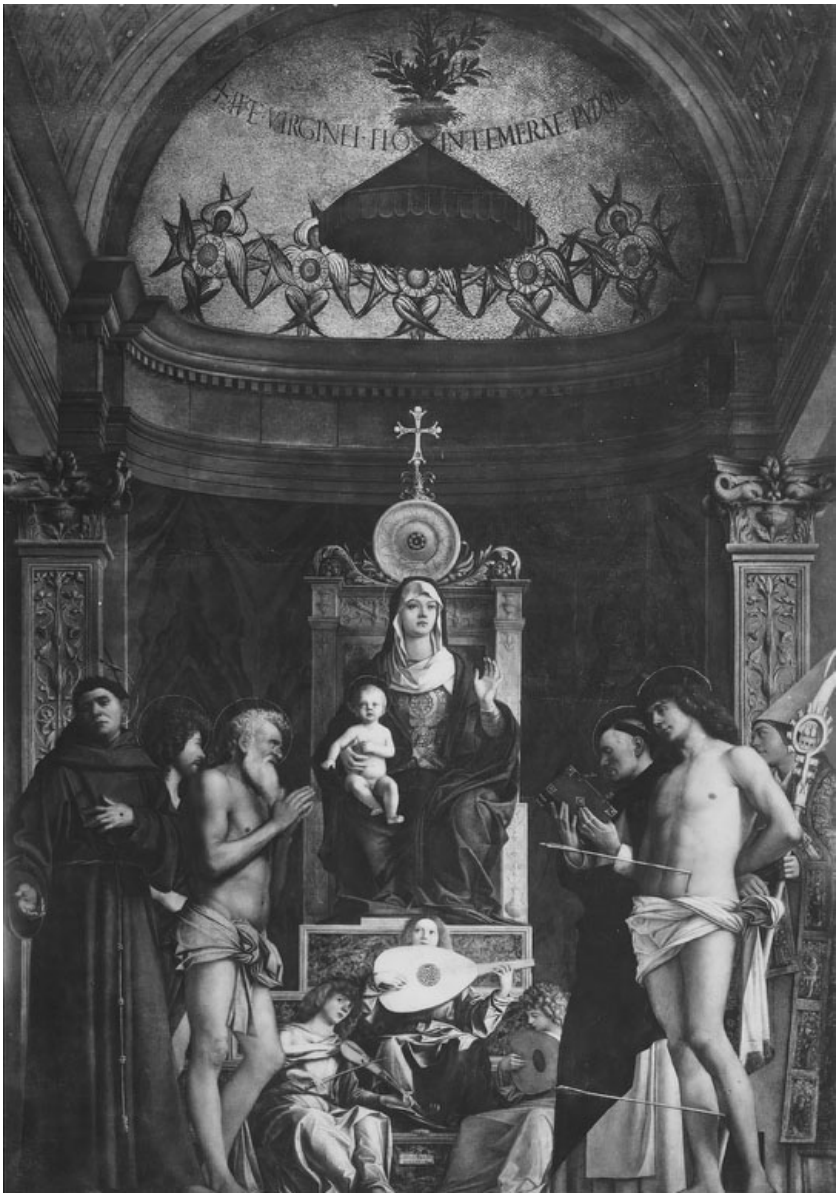

图4　乔凡尼·贝利尼，《圣约伯祭坛画》，板面油画，1478年前

至于贝利尼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创新设计，原因之一在于威尼斯圣约伯教堂的地理位置，此画最初就悬挂在该教堂正殿的墙上。由于教堂的一侧有一条运河流过，教堂无法在建筑的这一侧建一个真正立

体的礼拜堂。但是，无论如何，没有一个真正的礼拜堂能使得艺术家将赞助人的世界与祭坛画中所描绘的虚幻世界如此成功地连结起来。在这里，天堂般的幻景似乎是对我们所处的空间天衣无缝的延续。我们看到圣母庄严地抬手祝福聚集在祭坛前面的信徒。画面左边，几乎裸体的圣约伯双手合十为我们祈福，再往左，是富有同情心的圣方济各（这个教堂就是由他的修道会圣方济各会所负责的），他向下伸出手，似乎是在亲自邀请我们参加这一神圣的聚会。

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中，圣母的形象并不像是出现在一个真实的礼拜堂里，而像是有一扇巨大的窗户，从拉开的窗帘中，圣母马利亚从天堂降临到我们眼前，向我们引见她心爱的圣子（图1）。然而相同的是，她的一个圣徒伴侣伸向画外的手势似乎是邀请观者进入这个场景。考虑到做这个手势的长着胡子的人是圣西克斯图斯，即当时的教皇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已故的伯父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的守护神，这个手势越发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正是尤里乌斯二世为意大利的皮亚琴察城的西斯廷女修道院的高祭坛订制了这一作品。在画面的底部，可爱的天使靠在窗沿上，而这个窗沿似乎存在于我们的空间和画面所描绘的天堂之间，由此这两个天使就有着特殊的信仰功能：他们充当着这个世界和下一世界的桥梁，因而修女们可以更直接地为死去的教皇的灵魂向圣母祈福，这幅作品原本就是为她们而订制的。这样，尽管今天我们会从美学的角度欣赏在德累斯顿画廊的这些美丽天使，但是只有将他们放到原来的环境中，用最初观者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一作品非审美的方面，或更准确地说，审美以外的方面才变得明显起来。

北方雕刻的和绘制的祭坛画

使用创新的视觉手段来进一步发展祭坛画由来已久的宗教、社会、甚至偶尔的政治功能，这一兴趣在北欧艺术家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在15世纪以及16世纪的早期，德国和低地国家的艺术家和赞助人

在保持中世纪以来祭坛画的传统版式的同时，开始发展出新的视觉和意象策略。这样，不同于意大利从多联画屏转变为独幅的、有着中央绘画场景的祭坛画，艺术家们如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在大约1513—1515年创作《伊森海姆祭坛画》、以及蒂尔曼·里门施奈德（Tilman Riemenschneider）在大约1499—1505年创作《圣血祭坛》时都继续使用了中世纪的带翼祭坛画作为他们最基本的结构单位。这里的祭坛高架（retable一词来自于拉丁文，意为“［祭坛］桌后面”）上既可以是绘画，也可以是雕刻，由一组居于中央的人物形象构成，后来发展为单个的人物形象，两种类型都在两侧带有窗板式的侧翼，平时可以关上以保护里面的部分，在特殊的宗教节日里打开。

虽然这些祭坛画的结构大致上是对中世纪祭坛画的继承，但事实上它们越来越多地追求物质和心理上的逼真，而且开始选择统一的画面场景来取代单个圣徒像的陈列，这种现象明显是与意大利祭坛画的发展相一致的。在《伊森海姆祭坛画》中，最里面的中央核心仍然是由单个的镀金圣徒像组成并陈列在一个精致的、哥特式风格的画框里，但覆盖和围绕这些人像的三个侧翼和两块中央画板在风格和精神实质上都截然不同（图5）。在这些画板中，采用了油画来描绘关键的代祷者（包括圣母马利亚）、复活的基督，以及祭坛画最外“层”的中央画面上可怕的基督受难场面。在这里，基督的身体上布满了不断渗出脓水的伤口，他那爆裂的嘴唇被抹上了死亡的干枯蓝白色。然而，这个令人震惊的逼真画面对于当时的观者来说并非不合适。那是些身患绝症的朝圣者，他们来到伊森海姆（位于阿尔萨斯地区，今天的法国和德国边境）为一种被称为“圣安东尼之火”的可怕病痛寻求灵丹妙药，这是一种会改变病人形体的真菌疾病，它会使患者的肢体由于坏疽而变黑、变青，最后脱落。对于这样的观者来说，看到用极度恐怖的细节所描绘的死去的基督，可能意味着他们的救世主也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总有一天他们会像基督一样重生，重新拥有完美、完整和健康的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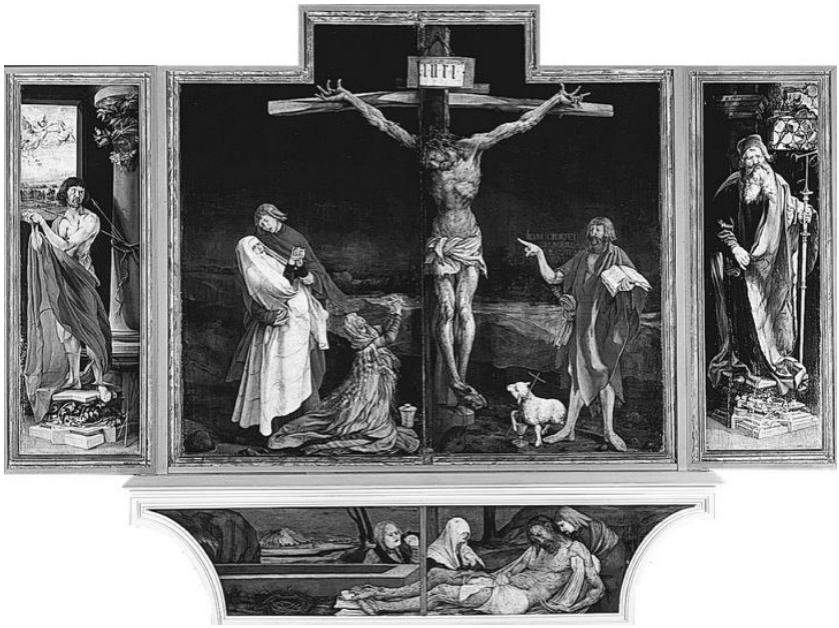

图5　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伊森海姆祭坛画》：（从左至右）《圣塞巴斯蒂安》、《基督受难图》、《圣安当》，以及（下部）《哀悼基督》，板面油画，约1513—1515年

里门施奈德创作的、放置于德国南部罗腾堡的《圣血祭坛》（图6）没有采用具备高度描绘性的油画手段作为媒介，而是利用了椴木的特殊材质以及圣雅各布教堂的光照条件来吸引观众，至今这幅祭坛画仍然存放在该教堂。里门施奈德不像他的前辈和许多同时代人那样将祭坛画涂上明亮的颜色，他的罗腾堡祭坛画的木雕人像和浮雕只是抹了一层褐色的透明釉，这种统一单色调画面中唯一的例外是人物瞳孔都点上了黑色，他们的嘴唇都罩上了一层薄薄的淡红色釉。就像格吕内瓦尔德的作品最外层的中央画面一样，这个祭坛画的中央部分也聚焦于单幅、统一的叙事场景，这个场景立体地表现了最后的晚餐，正中间是出卖基督的犹大。通常来说，如果要给木雕涂上明亮的色彩，事先必须抹上厚石膏，里门施奈德避免了这种方法，他利用椴木的柔软和柔韧性雕刻出比不透明的色彩厚涂层看起来更好和更逼真的细节。为了使这一场景更为生动，他在《最后的晚餐》浮雕后面采用

了厚实、透明的玻璃圆板而不是通常采用的实心木背板，这样祭坛后面的高大窗户透进来的自然光就成为了画面叙事场景中活跃的、不断变化的组成部分。

图6　蒂尔曼·里门施奈德，《圣血祭坛》，褐釉椴木浮雕，约1499—1505年

除了中央画面《最后的晚餐》外，祭坛画的下部最初也是城市最珍贵的圣迹收藏所在地，据说是基督自己的一滴血。当然，正是在最后的晚餐上，基督创立了圣餐的典礼，包括以他自己的血作为酒让圣徒们饮用。选择这个主题作为祭坛装饰的中心画面最适合体现祭坛的圣物箱功能，这种功能在作品赞助人、罗腾堡市议员的心目中也是至高无上的。里门施奈德的这件作品在视觉和材料使用方面的创新同样是为了配合他的赞助人的需要，而不是主要为满足抽象的审美需求。

按最初的约定，制作这个神龛似的框架来安放里门施奈德的雕刻的木匠应得到50弗罗林的工钱，雕塑家本人的报酬也是同样数额，这一事实的确意义重大。只是在祭坛完成之后，后者的报酬才增至60弗罗林，这是因为他工作出色而得到了额外的奖金。但是，“纯粹的”木工活与我们今天所认为的艺术作品有着几乎一样的价值，这个事实很

有启迪意义。的确，这一报酬标准证实了议员们的首要目的是制作一个引人注目的、具有宗教功能的复合作品来提高城市的声誉，从而吸引更多的朝圣 - 旅游者——以及他们的消费力——来到罗腾堡朝拜他们珍贵的圣迹。从这个角度来看，赞助人对于能确保城市的主要景观被适当“包装”的木制神龛的重视，丝毫不亚于他们对于祭坛画里感人和有着审美意义的雕塑的重视，这种做法就很有道理了。

拉斐尔的《基督下十字架》的创作和意义

在宗教改革前的祭坛画中展现的革新形式和意象策略可以与这一类型长期存在的宗教和社会功能联系起来，我们在本章最后讨论的一幅作品，即拉斐尔创作于1507年的《基督下十字架》（图7），也强调了这一点。在形式的层面上，这幅画表明艺术家有着非常成熟老练的构图技巧，而且他能轻松地参考古代材料中的图像资料，比如刻画死去的英雄墨勒阿革（Meleager）被抬去埋葬这一场景的罗马石棺浮雕。同时，创作这幅画的故事还证明：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祭坛画能承载广泛的意义，宗教的、个人的、甚至是政治的意义都可以嵌入其中。而当一件作品被陈列在画廊的墙上，远离它原来的背景环境时，上述这些意义往往被遗忘了。

图7　拉斐尔·桑齐奥，《基督下十字架》，板面油画，1507年

这幅祭坛画是由一名贵妇，佩鲁贾的阿塔兰忒·巴利奥尼（Atalanta Baglioni of Perugia）订制的。阿塔兰忒比较年轻时就成了寡妇，从此再未结婚，她成为了家族的首领。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她掌管着家族的财富和收入，对于这个时期的妇女而言，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地位，而这样的地位也使得她能够独自决定雇用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艺术家。在阿塔兰忒委托订制这一作品的时候，佩鲁贾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城市：不仅是这个城市正在与邻城发生军事冲突，而且在城市内部，统治阶层的不同宗族间也经常卷入血腥冲突。而巴利奥尼家族所面对的，不仅是与其他家族的斗争，而且还包括本家族的内讧。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件涉及到了阿塔兰忒的儿子格里福内特

（Grifonetto），1500年，他试图在一个家族婚宴中谋杀亲戚中所有的男性长辈。许多姻亲都被杀死，但那些在这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却发誓要向这个年轻的新贵复仇。然而，在他的母亲拒绝将他藏在她的房间里之后，格里福内特设法逃走了。后来当格里福内特回到佩鲁贾，打算乞求他的亲戚宽恕他时，他立刻被一个愤愤不平的姻亲连刺数刀。阿塔兰忒冲到她临死的儿子身边，但她并不是要给他任何母爱的宽慰，而是冷冷地命令他宽恕刺杀者，以此来向公众证明在她心目中，家族的荣誉高于母性本能。

但是，几年以后，阿塔兰忒觉得必须做点什么来纪念她死去的儿子，也许是试图为她在儿子需要她时所表现出的无情行为作出补偿。这样，她决定请拉斐尔回到这个城市为她画一幅壮丽的祭坛画——拉斐尔在移居佛罗伦萨之前曾在佩鲁贾工作过几年。阿塔兰忒的祭坛画并不是描绘一组圣徒静像，而是表现了死去的基督被哀悼者围绕，将要被抬入坟墓的叙事性的痛苦场景。拉斐尔所创作的复杂的视觉形象，以及优雅交错的人物有节奏地穿过画面的前景，犹如古典浮雕的场景，而在这里，母亲对于儿子悲剧性死亡的哀悼终于得到了实现。的确，在画面的右边，圣母马利亚已经不堪悲恸而晕厥，也许，对于阿塔兰忒来说，这是为了从视觉上宣泄她七年前失去儿子时在公共场合下压抑的悲痛感情。无论如何，这幅祭坛画是作为阿塔兰忒想要为她儿子的灵魂祈祷，或者，含蓄地为她自己在将来得到拯救而安排的纪念性弥撒的永久性视觉体现。

拉斐尔在创作这样一幅感人图画时所表现出的技巧和独创性对于其成功显然是至关重要的。的确，在这幅作品中，拉斐尔似乎力图在艺术上取代被认为是他老师的本地画家佩鲁吉诺（Perugino），后者在12年前曾创作了一幅类似主题的祭坛画。他也想超越他自己早期的作品，包括在佩鲁贾为巴利奥尼家族的主要敌对者、奥迪（Oddi）家族的女性成员所画的祭坛画。但是，从根本上说，正如我们在本章涉及的许多其他例子中所看到的，拉斐尔在《基督下十字架》中表现出的不容怀疑的艺术才能首先和最主要是为了满足赞助人的要求，而不是满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艺术”这个词的标准。因此，在原来的背景

中，这些祭坛画远非仅仅是美丽的画面，而是信仰、社会甚至政治要求的复杂交汇物在视觉和物质上的具体体现，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最成功的艺术家都力图以新的、甚至更为革新的方法来满足这些要求。

结语：圣像与圣像破坏运动

在整个16世纪以及之后，起源于中世纪多联画屏和带翼装饰的祭坛画传统，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北欧的天主教地区延续下来。但在16世纪早期被新教改革运动席卷的城市和地区，这个传统被突然、甚至是暴力地中止。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者在仔细审视了《圣经》中关于禁止制作“偶像”（《出埃及记》20：4—5）的明确戒律之后，开始辩论说：关于圣人和《圣经》故事的图像不应该出现在教堂里，可能甚至都不应该出现在信徒个人宗教活动的场所。这个观点的根据还在于历史上长期以来对宗教画和雕像的滥用，虽然在几个世纪中反复有禁令发布，但是把圣像和圣人雕塑当成圣人本身（而不仅是圣人的画像）来崇拜的现象一直存在。有的改革者允许某些类型的宗教形象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下继续作为信仰的辅助工具，而另一些人则不仅禁止制作任何新的宗教艺术品，而且还有系统地毁坏所有已存在的圣像和圣人雕塑，祭坛画就是他们攻击的中心目标。1566年，一个英国目击者描述了在安特卫普大教堂发生的这样一次破坏行动，安特卫普是荷兰南部的主要城市之一，在今天的比利时境内：

> 我进了教堂……它看起来就像个地狱，仿佛天堂和大地都一同消失了，只有倒下的雕像和摔落的昂贵作品……所有的一切，都毁灭了！［这曾是］欧洲最华贵的教堂；他们把这个教堂破坏得如此厉害，甚至都没有留下一个坐的地方。

由于各地宗教原因以及政治环境因素，这样恶性的圣像破坏运动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在北欧的不同地区，不仅导致了数个世纪的各种宗教艺术品（包括无数祭坛画）遭到彻底破坏，同时也急剧减少了艺术家的工作机会，而这些艺术家以前主要依赖大量的祭坛画订货

来维持生活。在大约1520年之后的北方新教区，艺术制作不再是一个好的职业选择，除非艺术家愿意从事通常是小规模且低报酬的绘画创作，比如我们要在第五章里涉及的肖像画。但是对于在天主教地区工作的画家和雕塑家来说，祭坛画传统则成功地延续了数个世纪。

第三章

文艺复兴艺术中的叙事

乌尔苏拉的传奇：一个威尼斯的故事

在不列颠有一个基督教国王…… [他有个] 女儿名叫乌尔苏拉。这个女儿因其诚实、智慧和美貌而享有盛誉……英格兰国王（他仍然崇拜异教偶像）……说他很希望他的儿子能与这个贞洁的女子喜结良缘。而那位年轻人也很想娶她。于是，他们派出一个正式的使团去见乌尔苏拉的父亲，并且为娶她许下了郑重的承诺，说了许多恭维话……而她得到神示，同意……与他结婚……条件是……这个年轻人必须接受洗礼 [并且允许她在11,000个贞女的陪伴下去朝圣。王子] ……同意满足乌尔苏拉的所有要求…… [于是] 他们向罗马进发。

这是由13世纪的热那亚大主教雅各布·达·沃拉吉纳（Jacopo da Voragine）汇编的圣徒故事选集《黄金传说》中圣乌尔苏拉的故事的开头。此书在整个欧洲都非常流行，可能就像《圣经》本身那样家喻户晓。到1500年时，已经有将近75个拉丁文版印刷出版，更不用说其他的英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和波西米亚文版本了。因此，被称为圣乌尔苏拉会（*Scuola di Sant'Orsola*）的这个威尼斯公会决定为他们的会所订制一幅新的绘画取代一些老旧的壁画时，很容易详细地了解到他们的保护圣徒乌尔苏拉的生平传奇。

1488年，这个包括男女、贵族和富人的公会雇用了一位年轻的、颇有发展前途的艺术家，也就是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提到过的维托雷·卡尔帕乔。乌尔苏拉会请他画一组约6米长、3米高的圣乌尔苏拉的故事。这些大约在1490到1500年间完成的作品悬挂在用作公会的会议厅及公共礼拜堂的建筑内。它们以逐渐展开的叙事方式描绘了圣乌尔苏拉的生平，开头便是英格兰国王派出使者来为他的儿子向美丽的基督信徒公主求婚的场景（图8）。

图8　维托雷·卡尔帕乔，《乌尔苏拉传奇：英格兰使者的到达和圣乌尔苏拉与她的父亲》片断，布面油画，15世纪90年代

在这幅画面中，我们看到在远处，使者的船只停泊在大广场的另一边。在画面的前景中央，使者们按照礼仪列着队从左到右在画面上展开。画中人物如同处于一幅从电影中截取的静止画面中：首先，在左边第二个柱子旁边，我们看见有两个人站着；紧接着旁边另外两人正要跪拜；而同时，还有两个人正弯腰跪在戴着王冠的国王面前。画作在时间和空间上给人一种几乎像电影一样展开的感觉，这种感觉在画面的右边继续体现出来。在右边，美丽的年轻圣徒站在一个更为私秘的空间里，那里有带华盖的床，她在与她的世俗父亲讨论婚事，后者曲臂用手托着头。正是在这里，在故事中的这个时刻，乌尔苏拉作出了重要的、而且是“神意的”决定——要求她的求婚者皈依基督教，并允许她带着11,000名贞女扈从到罗马朝圣。在其后的叙事画面中，我们看到使节离开，然后是公主向她的未婚夫告别，去罗马朝见教皇，接着，在返回英格兰的旅途中，与她的女伴们一起悲剧性地被匈奴部落的异教徒所谋杀（也就成为了殉教者）。

除了这个故事的戏剧性之外，卡尔帕乔的组画往往还强调故事中的仪式：人物的列队行进，或者被国王、教皇或王子正式接见。这种对仪式行为的强调可能是反映了公会成员自己定期参加的仪式或典礼。比如，每月一次，圣乌尔苏拉会的全体成员都要聚集在会议厅进

行一次弥撒活动，在这个仪式中，每个成员要手握蜡烛列队绕大厅环行。实际上，这种每月的列队行进无疑是与礼拜堂 - 会所墙上画幅中的队列相互呼应的。在其中许多油画中，艺术家采用了各种其他的视觉策略来进一步打破真实世界的观者和乌尔苏拉的虚幻世界之间的界限。比如，在表现使者到达的画面中，前景的栏杆处留出了一个空当，似乎是允许我们加入英格兰代表团的行列，同时在画面右边的台阶上，仅有一个老女仆守护，似乎在邀请我们进入乌尔苏拉和她父亲进行私人谈话的卧室。同样，在将使团与大型广场分开的栏杆外面，我们看到一排本地人靠在栅栏上饶有兴趣地观看活动的进行——就像被画中栏杆隔开的我们也在围观一样。换句话说，画中的观者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对站在画前的观者的镜面反映。

在10月21日圣乌尔苏拉节的前后，这个公会的成员自己会公开露面，列队行进或用其他庆典方式来纪念他们的保护圣徒。这样的仪式不仅会在他们自己的会所进行，也要在会所前的公共广场上举行。在那里，威尼斯市民可以直接看到他们的仪式和庆典。卡尔帕乔的油画所讲述的故事多少与订制了这些画的人们有着直接关系，这种视觉叙事结构里的故事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公会自身举行的诸多仪式。同时，这些仪式以及圣乌尔苏拉会订制的油画跨越了神圣 - 世俗间的界限，就像公会本身的作用一样。这个公会既是一个宗教组织，也是一个社会组织。反映在画中，圣乌尔苏拉的故事不仅强调了宗教主题，如鼓励即便是殉教也要坚持对上帝的信仰，同时也反映了威尼斯各种典礼上的社会礼仪，此外通过描绘船只在遥远陆地间的来往，反映了作为威尼斯经济和政治生活基础的国际贸易。

叙事形象：宗教或世俗？

在许多其他例子中，要分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在其作品中所描述的故事是属于纯粹的宗教类别还是世俗领域同样也很困难。比如我们在前一章中简略提到的《圣路加教堂祭坛画》，最初有一些镶板附

饰画直接放在主要场景人物的下面（图3）。乍看上去，这些画分别描绘了每个主要场景中的圣徒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情景，似乎是纯宗教性的绘画。但事实上，对佛罗伦萨最重要的保护圣徒施洗者约翰和主教齐诺比厄斯（两个人都出现在主画面中）的主要事件的描绘意味着，订制祭坛画的人在表达他的宗教感情的同时可能也想要证明他在政治上对自己家乡的忠诚。在拉斐尔的《基督下十字架》中，主要画面的宗教性叙事既是作为弥撒过程中虔诚祈祷的中心，同时也体现了阿塔兰忒·巴利奥尼复杂的个人和政治考虑（图7）。同样，一个16世纪早期的收藏家买下了丢勒的17幅描绘《圣母生平》的木版画，他之所以欣赏这些画，可能并不仅仅是因为画中叙事的信仰功效，而且也因为其美丽的构图是出自北欧最受尊敬的艺术家之手。

被称为“时间之书”（books of hours）[1] 的装饰华美的手抄本祈祷书中也体现了世俗和宗教二者之间的类似张力。“时间之书”是一种源自中世纪的艺术形式，在文艺复兴时期仍然十分流行，甚至在15世纪中叶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现代印刷术之后也还比较盛行。虽然这样的祈祷书只是用于虔诚信徒的个人祈祷活动，但同时它们也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在用动物皮革制成的上等皮纸上，用珍贵的颜料和金叶子辅以精良的手工艺而制成。毫无疑问，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买得起这样的书，因此这样的书不光体现了主人的虔诚，同时必然也表明了他们的富有、品位和威望。这类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约1480年勃艮第女公爵玛丽（Mary）所订制的祈祷书。这本书的卷首插画，也就是第一幅插图，描绘了女公爵本人正在看一本装饰华美的祈祷书，而这本祈祷书就像是为她所制作的那本（图9）。在她的坐像旁边，透过一扇开着的窗户，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女公爵的形象，这次是在一个巨大的教堂，她与她的侍女一起，跪在与她同名的圣母马利亚面前。这幅画中画大概意味着：玛丽在阅读了她的时间之书中的宗教故事以及诵读里面的祈祷词后，可以在其想象中呈现有关神圣世界的场景。虽说她很可能真的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妇女，但耗费如此多的钱财和精力手工誊抄并绘制这样一幅作品，首先便清楚地体现了她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图中窗台上随

意摆放的大量宝石和玛丽及其侍女穿着的华贵天鹅绒、丝绸和锦缎衣服都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

图9　勃艮第的玛丽，《勃艮第的玛丽在阅读时间之书，出现圣母子在教堂的幻象》，羊皮纸彩饰，约1480年

当然，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见到的，有人会争辩说：把任何宗教

故事或宗教人物表现为具体的画像都是一种亵渎，因为《十诫》明确禁止制作任何这样的“偶像”，尤其禁止崇拜偶像。但是在7世纪，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已经宣布，可以制作宗教画像（虽然不能用来崇拜），以启发那些不识字的信徒。同时人们也认为图像比单靠说教和文字更能有效地使人记住经文并被圣徒故事所打动。1492年多明我会的修道士米凯莱·达·卡尔卡诺（Michele da Carcano）总结了这些赞成宗教图画的争论：

……描绘圣母和圣徒的形象有三个理由。首先，考虑到一些无知人们的愚昧，那些不能阅读经文的人能够通过看图而理解灵魂得救和信仰等圣礼……其次，制作画像也是为了克服我们情绪上的懒散；使那些听到圣徒的故事时没有被唤起虔诚信仰的人们至少在图像中看到这些故事时会被感动。第三，制作画像也是因为我们的记忆不可靠……因为许多人不能记住他们所听到的，但却能记住在图像中所看到的。

佛罗伦萨的湿壁画系列

公众最容易接触到的宗教叙事画应该算是数世纪以来被画在教堂和礼拜堂墙上、穹顶和天花板上的大型湿壁画系列。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壁画的创作继续存在，并且采用了直线透视法和更精准的人体结构描绘法等新的视觉方法来使画中的故事更加生动逼真。比如，在佛罗伦萨的圣三一教堂，其中一个礼拜堂的墙上描绘了圣方济各生平和身后的主要场面（图10）。乍一看，这些由多米尼科·吉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和他的助手在15世纪80年代中期所作的壁画似乎完全满足了“正统的”宗教图像的要求：通过描绘与圣方济各有关的重要事件，并把其中一些事件放在当时的佛罗伦萨场景中，从而使得那些不能阅读的人们也能理解画中所描绘的故事，此外也能使所有人记住这些故事并为之感动。

图10　萨赛蒂礼拜堂：多米尼科·德尔·吉兰达约及其助手，《圣方济各的生平》湿壁画系列，祭坛画《牧羊人的崇拜》临摹，朱利亚诺·达·圣加洛（Giuliano

da Sangallo）（归属），弗朗切斯科·萨赛蒂（Francesco Sassetti）和内拉·科尔西（Nera Corsi）的黑色大理石墓（侧墙上的壁龛里），1483—1486年

方济各的故事以及传说中他死后所经历的奇迹的画面按照时间顺序从穹顶到底部连续排列开来。于是，在礼拜堂墙面的最上面一层，我们看到的场景（按顺时钟方向）依次是：年轻的方济各放弃他的遗产继承权以便过上一种圣洁的清贫生活、教皇正式批准他创建方济各会、方济各奇迹般地从一个苏丹法庭上的火刑审判中生还。在中间层，左边墙上的画中，方济各的身体出现了圣痕（即在他身上出现了类似基督钉痕的伤痕），他的葬礼被画在右边的墙上，而在中央我们看到人们在向这位已故的圣徒祈祷后，一位死去的孩子奇迹般地复活。

但是，上述事件中的最后一个很难在其他关于圣方济各的组画里看到，而它被放在礼拜堂祭坛画上这么突出的位置，并且在年代顺序上也稍有打乱（即这幅关于方济各死后的奇迹被画在右边墙上的圣徒葬礼之前），这一现象意味着该礼拜堂壁画的意图可能不仅仅是向不识字的信徒准确而生动地传达圣徒故事。

相反，这个场景和整个礼拜堂下层的画面都表明，这一工程中包含了超出纯宗教内容的东西。因为正是在这一层，在最靠近礼拜堂拜访者的地方，以及在祭坛画上方最突出的位置，赞助人弗朗切斯科·萨赛蒂的要求被明确地体现了出来。萨塞蒂是美第奇（Medici）家族银行的总经理，因此他的财富与这个佛罗伦萨权势家族的经济和政治成功有着密切联系。他不仅选择了描绘与他同名的圣徒方济各来作为家族礼拜堂壁画的主题，而且还确保他的美第奇东家和他们的联盟也被很好地表现出来，特别将他们的个人肖像放在两个中央墙面的主画面上。最上层的一幅壁画中，在一个明显会令人想到佛罗伦萨的主要市政厅广场的地方，这个家族的首领，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站在弗朗切斯科的身边。紧接着下面的画面中，一个孩子奇迹般复活，也是在佛罗伦萨，这次是在圣三一教堂的前面。在吉兰

达约刚开始设计这组壁画时，弗朗切斯科自己的大儿子死了，几个月后另一个男孩奇迹般地出生。因此在祭坛画上部这个表现基督诞生的复活男孩（也是吉兰达约画的），可能是赞助人因为他的新生儿子而表达的谢恩之意。的确，有人曾表明这个复活的男孩形象实际上就是弗朗切斯科的小儿子的肖像。

最后，为了使个人动机更加清楚，弗朗切斯科不仅在礼拜堂左边和右边的壁龛里安放了自己和妻子内拉·科尔西的雕有古典图案的黑色大理石墓（可能是由雕塑家朱利亚诺·达·圣加洛制作），而且在祭坛的两边描绘了他自己和妻子跪着祈祷的形象，作为祭坛画上基督降生的见证者，也是在祭坛前为他们的灵魂所作的所有弥撒仪式的见证者。因此，虽然祈祷和虔诚信仰确实是订制这一组壁画的重要动因，个人在此世和彼世的利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换句话说，这里的这个故事既是讲圣方济各的，也是关于弗朗切斯科的。

更多的故事讲述策略

在描绘神圣故事的同时纪念甚至颂扬赞助人的这种方法，在雕塑家圭多·马佐尼（Guido Mazzoni）的作品《哀悼基督》中也很明显。这是一个真人大小、着色陶塑的立体场面，表现的是悲恸的哀悼者围绕着死去的基督（图11）。这组雕塑完成于15世纪90年代早期，安放在那不勒斯的圣安娜·德·隆巴尔蒂教堂内。这里，观者实际上可以进入这组由圆形群雕组成的神圣故事情境中。但重要的是，其中的一个哀悼者，即跪在最左边的男子，正是该作品的赞助人、那不勒斯的国王阿方索二世（King Alfonso II）的塑像。当观众接近这个立体的群雕时，最靠近的就是这个国王了。阿方索不仅想通过描绘自己永远在基督面前进行祈祷和敬拜的形象从而保证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而且，通过不单是见证而且参与到这个原本安放在他自己的家族礼拜堂中的神圣雕塑中，他还提升了他的个人和政治声誉。个人化的神圣叙事似乎又一次被用来为赞助人消除从此世到彼世的障碍。

图11　圭多·马佐尼，《哀悼基督》，着色釉陶，1492—1494年

虽然对于今天的观者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究竟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没有一个明显的分界，颇让人迷惑，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赞助人、艺术家和观者并不觉得这种区分是必要的，而是认为神圣和世俗之间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尽管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也描述了一些纯粹世俗性质的故事，在如今的观者看来其中没有一丝宗教信仰的痕迹。但是，在这样的例子中，画中讲述的故事同样是为了提高委托订制画作的赞助人的个人声誉。这种情况可以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为他在离巴黎不远的枫丹白露城堡、或者说是行宫订制的关于神话和寓言的绘画中体现出来。国王雇用的主要是来自意大利的艺术家，比如罗素·菲伦蒂诺（Rosso　Fiorentino）和普里马蒂奇奥（Primaticcio）。他想通过这些画令来访的精英人物们感到困惑和吃惊，他在高雅的画面中采用了复杂的视觉象征，并将这些画安装在精致的、高度风格化的粉饰灰泥画框中，展示在城堡的主要公共房间和长廊里。只有国王本人被告知了每幅画的准确意义。实际

上，这些作品的“叙事”不仅仅在于画面本身所描绘的故事，同时也在于国王亲自引导的游览或者国王给予观者的演出，他描述每一幅画的意义时，往往都会令观者倍感惊愕。这些画中描绘得最直接的故事是达娜厄的传说：异教神宙斯化身金雨临幸了这个美丽的少女，使她怀了孕（图12）。但是其他由弗朗索瓦订制的作品的确切意义至今仍是学术争论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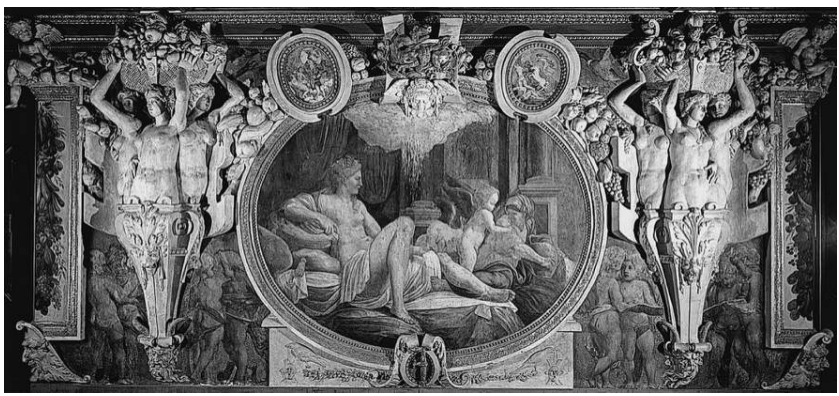

图12　乔凡尼·巴蒂斯塔·罗素·菲伦蒂诺，《宙斯化身金雨拜访达娜厄》，湿壁画，边框为灰泥浮雕，16世纪30年代

结语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不论是宗教的、世俗的，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中都充满了故事。的确，这个时期的艺术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用视觉手段向当时的观者传达故事和思想，而这种方法通常比单纯的文本、说教或演说更有吸引力、更生动并更容易被记住。正如阿尔贝蒂在15世纪30年代所指出的，最成功的视觉叙事，或者说历史画（*Istoria*）具有“那样令人欣然和愉悦的吸引力，它能够吸引所有观者的眼球，包括有学问的和没有文化的人，并打动他们的灵魂”。在公共领域，叙事性祭坛画（不论是绘画还是立体雕塑）、描绘圣徒生活的祭坛台座镶板画、为宗教团体创作的绘画、教堂里的大型湿壁画

系列和仿古典的宫殿装饰不仅通过它们颇具吸引力的图像使观者记住了特定的故事，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订制作品的个人或团体的私人、政治和社会状况。有时，比如在精印插图手稿或系列叙事的版画中，故事的讲述可能更为私人化、甚至是私密的活动，比如只包含一个人手中拿着一本书、或者一页纸。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例子中，一个特定的故事是如何用画面讲述出来的，以及它是被如何解释的，大多受制于赞助人和他/她的同时代观者的兴趣、信仰和关注点。

注释

1 books of hours按字面意思译为“时间之书”，实际上就是祈祷书，最先出现于13世纪，其中记载了向圣母祈祷时所用的祈祷词。——译注，下同

第四章

对自然与古风的挑战

虚幻的苍蝇

我们眼前的这幅肖像画描绘了一个小康之家的丈夫和妻子，他们站在桌子后面，桌子上谨慎摆放的各种物件被细致地描绘出来（图13）。在画框的下沿，可以看见年份为1496年，还有这对夫妻的年龄，表明在这一作品完成时，他36岁，她27岁。画面的顶部有一枚被一头公牛抱着的盾形纹章，这是传福音者路加的标志，与安特卫普画家的圣路加行会有关，画中花瓶里所插的和妻子手里拿着的、名叫紫罗兰的精致蓓蕾，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再加上男主人公直接朝向画外的凝视，使许多学者认为，这一镶板画实际上可能是画家和妻子在一起的自画像。有趣的是，如果艺术家是对着镜子用右手作画，那么这只手所对应的应该是画中藏在桌子下面的那只手，艺术家在自画像中通常都采用这样的策略，因为要描绘一只正在活动的手是非常困难的。

图13　法兰克福大师（活跃于安特卫普，可能是亨德里克·凡·乌鲁威［Hendrik van Wueluwe］？），《画家和他妻子的肖像》，板面油画，1496年

从艺术风格上看，通常认为这幅画的作者是法兰克福大师

（Master of Frankfurt），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与这个人物有关的最重要的作品是为这座城市的一个教堂制作的。但是，从盾形纹章和这幅画的总体风格来看，这个画家更像是居住在安特卫普。有文献表明，实际上这位匿名的画家可能是16世纪头几十年里安特卫普最为活跃和杰出的艺术家之一，很有可能就是亨德里克·凡·乌鲁威，此人曾是圣路加行会的会长，连续任职达六届，其任期之久前所未有。据记载，在此画创作的同一年，他买下了一座石屋，娶海维齐·索尼斯（Heylwich Thonis）为妻，后者的父亲也是一位画家，同样在圣路加行会担任过会长。

艺术史家们一直试图确认画家的身份，并弄清画中描绘的各种物体的象征意义。比如，有些观察者将散放在画面中间的盘子里的樱桃（又被称为“天堂果实”）与圣母马利亚联系起来，作为神秘的新娘和基督的母亲，圣母是新婚妻子最合适的模范。的确，这对夫妇明显亲昵的姿势，加上凡·乌鲁威于1496年新婚的事实，都意味着这幅画的创作可能正是为了纪念这对夫妇的结合。画中的大块面包和一杯酒象征着与弥撒相关的圣餐，这进一步增强了夫妇间交换的神圣誓约，同时暗示着这一作品旨在从视觉上见证上帝给予这对新婚夫妇的祝福。

但是，我们突然意识到，有一样东西出乎意料地扰乱了这个和睦幸福的完美场景：画中家庭主妇端庄的洁白头巾上，竟然停留着一只又黑又丑的大苍蝇。但是，当我们试图把它轰走时，我们发现艺术家用他高超的技艺欺骗了我们，因为这不是一只真正的苍蝇落在画的表面，而是一只画面里的假苍蝇。似乎是要进一步证明他的模仿技巧，画家不仅在水果盘旁边描绘了另一只有着精确昆虫结构的苍蝇——虽然这只很明显是在画面的“里面”——他还画了一小块面包，险险地悬在桌子边上。这一物体就像头巾上的苍蝇一样，似乎处在我们的空间和肖像画的虚构空间之间的某处。

但是，正是这只好像刚刚落在画面上的苍蝇表明画家并非仅仅是在制造视觉笑话。的确，我们可以认为，这只昆虫的出现，尤其是用来表现它的幻觉手法，告诉了我们关于这位画家在艺术上的一些职业雄心，或者更广义地说是这个时期艺术本身（或者是“艺术”，Art，首

字母大写）的追求，因为在历史上，一只可以愚弄观众的苍蝇长久以来就是一种视觉隐喻。在15世纪中期，意大利艺术家安东尼奥·菲拉雷特（Antonio Filarete）就用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证明乔托（Giotto）的杰出才能，后者可能是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早期最著名的艺术家。在他的描述中，菲拉雷特声称，乔托还只是一个学徒的时候，他画的苍蝇就非常逼真，以至其师傅契马布埃（Cimabue）试图用破布将这些苍蝇赶走，这个例子表明了这个年轻的艺术家有多么高超的技巧，甚至可以骗过一位职业画家的眼睛。

更为古老的是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他的关于公元1世纪著名艺术家轶事集里所记载的故事，而这个文本的依据则是一些更为古老的传说。根据老普林尼的记载，两个古代最伟大的画家宙克西斯（Zeuxis）和帕尔哈西奥斯（Parrhasios）进行过一场竞赛，看谁能在绘画中更好地复制真实世界。首先是宙克西斯，他画的是一串葡萄，画得是那么逼真，鸟儿都飞过来想要啄食这水果。接着，帕尔哈西奥斯决定画出更好的，并邀请对手来看结果。宙克西斯急急地赶到帕尔哈西奥斯的画室去看他的新画，匆忙中，他试图揭开似乎是覆盖在画上的帘布。但是，正是在这一刻，宙克西斯意识到他输掉了这场比赛，因为覆盖在画上面的帘布实际上是虚构的，仅仅是对帘布褶皱线的逼真描绘，就像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图1）中拉开的帷幕那样。但是，这次不只是一群鸟儿被愚弄，帕尔哈西奥斯愚弄了古代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这就证明了他自己作为一名画家更为高超的技巧。

在16世纪，类似的轶事一再出现，只不过内容上略有不同。比如，意大利作家彼特罗·阿莱蒂诺（Pietro Aretino）描写了一只母羊在看见提香画的小羊羔时发出欣喜的叫声，而另一个作家则称，一条狗在看到丢勒为它的主人所画的肖像时也吠叫了起来。在瓦萨里出版于16世纪中期的《艺苑名人传》两个版本中，他像老普林尼的故事一样表明，不仅是动物，人也能够被这类错视画（*trompe L'oeil*）所愚弄。在其中一个这样的轶闻中，瓦萨里描述到，路人以为遇见的是教皇本人而向他致敬，但实际上那只是一幅提香放在窗户边晾干的肖像

画。艺术理论家祖卡罗（Zuccaro）也写过类似的故事，但不是随意的行人，而是一位真正的红衣主教，他误把铅笔递给另一个主教的肖像，让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名，这幅肖像是拉斐尔所画的。

这些故事的真假其实并不重要，但是这种一再重复很可能是由普林尼的著名故事所开启的传统主题（*topoi*）或者是常备主题的事实，让我们开始了解到文艺复兴文化对一位画家精确而逼真地模仿真实世界的能力给予了多么高的评价。这样，法兰克福大师（无论他是谁）选择在很可能是他自己的肖像画里描绘一只似乎正落在画面上的苍蝇，这样的手法对于影射自己的艺术技巧和他颇有威望的古代先辈来说是非常适宜的。

与古典世界和自然世界争锋

总体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不仅力图模仿自然，再现古典时代，而且实际上也力图超越这二者。的确，与古代艺术的威望和自然世界的现实竞赛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最具创新意识的艺术的试金石。比如，丢勒创作于1504年的华美版画《亚当与夏娃》（图14）就采用了两个在文艺复兴时期最为著名的古代雕像作为原型，即《美第奇的维纳斯》和《观景殿的阿波罗》（采用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前者属于美第奇家族，后者收藏于梵蒂冈的观景殿）。这里，在一个完美想象的伊甸园场景中，甚至猫和老鼠（两者都在画面前景中）都能和平共处于一个人类堕落前的世界里，还没有犯原罪的亚当和夏娃完美的身体简直是由两个古典艺术中的偶像来表征的，但是，现在被放在一个明显是犹太 - 基督教的环境中。作为印刷品，这一版画可以广泛分销给各地独具慧眼的收藏者，由此丢勒向他同时代的观者证明，尽管他有着日耳曼血统，尽管意大利的艺术家们有浸染于古罗马世界遗产的优势，他仍然可以像任何意大利艺术家一样轻松运用古典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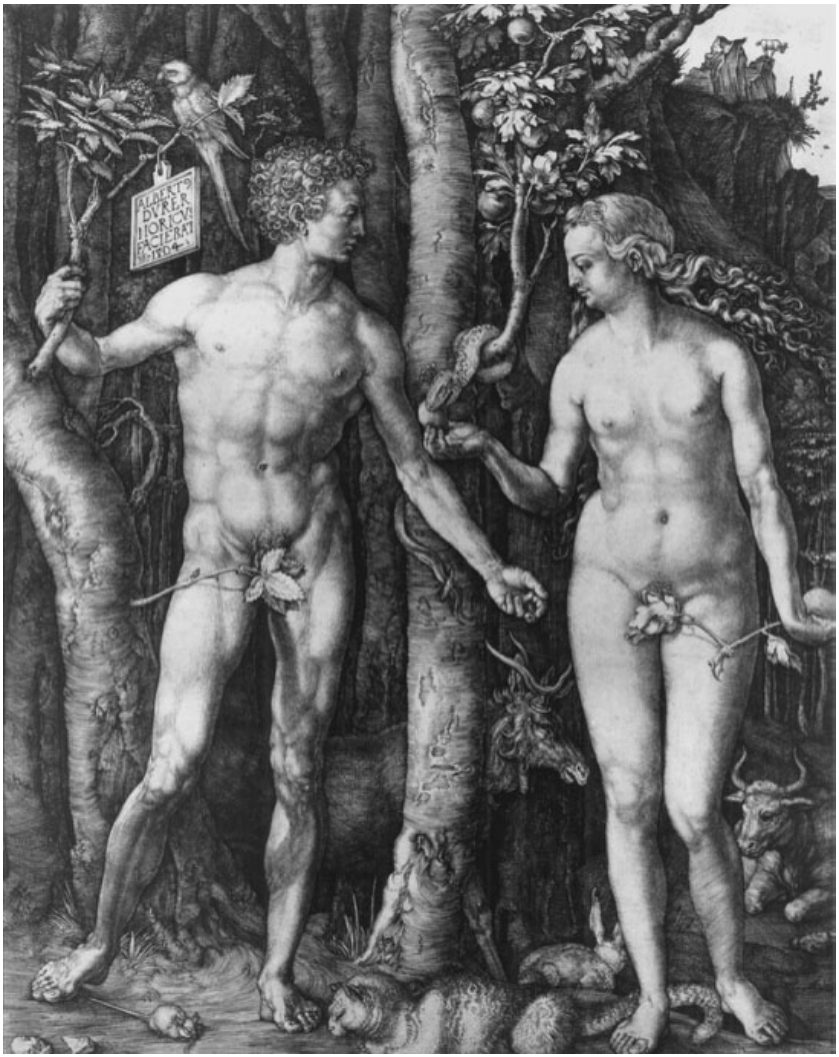

图14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亚当与夏娃》，版画（第二版），1504年

观景殿的阿波罗大理石雕像本身就是在罗马时期对更古老的希腊原型的摹制品，同时它也成为了另一个技艺精湛、部分镀金的青铜小雕像的原型，此雕像的创作者为意大利北部的雕塑家皮耶罗·雅各布·阿拉里·伯纳科尔西（Piero Jacopo Alari Bonacolsi），他的绰号“安提科”（Antico）就是来自他与古代原型的密切关系（图15）。这个小

型的作品不仅证明了雕塑家用技艺高超的方法吸收和重新诠释古典艺术的能力，同时也证明了他的赞助人高雅的趣味和对古典知识的谙熟。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赞助人可能是曼图亚的女侯爵伊莎贝拉·德·伊斯特（Isabella d'Este），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古物收藏家之一，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在她的“新”艺术订制品中采用古典主题的赞助人。对于伊莎贝拉（此人还会在第六章中谈及）和安提科来说，古代模型，不论是形象上的还是文字里的，都不仅自身具有并且带来审美的愉悦感和满意度，这些模型的价值更多的只是因为它们很古老，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崇拜久已失落的希腊和罗马时期“黄金时代”的威望。的确，这种对失落的过去的怀念和对从现在的肉体和精神上再度唤醒它们的愿望，甚至在15世纪晚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家族首领洛伦佐·德·美第奇所采用的箴言中都能体现出来：*le temps revient* ——其字面意思是，“时光（或者更准确地说，过去）重来”。

图15　安提科（皮耶罗·雅各布·阿拉里·伯纳科尔西），《观景殿的阿波罗小雕像》，部分镀金的青铜像，眼睛用银嵌入，约1497—1498年

这个时期最为常见的古代工艺品是古典雕像、硬币和宝石，而它们最受崇拜的一个特质是它们用写实和逼真的手法表现人体的能力。

南方和北方的艺术家都力图在这方面竞争并超越古代，同时也以逼真的手法描绘其他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观者来说在古典艺术中不太常见的自然事物，比如植物、动物，甚至全景式的风景。在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事例中，一页又一页的素描证明他期望通过仔细观察植物、动物和人体来揭开自然界的奥秘，例如他在一幅绝妙的速写中，从四个稍稍不同的角度描绘了人体胸、肩、手臂的解剖图（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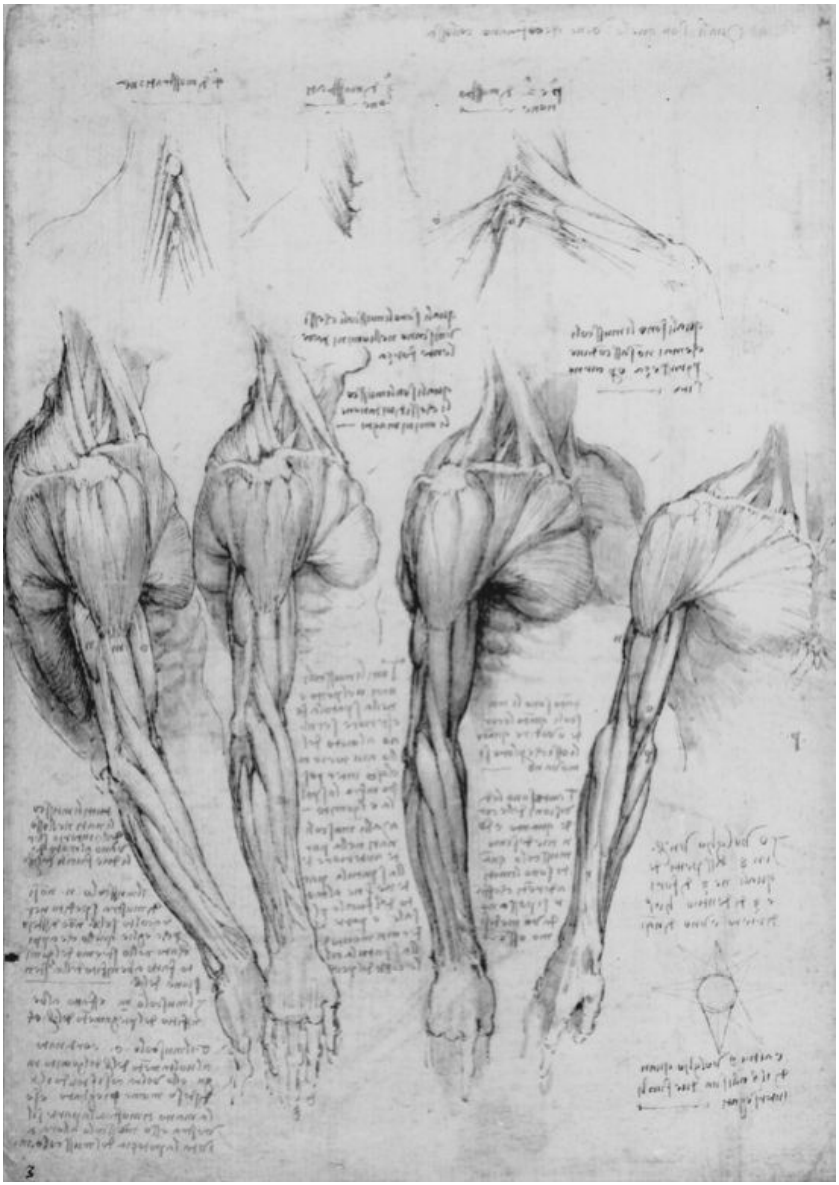

图16　列奥纳多·达·芬奇，《人体手臂、肩膀和胸的四个连续的表面解剖图》，钢笔淡彩画，约1510—1511年

在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列奥纳多以类科学的方式探索从人类肢体到山崩的各种现象，他的这种探索方式至少部分地受到了15世

纪头几年北欧绘画中就已经出现的高度精确地描绘自然现象的风格的影响。北欧艺术家，如我们会在下一章中讨论到的杨·凡·爱克，主要注重对真实世界各方面进行精确细微的描写，从水果和苍蝇到织物和家具，这种注重细节的绘画非常适于用从15世纪早期在尼德兰发展起来的油画媒介来表现。在意大利，像列奥纳多这样的艺术家可能受到了这种北欧风格的影响，也力求更为细致地观察自然。但是，与北欧的艺术家相比，意大利的实践者们可能更关注通过描绘活的模特和解剖尸体来精确地刻画人体解剖结构，比如列奥纳多描绘人类手臂的钢笔画几乎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

完善透视画法

然而，对于意大利艺术家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对房屋和建筑空间精确而逼真的描绘。在北欧，精确地描绘物体是证明一个画家能在他或她的绘画中捕捉到“真实”世界的关键，而在意大利，令人信服的写实物体和人物必须放在同样逼真的空间里。虽然从乔托开始，艺术家就凭着直觉反复摸索，不断完善描绘三维空间结构的方法，但到15世纪早期时，以数学的精密性来描绘空间突然变成了一种可能。

在1435年首次以拉丁文出版的《论绘画》（*De Pictura*）中，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阿尔贝蒂试图从数学上概括线性透视的原则，这种方法通过使用正交线相交到与观者视线在同一水平面上的单一灭点，从而使得在平面绘画或是雕塑表面上系统而逼真地描绘立体物体和建筑空间成为可能。在写作此书时，阿尔贝蒂显然没有在他自己的绘画和雕塑中使用这一技术，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其他人的实验。最主要的例子是雕塑家和建筑家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他独创性地完成了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八边形大圆顶，这个工程最后完成于1436年，同年，阿尔贝蒂发表了他论著的意大利语版本，并将其题献给布鲁内莱斯基（等人）。在1424—1425年左右，布鲁内莱斯基已经利用佛罗伦萨的标志性建筑，包括位于大

教堂前面的洗礼堂，来证明他能用精确的数学手法来描绘建筑物和城市空间。很快，另一些艺术家在绘画、湿壁画、甚至浮雕领域也开始使用布鲁内莱斯基的方法，特别是在阿尔贝蒂的论著开始发行之后。但是，由于这一文献保存下来的多半是拉丁文版，而拉丁文是人文主义学者和赞助人等精英人物使用的语言，这样看来似乎大多数艺术实践者是通过口头传授或者通过仔细研究马萨乔（Masaccio）创作的运用错视手法的湿壁画《三位一体》或雕塑家多那太罗（Donatello）创作的有透视感的大理石和青铜浮雕等15世纪早期的作品来学会线性透视法的。

画家多米尼科·委内西亚诺就是这样的一位艺术家，虽然他可能也从与同事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的讨论中得到过启发，后者也是画家，在15世纪后期写过他自己的数学论著，其中包括一篇透视学论著。在第二章中简要谈论过的多米尼科大约在1445—1447年间创作的《圣路加教堂祭坛画》（见图3），不仅证明（他）完全理解了线性透视的法则，而且在阿尔贝蒂的论文仅仅出现的十年之后的当时，还显示出他力图熟练掌握这一技术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虽然这幅祭坛画的主要中心画面显然倾向于表现一个单独的、统一的画面，多米尼科把他的人物放在带略微突出尖拱的连拱廊组成的三分法建筑中，视觉上接近于以前的三联画屏。不过，乍看上去，这个空间似乎是根据线性透视的法则来描绘的。的确，人们如果从跪在祭坛前的信徒或牧师的位置看祭坛画，首先注意到的很可能就是紧挨祭坛台座的画面底部复杂而高度细节化的地面瓷砖。同数学论著中的图表一样，这些瓷砖从画面的底部到圣母的宝座按远近比例逐渐缩小，极为逼真。背景中的拱廊和贝壳状的壁龛似乎是同样小心地根据严格的数学法则构建而成的。

但是，外表是有欺骗性的：虽然地面瓷砖的确是根据线性透视正确描绘的，但建筑的其余部分和其中的人物却非常不明确。比如，画面顶部的连拱廊剖面似乎是位于虚构的画幅帧面的最前面，但在画面的中间和下部，它就明显显得不合情理，因为边上的四个圣徒显然是站在这个结构的前面而不是在它的圆拱下面。同样，乍看上去圣母坐

在中央扇形壁龛里，然而柱子的位置却明显说明她的实际位置离身后的壁龛还有一些距离，她的长袍下摆更是意味着她可能是位于第一排柱子前面一点的地方。我们很快会意识到，与画中建筑和其他人物相比，圣母的体形无疑是巨大的。的确，如果她站立起来，不仅会使她身边的圣徒显得像侏儒，而且她自己可能会像她宝座旁边的柱子一样高。

高度精确描绘的地面瓷砖证明了多米尼科对线性透视画法的精通。但是，他明显的“误差”应该看作是有意为之的对数学法则的颠覆，这种颠覆意图在于使绘画能最好地满足其主要目的，即成功达成其信仰功能并且颂扬该作品原来所在的教堂、佛罗伦萨的圣路加·德·马格诺里教堂，以及颂扬为它出资的富有赞助人。因此，虽然多米尼科的赞助人显然想要一幅看起来比较“新潮”的祭坛画，这一点体现在画中所使用的透视因素，如地面瓷砖的画法，以及主画面所采用的单一中心的场景上，然而在绘画的构图中却仍然包含着非常传统和等级分明的虔敬结构。这种效果是通过用建筑因素在视觉上将圣母子与两边的圣徒（其中包括教堂的同名圣徒圣路加以及两个佛罗伦萨的保护圣徒，施洗者约翰和齐诺比厄斯主教）隔开来达成的，如同早期的三联画屏一样，同时还使圣母在身形和象征意义上都超过其他所有人。同样，画面中具有迷幻性的空间安排和人物关系，对于此画最初的虔诚观看者来说，可能是为了强调场景的虚幻性。

从15世纪初期开始，艺术家们以各种极富想象力的方式采用了阿尔贝蒂所总结的线性透视技术，以便为宗教和世俗主题创造逼真的视觉空间，从而将绘画和浮雕变成了通向似乎可与真实世界本身相媲美的想象世界的窗户。也许这一技术运用的顶点是列奥纳多的另一作品，即他多次被复制并受到严重毁坏的湿壁画《最后的晚餐》（图17）。这一作品在列奥纳多于15世纪90年代晚期完成后不久就已经开始从米兰的圣马利亚感恩教堂的餐厅墙壁上剥落，因为他试验性地采用了灰泥油画技术，这种方法很快就被证明是一项失败的技术。但是，在公众印象中，该作品却一直很成功，这要归功于艺术家在刻画这一圣餐的戏剧性场面中各种人物不同情绪时体现出的悟性，以及他

同样逼真的空间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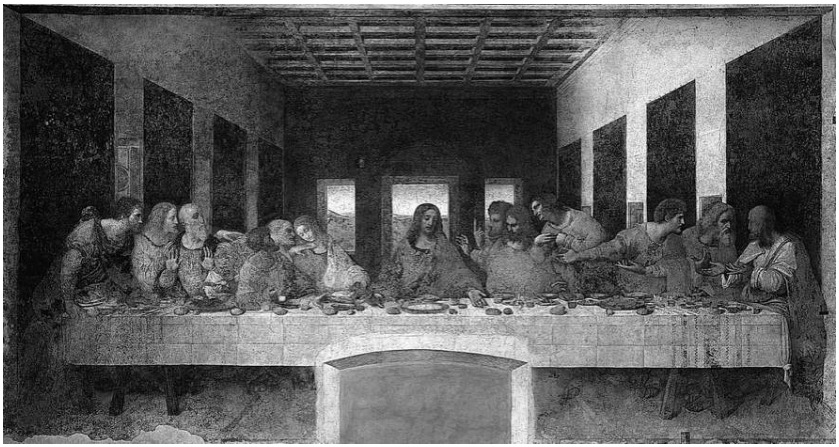

图17　列奥纳多·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壁画，1495—1497/1498年

这一绘画的赞助人是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Sforza），他与圣马利亚感恩修道院有联系，每周两次与修道院僧侣一起进餐，而餐厅的墙上就是列奥纳多描绘的历史上最著名的晚餐。人们仅仅观看这一作品的照片时可能会认为这一虚构的房间是对真实的餐厅空间的天衣无缝的延续。但是，正如《圣路加教堂祭坛画》一样，艺术家又一次巧妙地使线性透视法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可能最为重要的是，对于在餐厅中无论是站立还是坐着的人来说，这幅画以及画中线性透视技术所要求的灭点都在观者的视觉水平线之上，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从一个理想的观赏位置来看这一作品。同样，在画面前景中占据主要位置的桌子，看起来似乎是按适当的远近比例所描绘的，但实际上它与人物和虚构的建筑空间之间的关系非常模糊，因为如果仔细观察，相对于其他物体而言，这张桌子显得过长过窄了。另外跟《圣路加教堂祭坛画》一样，画面中间的神圣人物耶稣本人的身形尺寸实际上要比他周围的门徒大得多。因此，列奥纳多的《最后的晚餐》颠覆了线性透视的严格法则和相对的比例均衡，以取得特定的效果，也就是要以这个神圣场景中平静而安详地坐着的耶稣为中心，营造出一种叙事性紧迫感和戏剧性张力——而这个场景似乎既是我们物

质世界的一部分，又神秘地与物质世界区分开。

结论

文艺复兴时期的观者认为，如同深入观察自然、人体以及古代典范一样，线性透视具有值得认真研究并进行理论思考的价值。但是，在将这些技法运用于真正的艺术作品时，画家、雕塑家和他们的赞助人都非常愿意变更或改写“现实”——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是空间的还是自然的——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艺术或其他目的。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这种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张力也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最流行的画种中，也就是肖像画。

第五章

肖像绘制艺术和“文艺复兴人”的产生

个人形象

根据颇有影响力的19世纪中期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第一章中曾简要提及此人）的记载，文艺复兴时期，现代意义上的“个性”，确切地说是自我作为一种自主个体的观念首次完全呈现，并促使一种理想化的、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或者说全才的产生。自从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在1860年出版以来，学者们一直为这一总括性观点的价值争论不休。他们指出，像这样知识全面并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在更早的历史时期中也是存在的。

虽然不管证明还是反驳关于特定时代人们的人生哲学（*weltanshauung*）或“世界观”转变的理论都异常困难，但无疑，文艺复兴时期确实出现了大量表现可认出的个体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当然，极少数国王和教皇的独立绘画肖像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就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甚至也有等级稍低的社会精英分子的肖像，比如主教或上层贵族，他们的肖像被绘制在墓碑上。同样，捐赠人，如赞助祭坛画等作品的富裕而有势力的赞助人的肖像，被画在神圣场景的中间或者边缘处，这种情况从中世纪开始也已存在。

到15和16世纪时，类似的世俗和宗教肖像画的创作活动仍在继续。但是，从15世纪初开始，其他类型的被画像者，比如妇女、富有的商人，甚至艺术家都开始大量地出现在独立肖像中。即使是在传统的精英分子肖像画中，对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描绘的兴趣变得更为明显，由此反映出这一时期用越来越自然的手法描绘空间、自然和人体结构的新途径。这种对个体描绘的兴趣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风格的复苏，因为古代作家注重著名人物的传记，同时，印有罗马帝王以及地位略逊于他们的公民的古代硬币和他们的大理石半身像都被保留下来，以供研究、欣赏，并被文艺复兴时期的赞助人、收藏家和艺术家用来作为新的艺术订制品的模型。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提到过好几幅肖像，它们体现了这一绘画类型

可以非常多样化。在由阿方索二世为那不勒斯教堂订制的《哀悼基督》中，国王被描绘成场景中的一个参与者，这一点与过去数世纪中的做法是一样的，但不同的是，这个作品中赞助人的形象是三维立体的，并且情感上也参与到场景中，这证明了雕塑家对人体的谙熟（图11）。同样，制作于15世纪晚期的插图手抄本祈祷书页面中，描绘了一个贵族精英，但特别之处在于这里的贵族是名妇女，即勃艮第的女公爵玛丽，而且她周围的物体、织物和空间显示出一种欣赏写实描绘的新趣味（图9）。但是，直到前一章节在对一名艺术家和他妻子的肖像进行长篇讨论时，我们才发现，15世纪晚期时的肖像绘制艺术的范围已经有了多大的扩展（图13）。在这一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富有但肯定不是贵族的艺术家和他的妻子被描绘得如此精细，就如同过去数世纪中对教皇或者王子的肖像画的要求一般。虽然，穷人们仍然被绝对排除在外，他们不具备布克哈特所认定的文艺复兴人的重要特点，即日益增长的对个性的关注，但勿庸置疑的是，关注自我以及在公众世界中展现自我形象的意识在比以往历史阶段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体现出来。

当我们观看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时，我们经常会以为这个形象是对被画者“真实”外貌的直接描绘，仿佛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照片的绘画或雕塑版本一样。但是，正如我们所知，甚至照片也可以是高度加工过的，而不一定是对现实的忠实反映。正如21世纪的肖像摄影可以利用具有美化作用的光线、特别选择的服装，以及一些化妆手段——更不要说在打印数码照片前可以使用类似PhotoShop这样的程序来去除电子照片中人物形象的皱纹或瑕疵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也采用了精致的技术和仔细的构图。比如，在艺术家和他妻子的肖像中，我们看到这对夫妇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而他们身边的东西从紫罗兰花和樱桃到有暗示性的苍蝇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以突出其视觉和象征意义。

实际上，根据肖像画的性质比根据其是否肖似被画者来评判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要更有助益，这两种标准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我们知道列奥纳多在《最后的晚餐》（图17）中采用了真人模特的脸和

身体的初步草图作为逼真肖似的基础，但是严格来说，我们并不能称这些形象为“肖像”。同样，我们从文献中了解到，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I）在晚年时仅允许艺术家在画她的肖像时采用少量经过批准的模板作为基础。在这些经过批准的模板中，女王一直是年轻美丽的，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显然应作为肖像来理解，但肯定不是对日益衰老的女王的真实描绘（图24）。同样，提香所画的伊莎贝拉·德·伊斯特，一位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简单讨论过的赞助人和收藏家，在60岁时仍被画得如同少女一样年轻。

即使对那些很少明显美化过的肖像，我们在区分其中的现实和美化成分时，仍须持谨慎的态度。的确，只有在极少数例子中，当那些由不同的艺术家所画的同一个对象的肖像画存在时，我们才有可能尝试将两者区分开来。但是“美化”不仅是为了使某个年龄段的妇女看起来年轻和自信，同时也是为了“粉饰”被画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以及志向。

意大利的肖像绘制艺术

比如，提香在16世纪30年代后期所画的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Francesco Maria della Rovere）的肖像中，把他表现为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有着稍微后退的发际线和一些眉心皱纹（图18）。但是，公爵那明亮的面孔上稳定而坚毅的目光，在暗色调背景的衬托下，显示出他的勇气和果敢，而他的皱纹则肯定了他必定是睿智和富有经验的。当然，这些特质无疑也是一个著名的雇佣兵队长（*condottiere*），或职业军队的将军，同时也是有爵位的贵族在订制此画时想要达到的效果。实际上，作家彼特罗·阿莱蒂诺认为这幅肖像画作为一个整体以及它其中所描绘的各种物件，是对公爵整个生涯的一种视觉概括，比如，他所穿的从德国进口的豪华盔甲以及放在他身后的红色天鹅绒所覆盖的架子上的羽饰头盔，又或者是放在同一个壁架上和他右手里的各种指挥棒，它们分别代表了他所掌握的威尼

斯、佛罗伦萨和教皇军队的指挥权。

图18　提香（提香·韦切利奥），《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乌尔比诺公爵》，布面油画，约1536—1538年

有趣的是，公爵的妻子埃莱奥诺拉·贡萨加（Eleonora Gonzaga），伊莎贝拉·德·伊斯特的女儿，也由提香绘制了一幅肖像，打算悬挂在她丈夫肖像的旁边。但是，与文艺复兴时期傲慢站立的勇士王子的这种理想男人特质相反，她的肖像是一个放松的坐像，穿着考究的、带有褶皱裙边的天鹅绒锦缎衣服，佩戴着精心挑选的珠宝；她的头发盘起，戴一顶绣花的帽子，所有的一切都得体地表现了一个

富有的、有鉴赏力的，但又端庄娴静的贵族妻子。为了使这个观点更为明确，围绕在公爵身边的物件都力图说明他是一位理想的军人，而公爵夫人身边最突出的是一只小狗，这也是婚姻忠诚的传统象征。

几乎恰恰是在一个世纪以前，阿尔贝蒂写道，艺术应该尽量通过“身体的活动”来表现“心灵的活动”；换句话说，通过描绘外在的迹象来表现内在的个性。但是，从像乌尔比诺公爵和公爵夫人的肖像这样的绘画中根本不可能看出他们的“真实”外貌，更不用说他们的“真实”个性了。相反，从他们小心摆出的姿势和表现出的特质上，我们只能确定他们希望或者期待如何被他们的同时代人所看待，并且至关重要的是，如何被他们的子孙看待，因为肖像几乎总是具有纪念和世袭的功能。

虽然像提香和列奥纳多·达·芬奇这样的著名意大利艺术家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在创作肖像画——包括后者标志性的作品《蒙娜丽莎》——但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家看来，肖像画这个类型本身是一种次要的艺术形式，其地位要低于主要的宗教画或历史叙事画。比如，米开朗琪罗只画过一幅严格意义上的肖像，他对这个画种很不屑，认为它只需要机械复制自然的能力，而不需要艺术的创新和独创性。的确，当一个同时代人抱怨他雕刻的美第奇公爵像看起来根本不像他本人时，米开朗琪罗的著名反驳是，一千年后没有人会知道或在乎这个人的相貌，但所有人仍会惊叹于用高超技艺雕刻了这个肖像的艺术家。

北方的肖像

与此相反，在北欧，肖像绘制艺术则受到了更为广泛的欢迎，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地区有关宗教形象和物件的画作订制活动完全停止了，被大量的世俗题材比如肖像画的委托所取代。实际上，由于在北方这个画种有着更高的地位，毫不意外，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最著名和最吸引人的肖像是由英格兰、法国、德国和低地国家的艺

术家创作的。

其中最著名的一幅文艺复兴肖像画是由尼德兰画家杨·凡·爱克所作。他和他的兄弟胡贝特（Hubert）两人创作了15世纪欧洲最杰出的祭坛画之一。这是一幅多联带侧翼的祭坛画，名为《根特祭坛画》。1434年，在完成这一作品的两年之后，杨画了一幅尺寸小得多、但同样著名的双人肖像，表现了一对夫妇手牵手站在室内（图19）。这幅画名为《阿尔诺芬尼夫妇像》，因为有证据显示画中的男士可能是乔凡尼·阿尔诺芬尼（Giovanni Arnolfini），一名来自意大利城市卢卡的富有商人，他移居到布鲁日经商发了财，这个城市在今天的比利时境内，他与乔凡娜·塞纳米（Giovanna Cenami）结了婚。这幅画是绘画艺术新媒介即油画的早期重要例证，这种媒介最早发展于北方，后来又在意大利艺术家中流传开来。同时这幅画可能是第一幅表现既非传统宗教人物又非世俗精英人物的重要肖像画。虽然这对夫妇显然很富有，正如整个画面中那些昂贵的织物、陈设和家具所显示的，但他们肯定不是贵族，而是一个独立奋斗的男人和他的妻子。这对夫妇被表现为全身像，这个姿势在以前几乎是被精英人物中的精英所独占的。此外，画中的他们是在自己家中，周围全是他们自己的所有物，而不是作为捐赠人处在一个宏大的宗教场景中。

图19　杨·凡·爱克，《阿尔诺芬尼夫妇像》，板面油画，1434年

但是，就如同一个世纪之后提香为乌尔比诺公爵作的肖像画一样，杨的肖像画中的夫妇也是用身边的物件摆设来表明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抱负。但是，除了证明他们的富有之外，这幅作品到底还想说明什么呢？这对夫妇似乎刚刚进入房间，因为我们在前景中看到这位

男士刚踢掉他的鞋子。女士脚边的狗据推测是对她作为妻子的忠贞的暗示，两人仪式般地牵着手，丈夫庄严地举起右手，这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正在见证某种保证或誓约。毫不奇怪，学者们认为，实际上这幅画如同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艺术家和他妻子的肖像一样，是为了纪念这对夫妇在他们的婚礼或订婚时交换的誓约而作的。

然而到底是谁见证了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仪式呢？在背景中的凸面镜中，我们看见了两个小小的人物形象，可能就是男人做手势的对象，他们无疑是站在所画场景的前面，并被含蓄地表现出来。实际上，这些人物也可能就是为了代表艺术家杨·凡·爱克，以及我们中的某个人，也就是站在他身边的观众。在镜子上面的墙上看到的日期1434年和“杨·凡·爱克曾到此地”的铭文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短句既是他作为见证人的在场证明，也是他的一个签名。这样，这幅肖像既是公开纪念这对夫妇的结合，同时也是从视觉上见证他们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以及丰厚的物质财富。

通过在镜子里留下自己的微型自画像，杨可能也想以此来证明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能力：他不仅能够逼真地描绘像凸面镜那样极为复杂的物体，同时还能像一面镜子那样在画面中表现整个自然世界。重要的是，杨在完成《根特祭坛画》后，在开始画《阿尔诺芬尼夫妇像》之前的那年作了一幅可能是最早的独立艺术家自画像。正如我们看到的，到15世纪末时，像法兰克福大师那样的艺术家都已经在明确地描绘自己，以证明自己的职业抱负。但是，到16世纪初时精英艺术家的身份究竟被提高到了什么程度，最好的证明是丢勒在1500年大胆创新的自画像，这也是一幅所有时代中最杰出的自画像之一（图20）。

图20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自画像》，板面油画，1500年

在这幅画中，艺术家通过精确描绘的细节表现出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熟练技巧，比如对他发亮的卷发和华贵的皮毛领子上清晰可辨的毛撮的描绘。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丢勒采用了完全正面的姿势描绘他自己，这种处理令人想起早期圣像画中上帝圣父的形象，就像世人的

救主（*Salvator Mundi*）或者说是世界的救世主。再加上在画中艺术家头部的左边，其名字首字母签名的上面有1500这个半千年的日期，这意味着丢勒可能试图在艺术创作和神圣造物之间建立一种有意的视觉联系。换句话说，艺术家现在变成了神，就像上帝本人一样，他也能在他的艺术中创造世界和其中的居民——这个主题我们将在第九章中进行更详细的讨论。然而，在把肖像绘制艺术作为一个画种的背景下，艺术家表现出来的这种大胆的艺术自信，甚或是傲慢，突出了这种艺术形式与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个性、独创性与创造力的新观点之间的重要联系。

肖像绘制艺术的可能性：荷尔拜因的《大使》

这些联系在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最为壮观的一幅肖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这幅作品一方面似乎是肯定了布克哈特有关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的理想，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其特殊性，它也提醒我们，这种理想只有在非常有限的富人、精英以及通常是男性的人文主义学者、贵族和牧师中才会实现。我们讨论的这幅作品名为《大使》（图21），是由德国画家小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1533年创作的。当时他已永久性地移居英格兰，这可能是因为在他工作了许多年的瑞士城市巴塞尔发生了破坏圣像的宗教运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6世纪30年代晚期，英格兰也开始摧毁它的宗教艺术品，这始于亨利八世（Henry VIII）1536年解散所有天主教修道院的决定。作为新成立的英国教会的首领，亨利八世将那些修道院的财产，包括还没有被圣像破坏暴徒们破坏的艺术品全部据为己有。

图21　小汉斯·荷尔拜因，《大使》，板面油画，1533年

但在这一切还没有到来之前，荷尔拜因大型双人肖像的29岁赞助人让·德·丁特维尔（Jean de Dinteville）在1533年5月给他兄弟的信中写到：“承蒙拉沃尔的先生前来看望我，这对我而言是莫大的荣幸。”丁特维尔是天主教徒，他学识渊博，出身高贵，是法国驻英国宫廷的大使。当时亨利八世正与他的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而与替代她的安妮·博林（Anne Boleyn）结婚。后者是一个新教的同情者，国王希望她最终能为他生一个男性继承人。在肖像中，丁特维尔站在左边，右边是乔治·德·塞尔维（Georges de Selve）。塞尔维不仅是丁特维尔的亲密朋友，也是法国西南部地区拉沃尔的主教、法国天主教联系欧洲各国宫廷包括罗马教廷的外交家。丁特维尔的信指的是他朋友的一次秘密来访，当时前者非常思念法兰

西，特别是他在离巴黎不远的波利斯城堡的家人。重要的是，城堡的名字被刻在位于两人之间书架下层的地球仪的中央。我们也知道，荷尔拜因的画最初就是挂在波利斯，可能是在其中一间豪华的公共房间里。

除了地球仪之外，双层架子上还展示出许多其他被精心描绘的物体。上层有一个天体仪，还有其他一些与天文测量和时间计算有关的科学仪器，比如两个四分仪和一个日晷。架子的下层，在地球仪旁边，我们看到一本数学书、一个放着几支长笛的盒子、一把断了一根弦的鲁特琴以及一本赞美诗。这些多种多样的藏品说明他们正是布克哈特所崇尚的那种“全能人”，与此同时，尤其是架子下层的东西意味着这一作品不止是为了列举被画者的各种不凡兴趣。实际上，一些物品的出现似乎是为了显示不同或者不和谐的主题：在数学书打开的那一页上的头一个词是拉丁文的“分割”（*dividirt*），赞美诗是著名的德国新教出版物，它被翻开到与有争议的人物路德本人有关的那首赞美诗，而鲁特琴上断了的弦以及长笛盒中丢失了一支长笛的事实都强调了失调以及不和谐。有趣的是，当时两个男人都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活动以缓解欧洲所卷入的宗教和政治分歧；丁特维尔是作为天主教法国君主弗朗索瓦一世派往亨利八世宫廷的大使这个身份开展工作，塞尔维则是在欧洲大陆组织的会议中发表重要演讲，以试图调解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日益严重的分歧。

但是，在整个画面中最具有冲击力的——以及在视觉上最不协调的——因素是在构图前景中似乎漂浮在两人之间的一个奇怪的灰色物体。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失真图像，一个有意扭曲的影像。观众只有站在画面的右边，从一个倾斜的角度来看图像的表面，才能在视觉上理解这个物体。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形体突然地、几乎是如同魔术般地变成了一个眼眶空洞的人体骷髅头骨，这是对死亡、人类必死、生命短暂的象征性暗示。简言之，它是一个死亡的象征（*memento mori*）。（要观察到这种效果，你可以用这本书上此画的复制品试一下，将它放在你的眼睛右边，然后从这个角度仔细观看这个物体。）其他的艺术家，特别是那些15和16世纪早期北欧的艺术家

也在他们的一些作品中画过骷髅，或是放在被画者的手下，或是画在背景中。同样，16世纪早期时，幽默的失真画法在宫廷圈子里变成了一种时尚。但是，《大使》将这种时尚与令人烦扰的、扭曲的、自由浮动的骷髅结合起来却是独一无二的、唯一的。

结语

《大使》中的骷髅既是对荷尔拜因的艺术技巧的证明，也是对于被画者在那个充满着宗教和政治危机的时代对死亡的病态迷恋的见证。虽然，从丁特维尔的信中，我们知道他在订购此画时因为长期远离他所热爱的波利斯而深感郁闷，但我们仍然不应把此画看作是一个久居异乡者高度个人情绪化的产物。相反，从画面中特别是架子上层的那些测量仪器所投射的积极科学态度，加上画面左上角似乎是从绿色丝绸的背景幕后窥探出来、刚刚能看到的小型基督受难雕像，都是代表着希望的因素——前者是人类逻辑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的希望，因为它们或许可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后者是对唯一真实上帝的信仰，而这或许可以使自己在彼世获得拯救。但是，这些优异的“文艺复兴人”，如同创作这幅肖像来纪念他们的友谊、希望和担忧的杰出艺术家一样，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磨难和艰辛在后来的日子里只会变得更加深重。

第六章

妇女经历了文艺复兴吗？

有没有“文艺复兴妇女”？

在前一章中，我们考察了在一些杰出的、很可能是高度理想化的肖像中描绘的少数优异的“文艺复兴人”。根据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记载，在这个时期，“妇女处在与［这些］男人完全同等的地位上……［而且］上流社会妇女所受的教育在本质上与男人相同”。这就暗示着肯定存在“文艺复兴妇女”与像让·德·丁特维尔和乔治·德·塞尔维这样的男人相媲美。但是，妇女真的也经历了文艺复兴吗？根据1977年琼·凯利－加多尔（Joan Kelly-Gadol）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答案是一个响亮的“否”字。虽然布克哈特的看法与此完全相反，但甚至最聪明和出身高贵的妇女也未能在社会和政治地位上与男人平等，只有极少数精英妇女接受了某些正式教育。在经济上，除了少数例外，妇女几乎完全依赖于男人，除非她们恰巧变成了富有男人的遗孀，而且之后也没有再婚，因为在婚姻中，一名妇女要将其身份和财富（以嫁妆的形式）从她的父亲家转到她的丈夫家。凯利－加多尔认为，事实上，与中世纪的妇女相比，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的法律权利更少，经济地位更低，政治影响也更小。在她看来，文艺复兴对于妇女而言并不是一个革新和充满机遇的时代。

虽然这样具有煽动性的结论迫使许多学科的学者重新审视很多从布克哈特时代以来已被广泛接受的、关于文艺复兴文化的基本推测，但在视觉艺术领域，情况远非凯利－加多尔所暗示的那样简单。当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劳动阶层中，妇女在物质、政治或社会地位上并没有好转，这一点非常肯定——但是，大多数男人也一样。在中等社会－经济阶层的艺术家、匠人和商人中，大多数妇女状况与以前的世纪相比是好转还是恶化还不甚清楚。但是，在精英阶层，少数的女性赞助人通过她们的艺术品委托制作，确实使自己像她们的中世纪前辈一样令人注目（如果不是更为注目）。同样是在16世纪，我们首次在美术史上看到，有少数妇女成功地进入了职业艺术家的范围。同时，在

文艺复兴时期比女赞助人和女艺术家更为普遍的是成千上万的对真实或理想女性——无论是圣母还是维纳斯——的形象的描绘，主要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的视觉消费和愉悦的需要。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从三个角度探讨“妇女和视觉艺术”这个题目，也就是妇女作为艺术的对象、妇女作为赞助人以及妇女作为艺术家。

妇女的形象

关注性别问题如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欣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通过考察这一时期创作的诸多妇女肖像画中的一幅可以给我们一些方法上的启示：16世纪出生于威尼斯的画家洛伦佐·洛托（Lorenza Lotto）的一幅画，在画中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妇女迷人地向外凝视（图22）。被画者头部的倾斜和她手指的指向引导观众的眼光落在她左手拿着的一张纸上，上面是一名裸体妇女正要把匕首插入胸膛的速写。一个受过教育的16世纪观众可以马上认出这是年轻的罗马人妻子卢克雷蒂娅（Lucretia）的形象，她在受到强暴后，以自杀来维护自己的荣誉。这种阐释由速写下面桌子上的一张纸片上的文字得到了进一步印证，上面用拉丁文写着：“卢克雷蒂娅不容羞辱。”根据这个卢克雷蒂娅的古代传说的暗示以及其他文献证据，学者们认为这幅画是一个于1533年结婚的富有家庭的妇女卢克雷齐亚·瓦利尔（Lucrezia Valier）的肖像。

图22　洛伦佐·洛托，《卢克雷齐亚·瓦利尔》，布面油画（摹绘自板画），约16世纪30年代早期

以前大多数对于这一作品的学术讨论都集中在推测此画的作者、考察它的肖像画法，以及试图认定被画人的身份上。但是，考虑到主人公是名妇女，便可以提出许多完全不同的问题。比如，人们通常认为妇女手中的素描是一个男人为潜在的男性观众而画的。但是，如果素描的作者就是被画者本人，或者它的“信息”可能是传达给女性观众的，那么新的阐释就产生了。比如，素描中的卢克雷蒂娅被以一种英勇的姿势表现出来，而不是像同时代许多其他这类主题的作品那样作为一个色情幻想对象，这意味着被画者想要声明这个年轻的罗马妻子堪称所有妇女的楷模，而不是要利用这个故事作为满足男性观众性快感的借口。再看被画者的服装，大多数学者仅仅将它作为测定这幅画的年代和创作者的辅助手段。但是，根据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的实际生活来评判她的衣服，我们认识到，服装的选择可能意味着这幅作品是

为了纪念一项在这个时期影响了妇女生活的重要事件（结婚、生子、守寡）。

过去几十年里，同样思路的最新研究也促使着我们重新审视文艺复兴时期一幅最著名的女性形象，即提香的名为《乌尔比诺的维纳斯》的作品（图23）。这幅表现一位斜倚裸体女性的绘画大约完成于1538年，是为另一位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德拉·罗韦雷（Guidobaldo della Rovere）所画，此人是我们在前一章中讨论过的肖像画的主人公乌尔比诺公爵（图18）的儿子。今天，从啤酒广告到《护滩使者》[1]，我们被无处不在的衣着暴露的女性形象所淹没，这样一幅画也许并不会有多大的冲击力。但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19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中清楚地说明了他在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画廊看到这幅作品时所感到的危险的高度性吸引力：

图23　提香（提香·韦切利奥），《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布面油画，1538年前

……在那里的墙上，你会发现自己眼前充斥着这幅世界上最肮脏、最邪恶、最猥亵的绘画，没有任何遮蔽——提香的维纳斯……维纳斯躺在那里满足所有想贪婪盯视的人的愿望——但她有权利躺在那儿，因为她是一件艺术品，而艺术是

有特权的。

毫无疑问，看到这幅原来展示在圭多巴尔多的乌尔比诺宫廷的绘画，这个男主人以及来访的男性客人会像吐温一样，意识到它强烈的色情含义。

但这真的是维纳斯的形象吗？正如吐温指出的，给这一作品加上神话标题（顺便提一句，所有与委托相关的原始文献资料中都没有提及标题的问题），从而将作品从视觉上以及从文字上与著名的古代原型联系起来，然后将它作为一个由提香这样著名的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Art，首字母大写）来展示，这就为文艺复兴时期以及之后的观众提供了一种知识性的“封面故事”，使得软性色情能在更容易被接受的古典知识和艺术欣赏的掩盖下受到公然崇拜。在最近的几十年，对于性别观点是如何塑造广义上的文化以及又是如何被文化所塑造的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学者，不仅揭露了让男性观众欣赏这样一个形象时所暗含的男性 - 女性权力关系，而且也对这个形象所表现的是否真是维纳斯提出了质疑。的确，除了她的裸体之外，没有什么能确切地证明这幅画中所画的肯定是古代神话女神。相反，豪华的室内布置令人想起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精英分子的宫殿，也许就像乌尔比诺的宫殿，摆放着豪华的亚麻床单，在背景中有两个女仆和一个卡索奈长箱（*cassone*）。卡索奈是一种装织物和衣服的储藏柜，通常是妇女结婚时所用的家具（图28）。这就导致一些学者认为，也许这个女性实际上就是公爵的情妇，或者甚至是他的妻子，而不是维纳斯。无论如何，只有通过探索文艺复兴时期对待妇女的态度，不论是对待真实还是理想的女性形象，以及通过考察刻画情人、妻子和女神的常规方法，我们才能从它最初的观众的角度来欣赏这幅画的复杂性，而不是仅仅将它看作是展示在画廊墙上的“艺术品”。

妇女作为视觉艺术赞助人

近年来，妇女作为赞助人的角色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兴趣。正

如前面章节所讨论的，文艺复兴时期赞助人的角色对于艺术的创作至关重要。的确，我们可以说，赞助人是几乎所有重要的艺术项目的发起者，赞助人决定了单个艺术品最重要的面貌和特征，包括它使用的材质、展示的地点、表现的主题，以及它的尺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决定它的风格和构图。虽然了解一个作品的赞助人并不能帮助我们解释一件艺术品的全部内容，但理解一个赞助人的环境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某个特定的艺术品会被订制，以及为什么它有某些特点而不是其他特点。这对于研究精英阶层的女性赞助人来说尤其重要。作为艺术赞助人，虽然她们的习惯和兴趣与同时期的男性赞助人类似，但也有许多重要的区别。

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委托艺术作品的妇女究竟是哪些人呢？到目前为止，有文献记载的女性赞助人的身份中最多的就是寡妇，如雇用拉斐尔制作祭坛画来纪念她那被谋杀的儿子的阿塔兰忒·巴利奥尼（图7），或生活在修道院的修女。这种寡妇和修女作为艺术赞助人的风尚很容易解释：只有这些妇女有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可以自己支付艺术品的费用。而对于少女或结了婚的女子来说，她们在法律和经济上首先是处于父亲控制下，然后又被丈夫控制。的确，一名妇女只有在她的丈夫去世后，才有可能独自决定是否花钱或花多少钱来委托艺术品的制作。同样，在进入修道院之前，一个年轻的修女是不能在家里独立赞助艺术品创作的。只有在加入女性宗教团体之后，她才能参与集体决定一个艺术品的委托制作，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是由女修道院长负责决定整个工程的。

在世俗题材的领域，对妇女而言最常见的艺术委托品是为她们死去的丈夫订制的坟墓。文艺复兴时期的寡妇被激励着追随古代的楷模阿尔泰米西娅（Artemisia）的榜样，这个守寡的女王为她的丈夫摩索拉斯国王（King Mausolus）所造的宏伟坟墓，变成了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这也是今天“mausoleum”（陵墓）一词的来历。像阿尔泰米西娅一样，15和16世纪的寡妇首先关心、最为关心，甚至是唯独关注的通常就是为她们的丈夫订制一个合适的墓葬纪念碑。有些（并不是全部）纪念碑上有死者的雕像。妇女的雕像是很少见的，虽然在用

于家族墓堂的祭坛画或壁画中，有时也有妻子与丈夫一起跪拜的形象，比如萨赛蒂礼拜堂的内拉·科尔西——虽然，在这个例子中，该项目是由她还活着的丈夫委托的（图10）。但是，即使一名寡妇没有在她丈夫的墓堂里留下个人肖像，她也会通过铭文或者刻下她和丈夫的盾徽等方式来使她的子孙们记住她的赞助人角色。

在最精英的阶层，极少数妇女留下了更为引人注目且更持久的印记，因为她们所赞助的艺术品并不局限于墓葬领域。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伊莎贝拉·德·伊斯特，出生于费拉拉的赞助人和收藏家，她是曼图亚的女侯爵，嫁给了弗朗切斯科·贡萨加（Francesco Gonzaga），也是埃莱奥诺拉的母亲，我们在前一章中考察过埃莱奥诺拉的丈夫乌尔比诺公爵的肖像画。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曼图亚是意大利北方一个虽小但颇有影响的城市，由受人尊敬但不是特别富有的贡萨加家族统治。不寻常的是，伊莎贝拉在她还是一个妻子而不是寡妇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赞助艺术。她非常积极地赞助艺术家，永不知足地收藏艺术品，在她1530年去世前的50年里所写的20,000多封书信中很详尽地记载了她的这种习惯。从这些信中，我们知道，她像同时代的男性精英一样，试图购买她所能买得起的最好的古董，也试着雇用当时最著名的艺术家为她工作。到她去世时，她已经收集了非常可观的古代艺术品以及更为“现代”的作品，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提到的部分镀金青铜像《观景殿的阿波罗》（图15）。在其他贵族看来，她的小额计划支出本来是不可能购买到这么多艺术品的。

她希望雇用“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和收藏古典和仿古典作品，这种愿望非常类似于同时代精英男性的趣味，包括她自己的兄弟阿方索·德·伊斯特（Alfonso d'Este），后者统治着她的家乡城市费拉拉。但是，她不仅仅是一个精英赞助人，而且是一个精英女性赞助人的事实似乎的确影响了她的艺术委托。比如，她的男性同时代人所委托的肖像画重在突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权力，正如我们在提香的乌尔比诺公爵身披盔甲的肖像画中所看到的，而伊莎贝拉由同一位艺术家所画的她60岁时的肖像却把她表现得如同一个美丽而年轻的女子，这意味着在这个时代对于妇女而言，美貌比智慧和勇气更为重

要。

或许性别还影响了伊莎贝拉与她所雇用的艺术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一些学者批评说伊莎贝拉在她雇用艺术家为她装饰曼图亚公爵府的书房（*studiolo*）和地下室（*grotta*）时，是一个管得太多和太有控制欲的赞助人。这些小房间是她用来储存和展示她收藏的艺术品和古董的。从她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确实竭力要求她的艺术家严格遵守她那些非常详细的要求。在雇用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时，她不仅特别指定他的绘画主题应该是关于情色之爱与贞洁之爱之间的寓言性抗争，而且还给出了非常精确的指示，为艺术家画了一张很详细的素描说明整个构图的样子，甚至给他一截细绳以告诉他画中最大的人物应该是多高。但是，伊莎贝拉对佩鲁吉诺的艺术作品的控制并不只是毫无根据的偏执狂的结果。在安德里亚·曼坦那（Andrea Mantegna）所画的一张表现维纳斯和战神玛尔斯在帕纳塞斯山上统治缪斯女神的例子中，伊莎贝拉并没有提供这样详细的指示。结果一些观者显然曲解了这幅画，以为画中维纳斯的形象就是伊莎贝拉自己，虽然在画中维纳斯非常美丽，但她却是全裸的——这对于一位非常在意自己公众形象的尊贵夫人来说是很不适宜的。这样，伊莎贝拉对她的艺术家控制严格是与这样的情况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女赞助人，她必须特别注意委托的艺术品不会给她带来任何丑闻或尴尬。

为女赞助人设计合适形象的问题对于英格兰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来说可能是更为敏感的事，她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妇，而是一个不同于所有人的特例：一个富有并握有大权的单身妇女。伊丽莎白也同样沉迷于怎样有效而适当地使用形象，以证明她作为父亲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新教徒继承人的合法性。她既要显示她的权威，同时也要避免文艺复兴文化赋予试图统治男人的女人的消极意涵。毫不奇怪，她在1558年继承了同父异母的天主教徒姐姐玛丽（Mary）之位后，在统治初期所委托的一些最重要的肖像画非常明显地指明了自己与父亲以及都铎王朝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名为《都铎王朝继任者的寓言》的画作中，伊丽莎白由象征着和平和丰饶的女神引领着走向王位上的父亲，旁边是亨利当时已死去的儿子爱德华（Edward），

这样就从视觉上肯定了她是亨利合法的、神意指定的继承人。

伊丽莎白的肖像从16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改变，那时女王已接近50岁，很明显她可能永远不会结婚，同时更重要的是，她永远不会自己生育王位继承人了。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她开始鼓励廷臣们订制一些描绘她贞洁的绘画，表现出她永远纯洁、永远年轻。如同天主教最崇拜的圣母马利亚，身为新教徒的伊丽莎白试图在自己的礼拜中取代她的地位，在小马库斯·海拉特（Marcus Gheeraerts the Younger）所作的一幅画中，女王被描绘成一个半神似的人物，穿着无暇的白色衣服，戴着长串的珍珠，二者都是贞洁的象征（图24）。在这幅肖像画中，伊丽莎白实际上站在英格兰的版图上，与她父亲在其全身肖像中居高临下、圣像般的姿态相呼应。

图24　小马库斯·海拉特（归属），《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迪奇里肖像画）》，约1592年

有趣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女王本人实际上并不会订制或资助这样的画作，而是鼓励她的廷臣们买单。这幅肖像画可能就是由廷臣亨利·李（Henry Lee）资助的，他在牛津郡迪奇里拥有一大块产业。重要的是，伊丽莎白在这幅肖像中坚定地站着的地方正好是这个郡，而且我们从文献中得知她甚至在1592年拜访过迪奇里，可能正是这个机会鼓励她的忠实臣子委托订制了这一作品。在这幅作品中，赞助人和画家也确保了他们在描绘伊丽莎白的面容时采用经过女王批准的标准模式。这样，虽然伊丽莎白可能实际上并没有为这幅肖像付钱，但她最终还是左右了这些项目的风格和肖像画法，加上女王鼓励人们大量复制她最喜爱的肖像类型，这些事实意味着，这样的委托是她使用的一种视觉手段，是巩固她50年来在廷臣心目中的威信以及对王国的控制策略的一部分。

妇女作为艺术家

但是，在这个阶段，妇女并不仅仅是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绘画的对象或是艺术作品的赞助人。因为在16世纪晚期主要是作为画家的职业女性艺术家也开始出现。可能已知最早的这类画家是博洛尼亚的画家拉维尼娅·方塔娜（Lavinia Fontana）。她的父亲普罗斯拜罗（Prospero）也是一名艺术家，可能是因为没有儿子来继承这项家族事业，他决定让女儿追随他的足迹。作为一个工作在完全属于男人领域的妇女，拉维尼娅可能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她也由于这一不寻常的情况而具有了一些有利条件。虽然她因为习俗和礼仪不能进行男性人体写生，并因此失去了在这个时期最关键的一项艺术训练的机会，但她通过临摹古典男性人体雕像而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补偿，正如在她的一幅包括了一个小雕像的自画像中所表明的那样。作为在这个男性至上的历史时期中的特例，她似乎还利用了她这个“令人惊奇”的身份，来发展对于她的技巧高超的画作的需求。在创作男性学者、教士和贵族的肖像画，以及大型的宗教作品的同时，拉维尼娅似乎是有意

开拓了一个小众市场，为那些更乐意与文雅的年轻女艺术家合作的富有女赞助人提供画作服务。这又一次意味着，性别，只要适当地利用，对于这个时期的女艺术家来说有时能成为一个积极的优势。

拉维尼娅的成功既在于她在绘画中展现的技巧和创新，也在于她塑造了一个独立、高雅、才华横溢的女性艺术家的公众形象。这种有意的自我塑造在她的许多自画像中都可以看到，在其中一幅里，她穿着美丽的衣服，像一位优雅的淑女一样坐在一架古钢琴前，身边有可供使唤的女仆（图25）。这一绘画很可能还在她为1577年与一位相对贫穷、但出身贵族的年轻人结婚做准备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拉维尼娅完成这幅画后，送给了她未来的婆家，以向他们保证她优雅的社会形象、讨人喜欢的外貌，以及她的多才多艺，这些都是做一位教养良好的绅士的新娘所必备的条件。除此之外，这一自画像也是为了使她未来的丈夫相信，她完全愿意承担婚姻中她的那部分义务，包括通过她的艺术创作来改善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重要的是，方塔娜的自画像里还包括了画架和卡索奈长箱——一个是她从业的工具，而另一个则是一件通常与婚姻和嫁妆相联系的家具。方塔娜自己没有嫁妆，她就是这样用视觉手段向她的丈夫和他的家庭保证，她所具有的宝贵才能可以代替、甚至超过财产类的嫁妆。

图25　拉维尼娅·方塔娜，《有女仆、钢琴、画架和卡索奈长箱的自画像》，1577年

结语

看着这些绘画——这些关于真实的或者虚构的女性的绘画，以及由女赞助人或者为女性委托资助的艺术品——从性别的角度，我们可以对这些形象本身以及它们产生于其中的文化有更加深人的理解。这样，当我们继续争论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从整体上说是否真的也有“文艺复兴”的问题时，从性别的角度来考察这一时期的艺术无疑给

了我们新的启发，并促使我们提出新的问题。

注释

1 《护滩使者》（*Baywatch*），美国的救生员剧，由大卫·哈塞尔霍夫和帕米拉·安德逊主演，故事情节围绕海滩护卫队员营救故事展开，最大看点是海边的旖旎风景，以及无数的泳装帅哥美女。

第七章

家庭私域的器物与人像

文艺复兴时期的室内装饰品

许多博物馆和旅行指南似乎都在暗示一点，即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仅指那些由著名艺术家创作的不朽杰作，但是本章将会提醒我们，这一时期创作的绝大多数作品实际上是一些尺幅较小的作品，由名不见经传、甚至是佚名的艺术家或工匠创作，主要用于家庭陈设或宗教目的。财产清单上的说明和一些室内绘画，比如杨·凡·爱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勃艮第的玛丽的《时间之书》、法兰克福大师的《画家和他妻子的肖像》、荷尔拜因的《大使》，或者卡尔帕乔的《英格兰使者的到达和圣乌尔苏拉与她的父亲》一画的右端远景，都在提示我们：文艺复兴时期的富人，不论是男子、女子，还是小孩，家里都有各种多少进行过装饰的实用物品或者装饰性物品（见图8、9、13、19和21）。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城堡或富裕市民的联排别墅的室内景观在视觉和材质上的奢华从下面列举的部分财物中可见一斑：银质的餐具和大浅盘；明亮的上釉陶器；闪闪发光的玻璃器皿；华美的织锦挂毯；从东方进口的五彩地毯；精美的床单和枕套以及天鹅绒窗帘；手工纺织和刺绣的羊毛、丝绸、织锦和带蕾丝花边的服装；镶在金银底座上的名贵宝石；装饰富丽的手稿，以及从15世纪晚期以来就配有插图的富有质感的皮面书籍；彩色的板画和布面油画；边饰精致的镜子；青铜和大理石雕像（比如曾经属于伊莎贝拉·德·伊斯特的《观景殿的阿波罗》青铜小雕像，见图15）；发光的枝形大烛台；古钱币和新铸的纪念勋章；做工精美的科学仪器和音乐器械；人称“细木镶嵌装饰”的镶嵌木制品；装饰考究的床、长凳和其他可移动家具。一些人家的墙壁甚至覆以压花皮革或绘以装饰性壁画。

今天，一些最初发现于富有的文艺复兴赞助人家中的器物被当作“艺术品”骄傲地陈列在我们的画廊里，而另一些则陈列在专用房间，或者甚至是陈列在专门用于展览装饰性艺术品的博物馆里，被当成不那么重要的艺术品创作的典范。但是，十五六世纪的观者可能不

会作出这样泾渭分明的区分。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春》（*Primavera*）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可以说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艺术“杰作”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观者眼里很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图26）。虽然今天我们可以将这幅画看作无价之宝，但15世纪晚期的观者却可能把它当成是相对于昂贵得多的织锦挂毯来说更为便宜的替代品。这样的推测是基于以下事实：这幅画的构图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挂毯设计——背景层次并不分明，上面有水果、鲜花和植物装饰，前景是一群起绒粗呢般的人物。《春》可能是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名成员的婚礼而订制的，这一事实也说明：它复杂的意象可能与在结婚生子的用品上使用恰当的象征和寓意图像这一悠久传统有关。其他类型的家居用品和家具的装饰上也运用了这一做法。今天的我们可能不会认为那些物品在美学意义上能和《春》相提并论，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观者却会把它理解为与王朝传承相关的象征图像连续体的一部分，而王朝传承隐含于婚姻和生育之中。

图26　桑德罗·波提切利，《春》，板面蛋彩画，约1478年

对《春》的一些关键要素的简短考察支持这种解释。在构图中心

的附近，我们看到爱神维纳斯，她头顶上方画着飞翔的、被蒙住双眼的丘比特，他正要射出一支爱情之箭。右边有一名代表寒冷北风的男子，被画成了浅蓝色，正试图抓住一名女子。画家可能意欲让这名女子代表春天，她嘴里不断有鲜花萌发。她旁边的女子可能仍然代表着春天，但是已经摆脱了凛冽寒风的控制，浑身布满了盛开的鲜花。画面左边是古典神话中神的信使墨丘利，以及围成一个圈在跳舞的美丽的美惠三女神，他们使画面变得完整。虽然学者们直到今天还对这一复杂构图的准确意义存有争议，但是图中好几个人物似乎都与爱情、生育和美的主题相关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意味着该画作可能是为一对新婚夫妇专门设计的，以庆祝他们的结合，并确保他们生下许多漂亮、健康的孩子。

富人家里的其他物品也是“订制的”，以反映主人的爱好和关注点。比如，美第奇家族——波提切利的《春》的赞助人——从西班牙的巴伦西亚地区一位佚名工匠那里订制了一个华丽的双柄上釉陶罐（图27）。这件工艺品华美无比，其炫目的光洁表面——称作“虹彩釉”——是通过采用一种特定工艺来制成的。这种工艺最初由伊斯兰工匠开发出来，在15世纪时被西班牙陶艺师采用，16世纪又传到了意大利。我们知道这件工艺品制作于15世纪后半期，因为陶罐的一面有一枚盾徽，这枚盾徽不是彼埃罗·德·美第奇（Piero de'Medici，死于1469年）的就是他儿子洛伦佐（人称“伟大的洛伦佐”，死于1492年）的。在陶罐的另一面，也就是图27所示的这一面，人们还可以看到美第奇家族的其他纹章，其中有一枚象征永恒的钻戒，画在陶罐中央的深蓝色背景上。罐子的其他地方可能用的是葡萄叶形装饰，美第奇家族举办宴会时用它来给宾客斟葡萄酒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即便是在不使用的时候，家族的徽章和罐子本身那明显不菲的造价以及它的华美也会为来客所欣赏，因为这件器物可能就公开陈列在该家族的某座宫殿里。

图27　巴伦西亚的佚名陶艺师，饰有叶形图案和美第奇家族纹章的双柄陶罐，上釉陶器，约1465—1492年

在大约制作于1455年至1465年间的装饰富丽的镀金卡索奈长箱（图28）上也可以看见佛罗伦萨另外两个家族的盾徽。它们镶嵌在箱

子左右两边的装饰性壁柱上，具体说来，一边是斯皮内利（Spinelli）家族的盾徽，一边也许是唐纳利（Tanagli）家族的盾徽。这就意味着这个箱子是两个家族的成员在缔结婚约时制作的。这样的箱子往往包含彩绘的图像（如表现古代历史或古典神话中的某些场面的图像），以证明其赞助人的博学，也有一些图像暗指或象征婚姻（如《贞洁的胜利》中的插图）或家族地位（如图28中的卡索奈长箱上所描绘的佛罗伦萨圣克罗斯广场上的马上比武场景，该广场距斯皮内利家族的府邸不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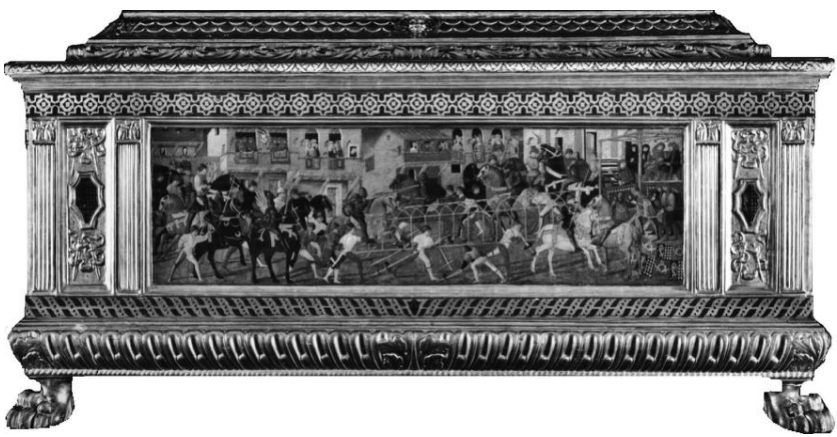

图28　佛罗伦萨的佚名艺术家，饰有圣克罗斯广场马上比武场景的卡索奈长箱，蛋彩画，镀金木箱，部分包银，约1455—1465年

生育、婚姻和圣母浮雕

通过婚姻建立起联系的两个家族的盾徽也经常出现在圣母子雕像的底座或边框上，如图29所示。这尊雕像可能是由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所设计，它在15世纪时被大量复制，有许多版本。总的来说，圣母浮雕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流传下来的艺术品中数量最多的种类之一。实际上，据估计，流传至今的圣母浮雕大约有1,000多件。大多数艺术史家主要致力于运用风格标准对这些作品进行分类，主要依据艺术家的名字和创作年代，以便为真正的文艺复

兴时期的艺术品建立起可信的体系——这是对此类作品给予的严肃认真的关注，因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出现了许多这些浮雕种类的复制品、摹制品和纯粹的仿制品。但是，这些并不是圣母浮雕最早的观者所关注的问题。事实上，直到15世纪末，大多数家庭的财产清单上并不会特别注明这类艺术品的作者身份，这就意味着艺术品的作者归属问题对它最初的主人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只有将这些浮雕从传统艺术史研究的语境中抽离，再重新植入最初的欣赏环境时，其完整的文化意义才会开始显现。

图29　洛伦佐·吉贝尔蒂（设计），《圣母子》，着色陶，约15世纪20至30年代

显然，这类浮雕主要用于宗教目的。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本身，包括一些宗教仪式和习惯都在逐渐发生变化。比如人们根据文献资料会发现12或13世纪以来，圣母崇拜日益盛行，此外还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即强调俗人（与神职人员相对）的虔敬行为。圣母崇拜和俗人对虔敬行为日渐高涨的兴趣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即希望以新形式的文本、形象和宗教活动将基督和圣母人性化。描绘宗教人物的绘画越来越多地展现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耶稣和马利亚人性的一面通过新的肖像类型（如圣家庭和给圣婴哺乳的马利亚）得到了强调。新的祈祷文本也鼓励读者与基督和圣母马利亚产生共鸣。在一些情况下，虔诚的信徒甚至开始有了一些神秘体验，觉得自己就是马利亚或基督本人。这类幻觉有些可能是由某些物品引发，如文艺复兴初期真人大小的木制圣婴像，而不仅仅是由文本引发。比如，圣方济各描述了这样一个神迹：置身于某个耶稣诞生场景的这样一个木像似乎在他怀中活了过来。另一些文献证实：妇女，包括修女，有时也会想象自己变成了圣母马利亚，怀里抱着的木像仿佛也变成了真正的圣婴基督，正吃着奶。

这种引发移情作用的虔诚，加上马利亚和圣婴人性化形象的增加，都对15世纪时圣母浮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这些浮雕也吸收了绘画作品中表现的主题，但是雕塑作为一种媒介的特性使得人物形象与观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无疑，与绘画相比，宗教人物与观者之间的距离缩小了，因为这些雕像是立体的，与观者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包括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有的雕像似乎被当成了有血有肉的人，比如，人们给它们穿上真正的衣服，戴上真正的珠宝，这就更进一步支持了上述阐释。色彩艳丽的圣母子高浮雕陶像在促进有形的宗教虔诚方面一定特别有影响。15世纪的神学家乔凡尼·多米尼奇修士（Fra Giovanni Dominici）在建议家长摆出宗教人物的雕像让孩子们凝视时，他心里想的也许正是此类艺术品：

……在［有雕像的］房间里，你的孩子还在襁褓中就会感到欣喜，因为雕像就像他一样……最好有怀抱孩子的圣母马利亚像……一尊完美的雕像是耶稣吃奶的形象、耶稣在母亲的大腿上睡觉，［或者］耶稣有礼貌地站在圣母面前。

这意味着这位作家脑海里的圣母形象主要是给那些相对单纯或者甚至没有受过教育的观者看的，包括妇女和孩子。

15世纪的财产清单证实：一般说来，最常放置圣母浮雕的地方是卧室。然而，在这一时期卧室远不止是睡觉的地方。事实上，从许多方面来说，卧室是家庭的中心，就好比心脏一样。正如《阿尔诺芬尼夫妇像》所示，画中的这对夫妇会客的屋子里就有一张带罩篷的床；或者在卡尔帕乔所作的乌尔苏拉与父亲讨论婚事这一画面中也突出了类似家具和带框的圣母子画像（也可能是浅浮雕）。油画、版画和家庭财产清单表明：卧室内的圣母子像前面经常供有圣水容器或枝形大烛台。圣母崇拜的其他形式还包括给这些浮雕戴上真正的珠宝首饰，穿上真正的衣服（前面已提到过），还有人把它们隐藏在防护性的帘子或窗板后面。

虽然这些物品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人们在家里祈祷，但它们还有其他用途，只是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用途罢了。具体说来，这类图像在表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婚姻和生育问题的关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证明圣母浮雕具有这些宗教外作用的重要线索可以在富有的佛罗伦萨人的购买方式中找到。就像今天的夫妇在婚礼来临之前会在一个大百货商店“登记”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人也会在婚礼前疯狂采购一番。新郎会买来新家具和艺术品，特意把婚房重新装饰一番。他们所购的物品包括以历史、神话或寓言等流行题材装饰的卡索奈长箱；给卧床休息的新妈妈们送食物和饮料的生育盘（*deschi da parto*）；最重要的是圣母子的绘画和浮雕。这些物品的实用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储藏珍贵的织物、递送食物和饮料，或者作为祈祷者每天凝视的对象。此外，它们还具有教化或避邪的作用，只是这种作用不那么明显罢了，比如力图强化同时代人关于女性得体行为的信念，或者神奇地确保生出一名健康男婴以延续父亲的血脉，前者可以在一些卡索

奈长箱上画的《贞洁的凯旋》得到证明，后者将在下面的叙述中看到。

总的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婚礼仪式，以及结婚时所购买的物品，常常是明白无误地强调新婚夫妇所属家族的结合和维护新郎传宗接代的希望。结婚时购买的许多用品，如卡索奈长箱、生育盘和圣母浮雕，上面都装饰有两个家族的盾徽，这样一来，夫妻之间的结合就有了看得见的永恒形式。除了这种直白的家族象征图像外，新郎传宗接代的希望也可能暗含在圣母子浮雕这类寓意丰富的作品中，具体来说就是隐含在圣婴形象中。一般说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非常看重男婴的诞生，因为他标志着父亲的血脉得到了延续。男孩的形象经常出现在与婚姻和生育有关的物品上也就毫不奇怪了，比如圣母浮雕中的圣婴基督形象，又如图30所示的生育盘中的小男孩形象。这类物品的避邪作用或魔法作用在生育盘上的铭文中得到了印证，该铭文意在祈求好运，希望生下一个男孩，并保护妇女平安顺利地生产。

图30　巴托罗米奥·蒂·弗鲁斯诺（归属），《有裸体男童坐像的生育盘》，蛋彩画，镶板上饰金和银，1428年

这些物品最初的主人为什么认为这些形象会“起作用”呢？最好的解释就是当时人们对交感魔法[1]和母亲想象的力量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可上溯到古代。公元4世纪的一个文本简洁明了地总结了这个概念：“胎儿成形于妇女受孕期的想象中；由于女性往往喜欢各种画像和雕像，因此它们给人带来了后代。”这样，只要让年轻的新娘在受孕时或孕期看一幅画有漂亮小男孩的画，或者更好一点，看一个漂亮小男孩的立体雕塑，人们认为她就会产下同样漂亮的小男孩（其地位也与圣子一样重要），来延续夫家的香火。合适的漂亮小男孩的形象经常被放在卧室里，这大概是特别实用的。

至此，我们从当时的宗教习惯和把它们用作与婚姻和生育有关的避邪物这两个角度考察了圣母浮雕。但是还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些形像，即艺术品的角度。然而，直到15世纪末，才有人开始意识到这些作品可以被主要当成艺术品。比如，只有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宫1492年的财产清单中我们才首次发现某件圣母浮雕注明了艺术家的名字，这位艺术家就是多那太罗，这件圣母浮雕与其他艺术品、书籍和古董一起存放在书房，而不是悬挂在卧室的墙上，主要用于宗教目的或起避邪的作用。然而，即使在这份清单中，这类浮雕中的绝大多数仍然没有注明其创作者，仍存放在卧室中。当然，15世纪的赞助人肯定不会对这些浮雕的艺术特征视而不见。实际上，有如此多不同种类的圣母浮雕存在，从质量、设计和媒介来看，不仅有着色陶塑，也有大理石、青铜、石膏和上釉陶塑，这说明15世纪的许多观者都对这类题材十分敏感。但是，直到15世纪的最后几年，大多数赞助人都不会像今天的我们那样首先将这些物品中的绝大多数看作是艺术品。

家庭私域的新类型

圣母浮雕在15世纪的意大利日益流行，与此同时，新的艺术类型也逐渐兴起，无独有偶，这些新类型的艺术品主要也是陈列在家庭内部。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从15世纪初开始，在意大利，特别是在北欧，订购独立的肖像画的客户越来越多。相比这种肖像来说，一个更为昂贵的选择就是大理石半身像，它最初发端于意大利，后来则变成了青铜半身像。前一种材质特别容易让当时的观者想起古典原型，而且同时还能表现像美第奇和萨赛蒂这样的家族希望世代传承的雄心。这两个家族的成员的大理石胸像被骄傲地陈列在气派的城市府邸中，他们一定是希望这些胸像能够像古罗马时代祖先的雕像那样世代长存。

在16世纪的北欧出现了其他一些世俗的艺术形式，它们也主要用于家庭陈设。出现这些艺术形式的部分原因在于宗教改革的压力，因

为宗教改革反对各种类型的宗教形象。特别要提到的是，16世纪初，风景画开始作为独立的艺术类型出现在像丢勒和阿尔布雷克特·阿尔特多费（Albrecht Altdorfer）这样的艺术家的作品中。稍后，表现日常生活的绘画，即“风俗场景画”也开始被订购和收藏。虽然这些完全缺乏明显叙事因素的风景画和风俗场景画在16世纪被大加创作、印刷，但许多这样的作品，特别是油画，经常画有一些次要的或补充性的主题，而这要仔细观察才能看清楚。比如，16世纪中期的佛兰芒艺术家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画了一幅名为《伊卡鲁斯的坠落》的画，这幅画描绘了典型的乡村生活——画中前景是农夫在耕地，背景是一片开阔的陆地和海景，似乎一直延伸到目力所及的地方（图31）。

图31　老彼得·勃鲁盖尔，《伊卡鲁斯的坠落》，布面油画，约1555年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勃鲁盖尔的作品，我们最终会在画面右下角的蓝绿色海面上（即最大的那条船与海岸线之间）发现有两条很小的白腿在猛蹬。正如画名所暗示的，这就是伊卡鲁斯，古希腊艺术家兼工艺巨匠代达罗斯之子。代达罗斯为他自己和儿子各设计了一对

巨大的翅膀，他们插上翅膀后飞出了囚禁地克里特岛。尽管父亲事先警告过他，但是冲动的伊卡鲁斯相信他可以飞到天神那里去，于是他越飞越高，直到最后他距离太阳太近，翅膀上粘结羽毛的蜡熔化了，他坠落下来，掉进海里淹死了。这是一个妄自尊大以及骄傲（字面意义上）最后导致坠落的永恒象征。

勃鲁盖尔的这幅画取材于古代作家奥维德（Ovid）的悲剧性小说，这使得勃鲁盖尔的风景类画作带有一种神秘的叙事焦点。如今这幅画陈列在布鲁塞尔博物馆，在1938年的一首诗中（该诗即以布鲁塞尔博物馆命名），奥登（W. H. Auden）生动地描绘了这类史诗般的神话事件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多么地不协调：

> 说到苦难，他们从未看错，
> 古代那些大师；他们深切体认……
> 例如勃鲁盖尔的《伊卡鲁斯》，众人
> 都悠然不顾那劫难，那农夫可能
> 听见了水波溅洒，呼救无望，
> 但是不当它是惨重的牺牲；阳光灿照，
> 不会不照见白净的双腿没入碧湛
> 的海波；那豪华优雅的海舟必然看见
> 一幕奇景，一童子自天而降，
> 却有路要赶，能安详地向前航行。[2]

结语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像维纳斯或伊卡鲁斯这样的神话人物形象，以及大理石胸像或青铜雕塑之类的古典类型，似乎与日常生活中的家居和宗教用品（从圣母浮雕和织锦挂毯到装饰精美的储藏柜和酒罐，不一而足）极为自然地共处于一室。今天，博物馆通常会以“高雅”和“普通”为标准来将这些艺术品分开陈列，但是，对于十五六世纪的富有观者来说，这些东西只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 交感魔法，即指力图通过一些方法传播消息，从而使人们想象中的鬼、神、精灵等超自然能力接到信息作出回应。

2 本段译文主要来自余光中先生的翻译（见http://www.ideobook.net/33/），局部稍有改动。

第八章

一个广场的故事：佛罗伦萨的艺术和都市生活

安排场景

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去看一幅幅孤零零地挂在博物馆墙上或印在教科书上的作品，还应该考察作品与创作地、赞助人、观者，以及决定作品原始语境的历史背景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在前面各章中，我们探讨了文艺复兴时期为教堂、礼拜堂、宫殿和家庭制作的绘画、雕塑以及其他一些视觉和物质文化器物。在本章，我们将来到室外，来到佛罗伦萨的街道和广场上，以考察大型公共雕塑是如何积极地融入十五六世纪观者的生活中，并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

具体说来，我们将特别关注一个公共广场，即佛罗伦萨的西尼约里亚广场[1]。这个广场建在这座中世纪城市的中心，广场上耸立着气势恢宏的市政厅。直到今天，西尼约里亚广场仍然是佛罗伦萨最重要的市民活动场所，从许多方面来说，广场基本上保留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面貌，这一点可从16世纪初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所画的广场图中得到证明（图32）。如图所示，右边是市政厅，楼顶上有高耸的瞭望塔，楼前是举行仪式时用的高台，人们称之为*ringhiera*（即意大利语中的“凉台栏杆”）。再往右是兰齐走廊（*loggia*），这是一个带拱顶的回廊，它有三个开间。在构图的左边远端，我们只能看到佛罗伦萨大教堂的部分穹顶，这个大穹顶建成于1436年，由布鲁内莱斯基设计，我们在第四章作过简短的讨论。让人不安的是，在广场的中央有一个熊熊燃烧的柴堆，被一条临时搭建起来的通道与市政厅前面的一角连接起来，火光中有一些小小的人影在高柱上摇晃。这些人就是激进的多明我会教士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修士（Fra Girolamo Savonarola）和他的同伴，1498年他们在这里被执行火刑。正是因为这个可怕的事件促使了这幅画的创作，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画中所记录的空间、建筑和雕塑，而不是那些狂热修道士的可怕结局。

图32　佛罗伦萨的佚名艺术家，《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1498年在佛罗伦萨的西尼约里亚广场上被处死（市政厅前有“马尔佐科狮子”和“犹滴”雕像）》，板面油画，16世纪早期

1382年佛罗伦萨建立了以贵族为统治阶级的政体，15世纪30年代美第奇家族兴起，在这之间的半个世纪中，一个对城市进行规划并树立城市雕像的宏伟计划在佛罗伦萨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展开。市政厅和大教堂周围的街道和广场被拓宽和规整，雕塑家吉贝尔蒂为该市的洗礼堂设计了两扇巨大的装饰精美的青铜门；由多那太罗和南尼·迪·班科（Nanni di Banco）这样的艺术家创作的等身大雕像被显眼地安放在佛罗伦萨中心的主要建筑前，数量超过二十多座。这样一个计划，无论是从它的数量还是种类来说，都是欧洲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但是，其中大多数建筑和雕塑的来源都可以追溯到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也就是远在1382年新的寡头政权上台之前。

广场上的狮子

相反，这个新政府委托制作的第一件雕塑似乎是为了放在一个重要的市民场所，而且之前那里没有放置过任何雕塑。这个地方就是西尼约里亚广场，这里坐落着新近建成的兰齐走廊和市政厅，后者是被称为领主（*Signori*）的贵族统治者的居所。这个新石雕通身镀金，表现的是佛罗伦萨的象征——狮子，称为“马尔佐科”（Marzocco）。它被放在市政厅前仪式用高台的一角。14世纪晚期的那个马尔佐科原始雕像已经丢失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后来的绘画和壁画来确定它的样子。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幅表现萨伏那洛拉行刑的画，我们就会在临时通道与高台在市政厅前相交的地方辨识出这座雕塑。这样的画面意味着：马尔佐科的基本设计相当接近多那太罗在1419年创作的一座石雕，那座石雕最后取代了市政厅前的第一个马尔佐科。多那太罗雕刻的狮子蹲伏在地上，右前爪骄傲地抓着一面盾牌，上面用佛罗伦萨的市花百合装饰。但是，最初的马尔佐科并没有抓着盾牌，而是身子底下压着一匹狼，而狼可能代表着佛罗伦萨多年的对手锡耶纳。

市政厅前安放第一个马尔佐科之前的那个世纪，在佛罗伦萨政治、社会和经济史上都算得上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工商业的破产凋蔽、劳动阶级的起义、与罗马教皇的冲突、短暂的残暴统治、宗教狂热的爆发，以及1348年的那场大瘟疫，即黑死病的流行，使得14世纪在很多佛罗伦萨人的眼里都是一个危机四伏、充满焦虑的时代。这种紧张关系在1378年的羊毛工人起义（Ciompi Rebellion，意大利的羊毛工人被称为ciompi）中达到高潮。在这场暴动中，羊毛工人发动政变，并和其他较穷的行会成员一起短暂地统治了这个城市。1382年，这个政权又被联合起来的较富裕的行会会员和贵族精英所推翻。到15世纪初期，佛罗伦萨的统治权实际上掌握在一个由贵族和最富有的行会首领组成的核心集团手中，这些首领包括银行家、布料商和毛纺与丝织厂主。正是在这个精英集团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在15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市政厅前的马尔佐科雕像和其他二十多个大型雕塑被

显眼地安放在佛罗伦萨的政治和宗教中心。

雕像斜对面的西尼约里亚广场的一角是看到马尔佐科雕像的主要位置，而这个位置也是从大教堂过来的观者进入广场的最近的道路——在这幅表现萨伏那洛拉被处死那天的广场的画面上，这个角度就相当于构图的左下角，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人正骑马进入广场。14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共同努力拓宽和规整连接市政厅和大教堂的街道，在这一过程中，这条通向市政厅的道路的重要性得到了突出。虽然整条街道直到19世纪才全部完成拓宽，但有文献证据证明，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早在14世纪晚期就已经计划这么做，并希望西尼约里亚广场的外观、连接道路两边的建筑和大教堂周围的建筑在风格上能够协调起来，这样，包含了佛罗伦萨主要市政和宗教空间的市中心就被完全融为一个视觉上的统一综合体。通过从视觉上和象征意义上把马尔佐科放在新近突出的、通往市政厅的道路的焦点处，领主可能是要把市民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的权力和权威上，而佛罗伦萨的狮子、狮子背后的市政厅以及居住其中的统治者就是权力和权威的象征。在市政厅前面的高台上定期举行的仪式中，露面的正是这些统治者们，以展示他们的权力。

佛罗伦萨统治者和马尔佐科之间的象征性联系也延伸到城墙之外。实际上，整个15世纪，佛罗伦萨领域内的起义者和意大利中部的敌对者都把佛罗伦萨人及其统治者与这头狮子等同起来。比如，波伦亚人在中央广场焚烧了麦秆做的马尔佐科以抗议佛罗伦萨政府干涉当地事务，比萨人重新从佛罗伦萨手中夺回城市的控制权之后，推倒了佛罗伦萨人安放的一座狮子雕像，拖着它穿过大街小巷，最后把它扔进了阿尔诺河。佛罗伦萨人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马尔佐科这个形象的意义，因此在其治下的其他城镇的主要广场上都悬挂或安放了马尔佐科的绘画或雕塑。甚至佛罗伦萨的农村都对这一意象的重要意义有着广泛的认识，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明证：某地的村民把一头驴装扮成马尔佐科，然后砍下了它的头，以表达对大城市雇主的愤怒。无论是陈列在西尼约里亚广场的马尔佐科，还是安放在佛罗伦萨治下的城镇里的马尔佐科，它实际上都成为了佛罗伦萨政府的永恒象征。的确，

从某些方面来说，马尔佐科甚至可以与贵族领主本身互换。

雕像与理想

在15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市政厅广场上再也没有订制安放重要的新雕塑，这可能象征着在这一时期随着美第奇家族的兴起，贵族领主的势力逐渐衰落。到15世纪中期，美第奇家族已成为这个城市事实上的独裁统治者。在洛伦佐·美第奇——此人因其统治风格和对艺术的慷慨赞助而被称为“伟大的洛伦佐”——的统治下，佛罗伦萨在15世纪后半期进入了一个短暂但辉煌的黄金时代。但是，在1492年洛伦佐去世后，情况很快急转直下，1494年一个新的共和势力联盟推翻了美第奇家族并将其驱逐出这个城市。不到一年以后，即1495年，佛罗伦萨的新统治者没收了多那太罗创作的青铜雕像《犹滴斩首荷罗孚尼》（图33，以下简称《犹滴》），这座雕像曾经被用来装饰美第奇家族位于城市中心的豪华府邸花园，没收后被放到了市政厅前面的高台上，离马尔佐科不远——在萨伏那洛拉行刑的画面上人们能够大致辨认出它。这座雕塑是一个非常耗力的工程，因为要成功地在饰有浮雕的、完整的三角形基座上铸造出真人大小的双人雕塑是非常复杂的，就如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看到过的切利尼对铸造这样一件作品时的危险和困难进行的生动描绘。

图33　多那太罗（多那托·迪·尼科拉·迪·贝托·巴尔迪），《犹滴斩首荷罗孚尼》，青铜，15世纪中期

当这座雕塑最初陈列在美第奇宫时，其本来的寓意比较普通，就是美德战胜邪恶。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新的物质和政治语境中，并且在上面加上了新的铭文，那么它的意义就转向了旗帜鲜明的反美第奇倾向，暗指共和主义对专制独裁的胜利。考虑到1494年到1495年间的政治形势，犹滴故事的象征意义似乎特别适合新政府。犹滴，贞洁的犹太寡妇，杀掉了放荡的暴君荷罗孚尼而拯救了她的人民，犹滴这个形象就成了这个新政府的恰当象征，因为它声称与15世纪美第奇家族最后几年的腐败统治和自高自大相比，这个政府在道德上更为高尚。如同克服了性别局限的犹滴一样（她杀死敌人时如同一名男子），新政府也得克服种种不利条件战胜强大的美第奇家族及其盟友。重要的是，多那太罗的作品表现的正好是获胜的犹滴举起剑向瘫倒在地的将军发出最后一击的时刻，这一下她将砍下将军的头颅。通过把这个富有表现力的作品放在市政厅主要入口的高台上，并通过使用新的铭文来重新定义它对于市民的意义，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将一个美第奇时代的偶像转变成了共和时期的理想。

但是，政府将《犹滴》用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的决定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重大问题，也就是他们新推出的女英雄的性别。在青铜雕塑被安放在高台上后不到十年，《犹滴》就被从佛罗伦萨市民生活的象征性中心移走，并被米开朗琪罗那巨大的大理石雕像《大卫》（图34）所取代。1504年1月，在一次公民集会上，人们对刚刚完成的《大卫》雕像的安放位置进行了充分讨论。人们最初打算把它放在佛罗伦萨大教堂的一个扶壁上，以使它远高于地面。第一个在这次集会上发言的人是新政府的官方代表，宫廷使者，一个名叫梅塞尔·弗朗切斯科（Messer Francesco）的人。他的意见可能至少反映了政府内部一些官员的态度，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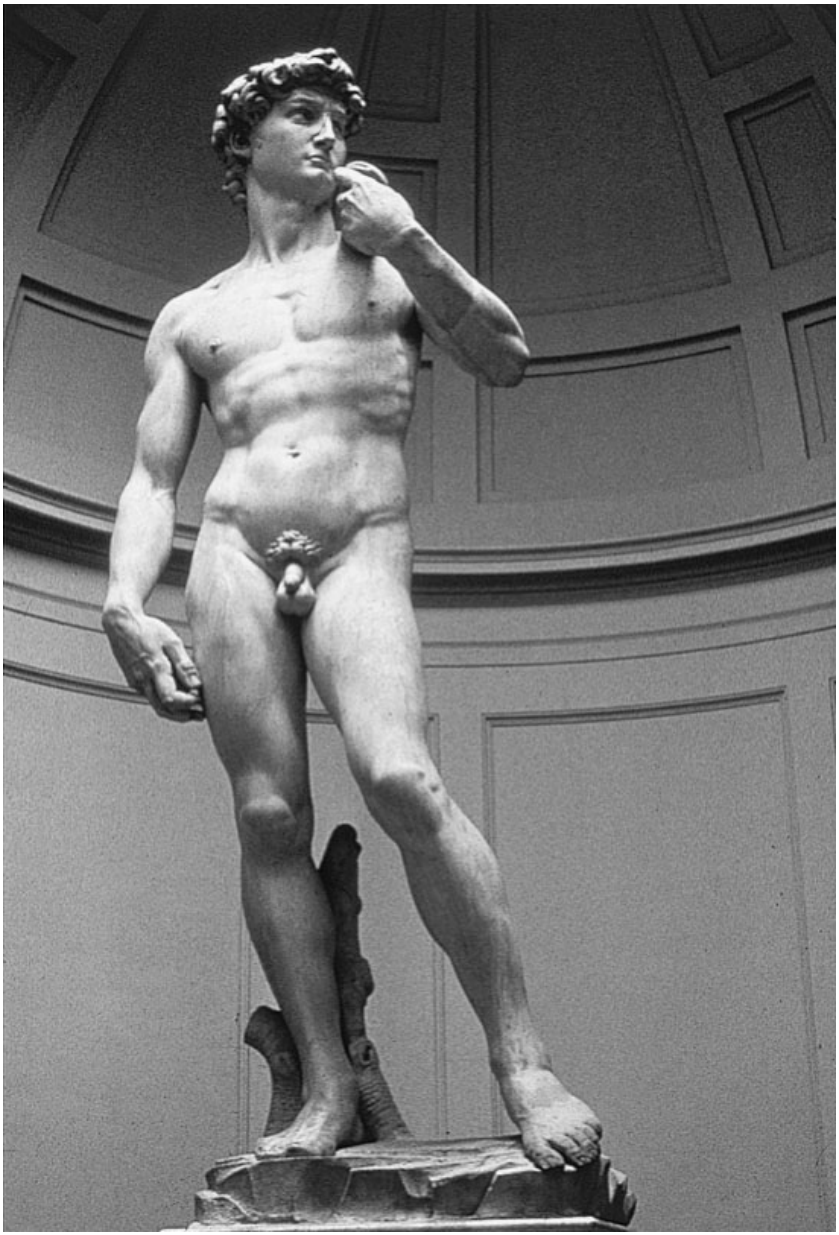

图34　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大卫》，大理石，1504年

……犹滴象征了死亡，不适合放在此地，因为我们的［即佛罗伦萨的］象征是十字架和百合花。一名女子杀害一名男子是不合适的，最糟糕的是，它所处的

位置属于煞位，因为从那以后，形势越来越糟，比萨城丢掉了。

这唤起了人们对女性具有危险力量这个近代早期的熟悉主题的意识，因为她们能够诱惑并杀害毫无戒心的男子。梅塞尔·弗朗切斯科认为，佛罗伦萨最近的不幸，包括丢失比萨城这个以前统治下的城市，都要归罪于在公共场所放置这样一个危险女人的不祥形象的决定。

明摆着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新找个地方安置这座严重打破了男人就应该统治女人的父权制秩序的雕像。无疑，决定用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取代《犹滴》同样会赋予新政府合适的寓意——即共和制战胜美第奇暴政，而且对政府的困扰也更少。就像犹滴的故事一样，大卫的故事也是关于一个最意想不到的英雄：一名牧羊少年克服种种困难，战胜了另一个恶人——邪恶的巨人歌利亚。于是，米开朗琪罗的标志性雕塑被安放在市政厅前面，而多那太罗的雕塑被挪到了室内，从公众的眼中消失了。两年以后的1506年，《犹滴》再次获准陈列在西尼约里亚广场上，但是，她被放在了兰齐走廊左远端的拱门下，这一位置比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现在所处的市政厅前的高台这个位置次要得多，这证实了她在象征意义上要逊于获胜的大卫。

1554年，在《犹滴》被重新安放在广场近半个世纪以后，雕像旁又增加了一个青铜饰物。但是，这座新的雕塑，即切利尼的《珀尔修斯手举美杜莎之头》（图35，简称《珀尔修斯》），完全颠覆了《犹滴斩首荷罗孚尼》雕像中“妇女在上”的主题。相反，《珀尔修斯》（在第一章中，切利尼描述了制作过程）表现的是一名男子站在被斩首的女子身上，一手高举着美杜莎血淋淋的头。美杜莎活着时会把胆敢看她的男子都变成石头。因而，切利尼这个令人不安的作品与当时父权为主的意识形态更为一致。

图35　本韦努托·切利尼，《珀尔修斯手举美杜莎之头》，青铜雕像，青铜与大理石底座，1545—1554年

结语：美第奇的归来

切利尼的雕塑，加上其他几尊大理石神话人物雕塑都是由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公爵在该家族于1512年成功地从流放中归来后委托订制的。到1575年，美第奇家族在市政厅的一角，也是当时广场的一个焦点处，设置了一座壮观的喷泉，顶部是海神尼普顿的雕像，这样他们就以家族自行选择的艺术品取代了让人回忆起前美第奇时期的马尔佐科。虽然《犹滴》或《大卫》那样的作品让人有更多的共和时期的联想，但要将它们移走一定非常困难，因为16世纪中期时，这些雕塑及制作雕塑的艺术家已被普遍尊为佛罗伦萨惊人的艺术遗产中最璀璨的明珠。这样，美第奇家族并没有随便移走这些雕塑，而是通过委托订制无数新作品而把广场上的所有雕塑融入新的历史背景中。这些新作品均由当时著名的艺术家所创作，其中包括切利尼和后来的雕塑家乔凡尼·博洛尼亚（Giovanni Bologna，也叫詹博洛尼亚［Giambologna］，生于佛兰德斯）。

事实上通过将西尼约里亚广场变成一个巨大的室外雕塑长廊，较早时期的雕塑那令人不安的象征含义就从反美第奇的共和宣传转变成了具有美感的艺术作品，含蓄地证明了佛罗伦萨人和美第奇家族的财富、品位和艺术造诣。换句话说，16世纪晚期时，广场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件艺术品，并且这种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游客纷涌而至，他们渴望看到集中在一个广场上的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雕塑作品”。但是，只有仔细考察西尼约里亚广场和广场中展示的那些雕塑不断变化的物质和历史背景，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这些作品与它们周围环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必然联系。

注释

1 西尼约里亚广场（Piazza della Signoria），位于佛罗伦萨市中心，又称“市政厅广场”或“领主广场”。

第九章

米开朗琪罗：艺术家和艺术史的诞生

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新观念

至此，我们主要从地点、媒介、功能、类型、构图、象征、赞助人和观者的角度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但是，16世纪的画家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他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位真正的艺术史家——在论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时是按时间顺序，以艺术家的传记为主线来组织材料的，由此所建立起的一套艺术标准以及所确立的艺术史这门学科，在某些方面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实际上，也只有在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在瓦萨里和他最崇拜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的影响下，我们对艺术家、艺术和艺术史的许多最天真、最深信不疑的臆断才首次出现。这些臆断有：艺术创作主要是一种审美活动，而不是为了实用目的（即“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家是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天才；艺术的目标在于临摹自然界；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可避免地在“进步”。

在前面的许多章节中，我们把“艺术”看作是具有文化特异性的术语，这个术语首次以我们今天所认可的方式使用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15世纪下半叶之后。尽管如此，许多在今天被我们认为是艺术品的画作和物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创作者和观者眼中并不一定是艺术品。对“艺术家”这个词的理解也是如此。今天，我们经常想当然地认为以艺术家为主线来呈现艺术史是最自然、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不论是我们购买的专题著作、参观的个人展览，或是观看的电视纪录片，都是以艺术家为线索来组织材料的。但是，这一做法实际上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才成为惯例。的确，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时期的许多物品和塑像首先要从赞助人、功能、媒介或者象征的角度来看待，而不是把它们与创作者的名字相关联。

我们如今对艺术家的看法，跟我们今天对“艺术”的理解一样，大多形成于19世纪，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艺术的重点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从艺术家的技巧或能力转到了他/她个人的创造力上。换句话

说，人们不再只把艺术品视为精心制作的工艺品，转而高度重视艺术家的观念和思想，这其中必然涉及到艺术家的个人特征、生活经历甚至心理特征等被认为是成就了这个艺术家的那些因素。这样，如今“真正的”艺术家最被人看重的就是他们的想象力、独创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自我表达，即使（或者说，特别是如果）这些特征使得艺术家过着一种带有些许创造性癫狂特性的非传统生活。这种观点的结果就是人们以为艺术家无一例外地被同时代那些迟钝、无趣、因循守旧的人所误解、忽视和虐待。简言之，这就是艺术史上的“顶楼上饿死的艺术家”的浪漫主义故事——我们只需想想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众所周知，他生前从未卖出去一幅作品，在一时疯狂之下，他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并最终自杀身亡。

但是，人们对艺术家和艺术天才某些方面的看法可以上溯至文艺复兴时期和艺术世界最早一批“超级巨星”的兴起。比如，米开朗琪罗间歇性的忧郁症发作、爱沉思的个性、易怒的脾气（这一性格导致他年轻时与另一名艺术家打架时鼻梁被打断），他惊人的创造力和艺术创新，甚至他古怪的个人习惯，比如他长时间地穿一双皮靴，以至于最后只能把靴子从化脓的皮肤上割下来，这些特点都在与这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相关的同时代传记和记叙中得到描绘。米开朗琪罗不仅是一位画家和雕塑家，还是一位建筑师和备受尊敬的诗人。米开朗琪罗认为自己的创造力是天赐的，像神一样。他在世的时候，不仅喜欢被称为“神人”（*Il Divino*），而且在他写的许多十四行诗中，他将艺术创作与上帝造人的行为等同起来。实际上，我们可以把米开朗琪罗约于1508年至1512年间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上创作的壁画《创造亚当》（图36）理解为一种比喻性的自画像。在这幅壁画中，艺术家将自己富有创造力的手与上帝那创造生命的手相类比。在分析大理石雕像《大卫》时，瓦萨里明确地宣称：米开朗琪罗将一块最初被另一位拙劣的艺术家雕刻过的旧大理石变成了一个极具表现力的形象，简直就是“一个赋予将死的事物以生命的奇迹”（见图34）。

图36　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创造亚当》，湿壁画，约1508—1512年

名字里有什么？

我们在第五章已提到丢勒——北欧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超级艺术巨星——在他于1500年大胆创新的自画像中也展现了类似主张：他使自己的自画像在视觉上等同于描绘上帝本人的肖像画（图20）。丢勒在画上的签名还突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日益变化的地位的另一个方面。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艺术家的名字通常不会为后人记录下来。除了偶尔出现在契约和类似的工作日志里之外，艺术家的名字几乎从不出现在单个的艺术作品中。而到了15世纪，一些艺术家开始试着在自己的一些作品上签名，以便把自己与其他工匠和手工艺人区别开来。比如，在《阿尔诺芬尼肖像》（图19）这幅画的后墙上就有杨·凡·爱克醒目的草体签名。这一倾向在16世纪时日趋明显，绘画、雕塑、版画，有时甚至在素描上都出现了艺术家的签名。值得注意的是，丢勒在他表现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里的版画中醒目地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图14）。在这幅画中，亚当这个最早被上帝创造出来的人手里举着一块标牌，上面非常清楚地写着“纽伦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制作”——但是，这位德国艺术家“制作”的到底是版画还是亚当本人却有点儿含糊不清，这可能是艺术家的刻意行为。

毫不含糊的是丢勒的名字所起的作用，或者说他的花押字[1]在一次艺术品版权侵犯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一点儿也不含糊。这是最早的艺术品侵权事件中的一例。在这次事件中，意大利艺术家马尔坎托尼奥·雷蒙迪（Marcantonio Raimondi）复制（或者应该说是伪造）了丢勒的一些版画。随后引起的法律论战以这样一个决定告终：允许复制品继续印刷，但条件是不能出现花押字“AD”。这样，艺术家名字或花押字是否出现似乎成了争论的关键——对于像丢勒这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级艺术家来说，他的花押字显然多少类似于今天麦当劳的金色拱门标识或香奈尔的双C标志，即通过我们所谓的“商标”来确保艺术品的质量和连贯性。

也正是为了不让作者身份流于含糊，米开朗琪罗后来决定在他早期雕塑中最重要的一座上签上名字，这就是完成于1499年、存于梵蒂

冈的著名大理石雕像《哀悼基督》。瓦萨里在《米开朗琪罗生平》一书中描绘道，年轻的艺术家在听到一个好吹牛的伦巴第人说这件作品是某个叫戈博的米兰人所创作时愤怒不已。当天晚上，米开朗琪罗迅速地在圣母胸前的肩带上凿上了自己的名字，非常显眼，从而永久性地确保了其作者身份不会再被否认。

瓦萨里和艺术史的出现

在作品上署上作者名字的做法反映了人们对艺术家身份的新认识。这一做法首先在15世纪中期的雕塑家洛伦佐·吉贝尔蒂的《评论集》一书中得到记录，后来在瓦萨里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生平》（以下简称《生平》）一书中得到全面阐释。此书可能算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的艺术史著作了，于1550年首次出版，1568年又出了修订版。瓦萨里在《生平》一书中总结梳理出的许多方法曾经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艺术史写作的基本原则。比如，直到最近，学者们才开始认真地质疑瓦萨里对艺术发展的看法，即认为艺术显然是朝着某种未阐明但固有的目的而发展的，首先是自然主义，然后是朝其自身风格或形式上的变革而发展。虽然吉贝尔蒂在《评论集》一书中已经开始提出他有关艺术发展的原始模式，但是一个世纪后出版的瓦萨里对艺术史的长篇论述才是里程碑似的著作，并极大地影响了后五个世纪的艺术史研究。

瓦萨里的模式既回答了许多问题，同时又提出了很多疑问。首先，通过阅读《生平》（分为三部分）每部分的序言，人们会发现，瓦萨里认为视觉艺术在质量、风格和独创性方面都会有起有伏。事实上，他这样描述古代艺术史，把它和人的生命周期相类比，首先是青年期，然后是成熟期，接着是不可避免的衰亡期。瓦萨里那个时代（广义地说）的艺术也有着类似的发展轨迹。以乔托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属于青年期，也即瓦萨里所说的第一个时期。瓦萨里相信，虽然这批艺术家远远说不上完美，但他们的确在后古典时期艺术经过几个

世纪的衰亡和没落后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实际上，瓦萨里是在给第一个时期的艺术家（主要活跃于14世纪）颁发“最佳新人”奖。瓦萨里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不应该用最高的艺术标准来评判这批艺术家，而只需与他们之前的（瓦萨里眼里的）“野蛮”艺术相比较。瓦萨里的第二个时期涵盖了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虽然他承认这时的艺术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没有哪个艺术家在艺术创作各方面达到完美的程度。为了与我们前面比喻性的颁奖说法保持一致，我们就给这一阶段颁个“最大进步”奖吧。

但是，第三阶段则不需要这样的限制条件。第三阶段包括了瓦萨里所在的16世纪艺术家，在瓦萨里看来，他们应该获得“最有价值球员”奖；或者就米开朗琪罗个人而言，他甚至应该获得一枚金牌。事实上，米开朗琪罗，这位艺术大师中的大师，其艺术成就不仅超过了他同时代的艺术家，而且还超越了瓦萨里用来衡量完美的两个标准，即古典艺术的标准和自然世界的标准：

> 米开朗琪罗胜过了所有后来的艺术家，他超越了古代的艺术家，还超越了自然本身——大自然所创造的所有复杂或非凡的事物，他都能凭借其天才灵感，用他卓越的应用能力、构思技巧、艺术修养、判断力以及优雅风范轻松超越。

在《米开朗琪罗的生平》一书中，瓦萨里的方法既显示出了优点，也透露出了不足。在分别对这三个部分进行介绍时，瓦萨里对每个时期都作了全面的纵览，接下来他声称自己的意图并不是只罗列出一系列艺术家和作品的名单。但是，通过把单个的艺术家的传记作为组织材料的基本单位，作者使单个的艺术家成了关注的焦点，而不是让赞助人或者作品的原始功能等成为焦点——这种方法一直被许多艺术史著作所沿用，直到最近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同时在评估一件艺术品时，这种方法常常让我们看不到艺术家名字以外的东西。但是，这种方法确实让瓦萨里传达了他的主要观点，即艺术家（当然，包括他自己）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并且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瓦萨里热切地希望把米开朗琪罗这位神一般的艺术家与平凡的工

匠和手工艺人区别开来，他在《米开朗琪罗的生平》一书中暗示了米开朗琪罗的崇高地位，他描述道，米开朗琪罗从小就与当时的伟人和显贵们有来往。比如，根据瓦萨里的记载，米开朗琪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经常被邀请参加“伟大的”洛伦佐·美第奇的宴会；在青年时期，他就愿意并能够将贵族、红衣主教，甚至教皇当成平等的人来面对。在这个重要层面上，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不同于后来的浪漫主义艺术家：后者传记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浪漫主义艺术家常常为同时代人所排斥，而对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超级巨星来说，他的传记正是通过表明他能够与社会的核心层、精英人物交往，从而证明他作为艺术家拥有着崇高的地位。因此，对于像丢勒和米开朗琪罗这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来说，不为同时代人所欣赏、饿死在顶楼上之类的场面绝不会是什么荣耀。实际上，最近的文献研究已经证实，米开朗琪罗去世之前是多么地富有，而丢勒在访问威尼斯时也为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家所受到的尊重而感叹：“在这里，我是一个绅士。”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虽然没有像典型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家那样得到被社会排斥的恶名，但他们还是可以有一些喜怒无常的怪癖的。

在《米开朗琪罗的生平》一书中，瓦萨里运用的许多方法到现在仍然是艺术史研究的基础，比如考察出处（即艺术品最早的主人）、赞助人、象征、艺术先例以及风格分析等。比如，他告诉我们米开朗琪罗的一幅底图的残存部分最后如何被一位曼图亚贵族收藏，而米开朗琪罗经常与其精英赞助人发生的激烈冲突是《米开朗琪罗的生平》一书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同样，瓦萨里描述了米开朗琪罗复制过书中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的两位主人公，即乔托和马萨乔的作品。令人惊奇的是，年轻的米开朗琪罗临摹的这两位前辈的作品保留到了今天，这证实了瓦萨里的说法。但是，瓦萨里的叙述也突出了由于过分关注艺术家的生平和个性而带来的一些潜在问题。作者反复告诉我们，这些相当拙劣和稚嫩的草图，与瓦萨里提到的底图残片和流传下来的其他残余物一样被当作宝物和圣物保存了起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神化了米开朗琪罗，使他的一笔一画或者每一凿都获得了值得类似宗教崇

拜的地位。

当然，将艺术家拔高到神的高度带来的问题是，最后艺术家自己也开始相信他们真的是神。的确，以米开朗琪罗为例，他甚至雇用了一个叫阿斯卡尼奥·孔迪维（Ascanio Condivi）的人为他写一部传记，这可能是第一部获得授权的艺术家传记，其目的是为了掩盖瓦萨里在第一版《生平》中的一些说法，因为这些说法似乎损害了米开朗琪罗精心构建的自我形象——一个艺术超人，其天分源于神启，完全是与生俱来的。其中，米开朗琪罗想否认1550年版的《生平》的一项内容是，瓦萨里在书中称米开朗琪罗实际上在画家吉兰达约的画室里接受过一些训练——吉兰达约就是我们在第三章讨论过的、创作了萨赛蒂礼拜堂祭坛画和壁画（图10）的艺术家，这就暗示了米开朗琪罗的创造力并非来自于神。这一冲突的结果是可怜的瓦萨里——毫无疑问，他对伟大的米开朗琪罗充满了敬畏——不得不在第二版《生平》中提供档案资料以证明自己的说法。瓦萨里1568年版的《生平》可能是艺术史学界第一次使用文献证据的书，他详细引用了米开朗琪罗的父亲签署的一份契约，这份文献明白无误地驳斥了米开朗琪罗有关自己从未正式拜师的说法。

瓦萨里偏离主题对艺术史档案文献的叙述以下面这句话结束："我偏离主题叙述这一段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这也使得《米开朗琪罗的生平》更为完整。"但是，这也恰好是瓦萨里行文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也就是说，瓦萨里的书远远不是一部汇集了各种历史真相的综合文献。虽然许多学生，甚至一些艺术史家仍然认为可以把瓦萨里的著作当作了解当时"真实的"历史事件的确切证据，但在许多情况下，《生平》一书更像是各种希望、愿望和故事的堆砌，与那些明确划归小说一类的书别无二致。显然，瓦萨里在写作《生平》时有一个大纲，这个大纲就是以提高艺术家的地位为中心，并且把艺术的目的定义为试图超越自然和古人。正是这个大纲奠定了《生平》中一些更明显和不自然的编造材料的基础。比如，瓦萨里使用了一个可追溯到老普林尼这样的古典时期艺术作家的主题，他一再声称：艺术天分可以在童年时期被偶然发现——这种策略证明了瓦萨里的另一观点，即

艺术天分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这样，虽然瓦萨里坚持认为米开朗琪罗在吉兰达约那里接受过一些训练，但他还是强调米开朗琪罗与生俱来的天赋早在其学徒生涯开始之前就已经显露无遗，而且在跟随师傅学习后，他很快就超过了老师。

更为常见的是这类主题：艺术家的天分在放羊时被过路人所发现，其素描虽未受过训练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我们第一次读到这样的故事是在瓦萨里的《乔托的生平》中。在这部分里，乔托的才能首次被画家契马布埃所发现。当时乔托一边替他父亲放羊，一边在石头和沙地上画动物图像。我们可以相信一个拥有艺术天赋的牧羊少年的故事，但是在《生平》的后面部分，瓦萨里讲到锡耶纳画家贝卡富米（Beccafumi）时，他又一次把贝卡富米描绘成农民的儿子，当他在羊群所在的沙地上画画时被一个锡耶纳贵族发现。瓦萨里描述安德烈亚·圣索维诺（Andrea Sansovino）和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Andrea del Castagno）的早年经历和被发现的过程几乎采用了完全一样的套路，而这肯定不止是一种巧合。

在更微妙的方面，瓦萨里传记中的艺术家所选用的某些艺术主题也都相互雷同。于是，在瓦萨里讲述的米开朗琪罗年轻时的一个故事里，米开朗琪罗临摹一幅魔鬼攻击圣安东尼的德国版画时，他出门买回来一些色彩很奇怪的鱼来帮助他画邪恶的庞大幽灵。同样，在《列奥纳多的生平》中，瓦萨里声称，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列奥纳多在把蜥蜴、蝾螈、蛇和蛆等搜集到一起之后画了一个可怕的怪物。因此，根据瓦萨里的说法，这两位艺术大师少年时都利用了本地动物来绘制怪物——虽然，在讲述列奥纳多的生平时，瓦萨里还另加了一个生动的细节，他记述道，列奥纳多是那么专注地描绘那些爬虫模特，以致于他都没有闻到这些虫子由于开始腐烂而发出的恶臭。

米开朗琪罗的神话

可是，最生动的叙述是米开朗琪罗的例子，他是瓦萨里的《生

平》一书中无可争议的主角。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了米开朗琪罗对一个评论家的批评作出回应的例子。评论家说他的美第奇公爵雕像不像公爵本人，而米开朗琪罗反驳说，1,000年以后，没有人会关心公爵长什么样子，而所有人都会记得雕刻者的名字。在21世纪之初回顾文艺复兴，我们必须承认米开朗琪罗在这一点上是对的：自瓦萨里那个时代以来，人们对艺术天赋和艺术杰作的崇拜与日俱增。近年来，修复西斯廷教堂米开朗琪罗的壁画常常引发激烈的争议，这意味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的神话，这个最主要且最为充分地在米开朗琪罗身上表现出来的、瓦萨里进行过生动描绘的神话，如今仍然存在，并且还在影响着我们对这个艺术史上典范时期的艺术品的评价方式。

西斯廷教堂的修复工程可能算是近期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个修复项目了。毫无疑问，1980年修复工程开始之前，壁画的局部地方已经开始剥落，需要对壁画进行保护。但是梵蒂冈艺术博物馆馆长作出的对教堂壁画装饰进行全面修复的决定走得更远。最后的结果是，那个为几个世纪的艺术爱好者和艺术史家熟悉的忧郁、沉思的天才形象不见了，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改进过的新米开朗琪罗，他更加明亮轻快——既是字面意义上也是比喻意义上，正如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修复过的《创造亚当》那样。

对西斯廷教堂壁画的修复还包括米开朗琪罗在教堂后墙上画的《最后的审判》。将修复前的照片和修复后的照片对照后会发现，壁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原来那个疯狂的、脾气暴躁的原始浪漫派天才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许多著名艺术家，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到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再加上一帮能说会道的艺术史家，每一个人都认为壁画修复者实际上去掉了表面那层暗淡的釉面，而那是米开朗琪罗为增加壁画朦胧的神秘效果而最后加上去的。但是，修复者所作的全面技术分析说明：所发现的唯一釉面只是以前的修复者涂上去的。那些几个世纪前的修复者的一个做法就是试图用过期面包和发酵的希腊葡萄酒清洁壁画。

人们本不应该对修复工程揭示出的新的米开朗琪罗作品这么惊讶。实际上，修复后的壁画清晰、色彩明丽，不仅能让站在礼拜堂地

板上的观者在昏暗的灯光下清楚地看到穹顶上的壁画，而且它们与15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画家所画的壁画也非常类似，如吉兰达约的壁画。我们已经知道米开朗琪罗年少时曾是吉兰达约的学徒，尽管他后来对此表示否认。实际上，虽然色彩不是完全一样，修复过的西斯廷教堂壁画的基本用色与萨塞蒂教堂的壁画用色非常接近。然而，问题在于20世纪晚期的大多数观者第一眼看到修复过后的壁画时并不是在原位置，即站在西斯廷教堂往穹顶上看，实际上他们看到的是照片中的壁画，而这些照片常常是由赞助这个修复工程的日本电视公司在距壁画很近的地方拍摄的。当然，照片只是强调了米开朗琪罗用色的荧光一样的质感，让观者脱离了壁画的原始观赏背景。

如果我们牢记一点，即这类照片绝不能代表在原位置观看修复后的壁画的真实体验，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一些人在突然看到这些壁画时为什么会震惊了，因为像《创造亚当》这样他们非常熟悉的作品就在眼前发生了根本而迅速的变化。但是，不论人们对西斯廷教堂的修复工程持何种看法，它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讨论却是事实，这说明瓦萨里所描绘的米开朗琪罗这样一个隐晦的、神秘的、沉思的艺术天才的形象是多么深入人心。

结语

显然，我们现在很难真正地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观者那样“看待”十五六世纪欧洲的艺术家和艺术。但是，通过重构原来的“时代之眼”的尝试，也就是不仅只聚焦于伟大的米开朗琪罗创作的一小部分艺术品，而且也考察许多名不见经传的、甚至是佚名的艺术家和工匠制作的雕像和器物，我们才能不局限于仅仅考察某件艺术品是谁创作的，而是要开始理解这些艺术品为什么会被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观者最初又是如何理解和使用这些艺术品的。

注释

1　花押字（monogram）指的是由姓名首字母组成，用于私人信笺、台布、衣服、珠宝等上的交织字母。丢勒的花押字就是“AD”的字母组合。

术语表

对于主题不常见的艺术作品，包括宗教的和神话的，读者应参考类似詹姆斯·霍尔的《西方艺术事典》（约翰·穆莱出版社，1974）这样的图典。

祭坛画（**altarpiece**）： 表现一个或多个宗教人物或宗教故事场景的宗教画面，用于弥撒活动；有的祭坛画还有可以打开和关上的侧翼；参见祭坛装饰、三联画屏、多联画屏 和祭坛附饰画 。

歪像画法（**anamophosis**）： 有意歪曲形象，使之从某个特定的角度看是“正确”的，通常是从画面的左边或右边看。

时间之书（**book of hours**）： 祈祷用书，经常是有插图的，用于私人宗教活动。

扶壁（**buttress**）： 建筑物的支撑结构，附在墙上以支撑屋顶或拱顶。

底图（**cartoon**）： 画在硬质纸上的整幅绘画（意大利语称为*cartone*），用于将某个人像或者构图的轮廓拓画到特定墙面、镶板或画布上。

卡索奈长箱（***cassone***）： 给妇女陪嫁用的装饰精美的木箱，用于储藏衣物、亚麻床单以及其他嫁妆。

铸造（**casting**）： 制作青铜和其他金属制品的工序，将熔化的金属倾倒进一个模具中；在大型雕像制作中，经常是铸成薄壳，而不是铸成一个实心的金属块。

琼皮（***ciompi***）： 14世纪佛罗伦萨的羊毛工人的绰号。

佣兵队长（***condottiere***）： 一种职业军人首领，他们为佣金出价最高的人服务。

公会（**confraternity**）： 一种以职业或邻居关系为纽带的团体或组织，旨在进行公共宗教活动、社会活动和慈善活动。

生育盘（***desco de parto***）： 字面意思是“生育盘”；通常为圆形，常饰有与生育有关的图案，用来给卧床的产妇送食物和饮料。

近代早期（**Early Modern**）： 从中世纪晚期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 运动到18世纪的历史阶段；常用作文艺复兴 的替代词。

还愿物（**ex-voto**）： 一种奉献物（通常是象征物的形式，小幅画或者饰板），用于谢恩或祈求神助。

湿壁画（**fresco**）： 画在墙面或天顶上的一层湿灰泥上的绘画；整幅的设计经常是通过底图 拓画到灰泥上的。

卷首插画（**frontispiece**）： 书或者手抄本的标题页或者第一幅插图页。

性别（**gender**）： 本书中这个术语指男性和女性之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差异；这里的“性别”包括了比“性”（sex）更为丰富的含义，后者只是指男女之间的生物学差异。

门类（**genre**）： 一种艺术分类或艺术形式，例如祭坛画 、肖像画、风景画或静物画；也用于genre painting这一词语中，指表现日常生活的风俗画。

石膏（**gesso**）： 一层稀释的、白色灰泥状物质，用于给木制画板或雕塑表面打底，以便在上面绘制油画或蛋彩画 。

洞穴（***grotta***）： 字面意义是“洞穴”，但也可以用来指小房间。

行会（**guild**）： 同一行业的商人或工匠的组织；在16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家行会在精英阶层已经不太流行，被官方批准的艺术学会所取代。

人文主义（**humanism**）： 在欧洲文艺复兴的背景下，一种对于研究和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艺术的兴趣；同时也关注人的个性重于神性。

圣像破坏（**iconoclasm**）： 出于个人、政治或宗教动机有意破坏宗教偶像。

肖像学（**iconography**）： 肖像的主题或意义；在叙事场景中讲述的“故事”。

在原位置（***in situ***）： 字面上指“在现场”；在原来的位置。

细木镶嵌装饰（***intarsia***）： 镶有彩色木片的木板，经常构成引起幻觉的静物场景或空间环境。

历史画（***istoria***）：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在15世纪30年代中期所采用的意大利语术语，用来指作品描绘的叙事或故事。

线性透视（**linear perspective**）： 见透视画法 。

凉廊（***loggia*** ）： 一种有一边或多边开间的连拱廊。

虹彩陶（**lustreware**）： 装饰着彩虹色、金属质釉彩的陶器。

死亡的象征（***memento mori*** ）： 一种使观者联想到死亡或自己死亡的必然性的象征性形象或造型。

正殿（**nave**）： 教堂的主体部分，从入口一直到祭坛，经常被柱子划分成三条或更多的过道。

板面画（**panel painting**）： 画在木板上的绘画，木板表面涂有一层光滑的石膏；可以在上面绘制蛋彩画 或油画。

赞助人（**patron**）： 委托订制并资助艺术作品或建筑物的人；经常会为某一特定的项目与艺术家商定详细合同。

三角墙（**pediment**）： （古典神庙等）建筑物立面上方的三角形结构，也用于门或画框的上方；常由柱子或壁柱 支撑。

透视画法（**perspective**）： 单一灭点线性透视画法是一种基于数学的技术，指在平面上描绘物体或建筑空间时，通过使直角线相交成一个单一的灭点，造成三度空间效果；理想地说，这个灭点应该与观者视线在同一水平面上。

壁柱（**pilaster**）： 一种装饰性结构，看起来像扁平的柱子或稍稍突出于支撑墙面的物体。

多联画屏（**polyptych**）： 一幅有三个以上主画面或镶板的祭坛画 。

祭坛附饰画（**predella**）： 一组小型画作，常描绘叙事场面，放于祭坛画 主画面的下面。

堕落前期（**pre-Lapsarian**）： 字面意义为“堕落之前”，指亚当和夏娃未从伊甸园的智慧树上采食禁果犯下原罪之前。

起源（**provenance**）： 一件艺术作品原先的拥有者，包括机构和个人。

四分仪（**quadrant**）： 一种测算恒星和其他天体位置的角度测量仪器，可用于航海。

修道院餐厅（**refectory**）： 修道院或女修道院成员一起进餐的

场所。

宗教改革（**Reformation**）： 开始于16世纪早期的宗教运动，试图对教皇制度和罗马（天主教）教会进行改革。

文艺复兴（**Renaissance**）： 开始于意大利14世纪的人文主义复兴，后又在15和16世纪与整个欧洲精英文化相融合的历史阶段；有时也可与近代早期 替换使用。

祭坛装饰（**retable altarpiece**）： 来自拉丁文，意为“（祭坛）桌后面”；一种绘画或雕塑的祭坛画 ，通常见于北欧，由一组中央人物群像构成，在后期也出现单个形象，两种类型都有窗板式的侧翼，可打开或闭合；通常放置在祭坛附饰画 或圣物箱的上面。

凉台栏杆（***ringhiera***）： 位于佛罗伦萨市政厅广场前面的仪仗台。

领主（***signori***）： 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佛罗伦萨的贵族统治者。

圣痕（**stigmata**）： 根据基督教传统（说法），指基督受难时的伤痕神奇地出现在圣方济各身上。

书房（***studiolo***）： 位于宫廷或城镇建筑中的小房间，是精英人物赞助人用来学习以及储存他们收藏的小型艺术品、古典工艺品、书籍和来自自然界的奇特物品的房间。

蛋彩画（**tempera**）： 一种不光滑的、以鸡蛋为原料的绘画，一般创作于用石膏 打底子的木板或者雕塑上；在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逐渐被油画所取代。

传统主题（***topos***）： 常用的、经常反复出现的主题或题材。

三联画屏（**triptych**）： 有三个主画面或三个镶板画的祭坛画，通常表现一个或多个宗教人物。

错视画（***trompe l'oeil***）： 源自法语，意为“欺骗眼睛”；用于描绘接近真实并让人产生错觉的图画。

牛皮纸（**vellum**）： 一种用小牛皮制成的优质纸张，可以用墨水或油彩在上面作画；经常为昂贵的插图抄本用纸。

艺术史上，文艺复兴时期堪称是一个巨人的时代。达·芬奇、丢勒、荷尔拜因、米开朗琪罗——这些名字代表着艺术中的尽善尽美，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备受尊崇。但是，他们为何能创造出如此杰作？那时的人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些艺术家及其作品的？

作者运用丰富生动的例证，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地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说明了它们的创作和发展过程，并分析了这些艺术品在当时的意义，为读者理解文艺复兴艺术构建了一个广阔而具体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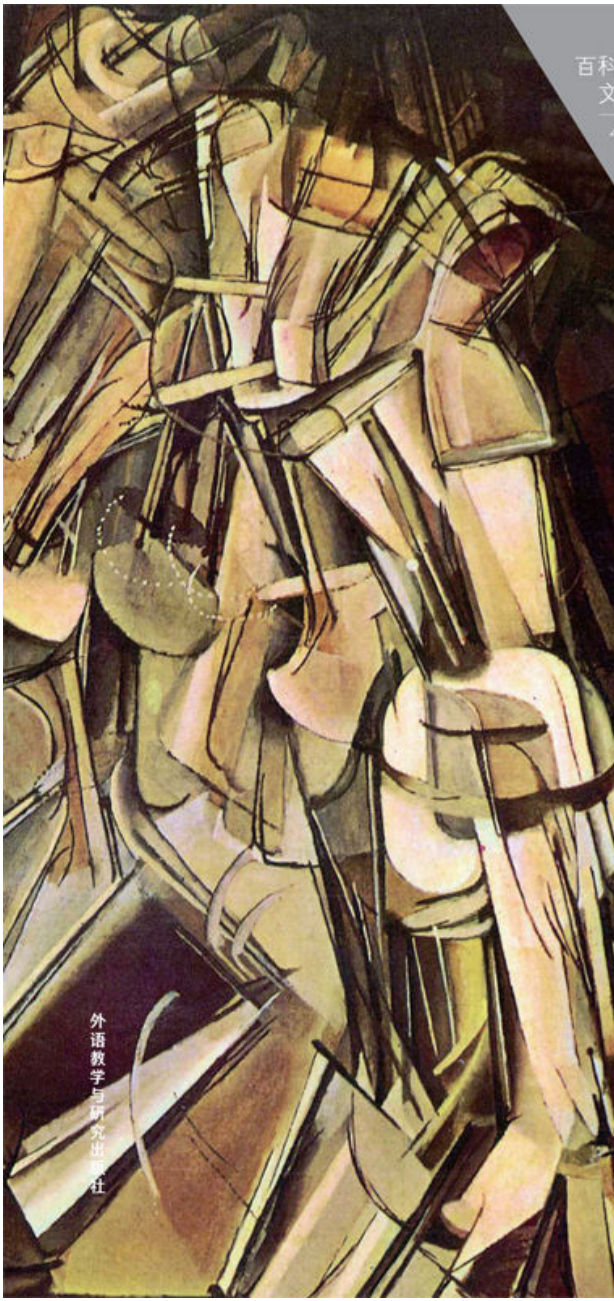

百科通识文库

49

走近现代艺术

戴维·科廷顿 著

朱扬明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走近现代艺术

戴维·科廷顿 著

朱扬明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48**

Modern Ar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5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David Cottington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现代艺术 / （英）科廷顿（Cottington, D.）著；朱扬明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01-1

I．①走… II．①科… ②朱… III．①艺术评论 - 现代 IV．①J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793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刘　旭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01-1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绪论
第一章　前卫派溯源
第二章　现代媒介，现代信息
第三章　从毕加索到波普偶像：艺术家的显赫地位
第四章　炼金术实践：现代艺术和消费主义
第五章　跨过标杆：不管下一步如何？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戴维·科廷顿，英国康沃尔郡法尔茅斯艺术学院艺术史教授，已出版的著作有《立体主义》（“现代艺术运动”系列丛书）、《战争阴影下的立体主义》和《立体主义及其历史》等。

译者简介

朱扬明，1955年生，江苏扬州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理研究生院。多年来主要从事中外美术史研究工作，主持并参与策划多项中外美术大展。曾任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副馆长，现任美国西雅图市西花园协会主任。

图　目

图1　迪米尔·赫斯特，《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1991年
图2　路易斯·布努艾尔和萨尔瓦多·达利拍摄的电影《一条安达鲁狗》中的一幅画面，1928年
图3　爱德华·马奈，《草地上的午餐》，1863年
图4　马赛尔·杜尚，《瓶架》，1914年
图5　弗拉基米尔·塔特林，《第三国际纪念碑》，1920年
图6　阿尔弗雷德·巴尔为1936年“立体主义和抽象艺术”展览目录准备的图表
图7　杰克逊·波洛克在创作《作品7号》，摄于1950年
图8　法兰克·斯特拉，《塔克提苏莱曼宫》，1967年
图9　德哈特·里希特，《贝蒂》，1988年
图10　帕布罗·毕加索，《静物》，1914年
图11　帕布罗·毕加索，《水果、酒杯和报纸组成的静物》，1914年
图12　罗伯特·罗森伯格，《字母组合》，1959年
图13　罗伯特·莫里斯，《无题》，1965年
图14　辛迪·谢曼，《无题电影第15号》，1978年
图15　朱迪·芝加哥，《晚宴》，1979年
图16　艾娃·海斯，《无题，或尚未有》，1967年
图17　大卫·斯密斯，《立方体，XXVII》，1965年
图18　比尔·伍德罗，《车门，椅子和事故》，1981年
图19　詹姆斯·罗森奎斯特，《F-111》（局部），1965年
图20　利昂·格鲁布，《雇佣军II》，1979年
图21　高桥智子，《灯火导航区》，1997年
图22　关根申夫，《阶段：大地母亲》，1968年

章前插图

图I　蕾切尔·怀特瑞特，《纪念碑》，2001年
图II　乔治·修拉，《大碗岛星期日的下午》，1884—1886年
图III　亨利·马蒂斯，《红色中的和谐》，1908年
图IV　翠西·艾敏，《自画像》，2001年
图V　爱德华·凯霍尔兹，《袖珍战争纪念碑》，1968年
图VI　切利·桑巴，《我们的艺术的未来何在？》，1997年

绪　论

现代艺术是里程碑还是笑柄？

2001年6月4日，蕾切尔·怀特瑞特[1]的雕塑《纪念碑》（图I）被安放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第四个空着的方墩基上，次日英国国内报界的反应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如同以前在同一地点临时安置的另外两座雕塑一样（分别由当代艺术家马克·渥林格和比尔·伍德罗创作），这一用透明树脂翻制的倒立在原有方墩基之上的作品，立刻受到了公众的嘲笑。《每日邮报》谴责它“平庸”、“玩弄噱头”和“毫无意义”。据《泰晤士报》报道，公众将它比作鱼缸和浴室抽水马桶的水箱。也有一些报纸刊载了来自文化机构成员的支持意见，但都含混不清且多是辩解。随后，文化部长克里斯·史密斯、泰特艺术馆现代部主任拉斯·纳塔夫以及泰特艺术馆策划部主任桑迪·奈恩以各种溢美之词赞扬了《纪念碑》，称其形式简单扼要，观念清晰明了，是“美丽的”、“聪颖的”和“耀眼夺目的”。但他们并没有设法去应对那些攻击谴责。同样，对于怀特瑞特通过复制和倒置这件建筑底座本身所大胆表示的纪念碑的意义及目的，他们也避而不谈。

图I　蕾切尔·怀特瑞特，《纪念碑》，2001年

这种公众的讥讽嘲弄与名人的辩解之间的失谐一直是现代艺术与普通观众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其历史由来已久，记忆难以追溯。最近的例子有翠西·艾敏〔2〕的《我的床》和加文·特克的垃圾箱袋，他们只是重复前代艺术家们的“丑闻”，如1976年泰特艺术馆购进的卡尔·安德尔〔3〕题为《等价物之八》（1966）的一堆耐火砖，或者更早可追溯到1918年马赛尔·杜尚在纽约的一次雕塑展中递交的小便器。这些

或许是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但现代艺术受欢迎的程度又可谓盛况空前，现代艺术展览及博物馆的参观人数不断增加便可以证明。例如，1996年到2000年期间，参观泰特艺术馆透纳奖年度展的观众人数翻了一倍多，而最近一次马蒂斯-毕加索展打破了泰特艺术馆的参观人数纪录，2000年5月泰特艺术馆现代馆的开幕更是千禧年的一大盛事。新的艺术馆和画廊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观众人数众多，颇受欢迎。

这一矛盾现象何以产生？为什么一方面每当一件最新的“现代艺术”作品公诸于世时，总是伴随着人们对它的困惑甚至蔑视，另一方面对现代艺术的主题和体验的兴趣又在不断增加？这些问题是本书的核心，我们将首先探讨现代艺术的理念，即为何会形成这样的艺术，其意义何在，是什么使得它现代，及由此引出的其他问题。并非所有过去一百年左右创作的作品都被认可为现代艺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件作品被选定为现代艺术，而且一直到20世纪末仍被确认为是“现代主义的”，它是如何与西方世界过去150年在经历“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相关联的？哪些因素使得一件艺术作品能（或不能）被合格地 称为是现代主义的？是谁说了算以及是如何遴选的？今后它还会继续是现代主义的吗（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有何联系）？它代表着谁的现代性或是对谁而言？最后还有“后现代主义”这一时尚流行名词，对艺术而言，它意味着什么？“后现代主义”艺术是不再现代了，还是不再是现代主义的了？无论是哪种说法，就艺术和“现代的”概念而言，其原因和意义何在？

一旦我们开始探讨这一系列问题，有一点便立刻凸显出来，即贯穿于过去150年间的大众对现代艺术的困惑，自从“前卫”艺术家开始以自我意识和极端方式挑战传统的艺术实践以来，这种困惑就存在了。的确，“现代”和“前卫”这两个词几乎可以互换，“现代艺术”就其定义而言是指其特点、志向和群体方面是“前卫的”，而前卫艺术家所创作的也必须是“现代艺术”。 这种联系至关重要，值得我们将其作为探讨“前卫”的起源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我们也许首先会注意到“前卫”一词在常见的用法中，是游离于形容词与名词之间的。如上

述粗体部分的文字中，形容词“前卫”指的是特征，而名词“前卫”指的则是一群在自我意识和审美标准上都具有激进观念的艺术群体。对两者的区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术语。从历史上来看，（简单地说）其形容词用法先于名词。也就是说，被我们称作“前卫”的艺术——一种在其所处的时代寻求表达某种新的东西，认可新的视觉表现手段的意义，主张拥有审美的自主权，或对当时盛行的价值观进行挑战的艺术——其特征和志向于19世纪中期开始显现，当时审美激进的艺术家人数尚少，还不足以形成一个群体。这一群体的出现大约在20世纪初，此时“前卫”一词才首次由艺术批评家及支持者们将其与新艺术挂上钩。这一群体迅速成为新艺术的参考框架，其存在本身影响着其所采取的方式以及对其含义的理解，我们将在下文探讨这些方式。

为何在19世纪中期有些艺术家会产生“前卫”意识呢？原因错综复杂。统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在19世纪整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以及商业价值对社会文化实践各个方面持续不断的侵蚀，刺激了一些艺术家去寻求摆脱带有那些价值印记的“被社会认可的”艺术的传统、商品化和自以为是。波德莱尔和福楼拜一类的作家和马奈一类的画家发现，他们作为推崇物质主义的向上攀爬的资产阶级的成员，其存在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他们对这些价值观的厌恶使得他们脱离现存的社会和艺术组织机构，同时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心理疏远感，这种双重疏离被认为是前卫主义的源泉。但还有其他因素。上述三位都是法国人，这绝非巧合，法国虽然不是唯一快速朝现代化发展的西方国家，但巴黎却被认可为欧洲的文化首都，拥有无可匹敌的文化机制、艺术院校和职业结构。有抱负的艺术家和作家从世界各地云集巴黎，期望得到这座城市所允诺的荣耀。他们中大多数并没有成功，怀有同样梦想的人过多使得成名之路困难重重，同时还要受到种种规矩的阻碍。于是，他们寻求其他发展途径：结成非正式的团体集体举办展览，在不断扩大的以咖啡馆为基地的圈子中进行串联，宣传、比较和质疑彼此新的艺术观念和创作实践。他们为数量激增但往往是昙花一现的小型杂志撰稿，介绍这些新观念和新实践，其结果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进行探讨。正是在这种喧闹繁忙的活动中诞生了前卫艺

术和前卫艺术群体，以至有了“现代艺术”。

前卫艺术家所感受到的疏离感并非只是单方面的。观众对现代艺术大多表现出迷惑不解，从根本上来讲，是怀疑它的真诚性，怀疑自己被“哄骗了”或被证明缺乏鉴赏力，即怀疑这种艺术是那些渴望成名的艺术家所为，再由以赚钱为主要目标的艺术经纪人兜售。而诸如查尔斯·萨奇〔4〕这样著名的艺术经纪人兼/或收藏家在现代艺术的宣传和展览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被披露，更是加深了这种怀疑。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要么 20世纪初出现的现代艺术的市场是与前卫艺术及前卫艺术群体同时产生，甚至是他们的主要支持者；要么 这一市场原本就是由投机资本家所引导。尽管如此，现代艺术出现的动力并非神秘化和牟利，而是另外两个主宰着西方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核心因素——个人主义和对新生事物的激情。尤其是艺术中的个人主义，随着官僚及商业的结构和关系越来越多地主宰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艺术的个人主义品质越发受到珍视；艺术家的创造力成为更高价值观的象征，借用马克思对宗教的论述，它是“失去灵魂之社会的灵魂”，即使对作为该社会主要建筑师的资产阶级而言也亦然；“天才”成为至高无上的赞誉。这一发展表现为19世纪中期以后在现代艺术市场中，注意力从完成了的油画作品（这些画成千上万地出现在各种公开的年展中）转向艺术家的职业生涯。19世纪60年代中期巴黎的艺术经纪人杜兰-鲁埃〔5〕买下了画家西奥多·卢梭画室内的全部物品：油画创作的素描稿、习作，以及其他所有一切，因为即便这草草几笔也是艺术家进行创造的痕迹。作品越具独特性（或越“前卫”），其创造力就可能越没有受到束缚，其个性就越能得到充分地彰显；至少值得为这一可能性赌一把。杜兰-鲁埃的投资最终被证明是精明的，没过多久，越来越多的经纪人和收藏家效仿其法，寻找和赞助那些有前途但未成名的艺术家，以此显示他们不仅对天才有信心，而且自己也具有识别天才的洞察力。这类活动和兴趣为毕加索——一位典型的现代艺术天才——创造了一个最终又由他去填充的文化空间。不管怎么样，总要有某个人去填充这个空间，我将在后面的部分说明理由。

这样，从20世纪初开始，“前卫”艺术家的观念及其群体维系着一

种艺术实践，这种有意识地在美学、道德和政治观念上都违背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艺术观念的倾向也正是对构成现代西方意识形态的人个主义的认证。凡·高、毕加索，以及后来的杰克逊·波洛克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示其广获众人瞻盼的个人主义特性，他们在探讨人类的主观性方面所达到的深度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所无法企及的，通过安抚我们和弥补这些社会关系的局限性证实了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6] 所称的文化的“肯定”特性。这些现代艺术家以英雄似的开拓者的形象出现，代表每个人 去开拓新的被忽视的人类经验的疆域，正是这种形象构成了前卫主义的特点（同时也激起了许多人明确的反对）。这样也把他们自己及其创作的艺术置于三重矛盾之中。首先，因为许多这种探索的出发点是对艺术实践本身的材料、传统和技巧提出质疑。这种质疑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表达，从反传统，如毕加索用报纸、壁纸、旧锡罐及其他杂物制作拼贴画和雕塑（图10）——到挑衅，如波洛克放弃画笔、颜料和创作技巧，改为随意地从锡罐中泼洒家用亮光漆涂料（图7）；或是安迪·沃霍尔在汤罐头版画和布日罗啤酒盒做的雕塑中采用广告和包装业所使用的非个性化的技法——再到公然地挑战，如杜尚将一个小便器（后来，赫斯特以更奇异的方式将一条死鲨鱼［图1］）命名为艺术品。

图1　迪米尔·赫斯特，《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1991年

这种质疑冒犯了已有的价值观，并无可置疑地异化分离了它承诺代表的“每一个人”。在超现实主义者的例子中，这种自相矛盾以极端的方式展现，因为这种冒犯恰恰正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形象或姿态所企图达到的；只有通过他们震撼性的、非理性的行为或错置所产生的“痉挛性的美”，“理性”自鸣得意的专制才能受到挑战，无意识的冲动才能不受限制地得以表达，单是对这些冲动的认同和吸收就可以使现代人类精神趋于完整。

第二重矛盾：以超现实主义者和其他有自我意识的“前卫”团体为例，是他们通常所诉诸的观念和知识的深奥性，以及他们创作的形象和物体的“难懂”——比如要解释蒙德里安的抽象绘画或极简主义艺术家莫里斯的雕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们拒绝提供任何明确的“含义”——使其文化带上了精英主义的色彩，致命地削弱了艺术家本人所提倡的平民主义主张。毋庸置疑，前卫艺术家们的许多行为是大众化的。其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创举之一——发表宣言，以及举办挑衅性的展览（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非常精于此道），都是针对普通大众的雄心勃勃的宣传策略。1909年2月，《费加罗报》的头版刊载了马利奈蒂的《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该报是当时巴黎的主要日报之一，但文章真正的读者却是小范围的。能够理解未来主义艺术含义的人自然是凤毛麟角，其中大多数也是这种艺术的圈中人。此外，当现代艺术狂热者　的联络网在20世纪稳步发展时，其超然性和排他性也随之发展，因为赞助者们既是对这些艺术品未来的金钱价值投资，也是对其中所表达的个人主义和独立品格投资。正如20世纪中叶美国批评家克莱蒙特·格林伯格所言，前卫艺术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其赞助者由“一根金脐带”相连。这种关系（以及艺术家们达成这种关系的协商方式）如何塑造了现代艺术，此种情况是否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将在后面的篇章中探讨。

图2　路易斯·布努艾尔和萨尔瓦多·达利拍摄的电影《一条安达鲁狗》中的一幅画面，1928年

第三重矛盾：以文化英雄自居的现代艺术家，代表着社会去保证我们的个人主义，并更新其表现方式，但其带有性别偏见的特点却将社会中一半的人排除在自己的行列之外。如艺术史家卡罗·邓肯30年前所评论的，20世纪初前卫艺术家们的行为、艺术实践和创作是扎根于广泛盛行的大男子沙文主义文化中的。从绘画和雕塑中盛行的女性裸体为主题，到两性关系的社会性退化（以“波希米亚”的生活方式为典型代表，在此方式中，女性是情人和缪斯，但难得与男性平起平坐），再到促进一位前卫艺术家职业发展所必需的积极寻求关注和自我宣传造势，“现代艺术”和现代艺术家注定要将女性艺术家排斥在外。当然也有例外，但并不多。在现代西方社会，女性为赢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独立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并不多，我们将在随后50年现代艺术的舞台上看到。尽管如此，20世纪70年代和其后的美国及欧洲妇女运动还是为女性在艺术世界中争得了一席之地（部分归功于邓肯及其他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的著作，如美国的琳达·诺奇林和英国的格里塞尔达·波洛克），过去和现

在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正在得到更多的展现，这对于改变现代艺术家的自我和公共形象是否多少能起些作用，我们将在后文讨论。

与现代艺术家的个人主义不能分割开的当然还有“他的”原创性；如同“前卫”一词一样，要现代，艺术家就必须在某些方面有原创。现代艺术出现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这种原创性和对它的追求既是后来被称为现代主义　的艺术摆脱现存社会体制或主流文化——对许多人而言，是对那种文化的反抗——而独立的表现，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0年，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国家中，前卫艺术和广告业的形成都得到了巩固，这也绝非巧合。法国艺术批评家卡米耶·莫克莱尔在1909年的一篇文章中将两者明确地联系在一起，指责“对新生事物的偏见”造成了很多现代性弊病，指出新艺术和新器械的推销使用的竟是同样的夸张手法。他本也可以提到，在使用诸如合成照片和平面设计等新的视觉技法和语言方面，艺术与广告业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的确，在此后的10年中，这些交叉跨越已是家常便饭，全欧洲的前卫艺术家，从巴黎的索尼娅·德洛奈到莫斯科的亚利山大·罗琴科都身跨两个行业。

如果说现代艺术和现代消费品都以同样的手段来推广，那么最初在后者身上远比前者要成功。在1900年后的30年中，消费品的设计技术、生产技术及创造对其需求的手段都发生了革命，而前卫艺术还只是停留在文化的边缘地带；它的非正统性仍然不能为主流品位所容忍。但是，这一现象很快有了改变。现代艺术的文化总部从巴黎穿越大西洋转移到纽约，其社会基础开始扩大。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霸权地位逐渐加强，而来自希特勒的威胁又迫使前卫艺术家们离开欧洲，这两个因素均促成了这一发展。1929年，现代艺术博物馆在纽约落成，主要由洛克菲勒家族赞助，它的建成是现代艺术扩展的第一个标志，虽然不怎么显赫。但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三个世纪中，该馆在文化资产、声望和影响力方面的稳步增强不但表明现代艺术已逐渐进入西方社会的休闲产业（后来还进入了娱乐产业），还为许多国家的其他博物馆提供了一个范例。近些年来，现代艺术不但已经走出备受冷落的

低谷，而且已经完全融入了文化评论家居伊·德波[7]所称的“展示的社会”。我在前文指出，此类博物馆增多，观众数量增加，个别艺术家获得了名人地位（比如现在的翠西·艾敏），均表明了这一点。

或许，我应该说是“重新融入”。因为如我所言，“现代艺术”开始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反抗艺术价值观的坍塌，当时，以19世纪学院派为代表的艺术已沦为了展示和交易。或许1863年在巴黎举办的落选者沙龙是现代艺术的开端，它使得一批没有得到当年官方沙龙展览评委会认可的油画有了一个自己的另类沙龙，当然，也赋予了公众尽情地用粗俗的语言嘲笑和奚落所谓“坏的”艺术的权利。这一另类沙龙展的“明星”是爱德华·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图3）。根据各种报道，它所吸引的观众和受到的嘲弄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件展品。探讨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它对当时的观众有关艺术和与艺术的关系的假定所作出的暗示，将有助于阐明曾经（或许仍在）使艺术变得“现代”的有关特征。首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为何画面场景的同时代性——衣着时髦的男士和熟悉的野餐场景——在观众看来显得十分可笑，尽管它遵循和表现的是“男士与裸女”这一传统绘画题材。古代大师，如乔尔乔内或拉斐尔（观众可能熟悉他们挂在卢浮宫的作品）也画穿着他们同时代服饰的男士，但那些画上的穿着对于19世纪中期的巴黎观众而言，已不再是同时代的，这些作品在他们看来带有古典艺术的光环。企图以这种方式去“更新”这一传统的做法在当时看来似乎是愚蠢的，也暗示出了马奈自身能力的不足。同样令人困窘的可能是画中女子的目光：它直接从画面射向观众，打破了所处画面的梦幻感，同时引发（并因此强调了）观众的主观性。这样它严重削弱了画面场景所可能含有的任何叙事说服力，使得观众更加不知所措，更加无法确定这幅画究竟“意思”何在。当我们注意到画面的中上方有一只小黄雀在盘旋时，对画面男主角伸出的食指是和他（也许）要说的内容有关这一推测，会被另一种可能性推翻，即他伸出手指也许是想让鸟停歇其上。尽管荒唐，但这种荒谬的另类解释足以进一步破坏画面的叙事说服力，进而加剧了画面是在嘲笑古代大师的艺术和观众的感觉。而且就好像单单从画面构成和叙事角度对传统进行破坏还不够似

的，画面中人物造型缺乏说服力（尤其是画面上的裸女，看上去平薄光亮得有点失调，像是用闪光灯拍的照片），近景中的人物组合与远景中的女子之间比例和透视不一致，这些都引发人们去关注画幅表面的物质感以及错觉艺术手法的手段和传统。对19世纪中叶的观众而言，这些也表明马奈本人的能力不够；但令观众困惑的是，画面上有足够的表现艺术家能力的证据去推翻此类推断，这就更加剧了那种讽刺的感觉。

图3　爱德华·马奈，《草地上的午餐》，1863年

《草地上的午餐》对1863年巴黎观众的艺术欣赏基于的所有设想提出了质疑；或者换言之，该画没有达到可被接纳作品的通行标准，它的表现方式是荒唐可笑或令人不快的。难怪当时的观众对之加以嘲笑。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些设想和标准并不像当时那样确定。在一个视觉文化不再受绘画形象统治支配的世界中，将绘画置于其顶点的文化等级结构虽然还没有完全土崩瓦解，但正在受到各种无限扩展的商业化流行视觉手法的围攻。这样说也许比较合理，如《草地上的

午餐》似乎想要表明的那样，一幅画在进行任何视觉再现时，都必须将绘画作为一种媒介、一种实践和一种视觉经验所具有的特点考虑在内。对马奈而言，这也许是首次，但对马奈之后的一代代艺术家们而言，一件绘画作品不再是展现世界的窗口，而是一幅世界的重构形象，它所运用的进行艺术再现的技法和常规的含义已不再像人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确定无疑。任何想以绘画的形式表达有关现代世界值得表达的东西的尝试，都必须先认识到这一点，任何一件宣称是“现代主义的”作品也是如此。

这也许能将我们带回到蕾切尔·怀特瑞特和她的《纪念碑》。我们可以看出《每日邮报》和它所引用的大众的评论之于该雕塑的关系恰恰如同马奈的观众之于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对一座纪念碑应该是什么样子有主观的设想，并将这种设想带入了对此件作品的理解，而《纪念碑》却未能满足这种设想。像马奈的绘画一样，这种将“纪念碑性”本身与作品等同的做法，引发了不同层面的问题。反过来，这似乎是在假定自马奈以来一切都没有变化。我认为变化还是有的，事情比过去的和现在的这两个例子之间的相似性要复杂得多。以下篇章将试图解释其方式和原因。

注释

〔1〕 蕾切尔·怀特瑞特（Rachel Whiteread），出生于1961年，英国女艺术家，以其雕塑著称。尤其爱使用实物灌模浇铸的手法，是第一位获得透纳艺术奖（The Turner Prize）的女性艺术家。竖立于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的这件雕塑是其著名代表作之一。——译注，下同

〔2〕 翠西·艾敏（Tracey Emin），1961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是当今著名的英国女艺术家。本书的第三章中论及女性艺术家时，作者对其作品有详细的评论。

〔3〕 卡尔·安德尔（Carl Andre），1935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美国极简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1972年泰特艺术馆购进其1966年创作的《等价物之八》（*Equivalent VIII*），作品是由120块耐火砖组成的长方体造型。当时成为国际艺术界的重大新闻，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买入年代1976年为作者笔误。

〔4〕 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1949年出生于伊拉克的犹太家庭。

在英国以广告业发财致富，是英国著名的当代艺术收藏家和经纪人。他赞助了青年英国艺术家组织，也是英国当代著名艺术家翠西·艾敏和迪米尔·赫斯特（Damien Hirst）的艺术赞助商。

〔5〕 保罗·杜兰-鲁埃（Paul Durand-Ruel, 1831—1922），法国人，是购买法国印象派绘画的艺术经纪商。他是最早向现代艺术家提供生活费和为他们举办个展的现代艺术经纪人之一。他在美国和欧洲成功地开发和建立了法国印象派的市场。收购法国巴比松风景画派代表人物西奥多·卢梭（Theodore Rousseau, 1812—1867）的作品只是其运作手笔之一。

〔6〕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7〕 居伊·德波（Guy Debord, 1931—1994），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家、电影导演和社会活动家。“展示的社会”来自于他的主要著作《展示的社会》（有译为《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的书名，出版于1967年，被认为是1968年法国学生起义的催化剂。

第一章

前卫派溯源

起源和姿态

1863年当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巴黎为那些被官方沙龙展览评委会否决的艺术作品建立起“另类”沙龙，即“落选者沙龙”时，他事实上承认了正在出现的社会和审美方面的变化发展，虽然他的承认有些姗姗来迟。希望赴他的首都拓展艺术生涯的艺术家人数与日俱增，他们需要通过参加年度沙龙展达到这一目的，而其作品中所展现的审美趣味也不断多样化（显然，大多数都未能成功地感动沙龙评委会）。这种发展变化遍及整个欧洲，成为文化职业者的地位和形象广泛提升的一个特征，但在巴黎这座拥有无可匹敌的艺术声望和赫赫有名的文化机构的都市，表现得最为突出。满怀抱负的艺术家从世界各地涌入这座城市，尤其是在1870年拿破仑帝国崩溃、继而建立第三共和国、以及随之引入国家文化政策和控制机构的改革之后。作为改革的一部分，艺术教育被全面革新，对新闻和娱乐业的审查及批准也得以放宽。到20世纪之交，据估计，在法国（大部分在巴黎）的艺术家人数几乎是原来的两倍，记者和“文学家”则是原来的三倍。

但是大多数新来者发现自己被新共和国所谓的获取名利的道路上人人平等的许诺欺骗了，他们的职业发展受到了阶级等级制度和行业规矩礼仪这些现实的阻碍。他们还发现，仅仅几条新法规远不足以改变世世代代所固有的传统、特权和偏见。当不得不依靠自己时，他们开始在新闻和娱乐界中新解放出来的部门的内部及外围，为自己创造新的支撑手段，为自己被学院派认可的主流艺术拒之门外的作品寻找出路。私立艺术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最初只是作为国立艺术学校的补充（和生源输送地），但最终则取而代之；艺术家团体将咖啡馆和歌舞餐馆作为他们的阵地，在里面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名不见经传的杂志”社里展出他们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巴黎大约有200种这样的杂志，在这些活跃的圈子里，这些出版物的作者通过评论自己所扶持的新艺术而一举成名。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即到第

一次世界大战时，一种反文化的运动已在巴黎蔓延开，其活力和忙碌的联络网体现在由此而诞生的众多艺术和文化方面的“主义”上。这些“主义”作为审美的标识，没有被主流所承认（实际上是被讥笑），却被新出现的“前卫派”认可。该时期的前卫派成员鼓吹“前卫”一词，借用“在比赛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含义（该词最初源于军事领域，后来被广泛使用于政治言论中），将其当作一种补偿方式，补偿他们正在经受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边缘化。

被拒于主流及其物质报酬大门之外，很多自称前卫的艺术家不仅将其理想主义付诸于用他们所选的表现手法及其可能的新方式和意义进行试验——这一点我后面会谈到——还贯彻在其信仰中，即艺术扮演着一个公共角色，它在沙龙中所降至的微不足道、逸闻杂谈的娱乐地位可以得到提升。的确，这种对公共艺术的承诺对于前卫主义的奠基行为，即1886年“新印象主义”的诞生，是不可或缺的。它的成员很多也是1884年创建“独立艺术家协会”的人士，该协会的主要目的是每年春季在巴黎举办无需评审的、对所有人开放的年度展览。结果，该“独立展览”很快就演变成了接下来的25年中最具冒险精神的艺术展览平台。两年以后，该团体中的领军人物乔治·修拉展出了他的巨幅画作《大碗岛星期日的下午》（图II），画的旁边排列有约六、七位其他艺术家以同样点彩手法绘制的较小幅的作品，这是该印象主义团体的最后一次展览。其画幅的公众性（没有画室可以容纳下它），主题的公众性（描绘的是当时巴黎居民在他们最喜欢去的一个市内河中岛休闲的生活剖面），僵硬的拘谨感，深思熟虑后构成的几何形体，周密而又有条理的笔触，以及强烈的漫画暗示，都使得它与之前的印象派作品明显不同。因此，这幅画不仅自己宣布，而且也被认为是一种新艺术方法的“宣言”，它骑跨在我曾在前文中提及的两种矛盾之上。因为它既 明显回归到绘画的传统价值——这个价值是被沙龙艺术家的逸事主义和印象主义的非正式性绘画双双抛弃了的；又 开拓了新的绘画技法，它采用了机械般的规范化笔触和学究式的色彩分割法，仿佛是可笑地去模仿现代的大批量生产和科学知识。因此，对一名当时的观众来说，这幅据称带有大众化甚至平民化处理方式的画作，却最终

被其风格上的专业化以及或许是嘲讽性的新技法破坏了。这种情况犹如20多年前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但现在却是以一种公诸于世的“新”的地位，设法异化分离，同时使这种异化分离得到社会的正式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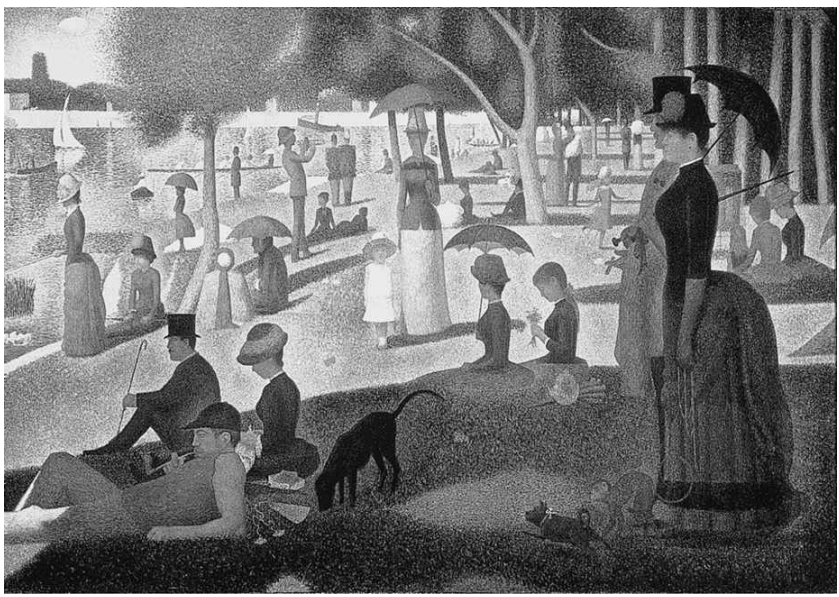

图II　乔治·修拉，《大碗岛星期日的下午》，1884—1886年

前卫派在其初期确定了现代艺术的关键特征和它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不过前卫派的出现并不局限在巴黎。在欧洲的每一座主要城市，甚至一定程度上也在美国，类似的反学院派艺术家团体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间迅速崛起，仿佛是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和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应运而生的副产品。到1914年，从纽约到莫斯科，从罗马到斯德哥尔摩，每一座主要的城市中都有这样的团体；一本1974年出版的书，仅仅列举从1900年到1916年期间在这些城市举办过的现代艺术展览，名单就足足有两大卷。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以及相关的艺术批评家、收藏者穿梭在整个欧洲大陆（在大西洋区域活动也在增多），交流并传播他们的思想，创造出一个另类的“艺术世界”，而这个艺术世界还在逐步地将以沙龙和其他官方艺术机构为中心的艺术世界从之

前显赫的位置上挤下来。在这个世界的中心，被驱动和产生驱动的是两种力。第一种是竞争革新精神，甚至可以说是对新事物的狂热，它不仅体现在艺术实践和各种具有表现力的实验方面，还体现在组织和推广的策略方面。不断涌现的各种“主义”令人眼花缭乱，各种宣言、活动和煽动成了“前卫派”行为的代名词。第二种是与当时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不太调和的国际主义精神（它有时也起着缓和民族主义的作用），就这个群体的成员而言，其民族归属感受到他们对前卫派组织归属的制约，因而变得复杂且常常是矛盾的。从1912年到1914年期间，由马利奈蒂领导的意大利未来主义前卫派和由温德姆·刘易斯领导的英国漩涡派 [1] 之间的关系就反映了这种矛盾。两个团体互相赶超，不仅体现在咄咄逼人的自我推广和对钢铁机械构筑的现代世界的信誓旦旦上，也体现在对传统民族价值的爱国主义依附上。

对很多艺术家来说，派别的归属和意义远远超越了对民族主义的诉求，在那些民族/国家之间充满灾难性冲突的年代，他们毫无保留地反对那些将世界卷入战争的社会制度。这样，国际达达运动（该名称的含义并不确定，可能是一种对婴儿呢喃之音的模仿）的艺术家们开始寻求以不同的方式嘲弄、激怒或诋毁资产阶级社会，直至将其送进坟墓。在苏黎世和巴黎，雨果·巴尔、埃米·海明斯和特里斯坦·扎拉等人通过卡巴莱歌舞表演和艺术展览来进行尝试，这些艺术展览采用的重要手法表现为冒险、荒谬、亵渎、冒犯甚至攻击观众。在柏林，乔治·格罗兹、约翰·哈特菲尔德等人与政治左派联手，创作艺术作品、漫画和宣传材料，尖锐地讽刺1918年后的德国社会。政治色彩没有那么明显、但却同样具颠覆性的是马赛尔·杜尚。他在纽约开展一场实属单枪匹马的运动，将一系列“现成品”命名为艺术，以此来质问艺术的地位、它与语言的关系以及艺术家的角色。此类作品的第一件是1914年“制做”于巴黎的《瓶架》（图4），在随后的作品中，有一个钉在地板上的衣架，名为《陷阱》；还有一个小便器，名为《泉》（最后这件是一次纽约前卫派艺术展的参选作品，但被评委会否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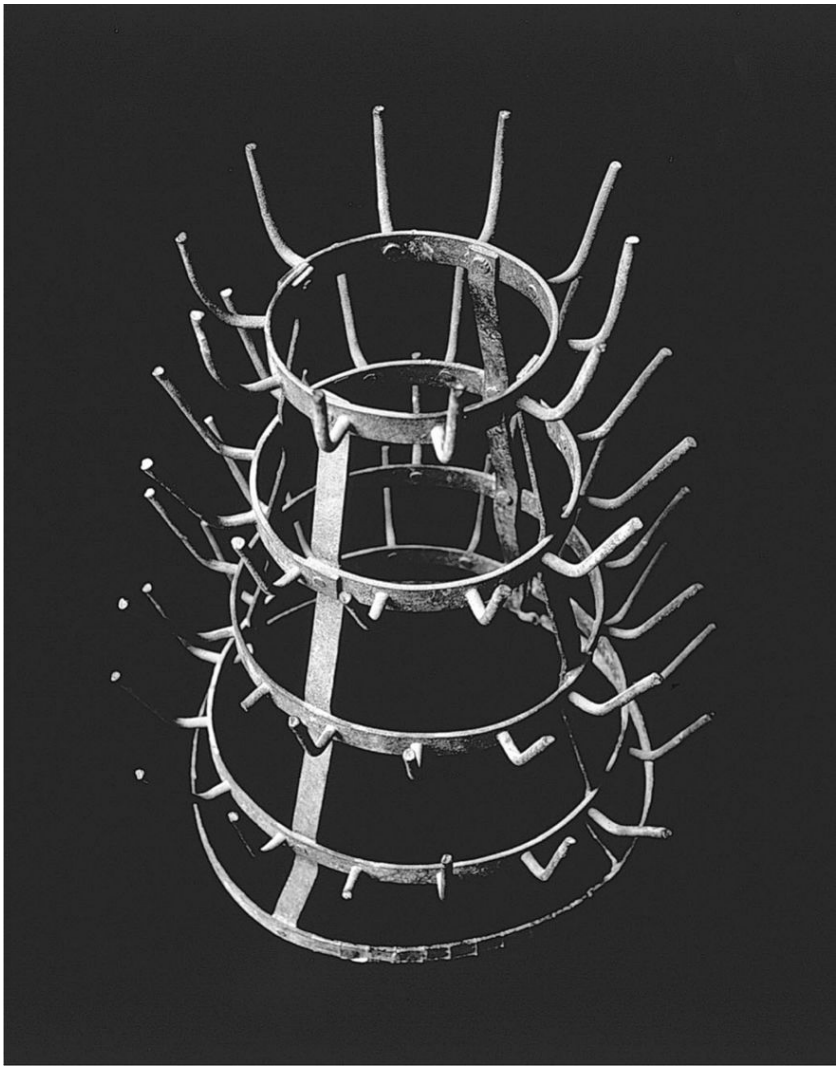

图4　马赛尔·杜尚，《瓶架》，1914年

属于其他“主义”的艺术家们也同样具有颠覆性。在巴黎，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诗人和散文家安德列·勃勒东所发起的超现实主义运动旗下的艺术家们采取了达达主义的反社会姿态，并在此之上建立起一套准则，直接向资产阶级社会令人窒息的“合理性”挑战。他们的艺术是粉碎这一社会加在人类想象之上的枷锁、解放人类的欲望、使

我们重塑完整人性的一种手段；任何物体、文本或形象，无论有意或无意，只要能为此服务，都以其“痉挛性的美”而受到称赞（图2）。在墨西哥，一些在巴黎的早期前卫绘画能手，比如迭戈·里维拉，从欧洲回来后才发现就在他背井离乡之时一场革命已经爆发，于是他放弃了立体派的错综复杂和深奥老到，代之以复兴叙述性风格的壁画，将现代主义注入其旨在提高不识字的农民形象的作品中。而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构成主义者们，受立体主义的美学革命和未来主义打破偶像的理念所激励，受对保守的沙皇独裁的憎恨所驱使，欣然认同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改革，并尝试既要在艺术上表现其乌托邦似的理想抱负，又要使自己的艺术实践与建立新社会的使命相结合。艺术，甚至是前卫艺术，在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中都是资产阶级的和累赘多余的，在弗拉基米尔·塔特林〔2〕的引领下，“构成主义”转变成为“生产主义”，其拥护者放弃绘画和雕塑，转而为实用的衣服、家具、陶器和纺织品制作样品。所有这些努力中最雄心勃勃的是塔特林1920年的《第三国际纪念碑》。他的初衷是建造一座巨大的钢铁和玻璃建筑，螺旋式上升，高度超过埃菲尔铁塔，将新政府所有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委员会容纳一堂，可以用探照灯将新闻文字投入夜空，但这项计划最终只停留在设计模型阶段（图5）。此外，在革命之后内战分裂、半饥半饱的严酷环境下，苏维埃政权也毫无机会将其付诸实现。但即使只是一个模型，塔特林的纪念碑也是前卫派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一个有力象征，它很快就闻名遐迩，直到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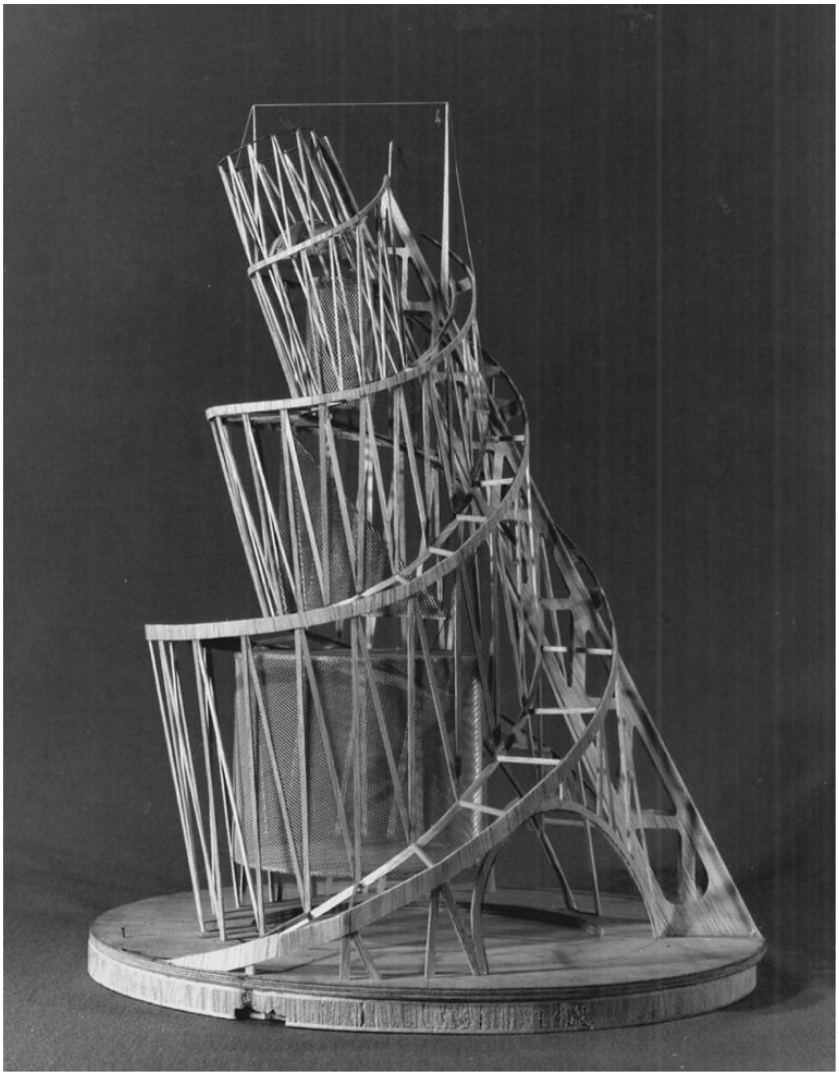

图5　弗拉基米尔·塔特林，《第三国际纪念碑》，1920年

这些原创活动的不断积累，以及其榜样在整个20世纪中叶不断自立的前卫派圈子周围的传播和影响，促进形成了前卫派艺术家的特定身份，即文化上独立、政治和审美上激进、社会上倔强反抗。他们将自己的艺术塑造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视觉规则的武器。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批评家兼艺术史家本杰明·巴克

洛对前卫艺术创作的特点作了如下的解释和称颂：

> [它]是围绕着文化意义的定义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新的斗争，发现和代表着新的观众群体，发展新的对抗策略，开展对文化行业的意识形态机构企图占据并控制所有艺术实践和表现空间的反抗。

这一定义引发出一些重要问题：这样的身份和角色在本质上有多大的神秘色彩？这些反学院派或非学院派艺术家们丰富多彩的艺术经历和美学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及以何种方式），为社会自身的原因，被简化成为一段英勇的文化斗争史？还存在多大的空间使巴克洛赞扬的实践活动能够展开他所描叙的反抗？这些问题相当复杂，不是本书所能详尽解答的，但如果想要弄懂现代艺术的方式、原因及其意义的产生，就需要探讨这些枝枝蔓蔓的问题。

一方面，在上世纪中期，前卫派群体（或更确切地说，不同城市的不同群体）中的许多艺术家的确 从生产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他们的同代人手中接过了反抗资本主义文化及其所属“机构”的大旗。他们遵循前辈的榜样，想出对策与将艺术转化为以画廊为基地的商品进行竞争；与权力日增的博物馆（如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将艺术体制化进行竞争；与“高级”文化被排斥在日益流行的商业性的“低级”文化的活力之外进行竞争。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美国，罗伯特·罗森伯格等人通过把不寻常的材料，包括一只剥制填充的山羊和橡胶轮胎（图12）“组合”在一起，以嘲弄盛行的消费主义和“高级”艺术，他们的“组合”不仅继承了毕加索用废弃材料做小件组合的手法（图10），还预示了后来迪米尔·赫斯特那件最为著名的组合作品（图1）的出现。克莱斯·奥登伯格 [3] 1960年在曼哈顿区邋遢的下东城租了一间店铺，出售用贴纸和铁丝网仿制的三明治、鞋和其他物品的模型（一件也没卖掉），并进行一些演出或“即兴表演”，同样没有销路。60年代末，罗伯特·史密森、理查德·龙、迈克尔·海策以及其他大西洋两岸的艺术家在实际意义上扩展了艺术的领域， [4] （他们中有些人试图摆脱画廊的约束）制作了巨型的大地雕塑或用从偏远

地区取来的天然材料作雕塑。整个70年代，这些针对艺术体制化和市场化准则的背离与挑战，在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中开始具有明确的政治性。英国的斯图尔特·布里斯利[5]与德国的约瑟夫·博伊斯[6]进行行为表演或举行活动，时而嘲笑、时而尖锐地讽刺社会和审美传统。博伊斯有一次对一只躺在他膝盖上的死去的野兔讲述艺术史，另外一次则在一间空屋子里和一只丛林狼共同生活了好几天；布里斯利有一次坐在剧场舞台上喝了数公升水，同时有人在他旁边搭建起一个宝座，然后他随着国歌的旋律将水喷出，作为对阶级结构和君主政体的象征性攻击。在同一个十年间，随着妇女运动取得重大进展，数量不断增加的女性艺术家，包括女性艺术史家和批评家，向前卫文化中的男权主义，进一步向不平等的父权社会发起了挑战。70年代，纽约艺术家南希·斯贝若通过一系列在纸上创作的和墙一样宽的横条式画作，恢复并歌颂了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女神谱系，用意喻“女性”和“男性”话语的文字与交替重复出现的女神形象，暗示形象化的女性身份与女性文字之间的等价性。同期，另一位纽约人卡若利·史尼曼则创作出一种表演风格，颂扬女性身体主动性，用以挑战传统艺术中对女性身体的消极再现。在1975年的作品《内部卷轴》中，她一丝不挂地站在观众面前，缓缓从其阴道中抽开一个纸卷，并宣读纸卷上一个“结构主义电影制片人”对她作品的评论，批评她的作品过于个人化，感情杂乱无章。

与女性主义者一起，其他政治激进的艺术家也创作了公开批评艺术博物馆政策的作品。而在直接性和对抗性上没有人能比得上德国艺术家汉斯·哈克[7]，他在一系列纪实性“画廊展览”中展现了他对那些邀请他作展览的博物馆的某些方面所作的调查结果——那些看上去令人尴尬的博物馆“家丑”。以1970年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为例，哈克披露的内部丑闻是一批贫民窟出租房，而其拥有者竟是该博物馆的一位董事；作为回应，古根海姆博物馆取消了这次展览，结果适得其反，引发了对其审查制度的种种指责，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宣传影响（也使得人们进一步关注那位拥有贫民窟住宅的董事的行为）。

另一方面，这种反抗行为无论如何多样和有创意，都不能阻止它

所反对的主流势力对前卫派及其所创造的艺术不断进行的拉拢进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古根海姆取消展览的举动对哈克毫无影响，他受邀去其他博物馆作类似的调查。这些博物馆大概认为，与哈克可能发现他们在过去进行的秘密交易相比，随之而来的争议所引发的宣传效益更有价值。到头来，普遍认定，根本就没有坏的宣传这回事。因此哈克在或许可以被称为“搅屎棒”的一系列展览基础之上建立了他的个人事业，它的确揭露了某些博物馆过去那些令人置疑的实践和政治活动，但他想传达的政治信息即使没有完全被模糊，也还是被削弱了，因为他作展览的方式是那些博物馆设下的“圈套”，博物馆委托他作展览这种事本身一开始就可以为该馆获得不偏不倚的美誉。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拉拢，而哈克绝非其唯一的对象。因为尽管前卫派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受到排斥，激发其活动的动力本身——对新事物和国际化的狂热——同时也驱动着现代的、消费型的资本主义。由于这种消费主义的持续扩张贯穿于20世纪中期，于是前卫派变成了，如一位艺术史家所称，处在消费主义中心的文化产业的“研究和发展力量”。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从最初几位私人艺术收藏的陈列起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大规模扩张，拥有了当今全世界最重要的现代艺术收藏和无可匹敌的文化鉴赏权威，恰恰表明了这种拉拢所起的作用。

售卖现代艺术

1863年拿破仑三世建立“落选者沙龙”时，他也许的确是想通过展出那些落选作品让公众去奚落它们，以巩固沙龙评委会的标准，进而巩固指导艺术事业的学院系统的标准。至少，很多年来艺术史家们是如此解释他的这一行为的，他们认为“好”的前卫艺术和“坏”的学院派艺术之间的对立是叙述现代主义的英勇独立性的奠基石，这一观念现在依旧支配着公众对现代艺术史的理解。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更有可能是皇帝希望通过举办这种对立性的展览来动摇学院的自以为是心理，以鼓励更大范围的艺术家，这与他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即鼓励所

有经济领域、尤其是文化方面的企业家行为。与决定建立另类沙龙一道，拿破仑还采取措施削弱学院对艺术教育的掌控，提高设计和装饰艺术的地位。正如尼克·格林和其他艺术史家所表明，拿破仑的推理似乎是：如果允许多种丰富变化的艺术实践兴旺发展，那么它们将能够以风格和作品多种多样的绘画和雕塑去满足不断多样化和扩大化的中产阶级客户的需求。

如果这是拿破仑的目的，那么结果并不如他期望的那样奏效，至少没有立即体现出来，因为艺术特权阶级和那些老顾客的保守品位合力抵抗，使得另类沙龙陷入窘境。但恰恰是这种保守主义，在中产阶层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还是给那些具有眼光、愿意在新兴艺术家身上冒险的艺术经纪人留下了空间并提供了机会。保罗·杜兰-鲁埃便是首批这类经纪人中最著名的一位，他从19世纪70年代起，无论时运好坏，都在购买和支持印象主义画家，直到20年后富有的美国新贵赞助人的到来才确保了他的投资。他的榜样被一小批年轻人效仿，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其中有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8]和丹尼尔-亨利·卡恩维莱[9]，还有一位女性，贝丝·威尔[10]。20世纪初，威尔热衷于支持新兴的年轻艺术家，在其小小的蒙马特画廊给他们作展览，她的热情为她赢得了一个双关的昵称“小惊喜”（*la pefite merveille*）。然而，是卡恩维莱在1907年他的新画廊开张时首度将新想法和新策略引入了新艺术的销售。卡恩维莱雄心勃勃地置身于巴黎艺术界最昂贵的地区，与“他的”艺术家们签订合约以确保这些人归自己的画廊独有，并借助我前面提到的在全欧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前卫艺术联络网坚持不懈地推介他们，培养了一批人数不多、有眼力的“走在前列的”收藏家。

收藏家固然是关键，但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有钱人愿意去投机，那么新市场也无法形成。投机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为明显。1904年，10位巴黎的中产阶级人士组成了一个投资团体，在10年内每年花费小量金额（3,000法郎）投资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艺术家的艺术，并商定在1914年出售他们的收藏。他们称自己为“熊皮社团”（*Société la Peau de l'Ours*），名称取自拉·封丹的一篇寓言，讲述的是两个猎人

在还没有尝试去捕熊之前——结果失败了——便开始向别人兜售熊皮；这样他们承认了自己的投机动机，甚至也乐于花钱去冒险。而1914年的销售实际超过了10万法郎；这证明了当代艺术是能够为它的收藏者们赚钱的。

但是金钱并不是唯一的动机。正如我提到的，收藏新潮艺术所必备的（或看起来所需要的，如艺术经纪人急于强调的那样）眼力给收藏者脸上增辉，其花费大大少于收藏公认的成功艺术家的作品，这显示出收藏者既有相当独立的艺术品位，又有可自由支配的经济收入。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很多想成为新艺术赞助商的人（主要在美国），他们渴望获得个人主义映射的光环，去维持非对抗性的前卫艺术家的艺术活动。战后，被当作敌人资产而没收的卡恩维莱和威廉·乌德[11]（两人都是德国人）所收藏的大批立体主义的作品被投放市场，使得这些绘画的价格暴跌，令创作了这些作品的艺术家们失望至极。但任何坏事都会对某些人有利，这些作品被正在兴起的新一代收藏者廉价抢购，从而使他们拥有了大量毕加索、勃拉克、格里斯和莱歇的作品。与此同时，有些收藏者决定要建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一家画廊），向公众展示他们的艺术和品位。现在看来，这似乎是当时不可避免要采取的做法。正是为了这一目的，现代艺术博物馆[12]在1929年曼哈顿市中心的一栋建筑中诞生了。它是当时全世界唯一专门致力于现代艺术的公开收藏的博物馆。董事会任命了一位年轻的艺术史家——阿尔弗雷德·巴尔担任博物馆的首任馆长，他不仅带来了其学者式的教育背景，还带来了能明辨艺术形式和价值的训练有素的眼光。这一任命是明智的，因为这些优点的结合使巴尔能借助一系列主题展览，展开他雄心勃勃的计划，即以该馆的收藏为中心，对现代主义进行一次历史的叙述。这样既能使博物馆的艺术价值神圣化，又能确立其作为仲裁者的地位，不仅仅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还要判断什么才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巴尔组织的一些展览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们制定了一些基调，人们通过它们可以理解现代艺术，这些展览同时也将现代艺术从事件丛生的混乱局面梳理成一条线性的“发展”史纲，为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作好准备。1936年的“立体主义和抽象

艺术”展出版了一本目录，至今都尚未绝版，其扉页上所展示的叙述图表（图6）不断地被复制，如同其大部分展品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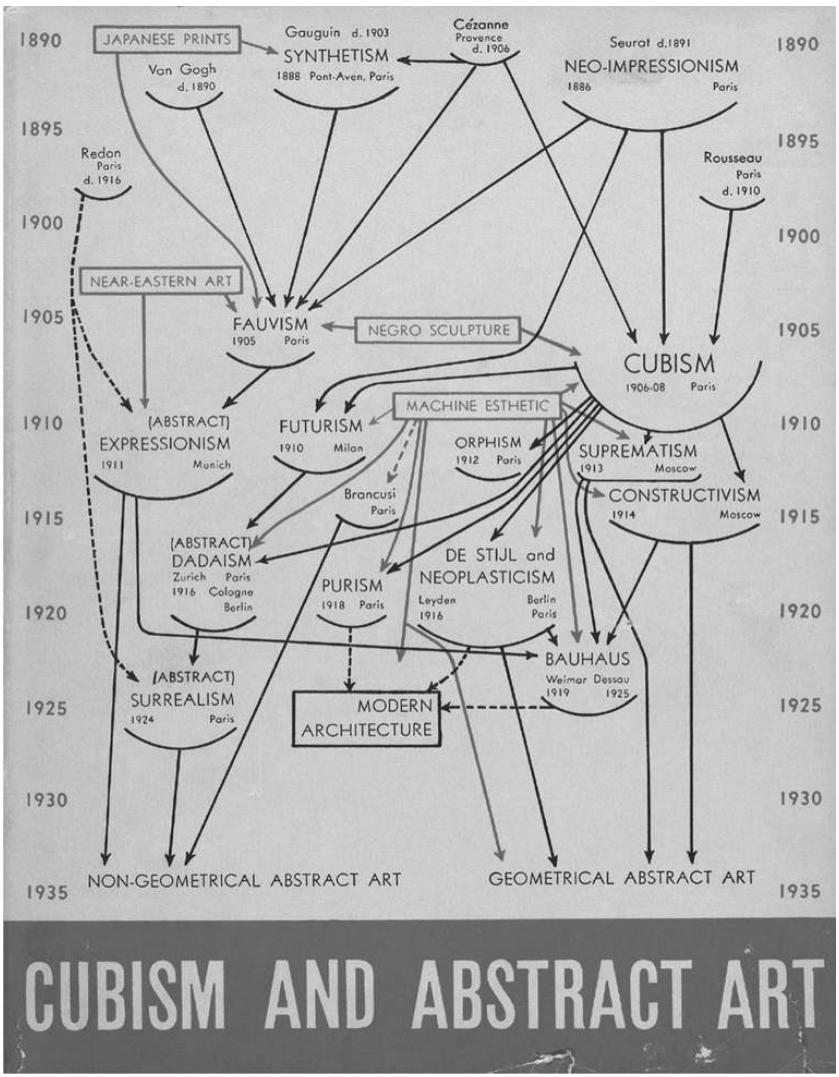

图6　阿尔弗雷德·巴尔为1936年“立体主义和抽象艺术”展览目录准备的图表

巴尔的任命也非常应时，它与华尔街股市的崩溃同时而至。尽管艺术收藏者们似乎并没有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但艺术市场却一直低迷不振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这种背景下，为现代艺术树碑立传，或

为“伟大”的现代艺术家建立经典（或名人榜）是一道不可估价的防止投资信心丧失的防波堤。也很巧合，伴随现代艺术博物馆早期发展的是在欧洲不断加剧的战争威胁。整个30年代至40年代，随着大批欧洲当代艺术名家为躲避纳粹和法西斯而来到纽约，人们对欧洲当代艺术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也是巴尔的展览所要扶植的。艺术家瑙姆·加博、皮埃特·蒙德里安、费尔南·莱歇、萨尔瓦多·达利、马尔克·夏加尔和马克斯·恩斯特的到来，巩固了纽约正在成长的现代艺术产业，并促进了新的艺术博物馆甚至一些当代艺术画廊的出现，只要有一些富有得足以承担早期损失的赞助人签约买单就行。靠采矿业发家的巨富古根海姆家族就拥有一些艺术机构。1937年，索罗门·古根海姆建立了非具象艺术博物馆，该馆至今仍沿用他的大名（最近它在挑战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霸主地位，我将在后面探讨）。1942年，佩吉·古根海姆在第57街开办了属于她自己的“本世纪艺术”画廊，展示的不仅有欧洲移民创作的作品，还有年轻纽约艺术家的作品。到1947年画廊关闭为止（佩吉移居威尼斯，并在那里重新开业），“本世纪艺术”画廊推动了大部分抽象表现主义先驱者的职业生涯，并被一些其他同时代的艺术画廊效仿，这些画廊的艺术经纪人——山姆·库兹从1945年开始、贝蒂·帕森从1946年开始——支持（并经常资助）纽约新兴的国际前卫艺术冉冉上升的年轻一代。

抽象表现主义运动是这一前卫艺术中第一个完全成熟的艺术创造，它从出现到巩固的进程同时奠定了纽约在国际现代艺术界的领导地位，以现代艺术博物馆为领导核心。就人数而言，纽约的艺术市场当时已拥有了充足的批评力量，包括艺术经纪人、非常富有的收藏家以及相关的艺术批评团队，那些见多识广、雄心勃勃的作家（有时也是艺术家），撰写展评，阐明立场，并塑造对应的公众审美品位。他们所倡导的运动后来被称为纽约派。其中一些批评家，尤其是克莱蒙特·格林伯格〔13〕和哈罗德·罗森伯格〔14〕，变得和他们所评论的艺术家一样有名，甚至（在我们将探讨的某些方面）可能更有影响力。他们不断增强的自信心和战斗力背后的支撑力是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与战后冷战世界中典型的美国价值观两者之间不断加强的联盟。抽象表现

主义者的绘画似乎已不再充当反美学或反政治的旗手，它作为一种创作自由的典范而炫耀于全世界，这种自由在西方文化中是比较典型的。1952年，现代艺术博物馆发起了一个“国际巡回展览项目”，经常与政府机构合作，传播纽约前卫派的艺术作品，比如1959年在欧洲巡展（并进入泰特艺术馆）的“新美国绘画”展。从1863年“落选者沙龙”展览算起，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或许直到1959至1969年间，随着下一代艺术家、艺术经纪人、批评家和收藏家们通过推翻信条、摒弃原有圣坛而转投其他信仰的方式，逐渐承认了抽象表现主义历经时间考验的文化权威性，纽约前卫艺术的形成和市场才备受推崇。波普艺术（常常具有讽刺意味地）对消费主义文化活力的赞美，吸引了里奥·卡斯特里和伊凡·卡珀这样的新艺术经纪人，以及罗伯特和伊舍尔·史卡尔夫妇、艾米莉和波顿·特雷梅恩夫妇这样的新收藏家，他们如饥似渴的、大张旗鼓的收藏活动——此外，可能同样重要的是，他们10多年后将藏品推向销售市场时的大肆炫耀——大大提高了纽约市场的声誉，也使市场的主要供货者变得富裕起来。当极简主义者和概念艺术家创作作品，并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整个70年代中，遵循含蓄或直接地批评波普艺术及其操纵者看上去特别爱好当代艺术的商品化倾向这一策略时，同样还是这批艺术经纪人和收藏家乐意去赞助他们——史卡尔支持极简主义的橱窗格林画廊，卡斯特里将莫里斯和贾德两位主要名家列入他的支持对象，尽管这些艺术家制作的无名的、盒状的、无题的物体与这些艺术经纪人和收藏家曾经喜欢的波普盛宴有着光年般遥远的距离。

然而，结果证明极简主义和概念主义艺术是很难销售的。60年代中期，这两个“主义”突然在艺术领域兴起并赢得批评界的赞赏，旗下的艺术家拥有着前卫派的权威，他们是首批接受过大学艺术教育的人，并撰写大量关于自己作品的文章。尽管如此，他们的作品还是不如传统绘画和波普艺术那样有趣，到了70年代，相当多的主要收藏家放弃购买这些作品，导致了一些画廊的倒闭（比如致力于收藏极简主义艺术的纽约巴克特画廊〔15〕）。市场的领导者自然试图扭转这一潮流，并在几年之后做到了这一点：80年代初期，不但出现了向传统美

术手法的回归，还出现了向造型具象的回归。“新表现主义”是一个松散的、新闻性的标签，用来称呼一群以不同的具象风格从事绘画的画家，他们在大西洋两岸——在意大利、德国和美国——同时迅速崛起，一举成名。这更直接表明艺术经纪人卡特尔式的经营对当代艺术市场的控制力超过了前卫派思想上任何深刻和影响广泛的变化（尽管他们当中一些人所共有的“热衷怀旧”和混成的艺术风格具有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所有特点，“后现代主义”当时是一个时髦新词）。新的名字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例如意大利的山德罗·基亚和佛兰西斯科·克莱门特，德国的奥尔格·巴塞利兹、赖纳·费廷和安塞尔·基弗，美国的戴维·萨勒以及最著名的朱利安·施纳贝尔。与他们一道，新的艺术经纪人也迅速获得了名望。其中有斯皮罗内、韦斯特沃特和费希尔，他们通过与法兰克福和米兰的卡斯特里的合伙人们联手，在曼哈顿的苏豪区〔16〕启动了斯皮罗内–韦斯特沃特–费希尔画廊〔17〕，用三种语言作为画廊名称也体现了这个由市场创造的艺术的国际化；玛丽·布恩，在自己的画廊开张营业前曾在巴克特画廊工作，她非常成功地推销了萨勒和施纳贝尔，因而1982年被《纽约杂志》（当然是先于她的艺术家们）称赞为“艺术领域的新女皇”。

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同样也是艺术经纪人的作品，在风靡一阵之后，又因1981年在伦敦皇家学院举办的一次重要展览而备受尊崇。展览的标题为“绘画的新精神”，该标题巧妙地掩饰了该展览其实是一个具有伸缩概念的混合体，包括了艺术中知名大师的、世纪之初现代主义的、年纪偏大用来替补凑数的、及新表现主义“超前卫”的（如他们现在所称）各种各样的作品。这次展览也证实了随着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在政治上的胜利，艺术世界中新保守主义姿态开始抬头，扭转了办展机构表面上的财富衰势。对于艺术市场的未来而言，或许同样重要的是，此次展览“成就”了查里斯·萨奇的收藏。萨奇一直在对很多此次参展的艺术家投资，并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赢得了艺术市场中的战略性地位，他在1984年出版了光亮精美的四大卷藏品目录《我们时代的艺术》，并在一年之后于伦敦的边界路开张了他自己的巨大展览馆来展出这些作品。虽然表面上更像是收藏家而不是艺术经

纪人，但自70年代初（与兄弟莫里斯合伙）创立广告公司和开始购买艺术作品之时起，萨奇就将生意和乐趣结合在了一起，据报道，1978年，萨奇兄弟公司当年的艺术品销售总额为38万英镑。90年代初，公司的急剧扩张使其陷入债务之中，迫使查尔斯卖掉了大批艺术品，他恰好在艺术市场突然崩溃前出手，售出的200件作品给他带来了2,300万英镑的收入，而他的支出仅为800万英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与90年代初的经济萧条同时发生的艺术品价格的急剧跌落，进一步（即使是间接地）巩固了萨奇在艺术市场的战略地位。在过去10年中，他在这一市场上曾经两次决定性地操纵了“杠杆”。一次是1982年在泰特艺术馆举办的朱利安·施纳贝尔的画展，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展品都是由萨奇借给艺术馆的。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重要公共艺术馆对其藏品的肯定，大大提升了这些作品的市场价值。另一次是几年之后，萨奇在一次售卖中倾销了他收藏的所有山德罗·基亚的绘画，从而给基亚作品的价格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90年代早期经济萧条的直接影响是在一定程度上拆散了国际当代艺术的联络网，至少在萨奇的基地英国，在伦敦和其他正在展出“最前沿的”艺术的城市，需要根据国内的关注去重新组装英国艺术，培育和形成一个以小型画廊和艺术藏库为主的区域性联络网。萨奇的回应是（对他这样大规模的收藏家来说是独特的）去熟悉这些新出现的联络网，而且或许是凭借一个广告专业人士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洞察力，去追寻和购买那些出人意表的新潮艺术，即那些尚未成名的年轻艺术家如迪米尔·赫斯特、翠西·艾敏和加文·特克的作品。其余的当然也是类似的历史，如1997年在皇家学院为这些藏品举办了名为“耸人听闻”的展览，并以此确立了“青年英国艺术家”，又称“yBas”，这既是一种媒体现象，有时也是艺术名流秀；2003年4月展出这些作品的萨奇画廊开幕，展馆坐落在泰晤士河南岸区的原大伦敦地区议会大楼的主要旅游街区（作为展览空间可能有些别扭），正对议会大厦。

事实上，萨奇画廊所处的位置是对以巨大的泰特现代艺术馆为典型的公共艺术博物馆复兴的一种默认（或许是一种挑战），该馆位于泰晤士河下游河畔，其建筑物前身是一家发电站。虽然在艺术世界

里，不应该过多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如艺术史家吴金桃所说，两者紧密地混合在一起，而且前者的董事会里有很多后者（或与他们相关的机构）的主角——过去10年在全球范围内，现代艺术博物馆异常繁荣兴旺，这是艺术领域里最显著的特点，它对艺术观众和艺术经济的影响甚至使像萨奇这类收藏家的活动也变得黯然失色。略举一些例子：由加拿大建筑师法兰克·盖瑞设计的位于比尔堡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于1997年开放，它或许是最著名的；而在它之前，1996年就已经有了巴西人奥斯卡·尼迈耶为里约热内卢市设计的同样令人惊叹的艺术博物馆；泰特现代艺术馆经过瑞典的赫佐格和德·穆荣合作重新装修后于2000年开张；与其比肩的是2004年经过大面积扩张后重新开张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那是日本建筑师谷口吉生[18]的作品。这一发展的全球化特征的确引人注目，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另外两个特征。在每一个例子中，就像作为“后现代”博物馆之首的巴黎蓬皮杜中心（它由伦佐·皮亚诺和理查德·罗杰斯设计，于1977年开放）一样，博物馆建筑本身也是它的主要展品，它不仅取代了内部收藏的艺术品成为人们前来参观的主要原因，还以其规模和/或视觉的极度夸张抢了那些艺术品的风头。不仅如此，这些博物馆还认为参观藏品仅仅是他们现在预计提供活动的一部分。其余的还包括购买与博物馆藏品有关的书籍、复制品和艺术装饰商品，在博物馆的咖啡厅与餐厅享受其特有的价格偏高的食品。因此，公共现代艺术博物馆被越来越多地改建为消费场所。（这不难理解，现在博物馆对面的现代艺术商店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是美国购物中心平均销售额的7倍。）

当今前卫艺术：已不复存在还是仍具活力？

如果现代艺术已变得如此“商业化”，被一种以赚钱和花钱为动力的文化所吸纳，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所谓的“前卫”已不复存在，而它致力成为文化产业内研究和发展力量的演变也已完成？并非完全如此。在三个方面，而且由于三个原因，这个术语仍然是有意义的。首先，

即使是在最微弱的意义上，由20世纪前卫派的历史所引出的那一部分艺术世界，即自称独立的、实验性的、自我指涉的艺术创作，事实上仍然存在着，它的专业画廊、专业杂志以及依然难以理解的艺术语言也仍然存在着，尽管已越来越多地受到商业价值的浸淫，如阿玛尼公司在《泰特》杂志上刊登广告、安永公司赞助热门展览。诚然，宣称前卫派的地位是基于这一市场因素，除了是最中立的描述以外，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对这一术语的意义和历史的夸张歪曲。的确，已有几位文化评论家注意到，市场对前卫派的吸纳实现了原创前卫艺术家让艺术回到社会生活中的乌托邦目标，但其完成的方式却是反乌托邦式的。然而当代艺术世界并非铁板一块；有些部分要比其他部分更加独立，一些将前卫主义塑造成某种意识形态的动机仍然在推动着“最前沿的”艺术创作。对那些非学院派或反学院派艺术家来说，他们要“领先”（这一军事术语原来的含义）于主流社会及其艺术的观点始终一方面是对他们被边缘化的补偿方式，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献身于一系列专业性的、独立性的和越来越自我指涉的艺术实践的表达。这种理念一直被坚持着，全世界每年从艺术学校走向社会的大多数有抱负和经济收入继续从事艺术创作的毕业生们仍然要经历同样的边缘化过程，并拥有同样的奉献精神，青年英国艺术家组织的艺术名流除外。很少有人能够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依靠赞助人支持或仅靠出售作品来支撑其艺术实践，但如同任何职业的教育一样，艺术教育给予他们的以特殊材料、技能和思维方式从事创作的特殊训练将继续使他们（倘若他们有抱负和经济收入的话）去塑造自己的艺术，而且这门学科的丰富历史将保证他们的信仰是有意义的。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套复杂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的“主义”，在过去的100年中，所有对现代艺术的投入和奉献都借此得以表达。对“主义”的崇尚似乎终于结束了，但对艺术再现的新手法和空间可能性的探索，无论在文化产业内部还是外部，都很可能继续下去。

此外，有证据表明，仍存在着一种真实和持续的反抗，尽管已大大减少了，属于我在前文引述的本杰明·巴克洛赞扬的类型，即反抗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机构企图“占据并控制”所有艺术实践和表现空间的

趋势。尽管认为他们可以成功地抵制资本主义文化的坚定信念和投身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解放运动中去的参与意识，这两个曾经燃烧起20世纪早期前卫派激情的信念已经枯萎凋谢，在新出现的当代新自由主义的严峻环境下维持一个集体行动和身份的“公共领域”的想法也已减弱，但以千变万化的媒介、从多种多样的角度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们（他们中许多人参与共同合作的项目）正在继续与市场价值的垄断和艺术实践的体制化作斗争。迈克尔·兰迪2001年的行为作品《打碎》就是近期一个有力的范例，在这件作品中，他有条不紊地破坏了他所有的物质财产。在英国，那些在伦敦和其他城市出现的小画廊、艺术仓库和其他非正式或“未被神化”的艺术场所等形成的地方性联络网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中也包括艺术家经营的集体。他们自办展览，以寻求躲避官僚化了的博物馆策展人那光滑而冰冷的触角，这些策展人在最前沿的艺术中为自己高度概念化的展览寻找素材，而这些艺术家自办的展览大多都是昙花一现且过于尖锐，不能达到这些目标。其中最突出的是BANK，一个以伦敦为基地的艺术家团体，他们举办了一些展览，如“可卡因高潮”等，展览同时散发宣传材料，将闹剧和反艺术界的辩论混为一谈。BANK在2000年提出一项建议——“关闭所有公共艺术馆，并将公共基金重新分发给个体艺术家”，取消“策展人、身份贩子、官僚分子、投资家和经理人”。其他团体包括“所在地＋”，一个以纽卡斯尔为基地的组织，主要经办依时间和地点而定的作品，还有名为“威士忌”的另一个伦敦艺术集体，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3年时间内，每月举办一次活动，共展出了300多名艺术家的装置作品和行为艺术作品。

从所有这些团体的创造力和他们以最少的资金运作所表现出的足智多谋来看，他们的前卫艺术已被置于市场和社会边缘两者之间。如艺术史家乔纳森·维克雷所说：

> 十分矛盾的是，BANK的争论可以被解读为一场为了私有化的争论：公共资金支持民间的（和无责任的）个人事业，这些人无疑——即使是无意识地——将为了个人利益而建立小型的权力和排他网络，并确保宏观经济上出现的基金问题再

现于微观层面上。

不过，BANK的策略或姿态并不能阻止萨奇挑选BANK艺术家的作品作为收藏。另一方面，像“威士忌”采用依时间和地点而定的作品之手法，显而易见与20世纪70年代的极端艺术一脉相承，也是艺术世界边缘区域的产物。在《职业危险》这本颇有价值的有关这一短暂艺术活动的文集中，作者们称赞“威士忌”的活动是“夜总会和艺术空间相结合的产物，［在其中］人们除了可以听、看和参与到艺术中，还可以喝、吃、跳舞、娱乐”，这是一种立场和倾向，它所冒的风险是将批评性的艺术实践沦落为简单的狂欢盛宴。

看来，在当代艺术中玩弄前卫的概念，这种游戏将近结束了。或许在西方艺术范围内，不再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够代表和占据其所有空间，并从中施展——用巴克洛的话来说——“抵制和开展反抗的新策略”，去对抗在文化行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正统，即广告、电视和好莱坞电影这些主宰一切的视觉信息系统。鉴于它们的图像已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而我们也已养成了对这些图像进行复杂解读的习惯，任何可能质疑他们的空间似乎都被封闭了。但仍然有现代艺术家前卫理念传承以外的其他因素需要关注，在前卫派形成时所提供的批评实践模式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式。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评审还在进行中，我将在本书的结尾处讨论该问题。

注释

〔1〕 漩涡派是介于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之间的流派。

〔2〕 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 1885—1953），俄国建筑师、画家和设计师，被称为构成主义之父。

〔3〕 克莱斯·奥登伯格（Claes Oldenburg），1929年生，以将日常物体放大形成的装置雕塑而著称。

〔4〕 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 1938—1973），以其作品《螺旋形防波堤》闻名于世。迈克尔·海策（Michael Heizer），1944年出生，以其大地艺术作品《双重否定》闻名于世。两人均为美国的早期大地艺术家。理查德·龙（Richard Long），1945年生，英国最著名的大地艺术家之一。

〔5〕 斯图尔特·布里斯利（Stuart Brisley），1933年生，被认为是英国行为艺术的领袖。

〔6〕 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 1921—1986），德国行为艺术大师。

〔7〕 汉斯·哈克（Hans Haacke），1936年出生于德国，定居纽约的德国艺术家，哈克的作品经常引起艺术界、商界和政治界的争议和质疑。在当代艺术中，哈克被普遍认为是政治性和观念性艺术家。

〔8〕 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Ambroise Vollard, 1866—1939），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商，发现并赞助了毕加索。

〔9〕 丹尼尔-亨利·卡恩维莱（Daniel-Henry Kahnweiler, 1884—1979），德国人，艺术家及艺术收藏家，20世纪法国艺术的重要经纪人之一。

〔10〕 贝丝·威尔（Berthe Weill），女艺术商，首次在其画廊展出法国画家杜飞的作品。

〔11〕 威廉·乌德（Wilhelm Uhde, 1874—1947），德国人，艺术经纪人、收藏家和艺术批评家，最早开始收藏毕加索、勃拉克和亨利·卢梭等现代艺术家的作品。

〔12〕 位于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由Lillie P. Bliss, Mary Quinn Sullivan, Abby Aldrich Rockefeller 三位女士共同创立于1929年的夏天，同年11月7日正式开放，时逢华尔街股市大崩盘9天之后。开馆时仅有8幅版画和1张素描。历史上曾3次搬迁，1939年定居于现在的馆址。现有艺术藏品超过15万件，电影2.2万余部，电影照片400多万张。

〔13〕 克莱蒙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 1909—1994），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美国艺术批评家，和美国国内的现代派艺术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他提倡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是最初赞扬波洛克的批评家之一。

〔14〕 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 1906—1978），美国作家、教育家、哲学家和艺术批评家。“行动绘画”的术语即为其1952年首创，以后变为人们所熟悉的“抽象表现主义”。

〔15〕 巴克特画廊（Bykert Gallery）是由画商、策展人克拉斯·科特斯（Klaus Kertess）于1969—1975年期间在纽约经营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画廊。

〔16〕 苏豪区（SoHo），纽约曼哈顿下城的著名艺术区。

〔17〕 斯皮罗内-韦斯特沃特-费希尔画廊（Sperone Westwater Fischer Gallery）于1975年由意大利人简·恩佐·斯皮罗内（Gian Enzo Sperone）、美国人安吉拉·韦斯特沃特（Angela Westwater）和德国人康拉德·费希尔（Konrad Fischer）在纽约建立，三位艺术经纪人来自三个不同的国家，也体现在画廊的名字上。

〔18〕 谷口吉生（Yoshio Taniguchi），1937年生，日本著名建筑师，毕业

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在1997年现代艺术博物馆扩建的设计招标中，他击败其他10名国际著名建筑师，一举夺标。这也是他在日本本土外的第一个建筑项目。

第二章

现代媒介，现代信息

在20世纪初，艺术和非艺术的重要区别之一体现在制作材料上。布上油彩、黏土或石膏、青铜和大理石分别是绘画和雕塑的固定材料；其他媒介或实践方法，无论要求多少技巧或追求怎样的创造性，在视觉再现人类状况方面，都不如艺术有文化含量和权威。这种状况持续了数个世纪。而现在却很难想象哪种材料不能——甚至不曾——用于创作这样或那样的现代艺术：艺术家自己的凝固的血（如麦克·奎恩1991年创作的自己的半身像《自我》）；裸体的人群（由纽约艺术家斯潘塞·杜尼克开创的艺术形式）；巧克力（如阿妮亚·加拉乔1994年创作的《笔触》，一张巧克力沙发和壁挂）；香烟（萨拉·卢卡斯）；办公室的废物和垃圾（高桥智子［图21］）；甚至大象的粪便也可以出现在画作中，至少是在克里斯·奥菲利的作品中。尤其是在近些年，以打破常规的方式选用艺术创作材料的趋势愈演愈烈，以至于我们可以将本章的开篇句反过来说，即当今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在于艺术可以使用任何材料进行创作。这种状况何以产生，对现代艺术的地位，或其“表现人类状况”的能力又意味着什么？既然当今艺术不再需要特定的材料，它是否不再有资格享有特权？或者媒介材料的性质是否已不再是判断一件艺术作品的质量或潜在的深刻性的标准，更不必说以此来判断它在这方面的地位？在此情况下，相对于制作录像或装置，或以冷冻血液制成肖像，绘画或青铜雕塑在今天又意味着什么？

绘画与装饰：愉悦和原则

在20世纪初，西方世界的艺术家及其观众面临着一次似乎与现在规模相当的视觉技术的激增。现在我们有数字影碟、电脑辅助设计程序和无线上网浏览器来娱乐和诱惑我们，而我们的先辈在1900年开始接受照相制版复制、套色印刷以及胶片等新工艺，还有以电、无线电波和汽油发动机为基础的新的非视觉传播与传递技术。所不同的或许

是，同时颠覆如此众多的视觉和交流习惯所带来的新鲜感 。这种颠覆发生在一个利用新技术制成的商品范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的时代。在这种“现代化”的背景下，一些艺术家、作家、音乐家以及表演家发现自己因自身的缺欠或癖好被自己的职业主流排除在外，于是，他们通过我在第一章所概述的方式越来越多地去关注其所选择的媒介的特性，关注什么使其意义与众不同，以及这种不同如何产生。他们这样做有着复杂的动机：面对正在发展的商业与大众文化（这种文化倾向于将他们淹没在已为人们所意识到的平庸之中），突出自己的不同，丰富各种艺术形式的独特性；探索视觉表现的传统手法和方式，为它们在新技术下的可传播性而忧虑；运用两者为新社会服务。其结果，相应地，也多种多样，我们将在本章探讨。这些关注由来已久，数十年来它们是艺术家们专业身份特性的构成部分，但对自发形成的前卫艺术家群体来说，它们成了决定因素。第一代具有自觉意识的前卫艺术家们，即后印象派画家，自文艺复兴以来第一次认为艺术的模仿功能——它对视觉真实的遵循——不如它的象征或表现功能重要，或者甚至不如它的形式协调重要。因此凡·高和高更运用丰富饱满的色彩并非是为了表现视觉的现实主义，而是通过色彩的强度和相互关系直接传达一种情绪或绘画某一方面的意义。塞尚也是在印象派忠实于事物在日光下的形象这一准则中成长起来的，他努力使该准则的要求与画面的和谐相吻合（如他不断重复并着迷于描绘家乡的圣维克多瓦山[1]），在风景画中所指物体仍然是描叙性的同时，减少调色板上的色彩使其明显通过彼此间的对比和互补而相连。这一流派年轻的代言人，艺术家莫里斯·德尼，抓住了他们关注的要点所在，在1890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应当记住一幅画——在表现战马、裸女或轶事之前——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涂满色彩的平面，这些色彩按某种规律组合在一起。”

德尼在20世纪早期从事装饰绘画，为富有的巴黎人绘制客厅屏风和壁画，为城市公共建筑的檐壁画装饰，这并非偶然。因为对绘画的“形式”特质的一系列考虑——色彩、形状、体积、空间以及它们的内在关系，独立于它们的模仿价值——使其本身更接近装饰表面所带

来的纯粹的享乐主义和视觉愉悦，如檐壁或壁画。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这种接近一直是现代艺术之所以丰富多彩的原因，同时也是“形式主义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忧虑的原因，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建立并保持一种不受流行文化或社会功能污染的现代主义。因此对于美国的克莱蒙特·格林伯格这样一位20世纪中期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形式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建者而言，装饰是“萦绕着现代主义绘画的幽灵”。因为如果绘画“仅仅”是装饰——如果（如格林伯格所认为的）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深度只不过是视觉愉悦——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将它同《世界室内装饰》这一类杂志展示的有品位的装饰陈设区别开来；既然绘画放弃了再现画框之外的世界——像形式主义者所意指的它应该的那样，那么它正在冒此风险。

而对于像马蒂斯这样的艺术家来说，这种危险区域正是现代艺术最具潜力的地方。他看到，如果绘画魔幻般的技法（运用平面上的符号和色彩创造出空间和形态、光和影的虚拟世界）不再从属于模仿功能，它将不受限制地成为最深层的视觉和智力享受的源泉。1908年他的绘画《红色中的和谐》（图III），建立了他在有生之年不断追求的表现方式。从纯视觉的角度看，这是一幅色彩效果强烈的绘画。墙壁和桌布上强烈的红色被蓝色的藤蔓花纹所抑制，形成戏剧性的效果，强调了绘画的平面感（与此相比，窗外景观的空间感则完全处于从属地位）。这种平面感处处被画面深度的暗示所衬托，尽管这种深度在表现特征上是更概念化而非视觉性的，并且常常只是最低限度地被表述。因此尽管红色和蓝色之间有着不断的较量，我们仍可毫不费力地将圆桌顶部的平面解读为水平面，部分是因为我们受到桌子右边缘和左边后方角落的暗示，同时也是因为我们“知道”画面上那些玻璃花瓶、水果碗以及水果“要求”它如此，它们聚集在女仆（她建立了一个有重要深度的独立小区域）和椅子（建立了另一个）周围，提供了足够的根据使得我们这样认为。平面和深度、线条和色彩、眼睛和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马蒂斯艺术的丰富乐趣和地地道道的个人特征所在。这幅画为真实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沙漠奉献了一片以令人愉悦的技巧建成的绿洲，这就是为什么在创作了它100年之后，马蒂斯如此

受欢迎，并仍能与当代的画家及观众相呼应。

图III　亨利·马蒂斯，《红色中的和谐》，1908年

无论从意向还是结果来看，并非所有的现代主义绘画都像马蒂斯那样充满欢乐主义；事实上，大部分绘画的关注点都不同。“现代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名词，20年来对“后现代主义”含义的争议使它更加如此。简单地说，正如我在绪论中所提出的，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内，现代主义绘画的共同特征是认识到绘画作品不再是展现世界的窗口，而是一幅世界的重构 形象，它所运用的进行艺术再现的手段和常规（如焦点透视、投影造型或构图的几何学方法），其含义不再像人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确定无疑，这是由于不断出现的新视觉技术对它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艺术家们通过各种方式对这种共识进行表达并对其进行扩展延伸。当马蒂斯将明显的欢乐带入它所准许的虚构游戏时，立体派运动的艺术家们则出于其他目的去探索艺术作品的方式和手段，即表达他们在现代大都市的生活经历或对其诱惑进行批判

性抵抗。尤其是毕加索和勃拉克，他们的探索将绘画理解为一种像语言一样的符号系统。他们的做法与美国的皮尔斯和日内瓦的索绪尔同时期有关语言的论著极为相似，先将绘画创作回归到零点，然后重建，创造了一种以扁平的、平面交叉构成为特征的绘画风格，突出强调并反复颠覆他们自己的错觉主义[2]（图11），同时毕加索富于创造性的双手也为雕塑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词汇（图10）。立体主义的绘画风格主宰了西方世界前卫派的现代艺术创作达10年之久，但更重要的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促成这一风格诞生的立体主义艺术家的理论和绘画实验方法为现代主义的艺术实践提供了一系列的参考坐标。实验主义正适合第一代具有自觉意识的前卫艺术家，其中有马列维奇及他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亲密信徒；荷兰风格派运动中的蒙德里安和他的同伴；米兰的未来派艺术家和伦敦的漩涡派画家；他们将立体主义视作不同版本的崭新的、非再现的（或“非具象的”）艺术的基础。这种无所不在的艺术创作模式被载入史册，阿尔弗雷德·巴尔1936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立体主义和抽象艺术”展建立了它的历史谱系（图6）；同样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影响了纽约（这座即将成为现代艺术新首都的城市）随后一代的艺术家。

但是，与立体主义的革新在时间上相隔有一代人、在地理上相隔有一大洋的纽约艺术家们则在挑战和吸收立体主义艺术。20世纪中期，苏豪区的酒吧、俱乐部和工作室成为各种思想的熔炉，与前卫主义的原则保持一致，展开了一系列密切相关的、建立在欧洲现代派基础上并超越了他们的艺术实践，这既是处于火红年代的艺术家们的成就，也是批评家们的成就，他们拿了薪金去作总结、选择和预测。这一熔炉练就了两种以激进的新方式进行现代主义绘画创作的方法，批评家为其打造了两个名称——“色域”绘画和更具争议的“行动绘画”；两者一起组成了后来被称为抽象表现主义的画派，或称纽约画派。其中最著名的艺术家是杰克逊·波洛克，他在40年代早期就被格林伯格誉为美国最优秀的画家和欧洲现代派艺术的继承人。其作品的形式因素使其获此赞誉，波洛克将巨幅画布从画架上摘下，铺在地上，将直接从罐子中倒出的家用亮光漆涂料滴洒在画布上，形成“遍布的”抽象形

象（图7）。格林伯格特别赞赏这种方法，正如他所认为的，波洛克改造了立体主义和后立体主义的绘画手法以及浅浅地紧贴画幅表面的空间，创造出一种极端不同的绘画。这种画法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尺寸，在于它消解了线条和色彩的区别，在于它省略了线条和色彩所依附的“轮廓”（即形体）和“画底”。然而，这些特征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们的血统 ：它们遵循其必须履行的职责道路，即突出并丰富绘画的独特形式特征，格林伯格将这一开端一直追溯至马奈。

图7　杰克逊·波洛克在创作《作品7号》，摄于1950年

格林伯格对波洛克作品的解读产生了巨大影响，既影响到了年轻一代的艺术批评家，也影响到了这些批评家所评论过的60和70年代的艺术家。但现在这种影响似乎大大减少了。那么这些巨大复杂的平面上一缕缕的涂料具有的表达力呢？还有创作它们所需的精力，大幅度动作的肢体性，以及这些画在某种意义上记录的演示过程，即“行动绘画”活动又如何？这些对于格林伯格都不重要，然而正如近来的艺术史家所强调的，它们对波洛克和他的追随者们来说确实很重要。这些特征中的“美国主义”对于波洛克，一个来自怀俄明州的“广阔天空”的乡村男孩，非常重要，他决心学习欧洲艺术的精致，又决心与它决裂。的确有人曾提出，许多抽象表现主义派绘画的一个关键特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它们的“粗野”——黏厚的色彩、运用时的夸张手法（看上去似乎如此）、以及身体上的男性特质，通过这些宣告了这种（也许是老一套的）“美国主义”。尽管如此，许多此类绘画中的尺寸和令人震惊的“整体”特性常常折射出一种超越形式主义艺术家构思的高贵，并受到广泛的认可和欣赏。这在马克·罗斯科的作品中更为突出，它的标志性风格是堆砌呈长方形的色彩饱和的“云块”，象征着这场运动中的色域画派。其中有些作品中的纯粹美，以及画幅表面萦绕不息的非物质性，比波洛克的“滴洒画”更成功地抓住了艺术大众的想象力。波洛克绘画中貌似直截了当地对画家技法的摒弃，至少在不善观察的人眼中，仍然冒犯了对艺术创作应该是什么的期望。

人们无法很好地从形式主义的角度去理解波洛克、罗斯科的作品以及其他现代主义绘画，不仅因为人们对它们的解读非常多元化，远比评论标准所允许的尺度丰富和有意义，还因为在过去的100年里，除了艺术再现的“重构”本质，现代主义还建立在另一种认知上。20世纪初，新视觉技术的激增和扩展激发了这一认知，也使得直到当时仍被认为是艺术质量中必不可少的制作技巧变得多余。绘画要求能够准确地再现任何指定对象，将视觉现实世界中的某一部分令人信服地幻真般地再现出来。如果这一点能够用机器完成——早在1884年，修拉

运用刻板公式的色彩笔触创作了《大碗岛星期日的下午》（图II），预见了现代生活中电视的像素，暗示了这一可能性——那么什么才能使一件艺术作品不再是这种工艺性的 作品，而是构想出来的智力性的作品呢？正如艺术史学家蒂埃里·德·迪弗所言，“在1913年左右，绘画作为技巧已被绘画作为理念所取代”。他之所以提到1913年，有两个原因。一是在那一年整个西方世界的前卫艺术家们朝着抽象艺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二是1913年在巴黎马塞尔·杜尚将两件日常用品——自行车轮子和凳子——简单地固定在一起，构筑了他的第一件现成品 “雕塑”。第二年，杜尚创作出第二件现成品 ——一个用来晾干酒瓶的金属架被他命名为“艺术”（图4）。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件作为现代艺术典范的“瓶架”，变得与迈向抽象艺术的运动同等重要。它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和优雅的简约，因为它用绝对经济的方式（如同设立一项几何公理一样）建立了新的原理，即在一个艺术可以像复制其他耐用消费品一样被机械化生产的文化中，唯有认为某物是艺术的理念 方能使其成为艺术。换言之，杜尚揭示并玩弄了智力的常规，这种常规支撑着艺术，与我所概述的马蒂斯、毕加索和其他人所揭示及欣赏的那些技法常规并存。反过来讲，智力的常规也有赖于与艺术家身份有关的设想，这一点我将在第三章加以探讨，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从杜尚原创的敏锐性开始，越来越明显的是，用观念艺术家迈克尔·鲍德温的话来说，“现代艺术更多是交谈讨论的产物，而不是普通制作者的产物”。换言之，艺术的身份更多地依赖于社会和已形成的制度习俗，而不是实际制作它的人，即个人艺术家，无论他们多么有创意。

因此，波洛克绘画方法的“粗野”，以及它们表面上对绘画技法的摈弃（尽管这么说有些夸张；波洛克倾泼和滴洒颜料的熟练程度丝毫不逊色于他之前运用画笔的熟练程度），不应该仅仅从它们在形式方面的效果或创新，或它们的表现力来理解，还应该从这种摈弃背后的理念来理解，明确地质疑那些技法也是这些绘画意义的一部分。他们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恢复绘画行为中在获得技巧的同时丧失了的某种未经训练的原始性和精神潜质，这不仅是为了表现力，也是为了逃

避被主流品位所吸纳。（1950年塞西尔·比顿为《时尚》杂志拍摄了一组著名的时尚摄影照片，其中模特们穿着与画面颜色相配的服装，在波洛克的滴洒绘画作品前搔首弄姿，艺术史家T. J. 克拉克认为这些照片恰恰象征了“现代主义的悲剧性”，因为它们表明这种逃避注定以失败告终。）二，间接地参照超现实主义画家的“自动化”技法，这一点对于他们同时代的观众而言或许比对于现在的我们更为明显。这些技法是放弃对形象创作控制的策略——往画布表面随意溅洒、闭上眼睛涂鸦等——马克斯·恩斯和诺安·米罗之类的艺术家们以这样的手法去寻求接近无意识，让这种无意识在创造视觉意义时和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扮演主要角色。波洛克和大多数其他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一样，迷恋于无意识和自我的本能；在广岛事件之后，二战刚刚结束的那几年，这是当时文化中一个普遍主题。然而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程序式地追求无意识的“解放”不同，这种关注引发了与非理性的广泛结合。在欧洲和美国，艺术家们，如沃尔斯、卡雷尔·阿佩尔、埃尔斯沃思·凯利、罗伯特·劳森伯格以及作曲家约翰·凯奇等，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探索即兴性、偶然性和意外性在艺术创作及主观表现中的作用，借用了从东方哲学到心理分析等方法。

形式主义艺术批评则完全不是这样，格林伯格作为批评家其无可争议的权威使他所支持的艺术家获得了重要地位，这掩盖了战后非形式思考的力量。60年代初，当一批年轻的艺术史批评家在一本崭新而活跃的艺术刊物《艺术论坛》中开始扩展和应用他的学说时，一个拥有了自己的权力批评基地且具有自我意识的形式主义艺术“流派”，第一次短暂地主宰了纽约的艺术舞台，同时倚靠它的活力和经济力量，主导了欧洲的各个艺术中心。其中，美国画家肯尼思·诺兰、法兰克·斯特拉和英国雕塑家安东尼·卡罗以格林伯格学说中的“媒介特殊性”和“视觉性”为基础创造了抽象、生硬、色彩明亮的艺术（图8），他们的批评家同行对这些作品的含义进行了系统的解释和阐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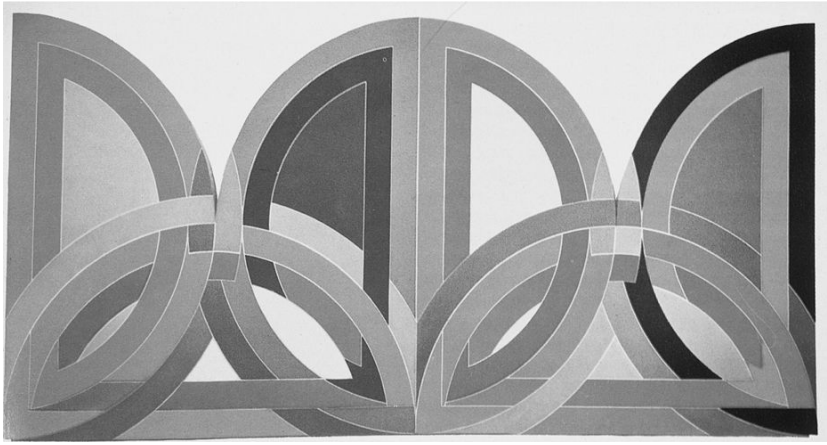

图8　法兰克·斯特拉，《塔克提苏莱曼宫》，1967年

它们至少被欧美大陆的艺术学生们所模仿，在60年代中期的一小段时间内，格林伯格1961年的文集《艺术与文化》被艺术院校奉为“圣经”。但这是这一最具影响力的审美理论最后的繁荣。如果说斯特拉坚持在他的绘画中“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所得到的”言简意赅地体现了这一学说的自信和简约，那么他的绘画中那些表面设计与奇形怪状的画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那不知羞耻的装饰外表则提出了一些尴尬的问题。比如，形式主义者硬性规定一幅画必须表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必须（用他们的评论术语来讲）“承认并超越其自身的客体性”，这种花哨的脑筋急转弯游戏很值得怀疑，其方式和后果将在下文详叙。但更重要的或许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形式主义艺术不可能继续抵挡其画框之外商业化视觉文化的勃勃生机、无所不在和表现潜力；不过10年的时间，它的堡垒就崩溃了。

混合材质：从拼贴艺术到装置艺术

第一代前卫艺术家在探索他们所选择的媒介材料与20世纪初交流的新技术之间的区别时，也探索这些技术所提供的新的可能性。通过补充我曾提及的对于“纯粹”的探索、与它对话或反对它，画家和雕塑

家们抓住并享受了“混合型”的乐趣。决定这一探索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种考虑，我们称之为“吸纳”和“超越”。两者均为前卫派被文化边缘化的产物，既不是艺术实践主流的一部分，也不是流行与商业视觉文化的一部分；但还是附着于前者（如展览、经纪人、艺术院校等），而且作为消费者和出于对新技术的兴趣也被后者所吸引。一方面，如艺术史家汤姆·克劳观察到的那样，有时画家们“劫夺”海报、照片、音乐厅以及电影院流行的商业艺术，以寻找方法取代学院派艺术死气沉沉的常规，并吸纳它们的手法或效果以补充或更新绘画的魔幻箱。另一方面，艺术家经常运用至今仍被认为是非艺术的材质，以分裂瓦解这种分类，摆脱或超越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而又过时的文化等级制度的束缚，或将倾斜了的审美经验对准到新的材质。

摄影是最初以此类方式去探索的新视觉媒介之一。事实上自从19世纪30年代摄影被发明后，它就一直在和绘画进行对话（一位法国画家在1839年就有点过早地认为，“从今天起，绘画死了”），而上个世纪中参与这一对话的画家举不胜举。对其中一些人而言，包括杜尚、超现实主义艺术家、19世纪20年代的“新客观”画家、肖像画家们以及像培根这样的人物，这两种媒介之间的对话至关重要，尽管其中绘画是前辈；大致来说，摄影的手法和效果被绘画所吸纳，而不是在绘画以外另辟道路。但并非总是如此，德国画家赫尔穆特·哈特菲尔德（后来为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其祖国的政策改名为约翰·哈特菲尔德）在19世纪20年代放弃了绘画媒介，转向蒙太奇照片，用它为左翼报纸编绘了强有力的反纳粹图片，因此名声大噪。约在同一时期，不同的艺术家们，如与巴黎超现实主义团体关系密切的美国艺术家曼·雷和在德国包豪斯教书的匈牙利雕塑家兼电影制作人莫霍利-纳吉，都将抽象绘画的美学观引入摄影，对用摄影图像表现非具象的可能性进行实验，两人均不使用照相机，而是将各种不同物品放在感光相纸上曝光，直接在纸上创作作品。这种“物影照片”（被曼·雷一语双关地称为“射线照片”）开创了一个新的实验领域，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为众多追随者进一步开发利用。

19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摄影这一媒介在杂志、电视和广告中的

广泛应用，艺术家们对广泛传播的摄影图像越来越感兴趣，绘画实践通过与摄影技术结合也变得相当丰富。在感情主义的高歌和对抽象表现主义的反思之后，随后一代的艺术家们把机械化的图像视为一种与工作室之外的世界重新连接的手段。在他们所表现的主题世界中，安迪·沃霍尔在60年代早期使用网版印刷所表现的车祸死亡、自杀和电刑椅图像给人以独特而又恐怖的震撼。他将尸体场景与让人麻木的重复、颗粒粗大的纪录照片与丰富的色彩、永恒的死亡与遭遇死亡的凝固瞬间同时并置在画面中，明显地放弃了对于审美的掌控和判断。除此之外，沃霍尔还提出了在我们这个充满图像的社会中，艺术的位置何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批评家和历史学家至今仍在讨论。比较不尖锐但涉及范围更广泛的是德国画家德哈特·里希特，在与摄影打交道近5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一直在探讨在一个视觉图像可以即刻呈现在眼前的文化中绘画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独具特色地利用了焦距模糊手法，而不是新闻照片的中间调子。他精心制作的这些模糊图像，无论是受人喜爱的穿着战时纳粹制服的大叔，还是主人公转过头去的定格（图9），还是（与沃霍尔的《灾难》最为接近的）一具巴德尔-迈恩霍夫恐怖组织成员的尸体，无不具有多重含义——关于家庭相册、警方档案或定时抓拍，关于运动和瞬间，关于相机背后的眼睛。这些联想被引入绘画，转化为这一不同凡响的实践的细节，并把它在传统范围内（肖像画、历史画、风景画等）的应用与其严谨的手工制作方式相结合，从而在这一艺术媒介的持续性和适应性方面留下延绵不绝的影响。

图9　德哈特·里希特，《贝蒂》，1988年

从“吸纳”和“超越”的角度看，毕加索发明的“拼贴艺术”或许是对非艺术媒介最极端和最有影响力的探索。该名词是由他使用报纸、墙纸、手袋以及其他丢弃材料的碎片，创作二维或三维的艺术品而来。

1912年，他第一次开始这种史无前例的尝试，随后的几年，拼贴艺术几乎是毕加索唯一关心的事，他不仅为其超越的意义而着迷，也为其作为试探和把玩幻觉极限的载体所具有的潜力而着迷。在他1914年春天创作的《静物》（图10）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是由粗陋的材料组合而成——一些零碎的木头和带流苏的编织品，画成和摆放得像放在桌上的面包、火腿片、刀和酒杯。通过这种基本的相似，它们创造出一个虚构的空间——墙边的咖啡桌，它们无需任何通常的画框和垫座就直入我们的 空间，使得这种虚构受到质疑。与此同时，相似自身也被破坏，因为即使面包、火腿片和小刀看起来很逼真，玻璃杯却只具有图示的性质，其透明度和容积是由沿口的木制弧形物通过其立视面的恰当角度暗示出来的；而桌面向下倾斜，仿佛是从上往下俯视，与照理是站立在这一平面之上的玻璃杯不一致。以这样综合再现的常规手法，毕加索指出它们的常规特征。事实上，他所做的不止这些。虽然我们不会被面包和火腿愚弄，可以辨认出它们由木料制成，但流苏镶边的确就是　在1914年的台布中常见的那种流苏镶边。这样，虚构和真实（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线被调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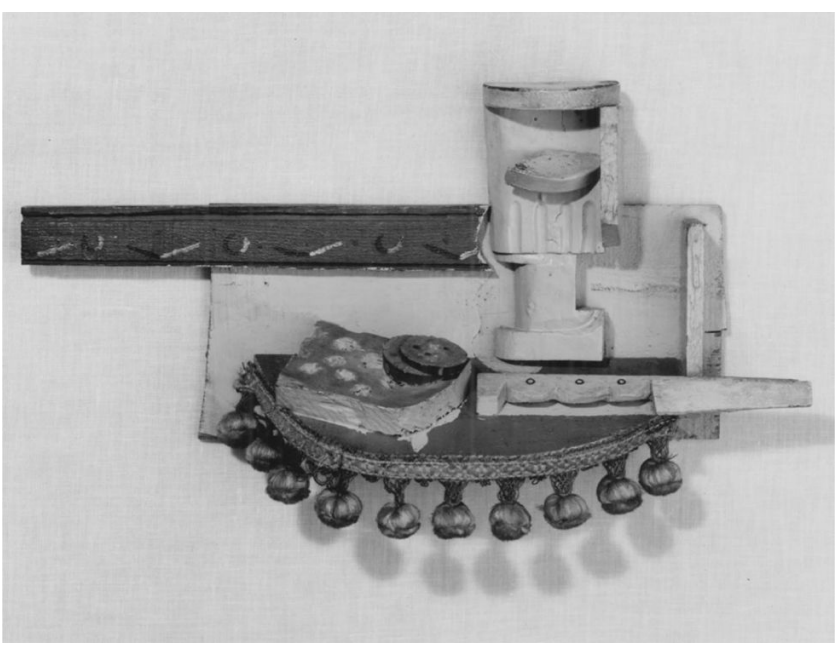

图10　帕布罗·毕加索，《静物》，1914年

如果说这件小作品是令人愉悦的超越性的——粗陋的材料本身增加了它的才智，那么对于这种超越而言边界线是一个标志，而不是一项障碍。关键在于它的虚构，它凸显了毕加索的创造性。也许就是这一点决定了艺术与丢弃废料之间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很重要。毕加索很快将这种才智转而　运用到油画中，在1914年夏天创作的《水果、酒杯和报纸组成的静物》（图11）等作品中，他又反过来摆弄拼贴艺术的表面处理效果——桌子边缘的绳状造型，在构造上看起来如同几周前的拼贴作品中的流苏镶边一样真实。

图11　帕布罗·毕加索，《水果、酒杯和报纸组成的静物》，1914年

这种将废料回收为艺术服务，为艺术实践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从1914年开始，一代艺术家们不断探索绘画与印刷速耗品之间的边缘区域。其中德国艺术家库特·施韦特斯〔3〕做得最专一，他用车票、卡片、招贴、新闻照片等制作了许许多多拼贴艺术的创新作品，引人入胜地展现了现代城市生活。他所使用的这些材料在现代城市生

活的边边角角、大衣口袋、厨房抽屉中都能找到，我们对它们的随意偶然的再发现可以触发我们的记忆，就像《追忆似水年华》中玛德林饼干的味道之于书中的男主角；在施韦特斯的拼贴画中这种难以捉摸的内涵是用多种意义编织成的经线，而纬线则是它们质感的相互作用和画面设计。

将私人所指和公众约定与绘画的手法及常规相结合也是贾斯珀·约翰斯绘画创作的中心，尽管一定程度上他已经远离了施韦特斯对20世纪城市生活的那种强烈迷恋。在他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一些绘画中，约翰斯将“现成的”基本图案，如靶子和美国国旗，与夸张的“表现性”笔触以及石膏人体部位模型令人费解地组合在一起，运用拼贴艺术的原则去挑战当时流行的抽象表现主义的强烈的主观性以及观众所抱有的“易懂”的期待心态。结果他所画出的图像令人迷惑不解。这种困惑不仅仅在于，一种不确定性略微破坏了绘画与其主题之间通常存在的固定差别，比如说，1955年的作品《旗》是一幅有关旗的 画还是一面画有色彩的 旗；还在于这种笔触的“表达性”并无目的，对于干巴巴的图像和正确的细节设计都完全是不必要的。显然，这些不是“纽约画派”的首次个人宣言，而是某种更模糊的、甚至不能探知的东西。约翰斯6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容纳了越来越多的外来对象，包括杯子、扫帚和椅子，这些特性变得更加明显了。其中难以捉摸的意义和稠密的画面处理产生的吸引力使我们作出思考性的回应，丰富了我们对于如何从完全另类的符号、图像和联想中推断其视觉意义（简言之，什么可被称为画中“诗”）的理解。

如果说讨论毕加索拼贴艺术的含义，方法一在于将其复原，以丰富现代主义绘画，那么方法二则完全相反，在于分解或打破绘画框架的束缚。1913年，年轻的俄国艺术家弗拉基米尔·塔特林参观了这位西班牙人在巴黎的工作室，他带回莫斯科的，不仅是对于他所见的激进构成派作品的兴奋，更重要的是甚至比它们的原则更加激进的观念。第二年他创作了系列三维空间作品中的第一件。这些作品像毕加索的拼贴艺术一样，综合了废弃的木头、玻璃和金属，但没有虚构的对象、主题或空间。它们挂在墙上，称为《浮雕》；1915年开始挂在

房间的角落里，称为《角落浮雕》，就像它们本身一样简单。“真实空间中的真实材料”，塔特林宣称它们的创新性时使用了这一口号。它们不仅从任何再现的作用中得以解放，也从艺术对象的地位中得以解放，可以被看作是空间划分或材料、色彩和质地并置的模型。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之后，塔特林（他像大多数俄国前卫派成员一样欢迎这场革命）为追求这种模型的实用逻辑，放弃了艺术创作，转而根据他提出的构成原理去设计对社会有用的物品（衣服、家具等）。事后我们可以在塔特林的这种快速转变中看出从前卫艺术实践中衍生出的“产品设计”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德国魏玛建筑师瓦尔特·戈洛皮乌斯1926年创立的包豪斯艺术和设计流派中得以巩固。当然，塔特林的浮雕是艺术，不仅因为像杜尚一样他自称如此，还因为这种宣称是一种（前卫）艺术论述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些作品是在艺术环境中得以展现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塔特林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摒弃艺术被神圣化的媒介，摒弃其塑造虚构的功能，但只要他扮演的是一个艺术家的角色，又与艺术的身份保持联系。这注定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局限，后来采用其模式的艺术家们都有所体验。

这种解放令人欢欣鼓舞。罗伯特·劳森伯格运用强调艺术品的“普通性”的拼贴材料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像约翰斯同时期的作品一样，嘲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的夸张手法。在用一系列红色和一系列黑色绘染布料和纸张构成的拼贴画中（他称之为“综合绘画”），色彩的情感性被材料的平凡性所否定。他很快又继续开拓创新，纳入了最意想不到的事物，诸如1959年作品《峡谷》中的一只枕头和一件老鹰标本，以及《字母组合》（图12）中插在汽车轮胎中的一件山羊标本。在后者中，绘画被从墙壁的平面转移到地面上，其意义并不只是聪明地玩弄一个可供山羊徜徉的“色彩地带”的概念，或是玩弄一个可供“造型”的“底子”的概念。正如艺术史家利奥·斯坦伯格首先意识到的，它也标志着观念的转变，即绘画从视觉的、脱离实体的表面或屏幕转变成了安置事物的“平台”（他借用了印刷业的术语），在此平台上物体可以平放、倒下或安置，类似广告牌。这并不是说，对于劳森伯格或其他人而言，绘画是卧式的（我很快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而是绘画的表面代表 的是什么这一主导思想发生了改变。对劳森伯格而言，它是种种形象所共同的底子，他从令人眼花瞭乱的资源中收集这些形象。他采用转印和其他技术手段，从（太空探索、政治家、体育、捕食的鸟类、旅游景点等各种各样的）报纸、线描、图表中，对任何跃入他眼帘的图像复制照片，并将它们组合成绘画，尽管来源如此大众化，它们的意义却同贾斯珀的作品一样，隐秘和多元到了令人难以捉摸的地步。

图12　罗伯特·罗森伯格，《字母组合》，1959年

这种由塔特林等首倡的自由组合，也被以其他方法来利用和表现。对于超现实主义者而言，如果物体或材料的组合不再具有再现性的目的，它便可以具有一种心理性的目的。以19世纪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提出的一个形象为例，“当一把雨伞和一台缝纫机在一座解剖台上不期而遇时”，它们之间的截然不同令超现实主义者着迷，他们通过并置那些截然不同的东西寻找所谓的“痉挛性的美”，即当一个形象滑入无意识时我们所经历的那种精神震颤以及毛骨悚然。这些“超现实主义的物体”中最有名的，如梅雷·奥本海姆的毛皮覆盖的茶杯和茶

托，萨尔瓦多·达利的龙虾电话，我们现在或许是太熟悉了，但对当时的观众而言它们曾成功地唤起过这种震颤。其他艺术家选择材料则更多出于它们的不经久性或消耗性，而非心理指向。阿伦·卡布罗的垃圾组成装置，如他所说，是一种迫使观众面对“什么可能是（或成为）艺术以及什么不可能是（或成为）艺术这一永恒问题”的手段。在这个方面，卡布罗走在了前列。此后许多追随同样理念、关心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垃圾和浪费行为的艺术家以不同的方式探讨了这一问题。罗伯特·莫里斯用废旧金属和纺织品组成的“分散碎片”；托尼·克拉格用家用塑料废品精心组成的多幅英国地图（《从北方看英国》，1981）或色谱；高桥智子利用丢弃的电气和电子设备，将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物品变成一屋子不停闪烁和发声的废物（图21），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然而这一谱系在不断展开的同时也显示出一种变化。这种组合开始于塔特林作品中将互不关联的物体凑在一起，在劳森伯格手中得以发展（尽管他使用了多种材料），直到在高桥智子手中已经变成了“装置”，现在这是普遍的雕塑实践。整个房间，或是在房间内创造的一种环境，或者甚至整个画廊，都可以作为艺术品来包围观众。就观众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而言，这种做法的含义，即使细微，却是根本性的。

艺术品和其他物体

当批评家哈罗德·罗森伯格为波洛克、德·库宁和其他一些1950年左右的艺术家的作品创制了“行动绘画”的标签时，他的设想有些过于诗意。这些艺术家并没有将其作品仅仅视为“事件”的记录，他们的画布也不只是“行动的舞台”。但这个术语仍抓住了某种要点：波洛克创作一幅“滴洒画”时时间的 维度，创作的方式和时间跨度，这些也决定了它所代表的东西——他绘画时姿态和动作的身体特征、在地面上泼洒颜色的返祖现象。当波洛克绘画这些充满情感刺激的特征萎缩成了纽约画派的陈词滥调时，年轻些的艺术家开始重新审视它们。1961年

罗伯特·莫里斯敲敲打打地制作了一个大约50立方厘米的木盒子，在里面藏了一个磁带播放机，播放他制作过程中的声音。他给这个盒子命名为《录有制作自己时声音的盒子》。在这个设计巧妙、类似杜尚的别出心裁的构想背后，是对波洛克绘画中的“创作之中”与“创作完成”之间的紧张状态的感知，它关心的是检验、甚至质疑一件艺术作品所谓的“永恒性”和我们对物体的生活体验之间的界限，这正是莫里斯与其同辈的艺术家的共性。

简言之，这种对“客体性”的关注引发了后来被标榜为“极简主义”（还是批评家打的标签）的艺术。受杜尚式的对艺术地位质疑的提示（它或许是被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讨论的世纪中叶的现代主义和前卫派的体制化所激发），全世界的艺术家们在艺术与“客体性”两者的临界处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美国的极简主义及其在英国的分支与意大利的“贫困艺术”[4]（*arte povera*）和日本的“物派”[5]（*mono-ha*）同行并举。唐纳德·贾德自己创作，同时也评论美国其他艺术家的三维物体作品，它们通常取材于现有的工业材料，如钢板、有机玻璃或胶合板。这些材料内在的复杂性和分类，尚未被清晰表明，但不管是什么，都不影响观众将它们当作 物体来理解。这些作品刻意避免使用“雕塑”一词，既而回避了它们究竟要检验何种艺术形式的问题；同样，也避免使用标题，以给作品引入完全无关的联想。在贾德的例子中，这种存在于作品内在的复杂性与其“整体”特征之间的紧张状态是关键。我们注意到，它和形式主义者所坚持的艺术作品应“承认并超越自身的客体性”相去并非甚远。但对于莫里斯来说，这种紧张状态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观众如何 理解一件物体，也就是说，就展厅里陈列的一件雕塑作品的“客体性”而言，我们对其认知的感性和理性的过程是什么？莫里斯1965年的一件无题作品可能是他对这一问题最简洁的设想，在这件作品中，四个用镜子做成的高约60厘米的立方体被放置在虚构的正方形的四角上（图13）。它们消解在自己的反射之中，使观众看到所有一切而唯独不见其自身，然而它们又不会被忽略错过，从而证明了我们是如何自动地，“不假思索”地来解释视觉所提供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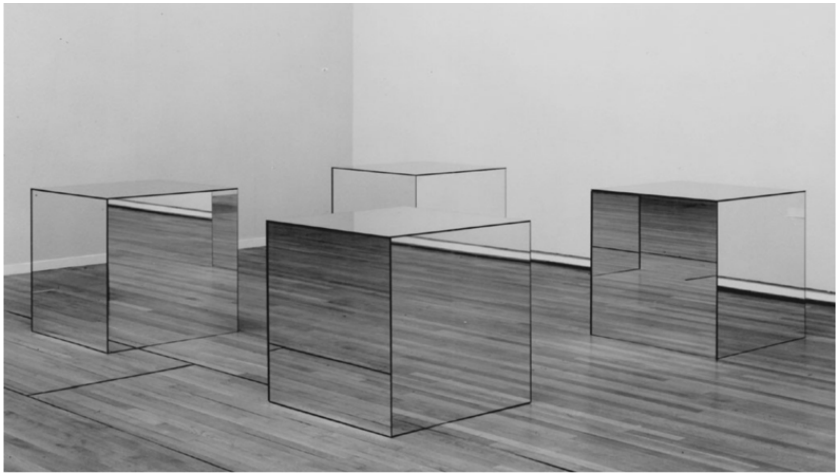

图13　罗伯特·莫里斯，《无题》，1965年

莫里斯、贾德和其他极简主义艺术家制作的物体，与波洛克的绘画或塔特林的浮雕一样，严重冒犯了艺术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盛行观点，这一点甚至由于追溯到塔特林的浮雕而更为直截了当。这些极简主义艺术家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具有革命性，通过将审美焦点从它们的客体性上转移，开启了通往雕塑创作新领域的大门。不出几个月，艺术家们开始在描绘陆上风景之外，直接在大地上进行创作，从理查德·朗用采集的雏菊花瓣尖在草地上构成的圆圈，到罗伯特·史密森在犹他州的盐湖上用几百吨石头创作的巨大规模的《螺旋形防波堤》，无奇不有。其他人则完全无需使用任何物体，他们追随杜尚的艺术即理念的观点走进了“观念艺术”，提出独立于可见形式之外的理念本身就是艺术。如果大众认为这是荒谬的，形式主义者则认为这是致命的，批评家迈克尔·弗莱德，格林伯格的主要追随者，在1967年《艺术与客体性》一文中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他指出，极简主义（他称之为“彻底写实主义”）及其追随者们瓦解了艺术与剧场之间的差别，这种“剧场”不是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一类，而是我们与普通物体之间所体验的那种空间关系。重要的艺术能使我们超越这种空间关系的意识，迷失于它对我们视觉的“呈现”中。在文章结尾，他主张让艺术成为宗教信仰的替代品。他声称：“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候，

我们统统都是‘彻底写实主义者’；呈现即优美”。

弗莱德的文章成了批评理论的一个里程碑，不仅因为他在文章中清楚地表述了这些美学原则相互之间的对立，还因为尽管对立，这些原则仍然主导着批评家和普通观众对当代艺术的接受度。他所称赞的“超越”，依然是许多人对一件艺术作品所抱期望的美妙形容。然而，“雕塑”向不断扩展的实践领域的发展（它现在包括影像、表演、装置以及户外或特定场所的规划），以及流行和消费文化的形式和媒介的壮观发展，被认为已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很多批评家认为装置艺术的文化空间与主题公园的特色展示、百货公司的陈列以及狂欢节彩车并没有太大区别，而艺术家的影像艺术与MTV和电脑游戏中的影像也没有太大区别。不仅如此，在我们自称民主的文化中，“高档的”现代派艺术提供了超越日常生活的体验，这本身听起来就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作为回应，大部分所谓青年英国艺术家的作品则以激进的平民主义为基础，如莎拉·卢卡斯雕塑中淫秽的性暗示、加文·特克的流行英雄化装服饰、翠西·艾敏的“坏女孩”行为。借用朱利安·史塔勒伯斯的评论标题，这是有着“高级艺术之轻”独特风格的工作，它之所以能成功销售靠的是其主要广告业巨亨的赞助。

这种文化等级体系表面上的解体促使雕塑活动迅速扩展成一种无限制的媒介领域，使得“雕塑”这个词成了多余，但这并非全部，“后现代主义”这个现在无处不在的简略标签也不像其倡导者认为的那样所向无敌。我此前所提到的近期艺术博物馆数量、地位和流行程度的增长显示了某些比简单地称为艺术“消费化”更为复杂的情况，因为它们作为机构 的重要性也相应地增长了。简单地说，艺术博物馆始终是、并将继续是把某些文化艺术作品和活动奉为特殊物而加以推崇的场所。的确，艺术博物馆机构的权威（而非个别艺术家的“天才”想法）已成为了确定“艺术身份”的决定性因素。而在约一百年前，杜尚相信作为艺术家，他一个人的决定就能确定他的瓶架子为艺术品。我们现在明白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是现代艺术的论述以及它的主要原动力——艺术博物馆确定了这一切。对于任何一位献身于反对文化产业的前卫派自由斗士而言，如我在第一章提到的本杰明·巴克洛，这都是一

种限制，它始终与将艺术从油画颜料、青铜和大理石中解放出来的努力相伴随（如我在本章中所追述）。不管一位艺术家使用什么材料，不管他或她如何努力追求运用新的和非艺术的技法将艺术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其结果都取决于艺术机构对其作品含义的理解。本世纪第一个透纳奖颁给了马丁·克里德，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的一件作品别出心裁地包括了忽明忽暗的画廊灯光。那么，对于艺术家的身份地位而言，现在博物馆的压倒性权威意味着什么呢？有什么能给个人主义标价呢，更不用说给天才标价了？

注释

〔1〕 圣维克多瓦山（Montagne Sainte–Victoire），位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山区，为塞尚特别钟爱。

〔2〕 错觉主义（Illusionism），指在绘画中使用透视法和前缩法将所描绘的对象表达到可以乱真的地步。

〔3〕 库特·施韦特斯（Kurt Schwitters, 1887—1948），德国达达主义、构成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画家及雕塑家，擅长多种艺术手法和装置艺术。

〔4〕 意大利语“贫困艺术”（arte povera）一词由意大利艺术批评家、策展人杰尔马诺·西朗特（Germano Celant）在1967年开始创立使用，指的是意大利当时的波普艺术。

〔5〕 日语的“物派”（*mono-ha*）指的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日本流行的一种艺术流派，它提倡摒弃创造物体，而是重新安置组合物体，使其成为艺术。

第三章

从毕加索到波普偶像：艺术家的显赫地位

“天才”这个概念现在似乎有点过时，一定程度上被废弃不用了，甚至我在这里使用它时，都是以道歉的口吻来开场的。它似乎已被“名人”的概念所取代，相对来说，“名人”这个词好像无法避免。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吗？如果一位来自火星的客人这样猜想，还可以原谅。大卫·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属于这个星球上最有名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极具天赋。但我们知道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名人并非就是非凡能力的保证，而更多的是我们这个被媒体所渗透的社会的产物，是我们渴望“新英雄”和市场渴望新品牌的产物。此外，“名人”这一特殊概念还混合了，至少部分混合了另外一些理解——虚构、假相、不应得的；而“天才”这个概念，尤其是艺术天才，似乎完全不同。这个词意味着一种真诚、可信，甚至尚未被认知。由此才有了凡·高的声望。这个孤独天才的典型人物，一生中只卖出了一幅作品，用枪结束了自己生命。凡·高的神话得以经久不衰，因为它是　神话；也就是说，它是我们需要的那种故事，它使我们确信艺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我们的人性，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辨识出这种真实，即使凡·高同时代的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些。那么，当代艺术家中的名人们又如何呢？比如翠西·艾敏，她在英国艺术史中取得了空前的知名度，这是否归功于媒体？毕竟，艾敏的大众形象和凡·高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自传的重要意义、他们遭受的痛苦和暴力、表达的笨拙、暴躁的举止（凡·高间歇性的癫痫、自残、“孩童般的”绘画风格、他的自杀；艾敏童年受虐待、青少年时被强奸、“去你的吧”艺术、醉酒后上电视）。几乎没有批评家对艾敏的艺术有什么好的评价，更不用说称她为“天才”了。确实，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给予《我的床》的作者这种赞词似乎太天真、太过时了，人们更容易想到的是“冒牌货”这个词。那么我们是否会重复凡·高当年观众所犯的错误？对艾敏的这种判断是否有些仓促草率？如果说批评界（和公众）对艾敏及其艺术的评价与她的名人地位相差甚远，那她为什么又确实是名人？为什么近年来有些艺术家成了具有空前声望的名人？对于艺术家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

总要有人当毕加索

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我们带回我在绪论中所作的评论，我们可以把它作为起点：在19世纪整个进程中，当商业价值开始稳步蚕食西方社会的大部分生活领域时，艺术创造开始成为更高价值的代表。可以补充的是，因为理性和组织的逻辑性（社会学家韦伯称之为“工具理性”）在追求那些商业目的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作为补偿，创造性的想象力变得比技术性技巧更为重要。在19世纪的前30年中，在全欧洲所有的艺术领域出现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上述变化的首次具体表现，其特征属性“天才”（这个词以前是表示对技术性技巧的熟练掌握）被赋予了这样的含义——非凡的想象力和凭直觉表达想象的能力。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我在后面将谈到），正如克里斯廷·巴特斯比所指出的，在其含义变化过程中，“天才”一词获得了一些特殊属性，这些属性以前曾被鄙视为是“女性气质的”，与推崇理性和技术性技巧的“男性气质的”价值观恰恰相反。男性可以继续展现自己比女性更具有深刻的创造性，虽然作为男性 也会具有“女性气质”，而女性则仅仅是其非理性本性的奴隶。

在20世纪之交，现代艺术的市场日趋巩固，对西方各城市的非学院派或反学院派艺术家而言，前卫艺术的出现既是一种文化的形成，也是一种集体身份特征。“天才”的概念取得了战略性的意义，从一开始作为对具有最杰出（最富于想象力）天赋的个体艺术家难得的赞词发展成为对前卫派权威信誉的保证。很难想象有学院派艺术天才，就其定义而言，他（偶尔也会是她）会与功利主义妥协，被教导得有些迟钝，被各种规定所限制；同样就其定义而言，“天才”这个词被浓缩概括到了最高的地步，即自由思考的独立性和原创性，这正是前卫艺术认为自己所坚持的。正是对“天才”的信仰才使画商杜兰-鲁埃敢于孤注一掷，在1866年买下画家西奥多·卢梭画室里所有的东西。正是对天才的“识别力”（以及意识到自己有这种识别力而带来的自尊）引导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0年有眼光的艺术经纪人、收藏家把钱投在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年艺术家身上。正是因为认识到天才是一种“具

有市场方面的天赋”的特征，是一种被构想出来的 身份和气质，艺术经纪人卡恩维莱才会去支持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的过火行为。

简言之，19世纪晚期社会在文化方面的雄心壮志、前卫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现代艺术市场寻求“天才”概念的动力已经共同创造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现代主义拱门的基石。作为那个时代的主要天才人物，毕加索应该占据这个空间，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独特的天赋（尽管这一点看上去也很重要），还因为他的特别才能和雄心壮志正是20世纪初的巴黎所需要的。他超常精湛的绘画技能，他避免使用这种能力赋予他的省力的解决方法而宁愿重头开始再创造一种绘画语言以获得更丰富表现力的决心，他的个人魅力和性吸引力，带有革新性和恶作剧色彩的聪明机智以及前卫主义的雄心勃勃，所有这些品质聚合在一起，注定了他恰恰就是新世纪所期待的那种艺术天才。事实上他并不是原型 ，原型是雕塑家罗丹。非正统的艺术训练、风格和技巧的革新以及众人皆知的画室习惯使罗丹成为毕加索到来之前那一代前卫艺术家的榜样。在成为一名纪念碑雕塑家的学徒之前，罗丹曾经三次报考国立美术学校落榜。在他富于表现力的泥塑模型上，罗丹怪异地将人体解剖结构变形，并别出心裁地引入未完成的人体躯干造型。他还要求自己的女模特们裸体在画室走来走去，以便让他抓住他所喜欢的姿势和公众的情欲想象。而毕加索则既是画家又是 雕塑家，手头上有更多已开拓的艺术市场，也许更关键的是，他热爱当时的艺术表现形式，尤其是商业文化中低级的幽默和随意的小聪明——音乐厅、漫画、流行歌曲、廉价小报。这些东西为毕加索提供了表现手法和素材方面的丰富资源，远远超过了罗丹。1914年，在毕加索35岁前，他确立了自己作为天才的特征——炼金术士、莎士比亚戏剧人物中的傻子和好色男人的混合体。这个形象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几乎存在了4年，在此期间，他创造性的想象力构成了他个人艺术的核心，他赋予了这种想象力一种丰富的情感，从高级的悲剧到低级的闹剧。

在这4年里，他和乔治·勃拉克创立了后来被批评家们命名为“立体主义”这一绘画风格的深层结构和激进的绘画语汇。这种风格具有产生新解剖结构和新含义的潜力，使立体主义成为了我前面所提及的现

代主义的典范。“勃拉克是我的妻子”，在晚年回忆起他们在立体主义运动中的合作关系时，毕加索用了这句很有名的表述；而勃拉克自己最喜欢的比喻则是“同一座山上被拴在同一根绳索上的两个登山者”。这些形象精辟地概括出了第一代前卫艺术家的特征：他们是性别歧视、勇于冒险和大男子主义的混合体。但不幸的是，他们对占统治地位的艺术传统进行的进步的、现代主义的拷问，通常伴随着一种倒退，即性关系退回到前现代。正如卡洛·邓肯30年前所指出的，这些前卫艺术家的作品“确立了一种新的艺术家类型：实际而又有诗意的男人，生活围绕着他的本能需要而进行”，其艺术“是对艺术家自己生活中独特之处的描绘和赞美：他的画室、他前卫的友人、他对自然的特殊感受、他走过的街道、他常去的咖啡馆。”在这种文化和前卫的努力中，女性并没有被同等地包括在内，只有极个别例外，她们能扮演的角色也仅限于情人、缪斯和其合伙人事业的经纪人。事实上，在20世纪绝大部分的时间内，对现代艺术进行详细阐述时，对女性的排斥比实际行为本身更严重。当前卫艺术的形成变得确定和正规化时，这种自觉的波希米亚风格慢慢让位于更为“布尔乔亚化”的习俗，前卫艺术中的男性气质在审美原理中得到表述，绝大部分现代艺术都建立在这些原理上。这些原理被艺术家、批评家和史学家确定为不但具有积极的特点，还具有反对其他选择的特点，文化史学家彼得·沃伦称之为“一连串的对立矛盾”。如他所言，现代主义可被看作是使结构优于装饰（所以毕加索立体主义的线性几何体系优于马蒂斯的色彩感觉体系）；机器对立于身体（现代主义建筑师勒·柯布西埃曾宣称“房屋是用于居住的机器”，这句话很有名）；简约优于过量；西方对立于东方；这一连串对立（其他还可以再加进去）的基础是，“男性气质”对立于“女性气质”。结果，女性现代主义者的艺术被想当然地认为是二流的，除非（甚至有时即使是）它们显现出那些被推崇的男性特征，而且有时它们直接被界定为隐形的。因此，许多女性艺术家，如索尼亚·德劳内，1910到1970年间抽象绘画、时装和图案设计领域的开拓者，李·克拉斯纳，站在20世纪中期纽约抽象派前沿的画家，直到不久前都在靠边站，被看作是各自了不起的丈夫罗伯特·德劳内和杰克逊·

波洛克的模仿者。再举一个例子，超现实主义所寻求解放的欲望是男性 的欲望，这样就几乎不可能产生有任何重要意义的女性超现实主义者。历代艺术史家都是这样理解的，直到最近才有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表明，恰恰相反，列奥诺拉·卡林顿、弗里达·卡洛、多萝茜·坦宁、艾琳·阿加、克劳德·卡洪以及其他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对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意义具有重要作用。同样，并且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20世纪中期纽约画派的艺术被涂上了不可抹去的男性气质色彩，它强调姿势的身体特征，其主要特点被明确地认同为“拼命喝酒，努力生活”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形象尤其是为波洛克而勾勒的。汤姆·沃尔夫 [1] 在1975年对战后艺术世界进行讽刺挖苦的作品《绘字》中，描绘了一个酩酊大醉、赤身裸体、正在一个收藏者为其举办的聚会上往壁炉里撒尿的波洛克。这可能不足为信，但它成为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传说，象征性地表现了20世纪中期纽约前卫艺术家的那种粗俗男子汉的形象。抽象表现主义运动中也有女性艺术家，不是所有人都像李·克拉斯纳和艾莲·德·库宁那样嫁给了这场运动的杰出人物。她们中的一员，海达·斯德恩的照片甚至出现在了1951年的《生活》杂志上，照片的原标题为“性情暴躁的进步艺术家团体”，包括了该运动的所有主要人物。海达·斯德恩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至今仍不为人们熟悉的人物。

女性艺术家：并非无足轻重

对于女性艺术家而言，因为她们面对的是以“男性气质”特征界定的现代主义，而且作出此界定的前卫派其行为和准则都拒绝女性进入其领域对此进行挑战，这就使得女性艺术家除了默默无闻，几乎别无选择。一个选择是伪装：接受并强调表现两性差异的“女性气质”，代价则是放弃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平等。从19世纪晚期开始，批评家就遇到了一次女性画家人数的高涨期，它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一次“女性主义”的表达。批评家们的应对是建立一个“女性艺术”领域，其特点当然

是多愁善感、家庭生活和女性魅力。玛丽·劳伦桑是第一个从前卫主义形成的圈子中，将自己在这一领域内占据的空间变为职业战略目标的女性。从1908年前后起，她用粉红色、蓝色、绿色、灰色蜡笔作画，其作品倦怠的形式和家居生活或富于诗意幻想的主题几乎把“女性艺术”的特点夸大到了几近滑稽模仿的地步，相伴随的是同样夸张的女性人格。晚年她曾这样写道：“如果我没有成为立体主义画家，那是因为我从来就做不到，我没有能力做到，但我对他们的探索充满热情。”此外她还泛泛地声称：

> 如果我觉得离这些画家很远，那是因为他们是男性，他们的讨论、研究和他们的天才总是让我感到惊讶……男性的天才让我害怕。

正如她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她同时还感到：

> 对每种具有女性气质的东西都感到非常适宜放松……小时候我喜欢丝线，常常偷些珠子和彩色的棉线轴，把它们藏起来，在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才看看它们。我一直想要好多孩子，这样我可以给她们梳头，在头发上扎丝带。

伪装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奏效了，批评家对这种强颜作笑报以了殷勤的呵护，劳伦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巴黎画派的艺术史上占据了显赫的位置。近年来，后现代艺术史家开始怀疑她的这种滑稽模仿是故意的，他们解读她的艺术作品时觉得它们充满了讽刺嘲弄；但即使果真如此，这种讽刺嘲弄也是非常微妙的。

即使是那些抱负和审美倾向都与同时代的男性一致的女性也难以挣脱“女性艺术”这一分类界定，人们想当然地假定她们必然直接地展示女性气质特征。美国画家乔治娅·奥吉芙在20世纪头10年中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时，她与当时众多艺术家关注的是同一问题——探讨具象和抽象之间的两可境界，即这样一个领域，其中由线条、形体和色彩所构成的含糊不明的画面徘徊在暗示具象的形式和宣告自我的独创之间。对许多风格互不相同的艺术家，如杜尚、莱歇、康定斯基和蒙

德里安来说，这被认为是摆脱具象表现技法束缚的第一步，这种表现技法曾一度是每一位有自尊的现代艺术家必须掌握的。但只有奥吉芙的作品被人们以性别语境来解读。一位画家朋友在她的作品中看到了“十足的根深蒂固的女性气质”；一位批评家评论说：“在其所绘物体中表现了她的躯体对自身潜意识的认知。”为了寻求一种方式以避开那些她认为是“如此奇怪而又与我对自身的认知风马牛不相及”的男性主义者的陈词滥调，奥吉芙转向以真实而形体清晰可辨的花卉作为其画面探索的主要题材。当她以独特的稀释薄涂方式画出色彩夺目、曲线优美的美人蕉和马蹄莲，并形成画面中形体和空间的微妙对比时（这种策略曾被称为“伪装的抽象”），批评界的反应则更具性别歧视。批评家们根据这些画评价奥吉芙为杰出的（*par excellence*）“女性”艺术家，一个以花卉表现女阴的画家，这种声誉至今仍然主导着人们对奥吉芙艺术作品的认识。然而，当马塞尔·杜尚在1912年完成《新娘》和《从处女到新娘之路》时，其画面中含糊不清的内脏形体显然与妇科有关，却没有人推论说他有十足的根深蒂固的男性气质 。他有关性的暗讽影射被一本正经地解读为故意的讽刺，而非受到内心深处欲望的驱使。

杜尚所玩弄的伪装技巧也同样一本正经。1920年，杜尚做出了一个举动，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他的顽皮聪明和国际象棋手般的战略谋划才能。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化名，叫厄柔丝·瑟拉维，该名的法语发音意为“情色即生活”。这一化名被附在他所制作的各种各样现成品 的标题上，作为一种对性（包括性刺激和性烦恼）的迷恋的表达，处处流露在他的艺术中。但它也戳穿了现代主义的男性的虚荣，朝那符合标准前卫艺术家形象的“现实而又富有诗意的男性”的裤裆处顽皮而又准确地踹上了一脚。1921年，杜尚将自己也变成了现成品 ，他以厄柔丝的身份请曼·雷为他拍了几次照片，其中一张杜尚身着毛领大衣，头顶钟形女帽，配戴珠宝首饰，脸上浓妆艳抹，其面部表情有人认为和《蒙娜·丽莎》相像。杜尚曾在两年前对她那永恒的性诱惑进行了一番恶作剧般的调侃，用铅笔给她的复制画像加上了八字须和胡须，并惯以标题L.H.O.O.Q.（其法语发音听来像是“她有一个性感的屁股”），

制成了一件现成品 。在这些照片中，厄柔丝的穿着特别时髦，杜尚以穿着异性服装的方式对女性气质进行调侃扰乱，其做法既是对当时性状态的阐述，也是对艺术史的阐述。

现在情况依然如此。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艺术家辛迪·谢曼使用伪装策略进行创作，厄柔丝继续像影子一样出现在这些假面背后。谢曼最早的作品由假定的“无标题电影静止照片”组成，黑白照片里的年轻女性出现在不同的场所：穿着性感毛衣和短裙的金发女郎坐在窗台上，凝视窗下的景色（图14）；一个打扮入时的女子半身像，她站在城市的街道上，面带焦虑从照片中向外看；一个搭顺风车的人带着箱子站在路边。所有这些照片看起来都取自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影，但又很难确定是哪部电影，而所有照片里的人物都是谢曼自己。我们知道这一点，然而画面上的女性外貌、穿着和举止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我们很难相信她们是同一个人。我们的知情与这一可变的外观之间的冲突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女性属性和女性气质被构造出来 的特征。在假面下寻找“真正的”谢曼是徒劳的，反而会凸显谢曼不断变换各种身份的计谋。这些摄影与电影中关键镜头的相仿之处，如希区柯克或道里斯·戴的影片，展示了这种计谋构建中所使用的技法和假设。

图14　辛迪·谢曼，《无题电影第15号》，1978年

谢曼随后的作品继续对这些问题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她对“古代大师”的绘画作品进行了一系列恶作剧式的模仿，以此来探究艺术史，后来的小丑人物系列的假面下掩盖的其实是令人不安的“别的东西”。然而，那些早期摄影充满了女权运动复兴的力度，至今仍无人能超越，该运动的直接攻击对象就是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这些作品正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和20世纪70年代的那场运动有联

系，而且大家普遍意识到了待遇的不公正，这些摄影作品曾经并将继续引起共鸣，如同70年代及其后不断增加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一样。同样产生突出效果的是美国艺术家巴巴拉·克鲁格[2]的集成照片作品，她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探索女性气质的社会结构。克鲁格是康泰纳斯出版社的前美术编辑，她运用杂志版式设计的格式，即宣传式的标语、夺目的红色通栏大字标题、有光泽的黑白照片，来树立那种她们所宣传的以女性的性特征为前提的价值观。这种作品的力量来自女性解放的话语，进而又丰富并传播了这一话语。

这些艺术通过批判地再现女性在许多方面被迫使其自我意识适应由男性统治的社会的要求，推进了女权运动。此外，这一运动的冲力和广度反过来又从根本上修正了艺术家的形象以及他或她发挥作用的文化空间。这一修正有三种基本形式。一，女权运动迫使人们认可过去女性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丰富了当代艺术家所拥有的历史遗产，并为当代女性艺术家提供了新的榜样和灵感。最先出现的里程碑作品之一是一件雕塑作品《晚宴》（图15），在艺术家朱迪·芝加哥[3]指导下于1974到1979年间由集体创作，它是一种姿态，体现了女性文化实践的传统，体现了不同于人们所意识到的大男子主义的个人主义。这件作品用39张餐桌组成了一个三角形，每张餐桌都以一位过去的女性艺术家或女性作家的名字命名（奥吉芙是其中唯一活着的艺术家；其他还包括诗人埃米莉·狄更生和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每位艺术家的位置上都摆放着一个陶制盘子，里面装着呈阴道形状的物体，用来象征她本人。

图15　朱迪·芝加哥，《晚宴》，1979年

在其后有一些恢复女性地位的作品，表现手法和语言多种多样。其中包括1981年由柔斯卡·帕克和格里塞尔达·波洛克撰写的艺术史书籍《老情妇》，以及第二年由劳拉·穆尔维和彼得·沃伦策划、在伦敦白色小教堂区画廊举办的画家弗里达·卡洛和摄影家提娜·默多提的作品展。该展览在德国、瑞典、美国和墨西哥巡回举办，在西方艺术观众面前，把两位女性艺术家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作品提升到了空前的和应有的地位。卡洛和默多提都有部分墨西哥血统，都触及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后繁荣时期墨西哥前卫艺术的中心，和上个世纪众多重要女性艺术家一样，她们的光辉最初也被比自己更有名的丈夫所遮蔽。卡洛的丈夫是墨西哥著名壁画家迭戈·里维拉，而默多提的丈夫是美国摄影家爱德华·威斯顿。从这次展览开始，通过后来的展览、书籍、海报和电影，卡洛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受尊崇，但这是因为要在一个典范标准中强调涉及恢复女性艺术家地位的问题，而这一典范标准的前提是，除了性别，其他方面并没有被打破。卡洛在1954年40岁出头时去世，人们纪念她的方式是活着的艺术家不可能享有的。25年

前的一次交通事故对她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她在绘画中执着地探讨交通事故对于作为女人的她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些作品是隐私性和个人象征性的，但它们也直接地、准确无误地触及到了其他人可以共享的主题：她的女性身份、墨西哥人身份；身体、出生、死亡；流行文化与高雅文化；她与那位有影响力而又不忠诚的男人里维拉的关系。最终，卡洛不仅变得备受崇拜，而且她个人经历的苦难和成为性别歧视牺牲品的背景非但没有搅乱现代艺术的典范标准，反而巩固了它，因为它是建立在饱受苦难的、具有英雄气概的艺术家形象之上的。卡洛的经历和绘画方式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大男子主义的现代主义的选择，同时还具有使她进入英雄群体的特征，使得那些确保男性之伟大的艺术机构和规则能够毫无愧意地将她的作品收入其列。

正是这样的问题和与其相关的“有必要地”阐述女性艺术的基本形式，甚至是无意识地将她们的性别作为标记，使得《晚宴》在女性主义者中成为了有争议的作品。它坚持将艺术与它所捍卫的女性性别联系在一起，在许多人看来，是将所有 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强迫纳入同一生物规则中，这种规则曾将奥吉芙锁入困境。该作品在歌颂“女性”身体特征的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创作艺术的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方法演变成了对由男性创造的现代艺术的第二种挑战。同形式主义与世隔绝的抽象和极简主义及概念艺术的枯燥理论相对比，许多女性艺术家试图把自己的美学观点建立在对自己身体的属性和差别的肯定上，另外一些女性艺术家则是肯定而非否认其生活经验。这些关注的本身并不能划分出当代女性艺术——罗伯特·劳森伯格和克莱斯·奥登伯格即是（如劳森伯格所说）在“艺术与生活空隙之间”创作的男性艺术家。然而就整体而言，女权运动的动力（更不用说其口号“个人即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她们更专注于其自传与具体化身的统一，有时甚至带上了程序化的特色，这种倾向影响了整整一代女性艺术家，而这类作品也有较广泛的适用范围。艾娃·海斯在1970年34岁去世之前创作的雕塑作品中（图16），表现出她对极简主义所关心的艺术客体性和工业材料同样感兴趣，但其中却糅入了一种扭曲了的官能意识，并以此看待这些无声作品的身体内涵和潜在象征，这就给极简

主义的严肃带来了一些显然是低俗的、社会化的性别幽默。

图16　艾娃·海斯，《无题，或尚未有》，1967年

另一个极端是，玛丽·凯利 [4] 在1974到1979年间创作的复杂作品《生育后文献》展示了一位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发展史，与占统治地位的认为母子关系是“自然而然的”的观点背道而驰。这件作品综合了几种不同的文献资料，包括孩子在不同材料（从弄脏的尿布到铅笔涂鸦）上的身体痕迹与姿势、孩子的饮食安排、母亲本人对各种经验进行思考时所写的日记、弗洛伊德与拉康著作中论主体性的理论性建构。它对所有这些进行了视觉展现，以对比她所谓的“脚本式图像”方式。凯利的作品在主题内容和理论复杂程度上均颇具开创性。

庆祝女性已取得的成就、强调女性气质的社会建构和女性属性的身体特征受到了欢迎，但很多人认为这些应该与挑战艺术世界本身联系在一起。在进行这种意识形态和史学水平上的挑战中，《老情妇》这本书最具效果。在回答诺克琳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时，帕克和波洛克提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论点，即“伟大”一词从历史上而言一直被定义为“男性的”（如我所指出的，这一理论后来又被克里斯丁·巴特斯比 [5] 进一步发挥），她们还指出这种定义通过艺术史教学、艺术书籍出版物和展览策划中的性别偏见得以实现。她们的著作为开辟女性主义挑战艺术实践和艺术领域的第三条道路增强了动力。这就是促使尤其是北美和欧洲的女性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和艺术史家，攀登当代艺术要塞之墙的动力，不仅要征服它还要拆除它。这种集体运动在英国国内的表现在帕克和波洛克6年后所著的《构建女性主义》一书中另有记录和评述。如她们在书中所指出的，寻求与男性平等的认可和挑战父权制艺术世界的两分法：

……反映了妇女解放运动中类似的区别。女性是应该寻找使自己成为专业人士的机会呢，还是抛弃那些附着在专业性上的装饰物，以便实现对由女性创作的一切进行艺术的认可？一方面，艺术家联盟中的妇女工作室正在为专业工作条件的革命化而斗争，另一方面，有些人则认为为了让传统上与女性有关联的技术被认知和重视，专业/业余、公共/私人、纯艺术/装饰艺术之类的等级制度应该统统被铲除。

在《构建女性主义》所记载的15年的历史中，女性开拓了一系列不同的艺术创作实践和展览实践。“女性主义者”是一个通过邮递进行艺术交换的项目，最初由凯特·沃克和莎丽·高勒普在1974年开始进行。她们的目的是绕开艺术创作中所遇到的困难，比如需要照料年幼的孩子和只能在厨房工作台上创作等。两年以后，又有十几个人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并创作出了200多件以“家庭主妇和母亲”艺术家为主题的作品。沃克编织了一件挂毯《是艺术但恐怕不是发自内心的/自制的》，并用钩针钩制出装着熏猪肉和鸡蛋的“全套英国式”早餐盘。其他作品还包括一个黑色的魔术箱，里面装着用巧克力做成的女性身体部件；用混凝纸浆做成的一盘沙拉，上面一个斜倚的裸体女性取代了火腿的位置。这些作品在英国各地的画廊展出，包括伦敦的现代艺术协会。

另一艺术策略和艺术类型是行为艺术。行为艺术作为一种往往更直接的艺术交流方式，吸收了大众流行文化及前卫派运动的传统，如达达主义、未来主义以及纽约艺术家的“偶发艺术”，把身体当作一种象征和资源，如活跃于纽约的卡洛里·西尼曼[6]，她的行为艺术很有代表性，如她自己所言，是“被剥光了的毫无修饰的人体”；或如同苏珊·希勒[7] 1973到1974年间在伦敦创作的作品《街道游行典礼》和《绘制梦的地图》，在参与性活动中使许多观众加入。在此后的10年里，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艺术家从事行为艺术创作，作品规模也迅速扩大，以至于帕克和波洛克在1987年指出：“今天没有行为艺术的女性主义艺术展是极为罕见的。”此外，各种展览被安排在非艺术性的场所举行——图书馆、废弃的工厂或仓库、托儿所、破败的房舍。最初人们使用这些地方是受条件所迫，后来艺术家越来越多地刻意去寻求这种展览空间，以避免与画廊的习俗相关联。但显然这些另类的新地点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在1970年纽约的惠特尼年度展及随后的洛杉矶、华盛顿和伦敦的海华德画廊[8]年度展上，反对将女性排除在重要艺术概况展之外的呼声日趋高涨。与此同时，全部由女性加入的画廊，如纽约的露天大展[9]，弥补了那些展事中性别方面的不均

衡。到1980年的时候，这些策略开始取得成效。这年秋天，英国现代艺术协会连续举办了3次全部由女性艺术家参加的重要展览，公开宣扬其女性主义的色彩。

然而，以现在的视角来看，显然，到《构建女性主义》一书问世时，女性艺术运动，像普遍的好战的女权运动一样，其势头的巅峰已经过去。这一文集大多记载了这一运动高峰过后的残留，展示了该运动的丰富多姿。该书在这一时期出版问世，说明了在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的里根主义占据上升地位、它们支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变了文化潮流，这时，需要对该运动作一下盘点。在该书的介绍概述部分，强调这一运动的收获的同时，另有一种深情的告别。这些收获是真实而又长存的，现今在当代艺术实践中如果没有女性的重要参与将是无法设想的，西方世界的艺术学校培养出的男生和女生数量相等。波洛克式的粗俗男子汉形象和毕加索那样的炼金术士-傻瓜-好色的天才形象，已被现代派艺术家视为陈旧过时的榜样。这一切都主要归功于女性主义对传统的挑战。

另外，其示范作用还为其他被忽略的团体去挑战艺术家的白人/西方模式开拓了道路。在我们下面要研究的问题中，后殖民主义和性政治对如今的持续不断的现代艺术形象和实践现况的重新排列都作出了贡献。但这一进程中依然存有一些障碍，女性主义甚至出现了一些倒退。在艺术世界中，如同在普遍的社会中，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同以前相比没有多大改变：在市场中仍然是男性经纪人说了算；大部分艺术奖项仍然是由男性摘得；女性高端策展人仍旧占少数，这些在整个经济社会中都有所体现，无论是公众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往往是通过富有同情心的策展人的作用，女性主义艺术才被吸纳进了博物馆文化，而其在性政治方面的激进性随即被淡化，并被重新推上台面，变成了一种展示。路易斯·布尔茹瓦〔10〕的雕塑作品在2000年被泰特现代艺术馆作为特尔宾大厅展览项目的开幕展就是一个例子。更年轻一代的女性艺术家通常和那些自称为“后女权运动支持者”的年轻女性一样，将20世纪70年代的那些女性同仁所取得的成就视作理所当然。

这使我们又回到艾敏，因为如果想要回答我在本章一开篇提出的

问题，就必须将她的作品放进这个背景中。艾敏和其他“青年英国艺术家”（萨拉·卢卡斯是其中最突出的人物），用时下的说法获得了“野蛮女”的称谓。她们那冲动的、性直白的艺术以及在公共场合的极端行为被视为是一种更多地与工人阶层的年轻男性有关的令人不悦的粗俗，这在以前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不允许发生在年轻女性身上的。卢卡斯的“自画像”《两个煎蛋和一串烤羊肉》就很具有代表性，这些东西被放在一张简单的桌子上，暗示着她的乳房和性器官，用厕所涂鸦式的粗野去挖苦高雅艺术中斜倚的裸体。艾敏的作品在具备这种特点的同时，也间接地涉及到了女性主义的前驱者以及其他前卫艺术家。她缝制、刺绣、镶饰出的毛毯充满了女性的愤怒和绝望的忏悔宣言，她用这些毛毯回顾女性手工活动的传统，回顾弗里达·卡洛作品中自传性的、大众的象征主义和风格。艾敏的这些作品令人激动地、并有意识地以当代街头语言和时装杂志图片或政治壁画的方式将卡洛的风格和她饱受苦难的人格面貌重现舞台。在另一件1995年创作的作品中，艾敏将字句“每一个曾跟我睡过觉的人，1963—1995”镶饰在一顶现在已臭名昭著的帐蓬上，众所周知该帐篷最终被烧毁。在她的那个“睡伴花名册”中包括两个流产胎儿、她的孪生弟弟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名字，艾敏有意地玩弄了观众会从这些名字得出她乱交的假定。她知道“我们”会将这件作品理解为对自己性能力的宣告，但她说，作品中包括这些东西事实上更多的是指同床共眠的亲密关系而不是同床做爱。作品的讽刺意味不只是围绕着人们对放荡女性的令人讨厌的陈词滥调和性色推测，还玩弄着她自己的名人身份以及“坏女孩”的人格面貌，这是她与媒体串通一气打造的一个自我形象。艾敏用反身指代和事先预谋的方式阐述这一关于“名人艺术家”的主题，如她对女性主义的认同，她吸收了以前的实例作为源泉，并将她的报复编织进作品的模糊性中。她的这种方式基本上没得到什么赞扬。

波普偶像

“名人”现象是大众媒体的产物。除了名字家喻户晓这一“名气声望”所应有的标准外，它还暗示着一种与观众的间接亲密，这种假象的产生是因为名人的形象在我们日常社会环境中无处不在。当然，自从有了覆盖面广泛的报刊后就有了名人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名人”一词也在这时被附带创造出来，但却是在二战后由电视作领军力量的高速增长的大众媒体渗透进了整个社会生活之后，“名人”一词才获得了今天所具有的含义和光辉。所以，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就当代意义而言，艺术家首先成为“名人”也就不是巧合了。杰克逊·波洛克就是一个早期的典型。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时，现代媒体还尚未达到渗透状态，他是第一位，甚至在他的前卫主义声望尚未稳定之前，大众出版物就进行了广泛宣传的现代艺术家。最初是《生活》杂志使波洛克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该杂志奉行旨在弥合“艺术家与民主社会之间的分歧”的政策，在1948年的10月刊中发表了它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主办的“现代艺术圆桌会议”的图片纪录报道，其中波洛克作为主角，代表着现代艺术中最极端的潮流。一年后，《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配有跨页图片的有关波洛克的报道，其通栏标题为《杰克逊·波洛克：他是美国活着的最伟大的画家吗？》。和通俗出版物通常讽刺前卫艺术的敲打行为大相径庭的是，这些文章的基调是尊敬的、甚至是同情的，并单独将波洛克提出来以引起重视，使得他的名字广为人知，变成了一个媒体的识别标志，这不久就被其他人沿用。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塞西尔·比顿1950年的《时尚》杂志摄影集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波洛克的名气不是他特意追求而来的（尽管看上去他并不为其到来而后悔），而且也不完全是在他的艺术实践之外的。安迪·沃霍尔则相反。他一直都在追逐名气，其原因跟大多数人并无两样。他从图案设计开始步入自己的职业生涯，后来从画鞋子插图转到绘画创作，很明显是因为后者似乎预示着更大的名誉。自孩提时代起，沃霍尔就对名人非常着迷，他选择名人形象本身作为创作主题和他对名人狂热的痴迷是一致的。沃霍尔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声名鹊起，不仅因为他专用名人作主题，比如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杰奎琳·肯尼迪的

丝网印刷品，更因为他将名人身份的获取机制和象征玩弄于股掌之中。他模仿好莱坞的工作室体系，从自己的朋友圈里发展出自己的“明星”团队，并通过将他们封为“超级巨星”在其身上增加赌注。如文化史学家约翰·沃克所说，与好莱坞签约的明星不同，这些人实际上是一群杂七杂八的与社会不合拍的人，“没有薪水、未经训练、缺乏指导，最终无人雇用”。沃霍尔拍摄有关这些人参与多种媒体事件的电影，还征募了一个名为“地下丝绒”[11] 的摇滚乐队来为那些电影伴奏。该乐队后来的名声对有“超级名人”美誉的沃霍尔大有裨益，这种超级名人不但自身有权利享有名气，还可以操纵名气，在沃霍尔看来，名声本身也是一种艺术材料。对名声的操纵体现在好几个方面。沃霍尔继续保持着对明星地位的迷恋，将自己的社会生活变成了一种艺术实践。他用相机和磁带记录自己的每一个电话和对话，在1969年创办了杂志《采访》，刊登电影明星和其他名人魅力四射的照片。沃霍尔自己的装扮，如同他的随行人员中那几个异装癖或男扮女装者一样，都是一场无休止的假面舞会：浓妆艳抹，配有一系列的假发套（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拥有50顶假发套），正如有些人所说，这些都帮助他以自身来表现“美化、改头换面、转变和穿着异性服装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这些花样繁多的人物面目背后，在他所有的作品背后，沃霍尔似乎在着力暗示这不是他内在的自我，而是一面镜子。这样的做法显然摧毁了传统意义上艺术家独特的、具有创造性和原创性的形象，他做得如此成功有效，使得公众对其策略的性质深感怀疑。这种摧毁需要始终保持绝对的、思考性的、富于魅力的门面形象，几乎容不得一丝他的 嘲讽和他与该形象的脱离。最终，沃霍尔的艺术其真实作品本身超逾了其名人主题；但正是他对该主题投入的模棱两可性，而非他的艺术，持续地引发了人们的兴趣和好奇。

其他现代艺术家为成名而采取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采用了“萨满教巫师”的人物面具——穿着斗篷，处于一个类似魔术表演的神秘氛围中，其背景来自一个他多次叙述过的故事。二战中，他作为纳粹空军飞行员，在克里米亚地区上空被击落后被当地部落男子所救，他们在他身上涂抹动物脂肪，并用毡子把他裹起来

（这两种物品后来在他的作品中被频繁使用）。这种神秘性被一种与动物之间存在的相似性进一步增强，如在博伊斯1974年的作品《我喜欢美国，美国也喜欢我》中，他身裹毛毯，与一只丛林狼在纽约的一个画廊里共同居住了3天。英国艺术家组合“吉尔伯特和乔治双人组”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一开始就通过一种怪异的表演角色和行为去塑造自己的名气。两人最初都拒绝被认定身份，他们既不是吉尔伯特，也不是乔治（后来他们放弃了这种方式），他们将自己变成“雕塑”而不是“雕塑家”（他们早期的作品为现场的行为艺术表演，他们穿着同样的粗花呢西装，满脸涂金）。20世纪80年代，他们以怪异为特点的名声得到了巩固，这主要得助于他们许多高超的摄影作品带来的知名度，这些作品将城市青年形象和种族主义的、同性恋恐惧症的涂鸦综合在一起。这种由粗花呢式的沉默和街头暴力组成的并置对比，光鲜浮华，给人一种紧张兴奋感，对艺术（或更广泛的）媒体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确保了他们的艺术明星地位，使其享用至今。

也许与其他当代艺术家相比，翠茜·艾敏更是紧随沃霍尔的脚印，她拥有沃霍尔为自己开凿出的那种“艺术家 - 名人”的空间，同时又在一些重要方面发展了它。和沃霍尔一样，她似乎也是运用模棱两可的策略。作品坚持不懈地关注自我，有着特殊的张力，伴之以对痛苦的过去毫无畏缩的揭露；将自己的版画作品（通常是独幅版画，从风格和主题上来看，似乎未受过专业训练，乱涂乱画，粗野的程度就像厕所里的涂鸦）与同样毫无艺术性可言的摄像和摄影等公共媒体结合在一起；她本人和这些作品时刻准备着上时尚杂志做模特，做商品促销广告，上电视参加问答测试节目；所有这一切使得艾敏的作品给人以自我专注、哗众取宠、渴望一鸣惊人的第一印象，可谓天真至极，甚至是愚蠢幼稚。如此而言，它们似乎是自发的、不假思索的、未经雕琢的，其质量也是值得怀疑的，如同大多数媒体（艺术批评家或小报记者类人士）所断言的那样。然而，正如我所说，它不但是“故意的”，而且还浸透了自觉的文化参照。艾敏的许多作品借鉴于艺术史，她拐弯抹角地不断重复从席勒到爱德华·蒙克的北欧式的自我专注；她在2001年对弗拉基米尔·塔特林1920年创作的雄心勃勃的乌托

邦式建筑物《第三国际纪念碑》（图5）进行了“随意的”模仿，创作了《自画像》（图IV）；她借鉴了19世纪前卫艺术之父居斯塔夫·库尔贝绘画中性描叙的坦率；还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观念艺术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她吸收的其他元素还包括大众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比如微微恩·维斯特伍德[12]，艾敏不仅在日常生活中穿着其设计的服装，还为其作模特。事实上，文化史学家乌尔里希·莱恩[13]曾说过，艾敏是艺术界的维斯特伍德，维斯特伍德是时装界的艾敏，两人都是“主观非理性、情绪赤裸裸，因此也就非常的女性，她们都是各自所处年代里获得了性解放的‘野孩子’。”此外，在一些作品里，艾敏不但清楚地表现了她对自己名气的意识，还又一次重复了沃霍尔的做法，把名气当成创作素材。在2000年的作品《我全都有了》中，她使用了喷墨照相印刷术（一种毫无艺术含义的媒介），作品中的她坐着，穿着低胸超短裙，朝着镜头两腿分向叉开，在她那分明未穿内裤的胯部塞满一大堆的钞票和硬币。图像和标题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双关意味。在这幅富有艺术家的自画像中，性和金钱的隐喻彻底暴露无遗。

图IV　翠西·艾敏，《自画像》，2001年

这样，艾敏的作品既是也不是人们第一眼看到它时的含义。它是“我们”一眼看到的那些东西，也是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每次展览的名气，这种名气来自于观众，也来自于制造并维持着名气的高于一切的“名人”机制。她与这些机制和驱动这些机制的媒体业合谋，就像驯

兽师把头伸到马戏团里的狮子嘴里进行表演一样，都是危险的游戏，前者是必须如此，后者是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一个是冒掉脑袋的风险，另一个则是冒失去批评上的独立性的风险，这种独立性追求有别于占统治地位的艺术的意义范围，是现代艺术的生命线。问题是，狮子究竟有多饿？媒体究竟有多贪婪？观众付钱要看的到底是什么？

注释

〔1〕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美国重要的版画家及漫画家。

〔2〕巴巴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1945年生，美国观念艺术家，她的作品多数使用黑白照片为背景，然后加上红底白字的话语。

〔3〕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1939年生，女性主义艺术家。

〔4〕玛丽·凯利（Mary Kelly），1941年生，美国观念艺术家、教师及作家。

〔5〕克里斯丁·巴特斯比（Christine Battersby），美国活跃在哲学、性别研究、视觉美学和文学美学领域的重要的女性主义学者。

〔6〕卡洛里·西尼曼（Carolee Schneemann），1939年生，美国视觉艺术家，探讨用身体、性和性别作艺术。

〔7〕苏珊·希勒（Susan Hiller），1940年生于美国，但活跃于英国，擅长装置、影像、摄影、表演和写作。

〔8〕位于英国伦敦南岸中心的海华德艺术画廊（Hayward Gallery）创建于1968年，每年举办三四个艺术大展。

〔9〕纽约露天大展（New York Air Show）是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在纽约的琼斯海滩公园举办的露天艺术大展。

〔10〕路易斯·布尔茹瓦（Louise Bourgeois），1911年生于巴黎，后移居纽约，著名雕塑艺术家。

〔11〕“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是60年代后70年代初活跃于美国的一支摇滚乐队。

〔12〕微微恩·维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1941年生，英国女服装设计大师，将“朋克”和“新潮”引进了服装设计的主流，也是一名积极的政治活动家。

〔13〕乌尔里希·莱恩（Ulrich Lehmann），英国的美术史家，任教于英国创作艺术大学学院。

第四章

炼金术实践：现代艺术和消费主义

马戏表演在19世纪末是深受前卫艺术家青睐的主题。修拉画过，毕加索、夏加尔、虔诚的天主教徒乔治·鲁奥以及其他许多画家都画过。一部分是因为在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被边缘化的、具有波希米亚风格以及游牧民族冒险精神的表演团体中，他们看到了自己（或许是被美化了的，但毫无疑问是被浪漫化了）的形象。另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就是喜爱马戏团。100年以前，去马戏团看表演是一项非常流行的娱乐活动，大多数大城市都有永久性的马戏表演场。其中巴黎一个名叫美德哈诺的马戏表演场，从蒙马特区的工作室聚集区下山坡就是。但看马戏只是当时流行的多种娱乐方式之一，在1914年以前的十来年，这种休闲娱乐方式很快被更时髦流行的事物所取代，尤其是电影（1900年巴黎有5家电影院，到1914年，增长到了近300家，此时伦敦和纽约则分别拥有400多家），其他还有歌舞表演场所、音乐厅和以刊登大量荒诞离奇、投人所好的故事、连环画和路边广告来吸引注意力的廉价报纸（俗称“便士”报纸）。在这个十多年内，不但在欧洲出现了第一次前卫艺术团体的繁荣，在美国也出现了消费主义和商业化的娱乐。百货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售新的耐用消费品，如缝纫机、电话、电灯这些家用和休闲用品，宣传这些产品的广告刊登在廉价小报上，养活了这些小报，而张贴这些报纸的广告牌改变着每一座城市的面貌。对任何一位自我标榜的现代艺术家来说，这种发展变化所创造出的繁荣而崭新的图片环境都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主题。

这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很相似。微型芯片的发明引发了新传播媒体和娱乐活动的繁荣发展，颠覆了各类市场和社会行为方式，消费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似乎不可阻挡；同样，对这种文化，尤其是对庸俗艺术的痴迷，似乎在艺术表现的主题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杰夫·昆斯制作的迈克尔·杰克逊的小陶瓷像，到1997年在皇家学院举办的“耸人听闻”展，到马修·巴尼[1]在史诗性多媒体电影《悬丝系列》（1994—2002）中对美国波普文化形象的不寻常的抄袭，庸俗艺术在当代艺术中似乎无所不在，几乎使得现代艺术家若不欲与社会脱节，就必须使用庸俗艺术的元素。这种发展方向的明显相似性为这一艺术的早期阶

段开拓了新的领域，诱使当今观众愉快地参与这种“低级”文化，这种同流合污早先曾让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克莱蒙特·格林伯格大皱眉头，他一向坚持纯粹的“高级”艺术传统的优越性。这种引诱是解放性的，但我们需要谨慎对待。研究历史所得的基本经验和乐趣之一，就是过去始终在变化。它的基本轮廓在变动；当以不同的“现在”的眼光看待它时，新的特征便变得突出，在这种变化中，其他特点则被抛在一边。因此，我们必须小心区别什么是100年前对前卫艺术的大众流行商业文化的迷恋，什么是我们目前看起来与之类似的迷恋。我们还应该关注前者不受我们瞩目的方面。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最重要的就是对现代主义“事业”——构建新的视觉语言以适应现代世界的现实——的奉献，这与我们自己丧失的奉献精神（或许我们会对此感到内疚）形成了强烈对比，这种丧失体现在术语“后现代主义”上。换言之，我们对“低级的”以及它与“高级的”之间边界的消亡所抱的热情与他们 不同。实际上，文学史家和文化评论家泰瑞·伊格顿[2]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以“具有革命性的前卫主义为代价的一个不健康的笑话”。他认为在后现代主义商品化的艺术品中，“前卫主义者有关艺术与社会相互融合的梦想以一种丑陋的漫画形式回归了”，早期那些乌托邦式的希望“以反乌托邦式的现实方式侵袭、歪曲，并反过来嘲讽它们”。他为何这样表述？他这样表述对吗？他的主张对现代艺术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这些是我们本章要探讨的内容。

从废物到黄金

我认为，毕加索1914年的小幅作品《静物》（图10）的核心在于他创造性的想象力。凭借这唯一的手段，他像一位炼金术士一样，将弃材中的“废物”变成了艺术中的“黄金”。在制作手法的极端经济之下蕴藏着体现丰富含义的巧妙构思，因为它同时在设法摧毁当时普遍的传统，即必须用合适的材料进行雕塑创作。它与杜尚创作于同一年的《瓶架》（图4）一起宣布了艺术创作中理念是最重要的，并提出

想象力，或者说天才的想象力，应被看作理念等级中的最高级别。通过这件作品和其他成打的用碎木块、金属及黏糊的纸张拼贴而成的作品，毕加索展示并享受着自己炼金术士般的才能，这最终成为了他个人艺术中的关键词。这些作品从1913到1914年间开始充满了毕加索的工作室，使用的材料都是被丢弃的批量生产的型材、容器和现代消费主义的代表物。从那时起，这种艺术便表明了毕加索在材料和形式转化方面的天才。他的雕塑尤其如此。与此同时，它们展开了一场反对现代消费的千篇一律和铺张浪费的游击战，巧妙地重复利用现代消费社会的产物，以似乎轻而易举的方式化腐朽为神奇。在毕加索1951年创作的《狒狒和年轻人》中，两辆底盘相互连接在一起的玩具汽车构成了狒狒的头，一只罐子成了狒狒的身体；在第二年创作的《鹤》中，一根水龙头变成了鹤的头，一个餐叉被当成鹤的脚；在1945年创作的《气体维纳斯》中，一个环形煤气灶变成了维纳斯的躯干；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在1943年将自行车车座和车把手魔术般地变成了《公牛的头》。

他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的娴熟机敏令人瞩目，它们以其完整性向观赏者展示了（同时它们也完全依赖于）毕加索的创造性想象，仿佛走在高高的钢丝上的小丑一样既有趣，又惊心动魄。但和小丑一样，这需要一系列在早年就精通的技巧。比如创作于1914年的《静物》（图10），不但打破了当时在材料选用方面的传统习俗，而且如我前文所说，还使得两种不同的表现语言相抗衡——面包和刀子“平淡无奇的”相似性与玻璃杯、杯口边缘和柠檬片的“图像式”展示相对。而后者，追求一种语言的意象，是立体主义特有的语言和一种简略的表达方式，闪烁着视觉的双关语和与不同的艺术再现语言的联想，如技术性绘画的、漫画的或属于过去的艺术的。当他在1909到1914年间与勃拉克一起对这种“自发的”属性进行精心探索时，他们的作品对大众而言变得越来越难以解读，除非是已入其门道的人。这种解读的困难至关重要，因为当毕加索以反叛的姿态利用这些“非艺术”手段和材料反抗各种清规戒律时，他同时需要避免自己的 艺术溃变为这些手段和材料，即防止它被还原成商品价值。因此，用一位现代批评家的话来

说，像毕加索这样的现代主义者的作品“加厚了它的结构，扰乱了它的形式，阻碍了它即时具有可消费性。”它并不总是如此地难以解读；毕加索从立体主义里发展出一系列灵活的原则，使人们能够联想到多层次的艺术表现并将它们交织在一起，正是这些原则贯穿在我所提到的那些雕塑中。它们来自毕加索对漫画和漫画中的简单图式的喜爱，又把漫画中的幽默带回到这些作品中。但对于其他现代主义者和毕加索的大部分艺术来说，这些原则建立的基础——“自发性”，和“加厚的结构”，即难以解读性，都显示出了他们作品的特色，这些与炼金术一样重要。对后来的艺术家而言，毕加索所施展的这些特征证明了一种方式，它既承认消费文化的生动活力和形式方面的视觉吸引力，又在这些形式和这些形式的艺术之间划分出一条界线。

我们可以在美国雕塑家大卫·史密斯的作品中发现这种平衡（或张力）。史密斯是与杰克逊·波洛克同时代的人，也是他那个圈子的一员，20世纪30年代史密斯最初在斯图贝克汽车流水线上工作，以此来维系自己的艺术实践，毕加索的金属焊接雕塑激发了他的灵感，引领他将两者的技巧结合在一起。在35年的职业生涯中（深具悲剧性和讽刺意味的是，1965年他死于一次车祸），他创作了750多件雕塑作品。他的作品是现代雕塑几种不同传统的融合，特别是引入了立体主义的自发性使其能够承载重工业的形式和材料。和同时代的雕塑家们一样，史密斯追随毕加索使用“现成的”物体，但他不是以令人乏倦的天真去重复毕加索式的幽默，这样做很快就成了俗套，而是看到了进行艺术再现的体裁所具有的潜力，即雕塑如何代表人、物或品质。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通过将汽车与机器部件结合为越来越抽象的雕塑，史密斯接触到了一系列要关注的问题，如我们所见，这些关注在10年后由极简主义及其反对派作了清晰的表达，即合成的复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联系，“戏剧效果”和“简单呈现”之间的联系（尽管他自己没有这样表述）。尤其是过去对史密斯雕塑作品组成成分属性的追溯比较模糊，使得它们被笼统地认为与工业材料和方法有关联，后来，他使用的现成材料的范围缩小到了预制的杆秤体块、锅炉水箱两端、“工”字形梁和矩形不锈钢钢板（这些钢板后来成了他的惯用技

法）。1963到1965年间创作的系列作品《立方体》（他到去世都没完成）由28个非常完美的、大多体积巨大的体块组成，灵巧的组织结构和由高度抛光打磨产生的反光的表面效果减轻了其重量感，史密斯以这样的构造表达了对钢铁时代的敬意，这一敬意也体现在他对上述雕塑问题的持续探索上。这一个系列的倒数第二件作品《立方体，XXVII》（图17）是一件代表作，具有纪念碑意义，可以被看作大门、栅栏或框架，闪烁发光的表面和精细的拱形焊接结构似乎摆脱了重力的束缚，框内没有任何“核心”元素，正面图式布置不容忽视，所有这些都在否认作品的物质性，甚至否认它的深度，自发地玩弄着二维空间的错觉，使它看上去就像一幅巨大的立体主义绘画。这与毕加索的《公牛的头》中的机智相去甚远，但它指向了工作室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含有一种高贵伟大感，同样震撼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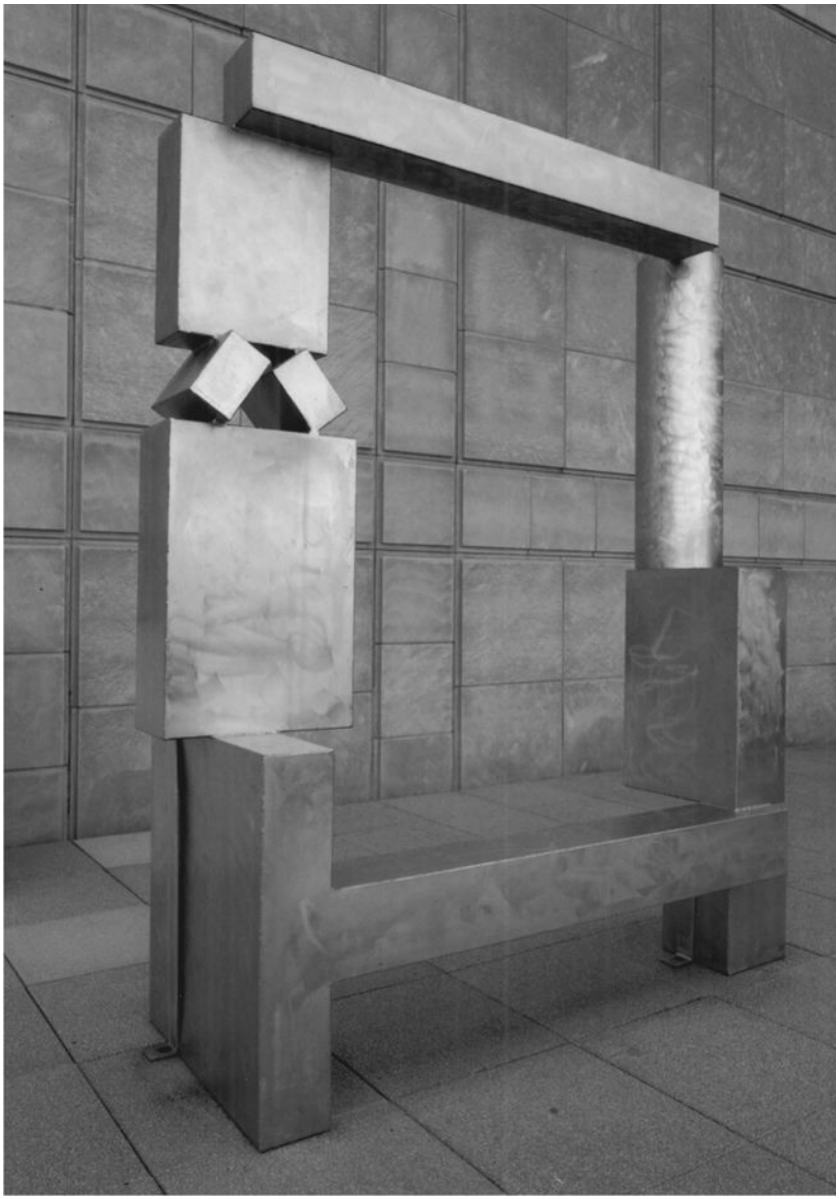

图17　大卫·斯密斯，《立方体，XXVII》，1965年

史密斯所选择的途径体现了现代主义的自发性要求，即坚持一件艺术作品要将材料本身和传统放在首位。这一要求使得20世纪60年代

的雕塑逐步走向极端的抽象主义，远离了毕加索所陶醉的与大众流行文化艺术进行的生动对话。甚至极简主义的挑战也被涂上了一层厚厚的艰难抽象的色彩，它强调以“客体性”作为媒介材料的基本点，并以史密斯后来按照这一原则创作的作品为范例。极简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分水岭。它不但为雕塑实践开拓了一个在手段和方法上都更为广阔的领域，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还揭示了现代艺术的基本原理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即依赖弗莱德所宣称的信奉超越性审美经验，致力于将已经神圣化了的画廊和博物馆变为自身的合适场所，使得随后一代的雕塑家们可以将其视作理所当然。因此，那些继续创作独立作品（与装置、环境和偶发艺术相对）的雕塑家可以从现代主义只创作与本身的存在条件“有关”的作品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并再次公开地与大众百姓展开对话。有几个艺术家是这样实践的。在美国，司各特·伯顿采用了与罗伯特·莫里斯的胶合板物体极为相似的形式，其作品被命名为《椅子》、《躺椅》等；乔尔·夏皮罗〔3〕采用了史密斯使用的不锈钢材料，但作品的形体小，挑衅性地徘徊在抽象和具象之间。在英国，托尼·克莱格〔4〕把勉强可以识别的活塞环和相似的机器形体堆积成有异国情调的一簇簇塔状和螺旋状物，用于暗示古代东方文化或碑谷〔5〕被风化了的层积石；比尔·伍德罗对废弃的耐用消费品进行剪裁、重构，使它们变成富于机智的图案，如创作于1981年的《带吉他的浴盆》或《车门，椅子和事故》（图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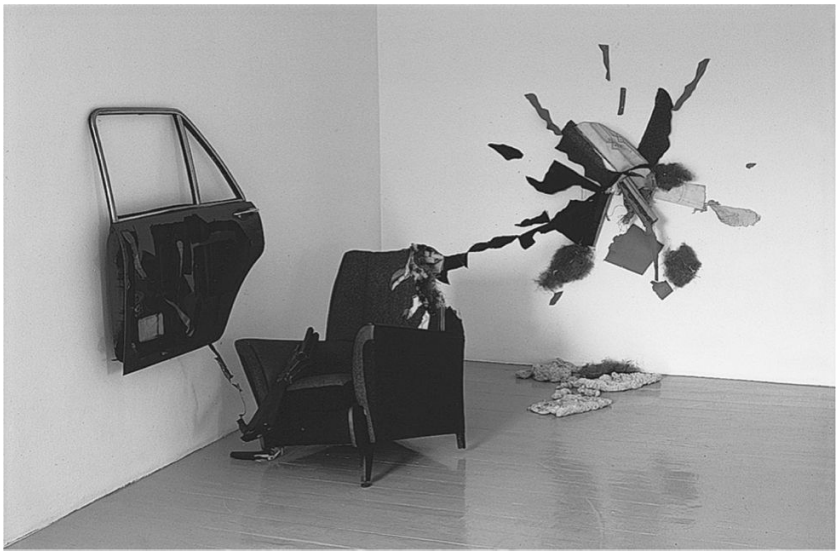

图18　比尔·伍德罗，《车门，椅子和事故》，1981年

伍德罗把大众流行文化的陈词滥调创造性地运用到了他的艺术中，比如在最后那件作品中借鉴了黑帮电影和漫画中的暴力场面、霰弹枪子弹爆炸形成的生动逼真的场面等。他的作品既从那些“低级”文化形式和产品中借鉴其生动性、易接近性和无处不在性，又参考早先的现代派艺术传统，这种类似的借鉴补充了其步骤和设计。在此，伍德罗对毕加索的范例深表赞赏，其作品中取材的自然和操作的机智灵巧，都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回想起《静物》（图10）这样的小作品。当然，他也借鉴了我所提到的所有其他雕塑，尽管各有不同，但同样清楚明白。这是必然的，因为这种引用是它们的要义和合法化的一部分，正是这些作品既“现代”又“大众流行”的“双重编码”（正如后现代主义第一位编年史家查尔斯·詹克斯所称）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它们的含义。这些作品的统治姿态颇具讽刺意味：重复利用两套不同的已存文化的含义，并进行错位并置，这意味着一种从两者中分离出来的有趣的超然状态，同时也暗示着拒绝现代主义对两者所作的区分。但只有那些维持这种区分的机制持续存在，这种讽刺意味才会存在。如果没有现代艺术画廊和博物馆，就没有这些雕塑存在的文化空间，也就

没有这些意义可被解读的语境。

展示的社会

后极简主义（如我们所见，又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拥护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艺术家所创造的大众流行和商业化的视觉文化，其自身不是一个新的起点，这种拥护所含有的讽刺特征也不新鲜，因为这在此前30年左右就发生过。1945年，随着美国经济回归和平时期的状态，工业生产从船舰和枪炮转为汽车和电视机，中产阶级在战争时期被迫实行节约而积蓄的财富如洪水般涌入市场，大量购买市场所能供应的一切，为社会的幸运儿带来了持续20年的富足。这种富足也反映在科学进步方面扩张主义的幻想上，特别是太空旅行。这种幻想对市场上从汽车到洗衣机的所有商品都产生了影响，创造了一种过分享乐主义的审美观，这与战前现代主义设计的理性和严肃相去甚远。新富“婴儿潮”一代在新生的流行音乐文化中庆祝这种新审美观的性感。全世界的艺术家都在分享这种为了美好生活而表现出的消费热情及其视觉标志，或许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即使像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这种类型的博物馆也开始将前卫艺术家对资本主义的评论体制化，其文化中最重要的大众要素的诱惑力，以及这些要素中蕴藏着的可以作为批评武器的巨大潜力，都吸引着全世界越来越多的艺术家。

也许我们更应该感到惊奇的是，在最早的这些实践活动中竟然也有一群英国艺术家的功劳。在此前的30多年中，英国对现代主义的讨论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要闭目塞听，其视觉艺术家们，除极少数人士以外，在前卫艺术的实践方面也比其他国家要保守些。但战争的经历和战后奉行平等主义的工党政府为英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青年人比他们的前辈拥有更多的社会流动性、独立自主性和可自由支配的收入。苏格兰雕塑家爱德华多·鲍罗兹就是其中之一。鲍罗兹注意到美国的商业流行文化在战后10年里不断发展，他逐渐开始迷恋这种文化，起初是着了魔似地收集进口美国杂志，把从杂

志里剪下来的图像拼贴成一本又一本的剪贴簿。他经常光顾伦敦刚创办不久的当代艺术协会，发现一些艺术家和文化评论家有着同样的痴迷热情。他与建筑史家雷诺·班纳姆、艺术家理查德·汉密尔顿以及其他一些拥有被他们自己称为“多种审美观”的志同道合者一起，创立了“独立团体”，定期聚会，交换思想、热情和对阿拉丁神灯似的（能够满足人的一切愿望的）美国产品设计、广告及漫画英雄形象的新发现。

这种共同的热情是强烈的，由以下两种力量推动。第一，他们敏锐而又嫉妒地意识到英美之间的鸿沟，当时英国奉行节俭而单调的消费文化，对大多数商品仍然实行定量供应，而美国市场看上去却能够提供丰富充足而又带有感官刺激的商业产品。第二，他们对民主自由、生命活力和由市场经济主导而产生的对文化新事物的开放程度十分欣赏，这些有别于他们眼中当时英国文化姿态中仍然盛行的令人窒息的保守和势利。但是他们的这种热情认同了商业文化的影响力和扩散力，这对于不论是“高级”艺术还是通常的现代文化都颇具讽刺意味。这在鲍罗兹的创作中，则体现在他开始创作机器人形雕塑时所表达的矛盾情感，主导他早期雕塑创作的对蔬菜形体的兴趣被机械和电子部件所取代，这些部件是他从在垃圾场和废旧汽车处理场发现的废弃设备中得到的。这一系列巨大的头像和超出真人尺寸的雕塑既有趣又恐怖，用石膏（然后用青铜）浇铸，（引用鲍罗兹自己罗列的清单）以“（一个）被肢解的锁、玩具青蛙、橡皮龙、玩具相机、多样混合的齿轮和电子元件、钟表零件、折断的梳子、弯曲的叉子”，以及其他种种物件为原材料，是一个为消费时代创作的，来自于弗兰肯斯坦式魔怪漫画的角色。

汉密尔顿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借鉴来自美国的消费品风格进行绘画创作，虽然与鲍罗兹的表现手法不同，但具有同样的讽刺意味。在1957年《向克莱斯勒公司致敬》的作品中，他用从广告中找到的许多当年出产的克莱斯勒·普利茅斯牌和帝国牌（及其他一些牌子的）汽车图片细部（如挡泥板、前灯、散热器格栅等）进行拼贴，表面光洁悦目，其风格的活力与由标题所暗示的法国现代派艺术绘画传统相比

拼。汉密尔顿作为一名工业制图师，当时已拥有稳固的事业。他将“高级”美学理念与“低级”美学理念恶作剧式地并置，以作品《致敬》展现出的技巧，再现了毕加索在1912到1914年间的创新，并为新的消费时代更新了这些创新。在有些作品中，汉密尔顿的批评更为锋利尖锐，如他在1959到1960年间创作的作品《$he》中，以厨房和化妆技术取代了汽车，有意通过用拜物主义的细节所组成的蒙太奇画面，揭露现代家政女神的组成面目——撅着的嘴唇、裸露的肩膀、烤面包箱与真空除尘器以及敞开的冰箱。然而，尽管这些具有讽刺意味，汉密尔顿跟鲍罗兹一样，对美国商业文化的热情都是不容置疑的。和鲍罗兹列出自己所用物件的清单一样，汉密尔顿在1957年列出了一个关于波普艺术特点的清单，对他所称的“波普艺术”（即大众流行的商业艺术）下了定义：

> 流行（为大众群体设计）/ 短暂（短期解决方式）/ 消耗性的（容易被忘记）/ 廉价 / 大批量生产 / 年轻（针对年轻人）/ 机智 / 性感 / 手法巧妙 / 充满魅力 / 大买卖……

如果说《致敬》和《$he》这样的作品是从毕加索那里获取了灵感，并有可能从舒维特的作品中借鉴了从日常生活中集结视觉引用物时对细节的关注，那么它们的易接近性和对消费主义美学品位的坦率承认，使得它们比现代主义难以读懂的形象和晦涩不明的语言更接近这种商业流行文化。

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艺术家们也开始审视和利用消费主义及其视觉文化，其表现方式记载了战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以及艺术家们所感受到的影响。在法国，对美国产品及其推销的强烈兴趣通过法国当时的政治文化和艺术社团折射出来，在这种政治文化中共产党依然很强大，而艺术社团尽管因形成的政治宗派而分裂，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优秀历史。一个名叫“新现实主义”的团体在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和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两极意识形态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路线。阿尔芒、凯撒和马歇尔·雷斯这些艺术家像达达主义艺术家那样在

作品中使用实物，但他们无法重现杜尚用现成品创作时形成的冲击力，也无法在呈现这些作品时再次对艺术作品的等级划分提出挑战，他们用废弃玩具、工具以及类似的东西组合制成的作品其颠覆性往往因品位的别致而减弱。更有挑战性的作品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的德国，当时美国军队在德国仍处处可见，经济的稳步复苏使人们集体性地选择忘却纳粹主义的经历，西方消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模式毗邻而居。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杰哈特·里希特、西格玛·波克以及其他一两位艺术家精心创作了一个类型的绘画作品，其形象源自日常生活（通常是消费者）的经验，经常不露声色地充满了淘气式的嘲讽。他们自称其风格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与同时期美国波普艺术家的作品十分相近。如我们在前面的篇章所见，里希特运用摄影形象创作的作品与沃霍尔的相似；波克挪用了利希滕斯坦的印刷网点技术。但他们对那些形成艺术流派特点的形象和技法的“借用”并不直截了当，暗中颠覆了艺术家作为文化批评者的角色。在一本1964到1965年的笔记中，里希特描叙了他兴奋地“发现拷贝一张明信片这样一件愚蠢、荒唐的事可以导致一幅画的诞生”，和“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自由。动物、飞机、国王、秘书……”。波克也使用印刷网点技术，但显得漫不经心，缺少“专业性”，这跟利希滕斯坦的作品很不一样，他还使用最低档的制图媒介材料，如圆珠笔、橡皮图章和广告宣传画颜料，创作的形象明显缺乏对技巧和品位的关注，与达达主义艺术家的作品产生共鸣（也预示了最近一些涂鸦艺术的发展）。

可能是因为饱受流行文化之浸染，在处理他们自己的大众流行文化时，美国艺术家们的借用手法似乎比那些欧洲同行更直截了当。他们将大众流行文化形象和技巧引入自己的作品，气势生动、引人入胜，主题也通俗易懂。1965年，詹姆斯·罗森奎斯特创作了一幅长达26米的题为《F-111》的作品（图19），该作品缺乏大西洋彼岸那些折射美国文化的作品所具有的锐利和讽刺性，将当代美国生活方式的象征形象以平滑光亮的蒙太奇手法拼贴在一起，犹如一个霹雳，戳穿了格林伯格式的形式主义有关什么才是适当的艺术这一假设的自以为

是。它巨大的尺寸和视觉上的直观性带有广告牌的习惯特色，同时它非人格性的技法、光亮的表面和比例的突然变化，无论是表现主义的还是形式主义的，都在挑战着抽象艺术最基本的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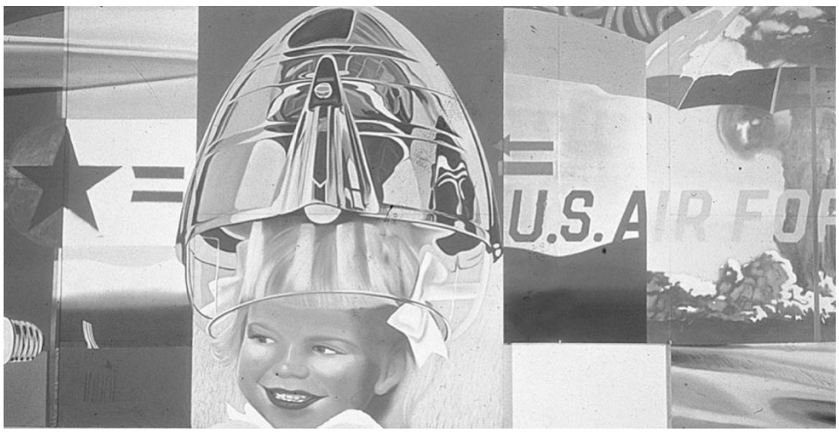

图19　詹姆斯·罗森奎斯特，《F-111》（局部），1965年

然而，它缺乏的是像欧洲艺术家那样对商业流行文化本身提出质疑（虽然常常是拐弯抹角地），这也是大多数美国波普艺术普遍存在的问题。对美国波普艺术家来说，这种文化既是对美国抽象派的精英主义和膨胀的个人主义的挑战，有时又是快乐享受的客体的强烈表现，如克莱斯·奥登伯格的艺术信条——“我支持这样一种艺术，它是政治的—情色的—神秘的，应该有所作为，而不是呆板地安放在博物馆内”。他在1960年的一个宣言里说：

> 我支持这样一种艺术，在撕开包装纸之后，孩子可以舔舐它……我支持闪烁的艺术，它照亮了夜空。我支持艺术可以下降、喷溅、扭动、跳跃、断续……我支持酷儿香烟艺术、七喜汽水艺术、百事可乐艺术、九块九毛九分艺术、新艺术、火灾后物资拍卖艺术、牛肉香肠艺术……

但它们很少直接与商业文化交战，质疑（更不用说对抗）这种文化本身的意义或后果。唯一提出这种挑战的是洛杉矶雕塑家爱德华·凯霍尔兹的作品。他把消费品和面目可憎的人体模型组合在一起，展现

美国生活片段中令人不安的舞台场景（在1964年创作的《道奇车后座》中，汽车是一个充满热情的陷阱；在1965年创作的《小餐馆》中，表现的是一个就餐者的内心；在1963年创作的《洛克斯俱乐部》中，描绘的是一个下流妓院）。用一位美国批评家的话来说，凯霍尔兹构建了一系列古怪的哥特式寓言，描叙了衰亡、人类污染和精神混乱，所有这些维系着美国日常生活的平庸陈腐。在20世纪60年代不断增长的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鼓动下，凯霍尔兹于1968年创作了《袖珍战争纪念碑》，其批评的尖锐性达到了顶点。这是一件非常有力度的雕塑，不但辛辣地揭露了自1945年以来为美国连续不断并持续增长的暴力及帝国主义冒险大开绿灯的爱国主义神话，而且运用了同样神秘的消费主义文化的诱惑力以确保观众进入那段历史（图V）。这幅长达10米的场景将爱国主义与文化传统的标准面貌有效地并置，将穿着垃圾桶的人物模型与史密斯歌唱《上帝保佑美国》的声音、山姆大叔“我需要你”的美军征兵招贴画和根据一张著名的（精心设计的）战争照片复制的雕塑排列在一起（这张照片表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将星条旗插在硫磺岛上以庆祝对日战争的胜利），雕塑的前方有一个人，模仿的是美国就餐者，身旁有一个尚可使用的可乐售卖机，还有椅子、桌子和黑板，黑板上写着475个国家的名字，因为战争的缘故，它们已不复存在（一根绳子上拴着一支粉笔，可以在将来添上新的名字）。这件作品象征性地将美国帝国主义和它的战争机器扩展到了消费领域，对曾经的“可口可乐化”提出了尖锐的讽刺批评。不仅如此，它的咖啡吧场景邀请画廊的观众停下来喝点可乐，这一展示直接挑战着两种假设，即将“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区分开来的文化等级，和“高级”艺术对日常生活空间的超越。除了画廊参观管理规定中的那些禁令外，在此观众与艺术造型之间没有任何障碍。

图V　爱德华·凯霍尔兹，《袖珍战争纪念碑》，1968年

对以美国大公司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所创建的消费社会最尖锐的艺术批评来自于巴黎的前卫艺术，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它可以说是前卫艺术圈子内的最后一个组合，该团体仍然传统地奉行（我在第一章所论及的）政治和美学上的激进主义信条。“情景主义国际”[6]　创建于1957年，它将原本分散的前卫马克思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派别聚合在一起，开展艺术活动，发表宣言，以其边缘性的地位直接对抗现存的政治和文化秩序。情景决定主义者在巴黎张贴讽刺性漫画和卡通画，企图彻底颠覆现行的文化秩序，他们的努力几乎不为人知，即使找到了他们的出版物，一般人也读不懂，他们的做法除了自己的成员，对其他人毫无意义可言。直到10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处在巴黎左岸学生暴动的中心，他们的口号“现实点：对不可能说不！”、“圆石头下面，就是海滩”成了1968年五月风暴的号角。1967年，情景决定主义的领军人物居伊·德波出版了《展示的社会》一书，这本由221小段对当代资本主义格言式的评论合成的文集，严肃认真，言简意赅。他宣称：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的整个生活表明它自身是一个由各种展示　聚合成的庞然大物。与生活直接相关的每一件事物都转成了一种表现……经济对社会生活的主宰的第一阶段已将关于全人类实现活动的定义界定为从‘存在　’明显堕落到‘拥有　’。现阶段经济不断累积的结果已全部占据了社会生活，这种现象

导致了总体地从‘拥有 ’下滑到‘显露 ’……这种展示使活着的人们屈从于它，完全被经济控制。一切只是经济为它自身而发展而已。

现代主义的危机

当然，德波的评论在当时只影响到了极少的读者，尽管从那时起，他的见解已开始被人们广泛接受和（有选择性地）采纳，这些我们将在下文谈到。尽管所有这些批评的活力曾在巴黎的街道上短暂地展示过，但其锐气却被1968年另一个规模远远超过它的呼声所削弱，这一呼声是从另一座城市发出的。当巴黎在鼓动抗议时，旧金山在支持享乐，虽然起先政治和个人言行的自由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像情景决定主义者那样，但嬉皮运动所坚持的享乐和欲望的权利不久就被分开了，接着被用来反对巴黎激进主义的“更直接”的政治要求，最后又被商品化为“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1968年动乱的尘埃落定，化为两种模式。一方面，其结果是对左派政治和有关的文化抗议活动能够实现社会变革的信心（对有些人而言是信仰）广泛丧失；另一方面，自由派的无限制的社会和性生活的幻想被演变成为一种促销更多消费品的手段。当它所提倡的生活方式的梦想显示出磁铁般的吸引力时，“展示的社会”便开始像它曾做过的那样将针对它的批评中立化，这些批评来自现代主义的各种不同流派，从达达到波普，通过拆除划分“高级”和“低级”的文化等级制度，仿佛是达到了20世纪早期革命的前卫艺术家一直追求的艺术与社会生活的重新统一。对那些自认为是此类前卫主义的继承人来说，如同我前文所引用的泰瑞·伊格顿所言，早期乌托邦主义的希望——那些安德列·勃勒东所表达的对精神革命的期待，那些超现实主义用令人震惊的形象去“解放欲望”的企图，以及弗拉基米尔·塔特林在他耸立的《第三国际纪念塔》（图5）中所歌颂的社会革命——似乎正在被消费主义对艺术的无情殖民“控制、扭曲、并且嘲弄般地回敬以反乌托邦式的现实”。

然而，对其他人来说，这种“商业与文化的联姻”就等同于将艺术从自我专注、严格节制的平民窟中解放了出来，这些窘境是由于格林伯格所坚持的现代主义的自主性和自指性，以及观念主义对它们一追到底的努力所致（这种追求深入到了观念主义自身的中心）。现在“享乐观”取代“纯粹性”成为议事日程的首项，容易接近性似乎比自发性更为重要。与现代主义相脱离的意识由一个新创的词“后现代主义”所表达，现代主义的原则似乎与当代的（西方）世界不合拍。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到现在，这个词越来越流行，意思却越来越模糊。甚至到1988年，文化评论家迪克·赫布迪奇[7]竟然能够这样说：

当人们变得有可能用‘后现代’来描述房间装饰、建筑设计……电视广告……时尚杂志的版面设计……对战后婴儿潮一代因面临梦想破灭的中年期所产生的集体苦恼和病态预言……文化等级制的崩溃、大学的衰败、最新微型化技术的功能和效果……，当所有这一切［他所列的清单事实上比这还要多一倍］都可以用“后现代”来形容时，那么显然我们正面对一个时髦术语。

以这种方式指出特殊的当代文化态度，其有效性早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后现代主义”曾经意指某种或某些事物。大多数境况下，它指的是对当代那些无处不在的形象的认知，这些形象出现在电视、广告、报纸、电影和相关的消费品中，这些东西充满我们西方社会，为其经济补充燃料；它指的是默认这些形象指导我们的思想、想象和现实感觉的力量；它指的是认识到它们的内部联系和明显自我形成的性质。正如第一位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8]在他的著作《后现代主义状况》里所说：

折中主义是当代流行文化的零阶段：一个人听雷盖音乐，看美国西部片，午餐吃麦当劳，晚餐享用当地风味美食，在东京喷法国香水，在香港穿怀旧服装；知识只是为了电视游戏节目的需要。

这种认知引发了对我们所假定的个人特征和主观稳定性的质疑，转而认为这两种特性是临时性的、变化着的、甚至是由自我属性

而“构造出来的”，是我们在扮演社会的（越来越全球化的）形象角色中被赋予的。

从这些问题和主张又可推理出其他东西。所谓“超越叙事”的思想，即对人类状况或历史动力的全面性解释，如基督教、马克思主义或关于文明进程的观念，连同其所依附的那些绝对确定的事物一起被抛弃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按时下的看法）个人主义的流动沙丘之上的。取代它们的是相对主义、不确定性以及对“真理”的暂时性、部分性的接受（有些人的接受是热情的、乐观的，另外一些人则是听天由命的、愤世嫉俗的）。这些是重大的哲学问题，我们不可能在此处出于对它们本身的兴趣进行探究。但艺术家们通过扮演和玩弄形象和意义的“现成的”特征这一流行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任何一件视觉标识或视觉再现都随之带来不可避免的重要联想和暗示；这些问题也在文化批评中得以表现，重点强调的是在这些策略与那些现代主义策略之间存在着的“突变”。20世纪80年代，流行对两者进行对立比较列项，建筑批评家查尔斯·詹克斯（在20世纪8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最繁荣的时期，对传播后现代主义思想作出了主要贡献）列了不下于30条对立比较。他声称，后现代主义是“流行的”，而现代主义是理想主义的，以及符号与功能、复杂与简单、折中与纯粹、幽默与直接、模糊与透明、拼贴与联合的对应等。

詹克斯幽默地称，后现代主义时代开始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点32分，在这一时刻，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城，一座典型的理想主义的-功能主义的-简单的-纯粹的-毫无幽默感（等）的住宅区被炸掉了，以便给某种更流行的-符号的-复杂的-折中的-有幽默感（等）的事物让路。他本意在于强调（但许多人会认为他是夸张）后现代主义所代表的对现代主义的突破；但后现代主义一旦被确认为一种“时代精神”（*Zeitgeist*），它确实以非凡的速度和生命力传遍了整个世界，并同样获得了非同凡响的视觉效果。在建筑上，区别之大如同黑夜之于白昼，比如伦敦的中心大厦对比于特里·法雷尔[9]对伦敦查令十字街火车站的翻新，车站临河的正面犹如一台自动点唱机；或是1995年同样由他设计的新艺术装饰派风格的M16总部大楼，比之于建于20世纪

60年代位于河对面的光洁严肃的米尔班克大厦，这座建筑非常“酷”，完全可以被放进007电影系列中担任主角。法兰克·盖瑞设计的位于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或奥斯卡·尼迈耶设计的位于里约热内卢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均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都很有名，也都尽可能地与以往的博物馆建筑不同。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一种似乎不但可以运用商业文化社会的形象和技巧，还可以运用产品本身的新自由被呈现在眼前，艺术家们紧紧抓住了这些机会。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以色列出生的纽约艺术家哈伊姆·施泰纳巴赫将一组新买来的原装物品，如花瓶、足球、厕所塑料刷子、奖杯、啤酒罐，排列在固定在墙上的架子上，使得雕塑作品摆放得像是商店里的货品架（观赏艺术品如同浏览橱窗）。更具有挑衅性的是另一位纽约艺术家杰夫·昆斯（他曾经是一位华尔街期货经纪人），他选了一些他所能找到的最粗劣的消费物品，比如可充气的粉红色兔子、金色的迈克尔·杰克逊小陶瓷像，把它们以同样沉闷乏味的方式陈列出来，将杜尚关于现成品的观念（约1913年）延伸到了“艺术”和“品位”分离的地步。后来昆斯还开玩笑般地运用色情材料，把自己与妻子拉·西西奥莉娜（意大利色情电影明星、政治家）做爱的真人尺寸的照片和场景拿来展览，赤裸裸地承认了那种促使对商品产生拜物教式渴望的欲望。

犹如美术史家布兰顿·泰勒所评论的那样，对美国商业艺术最值得一谈的可能就在于它对大众流行商业文化的拥赞“包含着这样一种含义，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承认了社会主义典型模式在东欧和西方的失败。”但这种论断是建立在现代主义者所坚持的现代艺术肩负着批评责任的假定基础之上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补充道：“认为重新展示和再现消费品可以提供对商业文化的有效批评这种想法，在20世纪80年代市场热情高涨的时期，充其量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昆斯就是一个例子，他对这种批评不感兴趣，相反，他的装配组合艺术品和他爱开玩笑的性格与这种文化正相一致。不过，用这些材料进行创作的其他艺术家对这种批评是感兴趣的。在20世纪80年代出名的几位英国雕塑家，如托尼·克拉格、比尔·伍德罗、朱利安·奥培和大卫·马奇，他们都利用家庭生活垃圾作材料进行创作，这些垃圾具有隐含

的、有时也是很明显的批评锋芒，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雕塑中，克拉格使用现成的厨房塑料垃圾——漂白剂和厕所清洁剂瓶子及其他一些包装物，这种做法不可置疑地带有社会和环保含义。但市场在吸收他们的作品时所表现出的兴趣表明了他们在批评方面的努力基本上一无所获，假如允许使用这一双关语〔10〕的话。因为这种努力要有收获就要求艺术家在对商业文化进行批评时，必须站在一个独立于此商业文化的位置。这就像阿基米德的杠杆要想撬动地球，他就必须找到一个支点一样，艺术批判商业文化，也需要一个脱离消费主义引力之外 的立足点。但现在越来越难发现这种位置，原因有二。第一，因为我在第一章所谈到的前卫艺术体制化已经将艺术实践的空间圈入到了自己的范围，而且艺术博物馆本身也越来越难以和商店区别开。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博物馆的商品区和休闲区就开始无情地扩大，因为许多博物馆发现把高级文化的吸引力和消费主义的消遣活动结合在一起，可以得到经济利益（“第一流的餐馆，顺道可去漂亮的博物馆”这一著名口号就是在那时被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罗伊·斯特朗〔11〕所采用）。对连锁零售商家来说，他们同样也看到了在马路对面获得的好处。任何人在参观重新装修过的卢浮宫之前或之后，只要去过隔壁杜伊勒里宫的地下大型购物中心，就一定会注意到两者设计上不可思议的相似性和高价位的货品。当认识到可以依靠（特别是）当代艺术为他们从锁定的目标A、B、C1市场消费群体中招来追求风格款式的年轻观念创建者时，英国的大公司，如哈维·尼科尔斯、塞尔弗利捷思、季风和线锯，便开始在商场里组织艺术展览，而居住处公司〔12〕则发行附有这些展览请柬的《艺术海报》杂志，他们所遵循的正是“关系营销”的策略。

但是，消费主义引力之外的文化空间也正在因历史本身的商品化而逐渐被封闭。前卫主义意识到针对现存的文化和社会秩序应存在不同的选择，这种意识是其文化批评的基石，而且它在这两者之间的自我定位是由对历史发展动力的信仰形成的。后现代主义不仅对这一发展观提出疑问，还对形象进行无止境的循环利用，在同样无止境的对身份属性的建构和重构中赞美时尚所扮演的角色，这些都将过去的历

史简化为一种市场，在这个市场里，一个历史时刻和另一个历史时刻是相同的，就像电视屏幕上的一个画面，不再与我们当前的生活经验发生关联。既然如此，那些致力于文化批评的艺术家怎样才能抵制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引用过的美国批评家本杰明·巴克洛所称的“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机构企图占据并控制所有艺术实践和表现空间的趋势。”另一位美国批评家哈尔·福斯特〔13〕在1983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答案的开头部分：

> 在今天的文化政治中，两种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对立。一种后现代主义寻求对现代主义的解构，抵制现状；另一种后现代主义则拒绝接受现代主义，赞美现状，即一个抵制性的后现代主义和一个反应性的后现代主义……抵制性的后现代主义关注对传统的批评性解构，不是一种……对波普或伪历史形式的模仿，关注对起源的批评，而不是回归到起源。它试图对文化规则提出问题而不是加以利用，探讨而不是隐藏社会与政治的附属关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及我前面所讨论的女权运动的背景下，出现了美国艺术家辛迪·谢曼的作品（图14）和巴巴拉·克鲁格的作品。谢曼以无休止地伪装多种女性角色的方式解构现代女性气质，而克鲁格直率的图案模仿的同时也嘲讽了各种生活方式杂志上刊登的大肆夸张的甜言蜜语式的广告。这些都是生动的例子，它们采用大众流行/商业风格和主题以达到批评而不是赞美的目的。其他还包括芝加哥艺术家利昂·格鲁布尺寸像墙面一样大的绘画作品，其中所描述的题材往往可以在电视新闻中看到——有关“恐怖主义者”的审讯，或全副武装的“自由战士”的场面，这种方式结合了纽曼或罗斯科画面中饱和的色彩与战争漫画中的人物造型传统（图20）。它们使我们对现代绘画在美学主张之外还能提供什么产生困惑，同时似乎在重申绘画与政治的相关性，众所周知，70年前毕加索曾在作品《格尔尼卡》中大胆表现了这种相关性，在当时看来这似乎是最后一次了；通过显示这种风格结合的绝对不可能性，它们强调了绘画形象与新闻印刷之间的巨大差别。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蕾切尔·怀特瑞特，本书就是以谈论她

2001年的雕塑作品《纪念碑》（图I）开篇的。她“别出心裁”地用石膏、乳胶或树脂铸造日常生活中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和有时被我们忽略的固体，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具有想象力的方法，将我们自身和这些东西拉开距离并重新审视它们。怀特瑞特的作品《房子》在1992年获得透纳奖，引起了骚动，导致该作品后来被毁。其价值至少在于展示了对现代主义关于雕塑的“客观性”进行解构所能引发的感情冲击。另一方面，它或许也清楚地表明了试图创作一种艺术挑战运用在我们的家庭和社会空间的多种假定所具有的隐患。当然，“批评的”和“后现代主义”这两个术语已被证明它们之间的结合一直是更易于提出，而不易于实现，或至少是不易于维持。

图20　利昂·格鲁布，《雇佣军II》，1979年

注释

〔1〕 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1967年生，美国当代艺术家，以多媒体手段创作艺术。《悬丝系列》（Cremaster Cycle）一共有5部。

〔2〕 泰瑞·伊格顿（Terry Eagleton），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曾任牛津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著作等身，现任曼彻斯特大学英国文学教授。

〔3〕 乔尔·夏皮罗（Joel Schapiro），1941年生，美国著名雕塑家，擅长使用简单的长方形体块组合成动力感强的雕塑。

〔4〕 托尼·克莱格（Tony Cragg），1949年生于英国，后移居到德国，擅长利用现成材料、建筑垃圾以及家用废弃物做雕塑。

〔5〕 碑谷（Monument Valley），地处美国犹他州南部边境与亚利桑那州北部交界处，以其红色及深蓝灰色的柱子形状的岩石著称。

〔6〕 “情景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20世纪中叶欧洲一个重要的文化艺术团体。

〔7〕 迪克·赫布迪奇（Dick Hebdige），1951年生，英国媒介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他对次文化的研究专著《次文化：风格的意义》影响甚广。

〔8〕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法国哲学家及文学批评家，以对后现代主义的阐述著称。

〔9〕 特里·法雷尔（Terry Farrell），1939年出生，英国重要的建筑师，其风格是将后现代主义与高科技相结合。

〔10〕 purchase 一词在英文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购买；二是指收获、获得。

〔11〕 罗伊·斯特朗（Roy Strong），1935年生，英国美术史家，任英国国家肖像画廊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

〔12〕 居住处公司（Habitat）是英国的室内装饰商店，在英国和欧洲都有连锁店。

〔13〕 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艺术批评家，《艺术美国》的栏目编辑。

第五章

跨过标杆：不管下一步如何？

后现代主义在何处脱离了现代艺术和作为观众的我们？无论是好是坏，这都是一场文化大动荡，其规模是自从一个世纪前的前卫艺术出现以来前所未有的。如前文所阐述的，现代艺术早期的发展推翻了原本确定的有关艺术是什么，谁可以创造它，它为什么和为谁服务等观念。原来被接受的材料和实践范围很窄——油画或水彩；青铜或大理石；绘画，版画或雕塑——但现代艺术使得艺术家们可以利用他们所选的任何一种方式来表现自我。它使得曾经是受到小心保护的中产阶级从事的行业变成了为每一个有创造想象力和志向的人敞开大门的职业。它不再是那种将堂皇的公众艺术置于小圈子的私密装饰艺术之上的文化等级结构，而是孕育出一大批形象、媒介和观念，其中政治目的和个人喜好相互斗争和包容，它希望观众如同它的表现方式一样多样化。

在此转折中，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激变究竟如何影响了我们对现代艺术的理解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一些现代艺术的术语的含义。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这一名称比它本身看上去要复杂得多。与艺术史中其他的名称，如“文艺复兴”或“巴洛克”不同，“现代”所指的不仅是一段时期或一个历史时代，还指目前的时间。按照惯常的用法，“现代”既意指今天也指最近的过去，如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我们使用现代技术等说法，假如“现代”只是最近的过去，那么这些说法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同样按照惯常的用法，“当代”是指现代的前沿——“最现代”的时刻。由此可以推出，“当代艺术”是“现代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什么截然不同之物；迪米尔·赫斯特是现代也是当代艺术家，附加的指称有助于给他在现代艺术中定位，而不是要将他从中区分开来。因此，我在本书中所探讨和解释的有关现代艺术的特点以及过去约150年许多艺术家们对这些特点的展现，是为理解赫斯特以及其他当代艺术家的艺术提供了一个总的参考框架。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现代”和它之前的各个时期进行区分的方式与“文艺复兴”等不同，部分是因为“现代”这个词中隐藏着一种价值判

断，使得这种区分不但体现在编年方面，还体现在性质方面。“现代”意味着要具有西方社会现行的价值观。要“现代”就要具有如下性质：充满生机，对新事物思想开放，对现今的时代反应敏捷或与之密切相关等。也许读者会注意到，这些性质是当今的政治家们为避免具体地为其政策辩护所常常借助的；毋庸多言，将某一事物“现代化”就意味着要改进它，或希望如此。同样，“现代艺术”之所以能将它所处时代的最重要的艺术与同时期创作的其他艺术区别开来，是因为它可以，像我希望我能做到的那样，展示我所提出的那些性质；虽然在每一个具体例子中它们展示的方式，即使不是有悖常理的（如杜尚的作品），也常常是令人费解的（如杰克逊·波洛克的绘画），导致观众对它们感到困惑，甚至怀有敌意。艺术史家称这些艺术为现代派 艺术，如我们所见，这一名称意味着很多。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现代”确实也 指某一时期或历史时代。即使它还没有结束（我们仍然还处在现代世界内），但它是有一个开端的。这个开端始于何时，社会和文化史家们依然有所争论，主要的观点有始于14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一说，还有始于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一说。艺术史家采纳了第二种说法，虽然通常都承认对那些使得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划时代性的改变，艺术方面的反应，即我们所谓的现代主义，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才真正开始。那么，在认定有一个按照特定历史标准而划定的“现代”时期时，很有可能提出的问题是，这一时期是否会按照上述该名称惯常用法的定义，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保持和现今一致；或者说，那些引入现代时期的前提条件，即历史标准，是否有可能会改变，如同过去发生过的那样。

这就与“后现代主义”相关，因为它被宣传为宣告了现代主义的结束，或如一些后现代思想的鼓吹者所说，甚至宣告了现代时期本身的结束。从我们对现代艺术的理解而言，无论是哪一个版本，这种宣言的价值都在于它识别并解释了那些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新时代开始的各种因素。我在上一章中曾讨论过这些因素，以及它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给现代主义带来的危机。它们对新生艺术为大众所接受的 方式

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即当今的艺术观众如何欣赏现代艺术？在我们对“现代”和“当代”艺术的反应之间，后现代主义真能建立一个分水岭吗？

新的观察方式

现代艺术被接受的最明显的标识在于越来越多的观众前去参观那些我们称为现代派蓝筹股的“重大展览”，尤其是现代派绘画大师的回顾展。在过去的10年中，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甚至连抽象绘画风格质朴且有明显空洞的罗斯科的展览在西方的主要城市也吸引了史无前例的观众人数，需要采用从未听说过的预先订票、分期进入的参观管理方法。这是否是在面临当代艺术人人可自由参加的情形时，人们对绘画中，甚至是抽象绘画中，意义（和审美的回报）的相对确定性所表现出的怀旧？如果是，那么现代艺术家不久前既被颂扬又被谴责的大胆打破旧传统的肆无忌惮的创造是否已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软化为传统的文化“家具”，而其功能不无讽刺地成为“疲倦的商人的安乐椅”，正如马蒂斯1908年曾乐观地期望自己的绘画所应该受到的那种待遇？这也许是部分原因。在20世纪的大部分进程中，毕加索是现代艺术的主要人物，其想象力的旺盛和创新的大胆既是现代派艺术创造者的楷模也是反对者的靶子。但观念艺术在20世纪70年代及其后崛起上升则是建立在马塞尔·杜尚的基础之上的，他　所提供的艺术创造的新模式追求无情的晦涩的理智，相比之下毕加索之后绘画中的视觉复杂性仿佛就是纯粹的寻欢作乐。

但是，这种对绘画的喜爱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同时期其他替代选择的厌恶。在前面的篇章中，我曾引用了迈克尔·弗莱德的断言，欣赏艺术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优雅”的体验，它使得我们能够短暂地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凡世俗；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明显的宗教类型的体验，的确，在我们世俗化进程日益加深的社会中，美学经验的超然存在是可以代替以前由宗教团体为中介所提供的那些东西的有限选择之一，至

少在西方社会是这样。因此，如同对乡村生活和风景的怀念情感一样，尽管两者中神秘地掩藏着普通而又不美的现实，观赏绘画，无论它是像毕加索或波洛克那样晦涩难懂和具有挑战性，或是像塞尚或马蒂斯那样对生活的肯定，能够提供一种熟悉的、可预测的、使人感到安慰的经验，简言之，如同教堂里的空间那样神圣不可侵犯。意识到这一点，马克·罗斯科在1970年为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德·梅尼尔家庭教堂定做的一套组画（他的重要定制作品之一，后来成了他最为著名的作品），在美国现代艺术的旅游地图上，成为最受人欢迎的景点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明显的是，合法化了的媒介和现代主义的大师并不能完全代表当今艺术观众的品位；参观泰特画廊每年举办的透纳奖大展的观众人数众多，而且还在增长，这表明当代艺术也有广泛的吸引力。这不是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尽情谩骂和嘲弄的机会，如同早期现代主义的观众贬损马奈和立体主义那样。自从“美好时期”[1]的巴黎人和爱德华时代的伦敦人愚蠢地嘲笑前卫艺术家的古怪行为以来，我们的性情和对艺术的期望都发生了变化，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发生了变化。在现代办公室内，来自各方面的信息飞速地积聚和处理，在21世纪的制造业中，不同来源的各种部件可由快速的、自动化程度不断加强的装配线来应付，这些变化已被转化为一种更加成熟的心态，即将艺术家看成是各不相同的材料和表达过程的组织者，而不只是有着高度熟练技能的绘画、雕刻及塑造的加工者。对艺术作品质量的判断不再像过去那样取决于对手工技术灵巧敏捷程度的要求。举我们前面论及的高桥智子的装置艺术为例（图21），它对废弃的办公室电气及电子设备进行废物利用，把它们变成了一屋子缠在一起的发着噪音、闪烁发光的一堆堆杂物，这种类型的艺术与我们的工作环境在不同层次上产生共鸣，使得观赏者们能够在识别时报以苦笑。其幽默之处与毕加索用现成的器物做成的雕塑所体现的很相似，它是后者直接的并有可能是有意识的传承，但与其说高桥智子的才智是这件作品的动力或意图，不如说它是触动了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以不同的方式所共同体验到的、对现代科技的无情迈进所怀有的强烈矛盾情

绪。这不是在变魔术，原材料依然是那些废物，但它们是我们 生活中的废物，高桥智子的艺术语言就是我们的日常用语。如我前面所言，自从所谓的艺术作品的“艺术地位”被极简主义解构，随后现代主义对“高级”艺术与商业文化的界限进行挑战以来，艺术与日常经验的共通性成为了许多装置艺术的特征。所以也许在这一程度上，我们对“现代”和“当代”艺术的理解存在差异。但我也说过，文化等级（结构）的解体只是貌似真实而已，艺术博物馆的增长表明的其中一点就是其文化权威地位的提高。我们仍然是（越来越多地？）在博物馆内体验最现代和当代的艺术，而且，如同泰特现代艺术馆用非常规的陈列方法将现代和当代艺术按主题并置在一起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也是根据博物馆的看法去理解艺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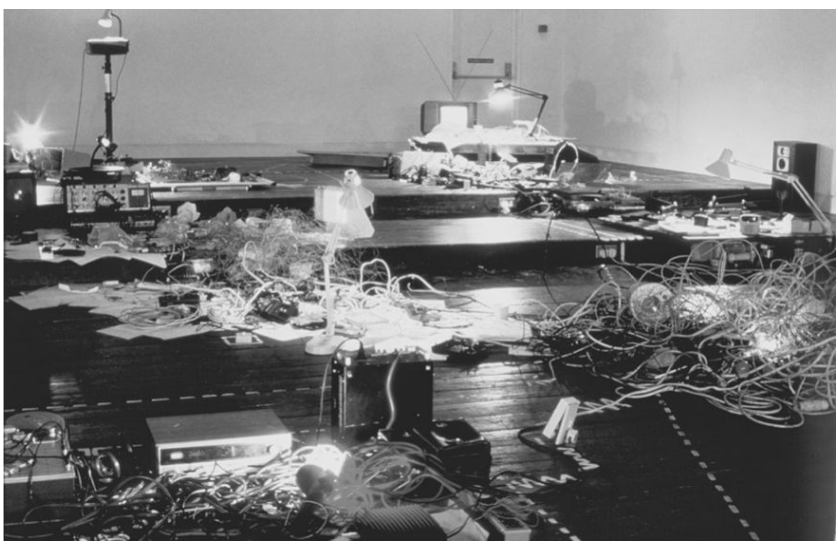

图21　高桥智子，《灯火导航区》，1997年

差异的世界

不仅仅是西方的现代和当代艺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也不仅仅是后现代主义使得设想中的“高级”艺术与商业文化的界限日趋模

糊。伴随着西方大多数人工作生活的改变，现代全球化经济秩序将世界的不同区域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到了一起。从文化的层面来看，其结果是西方对不同文化传统和遗产的存在，以及平等合法权利的更大程度的认知。与此同时，在美国和欧洲以前唯我独尊的文化首都中，出现了对其他 的艺术中心、艺术大众和艺术传统的认可。由于前一章所描叙的“批评的后现代主义”的推动，这种认知和认可已开始慢慢发展，其传播的主要手段（也是标识）之一是过去20年来在大西洋两岸举办的一系列重大的博物馆展览，这些“重大”展览记载了我们与“世界艺术”融汇沟通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承认西方现代艺术受惠于非西方文化的传统艺术。例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1984年举办的“‘原始主义’与20世纪艺术：部落和现代的亲密关系”和皇家学院1985年举办的“非洲：一个大陆的艺术”，打开了西方观众的眼界，使得他们看到了非洲艺术的美和创造性。但这些展览依然坚持认为，这些艺术和现代派艺术相比是从属性的，如与曾受其影响的毕加索、马蒂斯或德国表现主义的艺术相比。将“部落”和“现代”并置意味着非洲艺术的特性属于无时间性的社会集体；将其特征界定为“大陆的”来呈现，又把非洲艺术家们更加牢固地锁定在预先决定的、传统的参考框架中。而西方艺术，作为鲜明的对比（如现代艺术博物馆展），或暗示（如皇家学院展），则是个人的、不受羁绊的、与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碰撞的产物。

一部分是作为对这种老套的研究方法论的回应——特别是现代艺术博物馆展遭到了艺术家、批评家和研究非洲文化的专家等的严厉批评，一部分是受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所开拓的新视角的促进，在西方出现了第二种针对现代非西方艺术的研究方法。1989年在巴黎举办的大型展览“大地的魔术师”是该方法的展示。它试图将世界上所有的艺术置于平等的地位，认为无论来自哪个洲，无论他或她的创作与何种文化传统相关联，每一位参展艺术家都是现代的、独特的创作者。但这一目标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它要做到这一点（如果它要保有任何展览必须有的协调一致性），就必须假设只有一种单一的“现代性”，所有的参展艺术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体现这种“现代性”。如此而言，

一件非西方的艺术作品如果要被接纳为“现代的”艺术，就必须具有策展人所认为的混合的、混成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特征。展览中最著名的作品有加纳的塞穆尔·凯恩·科维制作的棺材，它的外形设计参照了与死者生前职业有关的物体，如一辆奔驰车配一位曾经拥有一个出租车车队的老板，或一条船配一位渔夫；以及刚果的切利·桑巴的“流行画”（画家自己如是标榜），它将非洲的和西方的艺术风格和主题，法语和林加拉语混合在一起，色彩明快、粗俗风趣。

桑巴1997年创作的三联画《我们的艺术的未来何在？》（图VI）是他的代表作。第一联中，画家坐在一张放满非洲面具的桌子后面，邻桌坐着毕加索，手里拿着铅笔，桌布为格子图案，暗示着蒙德里安从立体主义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抽象绘画。桑巴由此暗示的是，无论是非洲画家还是毕加索，两者都没有能力阻止他人对其作品不当地使用。桑巴此处的讽刺非常尖锐——恰恰是毕加索这一类的立体主义者，最先开始不当地使用非洲艺术！其他两联中，一幅画有毕加索和桑巴各持一幅油画在手，站在一个类似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现代建筑旁，另一幅是桑巴自己站在看得出是蓬皮杜艺术中心正门前的人群中；画中的文字责问为什么非洲艺术家在这样的博物馆中被另类聚集，在许多重大展览中都缺乏他们的作品。滑稽可笑的讽刺、交叉文化的提示、明亮的色彩以及熟练的肖像绘制，所有这些都是桑巴作品的典型特点，使得他的画在非洲本土和西方世界都深受收藏家的喜爱。对西方与非洲利益和文化之间关系的评论倾向贯穿于桑巴的画中，向观众展示了其通常锐利而又有趣的洞察力，那么同时，它是否仍继续将西方的利益和论断置于每一对应组合中的主导地位呢？如果如此，这是一种现实主义，还是习惯的奴性？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如人类学家塞萨尔波比所说，现代艺术博物馆展、皇家学院展和“大地的魔术师”分别代表的两种观点都是有问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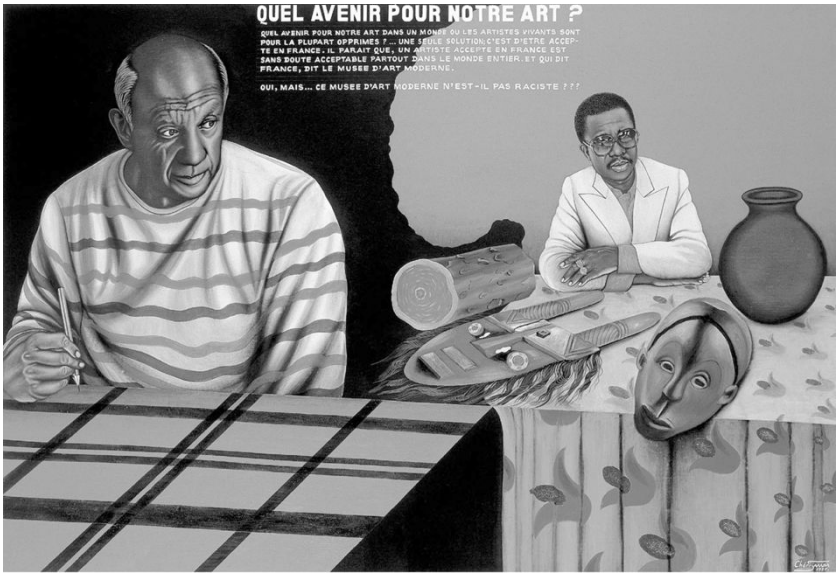

图VI （a）切利·桑巴，《我们的艺术的未来何在？》，199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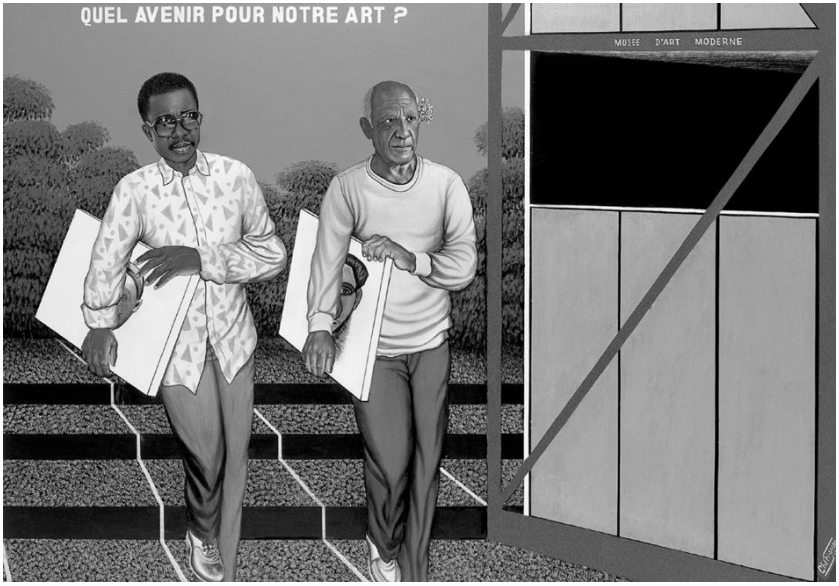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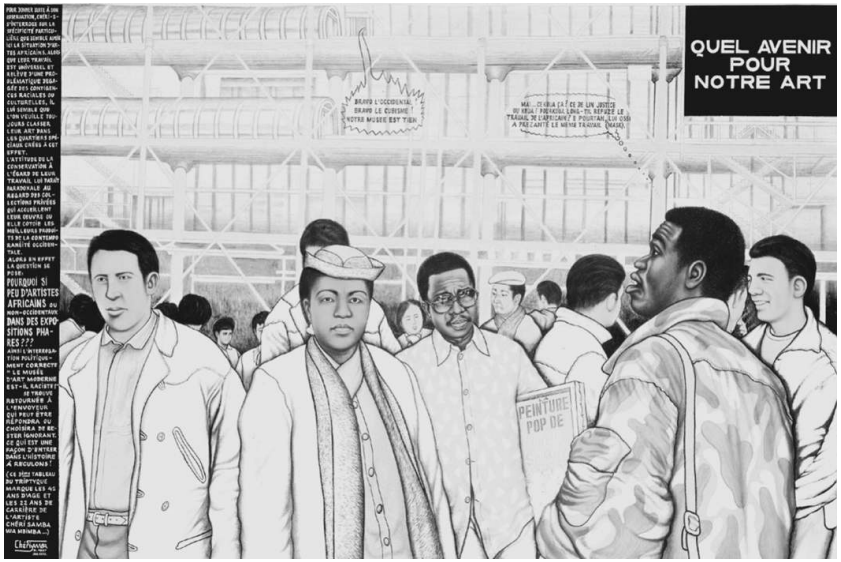

（c）

一方面，经久不衰的“传统”艺术被移植到了一个持久的“它时异地”——“原始主义”；另一方面，那些功能非常特定的、因此也“当地的”艺术被位移到了后现代主义“什么都可以，越怪越好”的变动中。

其结果可能有点像是大杂烩，它将“古典的”和“国际现代的”混合在一起而错过了对两者都不适配的非洲艺术，如波比引用大英博物馆非洲馆为例时所言。以切利·桑巴的绘画为例，我们可以说他的艺术名声来自于“后现代的”将其参照对象的混合；也就是说，它们参照的是注意到它们的西方。

泰特现代馆于2001年下半年举办了雄心勃勃的展览“世纪城”，以欢庆千禧年的来临和在河边发电厂旧址上开辟的大型新馆的开馆。此次展览对于非西方文化，以及这些文化在经历（往往是非常不同的）“现代性”时所作回应的创造性抱以类似的开放态度，尽管它寻求的是承认这种“现代性”在不同地区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此举表明泰特艺术馆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承认，其收藏的20世纪西方艺术受惠于各式各样的文化。“世纪城”展勾画出了过去100年间在9个城市出现的现

代艺术和前卫团体的轮廓，这9座城市包括伦敦、纽约、巴黎、莫斯科和维也纳这些毫无疑问必然会入选的城市，还有孟买、拉各斯、东京和里约热内卢。每一个城市的艺术展览品及相关的文化内容都由该城市的策展人选定，重点放在这100年中的某一个10年。结果杂乱无章、参差不齐，但对一个对全球范围内艺术不熟悉的观众（这包括大多数展览参观者）而言，展览充满了发现和惊奇。

“世纪城”展的成功在于，它既　展现出了“现代性”之间的巨大差别，如孟买和伦敦之间的不同，又展现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巨大吸引力，它的产品和市场营销将非西方的城市及文化拉入了围绕自己的中心城市旋转的轨道中。这样，侯赛因的宝莱坞影片，以及这位年已八旬的印度桂冠艺术老人亲自设计的电影招贴画吸纳了西方题材和风格，同时又与此保持着距离。“世纪城”中展出的他2000年拍摄的电影《像大象似的走路》，歌颂赞美了“印度女性”，其手法是既承认女性主义的革命，同时又设法避开它。同样，在展出的东京部分，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在日本出现了“物派”（字面意思为“事物流派”）运动，其具有自我意识的观念主义者对自然材料和过程的接触与同时期美国的极简主义和后极简主义艺术家的兴趣以及意大利的“贫困艺术”运动非常相配。例如，关根申夫[2] 1968年的《阶段：大地母亲》（图22）是一个直立的2.7米高的圆柱体土方，从旁边同样形状的坑里取土，似乎和罗伯特·史密森同样制作于60年代后期的《场点/非场点》或迈克尔·海策的《双重否定》在表现手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材料和形状、纪念碑性和空虚感以及理念和事物。但如日本的美术史家石田武寿[3] 所坚持认为的，这种当代艺术作品间极为相似的关系既不是巧合也不是简单的影响。因为当日本的物派艺术家们独立于西方艺术潮流之外取得自己的审美地位时，他们所处的艺术大环境又是由西方的模式和体制塑造的。这种矛盾当然也反映出了日本自身在地缘政治舞台中的地位。

图22　关根申夫，《阶段：大地母亲》，1968年

尽管“世纪城”并列展出的展品如此丰富刺激，但还是遭到了一些批评，指责它依然带有早期展览无法摆脱的“双重标准”。展览中所展示的20世纪90年代孟买的和1955年至1970年拉各斯的前卫文化是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的，而其他城市的却是从美术史的角度去体现的，因此，展览被指控为是用第三世界城市，如所说的这两座城市来衬托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大场景。当然，我们可以和切利·桑巴一样回答道，这种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事实不太可能随着人们的愿望烟消云散，而且全球艺术家激进的创新常常会不可避免地变得和它的楷模相仿。如果说东京的物派艺术家在当时或多或少地受到纽约、伦敦和巴黎的现代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家的冷落，20世纪50年代的巴西构成主义派（赫里奥·欧伊提希卡和里佳·克拉克）的作品则被贬低为仅仅是对欧洲和北美潮流的模仿。其结果，如同古巴批评家哥拉多·墨斯凯拉 [4] 所言，是出现了新的艺术策略，即将拉丁美洲艺术家承认所受到的各种影响进行改编、重新标明含义和进行改革。但是墨斯凯拉也建议这样的策略应伴之以比现行设想中的更为复杂 的文化交通方向，即不仅是

颠倒占主导地位的“由北往南”、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的方向，还应该增加更多的“由南往南”的交通。至于这种现象究竟能否出现，还有待观察。回避（更不用说扭转）权力关系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全世界的现代和当代的艺术机构全都被嵌固在这个关系中。

为创造性付出代价

当艺术几乎完全体制化时——其必然结果是，艺术实践领域扩张到了什么都可以当作艺术的地步，只要艺术机构将其作为艺术品奉献给大家——剩下的归艺术家所特有的，属于他或她的独特属性，就只有创造性。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稳定发展的艺术商品化的仅存遗产。人们会认为，这至少是底线了：如果不再是根据他或她创作的质量高低、材料的选择、或他或她选择从事的实践类型来判断，那么一位艺术家唯有凭借其想象力的创造性成为 一位艺术家；同样确定的是创造性不会被拿去利用或腐蚀。这样想当然是错误的。一方面因为这种创造性必须经过专业化体系的裁定 才能被认可为是富有艺术性的，该体系的看门人是艺术院校和画廊（被承认的没有经过艺术学校训练的艺术家毕竟很少），而它们又受到严格的（即便是默而不宣的）规矩和标准的统治，最终受命于现代艺术的主要学术机构；上述想法的错误还在于，创造性本身是可以被市场化的，而且已有过这样的事例；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设计行业就是通过关键的教育机构从艺术的前卫活动中衍生出来的，比如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包豪斯。当前卫有了自己的空间、传统，并独立于文化主流之外，有了自己的身份属性，可以被看作是另一种 专业化时，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被商业吸纳。但是随着我在上一章指出的这些标准的崩溃，除了被吸纳，还有其他选择吗？

艺术创作的一个最新领域——数码艺术，自觉地与20世纪初期前卫艺术的理想和策略重新对接，对传统的艺术机构有着相对较少的依赖性，仿佛预示着存在其他选择。首先，如媒体艺术策展人克里斯蒂

娜·保罗所评论的，尤其突出的是杜尚的例子，许多数码艺术实践的背后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他的“现成品”，比如《瓶架》，对艺术理念手法的揭露——它们重观念而轻物体和制作技巧——适合进一步去探讨电脑这样面向过程的媒介。另外，遵循杜尚和其达达派同行的道路，利用机会和随意性，这些都是劳森伯格、漂浮社以及作曲家约翰·凯奇之类艺术家作品的特点（如我在第二章所言），这些都在最近的数码艺术重新出现。更普遍地说，如保罗所指出的，20世纪中期现代艺术家的主要关注点在新技术的帮助下，获得了更新和发展。如此，像约翰·哈特菲尔德之类的摄影合成艺术家们的作品或是马克斯·恩斯特精心拼贴的奇异的版画在后来的艺术形象中找到了共鸣，比如南希·伯松〔5〕用电脑印制的合成照片。她在1993年的《美的构成》中将电影明星贝蒂·戴维斯、奥黛莉·赫本、格蕾丝·凯利、索非亚·罗兰以及玛丽莲·梦露的形象综合成一体，创造出一个西方美女怪异的“标准”形象。利连·施瓦兹在1987年创作的《蒙娜/列奥》中将《蒙娜·丽莎》中的左脸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素描自画像中的右脸对齐后拼在一起，揭示了出人意料的“家人”形象的相似性。

也许是在数码艺术的一个特定区域——互联网艺术内，现代主义的前卫继承性是被最有意识地认可的。由于上网便利，对介入其信息系统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和专业知识要求相对较低（对第一世界的公民而言），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许多艺术家（他们共享理想主义概念并且反对企业资本主义，这都是在20世纪初激发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构成主义的因素）会转向这种媒介。如艺术史家朱利安·史塔勒伯斯所记述：

> 网络艺术的出现退还给了艺术家一个奖赏和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责——明显的社会角色，在自由社会中它早已被拱手让出以换取艺术许可证书和小型手工业生产价值。

他还指出：

许多前卫艺术的真实状况在网络艺术中得以展现：它的反艺术性，对艺术领域的不断拓展，对艺术与非艺术的探讨，以及对艺术机构的挑战。

有些网络艺术家明显地借助于毕加索和勃拉克在他们早期立体主义时期拥有的英雄般的同志情感，视他们之间的共享、借用想法和点子等同于那两位艺术家在蒙马特区的画室之间的穿梭往来。其他艺术家则合力朝着更有战略性的目标努力，如有几个网络艺术家和群体，他们一直致力于品牌方面的问题。因为品牌名称已经变成了强大的资产，受到强力的保护，而互联网已成为它们传播的主要手段，小的极端团体对大企业进行有效干预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麦当劳、美孚、凯马特及电子玩具等大公司都吃尽了这些团体行为的苦头。

但无论网络上的前卫艺术家如何地有创意，从文化角度讲，他们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还是有限的。首先，可以接触到电脑的人从全世界范围看仍然是少数，集中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其次，上述经济干预行为虽然被认为有阻扰价值，但它或者面临着屈从于网络的“工具性”的危险（网络在经济上被当作大公司和政府的工具），或者太边缘化和太孤立以至于除了对自己，对任何其他人都造成不了影响。二者之间无论哪种，都难以区别于其他以网络为基础进行的颠覆破坏活动，如“骇客行为”。这等于说使艺术创造性不被“工具化”的唯一方法是不认可它为艺术。这种策略也许可以保持当代的、自封前卫的艺术家的完整性，但代价是，对这些艺术家群体之外的所有观众而言，它不再能发挥连接当代艺术和现代主义的作用。

还存在另外一个结局。毕竟我们可以接受现代艺术（几乎）不能避免的商品化地位。作为艺术 的艺术仍然具有感动、陶醉和启蒙观众的力量。与现行的那种断言当代艺术的语言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语言相反，我们可以坚持，恰恰正是与日常生活经验的不同之处才使得现代艺术如此有意义和丰富多彩——立体主义引人注目的难解性，超现实主义（有时令人震惊）的奇异性，马蒂斯的绘画对脑和眼的丰富刺激感，罗斯科色彩薄涂法的崇高简洁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主张，这就是文化如何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

作用的，它为我们提供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缺乏的深刻的审美经验，弥补了这种欠缺。伴随着这些对我们日常平庸生活的补偿，还有更多令人不安的倾向：那些拼贴、混合、合成，其将材料和主题引人争论地并置的做法，既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构成性质的沉思，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如电影、流行音乐以及商业化的视觉环境）丰富了对现实的再现。毕竟，如果没有超现实主义，又何来蒙迪·派松或现代广告业？

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那就是我们能将这些不同的选择综合在一起吗——我们能否既 保持与现代艺术史的复杂关联，当代艺术的很多含义从此历史中而来，又 坚持试图避免使这一历史“博物馆化”的当代艺术实践？如果作为现代艺术观众的我们打算相信它最初发展时的理念，我们就表明自己要像前卫艺术家那样反对体制化了的现代艺术——那几乎是其中所有的艺术——它要求默认放弃作为 艺术的艺术，并赞成将原先投入在批评资本主义文化的作品中的艺术创造力转投到其他更为适宜的领域中去。但假如我们允许自己按照审美及博物馆的定义去欣赏现代艺术，无论我们在遇到这些艺术品时得到何种视觉满足，都是以误解它们原意的方式得到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巴奈特·纽曼（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说过，“如果人们能真正理解我的作品，那就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和集权统治的结束”。那么，我们是希望艺术能够针对资本主义的不足给我们以安慰，还是去挑战这种制度呢？或是两者皆有？这要看我们能否鱼与熊掌兼得了。

注释

〔1〕“美好时期”（*the Belle Epoque*）指20世纪最初数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

〔2〕关根申夫（Sekine Nobuo），1942年生，日本物派艺术的创始人之一。

〔3〕石田武寿（Tatehata Akira），1947年生，日本大阪国立国际美术馆馆长。

〔4〕 哥拉多·墨斯凯拉（Gerardo Mosquera），古巴艺术策展人、批评家及艺术史家，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临时策展人。

〔5〕 南希·伯松（Nancy Burson），1948年生，美国当代女摄影艺术家。

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件作品是“现代的”？选定标准是如何制定的？艺术经纪人在其发展过程中扮演何等角色？现代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创作究竟想表达什么？

作者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阐述和解读了这些问题，同时运用丰富生动的例证评析了与现代艺术发展有关的历史和文化现象。

百科通识文库

49

走近当代艺术

朱利安·斯托拉布拉斯 著

王端廷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走近当代艺术

朱利安·斯托拉布拉斯 著

王端廷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64**

Contemporary Ar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4.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4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Julian Stallabrass 2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当代艺术 / （英）斯托拉布拉斯（Stallabrass, J.）著；王端廷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85-4

I．①走… II．①斯… ②王… III．①艺术 - 研究 - 世界 - 现代 IV．①J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58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85-4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全球化时代的艺术奇观——译者序
第一章　一个自由地带？
第二章　新的世界秩序
第三章　消费文化
第四章　艺术的用途与价值
第五章　当今艺术法则
第六章　种种矛盾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朱利安·斯托拉布拉斯，伦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艺术史高级讲师，为《泰特》、《艺术月刊》、《新政治家》、《新左派评论》等多家杂志撰稿。曾为泰特英国美术馆策划“网络中的艺术与金钱”展览，出版多部争议作品，包括《高雅艺术精简版：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艺术》（1999）、《画中的巴黎》（2002）以及《因特网艺术：文化与商业的线上冲突》（2003）。

译者简介

王端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三次作为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分别留学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研究院（1997-1998）、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文学与哲学学院艺术史系（2002-2003、2010）。已出版译著《抽象绘画》，专著《迷狂的独行者——雷蒙·饶可让的绘画艺术》《人体艺术欣赏》《百年困惑——现代美术》《后印象派》《立体派》《巴黎画派》《静沐西风——西方艺术论说》《西方美术史》《从现代到后现代》《桑德罗·特劳蒂》《新现实主义》《超前卫艺术》等十六部。发表论文一百五十余篇。

图目

图1　梅尔·琴，《夜间罪责》
图2　卡拉·瓦尔克，《棚区小姐》
图3　维克·穆尼兹，《后果（安杰利卡）》
图4　桑提亚戈·西耶拉，《纹在4个人身上的160厘米长的线》
图5　鲍里斯·米哈伊洛夫，《尘土之上》系列
图6　谢尔盖·布加耶夫·阿弗利卡，《MIR：20世纪制造》
图7　何塞·安吉尔·托伊拉克，《迷恋》，出自“新时代”系列
图8　王广义，《伟大的资本主义系列：可口可乐》
图9　徐冰，《天书》
图10　科乔，《谈及常规之物对我们来说从来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图11　村上隆，《巨乳美少女》
图12　西尔维·弗勒里，《ELA75/K系列（容易，轻松，美丽）》
图13　瓦内萨·比克罗夫特，《VB29.243》
图14　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时代广场》
图15　托马斯·斯特鲁斯，《时代广场，纽约》
图16　托马斯·鲁夫，《h.e.k.04》
图17　杰夫·昆斯，《多圈的》
图18　弗朗西斯·阿利斯，《宪法广场》
图19　利亚姆·吉利克，《马尔默罗塞姆艺术中心改造计划》
图20　达米恩·赫斯特，《绝对赫斯特》
图21　托比亚斯·里赫伯格，《世界七极》
图22　保罗·法伊弗，《长计时（在丛林中搏斗）》
图23　加布里埃尔·奥洛兹科，《La DS》
图24　葆拉·皮维，《无题（飞机）》
图25　茨比格涅夫·里贝拉，《乐高集中营》
图26　加文·图尔克，《切·格瓦拉》

图27　爱德瓦尔多·卡茨，《阿尔巴，放射出荧光的兔子》
图28　etoy，《公司，玩具战网站》
图29　艾伦·塞库拉，《等待催泪瓦斯》

全球化时代的艺术奇观
——译者序

艺术从遥远的过去走来，又朝着无限的未来走去。艺术除了有空间和民族的区分，还有时间和历史的向度。在时间的长河中，艺术始终处在或缓慢或剧烈的变化之中。为了界定已经发生的艺术现象，人们将艺术史加以分期，并赋予各种各样的名称。这些分期不仅有特定的时间节点，还有特定的性质含义，它们被人们作为知识来铭记。在世界艺术史教科书中，古代艺术、中世纪艺术、文艺复兴艺术和现代艺术等许多概念均已约定俗成、一清二楚，只有当代艺术这个概念在时间和内涵上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contemporary这个英文形容词有“当代的”、“同时代的”、“同时发生的”和“同龄的”等含义，作为艺术的时间定语，它是一个随着人类生命代代延续而永远适用的概念，换一句话说，每一代人都可以把他们那个时代出现的艺术叫做当代艺术。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在《艺术与忧虑》（*Art and Fear*）一书中发出这样的诘问：“同（当）代艺术，没错，但与什么同代呢？”（Contemporary art, sure, but contemporary with what？）除了时间上的模糊不清，当代艺术在内涵上亦无定论。

“二战结束的1945年”、“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都曾被人确定为当代艺术时期的起始点，而本书作者、英国评论家朱利安·斯塔拉布拉斯则为当代艺术找到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1989年。回想一下那一年发生的世界大事件——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以及东西方冷战的结束，我们就应该承认1989年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伴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历史终结的是全球贸易协定的签订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来临，而全球化正是1989年之后世界文化和艺术的背景和底色。

经济全球化不仅打破了各国意识形态之间的壁垒，也摧毁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屏障，使得当代艺术变成了一个多元而开放、各国艺术家都可以进入的舞台。换句话说，全球化首先带来的是世界艺坛格局和艺术秩序的变化。斯塔拉布拉斯写道："（在当代艺术中）现代主义线性、单向、白人和男性原则彻底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多元、多向、彩虹般多色人种、由实践和语言组成的碎片般的复杂景观。"的确，此前由西方人撰写的"现代艺术史"均是一部部主要由西方白人男性艺术家组成的历史，因此我们在翻译出版这类著作时往往会增加"西方"二字作定语，而在近些年西方艺术史论家撰写的关于当代艺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亚洲和非洲、黄种人和黑种人在内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各个种族的艺术家的创作。在本书中作者就辟有专门章节介绍中国和古巴的当代艺术状况，出现在这本书中的中国人除了艺术家谷文达、徐冰、王广义和王晋，还有批评家栗宪庭、高名潞和侯翰如。全球化时代诞生了史无前例的无国界的当代艺术。

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使得当代艺术的创作主题和艺术语言发生了转变，正如本书作者转述科科·福斯科（Coco Fusco）的话：全球化改变了艺术世界的面貌，也改变了种族与文化差异性的处理方式，使得艺术按照共同的世界主义模式发展演变。从对地方和国家（民族）关切的表达转向对人类共同心声和普遍关切的言说，当代艺术将普适主义（universalism）作为重要的价值观。在本书中，斯塔拉布拉斯还以他2002年在香港看到的"第九届全国美术展览"部分作品展中王宏剑描绘的民工在月光下等待乘车回家的绘画《阳关三叠》和郑艺描绘的在阳光下微笑的农民肖像《凡心已炽》为例，指出了中国一些主流艺术作品不能进入当代国际艺坛的原因："由于缺乏应有的西方参照对象（实际上在西方也有一些同类创作，但包括印象主义在内，都是较为陈旧的风格）和非功利的追求，它们全都带有某种宣传功能，这样的作品与西方作品迥然不同，因而难以在全球化的艺术系统中脱颖而出。"由此我们看到，艺术主题是否具有普适性（universality）已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而在艺术语言上，当代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形象的肆意挪用、对新材料和新媒介的偏爱，迷恋

架上艺术的传统主义者只能在观念主义和装置艺术一统天下的优势面前绝望地哀叹。

为了吸引世界各国观众的眼球，许多杰出的全球化艺术作品都极力标榜各自的文化身份，但不同的艺术语言和作品表象的背后，却是内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正如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Žižek）极力证明的，只有不是真正的不同，各种文化身份的差异性才安全。在当代艺术中，差异性产生了同质性，因为一切都要受到全球化时代艺术市场的制约。事实上，正是经济的纽带将整个人类紧紧地联为一体。金钱和市场是当代艺术的真正主宰，它不关心灵魂的归宿和底层民众的疾苦，几乎将宗教和社会学的主题抛弃得一干二净，只热衷于表现消费主义的庸俗趣味。艺术与时尚、艺术与商品、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不可分、浑然一体。

本体几乎彻底消失，艺术已经迷失在当代人类社会复杂而瞬息万变的迷宫中。在这本专门论述艺术的著作中，作者很少谈及艺术的主题、风格和语言，全书连篇累牍评述的都是当代艺术的外部关系和外在因素。社会政治对于艺术的影响由来已久，自不待言，全球化时代的当代艺术恰恰就是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和去民族化的艺术，此书更关注的是艺术与经济的关系。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了当代艺术巨大的自由，又给了它致命的束缚。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艺术的命运与经济的繁荣与衰退息息相关，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对艺术的赞助都带有经济的目的，而艺术品的价值和用途则不再是满足精神、教化和审美的需要，而是被赋予了包括投资、避税和洗钱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功利主义功能。

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当代艺术是极其复杂、极端多样的……艺术中各种各样的当代形式、技术和题材实在是扑朔迷离、令人应接不暇。”当代艺术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它一方面标榜自由主义和多元化，但同时又另立标准，将许许多多同代人创作的形形色色的艺术作品排斥在当代艺术之外。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命运，每一代艺术家有每一代艺术家的使命。当代艺术与我们同行，不管美丑，无论好恶，它都记录了当代人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表达了当代

人不懈求索的生命意志。当代艺术尚在路上，它的明天不可预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命的延续不断更新。

这本书是关于世界当代艺术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从崭新的视角对崭新的艺术现象作了崭新的阐释，多有真知灼见，但此书也是译者迄今读到和翻译过的最艰涩的英文，正如被撰述的对象亦即当代艺术本身的特征，作者的行文也隐晦难懂，生僻的词汇、散漫的语法和层见叠出的从句，使得准确翻译变得极为不易。毫无疑问，“信、达、雅”的最高翻译标准很难达到，本人只是力求在准确传达原文含义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作者的文风笔韵。好在是中英文对照版，译文若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和专家以原文为准。

王端廷

2009年10月19日于北京

第一章

一个自由地带？

我们首先来看看当代艺术家对人体的利用：有人把头发梳理成汉字形状的图案，或是用头发织成一块地毯，或是从自己身上拔下头发安插到根据其父亲模样制作的小蜡像上；有人割破自己的皮肉让鲜血滴在画布上，或是用鲜血绘制自己的半身像；有人把精液射在图画上——甚或耶稣受难像上；有人把整容手术作为行为艺术来展示；有人把人的耳朵放在皮氏细菌培养皿[1]中使其腐烂；有人烹煮婴儿的尸体并（佯装）吃掉。当代艺术似乎生存于一个自由地带之中，丝毫不为日常生活的凡俗和实用特征所牵缠，也不受其规则和传统的制约。在那个地带，伴随着相对静默的冥想和才智竞争，一种由狂欢节式的新奇感、对道德准则的野蛮破坏和对既定信仰的疯狂背叛所组成的奇妙混合物也在茁壮成长。从专业期刊到通俗小报中的专栏，围绕当代艺术的讨论涵盖了下列多个层面：对作品的恭敬诠释，复杂的哲学分析，胡吹乱捧式的宣传，最后还有谴责、嘲弄和排斥。然而，这样熟悉的景象——打破艺术规则是那样老生常谈而且理所当然的现象，而赞扬与谴责又是那样司空见惯——掩盖了近期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这一变化部分是由艺术的内在信念所驱动的，还有部分则是对宏观经济与政治变革的反映。乍看起来，与建立在自由贸易的理想（若非实践）基础上的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相比，艺术似乎并不具有更明显的区分度。经济严格依据铁一般的规则运行，由大型跨国经济实体不公平地加诸各国；它建立起一整套财富和权力的等级体系；它将一种时刻表式的规范化工作生活方式强加给大多数世界民众，同时利用那些冒险及传奇故事中（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们正是通过打破规则而创造了自由的生活）的电影式生活前景，以及那些表现反叛或爱情主题的伤感歌曲来抚慰他们的心灵。乔纳森·里奇曼（Jonathan Richman）谱写的一首营造了甜蜜假象的歌曲《政府中心》触及到了这一点。下面是其中的几句歌词：

> 我们要在政府中心摇滚
> 要使那些部长感觉更棒

当他们把图章盖在信上……

这首歌用打字机的铃声结尾，它向其听众显示了流行歌曲的（大部分）功用究竟何在。

看起来，艺术是独立于僵化的工具性、官僚化的生活及与其互补的大众文化领域之外的。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应归因于艺术特有的经济法则，这套法则是建立于生产独特或罕有的手工艺品及摒弃机器复制的基础上的。艺术家和艺术经销商们甚至人为地限制可复制作品的生产，这一手段表现为限量版图书、照片、录像以及CD。这个小小的世界——从其内部看，它似乎是独立自主的，是一个由少数重要收藏家、经销商、批评家和策展人的行为所控制的微观经济体——创造了区别于大众文化市场的艺术自由。显而易见，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的录像作品并没有在中西部目标观众群体中进行试播，而制作人也并未强迫奥瓦达那样的艺术乐队确保他们的音像作品能在商店里播放时不致惹人厌烦，抑或得到11岁少女这一核心市场的青睐。因此这个文化飞地不会受到粗俗商业压力的影响，伴随着那些标准化的对陈规禁忌的抛弃，它允许对各种物质和符号进行自由运用。

艺术的自由不仅仅是一种理想。虽然成功机会很小，但艺术家这一职业仍然是很受欢迎的，这是因为它展现的是一种不受狭小的专业范围限制的劳动前景，它允许艺术家像电影中的主人公那样赋予其工作和生活以独特的意义。同样，对于艺术的观众而言也拥有一种对应的自由，即他们在欣赏那些对创意和形式的自由运用时，不必挖空心思去神圣化艺术家的意图，而只需让作品唤起与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密切相关的思想和感受。富人们以拥有者和赞助人的身份进入这个自由地带，而他们购买了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政府保证更大范围的公众至少可以拥有片刻的机会去呼吸艺术作品所散发的自由气息。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来思考自由贸易和自由艺术是否真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彼此对立。首先，艺术经济准确地反映了金融资本经济的状况。在最近的一份关于文化优势意义的分析报告中，唐纳德·萨松（Donald Sasson）仔细考察了19和20世纪小说、歌剧和电影的

输入和输出模式。那些文化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拥有大量能够满足其国内市场需要的本土产品，它们很少输入外国文化产品，却成功地将本国文化产品大量输往国外。19世纪时，法国和英国是文学强国。而今天的美国显然是最强盛的文化之邦，它向全世界输出本国文化产品，而极少输入他国之物。正如萨松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美国文化的消费者，而只说明大多数跨国界的文化产品来自于美国。

萨松没有将美术纳入其考察范围，因为它没有大众市场。在一个完全超国界的系统中，要想从贸易数字中获知文化优势国的情况是很困难的。在这一系统中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形，一个德国收藏家通过一位英国经销商购买了一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不过，我们仍然能够对每个国家的贸易量有一个模糊概念，并且由于艺术市场中国际贸易所占的高比例，这也能反映全球文化霸权的格局。这一格局与全球财政力量的分配情况极为吻合：美国所占的主导性地位并不令人意外，它占了全球艺术销售量的近一半，欧洲则占有剩余的大部分份额，而英国又占据了其中一半左右的销售量。艺术品价格和销售量往往与股票市场关系密切，而世界重要金融中心同时也是艺术销售中心，这并非偶然。这种平行关系的强化，是因为艺术不仅是一个非功利的自由表演领域，它也是一个小小的投机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艺术品被赋予了投资、避税和洗钱等各种各样的工具主义功能。

第二，为了消除艺术观众心目中如此粗俗的经济考虑，当代艺术必须将自己的作品从庸俗的大众生产和大众趣味中独立出来，继续展示其自由和独特的特点。它可以从无闻甚至无聊之中获得益处，甚至使这些东西本身成为常规习俗。缺失了感伤情怀的当代艺术展现了一种与流行歌曲、电影和电视中所表现的甜蜜幻想和幸福结局相悖逆的形象。在对人类心灵的探索中，当代艺术往往会探究其中最为黑暗恶劣的一面，这似乎并不能给人以慰籍。然而，所有这一切探究最终仍会起到一些安慰作用，因为在消极因素之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信息浮现出来：这样的一个自由地带以及自由批评能够得到资本主义工具主义体制的保护。

第三，对于纯洁的文化自由理想来说，最危险的是人们有可能不把自由贸易与自由艺术看成是对抗的关系，而认为它们分别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系统以及该系统的补充物。这个补充物似乎是一种无关紧要的赘生物，不过（按照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著名分析），就像一本书的后记或者一篇论文的脚注一样，它仍然对整个系统的完整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具有整体的基本特性。自由艺术与自由贸易之间存在着一种不被承认的密切关系，而微小的补充活动对于主体系统的运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在追求新奇和刺激的过程中，当代艺术将各种象征物不断洗牌并重新组合（例如，在最近的一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鲨鱼和玻璃橱窗、油漆和粪便、小船和现代主义雕塑以及椭圆形的台球桌等组合），这鲜明地反映了广告中各种元素的奇特结合，而且当代艺术和广告业这两者之间总在不断地相互促进。在大众文化产品行列中，各种形式和符号被不断地混合、匹配，就像每一种文化元素都是一种像一美元那样可用以交换的标志。自由艺术的大胆创新——通过不断打破各种规范——只不过是苍白地映照了一种由资本自身造成的各种必然之物不断烟消云散的现象，资本能够突破任何阻力，从而使得基金、数据、产品，甚至无数移民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就如同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在他一篇对当代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章[2]中指出的那样：

>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被摧毁的并不仅仅是国家的屏障。持续不断的工业和文化革新消解了古老的结构、传统和联系，因此马克思写出了这样的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我们将会看到，有许多艺术家从不同程度上批判性地讨论了当代

艺术与资本之间的亲密关系。然而，艺术世界呈现出的一般情形中——特别是对于普通民众而非专家来说——那种亲密关系是看不见的。任何阅读过大量有关当代艺术著述的人都会经常碰到下列符咒的不同表述：这件艺术作品／这个艺术家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的艺术已经超出了理智的理解力，它将观众带到一个所有常规类别都土崩瓦解、令人发颤的不确定境地，带着由理性缝合的创伤，它打开了一扇令人头晕目眩的、通往无限抑或通向虚无的窗户。根据这一普遍性观点，艺术作品只是附带地成了被制造、购买和展出的产品，它主要还是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是时而严厉、时而温和的自我实现的监工。

在《艺术的法则》一书中，皮埃尔·布尔迪约（Pierre Bourdieu）深入分析了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文学，对一种不受宗教、赞助人和政府控制的自主艺术出现的社会条件作了探究。他指出，这个诞生于那个时代并延续至今的信念——艺术是不可解释的——仍然活跃着：

> 我只想问，为什么这么多的批评家，这么多的作家，这么多的哲学家如此满足地宣称，一件艺术作品的感受是不可言传的，就本质而言，它不能用理性判断力来解释；为什么他们如此迫不及待、毫无抗争地承认知识的失败；他们那无法抑制的轻视理性认识的需要从何而来，这种断定艺术作品具有不可征服性，或用一个更恰当的词，具有超凡性的热潮究竟源自何处。”（第xiv页）

今天的艺术应该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纪，它已经远离了激荡在福楼拜（Flaubert）和库尔贝（Courbet）作品中的第一股前卫浪潮，也远离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目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后现代主义以越来越强劲的势力，意欲将这样的关注抛在一边，对高雅艺术自身的范畴发起了挑战，抑或至少为自身受到的来自各种文化形式的浸染而感到愉快。因此令我们惊讶的是：在今天的视觉艺术中，这种更多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而不是分析精神的、关于艺术的不可知性的古老观念，仍然盛行不衰。

这种对于艺术不可认识性的反复强调变得越来越奇怪，因为最近出现了一些纯粹的工具主义艺术实践活动。既然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

无法知道的东西，这个关于艺术王国难以探测的符咒就成为了一种赤裸裸的宣传。艺术被赋予的功用，以及那些艺术利用者的身份，一般来说，远不神秘。自从东欧共产主义垮台以及资本主义事实上在全球占据了主要地位之后，艺术的功用已经变得更加高级、更加明显了。

冷战之后

1989年的全球事变及其后续事件——德国的统一、苏联的解体、全球贸易协定的出台、贸易集团的巩固，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深刻地改变了艺术世界的性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艺术首都从巴黎移至纽约之后，艺术世界就是建立在东西方分裂的冷战基础上的。一个集团中的国家所支持的艺术就是另一集团艺术形式的反面形象：如果东方集团的艺术必须遵从并代表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内容，还具有明确的社会效用，那么，西方集团的艺术必定要摆脱一切类似倾向，转而追求完全的非功用性。如果东方的艺术赞美人类、尤其是社会主义的人的成就，那么西方的艺术必然要集中表现人性的弱点、局限和残忍（同时抱着这样的希望，即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艺术自身能够有所作为）。随着这种对抗的逐渐消失（先是在开放条件下的缓慢改变，后又随东方社会制度的剧变而迅速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凯歌高奏（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建立起来，其中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艺术世界的面貌迅速改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世界各地涌现了大量艺术事件，与此同时，西方那些长期被忽视的来自不同国家、种族和文化的艺术家迅速获得了评论和商业上的成功。

后现代批评为这种转变做了准备，它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理论运动，确认了那些已被市场慢慢认可的东西，揭开了隐藏在高雅文化普适性外表背后白人男性“天才”的面纱。女权主义者对艺术世界中的男性统治地位发起了挑战，力图重新阐释那些排斥妇女的评判标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美国存在较长时间的种族主义现象也引起了世人激烈的争论。

著名的多元文化展览的出现恰好与冷战的终结构成了巧合，其中规划于开放年代、且都在1989年开幕的两个展览打破了制度上伦敦和巴黎白人垄断艺术世界的局面，这就是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举办的“大地魔术师”展览和海沃德美术馆举办的“另外的故事”展览。两个展览都引起了争议，并且作为进入这一领域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必然是有偏向性的。“大地魔术师”展览尤其受到了指责，因为它将第三世界艺术家异类化，其标题就体现了这种态度。然而，这是在艺术世界大都会举办的、首次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当代艺术同时且平等展出的重要展览。拉什德·阿拉恩（Rasheed Araeen）与英国艺术精英层的冷漠和自高自大作斗争，举办了“另外的故事”展览。该展览是第一次在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展示黑人和亚裔英国艺术家的作品。这些展览为非白人当代艺术家争取到了一种新的关注度。而且，这两个展览——尽管在几年的边缘化之后，阿拉恩完全有理由担忧他的展览可能只不过是白人之外一个“孤立的异类”——预示着一种体制的建立，在这种体制内，非白人艺术家再也无须抱怨不被关注，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必须开始担心他们所得到的关注的类型。

随着冷战的终结，一种无拘无束的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样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巩固，它也与席卷艺术世界的有色人种大翻身的潮流相重合。在新自由主义中，自由贸易的话语仍然风行，但那些全球性的管理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却在实施各种规则，对富裕国家的工业和农业加以保护的同时，又让一些经济脆弱地区承受不予控制的贸易（包括低于成本商品的倾销）、私有化以及福利条款解体等现象。整个世界出现了低工资、就业不稳定、高失业和工会力量削弱的普遍情形。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描绘了这套体制及其对那些最弱小国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如何在俄罗斯、东亚及其他地区制造或加剧危机从而给当地居民带来严重甚至致命后果的。而且，尽管财富都流向了跨国公司——并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财富也因此而流向了艺术世界——但对于艺术来说，最大的影响不是在其经济状况上，而是在其语言上。

贸易壁垒被打破的同时文化屏障也随之消失，由此产生了灿烂的文化融合，人们对这些现象进行了高度而热情的赞美。在这方面，艺术世界并不是孤立的。对全球化的这股热情浪潮席卷了经济、政治学以及人文科学等各个领域的讨论，这些讨论充斥了各种学术研讨会和自由报纸。贾斯廷·罗森堡（Justin Rosenberg）对这些言论的逻辑作了深入的分析并给予了讽刺，他指出了那些分析中的无条理性，它们意图用时空的抽象特性代替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特性，将其作为社会理论的首要原动力，其结论则常常含混不清、甚或仅仅是语言上的故弄玄虚。在艺术世界中，关于全球化的讨论经常是既漫不经心，同时又无处不在。

尽管艺术世界接受了这一语言政治自由的一面，特别是推崇文化融合或杂交的好处，它背后的整体设想——全球资本之梦——仍彻底而又迅速地在艺术领域显现出来。作为结果，艺术论述、机构和作品已经迅速地改变了面貌。整个20世纪90年代期间，世界各地都开展了双年展以及其他各种艺术活动。与此同时，许多城市修建了新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或是扩建了老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的活动逐渐变得更加商业化，因为它们采用了企业的理念，与商业结成联盟，让它们的产品更紧密地贴近商业文化，此外，较之于图书馆，它们更倾向于将商店和主题乐园作为自己的榜样。同时，当代艺术有选择性地与大众文化中的某些元素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变得如此无处不在，以至于人们有时会误认为这种转变是艺术与“现实”或“现实生活”的结合。长久以来，艺术明星就一直是社会名流，但现如今，作为一个整体的艺术舞台往往被当作时尚或通俗文化一样看待，甚而那些舞台上的小角色也出现在追踪明星运行轨迹的新闻媒介中。尤其是席卷了整个文化界的青春膜拜潮流也渗入了艺术世界，因而艺术与时尚越来越被看成是手拉手的亲密伙伴。

本书常常将1989年以后的时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考察艺术世界的结构及其产品，但是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引起当代艺术变革的、与全球化有关的重要变化。这是一些相互联系的问题，诸如美国的政治化艺术、经济周期和当代艺术展示的标

准形式的转型等。

文化战争

在美国，当代艺术，尤其是摄影和行为艺术，是一场关于中央政府艺术基金的政治斗争的焦点所在。这一现象的诱因是，一些由政府资助的艺术会场展出了一些有可能被看作是淫秽下流甚或是亵渎神明的作品。1989年，阿尔方斯·达马托（Alphonse d'Amato）当着他一些参议员同仁的面将安德烈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的作品《撒尿基督》的复制品撕成了碎片，那是一幅反映一个批量生产的基督受难像被浸泡在艺术家尿液中的照片。1990年，因为推出罗伯特·马普尔索尔普（Robert Mapplethorpe）的展览“完美瞬间”，辛辛那提当代艺术中心主任丹尼斯·巴里（Dennis Barrie）受到了违犯淫秽法的指控。该展览展出了马普尔索尔普拍摄的高度艺术化的黑白照片，其中包括了一些表现同性恋、施虐受虐狂题材的作品，以及艺术家为表现完美的（黑人）阴茎而长期探寻的成果照片。巴里最终被判无罪，只是其辩护词最后集中于坚持这些照片是艺术，而不是色情图片，因为它们能够被光明正大地欣赏。这些及其他类似作品被共和党拿来作为攻击国家艺术资助基金会（NEA）的根据，NEA是为美国艺术提供基金的联邦机构。这种攻击取得了部分成功，NEA可以支配的已然不多的资金被进一步大幅削减。此外，尽管存在着激烈的政治争议，这种攻击还是威吓了反对者，最终导致了一种更为沉寂的艺术景象的出现。正如道格拉斯·戴维斯（Douglas Davis）在一份针对克林顿政府的艺术政策的完美而又详细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面对保守派的持续攻击，政府的策略只是防御性的，也是有限的，而确定无疑的是，它们没有给视觉艺术提供任何明确的支持。其结果是由于政治上的驱动作用，政府进一步削减了NEA的预算。

保守派的愤怒直指那些赞成同性恋行为、反对政府对艾滋病防治的不作为，或公开展示黑人身体和性征的画作或行为艺术。一方面这

样的作品受到了公开痛斥，这种愤怒情绪暴露了美国政治大背景中存在的种族主义以及对同性恋的憎恶倾向，另一方面这种攻击也延伸至政治性作品中，尤其表现在艺术对种族主义的整体探究上。1994年，由塞尔马·戈尔登（Thelma Golden）策划、在惠特尼美术馆举办的“黑人男性”艺术展览就是一个广受争议的事件，展品中有大量表现裸体的作品。这是一个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展览，它反映了白人当权派对黑人的恐惧和镇压。其中，集中浓缩了展览主题的一件作品是梅尔·琴（Mel Chin）的《夜间罪责》，它表现的是一根将把手设计成勃起的阴茎形状的警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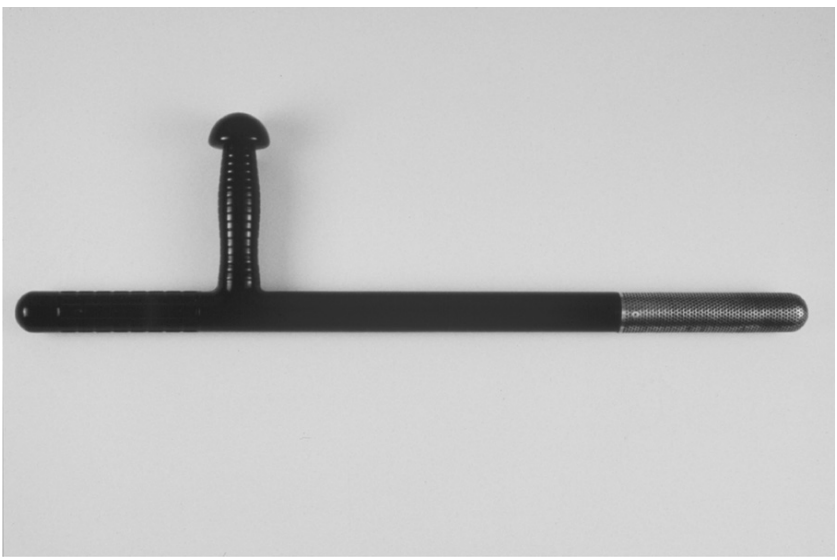

图1　梅尔·琴，《夜间罪责》

“黑人男性”展览遭到的反对不仅来自对该展览的政治主题感到不快的白人保守派，而且还有黑人激进主义者和艺术家，他们指责展览对裸体太过关注，进而可能反而肯定了该展览本来要批评的态度。

概括说来，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美国既出现了大量带有明确政治性的艺术展出，同时也存在着一股反对这类展出的激烈浪潮，其中甚至不乏像彼得·施杰尔达（Peter Schjeldahl）和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这样的温和保守派批评家，他们为了将这类作品逐出“艺术”的范畴而作出了协同的努力。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数年之后，这些批评家确实成功地在当代艺术领域确立了“美”的时尚。相比之下，极右派的攻击最终并没能使当代艺术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几乎没有人认真对待他们所推荐的东西，即那种在麦卡锡时代大行其道的高尚的爱国主义艺术。不过，极右派的态度也反映了其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即他们如此强烈反对的文化现象正是被他们极力维护的经济力量制造出来的。

然而，由激进主义者主导的旨在反抗主流风格的政治化艺术由来已久，但之前很少被人注意，现在为何变得如此引人注目呢？一方面，它是对由于经济衰退而突然搁浅的20世纪80年代迎合市场的艺术的反抗；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对政治舞台向自由派转变的一种期待，因为很多艺术界人士支持了克林顿1992年的竞选，其中一些甚至参与了为其竞选筹措资金的队伍。不管这种期待是否最终变成了水中月镜中花，但在最初，克林顿在把握那些预示着新兴变革的文化迹象时表现出的准确判断确实给了很多人信心。比上述两方面更重要的是，这应该说是面对艺术世界的全球化，美国艺术的一种重构。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约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意味着美国艺术的焦点从地方和国家主题转向了对所谓的世界性主题的关注，那么新的艺术秩序则要求人们抛弃普适性而转向对多样性、差异性和混合性的探索。艺术世界的物质中心仍然与以前一样，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作为世界上最富于文化多样性的国家，美国在新的体制下除了其经济和政治上的力量，还有艺术上的优势。然而，在没有克服其自身的偏见和排斥性——贸易壁垒——之前，这种优势还不能发挥出来。“文化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围绕政治性艺术的斗争是一个现代化的进程。在其他一些宗教占据了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主导地位的国家，这样的情景还会重演，例如，在波兰和希腊就发生了类似的艺术丑闻：艺术作品由于亵渎了宗教符号或直接表现了性爱场景而招致审查，策展人因此而遭到解雇。

如果说相比之下这种政治性艺术只是名噪一时，那么其短暂性的

部分原因在于它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艺术原本是变化着的，一旦它适应了新的环境，就很难回到过去。如果它没能实现自己更远大的理想，那则是由它不完善的特性，尤其是它脱离现实政治进程的孤立性造成的。本雅明·布克洛（Benjamin Buchloh）在一篇关于当代艺术的尖锐而又令人信服的文章中指出，在美国（人们还可以加上别的国家）政治从公众转向私人化领域的大趋势下艺术将精力集中于艺术家的个性身份，以及通过组合传统文化符号来确立这些身份的方式。与棘手的社会等级问题和冷漠的政治制度相比，这些更适于作为艺术探索的课题。

在这一政治体制中，由金钱和阶级构成的身份及其与其他身份的整体联系被忽视了。这样，当美国经济复苏的时候，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种突变的亲近市场的艺术再一次浮出水面。在这类作品中各种身份结成了幽灵似的联盟，它们彼此交织而又飘忽不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构成了奇怪多变的消费主义的主题。一个突出的典范就是卡拉·瓦尔克（Kara Walker）非常成功的作品，她的那些表现种植园中的性与暴力虚幻场景的剪纸作品引起了广泛争论。

最具创伤性的身份——代表极大耻辱的奴隶——在这些作品中被处理为黑色的剪影，而且是一种漫画化的形象，通过一种甜蜜的童话式的手法，这些形象将最为粗俗的服从行为呈现出来。正如科科·福斯科（Coco Fusco）指出的，这里没有明确的可资参照的道德准则，她的作品不是记录，也不是说教，而是要表现被压抑的幻想和欲望。问题是，那是谁的欲望？一些黑人评论家，特别是贝蒂·萨尔（Betye Saar），都因瓦尔克在主流艺术体制中迅速而富有戏剧性的成功而深感不快，他们认为她的作品是在冒着承认他们自己被歧视这一事实的危险来取悦白人观众。

图2　卡拉·瓦尔克，《棚区小姐》

因为艺术世界与经济的联系就像亚哈与白鲸〔3〕之间的联系那样紧密，考察上述关系的另一途径就是通过经济周期。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时期——从1989年至今（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军队正在巴格达确立一种新型的并且反全球主义的帝国秩序）——首尾两段都为经济衰退所困扰。首先是1989年的惊人风暴大幅削减了20世纪80年代过于膨胀而供过于求的艺术巨人数量，粉碎了艺术世界的妄自尊大和狂妄自信，使得艺术在较长时期内致力于政治艺术创作的同时也催生了更通俗更大众化的作品。艺术市场的泡沫由于日本买主从这一市场的突然撤退而迅速破灭。大背景中的经济问题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此外，有关丑闻的揭露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日本，大量的艺术买卖曾经是逃避房地产利润税收的手段，并且人为地造成了价格上涨的副作用。

第二次全球经济衰退在西方是一个缓慢展开的过程，它由高科技领域的失败引发，并伴随着证券市场的普遍低迷、有关财政腐败的丑闻和美伊战争而出现。在这两次衰退之间，经济复苏的迹象是不稳定

的，其中的例外出现在西方最具新自由主义特征的经济领域，表现在高科技和商业网络经济泡沫对经济的振奋上。在那些国家，巨大的供应（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预见性地）产生了一种针对那种与理论和政治紧密联系的艺术的反作用力，从而有利于具有美化作用、使人敬畏、令人愉悦并有卖相的作品的出现。

20世纪90年代艺术中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装置艺术”的兴起。这是一个复杂且颇有争议的术语。有人把它看成是一种坚决排斥买卖的艺术，因为从其定义上来说，这种艺术品生命短暂并且难以甚或不可能四处移动。因此，如朱莉·H.里斯（Julie H. Reiss）所说，装置艺术——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商业驱动的20世纪80年代从长期的沉寂状态中复苏并活跃起来。在它的第一个阶段（当时它被称作“环境艺术”），它都是在一些新建的“另类”并且往往是艺术家管理的空间中展出。装置艺术的重新流行刚好与1989年的经济衰退同时出现，但是，这种复苏的样式在艺术世界的中心地带，即博物馆安家落户。从“环境艺术”到“装置艺术”这种名称上的改变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展览是组装而成的。装置艺术再也不必抵制商业化了，从此以后，它俨然变成了能够移动、可以出售的作品。即使不是这样，艺术家和商人也往往为推销更有市场的产品而将装置艺术作为削本出售的商品。

装置艺术并不专注于某一种媒介，它本身就是一种媒介。它包括了录像，还包括绘画这样日渐陈旧的老媒介，或许它还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空间艺术，几乎囊括了所有媒介——甚至还包含了行为艺术的元素。尽管如此，它的繁荣兴旺仍然伴随着绘画和雕塑这类传统媒介的相对衰落。然而艺术世界总是纵向分层而又横向混杂的，它包括了许许多多彼此连接、相互交叉的领域。不管是不是占据着艺术话语的中心位置，绘画仍然是最适合买卖的艺术形式，它继续被创作并出售给个人和企业，成功的程度如何，则取决于经济状态。除此之外，素描、版画、艺术家的图书以及其他一些习作的情形也大致与绘画相同。然而，这里的焦点仍然是，究竟是什么艺术形式占据着中心位置，又是什么形式在世界艺术舞台的至高点上传播。

在这样的环境下，装置艺术具有两个显著的优势。第一个优势体现在它与大众文化的持久竞争方面——也就是，如何吸引观众，让他们感到参观一座博物馆或其他艺术场所要比看电视、看电影、听音乐会、看足球赛或上街购物更有意思。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竞争，看哪个更令人惊叹：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比如电视就不断地通过宽大的屏幕、高分辨率和DVD录像来更新换代。我们已经知道，艺术通过其对内容的处理将自己与大众文化分隔开来。除此之外，可复制媒介目前还不能模拟的东西就是人的身体在一个被巨型录像投影或者被具有重量、香味、动感或温度的作品所包围的特定空间中活动的时候所产生的感觉。因此，装置艺术——它提供一个让人可以进入的空间，而不是呈现一件让人观看的作品——走到了前台。

第二个优势是，为一个特定场所量身定做一件独特的作品是确保观众必须亲临现场的一种方式，并且这类由重要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聚集在一个双年展中，其在艺术世界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从这一点看，装置艺术和场所特定性就与艺术世界的全球化以及一种有利于地区和城市发展的艺术建立了联系。如今，作为常规的策略，参加这些盛会——不只是在威尼斯双年展、巴塞尔双年展和马德里双年展，而且现在还有圣保罗双年展、达喀尔双年展和上海双年展——变成了向观众证明社会地位的另一种方式（只要稍稍接触艺术世界的闲谈便可以肯定这一点，这种闲谈最常见的主题就是最新的异域集会）。

在后续章节中，笔者将探讨1989年以来的这些不同艺术元素之间的联系：美国的文化战争可以被看作是在美国国内出现的、全球大融合的序幕，并且它们是由同样的力量配置形成的——一边是旨在彻底打破商业上一切限制的自由消费主义，另一边是地方上的传统、宗教和道德势力。装置艺术（广义上来说）既与奇观胜景密切相关，又是大众文化的竞争者。当代装置艺术是一种昂贵的艺术，通常情况下，它必须依靠私人赞助和公共基金。这样，它将企业与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导致了博物馆的商业化，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直接使装置艺术与其艺术家独立自主创作的源头渐行渐远；此外，它也与全球化和私有化之间的联系紧密相关（艺术世界的私有化只是整个私有化进程

中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这种联系促使博物馆和画廊举办更为壮观的展览。与此类似，与大众文化的精华元素互依互利，以及与“现实生活”（也就是与消费文化和大众媒介密切相关的事物）打成一片的热望，也是上述推动力的组成部分。

为了不使这一描述显得过于粗略笼统，我希望读者对这些元素之间所具有的巨大张力和矛盾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在探讨全球化、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艺术的价格和用途、艺术的特性与艺术写作的特性时会考察这些因素间的矛盾。最后，我想说明的是，如此篇幅的一本书只能算是一个导言，这里能够容纳的要远远少于不得不大量删减的内容。本书对艺术家和作品的收录并不含有任何品质评判的意思，这些例证只是集中表明了本书关注的核心问题：亦即新的世界秩序中艺术的规则和融合。

注释

〔1〕 德国微生物学家皮特里（Julius Petri, 1852-1922）发明的实验室用于培养细菌等的有盖小玻璃盆。——译者注，下同

〔2〕 即《共产党宣言》。

〔3〕 亚哈与白鲸的故事出自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1819-1891）的小说《白鲸》。捕鲸船船长亚哈在一次出海中被南太平洋一条名叫莫比·迪克的大白鲸咬掉一条腿，为了复仇，亚哈航行世界各大洋，最终与白鲸同归于尽。

第二章

新的世界秩序

多利斯·萨尔切多（Doris Salcedo）是一位哥伦比亚艺术家，她用家具创作雕塑，而那些家具原先的所有者则是在该国长期内战中已经“失踪”的人。在这场惨痛的战争中，双方——游击队与政府军——都用毒品交易所得来资助战争；然而，尽管哥伦比亚政府军长期受到侵犯人权的指责，却还得到了美国的大量资助。一些与政府军结成了密切同盟的准军事力量可以不受惩罚地肆意劫持并屠杀百姓。在萨尔切多的一些作品中，一件家具被细致地置于另一家具之中，组成一对。在另一些作品中，第一眼看上去像是木头纹理的东西实际上却是人的头发。这些集成作品是用水泥封铸而成的，有时也会将一扇门或一张倒置的餐桌部分地掩埋起来。在观看这些家具作品时，人们会有一种极为缓慢的湮灭或腐蚀之感，似乎能看到一张记忆活动曲线图，这种记忆因暴力烙印而深刻于心，又因沉默和审查而尘封，在梦幻和无意识的思考中，它们又不请自来地返回到人们脑中；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记忆又会令人心痛地逐渐模糊，因为新的记忆和关于记忆的记忆会逐渐覆盖旧的记忆。

贾尔斯·吉尔伯特·斯科特（Giles Gilbert Scott）设计的坐落于利物浦的“英国大教堂”是一座巨大的未加装饰的哥特式建筑，其高大壮观的整体形象和建筑布局都沿袭了传统程式，但它却是上个世纪建造的。人们步入教堂时，会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奇异感。观众们会想弄明白，那些带有历史记忆的装饰、它们被去掉与被磨蚀的痕迹，以及人们所熟稔的多少世纪积累下的杂物都到哪里去了呢？还不如说它是一座新创的古老大教堂，然后被赤裸裸地丢在那里。

1999年举办了第一届利物浦当代艺术双年展，其中，由安东尼·邦德（Anthony Bond）策划的国际当代艺术部分“痕迹”展将一些当代艺术展品分别陈列在该市几个不同的场地。萨尔切多的作品就在英国大教堂展出。这样的组合达到了什么效果呢？建造这座大教堂的70年跨越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英国政治激进主义的兴衰、去工业化以及社会的彻底世俗化过程，因此，最终建成的教堂成为一个缺少工作、人口和信仰的城市中的超大建筑。萨尔切多的作品，包含了为向

记忆致敬的谨慎而又费力的努力，是爱德华多·加利安诺（Eduardo Galeano）那些非凡作品的视觉拷贝，后者的作品漠视来自整个拉丁美洲对语言或行动上抗议的强烈镇压，重新唤起了集体的政治记忆。更确切地说，正如查尔斯·梅里韦瑟（Charles Merewether）所指出的，他们的作品旨在反抗那种故意设计的失踪对记忆的冻结和封禁，因为对于那些哀悼者而言，若宣告他们的心爱之人失踪，那么他们就见不到遗体、坟墓，甚至不敢肯定心爱之人是否已不在人世。在视觉上，萨尔切多的作品与大教堂空旷、无装饰性的空间极为匹配，摆放这些作品的陈列柜就像变异的忏悔室或超大的棺椁。如此并置的场所与作品应该是相得益彰的，它们会有效地带来不同文化的融合，引发人们的思考，加深人们对其他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理解。虽然墓碑适合放在教堂里，但在这儿，这样的结合还是显得互相对应，因为在这座似乎代表着一切都未改变的建筑里，萨尔切多的记忆仪式与圣公会宗教精神格格不入。

“痕迹”是双年展一个典型的主题，因为它具有巨大的延伸性，几乎可以囊括任何东西，但也意味着它几乎什么也不代表。利物浦双年展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展览，它纳入了一些老的年度展，包括“当代新作品展”和“约翰·穆尔斯（John Moores）绘画比赛”。利物浦非常适合举办这样一个展览：这是一个海港城市，它一度辉煌的财富来源于包括贩卖奴隶在内的贸易，对于那种表现全球化及其历史的艺术而言，它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展览环境。如今，它邋遢不堪的城市建筑提供了大量可用于艺术展览的空间，那些阻碍了浪漫想象的破败区域亟待翻新改造。所有这些都给艺术展览提供了大量富有建设性和激发性的良机，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欧内斯托·内托（Ernesto Neto）的作品，亦即那些悬挂在利物浦泰特美术馆的使空气充满香水气味的巨大香袋，而这个美术馆原先就是一个用来存放这类货物的仓库。与此类似，维克·穆尼兹（Vik Muniz）的《后果》系列就是一组关于他的出生地圣保罗街头流浪儿的作品，主题深刻而又复杂。穆尼兹将凡·戴克（Van Dyck）、埃尔·格雷柯（El Greco）和委拉斯贵支（Velázquez）的绘画作品的图片给流浪儿看，让他们摆出画中人物的姿势，并用相机把

他们拍下来。他再以这些照片为基础，用狂欢节过后留在街上的垃圾和五彩纸屑精心构图，并以食糖勾勒出这些儿童幽灵般的轮廓。然后这些图像被拍成巨幅照片，并在美术馆展出。展览这些作品的泰特美术馆其名称本身就来自一位糖业巨子，这使作品获得了另一层含意。

图3　维克·穆尼兹，《后果（安杰利卡）》

“痕迹”展览图录的前言声称利物浦双年展反映了这座城市“当前都市的复兴”，不过，在1999年，这一说法与其说是一种事实的陈述，毋宁说是一种渴望。邦德写道，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艺术展品“确保观众在体验艺术的同时发现利物浦这座城市丰富多样的特性”。就这样，参观展览与旅游观光被明确地联系起来，的确，对于观众来说，他们参观该双年展的经历就像游客那样依照地图不断地从一个景点赶到另一个景点。作品与场地之间有着令人困惑的相互关系，而且两者都缺少背景材料；考虑到双年展的主旨基本上是模糊不清的，通过参观那些与建筑环境形成对照的艺术作品，除了极少数见多识广的艺术界内行人士（或许这个展览主要就是针对他们的），观众的经历基本上成了一次审美的练习。

展览图录罗列了该双年展的赞助者和协办者的名称，其中有企业、地方学术机构和艺术部门、国家艺术委员会以及像歌德学院这样的在国外促进文化的政府团体。这种混合显示了由双年展催生的联盟的含意：企业无论大小都想提高其品牌的知名度；国家借此推销它的文化产品；地方团体希望获得新的活力；而大学则需要提升它们的研究地位。

利物浦双年展只是一种日益盛行的文化现象中的一个例子。艺术界早已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冷战的终结也给艺术界带来了运作和习惯上的巨大变革。恰如企业主管环游全球寻找新的市场，那些过着游牧般生活的国际策展人开始干起了同样的事情，他们在各个双年展或跨国艺术活动之间往来穿梭，从圣保罗到威尼斯、光州、悉尼、卡塞尔和哈瓦那。在发展中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举办的那些艺术活动中，一些展览创办已久（像圣保罗双年展就创办于1951年，虽然它最近又经历了大的改进并得到了更多的资助），而其他的展览则全都是新生的。这里有一份仅包含部分新生双年展及其创办时间的名单：哈瓦那双年展（1984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迦双年展（1993年）、韩国光州双年展（1995年）、约翰内斯堡双年展

（1995年）、上海双年展（创办于1996年，2000年向国际艺术家开放）、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办的梅可索尔双年展（1997年）、塞内加尔达喀尔艺术展（1998年）、韩国釜山双年展（1998年）、柏林双年展（1998年）、横滨双年展（2001年）和布拉格双年展（2003年）。

艺术界对于这种发展的整体观点是乐观的：现代主义的线性、单向、白人和男性原则彻底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多元、多向、彩虹般多色人种、由实践和话语组成的碎片般的复杂景观。国际策展人罗萨·马丁内斯（Rosa Martínez）对“一个双年展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个问题作了如是回答：

> 理想的双年展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和精神活动。它怀着一种变革的愿望注视着当下。正如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在一个我欣赏的定义中所言，一次双年展“是对一个跨国乌托邦的惊鸿一瞥”。

对于每一个艺术事件，要想达到理想境界，关键是要给全球化艺术的热门标准带来变化——看双年展花名册，主要是看有多少相同的名字持续地反复出现——要让全球化艺术与当地艺术家和环境建立起具有建设性的联系。理想境界的另一个层面就是能够适时地创造一种艺术形式上的混合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来自具有广阔而又不同背景与归属的艺术家，既有世界性，又有地方性，占据并创造居中的空间，这样的空间会逐步削弱那些同种族国家——尤其是单一民族国家——政权存在的根基。

这一理想具有强大的理论后盾——它尤其得到了霍米·巴巴（Homi Bhabha）和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著作的支持，这些理论伴随着他们的文学作品，在各种艺术活动中定期传播，它帮助提升了那些在有些国家中以前只是作为特例才能获得成功的艺术家的声望。例如，这些来自中国、古巴、俄罗斯、南非或韩国的艺术家给全球化的艺术世界带来了新的声音、视角、观念和风格。萨尔切多作品的冲击力，源自她与那些失踪者哀伤的亲属们的合作，相对于诸如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或查普曼兄弟[1]那些间接的、由媒介

激发的暴力幻想作品，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如此对比也使得它们看上去显得荒谬可笑。这样的作品改变了艺术景象，并使自己站在了国际巡回舞台的最前沿。《第三文本》，一份致力于鼓励并分析第三世界艺术和文化视角的杂志，已经不得不将它的首要目标从努力让这样的艺术和主张变得引人注目，转向探讨它之所以会如此成功的条件。正如让·费希尔（Jean Fisher）指出的，关键的问题已不再是默默无闻，而是过分引人注目，这是因为，文化差异性如今已经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首要卖点。

我们可以通过依次考察那些双年展、不同地区艺术事件的对照实例以及全球化艺术生产和消费的这新一波蓬勃发展的功效，来探究这种成功背后的原因。

推动双年展超常激增的力量与导致新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和老博物馆竞相扩建与重建的力量是相同的。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城市之间正面临着吸引投资、公司总部落户和游客等方面日益激烈的全球性竞争。最成功的城市必须保证在增强经济活力的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双年展只是所有想要成为全球化都市（或者往往是渴望那种地位）的城市用以吸引特定的旅游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富有）、同时也为那些有能力离去的本地居民提供娱乐的箭囊中的一支箭而已。

侯瀚如（Hou Hanrou），这位组织过一系列以探索急速发展和改变的亚洲城市为主题的展览的颇有影响的策展人，在一篇文章中清楚地指出了艺术世界的利害关系：

> 这些新兴的全球化城市代表着新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力量的崛起，这些力量正给这个星球带来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和崭新的前景。最重要的是，凭借其自身特有的文化遗产，这些城市变成了新的有创造性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对现代性的新视觉和新认识、“乌托邦／反乌托邦”想象的新的可能性，都能得到充分体现和重新确立。

这样的双年展也是对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文化阐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算得上是一个例证。土耳其政府千方百计地向欧盟证明该国

正十分严格地遵守非宗教和新自由主义准则，以获取成员国资格，而该展览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另一个展览，即哈瓦那双年展，也是通过准许在艺术这个狭小范围内不同意见的存在来为古巴政府树立一种更加温和、文化观念开明的形象。

双年展还拥有另外两个优势，使其有别于一个新技术博览会或一场重要的足球赛。首先，尽管存在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学术上的否定声音，但在公众眼里，艺术仍然保持着超越普通的文化和消遣、抵达超凡境界的声望。如此说来，双年展对于一个城市所起到的作用——为了争得全球化市场中的一席之地，它必须应对激烈的竞争——就如同挂在壁炉上方的一幅毕加索绘画作品对于一名烟草商所起的作用一样。其次，双年展不仅能够体现、而且可以有效地宣传全球化的种种优点。

在某些情形下，双年展实际所起的作用与其本应体现的理想互相抵触。约翰内斯堡双年展创办于1995年，也就是1994年南非第一次实行自由选举后不久。举办这次双年展的用意，是在多年的国际抵制结束后重新建立南非与文化世界的联系。第一届双年展包含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大型展览，其目的就是要把约翰内斯堡打扮成一个完全成熟的全球化城市。那些可能会表现该国混乱景象的本国艺术家被统统排除在外，许多人觉得该双年展呈现的是一幅值得怀疑的南非社会正面图画。虽然该双年展也吸纳了南非本国的策展人，但展览还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指责，因为对于一个对此毫无准备、贫穷而又四分五裂的国家来说，这次双年展就像是一个外来入侵者。该双年展遭到了黑人社会大多数人的抵制，他们对这种向国际艺术界的谄媚奉承之举感到极为反感，这样的结果令包括托马斯·麦克埃维利（Thomas McEvilley）在内的许多人都吃惊不已。

1998年举办的第二届约翰内斯堡双年展——由奥克维·恩维佐尔（Okwui Enwezor）和一个国际团队策划，主题为“贸易之路：历史与地理”——试图对第一届双年展引发的批评作出回应，即定位为一个关于种族、殖民和移民问题的政治展览。这次的双年展又完全是一次全球主义的尝试，包括了侯瀚如和杰拉尔多·莫斯奎拉（Gerardo

Mosquera）这样一些策展人，不过这届展览强调的是南-南关系。尽管主题变了，而且有着严谨的理论化的策划，但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双年展这种形式似乎就注定了其与成功的背道而驰。约翰内斯堡市议会的财政危机给展览带来了威胁，并进而延误了这一活动。当地艺术家和批评家再一次怨声载道，他们抱怨该展览为了迎合与全球融合有关的世界主义关切而让非洲作品边缘化了，而其中对他们尤其不利的是展览对媒体艺术的关注，然而没有几个当地艺术家擅长或有机会学到这种艺术。此外，后观念艺术和镜头艺术的标准形式被看成是以殖民主义手段强加给当地文化的外来之物，结果曲高和寡，当地观众对其难以理解，而且这类艺术也远远脱离了当地民众的关切。由该市的财政危机引起的宣传和教育基金的缺乏，更强化了这一认识。由于城市治安的恶劣，双年展的外国观众感觉像是呆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因此，原本期待的文化交流在两个方向上都未能取得成功。双年展吸引的观众远远少于它所期望的数量，而且，它还被市议会提前一个月关闭了。该市随后宣布，他们再也没有资金举办下一届双年展了。

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失败的局面呢？简·布德尼（Jen Budney）坚持认为，该双年展错在试图吸引那些原本对展览的文化理想没有多少兴趣的中产阶级观众（包括白人和一小部分黑人）。此外，双年展难以吸引当地观众也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因为，实际上有许多南非白人仍然保留着种族隔离的观念，他们很难接受一个表现多元文化的全球主义展览，而黑人精英则有自己更为切身的利益关切；对于剩下的那部分人来说，与西方签订的终结种族隔离制度的协定，也意味着他们承诺要按照全球惯常的约束规则来管理经济，但这却使他们陷入了持久的贫困，这一切无疑使他们始终怀有一种矛盾心理。

甚至那些成功的双年展都包含着类似的矛盾。在哈瓦那，双年展以古巴和第三世界艺术作品的展览吸引了大量观众。这个城市的普通民众远比南非贫民窟的居民有教养，但他们也并没有觉得这个看起来主要为外国人举办的双年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更好的服务。新媒体作品在开幕后就被关闭，或是某些场馆不到闭幕就提前关门了，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科科·福斯科对2000年哈瓦那双年展上古巴艺术服务

于外国赞助者的重构作了这样的描述：

> 载着欧美策展人的飞机来了……他们被人领往精挑细选的工作室和奢华高档的鸡尾酒会，被护送着去参观那个重要展览，而这对于大多数古巴人来说是太过昂贵的活动。在那里，只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大量录像投影和少数现场活动专为外国旁观者而开放。在随后的日子里，当其他观众来到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几乎没有什么机器在运转。

在桑提亚戈·西耶拉（Santiago Sierra）为2000年哈瓦那双年展创作的作品《桑提亚戈·西耶拉请你喝一杯》中，艺术家雇用了一些妓女并让她们藏在作为聚会参加者座位的箱子里，从而对艺术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可能存在的权力与利用的关系作了尖锐的批评。

图4　桑提亚戈·西耶拉，《纹在4个人身上的160厘米长的线》

双年展优先考虑的往往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观众而不是当地居民，其结构继承了国际艺术或贸易展览的模式，在这样的展览中，各个国家竞相推出它们最杰出的文化产品，从而展开激烈的文化战争。

尽管许多双年展已经从设立国家展厅这种有形的竞争模式中走了出来，但国家竞争的气氛有时仍然存在。而且，这些展览的策展人，这些漫游专家，也是全球化艺术体制的产物。当然，他们确实也倾听、请教并吸纳当地的声音，但他们本身存在的理由和活动的环境是全球化的，也是混杂的。卡罗尔·贝克尔（Carol Becker）在一篇关于全球奔走的策展人角色的评论分析文章中写道：

> 一些走遍艺术、文化、文学、创作和展览精英世界的人物，如今看起来只对艺术世界负责。尽管一个作品看起来是为社会问题所驱动，这种重要尝试带来的唯一结果是其被艺术世界接受、不接受或者另眼相待的程度，通过作品得到的评论来衡量——它所引发的文章的质量，以及作品最终达到的相关销售额。

地方题材经过艺术体系过滤最终产生了同质性，这一体系——不只是策展制度，还包括私人和公共团体的利益，它们建立起的联盟正是双年展举办的基础——倾向于创造一种表现国际关切的艺术。更确切地说，它强调的是新自由主义价值，尤其是工作流动性以及与多元文化主义相关的优势。

一个突出的范例是阿尔弗雷多·贾尔（Alfredo Jarr）在赫尔辛基当代艺术博物馆ARS95国际艺术节上展出的作品《一百万本芬兰护照》。贾尔制作了一百万本经过轻微改动的芬兰护照的复印件，并将它们排列成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类似极简抽象派构造的巨大方阵，放置在一道安全隔板后面。如果芬兰政府按照其他欧洲国家那样的比率来批准移民，这些护照所代表的那些人本来是可以获得移民许可的。后来由于芬兰移民当局的坚决要求，贾尔的作品被销毁了。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件作品都算得上是全球化艺术创作的典范之作。它既直接采用了地方题材，又运用了当代艺术的世界主义语言；它对地方政治问题作出了反应，并发表了评论。通过这样的做法，它超越了地方关切而站在了全球资本利益的一边，这件作品的寓意就是人们的重新定居权应该不受任何国家规定的限制，即便这个规定是通过民主方式达成、维护同质性和社会团结的。

后文中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上，并继续探讨全球化艺术体系的同质性效果，但是为了强调它的多样化，我想先选取两对恰成对照的实例：一是新自由经济力量引起的冲击使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作品；二是来自中国和古巴这两个仍然保留着共产主义政府的国家的作品。

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均开始受到极度的市场经济压力的冲击。在俄罗斯，来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向政府建议采用一种迅即而猛烈的方式——“休克疗法”——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方式从短期来看可能会给人带来痛苦，但却可以迅速致富。休克疗法的实施虽然使极少数俄国人变得极为富有，但对于整个国家，其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带来的是凋敝的基础服务业、猖獗的犯罪、缩短的寿命预期和普遍的贫困。

由于这一灾难，来自俄罗斯和前苏维埃共和国的艺术受到了广泛关注。社会退化的碎片给西方观众带来了欢愉。不管是纪录片和摄影，还是表演和装置作品，“现实”在这里都是很紧俏的。此类以鲜活的现实为元素的作品都离不开对创伤的表现（人们可以从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的著作《现实的回归》中获得更丰富的认识，此书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的艺术，具有广泛影响），尤其是经济休克疗法对整体民众的冲击。

图5　鲍里斯·米哈伊洛夫，《尘土之上》系列

鲍里斯·米哈伊洛夫（Boris Mikhailov）创作了一系列摄影作品，在创作这些作品时，他花钱雇来一些无家可归者，让他们在照相机前摆出各种姿势并暴露自己，他要着力表现为赚钱而出卖身体这一行为中的压迫（在这一点上，他与桑提亚戈·西耶拉的作品很接近，后者也是付费让人忍受各种羞辱和暴露的痛苦）。在《场边》（1991年）和《尘土之上》（1993年）这两个系列中，他仿照20世纪早期摄影的风格，描绘乌克兰街道上的生活；他再次把镜头对准许多街头流浪者，但也关注那些可能有家但只能勉强度日的穷人。题材与风格都使人联想起前革命时代。这些作品从视觉上模拟了后苏联时代许多人的感受，人们感到后苏联社会的历史和发展已陷入倒退，而他们原以为资本主义能将他们带入一个幸福的消费时代，不曾想如今它却产生了一个时间结构上的分层，将大多数人抛回了沙皇时代的赤贫境地。

图6　谢尔盖·布加耶夫·阿弗利卡，《MIR：20世纪制造》

谢尔盖·布加耶夫·阿弗利卡（Sergei Bugaev Afrika）在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中代表俄罗斯，展出一件名为《MIR：20世纪制造》的装置作品。我在纽约一个展览开幕式上看到了这件规模宏大的多媒体作品，陈列室的地板和墙壁上密密麻麻地铺满了印有苏维埃生活宣传照片的锡片，那些照片也被重新洗印过，以使其看上去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观者的踩踏使地上的金属片弯曲变形，那些照片就像印在饼干筒上的幼稚图画。陈列室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金属球，球中还有一台录像机，放映着一个被捆在一台电器上的人正痛苦地一边哭喊一边咬着绳索。这部电影似乎是现成的资料片断，也有可能是虚构捏造的；在一个商业画廊看到这件作品，我的第一感觉是它是一种行为艺术。实际上，这个录像是根据一部纪录片复制而成的，影片纪录了一个人被迫接受电休克疗法的过程，而在我们这群正举杯畅饮的优雅之士眼里，那却是一个精神崩溃的奇观。阿弗利卡的作品力图将心理的创伤和社会的痛苦融为一体，从而揭示出潜藏在社会制度下痛苦而残忍的压抑，而在照片中这种制度却呈现出如此仁慈和英雄主义的面目，作品试图用这种古老的、可能带有怀旧之意的描绘来抗拒记忆的湮灭。

为了深化争论，阿弗利卡接着又创作了一件以描绘一支俄罗斯巡逻队被车臣叛军杀害的电影纪录片为基础的作品。这两个例子充分显示出后苏联时代的社会现实对于西方艺术界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人们可以从照片和电影中看到这些内容，尽管我们对后现代教给我们关于表现形式的旧有教训仍然还存有模糊的记忆，但还是会把它们当作现实来看待。它也可以通过行为艺术表现出来。奥列格·库利科（Oleg Kulik）的作品《狗》就是这类作品中的一个范例。在这件作品中，赤身裸体的艺术家不断地向观众发起攻击，试图用嘴咬他们，这是一条人变的狗，它用一种貌似逼真的表演宣泄了俄罗斯的悲惨和退化。

这类作品对于西方观众的魅力所在是明白无误的：这是一种资本主义蓬勃兴起（与此相伴的是强盗贵族和尚武冒险者，或者换句话说，是遍地的骗子和杀人犯），和一个欧洲白人第三世界骤然诞生的奇异景象；这是一个土崩瓦解的“邪恶”帝国和一个瞬间倒毙的敌人的浪漫传奇（这使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兴高采烈）；这还代表了一种进入历史的意识形态。由上述内容构成的俄罗斯特性通过公开展示得到了充分表现。

对于西方观众而言，较难理解的或许是，为什么这些作品不标榜斯拉夫人抑或苏维埃历史的特异性，反而表现资本主义的现状。米哈伊洛夫的作品表现的正是不受抑制的资本主义体制中，一切都可买卖。库利科的《狗》无疑是布尔加科夫（Bulgakov）的小说《一条狗的心灵》的更新版，在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中，一条狗经过外科手术变成了人的模样，并且凭借它卑劣的本性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维埃社会茁壮成长。然而，布尔加科夫剖析的社会正处在暂时从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道路上的战略撤退过程中，而且正临时采用自由经济措施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一个暴发户阶级从天而降，向世人炫耀着他们通常是采用不正当手段攫取的财富。换句话说，那就是今日俄罗斯的一个相对温和的蓝本。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卓有成效的社会-民主经济也由于金融市场控制和外汇管理的解除而被卷入了自由主义经济的洪流。这一进程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而变得更

为糟糕，因为经济衰退迫使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政府部分地取消了早已被公民视为理所当然应享有的社会健康和福利计划。失业率，这一不受欢迎的新奇事物，随着制造业的萎缩而急剧上升。大量的外来移民也开始改变这些原本十分封闭的同质性社会。

像别的国家一样，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现代主义与社会民主有着紧密的联系。经历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给世界其他许多国家造成巨大影响的右翼和新自由主义力量的考验，社会民主仍存续了下来；与此相同，在斯堪的纳维亚艺术界，一种纯正的构成派现代主义也幸免于难。经济衰退及其后果导致了艺术角色的转换，从功能主义设计和乌托邦-构成主义项目的创建，转向公开批评。社会-民主政府像其他许多政府一样，不可否认地给予了艺术家财政上的扶持，从而使艺术家们成为圈内人士。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甚至在艺术家发起反社会运动时亦是如此。一本斯堪的纳维亚艺术家文集——书名很刻薄地叫做《我们都是正常人（并且我们要自由）》——中的一篇文章道出了问题的根源："艺术家似乎起到了斯堪的纳维亚社会自由度指示器的作用，实际上，艺术家对社会多一份拒绝——艺术家的传统角色总是如此——他对它更多一份肯定。"

新艺术体制所要求的这种批评与伴随新自由主义产生的自由主义话语是相一致的。在全球化的艺术世界，地区或国家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的抗拒几乎没有得到文化上的表现，这使人们怀疑艺术或许在宣传身份政治甚至新自由主义本身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哪怕是次要的）角色。

这些被严密保护着的社会与冷酷无情的经济力量之间的碰撞，迸发出一连串史无前例的灿烂辉煌而又五彩缤纷的文化火花。其结果是当代斯堪的纳维亚艺术连同其音乐和电影都受到了全球的瞩目。在2000年举办的"建构自由：9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艺术"展中，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新形势带来的成果。正如该展览的策展人戴维·埃利奥特（David Elliott）在展览图录中指出的，这些艺术家似乎对一些事情"感到十分愤怒"，他们对于理性主义建筑、乌托邦梦想、理想主义和社会工程（以及其他东西）都有意见。雅各布·科尔丁（Jakob

Kolding）将构成主义形式运用于他的拼贴画创作，使作品产生一种古老而又激进的、具有极端迷失感的视觉效果（就像人们从俄罗斯革命性的前卫艺术作品中看到的那样），与那种优雅温和、四平八稳的建筑和社会规划形成了对比，而后者则是构成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后代。科尔丁在哥本哈根一个模范郊区城镇中长大，在那里到处都是安全的步行街，商店、学校、幼儿园和诊所都近在咫尺。我们被要求将这看成是一个可怕的宿命，并且毫无疑问地，除非这些设施都被关闭，这一宿命不会更改。

具有基本需要的普通现代主义的“人”已经分裂成了具有利益冲突和对抗身份的碎片。米利亚姆·巴克斯特罗姆（Miriam Bäckström）在宜家公司博物馆的室内展厅拍摄了一系列表现狭窄的、毫无生气的空间的作品。宜家的理念是现代主义、平等主义和民主化：对家庭空间的理性、经济和逐步的改善。像许多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当代艺术家一样，巴克斯特罗姆把现代主义的效果看成是导致幽闭恐怖的。不难想象这种室内空间中缺席的理想住客的模样，即那些拥抱同质性、容易满足、谨慎小心的理性人物。相比之下，艺术家们则津津有味地揭露那种理性文化的弱点，特别关注围绕其他文化地域移民的进入权而产生的问题，并肯定身份政治方方面面的要求。比亚尔内·梅尔加德（Bjarne Melgaard）是一位热衷于同性恋主题的艺术家，他游历过塔希提岛，并在高更的坟墓上公然手淫。现代主义的幽灵仍在斯堪的纳维亚游荡（它的葬礼才刚刚结束），因而需要不断地驱邪除魔。许多艺术家仍在忙着钉紧棺盖。

不过，从其他国家的民主生活状况来判断，这些社会民主政治国家发展的走向是十分清晰的。（瑞典艺术家）门斯·兰格（Måns Wrange）的“普通公民”研究项目是对新的民主状况的检验，它表明权力已经从政治上合法的民众手中转到了那些专门操纵公众舆论和政治进程者的手里。该项目按照瑞典福利政府所定义的普通公民的概念，找到一名在统计学意义上符合此概念的普通人，询问了她的政治观点，使用各种专门的手段包括利用说客来保证她的权益。通过政治演说和大众媒体，她的观点已经散播于公众之中。民意测验被用来检验

这些策略的效果，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一位知名人物之口，在一个热门电视系列节目中说出她的观点。这件既尖刻又有趣的作品将公众生活的变化置于检验之中，它不仅嘲笑了古老的对人类中庸之道的依附，还讽刺了新体制的腐败。它更意味着在经济衰退与文化分歧的压力下社会的解体促成了政治为竞争的团体所操纵，其中最强大的团体也是最富有的。

戴维·麦克尼尔（David McNeill）在一篇关于艺术和全球化的杰出论文中，讲述了199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国际刑警”展览中的一个著名事件，该展览汇集了一群本以为能够相互协作的瑞典和俄罗斯年轻艺术家。在展览举办的过程中，又陆续增加了一些其他国家的艺术家。谷文达（Gu Wenda）这位中国艺术家，在没有参照任何艺术家作品的前提下创作了一个用人类头发费力筑造的隧道。在作品展出首日，俄罗斯行为艺术家亚历山大·勃兰奈尔（Alexander Brener）用一把大砍刀将这个隧道砍成了碎片。警察被叫来了，他们拘捕了库利科，因为他装狗，要咬一个小孩，不过，勃兰奈尔却逃脱了处罚。谷文达认为自己作品的毁灭是达达主义观念造成的，是俄罗斯走向衰落与混乱的象征，但勃兰奈尔之所以怒火中烧，不仅由于他认为东欧艺术代表团遭到了西方策展人的不公正对待，而且因为他们最初的理念被淡化成了一场全球化的博爱大聚会。对于自己的行为他发表了如下声明：

> 第二天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会上我被人称做法西斯分子。不，我亲爱的老兄，我不同意。在这个展览中，我是唯一的民主人士，我不仅坦率地表明了我的态度，而且用行动表达了对展览组织者的抗议。这是行动中的极端民主！让我们砸烂陈陈相因的模仿和新自由主义的庸俗！

古巴和中国

在新世界秩序的时代，共产主义国家的艺术有着不同于俄罗斯这样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艺术的魅力。如今，古巴和中国已经用必要

的、完全不同的方式解决了在新秩序中继续生存的问题。在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错综复杂、千姿百态的艺术形式，这里，我只能就几个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例子作一个简要的描述。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出现了打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清规戒律的多样化艺术，其中有些作品与宗教主题有关，一些作品呼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有一些作品（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关注新生而又迅猛成长的消费文化。作为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中国的艺术一时间引起了全球的瞩目，而那些可能被当成反动派的艺术家更是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有调控的市场经济的横空出世和巨大财富及不平等现象的迅速产生，使得中国持续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标准有了显著而普遍的改善，并且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高名潞（Gao Minglu）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断言，伴随这些戏剧性变化的艺术潮流，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那些原本热衷表现宏大的灵魂和人文主义主题的艺术家（包括王广义［Wang Guangyi］）开始改弦更张，转向了更为直接的社会批评。王广义呼吁消解人文热情，认为艺术的创作只是为了在媒体和市场中获得成功。这类新作品的一种主要样式是毛泽东画像的再次兴起，并加以适当改造使之适应新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这是一种通过波普艺术的镜头看到的图像，它同时呈现出一种媚俗和荒诞的特点。

而古巴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作为一个紧邻敌对国的海岛小国，它受到美国越来越严厉的贸易禁运制裁和越来越大的威胁。与流亡国外的古巴人打交道是困难甚至危险的：著名拉丁美洲艺术的策展人、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杰拉尔多·莫斯奎拉（Gerardo Mosquera）1996年接到在美国佛罗里达迈阿密美术中心作报告的邀请，但后来邀请被取消了，因为他仍然居住在古巴的事实使他成了不受听众欢迎的人；迈阿密古巴艺术文化中心曾两次遭到炸弹袭击，因为它展出了居住于古巴的艺术家的作品。另一方面，古巴仍然很好地适应了新的全球化的环境，因为它的种族和文化是混合的，是非洲、欧洲和美洲各种元素相对和谐的合成物。

古巴统治集团对东欧共产主义垮台和苏联经济援助突然中断的第一反应就是镇压艺术自由：前卫艺术展览被关闭，曾经批准过这些展览的政府官员被解职，安杰尔·德尔加多（Angel Delgado）——他曾公然把大便拉在一份共产党官方报纸上——被关进了监狱。结果，大批在20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的前卫艺术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纷纷移居国外。

正如莫斯奎拉所描述的那样，从那以后，市场经济的复兴、吸引外资的需求再加上国际上对人权的监督，都对古巴文化开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成功的古巴艺术家是第一批一直留在古巴并被允许出国旅行的人，更重要的，是被允许通过出售作品换取美元的人，这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过上了好日子。人们能够看到一种温和的商讨式的批评，有时候审查人员还会与艺术家讨论作品。莫斯奎拉写道："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这种批评方式可能变成一种增强出口艺术吸引力的固定套路。对于国外画廊和收藏家来说，政治批评已经变成了一个卖点。"

在古巴，大众传播媒体仍然受到审查制度的约束，但艺术家获得了有限的批评政治制度的自由。这是西方实际存在的社会结构的一种法定的形成过程，即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强化政治的正统性（这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长期研究的课题），而在古巴，政治上激进的艺术最有可能在双年展上大出风头。

在中古两国，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景象拼接在一起的宣传艺术，我们可以将王广义和何塞·安吉尔·托伊拉克（José Angel Toirac）的作品作一比较，他们用与商业广告拼接的形式分别塑造了毛泽东和卡斯特罗的形象。卡斯特罗的形象摇身一变，成了波普艺术作品，这与中国艺术家加工毛泽东像的手法如出一辙。何塞·安吉尔·托伊拉克让卡斯特罗出现在卡尔文·克莱恩"迷恋"香水的广告中，"迷恋"在这里象征的是美国要推翻他的决心。当一个抽着香烟、骑着马的卡斯特罗突然出现在托伊拉克的万宝路香烟广告中时，它的寓意已经在该系列作品的标题"新时代"（*Tiempos Nuews*）中表露无遗了。托伊拉克还利用他的朋友重新拍摄了一些古巴革命的著名

文献照片，并极力渲染了原作的虚夸特征。

中古两国在艺术上如此相似不应令人感到惊奇，因为中国和古巴政府都放宽了对经济的限制，允许存在有限的私营企业；在此过程中它们按需要改变了它们的策略，允许商业宣传的竞争模式进入国内。这样，两国民众都为政府和企业的宣传所侵扰，两者都在努力让民众相信它们的产品是独一无二的。在西方，这些作品讨人喜欢地扮演着双重角色，它们既是对曾经可怕的敌人和意识形态衰退为纯粹图像的记录，又是文化融合的例证。这种缓和的、针对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的态度允许艺术家将其象征形象运用于当代文化，对艺术家而言，这样做并不比让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头像出现在T恤衫上更有危险性。

中古两国艺术还存在着另外一些类似之处。中国批评家栗宪庭（Li Xianting）把新前卫艺术说成是“反理性、反理想、反形而上学以及反英雄主义”的艺术，因此也是后现代的。而在古巴，欧杰尼欧·瓦尔德斯·费格洛阿（Eugenio Valdés Figueroa）引用了一个哈瓦那另类艺术中心，即阿格洛提纳多中心的宣言式的声明：

图7　何塞·安吉尔·托伊拉克，《迷恋》，出自“新时代”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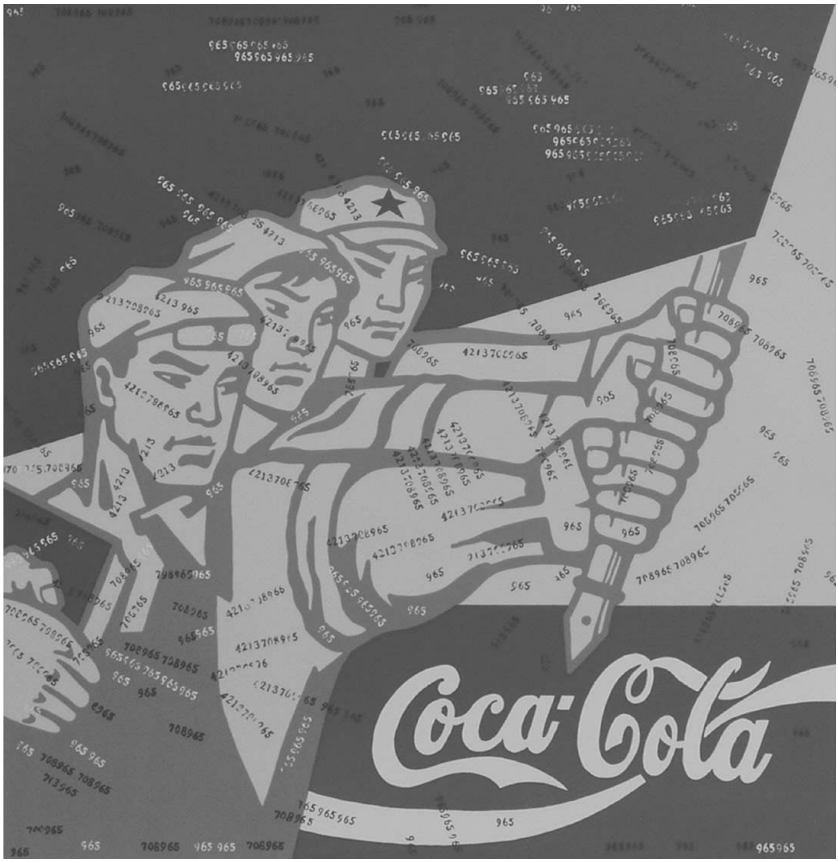

图8　王广义，《伟大的资本主义系列：可口可乐》

错误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如果阿格洛提纳多中心像躲避瘟神一样躲避着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一致性，是那乏味的、令人作呕的良心中的“美德”。

像塔尼亚·布罗圭拉（Tania Bruguera）的女性化塔特林〔2〕滑翔机这样的作品——它以脆弱而透明的材料来演绎俄罗斯构成主义——就是一个拒绝一致性的例证。该系列作品将一些两相对立的因素引入到单体雕塑样式中，阳性与阴性、设计与制作、乌托邦式的构造物与现成品的集成，使人们对其中的每个因素都有了批判性的认识。而按惯例，在当代艺术中，没有什么合成或分解是现成的。

中古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最成功的艺术作品，皆为西方观众展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性或古巴特性。在古巴，许多杰出的作品，例如科乔（Kcho）和罗斯·卡尔平特罗斯（Los Carpinteros）的作品，都包含有一些明显的低技术创作元素，包含了对点滴收集材料的创造性使用和对古老手工技艺的采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出于创作的需要，但也迎合了西方人对古巴艺术的预期。中国两位最有影响力的“出口产品”，谷文达和徐冰（两人现在都在纽约生活），都将中国书法作为他们主要的表现媒介。而且，一般来说，作品所选取内容的标准是十分明显的——作品应该反映中国的种种现状，而在西方这些现状应是人们熟悉并关切的：政治、经济增长与消费主义、性别不平等和计划生育等。这些显而易见的“中国”关切，应该按照一种公认的当代西方模式表现出来，以产生一种明显的杂交产品。

在参观了2002年在香港举办的“第九届全国美术展览”中的部分作品后，我对前面所提到的标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个展览的油画部分展出了大量让人印象深刻、描绘中国当代生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它们的创作风格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技法上往往显示出高超的造诣。有些作品，像王宏剑（Wang Hongjian）那幅令人忧伤的、描绘民工在月光下等待乘车回家的油画[3]，直接而又雄辩地表现了在一个巨变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经历。而另一些作品，像郑艺（Zheng Yi）描绘的在阳光下微笑的农民肖像，（在我眼里）似乎是庸俗得不可救药——《凡心已炽》不是一个你能期望在伦敦或纽约出现且毫无讽刺意味的标题。由于缺乏应有的西方参照对象（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对象，但包括印象主义在内，都是较为陈旧的风格）和非功利的追求，它们全都带有某种宣传功能，这样的作品与西方作品迥然不同，因而难以在全球化的艺术系统中脱颖而出。

作为对照，我们来看看两个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艺术家，中国的徐冰和古巴的科乔，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人们对此类艺术的期待。作为众多双年展的主角，徐冰的成名归因于他1988年在北京展出的一件作品《天书》。

这是一件超乎寻常、由1250个自创汉字组成的工程浩繁的大型作

品，那些汉字由中国表意文字衍化而来，但却没有任何含义。徐冰用这些汉字创造出规模庞大、令人印象深刻的卷轴和书籍式装置艺术作品，呈现给中国观众一个奇特的、意味深长但却完全不可解读的文本。这件作品是一个能够不断发展的项目，可以根据不同的展出地点改变其装置的形式，还可以采用计算机技术生产可供人收藏的书籍。《天书》在中国引起过激烈的争论，有人抨击它，也有人为之辩护。在创作这件作品的过程中，徐冰一度长期独居，对于公众千差万别的感受，徐冰本人发表过这样的看法，这段话曾被斯坦利·K.阿贝（Stanley K. Abe）引用过：

> 把一个人的作品交给社会就像是把活的动物赶进屠宰场。作品不再属于我：它已变成了所有接触到它的人的财产。现在它是有形的也是肮脏的。

阿贝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叙述了《天书》的不同解读角度。一旦走出中国，因为大多数新的观众无法阅读汉字，也不能体会其陌生的亲切感，所以这件作品就变得完全不同了。美国观众会透过极权主义的镜头来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善（个人表现）对恶（东方专制）的寓言。对于这样的解读，徐冰既不认可也不否定。不管怎么说，展开来看，这种解读永远只是一种对中国传统、制度和历史的批评，而从来不是对作品本身含义的学术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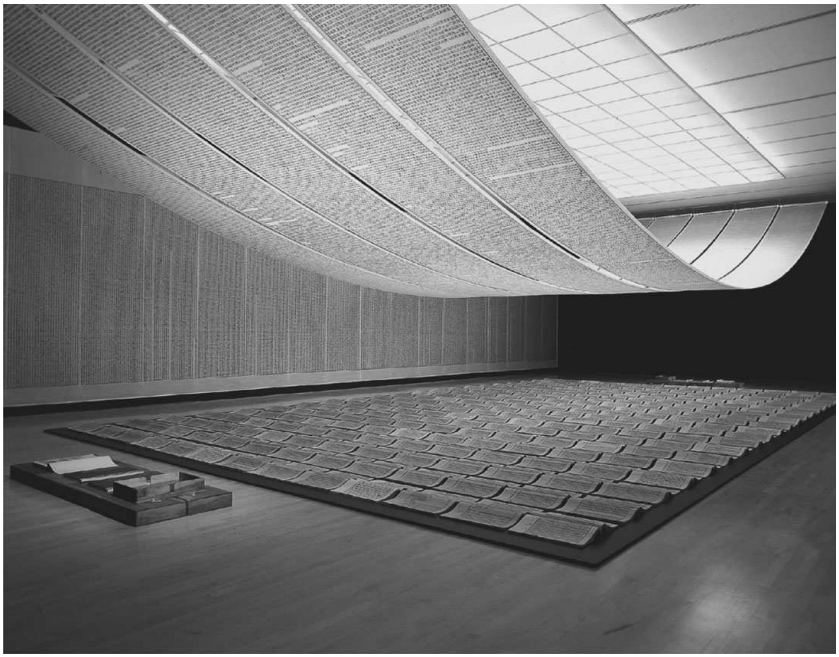

图9　徐冰，《天书》

高名潞（Gao Minglu）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误读的问题，他在一本著作中论述了评论性的前卫运动如何让位于

> 一种实用主义的新前卫运动，后者力求超越本土以在国际角斗场中得到认可。这种改变主要是后冷战时代外部压力的产物，但在西方还有一种忽视这一改变的一以贯之的倾向，人们依然从冷战的意识形态的视角来解读当代中国艺术。

高名潞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所谓的“前卫艺术”大多与消费文化的宣传沆瀣一气（消费文化对波普艺术的情有独钟并非偶然），而有些从中国外部看似乎是前卫的东西，从中国内部考察却是反动的。与这种畅销全球的艺术相对立的就是高名潞所说的“公寓艺术”，这种艺术通常在私人空间或街道上展出，其中还包括一些临时性的不可出售的作品。王晋（Wang Jin）1996年在郑州市一座新建的大型商场外建造的一道巨大冰墙就是一个例子。王晋将许多奢侈消费品埋置在冰墙

中，民众可以用任何方法把它们挖出来拿回家，最终，这道墙化为乌有。

科乔一般采用木料来创作雕塑作品，通常包含了各种让人联想到船只框架的材料。随着1994年在哈瓦那双年展以及次年在光州双年展上的亮相，他声名鹊起，大获成功。他成为纽约著名的巴巴拉·格拉德斯通画廊的签约艺术家，1996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收购了他当年创作的一件大型雕塑作品《无限之柱第一号》。作为科乔的简易小船骨架式雕塑之一，这件作品的拼接塑造指涉了欧洲现代主义（在此例中是布朗库西［Brancusi］1938年创作的《无尽之柱》），它显然暗指美国的一项规定引发的古巴流亡者投靠美国的悲剧性尝试：这项规定宣称，所有流亡者只要能够到达美国的海岸线就可以被接纳为美国公民。像徐冰一样，这样一种通过工匠技艺来表现典型民族主题的作品，完全符合当代艺术的规范。

尽管这类作品大多能够唤起人们对各种政治问题的共鸣，但它们并不表明艺术家的立场，带有讽刺或缄默政治的特征。科科·福斯科，在为著名的严肃艺术杂志《横饰带》撰写的一篇文章（此文也被收录于她的著作《不属于我们的身体》）中，试图将政治寓意引入科乔的作品，尤其是通过考察哈瓦那双年展中古巴当局对其的利用。这样冒失地分析一位市场新宠的行为使她受到了恐吓，该杂志也不得不应付来自科乔作品经销商的投诉。这样的一篇文章居然在艺术批评圈里引起了如此大的关注，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这类杂志中的艺术批评文章究竟属于何种层次，以及财大气粗的艺术经销商和艺术机构确保圈里只接受卑躬屈膝式的“批评”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当然，一般情况下，很少需要有什么恐吓或投诉，因为大多数作者会自我审查。就像常恶言诽谤的艺术杂志《凝块》指出的那样，对于作者而言，这是特别悲哀的事情，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从写作中赚到的钱微乎其微。

图10　科乔，《谈及常规之物对我们来说从来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许多杰出的全球艺术作品，为了取悦世界各国观众，都极力标榜各自的文化身份。文化混合的面貌、反讽和身份的公开展示，是符合西方观众口味的，（正如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Žižek］极力证明但富有争议的那样）只有不是真正的不同，它的差异性才安全。福斯科已经对其结果作了总结：全球化改变了艺术世界的面貌，也改变了对种族与文化差异性的处理方式，使得它们都按照企业跨国主义的模式发展演变。文化领域的可见性并不是政治权力的保证，博物馆和画廊的日益私有化削弱了过去那种可见性产生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差异性被正常化了，而其批评性的内容却被回避。通过考察艺术家自身的移民身份，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特征：他们的出生籍贯可能不同，但其中许多人——绝不只限于那些以合法身份离开祖国的人——最终栖身于纽约这个巨大的艺术漩涡之中。于是，差异性产生了同质性，因为一切都要受到市场的制约。

且不说这类艺术对于西方观众具有可疑的吸引力，其中的大部分作品确实言说着一些令人着迷的东西，它们带有一定程度的张力和关注感，这些都是很难从那些富足安定的社会中感受到的。在理论著述中，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最为体制化的作品都是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亦即由于综合但不均衡的发展，思想家们面对的是场景的极大反差，就好像他们生活在一个能够从一个历史时期步入另一个历史时期的环境中。稻田里的农夫或许会在劳作间隙抬头瞧一瞧他的新邻居，那座后现代高层综合办公楼。詹姆森认为，这促使了对历史变革的系统化和整体性思考。艺术中不存在对这种系统化品质的期待，但那种环境仍然具有一定的作用，尤其对人们超越无处不在的消费文化的思考有一定影响。同样，人们会觉得最乏味、最破碎、最失败的艺术将会产生于最古老、最富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中，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确，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事实就是如此。

这里简要考察的并不是全球艺术创作的全貌，由于错综复杂和千差万别的地方条件，全球艺术千姿百态，难以尽述，所以这里提到的只是经过国际艺术系统筛选过的进入国际视野的艺术杰作。虽然创作这些作品的大部分艺术家可能是国际艺术精英，但对于整个艺术世界来说仍然是挂一漏万；尽管存在美国霸权和专业隔阂，这些作品仍在不同的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因为很多观众始终怀有乌托邦式的信念，他们相信艺术承载着更为丰富的寓意。对于他们来说，艺术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有时甚至是激进化的经验。

我在这里粗略叙述的是这样一种理念，亦即在全球化的艺术世界大吹大擂的多样性之下遮蔽的可能是其他更新的一致性。正如资本主义这一新的世界体系在1989年之后从东欧共产主义的斗篷后面走出来，在急剧的变化中，显露出它贪得无厌和冷酷无情本性那样，可以说艺术世界也毫无二致。艺术作为冷战工具的作用已经完结了，与此同时，它作为新自由主义价值传播者的核心功能已经显现出来。

注释

〔1〕 查普曼兄弟指英国艺术家杰克·查普曼（Jake Chapman）和迪诺斯·查普曼（Dinos Chapman）。

〔2〕 塔特林（Vladimir Tatlin, 1885-1953），俄国画家、雕塑家，构成主义的代表人物。

〔3〕 亦即《阳关三叠》。

第三章

消费文化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是愈加明显的不平等，在政治上的表现是解除管制和私有化，那么它在文化上的表现无疑就是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当“新的世界秩序”使得艺术界通过全球化的运作方式旧貌换新颜的时候，在发达国家，艺术则受到它的老对手和老伙伴，即大众文化更强大的压力。至少从20世纪初期开始，随着电影、留声机和收音机的发明，艺术与大众文化便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场步调不一的双人舞中，而大众文化通常充当领舞的角色。

当代艺术家在对待消费文化问题时既有迷恋之情又怀恐惧之意，这两种反应都有充足的理由。迷恋它，是因为消费主义已越来越具有文化性了，形象、声音和文字都可以像物质那样出售或展示。恐惧它，是由于消费主义的机器是如此马力强劲，有着奢华的资助，其产品又是如此咄咄逼人而又无处不在。如果商品都成了文化，那么留给艺术的空间又剩下什么呢？

图11　村上隆，《巨乳美少女》

这是一种古老的焦虑，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中都存在这样的担忧，尽管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当费尔南·莱热[1]在1924年巴黎万国博览会的机器展厅中看到如此精美无瑕的工业产品时，他目瞪口呆，惊叹在这些产品面前，艺术家粗糙拙劣而又忸怩作态的作品真是相形见绌。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论调认为艺术不再有发展的可能，

因为产品世界已经浸透了美学，这种论调便是上述焦虑的后现代版本；显然，艺术与生活合二为一的现代主义梦想已经实现，虽然与其说是二者的合成，还不如说是两者中较弱一方的投诚。

艺术与商品文化的分合问题由来已久，但在20世纪90年代，其中所包含的各种力量更加激化，其中大部分是带有资本主义古老特性的力量，它们对消费文化的决定性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使得不只是艺术，所有其他文化产品都打上了消费主义的烙印。商品甚至变得愈加不像功能性的实物，而更像是一场深奥莫测、自我指涉的棋盘中易逝的文化棋子。商标名称在各种毫不相干的产品之间快速变换，而广告则在新老文化联系加速消逝的过程中，在指涉、自我指涉和超指涉间来回翻腾。服务业、信息工程和金融业代替工业成为继续创造巨额利润的领域，这些领域的成功与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特别是美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西方，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们就察觉到了这一变化，但在90年代，人们看到了传统经济模式的崩溃，不仅是东欧，而且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工业大国，都出现了经济停滞和衰退。欧洲大陆国家转而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尽管它在整个90年代中晚期始终是裹着糖衣以社会民主管理的名义出现。跟商品化自身一样，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正在不断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控制。

我们已然看到，在这些新近因不受限制且具有侵蚀性的市场力量而造成经济衰退的国家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艺术充当了新自由主义的经纪人，它无情地践踏了虽然压抑但给人安慰的社会民主，热衷于展现身份政治、消费主义、庸俗趣味和堕落中的快乐情感等被解放的问题。这样的作品成了私有化和商品化殖民力量的盟友，其身份虽然是配角，但也不可或缺。人们常常谈到后现代主义正统观念与自由市场经济信条之间的平行关系。迈克尔·哈尔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在他们颇有影响的著作《帝国》中，很好地阐述了这一问题：

> 世界市场的观念总是存在于那种反基本原理、反本质要素的奇妙著述中。循环、流动、差异和混合为这种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的条件。贸易带

来了各种差异的大总汇，而且差异越丰富越好。（商品、人口、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固有边界受到越来越猛烈冲击的国际市场中，似乎在无边无际地增加；这种无穷的多样性足以颠覆任何二元化的分类模式。

这绝不是什么巧合的相似，而是（如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在其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纲领性文章中所指出的）一种功能性的关系：审美成分被融入到普通消费品的生产中，这些消费品按照时尚的步调不断变化。生产那些消费品的企业则在经费上支持其研究开发和回收利用部门，即艺术。玛莎·罗斯勒（Martha Rosler）在一本论述当今录像艺术中存在的高成本制作潮流的著作中描述了这方面的情况："没有什么能比让艺术家去挑战边界，修饰形式，并为广告宣传和图像制作而制定战略更合乎意识工业的需要了。"

艺术可以被想象成消费主义的梦想，它用游戏的手法将各种大众文化元素混杂地重新组合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碰巧设计出实用物品。在将无用之物重新组合并存储起来这一过程中，艺术也许和"垃圾"DNA有着同样的作用，人们相信后者将古怪的基因排列保留下来，以备有朝一日再次派上用场。

企业文化完全吸收了已被驯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观念。而在大众文化中，艺术中传统规范的缺乏本身全然成了常规。无处不在而又持续不断的声音驱使消费者去表现自我，做有创造性的人，与众不同，打破常规，超凡脱俗，甚至成为叛逆者，但是，这些声音不再是来自激进煽动者的语言，而是来自商业的词汇。美国文化分析杂志《阻击者》的作者们生动地描述了这些指令的范围和标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威廉·伯勒斯（William Burroughs）在耐克广告中的露面。自1990年以来艺术界的大致景象显示出一种要将那些被企业文化窃取的基本美德付诸行动的自觉意识。

后现代理论本身好像已经从对潜在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描述，变成了对某种现实的平淡描述，从而丧失了其批判性和道德力量。简化了的消费主义和顾客应被授予的权利成为后现代主义探究的核心课题。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理论因其内在的荒谬及用毫无意义的科

学术语来吓唬读者的做法（这在“索克尔事件”[2]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遭到了猛烈抨击，但无论如何，在学院派艺术界，它还是作为艺术发展的背景被人们所接受，虽然不是风光无限，但也无法取代。

许多后现代理论坚持认为，模仿是如此彻底地充塞了整个世界，以至人们无从知晓观念是在哪里结束，而现实又从哪里开始。然而，当代商品幽灵般、貌似非物质的特性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携手同行。资本主义这一激进形式，由于广泛的技术变革而变得可能，特别是由于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出现使得信息交流变得便宜、快捷和简单。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在《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描述的，庞大的计算机网络基础的建立是由公有电信产业私有化的投机行为所驱动的。在一个封闭的数据共享领域，数据的数字化可以把以前免费的信息（如图书馆的资料）转化为商品。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则倾向于使商品看起来不那么物质化：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品牌创建受到极大重视，许多公司将生产外包，用省下来的钱美化自己的形象。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在她著名的《No 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一书中指出，由于生产被转移至低工资国家进行，产品的消费者与制造者之间的纽带就被割断了。作为报偿，品牌的知名度被不断提升，它游离于产品本身之外，成了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一种特定的善或令人推崇的恶的集成体的可靠化身。有时，就像罗纳德·麦当劳一样，品牌已经凝结成了一个卡通形象。结果是艺术与商品相互吸引，越走越近。

登录资深观念艺术家克劳德·克洛斯基（Claude Closky）网站的链接页面，浏览者就会看到一份按字母顺序排列、由一些熟悉的名字组成的商业网站名单，这实际上是一份当代艺术明星的名单：前面排列的是亚当斯、阿克曼、阿里斯、阿梅尔、安德烈、阿拉齐。所有的链接实际上都与公司网站相连，因此，假如你点击www.billingham.com，就会进入一个出售摄影包的网站。这些与艺术家有相同名字的产品和服务范围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小数据库，这件作品鼓励用户将艺术家的名字作为品牌来看待，从而思考他们作品的商业特性。

由于商品变得更富文化色彩，艺术也变得愈加商品化，其市场不断扩张，同时也越来越融入到资本主义活动的总趋势中。甚而早在后现代主义初期，阿多诺（Adorno）就认识到艺术与消费品之间存在着同兴共荣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上升时期：

> ……什么地方商品的物质使用价值的重要性下降，就意味着什么地方的消费变成了对名望的间接体验……而且，最终也意味着什么地方消耗品的商品特性完全消失了——它似乎变成了一种审美假象的拙劣模仿。

这一现象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对待艺术的态度与对待商品的态度趋于一致，而那些商品也假装自己丝毫不劣于艺术。然而，这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抑或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过程，产生于艺术与商品暴露的本质，而是与经济循环的起伏节奏密切相关的过程，而且只有那些有购买奢侈品能力的富人才能够享受这一过程。

20世纪90年代的大量艺术实践反映了并且进一步助长并推动了这些变化。西尔维·弗勒里（Sylvie Fleury）会将她在高档精品店采购的成果当成作品，陈列在画廊的地板上；或是将一些吸引人的时髦商品（按原样）摆放在基座上。弗勒里还考察了不同层次的消费活动，她通过把超市购物车镀上黄金而将最普通、最实用的购物与奢侈品消费联系在一起。

纪尧姆·比耶尔（Guillaume Bijl）简直把商店开到了博物馆。利物浦泰特美术馆因为举办他的“购物”展览，将一个展厅变成了乐购超级市场的比耶尔分店。展厅由乐购超市职工来维持，他们四处走动，将商品重新布置并标价，此外还负责整理货架。然而，由于实际上没有人能购买什么东西，而且所有的货架都放满了货物并被博物馆的聚光灯照射着，因此，“分店”变成了一组组过度包装的各色商品的美学展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件作品使人联想到勒弗里的购物车，它将毫无美感的购物经验变成了一种孤立的视觉奇观。它令观众感到难堪，因为他们不太习惯用鉴赏家的眼光来观看这样一个罐装商品的商业展示。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种难堪也是对鲍德里亚尔（Baudrillard）著作中出现的一个观点的小小反驳，即美学早已完成

了对商品的入侵。

图12　西尔维·弗勒里，《ELA75/K系列（容易，轻松，美丽）》

从一些后现代主义声明中看，认为任何文化领域都不可能逃脱艺术的入侵的看法或许是可以谅解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艺术世界对其盟友是有选择性的。这里没有对飞镖或饲养鸽子的持久兴趣。相反，这里存在着将艺术与时尚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巨大努力。雨果·博斯（Hugo　Boss，弗勒里一个展览的策展人）曾发表过一个无关痛痒的声明，由于其术语使用的混乱，该声明充分显示了后现代作

品的意识形态特征：

> 艺术与时尚总是携手同行。有时激进并震撼，有时传统且保守，而这都是根据品位的主观标准来判定的。两者都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时代的氛围和精神。它们作为一个富裕社会的迷恋物和文化遗产刺激着人们的感观并创造着欲求之物。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艺术与时尚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艺术杂志越来越大量地刊载普拉达的广告，而时尚杂志也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当代艺术的信息，而且还出现了两者之间名副其实的融合（像《坦克》和《非常》这样的杂志），在这样的融合中，艺术界与时尚业实现了互依互利。大量像约尔根·特勒（Jürgen Teller）和科琳娜·戴（Corinne Day）这样的时尚摄影师也出版艺术图书。他们的作品不仅发表在书刊报纸上，也陈列在画廊中。戴德里克·戴德里克森（Diedrich Diedrichsen）认为精美艺术作品的盛行与以下两点有关，一是明显改善了的印刷质量促使杂志更大量地使用图片（以替代文字），二是包含了艺术、流行样式和时尚等交叉内容的杂志数量越来越多。这类出版物自然倾向于刊载那些人们只需看一两幅照片就能迅速把握其内容的艺术作品。

这些发展既与公共画廊和博物馆受到的要求其商业化的压力有关，也与展览赞助者的个人偏好密不可分，但同时它们还反映了在商业文化中一种相当普遍的偏好青春的倾向，或至少是对青春容颜的偏好。年轻是一种吸引人的营销品质，甚至对于那些以年龄稍长的人为目标观众的艺术活动来说亦如此，因为那些观众都希望自己如年轻人那样朝气蓬勃。青春成为艺术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利用的优势。艺术家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保持年轻，甚或被贴上“年轻”的标签。他们可以描绘年轻人，而且此类描绘有很多，特别是在摄影作品中，这一领域的作品总会暗示老龄化与死亡的痛苦。因而，里内克·迪克斯特拉（Rineke Dijkstra）摄影作品中的青少年们在海滩上或在俱乐部中面对镜头费劲地摆出各种姿势；或者，萨拉·琼斯（Sarah Jones）的既有优越感又颓废迷惘的少女们带着某种神秘的神情忧郁地列队穿

过庄严的房屋；又或，以不同的记录方式，瓦内萨·比克罗夫特（Vanessa Beecroft）的行为艺术、录像和摄影作品中处于不同程度裸体或半裸体状态中的模特儿，带着因欲望和抱负而产生的愧疚感面对着观众。

所有这些作品都可以当作批判性作品来解读，同样，它们也可以作为对美丽青春的卓越文化表现来欣赏。最后，艺术家们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进行表演，仿佛他们自己就是年轻人：乔治亚娜·斯塔尔（Georgina Starr）、伊丽莎白·佩顿（Elizabeth Peyton）等人对令人痴迷的青少年粉丝文化进行了表现，同时，与像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这样一些功成名就的、继续高举天才般美学质量的火炬的艺术家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过于明显的蹩脚者和表现拙劣者带来的轻松调剂，就像肖恩·兰德斯（Sean Landers）的滑稽行为所代表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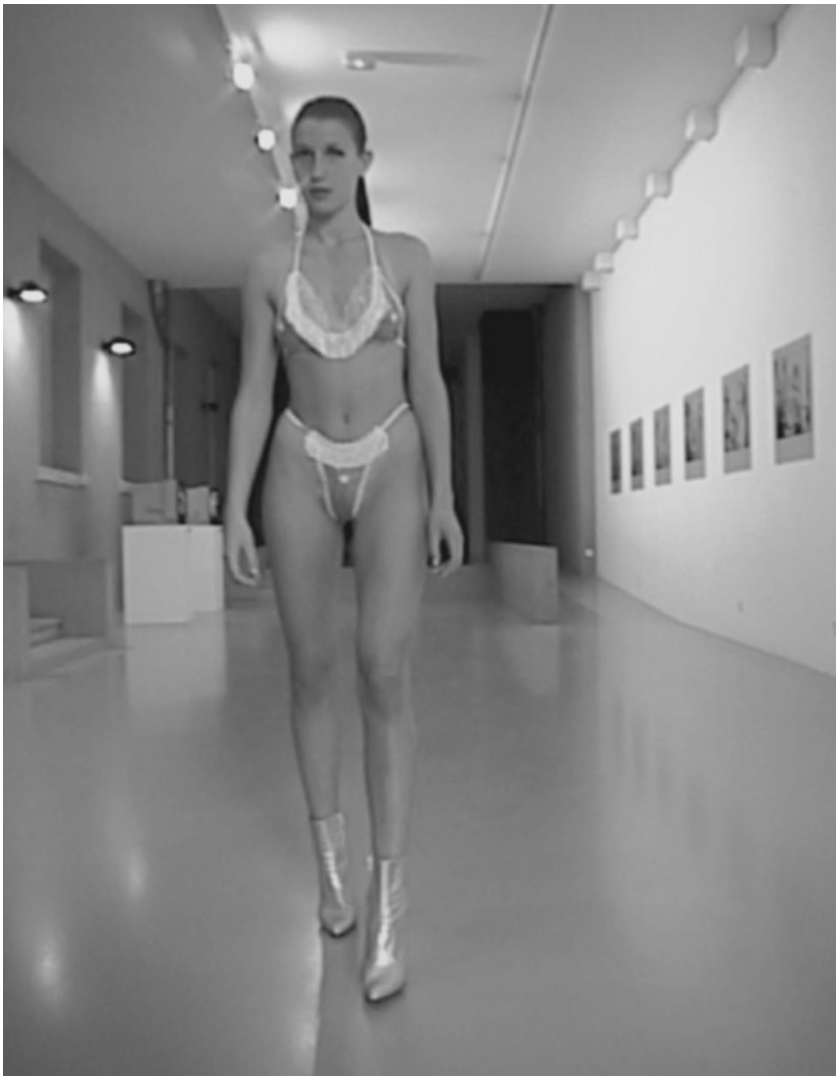

图13　瓦内萨·比克罗夫特，《VB29.243》

在那些栖居于画廊与杂志之间的世界的艺术家中，沃尔夫冈·蒂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算得上是最成功的一位，他因为在《i-D》和《面孔》这样的杂志上发表时髦、随意和快照式的作品而出名，但他也定期在画廊和博物馆展出作品。2000年他荣获特纳奖，并于2003年在英国泰特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蒂尔曼斯作品的主

题就是青春，他的目光（人们可以从他作品的随意特性来推断）天真无邪而又年轻，好奇地注视着世界上的每一个视觉碎片，不管它们是平淡无奇的还是新鲜刺激的。在他的作品中，他以相同的目光凝视着一杯清咖啡、一只沿着地沟逃跑的老鼠、一根在床边早餐托盘边的阴茎。正如你所期待的，那种视角也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美，例如，他有一张照片拍摄的就是一堆有着彩色糖果般颜色的空气清新剂反射在一把尿壶光滑的金属表面上的影像。

蒂尔曼斯的世界是一个特权人群特别是白人青年的舞台，除了穿着入时的人们，他还描绘夜总会常客和“柏林爱情大游行”的场景。这些作品中还穿插了年轻人关心的政治问题——同性恋者欢庆日、无家可归者和反战等，所有这些皆镀上了青春精神的金边，带有年轻人自身的率真、性感、理想主义及对青春易逝的忧郁（在蒂尔曼斯的摄影中，这一点是通过完全传统的象征形象，即凋谢的花朵和过熟的水果来表现的）。蒂尔曼斯的作品很有用，因为它是杂志、图书和展览中众多艺术时尚产品的代表，而这些媒介和展览体现的是相同的感情，呈现的是相同的价值。由于它展现了商业文化对青春迷恋的份量，这一视角有着相当大的冲击力。反对它的人无疑会被认为是粗暴并且守旧的。

我们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照片究竟是表现了青春膜拜现象中的张力抑或只是证明这些张力的存在？图片之间的并置究竟是要制造意义抑或只是暗示某种意义？蒂尔曼斯说过，通过拍摄金块，他暗示了某些与金钱和价值有关的意味深长的东西。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一句老话在这里很有用：一张工厂的照片不可能告诉你工厂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蒂尔曼斯在泰特美术馆的展览和书所共同拥有的标题——《一事要紧，事事要紧》——不仅泄露了这个游戏的秘密，也反映了最近艺术世界对直接描绘“现实”的偏见。这里真正呈现的是对不同物体和人的不经意的一瞥。通往现实的道路需要更高的代价——这些代价存在于思想、知识和结构的建立中，以及在一些东西确实比其他东西更加重要这一认识中。

所有这些现象不应让我们感到艺术与时尚之间的融合比艺术与大

众文化或者说艺术与娱乐之间的融合更为紧密（就像沃克艺术中心最近一个展览所显示的）。如果两极间的交叉没有激发出某种有益的火花——对时尚来说是文化的品位和严肃性，对艺术而言则是活力和时髦——艺术与时尚的相互吸引就不会长久。这种分野是如何持续存在的呢？专业的艺术论述是一个渠道，与此相关的是常有艺术作品又暗指了另外一些艺术作品，这就要求那些观众必须是内行，除了懂得专门的艺术术语之外，还应具备历史和当代艺术领域的知识。在下一章，我们还会看到艺术如何以极大的雄心壮志，抵御被更广泛的文化所吞并的威胁，维护自身的自主权，捍卫自己的专业地位。

然而，比起与商品彻底的同流合污，与时尚或娱乐打成一片对艺术来说或许还算是一个不太严重的威胁。如果真与商品同一化，艺术将丧失理想主义的所有矫饰和获取政府资助的所有理由。对于马克思来说，商品是一种奇怪而又复杂的东西，它因其用途而具有对于购买者的使用价值，同时由于市场行为，它又成了一种能用金钱衡量的交换价值的依托。虽然使用价值多种多样、无从比较，但交换价值却完全依凭单一的衡量尺度。在本雅明·布克洛对当代艺术的悲观论述中，他认为，由于使用价值的日益减弱，艺术（就像金钱一样）几乎变成了只带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只要它们仍然是物质客体，不管是金钱还是艺术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其使用价值；正如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所描述的，在俄罗斯内战期间，一些书籍就被印在已经退出流通的钞票上，而在杜尚［Duchamp］臭名昭著的挑衅性作品中，一幅伦勃朗［Rembrandt］的绘画可能被当作一个烫衣板来使用。）更进一步，艺术甚至连其追求使用价值的伪装都会卸掉，因为艺术家只是反映和检验新的景象，在这样的景象中艺术与金钱没有区别，他们这样做也并不带有批评或改变的愿望。

西方当代艺术的一个标准策略，就是在一件作品中或谈论一件作品时，拒绝偏袒一方。当然，在这方面，沃霍尔（Warhol）算得上是一个典型，他曾谈过和写过很多东西，不过这些语言是出自他品牌化的面具人格之口，因而没有人能够确定他们的身份："善做生意就是一种最引人入胜的艺术。"因为艺术越来越接近标准的商品，期待它

的制造者对商品作出审慎的评论是愚蠢的。因此，比耶尔、比克罗夫特和弗勒里的作品对时尚业和消费主义是歌颂还是谴责，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这类作品只是通过改变它们被观看的环境等方式而将商品变得貌似怪异，从而突出商品或模特的存在。然而，尽管艺术家和批评家围绕这类作品发表了各种声明，并向观众保证其中立态度，但摇摆不定的矛盾依然存在。若将此类作品看作评论，那么它们便是谦逊甚至软弱的，若是看作歌颂，那么它们便是强壮甚至猛烈的，因为说到底——特别是在弗勒里和比克罗夫特的作品中——艺术家费尽心机创作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另一套商品，以及使人们能看到并购买这些商品的广告宣传和赞助人安排。消费这些对自身以及自身的消费带有些许评说色彩的商品，正是“坎普”[3] 的真实定义，“坎普”是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很久以前提出的知识分子用以准许他们自己享受大众文化的策略。

这样一来，艺术作为一种交换价值的物质表现形式就与金钱这种极为抽象的商品的状态极为接近了——它实际上就是像金钱一样被富人当成半流动形式的投机资本来使用的——因此大量有交换价值的艺术品就被锁进了秘密而安全的专用储藏处了。

不过，要使艺术与其他商品或是画廊与商店在性质上变得越来越接近，还是有干扰存在的。艺术品是具有物质性的，即使是录像和媒体艺术也不例外，它们通常也只在付出部分物质化的代价后才会被当作艺术来接受。艺术市场仍然取决于稀有或独特物品的买卖，远远不同于那种普通商店提供的批量生产的商品。在大多数市场中，生产总是被少数占优势地位的公司控制着，但是几乎没有哪个市场的消费是被控制的。商业艺术界则试图抓紧两根缰绳，这些物品的买主总是很少且往往是卖主所认识的人，生产往往是人为限量的，而赞助人常常带有个人感情的色彩。考察当代艺术世界就相当于是对更古老的、前工业市场体系的回眸一瞥。

最重要的是，虽然普通商品的生死是由无数个体买或不买的行为决定的，但决定当代艺术发展轨迹的反馈机制却是被控制并且带有排他性的，普通的艺术观众无权参与其中。维塔利·科马尔（Vitaly

Komar）和亚历山大·梅拉米德（Alexander Melamid）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他们通过问卷调查的标准方式征求消费者的意见，以创作能够满足不同民族人们的一般口味的绘画作品。其结果是他们完成了一系列具有惊人一致性的绘画：在以蓝色为主色调的画面中，珍禽瑞兽和著名历史人物居住在最适宜于人类生存的田园诗般的风景中。

脱离了市场的严酷，艺术可以在保证其安全界限的同时与消费文化谈情说爱。的确，那些看起来似乎威胁到艺术与商品结合的作品（像比耶尔的作品），通过使两者之间的区别变得可见而强化了这一界限。另一种确保这种区别依然清晰可辨的方式就是转而凝视内部，就像现身于一个装有镜子的箱子之中，各种反射的映像就有了一种无法证明的意义，而艺术家的行动往往与其他艺术家的活动有关，它几乎不在外部世界的语境之内。艺术就是循环轮回的游戏，它既与前辈艺术家的作品联系密切，也与大众文化素材打得火热。

内行专家的论述所提供的只是逃离商品形式的幻象。马克思假定被偶像化了的商品能够说话，而下面就是商品的自白：

> 我们的使用价值或许使人们感到兴趣，但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作为商品物进行的交易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彼此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发生关系。

艺术总是通过作品和文字的内在话语来寻求自我保护，因此显而易见的是，艺术最重要的东西总是与其他的艺术相关，它只是模仿自由浮动的交换价值的游戏，假以时日的话，那些价值就会充分显现出来。

当然，从其建立的那一刻起，艺术这块飞地的安全就一直受到艺术家们的挑战。也是部分出于这一原因，艺术家们将报纸贴在画布上，或尝试将签有人名和日期的小便器放在美术馆，或者——更激进的做法是——将艺术当成批量生产的奴仆。然而，尽管这些挑战离不开时代和历史环境，作为挑战化身的那些物品并不如此，而且，由于它们经历了历史的考验，它们的激进主义色彩增强了它们的美学光辉

和市场价值，它们也逐渐变成了常规的艺术商品。

由于大众文化——通过更大的高清电视和宽大的电影屏幕，通过购物中心和主题公园中封闭的、精心设计的景象——已经变得越来越灿烂夺目、引人入胜，艺术不得不奋起抗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艺术可以在增加自身审美和个性优势的同时，通过吸收大众文化的魅力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它可以通过颠覆大众文化的准则来展开竞争：以录像艺术为例，它能够创作缓慢推进、充满凶兆的作品，没有镜头的移动，没有故事情节，也没有明确含义，与电视的道德说教和视觉事件的标准规范形成对比。它可以提供令人印象深刻、非实用性的物体或环境，不同于商场或风景胜地，这些物体或环境是不可出售的（至少不出售给大多数观众）。最后，它还能够展现大众传播媒介不能提供的极大规模、极为丰富的色彩和概念。

最后的这个策略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以及之后在商业上最为成功的作品：大型彩色摄影。这样一些用高分辨率照相机拍摄、有时还被印在铝板上的照片，以大型绘画的尺寸、惊人的清晰度和浓烈的色彩，传达着当代世界的视觉图像。这些照片又往往被制成小版本而且提供不同的尺寸，使其既适合在博物馆中展览，又适合在收藏家的客厅里张挂。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期，博物馆为寻找引人注目而又易于理解的作品而大量购买这类照片，这使得摄影作品的价格节节攀升。如今，照片的价格可以与顶级画家的作品相匹敌；2002年，古尔斯基（Gursky）的一幅大型摄影作品在拍卖中以40万英镑的价格成交，创造了当代摄影作品拍卖价格的新纪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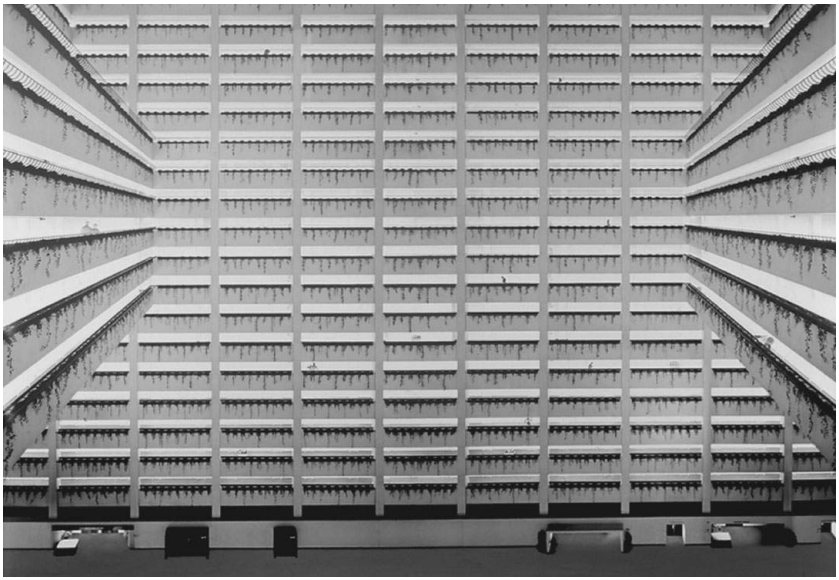

图14　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时代广场》

图15　托马斯·斯特鲁斯，《时代广场，纽约》

图16　托马斯·鲁夫，《h.e.k.04》

从几位最成功的德国艺术摄影家（古尔斯基、托马斯·斯特鲁斯［Thomas Struth］、坎迪达·霍费尔［Candida Höfer］和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追溯到他们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老师伯恩特（Bernd）和希拉·贝歇尔（Hilla Becher），从他们再回溯到魏玛共和国杰出的人种学家奥古斯特·桑德尔（August Sander），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艺术史的轨迹。这条轨迹的起点是桑德尔，他倾向于通过一组长期的比较性的系列照片来反应社会万象，接下来的贝歇尔则偏好那种哀悼工业现代主义各种形式的系列作品，再是鲁夫，他坚持以他的6英寸高、护照式的肖像来说明媒体无力表达任何富有意义的东西，不管它扔给其观众多少细节。通过画廊中的藏品（而不是复制品）来追踪这条轨迹，还会发现另外一些东西：桑德尔的黑白照片都是精心制作而成，其尺寸很少大于一手掌；贝歇尔的作品也是黑白的并被印成各种不同的尺寸，他还常常将这些照片排列成格栅形状，裱贴在一个单一的框架中，创作出一幅4到5英尺宽的作品；下一代摄影家的照片则采用了丰富而饱和的色彩，并且尺寸通常都大大超过了前辈摄影家的作品。古尔斯基和斯特鲁斯的最大作品长达17英尺，它们允许观众走到跟前，仔细审视其细腻而又无颗粒的表面和无比丰富的细节。

从尺寸、创作理念、自觉的重要性和制作费用来看，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新型的历史画，也恰如历史画，它们主要是为博物馆而创作的。

大部分摄影作品越来越标榜其艺术性：斯特鲁斯的早期街景照片相对于桑德尔的眼光和技术来说是一个转折，后者总是用较小尺寸、巧妙构思的黑白照片来表现城市风貌；古尔斯基的作品采用了业余摄影者般随意拍摄的、看上去像褪色老照片的风格，用其来表现庸常的节日场面和乏味的观众。这些作品从很多方面反映了现代主义继承的遗产。鲁夫拍摄密斯·凡·德·罗[4]建筑的照片，摈弃这些建筑明亮的色彩而赋予它们一种古旧的风貌，强调建筑的老化；又或者，他将旧照片涂上暗淡的颜色，以获得类似的效果。

斯特鲁斯和古尔斯基记录了工业区、综合办公楼和休闲娱乐场所的系统建筑结构。近来，艺术史的参照系有所扩大。如今，古尔斯基和斯特鲁斯两人都会令观众对他们所看到的作品没有什么疑惑：他们的奢华作品往往以绘画为蓝本，还常常将画廊本身作为表现主题。两人近年都在纽约最重要的博物馆举办了展览——古尔斯基的展览2001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而斯特鲁斯则于2003年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作品。这些展览及其图录标志着摄影这一门类已经逐渐攀上了艺术的顶峰，而展览的评论文章（特别是彼得·加拉西［Peter Galassi］撰写的关于古尔斯基的文章）引证更多的是绘画而不是摄影。艺术通过参照其他艺术而获得认可，摄影作品再次成了博物馆中引人注目的藏品。他们朴实无华的早期摄影作品促使观众对其主题进行批判性的阅读，陈腐平庸的场景与不带感情色彩的拍摄彼此相称；而他们最新的作品则往往将当代场景转换成史诗般的、甚至是壮丽雄伟的奇观，他们希望作品获得赞叹而非引起沉思。

当代艺术仍然明确表示要与大众文化划清界限，而且必须这样做，因为它要避免批量生产，这就对它的主题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马克思认为生产和消费密不可分，形成了一个统一体。不仅是一方依赖并成就另一方，而且生产总是包含着消费（例如，原材料的消费），消费也影响着生产（例如，吃饭使劳动者有充裕的劳动力）。艺术世界对消费的关注是一个观念问题，而这源自产品广告和其他的企业宣

传手段的显著地位，因为消费者越少去考虑生产的问题（是谁劳动、酬劳多少、在什么样的环境和什么样的危险之中、在什么样的压制下、对环境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越利于消费。艺术界自身古老的生产实践强化了这种盲目性，这种生产方式将艺术与批量生产的普通商业行为分隔开来。例如很多艺术作品都曾讨论过消费王国中玩具的怪异特征（可以举出各种各样的例证，如马丁·霍内尔特［Martin Honert］、麦克·凯利［Mike kelley］、马利科·莫利［Mariko Mori］和乔治娜·斯塔尔［Georgina Starr］的作品）；很少有作品关注产品的预期效用与生产环境之间的反差问题——比如说，一些中国的玩具，是由穿梭在不安全的工厂与拥挤的宿舍之间、有着严格纪律要求的年轻女工，用辛勤的劳动制造出来的（一个新近的例外是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的《真实的玩具故事》，该作品曾于2004年在中国香港展出）。

有一些艺术家使生产和消费陷入相互关联而又彼此竞争的境地。古尔斯基那些有关商店、画廊和工厂的摄影作品，探索的是消费与生产之间文化上的统一性而非经济上的统一性。比方说，他拍摄的根德工厂、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和99美分廉价商店的照片，展现了大规模网格结构下无声的人类形象。这些照片可以作为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自由时间》一文的典型图示，该文认为工作与休闲有着秘密的亲近关系，两者相互依存，其中休闲只是表面上与工作相区别，它拥有的仍然是工作式的结构和形式。一位德国艺术家的作品中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德国工业经济的长期成功培养了该国艺术家对生产的关心意识，来自迅速去工业化的美国和英国艺术家的观念对这种意识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这样的关心也引导了古尔斯基和斯特拉特前往类似的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中国香港，拍摄作品。另一个（相关的）原因就是当后现代主义在其他地方已经获得凯旋的时候，现代主义思想（包括阿多诺的著作）在德国仍然持续活跃。但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消费主义的奇观——为适应艺术世界的口味而相应改变——压倒了对生产与消费相互关系的批判性思考。在本书最后一章，我们将看到这一点

是如何开始改变的。

注释

〔1〕 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 1881-1955），法国画家，机器立体主义的代表人物。

〔2〕 “索克尔事件”：1996年，美国纽约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艾伦·索克尔为后现代研究的核心杂志《社会文本》写了一篇论文《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语言规范，结构严谨。35页的论文附有217篇参考文献，条条准确无误，109个注释也符合学术规范。《社会文本》五位副主编一致认为该论文具有相当学术水平，将其发表在“科学大战”特刊上。不料索克尔三周后在《大众语言》月刊上发表了名为《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的文章，对该文作了彻底否定，坦言自己是有意模仿后现代行话，论文看似言之成理，实属胡说八道、错误百出。“诈文”不过是“把有意编造的谬误、语言的滥用以及各种毫无根据的结论捏合在一起的大杂烩”。这就是西方学术界轰动一时的“索克尔事件”。

〔3〕 坎普，原文为Camp，亦有人译为“矫饰”、“阵营”等，源自桑塔格为颇有影响的文艺评论杂志《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写的Notes on Camp一文。

〔4〕 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 1886-1969），德国建筑家，20世纪最著名的四位现代建筑大师之一，包豪斯第三任校长，在包豪斯被德国纳粹当局关闭后流亡美国，任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他最早在现代建筑中融入玻璃、不锈钢、水和石头等元素，创造出外观均衡优雅、内部灵活多变以及细节考究精致的建筑风格。

第四章
艺术的用途与价值

近来被美国化了的前卫艺术第一次与挣大钱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它的神秘目标和无常的未来已经被成功地翻译成了日常词汇。对于异乎寻常的现代主义，我们现在可以解读为“投机增长股”；把外在品质看成是“市场吸引力”；把口味的逆转理解为“技术过时”。语言的技艺解除了态度转变的责任。艺术毕竟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它就是现金。整个艺术，包括其不断成长的顶端，都被人们熟悉的价值观所同化。再过十年，我们将拥有建立在以图画形式保存在银行储藏室中的证券基础上的共同基金。

（利奥·斯坦伯格［Leo Steinberg］，《其他标准》，1968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所作的演讲）

这段被解读了近四十年的文字具有既出人意料又极为熟悉的奇异特性。当斯坦伯格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当代艺术仍在解决如何适应金钱的问题，因为市场的成长已经大大突破了其小众且专业性的旧有格局，人们还对由此产生的艺术景象的变化存在短暂的疑惑。尽管这种景象已经完全变成了艺术运作的通行环境，斯坦伯格过于直白的描述仍然令人感到惊奇。如今，一般观点是，谈论这个问题要么是多余的，要么是不礼貌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在艺术市场上，创作和销售都受到了非比寻常的控制。艺术经销商往往会与艺术家签订专销合同，然后艺术家遵照经销商的建议或指示创作特定门类、尺寸和数量的作品。人们在商业画廊中看到由顽强的反商业装置派生出来的、固定在墙壁上的装饰性作品的频率能有多高呢？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样的要求总是秘而不宣的。买主的收藏承诺也会受到审查，因为突然出售作品对于艺术家的声誉，乃至对于整个艺术市场，都有可能是危险的。在被称作“第二市场”的拍卖行，规章要少一些，但即使在那里，市场也很难说是自由的。姑且不谈有计划地操纵价格的丑闻，很多情况下，标金底价被定在作品不会出售的价格以下，喊价出价也被收藏家和经销商所操控。

利用可再生媒介创作的艺术品可以尤为鲜明地说明这一情况；艺术家们本可以大量廉价地制造照片、CD和录像作品，并努力争取让更

多的人拥有他们的作品。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推出限量版作品，每一件还会附上一个防伪证明，并以高价出售。拥有这样一件作品对收藏者来说是身份的标志，与此对应，高昂的售价也提升了作品的地位。

与高雅文化其他领域相比较，这是艺术的界定性特征：戏剧、音乐会或歌剧通过要求听众出席现场表演来显示其独特性（当然高雅艺术也能做到这一点）；其他门类——小说、诗歌、音乐和电影——通过工业化的制作手段创作大量产品并拥有广大的受众。只有在高雅艺术中，创作稀有或独特作品才能成为核心业务，那样的作品只能被非常富有者所拥有，不管拥有者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

当艺术品需要通过手工技艺进行创作的时候，任何艺术家作品的供应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而且，如果某一作品的需求量很大，价格就会上升。现在仍然有许多艺术家通过耗费大量（他们本人的，或者更常见的是他们助手的）手工劳动，创作不可复制作品来创造价值。但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更多艺术家倾向于使用高科技手段和可复制媒介——特别是摄影和录像——而对生产的限制似乎日益变成了人为的做作。这一局面带来了一些非常奇特的做事方式。在杰夫·昆斯（Jeff Koons）最近的作品中，他选取各种不同的商业形象，用计算机将它们拼贴在一起并加以改动。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后，生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印稿，该打印稿随后被交给昆斯的助手，（就如罗伯特·罗森布罗姆［Robert Rosenblum］在德国古根海姆博物馆的目录中所说的那样）助手们“以科学工作者般的精确度”用油彩在画布上创作出一个可出售的、独一无二的复制品。这个最后也是最机械性的步骤确保了这幅画作为唯一性艺术作品的地位。

对供应的限制使得艺术市场极不寻常，以至于许多经济学者都不情愿用惯常的术语来解释它。通常情况下，例如一听汤罐头的售价是与买主对产品的需求相匹配的；相似或相同的罐头能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价格出售；这些价格随着供求之间的消长变化而波动。正如尼尔·德·马尔奇（Neil De Marchi）在一本关于经济学家论艺术的书中所描写的，上述理论很难运用于艺术市场。时尚，而不是实用价值，对

需求具有巨大的影响，这就破坏了功用与需求之间的正常关系；许多艺术作品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扰乱了供应法则，因为供应变成了一种要么有要么没有的情形，供求之间相互呼应的平衡关系就无法建立起来。更糟糕的是，从一位垄断供应者手中购买一件唯一性作品时，因为缺乏与其他作品的比较，也就不可能获得任何关于交易的可靠市场信息。

图17　杰夫·昆斯，《多圈的》

实际上，这种情况还是有一点世俗化的：很多艺术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经销商和买主不会将它们与他们认为类似的作品进行比较——通常是与同一艺术家的其他作品比较，当然，一件作品的尺寸、所用材料和花费的劳动也都是重要因素。拍卖价格也许与纯粹的市场评价指标相去甚远，但它们至少有时会与经销商的定价有所差异。尽管如此，市场信息仍然短缺（大部分信息是保密的），供应受到控制，需求受到操纵，而定价极易受到时尚和环境的影响。

拍卖会上那些重要作品往往拍出了极高的价格，这使广大公众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认识，即艺术是很好的投资对象（当然，拍卖行自身也强化了这一认识），然而一般来说，事实并非如此，艺术品尤其不宜作为长期投资项目，它的业绩始终比不上证券和股票。虽然有些门类的作品会一时增值，但艺术品的实际价格往往会降低。进行低价位的当代艺术品的投机买卖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彼得·瓦特森（Peter Watson）对艺术的经济业绩作过详细描述，他认为，作为一种高风险的投机行为，只有短期投资才有意义，艺术作品只有在市场的高度繁荣期间出售才能赚到大把的金钱。这样说来，购买已经是高价的艺术品几乎总是一种糟糕的投资。就长期投资而言，各种研究表明，艺术投资的业绩只有其他投资类型的一半左右。这就是为拥有艺术品而付出的代价，并且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只有相对少数的富人收藏艺术品。这其中许多人搞收藏与其说是投资，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个人喜好和提高声望。

艺术品消费像所有奢侈品消费一样，在富足中开花，在穷困时凋谢。我们这里讨论的时间跨度处于两次经济衰退之间，两次衰退都因美国与伊拉克的战争而加剧。由20世纪80年代经济繁荣之后的巨大动荡引起的第一次经济衰退，使得艺术界的重量级作品的价格大幅跳水。安塞尔姆·基弗尔（Anselm Keifer）和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创作的规模巨大（而且造价不菲）、准历史性以及新表现主义绘画，曾是20世纪80年代价格过度膨胀的最佳范例，但后来价格

暴跌并（随着大量拍卖行的倒闭）从拍卖行迅速消失。几年后，它们再度进入艺术市场变成了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我认识的一位评论家在为一家商业画廊写其中一位大艺术家的目录文章时，画廊经销商差不多就站在他身旁。

日本的发展情况对艺术市场衰退的速度和深度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因为整个20世纪80年代受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疯狂而又不可遏制的增长的影响，日本人购买艺术品的规模相当可观。腐败行为加剧了价格的跌落。彼得·瓦特森详细描述了这样的丑闻，艺术品被用于清洗巨额行贿基金，受益者是腐败政客和犯罪组织：为了规避政府限制投机房地产获利的措施，他们“购买”一幅画，其条件是这幅画很快会以原价十倍的价格从他们手里被买回。这是一种极为有害的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些秘密交易和偷税漏税——这些是日本艺术界的典型特征——而是因为这样的欺诈行为扭曲了市场。突然之间，日本人花费大量金钱购买名不见经传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绘画的喜好，看起来更多的是出于缺乏道德的算计而不是由于幼稚的趣味。丑闻的败露对市场产生了令人沮丧的影响，日本一些著名的破产事件进一步动摇了市场，而大量在繁荣鼎盛期购进的作品突然面临着抛售的局面，这进一步压低了价格。当一些涉及欺诈案的作品在1993年被售出的时候，其售价只是原价的零头（在原价的1％以下）。

经济上的这些起伏波动不仅影响着艺术销售的数量，而且还影响到其类型。绘画，这种最易于出售的艺术样式，在每一次经济繁荣时期都获得了可以预料的复兴，与此同时，一些不那么直接的商业实践——包括行为艺术和各种各样的后观念艺术——则在每一次衰落时声名大噪。这种情况在市场与销路惨淡的艺术样式（避免过于商业化的艺术样式可能最终会获得市场优势）之间的持续斗争中一直存在。这是一种可以预期的机械性的过程。可以举一个例子，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复苏引发了对过去几年盛行的政治艺术的一致攻击，导致了对恢复艺术美、确立市场为艺术趣味最终仲裁者的持续努力（我们将在第五章回到这一话题）。

1989年衰落之后的经济复苏持续了很多年，很多人怀疑市场能否

再次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繁荣期的最高点。尽管在一些发达的新自由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经济增长十分强劲，但在其他地方出现了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发生在墨西哥（1994年）、东南亚（1997年）、俄罗斯（1998年）和阿根廷（2002年）的地区性经济动荡，使全球经济面临了崩溃的威胁。人们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取决于观者所处的位置。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这是一个持久增长和低失业率的时期。而对于地区危机所在地的居民而言，这是一个往往伴随着政治动乱和环境恶化的经济灾难时期。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也清楚地反应在各个地区不同的艺术情形之中。

这并不是说动乱地区的艺术仅仅反映了这些动乱。以墨西哥为例，在确立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贸易区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于1992年签订之后的几年中，在国际市场获得巨大成功的墨西哥艺术是讽刺性的和非政治化的作品，尽管该国内部仍然存在着惊人的掠夺和革命的反抗。科科·福斯科以加布里埃尔·奥罗兹科（Gabriel Oroczco）、弗朗西斯·阿利斯（Francis Alÿs）和米盖尔·卡尔德隆（Miguel Calderon）的作品为例，描述了墨西哥艺术如何与美国机构合作，将观念敏锐的年轻艺术家推向国际市场，以此塑造墨西哥文化新形象的努力。辛提亚·麦克莫林（Cynthia MacMullin）叙述了埃米利奥·阿兹卡拉加（Emilio Azcárraga）及其墨西哥城当代艺术文化中心促成这一变化的过程，此人是墨西哥最杰出的肥皂剧制片人之一，也是特拉维萨电视台的创始人。特拉维萨电视台与革命制度党（PRI）这个直到2000年下台时已经执政70年的墨西哥政党有联系，而且，艺术与商业利益也密切相关。因此，当墨西哥自1994年以后陷入严重经济危机——许多墨西哥人堕入赤贫甚至食不果腹境地的时候——国际化的、与跨国公司联系密切的当代墨西哥艺术市场仍然一帆风顺。一些这类作品不仅是温和而自由的，而且对民众的政治参与持敌对态度：弗朗西斯·阿利斯的事件影像作品《爱国故事》（1997年）表现了一群绵羊被驱赶着围绕宪法广场中央的巨大旗杆转圈的情景，该广场是墨西哥城举行政治集会的传统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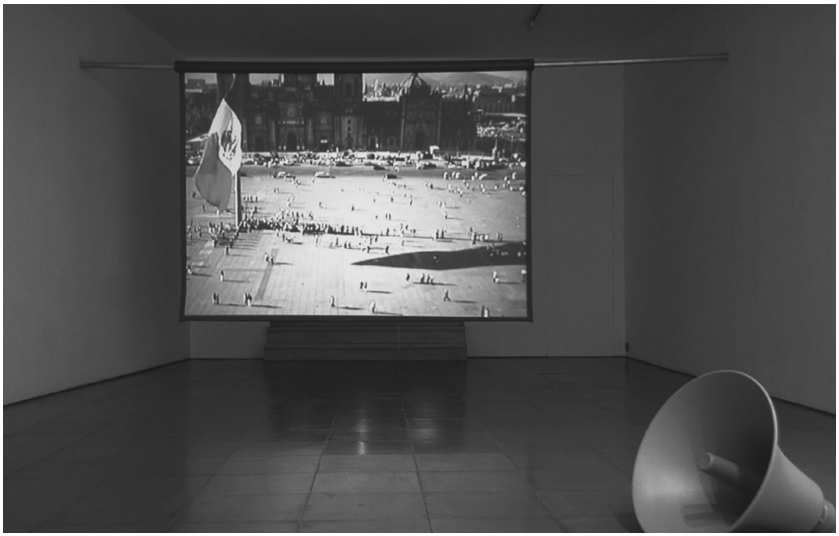

图18　弗朗西斯·阿利斯，《宪法广场》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与高科技工业有关的股市不断增长的泡沫对艺术价格产生了通胀压力。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拍卖中出现了许多创纪录的价格。当泡沫再一次破裂——因商业网络股票价格暴跌、结算丑闻（包括安然公司的丑闻）和9·11事件而产生——艺术市场和博物馆也随之走向衰落，不过到现在为止这次衰落不如上一次衰退那么强烈。

因为经济疲软的局势绵延不止，过去十年中貌似必然的东西也逐渐烟消云散了。甚至美国经济力量的增强都可能是一种幻觉。罗伯特·布雷内尔（Robert　Brenner）在他的预言性著作《繁荣与泡沫》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要工业贸易区的长期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他指出，美国有时会通过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例如，通过保持美元坚挺）而从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的长期发展中获取好处。20世纪90年代，这一战略性慷慨解囊政策的取消导致了美国财富的暂时增长，并使其主要贸易伙伴出现经济衰退，这一发展也引发了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优越性的大力追捧。然而，如今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金融丑闻的暴露和近期战争造成的美国经济衰退，加上欧洲和

东亚的长期停滞，一个高度危险的局面正在形成。

如果说经济衰退对艺术市场的影响至今尚未被人们感觉到，或者说这种影响还没有达到1989年经济崩溃时的水平，那是因为极低的利率使得艺术成了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对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随着社会气候的转变，上次的经济衰退引起了一道灭亡的波浪，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和德国新表现主义巨作的大量死亡。这次新的衰退，虽然波及面窄，但持续时间长，可能最终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如果长期的经济衰退在所难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借贷的巨大规模和系统性（由于布什政府的减税和巨额军费开支而增长）造成的，那么艺术市场及艺术作品的整体性质就将再一次发生变化。

艺术市场对于买主来说可能有点怪异，对于生产者而言，它同样是奇特的。根据汉斯·阿宾（Hans Abbing）的说法，艺术市场的这些特异性使得大多数艺术家处境清贫。尽管这项职业的地位很高（部分是因为它貌似独立于商业的常规套路之外），而且少数成功艺术家的收入都是天文数字，其参与者特别是艺术家都否认与艺术经济的总体性质有任何关系，艺术家们总是忽视或否认他们的创作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回报。艺术家是一个对自己能否成功的前景格外不知情的群体，他们是冒险家，是穷人但有着富裕的背景（这是一种反常现象，因为大多数穷人都有贫穷的背景，但人们不必深究便能知晓其中的原因），他们总是用其他收入来补贴他们的艺术创作。阿宾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艺术界永远拥挤不堪，使得艺术家的贫穷成为一种结构性特征。（在英国，自1981年以来每年进入大学的美术类学生人数几乎增长到了以前的3倍，远远高于普通专业学生人数上升的比例。）艺术家的贫困对艺术的地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极少数的成功者应被看作是从一个巨大水池中掬起的几滴水，而所有的艺术家都甘冒贫穷的风险以追求自由的表达。

阿宾说，这种经济的特点——在天赋和资助的重要性，以及个性在获取资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方面——都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相类似。而其他特点，特别是成功对失败的微小比例，更接近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整体而言，艺术市场是一个古老的、受保护的飞地，新自由主义

现代化的狂飙已经将其他许多商业化程度较低的实践活动扫至一边，而艺术却仍然不受影响。它的地位赋予了它社会独特性和一定的自主地位，有时甚至允许它从作为其基础的奇特市场中独立出来。

艺术自主权

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对艺术的自主权作了颇具说服力的论述，他把艺术与现代社会其他功能系统（诸如科学、政治和法律）进行了比较，指出，它具有类似“运行闭合”的倾向，也就是一种发现自身功能、并且只专注于这种功能的驱动力。在卢曼看来，艺术的独有特征在于它使用感觉而不是语言，因此，它独立于世俗的交流形式之外。它的角色也许就是将无法表达之物融入到社会交流的网络之中。（我们稍后将会看到，至少作为对当下艺术的描述，这种讨论将不得不涉及两者间的距离正在缩小的问题。）

对于卢曼来说，艺术越是试图将自己融入到社会产品和话语的一般规律中，就越是强化了它的自主权：

> 没有任何普通物体坚持一定要被当作普通之物，但若一件作品果真这样坚持，反而会因这种努力而事与愿违。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的功能就是再造艺术的差异。然而，艺术总想消除这种差异，但这种努力并不成功，或许，这一事实本身比任何辩解和评论都能告诉我们有关艺术的更多东西。

然而，艺术体系的确有着鲜明的特点：人们可以自由地参与其中（这一点对于经济或法律领域来说是不可能的），并且它仅能吸引一小部分人的参与（例如，很大比例的英国人并不经常光顾画廊）。其包容和排斥的手段与其他体系均不相同，并且它是一个相对孤立的活动领域（再比如，政治与法律之间的联系就非常密切）。

卢曼给出的是一种笼统而理想的描述，它没有考虑阶级与地位以及市场与政府压力对艺术的影响。我们可以更具体地考察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例如，哪些人愿意参与艺术活动：布尔迪约及其合作者进行了一项名为“艺术之爱”的大规模社会学研究，对欧洲人拜访博物馆和

画廊的习惯进行了调查，其结果强有力地显示，人们是否参加艺术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受的教育。简而言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有可能光顾画廊，他们在那里感觉更惬意，停留时间更长，而且更善于谈论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不过，卢曼的著作也关注了艺术的实际自主权问题，矛盾的是，艺术的自主权既解释了它与其他系统的联系，又说明了它对其他系统的作用。这种自主权绝不是虚幻的，它是艺术观念功能的核心，并且由各种各样的艺术机构来维护，包括学术界（艺术学校、艺术史与视觉文化部门）、博物馆和专业团体。有时候，被上述机构广为传播的艺术与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艺术并不一致。

霍华德·辛格曼（Howard Singerman）详细描述了作为大学学科的艺术的发展情况，分析了这种制度化对于艺术作品的影响。大学要做的就是将职业艺术家与“星期日画家”区分开来，它并不希望那些艺术学子具有熟练的手工技能，或是将他们的创作当作消遣的娱乐，或是从创作的痛苦灵魂中获取快乐。重要的是，它们必须生成一种独特而又可证实的知识，用一种理论化的深奥语言，保证艺术专业的地位和独特性。艺术家不仅在大学接受训练，而且有时候也会以兼职教师或是带着作品巡回表演者的角色进驻大学。辛格曼着力描述的学院艺术——包括录像、电影和行为艺术——通常要求艺术家至少在展出时必须在场，这类艺术一般吸引学术界的观众，并且都有资助、研究基金或有关驻留机构作后盾。这种需要艺术家陪同的艺术可以出售，但它独立于商业市场之外，因为买主购买的与其说是艺术家的作品，不如说是艺术家的时间。它也不同于大众文化的一般运作程序，代价是它必须适应另一套体制，适应所受审核日益增多并有着专业化管理的大学的需要。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专业圈内形成对话，但它的效用却远远超出了这一目的，它会对围绕艺术的大部分话语产生影响。

第一个效用是，要有一个艺术系就必须有一个统一化而又概念明确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艺术”。第二，艺术要能够被研究，而且艺术家所做的很多工作都可以说是研究。第三，艺术领域需要用专门的语言来描述，而掌握这种专门的语言是界定艺术专业人员的标准。所

有这些效用都有助于创造出一种能够与艺术从业者有效交流，但将广大公众排除在外的艺术。

这种自主权并不是一成不变、铁板一块或不可置疑的。为市场服务的专业艺术圈与那些同学术界联系密切的专业艺术圈是非常不同的。为了对这一问题有一个粗浅而迅捷的认识，我们不妨来比较两个杰出范例——《艺术快讯》杂志（我们可以看一看它的纸张和色彩复制的质量、它刊登广告的数量和特点，以及其平易近人的文风）与《十月》学报，后者有着严谨的视觉风格、单色的插图、艰涩高雅的文体和深奥的理论规范。

此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学术界所向往的专业化是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商业企业——所鼓励的民粹主义的反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毕数年之功、历经艰辛终于掌握了艺术世界专业语言的博物馆专业人士，在与公众沟通的时候，必须放弃专业术语的使用。在公共场所举办的艺术展览必须能够让没有受过专门教育的观众看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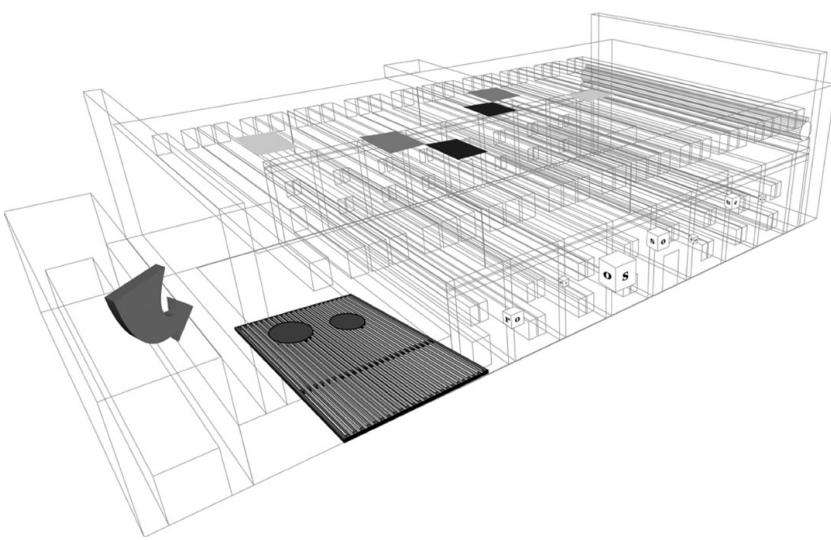

图19　利亚姆·吉利克，《马尔默罗塞姆艺术中心改造计划》

这样的对立状态可以从围绕着利亚姆·吉利克（Liam　Gillick）高

度成功的作品的评论中清楚地看出来，其中很多讨论是由艺术家本人引起的。

吉利克曾在伦敦白教堂画廊举办了一个名为“木材之路”的展览，明亮的彩色半透明展板和展台就像是现代主义建筑乌托邦的一个公司版，在这一乌托邦里，明亮的玻璃给阴暗的家庭内部带来阳光、健康、清新的头脑、开放性和自然气息。如果那种构想没有实现，按照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著名论断，那是因为透过20世纪30年代的平板玻璃窗除了能够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和法西斯主义之外看不到任何令人愉快的东西：

> 被一个喧闹的外部世界塞得满满的大窗户需要一个充满了可爱的陌生人而不是纳粹分子的外部；落地玻璃门真正期待的是阳光的进入而不是盖世太保。

吉利克的作品长期关注官僚主义和技术专家政治的中间地带，在这样的国度——至少是在发达国家——大部分决定是由政治家、商人、计划制定者和行政管理人员作出的。他一再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一种后乌托邦的环境中，不久的将来是被如何控制的？对于一个缺乏宗教救赎、平等或者纯洁而和谐的民族等终极目标的国家来说，靠什么隐秘的构想来推动未来的发展呢？在创作作品时，吉利克采用了公司元素——颜色、商标图案、字样——并将它们编排成审美的游戏。表面看来，这是采用了工具官僚主义的组织结构，并使其与对立的游戏美学竞争。然而，那还不完全是它所承担的任务，虽然商业性和政治性展览的底线是工具主义的结果（买或不买之决定的计数0/1，或只是候选人选箱中的一个对勾），但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经由人类意识和对环境的控制而引导——还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

在创作旨在用范例证明而非以材料记录世界官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审美作用的作品时，存在的危险是艺术与它的对象变得难以区分。吉利克不仅需要克服这样的危险，而且需经受在画廊中创作与展出艺术作品的考验。后一问题的部分解决方式是采用拆分的策略。他的作品和文章看起来既不明确表明想法，也不具备讽刺性——这令那些画

廊常客感到轻松。它们作为艺术作品似乎并不要求特殊地位，而且吉利克也说过，当人们认为艺术能比世界上其他复杂建筑承载更为本质的意义的时候，艺术就变成了一个问题。然而，虽然这些行动本身非常有益，但却突出了第一种危险。

他的作品利用许多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最突出的是将最近的过去和不久的将来联系起来，采用了一种基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思想的手法，本雅明同样从近代那些过时而不再时髦的商业建筑中——巴黎的购物走廊——寻找预示着现代主义和共产主义乌托邦即将到来的理想建筑构想。吉利克还将目光转向20世纪70年代另一种至今尚未修复的商业和行政建构，从而使现行的意识形态和审美结构变得可见而怪异。

另一种手段就是对人道主义进行攻击：吉利克的美学展示，虽然看上去为民主参与、接触和对话提供了机会，但实际上，它又常常通过那些不便使用并且固定摆放、不可能促进交流的桌子和椅子，通过放置在观众难以触及的位置上的展览图录，通过内页空白的假书稿，通过表面上尽管带有欢快的公司色彩但看起来却让人敬而远之、令人讨厌的安排，使这样的期望变成了泡影。就这样，官僚主义的功能、亦即对人的非人性管理，就被巧妙地暴露了出来。越来越像企业奴仆的画廊和博物馆，是进行这种展示的重要场所，尽管作品本身的地位——既作为这种状态的例证，又是这种状态的排斥力量——仍然是极为模棱两可的。

在有关“木材之路”展览的文章中，策展人伊沃娜·布拉兹维克（Iwona Blazwick）声称，吉利克“为我们创造了去接触、去再次拥有讨论、协商、创新或延误等观念的机会——让我们成为塑造未来的主人公”。这一陈述中，未作界定的“我们”是颇有争议的；吉利克的实践似乎确实为一个为数不多的合作者、策展人甚至收藏家的精英圈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而且广大的画廊观众群体也利用他的空间进行各种形式的表演或讨论。然而，实现这种参与的障碍似乎很大，或许正是排他性、差异性和等级的特征赋予他的作品和文本以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又将其带入了一个同质文化俱乐部。

吉利克的作品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艺术家的专业话语与艺术更宽泛的功能和理想之间的部分张力。如果过分追求专门化，那将再次损害艺术普适性的主张（及其受保护的理由）。而如果过分强调通俗易懂和工具性，艺术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就会逐渐削弱，最终出现相似的结果。

除了各种不同的自主模式之间普遍的张力之外——这些张力通过市场、大学和博物馆生成——近来还出现了一些更具体的威胁要破坏艺术自主性基本构造的力量：艺术市场的现代化，以及艺术应具有实用性的反方论点，已经由政府和商家传播开来。

现代化？

一些迹象表明，艺术界已经被经济和技术变革的力量推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技术革新一直是艺术这块受保护飞地的持久威胁。摄影已被同化，其途经是通过强调洗印照片的手工技巧，通过其他解决复制难题的手段，例如宝丽莱拍立得相机（拍出来的都是唯一的独幅照片）的使用以及最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适合博物馆尺寸的照片的扩印。录像因淡化了其乌托邦式的社会批判和广泛参与和分配的愿望而被同化，转而与装置艺术相结合，从而创作出轻松愉快、基于博物馆的、让人联想到绘画或雕塑的作品。

一个更新而又更根本性的挑战来自于互联网艺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艺术家开始利用网络创作各种不仅能够复制而且可以自由发布的作品。这类作品能够被完美地从一台机器复制到另一台机器上，而且大部分使作品运行的密码都是公开的，人们可以随意浏览、拷贝和修改作品。如果数据共享的网络文化甚至威胁到那些曾经欣然接受了工业生产方式的产业，那么对于未曾欢迎那种方式的艺术而言该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显得毫无意义，尤其是因为互联网艺术的特性更倾向于对话，而不是成品的生产，更不是实物。互联网艺术并不会对艺术作品本身的制作、所有权和出售构成挑

战，但它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在这里，艺术家创作能被当作艺术来观赏的非物质作品，而且它可以摆脱经销商、政府机构和企业的控制。其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将在最后一章回到这一话题。

现代化的另一个标志是主要拍卖行的举动，这些拍卖行已成为公有公司，因此在当代艺术领域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其合法目标。它们举办由知名人士策划并提供大部头图录的展览，以此提升可供将来出售的当代艺术作品的身份。它们还仿效艺术家掌控的“另类”空间，在废弃的工业建筑中举办展览，甚至买断艺术家作品的特许经销权。这些举措获得了成功，部分原因是艺术家看到了打破经销商垄断的好处。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代艺术就成了拍卖业有利可图的香饽饽，而且，这种“第二市场”的存在本身也削弱了经销商的垄断势力。

这既是对商人-收藏家这一群体兴起的反应，也有助于这一新型群体的兴起，这些人为了投机性投资而购买艺术品，而且往往是从常规的画廊渠道之外——通过拍卖行或从其他收藏家手里购买。在英国，查尔斯·萨特奇（Charles Saatchi）是这一群体中最杰出的范例，因为他经营艺术是为了投机，而他的艺术收藏与他的企业财政情况密切相关。他以直接从艺术家手里甚至从各种展览会上购买作品的做法而名闻遐迩。正如蒂莫西·科恩（Timothy Cone）所证明的，这种做法使得画廊对艺术家价格的控制程度降低，并不得不对艺术家在第二市场中的地位作出反应。不过，科恩接着说，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价格和缺乏透明度的问题依然存在。拍卖会为艺术家的作品拟定拍卖价，而且这个价格还经常被收藏家和经销商操纵，他们往往过高出价，以抬高其藏品的价值。在艺术界，这类操控价格和幕后交易的做法仍然司空见惯，而在任何其他投资领域，这都是非法的。

另一个给艺术市场带来极大影响的因素是企业收藏。这是一个相当新近的现象，这类收藏大部分起步于1945年，1975年以后渐成规模。当代艺术这一发展轨迹的某些后果很早就在亚历山大·阿尔贝罗（Alexander Alberro）关于概念艺术营销的著名著作中得到了呈现，那时，企业收藏已经开始变得举足轻重。各企业都收藏有利于体现其

自身创造性和精神价值的创新艺术。虽然这只是一项小规模的活动，游离于商业活动的一般运作规程之外，并且往往取决于个别决策人的兴趣和喜好，企业收藏最近还是大有变化。在一些大公司，收藏已被纳入商业经营计划，并力求与公司形象相吻合。它不再局限于搜集一些挂在办公室墙壁上的装饰物。不过，根据吴金桃（Chin-tao Wu）对企业收藏的考察，许多商业企业还是偏爱四平八稳的装饰性艺术作品，即那些不会引起社会、政治或宗教争论的作品。毕竟，这些作品被展出的环境既非完全私密、又非完全公开。

很难评价企业收藏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因为大多数交易仍然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可以推测企业收藏在当代艺术的销售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但很难知道确切数量，因为艺术作品的购买通常被企业纳入公共关系、建筑或室内陈设的预算之内。吴金桃援引199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声称在美国纽约大约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市场份额应归于企业收藏，其他城市则占一半左右。这种工具性、机构性收藏所占的巨大份额很可能使得艺术市场表现得更像一个普通市场。

阿宾指出，有迹象表明艺术经济的特殊性正在降低。一个迹象是艺术家们对艺术地位的态度日益含混不清，而公开的经济活动也在增加。根据这一看法，对艺术界的矫饰现象加以讽刺的艺术家（如现已解散的曾活跃于伦敦的艺术团体Bank）和那些赤裸裸地追求财富的艺术家（如昆斯、村上隆［Murakami］或赫斯特）都表明了艺术的崇高地位以及其与低级商业的区别都已经不再牢靠。然而，我们还不清楚这些特征究竟是结构性的还是周期性的，是否与市场的兴衰有联系。不过，人们还是很容易举出两类艺术家的大量先例（“艺术与语言”团体和沃霍尔就是两个会立即浮现在人们脑海里的例子）。

艺术的用途

相比于现代化的那些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艺术非功用性的自主权构成了更根本性的挑战。艺术作为新自由主义配角的特点正变得越

来越引人注目，由于意识到自由贸易中的缺陷，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试图通过提高对艺术的工具主义要求来改善这一情况。企业想利用艺术来确保公众对自己品牌的眷顾，而这种眷顾不是广告能收买到的；政府则想通过艺术来医治自由贸易对社会凝聚力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也就是说，两者都试图反抗他们自己共同设置的力量。即使是富裕国家，也要面临由于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引起的社会凋敝问题，因为不平等使许多人过着贫困与不安定的生活，甚至使支撑整个消费主义制度的中产阶级也面临着压力。我们知道瑙米·克莱因说过，将产品的生产“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表明了人们更注重商标和品牌的知名度。作为树立品牌形象的一部分，企业对艺术的需求亦变得更加普遍、更有系统性。

商家已经从对艺术的偶然性慈善赞助转向了与博物馆或艺术家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这种方式两个品牌可以密切合作，达到互利双赢。企业开始越来越大量地收藏、定制和展览艺术作品，近来甚至开始策划在一些公共场所举办展览。

这种联盟的一个有力例证是近年来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与艺术的联姻，这一合作已经成了尼尔·卡明斯（Neil Cummings）和马利西亚·莱万多斯卡（Marysia Lewandowska）“物品的价值”调查计划的一部分。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赞助了1998年在巴比肯艺术中心举办的一个名叫“沃霍尔的外貌”的展览，利用这个机会，该商场将其橱窗布置成一个以“工厂”为主题的展台，展出了一套沃霍尔风格的时尚大片。食品厅摆放了成堆的“坎贝尔汤罐头”、“布利洛肥皂箱”和“可口可乐瓶”[1]，周围墙上陈列着沃霍尔的版画，在男装部放映着沃霍尔的电影并相应推出了一系列促销活动。当然，沃霍尔对于这样的待遇求之不得，然而，这还只是塞尔弗里奇公司利用当代艺术吸引顾客的一整套战略举措的开端。

另一个例子是将一系列“绝对”牌伏特加酒的广告、绘画或物品印在杂志页上，以此缔结艺术家与伏特加酒业公司间的品牌联盟关系。这个活动的开山之作是沃霍尔于1985年创作的。这些使得艺术家与企业间的关系变得特别透明的作品，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层出不穷。许多

知名艺术家，包括基思·哈林（Keith Haring）、大卫·利文萨尔（David Levinthal）、埃德·拉沙（Ed Ruscha）和维克·莫尼兹都创作过这类作品。相似的例子还有村上隆，作为一个公开追逐商业成功的艺术家，他已经与路易威登公司签订盟约，为该公司设计了多款畅销皮包，最近还为该时尚品牌制作了一部促销性质的艺术影像作品。这部名为《超平花押字》的视频作品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一个娱乐版本，片中一个女孩为了寻找她丢失的手机，在一个由该公司标志图案组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四处游走。这是一件彻头彻尾的杂交作品，它既是一个冗长的广告，又是一部带有村上隆标志性风格的动画片。在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上，这件作品被安排在弗朗切斯科·波拿米绘画展第一展厅展出，它还在世界各地路易威登的旗舰店播放，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村上隆手提包的销量。

直到今天，企业介入艺术的活动仍然是一个笼罩在秘密协定中的阴暗领域，间或会被汉斯·哈克调查艺术赞助人腐败行为或博物馆董事会成员商业活动的知名但受到审查的文章所揭露。幸运的是，现在有两个人对企业介入艺术的内幕情况作了详细描述，这就是吴金桃和马克·雷克塔诺斯（Mark Rectanus），他们不顾围绕这一话题的秘密状况，历尽艰辛，最终完成了他们的著作。无论是艺术机构还是赞助企业，都是不愿透露他们之间协定的具体细节的。

吴金桃的报告主要讨论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情况，它详细描述了两国尤其是英国的艺术私有化情况，英国已经从博物馆和其他艺术机构撤回了政府基金；这两个国家的企业开始赞助艺术，它们乐于定制、收集并公开展示它们的藏品。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领导的保守党政府的一个明确目标，就是通过更多地依赖市场力量来改变当代艺术令人不安的政治特性。同样，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本人也支持企业，尤其是石油和烟草公司，介入艺术。

赞助以及其他与艺术机构的长期合作计划对企业具有明显而又可量化的好处。对于那些通过其他方式很难接触到的潜在顾客来说，与艺术的合作具有一种吸引力：与普通民众相比，艺术观众一般都接受

过更全面、更良好的教育，他们因而也会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好处是，这样的赞助看起来像是企业的慈善之举。许多赞助艺术的公司存在改善形象的需要，它们希望通过对文化的慷慨施予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例如，英国石油公司与泰特美术馆的长期联盟就带有这样的目的。与之类似，德国的雷姆斯特玛烟草公司在赞助第九届卡塞尔文献展的过程中，通过限量版招贴画和特装烟来推销威狮牌香烟；该公司的广告还被印在展览图录的背面。大规模的艺术赞助也可以起到政治杠杆的作用。吴金桃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的阴谋诡计，作为美国一个重要的艺术赞助商，该公司为了反对纽约正在草拟中的反吸烟法，曾威胁要撤消对该市艺术界的所有支持，但以失败而告终。

图20　达米恩·赫斯特，《绝对赫斯特》

正如吴金桃和雷克塔诺斯所指出的，公司通过赞助艺术而获得了很多回报。因为它们可以通过赞助展览——如今欧洲高达百分之七十的展览费用由私人提供——获得与这些艺术事件相关的最大程度的宣

传效益。其余的资金——从编制收藏图录到维护排水设施等琐碎花费——由政府承担，企业有限的慷慨捐助，正是建立在政府补贴的基础设施之上的。

这一切都对文化有着直接影响。企业在赞助之前总会确定一些必需达到的具体标准。那些达不到这些标准的文化计划几乎没有公开的机会，自然也不会被那些依赖企业存活的著名机构所考虑。雷克塔诺斯说，主要标准就是看文化活动领域是否与企业的核心市场相吻合（比如耐克公司就不大会愿意赞助伦勃朗的展览）、展览是否会受到良好的媒体报道，以及参与的个人或团体是否适合作为促销的对象。

这样做的结果在上一章已经考察过了：对青春形象的偏重、可在杂志上刊印的作品的盛行，以及明星艺术家的增多；艺术作品都拼命讨好商业文化和时尚产业，就像是服务于赞助商的香甜诱人的蜜罐；而且，除了某些被限定、受控制的情况，这样的作品缺乏批评的参与。的确，最近汉斯·哈克再度辉煌就是一个例子：这位从观念艺术激进的政治性历史中走来的艺术耆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标榜成一个考古学上的稀世遗珍，在这位特立独行的老艺术家的作品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一股浓烈的、舒服而又无力的怀旧气息（毫无疑问，这与他的初衷相背离）。

赞助还倾向于催生壮观昂贵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中，高昂的费用就是一个明显的特征。这种阔气的消费同时证明了艺术家、博物馆和赞助人的实力。这种赞助也推动了大型装置艺术、视频和其他高科技展览的举办。此外，当那些大企业赞助艺术或与艺术机构缔结盟约的时候，它们期望的是——这也显示了它们的世界影响力以及对规模经济的期待——与跨国文化接轨。对于艺术团体而言，这又是一种压力，迫使它们在举办展览时注重多元文化的融合。

企业希望通过与那些它们自己无法包含的品质联姻，例如高雅艺术的自由表现，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正如当今臭名昭著的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的那句口号所言："要创建伟大的公司需要使用艺术。"与此同时，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企业都力争成为有创造性、有文化的角色。雷克塔诺斯说，企业涉足艺术有助于表明企业的创造力，使之

作为艺术庇护者、经销商或者至少是艺术中介和收藏者的地位合理化，也有助于使企业成为艺术观众亦即艺术所吸引的社群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艺术能够通过这些改善形象的活动帮助企业增加利润，那么这样做也存在风险，那就是如果这个过程变得过于透明，艺术就会失去其自主权，要知道正是自主权使艺术能够履行这一职能。

近来，政府对艺术的要求与企业对艺术的要求有着互补作用，因为两者对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和服从抱有相似的兴趣，以应对他们致力于提倡的经济体制不断带来的创造性的毁灭。在英国，工党政府将艺术当作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尤其是对所谓的“创意产业”的推动，艺术还被看成是地区发展的助推器，是弥合由于保守党长期统治造成的社会裂痕的香脂。艺术应该是高质量的，但不都是精英主义的，它应该能够吸引新的各种各样的观众。在美国也有类似的举措，长期遭到保守派政治家攻击的国家艺术基金会，最近以艺术可以在社会发展规划中，包括在减少犯罪、解决住房和学校教育等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依据，来证明自己为艺术提供资金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这种举措的危险是，在揭露艺术的工具性的同时，它们也过于清晰地暴露了艺术与政府间的亲密关系，人们原本以为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理想主义和永恒的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如果政府资助艺术是为了净化公民的心灵，那么，如果这些漫步在画廊中的艺术消费者考虑的是广告策略和区域发展的话，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应该说，这样的想法越来越不可避免。只有在艺术的功能被自由的理想所掩盖，并且艺术与自由贸易的本质距离得到保持的情况下，艺术才能满足商家和政府的工具主义需求。

政府和商家都乐意使艺术远离纯粹的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在许多国家，政府在收藏和展示艺术作品方面，在影响大众品味倾向和艺术著述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艺术作品真的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那么政府就会心安理得地让市场力量来控制它们的购买、保存和处置。一般认为，商品除了确定身份之外，还能划分身份，有着在个体之间引起竞争欲望的效力，而在艺术界则存在着一种可疑的臆断，

就是博物馆中的艺术作品铸就了社会凝聚力，虽然它们赞美差异，这些作品在不断地循环利用并重新组合多种多样而又全然不同的参照系的过程中，强化着集体记忆。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地博物馆的蓬勃兴旺是史无前例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新博物馆有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休斯敦美术博物馆、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和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毕尔巴鄂分馆。阿德里安·埃里斯（Adrian Ellis）所概括的导致这一局面的几个可能原因十分贴切。首先，博物馆向来是一种表现由财富带来的显赫威望的方式，而在20世纪90年代财富进一步集中——于是，富人做了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如今他们变得更加富有了，建造博物馆就变得顺理成章。第二，国家间和地区性的竞争对博物馆的兴旺也起了作用，对此我们已经有所了解。第三，博物馆新的教育和娱乐项目需要更多的空间。第四，不断变化的休闲方式意味着人们更经常地光顾博物馆。最后一点，扩建引发了各个博物馆之间的竞争，因为，在其他博物馆都在发展壮大的时候，原地踏步似乎不是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埃里斯进一步指出，由于各博物馆长期处于资金不足的状态，使得它们难以维护馆舍并留住员工，扩建往往是为了摆脱困境。博物馆依靠不断减少的政府补贴、赞助人和商家的赞助或其他形式的支持而生存。最常用的改善资本结构的办法就是推出重磅炸弹式的展览和进行扩建。相对于维持博物馆日常运转的费用来说，宏大的扩建计划更容易获得私人赞助。但扩建的困难是，从长远角度看，除非这一规划完成得非常成功，能够引来大量的后续资助，否则就会使根本问题进一步恶化，使博物馆需要更多的资金来保证大型馆舍的灯光、暖气、职工和维护。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助长了博物馆的扩建风潮，因为股票市场的迅速崛起直接和间接地给博物馆带来了更多的钱财。最近的经济衰退则使得许多博物馆扩建计划戏剧性地搁浅，包括洛杉矶艺术博物馆和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以及古根海姆博物馆在纽约苏荷区和拉斯维加斯的两家分馆的关闭。

博物馆大肆扩建的一个直接效应就是刺激了艺术创作。正如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指出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因为缺少足

够优秀的艺术作品而空闲的画廊，为了填满画廊，评判标准和产量这两个方面都必须具备足够的弹性。这无疑又是一股扩大当代艺术的世界影响的促进力量，它也是一种扩大创作范围的关键手段。

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各家博物馆都努力塑造自己的品牌。这里最突出的范例是古根海姆博物馆的运作，作为一家具有全球特许经营权的博物馆，它最醒目的表现就是古根海姆毕尔巴鄂分馆。在古根海姆基金会主席托马斯·克伦斯〔2〕的领导下，古根海姆博物馆与德意志银行合作在柏林设立了分馆，以及（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另外两个将成为经济衰退受害者的分馆。最大胆的冒险是毕尔巴鄂分馆的创建，那里曾是一座鲜有游客的富裕工业城市，分裂主义政治势力，包括埃塔的爆炸和刺杀事件等把它搞得四分五裂，按照金·布拉德利（Kim Bradley）的详细分析，这座博物馆的建立与该市港口、新地铁和新机场的发展密切相关，最重要的是与零售业、写字楼及住宅开发业的发展有关系。它的确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将毕尔巴鄂变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其中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用钛合金包裹的华美雕塑式建筑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当地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负担了古根海姆博物馆用于构思、设计、建造和运行该分馆的所有费用。它们设立了一笔5,000万美元的采购基金，尽管购置的作品仍属于古根海姆的财产。除此之外，还有一笔2,000万美元的免税资金，用于支付租借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其余藏品以及使用该品牌名称的费用。该博物馆的服务对象大多是外国游客，它与巴斯克当地民众的利益究竟有多大关系，是一个在最初几年引起过激烈争论的问题。尽管当地政府为发展西班牙和巴斯克艺术而划拨了一笔巨额款项，该馆购置和展出的都是著名的美国和欧洲艺术“大师”的作品。我们知道，装置艺术可以保证铁杆观众的到场率。建筑的豪华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在这座博物馆中装置与其展出环境相互呼应，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

从更宽泛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艺术机构，古根海姆博物馆实际上是一家特别透明的商业公司，它的所有展览都服务于经济利益。“摩托车艺术”展是大量这类展览中的第一个，它看起来更像是赞助商们

的商机而不是文化展示。人们猜想，2000年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乔治·阿玛尼”展，可能与阿玛尼同该馆达成的1,500万美元的赞助交易有某种关系，这个展览与其说是该时装品牌产品的历史回顾，不如说是一个现时行销货物的展示，无论是展览还是图录，无非都是对阿玛尼设计的吹捧赞美。阿玛尼实际上是租用博物馆做了一个广告。

古根海姆公司的做法显示了艺术界的大趋势，注重品牌创建的现象已在艺术界遍地开花。画廊和博物馆千方百计刷亮它们的新标志，努力让民众记住它们的品牌特征。“泰特”品牌（营销人员展开了系统地反对其名称前添加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斗争）已经产生了一个实体，大大超出了它许许多多有形的分支机构，并通过一些商业交易，例如，为在DIY巨人百安居公司（B&Q）销售的一系列家用油漆做广告，实现了品牌互利共赢。许多艺术家也在挖空心思树立品牌标志，并且出现了一些成功的范例：特蕾西·埃明（Tracey Emin）已经成了一个品牌，她的艺术作品均出自这个品牌。作为品牌的艺术家都是一些寓言式的人物，就像机器人，连同他们的其他产品，总是传达出特定的可预见的行为。在2001年英国皇家艺术协会举办的一个关于艺术赞助的会议上，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的一位代表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该商场修缮期间，在商店门面举办的萨姆·泰勒-伍德（Sam Taylor-Wood）绘画展是两个品牌的一次携手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

我们已讨论过企业赞助的展览都不太喜欢批判或激进的内容，而各博物馆的品牌创建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压制批判思想的力量。如果博物馆的建筑变成了一个特殊的标志（其外形图像被印在手提袋和博物馆商店各种小饰物上），如果博物馆不惜代价地用能够建立品牌形象的特定的颜色、字体和图像创造了一种自己的营销风格，那么博物馆的内容也会被标签和解释性的材料含蓄地打上品牌的印记。博物馆的趋势就是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展出一个接一个的作品，就好像那些艺术作品之间从不彼此扞格、从不相互抵触。一张保证单覆盖了所有的展出内容，这些内容的入选本身给它们打上了品牌的烙印。

由于艺术画廊和博物馆吸取了商业实践的经验，并致力于寻找更大量更多样的观众，它们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布尔迪约的《艺术之爱》一书描写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尚未改变的欧洲博物馆的情况，那时的博物馆灌输给观众的是这样的观念，即他们在这里得到的体验是与日常生活迥然有别的：

> ……展品禁止触摸，观众必须保持宗教般的肃静和清教徒禁欲主义的礼仪，观众总是稀稀拉拉而环境总是令人不适，信息资料的缺乏成为准系统化的现象，博物馆的装饰富丽堂皇，礼仪庄严肃穆……

今天，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事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只要去参观一下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就足够了：虽然建筑的戏剧效果仍在向观众强调展品的重要性，但却很难让人有神圣的感觉。作为各种文化设施和传播空间的配角，画廊挤满了欢声笑语的观众，那里有丰富的信息资料，而且至少在一些区域，它还鼓励艺术与观众间的互动。

这些变化是艺术飞地走向商品展示进程的一个步骤。在本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相反的趋势：通俗易懂以及更加规范的商品化形式，至少促进了艺术与商业文化的部分融合；艺术的学术专业化则又促使艺术自主权和精英话语权的确立。这种矛盾通过政府行为得到了缓解，因为专业化的真正目的，至少对于博物馆而言，就是实现有效的公众交流。

在一些领域，政府与企业对艺术的利用产生了更大的矛盾。政府利用艺术是为了扼制由无节制的消费主义造成的民主空洞化和人情寡淡的现象——而这正是企业行为的后果。企业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向越来越愤世嫉俗、对传统的营销手段充满怀疑的民众推销产品。国家政策的指向是艺术的社会广泛包容性和艺术观众的增多。而企业的兴趣在于利用艺术的排他性及其与精英人士和社会名流的联系，从而进入一个能够得到高雅文化认可、获得持续的媒体报道和丰厚利润的特权王国。这样的联系越透明，艺术就越是受到它的腐蚀，似乎完全变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其对宣传手段和名人效应的使用令人厌倦。毫无疑问，让麦当娜宣布2001年泰特美术馆透纳奖的意图是为了提升

该活动的知名度，与此同时，与高雅文化的合作也提高了这位流行歌星的品位。其结果是每一个观众都知道他们所处的位置就是世人非常熟悉的大众文化领域，艺术展品扮演的是这位歌星诸多大事张扬的不当行为之外多少有点趣味的消遣。

20世纪90年代的品牌大战使得艺术成了商业形象经营中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种降低艺术地位的行为只会一发而不可收，因为那些关心自己的公众形象或已卷入到“文化产业”的企业不可能将参与艺术的优势拱手让给其竞争对手。企业只会继续系统地损害艺术的自主权，而自主权正是艺术的吸引力之所在。

根本的矛盾是，来自古老的、受保护飞地的美术是传播新自由主义力量的手段，而如果将新自由主义运用于艺术，则会导致艺术的毁灭。本雅明·布克洛指出，政府认可的这种文化模式已经变得企业化了，而且企业都想让审美体验服从于时尚；他写道，这种文化模式与民众能够借以肯定并最终认清自己的文化民主理想完全背道而驰。那些理想的幽灵仍然紧紧地依附在艺术上（并被吉利克这样的艺术家所戏耍）。在许多人的艺术观念中，它们仍然占据着中心位置，不管人们的期望泡汤的几率有多高。这个问题是反对将艺术当成商业和政府的奴仆的关键，我们将在最后一章回到这一话题。

注释

〔1〕 这些都是沃霍尔作品复制的对象。

〔2〕 据悉，托马斯·克伦斯（Thomas Krens）已于2008年2月28日因古根海姆博物馆发展战略及巨大的资金漏洞问题提出辞职。而在此前一年，亦即2007年2月10日由中国美术馆与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美国艺术三百年：适应与革新》教育项目之研讨会”上，译者曾与克伦斯一同出席会议并发言。

第五章

当今艺术法则

当代艺术是极其复杂、极端多样的，这是艺术界一个基本的、获得了普遍共鸣的正统观点。当代艺术的形式、技术和题材确实种类繁多、令人应接不暇。传统的绘画、雕塑和版画印制等媒介已经与装置艺术和“新媒体艺术”相交叠，后者能够将任何东西，包括在线艺术和计算机控制的声音环境等因素集于一身。艺术家们塑造了各种个人形象，从传统的大师或萨满教巫师角色到目光锐利、假心假意的投机家和野心家，其面具人格也是各不相同，从光彩照人的少女到狼吞虎咽、挥舞斧头的精神病人。艺术所关切的问题多种多样，涉及女权主义、身份政治学、大众文化、购物和心理创伤等各个方面。也许艺术的基本条件就是要具备不可知性（这类概念用视觉形式来表现时可能包含着矛盾），或者说持这种观点的那些人有意遮蔽一种不同的一致性。

怀疑传统观点有所隐藏的理由有几点。第一，不管是对于门外汉还是对于艺术行家，大多数艺术作品都是极易辨识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被陈列在画廊中。第二，完全随意性是完全一致性的一种形式。艺术多样性的各种不同元素相互融合而产生了一种更广泛的同质性。第三（与第二点有些对立），正如我们看到的，自由远不彻底，许多文化产品被严格排除在当代艺术世界之外。最后，时下有大量作品（比如广告）以非常传统的方式利用视觉符号。因此，伴随着宣称艺术本质上的不可知性的言论的盛行，或许艺术的可知性正不断增加。

当然，任何关于艺术的论述都不具有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什么分析会如同对甲虫的研究那样客观，因为任何描述都会给其考察的真实对象带来某种影响。格林伯格（Greenberg）将整个现代艺术的发展看作是一种黑格尔式的走向抽象的过程，这一描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促进了波普艺术的产生，而波普艺术的出现就是对这一说法的明确反驳。

自前卫艺术诞生以来，似乎只有从一定的历史距离来看，艺术才具有方向性和逻辑连贯性，而现实似乎总被混乱的迷雾所笼罩。回首

过去时我们对艺术是有方向感的，但对当下的艺术，我们却失去了方向感，这是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感觉。事实上，不管怎么说，那些能够极为准确地把握当前推动力的作家（就像格林伯格）都是特例。或许是看待艺术的历史模式简化了我们看到的内容，迫使它服从当前的兴趣；但也许这只是智力劳动的必要任务，也就是说，应该将各种现象纳入到一种秩序之中，按照其重要程度评定出先后顺序，并且忽略或是遗忘其中的大部分，从而揭示出某个景象背后的意义。随着曾经被认为处于世界边缘的艺术种类变成艺术世界关注的中心，这样的工作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得显而易见。

20世纪90年代的艺术有时被看作是辉煌壮丽的80年代艺术与观念艺术的技艺和某些关切之间的综合。其结果是将语言和观念的表演与视觉上给人深刻印象的物体拼接在一起。托比亚斯·里赫伯格（Tobias Rehberger）的装置艺术作品《世界七极》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他用一串串的玻璃气球装满了一间屋子，气球展示出一种美丽而又缓慢变化的景象，放射出不同颜色的光，气球中的光是通过互联网转播的、世界各地不同光线环境的再现。这件作品既是一件技艺精湛、气势宏大而又引人入胜的物体的展示，又是一种观念的呈现。

图21　托比亚斯·里赫伯格，《世界七极》

或许，这种综合是一种消极辩证法的结果，它强加给艺术的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对观念主义激进批评的驯服，是与其最鄙视的对象的虚伪调和。这正是“艺术与语言”团体一些资深观念艺术家2002年在利森画廊展出的一件装置艺术作品的意义。在这个装置中，他们重新制作了他们的著名作品《索引》——它原本是一件意在鼓励互动与对话的作品——将其变成一座糖果般色彩绚丽的非实用雕塑，与一篇荒诞不经的色情文字并列展出，参考了“年轻英国艺术家”的古怪行为。

艺术之谱就是由这种综合体之中不断变化的元素所组成。一极——最传统的、最有可能与顽固不化的男性天才观密切相关——是将一种观念框架的最基本要素与大量的情感、精神性或人道主义内容融为一体，从而保证了史诗般作品的创作。说到这里，我们可能会联想到比尔·维奥拉、安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或安东尼·戈尔梅利（Antony Gormley）和（最近的）马修·巴尔尼（Matthew Barney）。另一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种现在更为普遍的

实践——则是观念主导着物质性作品的创作或那些新媒体艺术作品的创作，载体的选择都与作品匹配。这两极都是对无所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反抗：第一类艺术呈现给观众的是一种以大量材料或（近年来的）数据为特色的、或气势恢宏或引人入胜的景象；在行为艺术中，艺术家的身体，有时候还有鲜血确保了其作品的有机性和唯一性，并与所有能够复制和传播的作品形成对照。在另一极，现实环境或大众传播媒体中的世俗元素被融入到非功利性的运用中：我们可以从那些利用了大众传媒景象但又去除了其中的壮观场面的作品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现象，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保罗·法伊弗（Paul Pfeiffer）的作品《在丛林中搏斗》，它将阿里拳王拳击赛电影进行了数字化的改造，删除了原片中拳击手的形象。的确，冷战结束后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这种对借来的形象、材料和媒介的运用，而且这种做法已经对天才人物深刻严肃的艺术实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直到其实践者越来越少，并且看起来像是前一个时代残存的怪人，而传统主义者只能在“观念主义”和“装置艺术”一统天下的优势面前哀叹。

这种创新作品的突出特色主要是现成品（或至少是容易辨认的物品）和标志的挪用，以及将现成品或标志重新改造组合而完成集成作品。我们来看艺术家对最受重视的消费品即汽车的利用：奥洛兹科的著名作品《La DS》（1993年）就是一辆纵向缩微的雪铁龙DS汽车，艺术家去掉了汽车的中间部分，然后加以重新拼合，形成了一辆瘦身版DS汽车；加比内特·奥尔多·阿莫里斯（Gabinete Ordo Amoris）的加长版拉达出租车（将三辆拉达焊接成一辆汽车）堪称古巴出租车中的豪华车，该作品对这个岛国新生暴发户的怪癖作了讽刺性的批评；达米安·奥尔特加（Damián Ortega）的爆炸的大众汽车表现的则是一些悬挂着的汽车零部件，这些东西就像是流水线上成套汽车构件的三维图像。（这里还可以举出大量其他的例子，例如雷贝格、弗勒里和查尔斯·雷［Charles Ray］等。）这些可挪用的因素既可以是品质，也可以是物品，就像葆拉·皮维（Paola Pivi）的倒置的喷气式战斗机，奥洛兹科的《椭圆形台球桌》（1996年），或毛里齐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的《体育场》（1991年），后者是一个加长的

台式足球游戏桌，可供22个人同时参与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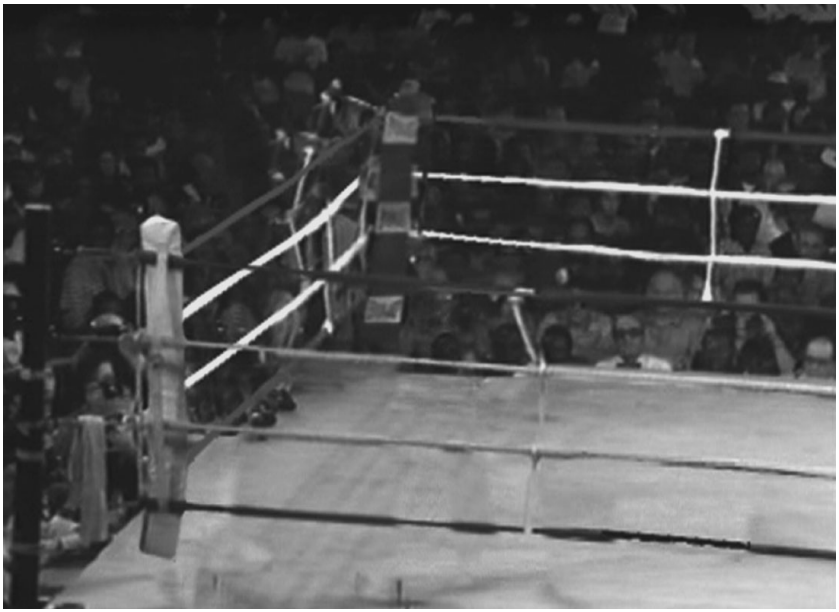

图22　保罗·法伊弗，《长计时（在丛林中搏斗）》

图23　加布里埃尔·奥洛兹科，《La DS》

包含了这些元素简单组合的艺术作品数量非常之多。对这类作品的考察可以使人们对艺术世界创作情况产生这样一个（迷惑性的）印象：艺术家们将各种元素从其固有的功能中解放出来，重新利用并组合这些元素，因此，整体而言，各种标志和物体的任何组合最终都会产生。挪用是广告的一个关键技术，就像艺术一样，这种挪用必须令人震撼、逗人开心或至少要能引起观众的兴趣；用途和场所安排是区分艺术与广告的主要因素，否则，二者就会继续保持密切关系，并仍将存在频繁互相剽窃的现象。

图24　葆拉·皮维，《无题（飞机）》

图25　茨比格涅夫·里贝拉，《乐高集中营》

对这类组合的系统化探索有一个结构上的原因，因为艺术家都殚精竭虑地要在艺术世界找到一个独特的位置。正如霍华德·辛格曼所言："［艺术］学生的任务，与其作品的使命一样，就是要获得——并标明——他或她的位置。"随着越来越多的阵地被占据，艺术中任何元素的组合似乎都已经百无禁忌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茨比格涅夫·里贝拉（Zbigniev Libera）的《乐高》（1996年），它是一套用儿童积木搭建的集中营系列作品，2002年该作品与其他类似的反映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挑衅性作品一起，在纽约犹太博物馆一个名叫"照见邪恶"的展览中展出。

从每个艺术家的个人创作角度看，这些作品都是各不相同、独一无二和个性化的，各自都有特定的意义。从作为一个系统的艺术世界的角度看，它们似乎又是一个完整机器的零部件，这台机器产出各种各样新颖的组合样式，为了获得市场的认可，它们接受形形色色的公

众的检验。

为了避免人们将休谟（Hume）的观点——人类的所有想象力都只不过是已发现元素的组合——运用在这里，应该说，与现代乃至各种后现代艺术实践相比，这些组合已经变得越来越简单，它们的创作元素越来越唾手可得，其重新组合越来越信马由缰、随意而为，而且它们所产生的意义也越来越转瞬即逝、肤浅不堪。或许艺术图像的急剧变幻与自由贸易的发展有关，与贸易壁垒、历史记忆和民族身份逐渐消失有关，取而代之的是物品、标志和人员的互换和流通。

艺术与资本的这一联系通常不被承认，人们倾向于另一种更适意的解读：在过去，艺术风格上的矛盾或失调往往被艺术史家看成是社会矛盾无意识的表现（最富权威性的例证是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对法国苏亚克雕塑群的分析），而如今，对这些矛盾的有意识的运用则突出了人们对当代文化衰落的认识。当然，那种认识本身及其在艺术作品中的显现使得观众能够欣赏到文化堕落的景象，并向观众保证只要有这种意识就足以将他们提升到一个更崇高的境界。

艺术创作的趋同性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代艺术的重要批评著述中得到了反映，应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艺术创作与支持它的艺术著述是很难分开的。即便如此，大部分学术性的艺术著述与艺术批评之间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学术性著述已陷入解构主义、陈旧的弗洛伊德和拉康模式（这些模式在其他学术领域已遭到普遍的质疑），以及基于身份的描述持续性地一统天下的局面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带有明显随意性的解读、充满着诗意联想和任意跳跃的写作，也是艺术自身存在的自由的一种体现。作家的作品与艺术家的作品都同样具有创造性。许多学术性艺术著作也显示出一种隐秘的一致性，这种潜藏在形形色色的外表之下的一致性是由体制性的压力造成的。占主导地位的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描述的独特优势是，它们可以被随心所欲地应用到最不可能的作品中，并赋予该作品某种可预知的“批评”结果：一旦掌握了这种方法，就能将任何材料放进这台机器中。即使在萨姆·泰勒-伍德的作品那细腻光滑的表面上，人们最近还是发现了一些破损的裂缝。因此，机构体制对学术成果的出版有着配额规

定，且所允许的研究时间很少，这些要求必须满足。

那些与艺术界休戚相关并拥有更大量读者的作家所关切的问题完全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艺术批评中，曾有一次关于美的讨论的复兴，而这是一个一度被忽略的话题，这一现象反映出随着经济的复苏，装饰性和商业性艺术逐渐兴起。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摆脱政治、金钱、差异性和精英主义等问题的一种方式，对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国艺术来说，这都是一些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问题（对部分艺术家而言，它们太沉重了）。

为了对这些发展有个认识，我们将考察阿瑟·丹托、托马斯·麦克埃维利和戴夫·希基（Dave Hickey）这三位重要的美国作家——这里我们又回到了艺术消费的主导中心——尽管他们的学术立场各有不同，但也有许多共同特点。他们都是自由开明的白种男性（这样，我们这里就排除了像罗伯特·休斯和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这样对艺术现状持抱怨态度的保守主义者）。他们都拥有广大的读者。丹托和希基都在当代艺术对美的重新关注上起过作用。

阿瑟·丹托为左派自由主义杂志《国家》撰稿，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和当代艺术理论家，其尤为著名的理论是，自安迪·沃霍尔开始，艺术创作出现了断裂。他认为，如果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与真正的布里洛盒子之间没有视觉上的区别，那就意味着艺术不能根据它的视觉特性来定义，必须代之以哲学的界定。麦克埃维利是莱斯大学艺术史高级讲师，并具有古典哲学的博士学位。他是《艺术论坛》杂志的特约编辑，为促进人们对非西方当代艺术的理解作了大量工作。他对1984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20世纪艺术中的‘原始主义’”展览的潜在臆断所进行的系统而严谨的批评，使得他声名鹊起，那次行动导致了一场与展览策展人漫长而繁杂的辩论。戴夫·希基是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的艺术批评和理论教授，还是一位以散文风格著称的广受欢迎的作家，获得过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奖”。正如许多杰出艺术作家所做的那样，这三位评论家每人都给艺术批评带来了一种特殊而又异质的趣味：对于丹托而言，是哲学；对于麦克埃维利来说，是人类学和经典名著；对于希基，则是流行音乐和文学。

丹托的《艺术终结之后》声称，自20世纪70年代亦即前卫艺术寿终正寝之后，艺术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如今，它完全是一种后历史（的文化存在）。现代主义和前卫的观念与一种历史进化论息息相关——也许会走向形式抽象化，或者走向艺术与生活的合而为一。在丹托看来，事情正好相反，“当故事即将终结的时候，生活才真正开始”，那些如今仍然期待艺术不断进步的人忽视了其中的要点，那就是艺术与生活的最终结合已经完成。尽管丹托没有提到过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这一立场与福山在其广泛发行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发表的政治观点非常接近，它基于黑格尔的同一论点，那就是，虽然事件会继续发生，但历史即将结束；我们永远摆脱不了我们今天赖以生存的体制。同样，对于丹托来说，一旦艺术穿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黑夜（他将这段充斥着极端政治化的时期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相比较），它就会步入阳光灿烂、自由自在的极乐园，并且永不离开。在这样的极乐园里，任何风格的融合或表现形式的拼凑在原则上都是一样好的。

我们已经认识到，从某个角度看，这是对当代艺术精辟而合理的描述。它在艺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共鸣，许多与丹托在其他方面存在巨大分歧的人物也对此予以附和。例如，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当代艺术学院派作家之一，哈尔·福斯特，在其《设计与罪恶》一书中对当下艺术“象征性失重状态”和脱离历史的现象作了如下描述：

> 可以这样说：当代艺术似乎已不再是“当代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现在已不再能率先把握当下，甚或具有“征候性”，至少它不比其他文化现象更具有优势。

丹托想说的是，当代艺术是当代的，但其中的含义不仅仅限于当下创作的艺术：“从某个方面看，当代是一个信息混乱的时期，一种全然无序的审美状态，但同时又是一个绝对自由的阶段。”这种自由源于艺术观念的改变，这种艺术观考虑的是艺术存在条件的哲学问题，而不再牵涉它表象如何的问题。从历史的重负中解放出来，艺术家就可以“以他们希望的任何形式，为他们希望的任何目的，甚或不

为任何目的”创作作品。这是一种完全乌托邦式的成果，丹托毫不犹豫地将它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设想相提并论，在这一设想中人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按照他们选择的活动充分施展各自的才能。

在《艺术与异类》一书中，麦克埃维利对当代艺术世界作了考察，他认为全球的各种不同艺术逐渐平等并得到充分展示，这削弱了现代主义的自信，同时浇开了后现代多元化的花朵。腐朽陈旧、普遍目的论 [1] 的现代主义（这是他以对康德［Kant］和格林伯格毫无差别的解读来描述的现代主义的特性），已经被具有多元化和前瞻性特点的后现代主义击败，而通过后现代主义，我们能够瞥见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未来。这里所给出的对现代主义的描述（或许在美国这种描述具有更多的可信性，因为格林伯格的影子在这里仍然隐约可见）是温和而统一的，没有现代主义过去常常所包含的诸多差异、矛盾和纷争。在任何情况下，随着它的逐渐消逝，对于品质的评判——一旦被认为是绝对的——可以用相对论来处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人类学的方法。根据麦克埃维利的观点：

> 在社会急剧动荡的时刻，艺术可能会起到妨碍、掩盖或歪曲社会变化的潜质的作用。今天，尽管困难重重，艺术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展望未来，它会发现一些路径，沿着这些路径，一个崭新的自我就会出现，沐浴在一种重新界定的历史的光辉中。

在这种不稳定的时代，作为对该时代的忠实反映，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必然是隐晦深奥、模棱两可的。这种不稳定性部分归因于多元的非西方观念的出现，以及西方价值观的相应相对化，在麦克埃维利看来，这些现象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对于麦克埃维利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是一种特定的历史观念的终结。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整体已经让位于一种壮丽辉煌的多元化状态，但这并不是说不会再有新的综合体出现，而只是说它还没有被瞥见。就目前而言，这是非常美妙的：

> 为什么不让这个世界在一个受超叙事制约、被称作终极的狭窄空间之外，自由自在地呼吸片刻？为什么不让它脱离那些与宗教预言几无二致的整

体化、全球化和普遍化的救赎主义神话，摸索自己通向未来的路？

正如丹托的观点那样，这是一种对当代艺术现状多样性的乐观看法，它似乎很有道理，因为在艺术世界，尽管现代主义从未像麦克埃维利所说的那样简单或单一，不同的声音确实在显而易见而又实实在在地增加。在其探讨非洲和亚洲的具体审美环境的著作中，麦克埃维利进一步论述了这种变化，相对于《艺术与另类》中笼统粗略的判断，他更为详细地阐释了它所蕴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戴夫·希基也希望观众能够放松心情、享受艺术，尤其要忘记市场的邪恶。他在其著作《空气吉他》中陈述了一个请求，就是要允许艺术在市场中自由成长而不必惟学术马首是瞻，希基将一个“巨大、美丽的艺术市场”看作是美国的特有发明，该市场直接而又民主地反映了大众的趣味。谈到拉斯维加斯学者们对于他们家乡的态度时，他声称：“他们认为一切都是为了金钱，我一直都认为，撇开其他所有方式，这是区别个人的最坏的方式。”在政府艺术基金中孕育并在学术界成长的市场的替代物，是一种由行政部门操纵、政治正确、有理论支撑的文化，其中包含着“一种‘对代表制的批评’，这种批评的核心则是对代议制政府的批评——这是对扮演着新的文化警察角色的行政部门的极大支持。”

希基用精心组织的语言来支持这一观点，即市场机制中包含了“民主”，因此，供需法则确定了价格的等级，而价格则真实地反映了人们想从艺术中得到的东西。人们很容易将这一观点与自由主义思想的标准台词联系在一起，亦即你不可能拥有没有市场的民主。然而，说市场可以作为民主的替代品，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它被应用于自由市场时是一种靠不住的主张，那么在被应用于艺术市场时——正如我们看到的，艺术市场是一个颇为陈旧、极受限制和约束的领域——那则是荒谬的。

要使这种观点看起来有些可信度，希基不得不相信文化差异并不重要，观看艺术并不需要特殊的技巧或教育，而且进入艺术世界纯粹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你想进入就可以进入）。对于艺术世界内部人

士来说，持有这种观点是过于理想化的，它显然没有考虑到社会差异、金钱和权利的作用。希基想让我们相信：

> 身在这种文化中的每一个人 都懂得艺术所授予权力的自由和许可。简而言之：艺术不是火箭科学 ，观看艺术不必非得作出回应，也不需要他人允许，是没有先决条件的。

这些话里存在着一些真实的要素：作为一门专业，艺术并不像医学、法律或工程学领域那样拒绝门外汉的介入；艺术欣赏肯定不是火箭科学，而且，人们只要是接触过商业文化的，都能够或多或少地懂点艺术。然而，人们是否进入画廊的唯一也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教育（正如我们前文所看到的），其部分原因是，所有层次的艺术（从学术的到商业的）都与大众文化划清了界限。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通常会使用与艺术史的复杂参照关系，要求它的观众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希基本人远非一介白丁，他花费数年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因此跨越了介入艺术最艰难的障碍。

希基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就如同他是一位摇滚乐迷那样，因此，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他们对艺术是不是商品所费的心思不应该超过他们对CD盘买卖的担忧。为了反驳这一观点，我们不妨再看看另一位著名评论家迪耶德里奇·迪耶德里奇森，他也写过大量摇滚乐方面的文章。通过对当代艺术批评现状的深入考察，他指出了艺术爱好者文章与艺术批评之间的显著差别。爱好者文章是为那些很可能要购买一件作品的人写的，以帮助他们决定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因此，它的目标高度集中并带有工具主义色彩。然而，几乎所有阅读艺术评论的观众都不期待成为那些他们所读到的作品的拥有者。这样的写作——通过其专业学术性和平民主义版本——也起到其他一些极不相同的作用，它们要么对艺术质量不作直接评判，要么仅仅根据个人的主观趣味来评论。希基的写作显然应归入后一种类型。

希基最近还策划了一个国际展览，通过抛弃他所认为的艺术对政治和社会议题的精英式的关切，呼唤美的回归，同时使艺术大众化。这个在2001年圣塔菲第四届国际双年展中推出的展览有一个朴素的标

题："美丽世界：走向救赎的世界主义"。在展览目录中希基宣称，因为观众能够记住的展览内容只是一种气氛（而不是观念），他决意用饱满的热情和轻松的心境来处理每一个细节。圣塔菲展馆仓库被改造成带有花园、图画之窗和奇异的建筑细节的空间，所有的作品都被摆放在引人入胜的背景中。双年展的正统观念就是该展览所计划的救赎的假定目标。希基宣称，各地双年展已经"执迷不悟地沉溺于地区身份和当地特色的营销理念中，而且它们使用的都是后极简主义艺术实践的标准语言。"他肯定是曲解了这类展览的用意，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们是以文化融合和文化交流的观念为基础的，尽管希基有关所有这些差异都终结于统一的语言中的说法是正确的。这种误解使得希基转而推崇一种将各种文化资源混为一体的世界主义，事实上，这种世界主义扮演的仍然是他所抱怨的国际主义角色。按照希基下述惊人的论断，实际的对比更加鲜明，更具有明确的政治性：虽然那些涉及文化身份的展览往往由提出问题的艺术作品所组成，"美丽世界"展览中的艺术作品却希望解决这些问题："文化不和谐的明显消除，有其道德和智力上的后果，有其社会学的寓意，也有其用途以及功能。"（在这里令人好奇的是，希基的语言朴素、规范流畅的文风是如何背叛了他，或许这是由于荒谬论断的压力造成的。）"美丽世界"展览中双年展的突变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它保持了对融合的赞美，把对作品的标准回应从肯定变成了否定，但起到了一样的宣传效果；传统的双年展提倡多元文化，谴责陈旧保守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壁垒阻碍了它的进展；"美丽世界"双年展因其当时的成功及其创造的美而洋洋得意。

艺术家勒内·格林（Renée Green）以希基的思想为例，列举了当下艺术界的一些陈词滥调：

1．艺术无边界。

2．思想导致了过度严肃，造成了与审美愉悦同等的乐趣和美的减少。

3．思考意味着思考得太多，并且与体验相抵触（后者是一种二元论的术语，因此它与感觉有关，也就是说感觉／体验与思

考相对立）。

希基奇怪地假定，人们——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艺术观众——不能从一件精心制作的作品、一件政治性的作品甚或一场思想的游戏中得到乐趣。

三位批评家，丹托、麦克埃维利和希基，殊途同归，达成了一致的认识：当代艺术世界（用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与他人合写的后现代主义核心著作之一《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一书中臭名昭著的话来说）“几乎是十全十美的”。艺术观众应该为艺术光彩夺目、无奇不有的多样性感到心满意足。

我们已经知道，那种多样性变成规定的一致性的原因有很多。布尔迪约也指出了一种原因：对于从悠久的传统中走来，又与传统决裂的艺术作品而言，无论是其创作还是消费，都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是彻底的历史行为，又是彻底的反历史化的活动。那些作品参照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没有记住其中任何一种形式或是它们的创作条件。历史沦为一种纯粹的关于形式的历史，就像是一张摊开的表格，人们可以从中选择任何选项的组合。

这一现象的显著特点是对艺术的学术性诠释与那些比较平民化的写作间的趋同，后者提倡无忧无虑地享受美。处理任何可能遇到的文化问题都利用反向的“奥卡姆剃刀”[2]原理的学者，与追求合理、慎重和引人入胜的明晰性的批评家，都偏爱破碎、分裂的主体或灵魂、社会所生产知识的局限性和虚伪性，以及对不可知的极度迷惘。而且他们是在一个艺术越来越受到各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策略和技术支配的时代这样做的。

无论如何，这些观点的合理性近来受到了打击。尤其是自9·11事件以来，美帝国主义的复活——以其对国际法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蔑视——沉重打击了麦克埃维利著述中阐释过的理想的多元文化和全球化。如果福山和丹托的论述正确无误，一种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时代的回归，以及与此相关的前卫艺术的回归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在经济持续增长，艺术消费者可以继续纵情享受各种漂亮物品的时候，希基所提倡的对美和市场的促进才是有意义的。在最后一章，我们将看到

这些以及其他因素是如何进一步激化艺术世界体系中现有的紧张关系的。

注释

〔1〕 目的论（Teleology）：哲学概念，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被某种目的所安排和决定。

〔2〕 “奥卡姆剃刀”是英国经院哲学家、逻辑学家、中世纪唯名论的主要代表，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 1285？-1349？）提出的论题简化原则。奥卡姆认为“若无必要，不应增加实在东西的数目”，应把所有无现实根据的“共相”一剃而光。故称。

第六章

种种矛盾

同（当）代艺术，没错，但与什么同代呢？

（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艺术与忧虑》）

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在意识形态领域，事物总是以颠倒的形式出现。当代艺术作为自由的化身赞美所有强加给我们的东西。它这样做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与消费密切相关的自由是精英人士的经验，在他们眼里，艺术中，角色的选定和抛弃以及多重身份都是经过消费者选择的。最近的各种事件——又一次全球经济衰退的爆发、激进政治运动的高涨和美国公然实施帝国计划所产生的诸多后果——已经开始破坏长期存在的、对于艺术角色和特征的统一认识。作为结果，甚至在学术界内部，人们已开始发表许多极为不同的艺术观点。

近期两部法国人撰写的关于当代艺术的论著可以作为例证。尼古拉·布希欧（Nicolas Bourriaud）在其颇有影响的《关系美学》一书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艺术的最大特征是，艺术作品通过向观众提供某种服务或与其订立某种契约，抑或只是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使社会互动交流变成一个美学的竞技场。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观点，我们来看他举的这样一个例子：延斯·哈宁（Jens Haaning）在哥本哈根一个广场通过广播用土耳其语讲笑话，从而与那些听得懂并发笑的听众订立了一个暂时的契约。而在保罗·维希留以《艺术与忧虑》为题出版的讲稿中（这些讲稿2000年在法国发表时反响并不好），作者宣称，艺术的逻辑就是持续不断地打破禁忌，创造奇观，挑战人类的极限——甚至要参与创造性的基因控制：这种逻辑最终会指向为了审美目的而谋杀。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看到，谢尔盖·布加耶夫·阿弗利卡为唯美主义者拍摄了一部虐杀实况电影。这部作品支持了维希留认为当代艺术冷酷无情、嘈杂不堪的观点。尽管在传统和理想的观念中，真实、美和道德是不可分割、连为一体的，但维希留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好像其中一方妨碍了另一方似的：“是道德还是审美？”

两种观点的惊人对立部分归因于作者的背景：布希欧是一位策展人，现任巴黎东京宫这一国立当代艺术中心的副主任。他的观点都是

通过与艺术家的共事和谈话形成的。他的著作不仅仅是一种讨论，更是通过介绍像瓦内萨·比克罗夫特、利亚姆·吉利克、菲利普·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里尔克利特·提拉瓦尼亚（Rirkrit Tiravanija）这样一些艺术家来促进艺术的发展。维希留则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哲学家、城市规划专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与艺术世界的渊源应追溯到他曾与布拉克（Braque）和马蒂斯（Matisse）一起制作过彩色玻璃画。他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想象力、速度和战争的论述都具有启示论的倾向，因此他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从事当代艺术的写作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在布希欧看来，鼓励其观众进行社会互动的艺术是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分裂倾向的直接反抗，导致这种分裂的原因是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专业化，而且人们开始习惯于将自己锁在家中，与各种媒体而不是与其他人相伴。艺术能使这种状况得到缓解："通过提供小小的服务，艺术家弥合了社会关系中的裂缝。"艺术提供的不是理论上的药方，而是小小的、短暂的和主观性的"亲身实践的乌托邦"，在那里人们能够学会更好地生活。然而，这个"交流的舞台"必须通过对其形式的分析，接受美学上的评判。除了摄影、录像和装置，社会关系被当成了另一种艺术媒介。这类作品看起来像是传统的艺术品，可以被买卖，尽管它们最终也应该被看成是社会性整体景象的一部分。按照布希欧的观点，这种艺术就是人性和民主的艺术。

加文·图尔克（Gavin Turk）的《切·格瓦拉的故事》是布希欧推荐的这类艺术中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图尔克根据格瓦拉事件创作了一个系列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将自己的面孔嵌到切·格瓦拉的著名肖像中，并张贴在红黑相间的板墙上，那幅被用来证明该革命者已经死亡的著名照片还被制成了蜡像，蜡像的脸也换成了图尔克本人。

2001年，图尔克脱离了以前的创作路线，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在夏雷迪奇一个擅自占用的房间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切·格瓦拉的人生和遗产的会议和讨论。这些政治战略会议之后，一些活动积极分子还组织了一个示威游行，这场游行成为该系列活动的高潮。图尔克说，这一作品的意图就是利用他作为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艺术

家的身份建立一个讨论和行动的空间，从而获得一次打入大众传播媒体的机会。

切·格瓦拉吸引力的复苏在于他的生命和形象是青春魅力和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的综合体，其中一方给另一方增添了些许半被遗忘的危险。按照图尔克的说法，这一创作的部分意图是凸现拉丁美洲革命政治与“年轻英国艺术”陈腐面目之间的差距，从而关注在历史上闪光并延续至今的东西。因为反资本主义运动重新兴起，左派的古老斗争又开始焕发出新的活力，它们已制定出与政治和文化行动结盟的新方案。这恰恰体现了切·格瓦拉形象所代表的文化与政治激进主义的危险结合。

切·格瓦拉曾让他的游击队员阅读《唐吉珂德》，而图尔克的计划则确实是唐吉珂德式的行为。你不可能在短短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召集各路人马，并用魔法凭空变出一套政治纲领。我参加过一次讨论会，感觉很有趣，但目的不明确，主题不集中，我与其他多次参加过讨论会的人交谈时，发现他们也有同感。奇怪的是，最后讨论的重点却是裸体主义者争论在公共场所裸体游行的权利。

图26　加文·图尔克，《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的故事》具有许多社会互动作品的典型特征。在参与者人数及其多样性与可能的会话之间有一种平衡。积极的参与者往往是极少数自发的精英人士。在这些短暂的乌托邦的泡影中，丝毫不可能达成什么真正的政治主张，原因之一是，即使是那些活动的参加者，彼此之间真正的分歧和利益冲突也都只是被暂时抛弃或遗忘了。其结果可能只是一种姿态式的政治主张。

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有可能变成现成符号和物品的随意组合的艺术来说，观众的互动效用可以重新带来有组织的、不可否认的在场感。在场的不再是艺术天才，而是观众，他们会短暂地感受到民主理

想的温暖，这种理想承认其思想和行动的价值，抑或至少会承认他们具有创造性参与艺术的潜力。

如果这种工作自身只是徒有其表，没有什么实际效用，那么这类艺术的兴旺或许就没有布希欧认为的那么积极。联想到民主政治的空洞化（我们可以想想瑞典的“普通公民”实验一例），布希欧所描述的只不过是艺术世界对已经死去或已被抛弃事物的一种同化，是对曾经的社会互动、政治话语甚至普通人际关系的审美展示。如果民主仅仅存在于艺术作品中，那么它就陷入了巨大的麻烦。

然而，这类艺术却受到政府（尤其是那些经历了社会-民主转型的政府，这类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风行一时）和商家的青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政府把艺术看成社会的拯救者，希望具有社会互动功能的艺术能够医治资本不断造成的严重创伤。企业也会专门利用艺术中体现的创造性来潜移默化地活跃其工作环境，并以创新的思维来改善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法。艺术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变成了管理顾问。

对比之下，维希留关于当代艺术的评说却不是政府、商家或艺术界想听到的东西。他的观点确实有很多缺点，它们具有极端、威吓性的表达形式，包含了低劣的错误，并且他将许多当代艺术创作与大规模屠杀直接联系的做法也很具有煽动性。即便如此，这些论述仍然清楚地表达了一种关切，即这样的艺术将自身放在与人类的话语、静默和沉思相对立的位置，并使自己变成了工具主义权利的附庸。把布希欧和维希留的观点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将社会互动重新包装为美学展示恰恰就是艺术采用的许多策略之一。

资本的逻辑将所有的材料、机构、文化和团体都卷入到唯利是图的机器中。人们可以在艺术失重的符号置换行为中看到类似的情况。在维希留看来，艺术创造力与资本联姻，就与人性相违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将基因控制运用于艺术创作。在最近的数码摄影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基因被改变的人类形像——例如马尔基·吉尔林克斯（Margi Geerlinks）和伊内兹·凡·兰姆斯韦德（Inez van Lamsweerde）的作品——这类作品以其奇妙的景象，表达了对创造性改变基因可能性的赞

美。还有些艺术家则进一步宣称，为了追求艺术效果，他们实际上已经改变了某些生物的基因。不管爱德瓦尔多·卡茨（Eduardo Kac）是不是真地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培育出了一只作为艺术作品的、放射出绿色荧光的兔子，其中的含义是清楚的：艺术家有权宣称为了审美的目的而使用基因控制技术。

面对这种持续不断的变化，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堡垒是观众的主观性。很早以前，利奥·斯坦伯格就意识到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创作的一件互动作品使他沦落成一个转换器的角色。这几乎是控制论作品的开山之作，这类作品的确对我们有这样的设计。尽管对观众有着极为明显的操控行为，这类作品的神圣特征以及艺术相关的神秘性始终存在。布尔迪约提出了为什么艺术必须杜绝一切阐释的问题（见此处），他说，寻求阐释“对艺术家的自命不凡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可言喻的奇人，并且可以拥有不可言传的经验，这种现象是如此普遍（至少艺术爱好者如此），但又如此‘出类拔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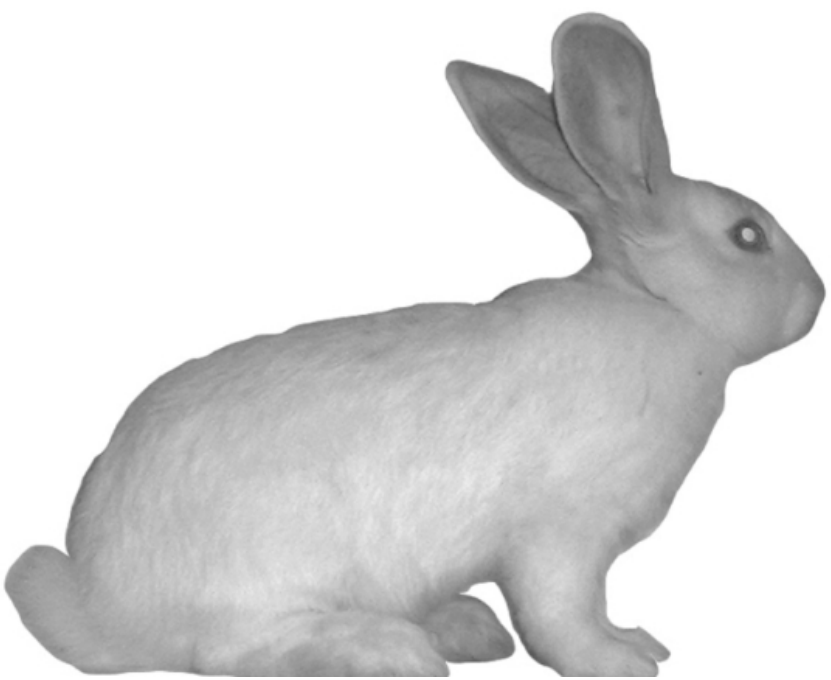

图27　爱德瓦尔多·卡茨，《阿尔巴，放射出荧光的兔子》

因此，归根结底，艺术的目的就是向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观众保证，尽管存在着民主的腐败、宣传媒体的操控，以及无休无止、令人不快的商业宣传造成的精神环境的污染，艺术依然没有改变，是毫发无损、自由自在的。当艺术家们认可了这一点，他们甚至可以与情投意合的陌生人进行富有意义的社会交流。

普通观众都反对另一种普救论。西尔盖·吉博（Serge　Guilbaut）向我们展示了美国艺术界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特定的地方关切——走向衰亡的过程，其原因是美国艺术转向了对全球统治地位的追求。进一步发展下去，这种统治地位也被扬弃，也就不再要求艺术是美国的，只要它是按照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模式创作的就好。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受推崇的当代艺术就是那种在持续融合的过程中，能够进一步促进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利益并帮助其打破贸易壁垒、地方一致性和文化依恋性的艺术。当代艺术界对其自身的看法与其实际功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错位，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

艺术突破了地方特色的边界，促进了世界各地文化和经济的变革和融合。这一过程中的进步与倒退两方面的内容有着极为复杂的联系。地方的抵抗被打败，而在许多地方，结果却是情况的恶化。同样，艺术也为更伟大的融合、更广泛的一致性的出现开辟道路，这些都在哈特和内格利的《帝国》一书中得到了引人入胜的描述。即便如此，艺术世界任何支持新自由主义的进步的一面，都与其对自身行动的看法是相反的，后者关注的是特殊性、个人化和非工具性，它们无疑不会在全球同质化的圣坛上牺牲特殊性。正是这种错位构成了艺术的这一重要贡献，虽然，归根结底大众文化在这方面更为有效：对那些俯视并远离其地方文化的精英人士的吸引力，以及为这一观众群体与全球资本的合谋提供的特别有效的意识形态借口。

然而，这一情形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和矛盾。我们已经看到，艺术的无用性——它的主要用途——已被政府和商家的特定需要玷污了。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发展中，艺术的精英主义受到了扩大艺术影响

力的企图的挑战：商家重视艺术是因为它的排他性，而通常情况下，政府的兴趣恰好相反，它们希望扩大艺术的适用范围。最终，艺术日益技术化的生产方式与其落后的生产关系产生了冲突。

利用这些冲突的机会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策略，就是破坏运动。对艺术的破坏甚或破坏的企图，都是对当代艺术暗含的一种观念最基本的抗议，这种观念认为所有的符号都可以平等地拿来为艺术所用。迈拉·欣德利（Myra Hindley）杀人案的受害者亲属认为，她的形象不应该被公开玩弄，有两个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在“感觉”展举办期间，试图毁坏马库斯·哈维（Marcus Harvey）的《迈拉》。同样，“感觉”展在纽约展出时，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i）的作品《圣母马利亚》也因将马利亚形象与从色情杂志上剪切下来的图像并置，而遭到了攻击。这类行为也对人们普遍认可的观点构成了挑战，那就是所有的艺术都是一种善，都是一种神圣的自我表现的产物。当公共艺术作品受到攻击时，它们的创作背景、意图及其政治主张便都凸现出来。雷蒙·马松（Raymond Mason）在伯明翰举办的“前沿”展（1991年），令许多当地人感到厌恶，该展览遭到了精心策划的纵火攻击，这是一次平民力量对抗市政宣传的演练。

第二和第三种策略就是艺术中的政治行动主义，以及与其关联的利用技术手段避开艺术世界系统制约的行为。在世界各国的双年展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对新自由主义的尖锐批评。最近的两届卡塞尔文献展都以政治参与为主题：凯瑟琳·戴维（Catherine David）策划的1996年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展大胆地呈现了20世纪90年代鼎盛期艺术世界不问政治的特色，结果因其向后看和怀旧的倾向而遭到了各方面的严厉指责。奥克维·奥文佐尔（Okwui Owenzor）策划的第十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则显示出另一种清晰的迹象，即边缘地区的艺术已经走到了世界艺术舞台的中心，该展览包含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重要作品，在世界各地举办的讨论会和一些关于民主、真理与和解、“克里奥尔化”[1] 与拉美城市的对话的发表，强化了展览的主题。然而，只要这类作品仍然停留在传统艺术世界的结构之内，这些批评就会包含可能会减弱其力量的明显矛盾。

在一本有趣的小书中——亦即一篇马休·阿纳特（Matthew Arnatt）与马休·科林斯（Matthew Collings）之间关于第十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对话，尽管内容也是关于他们自己和批评辞令的——两位作者表达了对于相异性的展示的不安。科林斯，为了使读者不因他们自己的健忘与专业知识的缺乏而难堪，将他所看到的事物表述得含糊不清、杂乱不堪，尽管他记得反对下面这一做法，“出席论坛的每一个人……在新闻招待会上，都拉着脸，感觉是在忍受痛苦或者正在遭受痛苦，或至少是坐立不安、愁眉苦脸。”这里重要的问题是，这种反应是事先应允的。对于像科林斯这样对“政治正确”假定充满敌意的人来说，这类作品是软弱无力的。

阿纳特用激烈的巴洛克散文文体，指出了这些视觉变迁——从它们的形成到德国艺术的盛大景象——可能就是：

> 大家都是通过一种颠倒的真知才“知道”——就好像是一种有原则的势利行为——这种颠倒的真知就是利用非洲人（具有浓重肤色和舞蹈才能赋予其一半的机会），以及政治和经济“暴行”和地理距离的受害者们被折磨的“感觉”的“服务”——并使它们整齐划一。用这种方式——处于中心的事物为它自己的中心地位道歉——将相异性的奇特水果拉进自己可怕而又古怪的家庭，按照某个比顿女士的口味捣成果酱；令人作呕。

他也认为这类事件中的职业个人主义（就像艺术家一样，策展人也想占据一个独特的空间）与其激进的先入之见（这些成见似乎倾向于集体主义）之间存在矛盾。

然而，对艺术中这些问题进行展示所涉及的不信任，并不在于这些主题是左派的本能反应，也不是说展示的问题与所陈列作品的目标观众之间没有联系；而是在于一种很小的可能性，即艺术世界自身就能解决任何问题。如果被展示的作品没有显示出它能够产生一定影响的话，那么它的展示就变成了纯粹的表演，观看这种艺术也就变成了一种娱乐形式。人们会说，艺术世界与社会的其他领域并未被不可逾越的屏障分隔开，因此这些展示可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并且，如果艺术的自主权继续受到侵蚀的话，这一论断也可能变得越来越真实。

然而，相对于其他文化领域，当下艺术的边缘化意味着这些影响可能变得很少。瓦尔特·本雅明的古老观点在这里仍然适用：激进的艺术需要做的不只是将政治作为它的题材；它必须改变它的创作、传播和观看方式。

艺术对此的一个回应是走出传统的画廊和博物馆等展示场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万维网浏览器的兴起，艺术作品的非物质化——特别是在数字网络上的无重量传播——已经威胁到艺术这个受保护的系统。对于一件可以被完美复制、能够同时存在于成千上万的服务器和电脑中，并且能够被用户任意拆散利用和修改的作品而言，市场会作何反应？人们怎样才能购买、出售或拥有这样一份数据？这是一种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的现象，也就是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与生产关系之间已经陷入了冲突。数字艺术使用新的技术手段来创作并传播作品，这与艺术世界以工艺为基础的习惯做法、赞助人制度和精英主义观念产生了冲突。

艺术家进入了网络空间，与此同时，企业则齐心协力将因特网的功能从论坛转为购物中心。商业殖民化已成为互联网艺术家的一个重要主题，他们创作了许多时髦而又复杂的作品，旨在吸引顾客的眼球。最臭名昭著的作品之一是由etoy艺术公司制作的。它们的作品《数字欺诈》会让网上冲浪者在输入“麦当娜”、“保时捷”和“顶层公寓”等关键词时进入一个搜索引擎，并且当点击etoy上评级最高的网站时，回应他们的是：“别他妈的动！这是数字抢劫。”接着就会下载一个音频文件，内容是被监禁的黑客凯文·米特尼克（Kevin Mitnick）的苦境和网景公司公布的因特网欺诈案情。其他人——包括雷切尔·贝克尔（Rachel Baker），以其对消费者调查、数据采集和优惠购物卡的考察——与那些利用版权法来限制言论自由的企业发生了争端。贝克尔建立了一个网站，允许通过万维网申请了乐购公司积分卡的用户在网上冲浪时获得积分，只要他们填写一份登记表，其中会有这样一些问题，“你经常把你的个人信息提供给商家吗？”“你的个人信息对营销商有多大价值？”她很快就收到了乐购公司的一封信，威胁她停止侵权并要向她索求损害赔偿。

这一艺术形式预示着一种更广阔、更非凡的发展前景：从一种全新而又致命的资本主义样式中——在其似乎已大获全胜的时刻——各种支离破碎的单一问题政治主张凝结为一种连贯的反抗运动。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利认为这并非偶然，因为合作价值观就是因主要经济系统向数据处理的转变而产生的，在这一转变中，使用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合作可能是一种比投资资本更重要的组织力量。其结果证明了“一种自发的初级共产主义的发展潜力”。免费软件运动——正是以这种受黑客形式版权法保护的全球性的自愿合作为基础——是对微软霸主地位的挑战，并且为这类合作行动提供了一个杰出范例。

第四种利用当代艺术内部紧张关系的策略，就是通过创作具有明确用途的作品来挑战艺术无功用性的假象。生产和复制技术在数字艺术领域的综合利用使两具老早就被人们认为已埋葬的尸体又浮现出来：艺术的前卫形式和政治用途。对于本雅明·布克洛而言，在具有使用价值的艺术中，很重要的一个例子是前苏联的结构主义艺术，它是在十月革命后兴起的，有着具体而又明确的目的。尤其是在网络上，生产与复制之间的界限很不明显，艺术家们一直在重新发现艺术的使用价值。保罗·加林（Paul Garrin）反对万维网网站命名的唯一性和集中控制性，他认为，这些做法违背了万维网的民主原则。他设计了一个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名字·空间”，并且使这件作品具有实用和政治功能，以此来反对艺术作品必须无功用性的观点。其他与新的政治运动密切相关的积极分子的作品——像布雷特·斯塔尔鲍姆（Brett Stalbaum）设计的“洪水网”——对消费主义进行了直接破坏。一场抗击大型在线公司eToys的战役——该公司曾通过法律行动关闭艺术团体etoy网站——是如此有效，以至于该公司（随着经济衰退的到来）被迫进入破产管理。最近几年最激进、最富成效的作品或许并不是那些依存于消费主义力量之中的作品，而是那些探索消费主义力量的极限以及超出这种极限之物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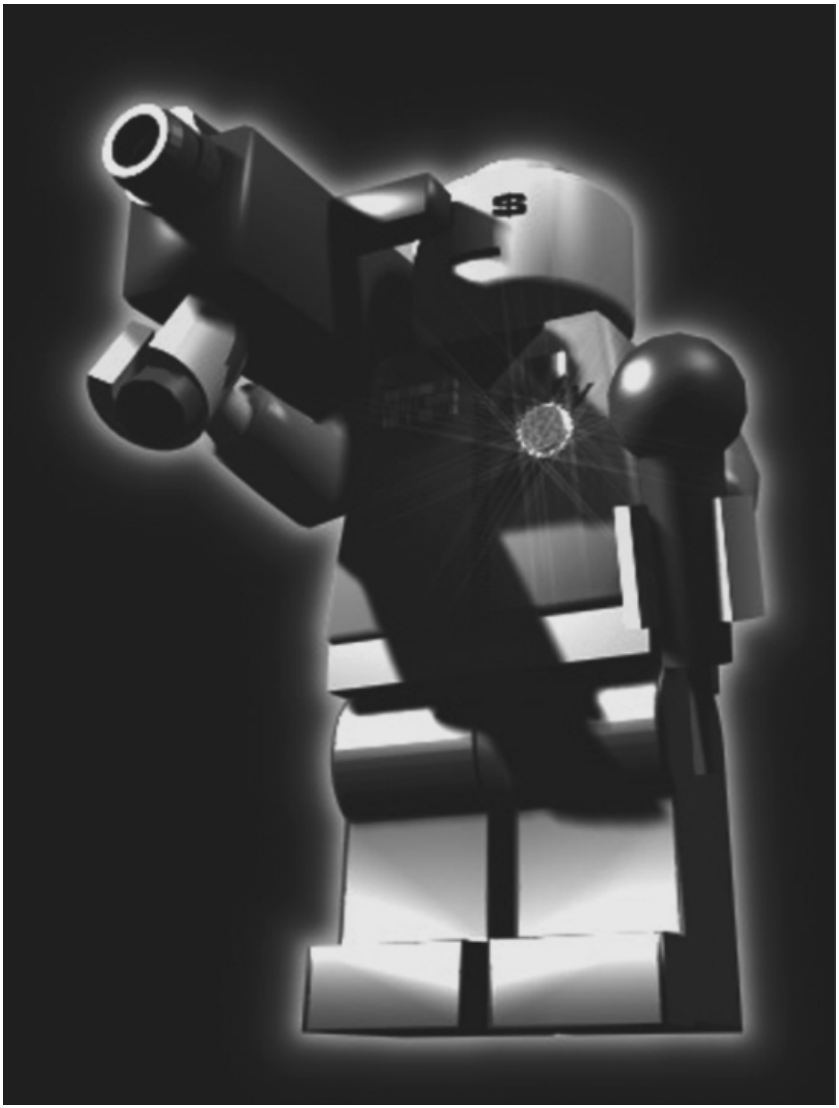

图28　etoy，《公司，玩具战网站》

网络中的艺术明确提出了对话和民主的问题——这比那些在画廊中受到拙劣对待的艺术来得更有效。在这里，民主与市场割裂开来，对话很便捷，借用很频繁，开放性成为艺术特质的一部分，而且创作者与观赏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这是摒弃独立自主的艺术家与孤独的

观众，转向共同参与以及——艺术最必要、最不可捉摸的品质——富有意义而又卓有成效的反馈的开端。

这类实用性的作品并不局限于网络世界，尽管它们能够在那里蓬勃发展，因为企业赞助和博物馆管理并不能限定网络上展示的是什么。艾伦·塞库拉（Allan Sekula）创作了大量由图片和文本交织在一起的作品，他带着勃勃雄心试图完成一些有关重要课题的长期计划——例如，在他的自我反思式的、深奥玄妙的《鱼的故事》一书中，他将海上贸易作为表现的主题。最近，他又创作了一件比较小的由一组图片组成的作品，该作品以幻灯片的形式在一些画廊露过面（它还在里斯本那座法西斯风格的哥伦布纪念塔展出过，这很能说明问题），并且它与一本名为《震撼世界的五天》的书中的文字内容相关。这里的“五天”指的是1999年底在西雅图举行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游行。可用来解释这些图片产生背景的这本书——由亚历山大·科克伯恩（Alexander Cockburn）和杰弗利·圣·克莱尔（Jeffrey St. Clair）所作——叙述了游行示威的目的、策略和抗议者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揭露了警察的野蛮反应（的确很野蛮，很可能还是致命的）。不同寻常的是，塞库拉本人并未对这些图片作品作过多文字说明，他认为，面对如此奇怪的场景，一种“简单的描述性的面相是必要的”。他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 我希望描述人们等待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催泪弹时的心情，他们手无寸铁，有时故意一丝不挂地站在冬季寒风中。这是公民的庄严时刻，也是都市的紧张时刻，还是人们的狂欢时刻。

等待中的时刻就这样被定格在照片中，但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时光，这些时光最可能是展望未来的，有期望也有忧虑；同时也是回首过去的，因为无论是示威游行还是这些形象都带有些古老的东西，有一种历史自我重复的感觉。在这些图片中，是什么东西激活了时光呢？这不单单是西雅图事件，而是该事件引向一种更宽广的变革系统的途径，因为曾经很难驾驭的单一问题政治小组已经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更广泛的批评力量。新运动的积极计划是有争议的，但其主要

纲领却是明确的：要保护环境、促进平等，使民主不仅仅局限于阶段性的领导人和政党的选举中，否则富豪统治现象将永远存在。

图29　艾伦·塞库拉，《等待催泪瓦斯》

另外，这样的作品也具有明确的宣传价值，它并不想把自己搞得神秘兮兮，也不想通过肯定观众肤浅的自认深刻感来讨好观众。当然，在画廊展出这类作品可能会给它的主人带来荣誉。然而，作品明确具体而又比较宽泛的角色却与此种功能背道而驰，因为它并不适合这种寻常而又虚无缥缈的强化艺术和画廊地位的理想主义。

很自然，艺术的用途问题又将我们带回到艺术的自由问题上。艺术真正关切的东西——创造性、启示性、批评和自我批评——像那些隐藏在艺术背后的东西，亦即艺术必须隐含的重要因素——商业、国家应急分配制度和战争一样，都建立在工具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也许是因为在艺术创作中包含的局部解放以及对艺术的享受都是真实的。布尔迪约引用了福楼拜关于艺术自由的一封信：

> 那就是我为何喜欢艺术。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至少任何东西都是自由的。在那里，人们会感到满足，可以做任何事情，既是国王又是臣民，既可

以主动又可以被动，既是受害者又是赐福者。没有任何限制；人性对于你来说就是带着铃铛的木偶，你可以在他说话结束时踢他一下使其响铃。

福楼拜更多暗示的是，艺术家（以及读者或观众）的自由优势是一种残酷的权力。根据布尔迪约的分析，福楼拜的自由，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前卫艺术的自由已被与经济世界实际脱节的代价所收买。其他波西米亚作家是这类作品主要但远非合适的市场，其写作也故意无视资产阶级的理解力。艺术自主权是由一种既反对高尚的资产阶级写作，又反对忠诚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抗力量缔造的；喝彩声——如果有的话——也只有在时过境迁很久之后才能听到，亦即在新的前卫形式取代老的前卫艺术并使老的前卫艺术为人所熟知的时候。很显然，艺术世界中不再有那种自由的环境：艺术家们已经拜倒在市场的石榴裙下；作品以讨好公众为务；必要的自主权成了艺术之为艺术的证明，但除此之外，大多数的风格和题材都被人恣意滥用；成功通常是来得很快，要么就根本不来。

在这种情况下，艺术自由的可信性和力量正日渐衰弱。在《美学理论》一书的开场白中，阿多诺就对艺术自由问题发表了这样的见解："艺术中的绝对自由总有特定的限制，并且总是与整体的永久不自由相矛盾。"当更广泛的不自由被取消的时候，特定的艺术自由也就如沙过手指般消失了。虽然它们可以打开一扇乌托邦的窗户，呈现一个工具主义色彩较为淡化的世界，但它们也为压制提供了有效借口。相反，那些具有明显用途的作品强化了艺术体制中固有的矛盾，并寻求将自己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抛弃自由艺术的自主权就等于揭去了自由贸易的一个面具。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人们不再把自由贸易当作世界发展的一种模式，那么它的盟友自由艺术也会被抛弃。

注释

〔1〕 "克里奥尔化"意为混合。克里奥尔是人种的称呼，指的是出生于美洲的欧洲人及其后裔，也指这些人与黑人的混血儿，以及路易斯安那人。由于是混

血人种，其语言和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混合特性，这就是所谓的“克里奥尔化”。

鲜血淋漓的玩具士兵、镀金的超市购物车，还有用乐高积木拼成的集中营：当代艺术似乎是一个如野草般自由生长和蔓延的领域。艺术家们不断地打破各种禁忌，创作出惊世骇俗的作品。在观者眼中，这些作品也许艰深晦涩引人苦苦思索，也许琐屑无聊令人大跌眼镜。

然而，在惊叹之余，我们是否思考过这些问题：当代艺术是否真的绝对自由？它的“当代性”表现在哪里？政治和经济环境对当代艺术有着怎样的影响？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艺术世界又是由什么来推动运转的？读了这本小书，或许你会对当代艺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百科通识文库

49

古代战争简史

哈里·西德博特姆 著

晏绍祥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古代战争简史

哈里·西德博特姆 著

晏绍祥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73**

Ancient Warfar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4.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4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Harry Sidebottom 2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战争简史 / （英）西德博特姆（Sidebottom, H.）著；晏绍祥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23-3

Ⅰ．①古… Ⅱ．①西… ②晏… Ⅲ．①战争史 - 西方国家 - 古代 Ⅳ．①E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55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23-3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插图目录
地图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看到我的信号就进攻”：西方式战争？
第二章　战争思维
第三章　战争与社会
第四章　思考战争
第五章　战略
第六章　战斗
第七章　“一旦战败，就应认命”：西方式战争的重塑
年表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哈里·西德博特姆博士，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古代史讲师，沃里克大学古典学及古代史兼职讲师。曾在《古典学季刊》、《罗马研究杂志》及《罗马世界的战争与社会》等学术期刊及论著中发表论文多篇。

译者简介

晏绍祥，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荷马社会研究》、《古代希腊历史与学术史初学集》、《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等著作和《希腊帝国主义》、《罗马的遗产》等译作，并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插图目录

图1　希腊双耳酒罐装饰画细部
图2　布里奇内斯石板画
图3　涅瑞伊得墓碑，表现围城场面
图4　波托纳西奥石棺上雕刻的战斗场面
图5　雅典单耳（葡萄酒）罐
图6　科林斯的戚吉陶瓶及其细部
图7　罗马统治下意大利的“农业危机”产生模型
图8　勒特韦克关于罗马帝国的两个模型
图9　重装步兵的正面和侧面
图10　重建的三列桨战舰奥林匹亚斯号
图11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LXXVIII a-b
图12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XLIII
图13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XVI
图14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XX
图15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CIV
图16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LXI
图17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LXVI
图18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基座的东面

地图目录

1 特洛伊战争和希波战争的重要地点
2 公元前270年左右的主要强国
3 公元117年前后的罗马帝国
4 实现和未实现的伟大征服计划
5 约公元640年以前阿拉伯人占领的地区

前言

本书讨论的是公元前750年至公元650年间的战争，重点关注古希腊和古罗马，尽管也会顺带论及它们的某些敌人，例如波斯人、迦太基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阿拉伯人等等。除专业背景因素外，作者选取这个重点还有其他理由。

战争是古典文化 [1] 的核心，但与通常的观念相反，古代希腊和罗马并不总处于战争状态，即便征战时，也不总是寻求公开决战。总的来说在战争领域，希腊人和罗马人长期以来是成功的，他们的思想中也总是有战争的存在。古代地中海世界产生了完善的、专门论述战争的思想，其中许多在当今仍有重要意义。从战争中产生的观念在许多其他领域中用来构建思维。战争还被作为区分此文化与彼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古典文化中，战争在男子汉气概的建构以及男女差异的思想中均处于核心地位。源自战争的观点也被个人用来理解和建构其品格。在希腊和罗马世界，你读到的、听到的或看到的一切，都有可能让人想起战争。

希腊人和罗马人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在以一种既不同于更早的民族，也不同于当时的其他民族的方式进行战争。这使他们的战争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有些现代学者重拾古典文化关于其战争独特性的观念，并将其与古典文化对现代西方文化产生的影响联系起来，构建了“西方式战争”的概念。他们宣称，从古代希腊到现代，战争实践一直具有连续性。对这一观念的探索和重新评价，将是本书的核心。

那些在“西方式战争”中看出连续性的学者，倾向于这样界定它：这是一种对公开的决战的渴望，其意图在于歼灭敌人。在理想状态下，它是通过重装步兵面对面的交战展开。战斗通过勇气赢得，勇气部分来自训练和纪律。人们常常把这一点和拥有政治自由和土地的战士联系起来，即所谓的“公民 - 尚武精神”。这种“西方式战争”观念被

认为是由希腊人创造、由罗马人继承、在欧洲的中世纪得以幸存，然后在文艺复兴时代再度繁荣，而后直接进入现代西方。

本书对西方式战争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与其说西方战争是一种客观实在，一种战争实践的延续，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自希腊人创造这个概念以来，它就经常被、而且仍然在被再造，且每次再造都有改变。那些服膺于该意识形态的人在与他人战斗时，方式并不一定有很大不同，不过他们自己笃信他们是在用不同方式战斗。

有些较早的文化与希腊人的战斗方式并非有很大的不同。亚述人显然也寻求公开决战，以歼灭敌人。他们的军队部分由土地所有者组成，受过训练，有严明的纪律。在我们所说的新亚述时期（公元前934—前609），军队中有穿盔甲的重装步兵，仅用长矛武装以利近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那是为政治自由而战。如果与“西方式”自由比较，对亚述人的自由我们是不能弃之不顾的。自由观念无法普遍化，自由的意义不仅在不同文化间存在差异，就是在同一文化内部，对不同的集团也有不同的意义，而且这些意义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

古典文化在战争方式上是否像它们惯于相信的那样如此与众不同，这一点也远不是那么清楚。20世纪20年代，在丹麦阿耳斯岛上的小湿地胡加斯普林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条华美的船只和一些武器，这些东西可能是约公元前350年作为献给诸神的礼物存放在湿地中的，它们可能是在一场当地战争中战败者的部分装备，武器中有剑和护胸甲以及大量长矛、标枪和盾牌。现代的解释认为这些发现揭示，这是一支蛮族军队，创建于远离希腊和罗马的地区。他们由土地所有者组成，拥有他们的共同体所理解的政治权利，编排到了装备相似，使用突击战术决胜负的矛兵队阵中，和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军队，尤其是那时的罗马军团相像。

古代世界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其他文化在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受到西方影响的情况下，仍会发展出一套与西方式战争明显雷同的战斗方式。我们会看到，在19世纪早期的南非，祖鲁人改革了军事组织、战术和装备，创建了以步兵面对面交战为特征，目的是获得决定性胜

利的公开的阵地战方法。

事实上，古典文化并不总是按照“西方式战争”模式作战。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希腊人似乎相当善于避免战斗。在雅典和斯巴达以及它们各自盟友之间27年艰苦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27[2]）中，只有两次，也许是三次重大的陆上决战，与西方式战争接近。同样，罗马人也不总是死守阵地战。公元16年，当皇帝提比略[3]将杰马尼库斯[4]亲王从莱茵河以东的战场上召回时，他觉得，唆使日耳曼人相互残杀对罗马人更加有利。公元前48年，当尤利乌斯·恺撒和庞培之间的内战在希腊的杜拉奇乌姆[5]进行时，初期是希望通过战场上的防御战，而非公开的决战来决定胜负。在公元83年的蒙斯格劳皮尤斯战役中，将军阿格里科拉在与古代苏格兰人交战时，将辅助兵置于前列，罗马公民兵置于后排。他的女婿塔西佗[6]记叙这一事件时宣称，战争如果在罗马人不流血的情况下取得胜利，那要荣耀得多。

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现有的资料类型可能导致了我们过多强调希腊、罗马战争的独特性。虽然考古学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他们的敌人的情况，但几乎无一例外，文献资料都来自古典希腊和罗马文化。如果他们的敌人也创造出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文献作品，而且这些作品保存下来的话，那我们获得的印象可能与现在有很大不同。

现实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历来复杂。一方面，西方式战争的意识形态已经影响了我们对现实的解释，如我们将看到的，公元7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居民认为，他们是按公开的、“西方”的方式战斗，而他们的敌人阿拉伯人则不是这样，但在现实中，东罗马帝国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尽可能地回避阵地战。还有，当欧洲人了解到祖鲁人的战争组织时，他们以为非洲人不可能独立创造出这样的形式，肯定是抄袭了西方的模式。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又会塑造现实。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可能只有很少几次陆上决战，但在冲突的前几年，这种意识却让斯巴达人开入雅典领土，期待决战。如果提比略判断出公元17年有可能在日耳曼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那他可能不会命令杰马尼库斯将罗马军队撤回莱茵河岸。对杜拉奇乌姆的围困并没有解决恺撒和庞培之

间的问题，最终胜负是在法萨卢斯战场上决定的。塔西佗可能会说，罗马人不流血取得的胜利是理想的胜利，但在蒙斯格劳皮尤斯的罗马军团还是愿意而且有实力进行战斗。

我们最好还是把西方式战争解释为一种意识形态，而非客观实际，虽然两者间的联系远不那么直接。换句话说，将西方式战争作为连续的实践，意味着将历史单一化。这样太容易让人们认为只有一种“西方式战争”存在，推而广之，只可能有一种“其他方式的战争”。这就抹去了过去与现在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我们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一样有趣。当我们十分惊异地发现这些差异时，我们对自身的了解，也许比只是反观自己时会更多。

重读本书并作序时，我感到因篇幅有限，公元6世纪未得到必要关注，当时的皇帝查士丁尼〔7〕发动了再征服战争，并由一位伟大的古典历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将战事记录下来。为以某种方式弥补这一缺憾，我在补充阅读书目中收录了一些有关该时期的现代著作。补充阅读书目相当于本书的第八章，相关部分应与正文平行阅读，因为本章将我的论证置于现代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和相关讨论中，使得读者对这一主题的兴趣能深入下去。

本书既着眼于战争如何进行，也着眼于人们如何思考战争，但对后一主题的研究要少得多。本书亦把使用具体资料进行概括总结和对现代学术某些重大问题与争议的具体例证分析结合起来，希望借此鼓励读者在其他背景下作类似的历史研究。

接下来，我要衷心感谢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帮助过我的所有人。首先是乔治·米勒，他既是编辑，也是朋友，是他首次把这个任务委托于我，我们通过讨论明晰许多观点。然后我要感谢两位同事兼朋友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他们分别是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的玛利亚·斯塔马托普洛和沃威克大学的迈克尔·惠特比。此外，我还要感谢牛津大学的匿名审稿人。

最后，我希望以本书纪念我的父亲休·西德博特姆上尉。1939年9月3日，他志愿参战。

注释

〔1〕 本书所说的古典文化，是西方学术界通用的称呼，一般指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尤其是公元前8世纪古典希腊、罗马文明诞生到公元4世纪基督教取得统治地位之间的文化。古典世界大体也指这一时期的希腊和罗马人的世界。其地理方位则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变化过程，最初局限于巴尔干半岛，后扩展到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希腊化时代曾达到印度河流域。罗马帝国时代主要指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罗马帝国统治区，其东界大体在西亚的两河流域，西北达到不列颠北部的苏格兰，北界为莱茵河和多瑙河，南为今埃及北部。西方人所说的古代世界，一般也指该时期的这个地区。——译注，下同

〔2〕 此处时间有误，应为公元前431—前404年。

〔3〕 罗马皇帝（14—37年在位）。

〔4〕 提比略义子，罗马大将，曾指挥对日耳曼人的战争。后与提比略失和，据说为提比略指使手下毒死。

〔5〕 亚得里亚海北岸城市，公元前48年恺撒和庞培初次在此交战，后恺撒退到色萨利，与庞培在法萨卢斯决战并击败庞培。

〔6〕 公元2世纪罗马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编年史》、《阿格里科拉传》等。

〔7〕 拜占庭帝国皇帝（527 - 565年在位）。在位期间编订罗马法，出兵意大利、西班牙和北非，力图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疆域。

第一章

“看到我的信号就进攻”[1]：西方式战争？

电影《角斗士》的开篇是日耳曼森林中的一场大规模战役。一方是罗马人，排着整齐的队形，有着统一的装备，他们在众人的注视下静静地等待着，打算用他们相对先进的武器进行战斗。他们的口号是“力量和荣誉”。命令按军阶逐级发布时，他们同时发射武器，整齐地前进。战斗中他们相互帮助，英勇无畏。另一方是蛮族。他们没有队形，身着兽皮，且服装不一。有些人带着偷来的罗马盾牌，但他们缺少投石器——代表当时顶尖军事技术的装备。开始时，他们的队伍隐藏在树林中，士兵们前后乱窜，各自用武器敲打着盾牌，发出粗野的喊叫声。他们的叫喊嘈杂而混乱，难以辨别。唯一能显示地位区别的是数次给一个特别高大强壮、毛发浓密的武士的特写镜头。他们如暴民般杀入战场，每个人都狂暴地进行着战斗。

一方代表文明，另一方则代表野蛮。罗马人在影片中进行的是常说的“西方式战争”，其目标是公开的决战，最终靠勇猛获胜，而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严明的纪律。日耳曼人所进行的，有点像“偷偷摸摸的”战争。他们的意图是伏击，作战毫无纪律，仅凭蛮勇。观看这样的战斗时，我们觉得它似乎是“真实”的，因为看上去很“自然而写实”。可是，它并不“写实”。“西方式战争”以及“非西方式战争”是文化建构的产物。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西方式战争的观念起源于何处？为什么会被建构出来？又为什么会延续下去？

希腊人与特洛伊人

我们可以从思考西方第一部文学作品—荷马的《伊利亚特》开始。这部希腊人的史诗的背景是约公元前1200年特洛伊战争的神话时代，当时在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统帅下的希腊人联军围困并洗劫了小亚细亚的特洛伊。这部诗篇自那时诞生后，被一代代的诗人们讲述、复述，并改编着，公元前七、八世纪最后定型，在公元前6世纪最终被书写成文。

这篇诗歌中的某些元素暗示西方式战争已经出现了：希腊人用此方式作战，特洛伊人则不是。阵亡的特洛伊人比希腊人多，他们遭受了更加可怕的伤痛折磨。某些表达痛苦的动词仅用在了特洛伊人身上。在诗歌中，特洛伊人的言语不如希腊人有气势、富有战斗精神，在长矛下哀求饶命的只是特洛伊人。诗歌两次明确提到希腊人在战斗中互相帮助，也两次讲到希腊人投入战斗时一言不发，而特洛伊人则发出羊咩般或禽鸣般的怪叫。

但是，《伊利亚特》对“西方式战争”的建构不应源出于此。特洛伊人的语言不那么激昂，但这可以用他们在国内作战来解释，他们保卫的是自己的父母和妻儿，文中的谈话对象也常常是父母和妻儿。希腊人的军营完全由战士组成，他们的长矛下是女性俘虏。特洛伊人战死得更多，是因为他们最终输掉了战斗。特洛伊人哀求饶命，遭受了更可怕的伤痛，表达痛苦的动词用到了他们身上，这些都是为强化命运的悲惨，因为所有读者都知道特洛伊即将来临的命运。在一首非常长的诗篇中，仅有三段（3.2—9；4.428—438；17.364—365[2]）明确叙述希腊人在战斗中相互帮助和在沉默中前进，而只有一段说的是特洛伊人在沉默中挺进（13.41）。在叙事过程中，特洛伊人以及希腊人都会帮助他们的同伴。

总体上看，这部希腊史诗叙述的是一次希腊人对非希腊人取得的神话般的胜利，其中并无排外情绪，希腊人对非希腊人也无优越感。特洛伊人，还有他们的盟友，以及希腊人，都有共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双方都生活在城邦中，由国王统治，有长老会和全民大会。他们进行战争的装备相同：战车、头盔、青铜甲胄、盾牌、长矛和剑。双方都有弓箭手。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利用这些装备作战：有时远距离进行战斗，有时面对面战斗；有时个人决斗，有时是集体作战。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同样的动机。诗歌用最美好的言辞详述英雄主义信条，正是这信条激励着将士们投入“激战”中。萨耳珀冬—来自小亚细亚的利西亚的特洛伊人盟友—慷慨陈词：

我们现在理应站在利西亚人的最前列，

坚定地投身于激烈的战斗，毫不畏惧，
好让披甲的利西亚人这样评论我们：
“虽然我们的首领享用肥腴的羊肉，
啜饮上乘甜酒，但他们不无荣耀地
统治着利西亚国家：他们作战勇敢，
战斗时冲杀在利西亚人的最前列。

但现在死神的巨大力量无处不在，
谁也躲不开它，那就让我们上前吧，
为自己赢得荣誉，或把荣誉让与他人。”

（12.315—328 R. 拉铁摩尔英译）

让我们把萨耳珀冬的激昂话语与一个希腊英雄的言论作个比较。

名枪手奥德修斯仍独自站在阵前，
身边没有一个同伴，恐惧征服了他们。
他长吁一声对自己无畏的心灵这样说：
“天哪，我怎么办？在敌人面前逃跑
是奇耻大辱，单独被擒更令人惧怕……
但我的心啊为什么要忧虑这些事情？
只有可耻的胆小鬼才临阵脱逃，
勇敢的战士在任何险境都坚定不移，
无论是进攻敌人，还是被敌人攻击。”

（11.401—410 R. 拉铁摩尔英译）

在《伊利亚特》中，不存在把希腊人与他们的敌人明确区分开的“西方式战争”。

希腊人与波斯人

虽然古风时代（公元前776—前479）的希腊诗人的确偶尔会对异邦人发表贬抑性的评论，但那种把世界划分成高贵的希腊人和低劣

的蛮族的思维方式却产生于希波战争（公元前490—前479）及其战后余波中。正是伴随着这种二元对立的出现，“西方式战争”的观念诞生了。

希波战争前，绝大多数希腊人都生活在大批自治的“城邦”（*polees*，单数*polis*）中。在一场声势浩大的殖民浪潮（公元前750—前550）后，这些希腊人从家乡希腊大陆、爱琴海诸岛和现代土耳其西海岸，迁移到西部（西西里、意大利南部、法国和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黑海沿岸以及北非的定居地。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法律，政治生活由数目不定的成年男性公民控制。城邦军事力量的核心是民兵，主要由农民组成。他们作为重装步兵进行战斗：身着重铠甲，排布于密集的方阵中，如此装备是为了在近战中用长矛和利剑展开搏斗。

在赢得了对小亚细亚希腊人城邦以及爱琴海中某些岛屿的统治权后，波斯帝国[3]在公元前490年和公元前480—前479年间两度入侵希腊。波斯是个年轻而喜好扩张的帝国，其军队由臣民中征召的士兵和伊朗人组成。伊朗人是部队的核心，既有步兵，也有骑兵。他们有远距离作战的能力（用弓箭和标枪），也有近战能力（用长矛和剑）。对波斯来说，第一次远征[4]是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果在马拉松战役中被雅典人和来自普拉蒂亚的一小支援兵击败。第二次远征由波斯国王亲征，是一次更大规模的行动。大陆上的希腊人并未全部参加反对入侵的同盟。公元前480年，一小支希腊军队在300名斯巴达人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抵抗，但仍在温泉关被击败。同时在阿尔特米西昂[5]进行的海战不分胜负。当年晚些时候，希腊人在萨拉米斯赢得了一次海战的胜利。次年，希腊人在普拉蒂亚战役[6]中彻底击败了波斯人。

希腊人的胜利肯定让人吃惊。他们人数少于对手；与波斯军队的灵活多变相比，他们的重装步兵方阵是一种简单的战术，且过去波斯人曾多次打败过其他希腊军队。

除具体战术和环境外，研究希波战争的伟大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解释普拉蒂亚战役的结果：“在勇气和力量上，他们（即波斯

人）和对手一样优秀，但他们缺少装甲，未受训练，技巧上远不如对手。”在他的叙述中，波斯人在近战中表现勇敢，但后来指挥官的阵亡削弱了他们的士气。希罗多德是个道德相对论者，其历史著作的公开目标是记载希腊人和蛮族人的功绩。对他来说，蛮族人通常在习惯上异于希腊人，但这不表明蛮族人劣于希腊人。只有一点例外：希腊人生活在自由政治中，而蛮族在国王的统治下，政治上处于被压迫状态。

在希波战争的年代里，希罗多德的态度并不是当时的主流观念，当时希腊人正在雅典人的领导下继续着战略上的反攻。

更典型的希腊式态度早在公元前472年就已经出现，当时埃斯库罗斯〔7〕的剧本《波斯人》正在雅典上演。戏剧的场景是波斯王宫，国王和大臣们等待着，等到的是萨拉米斯失败的消息。亚洲被描述为一个富庶、肥沃、耽于享乐、本质上女性化的地方；相反，希腊则是多石、崎岖、有男子汉特征的地区。波斯人为国王而战，国王却残忍、渎神且怯懦。他们卑屈顺从：匍匐在国王面前，甚至在某个统治者的鬼魂面前都不敢讲话。他们易激动，因哀伤而不能自已。希腊人是为自由而战。在波斯，国王就是国家；在希腊，组成城邦的是人民。剧中提到了许多波斯人的名字，但没有提到希腊人的名字。这就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希腊人是一个集体，波斯人则不是。波斯人一次次地被称为弓箭手和骑兵，希腊人则被称为矛兵。这体现在下面摘引的波斯王太后（一位贵妇）和由老年男性组成的歌队之间的对话中：

王太后：他们（雅典人）有那么多的战士？

歌队〔8〕：是的，他们曾经（在马拉松）给波斯军队以可怕的打击。

王太后：他们善于射箭吗？

歌队：不，根本不。他们有坚固的盾牌，以长矛近战。

王太后：谁是他们的牧者？他们的大众服从哪个主人的命令？

歌队：主人？他们不是任何人的仆从。

王太后：没有主人？那他们如何抵抗入侵？

歌队：他们能啊！他们消灭了大流士那庞大而显赫的军队（又是在马拉

松）。

（235—244页，P. 维拉科特英译，略有改动）

保存在医学作家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一部公元前5世纪佚名希腊人的作品，对亚洲人的贬抑更加明显。

亚细亚气候缺少变化，没有严寒、酷暑等极端气候，这造成了亚细亚人精神上的软弱和怯懦。

在我看来，这些事物造成了亚细亚种族的软弱，但他们的风俗也起了辅助作用，他们大多受君主统治。

（《空气、水和地方》，第16页，卡特利奇英译）

希波战争最终让“西方式战争”的观念牢固确立。希腊人为自由而战，他们寻求公开会战，战斗中会面对面交战，因勇气和训练有素而赢得胜利。奴性的波斯人在专制君主的统帅下作战。他们作为弓箭手可以避免近战，作为骑兵则可迅速逃跑，是缺乏男子气概的懦夫。

当然，这不是毫无偏见的分析，而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建构。战争期间，正如希罗多德所说，波斯人寻求过公开决战，他们也曾勇敢地和希腊人对面交手。希罗多德提醒我们注意，并非所有的希腊人任何时候都服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有些波斯人被希腊人视为勇者。总体上看，波斯人可以被视为一种古老、睿智文化的代表。战争之后，希腊人开始使用波斯人的多种物质产品。允许其成员持相左的观点也正是文化定义的一部分。

罗马人与迦太基人

历史证明，“西方式战争”观念具有持久性，可不断调整并可广泛传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传到了罗马。从一开始，罗马就在某种程度上受希腊的影响。到公元前270年，罗马人统治了意大利南部希腊人居住的城市。公元前264—前241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人们对罗

马与迦太基战争的习惯说法，来自布匿[*poeni*]一词，罗马人如此称呼迦太基人）以罗马控制西西里的众多希腊城市告终。公元前218—前201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统治了地中海西部地区。公元前149—前146年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导致了迦太基的灭亡。

共和国时代的罗马社会和组织从结构上看极富攻击性。精英们渴望获得荣誉和利益，精英的支持者以及罗马控制的意大利盟友也为扩张煽风点火。这些盟友并不承担税收，只是为罗马军队提供兵员。罗马城市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军团——一种由重装步兵组成的公民民兵组织，主要由有产农民构成。他们一度被作为重装步兵武装起来，但到布匿战争时期，他们装备的是重型标枪（*pila*）和剑。

迦太基是北非的一个城市国家，公元前8世纪由来自近东的腓尼基人建立。到第一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人已经建立了一个海外帝国，疆域包括西西里、撒丁岛、巴利阿里群岛和西班牙的几个地区。因为在对罗马的第一次战争后失去了西西里和撒丁岛的领土，迦太基在第二次战争前扩张了其在西班牙的控制区。到布匿战争之时，迦太基军队虽然由迦太基人指挥，却不是由迦太基公民组成。相反，其征募的是领地臣民、同盟者和雇佣兵，迦太基人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战斗。于是，罗马人将迦太基人的作战风格描述为“东方式的”，认为他们不按照“西方式战争”方式作战。

罗马人把迦太基人描述为“东方的”、怯懦的蛮族，但好像很少提及迦太基人的东方起源。罗马人认为自己起源于来自东方的特洛伊人[9]，这可能让他们不宜过多诟病迦太基人的东方起源，取而代之的是用气候和地理因素进行抨击。在一个贸易港口中生活，致使迦太基人贪婪而且不诚实。对罗马人来说，背叛是迦太基人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布匿人所谓的“良好的信誉”（*Punica Fides*）表示的正是相反的意思。此外，罗马人认为迦太基人残忍而又迷信。这些特征集中体现在他们会把族人，尤其是自己的孩子作为祭品这一点上。迦太基被脂粉化了。

像神话中的女王狄多[10]一样，迦太基女性是危险的引诱者。脂粉化的迦太基男人们穿着宽松、不扎腰带的衣服，在性欲上毫无节

制。让他人为自己作战则显示了他们的怯懦。在罗马人眼里，这些行为可以用迦太基人生活在非洲来解释。他们认为，炙热的阳光使非洲人的身体里只有很少的血液，所以，由于担心失去仅有的一点血液，他们害怕受伤，于是就成了懦夫。证明迦太基人野蛮、另类的最后一个“证据”是据说他们吃狗肉。

关于迦太基人种族上的负面形象，部分是基于现实（他们确实会把某些孩子作为祭品），部分则是出于假想（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不吃狗肉）。即使有相反证据，这种负面形象依然未得到改变。迦太基军队曾寻求与罗马公开决战，在汉尼拔率领下，迦太基军队还经常打败罗马人。迦太基人是依靠他人的勇气作战，正是汉尼拔的超人智慧，使他赢得了这些人的心。

如前所述，希腊人对波斯文化是又爱又恨，但憎恨可能更多一些。可是如果也这样来界定罗马人对迦太基文化的看法，就不那么准确了。当罗马人摧毁迦太基时，他们将迦太基图书馆送给了“非洲王子”，只留了那些关于农学的实用书籍，这些书后被翻译成了拉丁文。可能正是通过军队的传播，布匿语中的一些古怪词汇（例如小房子［*mapalia*］）随着罗马人对这些事物的接纳进入了拉丁语。布匿的文化和语言没有被压制，到迦太基作为罗马城市被重建时，一位用拉丁语写作的地理学家仍能自豪地提及他那布匿人的世界观。作为历史学家，塔西佗于公元2世纪初指出，如今无论你赞美罗马还是迦太基，都没有关系。可是，迦太基种族的负面形象却一直存在。第一个布匿血统的皇帝塞蒂米乌斯·塞维鲁普遍被人们视为残忍、迷信而狡猾，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罗马人与希腊人

我们将在本章讨论对“西方”和“东方”界定的最后变化。哪个民族被认为是以“西方战争方式”作战的民族，哪个民族被视为“东方的”民族，即不以西方战争方式作战的民族。当我们讨论罗马对希腊世界的

征服时，这种界定的变化极具讽刺意味。

亚历山大大帝死时（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已经统治了希腊和古老的波斯帝国。他的继承人为瓜分其帝国而征战。经过一系列阴谋和战争的灾难，到公元前270年出现了三个长命且稳定的“超级大国”，它们是马其顿人统治下的诸“希腊化”王国，包括安提柯王朝（以马其顿为中心，统治着希腊），塞琉古王国（以近东为基础，控制着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和托勒密埃及（以埃及王权为中心）。公元前2世纪，罗马击败了安提柯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经过三次战争和一次起义，马其顿于公元前147年变成了罗马行省。次年，希腊被并入马其顿行省。经过一场反对安条克三世的战争（公元前192—前189），塞琉古王朝被逐出小亚细亚，成为罗马的附庸。公元前133年，罗马创立亚细亚行省，当时帕伽玛王国的末代统治者在遗嘱中将领土留给了罗马。在一系列的战斗中，罗马军团全面击败了希腊化君主国以长矛武装的步兵方阵为战术基础的马其顿式军队。

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征服希腊东方之际，正是他们开始大规模吸收希腊文化之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希腊化过程。二者相互关联。如前所述，罗马从一开始就处在希腊文化影响之下，自公元前3世纪起他们就开始统治希腊城市。（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深入到希腊大陆，那里是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家乡，对罗马人来说，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拥有较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11〕更高的文化声望。也正是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首先是罗马的精英人物，开始从征服中获得巨额财富，对罗马的希腊化来说，财富是非常必要的。罗马精英们内部竞争激烈，希腊化为精英阶级成员提供了新的竞争手段。例如，他们相互比赛，看谁拥有更多的希腊艺术品。希腊化对罗马精英还具另一层深意，这使他们与平民区别开来，因为平民无力参与这场“游戏”。它同时还把精英们与意大利同盟中的精英分子联系起来，因为这些人也同样有财力。艺术和建筑重新兴起，文学和哲学也开始复兴。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罗马精英分子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罗马精英用希腊语教育孩子们，让希腊建筑师为其设计建筑物设计；并请希腊艺术家进行装饰。在家里，他们常穿希腊式

服装，说希腊语。他们社交聚会的形式也模仿希腊式的宴会或酒会（*symposium*）。如果家里少了个温顺的希腊文化人，任何上层罗马人的家庭都好像不完整了。

罗马人日益希腊化，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赞许或欣赏先是被他们打败，后又被他们统治的希腊人。古代希腊人自称*Hellene*，罗马人并未采纳这个客气的说法，相反，罗马人会称希腊人为*Graecus*。这个称呼明显具有攻击性，更让希腊人憎恶的是被称作*Graeculus*，意思是“希腊小子”（同样，一个迦太基人可能被称为“布匿小子”［*Poenulus*］）。这样的称呼，和美国南部诸州的白人称呼黑人为boy具有同样的贬义。罗马人可能认为，遥远的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以及生活在战前时代的希腊人是好的，甚至可能认为他们很像罗马人。但希腊人的后代已经堕落了，他们贪婪、腐化，撒谎成性。有些希腊人还要更糟。那些来自亚细亚的希腊人天生有奴性。拉丁讽刺诗人玉外纳[12]愤怒地描写了那些来到罗马的希腊人（3.58—125），他尤其憎恨那些来自叙利亚的希腊人，“那些来自奥隆特斯河[13]的垃圾，潮水般涌入台伯河（3.62—66）。”可是，全体希腊人都被认为耽于享乐、放荡且软弱。罗马精英们全盘接受的希腊文化产品价值令人怀疑，它们可能会削弱罗马人的“男子汉气概”。哲学会使人耽于思考，疏于行动。希腊人体育场里的裸体运动员会鼓励不道德行为。事实上，罗马人宣称，同性恋行为就是通过体育场从希腊进入罗马文化的。小普林尼[14]抱怨，到他那个时代，身体训练已经不再是获得军事荣誉的老兵的领域，而被“希腊小子”们（《颂诗》，13.5）控制。希腊人的体育运动不是很好的战争训练方式，而罗马人对希腊人的负面看法主要是基于他们的战争表现。

在罗马人眼中，希腊人不擅长战争。如塔西佗指出的，希腊人即使有罗马的军事组织、武器和装备，以及罗马公民享有的权利，他们仍是希腊人，懒惰而无纪律（《历史》，3.47）。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懦夫。如果你能像《亚历山大里亚战记》（15.1）的作者那样找到一个勇士，你需要拿他与罗马人而不是其他的希腊人比较。拉丁诗人卢坎借尤利乌斯·恺撒之口猛烈诅咒过希腊人。他们被教育得过头了，

奢侈、软弱、甚至会被自己的呼喊声吓倒（《法萨利亚》，7.400—410）。罗马人所说的关于汉尼拔的一件轶事，很大程度上暗示了他们对希腊人和战争的态度。当汉尼拔在希腊城市以弗所流亡时，这位伟大的迦太基将军听了一场关于统帅才能和一般军事事务的演讲。演讲持续了几个小时，结束后希腊听众反应热烈。当有人问汉尼拔对演讲作何感想时，他答称，他听过当时许多笨蛋的演说，但从不曾有一个这么笨的（西塞罗：《论演说家》，2.75—76）。

多种因素促使罗马人把希腊人视为懦夫并认为他们进行的是“东方式”战争。罗马人统治的第一批希腊人是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长期以来，他们就被其他希腊人认为软弱而且奢侈。“奢侈”（sybaritic）行为就源自意大利的一个希腊城市锡巴里斯。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使得希腊人散布到近东全境，这些定居者和后来接受了希腊文化的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将已经存在的对近东原住民的印象推而广之，扩展到居住在那里的希腊人和“接受希腊文化的人”身上，然后再延及全体希腊人，不过是历时很短的一小步。虽然不像罗马人在剑尖可及的近距离作战，希腊的长矛重装步兵确实亦是近战，距离也就是几英尺，以使长矛能从队列中伸出。罗马在共和国时代征服了希腊，所击败的大多数希腊军队受雇于国王。不曾有哪一个古代作家把罗马共和国视为民主政治国家（尽管某些现代学者认为其颇具民主政治的特点）。罗马人可能认为，希腊衰落的根源，就是他们过去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穷人控制了政治，让希腊走了下坡路。在精英们眼中，穷人，或如罗马人称呼的“渣滓”，像任何蛮族一样，既无理性，又乏毅力。

虽然上述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罗马人将希腊人模式化地视为不按“西方式战争”作战的懦弱的东方人，而这种模式化偏见的始作俑者正是希腊人自己，但对形成此看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下述残酷的事实：罗马人取得了战争胜利，而希腊人被击败。

艺术与“西方式战争”

艺术反映思想，但也塑造着思想。如果我们看看下面描述冲突的一幅画，那些围绕着西方式战争及其对立的战争方式的许多观念会变得更加鲜明起来（图1）。

图1　希腊双耳酒罐（一种混合葡萄酒和水的罐子）装饰画细部，出自意大利南部，年代约为公元前440年

在图左方是一个希腊重装步兵——代表西方式战争。在图右方是一个东方人。在希腊和罗马艺术描绘的战斗场面中，胜利者通常是从观者的左方移动（可能受到欧洲人阅读时从左到右习惯的影响）。这个西方人裸体，此乃艺术常规，常常代表的是“英雄式裸体”，这让艺术家们能够展现希腊人强壮、肌肉发达的身体，而那是艰苦的农业劳动或者身体训练的结果。画面上的东方人穿着衣服，因此我们无法看出他的身体是强壮还是柔弱，是否受过训练。西方人毛发多，男性特征明显；东方人面部则无胡须，缺少男性第二性征，这一点与对手和马匹被精心描画的阳具形成对比，给人一种阴柔的印象。这可能会使人们把这个人物解读为阿马宗——神话中来自东方的女性战士。西方

人站在地上，立于画面的基线上，其右脚甚至“深入”到基线内。东方人则在马上，马腾于半空中，因为骑手勒住了马缰（马嚼和左手之间紧绷的线条，以及马张开的嘴和脖子处密密的粗线条似乎暗示了这一点）。它让人联想到的是，一个坚定地坚守着他的阵地，另一个则“飘浮”着，准备逃跑。两人身体的角度强化了这种印象：西方人上身前倾，直面两件武器的方向；东方人则后仰。拿武器的方式也形成了对比：西方人牢牢地握住了武器，四根手指紧箍着枪杆，东方人抓武器要松些，只用中间的两根指头抓着。他们准备使用武器的方式也不同：一个向前刺，另一个准备投掷。

可是，这幅画中也有模糊之处。东方人尚未直接被非人化或妖魔化，他们有着让人惊羡的东西：精致的服装和华丽的马匹。东方人的面部亦无惧色，五官漂亮而且神态从容。重要的是，当他们彼此直视对方的眼睛时，两个战士之间有冲突和交流。战士互相盯着对方，马则看着画面外的观众，将其带入到画面中，带入到对西方式战争的冥想中。

注释

〔1〕 这里借用的是电影《角斗士》的对白。第七章的标题也采用了同一电影的对白。

〔2〕 引用古典著作时，西方学术界通行的注释方法是注作者名和卷、章、节编号或者行数。如果某一古典作家只有一部著作传世，一般只注作者名和编号，如希罗多德，5.23表示希罗多德所著《希腊波斯战争史》的第5卷第23章。荷马：《伊利亚特》，5.23则表示《伊利亚特》的第5卷第23行。这些数字和我们引用现代著作所用的页码无关。

〔3〕 古代西亚强国（公元前558 - 前331），曾统一西亚和埃及，并三次发动对希腊的入侵。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即以此次战争为主题。

〔4〕 实际上公元前492年波斯就发动过一次远征，不过陆、海军都在北希腊遭遇重大损失，未能进军希腊本土。

〔5〕 温泉关为北希腊通向中希腊的关口；阿尔特米西昂在优卑亚岛北端。两地相距甚近。公元前480年，希腊人的陆海军曾在这里阻击波斯入侵军。

〔6〕 普拉蒂亚地处中希腊。公元前479年，以斯巴达为首的希腊联军在此击

败波斯陆军，取得希波战争的胜利。

〔7〕 雅典悲剧作家，著有《波斯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悲剧。

〔8〕 希腊悲剧表演中演员数量很少，剧情大多靠歌队和演员之间的对白表现和推动。

〔9〕 按照罗马人的神话，罗马人的始祖是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特洛伊陷落后，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历尽千辛万苦后到达意大利，并在意大利中部定居下来。建立罗马城的罗慕路斯据说是埃涅阿斯的后代。

〔10〕 据说罗马人的始祖埃涅阿斯逃出特洛伊前往意大利途中，曾在迦太基停留，为迦太基女王狄多所爱，致使埃涅阿斯陷入温柔乡中，几乎忘记自己的使命。埃涅阿斯后觉醒离开，狄多伤心自杀，并诅咒埃涅阿斯。公元前3世纪的布匿战争被视为两国间敌对的继续。

〔11〕 自公元前8世纪中期开始，希腊人开始大规模地殖民，并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了大批殖民地。这里所说的希腊人，就是这些殖民者的后代。

〔12〕 玉外纳（约公元50或70—约127年以后），罗马诗人，现存作品为5卷16首的讽刺诗。

〔13〕 叙利亚的主要河流，注入地中海，下文提到的安条克、阿帕梅亚等重要城市均在此条河上。

〔14〕 小普林尼，（约61—约111/113）罗马作家和政治家，老普林尼（《自然史》作者）的外甥，传世作品有《书信集》10卷，《颂诗》等。

第二章

战争思维

古代世界中，人们喜欢用战争思维。换句话说，希腊人和罗马人常常使用与战争相关的观念来理解世界以及他们在其中的地位，他们也用战争来思考其他论题，如文化、性别和个人。战争弥漫于古典思想之中。

文化

当希腊人和罗马人思考“东方”文化，并反思他们自己的文化时，他们常用战争来诠释。这种思维模式不限于解说东方，而且具有普遍性，尽管它对其他文化的想象空间有限。例如，当罗马帝国的居民目光转向东方时，他们顺理成章地看到了“东方”诸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等等）。当他们转向南方时，他们再次看到了东方的文化（迦太基和埃及文化）。当他们面向西方时，那里除了大洋外一无所有，大洋中有些多少带有神话色彩的岛屿（例如福岛，少数有特权的死者在那里生活）。北方的情况不同。对古典世界来说，北方是想象中的另一个重要的“他者”。事实上，在罗马化之前，有时在后来的玩笑中，远西地区的居民，如西班牙人，其性格被认为是“具北方特征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极北地区，即今天的苏格兰。罗马人有关喀里多尼亚文化的观念，有关对其心照不宣的评判主要源于其作战方式。我们可以通过研读三篇大相径庭的资料来研究这个问题。它们分别是一块雕刻和写有铭文的砂岩石板；一块上有作品残篇的木板以及一篇文学作品。它们不仅显示了可供古史学家们利用的资料的多样性，而且也表明，每件资料都会引发多种不同的解释。

在皇帝安东尼·庇护统治时期（138—161），罗马在不列颠的疆界暂时从哈德良长城北移至克莱德福斯一线，在这里修建了安东尼土木长城。参与建设的军队立起一块块经过装饰的石头来纪念他们付出的努力。人们发现了20块这样的石头，就是现在人们所知的“遥远的

军团石板”。其中一块是在布里奇内斯发现的，年代可能在公元142—143年间，标明了要塞的东端（图2）。

图2　布里奇内斯石板画

铭文记录了第二军团完成的4,652步长城，侧面为两副雕刻。在观者的左面，是一个罗马人打败了当地蛮族的场景，右面是军团成员准备向诸神献祭的场面。军团内的等级也可看出：主要人物身着托加袍，其他人着军用斗篷和战袍。对观者而言，对石板进行诠释具有挑战性，因为需要把装饰上出现的不同因素联系起来。与和平活动画面相比，战斗胜利的画面可以被理解成发生在前且使其成为可能，因为战争的胜利是文明生活的必要前提。另一种理解是：奉献祭品可以被理解为罗马人希望得到诸神垂青，从而巩固胜利果实。此外，奉献祭品还可以说是执行任务前的洁净仪式，因此可以和铭文联系起来。由于对不同部分间关系的解读不止一种，所以战斗的场面也就可以按不同的方式解释。有人不愿把它解释成一个罗马人正击败4个布雷顿人[1]，主张它表现的是一个布雷顿人被击败过程中4个不同的阶段（从左上开始，按顺时针方向看，分别是被击倒、受伤、被俘和被枭首）。这样的解释可能过于具体了。由于石板是整个军团竖立的，骑兵仅仅是军团的一小部分，所以石板以一个士兵代表全体，这个罗马人代表的应是作战的集体。他还代表着文明，他手执的“先进技术”装备，他的姿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著名的墓碑上人物的姿态。布雷顿人与罗马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是裸体的野蛮人，他们所拥有的唯一代表文化的器物，就是战争中使用的武器。雕刻未显

示出他们的社会阶层。尽管他们有4个人，但他们非常不同的姿势表明，他们是单兵作战。他们为罗马文明所包围，其左方是凯旋门的柱子，顶部是那个骑兵，右面还有一根柱子。他们的未来完全在罗马人的掌控中。等待中央那两位的是战争中的死亡。对于下面的两个而言，是被俘和被处死。对那名（暂时）活着的俘虏有多种解释，或说他吓呆了，或说他听天由命，或说他在沉思，或者说他感到羞耻。在这里，喀里多尼亚文化只是通过战争，具体地说是战败来诠释。有意思的是，罗马的强大力量在文物出土后得以彰显。当安东尼长城被放弃时，它们被小心埋藏在那里。

罗马的文都兰达要塞位于哈德良长城附近，自1973年以来已出土几百件文书，即文都兰达文书，当时是作为垃圾处理并埋在那里的。其中一件属公元97年至公元102或103年间，谈到了当地的布雷顿人。残存的6行文字可以翻译如下：

布雷顿人无盔甲保护（或“裸体”）。他们有大量骑兵，骑兵不使用剑，这些可怜的布雷顿人（或“小子”）（*Brittunculi*）也不上马（或“占据固定位置”）以便投掷标枪。

（第164号）

有人解释说，这是一篇情报，或者说是给新任指挥官写的有关敌方部族情况的备忘录。另一种看法是，它是一篇有关征募到罗马军队中的当地新兵情况的报告。它也可能就是一篇文学作品。无论是哪种情况，文献对不列颠文化的评判再度是仅仅根据战争而作出的，认为不列颠文化存在不足。文中提到有许多骑兵参战，但是不同于罗马人的作战方式。布雷顿人不骑马（或者说在固定的位置）作战。他们不打近战，他们的文化成就低，他们不穿盔甲（或裸体），而且他们没有剑。他们被用悲天悯人和不屑的口吻称为*Brittunculi*—“布雷顿小子或可怜的布雷顿人”。

通过战争分析不列颠文化的资料恰好来自帝国边境，又出自特殊的军事背景中，也许不足为奇。但第三件资料—塔西佗的《阿格里科

拉传》—就不能不令人吃惊了。众所周知，塔西佗关于其岳父偶像化的传记难以归入任何一类古代文献。这部可能在公元98年创作罗马的作品包含传记、历史、地理、人种志和政治论文等多种元素。由于阿格里科拉是公元77—84年的不列颠总督，所以其中的人种志是关于布雷顿人的（第11—12节）。它开篇讨论了不列颠不同部落体质特征体现了布雷顿人的地理与种族起源。喀里多尼亚人的红头发和庞大体格显示他们起源于日耳曼人。像高卢人一样，布雷顿人对危险能作出迅速反应，但随后就是快速逃跑。那些较早被罗马人征服的布雷顿部落的士气比其他部落差。然后传记概述了他们的战术。他们的主力是步兵，但有些人也使用战车。贵族驾驶战车，侍从为保卫贵族而战。不列颠各部落的不统一给了罗马人有史以来最大的帮助。罗马人讨论不列颠文化时，又是通过战争的理念。战争曾一直是理解不同文化间差异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当希腊人和罗马人建构“北方人”的种族形象时，他们构建出了不仅不同于他们自己，也不同于他们心中“东方人”形象的异族形象。东方人矮小、堕落、聪明而怯懦；而北方人高大、原始、愚蠢而狂暴（至少最初如此）。当然，两种描述都缺少古典世界观察者应具有的理性、克制和训练。可是，相对东方人而言，对北方人的印象又可以完全不同。如前所述，他们可以认为东方人拥有比古典文明更加古老的文明，而北方人未受已衰落文明的不良影响，因为他们具有一些原始特性。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一部人种志著作，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把同时代的罗马人和高贵的日耳曼人作比较对罗马人进行谴责的作品。

北方人和东方人尚未穷尽古典世界关于人种的想象。他们建构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型是游牧人。在北方、东方和南方，他们都可以发现游牧人（北方除其他部落外，有锡西厄人和匈奴人；东方有阿拉伯人和撒拉森人；南方有利比亚人和摩尔人）。他们没有农业和房屋，更不用说城市了（古典文明的关键象征），所以游牧人被视为与希腊、罗马文化对立的极致。因此，在古典文献中，人们很少认为他们代表了另一种先进的生活方式。虽然其中有些例外（克文图斯·科提乌斯，

7.8.12—30），这些作品中诞生过一些如锡西厄人阿纳查西斯那样奇特的智者。

事实证明这些模式化的印象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希腊人和罗马人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敌人一如从前，而实际上敌人已经有了变化。这一点可以通过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部落的先后两次交锋中来说明。公元1世纪，罗马人面对过日耳曼人，3个世纪后他们再次交战。到公元4世纪，日耳曼人生活的部落已经比此前数量要少但规模更大，农业的深化带来了人口和经济的迅速增长；在政治集权化和社会阶层化方面，日耳曼人的社会得到了发展，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君主制王朝；战士精英阶层产生——这些人可以视为“形成中的贵族”。人们认为，这些因素可能加强了部落的控制力量，使其在战斗中的控制权和指挥能力得到改善。日耳曼人军队规模变得更大，装备更好，有了更多的骑兵和弓箭手。可是，我们拥有的罗马文献资料难以证实这些推测。对他们来说，日耳曼人还是过去的日耳曼人。如果我们把阿米亚诺斯·马克林纳斯4世纪后期对公元357年斯特拉斯堡战役的叙述（16.12）和塔西佗在公元2世纪初的《编年史》中对公元14—16年日耳曼战役的描绘（尤见2.14）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对日耳曼人这种一成不变的看法。两位史学家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一致。日耳曼人身材高大，因而容易疲劳；他们作战毫无纪律，仅靠蛮勇，而后又惊慌失措。阿米亚诺斯对近战的描述，是罗马意识形态恒久不变的表述：

〔日耳曼人〕在力量和身高上有优势，罗马人则在训练和纪律上有优势。一方狂野而骚乱，另一方细心而谨慎。我们的人依靠的是勇气，敌人依靠的是充沛的体力。

（16.12.47，W. 汉密尔顿英译）

在这里，无论是罗马军队，还是他们的敌人的变化，绝大部分游离于历史写作之外。

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不仅蛮族一般不会变化，就是那些新遇到的部落，也会马上被与先前了解的那些部落等同起来。当匈奴人于

4世纪末杀入罗马世界时，阿米亚诺斯承认，他对匈奴人的起源几乎一无所知，因此用他们当时的名称来称呼他们。可是即便是他，也征引更早的关于其他民族的描绘来描述匈奴人。其他的作家，尤其是希腊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把匈奴人和公元前5世纪甚至更早时期听说的蛮族等同起来，这些人中有锡西厄人、马萨格泰人、辛梅里安人等等。在进行上述类比时，作者试图卖弄他们有关古典文献的知识，首先是对希罗多德著作的了解，借此表现他们高贵的社会地位。这种做法的潜在理由是：过去的伟大作家肯定已经了解了这些看似“新生的”蛮族，因此，新近遇到的蛮族与那些已知部落来自几乎同一地区，前者中一定包括了后者。这种观察世界的方式首先是一种“防卫机制”，或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安心毯”。这样，新的、有威胁的部落就不那么陌生了，因此也更加容易应付。他们曾被打败或被遏止，他们还会被击败。

这种种族模式化的思考方式根深蒂固，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它依然在西方存留了下来。公元5世纪，西方新蛮族王国的一些罗马臣民还用它来改写现实，以让他们对当时政治环境的感觉有所改观。他们的新蛮族统治者，即使其祖先不是真正的罗马人，也被描绘得与罗马人一般无二。在这种虚假的吹捧下，一些蛮族统治者欣然接受了这种思维方法，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以激发他们新臣民的忠诚感。

古典世界有关外来文化的模式化描述并不很多，它们由数量有限的基本元素（大与小、懦弱与狂怒、堕落与原始等等）组合而成，具有持久性、可转换性和适应性。它们被用来界定中心（希腊人与罗马人），以与边缘（蛮族）形成对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为我们提供非古典世界的任何信息。古典世界不是存在于真空里，在它之外有其他文化存在。根据自己的世界观理解其他文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臆想。如果古典文化需要一面镜子来审视自己的话，那就无须构建一个以上的“他者”。

我们不应该因为古典人种学的人为痕迹而推想它仅仅是个“智力填充”游戏。希腊人和罗马人可能会热衷于这种思维游戏，例如读塔西佗的《阿格里科拉传》时会这样做，但在战场上面对现实中的蛮族

时，他们会抛掉这类思维游戏。在阿米亚诺斯描写的斯特拉斯堡战役中（见前文），罗马军队应当看到了4世纪日耳曼军队的实际情况，但他们会依据几百年来的模式化思维进行解释。举个现代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东线与其他民族作战的现实并未动摇深植于德国士兵思想中的纳粹意识形态，相反，还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

性别

当今古史学家对性别及与之相关的领域作了大量研究（见第三章有关学术兴趣的观点变化的讨论）。这本小书讨论的是战争，但在古典时代，战争是强烈性别化的。

战争特别被视为是男人而非女人做的事。人们认为女神可以出现在战场上。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雅典娜、阿尔特米斯、赫拉和阿弗洛狄特 [2] 都参加了战斗，阿弗洛狄特还为一个男人所伤。可是，对神灵来说可以接受的行为，对凡间的希腊和罗马妇女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赫克托尔 [3] 在《伊利亚特》中对他妻子说的话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 你且回到家里，照料你的家务，
> 看管织布机和卷线杆，
> 看看缝纫女是否在飞针走线，
> 打仗的事男人管。
>
> （6.490—492 L. 拉铁摩尔英译，略有改动）

阿里斯托芬 [4] 的喜剧《吕西斯特拉塔》于公元前411年首次在雅典上演，为创造喜剧效果，这部剧使社会规则颠倒、错位。为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的妇女发动了性罢工，并夺取了城市的战争资金。正是在这部喜剧的颠倒演绎中，女主人翁告诉我们，当她丈夫把赫克托尔的话转告她时，她不予理睬，而后她接着说，“让战争变成女人的事情。”（第520—538行）

在各个蛮族中，妇女在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成为他们不同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一个标志。塔西佗的《阿格里科拉传》称，“布雷顿人在指定指挥官时不考虑性别”（16；参见31），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好色的本性。在古典文献中存在着一系列让人畏惧、但具有异常吸引力的外族女战士，她们是小亚细亚卡里亚地区的阿尔特米西娅、马其顿的奥林匹亚斯、埃及的克里奥帕特拉、不列颠的波狄卡和卡提曼杜娅、叙利亚帕米拉的芝诺比娅[5]。女战士的最极端代表是神话中的阿马宗。人们认为，她们不需要男人，自己生活，只是一年一度地要和当地一个部落交媾以繁育后代，或者是把她们的男孩弄瘸，让男人充当古典社会中女人的角色。神话中的阿马宗与男人战斗，并被男人击败。“对阿马宗之战”（*Amazonomachies*）的神话传说在艺术中极为流行，许多希腊神庙的雕刻以其为主题，其中包括雅典的帕台农神庙。这些战争中性别角色的僭越者最终因她们的失败重新承认了原来的性别界限。她们通常居住在小亚细亚以东遥远的地方，因此，阿马宗神话与古典社会认为的东方男性女性化的观念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考察视觉艺术作品（图3）会提升我们关于战争和性别的思考。这是小亚细亚利西亚地区一座坟墓浮雕装饰的一部分，年代属公元前390—前380年，即我们所知的涅瑞伊得墓碑。它表现的是一个正受到攻击而进行防御的城市。9名战士守卫着城垛，装备着希腊重装步兵的头盔和圆盾，手持石头向敌人掷去。在城市的中央是一个妇女。雕刻中只有她直视观众，将我们带入到画面中。她左手上举，右臂环绕头顶。她在做什么？一个现代的观众也许会想，她正在祈祷。可是，古代观者不太可能这样认为。虽然在希腊和罗马宗教中，妇女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战争仪式中，她们很少参与。

图3　涅瑞伊得墓碑，表现围城场面

这个场面表现的是攻城。当战争来到家门口时，如果妇女没有因为安全的原因而被送走，那她们确实有几种角色需要承担。在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6〕所写的《女性的勇敢》中，表现女性美德的舞台常常就是在围城战中。妇女可以为守卫者准备食物。公元前429年，没有被送到雅典去的110名普拉蒂亚妇女就是这样做的。在投石机发明后，妇女还可以捐献出头发，制造投石机所需要的绳子。公元2世纪后期拜占庭被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7〕围困时，妇女们就捐出了她们的头发。她们可以把投掷物运到城墙上，激励男人们，公元前3世纪末的希俄斯妇女就是如此。公元前4世纪中期一部“如何守卫被围城市”手册的作者建议，让妇女穿上男人的服装，并把她们派上城墙，这样会使守军看上去更多些。可是你决不能让她们投掷任何东西，“因为即使离得很远，当一个女人试图投掷时，她的性别立刻会暴露（埃涅阿斯·塔克提库斯，40）。”公元前5世纪早期阿戈斯妇女凭自己的体力击退斯巴达人对阿戈斯城进攻的故事，乃离奇的神话。如果敌人破城而入，妇女们可能从屋顶上向敌人投掷瓦片。公元前272年，正是一个贫穷的阿戈斯老妇人掷出的此类武器，击中了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遭遇围城时，妇女需要监督，因为她们比男人更加贪婪，但在理性和勇敢程度上远不如男性，因此可能将城市出卖给敌

人。在罗马，神话中的塔尔佩娅就试图出卖过城市。

涅瑞伊得墓碑上的妇女形象很可能不应以上述的任何一种方式解读。也许，她正撕扯着自己的头发，为自己的命运唏嘘：如果城市陷落，她的未来是被强奸、奴役、暴死或者逃亡。

在希腊和罗马，战争是构建男子汉气概的一个关键因素。荷马的英雄们在战争中相互激励时说的是“朋友，要像个男人。”雅典演说家埃斯基涅斯在法庭中为自己辩护时，连篇累牍地罗列他的男性亲属以及他本人的参战经历。相反，他指责控告者德摩斯提尼[8]，“你声称自己是个男人，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你曾被控弃阵而逃。”德摩斯提尼还是个有女人气的、贪得无厌的被动同性恋者（*kinaidos*）（2.148—151，167—169）。他并非是喜好男性间性行为，而是自我控制能力的缺乏和被动，才让这个*kinaidos* 没有了男子气。在想象着为自己的理想城邦立法时，柏拉图希望表现得像懦夫的男人应当被变成女人。由于这样做不可能，“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与此最相近的惩罚。”他要在安全区度过余生，并生活在因此带来的耻辱中（《法律篇》944A）。普林尼赞扬罗马皇帝图拉真组织的角斗表演时说，“那里没有任何松懈或堕落的东西会削弱或者摧毁他的臣民的男子汉气概。”（《颂诗》33.1）战争和男子汉气概之间的联系在语言中得到体现。在希腊语中，*andreia* 的意思是男子汉气概或勇气。在拉丁语中，*virtus* 表达的是男人的美德或勇气。

个人

人们不仅在文化、性别等大问题上喜欢使用战争思维，而且在思考小的、私人的问题时，例如个人品格时，也不忘战争。这里我们将讨论三个集团的成员通常如何通过战争思维来构想他们的品性，尽管事实上他们并不好战。

战争和爱情很久以来就被联系在一起，但直到罗马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时代（公元前31—公元14），拉丁诗人，首要的是普罗波提乌

斯和奥维德，才对这种联系作了最全面的诠释。诗人可以把自己描绘成与爱情战斗的人。反过来，他也可能是情人或爱情大军中的一个士兵。他可能与情敌战斗，也可能与和情人的丈夫或者情人的贞操作战。一个爱情的士兵像真正的士兵一样需要坚强。上述两类士兵都需要坚强、勇敢，面对同样的风险：前途未卜、艰苦，甚至死亡。爱情士兵的角色可能承载着诗人的渴望，令其愉悦，但也可能带来不得不承担的痛苦。无论如何，一名爱情战士都不是一名真正的战士。这就使我们产生了一个重要疑问：这类诗作表达的是对统治集团的支持还是反对？

奥古斯都通过内战掌权后，着手创建了新的政治秩序，虽然这是在恢复旧秩序的幌子下。他同时创立了新的道德标准，而新道德再度被描绘成旧道德的复兴。奥古斯都的政权非常重视个人履行对国家的责任，包括婚姻、生育和战争责任。诗人抛弃真正士兵的角色，支持那种不合法的、非婚姻的爱情，等于背离了这个政权的意志。可是，我们不能只把诗人当作单纯的持不同政见者，诗中的自贬和夸张并不总能准确反映出诗人真实的自我。

有关这类诗歌的另一个问题是诗歌是否反映了诗人真实的意愿。对这个问题仍无简单答案。走在罗马的大街上，你可能并不一定会碰到妓女—一些重要诗人一见钟情的对象。可是，即使他们宣称他们诗歌中的情人只是虚构的人物，那他们的自我认识也应与其有关（“我诗歌中的主人公是爱情战士，但我不是。”）。

奥古斯都建立的元首制（公元前30—公元235）很大程度上将战争“驱逐”到了社会和地理上的边缘地带。当时参战的是职业士兵。除内战外，战争多发生于遥远的边疆。那个时代的希腊哲学家从未或者几乎没有经历过战争，却并未停止在这个问题上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但他们见过士兵，对那些保护他们的士兵，哲学家们的态度是疏远、鄙视和畏惧。他们认为，士兵的生活充满约束、辛劳和风险。如爱比克泰德[9]（55—约135）所说，如果士兵无视纪律，“那谁也不会挖战壕，树围栅，夜间放哨，或者投身于危险之中。”（3.24.32）可是，这些恰好是一位哲学家宣称的他自己生活的特征。例如，狄奥·

克里索斯托姆（约40—约112）多次强调，哲学家需要纪律，并吹嘘他自己的勇气，以及他在流放中经受的痛苦。受这些苦不会给士兵带来任何益处，但却能让哲学家获益良多。哲学家在经过审慎思考后，自愿去承受这些痛苦。哲学家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为拥有自制力、美德和真理努力奋斗的士兵。狄奥·克里索斯托姆宣称，为美德而战，与会削弱美德的享乐抗争，是一场比《伊利亚特》所描写的战斗更加伟大的战斗（8.20—22，第四章将就哲学家对战争的看法作更多论述）。

如果罗马帝国中有哪个团体的成员有充分的理由仇恨士兵，那就是基督徒，虽然（除公元64年的尼禄〔10〕外）对基督徒迫害的发起者并非政府，而是异教的大众。直到德西乌斯统治时期（249—251），为了维护公共秩序，政府才参与到迫害活动中，对基督徒的拘捕、审判和处死是在士兵监督下进行的。军队生活中异教信仰的盛行，特别是对皇帝的崇拜，不仅让基督徒难以从军，也让他们难以把军人接纳进他们的团体。因此在现存基督教殉难者的故事中（如今通常统称为《基督徒殉教者传》），最常见的受迫害者不是士兵而是运动员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很少能发现这样的例证：一个殉教者之所以被描写成一名为信仰而战的上帝的战士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战士（优西比乌斯：《教会史》，6.41.16）。可是，在其他背景下，当我们抛开殉教者的文献时，甚至基督徒也可能自视为士兵。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约160—约240）和奥里根（184/5—254/5年）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坚持基督徒不应在罗马军中服役（关于基督教对战争的态度，更多的内容见第四章）。对他们来说，《旧约》中的战斗应作为寓言来读，由于这个原因以及《新约》中只有少数正面的军人形象的事实，外加他们对异教希腊哲学的了解，他们把基督徒视为新一类的宗教战士。如德尔图良所说，“难道我们不也是士兵吗？士兵要遵守更严格的纪律，而我们服从的是如此伟大的一个将军（即基督）。”（《劝人向贞》，12）。奥里根写道：“我们不在他（即皇帝）的指挥下战斗，虽然他要求我们如此；但我们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军队为他而战，一支虔诚的军队，并将我们的祷告献给了上帝。”（《反塞尔苏斯》，8.73）。

不只是不尚武的文化人用战争来建构个人的品格，这种思维方式在古典世界中无处不在，它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时被现代学者们忽视了，这导致了对某些资料过于拘泥字面意义的解读。

在2世纪的罗马帝国，火葬普遍转变为土葬，导致了石棺雕刻（石棺雕刻的字面意思是“食肉者”）的繁荣。在装饰石棺的各类浮雕中，有些是罗马人（或者希腊人）与蛮族作战的“战斗场面”，有些是“宽恕场面”—罗马的将军接受蛮族的投降（因此他是在宽恕蛮族）。在波托纳西奥的石棺雕刻上（石棺因发现地而得名），两种场面都有。该石棺可能制作于公元180—190年（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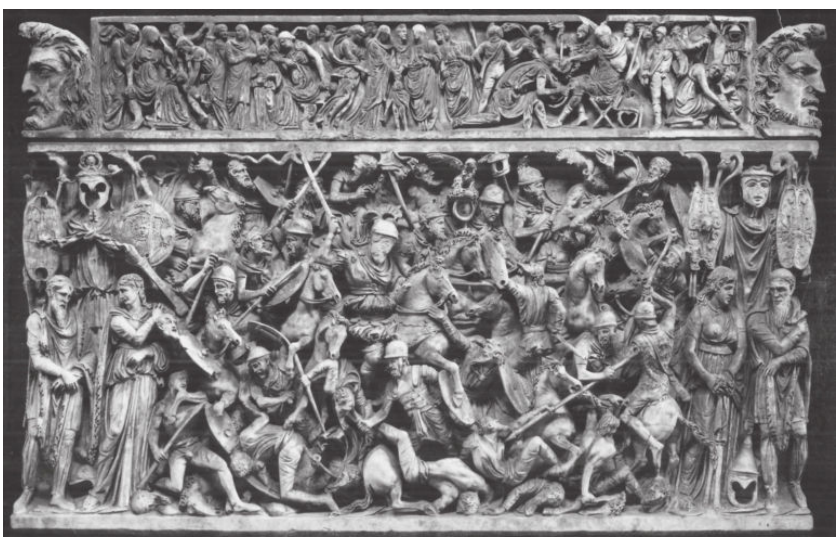

图4　波托纳西奥石棺上雕刻的战斗场面

石棺雕刻的主画面，即三个雕刻面中最长的一面，表现的是异常激烈的战斗。居于画面焦点上的指挥官正率领楔形队形的罗马骑兵杀入战阵。在这支队伍的下方，是另一些罗马步兵和骑兵队伍击败蛮族的场面。画面底部满布蛮族的尸体。军队已冲锋到敌人的大军之中，将某些敌人留在了身后。从画面两侧被俘的蛮族和缴获的武器等战利品可以明确看出他们取得了胜利。在顶部有三个画面：从左向右分别是：一个正沐浴的儿童；一场进行中的婚礼和一个罗马将军接受蛮族

的投降。

现代艺术史学家在解释这幅石棺雕刻或其他类似题材的雕刻时，特别希望把它作为某种传记来对待，认为棺中的死者实际上就是那位将军。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有人甚至对墓主的名字进行了猜测。我们最好避开这种将该雕刻作为传记来读的诱惑，因为我们很少知道石棺雕刻直接的考古学背景，也没有可供识别死者的墓志铭。“战斗”和“宽恕”场面不过是从众多石棺雕刻装饰中挑选的两个而已，一些其他浮雕确实有明显的传记性质，例如石雕将死者表现为鞋匠，但多数并非如此。绝大多数浮雕描绘的是希腊神话，例如赫拉克勒斯的功绩，或者希腊英雄墨勒阿革耳的狩猎。石棺的使用方式，也不会自动引领你作传记式的解读。有一具石棺中发现了7具以上的成人和两个孩子的尸骨。一幅有战斗画面的4世纪的石棺雕刻上，有一个皇族的女性成员，可能是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不管最初刻画这个形象是否为代表她，石棺上的战斗场面在这里所表达的人物不可能是一个将军。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波托纳西奥石棺雕刻上的主要人物形象，主画面上的骑兵指挥官、将军、正举行结婚仪式的夫妇和画面上部看护孩子沐浴的妇女，我们会发现，他们的面部都未完工。这表明，石棺订购者并非委托制作者从零开始进行创作，相反，生产石棺的作坊有相当标准化的装饰题材，在完成画面上主要人物的肖像后，可以再为购买者将其“个性化”。我们不应假设购买“战斗”或者“宽恕”场面石棺的多数买主碰巧都是退役将军，这些石棺上的雕刻应当以其象征意义来解释。石棺高昂的费用表示墓主人的高贵地位。如果以描绘赫拉克勒斯功绩为主题的石棺雕刻被选中，它表明死者，或者说死者的家人，希望人们把死者和一个承担文明使命的英雄联系起来，英雄致力于让世界摆脱魔鬼，死后变成了神。同样，如果购买者选择的是有类似波托纳西奥石棺上“战斗”或“宽恕”场面的石棺，那表明死者希望人们把他视为一个具有让人敬佩的军人式勇敢（*virtus*）和宽厚（*clementia*）等美德的人，哪怕现实中的他和战争没有任何关系。有些当代人可能会更进一步把“战斗”的胜利当作一种对死亡本身的胜利。在纪念死

者时，人们再度驾轻就熟地运用了战争思维。

罗马帝国后期，自3世纪后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公开把自己视为士兵。自上而下的公职人员都可以自称为士兵，戴军衔、穿军服、特别是扎军用皮带（*cingulum*），退休后变成“退伍军人”。当时的人们认为法律需要制止，至少应限制非军人着军装（《提奥多西法典》，14.10.1）。在古典世界，人们总是乐于用战争思维进行思考。

注释

〔1〕不列颠的古代居民，为凯尔特人的一支。

〔2〕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分别主管智慧、狩猎、婚姻和爱情。

〔3〕《伊利亚特》中，他是特洛伊人的统帅。

〔4〕雅典喜剧作家（约公元前457后 - 约前385以前），传世作品有《阿卡奈人》、《骑士》、《公民大会妇女》、《地母节妇女》等。

〔5〕阿尔特米西娅曾随波斯国王入侵雅典；奥林匹亚斯为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之母；波狄卡和卡提曼杜娅曾发动反对罗马的起义；芝诺比娅利用罗马内乱，策动帕米拉独立并与罗马对抗。这些妇女的形象与古典文化关于妇女的看法多少都有些相反，被认为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据说雅典人拼命想活捉阿尔特米西娅，因为她一个妇女，竟然敢于率领军队来进攻雅典。

〔6〕罗马统治时代的希腊作家（约公元50年以前 - 约120年以后），著有《平行列传》、《道德论丛》等。

〔7〕罗马皇帝（193 - 211年在位）。

〔8〕埃斯基涅斯和德摩斯提尼都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著名的演说家和政治家。

〔9〕罗马作家和斯多葛派哲学家，其思想曾对皇帝马可·奥里略产生重大影响。下文的狄奥·克里索斯托姆为罗马著名演说家和作家。

〔10〕罗马皇帝（公元54 - 68年在位），64年罗马城大火，尼禄嫁祸于基督徒，对其大肆迫害。下文的德西乌斯也是罗马皇帝，同样下令对基督徒进行迫害。

第三章

战争与社会

众所周知，一个社会进行战争的方式就是那个社会自身的写照。举一个例子：19世纪早期祖鲁希望进行决战，与敌人面对面交手以歼灭敌方兵力，并将所有其他非祖鲁人并入祖鲁国家。这种征服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祖鲁专制王权的兴起而引发的。国王希望通过军队使所有人只对国王绝对效忠。

本章通过反观问题，用三个例子来说明战争方式如何深刻地改变了希腊和罗马社会。

希腊的“重装步兵革命”

研究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后期和（或者）公元前7世纪希腊世界“重装步兵革命”的军事情况的方法之一是观察两幅古代战斗的图画。第一幅为几何陶时代后期（公元前735—前720）出自雅典的一个单耳（葡萄酒）罐（图5）。

图5　雅典单耳（葡萄酒）罐，约公元前735—前720年

罐上的画面中战斗的风格是流动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有些战士登上了战车，其余为步兵。有一对战士，常被当作神话中赫克托耳的连体孪生子，正欲登上战车。“孪生兄弟”持方形盾牌，其他人持椭圆形盾牌，边缘为半圆形切口（因描绘此类盾牌的大量陶器发现于雅典的狄皮隆，故常称“狄皮隆盾牌”），还有些人根本没有盾牌。士兵们似乎在通过投掷长矛和用剑近身交锋等手段进行战斗。

该陶罐上的战斗场面可以认为与荷马的《伊利亚特》所描写的决斗非常相近。在那样的决斗中，英雄们在战场上占主导地位，他们驾

着战车，到达战场后下车战斗，先是投掷长矛，然后用剑拼杀，追随的大众通常不是观众，就是牺牲品。

第二幅画出自著名的“戚吉陶瓶”（因曾经的主人得名）。这个原始科林斯风格陶罐的年代约属公元前650年，罐身上部刻画的是战斗中的人们（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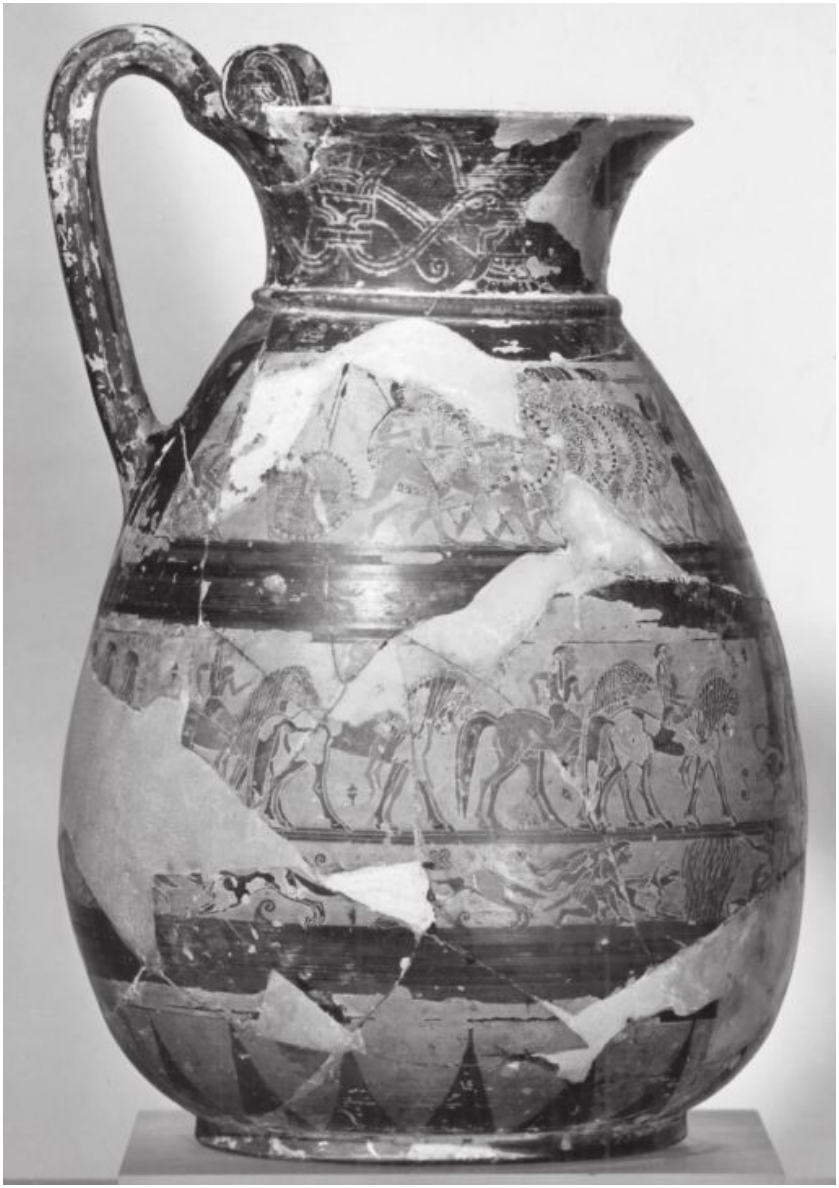

图6　科林斯的戚吉陶瓶及其细部，约公元前650年

这里的战斗方式似乎是团结一致的。战士们排成密集的队形，齐步前进，所有人的装备一致，手执圆盾，正准备用长矛战斗。这里的战斗场面可以认为与公元前5世纪后期——前4世纪这段时间典型的希腊人战斗风格一致，或者非常接近，即通过我们从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那里知道的步兵方阵作战。步兵方阵由重装步兵组成，排成几排，形成密集的“盾牌墙”，他们全部持圆形盾牌，主要用长矛战斗。（我们将在第六章对这类战斗进行探索。）

正是上述解释有力支持了这个现代理论：公元前650年之前的某个时候，也就是“戚吉陶瓶”制作的时代，希腊人对他们进行战争的方式作出了重大改变。最初的战争被视为“原始”的战斗场面，类似于人类学家记载的高地新几内亚的战争，那是个“令人恐惧的战场”，几乎没有什么阵形或者战略。在这种战争中，在争取个人荣誉、避免蒙耻的想法的驱动下，单兵在决定何时、何地、何人战斗的问题上有很大空间，所以少数贵族决定战局也不足为怪。在光荣抑或是蒙羞的游戏中，贵族的得失也更多，他们拥有最好的装备（尽管极少有学者相信他们在实际战斗中会使用战车）。人们认为，上述战斗方式被“文明的”战斗取代，其核心是两个集团—对立的两个方阵。一旦装备基本统一的战士按照特定的位置布成方阵（必须承认，谁也不清楚这个过程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对何时、何地、作战对象是谁，几乎无可选择。个人利益加上保卫群体及城邦的愿望使得他们不会在本就寥寥的选择中寻求退路：停止战斗、强行穿过身后的士兵队列撤退或逃跑。

人们把这种设想的军事革命看作是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原因。一位对此观点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通过其提纲性的论证，为人们进入该领域指明了道路。安东尼·安德鲁斯（Antony Andrews）[1]认为，贸易的增长导致了希腊社会中相对富有的非贵族的新集团形成，正是这些人（主要是受益于当时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民）构成了重装步兵方阵。一旦他们进入方阵—城邦当时主要的军事力量—这个共同体组织，这个“中产阶级”就开始索求政治权利，因此助长了僭主政治的崛起，至少他们不反对僭主政治，而僭主推翻了此前存在的贵族政权。僭主政治衰落后，正是重装步兵统治着绝大多数的希腊国家。

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方阵是如何引入的（是一蹴而就的，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何人将其引入（富有的非贵族，贵族，抑或是僭主）、最重要的是引入方阵后产生了什么影响，但部分学者在下述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确实有过一次重要的军事改革；这次改革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影响。“重装步兵革命”于是成为“正统”观点。

但这种看法不可能持久。约阿奇姆·拉塔兹（Joachim Latacz）[2] 是正统理论早期的反对者之一。在他看来，《伊利亚特》所描写的战争就是重装步兵的战争，极少数学者赞同这样极端的看法。但还有些人采取了“修正路线”。他们倾向于认为，荷马式战争是“原始的重装步兵战争”。他们对《伊利亚特》的解读是：个别英雄的作用微弱，普通士兵的集体作战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军事“革命”并没有存在的空间；相反，他们至多是开始逐步采用某些新式装备，以及出现缓慢的统一趋势。由于重装步兵的先辈们已经在战斗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重装步兵方阵最后的“正式化”不可能激起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不需赘言，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接受这些论证，“正统观点”再次引发了争论。

怎么会产生如此对立的解释？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资料稀缺。我们关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希腊战争的资料很少。尽管“实验考古学家们”积极努力，创造和使用了多种复制品，但我们从发现的武器中了解的远没有我们期望的多。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是否最“合理”或最“理性”地使用了配套装置中仅发现的一件。

且让我们转向假设的“前重装步兵”战争，再观察一下插图中的雅典单耳陶罐（图5）。艺术家是否试图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表现当代的战争？当时的观众是否也是从同样的角度来看待这幅作品？战车是怎么回事？战车的使用，在艺术领域外，考古没有提供任何相关资料。仅仅在艺术领域出现的狄皮隆盾牌又是怎么回事？孪生连体兄弟在战场上可能出现吗？对荷马，我们可以提出大量同类的问题。虽然《伊利亚特》的聪明读者能把史诗中的战争前后联系起来，但除了诗歌或想象世界中的和谐统一外，还有更多的东西吗？我们知道，《伊利亚

特》中的装备来自希腊历史上相距遥远的不同时期，迈锡尼的“塔形盾牌”和当时的重装步兵盾牌同时在战争中出现了，战术难道不也是不同时期的混合吗？

同样，我们对早期重装步兵战争了解得很少。（公元前）7世纪的诗人们所描述的好像并不全是重装步兵的战斗。以弗所的卡林努斯（残篇1）谈到过用标枪而非长矛进行的战斗。斯巴达的提尔泰奥斯[3] 在残篇11中对队形密集的重装步兵方阵进行了经典描绘，但该残篇的结尾处则描述了蹲在重装步兵盾牌下的轻装兵（*gumnetes*）。

再看看戚吉陶瓶，想象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会发生什么。前排士兵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冲锋陷阵，左边的4人要倒下，右边的4人一样。这样会只剩下右边的一个战士和左边第二排中间孤零零地吹长笛者，会是这样吗？如果你仔细观察这幅画，你会发现前排左边有4个士兵，但有10条腿，绝大多数战士有第二支长矛，而后来的重装步兵只有一支矛。许多长矛有圆环，以利于投掷，可后来的重装步兵是用长矛刺杀。队列不是前后排紧挨，而大多数学者相信后来的重装步兵队形密集。如果我们不了解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重装步兵战斗，我们会不会认为这个场景表现的是由数列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间的冲突？

将我们了解的后来的重装步兵的战斗加以改造，并回推至过去的做法是危险的。这种做法等同于我们借用公元前5世纪及前4世纪阵行密集的重装步兵方阵，但剥离了支撑它的轻装兵和骑兵，以及相对成熟的战术，并将其向前推到公元前8世纪及前7世纪，就此创造出一个简单的、早期重装步兵战斗的“仪式化”阶段。

鉴于解释有限资料时我们遇到的挑战，人们对古风时代希腊战争的性质及其引起的社会影响提出大相径庭和截然相反的看法也就不足为怪了。希腊重装步兵方阵是希腊城邦的现象，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城邦最终都采用了方阵。那些没有生活在城邦中的希腊人却没有。同样，僭主似乎只在城邦中出现。那些不生活在城邦的希腊人中，我们没有听说出现过僭主。城邦、僭主和重装步兵之间的联系仍需要给予重新解释。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公元前735年到公元前650年间，希腊人改变了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在此期间，他们停止了把武器和死者埋在一起的做法，只有边远地区例外。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希腊人开始把武器和装备以及装备和士兵的微型塑像奉献给圣所，最令人瞩目的是在斯巴达的阿尔特米斯·奥特亚神庙发现的成千上万的微型塑像。最后，大约公元前650年，重装步兵开始大量出现在陶器上的画面中。

意大利的“农业危机”

人们一般认为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大规模的战争，导致了意大利的农业危机，农业危机反过来削弱了罗马共和国政府，以至于共和国被名为元首制的君主制所取代。古代史学家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4] 制作的一张流程图（图7）有助于我们直观地了解这种“传统观点”。

我们来看这个模型的主要线索。这一过程的关键“动力”是左上角的方框：持续的帝国主义征服战争。战争导致了对被征服领土的劫掠，劫掠而来的战利品、税收和奴隶被输入意大利。它们（转到下面的方框）为主要由奴隶耕作的大地产的形成提供了资金，大地产的形成（转入右边的方框）导致了自由自耕农的被取代（也许用“农民”这个词没有那么多的时代错位感）。被剥夺土地的农民会流入（沿两个向下箭头）日益发展的意大利城市，首先是罗马，他们的进城有助于形成那些大地产所出农产品的消费市场，而这些大地产正是他们原来的土地。失地的农民也会进入军队，为引发这一连锁过程的扩张战争出力。事实上，意大利的农民是在为被从土地上驱逐而战。在罗马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的统治下（公元前31—公元14年），随着持续的扩张战争的结束、职业军队的建立，以及将意大利老兵安置在海外行省的大型计划的实施，这种“恶性循环”才宣告结束（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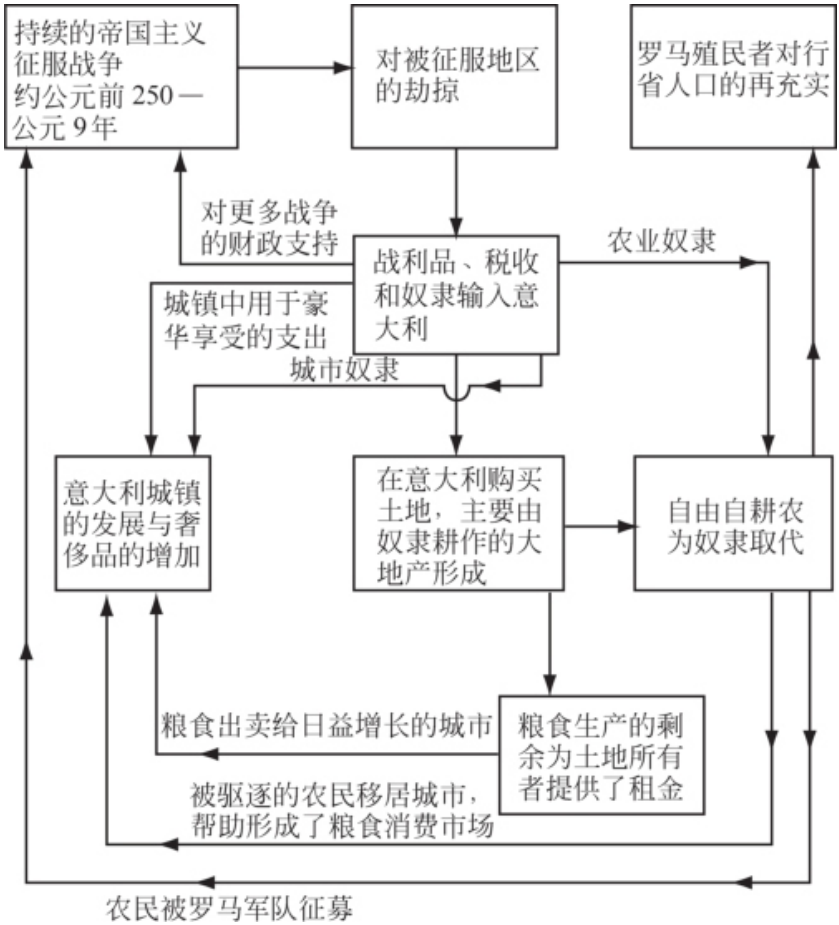

图7　罗马统治下意大利的“农业危机”产生模型

尽管该流程图精巧、直观而且有启发性，但它只是非常有限地简要描述了霍普金斯的论点。从被征服领土上获得最大好处的是罗马的精英阶层（如该流程图所暗示）。罗马最高的社会等级——元老们——是那些政治上活跃的大土地所有者，通过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和行省总督，主要通过以权谋私、贪污主要战利品赚得钵满盆丰。次高的等级——骑士——也是土地所有者，参政程度较浅，但他们通过税收和商业活动也分得一杯羹。精英阶层不仅仅是在意大利购买土地以创建他们的地产，同时通过武力把农民从他们的小块土地上驱逐出

去。精英阶层还圈占公有地（*ager publicus*），这也间接导致农民被迫离开乡村。农民的土地面积一般非常之小，他们必须利用公有土地才能维持生活。

古典世界相信公民权可通过在军队中服役而合法获得，那些与共同体利益一致的人更可能忠于共同体，农民因此是最优秀的士兵，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公元前107年，在罗马军团中服役一直有财产资格限制，并且大多数被征召者是农民士兵。公元前2世纪，罗马大规模的海外战争使得大量意大利农民长期远离他们的农场。当他们返回时，却发现自己的家庭已被从土地上驱逐；或者陷入了无法偿付的债务中，或者因为圈地被剥夺了使用必要的公有地的权利。成千上万的农民或死或伤，要么一去无回，要么由于受伤过重而无法再从事农业耕作。

人们认为将农民大规模地从土地上驱逐从两个方面严重削弱了共和国。首先，大批农民进入罗马，成为对生存状态日益不满的城市贫民的一部分。城市平民（*plebs urbana*）中切实的不满让某些元老，通常是那些来自最高贵家庭的人，把自己打扮成人民领袖（*populares*），并通过支持贫民的利益获得有巨大影响的职位。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精英阶层统一一致的政治原则出现严重分歧。第一次公开冲突发生于公元前133年，作为平民保民官的提比略·格拉古强行通过了向无地罗马公民分配土地的计划。我们的资料显示，他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担心能够并愿意在军队中服役的士兵不断减少。其次，军役造成的有产农民数量的锐减导致征兵时放弃了对财产资格的要求。这一变化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107年，并且和当年的执政官马略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后来，无财产的军团兵显然服役后无地可归，于是他们求助于将军，迫使政府为他们这些退役士兵寻找土地。与此同时，将军们在政治上也开始寻求士兵的支持，军团士兵和将军之间的这种互利关系最终导致共和国垮台，因为军队士兵愿意追随他们的指挥官与国家对抗。

对“农业危机”的这种“传统”理解近来受到部分学者不断的质疑。我们接下来考察这些“修正派”抨击的两条主线。首先，“修正派”们指

出，公元前2世纪的战争与公元前3世纪的战争无任何不同，如果是它引起了农业危机的话，那危机发生的时间应该更早。其次，他们争辩说，现有的考古资料并不支持传统观点。

任何基于共和国时期罗马人口统计的论证都必须被看作只是尝试性的，我们的资料零散，解释起来有难度，因此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意大利的公民人口要么急剧下降，要么快速上升。（公元前）2世纪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比公元前3世纪的战争带来的压力要小，因为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同时投入作战的军队数量从始至终都没有汉尼拔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时期多，另外战争也不是在意大利的领土上进行的。但其他因素发生了变化，罗马当时需要在某些行省永久性地驻军。罗马军队在整个公元前2世纪一直驻扎在西班牙（可能在山南高卢也有驻军，罗马那时如此称呼波河流域周围的北部意大利）；在马其顿，自公元前146年开始驻军。理论上，军团每年冬天应当解散，次年再征召新兵，但要遣散在西班牙服役的所有士兵并一年一度地在意大利征召新兵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军团并不在特定时期征募新兵，而是在一次战役前才开始征募。如果被征入西班牙的“驻防军”服役，那这场“战役”就似乎没有尽头。此类军队中的军团兵可能会远离他们的农场，一去就是数年。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33年的分地行动，就是企图解决这个长期形成的问题。公元前2世纪40年代，人们对可能出现的危机的强烈预感使得思想极其保守的政治家莱利乌斯也主张改革。可是，他作为反对改革的英雄，因为后来抛弃了改革的想法而赢得了“智者”（*Sapiens* ）的称号。

有人争辩说，我们所拥有的考古资料不支持意大利发生农业危机的“传统”观点。例如，我们的主要文献资料之一（普卢塔克：《提比略·格拉古传》，8.7）表明，提比略·格拉古改革的想法是他在穿过意大利的伊达拉里亚旅行时萌生的，当时他看到那里自由人稀少，农业由奴隶来从事。可是对该地区的考古调查似乎表明，那里充斥的是小农庄，不是大地产。由于他是个政治家，人们因此很容易认为他夸大并过度概括了事实，但考古学家也并非不会夸大其词。意大利的大多

数地区还未进行过考古调查，我们不应忘记考古学的局限性。考古学擅长考察的是土地如何得到利用（例如，种植的是橄榄还是葡萄），但它很少能告诉我们土地耕作者的身份（是所有者还是占有者，是佃户还是奴隶）。非常贫穷的人，比如说农奴，在历史上很少留下痕迹，所以考古调查不能充分反映这个群体的情况。

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所谓“传统的”和“修正的”观点，避免进行过于严格的二元区分。任何“修正派”都不会宣称，农民从未被驱逐出他们的土地；同样，也不会有任何“传统派”坚持说，所有农民都被从土地上驱逐。所争论的是程度问题，不是类别问题。并非所有的意大利土地都成为了大地产，这是由气候、地形和土壤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只有某些地区才适合大地产的形成。葡萄和橄榄在意大利的西海岸长势茂盛，畜牧业则在南方发展良好。与糊口式的农民田庄（“自给自足者”）不同，大地产按照创造利润的商业模式（“最大化者”）运作，需要进入市场。在古代世界，大规模陆路运输缺乏经济效率，因此，大地产限于那些接近其市场（城镇）或水路运输（可供航行的河流或港口）的地区。大地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一年中是不同的，收获时节需要大量劳力，仲冬时节的需要就少得多。对大地产来说，始终保持高峰时所需的奴隶数量不够经济，相反，大地产上只留尽量少的奴隶，农忙时节再额外雇工。因此，确保其地产附近有部分农民作为临时雇工，对大地产是有利的。在意大利的农业中，大地产从未占据主导地位（从其耕种的土地数量并非占多数的意义上而言），但它们确实成为了农业上的一个特殊类型。农民的农场为大多由奴隶耕作的大地产取代，这导致的问题愈来愈突出，以至于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提比略·格拉古和莱利乌斯都一致认为需要想办法补救。

罗马军队的“蛮族化”

时下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罗马军队的“蛮族化”导致了帝国西半部的衰落。下文将论述这种观点的依据。公元4世纪，当地军队被

大批蛮族队伍取代，并由蛮族自己的部落领袖指挥，按照蛮族原来的方式战斗；蛮族将士加入罗马正规军队后，罗马军队采用了蛮族的装备和作战方法。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使帝国军队的效率变得低下，更容易出现逃跑和叛变行为。公元5世纪，帝国东部的“蛮族化”被遏制，但帝国西部的蛮族化加强，于是东部帝国幸存下来，而西部帝国灭亡了。

“蛮族化”的观点成为修正派近来不断攻击的对象。有人指出，在罗马的正规军队中，4名军官和士兵中只有一个可能是蛮族。公元4世纪和5世纪早期，这个数字并无增加。还有人论证说，即使一整支正规部队开始都从某一蛮族部落征募新兵，这支军队也不会长期保留蛮族的集体特征，因为接替的官兵不是从最初的族群中招募的。与此类似，还有人认为，在正规军队中服役使得新兵将自己视作一名罗马战士而非蛮族人（法兰克人、哥特人〔5〕等等）。就我们拥有的文献史料而论，军队中的蛮族并不比当地的罗马人更容易叛变或者开小差。还有人指出，罗马军队总是采用敌人的装备和习俗，我们了解的帝国后期的一些作战习惯（例如穿裤装，或者使用日耳曼人的战争号子*Barritus*等）很难说会影响军队的效率。当时的注疏家宣称，对蛮族某些方法的借鉴，实际上改善了罗马军队的表现。维格提乌斯〔6〕（1.20）称，效法蛮族的一些做法对罗马骑兵是有益的。

当然，修正派的看法也并非无懈可击，我们只知道一小部分军官的民族背景，而对普通士兵民族背景的了解微乎其微。资料很少告诉我们某个人的族源，我们常不得不根据其名字来推断，如修正派承认的，这种方法很不可靠。我们知道，有些蛮族人采用了罗马人的姓名，而有些在帝国内征募的兵员使用的却是当地人的名字（凯尔特人的、色雷斯人的等等），这些名字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蛮族的姓名。新兵将自己看作罗马士兵而抛弃原有身份的说法也让人生疑。有一个老兵把自己描绘成*Francus civis*，*Romanus miles*，意思是法兰克人公民和罗马士兵（《拉丁铭文选集》〔ILS〕，2814）。当时有人注意到了军队蛮族化的现象。公元4世纪，在帝国东部某些地区的叙利亚语中，“哥特人”是“士兵”的俗称。在某些场合，当时的一些人谴责了军

队的“蛮族化”问题，较出名的是：公元5世纪早期，库列涅主教叙列西乌斯因皇帝阿卡狄乌斯在军队中雇佣大量蛮族士兵而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论王权》，1091）。修正派的观点假设，蛮族“同盟者”在他们自己军官的指挥下服役，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战斗，这对正规军队并没有产生“冲击”。但可以想象得出，那些和正规军队一起服役，却纪律更为松弛、对训练也不那么投入的蛮族可能会对正规军队产生有害的影响。最后，我们应当记住，修正派的论点只涵盖了某段历史时期：它最早追溯到公元378年罗马在阿德里安堡的大败，或稍后的公元425年。到公元5世纪中期，西罗马的战斗部队已经彻底“蛮族化了”。公元451年，在查隆战役中击败阿提拉的“罗马”军队，或者完全由蛮族组成，或者其中具有战斗力的部分由蛮族组成，这就看我们对史料如何理解了。

修正派的论点已经表明，军队的“蛮族化”不是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和东罗马帝国幸存的唯一解释，我们必须寻求其他的原因。可能的解释包括：西部承受了来自蛮族的更大压力，篡位的皇帝更多；它的边界较长；缺少战略上难以攻克的、类似君士坦丁堡那样的都城；更糟糕的税收基础；未能遏制拥有大地产的贵族家庭并创造出类似于东方的官僚“服役贵族”；未能将军队统帅吸收到帝国宫廷中。可是，有人仍会认为军队的“蛮族化”确实是西罗马灭亡的一个原因。

历史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本章是以下面三部分构成的：首先是“传统的”解释，继之以“修正派”的看法，然后是对后者某些方面的批判。如此安排表明所有历史解释都具临时性，它们属于一个持续过程的一部分。之所以如此，有许多原因，这里提出其中的三个。

新资料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经常找到，但它们的发现促使了新观点的产生。意大利的考古发现是重新评估共和国后期“农业危机”的因素之一。

由于受到所处政治或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通常会发生转变，而这常常引出对已知资料的新解释。德国学者在19世纪最后25年和20世纪前期首次对罗马晚期的军队“蛮族化”作了认真研究。考虑到当时新德意志帝国对集体身份的寻求，这些学者倾向于将罗马古代的日耳曼因素最大化并构建出一支非常“日耳曼化”的罗马军队也就不足为怪了。另一个例证是对“重装步兵革命”这一传统观点的反对。它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反对历史变革社会决定论的思潮的一部分。

这里所提出的最后一个解释更具犬儒味道：每一代都重新书写历史，因为著作需要出版，人们需要工作。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要求他们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他人的解释，因此他们不会，也不应该靠重述他人的观点作为职业。如一个古代史学家所说，这是“正常的、循环的、内源性的变化，因为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在理解和解释过去时，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抛弃其导师们主导的范式，以寻求‘进步’。”

注释

〔1〕当代古典学者，曾任牛津大学教授，著有《希腊僭主》等。

〔2〕德国古典学者，其最近的著作有《荷马与特洛伊》等。

〔3〕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诗人，据说其诗歌对斯巴达人赢得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发挥过重要作用，这是重装步兵交战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

〔4〕当代古典学者，曾任剑桥大学古代史教授，著有《征服者与奴隶》、《死亡与再生》等。

〔5〕均为日耳曼人部落，罗马帝国后期曾入侵西罗马帝国，分别建立东、西哥特王国和法兰克王国，西哥特人还于公元410年攻陷过罗马城。

〔6〕罗马帝国后期的作家，著有《兵学大纲》。

第四章

思考战争

“9.11”之后，一个超级大国发动了一场“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主要表现为两场很大程度上的“常规”战争，结果导致两个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政权的变更”。如今，不同形式的战争会影响所有的人，因此我们都须对战争有所了解。杰出的哲学家理查德·索拉吉在思考当时一触即发的战争的道德性问题时，综合考虑了各种观点，尤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的看法。古典世界的思想家们相当关注战争，本章介绍了他们对战争的原因、正义性、可接受度的看法。本章的主题不仅涉及过去的这些思想，还有助于我们在此基础上理解有关战争的现代讨论和看法。

古典时代的希腊人

古典时代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各把一场战争作为他们研究的主题，它们分别是希波战争（公元前480—前479）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他们分析了战争的原因。对希罗多德来说，复仇、亲缘关系和义务是历史上战争爆发的关键原因。为解释亚洲的波斯人为什么对欧洲的希腊人作战，他首先详细论述了神话中双方所做的一系列错事，由于他觉得无法判断这些神话的真伪，希罗多德选择从他了解的地方开始叙述。

吕底亚（在小亚细亚）的克罗伊索斯决定攻击新兴的波斯强国。随着克罗伊索斯的失败（公元前547年），爱奥尼亚的希腊人（今土耳其爱琴海沿岸）落入波斯的统治。当爱奥尼亚的希腊人暴动时（公元前499—前494），其族人雅典人援助了他们。这导致了波斯对马拉松的远征（公元前490年）。在那里的失败引发了公元前480—前479年波斯的主力入侵。对于克罗伊索斯引发这一系列事件的行动，希罗多德提供了多种理由。一种是从人的立场加以解释，包括克罗伊索斯的两个愿望：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和为自己的连襟在波斯人手中的遭遇复仇。另一种是从神的立场加以解释：神灵对吕底亚王室复仇

的承诺[1]得到了应验。这两种解释并不应被看作相互矛盾，相反，它们是互为补充的。

修昔底德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把神的作用弱化为不过是“偶然或者运气”（*Tyche*）。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时，修昔底德对造成交战双方不和的公开原因和“最真实的”原因——雅典势力的增长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作了著名的区分。虽然他们列举的原因和现代历史学家的看法差别很大，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这些具体战争原因的分析似乎仍然是合理而精辟的。可是，两人都不太关注他们所叙述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也没有在总体上对战争的原因进行任何明确的讨论。

我们也许期望在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找到对战争更具总括性的论述。他们本人关注着战争，讨论了谁应当参战、对参战者的教育、理想国家所处的战略位置和拥有的防御工事，以及它的军事指挥和组织情况。他们也确实讨论过战争中的公正性问题，例如对自己战士的奖惩，对敌人的处置等。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广泛或系统地讨论过战争的正义性。他们与此最接近的论证是对希腊人与蛮族之间的战争的论述。这些基于“种族模式化”让他们脸上无光的论调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已经简要论及。在《理想国》（469b—471b）中，柏拉图称，希腊人和蛮族人之间的战争属正常范畴，而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不正常。因此，对后一类战争应加以限制，但不应限制前一类。希腊人不应相互奴役，这样他们就能齐心协力对付蛮族。在《政治学》（1333b38—1334a2）中，亚里士多德声称军事训练有三个目的：防止那些受训的人沦为奴隶；赢得领导权，并为被领导者（即其他希腊人）谋利；奴役那些应当做奴隶的人（即蛮族）。后者呼应了《政治学》的开篇，在文章的开始亚里士多德创建了奴隶制合理理论。

我们可以部分从哲学家的规定性论述中，部分从历史学家的叙述中了解战争中可接受行为的标准。圣所和得到国际承认的节日（例如奥林匹克赛会）不得侵犯。可是，出于实际考虑的战争可能会无视这些约定。圣所拥有财富，且常常处于有利的战略位置，似乎仅有使者

可总享有豁免权，人们当时广泛接受的看法是：战俘可以被赎买或被奴役。处死战俘是否合理存在争议。在攻克一个城市后，胜利者完全有权杀死男子，并奴役妇女和儿童。可是，杀死非战斗人员在道德上令人质疑。

在希腊人的政治语篇中，对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讨论似乎非常流行。例如，演说家伊索克拉底规劝塞浦路斯国王尼科莱斯永远不要进行非正义战争（《致尼科莱斯》，24）。可是，是什么使战争具有正义性或非正义性，鲜有详尽论证。公元前4世纪有一篇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对话，在古代，该对话（《阿克比阿德斯篇》）可能被错误地归于柏拉图名下。这篇对话提到如果敌人不曾有任何过错，对他们发动战争即非法。针对欺骗、暴力或劫掠等恶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需要注意的是，战争针对的错误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或潜在的攻击。欺骗也是一种错误。与多数近代理论包含的观点不同，古典时代希腊人认为正义的战争不一定是自卫战争。

古希腊人没有关于正义战争深入和系统的理论，这或许表明他们认为战争状态是人类的正常状态，因此不需要详细的理论证明。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篇中的一个发言人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绝大多数人所谓的‘和平’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词语，事实上，从本质上来说，所有的城邦在任何时候都处在对所有其他城邦不宣而战的状态”（626a）。这个发言人嘲笑多数持相反观点的人无知（625e）。柏拉图引入这个观点的目的是要驳倒它。

希腊人不注重对战争正义性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战争是正常状态。相反，他们认为战争的原因显而易见，为人们普遍赞同，而且被认为存在于人性之中，所以对一个成熟理论的需求并不强烈。绝大多数希腊作家一致认为战争的原因是对利益的渴望，对荣誉的追求以及自卫。如修昔底德借雅典人之口所说，这一切说到底是安全、荣誉和自身利益（1.76.2，并见前引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那段论述）。对希腊人来说，寻找战争原因不难，对恶行的惩罚没有时间限制，况且所有希腊人的城市都处于亲缘关系和盟友的网络之中，因此正义战争的原因常常就是现成的。敌人，或者敌

人的盟友，在某个时候对你自己的人民或者盟友犯过错误，这种说法并非虚伪的言论。

共和国时代的罗马人

在共和国时代的罗马人那里，我们似乎找到了对“正义战争”系统的、正式的思考。在缔造庞大且稳定的帝国过程中，特别是公元前2世纪征服了希腊人的东部领地以后，罗马人感到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拥有的强权和赢得强权的战争是合理而正义的。最好的相关资料虽然来自西塞罗的一个残篇，但如我们会看到的，其中表达的观点并非不典型。

在《论共和国》的第三卷中，西塞罗写道，理想的国度不应进行战争，除非是为了信誉（*fides*），或者是为了国家安全和健康发展（*salus*，3.34）。在另一段中，他提到，正义战争必须有原因，要么是复仇、要么是防御（3.35），但不应就此认为只有自卫或保卫盟友的战争是正当的。正义战争包括这类战争，但上述论点还有更深刻的意义。为保持信誉罗马要担负捍卫盟友的义务，但这是双方面的，盟友亦应忠于罗马。自公元前2世纪起，罗马人认为，他们所有的盟友，即我们所称的附属国，都处于从属地位，任何与罗马有外交关系的民族都被视为属于此类。那些不能服从罗马意愿的行为就是对忠诚的破坏，所以罗马的“复仇”战是正义的。不仅如此，任何对罗马的伤害，不管是对罗马的进攻，还是对罗马盟友的攻击，都可能遭到报复。外族对罗马人的敌视，甚至仅是某一外部强国的存在，都可能被罗马人认为是对其安全的威胁，所以罗马的侵略战就是正义之战。

在《论共和国》保存下来的另外一段中，西塞罗称，除非经过宣战（*denuntio*）、战前提出正式警告（*indictio*）和索赔（*rerum repetitio*），否则不存在正义战争。这里提到了负责宣战的罗马祭司团举行的被称为*Fetiales*的仪式。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些仪式何时开始，也不知道它们会持续多久，但它们确实揭示了罗马人对战争的态

度。罗马人认为，这些仪式最初由三个阶段组成，西塞罗对这三个阶段进行了逆序描述，第一阶段是索赔。仪式暗示敌人对罗马犯了错误（否则何来要求补偿？），但这并不一定就是指对罗马或其盟友发动过进攻。此外，确定赔偿标准的是罗马人，而且他们知道索要的赔偿是赔付方无力承担的。这些仪式与其说是与侵略战争行为的坚决决裂，不如说是一种将争端置于众神的法庭前进行裁断的正式方式。神灵的裁决影响着战争结果，如果胜利者是罗马，那战争就是正义的。胜利后，罗马人常强迫战败者支付战争的开销，这样，战败方被迫承认罗马的事业是正义的。

内战

内战的威胁在古典世界无时不在，这引出了严重的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如希罗多德所说（7.102.1），希腊总是与贫穷为伍。有限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导致所有希腊城市的人口都被划分成大多数人的“穷人”集团和极少数人的“富人”集团，这意味着总是存在希腊人称为内讧（内争或战争［stasis］[2]）的可能性。公元前5世纪，内讧演变成政治化的冲突，冲突的一方支持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政治），另一方则期望由少数人统治（寡头政治）。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以后，城市内发生内讧时，政治家们越来越愿意请求外来力量干涉，利用外部势力帮助解决争端。先是雅典，后是底比斯，他们倾向于支持民主派；而斯巴达和后来的马其顿通常支持寡头派。

关于希腊城市中发生的内讧，我们最好的资料是修昔底德关于公元前427年科西拉（科孚）事件的叙述（3.69—85）。内讧源自法庭纠纷，首先诉诸暴力的是寡头分子，但民主派的行为最为残暴。

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死亡。像这类事件中常见的那样，人们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行为超出极致。父亲杀死了儿子；人们被从神庙里拖走，或者就在祭坛上被杀戮。有些人实际上被困在了狄奥尼修斯神庙中，并在那里惨死。

（修昔底德，3.81，R. 沃纳英译）

修昔底德之所以长篇叙述这些事件，不是因为它们内在的重要性，更多的是因为科西拉的内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此类事件的第一次大规模爆发，因此他可以以此为参考对整个事件进行反思。就像上段引文所揭示的，修昔底德认为，内讧不仅导致了政治的崩溃，还是对社会、宗教和道德的颠覆，甚至使语言也发生了变化。例如，鲁莽的攻击变成了勇敢。对立派别的领袖们把战争的动机描述得冠冕堂皇：发动战争是为了多数人的平等或稳固的政府；但这些仅是追求私利的幌子。修昔底德的这段论述是为支持他的关键论点：战争让希腊人的品性野蛮化了。修昔底德认为，只要人性依然如故，那这种内讧总有发生的可能，但在外部和平时期，这样的行为不会那么残暴，用他那著名的论断来说就是“战争是一个残酷的老师”。

如果你是一场内战的参与者，你眼中的战争会大不相同。虽然罗马建城的神话包含了亲族仇杀，罗慕路斯杀了勒莫斯[3]，而且在经历了导致共和国政府垮台的内部冲突后，内战的阴影在罗马人的心头仍然挥之不去，但与希腊城市比较，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在避免内战方面做得相当好。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它对其他强国实行的无情的军事打击政策。可是，内战一度不仅在现实中而且也在思想上构成威胁。公元前63—前62年，罗马发生了“喀提林阴谋”[4]，阴谋在武装冲突中破产。有关这个事件的资料比其他大多数事件的资料要完整、详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让我们对该事件的评估更加困难。我们的主要资料来自西塞罗，他宣称自己是阴谋的主要反对者。甚至在武装冲突开始前，西塞罗在自己的演说《反喀提林》中就把阴谋描绘为“战争”。对喀提林的战争也因此被描绘成一场反对奢侈、疯狂和犯罪的战争（2.11），一场美德对恶行的战争（2.25）。其他内战都很糟糕，但“喀提林阴谋”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其他内战以变革政府为目标，而这次内战的目的是要消灭共和国（3.24—25）。阴谋者不仅企图把野蛮的高卢人拉入阴谋，而且他们本身变得就像是野蛮人。他们有罪犯的大胆妄为（*audacia*）、不虔

敬（*scelus*）和狂怒（*furor*，1.31等处）。内战之中，有必要说明对手已经放弃了同胞应得到的对待，相反，由于对手的行径如同蛮族甚或比蛮族更恶劣，他们应被视为国家的敌人（*hostes*）。当与另一个罗马人战斗时，如果能表明他根本就不配做罗马人，那对其实施打击时将没有顾虑。

喀提林阴谋发生大约20年后，拉丁历史学家萨卢斯特（Sallust）写下了两篇专著来揭示罗马人的道德堕落，分别是《喀提林阴谋》[5]和《朱古达战争》。萨卢斯特的《喀提林阴谋》模仿了修昔底德的风格，他谴责政治领袖们打着为公众谋利的旗号追求个人私利（38）。可是，对萨卢斯特来说，内战的起因不仅不是外部战争反而是因为缺少外部战争。和平和繁荣使人们先是产生了对金钱的贪欲，而后又产生了对权力的贪欲（10）。罗马人持有一种独特的观念，认为可怕敌人的存在是必要的。如萨卢斯特在《朱古达战争》中所述，迦太基毁灭之前，“公民之间不曾因争夺荣誉或权力而发生争斗。对敌人的恐惧（metus hostilis）让这个国家的国民保持着良好的道德。”（41）

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人

罗马元首制治下的希腊哲学家的处境与他们的前辈们比较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在非希腊人的专制君主——罗马皇帝的统治下生活。该专制统治很稳固，虽然个别皇帝可以被废黜，但改变制度的现实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帝国宣称对全世界至少是对世界上最好的区域享有统治权，除偶尔爆发的内战外，战争只发生在遥远的边境地区，戍边的职业军人在那里征战。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变化所造成的一个后果。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战士怀有敬意，元首制下的希腊哲学家却对他们持一种混合了厌恶、鄙视和畏惧的态度。他们对战争本身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这里要讨论的是其中两种观点。

古典时代的哲学家们谴责为荣誉或利益发动的战争，但不会谴责

自卫战争，因此他们从不曾否认正义战争的存在。元首制时代，哲学家们继续批评那些追求个人利益或者野心的战争，但他们的批评更加深入。狄奥·克里索斯托（《演说》，80.3）和爱比克泰德（4.1.171 - 172）都否认为政治自由发动战争的正当性，从逻辑上说，他们实际上否认了任何自卫战争的正当性，并对所有战争的正当性表示了怀疑。这种和平论调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不大可能存在自卫战争，对自卫战争合法性的抛弃可能就更容易理解。此外，这些人都是斯多葛学说——元首制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学派——的追随者。对一个斯多葛派来说，不会影响人内心的事物就是无关紧要的事物。因此，由于他们相信战争是由于人类的残忍，或者错误的判断（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雷同的）所引起，破坏了世界的和谐，它的邪恶，例如置人于死地和奴役他人，和一个善人不相干。爱比克泰德坚称，置人于死地实属不道德行为（3.3.15），狄奥·克里索斯托写过两篇演说稿（15和16），以此来证明“石不成牢，心灵无羁。”

鉴于他们如此形而上地强烈反对战争，当我们看到下面的事实时，不免会吃惊。斯多葛派的狄奥·克里索斯托在其第二篇演说《论王权》中，为战争进行了全方位的辩护。他的论证如下：国王（或皇帝）之所以进行统治，是因为他拥有所有美德（*arete*），而美德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类之博爱（*philanthropia*），这种爱表现为对臣民施予的恩惠。因此，如果国王遭遇暴君，他应该击败暴君，从而可以在未来向暴君的臣民赐予恩惠。同样，他应当和其他的国王作战，胜利者往往拥有更多的美德，因此会给战败者的臣民以更大的恩惠。该论证明显存在漏洞，因为它设想战争胜负是通过统治者之间的个人决斗来决定的，所有的战争都以彻底的征服告终，这种精心编织的理论由来已久且极具危害性。

罗马统治下的基督徒

战争对基督徒而言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主战的《圣经·旧约》

如何能与主张和平的《新约》相调和？如前所述，德尔图良和奥里金等早期基督徒倾向于和平主义，他们对《旧约》中上帝及其选民无休止的“争战”进行了寓言式的诠释。由于不希望与异教徒的政权相敌对，他们宣称，虽然他们不会为世俗而战，但会为帝国的稳固祈祷，这样他们就成为一支宗教军队。异教徒自然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基督徒只向他们唯一的神而非所有神祈祷，正是这样的祈祷对作为帝国基础的神圣和平（*Pax Deorum*）构成了威胁。随着君士坦丁大帝（307—337年在位）皈依基督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对一种帝国宗教来说，和平主义不是现实的选择。虽然我们并不能确定圣奥古斯丁（395—430年的希波主教）的观点对他同时代的人影响到底有多大，但在古典晚期和中世纪西方战争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家。由于不懂希腊语，奥古斯丁没有直接征引信奉异教的希腊哲学家的作品，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他广泛阅读过拉丁语文献，并参考了西塞罗的作品。尽管就我们所知，奥古斯丁从不曾广泛、系统地讨论过战争问题，但通过散见于他多部作品的一些段落，可以看出他试图证明基督徒参与战争是可以接受的。从西塞罗的论著和罗马的传统中，他接受了正义战争必须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错误的回击（《旧约全书前七卷的若干问题》，6.10），通过考察《旧约》的历史，他提出了下述证据：错误不一定是指暴力袭击（同上，4.44）。无论是对基督徒还是对异教徒而言，正义战争并不局限于自卫一种。

奥古斯丁的思想中，有两部分具有明显的基督教思想特征。首先是诉求权力当局。虽然认为个人杀戮不可接受，哪怕是自卫，但对一个士兵来说，取人性命是他的合法使命（《书信集》，47.5）：

> 如果一个义人正好是一个邪恶的君主的属下，那他可以根据君主的命令参与战斗，保卫公共和平。他得到的命令可能不违反上帝的律法，也可能违反与否尚无定论（这种情况可能是：罪恶的命令只与有罪的君主有关，而士兵的服从角色让他清白），既然如此，那根据上帝的旨意参战的士兵，该是更加清白，犹如所有为上帝服务的人都知道，上帝不可能发出任何罪恶的命令。

（《反福斯图斯》，22.75 L. J. 斯威夫特英译）

在这里，部分责任（而且仅仅是部分）被转嫁给了统治者。它所暗示的是，如果一个邪恶的统治者发布的命令明显违背上帝的律法，那服从命令的士兵就有罪。由于奥古斯丁的看法源自基督教对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区分，而且他亲历了蛮族入侵者发动的战争，这种诉求权力当局的做法并非附和此前异教徒关于战争的思想。

奥古斯丁的另一个具有基督教思想特征的观点是他对内心的意向和外在行为的区分。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正是参与者心灵的状态，“在战斗中摧毁敌人的应该是必胜的决心，而不是愿望（《书信集》，189.6）。”在这一片断中他讲到，上帝之所以允许进行战争是为了换来和平。而另外一个片断讲的是上帝之所以允许战争是为了纠正人类道德上的错误（《上帝之城》，1.1）。在第三个片断中他提到，用语言消灭战争比用利剑消灭敌人更为光荣（《书信集》，229.2）。用基督教的战争思维模式来看，为了敌人自身的利益与其交战，几乎就变成了基督徒的义务。

如果一个国家遵守基督教的律法，甚至战争都可能会在不乏仁爱的情况下进行，那在抵抗的民族被击败后，更容易以虔诚和正义为基础达成和平盟约。

（《书信》，138.14）

注释

〔1〕 据希罗多德，克罗伊索斯的祖先是靠谋杀前王登上王位的，因此注定要受到报复。

〔2〕 这个词的意思比较宽泛，指城邦内公民之间发生的斗争，可以是一般的争吵和小冲突，也可以是大规模的内战，姑以内讧名之。

〔3〕 据说两人是孪生兄弟，建造罗马城时发生冲突，勒莫斯被杀。

〔4〕 喀提林为罗马贵族，连续竞选执政官失败后，企图通过武力夺取政权，为西塞罗挫败，喀提林的暴动也被镇压。

〔5〕 也译撒路斯提乌斯，其第一部著作拉丁原文的意思是《对喀提林的战争》，但中文一般译为《喀提林阴谋》。这里遵从传统。

第五章

战略

战略还是幻想？

古代资料中包含了许多领袖和民族宏大却未能实现的战略计划，这成为研究古代战略最有趣的资料。这里挑选的战略故事通常为现代学者忽视或摒弃，但这些故事可以让我们充分了解古典文化是如何从军事角度来看待世界的。

公元前41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发动了对西西里的远征。传记作家普卢塔克（约50—约120）宣称，对雅典政客阿尔西比亚德斯而言，西西里不过是一场征服战争的起点，征服的对象包括迦太基、利比亚、意大利，而后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在普卢塔克笔下，这个计划让雅典的老老少少着迷，他们在角力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的沙地上勾画西西里的轮廓，以及迦太基和利比亚的位置（《阿尔西比亚德斯传》，17）。当时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于计划中的系列战争目标进行了不同的排序，他借逃亡斯巴达的阿尔西比亚德斯之口称：首先是征服西西里，然后是意大利的希腊人，此后是迦太基人，最后是伯罗奔尼撒人（6.90）。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一份备忘录被制订了出来，据说其中包括他进一步的征服计划：首先是迦太基，然后是利比亚和西班牙沿岸民族，再回到西西里（狄奥多：《历史集成》，18.4）。另一份资料把他的征服计划细化了（库尔提乌斯·鲁弗斯，10.1.17—19）：亚历山大的目标是击败迦太基人，然后横穿努米底亚沙漠（北非）前往西班牙，绕行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海岸，最后返回伊庇鲁斯（阿尔巴尼亚）。第三份资料称，有些作家描述的计划更为大胆：绕航非洲，经赫拉克利斯柱（直布罗陀海峡两翼的高山）进入地中海，最后把利比亚和迦太基纳入到他帝国的版图中（阿里安，7.1.1—3）。

公元前44年，正当恺撒将要离开罗马前往东方，准备对帕提亚帝国——该国以现代伊拉克和伊朗为中心——发动战争之时，他遇刺身亡。普卢塔克认为恺撒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在打败帕提亚人后，他有

意越过高加索山脉向黑海进军，击败西徐亚人（多瑙河以北的民族）和日耳曼人，然后通过高卢返回意大利（《恺撒传》，58.3）。

当时的人们认为，蛮族可能野心勃勃。公元前63年，当本都（位于小亚细亚）的米特拉达梯被逐往克里米亚时，有人相信米特拉达梯曾计划环黑海行进，再沿多瑙河而上，借助某些高卢人的帮助，通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卡西乌斯·狄奥，37.11.1；阿皮安：《米特拉达梯战争》，102，109）。萨珊波斯的第一个国王阿达西尔于公元3世纪20年代推翻了帕提亚人的统治，据那些罗马帝国内的人猜测，他希望重新占领所有曾在阿契美尼德的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前330）统治下的领土，因此，萨珊王朝被认为对罗马在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领土构成了威胁（卡西乌斯·狄奥，80.4.1；希罗狄安，6.2.2）。

记述这些故事的作家们是用这些故事来说明其中人物的雄心。人们对此的理解可以是正面的——拥有远大抱负的人对荣耀的追求（阿里安对亚历山大的评价），也可以是负面的——自不量力的傲慢（库尔提乌斯·鲁弗斯对亚历山大的评价）。对于蛮族，人们的评价几乎总是后者，因为他们被认为在本性上易有这种不合理的欲望。

现代学者倾向于贬低这些故事的意义。他们或者把这些故事“合理化”到一个更易“实现”的程度，或者弃之不顾，不是将它们当作那个时代一厢情愿的想法，就是认为它们是后来杜撰出来的。他们的批判或许是有些操之过急了。汉尼拔翻越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从西班牙进军意大利，亚历山大对从希腊到印度的广大地区的征服，这些事情如果不是真的发生过，很可能也会被看作是白日梦而已。

让我们对其中一个例证——雅典在西方的野心——作更深入的考察。普卢塔克的资料可能来自修昔底德，因此不具有独立资料的价值。修昔底德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该计划的现实性的段落。阿尔西比亚德斯的一篇演说对该计划作了最充分的说明，演说的目标是说服斯巴达人重新对雅典开战（6.90）。阿尔西比亚德斯在此处完全有理由夸大其词。这个“宏大的计划”显然不是在讨论派出远征军计划的雅典人民大会上公开提出来的（例如6.16—18），也不

是在将军们到达西西里后举行的战略会议上提出来的（6.48）。从西西里开始，雅典人实际上请求了迦太基人的援助（6.88）。另一方面，修昔底德个人认为雅典人希望占领整个西西里（6.6；参见6.1），阿尔西比亚德斯的目标是迦太基（6.15）。任何占领西西里全岛的意图，自然会与迦太基发生冲突，因为它控制着岛上的城市。雅典人从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那里得到了帮助（6.103），这显示了他们在西部地中海势力范围的广大。修昔底德笔下西西里城市叙拉古的一位政治家在一篇演说宣称，迦太基人总是担心他们有一天会遭到雅典人的进攻（6.34）。在公元前424年的一部喜剧中，已经提到了雅典进攻迦太基的可能性，尽管表述带着喜剧的夸张（阿里斯托芬：《骑士》，1302—1305）。虽然该政策并未公开，但大家都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如果雅典在西西里的远征获得更大的成功，那这个“宏大的计划”当时一定颇具吸引力。

如果我们了解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脑海中是如何构建世界的，那这些宏大计划可能会显得更加“理性”，更有可能实现。在我们前面概述的计划中，某些地理特征凸现出来：海岸、河流和山脉。这些都表明了古人思考地理的方式。由于缺少精确的地形图，与我们不同，他们倾向于不按一片片领土——所谓的“地图式思维”——来思考，而是按一条条线——所谓的“里程式思维”——来思考，例如考虑的是海岸线、河流和山脉等。图文并茂的《周航记》就是这种“里程式思维”的产物；《周航记》标明了沿海岸航行时遇到的港口和地标、巡游路线、沿途所有的歇脚处和城镇名称。制订战略计划时，人们依据的正是这些东西。《周航记》和线路图犹如伦敦地铁地图，既实用，又和实际地形无关。

当然，古代地理学家尝试过对世界进行准确的地形描绘，这里提出需要注意的三点。第一，虽然他们的作品在早期现代欧洲的“发现时代”极其重要，但它们仍属专业文献，对古典世界很少产生广泛影响。第二，他们估计的“有人类居住的世界”（希腊语是*oikoumene*，拉丁语是*orbis terrarum*），即他们已知的世界，以及周围那些或多或少属于传说的地区范围实在是太小。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论证道，

人类居住的世界大约8046英里“长”（从东到西），“宽度”（从北到南）则大约是长度的一半。第三，仍据斯特拉博，人类居住的世界被认为是个东西向的椭圆，时人认为的多瑙河以北的欧洲比实际的要小得多（因此，这使米特拉达梯和恺撒的计划对于那个时代的人而言，不像在我们眼中那样令人生畏），西非和欧洲也被大大压缩（古人对雅典人和亚历山大“计划”的态度也相应受其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地理学的重要性对古代的战略思维来说是第二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所想的是征服民族而非地区。他们期望征服的民族是蛮族，而且如同在第一和第二章指出的，他们认为蛮族生来就是劣等民族。针对一个由劣等民族组成的狭小世界的庞大征服计划若包括穿越或沿某些河流、海岸或山脉征战，这对古人来说，可行性比我们认为的大得多。

罗马帝国的“宏大战略”？

1976年，美国战略分析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出版了《罗马帝国的宏大战略》一书。如我们将看到的，由于各种原因，少有著作引起了古史学家如此多的争议。勒特韦克著作中描述的两种帝国模式（见图8）为我们了解他的思想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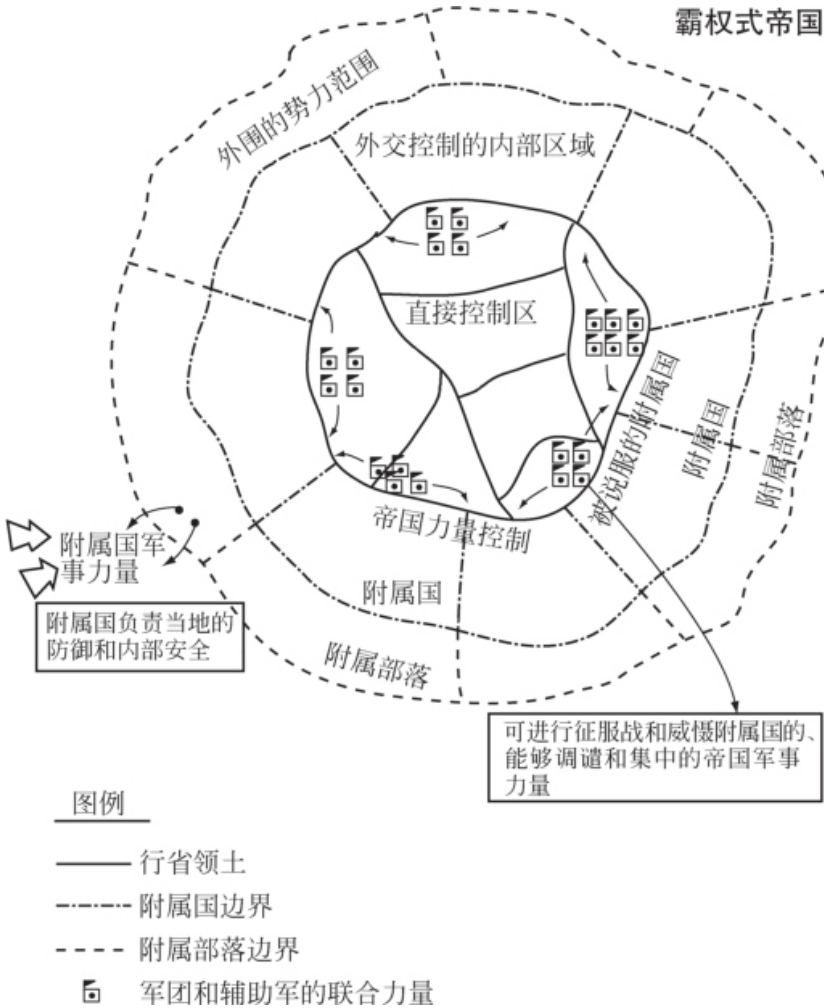
霸权式帝国
外围的势力范围
外交控制的内部区域
直接控制区
被说服的附属国
附属国
附属部落
帝国力量控制
附属国
附属部落
附属国军事力量
附属国负责当地的防御和内部安全
可进行征服战和威慑附属国的、能够调遣和集中的帝国军事力量
图例
行省领土
附属国边界
附属部落边界
军团和辅助军的联合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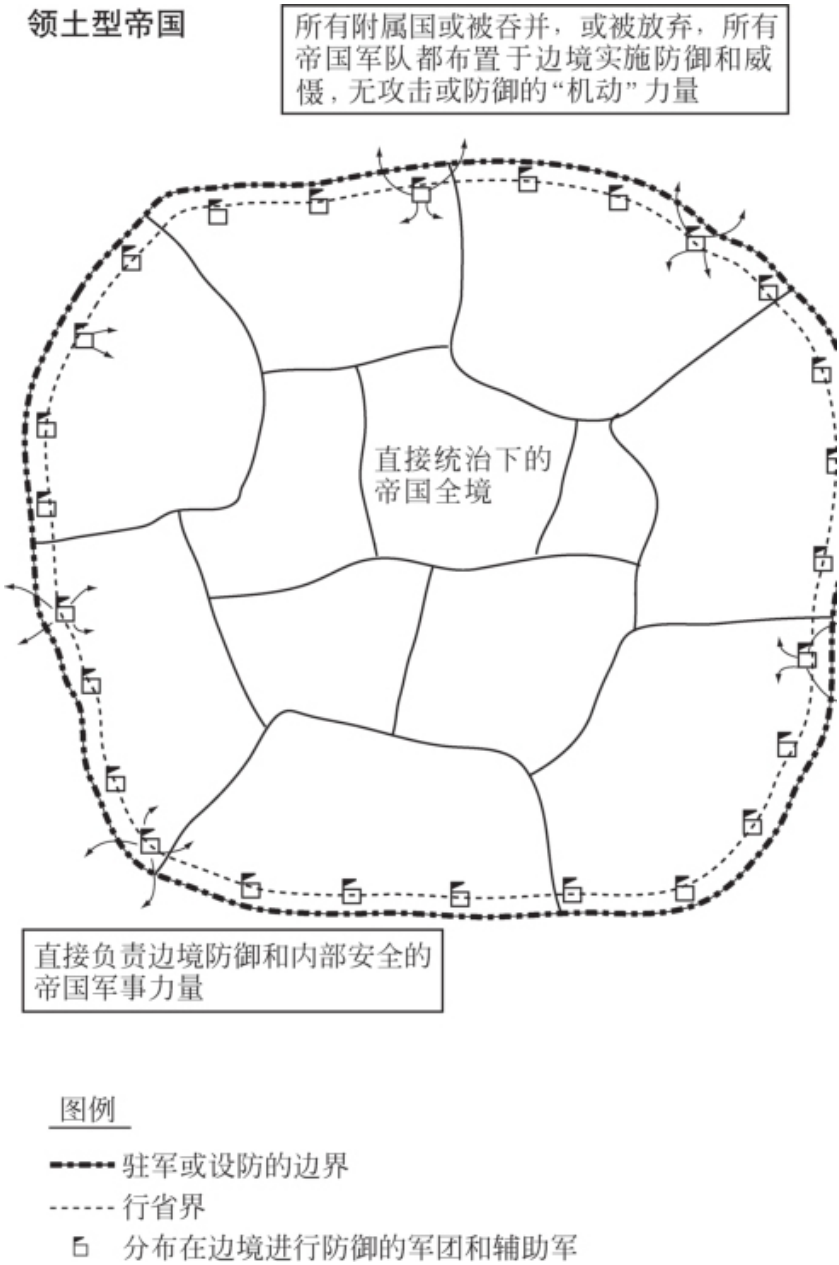

图8　勒特韦克关于罗马帝国的两种模型

在第一种模式中，勒特韦克概要地阐述了他对共和国后期和元首

制早期（至1世纪中期）罗马帝国的看法。罗马帝国是个“霸权式”帝国，在罗马直接统治的地区（意大利和行省）周围，是一圈“附属国”，后者的责任是维护它们自己的内部秩序，应付较小的外来威胁，以及推迟构成威胁的行为。由于罗马的军团（元首制时代是职业的辅助军）不负责帝国边境的日常防御，它们成为机动的战略储备力量，用于消灭那些有独立倾向的“附属国”、出兵附属国消除潜在的严重威胁，以及寻求进一步的征服。

第二种模式中，勒特韦克提供了关于1世纪后半期到3世纪后期帝国通行的宏大战略的图景。这是一个“领土型帝国”，“附属国”已经消失，军团和辅助军驻扎在边境沿线的永久性基地中。进一步的扩张是危险的，因为增加一处边境地区的军队，意味着抽调其他边境上的守军。勒特韦克暗示，这一宏大战略是皇帝及其参谋们专门制定的。这是一种防御政策，目的是使用“节约兵力”，因此对地理情况细致考量，选择那些良好的、便于防守的边界——最理想的是天然边界（河流、海洋、沙漠或者山脉）——加以巩固；如果必要，则以人工工事（城墙、壕沟、清理过的开阔地，如哈德良长城）取代之。防御性战略并非消极、被动。高效的情报传递让罗马军队在危险到达边境之前就可以先行阻截。

勒特韦克的观点获得了某些支持，但学术界的主流对其是敌视的。这种敌视或许来自下述事实：勒特韦克并非职业历史学家，因此他被视为外来闯入者。可以肯定，勒特韦克的著作反映出的对在“附属国”领土上从事战争的热情，让冷战时期的西欧人读来感觉颇不舒服（勒特韦克是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政府的安全顾问）。无论当代的因素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们最好记住，现代历史学家并不是在历史真空中从事研究），尽管勒特韦克的批评者倾向于过于简单化地对待他的论证（如同在这里由于篇幅所迫我也只能如此），一些对“罗马帝国的宏大战略”的批评还是相当有力的。这里我们可以考察其中几个。

“附属国”从不曾消失。当时存在着把“附属国”转变为行省的趋向，特别是在东方，但罗马人从不曾停止把在他们直接控制之外的地

区转变成“附属国”的尝试。

另一种批评是概念上的。罗马人缺少必要的思维工具来构想像勒特韦克所描述的那样宏大的战略。前一节我们已指出，罗马人缺少准确的大比例的地形图。虽然他们保存了一些记录，包括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以及授予受宠的外国人公民权的记载，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外交档案或者对外政策档案。决定由皇帝做出，人们认为他会咨询其顾问团（*consilium* ），可是，顾问团是由皇帝邀请的那些人组成的，而且皇帝可以推翻他们的意见；此外，我们从不曾听说有专门领域的对外政策专家，或者是一般的外交专家。当时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76.9.4）告诉我们，皇帝塞普蒂穆斯·塞维鲁公元198年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战争时就遇到了缺乏信息的问题。而这已是罗马初次在那一地区作战以来大约200年以后的事情了。

历史上有人表达过防御的理想。公元2世纪的历史学家阿皮安描述道，罗马人在帝国周围建立了“一圈庞大的军营”（《序言》7）。其后一个世纪的另一历史学家希罗狄安说道，奥古斯都“用巨大的障碍物、河流、壕沟、山脉和无人区把帝国包围起来，以此加强帝国的防御力量”（2.11.5）。但这样的论断，与勒特韦克那精心设计的地理大战略无法相提并论，将其和那些有关进一步征服的理想摆在一起也不相协调。希罗狄安还宣称，如果皇帝马克西姆斯不是为一场叛乱所阻，他有可能一直征战到海边，征服这些地区的日耳曼人，文献确信这会是一桩好事。（7.2.9）

罗马人用他们认为理性、但我们看来怪异的话语讨论战略问题。卡西乌斯·狄奥曾在塞普蒂穆斯·塞维鲁的顾问团里任职，在写到皇帝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吞并时，他说，

> 他过去常说，他将一大片领土纳入帝国，并把它变成了叙利亚的堡垒。事实恰好相反，这一征服一直是不断战争的根源，并造成了我们巨额的花费。它带来的利益很少，而耗资巨大。（75.3.2—3）

我们不必相信卡西乌斯·狄奥曾真向皇帝表达过他的这些看法。但

除塞维鲁对帝国主义的公开溢美之词外，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篇相当平常的战略文章。但卡西乌斯·狄奥对这个皇帝另一次远征给出的理由却大不相同。

塞维鲁由于看到儿子们正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越变越糟），军团因为懒惰而衰弱，于是发动了对不列颠的战争。（77.11.1）。

战争和后勤：总体考虑

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进行一场战争，无论胜负，花费都是非常高昂的。古典世界的战争也需要巨大开支，尤其是围城战和海战。为支付对日耳曼人的战争费用，皇帝马克西姆斯所征的苛捐杂税，导致了最终让他丧命的叛乱（希罗狄安，7.3.1—4.6）。可是，战争也可能带来巨大利润，那完全取决于你和谁作战，获得怎样的成功。近来的研究表明，古罗马圆形剧场的铭文写到，它的建造资金来自战利品。这一巨大工程的费用部分来自皇帝韦斯巴芗及其儿子提图斯镇压一个十分小的行省朱迪亚的起义时掠夺的财富。

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一项开支——支付军人的薪水——在古代世界并不总是必需的。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古典城邦中，公民权和服兵役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城邦因此勿需为它们的公民士兵支付军饷。在古希腊，雅典是唯一一个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支付军饷的城邦。薪水制似乎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引入雅典，那时雅典吞并了一个帝国；军饷最初好像是以一种生活费的形式出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军饷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对兵役的酬劳，而其他希腊城邦也开始向士兵支付军饷。罗马人在围攻维伊 [1] 期间引入薪金制，那场战争结束于公元前396年。皇帝奥古斯都建立了一个特别国库，并开征两种新税，以支付元首制度下职业军人的薪资。军人的基本薪资是否可以成为致富的途径，这一点值得怀疑。元首制时期，如果一个士兵能够活到可以领取他的退役金时，他的余生会过得衣食无忧。

否则，在整个古典世界，士兵只有通过获取战利品才能显著改善其经济状况。

甚至某些雇佣兵也无需支付军饷。有些雇佣兵，例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色雷斯部落民，服役不取报酬，寄希望于获得战利品。可是绝大多数雇佣兵需要支付军饷。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大多数希腊雇佣兵来自希腊最贫穷的地区，例如阿卡狄亚等地，他们要么为非希腊雇主，例如吕底亚国王或者埃及法老服役，要么为希腊僭主当兵。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雇佣兵好像来自希腊世界各地区，而且他们不仅受雇于非希腊人，还服役于任何政体的希腊城邦，前者如波斯的图谋篡位者居鲁士，为其服务的万名希腊雇佣兵因为色诺芬在《远征记》中的记述而不朽。亚历山大死后，其继承者发动的战争标志着希腊世界雇佣兵发展的高峰。

我们很少听说有罗马人作为雇佣兵在国外服役（例如，约公元前217—前209年间，一个名叫卢修斯的人撰写了一篇碑铭，以纪念他在埃及的服役，见《希腊铭文集成》第3卷第4册第18号）。可是，绝大多数为外国统治者服役的罗马人，如在本都的米特拉达梯的军队中的罗马士兵，都不把他们自己视为雇佣兵，他们或者是自愿的，或者是迫于形势的政治流亡者，为恢复自身地位而战。共和国时代，作为罗马主要军事力量的重装军团兵，常常需要骑兵和轻装兵补充，其中有些士兵是雇佣兵，例如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克里特弓箭手。但是，尽管两者间的界限模糊，多数士兵来自同盟者分遣队。元首制时代职业辅助兵的出现使雇佣兵不再是必需，尽管支援部队仍可能来自同盟者，而且同盟者可能会从罗马获得补助。帝国后期，恢复了对雇佣兵的使用。公元5世纪，一些显赫人物开始使用蛮族雇佣兵作为私人军队。鲁菲努斯是皇帝阿卡狄乌斯的近卫军长官，他曾指挥了一支由匈奴人组成的个人卫队。这类军队后被称为*Bucellarii*（“食用饼干的军队”）。公元6世纪，他们常是罗马帝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公元7世纪早期，*Bucellarii* 成为了正规骑兵队的称号。

水、粮食、柴木、草料和其他物资等后勤供应，对古代军队至关重要，却易被忽视。古代文献不常有军需问题的论述，只有当处境极

其恶劣时才略有提及，如亚历山大大帝在穿越格德罗西亚沙漠时遇到的情况（阿里安，6.22—26）。因缺少资料，重建古代的军需供应变得特别困难。尽管如此，汇集起来的资料足以写成书本厚的研究报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罗马军需供应总体情况的两部著作和一部关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著作。这些作品需要从后来的、资料更多的时期搜罗相关军需资料，然后回推解释散落的古代文献，但这样做需要非常谨慎。例如，对现代士兵需求的估计不能照搬到古代的士兵身上，因为古代士兵年龄更大，个头更小，也更习惯于艰苦生活。此外，现代学者对下述事物的估计，例如对不同驮畜驮载重量的估计，差别很大，所以，这些现代研究的结论都极具临时性。

古代军队很少在冬季作战。冬季进行战争需要特别的理由。例如，公元前324—前323年亚历山大对扎格罗斯山区科萨人进行战争的动机，就被认为是这位君主希望通过军事行动来缓解其朋友赫菲斯提昂死去带来的悲伤（普卢塔克：《亚历山大传》，72.3）。而绝大多数现代学者更青睐另一种解释：作战的意图是为了在天气条件不允许该部落向山上逃跑时截获他们（阿里安，7.15）。不愿冬季作战与其说是为了让军队避开恶劣的天气，不如说是因为缺乏粮草和运输给养困难。古代运输大批货物时倾向于水运，因为陆地运输缓慢且低效，而海运在冬天极其危险。

军队人数越多，集结的时间越长（尤其是在一个地区集结），作战离开本土越远，供应的问题就越大。

古代近东的军队显然具有良好的军需供应能力。虽然希罗多德提供的数字肯定有极大的水分（7.186），但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腊的波斯军队即使不是数十万，也至少是数万。同样，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迦太基能够为它在海外作战的数万军队提供给养。对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军队来说，由于军队规模相对较小，作战地区离本土不远，而且驻留的时间也不长，军需一般不大可能成为大问题。通常情况下，权力机关发布集结日期并要求士兵自己准备若干天的给养。亚历山大军需供应上遇到的困难，则可能因为他惯常的快速行军以及攫取波斯国库后的无限财富而得到了缓解。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以及希腊化时

代的各个王国不得不进行周密的军需安排，因为他们的军队数量庞大，常包括大量骑兵，而且可能一次在战场上停留数年。公元前306年，安提柯一世[2]带领一支接近9万人的军队携攻城器械设法穿过了西奈沙漠（西西里的狄奥多，20.73.3—74.5）。

当罗马人首次在海外作战——即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在西西里时，他们被迫开始寻求一套高效的军需供应方法，其基础是把搜寻粮秣、征集物资和建立供应线等手段混合使用。虽然我们难以确定其通常的做法，但罗马人在军需供应方面确实具有非凡的能力。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间（公元前172年——前167年），他们维持着一条长约100英里、穿过巴尔干山区的供应线；公元73—74年，在无水的沙漠要塞马萨达[3]，他们设法为一支攻城大军提供了即使不是数月、起码也是数周的供应。在击败希腊化君主国后，罗马人的军需供应能力比他们的任何敌人都要强。这一优势得到了古人的注意。卡西乌斯·狄奥称，帕提亚人的战争努力由于他们“没有重视粮食供应或者军薪问题”而受阻（40.15.6）。

希腊人和罗马人倾向于认为，拥有庞大的辎重队是蛮族军队的典型特征。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对跟随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去和亚历山大作战的庞大随从队伍——其中包括360名妻妾的车队——作了精彩的描绘（3.3.8—25）。古人意识到了庞大辎重产生的问题：它们导致军队行进缓慢；如果辎重和军队混编，造成的混乱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对于德意志条顿堡森林中的惨败——公元9年，瓦鲁斯三个军团在那里被全歼，人们认为辎重应对失败负部分责任（卡西乌斯·狄奥，56.20.5）。有些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著名将军，把他们认为不必需的辎重或者销毁，或者运走，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恢复纪律。公元前134年，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在西班牙“驱逐了所有的商人、妓女，以及预言家和神职人员，士兵们经常求教于后两类人”（阿比安：《西班牙战争》，85）。有些古代的资料之所以记录随军人员或者马车的数量，是因为其数量异乎寻常地庞大。在公元前171年的一次劫掠中，安提柯王朝的国王帕修斯从敌人那里掳获了1000辆马车（李维，42.65.1—3）。公元前105年的奥兰治之战中，

据说罗马人损失了8万士兵，4万仆人和随军人员（李维：《摘要》，67）。但是，可以认为现代学者低估了他们所研究的军队中辎重车队的规模。例如，那部关于马其顿军需的重要著作将显然是指一次训练的不可靠的营地仆人人数当作了符合作战常规的真实数据（弗龙蒂努斯：《智谋》，4.1.6）。

通常只有在行军速度非常之快的情况下，古代作家才会对这一点作记录。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率领一支特别挑选的“飞虎队”，3天时间行军185英里（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4.6.4）。有时他们之所以记录相关数据，则是因为行军速度非常慢。公元前189年，一支在小亚细亚作战的罗马军队为战利品所拖累，以致一天行军不足6英里（李维，38.15.15）。行军中存在非常多的变数，例如大小道路的状况、天气、军队的构成、辎重车队的类型和规模、扎营消耗的时间、敌人的远近，以及急行军的需要，所有这些都让我们难以算出平均速度。考古学可帮助我们了解某些战争。虽然给罗马行军营地定年众所周知非常困难，但还是测定出了苏格兰东北部两组营地的年代，它们分别属于阿格里科拉战争时代（即公元1世纪后期）和塞普蒂穆斯·塞维鲁时代（即3世纪早期）。两个营地之间的距离表明行军速度缓慢，一天不到15英里。

战争和军需：“让匈奴人下马”

对古代军队军需供应进行分析、阐释时的可取之处和存在的陷阱，可用R. P. 林德纳的文章《游牧习惯、马匹和匈奴人》作为个案加以说明。该文宣称其目的是“让匈奴人下马”；其结论是：当匈奴人定居在大匈牙利平原上时（约公元410/420—465年），他们不再是游牧民，因此也就不再作为骑兵战斗。他以两条线索的论证来支持他的结论：一条线索是文献的，另一条是生态学的。林德纳指出，当时的一些资料并未明确说明匈奴人是骑兵，而另一些资料确把匈奴人视为骑兵但却被认为有违历史而抛弃，因为它们依据的是一份更早时期

的描述（即出自阿米亚诺斯·马赛林纳斯，31.2，写于公元395年）。从生态学的角度，林德纳估计，大匈牙利平原只能养活大约15万匹散牧的马匹。通过与后来的蒙古人类比，他认为每个匈奴人需要10匹马，这样，当时只能有1.5万匈奴骑兵。

一些学者曾顺带地对林德纳的看法表示过赞成或反对，但就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尚无人对他的观点进行深入的学术分析，这里只是略作评论。

默证总是令人生疑。当时的文献未把匈奴人明确描述成骑兵，可能是因为众所周知他们是骑兵。而因为其借鉴了阿米亚诺斯就将那些把匈奴人描述为骑兵的资料视为有违历史而将之抛在一边，则可能是对它们作出了年代误植式的解读。在古典文献的创作文化中，旁征博引被推崇，因此，征引更早的杰出作家的言论总是合宜的。这里只举一例：在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30年雅典的瘟疫作了著名的描述（2.47—55）后，后来的作家们描绘瘟疫时都倾向于援用修昔底德的描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瘟疫的描述是凭空臆想出来的。阿米亚诺斯对匈奴人的描述可能具有相似的地位。此外，林德纳没有提到当时某些未受阿米亚诺斯影响的文献证据，这些文献确确实实把匈奴人作为骑兵论述。韦格提乌斯，林德纳认为在5世纪中期从事写作的人，在其《兵学大纲》（*Epitoma rei militaris*）中，两次把匈奴人作为骑兵的典范（1.20；3.26）。需要注意的还有，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当匈奴人作为雇佣兵在贝利萨留斯统帅的拜占庭军队中服役时，他们“全部都是马上弓手”（普罗科皮乌斯，3.11.12）。

即使林德纳对大匈牙利平原牧业潜力的估计是正确的，他的推论仍然有问题。首先，当时的匈奴社会已经与他们在黑海东北平原上时很不一样了。匈奴人已经建立了专制君主制，社会阶层化，帝国庞大。文献资料表明他们居住在村庄中，事实上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游牧民了。匈奴人同样很会从被征服的民族那里榨取农产品，从东罗马帝国榨取贡金。如果匈奴人愿意进行另一场变革：用一部分粮食喂养马匹，就可以弥补大平原的饲料不足。其次，林德纳把匈奴人和蒙古人进行类比是随意的，他也可以把匈奴人与其他人群比较。如林德纳

所说，一天换三次马可能把马累垮，但如果匈奴人愿意冒险一试，那根据现有的数字，大平原就能够支撑5万名骑兵。最后，如果认为匈奴人不再是游牧民因而就不是骑兵的观念也是有问题的。所有草原的游牧民都是骑兵，但并非所有骑兵都是游牧民。

公元451年在高卢遭遇失败后，我们得知（约尔达内斯：《哥特史》〔*Getica*〕，4.215）阿提拉打算自杀，方法是在部下的马鞍所垒成的火葬堆上自焚。林德纳就此评论道，这是“他不仅没有大量骑兵、相反他率领的骑兵数量极少的证据”。这个评论在下述意义上也许是对的。那时阿提拉的军队中来自被征服民族的士兵占了很大比重，他们中的许多人作为重装步兵战斗。但以此为据，认为绝大多数匈奴人已经抛弃了他们的战马势必过于轻率。

注释

〔1〕 维伊为伊达拉里亚人城市，毗邻罗马。据说罗马人花了10年时间才将其攻克。

〔2〕 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曾有意统一亚历山大的帝国，后于公元前301年的伊普苏斯战役战败身亡。

〔3〕 犹太人的要塞，起义者最后的堡垒。

第六章

战斗

约翰·基根出版于1976年的名著《战争的面貌：阿金科特、滑铁卢和松姆河之战研究》，普及了战争写作的一种新体裁。这部书为已有的从将军角度进行的战争研究增加了一个视角：探寻那些普通战斗人员生理和情感上的经历。本章遵循这种写作模式，依次观察古代的陆战、围城战和海战。在每节开头，会对技术的发展作简要描述，为探讨战斗人员的特殊心理作铺垫。最后一节会详尽解读一次战役，这可以将本书的许多主题综合起来，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古典战争中领袖的地位。

重装步兵

让我们来看一下希腊重装步兵的形象（图9）。这是一座青铜雕像，约于公元前500年献纳给多多纳的宙斯圣地。一个重装步兵穿戴的甲胄重量随时代变迁而不同。但如我们将看到的，除两处外，这一尊铜像似乎代表了典型的重装布兵。首先，我们来看他的装备及其所暗示的战斗方式。他头戴青铜头盔，身穿青铜胸甲和胫甲，手执一个大盾牌。这个重装步兵拿的是“比奥夏”盾，与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狄皮隆”盾牌相像，但可能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重装步兵通常拿的是圆形木质盾牌，盾面覆以青铜，通过中央的臂带和边缘的手柄抓握。雕像人物原本右手执长矛。绝大多数重装步兵还有一把剑作为补充武器。这套装备沉重，穿上后会感到燥热，易疲劳。头盔使视觉和听觉减退。他没有携带任何用于远距离作战的武器。他的战斗少有战术可言（他能多清楚地听到或看到信号不得而知），仅是面对面的交手，而且时间短暂（需在尚未疲劳之前结束战斗）。

图9　重装步兵的正面和侧面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着此装备的士兵。除非他是斯巴达人或者雇佣兵，否则他不是职业士兵。他自己准备装备，而且服役不取薪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前是这种情况，在那之后也经常如此。他相对富有，一般身份是农民，年龄在十八九岁到六十岁之间。公元前5世纪后期，专业武器教练出现了，但很少见。人们认为，对战斗训练来说，舞蹈和竞技比较适宜。士兵与其装备互为一体，与敌厮杀通常都是短兵相接、速战速决。

最后，我们借用最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对重装步兵战的解释设想一下这名士兵在整场战役中的地位。他的位置在方阵——一个由几排战士紧密排列的集体——之中，他认识自己周围的人，有些可能是他的亲戚。在献祭一头牲口的仪式结束、将军发表完演说后，方阵向敌人移动。士兵们步调一致地推进，唱着他们城邦的战歌或者颂歌。接近敌人时，他们由行走变成跑步前进，而且高喊简单的战斗口号，目的是杀入敌阵。如果他们的对手是另一个方阵，那就可能出现相互推挤的情况。人们把这样的战役比喻成一场宏大的橄榄球争夺战，只不过多了致命的武器。后排推搡着前排。或迟或早、有一方会积攒好力量向前冲杀。失败的一方会溃散奔逃，死伤无数。有人估计，对胜利者来说，伤亡率为5%，对失败者来说，为14%。

有些学者从另一个角度看重装步兵的战斗。他们认为“推挤”只是

一种比喻说法，后排给予前排士兵的是精神上的支持，或者说重装步兵事实上是在更松散的阵形中战斗。对“标准”的寻求一定会以失败告终。不同的希腊城邦开始采用重装步兵方阵的时间不同，因此它们的作战方式也不尽相同。我们知道，斯巴达人是走入敌人阵列的，底比斯人则喜欢用比标准方阵更密集的阵形交战。即使是同一城邦的方阵，阵形也会根据交战时的情况，作出进一步调整。

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在希腊的阵地决战中，重装步兵方阵占支配地位，当然也有其他类型的辅助军队，如轻装步兵和骑兵。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轻装步兵和骑兵在战斗中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加。但希腊人倾向将它们边缘化，无论是在实际的战斗中还是在那些历史记载者的思想中都是如此，因为在绝大多数希腊国家中，控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皆为重装步兵。

马其顿方阵步兵

马其顿的腓力二世的军队是合成兵种。腓力二世依靠这支军队赢得了对希腊的霸权，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依靠这支军队征服了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以及他们所建立的希腊化王国也凭借它统治着东部地中海。这支军队由长于近战的重装步兵方阵、轻装步兵和骑兵组成，轻装兵装备有标枪、投石器或弓箭，同整个古代传统的作战方式一样，他们在掩护自己部队的同时试图从远距离骚扰敌人的主力。马其顿的杰出骑兵队是实施突然打击的重要力量，虽然其他骑兵也发挥作用（本章后一部分将叙述骑兵的作用）。马其顿军队的核心是那些方阵中的士兵。我们对于这些方阵步兵的了解比从某些现代著作中可能获得的似乎要少。我们关于马其顿方阵的资料，包括文学的和艺术上的，往往和亚历山大有关，而且重点关注的是他作为国王的言行。由于阵地战中亚历山大是以骑兵作战，我们对于步兵的了解相应很少。关于马其顿方阵，我们最翔实的资料来自波利比奥斯[1]（18.28—32）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对马其顿方阵如何为罗马军团击

败进行的解释。虽然马其顿的战斗方式变化了，但由于骑兵的数量和突袭能力下降，方阵成为赢得战斗的主要力量。波利比奥斯称，因方阵缺乏灵活性，在崎岖不平的地区作战时难以发挥作用。对此他似乎有些夸大其辞。更早的伊索斯战役中（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的方阵在面对希腊重装雇佣步兵的猛烈冲击时，依然能够在战场上改变阵形，而且一边作战一边渡河。后来在公元前197年，在库诺斯克法莱战役中，马其顿方阵的一翼在山坡上作战，在遭到来自后方的攻击前成功地击退了罗马敌军。

马其顿方阵与重装步兵方阵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其主要武器*sarissa*。学者们已经为研究*sarissa*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这种努力似乎还将持续下去。至少大家都一致认为，*sarissa*是一种长矛，由双手掌控。它的长度，可以超过四、五排士兵阵列的长度，而希腊重装步兵方阵的长矛只能伸出两到三排远，武器的设计理念似乎是为扩大杀伤区域以及方阵内攻击点的数量。它的目的是让敌人在距离步兵方阵还有数英尺远时，就以难以突破的长矛阵对其进行打击。但我们不应把*sarissa*的地位提升到一种“超级武器”，如果它真有如此威力的话，那斯巴达人就不用等到它在希腊战场上出现100多年后才于公元前227年引入自己的军队中。绝大多数马其顿方阵步兵，如同绝大多数希腊重装步兵一样，对战场中战斗进程了解可能非常有限。只有前几排的士兵能看到战斗情况，多数人密集地集合在方阵之中，因受到同伴遮挡以及扬起的灰尘妨碍了视线，听觉也受到噪音的严重干扰，他们很可能对战斗的进程不能客观了解。马其顿方阵中士兵的士气特别容易受到吵闹声的影响，这些喧嚣声会使他们认为，侧翼或后方处于危险之中，或者方阵正在后退。

军团步兵

罗马人似乎和他们的邻居伊特鲁里亚人一样，可能在公元前7世纪或公元前6世纪的某个时候采用了重装步兵方阵。可在公元前4世纪

左右，他们似乎已经创建了著名的军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团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军团由最初的30个小分队组成变成由10个被称为联队的较大步兵团构成，前者有波利比奥斯的描述，后者在恺撒的作品中出现。与此相似的是，它的成员也从意大利农民士兵，变成了主要从元首制下的行省征募的、长期服役的职业兵。可是，除长矛（在波利比奥斯的描述中，只有少数人使用）消失外，军团士兵的装备，从我们最早的证据到公元3世纪的证据均显示，仍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军团士兵戴金属头盔，通常有胸甲，携带大而弯的盾牌（*scutum*），一到两支重标枪（*pila*，单数形式*pilum*），剑（*gladius*）和匕首（*pugio*）。

我们所拥有的证据让我们无法确定军团正面的阵形。人们常估计它有6—7英尺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具体的战斗情况变化而变化。虽然军团可以受命使用重标枪进攻，一般用于攻击骑兵，但因为是投掷性武器，其重量使得它只能飞行较短的距离。在恺撒有关法萨卢斯战役的叙述中，我们发现了关于猛攻和保持队列完整哪个更具优势的争论（《内战记》，3.92）。是冒着失去完整队形的风险通过进攻取得先机；还是反过来，站在原地接受攻击？在哪种方式更好的问题上，恺撒和绝大多数罗马将军更青睐前一种。

在对抗其他步兵队时，军团会上阵迎敌，根据命令齐掷标枪。当标枪雨让敌人陷入混乱时，军团战士会拔剑出鞘和敌人面对面肉搏。剑既可用来刺杀，也可用于劈砍。盾牌可以用于攻击。握住盾牌中央，并抓牢上面的金属饰球，可以将其作为武器击打对手的面部；或者借助臂力挥动盾牌将敌人击倒。不列颠的梅登堡被罗马攻陷，把在那里发现的骨骼与中世纪维斯比之战更多的遗骨进行比较，发现军团兵作战时力图将对手打倒在地，然后用剑多次攻击对手头部置其于死地（见图14）。这样的战斗非常消耗体力，我们估计有些步兵间的战斗，例如坎奈战役[2]，会延续数小时。因此某些现代学者假设，这样的战斗有时会回到“初始状态”：双方战斗中会后撤，投掷标枪，相互辱骂，以积聚勇气再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在这样的“艰苦的拉锯战”中，军团能保持良好的体力是得益于他们平时的刻苦训

练。我们得知，他们训练时带着比实战中更重的武器（韦格提乌斯，1.11）。此外，严明的纪律（*disciplina*）和罗马战士神话给了他们精神上的帮助。罗马人认为只有他们拥有严明的纪律，而其他民族没有；罗马神话强调的是“长期的坚持”，例如神化人物荷拉提乌斯[3]曾坚守桥梁对抗占明显优势的敌人。

骑兵

希腊是由众多贫瘠和崎岖的半岛以及岛屿构成的，因此虽然拥有马匹是上层社会的标志，但骑兵并非古典时代希腊军队主要的攻击力量，只有来自北方塞萨利平原的部队是例外。塞萨利往北，马其顿广大的草原和部落社会使极具战斗力的骑兵得以发展起来，并在军队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腓力二世[4]依靠骑兵征服了希腊，亚历山大借助骑兵征服了波斯帝国以及远达印度河流域的印度各民族。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化王国中，骑兵的数量和战斗力都有所下降。共和国时代，罗马人似乎拥有规模虽小但颇有战斗力的公民骑兵队伍，可是，到公元前1世纪早期，骑兵消失了。虽然元首制时代由极少数公民充任的骑兵再度出现，但罗马军队自那以后依靠的是外国或者臣服国家的辅助骑兵。罗马军队中骑兵的重要性在早期次于重装步兵。3世纪后半期，情况开始变化。4—5世纪的罗马军队严重依赖骑兵，到6—7世纪，虽然步兵数量上仍占优势，但骑兵成为了帝国主要的战斗力量。

我们可以把古代多种骑兵组合想象成一个光谱。在一端是真正的轻骑兵，例如北非的努米底亚人和摩尔人的骑手，他们依赖于投掷武器，尽量避免近战，至少是在敌人逃跑前如此。他们利用马匹的速度和机动性，构建了人马合一的移动投掷平台。在光谱的另一端是真正的“突击”型骑兵，例如亚历山大的近卫骑兵。这些人的装备只为近战。由于马匹无法突入坚固的目标，如密集的步兵阵，“突击”骑兵只能是通过马匹和人协同作战吓跑对手，或至少突破敌人的正面队形，

以便杀入敌阵中，踩踏或者砍倒敌人。

古代骑兵的潜力可以从普卢塔克对公元前53年卡雷战役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天的描述中反映出来（《克拉苏传》，23—27）。一支完全由骑兵组成的帕提亚军队，其中多数是轻骑弓箭手，也有少数是带着标枪的重装骑兵，他们遭遇了一支规模远远大于他们的罗马军队。罗马军队由克拉苏指挥，主要由军团重装步兵组成，轻装步兵和骑兵辅助战斗。由于军团兵摆出了密集的、连续的阵形，帕提亚骑兵的第一次冲锋并未成功。可是，罗马人这样的队形给帕提亚轻骑弓箭手提供了理想的标靶。罗马人忍受着标枪的攻击，相信对手总有用完标枪之时。当他们发现轻装弓箭手正在补充枪弹时，克拉苏命令他的儿子普布利乌斯从右翼发起攻击。帕提亚人撤退了，边撤边投射，直至普布利乌斯的军队和大队主力分开。这时帕提亚人派一队重骑兵对他们进行阻截。普布利乌斯未能说服他的步兵发动攻击，结果在一次骑兵混战中被击败。普布利乌斯将他的残余步兵集中在了一座小山上。在那里，他们遭到射杀，最后被帕提亚重装骑兵击溃。帕提亚人然后转向罗马军队的主力，重装骑兵用长矛攻击罗马军队的正面战线，弓箭手向侧翼下起了箭雨，当夜幕降临、战斗停止时，罗马军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

作战动机：仅有少数人战斗吗？

约翰·基根的《战争的面貌》鼓励古典史学家们把对近代战争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应用到古代世界。此类研究需注意的方法论问题可以通过以下例证来说明。在1947年出版的《人对火》中，S. L. A. 马歇尔宣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线的美军每4人中仅有1人开过火。A. K. 戈兹沃西将这个结论应用到古代军队的研究中。他发现处于密集方阵中的士兵不可能原地不动，于是估计投射部队75%的士兵在发射武器时没有瞄准，只在近距离进行防守战的重装步兵的比例也是一样。这种直接的移植自然让人生疑。马歇尔本人并不认为他提供的数字具有

普遍意义，在后来的一部著作中，他论证说，在朝鲜战争中开火士兵的比例上升到37％至55％。现代战争史学家们对马歇尔的统计数字表示怀疑。即使马歇尔的统计是正确的，那我们也有理由怀疑是否可以将这个数字应用到古代世界。

现代军事研究中关于战斗动机的观点可否应用到古典世界应分三步考虑：在古代的资料中能否找到相关证据支持；战斗的环境是否足够相似以使现代观点在古代世界“可行”；在现代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基本因素在过去是否也存在。考虑了这三个因素后，那4个罗马士兵中仅有1人进行攻击性战斗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我们可以把保存在尤利乌斯·恺撒作品中的那篇匿名的《西班牙战记》（*Bellum Hispaniense*）作为个案来进行研究。这篇未被人们认真研究过的恺撒《战记》的简短续篇却难得地让我们看到了处在下层社会的普通人的观点。作者虽然对大的战略不甚了解，但对天气、军饷、下级士兵的脱逃、军事惩罚措施等感兴趣。很久以前，马考利勋爵就猜测作者可能是个“强悍的百人队队长，其战斗能力比写作水平更高超”。虽然文章的作者确实认为在等待战斗开始的时刻，士兵的感受与将领不同，那些缺乏经验的士兵被吵闹声吓蒙了。在描述战斗时，他说将士们共同作战。他们一起投射，面对面地肉搏，并拒绝妥协、后撤或者逃跑。仅有两种情况不符合上述“4人中仅有1人”的模式，这两种情况是分别是两人的决斗以及两名百人队队长为鼓舞其余将士英勇献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大兵和罗马的军队非常不同。前者常常喜欢静静独处，不太与周围人联络，后者常和同道在一起，而且常在同道的包围之中。最后，马歇尔认为，除恐惧外，正是基督教的戒律——“你不应杀人”——阻止了美国大兵扣动扳机。众所周知，公元4世纪前的罗马士兵不是基督徒，4世纪后的罗马士兵常常也不是。罗马社会是暴力的，人们可用暴力进行自卫，这被赋予合法权利，甚至成为了一种道德责任。公开的处决会吸引大群的人，角斗士是性感偶像。虽然“你不应杀人”的戒律对一个罗马军团士兵来说不会有任何影响，但质疑马歇尔的观点在古代世界的适用性并不是浪费时间。当我们注意到古典世界与当今世界的差异时会获益良多。

围城战

古典文明对其早期历史进行评价时，宏大的围城战被认为具有突出地位。希腊人围攻特洛伊10年，而罗马人对维爱的围困可能也延续了10年。尽管如此，希腊和罗马在围城战领域都落后于近东。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腊的波斯人装备了古代世界使用的除扭力驱动的投石炮外各种攻城机械，投石炮以石头作为炮弹攻击城墙，再就是用石头或木块攻击守军。这种石炮的发明要么是在叙拉古僭主狄奥尼西奥斯一世时代（公元前405—前367年），要么是马其顿的腓力二世时代（公元前359—前336年）。罗马人完善了当时的技术，从元首制时代起，在攻城战方面他们一直占优势，只有萨珊波斯人略胜他们一筹。

古代世界优秀史学家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精彩地描述攻城战。在描述攻城战的文学作品中，具有特别重要地位的有修昔底德的普拉蒂亚之战（公元前431—前427年）、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罗德斯之战（公元前305—前304年）、尤利乌斯·恺撒的阿列西亚之战（公元前52年）、约瑟弗斯的耶路撒冷之战（公元70年）以及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阿米达之战。从这些文献和考古资料中（特别重要的遗址是幼发拉底河上的杜拉 - 欧罗波斯和以色列的马萨达），我们可以拼出一幅围城战的画面。

要攻取一个有城墙的要塞，进攻者需要从城墙上面或从下面攻破它的防线。地下突破是利用地道。人们挖掘地道有两个目的：突入防御工事后方和通过破坏工事制造突破口。制造突破口的其他方法是坑道工兵用镐或撬棍破坏墙基、用撞城槌连续撞击城墙，如果有投石炮，就用投石炮进攻。攀登城墙需要云梯、可移动的攻城塔，或者是搭建土木攻城斜坡。进攻者会依靠其投掷部队的投射来阻止敌人对其战术的破坏。

守军很少会被动防守。他们也会挖掘坑道，试图破坏进攻者的攻城坡或坑道。埋葬于杜拉 - 欧罗波斯的萨珊波斯和罗马士兵的尸骨为此类地下战争的残酷性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据。钩子和链子可以用

来“抓取”撞城槌使其失去作用；“垫料”可以放到城墙下以缓冲撞城槌和投石炮的冲击力。在那些面临被突破危险的地区，第二道，甚至是第三道城墙会修建起来。守军会利用任何可用的投掷武器阻止进攻者的进攻。他们也可能突然从城墙的任意一处组织出击以在围城的敌军中制造混乱。

阿基米德用神奇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明来保卫叙拉古免遭罗马攻击，这一古代故事，表明攻城战使用的武器处于古代战争技术的前沿。但除技术因素外，许多城池是因为突袭、阴谋、背叛，或者饥饿而陷落。

围城会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并需要有高度发达的军需供应系统。攻城常延续很长时间，在此期间，士兵常需要军饷和大量的物资供应，这包括攻城部队的粮草以及建造攻城器械的原材料。这些材料通常要从远处运来，并不是所有物资和运输工具都可以通过强行征募获得，有些是需要购买的。波提底亚之围（公元前432—前430年）消耗了雅典鼎盛时期财富储备的40%。反过来，一场成功的围城战也会赢得包括奴隶在内的大量的战利品。

在围城战中，一般的战争规则并不适用。对于围城战为何比绝大多数其他陆地战要血腥得多，人们提出了各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当军队分散到各个堡垒中后，古代的指挥官对他们失去了控制。另一种说法试图诉诸生物学理论：太多富有攻击性的人类或者鼠类被放置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所谓的“非逃跑即战斗”的机制被释放出来。第三种观点认为，军队试图重新夺回对战斗的控制权，攻城期间，工程师削弱了他们的控制。还有一种解释是：古代的陆战很快结束，一般在一天之内，最多历时两到三天；围城战则可能延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整个战争期间，围攻者始终处于危险中，危险可能来自敌人的突袭，也可能来自疾病的明显威胁。洗劫城市时所用的极端残酷的手段，可能源自对敌人“复仇”的欲望，攻城者认为敌人让他们长期处于恐惧状态。

海战

让我们先看一艘希腊人的战舰奥林匹亚斯号（见图10）。这是现代人重建的雅典三列桨战舰。奥林匹亚斯号是实验考古学的一大胜利，广泛吸收了众多不同领域的成果，包括近年来水下考古学的成果。可是，这条船永远不可能告诉我们三列桨战舰的真实潜力。现代的海员们有不同于古代海员的身体特征，缺少古代海员与生俱来的技巧和水性。没有人会建议使用奥林匹亚斯号做沉船测试，考察三列桨战舰的海员如何溺水而亡并非复原战舰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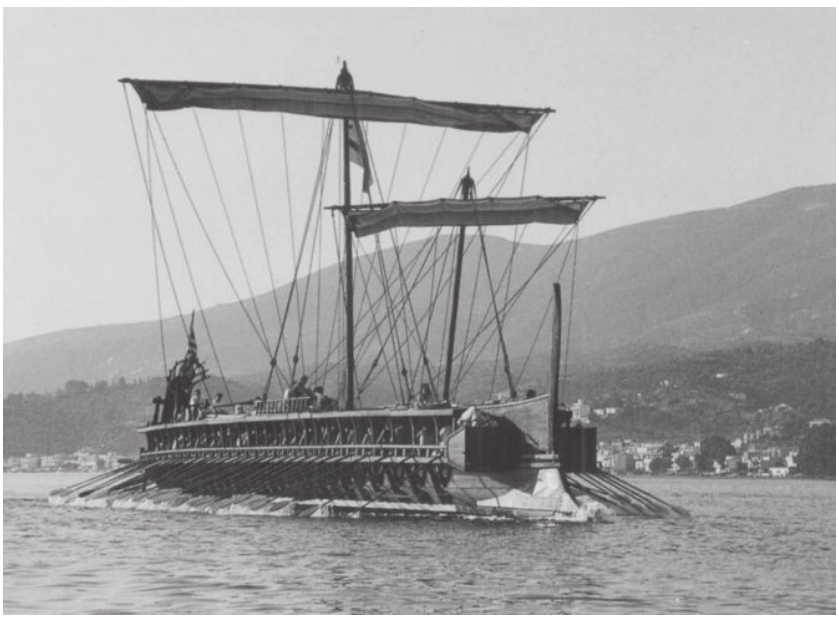

图10　重建的三列桨战舰奥林匹亚斯号

如在该照片中所见，三列桨战舰使用风帆，但并不是主要靠风帆获得动力。战役之前，战舰通常留在海岸上。三列桨战舰是一种有撞角的船只，170名桨手三人一列划桨。三列桨战舰的作战方法有两种。“轻巧派”注重灵活的操作，努力用撞角将对方的船只撞破，水淹敌人，或者干脆撞开对方船一侧的船桨，让船只无法移动。“轻巧

派”的特殊战术是翼侧包抄（*periplous* ）和突破（*diekplous* ）。“重型派”有时会加固三列桨战舰的船头，试图以撞对撞，但更多的是强行登上敌船搏斗。如果遭遇超级舰队的威胁，舰队会采用被称为*kyklos*的战术，即各船船头向外组成一个封闭的圆。

文献中提到的最早的三列桨战舰属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从那时起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三列桨战舰是地中海上的标准战船。此后，重型战舰占据了主导地位，强行登上敌船作战取代了翼侧包抄，迂回作战。重型战舰的名称有多种，如四列桨、五列桨战舰等等。桨手很可能是三排一组，但每支桨不止一个桨手，或者部分桨有一个以上的桨手。布匿战争期间的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建造了五列桨战船，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的罗马内战中，罗马舰队倾向于采用比五列桨战船更大的船只。元首制时代，由于没有任何切实的海上威胁，罗马舰队大多由小船组成，其中包括三列桨战舰。我们最后一次听说三列桨战舰作战是公元323年的内战期间（索西穆斯，2.22.2；2.23.3—4）。到公元5世纪，我们得知，建造三列桨战舰的技术已经被遗忘（索西穆斯，5.20.3—4）。公元6世纪，当拜占庭帝国再度建立大规模海军时，其标准战舰*dromon* ，设计上与古典时代的战船不同。

古代战舰在战略计划实施方面的局限性部分源于它们相对较弱的适航性，部分因为船上缺少存储空间。虽然古代战舰能够携带数日的给养，但正常情况下，它们中午会靠岸停下来取水和让船员就餐，夜间还要停靠岸边让船员上岸睡觉。与18—19世纪的帆船不同的是，古代战船不能长期脱离陆地航行，因此无法对远离海岸的地区实施封锁。

海战，如同围城战一样，需要大量的资源，而且还要利用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因此开销非常大。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对西西里的灾难性远征（前415—前413）损失了两支大舰队。首次战败后，雅典人倾其财力重建了一支舰队。但当这支舰队在羊河之战（公元前405年）中被毁后，雅典再也无力重建任何舰队，战争随之结束。他们的斯巴达对手情况不同。斯巴达人佯称放弃解放小亚细亚希腊人的努力，作为回报波斯人开始给他们财政援助（公元前412/411

年），因此斯巴达人能够承受多次海上大败，例如库济库斯（公元前410年）和阿吉纽西（公元前406年）战役的失败，并且在战败后能够重整旗鼓继续作战，因为他们有财力替换失去的船只和人员。

舰队的高昂费用，通过考察雅典有关三列桨战舰的制度可见一斑。用以支付战舰维护费用的是某种形式的财产税。理论上，国家提供三列桨战舰的船体、船帆、船员的工资和给养，然后指定一个富有的雅典人担任舰长并支付维修费用。实际上雅典补发的薪水和给养在公元前5世纪只有一半，到公元前4世纪一点都没有了。此外，作为舰长，为了他们的荣誉以及身体和财政上的安全（因为他们既要在船上服役，还要为它的损失负责），常自掏腰包购买船帆、雇佣熟练的水手。随着雅典财政状况的恶化，要找到足够的人充任舰长愈加困难。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指定两人（*syntrierarchs*）共同担任舰长，公元前350年，雅典将前1,200名富豪组成20个小组（*symmoriai*）共同担负三列桨战舰的费用。

保存在德摩斯提尼作品（《演说集》，50）中的一篇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详尽说明了作为三列桨战舰舰长的财政支出，尽管该作品并非德摩斯提尼创作。这篇演说是为一个名为阿波罗多罗斯的雅典银行家写的（也可能是该银行家本人所写）。作为雅典公民中的新贵，阿波罗多罗斯渴望出名，于是给其战舰配以豪华装备，可是他的爱国情感被不当地利用了。作为装备最好的战舰之一，阿波罗多罗斯的三列桨战舰被指挥官派出执行额外任务，其中包括返回雅典港口比雷埃夫斯一趟。但在那里，阿波罗多罗斯的水手要求得到更高的薪水才登船。在演说中，阿波罗多罗斯为额外的花费起诉他的继任，他的断任耽搁了5个多月还没有接手这条船。尽管演说似乎有理有据，我们也不能把它当作一篇无偏见的报道来阅读，但应记住，这是一篇以说服陪审团为目的的法庭演说。

古代海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士气并不是体现在单个水手身上，而是通过整条船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引用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30年斯巴达人在诺帕克都战败经历的叙述来进行说明。

水手们喊叫着，退避着，相互咒骂着，混乱中根本听不到指挥官或者舵手的命令，由于他们平日训练不够，无法在有风浪的水域中划桨，导致他们的船只失控。就在此时……雅典人杀入并用船头展开撞击。混乱之中，没有一条斯巴达船只参与战斗，而是集体溃逃。

（修昔底德，2.84，略有删节）

尽管缺乏训练，而且身体疲劳，逃跑的斯巴达舰队上的水手们并未因恐慌而放弃战斗，他们仍然作为一个团队奋战。但舰长的行为致使士气丧失殆尽。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史学对其原因加以研究。N. A. M. 罗杰在一本对18世纪英国海军精彩的研究论著中发现，虽然个别水手在战斗中可能试图离开他们的岗位，并躲藏在那些不会马上受到伤害的地方，但大多数人因为对整个战斗进程了解有限，仍然忙碌着，以致忘记了恐惧。对船只的指挥员来说，情况正相反。他们对战况有清楚的了解，在大家能看到的位置上指挥，而且由于不需付出持续的体力劳动，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考虑他们面临的风险并作出放弃战斗的决定。我们可以想象，对古代战船的指挥官和水手来说，情况也相似。对他们而言，甚至没有可藏身之处。

冬营：探索一次战役及其领导权

由于上一年夏季（公元前54年）的干旱，整个高卢出现了粮食短缺，恺撒被迫打破常规做法，当军队进入冬营时他拆散了军队。一支分队驻扎在位于阿登山上的阿图图卡。该分队由新近在意大利北部征募的一个军团以及5个联队（相当于半个军团）外加一些西班牙辅助骑兵组成。他们舒适地呆在以茅草覆顶的木屋里，军需供应充足，并有壕沟和壁垒保护，位置非常有利。当地的部落埃布罗尼人似乎较顺从。部落领袖是阿比奥里克斯和卡图瓦库斯，两人曾在边境会晤过罗马人，还把粮食送到军营里。这样过了约15天，一切看似平静。当地部落发起攻击时，一分队正外出拾柴，其他人解甲留在营地中。外出分队被击败。在营地的军团兵连忙武装自己，并在壁垒上列阵以待，

力图击退敌军进攻。西班牙人的骑兵出击并取得对高卢骑兵的优势，当地的部落民撤退了。

埃布罗尼人要求和谈。阿比奥里克斯通过罗马调解人发了誓，保证不再骚扰被困部队。高卢首领声称，进攻罗马军队并非他的意愿，而是为他的族人所迫，他们被鼓动参与一次全高卢的总起义。所有恺撒的营地都成为攻击的对象，一支日耳曼人大军已渡过莱茵河，两天内就会到达阿图图卡。得到这个消息后，军官们举行了会议，两个罗马指挥官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科塔认为部队应当在原地抵抗。萨宾努斯要求撤退，而且提高了嗓门，以让士兵能了解他的看法。争执到半夜，科塔让步了，于是向全军宣布，他们将在黎明时撤退。士兵们在聊天和整理及精减随身物品中度过了残夜。

天一亮，疲劳的士兵们拖着长队开出营地，进入了茂密的森林中。由于行李过多，行军受阻。走了约两英里后，队列进入了一个陡峭的山谷。当前锋部队试图向上攀登时，当地部落的伏兵突然杀出，阿比奥里克斯原来撒了谎，根本没有高卢人的总起义，也没有日耳曼人来帮助他们。阿比奥里克斯率领自己的部落投入了进攻，而且他根本没打算遵守与罗马人的安全协定。罗马人营地的喧嚣向埃布罗尼人发出警告：他们清晨会开拔。

当军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时，罗马将军们的反应是不同的。萨宾努斯跑来跑去，无效地指挥联队部署。而科塔则向士兵发表演说以激发他们的斗志，并像一名士兵一样战斗。由于队列过长，无法有效监督，将军们命令他们的士兵组成方阵。这个策略似乎有点孤注一掷，结果反而鼓舞了敌人，削弱了罗马人的士气。在哭喊声中，罗马士兵们纷纷撤出队列，企图从辎重里捞回自己的财物。埃布罗尼人则严格服从命令，一直保持着队列，没有四散去抢掠罗马人的辎重。看到罗马人在面对面的交手中仍给自己的军队以巨大杀伤，阿比奥里克斯命令他的士兵用投射武器从远处进攻。而进攻的罗马联队无法赶上高卢人，高卢人轻便的装备和平时的训练提高了他们的机动性。进攻的罗马军队无盾牌遮挡的右翼遭到投掷武器的杀伤，撤退时又被敌人包围起来砍杀。在大约8小时的时间里，那些密集方阵中的

罗马人忍受着投掷武器的攻击。萨宾努斯要求和谈，阿比奥里克斯回应时称，如果萨宾努斯将军愿意和谈，他保证保住其性命，并努力说服他的部落民饶恕其他的罗马人。而科塔此前虽已为投石器击伤面部，但拒绝与武装的敌人和谈。萨宾努斯让身边的军官陪同他前往和谈。阿比奥里克斯命令罗马方面放下武器并一直拖延谈判，直至他们将来和谈的罗马人包围和屠杀。处死萨宾努斯后，蛮族比以往更加起劲地叫喊着，杀回罗马人军中进行最后的肉搏战。科塔战死阵中。

部分罗马人设法杀回了营地。旗手用生命保卫了军团鹰徽，残余部队一直坚守到夜幕降临。由于意识到无生还希望，当夜他们相互结束了性命。全军之中只有少数溜出森林得以逃生。

我们对公元前54年——公元前53年冬阿图图卡灾难有较清楚的了解源于多份古代资料对它的描述，但这些资料无一例外地参考了同一篇文献——尤利乌斯·恺撒的《战记》（《高卢战记》，5.24—37）。恺撒试图使罗马读者相信他行动的正确和伟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相关文章具有宣传目的。我们无法弄清，在阿图图卡有多少由罗马公民和辅助兵组成的军团士兵阵亡。当时一个军团大约5,000人。驻扎于阿图图卡的部队的主体是最近征召的，因此可能还没有常出现的人员不足的问题。无论怎么估计，数千罗马公民在恺撒为最高统帅时被屠杀了。恺撒必须为此作出解释，他为自己洗脱罪名的方式非常有趣。

首先，他力图表明他对阿图图卡事件有准确的了解，声称从交战双方获知了该事件的具体情况。得以逃出的少数罗马人到了罗马另一个副将拉宾努斯的营地。拉宾努斯给他送去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后来，当他俘虏了一些埃布罗尼人后了解到了更多的细节，而后他又亲自到了阿图图卡。其次，恺撒试图证明他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防范措施。虽然解决军需供应需要分兵，可是他确保所有冬营相距都不远，在获知所有营地都已设防并得到供应前，他一直在高卢。接下来，恺撒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萨宾努斯头上（下文我们会谈到恺撒如何描述士兵的行动）。恺撒认为萨宾努斯的行为可以用愚蠢来形容。如果相信高卢人一次就算愚蠢的话，那在对方违背了誓言后还第二次相信他，

简直就是蠢上加蠢。在军官会议上，萨宾努斯提高嗓门以让士兵听见他的言论的做法，显示了他煽动家的特点。在遭到伏击后，他惊慌失措，更表明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的懦夫。在要求科塔陪同他与阿比奥里克斯谈判时，他隐瞒了敌人已赦免了他而其他人还生死未卜的事实。在后面的叙述中（5.52），恺撒告诫他的军队，不必因为这场灾难而丧气，因为那完全是萨宾努斯的鲁莽或背叛造成的。当恺撒继续长篇叙述昆图斯·西塞罗（那位著名演说家的兄弟）在几乎同样情况下的优异表现时，萨宾努斯的所作所为愈发显得可憎了（5.39—52）：当营地受到攻击时，克文图斯拒绝了高卢人和谈的建议，进行了坚决的防御，最终得到恺撒的拯救。

除树轮提供的关于公元前54年旱灾的情况外，考古研究未能提供这场灾难的任何直接证据。人们通常认为比利时的同格雷斯就是阿图图卡，但恺撒提供的稀少且不准确的地形资料，让我们无法作出肯定判断。强调冬营天然有利的位置符合恺撒的利益，阿登山区布满林木森森的峡谷。公元9年，更大规模的类似灾难在此地降临到瓦鲁斯领导的罗马军队身上。地点在今德国的条顿堡森林，即现今的卡尔克里泽城外。该遗址最近出土了大量资料。在发现的众多罗马人的装备中，有一件特别能说明问题：一头驮运辎重的骡子的骨骼。骡子脖子上的大青铜铃铛被塞上了草，以防其发出声音，不致泄露军队的行踪。如果我们考虑到考古学家所说的遗址的形成（就本个案而言，指的是从战争发生到遗址被发现或发掘时所发生的情况），从考古学获得的关于两个战场后来的不同命运的记录变得清晰起来。虽然后来罗马军队到过瓦鲁斯战败的地区，掩埋了一些尸骨，但战场仍处在帝国之外，属自由日耳曼部族的领土。日耳曼人似乎将罗马人的尸骨和他们的部分装备留在战场上，作为献纳给诸神的礼物。对日耳曼人来说，遗址成了圣地，是对他们胜利的永久纪念。后来阿图图卡战场的情况发生了巨变，罗马人数周后再度占领了那里，几百年时间里它一直处在罗马的高卢——贝尔吉卡行省管辖下。除表示虔敬外罗马人还有其他的理由把死者埋葬并清扫战场。

阿图图卡事件使我们牢记军需对古代战略和策略的重要性。对粮

草的需要迫使恺撒分兵，过长的给养车队是导致萨宾努斯失败的一个因素。两次打败高卢人对阿图图卡营地的进攻以及昆图斯·西塞罗遭到大批蛮族连日进攻却仍成功守住营地的事实，都说明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围城战方面有超越当时其他文化的优势。几个世纪的战争中，有一个不变的重要事实是要塞中粮草充足的正规军抵御数量占尽优势的非正规军的能力。阿图图卡之战显示了古代战争中地形的潜在作用。在陡峭而且林木茂密的山坡上，重型装备的罗马人不可能赶上装备较轻习惯于山地作战的高卢人。在峡谷底部小片平地上，罗马人只能密集布阵，过于密集的阵形使他们无法有效战斗，而且还容易被投掷武器击中。虽然装备重要，但在恺撒的叙述中是士气决定了成败。他指出疲劳是削弱斗志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还讲到，在勇气（*virtus*）方面，高卢人可与罗马人匹敌，萨宾努斯及随同军官的死亡对双方的士气来说是转折点。这证明，古代陆战具有“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特点。

最后那批罗马人选择集体自杀而非投降表明他们对手的野蛮性。这是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一种按照“西方式战争”模式作战，另一种则不是。恺撒对这场战斗中高卢人的描述有很多细节符合通常对蛮族的看法。他们谎话连篇、言而无信，毫无信仰可言。在战斗中，他们吵吵闹闹，更愿意伏击和远距离作战，而不愿进行公开的面对面厮杀。可是，恺撒同时也在逗弄读者。虽然他强调了罗马人集体的勇敢表现，而且也简略提及了个别人的英雄行为，但他同时讲到罗马士兵的行为偶尔也像蛮族。军团士兵缺乏纪律性，首先表现为他们彻夜闲谈，不仅使自己疲惫不堪，而且让敌人警觉；而后，他们又哭喊着逃离战斗岗位去抢救个人的财物。相反，蛮族有时表现得与罗马人无二致。他们每天训练，服从命令，始终保持着队形而不是分头抢劫罗马人的辎重。恺撒有意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古典文化的期望，为的是使下述信息变得更易被接受：作为罗马军团主力的新兵尚不能按罗马式纪律要求自己。可是，归根到底，他谴责的不是士兵，而是他们的将领萨宾努斯。

恺撒有关阿图图卡战役叙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对两个罗马将军

行为的评价。对于他不赞同的萨宾努斯，他是这样描述的“跑前跑后地部署各联队，但即使做这件事时，他也紧张不安，而且似乎已经黔驴技穷，就像战斗开始后才不得不做决定的那些人一样。”对他认为采取了正确行动的科塔，恺撒则说“他尽一切可能拯救军队，把士兵们召集起来，像总指挥（即恺撒本人）那样鼓励他们，并像士兵一样在队列中战斗”（5.33，H·J. 爱德华兹英译）。现代读者也许会认为，如果一支队形散乱的军队遭到伏击时，恢复战术秩序的重要性至少等同于激励性言语和增援前线，但恺撒并不是这样认为。这使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与前面讲到的一致性不同，统帅的指挥方式不尽相同。战斗之中将军们所做的，或者说人们期待他们做的，是他们所属文化的产物。

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领袖们是英雄。战斗之前和战斗之中，他们都能做出战略决策。涅斯托尔就排兵布阵的问题给其他希腊领袖们献计献策（2.362—368），并组织好自己的人马严阵以待（4.293—309）。而赫克托尔在战斗过程中把特洛伊人分成5支队伍攻击敌人的营地（12.81—87）。可是，在一首长诗中，这样的段落并不多见。在人们的思想中，英雄们总是由一个随从陪伴出没于战场，有时视情况也会远离战场。他们身先士卒，设法用言语鼓励自己的战士并打击敌人的士气，同时在个人的决斗中寻求荣誉。他们是战斗前沿的指挥官，虽然不是时刻在战斗。

重装步兵方阵出现所带来的变化比我们预期的要少。战斗开始之前，重装步兵的将领是忙碌的。他要组织战斗队列；参加献祭动物的仪式，以猜测诸神的态度和（或者）争取诸神的支持。我们不应因为这种做法的另类，或是因为有时“结果”被操纵，而认为它是装模作样的把戏而不屑一顾。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的文献中的战前演说是作家而非将军创作的，或者因为在一支庞大的军队中将军要让士兵听清自己的演说所存在的实际困难，而否认将军发表战前演说是客观事实。命令方阵前进的信号是将军发出的。将军是在《荷马史诗》的熏陶下长大的，因此通过身先士卒方能激励将士的想法以及力图证明自己为最优秀者（aristos）的愿望促使他战斗于方阵前排。人们一般相信，

将军在前排作战、缺少清晰的指挥框架以及军队缺乏训练共同导致了除斯巴达军队外的所有军队在重装步兵方阵建立初期（公元前725—前431年）几乎无法进行任何战术调度。最初的方阵作战是两个方阵相向推进。从荷马式战斗向重装步兵战斗的转变也可以被认为是从“原始的”战斗向“文明的”战斗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将军角色的象征作用却令人惊异地一如从前，虽然实践中他的作用有所下降，因为一旦短兵相接重组军队就变得很难了。

约从公元前431—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战场上的形势日益复杂。重装步兵仍然是希腊城邦军队的主力，但骑兵和轻装兵的作用比过去更大，战术也更加成熟。例如，在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战役中，底比斯人通过骑兵和轻装兵的联合进攻开始了战斗，然后以他们方阵的一翼攻击对方，同时“拒绝”另一翼与敌军接触。公元前4世纪的文献中，出现了探讨军事指挥理论的著作，例如色诺芬的《论骑兵指挥官》和《居鲁士的教育》等，这些著作的思想似乎弱化了将军亲自参战的作用。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斯说，他既不是个骑兵、重装兵、弓手，也不是轻装兵（轻装步兵），而是一个知道如何统帅所有这些士兵的人（普卢塔克：《国王和指挥官名言录》，187B）。可是，将军很少对排列好的阵形再进行调度，因为这样容易导致混乱和灾难。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之战中，斯巴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在双方接战时为增加方阵阵列而改变队形造成的。人们的期望仍然是：将军在前排作战，许多将军似乎也是这样做的。在留克特拉，伟大的底比斯将军伊巴密农达在“推进”阶段（*othismos*）似乎就在前排，他大喊：“再前进一步，我们就会胜利了（波里艾努斯，2.3.3）。”即使在这个时期，重装步兵的将军们似乎仍是经常战斗在前沿的指挥官，而且他们一旦参战，可能就是全程参与。

马其顿的国王们继承了希腊人关于“将军才能”的观念。据说亚历山大枕头下就放了一本《伊利亚特》，腓力二世曾在战斗中沦为底比斯埃帕米农达的人质。马其顿国王们还继承了马其顿人关于战士的观念。马其顿文化观念宣扬：马其顿人只有在战斗中杀死一个敌人后才

能扎上成人腰带。在这两种观念的共同影响下，国王们出现在战斗前沿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腓力二世多次受伤，其中一次失掉了一只眼睛，亚历山大被刺破了肺。尽管他们也在前排领导战斗，但他们似乎比早些时候的希腊指挥官们更善于在战斗中改变部署。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中，腓力二世虽然在前排（波里艾努斯，4.2.2），但在方阵已和敌人短兵相接时仍能设法让他的步兵后撤（狄奥多罗斯，16.86.4）。这样的调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以下三个因素：第一，马其顿军队确实拥有有效的指挥链。第二，他的士兵训练有素，能够很好地执行新发布的命令。第三，国王们肯定有可以脱离战斗的间隙。他们要么可能从队列中临时撤出，要么如上文分析的，战斗有时会回到交战双方暂时分开的“初始状态”。

公元前3世纪，针对希腊而言是我们所说的希腊化时代的开始，对罗马而言是共和国中期的开始阶段。由于需进一步探讨的原因，这个时期指挥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希望将军不要像以往那样在前排作战，也少有将军继续在前排作战；相反，他们开始像人们常描述的“战役经理人”那样，常骑着马在阵线的后方巡回指挥，观察着战事的发展，鼓励他们的士兵，发布战术命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他们才亲自披挂上阵，失势后他们往往会自杀。从拜占庭的斐洛向一个正围攻城市的将军提出的建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

> 使自己身处投掷武器的射程以外，或者在不暴露自己的条件下移动指挥，规劝士兵们，给那些表现英勇的人以荣誉和赞美，谴责和制裁懦夫。这样你的士兵就会不畏危险，奋勇作战。
>
> （5.4.68—69）

这种指挥风格经罗马共和国后期一直延续到帝国时代。公元1世纪欧拉桑德就这种风格形成的依据作了很好的表述：“由于将军的知识远比他的体力重要得多，所以他通过战斗给部队带来的帮助远不及他被杀后对军队的伤害大（33.1）。”现代学者称赞尤利乌斯·恺撒

为“战役经理人”的典范。

用现代“战役管理”的观点评价该时期的统帅才能也许稍微有点时代错位。对于古典时代将军们在战场上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身体力行”：亲自参战；“指挥战斗”：发布战术命令；“象征”：鼓舞士气。鼓舞士气的做法在荒无人烟的地区镇定自若地骑行于部队中；让人牵走马匹，摘下头盔，扛起军旗，命令将士拿起武器，迫使士兵归队，甚至杀死那些企图逃跑的人，与神沟通，以及发表正式或即席的演说。

我们已经看到，将军“身体力行”的情况很少，常常是最后的选择，而且有时他们更愿意选择自杀。“战斗指挥”当然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合成各兵种的战斗中。将军们应尽可能在他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战斗，战场的地势具有重大意义。当发现高卢军队列阵于小山上，小山四周几乎全为广阔的沼泽地包围时，恺撒遏制住了士兵的急躁情绪，拒绝开战（《高卢战记》，7.18—19）。将军指挥才能的关键方面是排兵布阵以及发布命令，执行预定战略计划。法萨卢斯战役发生的那天早晨，在发现敌人的意图后，恺撒改变了他自己的战斗队形，以及对队列中的不同部分发布了不同的进攻指令（《内战记》3.89）。战斗过程中还可以进行成功的即兴战术调度。在围攻阿列西亚时，恺撒发现一个有利地点，并从那里派出由拉宾努斯指挥的一支增援部队到一地参战，然后他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区，又相继派出两支部队赶往其他地区参战；再以后他亲自率领第三集团作战。危机过去后，他留下部分士兵同他在一起，让其余部队取另一条路线去了拉宾努斯前往的地区（《高卢战记》，7.85—88）。临时的战术调动并不总出自统帅。统帅对战斗的认识只能依靠他耳闻目睹的信息。有些时候，其他人会负责指挥即兴的战术调动。在与赫尔维蒂人交战中，当罗马军队的侧翼被包抄时，第三排的士兵转向面对这场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恺撒虽对他在战争中的参与程度从不轻描淡写，却没有说是他发布了这道战术调动的命令（《高卢战记》，1.25）。我们也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所有战斗都包含即兴的战术调动命令。有时候，恺撒会从他宣称亲自指挥的大部分战斗中“消失”（例

如《内战记》，3.67—71）。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过多的命令只会让军队陷入混乱，恺撒的命令就曾在泽拉战役中造成了混乱（《亚历山大里亚战记》，75）。在有些战斗中，当士兵忽视统帅的命令，自己掌握局面的时候，统帅作为“战斗经理”的作用会完全失去，如恺撒在非洲的塔普苏斯战役中意识到的（《阿非利加战记》，80—86）。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无论是好还是坏，统帅的“象征”作用都不应忽视。如果我们再看上文引述的拜占庭的斐洛的那段话就会发现，他强调将军需要通过在军中巡视和发表演说来提高士气。恺撒描述他在法萨卢斯战役后期的活动时，提到了他发布了一系列战术命令，并两次发表演说就士兵们已取得的战绩给予鼓励（《内战记》，3.95—97）。在萨布雷战役中，当形势变得非常非常严峻时，

> 恺撒从后排一个士兵的手里抢过盾牌（他自己没有带盾牌），站到前排，喊着百人队队长的名字同他们讲话，鼓励士兵们，命令旗手前进，命令队列散开以便他们可以更自如地使用手中的剑。他的到来给士兵们带来了希望，提高了他们的士气，每个人，即使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中，都希望在他们的统帅面前竭尽全力地拼杀。于是敌人的前进暂时被遏制。
>
> （《高卢战记》，2.25）

未来的研究也许会表明，着重探讨古代将军们在战斗指挥方面的作用的同时不应把他们的“象征”作用边缘化。古典时代的统帅们在“战役管理”中，鼓舞士气与灵活运用战术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注释

〔1〕 罗马时代的希腊史学家，著有《通史》，今仅存前6卷。

〔2〕 公元前216年，罗马军队和汉尼拔统帅下的迦太基军队在坎奈作战，罗马被打败，据说损失约8万人。

〔3〕 早期罗马史上的人物。据说当敌人攻打罗马时，他孤身坚守台伯河上的桥梁，让同伴后撤并拆掉桥梁后，自己才跳入河中游回对岸。

〔4〕 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的马其顿国王，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之父。正是在他统治下，马其顿强大起来并最终征服了希腊。

第七章

“一旦战败，就应认命”：西方式战争的重塑

电影《角斗士》的开篇，罗马人在等待战斗开始时，一名军官扫视敌人一眼后说，“一旦战败，就应认命”。将军马克西姆斯回应道，“昆图斯，你会认命吗？我会吗？”这段对话除了对“文明的”罗马人和“野蛮的”日耳曼人之间的严格区分提出质疑外，还指出心理因素对战斗胜败的重要性。

公元86年，皇帝图密善镇压了北非部落的暴动后，据说他向元老院这样报告：“我拒绝让纳萨摩尼人再存在下去。”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把这段谈话记录下来的原因似乎是要表明图密善的傲慢（67.4.6）。而纳萨摩尼人仍继续存在，直至公元3世纪末才被拉古坦部落联盟合并。尽管人们有时声称实施了种族清洗，但在古典世界中种族灭绝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绝大多数战争的胜利，像那场对纳萨摩尼人的战争一样，不是通过摧毁敌人的作战能力，而是通过击垮他们的抵抗意志而取得的。

公元前215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汉尼拔与马其顿安提柯王朝的国王腓力五世结盟。签定盟约时假定罗马战后会继续存在。显然，汉尼拔认为他的一系列胜利会让罗马人和谈时接受他的条件。可是，多数意大利同盟者仍忠诚于罗马，罗马人为此感到振奋，这样他们的后备力量充足，可以一直战斗，直至迦太基人接受他们的和谈条件。

公元633至640年间的形势迥然不同。由于被打着伊斯兰教旗帜的阿拉伯人征服，当时的拜占庭帝国——现代历史学家对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罗马帝国东半部的称呼——先是失去了叙利亚的领土，随后到642年，又失去了埃及。对阿拉伯人发动征服战的动机作出解释并不容易。人们通常在以下两个方面寻找原因：拜占庭的软弱和阿拉伯人的强大。

虽然我们无法给出具体的数字，但拜占庭帝国因与萨珊波斯从公元604至629年进行的一系列战争而出现了巨大的财政困难，并失去了大量人力。波斯人占领了叙利亚，617年后的10年中，埃及也为波斯占领。财政的紧张，意味着缺乏正规军队防守叙利亚。拜占庭统治

下的叙利亚几乎没有地方自卫的传统。拜占庭人试图与当地非穆斯林阿拉伯人部落重建联盟来克服财政困难。与这些部落的同盟关系曾因波斯的占领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阿拉伯人入侵时，也试图争取这些部落。我们不能肯定的是，拜占庭帝国内的宗教分歧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其防御力量。叙利亚和埃及的一性论派基督徒与拜占庭政府支持的“正教”基督徒团体关系疏远，还曾受到他们的迫害。叙利亚的居民最初肯定是把阿拉伯人当作危险的蛮族来看待的，但那些在被入侵者攻克的城市中幸存下来的人，会发现，只要交纳人头税，他们的新统治者会大度地赐予他们宗教自由。虽然我们缺乏当地的一性论派基督徒在叙利亚帮助阿拉伯人的证据，但有资料表明，一性论派中的一些人在埃及与阿拉伯人有瓜葛。在波斯统治下的那些年已经表明，服从拜占庭的权威并非唯一的选择，当地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接触，为处理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开创了先例。

伊斯兰教树立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开始定居的古莱氏家族的阿拉伯人精英集团的兴起促使阿拉伯人将其军事才能从部族间的战争转向对外战争。伊斯兰教禁止与其他穆斯林作战。在先知穆罕默德死后随即发生了被称为叛乱战争（*Ridda*）的内战（632—633年），在那以后发动对外侵略似乎正是时机。当时阿拉伯半岛似乎满布武装匪徒，他们引起了严重的经济混乱，而这些经济问题只能通过掠夺战利品来解决。阿拉伯人的成功不能用他们人数上的优势来解释，因为在某些战役中，他们在人数上似乎处于劣势；也不能用武器的先进来解释，因为他们武器的数量和质量看起来也不如对手。阿拉伯人在战斗中的成功，似乎源自由宗教狂热激发的高昂士气。他们相信，所有在战斗中阵亡的人都会直接升入天堂。

公元636年拜占庭在耶克穆克会战的失败被认为是战争转折点。自那以后，拜占庭退出了叙利亚，开始重组其军事力量，并企图在西里西亚和叙利亚的边界地区制造无人区，此后拜占庭再未把夺回叙利亚作为其持久的战略目标，耶克穆克的战败局面被认为无可逆转。

征募兵员、配制装备和训练正规军队的高昂费用，致使拜占庭到公元7世纪初时不得不开始避免公开决战，转而注重战略调度和伏击

战术。耶克穆克的失败使他们更坚定了这种战略转移。虽然“西方式战争”对拜占庭人来说不再具有多大现实意义，它却仍是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为此晚期拜占庭的历史学家们常将阿拉伯人在耶克穆克的胜利归于欺骗和诡计。

最后，让我们回到本章的开头——《角斗士》片头那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战斗。我们可以把电影中对这场战斗的描绘与同类战事的另一种直观表现形式——100（罗马）尺高、现在孤零零地矗立在罗马科伦纳广场的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进行对比。该纪念柱一度是某建筑群的一部分，建筑群包括这位被神化的皇帝的庙宇，可能还包括一系列柱廊；它是公元180—192年间在康茂德安排下建造的，其盘绕廊柱的浮雕刻画了皇帝已故父亲马可·奥勒利乌斯公元172—175年间对日耳曼人和撒尔马特人的战争。

在此，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考察两种表现形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战争的“实际”。人们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导致这类研究最终可能不会取得任何成果。首先，我们搜寻的是谁的“现实”，是马可的，还是他手下部将或士兵的，抑或是日耳曼人首领或日耳曼将士的？其次，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在罗马方面，战争的参与者可能都会对经他们的期望过滤后的战争实际作出自己的解释，而他们对战争的期望很大程度上又源于对该纪念柱一类“战争艺术品”的观感。相反，我们的意图是从对战争各种描绘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中找出人们是如何连续不断地对“西方式战争”进行建构的。

与过去比较，很多东西没有变（图11和12）。罗马人排成整齐的队列投入战斗（请注意下排的长矛全都高抬前伸，上排的则后倾），军官和军旗在前排。通过对装备以及对他们渡河浮桥的精心刻画突出了他们技术上的优势。这一点与《角斗士》开篇罗马人等待战斗开始时的井然有序非常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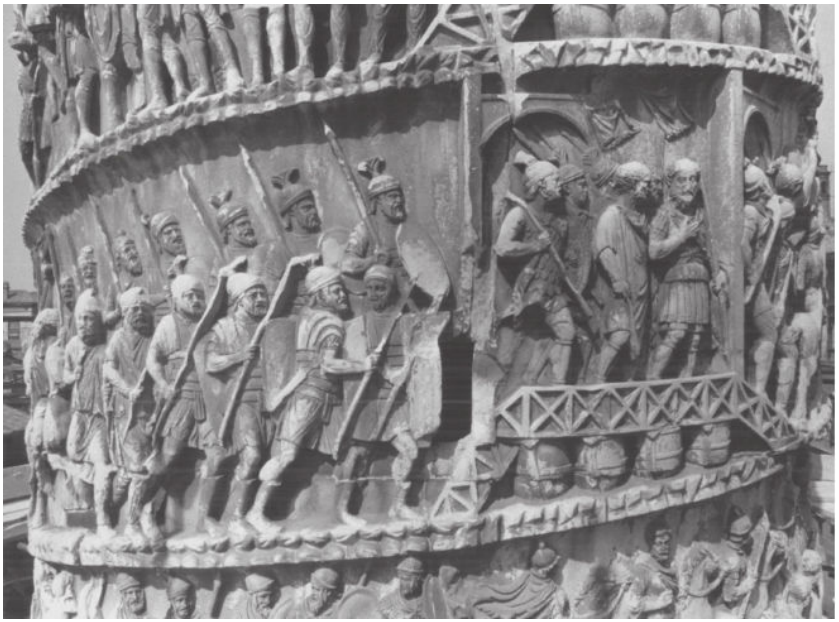

图11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LXXVIII 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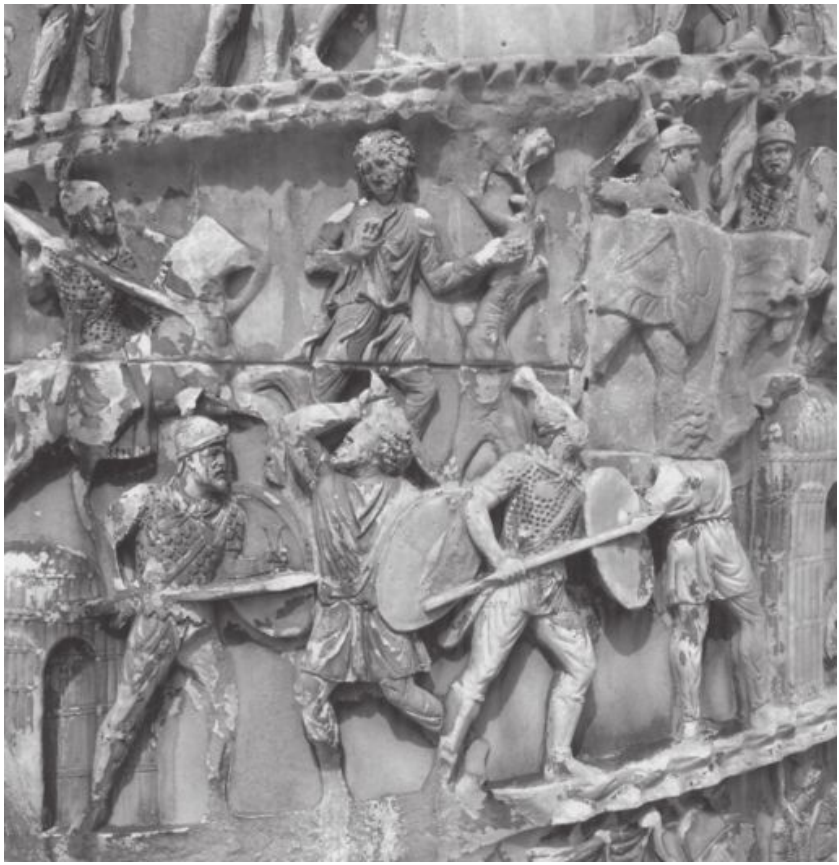

图12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XLIII

战斗之中，罗马人镇定而勇敢地近战（请注意他们似乎“毫无表情”的面部），而且是集体作战（请注意步兵的姿态非常相似）。与此相对照，蛮族或者狂暴战斗（下排中央的战士头部后仰），或者惊慌地逃跑（上排中央人物双手“绝望地”张开）。无论做什么，他们都是各行其是（他们的姿态全然不同）。《角斗士》也呼应了浮雕反映出的上述观念。

可是，两种表现形式也存在差异。电影代表的现代形式夸大了双方技术上的差距，给罗马军队平添上了“希腊火”式的投射武器。浮雕代表的古代形式则包含了许多在电影中“被压缩的”内容。

一个身材巨大、伸展着双翼的神前来帮助罗马人（图13）。从其长长伸出的手臂上生出的暴风雨将蛮族和他们的马匹扫入了尸体堆，但罗马人或者没有受到暴风雨侵袭，或者为盾牌所庇护。在古代战争的现代“写实”版（即《角斗士》）中则没有诸神的介入。

图13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XVI

罗马人扫荡了一个村庄（图14），画面顶部的一个蛮族人正向神求助，但毫无用处。我们前面看到，在这场竞赛中诸神到底站在哪一边。在右下角，一个已经被击倒、匍匐在地的蛮族人即将被罗马士兵杀戮（比较第六章，杀戮者是军团步兵）。左面，一个妇女和一个孩子正试图越过一具蛮族男性的尸体（她的丈夫、兄弟，抑或是父亲？）逃亡，但一个士兵揪住了她的头发。她的衣服已经从肩上脱落，现出了她右侧的乳房。这表明她已经或者是将要遭到强奸。这个场景还远不能表现军队失去控制时令人遗憾的混乱情形。对村庄的扫荡是由马可亲自监督并在他的军官和旗手的支持下进行的。而在现代对古代“西方式战争”的重现中，我们见不到类似的“种族清洗”。

图14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XX

7名妇女和3个孩子被俘，可能会沦为奴隶（图15）。抓捕进行的似乎还算有序（画面左侧两个士兵姿势几乎相同），但下层的画面表现的却是混乱与痛苦。两个妇女正被士兵拖走，她们衣衫凌乱，无助而忧伤。在《角斗士》中，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强奸和奴役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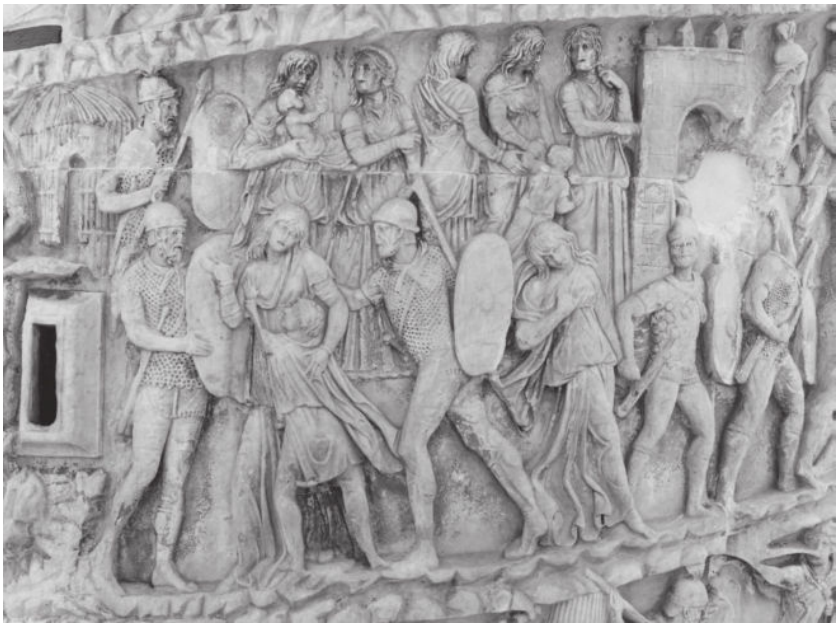

图15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CIV

两个蛮族俘虏的手都被反捆在背后，低头弯腰即将被处决（图16）。在他们脚下，是两个此前已经被处死的人，他们的头颅就在尸体堆旁边。在画面的两侧，更多的被定罪者在等待死亡的来临。虽然监督者是画面背景中的罗马士兵，但有趣的是，刽子手和被处决者都是蛮族人。是罗马人强迫他们相互残杀，还是蛮族间在内讧？在《角斗士》中，虽然罗马人在战役结束后立刻结束了受伤蛮族人的性命，但见不到这种对俘虏残忍的大屠杀。

图16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LXI

从其他古典和现代文献中我们获知，马可·奥勒利乌斯是一名“哲学家皇帝”。当马可的士兵们将俘虏带到他面前时，他端坐着（图17），一个士兵向他呈上了一颗头颅。而《角斗士》却进行了相反的描绘，在电影中，猎头风俗只存在于蛮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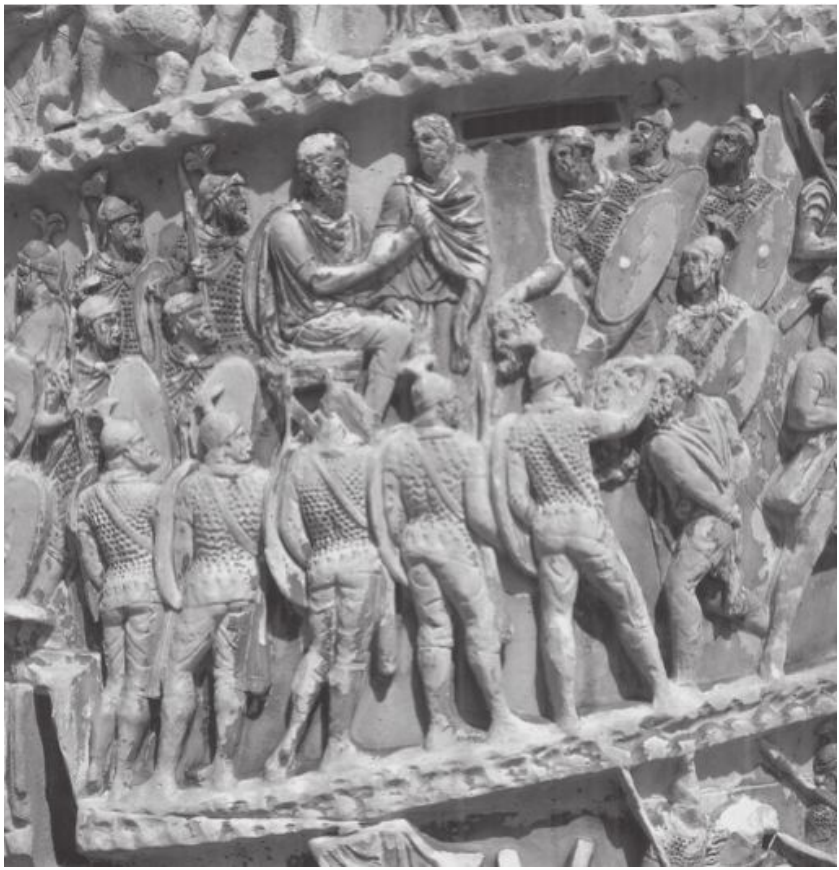

图17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之LXVI

纪念柱上充满了战斗场面，但对古代的观众来说，无论他们是细致还是粗略地看这幅画面，或无论从哪个角度、按哪种顺序看，都不会有悬念。他们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局。他们能看到我们今天无法看到的雕刻——那些基座上高度与视线平行、如今已经毁坏的雕刻（图18）。通过1540年前后的一幅绘画，我们得知基座的东边雕刻了故事的结局。画面左边站着的是皇帝，右边的罗马士兵监督着下跪臣服的蛮族。与《角斗士》中的蛮族不同，当这些蛮族人被击败时，他们知道认命。

图18　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基座的东面

古代的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柱和现代电影《角斗面士》对同类战役刻画的异同显示了“西方式战争”的概念是如何不断被重塑的。

以希波战争为基础，希腊人建构了一系列我们称为“西方式战争”的观念。这个理念反映的是，西方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用阵地战歼灭敌人，而且最好是重装步兵间的近战。胜利依靠勇气，而勇气则部分源于训练和纪律，部分来自“公民的尚武精神”，战士是拥有政治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但这些更多是理想，而非客观实际。

构成“西方式战争”的所有元素在任何时期都不曾同时具备。它的悖论在于，人们认为最能体现这一理想的时代是引入重装步兵方阵后和希波战争之前的希腊世界，但对于该时期的战争我们却知之甚少。于是人们乐于将后来的战争方式简化处理后回溯到这一时期。对自由人对峙非自由人的强调看似源于希腊人对希波战争的看法。我们应当牢记约公元前725—前490年间，在希腊城邦的军队中，重装步兵可能鲜有或者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和参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构成“西方式战争”概念的各种元素中仅有很少一些出现在西欧的实际战争中。例如，历史学家约翰·林恩指出，“公民尚武精

神”几乎随着罗马共和国公元前1世纪末的灭亡而消失，直到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时才再度复兴。在所谓2,500年的延续中，竟然存在大约1,800年的空白。这一空白使“西方式战争”这一命题显得苍白无力。

尽管实践中少有连续性，但“西方式战争”的意识形态却表现得既顽强又极具适应性。当西方社会回顾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战斗时，要么认为他们应当按古典作家推崇的方式战斗，要么认为他们的确是以作家笔下生动描绘的方式作战的。在传播古典的战争观念方面，一篇重要的文献是韦格提乌斯的《罗马军制》，创作时间约在公元383至450年之间。他结合过去与当时的战争方式，一厢情愿地想为罗马日后的战争创建一个指导性范式。韦格提乌斯注重的是理论而非力图反映客观现实。其作品的许多内容非常符合“西方式战争”的理念，他既强调勇气源于训练和纪律（例如1.1；28等），也提出了人种论的观点——日耳曼人粗壮；非洲人奸诈；来自寒冷北方的人愚蠢；来自炎热地区的人懦弱，诸如此类（1.1—2）。但这些想法来自对过去思想的改造。公元378年，罗马军队在阿德里安堡被哥特人大败，在罗马军队受到重创后韦格提乌斯在作品中建议，将军们应当警惕公开会战，注重打伏击战（3.9）。如果说在古典晚期韦格提乌斯重塑了“西方式战争”的话，那么这种“重塑”与后来“西方式战争”内涵的巨大变化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在中世纪的西欧，人们敬佩韦格提乌斯，但并不认为他的作品是描绘变化的蓝本，而是将其解读为对当时作战方式的再次肯定。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因韦格提乌斯对勇气的论述而将其作品视作骑士手册。在一个版本中，它甚至被以《骑士手册》（*livre de chevalerie*）命名。

“西方式战争”并不总是用来阐释当时的现实，有时候也会被用来改造战争现实。自16世纪后期开始，荷兰将军拿骚的莫里斯按照古典模式训练和组建军队；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士兵在整个18世纪一直鼓舞着人们，公民尚武精神的激励作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军队中达到顶峰。

将与“西方式战争”有关的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当作客观现实而不加批判地接受，并相信从古代希腊到现代西方战争实践具有延续性，

可能产生两个危险的后果。第一，它可能导致西方的自满。西方人可能会认为，“自希腊人受‘公民尚武精神’鼓舞寻求决定性会战以来，战争胜利最终都属于西方。如果作战的方式基本不变，那西方人就总能获胜。”这如同古典文化中人们所认为的，蛮族不会变化，新近遭遇的蛮族，不过是改名改姓的旧蛮族，他们过去被打败，将来还会被打败。这两种看法可同样发挥“意识形态的安心毯”的作用。第二个危险后果是：西方在发动战争中可能放弃或者削弱克制精神。“‘西方式战争’的本质是寻求歼灭敌人，因此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消灭敌人，不过是顺性而为罢了。”希腊人认为，既然蛮族生而为奴，那对蛮族的战争就不需要克制。这两种观点具有同样危险的倾向。

把“西方式战争”看作一种长期存在的、有高度适应性的、强大的意识形态要稳妥得多。当然，如前所述，“西方式战争”还会不断被重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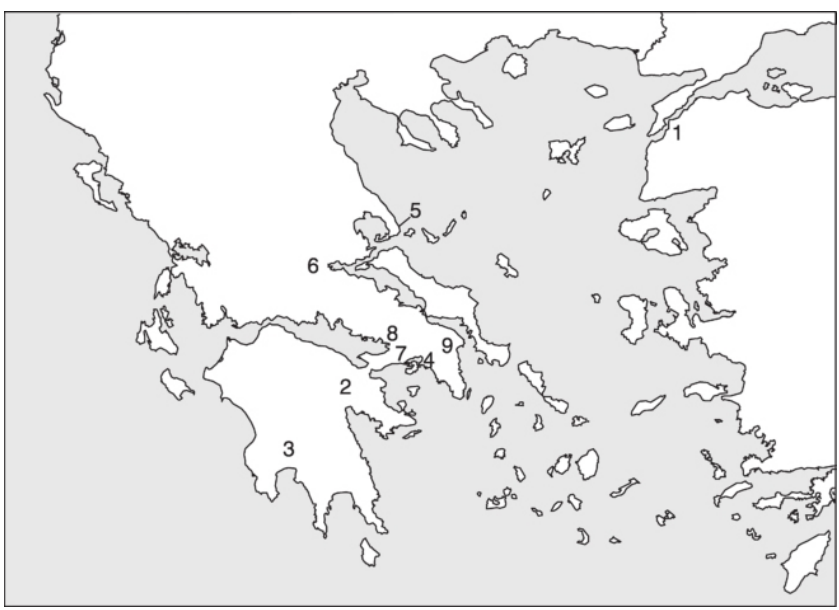

1．特洛伊 Troy
2．迈锡尼 Mycenae
3．斯巴达 Sparta

4．雅典 Athens
5．阿尔特米西昂 Artemisium
6．温泉关 Thermopylae
7．萨拉米斯 Salamis
8．普拉蒂亚 Plataea
9．马拉松 Marathon

地图1　特洛伊战争和希波战争的重要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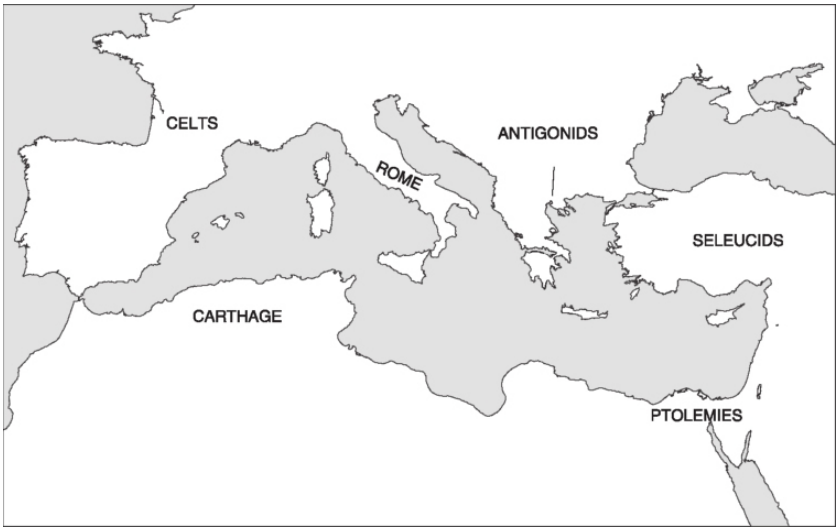

1．凯尔特王国 CELTS
2．迦太基 CARTHAGE
3．罗马 ROME
4．安提柯王朝的马其顿 ANTIGONIDS
5．塞琉古王国 SELEUCIDS
6．托勒密王国 PTOLEMIES

地图2　公元前270年左右的主要强国（顺序自上至下，从左至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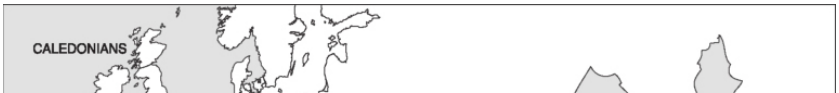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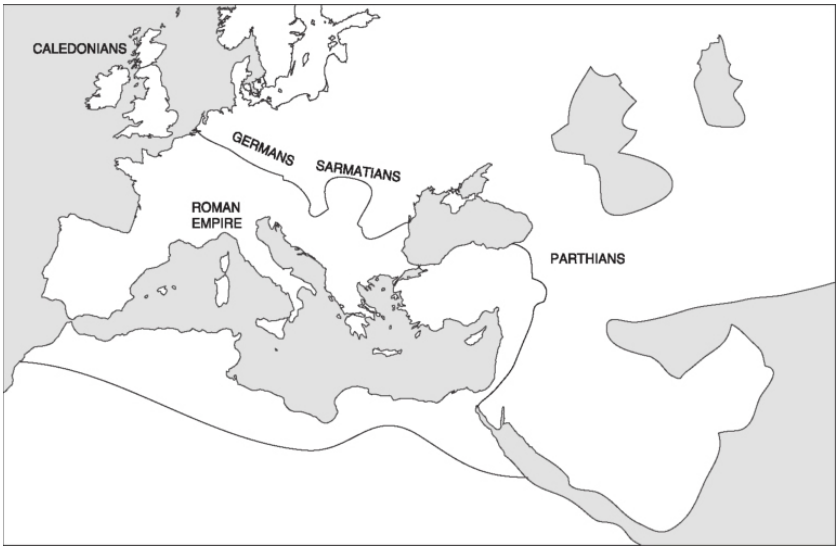

1．喀里多尼亚人 CALEDONIANS

2．日耳曼人 GERMANS

3．撒尔马提亚人 SARMATIANS

4．罗马帝国 ROMAN EMPIRE

5．帕提亚人 PARTHIANS

地图3　公元117年左右的罗马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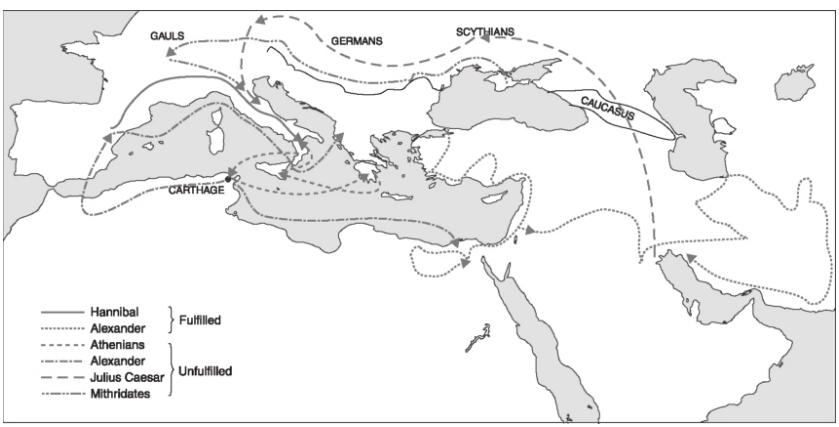

已实现的

____汉尼拔 Hannibal

____亚历山大 Alexander

未实现的

____雅典人 Athenians

____亚历山大 Alexander

____尤利乌斯·恺撒 Julius Caeasr

____米特拉达梯 Mithridates

地图4　实现和未实现的伟大征服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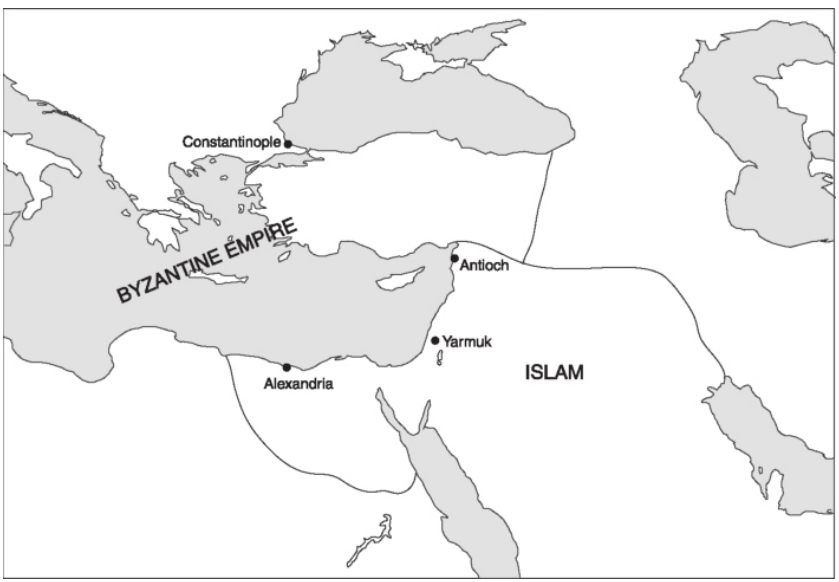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拜占庭帝国 BYZANTINE EMPIRE

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安条克 Antioch

雅姆克 Yarmuk

伊斯兰世界 ISLAM

地图5　约公元640年以前阿拉伯人占领的地区

年表

现代历史学家们对古代史的一般分期用黑体表示，罗马史分期用斜体表示。

公元前1575/50—前1100年	迈锡尼时代的希腊
公元前1200年	特洛伊战争？
公元前1100—前776年	黑暗时代的希腊
公元前934—前609年	新亚述帝国
公元前776—前479年	古风时代的希腊
公元前753—前509年	罗马的王政时代
约公元前750年以后	希腊城邦的兴起（城市国家）
约公元前750—前550年	希腊“殖民时代”
约公元前725—前650年	希腊人发明重装步兵方阵？
公元前550—前330年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
公元前509—前287年	罗马共和国早期
公元前490—前479年	希波战争
公元前490年	马拉松战役
公元前480年	温泉关战役
公元前480年	阿尔特米西昂战役
公元前480年	萨拉米斯战役
公元前479年	普拉蒂亚战役

公元前479—前323年	**古典时代的希腊**
公元前472年	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第一次上演
公元前432—前430年	雅典围困波提底亚
公元前431—前404年	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431—前427年	斯巴达围困普拉蒂亚
公元前430年	雅典在诺帕克都赢得对斯巴达的海战胜利
公元前415—前413年	雅典远征西西里
公元前405年	雅典在伊哥斯波塔米的海战中败于斯巴达人
公元前405—前367年	叙拉古僭主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位
公元前371年	底比斯人在留克特拉战役中击败斯巴达人
公元前362年	底比斯人在（第二次）曼提尼亚战役中击败斯巴达人
公元前359—前336年	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在位
公元前338年	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击败希腊联盟
公元前336—前323年	亚历山大大帝在位
公元前333年	亚历山大在伊苏斯战役中击败波斯人
公元前323—前30年	**希腊化世界**
公元前305—前304年	德米特里乌斯围攻罗德斯
公元前287—前133年	**罗马共和国中期**
公元前264—前241年	第一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247—224年	帕提亚（阿萨息斯王朝）帝国
公元前218—前201年	第二次布匿战争（汉尼拔的战争）
公元前214—前205年	第一次马其顿战争

公元前213—前211年	罗马围困叙拉古
公元前200—前196年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公元前197年	罗马在库诺斯克法莱战役中击败马其顿
公元前192—前189年	罗马与安条克三世（塞琉古王朝国王）的战争
公元前171—前168年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
公元前149—前147年	马其顿人起义（马其顿成为罗马行省）
公元前149—前146年	第三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133—前30年	罗马共和国后期
公元前133年	平民保民官之一提比略·格拉古颁布土地法
公元前133年	帕加马王国成为罗马的亚细亚行省
公元前107年	执政官马略征召无产者加入军团
公元前63年	本都的米特拉达梯六世死
公元前63—前62年	喀提林阴谋
公元前58—前50年	尤利乌斯·恺撒征服高卢
公元前54—前53年（冬季）	高卢人在阿图图卡打败萨宾努斯统帅下的罗马人
公元前53年	帕提亚人在卡雷战役中击败罗马人，克拉苏死。
公元前52年	尤利乌斯·恺撒围困阿列西亚
公元前48年	尤利乌斯·恺撒在法萨卢击败由庞培领导的共和派
公元前47年	尤利乌斯·恺撒在泽拉打败本都国王法尔纳凯斯二世
公元前46年	尤利乌斯·恺撒在塔普苏斯打败共和派

公元前44年	尤利乌斯·恺撒被刺杀
公元前**30—235**年	帝国君主政体时期（早期或盛期的罗马帝国）
公元前30—前14年	奥古斯都的统治
公元9年	日耳曼人在条顿堡森林打败瓦鲁斯统帅的罗马人
公元14—16年	罗马人在杰马尼库斯指挥下发动对日耳曼人的战争
约公元40—约112年	狄奥·克里索斯托的生活年代
公元43年	罗马在克劳狄领导下入侵不列颠
约公元50—约120年	普卢塔克的生活年代
约公元55—约135年	爱比克泰德的生活年代
公元73/4年	罗马围困犹太人的梅察达堡
公元83年	罗马人以阿格里科拉为统帅，在蒙斯格劳皮尤斯击败喀里多尼亚人
公元86年	图密善的军队击败纳萨摩尼人
公元98年	塔西佗写作《阿格里科拉传》
公元122—126年	哈德良长城修建
约公元139/142—154/158年和约158/164年	罗马驻守不列颠北方的安东尼长城
约公元160—220年	德尔图良的生活年代
公元172—175年	马可·奥勒利乌斯对日耳曼人和撒尔马特人的战争
公元180—192年	康茂德在位、修建马可·奥勒利乌斯纪念碑
约公元185—254年	奥利金的生活年代
约公元185—254年	塞蒂米乌斯·塞维鲁在位
公元224年	萨珊波斯推翻帕提亚人

公元235—284年	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
公元235—238年	马克西米努斯·特拉克斯在位
约公元257年	萨珊波斯围困杜拉——欧罗波斯
公元284—476年	多米那特制（罗马帝国后期或者晚期）
公元307—337年	君士坦丁大帝在位
公元354—430年	圣·奥古斯丁生活的年代
公元357年	斯特拉斯堡战役
公元359年	萨珊波斯占领阿米达
约公元370年	匈奴人出现在罗马世界
公元378年	哥特人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击败罗马人
公元451年	“罗马人”在查隆战役中击败匈奴人
公元475—476年	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鲁斯在位
公元476—1453年	拜占庭帝国时期
公元604—629年	拜占庭与萨珊波斯的战争
公元632—633年	阿拉伯的叛乱战争
公元633—640年	阿拉伯人征服拜占庭的叙利亚
公元636年	阿拉伯人在耶克穆克战役中击败拜占庭
公元642年	阿拉伯人征服拜占庭的埃及
公元651年	萨珊波斯帝国灭亡
公元1453年	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
公元1812/1816—1828年	祖鲁人军队的兴起（恰卡在位）
公元1976年	约翰·基根出版《战争的面貌》
公元1976年	爱德华·勒特韦克出版《罗马帝国的伟大战略》

公元2000年 里德利·斯科特的《角斗士》上映

从烽烟四起的古代战场到战事更迭的现代世界，似乎有一种“西方式战争”的观念贯穿始终，即西方人纪律严明、勇气可嘉、惯用阵地战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常立于不败之地。这种观念符合历史的实际吗？

本书通过探寻隐藏于文学、艺术、宗教等文化编码中的西方意识形态对“西方式战争”的历史渊源作了饶有兴味的剖析，并以此为切入点对社会道德、人性及生命价值进行了深刻的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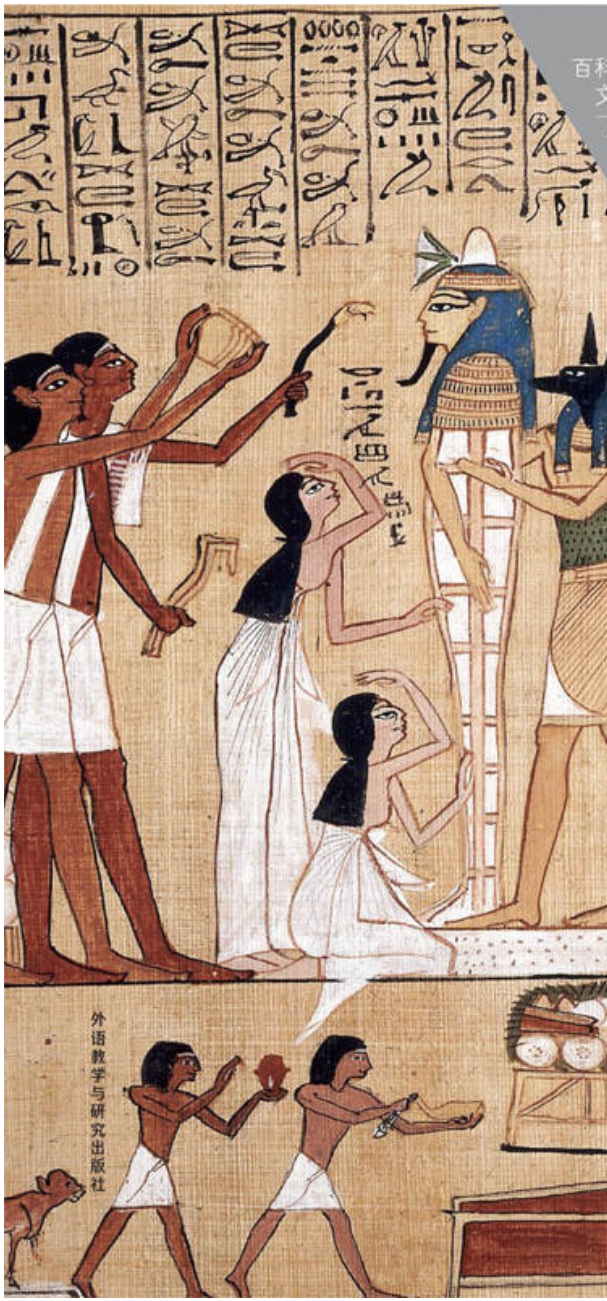

百科通识文库 49

探秘古埃及

伊恩·肖 著

颜海英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探秘古埃及

伊恩·肖 著

颜海英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74**

Ancient Egyp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4.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4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Ian Shaw 2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秘古埃及 / （英）肖（Shaw, I.）著；颜海英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24-0

Ⅰ．①探… Ⅱ．①肖… ②颜… Ⅲ．①埃及 - 古代史 Ⅳ．①K4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61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24-0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前言
图目
第一章　绪论：迄今为止的故事
第二章　发现与发明：构建古埃及
第三章　历史：构建年表　记述历史
第四章　文字：象形文字的起源与含意
第五章　王权：模式化和“东方专制君主”
第六章　身份：关于种族、人种以及性别的争论
第七章　死亡：制作木乃伊、肢解和奥赛里斯崇拜
第八章　宗教：古埃及众神和神庙
第九章　埃及热：再用埃及象征重构埃及形象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伊恩·肖，利物浦大学埃及考古学讲师。目前在参与上埃及片麻岩采矿区格贝尔艾尔阿瑟的田野考古。著有《牛津埃及史》（2000）、《古埃及材料与技术》（2000）以及《古埃及探研》（2003）等学术专著。

译者简介

颜海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院访学，著有《古埃及文明探研》及多篇学术文章。2002年9月主持了中央电视台《金字塔考古行动》节目，并为国家博物馆、世界美术馆举办的大型展览担任专家顾问。

前言

在距离阿斯旺市南部几英里远的费莱岛上，有一座伊西斯女神庙，神庙的一面墙上刻有一段简短的象形文字铭文。这段铭文的意义不在于其内容或含义，而纯粹在于它的刻写时间——公元394年8月24日，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是象形文字符号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此后古埃及的语 言 存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费莱岛神庙上还有最后的世俗体象形文字的涂写，时间是公元452年12月2日），在某种程度上它还以古老僵化的形式存在于当代科普特教堂的礼仪典籍中。尽管如此，大约在公元4世纪末期，人们已经不再了解和使用象形文字。在1822年商博良解读象形文字之前，古埃及人的文字世界一直不为人知，学者们的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希腊罗马作家的记载，或者《圣经》中有关埃及的章节。因此，直到19世纪末，古典的和《圣经》中的埃及形象几乎一直主导着埃及学这一新兴学科。

在商博良作出突破性发现的180多年后，古埃及研究已经深刻影响到了许多当代问题，从语言学和“非洲中心论”到宗教崇拜和关于外星人的奇谈怪论。本书既讨论古埃及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也评析埃及及其诸多象征对于过去和现在的西方社会及思想的影响，目的是使读者对于主导当代埃及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专题有一定了解，并试图探讨埃及文化依然深深吸引我们的原因。

这本小书集中讨论了“纳尔迈调色板”（约公元前3100年）——至少在开篇如此，概括了它对我们理解早期埃及文化的重要性。大部分章节都将调色板的不同方面作为讨论埃及学关键要素的出发点，这些要素包括历史、文字、宗教和墓葬信仰等。在这个框架下，本书偶尔会把当前的埃及学学术观点和发现与更为通俗化、商业化的观点——其中包括现代大众传媒对埃及的广泛宣传——进行对比。

图　目

图1*a*　纳尔迈调色板正面，约公元前3000年
图1*b*　纳尔迈调色板背面，约公元前3000年
图2　耶朱地兰第8门楣，表现玛雅人抓获俘虏的情景，约公元755年
图3　《埃及和努比亚全景》（1838）中的插图
图4　埃及和努比亚地区的主要遗址
图5　赫拉康波里斯平面图，图中标示了“大宝藏”及其他物品的发现地
图6　对发现玛亚墓的讽刺性报道
图7　21世纪的埃及田野调查，在萨卡拉进行的地球物理勘测
图8　纳尔迈权标头上的装饰图画，约公元前3000年
图9　底比斯的祭司阿蒙美斯墓中的王表，约公元前1300年
图10　位于盖斯尔艾尔萨加遗址的一座未完成的神庙89
图11　阿拜多斯U-j号墓出土的标签，上面有早期象形文字，约公元前3200年
图12　图纳艾尔格贝尔出土的彩釉杯，约公元前925年，上面有国王击打俘虏的几幅画面
图13　吉萨发现的国王哈夫拉的片麻岩雕像，第4王朝，约公元前2500年
图14　塔尼斯发现的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的花岗岩斯芬克斯像，第12王朝，约公元前1820年
图15　代尔艾尔迈迪纳墓室祠堂壁画，第20王朝，约公元前1160年
图16　塞提一世木乃伊的头部，第19王朝，约公元前1300年
图17　石灰石陶片，表现的是正在祭拜一个蛇形女神的赫努摩斯，第19王朝，约公元前1200年
图18　前王朝时期的女性雕像，双臂上举，可能描绘的是一个早期

的女神形象，约公元前3500年

图19　1886年爱德华·纳维利教授在指挥太尔巴斯塔地区的发掘工作，目的是寻找关于《圣经》的考古证据

图20　王后尼弗尔提提的胸像，约公元前1350年

图21　电影《埃及艳后》（1963）中的一幕，伊丽莎白·泰勒扮演克里奥帕特拉，理查德·波顿扮演马克·安东尼

第一章

绪论：迄今为止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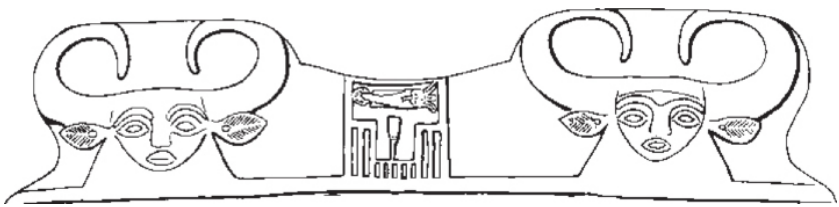

1898年，英国埃及学家詹姆斯·奎贝尔和弗雷德里克·格林在上埃及的赫拉康波里斯一个早期神庙的废墟中发现了一块绿灰色的石板。这个发现不像24年后图坦卡蒙墓的发现那样令全世界的记者蜂拥而至，但这块石板的发现者马上就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像罗塞塔石碑一样，这个石刻，即纳尔迈调色板，对古埃及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重要性远不止于赫拉康波里斯当地。在随后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为了解决各种问题——从埃及国家的政治起源到埃及艺术与文字的本质等——埃及学家对该石板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没有哪个物品足以代表整个文化，但是尼罗河谷流传至今的一些手工艺品是如此具有代表性、所含信息如此丰富，以至于它们可以成为整个古埃及文化某些方面的缩影，纳尔迈调色板就是其中之一。

纳尔迈调色板

到位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参观，人们最先看到的展品之一就是纳尔迈调色板。它是一块绿色石板，呈盾形，高63厘米，正反两面都刻有浅浮雕装饰。人们一般认为纳尔迈调色板出现在公元前4千纪的最后一个世纪[1]。调色板正面描绘有两只狮头怪兽（serpopards），它们的长颈交织在一起，分别被两名蓄着络腮胡的男子用带子拴着。类似这对怪兽的成对对称“驯兽”似乎来源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图像，或许也包括埃兰的图像，但是在埃及，这些驯兽可能代表着上下埃及的武力统一，是整个法老时期埃及艺术与文献的主题。

两头怪兽缠绕在一起的颈部形成的圆环巧妙地构成了一个凹处，也叫浅盘，它可以用来磨制描绘眼睛的颜料（这是这些调色板的本来用途），但是我们不清楚像纳尔迈调色板这么重要的仪式用品是否真的用来磨过颜料。像这样造价很高的仪式用具可能已经超越了所谓的实用功能，因为它们是献给赫拉康波里斯神庙的供品。在类似的其他仪式用调色板上，圆形凹槽可能会中断调色板的画面，这是人们不愿

看到的。试比较同样由奎贝尔和格林在赫拉康波里斯发现的“双狗调色板”，其正面也有两头长着长颈的狮子，但是凹槽只是位于脖颈之间，而不是由脖颈相交形成（或者比较“战场调色板”，其中的凹槽位于一排俘虏中间，割断了画面）。

在纳尔迈调色板正面的顶部、两个怪兽的上面，艺术家刻画了一位早期埃及统治者的形象：他长着络腮胡，正向前迈步。从他身前的象形文字和调色板顶部位于两个母牛头之间的“王名框”里的象形文字来判断，这位统治者可能名叫纳尔迈。他头戴所谓的红冠，这种王冠最早出现在涅迦达一期（公元前4000—前3500）的一块陶片上，最终成为下埃及统治者的象征（但是这种关联形成于涅迦达一期还是纳尔迈时期尚未确定）。他手执权杖和连伽，身穿一件系于左肩的束腰外衣，腰部系着一条牛尾。

国王和其他6人列队前进，其中两人只有他身高的一半，他们在调色板上的位置是一个在国王前面，一个在后面，但这可能意在表示两人实际上走在国王的两边。他们胡子刮得很干净，显然是高级官员。左边的那个显然是持鞋者，因为他一手拿着凉鞋，一手拿着一个小器皿，胸前还挂着一个胸饰，可能是王印；他头部后上方有一个矩形框，里面有一个象形文字；这个符号可能代表芦苇船（但是在这一情境下意义并不确定），通常读作*ḏb3*。他头部前方还有两个不同的符号，分别是叠加的玫瑰花饰和一个读作*ḥm*的符号，该符号后来具有几种含义，“仆人”为其中之一。国王右边的官员略高大些，头戴假发，身穿豹皮衣，脖子上好像挂着书写工具。他的身份可由他头顶上的象形文字*tt*来断定，这个词可能是“宰相”一词较早的写法。

图1*a*　纳尔迈调色板正面，约公元前3000年

图1*b*　纳尔迈调色板背面，约公元前3000年

从图上来看，国王和这两个官员，以及其他4个较为矮小的掌旗官（其中只有一人留着胡须），正在巡视被斩首的10个敌人的尸体，尸体在最右边，死者的头颅都被放在他们的两腿之间，这一情形可能出现在一次战役或者一次杀戮仪式之后。4根旗杆顶部分别有两只鹰、一只豺狼（可能是韦普瓦韦特神），以及一个显然是王室胎盘的球状物，这些象征物或者图腾后来才为人所知。这些旗杆一起组成了一个后来被称作“荷鲁斯的追随者”（或“追随荷鲁斯的众神”）的组合，它们与王室庆典或者葬仪有密切联系。尸体上方有4个符号或者图像：一扇门、一只鹰、一条首尾都很高的船和一只举着鱼叉的鹰。

调色板的另一面是纳尔迈更高大、更强壮的形象，这次他头戴埃及的圆锥形白色王冠，身穿同样系于左肩的束腰外衣，腰部系着牛尾以及一端有母牛头图案的流苏。他将一个梨形权杖举过头顶，击打一个外国人（但他的举法有点怪，手抓在权杖的中间），而这次只有一个持鞋者陪伴（在他的后面或者侧面）。持鞋者的身高看起来依然不及国王的一半（尽管国王高高的王冠使他比画中的其他人符物都要高），他头部的一侧再次出现了玫瑰花饰和*ḥm* 符号。国王揪着俘虏的头发（俘虏的面部特征更像埃及人而不像利比亚人或亚洲人），在俘虏头部右侧有两个表意符号。多数埃及学家推测这两个符号是早期象形文字中的“鱼叉”（*w‘* ）和“湖”（*ĕ* ），它们可能代表外国名字“瓦什”（*Wash* ）的读音，或者指某个名字、头衔、甚至出生地是“鱼叉（湖）”的人。看来，在调色板正面（见图1a）被斩首的尸体上方的一组令人费解的符号中，举着鱼叉的鹰所要表达的也是化身为荷鲁斯–鹰的国王大败瓦什或者鱼叉。

在国王面前、俘虏的上面，鹰神荷鲁斯盘旋着，用一根系在俘虏鼻子上的绳子抓着这个被抽象化的俘虏。这个俘虏的背上伸出6根纸草，鉴于每个纸草代表数字1000——正如在后来的法老时期那样，有人认为这个画谜的意思是“6000个俘虏”。另一种不同的解释是这组纸草象征着俘虏们的故乡，也许是盛产纸草的北部埃及。“鱼叉”和“湖”的符号很可能既指国王的俘虏也指鹰所抓着的俘虏，因此二者实际上可能是同一个人。调色板反面的最底部是两个卑躬屈膝的裸

体的人，可能也意在表示俘虏或死去的敌人。两人脸部左侧各有一个符号，他们的身体扭曲着，面朝左边，与上面两个俘虏面朝的方向一致（与国王和持鞋者的方向相反）。

自从纳尔迈调色板被发现以来，人们就一直在讨论这块石板上的浮雕的外观和复杂的含义。图像的风格以及国王纳尔迈身份的确定都表明它刻制于公元前4千纪，许多埃及文化中最有特色的元素就是在那时出现的。这些形象已经体现出法老时期艺术的某些鲜明特征，例如把画面分成若干个水平“格层”；将人和动物的正面与侧面结合起来，并以半图表法表现出来；用身高来表现每个人物的重要性。后一种正是权力的象征表达法。

对调色板的跨文化研究中，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杰指出，那个独具埃及特点的打击画面与意象研究中具有普遍性的各个方面之间取得了平衡。他指出，国王的精致服饰与俘虏的赤身裸体形成了鲜明对比，并援引埃纳图姆（约公元前2560年）的胜利石碑为证，在这个石碑上，宁吉尔苏神在对一群被网套住的裸体敌人挥动着权杖。他还注意到北美易洛魁族人有剥去战俘衣服和配饰的习惯，阿卡德人也有对“裸体的，戴脚镣的俘虏”的描绘。他与来自耶朱地兰的门楣上的玛雅浮雕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该浮雕表现的是一个叫做贾古尔鸟的统治者抓着他的两个敌人（约公元755年）。在这幅玛雅浮雕中，胜利的武士衣着华丽，而战败的统治者则半裸着身体，其中一人还被揪着头发。正如特里杰总结的那样：

> 尽管纳尔迈调色板上的画面不一定是描绘在战场上俘获敌人，但这两幅画面在心理层面上非常相近，虽然它们来自不同的半球且时间上也相隔甚远，彼此毫无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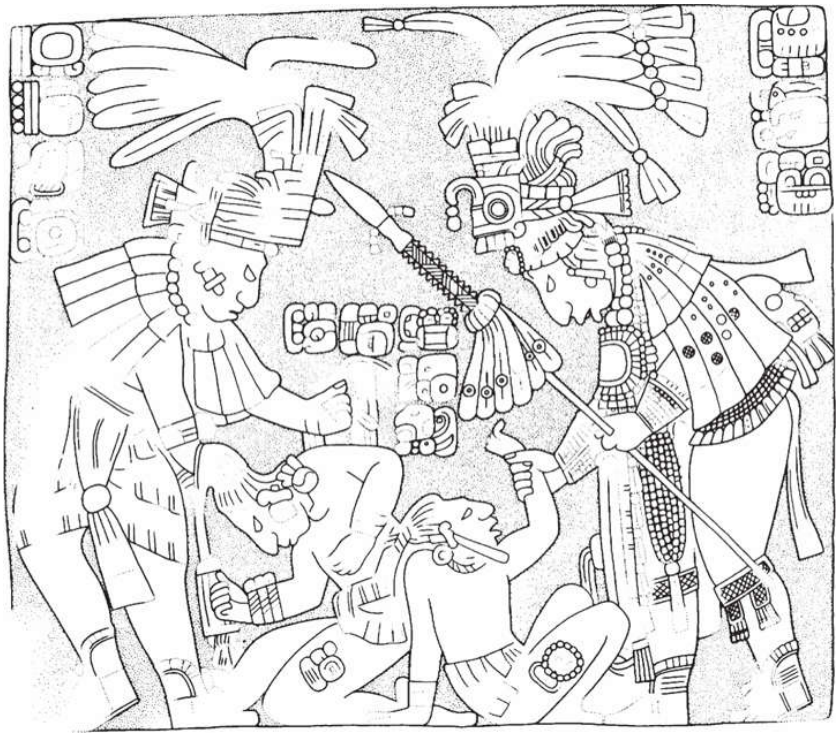

图2　耶朱地兰第8门楣，表现玛雅人抓获俘虏的情景，约公元755年

从某方面来说，这个评论可能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埃及文化。我们不自觉地在两种对立的想法之间摇摆不定，一种是“他们和我们一样”，一种是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埃及人。正如巴里·肯普在《古代埃及：对一种文明的剖析》（一本备受欢迎的介绍古埃及的长篇著作）中所说：

> 我们可以走入和走出［古埃及人的］思想世界，而不觉得他们的思维怪异，因为他们的语言和图像也是我们西方人自出生以来用以给现实世界分类的一种方式……我心中的古埃及更像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尽管我希望它不会与原始古代文献有太过明显的出入。

在另一部有趣的埃及学著作——《纪念奥赛里斯》中，汤姆·黑尔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古代埃及已经死了。没有人能够声称在种族或者语言上对它拥有与生俱来的特权。尽管经过了数千年时光的侵蚀，又有罗马人、科普特人、穆斯林、帝国军人、语文学家、市政工程师、游客等持续不断的毁损和掠夺，但是它的“亘古不变”以及怀旧的力量使埃及死而复生。尽管经历了这些劫难，埃及仍然存留了下来。

如果古埃及文化的魅力在于它的异族感与熟悉感的结合，那么埃及学家的任务就是运用现有的考古、图像以及文字资料区分以下两方面：一是对我们或古埃及人来说都是因文化而异的生活的某些方面，二是肯普所描述的那种“自从古代世界出现第一个城邦以来就已经确立的基本核心。”这当然不是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唯一原因，尽管这种思想模式使我们避免孤立地看待埃及，而是视其为人类在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拿出的多种文化对策中的一种。

古埃及是什么

最早的“埃及人”（如果我们可以在埃及出现之前这样称呼他们）出现在约公元前40万年旧石器时代的非洲东北部，但他们直到约公元前2.5万年气候开始变得干燥起来时才开始在尼罗河附近定居，那时东部和西部沙漠已经形成。在中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万年到5000年），一些半游牧民族在尼罗河谷附近定居下来，他们以打猎和捕鱼为生。约公元前6000年，随着气候逐渐湿润，越来越多的新石器时代的部落在尼罗河沿岸定居，他们主要以驯养和种植为生。

到公元前4千纪初，尼罗河谷北端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明。这个地区雨量非常小（现在也是这样），因此埃及富饶的农田（古埃及人称为凯麦特，意为“黑土地”）是靠“洪水”来灌溉的，奇特的是，洪水每年都会泛滥，给河床带来了新的肥沃的淤泥层。随着河水蜿蜒北流，两岸耕地带的厚度也不等。因此，由位于东非的发源地向北流至地中海岸的尼罗河是埃及地理中最重要的元素。它将埃及分为两部

分：一部分是上埃及，位于埃及南部，包括瓦迪哈勒法到开罗之间的区域，另一部分是下埃及，基本包括了埃及的北部地区，在那里尼罗河分成了几个支流，形成一个大而肥沃的三角洲，随后注入地中海。古埃及人称他们的国家为凯麦特（指黑色的沃土），与周围的杰塞瑞特（“红土地”或者沙漠）形成了对比。在这种简单而奇异的对称地理环境形成了一种发达的文化，这种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平衡与和谐的特性。

法老埃及历经了约3,000年（约公元前3100—前332），其文物包括手工艺品、建筑、文献以及残余的有机物等。全世界的博物馆收藏了数百万件埃及文物，而尼罗河谷和三角洲地区还有更多的遗迹，既有神庙、陵墓、城市，也有年代久远的岩刻，它们刻在利比亚沙漠、东部沙漠和西奈半岛等地的岩石碎片上。三大因素促使法老埃及有异常丰富的文物保存了下来：首先是贵族阶层追求豪华精致的墓葬；其次是干燥的气候条件刚好适宜文物保存，最后是文字广泛应用于各种媒介。

法老埃及再发现的历史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在遭到几个世纪的遗忘和掠夺之后，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学者逐渐开始用更为文明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在这个大趋势下，埃及学的各个具体方面，如碑铭学、考古发掘、语文学、人类学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埃及的看法

在埃及之外，最早把埃及人作为一种独特而有趣的人类学现象来研究的是古希腊人。尽管埃及和其他地方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埃及人和希腊人就有贸易往来，但实际上，公元前7世纪时第26王朝的统治者塞姆太克一世大量征募希腊雇佣兵可能才标志着两个文明之间的全面接触。

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多次提到埃及，除此之外，一些证明希腊

人对埃及感兴趣的最早的文献来自于他们早期对全球地理的研究。公元前6世纪，米利都的泰勒斯描述了尼罗河的泛滥，他认为这是由夏季的北风引起的，北风阻碍了尼罗河汇入地中海。大约在同一时期，阿那克西曼德首次以科学的方法绘制了一张地球的地貌图；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该地图的一个铜版复制品上包括了“地球上所有的道路、所有的海洋和河流”，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尼罗河谷也在上面。

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很多希腊和罗马学者到访埃及，他们对于埃及之旅的记述是外来者对埃及的理性观点的最早的文字描述。然而，遗憾的是，许多古代作家关于埃及的著述都没有保存下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公元前47年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烧毁，以及公元391年70万册书丢失，其中就包括曼尼托的36卷本的埃及史（见第三章）。

第一位确知到访过埃及的希腊地理学家是米利都的赫卡塔埃乌斯，他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曾南行至底比斯。他写了一篇名为《记述》的专论，该论文是第一部系统描述世界地理的作品。虽然现在只有残篇留存下来，但这篇文章显然包括对埃及的详细描述，因为拜占庭人斯提法努斯（约公元600年）从中引用了15个埃及城镇的名字。

最广为人知、也是见闻最广博的到访埃及的希腊人要数哈利卡尔纳苏斯的希罗多德了。希罗多德是一名旅行家和历史学家，他的9卷本的《历史》创作于公元前430到前425年间，其中的第二卷全部是关于埃及的。希罗多德的著作是有关木乃伊制作和其他古埃及宗教和葬仪习俗的最早的主要文献来源。他吸引了众多的仿效者，包括斯特拉伯和狄奥多罗斯·塞库鲁斯。希罗多德在埃及的旅行最南可能曾抵达阿斯旺，但他没有详细描述底比斯，而是集中关注了下埃及。他的证据似乎主要来源于地位卑微的祭司，但他也会以自己敏锐的观察来判断，比如他断定金字塔是王陵。希罗多德不仅提供了大量关于公元前5世纪埃及的人种论方面的信息，而且还提供了一部后期埃及200年的历史，即从公元前650年左右塞姆太克一世的统治到公元前450年左右（那时埃及已经是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了）希罗多德到访埃及这段时期。考古活动偶尔也能证明希罗多德的描述出奇地准确，位于尼罗

河三角洲东部、距离开罗东北80公里的太尔巴斯塔，即布巴斯提斯神庙和城镇的所在地就是一个例子。1887到1889年间，埃德伍德·纳维尔对该地主要的纪念物——猫神巴斯太特的红色花岗岩神庙——进行了发掘，证实了这位希腊历史学家的报告中对埃及建筑的许多细节描述。

希罗多德对于埃及的描述被英国埃及学家艾伦·劳埃德形容为“我们对公元前664到前525年间埃及历史的唯一的连续记载，尽管有些记载有误，它仍然是所有关于这个时期的现代研究的基础”。劳埃德指出，公元前5世纪的埃及本土文献虽然内容广泛，但往往都千篇一律、刻板陈旧，可信度不高。然而，希罗多德自己也存在一些问题。劳埃德认为，他“提出了一种对于埃及历史的看法，但这种看法没有表现出对埃及历史的真正理解。一切都完全是为了投希腊人所好，并且被明确地描述成一种希腊的模式”。早在1887年，德国语文学家赫尔曼·狄尔斯就证实了希罗多德曾大量抄袭他的杰出前辈赫卡塔埃乌斯的著作，特别是埃及卷中有关地理和民族学的部分。有人由此认为应该是赫卡塔埃乌斯构建了基本的知识框架，这个框架成为希罗多德和后来多数描写埃及的希腊作家的特色。

第二个基于个人经历来大量描写埃及的希腊人是另一个叫赫卡塔埃乌斯的人（约公元前320—前300），他是一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出生于色雷斯的阿布戴拉镇。他有多部著作，其中一部可能叫做《关于埃及人》。他在埃及曾受雇于托勒密王朝的奠基人——托勒密一世，该书就是以他的这段经历为基础。尽管他可能的确曾与托勒密一世一起沿尼罗河而上，但他的作品中仍有许多内容是抄袭希罗多德的。赫卡塔埃乌斯是怀疑论者皮洛的学生，尽管前者只有一些残篇保留下来，但还是有许多著者引用他的著作，其中就包括狄奥多罗斯·塞库鲁斯。他关于埃及的著作是现存希腊史学作品中最早提到犹太人的。他的作品也体现了希腊人对于托勒密王朝早期古代埃及政治制度的看法，尽管他对于古埃及王权的观点似乎并不准确。以下提法就是如此：

一般来说，祭司最先审议最重大的事务，他们总是在国王身边，有时作为他的助手，有时作为提议人和老师；他们也通过占星和预言来预测未来，让国王了解那些对他有所帮助的圣书中记载的行为。

有人认为赫卡塔埃乌斯对托勒密王权的看法基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将祭司和祭司文献作为史料；二是希腊作者倾向于在描述“东方”的习俗时加入自己的看法。

并非所有希腊人前往埃及的目的都是研究书籍，一些人也会出于商业或军事目的来到尼罗河谷（或者只是经过），这些游客或“朝圣”者在到访过的景点和遗迹上留下了一些最早的涂鸦。美侬巨像的最北端是涂鸦最多的地方之一，美侬巨像是矗立在底比斯河西岸阿蒙霍太普三世祭庙废墟前的两尊巨大雕像（希腊人认为这两座雕像是“吟唱的美侬”，它们每天早晨发出的奇特鸣声正是《荷马史诗》里的人物美侬在为他的母亲——黎明女神厄俄斯而歌唱）。即使是远在努比亚的阿布辛贝尔的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庙，也有迦南、希腊和腓尼基士兵留下的涂鸦，他们是公元前6世纪早期塞姆太克二世远征库什时的军队成员。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伯在公元前1世纪后期曾经在亚历山大停留过几年，他提到了底比斯的几个纪念物，包括巨像和新王国时期的岩凿墓。尽管斯特拉伯的《地理学》总体来说不如希罗多德的作品信息丰富，并且更倾向于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评论埃及文化，但它仍然是对公元前1世纪的埃及有价值的记载。

希罗多德及其后继者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后期埃及和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信息，也帮助我们认识到埃及人所关注的知识和精神层面上的事物。尽管希腊和罗马作家看似经常对埃及人的宗教和哲学作出错误评判，但他们的反应往往和许多现代研究者的那种复杂的反应一样。例如，公元1世纪时的罗马讽刺作家卢西安曾一度为埃及总督服务，他曾写过一篇墨莫斯与宙斯的对话，真切地传达了罗马人在嘲笑埃及宗教习俗的同时又暗暗羡慕的心理。墨莫斯问道：

“你，狗脸的，穿亚麻的埃及人，你认为你是谁？以你的吠声，你如何认为你

自己是神？……我耻于提到朱鹭、猴子和羊以及其他更滑稽的动物，它们从埃及偷偷溜到天堂，天知道是怎么溜出去的。众神啊，你们如何忍受，看着它们以与你同等甚至是更高的级别受到祭拜？而你，宙斯，当它们用一根羊角对你指指戳戳时，你如何忍受？”

然而，宙斯回应：

“你说的埃及人的这些事情的确令人震惊。然而，墨莫斯，它们大多数都有神秘的含义，一个尚未入门的人不应该嘲笑它们。”

《圣经》与埃及

埃及有希腊人和罗马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将《圣经》里的叙述与埃及文献和考古学记录联系起来就存在明显的问题。由于《旧约》的年代背景不确定，多数学者在确定《圣经》中与埃及相关事件的年代时都遇到了障碍。而且，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对古埃及人未必同等重要，因此无法确定有独立的埃及文献存在，何况还只是极少数留存至今的文献的一部分。

直到公元前1千纪，《圣经》中才出现有确切年代的关于埃及的记载，那时有许多具体的关于埃及人的典故，尤以那些抗击亚述人和波斯人的战斗典故居多。以东的哈达可能生活在第22王朝的统治者“老奥索孔”（公元前984—前978）统治下的埃及。几乎可以肯定，第22王朝后来的统治者索尚克一世（公元前945—前924）就是《圣经》里的示撒，据说他曾于公元前925年洗劫了耶路撒冷和所罗门神庙。约两个世纪后，据说在撒马利亚的统治者何西阿书反抗亚述人入侵的时候，为了寻求军事援助，何西阿书曾经联系过埃及王子——舍易斯的太夫纳赫特。

然而，这些非常具体的提及统治者名字的记载纯属例外，一般而言，就古埃及与《旧约》中的叙述之间是否有可证明的联系这一问题存在很大争议。由于《圣经》所描述的事件大都是在发生几百年后才

被记载下来，因此很难判断哪些是真实历史事件的描述，哪些纯粹是寓言性的或修辞性的。此外，还有一些因为埃及人名、地名或者文化现象的年代错误而可能产生的问题，这些人名、地名、文化现象不是出现在应当发生的年代，而是出现在创作这些文献的年代。例如，约瑟夫的故事通常被认为是发生在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0—前1070），但它却包含了某些与舍易斯时期（公元前664—前525）的政局紧密相关的细节。

在《圣经》与埃及的联系问题上，最经常被讨论到的可能就是“出埃及”的故事了。一种广为流传的假设认为，拉美西斯二世（第五章将会谈到他的名誉）正是将犹太人驱逐出埃及的法老。证明拉美西斯二世与“出埃及”有关的证据极其薄弱——被奴役的以色列人在培尔拉美西斯城做苦力，而此地是拉美西斯二世及其父亲在三角洲东部建立的。也有人指出，早在拉美西斯二世在位初期，其长子阿蒙荷尔荷普塞夫似乎就没有任何相关文献记载了，一些学者认为他可能是英年早逝，因此在理论上有可能是《出埃及记》里面那个被杀的法老“长子”。然而，法鲁克·格玛认为这个儿子可能只是将他的名字改为了阿蒙荷尔威奈迈夫或塞特荷尔荷普塞夫，这两个名字一直到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末期还有文献记载。如果格玛是正确的，那这个王子可能在拉美西斯二世在位第40年时还在世，由此推测他可能活到了50多岁，因此不太可能是那个被杀的长子。

遗憾的是，格玛的推论晚了半个世纪，没能阻止塞西尔·德米勒在他的著名默片《十诫》（1923）中把拉美西斯塑造成一个反面角色。而在20世纪90年代，梦工厂以《出埃及记》为背景制作了动画片《埃及王子》，片中的拉美西斯再次陷入尴尬处境，而这次显然是因为编剧对格玛严谨的推论并不了解。

一些埃及学家曾提出，《出埃及记》里面的法老实际上是拉美西斯的儿子及继承人美尼普塔，该观点的依据之一是：美尼普塔在位期间所立的一块“胜利石碑”是各种文献中最早提到以色列的。该碑立于他在位的第5年（约公元前1208年），内容包括颂扬美尼普塔战胜各国敌人的一系列赞美诗。以色列是在巴勒斯坦的敌人的名字当中出现

的，值得注意的是，和这个词一同出现的是一个表示民族而非城市或地区的象形符号：

> 迦南及其所有的罪恶都被驱除了；阿什克伦被夺取了；格泽尔被占领了；亚诺姆已经被消灭了；以色列被摧毁了，它已被斩草除根；胡鲁已经成了埃及的寡妇。所有的土地都被夷为了平地。

然而，正如这段译文所示，石碑实际上几乎没有关于以色列起源和本质的描写，而且根本没有提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出现，更不要说他们被驱逐。正如约翰·劳克林所强调的：

> 某些文献证据，如阿纳斯塔斯纸草第5卷……可能会使人们猜测有少数埃及奴隶可能时不时地逃离埃及，但是所有现存的埃及文献都无法证实《圣经》中所描述的“出埃及”的真实性。美尼普塔石碑与该问题毫无关联。

近年来，第18王朝早期的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甚至也成为了《出埃及记》中法老的可能人选，其理由是红海海水的分开可以被解释为爱琴海上圣托里尼岛火山爆发的结果（尽管现在多数人推测火山爆发于公元前1620年左右，比女王在位早150年），这种解释有些牵强。然而，加拿大埃及学家唐纳德·雷德福的观点更极端，他认为《出埃及记》只是若干个故事的大杂烩，它可能源于人们对驱除喜克索斯人（第二中间期时统治北部埃及的亚洲国王）的遥远记忆。在《埃及人摩西》一书中，简·阿斯曼提出埃及人把亚洲统治者从埃及北部驱逐了出去，这所代表的不仅是对喜克索斯时代终结的民族记忆，还可能是一种对所谓“异教的”阿玛尔纳时代（详见第九章）的神化。他认为，从本质上来说，《出埃及记》刚好利用了这样的民间故事使以色列人能够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在《出埃及记》中，埃及的角色不是历史的而是神话的：它帮助那些讲故事的人来界定自己的身份。”

埃及与《圣经》之间有某种文学（也许还有宗教）上的有趣的直

接联系，那就是第104首赞美诗，它与对太阳神阿吞的赞美诗非常相似。相传这首赞美诗为法老埃赫纳吞所作，他将埃及宗教改革成了一个单一的宗教，有人认为是一神教。偶尔有人试图把埃赫纳吞与摩西等同起来（甚至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曾出版《摩西与一神教》一书）。然而，这位法老在生活上，更确切地说是在对阿吞神的崇拜上，与《圣经》记载的摩西相差甚远。两首赞美诗的相似也许仅仅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文学传统——它们很可能源自同一部近东作品。后期埃及的一篇名为《卡纳赫之子阿蒙涅姆普特教谕》的智慧文与《圣经》中的《箴言篇》也非常相似，这可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某些学者认为《箴言篇》的作者甚至可能受到过《阿蒙涅姆普特教谕》的影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圣经》考古来说，我们对埃及与《圣经》相联系的文献和考古遗存研究得越多，这些关联看起来就越不真实、越没有说服力。正如约翰·罗默在《圣约书：圣经与历史》中所说："考古既不能'证明'《旧约》中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也无法对其进行'证伪'，它只是关于内容可能具有的含义的现代理论。"埃及的"圣经考古"可能注定是一条死胡同，但在早期的埃及学研究中，古典作品和有关《圣经》的著述都起到这样一个关键作用：使人们以熟悉的方式探寻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国度。

"埃及学"的出现

我们很难确定欧洲的古物研究被考古学所取代的日期，同样，对于"早期旅行家"的写作和搜集埃及古物何时演变为了类似于现代埃及学研究的行为，我们难以知晓。然而，在很多埃及考古史中，19世纪初的拿破仑远征被视为记录和描述法老埃及遗存的首次系统尝试。这次远征留下的多卷本《埃及记述》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高水准的制图术和精确性，而且在于它包括众多学者作出的连续而一致的评价，这是对古代埃及进行的首次真正而全面的评估。

尽管拿破仑的“专家”抱着科学的目的，但事实上，19世纪时期所有在埃及的发掘都是为了给欧洲和美国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提供艺术珍品，因为它们通常是探险队的经济来源。19世纪上半叶，欧洲探险队来到了埃及，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以极快的速度获得、消化并吸收了新信息，描绘出了法老埃及的概貌。1838年，法国建筑师赫克托·霍鲁发表了埃及“全景”，其中一幅插图展现了埃及的主要纪念物。该画展现了想象中的蜿蜒的尼罗河，亚历山大和地中海岸在最显著的位置，菲莱岛上的伊西斯神庙在远处。这张埃及图景涵盖了埃及最主要的建筑，从吉萨的金字塔到底比斯东西两岸的神庙。它生动地体现了埃及学基本要素的构建速度。早在19世纪30年代，加德纳尔·威尔金森就已经在其著作《礼仪与风俗》中全面而细致地介绍了古埃及。当然，19世纪中期的出版物中不乏错误、误解和漏洞，但是许多方面的基本原则已经确立，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则主要是填补细节而不是开拓新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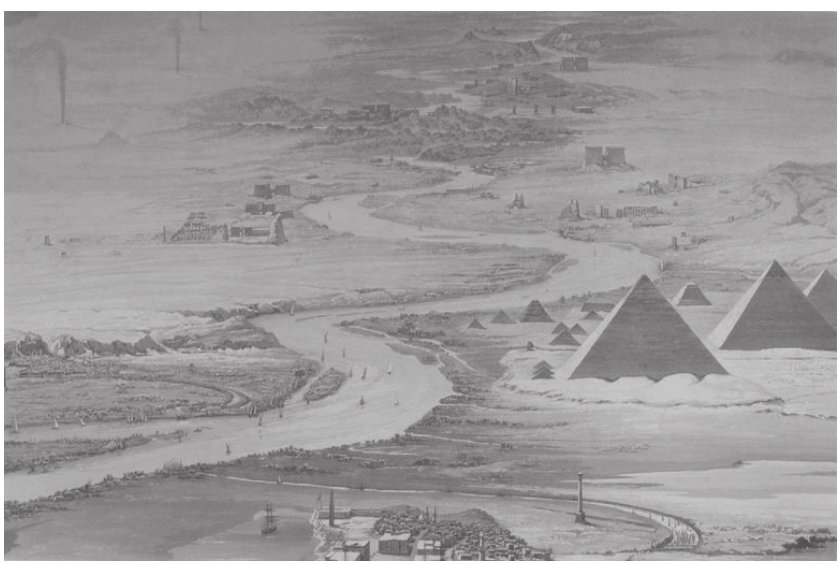

图3　《埃及和努比亚全景》（1838）中的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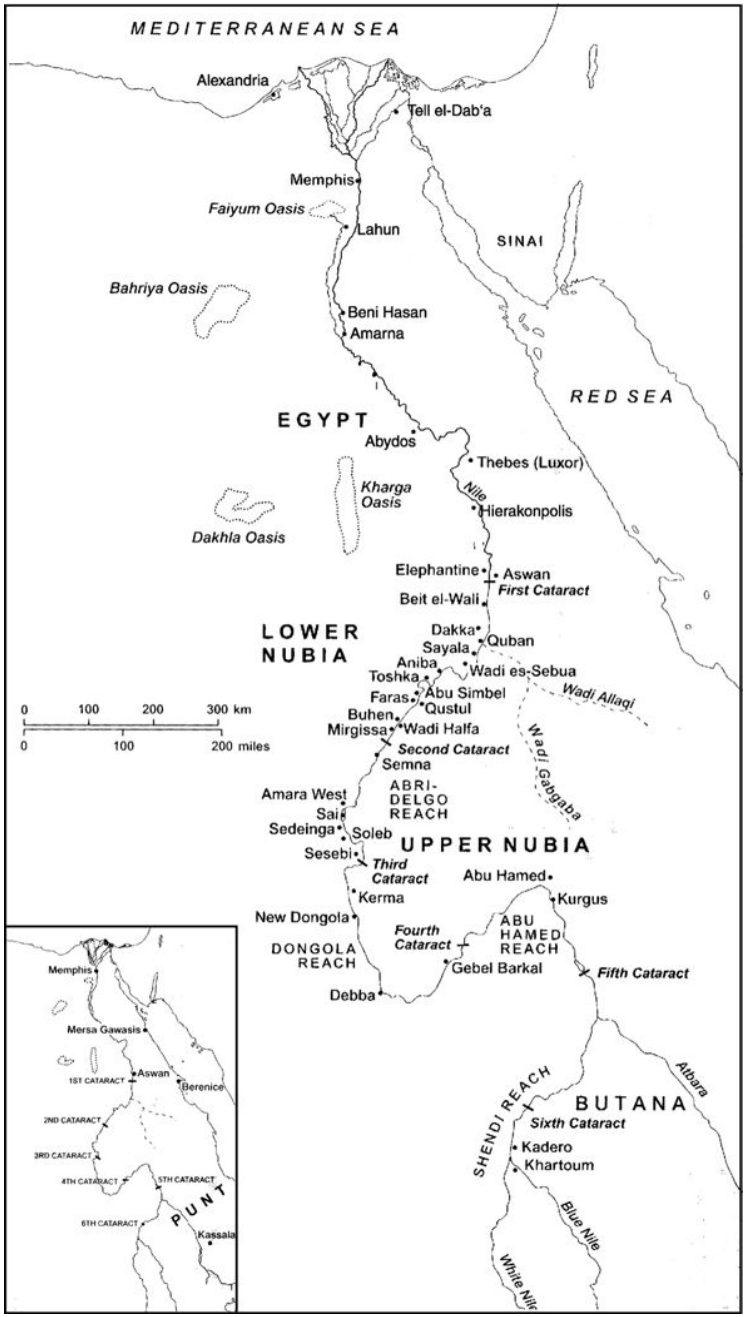

图4　埃及和努比亚地区的主要遗址

从19世纪早期乔瓦尼·贝尔佐尼和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进行有组织的抢劫活动到19世纪90年代埃米尔·阿姆利诺和雅克·德摩根进行考古发掘，这一期间埃及考古学家使用的技术几乎没有任何进步。约翰·沃瑟姆在他的英国埃及学史中巧妙地把这一时期概述如下："尽管埃及学家不再使用炸药发掘遗址，但他们的技术仍然很粗糙。"

19世纪埃及考古危害最大也是倒退最严重的一方面也许是与科学考古相对立的"清除"的概念。该词体现了这样一种谬论，即必须通过清除沙子来暴露出埋藏在下面的重要文物。这一概念阻碍了按照地层学原理进行的发掘，同时也不利于把遗址的所有组成部分——沙子、陶片、泥砖、高耸的石门——视为考古记录中同等重要且必不可少的部分。"清除"一词也会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人们只需要简单地发掘、陈列埃及文物，而不需要去分析、解释和重构。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更为科学的方法，逐渐推动埃及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有序的时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田野考古和分析的科学方法在考古学的各个分支中都尚未完善的时候，两位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和乔治·赖斯纳——以他们创新的方法为整个学科设立了新标准。这可能是埃及考古学在其历史上唯一一次走在了方法论发展的前沿，为欧洲和美国的发掘奠定了模式。虽然社会出身和教育背景不同，但皮特里和赖斯纳的职业生涯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先驱人物，而更相似的是，他们都主要依靠一位女性赞助人的资助（皮特里由英国女小说家阿梅莉亚·爱德华兹资助，而赖斯纳则由美国慈善家菲比·阿珀森资助）。

皮特里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创新性主要在于他对所发掘的考古遗存的每个细节都非常关注，而他的前人和同辈（甚至某些后人）则主要关注遗址的挖掘及对其重要特征的描述。19世纪的其他"发掘者"倾向于不加选择地大面积清理考古材料，而皮特里却有策略地在每个遗址内选择一些地段进行挖掘，由此逐步构建整个遗址的全貌，并且不会破坏整个遗址。例如在阿玛尔纳，皮特里通过在该城市的各个部分发掘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结构，在短短一个发掘季内就较好地掌握了这个复杂城址的概况。

赖斯纳约比皮特里晚20年开始田野考古工作，然而他的方法同样具有开创性。在某些方面他与皮特里非常相似，例如对细节的高度关注；但他也认识到不仅需要认真细致地进行勘测和发掘，还需要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使未来的研究者可以通过记录再现遗址及其最初被考查的过程。由于大量研究成果尚未发表他就去世了（这是他过于精细的方法的缺点之一），这些研究结果就只好由后世的考古学家来解释和出版。赖斯纳成功的秘诀之一是在考古现场启用真正的多学科专家队伍，而不是日后再把考古材料交给科学家，那时这些材料的背景和现场意义就模糊了。例如，在纳加艾得代尔的前王朝墓地，解剖学家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就跟随着赖斯纳，对N7000号墓出土物进行了细致观察，为当代研究者提供了极其可靠的人类学研究资料库。赖斯纳还把系统使用截面制图的方法引入了埃及考古，时间是朱斯皮·菲奥雷利在庞贝首创这类地层学分析法之后的40年左右。此前，埃及所有的发掘者们（包括皮特里）只是简单地利用平面图的顺序来描述遗址的不同历史阶段。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皮特里和赖斯纳的成就在于他们突破了常规。历史上的埃及学研究大多极端保守，不管是概念术语还是发掘后的分析方法以及考古资料的解读。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与世界其他地方在史前和历史考古上取得的进步相比，埃及和近东的考古学家在分析和解读方法上几乎没有大的改变。当刘易斯·宾福德、科林·伦弗鲁和米歇尔·希弗等主流考古学家在扩充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时，多数埃及学家还在单纯地埋头搜集数据和撰写历史。

在布鲁斯·特里杰的《考古思想史》中，只有少数几处提到了埃及考古：只有约一整页的篇幅介绍了皮特里发明的“顺序定年法”，它是系列法的早期形式。就埃及学对考古思想 的贡献来说，这种评价也许是公正的，但在过去150年间，埃及遗址的发掘却源源不断地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考古资料 。埃及考古资料的迅速积累使我们对法老时期的物质文明有了新认识，但更重要的是，它为地中海地区年代学框架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埃及学对古代历史年表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使得查明法老时期年表中的错误在近年来变得更为重

要，但已经确立的年表是一个由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组成的密集矩阵，很难进行拆分和重组。19世纪中期到二战期间，大部分埃及考古工作都体现出以下两种趋势：首先，早期考古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发掘资料进行严格的艺术–历史的、以实物为主的研究。其次，田野考古工作偏重于研究宗教和墓葬建筑，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手工艺品和建筑。这两种倾向严重抑制了埃及考古在观念上的发展，直到20世纪60年代，两大重要事件——对尼罗河流域史前史的研究和对法老时期城镇的发掘——才最终开始对整个学科产生影响。

在分析埃及学研究的变化趋势时（见表1和表2），戴维·奥康纳证明了在1924到1981年间，已出版的田野考古著作中有关聚落的出版物所占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到20世纪90年代，形势发生了更为戏剧性的变化，据1989—1990年间埃及学出版物的目录显示，至少有44.4%的田野考古工作是关于聚落遗存的，而对非纪念性的墓地的发掘则相应地急剧减少。因此，当代埃及学家无疑更注意“平衡”和总体把握他们现在研究的考古资料类型。下一章我们会讨论不同类型的考古发现、分析以及对新旧考古证据的解释。

表1　已出版的埃及学著作的比例

		1924	1981
语言与铭文	铭文为基础	15.5	19.1
历史与宗教	铭文为基础	17.2	10.8
社会与文化	铭文为基础	3.5	5.5
艺术		2.0	4.6
考古（包括碑铭学与考古报告）		33.2	27.2

表2　考古报告类型的比例

出版年代	纪念性的		非纪念性的		勘测
	墓葬	宗教	墓地	聚落	
1924	34.1	20.7	30.5	13.4	1.0
1981	36.2	13.0	8.7	23.2	15.9
1982	34.6	17.9	11.5	17.9	17.9
1990	27.8	16.7	5.6	44.4	5.6

除了 1990 年的数据之外，所有数据都摘自戴维·奥康纳的《埃及学与考古学：非洲视角》，载于 P. 罗伯肖主编的《非洲考古史》（伦敦，1990）。

注释

〔1〕 即公元前3000年左右。——译注，下同

第二章

发现与发明：构建古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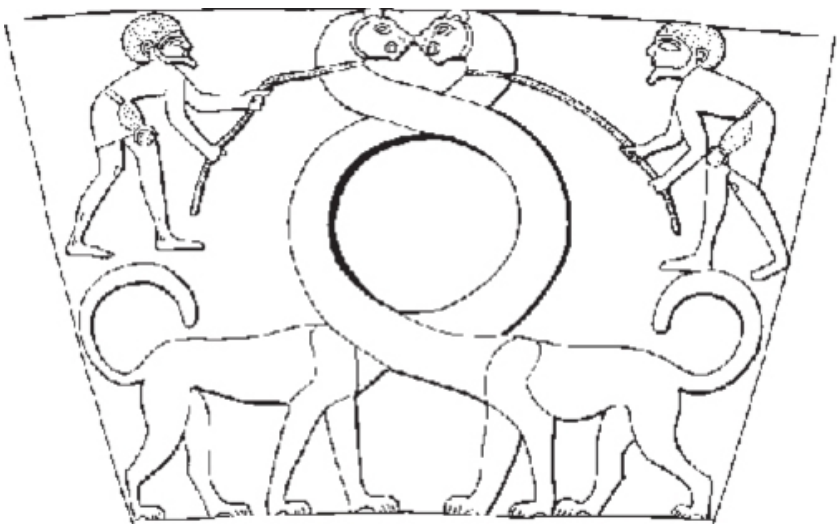

距离纳尔迈调色板的发现地一米处，埋藏着一批前王朝末和王朝初期的仪式用具（公元前3100—前2700），其中包括用于祭祀的调色板、权标头和象牙小雕像。自从奎贝尔和格林发现这些手工制品以来——他们称之为“大宝藏”——它们就是我们理解埃及国家起源的最重要的一组证据之一。不幸的是，由于没有已经发表的该遗址准确的平面图和地层截面图，这一早期重大发现的确切日期和重要性仍不明了。在该遗址的周边地区，发掘者还发现了埃及王朝末期的几件很有价值的遗物，其中包括两尊独特的古王朝末期统治者培比一世（公元前2321—前2287）的铜合金雕像，还有一个金制的鹰头，可能是神庙里一座宗教雕像的一部分。这些来自不同时期的物品混杂在一起，表明它们是王室给神庙的一系列捐赠，但我们无从知晓这些赠予神庙的物品是由前王朝晚期到古王国时期的众多统治者分别赠予的，还是由古王国或中王国时期的某个统治者一起献给神庙的。

奎贝尔对“大宝藏”及其毗邻地区的发掘工作作出了评论，真实地传递了一种绝望情绪，认为他们的技术达不到这项工作的要求。

> 日复一日，我们坐在这个洞里不停地刨着土，并且试着将发掘出来的物品理清；因为它们随处可见，每一件都与其他五六件有联系，它们相互交叉，就像一把在手中摇晃后抛到桌子上的火柴一样。

在《法老前的埃及》一书中，美国史前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夫曼概述了奎贝尔和格林如何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尽管他可能错误地低估了他们在赫拉康波里斯工作的复杂性）：

> 不幸的是，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个最生动的证据“纳尔迈调色板”来自何处。显然，它是在“大宝藏”附近发现的，但与其他物品并不在同一处。从格林的考古日记看（奎贝尔没有记录！），它好像是在离“大宝藏”一两米处被发现的，格林在1902年发表的报告中提到，它很显然是在前王朝末期的地层中发现的，这使得纳尔迈调色板的年代回溯到了上下埃及统一（即公元前3100年）前的一两代。但两年前，在奎贝尔发表的关于赫拉康波里斯的第一份报告中，纳尔迈调色板被认

定为发现于“大宝藏”区，这使得它出现的时间被推迟到了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130—前17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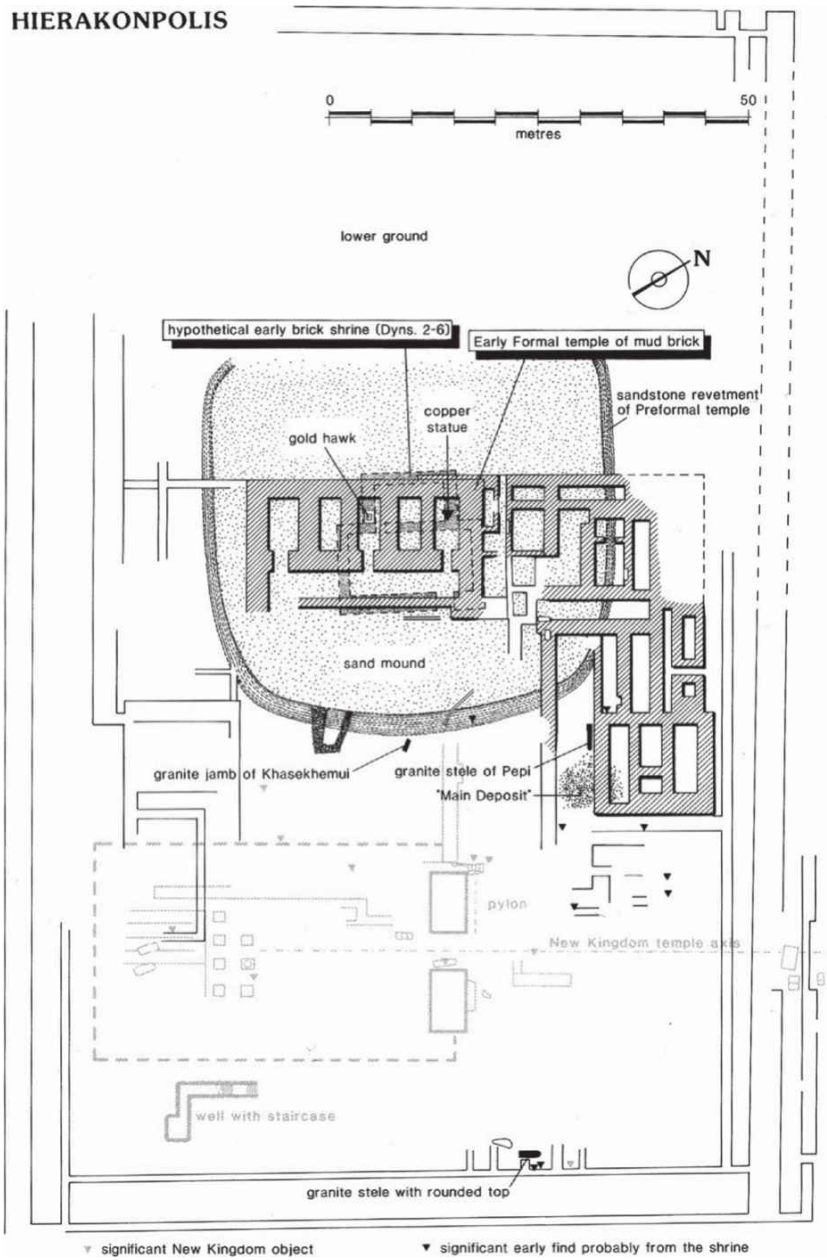

图5　赫拉康波里斯平面图，图中标示了“大宝藏”及其他物品的发现地

Treasures of Tutankhamun – Lat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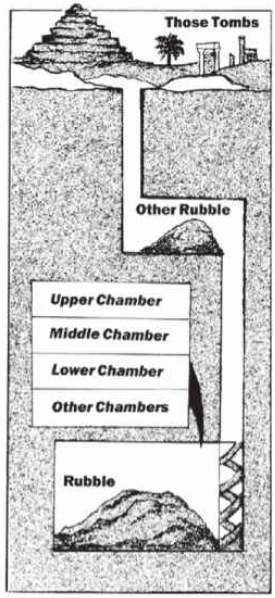

TOMB AFTER TOMB OF AMAZING DISCOVERIES REVEALED!

DUST-encrusted archaeologists today abseiled gingerly down through the foetid air of an ancient spiral staircase into the ancient subterranean necropolis of Ben-Gazzara.

There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22 they shone sand-choked torches into what is believed by experts to be Tutankhamun's ancient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or possibly ancient DVLC.

FABULOUS WEALTH

Rumours quickly spread that there was absolutely no sign of any ancient solid gold sarcophagus or similar.

But as near-exhausted Egyptologists worked in shifts through the hot and stuffy night, a painstaking inch-by-inch search for ancient jewel-encrusted artifacts also drew a disappointing blank.

DRIPPING WITH GOLD

Then suddenly, in the rubble-strewn ancient burial chambers and mud-baked network of ancient tunnels which may once have linked The Boy King's DTI with his once-glorious ancient Office of Fair Trading in Luxor, one or two faded hieroglyphs turned up.

In hushed tones which belied almost hysterical excitement, sweating archaeologists suggested that these almost definitely would fill massive historical gaps in our knowledge of where to find unlooted ancient treasure houses dripping with gold.

INCREDIBLE

Nearby, in the ancient Valley of the Fools, just yards from where the team could easily have stumbled across pile after pile of ancient ceremonial chokers inlaid with rubies, excitement was at fever pitch.

Incredibly, they had unearthed evidence of what once might have been the ancient Mayan DHSS centre at Cairo NE99 2LU.

TREASURES FROM THE TOMB

According to Egyptologist Mortimer van Dijk, mile after mile of ancient labyrinthine corridors, which criss-cross the stygian gloom deep beneath the hot swirling sands, could one day yield an unprecedented ancient horde of rich fragments and/or Aladdin's Cave of fascinating shards.

UNBELIEVABLE

Meanwhile, an ancient piece of papyrus reed, over an inch long and more than likely crafted about 1361 BC into the shape of a vulture's knee, was carefully dusted off.

It stood as unbelievably mute witness to what perhaps were once the ancient workings of The Necropolitan Water Board or North Nile Gas.

Both probably worshipped richly painted vultures, or at any rate finely chiselled she-goats, and surely must have stashed their fabulous takings somewhere round here.

YET MORE MAY BE FOUND

Tomorrow archaeologists will clear ancient debris from an ancient archway, believed once to have soared above an ancient door.

No one knows for certain whether it will indeed prove to be the fabled Lost Door To Tutankhamun's Once All-Powerful VAT Sorting Centre.

A fragment of ancient dust, shown actual size –

Another tell-tale ancient shard is unearthed.

图6　对发现玛亚墓的讽刺性报道

奎贝尔和格林在赫拉康波里斯发现的纳尔迈调色板的特性和背景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文物出土的整个情境没有被准确地记录下来，一些伟大的发现甚至也有可能变得毫无意义。即使是再小心谨慎的发掘也有可能遇到解释的问题，但反过来，如果这些发现是以一种不科学的方式进行或者发表的，我们就不太可能了解它们的全部意义。

在历史上，埃及学的资料非常丰富，因此埃及学家常常一味地搜寻资料。连续不断的新发现使得考古证据在数量和多样性上进一步稳步提升。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媒体对埃及考古发现的反应，以及对这些发现及其主要发现者的描绘，使得埃及考古发现成为了一种陈词滥调。1986年，英国《笨拙》杂志生动地讽刺了媒体对某个新发现过分夸大其词的报道，如一个名叫玛亚的图坦卡蒙的司库的坟墓，被夸大为一个小型的图坦卡蒙陵墓。看到那些埋藏的宝藏发出的闪闪金光时，报纸的报道风格就习惯性地变得俗套而幼稚。

这个学科并不是单纯依靠发现新资料来取得进展的。不同时代的埃及学家都采用了新的理论范式，逐步改变着人们对古埃及文化的已有认识。第二，新方法——如新的发掘技术或尖端的科学分析方法——在许多时候已经转变了我们对古代埃及现存证据的认知。不管媒体如何夸张，某些考古发现还是真实地代表了该学科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如1987年在太尔艾尔达巴遗址发现的爱琴海风格的壁画，或19世纪90年代在阿玛尔纳发现的一个保存着大量楔形文字泥板的地窖（即所谓的阿玛尔纳书信）。和纳尔迈调色板一样，人们很快认识到这两个发现不仅仅是埃及学这块“拼图”中新的关键组成部分，而且是新的信息类型，它们推动了对现存资料模式进行的重整，这种重整是非常重要的。

太尔艾尔达巴的壁画

20世纪60年代以来，奥地利考古学家曼弗雷得·比塔克就开始在

太尔艾尔达巴发掘阿瓦里斯城址，该城曾是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喜克索斯人的首都，他们在第二中间期控制了北部埃及。太尔艾尔达巴纵深的地层分布使我们能够观察一个青铜时代的大聚落的居住模式在几代之间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掘的中心是位于该遗址西部边界的赫尔米庄园的一个第18王朝早期大型宫殿建筑的地基。1987年，在紧邻宫殿的古代花园的碎石堆中，发现了许多米诺斯风格的壁画残片，其中一部分来自于一些“戏牛”图，这些图与著名的克诺索斯青铜时代中期宫殿中的壁画非常相似。尽管此前在许多埃及新王国时期遗址中都发现了米诺斯和迈锡尼的陶罐，这些陶罐通常被认为是埃及与爱琴海地区贸易往来的证据，但太尔艾尔达巴的米诺斯风格壁画的出现则表明：在第18王朝早期（约公元前1550年），阿瓦里斯的居民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来自爱琴海的家族。还有研究表明，太尔艾尔达巴的米诺斯风格壁画频繁地使用了一种红色背景，这表明它们的年代甚至要早于那些克里特岛和希拉岛（圣托里尼）的壁画。

既然在埃及遗址中出现了米诺斯壁画，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埃及也许有米诺斯艺术家，这就可以解释第18王朝早期的埃及陵墓中为何会出现“飞奔”（即表现撒腿狂奔的动物）等爱琴海特色的壁画。在利凡特古城的两个遗址中（卡巴里和阿拉拉赫）也发现了类似的米诺斯壁画的残片，与在阿瓦里斯发现的一样，这些残片似乎也与贵族统治阶级有关。能将横跨地中海东部的各种文化的年代顺序连在一起的关键因素并不多，该发现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发现也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米诺斯”文化？在太尔艾尔达巴壁画被发现之前，我们一直认为克里特岛是“米诺斯”艺术的发源地，当这种艺术在其他地方出现时，我们则认为这是克里特人以贸易或者移民的方式与地中海地区其他文化进行交流的标志。而埃及三角洲地区“米诺斯”艺术的出现要早于克里特岛，这说明“米诺斯”艺术可能源于克里特岛之外，尽管到目前为止，太尔艾尔达巴是埃及唯一一个发现有“米诺斯”艺术的地方，也就意味着“米诺斯”艺术可能并非源自埃及文化。

阿玛尔纳书信

和太尔艾尔达巴壁画一样，阿玛尔纳书信也是一个意外发现，因为它们实质上是埃及考古中“非埃及的”发现。这两个发现有着同样深远的意义，因为阿玛尔纳书信对我们理解青铜时代晚期埃及和近东地区的政治和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阿玛尔纳书信的故事始于1887年，那时，一位乡村妇女在挖掘用作肥料的古代泥砖（阿拉伯语为*sebakh*）时，发现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和利凡特的刻有楔形文字的小块泥板。这一发现引发了更多的非法发掘，古董市场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泥板。当时这些泥板的重要性并没有马上得到确认，很多泥板都流入了私人手中，但大英博物馆的瓦里斯·巴奇却认为这些泥板是真品，并且大量买入。时任牛津大学亚述学教授的阿奇博尔德·塞斯总结了它们的重要性：“单这一项考古发现就对众多的学术讨论、精妙的理论以及怀疑性的论证产生了巨大冲击。”

1891到1892年间，弗林德斯·皮特里在阿玛尔纳进行后续发掘时又发现了几块泥板，由此确定了大批泥板的发现地点就在埃赫塔吞古城的中心，这些泥板都是在一个被断定为“王家档案库”的建筑的地下发现的，由该建筑的泥砖上的印章及周边建筑物即可断定。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德国和英国的发掘者又在阿玛尔纳发现了一些泥板，泥板的总数达到了382片，分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柏林的博德博物馆、卢浮宫和开罗的埃及国家博物馆。然而，由于大多数的泥板都是通过最初的非法挖掘而不是科学发掘发现的，因此不能确定它们的准确来源。关于这些泥板的确切年代也尚存争议，但它们的时间跨度为15到30年，约始于阿蒙荷太普三世（公元前1391—前1353）执政的第30年，持续至图坦卡蒙统治（公元前1333—前1323）的第1年，大部分是在埃赫纳吞的统治时期（公元前1353—前1335）。尽管泥板上也出现了亚述人、赫梯人和胡里安人的语言，但多数泥板上的铭文都是用一种叫做阿卡德语的方言写成的，这是当时的一种通用语。

档案中的大多数文件是埃及与巴比伦、亚述等西亚强国或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附属国之间的外交信函。虽然来自埃及统治者的信函

很少，大多数都是由其他统治者寄来的，但这些信函仍然能够生动地描绘出埃及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对这些信件的一种理解是，它们证明了埃赫纳吞统治时期埃及帝国的瓦解。由于这位所谓的“异端法老”只留下了很少的军事活动的记录，因此人们认为，他由于一心在埃及推行宗教和政治改革而忽视了外交政策。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我们只是碰巧得到了这批埃赫纳吞统治时期的文件，如果类似的新王国早期或晚期的档案也保存下来的话，其中可能同样会有被包围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城绝望地向埃及求助的内容。换句话说，我们对埃及对于叙利亚–巴勒斯坦有影响力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埃及人自己对战役和胜利的记载，而阿玛尔纳书信中记载的这种外交事务的混乱状态，实际上是整个新王国时期埃及“帝国”的正常状态，并不是暂时的失常现象。

另一个在阿玛尔纳书信的翻译和解读过程中出现的争论就是阿匹鲁人的身份问题。许多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附属国的泥板中都提到了一群被称为“阿匹鲁”的人，在整个公元前两千纪，他们似乎已经遍布整个近东地区。由于第一次翻译阿玛尔纳书信时这个名字被写成了Hapiru或Habiru，一些《圣经》研究者便立即开始探究这些词是否是最早表示希伯来人的词汇，有的学者甚至还将阿匹鲁的进攻同约书亚侵入迦南的记载联系起来。然而，还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表明，表示种族的专用名称Apiru（阿匹鲁）和Ibri（希伯来）在词源上有什么关联；我们甚至还不清楚阿匹鲁是指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群体还是一个经济阶层（或者三者皆有），还有一位评论家指出这个术语与“社会的抢劫团伙”同义。约翰·劳克林在《考古与圣经》中指出，“毫无疑问，并非所有的阿匹鲁人都是希伯来人，而是否有希伯来人曾经是阿匹鲁人，现在仍在讨论中。”

阿玛尔纳书信不仅使我们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所了解，还清楚地展现了当时的贸易关系，以及诸如玻璃、金子和新传入的铁这些特殊商品的价值，同时，阿玛尔纳书信中使用的不同落款也显示出写信人相对于埃及王廷的不同地位。1996年，一场具有创新意义的会议（2000年出版了《阿玛尔纳的外交》，由科恩和韦斯特布鲁克主编）

召开，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外交官齐聚一堂，讨论了“阿玛尔纳时代的国际法”、“外交信号”和对阿玛尔纳外交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等主题，并分析了阿玛尔纳时期的外交状况。各领域专家意见的创新性结合使对阿玛尔纳书信的研究步入了埃及学家以前从未思考过的一些新领域。

除了依据新的文本分析之外，人们也开始以更科学的视角对阿玛尔纳泥板进行研究。以色列地质学讲师尤瓦·戈伦博士用岩相分析法来研究形成这些泥板的黏土，其目的是将这些泥土同地中海、近东和北非等地不同遗址的地质状况进行比较，试图由此推断出阿玛尔纳书信的发送地。通过这种方法，戈伦解决了阿拉西亚王国所在地的问题。该王国向埃及以及其他国家供应铜，它可能位于现在的塞浦路斯、希里西亚、叙利亚西北部，甚或是以色列南部。在大英博物馆的8块“阿拉西亚书信”泥板中，有一块看上去同其他泥板的构造大不相同，这意味着这块泥板可能并非一件埃及本地制造的复本，而是由阿拉西亚当地的泥土所制成的信件原件。该泥板由淡粉色的泥灰质黏土制成，夹杂着很多亚绿泥石和辉绿岩的碎片，这表明这种黏土产自一个以火成岩为主的特定地区。戈伦认为，这有助于将可能的选择范围缩小在塞浦路斯的托罗斯山、安纳托利亚的基祖瓦特纳地区以及叙利亚西北部的比亚巴辛地区。而后，他首先排除了基祖瓦特纳，因为该地当时正处于埃及最大的对手——赫梯人的统治之下；其次又排除了叙利亚西北部地区，因为该地区在地质上的差异太大；而另一方面，在塞浦路斯正好有一个地区在各方面都与证据相吻合。从地质角度来看，该地区位于辉绿岩构成的托罗斯山脉与毗邻岛屿的泥灰质部分之间，可能出产由辉绿岩和泥灰质混合而成的粉色黏土，而那个泥板正好是用这种材料制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自青铜时代中期以来，塞浦路斯的这个地区一直是出产铜的地方。塞浦路斯通常被认为是阿拉西亚最有可能的所在地，而戈伦的分析似乎为该理论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证据。

尽管大多数阿玛尔纳档案由信件组成，但其中也包含32份其他文献，这些文献似乎与国际外交没有直接联系。它们很可能与书吏教育和翻译活动有关，其中一块泥板上有个类似于字典的阿卡德语和埃及

语的词汇表、一个字音表的片断和一些书吏的练习题及文学作品。因此，我们不仅有王室间的通信资料，还有一些证据证明受雇书写并翻译这些信件的书吏的活动。

威尔伯的腓尼基卷轴、皮特里的新种族及其他尴尬事

由于对埃及文明图景的不断调整和重构，我们能够周期性地回顾并重新解释早期的发现，有时甚至是从根本上重新解释。尽管太尔艾尔达巴壁画和阿玛尔纳书信的发现背景迥异（而且时间上相距近一个世纪），但它们都很快被认定为重大发现。然而，有很多重要发现在最初被完全误读或是被认为无足轻重，在很久以后才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证据来源。例如，1890到1893年间，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威尔伯从象岛当地妇女手中购买了9张带有封印的纸草卷。他最初认为这上面写着某种腓尼基文字，但他最终推断：这些文字实际上是阿拉姆语（公元前1千纪近东地区使用的语言文字）。这些卷轴被他束之高阁，直到1953年他的女儿将它们赠予布鲁克林博物馆之后才公诸于世。事实上，这些文献——以及后来在发掘象岛的过程中出土的其他文献——后来被证明是有关第一波斯王朝时期埃及生活最重要的文献资料。

令人惊讶的是，在著名的弗林德斯·皮特里的职业生涯中，也有一些起初对重大发现的误解。在1895年对涅伽达墓地的发掘中，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墓都有一个长方形的墓坑，有的墓坑还有泥砖砌边，墓坑中有一个或多个呈胎姿的尸体，他们被放置在芦苇席上，头朝西方。有些尸体似乎在埋葬之前就已被肢解了，并且还有一些人殉的迹象。随葬物品数量不等，通常有陶器、石制器皿、调色石板、燧石刀、珠子、手镯和小雕像等。皮特里立刻意识到这与传统的埃及墓葬有很大不同，他得出结论：这些墓属于埃及之外的一个“新种族”，该种族可能在古王国晚期入侵了埃及。然而，结果证明，无论从年代学还是人类学上来讲，这一结论都是大错特错。对皮特里来说，这个错误让他

最为难堪的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雅克·德摩根在公布阿拜多斯的一组类似的墓群时作出了正确解释。葬于涅伽达和阿拜多斯墓地中的人之所以特别，并非因为他们是一个“新种族”，而是因为他们是史前时代晚期的埃及人，他们悠久的文化出现在法老时代之前，只是此前几乎不为人知。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个重大错误，皮特里继续利用涅伽达的材料发明了巧妙的“顺序定年法”。这个类型学系统帮助他创建了第一份前王朝时期的年表，很多人认为这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图7　21世纪的埃及田野调查，在萨卡拉进行的地球物理勘测

相反，埃及一些最著名的发现并没有显著影响到我们对埃及的看法。以霍华德·卡特发现的图坦卡蒙陵墓为例，自20世纪20年代起，该发现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埃及学的认识，但是，它除了让人们第一次领略法老随葬品的奢侈程度、推想像阿蒙霍泰普三世和拉美西

斯大帝这些更著名且长寿的法老们的陵墓中也有同样的随葬品之外，并没有提供多少真正的新史料。可以说，卡特最伟大的成就在于他大大提升了埃及考古学的公共形象，但是该墓的内容却并没有使埃及考古走向新的研究方向，也没有改变任何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除了图坦卡蒙头骨底部钙化的血块证明他有可能死于谋杀）。这个陵墓也许是考古史上最令人兴奋的发现，而墓的内容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公元前14世纪的技术的各方面信息，而这些对埃及学家来说还远远不够……

走向科学的埃及学

随着越来越多的新方法运用于勘测、发掘和分析等领域，专业埃及学家也开始需要对诸如生物人类学、地质学、遗传学和物理学等若干科学领域略知一二。这些学科为埃及学将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埃及学的学科力量也通过这一扩展过程得到了增强。

在卡特那个时代，科学才刚刚开始对埃及学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反映在一个叫艾尔弗雷德·卢卡斯的人身上。在图坦卡蒙墓发现后的4年内，他出版了《古代埃及的器物与工业》的第一版，该书对现存的关于埃及器物和工艺品方面的资料作了很好的综述，直到20世纪90年代，该书仍被视为埃及科学方面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卢卡斯是一个在开罗工作的化学家，能够接触到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很多资料，这使他能够发表19世纪中期以来出土的大批最重要的资料、化学分析和文献题录，其中包括图坦卡蒙陵墓出土的物品。

1934年，英国埃及学家埃里克·皮特就任牛津大学埃及学讲师时发表了题为“埃及学研究的现状”的演说。他敏锐地觉察到了科学对埃及学的影响，并指出：

> 很多问题，特别是那些困扰我们已久的关于器物起源以及艺术品与工艺品的技术流程问题，最终将会通过化学和其他科学得以解决。

在皮特演讲之后的70年间，埃及学有两方面多次受到科学的影响：一、考古资料中的一些因素，如土壤和种子，从前被认为是没有多少信息含量的，而科学的运用使这些因素能够传递更多的信息，同雕像和纸草等更为传统的发现所包含的信息一样多。二、科学技术的运用使我们能从那些传统的资料当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就木乃伊来说，我们过去只是简单地揭开木乃伊的裹布，研究外部情况，现在则可以进行各种X光检测，甚至都不用揭开裹布，并且DNA样本可以揭示关于该人或动物的类型与身份的更多信息。对那些非生物的研究对象，如石制器皿，现在也能进行更为广泛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从形状、大小和装饰这几方面来研究石材手工艺品，还可以研究用来制作的石材类型：它产自哪里、是怎样开采的、把它加工成重要的墓葬品时所采用的技术。

近年来，一个重要领域取得了发展，那就是将地球物理学方法用于勘探史前时代和法老时代的遗址，其中包括电阻率勘测、质子地磁仪勘测、声波扫描、探地雷达和热象等技术的使用。例如，在吉萨的大金字塔内，通过微重力测量（用于测量石块的相对密度的技术）和电磁微波传导技术的结合使用，研究者们探测出在“国王”和“王后”墓室的石墙后面可能还有一个密室。有些发现也许没那么轰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萨卡拉、孟菲斯和艾尔阿玛尔纳进行了电阻率勘测，结果表明，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埃及遗址的勘测。断面电阻率和测磁仪的使用使传统的测量技术得以延伸，让考古学家可以选择最有发掘潜力的区域，也可以对井或围墙之类的主要地貌特征进行绘图，而无需清除上面的覆盖物。例如，坎提尔（皮拉美西斯古城遗址）的发掘负责人埃德加·普什就使用铯磁力仪，发表了详尽的“街道规划图”，图中包括尚未发掘的砖砌城区。

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法老埃及时期人们饮食的研究也取得了大的进展，它主要以分析日常生活和墓葬中留存至今的食物残渣为基础。最近的这类研究还包括对埃及的面包和啤酒制作、葡萄酒生产以及肉类加工的研究。通过对法老时期的考古遗迹使用新科学研究方

法，包括实验考古学和文化群落考古学的方法，人们逐渐开始探索埃及技术的许多其他方面。

将科学运用于纳尔迈调色板

纳尔迈调色板是用一种学名为粉砂岩的岩石雕刻而成的，这种岩石在前王朝时期常用于制作大型墓葬和祭祀用的调色板。早王朝时期以前，这种多功能的材料甚至被用于制作雕像，其中就包括第二王朝统治者哈塞海姆威的雕像，该雕像是在赫拉康波里斯古城中离纳尔迈调色板出土地点不远的地方被发现的，现存于开罗的埃及国家博物馆中。

古代埃及人所使用的坚硬的绿色粉砂岩、杂砂岩和砾岩属于前寒武纪晚期的哈马马特的粉砂岩，它们广泛分布于埃及东部沙漠的北部和中心地区。同许多古代埃及人所使用的其他石头一样，这种岩石多年来常常被埃及学家们误认。它常被描述为“板岩”，但事实上板岩具有明显的叶理岩层和薄片状剥落分离的特征，而哈马马特粉砂岩则没有。所谓的前王朝时期的“板岩”调色板实际上是由粉砂岩制成的，这种岩石和法老时期用于制作器皿和雕像的石材完全一样。“片岩”是另一个曾被误用于描述深绿色哈马马特岩石的名词。片岩是一种在特定岩层里含有大矿物颗粒的变质岩，完全不同于纹理细密、均匀的哈马马特干河谷的粉砂岩。颜色分布由深灰至黑色的粉砂岩和杂砂岩偶尔会与玄武岩相混淆，后者是一种直接由熔岩形成的晶体状的火成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英语中的“玄武岩”一词就是由古代埃及语中表示粉砂岩的“*bekhen*”一词——经过希腊文的*basan*和拉丁文的*basanites*——演变而来。

纳尔迈调色板的石材从何而来？事实上，我们只知道一个出产这种石材的古埃及采石场，尽管可能还有其他采石场存在。该采石场位于哈马马特干河谷，从前王朝到罗马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公元500年）一直都在使用。在哈马马特干河谷与阿特拉干河谷交叉处的

西面1公里的延伸范围内，发现了250多件碑铭和大量采石工地。干河谷的南面是一个罗马时期的斜坡，而在干河谷北边的地面上，是一个第30王朝的小祠堂的废墟。开采绿色砾岩的矿坑位于采石场的西端，那里有许多罗马人开采出的巨大石块遗留下来。罗马人给哈马马特干河谷开采出的石材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lapis hecatontalithos*（“百里挑一的石头”）。意大利的石匠们常常重新利用罗马人带回意大利的石块，并将哈马马特粉砂岩称为*breccia verde antico* 或*breccia verde d'Egitto*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绿色角砾岩”一词的来源。然而，在现代术语中，角砾岩是由带尖角的碎片组成的岩石，而形成粉砂岩等砾岩的碎片是圆的。

在对埃及手工艺品和建筑物所使用的各种岩石类型进行鉴别和命名时，埃及学家面临着许多问题，对粉砂岩的混淆和误认则凸显了这些问题。然而，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埃及学家，我们要知道，现代埃及学学者们需要掌握不断扩展的埃及考古学以及语文学学科中的各种技能，因此很难期望他们在一夜之间就得到高端的地质学方面的训练。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对埃及石制器物的研究中，许多地质学上的错误和误解纯粹是由于考古学家和博物馆馆长缺乏地质学知识造成的。

如果只是让所有埃及学家都同意将埃及雪花石称为钙华岩，或将黑色花岗岩称为闪长岩或辉长岩，那么这种转变可能要相对容易些，但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术语上的转变被广泛接受，要使其真正渗透到文献当中，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然而，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从地质学角度重新评估现藏于博物馆以及发掘基地库房中的大部分石头雕像和手工制品，当然还包括改写那些数之不尽的发掘报告，在这些报告中，发掘者使用的是个人独有的地质学分类系统（例如，皮特里用大理石一词来指彩色的石灰石）。

在20世纪的后20年中，埃及陶器的研究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一个主观描述的时代进入了要求更为严格的时代，这一时代的研究需要缜密而客观的分析，采用的方法包括分析织物的“维也纳系统”[1]、统计取样和其他量化的方法，这种势不可挡的变化是有益的。如果对陶

器的研究能发生如此彻底的改变，为什么对岩石种类的鉴定和分析会如此落后？二者的一个关键差别在于：一些埃及学家致力于从事陶瓷学，制陶学逐渐成为了他们的专门领域，而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都涉及岩石鉴定，从对手推石磨或门插销这类实用物品的技术分析，到对王室雕像和早期重要物品——如调色板和权标头——的美学评价。类似地质埃及学这样的分支理当出现，但在实践中，与对陶器的研究相比，岩石类型的相关知识应该在该学科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注释

〔1〕 维也纳的学者发明的一种分析织物的方法。

第三章

历史：构建年表　记述历史

人们常常问到的有关纳尔迈调色板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它是否是为了记载特定历史事件而创作的，就像它的发现者所设想的那样：记载了为第一个统一的上下埃及王国的形成奠定基础的军事胜利。一直以来，这块调色板和其他各种“先王朝”时期的手工制品的年代都被认为是在古埃及史前史和历史时期之间。“先王朝”一词特指从前王朝晚期到早王朝初期的一段重要时期。“前王朝”是指尼罗河河谷漫长的史前时代的最后几百年，而“早王朝”指的是王朝时期或法老时期（见本书后的年表）的最初几个世纪。

发现纳尔迈调色板时，人们对前王朝时期几乎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年，弗林德斯·皮特里才发表了第一份关于史前史晚期的年表，他所使用的“顺序定年法”以前王朝时期涅伽达墓群随葬品中的手工制品的风格变化为基础。这意味着对于这块调色板的年代背景，奎贝尔和格林与现代研究者的看法会大相径庭。现在，大多数埃及学家都认为，这个重要的手工制品是前王朝晚期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带有装饰的调色板越来越多，但其发现者（奎贝尔和格林）却将它视为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上第一份真正的“文献”，它从史前史的一片黑暗中脱颖而出。随即，这块调色板就被认为记录了埃及历史上第一个真正重大的历史“事件”：不断扩张的上埃及王国的统治者对下埃及（北部三角洲地区）的军事征服。

1961年，英国埃及学家布赖恩·埃默里在他发表的《古朴埃及》一书中，首次尝试性地总结了早王朝时期埃及的特征，书中有许多新发掘的主要证据，大部分是由他本人及同辈或稍早些的前辈发掘出来的。当然，也有大量证据尚未被发掘，尤其是关于早期埃及出现前几千年的证据。在埃默里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埃及史前史在很大程度上才刚刚起步，就像埃及学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因此，埃默里不断地通过与法老时期的对比和类推，将他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埃及文化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然而，最近有关早王朝时期的文章著作却倾向于以前王朝晚期为基点。事实上，德国发掘者通过在前王朝晚期王室墓群（即U墓区）附近的发掘——他们在那里已经发现了可能属于“王

室”的墓地，其年代要早于纳尔迈时期——重新考察了阿拜多斯地区的早期墓群，找到了更多的证据，以此来证明早在第1王朝之前埃及在政治和/或文化上就已完成了统一，从而证实了某些埃及王权象征物（包括一个前王朝晚期的象牙王室权杖模型）的年代至少要比第1王朝的统治早150年。

大多数现代埃及学家在研究早期复杂社会中国家的形成时，都曾明确使用人类学方法，但对于埃默里那一代的考古学家来说，“文化史”的方法仍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模式。正如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杰所说：

> 在考古记录中，几乎所有的文化变革都被归因为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观念传播，或是移民所导致的某一群体及其文化被另一群体及文化所取代……W. M. F. 皮特里的著作体现了后一种模式，在探讨埃及史前时期的发展时，他将所有文化变革都归因为大规模移民以及少数移民与当地人在文化和人种上的混合。皮特里认为任何文化上的重大变化都必然伴随着人种上的改变。

布赖恩·埃默里极力推崇这样一种观点，即埃及文明在公元前4千纪末期的出现是美索不达米亚所谓“王朝家族”（或“荷鲁斯的追随者”）入侵或移民的结果。然而现在，我们对史前时期有了更深的了解，最近对前王朝和早王朝早期遗址的发掘——特别是对阿拜多斯的早期王室墓群、赫拉康波里斯城及其墓区的挖掘——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些都强有力地证明：法老时代的开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埃及的本土现象，伴随着前王朝晚期尼罗河河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这一现象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近期，一本关于早期埃及历史的书（托比·威尔金森的《早王朝时期的埃及》）指出：“导致埃及国家形成的各种趋势在前王朝早期就已出现了，它是一种渐进的过程。”

调色板、权标头和撰写历史

纳尔迈调色板只是众多现存的属于贵族的手工艺品之一，这些手工艺品主要包括史前时代晚期和第1、2王朝时呈奉用的调色板、权标头和象牙。这些“可移动艺术品”（即可以随身携带的艺术品）提供了有关早期埃及的图像材料和象形文字的资料，正如我们将在讨论文字的那一章中讲到的，在这个时期，纯粹的象征符号和词语是很难区分的。单独或是成组的物品都常被用来创建关于早期法老国家出现和统一的理论。奎贝尔和格林还在赫拉康波里斯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调色板和权标头，其中包括一个仪式用的梨形石灰石大权标头的碎片，上面也刻着“纳尔迈”的名字。这块权标头所表现的似乎并非战争场景，而更像是与王权相关的早期仪式的场景，其中一个场景被认为是已知最早的对*ḥ‘ty-bity*——“下埃及之王出现”这一仪式的描绘。正如很多埃及学家认为纳尔迈调色板是对上埃及统治者纳尔迈打败下埃及这一事件的文字记述，这个权标头也一度被公认为是纳尔迈与一个“北方公主”联姻的纪念物。这个观点的主要依据是那个没有胡须、坐在抬椅中的人物形象代表了王室新娘，但也有人指出这个坐着的形象可能是一个神，甚至并不一定是一位女性。

除纳尔迈权标头之外，还发现了另一个类似的石灰石权标头的碎片（现存于牛津的阿斯姆林博物馆），这个权标头上的装饰是高浮雕场景，其中有一个戴着上埃及白色王冠的男性形象。这个人物是权标头上最高大的形象，根据刻在他前面的表意符号似乎可以断定他是蝎子王，纳尔迈国王的前任。蝎子王手握一把大锄，一个仆人正向他递上一个篮子，也许是为了接住蝎子王从地上挖出的泥土。他和仆人站在紧靠河道的地方，表明他正在助手的协助下仪式性地挖掘用于灌溉的运河。这种解释虽被广为接受但并未得到最终证实，这种解释导致了蝎子王权标头常被用作一条重要证据来证明以下假设：埃及国家及其政府的君主专制特征是在某个贵族群体治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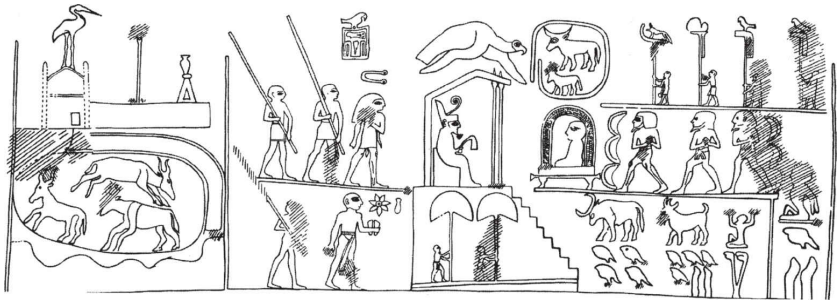

图8　纳尔迈权标头上的装饰图画，约公元前3000年

加拿大埃及学家尼克·米利特认为，公元前4千纪晚期及3千纪早期的调色板和权标头上的图像和文字本身并非为了描述历史事件，而仅仅是用于标记、纪念和纪年。他颇为肯定地指出，这个手工制品上的装饰的目的是通过事件和仪式来传达创造该物品时的“背景”。他通过对纳尔迈权标头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这个权标头表现的是某年举行的王室仪式，时间很可能就是制成这个权标头并将其供奉给神庙的那一年。米利特认为权标头上的场景很像帕勒莫石碑上列在国王年鉴下的简短仪式列表（关于埃及早期的“国王列表”，参见本章后面的“构建年表”部分）。

如今，我们渴望能够将“真实”事件和仪式区分开来，这就使我们对纳尔迈调色板和权标头等物品上的图像和文本的分析复杂化了。然而，古埃及人几乎无意对这两者进行区分。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认为法老时期埃及人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与王权有关的意识——依赖于真实事件与纯粹的仪式或巫术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的混淆。这些铭文与手工艺品构成了埃及历史的基础，它们所传达的信息通常既有普遍性（神话或是仪式性的），也有特殊性（历史的），而考虑到古埃及人倾向于模糊二者的界限，在构建埃及人所叙述的历史时，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明确地区分这两类信息。

至于调色板和权标头，唐纳德·雷德福提出，对于公元前3千纪末发生的埃及统一这种独一无二的事件，肯定有纪念的必要，但这些事件是被“纪念”而不是被“叙述”。这一区别十分关键：我们不能指望从

纪念性而非描述性的场景中理清“历史”事件，如果我们这样做，很可能会常常被误导。

德国考古队重新考察阿拜多斯的王室墓群时有了一些发现，其中一项发现给这场关于仪式、符号和历史事件的辩论带来了有趣的新转折。古时人们变陵墓为祠堂的改造（参见第七章）、19世纪到20世纪的考古发掘，都造成了大量废弃物的堆积。2000年，德国考古队在探查某个废物堆时，发现了一块几乎完整的象牙标签，其上的装饰图案与纳尔迈调色板上的某些图形极为相似。与大多数在早王朝时期王室陵墓和前王朝晚期U墓区的贵族墓中发现的这类标签一样，这枚象牙标签是用于标注墓中某件物品（通常是一件装有进口油的器皿）的质量、数量及出产年份。象牙标签右上角钻有一个小洞，用于把标签和器皿连接起来，标签上还刻有两行象形文字，下面那行字说明这个容器里装有“300个单位的上等油”。

然而，与我们的讨论关联最大的是纳尔迈标签上两行铭文的上面一行，因为它与纳尔迈调色板上表现的打击敌人的场景极其相似，只是在这个标签中，图像被转化为了一句象形文字，句中两次出现了纳尔迈的名字，一次是在右边，框在王名圈里（与调色板上的一样），一次是在铭文的中间，但这次在象形文字*nar*（鲶鱼符号）上添加了两只手臂，使它能一手挥动权杖而另一手抓住一个留着胡须的异族人。这个异族人的头上长着纸莎草（与调色板上被鹰神荷鲁斯抓住的那个俘虏相似），他的左边刻有一个小小的“碗”形象形文字。标签的左上角是一只秃鹫，盘旋在一个可能代表着王宫的长方形之上，秃鹫前面是一个顶上站着鹰的旗杆。对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王宫的（胜利）庆典，庆祝荷鲁斯纳尔迈战胜了沼泽地中的利比亚人。”和其他标签一样，它可能标志着国王统治的某个特定年份，因此，它所描绘的场景很可能与纳尔迈调色板上的发生在同一年。此外，在赫拉康波里斯还发现了一个刻有纳尔迈名字的象牙制的小圆柱印章，它可能也制作于纳尔迈统治期间的同一年，因为它上面有鲶鱼正在打击三排异族俘虏的画面，那三排异族俘虏也被认为是*tjehenw*（通常被译为利比亚人）。标签、圆柱印章和调色板似乎共同证实了米利特的想

法，即这些标签和供品的装饰中都含有对某个国王统治期内特定年份的描述。这个标签的发掘者——德国埃及学家古特·德雷尔认为，这些证据能够共同证明纳尔迈打败北方人/利比亚人是真实的历史事件。然而，这个判断似乎过于草率了。与之相反的一种设想是，我们现有的只是有关同一事件的3份记录，但我们仍不清楚究竟是下面哪种情况：（1）历史上一场真实的军事胜利，（2）纯粹是一种与王权相关的仪式，没有现实依据，（3）用仪式再现了过去取得的胜利。

埃及历史是什么？

在定义埃及历史时，学者们难免会试图把现代的概念和分类强加于埃及史料之上，而对于创造这些文献的古代作家来说，这些概念和分类通常没有任何意义，或与他们毫无联系。那些被称为“历史的”各种古埃及文献，在最初创作出来的时候都有完全不同于“历史”文献的功能；因此如果要从中提取真正的历史信息，就必须要仔细解读它们。

在《剑桥古代史》中，威廉·海斯认为只有3份现存的埃及历史文献符合雷德福所下的定义，它们分别是：卡摩斯铭文（两篇刻在石碑上的圣书体铭文和僧侣体的卡纳冯石碑，约公元前1555—前1550），描述了这位第17王朝晚期的统治者抵抗喜克索斯人的战役；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1479—前1425）年鉴，记述的是图特摩斯三世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战役；还有皮耶（公元前750—前712）石碑，记述了他征服埃及的故事。雷德福还补充了两份文献：一是哈特谢普苏特的一段话，这段话刻在斯庇欧斯·阿提米多斯的岩凿庙中，很可能是拉美西斯三世（公元前1194—前1163）在哈里斯大纸草的最后一段中虚构出来的；二是奥索孔的记述，它描述了第三中间期时（公元前1070—前712）底比斯人的叛乱。现在另一个可能被列入清单的文献是阿蒙涅姆赫特二世（公元前1929—前1892）年鉴，这篇文献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孟菲斯被发现，但直到1980年

才得以发表，它表明埃及中王国（公元前2040—前1640）时期编写的历史中已经有某些与现代历史思想极为接近的东西，其形式为国王统治期内每年发生的政治和宗教事件的详细记录。

尽管有上述几个例外，但在埃及现存的叙事体和庆典类文献中，绝大部分都更关注保存和传播民族传统，或在宗教或丧葬事务中担当某种角色，而不是试图客观地记述过去。瑞士埃及学家埃里克·霍尔农将古埃及人对过去的看法描述为对延续和变化的某种“庆祝”。

甚至那些被看作是历史片段的埃及文献，例如卡摩斯石碑和图特摩斯三世年鉴，也是其所在神庙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们与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开创的真正的历史传统有很大区别，埃及文献中混合了高度的象征主义和纯粹的仪式。埃及墓室和神庙墙壁上重要的铭文和浮雕通常与象征性的、静止的神话世界有更多关联，与历史的关联则较少。人们普遍倾向于将神话看作某种形式的“原始历史”，但真实情况不可能是这样。雷德福对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区别作了精辟的阐述：

> 它们的意义[即神话的意义]与它们曾发生在过去没有任何关系，而与它们现在的重要性有关……荷鲁斯对父亲的支持、舒神的托举以及奥塞里斯被谋杀——这些都是原初事件，它们是永恒的、永远存在的；而那些重现这些事件的国王或祭司都不能说是在担当历史角色或是在纪念“历史”。

构建年表

如果不能按某种年代顺序来构建历史，历史就只是杂乱无章的堆积。埃及学家通过很多途径着手为古埃及历史创建年表，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料，包括考古资料（如有不同装饰风格的棺椁）、文献（如“王表”和石碑）和科学的测年方法（如碳14年代测定法和热释光测年法）。

埃及学家用“王表”一词来特指那些列出统治者名字和头衔的古埃及文献，其中一些还列出了每个国王的统治期及其在位期间发生的主

要事件。实际上，所有留存下来的王表都出自宗教或丧葬文献，这些文献通常与祭拜王室祖先的仪式有关。通过定期向名册上的前几任国王献祭，每个国王都得以在这个序列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合法性。王表的保存形式多种多样，它们大多数都是新王国时期的，而最早的一个被称作帕勒莫石碑，它是玄武岩石碑的一块残片，其年代可回溯至第5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494—前2345），现存于西西里岛的帕勒莫考古博物馆。

帕勒莫石碑的正反两面都刻有圣书体铭文，描述了第1到第5王朝期间国王的统治及更早的神话时代的统治者。据估计，原石碑长约2.1米，宽约0.6米，现存有4块较小的碎片（收藏于开罗的埃及国家博物馆和伦敦大学学院的皮特里博物馆）。我们对该石碑最初的发现地一无所知，因为1866年那块最大的残片曾出现在文物市场，但来源不明。这份文献包含了下埃及国王的年鉴，年鉴从神话时代的统治者延续数千年的统治开始，一直持续到荷鲁斯时代，传说正是荷鲁斯将王位传给了美尼斯。美尼斯的继任者的名单一直列至第5王朝。石碑被分为若干个水平的格层，每个格层又被顶部弯曲的竖线分隔为若干部分，以此来代表“国王在位纪年”的象形文字符号（*renpet*）。每一栏里写着当年发生的有纪念意义的事件及尼罗河泛滥时的水位。记录的事件大多是宗教庆典、战争和特殊雕像的制作。相关统治者的名字写在对应栏的最上面。这个石碑记载了第5王朝末期之前的每一个国王的名字和在位时间，它曾经很完整，但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现在却只有这些碎片。

另一个令人为之扼腕的残片是“米特拉希纳记事本”。这块石碑原是古王国时期的一块浮雕，后来被重新利用，上面刻有已知最早的中王国王室年鉴。这部分年鉴记录的是第12王朝法老阿蒙涅姆赫特二世的统治，它在新王国时又被用于普塔神庙中，该神庙靠近现在的米特拉希纳村，这个村子是古代都城孟菲斯遗址的一部分。帕勒莫石碑只是简单概括了各位国王统治期间每年所发生的事件（大多数可能都是仪式），而米特拉希纳铭文则不同，它详细记载了阿蒙涅姆赫特二世在位两年中的部分事件。

都灵纸草（也称都灵王表）是第19王朝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90—前1224）在位期间编纂的，它只简单列出了统治者及其确切的统治时间，偶尔会列出某个统治者距美尼斯时代有多少年。古埃及人认为美尼斯是法老时代的第一个统治者。这份用僧侣体书写的纸草被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从埃及带走，现存于都灵的埃及博物馆。那时它几乎是完整的，但和其他王表一样，它在被都灵博物馆收藏之前遭受了严重损坏，现在已不完整。19世纪中期的埃及学家，如商博良和古斯塔夫斯·塞法特，整理了这篇文献中的大量碎片，尽管仍然存在很多空白。这份文献原先很可能包含近300个名字，甚至包括第二中间期时来自亚洲的“喜克索斯”统治者（尽管有一个符号表明他们是异族人，而且他们的名字没有被写在王名圈内），最后以拉美西斯二世的名字结束。与帕勒莫石碑一样，这份王表回溯到了已知的国王统治之前的时期，列出了无名的神灵和众神的统治时间，他们被认为是第一个法老出现之前的统治者。这份文献极其重要，它的严重毁损是另一个重大损失。

5个主要王表的年代也都可追溯至第19王朝早期，这5个王表包括：两个阿拜多斯王表（分别发现于阿拜多斯的塞提一世神庙和拉美西斯二世神庙，后者现存大英博物馆）；卡纳克王表（现存卢浮宫）；萨卡拉石板（现存开罗埃及国家博物馆），它发现于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高官图纳若伊的墓中；底比斯祭司阿蒙美斯的墓室壁画（TT373，约公元前1300年），画面表现了他向13位前任国王的雕像致敬的场景。还有一些更为简单的王表，例如在哈马马特干河谷的采矿和采石遗址发现的一张涂画，根据古文字学的研究判断，其年代应是第12王朝（公元前1991—前1783），涂画里包括第4王朝的5个国王和王子的名字。1985年德国考古学家在乌姆·艾尔·卡博发现了一个印章的印记，它是现存最短的王表之一，但却充分显示了这类文献的重要性。这张王表列出了6个统治者，他们的排列顺序如下：纳尔迈、阿哈、杰尔、杰特、丹和美尔奈斯，因此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了纳尔迈调色板上所描绘的那位国王可能是第1王朝最早的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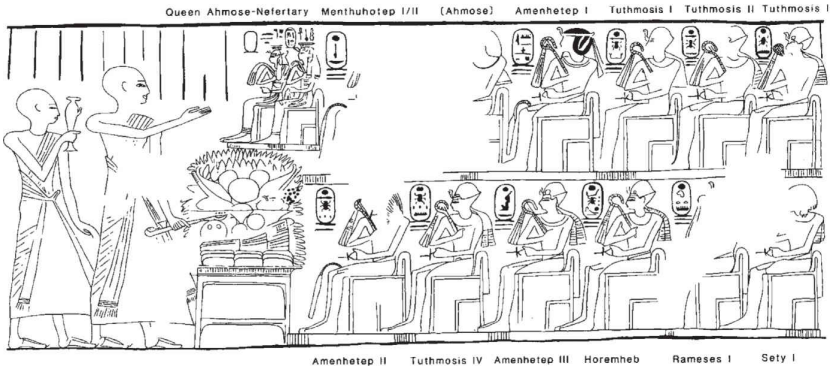

图9　底比斯的祭司阿蒙美斯墓中的王表，约公元前1300年

最后，有关埃及的最详细的史料是《埃及史》，它是由托勒密王朝早期（公元前3世纪）一位名叫曼涅托的古埃及祭司用希腊语编写而成的，书中记述了埃及统治者的历史，但不幸的是，这份文献仅以摘录的形式保存在很久以后的历史学家——如约瑟夫斯（公元1世纪）和乔治·辛斯勒（公元9世纪早期）——的著作中。根据现有证据来看，曼涅托不仅能查阅埃及文献，如之前提到的王表，还能查阅希腊年鉴。创作这本（献给托勒密二世的）历史书时，他可能正任职于塞布尼托斯神庙，该神庙位于三角洲的现代城市萨马努德城附近。他将世俗（即神话时代之后的）统治者划分为30个王朝（后来第二波斯王朝也被加入其中，成为第31王朝），这一划分对19世纪早期以来有关埃及年表的传统观点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然而，随着新文献的翻译和新遗址的发掘，埃及学的历史和考古资料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曼涅托的纪年系统的致命缺陷逐渐暴露出来。曼涅托的基本假设是，整个埃及只是由一系列统治者来统治的，彼此之间并无重叠，也没有出现分裂的小王国。多年来的研究逐步证明，在许多时期，埃及并不是一个文化统一、政治集权的国家，埃及的各个地区都在以不同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也有其他分析显示，人们倾向于把短期的政治事件看作历史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但与渐进的社会经济发展相比，后者更具历史意义，从长远角度看，它能给整个文化带来更剧烈的变化。

事实上，传统的年表还有一些主要问题。第一，曼涅托编写的历史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通过引用留存下来的只言片语，并非整个原始文献，同时我们也并不清楚他的资料来源。第二，国王在位的年限也常常没有定论，例如：都灵王表中提到塞诺斯瑞特二世和三世分别统治了19年和39年，而他们的纪念碑上所显示的统治年限的最高记录分别是6年和19年。第三，所谓的“中间期”也存在一个重大问题，传统上，人们出于某种惰性将它们解释为“黑暗年代”。第四，关于父子共治仍有很多争论，特别是第6王朝和第18王朝的情况。最后，很多年表都取决于古代天文观测（特别是“天狼星偕日升”），随着古代天文学家——祭司——观测地点的不同，绝对年代也会有所不同。一些埃及学家，如罗尔夫·克劳斯提出，所有的观测都是在同一个地点进行的（如象岛）；但另一些埃及学家，如威廉·沃德，则认为各地一定有各自的观察点，即对于那些需要根据天文现象来确定庆祝日期的宗教庆典，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庆祝日期。在拉洪发现的一份文献记载了天狼星同太阳一起升起的情况，时间是塞诺斯瑞特三世统治的第7年，如果观测地点在象岛，那么其“绝对”年代就是公元前1872年；如果是在赫里奥波利斯，其年代就是公元前1830年——差异之大几乎超过了古埃及人的平均寿命（据估计，公元前19世纪时，即使是贵族阶层的男性，平均寿命也只有35岁左右，女性则是30岁。在古代，生育有很大危险，因此女性的死亡年龄普遍较早）。

最基本的历史分期（即前王朝时期、法老时期、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之间的区分）的重要性开始受到质疑。一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阿拜多斯的乌姆艾尔凯博墓群中的发掘结果显示，在第1王朝之前还有一个零王朝，其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4千纪的某段未知时期。这意味着，最晚在前王朝时期的最后一两个世纪内，埃及在政治和社会的很多方面可能已处于“王朝”时期了。

相反，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意识到，前王朝晚期的陶器风格在早王朝时期仍被广泛沿用，这表明前王朝时期文化的某些方面一直延续到了法老时期。埃及史前史中漫长的“前王朝”时期难免被理解为一种文

化而非政治发展的结果。现在，有学者开始认为，研究王朝时期（以及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不仅要研究国王及王族的延续，也要研究陶器的材质类型及许多其他手工艺品的风格和材质。

尽管法老时期和托勒密时期、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之间都有政治剧变，但随着后两个时期的考古资料的逐渐增加，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文化变革的过程似乎没有纯粹的政治文献中记载的那么突然。因此很显然，托勒密时期的意识形态和物质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在政治剧变中仍然保持不变。与其说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将军托勒密到达埃及是埃及历史的分水岭，倒不如这样认为：尽管公元前1千纪中期到公元1千纪中期之间发生了许多重大政治 变革，但这些变革是在相对缓和的社会和经济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法老时期文明的重要元素可能相对完整地存在了几千年，直到公元641年伊斯兰教时期开始后，才经历了文化和政治 转变的全面结合。

前面介绍了埃及年表构建的基本内容，但要了解它们如何运用于实践中，我们需要举一个适当的例子来分析。

盖斯尔艾尔萨加神庙：测年的案例分析

法雍地区位于开罗西南方向50英里（75公里）处，在其东北角的沙漠峭壁旁有一个矮丘，其上有一个大型的石头建筑，它位于盖斯尔艾尔萨加遗址地区，明显是某种宗教纪念物。然而，与其他幸存下来的宗教建筑不同，该建筑尚未完成，上面没有装饰、没有铭文。缺少铭文就意味着我们既不知道谁是建造者，也不知道它是为祭拜哪个神而建的。于是问题出现了：埃及学家如何确定这样一个无名的大型石头建筑的年代？

图10　位于盖斯尔艾尔萨加遗址的一座未完成的神庙

这座神庙是用暗棕色的含碳酸钙的沙岩建造的。有一种被称为“光释光”（OSL）的科学技术能够测量从石块最后一次受阳光照射至今的时间长短，这种技术在理论上可以用于测定砖石结构的建筑时间，但尚未有人在盖斯尔艾尔萨加遗址尝试过这种技术。另一种更为传统的方法是确定建筑风格的年代。这个建筑物的总占地面积是33×16平方英尺（10×5平方米），由7座神龛和一个长条形的祭品屋组成。我们可以假设，如果这个神庙得以完成的话，它前面应该会有一个庭院或柱厅（或二者皆有）。直到中王国时期，人们才开始用石头重建原来用泥砖建造的地方神庙。有两座第12王朝的神庙与盖斯尔艾尔萨加的这座神庙非常相似，尽管它们曾在第18王朝和托勒密时期经历过多次翻修。第一座神庙位于距底比斯北部5公里的米达姆德，它是一个三重结构的神庙，是第12王朝统治者塞诺斯瑞特三世修建的。它建在一个早期的泥砖复合建筑上，用来供奉当地的蒙图神。第二座是用沙岩建造的瑞内努泰特（一个眼镜蛇形象的丰收女神）神庙，位于法雍地区西南部的麦地那迈阿迪，这座神庙是在第12王朝末期的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和四世（公元前1844—前1787）统治期间建

造的，但是同米达姆德神庙一样，它在希腊–罗马时期也得到了扩建和翻修。神庙内部有一个纸草式柱构成的小柱厅，柱厅通往由三个礼拜堂组成的圣殿，每个礼拜堂中原本都立有神像。盖斯尔艾尔萨加的神庙可能也是为了供奉一组当地的神祇，其神像可能就安放在那7座神龛中。这意味着神庙大约建造于第12王朝时期，至于具体是由哪位国王建造的，20世纪70年代研究该神庙的迪特尔和多罗西娅·阿诺德认为，最有可能的建造者是塞诺斯瑞特二世，因为他留下了太多未完成的神庙（可能与他在位时间相对较短有关），虽然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阿蒙涅姆赫特四世也可能是建造者。

把建筑风格作为定年标准相对不太可靠，所以谨慎的考古学家往往会通过其他方法来进一步确认。以盖斯尔艾尔萨加神庙为例，在神庙附近发现了可能的定年证据，即一个有条有理的矩形居住区，面积约374×260平方英尺（115×80平方米），紧挨着居住区的便是一个墓地。主要居住区的东北方是一片稍大但缺乏规划的泥砖房区域。两片区域都已被发掘了一部分，根据在其中发现的陶器可以将它们的年代定为第12王朝。与大致同时代的中王国时期的金字塔城卡洪一样，矩形居住区中明显曾住过一群特殊的第12王朝居民，他们受国家的直接控制。

关于盖斯尔艾尔萨加神庙的定年问题还有更进一步的转折。通过一条古代铺设的道路，整个遗址看起来似乎与大约向北6英里（10公里）处的盖特拉尼山的玄武岩采石场相连。人们自然会猜测定居点和神庙与采石场的开发有直接联系，但很多学者指出玄武岩主要用于古王国时期和后期埃及，而少量的那些与采石场道路相关的陶器也主要是古王国时期的。因此我们能够断定，这是第12王朝时期的一座神庙和两个定居点，在这个时期，玄武岩开采呈现出衰落趋势。

盖斯尔艾尔萨加遗址最初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采石工人定居点（尽管这个遗址中尚未发现任何古王国时期活动的痕迹），到了中王国时期，它已发展成为一种不同的社区，其功能尚不清楚，可能与那座未完成的空神庙有关。这说明测定某个事物的年代与真正了解它之间相距甚远。巴里·肯普提醒我们，在埃及学研究中不应过分关注年代

的测定而忽视对现象的理解：

> 年表使我们能够了解那些随时间而变化的模式，并绘制出那些朝我们这个现代社会发展的轨迹。但是，对“历史”——年代和事件的时间顺序——的过分关注将会阻碍我们了解过去真实的社会和文明：它们是解决个人和集体的问题的方法，也可以为当今社会中的一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历史变迁与物质文化

对盖斯尔艾尔萨加定居点的定年过程表明，现代埃及学家使用的最有效的定年方法之一就是对陶器的样式和材质的研究。过去20年里，对古埃及陶器的研究有了巨大发展，用于分析的陶器碎片的数量（来自各种不同类型的遗址）增加了，现代技术的种类也更多了，这些技术用于从陶器中获取更多的信息。陶器是埃及物质文化中一个异常丰富的领域，我们对这方面认识的提高必然会对年代框架产生影响。20世纪80年代对孟菲斯城某地（考姆拉比阿遗址）的发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证明了在陶器研究中使用更先进的方法有助于理解文化变迁的整体过程。

我们可以通过传统技术来确定陶器的相对年代顺序，这些技术包括确定墓葬品的排列顺序、分析居住地或宗教遗址中的大量层状材料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传统方法确定陶器的绝对年代，如将陶器与铭文或年代确定的图像（特别是陵墓里的）联系起来，也可以通过热释光测年法等科学技术来确定。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器皿和材质类型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例如，烤面包用的陶制模具的样式在古王国末期有显著变化，但并不清楚这种变化是源于社会、经济或技术因素，还是单纯是“潮流”变化的结果。这种分析表明，物质文化的变革可能源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只有一些因素与政治变革有关，而传统观点认为政治变动是影响埃及历史的最主要因素。这并不是否认政治与文化变革之间的诸多联系。例如，古王国时期的陶器往往是集中生产，这与政治上的统一有关，在第一中间期期间，随着政治上的分裂，地方风格

的陶器再度兴起。随后，在较为统一的第12王朝，陶器的风格再度统一起来。

在研究埃及历史的某些阶段时，如法老时代初期统一国家的出现或是古王国的衰落与灭亡等时期，为了解释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变革，学者们有时会考查环境和文化因素。然而，这种对非政治性历史趋势的有选择性的 关注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在古王国和中王国这样繁荣稳定的时期，我们尚不了解埃及的环境和文化发生了何种变化，要想解释这些因素在政治危机时期的作用就更加困难了。有关陶器和其他普通的手工制品（以及环境因素，如气候和农业）的研究越来越多，这就为更全面地看待埃及历史奠定了基础，根据这种全面的埃及历史观，政治文献要放在长期的文化变迁的背景中来进行解读。

通过用系列法来研究中王国时期的私人棺椁，我们得到了年代和历史方面的有价值的资料。根据梅斯和温洛克对中王国棺椁的传统分类法，只有两种基本类型的棺椁：（1）北部风格（源自孟菲斯地区、贝尼哈桑、贝尔沙和梅尔）；（2）南部风格（源自艾斯尤特、艾赫米姆、底比斯、戈伯伦和莫阿拉）。这两种风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南部风格的棺椁上，绝大部分装饰在外部，而北部风格的棺椁上则没有人物形象。以门图荷太普二世的王后的石棺为例，它是在底比斯发现的，上面雕饰有理发的场景，在戈伯伦和莫阿拉发现的石棺上也有类似的雕饰。一些“南部”风格棺椁的棺盖内侧饰有所谓的“星辰钟”，还刻有成行的祈祷文，祈求星宿诸神的保护，如努特、索普德特（即天狼星）、沙（即猎户座）和大熊星座。

20世纪80年代，哈克·威廉斯彻底修正了这种传统的分类法。他认为中王国时期的棺椁装饰中有一些基本元素：眼睛、假门、水平饰带、供品套语、祷文、石棺铭文、两世书以及星辰钟，这些都表明了梅斯和温洛克的分类中存在很多缺陷。首先，南部和北部风格的区分没有任何根据，因为各个地区的风格本身就是独特的——艾斯尤特和贝尔沙的棺椁之间肯定有显著区别。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赫拉克里奥波里斯”（他称之为“标准的”）风格的装饰发生了整体类型上的转变，因此可以用来确定棺椁的年代，也可以用来确定其所属陵墓的

年代。

威廉斯的新分类法本身并不重要，其重要性在于：棺椁是很多埃及遗址中都能找到的常见文物类型，它们是一种极其丰富的资源，使年代学研究的潜在价值能够得到正确的开发。威廉斯的棺椁“顺序定年法”不仅可以更有效地确定棺椁本身的年代，还意味着成组的棺椁可以用于确定不断交替的地方统治者与国王之间的关联，因此得以将地方变革和国家变革联系起来。未来，构建埃及年表必须建立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因为王表和其他类似文献只能为我们提供关于政治变革（王朝和统治者的兴衰）的有限信息，但埃及境内各遗址中发现的物质文化的具体要素可以作为年表的基础，为我们提供古埃及社会史和经济史方面的信息。

埃及学家需要将他们自己从曼涅托式的宏大埃及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埃及历史就是一份详细的王表）中解放出来，在关于第一中间期的一篇报告的序言中，德国埃及学家史蒂芬·塞德勒马耶尔明确表述了这一观点：

> 很多关于埃及历史的著作都把关注点集中在王宫、国王和“宫廷文化”上，但在撰写第一中间期的历史时，有必要去关注地方城镇和作为社会最基本元素的大众。

这段话普遍适用于埃及历史的撰写。

第四章

文字：象形文字的起源与含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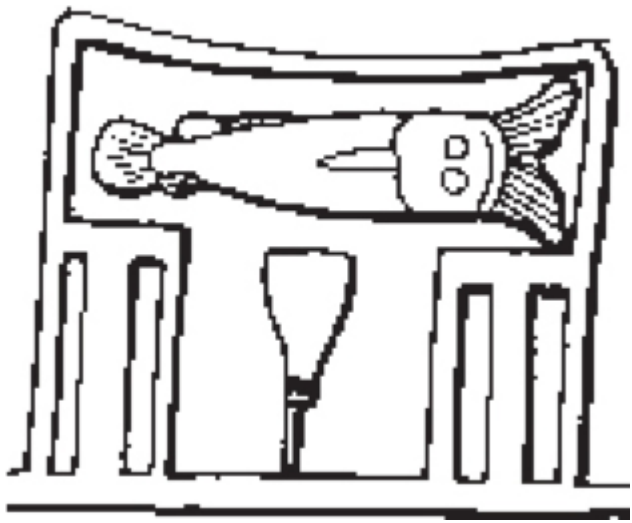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由表意符号（用来直接表示事物的符号，例如“天空”或“人”）和表示某个词的全部或部分发音的表音符号组成，因此在法老时期的埃及，文字与艺术之间的联系比在许多其他文化中都更为密切。在用来装饰建筑物和雕像的象形文字中，书写简单的词——如“鹅”或“头”——在某种程度上既是一种艺术训练也是文字交流。第三类象形文字是“限定符号”，之所以称之为“限定符号”是因为它“限定”了整个词的意思。例如各种表示食物、饮品以及吃这一过程的词，在最后都有一个以手指嘴的男子作为限定符号；而一些更抽象的词，如“知道”或“听见”，在最后都有一个纸草卷的限定符号，以示这些词与思想和知识有关。

埃及神庙和陵墓的墙壁及屋顶有大量壁画和浮雕作为装饰，现存的很多古埃及铭文就是用来填补和装饰这些壁画和浮雕的。因此，古埃及文字艺术的外观和功能都与宗教信仰及墓葬习俗紧密相连，而且埃及人坚信这些文字与形象具有真正的自然力量。的确，在许多刻写在墓室墙壁或墓葬器物上的文字中，古埃及人认为有必要去除象形文字的某一部分，比如鸟类符号都被去掉了腿，目的是使那些可能伤害死者的力量失灵。这种认为文字和艺术形象具有魔力的认知也体现在一种叫做“开口”的葬仪中。埃及人相信，通过这种仪式，死者的木乃伊和雕像就会被注入新的生命——在托勒密时期的神庙中，每天早晨似乎都会举行类似的仪式，目的是让神庙墙上的文字与形象复活。

纳尔迈调色板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

与许多早期的人工制品一样，有人把纳尔迈调色板上面的符号解释为纯粹的象形符号，即一连串互不相关的象形文字，或者是合乎语法语序的句子。就目前关于埃及文字起源与本质的讨论来说，这些解释能为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呢？

调色板上除了图画叙事之外，还有象形文字作补充，如在对敌人

实施打击的国王前方的“鲇鱼”和“凿子”的符号。在法老时代，这两个符号的读音中分别有音值*nar* 和*mer* ，但我们还不确定*nar* 和*mer* 在这里是表音还是表意。“*nar-mer* ”这个符号重复出现在调色板正反两面的上方，被框在王名框中，王名框可能代表的是早期王宫正门，象征着强大的王权。从前王朝晚期开始，王名框就被用来框起国王的某个名字，它具有象征意义（例如王名框的顶部经常有鹰神荷鲁斯，象征着埃及学家所熟知的国王的“荷鲁斯名字”）。然而，调色板的这一面还有许多其他符号，多数埃及学家认为它们是早期的象形文字（见第一章中的描述）。至于调色板这一面右上方的4个符号（紧邻10个被斩首的尸体的上方）是象形文字还是图画，仍然存在不同意见。

1961年，艾伦·加德纳大胆地将这个调色板描述为“一种观众可以将其译成文字的复合图画”。这句话似乎并不能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它只是描述了解读图像资料的过程。然而，1991年，一位美国的埃及学家小沃尔特·费尔瑟维斯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早先的埃及学家对于纳尔迈调色板的解读都犯了“一个严重的方法论错误”，因为他们把调色板上的大部分装饰看作图画而非文字。费尔瑟维斯认为调色板两面所有的符号都应该被译成合乎语法的短语，它们是埃及象形文字的早期形式。换句话说，他认为应该把调色板当作一个长句来读 ，而不是把它当成艺术和文字的组合。他辨认出了62个推定的“象形文字”，并且分析了每个文字可能包含的细微含义，然后将它们整理成篇，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调色板“并非是关于上下埃及统一的记录，而是表现了伊德福地区的统治者穿过尼罗河谷向南进入努比亚所取得的胜利”。其他埃及学家不接受这一理论，但是该理论确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前王朝晚期和王朝早期的艺术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完全成熟的文字体系，而不是仅仅通过纯艺术形象传达信息？

最近关于埃及文字起源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上：象形文字体系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什么时候开始包含了语音学和语法？它是吸收了另一种文化（最有可能的是近东地区的文化，那里的文字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时间要略早一些），还是在埃及独立出现的？如果是那样，它是由某个人或某一小群创新者“创造”的吗？

还是经历了几代人或几个世纪的缓慢演化？

另一个适用于所有早期文字体系的问题就是，早期文字的出现是出于政府管理的实际需求，还是由仪式和典礼等最初的需求发展而来？最早的埃及象形文字是不是统治者和贵族集团用来维持他们权力的宣传工具呢？由于我们对不同文化中文字的出现时间有不同看法，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被复杂化了，而且文字最初使用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书写介质的材料（如泥板、骨头标签、纸草卷和石制文物），以及这些材料在世界不同地区环境下的保存情况。由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管理类文献所使用的泥板在当地环境下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很多学者就据此认为文字的出现是为政府管理来服务的，而在中美洲、中国和埃及，最早的刻有文字的物品（如玛雅的石碑和埃及的石制调色板）似乎都是为仪式而服务的，主要与贵族阶层维护自己的权力有关。根据这种跨文化的文字观，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文字的根本原因与其他地区有鲜明的对比，这种跨文化的观点忽略了一点，即在绝大部分早期社会中，政府管理档案多写在廉价且耐用性差的材料上（如埃及的纸草，早在第一王朝时就在使用），这是由这些档案的性质决定的。因此，这些成本低廉的管理文献并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而最早的礼仪和“宣传”文献却写在特殊的耐久材料上（主要是石头），较好地保存了下来。当然，将管理文献与礼仪/宣传文献一分为二的想法本身也许就有缺陷，因为某些早期埃及的铭文（如在有大量墓葬品的前王朝晚期/零王朝王陵中发现的骨头、象牙制作的标签）可以看作是相对单调的管理文献的精致而有贵族风格的版本。

我们能确定古埃及文字起源的时间吗？

关于文字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它的形成和使用机制，近期有这样一种假设，即苏美尔人最古老的一些楔形文字比埃及象形文字出现得早。由于埃及最早的铭文似乎是在公元前4千纪晚期突然出现的，因此有人进一步推测，随着埃及与近东的联系增多，埃及文字

的出现可能是受到了楔形文字的启发。但是，由于组成这两种文字（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的符号差异很大，很少有学者相信埃及的文字体系是直接从楔形文字发展而来的，一些埃及学家倾向于认为美索不达米亚传递的是图画文字的基本观念。

图11　阿拜多斯U-j号墓出土的标签，上面有早期象形文字，约公元前3200年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假设已经被90年代在阿拜多斯的德国考古学家的发现所击破，这些发现表明，象形文字可能在前王朝中期（也许是约公元前3500年）就开始使用了，不仅如此，表音符号的使用可能也比人们原来认为的要早。在对U-j号墓进行发掘时——这一大型陵墓的墓主是一个叫做“蝎子王”的国王（其年代显然比在纳尔迈调色板附近发现的权标头上的蝎子王更早）——发现了一个墓室，里面有很多木制和骨制标签，上面刻有清晰可辨的象形文字，其内容包括数字、物品名称，也许还有地名或王室地产的名称。这些象形文字标签的重要性在于，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已经不仅仅是象形符号（“表意符号”）了，即文字发展史中非常初级的阶段；相反，很多符号已经可以在口语中表示读音（“表音符号”）了，而以前人们一直认为，直到第一王朝时期文字发展才进入有表音符号的阶段。研究这些标签的德国语文学家能够辨认出它们是表音符号，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拼法往

往同后来文献中常提到的一些著名城镇——如布托和布巴斯提斯——的名字一致。

因此，阿拜多斯最早的统治者所雇佣的官员——至少在早于第一王朝200多年时——已经开始使用兼具表音和表意符号的成熟的埃及文字。这些文字似乎经常提到上埃及统治者墓中所用随葬品是来自下埃及的某些地方，这有力地证明了埃及南北两部分在经济上联系紧密，政治上可能也是如此。因此，早在埃及文化还处在传统上所认为的“史前时期”时，埃及就已具备了这些与高度发达国家相关的因素，如文字、官僚制度、纪念性建筑、复杂的贸易和经济管理体系。

文献在埃及学中的运用和滥用

1822年，商博良成功释读了埃及象形文字，使埃及学成为一门由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组成的完整的历史学科。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世俗体象形文字也得到了解读（大部分由托马斯·杨完成）。由于有了文字材料，短短10年间，埃及学仿佛从研究史前史转变为了研究历史。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查尔斯·古德温和弗朗索瓦·查瓦斯释读并翻译了写在纸草上的诸多僧侣体象形文字，至此，4种字体的古埃及铭文（圣书体、僧侣体、世俗体、科普特语）都得到了解读。

对这一系列文献的翻译——包括神和国王的名字、宗教仪式和经济文书的翻译，使埃及学领域可以与古典文明研究并立。然而，商博良的发现还激发了语言学家和发掘者在学术上的分立，即文献研究和物质文化研究之间的分立，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几乎从翻译圣书体、僧侣体和世俗体文献时起，埃及学就越来越多体现出这一特点，即努力确保以下两方面的平衡：一是考古资料中包含的各种一般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证据，二是古代文献中的更具体的历史信息。新发现的文献能够重现古埃及人的思想和情感，但它也诱发了这样一种思想的产生，即人们可以通过文字而不是考古学家的沟渠来揭开埃及文明的面纱。古埃及文化是以埋藏的墙垣、手工艺品和

有机遗存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往往必须以大量写于石碑和纸草上的文献为背景来看待埃及文明的纯考古学观点。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也许会困难重重，但这无疑也给了史前历史学家更大的自由，使他们能够单纯依靠现存的物质文化来建立新的理论和假设。与其他历史学科一样，在埃及考古学中，由于文字资料的主观性和说服力都很强，它们往往会模糊——有时甚至遮蔽——考古证据，呈现出一种矛盾。

如果我们认为文字和考古学是一分成二的，那么拿埃及考古史和当代玛雅研究进行比较就会非常有趣。玛雅学家的经历似乎完全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玛雅文字被解读之前，人类学和考古学一直在这门学科中占主导地位，但玛雅文字的解读使得大量文献突然涌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玛雅文化的理解。最初玛雅考古学家对语文学家提供的历史信息表示怀疑。近年来，考古学家更多地从科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对法老埃及进行分析，许多传统的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的埃及学家产生了和玛雅考古学家同样的反应。玛雅学家与埃及学家都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文字是社会的精英成员创造的，而大批的考古资料则来自那些目不识丁的平民大众；只有将各类考古证据结合起来，全面地看待整个社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在法国考古理论学家让–克洛德·加尔丹看来：

>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考古学可以不受限制地研究古代人的一切。然而，有些限制仍然是常见的，即使它们没有那么明显。限制之一就是以下矛盾所导致的结果，即一方面是有文字的材料和古代文献，由碑铭专家和历史学家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是考古学家和史前历史学家研究的物质对象。

过去，古代埃及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常常被综合运用，但由于这两类资料的数量都在不断增长，埃及学研究中的语言学和考古学逐渐分离开来，如加尔丹描述的那样。在关于中王国时期努比亚的行政管理的研究中，巴里·肯普同时使用了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他的研究表明，文献资料通常只能反映系统的片断，而考古学却能展示“广

阔的社会结构的轮廓”。另一方面，文献资料往往能补充一些细节，正是这些细节促使抽象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转变为常规的历史。在1974年，戴维·奥康纳提出将埃及考古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使用这样一种相对乐观的看法，他认为：

> 这两种资料本质上是互补的；考古资料包含那些在文献资料中只有模糊记载的内容，反之亦然。通过互相参考，对两者的诠释常常能得以纠正和扩展。

第五章

王权：模式化和“东方专制君主”

纳尔迈调色板的两面都饰有类似于国王征战的场景，但是最有影响力的场景可能在调色板背面，上面有高大的国王用权杖击打外族人的情景。这种国王击打敌人的场景是埃及艺术中最常见的画面，它象征着法老的权力，通过征服混乱势力，法老维持着宇宙的秩序。1899年，也就是发现纳尔迈调色板的第二年，弗雷德里克·格林在赫拉康波利斯的100号墓的墙上发现了前王朝时期的类似打击场景，100号墓的主人是公元前3300年左右的一位当地官员，该墓是埃及现存的第一个有墓室壁画的墓。大概一个世纪以后，在20世纪90年代，阿拜多斯的U-239号墓（可以追溯到涅伽达一期文化的晚期，约公元前3500年）中出土了一个陶器，陶器上有一个高大的人物正在击打3个蹲在地上的俘虏，这一画面的年代更早。几千年来，法老打击敌人的这一经典画面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出现在各种与宗教和艺术相关的事物中，从护身符、石碑到寺庙的塔门及外墙，晚至罗马时期仍然能在这些事物中找到这一画面。

图12　图纳艾尔格贝尔出土的彩釉杯，约公元前925年，上面有国王击打俘虏的几幅画面

图13　吉萨发现的国王哈夫拉的片麻岩雕像，第4王朝，约公元前2500年

在埃及学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埃及国王的本质，特别是他与世俗人和埃及众神的关系。纳尔迈调色板上描绘了一只神鹰在纳尔迈面前为他抓着外族俘虏的画面，进而确立了国王与鹰神荷鲁斯之间的某种密切联系。该调色板还描绘了征服行动中国王与神之间的互动，体现了有关古埃及人王权观念的象征和隐喻的复杂性。专制的法

老的观念通过种种渠道——从《圣经》到雪莱的作品——进入了现代人的意识，埃及学家还经常通过对埃及王权的讨论来研究这类问题，如埃及政治体制的变化性，以及诸位法老作为真实的个人（而不是象征性的符号）具有哪些特性。在对那些残破的纪念物和从法老统治时期留存至今的文献进行考证的同时，众多保存完好的木乃伊（尤其是新王国时期的木乃伊）使我们能够直视法老们的面容，仿佛他们是和我们同时代的人。

对埃及人而言，每位新国王继位都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不仅在哲学上，在现实中也是如此，因为埃及人是用“执政年”来纪年的。这意味着埃及人在心理上倾向于将每届新的统治当成一个崭新的开端。几乎每位国王在其任期内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关于王权的神话。古王国时期，每位国王都有5个名字（即所谓的“五重头衔”），每个名字都概括了王权的某个特定方面：3个头衔强调国王作为神的角色，另外两个则强调了埃及所应该被分为的两块统一领地。

很多统治者都有“强大的公牛”或者“荷鲁斯的公牛”的头衔（注意在纳尔迈调色板上，正反两面的纳尔迈都有一条公牛的尾巴从腰间垂下，这是王权的标志之一）。纳尔迈调色板正面的下部描绘了一头公牛，它将倒地的异族人踩在脚下，并且冲破了城墙，这一画面很可能象征着国王在异国领土取得胜利。国王与公牛形象之间的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以公牛象征国王的做法）贯穿了整个法老埃及时期。国王同公牛之间的关联很可能也是因为双关语的关系，在埃及语中，公牛一词写作*ka*，该词与表示国王的神性或“魂灵”之意的词的发音相同。

每位国王的名字以及画像中都存在大量隐喻和象征，这使得现代学者很难通过此类证据来研究国王作为个体的特点和行为，相比之下，对王权这一观念的研究则要更容易一些。在阅读埃及学家对各位法老统治的叙述时，我们必须要注意两种类型的固有模式和分类法：第一，古埃及文献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固有模式；第二，通常由埃及学家无意识地造成的固有模式。

运动健将阿蒙霍泰普

这种模式化的帝王形象的一个“受害者”就是阿蒙霍泰普二世，在相关纪念物中，他常常被描绘成一个运动健将。因此，在1961年，艾伦·加德纳对他作了如下描述：

> 他的肌肉具有非凡的力量：据说他射出的箭能够穿透巴掌厚的金属箭靶，箭头可以从箭靶的另一面露出来；遗憾的是，这种描述被认为和图特摩斯三世有关，只是缺少细节描写，所以我们有理由对此保持怀疑。但是还是有一些关于他的运动才能的例子，由于个人特点十分鲜明，因此我们无法断然否认这些描述。

20世纪80年代，法国埃及学家尼古拉斯·格里马尔甚至透过阿蒙霍泰普的名字和绰号看到了这些才能：

> [他]绝不是一个以智慧著称的统治者……他的名望主要来自他非凡的体力……这种对力量的嗜好在阿蒙诺非斯的头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荷鲁斯名是“力大无比的公牛”或者“有尖角的公牛”，他的金荷鲁斯名是“以力量征服了所有土地的人”……阿蒙诺非斯还通过三次叙利亚远征证明了他的力量。

但是，阿蒙霍泰普二世是否是一个强健非凡的国王，这更多的是一个从对特异事实的记述中寻找模式化细节的问题。

首先，这是否只是偶然幸存下来的文献？是因为与其他国王相比，有关阿蒙霍泰普二世时期崇尚运动的记载恰好被更多地保存下来了吗？其次，如果这与文献偶然得以保存无关，我们是应该将这些材料当作证明阿蒙霍泰普的确是运动健将的证据呢？还是单纯地把他当作一个对“埃及国王应该是运动健将”这一观念作出巨大贡献的人？

图14　塔尼斯发现的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的花岗岩斯芬克斯像，第12王朝，约公元前1820年

美国埃及学家彼得·德马尼埃利安认为，阿蒙霍泰普二世不仅是一个真正狂热的运动爱好者，同时也是积极倡导王权的这方面特征的人：

将阿蒙诺非斯作为体育事业最积极的倡导者是合情合理的，他通过一些新颖而又详尽的文章拓展了这一特殊文学体裁的内涵，特别是划船、马术和箭术这几个方面。这些独一无二的文章使那些关于他性格这一面的相对精准的描述更为可信。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运动类文献中的事实与夸张。阿蒙诺非斯真能射穿铜制的箭靶吗？他真能轻松地挥动一支20腕尺长的长矛吗？……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对阿蒙诺非斯的文献的准确性抱有怀疑，那么这些对国王能力的夸张描写就不会改变我们的结论。实际上，考古学记录已经印证了文献证据。王陵谷的阿蒙诺非斯墓中（第35号）就曾出土了木头和牛角制成的复合式弓箭。

哈特谢普苏特：女法老还是女权主义者的先驱？

当我们要了解图像和文字记载所反映的法老的个性特征时，很多埃及学家和其他学者会自然而然地尝试着去推测他们的性格及动机。特别是动机激发了对两位国王的研究。这两位国王——哈特谢普苏特（女法老）和拉美西斯大帝——声誉已经远远超越了埃及学领域。有人尝试着刻画他们的心理特征，这种尝试备受争议，而且通常足以将这两位国王模式化。

哈特谢普苏特是埃及历史上少数几个能够独立统治埃及、而不附属于男性统治者的女王之一（可能共有5个）。“王后”一词通常指埃及王室中的女性，但是埃及学家使用这个词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古埃及语中并没有真正表示女性统治者的词，只有极少数的短语用来表示与男性统治者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女性（最重要的是“伟大的国王之妻”，*hemet weret nesw*）、“国王之母”（*mwt nesw*）以及“国王的妻子们”（*hemwt nesw*）。这就意味着在极少数情况下，当女性自己成为“国王”时，她们实际上只能采用男性统治者的王权标志和象征物。哈特谢普苏特的大多数史料都被保存了下来，作为女性统治者，哈特谢普苏特在她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把自己塑造为一个男性。在她位于代尔艾尔麦迪纳的祭庙中，以及其他纪念物上，她的形象经常是身着男性统治者的服装，还戴着国王的“假胡子”。在她的真实性别以及法老的男性角色之间很可能会让人感到某种冲突的存在。但是，只有在她死后，她的名字被从纪念物上抹去这一行为才真正表明人们感觉到了这种不协调。有趣的是，她的王名和头衔常常以阴性词尾结尾（其中一个可能是有意让人联想到中王国时期的女王索白克尼弗鲁），通过玩弄一套文字游戏而将她与某些不可能出现在男性国王名字中的神祇以及神性联系起来。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哈特谢普苏特的性别原因，很多埃及学家一直都倾向于固定地将她归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例如，在1951年，约翰·威尔森提出：

在国家事务方面，哈特谢普苏特同图特摩斯三世形成了鲜明对比。她没有任何关于军事远征和征服活动的记载；而他成为了埃及帝国最伟大的征服者和缔造者；让她引以为豪的是埃及国内的发展以及贸易事业……这次冒险[即远征蓬特]具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它宣扬了埃及的政策，即埃及人应当积极加深与已有朋友之间的友谊，而让那些顽固不化、不友好的亚洲人自食其果，因为埃及人不会与他们往来。

10年以后，艾伦·加德纳对此作出了更大胆的论断："除了对努比亚进行过一次微不足道的劫掠之外，哈特谢普苏特在位期间几乎没有军事征服活动。"尼古拉斯·格里马尔在1980出版的埃及历史中也指出，哈特谢普苏特唯一真正的对外侵略就是派遣了去往蓬特的贸易远征队：

关于这一[前往蓬特的]远征，哈特谢普苏特祭庙的墙上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它代表了哈特谢普苏特时期外交政策上的制高点，此前其外交活动仅局限于开采西奈半岛的马哈拉干河谷矿场，以及派遣军事远征队前往努比亚……哈特谢普苏特在位时期，唯一一次军事行动是为了巩固图特摩斯一世所取得的成就……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埃及学家唐纳德·雷德福就已对女王的统治提出了一种修正观点，他认为这种不合理的假设没有事实依据，明显证据不足。他指出，如果只是因为缺乏描述军事远征的文献就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一些男性统治者也可以被（可能是错误地）看作和平主义者，

在哈特谢普苏特统治之后，埃及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帝国扩张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哈特谢普苏特所取得的军事成就必然会显得黯然失色……如果说图特摩斯三世的远征的确同哈特谢普苏特在军事领域的作为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图特摩斯同荷伦布以及塞尚克一世的统治形成的反差就更大。如果只根据现存文献下结论的话，那么后面这两位君主就几乎没有对外征战。

荷伦布在成为国王之前曾是图坦卡蒙的将军，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他绝不是个和平主义者。

另一个关于哈特谢普苏特的统治和性格的争议集中在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上：一、她是否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国王，要通过异常多的宣传为其获取王位造势；二、她是否被她的管家塞内姆特（男性）所牢牢掌控。加德纳在1961年提出：

没有男性的支持，即使是一个最具男性特质的女性，要达到权力的顶端也是不可想象的。底比斯墓区中仍然有很多她的大臣的豪华陵墓，这些大臣都用卑躬屈膝来形容她。但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男性表现得十分突出。

唐纳德·雷德福在1967年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毋庸置疑，她最大的支持者是她的总管塞内姆特，此人出身卑微，在她在位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王权背后的实权人物……她的身边围绕着很多宠臣，这些人鱼龙混杂，没有共同的背景，也不大可能拥有同样的政治目的……在她在位第16年后的某个时候，塞内姆特消失了，他最终是自然死亡还是失宠并被暗杀，我们无从知晓……图特摩斯三世，这个正值盛年的天才军人，迅速填补了塞内姆特和尼弗鲁拉离任后的空白，如果哈特谢普苏特还希望挽回局面的话，她就不得不对他采取一种妥协的态度。

雷德福继而指出，当图特摩斯三世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浮雕中，并且开始掌握发动对外战争的权力时，哈特谢普苏特就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了——但是，这同其他的父子共治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埃及的王子们一般都会被给予更多的权力，使他们能够为将来继承王位做好准备。

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格利马尔仍然在把哈特谢普苏特描绘成一个软弱的、受塞内姆特——王位背后的险恶的实权人物——控制的形象：

在其统治时期，她依靠着一些重要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叫做塞内姆特的人。甚至在塞内姆特得志的时期，就有一些恶意的谣言，说他之所以荣华富贵，是因为与女王关系暧昧……在哈特谢普苏特在位的前3/4的时间里，他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人物，但是随后因为一些不明原因，他似乎失宠了。人们认为他是在

尼弗鲁拉死后失宠的……他可能已经开始同图特摩西斯三世结盟，这使得哈特谢普苏特在她在位的第19年弃用了他，3年后，女王本人就消失了。

但是，格利马尔所提及的“恶意的谣言”以及“失宠”并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而更多的是出于他自己的想象。

接着，法国的埃及学家苏姗·拉提挺身而出，为哈特谢普苏特辩护：

塞内姆特的性格复杂多变。他的职业生涯的某些方面令人费解。至少到女王在位的第16年，所有的重大成就中都能找到他的身影。在各种决策和活动中，很难分清女王和她的“顾问”各自扮演的角色。我们用“顾问”一词来形容塞内姆特，而有意避免使用“宠臣”一词，因为哈特谢普苏特和塞内姆特这方面的生活是我们完全接触不到的，而且也没有任何客观证据。

最后，第三个关于哈特谢普苏特的历史争论的焦点是：她如何证明自己应当登上王位。在新王国时期的王室纪念物中，有一小部分表明统治者是由一名女性和神（阿蒙神）结合所生，也就是说他（或她，例如哈特谢普苏特）的身体是半人半神的。这就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这些画面本是许多王室纪念物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是因为偶然的机会，某些朝代的纪念物上的这些画面才得以保存下来？还是像很多埃及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某些统治者更注重强调他们的统治的合法性？

埃及学家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哈特谢普苏特和阿蒙霍泰普三世的“神圣诞生画面”——分别出现在代尔艾尔巴哈里神庙和卢克索神庙——是政治宣传性的还是宗教性的（也许兼而有之）？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哈特谢普苏特的性别迫使她利用新方法证明其地位的合法性。而阿蒙霍泰普三世（以及后来的拉美西斯二世，现存的相关画面为数不多）并不存在哈特谢普苏特那样的“性别问题”，但他们也利用了神圣诞生的神话，上述观点则无法解释这个问题。在科林·坎贝尔的《国王阿蒙霍泰普三世的神奇诞生及其他埃及学问题》（1912）一书中，他提出，考虑到王权中阿蒙崇拜取代了拉神崇拜，哈特谢普苏特

和阿蒙霍泰普三世的诞生画面的出现实质上是由于宗教原因而非政治原因，其目的在于将国王塑造为阿蒙之子，而不是太阳神拉之子。但是，早在阿赫摩斯统治时期，也就是哈特谢普苏特的三代之前，阿蒙就已经被描述成了国王之父。实际上，至于哈特谢普苏特为什么要强调她的神圣出身，至今仍没有定论。

尽管拼凑的证据总是会造成解读上的困难，但毫无疑问，20世纪对于哈特谢普苏特统治的解读存在三个难题，这些难题至少部分来源于埃及学家的假设和个人偏见，这些假设和偏见不仅使他们错误地解释证据，还使他们公然为女性统治者建立起一个半虚构的形象，这必然使埃及学家在研究这个主题时借鉴了后来西方史上的（通常都是非常不适合的）许多女性统治者的固有形象，比如伊丽莎白一世和维多利亚。例如，当米歇尔·赖斯推测哈特谢普苏特与塞内姆特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时，他借鉴了俄罗斯历史：

> 她似乎同她的建筑师塞内姆特维持着一种暧昧关系，他可能是她的女儿尼弗鲁拉的父亲；也许他对她而言就像波将金对凯瑟琳一样，哈特谢普苏特本人也同凯瑟琳非常相似。

除了哈特谢普苏特以外，另外两个得到这种“盖棺定论”式的性格描述的埃及“王室女性”是尼弗尔提提（她的一尊雕像举世闻名）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后者是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同时也是20世纪电影业中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之一。我将会在本书最后一章讨论尼弗尔提提和克利奥帕特拉的声誉及种种影响，因为这两位埃及王室女性无疑已经跨越了时空界限，登上了现代流行文化的舞台。

拉美西斯大帝

人们对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埃及王权有着更为普遍一致的看法，但这种看法仍然非常模式化，在他去世之前，他似乎就已被视为帝王的典范了。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他成为了一个活着的传奇，并且受

到后世法老们的高度敬仰（以及钦羡），拉美西斯三世就是其中之一。在声名显赫的拉美西斯二世死后仅30年，拉美西斯三世继位，他不仅在麦迪奈特哈布为已被神化的拉美西斯二世建造了一座祠堂，而且还用拉美西斯二世的儿子们的名字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

到公元前11世纪，拉美西斯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神话式人物，以至于一份魔法纸草如果被鉴定为是“在国王乌斯玛拉（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的颈项上发现的”，它就具有了更超凡的力量。此外，拉美西斯还明显与埃及王权体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第三中间期，祭司以及高级官员有时会被称为：“拉美西斯的王子”，显示出拉美西斯的名字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后世有关拉美西斯的记忆不仅限于拉美西斯本人而且涉及塞索斯特里斯，实际上塞索斯特里斯是中王国时期几个统治者的集合，拉美西斯二世在世时贪婪地侵占了他们的纪念物，还无情地将他们的美誉纳入自己名下。在5世纪，希罗多德描述了一个名叫拉姆普西尼图斯的人，他认为正是这个人修建了孟菲斯普塔神庙西端的塔门，还提出他经常寻访底层社会。希罗多德在其《历史》第二卷的121到123页还记述了拉姆普西尼图斯统治时期的两个故事，从这些叙述来看，他似乎就是拉美西斯二世和三世的半神化的混合体。第一个故事讲述了国王如何去冥界玩掷骰子游戏，另一个则是窃取国王财宝的狡猾的盗贼与国王之间斗智斗勇的故事。

大约在400年以后的公元前1世纪早期，狄奥多罗斯·塞库鲁斯引用了埃伯戴拉的赫卡塔埃乌斯对奥西曼德斯之墓的描述，该墓貌似拉美西姆——即拉美西斯二世的祭庙。奥西曼德斯这个名字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第一个名字乌瑟尔–玛阿特–拉的希腊读法。狄奥多罗斯记述了一场假想的奥西曼德斯同“巴克特利亚人”之间的战争，这很有可能是对埃及和赫梯之间的那场真实而遥远的战争的回忆，这场战争中就包括著名的卡叠什战役。埃伯戴拉的赫卡塔埃乌斯对拉美西姆的国王巨像进行过描述，狄奥多罗斯对这些描述作了一番释读：

在神庙的入口旁边是三座雕像，每座都是由产自赛印的一整块黑色巨石雕刻

而成。其中一个坐像是埃及最大的雕像……上面的文字写道：“万王之王就是我，奥西曼德斯。如有人想知道我有多么伟大，我将葬于何处，就让他先超越我的功绩。”

如果说讨论这些雕像和暴虐的专制君主距离当今世界有些遥远的话，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那时世界上所有的电视媒体都转播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巨大雕像被推倒时的情景，这也象征着萨达姆政权彻底被推翻。

狄奥多罗斯的“巴克特利亚人”的主题取材自刻有铭文的班切斯石碑（现存于卢浮宫），尽管相传该石碑是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时期（公元前1290—前1224）制造的，但上面的铭文大概成文于公元前2世纪到4世纪之间。这块黑砂岩石碑发现于卡纳克孔苏神庙附近一个托勒密时期的小神龛里。铭文中说，国王娶了一位名叫尼弗鲁拉的异国公主，她来自巴克坦（巴克特利亚？），姐姐身患重病。据说，由于孔苏神可以化身为“供养者”，具有驱除恶灵的能力，因此拉美西斯传旨将一尊孔苏雕像送给了他叙利亚的岳父，以便给尼弗鲁拉的姐姐班切斯治病。这可能印证了在那个遥远年代里拉美西斯与赫梯公主联姻的真实性，因为赫梯公主被命名为玛洪尼弗鲁拉，同班切斯石碑上记载的异国公主的名字十分相似。我们不知道这块石碑旨在宣传些什么——是颂扬孔苏这个慈悲和仁善之神（*pa ir sekher*：“计划制订者”或“供养者”）？还是意在化解孔苏的两个主要派别的祭司之间的敌对关系？抑或在国势衰微之时借此重新唤起面对外部世界时的民族荣耀感？可以肯定的是，同古王国时期的斯涅弗鲁一样，在埃及人的心目中，拉美西斯二世的统治已经成为了一个永恒的黄金时期。

然而，在1817年，拉美西斯的名誉又受了负面评价，这一年雪莱发表了名为《奥西曼德斯》的十四行诗，诗中包括以下名句：

“我是奥西曼德斯，众王之王。
强悍者呵，谁能和我的业绩相比！”
这就是一切了，别无其他。
在这巨大的荒墟四周，无边无际，

只见一片荒凉而寂寥的平沙。

雪莱从未去过埃及，他很可能是在参观了几次大英博物馆之后产生了灵感，写下了这首诗，因为我们知道1817年时他正在伦敦，在完成这首十四行诗的前几个月，他曾有一个晚上同济慈以及利·亨特一起创作关于尼罗河的诗句。这首诗显然大量借鉴了狄奥多罗斯·塞库鲁斯，也许雪莱还读了威廉姆·汉密尔顿于1809年出版的关于埃及的入门书——《埃及》。另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1817年，名为“小美侬”的拉美西斯巨型石像的一部分被送到了大英博物馆，这是穆罕默德·阿里送给雷根王子的礼物，由贝尔佐尼从拉美西姆的第二庭院运至英国。

拉美西斯的种族渊源甚至也成了讨论对象。在第六章（主要讨论埃及人的民族和种族问题）中我们将会看到，多年来，很多埃及学家都怀有种族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的动机。其中一位就是所谓的“狂热的文化传播论者”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爵士。他研究了塞提一世、拉美西斯二世以及美尼普塔的木乃伊，并得出结论：“他们的面相及头骨体现了更多异国人种[亚洲人]的特征”，他认为同第18王朝的统治者相比，他们“作为埃及人的特征不太突出”。从其种族主义的观点出发，他无疑是想极力证明这些英勇尚武的国王并不是非洲血统。布鲁斯·特里杰、史密斯及其持文化传播论的同道者们认为：“大部分人类天生就是不开化的，如果没有统治阶级的阻止，他们随时会倒退到野蛮蒙昧的状态。”也许正因如此，为了符合“统治者”与“臣民”有不同的血统这一观念，从种族上将拉美西斯及其家族与他们的臣民区分开来就非常关键。

去世后的拉美西斯又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许多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出现在了从埃及学家转行为作家的克里斯蒂娜·雅克的系列小说中。同样，在1989年出版的由安·赖斯创作的《木乃伊或被诅咒的拉美西斯》一书中，拉美西斯靠神奇的灵药（同克里奥帕特拉一起）得到重生。

正如我们在本章前面部分所说，当代埃及学家认为哈特谢普苏特

是一个特例，因此她需要通过独特的故事来巩固王位，而不管这些叙述是否有根有据，对哈特谢普苏特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当代埃及学家的这种认识造成的。与此相反，从新王国晚期到20世纪，在关于拉美西斯二世的生平和统治的记载当中，他似乎被描述为了傲慢与专制的混合体，而这些典型特征往往被认为是埃及统治者所需要的。结果，当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和埃及考古协会的创建者——艾米莉·爱德华在1877年描写拉美西斯的时候，将他形容为“战争中残酷无情，和平时挥金如土，对战利品贪得无厌，在执行几乎无处不在的权力时毫不留情”。她能描述得如此栩栩如生，并不是因为她搜集了足够的证据，而是因为她显然受到了对拉美西斯的模式化评价的影响，这种模式至少从赫卡塔埃乌斯就已出现了。

最后，最公正的拉美西斯的传记作者之一——凯奈斯·基钦尽力避免对拉美西斯进行草率的模式化塑造，但与此同时他却塑造了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君主形象。他批评了埃及学家同行们对拉美西斯二世所进行的艾米莉·爱德华式的归类，还推测了拉美西斯二世对这个现代世界的看法：

> 他最初也许会为技术和科学而感到眼花缭乱……但不久他就能够透过物质的表面（为了寻求真理和正义），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另一面：那就是现代世界同他所处时代的世界一样，同样饱受人类的争斗以及人性的弱点所带来的苦难……最后，他无疑会看到某些永恒的正面价值，如爱、奉献、正义感，以及在非实质问题上的相互宽容……

如果说赫卡塔埃乌斯/爱德华强调拉美西斯的专制的看法令人困惑，那么将拉美西斯视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式人物的基钦式的观念就更加混淆视听。

为了对埃及王权的模式化有真实的了解，我们也许应该看看简·阿斯曼的研究，他在《在古埃及寻找神》一书中描述了王权如何成为埃及创世神话的核心：

故事由国王开始。他是荷鲁斯神的化身，是那个曾经并且现在还是要通过战胜父亲的死亡而取得王位的儿子。九神会[9个创世神的组合]既是他的家人，也是宇宙本身，他必须在他们面前证明他才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按照向下的顺序读，他的家谱就是宇宙演化的过程。他的职责的合法性在于：这一统治权，即阿图姆的职权，原始之神曾在他的后代身上实施，它经历了这样一个传承过程：从空气与大地之神，到荷鲁斯死去的父亲奥塞里斯，再到那些历史上的国王，他们是奥塞里斯之子荷鲁斯的化身。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对阿蒙霍泰普二世，哈特谢普苏特以及拉美西斯二世时期流传下来的大多数文献和艺术形象的背景有了一些了解，而且有了这些关于宇宙的比喻，我们能够从这些材料中隐约看到一些国王的个性。如果埃及的统治者们给人感觉十分傲慢，那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看作是人类和宇宙之间的关键角色，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

第六章

身份：关于种族、人种以及性别的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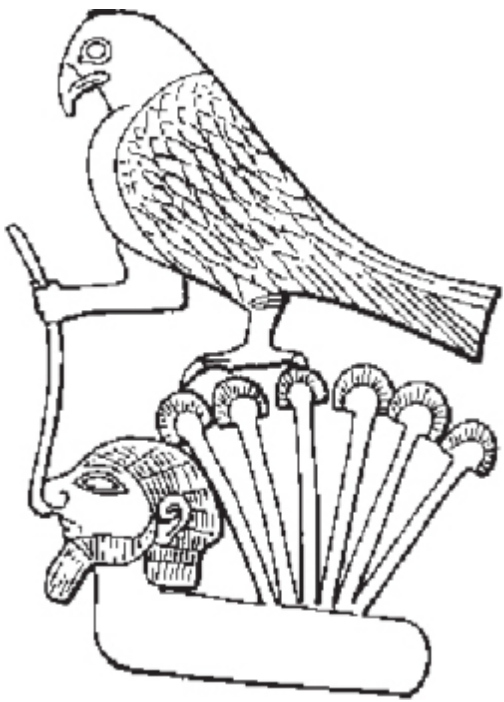

纳尔迈调色板上有法老和他的化身（反面是鹰神荷鲁斯，正面是公牛）处决或羞辱外族人和敌人的场景。如前所述，这些形象一方面是埃及人表现模式化的王权观念的部分工具，另一方面还是一种象征。埃及人以此来界定和强化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身份，将自己与境外混乱的外族人区别开来。然而，我们也许会问，浮雕上荷鲁斯抓着的那个俘虏是否是利比亚人或者亚洲人，或者该浮雕描绘的是否仍然是上埃及以武力统一下埃及的一场内战，而那个俘虏是下埃及人。我们也许还会问：调色板底部的那两个卑躬屈膝的人，以及另一面上那一排被斩首的人，他们是下埃及人还是外族人？上埃及人在这一时期是否将下埃及人看作半外族人？难道正如埃及学家皮特里和埃默里所说，画面中的法老及其臣子实际上是来自近东的入侵者，而不是“埃及人”？如果是这样，纳尔迈调色板上到底哪些人才是真正的“埃及人”？

埃及早期种族身份的象征

事实上，对于法老时代早期的埃及人来说，纳尔迈调色板似乎对他们的民族身份的界定有着特别的意义。托比·威尔金森认为，纳尔迈的名字所代表的动物被直观地表现出来，他是古埃及最后一位被如此描绘的国王，因此，在纳尔迈的象牙权标头和圆筒印（见第三章）上都有一条被拟人化了的鲇鱼，它正在重击外族俘虏，这多少有点不可思议。而在调色板上，纳尔迈不仅化身为隼鹰和公牛等代表法老的兽类标志，同时表现为一个攻击敌人的法老形象。因此，威尔金森提出：

> 纳尔迈调色板是王室象征的早期及晚期传统手法的高度混合，纳尔迈的统治标志着统治观念的根本转变，调色板是体现这一观念转变的最好例证。

威尔金森还指出，纳尔迈调色板可能是借鉴了美索不达米亚图形

（如在调色板中间的凹处有两只脖颈缠绕在一起的长颈怪兽）的最后一件王室手工艺品，因此：

> 随着埃及的统治者开始拒绝使用王室图像，转而采用本土的图形，在第一王朝初期，官方对于外部世界的意识形态也经历了重大转变……此后，在埃及的国家意识形态中，非埃及人就是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被排斥在埃及人的王国之外，因此对埃及法老、老百姓及其生活方式采取敌对态度。

毫无疑问，在对纳尔迈调色板的研究当中，身份认同问题十分普遍，同样，这个问题也渗透到了整个埃及学学科当中。古代埃及人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如何使自己区别于周边的民族？埃及文化是黑非洲文明的一部分还是近东文化的若干变异形式之一？我们定义埃及人的依据是什么？是他们的语言、地理位置还是他们的外貌？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在很多方面，埃及人通过强调他们与非洲和近东的外族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来明确自己及统治者的身份。埃及逐渐与之建立商业和政治联系的地区大致可分为3个区域：非洲（主要是努比亚、利比亚及蓬特）、亚洲（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以及安纳托利亚）以及地中海北部和东部地区（塞浦路斯、克里特、海上族[1]以及希腊人居住区）。

纳尔迈调色板或许还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早期埃及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情况。早在1955年，以色列考古学家伊加尔·亚丁分析指出纳尔迈调色板所描绘的可能不是简单的庆祝国王继位或宗教仪式等场景，甚至也不像过去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记述了上下埃及的统一。亚丁认为，它反映的是埃及与近东早期的军事冲突。亚丁重点关注了在纳尔迈国王击打敌人的高大形象下面的两个卑躬屈膝的人。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谈到的，在某些方面这两个人物的身份可以通过旁边的一对类似象形文字的符号来确定。左边的符号看似一座防御城墙的长方形平面图；如果该符号代表的也是建筑的话，右边的则可以看作一座半圆形围墙，有两堵墙由它的中间向外伸展出去。亚丁指出，右边的符号可能是埃及人独特的风筝形围墙的表现方式（从上面看，它呈钻

石状，并有两条“带子”从上面垂下）。在现代城市阿曼附近的哈玛德沙漠发现了大量此类建筑，在阿曼，人们认为这些建筑是防御城墙，畜群可以圈养在其中以免受其他部落的袭击，因此这两个符号表现出了纳尔迈脚下那两个人的来源地，如果亚丁判断正确的话，第一个符号代表埃及人在青铜时代早期的巴勒斯坦征战时遇到的长方形防御城墙，第二个符号表现的则是风筝形围墙，与当时外约旦地区的游牧民族有关。

有趣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以色列纳哈尔蒂拉地区的西罗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块埃及陶片，上面刻有一个王名框，框内写着纳尔迈的名字，同时还发现了很多其他的埃及手工艺品，其中有象征权力的物品如权标头，其年代与纳尔迈调色板的年代相近。此外，在纳哈尔蒂拉地区西北部的泰勒埃拉里地区也发现了埃及人活动的证据，这些都表明当时埃及人的确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这些考古学证据或许可以证明亚丁理论的正确性，即埃及人的军事扩张很久之前就到达了黎凡特地区。

黑色的埃及人：伯纳尔，迪奥普以及对“凯麦特”的再定义

谈到埃及人的民族身份，我们就必然要试着解决这样一个当代性问题，即从种族和民族的角度来说，埃及人在多大程度上是“黑色”人种。马丁·伯纳尔和谢赫·安塔·迪奥普认为埃及文明在本质上是“黑色”文明，只是欧洲白人在文化上对它进行了修正，使该文明受到了曲解。他们的这种观点有多少依据？1981年，迪奥普断言：“埃及人是黑人，他们嘴唇厚，头发卷曲，双腿纤细。”就现存的木乃伊以及对古埃及人的描绘来说，尽管有一部分 符合迪奥普的描述，但从外貌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大多数都与迪奥普的描述相去甚远。

埃及人如何看待自己？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回答这个问题：一是研究埃及人在绘画和雕塑中是如何描绘自己的；二是分析他们如何描绘外族人。与许多其他文化一样，埃及人似乎主要是通过自身与埃及之

外的民族的比较来获得身份认同感。从埃及人描绘自己和外族人的象征符号上来看，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他们对自身形象的认识往往介于黑皮肤、卷头发的非洲人以及肤色浅、蓄胡须的亚洲人之间。新王国法老塞提一世以及拉美西斯三世的陵墓位于帝王谷，墓中有一些壁画，这些壁画表现了太阳神拉掌管的宇宙中的不同人种，其中就包括皮肤呈红褐色的埃及人，与黑皮肤的库什人（努比亚人）和肤色较浅的利比亚人及亚洲人都形成了鲜明对比。除了肤色和其他身体特征外，我们也可以从发式与服装上来区分这些古代人种，这些分类无疑能够使埃及人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区别开来，成为一个民族。然而，就连埃及人自己也会认为这些描绘是一种简单的模式化，因为从成千上万的埃及人的肖像来看，他们的肤色是非常多样的，从深浅褐色到黑色都有。

因此，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埃及人是在文化上而非种族上将自己视作一个独特的民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于一些外表看来明显属于“异族”的人，埃及人也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把他们看作自己人。梅伊赫普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梅伊赫普里是第18王朝早期的一名军官，他获得了在帝王谷建造自己陵墓的特权，但是他的外貌特征（黝黑的皮肤和卷曲的头发）清楚地表明他是努比亚血统。同样在第18王朝，一个叫做阿佩尔的亚洲男子当上了维西尔（最高的官职，仅次于国王），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他来自近东地区，在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其他亚洲人在埃及的精英统治中身居要职。

埃及学家——尤其是北美的埃及学家——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古埃及文化的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黑色问题”。认为埃及本质上是一种黑人文明的观点——这通常被描述为一种“非洲中心论”的立场——对很多非洲人以及非裔美国人都至关重要，因为它说明非洲人和黑人在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很多非洲中心论者认为针对“埃及”的权威埃及学研究带有很深的偏见，因此他们只用古埃及的地名凯麦特（字面意思是“黑色的土地”）来指称埃及，尽管该词实际上是指黑色的沃土，而不是人的肤色。非洲中心论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论据，其中包括马丁·伯纳尔的极度理性的观点——与谢赫·安

塔·迪奥普那颇受争议的蹩脚观点（例如，他指出约鲁巴人的“教皇”奥尼与埃及神奥塞里斯拥有同样的头衔）相比，伯纳尔在其两卷本专著《黑色雅典娜》中列举了一系列论据，较为可信地说明了埃及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推动力——还包括一些极其感性或模棱两可的看法，如莫莱菲·凯特·阿桑特提出：

……埃及语中的*mdw ntr*，即书面文献，代表着整个非洲世界。每一个埃及象形文字符号本身都是世界的一个微小部分，因此文字作为思想的表述不断地在非洲大陆上重复着，而雕塑正是这些思想的构成成分。

毫无疑问，过去某些埃及学家对埃及人的解读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最为恶劣的是，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曾在1909年指出：“哪怕只有一点非洲血统，其后果也会马上显现出来，它会使人们不思进取，成为文明艺术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弗林德斯·皮特里也提出了一种理论，他认为法老埃及是来自近东甚至是来自欧洲的“优等民族”建立的，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他的政治观点是右翼的（他写了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危险性的小册子），或者没有意识到他是优生学运动的积极分子，而该运动的宗旨正是通过“研究受社会制约的可以提高或降低人类后代的人种质量的力量”（引自该运动的创始人——人类学者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从而致力于“改善”人类血统那我们就很难理解他的理论。另一方面，布莱恩·埃默里对于早期埃及侵略论的拥护无疑是更多地受到了戈登·蔡尔德的文化传播理论的影响，但也有可能是受到了二战前英国在埃及和苏丹的殖民主义的影响。

然而，我们来设想一下——许多非洲中心论者似乎也是这样做的：首先，许多传统的埃及学观点仍然受到种族主义的影响；其次，这种偏见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证明：与图像和文字证据所表明的相反，古埃及人是非洲黑人。这些设想似乎缺乏证据。也许对此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C. 洛林·布雷斯：

埃及并不存在“种族”的概念，希罗多德的著作、《圣经》以及任何其他古典

文献也没有提及这一概念。由于它缺乏生物学和社会学上的依据，因此无论在公共还是私人场合，我们都应该竭力避免使用这个词。不用这个词并没有人会在意，反而对我们有利。R.I.P [2]

性别与性特征

自从埃及人的身份问题被提出以来，它就一直备受埃及学家的关注。然而，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却很少被提及，这可能是因为埃及学家往往是欧洲的白种人或北美男性学者。纳尔迈调色板顶部女神巴特的几个头像是唯一具有女性元素的装饰（埃及学家——也是艺术史家——惠特尼·戴维斯指出，这些甚至有可能是公牛神的头像）。与大部分埃及艺术或文献一样，纳尔迈调色板本质上也是一个以刻画男性为主的手工制品。这样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对古埃及女性了解多少？对埃及人自己如何看待性别与性征又知道多少？埃及社会的哪些方面受到了性别问题的显性或隐性的影响？

在观察埃及文字和图像资料中的性别模式时，我们几乎能立刻看出男性形象及其受关注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女性，而这些作品中对男性的倾斜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很明显，有些则更微妙而含蓄。正如我们在总结关于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统治的观点时所看到的，在法老埃及近3,000年的历史中，极少有女性能够成为统治者。在墓室祠堂的壁画中，女性通常是次要角色，因为这些陵墓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为她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所建。从埃及的文献和艺术图像中可以看出，最晚从第1王朝开始，埃及就一直以男性为中心。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倾向性地选择了某些资料，从而造成了一种假象，但在某些方面也是埃及的社会现实：古埃及的女性未曾受过教育，她们常常被排斥在管理层之外，也极少出去工作，当然，纺织、酿酒和烘烤等工作除外（尽管也有男子从事后两项工作）。墓室壁画以及随葬木俑常常表现的是女性纺纱织布的形象，有时也有一些收割亚麻的农耕场面。一些古代文献指出，收割亚麻是王室女眷的主要活动之一（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东方主义画家在创作“法老女眷”这类作品时常常忽

略了这个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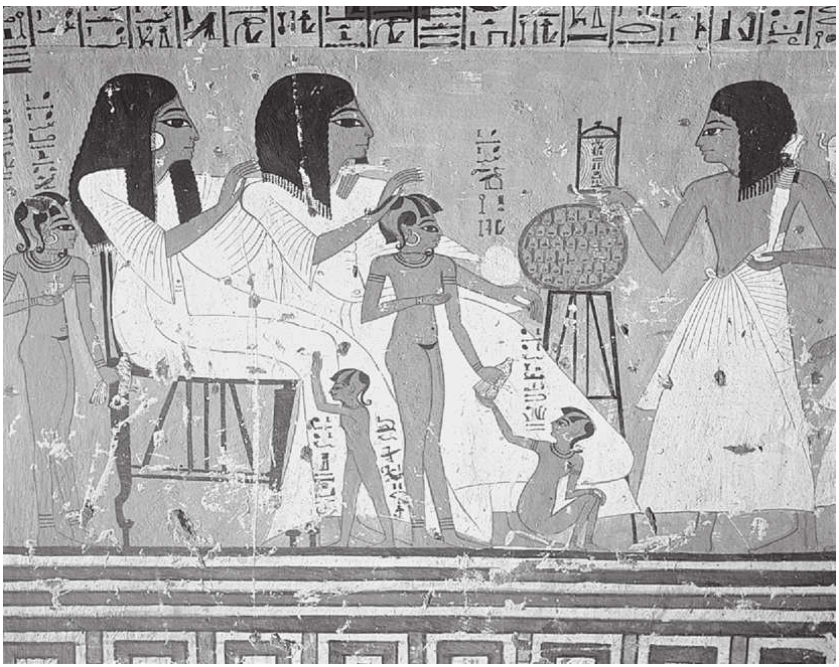

图15　代尔艾尔迈迪纳墓室祠堂壁画，第20王朝，约公元前1160年

过去，以男性居多的埃及学家简单地把这种情况视为理所当然，很少从男性为中心的文献中努力“挑出”关于女性的角色和生活方式的信息。然而在过去的30年间，随着女性埃及学家越来越多，这方面的尝试——即透过字里行间去寻找关于女性生活和成就的信息——也就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例如，有一点非常明显，即女性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着变化。在法老埃及时期，事实上有3个阶段的文献体现了女性的突出地位：一是古王国时期，那时女性可以担任一些管理职位（尽管只是管理女性群体）；二是第18王朝早期，这时女性形象更为频繁地出现在墓葬石碑上，这可能反映出她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丧葬仪式；最后是第20王朝晚期到第22王朝早期这段时间，此时女性形象不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墓室祠堂中，还常常单独出现，并没有任何男性亲属的陪同。

由于埃及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研究精英集团的纪念物，因此许多早期研究都不可避免地集中在王室妇女和贵族妇女身上，譬如海泰菲利丝（胡夫的母亲）、索贝克内弗鲁（第12王朝的女性统治者）、哈特谢普苏特以及尼弗尔提提。然而，埃及学家们越来越注重获取有关不同社会和财富阶层的妇女的信息，而新近兴起的居住区考古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一重心的转移，这种居住区考古可以提供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证据，这些证据至少有可能展现埃及社会中以妇女为中心的某些方面。那些在男性为主的文献和艺术形象中看不到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在考古记录中有时却表现得很明显。然而，我们在分析男女利用房屋的模式时需要特别谨慎，因为我们很容易毫无根据地把某个空间同特定性别联系起来（如女性/厨房，男性/客厅，女性/卧室），而这种设想带有一种民族中心主义的色彩。

另一个性别研究的领域就是较为棘手的性征研究，在该领域中，埃及学家常常会犯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在第八章中，我会提到埃及宗教非常重视某些神祇的男性生殖器。很多在犹太–基督教宗教传统下长大的埃及学家——用学术语言来讲，都在避免谈论这种男根崇拜，有意无意地把它看作某种与宗教格格不入的东西。从广义上讲，这使许多埃及学家企图对一些事件轻描淡写，如阿图姆为了传宗接代而进行自淫（在没有与任何女神结合的情况下）。根据雷蒙德·福克纳的翻译，《金字塔铭文》的527条明确说道：

> 阿图姆神从一开始就存在，他在赫利奥波里斯进行自淫，他抓住自己的生殖器并获得性高潮，然后生下了舒和太芙努特。

然而，1892到1924年间在大英博物馆担任埃及和亚述文物保管员的瓦利斯·巴奇说，这一虚构的行为是“有关自然论的一个粗鄙的例子”，巴奇显然只能把它视为某种史前宗教的遗留，从而使这一行为得到解释。而美国埃及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则含糊其辞地把这段铭文译为：“阿图姆运用自己的男性力量进行了自我繁殖”，其中根本就没有提到性行为。

到目前为止，只有两本书谈及法老埃及和希腊–罗马时期的埃及的性问题，但两位作者都强调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埃及学的设想，即传统上倾向于把和性有关的器物及图像与较为中性的“繁殖力”联系起来，而不是公开承认对性的描写和性行为。正如林恩·梅斯克尔所说：

> 墓室壁画强调的是女性的性能力，而不是她们的繁殖能力（即怀孕），她们的性能力可能是来世生活中备受欢迎的东西，就像仆人和食物一样。

汤姆·黑尔则谨慎地指出，我们通常难以判断画面是否是色情的。黑尔分析道：

> 不管我们个人认为刻画胸部赤裸的埃及妇女或女神的绘画多具吸引力，如果将其视为色情的是很轻率的。这是因为在古埃及规范的艺术形式中，成年妇女和女神通常都是袒胸露乳的，而且胸前的乳头也被勾画了出来。

他进一步分析了我们之前所见的那幅画面，衣着相同的妇女在雕像中就没有露出胸部，而在平面绘画中则裸露着一只乳房——这似乎是某种艺术惯例而非色情。另一方面，他承认在第18王朝中期的贵族墓室中，有许多赤身裸体的舞女、歌女和仆人的形象，从其外观可以断定这些是有意识的对性征的描写，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女性形象无疑成为了男性目光的焦点”。

以上对民族、种族、性别以及性的讨论的最终结果表明，在当代埃及学研究中，这些话题无疑是最有争议的也是最吸引人的。由于当代西方世界本身也深陷于种种身份危机之中，从“政治正确”到“民族纯洁”和“种族仇恨”，古埃及的文献资料自然就有了新的利用价值（这句话让我无意间想起一则谣传——也可能是诽谤——曼彻斯特的磨坊主用埃及的木乃伊作燃料……）。

注释

〔1〕 指在公元前13世纪从陆地和海洋侵占埃及和东地中海的侵略者，这里

指的是他们的活动范围。

〔2〕 拉丁文*Requiescat in pace* 的缩写，即Rest in peace，通常写在墓碑上，本义为“安息吧”，此处引申为“不要再提这个词了”。

第七章

死亡：制作木乃伊、肢解和奥赛里斯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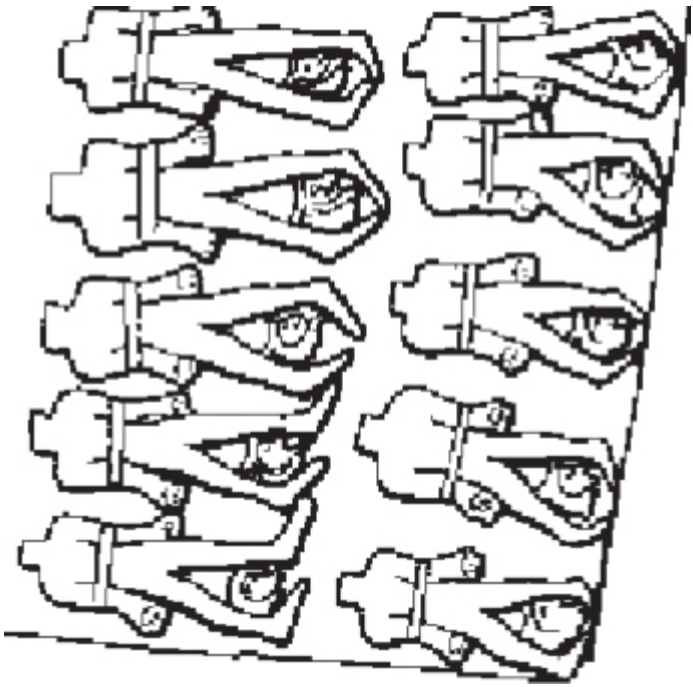

虽然纳尔迈统治期间最重要的两件物品——纳尔迈调色板和权标头——都发现于赫拉康波里斯，但纳尔迈的墓却不在此处，他的墓与零王朝和第1王朝其他统治者的墓都在阿拜多斯的乌姆艾尔卡博遗址的墓群B中，该遗址位于赫拉康波里斯西北150公里外。B17/18是双墓室墓，经鉴定，它很可能是纳尔迈的墓，尽管能够证明它与纳尔迈有关的文献非常少。墓群B中还有其他国王的墓，包括纳尔迈的继任者——第1王朝的另一位国王阿哈，以及可能是纳尔迈前任的两位国王——伊瑞–霍尔和卡（尽管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名字并非零王朝某两位国王的名字，而只是两个普通的王室称号，可以用于指前王朝后期或第1王朝的任何一个统治者，甚至特指纳尔迈的不同方面——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那其他4个墓室可能是纳尔迈墓群的附加部分）。伊瑞–霍尔、卡和纳尔迈的墓都是双墓室结构，但阿哈的墓却是一个墓群，它由若干个单独的墓室组成，分3个阶段建成。阿哈的墓还有一个新要素：墓群的东北方有33个附属墓，里面有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的年轻男子的遗骸，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在国王下葬时被殉葬的。除此之外，在其中一个附属墓附近，还发掘出至少7具幼狮的骨骸，它们可能是象征国王身份的随葬品。

事实上，与本章主题——奥赛里斯崇拜及埃及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最为相关的是位于阿拜多斯的第1王朝后期一位国王的陵墓，即阿哈的继任者杰尔（可能是纳尔迈的孙子）的墓。杰尔墓（包括成排的附属墓，占地面积为70×40平方米）是阿拜多斯地区早王朝时期王室墓群中最大的一个，弗林德斯·皮特里就是在该墓的北墙里发现了一截包裹在亚麻布里的手臂，手臂上带着珍贵的手镯（该墓在古代被烧毁时，这截手臂因为藏在墙中而得以保存下来）。这截手臂可能是早王朝时期墓群中某个王室成员的木乃伊的残留部分，但遗憾的是，由于只有那个手镯和几条亚麻布绷带留存至今（前者现存开罗埃及国家博物馆，后者现存伦敦大学学院的皮特里博物馆），因而无法通过对该肢体的科学定年来判定它是否与杰尔同时代。

最晚在中王国时期，杰尔墓已成为了奥赛里斯神的一个象征性的

墓（字面意思为“空墓”），从而变成了“朝圣”中心。墓地中立有一座奥赛里斯神的石像，1897年法国考古学家埃米尔·阿姆利诺第一次发掘此墓时，发现该石像仍然立在原地。这个墓似乎被视为最典型的王室墓葬遗址：这里是神话中奥赛里斯神的埋葬地，而对奥赛里斯神的宗教崇拜又与那个死去的国王紧密相关。那么，奥赛里斯究竟是什么？为何他对我们理解死亡、木乃伊以及其他东西如此重要？

“西方最首要者”

冥神奥赛里斯是最早的埃及众神之一，他起初可能是掌管农业和尼罗河“泛滥”的丰饶繁殖之神。与很多其他埃及主神一样，随着对他的崇拜遍及全国，他逐渐吸收了其他神的特征。在某个时期，奥赛里斯崇拜传播到了阿拜多斯，在这里，他被冠以Khenty-imentiu（“西方最首要者”）的称号，这一称号是当地人祭拜的一位豺狼形象的冥神的名字。最迟从中王国时期起，阿拜多斯开始每年举办奥赛里斯神的纪念活动，内容包括奥赛里斯神的神像被放在他的圣船上进行游行，由豺狼神韦普瓦韦特（“开路者”）在前引路。在奥赛里斯神的雕像被送回神殿接受净化之前，游行中还会表演奥赛里斯战胜敌人的场景。与“神秘”的奥赛里斯相关的仪式在神庙中举行，这些仪式很可能是要赞颂他这个起初的丰饶之神。一位名叫伊赫尔诺弗瑞特的祭司——第12王朝国王塞努斯瑞特三世在位时期奥赛里斯神年度纪念活动的主办者——在阿拜多斯立了一块石碑（现存柏林博物馆），石碑上记载了奥赛里斯庆祝仪式的某些场景。

在很早的时候，奥赛里斯就占用了安杰提神的标志，也许他作为冥王的神性也源自安杰提神。后来，安杰提神的宗教崇拜中心，即三角洲地区的杰都，也因此被称为布赛里斯，据说该地与奥赛里斯的脊椎骨紧密相连（其标志就是杰德柱）。奥赛里斯同时代表丰产和死亡，这种组合几乎注定了他会成为最终的复活之神。与这位死去的国王之间的联系则最迟确立于第5王朝。为了获得永恒的生命，人们必

须要将制成木乃伊的尸体与奥赛里斯联系起来。

图16　塞提一世木乃伊的头部，第19王朝，约公元前1300年

埃及文献常常通过一些仪式和称号来暗指各种神话，然而众所周知，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缺乏简单易懂的叙事体神话。就像靠一些圣诞卡片和颂歌拼凑出《圣经》中对耶稣诞生的描述一样，通过古埃及文献重构埃及神话也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最详尽地记录奥赛里斯的神话的不是某个古埃及文献，而是希腊作家普卢塔赫（约公元46—126）后来编辑整理出来的传说。古埃及文献中一些现存的残篇已经

证实了普卢塔赫所记载的某些内容，但其他内容则有可能是希腊人或罗马人杜撰出来的。根据普卢塔赫的记述，奥赛里斯是一个人形的统治者，他偶然（！）与自己的弟妹奈弗希丝发生了性关系，招致他邪恶的弟弟塞特的嫉妒，于是塞特密谋暗害他。塞特设法掌握了奥赛里斯身体的尺寸，并按照他的身材做了一个漂亮的箱子。之后，塞特举办了一场宴会，邀请奥赛里斯还有自己的72个同谋到场。席间，他搬出那只箱子，并宣布谁躺进去刚好合适，谁就要接受这个礼物。当奥赛里斯一踏进这个箱子，他就被锁在了里面。塞特等人用熔化的铅把盖子封死，并把箱子扔进了尼罗河。箱子漂流至地中海，最终被冲到了叙利亚港口拜布罗斯。有人说箱子在那里被一颗雪松缠住了，由于这座城市与古埃及保持着密切联系，尤其是在雪松的供应方面，因此这种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终，奥赛里斯的妻子伊西丝把他救回了埃及，把他藏在棺材里并埋入了沼泽地，打算为他举办一场体面的葬礼。然而，据说塞特在经过此地时被棺材绊倒了，于是一怒之下肢解了哥哥奥赛里斯的尸体，并将碎尸（有关碎尸数目的记载各不相同，从14块到42块不等）分散到埃及各地。伊西丝四处寻找这些碎尸，并把它们就地安葬。根据普卢塔赫的记述，奥赛里斯的生殖器被尼罗河鲤鱼（鳞齿鱼）、法格鲁斯和奥克林库斯鱼吃掉了，所以只好给他安了一个假阴茎。但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残存埃及文献都没有提及这一点，因为在奥赛里斯崇拜中，强大的生殖力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据原始的埃及文献记载，在奥赛里斯的碎尸被找回并被拼成第一个木乃伊后，还有另外一出情节——伊西丝通过奥塞里斯的木乃伊受孕并怀上了荷鲁斯。有这样一幅场景描绘受孕的瞬间：伊西丝化身为鸢，在木乃伊的阴茎上盘旋。位于阿拜多斯的塞提一世神庙中的索克尔–奥赛里斯神龛，以及丹德拉的哈托尔神庙的屋顶密室中都有这一场景的不同版本。

奥赛里斯和伊西丝神话中的许多主要内容在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686—前2160）就得到了证实，包括奥赛里斯被淹死和伊西丝发现他的尸体。确定沙漠和混乱之神塞特为谋杀奥赛里斯的人则是在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40—1640年），但故事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塞

特分尸的行为。然而，最能使我们深刻理解古埃及文化的恰恰是这一分尸的过程。尽管我们很难确定神话是仪式的反映还是诱因，或者在现存的文献和图像资料背后是否经历了其他创作过程，但奥赛里斯神话和木乃伊的制作过程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某些联系。希罗多德对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过程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在制作过程中，主要执行者是“开切口者”（*paraschistai*）和“泡制者”（*taricheutai*），这两个称呼虽然稍显不敬，但却清楚地体现出了制作木乃伊的两个主要步骤：必须先由“开切口者”把尸体切开，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肢解，然后再由“泡制者”重新组合并保存起来。因此，奥赛里斯的神话准确地展现了尸体保存的实际操作过程。

虽然奥赛里斯崇拜以各种形式渗入到了埃及人对来世的信仰中，但其中有两方面最为突出，影响也最广泛：其一，到了新王国时期，墓葬文献中越来越普遍地将死者同奥赛里斯明确联系起来的，同时在描述死者的命运时也有意呼应神话中的部分内容；其二，阿拜多斯遗址作为私人墓葬礼仪的中心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阿拜多斯有许多留存至今的私人供奉的墓碑及纪念碑，这说明至少从古王国末期起，奥赛里斯崇拜就开始流行起来（就流行一词的字面意义而言）。甚至当人们不能在阿拜多斯树立墓碑或纪念碑时，就在墓中放入一些代表去阿拜多斯朝圣的物品或图画，如船的模型等。这些船的模型有时象征着死者前往奥赛里斯的家乡之旅。*Abydosfahrt*（埃及人称其为“平静之旅”）指的是一段想象中的阿拜多斯之旅，它最早出现在中王国时期两个地方长官阿蒙涅姆赫特和赫努姆荷太普二世的墓中，以彩绘的形式表现了船只往返于圣地的情景，旁边的铭文则描述了死者参加奥赛里斯纪念活动的场面。

到中王国后期，在阿拜多斯立私人墓葬纪念碑已经泛滥，以至于第13王朝的统治者卫加弗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在奥赛里斯节游行的沿途修建坟墓。奥赛里斯式的丧葬权不仅局限于直系王室家族，对此，美国埃及学家约翰·威尔金森曾有一句著名（但并不确切）的评论，即“来世的民主化”：换句话说，普通民众也获得了以往专属于王室的丧葬特权，他们可以亲自参与奥赛里斯的仪式，并因此享受之前

仅限于国王的丧葬权利。“民主化”一词难免有这样一种含义：由于普通百姓也可以使用王室套语、举行王室的丧葬仪式，直接的后果就是对王权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但与此相反，也有人指出这一模仿举动实际上加强了对王权威望的信奉。

古埃及人的死亡观

有这样一句老生常谈：古埃及人完全沉迷于和死亡有关的事物。这句话面临着被下面一句新的套话所取代的可能。近年来，很多著作都清楚地表明，古埃及人实际上沉迷于生命，他们的陵墓中有无数个描绘“日常生活”的画面和模型，人们或是在田间劳作，或是酿酒、欢宴、奏乐、舞蹈，或是从事着其他种种和生活相关的活动。事实上，如果用漫画来表现埃及人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真正的关注点位于生命和死亡这两极之间。当然，古埃及社会的贵族阶层为准备后事投入了过多的时间和金钱，比我们认为应该在健康方面的投入要多；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总是过分关注古埃及社会中和殡葬有关的那些方面，部分原因在于墓群和其他与丧葬相关的事物都位于沙漠中，其保存状况更为完好，而大多数房屋、城镇、集市都位于靠近尼罗河或其他水源的相对较湿的环境中（也往往会被现代城镇所覆盖）。很多考古学家偏爱与死亡和来生等话题相关的资料，这直接导致了许多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都与这些题目有关。虽然在最近几十年，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对城镇的勘查和发掘越来越多，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结尾所谈到的，但直到最近，很多研究项目一直是围绕丧葬或宗教事务来进行的，而不是以社会或经济发展趋势为中心。大部分埃及学证据仍然以死亡而非生命为中心。

古埃及人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生死观，他们坚定地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永生，其中包括虔敬众神、将尸体制成木乃伊保存起来、提供雕像和其他丧葬用品等。套用现代词汇就叫做分散技术。保存下来的众多陵墓和墓葬文献使埃及学家得以探究这

个信仰体系的复杂性并使该体系得到详细解释。古埃及人认为，人作为个体不仅仅是由肉体构成的，还有其他3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即所谓的护卫灵（*ka*）、身魂（*ba*）和善魂（*akh*），这些是每个人存在的基本要素，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名字和影子不仅是语言和自然现象，还是有生命的实体，它们对于人类的存在起着关键作用。所有这些元素的集合构成了人的本质，缺一不可。

之前在谈奥赛里斯崇拜时，我们讨论过肢解（和重组）这个主题，而意识到个人是各种身份的复合体将我们再次带回该主题。在埃及人的死亡观中，此类主题表现得非常突出，其原因之一就是：要确保一个人能够享受来生，就要进行精密的分解和组合。所有这些单独的元素（身体、护卫灵、身魂、善魂、影子和名字）都必须保存起来，以免受到伤害。实现这个目的最初级方法就是在尸体下葬时放入一整套墓葬用品。最考究的是王室的葬礼，除了几座神庙之外，还配有祭司，同时还有不间断的祭品，其资金通常来自作为贡品的农田以及其他经济渠道。现存的墓葬文献（《金字塔铭文》、《石棺铭文》及各种各样的《亡灵书》）之间差异很大，它们对来生的描述往往互相冲突，按照某些描述，人们死后会化为拱极星，而根据另一些描述，人们会在冥界延续着今生的正常生活，这里的冥界有时被形容为一片芦苇地。

古代、现代，以及后现代的木乃伊

直到最近，人们一直以为最早的人工制作的木乃伊（与在沙漠中自然风干的尸体相对）发现于早王朝时期的阿拜多斯、萨卡拉和塔罕的墓群中，但1997年，一个英美埃及学家联合考古队在赫拉康波里斯发掘某个前王朝时期的平民墓群时，发现了3座完好无损的墓，墓中有几具女尸，其头颈和手部都缠有亚麻布，每个尸体外也裹有亚麻布和席子。墓中随葬品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600年（涅伽达文化二期的早期）。仅仅用绷带缠绕尸体的某个部分是否算是制作木乃伊，学者

们对此各持己见，但这个发现将人工制作木乃伊的时间提前到了一个比预想早得多的时期。有趣的是，其中一个女人在死后被割断了喉咙，这意味着早在那个时期，人们可能就已经在有意识地上演肢解和重组奥赛里斯的身体的仪式。然而，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澳大利亚埃及学家贾纳·琼斯在著作中证明，木乃伊制作技术的应用可能始于巴达里文化时期（约公元前4500—前4100）。她考察了巴达里和摩斯塔格达地区新石器时代墓群中完全变干的厚厚的裹布，结果显示尸体外裹着浸透了树胶的绷带，其制作方法与在赫拉康波里斯的发现类似。因此，我们有证据证明，早在第1王朝前就已经有了制作木乃伊的实验，其历史至少有1,000年左右，但正如琼斯所说：

> 最初的裹尸行为是有意识的人工保存尸体的方法，还是只是丧葬仪式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还无法确定。

埃及人最初制作木乃伊似乎只是为了保存尸体的外观，因此，一些公元前3千纪左右的木乃伊就只在尸体外涂了石膏和颜料，以保护尸体外壳，却任内脏渐渐腐烂。随着技术日渐成熟，越来越多的肢体得以保存下来，在新王国晚期和第三中间期（约公元前1200—前900），这项技术最终达到顶峰。公元前5世纪中期左右，希罗多德详细记述了木乃伊的制作过程，而此时这项技术实际上已经开始衰退，部分原因可能是出于迎合“大批量生产”的需要，因为制作木乃伊的习俗已经广泛传播开来。

通过制作木乃伊来保存尸体是古埃及丧葬习俗的基础，因为护卫灵，或者魂魄——必须返回身体才能得以维持。如果身体破损或无法辨认，护卫灵将无以为生，去往来世的机会也就减少了。

在阅读丹尼斯·惠特利1956年出版的小说《吉福德·希拉里的护卫灵》时，我第一次遇到了古埃及的“护卫灵”的概念。这本书不断吸引着我走向埃及学。我现在知道小说中所描写的鬼一样的现象（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鬼魂》的主角一样，四处游荡，成功地干掉了谋杀自己的人）更像是身魂而不是护卫灵，但考虑到现代书籍和电影对

埃及学造成的破坏，挑剔丹尼斯·惠特利似乎就显得有点吹毛求疵了，因为他至少还作过一点研究。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古代历史馆馆长卡特·勒普顿指出，“大部分外行人对埃及的‘熟悉感’都源自畅销小说和电影，而这些小说和电影与正统的埃及学的诠释常常是不一致的。”当然，如果说电影《木乃伊》（1998）是“研究性的”，那就严重扭曲了这个词的含义。

长久以来，木乃伊（和他们的重生）一直是文学作品和电影的题材，其悠久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27年。那一年，简·韦布·劳登出版了《木乃伊——22世纪的传说》一书，书中讲述了大金字塔的建造者胡夫的木乃伊复活的故事。这本书实质上和较早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属于同一体裁。之后有很多作家在木乃伊体裁的创作中独领风骚，其中包括：泰奥菲勒·戈蒂埃（《木乃伊之足》，1840）、埃德加·爱伦·坡（《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1845）、H. H. 赖德·哈格德（《她》，1887；《史密斯和法老们》，1912—1913）、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图特之戒》，1890；《第249号签》，1892）、布拉姆·斯托克（《七星珠宝》，1903）以及萨克斯·罗默（《她，睡着的人》，1928，及许多其他作品）。N. 戴利曾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他认为是大英帝国的变化性造成了维多利亚和爱德华七世时期木乃伊故事的泛滥，木乃伊无形中反映了帝国创建者们追求危险刺激的异国资源的心态。

表现木乃伊的重生及复仇的最早的影片也许是由乔治·梅里爱制作的无声电影《克里奥帕托拉》，片长只有1分钟，然而，有关这一题材的最著名的故事片则是拍摄于1932年的《木乃伊》，由鲍里斯·卡洛夫饰演伊蒙荷太普。在剧中，考古学家们在朗读“图特的卷轴”时，伊蒙荷太普的身体复活了。该情节实际上取材于古埃及很少见的一个关于尸体复活的传说，即塞特内·哈姆瓦塞特的轮回，它记载于罗马时期的一篇世俗体铭文中。这部电影似乎主要改编自尼娜·威尔科克斯·帕特南的《卡里奥斯特洛》，也有可能受到了赖德·哈格德的《她》（其电影剧本出自《木乃伊》的作者约翰·鲍德尔斯顿之手）以及柯南·道尔的《图特之戒》的影响。自20世纪30年代起，大量木乃伊题材

的电影涌上银幕，事实上，它们已经足以被单列为一类电影题材。

诅咒……

谈到木乃伊，我们就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象：在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尤其是20世纪的文学和电影，木乃伊总是和致命的诅咒相联系，被诅咒的对象则通常是打扰死者安息的考古学家。这种说法究竟始于何处？更重要的是，它是真实的吗？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这些诅咒的确存在的话，我和我的几个埃及学家同事肯定早就被毒蚊叮咬并感染致死了，就像卡纳冯伯爵在图坦卡蒙墓打开不久后就死去了一样。至于这种传说始于何处，可以肯定的是，为了使墓室免遭毁坏或轻慢，古埃及墓室铭文中有一些威胁的话语，这些话成为了这类诅咒的早期证据。然而，宣扬这种诅咒会成为现实的始作俑者是埃及学家亚瑟·韦戈尔。在搬移图坦卡蒙墓随葬品的最初几个星期，他作为《每日邮报》的记者报道了这一过程。也许是韦戈尔觉得这项发现本身并不够刺激，他突然想到了用诅咒来给自己的文章添油加醋（虽然他声明自己并不相信）。第一个把木乃伊诅咒写入小说的作家可能是《小妇人》的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1869年，她发表了一篇名为《迷失金字塔或木乃伊的诅咒》的小说，韦戈尔正是借鉴了50多年前的这一木乃伊诅咒题材的小说。

第八章

宗教：古埃及众神和神庙

纳尔迈调色板正反两面的上部各有一对母牛头，弯曲的牛角十分巨大，这是早期的母牛神芭特画像的一部分。芭特是上埃及第7个州的守护神。到了中王国时期，对她的崇拜逐渐被另一个更为著名的母牛神哈托尔所取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芭特的鲜为人知。哈托尔的形象通常是一头母牛或是一个有着母牛头的女子，而芭特则不同，她的形象（很少出现在古埃及艺术作品中）通常被描绘成叉铃（一种类似拨浪鼓的乐器，专由女子演奏）的样子。在纳尔迈调色板中看不到芭特的身体，但据金字塔铭文的描述，芭特“生有两面”，也许正因如此，调色板正反两面都有她的形象。由于某些神更受当时国王的青睐，或对某些神的崇拜传播得更为广泛，它们逐渐取代了对那些次要的神的崇拜，这种现象贯穿着整个埃及宗教史。

正如在古埃及宗教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埃里克·霍尔农所指出的那样，“古埃及神的特性和表现形式总是在不断变化，在这一点上，古埃及神与这个国家的神庙很类似，这些神庙总是‘正在建设’，从来没有完工的时候。”霍尔农还认为，在法老埃及的大部分时间内，在埃及宗教多神崇拜的表象下很可能潜藏着某种形式的一神论。论据之一就是创世神似乎超越并包含了众多的埃及神；另一个论据则是我们需要用相对论的观点来看待宗教：

> 多神崇拜的时代已经过去；再没有人会向阿蒙神或宙斯献上一头公牛。但是，目前的一神崇拜的时代也未必是定局。这两个时代都与人类意识的发展阶段相对应，所以无法用“对”或“错”的标准来评判它们。

谈到埃及学家对古埃及宗教的看法，首先应该谈的就是芭特女神的母牛头，因为说起埃及宗教，我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兽首人身或鸟首人身的神的形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半人半兽形象的神似乎至少与某些埃及人之间有直接的互动。布鲁斯·特里杰在他的《早期文明：古埃及》一书中指出，我们和古埃及人的世界观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我们对自然界和超自然界作出了明确的区分（这是我们继承的

希腊哲学思想的一部分），而古埃及人则认为人和神在同一个社会和自然层面中相互影响。

如果说古埃及文化整体上常常难以理解的话，那么埃及宗教便是埃及学家处理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大量现存的埃及艺术都与宗教相关，对它们进行描述和分类要比进行有效的分析和诠释容易得多。对于以下几个问题，埃及学家就很难给出有效的回答：古埃及人真的认为那些形象是半人半兽的神——从貌似可信的鹰头人身的荷鲁斯，到（在我们看来）难以置信的蜣螂头人身的太阳神赫派瑞——存在于“真实世界”中吗？或者他们创造出的这些形象只是用来象征和暗指众神的特征或个性？当我们看到豺首人身的阿努庇斯正在往死者身体上涂油时，我们应该相信这位冥界之神确实负责制作所有的木乃伊吗？还是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个负责涂油的祭司，他戴着阿努庇斯的面具来模仿这位神（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位祭司是真的会被神话还是被看作在仪式中模仿阿努庇斯而已）？现存的文物中有一个与阿努庇斯的豺首一样大小的陶制面具（现存希尔德斯海姆的佩利察奥伊斯博物馆），但这并不能真正回答上述问题。埃及学家急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们想要了解古埃及的思想体系是否与我们的有根本差别，或者这些差别是否只是表面上的，因为我们现在很难理解古埃及思想体系的表达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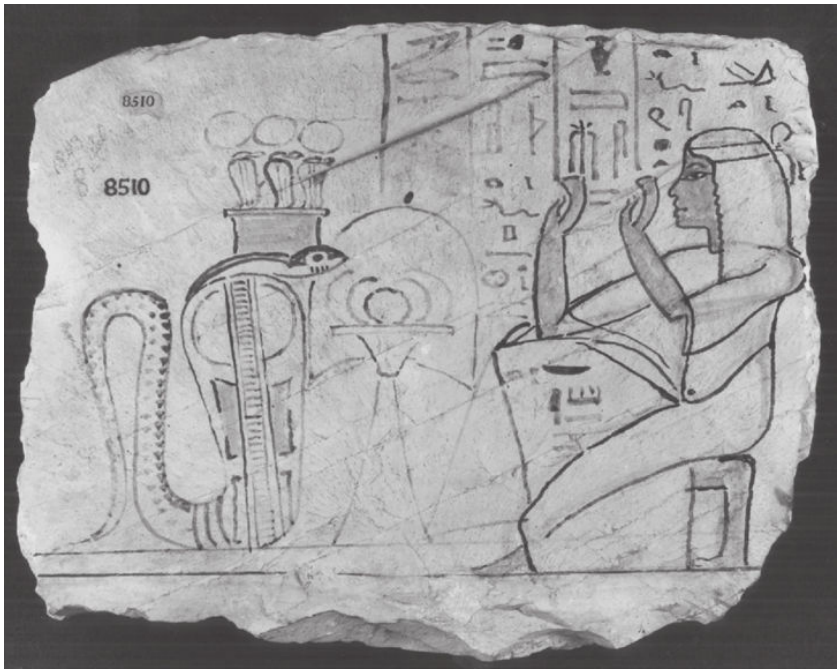

图17　石灰石陶片，表现的是正在祭拜一个蛇形女神的赫努摩斯，第19王朝，约公元前1200年

图18　前王朝时期的女性雕像，双臂上举，可能描绘的是一个早期的女神形象，约公元前3500年

多数学者在描写埃及宗教时，重点关注的是貌似宗教建筑的考古遗存，以及与神学思想有关的文献和图像。巴里·肯普指出，我们对埃及的“神庙宗教”的了解大多与大型国家神庙中的象征符号和宗教仪式有关，而对于这些建筑如何为人们所用——无论是祭司、书吏，还是普通人，我们则知之甚少。显然，普通民众几乎无法穿过神庙的外部庭院，只有在极少数的节日期间，当神像需要从一个神殿挪到另一个神殿时，普通民众才可能接触到这些神像。很多埃及学家由此断言，古埃及宗教建立在保密和揭秘的理念上，古埃及神话、仪式和庙宇建筑都支持并阐释了这两个理念。正是通过宗教仪式、节日庆典以及戏剧表演，神圣实体才能得以显现。宗教仪式和固定的节日庆典能够不断强化神话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因此，每个神庙都不只是某个或几个神的“住所”，同时还是举行仪式和庆祝活动的场地。从某种意义上讲，神庙只是使祭品和神像得以在各个神殿间转移、并将这些活动记录下来的场所。

宗教起源

在某个历史阶段，人们曾经认为古埃及宗教主要与法老时期的信仰和神庙有关，但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与其他埃及文化一样，埃及宗教还有一段重要的史前时期，要想正确解读后期的资料，先要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记录下来并加以分析。例如，1992年，在纳布塔普拉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阿布辛贝尔神庙向西约100公里的西部沙漠地区）中发现了呈环形和线形排列的小型标石，这说明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有关天文现象（方位基点和夏至）的标石。在其中一排石头旁边发现了两个古坟，下面埋葬着长角公牛，再往前，在通向纳布塔普拉亚洼地的一条干河谷里，又发现了埋葬牛的墓地，上面覆盖着巨大的石块。这些发现清楚地表明，公元前4千纪左右，生活在埃及沙漠中的畜牧民族中已经出现了某种形式的母牛/公牛崇拜，这明显预示着后来芭特和哈托尔等母牛神的出现以

及埃及国王与公牛之间的紧密联系。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史前时代早期和前王朝时期岩石雕刻中的女性形象与法老时期的一些图像之间有很强的连贯性，然而我们不能由此简单地认为，图形或艺术主题的相似就必然意味着背后的宗教信仰也存在某种深远的联系。

1985年，考古学为研究埃及史前时期宗教发展的关键阶段提供了令人兴奋的突破点。在赫拉康波里斯前王朝时期的某段城镇遗址（位置是HK29A）发现了一大片区域，这是一个早期的宗教综合建筑，其主要组成部分包括一个抛物面形的庭院、一个巨大的类似神像的东西、一个仪式用的塔门，以及4个插旗的大孔，这4个孔可能标志着某个纪念性的正门。这些遗迹的年代都在涅伽达文化二期到三期之间（约公元前3500—前3000）。与纳布塔普拉亚遗址类似，在这个可能是早期神庙的建筑区内也有大量动物祭品的痕迹。用动物献祭及堆积供品是早期埃及宗教的两个关键因素，后来成为埃及祭祀活动的主要特色。

很多埃及神庙墙上的铭文都列举了献给神殿的供品，并说明了供品的性质和数量。以拉美西斯三世的陵庙为例。该庙的墙上列出了71种供品，是现存新王国时期王室陵庙的供品清单中最长的一个。最常见的供品是面包（事实上，表示“供品”的象形文字就是一块放在盘子里的面包），清单显示每天要献上5,500多块面包和204罐啤酒。面包分为几类，常见的是圆形的培什（*pesen*）和圆锥形的比特（*bit*）。在麦迪纳特哈布城及其他宗教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制作比特面包用的圆锥形模具的碎片，这与铭文上的记载正好对应，这种文献和考古资料相互印证的情况在埃及学研究中很少出现。这些比特面包似乎与宗教节日有更为密切的联系，而不仅是一种面包的标准样式。

如果敬献供品代表的是现代西方研究者“可接受的”埃及宗教的一方面，那么另一个在很多宗教崇拜中都很常见、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埃及学家常常忽略（至少是掩盖）的一方面就是“男根崇拜”的倾向。男根崇拜指的是崇拜一些阴茎明显勃起的神（尤其是敏神和阿蒙神）。尽管埃及艺术羞于表现性行为，但却很坦然地表现勃起的阴茎，其原因非常简单：正如汤姆·黑尔所说，“从前王朝至罗马占领时

期，对男根的赞美一直是古埃及宗教的焦点之一”。皮特里在科普特斯的敏神庙最早期的地层中发现了三个雕像（现存牛津的阿什姆林博物馆），它们是埃及历史上最古老的大型宗教雕像，其外形实际上就是勃起的巨大的阴茎，而且很可能是指敏神的阴茎，这些雕像的年代不晚于纳尔迈时期。对男根的赞美似乎与埃及人关注万物的创造（和生存）有直接关系，他们认为国王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无疑也是为什么埃及这个国家要确保维持男根形象在众多崇拜中的重要性（例如在第七章中讨论过的奥赛里斯崇拜中的男根崇拜）。

古埃及的宗教和王权

在法老埃及时代的宗教文献中，国王占主导地位，这使得一些埃及学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埃及所有的宗教崇拜实质上都是为了将注意力引向王室成员。用来形容这一情况的最合适的词莫过于所谓的“供品惯用语”了，这个词在埃及很多宗教习俗中都很常见，它出现在供品清单的开头，由*hetep di nesw*（“国王献上的供品”）这几个词构成。换句话说，任何个体祭拜和供奉神的行为都受制于该个体与国王之间的联系。鹰神荷鲁斯是纳尔迈调色板正面最为突出的形象之一，这表明这个被认为与荷鲁斯有关的国王在第1王朝时期的宗教仪式和祭祀中就已扮演着中心角色。

我们也可以认为，纳尔迈调色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阐释国王在向神献祭这一行为中的作用。献给神的祭品多种多样，既可以是水果，也可以是被杀死的敌人或战俘。调色板的装饰中有很多反复出现的图示：一是国王打击敌人；二是攻城略地；三是战俘被捆绑起来并斩首；四是向埃及众神献上战利品。这些行为共同表现出一个非常简单的主题，即埃及国王的任务就是代表众神去战斗，之后将带回来的战俘和战利品献给神庙中的众神。

宗教和意识形态

我们之前讨论了宗教仪式、神殿和神庙的出现及发展，同时，我们还有留存至今的关于埃及的意识形态及社会行为规范的记载，把这两者区分开来是很有必要的。早在古王国时期，墓室主人们似乎就感觉到有必要在墓碑上宣布他们正当地拥有那些能确保他们安享来生的纪念物，为此，他们会声称自己的墓是在新土地上建的，而且那些修墓人也拿到了报酬等等。然而，这些实用主义的陈述中逐渐开始附加了道德主张。在法老埃及时期，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及对错观似乎与墓葬信仰和宗教仪式需求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丧葬文献中注定会蕴含着最早的埃及哲学理念和道德观念。最开始，这些内容表现为一些陈述性文字，与供品惯用语一同出现，通常写在所谓的“假门石碑”上，后来成为个人“自传”这种文献的组成部分。哈胡夫的自传（在阿斯旺）或安赫提菲的自传（在莫阿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些文献中，死者的功德被一一列出。只有少数几个人的传记在第一中间期时未遭损坏，安赫提菲的自传便是其中之一，他这样说道：

> 我是最诚实的人，在他人被迫沉默时，我能够直言不讳……整个上埃及都陷入饥荒，每个人都饿到了食其亲子的地步。但我不愿看到这个州内有任何一个人死于饥饿。我为上埃及筹借粮米，也把上埃及的粮食送给北部。我想，我之前的州长从未做过此类事情……

毫无疑问，安赫提菲渴望把他作为地方长官的成就与他的道德权威联系起来。这些丧葬文献主要是为了证明或维护其个人行为的道德性。

很多实用性的、陈述埃及伦理的文字都以“教谕”（*sebayt*）的形式保存了下来，这些文献主要写在纸草上，其年代从古王国时期一直延续到罗马埃及时期（约公元前2500—公元325）。最早的此类文献讲述的是一个人要具备何种品质才能在今生和来世的生活中都获得成功。人们应该迎合上意、扶贫济弱。现存最早的教谕（关于如何“真

实地生活”的一系列格言警句）据说是第4王朝时期的贤人哈杰代夫所作（约公元前2525年），而另一个类似的文献则被归为普塔荷太普的作品，他是第5王朝的国王杰德卡拉·伊塞西的维西尔。这些教谕很可能并非出自这些传说中的作者之手，而且其中很多文献的创作年代都比其所宣称的年代要晚得多，包括传说中的哈杰代夫的作品。这些教谕在整个法老时代都非常流行，其中两篇还被认为是国王的作品，一篇是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181—前2055）的《献给国王梅里卡拉的教谕》，另一篇是第12王朝初期（约公元前1950年）的《阿蒙涅姆赫特一世的教谕》。

然而，从公元前两千纪起，教谕中所描述的伦理规范不再以世俗生活为主，而是更倾向于以信仰的虔诚而非物质上的成功来衡量人们的德行。现存希腊–罗马时期的两个最重要的教谕是《安赫塞尚克的话》（大英博物馆，EA　10508）和记载在英辛格纸草上的格言（瑞克斯博物馆，莱顿），这两份教谕都是用世俗体象形文字写成的，与法老时代的教谕相比，其格言更为短小精悍。

埃及人的伦理观念及宗教思想的中心是玛奥特（常被译为“真理”或“和谐”）这一概念，它回归到了创世之初的那种安静宁和的状态。当埃里克·霍尔农（在其著作《偶像背后的思想》一书中）论证研究古埃及思想和理念模式的必要性时，他提出古埃及是最早试图回答一些永恒性问题的几个文明之一：

> 古埃及人与苏美尔人共同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但绝不是原始的——有关人类思想的证据……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古埃及人就在思考以下问题：生和死、死亡的意义、宇宙和人类的本质、时间的本质、人类社会的基础以及权力的合法化，这些问题成为了后期欧洲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其中一些甚至至今仍未得到解答。

第九章

埃及热：再用埃及象征重构埃及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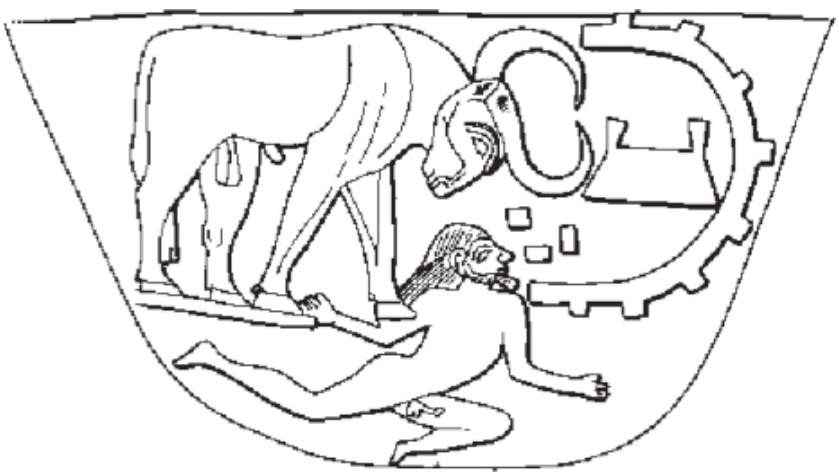

最初，纳尔迈调色板被认为是一种历史记录，它记载了对利比亚人或下埃及人进行的多次军事征服，这些军事征服促成了埃及的首次统一（见第三章）。然而，近来有观点认为，调色板上的浮雕装饰所表现的只是它被献给神庙那一年所举行的（很可能与王权有关的）一系列仪式。埃及学家通过各种方法对纳尔迈调色板（还有其他同时期的文物）的很多其他方面进行了解读。这些解读清楚地表明了埃及学家分析和诠释手中原始材料的方式。埃及学家所塑造的过去的形象无形中反映了他们自己那个年代的社会或政治背景。

毫无疑问，现代埃及学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并轻松进入了各文化领域，从现代艺术、音乐到玫瑰十字会[1]、烟草广告和“黑人意识”团体，其中一些领域可能是我们从未想到过的。那些曾经专属于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以迪奥普和伯纳尔为代表的少数非洲中心论者的东西，如今却成为了更为普及的主流文化产品，例如，在一份关于黑人文化遗产的可购买的商品清单中，近期的一张嘻哈唱片榜上有名，唱片中有一首名为《尼弗尔提提墓和克里奥帕特拉》的歌曲（很不幸，尼弗尔提提无福成为黑人，她无疑是白种人，克里奥帕特拉很可能也是如此，关于这些我会在下文详细讨论）。

埃及学，至少是古埃及本身，正朝着众多不同的方向迅猛发展。我们现在无法预测哪些研究方向最终会硕果累累，让人为之一振，哪些会问题百出。然而，有一点不容忽视，埃及再不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学术研究对象，它已经活跃在公众领域。不管结果是好是坏，除了我们所认为的“真实的”埃及之外，还有许多“另类的”[2]埃及。很多人参与到了针对不同人群、出于不同意图的重塑埃及的过程中，其中包括记者、艺术家、电影制片人、音乐家、广告制作人、“金字塔迷”[3]，甚至偶尔还有大学讲师和博物馆馆长。在对古埃及资源进行再利用和开发的过程中，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人们往往对文化和历史有不同的偏好。因此，现代人对古埃及的非埃及学的看法是一盘大杂烩，既有关于木乃伊的廉价惊悚小说、好莱坞史诗巨片、新世纪的伪科学的巨大发现、滥俗的旅游纪念品，也有少数永恒的图像——面部肖像

及手工艺品，观察者的一时兴起，使它们从最初的古代背景中剥离出来，在后现代的真空中漂浮。在最后这章，我会对埃及热这种现象进行分析，说明古埃及这艘沉船的残骸为何会在21世纪初期被冲上岸，并最终意外地大量堆积，零星地散落在现代文化的各个角落。

埃及学中的解释：以金字塔学为例

近年来，在解读方面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就是：金字塔为何是现在这种形状，该形状表明了怎样的建筑目的。实际上，这种“金字塔学”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关注的焦点不仅是金字塔的形状，还有它们的精确尺寸、空间位置以及墓室内部布局的细节。众所周知，埃及学历史上解释金字塔的理论大多漫无边际、毫无逻辑可言，这是因为金字塔似乎能对某些研究者的思维能力施以某种为人所熟知的影响。根据研究者在不同时间点所选择的不同解释，我们在对研究问题有所了解的同时，也可以发现研究者本人的一些信息。

在建造高大纪念物时，金字塔形在建筑学上是一种最优结构，这样既能最有效地利用建筑材料，又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其稳定性。这种常识性的解释是一个有效的出发点。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解释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忽略了两点：（1）外星人移居地球；（2）古埃及文明形成之前就已存在的一个繁荣了数千年之久的未知文明。也曾有人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金字塔并非建造出来的，而是在周围所有的石头都被凿去后形成的——这种说法并没有真正解释金字塔的形状，但它却很好地说明了人们对破解金字塔之谜的无限渴求，这些解释多半基于想象而非逻辑。

根据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金字塔和《圣经》中约瑟的故事有关——早在公元5世纪时，罗马作家尤利乌斯·霍诺留斯就曾猜测金字塔是约瑟的谷仓。1859年，约翰·泰勒提出一种理论，认为大金字塔是由外族入侵者在上帝的指引下建造的。中世纪的阿拉伯作家认为金字塔是诺亚洪水期间建造的，目的是为了收藏埃及人所有的智慧和科学

知识。所有这些设想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金字塔与埃及在《圣经》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某种联系，这是由于早期学者对埃及的研究大都出于神学的目的。到19世纪晚期，很多去往埃及的考古探险队的关注点都发生了转移，从寻宝转向了证实《圣经》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发掘促进协会（埃及考察学会的前身，由英国的埃及学爱好者及学者组成）明确致力于在三角洲地区搜集“关于《圣经》中一段空缺的历史的资料”，正因如此，最初由弗林德斯·皮特里和爱德华·纳维尔代表埃及考察学会进行的遗址发掘工作都是在三角洲地区的城市进行的，这些城市包括塔尼斯城、布巴斯提斯城、诺克拉提斯城、纳贝沙城和德芬纳城。在现代埃及学家看来，关注《圣经》和三角洲地区的联系有一个意外收获——由于三角洲地区遗址的恶化程度比南部地区更严重，因此，这些痴迷于《圣经》考古的19世纪考古学家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古城中的纪念物，而这些城市经过20世纪时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和城市扩张已经消失殆尽了。

图19　1886年爱德华·纳维尔教授在指挥太尔巴斯塔地区的发掘工作，目的是寻找关于《圣经》的考古证据

我们回到关于金字塔的争论。关于金字塔的形状和建造目的，最近有观点认为金字塔和天文学之间存在毋庸置疑的联系。长久以来，一直有人认为大金字塔上所谓的“通风孔”有某种天文学功能，因为它们的排列明显与几个恒星的排列一致，其中就包括猎户星座（埃及神Sah），这个星座是国王的身魂升上天空，在拱极星中就位时的预想归宿。最近，剑桥大学的一位埃及学家凯特·斯彭斯提出，金字塔的设计师肯定是通过瞄准两颗围绕北极旋转的恒星（小熊星座的b星和大熊星座的z星）来使金字塔的四边与方位基点保持一致。她指出，在公元前2467年，也就是胡夫金字塔（即大金字塔）建成的那一年，这两颗恒星的排列应该是正好对应着正北方。胡夫金字塔之前和之后的金字塔的方位都有偏差，而这些偏差与上文提到的那两颗恒星偏离正北方的程度紧密相关，这恰好证实了她的假设。

一些畅销书曾特别讨论过所谓的“猎户星之谜”，这种说法认为吉萨地区的3座金字塔象征着公元前10,500年左右的3颗恒星，这3颗星构成了猎户星的腰带部分。金字塔的设计中确实存在天文学的因素，而这些畅销书往往只关注天文学因素，作者在书中加入了对外星人参与金字塔建造的猜测（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一些现代流行文化的理念，如1995年上映的电影《星际之门》中所表现出的那些观念）。尽管自埃里克·冯达尼肯之后，只有少数作者明确在发表物中提出某些文物可能是外星人建造的，但罗伯特·博瓦尔和格雷厄姆·汉考克等研究者对金字塔中的天文因素的研究至少暗示了有某种“外来因素”参与建造了金字塔。

苏格兰皇家天文学家、爱丁堡大学天文学教授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位伟大的埃及学爱好者，他成功地在金字塔研究中结合了《圣经》和天文学的研究方法。他深受上文提到的约翰·泰勒的影响（后者认为金字塔的各项尺寸与整个世界是成比例的），1865年，皮亚齐·史密斯勘探了吉萨地区，他声称以“金字塔英寸”为单位建造的金字塔的数值和地球周长有关，根据泰勒的解释，埃及人已经能够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圆周率知识计算出地球的周长。于是，皮亚齐·史密斯在他的三卷本《大金字塔下的工作与生活》（1867年出

版）一书中写到，诺亚方舟和摩西神龛的建造者使用的度量单位也是金字塔英寸。金字塔英寸事实上很简单，它和英制英寸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只要稍加推测就可得出结论，即英国人本是以色列某个消失了的部落，这种推测巧妙地为皮亚齐·史密斯的金字塔研究增添了强烈的维多利亚时期帝国主义的色彩。

大多数埃及学家认为，金字塔之所以采用现在的建筑外形，其原因应该与他们的宗教和墓葬信仰有关，这些信仰在他们的文献和视觉图像中都有体现。一种可能性是梯形金字塔和真正的金字塔都代表了那些最初堆在坑墓上的原始沙堆，另一种可能则与创世活动中的原始土堆有关。《金字塔铭文》（自第5王朝后期起写在金字塔内墙上的文字）中的某些段落证实了对梯形金字塔（早期金字塔的形式，位于萨卡拉的第3王朝国王乔塞尔的金字塔就是典型的梯形金字塔）的解释，从字面意义来看，金字塔是使国王升上天空、在群星中就位的阶梯。《金字塔铭文》中还提到了国王脚踩着阳光以到达天堂的情景，因此，真正的金字塔可能象征着从天上撒落到地面的阳光。

上述看法都属于我们所了解的理性主义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埃及学家利用古代资料来探索古埃及人自己对金字塔的看法。巴里·肯普总结道，当埃及学家试图重构古埃及人对金字塔等文化现象的思维模式时，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了自己的知识，这种创造性可能连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

> 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古代的逻辑。但有趣的是，这种做法也暗藏玄机，因为我们很难知道何时该停下来……即使我们的一系列学术猜想既忠实于古代思想，又充分利用了现有史料，我们最终还是无从得知古人是否真的这样想过。一些关于古埃及宗教的现代书籍和学术文章对古埃及人的思想添油加醋，这些添加的成分很可能与用西方现代术语所作的诠释一样多。

捷克考古学家米罗斯拉夫·维尔纳这样评价金字塔学问题：

> 人们总是会有梦想，因此总有一些人痴迷于某些神秘事物，而另一些人则投身于科学探索。两种人都会沿着各自的道路走下去，但他们的道路永远也不会相

交。

阿玛尔纳问题

作为一本综述性的埃及学读物，在临近结尾的时候竟然还未曾详细讨论过埃赫纳吞、尼弗尔提提或克里奥帕特拉，这也算得上是破纪录了（而且非常不合情理）。这3个人无疑是古埃及最受欢迎的一些形象（第四位最受欢迎的当然是图坦卡蒙）。这些古代人物对很多现代埃及学爱好者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除此之外，埃及学成为了21世纪流行文化中充满活力的一部分，在此转变过程中，这些人物也走在前端。因此，通过观察现代人利用这些形象的方式，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到埃及是如何进入大众传媒的。

按照时间顺序，我们首先应该讨论埃赫纳吞和尼弗尔提提。毫无疑问，埃赫纳吞统治期，即公元前14世纪中期，是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0—前1069）——如果不是整个法老时期——宗教和艺术发展史上最不同寻常的阶段。在埃赫纳吞的统治初期，他逐渐显露出对阿吞（字面意义为“日轮”）崇拜的痴迷。与传统的埃及众神相比，阿吞是相当抽象的神。埃赫纳吞在很多地方为阿吞修建了宗教纪念物，但这些纪念物主要集中在卡纳克东部和埃赫塔吞（“太阳升起的地方”），后者是他在一片据称是处女地的土地上建造的新都城，该城位于中部埃及，现在被称作阿玛尔纳。埃赫纳吞及其后继者的短暂统治时期正是以“阿玛尔纳”命名的。埃赫纳吞去世后不久，他本人和他的所作所为就遭到了谴责，所有他的纪念物几乎全被拆除，那些保留下来的纪念物上也不再有他的名字。因此，直到有了19世纪考古学家的发现，阿玛尔纳时期的历史才得以在众多的残片的基础上被重构。

正如埃里克·霍尔农所说：

> 埃赫纳吞被遗忘了如此之久，现在他作为伟大的宗教创始人之一出现在我们面前，也是我们能够了解的第一个（古埃及）人。不管是“英雄”还是“异端”，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不仅属于古埃及，也属于整个人类历史。

回顾20世纪早期以来人们对埃赫纳吞的看法，我们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他起初声誉卓著，亚瑟·韦戈尔的帝王“传记”将他刻画成了一个宗教创始人，认为他所创立的“宗教如此纯粹，以至于人们只有把它与基督教相比时才能发现它的缺点”，而托马斯·曼则把他作为自己的爱情小说《约瑟》的主角。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埃伯哈德·奥托将他描述成一个自私、丑陋、暴虐的人；到20世纪80年代，唐纳德·雷德福则提出“埃赫纳吞的破坏居多，创造极少……无论他曾经是什么，他都绝非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埃赫纳吞在现代备受瞩目的原因主要在于他统治期间的很多艺术品看起来都非比寻常、令人惊叹，而并非出于对他的神庙建筑或他反对偶像崇拜的宗教理念（虽然这些对玫瑰十字会等一些更为近代的信仰和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详细了解。这位国王并没有被描绘为一个理想的身材健美的年轻男子形象（据王室首席雕塑师巴克所说，这种艺术风格是经过国王本人首肯的），而是被描绘为长脸、下巴凸起、厚嘴唇、大肚子的形象，并且有着女性的胸部和臃肿的大腿。在其他时期，王室成员和国王身边的高级官员也被塑造成了类似的形象，从而使所有阿玛尔纳时期的艺术作品，包括人物形象，都非常容易识别。此外，由于这种夸张的风格相对容易模仿（也很受古董买家的欢迎），所以出现了大量阿玛尔纳时期雕像的仿造品和赝品。例如在曼苏尔的私人古董收藏中，大批阿玛尔纳时期藏品的真实性就遭到了严重质疑。还有观点认为，阿玛尔纳的艺术作品体现了更为强烈的自由感和创造性，然而，这种感觉的产生无疑有一部分源自宗教主题事物的变化，同时也因为大批保留下来的绘画都是在民房和宫殿里而不是神庙和陵墓中发现的。

阿玛尔纳“肖像”中的艺术变形是埃赫纳吞外貌的再现吗（如果是的话则说明他患有某种疾病）？还是这种雌雄同体的外貌特征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在体现男女两性的繁殖力？这些问题我们尚不清楚。例如，一些埃及学家认为，阿玛尔纳风格的人物形象兼具两性特征，这可能是对掌管尼罗河泛滥的哈皮神的模仿，哈皮神的身体就体现了

男女两性的繁殖力。

专门从医学角度对埃赫纳吞的外貌特征进行解读的尝试始于无处不在的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爵士，他认为这位国王可能患有弗勒赫利希综合征，这种内分泌失调症会引发相似的症状。该说法的缺陷在于：弗勒赫利希综合征的患者不仅会智力受损，而且无法生育，而这两点都不符合埃赫纳吞的情况——他与尼弗尔提提至少生有6个女儿（另外还有两个可能是这位国王与自己女儿乱伦的结果）。对埃赫纳吞外貌特征的另一个解释是他可能患有马凡氏综合征，这一观点是由加拿大的阿尔文·伯里奇率先提出的。这种病症（某个变态基因导致的严重紊乱）很符合埃赫纳吞的情况，其症状包括鸡胸、宽骨盆、长头骨、蜘蛛指、长脸和突出的下巴。此外，还有一点也很符合，即患者和他们的子女都极易猝死（由于心血管系统很脆弱）。可能的症状还包括失明，埃赫纳吞对日轮的沉迷也许就与此有关，因为那或许是他唯一能够看见的东西。然而，仍有很多埃及学家认为，这种身体和医学分析理论对艺术形象的理解太过表面化。阿玛尔纳王室成员的奇特形象更有可能是一种象征和隐喻。有关埃赫纳吞外貌的现存资料表明，在他在位早期（即在他全面推行阿吞主义、并将自己的名字从阿蒙荷太普改为埃赫纳吞之前），他的形象更像他的父亲，有着标准的完美的外貌特征。这说明我们所见到的可能是一种艺术风格，而并非真实的身体状况。

上述因素使得现代研究者被埃赫纳吞、他的妻子尼弗尔提提以及他们统治的整个阿玛尔纳时代所深深吸引。这个时代有许多“谜团”，也有诸多引人深思的话题不断出现，例如，为何在埃赫纳吞统治结束之前，尼弗尔提提就从记载中消失了？她有没有可能改头换面、成为了貌似男性的统治者塞门卡拉——那位在阿玛尔纳末期与埃赫纳吞共同统治了很短一段时期的国王？还有很多其他热门话题，其中之一就是阿玛尔纳王室所有成员尸体的下落：他们最初被埋于何地？现又位于何处？还有一连串针对埃赫纳吞的思想和性格的问题：他是个虔诚的一神论者吗？他是否预见（甚至促成）了犹太信仰的出现？他是几乎摧毁了埃及经济的不可理喻的暴君吗（抑或是兼而有之！）？

直到19世纪，埃及学家才开始全面认识埃赫纳吞和阿玛尔纳时期，但正如约翰·雷那略带挖苦的评论，现在正是埃赫纳吞走向前台的最佳时机：

> 20世纪就像是为他而设：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因同僵化的权势集团对抗而备受折磨的天才、一个深情的丈夫和父亲、一个杰出的空想家和艺术家、一个相信所有人类皆为手足的和平主义者、一个宗教象征主义大师。

阿玛尔纳时代的某些方面令人可望不可即，例如，我们有大量关于这段历史的艺术品、纪念物和文献资料，但要再现这段埃及历史上非同寻常却相对短暂的时代的全貌，我们似乎还是缺乏证据。正如英国埃及学家尼古拉斯·里夫斯所说，“研究阿玛尔纳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缺少足够证据，而在于有太多的猜测被误认为事实”。

既然里夫斯如此评价，出现众多对阿玛尔纳时期虚构性的改写作品也许就合情合理了。这些改写包括阿加沙·克里斯蒂创作的诺埃尔–考沃德式的戏剧（《埃赫纳吞》），剧中一个角色这样说道：“埃赫纳吞和我永远合不来。我觉得他毫无幽默感，而且过于虔诚。”另外一个则是菲利普·格拉斯创作的阿玛尔纳歌剧——1984年首演的《埃赫纳吞》。他在剧中采用了不受西方影响的极简抽象派音乐风格，配合含有古埃及语、阿卡得语和希伯来语的歌词，营造出埃赫纳吞和尼弗尔提提这两个悲剧人物之间催人泪下的场面，二人的灵魂最终在荒凉的阿玛尔纳城的废墟间游荡。这类创作还包括电影《埃及人》，这是涉及古埃及题材的最著名的好莱坞电影之一。它拍摄于1954年，由米歇尔·柯提兹执导，以米卡·沃尔特瑞的小说为原型。故事以埃赫纳吞的宫廷为背景，由维克多·马休饰演主角荷伦布。上述对阿玛尔纳的演绎都像电影《埃及人》一样别具一格，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倾向于将埃赫纳吞表现为一个革命空想家。

在所有对阿玛尔纳时代的评价中，最恰当的就是玛格丽特·默里在1949年发表的评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埃赫纳吞产业”加速发展之前就出现了这一评论）：

关于太尔阿玛尔纳时代的无稽之谈可能比埃及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多……以埃赫纳吞为例，对他的解释常常与事实不符。

偶像与妖姬：埃及女性的命运

上述讨论似乎还远远不够，阿玛尔纳时期还有一个特殊的艺术象征，在某种程度上，它既有玛丽莲·梦露般的性感，又像埃尔金石雕一样饱受争议[4]，可能还带有一丝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意味，这就是尼弗尔提提的胸像。

1912年，德国发掘者路德维格·博查特在雕塑家图特摩斯的作坊里发现了这座著名的尼弗尔提提石灰石彩绘胸像，图特摩斯的别墅是阿玛尔纳城南部占地最广的别墅之一。这座雕像可能只是雕塑家的一个模型，而不是一件完整的作品。它高约50厘米，保存得极为完好，唯一的瑕疵是右眼缺失（虽然这丝毫不影响它的整体美感）。这座胸像最终被柏林博物馆收藏，但收藏的过程却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激烈争论。尼古拉斯·里夫斯这样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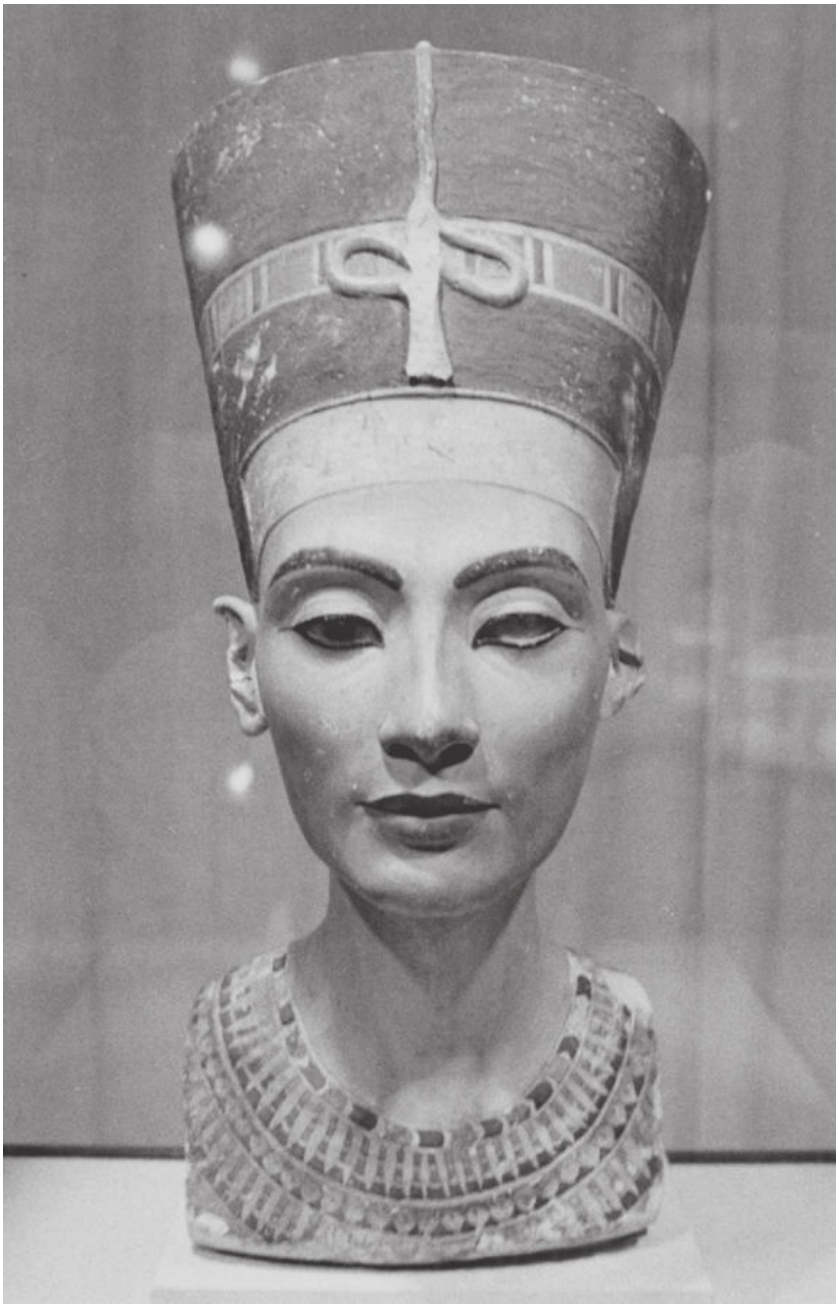

图20　王后尼弗尔提提的胸像，约公元前1350年

胸像被发现后仅一个月，通过分赃，它被移交给德国考古发掘活动的赞助人詹姆斯·西蒙博士。1920年，西蒙将他的收藏品作为礼物正式献给了普鲁士国；3年后，这位王后的雕像被公之于众，引起一片哗然——很快，埃及政府愤怒地指控说这座王后胸像是在非正规的情况下被运出埃及的。于是谴责之声不绝于耳，也曾有人试图提出方案来解决这一不快局面，但都于事无补……

如果说这座胸像到达欧洲时惹来了一片争议，那么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只会变得更糟，因为阿道夫·希特勒宣称，这是他最喜爱的埃及艺术作品，因此要把它留在德国。

此事与希特勒的联系也许并非偶然，因为有关这座胸像的争议点之一就是她有着鲜明的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的面部特征。对于很多非洲中心主义者来说，它象征着埃及学界一种传统的看法，即古埃及文化不是非洲和黑人的文化。1996年，一场名为“非洲的埃及”的展览引发了颇多争议，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教育学教授阿萨·希利亚德三世在展览的目录中提到：

这是具有首创性的展览之一，它精选出的展品表现了更典型的非洲人形象，而不是大部分欧洲人所希望看到的非典型的、有时甚至是具有异域特征的形象，如尼弗尔提提、谢赫艾尔比拉德或书吏卡伊。这些形象因缺乏明显特征而被看作“白人”。

这座雕像似乎属于阿玛尔纳时代后期的作品。那时，新的艺术风格已经确定，而且不再那么极端。一些欣赏者认为，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这座雕像是所有的艺术创作中最让人愉悦的女性面孔。哈罗米尔·马莱克曾试图分析这种情况背后的原因，他提出：

这件艺术品的魅力主要在于它那完美、几乎完全符合几何学原理的匀称的五官，这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以长而直的线条为主，最明显的就是那些从侧面看连接王冠正面和王后前额的线条，以及从正面看连接王冠侧面及王后脸颊的线条。

即使以阿赫荷太普一世与哈特谢普苏特等第18王朝的王室女性的标准来衡量，历史上真正的尼弗尔提提——埃赫纳吞的正妻——也拥有非同寻常的权力和影响力，这可能建立在她影响力非凡的婆婆（也可能是她的姑母）王后泰伊的成就上。卡米耶·帕利亚将尼弗尔提提描绘成了一个可怕的、麦克白妻子式的人物：

> 看到尼弗尔提提胸像的正常反应是恐惧。这位王后是一个机器人，一个人造品。她是新的戈尔贡头像[5]，一个“没有身体的恐怖的头颅”……艺术作品中的埃赫纳吞具有半女性化的特征，也许是由于先天的缺陷或疾病，他四肢纤瘦、腹部凸起。而这座雕像则表现了埃赫纳吞的半男性化的王后，她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妖妇。

不论我们是否认同帕利亚过于个性化的描述，它都显示了这座胸像——乃至尼弗尔提提本人——那种可以激起人们强烈反应的持续不减的魅力。几乎没有哪个雕像会如此接近它所表现的人物，以至于评论家们如此热烈地讨论这座胸像，仿佛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尼弗尔提提本人。

这座雕像本身几乎被当作了一件神圣的遗物，这一点在2003年得到了证明。当时有两位艺术家（“小华沙”）造了一副身体来支撑这座胸像，使整座雕像得以“复原”并作为威尼斯双年展匈牙利展厅的一部分。虽然胸像最终未能获准与那副身体一同在威尼斯展出，但一张新奇的、能唤起人们无限遐想的照片却被拍了下来，照片中，古老的头像和崭新的身体合二为一，在柏林博物馆空空如也的展示柜前笔直地立着（仿佛尼弗尔提提穿越时空来拜访自己的胸像时却发现它不见了）。这是一幅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图像，但从博物馆学和埃及学角度来看，用这样轻浮的态度对待这件文物是不合适的，同时柏林埃及博物馆和开罗最高文物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再度恶化——因为原本把头像和身体一起在威尼斯展出的计划被废弃了。“尼弗尔提提的身体”这个展品还附有一个小册子，其中有一些艺术家的评论：

很明显，埃及学家对尼弗尔提提的研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赋予她新生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将她移植到现代艺术的土壤中去。

他们还评论了种族之争：

这座雕像是欧洲文化史和雕塑的重要源泉之一，尽管它并非在欧洲创作的。她外来者的身份为这个复原计划赋予了新的意义：从它被发现并公之于众的那天起，这个有3,000年历史的美人模型就一直被欧洲人视为美的典范，虽然无论从文化还是历史上讲，这座雕像都不是欧洲的。

如果这段话暗示了尼弗尔提提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欧洲化了的埃及形象，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克里奥帕特拉形象的塑造中也可以找到埃及和欧洲之间的这种联系。克里奥帕特拉七世菲拉帕托尔无疑是7个克里奥帕特拉中最著名的一个，她很早之前就已经成为放纵堕落的东方的象征和标志——虽然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以至于她很难真正被人们所认识。在亚克兴之战以及她自杀后不久，贺拉斯和普罗佩提乌斯等罗马作家仍将她视为一个诡计多端、颓废堕落的角色，认为是她毁掉了马克·安东尼的声誉，使罗马帝国的稳定受到了威胁，然而一旦她死了，他们便对她多了些同情。贺拉斯在一篇颂诗中将她称作*fatale monstrum* ，其字面意义是“有致命威胁的怪物”，但也可以有某种更有趣的含义，即“命运送来的不可思议的人”，这表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克里奥帕特拉本人是一个迷人但命运悲惨的人物，而不只是一个代表懒散的东方人的符号。

即使没有克劳德特·科尔伯特、费雯·丽和伊丽莎白·泰勒扮演的克里奥帕特拉，在公众舆论中，克里奥帕特拉的美貌也足以与尼弗尔提提相媲美。但事实上，我们对她的外貌缺乏真正的了解。1969年，安德烈·马尔洛克斯在一次讲演中这样评价：“对于尼弗尔提提人们知道的更多的是她的样貌，而不是她作为王后的一面；而对于克里奥帕特拉，人们知道她作为女王的一面，却极少了解她的相貌。”人们越来

越倾向于认为克里奥帕特拉的外表很可能更像希腊人，因为她的祖先是马其顿人/托勒密人，而且据说她曾经学过古埃及文，这意味着无论在种族还是文化上，她都更有可能是希腊人而不是埃及人。虽然薄伽丘说她“仅以美貌而闻名”，但根据当时钱币上她的肖像来看，她只能算是长相特别，而不能说美丽。在普鲁塔克看来，“她的美本身并不出众，也不会让人眼前一亮，但她的言语之间总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如果才华横溢的谈吐是女王最优秀的特质的话，那么很遗憾的是，她的银幕形象中几乎没有几个表现出了幽默感。英国电影《艳后嬉春》（1964年）是以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为题材的少数几部喜剧之一，剧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也许是阿曼达·巴里塑造的邻家女孩式的克里奥帕特拉，以及肯尼斯·威廉斯对尤利乌斯·恺撒的独特的演绎方式（“恶名，恶名，他们都把它给了我！”）。

银幕中的克里奥帕特拉都是由白人女性塑造的。在塞西尔·B.　戴米勒拍摄的关于克里奥帕特拉的电影中，有一个幼稚的人因询问克里奥帕特拉是否是黑人而被嘲笑。然而，也许是因为克里奥帕特拉已经成为整个埃及的鲜明标志，因此总有人试图宣称她不仅是纯粹的埃及血统，而且还是黑人女性。玛丽·汉默尔曾著有一本关于克里奥帕特拉之谜的书，她在书中这样评论：

图21　电影《埃及艳后》（1963）中的一幕，伊丽莎白·泰勒扮演克里奥帕特拉，理查德·波顿扮演马克·安东尼

对于克里奥帕特拉的身体，尤其是她的种族，目前又出现了新一轮的论战。美国的黑人种族主义者称克里奥帕特拉属于自己的种族，这样做无疑是为了追求黑人家庭及其生活方式所得不到的尊严和尊重。这种说法的反对者主要是白人学者。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为了捍卫“文明”和“科学知识”，他们坚持认为克里奥帕特拉不可能是黑人。

克里奥帕特拉之所以在20世纪到21世纪早期声名远播、长盛不衰，主要原因是电影和戏剧（例如萧伯纳的《恺撒和克娄巴特拉》）所带来的影响，而不是考古学。然而，最近法国和埃及在亚历山大里亚古代港口地区合作进行的发掘工作，展示了从沉在海底的托勒密和罗马时期的建筑物中找到的雕像和建筑物的碎片。事实上，整个工作被（埃及学家和记者）通俗地描述为发掘“克里奥帕特拉的宫殿”并不奇怪——克里奥帕特拉这个“商标”太有吸引力了，没人能拒绝（尼弗尔提提和克里奥帕特拉都是埃及香烟的名字）。法国海洋考古学家找到了两座雕像，其中一座暂被鉴定为恺撒利昂——克里奥帕特拉和恺

撒的儿子，另一个则可能是女王的父亲，托勒密十一世。也许克里奥帕特拉的胸像就静静地躺在亚历山大里亚之外的海底，其耀眼程度足以与柏林的尼弗尔提提胸像相媲美。

太多“另类的”埃及？

在讨论埃赫纳吞、尼弗尔提提和克里奥帕特拉形象的塑造和解构时，我集中讨论了他们是如何被艺术家、作家及电影制片人改造和借鉴的。临近尾声，我还想讨论一下“另类的”埃及学家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当西方世界即将进入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时，一大批“新世纪”图书和纪录片出现一个大高潮，其中有一些提倡在考古学和古埃及文献中运用独立的、非学术性的方法。这种现象其实比埃及学出现得更早，约翰·泰勒和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等19世纪作家的理论中就有所体现，只是此时又卷土重来。

“另类的”埃及学家一般是运用一种拼凑组合的方法，选择他们想要的资料，忽略或放弃使用其他那些无法有力地证明他们论点的证据。这是因为他们通常在开头提出结论而不是问题，之后，他们遍寻资料以证明该结论。这种方法确实与传统的“以问题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方法相对立。后者要求研究者由问题（例如：早王朝时期的王陵看起来像什么？）出发，然后考察并评估相关资料，以期找到一个或更多可能的答案。“另类的”研究者的特征也许就是类似“以结论为中心”的方法，可能在资料被汇集起来之前，一本书就可以轻松地完成了。拼凑组合这种方法有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另类的”研究者偶尔会使用一些在传统学界中广为人知或得到公认的资料。以金字塔为例，埃及学家I. E. S. 爱德华早就发表了观点，提出大金字塔上的“通风道”与天上星象能够排成一列，而时隔已久才出现了鲍威尔的畅销书《猎户星之谜》。同样，赫里奥波里斯和吉萨这两个地方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从其中一个城市可以清楚地看到另一个城市的纪念物，如从赫里奥波里斯能看到吉萨的金字塔，从吉萨可以看到赫里奥波里

斯的太阳神庙。对于这个现象，伦敦大学学院的讲师戴维·杰弗里斯已经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在鲍威尔的假设中也有同样的观点。

在这本主要论述古埃及的考古和历史的书中，我只是粗浅地讨论了“另类的”解释埃及的方法以及现代的艺术家、建筑学家、作家、音乐家和剧作家如何改写并重新借用古埃及的思想、主题和故事，这些领域就像一片汪洋的大海。所有“另类的”埃及——从鲍里斯·卡洛夫的复活的木乃伊到伯纳德的“黑色雅典娜”和菲利普·格拉斯的歌剧版《埃赫纳吞》——都值得用几本书来写。

从“了不起的东西”到“了不起的人物”

“了不起的东西”这个词出自霍华德·卡特，当卡纳冯伯爵问他第一次看到图坦卡蒙墓室时看到了什么，卡特回答的正是这句话。这些“了不起的东西”不仅是古埃及，也是埃及学本身的魅力之一。欧洲人和美国人戴着（木髓制的）太阳帽，骑着骆驼，穿着他们爱德华七世时代最好的服装在王室墓地前搔首弄姿，再穿上奥斯曼人的华丽服饰，这些画面同所有留存至今的古埃及图像一样，构成了当代我们对埃及的看法。

现代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在1937年写了一本关于大侦探波罗的小说《尼罗河惨案》（1978年拍摄了同名电影），书中所描写的那个邪恶的游船世界可能是现代作家想象出来的对埃及的描写中最为流行的一个。书中的人物西蒙·道尔说过一段简短的话，以此来作为这本小书的结尾再好不过了：

> 你知道，我是个对神庙、游览这类事情不怎么感兴趣的人，但像这样的地方确实吸引人，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那些古埃及的法老们肯定是些了不起的人物。

注释

〔1〕 始于17到18世纪的秘密会社，自称有古传秘术。

〔2〕 “另类的”意为“存在于传统或现存体制系统以外的”。

〔3〕 原文是“pyramidiots”，是指那些用奇异的或牵强的理论解释埃及金字塔的起源、特质和建造目的的人。

〔4〕 即埃尔金大理石雕刻群，现藏大英博物馆，原是希腊雅典卫城巴特农神庙山墙上的一批浮雕像。多年来，希腊一直试图让英国归还这件国宝。这件珍品的归属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不断引发争论。

〔5〕 指希腊神庙和装饰艺术中再现戈尔贡被割下的头的装饰像，上面刻有或绘有戈尔贡的脸孔：常常是舌头穿过尖牙，直吐于外，并有蛇在头上芜乱地凸现出来，经常摆设在门、墙、盾、护胸及墓碑之上，用以避邪，是一种驱邪护符。戈尔贡在希腊神话中是一伙长有尖牙，头生毒蛇的妖怪。

木乃伊、金字塔、法老诅咒、宗教仪式，古埃及的独特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

本书以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纳尔迈调色板为主线，分章讨论了古埃及文明的各个重要方面，从专制法老到木乃伊制作，从象形文字到动物头人身的神祇，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古埃及全景图。

百科通识文库

49

罗马帝国简史

克里斯托弗·凯利 著

黄洋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
文库
49

罗马帝国简史

克里斯托弗·凯利 著
黄洋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29**

The Roman Empir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6.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6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Christopher Kelly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帝国简史 / （英）凯利（Kelly, C.）著；黄洋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96-0

I．①罗… II．①凯…②黄… III．①罗马帝国 - 历史 IV．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47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96-0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绪论
第一章　征服
第二章　帝国权力
第三章　共谋
第四章　历史的较量
第五章　让基督徒喂狮子去
第六章　生与死
第七章　回顾罗马
地图：公元2世纪晚期的罗马世界
大事年表
返回总目录

| 作者简介 |

克里斯托弗·凯利，剑桥大学圣体学院研究员，代表作是《统治晚期罗马帝国》（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

| 译者简介 |

黄洋，英国伦敦大学古典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等。

图目

图1　提图斯凯旋门
图2　图拉真记功柱
图3　马萨达的空中鸟瞰图
图4　阿弗罗狄西亚的克劳狄和不列颠尼娅浮雕
图5　安东尼·庇护和福斯蒂娜升天
图6　尼禄和阿格丽品娜，阿弗罗狄西亚的浮雕
图7　市集，大勒浦克斯
图8　露天剧场，大勒浦克斯，阿诺巴尔·塔帕皮乌斯·鲁富斯的铭文
图9　马格里乌斯的狩猎镶嵌画，突尼斯的斯米拉特
图10　维吉尔和缪斯女神，突尼斯的苏萨
图11　奥林匹亚神庙和雅典卫城
图12　帕提农神庙和罗马奥古斯都神庙
图13　可望到奥林匹亚神庙的哈德良凯旋门
图14　大竞技场剖面图，罗马
图15　帕拉丁山的涂鸦画
图16　“米南德私宅”地基图，庞培
图17　从前厅看到的“米南德私宅”
图18　特洛伊木马壁画，“米南德私宅”
图19　寿命模型表，西方第三级，女性
图20　托马斯·桑尼克罗夫特的“包迪西亚”雕像，伦敦的泰晤士河河堤
图21　威廉·贝尔·斯科特的壁画《建造罗马长城》
图22　艾伯特·斯皮尔的日耳曼尼亚（即新柏林）的缩尺模型
图23　尼禄（彼得·尤斯蒂诺夫饰）向廷臣展示他对新罗马城的规划
图24　按导演里德利·斯科特设想重建的罗马，电影《角斗士》中的

一幕（2000年上演）

图25　万星威服饰借电影《暴君焚城录》之名，为其平脚短裤作的广告

绪论

罗马帝国是项令人惊叹的成就。在公元2世纪的鼎盛时期，它统治着大约6,000万的人口，5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大约是英国国土面积的20倍）。那时帝国从细雨滋润的英格兰北部哈德良长城一直延伸到叙利亚幼发拉底河干涸的河岸；从蜿蜒于欧洲低地国家和黑海肥沃平原的莱茵河–多瑙河流域一直绵延至北非沿海富庶的平原和埃及尼罗河丰饶的河谷。罗马帝国完全包围了地中海。帝国的征服者把它看成是罗马人的内海，沾沾自喜地称其为“我们的大海”。

本书试图探讨这个超级帝国的一些重要方面。所采用的叙述方法完全是主题式的，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作者讨厌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见大事年表207—212页），而是因为现在已有很多有用的按年叙事的罗马帝国史和帝王传记。本书采用不同的方法探索同一领域。第一章审视征服的残忍过程，帝国的建立以及罗马人的帝国使命感。第二章讨论帝国权力的展示，审视同时作为神明（在宣扬对皇帝的个人崇拜中）和凡人的皇帝（在苏埃托尼乌斯和塔西佗的历史著作中）。第三章变换视角，从地中海世界诸城中特权精英阶层的角度来理解帝国的运作。主要是这些富人——而非某个庞大的帝国行政管理系统——对帝国进行着有序的管理。

第四章讨论公元2世纪一些由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人写的、不为人熟知的文献。这些文献弥足珍贵，因为它们使我们得以认识被征服者在一个新的帝国里是如何确立其身份认同，而这种对前现代帝国的认识是很少能够被后人找回的。在罗马帝国，有关现在的争论常常表现在有关历史的争论中。历史著述不是孤立、纯学术性的活动；相反，它直接涉及政治和权力的语言。现在可能完全是罗马人的，但过去究竟属谁仍有待争夺。

第五章转而讨论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外部人群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基督徒身处社会边缘的经历决定了他们的形成，并塑造了他们的信仰。与此相反，第六章提供了一个内部人群的观点，试图确定某种关于在这个庞大的前工业化帝国的城市和农村里生存和死亡的感受。第七章，即最后一章，从下面三个现代视角回顾了罗马帝国：从第一

次世界大战之前10年间大英帝国的视角；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的视角；从好莱坞的视角。这些视角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有时令人吃惊）仍然决定着在21世纪初我们如何想象和评判罗马帝国。毫无疑问，现在的优势之一是能够有选择地回顾过去。但同样——就像这本简史一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意识到这种选择性。

本书集中讨论罗马帝国最为繁荣的时期，大体上是从约公元前31年至公元192年的两个世纪：从后来成为皇帝的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战役中战胜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到康茂德皇帝被暗杀。（不过第一章回顾了布匿战争；第五章简要展望了公元4世纪初，这是为了以第一位公开支持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正式皈依基督教结束讨论。）

本书各章主要关注的是罗马在建立和维持一个唯一囊括了北欧、中东和北非的最大的世界性帝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个成功本身就需要丰富而复杂的解释，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步理解随后罗马统治衰弱、西部帝国最终分裂、沦为蛮族王国以及东部拜占庭逐渐兴盛的原因。这些主题大大超越了本书的范围。对于这场“可怕的革命”最好的描述仍是爱德华·吉本权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年间出版于伦敦）。然而粗心的爱好者须知：吉本的著作一共6大卷，他从来没有想要撰写任何类似简史的东西。

第一章

征　服

扩张与生存

罗马是个崇尚武力的国家，其庞大的帝国是从一系列激烈的战争中艰难赢得的。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罗马还是一座微不足道的小城；它通过和周边诸族结盟，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从而确保了其生存。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罗马人得以在台伯河谷建立领土，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张至南面的康巴尼亚（那不勒斯海湾周围）。这是一个逐渐推进和稳步巩固的缓慢过程。在公元前295年击败萨姆奈人（从而控制了意大利东部）以及挫败希腊亚得里亚海沿岸伊庇鲁斯王国统治者皮洛士的入侵后，罗马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公元前280年，皮洛士率军在塔伦托姆（现今意大利半岛“脚跟”的塔兰托）登陆。尽管起初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他未能迫使罗马人投降。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征战5年之后，因为不愿耗尽自己有限的资源和冒失败的危险，他选择了撤退。

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都处于罗马的控制之下。在之后的1个世纪里，罗马人及其盟友向北非的迦太基城——主宰地中海西部的强国——发起了挑战。迦太基的海上贸易确保了其持续的繁荣和国际影响，其商船队向东行至埃及和黎巴嫩，从事奢侈品贸易；向北可能远达不列颠，以购买铝；向南则活动于非洲沿海，以便运回象牙和黄金。和这样一个颇具威胁的对手的三次长期冲突——称为布匿战争——耗尽了罗马的国力。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的直接原因是对西西里的争夺。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罗马人认为这是对其安全的直接威胁。不过，如果不能有效地抗衡迦太基的海上优势，就不能进行真正的反击。罗马人在意大利半岛的胜利是基于其陆军的优势，现在他们被迫组建一支常设海军，匆忙地将士兵训练成水手。据罗马后来的传说，他们的能工巧匠模仿一艘搁浅的敌舰，在60天里赶造了100艘战舰。最后这一险招取得了成功。在历经了23年艰苦的战争后，罗马人最终在公元前241

年迫使迦太基人全部撤退。

来之不易的和平仅仅维持了20多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中，伟大的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发动了古代世界最为大胆和最具想象力的军事行动。他率领50,000名士兵、9,000名骑兵和37头大象从西班牙出发，经过法国南部，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最后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马在这段漫长的旅程中幸存了下来。7个月后，在公元前217年5月的晨雾中，汉尼拔把罗马将军弗拉米尼乌斯和他率领的军队包围在了翁布里亚的特拉西梅诺湖畔，一举歼灭了15,000人。次年，在阿普里亚的坎尼，他几乎全歼了罗马军队。这是罗马人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失败，一场战斗就夺去了他们50,000名士兵的生命，这也是欧洲战争史上在一天之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战斗。和索姆河之战[1]中的伤亡者不同，坎尼之战中的罗马士兵是倒在了短兵相接的近战中。在血流成河的平原上，他们的尸体堆积如山。

汉尼拔占领意大利长达15年。在费边·马克西姆斯——他被恰如其分地冠以“拖延者”的绰号——的指挥下，罗马人及其盟友有意避免阵地战。他们烧毁自己的庄稼，退守在加固的城池里。在罗马人的这种焦土政策下，汉尼拔的军队逐渐为饥饿所困，又受到罗马小股部队的侵扰，最后被迫放弃了远征。罗马人最终获胜，但这却是在坎尼之战的10多年之后。只是到了公元前202年，被召回保卫迦太基的汉尼拔才被西庇阿·阿非里加努斯在扎马（今突尼斯）之战中击败。时隔60年之后，恢复了元气的罗马又摧毁了业已衰弱且士气低落的迦太基。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前146年）以这座城市的彻底毁灭而告终，其建筑全部被夷为平地，幸存的50,000名居民中的绝大部分沦为了奴隶。

在往西向西班牙和北非扩张的同时，罗马在东方也发动了战争。到公元前146年，也就是迦太基和科林斯同时遭到毁灭的这一年，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城市都已臣服于罗马。在随后的1个世纪里，在经历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争之后，罗马控制了小亚细亚。公元前1世纪60年代，常胜将军庞培“大帝”兼并了叙利亚；公元前1世纪50年代，尤利乌斯·恺撒征服了高卢（从法国南部的比利牛斯山脉到莱茵

河）；公元前31年，他的养子屋大维击败了埃及的最后一位独立君主克娄巴特拉七世。在希腊西北部亚克兴角的海战中取得的这次胜利带来了最大的回报。埃及这个地中海世界最古老最富庶的王国，现在完全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在东方诸国以及在反对迦太基的战争中，罗马传统的共和政体尚能有效运转。的确，由于一系列成功的军事征服，公元前2世纪通常被看成是罗马共和国的鼎盛时期。不过从某些方面来说，“共和国”是个具有误导性的概念。至少对现代的读者而言，它的问题在于暗示着有很大程度的民众政治参与。（这在古代不成其为一个问题；拉丁文中的*res publica* 最好可简单译成“国家事务”。）罗马共和国是个不加掩饰的富豪政体，其公民群体按严格的财产资格仔细分等。这种等级制度又决定了投票的权利。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享有投票权，但其集体投票制度确保了如果富人团结起来，就能超过穷人的票数。此外，竞选和担任官职的高额费用，也保证了罗马政府中的重要职位都由富人把持。

在这一严格的寡头政体中，两位执政官是国家最有权力的官员，每年由选举产生。只有担任过司法长官职务（国家次重要的官员）且年龄在42岁以上者才能竞选。在任职期间，执政官可能获得重要的军事指挥权，这一指挥权也可能按年限延长。在军事指挥权终止后，前任执政官卸去其职权，回到元老院任职。元老院并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机构，而是由所有曾经担任过高级行政长官的人组成的咨议委员会。官职任期1年，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且军事指挥权有时间限制。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罗马统治精英对权力的集体行使。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到公元前2世纪，大约一半的执政官出自于10个贵族家庭。这不仅表明一个较小的世袭集团处于稳固的统治地位，而且也说明在这个核心集团之外有着相当的流动性。近世先辈不属元老阶层或其祖上从未进入过元老院的人也经常能进入元老院任职。

共和政体也专门对具有野心的个人施加了限制。尤其是，它防止政治和军事权力长期集中在军功显赫的将军手中。对伟大人物的真正考验——至少对罗马道德家是如此——不是他获得高位的能力，而是

他诚心放弃高位的意愿。最初为在意大利立国，罗马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胜利是在昆克提乌斯·辛辛纳图斯的领导下取得的。（据记载）辛辛纳图斯极不情愿离开他的农田、中断他的耕作去组建军队。比他无意于高位更为著名的是他拒绝加强自己的指挥权。他放弃了继续掌权的机会，回到自己的小田庄里，重新过起了农耕生活。

尽管有这样突出的榜样，但一些吞并地中海世界最富庶地区的将军们还是越来越不愿放弃权力。对他们而言，辛辛纳图斯的故事对他们没什么道德约束。最终，事实证明，共和政体对于个人行使权力的制约太过微弱，不足以抵挡帝国扩张的野心。在公元前1世纪，一个接一个在征服战争中获胜的将军们决心靠其军功揽权。他们远未到要求的最低年龄就担任了执政官，迫使元老院让他们继续执掌军权，并且依靠军队对他们个人的忠诚以及武力威胁不断干预政治。当尤利乌斯·恺撒完成了他在高卢的军事使命之后，他拒绝按照法律的要求放弃兵权。公元前49年1月，他率领一支经历过8年战争考验的老兵队伍，渡过卢比孔河（这标志着他管辖领土的南部边界），向罗马进军。很显然，恺撒的权威是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的。一些罗马人准备反对这一政变，但同样是以非法的方式。5年之后，在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被刺杀。与其把这个事件看成是布鲁图和卡修斯为了自由而做出的正义之举（应该坚定地把莎士比亚的刻画放到一边。），还不如把它看成是一个政治派别从其政敌手中夺取政治权力的残忍手段。

这次刺杀引发了10多年的内战。马可·安东尼（恺撒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和屋大维（恺撒的养子）的联盟击败了布鲁图和卡修斯。之后这一脆弱的盟友关系破裂了。安东尼向埃及求援，并寻求其统治者克娄巴特拉的支持。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因为可以利用埃及的财富来资助同屋大维的战争；其最重要的城市、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亚历山大可以成为东罗马帝国的新都城。这才是比较负责任的说法。把马可·安东尼说成是酒鬼、是因为对埃及艳后的情欲而变得无能的人，实际上是屋大维对安东尼的诋毁和攻击。这类诋毁是胜利者的特权。公元前31年埃及水师在亚克兴角的覆没和次年安东尼的自杀，使屋大维巩

固了自己的地位，并且使政敌声名狼藉。在新发明的“奥古斯都”（意为“神宠者”）的称号下，屋大维对帝国财富与军事资源的控制使他的家族成了地中海世界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公元前2世纪中叶开始的罗马帝国的迅速扩张，正是100多年后王朝君主制建立的原因。然而，如果把这一变化看成是独裁取代自由或是专制取代独立的话，那就过于草率。从奥古斯都开始，在皇帝统治下，罗马政治就由一些特权家庭把持，它们一如既往地为争夺帝国的胜利果实而展开竞争。发生变化的只是竞争的规则，以及皇帝的近臣力图接纳或排挤行省贵族的方式，后者因其财富而要求成为全帝国的新贵族。

从这个角度来看，屋大维蜕变为奥古斯都——从一个军阀成功转变为皇帝——与其说是罗马政治本性的改变，不如说是权力在寡头阶级内部斗争中的艰难重组。罗马真正的革命是在共和时期建立起一个帝国。在奥古斯都之后，新的扩张非常有限，这也许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不列颠、达契亚（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罗马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征战由皇帝亲自指挥。其他军事指挥权受到严格控制；潜在的竞争者，即使是皇亲国戚，都要受到严密监视。这是在风险管理中吸取的惨痛教训。像公元前1世纪残酷的内战显明的那样，征服地中海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使得即使像辛辛纳图斯那样的将领也难以弃权从耕。

震惊与恐惧

无论怎么说，从一个小型的城邦扩张为超级帝国都是令人惊叹的转变。罗马人的帝国是通过远胜于竞争对手的军力而建立的，在击败汉尼拔之后尤其如此。公元前2世纪，为了组建一支大约13万人的军队，罗马人不仅十分依赖意大利的盟友，而且还征召了大约13%的成年男性公民走上战场，其中主要是年轻人。为了维持这样一支军队，60%的17岁青年都会被征召入伍服役7年之久。换言之，大半罗马男

性公民都须服兵役至25岁左右。这些数字非同寻常。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只有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的军队才动员了如此多的人力资源，并且持续的时间很短，远不能和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所用的两个世纪（从布匿战争到亚克兴角战役）相比。不妨作一个粗略的数量级比较：现在美国如果要像罗马那样在军事上投入人力，它就需要维持一支近1,300万人的常备军，这会是其现役军队人数的10倍以上。

这个庞大的军事组织实现了良性运转。通过严明的纪律、精良的武器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罗马军队利用其规模优势不断打胜仗。胜利带来了大量的战利品。反过来，从敌人那里劫掠的财富，加之行省上缴的税收，又负担了持续征服所需的高额费用。罗马在地中海东部的战争中所获取的财富成了传奇故事。在50年（公元前200—前150年）的时间里，它攫取了价值超过30吨黄金的财富。之后罗马统治在小亚细亚的巩固和对叙利亚的兼并，意味着这个数目可能被超过。15年之后，尤利乌斯·恺撒从高卢搜刮而来的大量黄金致使金价大幅下跌。

帝国的胜利果实在罗马城中受到了最为热烈的称颂。城市中心挤满了炫耀罗马扩张其统治的纪念性建筑：宏伟的凯旋门、令人难忘的雕像、用战利品装饰得光彩夺目的神庙。罗马历史学家在其冗长的历史著作中塞满了似乎没完没了的有关征服与战争的叙述。公元前2世纪，所有谋求担任官职的人都须服至少10年的兵役。作为执政官或前任执政官，高级军事将领同时也是成功的政治家。民众景仰的英雄都是那些能克敌制胜的伟大将军，例如费边·马克西姆斯这位战胜汉尼拔的“拖延者”、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这位打败迦太基的“非洲胜利者”、庞培这位将罗马帝国的版图向东扩张到幼发拉底河的“大帝”，还有征服高卢的尤利乌斯·恺撒。

一个罗马人政治生涯的顶峰就是在首都的街道上为其举行的凯旋式，这是一名军事指挥官唯一可以合法率军进入罗马城的时候。公元71年6月，皇帝维斯帕西亚努斯与其子提图斯庆祝了他们对犹太人反叛的残酷镇压。之前，在公元70年夏末，提图斯围困并攻占了耶路撒冷，希律王建造的宏伟圣殿被摧毁，其内殿圣所——至圣所——被劫

掠。圣器、黄金祭台、精美的七枝烛台、银制喇叭以及律法书卷被带回罗马，在凯旋式上展示。10年之后，即公元81年，通过在通往市政广场的东部入口处建造献给提图斯（他在当年早些时候去世）的凯旋门，这一欢庆征服犹太民族的历史瞬间得到了永恒的纪念。这个凯旋门是帝国统治的恒久象征，上面的雕像则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反叛罗马统治者的下场。所有经过这里的人都会想起这次胜利，在这一瞬间他们也身处于一个征服性帝国的最核心：一侧是耶路撒冷圣殿里的宝藏，另一侧则是提图斯本人，他乘着战车，周围是拥戴他的士兵和护卫他的“荣誉”、“勇气”和“胜利”的化身。

凯旋式上的华丽展示还讲述了战斗的情形。在高达15米的巨大移动舞台上，战争及其残忍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些画幅以象牙和黄金镶边，使那些来度假的人倍感钦服，并得以再次体会到征服的刺激和知道罗马一定能克敌制胜后的安全感。当时的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向我们描绘了这一情景（可能是亲历），也许此时他克制了通常表现出来的对罗马明显的支持：

> 在这里可以看到曾经繁荣的乡村被摧毁，整支敌军遭屠杀，人们四处逃窜，另一些被俘获……战壕里还挤满守卫者的城池被完全征服了，一支军队潮水般涌进城门，整个地方血流成河，那些不能抵抗的人举手乞降，神庙被烧毁，房屋被夷为平地，而主人尚未逃出。在彻底的破坏和苦难之后，河流不再为人畜提供饮水，它流经的不是开垦的农田，而是四处仍燃烧着大火的乡村。

维斯帕西亚努斯和提图斯的凯旋式尽管宏大，所庆祝的只是对反叛的镇压，而非对新领土的兼并。更为奢华的是公元前1世纪那些最伟大的罗马将领们展示其掠夺物的场景。在公元前46年9月长达12天的欢庆活动中，尤利乌斯·恺撒庆祝了他在高卢、非洲、埃及和本都（位于黑海南岸）的胜利。这是最为宏大的凯旋式之一，每天都有令人惊叹的新鲜事：今天展示的是俘虏（一些获释、一些被处死），明天又是异国的动物（这次罗马人第一次看见了长颈鹿）；今天在特别开挖的人工湖里表演一次海战，明天又在马克西姆斯竞技场让俘虏们

上演大规模的阵地战，一次就有多达40头的大象参战。丝织的凉篷（这是恺撒的又一奢华发明）高高挂在观众的上方，为他们遮挡阳光。看到成千上万的俘虏被杀，他们则欢呼雀跃。在这些凯旋式上，杀戮的战场在帝国都城的中心得以再现。兴高采烈的观众为军队的成就和那些反对罗马者的灭亡而欢欣不已。在最后一次凯旋式上，有一系列描绘恺撒征服本都的彩绘场面，中间还夹带了一个标语牌，上面简简单单地写着一句话："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这个口号再次简练地提醒人们罗马的军事优势，不过它经常被错误地和恺撒在不列颠短暂而失败的征战联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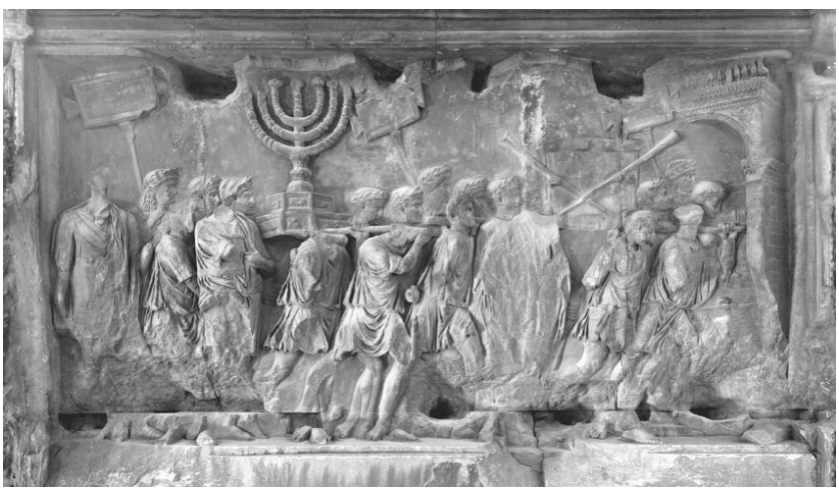

图1　凯旋式上展示的来自耶路撒冷圣殿的掠夺物。提图斯凯旋门上的浮雕，罗马

人们很容易被这种对征服的炫耀所感染，很容易忘记每次凯旋式（70%以上是在公元前252年—公元前53年间举行的）也意味着大量兵士和平民被成批地俘虏和屠杀。暂时停下来反省一下罗马在建立其帝国的过程中带来的恐怖和冷酷无情的破坏是十分重要的。尤利乌斯·恺撒的军队在高卢屠杀了100万敌方战斗人员，又使另100万人沦为奴隶。即使恺撒在自我标榜的叙述中对于其军队的残忍有所夸张，但仅就对人口和经济破坏的程度来说，在西班牙人入侵美洲之前都无出其右者。

和最初征服同样残酷的是随后对叛乱的武力镇压。公元60年，不列颠东南部的居民伊克尼人发动叛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试图重获独立。卡姆罗都努姆、维路拉米乌姆和隆迪尼乌姆（今科尔切斯特、圣阿本斯和伦敦）被攻占，罗马人的反攻迅速重新控制了这些地区。成千上万的不列颠人被杀，而罗马军队只损失了400人。在早期的一次种族清洗中，罗马军队连续不断地打击伊克尼人，直至所有抵抗全被消灭。伊克尼人的领袖之一布狄卡兵败自杀。她试图驱逐罗马人的努力以痛苦和代价巨大的失败而告终。

罗马军队入侵并平定敌人领土的强大力量，突出地反映在30米高的图拉真记功柱上。这是在公元113年落成的，以纪念在此前的10年里图拉真皇帝在达契亚的两次征服。这根白色大理石的记功柱仍然耸立在罗马市中心，柱身饰以长条带状的浅浮雕（像是巨型的卡通连环画），呈螺旋形绕柱24圈。上面总共刻画了2,500个人物，组成154幅可以明确分开的场景。这些形象并非直接描绘图拉真的征服，而是向观看者提供了更为理想化的有关帝国扩张的叙述。在这里罗马军队保持着良好的行进秩序：充满活力且纪律严明的军团士兵修建营地、堡垒、道路和桥梁，围困和攻占敌人的堡垒，并在战斗中无往不胜。在这个图像的世界里，罗马人从不伤亡，只有敌人被消灭。在这里，皇帝御驾亲征也总能确保战争的胜利。浮雕表现图拉真率领军队投入战斗，接见使节，和高级官僚议事，向士兵发表讲话，并主持祭祀以确保神明的支持。

图拉真记功柱同样客观地记录了战争的暴行。被打败的达契亚人跪地求饶。其中一些被俘，另一些则受拷打。村庄被焚毁，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家畜均遭屠杀。渴望获得战利品的罗马士兵纷纷向皇帝和他的幕僚展示割下的敌人头颅。

征服战争结束后，当地居民和他们的牲畜被强行驱逐，他们的土地现在归罗马定居者所有。这些征服场面的背景无疑是在达契亚，但它们所描绘的主题却是普遍的：罗马霸权势不可当，抵抗徒劳无益，暴力总是伴随着新的领土征服。正如图拉真记功柱公开而骄傲地宣告的那样，对于那些胆敢企图反对罗马推行其统治的人，这些就是他们

悲惨的下场。

然而还是有些反叛者准备殊死一搏。对于那些歌颂英勇无畏但却徒劳无功地试图阻止帝国扩张步伐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犹太人反抗到底的故事更激动人心的了（直到公元74年春，在耶路撒冷被占领将近4年之后，反抗才最终被镇压）。其中最为坚定的犹太派别之一被称为“斯卡利人”，意即“短刀人”。这个城市杀手队的成员将刀剑藏在衣袍之下，混在挤满耶路撒冷城的朝圣者中间，暗杀那些他们斥之为通敌者的犹太达官贵人。公元66年夏，在起义爆发后，“斯卡利人”从罗马守备部队手中夺取了马萨达。它是犹地亚地区最难攻破的堡垒之一，建筑在死海西面一个四面陡峭的狭长高地上。站在这个高地上，四周因有盐层覆盖而闪着微光的平原一览无余。在这里“斯卡利人”坚持抵抗，直到提图斯攻陷耶路撒冷，甚至延续到他登上罗马皇位之后。

图2　军士向图拉真皇帝及其幕僚展示割下的敌人头颅。图拉真记功柱上的浮雕，罗马

面对被围困在马萨达的967名男女老幼，负责在这个被征服行省肃清残敌的罗马将军弗拉维乌斯·西尔瓦动用了一个军团，外加一支后备军队（总计8,000至9,000人），攻打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为此而用石头建成的兵营（罗马世界保留下来最完整的兵营之一）和环绕着高地地基的4公里围墙至今在平原上仍可见其轮廓。但和罗马军团修建的围城坡道相比，兵营和高地围墙都显得相形见绌。这个坡道长205米，以1比3的倾斜度爬高达70米。其顶部是一个23米宽的石头平

台，用于架设攻城槌。

单单这些数字就已令人吃惊，但犹太起义者日益增长的恐怖感要切实得多。他们日复一日地看着这些用于围攻堡垒的工事不可阻挡地建造起来。就像凯旋式奢华的花费炫耀了罗马的统治权一样，马萨达的围攻同样展现了帝国的强大，它可以集中大量的资源，用于对付哪怕是近千个敢于反对它的起义者。就像远在罗马的提图斯凯旋门，这个至今仍然紧挨着马萨达西面悬崖的巨大坡道是一个永恒的警示，告诉人们反叛罗马是不可能得逞的。

图3　马萨达，沿西面峭壁上建筑的围城坡道

面对必将来临的死亡，“斯卡利人”选择了自杀。除了7人之外，其余的人全部自杀。2名妇女和5个孩子藏在了从地下水塘向堡垒供水的饮水渠里。正是这些幸存者讲述了犹太起义余部的最后时刻及其首领以利亚撒的战斗口号：

来吧！在我们的双手自由、尚能提剑之时，让它们高贵地为我们尽职吧。让

我们不被敌人奴役即死去，作为自由人和我们的妻儿一道放弃此生吧……让我们奋进，不让罗马人有俘获我们时的踌躇满志，让他们惊惧于我们的死、敬畏于我们的勇气吧。

帝国的使命

有关帝国征服带来的毁灭性后果的生动叙述极为少见。罗马人自己在解释其扩张及其后所采取的控制被征服行省的政策时，很少认识到自己是侵略者。相反，他们认为，战争是为了使那些他们断定对罗马领土完整构成威胁的敌人屈服。帝国的建立是保障本土安全的温和而合理政策的意外后果。公元前1世纪最著名的演说家西塞罗简洁明了地说明了这一点："发动战争的唯一理由是为了我们罗马人能够生活在和平之中。"

诗人维吉尔以恢弘的笔法详述了这个主题，其创作的时间是在亚克兴角战役和屋大维／奥古斯都获胜之后的10年里。他的《埃涅阿斯纪》是最伟大的英雄史诗之一，记叙了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的命运。希腊人采纳了尤利西斯的妙计，狡猾地把自己掩藏在木马肚子里，从而攻破了特洛伊，但埃涅阿斯逃脱了希腊人对他家乡的洗劫。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从荷马的《伊利亚特》结束处起笔。埃涅阿斯背负着年迈的父亲安基瑟斯逃离特洛伊，年幼的儿子阿斯卡尼俄斯拼命地紧跟在后。这个宏大的叙述便从此处开始。埃涅阿斯向西而行，穿越地中海西部，先是到了迦太基，最终到达意大利。在这里特洛伊人攻打当地的余提利亚人，后者抵抗他们侵占其领土的企图，但余提利亚人注定会失败。他们的国王图耳努斯在一对一的决斗中倒在了埃涅阿斯的剑下。在众神之王朱庇特的庇护下，埃涅阿斯的神圣使命就是繁衍一个注定要统治地中海世界的民族。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简要地叙述了罗马的历史。埃涅阿斯寻找新家园的探求预示了罗马要建立帝国的使命。在其征程的开头，埃涅阿斯被风暴吹离航线，在迦太基找到了安身之所。他必须经受的最艰难的考验之一，就是摆脱这个城市的骄奢淫逸和它的妩媚女王狄多

的诱惑，而他险些没能经受住诱惑。埃涅阿斯个人的“布匿战争”和罗马后来的布匿战争一样艰难和惨烈。狄多爱的力量丝毫不逊于后来汉尼拔的武力。在伴随着电闪雷鸣的一夜春宵之后，朱庇特的使者墨丘利便来提醒埃涅阿斯他的命运。在神明激发的狂热心情驱使下，埃涅阿斯命令特洛伊人起航。遭到抛弃而几近疯狂的狄多闻讯自杀，她的自我毁灭预示了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时整个迦太基的自我毁灭。

逃离迦太基后，埃涅阿斯首先在西西里登陆，并在此安葬了他的父亲安基瑟斯。然后他前往那不勒斯附近的库迈。在阿波罗神古老的预言者西比尔的洞穴里，他向她请教未来之事。在此他接受神命，下到阴间去了解他的命运及其忠诚追随者的未来。在父亲阴魂的指引下，他看见了许多尚未出生的罗马英雄以及罗马帝国历史的辉煌展示——从罗马城的建立到征服意大利，布匿战争，兼并地中海东部，直至庞培、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在这个幻象中罗马的命运被揭示了出来，就如同安基瑟斯所预言的那样：

> 其他民族会更柔软地用青铜塑造
> 活生生的人物，我毫不怀疑，
> 会用大理石雕塑更栩栩如生的形象；
> 会更为雄辩地争论，用指针
> 准确追踪天空的轨道
> 并精确地预报星辰升起。
> 罗马人，记住用力量去统治
> 大地上的人们——你们的艺术就是：
> 征服，实行法治，
> 宽恕被征服者，消灭骄傲者。

我们在阅读其他民族的史诗时，通常都带着一丝嘲讽的微笑。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读者在对欧洲殖民主义这一可疑的遗产进行反思，可能不愿赞许维吉尔的诗性宣言，称罗马的帝国使命就是教化那些没有法度的次等种族。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假思索地把《埃涅阿斯纪》简单看成是在粉饰太平、是在为一个暴虐的政权辩护。实际上它

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评论要比这种看法微妙复杂得多。我们有可能深深地同情临死时的狄多。她先为埃涅阿斯所爱，后又被他抛弃。在单独的决斗中，埃涅阿斯在犹豫之后才残忍地杀死被击败的余提利亚国王图耳努斯。就算埃涅阿斯是在神助之下为其追随者和后代在意大利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诛杀图耳努斯有极其正当的理由，但这仍然是野蛮的行为，是在狂怒和复仇的杀戮欲驱使下进行的。即便如此，就像大张旗鼓地庆祝将军得胜的凯旋式，《埃涅阿斯纪》的目的也并不是要给战败者以同等的关注。它虽然没有公开表达为罗马屠杀敌人而感到的自豪之情（也许反映了饱受三个世纪的征服和一次长期内战之苦后罗马社会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心态），但它明显是以肯定的口吻来描述罗马帝国的成就，其目的就是坚决驳斥那些更为负面的评价。

与此相反，当时的历史学家科尔内琉斯·塔西佗在记叙公元83年不列颠反叛的最终失败时，让其领导人卡尔伽库斯发表了一次精彩的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在面对强大的军队而不可避免地失败之前）对罗马的帝国式统治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罗马作家如此设想对帝国的反对并不多见，它表明，即使在胜利者中间，也并非所有人都心安理得地赞同征服必然带来的毁灭和屠杀，这一点难能可贵。在看到《埃涅阿斯纪》对罗马帝国主义的虔诚辩护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卡尔伽库斯的严厉谴责：

> 他们是世界的掠夺者，不分青红皂白的蹂躏耗尽了大地，把魔爪伸向大海。如果敌人富有，他们就贪婪；如果敌人贫穷，他们就傲慢；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满足不了他们……掠夺、屠杀、攫取，他们错误地把这称之为“帝国”。他们留下一片荒凉，却说这是“和平”。

就像以利亚撒在马萨达高地上不屈的反抗一样，一些人可能会钦佩卡尔伽库斯的讲话，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由战士鼓舞人心的情感表露，他宁愿英勇就义，也不愿放弃自己的独立。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他的讲话仅仅是一个反叛恐怖分子危险而具有误导性的宣传，他愚昧地企图阻止有神明保佑的罗马统治的前进步伐。

注释

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战役，在1916年7月1日至11月8日进行，是历史上最残酷的战役之一，双方伤亡达几十万人。——译注，下同

第二章

帝国权力

权力的展示

游览以弗所这座伟大城市（位于土耳其境内的爱琴海岸）的人也许会被那些急于要看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的人粗鲁地推开，或是为他们让道。这支游行队伍由至少250名祭司、年轻人和手捧31尊金银小雕像的市政官员组成。这个游行式开始于公元104年，是在以弗所最富有的人之一卡约·维比乌斯·撒路塔里斯慷慨捐赠了土地、钱款和金银之后才得以举办。在城市露天剧场南面入口处显耀位置展示的长篇碑文，气势恢弘地纪念了他的慷慨之举。这篇碑文是罗马帝国留存下来的最长的碑文之一，共计568行，分成6栏，刻写在差不多16平方米的大理石上。它记录了撒路塔里斯的种种善举，以及他的同胞接受捐赠的感激之情。即便路人不能阅读碑文的细部，但他们还是赞同以如此宏伟的公共建筑来纪念撒路塔里斯的慷慨行为。

通过对游行式细心的规划，撒路塔里斯向参与者和观看者简要地介绍了以弗所的历史。游行队伍从城外阿耳忒弥斯神庙出发。这座神庙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也是地中海东部最为富有的圣地之一。以弗所以阿耳忒弥斯崇拜而著称。传说这位宙斯和勒托所生的女神出生于城外一片神圣的小树林。在这儿她的母亲为她找到了庇护所，可以不受宙斯之妻赫拉的猜忌。9尊阿耳忒弥斯的神像、8尊银像和1尊金像穿插在游行队伍中间。这提醒人们，即使在公元2世纪，以弗所被罗马帝国统治许久之后，它仍然珍视和传统希腊神明的密切联系。

这座城市的悠久历史也得到展示。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早在距撒路塔里斯施行善举1,100年之前，以弗所就由英雄安德罗克洛斯建成。据说一头野猪掀翻了一只正在炸鱼的油锅，引燃了草地，从隐蔽处逃了出来。安德罗克洛斯杀死了这头野猪，从而实现了阿波罗的神谕：即定居者应在“一条鱼和一头野猪指引的地方”建城。公元前3世纪初，亚历山大大帝的亲密同伴之一利西马科斯重建了以弗所。他将城市迁到了现今的位置，使它面朝一个可通航的港口，并由一道巨大

的环形城墙护卫着。在撒路塔里斯的善举里，以弗所历史上的这些重要时刻都得到了纪念。游行队伍捧着的雕像包括这座城市两位建立者和砒翁山的银像。砒翁山耸立在利西马科斯建立的新城的商业区背后，护卫着这座新城，而安德罗克洛斯就曾在这座山的山坡上猎杀过野猪。

游行队伍从阿耳忒弥斯神庙出发，经过城中的主要街道，最后再回到神庙，总共耗时约90分钟。通过250名庆祝者和31尊塑像，这支游行队伍展现了以弗所社会的运作模式、城市和神明的联系及其远在罗马征服之前的建城经过（以及重建情况）。同样重要的是，这一精心排练的活人造型表演还巧妙地融入了最近发生的事件。在象征以弗所市政议事会的雕像之前是象征罗马元老院的雕像，之后（隔着阿耳忒弥斯的另一尊雕像）是代表罗马人民的雕像。最为重要的是，整个游行队伍的前面是在位的图拉真皇帝和普洛蒂娜皇后的银质雕像。在一长串的游行队列中，这些象征罗马统治的光辉形象和以弗所的建城者及其保护神阿耳忒弥斯直接联系在了一起。

通过把在世的皇帝当作神明一样来崇拜，以弗所人不仅认可了帝国权力的至高无上，而且试图理解它，把它和更为地方性的事务关联起来。当这堂流动的历史课以缓慢而庄重的节奏穿过纪念性的城市景观时，它使人们完整地理解了以弗所在罗马帝国的地位。在城市新建区域的上广场上，人们捧着图拉真和阿耳忒弥斯的雕像路经供奉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神庙；还经过了一尊巨大雕像（4倍于真人大小），它位于一个公元1世纪后期的神庙里，献给“神宠的诸皇帝”。特别是在这里，游行的队列表明，无论图拉真离这儿多么遥远，他还是像之前的统治者一样，像阿尔忒弥斯女神本身一样，特别关心这座城市。作为皇帝，图拉真只驾临过以弗所一次（113年晚秋前往安条克和东部边境时在此短暂停留），但这里的公民信心满怀地宣称，图拉真皇帝对他们关爱有加。正如撒路塔里斯的规定所要求的那样，他们每隔两周就举着图拉真闪闪发光的银质雕像，游行在城市的街道上，以此来确认他们自己在这个庞大帝国中的重要性。

就在二三十年前，阿弗罗狄西亚城（在以弗所往内陆延伸约130

公里处）两个最富有的家庭宣告了他们自己的重要性及其城市和罗马的特殊关系。他们共同出资修建了两座宏伟的白色大理石柱廊，献给阿芙洛狄忒（该城即以她的名字命名）和“神宠的神明–皇帝”。柱廊有3层楼高，在一条大理石铺就的90米长道两旁相对而立。道路的一端耸立着一个巨大的门楼，另一端是用于帝国崇拜的宏伟神庙。柱廊的柱子将上面两层划分成大体呈正方形的格子，共计190个，每个都饰以有花纹的雕塑。北面柱廊的第二层饰以奥古斯都时期被征服诸民族的拟人化形象。与此直接相对，南面柱廊的雕塑则描绘了希腊神话中的场景。在最上层，描绘罗马诸皇帝的浮雕和描绘奥林匹斯诸神的浮雕并排在一起。在此，有限的历史时间和永恒的时间融为一体。在另一组浮雕中，一个带翼胜利女神像居中，一边是庆祝公元43年克劳狄入侵不列颠的浮雕，另一边则是庆祝公元54年尼禄即位之初在亚美尼亚获得短暂军事胜利的浮雕。如同奥林匹斯诸神一样，这些罗马皇帝也用英雄式的男性裸体雕像来呈现。一尊精心雕刻的奥古斯都像——其披风在身后飘然张开——正在接受象征大地和大海的形象的致敬。另一尊健壮的克劳狄像以胜利者的姿态踩在被击败的不列颠尼娅身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脑袋往后拉扯，准备给她致命一击。

这些场景意义深刻。它们在庆祝罗马胜利的同时，同样力图将它理解成是由传统神话与远古神明确立的宇宙秩序的一部分。通过把罗马皇帝看成神明一般，不受时间和距离的限制，行省居民便能理解他们自己的屈从地位。他们自己作为异族人的历史便能和十分罗马化的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阿弗罗狄西亚，甚至征服扩张——帝国最为残酷的一面——也被纳入了在希腊世界长期存在的宗教体系里。通过一系列形象淡化了它残酷的一面，强调了希腊神话和罗马历史的联系、阿弗罗狄西亚和罗马的联系以及奥林匹斯诸神和赤身裸体的罗马皇帝的联系。这些雕塑的观赏者能够以罗马进一步的征服扩张为荣。在这一帝国世界观中，阿弗罗狄西亚不同于不列颠尼娅，永远不会匍匐在罗马皇帝的脚下。

这一基本的模式不断被重复。米提林（位于爱琴海东北部的勒斯波斯岛上）的公民通过了一项法令，设立四年一度的运动会，以纪念

奥古斯都，并在他的诞辰举行祭祀。这两项活动都以业已存在的宙斯崇拜为模式。法令条文连同下达给前去拜谒罗马皇帝的使者的指令被刻成了气势磅礴的铭文。指令要求这些使者在禀告奥古斯都时，应该强调说米提林人已认识到，对于那些“获得超凡荣誉并具有神明的卓越及力量”的人来说，他们的提议微不足道；但他们也要奏明，如果能够想出任何其他的方式来表达对皇帝的敬意，他们也会立即付诸行动，因为“全城的人都会用所有的热情与虔诚来做任何使皇帝能更像神明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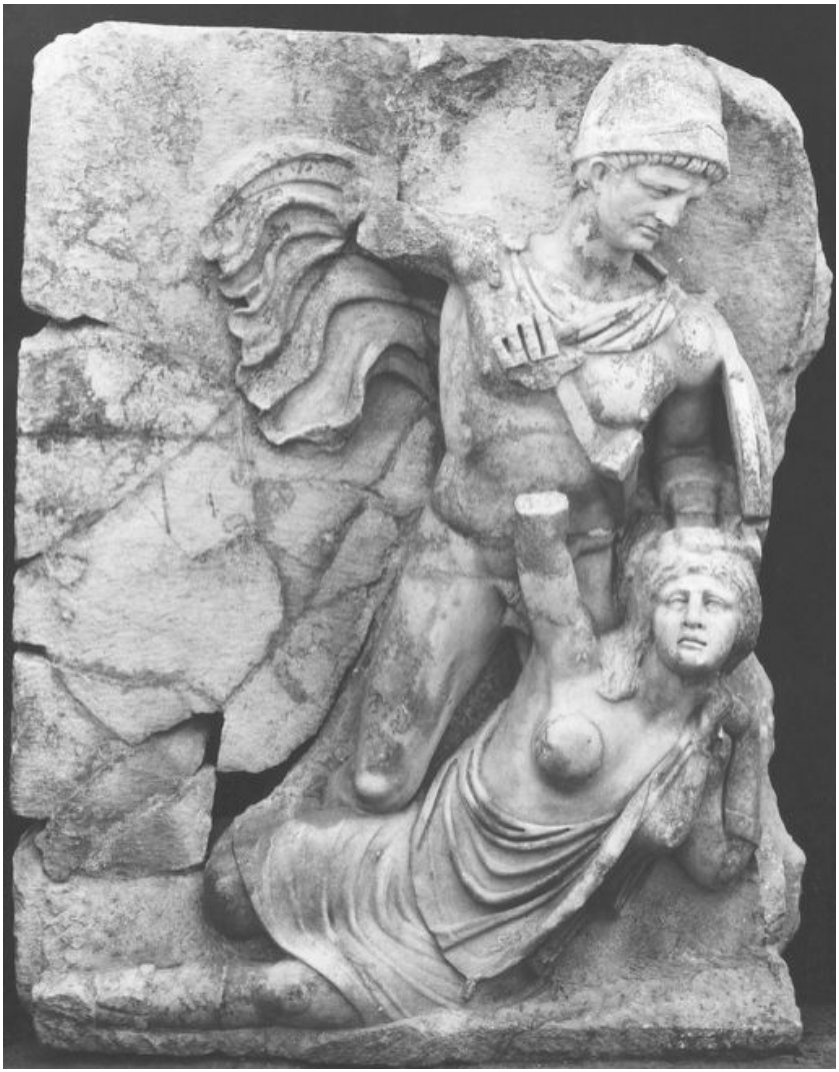

图4　克劳狄击败不列颠尼娅。用于皇帝崇拜的神庙建筑上的浮雕，阿弗罗狄西亚

在地中海遥远的另一方，高卢的一些地方贵族刻写铭文，纪念一些奇奇怪怪的、包含了多种文化传统的神明，诸如尼毛苏斯·奥古斯都、博马那·奥古斯塔、马耳斯·卢克提乌斯·奥古斯都、奥古斯都·阿努阿鲁斯和科美都阿·奥古斯塔女神。就像阿耳忒弥斯和图拉真同时出现在以弗所的撒路塔里斯游行中或是米提林将宙斯和奥古斯都联系起来

一样，这种明确将传统神明和罗马皇帝结合起来的做法，也证明了传统信仰体系的活力，它能够找到新的方式来理解罗马征服的本质，并作出创造性的回应。这种“宗教双语主义”的形式有助于把帝国和地方上的事务结合起来考虑。

如同在全帝国范围内一样，在高卢人们也经常通过皇帝崇拜来争夺社会荣誉。在公元2世纪70年代后期，皇帝马可·奥勒利乌斯和康茂德出面干预，以避免卢格杜努姆（今法国南部里昂，高卢地区皇帝崇拜的中心）在祭司职位上的花费因其任职者的竞相攀比而进一步增加。因为每个祭司都试图通过举办更为奢华的角斗比赛来超过前任。罗马元老院颁行法令，限定角斗士的最高价格及其训练师收取的费用。为了庆祝皇帝神性而进行壮观的公共展示的欲望不得不和防止帝国祭司开销过大的要求平衡起来。重要的是，对所有相关方而言，这个在该行省最具声望的职位之一，应该被高卢精英集团中最富有成员看重。

在罗马城，帝国崇拜的焦点无疑是过世皇帝的神性。在市政广场周围，他们宏伟的神庙和纪念建筑矗立在帝国的政治宗教中心。最早的神庙敬献给神化了的尤利乌斯·恺撒，它是由恺撒的支持者在公元前42年（即他被刺杀两年之后）建造的。恺撒的神性由一颗彗星的出现而得到确认，因为这象征着一位新神升入了天国。对于恺撒的养子屋大维而言，这为他将自己描绘成“神子”找到了理由。在随后的内战中，这个令人吃惊的称号凸显了神明对他的护佑，也为他的胜利提供了一种解释。在被击败的马可·安东尼看来，屋大维是个“靠名头获得一切的小子”。奥古斯都本人的神性则由一只雄鹰从其火葬柴堆中飞出而得到证明，此鹰是众神之王朱庇特的圣鸟。有时候这类令人称奇的升天时刻（在尽量真实再现的情况下）需要更为细致的想象。在公元161年后不久建造的一根记功柱的底座上雕刻了一幅浮雕，用于纪念刚去世的皇帝安东尼·庇护。它表现的是一位展开巨大双翼的青年背负着皇帝和皇后福斯蒂娜（20年前就已去世）飞向天国。由两只雄鹰护卫两侧，皇帝和皇后两人在象征罗马城的人物上面高高升起。有时候现代的观赏者盯着这类形象，完全觉得难以置信。对很多人来说，

很难理解一个不承认在人性和神性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的宗教体系。在古代世界，人与神并不是明确对立的两极。重要的不是个体的本性究竟是人还是神，而是他或她在这个人神之间的模糊领域内所处的位置。也有可能很难想象存在一个没有明确区分宗教和政治的社会。然而在罗马帝国，围绕皇帝崇拜的宗教仪式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统治的“正事儿”（诸如行政、司法、税收、军事等国事）。相反，宗教意象和宗教语言是罗马政治语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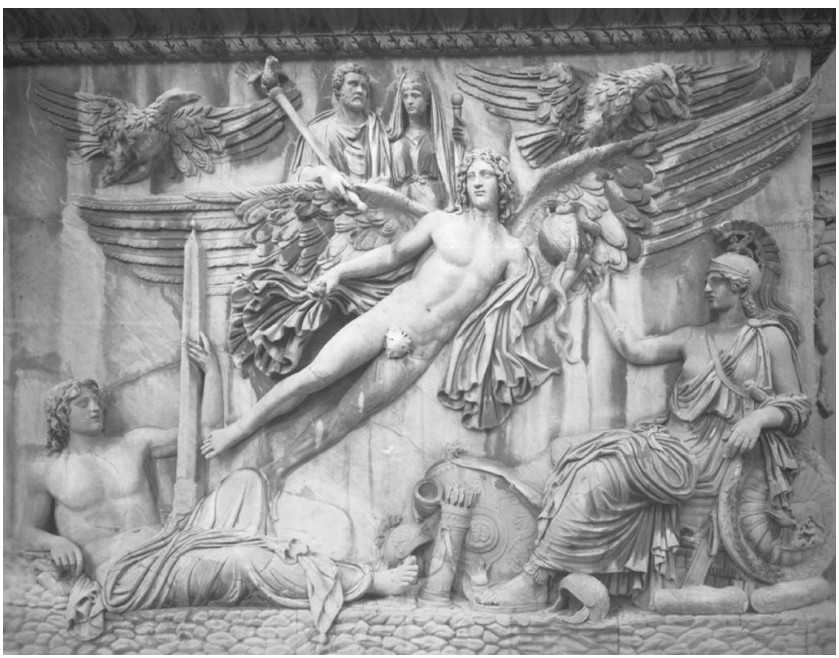

图5　安东尼·庇护和福斯蒂娜升天。安东尼·庇护记功柱底座上的浮雕，罗马，现藏梵蒂冈博物馆

敬拜在世皇帝及其死后化身为热心于这些活动的人提供了一种理解归属罗马帝国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方式。无论是在以弗所、阿弗罗狄西亚、米提林，还是在高卢，这种敬拜活动都能将个人和社会同一个单一的帝国中心联系起来；它能够将传统的神明及悠久的地方信仰整合进一个仪式体系，并使之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得到复制；它还能提供一种理解专制权力的语言。对于像卡约·维比乌斯·撒路塔里斯这样在

自己的城市里处于最高地位的富人来说，向另一个凡人低头致敬会冒不堪设想的遭社会羞辱的风险，但崇拜一个神明为地方显贵提供了一种既能承认自己的从属地位又不失颜面的方式。实际上，在争夺城市和个人荣耀的竞争中，显示和神圣皇帝的特殊关系既加强了那些担任祭司和赞助节日、出资建造神庙者的特权地位，又确认了他们城市的优越地位。特别是，这公开表示，他们是属于一个世界性帝国社会的成员。公元2世纪埃及一片纸草上保留下来的部分谚语式问答录，简洁地概括了这种由帝国强加的天地等级观念：

> 什么是神明？权力的行使。
> 什么是统治者？宛如神明。

接近皇帝的难题

对于许多接近帝国中心的人，尤其是对于那些身处皇宫的人，如此满怀信心地宣布皇帝的神性，并没有完全领会到当面和皇帝相处的复杂性。毕竟，皇后福斯蒂娜娴静地站在她钟爱的丈夫身旁、他们一起安详地飞上天国的情景和一个桀骜不驯的女人、其放荡的生活为安东尼·庇护严格的家规所约束的形象之间有着很大差距。同样，在阿弗罗狄西亚的南面柱廊上的克劳狄裸露着威武的身躯，身材比例极其匀称，这和现实中淌着口水、说话结结巴巴和遇事优柔寡断的皇帝也有着很大差别。据说在他小时候，其母安东尼娅无情地抛弃了他，斥他为不完全的人："与其说天生不完全，不如说简直没有开始生长"。

一面是专制统治，像神一般行使绝对的权力，另一面是那些罗马帝国统治者具有的凡人的缺点，这两者间的不一致有时会成为人们消遣的对象就不足为奇了。最逗人的俏皮话是由皇帝本人说的。据说在公元79年6月，维斯帕西亚努斯在临终之时以嘲讽的语气俏皮地说道："见鬼！我想我要变成神了！"在此25年之前，即公元54年，卢奇乌斯·阿内乌斯·塞内加（著名的道德论者、哲学家和剧作家）撰写了一篇辛辣讽刺克劳狄皇帝神明化的作品。它的标题*Apocolocyntosis* 是

希腊语中的“apotheosis”（“神明化”）一词的巧妙变体，大体可译为“南瓜化”。塞内加想象，死去的克劳狄站在奥林匹斯的天庭门前，嚷着要求进入天庭。朱庇特有些不知所措，召集众神商议此事。在争论结束的时候，克劳狄的叔祖、已神化成仙的奥古斯都发表长篇演讲，坚决反对接纳他：“难道是为此我才保障陆地和海上的和平的？难道是为此我才制止内战的？……谁会把这个人当作神明来崇拜呢？谁会相信他呢？如果你们把这类人变成神明，那么谁也不会相信你们也是神明。”在场诸神无不称是。克劳狄当即被逐出天庭，并被墨丘利拖到冥界接受永世的惩罚。

尽管这些话尖酸刻薄，但这类幽默的讽刺作品还是应该受到认真对待。与其说它们说明了罗马精英阶层对皇帝神性持某种怀疑的态度，不如说它们承认了（我们社会中最好的政治讽刺作品通常也是如此）理解权力的困难和围绕权力的行使进行直接批评的担忧。问题不在于接受一个在世皇帝的权威，而在于建立一个道德体系，以便使皇帝的行为得到评判。在其哲学论文《论仁慈》（作于《南瓜化》发表两年之后，是写给尼禄皇帝的）中，塞内加提出，要行使帝国权力就要有种紧张感和自我约束的精神。负责维持和平者不得不随时为战争做好准备，负责司法者不得不总是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语言：

> 陛下也许难以相信，君主会被剥夺即便最低贱者也享有的说话的自由。陛下也许会说：“这是枷锁，而非最高权力。”果真如此吗？陛下难道没有意识到，最高权力意味着陛下要接受一种高尚的奴役吗？……居于至高无上之位所受的奴役在于不可能从这一地位下降。陛下与诸神一样同受这种限制。他们同样被牢牢系于天庭，……陛下也被固定于权力的顶峰之上。

尽管皇帝如同神明，掌握了帝国的权力，但他们可能也受制于一套道德规范，其行为理应合乎这一规范，贵族精英一直以此来颂扬皇帝。公元100年9月，著名的元老院议员小普林尼向图拉真和元老院发表了一次演说，感谢皇帝授予执政官一职。在这篇颂词中，普林尼极力强调图拉真的主要美德：仁慈、简朴、虔诚、开明以及平易近人。

他像神明一般关注正义："他目睹一切，耳闻一切，只要有人请求他帮助，他立时到场"。实际上，即使朱庇特也有理由感激他："由于他把你给了我们，以便卸去他自己对于整个人类的责任，他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天国之事"。尤其是，普林尼赞美图拉真的谦逊，赞美他作为公民之一员的行为，和普通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约束，并相互尊重各自的社会地位。在普林尼精心构建的政治经济学中，好皇帝同时也是好公民——罗马贵族精英经常以巧妙的修辞艺术重述这个悖论。的确，普林尼令人称奇的警句式语言几乎使人忘记，君主不可能同时也是臣民：

> 皇帝是我们中的一员，他的地位之所以更高更突出，乃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我们中的一员，并且认识到他既是众人之上的统治者，也是一个普通人。……当一个人身处最高位，不能再向上一步时，他唯一可以往上走的路就是走下来。

当面赞扬一个专制君主永远不是件容易的事。普林尼优雅的修辞表述抓住了——即使只是暂时地——廷臣所面临的困难。他们和图拉真相识，并且他们的成功仰赖于他不断的关照。要连贯地把握理解帝国权力各种可能的、时而又明显矛盾的方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普林尼而言，关键（正如在以弗所和阿弗罗狄西亚）在于宣称在他的听众和皇帝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其演说的核心在于论证，图拉真和帝国精英阶层是利益的共同体。一个值得称颂的皇帝应该试图保护这个群体的特权。在普林尼看来，皇帝展示的最大美德即是愿意被看成是"我们中的一员"。实际上，普林尼用另一个令人难忘的悖论说明，正是图拉真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行事才使他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陛下从我们都踩踏过的土地升入天国，在这里皇帝的脚印和我们的脚印融为一体。"

书写帝国权力

普林尼的同代门生苏埃托尼乌斯是一位学者和能干的官员，在图

拉真及其继任者哈德良的宫廷里担任过许多要职。普林尼通过赞扬图拉真对帝国权力的行使而暗示的许多期望，在苏埃托尼乌斯撰写的一系列皇帝传记里得到了更为公开的表述。和普林尼一样，苏埃托尼乌斯公开进行道德评判。他既赞扬也批评，他批评的尽可能是很早以前的皇帝。他为之作传的所有皇帝都已死去，因而没有什么危险，其《十二恺撒传》中的最后一位皇帝是图密善，也已在他写作的二三十年前去世。

作为一名传记作家，苏埃托尼乌斯尤其致力于揭示人类行为的秘密动机。好皇帝因其美德而能享有盛名：开明、谦逊、中庸、仁慈。他们的个人功绩和有节制的私生活反映了其政治主张，即尊重罗马富有精英阶层的地位和重要性。在苏埃托尼乌斯看来，奥古斯都是卓绝不凡的典范，他恢复了元老院的荣誉，并认可了其首要地位。正如他为国家建立了良好的秩序一样，奥古斯都在私生活方面也值得赞赏，是自我节制的好榜样：

> 从仍然保留下来的躺椅和桌子可以看出，他没有在家具和家居用品上花钱，……据说他只在低矮而装饰简易的床上睡觉，……他吃喝节俭（我甚至不愿省略这点），通常只吃普通的食品，尤其喜食粗面包、小鲱鱼、手工制作的软奶酪和青无花果。

坏皇帝的标志是他们的恶劣品质：傲慢、残酷、贪婪、奢侈、纵欲。他们的性格缺陷及其私生活的荒淫无度，反映了他们对维护罗马社会等级体系的漠不关心，而这一点是应当受到责备的。在苏埃托尼乌斯看来，卡里古拉无耻地在普通公民中博取公共声望清楚地表明了社会的失序。他威胁说要授予自己最宠爱的宝马执政官职位。我们不应把他的威胁看成是巧妙而蓄意地侮辱这个象征元老院议员生涯顶峰的官职，而应看成是他几近疯狂的恋马癖。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如果人们说一个皇帝不顾礼仪颜面，在公共场合命令元老院议员跟在他战车后面跑，人们也会相信他在私生活中一定沉湎于奢华酒宴，整日同男男女女、议员的妻子、甚至他自己的姐妹交媾贪欢。

苏埃托尼乌斯在卡里古拉身上所注意到的道德腐化在尼禄那里得到了重现。尼禄应该为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灾负责，这是他巧取豪夺土地的开始。在城市中心一块50公顷的土地上，尼禄建造了一座新宫殿，它坐落在风景优美的享乐花园里。就其规模和奢华程度而言，尼禄的“黄金屋”远远超过了奥古斯都及其后继者们在俯瞰市政广场的帕拉丁山丘上修建的皇帝住所。在苏埃托尼乌斯看来，在罗马市中心建造可谓是乡间庄园的做法，颠覆了事物的自然秩序。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表明尼禄政权无意维护一个良治社会的信号。帝国权力可能更多地基于城市的大众诉求而非元老院的精英支持，这种威胁最为恣意地表现在尼禄对诸如战车比赛、戏剧和角斗士比赛等大众娱乐的热情中。对苏埃托尼乌斯而言，这是性格存在致命缺陷的某种证据。其道德教训十分清楚。一个在角斗场上角斗、在舞台上表演的皇帝，更有可能被谴责为是危险的自大狂，在世界的都城陷于大火的时候，他却在漫不经心地弹着里拉琴或是哼着荷马史诗中的小曲。

对尼禄演技的关注，也是对其统治最有影响的记叙中的重要主题。这一记叙和苏埃托尼乌斯的传记一道，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人对罗马皇帝的认识。和普林尼以及苏埃托尼乌斯同时代的科内留斯·塔西佗是最敏锐的历史学家和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之一，其著作从古代世界流传了下来。在其《编年史》（约公元120年写成）中，塔西佗描绘尼禄乐意在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他认为这是尼禄对在皇宫这个更为私人的世界里不断排练的一系列技艺的公开表达。在这里尼禄皇帝也在表演，在这里由廷臣和皇族成员组成的一小群观众试图预测剧情，以便知道何时鼓掌、何时说话、何时保持沉默。

《编年史》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之一开始于皇帝的家宴。全家人聚在一起，看上去一派温馨、其乐融融的样子。出席宴会的有尼禄的母亲阿格丽品娜，年轻的屋大维娅及其兄弟不列塔尼库斯。作为克劳狄皇帝幸存的最后一个儿子，他对尼禄的皇位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席间不列塔尼库斯突然昏倒在地，说不出话来，拼命地喘着粗气。这（至少在塔西佗的叙述中）是一个谋杀的情景。不列塔尼库斯的一杯热饮已由其随从尝过，但随后用了含有剧毒的凉水冷却。在年轻的王

子气绝之时，尼禄却说并无不寻常之事发生，这个男孩只是癫痫病发作，很快就会没事。在知道了不列塔尼库斯并非在演戏，而是真的死了之后，那些不谙宫廷虚礼者匆忙离开了宴会厅。那些熟谙此道的人则留在原位。不列塔尼库斯慈爱的姐姐屋大维娅并没有畏缩（用塔西佗的话说）：“尽管她年轻不经事，但已学会了掩饰自己的悲伤、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各种情感。”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尼禄身上，看他怎么做，他们好依此而行。“接着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宴会的喜庆欢乐气氛又重新恢复了。”

尼禄的皇宫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即使是像无辜的屋大维娅这样沉默的旁观者，也不得不和别人一道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在不列塔尼库斯死去4年之后的公元59年3月，尼禄邀请母亲和他一起到巴伊埃度假，这个度假胜地在今天那不勒斯附近的康巴尼亚海滨，那时达官贵人常到此地。阿格丽品娜接受了邀请，盼望着好好（据塔西佗所载）享受一番。而且，尼禄在一次表现得尤为体贴周到的宴会之后，命令一艘装饰华丽的新船送她渡过海湾。一个星光明亮的夜晚，在靠近海岸的地方，灾难降临了。一切似乎都按照尼禄的计划进行：船散架了，也许这原本就是设计好的。这本会是又一次谋杀。但阿格丽品娜和她的侍女阿克罗妮娅被她们斜靠躺椅的结实边架所救，没有被压死。在接下来的一阵混乱之后，她们落入水中。

阿克罗妮娅叫喊说她是阿格丽品娜，自忖她会因此而得救。但是她装得太逼真，船员立即用锚和桨把她打死。阿格丽品娜本人则静静地游到岸边，只是受了点轻伤。尽管怀疑有人企图杀她，她还是立即令心腹仆人阿格尔姆斯去向尼禄报告，说她侥幸从一次事故中死里逃生。而尼禄则惊慌失措，将一把宝剑扔到阿格尔姆斯脚下，声称他刚刚侥幸逃过一次暗杀。尼禄宣称阿格丽品娜明显想要害死她的亲生儿子，于是派军队去杀她。宫廷里的人不知所措。一些人开始庆祝皇帝的好运，尼禄则眼含泪水，哀悼他生母的死亡。

在塔西佗的《编年史》中，尼禄对帝国权力的行使，扭曲了他的世界观，并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在尼禄统治下，罗马是个黑暗险恶之地，诸事皆暗藏玄机。在这里和皇帝有关的人只能力图揣摩皇帝心

血来潮的举动。所有人——或有意地、或偶然地、或不情愿地——都不可避免地陷入虚伪和欺骗之中。塔西佗把政治世界看成一个舞台，所有人都在表演，而只有少数人（如果有的话）能撰写自己的剧本。这个核心意象极具吸引力。对于那些坚决持怀疑主义立场的人和那些热情支持共和主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警示专制统治危害的意象。贯穿《编年史》始终的就是对腐蚀权势之人、危害统治过程本身的帝国体制的揭露和批判。这里面没有英雄人物。塞内加（尼禄亲近的幕僚之一以及《南瓜化》和《论仁慈》的作者）在自己的浴室自杀，试图通过此举来逃避帝国政权不可接受的要求。这必然是徒劳之举。在塔西佗看来，这无谓的死亡有点像是一场闹剧，以一种残忍的方式暴露了（因为这位博学之士气绝之时仍在让文书记下他的想法）塞内加过于夸大自身重要性的想法。

> 节俭的生活方式导致身体衰老而瘦弱，他的血只能缓慢流出。塞内加割断了腿上和膝盖下面的动脉，……然而即使在这最后时刻，他仍能说会道；因此他唤来文书，让他们记下一篇长文。

尽管塔西佗对专制独裁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恐怖统治进行了道德批判，但我们应该谨慎对待而不应全然接受这些批判。塔西佗生动的文风（如同19世纪最优秀的小说家一样）有时候能使读者忘记，他根本就不可能知晓那些他当作无可争议的事实而描述出来的许多行为和动机。如果尼禄，或者屋大维娅，抑或阿格丽品娜真是在掩饰他们的情感，我们也很难确定塔西佗或者给他提供史料来源的人何以知道他们真正的感受。相反，塔西佗描述的帝国历史中，一切都是狡诈谋划的，一切都是事先精心安排的，一切都是娴熟表演出来的。真正欢呼的大众不起作用，来自贵族、民众或行省的任何真正支持也不起作用。没有可能确定不列塔尼库斯是否真正死于癫痫病发作，或者阿格丽品娜是否确实遭遇了怪异的海船事故。塔西佗记叙之时已是事发60年之后，他怎么可能收集、研究和核实有关谋杀阿格丽品娜（如果的确如此的话）企图的重要细节呢？即使我们假定塔西佗总是力图恢复

事情原貌，我们又怎么能确信塔西佗能够有把握从谎言中筛选出事实呢？

图6　尼禄和阿格丽品娜。用于皇帝崇拜的神庙建筑上的浮雕，阿弗罗狄西亚

当然，关于尼禄的记载也有其他的版本，它们可能和塔西佗的记载一样令人信服或是一样不可信，或者说一样无从知晓其真实性。但

是可能找到其他的方式来考证这位皇帝的名声。至少我们应该质疑塔西佗记叙罗马皇帝时令人难以忍受的自以为是和苏埃托尼乌斯在帝王传记中强加的道德规范的诱人之处。苏埃托尼乌斯（总是热衷于强调罗马精英阶层的权利要求和偏见的重要性）和塔西佗（对他而言，权力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他们自己也是关于如何理解帝国权力争论的一部分。仅仅因为他们有时似乎更为直接地投合现代人的心理并不能使他们的叙述更为准确或可信。两人都有自己巧妙的安排，读者应该敏锐而不安地意识到这一点。

和罗马皇帝的这种形象一道，我们可以同时尝试列举一系列其他观点——一些相互矛盾，一些相互补充，另一些则相互重叠。在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严肃的历史记录之外，我们还应该列举奢华的游行式、昂贵的雕塑组合、言辞夸张的演说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碑铭。这样做不会使我们更接近“真实的尼禄”或其他任何皇帝（最终的目的不是评判一种记叙是否比另一种更可信）。但我们却更能理解罗马世界的人们理解和表述帝国权力的各种方式。

在公元1世纪中叶的阿弗罗狄西亚，那些负责在皇帝神庙前的两座柱廊里建雕塑的人，定制了两块敬献给尼禄的大理石石板雕塑。如同其他罗马皇帝的雕像一样，这些雕塑也是一个庞大的雕塑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包括了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和奥林匹斯诸神。在一块雕塑板上，尼禄赤裸身体，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一个精疲力竭的女人面前耀武扬威，后者代表了被征服的亚美尼亚。在第二块雕塑板上，他身着军服，手持长予，可能还有一个宝球，其母阿格丽品娜左手拿着丰饶角（一种象征丰足的角，角上盛满了葡萄和石榴），正给他戴上桂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想象表现了一个强有力的神明般的皇帝，它们是对罗马帝国持久的力量和繁荣的公开颂扬。作为帝国力量的象征，这两块雕塑板不应太轻率地被我们屏弃——尽管像塔西佗这样一个历史学家可能只会带着挖苦和嘲讽的微笑看它们一眼。

第三章

共　谋

统治罗马帝国

公元2世纪初，在小普林尼为担任执政官而发表了一篇含义微妙晦涩的答谢词10年之后，图拉真皇帝派他去统治黑海南岸的比提尼亚–本都行省。留存下来的普林尼和皇帝的通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罗马高层管理者的独特机会。在写给皇帝的信中，普林尼表达了他执行敕令的热情。在为期两年的时间里，他给图拉真写了61封信，内容涉及各种事务，其中39封是请皇帝就有关事务作出决策或是给予认可。例如，在接到皇帝的许可之前，普林尼没有擅自审查阿帕梅亚城的市政账目，尽管该城公民愿意提供这些账目（考虑到前任皇帝准许阿帕梅亚免于总督审查，普林尼的犹豫自有其理由）。他还请求图拉真批准所有新建筑的建造，因为在此前的10年里，建筑工程成为市政开支过度的主要原因。他还向图拉真汇报了诸如尼科美狄亚两座引水桥未能完工、修建了一半的尼凯亚露天剧场下沉、在克劳狄城建造新浴池的规划过于庞大等问题。他建议在尼科美狄亚修建一条运河，在锡诺普修建一座引水桥，在普鲁萨建造新浴池，给阿马斯特里斯城主街上发臭的敞开式排污沟铺上遮盖物。

从某个角度来看，尽管普林尼在比提尼亚–本都的管理活动是必要的，但是却似乎比较平庸（确实几乎不值一提）。他会坚持审查市政开支的记录或是请求图拉真批准建筑计划，抑或试图使帝国指令的模棱两可之处协调起来，这无疑说明他勤勉地履行了职责。同样，我们可能会想，总督关注一个繁荣行省里城市财政的健全本是无可厚非的。以现代人的感受而言，在两年时间里向皇帝请奏39次（即使这仅仅是更多奏请中公布出来的一部分），几乎不会有人觉得普林尼的管理是干涉过多的。但是对当时的人而言，这些详尽的调查之所以值得注意，恰恰是因为它超出了通常的做法，超出了罗马帝国统治应有的标准。

普林尼是个例外，而非常例。在多数时候，罗马总督们惯于被动

作出反应，而非主动采取行动。他们并不干预自己行省里各城市的内部事务。如果有人请愿或是要求仲裁，他们才可能选择裁决，尽管在许多时候仅仅是发回地方市政官员审理。在遇有要求或必须的时候，他们才对事态或是争端作出回应。他们是当地人可能求助的权威，而非主动行动的调查官。行省总督下属人数不多，反映其职权范围有限。普林尼不可能有100多个训练有素的官员帮他管理比提尼亚–本都行省事务。在可能发生反叛或因容易受到攻击而须更多警戒的军事化边境行省，官员人数要多一些。在公元2世纪，不列颠行省驻扎有3个军团，其总督有多达450名下属官员协助他，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军士中临时调派的。总体而言，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协助像普林尼那样负责行省管理的总督的官员总共也就1万人左右。

这个数字非常小，尤其是对那些习惯于现代国家施加严格管理的人们而言。这些现代国家通常都有一套涉及面很广的政策和计划。在此可以进行一下统治规模的大体比较：为了服务于和罗马帝国大体相当的人口，英国政府目前雇用约50万官员。不过要承认，罗马政府从未试图提供大众教育、住房、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福利（也不认为有必要或值得这么做）。即便如此，从管理的角度来说，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统治是非常经济而节俭的。很难说罗马帝国是统治过度了。

小城市社会

这种最少干预的状态是行省里许多人渴望维护的。在普林尼担任总督之前的第十年，比提尼亚–本都行省的中等城市普鲁萨的一个头面人物呼吁同伴，不要做任何可能破坏这种有利安排的事情。这位才艺出众的演说家和哲学家叫狄奥·科齐亚努斯，钦佩不已的后人称他为狄奥·克里索斯托姆——即“金嘴的狄奥”。他的演说留传下来的有80篇，其中一些是在市政大会上的发言。（正如普林尼对其浴池的调查所确认的，）普鲁萨是个普通的地方，很像散布在地中海地区的成百上千的其他小城。它坐落在迷人的比提尼亚最高峰奥林帕斯山下一片

宽阔的阶地上。普鲁萨的繁荣依赖于出口低矮山坡上茂密森林里的木材，耕种山下宽阔肥沃的山谷，以及吸引旅游者到这里的温泉来。

普鲁萨及其周围领土上的居民由一个公民大会和一个市政议事会来代表。公民大会向所有达到最低财产资格的成年男性公民开放，议事会成员资格则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局限在大概两三百个最富有的公民中间，他们担任着城市的高级官职。这些人是普鲁萨的地主士绅阶层，是一个收入主要来源于农庄的富人团体。这些富人及其家庭代表了这座城市的“品质”，他们期望其高贵的社会地位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和重视。他们是一个势利、自私、内向的阶层。在不断的艰难的地位争夺战中，他们心怀妒忌地互相注视着对方。他们将时间花费在了精心组织的社交活动（宴会、打猎、履行公共职责）、做作的繁文缛节、以及煞费苦心而又错综复杂的阴谋诡计中，后者是任何一个以继承权和婚姻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小特权群体的特征。

普鲁萨每年从这个“上层阶级”的成年男性中选举官员（名义上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但必须从市政议事会事先选定的候选人中选举），最高级的职位则由少数权势家族把持。狄奥·克里索斯托姆父子都担任过首席行政官。在市政议事会的监督下，一个由地方性租金、间接税（例如关税）和特别税组成的税收体系为城市管理提供了资金：为差役队伍提供经费和设备、监督粮食供应以确保有定价合理的食物、维护排污系统、维修公共建筑和街道、供应公共浴池燃料、规范私人建筑以及控制度量衡。此外，市政议事会中最富有的成员为了获得优越的地位而永无休止地进行竞争。作为这种行为的一部分，他们被指望利用其私人资源承担公共娱乐的费用（宗教节日、纪念宴会、文化与体育竞赛、角斗士比赛等），并资助旨在美化他们城市的各项浩大工程。

同样重要的是，市政议事会集体负责向罗马交纳岁贡。这些岁贡部分按人头税计算，部分按财产税计算，用于在需要时（例如用于道路维护）组织和提供劳动力，以及为军队招募新兵。作为满足这些帝国基本要求的回报，像普鲁萨这样的城市被允许自己管理其内部事务。在狄奥·克里索斯托姆看来，是这种免于帝国干预的自由加强了小

城市社会持续不断的活力。同样，是帝国的存在（以及在动荡时进行报复的威胁）巩固了富人的高贵地位，并证明了他们对城市的控制是有充分理由的。

这些是地方精英阶层不愿放弃的重要利益。在公元1世纪70年代，普鲁萨人对食品价格的上涨感到愤怒，要求任命狄奥为负责粮食供应的专员，并要求他出钱补贴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粮食，从而使所有人都受益。在狄奥拒绝后，情况变得严重起来。一群人差点放火烧了他的房子。后来，狄奥在城市的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为自己的做法辩护。他列举了自己以前及其家庭世代的善举，举例说其祖父“慷慨地花费了他从自己父亲和祖父那里继承的全部财富，直至分文不剩”。狄奥宣称他已经负担了超出他应承担的公共开支，还说他其实不是普鲁萨最富有的人。他建议公民大会从那些尚未将私人财富用于公共支出的人中选出合适的粮食专员。

这是一个双重的指责，既指责公民，要求他们停止通过暴力强行提出要求，也指责在市政议事会里的同僚。狄奥有针对性地指出，市政议事会应集体负责确保普鲁萨得到合适的管理。也许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狄奥所宣称的财力有限及其祖父散尽家财的慷慨。即便如此，不管该城的精英阶层在此事中是多么不想表现出热心公益和慷慨解囊的精神，这样做都于其长远利益有害。如不能应对这一共同面对的挑战，那必会招致罗马当局的出面干预，而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狄奥以一个毫不客气的比方强调了这一点：

> 城市中所发生的事都逃不过总督的注意。正好相反，就像家长会将孩子在家里的淘气告诉老师，城市公民大会的不当行为也会被汇报给总督们。

后来不断有人对狄奥·克里索斯托姆的忧虑和他的自我利益表示了关注。在公元2世纪中期，另一位著名的希腊演说家埃留斯·阿里斯提得斯发表了一篇演说，热情洋溢地颂扬了罗马。他对罗马的颂扬牢牢基于其在斯米尔那（位于土耳其爱琴海岸的今伊兹密尔）的地方从政经历。在阿里斯提得斯看来，罗马帝国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对管理

地方社会的日常事务缺乏兴趣，这一点尤其值得称道。不仅帝国官员的人数少，而且在远离边境的地方也只有少量兵士。在帝国境内像小亚细亚这样最为和平的地方，整个行省驻扎的军队可能不超过500人。当然，帝国能够迅速地集结大军，但重要的是罗马的统治机构中没有永久驻扎在地中海地区诸城的军队。埃留斯·阿里斯提得斯对统治体制的这一好处大加称赞。在他看来，最好将罗马帝国描述为“独立城市的共同体”。反过来，城市的自治解除了罗马政府和军队的巨大负担：“没有必要在城市的要地驻扎军队，因为每个城市里最显要最有势力的人正为你们守卫着他们的家乡。”

地方精英集团是罗马帝国成功的关键。对于那些从最初征服的创伤中幸存下来、放弃任何无谓的有组织抵抗的人来说，和统治力量建立一种恰当关系的好处不言而喻。事实上，对于行省的许多人来说，他们最能感觉到的罗马统治就是加强了现存寡头集团的实力，使它们在地方能够施行绝对的控制。在像普鲁萨和斯米尔那这样的城市，帝国的存在明显加强了少数几个富有家庭令人难以忍受的对城市事务的独裁专断。就像狄奥·克里索斯托姆强调的那样，不能允许城市内部的争斗破坏公共秩序，进而危及现状。与此相似，在西部行省，罗马的有效统治依赖于和地方强人的亲密关系。在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帝国统治的确立结束了部落战争及其首领沉浮的恶性循环，在这之前他们岌岌可危的地位受到不断冲突的挑战。那些支持罗马统治的首领发现，通过和帝国力量建立密切联系，他们作为地方最显要人物（在罗马总督之后）的地位得到了加强。比起罗马征服之前，他们现在更加稳固地占有着权力和财产。

在地中海地区的各个城市中，罗马统治支持了地方精英阶层，保障了其重要性和权威性。连最令人恼恨的帝国要求，即缴纳岁贡，也可能使他们受益。那些承担征税经济风险的市政议事会成员，同时也最容易转嫁纳税负担。他们可以串通起来估低自己的财产总值、提早要求他人缴税以及自己拖后交税，这样一来，他们便能最大限度地转嫁负担，捞取利益。对于这些显贵来说，帝国统治的压力既是获益的潜在来源，又是其地方权力的基础。帝国的需要使他们对小土地所有

者少量剩余产品的暴力榨取（有时如此）合法化了。农民以佃农和纳税者的双重身份被束缚在了富人的田庄里。

对于那些统治地方并保障了和平以及定期上缴税收的人来说，其优越地位因获得罗马公民权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罗马帝国经常将公民权授予曾经担任市政官员的家庭及其直系后裔，也授予在罗马军队的辅助部队中服役满25年的兵士。狄奥宣称他应该被看成是普鲁萨有影响的人物，其中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其父母都是罗马公民。对于像狄奥这样的人来说，公民权的实际好处显而易见。他们获得了罗马法律提供的保护，对那些最富有和最有野心的人来说，他们由此而获得了在帝国行政部门和军队中担任高级职务的机会。

让组成帝国诸城中的统治精英有机会获得罗马公民权也有助于确保他们会主动去调和对地方和对帝国的忠诚。在公元168至169年，马可·奥勒利乌斯皇帝和卢西乌斯·韦鲁斯皇帝将公民权授予了尤里安的家人，后者是生活在摩洛哥阿特拉斯山区高处的泽格棱斯民族的领袖之一。为了宣传他是享有特权、与罗马有着特殊关系的帝国精英集团的一分子，尤里安的长子（他在九年之后也为自己的家人赢得了罗马公民权）用拉丁文将两位皇帝的授予状永久地刻写在了一块精心雕刻的青铜饰板上。对于那些希望追求如此成就的人来说（而且皇帝急欲鼓励其他人这么做），它传达的信息十分清楚。尤里安、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成为了罗马公民，“因为他乐意服从我们一方，表现得尤为忠诚”。就像每个知道尤里安的人毫无疑问都意识到的那样，在这里“我们一方”指的是罗马帝国。

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可以宣称是整个地中海范围内利益相互汇聚在一起的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在扩大公民权方面，罗马帝国比起其他古代国家和许多现代国家都更为宽容大度。（例如，在公元前5世纪推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只有父母同为公民的人才能成为公民。）这种对地方贵族相对大方的包容，是罗马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埃留斯·阿里斯提得斯特别挑出这一点来大加称赞：“这件事情比起其他所有事情都更值得关注和钦佩：我指的是你们的公民权及其宏大的构想，因为在其他地方完全没有发现类似的情

况。”阿里斯提得斯的赞扬很容易理解，因为他属于那个少数富有的享有公民权好处的小群体。最为重要的是，他的热情称赞揭示了罗马统治最为持久的一个方面，即在整个地中海世界，被征服的行省精英迅速而成功地转变成了帝国的统治阶级。现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能把自己说成是罗马人。

修建纪念建筑的冲动

行省中对于安全和繁荣最为引人注目的庆祝体现在私人出资修建的大量纪念性建筑中。地方显贵竞相以具象方式表达他们在所处城市中的优越地位以及他们属于帝国精英集团的身份。几乎所有城市都从这种竞争冲动中受益。现代观光者最为称道的柱廊、图书馆、神庙、凯旋门、浴池和露天剧场，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为表达自我优势而慷慨捐建公共建筑的高潮中兴建的，它们同时也是富人想要表明他们城市完全属于帝国城市这一奢侈愿望的产物。今天，这些建筑的精美大理石覆面已不复存在，其亮丽的彩绘装饰也已永远褪去，只有饱受风霜侵蚀的建筑骨架能略微显出它们以前的宏伟气势。

公元2世纪中期，葵库尔（今阿尔及利亚的贾米拉）最尊贵的公民之一卢西乌斯·科西尼乌斯·普里姆斯出资修建了一个巨大的新市集。它是一个由长方形柱廊（24米长，22米宽）包围着的广场，中间有一座六角形的柱廊式亭子，直径达5米。柱廊顶部的一圈铭文清楚地记录了科西尼乌斯的慷慨大方：他出资并指示他的兄弟卡尤斯监督建造“市集及其柱子和雕塑……还有亭子”。

同样重要的是，这个设计方案是有意模仿之作。卢西乌斯·科西尼乌斯的新市集是罗马大市集的微缩形式，后者建于公元59年，公元64年的大火烧毁了罗马大片城区之后，在尼禄的统治下又得以重建。大市场由一个大露天广场组成，周围是一个两层楼的柱廊。在市场的中央耸立着一个同样宏伟的圆形亭子。这种设计在帝国各地广为复制。以罗马大市场为模式建造市场表明这些城市都紧跟大都市的时尚风

潮。一座偏远的行省小城也会炫耀它关于帝国首都和国际时尚的知识。

对罗马城本身而言，大市集的建造是为了赶超一座古老得多的建筑（可能也是在公元64年的大火中烧毁的），后者最初是执政官、常胜将军马可·弗尔维乌斯·诺比利奥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出资建造的，其平面布局后来成了标准的设计：一个长方形围场，中央建造一座亭子。大勒浦克斯城（位于今利比亚沿岸）复制了这一罗马建筑原型，在此建造了一个四面由柱廊环绕的广场，中央是两座灰色石灰岩的圆形亭子，每座亭子都由八角形的柱廊环绕。在公元前8年市集落成时写的碑文把捐献者阿诺巴尔·塔帕皮乌斯·鲁富斯和当时在位的皇帝奥古斯都联系在了一起。

鲁富斯还出资建造了大勒浦克斯壮观的新露天剧场。剧场的座位区呈圆弧形，直径达95米，部分靠着一个自然的山坡，部分建在压实的泥土和碎石之上，还有部分建在石面的水泥穹隆之上。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鲁富斯在一些显眼位置刻写的铭文中夸耀了自己的慷慨大方，其中两篇铭文刻写在舞台出入口的上方，面对着观众。铭文以拉丁文和布匿文（当地语言）写成，前者强调他和广阔的罗马世界的联系，后者确保即使不懂拉丁文的人也能知道他的慷慨，并赞扬阿诺巴尔·鲁富斯这个“家乡的装扮者、和谐的热爱者”。

图7　市集，大勒浦克斯

在这个露天剧场里，地方精英能够展现他们自己。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大勒浦克斯的富人们竞相争取超过鲁富斯。他们出资增添更为壮美的装饰，包括改进座位，用矮墙把市政议事会的座位和其他观众隔离开来，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的中间增加一个小神龛，在舞台背后修建一面富丽堂皇的装饰性大理石遮蔽屏。这面遮蔽屏有三层楼高，上面饰有一百多个神明和皇族成员的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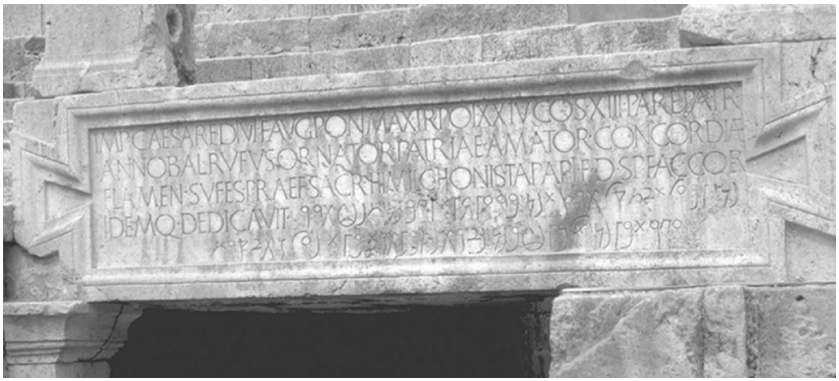

图8　表示向阿诺巴尔·鲁富斯致敬的铭文，露天剧场，大勒浦克斯

各地都在模仿这种慷慨和炫耀的方式。在半个地中海世界之外的阿帕梅亚（位于叙利亚西部），卢西乌斯·朱利乌斯·阿格里帕在公元115年的一次严重地震后宣布，他要为城市慷慨解囊。他负责修建了一座气派的浴池建筑和一个可用于举办音乐会和音乐或演说竞赛的大厅。在一篇长篇铭文中阿格里帕详细叙述了他的慷慨之举，列举了他在市政议事会担任过的各种官职以及其他善举："他还修建了浴池和它前面连接主街道和邻近大厅的柱廊，并捐献了他花钱购买的所有土地"。接着他详细列举了为浴池定制的青铜雕塑，包括一组忒修斯和米诺牛的雕塑以及一组阿波罗和玛息阿的雕塑。玛息阿是森林之神，他轻率地向阿波罗挑战，要和他在音乐上一争高下，输了比赛后，他被活活鞭打致死。这第二组雕塑也可能是阿格里帕对那些在隔壁大厅中竞逐奖项、充满渴望的表演者温和而诙谐的评论。

阿格里帕的青铜雕塑提醒我们，他热心公益并不仅仅表现在捐助建筑上。他本人还提供资金，以便向市民派发谷物和昂贵的橄榄油。在以弗所（如同第二章所描绘的），卡约·维比乌斯·撒路塔里斯资助了一个盛大的游行式，以向阿耳忒弥斯和图拉真皇帝表示敬意。其他捐资人则力图推广其城市的文化活动。在公元2世纪20年代中期，卡约·尤利乌斯·德谟斯梯尼，土耳其西南部名不见经传的俄伊诺安达市的一位富裕公民，提出要出资创办一个四年一度的文化节，节日为期三周，包括诗歌朗诵、喜剧和悲剧表演、伴奏歌唱和演说比赛，并将

以他的名字将该文化节命名为德谟斯梯尼亚节。记录德谟斯梯尼善举和德谟斯梯尼亚节安排的铭文小心谨慎地指出，这一计划得到了哈德良皇帝本人的批准和市政议事会的热情赞扬：

> 议事会表扬了德谟斯梯尼对家乡慷慨的善意和对荣誉的热爱，他无与伦比的高尚行为，以及他对有神明护佑的诸皇帝的忠心，并授予他诸般荣誉。议事会还通过法令，以各种方式装点节日，并且不折不扣地履行对于批准节日举行的皇帝的忠诚。

和夸耀的铭文相配的是理想化的形象刻画。城市名流的正式肖像充斥于每座城市的公共空间，使旁观者对其刚毅和充满社会优越感的安详神态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阿尔及利亚的葵库尔，在市政议事会投票决定给科西尼乌斯兄弟立像、特别是表彰哥哥卢西乌斯的“慷慨大方”时，是弟弟卡约出资将雕像建在市场大门口的两侧。在叙利亚的阿帕梅亚，在新建浴池正面齐人高的部位固定着一系列结实的石头托座，上面安放着慷慨资助整个建筑群的卢西乌斯·尤利乌斯·阿格里帕的大理石雕像。这些俯视着所有行人的多个雕像，是由那些对这位显要人物的资助满怀感激之情的人们敬献的。他们高兴地公开称赞他为“缔造者、保护者和恩人”。

在整个帝国的城市中，名流们对令人羡慕的名誉的大肆炫耀被永久地刻凿在了石头上。那些乍看上去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是一种得意的自我满足，要是理解成显贵家族宣传自己优越地位的迫切需要可能会更恰当。这是一个善变的社会，个人的地位需要不断地得到确认。对几近倾囊而出的慷慨姿态的永久纪念确立了一个标准，对手和新来者都必须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竞争。

对成功的庆祝在公共场所和私人场所都有所体现。在今突尼斯的斯米拉特保存了一幢乡村别墅的遗迹，里面一幅公元3世纪的精美镶嵌画使当时看见它的人不得不想到，他们自己在那个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画中房子的主人马格里乌斯衣着华丽，正带头猎捕野兽。画面抓住了他慷慨资助的斗兽表演的瞬间，使所有来访者都能看到，这一

突出的展示就如同一张表现和国王或者总统会见的现代照片。名为马美提努斯、斯皮塔拉、布拉里乌斯和希拉里努斯的四名角斗士战胜了四头豹子，它们的名字分别为克里斯皮努斯、罗马努斯、恣意者和胜利者（但在这里显然名不副实）。在画面中央站着一名仆人，端着一个大银盘，上面放着四个鼓鼓囊囊的钱袋。镶嵌画中间的长篇铭文记录了观众的欢呼，证明马格里乌斯的同胞们认可他的慷慨大方是其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毋庸置疑，观众的欢呼给比他地位低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使和他地位相当的人停下来反思他们自己和他们家庭对公共荣誉的追求。所有人都会感受到表示赞赏的观众富有节奏的呼喊声的力量，他们不断重复歌唱着他们赞助者的名字：“马格里乌斯！马格里乌斯！”在马格里乌斯的乡间别墅里，纪念其成就的巨幅镶嵌画精心保存了这个广受公众赞美的珍贵时刻，以供特许的个人观赏。它试图让一个表示具有无可争议的社会优越性的瞬间永久流传下去。“富有即如此！权贵即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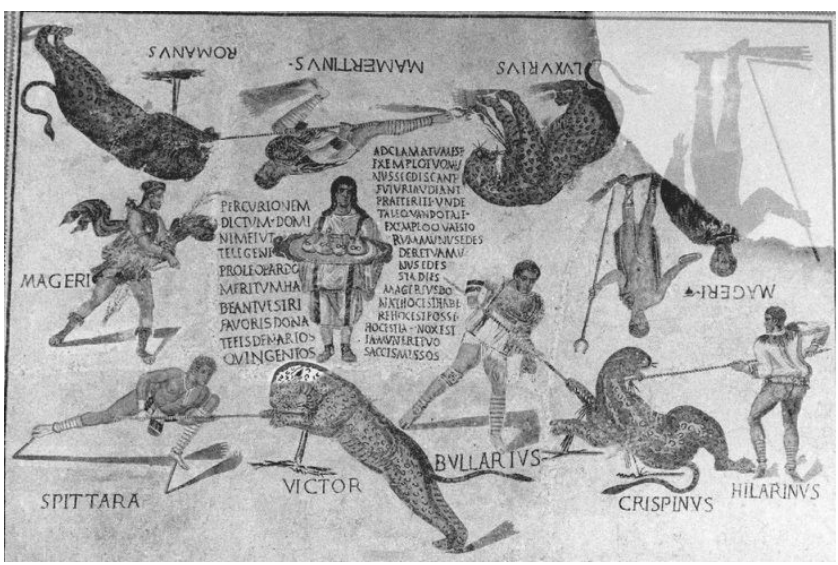

图9　表示向马格里乌斯致敬的镶嵌画，出自他在斯米特拉的乡间别墅，现藏苏塞博物馆，突尼斯

图10　在哈德鲁梅图姆（今突尼斯的苏塞）一个住宅里描绘维吉尔和缪斯女神的镶嵌画，现藏于巴尔多博物馆，突尼斯

忠诚的限度

很难确定，地方精英阶层的行为是主要出于对罗马帝国发自内心深处的忠心，还是出于在帝国体制中对他们自己地位的实际提升的关心。在一个通过血腥征服建立起来的帝国中，公开反对或反叛会招致迅速而果断的镇压。如果只说“赢得人心”、“忠诚”或是“热情”，而不谈这些东西必然会迅速转变为对实际利益更为赤裸裸的算计或更为急迫的追求，那是有问题的。一味宣称罗马“文明”带来的好处的说法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在为从公元77年起担任不列颠总督的克内乌斯·尤

利乌斯·阿格里科拉撰写的传记中，历史学家科尔内琉斯·塔西佗嘲讽了帝国的扩张。在这个遥远的行省，阿格里科拉力图推进城市化，建造罗马风格的房子和神庙，教导当地名流之子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鼓励穿罗马长袍而非粗人穿的裤子。塔西佗评论道："至于不列颠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他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虽然实际上这是他们受奴役的一部分。"

大体而言，绝大部分行省居民会反对如此刻板的分析。他们对帝国的感受要复杂得多，不是简单地在实行罗马统治方面充当机会主义的同谋和不可避免地受到征服力量的压迫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公元3世纪早期，哈德鲁梅图姆（今突尼斯沿海的苏塞）的一个富有居民为他的房子定制了一系列精美的镶嵌画。其中一幅描绘诗人维吉尔端坐着，手持一摊开的书卷，可以看清的内容是《埃涅阿斯纪》开头的诗句。在维吉尔身后站立着墨尔波墨涅和卡利俄珀，她们是分别掌管悲剧和史诗的缪斯女神。卡利俄珀正在读一卷书，而墨尔波墨涅则手持悲剧面具，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诗人表现出沉思和严肃的神态，双脚踏着搁脚凳，端坐在椅子上。

我们如何理解这幅描绘罗马最伟大诗人的镶嵌画呢？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证据，表明非洲精英阶层完全吸收了罗马帝国意识形态的关键要素，但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在远离罗马城的北非——即被击败的迦太基所属的北非——人们可能对埃涅阿斯的故事有着不同的理解。在这里，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埃涅阿斯抛弃狄多，或是接受其神圣使命可以作为他行为的辩护理由。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假定，哈德鲁梅图姆这位维吉尔镶嵌画的定制者毫不怀疑地支持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所宣称的"保障和平、推行法治、宽容被征服者、铲除傲慢者"。也许，当他在宴会之后向朋友吟诵《埃涅阿斯纪》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位富有的非洲人更为同情被击败的迦太基王后狄多，而非得胜的罗马人埃涅阿斯。

对于地中海世界享有地方权势的人来说，接受独特的罗马习俗的过程与其说是消极默认的过程，不如说是不可避免地——同时也通常是有利可图地——和统治力量进行调和的过程。这种调和可能也允许

维持地方上的传统和情感，不一定把它们看成是公开反抗的表示。毫无疑问，维吉尔镶嵌画的定制者慷慨地支持了公共建筑计划，把哈德鲁梅图姆的市政广场装扮得更为壮观。和比提尼亚–本都的狄奥·克里索斯托姆一样，他可能也在市政议事会里担任过高级职位。他一定也想让同伴看到他熟读经典拉丁作品的样子。

如果对于帝国共同文化的这种热情和对迦太基曾经统治北非的承认同时并存的话，那么也不应该认为这种热情在减少或是在衰退。毕竟，罗马帝国的统治依赖于地方和帝国利益的结合，这既有利于统治者，也有利于被统治者。考虑到这一点，塔西佗对于文明和野蛮之间仅一步之遥的嘲讽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尽管带来明显的好处，但也可以合理地怀疑，如果没有武力支持的话，或者说如果不是把拥有或者宣传帝国文化看成是缓和帝国奴役这一严酷现实的有效手段的话，统一的帝国文化的确立是否会如此迅速或者成功。

尽管很少付诸行动，但罗马随时都有可能报复它觉察到的行省的反抗，这种威胁就像一片暴风云飘荡在帝国诸城的上空。无论精英分子多么娴熟地在当地维持其影响力，他们能享有特权地位恰恰是因为他们一直情愿充当罗马统治的代理人。在面临罗马报复时，地方的特权地位、甚至罗马公民权也不起多大作用。公元1世纪60年代，后来当上皇帝的加尔巴在西班牙担任总督期间下令把一名被判有罪的投毒者连同其他罪犯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名罪犯对判决提出上诉，理由是他是罗马公民，加尔巴公开承认了他的优越地位，下令说，把处死他的十字架架得更高些，并漆成白色。

“你需要模仿演员”，希腊哲学家和散文家普鲁塔克（狄奥·克里索斯托姆的同时代人）这样劝告一个朋友和有抱负的地方政客：不要过度相信你自己的地位是稳固的。严格按照你的剧本表演，“不要超出当权者许可的节奏和韵律的自由度”。普鲁塔克劝告说，在担任城市官职时，明智的做法是回忆公元前5世纪伟大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经常对自己重复的话：“伯里克利，小心点，你统治的是自由人，你统治的是希腊人，是雅典公民。”此外，你应该对自己说：“你是统治者，也是被统治者，你统治的城市受总督的管辖，他们是皇帝的代理

人。”互利也是有限度的。当迫不得已时，地方精英——尽管他们十分珍视自治并艰难获得了罗马公民权——还是要听帝国号令。成功的城市领袖可能会同意普鲁塔克明智的评论：对你的地位“不要太骄傲和信任”，永远记住在处理你自己和你城市的事务时，把“罗马总督的靴子悬挂在你头上”。

第四章

历史的较量

基础与帝国

公元2世纪30年代，罗马皇帝哈德良入侵雅典。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皇帝对地中海东部这个文化都城的攻击，不是依靠精锐的罗马军团或是优良的军事供给，而是依靠建筑工人和细致的城市规划。哈德良一直夸耀自己对希腊文化的热爱。他是首位以游览者而非作战将军身份广泛巡游帝国行省的皇帝，他也是首位对地中海东部世界的古代历史和纪念建筑物产生持久和浓厚兴趣的皇帝。

在雅典，哈德良的新图书馆矗立在市中心，使古代市政广场上的其他建筑相形见绌。600年前（当罗马甚至还在奋力控制意大利中部的时候），雅典公民聚集在这里，处理一个民主国家的司法和行政事务。图书馆围成了一个四方院，四周被一个有100根柱子的巨大柱廊环绕着。柱廊的建筑材料是采自小亚细亚采石场的紫罗兰纹理的弗里吉亚大理石；图书馆内部装有闪闪发光的镀金天花板，并奢侈地饰以珍奇的画作和雕塑，还配以价值不菲的半透明的雪花石膏。这是最为华丽的皇家建筑。哈德良图书馆公开以巴罗克式的宏伟华丽为荣。矗立在希腊世界最著名城市中心的这座图书馆明白无误地昭示着罗马的财富和权力。

在雅典，哈德良还建成了罗马帝国所建造的最大神庙之一。奥林匹亚神庙——奥林匹亚宙斯的伟大神庙——开始建造于公元前6世纪（还在雅典成为完全的民主政体之前）。建筑工程时断时续，且耗资巨大，最近一位赞助者是早哈德良1个世纪的奥古斯都皇帝。在公元131年至132年巡游雅典时，哈德良亲自出席神庙的落成典礼，敬献了一尊由黄金和象牙镶成的巨大的宙斯雕像。尽管这个建筑群现在只剩残垣断壁，宙斯的巨大雕像也早已丢失，但是现代的参观者仍能明显感受到它的宏伟与壮观。在奥林匹亚神庙后面高耸的卫城上清晰可见的是帕提农神庙。这座献给雅典娜的近乎完美的神庙建成于公元前5世纪30年代——民主雅典当时正在最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领导之

下。帕提农神庙高耸于城市之上，它是雅典独立的永恒象征，让人们想起古代世界最出色的政治试验之一。

哈德良对雅典历史的帝国式挑战不仅仅体现在建筑上。奥林匹亚神庙的落成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希腊城市组织的开端，即泛希腊联盟的成立。这个联盟涵盖了五个罗马行省，远远超出希腊本土的范围，包括了马其顿、色雷斯、小亚细亚、克里特、罗得岛和北非的众多城市。联盟由一名高级行政官员和一个代表委员会主持，后者由成员城市从其最优秀的公民中选举产生。哈德良所设想的是一个永久的国际联盟，不仅包含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和阿戈斯等古城，而且还包括地中海东部那些能够证明和“古老希腊”具有密切联系的城市。

一些城市试图从神秘的历史中寻找证据来证明它们的希腊身份。在泛希腊联盟建立3年之后发布的一份官方公报中，哈德良亲自参与解决了昔兰尼（位于利比亚沿海的肥沃高地上）和托勒迈–巴卡（昔兰尼以西大约90公里处）之间的争论。昔兰尼的希腊身份毋庸置疑，它是在公元前7世纪后期由来自提拉（今锡拉岛）的希腊殖民者建立的。哈德良同时确认托勒迈–巴卡也应被接纳进泛希腊联盟，他用铿锵有力的语言说，这个城市的公民是“真正的希腊出身”。但是，哈德良指示该城市选派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委员会，而昔兰尼则被允许选派两名。哈德良的裁决可能反映了古代历史：托勒迈–巴卡建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不是直接由希腊人建立，而是由昔兰尼的殖民者建立。皇帝裁定昔兰尼和希腊有更紧密的联系。这一裁定被刻成铭文，并被骄傲地展示出来，昔兰尼不再需要进一步提供证明其真实性的证据了。

图11　雅典的奥林匹亚神庙，背后是雅典卫城和帕提农神庙

其他城市也力图确保它们在这个只有少数城市才能共享的希腊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公元1世纪早期的地理学家斯特拉博引证说，位于今土耳其西南部的克比拉不是希腊人建立的城市。过了一个世纪之后，为了顺利地加入泛希腊联盟，该市虚构了一种关于其起源的完全不同的说法，把它和斯巴达及雅典紧密联系起来。这个虚构的说法很有说服力。泛希腊联盟的成员急于串通起来，接受克比拉对自己身份的夸张虚构，说它是：

> 斯巴达人的殖民地，并且和雅典有联系，对罗马态度友好，在希腊的共同体（即泛希腊联盟）中属于亚洲行省里最出名、最伟大的城市，因为它的祖先是希腊人，它自古就和罗马人友善，也因为神明哈德良授予它伟大的特权。

哈德良的泛希腊联盟重塑了希腊世界。它把在过去从未联系在一起而且事实上经常相互敌对的城市融合进了一个单一的体制框架内。雅典被确定为泛希腊联盟的总部所在地。哈德良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四

年一度的宗教节日，称为泛希腊节。首届节日在公元137年举行。此外，他还创立了哈德良节（和皇帝崇拜相关的节日）以及奥林匹亚节（和奥林匹亚宙斯相关的节日）。这三个节日都安排了各自的“神圣竞赛”，各项体育和文化竞赛中的获胜者在他们的城市获得重要特权，包括标志他们胜利归来的游行、较大数额的免税以及公费就餐等。哈德良还给予了泛雅典娜节相同的地位，据说这个崇拜雅典娜的古老节日是由传说中雅典的建立者忒修斯创立的。忒修斯因在克里特杀死米诺牛，逃出迷宫而赢得了名声，他归来之后便开始统治雅典。

在一个城市中集中了四个神圣的节日，这在整个希腊历史上没有先例，这说明雅典在这个改编和修订过的希腊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对这座城市的大规模重建——它现在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具希腊特征——在刚刚完工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落成典礼中得到庆祝。神庙入口两侧安放着四尊哈德良的雕像，两尊大理石的，两尊斑岩的（出自埃及的一种坚硬的深紫色石料，自法老时代起就和统治权联系在一起）。在神庙后面耸立着哈德良的一尊巨型雕像，这是雅典人敬献给他的。神庙里放满了奥林匹亚哈德良的青铜像，它们是希腊各地的城市敬献的。所有这一切传达的信息十分清楚。在雅典发掘出来的近100座祭坛上的铭文几乎完全一样，重复不断地赞扬哈德良是“救世主、缔造者和奥林匹欧斯”。现在占据着雅典象征和宗教中心的地方，就是被这位皇帝的雕像所包围的哈德良奥林匹亚神庙，而不是伯里克利修建的帕提农神庙。

其他希腊城市重复着哈德良推动的希腊复兴这一经久不衰的主题。我们知道，地中海东部共有21座城市庆祝过名为哈德良节的节日，15座城市采用了“哈德良”作为其附称，9座城市改称为“哈德良城”。在哈德良统治下，地方和帝国一起充满热情地创造了希腊世界前所未有的统一，实现了文化上的融合。公元2世纪，在希腊诸城兴起的对其共同遗产的关注帮助它们忘却了旧日的冲突。在600年前，雅典及其盟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为斯巴达打败的事实应被抹去；同样，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的菲力浦在公元前4世纪征服雅典的事实也应从记忆中抹去。同时，破碎的历史也应被忘却。哈

德良的善举确保了雅典成为伟大的新泛希腊世界无可争议的首都，这个泛希腊世界从小亚细亚一直延伸到北非。最终，一个罗马皇帝在希腊史上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

梦萦希腊

也许并不令人吃惊，并非所有人都欢迎罗马帝国对希腊历史的激进改写。在公元2世纪70年代后期，即哈德良去世二三十年后，出生于位于今土耳其西部的吕底亚的保萨尼阿斯终于完成了他的《希腊志》，这是将近20年广泛游历和详尽研究的结果。在《希腊志》中，保萨尼阿斯计划引领读者领略“全部的希腊风景”。一系列精心规划的路线始于雅典，然后横穿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南部大陆。保萨尼阿斯尤其感兴趣的是各种圣地，它们的历史及其纪念物。大体而言，他对自己游历过的几百个遗址的记载是详细和准确的，其可信度得到了现代考古发掘的反复验证。保萨尼阿斯对迈锡尼狮子门的记叙、有关阿伽门农及其他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墓葬位于“城墙以内”的判断，启发了海因里希·谢里曼在1876年发掘了上城。这是希腊境内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之一。重要的不是谢里曼发现的漂亮黄金墓葬面罩以及贵重的随葬品是否真正属于特洛伊战争的胜利者，而是保萨尼阿斯可靠地记载了古老的墓葬传统，当他游历迈锡尼的残垣断壁时，这一墓葬传统已经有1,700年的历史了。

和任何优秀的导游一样，保萨尼阿斯并没有提供一个所有可以游览景点的清单，而是提供了他对所游历的领土的个人感悟，他的《希腊志》提供了一个关于“所有最值得提及的事情”的系统概述，“一个对最值得注意的事物的精选”，它们应该会吸引那些试图理解罗马统治之下的希腊的人。保萨尼阿斯注意到了哈德良在雅典的建筑计划，并赞扬他“对于各种臣民的安康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注意力牢牢集中在古代遗迹上。在市政广场上，他流连在那些标志着城市建立、庆祝忒修斯英雄行为、以及纪念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抵抗波斯入侵中所

起核心作用的建筑之间，但很少提及罗马征服希腊之后兴建的建筑，只是约略提及了哈德良的新图书馆。

保萨尼阿斯对奥林匹亚神庙进行了较详细的描述，不过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于记叙不久前哈德良完成其建造一事。没有时间去赞叹和注视一位罗马皇帝的成就，重要的只是这些成就让人想起了传说中的希腊的过去。读者不是被引导去观看神庙高大的柱子，或是敬畏地凝视四周的哈德良青铜雕像，而是被巧妙地引去参观一个宽约40厘米的坑凹的边缘。在保萨尼阿斯看来，这是任何对“所有希腊事物”感兴趣的人应该看的。它把旅游者及读者引向希腊历史的起源。这是曾经吞噬了世界的大洪水及其幸存者丢卡利翁的纪念遗址。丢卡利翁的儿子希伦是希腊民族最早的祖先。据说奥林匹亚神庙附近的坑凹是洪水最终退却的聚水坑。比起宏伟的宙斯神庙和宣称以“救世主和缔造者”身份重新建立起泛希腊世界的罗马皇帝雕像，这里和“古老希腊”的联系更为密切。

图12　雅典卫城上罗马奥古斯都神庙的遗迹，位于帕提农神庙东面的前端

保萨尼阿斯的雅典游记对哈德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他拿哈德良对希腊文化的修复工作同留存下来的原始遗迹作对比，揭示出后者明显要优于前者。从市政广场走到雅典卫城，保萨尼阿斯只是顺带提及一尊哈德良的雕像被安置在帕提农神庙中。毫无疑问，这雕像只值得随便看上一眼，之后保萨尼阿斯花了长得多的篇幅描述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娜的巨型黄金象牙雕像，当时它仍耸立在神庙内部："雅典娜的神像站立着，……她手持一个高达4肘尺（2米）的象征胜利的雕像，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长矛。一个盾牌放在她的脚下，一条蟒蛇盘绕在长矛旁。"对于逝去的古典时代的这种沉思也不应该被打断。因为在保萨尼阿斯游览卫城近两个世纪之前，在帕提农神庙的正前方建造了一座将近10米高的敬献给罗马和奥古斯都皇帝的圆形神庙，它阻挡了人们清楚观看帕提农神庙东面的视线。保萨尼阿斯的《希腊志》根本没有提及这个建筑。在这本"所有希腊事物"的导游手册中，这个罗马建筑明显破坏了古代景观，简直就应该被除去。

在雅典之外，保萨尼阿斯故意忽略了新近引入原初希腊世界的事物，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很少描述公元前3世纪之后的建筑。在科林斯，城市的大部分都被悄悄地忽略了。公元前146年，这座城市被得胜的罗马军队摧毁，只是在1个世纪之后才由尤利乌斯·恺撒重建。值得提及的是关于科林斯国王、神明和英雄的古老故事。在这里，敬献给"闯入者"雅典娜的一个古老神庙纪念着柏勒罗丰。雅典娜第一个给帕加苏斯——柏勒罗丰的力大无穷的带翼战马——套上了笼头。在游览帕特莱（位于科林斯湾南部沿海的今帕特拉斯）时，保萨尼阿斯注意到，奥古斯都皇帝大规模地扩建了该城，彻底摧毁了周围的定居点，并将那里的居民迁往他处。对保萨尼阿斯这样细心的观察者来说，这一破坏的后果显露无遗，至今都令人痛心。在往内陆15公里处的腓莱（曾经是独立的城市，但后来为帕特莱所管辖），一片神圣的树林遭到了破坏："这里既没有神庙，也没有神像，当地人告诉我说，神像被运到罗马去了。"

这明显是被征服的标志；这样的标志最好在游览被征服前更郁郁葱葱、更令人愉快的土地上迅速地忘记。对于同行的旅行者，保萨尼阿斯通过想象中的希腊给了大家一次愉快的旅行经历。和哈德良的泛希腊联盟一样，保萨尼阿斯的希腊比起原初的希腊更具希腊性，他的希腊是对于过去从未存在过的东西的一种怀旧式的渴望，是对于历史应该怎样的一种想象：一个以雅典为中心的团结起来的希腊。（那些在公元前5世纪末和斯巴达结盟并打败雅典的城邦被斥为“谋杀者和希腊事实上的毁灭者”。）尤其是，保萨尼阿斯的《希腊志》描绘了一系列彼此关联的古城旧地，通过一个知识渊博的能够发现“所有希腊事物”的向导，好奇的旅行者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些古地各自的特色。和哈德良的泛希腊联盟不同，这个理想化希腊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不是通过罗马皇帝的命令来划定的，而是深深植根于对于其自身起源、宗教和神话的原初感觉。

比较历史

如果说保萨尼阿斯试图删去外族征服对神奇的古典景观明显的影响，历史学家、哲学家普鲁塔克——同样是回应新的帝国力量对于古老世界的入侵——却试图调和、比较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风俗和历史。在公元2世纪初的20年里（跨越图拉真和哈德良在位的时间），普鲁塔克完成了希腊罗马名人的46篇传记，并把它们成对并列起来。例如，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的传记并列在一起，杰出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和“拖延者”费边·马克西姆斯的传记并列在一起，后者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迫使汉尼拔撤离意大利；还有，忒修斯（雅典的建立者）和罗慕路斯（罗马的建立者）并列在一起。

这些《比较传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描述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鼓励读者思考其中所涉及的道德问题。普鲁塔克集中关注政治家和军事将领的传记，是因为他坚信他们的性格在其行动中表现得最为清楚。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成对的传记吸引读者思考特定的问题：如何控制

激烈的情绪（愤怒、欲望和野心），如何评价成长和教育的影响，如何体现人性、宽容和怜悯。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提供了正面的和反面的例子。伯里克利和费边是英明政治家的榜样，他们在面临战争危险的时候，冷静地面对不满的群众。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的例子促使读者讨论个人野心的利弊。他们的比较传记揭示，对权力和荣誉的欲望能激发伟大的行为，但也能够导致灾难。

普鲁塔克的出发点在于表现一系列道德争论，以教化读者，因此对于材料的选择和安排就特别重要。他的用心最为明显地体现在每组传记结尾的正式比较之中。在《罗慕路斯传》中，普鲁塔克质疑古人对于这位罗马建立者的批评：据说在如何选择新城市地点发生激烈争论时，罗慕路斯杀死了他的孪生兄弟雷慕斯。但是罗慕路斯“非理性的愤怒、其武断而不假思索的恼怒”不可忽视。在普鲁塔克看来，是罗慕路斯不加控制的行为促使他的一个同伴当场杀死了雷慕斯。和这个事件相似的是希腊一件著名的家庭纠纷案。此案起因是忒修斯之妻菲德拉对继子希波吕托斯的指控。她宣称希波吕托斯想要强暴她。忒修斯毫不怀疑妻子的话，粗暴对待并且诅咒自己的儿子，拒绝相信他说自己是无辜的辩解。（实际上，是菲德拉引诱希波吕托斯，在遭到拒绝之后试图报复。）普鲁塔克认为，尽管忒修斯同样犯有“非理性的愤怒”的过错，但他是“被爱、嫉妒和女人的恶言中伤所害，很少男人能不受这些情感和语言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至少普鲁塔克相信的说法如此），忒修斯无法克制的愤怒仅仅导致了出言不公，而罗慕路斯的愤怒则引发了他朋友的杀戮行为。普鲁塔克得出结论说：“出于以上原因，我们应该投忒修斯一票，”即是说，他更喜欢雅典的建立者，而不是罗马的建立者。

在进行如此困难的评判时，普鲁塔克严格遵守了传统的希腊伦理观念。其中一个关键的文本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该书描绘了这位伟大雅典哲学家建立理想社会的蓝图。柏拉图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自制力。他认为，对于实干家而言，为了能激发战争中的勇气，一定程度的愤怒是必要的。但是对于道德高尚的人来说，必须永远用镇静克制愤怒。说到底，尽管忒修斯离这样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但他

比罗慕路斯更好地控制了狂怒的后果。控制情绪是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普鲁塔克称赞罗慕路斯的继承者、传说早期罗马七位君王中的第二位努马，坚信他制定公正法律的能力源于其严格的自律："他的修养是教育、坚韧不拔和哲学教育的结果，……相信真正的勇气在于通过理性克制自己的激情"。

如此看来，普鲁塔克写作的核心即是：刻画一系列成对的希腊和罗马人物形象，然后明确用希腊的伦理规范来评判他们。在某个层面上，《比较传记》认为希腊和罗马的政治军事人物具有可比性。将两边的人物并列，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放在同等地位上来加以描述。当然历史书写也是最好和最有效地表达这一点的方式。（普鲁塔克最晚的传记是《尤利乌斯·恺撒传》和《马可·安东尼传》。再晚就是要面对奥古斯都了，但能用哪个希腊人和他并列呢？）最为重要的是，普鲁塔克认为，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能用一套单一的标准来评价，而这套标准是公开的和明确的希腊标准。也许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在总共23对人物传记中，有20对是从希腊人的传记开始写起的。就是说，在《比较传记》中，是希腊的人物确定了撰写罗马人物的标准，是通过希腊的道德标准和哲学来评价个人的优缺点。总体说来，这些传记提出了一个激进而引入注目的主张，即罗马的历史最好是从希腊的视角来理解。这样便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悖论：在普鲁塔克看来，杰出的罗马人事实上是将传统希腊美德付诸行动的好榜样。

帝国历史书写的反击

当然，把普鲁塔克和保萨尼阿斯看成是罗马统治的积极反对者就太过简单化了。他们不会支持布狄卡和她领导的不列颠起义，也不会和马萨达的最后一批犹太战士一道自杀就义。他们的著作没有煽动起叛乱，他们自己没有激励人们进行武装反抗，也没有皇帝想要镇压他们。事实上，普鲁塔克（和地中海世界许多拥有土地的精英一样）是帝国的受益者。他继承了在希腊中部的比奥蒂亚田庄，在当地的喀罗

尼亚城担任高级市政官员，享有罗马公民身份带来的特权，并能和一些富有而有权势的罗马人保持着朋友关系。普鲁塔克和保萨尼阿斯二人著作的有趣之处不在公开鼓励抵制罗马统治，而是这两位作者明确意识到，帝国的扩张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破坏，而且由此也对过去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的确，除了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征税、维持法律和秩序外，统治阶级力量的标志之一（在血腥征服、重建和平和恢复繁荣很久之后）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有选择性地改造其臣服民族历史的能力。

公元2世纪早期，哈德良掀起了一场历史的革命。凡是与慷慨的皇帝以及合作的城市精英阶层形象不合的历史都被删去。哈德良在耶路撒冷的建筑工程完全无视该城的犹太传统。公元130年，在巡视犹地亚时，他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安置老兵的聚居地，称之为埃利亚·卡皮托利那聚居地（埃利乌斯是哈德良皇帝的姓）。有人认为这一消灭耶路撒冷的决定是导致公元132—135年犹太起义的原因之一。关于这次起义，我们知之甚少。在一段时间里，起义者在极具个人魅力的西蒙·本·科西巴（或称巴尔·库克巴）的领导下，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游击战。他们铸造自己的钱币，并宣布要重建圣殿。但是起义最终没有成功。哈德良本人亲自指挥的一支罗马大军镇压了起义，并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一份记载说，50座城市和985个村庄被摧毁，50多万起义者被屠杀。

罗马人获胜后，在耶路撒冷的建筑工程继续进行。新建市政广场（位于许久以后建造的圣墓教堂区域）的主要建筑是朱庇特神庙。在罗马军团于公元70年洗劫该城（罗马提图斯凯旋门上的浮雕庆祝的就是这一胜利）之后的60年里，圣殿山遭到废弃。现在它上面树立起了两尊雕像：一尊是朱庇特像，一尊是骑马的哈德良像。令人吃惊的是，罗马人严禁犹太人定居在该城及其领土上。经过重建和重新命名之后的耶路撒冷，把那些视它为至圣之地的人们拒之门外。他们被当作了永久的外来者。而彻底重建之后的埃利亚·卡皮托利那拥有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新建筑，现在完全成了哈德良的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它反叛的历史——就像犹太人自己一样——完全被清除了。

哈德良对希腊历史的态度则要温和得多。即使如此，把他看成是个对所有希腊事物热情而盲目的提倡者，则未免太过轻率。他对于雅典（以及对于地中海世界其他200多个城市）的惊人捐赠及其对于希腊历史和文学的喜好，并不仅仅表现出他对希腊的深切热爱。在帝国的城市里，哈德良资助的建筑工程以纪念碑的方式系统地表述了对历史的一种特定理解方式。接着通过和皇帝本人的明确关联，这种历史和罗马帝国的现在融为一体。人们以一种宏大的规模，尤其是在最宏伟的雅典奥林匹亚神庙，将哈德良皇帝和传统的神明并列在了一起，他有理由宣称他复兴了对这些神明的崇拜。在斯米尔那，即位于今天土耳其爱琴海岸的伊兹密尔，一座新建的巨大神庙把哈德良和阿克拉依俄斯宙斯（“居于高处的”宙斯）紧密联系起来。在位于马尔马拉海南岸的库兹科斯，哈德良本人的塑像从另一座巨型宙斯神庙的三角墙上俯看着世间万物。在位于今天叙利亚东部的巴尔米拉，哈德良皇帝和古老的巴阿尔沙明神和都拉赫隆神联系在了一起，现在他们在一个新建的宏伟神庙里受到崇拜。

公民的热情和私人的财富造就了这些工程。它们使得地方显贵能够把他们自己和皇帝联系起来，并宣称他们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在斯米尔那，一篇赞颂美化该城的铭文列举了25位重要公民和哈德良本人的捐赠。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形无法回避：它直接体现了征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影响。臣属于一个帝国的现实就包含了这些内容。在公元2世纪早期的以弗所，卡约·维比乌斯·撒路塔里斯资助的每两周一次的银像游行，把罗马皇帝和有关当地英雄、建城者和神明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正如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所探讨的，这种皇帝和城市的紧密联系至关重要；但这种联系也涉及了对于罗马至高无上地位的颂扬。在阿弗罗狄西亚，引人注目的裸体皇帝像使罗马的权力能够按照一种悠久的希腊传统展示出来，但同时也把帝国的统治者和奥林匹斯诸神放在了同等地位。哈德良建立的泛希腊联盟成员需要证明自己是古老希腊祖先的后裔（这点可能对于普鲁塔克和保萨尼阿斯都很有吸引力）；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勾结罗马皇帝重现希腊世界原有的样子。

普鲁塔克和保萨尼阿斯反对的正是这种看似没有诉诸武力的罗马

入侵。针对于此，他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版本的希腊历史，一个同样精心改造的版本。同样，他们的反对和质疑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保萨尼阿斯的希腊（希腊大陆南部、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完全包含在罗马的亚该亚行省之内，他的行程完全按照罗马地理著作所勾勒的路线前行（对此任何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都不能理解），这等于是默认了其《希腊志》所试图唤起的“古老希腊”直到罗马统治之时才得以统一。与此相似，普鲁塔克的《比较传记》这一历史著作也暗示，这位传记作家和哲学家承认，罗马帝国兴起乃至稳固地统治世界才是最需要解释的事情。

在公元1至2世纪，罗马政权的压迫性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就当时还是就过去而言都是如此。总体而言，被征服者的反应从来不是简单地勾结或是反对征服者，就像普鲁塔克和保萨尼阿斯的例子所说明的那样。（最终只是那些从未被征服的人才能够轻松地这么想）。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为缺乏公开反对罗马的史料——除了犹太人反抗这个显著的例外——而误认为哈德良的建筑运动没有体现尖锐的矛盾。对罗马皇帝来说，历史是可以盗用的，可以把它重新加以改造，以便抹去征服的创伤，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对一些希腊知识分子来说——试图躲在象牙塔里寻找舒服的避难所无疑是危险的——历史是唯一剩下来可以用来表达对解放的幻想或至少记住有解放的希望的地方。在保萨尼阿斯的希腊世界里，没有罗马式建筑；在普鲁塔克的传记中，希腊的伦理和哲学提供了对事件最好的解释和正直生活的最好榜样。

图13　雅典的哈德良凯旋门，背后是奥林匹亚神庙

历史不可避免地成为帝国统治的受害者。在雅典这座哈德良留下印记最多的城市里，一座典雅的凯旋门建在奥林匹亚神庙附近，用于纪念哈德良皇帝对雅典的慷慨捐助。在它的西面，一篇铭文宣称："这是雅典，从前是忒修斯的城市。"对于那些不明其意的人，它对面的一个口号再次申明了一点："这是哈德良的城市，不是忒修斯的。"如同哈德良的其他许多建筑一样，这座凯旋门及其铭文可以理

解成是对希腊历史满怀热情的肯定。我们看到，在伯里克利的城市里面，在泛希腊联盟的总部所在地，一位罗马皇帝巧妙地展示他的个人经历，并把自己和这座城市的最初建立者并列在一起。或者，我们可以把哈德良宣称自己的功绩能和忒修斯最初建城的成就相提并论的说法理解成是帝国对希腊的过去和现在都享有统治权的公开宣言。

当然，两种解释都是可能的，两种解读也都是正确的。最终起作用的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这种刻意为之的模糊性使地方精英可以用不违传统习俗的方式向罗马皇帝欢呼致敬，同时欣赏像普鲁塔克和保萨尼阿斯这样说希腊语的思想家复杂的历史书写。像哈德良这样的统治者会在自己的纪念建筑上大肆宣扬其优越地位并不令人吃惊。同样，我们也可以预见到保萨尼阿斯会在精心设计的雅典游记中，对敬奉罗马皇帝的拱门——位于希腊世界的中心——完全视而不见。

第五章

让基督徒喂狮子去

沙地上的鲜血

公元177年，在卢格杜鲁姆（今法国南部的里昂），正值午休的时候，圆形角斗场里正在上演一出有关基督徒的“好戏”。这些基督教的同伴后来记述了自己所目睹的一切。首先，马图鲁斯和桑克图斯被带进角斗场，受到各种折磨：他们被夹道鞭打，被野兽攻击，忍受了狂热的人群所要求的各种刑法。之后是阿塔鲁斯和亚历山大，他们也受尽折磨，最后被绑在一把烧红的铁椅上，皮肉都被烧焦。在节日的最后一天，女奴布朗蒂娜被带进角斗场。在遭到鞭打、狮子攻击、火刑之后，她被扔进网里，让公牛攻击。“在被公牛摔了几下之后，她不再有痛苦的感觉，这是因为她有希望、坚定的信仰并且和基督有交流。”

对于公元2世纪的里昂居民来说，看基督徒受折磨是外出休闲的一部分，是娱乐活动的一部分，是表演的一部分。人群像狮子一样吼叫。但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件事里（以及在许多其他有关暴力和残忍的故事里）热烈欢呼的旁观者并非是一群由当地乡巴佬和游手好闲者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不是一群歇斯底里的暴民，而是实实在在的良民。对他们而言，看公开组织的暴力活动是严肃而引人入胜的消遣。人们希望被社会遗弃的人（土匪、劫匪、罪犯、逃跑的奴隶）悲惨地死去，以供体面守法的人们享乐。与此相似，人们也希望职业的斗士（角斗士、野兽猎杀者）进行表演。一些观众对自己喜爱的斗士的技巧、训练和经历了如指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这些浑身都是打斗伤疤的壮硕粗人则是其性幻想的对象。

所有去观看角斗比赛的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在罗马，据说克劳狄皇帝对被杀者临死时的痛苦表情极其着迷，以至于他下令把他们的脸扭过来面向他。实际上，根据帝王传记作家苏埃托尼乌斯的记叙，克劳狄（他本人身有残疾）对于角斗的暴力如此热衷，以至于他会在拂晓前就赶到竞技场，在下午人群中的绝大多数有钱人都回家午

休后，仍不肯离去。

观看角斗比赛是罗马人的一个习惯。在角斗场里，走到座位上要经过一连串复杂的昏暗过道、斜坡和陡直的台阶。就像19世纪最好的歌剧院一样，这些尽可能确保了拥有最好座位的人能够通过专用通道到达观众席。当观众眨着眼睛从黑暗中走出来时，他看到的是自己所属的这个微观社会，在阳光照耀下格外显眼；人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按照精心排定的年龄、地位、财富和职业等级就座。奥古斯都皇帝曾经下令，按照帝国的社会等级秩序安排角斗场的座位。在行省城市里，市政议事会的成员占据了最好的座位，然后是男性公民，已婚者和单身汉分席而坐；职业团体占据指定的座位，具有公民权的少年拥有专门的区域。

毋庸置疑，实际上这一严格的等级划分并不是那么绝对（例如，达官贵人们可能邀请朋友和他们坐在一起），但其大致的目的是明确的：城市贫民可能会喧闹不堪，因此他们中只有少部分人能到场观看。在罗马的大竞技场里，5万个座位中的60％是留给富有公民的，只有后排20％的座位留给城市贫民、非公民和奴隶。其余在层层座位顶端的空间，是几排隐蔽的座位（从地面入口上来要爬220级台阶），这是分配给妇女的。圆形角斗场严格的几何形建筑结构，极为方便地把人群分成明显可辨的社会等级。人们在乎坐在哪里，以及被他人看见坐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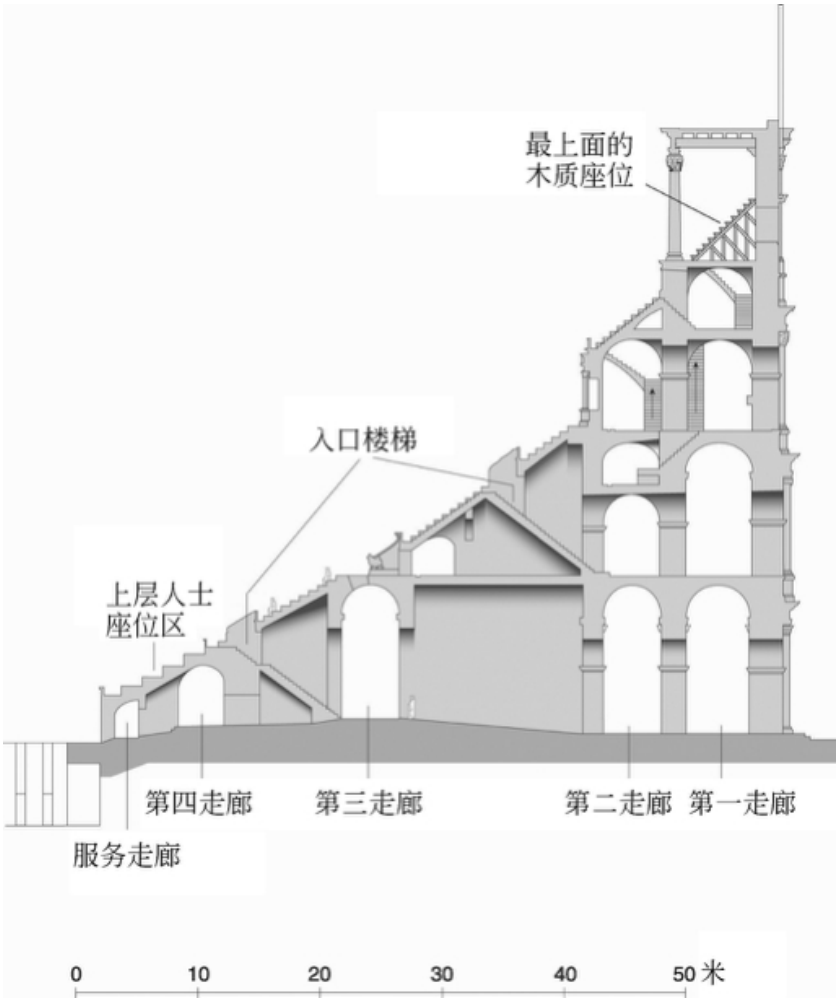

图14　罗马大竞技场剖面图（复原图）

在罗马，观看角斗比赛的皇帝主宰着一个等级分明的微型帝国。人群的欢呼是民众对现政权支持的见证。皇帝坐在专用包厢里，所有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他。尤利乌斯·恺撒和2世纪末期的皇帝马可·奥勒利乌斯因为忙于批复奏章忘记了观赏角斗表演而受到了强烈的批评。人们期望皇帝关心场上的角斗，也关注观众群体。他们随时都可能要求得到皇帝的恩赐，或者是大声叫喊："他击中了！他赢了！"以此欢呼致命一击或是身受重伤的角斗士当场毙命。角斗士不仅要被训练得善

于角斗，而且还要以合适的方式去死。他应该是挺胸，身子右倾，头下垂，蹲坐在武器之上。这是罗马世界垂死的天鹅形象，是一种冷酷的、正式的死亡方式。如果角斗士不以这种方式死去，不满的人群就会向他大发嘘声。

这种对生死攸关时刻的精心呈现是公开盛大演出的一部分，仅其组织本身就足以令人钦佩。对皇帝们而言，资助这些壮观的表演可以向所有人表明，他们在财富和地位上都处于社会的顶峰。在赞许的人群面前，鲜血的任意流淌和大把挥撒金钱均对他们有利。公元前65年，在恺撒为自己父亲葬礼举办的角斗比赛中，角斗士使用的是银质铠甲。在其他场合，铠甲上可能镶有珠宝，或是装饰孔雀或鸵鸟羽毛。公元80年，罗马大竞技场落成时举行了100天的竞技比赛，包括角斗士决斗、对9,000头野兽的屠杀。提图斯皇帝还款待观众。他向人群中抛掷小木球，每个小木球上都标有可以换取的奖品，包括食物、衣服、（对于少数幸运者）马匹、银器或是奴隶。

在角斗士决斗中投入惊人的时间、金钱和感情凸显了它在展示罗马统治地位方面的重要性。观众的欢呼和有节奏的歌唱既表明了他们的团结，又表明他们作为一个集体和那些在他们眼前被屠杀的人之间的距离。通过决定一个被击败的角斗士的命运，观众断言，他们对人类有着绝对的控制。关乎生死的角斗活动是由社会安排的有节制的混乱瞬间，其目的在于强调社会自身的安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角斗场、受到严密控制的人群以及角斗场内各种残忍的活动都体现了维护帝国统一的暴力和秩序。这些血腥的场景表明，暴力是一个有序社会不可回避的一部分，正如战争曾经是建立帝国的必要部分一样。

同样重要的是，无论暴力和秩序能够被多么成功地浓缩在一个场地的表演中，它们从来都不能被完全区分开来的。把竞技场地和观众隔离开来的坚实木栅栏标志着一种分隔，但这种分隔可以被跨越、被混淆、被推翻或是被模糊。公元192年，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卡修斯·狄奥观看了康茂德皇帝举行的角斗比赛，皇帝本人不仅主持了比赛，而且作为角斗士亲自上场决斗：

竞技会持续了14天。当皇帝陛下参加决斗时，吾等元老院议员总是出席观看……皇帝陛下对吾等元老做的一件事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的厄运即将来临。他杀死一只鸵鸟后，砍下它的头，径直来到我们坐的地方，左手提着鸵鸟头，右手挥舞着血淋淋的宝剑。他没有说话，但一边咧着嘴笑，一边摇着头，好像是说，他会用同样的方式对付我们。许多嘲笑他的人会当场被宝剑砍死（我们不是担忧得不得了，而是笑得合不拢嘴），而如果我不是从花冠上摘下片桂树叶放在口里嚼的话，也会被砍死。我还劝说坐在旁边的其他人也嚼他们的桂树叶，这样通过下颌有规律的咀嚼运动，我们可以掩饰脸上嘲笑的表情。

根据卡修斯·狄奥亲眼所见，康茂德皇帝疯狂地咧着嘴笑，手里挥舞着砍下的鸵鸟头，但很显然，他站在了敌对的一面，这非常危险。狄奥后来把这描述成一个作为娱乐的滑稽场面，但当时更可能是满心的恐惧和苦笑。一个皇帝向你挥舞砍下的头其实并不好笑，除非他已经死了。狄奥和他的元老院同僚肯定吓得半死。他们的恐惧并非没有道理。在竞技场上，罗马的皇帝们不仅强调他们作为社会准则维护者的重要性，而且通过证明他们能够不受任何惩罚地违反社会规则来强化他们的专制地位。

皇帝们位尊权重（而且公开如此）。和秩序井然地坐成一排排的观众不同，也和那些正因为是外来者而在角斗中被杀的人不同，皇帝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能够肆意地跨越暴力和秩序的界限。对于卡修斯·狄奥和他的同僚来说，一个皇帝充当角斗士的情景之所以令人恐怖，正是因为它暴露了他们作为元老院议员的弱点，也凸显了规范对于维护他们地位的重要性。和皇帝不同，元老院议员没有活动的社会空间。康茂德对于专制权力的强有力展示，威胁到了狄奥所代表的一切以及他为保障自己等级和位置所依赖的一切。在事后有可能嘲笑，但是在当场能笑得出来的唯有皇帝本人。毫无疑问，他看到一排排迟钝的元老院议员偷偷摸摸地咀嚼他们桂树枝编织而成的花冠，还希望没有被人发现，一定觉得好笑。

一个社会在闲暇时间的所作所为，是它试图如何组织和管理自身世界的重要体现。人满为患的角斗场专为演出而建，它是颂扬秩序和暴力的地方，是公开展示罗马社会和帝国权力的地方，是一个军事化

社会的成员在城市中不断发动战争——有时候是在他们内部——的地方，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就像中世纪北欧的大教堂一样，角斗场是罗马帝国城市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它和军队、税收、法律以及行政一道，在帝国被征服的行省里施加了一种明确可辨的秩序。在一座封闭的角斗场范围内，人们能够毫不费力地重演、大声地欢呼征服的残忍过程（只是在这个时候）。血腥的场景使得整个帝国受到严格控制的老百姓能够不离开他们城市的舒适环境参与战争。重要的是，在角斗场里，观众总是胜利者。

殉教者的队伍

正是在这个罗马社会试图表演生与死、暴力与秩序、社会及其敌人的危险之地，许多基督徒心甘情愿地从容赴死。殉教并不是基督教的发明，在犹太教里就已有先例。但是基督教的殉教与众不同，殉教者都刻意寻求在无信仰而且怀有敌意的人群面前殉教。其可怕的过程发生在罗马帝国城市中一个最重要的公共场所里，并且和暴力与秩序的复杂混合体结合在一起，而这暴力与秩序的复杂混合体标志着罗马角斗场上的角斗经历。

毫无疑问，殉教是极其血腥的场面。公元177年，在里昂欢呼基督徒被处死的人群目睹了其中一人在刑架上被肢解，一人被烧死在铁椅上，第三人被公牛挑死，其余的人则被扔给饥饿的狮子，被它们撕咬吞食。在秩序井然、成排端坐的角斗场里，在衣着讲究的人群的众目睽睽之下，将基督徒扔给狮子，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展现了罗马多数人对于一个少数派别所具有的权力。然而，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在集中了地中海各地的野兽和歹徒并将其屠杀以飨观众的表演中间，把几个基督徒扔给狮子不会引起太大的骚动。他们只是被展示、嘲弄和屠戮的另外一群不受欢迎的人。

但对于基督徒而言，殉教者遭受的折磨和死亡并不意味着败在一个敌对无情的社会手下而打击了教众的士气。殉教是一种胜利，是在

罗马社会选择展示自己、证明其优越性的同样地方进行公开反抗的戏剧性行为。对帝国城市中的基督徒而言，殉教成为肯定其信仰的象征，是他们公然蔑视罗马秩序的明证。公开承认信仰基督教以及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公开被处死，正是殉教者所说的成功的抗议行为，它对信仰者产生号召力起着重要作用。其他的死亡方式不能使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自我牺牲愿望神圣化。

和反复无常的皇帝一样，基督徒刻意寻求打破精心建构起来的处于角斗竞技核心的秩序和暴力之间的平衡。皇帝们以此显示，他们大权在握，高高在上，不受世人的烦忧和规范的束缚；基督徒则以此宣布，他们只关心来世。在公元2世纪早期，叙利亚安条克的主教依纳爵在殉教时毫不妥协地宣称：

> 在从叙利亚到罗马的一路上，我都在和路上及海上的野兽搏斗，不分昼夜……让我承受大火和十字架、群兽的攻击、撕裂、肢解、骨折、断肢和整个身体的碎裂吧……因为我是上帝的小麦，野兽的牙齿把我咬碎，好让我成为基督的白面包。

尤其重要的是殉教的颠覆性力量。人们在教堂里宣讲殉教者遭受苦难的血腥故事，这些对于基督徒死亡的生动而详细的描述，使得他们的胜利在每一次宣讲中都得到了重复。公元2世纪50年代中期，斯米尔那（今伊兹密尔）主教波吕卡普在火刑柱上被烧死。根据那些宣称目睹了此事的基督徒的描述：

> 火焰形成了穹隆的形状，就像一艘船的风帆在风中张满一样，它像一堵墙围绕着殉教者的身体。在火焰中，他不是燃烧的肉体，而是烘烤的面包，像是金银在熔炉中精炼。我们闻到了一阵浓香，仿佛是熏香或是昂贵的香水。

基督徒的殉教颠覆了罗马世界。在基督徒眼中，殉教者伤残的身体看起来很美。在基督徒闻起来，烧焦的肉体散发出让人难以抗拒的芬芳。美化是宣福的必要前奏，而且重要的是，基督徒的殉教行为总是取得胜利。

罗马的应对

大体而言，罗马人认为基督徒是个可笑的、也可轻易牺牲掉的群体。在公元2世纪初，即“里昂殉教者”从容赴死25年后，有人在罗马市中心帕拉丁山丘上帝国宫廷一座建筑的墙上刻了一幅图画，表现的是一个长着驴头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旁，一个旁观者举起手臂作祈祷状，十字架下方字迹潦草的铭文（希腊文）写道：“亚历山大崇拜他的上帝。”显然这既非对基督教老练的批评，亦非对其尖锐的指责。但它所表达的观点（尽管粗糙）却很明确：基督徒可笑，亚历山大是个笨蛋，他崇拜的神是一头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驴子。

米努丘斯·菲力克斯，一个在3世纪早期进行写作的律师和基督教皈依者，以同样的风格虚构了一名基督徒和一名异教徒之间的对话，其中包括他宣称的基督徒经常受到的一些诽谤：

> 他们通过秘密符号和标记互相辨认。……我听说他们圣化、遵从某种荒谬无知的信仰，崇拜驴头，这是所有动物中最低级的。……新来者入教的故事广为人知，也令人恶心。将要参加神圣仪式的人身旁放着一个用面团包裹的婴儿，以欺骗没有疑心的人们。新入教的人被煽动击打面团表面，看似无害，却以无形和隐秘的伤害杀死了婴儿。他们贪婪地舔食婴儿的鲜血，急切地撕碎他的四肢，这是邪恶的暴行。

图15　帕拉丁山丘上男侍培训厅里的反基督教图画，该建筑是皇宫的一部分，罗马

无论把这看成是对早期基督教的描述，还是看成是普通罗马人对基督教的真实看法，我们都不应该太过认真。（不过吃人的指控也许并不应该太令人吃惊。如果一个宗教的核心仪式涉及象征性地餐食其创立者的血肉，那么它很可能受到这样的攻击。）这段话所述事实的

准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纯粹是诽谤。在这里诽谤分出了敌我，并强化了群体的团结性——正如它通常所起的作用。这是小学生即已学会的经验。在听到诽谤的时候，我们通常更多地了解到那些诽谤者，而不是诽谤的对象。对一些罗马人来说，攻击基督徒从事古怪的、非人性的和反社会的活动，也是界定他们那个社会可以接受什么的一种方式。绘声绘色地抨击基督徒有助于建立明确的罗马特性。

对许多人来说，最令人迷惑的是基督教殉教者坚拒参与罗马社会，不愿分享帝国带来的益处，也无意向皇帝表示应有的尊敬。殉教者由宗教激发起来的对死亡的狂热也着实令人难以理解。受到严格控制的游行和节日对秩序井然的公民社会至关重要。与此相反，殉教作为公开表达信仰的一种方式，肯定让当时的人觉得具有神秘色彩，但却没有什么吸引力。即便如此，总体上说，罗马官方并不急于搜寻基督徒和迫害他们。在公元2世纪初，小普林尼在担任比提尼亚–本都行省的总督期间，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怀疑基督徒们举行的秘密集会和共餐有其邪恶的目的，并开始调查，还相应地处死了几名拒绝放弃信仰的基督徒。然而正如在搜捕行巫者中经常发生的一样，人们会利用新的指控来发泄旧的宿怨，因此指控大量地增加。接着有人向普林尼呈上一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上面列举了许多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也许此时普林尼有点后悔去调查基督徒的事，因此奏请皇帝裁定。图拉真的批复既简单，又很能说明问题。他指令普林尼不要再追查此事，不要再搜捕基督徒；应给予他们充分的机会，让他们宣布放弃其信仰；赦免那些声明放弃信仰的基督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理会匿名的指控。

公元180年，在里昂殉教3年之后，另一群基督徒被带到了迦太基的罗马总督面前。他们的领袖名叫斯帕拉图斯。见证此事的基督徒后来以审讯记录的形式记载了事情的经过：

总督：如果你们放弃邪思异志，你们便会获得皇帝陛下的宽恕。

斯帕拉图斯：我们从来没有犯错，从没有参与任何邪恶的事情，也从没有恶语伤人，在受到恶劣对待的时候，我们仍然感恩，因为我们尊奉我们自己的皇

帝。

总督：我们也是很虔诚的人民，我们的宗教很简单：我们向皇帝陛下宣誓，为他的安全祈祷，你们也应该这样。

斯帕拉图斯：我并不承认这个世界的帝国，但我服从上帝，凡人的眼睛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也不可能见到。

总督：不要再接受这种信仰。

斯帕拉图斯：但那样做是邪恶的。

总督：你坚持当一个基督徒吗？

斯帕拉图斯：我是个基督徒。

总督：你不需要再有一点时间考虑吗？

斯帕拉图斯：正义是那么显而易见，没什么可考虑的。

总督：给你缓刑30天，让你再考虑考虑。

斯帕拉图斯：我是个基督徒。

由于斯帕拉图斯的言语越来越忤逆，总督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被迫下令处死了他。这份文献十分重要，表明至少对部分罗马人而言，可以把基督徒看成是一个反社会的群体，他们经常吵嚷着要引起世人对他们的关注。就像斯帕拉图斯的审讯所揭示的，由于罗马人对他们漠不关心，许多基督徒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好让他们自己被罗马人抓去喂狮子。

总体说来，基督徒处于罗马社会的边缘，他们不是罗马人关注的焦点。在公元2世纪80年代后期，兴奋不已的人群团团围住了亚细亚总督盖尤斯·阿里乌斯·安东尼努斯的法庭，明确宣称他们都是基督徒，并且希望总督立即判处他们死刑。安东尼努斯顺着他们的意愿，下令将其中几人推出去处死，但是当其他人更为坚决地要求同样的命运时，他恼怒地看着这群虔诚的基督徒，大声喝道：“你们这群混蛋，如果你们想死，难道不能去跳崖或是上吊吗？”

同样重要的是，作为异教徒的罗马人在诽谤、处决或仅仅无视基督徒的存在时，忽略了——或者干脆是不愿主动去认识——这个新宗教至关重要的一点。通过把基督徒和罪犯、强盗以及其他可恶之徒相提并论，罗马人在思想上忽略了致使这一运动异乎寻常的因素。基督

教是一种宗教，尤其是一种有经书的宗教。就像犹太教一样（在罗马人看来犹太教就是一种古怪但却古老的异族迷信），基督徒也依赖于一系列神圣的文本，他们相信这是上帝的话。正是这种对于经书的依赖使基督教与众不同，它不是一个在面临有国家支持的暴力就会轻易垮掉的反社会组织。

一系列宗教经典文本的确定对于早期基督教至关重要。《新约全书》似乎还没有完全成书。在基督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出现了不同的版本，人们试图以不同的方式书写上帝，由此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马西昂。他于公元2世纪初在罗马撰写的著述中提出，《旧约全书》中的犹太上帝和基督教上帝并不完全相同。就像他在名为《对立面》（书名取得恰如其分）一书中试图证明的那样，两者的不一致之处实在太多。摩西的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从而让邪恶得以进入这个世界。他安排了在马西昂看来是令人蒙羞的性交繁育的过程、怀孕的不适以及分娩的痛苦。这个《旧约全书》的上帝并非是一个行善的仁慈榜样，他让先知以利沙对捉弄他的孩子发泄怒火，用熊伤害他们。他使太阳停在正午时刻，以便给予约书亚更好的机会去屠杀阿摩利人。他的无知明显体现在他向伊甸园的亚当提的问题中："亚当，你在哪儿？"马西昂提出，人们不会想到一个万能的神会问这类问题。这样的神不可能保证基督教的救赎。《旧约全书》启示的创造神使用严酷的法令，报复心极强，这和《新约全书》中允诺慷慨圣恩的上帝完全不同。

在马西昂看来，《福音书》的作者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区别。需要彻底重编《福音书》以明确此点。在其新编的《福音书》中，马西昂完全屏弃了基督出生的故事。在他看来，不可想象上帝是由女人生的，不管这个女人是否是处女。他争辩说，《四福音书》也导致了不必要的矛盾。因此他删除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删节了《路加福音》，增加了一些保罗的书信。自不待言，马西昂的思想没有被广泛接受，他在公元144年被逐出罗马的基督教会。这并不令人吃惊：毕竟马西昂的著作触及了这个新宗教的核心问题。如果基督教是基于一本经书，那么这本经书应该是什么样

的呢？

在基督教会之外，围绕创作一本以某种方式界定上帝的经书的这些争论基本上被忽视了。当斯帕拉图斯来到迦太基的总督面前时，他的胳膊上挎着一个小书包。总督问道：“书包里装的是什么？”斯帕拉图斯回答说：“是书籍和保罗的书信，他是个公正的人。”但是总督并没有表现出进一步的兴趣。只是到了公元3世纪末，在基督教会已经成为分布广泛且组织完善的机构之后，这些文本的重要性才得到认可。公元303年审讯基督徒的另一份笔录表明，罗马官方在搜寻书籍。在奇尔塔（今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市政议事会的领袖菲利克斯同当地教会的低级官员卡图利努斯和马尔库克留斯有一番唇枪舌战：

菲利克斯：交出你们带着的经书，好让我们遵守皇帝的命令和指挥。

（卡图利努斯拿出一本大书。）

菲利克斯：为什么你们只交出一本书？交出你们带着的所有经书。

卡图利努斯和马尔库克留斯：我们没有了，因为我们只是助祭。经书在读经师手中。

菲利克斯：如果你们不知道他们住在哪儿，那么告诉我他们的名字。

卡图利努斯和马尔库克留斯：我们不是叛徒；我们站在这里，下令处死我们吧。

菲利克斯：逮捕他们。

但这不是殉教的事例。官方施加了压力，两名助祭改变了主意。最终市政长官找到了读经师，带着几本宗教书籍满意而归。

这类审判属于戴克里先皇帝迫害基督徒的一招，这是罗马政府压制基督教最有效的手段。通过搜缴经书而不是抓人，戴克里先直击了这个新宗教的核心。因此后来的基督教作家把这些岁月说成是“大迫害”时期，这并不令人吃惊。最终教会幸存了下来，因为在戴克里先需要应付的事情中，基督教的事并不特别急迫。到公元3世纪末，基督教已是个十分强大、团结紧密的组织，面对罗马官方的搜缴，许多人都拿其他书来假冒他们的经书，瞒住了来搜缴的人。但是“大迫

害”的教训非常重要。它向所有人揭示了，特别是向那些负责执行戴克里先命令的帝国官员表明，基督教依赖于经书。

君士坦丁皇帝也没有忘记这一教训。在公元312年，即戴克里先“大迫害”10年之后，君士坦丁成为第一个认可基督教的罗马皇帝。随后在公开表示支持他新近皈依的宗教时，君士坦丁说他所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确立牢固和可检验的信仰基础，其目标是结束关于经书性质和数量的争论，并定义基督教上帝。君士坦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面对关于基督神性的激烈争论，他召集了第一次地中海范围的全体主教会议。会议于公元325年6月在位于今土耳其西南部的湖滨小城尼西亚召开。出席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基督教领袖在君士坦丁的强迫下，首次草拟了“尼西亚信经”：

> 我们信：独一天主全能的父，创造有形和无形万物的主；独一主耶稣基督，天主之子，为父所生的独生子，这就是从父的本体而来，从神而来的神，从光而来的光，从真神而来的真神，受生而不是被造，与父同体，万物都藉着主而被造。[1]

这个宣言至今仍然是所有主要教派的基督徒用来表达和申明自己信仰的基本表述。在《新约全书》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尼西亚信经”，它是后来人们想要界定作为信仰体系的基督教的产物，是建立教会作为一个统一性机构的方式。

对于许多并不赞同君士坦丁皇帝信仰的人来说，他对基督教的公开信仰一定是件令人不快的意外事件。事后回顾历史——肯定能看得更清楚——他们可能感到后悔，因为之前许多罗马人对基督教漠不关心。一些人无疑希望更多的基督徒被扔给狮子吃了。但是把基督徒当作罪犯一样对待没有触及基督教的核心。因为这样做忽略了基督教从根本上对于语言、经书和上帝之言的依赖，没能阻止一个全是狂热分子的教派的发展；该教派坚信自己的信仰，通过对殉教者的颂扬获得了身份的认同，并赢得了追随者的支持。许多殉教者是在罗马城中最具象征性的地点被杀。反思过去，放掉那些基督徒要好得多。把他们

扔给狮子的确娱乐了大众，但最终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如果在公元后的前两个世纪里，罗马官方真正想镇压基督教，一个有效得多的策略应该是放过基督徒个人，搜缴并烧毁他们的经书。

注释

1　译文引自徐怀启：《古代基督教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0页。

第六章

生与死

透过钥匙孔

“米南德私宅”是庞培城里最漂亮的房子之一。它位于城南，大约在市政广场和角斗场的中间，占据了大半个街区。其占地面积（1,700平方米左右）、华丽的装饰、精心规划的格局、昂贵的家具，全都反映了主人的财富和品位。

在庞培和赫库拉内乌姆（两者都位于今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附近）发掘出的房屋保存之完好令人惊叹；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富人生活的宝贵机会。公元79年8月末维苏威火山爆发，厚厚的火山岩浆吞噬了城市，“米南德私宅”从此停留在了时间的节点上；罗马历史的一瞬间被永远冻结了。

这座房子本来就是为了向世人炫耀才建的。通过一条街道，穿过一道宏伟的大门（4.15米高，两侧饰以壁柱），客人立即会对房屋的空间产生深刻的印象。前厅宽敞通风（有两层楼高，地面面积为73平方米），天井的四周围绕着海豚状的陶制滴水嘴。下雨的时候，雨水哗哗地喷射到天井下面的白色大理石池子里，再流入一个地下蓄水池。客人可以从前门一眼看到房子40米深的地方：穿过前厅，经过两侧以柱子作框架的内厅入口，便是一个有院墙的花园的后部，花园四周以柱廊围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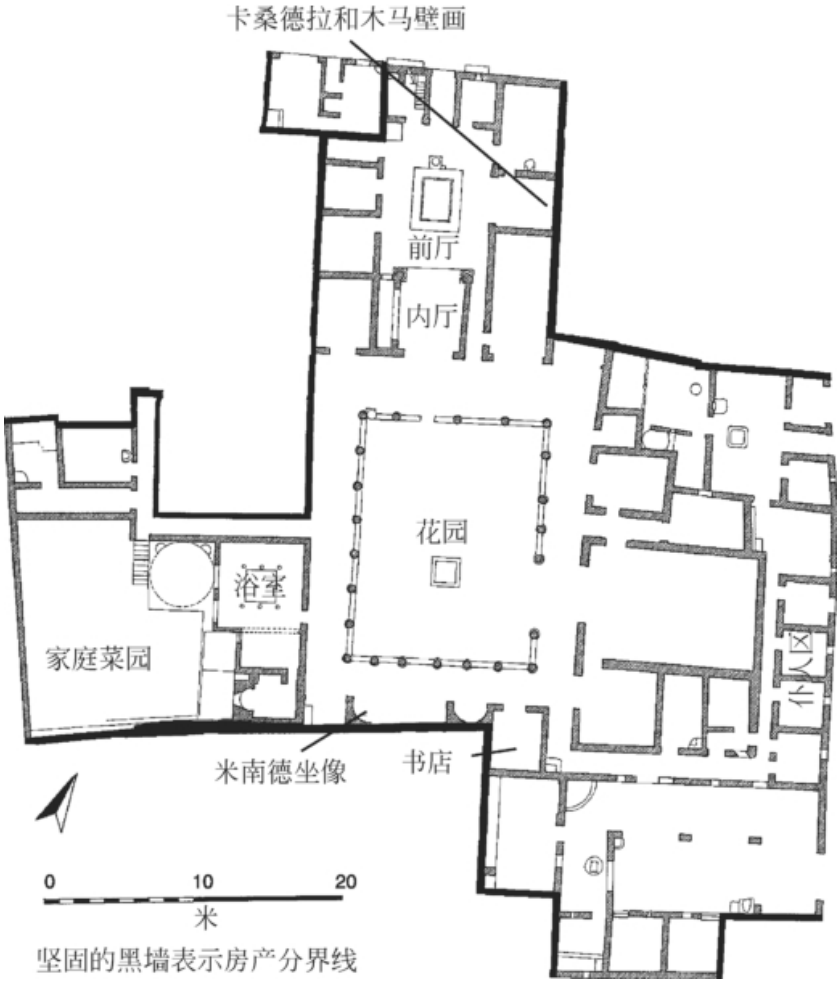

图16 “米南德私宅”的地基图，庞培

图17 “米南德私宅”，从前厅往花园方向看到的一景，庞培

这种远景是精心设计而成的。视线的错觉从表面上增加了房子的纵深：近前的两根柱子（位于内厅入口）比里面两根柱子（属于北面柱廊）要高些，更深处的柱子（花园另一面的柱廊）相互间距离更

近，同时部分被低矮的挡墙所遮蔽，因此看起来要矮些，比实际上显得更远。客人的目光被引进房内，通过亮堂和阴暗交替的区域（有上面天井照亮的前厅，有屋顶遮盖的内厅，敞开的庭院，有屋顶遮盖的柱廊），再通过围绕花园的低矮挡墙上描绘的茂盛的植物和野生动物，然后转向高处的自然景色，上面紧接附近的山峰。

这些精巧而又别出心裁的视觉效果由同样精心设计的装饰布局所加强。现存的大部分建筑都是公元62年大地震后修复和改建的，重建工作进展缓慢（也许是由于缺乏熟练工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20年之后，直到火山大爆发的时候，现场还有建筑工人在干活。此时主要的房间已经按照最新的样式进行翻新。前厅的墙壁粉刷一新，并饰以红色画板和黄色缘饰；这样的主题移位到内厅，又变成了黄色画板和红色缘饰。在前厅的红色画板中央绘有精巧的戏剧面具，而黄色墙面上则描绘了飞鸟、水果和水禽的迷人图像。在上方，一系列画板表现的是优美风景和宏伟乡间别墅的组合。

在前厅的东面有一个大凹室（3.45米宽，3.75米深），上面画板之间（和内厅一样，是黄色画板和红色缘饰）又各有彩绘的小壁龛，正面是一幅画，像是“悬挂”在深紫色的“边框”上，延续了巧妙的幻象。三种景象都表现了和特洛伊陷落相关的事件。埃涅阿斯逃难到达迦太基的时候，曾经向狄多及其随从生动地讲述过这些事件。在直接面对客人的后墙上，描绘的是一群欢呼雀跃的特洛伊人正将木马拉进城里。他们对事关自己命运之事欠缺考虑，毫不理会女祭司卡桑德拉的警告（她被粗暴地拖到一边），准备通过城墙的缺口把木马拖进城内。

这些壁画本身已十分优美；昂贵的装饰设计赏心悦目，但它们同时也考验来访客人的教育水准：他们能够理解壁画总体表现的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具体说是第二卷）吗？受过良好教育的客人能否察觉到艺术家在哪里偏离了维吉尔的原文（可能是受人所托，刻意为之）呢？（在《埃涅阿斯纪》中，卡桑德拉是在特洛伊城内而非城外遭遇木马的。）房子主人的文学偏好同样表现在花园柱廊的后墙（南墙）上。这里，三个大壁龛的中央描绘的是三位伟大剧作家理想

化了的肖像。唯一能够确切辨认的是一幅公元前4世纪后期希腊著名喜剧作家米南德的坐像，今天这座房子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对于那些能够欣赏这些东西的人来说，花园、壁画和柱廊表明了一种明确的思想立场。这里拥有和一个富人家里的文学沙龙相关的一切：一个用于私人研修的僻静之处（恰如其分地饰以剧作家的画像），一个用于阅读和讨论的柱廊，一个用于朗诵的大厅（有几个大小合适的大厅建在柱廊旁），一个图书馆（也许是花园里三个大壁龛的左边一间，里面粉刷成白色的壁龛洞表明书架是固定在三面墙上）。花园旁边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型浴池建筑增添了一种文雅的奢华感。在这里主人同样强调了他自己和一个有更大特权的世界的联系。宏伟的乡间别墅（就像前厅的墙上描绘的那种）有的设施在“米南德私宅”也能找到，只是规格要小些。以建筑和装饰语言表现出来的文学典故，也告诉我们在这里款待的会是哪一类客人——有教养、富有、受过良好教育、拥有闲暇的人，或是房子的主人想要讨好的人——通过向他们介绍这种环境，让他们好像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米南德私宅”设计优雅；它对空间的巧妙运用能把客人吸引进来，博得他们的赞赏，然后考验客人的社会地位和知识品位。房子的装饰设计需要有专业背景的人才能作出解释（毫无疑问，一些人是以审慎沉默的方式欣赏）。这种考验可以仔细地分出层次来。光线和木制隔墙可能让客人看不到房子的某些部分，但这也增强了他们在获准看到另一个漂亮房间时的愉悦感和优越感。墙上的装置表明，凹室（包括其特洛伊景象）可以被遮住，内厅的入口也是如此。在内厅和柱廊之间有一些方形青铜轴销托板和铰链，它们用在一扇折叠木门上。从前厅到花园后墙中央壁龛的整个长廊景色并不总是向客人展示。在炎炎夏日，房子可能会全部开放，但也只是供更尊贵的客人参观。

除了仔细设置的物障，还有一批奴隶和仆人巡视房子。客人首先会碰到看门人，他住在大门左侧一间朴素的小房子里。其他人也会上来询问，或是阻止客人再进一步；在客人进入主人安排好的见面地点时，一个“报名人”会通报来客姓名。客人不会经过杂物堆放区。在“米

南德私宅”里，这些地方被明确分开了。在花园柱廊的一端，一条长长的走廊和台阶通向下人住处（它有单独的边门供人出入）。在另一端，另一条长长的曲折走廊通向厨房。主厨房装备齐全：灶台由石砌的排烟罩保护；角落里有个大水槽，水槽流出的水可以冲洗隔壁房间的厕所。在走廊里，有九级台阶通到下面一块低凹的菜园，圆形的菜地里种着各种植物和蔬菜。人们一定会拿这些区域和房子的主要部分进行对比。厨房和下人住处被小心地遮掩起来（这里没有引人入胜的狭长通道），墙壁上的装饰也只有粗糙的灰浆粉刷。和客厅华丽的装饰相比，这些地方如此设计，就是为了不让人看见。

图18　前厅旁凹室里的卡桑德拉与特洛伊木马壁画，“米南德私宅”，庞培

尽管主要的杂物堆放区安置在不起眼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所

有家庭的活动都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豪宅那样，被完全掩藏起来。在“米南德私宅”里，柱廊也作烧烤（发现了烘烤设备的残留物）或是储藏之用。客人来访之前，也不会匆忙把大坛大坛的酒和橄榄油搬走。重要的是要严格控制入口。从这一点来说，“米南德私宅”的设计清楚地展示了它是以逐次升高的规格来对待不同的访客。一些客人可能从来不能越过前厅，甚至不能看一眼花园；另一些客人会受到热烈欢迎，被引领进入房子，参加可能是在柱廊里举行的聚会；只有那些受到特别礼遇的客人才能单独或是成对地住进较小、但装饰精美的房间。令人遗憾的是，这座豪宅的主人的身份并不为我们所知，但他显然十分富有，属于庞培的精英阶层。就像他富有的朋友一样，他拥有的豪宅既符合、又强化了他的社会地位。

精英阶层的住宅并不是设计成与世隔绝的私人场所，远离外部世界的竞争。相反，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城市里，它被设计成表演的舞台，其拥有者能够向一个有选择的观众群体有所节制地公开展示自己，从而增加自己在竞争中获胜的可能。毫无疑问，“米南德私宅”令许多来访的客人印象深刻，至少在主宰了意大利南部这个比较重要的城市的狭窄社交圈里是如此。然而，尽管有精巧的建筑设计和丰富的文学意涵，它还是不怎么会受到那些真正富有之人的羡慕，因为他们拥有豪华的乡村别墅，而不仅仅是拥有描绘它们的壁画。他们最多不过会对这种模仿真正奢华而有教养生活的做法报之以宽容的微笑；最糟的情况是，他们可能会认为“米南德私宅”是在附庸风雅，它企图模仿一个上流社会，但显而易见，仅凭其主人的经验和财力是无法跻身其中的。

无法更改的事实

对许多现代游览者来说，漫步在庞培和赫库拉内乌姆的房子里，或是若有所思地走在以弗所、阿弗罗狄西亚、大勒浦克斯城或是地中海世界任何一个保存良好的遗址的街道上，他们可能会想，他们至少

和罗马帝国的部分居民能够形成一种亲密的联系。像庞培这样的城市似乎展示了古代世界如此多的日常生活情况，（甚至更多）揭示出古代世界纯粹平平常常和明显令人亲近的一面：从专门设计的庭院，到厨房水槽和菜园；从建筑工人完成一项工程所花的时间，到主人想要用住宅的现代化以及时尚的高雅品位来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迫切心情。但正如思考“米南德私宅”所表明的，我们也不能过度发挥这种本是出自善意的移情心理。无论初看起来古代世界一些非常具有人性的活动和我们自己关注的问题是多么相似，我们也应该把它们和当时人们的习惯、态度和期望放在一起看待，这些东西使得罗马社会根本不同于21世纪初发达的工业化世界。

罗马帝国为疾病和死亡所困扰。人们的平均寿命在20到30岁之间，大体只有现代西方社会平均寿命的三分之一。这样的计算不是直接基于零散而且通常是贫乏的古代证据，而是基于一个合理的假设，即认为罗马世界遵循着不发达国家的共同趋势。20世纪早期在印度和中国的研究阐明了这些趋势。至少这些趋势有助于确定参数。平均寿命低于20岁会引起人口的迅速减少。另一方面，平均寿命高于30岁会使罗马帝国在人口方面比起任何具有相似环境、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前现代社会都要成功。

统计模型能够作为理解人口问题的有益向导。它的优势在于能够建立一个分析可能的年龄结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清晰框架。这类普遍化抽象模型的缺点是，它只能反映可能的情况。根据定义，统计模型抹去了个人经历的差别和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可避免的数据波动。一些特定的调查研究清楚地揭示了上述差异和波动，例如对罗马墓地里骨骼证据的分析（不过成年人的骨骼可能比儿童的骨骼保存得更好），或是对墓志铭上记录的年龄的统计（不过在一些情况下可以表明，这类记录受到了歪曲，它只是更准确地反映了有选择性纪念的文化取向，而不是实际死亡率的样本）。

最普遍运用于罗马帝国的“寿命模型表”通常被称为“西方模式第三级”，它假定有一个静止的人口数（即零增长率和恒定的年龄结构），并且在不同时期是稳定的人群（即没有移民和瘟疫的影响）。

图19中左边两列数据跟踪记录一个假设的10万人群体的情况，从出生到85岁，每隔5年统计1次。第三列是在同样的5年间隔时剩下的平均寿命，第四列是每个年龄段的人口百分比。

这些模型所揭示的情况令人吃惊。在这个模型里，只有一半的婴儿活到5岁，刚出生后的几个月里死亡率最高，约三分之一的新生儿活不到1岁。那些活到5岁的人通常很有可能再活40年。这样的高死亡率使得人口年轻化。“西方模式第三级”的平均女性年龄是27.3岁，男性是26.2岁，换言之，刚好40%以上的人口在20岁以下，只有4%的人口在65岁和65岁以上。同样，不会有人说这些数字是精确的，我们应把它们看成是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即便如此，在一个寿命模型表的限度内，这些数字对我们认识不同年龄人群的比例关系还是很有价值。大致说来，罗马社会的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例一般是10比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现代西方社会中这个比例小于3比1。

年龄	10 万人群体	剩余寿命	年龄群百分比
0	100,000	25.0	3.21
1	69,444	34.9	9.53
5	54,456	40.1	10.53
10	51,156	37.5	10.00
15	48,732	34.2	9.46
20	45,734	31.3	8.81
25	42,231	28.7	8.10
30	38,614	26.1	7.36
35	34,886	23.7	6.62
40	31,208	21.1	5.91
45	27,705	18.4	5.22
50	24,389	15.6	4.52
55	20,661	13.0	3.75
60	16,712	10.4	2.91
65	12,175	8.4	2.03
70	7,934	6.4	1.23
75	4,194	4.9	0.58
80	1,644	3.6	0.19
85	436	2.5	0.04

图19　寿命模型表，西方第三级，女性

这个罗马世界的人口模型和保存得最完好的史料可能吻合。这些

史料的数据跨越公元1到3世纪，来自于罗马统治下埃及地方当局归档的三百多份统计申报表，这些申报表是该行省定期人口调查的一部分。在这些纸草碎片上保存了近1,100名登记人员的详细情况。申报表显示，人口的平均寿命在22至25岁之间，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在15岁以下。这些数据处于罗马帝国20到30岁这个平均寿命范围的下限，也许也反映了在法尤姆（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以南）这个肥沃而易于滋生疾病的地区人口密度较大，而三分之二的人口调查数据恰好来自于这一地区。有理由假定，地中海地区不同的生态条件（贫瘠的土地、沼泽、山地、平原）对其特定人口的寿命会有影响。然而，即使考虑到环境的变化，富人也不一定会比贫苦农民的寿命长很多。在帝国时期，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人数稳定在600名左右，这个数字由于每年会有20名前任财务官（之前担任过最低级别政府官员的人）进入元老院而得以维持，他们的平均年龄在25岁左右。老议员辞世和新议员补入紧密相连。这个模式意味着，前任财务官通常能够活到55岁左右。更明白一点讲，意味着他们的平均寿命在20到30岁这个普遍平均寿命的上限。罗马社会最有特权的成员有机会优先享用各种上等资源，但这一优势很可能被长时间待在像军营和拥挤的市中心这样易感染疾病的环境所抵消。对于自然死亡的30位皇帝（从公元1到7世纪）的年龄分析表明，其平均寿命为26.3岁。尽管拥有如此的财富和权力，即使他们成功避免了暗杀，还是无法期望比他们的臣民长寿得多。

这些统计数据给了我们一个关于罗马帝国人口的总体印象。特别是，它们突出了死亡的不断发生，尤其是在婴儿和年轻人中。疾病永远存在。可能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从前工业化的欧洲起就为人所熟知：痢疾与腹泻；诸如霍乱、伤寒和疟疾之类的发热病；诸如肺炎和肺结核之类的肺病。高死亡率也反映了普遍的营养不良，卫生水准低，城市人口非常密集容易导致传染病迅速流行，以及在一个庞大、缺乏管理的帝国，中央政府不可能严格执行隔离措施。公元165年，一支远征波斯的军队回来之后，将天花永久地带进了地中海世界。这个传染病传播了25年，有可能夺去了多达600万人的生命，这大约是

帝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高死亡率给罗马帝国妇女的生育能力增添了很大负担。不言而喻的是，为了维持稳定的人口数量，平均每个到了月经初潮（即生理上能够怀孕的年龄）的妇女至少必须生下一个也能活到月经初潮年龄的女儿。在一个婴儿死亡率很高的社会里，满足不容变更的人口需求所需要的活婴数量急剧上升。平均必须有2.5个女婴存活才能维持稳定的人口，或者说，每个妇女至少必须生5个孩子。

埃及的人口调查数据表明了当地人口应对这种严峻的生育压力所采取的一系列方式。总体而言，妇女倾向于早婚，平均结婚年龄刚好在20岁以下，这似乎是普遍的做法。帝国西部行省的墓葬铭文（从一个合理的假设来分析，即未婚妇女更可能由父母刻碑纪念，而已婚妇女则更可能由丈夫刻碑纪念）表明，妇女初婚的年龄在20岁上下。结婚的人尽可能的多，这也是分摊生育压力的一种方式。在埃及，60%的妇女在20岁之前结婚，其余则在30岁之前结婚。很少有人不结婚，罗马帝国的老处女非常少。

埃及的数据也表明，在生育力和生殖力（即出生率和妇女生养孩子的生理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在20至35岁之间生育力大体保持稳定，在45岁之后则急剧下降。和现代西方社会的通常做法有着明显不同，没有证据表明，在生育了特定数量的孩子或者这些孩子活过了婴儿期后，妇女会有意停止生育。只要可能，已婚妇女不停怀孕。一些妇女在这方面非常成功。埃及人口调查的申报表证明，一些夫妇生育了多达8个孩子，但绝大多数夫妇不超过3个。不过，这些申报表并不记录每个家庭死婴的数量。而且，在一个稳定的人口中，五分之一的婚姻没有生育，另有五分之一只会生育一个或几个女儿。在这些冷冰冰的数据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父母显而易见的痛苦，他们拼命地想要确保传宗接代。在公元2世纪中期，元老院议员、著名的演说家马可·科尔内留斯·弗龙托的五个孩子都不幸夭折。弗龙托怀着极度的痛苦给他以前的学生马可·奥勒利乌斯皇帝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感人地表达了他对子女无法存活的悲哀：

我在最为悲惨的情况下失去了五个孩子，因为我一个接一个失去了所有五个孩子，每次失去的都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接连受到这种丧子之痛的打击，每次在失去孩子之后，才有另一个孩子降生。这样，我总是失去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留下来，给我以慰藉。在我仍然处于悲伤之时，我才会有其他的孩子出生。

高死亡率的风险使得任何可靠和长期的计划生育都不可能。那些埃及人口调查所记录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大家庭中，家庭成员可能会产生重大和突然的变化。在其中一个家庭里（根据公元187—188年的人口调查记录），一对已婚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丈夫前两次婚姻中所生的已长大成人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以及妻子和前夫所生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生活在一起。家庭向横向扩展，包括同辈中人和以前婚姻中所生的子女，但无论时间长短，祖孙三代居住在一起的情况极为少见。这样的聚居情况反映了总体高死亡率的后果，这种后果对单个的家庭产生了多样和不可预测的影响。单单平均数读起来就已十分明显：也许多达三分之一的儿童在青春期前就会失去父亲；多达一半的孩子在25岁之前会失去父亲；平均一半的10岁儿童才会有一个活着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不到1％的20岁青年会有一个祖父母活着。

总体看来，这样的死亡率、婚姻、生育和大家庭模式体现了一种和工业化社会完全不同的经验，后者有着高得多的寿命、低得多的出生率以及紧迫的赡养老龄化人口的社会和经济义务。这些对比相当重要：环顾罗马帝国，现代人会立即产生深刻的印象，即它的老年人口相对缺乏，年轻人很多，孤儿很多，婴儿死亡率高，最后这一点尤为让人痛心。可以合理地认为，在这个社会里，大部分人（如果他们活过童年期的话）会活到45岁左右。这样的预期寿命带给人一种非常不同的对时光流逝和个人人生轨迹（毕竟，具有抱负的精英在25岁就进入了元老院）的认识，对于一生中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获得什么样的经历也会有着非常不同的想法。在公元2世纪70年代，马可·奥勒利乌斯皇帝在其日志（后世称为《沉思录》）里思考了人类存在的单调重复。在他忧郁的思考里，40岁的一生足以体会永恒的枯燥：

回顾过去以及现在的一切变化；也有可能预见将来，因为它完全会是一样的，不可能和现在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不同。因此，思考一个人40岁的一生等同于思考1万年。你还会看到其他什么呢？

远离尘嚣

可以理解的是，现代人关于罗马帝国的大部分想象都集中于精英阶层。想象我们和王公贵族一起漫步，在富人豪宅里向权贵建言献策，和行家一道欣赏维吉尔、塔西佗或是普鲁塔克原本为他们创作的作品，这会让人觉得很荣幸。这么想并不是什么让人觉得可耻的事。实际上，这是大部分罗马人羡慕的经历。在地中海世界大约6,000万人口中，富人的人数也许不到20万。

当然，也有其他激发热情的事情。有关罗马军队的大量考古遗址——其武器、盔甲，尤其是仍然耸立在英国北部哈德良长城沿线和德国莱茵河边境沿线的堡垒——激发了一些人去再现罗马军团的日常活动。这在当时也是少数人从事的活动。在公元2世纪后期马可·奥勒利乌斯统治时期，罗马军队的总人数可能是50万人，还不到帝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宏大的罗马城废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如同在庞培那样，我们可能对帝国至少约15%的人口的生活状况有所认识。

罗马帝国的居民大都靠土地为生。土地不仅是古代世界主要的生存来源，也是财富的首要标志。土地主要集中在富人手中。一份属于公元2世纪初、从意大利南部不起眼的城市利古里斯·拜比阿尼流传下来的记录，列举了向图拉真皇帝支持的、用于资助部分公民子女的计划提供资助的人。这份记录表明，3.5%最富有的地主拥有21.3%的土地（其中一个地主就拥有11.2%的土地）。另一方面，14%最贫穷的土地所有者仅仅拥有登记在册的土地的3.6%。很难确定这些田庄的大小。利古里斯·拜比阿尼的记录仅仅给出了土地的资本价值，并没有说明土地的大小。而且，只有财产价值足以使所有者参与图拉真计划的人才被包括在内。最小的那些农庄完全没有登记在册，其面积可能只有不到2.5公顷那么大。这是公元前2世纪初期分配给在被征服领

土上定居的罗马公民的最大块土地。从公元1世纪开始，退伍老兵（在军团服役满25年后）被安置在帝国各地特意为他们建立的城市里，每人分得至多5公顷的土地。这些殖民活动在行省的土地上留下它们的印记：在突尼斯乡间的大片土地上仍然能够看到规则的、呈棋盘状分布的古代农庄。

农业依赖于农民阶层。只有在意大利、西西里、高卢南部和北非的部分地区，奴隶劳动才起了重要作用。大部分土地是由业主居住者及其家属，或是由佃农、雇工耕种。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群有相互重叠之处。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在农忙季节可能会在附近庄园里劳动，以增加收入。实际上，分配给退伍老兵的土地太少，他们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尤其是在耕地贫瘠的地区。由此看来，官方一定假定他们还能够同时从事其他工作。无论是业主居住者还是佃农，农民所采取的耕作方法和方式不可避免地受气候和地形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因而各不相同：从尼罗河河谷（帝国生产力最大的地区）的洪水泛滥和人工灌溉的交替循环，到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的雨养农田（足够肥沃，可以轮作而不用隔年休耕）；从北非高原大草地和前沙漠地区的“浇灌”农业（精心构筑的运河和梯田网络用来分配储存的春雨），到不列颠和莱茵河–多瑙河行省黏重而潮湿的土壤。

在地中海盆地，基本的农作物是谷物（主要是大麦和小麦）、旱地豆类作物（蚕豆、豌豆、鹰嘴豆、滨豆）、葡萄和橄榄。旱地豆类提供了谷物所缺乏的维生素B2和钙，橄榄则是脂肪、油、照明和肥皂的主要来源。小土地所有者可能也会畜养猪（以提供肉食）、山羊（以提供奶酪）和一些绵羊（特别是为了提供粪肥）。牛群较少见。在优质耕地相对缺乏、半干旱的地中海低地地区，发展大规模畜牧业完全不合算，而且还会给粮食和水资源施加很大压力。因此也许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在许多古典作家看来，畜养牲畜主要是和遥远的边远行省如不列颠以及生活在莱茵河–多瑙河一线以外的游牧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饮食中包括大量的牛肉和奶制品完全是蛮夷的标志。

通常，小农经济力图以最小的风险换取最大的产量。在地中海世

界的许多地区，大量不同种类的庄稼分散在崎岖不平的土地里。庄稼种类的多样性和土地的分散性降低了庄稼绝收的风险，而细心储藏则有助于确保全年有足够的粮食供应。个别遭遇不幸的农民可能还能够依靠邻居的帮助渡过难关，以前他们也许同样帮助过这些邻居脱离困境。不过尽管他们节俭、聪明和乐于互助，但饥饿的威胁还是时常存在。公元2世纪中期，古代最著名的医生之一盖伦——他的作品得以保存——生动地回顾了其家乡帕加玛（位于土耳其西部）附近农村粮食短缺所产生的后果。农民们先是宰杀家畜（他们无法继续喂养），然后吃掉了储存的用于冬季喂猪的橡果。盖伦注意到，即使是在饥荒的情况下，也很少有人死于饥饿，大多数人都死于食用不健康的替代食物，如树根、球茎以及煮熟的野草而导致的传染病：

> 出现了大量发热病……大便恶臭且疼痛难忍，接着是便秘或者痢疾；因为一些人的膀胱溃烂了，所以小便味道刺鼻或臭气熏天，……那些没有这些毛病的人要么明显死于内脏器官的炎症，要么死于严重而危险的高烧。

尽管经常面对严酷的环境条件和几乎是普遍的营养不良，那些种田人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适应艰难困苦的能力。但他们的经济十分脆弱，可能会由于不可预测的庄稼绝收、水旱灾害、或是地主、债主、收税人的无理要求而突然破产。一些农民经受住了这样的危机，一些却在死亡、疾病或债务面前无能为力，另一些从小农场主沦为佃农，或者从佃农沦为无地雇工。他们的儿子也许指望参加军队，希望在侥幸服役满25年后能获得自己的份地。许多退伍老兵被安置在他们服役的卫戍城市附近，通常远离他们从小长大的地方。在新的居住地，他们和大部分其他人一样，继续以种田为生。

罗马帝国的小土地所有者是沉默中的大多数。他们很少树碑立传，很少刻写墓志铭作为纪念。他们居住的是简陋的木结构农舍，其中绝大部分早已消亡得无影无踪。他们很少出现在现存的文献中，除了作为粗鲁的乡巴佬在优雅的城市生活面前不知所措，招人调笑一番外。然而，罗马帝国的财富却依赖于那些在农村劳动的人。他们那点

可怜的剩余产品被作为地租或者税收征走，资助了和平时期驻扎在边境地区的军队，促进了使帝国行政和文化协调一致的城市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理解的是，罗马帝国的历史集中描述皇帝、战争、征服、富人和权贵及其了不起的城市文明成就。这些值得我们关注，并且也许值得我们钦佩。即便如此，有时候我们太容易忘记，这个地中海世界的超级大国的稳定和繁荣恰恰依靠的是汗流浃背的农民的勉强支撑。历史并非仅仅关注碰巧留存下来的东西，也非仅仅关注引起历史学家注意的东西。在面对如此辉煌的帝国成就时，对罗马帝国的绝大部分居民没有留下可作永久纪念的资料进行反思，对我们总是有所裨益的。

第七章

回顾罗马

不列颠和平

1911年5月11日，弗朗西斯·哈弗菲尔德（牛津大学卡姆登古代史讲座教授）就任新成立的“促进罗马研究学会”的会长，并发表了就职演说。他发现有必要解释一下建立这样一个学会的理由，因为他注意到许多人认为成立这样一个学会“就是为了平息少数专家的牢骚”。他还敏锐地意识到，在过去，这类学会通过它们的刊物，发表了“优秀作品”，但也可以公平地说“同时也刊印了大量的垃圾”；而且哈弗菲尔德还在想，“个人主义的英国”是否是推动一个“集体学习和研究”计划的好地方。

对于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哈弗菲尔德作了有力的辩解。他坚持认为，罗马历史纷繁复杂，需要专家队伍来对现存的资料进行适当的评价和鉴定。现在是应该限制热情的业余爱好者的影响的时候了：

> 我们这些英国人对学问抱有偏见，这一偏见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仅仅是人们认为学问家是社会的讨厌鬼或者是怪人……而且英国人对学问还漠不关心，认为它毫无用处，相信即使没有训练和知识，任何一个英国人也能够去他喜爱的地方，取得他想要的成就。

然而哈弗菲尔德并非想把古代史束缚在象牙塔里，仅由专家来护卫，这些专家可能会嘲笑任何让其学科变得通俗易懂的努力。成立“促进罗马研究学会”的真正理由是因为罗马历史和当代社会和政治密切相关。对于哈弗菲尔德来说，尽可能全面而准确地理解罗马史并且交流这种理解的需要从来没有像在20世纪初那样迫切：

> 在我看来，罗马历史对于当今的借鉴意义是所有历史中最为突出的……它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对比和比较……其帝国体制，包括它的不同之处和相似之处，处处都能指引我们自己的帝国，例如在印度。

英帝国主义和罗马帝国主义的比较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启发性，是可以争论的问题。英国和罗马的关系不容易说清楚。许多评论者急于指出，这两个帝国之间有天壤之别，比较毫无意义：大英帝国更为庞大，而且散布在全球各地；其通讯手段更为迅速和可靠（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和印度之间使用电报联系）；其武器装备和作战手段在技术上要先进得多；其工业、商业和制造业的能力也要强大得多。最急迫的是，任何比较还要面对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无论英国后来的帝国多么成功，它自己都曾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征服者自己曾经也被征服过。

首先对罗马入侵不列颠报之以爱国主义回应是把布狄卡变换成了包迪西亚，前者是公元60年起义失败的伊克尼人的领袖之一，后者则是拒绝屈服于外族专制统治的强有力的民族主义象征。一个被帝国战败的反叛者将被改造成另一个帝国的女英雄。这一对历史重塑的高潮是托马斯·桑尼克罗夫特于1871年完成的宏伟雕像，于1902年用青铜铸造，矗立在伦敦的泰晤士河堤岸上。包迪西亚以一种夸张的反抗姿势，站在一辆轮式镰刀战车[1]（没有得到考古学的证实）的接合部，率领她的人民抗击罗马侵略者。

图20　托马斯·桑尼克罗夫特：“包迪西亚”青铜雕塑，伦敦的泰晤士河河堤

对于这件作品，女王的丈夫艾伯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桑尼克罗夫特还在雕塑这件作品的时候，艾伯特就参观过他的工作室，并把他自己马厩里的马匹借给他作模特。无论是赞助人还是艺术家都关心的是，应该尽量让这位包迪西亚看起来有皇家风范，能强烈暗示她就是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威廉·考珀激动人心的《包迪西亚颂》一诗最初发表于1782年，即美国独立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它被刻在雕塑的底座上，作为雕塑的最后一道装饰：

罗马将会灭亡——写下这句话
以她流出的鲜血；
无可救药地和令人憎恶地灭亡，
深深埋进废墟和罪恶。

然后从我们土地的森林里
滋生出来的后代，
武装着雷电，覆盖着翅膀，
将要统治一个广阔的世界。

你的后代将会支配，
恺撒闻所未闻的地区，
他的雄鹰从未飞过的地方，
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战无不胜。

对于统治一个日益扩张的帝国的民族来说，这种赞扬本土抵抗侵略的鼓舞人心的故事并非没有歧义之处。1857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被一系列通常称为“印度反英暴动”的起义所削弱。手无寸铁的平民惨遭杀害，这使人们突然对心安理得地认为大英帝国是一项合作事业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在勒克瑙南面的坎普尔，印度反叛者让男人、女人和孩子一排排地站在沟渠旁，然后残酷地将他们杀害。两年以后，即1859年，在桂冠诗人阿尔弗莱德·丁尼生勋爵笔下，包迪西亚的形象有所改变，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被想象成嗜血的野蛮人，指挥她的军队进一步犯下暴行。在这里没有女英雄：这是不列颠反抗罗马统治的叛乱。

撞开大门，烧毁宫殿，砸碎雕像，
抓住罗马人白发的头颅把它砸碎，抓着这可恶的，
把充满欲望而性感的罗马少年剁成碎片，
割掉母亲的乳房，把婴孩的脑浆击出，
上来吧，不列颠人，登上我的战车，登上我的战马，把
他们践踏在脚下。

无论是作为统治者合法平定叛乱还是作为被征服者合理抵抗侵略的故事，包迪西亚的神话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暴力、侵略和野蛮的场面。和这些相反，还有一种关于不列颠并入罗马帝国的更为和平的说

法。根据这种观点，是罗马帝国首先教化了不列颠。在1911年出版的《中小学英国史》中，拉迪亚德·吉卜林和C. R. L. 弗莱彻用毫不妥协的语言阐明了这一点：

> 罗马人在所有行省推行了一种法律体系，它是如此公正和强大，以至于现代欧洲几乎所有最好的法律都以它为基础制定。在所有地方，弱者都受到保护，以抵御强者。……为罗马神明建造了教堂以及富有罗马绅士的乡间别墅……这些绅士起初觉得他们是受到了流放，冻得发抖，并诅咒“令人憎恨的不列颠天气”，用暖气给房子供暖。他们渴望回到意大利。但是其中许多人留了下来……并对不列颠有了一种对自己亲爱的祖国才有的感情，后来这种感情逐渐成为一种激情。

在吉卜林和弗莱彻看来，征服无疑是件好事。他们对罗马人的唯一批评是他们没有把文明的统治扩大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所有地区。

图21　威廉·贝尔·斯科特的壁画《建造罗马长城》，沃林顿城堡，诺森布里亚

在许多方面，《中小学英国史》体现了普遍存在于维多利亚时代关于罗马式不列颠的看法中的一个主题。1861年，威廉·贝尔·斯科特在诺森布里亚的沃林顿城堡完成了关于当地历史的系列壁画，一共8幅。其中第一幅表现的是公元2世纪初建造哈德良长城的情形。一名负责指挥的罗马百夫长正向当地劳动者发号施令，他身旁立着一面军旗。在他身后，一名军团士兵击退了满怀敌对情绪的当地人试图中止这一宏大帝国建筑工程的反抗。

这组壁画清楚地表明，这种改善当地情况的努力在后来仍在继续：最后一幅壁画《铁和煤：19世纪》展现了近代泰恩塞德的工业成就，这是个同样值得称颂的景象。在壁画上方的墙壁上，斯科特绘制

了圆形物，描绘当地杰出人士：在这里，蒸汽机车的先驱乔治·斯蒂芬森和罗马皇帝哈德良站在一起，因为他们都热情地推广工程技术，致力于给英格兰北部（和更广大的帝国）带来繁荣和文明。

毫无疑问，这是极具吸引力的思考帝国统治的方式。在1901年出版的一项研究《古罗马帝国和在印度的大英帝国》中，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律师及著名自由党政治家詹姆斯·布赖斯提出，两个帝国的成功非常相似：两者在“维持高水平的内部和平与秩序”方面都十分出色；两者令人惊叹的道路和铁路建设都表明，它们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懂得工程技术的民族”；两者都在战争和统治方面取得了成功，体现了相似的“勇猛和活力以及勇于面对困难的精神，足以击败一切抵抗”。这种对于两个帝国更为肯定的比较的好处是，它似乎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找到了令人信服的历史依据，但也引发了更多令人不快的问题。1905年，在英国皇家科学院所作的报告《罗马不列颠的罗马化》中，弗朗西斯·哈弗菲尔德争辩说，罗马帝国之所以成功，一个原因是它迅速和有效地“将行省居民同化为一个秩序井然而凝聚在一起的文明”：

> 这就是帝国的成就……尤其是，意大利明显具有凝聚力的文明吸引了未开化但却聪明的人，而罗马的宽容并不强制任何人服从，这样做使罗马的文化更具魅力，因为它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这些问题也是克罗默侯爵伊夫林·巴林于1910年1月在古典学学会发表的会长就职演说中的关键问题。古典学学会成立于1903年，声明是为了推进“古典学研究的发展”及“让公众接受这类研究在全国教育计划中应占重要位置”的观点。克罗默此前不久刚刚结束其在印度和埃及担任殖民官员的光荣生涯，在其题为《古代和现代帝国主义》的演说中，他明确援引了自己在政府中的经验：“因此，由于不能作为一名学者而向学者讲话，我想也许可以允许我作为一名政治家和行政官员向学会讲话。”对于克罗默来说，尽管这两个帝国在许多地方可以进行比较（在此他基本上遵从了詹姆斯·布赖斯的观点），但很清楚，“同化的问题”标示出了统治不列颠的罗马人和统治印度的英国人

之间不可弥合的区别。“罗马人相对的成功很容易解释，他们的任务比起任何现代帝国来说都要容易得多。”

在克罗默看来，单单是印度的多样性，它许多的语言、宗教和种族，就使它和罗马人所面对的任何国家都不同。此外，人们明显感觉到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存在种族和肤色上的差别，这成为同化的一个重要障碍：

> 隔离的屏障赖以建立的基础……如此坚实，如此强烈地吸引男男女女心底里的本能和情感，以至于在未来的几代人中，它可能仍会经受得住任何微不足道的、尽管是好意的、瓦解它的努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确保“稳固地维持英国的霸权地位”：

> 谈论印度的自治……就好比主张统一的欧洲的自治，就好比我们假设在挪威人和希腊人之间、在顿河两岸的居民和塔霍河[2]两岸的居民之间存在相同的情感和利益。这种想法不仅荒谬，而且……不现实。

这样的观点并非没有受到质疑。几个月之后，在1910年5月，古典学学会的牛津分部邀请克罗默勋爵参加一个特别会议，就他在演讲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辩论。哈弗菲尔德第一个讲话，提出克罗默对于种族和肤色的强调并不合适。真正的困难在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面对的是发达的社会，“其思想、感情、传统和文明早已凝固成了确定的形式”。在哈弗菲尔德看来（也许在此想到了他关于罗马不列颠的著述），帝国力量同化其臣民的能力限定在“未开化或是松散的群体”。即使克罗默关于大英帝国在印度统治之未来的结论是正确的，其论述的基础至少值得争论。

另一位牛津古代史学家和考古学家D. G. 贺加斯提出了更大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如果历史有什么借鉴意义的话，那就是，罗马帝国“以一个不同化的时期开始”，然后产生了“同化的愿望”，然后再进

入到了“积极同化”的第三个阶段。问题主要不是种族和肤色，而是应该把大英帝国看成是“仍然处在帝国主义的第一阶段”。只有在存在能够证明“或多或少完全的社会一致性”的确凿证据时，才会有“足够的基础比较这两个帝国”。令人遗憾的是，古典学学会发表的会议记录没有提供相关信息，让我们无从判断听众或者克罗默对于这些争论的反应，或是他们对贺加斯更具煽动性的结论的反应。贺加斯认为，显然在一段时间后，英国会发展出一套先进的殖民地统治体系，它足够成熟，能够和罗马帝国“显著的成功”相提并论。

古罗马精神

对于意大利法西斯头目贝尼托·墨索里尼来说，罗马帝国并没有任何令人不安的歧义。墨索里尼在1922年3月做了一次报告，后来于4月21日发表在他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上。在这个报告中墨索里尼阐述了他对古罗马精神的向往：

> 古罗马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参照系；它是我们的象征，或者如果你们愿意承认，它还是我们的神话。我们梦想建立一个古罗马的意大利，它智慧而强壮，纪律严明而威震四方。不朽的古罗马精神的许多内容在法西斯主义中得到了再生。

7个月之后，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伊马纽埃三世邀请墨索里尼组建新政府。对于一个已经准备发动内战的激进派领袖而言，这种获取权力的方式并不特别戏剧化。在米兰获悉这一消息后，墨索里尼匆忙命令他的黑衫党民兵向罗马进军。他本人则搭乘一列夜班火车，随后赶到。在10月30日上午，他精神抖擞地到达了罗马。

法西斯很快便创造了“向罗马进军”的解放神话。摄影师们做好了准备，以便拍摄黑衫党到达时的情景。《意大利人民报》和他人串通起来，编造一场英勇的斗争，一场武装起义，创造了3,000名在推翻腐朽政权的高尚事业中牺牲的“法西斯英雄”。历史看似重演了。这是

第二个尤利乌斯·恺撒，他曾希望骑着高头大马，被支持者簇拥着进入罗马。墨索里尼积极鼓励制造这种相似性。在1932年3月23日到4月4日之间接受德国记者埃米尔·路德维希采访时，他承认："我喜欢恺撒，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次年在《意大利人民报》发表的文章中，他宣称：

> 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也可以被称之为恺撒式的，为特别杰出的人物所主宰，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如恺撒向罗马的元老寡头集团进军一样。

墨索里尼把恺撒在公元前44年3月15日的遇刺看成是"人类的灾难"。在他修订的罗马史（在意大利中小学里讲授）里，布鲁图斯和卡修斯被塑造成少数压迫人民的反动派的代理人，他们试图镇压人民自由的真正拥护者。只是到了罗马的第一个皇帝屋大维／奥古斯都获胜，恺撒的事业才得以重建。这就是墨索里尼想要复兴的帝国式罗马。1935年10月向埃塞俄比亚宣战，被说成是重建罗马帝国的一个步骤。在墨索里尼看来，这不啻于"第四次布匿战争"，一个意大利企图控制地中海的声明。他坚持用罗马帝国式的语言说地中海就是"我们的大海"。1936年5月初，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被意大利军队占领。这被看成是宣告胜利的充分理由，但民众没有被告知，其实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都没有被征服，而且意大利军队使用了毒气，墨索里尼还授权以"系统的恐怖主义和灭绝政策"来终结任何进一步的抵抗。5月9日上午10点30分，在罗马市中心的官邸威尼斯宫殿的阳台上，墨索里尼向欢呼雀跃的人群发表讲话：

> 意大利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帝国……为了埃塞俄比亚所有人民的文明与人性的帝国。这追随的是古罗马的传统，它在征服那些人之后，将他们和它自己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军团士兵们，满怀希望，高举你们的军旗，高举你们的宝剑，在15个世纪之后，热烈欢呼帝国重新出现在罗马命中注定的山丘上吧。

对于墨索里尼而言，古罗马精神复苏的中心是罗马城本身。在接

受埃米尔·路德维希采访时，他夸张地宣称：“在我看来，建筑是最伟大的艺术，因为它是所有其他事物的象征。”当路德维希提出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古罗马式的情感时，他说：“我也一样，首先是个古罗马人。”墨索里尼迫切希望，应该在一种露天的博物馆里展示古罗马帝国的伟大。1931年，他指示一个委员会进行总体规划，并令其不要回避大规模拆除老旧建筑、重新安置老城区居民的建议。应该把积聚起来的“许多个世纪的颓废”一扫而尽，无论是中世纪房屋还是巴罗克教堂都不应该妨碍展现“一个更伟大的古罗马”。

罗马城今天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源出于墨索里尼的规划。令旅游者赏心悦目的古代建筑之所以如此突出地耸立在那里，恰恰是因为周围“污秽的景象”（用墨索里尼的话说）被彻底地摧毁了：

> 我的想法很清楚，我的指令非常明确……罗马要让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称奇：幅员辽阔、组织良好、国力强盛，就像在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第一帝国时期那样……我们历史中千年以前的建筑应该像巨人一样孤然耸立。

罗马城里的帝国大道——现在较为委婉的名字是帝国广场大道——从威尼斯宫殿笔直延伸出去，完全是法西斯分子建造的。它是在城市中世纪的建筑区里开辟出的一条道路，以便从墨索里尼的总部能够清楚地看到大竞技场。尤其是，它提供了举行阅兵式所必需的巨大空间。

罗马不仅在地面上得以重建，还举办了纪念奥古斯都诞辰2,000周年的盛大展览，以庆祝罗马帝国更伟大的荣耀。1937年9月23日，“奥古斯都古罗马精神展”在罗马开幕，它包括了3,000件罗马帝国各地的纪念碑和建筑模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元4世纪初的罗马城模型，以1:250的比例建成，面积达80平方米。从未有如此多的罗马帝国建筑集中在一起，展览试图向参观者重现一个复原的帝国的完整景象。它引人注目的废墟——至少以微缩的形式——现在又被复原了。

图22　艾伯特·斯皮尔的日耳曼尼亚（即新柏林）的缩尺模型，南北中轴线，前方为人民大礼堂

在参观过“奥古斯都古罗马精神展”的100万名观众中，阿道夫·希特勒是最受触动的一个。1938年5月3日至9日，希特勒访问了罗马。他于夜晚到达，乘车穿过特意照耀得灯火通明的市中心。之后两天

里，希特勒两次参观了展览（第二次是特意要求参观的），并巡视了许多新近发掘出来的古代城市建筑。墨索里尼在罗马大兴土木，这促使希特勒下定了重建柏林的决心。13年前，在其自传性宣言《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经抱怨说，德国的首都缺乏宏伟壮观感，它最重要的建筑只不过是“一些犹太人的百货商店和一些企业的总部”。希特勒要求取而代之的是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公共建筑，就像罗马大竞技场“经受住了过去所有的动荡”那样。柏林应该比罗马（“世界上我们唯一的对手”）更“激动人心”。

这种憧憬建设新柏林（希特勒重新命名为日耳曼尼亚城）的结果可以在纳粹首席建筑师艾伯特·斯皮尔设计的模型中看出来。从其规模、不朽性和对于创造巨大的仪式空间的关注等方面来看，斯皮尔的规划似乎是决心要胜过墨索里尼的罗马。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其穹顶、凯旋门和柱廊经常仿照罗马的建筑形式，但就单个建筑而言，这个新柏林也力图胜过帝国时期的罗马——这个如此煞费苦心地在“奥古斯都古罗马精神展”的白色石膏模型中按照本来的荣耀重建起来的罗马。

这是最令人望而生畏和最具压迫性的说教式建筑。柏林对于希特勒就像罗马对于墨索里尼一样，城市规划不仅具体表达了他们对于罗马帝国的借鉴，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公开的宣言，宣告他们是古罗马精神的继承者和复兴者，《我的奋斗》这样清楚明白地劝诫读者：

> 尤其是在历史教育中，我们不应被吓倒而不研究古代史。如果从宏观轮廓上正确地理解罗马史，它会是最好的老师，不仅对于今天，而且可能对于所有时代都是如此。

银幕上的罗马帝国

罗马将军克拉苏（劳伦斯·奥利维尔饰）未能诱奸他的奴隶安东尼努斯（托尼·柯蒂斯饰），因而将视线转向军队，它正从罗马出发，前

去镇压斯巴达克思（柯克·道格拉斯饰）领导的奴隶起义：

小子，那儿就是罗马，那儿就是罗马的力量、威严和恐怖。那儿是如同巨人般控制已知世界的力量。没有人能够抗拒罗马，没有民族能够抗拒它。……安东尼努斯，只有一个方式对待罗马：你必须侍奉她，在她面前必须表现得谦卑；你必须匍匐在她的脚下，必须爱她。

好莱坞在20世纪50年代向观众展现的罗马帝国清楚地突出了它想要传达的所有重要信息。英帝国统治印度之功过的争论中表现出来的疑虑和争执，大体上没有妨碍好莱坞对罗马帝国的描绘。它试图坚决抵制（已被打败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提倡的法西斯主义对罗马的美化。相反，好莱坞描绘了一个专制国家，它沉湎于奢华，残忍而坚决地压制自由。

在好莱坞看来，罗马的统治者是精神错乱者。在《暴君焚城录》（1951年上演）中，尼禄皇帝（彼得·尤斯蒂诺夫饰）是一个大独裁者的混合体。在某种程度上，尼禄就是希特勒，他极其残忍地想要消灭基督徒。尼禄的大屠杀将会把他们从历史的表面抹去："当我消灭掉这些基督徒后……历史将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真正存在过。"在某种程度上，尼禄也是墨索里尼。他处于一个专制君主充当妄自尊大的城市规划者的悠久传统中，着迷于创造一个新罗马。尼禄皇帝向吃惊的廷臣展示的宏大城市模型是电影制片人向意大利政府借用的。这个模型最初是为了墨索里尼宏大的"奥古斯都古罗马精神展"而制作的。

如同《暴君焚城录》开头的匿名旁白吟诵的那样：

伴随这种权力而来的是腐败……没有人能够肯定自己一生会怎么样。个人任凭国家摆布。谋杀取代了正义……无法逃避鞭子和利剑。

图23　尼禄（彼得·尤斯蒂诺夫饰）向廷臣展示他对新罗马城的规划，《暴君焚城录》（1951年）剧照。

这些形象提供了好莱坞表现帝国时期的罗马的基本电影语言。《角斗士》（2000年上演）的导演里德利·斯科特证实说，电影中庆祝康茂德皇帝胜利的场景有意想要让人回想起勒尼·里芬施塔尔的《意志的胜利》（1935年上演）。把康茂德皇帝在罗马展示权力和希特勒亲临纽伦堡纳粹集会相比是明白无误的。两个场景的开始都是巨大建筑和欢呼人群的鸟瞰场面，两个场景都包括从中心人物角度拍摄的场面，摄像机的角度使康茂德和希特勒看起来比本人高大得多。电影还明确引用了希特勒行进中的一个时刻。他在前行时，一个小女孩向他献花。而康茂德走在元老院前的台阶上时，孩子们也向他献上了花束。在里德利·斯科特描绘的罗马城里，元老院面对着罗马大竞技场，中间隔着一个站满士兵的巨大广场。这种统治性建筑的宏大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希特勒的新柏林规划。公元2世纪的罗马街道狭窄，市政广场上满是建筑，从来不是电影中的样子。只有到了1932年，当

墨索里尼修建了用于检阅、穿过市中心的帝国大道时，罗马才与此有些类似。

帝国的庞大计划有着致命的缺陷，这种强烈的感觉主宰了好莱坞对罗马的描绘。也有可能提出其他的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从未得到实现。在《罗马帝国沦亡录》（1964年上演）中，马可·奥勒利乌斯皇帝允诺维护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无论你们居住在何处，无论你们的肤色如何，在取得和平之后，你们所有人，所有人都会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最高权利……在这个家庭中各民族都平等。"无论听起来是多么激动人心，这种构想没有变成真正的政治纲领是肯定的。

图24　重建的罗马，从元老院看到的一幕，《角斗士》剧照（2000年）

对于好莱坞而言，罗马帝国是不可挽回的。在《角斗士》中，临死的马可·奥勒利乌斯皇帝再次试图避免不可逃避的命运。他拒绝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康茂德（华金·菲尼克斯饰），却指示马克西姆斯将军（拉塞尔·克罗饰）恢复共和国，挽救"一个只能低声说出的脆弱的梦想"。在罗马，勇于直言的元老格拉古直截了当地指出："元老院即人民……从人民中选出，表达人民的心声。"（格拉古的宣称直接重复了美国共和主义的传统语言，我们应该理解它想要传达的想法，而不是简单地斥之为明显而严重的历史错误。）

然而《角斗士》并没有能应对政治挑战。马克西姆斯并非聪明的

廷臣，亦非忠诚的革命者。他特别渴望回到自己在西班牙的农庄。康茂德了解到马可·奥勒利乌斯的计划后，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自己称帝。马克西姆斯差点被处死，但却无法挽救自己的家人，康茂德残忍地下令杀死了他们。马克西姆斯受伤而逃，为了给妻子和儿子报仇，当了角斗士。一个政治上被离间的孤独者寻求正义的复仇，对其正确性的认可是《角斗士》明确颂扬的家庭价值之崇高性的一部分。康茂德不适于统治，他和皇帝父亲之间存在障碍的关系解释了这一点。他抱怨说，在他小时候，父亲从未像样地抱过他。康茂德的姐姐卢奇拉采取一切行动保护自己的儿子，即使这意味着出卖他人。马克西姆斯的替代“家庭”，即角斗士同伴，之所以在竞技场上成功，恰恰是因为他们形成了忠诚的兄弟关系。在最后决斗的高潮中，康茂德和马克西姆斯双双死于罗马大竞技场，实现了主人公复仇的要求，并且在最后梦幻般的场景中，让他得以和妻儿在阴间团聚。

这些已是陈腐的主题了。在《罗马帝国沦亡录》中，主人公李维·梅特鲁斯（斯蒂芬·博伊德饰）在与康茂德的决斗中活了下来，人们拥戴他做皇帝。在人们“好啊，恺撒！”[3] 的欢呼声中，他厌恶地走开了。未来不在皇宫受到玷污的公共空间中，而在于陪伴深爱的妻子，生活在他们自己私人的内省世界里。在《暴君焚城录》中，主人公马可·维奇纽斯（罗伯特·泰勒饰）推翻了尼禄，他眼看着下一个皇帝加尔巴的军团开进了首都。马可新近皈依了基督教，认识到教会和国家严格分离的重要性。他信奉的新宗教将不会是社会改革的催化剂。相反，这种宗教使他确信要从政治中引退。这里基督教的价值首先是家庭价值。在电影的开始，我们看到马可是个年轻的单身汉，刚从战场上归来，驾驶着战车莽撞地穿过罗马的街道。现在他带着妻儿，谨慎地驾着一辆沉稳的家用马车离开了罗马。

尽管鼓吹农庄里宁静生活的好处，远离都城里污秽不堪的反常状态，这类古装大片的一个持久的魅力仍然是，它从来没有完全避免它所试图批评的东西。这类电影称颂的是它自己创造的史诗故事：为了拍摄《宾虚传》（1959年上演），建造了一个完整的战车竞技场，使用了4万吨进口的沙子；拍摄《暴君焚城录》中尼禄的宴会时剩下的

食物捐献给了救济机构，用于拯救饥饿儿童；在《角斗士》中，宏伟的罗马是以数码技术重建的，罗马大竞技场中的人群里，只有2,000名观众是临时演员扮演的，其余33,000人则是电脑合成的。这类电影特别突出的特征是其奢华宏大的宽银幕场面。这种重建的银幕上的罗马以它巨大的花费和引人注目的复杂技术深深吸引了观众，而不是让他们感到厌烦。

这种悖论也受到利用，也许并不令人吃惊。《暴君焚城录》鼓动观众谴责尼禄，但是电影制片公司也认识到，战后崇尚消费主义的美国可能会对罗马帝国的炫耀性消费感兴趣。《暴君焚城录》帮助推销了雨衣、房地产、火灾保险、墙纸、桌布、珠宝、拖鞋以及睡衣裤。万星威服饰品牌和纽约人纺织品公司联合推出了“暴君焚城录”式平脚短裤：“色彩鲜艳的八种火辣款式……欢快的设计完全来源于这部关于伟大罗马时代的非凡电影。”最终，过度专制的产物在商业大街的商店里能被普通大众买到。穿着“宽大式裁剪的人造纤维”的“暴君焚城录”式平脚短裤，每个美国丈夫现在都拥有“像尼禄那样穿戴”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图25　万星威服饰的人造纤维平脚短裤广告

关于罗马帝国的各种现代版本——尽管过多——当然可供我们娱乐。《暴君焚城录》、《罗马帝国沦亡录》或是《角斗士》这类电影至多向我们传递了纯粹宏大的凯旋式场面、富翁们的豪宅、角斗士竞技血腥的刺激、战争的恐怖、专制统治可怕的随心所欲以及罗马大都市般的恢弘壮观这样的信息。它们很少揭示罗马人关于自己帝国使命（如同第一章中所讨论的）的意识，或是揭示围绕行使以及表达帝国

权力而存在的困难与模糊性的认识（如同第二章中所讨论的），抑或尝试理解行省精英阶层的微妙地位（如同第三章中所讨论的）。它们通常把征服和抵抗完全想象成武装对抗（很少考虑第四章中所探讨的更为微妙的其他方式），把基督教表现为业已完全形成，而且经常公开表现出新教的面貌和信仰（第五章中所描述的疑虑和争论被悄悄抹去了）。总体而言，电影里表现的罗马帝国令人吃惊地健康强壮。一群肌肉发达、经常酗酒的群众演员掩盖了一个为营养不良、高婴儿死亡率、传染病流行以及低平均寿命所困扰的社会。

在好莱坞电影对罗马帝国的刻画中，激烈的个人斗争是其核心。这包括赞美个人同惨绝人性的极权主义政权作斗争并取得胜利、成功赢得爱情（通常是异教男性得到基督教处女）以及寻求正义的复仇（通常是蒙冤而不屈的异性恋主人公击败疯狂堕落而且明显变态的统治者）。毫无疑问，这些引人入胜的组合是以罗马帝国为题材的电影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对此应该予以赞赏，但同时应保持清醒。我们应该记住，为反叛喝彩、支持令人费解的宗教崇拜、颠覆帝国权力或者鼓励个人自由，把这些作为文明社会的检验标准，对于古罗马的观众不会有什么吸引力。

大体上，当代对于古代社会的重构——例如关于英国在印度推行帝国主义的争论或者20世纪30年代纪念碑似的城市幻想——顶多可以这样理解，它体现了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复杂性以及它所关注的问题，并以重构古代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评述。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古罗马帝国的这类描述的“准确性”就是次要的了（无论它们宣称是多么真实）。《角斗士》在商业上的成功及时提醒我们，我们对于古代世界的想象仍然是很现代的事情。这些想象充分揭示了我们自己优先考虑的事情和我们的问题，点明了我们的抱负和担忧。就像维多利亚时代和法西斯主义描绘的罗马一样，21世纪描绘的罗马更多地揭示了我们自身的状况，而非古代的状况。它把我们的梦想和担忧装扮在罗马人穿的长袍里。然而最终它只能提供一个不那么具有启发性、在某些方面来说不那么有趣的罗马帝国简史。

注释

1 一种双轮马拉战车，攻击力更强。

2 源出于西班牙东北部，下游流入葡萄牙境内的一条河流。

3 罗马皇帝泛称为恺撒。

BRITANNIA
Camulodunum
Verulamium
Londinium
Albis
(Elbe)
GERMANIA INFERIOR
Colonia Agrippinensis
Bonna
BELGICA
GERMANIA SUPERIOR
Moguntiacum
LUGDUNENSIS
Liger
(Loire)
Rhenus
(Rhine)
Danuvius
RAETIA
AQUITANIA
Burdigala
Lugdunum
Rhodanus
(Rhône)
Alpes
Mediolanum
Aquileia
Legio
Garumna
(Garonne)
NARBONENSIS
ALPES COTTIAE
Padus
(Po)
Arausio
ALPES MARITIMAE
Tolosa
Nemausus
Iberus (Ebro)
Pyrenaei M.
Narbo Martius
Arelate
Genua
Numantia
Massilia
UMBRIA
Arimin
LUSITANIA
HISPANIA CITERIOR
Emporiae
Tagus
Tarraco
CORSICA
Aleria
Tiberis
Ligur
Baeb
Roma
Emerita
Saguntum
Corduba
Baetis
Neapolis
Pomp
Gades
BAETICA
Balearic Is
SARDINIA
Carteia
Carthago Nova
Caesarea
Volubilis
MAURITANIA TINGITANA
Carthago
Agrigentum
Cirta
Bulla Regia
SICILIA
Cuicul
MAURITANIA CAESARIENSIS
Lambaesis
NUMIDIA
Hadrumetum
AFRICA
Lepcis Magna
ASIA
Provinces shown thus
Land over 1000 metres
0
250
500
750
1000 km

公元2世纪晚期的罗马世界

大事年表

（公元前31年—公元192年）

公元前

31年	亚克兴角战役，屋大维击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30年	安东尼自杀
20年代	维吉尔创作《埃涅阿斯纪》
27年	屋大维采用“奥古斯都”这一称号

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奥古斯都在位

8年	阿诺巴尔·鲁福斯出资兴建的大勒浦克斯城市集竣工

公元后

1/2年	阿诺巴尔·鲁福斯出资兴建的大勒浦克斯城露天剧场竣工
14—37年	提比略在位
37—41年	卡里古拉在位
41—54年	克劳狄在位
42年	克劳狄入侵不列颠
54—68年	尼禄在位
54年	塞内加写作《南瓜化》
55年	不列塔尼库斯之死
约55年	阿弗罗狄西亚的柱廊雕塑完成
55/56年	塞内加写作《论仁慈》
59年	阿格丽品娜之死
60年	布狄卡在不列颠领导起义
64年	罗马城大火灾
64—68年	罗马黄金屋的建造
65年	塞内卡自杀
68—69年	加尔巴在位

69年	奥托和维特利马斯在位
66—70年	犹太起义
70年	洗劫耶路撒冷
70年	狄奥·克里索斯托姆在普鲁萨面临粮食骚乱
71年	提图斯和维斯帕西亚努斯在镇压犹太起义后举行凯旋式
74年	马萨达的“斯卡利”战士自杀
69—79年	维斯帕西亚努斯在位
77—84年	克内乌斯·尤利乌斯·阿格里帕任不列颠总督
79—81年	提图斯在位
79年	维苏威火山毁灭庞培和赫库拉内乌姆城
80年	罗马大竞技场竣工
81/82年	罗马的提图斯凯旋门竣工
83年	卡尔伽库斯在不列颠北部被击败
81—96年	图密善在位
96—120年	普鲁塔克写作《对比传记》
96—98年	内尔瓦在位
98—117年	图拉真在位
100年	小普林尼发表《颂词》演说
101年	利古里斯·拜比阿尼的地籍簿
101—102年	第一次达契亚战争
104年	卡约·维比乌斯·撒路塔里斯资助以弗所的游行
105—106年	第二次达契亚战争
约110年	安条克的依纳爵在罗马殉教
110—112年	小普林尼任比提尼亚–本都行省总督

113年	罗马的图拉真记功柱竣工
116/117年	卢奇乌斯·尤利乌斯·阿格里帕资助阿帕梅亚的浴池建筑群
117—138年	哈德良在位
约120年	塔西佗完成《编年史》
124年	哈德良首次巡幸雅典
125年	卡约·尤利乌斯·德谟斯蒂尼资助俄伊诺安达市的节日
130年	在耶路撒冷城址上建埃利亚·卡皮托利那殖民地
131—132年	雅典的奥林匹亚神庙竣工；泛希腊联盟成立
131—135年	巴尔·库克巴起义
137年	雅典的泛希腊运动会和节日创立
138—161年	安东尼努斯·庇护在位
143/144年	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发表演说《致罗马》
144年	马西昂被逐出罗马基督教会
156/157年	波吕卡普在斯米尔那殉教
157年	盖伦开始在帕加玛行医
161年	安东尼努斯·庇护记功柱在罗马竣工
161—169年	卢奇乌斯·韦鲁斯在位
161—180年	马可·奥勒利乌斯在位
165年	从波斯归来的军队带回天花
170—180年	马可·奥勒利乌斯撰写《沉思录》
177年	里昂殉教者
175/180年	保萨尼阿斯完成《希腊志》
177—192年	康茂德在位
192年	卡修斯·狄奥目睹康茂德作为角斗

士参加角斗

古罗马如何从一个弹丸小城发展成为横跨三洲的超级帝国？其统治精英又如何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治理国家，实现首都和行省之间的政治互动？近代的大英帝国、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和当代的好莱坞又如何看待罗马帝国的是非功过？

本书以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史为经，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为纬，既展示了古罗马帝国的辉煌成就，又揭露了其征服和统治过程中的血腥和残酷，既有对古罗马人民日常生活的微观描写，又有对古罗马帝国运作机制的宏观分析，是一本引领读者走进神奇的古罗马世界的上佳读物。

百科通识文库

49

揭秘北欧海盗

朱利安·D理查兹 著

徐松岩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揭秘北欧海盗

朱利安·D.理查兹 著

徐松岩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28**

The Viking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5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Julian D. Richards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揭秘北欧海盗 / （英）理查兹（Richards, J.D.）著；徐松岩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89-2

Ⅰ．①揭…　Ⅱ．①理…　②徐…　Ⅲ．①海盗 - 历史 - 北欧　Ⅳ．①D753.0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64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刘爱春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89-2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译者序
第一章　维京人的过去与现在
第二章　早期斯堪的纳维亚诸王国
第三章　异教徒与基督徒
第四章　乡村的变迁
第五章　城镇与贸易
第六章　漂洋过海——远洋航行和海外扩张
第七章　英格兰的外来定居者
第八章　爱尔兰海周边地区的劫掠者和商人
第九章　维京人与皮克特人：是种族屠杀还是种族融合？
第十章　北大西洋地区的殖民活动
第十一章　世界的边缘：格陵兰和北美洲
第十二章　对维京人的重塑
大事年表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朱利安·D.理查兹，约克大学考古学教授、考古数据资料库主任。曾主持过多处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点和德比郡内希思伍德的维京雄师阵亡者公墓遗址的发掘工作；已出版多部有关维京人的论著，如《维京时代的英格兰》。

译者简介

徐松岩，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亚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先后出版了《古代海盗行为述论》、《论雅典帝国》等论著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历史》等译著，在《世界历史》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

图　目

图1　红发埃里克：丹麦高档啤酒
图2　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
图3　出自耶灵的如尼石刻。
图4　艺术家心目中的菲尔卡特古堡
图5　在比尔卡发现的墓冢
图6　海泽比鸟瞰图。
图7　奥塞贝格舰船
图8　俄罗斯和东方
图9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的活动范围
图10　在约克铜门的挖掘现场
图11　北约克郡的米德尔顿武士
图12　鸟瞰伯赛湾的村镇遗址
图13　在劳塞岛的维斯特尼斯发现的男性舟葬墓。
图14　法罗群岛的特约努维克海湾
图15　北大西洋地区殖民航线图
图16　兰斯梅多斯遗址复原图
图17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张征兵海报
图18　文兰地图
图19　约维克街景

译者序

“鲜红的夕阳，漆黑的骷髅旗，沾满血污的战刀以及成堆的让人睁不开眼的黄金。”海盗的故事总是那么迷人，千百年来，它为文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们提供了无尽的创作源泉，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海盗行为是人类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特种地理环境下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史上以野蛮的方式否定野蛮的具体表现。在古希腊，人们通常把那些下海寻求生计的男子称为“海盗”，并无贬义。在原始社会末期，古代各族普遍把对外掠夺作为正常的谋生手段；如果借用英雄时代日耳曼人的话来说，那就是：能用流血的方式取得的东西，决不用流汗的方式取得。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英雄和强盗几乎没有区别，战争和贸易常常混在一起，殖民和劫掠往往相伴相随。在后世文献中那些杀人越货的强盗，很可能就是某些部族所顶礼膜拜的英雄！在耕地稀少、纬度较高而又濒临海洋、盛产木材并且拥有许多天然良港的斯堪的纳维亚，处于军事民主制度下的当地人，从8世纪到11世纪，开创了一个盛行劫掠的“维京时代”，也就不足为奇了。

维京时代以9世纪末10世纪初为界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主要活动是劫掠财物、人口；在后期，则以殖民、贸易为主。维京人长达数百年的海外开拓活动，对于中世纪的欧洲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维京人在不列颠、欧洲大陆西部、南部、东部的许多地方建立了殖民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将割据分散的欧洲连成一体，建立了一个更广阔、更巨大的欧洲；其次，维京人开辟多条海陆贸易新商路，用生产、贸易和掠杀强化了各地的联系，给“黑暗时代”的欧洲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欧洲诸民族的融合和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发挥过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维京人的海外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次浩劫。他们在各地肆意劫掠、血腥杀戮，必然破坏当地人安定的生产生活，使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甚或沦为他们的奴仆；同时，大量精壮劳力的外出也给斯堪的纳维亚本土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海洋意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包括海洋经济意识、海洋领土

意识和海洋国防意识等内容，而西方文明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西方文明中的海洋意识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来自于西方古典文明；二是对自中世纪早期出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海洋文化的继承。虽然这两种社会背景迥然不同，但在民间，人们却往往都对勇于探索、不怕牺牲的海盗们持肯定态度，因而总是把海盗和勇敢无畏的探险者联系在一起。

本书是一部研究被称为“北欧海盗”的维京人的学术专著。作者J. D. 理查兹是约克大学考古学教授，国际知名的维京文化研究专家，曾亲自主持和参与多处维京遗址的发掘工作。在本书中，他熟练地运用现代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在极为有限的篇幅内，以简练优美的文字，全面、系统、客观地介绍了历史上维京人的生产、生活状况，确当地评述了后人特别是近现代学者对维京人的种种新诠释；该书汇集了作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为近年来“北欧海盗”研究中的精品之一。

作者在谋篇布局方面匠心独运，以地域为基础，从维京人的故乡斯堪的纳维亚开始，逐步扩展到周边地区，每一章都各自围绕一个主题。第一章为引论，考察了“维京人”一词的来源及历史；第二章考察了维京人起源地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第三章探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第四章和第五章则分别展示他们的居住地——农村和城镇——的发展变化，以及民族国家的成长；第六章考察维京人向海外开拓和扩张的状况。随后几章进行了区域性个案研究，分别考察了维京人在英格兰、爱尔兰海、北部和西部诸岛、北大西洋地区以及格陵兰和北美洲的殖民活动。作者旨在展示那些至关重要的考古证据，并利用个案研究成果来考察各种环境下殖民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其现实意义。第十二章通过讨论“维京人”在19、20世纪各种背景下如何被重塑，着力强调今日之人对于昔日诸民族的印象是如何形成的。

正如理查兹教授所指出的，维京人远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全部。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人是兼营渔猎的农耕者、心灵手巧的手工业者和不畏艰险的经商者；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于欧洲造船技术的进

步有着重大贡献，同时也不乏高雅的生活情趣和艺术品位。

如今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们对“维京人”的理解也愈加多元化：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心目中的“维京人”，有文学家、艺术家塑造的“维京人”，有街头巷尾流传于普通百姓中的“维京人”，也有广告商、旅游开发商、电子游戏商以及某些极端分子着力打造的“维京人”，如此等等。无论如何，读完Julina. D.理查兹教授这本小书，你一定会从中受到有益的启发，进而对“北欧海盗”有新的理解。

徐松岩

2008年5月于重庆

第一章

维京人〔1〕的过去与现在

每年2月，英格兰北部城市约克的学童们都会穿上维京人的传统服装，庆祝当地一年一度的约维克维京节[2]。节日期间，英雄传奇故事再度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昔日的战斗场面再现于舞台之上，人们还在乌斯河上举行维京长舟竞赛。维京人昔日的劫掠行径已为人们所淡化。比起生活在9世纪的先祖们，现代约克商人对维京人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笔者写作此书的时候，顾客们可以在城外的服装加工店设计定制维京长夹克，可以在博德斯书店和沃特斯通书店选购有关维京人的书籍，可以在当地的电影院里欣赏由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和托尼·柯蒂斯（Tony Curtis）主演的电影《维京人》，还可以在咖啡馆和快餐店里享用舟状面包和维京主题三明治。尽管这一节日始创于1985年，但节庆活动的主办者却宣称它可以上溯到“原始维京人”所举办的一个仲冬节——约莱布罗特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到约维克这样的维京主题景点来旅游的游客数量逐年减少的事实。

在约克城，维京人的影响至今犹存。虽然这座城市更多地保留了罗马人、诺曼人以及中世纪建造者的遗迹，但只要你翻开电话簿，就会看到一系列具有维京特色的企业——约维克商业集团、约维克环卫服务公司、约维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约维克船运公司、约维克制冷设备厂以及令人有些胆寒的维京驾校——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很多。显然，维京精神在当代已重新焕发出了生机，而且不仅仅是在约克城。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在马恩岛，在北部诸岛与西部诸岛，在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在大西洋彼岸的北美洲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本土，都是如此。

不过，“维京人”一词是一个内涵不定的概念——在不同场合下，维京人曾是劫掠者、商人、手工业者、诗人、探险者、民主人士、政治家或勇士。这个概念出现的年代相对较近，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起初仅用以指海盗活动，后来作为人种学术语用以统称一个民族，之后作为年代标签有了维京时代的说法。正是由于这些变化，该词在10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15世纪的冰岛以及19世纪的英格兰，含义皆有所不同。事实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维京人”一词的含义更

多地源于后来的重塑与改造，与其代表的原初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本书力图解构这一术语，同时也力求展示其持续受到重视的原因。我们将特别关注最近30年来的考古发现，以便从中了解生活在9、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各民族的真实情况、他们拓殖的区域及其现实意义。

维京人：其人、其事、其时代

“维京人”一词最早是在古英语中使用的。在《盎格鲁 - 撒克逊编年史》[3] 中，该词出现过三次，意为“劫掠者”，显然是指沿海地带的劫匪，而不是绿林强盗。在遭受斯堪的纳维亚人袭掠的其他国家，人们并不使用这个词语，而西方观察者对这些侵袭者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比较关注这些侵袭者的宗教或宗教信仰缺失的情况，他们因而被归入异教徒之列。在《爱尔兰编年史》中，人们常常认为他们与本地居民迥异而称他们为“噶依尔”或“外乡人”。另外一些情况下，人们则根据这些人大体来自哪里而称其为“北方人”或“丹人”，不过在使用这些称呼时人们往往不加区别，并未考虑其实际的起源之地。最后，或许是因其作为较引人注目，他们被称为“海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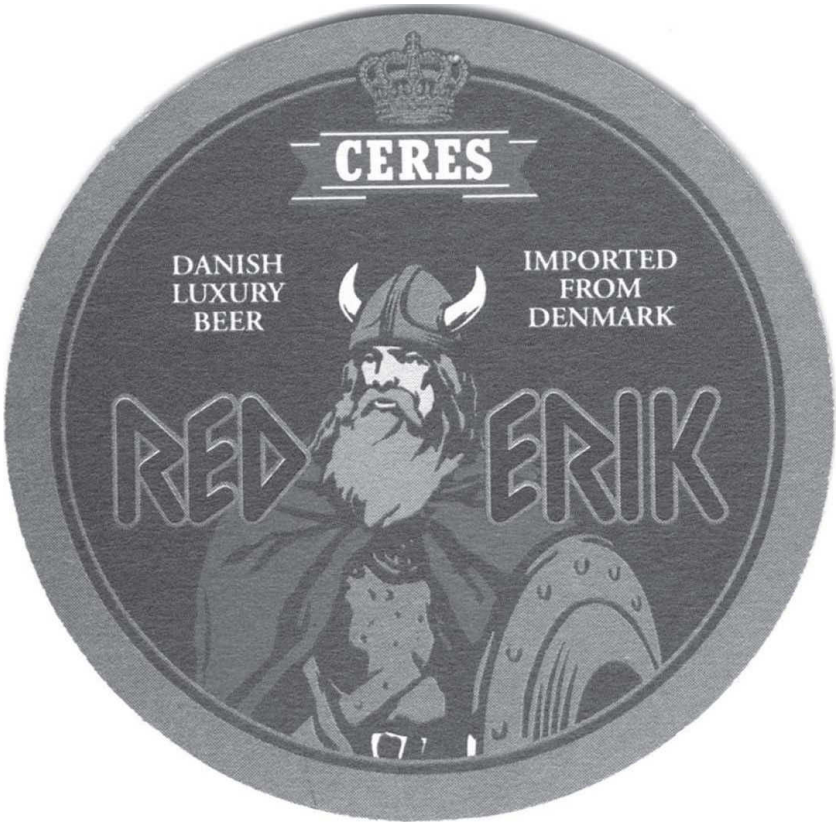

图1　红发埃里克：丹麦高档啤酒

最初，斯堪的纳维亚人自认为是某些特定地区的居民，诸如日德兰人、西福尔人、霍达兰人等等。他们忠于自己的首领，但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民族观念。他们的军队由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各地的兵士组成，是奥拉夫（Olaf）、斯韦恩（Svein）、索凯尔（Thorkel）或克努特（Cnut）的追随者。尽管如此，他们却操着相同的语言（语言学家称之为“古诺尔斯语”），在服饰、艺术和宗教等方面拥有同一种文化。随着民族认同感的逐步增强，他们开始使用民族称呼。后来，“丹麦人”[4] 就用于指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而“挪威人”[5] 则用于指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及至11世纪，“维京”（*viking*）作为词根再次出现于古诺尔斯语

之中，但在不同的语境下其所侧重的意义有所不同。在《克努特挽歌》中，作者称克努特的军队为*víkingar*，以突出其凶猛；该词亦在11世纪的如尼石刻[6]上出现过，用以描述那些在海外劫掠、在家乡受到尊崇的儿孙们，以及当地的小混混。到了13世纪，在《冰岛人萨迦[7]》中，该词被用来指海盗，但这个词在西欧中世纪文献中的使用并不普遍。19世纪，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维京人”一词才在斯堪的纳维亚得以广泛使用。1807—1808年，近代英语中才第一次收录了这个词；1828年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推出《海盗》一书，此后该词再度流行开来。

关于“维京”这个术语的实际来源，一直存有很多争议。有人认为，无论是古英语还是古诺尔斯语中的词形，均从一个表示“撤离”、“离开”的普通日耳曼语动词发展而来；有人则认为，该词与古冰岛语中意为“海湾”或“小河”的*vik*一词有关；也有人认为，该词是指那些居住在奥斯陆峡湾一带*Vik*或*Viken*地区的居民，他们为了摆脱丹麦人的控制，开始侵袭英格兰；另有人则认为，该词源自*vika*一词，意为“轮值或替班水手”；还有人认为，该词源于古冰岛语动词*vikya*，意为“避开”，或源自于古英语中的*wic*一词，指“兵营”。

无论“维京”一词的词源是什么，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人显然并不是海盗；只有那些从事海盗劫掠活动的人才算是名副其实。但若因此而放弃使用这一术语显然也不合适，因此，本书一般仅限于用它来描述那些从事劫掠或者其他战争行为的人，在现代语境下作为形容词或名词也用以指那些被模式化的“维京人”形象。其他情况下会使用较为中性的术语——斯堪的纳维亚人，并且按照惯例，用“挪威人”来指那些居住在北大西洋地区、传承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传统的民族，这些人未必来自于挪威。另外，本书中也会使用更为确切的术语“爱尔兰-挪威人”[8]或者“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人”，来反映所讲述的常常是一种文化杂交特征。

作为年代学术语，“维京时代”出现在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之后。19世纪40年代，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最早使用了这一术语，用以标示手工艺品。后来，这个术语又在迪谢吕（du Chaillu）

的《维京时代》（1889）和彼得·索耶（Peter Sawyer）的《维京时代》（1962）中相继被采用。在某些作家的笔下以及在一些休闲读物中，维京时代被描绘为人类进化历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非凡的时代，一种伟大的文明，堪比希腊或罗马时代。然而，没有人能够确定维京时代始自何时。

由于发现了更早的相互接触与来往的证据，维京时代再也不能以793年林迪斯凡遭袭掠这一事件作为其确切的起点了。在8世纪挪威人的墓葬中，已经发现有爱尔兰和英格兰的手工制品。无论它们是劫掠品还是交易物，都证明此前北海地区已有跨海交通往来。瑞典人也早就在波罗的海一带进行扩张，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许多与“维京时代”相关的特征早在8世纪初就开始出现了。它们包括：城镇的发展、权力的集中、从简单交换到市场贸易的转变、生产的增长以及海外联系的增多。实际上，人们对维京时代起点的争论意见分为两派：一些人将劫掠行为视为维京人活动的关键特征，认为维京时代始于8世纪90年代以后；另一些人则强调向外扩张、国家形成以及其他明确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是从8世纪初开始出现的。

自9世纪30年代开始，维京人对西欧的侵掠有所加剧。841年，维京人在都柏林建起了一个营寨。9世纪50年代，他们曾攻击法兰克和西班牙；从60年代起，他们开始进犯俄罗斯并在那里拓居。从70年代晚期起，维京人开始在英格兰建立永久性定居点，并且在马恩岛、北部诸岛与西部诸岛、法罗群岛和冰岛建立殖民地。他们在10世纪80年代也开始定居格陵兰岛；公元1000年前后，他们还曾航抵文兰[9]和北美洲。而要确定维京时代何时结束也是困难重重。它常与英国历史年表上的某些具体事件相关：有人认为维京时代结束于1042年，这一年英格兰最后一名斯堪的纳维亚籍国王哈瑟克努特（Harthacnut）去世；有人认为是结束于1066年，当时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r Hardrada）在斯坦福桥败北。然而，在那之后斯堪的纳维亚人依然在苏格兰、爱尔兰和马恩岛等地生活，虽然侵略性的军事活动在11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停止了。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也在北大西洋地区得以延续，在冰岛和格陵兰岛延续到14、15世纪，而在这些地区的某些地

方，维京文化特征甚至存留至今。

既然本书的主题就是关于“维京人”这一含混不清的概念的，它将涉及上述所有地区和历史时期。本书不仅关注维京人在中世纪和现代是如何被重新诠释的，而且也将探讨在8至12世纪期间各种地理环境下，其文化特征是如何形成并不断融合发展的。

本书展示给读者的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维京人编年史，而是主要以地域为依据加以谋篇布局，从斯堪的纳维亚开始，再扩展到外围地区，但每一章都围绕一个具体主题展开。第二章考察维京人的起源地；第三章探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第四章和第五章将展示其居住地——农村和城镇——日益加深的复杂性，以及民族国家的成长；第六章以事实证据来说明维京人高超的航海本领，并且开始探讨斯堪的纳维亚人向西欧和俄罗斯的海外扩张。随后几章是一系列个案研究。第七章论及英格兰，第八章考察爱尔兰海区域，第九章考察北部诸岛与西部诸岛，第十章考察北大西洋区域，第十一章关注格陵兰和北美洲。本书的一个目的，是力图把那些出自这些地区的重要证据介绍给读者，尤其是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另一个目的，则是利用个案研究来考察各种环境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探讨该关系的现实意义。第十二章通过考察“维京人”在19和20世纪各种背景下如何被重塑或被重新利用，着力强调今日之人对于昔日诸民族的印象是如何形成的。

以前，种族群体通常被认为是孤立存在的文化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独立体；如今，我们认识到文化其实就存在于跟其他文化的相互联系与对比中，文化的界定是通过比较它与其他社会文化的异同来实现的。人们可以运用语言、服饰、建筑、宗教以及丧葬习俗来确立自己的民族特征。在殖民活动中，殖民者可以采取种族隔离、融合、同化或灭绝等各种策略，以使自己在新的环境下融入当地社会。当代人印象中的维京人是否真正存在过？抑或是被构想出来，根据当地不同的情形而呈现为各种不同的身份——如盎格鲁 - 斯堪的纳维亚人、爱尔兰 - 挪威人、冰岛人或罗斯人〔10〕等？这里包含着关于近代欧洲的一些重要信息。欲知更多详情，且见下文分解。

注释

〔1〕 维京人（Vikings）通常被笼统地称为“北欧海盗”，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中的一部分。——译注，下同

〔2〕 约维克维京节（Jorvik Viking Festival），又译“约维克北欧海盗节”，Jorvik是维京人用语，同英文中的York。

〔3〕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原书采用编年体，以古英语写成，是记载公元前50年至公元1154年英格兰历史的唯一史料，具有极高的历史学价值。

〔4〕 丹麦人，又译“丹恩人”。

〔5〕 挪威人，又译“诺尔斯人”。

〔6〕 如尼石刻，刻有如尼文字或诗歌的石碑，如尼文是北欧等地的一种古文字。

〔7〕 萨迦（Saga），是关于中世纪冰岛和挪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轶事传闻等的北欧传说。

〔8〕 爱尔兰 - 挪威人，又译“希伯诺 - 挪威人”。

〔9〕 文兰，位于北美洲，其具体位置尚有争议。

〔10〕 罗斯人主要指居住在东欧平原的东斯拉夫人，与自8世纪起大批侵入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流域的“瓦兰吉亚人”（主要是瑞典人和一些芬兰人）相互融合而成。

第二章

早期斯堪的纳维亚诸王国

要想理解维京时代，就有必要从斯堪的纳维亚入手，考察那里自8世纪或更早时期开始所发生的变化。只有通过考察斯堪的纳维亚本土的文化和社会情况，才有可能弄清其是如何向外扩张的，以及在各海外殖民地又是如何被改造和同化的。

“斯堪的纳维亚”一词最早出现于老普林尼[1]（Pliny the Elder，卒于公元79年）的《自然史》中，他称那里是“水上的险地”。今日的斯堪的纳维亚包括丹麦、挪威、瑞典，一般也把芬兰包括在内，虽然芬兰语属于另一个语族。尤其是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他们都把其民族的起源追溯到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的面积占欧洲大陆总面积的12%，但其人口却只占欧洲总人口的3%，广袤的半岛腹地人口一直都比较稀疏。即使在今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总人口也几乎不超过1,700万。其中人口密度最大的丹麦有500万人；其次是瑞典，有800万人；挪威有400万。在维京时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很可能与此相仿，只是密度更低一些。定居点广泛分布在瑞典南部、挪威和丹麦，只有瑞典的密林地带、挪威的山区和日德兰半岛的滩涂之地人迹罕见。

在维京时代之初，现代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并不存在。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和欧洲大陆诸王国，人们已接受这样一种基督教观点，即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则不然。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中，古老的部落组织依然存在，它们由众多贵族掌控，由一位酋长临时统治。

及至10世纪，那些经年累月在欧洲征战的斯堪的纳维亚军队首领们重返故土，竭力传播和培育新观念。人们逐渐皈依了基督教，王权得以确立。到了12世纪，贵族们设法将原本建立在旧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权力通过特权、公文和法律重新确定下来，建立起新的权力结构。及至1200年，每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按照西欧的模式建立起了各自的民族国家。

因此，维京时代被视为是这些国家获得各自民族身份的时代。由于其间几乎没有任何书面文献，因而测定考古学证据的确切年代对于

说明这些国家早期的社会状况，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围绕斯堪的纳维亚铁器时代和维京时代的国家形成进程问题，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们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我们将考察这方面的证据，包括乡村日益复杂的等级制度和城镇的出现，但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其地理状况。

“丹麦”（Denmark）之名来源于其人民的称呼“丹麦人”（Danes），虽然*-mark* 这个后缀的含义晦涩不明。今天的丹麦包括日德兰半岛、菲英岛和西兰岛[2]，还有500多个小岛以及波罗的海的博恩霍尔姆岛[3]。然而，在维京时代，斯科讷岛、霍兰岛和布莱金厄岛也隶属于丹麦，直到1658年这些地方才被割让给瑞典。其南部边界位于日德兰半岛南端，也就是如今的德国北部。在维京时代，丹麦的领土被大片的橡树林和山毛榉树林所覆盖，虽然也有沙丘和石南荒原。丹麦境内的任何地方距离海洋都不超过55公里，其居民便藉此以谋生。文化革新首先是从日德兰半岛开始的；当10世纪丹麦作为统一的国家出现时，这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王权的主要中心。

图尔的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538/539—594）在其《法兰克人史》中写道：公元515年，一支丹麦舰队在国王克罗奇莱克（King Chlochillaich）的统率下，从海上入侵高卢。至于这些丹麦人来自哪里、他们的国王统治的疆域有多辽阔以及他在那里行使着何种权力，人们都不得而知，尽管格列高利明确地称这位丹麦国王为“勒克斯”[4]。此外，6世纪的史料中提到，丹麦人实力强大；普罗科匹厄斯[5]（Procopius，约500—565）向我们讲述了赫鲁利人在前往斯堪的纳维亚途中，是如何穿越丹麦人的境域的。但解读此类著述时需要注意：我们不应当把中世纪晚期或者罗马人的“国王”或“民族”概念强加于其他历史场合。

罗马人的影响波及到了日德兰半岛，这可以由铁器时代丹麦墓葬中的高规格外交礼物反映出来，不过斯堪的纳维亚地处罗马帝国境外，赠送这些礼物旨在保证帝国边疆的安全；这些礼物似乎也使那些地方酋长们的权力得到了巩固，酋长们得以在礼物经济中享有经济权力，也许还建立起了一直延续到维京时代的权力关系。这些礼物最终

并非是留在酋长手中，因为酋长的职责是把礼物呈献给诸神。这些礼物还需放在当时的战争观念形态下考量。在这种观念里，战利品都是要敬献给沼泽之神的。日德兰半岛的伊勒鲁普和艾斯博尔出土的文物正是当时的献礼。这些宝藏对于统治阶层的确立及合法化具有特殊意义，他们代表族群与诸神进行沟通。

在7、8世纪的史料中，仅有零星资料涉及丹麦人及其诸王。不过，我们知道，身为乌得勒支主教的传教士威利布罗德（Willibrord），在690至714年间，曾经造访统治着“丹麦原始部落”的国王翁根杜斯（King Ongendus）。只有到了8世纪末，尤其是在9世纪上半叶法兰克人的编年史中，才有了关于丹麦诸王的较为完备的资料，他们成为查理曼[6]（Charlemagne）及其后继者的劲敌。里面提到了一些国王的名字，其中包括古德弗雷德（Godfred）。从其描述来看，当时的丹麦似乎已经囊括了斯科讷岛和奥斯陆峡湾周边地区。

阿格斯堡
林霍尔姆-霍耶
菲尔卡特
奥胡斯
日德兰半岛
斯库勒莱乌
耶灵
沃巴瑟
朗宁-恩厄
罗斯基勒峡湾
特雷勒堡
奥登塞
西兰岛
里伯
菲英岛
海泽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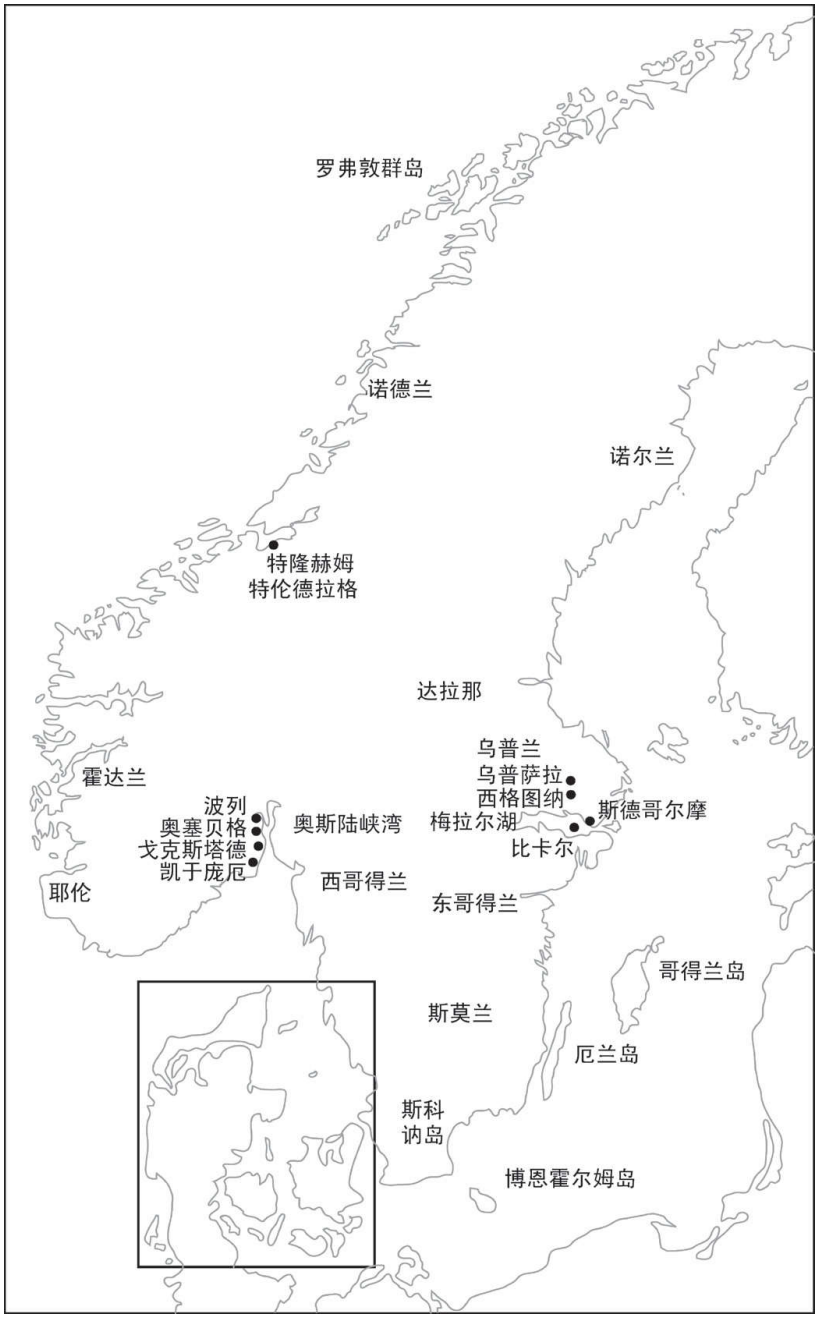

图2　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

考古证据表明，8世纪时，日德兰半岛已经出现了有组织的中央集权。位于日德兰半岛以东海域的萨姆斯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坎哈夫，有一条长500米、宽11米的运河，运河两岸树木林立；它是连接该岛屿西部海域与东部一个海湾的通道。坎哈夫运河容许吃水深达1.25米的船只由海港向西航行。树木年代研究表明：该运河建于726年，约在750年整修过，一直使用到885年。

在日德兰半岛南端，有一道长14公里的防御工事——丹麦边墙。该工事扼守住了夹在东部的施莱湾与西部的沼泽地区之间的石勒苏益格通道，这些沼泽地分布在向西注入北海的河流周围。这条防卫墙始建于737年，808年国王古德弗雷德在位时期进行了扩建。丹麦边墙不太可能是纯粹的防御性设施；它极有可能兼具控制人口和牲畜出入的作用。这些都是王权统治下修建的重大工程。但是，如果我们仅依据这些孤立的事例就得出8世纪时的那个国家已与现如今的丹麦相类似的结论，则极有可能是错误的。

首先使用“丹麦”这个名字的是约克城的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931—956年任职），其后在出土于耶灵的两件10世纪的王室如尼石刻上再次出现。从10世纪中叶起王位的连续更替状况我们已经知悉：从老戈尔姆（Gorm the Old）开始，之后，王权在他儿子青齿王哈拉尔[7]时期有所扩大，哈拉尔在10世纪60年代初征服了挪威，987年被驱逐。老戈尔姆的孙子八字胡王斯韦恩（Svein Forkbeard）以及他的曾孙克努特，都曾率军侵袭英格兰，后者还当上了英格兰国王（1016—1035年在位）。到10世纪末和11世纪，盎格鲁与丹麦之间有了经常性的接触，英格兰和丹麦也开始进行工匠间的互换与交流。

青齿王哈拉尔（Harald Bluetooth，约卒于987年）

青齿王哈拉尔是国王老戈尔姆之子，八字胡王斯韦恩之父，克努特之祖父。在古诺尔斯语中，他的名字（Blåtand）大概意

为“黑色面庞”。在竖立于日德兰半岛中部的耶灵的一件早期如尼石刻（约960年）上，哈拉尔宣称，他统一了丹麦和挪威，并使丹麦人皈依了基督教。在耶灵，还有两座高大的墓冢。北冢已被移走，只剩下一个银制高脚杯。20世纪70年代，人们从耶灵的教堂中发掘出一座10世纪的墓室，墓室中有一具散落的男性遗骸。北冢现在被认为是哈拉尔在大约959年修筑的，以纪念他的父母，他同时还竖起了一块如尼石刻。后来他改信基督教后，便将北冢以及那块如尼石刻移进了教堂，并修建了南冢，而南冢后来成了他自己的衣冠冢。

哈拉尔兴建了若干大型公共设施。这些工程应当置于丹麦人与日耳曼皇帝交战的背景下去考察。968年，他将丹麦边墙与海泽比连结起来，建了一道木墙对其加以扩建和重修。979—980年，他在朗宁 - 恩厄建起了一座横跨瓦埃勒河谷的大桥。该桥路面长720米，宽5.5米；大桥由1500多根橡木加以支撑，此路想必是用于军事目的。

10世纪80年代，他在王国境内各战略要地修筑了一系列环形堡垒——它们一般按其所在地命名，如西兰岛上的特雷勒堡古堡，但是也有例外，如日德兰半岛中部的菲尔卡特古堡、菲英岛的诺涅巴根古堡、以及日德兰半岛最北部阿格斯堡的一座未竣工古堡。每一座堡垒都是按照规整的几何设计图修筑的。其环形城墙是用土和草混合夯成的，外围有V字形壕沟环绕，在东、南、西、北各方向均建有城门。城门之间由用木料铺成的街道相连，每座城门又和堡垒内的另一条路相接。堡垒的东北、东南、西北和西南方位均建有四方广场，广场周围建有拱形大厅，其中住人的只占四分之一。虽然如此，人们还是在特雷勒堡和菲尔卡特古堡的护城墙之外发现了墓地。这些堡垒无疑代表了为哈拉尔王权效力的地方势力之中心，但是它们仅使用了大约10年，而且只有菲英岛的堡垒发展成了主要城镇。建造这些堡垒的成本似乎极为高昂，每个堡垒都有至少16个华丽的大厅，大厅里有凸墙和门廊，门廊尽头设有房间，美轮美奂。然而，它们却被用作储藏室

和作坊间，哈拉尔的虚荣心由此可见一斑。

“挪威”（Norway）之名得自于*Norvegur*　一词，即“北方之路”，指其西海岸航线。因布满了难以计数的峡湾，这条海岸线呈锯齿状；其直线距离为3,000公里，而其实际长度达20,000公里。西海岸地区山峦耸立，在维京时代，其人口局限于峡湾上游的狭窄岩架和小平原地带，各聚居地之间相对隔绝，孤立发展，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和文化。挪威境内有超过一半的面积位于海拔600米以上，但仅有少数几处坡度较缓的沃土地带人口集中。它们分别是：位于西南部的耶伦、位于东南部的奥斯陆峡湾以及位于东北部的特伦德拉格。时至今日，可耕地面积也仅占其陆地面积的3%；森林覆盖率达23%，这里有铁矿，有取之不尽的木材，还有野生动物，包括鹿、驼鹿、狼、熊和狐狸。北部沿海的哈尔戈兰一带，人口稀少；这里的挪威人从萨阿米人那里收取贡物。海洋为此地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在最北部海域有鲸、海豹和海象。

9世纪80年代，挪威首次由西福尔之王即金发王哈拉尔（Haraldr Finehair）实现了统一，领土包括挪威南部和沿海地带，但不包括较远的北部地区。哈拉尔大约于930年去世，王位由其子，声名狼藉的血斧王埃里克（Erik　Bloodaxe）（参见此处）继承。挪威和瑞典接壤，也有一小段边界与丹麦相接，但是陆路交通的不便使当地居民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海洋，寻求向西发展。第一批有史可稽的袭掠不列颠群岛的维京人，很可能来自于挪威西部的霍达兰岛，而北部诸岛与西部诸岛、法罗群岛、冰岛和格陵兰岛的斯堪的纳维亚殖民者则主要是挪威人。

图3　出自耶灵的如尼石刻。铭文写道："哈拉尔国王竖立此碑，以纪念其父戈尔姆，其母蒂拉。正是哈拉尔掌控了整个丹麦和挪威，并且使丹麦人皈依了基督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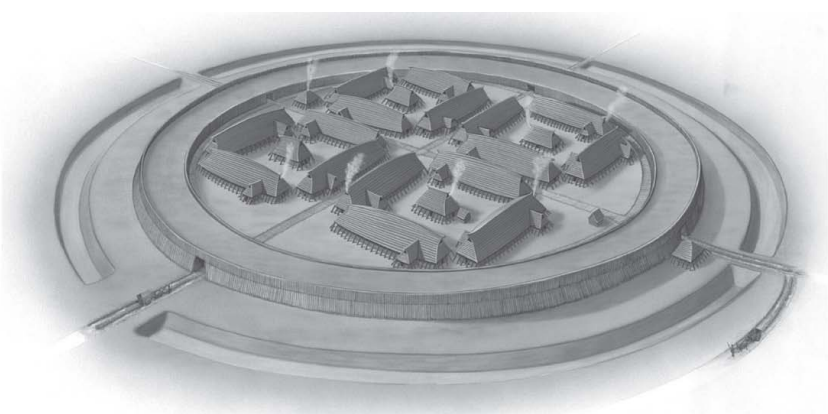

图4　艺术家心目中的菲尔卡特古堡；该古堡还有四分之一尚未挖掘。

"瑞典"（Sweden）之名来源于瑞典中部的斯维尔人（Svear）。今天的瑞典境内有多种地貌，其土壤和气候条件各有不同。位于斯科讷岛以北的斯莫兰高地人口稀少，它在维京时代是瑞典与丹麦的天然分界线。斯莫兰高地以北森林浓密、土地肥沃的中部低地被分成两个

区域：前者是斯维尔地区，以乌普兰为中心；后者即戈塔尔地区，在瓦纳尔以东。再往北，诺尔兰地区有森林带，也有岩石嶙峋之地，那里同样是居民稀少。在波罗的海地区，哥得兰岛和厄兰岛上都有沃土良田，它们在维京时代均为特别重要的战略据点。瑞典南部属于海洋性气候；而北部冬季异常寒冷，多冰雪，时至今日其57%的陆地仍为针叶林所覆盖；这样的自然环境为生活在维京时代的人们从事狩猎和捕鱼活动提供了条件。

波罗的海上的国际贸易逐步发展起来，向南和拜占庭建立了联系。瑞典的维京人倾向于东进，虽然曾几次西征过英格兰和诺曼底。整个9世纪的史料中提及了多位统治比尔卡的国王，但是其掌控领土的具体范围却不得而知。直到11至12世纪期间瑞典才实现了统一，这也是东哥得兰与西哥得兰长期权力斗争的结果。

在瑞典和挪威的北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与萨阿米人开始有了接触和来往，只不过有关维京时代的历史著作对萨阿米人鲜有提及。及至19世纪，对维京人的研究成了一个专门的历史学科，人们通过研究一个民族的民俗、神话和历史，来追溯该民族的祖先和血统。史学家为萨阿米人建立了人种志，把他们作为一个由外来的、原始的狩猎采集者组成的族群来加以研究。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萨阿米学者和知识分子开始为他们的文化正名，斯堪的纳维亚较为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开始审视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和萨阿米文化之间的共生共存与相互影响。墓葬资料表明，在维京时代，萨阿米人向南的活动范围已远至其现代地域以南地区；在乌普兰的温德尔和瓦尔斯高地区维京时代之前的墓葬中所发现的桦树皮制品，被认为是此地有萨阿米人存在的证据；对其饮食方面的考证表明，萨阿米人以远在其天然居住地以南的驯鹿为食。在现代斯堪的纳维亚，“非西方民族”的移民问题成为了一个重大政治议题，而考古发现表明：在维京时代，有两个不同的种族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广大地区比邻而居。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斯堪的纳维亚一直就处于欧洲的边缘地带，不仅地理位置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虽然存在地区性差异，但是斯堪的纳维亚的诸民族皆因邻海而居而表现出某些相似性，这一

点有助于他们形成一种超越国界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首次出现于维京时代。在下面几章里，我们将探讨维京文化特征的种种表现形式。

注释

〔1〕 老普林尼，古罗马科学家，著有《自然史》等。公元79年，在考察维苏威火山时遇火山爆发而身亡。

〔2〕 西兰岛，丹麦最大的岛屿，是该国首都哥本哈根所在地。

〔3〕 博恩霍尔姆岛，丹麦东部的一个岛屿，位于瑞典附近的波罗的海，17世纪成为丹麦的一部分。在此前的不同时期分别由丹麦、瑞典和吕贝克商人统治。

〔4〕 勒克斯（*rex*），拉丁语，意为“王”。古罗马人称其王为“勒克斯”。

〔5〕 普罗科匹厄斯，拜占庭帝国历史学家，著有《查士丁尼战争史》和《秘史》等。

〔6〕 查理曼大帝（742—814年在位），768—814年为法兰克国王，其中800—814年为罗马帝国皇帝，史称查理大帝或查理一世。

〔7〕 青齿王哈拉尔，又译“蓝牙哈拉尔”。哈拉尔酷爱吃蓝莓，牙齿常常被染成蓝色，因而获得了“蓝牙”的绰号。现代的蓝牙技术即由此得名。

第三章

异教徒与基督徒

人们对维京人的成见主要源自其富有侵略性的异教信仰。一些维京劫掠者进犯毫无防卫能力的修道院之所以备受指责，不仅仅是因为抢掠这些地方的财富轻而易举，更直接的原因是，这些地方信奉基督教。“异教”本身通常被用作一个蔑称，本书一般会避免使用这个词。新近的研究对基督教传入之前存在的诸多信仰的性质及其对其他宗教的借用进行了考证。皈依基督教不再被视作是一次性的教化行动，尽管当时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们喜欢把它描述为一步到位之事。事实上，皈依基督教是一个渐进过程，在中世纪早期多元信仰并存的社会里，基督教与更古老的信仰共生并存。

维京人思想意识的方方面面在艺术上也有所体现。在21世纪的西方社会，人们通常将艺术区分为应用性艺术和纯艺术，并将艺术家的活动与人们的日常活动分离开来。用现代概念衡量的话，所有维京艺术都属于应用性艺术，有时被视作是对实用器物进行装饰的艺术。但是，维京时代的装饰纯粹是功能性的吗？它是否蕴含了思想意识成分？在其他文化中，这种纯艺术与应用性艺术之间的区分在多大程度上是成立的？

类型学研究经常通过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动物饰品的演变来确定物品的年代，也用以勾勒维京社会和文化扩展的轨迹。这些动物饰品是文明的印证，表明维京人尽管进行破坏掳掠，却也不失品位。近年来，一些考古学家如比约恩·米勒（Bjorn Myhre）已开始从民族象征和民族身份的角度研究艺术风格，而这些则是维京特色的一种有力的表现方式。另一些考古学家则关注装饰图画可能包含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含义。例如，动物饰品可能反映出图腾崇拜的某些信息。然而，有一个重要事实不能忘记——我们对维京艺术的了解通常来源于金属器皿和石器等易于长久存留的物品；木器和织物则鲜有存留；人们身上可能刺有的精美文身则根本没有任何遗存。

皈依基督教之前的信仰体系

在我们看来，“宗教”包含了一系列的信条和行为规范，这些信条和行为规范体现了所崇拜的思想，并由男性或女性神职人员加以解释和宣讲。但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基督教传入之前没有人懂得这些。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宗教”更多地是一种“信仰体系”，即看待世界的方式，它仅仅是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对其诸神的崇拜并不是绝对的崇拜，甚至连无条件的拥护都谈不上，根本不像基督徒与上帝的关系。按照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传说，世间万物都将在“世界末日”终结，所有的凡人和神祇都将丧身火海。根据这种信念，我们行为的结果先前早已注定，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重要的是我们以何种行为方式去面对它。

对于现世与来世之间的界限，维京人并无严格的界定；人兽两个世界之间的界限也不甚明晰。在斯堪的纳维亚神话里，超自然的力量分为许多等级。神族有两系：一是埃西尔神族，包括主神奥丁（Oðinn）与雷神托尔（Thor）；一是瓦尼尔神族，包括尼约尔德（Njord）、弗雷（Freyr）和弗蕾娅（Freyja）。诸神还有侍从，如瓦尔基里[1]、奥丁的渡鸦以及巨人、小矮人、精灵、山神、幽灵、小鬼等等。巫术以及塞欧教（*seiðr*）习俗也是维京人信仰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尼尔·普赖斯（Neil Price）指出，塞欧教相当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萨满教[2]，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部分习俗可能是从萨阿米人那里习来的，因为萨阿米人有着与其相类似的特点。一些随葬物品，如金属和木制的手杖、形如椅子的银制护身符和动物面具，可以表明墓葬主人的职业。

在丹麦菲尔卡特的环形古堡的墓地中，有一个墓室据考证是一个女巫的坟墓。安放她尸体的棺材是一辆四轮货车。她没有按当时的习俗佩戴一对胸针，但是戴有两个银趾环和一个哥得兰匣形胸针。有人认为这表明她来自波罗的海地区。她的随葬器物包括一只盛水果的青铜碗、两只角制酒器和一把铁制烤肉叉，似乎还有一根木制手杖。此外，还有一些护身符（其中一个是形如椅子的银制护身符）、一个羊皮袋子（大概用来装莨菪籽）和一只玻璃酒杯。在她的脚边，有一只上锁的、里面装有布料的橡木箱、一把剪刀、一块石板磨刀石、一个

陶制锭盘、一块小猪下颌骨以及一堆猫头鹰吐出的食丸。

在奥塞贝格，从一座舟葬墓棺（参见此处 ）中出土了两具女性遗骸，一个大约死于25岁，另一个大约死于50岁。年轻女子生前可能是一位公主，年老者可能是其奴仆。不过，墓葬中的其他物品表明墓的主人至少有两个身份，一是公主身份，二是高级女祭司身份，而且这两个身份可能属于同一个人。两张小挂毯描绘的巡游场景上面还有费蕾娅和奥丁的像，一些随葬品表明这些挂毯描述的不仅仅是神话，而是确有其事。这些物品包括：一个装有巫师手杖的橡木柜、两盏与挂毯中所描绘的在巡游中使用的灯具相似的铁灯、五只木制动物头像和一辆雕有群猫像的小车，而猫是弗蕾娅的圣畜。

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丧葬习俗似乎不止一种，而且因区域不同存有明显差异。不过，无论是火葬还是土葬，通行的做法是：给死者穿戴齐整，为其佩戴饰物，并以一定的日用器皿作为陪葬品。其目的似乎是为其来世的生活作准备，当时的人们认为来世与现世大同小异。在奥丁神一派的信仰里，被杀死的武士墓穴中须有其武器作陪葬品，富人们则以他们的马匹、狗和奴隶陪葬。陪葬舟船、马车或马匹表示通向来世。若无法以整条船来陪葬，则可用一块刻成船只形状的石头代替。

在挪威和瑞典中东部许多地方，火葬是最流行的丧葬形式；而在丹麦（日德兰北部除外），火葬则极为罕见。在瑞典，火葬在温德尔时代前后盛行，并（与舟葬）一直持续到维京时代。火葬墓冢通常集中在农场四周。骨灰或者直接放进墓坑，或者放进袋子、陶器或金属容器中，抑或是撒在地面上。迄今所知的火葬形式多种多样。在日德兰南部与中部地区以及挪威北部地区，土葬自维京时代之初即已盛行。遗体可以直接埋在地下，也可以置于棺材、墓室或车辆中。与人们的普遍想法所不同的是，绝大多数墓葬的随葬物品都较少。9世纪的墓葬最简朴，刀具是最常见的随葬物，男性和女性墓葬中均是如此。10世纪时，丹麦出现了一批极具特色的富有骑兵的墓葬，其随葬品包括武器和骑马装备。在12世纪前的瑞典墓葬中，随葬品也时常可以见到。

图5　在比尔卡发现的墓冢

神殿和祭场

基督教传入以前的宗教活动可能大都在旷野和神圣的小树林中举行。不来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提到的位于旧乌普萨拉的所谓异教神殿，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宴会厅，在特定时间里，异教庆典在此举行。虽然其名称中使用的词缀*hof* 可用来表示“专作举行宗教仪式之用的建筑物”，如冰岛的霍夫斯塔济（Hofstaðir），但这个异教神殿并非专用来举行宗教仪式。

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新发现了一些建筑，表明在某 些地方出现过小规模的、地方性的宗教和祭祀活动。在瑞典的弗罗桑岛（又叫弗雷岛）之巅有一座中世纪教堂，在这座教堂的地板下发掘出了似乎是用于献祭的小树林的遗迹。在中世纪圣坛之下有一棵已经腐朽的桦树的残迹，此树是人为砍伐的。在树根四周有一大堆兽骨，这些兽骨是在此树未倒之前就积累起来的，包括五只全熊、六个驼鹿头、两个牡鹿头以及绵羊、猪和母牛的尸骸。这些尸骸以前可能是挂在树上的毛皮或全尸。据碳定年法测定，这些献祭活动发生在10至11世纪；而

那座石结构的教堂则建于12世纪末。

在瑞典东哥得兰地区的博尔格，有一处酋长农庄，庄内附带建有一座圣祠。该建筑早在8世纪之初就已投入使用，尽管大多数仪式活动发生在10世纪。它由两个房间组成，中间由一条走道隔开；在东墙边上有一个石台，可能是一个柱基，有神像置于其上。在房屋的西南部发现了两个圆环，除此之外并无别的发现。圣祠四周的地面铺有大石板，上面是一堆圆环，共98件，还有未焚化的动物遗骨和炉渣75千克。这些圆环似乎曾用于悬挂锤子或斧头形状的护身符；这些护身符在墓葬中亦时有发现，通常单个地出现。其中的一些还未完工，表明它们正是在此地进行加工的。与之相比邻的三处沙土地面的建筑物，曾用于金属加工。

兽骨中有大量的颌骨和颅骨，也许是祭牲的遗骸。此外，还有大量的马匹，且有至少10只犬，外加幼犬与狼若干，还有少量的猫、海狸、獾、狐狸、马鹿、鹅以及其他一些更普通的家畜家禽。母猪骨与公猪骨各在一处：公猪（可能代表司性欲之男神弗雷）被置于壁炉处，母猪（可能代表司性欲之女神弗蕾娅）则与悬挂护身符的圆环放在一起。11世纪时，这座圣祠遭到毁坏，变成了一层厚厚的瓦砾。13世纪时，一座石结构教堂在距离此地以东100米的地方建了起来，但此前可能还建过一座木结构教堂。

皈依基督教

鉴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信仰体系与基督教有诸多差异，皈依基督教既是形成新意识形态的过程，又是化解宗教矛盾冲突的过程。传统观点认为，皈依基督教是在王权的指导下完成的，首先是丹麦（965年，青齿王哈拉尔统治时期），然后是挪威（995年，奥拉夫一世统治时期），最后是瑞典（1008年，奥洛夫·舍特科农［Olof Skötkonung］统治时期）。但是，研究认为：基督教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基督教才得到官方承认；在斯堪的纳维

亚各国，这一过程大致是同步进行的，尽管存在着区域性差异。

与基督教最初的接触很可能是早期传教活动的结果。在8世纪早期，有一位在弗里西亚[3]任职、名叫威利布罗德的英格兰修士，其传教活动曾远至丹麦。据阿尔昆[4]（Alcuin）记载，他很可能曾渡海前往里伯，并受到国王翁根杜斯的欢迎，但最终因收效甚微，不得不放弃传教努力，带着30名男童返回弗里西亚。

据里姆伯特（Rimbert）的《安斯加尔传略》记载，829年瑞典东部斯维尔人的一位国王请求法兰克帝国皇帝虔诚者路易一世（Louis the Pious）派遣传教士到他的国家，因为他的许多臣民想要皈依基督教。来自科尔韦修道院的两位修士，一位名叫安斯加尔（Ansgar），一位名叫威特马（Witmar），受遣来到比尔卡。他们成功教化了比尔卡的行政长官海里加尔（Herigar），没过几年就建成了一座教堂。847年，当地发生暴动，神职活动被暂停，直到854年才得以恢复。其后安斯加尔重建传教团，并获准建造教堂和指派牧师。865年安斯加尔去世。但据不来梅的亚当记载，936年又有一个新的传教团组建起来。汉堡 - 不来梅大主教乌尼（Unni）曾造访老戈尔姆及其子青齿王哈拉尔，他也曾到过比尔卡并在那里去世。948年或更早些时候，乌尼的继任者阿达尔达格（Adaldag）任命了海泽比、里伯和奥胡斯三地的主教。

在斯堪的纳维亚墓葬中发现的基督教物品通常被认为是劫掠品，但有人认为这其中至少有一些反映了早期传教活动的情况。这些物品包括：十字架或带有耶稣像的十字架挂坠30多件，8、9世纪时的权杖5件（出自海泽比、隆城、黑尔戈、斯塔万格以及塞特内斯），圣物箱6个以及弗里西亚或泰廷陶罐约15个。这些陶罐大都饰有银箔十字架，并且与基督教圣餐礼有关，很可能用于贮藏和度量圣餐用酒。从9世纪比尔卡的一些墓葬中也出土了5个同样的陶罐。在一座东西朝向的女性墓室中，也发现了一个同样的陶罐，此外，还发现了一个带有鱼形底座的爱尔兰悬钵和两枚十字状的方头胸针。

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女性在斯堪的纳维亚宗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些人认为皈依基督教对女性来说是一场灾难。在基督教信仰体

系中，没有女神，只有男性才能主持宗教活动。但是，安妮 - 索菲·格拉斯隆德（Anne-Sofie Gräslund）及其他一些学者们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对女性的排斥是后来的事，在斯堪的纳维亚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女性发挥过重要作用。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对女性是有吸引力的，诸如禁止杀婴、上帝面前男女平等、女性亦可进入天堂等。而瓦尔哈拉英烈祠 [5] 则不然。大多数十字架挂坠和泰廷陶罐是在女性墓葬中发现的；在如尼石刻的修建方面，女性发挥了关键作用（见下文）。

基督教化的痕迹在墓葬遗物中随处可见。虽然基督徒墓葬中依然包括衣饰，但随葬品的数量已有所下降。1868年，在马门发现的一座10世纪丹麦富人墓穴就带有向基督教过渡的典型特征。其随葬品包括一张游戏桌和一把上好的镶银斧头（此外没有别的武器），还有一支放在棺材中的大蜡烛。树木年代测定表明，此棺下葬于970—971年之间，恰恰是耶灵王朝皈依基督教后的5至10年间。

早期基督教会将火葬视为异教活动而加以禁止，因而在10世纪时火葬逐渐减少，只在部分地区仍继续存在。在瑞典乌普兰地区的瓦尔斯塔，在梅拉伦河谷有一处典型的农场墓地，其中有大约70个墓葬，多数葬于约800—1150年间。其中葬于9—10世纪期间的所有墓葬都是火葬，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受到了来自比尔卡的基督教化的影响，虽然出土的随葬物，如玻璃杯、来自法兰克、弗里西亚和斯拉夫的陶器、来自阿拉伯的硬币和砝码以及来自欧洲大陆的刀剑等等，都表明此地与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

950年前后，土葬仪式传入这里，但火葬继续存在，直到12世纪中期或更晚时候才消失。这时候，土葬中的尸骨虽为东西朝向，但仍包含了异教因素，如带有随葬物品、雷神托尔的锤形护身符以及食品供奉；尽管如此，土葬仍可以看作是基督教信仰传入的标志。1100年前后，在此墓地的北端地势较高之处又出现了一处墓群。这处土葬墓群嵌在一座9世纪中期的大墓之中。人们在这座大墓中央挖出一个直径6米的坟坑，在其中嵌进3座箱形石墓室。先前的火葬土层被置于所嵌入墓室的四周，墓冢四周镶以栏石。不幸的是，这三座箱形石墓室

后来均被盗，但有一个小的铁十字架和一串用水晶和白色石英制成的饰珠幸存了下来。具有象征意义的墓葬布局既与先前的首领墓葬保持了一致，也传达出了与12世纪时的火葬共存的基督教符号体系的象征意义。

纪念性的如尼石刻出现于10世纪，成为纪念死者的一种新方式。在瑞典，维京时代如尼石刻现存2,500块；在丹麦（包括瑞典南部），约有250块；在挪威，约有65块。如尼石刻在瑞典中部的乌普兰地区分布最为密集，共有1,300块；其中超过60％的碑铭的年代可以上溯至当地建立主教辖区的时代，即11世纪晚期。比吉特·索耶（Birgit Sawyer）认为，如尼石刻还可以发挥世俗功能，如确保遗产的继承和对土地的所有权等。事实的确如此，但绝大多数如尼石刻同时也是基督教纪念碑。超过半数的石刻都以十字架来装饰，超过200块石刻上载有这样的祈祷文："愿上帝拯救他/她的灵魂……。"一些如尼石刻提到了整个地区对基督教的皈依（参见此处）。早期教会将建造桥梁作为一种赎罪形式，类似于慈善捐赠和朝圣。大约有150块如尼石刻作为纪念碑竖立在桥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55％的如尼石刻是由女性修建的。

对如尼石刻年代的测定再次表明基督教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人们认为，9世纪时安斯加尔在比尔卡建了一座教堂，但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最早的教堂建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许多乡村教堂最初是作为私人拥有的小教堂出现的。这些建于10世纪的小教堂为木结构，仿照的是英格兰稍早时期兴建的教堂的样式。据文献记载，之后在12、13世纪时石结构的教堂大量涌现。有些地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留了圣祠的功用和地位。例如在挪威中部特伦德拉格地区一个名叫迈尔的地方，有一座存留至今的石结构教堂，约建于1150—1200年间。其前身是11世纪建成的一座木结构教堂，而这座木结构教堂本身就是建于基督徒墓葬之上，这表明此地还有一座更早的教堂。第一座教堂建于一处文化遗址之上，在这处文化遗址上发现了4个柱洞和19件黄金箔片，此地可能是9世纪一个公共宴会厅或祭拜中心所在地。

总之，虽然“异教”活动与信仰体系已成为我们今天界定维京人时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但是，对于生活在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而言，基督教传入之前的信仰只是其生活的一个方面。这些信仰并不具有排他性，早期斯堪的纳维亚诸王们很快就欣然接受了基督教，通过它使其统治合法化。不过，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斯堪的纳维亚的海外殖民者在某些情况下把丧葬仪式作为保持其独特民族文化特色的手段，以应对当地文化同化的压力。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斯堪的纳维亚乡村拓居地的变迁情况。

注释

〔1〕 瓦尔基里，传说为奥丁的婢女。

〔2〕 萨满教，亚洲北部某些民族的泛神宗教。

〔3〕 弗里西亚，在今日的荷兰。

〔4〕 阿尔昆（732？—804），生于英格兰约克郡，盎格鲁 - 拉丁语诗人、教育家和高级教士。

〔5〕 瓦尔哈拉英烈祠，位于阿斯加尔，是勇士死后的安息之所。

第四章

乡村的变迁

考古学家研究了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早期国家的发展情况，认为这些国家的出现是铁器时代晚期社会和经济日益发展的结果。对国家产生之前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以及在斯堪的纳维亚（尤其是其南部地区）进行金属探测的结果表明人们逐渐在该地区定居下来，且定居形式日益多样化。

在铁器时代，挪威和瑞典的内陆地区出现了一些孤立的农庄，农庄内有几小片低矮的住房区以及配屋[1]。9世纪以前，在丹麦和瑞典南部地区，就出现了一些流动性较大的村落和独立的农场，但有证据显示10—11世纪时出现了新型的土地所有制；到12世纪时，近代风格的定居点才建立起来，这样的地名都以*-toft*、*-torp* 或*-by* 结尾。

丹麦和瑞典南部地区

人们曾认为丹麦在500—800年间处于一个衰落时期。而近期的考古发掘却显示，这是一个繁荣时期，社会阶层日益分化；许多定居点被废弃，并非是因为社会的衰落，而实际上是人们的居住点日渐集中的结果。考古研究和金属探测的结果还表明定居点的社会等级结构其实相当复杂。

从6世纪起，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地区开始出现大批具有专门功能的定居点。一些地方似乎被用作了生产基地和码头，它们是由一些想用剩余产品来换奢侈品的显赫家族所建。其中许多地方还兼具宗教功能，像乌普兰的黑尔戈[2]，哥得兰岛上的帕维肯，菲英岛上的古杜姆、斯特兰狄 - 甘姆托福特以及霍夫德，西兰岛上的博斯隆讷、西埃厄斯堡和内斯，以及日德兰半岛北部的赛伯松和波赛巴肯。

在菲英岛东南的古杜姆，有一个铁器时代的村落群，面积达1平方公里，由50多个农场组成。在这里发现了7,000多件金属器物，年代都在200至1000年间，其中包括6件金器和5件银器，证明这里是当地的权力中心。这些农庄的主人当中有很多是工匠，他们在此制作金

器、银器，锻造青铜器。村落的主建筑物是一座铁器时代晚期的宏伟厅堂，主人是贵族，为罗马帝国效力。附近的海港城市伦讷堡是他们对外贸易的港口。古杜姆也兼有一些宗教功能，“古杜姆”的字面意思就是“诸神之家”。尽管从6世纪起这个地方就开始衰落，但这里的贸易和制造业一直延续到维京时代。

在斯科讷地区的乌帕克拉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也发展成为了铁器时代的一个中心区，其贸易、制造业和宗教等功能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公元1000年左右被位于其以北5公里处的隆城所取代。人们在这片40公顷的土地上发现了一些金属器物，有阿拉伯和卡洛林王朝的钱币、小的古德谷伯（一种用于宗教仪式的金箔衬纸）许愿堆，还有染制手工制品用的染料和袖珍护身符。

内斯遗址在7世纪晚期至9世纪之间有人类活动。这里有20多座木结构厅堂，还有70来家作坊，它们肯定是被用作了纺织间，因为每间木棚里都有织机压石和纺锤。在遗址的低洼处还有57个柳条环绕的地坑，用于浸泡亚麻。为了便于换水，人们挖掘了一条150米长的水渠。在几处地坑里，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些鹿角，在加工之前人们要先把这些鹿角进行浸泡。另有证据显示，在赛伯松的贸易和制造中心区有300多家作坊，人们分区作业，有从事纺织的区域，还有从事铁器和其他金属器物制造的区域。

在日德兰半岛上的沃巴瑟，考古学家首次进行了足够大面积的考察来展示当时人们走向聚居的进程。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维京时代末期，最终形成了永久性的村庄。1974—1992年间，共发掘了面积达26万平方米的遗址。发掘结果显示，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1世纪，这片聚居地在不同时期至少发生了8次迁移，都是当地居民迁徙和重建过程中的一部分，为的是更好地利用可耕地。到8世纪，此地已经有7家面积大致相当的封闭农庄，皆建有围墙，它们大都位于道路的两旁。每个农庄都有一个主厅，主厅分隔为若干房间，通常在主厅的一端还有一些牛棚。主厅的周边建有作坊，有的还有水井，其中一处还有一家铁匠铺。

沃巴瑟的农庄数目在300年间没有多少变化。学者们根据这个事

实，认为该地居民不是自由独立的土地所有者而是大农庄主或当地地主的佃户，而这些主人要么自己直接经营农场，要么通过管家来管理农场。在10世纪末或11世纪初，此地的建筑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主建筑物为大型拱式厅堂所代替，其建筑风格见之于特雷勒堡古堡。农场上有了单独的牛棚，最大的农庄有5间牛棚，至少可以饲养100头牛，还有一个冶炼炉和一个青铜铸造坊。11世纪，聚居点最后一次迁移，搬到了现在的村落所在地。

日德兰的其他遗址，诸如赛津、特拉别格和奥姆加德以及斯科讷的菲尔波那，尽管发掘规模不如沃巴瑟，但情况都类似（包括拱式厅堂）。在菲尔波那，几代人居住的廊式长屋在11世纪时被特雷勒堡式的房屋取代。11世纪，在日德兰北部的林霍尔姆-霍耶，人们在风沙聚积的沙地上建起了新的村落，就位于先前居民的墓地之上，村落为拱式厅堂式的建筑。百年之后，这些11世纪的建筑又被风沙所覆盖。

在中世纪的初期，整个北欧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永久村落取代流动居住点的过程。究其原因，学者们提出过种种解释，包括人口的压力限制了聚居点的迁徙，进而促使人们划定领地范围。在村落发展的同时，也相应形成了不同的教区，建起了永久性石结构教堂。村落的发展与粮食产量增长有关，也与财富逐步演变为对土地而非动产如家畜的所有权有关。与此同时，王权控制力的加强也相应地要求人们固定住所，以保证稳定的赋税收入。尽管仅仅依据考古资料还不可能证明丹麦的封建制起源于维京时代，但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一时期在权势阶层的积极推动下，领主制和土地占有制是有所发展的。

若干定居点反映出从7世纪起出现了权力日益集中的情况。托福特加德（位于西兰岛）、斯勒英厄（位于西霍兰岛）这些维京时代的贵族居所就是在原有定居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两处遗址中，象征身份与地位的器物都集中在厅堂区一带。

西兰岛西部的齐斯遗址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定居点，它位于齐斯湖畔，距海岸7公里，从海上溯河而上可抵达这里。学者们用金属探测法对该地进行了探查，并从1995年起开始进行考古发掘。在发掘的第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发现是一座建于6—7世纪的带有长廊的大厅

堂，内墙用白色泥灰粉刷过。此厅堂建在一个封闭院落里，旁边另有两栋大房子和其他一些小房间以及作坊。厅堂在7世纪中叶毁于大火，人们在其遗址之南重建了一座坚固的拱式厅堂。该建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未修建牛棚。此外，尽管围墙的旁边建有一间铸造作坊，但却未发现有任何农用建筑物的迹象。及至8世纪，人们重建该厅堂，扩大了整个院落的范围，并在围墙的正中修建了一座宽阔的大门以方便四轮马车顺利进出。9世纪时，人们再次重建主厅，并扩建了院落。到10世纪时，该庄园的面积扩充达到顶点。人们建起了一座新的特雷勒堡式厅堂，新建了若干其他居所以及几处两端有出口、可能是用作停放马车的车棚。然而，仍没有发现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迹象。1977年，考古学家借助金属探测器发掘出一条重1.8千克的金项圈，其所属年代为公元10世纪。这个项圈价值不菲，可换500头牛，可能是国王赠送给其忠实扈从的礼物。后来发现此物正是在该宅院的大门外发掘出来的。齐斯最新的考古发现是一枚国王哈瑟克努特在位时发行的硬币，其年代约为公元1035年。

齐斯不是一个农业聚落的遗址，这里几乎没有牲口棚，居住于此的人所需食物极有可能是由该地区的附属农场提供的。其经济基础则依赖贡赋、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庄园外面南北方向都有许多作坊和贸易区，占地面积达2—3公顷。半地下的作坊达70多家，还有为数众多的小店大概在领主的保护下做买卖。在作坊里，金银匠制造各种金银饰品，他们把铜制成胸针；其他的手艺人制作玻璃球、琥珀珠链和梳子。考古学家们在此发现了100多枚钱币，最早的一枚是7世纪后期的英格兰古银币，还有一些8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兰克的货币，而大多数是9至10世纪的阿拉伯钱币。钱币的分布表明，贸易就在这里进行。

考古学家还发掘出了一枚9世纪中叶的拜占庭铅质印章，上面刻有狄奥多西（Theodosius）的名字，和在海泽比及里伯发现的印章一模一样。狄奥多西是拜占庭掌管军备、负责征兵的长官。拉尔斯·约尔根森（Lars Jørgensen）认为，狄奥多西可能曾在德意志北部和丹麦采购过铁器或是征招过雇佣军。

齐斯可能是一处贵族甚至是王室的居住地。在这个庄园的院墙之内集攒了许多武器和骑射装备，包括马刺、马勒及大量的箭头、剑鞘等。在中央大厅的附近，还出土了许多法兰克和卡洛林时期的酒器。此外，从这个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包括雷神托尔的锤子在内的袖珍护身符、火石和微型长矛等，这些物品可能是置于室内的一处祭祀场所。“齐斯”一词是根据战神提尔来命名的，意为“提尔之岛”。19世纪，人们在湖底发现了约50件刀剑、战斧和长矛。有些器物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600年左右，即定居点初建之时，有些器物是9、10世纪的，它们可能是献给战神提尔的典型祭品。齐斯的考古发现表明，维京时代的领主有如下职责：负责从军事上保护当地的安全；控制市场的贸易和手工业生产；主持宗教祭祀仪式（包括在大厅举行宴会）等。

最后要说的是，在罗斯基勒（位于西兰岛）附近的旧莱伊尔，人们在发掘过程中还对传说中的丹麦王室所在地进行了一番考察。7—10世纪时，该定居点包括两个功能区：其中居住区有50栋房屋，包括4座大厅（每座长约48米）；另一个是由众多作坊和货亭组成的手工业区。在这里共发现了4,000多件器物，包括镀金的珠宝、首饰盒、钱币、砝码、银锭、铜锭、模具、骑射装备、进口珠宝、宝石托以及原产于卡洛林和盎格鲁 - 撒克逊的玻璃。该聚落在同一地点存续了大约300年之久，这是非同寻常的，而莱伊尔也被视为一处王室的居所。

挪威

在丹麦和欧洲大陆，都有广袤的田地供人们耕种，贵族有可能置办大量地产。然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北部，沼泽、森林、河流和山谷遍布，大田庄难以管理，而独立的小农场则更为可行，因此自6世纪起，挪威基本的定居结构一直保持未变。在挪威南部以及大西洋沿岸往北直到特罗姆瑟一带，那里的部落首领进行着经济再分配，把贵重

物品分配给族人，族人用粮食向他们交租。在挪威南部的耶伦地区，可耕地都得到了精耕细作。比约恩·米勒认为，酋长领地的划分在6世纪就已经出现，各领地多以某个山堡为中心。从那时开始出现的豪华墓葬，是辨识这些部落领地的依据。从铁器时代到维京时代，建筑风格基本没有变化。农庄里是一小片一小片的带廊长屋。同一屋顶下，既住着一大家子人，又有牲口圈。

在挪威北部，这种混合型的农业经济与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存。此文化传统与以渔猎为生的萨阿米人相关，他们渔猎的范围包括峡湾深处、内陆和极北之地。这种社会被认为是一种流动的、平均分配的社会，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它却鲜见于挪威文献，因为挪威文献更倾向于记载维京式的生活方式。灵恩峡湾附近的交界地带以南是挪威人的墓葬，以北是萨阿米人的墓葬。在该地区地位显赫的挪威人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些萨阿米人的珠宝，这可能表明在挪威人和萨阿米人的显贵阶层之间存在着通婚的情况。在这两个民族交界的地方所出土的大批文物中，既有挪威人的器物，也有萨阿米人的器物，表明双方可能在边界谈判时交换礼物。酋长制的瓦解和基督教传入前存在的宗教信仰的终结，或许还造成了挪威人同萨阿米人之间关系的高度紧张。

挪威博尔格考古发掘的结果表明，维京酋长制下的生活方式维持了至少300年。罗弗敦群岛位于北极圈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最北的居住地，从博尔格到丹麦南部边界的距离与那里到罗马的距离是一样的远！

这里原有的长屋是在5—6世纪用木料和草坯墙建成的。而到7世纪时，长屋被扩建成一间廊式厅堂，长约80米，宽为7.5—9米。两排木桩支撑着屋顶，将整个厅堂分成三个长廊区；厅堂共有5个房间，5个入口。这座厅堂使用了300年，及至被拆除时，其建筑风格一定很过时了，尽管年代久远的传统建筑是统治家族权力长葆的象征。

虽然这里地处极北之地，但由于峡湾暖湿气流的作用，气候并不是那么严酷。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是他们饲养的牛群，这可以由巨大的牛棚而得到证明（虽然人们也种植一些大麦）。从出土的铅坠和渔

钩可以看出，渔业对他们也很重要，鳕鱼干的交易无疑居于重要地位。在这里还发现了大量的炼铁炉渣，或许铁匠铺内曾进行过金属的锻造，尽管铁是从挪威南部运来的。这里的人们还进口皂石，并制作各种各样的手工制品，如纺锤、钻头、网坠、织机压石等。人们还制作多种颜色的磨石，这是他们从海泽比人那里学来的。从这里发掘出的其他物品还包括两个泰廷陶罐的碎片和十二三个8—10世纪的玻璃器皿，有些饰有金箔。这些东西的主人显然受到了北欧贵族宴饮习俗的影响。外来器物是权力和声望的标志。在挪威，类似的外来物只见于凯于庞厄。因此，学者们常把博尔格的情况与奥塔雷的记叙（约890年）联系起来。奥塔雷无疑曾造访过此地，尽管据考证该农庄的主人是一位名叫托雷·约尔特（Tore Hjort）的酋长。大型船库的遗址表明，该酋长所拥有船队的远航能力与奥塔雷的船队不相上下。尽管这里没有发现海象骨，也没发现与萨阿米人相关的手工艺品，但他们的经济基础或许大同小异。

奥塔雷（Ohthere）

奥塔雷，又名奥塔尔（**Ottar**），挪威商人。他在9世纪晚期曾晋见阿尔弗雷德大王[1]（**King Ælfred**）。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人交谈时用的是何种语言，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翻译人员，但阿尔弗雷德确曾询问了奥塔雷的生活方式和游历情况，然后命人用英语记载下来。

奥塔雷的家乡远在挪威最北部，位于北极圈之内，他的农庄可能与在博尔格发掘的农庄大致相似。由于土地贫瘠，其收入主要来自捕猎驯鹿。他也从事猎鲸和猎捕海象的活动，并且从邻近的拉普人那里收取贡赋。贡赋是以实物形式交纳的（可能是海象牙和毛皮），因而奥塔雷拥有自己的船，时常向南行驶，进出北欧的市场进行贸易。

奥塔雷告诉阿尔弗雷德，他生活的地方是人类所能到达的最

北端。但在它以南有一个叫做凯于旁厄的贸易集镇。他说，在天天顺风的情况下，白天航行，晚上歇息，至少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抵达那里。在任何时候，船都必须沿海岸行驶。他还说，从凯于旁厄到海泽比的贸易城还需5天的时间。

10—11世纪，酋长的居所被3栋比原来小得多的房屋所取代，使得这里更像是一个农庄。这或许表明当地的权力结构经历了剧变，变化与挪威王权的兴起有关。这与斯堪的纳维亚南部贵族中心区走向衰亡、定居点分崩离析的情况有些相似。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和基督教时期，博尔格一直都是一个宗教中心。厅堂的正屋似乎是用来进行宴饮、举行宗教仪式和节日庆典的地方。大部分外来器物，包括悬钵的一些残片、5张古德谷伯以及一个金制的手稿阅读指示棒，都是在正屋的北角发现的，主座可能就在这个位置。因此，厅堂在特殊场合下也许还被用作异教神庙，当地的酋长兼宗教首领和世俗长官之职于一身。尽管我们无法确认这里的宗教习俗是否一直延续了下来，但重要的是，时至今日，当地的教区教堂仍坐落在博尔格。

可以看出，在维京时代，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乡村的居住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反映出社会日益复杂化、社会阶层不断分化以及场所的功能逐步专门化的事实。这些发展变化绝非只是在维京人内部出现，在欧洲的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相似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却为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国家的建立作好了准备，也为其海外扩张奠定了基础。定居模式不断演变发展，最终出现了一种新型聚居点——城镇。这就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注释

〔1〕 配屋，如谷仓或堆放杂物的房屋等。

〔2〕 黑尔戈，梅拉尔湖中的岛屿和市场，曾是瑞典乌普兰国王的财富和权力中心。

第五章
城镇与贸易

尽管就北欧大部分地区而言，中世纪早期是城市重建和复兴的时代，但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城镇的发展，对于改变维京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依然有着特殊的作用，而且也使人们更加认同他们是商人和手工业者。早先的研究，受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1862—1935）的启发，认为城镇是经济发展，尤其是长途贸易的结果；但是，如今学者们逐步改变了看法，认为城镇的兴起是当地权力结构的产物。他们认为，城镇市场和国际贸易港口的建立，都与王权的加强及早期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建立有关。持这一观点的考古学家们竭力想要找到最初的城镇。近期的发掘将具有城镇特点的遗址出现的年代一再推前，甚至回溯到铁器时代。有关这些早期城镇的证据主要来自于现在的丹麦、德国北部、瑞典南部和挪威南部地区。直到中世纪晚期，斯堪的纳维亚的大片地区都未出现城镇。

我们已了解到，自6世纪起，围绕着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沿海地带，已形成了一些早期的商贸中心和手工业中心。尽管这些中心还算不上城镇，但已被归入原始的城镇中心区的范畴。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城镇的定义虽存在诸多争议，[1] 但城市化这一概念，必定要包含一定程度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早的城镇之一，是地处日德兰半岛南部的里伯，建城时间大约在704—710年间。考古发掘结果显示，该城镇由若干相连的小块区域组成，规划得井井有条，城镇周边围有枝条编成的篱笆，以小护城壕与外界隔开。这些小块区域是由第一批来到此地的商人设计规划的，学者们常常将此作为王权支持和组织城镇规划的直接证据。城内厚厚的细沙层曾被认为是人们特意铺设用以平整地面的，但如今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由风吹积而成的。埃里克·克里斯琴森（Eric Christiansen）反对把里伯城的建立归结为国家行为，认为它是商人们彼此合作的结果，而国王只是力图保持对该地区的控制权而已。

或许里伯只是一个季节性的集市和手工业中心而非永久性居住

地，因为学者们没有发现任何坚固建筑物的遗迹，只有一些半地下的茅舍和作坊。在这里，一些专业的金属工匠制作多种多样的珠宝饰物，还有些工匠用从意大利北部进口的小块镶嵌玻璃制作玻璃珠。他们还从莱茵兰进口手推磨石料和陶器。从8世纪起，他们也开始铸造一种英格兰古银币，该银币上铸有所谓的怪物沃登（Woden）的头像。自9世纪早期开始，有人从挪威进口埃兹堡的板石磨刀石和皂石碗。这些物品中许多都销往了半岛腹地，有30多处遗址中都发掘出了进口器物。同时，牛则被卖到里伯，供那里的人们消费，也许是由那里再出口。人们在发掘中，发现有厚厚的牛粪层。及至9世纪中期，里伯城周围出现了护城壕。然而，壕沟宽仅2米，深1米，无法起到防御的作用，因而似乎只是以此表示这是一个商贸区，处于王权的保护下，王室对该地有征税权。

7世纪，瑞典王国兴起于瑞典中部大湖区附近，最早的城镇建立于比尔卡。此城地处梅拉伦湖的比约克岛，在原始的城镇生产中心黑尔戈以东12公里处。在海峡对面的阿德尔索岛上，有一座王室庄园的遗址。虽然比尔卡离此地有一定的距离，但学者们还是倾向于认为，比尔卡就处在这个王室的管辖之下，向其纳税。17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比约克进行了首次发掘，而1871至1890年亚尔马·斯托尔佩（Hjalmar Stolpe）的发掘发现了极其丰富的进口物品。但要完全确立比尔卡的发展进程，仍有待于最新的研究。

8世纪中期，比尔卡在水上和陆上都加强了城防。最早的城墙是一个半圆形壁垒，上有6处开口把城垣分割成7段，可能设有城门并通过城墙上的塔楼进行防卫。城墙向北一直延伸到梅拉伦湖的港口，并和水中的一连串木桩相连。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在城镇建立之前，人们就已经在城墙附近的台地上修房建屋。通过对一栋建于400—700年间的长屋进行发掘，人们发现，在城镇建立之前，这里和外界已经有了颇为广泛的商业联系。

还有一个小堡垒（即博尔格），也用来护卫整个城镇。堡垒的墙体用土坯和石头砌成，周边围有木栅栏。人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铆钉，表明此堡垒在修建时使用了造船技术，或是使用了大量船

板。堡垒在750年左右即城镇建立时首次进行了加固，但在9世纪被大火夷为平地，此后人们重建堡垒并增加了高度，但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时又一次遭遇火灾。堡垒之下是驻防区，在此发现了大量的武器。在驻防区之下的两块岩石间的坡地上修有石头平台，10世纪时人们在较高的平台上修建了一座坚固的厅堂，似乎是想把它作为长期驻军的议事大厅。三对粗大的柱子撑起了屋顶，在屋子中央形成了一片开阔的空间。在大厅内部靠墙的地方，发掘出了盔甲、锁子甲、盾牌和长矛等武器装备，它们曾经是靠墙摆放着的；另外还发掘出了刀剑、箭簇、斧头及马具，锁和钥匙的发现说明屋里还曾经放过箱柜。从发掘物的分布可以推断，主座在大厅西面。驻防军从堡垒可以直抵海边，因而堡垒建在这里，必定是为了抵御进犯比尔卡城的海上来敌。在军队驻防地的正下方，可以看到有两处用橡木搭建的码头，说明他们已经把军用码头和商用码头分开使用。在比尔卡还发现了若干处墓地，斯托尔佩发掘出了1,100座墓葬，其中的119座随葬品颇为丰富。上述情况表明，比尔卡是一个国际性的商业城市，与外界有着广泛的商业联系。与里伯不同，比尔卡似乎从建立之日起，就一直有人居住。该城镇在发展过程中曾遭遇多次袭击，而人们也一步步加强了城防。

《法兰克皇家编年史》在记述9世纪初国王古德弗雷德的活动时，曾提到雷里克这个城镇。该城镇极有可能与地处波罗的海沿岸的大斯特罗姆肯多弗遗址有关。20世纪90年代，这里发掘出了258座墓葬（其中6座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舟葬坟墓），从中可以看到撒克逊、弗里西亚和斯拉夫等多种文化的影响。此地的建筑以半地下的作坊间为主，引人注目的是这里有一连串用木栏围起的大坑，可能是用来漂染织物的。自8世纪20年代起，这里就已经是一个加工地，但直到8世纪60年代，人们对其进行了一定规划后，该城镇才呈现出城市的某些特征。公元808年，丹麦人与斯拉夫人发生了利益冲突，古德弗雷德摧毁了雷里克，把商人迁往海泽比。

海泽比（德语为*Haithabu*）的字面意义为“欧石南之地”。它地处日德兰半岛的南部，位于丹麦边墙之端，成为了扼东西方贸易之咽喉。人们在海泽比的贸易生产活动最早始于8世纪，那时人们修建了

第一批码头，许多作坊开工生产。9世纪时人们开始铺设一些横平竖直的街道，与小河平行，将围栏围起的大小规整的建筑区分隔开。和比尔卡城类似，这里也为半圆形的围墙所环绕，且有一个堡垒进行防卫。港口由安插在水中呈半圆形排列的木桩来防护。在城墙内发现有2,000—5,000座墓葬，城外更多。墓葬的主人主要是男性，尽管墓主人大多为穷人，但也发现了几座10世纪的奢华墓室。据估计，10世纪时，生活在海泽比城的人口有400—1,000人，[2] 他们直接或间接以贸易为生。他们进口各种原材料，进行多种手工业生产，包括从瑞典进口铁矿石炼铁，从迈恩地区进口火山岩磨石料来加工石磨，还生产青铜珠宝饰品、鹿角、骨器、皮革、木制品、玻璃球和琥珀珠。从9世纪初起，海泽比人开始铸造自己的钱币。

图6　海泽比鸟瞰图。弯曲的围墙清晰可见；最北端的那片茂密的林地，是俯瞰全城的山寨遗址所在地。

挪威第一个被考察的城镇是地处奥斯陆峡湾西岸的凯于庞厄。这个地名的字面意思为“市场”，也就是奥塔雷的游记中的*Sciringesheal*。达格芬·斯基雷（Dagfynn Skyre）近来在此地的考古发掘结果显示，在规划出单块的专门用地之前，这些地方曾在短时间内作为流动

手工制作场所。在规划之后，人们才在这些地方建起了全年使用的永久性建筑物，时间大约在9世纪初。然而，到了10世纪，这座城镇就遭到弃置，或许又变成了一个季节性的集市。凯于庞厄与其他地方有着广泛的商业联系，在此地交易的商品包括：用莱茵河地区陶罐装的产自德意志的酒（以及角形玻璃酒器）、丹麦或斯拉夫出产的蜂蜜、挪威的磨石等。凯于庞厄的居民还把白银熔化制成各种银器。发掘物中有一些金银器物，包括一张法兰克的书衬和一枚爱尔兰胸针，它们可能是劫掠所得。

在凯于庞厄的腹地，有一个大农场出现在了许瑟比 - 特约凌，农场内有一座拱式厅堂，厅内发现了若干进口的红玉髓小珠及一些玻璃酒器。难道这就是该地行政长官的大厅？这里还有不少风格各异的墓地，包括一大片火葬墓地以及一小片高规格的舟葬墓地。一些学者们认为，火葬反映了当地人的丧葬习俗，而舟葬或许是丹麦商人的习俗。对凯于庞厄码头的树木年轮进行年代测定表明，凯于庞厄大约建于803年之后。学者认为，海泽比和凯于庞厄大概都是9世纪初由丹麦国王古德弗雷德所建，其目的是控制海峡另一端的疆土。

最后，自10世纪后期起，斯堪的纳维亚的城市化过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的组织日益复杂，教堂的影响日渐加深。奥胡斯建于公元900年左右，在10世纪几度被称为主教辖区。该城可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起来的，整个城镇占地仅4公顷，其中一面临海，另一面为半圆形的城垣所环绕。学者们据此推断，王室推动了该城的建造，将其作为一个军事要塞，城内居民的日常活动在其庇护下日益蓬勃发展起来。

10世纪末，瑞典比尔卡城的地位为西格图纳所取代，但最初西格图纳与东部地区鲜有联系，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直到11世纪才重新得以发展。700米长的街道两旁，规划出了两排狭长的居住区。995年左右，瑞典最早的钱币就是在这里铸造出来的，但到中世纪晚期，贸易中心转移到了梅拉尔湖周边地区的斯德哥尔摩。另外，瑞典的隆城、挪威的卑尔根和奥斯陆，大致都建于11世纪初期。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北的城镇位于特隆赫姆，或名尼达罗斯。考

古发掘证明此地有一处王家庄园，还在后来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作为城镇中心区域的地方发现了当地一些部族首领零星的活动痕迹。但一般认为，此城是由奥拉夫一世于10世纪90年代末建立的。大多数永久性建筑物建于10世纪晚期，城区被均匀地分成小片。11世纪中期，在河滨城区用木头搭建起了第一个真正的码头，从1050年前后起，这里开始铸造硬币。特隆赫姆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尤其是朝拜奥拉夫二世（St Olav）的朝圣活动开始后，其地位就更加重要了。至11世纪末这里已建起了7座教堂，1152—1153年设立了大主教辖区。1973—1985年，学者们在此发掘出一段60米长的中世纪大道。这条大道最初为砾石路面，与河岸平行；11世纪中叶时，人们将其加宽并铺上了木板。临街建筑是些一室或两室的大屋，可能租给商人和工匠作联合作坊或仓库。建筑区的中央一带是居民住宅，里面有靠墙的长椅和壁炉。其他的房屋，包括浴室、厨房、储藏室和公厕，都位于住宅区的后面。

斯堪的纳维亚各地城镇出现的时间虽各不相同，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王权都曾为城镇的发展提供过有利条件。这些城镇并非极具维京特色，在整个北欧，忙碌的商人和工匠随处可见，他们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海外扩张，为权力的集中和商人阶层的成长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

注释

〔1〕 如皮雷纳从三个方面来界定城市：其居民不以耕种土地为生，而是一个从事商业和工业的地方；城市要具有法人资格，并拥有自己特有的法律和制度；城市是一个行政中心或者一个堡垒。他认为中世纪和近代城市具有两个基本属性：市民阶级和城市组织。参阅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

〔2〕 国际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居住人口达到5,000人左右的，可以称之为“城市”。由此看来，维京时代早期的这些聚居点，宜称为“城镇”。

第六章

漂洋过海——远洋航行和海外扩张

乘风破浪的长船、龙形的船头、船舷的护盾、红白相间的船帆，说起维京人，人们就会想到这些东西。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阿尔昆对维京人于793年突袭林迪斯凡的实际既恐惧又愤慨，震惊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袭击居然是从海上发动的。"对于8、9世纪的修士来说，维京人就是一些来自海外的异教徒。那时，陆路交通异常艰难，海上航行明显更为容易，维京人的海外开拓真有那么传奇吗？

11世纪的巴约挂毯，用卡通的形式描绘了用船运送一支中世纪早期的军队及其马匹和粮草的情景。那船据信与载着维京劫掠团伙的船很相似。毕竟，诺曼人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头目罗洛（Rollo）的直系后裔。那张挂毯展示了用"木砖"，即厚厚的木板建造的舰船，船帆色彩鲜艳。这些舰船可以被拉曳到倾斜的海滩上，桅杆可以拆卸。

1880年，在挪威的戈克斯塔德发掘出一座舟棺，这一考古发现，不仅可以证实挪威人有着高超的航海本领，还深化了维京人作为勇敢无畏的探险家、航海者和造船能手的形象。1893年，戈克斯塔德舰船的复制品从卑尔根启航，28天后到达纽芬兰。1904年，挪威第二座舟葬墓在奥塞贝格发掘出土，其精雕细琢的龙骨展示了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艺术活力。这一发现激发了挪威人的民族主义热情，挪威当时正处于争取独立斗争的最后阶段，并最终在1905年赢得胜利。据树木年轮可以确定，这艘奥塞贝格船大约建造于820年，可以容纳30名桡手，是现存最古老的帆桨并用船。此前的舰船只能靠划桨航行。虽然大概早在7世纪时舰船上就出现了龙骨，且差不多同一时间，在波罗的海哥得兰岛上的岩画中也已经出现了帆，但现在还未发现有比这艘奥塞贝格船更早的船桅保存下来。大约在834年，这艘船被用作舟棺，来安葬一位挪威公主。即使依照9世纪的标准，这艘船也有些特别，但由于缺乏其他发现，再加上是作为奥塞贝格重要的考古发现陈列在奥斯陆舰船博物馆，地位特殊，这艘王家舰船便作为维京船的"样船"摆放在那里。

1957年，丹麦国家博物馆从罗斯基勒峡湾海底打捞出5艘舰船，使这种状况有了改观。这些舰船在11世纪70年代被凿沉，目的是封锁

峡湾在斯库勒莱乌的入口，保护在罗斯基勒的王都。虽然舰船的装置已被拆掉，并且经过了多次维修，但这些舰船可以说明，到11世纪时斯堪的纳维亚的船舶已根据不同的需求，细分成了各种不同的类型：有专用于战争、帆桨并用的细长型战船，有空间更大、更坚固的载物帆船，还有用于捕鱼和摆渡的小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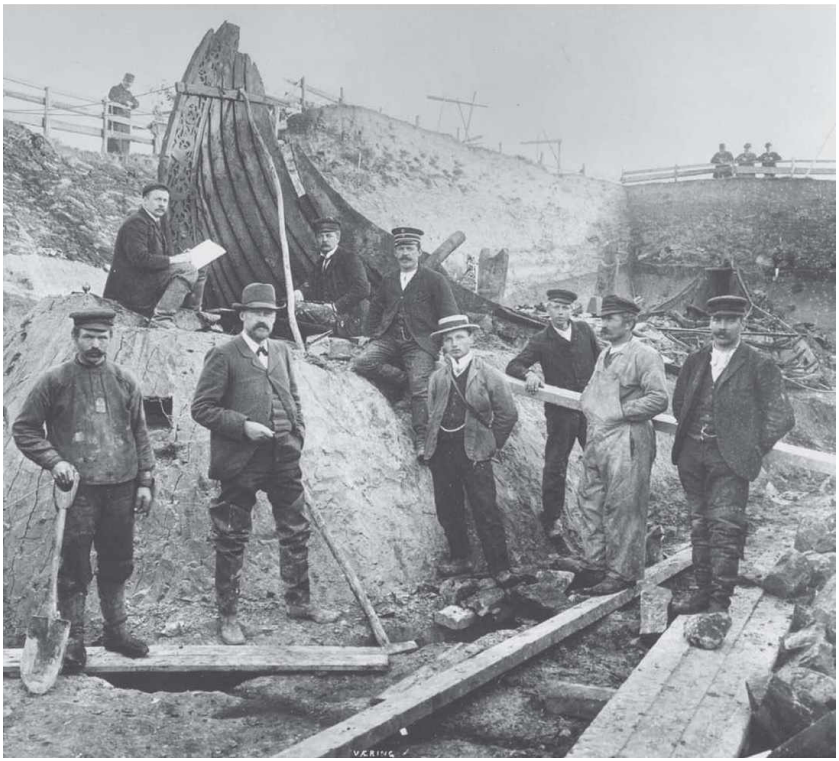

图7　奥塞贝格舰船；1904年9月21日，发掘人员在发掘现场

“斯库勒莱乌2号”是一条细长型战船，船长近30米。船体的设计主要考虑的是速度快，能装载下60—80人以及劫掠物品。船桅可以卸下，这样它既能在江河中逆流而上，也能在桥下航行。然而，树木年轮的分析证明，这艘作为伟大维京时代象征的舰船，却不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建造的。事实上，该船建造于都柏林地区，时间大约是在1042—1043年。它可能已在爱尔兰海域航行了至少20年，然后才被维修

（修补该船用的也是爱尔兰木材）并带到了罗斯基勒。船板用优质橡木制成，也许是按照斯堪的纳维亚的传统为当地一位酋长建造的，以便这位首领参与挪威人在都柏林的正常活动——买卖奴隶或是在爱尔兰、英格兰和威尔士进行金钱交易。

“斯库勒莱乌5号”也是一艘长船，但要小得多，造船工艺也要粗糙些。这艘船约于1040年在丹麦东部造成，能容纳26名桡手。底部船板起初是用新橡木建造的，但船弦由橡木、梣木和松木拼装而成，还用取自其他舰船的船板修补过。这艘船的使用已经到了极限，很可能是一艘“莱当”船。“莱当”船是当地村民的徭役，他们不但要交付船只，还要配齐26名桡手。这种见于12世纪史料的兵役是否起源于维京时代，仅靠“莱当”船还无法证明。但这种船只确实说明，斯堪的纳维亚的水手，和后来的海员一样能干，有条破船就能在海上航行。

相对于其长度而言，“斯库勒莱乌1号”船体要宽大得多，代表了远洋商船的发展情况。船体中部有一个货舱，能容纳多达40—50吨的货物。只有船头和船尾有甲板。桅杆被牢牢地固定着，船靠风帆推进。虽然该船最多可以搭载12名船工，但它只有在无风或进行机动操作时才用桨。这艘松木船1040年前后造于挪威西部，在1060—1070年间维修过两次，后一次维修用的是产自斯科讷岛的橡木。

斯库勒莱乌的考古发现，改变了我们对斯堪的纳维亚舰船的认识，但故事至此还没有结束。在罗斯基勒博物馆进行扩建以把这些古船置于室内保存时，又有9艘舰船被发现，这些船的年代跨越维京时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其中一艘是迄今所发现的最大的战船：1997年发现的“罗斯基勒6号”长约36米，大概在1025年之后的某个时间造于丹麦。桅杆上配备了一面横帆，面积将近200平方米，它可能有多达78个桡手的座位。此船用最优质的木材造成，工艺精湛，是财富和权力的产物，只有社会最上层的人士才能拥有。

在海泽比港口也发掘出一艘类似的船。人们认为，能容纳60名桡手的“海泽比1号”造于当地，是一艘王家舰船。这艘船制作工艺精良，橡木板长度超过10米，铆钉铆得异常密实。建造这样的舰船，需要技术熟练的船匠、巨大的树木和足够多的铁。该船沉没时大概只使

用了5至25年，可能在1000年前后港口遇袭时被用来火攻敌船，不幸被烧毁。相比之下，“海泽比2号”很可能属于斯拉夫人或撒克逊人，约于975年造成，只是一艘低等的货运船。船体的一部分是用旧船板拼装的，就连船肋也是取自于另一艘船，由于尺寸不合而需要用一些小木块来支撑。

总的来说，过去50年考古所发现的舰船和舰船碎片，不但进一步印证了维京人出色航海家的形象，还揭示了一幅更为复杂的画面。它们不只是一系列不同类型的舰船，更是一系列的投资行为：有修修补补的舰船，也有高贵华丽、适合作为公主舟棺的船只。研究表明，在靠海为生的诸民族中，从撒克逊人和弗里西亚人的桨船到各种专门用途的舰船，船只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不过，研究还表明，在整个爱尔兰和北海地区，船只都按公认的斯堪的纳维亚传统建造。“斯库勒莱乌2号”长船建于爱尔兰。11世纪初，在荷兰的蒂尔港，一艘用英格兰橡木制造的“维京”船被烧毁，木料用来建造港口护岸。

对于许多生活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人来说，海洋知识一直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斯堪的纳维亚部分地区来说，要想外出，唯一的通道就是海路，因而海洋知识是不可或缺的。挪威的国名正是来源于其西海岸一条航线的名称，即Norvegur。而航海术语“右舷”则来源于船只右侧安装的一个控制方向的舵，即“转向舵”。在挪威，已经得到确认的近代之前的船库[1]超过850个，其中有250个集中在挪威的西南部，还有500个集中在挪威北部。虽不能确切地断定它们属于维京时代，但其中有200—300个船库很大，放一艘渔船太富余，很可能是用来放长船的。有证据表明，这些船库还被用于举行宴会。有人认为，它们的分布揭示了当时的军事情形，当时的军事制度与早期酋长制有关，后来发展成了军事徭役或“莱当”制度。

没有精密的导航仪器，海上航行就要依靠对洋流、地标和星辰的观测。维京时代的水手们，只要有一个简单的方向盘，就能自东向西或自西向东沿同一条纬线航行，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这种办法要求在大部分旅程中可以看到太阳，在北大西洋地区这个条件可不容易满

足。人们通过测量航速并结合起航的时间来确定所处的经度，是很晚之后（18世纪）的事情。不过在当时，一艘挪威船带上方向盘，就可以从卑尔根启航，向正西航行，驶向设得兰岛；或者先沿海岸向北航行，再向西航行直到冰岛。1948年，在格陵兰岛的纳萨尔苏瓦克发现了半个木制圆盘，上面有等距刻痕，证明类似的航海工具确实存在。但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指出发现圆盘的地方据说是一个本笃会〔2〕女修道院遗址，这东西可能只是一个中世纪的忏悔盘。

那么，那些流传已久的北欧海盗故事可信吗？维京人的船帆并没有保存下来，但我们还有巴约挂毯上的图案。戈克斯塔德船和“斯库勒莱乌5号”的船舷上，都有可以悬挂盾牌的板条。龙首船仅存在于岩画和文学作品中，在考古学上我们能找到的只有一个从奥塞贝格发掘出的兽头床柱！龙首船可能只是现代人脑海里的维京人传统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一个熟练掌握航海技术的民族的存在则是毫无疑问的。那些舰船和航海技术使得他们在9世纪末到11世纪期间，从斯堪的纳维亚拓居到各地。

海外扩张

历史学家努力想找出维京人对外扩张的原因，对其前后的扩张活动作出统一的解释，但他们扩张的动机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和演进的。人口增长大背景下对匮乏资源的争夺是其向外扩张的根本原因，最初可能是为寻找财物，后来发展成为寻求新的土地。

维京人到底是劫掠者还是商人？争论一直不休，但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在铁器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权力的集中是以礼物交换经济为基础的。部落酋长有特权，能获得外来物品。首领地位的确立，靠的就是向下一级级地分发财物，奖励扈从。维京时代早期，斯堪的纳维亚的动产财富匮乏，驱使他们向海外扩张。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首领们，从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那里收取贡赋，反过来又通过向扈从馈赠礼物赢得社会地位，获得他们的拥戴。如果礼物不好筹措，首领们便

会武力掠夺。在后来的萨迦文学中，强悍的首领被刻画成“赠镯者”，他们赠送银镯给他们的扈从，以此确保和酬谢他们的忠诚。在维京人的家乡和受其劫掠的地区，典型的考古发现就是银藏。

公元900年前后，当爱尔兰 - 挪威维京人被从都柏林驱逐时（参见此处 ），他们随身携带着军队的“薪饷柜”，但在905年，他们被迫将其放入一个有铅质内衬的箱子中，埋在库尔达尔的里布尔河畔，并且未再取回。一支国际考察队花了几十年时间最终将其收集了起来。银藏中大约共有7,500枚钱币，包括5,000枚当时发行的维京钱币、大约1,000枚盎格鲁-撒克逊钱币，以及约1,000枚法兰克和意大利钱币。此外，还有约1,000根银条及一些白银饰物，其中包括一些完整的爱尔兰银镯。这里出土的白银总重量约为40千克；估计现在价值30万至400万英镑。

库尔达尔银藏可能是通过贸易和劫掠活动积累起来的。例如，他们劫掠爱尔兰获取奴隶，再在约克出售。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他们拥有政治控制力的地区的贸易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不仅进行奢侈品的贸易，也越来越多地从事大宗普通商品的买卖。同时，他们也在东西方贸易中充当中间商。在穆斯林侵入地中海、封锁了传统贸易路线之后，他们通过波罗的海和俄罗斯开辟新的商路。经济扩张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人口增长、制造业发展和新财富的积累——通常源于劫掠和贡物。事实上，在同一语言和文化区域内，交易更容易进行。因此，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政治统治也推动了经济增长。

像奥塔雷这样的斯堪的纳维亚的领主们，会涉足若干不同的经济领域。他们在国内收取贡品、礼物，在那里社会义务与金钱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聚藏财物只是其积累充当交换礼物的财富过程的一部分。贸易商们定期交易，换取奢侈品（尤其是白银），赢得朋友，影响权势人物，并收买同盟者。但是，当他们来到一片繁荣的北欧市场上进行货物和奴隶交易时，会碰到从未见过、也许将来也不会再见到的商人。在这里，需要靠王权而不是靠社会责任来确保公平交易，经济交易活动也从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王权控制下的货币铸造，对于推动纯粹的金钱交易活动而言变得非常必要。

随着礼物交换重要性的下降，获得土地所有权显得比获取动产财富更加重要了。聚藏财物活动的终结，并不是因为局势最终太平了，而是因为政权的基础发生了改变。土地和不动产，而非领土和扈从，成为权力的主要来源。后期维京人对外侵略的目标，就是占领新的领土以定居。北大西洋地区有大量人口稀少、尚未开发的土地，但在不列颠群岛，他们不得不从当地居民手中夺取土地。他们利用当地权力间的平衡，千方百计在当地人之间周旋。尽管在英格兰也有文献记载证明，那些维京人的首领用现金买过地，但他们常常能够摧毁国王或修道院的权力基础，轻而易举地从他们那里掠取土地，分配给他们的扈从。这时，白银主要用于商品买卖，而不再用于竞争性的馈赠。

维京人在西欧

史料记载西欧第一次遭到维京人袭击是在8世纪末。无论是欧洲大陆、北欧还是爱尔兰海域，所遭遇的袭击都大体相同。那些没有设防的沿海和沿河地区，包括一些修道院和集市，是维京人袭掠的首选目标。他们通常驾两三只舰船组成小股武装，一般在冬季风暴来临之前返乡。在8世纪90年代，他们袭掠了诺森伯里亚的修道院，799年入侵卡洛林帝国。维京人第一次袭击爱尔兰海岸发生在795年，记载中第一次袭掠腹地发生在830年前后。从9世纪30年代开始，较大规模的武装力量袭击弗里西亚群岛（近代尼德兰）海岸，并且洗劫了英格兰南部沿海地区。多雷斯塔 [3] 这个富庶的贸易城在834—838年间，连续四年遭到洗劫。

维京军队敏于利用当地的派别对立和他们的弱点。840年虔诚者路易一世去世后，卡洛林帝国被他的儿子们瓜分。 [4] 得知卡洛林帝国内战，且拥兵自重的军阀们意欲划分自己的地盘，维京首领们趁火打劫，加速了这一分裂过程。841年，维京人洗掠了鲁昂。845年，巴黎交付了7,000磅白银才免于洗劫。有一支维京舰队在852年和853年分别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驻扎越冬。这支舰队继续利用这些水道活

动，直到秃头查理二世[5]（Charles the Bald）修筑了设防的桥梁，并且采取措施保护城镇和修道院，才迫使维京入侵者把注意力转而集中到英格兰。

850年，维京人的军队第一次在英格兰境内越冬，标志着这些机动性极强的军队的持续袭掠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865年，文献中首次记载了“丹麦金”[6]的交纳情形，当地人以此换取和平。这个时期维京人在欧洲袭掠活动最有力的证据，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那里发现了成千上万枚卡洛林帝国和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钱币。

维京人对财富的掠夺必然也会削弱卡洛林帝国的实力，但除此之外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法兰克几乎没留下多少影响和痕迹，找到的考古证据少得可怜。从塞纳河下游直到鲁昂有一些受斯堪的纳维亚影响的地名，但是几乎所有的手工艺品都只见于西北部的诺曼底和布列塔尼。诺曼底的情况和英格兰一样，本地法兰克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相互影响，迅速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诺曼文化。这里沿海地区也有少量墓地，包括10世纪安葬于布列塔尼的格鲁瓦岛的舟棺。在舟葬的长船之内还有一条小船，这口舟棺先是沿着立石组成的行进道被拖曳了一段路，然后被装满陪葬品，包括武器、骑射用具、金银珠宝、象牙赌具、匠人的工具和农具。一名成年男子和一个少女——也许是殉葬者——被置于舟棺之内。长船周围围上24面盾牌，然后被付之一炬。虽然在人们对维京人的传统印象中这种仪式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这却是迄今所知把焚烧舟船作为埋葬仪式一部分的唯一例证。事实上，这一仪式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大多数武士皈依基督教之后，是他们面对普遍存在的同化，重构信奉基督教之前身份的一种举动。

在不列颠群岛和北大西洋地区的那些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殖民地，还有关于保留和重塑维京人民族文化特色的其他实例。这些内容是以下诸章要讨论的主题。不过，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向东扩张的情况。

东扩

在丹麦和挪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蜂拥西进的同时，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则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在那里，他们接触到的是迥然不同的文化。关于维京人的出现对俄罗斯发展的意义，一直没有定论，具体的观点也随着俄罗斯国内政治以及东西欧关系的变化而摇摆不定。一种意见认为，欧洲区域内的俄罗斯大城镇的建立要归功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即所谓的“诺曼主义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俄罗斯是由斯拉夫族的后裔建立起来的（“反诺曼主义观点”）。至于哪种意见占上风就要看当时是亲西欧还是反西欧的观点更流行了。这些立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860—862年应邀前往俄罗斯中心地区去维持秩序的那些被称为罗斯人的身份问题，即他们究竟是斯拉夫人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

毋庸置疑，来自波罗的海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活跃于俄罗斯各大河航线上，如顿河、第聂伯河、伏尔加河等。他们通过陆路，把船舶和货物从一条河流转运到另一条河流上，这样可以到达里海和黑海，并且最终通达富庶的拜占庭；然而，他们到这里是来交易还是来劫掠呢？瑞典100多块如尼石碑记下了有哪些人命丧东方，包括跟随一个名叫英瓦尔（Ingvar）的首领出征的许多不幸者，但却极少提及他们出征的目的和意图。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地，都发现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器物以及拜占庭的丝织品，还有超过6万枚阿拉伯人的钱币，但是这些东西究竟是战利品、饷银、贡物，还是通过贸易所得呢？

事实上，可能四种来源都有。10世纪的阿拉伯文献中提到，罗斯人在保加尔地区[7]贩卖毛皮和奴隶。旅行家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注意到了他们奇异的服饰和奇特的丧葬习俗，包括拿奴隶女孩作陪葬品。他还提到，罗斯国王有一支由400名勇士组成的个人侍从队伍。拜占庭（今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有一支瓦兰吉亚近卫军，是由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军组成的。860年，维京人对拜占庭发动了一次史上有名的袭击。910—912年，一支由16艘舰船组成的舰队以里海为基地，袭击了阿巴斯昆，杀死了许多穆斯林居民。

那么，考古学证据对于我们理解维京人这些行动的性质以及了解他们的活动范围，究竟有多大帮助呢？斯堪的纳维亚诸族在俄罗斯生

活的最确凿证据是他们的墓葬。迄今已发现26座舟葬墓，其中10座地处早期商港旧拉多加附近的普拉昆。有些墓主社会地位很高，有些墓主是妇女，说明他们是一个定居的群体。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格涅兹多沃，有一个约有3,000个墓冢的大型公墓，人们大约发掘了其中的600座墓葬。这些墓葬展示了丰富多样的丧葬习俗，其中有80％采用火葬，20％采用土葬，有一些还筑有墓室。这里还有11座舟葬墓，其中一些是火葬，这在斯堪的纳维亚是没有的。超过一成的墓葬中有武器陪葬，还有一成多有秤和阿拉伯钱币。随葬品最丰富的是那些有墓室的墓，这些墓葬中不仅有斯堪的纳维亚的珠宝、大锅、宝剑和角制酒器，还有来自拜占庭的舶来品。事实上，在格涅兹多沃的墓葬主人似乎至少有三类：一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主要是10世纪的）；二是斯拉夫人，他们的火葬墓要么是空荡荡的，要么仅有少许随葬物，如小刀、陶器和珠子等，但有一些墓主人是戴着东斯拉夫风格的金属环的女性；三是戴着摩拉维亚首饰的波罗的海居民[8]。

同样在位于斯摩棱斯克附近的特捷尼哥夫，有更多带墓室的墓，很多是男女合葬，男性遗骸周围有斯堪的纳维亚的武器和腰饰，但女性没有佩戴斯堪的纳维亚的胸针。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那些与重要中心地区相关的墓地里，墓葬中有斯堪的纳维亚的器物，或者是有当地生产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物品。总体来说，这些墓葬既不是特别奢华，也没有显得与其他芬兰、波罗的海和斯拉夫习俗的墓葬格格不入。因此，斯堪的纳维亚人似乎只是这个多民族杂居群体当中数量相对较小的一分子，被当作居住集体中的定居者。他们当中有雇佣士兵，也有商人，两者还不好区分。

考古研究结果显示，在900—1200年间，俄罗斯的定居方式大致是一脉相承的。定居点分布在河流和湖泊附近，周边是大片绵延不断的森林，这就是中世纪罗斯的文化景象。尽管在9世纪末到11世纪再到13世纪之间，乡村定居点迅速增多，但是比起大片的荒无人烟之地，已经开发的地区还是很小的。

第一批城镇坐落在河边或位于河道附近。斯堪的纳维亚人东进至旧拉多加后便分为了两路，一路去往伏尔加河，一路去向第聂伯河。

旧拉多加并没有濒临容易遭到突袭的开阔水域，而是位于沿沃尔库霍夫河[9]逆流而上12公里的地方。城镇濒临峡谷，建于高高的河岸上，城区面积约65万平方米，周围的泥土城墙可为该城镇进一步提供防护。根据树木年轮测算，城镇最初是760—840年间在一片未开垦过的土地上建起来的。当时建起了一些大房子，其中有些似乎是作坊间，工匠们在那里加工玻璃、青铜和鹿角。然而，这些用原木搭建、以凹槽和楔子相连接的圆木屋，并不属于斯堪的纳维亚风格，却很像较早时期居住在该地区的芬兰人的房屋。而且，最早的建筑大多数从本地取材，也有一些东西是从斯拉夫人那里买来的，另外还有少量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器物，如早期的椭圆形胸针。梳子是当地产的，看上去是出自那些流动的手艺人之手，这些人也在波罗的海地区揽活。大约在860年，这个定居点被大火焚毁，但很快得以重建，并在9世纪末筑起了石墙以加强防护。这里发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器物，在那之后的比之前的要多，其中有一根刻有如尼文的挪威手杖。在普拉昆附近发现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舟葬墓也属于这一时期。

图8　俄罗斯和东方

鲁里克-哥罗狄什科的一个山寨在9世纪时成为一个行政、贸易和手工业生产中心，交给一个斯堪的纳维亚部族首领的贡赋可能也在此收取。这个山寨后来可能被诺夫哥罗德，即斯堪的纳维亚人所说的霍姆加德尔取代了。根据《尼斯特编年史》〔10〕记载，第一批斯堪的纳维亚人正是在862年定居于此，处于留里克王朝统治下，虽然此前已有斯拉夫人在那里居住了。考古发掘显示，该地有一条蜿蜒的主街，由木料铺成，到1600年前后又用新木板重新铺设过。不过，除了少量

珠宝之外，这里没有太多明显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物品。

在格涅兹多沃，有一处占地4公顷的居住点，9世纪时未设防，在900—925年间建起了沙垣和木墙。到1000年时，这个山寨之内有一片墓地、一个不规则的居住区和手工业加工区。工匠们加工铁和其他金属、制作珠宝饰物以及用来铸造斯堪的纳维亚风格胸针的模子。他们还用三重焊接技术来制造铁刀。斯拉夫人并不懂这门技术。在格涅兹多沃逐渐衰落、其地位被斯摩棱斯克所取代后，这门技术便失传了。和那些早期的斯堪的纳维亚贸易据点不同，格涅兹多沃缺乏规划，似乎也没有自己的外围区。因此，它没有发展成为一座城镇。

而基辅则发展成为了中世纪俄罗斯的中心。这个城镇建于882年，坐落在第聂伯河西岸，正好位于河道的狭窄之处。据拜占廷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七世〔11〕记载，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初夏之时聚集在这里，然后在6月启程前往拜占庭。据说这个城镇由斯堪的纳维亚王子统治，但考古证据却表明那里的居民主要是斯拉夫人。

总之，公开政策〔12〕实施之后的观点认为，是内部（主要是斯拉夫的）因素的增长和外部来自西方（斯堪的纳维亚）的刺激协调作用，共同推动了中世纪俄罗斯的发展。在瑞典人到达这里之前，当地斯拉夫人的经济和社会已经有所发展。维京人刺激和扩大了贸易，但也有其他民族参与其中。和在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他们习取了很多当地习俗，融入了一个活跃的混合族群，既进行贸易，又进行劫掠，也就是从事“侵略贸易”。而这个折中的术语究竟是指集市上的讨价还价，还是指武力勒索，有时还真说不清楚。

注释

〔1〕船库，原为停放小舟的房屋，亦有供人小憩之处。

〔2〕本笃会（Benedictine），天主教一批修会的联合组织。它们遵循圣本笃（7世纪英格兰基督教教士）制定的规章。该词也指本笃会的修士或修女。

〔3〕多雷斯塔，位于弗里西亚群岛，有重要的市场和铸币厂。

〔4〕经过数年的争夺战，843年，虔诚者路易一世的三个儿子签订了《凡尔登条约》，将帝国三分，从而奠定了近代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疆域

的基础。

〔5〕 秃头查理二世，虔诚者路易一世的幼子，帝国三分后成为西法兰克之王。

〔6〕 “丹麦金”（Danegeld），盎格鲁 - 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为向丹麦侵略者进贡而征收的税金，后来亦指盎格鲁 - 诺曼国王征收的赋税。

〔7〕 保加尔地区，位于伏尔加河拐弯处。参见图8 。

〔8〕 指波罗的海东南岸地区的居民，包括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

〔9〕 沃尔库霍夫河，在俄罗斯境内，向北注入拉多加湖。

〔10〕 《尼斯特编年史》，又称《俄罗斯初期编年史》，即《往年纪事》。古罗斯最早的编年史，尼斯特是其编著者之一。

〔11〕 君士坦丁七世，即君士坦丁·波菲洛格尼图斯（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著有《帝国行政论》一书，是关于罗斯人和瓦兰吉亚人的史料来源之一。

〔12〕 公开政策（Glasnost），前苏联采取的让政府更具公开性和开放性以及让信息更为广泛传播的政策和做法，1985年由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起。

第七章

英格兰的外来定居者

当今的英格兰居民普遍认为盎格鲁 - 撒克逊人是他们的祖先而维京人显然是外来者。也许英格兰人对维京人那种不受道德观念束缚、无忧无虑的生存方式暗怀钦羡之心，但除了极少数鲁莽之人自称他们具有维京血统外，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维京人是其祖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与丹麦人基本都来自同一地区，只是比他们早到了约400年，但英国的语言、法律、习俗、统治管理制度，甚至英格兰的乡村都透出一股盎格鲁 - 撒克逊风情，而并非北欧或斯堪的纳维亚风情。正是英格兰的第一位国王阿尔弗雷德，把相互交战的盎格鲁 - 撒克逊诸王国联合了起来，共同抗击维京入侵者。793年时，共有4个盎格鲁 - 撒克逊王国：东英吉利亚、麦西亚、韦塞克斯和诺森伯里亚；到900年时，就只剩韦塞克斯了。

不过，因为阿尔弗雷德的书吏们把这些历史事件记录在其《盎格鲁 - 撒克逊编年史》中，而维京人并未记载自己的历史，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无疑是片面的。如今，历史学家们不大愿意接受韦塞克斯人的一面之词了。虽然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的规模尚有争议，但其积极的影响已得到普遍承认。考古学家们强调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英国的城市化、工业发展以及乡村定居方式的改变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人们能够从那些新型手工艺品和艺术风格中，了解到一种糅合了盎格鲁和斯堪的纳维亚特征的文化。现今的学童要学习和认识种族的多样化，在历史课上要了解多次出现的劫掠潮和移民潮，每一次浪潮都对民族个性特征的形成有所贡献。随着英格兰和丹麦在政治上的再次联合，这也是自克努特以来的第一次政治联合，维京人的形象也大有改观。

有关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的定居规模的学术讨论已发展成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一方面，有些学者把英格兰的历史看作是一部遭到一波接一波外来入侵的历史；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强调英格兰的历史是一部其本身不断演进和变化的历史。至于外来移民规模要取决于你赞同下面哪一派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移民仅仅是一小撮掠占土地的上层人士，有些则认为有大批移民随劫掠者蜂拥而入。问题部分还

在于不同类别的证据都未能连贯地反映实际情况，因此每个学派的观点都各不相同。《盎格鲁 - 撒克逊编年史》中记录了9世纪70年代在丹麦人和英格兰人之间有三次土地分割——分别在诺森伯里亚、麦西亚和东英吉利亚。根据886年签署的《韦德莫尔条约》，阿尔弗雷德与丹麦人之间划定了一条界线，《条约》写道："沿泰晤士河上溯，之后再沿利河上溯，直至利河之源，再沿直线到达贝德福德，然后沿乌斯河到华特灵大道"。这条线以北和以东的地区，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丹麦法实施区"，那里是丹麦的法律和习俗盛行的地区。

地名研究者们发现，斯堪的纳维亚式地名的分布与"丹麦法实施区"的区域范围具有某种一致性。以约克郡为例，该郡有210个地名以*-by*（古诺尔斯语中指"村落"）结尾；林肯郡有220个，大多数是与古诺尔斯语中的人名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值得强调说明的是这些地名的分布只表明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影响，并不能说明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的分布情况。古英语与古诺尔斯语这两种语言很相似，大多数交易中人们都能明白彼此所表达的意思，不需要广泛的双语化或专业的译员。尽管这样，但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在"丹麦法实施区"，一定分别存在着说这两种语言的社区团体。及至10—11世纪，两种文化广泛地融合起来，两种语言也相互借用。地名证据出现得较晚，大多数地名首次见于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1]，而这时盎格鲁 - 撒克逊人与操古诺尔斯语的人们之间的文化融合已经有长达200年的时间了。

图9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的活动范围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是很难考究的。在英格兰北部高地，像里伯尔海德那些孤立的农庄，经常被认为是殖民者的家园。再往南，出现了像戈尔索遗址中所发现的拱式厅堂，这可能是新斯堪的纳维亚地主的住宅——虽然该建筑的外形和结构并非是什么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在沃勒姆 - 珀西，人们在一个中世纪庄园遗址中发现有波尔式皮带配饰——可能是在挪威制造的。这个

村庄最初在10世纪的时候，可能是被规整地划分成了若干区域。10世纪时，乡村聚合的过程一直在整个英格兰低地重复进行，这也许是持续进行的土地私有化进程的一部分。以前归国王或者教会所有的大地产，被分割成较小的地产，由地主们分别占有。无论在“丹麦法实施区”还是在韦塞克斯，同样的情况都在发生；它并非是维京人劫掠的一个直接结果，尽管对修道院的侵扰以及随之而来的土地归属的混乱明显加速了这一进程。

金属探测人员的发现也改变了人们对移民定居模式的认识。维京时代的英格兰居民开始喜欢上了批量生产的铜合金服装饰物。虽然有些饰物依然保留了盎格鲁 - 撒克逊造型，如圆形胸针，但它们常常被装饰成斯堪的纳维亚风格，因此代表着一种混合文化，可以称之为盎格鲁 - 斯堪的纳维亚文化。所发现的器物中还有一些是全新的类型，如铜合金制成的小铃铛，可作护身符或者服装饰物。虽然它们在斯堪的纳维亚本地并不出名，却发现于相隔甚远的冰岛、苏格兰和约克郡等地的拓居地遗址中，也许是代表着一种在爱尔兰海地区发展流行起来的时尚的传播。在英格兰东部，也发现了大量按照盎格鲁 -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喜好生产的金属器物。尽管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基因，也只能有限地改变我们的语言，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珠宝饰物。这些发现物表明，盎格鲁 - 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在10世纪的英格兰已被广泛接受。

在东约克郡的科坦，我发掘了一个最初为金属探测人员所发现的定居点。在8—9世纪，这里曾有一处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农庄，可能是附属于德里菲尔德王家地产的一处偏远农庄。这里的居民曾是一个贸易网络的一分子。此地还发掘出了大量诺森伯里亚的小面额铜合金硬币，或称为斯狄卡斯（*stycas*）。在9世纪末或10世纪初，这个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农场被遗弃，取而代之的是一处新规划的农场，里面有矩形牧场，还有一个相当气派的大门入口。从新主人的服饰判断，他们很可能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殖民者，由于诺森伯里亚的铸币厂已经停止生产，他们无法再用钱币来做买卖，但这并未阻止他们向西与约克郡以及向南越过亨伯河与林肯郡用称量金银块的方式来进

行交易。他们在新农场只居住了几代，然后就搬到了另一个地方，这里后来成了一个有所规划的中世纪村庄。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也给该地区的城镇带来了重大变化，并且客观上推动了自罗马人统治不列颠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复兴进程。在麦西亚和韦塞克斯两地，人们奉国王之命建立起城镇防御系统（即*burhs*），以对抗维京人的威胁。这些城镇既是民政管理中心，也是教会管理中心，城里建有铸币厂。在某些地方，如切斯特、格洛斯特、埃克塞特和温切斯特，罗马人的旧址被重新设防；在其他一些地方，则利用天险加以防御。除此以外，在克里克莱德、沃灵福德和牛津等地，新的防御工事是在罗马城防的基础上建成的，许多这样的城镇成为了重要的市场。在切斯特，一个爱尔兰 - 挪威人商人群体在罗马人的城堡和迪河之间定居下来。

尽管维京人的袭掠活动起初扰乱了一些地方如汉威克（南安普敦）、伦敦威克（伦敦）和约弗威克（约克）[2] 通过城镇市场组织起来的贸易，但这些城镇在10世纪时都曾繁荣一时。大多数贸易据点都位于罗马要塞的围墙旁边或内部，其后这些城镇都得到快速发展。其中，约克是最有名的，在铜门（参见下一页的图10）有一条建于10世纪早期的大街，还有四幢为众多商人、手工业者和工匠所用的公寓。在50年之内，城镇空间的短缺——当时英格兰许多城镇都面临这一问题——促使该地搭建起许多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地下室用于存放原料和成品，楼上用于居住、加工制作和贸易。这个城市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和制造业中心。到900年时，约克的新维京统治者已在铸造他们自己的钱币了。这样做部分是出于宣传目的，以表明维京人的王国和其他西方基督教国家一样值得尊重，而钱币铸造的数量也反映了交易的高度发展。到1000年时，约克的人口可能已达1.5万人，依靠内地供应食物，如谷物、动物和海产品等。据《圣渥斯沃尔德传》记载，该城市“因各地商人带来的珍宝而富裕起来，尤其是那些丹麦商人”。

在英格兰中东部地区，丹麦人自己建立了一系列的市镇据点，即所谓“自治五市镇”：德比、莱斯特、林肯、诺丁汉和斯坦福。考古发

掘并没有发现这些城镇有什么地方具有鲜明的斯堪的纳维亚特色，它们可能是按照英格兰的城镇模式建立的。某些新的工业在它们的影响下发展起来，比如斯坦福釉陶的生产。它们可能是斯堪的纳维亚贸易者移居的结果。但是，为了满足新城镇市场的需要，整个英格兰农村的“茅舍”手工业，逐步被以城镇为基础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所取代。

尽管维京时代的英格兰兴旺繁荣，但是维京人本身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在英格兰，明显具有斯堪的纳维亚特点的坟墓相对而言很少。这种情况使人们得出一个结论，　即与那些大西洋边缘的居民不同，这里的大多数定居者没有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下葬。例外的地方大都集中在西北部和坎布里亚。在这些地区，斯堪的纳维亚特征似乎保留得更长久一些，因为大多数定居者都居住在分散的农庄里，死后就地埋葬。一些单独的坟冢常以武器作为随葬品，它们一般都在19世纪被发掘，如在阿斯佩特里亚、弗罗斯特的赫斯科特以及克劳夫敦霍尔等地的遗址中所发掘的。他们的丧葬习俗与人们在马恩岛（参见此处　）上所发现的类似。唯一的一处公墓在2004年被一位金属探测员发现，它位于一个小山坡上，俯视卡莱尔附近一个名叫坎惠斯敦的村庄。墓地中仅有6座墓，四座男性的和两座女性的，随葬品有武器和珠宝。其中一座男子的坟墓上耸立着一个坟丘。

在英格兰的低地区和东部一带，这样的坟墓极其罕见，它似乎表明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很少反映在丧葬仪式上。在这些地区，已建成的定居点中可能经常会有新来者加入，他们死后可能被埋葬在已有的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墓地中。近期在唐克斯特附近的阿迪克勒斯特里特发掘出了另一处墓葬，展示了不同的情形。这位妇女下葬时戴着一对不相称的椭圆形胸针（其年代为9世纪晚期），墓中还有一把铁刀的残片和钥匙或类似弹簧锁的东西。有一只铜合金小碗放置在她的脚边，可能是来自凯尔特西部的产品。对她的牙齿进行同位素分析表明，她来自挪威的特隆赫姆地区，也可能来自苏格兰东北部。在附近没有发现定居点的痕迹，也没发现其他坟墓，所以她肯定是被单独埋在这里的。

图10　在约克铜门的挖掘现场

血斧王埃里克（**Erik Bloodaxe**，卒于**954**年）

血斧王埃里克，维京人的首领及诺森伯里亚国王，是金发王哈拉尔一世之子，西福尔之王（872？—约930年）。有关其生平的可靠资料很少，我们只知道954年他被逐出约克，可能在斯坦莫尔地区、在罗马人所开辟的通往坎布里亚的道路上被杀。他的名声源于其在萨迦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于10世纪不列颠群岛上的一位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国王来说的确不同寻常。据说，埃里克从12岁就开始了他的海盗生涯，在一次远征白海的途中遇到了他的妻子贡希尔（Gunnhild）。他父亲死后，他杀死了他的几个兄弟和对手，当上了挪威国王，直到后来被他的弟弟哈康（Hákon）废黜。埃里克随后到了奥克尼，然后前往诺森伯里亚，最后居住在约克直至被驱逐。埃里克在《埃吉尔萨迦》中还作为精神变态者和诗人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Egil Skallagrímsson）的敌人出现过。尽管因为埃吉尔的一首赞美诗，埃里克饶了他一命，但鉴于他那非同寻常的抢掠与杀戮生涯，人们通常给予埃里克负面的评价。这也体现了现代人对维京世界的看法。

其他的例外情形来自与那支于873—874年曾在雷普顿越冬的维京雄师有关的两处宏大墓地。在占领了位于雷普顿的麦西亚王家神殿之后，维京雄师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巨大的D形营盘，利用特朗河来保护D形营盘平坦的一面，把盎格鲁 - 撒克逊教堂的塔楼用作门楼。在盎格鲁 - 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权力可以通过与神圣的事物建立联系而获得，有几座放置了陪葬品的坟墓是紧挨着殉难的圣威格斯坦（St Wigstan）的圣祠安葬的，其中包括一名死状惨不忍睹的武士之墓。在这座编号为511的坟墓中，死者是被长剑刺入大腿内侧并被利器刺穿眼窝而丧命的；从他胸腔内部所受的创伤可推知其内脏可能被挖掉了。他的随葬品包括一把断剑和放在带羊毛衬里的剑鞘里的一把小刀和一把钥匙。他的脖子上戴着银制的托尔神的锤形护身符，一根寒鸦腿骨和一根野猪的獠牙安放在他的两腿之间，它们也许分别是奥丁和

弗雷二神的象征。在营盘之外靠西的一个地方，维京雄师还亵渎了第二座陵墓，他们将这座有着两间墓室的陵墓夷为平地，在其中一间墓室的中央埋下了一位很重要的武士，并把至少250具遗骸改葬在他的周围。4名年轻男子可能作为殉葬者，被埋在这个墓冢的毗邻。在这个遗骸堆里，男性占80%，有人认为他们是维京武士；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他们可能是遇袭身亡或坟墓遭到盗掘的盎格鲁 - 撒克逊修士。

我曾在希思伍德发掘过一处战争墓地，也有可能是维京雄师阵亡士兵的墓地。它位于希思伍德东南方向4公里处的一个海角上，从这里可俯视雷普顿和朗特河冲积平原。在那一片坟墓中，有59座墓冢现在是可辨的。其中一些墓冢是建在死者火葬柴堆之上的。搜遍所有的火葬灰堆，仅仅找到一些焚烧过的刀剑和盾牌的碎片，还有作为祭牲的马、狗的骨灰和一些残肉。另一些墓冢乍看上去空空荡荡的，但在其中一座墓中发现了象征性祭品：一些焚烧过的骨头的碎片，还有一个环状胸针。这些墓冢也许是那些在异地战死并被火化的兵士们的衣冠冢，所以只有他们的一小包遗骨和个人用品被带回希思伍德墓地埋葬了。在不列颠群岛，希思伍德的火葬墓是极其独特的，不由使人们想起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皈依基督教之前的葬礼仪式；似乎是某些军人感到突出他们的维京特色是十分重要的，而其他人则更愿意被安葬在麦西亚圣地附近。虽然希思伍德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是雷普顿的墓地直到10世纪仍在使用，斯堪的纳维亚特色的坟墓继续埋葬于此，这里还竖起了一个拱形墓碑（参见此处 图）。

无骨人伊瓦尔（Ivarr the Boneless，约卒于873年）

伊瓦尔是865年入侵英格兰的维京雄师的首领之一。据说，他是845年率军洗劫巴黎的那位朗纳尔·洛德布罗克（Ragnar Lodbrok）（绰号为“皮革短裤”）的儿子。在后来的萨迦文学中，他被描述成一个缺骨之人。这是朗纳尔被第二位妻子诅咒的结果，她警告他要过三个夜晚他们才可完婚，但是朗纳尔迫不及

待要马上完婚，这样就有了伊瓦尔。有些人认为“无骨”是“无子女”的误译，但是传奇故事中的确讲到了伊瓦尔不能行走，只能让别人用盾牌抬着走。这暗示他患有“脆骨症”。

867年，伊瓦尔在约克击败了诺森伯里亚人，他们的国王奥斯伯特（Osbert）在交战中被杀；而伊瓦尔的对手艾尔（Ælla）则按照一种称为“血鹰”的祭祀仪式被处死。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述：“他们把血鹰刻在艾尔的背上，然后从他的脊骨处切断全部肋骨，再猛力扯出他的肺。”不过，这种说法并不被接受，常被当成后来的民间传说或是一种误译。

873年，伊瓦尔死于都柏林。据传说，他的遗体被运回英格兰。马丁·比德尔（Martin Biddle）和伯斯·克约拜 - 比德尔（Birthe Kjølbye-Biddle）都认为伊瓦尔就是那名被葬在雷普顿陵墓中心的勇士，但很多人怀疑此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9世纪的坟墓的确很少，及至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移居者的后裔可能已放弃了在坟墓中放置随葬品的做法，转而改用独特的石制纪念碑来标识他们的坟墓。特别是在英格兰北部和东部，他们借用盎格鲁 - 撒克逊人和爱尔兰人在墓地上竖立石制十字架的风俗，并将其转换，变成了乡村墓地创建者坟墓前竖立的个人纪念碑。例如，在北约克郡的米德尔顿有一组武士十字架墓碑，其中一个十字架正面刻的是一位全副武装的武士，背面是一只龙形圣兽；还有一个十字架上展示的是一个狩猎场面。

所谓的拱形墓碑所反映的是另一种新创的纪念碑。这些低矮的墓碑是拱式的，宛如拱式的会堂；有些墓碑的两端有一对圣兽把守，有时被认为是一对戴着口套的熊。他们的灵感可能来源于早期在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坟墓前横放着的石制墓碑，比如在约克的明斯特所发现的石制墓碑，其中就杂糅了爱尔兰神殿的要素。尽管在远至苏格兰北部和英格兰西南部的地方也发现过这样的坟墓，但它们集中分布在北约克郡，在约克和都柏林这些维京国王管控的领地范围内。

十字架和拱形墓碑是在1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这也许反映出爱尔兰 - 挪威移居者的后裔被从都柏林驱逐之后，从爱尔兰来到了这里。对他们来说，保持维京人的民族文化特色是十分重要的。

新的盎格鲁 - 斯堪的纳维亚领主们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许多雕塑品所表现的都是基督教和皈依基督教之前的主题，比如在坎布里亚的格斯福斯发现的十字架，其正面刻的是一幅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图像，画面中的众人身着斯堪的纳维亚服饰，反面则是一幅世界末日的图景。他们也是10世纪和11世纪教堂大量兴建的原因。在盎格鲁 - 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有一种大教堂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小型的修道院为大型地产所有者服务。在斯堪的纳维亚人来此定居期间，这种体系彻底瓦解，新的土地拥有者在自己的地产上建起了私人小教堂，这些教堂当中有许多都发展成为向当地居民开放的教区教堂。在沃勒姆-珀西，有一些8、9世纪的雕刻，也许与较早时期的大教堂有关，但到了10世纪，人们在新址上兴建了一座小型的木结构教堂。11世纪时，这座教堂被扩建成拥有单独的中殿和圣坛的石结构教堂。此教堂成为了早期庄园主下葬的首选之地，一些坟墓前还摆放了石板作为标志；许多早期葬于教堂周围的坟墓经过碳定年法测定为10世纪的坟墓。在科克达尔的盎格鲁 - 撒克逊大教堂遗址中出土的日晷上，刻写着一段古英语铭文，对盎格鲁 -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私有化进程进行了生动描述。它讲述了加玛尔（Gamal）的儿子奥姆（Orm）——都是古诺尔斯语中的名字——怎样买下了那座即将垮塌的大教堂，并于1055—1065年间，即斯坦福桥战役发生前的10年间，在原址建起了一座新教堂。

图11　北约克郡的米德尔顿武士

综上所述，在英格兰，现有证据表明，现在至少200年间，不同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诸民族之间发生了一连串复杂的同化，并且造就了多种混血身份。以下诸章将探讨不列颠群岛其他地区的情况，在那些地区，当地社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还没有获得如此程度的发展。

注释

〔1〕 《末日审判书》，亦称《土地清丈册》或《最终税册》，是英王威廉一世（1066—1087在位）下令进行的对全国土地调查情况的汇编。

〔2〕 括号中是三个古英语地名相应的现代称呼。

第八章

爱尔兰海周边地区的劫掠者和商人

同时代的文献史料，很少提及爱尔兰海周边区域。但是，这一带对于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劫掠者和移居者来说，却颇具战略重要性。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坎布里亚，本章我们将集中考察斯堪的纳维亚人曾在爱尔兰、威尔士和马恩岛定居和生活过的证据。在下一章我们将考察赫布里底群岛，它构成了这个文化带的北部边际。在苏格兰西南部以及索尔韦湾附近，也有斯堪的纳维亚人曾在此活动的证据。9世纪30年代，在惠特霍恩，有一座大型修道院（鲜见于文献记载）遭到焚毁并被废弃。后来，到9世纪时，此地被一个与斯堪的纳维亚人有关的群体占领。11世纪时，这里成为了一个繁荣的贸易据点，出现了一些常见于都柏林地区的方形木屋建筑。自铁器时代起，这些地区因为便利的海上交通而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的人们拥有爱尔兰 - 挪威人的混血身份，这是当地凯尔特人和后来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相互杂居的结果。

爱尔兰

到8世纪晚期，爱尔兰已经成为一个艺术、文学和学术中心。尽管没有统一的王权，爱尔兰的上层人士却逐渐形成了爱尔兰自己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基于语言、文化和宗教之上，并且通过宗族家谱和起源神话加以界定和印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新来的维京人则被视为“噶依尔”，即外乡人。尽管人们认为维京人在建造爱尔兰主要城镇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但他们依然被视为外来者，而爱尔兰人追根溯源，认为自己是凯尔特人的后代。事实上，大量证据表明，跟在英格兰的情况一样，一种混合文化在爱尔兰发展起来。尽管外来移民中有许多人都拥有挪威人的血统，但他们不大可能都是直接从斯堪的纳维亚迁移过来的，同时他们也部分地接受了凯尔特人的文化，因此他们常常被称作爱尔兰 - 挪威人。

劫掠修道院的似乎不只是维京人。在基督教时代早期 的爱尔兰，

劫掠活动时有发生。在795年挪威人首次洗劫雷什鲁（可能是安特里姆郡的拉斯林岛）之前，有稽可查的爱尔兰劫掠者所进行的袭掠活动至少有30次。直到10世纪初期，挪威人和爱尔兰人还总是能够清楚区分开来的；之后，这种区别逐渐模糊起来。那些袭掠活动与在英格兰所发生的袭掠情形大致相同。自9世纪30年代起，劫掠活动由针对沿海地带修道院的定点袭击，转为依靠更庞大的舰队向腹地发起全面而系统的征伐。他们还修筑了加固设防的军营，即所谓朗弗茨营寨（*Longphorts*）。

841年，挪威人在利菲河的一个交汇处构筑了一个要塞，被称为都柏林（*Dubh-Linn*），意即“黑水潭”。在奥拉夫（Olaf the White）的统治下，都柏林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小王国；直至902年挪威人被爱尔兰联军驱逐，“遗弃了大量的舰船，伤残甚重的他们，狼狈逃窜”，可能逃往英格兰西北部去了。可是好景不长，在短暂的和平之后，新的袭掠活动卷土重来。917年，挪威人在都柏林重建据点；到10世纪中叶，都柏林控制了大片的内陆腹地。据文献史料记载，都柏林成为了当时的奴隶贸易中心。12世纪60年代，诺曼人征服了爱尔兰，挪威人的诸城镇便成为英格兰国王的财产。到12世纪时，爱尔兰当时所有的建筑都归功于挪威人，因为据信爱尔兰人根本没有能力修建它们。威尔士教士兼作家吉拉尔杜斯·康布伦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1146—1223）写道：“爱尔兰人不懂得构筑城堡的重要性，他们只是以树林作据点，以沼泽为壕沟。”

19世纪时，维京人最初构筑的都柏林被重新发掘。在都柏林城内以及附近地带，至少发现了4处公墓和大量单个的坟墓，总计大约有70—80个男性墓葬以及约10个女性墓葬。所有这些墓葬的时间，据估计都在841年到902年这60年间。最集中的墓葬区是1841年发现的，位于吉尔梅因汉监狱附近的铁路路堑之下；第二大墓葬区在沿山脊再往西800米处的岛桥。在这两处地方，后下葬的坟墓插在了原有的无陪葬品的基督教石棺坟墓之间。所有的墓葬均为土葬，在这里出土了约40把剑、20支矛和盾牌，还从妇女服饰上发现了几枚椭圆形胸针。某些随葬物品，包括秤砣和秤杆，表明了当时商贸活动的存在；

其他随葬品还有剪刀、镰刀、火钳、镊子、纺锤以及针线盒。

由于城市改造的原因，随后的考古发掘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都柏林，尤其注重考察该城市的起源。10世纪时，这个城镇筑起了土围墙；到11世纪，在这条围墙之外又筑起了一道更厚重的土围墙；1961—1981年，研究者们在其主街、酒馆街和伍德奎因等地进行了大范围的发掘。发掘结果表明，从更早期开始居住在这里的人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爱尔兰 - 挪威人。用木桩和枝条搭建起来的住房和作坊，在其他地方未发现直接与其相似的建筑，它们可能属于爱尔兰风格，或者是10世纪重建时受到英格兰风格的影响。这些房屋内部用木桩支撑着屋顶，墙壁是用枝条和泥巴建成的，墙角是圆形的，每一面山墙都开有一个房门。屋内有一中央壁炉，靠墙放有窄板凳，有时在两边会有一些小室。

在菲沙堡街进行的大范围考古发掘表明，先后有不同的人在那里定居，9世纪晚期盎格鲁 - 撒克逊风格的建筑后来被爱尔兰 - 挪威风格的建筑所取代。这些建筑都建在这条街沿线的14个相邻规划区里，时间约从920年起直到11世纪。由于在这些建筑物周围没有发现马厩和牛棚，这里所发现的牲畜骨头说明这些肉类肯定是从城镇外围其他地方运来的，尽管芬巴·麦考密克（Finbar McCormick）根据所发现的大量猪骨推测居民房屋的后院是用于养猪的，且可能反映了食物供应并不太稳定。在盎格鲁 - 斯堪的纳维亚王国控制着的约克广大地区，养猪的比例要低得多，它与海泽比的情况类似，可能同样表明单凭内地提供食物是不可靠的。

2004年，在爱尔兰东南部伍兹敦地区的河流旁，发现了另一个朗弗茨营寨定居点：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带壕沟的围场，9世纪时被重新规划。这个定居点遗址中，有木结构房屋，还有许多船只残迹和造船用的物品，其中包括大量的铁铆钉。这里发现的铅秤砣超过170个，还有金属加工的痕迹。在围场外的一座坟墓里，发掘出了剑、斧、矛、盾等兵器以及磨刀石和环形胸针，这也表明9世纪中期爱尔兰 - 挪威人开始活跃于此，他们在此居住的时间大约到1050年终止。发掘显示，之后在距此约2公里远的沃特福德，人们沿皮滕街兴建了14个

城镇小区。在劳斯郡的安那加桑，可能也有一个类似的定居点。该定居点为河堤和壕沟所环绕，呈不规则圆形。据编年史记载，这个定居点建于公元841年。

爱尔兰－挪威人在这些半城镇中心区[1]以外活动的证据很少，而且爱尔兰乡村似乎没有爱尔兰－挪威人定居的证据，80%已知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墓葬，都位于都柏林周围5公里范围以内。尽管环形城堡和湖上住宅中发现了带有斯堪的纳维亚特色的物品，但却不能确认它们以前就是挪威人的住所。唯一可以确定的一个爱尔兰－挪威人的乡村遗址是一个海港，是他们在10到12世纪初的居所。比金岛位于凯里郡以西海岸附近，与教堂岛上的早期修道院所在地相邻。比金岛上的考古发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该岛被认为是中世纪早期挪威人的一个定居点，当时他们正处于文化融合的第二阶段。然而，新的发掘和研究对于是否真的有两个阶段提出了质疑，并且还确认它是一个具有爱尔兰－挪威特征的遗址，因为这里有如尼石刻，还有一些爱尔兰－挪威的手工艺品。这个定居点有8栋房屋，还有一些牲畜棚。其中一栋有一个半地下建筑，被认为是爱尔兰本土的建筑传统和地窖式建筑特色相互融合的表现，而这种地窖式建筑就是从斯堪的纳维亚的城镇传入的。

其他证据也表明，爱尔兰－挪威人的定居点只分布在爱尔兰南部和东部，在那些半城镇中心区，不过，他们与那些控制着乡村腹地的当地国王结成了联盟。在爱尔兰，发现了许多处爱尔兰－挪威人的银窖，包括53处没有银币但有臂圈和银锭的银窖、16处存有钱币和金属制品的银窖以及41处贮藏钱币的银窖，其中以东英吉利亚和诺森伯里亚铸造的盎格鲁－撒克逊钱币和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钱币为主，也有阿拉伯的钱币。约翰·希恩（John Sheehan）已经确认，那些发现有钱币的银窖分布在爱尔兰东部和南部，而那些没有钱币的银窖，则遍布整个爱尔兰，位于非爱尔兰－挪威人控制的区域；许多银窖发现于环形城堡中，那是当地酋长的据点。极少数银窖中发现有一些零碎银块和硬币，表明那时候曾有贸易活动和传统经济活动出现。但是，大多数银窖显然与缴纳贡金相关，并非与贸易有关。爱尔兰－挪威人

与当地的统治者结成军事同盟，互换礼物也许就是结盟过程的一部分。特别是那些臂圈，可能就是来自都柏林的贡金，他们试图收买爱尔兰诸王，以达到与其结盟的目的。

威尔士

威尔士的居民一般只注意到他们过去是凯尔特人，而对维京人则几乎没有兴趣。9世纪时，威尔士由数个独立的王国组成，它们是部分地通过基督教联合起来的，这些本土的统治阶层通常被视为威尔士人的祖先。除了沿海地区以外，古代挪威人几乎没有对威尔士产生什么影响，受到斯堪的纳维亚影响的地名也较少。考古发掘的证据，只有少量零星的手工艺品，如在亨加斯特尔（在斯旺西区）发现的玻璃珠子和在凯尔文特（在蒙茅斯郡）发现的一枚环形饰针。除了少量的墓葬，几乎没有定居点方面的证据。在这些墓葬中，有一座是1932年在塔拉克雷（位于弗林特郡）的一间新房子的污水池中发掘出来的，这座石板坟墓内有一具遗骸，随葬品是一个铁矛头；1945年，在安格尔西郡的本利奇海滩，又发现一座单人墓，里面有一些棺材铁钉和一把鹿角梳子。唯一的拱式墓碑是在兰德维-阿伯 - 阿斯（在锡尔迪吉恩）发现的，还有在彭芒（在安格尔西郡）和迈恩-阿奎凡（在弗林特郡）所发现的十字架，这些都展示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影响。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除了个别聚居地之外，维京人也许对于威尔士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然而，尽管文字史料匮乏，并且只有少数几则史料记载了劫掠活动的情形，但维京人和威尔士人之间依然可能存在着广泛的接触，而且他们也建立了一些定居点。第一次见于记载的劫掠活动发生在852年，波伊斯郡的辛根（Cyngen）为“异教徒”所杀，这些异教徒可能就是指维京人。大约从950年起，随着圭内斯郡和德胡巴斯之王海韦尔·德达（Hywel Dda）的去世，出现过一系列集中的劫掠活动，这一时期刚巧与954年血斧王埃里克被逐出约克的时间吻合。随后，维京人的军队侵袭沿海的低地区，袭掠彭芒、凯尔-盖

比（在霍利海德附近）、陶因（在圭内斯郡）和圣戴维等宗教中心（在967—1091年间袭掠达11次之多）。987年，威尔士南部遭到一支军队的袭掠，侵袭一直持续到1002年，直到当地人同意缴纳白银他们才罢休。在威尔士发现了11个银窖，全都分布在沿海地区。19世纪晚期，在安格尔西郡的红沃夫湾的一个银窖中发掘出了5个银臂圈。近期马克·雷德克纳普（Mark Redknap）在兰伯德罗克附近发掘了一个遗址，它提供了关于维京人活动状况的重要证据。

红沃夫海湾是一个天然大港，兰伯德罗克的定居点修建在一条通往码头的天然道路旁，距海大约1公里，毗邻一处天然的甘泉。7—8世纪，当地人开始把这里作为定居点，在外围挖掘壕沟、筑起堤岸，里面建起了许多木结构建筑，其中包括属于当地风格的环形圆屋和方形门厅。9世纪，对其外围又进行了加固，以大块石料建起的围墙厚重宽大，人们可以在上面行走，也暗示了安全防御的升级。在居住区里面，至少有6间9世纪晚期到10世纪初时的方形门厅，其中3间有门槛横梁，两间有铺过石地板的痕迹。这些建筑物的形式以及靠墙的长凳都显示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影响。这些房屋之间有宽约3米的石铺路相连，经由石阶可以到达一个圆形的泉水池。

从这个定居点出土了大量家畜骨头以及一些磨刀石，这表明该定居点有其农业基础，但兰伯德罗克也与外界有着广泛的贸易联系。这里出土过来自坎特伯雷和诺森伯里亚的英格兰硬币、卡洛林钱币以及一枚阿拉伯钱币迪拉姆〔2〕的残片；另有19个铅秤砣和9块碎银残片。11枚10世纪的环形饰针、4个装饰用的小青铜铃和波尔式的腰带扣〔3〕的发现，都显示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影响；另外发现的一块末端有铜箍、呈头盔状的大磨刀石表明了主人的武士身份。这里还有炼铁的地方，人们发掘出了1,300颗铁钉，包括用于修理舰船的铆钉和50多块刀片。此外，这里还曾铸造铜合金、银、铅等非铁金属，生产鹿角和皮革制品。在定居点的围墙外，有5具尸体被随意抛弃在壕沟里。其中一个男子压在一个小孩的上面，他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左眼遭到过利器的伤害。另外一个成年人脸朝下，双手被绑在前面。他们一定是劫掠活动的受害者。由于兰伯德罗克是一个早期王候领地或

庄园的中心，且在9—10世纪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集中地，因此这些尸骸很容易被视为维京人袭击并且可能占领过此地的证据。

马恩岛

马恩岛第一次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实体，是和西部群岛一起出现的，当时正处于其首位挪威国王戈德雷德·克罗文（Godred Crovan，1079—1095年在位）统治之下，随后又经历了几位些继任的挪威国王的统治，直到1266年，它被挪威割让给苏格兰的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痕迹遍及马恩岛的大部分地区，即使现在的马恩岛民也对自己的维京传统引以为豪。马恩岛民的议会——丁瓦尔德（the Tynwald）就源于挪威人的公众露天集会，至今人们仍在一处称作圣约翰的丁瓦尔德山岗（Tynwald Hill）的地方举行每年一度的集会，公布前一年已通过的法律。许多人认为，这里基本的区划单位（*Treen*，每个单位中都有个小教堂*Keeil*）来自挪威语，但也有人推测它们可能是来自挪威语之前的斯堪的纳维亚语。虽然有人宣称斯堪的纳维亚因素的影响仅限于统治阶层和大土地所有者，但一直有人坚持认为，与大量保留下来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名相对应的必定是相当数量的挪威人定居点，马恩岛民甚至在某一时期内全都说挪威语，直到1300年前后盖尔语[4]被重新引入，情况才有所改变。

从考古学上说，要发掘出那些可能已深埋于现代农场下的挪威人定居点的遗迹，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他们后来重新占据的海角如克隆克-尼-麦尔留和克洛斯-尼-乔拉，以及高地牧场中的多利什-卡伸和布拉艾德以外，考古发掘的遗址寥寥无几。鉴于挪威人建筑风格有着一脉相承的持续性，这些遗址的年代都难以确定。

关于墓葬的记录可提供更多的信息，在这样一个小岛上，墓葬数量超过25个，算是比较多的了。许多墓葬位于低矮的土丘下，俯视大海，似乎表明存在着对土地所有权的竞争，借助地形来表明对农场的

所有权是很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考古学家格哈特·伯苏（Gerhard Bersu）作为一名敌方的侨民被拘留在马恩岛，获准在许多遗址地进行发掘，其中包括巴拉杜尔。在那里他发掘出一座舟葬墓，此墓重叠在基督教的一个公墓之上，搅乱了几个邻近的墓葬。该船是一只小划艇，墓主人是一名男性。随葬的物品有骑具和一些服饰物品，包括一个卡洛林王朝时期的银皮带扣和一枚爱尔兰 - 挪威人的环形胸针。墓冢边还竖起了一根结实的木桩，上面覆盖着一层动物骨灰，它们是作为祭牲被焚化的。

格哈特·伯苏在西北海岸的巴拉狄尔也发掘出一座墓葬。墓室的底部安放着一名青年男子的棺材。他的随葬品中有一把断成三段的剑，放在剑鞘里，外面裹着他的外套。墓穴里还有一面残缺不全的盾牌和两支长矛。墓葬的上面也堆起了坟冢，里面也有火化过的祭牲的骨灰；一同下葬的还有一名年轻的女子，她是被利剑砍掉脑袋而死去的。墓冢之上也安插了一根大木桩。

马恩岛上的这些墓葬以及附近的其他墓葬，属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它们不像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坟墓，但却成为了维京武士墓的典型代表，比如年轻男子死后下葬时，会携带成为瓦尔哈拉英烈祠中的一员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武器、坐骑、猎狗，甚至他们的奴隶女仆。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面对最先来此的殖民者，强调和宣扬他们的维京人身份，对于确立他们的角色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似乎是很有必要的。

相比之下，在圣帕特里克岛的皮尔所发掘的一处早期公墓里，超过300个石棺墓葬中只有7个有一些随葬品，并且大都是服饰品。其中只有一位所谓“异教徒女士”的随葬物品特别丰富，有项链、梳子、小刀、剪刀、编织袋和烧烤叉或女巫权杖。尽管如此，她并没有佩戴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服饰，人们由此推测她是一位本地的凯尔特女子，嫁给了外来的移居者。皮尔公墓似乎代表了另外一种同化策略；几代人以后，爱尔兰 - 马恩岛民中的上层分子就被安葬在教堂的墓地里，并竖起石头十字架。跟在英格兰一样，当挪威人到来之时，当地已经开办了众多石雕艺术学校，他们皈依基督教后，在930—1020年间制

造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十字架。这些十字架往往杂糅了基督教的元素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神话元素。在科尔克 - 安德烈亚斯教堂里，有一个圆锥形的头盔，上面是西古尔格德（Sigurd）正在火焰上烧烤三片龙心肉。他的嘴里含着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正在品尝龙血，这是对基督教圣餐礼的一个粗俗的比喻。第二个十字架一面展示的是奥丁神，还有他的长矛和渡鸦，他的脚踩在狼形怪物芬里厄（Fenrir）的下颚上；另一面则是一个人手捧一本书和十字架的基督教故事场。

许多十字架上都刻写有如尼铭文。其内容大都是纪念性的文字，铭文按照同一模式撰写："N竖起这个十字架以示对M的纪念。"在提到的44个人的名字当中，有22个是挪威人的名字，11个是凯尔特人的名字。某些十字架是为了纪念妇女而立的，如在科尔克 - 安德烈亚斯发掘的一个例证："黑面桑都弗尔竖立这个十字架，以纪念其妻阿玲布约。"最早遗留下来的如尼铭文是属于10世纪的，它们清楚地显示了当地与挪威的联系，但同时也显示出挪威人逐渐吸纳接受了一种含有凯尔特元素的西方传统，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混合文化。

因此，在爱尔兰海周边区域内不可能存在一种纯粹的维京文化，这与在英格兰的情形是一样的。我们注意到劫掠者和原定居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彼此适应和融合，有时会着重强调彼此的文化差异，并常常由此形成新的文化规范。在下一章，我们将继续向北探索，去探访一些据认为挪威文化占绝对优势的地区。

注释

〔1〕半城镇中心区（semi-urban centres），大概是指那些设防的定居点。

〔2〕迪拉姆，摩洛哥、阿联酋、埃及等国之货币单位。

〔3〕波尔式的腰带扣，可能是挪威风格的产品。

〔4〕盖尔语，在现代苏格兰高地和爱尔兰等地使用，还有部分盖尔人也说盖尔语。

第九章

维京人与皮克特人：是种族屠杀还是种族融合？

要说明北部诸岛和西部诸岛上挪威定居点的特征，就需要全面完整地展现挪威人和本土皮克特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即由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到和平的种族融合的过程。现代遗传学方面的证据印证了人们大规模移居北部诸岛以及小规模移居西部诸岛这一事实。但无论是遗传学证据还是地名，都难以说明移居发生的准确年代。在中世纪，凯尔特人可能重新定居于赫布里底群岛；同时，很多奥克尼和设得兰岛上居民的祖先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这可能和该岛长期与挪威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保持着密切联系有关，这种联系可能始于维京时代之前。从考古证据来看，大规模移民后，挪威人在政治、语言及文化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不过当地土著和外来移民实现了某种形式的共存，并在各个地区有不同的表现。

赫布里底群岛

赫布里底群岛与马恩岛一衣带水，组成了一个王国，处于群岛领主统治之下，它们继承的都是挪威的传统，包括船役和有着瓦叠式外壳的船只的痕迹等。有学者认为，尽管这里的地名是盖尔语和古挪威语的混合体，但语言学的证据显示，几乎所有说古挪威语的人口后来都说盖尔语了。

许多考古学的证据是很久前发现的，其价值有着局限性。考古证据主要来自坟墓，它们常常是由于沙丘受侵蚀后而被偶然发现的，如科伦塞岛上的马赫伦遗址和艾莱岛上的巴林比遗址。我们可以确信，死者下葬时身着斯堪的纳维亚服装并佩戴传统饰物。在科伦塞岛的吉洛兰湾和奥龙赛岛上的卡恩 - 阿珀莱克，死者是被安葬在划艇里的。最近在刘易斯岛上的尼普遗址上发掘出了一个小社群的公墓。葬在这里的有男人、妇女和儿童，有些墓葬中有随葬品，有些则没有。通过对一位埋葬于10世纪晚期、身着传统挪威民族服装的中年妇女的牙齿进行同位素分析，得出结论她是在苏格兰西部长大的。作为第二代外

来移民，在她死后，其亲属们仍然给她穿上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服装，这是颇有意味的。与在马恩岛上的情形一样，赫布里底群岛上的挪威定居者似乎是通过强调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服饰和习俗来保持他们的民族文化特色；与马恩岛不同的是，在赫布里底群岛妻子们似乎也同样遵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习俗。

在绿草覆盖的沿海沙质低地的沙丘中也已发现了挪威人的定居点。近期在北尤伊斯特岛和南尤伊斯特岛〔1〕的发掘结果也显示了相似的情形：土著居民的土地被占，使得其文化难以延续。在北尤伊斯特岛的乌达尔，新来的殖民者首先在此地的最高点上修建了防御围墙，然后在5个定居点高地和皮克特人农场的废墟上，盖起了具有典型挪威特色的长屋。这里还出现了新的挪威风格的陶器、金属手工制品和梳子，还引入了用于烘烤大麦饼的陶瓷大浅盘，表明定居者的烹饪方法也发生了变化。

在南尤伊斯特岛，定居点遗址遍及沿海沙质低地。这表明，虽然农场从史前时代就一直被原地保留了下来，但新的手工艺品和新的建筑是在挪威人到来后出现的。在基尔 - 菲埃多尔，10世纪的木结构厅堂标志着当时的建筑出现了大变化，已与当地的建筑传统分道扬镳，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吃颇具特色的大麦饼。在伯尔尼什，在10世纪挪威人修建农庄的时候，皮克特人的一个长期定居点被夷为平地，而且建房者们在铺设地板之前可能还大吃过一顿。到11世纪晚期时，他们就住在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拱式厅堂里，这种厅堂长20米，地基用坚固的石头筑成，石料都是从毗邻的皮克特人的建筑物上强行拆下来的。伯尔尼什的居民更为富有，他们从韦塞克斯进口陶器，还制作鹿角梳子。他们或许也传递出了文化融合的信息。尼尔·沙皮斯（Niall Sharples）认为，一个挪威人的遗骸堆得到精心安葬，那是因为他与房屋的主人之间有某种密切的私人关系，而重建的房屋覆盖在此前建筑之上，以表明与从前祖辈们的联系。

奥克尼

《芬丹[2]传》乃是来自9世纪欧洲大陆的原始资料，是当代关于奥克尼当时定居情况的最重要的文献。它记述了当时从奥克尼的挪威贩奴者手中逃走的一位爱尔兰贵族，随后留在了一位主教那里，那位主教据认为是个皮克特人；此事件发生在840年前后。而人们普遍接受的有关该地起源的传说却记载于大约1192至1206年间写成的《奥克尼萨迦》中。书中叙述，奥克尼在9世纪被从挪威逃亡的厄尔·龙瓦尔德（Earl Rognvald）占据，书中还生动地描绘了挪威人在当地生活的画面。可以肯定，从9世纪中叶到12世纪，奥克尼是这个挪威人控制的半独立王国的政治中心，其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凯斯内斯地区。直到1468年，此地才被作为丹麦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Denmark）嫁妆的一部分送给了詹姆斯三世[3]（James III），成为苏格兰领土的一部分。

少数几个地名、刻有皮克特语言符号的石头以及一些定居点显示，在挪威人到来之前，当地曾经有皮克特人居住，但后来几乎所有地方都被代之以斯堪的纳维亚地名，只有少数几个本土地名保留了下来。挪威人的影响遍及那些最小的农庄以及每一处景观，但看不出有什么相互的影响。

在伯赛湾周围数个遗址上的发掘结果表明，位于海角上的当地人的权力中心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被挪威人占领了。据《奥克尼萨迦》记载，厄尔·托尔芬（Earl Thorfinn）“在伯赛湾有一处永久性住所，他在奥克尼建起了一座基督教大教堂，并成为了奥克尼的首位主教”。在9世纪后期，皮克特人的建筑被挪威人长方形的建筑取代。挪威人修筑了许多坚固的挪威式厅堂，内有靠墙长凳和箱形床架。当时奥克尼岛上已经有了铁器加工，人们还掌握了熔化白银的技术。但这里居民不能实现自给自足，他们从巴克奎农场等海湾地区的农场运来大块的牛肉和羊肉。尽管皮克特人的手工制品依然在使用，表明了居住人群的某种连续性，但是皮克特人持续了几代的独特的“8”字形结构的分格式建筑逐步为长方形厅堂所取代。在桑迪岛上的普尔地区，两个文化群体间的交汇重叠一度曾清晰可辨。一些居民利用挪威的建筑材料，特别是皂石，对皮克特式的建筑进行改造和再利用。

图12　鸟瞰伯赛湾的村镇遗址

在奥克尼，约有130座墓葬已经确认属于斯堪的纳维亚风格，这一数量与大量的移民人数是相对应的，也反映了这里定居点的分布比在赫布里底群岛上的更为广泛。尽管绝大多数证据是在19世纪发现的，且相关记载也较匮乏，但可以确定所有这些墓葬均出现于850至950年之间。

劳塞岛上的维斯特尼斯公墓的发掘年代相对较近。公墓中包括32座土葬坟，但有随葬品的只有8座——男女各有4座。其中一座坟墓埋葬着一位20多岁的母亲和她的婴孩。这位母亲佩戴了一对椭圆形的挪威胸针和一串珠子，同时还佩戴了一枚引人注目的凯尔特人的环形金银胸针。这位富有的妇女可能是最初的创始家族的首领。另外有两名男性武士分别被安葬在两艘小划艇里。其中至少有一人死于战争，他背部身中4箭。其余的人都葬在石棺里，没有随葬品，他们可能代表了挪威时代以前的坟墓。这些坟墓上都用巨砾作了标记，因而没有一座坟墓遭到挪威人毁坏。在同一个海角上，还有一栋船屋和一个农庄，农庄里有一个大厅堂，厅堂里面的壁炉两边安放有靠墙的低矮长凳，还有两个圈养家畜的圈栏：一个喂牛，一个养羊。

图13　在劳塞岛的维斯特尼斯发现的男性舟葬墓。船首和船尾都装满了石头，船舱中间安放遗体。

1991年，在桑迪岛上的斯卡尔，人们在一个低矮的崖岸边上发现了另外一个舟葬墓，它是因受风化侵蚀而裸露出来的。这是一艘小划

艇，从船缝中的火山岩颗粒可以断定，此船是在挪威建造的，后用大船运到了奥克尼。其中，一位年过七旬的妇女被安葬在中间，她的随葬品有一个枫木匣子、铁制的烧烤叉或者编织的压条，还有一个属挪威北部风格的精致鲸须胸襟饰物。与她一同下葬的有一个约10岁的小孩，在船尾还有一具30多岁男子的遗骸，该遗骸是被强行塞进这里的；实际上，为了把他塞进去，可能还把他的脚折断了。尽管如此，这个男子并不是奴隶，他的随葬品有一把梳子、一柄剑、一个箭囊以及22块用于赌博的鲸骨牌。虽然这些物品可能暗示这是一座9世纪晚期的墓葬，但根据碳定年法测定，遗骸的年代可能接近于10世纪中叶，这表明许多器物都是世代相传的；同时也表明在面对挪威殖民者日益增强的基督教化时，该族群力求保持其古老的文化和宗教特色。

在圣马格纳斯湾和狄尔尼斯，早在10世纪就出现了私人的石砌小教堂。到11世纪，整个奥克尼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去兴建教堂。在纽瓦克湾的长方形石建筑之上，后来建起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周围大约有250座坟墓，另外还有两座坟墓嵌在教堂的地板之下。在石头地板之下发现了两枚10世纪的钱币，而对墓葬出土物所做的20次碳定年法测定结果都表明下葬时间与10世纪中叶公墓风俗出现的时间是相吻合的。有人认为，在奥克尼所出现的地名巴巴，代表了幸存下来的皈依基督教的皮克特人的聚居区，早期挪威人皈依基督教正是由他们来完成的。然而，到公元900年，皮克特人在政治、语言、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都已经明显被超越了。他们的贵族已被挪威人的军事首领所取代，只有在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残留的本土要素。

设得兰

《奥克尼萨迦》中只是偶尔提及了设得兰，但一般认为它是与奥克尼同时被殖民化的，并且与挪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迄今为止，在这里的考古发掘研究中，还没有发现挪威人的遗址。我们对该岛的了解，主要是来自1934年亚历山大·柯利（Alexander Curle）在贾尔绍

夫所发掘的第一个被确认为不列颠群岛上的挪威人的农庄。贾尔绍夫虽然被描绘成是一个城镇，但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农庄，多次被重建；在这里挪威人的长屋与皮克特人的圆形石塔[4]毗邻而立。在古斯卡特尼斯，荒废了的圆形石塔内也发现有挪威人的手工艺品，这表明在斯卡特尼斯和贾尔绍夫，皮克特人的农庄中心区可能也成为了挪威人的目标。尽管仍然种植大麦和燕麦，但当地的经济还是发生了转变，其中包括新引进的亚麻种植技术（可能用亚麻来织造渔网）以及海产资源的集中开采。

斯蒂芬·斯图曼·汉森（Stefan Stumann Hansen）在安斯特岛进行实地考察，试图勾勒出当时挪威人的概况。如今这个岛上的人口已大为减少，现有居民仅600人左右。尽管如此，还是在30多处地方发现了挪威建筑物的废墟，其中哈马尔、桑威克和索特堡这几处已经进行了发掘。但这些遗址的具体年代很难确定。在安斯特发掘了少量带有陪葬品的墓葬，例如克里伯斯维克的墓葬中发现了属于9世纪的物品。定居可能始于那个阶段，但许多定居点长期存在，并一直沿用到14、15世纪。

大多数定居点都建有典型的挪威人长屋，里面有靠墙长凳、中央壁炉；皂石容器、纺锤锭盘[5]以及网坠等设备也很常见。由于设得兰早已没有树木，因此建筑物里用作主梁的木材肯定是进口来的。在安德霍尔发现了一座拱式厅堂，其基石就是取自铁器时代的圆形石塔和其他皮克特人的建筑物。其中一端有铺砌的地板和排水沟，说明这里曾被用作牲畜的圈栏。在这里用大量木材来建造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长屋并不经济实用。而皮克特人在建造房屋时，倾向用石料而不是木料。对于这些外来定居者来说，长屋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其民族文化特色的一种体现，使他们可以有“在家里的感觉”，来表达一种归属感，与本地的其他群体形成对照。

相关的经济变化也表明挪威人控制了奥克尼和设得兰。詹姆斯·巴雷特（James Barrett）业已证明在挪威人来此地之前，渔业主要限于沿海地区，后来出现了大规模的海上捕捞，海产蛋白在食物中所占的比重显著增加。基本生存方式的这种根本改变，很可能是大范围殖民

化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少量外来移民团体的影响。这一点从鱼类的消耗量上反映得尤为明显，食用鱼大概是较下层群体的消费习惯。跟语言和服饰的改变不同，当地居民大可不必去尝试新的经济活动，除非人口的变化使其成为必要。因此，渔业的快速发展肯定与大批外来移民的独特文化习惯有关，如果没有发生种族屠杀，那也必定发生过大规模的族群替换。

尽管挪威的文化传统在北部诸岛和西部诸岛的政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将这些传统视为是直接从斯堪的纳维亚传入的则是非常错误的。外来族群已经显示了文化融合的迹象，而原住民的文化元素亦得以保留，或被加以改造以适应新的变化，至少在社会下层是如此。要考察没有原住民的处女地的拓居情况，我们就必须探索更远的地方：北大西洋地区。

注释

〔1〕 北尤伊斯特岛和南尤伊斯特岛是赫布里底群岛中的两座岛屿，属于苏格兰。

〔2〕 芬丹（Findan），出生于爱尔兰，被挪威人捉到奥克尼充当奴隶，后逃往苏格兰，继而前往罗马，成为本笃会的修士，在瑞士隐居20余年。

〔3〕 詹姆斯三世，苏格兰国王（1460—1488年在位）。

〔4〕 指在苏格兰北部及其附近岛屿上发现的史前圆形石塔。

〔5〕 纺锤锭盘，指用以调整手纺车速度的小飞轮。

第十章
北大西洋地区的殖民活动

在北大西洋地区民族文化特色形成过程中，维京人的殖民活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多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视作维京人的家乡。本章将展现自公元800年到1400年间，从法罗群岛到冰岛的殖民活动，以此考察维京人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从斯堪的纳维亚保留了下来，同时探讨13、14世纪的萨迦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它们。

法罗群岛的殖民活动

法罗群岛，字面意思为“绵羊群岛”，由18个岛屿组成，在设得兰西北290公里处，距离挪威西海岸675公里。这里现有人口约4.5万，他们引以为荣地保留着挪威人的传统，包括声名狼藉的捕鲸活动。法罗人有自己的语言，是介于挪威语和冰岛语之间的一种斯堪的纳维亚语。19世纪时，法罗人开始寻根问祖，分别把目光投向了爱尔兰隐士、挪威流放者和巴斯克捕鲸人。领导法罗群岛地方自治的政治家乔安妮斯·帕图森（Jóannes Patursson，1866—1946）推动了法罗群岛考古的进程。而贡献更大的是国立博物馆（建于1952年）的馆长斯韦里·达尔（Sverri Dahl，1910—1987），他发掘出第一件被认为是出自维京人之手的工艺品：一枚在特约努维克海边墓葬里发现的环形胸针。

公元825年，爱尔兰籍的迪库尔（Dicuil）在亚琛的查理曼宫，编辑完成了当时最前沿的地理学著作《论世界的测量》。迪库尔提到，从不列颠出发，向北航行两天，可以到达几个小岛；其中一些岛屿在爱尔兰隐士来定居前，一直荒无人迹。过了100年，居住在这里的那些爱尔兰隐士被海盗赶走。在这些岛屿上，到处依然是成群的绵羊和形形色色的海鸟。尽管迪库尔没有道出这些岛屿的名字，但一般认为他所提及的就是法罗群岛。从法罗语中尚存的些许盖尔语痕迹以及保留下来的由爱尔兰隐士命名的地名来看，人们普遍认同的说法是，挪

威人的拓居或殖民活动（*landnám*，字面意思为“土地占领”）发生在公元9世纪。

据《法罗群岛萨迦》（约于1200年成书）记载，重要的殖民活动发生在9世纪70年代，当时格里穆尔·坎班（Grimur Kamban）为逃避挪威的金发王哈拉尔的迫害，来此避难。然而，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爱尔兰隐士的考古证据，而且人们也注意到，法罗语中的盖尔语成分不可能是8世纪爱尔兰隐士定居的结果，因为他们无法生儿育女，传承文化！对法罗语中存在盖尔语痕迹的另一种解释是，那些最初的维京定居者是来自于北方诸岛或爱尔兰岛的第一代或第二代挪威人。有一段时期，人们认为这些流传下来的语言方面的证据反映了公元650年前后人们在该地区的活动，但现在这种观点已被推翻，人们认为最早的时间应该是在大约875至900年之间。

法罗群岛上的考古发掘极少。1941年，在克维维克发掘出一座挪威人厅堂和一个牛棚，在这里发现了谷物种植的痕迹，此牛棚最多可以容下12头牛，同时有证据表明当时仍有捕捉海鸟和鲸鱼的活动。20世纪80年代，在托夫塔尼斯发掘出一处属于10世纪的定居点遗址。虽然木材短缺，长屋仍然是这里的挪威人典型的木建筑。大多数出土物品都是舶来品，包括700多件皂石制品、油石、磨石、一个木制游戏盘、两枚环形胸针以及有一只可能来自都柏林的黑玉手镯。

图14　法罗群岛的特约努维克海湾：这里有一处挪威人公墓遗址

冰岛：早期民主还是环境灾难？

大部分冰岛人会告诉你，他们的先祖最初是从挪威移民过来的，始于874年，第一位拓殖者是因戈夫·阿纳森（Ingólfr　Arnarsson）。根据传说，当因戈夫顺海岸进行探险时，他从船的高座上将一根木棒抛向大海，然后循着木棒漂流的方向，一直到达了后来成为冰岛首都的雷克雅未克。据说，第一批移民是为了逃避金发王哈拉尔的暴政，从挪威迁居过来的。据类似的说法，这里有一些爱尔兰隐士，但挪威人初到这里后不久，他们就离开了。930年，即殖民时代之末，挪威人颁布了一部特别的法典，在辛格维里尔确立了一种名为“阿尔庭”（Althing）的露天国民集会制度。这就是关于冰岛国家起源的传说。据此传说，冰岛宣称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阿尔庭”就相当于他们最早的国会。

事实上，关于冰岛的殖民活动的传统说法见于两份文献，这些文献至少是在殖民活动发生300年后写成的，文献中的说法继而成为中

世纪萨迦的基础，而19世纪的冰岛民族主义又是以此为基础的。牧师阿里·索吉尔松（Ari　porgilsson）所著的《冰岛人记》（约写于1122—1133年）着重描述了冰岛宪法和教会的发展。此后，写于13世纪的《定居记》记载了约400名殖民者的名字和经历。现在，人们认为它在描述冰岛的历史概况时还想要试图为中世纪的土地所有制模式提供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因而不能再被视作是对9至11世纪冰岛人物和事件的准确记述，尽管冰岛的萨迦以这些记述为基础。

实际上，冰岛距苏格兰（795公里）比距挪威（950公里）更近一些，第一批殖民者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更有可能来自于不列颠群岛。考古学方面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爱尔兰神父活动的遗迹，虽然《冰岛人记》提到，在挪威殖民者到来前，他们就居住在冰岛。不过，现代DNA研究结果显示，冰岛人基因库中可能有约20％起源于爱尔兰海地区。这项研究还表明，大约有75％的男性祖先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而只有37.5％的女性祖先是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由此也印证了这样的说法，即第一代殖民者中可能有来自爱尔兰的妇女和奴隶，构成了一个爱尔兰 - 挪威族群。有些地名可能也说明挪威人在移居冰岛之前就与爱尔兰和苏格兰有了联系和接触，其语言中有从盖尔语中借用的词汇，比如公牛。有人甚至认为，作为冰岛民族文化特色和民族主义情感核心的萨迦，其文化源头实际上就是爱尔兰人那些口口相传的诗歌。

冰岛人的早期墓葬也反映出了爱尔兰人对冰岛早期居民服饰的影响。尽管这里已知的属于皈依基督教之前的墓葬有316座，但其中大多数都发掘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并且记述的详细情况也各不相同。墓葬中那些可以辨别出性别的遗骸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大约为二比一。冰岛人的墓葬沿袭了挪威人的一般传统，但坟墓建造得较为简陋粗糙，并且没有竖碑。现在所发现的5座舟葬墓，都是用小划艇作为棺材。这些墓葬通常都是在农场附近的低矮土丘下发现的，大多数位于小型公墓之中，它们也许是家族的公墓。除了近来在摩斯菲尔附近的胡尔都霍尔发掘的墓葬外，跟苏格兰一样，这里没有发现火葬的痕迹。在这些墓葬中都发现了饰品和武器，但大多数墓葬中只有几

件随葬品，没有一座墓的随葬品是很丰富的。与斯堪的纳维亚不同的是，随葬品中工具极为罕见，很可能是由于缺乏原材料，且工具制造业水平低下。铁非常短缺，常被重复利用。另一方面，男性墓主人多以其矮种马来陪葬，有的则以他们的狗来陪葬。几个女性墓葬反映出了定居者混杂的文化渊源。在科恩萨的一座女性墓葬里，随葬品包括一对舌形胸针和一只小铃铛；在哈夫布甲那斯塔尔的另一座女性墓葬中，随葬品包括鲸须饰针、三叶形胸针和一个环形胸针；而在科洛普尔的一座墓葬里，发现了可能是产自不列颠群岛的环形胸针和皮带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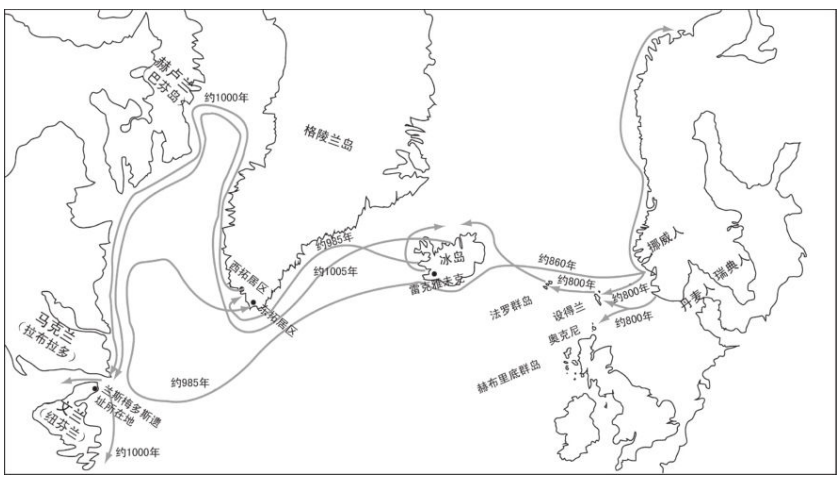

图15　北大西洋地区殖民航线图

传统上认为，冰岛最早有人居住是在874年，但如今这个时间已变得不太可信。一些保存完好的农庄在火山喷发时被湮没，火山灰年代学可以让我们从火山堆积层中得出确切的年代信息。20世纪90年代，碳定年法测定后得出结论，认为冰岛可能早在公元7世纪或者8世纪就已经有人居住。但是，这样确定出的年代也有问题，因为那些用来测定年代的木炭可能来源于古代的木材。如此以来，这些测定出来的年代的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另一方面，大部分考古学家现在认为，殖民活动可能始于870年之前稍早些时候。在890至900年间，由

于拓殖者大量砍伐桦树以扩大牧场面积，快速激进的殖民活动导致树林面积剧减而牧场面积大增。学者研究的重点也开始转向新社会的创建过程，而不再是殖民活动发生的年代本身。

《定居记》或许确为早期殖民模式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尽管冰岛的陆地面积超过10.3万平方公里，但其中心地区是因火山喷发而形成的荒漠，全岛只有1/6的地方适于人类居住。《定居记》提到了598个农庄，除了其中11座，其余的全都得到确认，沿海岸线分布。这种分布情况的形成似乎是由于第一批殖民者占领了大片适于耕种的良田，随后将其中一些分给了他们的亲友，这些亲友则成为他们经济上的附庸和政治上的追随者。及至11世纪，冰岛已有约4,000个农庄，在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后的时间里，这个数字一直保持稳定。11世纪晚期，冰岛人口可能约在4至10万人之间（现在其人口为25万）。后来的人就只能耕种大庄园之间的小块土地。中世纪的冰岛社会不是由自给自足、分散独立、地位平等的农民组成的，而主要是由几百个有权有势的农庄主组成，每一个农庄主都控制着其土地上大量的人口，他们借助对土地的所有权把3,000多名小农和佃农束缚在各自的土地上，并对他们进行政治统治。及至12世纪，教堂的出现和什一税的开征，更加巩固了这一局面。

第一批农庄里有用草坯和石头构筑起来的传统长屋，其中仍使用了大量的木材。这些房屋的墙壁呈拱形，长屋一头有房门，中间有一个壁炉。这种基本的长屋类型，经过发展和改进，分隔成了多个单间，在长屋后面还另建有小屋。在斯通，发现了另外两间屋子，一间当时被用作乳品间，另一间也许是公厕或是冷藏室。海克拉火山喷发时，火山灰将斯通完全湮没了。长屋的这些变化似乎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一方面是适应气候条件，尽量减少外墙的裸露，同时也是为了应付建筑木料日益紧缺的问题。

土地所有权既是经济势力的基础，也是政治权力的基础。岛上居民的日常生计，主要靠饲养牲畜，辅之以渔业和打猎，而不是谷物种植。似乎与快速而集中的殖民活动相伴的是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10世纪时，随着草木的剧减，自由觅食的动物不得不被奶牛所取代，在

霍夫斯塔济，猪和山羊相对于牛的比例不断下降。不过，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牛都圈养在家里，它们的生存取决于有没有饲料。在冰岛东北的斯瓦尔群岛，羊的饲养自最初阶段起就非常重要，但是当气候恶化、欧洲进入“小冰期”后，捕猎海豹也变得重要起来。在斯瓦尔岛上，虽然没进行谷物种植，但人们收集干草来作饲料和铺地板，用泥煤来作基床、燃料和建筑原料。人们也采集野生的浆果，如越橘、岩高兰果以及那些可以食用的籽粒和叶子。

斯诺里·斯图鲁松（Snorri Sturluson，1178—1241年）

斯诺里·斯图鲁松是冰岛的一位诗人、学者兼政治家。他从3岁起，就在冰岛的文化中心奥迪学习。他是一位政治领袖，曾两次担任“阿尔庭”的议长。斯诺里的农场在冰岛西部的雷克霍特，位于一个广阔而富饶的河谷的中部，一些最富饶的农场也在这里。一个狭长的“过道农场”[1]被发掘后，证明这里的人至少从事两项重要活动：剪羊毛和除虱！在这里也发现了一些谷物，但肯定是从欧洲进口的。斯诺里所从事的事业使他树敌甚多，其中包括挪威国王哈康，后者于1241年将他杀死在雷克霍特的地下室。

斯诺里如今的重要地位源于他的文学作品。他编辑了《挪威王列传》一书，尽管其中包括了根据萨迦写成的虚构章节，但仍不失为一部关于早期冰岛和挪威历史的重要著作。斯诺里也是散文集《埃达》的作者，这部著作中记载了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吟唱诗的一些片断。另外，他也可能是《埃吉尔萨迦》的作者。

关于早期冰岛历史的学术讨论所关注的主题，已从先前的殖民活动和移居起源，转到了更现代、更具21世纪特色的环境灾难上。据估计，由于滥砍滥伐和过度放牧造成水土流失，导致冰岛超过60%的原

始植被遭破坏。日益寒冷的气候条件加剧了环境恶化，维京文化体制在经济、人口和社会结构诸方面都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家族成员因为迁徙而流散各地，新的体制如农业合作社便取代了先前的家族保护体制，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服务体系。

总之，在北大西洋地区的殖民地，文化的演变最终取决于环境因素，而并非是与当地居民相互融合的结果，当然最初迁徙来此的移民也绝不是纯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族群。对维京文化特性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后来的起源传说所赐，在当时的情形下，向斯堪的纳维亚寻根问祖从政治角度而言显然更有利。

注释

〔1〕过道农场，大概指大农场之间的一些小农场。

第十一章

世界的边缘：格陵兰和北美洲

格陵兰是维京殖民地中完全孤立的岛屿，有着最极端的环境条件。人们对格陵兰殖民地建立过程的了解，也来自于后世的文献资料，主要是《冰岛人记》（写于1122—1132年）一书。该书详细记录了981—982年间，红发埃里克在被逐出冰岛后的三年流放期间，是怎样踏堪西部海岸的。三年之后，他说服了300名冰岛人同他一道乘坐25艘舰船重返格陵兰岛，但最后只有14艘到达。这些殖民者分成了两组：人数较多的一组在埃里克的带领下定居于西南海岸，后来这里被称为“东拓居区”，人数较少的一组则沿荒凉的海岸线向北继续航行650公里之后才登陆，建立了“西拓居区”。

11到12世纪的文献资料中提到在“东拓居区”约有190个农场，而“西拓居区”也有90个。在殖民活动的高峰期，格陵兰岛上大约有2,000—4,000人居住，自始至终大约有2.5万—3.5万人在格陵兰岛上定居过。因为后来这里没有再出现新的殖民活动，挪威的定居模式得以完好保存下来。考古人员已经发现了约250个农场和20座教堂。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草地进行放牧，这里的农场同冰岛的一样被山丘和沼泽分隔开来，分散在各处，一般都相距几千米。这里不能种植谷物，但可以饲养家畜。人们花费大量精力去收集冬天的草料，因为整个冬季家畜都需要在圈内饲养。4月，冬季结束的时候，农场就开始忙碌起来。格陵兰人靠猎捕海豹来补充他们的食物供给，在考古发现的遗骨中，海豹的骨头大约占了35—70%。每一个农场都要用一些海豹肉来喂养体型硕大的狗，这些狗通常用来放牧羊群，当然也作看家之用。农场饲养的狗还包括领主的猎狗，这些狗冬天被分到不同农场去喂养，到了夏天再集中起来供领主们猎取驯鹿之用。格陵兰人还到冰岛和欧洲去进行交易，用毛皮和海象牙换取谷物、盐和铁。

20世纪90年代，在加尔 - 昂德尔 - 桑德特（简称GUS）发掘出一处保存完好的“西拓居区”大型农场，展示了典型格陵兰农场的全貌。这个农场初建于1000年左右，后来几经改造，一直到1350年前后这里都有人住。该农场有38间房屋，其中12间直到这一时期的最后阶段都还一直在使用。房屋是木结构的，所用的木料包括浮木[1]和新木

材——许多木料肯定是从文兰、西伯利亚或挪威进口的。这些房屋皆为斜顶，屋顶下边缘搭接在支撑柱上，表面盖着草皮。在永久冻土层里残存的木头中，没有发现家具，由此可以推测最后的居住者带走了大部分对他们有用的物品。这些居民饲养绵羊以剪取羊毛，养山羊和母牛以挤奶，挤出的奶被装在桶里。格陵兰人还猎取野兔、海豹和驯鹿，考古学者从一间14世纪的织布房遗址里发现了野牛、棕熊的毛皮，说明这些格陵兰人还到过北美洲。

红发埃里克（Eirik the Red，约950—1003年）

埃里克是个典型的维京人。他长着一头红发，富于进取，勇于开拓，是一个大无畏的首领；他还是一位目光远大的民主人士、一个好丈夫和一位可敬的父亲。根据《埃里克萨迦》记载，他出生于挪威，但因为他父亲托瓦尔·阿斯瓦尔德（Thorvald Asvaldsson）犯谋杀罪而遭流放，全家被迫逃往冰岛。981—982年，埃里克因为一宗谋杀罪再次被驱逐而逃离冰岛，在被流放的三年里他沿格陵兰岛的海岸线进行了探险。984—985年，他又返回格陵兰，并在“东拓居区”建起了布拉塔里德庄园或者称为“陡峭之坡”。埃里克的头衔是“至高无上的酋长”。根据推测，他的农场大致位于卡西亚苏克，1932年在这里发掘出一个大农场和一座教堂。这座教堂据说是由埃里克的妻子特约迪德（Thjodhild）修建的，她皈依基督教后就搬出了自己的农场。1003年，埃里克死于由当时新移民带入的一种流行病。根据《埃里克萨迦》记载，埃里克有4个子女：女儿名叫弗雷迪斯（Freydis），3个儿子分别是托瓦尔（Thorvald）、托尔斯坦（Thorsteinn）和探险者莱弗·埃里克松（Leif Eiriksson）。

大胆闯荡：维京人在北美洲

有一种观点认为，早在哥伦布之前500年左右，维京人就已经发现了美洲，他们在那里与陌生的土著不期而遇。这种说法引发了近代人的探险热，也激发了当代人对太空的探索热情，电视系列片《星际旅行》就是这种探索的科幻版。但遗憾的是，能够支持这种观点的考古学证据很有限，其中一些还是虚构的。关于维京人发现美洲的说法是基于萨迦里的一些传奇故事，首次记载出现在发现美洲200年之后的传奇故事中。这些传奇故事起初被视为写实的历史文献；后来人们认为它们只是中世纪人虚构出来的。现在的观点则介乎二者之间，认为萨迦中可能保存了某些事实，但可能对部分事实有所美化和混淆。维京人发现美洲的故事，也许是对这块大陆进行了数十年的系列探索和接触后形成的一种半神话的演义。

在《格陵兰人萨迦》（约写于1200年）和《埃里克萨迦》（约写于1210—1230年）中出现的两处最初的记述，依据的似乎是同一则原始资料，但实际记述的内容则大不相同。在《格陵兰人萨迦》中，文兰的发现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布亚尔尼·黑尔尤尔弗松（Bjarni Herjolfsson）在从挪威到格陵兰的途中迷失了航向，意外地发现了位于格陵兰岛西南方向的这片不为人知的陆地。后来，约在公元1000年，红发埃里克的儿子莱弗，又对布亚尔尼所发现的陆地进行了探索。他考察了一些新的地区，将它们命名为赫卢兰、马克兰和文兰，并在文兰建立了根据地。莱弗·埃里克松和他的船员在那里过了冬，翌年春天才回到格陵兰。他的哥哥托瓦尔再次返航继续沿美洲海岸踏勘，但是与怀有敌意的当地人相遇，双方发生血战，托瓦尔中箭身亡。而在《埃里克萨迦》中，并没有提及布亚尔尼，迷失航向并首次到达新大陆的是莱弗·埃里克松。随后对新大陆的探索，则归功于冰岛商人托尔芬·克尔塞夫尼（Thorfinn Karlsefni）。但是在接下来的三个冬季里，由于频频遭到印第安人的侵扰，他的探险队便返回了故土。

关于文兰的具体位置一直颇有争议。从拉布拉多到佛罗里达，各种说法不一，但大家能够达成共识的是在纽芬兰岛。文兰是当时探险所到达的最南边的陆地，赫卢兰可能就是巴芬岛[2]，马克兰就是拉布拉多中部。但文兰这个名字本身还存在问题。不来梅的亚当在1075

年提到过它，明确指出这个地名源于当地发现的野葡萄，但这种野葡萄不会生长在纽芬兰岛上。不过，也许是亚当犯了一个错误，挪威语中的“文兰”（*vinland*）一词里，i是一个短音而不是长音，其意思是“天然草地或牧场”；另外也有人指出，既然在新不伦瑞克或圣劳伦斯河地区都有野葡萄，在文兰肯定也有。

20世纪60年代纽芬兰岛最北端的兰斯梅多斯遗址[3]被发现后，认为纽芬兰就是文兰的看法变得越来越有根据了。该遗址首次提供了维京人抵达了北美的确凿的考古学证据。在一块狭长的梯田地带，有一个小型的挪威人定居点，这个定居点被一条小溪所分隔。另外，三种类型的建筑已经得到确认。三座大型的厅堂里都有多间屋子，在外形和布局上都具有明显的冰岛特色。这些房屋具有10世纪末房屋的一般特征，但缺少11世纪以后出现的房屋的细节特征。每一座厅堂都包括一个或多个房间，分别供人们吃饭、睡觉和进行社交活动；每一个房间的中部都有一个壁炉，沿墙安放着长椅；每座厅堂都有一个作坊间和一个大的储藏室。有人据此推测，这里是货物装船转运前的集散储存地，转运的货物包括坚果、葡萄和上好的硬木。在地板层中发现的灰胡桃木不是本地出产的，应该是来自魁北克或者新不伦瑞克地区。

在厅堂的周围有三座稍小一些的窑洞式建筑。这些房间里有壁炉，说明它们可能被用作寝室，也许是奴仆们的住所；但是在其中一间小屋里发现了19枚铅锤，说明它曾作过存放渔具的储藏室。在其中一座较大的厅堂旁边，有一间长方形的小房子，这种小房子是那些很有实力的农场为依附劳动者修建的。在小溪的另一侧，在距离这些房子较远的地方有一个炼铁场，里面有一个简易的熔铁炉，附近还有一个炭窑。居住在这一带的土著民族并不懂得冶铁术，对挪威人的垃圾堆层进行放射性碳元素年代测定得出一个结论：人们在此遗址上居住和活动的年代为990—1030年间的几率达95％。有证据表明此前和此后都有印第安人在兰斯梅多斯居住过，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处于同一时代或者其居住时代相互重叠。

从他们住处睡椅的尺寸来估计，厅堂总共可以容纳77—92人。最

大的两座厅堂在其尽头都有一个私人寝室，冰岛的庄园主就住这种房间。这个遗址的房屋分为三组，说明这些人可能是三艘舰船的船员，每艘船大约30人。这个遗址发现的是结构坚固的建筑，而并非简陋的棚屋，因此是为整年居住而修建。但是，那里只有少量垃圾堆，也缺乏房屋维修的证据，这表明人们只是在这里短期居住。这里没有牛圈、马厩或者其他畜圈，也没有公墓。遗址中也没有食用家畜后遗留的骨头，而此地消耗的肉食主要是海豹和鲸鱼。此处的遗留物品极少，可见离开这里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离开时也很有秩序。在此仅发现了少量的个人物品，其他出土的东西大都与房屋的修建和船只的维修有关，包括3千克的废铁、铁炉渣、废铆钉，还有木头残屑和碎片，其中包括一块可能是用于修补小船的补丁。

图16　兰斯梅多斯遗址复原图

萨迦中提及的莱弗·埃里克松建立的定居点可能是在兰斯梅多斯，这个结论似乎是合理的。只有像莱弗这样的首领才能建立这样的据点，其建筑的规模意味着它不太可能是一个不知名的定居点，尤其是考虑到修建这个定居点本身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在它修建之时，整个格陵兰岛的人口只有约2,500人；如果没有估计错的话，那么兰

斯梅多斯的人口就占了整个格陵兰殖民地总人口的10—20%，而且大多数可能都是刚进入劳动年龄的男性。挪威人似乎不大可能有足够的资源去建立一批这样的定居点。

兰斯梅多斯无疑起到过门户作用。从格陵兰到位于美洲的南方资源地路途遥远，意味着这里是一个过冬的好地方，在返回之前可以在这里获得补给。从布拉塔里德到兰斯梅多斯的距离超过3,000公里，如此长距离的航程，大约需要一个月，这样一年之中能用来探索的时间就仅剩下一两个月了，因为只有在6月到9月他们才可以出航。因此，这个遗址应该是格陵兰殖民地的探险者在探索和考察北美地区有哪些资源时修建的。然而，它未能成为长久居留点，因为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包括路途遥远、大海变幻莫测、来自心怀敌意的土著的威胁、兰斯梅多斯资源匮乏而那些有用的资源距离又太远，不值得消耗大量人力和时间去获取它们。木材和酒可以从欧洲获取，且欧洲还可以提供奢侈品、食物、家庭联系以及宗教方面的更多的资源。与欧洲相比，新世界基本不具备什么优势。格陵兰殖民地本身很小，不足以再分立出一个小殖民地，要么全部移居到文兰，要么所有人都不迁移。当他们决定离弃兰斯梅多斯的时候，北美的探险之旅也随之结束。

假如把跨越北大西洋的航程与纽芬兰到格陵兰的距离作个比较，那么人们对于挪威人在北美洲登陆，可能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但是，挪威人到访北美，除了对现代美洲人的心态有影响外，对当地土著居民有没有长远的影响呢？无论是《埃里克萨迦》还是《格陵兰人萨迦》中都有章节描述挪威人和当地土著之间的和平贸易。在《埃里克萨迦》中，记录了卡尔塞夫尼和他的手下用红帆布与当地人交换毛皮的情形。尽管没有在北美洲发现可以表明挪威人和当地人有直接接触的遗址，但在原住民的遗址中发现了来自挪威的物品，其数量和分布情况表明，挪威人与北美洲的接触要比萨迦中记载的多。总的来看，这些证据材料说明双方的接触虽然层面相当广，但却断断续续，并没有证据显示有从格陵兰劫掠得来的挪威货物在此进行长途贸易。尽管有接触，但双方在接触过程中却鲜有文化方面的交流，他们对彼此的

文化都很陌生，显然都认为仿效对方的技术或行为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

衰落与离弃

关于格陵兰殖民地遭到离弃的时间和原因，学界一直有颇多争论。这些问题之所以变得重要，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殖民地代表了维京人的一种不寻常的失败。随着殖民地的荒废，斯堪的纳维亚人向西扩张的步伐也就停止了。1497年，约翰·卡伯特[4]（John Cabot）“重新发现”了纽芬兰。欧洲人对北大西洋的认识中真的存在一片未知区域吗？

14世纪40年代，伊瓦尔·巴达森（Ivar Bardarson），一位来自特隆赫姆的牧师，来到格陵兰，接管了在加达[5]的教堂。当他回到挪威时，他讲述说：到14世纪50年代中期，他已有很多年没有听说有关“西拓居区”的事情了。伊瓦尔组织了一次探索考察，但他的船队只发现了一些废弃的农场和一些半野生动物，根本没有发现人的踪迹。因此，人们相信“西拓居区”在14世纪中期就已被废弃了。关于“东拓居区”，最后的一条文献记录是，1406年，一艘冰岛货船从挪威出发后，途中遇到了风暴和浓雾，最终来到了格陵兰。这些船员在“东拓居区”的农场里生活了4年，其中一人还在瓦尔希的石结构教堂中举行了婚礼。1410年，他们返回挪威，这是人们最后一次听到“东拓居区”的情况，它大概在1450年被完全废弃。

关于这些殖民地被废弃的原因，人们提出过多种假说。其中一种假说认为，由于气候越来越恶劣，驯鹿改变了其迁徙路线，而那些定居者却被他们圈养的家畜限制在了一个地方。还有就是牧草状况恶化和西海岸与欧洲被完全隔绝。然而，这些证据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在现代学者看来，这样的环境决定论解释太过简单了。“小冰期”不可能摧毁挪威人的殖民地，因为密集的寒潮在1600年之前并没有出现，而到那时这些殖民地已经完全消失了。另一方面，植物的减少或者是

因为挪威人过度放牧而造成的。

第二种假说认为，格陵兰人遭遇了疾病，且营养不良，甚至有可能是遭到了黑死病的毁灭性打击。然而，所有格陵兰人的骨骼分析表明，他们除了变得日益依赖海洋动物外，个个都很健康。

第三种假说认为与欧洲贸易的中断是殖民地荒废的主要原因。因为到14世纪，印度出产的象牙和俄罗斯出产的毛皮已经很容易就能获得，殖民地的经济基础因而受到削弱。

第四种假说认为，殖民地的荒废是由于挪威人与伊努伊特人之间的竞争日渐加剧所致。据写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挪威历史》记载，挪威猎人与那些“用海象牙作投射武器并且使用锋利的石刀”的斯克莱令人（*skraelings*）之间发生过激烈的武力冲突。尽管现在很少有人相信伊努伊特人的袭击是造成挪威人人口剧减的唯一原因，而且他们到达时，这些殖民地可能早就被废弃了，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挪威人的遗址中显然并没有发现伊努伊特人的手工艺品和工艺的痕迹。挪威人既没有借鉴伊努伊特人的木架蒙皮船和皮艇，也没有模仿他们的穿着风格；同时，挪威人也没有掌握伊努伊特人的渔叉捕鱼技术以拓宽自己的生存空间。

毫无疑问，缺乏适应能力似乎是挪威人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挪威移民固定生活在一处，仅仅依靠零星的小块牧地来养活家畜。他们没有靠海吃海，海豹上岸之后，他们才用棍棒去追打猎取；但伊努伊特人则驾船出海猎捕海豹。这儿的挪威人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之中，这个社会由有权有势的酋长和教会公职人员控制。其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依赖于农民向地主、教会和挪威国王缴纳的赋税。

教会在当地很有势力。这里建造的教堂达20座以上，教堂的彩色玻璃、大钟和法衣随处可见。教会的权力中枢在加达，在这个已知世界的边缘成立了一个主教管辖区，并为纪念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而建造了一座小型石结构教堂。主教的宅邸建筑群中包括一个什一税仓库，里面所发现的25只海象的头骨和5条独角鲸的头骨反映出了什一税的征收额度。两处分别可以圈养150头牛的大型牛圈则展示了经济权力的集中。对主教遗骸（根据他的权杖确认的）的分

析表明：主教和他的教民不同——他通常食用陆生圈养动物，而不是海豹肉。2000年，托马斯·麦戈文（Thomas McGovern）将格陵兰殖民地遭废弃的原因，归于殖民者单一地实施欧式畜牧政策：

> 当他们的经济和社会面临着环境和社会架构等多方面的挑战时，格陵兰岛上的挪威人并未选择进行革新，而是继续强调和固守自己的传统，始终没有放弃被他们视为核心价值观念的东西，结果是其殖民地最终消亡。

若干处遗址都提供了挪威殖民地消亡的考古学证据。14世纪中期在加达的主教宅邸建筑群中，在其狗窝的地板上和住所的卧室里，发现了9具残存的猎狗的遗骨，埋在坍塌的房顶木料下。在加尔-昂德尔-桑德特，农场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被废弃。一只孤独的山羊晚归后，因为没有人饲养，活活地在外面饿死了。再后来，屋顶部分倒塌后，一伙伊努伊特人来到这里，并在这个废弃的农场建筑里扎营过夜，但是他们不小心引发了火灾，匆匆逃离时留下了一些物品。在加尔-昂德尔-桑德特附近，在代号为W54的遗址中，生物考古学研究揭示了农庄毁灭的秘密：因为那些在农场地面下层喜温的虫子消失了，取代它们的是生活在表层喜食腐肉的虫子。食品储藏室里所剩的就只有牛蹄了，不过其中还混有一些雷鸟和北极兔的足。在食品储藏室外面的走廊上，发现了一条大猎狗的部分遗骨。其骨头上的刀痕表明，这条忠实的猎狗生前为其主人奉献了最后的晚餐。

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中，那些饥饿难耐的14世纪移民，坚守着彼时彼地已不合时宜的生活方式。这与9世纪那些好战的国王显然大不相同，他们很看重维京一词被赋予的一系列文化表现方式。到最后一章，该言归正传了，让我们看看后世的评论家是怎样看待历史上维京人所扮演的这些不同角色的，以及它们是如何被评论家们用来塑造自己心目中的维京人形象的。

注释

〔1〕浮木，或称流木，指漂浮在水中或被水冲上岸的木头。

〔2〕 巴芬岛，加拿大东北部的一个大海岛。

〔3〕 兰斯梅多斯遗址，这里有欧洲人第一次到达美洲时留下的历史遗迹。197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

〔4〕 约翰·卡伯特（1450？—1498？），意大利裔探险家，于1497年率领英国远征探险队发现了北美大陆。

〔5〕 加达，格陵兰岛埃纳尔峡湾主教辖区，那里有一个大教堂。

第十二章
对维京人的重塑

本书开篇就已指出，“维京人”一词在9—10世纪时并不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词语。如今人们心目中的维京人形象与其说是基于历史真实，倒不如说是基于新近对“维京人”一词的认知和了解。在随后篇章中，我们通过考古学的发现了解了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维京时代”，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及其殖民地的那些民族的文化特征。但是，维京人在各个时代都被重塑，本章将考察维京人在近现代被重塑的情况。

19世纪的维京人——浪漫主义的复兴

16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人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早期历史感兴趣，事实上，人们对维京时代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奥利·沃姆（Ole Worm）1643年出版了《丹麦遗址》一书，详细介绍了丹麦境内的历史遗址，但学术界对其兴趣仍然有限。欧洲人更加关注其古典历史及希腊和罗马的辉煌文明。然而，自18世纪晚期起，维京人开始再次引发人们的兴趣，当然这并非因为他们是文化英雄，而恰恰是因为他们被视为野蛮人。维京人及其他中世纪早期文化，为卢梭[1]（Rousseau）的“高贵的野蛮人”提供了不少欧洲本土的实例。

在丹麦和瑞典，当这两个国家在军事上遭受屈辱性的失败之后，人们对维京人的兴趣变得尤为浓厚。1807年，纳尔逊（Nelson）炮轰哥本哈根；1809年，俄罗斯从瑞典人手中夺走芬兰。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爱国的浪漫主义情结在许多国家的民众中萌生。在斯堪的纳维亚，知识阶层感到有必要重振维京时代的那种生机和力量。于是，维京人的历史成为他们维系民族意识的纽带。1808年，尼古拉·格伦特维（Nikolai Grundtvig，1783—1872）的《北欧神话》在丹麦出版，掀起了向丹麦教育体系中灌输维京精神的运动。今天，他被普遍认为是终生学习的创始人。格伦特维按年代顺序用萨迦的形式讲述维京神话，力图确立并提升斯堪的纳维亚在欧洲的地位。1811年，哥特协会在瑞典成立，其目的为激发爱国精神，鼓励考古研究。参加者均

为男性，宣扬“哥特人在古时候用角器饮酒”。于是，角状酒器成为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中产阶级餐厅中的流行摆设。哥特协会的成员包括埃里克·古斯塔夫·盖伊尔（Erik Gustaf Geijer）和以塞亚·泰格奈尔（Esaias Tegnér），前者在其诗歌《维京人》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自由农民与高贵国王和谐相处；后者是浪漫主义诗歌《弗里蒂奥夫萨迦》的作者。

尽管诗人与学者们经常聚在一起吟诵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诗与歌，但他们还得仰仗考古学的研究与发现来向人们展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维京时代。墓冢是明显的人造之物，是人们研究的重要对象。1820年，在耶灵发掘出了一座王陵；第二座王陵在1861年被发掘。1846—1847年和1874年，在旧乌普萨拉地区，有三座大型墓葬被发掘；1852年，在波尔发掘出一座舟葬墓。1873—1895年间，斯托尔佩在比尔卡地区发掘出1,000余座古墓。大约与此同时，在斯堪的纳维亚，奥斯卡·蒙特柳斯（Oscar Montelius）第一次使用“维京时代”一词来指公元800—1050年这段时期。

农业的改良和深耕技术的应用大大加快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造就了一代城市无产阶级，他们将自己视为瑞典人或丹麦人，而不再是当地农业区的居民。直至1814年，挪威才从丹麦分离出来；但它随即又成为瑞典的一部分，直到1905年赢得独立。这时，挪威的民族主义情感特别强烈，地区性的方言研究也被作为证据，证明与丹麦或瑞典相比，挪威与维京传统和古诺尔斯语的联系更为密切。

总之，1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形象具有一系列特征，其中有些影响深远。首先可以确认的是，从800年到1050年，在斯堪的纳维亚出现过一种同质的维京时代文化。从一种宏观的进化论角度看，这个维京时代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一样，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维京人的过去完全属于斯堪的纳维亚诸民族，历史的主角是早期的维京国王们，特别是那些完成过统一的国王。只要可能，有关他们的历史都会基于文献资料，并通过考古发现加以说明，其主题是维京人的政治统一、航海活动以及皈依基督教的过程。到了

20世纪，维京文化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伟大文明”之一，人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兴起上。不过，相比他们所共有的语言和文化，地区间的差异是次要的，考古学的证据已经展示了这一点。

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外，维京人起初也被认为是古典时期前的蛮族文化的代表。但很快，英雄传奇的浪漫主义色彩便与人们对北欧世界重新燃起的兴趣以及向北欧寻祖问宗的努力结合在了一起。

在不列颠，维京人的重塑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种族意识、英勇观念和开创精神相关联。维京精神与维多利亚时代企业家和探险家的开创精神相应相合。于是，古诺尔斯语和盎格鲁 - 撒克逊语得以复兴，它们同古典语言一样成为大学的科目，尤其是在北部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和利兹，还有专门捐资开设的讲座。同时，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们也进一步激发起大众的兴趣，拉斐尔前派画家开始将注意力从古典人物转向挪威人和日耳曼人的英雄。甚至一些风景画也以此为主题，对他们来说，湖区〔2〕就是一幅凝固的维京时代风景画。1892年，旨在研究北欧的维京学社成立，并开始推出《萨迦读本》，这是第一本致力于维京研究的期刊。他们特别关注日耳曼神话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联系，这也促进了对维京雕塑的研究，因为它们既描绘异教神话中的重大事件也刻画基督教中的许多场景，强调两者并行存在。

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年）……与有角头盔

理查德·瓦格纳利用一系列传奇故事及其他资料，编成《尼伯龙根的指环》一剧，并在1869—1876年间首次公演。他对有关挪威人的资料进行了加工整理，将两个故事结合在了一起：一是西古尔德的传说，二是拉格纳罗克的传说，即挪威诸神的毁灭，写成了一部融合了日耳曼神话与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的混成作品。作品中有角头盔的形象很受大众欢迎，他在该剧中塑造的亨町

（Hunding）就戴了这样一顶头盔。在其后的戏剧创作中，有角头盔常伴瓦尔基里神，而最初的时候瓦尔基里戴的是带翼头盔。瓦格纳与他的服装和背景设计师卡尔·埃米尔·多普勒（Carl Emil Doepler）可能是从关于古代前维京时代日耳曼人的台剧中借用了这种服饰观念，并首次在原创于1865年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剧本中加以使用。

事实上，维京人是在19世纪首次获得有角头盔和带翼头盔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家们开始用艺术来表现神话故事，把日耳曼、凯尔特和古典的主题混为一体。斯韦德·古斯塔夫·马尔姆斯特罗姆（Swede Gustav Malmström）在为《弗里蒂奥卡萨迦》（1820—1825）的某个版本画插图时，为维京人的头盔安上了角，这也许是借用了斯堪的纳维亚史前岩壁艺术的某些观念。许多维京时代的人物形象都佩戴着有角头盔，但在奥塞贝格舟葬墓的一张挂毯上，他们在巡行仪式中则又扮成一副萨满教信徒的形象。遗存下来的有角头盔属于铁器时代，是19世纪60年代在泰晤士河边的滑铁卢桥附近挖掘出来的，现存于大英博物馆。部分维京武士在作战时的确戴有头盔，但只是简单的圆锥形之物，如在瑞典的耶尔蒙布所发现的，又或如米德尔顿十字架上所描绘的。

沃尔特·斯科特爵士对挪威人在苏格兰的历史很感兴趣，将其小说《海盗》（1828）的开场场景置于设得兰一个他称作“贾尔绍夫”的地方。一系列儿童读物也陆续出版发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巴兰坦（Ballantine）的《无畏者埃灵》（1869），以及萨拜因·巴林 - 古尔德（Sabine Baring-Gould）的《被逐者格雷特》（1890）。同时，历史学家们也在撰写关于维京人的学术著作。1841年，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出版了《论英雄、英雄崇拜与历史上的英雄》[3] 一书。在该书中，他将奥丁神作为强健有力、具有感召力的领袖的象征；1875年，他又出版了《挪威早期诸王》一书。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年）

威廉·莫里斯是一位设计师、作家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早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就对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莫里斯很欣赏那些挪威英雄，又跟随埃里克·马格努森（Eiríkr Magnússon）学习冰岛语，他们合译了一系列萨迦故事。他于1870年和1873年两次远航冰岛，这两次经历对他的艺术、诗歌和政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冰岛史诗《西古尔德与沃尔松》于1876年公开出版。莫里斯的拉斐尔前派艺术运动中的友人们，特别是伯恩-琼斯（Burne–Jones）和福特·马多克斯·布朗（Ford Madox Brown），其绘画中有不少表现的是浪漫的维京主题。但对于莫里斯来说，挪威人还是兢兢业业的社会主义者。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创始人之一，莫里斯身处1886—1887年不列颠政治动乱的中心。他的空想小说《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入门教本，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克莱门特·阿特利（Clement Atlee）与战后的福利国家。20世纪70年代，莫里斯关于环境的观点使他被公认为绿色政治的创始人之一。

威廉·科林伍德（William Collingwood，1854—1932年）

在牛津大学攻读人文科学期间，威廉·科林伍德得到了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赞助。1876—1878年，他在斯莱德学习，后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并兼任罗斯金的秘书，常随罗斯金四处游历考察，在科尼斯顿，他们也是毗邻而居。19世纪90年代，科林伍德一面提高绘画技能，一面定期在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文物与考古学会会刊上发表文章，后来他成为该刊编辑，之后又升为主编。科林伍德为挪威的传说所吸引，认为坎布里亚郡的湖区所展示的就是一幅挪威风景图。他以此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

小说，包括《小托尔斯坦》（1895）与《女奴》（1896）。1897年，他访问冰岛，之后与乔恩·斯蒂芬森（Jon Stefansson）一起出版了《在冰岛英雄传奇村庄朝圣》。他是维京俱乐部的成员并担任俱乐部主席，他对英格兰的挪威文化的艺术部分特别感兴趣，致力于建筑石雕的雕绘与编目。在去世前不久，他出版了《诺曼时代之前的诺森伯里亚十字架》（1927）一书，这也许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然而，总的看来，在英国历史学家的笔下，维京人往往是以危险狡诈的蛮族人形象出现的，借以衬托他们的英雄阿尔弗雷德大王。至于操日耳曼语的大不列颠统治者及其支持者将盎格鲁 - 撒克逊人视为祖先，这一点并不奇怪。对于英格兰人而言，直到现在，盎格鲁 - 撒克逊人一直是自己的祖先，称呼时用“我们”，而维京人则是外人，提到时则称“他们”。斯堪的纳维亚人仅在英格兰的部分区域定居，随后则是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重新征服”。在英格兰王国的统一进程中，它只如同一个短暂的插曲，与诺曼征服[4]不同，维京人的入侵并没有造成长期的根本性变化。

另外，在英格兰的维京人中没能产生一位历史学家；后人只能通过西撒克逊人的编年史来了解他们的活动状况。只要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认同西撒克逊人编年史的真实性，那么维京人在历史上的角色就势必不会得到足够的重视。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童被教导，是阿尔弗雷德大王赶走了入侵者，统一了国家，并创建了不列颠海军；他能同普通民众打成一片，尽管烤糊过他们的糕点。另一方面，维京人也被描绘成可敬可畏的对手，到19世纪末，他们几乎还被视为其所劫掠土地上的施惠者。他们被认为具有敢于冒险的高贵品质，在许多地方还被视为民主制度的创立者。

维京人与纳粹分子

在德国，纳粹分子对维京人的诠释则是用心险恶。19世纪后期，瓦格纳的神秘主义与尼采[5]（Nietzsche）的超人哲学相结合。一些德国人开始自认为是“优等种族”（即*Herrenwolk*）。维京人成了他们的祖先和效仿的典范，他们认为自己一定会击败其他国家的那些劣等民族。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后，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将这些观念融入了政党的政治主张中。纳粹分子力图把自己与斯堪的纳维亚所谓的雅利安民族联系在一起。他们在1933年掌握政权之后，开始征讨现代“颓废”文化，用他们自己的雅利安文化观念系统地取而代之。这种雅利安文化是基于维京文化、古挪威神话、瓦格纳作品以及日耳曼农民文化基础上的。在国家社会主义党（即纳粹党）的心目中，维京人金发碧眼，是清白谋生的典范。纳粹主义有一种非常极端的主张，即试图用古老的日耳曼诸神的异教思想，来取代基督教信仰。20世纪30年代，海泽比的考古发掘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沦为德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工具。纳粹党人希望籍此强调与斯堪的纳维亚民族的紧密联系，但这种联系事实上是没有多少依据的。

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右翼团体也吸取了类似的理念。挪威国家社会主义党在1935—1944年间，利用挪威西福尔郡的波尔公墓作为政治集会的背景：

> 我们在此相聚，因为这里安葬着将挪威统一成一个王国的人们。这些人将挪威的威名传遍了全世界。正是这些人，在俄罗斯建立了国家，并在某种意义上建立了大英帝国。

北欧新纳粹集团刻意宣扬皈依基督教之前的宗教信仰，并对一些维京遗址肆意妄断，特别是那些和民俗仪式有关的遗址，如旧乌普萨拉遗址。他们想籍此为自己的主张寻求理论上的合理合法性。

美国的赝品

对于许多现代北美居民而言，向欧洲寻根问祖已成为他们寻求自

己的独特文化身份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多人已找到证据，表明他们的祖先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就已经从欧洲移居北美，一些人还在不遗余力地创造证据。

1879年，一名瑞典移民到达了明尼苏达州的道格拉斯县，定居在肯辛顿镇。1898年，他宣称自己在田间挖地时发现了一大块如尼石碑，高约0.8米，位于一棵高大的白杨树树根下。铭文写道：

> 8名哥特人和22名挪威人出航，到文兰以西的海上探险。从此石碑向北经过一天的航行，我们来到两个多石的海湾附近扎营。一天，我们出去捕鱼，返回时，发现了10具血迹斑斑的尸体，死者都是我们的同伴。AVM [6] 使我们避开了恶魔。我们离开这座岛屿有14天的时间，当时安排了专人值班担任警戒，看护舰船。1362年。

不久，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的著名如尼文字学家就宣布，这块如尼石碑是一件赝品，因为其文字记载毫无意义。不过，在1948—1953年间，此石碑作为一件珍贵的人工制品在史密森博物馆展出。到1950年，至少有24块如尼石刻的碑石被援引为挪威人在北美定居的证据。随后，肯辛顿的如尼石碑被证明是在19世纪末用一种在明尼苏达有售的凿子雕刻的，人们也找到了那位农民，他是一名业余如尼文字爱好者，藏有大量有关如尼文的书籍。但是，在亚历山德里亚的如尼石刻博物馆，这件肯辛顿石碑仍作为获奖展品展出。

图17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张征兵海报

所谓文兰地图的真实性则是一个更具争议的话题。1965年，耶鲁大学出版了这幅地图，并公开拍卖，据称拍卖价高达100万美元。这是一幅用钢笔和墨水在薄薄的羊皮纸上绘成的世界地图。所表现的旧

大陆与中世纪的地图一致，并按习惯在大西洋中绘出了一些虚构的小岛。但它还包括了北大西洋上的两个大岛，一个为格陵兰岛，另一个标注为“文兰，由布亚尔尼和莱弗共同发现”。据推测，这幅地图是在德国或瑞士绘制的，很可能与1431—1449年的巴塞尔天主教会议有关。

事实上，这张地图也可能是一件赝品，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首先，图中的格陵兰被绘成了一个岛屿，但到1902年之前人们并没有发现它是一个岛屿。其次，北大西洋东部是基于16世纪葡萄牙地图绘制的，而这些葡萄牙地图直到19世纪晚期才受到广泛注意。最后，芝加哥实验室对墨迹的检验结果显示，其中含有一种最早于1917年才开始使用的钛颜料。事实上，如今这种墨迹在地图上的残留日益减少。但是，像所有上佳赝品一样，文兰地图也不会善罢甘休。1986年，地图上的墨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再次被进行分析。检测结果为，墨水中仅含有微量的钛，墨水与羊皮纸出现的时间与早前所称的15世纪是吻合的。肯辛顿的如尼石刻和文兰地图的有趣现象表明，对于那些愿意相信它们的人们来说，科学证据不再重要，只具有从属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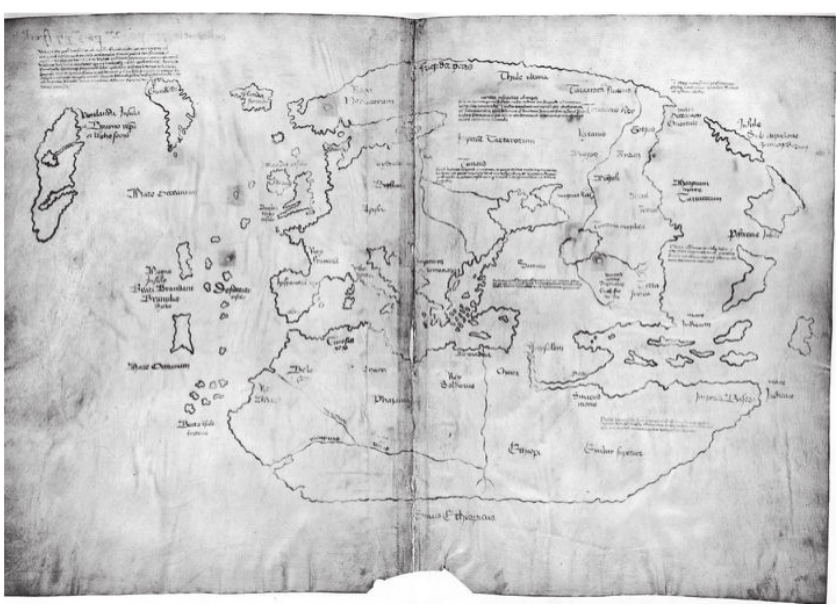

图18　文兰地图。这是15世纪的一幅用钢笔和墨水绘制的世界地图，文兰之地标注在左上角。

正如在撰写历史过程中常出现的情形一样，这一切也都掺杂了政治情感。美国人一直在试图寻找能证明其祖先是欧洲人的证据，而早期的努力是以牺牲北美印第安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人们无法接受当地伟大的建筑成就乃是野蛮文化的产物；而这种野蛮文化却几乎遭到了白种人的毁灭。所以，对于19世纪的殖民者来说，形成一个先入为主的说法是非常重要的。石结构建筑和墓冢被援引为维京人活动的证据，而不被认为是复杂精妙的古印第安文化或伊努伊特文化的杰作。虽然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遗物仍主要集中在19世纪中叶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移民区域，但发现遗物的地带一再扩展，直到整个美国东部沿海地区。

如今所传达出的信息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仍具有欺骗性。尽管能够被确认的维京人遗址仅仅只有加拿大的兰斯梅多斯遗址（参见此处），但在2000年，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还是举办了一场以维京为主题的展览会，以纪念莱弗·埃里克松抵达美洲的历史性航行1,000周年。为配合这次展览还出版了一本书（菲茨休与沃德编撰，2000），并由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作序。这位前第一夫人指出，维京妇女积极参与政治和宗教活动；而挪威人在格陵兰消失则可能是环境治理不善的结果。该书的主编认为，在美洲的确缺乏维京人长期定居的证据，但他们指出（参见此处）：

> 也许，双方接触的最重要结果是使得美洲印第安人熟悉了欧洲人的习惯、行为和物品，这对他们日后的交往互动非常有帮助。

约维克、DNA与今天的维京人

在21世纪，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和北美洲，维京人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含有维京元素的书籍畅销、电视节目受欢迎，人们利用维

京元素为商品作广告、吸引人们参观博物馆。当人们决定在约克建造一座新型博物馆时，其所选主题既不是罗马人，也不是盎格鲁 - 撒克逊人，而是维京人。该博物馆于1984年开放，来约维克维京中心的游客在第一年就超过了80万，名列三大旅游景点之首。随后，约维克又斥资400万英镑对其加以整修，2001年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宣布其重新开放，不久就迎来了第1,200万名游客。如今，游客们受邀回到过去，乘坐时光车，穿越10世纪的约维克，感受真实的维京时代。这里配备的背景声音系统、定向气雾喷雾器以及机器鸡，都可以为21世纪的游客提供真实的维京生活体验。

对于想寻求更为刺激的维京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昔日再现演剧团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它们在今天的欧洲、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北美洲迅速发展。这些演剧团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有些人特别注重形象细节，容不得服饰有任何年代错误；有些人只想找个合法的理由酣畅淋漓地打一架；有些人则是两种需求兼而有之。甚至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死亡拓荒者”的后裔也组建了一支维京演剧团。虽然部分演剧团最初都集中表现维京武士和强盗的形象，但随着时代的前进他们也在作出调整，现在他们也表现由商人、工匠和妇女儿童组成的维京群体。在不列颠，1971年成立的挪威电影和历史剧协会——“维京人”——是成立时间最长的再现黑暗时代的演剧团。他们定期出现在英格兰的文化遗址上，在电影和电视纪录片中临时出演战斗人员。协会成员被严格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如奴隶、半自由民、自由民和贵族。协会有成员600余人，其网址为www.vikingsonline.org.uk!

人们对维京人的兴趣还体现在金属测定上，这成了人们打发闲暇时光的另一种方式。在英格兰东部与斯堪的纳维亚部分地区，金属测定成为流行的喜好，并开始提供证据，证明当地曾为人口稠密的维京定居点。官方规划对各种考古遗物记录建档，并开始在公共领域（www.finds.org.uk）发布有关信息。无疑一些金属探测员是因为政府的财政资助而投入这项工作，有悖于考古工作者的精神；但也有许多人是因为对历史真正感兴趣而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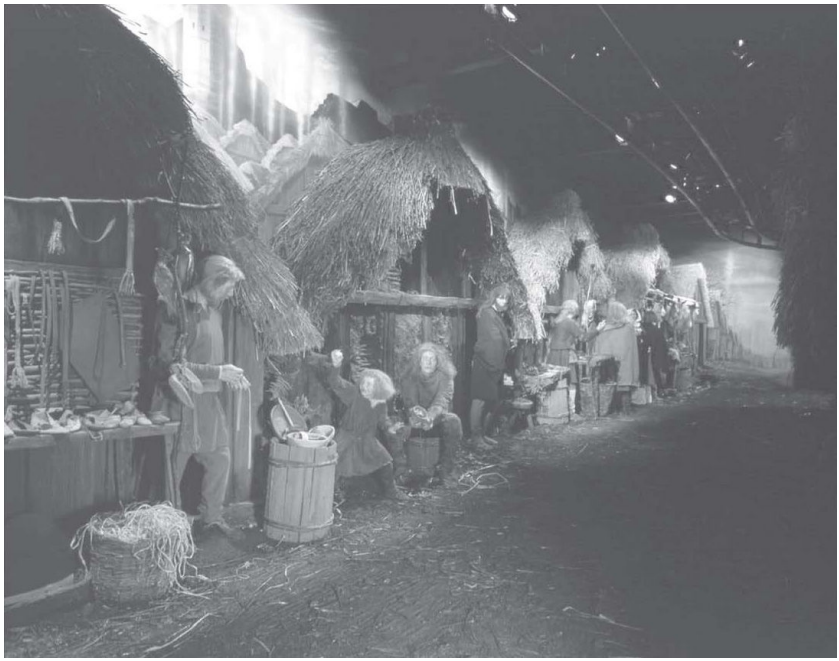

图19　约维克街景

还有些人相信，他们就是维京人，或者是维京人后裔。人们以为，确定维京基因是可行的。DNA研究误导了他们，提升了他们的期望。我不时收到信件和电子邮件，寄信者以为通过自己的头发颜色、家族姓氏或性格气质，就能证明他们是维京移居者的直系后裔。事实上，尽管我们可以通过DNA得出较有说服力的有关群体倾向性的结论，但我们很难得出任何关于个体的结论。从头发颜色或颅骨形状辨认维京人的方法更不可靠，因为人的体格特征只不过是基因的近似值，尽管血型可以提供与DNA检测较为接近的结果，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2001年，英国广播公司进行了一项基因调查，从许多地方采集人类DNA样本。他们主要选取小城镇，被测试者需要将其男性谱系向前追溯两代人，而且这两代人仍与其生活在同一乡村。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后来人口流动的影响，并且假定从1066年诺曼入侵到20世纪之间人口流动的范围并不大。该调查研究关注的是只有男性才携带的Y染

色体。在现代挪威采集的样本代表挪威的维京人，从丹麦采集的样本则代表丹麦的维京人。检测结果令人失望，但也不足为怪。在历史的长河中，英格兰东部屡屡遭受来自大陆毗邻地区的侵略。仅仅一部分的移民有史可稽，而大多数史前时期的移民并无文献记载。在英格兰，调查组在辨别撒克逊人与丹麦入侵者的DNA时遇到困难。苏格兰沿海岛屿提供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生活最确凿的证据。在北部诸岛和西部诸岛，以及苏格兰内地遥远北部地区，发现了挪威人的基因特征。在设得兰和奥克尼，60％的男性拥有挪威人的DNA。不过，要在现代居民中建立DNA的传播年谱是极其困难的。其他研究成果还发现，中央湖区与德比郡东北部的现代人的DNA与周边地区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与丹麦人的DNA更接近。

人们也试图研究出土遗骸的DNA，不过这类DNA受污染的几率很高。的确，最近一项检测的结果似乎表明，出自雷普顿的维京武士来自于非洲！虽然检测技术不断改良，但目前它们或许仍不可靠。牙齿的氧和锶同位素分析似乎更有前景。简单地说，我们饮用的水决定了我们是谁，孩提时代饮用水的化学成分会保留在牙齿里。（包括挪威在内的）部分地区地质环境独特，由此可以测定出当地饮用水的特征，并通过这种方式，将那些曾生长在此地的人确认出来，如那位来自阿迪克勒斯特里特的挪威妇女（参见此处 ）。

然而，我们在谈及“维京血统”或“维京基因”时，要避免将种族与民族文化特色混为一谈。基因并不决定我们所操的语言和所穿戴的衣饰，而文化因素同DNA一样，是决定我们是谁的重要因素。我们也深刻意识到，基于生物种族而形成的观念是很危险的。现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已采用“民族”一词来表达文化上而非种族上的认同。

雅克塔·霍克斯（Jacquetta Hawkes）有一句名言：“每个时代都会拥有其巨石阵[7]”。其意思是，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巨石阵成为德鲁伊特神殿、飞碟着陆点，或者天文日历。这种说法也适用于维京人的故事。根据我们的期望，维京人由高尚的野蛮人、劫掠者和盗匪，变为强奸犯、和平交易者、企业家、探险家、早期民主人士，或者宜家的销售员工。这本小书试图结合新近的考古研究成果，来追寻

这支在9—11世纪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民族的重要信息及其扩张的轨迹，这些扩张活动将他们与中世纪早期的社会体系连接起来。笔者考察了维京这个术语在他们身上的演化过程，以及自冰岛萨迦到21世纪独具吸引力的文化遗产，他们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塑。

我们会在不同场合遇到斯堪的纳维亚殖民者，他们所表现的维京人的特性会迥然不同，因而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加以修饰和限定。一名10世纪早期诺森伯里亚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可能仍然保留着挪威人的口音，但已经引入了不少英语。当他步入日益兴隆的约维克的城区市场时，他将看到新的酒窖和木屋店铺，与昔日的盎格鲁 - 撒克逊房屋或丹麦房屋有所不同。他可以在约维克为他的英格兰新娘购买新胸针，这种饰品融合了两种时尚元素，既不同于其母亲佩戴的式样，也不同于家乡妇女所佩戴的式样。当他去世时，如果家境殷实，他可以指望在其墓前竖立一座石碑，既不同于其父之墓，也不同于英格兰人之墓。如果说维京人的研究对我们而言有什么现代意义的话，那就是民族文化特色这一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更加深入的研究将有助于阐明新特色形成的情境及表现方式；不仅对维京人的研究如此，对所有社会的研究都是如此。

注释

〔1〕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

〔2〕湖区（Lake Discrict），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风景区，包括坎布里亚山脉和大约15个湖。

〔3〕《论英雄、英雄崇拜与历史上的英雄》，亦译作《英雄与英雄崇拜》。在该书中，卡莱尔将人类自古以来的各种英雄归纳为6种类型，奥丁就是第一类即“神话型英雄”的代表。

〔4〕1066年，以诺曼底公爵威廉为首的法国封建主出兵征服英国，并对其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在英国历史上影响巨大而深远。

〔5〕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诗人和散文家。

〔6〕AVM，即Ave Maria，“万福玛丽亚”，为基督教的祈祷文。

〔7〕巨石阵（Stonehenge），又称索尔兹伯里石环、史前石桌、斯通亨治

石栏等，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主体由几十块巨大的石柱组成，约建于公元前4000—前2000年，属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自发现以来，人们对其建筑过程和作用有过多种推测。

大事年表

700年 800年 900年 1000年 1100年 1200年 1300年 1400年

斯堪的纳维亚

约704—710年，里伯建城； 约900年，奥胡斯建城

里伯出现铸币 948年向海泽比、里伯和奥胡斯委任主教

726年，坎哈夫运河建成 约965年，青齿王哈拉尔皈依基督教

737年，丹麦边墙初步建成 约980年，特雷勒堡古堡建成

1027年，在罗斯基勒出现首座石结构教堂

约750年，比尔卡建城 约995年，在西格图纳出现铸币

808年，雷里克被毁，海泽比建城 11世纪70年代，斯库勒莱乌舰船沉入海底

9世纪20年代， 约980年，“海泽比1号船”建成

安斯加尔首次传教之旅

834年，奥塞贝格舟葬

约9世纪80年代，金发王哈拉尔试图统一挪威

995年，奥拉夫一世统一挪威

10世纪90年代，特隆赫姆建城

1050年，特隆赫姆出现铸币

欧洲大陆

800年，查理曼大帝加冕

799年，维京人首度袭掠法兰克王国

834—837年，多雷斯塔连续4年遭到维京人的袭掠

852年，一支维京舰队在塞纳河越冬

911年罗洛创建诺曼底

10世纪30年代，维京人被逐出布列塔尼

欧洲东部

约862年，鲁里克成为诺夫哥罗德的统治者

882年，基辅建城

700年 800年 900年 1000年 1100年 1200年 1300年 1400年

约910—912年，维京舰队在里海上游弋

10世纪80年代，罗斯人皈依东正教

737年，丹麦边墙初步建成 约1040年，英瓦尔远征东方

不列颠群岛 8世纪90年代，维京人首次袭掠活动 1066年，斯坦福桥战役

9世纪60年代，维京人频频袭掠英格兰

约10世纪50年代，维京人频频袭掠威尔士

867年，丹麦人攻占约克

954年，血斧王埃里克被逐出约克

9世纪70年代， 991年，马尔登之战

维京人在英格兰定居 1016—1035年，英格兰国王克努特在位

871—899年，韦塞克斯之王

阿尔弗雷德在位

约870年，设立奥克尼伯爵 1117年，马格努斯在埃吉尔塞殉难

841年，在都柏林筑起了朗弗茨营寨 12世纪60年代，诺曼人征服了爱尔兰

902年，维京人被逐出都柏林

北大西洋地区 约800年，爱尔兰隐士在法罗群岛和冰岛

约860年，挪威人在法罗群岛定居

约870—930年，挪威人在冰岛定居 冰岛萨迦

930年，冰岛国民大会“阿尔庭”成立

约1000年，冰岛皈依基督教

格陵兰和北美洲 约985年，红发埃里克在格陵兰定居 约1350年，约1450年，

“西拓居区”“东拓居区”

被废弃 被废弃

约1125年，在加达建立主教辖区

约1000年，远航文兰

他们是横行北大西洋海域的劫掠者；是四处寻找宝藏的探险家；是心灵手巧的手工业者；是不畏艰险的商人……不同的背景下，“北欧海盗”有着不同的身份。到底何为真实的历史？

朱利安·D．理查兹教授借助近代考古发现，结合现代历史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全面地考察了维京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为我们揭开了神秘的“北欧海盗”之谜。

百科通识文库

49

美国简史

保罗·S博耶 著

陈崛斌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美国简史

保罗·S.博耶 著

陈崛斌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15-5164**

American Histor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2.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12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2012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简史 / （美）博耶（Boyer, P.S.）著；陈崛斌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43-1

I．①美… II．①博…②陈… III．①美国 - 历史 - 通俗读物
IV．①K7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797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文雪琴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43-1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前言
第一章　发端：1763年前早期史
第二章　1763—1789：革命、制宪和新共和国的诞生
第三章　1789—1850：新共和国的希望与隐忧
第四章　1850—1865：奴隶制与美国内战
第五章　1866—1900：工业化及其后果
第六章　1900—1920：改革与战争
第七章　1920—1945：从冲突到全球大国
第八章　1945—1968：富足与社会动荡
第九章　当代美国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保罗·S.博耶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历史教授，曾任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主编过《美国历史小百科》（2001），与他人合著《巫术的社会根源》（1974），出版过专著《原子时代的美国思想和文化》（1985）等。

译者简介

陈崛斌　　美国研究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讲师，《美国研究读本》（一、二辑）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中美关系史、美国外交史。

图目

图1　科罗拉多州梅萨维德国家公园崖壁居室遗迹。由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北美印第安人修建，后由于降水量骤减，在12—13世纪被逐渐遗弃。

图2　托马斯·佩因出版的《常识》（1776年）极具煽动性，迅速在各个殖民地广泛传播开来，最终加速了殖民地与英国的决裂，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图3　在这幅1851年出品的禁酒海报上，一位年轻男士拒绝了身穿黑色长袍的妖艳女子递来的一杯酒，而选择了白衣少女奉上的清水。海报反映了那是一个倡导道德改革的年代。

图4　1863年7月5日，葛底斯堡战场上的南方士兵尸体。内战中，一些摄像师深入战场，带回的影像向平民们展现了战争杀戮的恐怖画面。

图5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附近霍姆斯特德的安德鲁·卡内基巨穴般的钢铁厂内景。这样的工厂是美国内战后工业发展的标志，从很多方面改变了美国。

图6　1871年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所作纽约政治大佬威廉·M.特威德漫画像。在19世纪末期，过快增长让很多美国城市准备不足，城市被腐败政客把持，从而引发了市政改革运动浪潮。

图7　警察在处理1911年纽约市三角制衣厂大火受害者尸体。这场致使141名年轻制衣工丧生的火灾震惊了全国，引发了人们关注由于工业发展缺乏管制而带来的社会和人身安全问题。

图8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于1906年参观巴拿马运河建设工地。巴拿马运河象征着美国崛起为世界性强国，罗斯福也为总统职位注入了好斗的活力和激进主义。

图9　在旧金山参加了1920年全国妇女党大会后，大会法律秘书莫德·

扬格（Maude Younger）开车返回华盛顿后在查看她的福特车。尽管妇女已经获得了投票权，但是汽车的出现赋予了妇女自由和机动性，让她们有进一步获得解放的感觉。

图10 1943年1月，温斯顿·丘吉尔首相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晤。他们宣布盟军战斗目标是迫使敌方“无条件投降”，并就开辟反纳粹德国的第二战场的位置进行了讨论。战争期间，两国领导人多次会面，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图11 1963年8月28日的华盛顿大游行吸引了25万人来到国家广场。在这次民权运动盛会中，参与者们在林肯纪念堂前聆听了马丁·路德·金那场难忘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图12 2009年9月9日，在严重的经济衰退背景下，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向国会陈述政府的经济复苏计划。尽管奥巴马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仍然和其他现代政客一样使用了提字器。在图中，讲台上奥巴马左侧可以看到提字器。

前言

对任何人而言，要写一部美国历史，必将遭遇各种挑战，无法轻易完成。其中，最艰难的莫过于突破由迷思、先入之见和意识形态抽象概念所构成的层层迷雾，因为这层层迷雾往往会遮蔽我们的视线，让我们无法看清美国历史的真相。从被欧洲航海者最初发现之时起，大西洋彼岸的这片土地在众人的笔下就被寄予了各种希望、梦想和疯狂的想象。尽管早在地理大发现之前，这块广袤的大陆就居住着好几百万原住民、衍生着复杂的社会体系，欧洲人还是一厢情愿地把它想象成一片诱人的、充满无限机遇的无主之地，并称之为“新世界”。在1516年，也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加勒比海小岛登陆24年之后，英国哲学家、政治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出版过一本书。在这本书里，莫尔虚构了一个他称为“乌托邦”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就位于今天巴西附近的小岛上。在这个虚构的新世界里，处处都是和谐、合作与平等的景象，人们共同拥有财产，对黄金嗤之以鼻。（书中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在乌托邦里，人们使用的夜壶都是金子做的。莫尔以此证明在乌托邦人们的眼中金子是多么地不值一文。）

几个世纪之后，当移民像潮水般涌入美国时，很多人都怀揣着有关这片土地的美好梦想，而矗立于纽约港中的自由女神像就是这些美好梦想的象征。在自由女神像的底座上，镌刻着埃玛·拉扎勒斯（Emma Lazarus）创作于1883年的诗，以下是该诗的结束语：

把你们拥挤土地上的不幸的‘人渣’，
穷困潦倒而渴望呼吸自由的芸芸众生，
连同那些无家可归四处漂泊的人们送来，
我高举明灯守候在这金色的大门！[1]

最后，一些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另一些人的梦想却在痛苦与失望中崩塌。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交织着成功与失败的现实很快就取代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被迫来到美国的几百万受奴役的非洲

人而言，他们甚至从未有过美好的幻想，他们的移民生活只有残酷的现实。）

在另一些人眼中，新世界被赋予了宗教的神圣色彩。哥伦布在晚年就坚信是上帝指引了他的发现之旅，从而实现了《圣经》中对新千禧年的预言。再后来，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们则相信，美国在上帝的神圣计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最终将在地球上建立基督的国度。直到现在，很多美国福音派信徒们仍相信，在上帝的宇宙蓝图中美国占有特殊位置——抑或是哀叹世俗的污垢造成了美国的堕落，使得美国丧失了曾经享有的天赐。

这种宗教色彩略世俗些的表现是美国例外论，这种观点渗透进诸多历史学作品和教科书中。这些书籍总是有选择性地对美国历史进行解读。自然地，这个国家的历史也就变成了有关自由、机遇和无限发展的历史，而那些不受上帝眷顾的社会中存在的阴暗和剥削从未在美国出现过。后来，随着历史事实不断被挖掘出来以及超自然主义假设的逐渐失势，这些自利偏颇的解读逐渐淡出视线。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当里根总统再次提起作为“光芒万丈的山巅之城”的美国如何独享上帝眷顾时，很多美国人仍为之一振。

还有一些人则认为，“美国”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代表着不祥。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以及新殖民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的强烈反对者而言，美国是后期资本主义的缩影，为了攫取市场、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而将自己的触手伸向世界各地。而在那些珍视民俗传统和地区文化的人们口中，美国则变成了劣质的、腐化的全球大众文化的源头。尽管不无可取之处，这些成见却远非美国历史的全貌。伊斯兰革命者则只相信《古兰经》中安拉所说的正义秩序，在他们眼中美国甚至变成了大撒旦，是阻碍梦想的巨大障碍。

虽然思想史学家对此颇感兴趣，但这纷繁复杂的各种迷思、理想化的抽象概念和意识形态框架却让我们难以摒除偏见和排除外设议题的限制，进而阻碍我们正确理解真正的美国历史。虽然绝对的历史客观性并不存在，但它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本书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细节的论点，也就不会生搬硬套地用历史事件来支持这一论点，而是采

用宽泛的历史事实来构建叙事框架，包括移民、城镇化、奴隶制、大陆扩张、美国的全球实力、宗教的中心性，以及美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逐步发展。在详述美国这些重大历史议题的同时，本书也将涵盖美国历史的多样性、历史人物的重要性，以及在美国历史大背景下种族、族裔、性别和社会阶层对塑造特定群体历史经验的重要作用。

在阐释美国历史这个宏大议题时，本书尽量避免了或美化拔高或全面否定的处理方式。诚然，从当代的角度看，和许多国家的历史一样，美国历史的很多方面会招致批判和说教，而历史事实与沙文主义者、政客和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的高调言论间存在的差距甚至让人觉得荒谬和讽刺。但是，这样的一种立场本身就包含着曲解。自始至终，本书的目的都是用一种批判的、平衡的、尽量免除意识形态影响的方式来讲述美国的历史，让读者可以在有必要时自己作出评判。尽管美国历史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它仍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具有人类历史的共性，是世界历史巨著中尚未完成的一个小篇章，而世界历史本身就是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谓的“扭曲的人性之材”的积累和汇集。这本小书绝不是要对美国历史作结或定性，它只是作者本人尽己所能观察和记录美国历史的一些成果，而作者本人也是美国社会的产物和这个国家的一员。

相比一般的美国通史，写一本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读完的美国简史还要面临更多挑战：很多历史事件不得不被省略，众多历史掌故很遗憾地无法顾及，大量有助于得出一般化结论的关联史实也只能留给大部头作品。但是，简史也有自己的长处。简洁的形式促使作者慎重地选择真正重要的历史内容，专注于主要的历史线索，重点描述关键历史转折点和具有深远意义的主题。此外，简史更加注重内容的清晰度和可读性，这样才对得起那些愿意花几个小时读一位不知名作者作品的读者。唯盼我的这本小书不至令读者太过失望。

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2012年1月

注释

〔1〕 该诗名为《现代巨人》（*The New Colossus* ），译文来自美国驻华大使馆官网，译者不详。——译者注，下同

第一章

发端：1763年前早期史

在二十一世纪，美国人过着快节奏的生活，很少有人会放慢节奏来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早在几千年以前就有人居住。在这块被我们称为北美洲（北美洲音译为“北亚美利加洲”，以佛罗伦萨制图师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命名）的大陆上，最早的人类定居活动可以追溯到一万五千年前，来自西伯利亚的人类部族乘船或穿越已经消失的大陆桥来到了今天的阿拉斯加地区。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这些早期美国人逐渐向南、向东迁移，在气候和地形千差万别的新大陆上散布开来，形成了语言、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各异的不同部族。

在今天的新墨西哥州境内，阿纳萨齐族印第安人最早建立了普韦布洛定居点，他们制作珠宝和彩绘陶器，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顽强地繁衍生息。从此地往东，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在卡霍基亚（在今天的东圣路易斯境内）交汇，这里是印第安文化的一个重要诞生地。继续往东，在大西洋沿岸，各个部族和部落主要从事狩猎、农耕和捕鱼等生产活动。他们发展邦交关系，有时也会开战，还维持着广泛的贸易关系。1450年后的某一天，来自五大部落的首领在今天的纽约州北部聚首，并建立了联盟关系，史称“易洛魁部落联盟”。在西部平原地区，即大湖区周边和今天的中西部偏北地区，根据各自不同的生态环境，各部族靠农耕、捕鱼或狩猎美洲水牛为生。

据估计，到1500年，北美洲人口已经达到700至1,000万。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人口也高达数百万，玛雅文明、阿兹台克文明和当时仍在扩张的印加帝国也已经繁荣了千余年。

然而，当时这些古代文明并不为欧洲人所知。早在1000年左右，利夫·埃里克松（Leif Erikson）和其他北欧航海家就曾到过北美洲东北角地区，甚至在纽芬兰建立了短期定居点。除此类零星接触外，北美印第安人和欧洲人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然而，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并给大洋两岸的居民带来重大影响。

图1　科罗拉多州梅萨维德国家公园崖壁居室遗迹。由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北美印第安人修建，后由于降水量骤减，在12—13世纪被逐渐遗弃。

地理大发现时期

十五世纪后期，思想革命、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席卷欧洲各国。为了缩短与亚洲贸易的航程，葡萄牙航海家冒险绕过非洲之角，向东抵达印度。另一些冒险家则选择了风险更大的航线，向西航行跨越大西洋。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是其中一位，他说服了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Ferdinand）和皇后伊莎贝拉（Isabella）资助他率领船队跨越大西洋。由于错误估算地球的体积，也不知道在他的航线上幸运地横亘着一片广袤大陆，哥伦布于1492年8月3日从西班牙帕洛斯港起锚，带领这支由三条船构成的小船队向西航行驶向亚洲。是年10月12日，哥伦布的船队在一座小岛登陆，并将小岛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岛。哥伦布坚信自己已经来到印度，因此称当地岛民为“印第安人”，这个名字也就这样一直流传了下来。

这股航海探险潮有着复杂的经济、政治和宗教动因。而哥伦布本人也梦想着获得更多财富和名誉，并热衷于教化印第安人成为基督徒

（故而在初次登岛后又进行了三次远航）。同时，哥伦布笃信他的航程实现了圣经中的预言，这也是美国一直被视为上帝眷顾之地的早期表现之一。对于资助哥伦布的西班牙王室而言，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将扩展他们统治的地域、帮助他们胜过欧洲对手并收获巨大的财富——人们认为，这就是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提到的“美好新世界”，遍地黄金。

欧洲殖民扩张时期

很快，欧洲的海洋强国就纷纷踏上了哥伦布开拓的航线，并开始宣誓主权。首先，西班牙先后在今天的佛罗里达（圣奥古斯丁，1565年）、新墨西哥（圣塔菲，1609年）、加勒比海、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等地建立了殖民定居点，来自西班牙的士兵、探险者、殖民统治者、天主教传教士随即涌向美洲大陆。

很快，荷兰的殖民地也在北美建立起来。在1609年，受聘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航海家亨利·哈得孙（Herry Hudson）抵达了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哈得孙河，并溯河而上进行探险。到162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德拉瓦印第安部落购买了曼哈顿岛上的一块土地，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东印度公司将哈得孙河沿岸的土地授予大庄园主，大庄园主向在此定居的佃农收租和赋税。

在这场帝国之争中，英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很快就赶了上来。16世纪30年代的新教改革对英属北美殖民地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除马里兰外，其他英属殖民地都有浓厚的新教色彩。（天主教信徒塞西莉厄斯·卡尔弗特[Cecilius Calvert]在1632年获查理一世[Charles I]颁布的特许状，建立了马里兰殖民地，成为英国本土天主教徒的避难所。）

英国人将他们在北美的第一个殖民定居点所在地区命名为弗吉尼亚[1]，以此纪念童贞女皇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1607年，在一家名为“冒险家”的投资公司的资助下，约600名各色殖民者抵达

了今天的弗吉尼亚，并建立了以伊丽莎白一世的继承者詹姆斯一世（James Ⅰ）的名字命名的詹姆斯敦要塞。“冒险家”对黄金白银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最早的殖民者大多数死于疾病、饥荒和来自印第安人的进攻。然而，自1611年烟草种植业被引入弗吉尼亚后，当时欧洲盛行的抽烟袋风尚使得烟草出口给殖民地带来丰厚利润。尽管早在1604年，詹姆斯一世就在一本小册子中对烟草进行了抨击，称吸烟的习惯“视之可憎，嗅之可恶，伤神伤身”，但是收效甚微。

英国开始向南方推进，从南北卡罗来纳到佐治亚，建立了更多的殖民地，直抵西班牙在佛罗里达的前哨。烟草业也成为南方这些新建殖民地的支柱产业，辅以水稻和槐蓝属植物种植。尽管英国新教仍是主流教派，但宗教信仰也逐步开始多元化。苏格兰长老会主张去中心化的教会管理结构；贵格会倡导简朴的生活方式和个人与上帝直接联系的“内心灵光”；卫理公会和浸信会则认为信徒与上帝的直接联系和自由自愿的信仰比宗教形式和仪式更加重要。

从詹姆斯敦往北，在1620年，一群完全脱离英国教会的教徒在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地区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在抵达北美之前，这群被称为“漫游者”的教徒曾流亡荷兰。1621年这些殖民者邀请当地的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共同庆祝丰收，并由此演变成美国的重要节日之一：感恩节。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用朴素的语言记录了这段历史，这些文字也成为早期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

1630年，规模更大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在波士顿建立，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该殖民地的创建人并非分离主义者，而是“清教徒”，因为他们渴望通过清除残存的天主教因素，以达到净化英国国教的目的。在后世的一些讽刺漫画中，清教徒往往被刻画成无趣的故作正经之徒。清教徒信仰一套独特的教义，包括：宗教信仰是朴素的，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主张政教彻底分离，会众实行自治，教会成员必须证明自己有皈依教会的亲身经验。

在经历了殖民初期的苦难后，新英格兰人的健康状况快速改善，寿命大幅延长，地域范围向南延伸到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向北扩展至

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和缅因。在耕作、捕鱼和城镇工作之外，新英格兰人开始发展海洋贸易。商船从新英格兰出发，满载木材、粮食、松脂和鳕鱼干，驶向英国及西印度群岛的英国殖民地，返航时，船队从西印度群岛带回糖和用来蒸馏生产朗姆酒的甘蔗糖蜜，从英国本土带回茶、家具、餐具和其他制造业产品。

随后，英国在大西洋中部沿岸地区建立了宾夕法尼亚、纽约、特拉华和新泽西殖民地，至此，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努力也告一段落。首先，为感谢海军上将老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在1660年英国王室复辟中的功绩，查理二世（Charles II）于1861年向老佩恩之子小威廉·佩恩颁发特许证，特许其在北美建立新的殖民地、并担任殖民地总督。小威廉·佩恩是贵格会信徒，以自己的名字将新殖民地命名为宾夕法尼亚，在这里进行“神圣实验”。在他的领导下，宾夕法尼亚敞开大门，收留受到迫害的英国贵格会信徒，以及来自瑞士和德国的门诺派教徒等持不同意见的欧洲宗教难民。

在英国和荷兰冲突的历史大背景下，新阿姆斯特丹总督于1664年向英国占领军投降。随后，这个多民族聚居的殖民地（以约克公爵、即未来的查理二世之名）更名为纽约，成为哈得孙河谷里繁荣的商业中心和富饶的农业腹地。随着荷兰大庄园主日渐式微，新英格兰地区的私人农场模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特拉华最早是瑞典殖民者建立的毛皮交易点，后落入荷兰手中，最后由英国人占领。新泽西州原本是纽约的一部分，查理二世将这片土地从纽约划分出来，授予一批颇具争议的殖民者经营。新泽西于1702年成为英国皇家殖民地。

印第安人与殖民者：宿命的邂逅

美国历史学家曾一厢情愿地神化哥伦布航海之前的美洲，称其为“处女地”，只是一片空荡的荒野。事实上，欧洲殖民者却遭遇了分布广泛、复杂而历史悠久的印第安部落社会。这种邂逅，对殖民者和

印第安人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双方交往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谈判、贸易和战略联盟，也有血腥冲突、新型疾病（因为没有免疫能力，印第安部落几乎被天花病毒毁灭）和因为宇宙观、社会体系不同所带来的误解。

在西班牙殖民地内，传教士和世俗统治者将印第安人当成劳工、传教对象，甚至有时是死敌。1680年，近400名西班牙官员和传教士在普韦布洛和阿帕奇印第安人起义中丧生。12年后，西班牙人才重新在这个地区取得控制权。哥伦布对原住民的认识成为后世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态度的模板。哥伦布写道："他们理应成为忠诚且技艺娴熟的好仆人……我个人认为，将他们教化为基督徒并非难事……只要给我50个手下，我就可以征服他们所有人，并按照我的意志统治他们。"

在英国殖民地，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的关系一度比较和谐，有时甚至会结成联盟以对抗共同敌人。比如，在1637年，康涅狄格的殖民者曾与莫希干族和纳拉甘西特族印第安人结盟对佩科特人发起进攻。在这次行动中，康涅狄格殖民者的民兵烧毁了一座佩科特村落，杀死了企图逃亡的几百名佩科特人，男女老少皆不放过。

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常常往掠夺和暴力方向发展，而双方对财产所有权的不同理解使得这种情况更加恶化。对于印第安人而言，土地是用来生产生活的，应该共享；欧洲殖民者却强调土地所有权的约束力和排他性。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差距，以及殖民者对印第安人领地的无情扩张，激烈冲突不断爆发。1622年，波瓦坦印第安人起义中，大批詹姆斯敦殖民者在冲突中丧生；1763年，萨斯奎汉纳河流域的苏格兰和爱尔兰殖民者，以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殖民统治者无视边防安全为由，向邻近的康纳斯多格族印第安村庄发起进攻，杀害无辜的康纳斯多格族印第安人，并剥下他们的头皮作为战利品。

在新英格兰地区，因为对殖民者圈地扩张忍无可忍，万帕诺亚格部落首领梅塔卡姆[2]（Metacom）向殖民者宣战，积蓄已久的矛盾在1675—1676年间彻底爆发。印第安战士越过边界，杀死了2,500余名殖民者。殖民者军队的反击造成了同样的杀戮，大批印第安人死于

冲突或被捕成为奴隶。梅塔卡姆战败被砍头，他的头颅被殖民者作为战利品示众。

简而言之，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北美就开启了印第安人在冲突、新型疾病和白人殖民者疯狂进攻下大批死亡的悲惨历史。截至1800年，美国印第安总人口约为60万，而欧洲殖民者来到之前，北美印第安人口据估计曾高达220万，这种对比触目惊心。

奴隶制在美国扎根

在这个时期，奴隶制开始在北美发展起来，也因此埋下了日后美国内战和种族歧视的种子。奴隶制曾在古代社会盛行，并在非洲和阿拉伯地区长期存在和发展。如今，奴隶制如同病毒一般蔓延，跨越大西洋被带到北美。

1619年，第一艘贩奴船抵达詹姆斯敦，更多贩奴船紧随其后。最初，非洲黑奴只是那没有自由的劳动力大军中的一部分，与白人契约奴一起工作。后者需要为雇主工作一段时间，以偿付来到美国的旅费。白人契约奴在契约期满后，他们本人及其后代就可以成为自由劳动者，但是非洲黑奴的命运则完全不同。黑奴不仅在文化和种族上是外来者，他们深色的皮肤更成为他们不自由身份的标志，永远无法摆脱奴隶身份。弗吉尼亚就曾于1705年立法规定黑奴身份通过母亲遗传，并且不可改变（由此，白人奴隶主和黑人女奴所生的孩子也被纳入奴隶阶层）。

很快，奴隶制蔓延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以及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其他殖民地。英国贩奴船是黑奴贸易的主力，而新英格兰的商船也参与其中。很快，在北美的各个殖民地都出现了黑奴的身影，尤其集中在主要生产烟草和稻米的弗吉尼亚、马里兰及以南各殖民地。截至1790年，北美地区黑奴总数约为70万人左右。

尽管黑奴起义时有发生，例如1712年在纽约、1739年在南卡罗来纳，但是均遭到血腥镇压。一些新英格兰人以及宾夕法尼亚的贵格

会信徒和门诺派教徒提出黑奴贸易有违道义，但是由于势单力薄，他们的抗议未能取得成效。渐渐地，奴隶制融入了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生活，直至19世纪60年代才被取缔，而奴隶制的影响则更加深远。

新的社会组织结构逐渐成型

就1492年到1776年间近300年的美国历史而言，一般美国人的记忆中只有一些零星的、半神话色彩的影像，而早期历史教材也是这样写的：美丽的印第安公主在詹姆斯敦救了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命；意志坚定的清教徒开拓者在普利茅斯岩登陆；荷兰人用一些不值钱的小装饰品买下了整个曼哈顿岛；塞勒姆的女巫被处以绞刑；西班牙传教士在加利福尼亚传道的浪漫主义画卷。

然而，在这个时代，新的社会模式和思维方式开始出现并延续下来。尽管欧洲殖民者、印第安人和非洲黑奴之间的关系让人不安，但是殖民地时期的一些现象却对美国的未来产生了长远的重大影响。

早在《独立宣言》之前，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就享受着事实独立，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自治和经济自主。尽管英国政府号称拥有最终统治权，但事实上，北美各殖民地越来越多地实行自治。很多殖民者并不认为自己是英国子民。伦敦派往北美的官员强调英国政府的权威，并要求殖民地服从英国政府，而这往往只会激怒殖民地人民。

同样，殖民者越来越倾向于从殖民地本身的角度出发来考虑经济问题，而不是从英帝国的角度。毫无疑问，英国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压制这种转变。根据重商主义理论，英国及其殖民地被视为伦敦掌控下的同一个经济体。在1651年到1733年间，英国议会颁布了一系列航海法案，试图将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统一在帝国经济体系之下，即：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并从英国进口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在一定程度上，重商主义刺激了殖民地的经济增长（比如造船业、渔业、烟草种植业、松脂生产）。然而，正如在政治领域一样，殖民者更加关注殖民地本身而不是遥远的英国的经济利益。因此，独立是一个过

程，而非某个单一事件。

在殖民地时期，宗教得到很大发展，牧师往往扮演着思想和社会领袖的角色。但是，殖民地的宗教文化非常多元，没有任何一个教派能够在所有殖民地取得支配地位。比如，英国国教徒在弗吉尼亚是多数派，在其他殖民地却很少；清教公理会则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贵格会在宾夕法尼亚处于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却没有什么影响力。统一的宗教信仰难以在任何一个殖民地实现。1635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塞勒姆市的牧师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因宣扬非正统观点而被驱逐，他和信徒随后迁居邻近的罗德岛。在宾夕法尼亚西部，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对在费城占支配地位的贵格会发起了挑战。在弗吉尼亚，浸礼会和卫理公会则一直抵制英国国教在该殖民地的统治地位。截至18世纪后期，弗吉尼亚的自然神论者和新英格兰的一位论派更是完全摒弃了正统基督教教义。尽管一些人对这种多元化感到失望，但是多元化却实实在在地激发了宗教的活力。在北美殖民地，不同宗教团体自由竞争，避免了出现占统治地位的单一教会，而宗教的影响力却得到了整体提升。

新教徒相信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才能得到救赎。在这种大背景下，宗教多元化更是激发了殖民地人们的宗教热情，进一步削弱了教会等级制度的影响力。18世纪40年代，“大觉醒运动”在北美掀起了一波信仰复兴运动，并迅速席卷各殖民地。在这其中，英国福音传道士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和一批在殖民地成长起来的传教士扮演了重要角色。

马萨诸塞的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是信仰复兴运动早期的推动者之一。在1741年，他做了题为《落在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的布道，给了众多未获救赎之人一记惊雷。作为一名博学的神学家、牧师和信仰复兴活动家，爱德华兹运用当时最新的意志学理论来证明那种能够引起信众情绪激动的布道方式的合理性。在熟练运用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理论的同时，爱德华兹重申了正统基督教信条，包括卡尔文派有关上帝万能和人类原罪的观点。爱德华兹一生著作颇丰，尽管在1758年即将前往新泽西出任普林

斯顿学院校长之际英年早逝，他的作品集仍长达26卷。

信仰复兴活动家们在接受他们的教堂及其他集会场合发表演讲，呼吁所有人进行忏悔，并指出洗礼和加入教会是远远不够的。大众对宗教的虔诚信仰不仅催生了传教组织和新的教派，更是殖民地时期的又一主要遗产。尽管当初的户外布道集会已经被电视布道和城郊大教堂所取代，布道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在21世纪的美国社会，福音派信仰仍然虔诚，传教热情依旧炽烈。

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有一种强烈的神圣使命感，坚信自己有着与众不同的天命。在乘船前往美洲大陆途中，后来成为马萨诸塞第一任总督的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发表演讲，称即将建立的定居点是“山巅之城”，是上帝为人类发展设定的模范。后代牧师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不断阐释。这种神圣使命感源自对宗教历史的一种特殊解读，即：正如上帝在古代选中犹太人一般，上帝选中清教徒在美洲建立新的天国。这种坚信美国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独特作用的信仰一直延续下来，并成为普通美国人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然而，清教牧师也警告说，一旦人们不再虔诚，报应惩罚就会随之而来，正如犹太人因为自己的堕落而遭到耶和华的惩罚。在这种背景下，地震、暴风雨、印第安人的攻击，甚至是1692年巫术审判都被当成上帝对殖民地信众不满的表现。这种与早期相比道德不断沦丧的罪恶感也对后世美国宗教和公众生活产生了长远影响。

与当时的欧洲相比，北美殖民地的阶级划分和性别差异确实并不那么严格，尽管这种差距有时候被夸大了。事实上，即使排除奴隶制，美洲殖民地也远不是启蒙思想家想象的那个没有阶级的乌托邦社会。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精英阶层，包括牧师、律师和商人；弗吉尼亚的大种植园主；纽约的土地资本家；费城的贵格会当权者；新英格兰的船主。从1636年创建的哈佛学院到1769年的达特茅斯学院，殖民地共创建了9所学院，学院教育使得这种精英社会得以维系。除此之外，殖民地的自耕农和城市手工业者构成了社会中层，在中层以下还有散工、雇农和契约奴。

尽管如此，与欧洲大多数社会相比，殖民地的白人社会分层更为

宽松、识字率更高、社会流动性更强。因此，美国社会开放、等级划分不明显的形象，部分要归功于虚构，也部分源自对殖民地社会的准确记忆。即使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工业时代，这种形象仍旧保留了下来。

在性别差异方面，殖民地不可避免地复制了那个时代男尊女卑的范式。有产白人男性才有选举权和出任公职的机会，而已婚女性则不得拥有财产和外出谋职。男女的社会职责划分明显，女性只是负责料理家务和抚养子女。1637年，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就因为在家庭聚会时批评教会牧师的布道而被教会驱逐，最后被迫离开波士顿。一位牧师告诫她说："你越界了。你把自己当成了家里的丈夫而不是妻子，自以为是布道者而不是倾听者。"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性别之间的界限却并非那样严格，妇女在各自生活的社区中也扮演着受人尊敬的社会角色。一些女性，尤其是失去家庭经济支柱的寡妇，也从事着一些"男人"的职业。此外，在工业化之前，园艺、饲养家畜家禽、烘焙、蜡烛制造、缝纫等女性从事的"家务事"往往是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一些年轻女性成为女佣，年长一些的女性成为接生婆，为社区服务。新英格兰地区老妇人还在家中开办"妇女学校"，教育当地孩童。因此，殖民地相对开放的社会结构为妇女们超越传统性别界限划分创造了机会，也为19世纪及后世妇女们进一步突破束缚奠定了基础。

英法帝国之争

尽管社会骚动时有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之前，由于法国殖民地从北部和西部形成威胁，北美的英国殖民者仍然非常需要英国的庇护。在16世纪30年代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探险和圣劳伦斯河流域法国捕鱼营地和贸易点建立后，萨缪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于1608年建立了魁北克殖民地。在法国天主教神父传教的同时，被称为"船工（*voyageurs*）"和"猎人（*coureurs de bois*）"的

法国皮毛商人在今天的密歇根、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境内从事贸易活动。法国要塞、天主教布道团、贸易点遍布从圣劳伦斯河、五大湖区、密西西比河一直到新奥尔良（建于1718年）的广阔地区，彰显了法国在北美建立帝国的野心。

英国殖民者对法国殖民者的举动一直保持着警惕。早在1654年马萨诸塞民兵就曾将法国人赶出布雷顿角岛。在随后的100年里，法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了多场战争，英法殖民者之间也冲突不断。1755年，英国殖民者针对位于今天匹兹堡的法国迪凯纳要塞发动了袭击。这次袭击以失败告终，当时23岁的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出任了死于此次冲突的英国将军爱德华·布拉多克（Edward Braddock）的副官。

在七年之战（1756—1763年）中，法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列强为争夺主导权而发动战争。战火一直烧到北美大陆，将英法军队、殖民地民兵和双方的印第安盟军全部卷入战争之中。（正是为了凸显印第安部落的加入，英国殖民者将战争的北美战事称为“法国—印第安战争”。）战火席卷了俄亥俄河谷、五大湖区、纽约北部及圣劳伦斯河谷法国占领区。两万余名殖民地志愿军加入英国陆海军作战。尽管英国军队在战争初期节节败退，但是在锐意进取的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出任首相后，战争局势得以扭转。1759年，英美联军在魁北克境内击溃法国军队，随后蒙特利尔在1760年投降，这场战争的北美战事停火。1763年签订的《巴黎条约》确认英国在北美大陆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支配地位。

然而，战争却增加了北美殖民地的不满，造成局势紧张。随着法国威胁的消失，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显得更加强势。英国政府颁布了《1763年公告》，禁止殖民者向西扩张，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作为印第安人保留地，这导致英国政府和殖民地的关系恶化。另外，英国政府在其新攫取的地区给予法国天主教徒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这让殖民地的宗教组织感到紧张，从而进一步激化了殖民者的怒火。此外，为了偿还战争债务，英国议会还提高殖民地的税赋负担。双方的最后摊牌已经不可避免。

注释

〔1〕 弗吉尼亚（Virginia）意味“处女之地”，与Virgin（童真）同源。

〔2〕 梅塔卡姆被英国人称为菲利普王，这场战争史称“菲利普王之战争”。

第二章

1763—1789：革命、制宪和新共和国的诞生

在华盛顿特区，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出游家庭和访客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门前耐心地排起长队，只为一睹《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真容。在一片敬慕之中，虔诚的游客们列队缓缓经过圆形大厅里的一个个拱顶展示柜。

这些被奉为神圣的褪色羊皮纸手稿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作“美国圣经”，它们的历史要追溯到那个充斥着帝国斗争、群众暴动、血腥战争和政治危机的狂热年代。它们代表着政治家们之间激烈的辩论、冷静的妥协和智慧的创造，而正是这些政治家们缔造了美国的独立，并创造了新共和国的政府模式。

独立之路

七年之战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债务压力，英国议会打算向殖民地征收更重的税赋。在英国政府看来，因为英国军队帮助殖民者打败了其法国敌人，所以征税完全是合情合理的。然而，由于英国议会中没有来自殖民地的议员代表，这些战后税赋和英国政府采取的其他一些措施激怒了殖民者。

这些措施的第一项是1764年通过的《糖蜜法》。根据该法案，英国国会降低了北美殖民者从法属西印度群岛进口糖蜜的关税，却同时提高了其他进口商品的关税。为了打击走私，法案还强化了对殖民地商船的查验，并规定走私案件不再属于倾向于从轻发落的地方法官的权限范围，而是交给由英国法官牵头的海事法院审理。

第二项措施是通过了1765年《印花税法》，要求殖民地居民在获得报纸、学位证书和法律文件时必须购买特殊印花票，甚至是玩骰子和纸牌都要缴税！《糖蜜法》至少是既能够增加税收还能调节贸易，而《印花税法》唯一的目的就是增税。1765年《驻营法》规定，殖民地纳税人需要给驻扎在北美的英国军队提供食宿，更是激起了殖民地的不满。

英国当局声称，在享受军事保护和贸易特权的同时，殖民地居民

的税赋压力小于英国本土的居民。但是，殖民者则抗议称，由于议会中没有来自殖民地的议员，因此任何税赋都是对殖民地居民权力的侵犯。在弗吉尼亚下议院会议上，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提议废除英国政府的法案。波士顿爆发了暴力抗议活动，一群暴民对收税官的塑像处以绞刑，并捣毁了支持《印花税法》的首席大法官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的宅邸。1765年10月，来自9个殖民地的代表在纽约市召开会议。在强调殖民地团结一致的基础上，该“反印花税法大会”通过决议，认定英国议会无权对殖民地征税。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浪潮中，英国议会于1766年被迫撤销《印花税法》，同时通过《宣示法》重申英国的殖民统治。

《印花税法》撤销后，在殖民地广受好评的威廉·皮特出任首相，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但是，由于身体不适，皮特很快被顽固派代表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取代。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汤森德关税法》，议会强行对殖民地进口的各种产品征收关税，并成立了新的税收部门：美国海关专员委员会。为了安抚殖民地居民的敏感情绪，汤森德称这些关税为“外部税”，以与《印花税法》等规定的“内部税”相区别。但是，在1767年，费城律师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发表了名为《宾夕法尼亚农人来信》这个有着误导性标题的小册子，这本影响深远的小册子揭露了汤森德的小把戏。

随着争议的深化，波士顿的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向各殖民地散发《马萨诸塞通知信》，谴责英国议会的征税行为。当多个殖民地议会公开支持亚当斯通知信后，这些议会均遭殖民地总督解散。当初为了反对《印花税法》而建立的松散组织“自由之子”得以复兴，号召殖民地居民抵制英国进口商品。1768年6月，波士顿民众向海关官员发起了攻击，原因是这些官员扣押了商人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名下的一艘（恰巧名为“自由号”的）商船。英国议会于1770年废除了《汤森德关税法》的大部分条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局势，而同时，为了彰显英国政府的权威，议会决定继续对殖民地进口的茶叶征税。此外，英国政府还向波士顿增派了一支4,000人

的军队，这给北美殖民未来的局势蒙上了一层阴影。

1770年3月5日，波士顿海关的英国驻军向扔石头攻击的抗议人群开火，导致5人死亡，包括美国黑人水手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波士顿惨案”的怒火迅速蔓延开来，波士顿银匠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表现该事件的雕刻作品更是刺激了很多人的神经。

1772年，在塞缪尔·亚当斯的促成下，马萨诸塞各镇成立了通讯委员会，负责协调抵抗运动，“向全世界”发出殖民地反抗的声音。很快，其他殖民地纷纷效仿建立了类似组织。但是，英国议会无视殖民地发出的警告信号，反而于1773年通过了《茶叶法》，以帮助陷入困境的东印度公司倾销过剩茶叶。根据该法案规定，虽然茶叶进口税有所降低（而不是取消），但是东印度公司获得了通过特别代理人在北美销售茶叶的特许权，危及殖民地本土茶商利益。

波士顿再次成为抵抗运动的中心和导火索。1773年12月16日晚，在一场群情激奋的镇民大会后，50来名伪装成印第安人的波士顿人登上了一艘英国商船，将342箱茶叶倒入波士顿港。“波士顿倾茶事件”激怒了英国当局。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强制法》（在殖民地被称为“不可容忍法案”），关闭波士顿港，又将该殖民地置于英国政府直接管辖之下。为了进一步警告信仰新教的殖民地居民，议会将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广大区域划归信仰天主教的魁北克殖民地疆域。

1774年9月，13块殖民地中除佐治亚州之外，各地代表在费城集会，是为第一次大陆会议。会议公开抨击《强制法》，赞成抵制英国进口商品并批准军事备战。但在这次大会上，与会代表仍宣誓效忠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并敦促国王抵制英国议会采取的压迫措施。

为独立正言

殖民地政客、时政评论作家和牧师积极地以时政小册子、报纸文

章和布道的方式就独立问题进行辩论，有的人支持独立，有的人则主张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当时已成为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的托马斯·哈钦森声称，继续留在大英帝国所能带来的经济和军事利益远远大于“所谓英国自由城”可能带来的利益。然而，大多数人则是谴责英国议会的税赋和高压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从英国本土的历史中，尤其是1689年光荣革命的历史中，援引了大量证据来阐释自己的观点，因为正是光荣革命结束了詹姆斯二世（James II）的专制统治，在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与英国激进派一样，殖民地的独立派认为，英国议会中的有产贵族正在与王室密谋践踏个人权利。正如1689年议会反抗的对象是王室，而现在，反抗的对象却变成了议会本身。独立派尤其赞赏伦敦记者和议员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的立场，即：应进行议会改革以提高议会的广泛代表性。

殖民地的时政评论作家也广泛引用英国政治作家的作品，尤其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经典作品。洛克在《政府论》（1690年）中提出，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所有人的自然权利；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保护这些权力；被统治者的认可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正如现代美国社会一样，在殖民地时期，宗教领袖也积极参与政治辩论。尽管以圣公会牧师为主的传教者们仍高唱忠于英国的论调，大多数宗教领袖都加入了谴责英国暴政的阵营，并坚称《圣经》和新教教义都支持殖民地人们的正义事业。一些牧师甚至将乔治三世及其手下的大臣比作基督的敌人、《启示录》预言的恶魔之主。

在大众之中，抗议者在城镇广场立起自由旗杆，高唱支持殖民地正义事业的歌曲。《波士顿公报》刊登了一首诗，前两句写道：

来吧，手拉着手，所有勇敢的美洲人民，
自由的号角已经响起，用你无畏的心去欢迎！

随着抗议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战争也越来越近了。英国议会无视威廉·皮特（当时的查塔姆勋爵）的调停方案和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支持殖民地民众的雄辩演讲，于1775年2月7日宣

布马萨诸塞殖民地谋反，并授权波士顿英国驻军司令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将军进行镇压。

4月19日，近700名英国士兵从波士顿向邻近的康科德进发，要占领那里的一个秘密武器库。保罗·里维尔和威廉·道斯（William Dawes）骑马提前一步到达康科德预警。在列克星敦，武装起来的居民与英国军队交上了火，共计8名殖民地居民被击毙。英国军队没有发现秘密武器库，只好边打边退返回波士顿。到当天晚上，英国军队共死伤270余人，殖民者一方伤亡也接近100人。6月17日，英国军队向占领波士顿周边邦克山和布里兹山的武装民兵发起攻击，殖民者伤亡300多人，而英国军队的死伤人数则超过1,000人。

在费城，大陆会议向乔治三世发出了被称为《橄榄枝请愿书》的最终吁求函，在表示继续向英王效忠的同时，敦促双方在波士顿停火，要求英国政府废除《强制法》，提议双方就争议问题进行协商。因为得知大陆会议已经授权乔治·华盛顿组建大陆军，英王和英国议会拒绝了大陆会议的提议。

在革命时期，往往某个单一事件会触发事态变化，让人们从犹豫不决转向毅然决然走上革命之路。美国独立战争的这个时刻出现在1776年1月，来自英国的新移民托马斯·佩因（Thomas Paine）出版了极具煽动性的小册子《常识》，雄辩地阐述了独立的主张。佩因在书中写道："一切正确或合理的元素都要求我们与英国分离。被屠杀者的鲜血和自然之母的啜泣声也在呼喊着：该脱离英国了。"佩因还借用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天命观论点，宣称："在很大程度上，美洲人民的事业也是全人类的事业……我们有能力重建整个世界。"佩因将乔治三世和英国王室称为"皇家畜生"。《常识》如同野火般烧遍各个殖民地，激发了殖民地人民的爱国情怀。

独立战争

大陆会议委员会于1776年春起草的一份声明中曾这样写道："这

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按其权利必须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来自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声明的主要起草人。声明列举了乔治三世为了建立“绝对的暴君统治”、剥夺殖民地人们“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而“滥用职权和巧取豪夺之行为”。在修改声明的过程中，大陆会议用更加容易产生共鸣的“追求幸福”取代了（约翰·洛克提到的）“财产”一词。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原稿现珍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大陆会议的第一项外交举措就是派遣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作为密使前往巴黎。富兰克林来自费城，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活动家和公民领袖，在他的努力下，新生共和国获得了法国提供的至关重要的贷款，并最终赢得了法国的军事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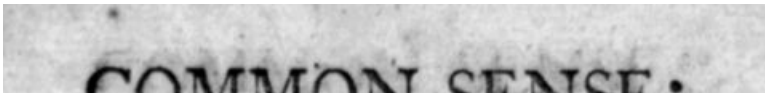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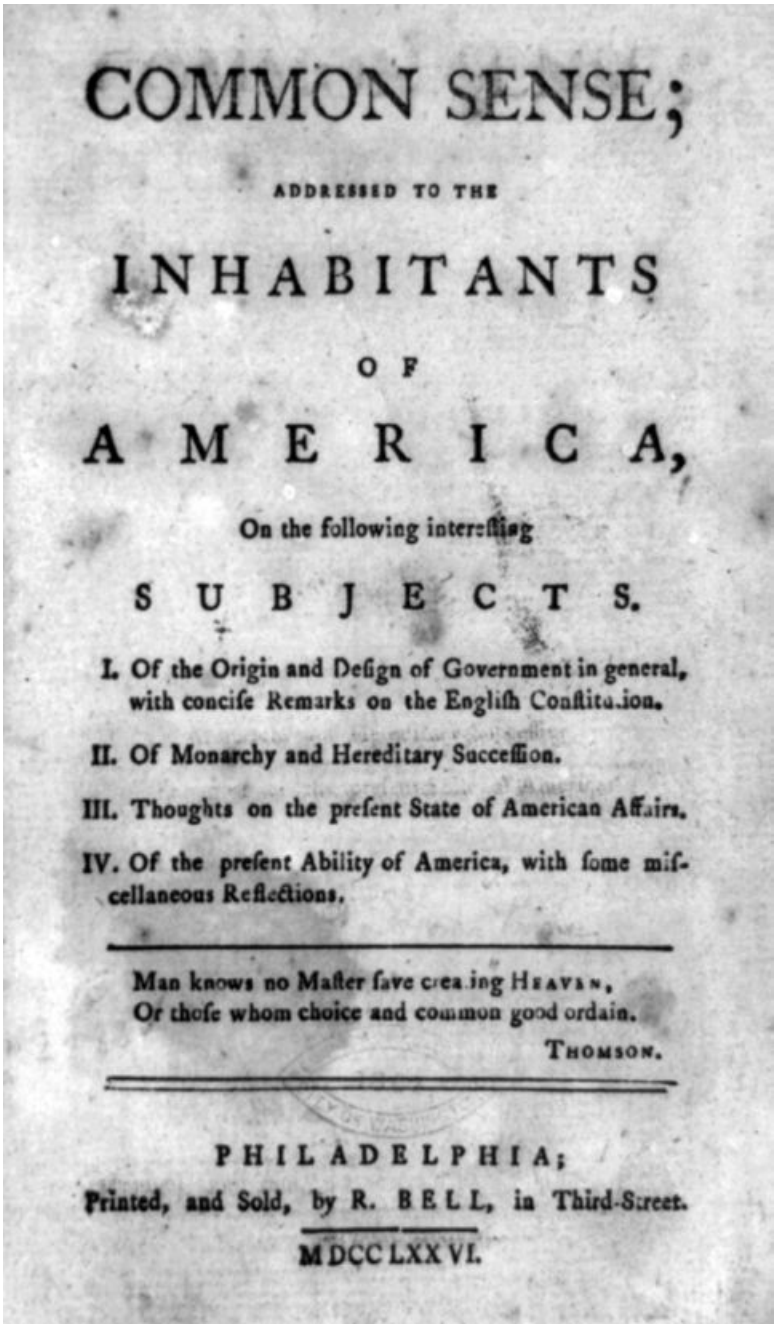

COMMON SENSE;

ADDRESS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AMERICA,

On the following interesting

SUBJECTS.

I. Of the Origin and Design of Government in general, with concise Remarks on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II. Of Monarchy and Hereditary Succession.

III. Thought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American Affairs.

IV. Of the present Ability of America, with some miscellaneous Reflections.

Man knows no Master save creating HEAVEN,
Or those whom choice and common good ordain.
THOMSON.

PHILADELPHIA;
Printed, and Sold, by R. BELL, in Third-Street.
MDCCLXXVI.

图2　托马斯·佩因出版的《常识》（1776年）极具煽动性，迅速在各个殖民地广

泛传播开来，最终加速了殖民地与英国的决裂，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独立事业也造成了美洲各英属殖民地间的分裂。英属加拿大殖民地拒绝了大陆会议邀请他们加入独立革命的请求。英属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甘蔗园主表示对独立没有兴趣。即使在13个大陆殖民地中，仍有近20%的白人居民，因为经济、工作以及依恋英国或害怕革命等个人原因，反对独立，这些人被称为“亲英派”。由于受到排挤甚至是暴力侵害，大量亲英派人陆续逃亡英国或加拿大。

在战争开始初期，双方均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英国有强大的海军和训练有素的陆军，军队指挥官经验丰富，而德国雇佣兵的加入更是一大助力。但是，除了少数亲英派的支持外，英国军队都是在敌占区作战，供给线过长，而且作战环境不利执行传统军事策略和进行阵地战。

大陆军主要由低收入的公民士兵组成，这些士兵常常因为服役期结束或者农事工作的需要而离开军队。但是，殖民地也有明显的优势。他们不仅是本土作战，而且总司令乔治·华盛顿的指挥才能也日臻完善。此外，法国、西班牙、荷兰等英国在欧洲的对手为大陆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支持。外国志愿兵也在大陆军中扮演重要角色。20岁的拉斐德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来自法国，曾出任华盛顿的副官。来自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冯·施托伊本（Friedrich von Steuben）将军帮助华盛顿训练士兵、制定武器和军事策略标准指南，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康科德和邦克山战斗失败后，英国军队在威廉·豪（William Howe）将军的指挥下撤离波士顿，进驻长岛，企图截断弗吉尼亚与马萨诸塞之间的联系。海军上将理查德·豪（Richard Howe，威廉·豪的弟弟）则指挥英国舰队在附近海域巡游。威廉·豪在几次小型战役中击败华盛顿指挥的大陆军，并于1776年9月占领了亲英派重镇纽约市。

华盛顿率部从新泽西撤退，跨过德拉瓦河进入宾夕法尼亚地界。

在新泽西，大陆军向英国要塞发起反攻并获胜，极大地鼓舞了独立派的士气。但是好景不长，威廉·豪的部队于1777年9月在白兰地溪再次击败大陆军，并占领了费城。大陆会议被迫撤离，华盛顿率领残部在附近的福吉谷度过了一个严酷的冬天。托马斯·佩因在他的新书《美国危机》中这样写道："这是考验人意志的时刻。"

与此同时，在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将军的指挥下，英国军队从魁北克出发，沿尚普兰湖和哈得孙河南下，希望与从纽约溯哈得孙河而上的威廉·豪部会合，然后与自西面而来的英国—易洛魁联军会合，从而将新英格兰地区一分为二。然而，在当地民兵和霍拉肖·盖茨（Horatio Gates）将军率领的大陆军的夹击下，伯戈因南下的计划屡屡受挫。1777年10月17日，伯戈因部队在纽约的萨拉托加向大陆军投降。萨拉托加大捷后，（一直秘密提供资金支持的）法国承认美国独立并许诺向美国提供直接军事援助。荷兰和西班牙也为美国的独立事业提供了各种支持。

英国部队不得不放弃在北方的战略安排，把重心转移到了南部。1778—1779年间，英国控制了佐治亚州，并于1780年5月占领了查尔斯顿。在（1780年8月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卡姆登战役中，乔治·康沃利斯（George Cornwallis）将军指挥英军击败了一支美国军队。随后，纳撒内尔·格林（Nathanael Greene）将军率部在南卡罗来纳的偏远地区经过血战战胜英军，扭转了战局，不过这次战斗出现了酷刑和大量平民伤亡。

到1781年春天，康沃利斯率领残部转移至弗吉尼亚的约克敦半岛，等待增援和补给。但是，华盛顿率领大陆军从宾夕法尼亚州南下，将康沃利斯残部困在了约克敦。与此同时，法国舰队为华盛顿部运送来增援部队，并挫败了英军从海上撤退的计划。1781年10月19日，军乐队奏响《颠倒的世界》，康沃利斯投降。

美国和谈使团与英国谈判代表在巴黎会晤，美国使团由一对出人意料的搭档领衔，分别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性格刻板、喜欢道德说教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务实派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和谈顺利进行，双方签署了《1783年巴黎条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

立。

革命年代的美国人民

尽管大多数美国妇女并未通过政治途径直接参与革命，但是她们也以抵制茶叶等英国进口商品的方式支持着独立战争。（事实上，美国人对咖啡的偏爱正是始于这个时期。）选择家织土布，拒绝英国生产的纺织品，也是普通民众抵制英国议会税赋政策的方式之一。

独立战争期间，由于家中的丈夫、父亲参军，妇女通过管理农场和经营生意积累了管理经验。自称“自由之女”的费城精英女性积极为大陆军筹措资金。一些女性在革命意识形态中发现了性别差异的影响。约翰·亚当斯的夫人阿比盖尔（Abigail）就曾在1776年半开玩笑地告诫亚当斯，如果新政府的奠基者们“忘记还有女士们”，“如果制定这些法律时没有考虑女性的意见、没有妇女代表参加的话，我们……不会遵守任何法律。”

在这场帝国斗争中，印第安人的策略也是如履薄冰。在1763年的庞蒂亚克起义中，五大湖地区的印第安人向英国要塞发起了攻击。尽管《1763年公告》承诺保护印第安人权益，但是随着殖民者的西进，双方仍旧冲突不断。在独立战争期间，印第安各部落效忠和联盟的对象受到经济关系、领地冲突和其他考量的影响。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偏远地区，切诺基人与英军联盟，攻击不断推进的殖民者。在西北领地，在弗吉尼亚青年乔治·罗杰斯·克拉克（George Rogers Clark）的带领下，当地民兵向肖尼人、特拉华人、怀恩多特人和明戈人定居点发动了残酷的袭击。在纽约州北部，亲英派的易洛魁人与大陆军及其盟友塔斯卡罗拉人、奥奈达人交战。整体而言，英国战败加速了白人殖民者向印第安部落领地的扩张。殖民者的“胜利”对于印第安人而言，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殖民地境内共有50多万黑人，大多数为黑奴。对他们而言，帝国冲突可谓机遇与风险并存。早在1772年，伦敦的一家法院就曾判定被

奴隶主带到英国的马萨诸塞黑奴詹姆斯·萨默塞特（James Somersett）为自由人，因此，其他美国黑奴都把英国看作他们获得自由的灯塔。1775年，弗吉尼亚总督邓默尔（Dunmore）勋爵规定，凡是加入英国军队的健壮男性黑奴均可获得自由，共有1,000名左右黑奴响应。这样一来，共有约2万名南方黑奴加入了英国阵营。然而，他们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获得了自由，大多数人则死于疾病或被抓重新为奴。

不同的是，在北部各州，大多数的黑奴和自由黑人都支持独立事业，一些人甚至加入了地方民兵组织或大陆军。乔治·华盛顿（其本人是奴隶主）反对给予参军黑奴自由的提议，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认为这样做会“让仍是黑奴身份的人更加仇恨奴隶制”。尽管如此，自然权利观凸显了奴隶制的悖论，并激起了北方各州的反奴隶制情绪。一位从奴隶主手上逃脱的罗德岛黑奴事后回忆说：“当我看到自由旗杆和人们都参与了争取自由的运动时，我禁不住……感到高兴。”尽管奴隶制是在几十年后才被废除，但是独立战争时期就已经为废除奴隶制打下了基础。

共和国的创立

在宣布独立后，美国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实现自治。在1777年战争还未结束时，大陆会议通过了《十三州邦联宪法》（下简称《邦联宪法》）。在《邦联宪法》框架下，大陆会议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签署《巴黎和约》、赢得美国独立和通过1787年《西北法令》。其中，《西北法令》就未来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五大湖区、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之间的这块区域进行勘探、定居和建州等事项作了明确规定。《西北法令》的一个重要条款规定：政府可以通过土地买卖来筹集公共教育经费。根据该法令，禁止在这片区域实行奴隶制，并声称遵守与印第安部落签署的各项条约，而最后一条很快就遭到违反，形同虚设了。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事实证明邦联体制是脆弱无力的。由于没有行政和司法部门，邦联体制下仅设有一院制邦联议会，议员每年选举一次，无论人口多少每州一票。议会负责印发货币、运送邮件和缔结条约，但无权征税、管理贸易和建立军队。因为美国人对英国议会滥用权力的做法仍记忆犹新，《邦联宪法》刻意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保留各州主权独立。独立战争后的经济危机更是凸显了邦联制的弊端。1786年爆发的马萨诸塞州农民起义，史称“谢斯起义”，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荡和免债呼声，也给保守派和有产阶级敲响了警钟，增强中央政府权力迫在眉睫。

1787年2月，议会提请各州派代表前往费城以修订《邦联宪法》。除罗德岛州因担心丧失征收进口税权未派代表出席外，其他各州均积极响应。制宪会议在5月正式召开，代表们决定完全抛弃原有的《邦联宪法》，而着手制定全新的美国宪法。在那个炎热的夏季，各州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维护本州利益、交流政治和社会观点、吸收各殖民地多年来实行自治的宝贵经验。为了平衡大小州之间的差异，制宪会议代表决定建立两院制国会，其中：参议院由各州分别派两位参议员组成，众议院则根据各州人口数量选出相应数量的众议员构成。

来自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记录下了整个辩论过程，这些记录反映出制宪会议代表对古往今来政治理论和治国之道的深刻理解和广博知识。很多代表引用洛克有关自然权利的理论（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苏格兰哲学家戴维·休谟[David Hume]的思想），认定民众的认可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他们还援引共和派理论家的观点，比如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政治家尼可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有关公民德行和对公共利益的关心是社会安定的基础的理论。受到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和加尔文教派学说的影响，保守派代表则强调称，要避免社会动荡和被霍布斯称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内战，就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法国理论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一书中主张，需要通

过分权来避免专制，他的这一观点对制宪会议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制宪会议起草的文件表明了与会代表对专制的担忧，而刚刚结束的独立战争正是为了反抗专制。文件不仅明确划分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权责，还将联邦政府权力划归三个不同部门：两院制国会、总统领导下的行政部门和以最高法院为代表的独立司法部门，其中最高法院院长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投票批准产生。权力制衡限制了各个部门的权力。比如，总统有权否决国会通过的议案，但国会仍可以2/3赞同的绝对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在当时，皇权和世袭贵族仍占主导地位，而根据《美国宪法》创建的共和国却按照规定需要通过选举向美国人民负责，宪法第一句就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开头。此外，宪法草案表明代表们对“民主”也心存怀疑，因为“民主”往往让人联想起“暴民统治”。根据宪法草案规定，由各州州议会而非通过普选方式选举参议员；此外，选民并不直接选举总统和副总统，而是选举出“选举人”，最后由“选举人”投票确定总统选举结果，而且只有有产男性可以参与联邦选举投票。（《美国宪法》规定所有有权参与州众议院选举投票的人都享有参与联邦选举投票的权力，而当时各州对于选举投票权都设定了财产要求。）在奴隶主的坚持下，与奴隶制相关的条文也被写进宪法。（因为担心共和国宪法中直接出现“奴隶制”不合时宜，制宪会议代表在草案中用“其他人”[见第一条第二款]和“服役或服劳役者”[第四条第二款]等婉言来指代黑奴。）宪法还规定：从一州逃往另一州的黑奴在被抓后，应被遣返交给奴隶主；在根据各州人口数量分配各州众议院议席时，黑奴人口按照3/5计算；甚至允许黑奴贸易继续存在20年。

是年9月，制宪会议将宪法草案提交各州议会批准，却引来了一片质疑之声。小农场主认为草案过多考虑了城市商业和银行利益。以来自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为代表的反对者批评称：宪法草案未能保护个人权力和州权，存在着出现专制的风险。宪法草案的支持者被称为联邦党人，包括了独立战争中著名领袖人物。为了消除反对者的担忧，联邦党人保证将支持通过《权利法案》。随后，《权利法案》于1791年以宪法头十条修正案的形式得以通过，其

中一条规定：宪法未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一切权力，归各州或人民所有和行使。

在是否批准宪法草案的辩论中，《联邦党人文集》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文集成为美国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联邦党人文集》包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John Jay）三人在纽约市出版的报刊上以“普布利乌斯（Publius）”为同一笔名而发表的85篇文章。三人中以前两人为主，其中汉密尔顿主要论述为什么需要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政府，麦迪逊则负责解释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和制衡制度。当时一些人担心在大国建立共和制政府难以成功，麦迪逊在第十篇中进行了反驳，指出：美国多元化的经济、地域和其他利益将可以相互制衡，进而确保社会的整体稳定。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转而支持宪法草案。到1788年夏，宪法草案在包括马萨诸塞州、弗吉尼亚州和曾经有所保留的纽约州在内的9个州获得批准，进而按照相关规定，正式生效。在同年11月进行的第一次联邦选举中，乔治·华盛顿以全票当选总统。第二年4月30日，华盛顿未着戎装，而是穿着棕色西服在纽约市宣誓就任总统。当时人们就如何敬称总统提出了各种建议，华盛顿明确表示他最喜欢的称谓是：“总统先生”。

在这风云变化的13年中，英国的13个殖民地赢得了独立，并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尽管有着时代的烙印，尽管还有奴隶制这样的污点，《1787年美国宪法》仍是一项卓越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第一个现代共和制政府。从诞生之日起到今天，美国宪法不仅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且一直忠于建国之父们的愿景。

那么，美国是如何应对各种亟待解决的国内问题，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初试啼声？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章

1789—1850：新共和国的希望与隐忧

随着新政府的建立，国内政党开始出现，外交官则开始在重重危机中为美国赢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这段共和国成长的岁月中，美国出现了社会和经济变革、改良主义浪潮和宗教骚乱，以及被一些人冠称为“美国文艺复兴”的文化创新浪潮。一位历史学家曾用一个词语概括这整个历史阶段，称之为“自由的骚动”。

政党政治的兴起

1799年，两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华盛顿逝世之时，已然成为美国人民永记心中的先贤之士。同样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亨利·李（Henry Lee）称华盛顿是“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时的第一人，同胞心中的第一人”。然而，对美国革命英雄的哀悼并不能掩藏共和国暗流涌动的政治分歧。尽管《美国宪法》并未提及政党，事实上，建国之父们对政党政治是深恶痛绝的。在1796年离职演说中，华盛顿告诫美国人民警惕“权力欲驱使的、狡猾的”政客为了个人利益而产生的派别之争。

尽管如此，不同利益与思想观念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派别冲突，两方的代表人物也都是华盛顿政府内阁中重要成员，分别是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汉密尔顿是来自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移民，在独立战争期间就曾出任华盛顿的幕僚。因为对民主制度心存疑虑，汉密尔顿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且政府应与有产阶级建立同盟关系。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巩固政府与工商阶级的联系，汉密尔顿于1791年创立了美利坚银行，并推动国会通过议案，由政府按照面值回购战争期间国会印发的早已贬值的货币，而当时这些货币主要集中在投机商手中。汉密尔顿还提议，由联邦政府偿还各州的战争债务。由于这一措施主要对北方各州有益，因此，在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的促成下，决定将美国首都设在南部地区，由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首都，这就是今天的华盛顿特区。1794年，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农夫为了抵制联邦政府对白酒征税爆发了“威士忌暴乱”，汉密尔顿重着戎装，与华盛顿一道亲自领

兵平息了这场动乱。汉密尔顿的支持者们组成了美国的第一个政党：联邦党。在他的领导下（直至汉密尔顿死于1804年与阿龙·伯尔[Aaron Burr]的决斗），联邦党以北部各州为重心，获得了放贷者、商人、企业家和大地主的支持。

杰斐逊则代表着另一种利益和世界观。杰斐逊对强力政府和大城市充满怀疑，却将从事耕作的农民看作美德的化身。尽管身为奴隶主，他信奉约翰·洛克以及其他激进派理论家有关自然权利的学说。以杰斐逊为领袖，民主共和党吸引了小农户、城镇工人以及反对汉密尔顿激进政策的州权维护者。党派报纸编辑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党派分歧。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初期，杰斐逊表示欢迎。他认为，由于美国自己也曾经历革命，因此美国应该支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革命运动。然而，大革命却让联邦党人惊出一身冷汗，法国贵族乃至王室成员被推上断头台更让他们坐立不安。1793年英国向法国宣战，得到了美国联邦党人的欢迎。后来，随着汉密尔顿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杰斐逊在1793年从美国政府离职。

在英法战争期间，英国战舰扣留与法属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的美国商船，逮捕那些被怀疑是英国皇家海军逃兵的美国海员。1795年联邦党人约翰·杰伊代表美国与英国签订条约，英国政府对因此让美国遭受的损失进行了部分赔偿，但是，民主共和党却批评杰伊未能更好地保护美国作为中立国的利益。

1796年，杰斐逊当选副总统，而当时的总统约翰·亚当斯却是联邦党人。1798年，在联邦党人的努力下，国会通过了“外侨和惩治叛乱系列法案”，仓促应对法国局势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依据这些法案，联邦党法官和陪审团把矛头不仅指向可疑外侨，而且针对杰斐逊党派的报纸编辑们。1800年，杰斐逊当选美国总统，实现了政权在党派之间的和平转移，预示了未来政府的平稳交替。杰斐逊上台伊始就完成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为他赢得好评，但杰斐逊在第二任期内保护美国航运业的措施却引起了争议。19世纪初，即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统治法国时期，英法之间再次爆发战争，交

战双方都采取措施防止美国与敌对国进行贸易往来。杰斐逊对交战双方实行出口禁运，希望借此迫使英法承认美国作为中立国的权力。然而，这项措施并未达到预期成果，反而因为禁运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广受诟病，批评之声最大的正是反对杰斐逊及其政党的北部商人和船主。

1812年，在杰斐逊的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的任期内，由于英国对美国商船的不断骚扰，英美之间爆发了战争。在国会“主战鹰派”的煽动下，美国向加拿大发起进攻，但除了在伊利湖赢得水战胜利外，美军节节败退。更糟的是，英军于1814年8月占领华盛顿特区，并一把火烧毁了新建的总统官邸。（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多利·麦迪逊[Dolley Madison]在出逃时带出了吉尔伯特·斯图亚特[Gilbert Stuart]创作的乔治·华盛顿肖像画。）

1812年战争也被称作“麦迪逊之战”，在新英格兰地区颇为不得人心，一些联邦党政客甚至考虑要脱离联邦。幸运的是，1814年12月，英国在欧洲战事中陷入被动，随后各方代表在比利时的根特召开和会并签订条约，战争告一段落。然而，包围新奥尔良的英国军队将领却未得知这一消息。结果在1815年1月8日，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将军率领美国民兵向入侵英军发起了进攻，击毙包括英军指挥官在内的291人，打伤英军近1,300人。

尽管《根特条约》并未满足美国的大部分诉求，但是美国起码避免了在“第二次独立战争”[1]中战败的命运，而新奥尔良大捷更是激发了美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战争结束后，联邦党日渐式微，麦迪逊赢得连任。1823年，因为怀疑法国干预西班牙殖民地古巴的事务，英国政府提议发表英美联合声明，向法国的干预行为发出警告。然而，时任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提醒詹姆斯·门罗总统（James Monroe，1816年继麦迪逊后出任美国总统）说，美国绝对不能变成“好战英国的小跟班”。因此，门罗转而发表了由亚当斯起草的独立声明，警告欧洲列强不得继续在西半球进行殖民扩张，这就是所谓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彰显了美国在应对国际事务时的信心日渐增强。

在1824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获得的选票最多，但未能获得选举人团多数票。按照规定，总统选举结果最终交由众议院裁决。在众议院投票中，另一位总统候选人、来自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Henry Clay）支持选票排名第二的约翰·昆西·亚当斯赢得了总统宝座。宣誓就职后，亚当斯即任命亨利·克莱为国务卿，这招致了杰克逊支持者的愤怒批评，称这是一次“腐败交易”。在上台后，亚当斯提出了一项宏大的国家发展规划，包括联邦政府支持农业、商业和交通发展、由联邦政府出资建设国家天文台和国立大学。这让强调州权至上的人感到失望，同时“腐败交易”的指责也一直困扰着亚当斯，这些导致了亚当斯竞选连任失败。

尽管联邦党已经衰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却仍然坚守着联邦党人支持强力政府和重商的信条。1801年，由约翰·亚当斯提名，马歇尔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此后他一直担任此职位，直至1835年去世。在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案件中，马歇尔不仅强化了联邦权力高于州权的地位，更是维护和践行了司法部门判定国会法案是否违宪的权力。在“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1819年）中，马歇尔支持契约不可侵犯，这对于资本主义企业而言至关重要。此外，在“麦卡洛诉马里兰案”（1819年）中，马歇尔裁定马里兰州向第二合众国银行（于1816年由国会批准建立）征税的做法违宪，从而进一步维护了联邦权力。

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这一事件成为美国政治的分水岭。杰克逊与其历届前任有着天壤之别。杰克逊生于南卡罗来纳州，14岁时成了孤儿。随后他移居田纳西州，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政治家、种植园主和民兵军官。在1815年新奥尔良之战中，杰克逊声名大振。杰克逊代表的是美国西部的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杰克逊宣誓就职时，欢欣鼓舞的支持者们涌入华盛顿为他们的英雄喝彩。1832年，杰克逊赢得连任，在大选中战胜了另一位来自西部的政客、保守的辉格党候选人亨利·克莱。

杰克逊竞选获胜标志着美国在人口结构和政治理念上出现了巨变。随着人口向内陆的流动，以及投票权的财产要求被废除，选民的

范围不断扩大，新获得选举权的人群包括：南部的棉花种植者、西部的农民和企业主，以及东部的体力劳动者和工厂工人。这些选民团结起来支持杰克逊，这一支持运动在1832年建立了自己组织：民主党。在这一过程中，由杰克逊亲信组成的被称为“厨房内阁”的核心集团扮演了重要作用，这其中就包括了两位报纸编辑阿莫斯·肯德尔（Amos Kendall）和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Francis Preston Blair）。

出于对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不信任，杰克逊一派反对旨在保护国内制造业者的高关税制度，同时对联邦政府特许建立的第二合众国银行表示反感。当时总部设在费城的第二合众国银行已经在8个州开设了分行。在杰克逊看来，第二合众国银行代表的是“金钱势力”，这股庞大势力正企图扼杀国内广泛的经济活力来源，包括400家自由的州立银行。杰克逊甚至将与“银行怪兽”的斗争看作是自己与第二合众银行行长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的个人恩怨。1832年，杰克逊否决了国会先前通过的有关延长第二合众国银行特许权期限的法案，随后通过撤回联邦政府资金，极大地削弱了第二合众国银行。这场所谓的“银行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837年的商业恐慌，以及随后几年的经济困难，但是对于杰克逊而言，这场胜利是“美国人民”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胜利。现在看来，这场争斗主要是老牌精英集团与在迅速发展的西部和城镇中心不断崛起的企业和工商业新兴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

杰克逊的政治对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副总统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在该州掀起了一场运动，旨在废除让南方各州觉得具有压迫性的1832年关税法。尽管杰克逊并不信任联邦权力，但是他却不遗余力地抵制了这场运动，并威胁动用武力，主张废除1832年关税法的人被迫放弃。

尽管保守派精英对杰克逊式民主的不成熟颇有微词，但是这种民主的确代表了主张扩张的白人野心家们的旺盛活力。1840年总统选举中，保守的、亲工商业的辉格党效仿民主党的竞选策略，组织火炬游行、建造小木屋、免费发放烈性苹果酒，最终成功地为自己的候选人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赢得了总统宝座。年迈

的哈里森生于俄亥俄州，曾多次参加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不幸的是，在室外发表了冗长的就职演说后，哈里森就患上了肺炎，并在一个月后辞世。

生机勃勃的美国社会

在赢得独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人的自信心（一些人称其为傲慢自大）不断增强。爱国演说家们纷纷找出各种理由为这种乐观情绪辩护。由于移民的不断涌入和高生育率，到1850年，美国白人人口总数超过2,100万，比1790年增长了5倍。仅仅在1845至1854的10年中，就有近300万移民来到美国，其中包括因为马铃薯疫病而逃亡美国的大量爱尔兰人。很多移民选择到美国西部寻找机会，另外一些人则选择定居东部沿海城市，靠当劳工、家仆或工厂工人谋生。

与此同时，美国的领土疆域也迅速扩大。1803年，为了保证欧洲战事的经费开支，拿破仑开价1,500万美元出售路易斯安那地区，美国驻巴黎使馆的外交官迅速响应，买下了这片近83万平方英里的广袤土地，这让美国的西部边界迅速由密西西比河推进到落基山脉。杰斐逊总统克服了联邦党人的抗议和有关交易是否违宪争论的重重阻碍，批准并完成了这次购地交易，并授权刘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远征队（1804—1806年）对新领地进行探索。1819年，西班牙将佛罗里达割让给美国；1846年，根据与英国签订的协议，美国获得了今天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所在的大片土地。

1836年，得克萨斯的英裔美国人宣布得克萨斯独立，而当时得克萨斯还是西属墨西哥的一部分。墨西哥军队在圣安东尼奥市击毙了186名保卫阿拉莫传教站的独立派战士，但是很快，山姆·休斯顿（Sam Houston）打着“牢记阿拉莫”的旗号，领导得克萨斯人在圣哈辛托战役中击败了墨西哥军队，保卫了得克萨斯的独立。1845年，得克萨斯人通过投票决定作为一个州并入美国。

墨西哥与美国就边界划分一直争论不休，而与此同时，扩张主义

者却声称向西部的不断扩张是美国的“天定命运”。又一场争议领土冲突后，1846年5月，在来自田纳西州的民主党总统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的促成下，国会通过决议向墨西哥宣战。美军获得了一连串胜利，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t）将军率部在是年9月攻占墨西哥城。墨西哥投降，将近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割让给美国，覆盖现今的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1848年淘金热移民潮导致加利福尼亚州人口激增，该州于1850年正式加入美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原先的大西洋沿岸13州迅速成为横贯整个北美大陆的大国，领土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

随着拓疆者大量向西迁徙，从1803年俄亥俄州建州开始，不断有新的州加入美国。公路、运河和铁路线源源不断地运送新来者向西迁徙。1806年，国会授权兴建美国第一条州际公路“国家公路”。“国家公路”始于马里兰州，一路向西，于1839年建至伊利诺伊州的万达利亚。连接哈得孙河和伊利湖的伊利运河于1825年正式开通。由各州政府和私人企业家出资建设的运河项目不断增长，同时铁路网建设也迅速发展。1828年7月4日，《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的查尔斯·卡罗尔（Charles Carroll）为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奠基。截至1850年，美国铁路总里程长达9,000英里。

人口增长、领土扩张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农业仍然占据首要位置，南方以棉花和烟草种植为主，北方和西部则主要种植粮食作物和发展畜牧业。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出口（主要为农业产品出口）年均总额达到2.5亿美元。此外，由于熟练掌握英国生产技术的移民的涌入，美国的工业也不断发展。1822年，波士顿投资者在附近的洛厄尔镇的梅里马克河沿岸投资新建了一家机械化纺织厂。纺织厂早期的工人主要为年轻农场妇女，但是很快就被新移民所替代。

很快，遍布北部各州的工厂就能够生产纺织品、鞋、钟表、枪支、机器、铁路机车，以及其他各种产品。随着蒸汽机取代水车，到1860年，美国工厂的年生产总值就已经接近20亿美元。尽管工业革命的伟大时代尚未到来，但是到19世纪中叶，美国已经为工业化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矛盾与改良主义浪潮

在国家发展的大趋势下，社会现实的阴暗面也突显出来。由于工厂薪金仅够勉强糊口，美国城镇贫困人口激增，阶级差距日益扩大。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遭到敌视，甚至成为暴力袭击的受害者。成立于1843年的反移民政党美国人党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西进运动给北美印第安部族带去了毁灭性的打击。在1811年印第安纳领地爆发的一场战役中，威廉·亨利·哈里森率领美军击溃了肖尼部落首领特库姆塞（Tecumseh）领导的印第安部落联盟。这一次，因为无法再次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冲突，西北领地内的印第安人被迫要么不断向西迁徙，要么偏安保留地之中。1832年，在部落首领黑鹰（Black Hawk）的率领下，索克人与其他印第安部落企图收回密西西比河以东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却遭到了残酷镇压。

在南方，根据《印第安人迁移法》（1830年），切诺基人和其他印第安部落被赶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尽管马歇尔首席大法官在两个著名案件中判定印第安人获胜，但是州政府官员和杰克逊总统却对此熟视无睹。杰克逊甚至讥讽道："马歇尔先生作了裁决，现在他得靠自己去执行。"在1830年《国情咨文》中，杰克逊称：当"这些野蛮的猎人"被驱逐后，南方将"迅速实现人口、财富和实力的增长"。在那个时代，杰克逊曾被视为"美国民主崛起"和"平民时代到来"的代言人，而从今天的角度看，他身上的光环却少了很多。在美国军队的铁蹄下，印第安部落背井离乡，沿着所谓的"血泪之路"迁移到今天的俄克拉荷马州境内，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在迁徙的路上倒下，埋骨他乡。

动荡的社会变迁也成为宗教奋兴、乌托邦改革尝试和改良运动的沃土。周期性宗教奋兴运动不断越过南部边疆，其中，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从1825年起领导的奋兴运动很快在北部城市吸引

了大批信众；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预言基督将于1844年返回人间，在新英格兰地区聚集了大批信徒；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于1830年发表了《摩门经》，声称自己是在超自然力量的协助下发现并翻译了这部经典，成功地吸引了一批追随者。《摩门经》反映了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的天定命运观，将北美大陆描述成肩负着神圣使命的特殊之地。

随着城市和工厂的发展，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耶稣基督复临归一会建立了多个禁欲社区，遍及从缅因州到肯塔基州的广大区域。耶稣基督复临归一会又称震教派，是英国的一个教派，其信徒早在1774年就来到了美国。这些社区因其特殊的礼拜仪式、做工精巧的手工制品和种子等其他产品而受到关注。在艾奥瓦州、宾夕法尼亚州、新哈莫尼、印第安纳州以及波士顿附近的布鲁克农场，其他宗教和非宗教性质的公社组织不断涌现。一些人成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理论的追随者。这些公社组织的创始人天真地希望合作能够取代竞争性个人主义，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基督并未在1844年重返人间；约瑟夫·史密斯却在1844年被杀害（不过他创立的新教派仍继续存在）；乌托邦社区也逐渐消亡。尽管如此，人们对社会改良的渴望并未消除，改革运动席卷美国。禁酒派倡导人们远离酒精；守安息日者敦促国会通过将周日定为休息日的法案；还有一些人则宣扬应仁慈地对待囚犯和疯子。马萨诸塞州的贺拉斯·曼（Horace Mann）为改善公立学校而积极活动。在北部各州，废奴的努力虽然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是废奴的呼声却越来越大。

城镇中产阶级崛起，一些女性开始对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和家长制提出质疑。1848年，纽约州塞尼卡瀑布城的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费城的贵格会牧师卢克丽霞·莫特（Lucretia Mott）和其他几人在塞尼卡瀑布城召开了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大会宣言引用《独立宣言》称“男人和女人生来平等”，并提出要求实现全面性别平等。尽管前路仍有重重障碍，但这仍标志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出席1848年大会的一位年轻代表后来活到了女性获得选

举权的1920年选举并参加了投票。）

这些宗教运动和改革尝试表明，当时美国社会渴望再现革命年代所憧憬的社会变革。尽管有诸多社会变革和问题，一些人仍然幻想着要实现托马斯·佩因在1776年提及的那个令人心向往之的“新世界”。

共和国的艺术与文化

1820年，一个苏格兰记者曾嘲讽道：“谁会读美国人写的书……又有谁会去看由美国人创作的画和雕像？”这样的话刺痛了美国的艺术家和作家，他们不遗余力地要在美国取得政治和经济成就的同时，推动美国文化的发展。独立战争胜利初期，吉尔伯特·斯图亚特、约翰·特兰伯尔（John Trumbull）等画家用自己的作品记录下了独立战争和制宪会议的英雄人物和场景。19世纪30年代，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专注于对壮丽荒野、别致乡村和古代遗迹的呈现，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美国艺术家也开始在自然中寻求创作灵感。尽管工厂、城市和铁路网正在不断蚕食自然之美，但是亚瑟·杜兰德（Asher Durand）等画家创作了一幅幅浪漫主义的风景画，画中有哈得孙河、康涅狄格河、卡茨基尔山、阿迪朗达克山，以及令人惊叹的尼亚加拉瀑布。

图3　在这幅1851年出品的禁酒海报上，一位年轻男士拒绝了身穿黑色长袍的妖艳女子递来的一杯酒，而选择了白衣少女奉上的清水。海报反映了那是一个倡导道德改革的年代。

在题为《帝国兴衰》（1833—1836年）的系列四格讽喻画中，

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记录了社会如何从原初的纯真走向灾难性的毁灭，激起了一种不安的情绪。因为受到铁路公司委托，乔治·因尼斯（George Inness）在1855年创作了《拉克瓦纳山谷》，除了不得已出现的小火车和圆形车库外，这幅作品表现的完全是宾夕法尼亚州田园诗歌般的美景。

作家们也对演变中的美国社会有着自己的思考。在182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中，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在浪漫化地描绘殖民地时期生活的同时，也指出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在《最后的莫西干人》（1826年）等小说作品中，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对农场和城镇不断推进的历史背景下印第安人和伐木工的命运作了浪漫主义的描写。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则用《厄舍府的倒塌》等恐怖小说表现了悲观版的浪漫主义。但是，艾伦·坡也有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如《人群中的人》（1840年），以及以巴黎为背景却基于纽约市一起真实谋杀案而创作的《玛丽·罗杰疑案》（1842年）。

19世纪50年代，美国文学创作进入活跃期。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发表了《红字》（1850年）和《带七个尖顶的阁楼》（1851年），考察了新英格兰先民的原罪观。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白鲸记》（1851年）以作者本人的航海经验为基础，记录了乘坐捕鲸船出海的生活体验，探求了船员的情感生活，描绘了船长如何偏执地追捕一条大白鲸，在作品中，船长的偏执具有很强的隐喻性。尽管在当时并未受到关注，《白鲸记》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经典作品之一。沃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出生于布鲁克林，曾是一名记者，后转行成为诗人，并发表了《草叶集》（1855年）。他歌颂了美国日益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更是以让同时代人咋舌的坦诚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

与此同时，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以及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等英国诗人和作家的影响下，新英格兰地区出现了一群试图

超越世俗经验以追求纯粹知觉的“超验主义者”。来自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是超验主义者的领袖人物，他于1832年辞去一位论教派牧师的工作，专注于写作和讲学。在1832年哈佛大学神学院的一次演讲和《论自然》（1836年）一文中，爱默生摒弃了宗教教义，转而认为只有依靠直觉才能获得真理。

在重视个人洞察力的同时，超验主义者也致力推动文化和社会发展。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农场就是超验主义者的乌托邦公社项目。在《美国学者》（1837）一文中，爱默生哀叹美国人在精神上仍然依附于欧洲，倡导建立以美国自身社会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民族文化。这篇文章被一位同代人称为美国的“精神独立宣言”。1845年，超验主义杂志《日晷》编辑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发表了《十九世纪的女性》一书。在书中，富勒提出，女权主义是爱默生所倡导的文化觉醒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爱默生一样，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也同样来自康科德。梭罗是最早倡导保护生态的人之一，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并不时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为了表示对墨西哥战争及支持战争的南方奴隶主的抗议，梭罗曾拒绝缴税，并因此在1846年被监禁一段时间。他的作品《论公民的不服从》（1849年）为消极抵抗不公正的法律正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改革家和活动家。18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记录了他在瓦尔登湖畔自己搭建的小木屋里两年的生涯。在书中，梭罗对正在经历巨大社会和技术变革的美国社会生活进行了反思。

在这个时期，活跃的不仅是阳春白雪的作家和思想家。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美国还产生了略显粗俗的流行文化。实际上，今天流行的电视真人秀和超市小报的雏形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在纽约市的妓院、酒馆和露天啤酒馆中，詹姆斯·戈登·本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创办的《纽约先驱报》等各种小报刊登载着各式各样耸人听闻的都市新闻，以娱乐读者。音乐厅既演奏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创作的伤感民谣，也上演着拿黑人和移民寻开心

的拙劣滑稽戏。1836年，一名漂亮妓女海伦·朱厄特（Helen Jewett）被谋杀的案件曾一时盛嚣尘上，而且类似的丑闻事件层出不穷，这些事件既带来了大量艳俗的新闻报道，更是让道德改革家们惊出一身冷汗。这些也构成了美国社会生活的另一面。

外人眼中的美国

在这段美国迅速成长的时期，外国访客对美国社会生活有着自己的观察。1827年，因丈夫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一位英勇无畏的英国妇女弗朗西丝·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带着孩子来到美国。她先是在田纳西州一处乌托邦公社短暂地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在辛辛那提当了两年的店主。1832年，她发表了畅销书《美国人的家庭礼节》。虽然这本书有偏颇之处，但是她对美国人的假正经、夸夸其谈、粗鲁举止、狡诈手段和煽动情绪的宗教复兴运动等的观察却是非常敏锐。

为了研究美国的监狱系统，法国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于1831年来到美国。在两卷本《美国的民主》（分别发表于1835年与1840年）中，托克维尔对美国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探究。他把美国看作是没有贵族、由多数派掌权、新兴平等主义民主制度的模范。在他看来，在鼓励个人主义（这个词就是由托克维尔首创的）同时，这种新制度依靠宗教、公众舆论和志愿组织的影响来维持社会秩序。直到今天，这些仍是美国社会生活的特征。

美国内战前的这段时期，在社会创造力得到大发展的背景下，奴隶制成为美国无法逃避的现实，这有悖于美国以自由和平等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由奴隶制引发的冲突可能导致“最为惨烈的内战”。在托克维尔访美30年后，他的担忧不幸地成为了现实。

注释

〔1〕 即1812年战争。

第四章

1850—1865：奴隶制与美国内战

1619年8月，一艘荷兰商船将20名非洲人作为契约奴卖到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开启了对美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黑奴贸易。截至1860年，美国共有440万非洲裔黑人，其中近90％是奴隶。

有关奴隶和奴隶制的故事有很多维度。奴隶制一方面巩固了南方各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政治争议。故事中既有抗争的黑奴，也有尽管面临种种生活困境却保持文化活力的黑奴，还有因为奴隶制与美国的政治和宗教信仰相冲突而反对奴隶制的美国白人。美国内战结束了奴隶制，但为实现《独立宣言》许诺的完全平等而进行的斗争却会持续很长时间。

内战前的奴隶制

在殖民地时期，奴隶制广泛地存在于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所有英国殖民地内。实际上，运往英国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非洲黑奴总人数高达480万，远远超过运抵大陆殖民地的36万人。为了满足欧洲对食糖日益增长的需求，甘蔗种植成为英属（和法属）加勒比海殖民地的主要经济基础。奴隶主对待黑奴极为残酷，加上疾病和营养不良肆虐，黑奴死亡率极高。

美国宣布独立后，奴隶制在北部各州逐渐被废除，只在南方各州保留下来。即使在南方，由于土壤贫化和解放奴隶运动的发展，奴隶制的末日也不远了。但是，英国和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需要棉花作为原材料，而1793年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的轧棉机实现了轧棉过程的机械化，这大大提高了棉花的盈利能力。尽管水稻、烟草和甘蔗种植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到1830年，南方已经是“棉花为王”，棉花种植园遍布从南卡罗来纳州至得克萨斯州的广大南方地区。1860年美国出口额中，棉花出口占近六成。

随着棉花种植园的推广，奴隶制范围也在扩张。尽管南方白人中只有少数是奴隶主，但是蓄奴人数超过100人的种植园主就有2,300名，整个南方的经济都依赖于黑奴的劳动。切萨皮克地区也成为棉花

经济圈的一部分，因为一些烟草种植园主将“富余”的黑奴都卖给了内陆地区的棉花种植园主。在商业、制造业和自由农不断改造北部各州经济结构的同时，南方却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一条与奴隶制互相依存的经济发展之路。

奴隶制下美国黑人的生活

奴隶制否认受奴役者的基本人格，是对自然权利理论的无情嘲弄。因为担心教育会导致反抗，奴隶主们普遍拒绝对黑奴进行最基本的教育。黑奴中有少部分是家政用人，绝大多数主要做农活。奴隶主们把黑奴看作劳动力和可交易商品，因而鼓励黑奴生育，却完全不考虑黑奴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奴隶主常常与女性黑奴发生性关系，因此出现了大批的混血新生儿。按照黑奴法规，这些混血儿也都是黑奴身份。奴隶主中有的残忍，有的相对温和。与南方偏北部地区相比，棉花种植区的情形更加严酷。尽管不同的奴隶主和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奴隶制的基础是奴隶主拥有绝对权威，各州立法更是强化了这一点。

尽管奴隶制摧毁人性，但是黑奴家庭和群体却顽强地保留了自己的人格。在这个方面，结合了非洲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元素的黑奴宗教扮演了重要角色。黑奴在歌谣和民间故事中嘲讽奴隶主，并歌颂奴隶们的足智多谋。这些歌谣和故事引喻基督教有关犹太人逃离埃及前往“应许之地”的赞美诗，表达了黑奴对自由的向往。

黑奴们常常以一些微妙的方式进行抵抗，比如破坏劳动工具、拖延劳动进度。尽管会因此遭到鞭刑，但是无声的抗争并未停止。更胆大些的奴隶采用了逃跑的方式。在被统称为“地下铁路”的众多避难所的协助下，逃到北部的黑奴迅速逃往加拿大以获得自由。马里兰州的前黑奴哈丽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在1849年出逃成功后，多次返回马里兰州，协助家人和其他人获得自由。奴隶主们刊登布告悬赏捉拿逃亡奴隶，并对被捕的逃亡奴隶施以酷刑。尽管如此，通往

自由的逃亡从未停止，尤其是在南部偏北各州。在1838年从巴尔的摩的奴隶主家出逃后，年轻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加入了废奴运动，他的自传也激励了很多人。

尽管并不常见，绝望的黑奴有时也会公开反叛。1822年，登马克·维西（Denmark Vesey）领导了查尔斯顿起义；1831年，纳特·特纳（Nat Turner）在弗吉尼亚领导了特纳起义。特纳是一位在俗传教士，自觉得到神谕要他组织黑奴抵抗运动。他和一帮反叛者袭击了当地种植园，杀死了59人。他们的行动遭到残酷镇压，惊恐的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了大量本地黑奴。特纳本人在藏匿两个月后被捕，并被判绞刑处死。此后，弗吉尼亚等州实施了更加严苛的黑奴政策。

奴隶政治

奴隶制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和政治问题，当有新州加入美国时，这些问题尤为突出。1819年时，美国的蓄奴州与自由州数量刚好相等。尽管宪法中有五分之三规定（即根据各州人口数量分配各州众议院议席时，黑奴人口按照五分之三计算），但是蓄奴州众议员数量仍远远少于自由州。1819年，密苏里申请作为州加入联邦时，来自南方的政客坚持要准许该州实行奴隶制。1820年，国会同意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为了保持平衡，缅因州成为自由州并入联邦。根据国会妥协协议规定，在密苏里州南部州界即北纬36°30″以北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涉及领土范围内，禁止实行奴隶制。当时已经年迈的托马斯·杰斐逊写道，这场争论就如“夜晚的火铃”让他心惊胆战。

正如杰斐逊担忧的那样，奴隶制越来越成为主导国家政治的议题。1836年，南部议员迫使国会通过了禁止国会接受废奴申请书的程序性法案。尽管前总统、议员约翰·昆西·亚当斯提出请愿本身是合乎宪法的，但是“言论限制法案”仍执行了8年。1844年总统选举中，主张废奴的自由党（成立于1839年）候选人一共获得了6.2万张选票，足以帮助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波尔克战胜辉格党候选人亨利·克莱。

1845年得克萨斯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这更加重了北方的不安。1847年，众议院通过议案禁止在通过墨西哥战争获得的领土上实行奴隶制，但是议案在参议院被否决。1848年选举中，由持反对意见的北方辉格党人和反对奴隶制扩张的民主党人组成的自由之土党总统候选人获得了11％的选票，再次凸显了美国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会为了平息争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被统称为1850年妥协案。在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时，国会批准新墨西哥领地和犹他领地的选民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实行奴隶制。此外，国会一方面关闭了华盛顿特区的露天奴隶市场，另一方面却允许奴隶制在首都继续存在。南方也赢得了一场重要胜利，即国会通过了严厉的《逃奴追缉法》，授权联邦警察可以逮捕并遣返逃亡黑奴，且无需经过陪审团审判。在必要时，联邦警察甚至可以临时授予旁观者执法权，协助警察完成抓捕。对于很多北方人而言，这项法律再次表明奴隶制是不可调和的。

奴隶制大辩论：从殖民到废奴

在共和国早期，一些南方领袖曾提出解放黑奴，并将他们遣返非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长老会牧师罗伯特·芬利（Robert Finley）于1816年成立了美国殖民协会。从1822年起，美国殖民协会共计遣返了约1.2万名被解放的黑奴，他们在（以美国殖民协会的支持者詹姆斯·门罗总统的名字命名的）西非沿海小镇蒙罗维亚定居下来，并以此为基础最终建立了利比里亚。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由于棉花种植园经济的扩张，以及纳特·特纳起义后民意转向，解放黑奴与殖民的呼声在南方渐弱。

对于包括新移民在内的一些北方人而言，只要将奴隶制局限在南部地区，他们最初对奴隶制似乎持包容态度。城镇工人担心奴隶被解放后移居北部地区，跟他们竞争就业机会。纺织厂主和工人则因为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依赖南方的棉花，反对奴隶制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

处。然而，奴隶制的扩张逐渐威胁到自由农业的发展，反对蓄奴领地扩张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人们反对的并非是奴隶制本身。与此同时，觉得奴隶制有违道义的北方人也越来越多，其中以信仰个人神性的贵格会为主要代表。英国也掀起了一场废奴运动，1833年英国决定在英帝国全面废除奴隶制，使得这场运动达到高潮，并在美国引起强烈共鸣。

早期，废奴派曾经支持采取渐进式的方法解放黑奴，并给予奴隶主一定的补偿，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废奴派的主张发生了转变，要求立即废除奴隶制。1831年，波士顿的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创办了《解放者报》，并声称："我将寸土不让，我要让人们听到我的声音。"1833年，加里森还协助成立了美国反奴隶制协会。作为一个彻底的激进派分子，加里森反对政治妥协，批评美国宪法是"与地狱的协议"，并坚称，如果继续允许奴隶制在美国存在，北方将不得不脱离联邦。然而，加里森也是一个反战者，他强调应该采取"道义劝告"的方式消除罪恶的奴隶制。很多致力改革的北部新教徒也接受了废奴主张。长老会牧师西奥多·韦尔德（Theodore Weld）组建了多个废奴协会，此外，他还与其妻子安杰利娜·格里姆克·韦尔德（Angelina Grimké Weld）在整理汇编南方报纸剪辑的基础上，共同出版了《美国的奴隶制度》（1839年）一书。

除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之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黑人领袖。逃亡奴隶威廉·韦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赞同加里森提出的"道义劝告"策略，而同为逃亡奴隶的亨利·海兰·加尼特（Henry Highland Garnet）则更加激进。在1843年布法罗城全国黑人大会的演讲中，加尼特高度评价纳特·特纳，并力劝与会者抵抗运动可以采取"能够赢得胜利的一切道义的、思想的或是对抗的方法"。在一个世纪后的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中再次出现了这样两种不同的策略。

在这场废奴运动中，女性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格里姆克姐妹莎拉（Sarah）和安杰利娜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奴隶主家庭，但是她们信仰了贵格会教义，移居费城，并加入了废奴运动。她们的一些公开演说遭到了新英格兰牧师们的反对，因此她们在自己倡导的改革

计划中增加了争取妇女权利的目标。同样，当遭到白人领袖排挤时，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和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更是将废奴与女权主义结合了起来。

随着废奴运动的不断发展，阻力越来越大。1835年，加里森差点死于支持奴隶制的波士顿激进分子的私刑。在查尔斯顿，暴民将从邮局偷来的废奴印刷品付之一炬。1837年，支持废除奴隶制的报纸编辑伊莱贾·洛夫乔伊（Elijah Lovejoy）在伊利诺伊州奥尔顿市被谋杀。在北部各州，一些知名人士领导下的激进分子数次破坏废奴聚会。1844—1845年，南部的卫理公会和浸礼会正式脱离本教派的全国协会，成为独立的教派，预示着即将出现的南部脱离联邦的危机。

期待1850年妥协案能够终结争议的愿望很快就破灭了。1852年，因为受到《逃亡奴隶法》的刺激，出生于福音派牧师家庭的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发表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反对奴隶制的小说在那个情绪化的年代唤醒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道德情感。斯托夫人写道，奴隶制破坏家庭、麻木人们的同情心、践踏基督教道德规范。很快，这本小说在北方成为热销书，影响力可以媲美汤姆·佩因1776年发表的《常识》。在小说中，西蒙·勒格雷（Simon Legree）鞭笞虔诚信仰基督教的黑奴山姆大叔（Uncle Tom），伊丽莎（Eliza）勇敢地穿过冰冻的俄亥俄河并获得自由，这些生动的场景深深地印在了一代美国人的心里。

作为应对，一些南方作家则创作了一批描述奴隶幸福生活的作品，比如玛丽·伊斯门（Mary Eastman）的《菲利丝阿姨的小屋》（1852年）。在《论人种》（1854年）一书中，亚拉巴马的医生乔赛亚·诺特（Josiah Nott）声称黑人天生低人一等，鼓吹人种多元论，污蔑黑人是另一种非人物种。虽然南方的福音派信徒否认人种多元论，但这只是因为这种理论有悖于《圣经》中的创世说，他们转而引用《圣经》中貌似赞同奴隶制的段落来为奴隶制询证。弗吉尼亚的乔治·菲茨休（George Fitzhugh）则采用了另一种方法来说明奴隶制的合理性。在《南方的社会学》（1854年）中，菲茨休将美国南方的“家庭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工资奴隶制”作了一番对比。他的结论

是，仁慈的奴隶主们关心奴隶的福祉，而北方工厂主却是在无情地剥削工人。尽管菲茨休对奴隶制的描述纯粹是臆想，但是他对北方工厂的批评也算是正中要害。

政治上，由于民主党和辉格党本身的分裂，反移民的美国党曾在1854—1855年昙花一现。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1854年5月）中，国会采纳了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提出的“人民主权”这剂万能药。这项方案否决了《密苏里妥协案》有关禁止在北纬36°30″以北发展奴隶制的规定，规定由堪萨斯领地和内布拉斯加领地的人们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是否允许奴隶制发展。1854年7月，北方辉格党和自由之士党领袖在威斯康星州里彭市召开会议，成立了反对奴隶制扩张的新政党：共和党。

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权”方案在堪萨斯引发了暴力冲突，来自密苏里的亲奴隶制殖民者与得到废奴者资金和武装支持的北部反奴隶制殖民者成立了敌对的领地政府，并分别申请加入联邦。1856年5月21日，从密苏里出发的亲奴隶武装分子掠夺了废奴重镇堪萨斯的劳伦斯城。三天后，废奴人士约翰·布朗（John Brown）与他的四个儿子和其他两人一道，在堪萨斯的波塔瓦托米县杀害了五名亲奴隶制殖民者。“堪萨斯内战”的游击战中，死亡总人数达到200余人。（在一系列复杂政治协商后，堪萨斯于1861年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在1856年5月这个多事之夏，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在华盛顿作了一次长达三小时的演讲，尖锐地批判了“奴隶寡头政治”。两天后，南卡罗来纳州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用一只重型手杖攻击了萨姆纳，导致后者倒在参议院地面的血泊中不省人事。为了表示对布鲁克斯的支持，一些南方支持者甚至给布鲁克斯送去了一大堆新手杖。

在南方的支持下，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赢得了1856年总统选举。尽管如此，共和党候选人、知名探险家约翰·C.弗雷蒙（John C. Frémont）仍在北部11州获胜。这一方面彰显了新政党的影响力，也表明新政党的地域局限。在就职演

说中，布坎南不仅抨击废奴主义，更是表示反对任何在新领地内禁止奴隶制的联邦政策，这让反对奴隶制的北方民众大跌眼镜。

最高法院有关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案的决议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斯科特是一名黑奴，他提出上诉要求获得自由，原因是原来的主人（一名军医）曾把他带到了自由州伊利诺伊和威斯康星。在来自马里兰州的首席大法官罗杰·托尼（Roger Taney）领导下，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拒绝了斯科特的申诉，理由是黑奴不是公民，因而没有上诉权；此外，最高法院还宣布《密苏里妥协案》违宪，因为禁止奴隶制在北部领地发展侵犯了奴隶主的财产权，且这一规定并未走正当的法律程序。纵览这些事件，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曾沮丧地预言称将爆发一场“不可遏制的冲突”。

1858年，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提名律师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作为候选人，向在任参议员史蒂芬·道格拉斯发起挑战。在一系列辩论中，林肯有针对性地批判了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权”观念。林肯曾质问道格拉斯：按照“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决议，一个领地的居民怎么能够禁止奴隶制本身？道格拉斯则谨慎地回答道，当然可以，只要他们拒绝执行保留奴隶制必须的实施条例。道格拉斯的回答激怒了支持奴隶制的人。尽管道格拉斯保住了参议院议席，林肯却也在国内成为名人。

1859年10月，在知名废奴活动家的秘密支持下，约翰·布朗带领包括5名黑人在内的18人，袭击了弗吉尼亚州哈泊斯费里的联邦军火库。他打算武装当地奴隶，引发一场更加广泛的动乱。联邦军队在罗伯特·E.李（Robert E. Lee）率领下轻松抓捕了军火库袭击者，布朗和其中的6人被判处绞刑。不久之后，北方军队将高唱着“约翰·布朗的尸体躺在坟墓里腐烂，他的英魂正在前进着”加入南北战争。

1860年2月在纽约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林肯一方面批判了废奴者中的极端主义，另一方面也坚称必须终止奴隶制的扩张。对此，参议院作出了轻蔑反击，在同年5月通过了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的提案，认定政府无权取缔奴隶制，并宣称

政府的职责是在各新领地内维护奴隶制。

是年5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提名林肯为总统候选人。由于辉格党已经分裂，而南方和北方的民主党人分别提名了不同的候选人，林肯在大选中赢得了40%的相对多数票并当选总统，但他在选举人团投票中未能赢得南方的任何选票，预示着悲剧将不可避免。

南方很快作出了回应。同年12月在一片欢呼声和焰火中，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召开的大会宣称："以美利坚合众国之名而建立的南卡罗来纳州与其他各州之间的联盟正式解散。"截至1861年2月，共有11个南部州脱离联邦，成立了美利坚联盟国，由杰斐逊·戴维斯出任总统。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玛丽·博伊金·切斯特纳特（Mary Boykin Chestnut）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南方和北方，已经分离，因为我们彼此仇恨。"

一些南方利益的护道者后来声称，对宪法中有关州权规定的理解不同是导致内战的原因。事实上，南卡罗来纳州的退出联邦宣言中已经指明了内战爆发的导火索，即：新当选总统"在观点和用意上敌视奴隶制"。可见，从一开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南方决心要捍卫奴隶制。

南方军队占领联邦要塞时，布坎南总统仍旧消极地无动于衷。虽然他下令派遣一艘补给舰前往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堡，但是补给舰却在遭遇来自海岸的炮火进攻时撤退了。1861年3月4日，林肯在就职演说中试图调停，并承诺蓄奴州可以继续实行奴隶制，但是他也发誓要抵制分裂联邦的行为。4月12日，萨姆特堡指挥官拒绝投降，海岸炮台向萨姆特堡开火。林肯随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征召建立了一支7.5万人的志愿军部队。西沃德口中的"不可遏制的冲突"爆发。

美国内战

北方在技术、交通、资金和人口（北方人口2,200万，南方人口

仅有900万，还包括350万黑奴）上都占有优势。因为考虑到南方棉花对英国纺织业的重要性，联盟国一方曾寄希望于英国的支持。然而，英国国内意见存在分歧，而且美国政府也警告英国政府不要插手。尽管当时美英关系一度紧张，但是英国并没有承认联盟国政府。

1861年7月，北方军队在华盛顿附近的布尔溪（第一次马纳萨斯会战中）被击败，北方希望在东部速胜的希望破灭，东部战线陷入僵持。1862年2月，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McClellan）将军率领北方军队借道切萨皮克湾向弗吉尼亚发起攻击，兵临南方首都里士满城下，在经过一番苦战后撤军。1862年秋季，南方将领罗伯特·E.李和有“石墙”之称的托马斯·杰克逊（Thomas Jackson）率领部队经马里兰州向华盛顿方向发起进攻。麦克莱伦于9月17日在安提塔姆河阻击两人率领的军队，双方爆发血战，麦克莱伦战败。受挫的林肯更换了几任将领，都未能突破僵局。

在其他战区，美国海军取得了较好的战绩，于1862年4月成功占领了新奥尔良，阻断了南方的海上通道。在西部战场，1862年初联邦军的尤利塞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将军就占领了田纳西州北部的几个关键要塞，并于是年4月在唐·卡洛斯·比尔（Don Carlos Buell）将军的协助下，在密西西比州科林斯附近的夏伊洛击败南方军队，交战双方都伤亡严重。1863年1月，南方军队在默夫里斯伯勒被击溃后，联邦军队获得了田纳西中部的控制权。在经历了长期的围困战后，格兰特于1863年7月4日占领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南方重镇维克斯堡，并在11月又攻陷了铁路和交通枢纽查塔努加市，至此西部战事基本结束。

在弗吉尼亚获得弗雷德里克斯堡（1862年12月）和钱斯勒斯维尔（1863年5月）两场战役的胜利后，李将军继续率领南方军队北进。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战役中（1863年7月1—4日），联邦军队成功阻击了李将军的北进，这场战役也成为美国内战的转折点。是年11月，在为葛底斯堡国家公墓揭幕式上，林肯发表演讲纪念那些为了确保“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当免于凋零”而献身的人们。尽管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只有272个单词，却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

总统演说之一。

1864年3月，时任联邦军队总司令格兰特将军率部攻入弗吉尼亚。尽管斯波齐尔韦尼亚战役、冷港战役和彼得斯堡战役中双方损失惨重，但是格兰特的军队仍一路向里士满挺近。威廉·T.谢尔曼（William T. Sherman）将军在9月攻占亚特兰大（此次战役的胜利帮助林肯赢得连任），并往东一路杀向萨瓦纳。1865年4月9日，李将军在弗吉尼亚州的阿波马托克斯郡府向联邦军投降。在双方付出了61.7万人（当时美国总人口为3,140万）生命的代价后，美国在内战中幸存下来。

林肯却没有时间来充分享受胜利的喜悦。1865年4月15日，在华盛顿的福特剧场，同情南方的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思（John Wilkes Booth）开枪刺杀林肯，林肯在第二天不治身亡。

图4　1863年7月5日，葛底斯堡战场上的南方士兵尸体。内战中，一些摄像师深入战场，带回的影像向平民们展现了战争杀戮的恐怖画面。

内战、奴隶制和非裔美国人

林肯最初决定向南方开战是为了拯救合众国免于分裂，并不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尽管林肯本人反对奴隶制，但是当时不仅是政府内阁存在分歧，北方领导的联邦各州之间也有分歧，因为马里兰、肯塔基和密苏里等3个蓄奴州并未脱离联邦。尽管如此，解放黑奴仍渐渐地成为战争的目的之一，一方面是由于废奴者不断施压，另一方面，大批逃亡黑奴（最终多达50万人）加入了联邦军队作战。

1862年9月，在安蒂特姆河战役后，林肯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解放联邦军控制范围内的所有奴隶。这就意味着一旦联邦军获得胜利，几乎所有黑奴都能获得自由。联邦政府一改之前的政策，转而欢迎黑人参军作战。到战争结束时，共有18.6万名黑人参军，但是他们只能加入白人指挥下的黑人部队。虽然黑人主要是非战斗人员，但是也参加了部分战役，其中比较有名的是1863年7月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瓦格纳堡战役。那些没有逃亡的黑奴也用各种办法在后方搞破坏，削弱了南方的经济。

家庭之战

内战双方的志愿者们也为战争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女性，她们在丈夫和儿子离家参军时承担起了料理种植园和农场的责任。北方妇女们召集“卫生集市”为美国卫生委员会筹集资金，以帮助这个志愿组织为军队提供所需的医疗和卫生供给。另外一些女性志愿者为军队送去食物，作为军队补给的补充。南北双方的志愿女护士总数超过3,000人，其中包括前专利局文员、后来的美国红十字会奠基人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诗人沃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也曾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医院担任义工，并用《桴鼓集》（1865年）和其他作品记录了他当时的印象。

战争在北方也激起了反抗。1863年国会决定强制征兵，贫困的爱尔兰移民发起暴动（因为富人可以花钱雇人代替自己服兵役）。在纽约市，暴动民众攻击征兵所和共和党名人的住宅，并用私刑处死了几

个非裔美国人，直到联邦军队出动武力来恢复秩序。为了压制反抗，林肯于1863年中止了人身保护的相关法令，批准逮捕了（多数只是短时间扣留）近1.5万名南方支持者和战争批评者。这项政策被后世政府当作战时政府镇压不同意见者的先例。

重建的诺言落空

虽然“第十三号宪法修正案”（1865年）宣告终止奴隶制，但是南方各州议会通过的“黑人法令”继续限制自由黑人的权力，并且广泛实行与奴隶制无甚差别的劳动法。为此，在共和党人的促成下，国会决定保留内战时为保护被解放黑奴而成立的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通过一项反对“黑人法令”的《民权法案》；并通过了“第十四号宪法修正案”（1868年），保证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的人（印第安人除外）拥有公民权和平等权。然而，林肯的继任者、来自田纳西州的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却藐视国会决议，公然反对这些措施。（因为总统任命权争议，约翰逊在1868年遭到弹劾，后在参议院投票中仅以微弱优势免遭去职。）

随后，国会改变了约翰逊对南方网开一面的政策方向，于1867年开始对南方实施军事管理。如果想要重新加入联邦，前联盟国各州必须认可“第十四号宪法修正案”，保证被解放黑奴的权利。在这段被称为“激进重建”的时期，南方黑人开始出任州议会议员，并出现了几位国会议员，包括两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参议员。尽管（被批评家夸大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重建时期的议会仍然筹措资金保证了公共教育、医院和收容所的运营，并采取措施保护了被解放黑奴的权利。

1868年，打着支持“激进重建”的旗号，共和党人尤利塞斯·格兰特在南方黑人选民的大力支持下赢得总统选举。“第十五号宪法修正案”（1870年）禁止“因种族、肤色，或过去的劳役状况”而剥夺任何公民的选举权。（但是这条宪法修正案却让女权主义者们失望了，她

们原希望宪法修正案会给予女性选举权。）

“激进重建”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865年，南方退伍士兵成立了秘密组织“三K党”，在南部各州对黑人选民和共和党政客进行恐吓。在路易斯安那州，三K党成员和其他恐怖分子在一场恐吓行动中共杀死了数百人。

《1875年民权法》规定所有人有同等使用公共场所和运输工具的权利。然而，北方对重建的支持在逐渐减弱，尤其是1873年经济危机之后。1876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纽约州长塞缪尔·蒂尔登（Samuel Tilden）虽然在选民票方面领先，但是在计算选举人团票时出现了争议。在众议院随后的协商中，南方议员同意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拉瑟福德·B.海斯（Rutherford B. Hayes）出任总统，作为交换，国会必须在其他问题上作出让步，包括结束南方的军事管理。随着联邦军队撤离，白人至上主义者又重新在南方掌权。

到1877年，奴隶制已经被全面废除，被解放的黑奴（至少在名义上）享有所有公民权。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白人种族主义再次抬头，使得之前的一些成绩化为乌有。在南方各州，政府不仅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更是采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阻碍黑人选民参与投票。种族歧视在北方也颇为盛行。尽管在种族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随着美国白人的注意力转向其他领域，很多问题被遗留下来。

第五章

1866—1900：工业化及其后果

1869年5月10日，在犹他州的海角点，工人们打下道钉将两条铁轨连接起来，一条蜿蜒至东海岸，另一条则延伸至加利福尼亚州，标志着美国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通车。这也标志着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从杰斐逊的自耕农社会进入工业大国时代。

随着银行家、企业家、工厂工人和文员让城市变得日益拥挤，以及成百万的移民涌入美国，工业化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新兴资本家精英炫耀着自己的财富和政治影响力，美国的阶级差异日益扩大，林肯预想的“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似乎变得很不现实。美国内战时期许下的诺言一再落空，种族主义又迎来了一个高潮。一些作家和社会思想家认为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能够带来发展，另一些人则对新秩序深表担忧。

新的工业文明

美国内战后的工业化带来多样需求：原材料、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大军、政府支持，以及在钢铁、铁路、蒸汽机、电力和石油等基础工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新型企业结构和金融机构也至关重要。实力强大的工业领袖们用自己的财富、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共鸣奠定了一代美国人的生活基调。

在19世纪中叶，美国炼铁业主要由不计其数的小铁矿和冶炼作坊组成。到了19世纪70年代，苏格兰移民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发迹，他并购矿山、工厂、航运设施，并将它们整合成巨型企业：卡内基钢铁公司。卡内基通过水路和铁路把明尼苏达州梅萨比岭的铁矿石运送至匹兹堡附近他自己的钢铁厂进行冶炼，创造了一条从铁矿到成品钢的垂直一体化生产链。通过采用以氧化方式去除铁水中杂质的贝塞麦酸性转炉炼钢法，卡内基批量生产出大批高质量钢材，广泛运用于铁路、蒸汽涡轮机、车间和农业设备的生产中。截至1890年，美国的钢产量超越英国，这也是美国工业崛起的里程碑时刻。

到1860年，美国的铁路网总里程已经达到3万英里，而内战结束后，铁路发展更是进一步提速。在激烈竞争、政治欺诈和疯狂建设的背景下，铁路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其中的一些又在万人瞩目中消亡。到1900年，美国铁路总里程达到20万英里，铁路工业总值高达近100亿美元——按现在的购买力计算竟超过2,600亿美元。

铁路大发展更是推动了美国战后的经济腾飞。经由铁路线，煤和铁矿石被运送至卡内基的钢铁厂，农业机械运到美国农村地区，牲畜到达芝加哥的屠宰场，粮食作物运到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磨粉厂，各种机器和消费品输送到全国各地，同时移民得以分布至广大的内陆地区。这个时代最知名和最受人敬畏的人之中就囊括了一批铁路大亨，如加利福尼亚的科利斯·P.亨廷顿（Collis P. Huntington）和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纽约的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和杰伊·古尔德（Jay Gould），以及明尼苏达的詹姆斯·J.希尔（James J. Hill）。

图5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附近霍姆斯特德的安德鲁·卡内基巨穴般的钢铁厂内景。这样的工厂是美国内战后工业发展的标志，从很多方面改变了美国。

在这个时代，燃煤蒸汽机为工厂、火车头、机械厂和谷物加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19世纪晚期，蒸汽技术迅速发展，推动着远洋轮船和工业汽轮机的发展。在1876年费城百年纪念博览会上，由位于普罗维登斯的科利斯蒸汽机公司出品的1,400马力蒸汽发电机通过一系列齿轮和连杆为整个博览会的所有机械提供了动力，这台巨型机器高达45英尺，单是调速轮的直径就达到30英尺。小说家威廉·迪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就赞叹地写道："语言已经无法形容科利斯蒸汽机；只有那些能够理解它宏伟而沉默气势的人才能够真正了解它；它是一个钢铁强者，就那样高傲地矗立在巨大建筑物的中央。"

到1900年，人们开始利用水力或者通过燃煤发电。电力作为新能源，让机械摆脱了固定蒸汽管和传动杆的束缚。得益于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等发明家的创造，这个时代不仅出现了电力机器，还有了有轨电车和路灯。与钢铁业同样，在电力行业中也出现了大鱼吃小鱼的情况。很快，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就控制了整个行业。

所有这些机器都需要润滑，而新兴的石油化工业提供了所需的润滑油。1859年，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开采出了美国的第一口油井。随后越来越多油井被开采出来，美国也很快成为了世界头号石油生产国。企业合并再次取代了无序竞争。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成立于1867年的标准石油公司，无情地扼杀了众多比自己小的公司，并通过"横向整合"的方法很快控制了整个石油冶炼行业。

不断扩张的金融系统为工业化大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美国和外国的投资银行不仅买卖大企业的股票和债券，还引导了企业发展。J.P.摩根（J. P. Morgan）旗下的纽约市银行不仅在伦敦和巴黎开有分行，控制了几条铁路，而且还操作了这个时代几宗最大的企业并购案。1901年，摩根买断安德鲁·卡内基的资产，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一年后，摩根创立了美国国际收割机公司，一家农业机械集团公司。摩根甚至几次出手帮助美国财政部应对金融危机。

工业化的社会成本

随着热切的产业工人涌入工业中心，工业化对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1850年时，美国仍是一个农业社会，只有少量城镇；但是到了1900年，美国已然成为城市工业国家，内陆地区为发达的农业区。1900年纽约市人口达到340万，几乎与1850年全美城镇人口总数相当。

城市新居民中有很多来自农村和小城镇，而更多的则是来自欧洲的移民。贫困故土的苦难和在美国改善生活的希望成为欧洲移民涌入美国的动力。1900年，美国20%的人口出生在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个比例在大工业城市则更高。早期移民主要来自英国、爱尔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而新移民则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地区，比如意大利、希腊、波兰、俄国和巴尔干半岛，新移民中信仰天主教、犹太教和东正教的比例较高。人口构成上的变化也为族裔关系紧张、文化多元化和政治版图重整埋下了伏笔。

尽管很多移民在西部农场定居下来，但是更多人选择了到克利夫兰、匹兹堡、圣路易斯、芝加哥、密尔沃基、明尼阿波利斯等工业中心城市，在工厂、磨坊和火车站务工。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城市不堪重负，住房、教育、交通和市政服务都显得捉襟见肘。此外，由于贫困移民不断涌入健康条件糟糕的居住区，肺结核、伤寒和其他疾病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尤其是在纽约下东区那些拥挤不堪、污水遍地的贫民窟。1870年，纽约市新生儿死亡率高达20%。教堂、犹太教会堂和城市布道会从宗教上给人们提供了慰藉，而杂耍剧场、舞厅、酒吧和游乐园等各种充满活力的流行文化场所则让移民至少可以暂时忘却新生活的压力和苦难。

城镇贫困人口不仅博得中产阶级的同情，也让他们感到恐惧。摄影记者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在1890年出版的《另一半人如何生活》中生动地描述了贫民窟的生活景象。芝加哥的简·亚当斯（Jane Addams）等改革家开办社会服务所，提供社会服务，并且在新移民和中产阶级志愿者之间建立了同情的纽带。城市政治机器为移民提供

了市政服务和工作机会，但也常常伴随着腐败现象。威廉·M.特威德（William M. Tweed，人称“老板”）控制的纽约市政府就因监守自盗而臭名昭著。因此，在《纽约时报》的披露文章和《哈珀周报》的讽刺漫画的推动下，纽约市“最明智、最优秀的市民”愤然掀起了一场改革，并于1873年将特威德送进了监狱。

工厂、磨坊和铁路虽然创造就业机会，但也带来了高昂的社会成本。这些工作强度大、时间长、工资低、工作环境危险，而且没有假期。时常出现的意外事故摧毁了不少工人家庭。1890年，共有2,451名铁路工人死于工伤，另有超过2.2万人受伤。一些大公司采取了家长式的方法应对这些问题。乔治·普尔曼（George Pullman）是芝加哥附近一家铁路卧铺车厢厂的老板，他不仅为工人提供住宿和文化生活设施，还采取禁酒等措施规范员工行为。但是，大多数资本家丝毫不关心员工死活，因为很容易找到人取代这些员工。在经济形势出现起伏时，一旦经济低迷，裁员和削减工资就成为家常便饭。1893—1897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就造成了严重后果。在芝加哥，绝望的人们不得不到垃圾场中寻找食物。

图6　1871年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所作纽约政治大佬威廉·M.特威德漫画像。在19世纪末期，过快增长让很多美国城市准备不足，城市被腐败政客把持，从而引发了市政改革运动浪潮。

这种情况引发了劳动力市场动荡、暴力事件和工会的建立。1877年，为了抗议降薪，铁路工人在全国各地举行了罢工。同时，由费城制衣工人于1869年成立的劳工骑士团提出要建立一个跨种族、跨性别、跨行业的劳工组织。这个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并在1884—1885年间赢得了针对杰伊·古尔德旗下沃巴什铁路公司的罢工胜利。因为担心就业竞争，劳工骑士团主张限制移民，尤其是涌入西海岸的中国移民。在劳工骑士团的推波助澜下，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1882

年），这项法案直到1943年才被撤销。

由雪茄制作工、印刷工和机械工等成立的技术工人工会并不赞成劳工骑士团提出的无所不包的方案。1886年，几家技术工人工会共同成立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在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的领导下，美国劳工联合会表示接受资本主义体制，集中精力争取提高工资和限制移民。1886年5月1日，在多家劳工组织和激进组织的协调下，美国主要城市的工人走上街头，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日。5月3日，在芝加哥国际收割机公司，两名罢工工人被警察开枪打死。次日晚，警察突然出动驱散了芝加哥秣市广场上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抗议集会，有人引爆了炸弹，导致一名警察死亡。在随后的骚乱中，又有4名示威者和7名警察丧生，大多死于警察的乱枪。“秣市骚乱”震惊了富裕的美国中产阶级。宗教报纸《公理会教友报》写道：“像芝加哥出现的骚乱那样，当无政府主义将受蒙骗的信徒们变成暴民时，加特林机枪……基本上就变成了最仁慈、最有效的解决方案。”8名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被捕并上了法庭。尽管检察官并未证明他们与爆炸事件存在关联，被捕者中仍有4人被处以绞刑，1人自杀。1893年，同情劳工的伊利诺伊州长约翰·P.奥尔特盖尔德（John P. Altgeld）给另外3人减刑，导致他本人在竞选连任时失利。

1892年，匹兹堡市附近的卡内基钢铁厂禁止试图组建工会的工人进入工厂，并从平克顿侦探社请来了300人，保护工厂雇佣来取代这些工人的工贼（被罢工工人称为“恶棍”）。双方发生了交火，导致3名平克顿侦探和7名工人丧生。宾夕法尼亚州长出动了国民警卫队来镇压罢工。两年后，普尔曼公司工人为抗议降薪举行罢工，随后美国铁路工会宣布进行全国性罢工，以支持普尔曼工人的行动。美国司法部长宣布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危险边缘”，并颁布法院禁令来阻止罢工，还囚禁了工会领袖尤金·V.德布斯（Eugene V. Debs）。（德布斯在入狱期间信仰了社会主义，并作为社会党候选人参加了后来的总统选举。）

尽管遭到了公司和政府精英的强烈反对，建立工会的努力并未停止。但是随着劳工骑士团逐渐淡出视线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局限在技术

行业，大多数工厂工人仍处于无组织的状态，只能听由雇主摆布。

企业时代的政治

工人、消费者与城市贫苦人群的福祉并未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因为各级政客都在为企业利益集团服务。虽然权钱交易时常出现，但是商业和政治精英们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贿赂都显得多此一举。政府出钱补贴铁路建设、出台保护性高关税、镇压罢工工人。不过，有一项监管改革值得注意，那就是“反托拉斯”运动。“反托拉斯”体现了政府担心以标准石油托拉斯（1879年）为代表的企业整合会扼杀竞争。《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年）规定禁止“阴谋限制贸易的行为”，但是该法律却执行不力。事实上，该法案的第一起重大诉讼发生在1894年，被起诉的竟然是一个劳工组织，即尤金·V.德布斯领导的美国铁路工会。

当然，其他问题也不时出现。国会就曾向联邦军老兵这个颇具政治影响力的游说集团慷慨拨款。此外，在一个谋官不成、精神错乱的律师刺杀了詹姆斯·A.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总统后，国会在1883年通过了公务员法，规定部分政府公职必须通过考试的方式招聘，而不是由官员直接任命。

这个时代一次重要的反企业政治运动的主力却并非产业工人和城市贫民，而是大平原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小麦和棉花种植者。由于商品价格下降、信贷紧缩、铁路运输歧视性定价和农业设备价格上涨，这些种植者已经负债累累。到19世纪80年代，南方和西部的农民联盟运动成立合作社，以提高产品营销能力，增加农民与铁路、设备商和磨坊主进行讨价还价时的筹码。一些更加激进的联盟领导人则要求政府调控降低铁路运费，迫使东部银行家放宽信贷条件。

在1892年总统选举中，新成立的平民党候选人赢得了100多万张选票，并在4个西部州获胜。1896年，由于债务、干旱和经济衰退的影响，平民党与民主党合并，对农民联盟的改革方案进行了整合，并

且在西部银矿主的支持下，大量发行银币以增加西部的现金流通量。两党合并后，推选来自内布拉斯加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为总统候选人，在大选中赢得了640万张选票，但是几乎没有吸引产业工人选票，原因是产业工人觉得自己与抗议示威的农民并没有什么共同利益。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则在企业和金融精英强大的财力支持下轻松赢得总统宝座。

尽管这些农业改革家为政治进程注入了活力，并且指出了缺乏监管的企业权力过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们只是代表了一个经济利益集团，未能吸收城市工人和消费者加入。直到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才真正建立了包括农民和产业工人在内的改革联盟。

19世纪末的非裔美国人与妇女

非裔美国人主要居住在南方各州，从事雇农或佃农工作，受到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选举歧视。在南方处于主导地位的民主党坚定地维护白人至上。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在亚拉巴马州兴办的塔斯基吉学院和其他少数学校为黑人青年提供职业教育，但这些学校也严格遵循种族等级制度。在北方，黑人仍习惯性地聚居于城市的“有色人种区”，从事着低收入的卑贱工作，或者从事诸如理发师、铁路搬运工等特定工作。

联邦政府默许了这种种族等级制度。实际上，在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最高法院以7票赞同1票反对的结果支持了路易斯安那州1890年通过的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铁路公司必须“为白人和有色人种提供平等但隔离的服务”。原告方提出，这项法令违反了第十四号宪法修正案有关保证所有人获得“平等法律保护”的规定，但是最高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求。“普莱西案”之后，种族隔离制度得到更加严格的执行。来自肯塔基州的前奴隶主约翰·马歇尔·哈伦（John

Marshall Harlan）提出的异议成为这次不体面法院裁决中唯一的闪光点。哈伦写道：“我们的宪法是不分种族的……在公民权利方面，在法律面前一切公民平等。最卑微的人和最有权力的人在这一点上也是平等的。火车乘客‘平等’享有乘坐权这一层薄薄的伪装不可能给人们造成平等的印象，也不能弥补今天裁决的错误。”

即使在这样的低潮期，仍有一些黑人领袖毫无畏惧地向种族主义提出了抗议。记者艾达·B.韦尔斯（Ida B. Wells）曾谴责孟菲斯市私刑泛滥，随后一帮暴民捣毁了她的报社办公室，迫使她在1892年离开了孟菲斯。她在1895年发表了《红色记录》，记录了白人种族主义者如何用恐怖主义手段恐吓黑人社区。

因为地域、种族、族裔和阶级不同，妇女的境况也千差万别。非裔美国妇女面临着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在照顾子女和料理家务之余，农民家庭的妇女们则需要忍受孤独，尤其是在大平原地区。农民联盟运动和民粹运动创造了社会交际的机会，也成了一些人发表意见的平台。充满激情的堪萨斯州民粹主义演说家玛丽·利斯（Mary Lease）就力劝农民们“少种玉米、多发出怒吼”。

在城市中，上层社会的妇女享受着安逸的特权生活。相反，移民妇女的日子却极其艰苦。为了贴补家用，一些移民妇女不得不做女佣或者在血汗工厂当制衣工。中产阶级妇女的人数不断增加，一些人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了教师、图书管理员、护士、文员或者纽约市梅西百货等百货公司售货员。妇女俱乐部运动的兴起为妇女提供了社会支持和丰富的文化活动，而社会服务所和慈善组织运动（“友好的访客”向贫困移民宣传禁酒和节俭）让妇女有机会参加志愿者工作。尽管主流文化仍将家庭视为妇女的主要活动场所，城市生活仍然开启了新的未来，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和苏珊·B.安东尼等资深女权主义活动家继续着争取选举权和平等权的斗争，也为后世女权主义运动的进展打下了基础。

作家和思想家对新秩序的反思

洛克菲勒、亨廷顿和摩根等巨头在这个时代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对于他们，有人仇恨，有人敌视，也有人由衷敬仰。这些巨头中，有人资助新建图书馆、交响乐团和其他各种文化设施；也有人出资收藏了大批艺术品，并最终交给了博物馆展出。安德鲁·卡内基的发迹之路成为美国白手起家神话的原型，这一题材为众多畅销作家所青睐，如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的《衣衫褴褛的迪克》（1867年）就宣传要依靠诚实、节俭获得成功，当然难得的运气也很重要。

一些社会思想家欢迎这种以残酷竞争为特征的新秩序。早在1850年，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就提出：竞争确保了“适者生存”。在《物种起源》（1859年）一书中，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提出进化是通过自然界中的自然选择实现的——自然选择的偶然性提高了某些个体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机会。耶鲁大学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发现人类社会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即只要没有政府和改革家的干预，激烈竞争就能促进社会进步。援助社会中的失败者只能造成不适者生存的结果。萨姆纳有这样一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说：“贫民窟的酒鬼就该呆在贫民窟，大自然也是用这种方法和过程淘汰不适者的。”

一些人对这种冷酷无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了反对。在《动态社会学》（1883年）中，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认为相对进化单位不是个体而是社会本身。沃德坚信，社会进步的实现，不是通过最大化竞争和任由失败者自生自灭，而是需要实现无论贫富的所有人的康乐。

在他们1873年合著出版的小说《镀金时代》中，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Charles Dudley Warner）从文化角度对新秩序进行了阐释，认为内战后的美国社会是俗丽粗野的。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出版于1899年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对“炫耀式消费”作了分析，认为富人通过这种消费方式彰显自己的财富、宣扬自诩的高人一等的地位。威廉·迪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

（1885年）描述了一个在激烈竞争中濒临破产的油漆巨头如何挤入波士顿上流社会。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在其作品《章鱼》（1901年）中，用半写实的方法记录了加利福尼亚州铁路资本家如何逼迫反对他们的农民就范。

另外一些作家则探讨了在城市工业时代各阶层女性的境遇。在《街头女郎玛吉》（1896年）中，史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描述了纯洁的贫民窟女孩如何在诱惑之下堕落为妓女。在新奥尔良作家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作品《觉醒》（1899年）中，一个对生活感到失望的有闲阶级妇女因为嘲讽本阶级人们的性行为而遭到排斥，最终走上自杀的绝路。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了短篇小说《黄色墙纸》（1892年），描述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年轻妻子的空虚生活和精神的崩溃。在《女人与经济》（1898年）中，吉尔曼探究了女性从属地位的历史成因，以及这种陋习如何在现代仍得以维系。这些作品共同描绘了马克·吐温及其合著者笔下的“镀金时代”的阴暗面，发人深省。

帝国梦和美西战争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政客、记者、商业领袖和军事家提出应该扩展美国的全球地位。在欧洲列强不断在非洲和亚洲扩展殖民地的同时，美国企业和农业利益集团也将目光放到了海外。对市场的追求刺激了扩张主义的神经。1890年，国务卿詹姆斯·G.布莱恩（James G. Blaine）就曾提出：“美国……制造业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超出了国内市场的需求……我们现在的需求是扩张。”

1893年，在美国海军、海员和战舰的支持下，夏威夷的美国甘蔗种植园主们（其中一部分是19世纪20年代来到夏威夷传教的传教士的后代）发动了一场政变，推翻了利留卡拉尼女王（Queen Lili'uokalani）的王朝。1898年，夏威夷被美国吞并。同一时期，为了扩大发行量而激烈竞争的各种纽约小报指责西班牙残酷镇压反抗西

班牙统治的古巴叛军，这危及到美国投资者在古巴的甘蔗种植园利益。1898年2月15日，在古巴哈瓦那港停泊的美国战舰“缅因号”发生爆炸，导致266名船员丧生，鼓吹强硬外交的媒体立即作出反应，指责爆炸是西班牙的阴谋（尽管爆炸的原因从未有过定论），要求对西班牙宣战。麦金利总统迫于压力接受了要求，国会于4月20日正式宣战。西班牙在古巴驻军不多，舰队落后，很快被美国海陆军（包括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上校指挥的一支志愿骑兵队伍）攻破，死伤惨重。美军共有5,000余名士兵丧生，主要死于疾病和食品中毒。尽管国会禁止正式吞并古巴，但是这场（一位华盛顿外交官口中的）“漂亮的小战役”却导致了美国对古巴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和军事控制。

根据1898年和平条约的规定，为了偿还2,000万美元的赔款，西班牙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群岛割让给美国。当时美国海军上将乔治·杜威（George Dewey）率领舰队对马尼拉进行了封锁，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已经投降。随后，菲律宾人为了独立而起义，镇压起义的战争一直持续了3年。这场战争将士兵和平民都卷入其中，最终导致4,000名美国人丧生，菲律宾人死亡总数则估计达20万。

与19世纪40年代的美墨战争一样，这场新的扩张浪潮也引发了美国国内的抗议。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就美军用水刑等刑罚虐待菲律宾叛军一案召开了听证会。包括简·亚当斯、安德鲁·卡内基、马克·吐温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等人在内的反帝国主义联盟义正词严地警告称，帝国主义扩张违背了美国的建国原则，美国在世界上扮演角色的变化让人担忧。

大多数美国人对内战后美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感到骄傲。事实上，工业化的确促进了物质生活的改善。但是，工业化也在政治、社会和国际影响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工人被盘剥、工厂工作环境危险、城市贫民窟大量出现、阶级划分两极化、政治体制屈从商业阶层。对于非裔美国人而言，种族主义泛滥让内战时期的成果化为乌有。对妇女而言，新秩序带来的影响至多是喜忧参半的。到1900

年，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发展和国际扩张，美国仍有约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美国军队也仍在镇压为了自由而奋斗的菲律宾人。1879年，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曾写道，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我们为了建立共和而作的一切尝试，固然有表面上的种种胜利，在本质上就是一场不健康的失败。”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对国家生活发展方向的不满日益积累，新的改革浪潮将会兴起。

第六章

1900—1920：改革与战争

1911年3月25日，周六，对于在纽约市三角制衣厂楼上车间工作的制衣女工们而言，漫长的一周工作就要结束了。突然，一场火灾爆发了。因为工厂没有灭火器和消防通道，而且出口大门要么被锁，要么违反消防规定向内开，这些主要是年轻女移民的工人们甚至没有逃生的机会。141人或被火焰吞噬，或在绝望中从窗户跳下摔死。这场灾难加剧了公众对工业化给人带来的代价的警觉，而这种警觉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在不断积累。到19世纪后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社会后果让很多美国人忧心忡忡，进而引发了被历史学家们称为“进步运动”的社会改良浪潮。

与此同时，在1914年，矛盾不断的欧洲对手之间爆发了战争。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在战争初期宣布中立，但美国后来还是参战了。在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感召下，美国人斗志昂扬地加入了战斗。然而，战争也激发了偏执和恐惧的浪潮，导致战后出现了理想幻灭后的激烈反应。

改革活力的觉醒

早在镀金时代，企业权力缺乏监管、阶级差异不断扩大、工厂和移民城市的条件骇人听闻，这些都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宣传社会福音的改革派牧师坚称，严格意义上讲，耶稣基督的教义要求关照穷困与受剥削的人们。在《如果基督来到芝加哥》（1893年）中，英国改革家威廉·斯特德（William Stead）激励生活安逸的中产阶级教徒正视美国生活的阴暗面。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市，公理会牧师查尔斯·谢尔登（Charles Sheldon）在畅销小说《跟随他的脚踪：耶稣会怎样做》（1896年）中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直到今天，在印有“WWJD”[1] 字样的手镯、咖啡杯和保险杠贴纸上仍能找到谢尔登作品的影子。）

图7　警察在处理1911年纽约市三角制衣厂大火受害者尸体。这场致使141名年轻制衣工丧生的火灾震惊了全国，引发了人们关注由于工业发展缺乏管制而带来的社会和人身安全问题。

一些改革家专注于提升道德意识。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1874年）和反沙龙联盟（1895年）致力于推动禁酒。反娼妓斗士们则援引废奴运动，敦促从美国城市中根除“白人奴隶制”。另外一些人则学习借鉴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改革经验，主张采取更加激进的方法，包括选举改革、支持劳工组织、政府管制企业行为，以及通过立法解决移民城市中的工厂安全、童工和卫生问题。一些人甚至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在《民主与社会伦理》（1902年）一书中，简·亚当斯从自己在社会服务中心的经历出发，明确指出：在工业化时代，“民主”不仅意味着选举权，更意味着公众需要采取措施改善社会最绝望弱势群体的境遇。记者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在《美国生活的希望》（1909年）一书中重申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有关政府应该积极介入的观念，但是提出现在政府介入是为了维护所有人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商业利益。

《麦克卢尔》和《矿工》等大众杂志揭露了城市工业化时代美国的糟糕状况。这些披露文章常被整理成册出版，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在《标准石油公司史》（1904年）中记录了约翰·D.洛克菲勒采用的那些冷酷无情的发展策略。戴维·格雷厄

姆·菲利普斯（David Graham Phillips）的《参议院的叛卖》（1906年）描述了大财团如何支配政治。约翰·斯帕戈（John Spargo）的作品《孩子们的痛苦呼叫》（1906年）生动地描述了170万产业童工的遭遇。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屠宰场》（1906年）揭露了芝加哥牲畜屠宰加工厂对工人的盘剥以及恶心的车间环境，提醒人们警惕受到污染的肉制品安全问题。辛克莱后来回忆说："我原本想打动公众的心，却不期意撩起了民众的胃。"

从纽约到旧金山，改革派也在各地发起了打击市政腐败的运动，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城市的耻辱》（1904年）中记录了这些努力。一些商业领袖意识到他们可以借此机会提高企业影响力、限制移民的政治权利，因此提议进行结构性改革，比如改选区选举为市级选举、当选者应称为"城市管理者"而非市长等。在经历了几十年无序增长后，主张市政规划和美化的改革派赢得了支持，他们提出美化城市能够培养好市民。

其他一些地方和州级改革则主要集中在劳工保护和商业监管上，包括制定工厂安全标准、禁止童工、治理烟囱污染。在三角制衣厂大火后，纽约州通过了多项劳工保护法案。其他州级改革包括：工人赔偿法案（1902年，马里兰州）、女工10小时工作制（1903年，俄勒冈州）、最低工资法案（1912年，马萨诸塞州）。赫尔馆的住院医生佛洛伦丝·凯利（Florence Kelley）创办了国家消费者联盟（1899年），致力于争取中产阶级对这些改革措施的支持。

在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在1900年对共和党为铁路等商业利益所主导的现状提出了批评，并因此成功当选州长。通过与位于首府麦迪逊市附近的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们合作，拉福莱特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包括：提高企业税率、成立威斯康星州铁路委员会、通过竞选开销规程，以及建立初选直选体制以约束企业的政治权力。

进步主义在全国推开

1901年9月，在纽约州布法罗市，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枪杀了麦金利总统。一周后，麦金利逝世。因在美西战争中的功绩而声名鹊起的前纽约州州长、时任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绰号“TR”）入主白宫，时年42岁。西奥多·罗斯福出生在一个显赫的荷兰移民家庭，他认为只有强力总统才能够保护公共利益，确保美国不断强大。他不喜欢也不信任控制经济和政治的“大财阀”。罗斯福不仅精力旺盛，也享受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在他的努力下，美国结束多年以来立法机关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总统的地位得以加强。他的女儿后来回忆道：“我父亲总是希望自己成为每场葬礼上的尸体、每场婚礼上的新娘、每场洗礼上的婴儿。”[2]

1902年煤矿工人举行罢工，罗斯福一改其前任们的反劳工态度，迫使矿主接受仲裁以提高矿工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当时，J.P.摩根等几个金融寡头组建了一个信托机构，控制了整个西北部的铁路建设工程，罗斯福政府的司法部长以这些金融寡头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由对他们提起了诉讼。最高法院支持了政府的诉讼，树立了罗斯福作为“反托拉斯斗士”的声望。在罗斯福的努力下，国会通过了《1906年赫伯恩法》，授权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简称ICC）负责管理铁路公司，铁路公司的一些用来赢取政治和民众好感的伎俩也被判定违法。（ICC成立于1887年，目的是监管铁路公司滥用职权和影响力，但是由于一系列不利于ICC开展工作的法院判决，ICC在此之前一直举步维艰。）同年，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和《肉类检查法》，监管食品和药品的不安全及掺假现象，并强制要求对辛克莱在其作品《屠宰场》中生动描述过的屠宰加工厂进行全面检查。

此外，罗斯福认识到工业化对自然的损害，因而支持建立了最早的国家公园，并采取措施保护自然资源。罗斯福还推动通过了《联邦土地开垦法》（1902年），利用公共土地出让金收入建设水坝和灌溉工程，从而保护了大片公共土地免遭乱砍滥伐、无序开矿的破坏。

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表示不再参加连任竞选，在他的支持下，时任陆军部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赢得了总统席位。支持商业利益和高关税的塔夫脱是更加传统的共和党

人，不过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却加强了对垄断行为的监管。然而，塔夫脱却冷落了关税改革派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因此在1912年（结束了在非洲狩猎探险的）罗斯福与塔夫脱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罗斯福落败，转而作为进步党候选人参加了选举。（罗斯福曾兴致勃勃地声称："我觉得自己像一头公驼鹿一样健壮。"因为这个原因，进步党也被昵称为"公驼鹿"党。）由于共和党选票分散，民主党候选人、新泽西州州长伍德罗·威尔逊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当时威尔逊还是一个政治新手，在此之前曾出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在这次总统选举中，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斯赢得了89.7万张普选选票，凸显了民众对缺乏监管的资本家权力的强烈反感。

具有改革精神的威尔逊支持通过了《安德伍德关税法》（1913年），降低关税的做法赢得了农民和消费者的欢心。在他的努力下，国会于1913年通过了《联邦储备法》，对银行系统进行了重组，由新成立的联邦储备局负责监管，联邦储备局是一个公私合作的新机构，拥有广泛的货币管理权力。1914年，又是在威尔逊的积极促成下，国会成立了负责监管不公平竞争行为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并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具体列出了违法的企业行为，进一步强化了《1890年谢尔曼法》。

1916年，在威尔逊的支持下，还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包括：帮助债务缠身的农民摆脱债务、赔偿因工受伤的联邦雇员、禁止童工产品的州际贸易。（两年后，保守派占主导的最高法院判定最后一个法案违宪。）是年秋季，威尔逊赢得连任。

1913年通过的两项宪法修正案反映了当时的改革精神。第16号宪法修正案批准征收联邦所得税；第17号宪法修正案确立代表各州的美国国会参议员由民众直接选举，不再由州议会选举产生，以解决公司利益集团影响和腐败问题严重困扰各州议会的问题。在联邦政府之外，改革的活力也仍在沸腾。随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职业女性的加入，妇女运动的力量不断增强，并且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争取选举权上。在卡丽·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的领导下，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专注于组织各种推动赢得州选举权的运动，

1911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运动就取得了成功。模仿英国妇女参政活动家的做法，爱丽丝·保罗（Alice Paul）也组织了类似的妇女选举权协会，主要将精力集中于推动国会通过有关妇女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

一些勇敢的黑人领袖和白人支持者成为了继续争取种族平等的先锋。《波士顿卫报》编辑威廉·门罗·特罗特（William Monroe Trotter）批评布克·T.华盛顿在种族问题上的谨言慎行，要求采取更加激进的方式。在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黑人的灵魂》（1903年）中，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亚特兰大大学（由废奴主义者在1865年成立，旨在为非裔美国人提供教育）教授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1909年，在包括废奴主义领袖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孙子在内一些白人支持者的协助下，杜波依斯和其他非裔美国人创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简称NAACP[3]）。通过协进会自己的出版物，即杜波依斯负责编辑的《危机》杂志，加上在各地建立的分支机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与私刑行为斗争、质疑法庭上的种族隔离、领导反种族主义运动等。

进步运动的成果与盲点

进步主义改革家们利用媒体、讲台和政治场合对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企业权力缺乏监管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讨论。不久之后，罗斯福新政（见第七章）从进步运动的先例中汲取了经验。多年之后，西奥多·罗斯福的环境保护伦理启发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

尽管如此，这些20世纪初的改革家主要是在美国出生的中产阶级白人，因此他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时代的偏见和盲点。一些人把工业化带来的问题归罪到移民头上；波士顿精英人士在1894年成立了移民限制联盟，1911年国会发表的一份报告宣称新移民存在身体和道德缺陷。在《伟大种族的消逝》（1916年）一书中，著名环境保护人士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甚至提供了一些伪科学证

据，以证明北欧人如何在人种上优于犹太人、非裔美国人以及南欧和东欧人种。

进步主义人士中只有少数对私刑和种族歧视进行了批判。事实上，很多南方进步主义者都捍卫了白人至上和种族隔离。西奥多·罗斯福虽然曾在白宫招待布克·T.华盛顿，但除此以外对种族问题都闭口不谈。作为一名弗吉尼亚人，伍德罗·威尔逊也曾盛赞D.W.格里菲斯（D. W. Griffith）于1915年拍摄的美化3K党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在威尔逊领导的联邦政府里，种族隔离普遍存在。所以，正如历史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有关进步主义运动的基本判断也是好坏夹杂的：进步主义者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身上的缺陷反映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令人遗憾。

经济帝国主义；欧洲开战

美国资本家从未停止在海外谋求发展的脚步。1899—1900年间，欧洲列强正迫使中国给予他们经济特许权，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John Hay）提出了一系列所谓的“门户开放”照会，主张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门户开放”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开放贸易的兴趣。）1900年，美国军队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了反对外国侵略的义和团运动。1907年，为了彰显美国的海上实力，西奥多·罗斯福派遣由战列舰、驱逐舰和补给舰组成的美国舰队进行环球巡游，出访了包括对自己海军实力感到骄傲的日本等国。

西奥多·罗斯福还采取措施确保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地位，将其作为投资机会和保证矿石等商品供应的来源地。成立于1899年、总部设于波士顿的联合果品公司以进口香蕉、咖啡和其他产品为主要业务，在这个时代该公司在美国和拉美都拥有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西奥多·罗斯福还提出了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1904年），警告称如果任何一个拉美国家“长期出现错误行为”，美国有权采取军事干预措施。塔夫脱总统则对拉美采取了“金元外交”政策，同样促进了美国的

海外经济利益。

美国扩张政策的高潮是1914年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巴拿马运河连通大西洋和太平洋，有利于促进世界贸易发展。在1902年收购了一家破产的法国运河建设公司后，罗斯福政府在当时还是哥伦比亚一部分的巴拿马一手导演了一场“革命”。在支付给哥伦比亚大量赔偿后，巴拿马实现独立，运河开凿计划得以进行。

1911年，墨西哥发生革命，威胁到美国的石油和矿业利益，威尔逊政府对墨西哥进行了武装干预。因为不喜欢韦拉克鲁斯当政的将军，威尔逊于1914年派兵推翻了他的统治。1916年，一个墨西哥匪帮杀害了16名美国矿业工程师，并占领了新墨西哥的一个小镇，威尔逊就向美墨边境派遣了15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然而，就在这场交锋正在展开时，欧洲爆发了更加严重的危机。

1914年6月，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对新近被奥地利吞并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国事访问。在大公夫妇乘车穿过萨拉热窝时，一位对吞并事件不满的波斯尼亚塞族青年开枪打死了大公夫妇二人。奥地利随即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站在塞尔维亚一边。其他欧洲国家也很快按照秘密条约加入了战争，其中法国、英国和俄国结盟为协约国一方，德国和奥匈帝国则组成了同盟国一方。（意大利在大战初期宣布中立，后于1915年加入协约国。）很快，战斗越演越烈，在从比利时到瑞士的漫长曲折的战线上，双方陷入了堑壕对峙的阵地战中。1916年在默兹河畔的凡尔登双方展开了一场漫长的、互有胜负的大战，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共有30万人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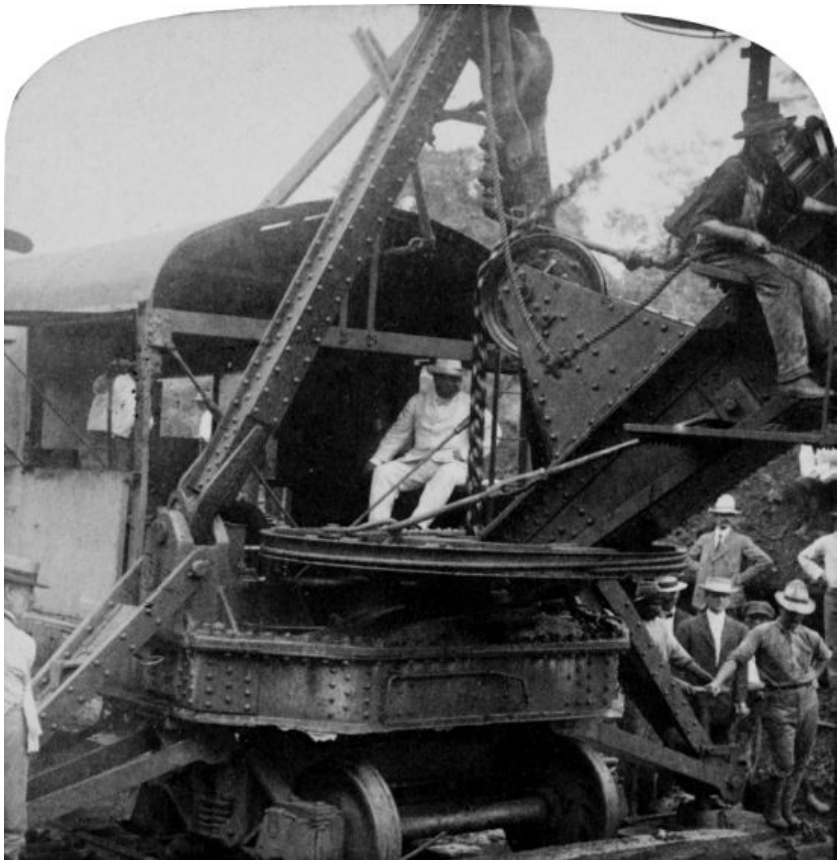

图8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于1906年参观巴拿马运河建设工地。巴拿马运河象征着美国崛起为世界性强国，罗斯福也为总统职位注入了好斗的活力和激进主义。

威尔逊总统宣布美国保持中立，主张和平的人得到了广泛支持。然而，事实证明保持中立并非易事。很多美国人，尤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美国政治和金融精英（包括威尔逊本人），在血源和文化上与英国和法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一些美国人则与德国和奥地利有着各种关联；爱尔兰裔美国人也不支持英国。最后，还是支持协约国的一方占了上风。美国银行给英国和法国提供贷款，同时金融机构和工业企业也发起了“备战”运动，重整军备。从根本上讲，美国的全球扩张与欧洲帝国主义尤其是同盟国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

与久远之前1812年战争时的情况相同，中立国家权力问题再次成为了导火索。一战的交战双方都威胁到了美国商船，但是德国U型潜水艇对美国船只的攻击最终促成了美国参战。1915年5月，一艘德国U型潜水艇发射鱼雷，在爱尔兰附近海域击沉了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导致近1,200人死亡，其中包括128名美国公民。威尔逊提出抗议，柏林方面也一时停止了类似攻击。但是，1917年1月，德国重新开始了无限制潜艇战。4月2日，威尔逊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呼吁对德宣战。参众两院都一边倒地通过了威尔逊的决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

作为战争措施的第一步，国会批准征兵。除300万名应征入伍者外，还有近130万志愿军和国民警卫队加入了军队服役，其中包括26万名黑人和1.2万名印第安人。号称“协约国远征军”的第一支美国军队于1917年10月抵达法国，正值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革命者在俄国夺取政权，并宣布俄国退出一战，德国将军力转移到西部战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远征军司令约翰·潘兴（John Pershing）将军的先祖是姓Pfoersching [4] 的德国移民。潘兴对堑壕战的僵局感到震惊，因此拒绝将美国军队并入法国和英国部队。1918年初，协约国一方组建了法国统帅指挥下的联合军队，但是美国士兵仍独立组成编队参加作战。德国发起春季攻势时，远征军在3月参加了法国西北部索姆河沿岸亚眠附近的战斗。5月，远征军协助击退了德军在亚眠以南发动的进攻。在此以东的马恩河战场上，德军已经推进到距离巴黎仅有50英里的地方。远征军在兰斯、蒂埃里城堡和贝洛森林地区阻击德军的战斗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协约国军队发起的反攻逼得德军向东节节败退，战争的局势也发生了扭转。超过25万名远征军士兵参与了前线作战，足迹遍布从索姆河到马恩河的战线，他们参加了圣米耶勒战役，最后在墨兹—阿尔贡战役中向北穿越阿尔贡森林，占领了重要的铁路要道色当。1918年

11月11日，德国投降。

这样简单的概要完全不能反映战争的残酷性，据保守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共导致1,000万士兵阵亡、700万贫民丧生，包括因饥荒和疾病死亡的人数。俄国共计死亡180万士兵、法国140万、英国88.5万。坦克、毒气和空袭等新的杀戮技术的运用大大增加了人员伤亡。从军营首先爆发的流感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至少5,000万人死亡。

美国军队在战斗中共损失4.9万人，另有6.3万人死于疾病，主要是死于流感。与其他国家的数据相比，美国的损失虽然巨大，但要小得多。尽管如此，一战在国内政治和外交领域对美国产生的影响丝毫不小于战争本身的后果。

国内交锋

与之前的冲突相同，美国在一战中的短暂参战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战场的范围。比如，由于欧洲出现饥荒、美国政府需要保证庞大军队的供给，美国农产品价格飙升。新发迹的农场主投资大量资金用于土地和设备，导致他们在战后价格下跌时负债累累。

继进步主义时代之后，美国政府管控经济的权限在1917—1918年间进一步扩展。负责管理铁路运输的联邦机构保证军需品运输享有优先权。由华尔街投资人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领导的战时产业委员会负责监管工业生产，以最大化地提高生产效率。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也采用这些战时经济管理办法，通过政府干预方式抗击经济危机的影响。

由于战备生产大发展、移民中断和大量工人参军等原因，美国企业调整了长期以来的歧视性雇佣政策。成千上万的非裔美国人从南方涌入北方工厂寻找工作。这股移民潮使北方城市的种族局势更为紧张，而与此同时，在法国作战的黑人士兵也接触到了种族问题不那么突出的社会。所有这些对未来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妇女抓住了战时就业机会，纷纷在工厂和其他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工作。尽管战争结束时，回国的退伍军人重新占据了这些工作岗位，但是战时工作的记忆在这些妇女的女性后代中得以传承，激发了后世争取在工作中实现性别平等的运动。

一些进步运动时期的改革措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个新设立的政府机构、战时劳工委员会支持工人组建工会，并促进了工厂安全和工作环境的改善。由于妇女选举权运动领袖对美国参战的支持，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支持妇女运动事业。1917年11月，纽约州通过法案承认妇女拥有选举权；1920年第十九号宪法修正案通过，所有美国妇女赢得了选举权。此外，在战时道德理想主义的刺激下，反娼禁酒改革运动继续推进。（一些大型酿酒企业使用德语作为品牌名称，比如安霍伊泽—布施，这也在战时促进了禁酒运动的发展。）1919年通过了有关禁酒的第十八号宪法修正案。作为战时举措之一，新奥尔良关闭了红灯区，这也导致很多爵士音乐家选择北上。

战争还影响到了国内政治和文化气候。威尔逊政府中的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利用海报、游行和杂志广告等方式煽动了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四分钟演说员”在电影院中就如何支持战争慷慨陈词。电影明星们宣传“自由公债”，为战争筹措资金。音乐创作者也创作了曲调欢快的战争赞歌，比如乔治·M.科汉（George M. Cohan）的《在那里》。以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支持参战，认为这样做才能够加速世界和平和公正新时代的到来，并推动国内政府更加积极地促进社会平等的实现。

然而，团结一致和理想主义的精神后来慢慢变得极端，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因为家族关系而同情德国的人和其他反战人士被批评是叛国者。在伊利诺伊州，一群暴民因为一名德裔美国煤矿工人批评战争而将其吊死，陪审团判定暴民领袖无罪释放。波士顿交响乐团解雇了乐团的德裔指挥家。电影和海报将德国士兵塑造成施虐狂和强奸犯。《1918年反间谍法》及《反煽动叛乱法修正案》（1919年）禁止出版宣扬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出版物，并认定一切批评政府和战争的言论违法。包括尤金·V.德布斯在内的很多人被捕入狱。德布斯

直到1921年才出狱，而他本人却在1920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90万张选票。由于保守主义情绪的蔓延，共和党在1918年中期选举后控制了参众两院。

战后苦果

美国人用庆祝游行的方式迎接1918年11月的停火协议，但是战争的后果远不是威尔逊总统和美国民众所期待的那样。为了推翻俄国共产主义新政权，美国军队加入了一支多国部队，这一决定成为后来两国之间敌对状态的一个刺激因素。威尔逊出席了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成为第一位在任时出访外国的美国总统），但是和会的结果让威尔逊大失所望。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提出了报复性和平条款，要求战败国支付惩罚性战争赔款，迫使德国和奥地利割让大片领土，这些都引起了战败国的强烈不满。

凡尔赛和会上，威尔逊最大的成就是促成协约国承诺在和约上签订协议，同意成立新的国际维和组织：国际联盟。为了推动参议院批准和约，威尔逊不辞辛劳地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讲。1919年10月，威尔逊劳累过度病倒。在赶回华盛顿治疗后，又一次严重中风发作，导致威尔逊变成了一个牢骚满腹的病人，再也无法处理政治事务。威尔逊病倒的同时，美国出现了孤立主义政治转向，尽管一些参议员曾努力尝试就国际联盟条款达成某种妥协，但是已经于事无补。1919年11月，参议院就美国是否加入国际联盟投票，一方是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领导的反对派，另一方则是按照威尔逊的指示拒绝以任何形式妥协的国联支持者，结果参议院投票拒绝签署和约，美国将不会加入国际联盟。在他1924年逝世之前的几年中，威尔逊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和怨恨，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在挫败和失望中辞世。威尔逊未能亲眼看到美国在1945年加入国际联盟的继任组织：联合国。

在美国国内，战时就已出现的反对改革的大环境更加恶化。白人

越来越敌视从南方涌入北方寻求发展机遇的黑人。私刑案例迅速增加，一些私刑的受害者甚至是仍在服役的黑人士兵。1919年，奥马哈、芝加哥等城市爆发了反对黑人的暴动。在反激进主义的浪潮中，国会众议院拒绝接纳来自密尔沃基、信奉社会主义的议员维克托·伯杰（Victor Berger）。西雅图市长调集联邦军队镇压了一场大罢工。1920年1月，在年轻的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后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领导下，司法部反激进主义局在一系列协调一致的“红色搜捕”行动中逮捕了几千名激进分子嫌疑人。数百人入狱，在美国的外国激进分子则在未经多少法律程序审查的情况下被驱逐出境。

1917年4月美国带着崇高的理想主义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时给美国留下了保守和孤立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一直持续至20世纪20年代末。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战争都未能取得支持者期待的成果。当美国在不安中进入20世纪20年代时，不久前的进步运动却已经成为了模糊的记忆。

注释

〔1〕 WWJD是What Would Jesus Do的缩写，意思是“耶稣会怎样做”。

〔2〕 这句话的意思是西奥多·罗斯福总是喜欢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3〕 NAACP是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缩写。

〔4〕 Pfoersching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姓氏。

第七章

1920—1945：从冲突到全球大国

从1920年到1945年的25年间，美国发生了巨大转型。在1920年，尽管美国已经成为工业大国，但仍只能算是地方性大国，在全球事务中无足轻重。截至1945年，整个世界饱受战争摧残，而美国却通过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实现了国内政治的改革，确立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同期，学者、社会思想家和文化创意者对前人倡导的道德必然性提出了挑战，进而促使美国社会更加现代和国际化。

20世纪20年代：政治反响、社会张力与文化骚动

“咆哮的二十年代”曾是美国记忆中的传奇片段。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的著作《仅仅是昨天：从大繁荣到大萧条》（1930年）等通俗历史作品更是强化了这一传奇。这是充满活力、享乐至上的十年：美国人抛弃传统禁忌和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涌入爵士俱乐部和禁酒令时期的非法酒吧；这些非法酒吧的烈酒主要来自各种族匪帮，比如芝加哥的阿尔·卡彭（Al Capone）。

“咆哮的二十年代”这一形象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部分现实。正如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在1920年出版的小说《人间天堂》中写的那样，对于一些富足的大学生而言，20世纪20年代的确带来了挣脱旧时代约束的兴奋感。得益于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批量生产工艺，拥有汽车的人口暴增，上百万的美国人得以享受自由出行的便利。在1914年，美国机动车登记量不足200万，而截至1930年，这一数字激增至2,700万。广播、好莱坞电影、音乐录制带和全国性广告的传播刺激了新型大众文化的发展。棒球运动员贝比·鲁斯（Babe Ruth）、拳击手杰克·登普西（Jack Dempsey）等体育英雄成为媒体明星。1927年，酷爱冒险的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成功地驾机从纽约不间断直飞巴黎，这让唯名人是从的美国掀起了庆祝狂潮。

然而，在表面泡沫和福特汽车的喧嚣声之外，美国社会现状却复杂得多。在政治上，一战后保守主义回潮仍在延续。1920年，共和党

总统候选人、俄亥俄州参议员沃伦·G.哈定（Warren G. Harding）以压倒性优势赢得总统宝座。除了1922年世界海军强国为限制军舰制造而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外，哈定的总统任期充满了各种丑闻，无甚建树。1923年，哈定死于心脏病，由副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接任总统一职。来自佛蒙特州的柯立芝沉默寡言，从表面上看与喜欢交际的哈定非常不同。20世纪20年代公共关系活动业快速发展，精明的公关活动塑造了柯立芝刚正不阿美国人的形象。尽管柯立芝政府相比之下更加诚实，但是在保守和亲商上与前任并无差别，正如柯立芝的至理名言所说："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

柯立芝在1928年提出不再参加竞选，时任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获得共和党提名，并在选举中战胜了竞选对手纽约州州长、来自移民家庭的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Al Smith），赢得总统席位。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反天主教的偏见帮助了胡佛当选，但是移民城市选民多支持民主党，彰显了未来可能出现的转变。胡佛出生在贵格会家庭，靠自己努力成为了一名采矿工程师。在出任战时食品管委会成员和商务部长期间，胡佛支持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他在思想上更接近西奥多·罗斯福，而不是哈定或者柯立芝。1927年，洪水袭击了密西西比河谷，胡佛急忙赶去现场，协调个人抢险救灾工作。在总统任期，胡佛发起了公共政策问题研究，并召集企业领导讨论通过志愿合作提高效率。虽然胡佛在任期初的表现让人期待，但是股票市场崩盘及其后果压垮了胡佛的总统任期，让他声名扫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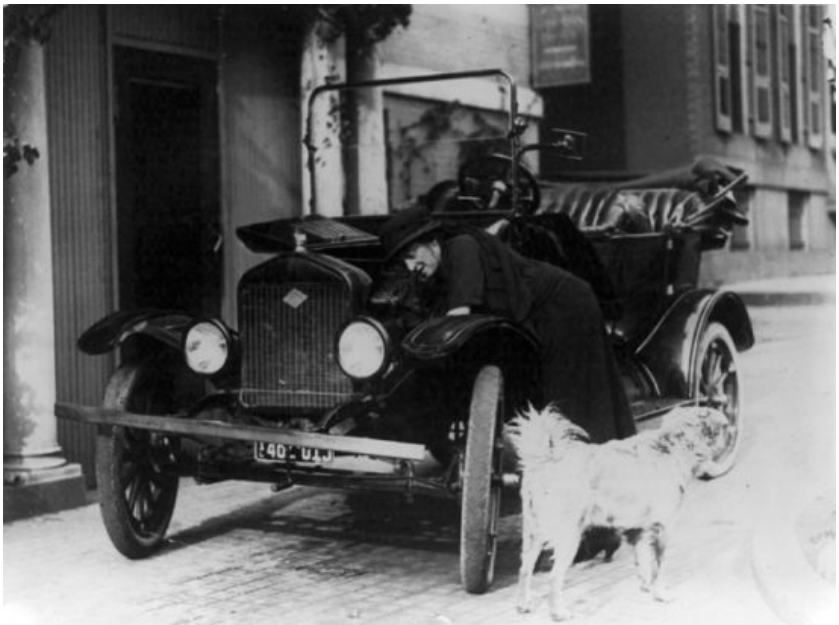

图9　在旧金山参加了1920年全国妇女党大会后，大会法律秘书莫德·扬格（Maude Younger）开车返回华盛顿后在查看她的福特车。尽管妇女已经获得了投票权，但是汽车的出现赋予了妇女自由和出行便利性，让她们有进一步获得解放的感觉。

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技术变革，意识形态动荡，城镇化、移民、黑人移居北方等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都让美国人不知所措，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紧张局势。192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美国城镇人口首次占到了美国人口的大多数，凸显了美国的城镇化转型。

20年代，在重建时期曾一度横行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三K党”重新活跃起来。由于采取了精明的宣传措施，“三K党”的影响范围在20世纪20年代初从南方扩展到中西部和西海岸各州。身着白袍、信奉新教的“三K党”成员举行游行和集会，在夜晚焚烧十字架，恐吓黑人、天主教徒和所谓的道德散漫者。印第安纳州“三K党”首领卷入了性丑闻事件，这一轮全国性“三K党”浪潮消退，但是它的不宽容和恐吓手段留存了下来。

很多劳工阶级的非裔美国人团结在马库斯·贾维（Marcus Garvey）周围，贾维是个极具领袖魅力的牙买加移民领袖。通过组织集会、统一制服，贾维领导的全球黑人进步协会（UNIA）成员宣扬黑人种族自豪、由单一种族组成企业以及最终重返非洲。这场运动让美国白人和提倡种族融合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颇为紧张。1927年，贾维被控邮件欺诈并且罪名成立，最终被驱逐出境，这削弱了黑人进步协会的影响力。尽管如此，这仍是大规模黑人运动的早期尝试。

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南布伦特里市发生了一起工厂抢劫案，一名出纳员和门卫被杀。两名来自意大利的移民、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和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被判定为此案主犯，并被处以死刑，而他们的支持者认为案件审判中存在着反激进主义和反移民的问题。尽管各地出现了抗议运动，但是由知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维持了原判，两人于1927年被处以电刑。年轻的白人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Passos）创作了一首诗，表达了他的愤怒。在诗中，他总结道："够了，够了，我们已是两个国家。"尽管随后的调查倾向于证明审判结果是合理的，但是萨科—万泽蒂一案仍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分裂的象征。

虽然自由派宗教领袖早已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新教原教旨主义者却反对进化论，视其为"圣经无误论"的巨大威胁。事实上，新教原教旨主义者早已对《圣经》批判研究、神学的"现代主义"和日益盛行的世俗城市文化颇为恼怒。田纳西州立法禁止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该州代顿市的教师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对法案提出了质疑，并得到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希望招徕生意的当地商人的支持。1925年斯科普斯案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包括突破传统的新闻记者亨利·L.门肯（Henry L. Mencken）、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和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等名流也参与进来，出庭作证。斯科普斯审判和最终不了了之的审判结果却并未能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动摇原教旨主义，却进一步凸显了这个时代深刻的文化分裂。

20年代也是文化创意爆发的年代，青年作家和剧作家，其中一些

正流亡国外旅居巴黎，创作了新颖、充满原创性的作品。在《永别了，武器》中，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摒弃了有关1917—1918年的理想主义言论，真实描述了大屠杀的现实。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大街》和《巴比特》讽刺了美国中产积极的地方主义和反智主义。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战后美国特权精英阶层的浅薄和傲慢进行了深入探查。在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中，才华横溢的黑人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创作了大量极具艺术原创性的作品。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弗莱彻·亨德森（Fletcher Henderson）、爱德华·（“公爵”）·埃林顿（Edward "Duke" Ellington）等爵士乐大师将爵士乐这种植根非洲的美国特有音乐形式介绍给了广大公众。在文化版图上，创意观点和现代主义对传统规则提出了挑战，科学技术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个时代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智力成果最为丰富的时代之一，改变了美国缺乏思考、俗气守旧的传统形象。

大萧条与改革

20世纪20年代是经济大繁荣时期，汽车、收音机和电器产品的广告以及消费者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住房建设快速发展。美国家庭形成了度假、观看电影和体育赛事的习惯。然而，经济繁荣是有限度的。大量举债的农场主经历了农产品价格从战时高点暴跌的厄运。移民工人家庭需要努力工作才能勉强维持生计。在那个种族主义盛行的年代，大多数非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都生活在经济的边缘。

随着时间的推进，警示信号不断出现。消费者收入的减少导致住房、汽车和消费商品过剩。建筑业发展停滞，工厂货品积压。股票价格暴涨，投机商和依赖信贷的股市新手更是抬高了股票价格。1929年10月，随着股市崩盘和虚拟财富蒸发，经济崩溃了。虽然胡佛总统发言表示乐观，但是随着失业增加、生产衰退、银行破产和恐惧席卷全国，美国进入了长期衰退阶段。1931年的全球通货紧缩更是加剧了危

机。截至1933年，美国工人失业人口达到工人总数的25%，另有数百万人处于半失业状态。唯意志论的胡佛敦促私营企业加倍采取补救措施。1932年，胡佛支持国会组建了一个新机构：复兴金融公司（RFC），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为经济发展注入资本，甚至向州和地方经济刺激计划提供贷款。

尽管如此，大萧条的危机仍在恶化。1932年，美国选民抛弃了胡佛，成功地选举纽约州州长、民主党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美国总统，同时，民主党也控制了国会。罗斯福出生在显贵家庭，是西奥多·罗斯福的远亲。因为1921年患上了脊髓灰质炎，罗斯福无法行走，但这更加磨炼了他的意志，让他对人类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罗斯福的竞选讲话并没有列出什么详细举措，不过他却承诺会采取一些“新政”，就这样在不经意中命名了一个时代。与胡佛不同，罗斯福自信、乐观，愿意接受各种尝试。他招募了跟他一样相信创新力量的年轻官员和顾问（包括之前被排除在华盛顿核心集团之外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

在友善的气氛中宣誓就职后，罗斯福首先着眼于解决当下的危机。为了恢复对银行的信心，罗斯福支持国会通过立法，对存款投保，并加紧了银行监管。为了应对就业危机，在罗斯福的推动下，国会拨款筹建了紧急救济基金；组建公共工程管理局（PWA），雇佣工人参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组建民间资源保护队（CCC），让无业青年在公园和荒野地区从事植树造林、山路维护等工作。新政早期最具创新性的项目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负责田纳西河流域的水坝和水电站建设、发电、土壤流失和洪灾控制，以及这一贫困地区的娱乐设施建设。

早期新政的两项措施促成了长期经济复苏。农业调整管理局（AAA）用经济补贴鼓励农民缩减基本农产品生产，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国家复兴管理局（NRA）则采用了胡佛提出的政企合作的方式。企业管理者通过协商志愿达成一致，保证就业、价格和工资，进而刺激工业复苏、预防通货紧缩。配合新政的企业打出了“做出我们的贡献”的标语。国家复兴管理局反映了罗斯福早期寄希望团结包括企业

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完成复兴计划的目标。然而，这些机构也出现了种种问题。复杂的官僚机构组织拖累了国家复兴管理局；农业调整管理局虽然整体提高了农场收入，但是农场工人、小佃农和外来工却获益不大。1935年，最高法院宣布这些机构和项目违宪，很少人为此而哀悼。

面对来自共和党人的反对和以颇善蛊惑人心的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郎（Huey Long）为代表的左派的挑战，罗斯福在1934—1935年间调整了努力的方向。罗斯福弱化了团结社会各界的主题，转向推动以党派和社会阶层为基础的立法、采用监管措施和制定税收政策。在罗斯福的推动下，国会提高了针对企业和最富有美国阶层的税收；新组建公共事业振兴署（WPA），能够比运转缓慢的公共工程管理局更快地创造就业机会；组建联邦证券与交易委员会，以便更加严格地监管股票市场。新政措施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两项措施也诞生在1935年。《全国劳工关系法》扭转了长期以来政府对劳工组织的敌视态度，确保了工会的集体议价权，取缔了各种反工会的策略。很快，在汽车、钢铁等行业，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同样产生了长远影响的措施还有《社会保障法》。根据该法案，美国在联邦和州两个层面创立了老年保险、失业救济和对需要抚养子女家庭进行援助的计划。尽管该法案并不包括农场主和自谋职业者，但是基于此项法律建立的国家保障系统却会在未来不断扩展——它引发了各种争论，却重塑了美国的社会契约传统。

在1936年总统竞选中，罗斯福批判了“富有的恶人们”，并表示无惧他们的反对，彰显了罗斯福新政措施正在转向左派。在以绝对优势赢得总统选举后，罗斯福很快提议扩大由9名最高法官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原因是由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已经否决了多项新政措施，而罗斯福担心1935年提出的新政措施会面临同样的命运。罗斯福的“最高法院扩充”计划并未成功，这表明即便是最受民众爱戴的总统，他的权力仍是有限的。但是，随着几位年长的最高法官退休，罗斯福趁机任命了几位更支持新政的法官。由于经济刺激的补贴开始削减和社会保障收入减少，1937—1938年再次出现了经济大幅衰退，

并再次抬高了失业率，导致共和党在1938年中期选举中大有斩获。作为回应，罗斯福推出了新一轮的刺激措施，但是1940年美国失业率仍高达14.6%。同一年，当罗斯福破纪录地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时，严峻的国际形势走向掩盖了国内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在国会投票中需要倚赖南方白人民主党议员的投票，罗斯福回避了种族问题，比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要求政府将私刑定为触犯联邦法律的犯罪行为的请求就没有得到总统眷顾。尽管如此，罗斯福政府也支持了一些象征性的措施。比如，1939年，在美国革命女儿会禁止黑人女低音歌唱家玛丽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在其位于华盛顿的会堂演出后，罗斯福政府批准安德森在林肯纪念堂举办了音乐会。罗斯福夫人埃莉诺（Eleanor）也是一个积极的政治人物，深入参与各种涉及社会公正的问题、谴责种族歧视，并不断推动罗斯福关注这些问题。

新政在反抗经济衰退方面的表现优劣参半。早期采取的一些措施并未取得成效。经济刺激和公共工程项目只是短期内给无业者提供了帮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美国才恢复了全面就业。罗斯福在预算政策上持保守态度，拒绝采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的利用赤字开支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由于新政所需资金主要来自出售政府公债，经济刺激效果有限。

尽管如此，新政仍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民间资源保护队、公共事业振兴署、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一系列新政机构改善了美国的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和国家公园建设。公共事业振兴署的文化项目帮助艺术家、剧作家、音乐家和作家进行创作。1934—1935年间那些更加激进的措施促进了工会发展，加强了金融监管，利用累进税收政策缩小了阶级差距，创建了社会福利体系的雏形。虽然有保守派对罗斯福提出批评，但是罗斯福只是改革者，而非革命者。罗斯福的目标是缓和资本主义弊端，进而保护而非摧毁资本主义。尽管赞扬、丑化和模仿始终伴随着新政措施，新政仍是不同意识形态流派学习的对象。正如新政重塑了美国政治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从根本上延伸美国的全球角色。

二战与全球霸权

1930年，几乎没有美国人会预见美国将很快卷入另一场战争。事实上，1918年后出现的对抗威尔逊国际主义路线的运动，反映了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那就是避免卷入外国事务。“扒粪运动”揭露了银行家和企业家如何推动美国在1917年卷入一战，强化了国人对国际主义路线的反对。截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和平运动席卷了美国大学校园，国会通过一系列中立法案，防止美国卷入未来争端。

国际局势的恶化表明美国的希望是多么幼稚。在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带领下，意大利法西斯在1922年攫取了政权。1937年，崇尚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入侵中国，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进行了大屠杀。在德国，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国家社会党（纳粹政党）在1933年上台，恐吓国内反对派，并实施了在德国境内清除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政策；撕毁了惩罚性的《凡尔赛条约》；在德国东部国境以外的区域寻求“生存空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领导的法西斯军队进攻西班牙民选共和政府，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爆发，预示着未来即将出现的冲突。希特勒支持佛朗哥，而苏联则向共和政府联盟内的共产党人提供协助。美国志愿者组成了亚伯拉罕·林肯旅团，与西班牙共和军携手作战，直至共和军战败。

1939年，希特勒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根据条约规定，苏德两国秘密瓜分了波兰。条约完全无视了苏联自己提出由共产主义者和非共产主义者联合组成人民阵线以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倡议，让支持这一倡议的美国人大为失望。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随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1940年春，德国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和比利时，并攻入法国。6月，英国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法国投降。纳粹飞机随后对英国城市进行了轰炸，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向美国求援。

尽管罗斯福也认为美国终究会参战，但他采取了谨慎的态度。“美国至上”运动凸显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氛围，1937年，罗斯福间接地提出了“隔离”侵略国的主张。1939年9月欧洲战事全面爆发后，罗斯福强调了美国的中立政策，但也声明他不能（像威尔逊那样）要求美国人民在思想上保持中立。1940年，国会通过扩军法案，美国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征兵。根据《租借法案》（1941年3月）的要求，国会批准贷款70亿美元，帮助资金有限的英国购买美国军火。在罗斯福的批准下，美国护航舰队护送军火运输船只横跨大西洋。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11月即推进到莫斯科近郊。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用飞机袭击了驻扎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舰队，炸沉炸毁19艘美国军舰和150架飞机，造成2,335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的暧昧态度终结。第二天，美国国会向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轴心国宣战。志愿者和应征入伍者涌入军事训练营，工厂转向军用生产，美国人团结一心参战。在战争时期的几次会晤中，罗斯福和丘吉尔结成了“大联盟”，以协调总体战略和战争目标。

在欧洲战场上，联军先是在北非击败了埃尔温·隆梅尔（Erwin Rommel）将军率领的德国部队，随后在1943年初占领了西西里，随后攻入意大利，并一路向北挺进。7月，意大利退出二战，到1944年夏天，意大利境内的德军撤出。1944年6月6日（登陆日），在美国将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的指挥下，16万盟军士兵在法国诺曼底登陆，这也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陆两栖作战行动。尽管德军进行了顽固抵抗，但是盟军很快横扫法国，并在8月份解放了巴黎。1945年初，盟军已经攻入德国本土。美英轰炸机对德国工业基地进行了轰炸，并对柏林、汉堡和其他城市进行了轰炸。1945年2月的一次轰炸彻底摧毁了多瑙河畔的美丽古城德累斯顿，共计炸死2.5万人。1944年起，德国用V-1和V-2飞航式导弹对伦敦、安特卫普等城市进行了密集袭击。“全面战争”的时代到来，双方甚至刻意将平民作为攻击目标。

与此同时，苏联军队在东线突破了德军对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的包围，将侵略者赶出苏联。苏联军队随后横扫东欧，并于1945年4

月攻入德国。苏联在东线进军的同时，美英等其他同盟国军队则从西线压进，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1944年12月，德国发动了反攻，是为坦克大决战，德军战败。苏联攻入柏林时，希特勒和情妇在地下掩体中自尽身亡。1945年5月7日，德国投降。罗斯福总统却于4月12日死于脑出血，未能活着看到胜利这一天。罗斯福逝世后，他的副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继任总统。

图10　1943年1月，温斯顿·丘吉尔首相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晤。他们宣布盟军战斗目标是迫使敌方“无条件投降”，并就开辟反纳粹德国的第二战场的位置进行了讨论。战争期间，两国领导人多次会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太平洋战场，日本在珍珠港事件后曾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攻占了西方殖民帝国的众多领地。美国控制下的菲律宾在1942年被日军攻占。媒体报道了日军暴行，包括针对在菲律宾被俘美军的“巴丹死亡行军”事件，加深了美国对日本的仇恨。为了扭转战局，美军采取了“越岛作战”战略，一步步逼近日本。1943年2月占领了所罗门群

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后，美军击溃日军的顽固抵抗，先后攻占了吉尔伯特、马歇尔和马里亚纳群岛。1945年2月，美国从日本手中夺回了菲律宾。1945年3月，美军攻占了马里亚纳群岛的硫磺岛，美军士兵在折钵山山顶插上美国国旗的照片更是成为了这场战争的标志性形象。日本本岛的最后一道防线冲绳岛在6月投降。美国在一系列海战中也取得了胜利，包括珊瑚海和中途岛海战（1942年）及莱特湾战役（1944年10月）。美国轰炸机从新建的海岛机场起飞，对日本城市进行了轰炸。1945年3月，375架B-29轰炸机对东京进行轰炸，引发了风暴性大火，估计共导致10万人死亡。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摧毁了日本广岛市和长崎市，数万人死于原子弹爆炸造成的冲击波和火灾，核辐射致死人数更多。原子弹基于欧洲物理学家的理论研发，这些物理学家有的是作为纳粹难民移民到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于1942年拨款资助了这个名为“曼哈顿计划”的秘密战时项目。原子弹的各个部件分别在华盛顿州的汉福德、田纳西州的橡树岭、芝加哥大学和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莫斯组装，并于1945年7月在新墨西哥试爆成功。随后，（当时正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参加战后盟军领导人会议的）杜鲁门总统批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美国于8月6日在广岛投下原子弹。两天后，苏联兑现了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对日宣战。在长崎原子弹引爆五日后，日本宣布投降。因为核物理研究的发展和曼哈顿计划，空战时代已经出现的大量平民伤亡变得更加严重，只需要一颗炸弹就能够迅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使用原子弹是否合理呢？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即使不使用原子弹，日本也会在1945年晚些时候宣布投降，尤其是如果盟军同意保留裕仁天皇（后来盟军确实也同意了）。另有一些历史学家发现，美国在苏联承诺的对日宣战时间的几个小时前引爆原子弹，这与华盛顿对战后美苏关系的考量有关。不管答案是什么，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了杜鲁门在战争胜利时的结论：原子弹帮助美国赢得了战争，减少了美国的伤亡。与1918年一样，兴奋的人们涌上街头庆祝二战胜利。

二战的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40万美国人丧生、67.2万人受伤。与一战的情况相同，美国的伤亡相比之下并不特别触目惊心，考虑到战争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物理性破坏和高达1,700万军事人员和2,000万平民死亡人数，包括数百万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和其他人种。然而，由于日本的偷袭行为和帝国主义目的，以及德国的种族清洗逻辑，很多人认为二战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在后来，当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和其他有争议的军事干预行动中时，美国人会回忆起被称为“正义之战”的二战，而数量逐渐减少的二战幸存老兵也被称为“最伟大的一代”。

与以往相同，战争带来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后果。战争期间，大量美国人在军工厂内工作，加快了长久以来的城镇化进程。与1917—1918年间一样，成千上万的非裔美国人和妇女加入到劳工队伍中。战争动员也终止了大萧条，带来了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至少对白人中产阶级而言，战争结束后，工厂转向生产民用产品，带来了消费商品的极大丰富。大规模军工企业职工住房项目为战后城郊住房开发提供了模版。《1944年军人复员法》，又称《退伍军人权利法》，为复员军人提供教育经费支持，文理学院、大学和技术学校的入学人数因此而得以快速增长。战争舆论宣传也激发了一些丑恶的情绪。漫画书、报纸漫画和好莱坞电影中的反日宣传攻势中出现了大量恶毒的族裔偏见。1942年，生活在美国西海岸的近12万日裔美国人被迫离开家园，被关进了偏远的集中营。这项措施得到了罗斯福政府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和认同。

战时的技术创新对战后世界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国火箭技术的突破预示了冷战时期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展。事实上，前纳粹德国火箭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在美国洲际导弹研发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战时计算机研究为战后计算机革命奠定了基础。原子弹开启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时期，由此带来的威胁至今仍困扰着整个世界。

战争还改变了世界权力格局，对美国的未来产生了重大意义。德

国和日本战败，欧洲实力下降，苏联也损失惨重，而美国则未受多少物理损害，由此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亨利·卢斯（Henry Luce）1941年在《生活》杂志的社论中所说的“美国世纪”似乎已成现实。1945年，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旧金山，宣布模仿国联而组建的联合国成立。与1919年的威尔逊总统一样，很多人热切期望通过联合国的协商机制和集体行动能够最终消灭战争。然而，就在联合国成立的同时，新的争端也在酝酿。亨利·卢斯自吹自擂的美国霸权也受到了挑战。美国的战时盟友苏联很快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竞争对手。在二战的废墟上，新冲突诞生，世界即将进入冷战时代。

第八章

1945—1968：富足与社会动荡

二战结束早期，在冷战恐慌和核军备竞赛威胁的背景下，美国呈现出物质富足与社会动荡并存的奇怪景象。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国内社会，表面上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出现了风声鹤唳的反共浪潮和严重的种族、性别和社会阶层不平等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社会活动浪潮再次高涨，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法案的出现，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抗议活动兴起。1968年社会动荡达到高潮，剧烈的政治返潮标志着美国社会生活和文化向保守转变。

冷战对抗

早在二战期间，因为斯大林敦促美英开辟第二战场，美国、英国和苏联这“三大国”的同盟关系就曾一度紧张。战争胜利后，同盟关系迅速解体。英帝国实力或许正逐渐衰落，而美国为了捍卫其全球战略和经济利益，与苏联之间出现了敌对状态。因为过于担心未来德国可能带来的威胁，斯大林在波兰和东德建立了亲苏政权。在西欧，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也表现出巨大的影响力。1946年2月，斯大林发表了一次不友好的谈话，公开抨击“西方帝国主义”。同年3月，在杜鲁门总统的故乡密苏里州，温斯顿·丘吉尔作出了回应，声称苏联已经在欧洲拉起了一道“铁幕”，必须予以还击。冷战爆发。

在联合国，苏联反对美国要求在国际上控制核能的计划，（合理地）指责美国这样是为了使美国的核优势常态化。二战期间，伊朗由同盟国共同控制，而战后，苏联直到1946年5月才迫于美国的压力从伊朗撤军。（美英公司随即就进口伊朗石油达成了协议。）在希腊，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与反革命君主发生了战争。1947年3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言中建议国会对希腊提供帮助。一名共和党参议员曾建议杜鲁门，要想在国会中获得两党的支持，就必须“把美国人吓得魂飞魄散”。杜鲁门在发言中采纳了这一建议，声称希腊内战及其领国土耳其的政治动荡是全球范围内自由与独裁斗争的组成部分，而这种斗争将决定世界的命运。同年6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提出了支持欧洲复兴的大规模援助计划。在推动欧洲复苏的同时，马歇尔计划也起到了限制共产主义扩张的作用；为美国出口设备生产企业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促进了多边经济合作，为未来欧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47年7月，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对“遏制战略”进行了概述，奠定了冷战早期的意识形态框架。（文章署名“X”，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凯南是真正作者。）

莫斯科政府不断在周边地区寻找突破点，因此，凯南提出西方国家必须采取警戒措施，将苏联的势力范围遏制在现有范围内。凯南的战略建议从本质上讲是防御和谨慎型的，但是美国其他行政官员和华盛顿的决策者却极大地扩展了凯南的观点。出于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日益加深的恐惧，他们敦促美国应大规模扩张军备，包括核武器。

1948年2月，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领导的亲苏集团发动政变，在捷克斯洛伐克夺取了政权。同年6月，在美国政府准备承认西德政府的同时，苏联切断了通往位于东德腹地的柏林的陆上通道。美国政府为避免战争风险，并未企图突破封锁，而是组织了大规模的空运，保证柏林的物资供应。1949年5月，苏联结束了封锁。在美国的支持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并加入了美国领导下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东德，苏联政府支持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丘吉尔的铁幕注定要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现实。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击溃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随后中苏建立同盟关系，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共产主义将不可阻挡地在全球扩张的担忧。

1949年9月，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杜鲁门总统随即授权研究杀伤力更大的氢弹。在全球热核战争的阴影之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0年制定了颇为悲观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将冷战描绘成半宗教性质的斗争，指出美苏之间是生死之战，而苏联在“一种新的疯狂信仰的鼓动下”正致力于争夺“全球主导地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将复杂的国际局势简化为可能带来世界末日的对

抗，认为外交手段无法解决问题，也无法找到缓和危机的方法，未来将“长期处于紧张局势和危险之中”。尽管美国人“实力占优却深陷危机”，只有大规模扩军可以保护美国人民。《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标志着冷战意识形态斗争升级，它将这场斗争描述为零和较量，一方获胜就意味着另一方失败。早前的伍德罗·威尔逊和更早期的新英格兰清教徒都提出过美国的世界责任，第68号文件则是这种世界责任的军事化版本。

与很多人预料的不同，真正的较量并没有发生在欧洲，而是在遥远的朝鲜半岛。1945年，日本结束对朝鲜半岛的占领，苏联和美国以北纬38度线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1950年7月25日，在莫斯科的授意下，朝鲜人民军跨过分界线，向南进发。趁着苏联当时正抵制参会，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采取军事行动。同年9月，在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的指挥下，联合国军在仁川进行两栖登陆，将南下的朝鲜人民军军队逐回38度线以北，并进一步向北推进。12月时，麦克阿瑟的军队抵近中国边境，大量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作战。麦克阿瑟意在推翻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在写给支持他的议员的信件中，麦克阿瑟还对杜鲁门的命令提出了批评。1951年4月，杜鲁门以不听从命令为由撤销了麦克阿瑟的指挥权，但麦克阿瑟回国时却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停火协议随后开始，但是战斗却一直延续到1953年。由于处在二战和越南战争之间，朝鲜战争有时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但是这场战争却导致36,516名美军士兵死于战斗和其他原因，联合国军中其他国家士兵伤亡也有3,000多人，而中国和朝鲜方面死伤的士兵和平民人数则更多。60年后的今天，朝鲜半岛仍然处于分裂状态。

二战英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赢得了195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最终赢得大选。美国对冷战的投入加大。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亚洲和中东建立了反共军事同盟。（1947年建立的）中情局策划的政变推翻了伊朗（1953年）和危地马拉（1954年）的反美或左倾政权。美国舆论机构在铁幕另一侧煽动抵抗运动。然而，1956年，当苏联出动坦克镇压

匈牙利起义时，美国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存在目标不一致的情况。美国政府一方面抵制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保护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资源；另一方面，却不顾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反对，在1948年支持犹太人复国建立了以色列。

1953年，斯大林逝世，他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缓和了苏联政策，甚至批评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然而，美苏之间的核军备和导弹竞赛仍在继续。1957年10月，苏联科学家发射了第一颗太空卫星“伴侣号”，这让美国紧张得立即采取措施加强数学和科学教学研究。

1958年，迫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民众反核武器的压力，美国和苏联暂停了大气层核试验。1959年，冷战的局势继续缓和，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问苏联，赫鲁晓夫则到访美国。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原计划在1960年的巴黎峰会上会面，但当时古巴危机阴云密布，随着苏联在国内击落一架美国间谍侦察机，会谈未能如期举行。

1960年总统选举中，理查德·尼克松惜败于充满魅力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年轻的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肯尼迪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对于美国这个一直以来存在反天主教传统的社会而言，这也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上任不久，肯尼迪就宣布成立和平队，招募美国青年到发展中国家从事两年的志愿工作，这一举措广受好评。然而，肯尼迪上任后，在国际关系上可谓出师不利。在1961年的维也纳峰会上，赫鲁晓夫认定肯尼迪软弱、缺乏经验，因而威胁再次对柏林进行封锁。在一次电视讲话中，一脸严肃的肯尼迪就可能出现的核战争发出警告，并宣布美国将加快民防建设。

与此同时，古巴成为冷战的新战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起义军，在1959年推翻了亲美派铁腕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政府，并很快建立了古巴与苏联的同盟关系。1961年，接受美国中情局特训的流亡者进军古巴，意在推翻卡斯特罗政府。这次行动最早由艾森豪威尔批准，并得到了肯尼迪的认

可。然而，行动彻底失败。受此鼓励，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目标直指美国东海岸。1962年10月，美国情报机构发现了这些导弹，肯尼迪要求苏联撤回导弹，并对前往古巴的苏联船只进行拦截。随后几天，核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最后赫鲁晓夫作出了让步。美国承诺绝不入侵古巴（此外，肯尼迪总统的哥哥、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协商了一项秘密协议，美军撤回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作为回报，赫鲁晓夫从古巴撤回导弹。在经历了这些磨难后，美苏双方决定采取外交措施。1963年，随着美国国内反核武器运动的浪潮益发高涨，美苏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永远禁止大气层核试验，并安排就限制军备举行进一步协商。

50年代美国社会：富足与担忧并存

在20世纪50年代，慈爱的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工厂生产出品种丰富的消费商品，国内一派欣欣向荣，一切都看似风平浪静。1950年引入的信用卡更是推动了经济发展。一位经济学家声称，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将历史上其他所有经济体制远远抛在了身后。”在经历了15年的大萧条和二战之后，美国人在努力追求好的生活。对于很多人而言，好生活似乎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中产阶级和很多白人工薪阶层家庭搬到各地新建的城郊地区。战后生育高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娱乐的需求提高。1955年，加利福尼亚州的迪斯尼乐园向公众开放。（1956年启动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使得度假旅游更为方便，连锁汽车旅馆和快餐店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生活》杂志预见未来将是一片繁荣景象，因而在1954年声称：“在未来的10年、25年内，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尽管广播和大众杂志仍拥有大量听众和读者，但是，电视作为新兴媒体迅速席卷了全国；截至1960年，超过5,000万美国家庭拥有了电视机。《我爱露西》等电视喜剧和《荒野大镖客》等西部剧集吸引了大量观众。电视广告业者兜售着汽车、冰箱、香波、剃须膏等各色

产品。《老爸大过天》、《反斗小宝贝》等电视节目描绘了城郊社区的完美画卷：慈爱的爸爸、幸福的家庭主妇和妈妈，以及快乐的孩子。

新搬入城郊的人们需要结交朋友，建立社交关系，因此教会迅速发展。成千上万人开始拥护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的复兴主义，另外一些人则在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充满正能量的作品中找到慰籍。国会通过决议在宣誓效忠美国的誓言中加入了“Under God”（“在上帝庇佑之下”），在美元货币上印上了“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这些不仅反映出美国人对宗教的虔诚，也凸显了美国与官方宣称无神论的苏联之间的区别。

然而，平静的外表之下，潜藏着重重问题。尽管社会富足，但仍有数百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白人与黑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凸显了种族歧视的丑恶现实。越来越多的拉丁美洲移民在社会边缘挣扎，包括流动农场工人和家政服务者。尽管电视节目不断颂扬居家生活的美好景象，但是40%的美国妇女都有工作，大部分是出于经济需要。

《飞车党》（1953年）、《黑板丛林》（1955年）和《无因的反叛》（1955年）等电影描绘了摩托车党的劫掠、城市中心学校的动荡和中产阶级青年的反叛。在文学作品方面，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的《嚎叫》（1955年）、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1957年）和其他所谓“垮掉的一代”的作品刻画了在因循守旧、充满忧患的社会里被异化的孤独者们，读来令人心绪不宁。在流行音乐方面，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佩里·科莫（Perry Como）等吟唱歌手被摇滚歌手取代。后者的代表是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他的歌曲未经雕琢、性感迷人。猫王结合了白人赞美诗和黑人布鲁斯音乐的传统，在50年代中期一炮而红。所有这些文化趋势都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不安和压力，并很快产生政治影响，引发了民众运动。

在政治方面，杜鲁门尽管在新政时期居于下风，却在1948年总统选举中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但是，1947年通过的反劳工法案《塔夫脱 - 哈特利法》也反映出保守主义的

回潮。杜鲁门提出了包括国家卫生保健立法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议案，但是收效甚微。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赢得1952年总统大选，在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下，开始了为期八年的“温和共和党”政府。这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新政的基本改革，同时也抑制其“激进”措施。

冷战的阴影让人们想起了一战期间的“红色恐怖”。早在1947年，杜鲁门总统就启动了一项规定，要求所有联邦雇员宣誓效忠。真实发生的间谍案件更是加重了怀疑的氛围。1948年，原共产党人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指控国务院外交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苏联间谍，从30年代以来一直为苏联服务。经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后，希斯被判作伪证罪名成立并被关进监狱。1950年，英国当局逮捕了曾为曼哈顿计划一名科学家的克劳斯·富克斯（Klaus Fuchs），判定其是苏联间谍。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朱利叶斯（Julius）和埃塞尔·罗森堡（Ethel Rosenberg）这对美国夫妻也被卷入进来。在法庭审判后，罗森堡夫妇被判有罪，并在1953年被施以电刑处死。1954年，原子能委员会以J.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20世纪30年代与左派人物有牵连为由，撤销了他的安全特权。《我嫁了个共产党员》（1950年）和描述吃人外星生物乔装打扮成普通人的《天外魔花》（1956年）之类的好莱坞电影更是对这股浪潮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国会听证会还声称共产党已经渗透到好莱坞、电台和百老汇，一些演员和艺术家也上了黑名单。

1950年在西弗吉尼亚，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声称自己掌握了国务院内数百名共产党人的名单。最初，共和党知名人士支持麦卡锡，但是随着麦卡锡提出的指控越来越离谱（甚至指向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他们随即改变了态度。终结发生在1954年：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喜剧《萨勒姆的女巫》表面上讲的是女巫，实际上对红色恐怖提出了批评；电视对国会有关美国军队中的颠覆破坏分子的听证会进行了转播，让人们见识了麦卡锡欺凌弱者的伎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播出了记者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拍摄的纪录片，片中将麦卡锡刻画成

一个民主威胁者。至此，麦卡锡也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尽头。12月参议院通过决议谴责麦卡锡，导致了他的下台，但是“麦卡锡主义”却成为50年代反共浪潮的代名词而保留下来。

20世纪50年代晚期，美国和苏联的氢弹试验导致辐射物质扩散，国防影片教导孩子们要“躲避和遮蔽”，核恐惧有所加深。激进主义兴起，美国抗议者发动了一场呼吁禁止核试验的运动，作家、艺术家和电影工作者也在作品里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电影《X放射线》（1954年）讲述从新墨西哥州的核试验场爬出巨型蚂蚁，这引发了变种电影热潮，凸显了美国人广泛的恐惧心理。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导演的《奇爱博士》（1963年）是一部描述核末日的黑色喜剧片。

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南方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猛烈批判，成为真正的历史转折点。多年以来，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资助下，通过法律手段逐步清除了1896年最高法院支持种族隔离的丑恶决议。1948年，杜鲁门总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终止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美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种族主义问题，在美国为了冷战目的结交朋友、建立同盟的过程中，这些种族问题成了美国的软肋。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最高法院在裁决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件时，投票一致裁定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的行为违宪。

“布朗”案件的裁决释放了积压已久的抗议能量，最终改变了美国。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是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官员，1955年，她拒绝按照公共汽车司机的要求坐到汽车的后部区域。在帕克斯的鼓舞下，美国黑人发起了对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的抵制运动。1956年11月，联邦法官裁定亚拉巴马州所有种族隔离法律违宪，标志着这场抵制运动的胜利。组织者聘用了年轻的浸信会牧师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领导这场抵制运动，后者很快成长为全国黑人自由运动的领导者，并成为公认的美国英雄人物，后来甚至有了纪念他的国定节日。

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进行了反击。1957年，阿肯色州的州长动用国民警卫队阻止小石城中心中学取消种族隔离，艾森豪威尔总统（尽

管私下里对“布朗案”颇有微词）下令派遣美国军队来强制执行取消隔离的法律。在各种事件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1957年民权法案》，这是重建时期以来第一部针对种族歧视的联邦法律。在时任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得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支持下，该法案在参议院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生效。该法案旨在取消限制南方黑人进行投票的各种不正当规定。尽管仍有众多问题亟待解决，这项里程碑式的法案仍预示着未来将取得更多新的胜利。

1960—1968年：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和黑人自由斗争

在美国国内，总统肯尼迪的生命不幸过早终止，这导致肯尼迪政府虽采取了一些有想法的措施，但是几乎没有成效。1963年11月22日，在访问达拉斯期间，肯尼迪乘坐敞篷车随车队经过热情的人群时，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开枪刺杀。看着肯尼迪的遗体（搭乘着曾经承载过林肯遗体的马车）从白宫运往国会山举行纪念仪式，随后安葬在阿林顿国家公墓，美国人都陷入了悲伤之中。

林登·约翰逊宣誓就职，并号召美国人民共同完成肯尼迪未完成的事业。作为一位极具经验的政治家，约翰逊的确成功推行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改革，比如“向贫困宣战”。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一个美国》（1962年）凸显了美国的贫困问题。《1964年经济机会法》规定了职业培训基金、儿童早期教育、类似和平队的国内志愿组织和当地社区组织领导下的扶贫政策等内容。贫困率迅速下降，在黑人社区尤为明显。然而，保守派却将这项计划称为政府过度干预的典型案例。

在1964年5月，约翰逊在一次毕业典礼讲话中提出实现国家复兴，号召美国人民共同建设一个“伟大社会”。国会通过了约翰逊提出的有关公共设施、农村卫生中心、城市公交、公共教育基金等的改革

计划。1965年的一项移民法案终结了歧视性移民配额制度。国家老年保健医疗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为美国老人和穷人提供了医疗保障服务，成为里程碑式的医疗改革成果。

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提醒人们警惕杀虫剂可能带来的威胁，激发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在约翰逊的推动下，国会针对自然保护、空气和水源污染、高速公路绿化等问题通过了近300项立法。1970年，数百万美国人共同庆祝了第一个地球日，表达他们保护环境的决心。

这一时期，民权运动进入了更加激进的阶段。1960年，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四个黑人大学生在当地的伍尔沃思餐厅参加一场午餐静坐，抗议餐厅拒绝为黑人提供服务。为了抗议南方公交车站实施种族隔离，一些既有黑人也有白人的活动家组织“自由乘车运动”时，遭到了暴力袭击。（一名黑人“自由乘车人”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在1961年遭到了暴力袭击，后于1986年当选议员。）报纸、杂志，尤其是电视披露了这些暴力袭击。在不断积累的压力面前，肯尼迪总统创建了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以解决就业中的歧视问题，派遣联邦军官前往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保护自由乘车者，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处理因一名黑人想要注册而引发的骚乱事件——这一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

激进派代表人物是马尔科姆·埃克斯（Malcolm X），他原名马尔科姆·利特尔（Malcolm Little），在入狱期间加入了伊斯兰民族组织，这是一个美国黑人的伊斯兰运动组织。1965年，马尔科姆放弃了激进的分离主义，转向更具包容性的人类手足观点，并对伊斯兰民族组织领导集团发起了质疑，因而被运动内部的对手暗杀。在激进派的压力下，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CLC）决定以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为重点，开始1963年的民权抗议。蒙哥马利警察动用了警犬和消防水枪对付游行中的黑人学生，并逮捕了金和其他领袖人物。美国人在电视里看到了这一切。受困于负面报道，蒙哥马利市的白人精英最终同意终止种族隔离。

同年8月，来自各个种族的人们聚集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庆

祝自由斗争。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并引用了一段美国黑人圣歌："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然而，更多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比如：一位密西西比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官员被杀；伯明翰一座黑人教堂被炸并导致四名女孩死亡。

尽管如此，变革的动力仍在继续。1964年7月，国会通过了一项里程碑式的《民权法案》，加强了政府干预投票歧视和学校种族隔离的权力，禁止在工作场所以及剧院、餐厅、汽车旅馆等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1965年3月，在亚拉巴马州塞尔马市组织了一场游行，越来越激进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和年轻的激进分子与塞尔马偏执的治安官发生了冲突，后者的手下向游行人群投放烟雾弹，并殴打游行者。所有这些也通过电视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抗议者涌入塞尔马，完成了计划中前往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市的游行。很快，《1965年选举权法》得以通过，进一步增强了政府干预黑人投票歧视的权力。1964—1965年这些成绩标志着美国长久以来反种族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深陷越战泥沼：国内动乱

当冷战在欧洲得到缓和、核威胁不再紧张时，美国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越南。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由共产党领导的北方政府与西方支持的南方政府之间爆发了战争。与1947年希腊局势相同，在很多冷战意识形态至上者看来，越南战争不过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进行全球争霸的又一战线。自从1954年法国撤离越南以来，艾森豪威尔政府就开始向南越派遣军事顾问；到1963年，在南越的美国军事顾问达到1.6万人左右。1963年11月初，在美国的支持下，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推翻并处死了南越专制统治者吴廷琰（Ngo Dinh Diem）。越南是个佛教国家，而吴廷琰信仰的却是天主教。

图11　1963年8月28日的华盛顿大游行吸引了25万人来到国家广场。在这次民权运动盛会中，参与者们在林肯纪念堂前聆听了马丁·路德·金那场难忘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在上任伊始，约翰逊总统采取措施避免全面参战。事实上，在1964年总统选举期间，约翰逊扮演了争取和平的总统候选人角色，而他的竞争对手，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却称美国将在越南全面参战，甚至提及使用核武器，让选民们极为紧张。然而，到了1964年8月，约翰逊却利用在越南东京湾停泊的美国军舰遭袭这一存有争议的事件，推动国会通过决议，批准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参与战争。约翰逊还得意洋洋地说，《东京湾决议》“就像老奶奶的睡袍，遮掩了一切。”

1965年初，在以压倒性优势赢得总统选举后，约翰逊全面升级了美国的参战规模。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国务卿迪恩·腊斯克（Dean Rusk）和其他高级顾问都表示支持。他们一致认为，参加越战彰显了美国在亚洲、拉美和非洲反抗共产主义的决心，而这些地区已经成为冷战的新战场。他们采纳了最先由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即：一旦越南落入共产主义手中，周边国家也将陆续沦陷。

约翰逊一次又一次满足了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将军的增兵要求，到1967年，在越南的美国军队总人数达到了48.5万。美国轰炸机对越南进行了狂轰滥炸。在“搜索并摧毁”方针的指导下，美国军队搜寻善于隐藏的敌人、烧毁被认定敌对的村庄、摧毁丛林以暴露敌军的藏身之所。然而，北越和他们在南越的盟友越南共产党仍在继续斗争，在南越建立稳定的反共政府的目标却一直未能实现。军队士气受挫，吸毒现象增加，并出现了残忍的暴行事件。1968年3月16日，一个美国野战排在美莱村屠杀了男女老少共计400多人。事件发生后，军队一度隐瞒了事实，但是记者在1969年对事件进行了报道。结果，仅有一名低级军官被判有罪，被罚在家中软禁三年半。

随着战争的进行，国内抗议运动爆发，大学校园的抗议活动尤为激烈。1962年成立的改革组织“民主社会学生会”在反战运动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鲍勃·迪伦（Bob Dylan）、琼·贝兹（Joan Baez）等流行歌手都出来支持反战事业。1967年，数十万抗议者在纽约和旧金山

举行抗议游行。因为广受质疑，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同年11月宣布辞职。

1965至1967年间，在洛杉矶、纽瓦克、底特律和其他城市的黑人居住区，暴动和纵火事件频发，国内危机进一步升级。简单的交通肇事逮捕案件就能引发这些暴力事件，这反映了人们对贫困、失业、低质学校、非人道住房项目等社会问题的深刻不满。在“黑人权力”赞歌的感召下，一些年轻的激进分子试图将黑人贫民区沸腾的动荡局面政治化。

1968年，局势达到关键时刻。1月31日是越南新年，越共在南越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攻势，展现了其在南越的实力，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对越战的支持。3月，在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初选中，反战候选人、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击败了约翰逊。随后，时任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参加竞选。3月31日，约翰逊宣布退出总统竞选。

4月4日，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支持环卫工人罢工时，马丁·路德·金遭到暗杀。当时，马丁·路德·金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阶级公平、北方体制性种族主义和越南战争上。全国陷入哀悼之中，在一些城市发生了黑人暴动事件，并造成43人死亡。6月5日，在刚刚赢得加利福尼亚州初选后，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身亡。8月，在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士气低落的民主党人提名约翰逊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为总统候选人。在会场外，警察暴力镇压了反战抗议人群。政治和种族动乱也带来了文化冲突。很多年轻人排斥老一辈的生活方式，他们听摇滚乐、吸食大麻、留长头发、服用迷幻剂、崇尚性自由。1964年，甲壳虫乐队从英国来到美国，受到了热烈追捧。媒体进一步放大了无组织的“反文化运动”的蔓延形势，更是加深了保守派认为社会正在分崩离析的担忧。

理查德·尼克松则迎合南方白人和美国的“沉默的大多数”的胃口，宣称定将实现美国有尊严地从越南撤军的目标，因而赢得了共和党提名。在越来越多的人反感校园抗议、城镇暴动和反文化运动的社会大背景下，汉弗莱也被认为与“约翰逊的战争”有牵连，结果尼克松以微

弱优势战胜汉弗莱。来自亚拉巴马州的第三党候选人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提出了迎合南方白人和蓝领工人的政纲，也赢得了13%的选票。尼克松和华莱士在本是民主党大本营的南方各州赢得了胜利，在全国获得了56%的选票。这是美国政治的一场革命，也代表了人们对约翰逊1964年大胜当选总统以来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强烈不满。

尽管充满了动荡和暴力，20世纪60年代也出现了自新政以来最伟大的进步主义改革浪潮，给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一记重击。然而，未来的岁月将更加动荡不安，美国公众生活也将在未来继续转向保守主义。

第九章

当代美国

与小说家不同，历史学家无法为故事选择幸福的结尾。美国1965到1970年间的政治动乱、城镇暴力和刺杀行动开启了一个动乱的年代，美国就在这种氛围下进入了独立后的第三个世纪。在随后几十年中，美国经历了一次总统辞职、一次总统弹劾、一次恐怖袭击，以及多个引发争议的国外战争，而高潮在于恶毒的政治争端与经济衰退的交替循环。与所有这一切相伴随的是让人无所适从的社会变更、对恐怖主义的持续恐惧、对国家经济前景的长期担心，以及对人为因素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忧虑。尽管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些里程碑式的时间点，比如冷战结束、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当选，但这个时期远远不是美国的黄金时期。美国能否动员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应对这些挑战、能否解决国家应该担任何种角色这一引起分歧的问题、能否实现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所有这些问题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尽管过去曾出现了一些黑暗的篇章，尽管未来充满了挑战，但是，美国的历史也让人们有理由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变迁中的社会

20世纪后半叶，欧洲移民人数不断下降，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则大量涌入，印度、中国、菲律宾和韩国成为美国移民的重要输出国。根据人口统计学家预测，到2040年左右，一直以来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拉美裔白人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将小于50%。早在2003年，拉美裔，包括合法与非法移民，就已经超过非裔美国人，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尽管从定义上讲，拉美裔是指母语为西班牙语的人，但它事实上包括很多民族。拉美裔移民主要来自墨西哥，同时也有来自古巴、波多黎各（事实上是美国领地），以及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其他族裔。拉美裔移民从事着各行各业的工作，主要包括农业、建筑业和公共服务业。尽管那些非法移民对美国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们面对的却是惩罚性法规和意图将他们驱逐出境的周期性运动。

农业就业人口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巨型农业综合企业取代了家庭农场。制造业也在走下坡路，而其他行业却呈现欣欣向荣之景：销售、金融、公共服务、白领工作和信息技术企业。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和其他技术工人和顶级教育机构聚集的地区成为信息技术企业的天堂。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有所改善，妇女在美国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从1970年的43％上升到2010年的60％。

随着制造业的衰退，缺乏专业技术的工人只能选择缺乏保障和福利的低收入工作。中产阶级收入也处于停滞状态。最富有人群与其他美国人之间的差距达到几十年以来的最大程度。尽管有不少黑人和拉美裔挤入了中产阶级行列或者成为职业人士，更多的人停滞不前，受困于失业和其他各种社会问题之中。美国监狱里，青年黑人男子的数量激增，其中大多数人的罪名都与毒品有关。

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美国，新电子技术带来了通讯、营销和娱乐方面的变革。电子游戏和社交媒体广受欢迎。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娱乐和购买商品，出版商、书店、报纸、杂志和唱片公司受到冲击。沃尔玛等大型零售中心在各地发展起来，残酷的杀价竞争造成了大量街边小店的倒闭，进一步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布局。

在原油价格飞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大背景下，也有一些人在关注资源保护、公共交通、燃料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等问题。在美国国内制造业衰退的同时，高燃油效率汽车、机械装置、电子设备和其他消费商品的进口大幅增长，造成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提高。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全球市场，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外经济危机的拖累，周期性经济衰退和贫富差距扩大同样困扰着美国。因此，美国经济远景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面前，政治体系的应对措施也缺乏连贯性，时常受到其他各种危机的干扰，有时甚至到了停摆的边缘。

1969—1980年：抗议、外交举动与新的改革之路

1968年，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并在当选之际即承诺要结束越南战争。但是，和平谈判在巴黎开始的同时，在尼克松和国家安全顾问（后担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授意下，美国军事援助仍不断涌入南越，轰炸也更加密集，目标甚至包括越南共产党在邻国柬埔寨境内的重要据点。

反战抗议仍在继续，1969年和1970年，华盛顿爆发了大规模游行。从美国各地的大学校园，到旧金山的海特 - 阿什伯里地区，反战热情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形式：吸食大麻和迷幻药、沉迷于甲壳虫乐队和鲍勃·迪伦等人的音乐。反文化运动在1969年8月达到一个高潮，数千名反文化青年汇集于纽约的伍德斯托克，参加为期三天的以宣扬和平与爱为主题的摇滚音乐节。一些抗议者采用了暴力行为。1970年8月，四名激进分子在威斯康星大学校园内引爆了炸弹，炸毁了一座学校大楼和该大楼内由军方资助的一个研究中心，炸死了一名在楼内的研究生。

在1968年总统选举的第三政党候选人、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以及尼克松本人等的煽动下，反战抗议也遭到了各方的激烈反对。昵称为“安全帽”的蓝领工人组织了亲尼克松的集会，袭击反战抗议者。1970年5月4日，俄亥俄州共和党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向肯特州立大学校园内的抗议者开火，导致4人死亡、9人受伤。不久之后，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州立大学，警察开枪打死两名学生。

1971年，《纽约时报》披露了“五角大楼文件”，这份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分析了导致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错误假定。1970年以后，反战运动逐渐消退。尼克松政府逐渐从越南撤离了美国士兵，转而依靠轰炸和南越军队，美国战争伤亡得以下降。1972年征兵结束，抗议活动进一步减少。随着反文化运动的衰退，很多年轻人回到自己居住的农村地区，一些人转向信仰东方哲学思想，另一些人加入了“耶稣子民运动”，将福音派信仰与（除去毒品的）反文化生活方式结合起来。

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改良激情寻找到了新的出口。在全国妇女组织（1966年）和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创立的《女士》杂志（1971年）的推动下，女权运动再次兴起，中产阶级女性加

入了反对性别不平等和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权至上思想的运动中，其中很多女性还曾参加过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1972年一项联邦法律的第九条规定在教育和体育领域取缔了性别歧视。（八年前，一个反对《1964年民权法案》的南方白人议员恶作剧地提出了针对该法案的一项修正案，将“性别”也列为反歧视的类别之一。）1969年6月，警察对曼哈顿的一家同性恋酒吧进行了搜捕，因而引发了抗议活动，这标志着同性恋维权活动的开始，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受到蕾切尔·卡尔森的作品《寂静的春天》的影响，人们开始行动起来反对环境污染。1970年4月22日，美国各地的环境保护积极分子庆祝了第一个地球日。是年12月，在尼克松的支持下，国会通过决议，成立了联邦环境保护局。

尽管国内风云四起，尼克松和基辛格重点关注的仍是外交问题。虽然基辛格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实现和平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他对（被尼克松长期视为美国死对头的）中国的秘密出访却取得了成效。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举行了会谈，奠定了美国承认中国的基石。作为均势外交大师，基辛格还致力于改善美苏关系。在拉丁美洲，尼克松政府支持亲美政府，并采取各种措施颠覆那些不亲美的政府。1973年，在美国的支持下，智利爆发政变，推翻了民选左翼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阿连德自杀。一个残暴的军事集团上台，一直掌权到1988年。

1972年总统选举年，民主党的青年活动派与由劳工领袖和大城市政客组成的老派民主党骨干产生了分歧。青年活动派在民主党大会占了优势，提名南达科他州州长、反战领袖人物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为民主党候选人。结果，尼克松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尼克松提出“南方战略”，赢得了很多对黑人民权运动成果不满的民主党南方白人的选票，以及因为民主党左倾而被孤立的蓝领工人选票。

然而，尼克松很快就陷入了他自己造成的危机之中，他偏执、刁滑的性格被带到了白宫（尼克松也因此被戏称为“狡猾的迪克”）。因为对“五角大楼文件”披露事件的不满，尼克松授意被称为“水管工”的

秘密小组调查文件泄漏事件。1972年6月，秘密小组溜进民主党国家委员会位于华盛顿的总部安装窃听装置，结果被保安发现，窃听者被捕。尼克松否认事件与他有关。

这一事件刚开始并没有引起公众关注，但是《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对事件进行了追踪，找到了白宫参与并掩盖该事件的确切证据。国会专门委员会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并很快发现了白宫椭圆办公室内的秘密录音系统。录音纪录证实尼克松曾参与掩盖事件真相。在总统弹劾案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于1973年8月8日宣布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尽管有着出众的智慧、战略眼光和灵敏的政治直觉，尼克松却最终败给了自己人格上的缺陷。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继任总统，并宣称“我们长久以来的国家噩梦已经结束。”由于原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因为被控受贿和逃税而辞职，福特在1973年刚被任命为副总统。作为一名虽不十分出众但受人爱戴的来自密歇根的议员，福特在上任之初就赦免了尼克松在任期内的所有罪名，使得尼克松免于受到起诉，可以说福特因为此事而浪费了初始对他有利的公众舆论。

1975年春天，越南共产党军队向西贡发起进攻，最后的美军撤离。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最终结束，为此美国有5.8万士兵付出了生命代价，伤亡人数也是成千上万，而越南的死伤人数更是触目惊心。一些人认为，如果没有国内的反对，美国本可以取得战争胜利；一些人则指出，美国在越南的败退标志着美国狂妄野心的失败，也彰显了因为意识形态斗争而忽略复杂地缘政治现实的危险性。

与此同时，为了抗议美国在1973年战争中支持以色列，阿拉伯世界中止了对美国的原油出口，引发了一场新的危机。汽油价格飙升，民众普遍对政府感到失望。由于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美国消费者更青睐燃油性能更佳的日本进口车，国产汽车的销售量因而大幅减少。与此同时，美国人们仍未忘记尼克松的不诚信行为，因此，远离政治中心华盛顿的前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宣称永远不会向美国人民撒谎，赢得了民主党候选人席位，进而成功赢得1976年总统选举。当时福音派新教正在兴起，身为南方浸礼会教徒的卡特称

自己是“获得重生的基督徒”。

1978年，卡特在外交上露了一手，促成了埃及 - 以色列和平条约的签订。但是，卡特在国内政策的表现上却乏善可陈。卡特是一个热衷于分析的技术官僚，缺乏政治技巧。随着通货膨胀和石油短缺形势持续恶化，卡特的支持率迅速下降。他无视内阁的意见，一意孤行地号召美国人民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尽管卡特的想法是好的，却无法获得广泛支持。

在此期间，在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推翻了亲美的国王，建立了伊斯兰政权。1979年，卡特批准原伊朗国王前往美国接受癌症治疗，伊朗抗议者攻占了位于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扣留了66名人质。这场危机困扰了卡特任期的所有剩余时间。计划不周的营救行动导致8名美国人质死亡。直到卡特离任，伊朗才释放了人质。

里根革命：保守主义的复兴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来自好莱坞，在好莱坞学习到的戏剧技巧对他的政治生涯颇有助益。尽管在“新政”时期是民主党人，里根在20世纪50年代在政治上向右转，并出任通用电气发言人。1966年，里根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因为批评校园抗议者而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关注。“道德多数派”是电视布道者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创立的亲共和党的宗教保守派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协助下，里根被提名为1980年总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在选举中大胜，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里根本人的乐观态度和电视荧幕魅力；卡特不得人心；民众对20世纪60年代激进主义的抵触情绪；宗教保守派的大力支持。

一直以来，尽管福音派新信徒在反堕胎和其他战前改革问题上比较积极，但其后在政治上却并不活跃，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教会和传教活动上。然而，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堕胎、联邦政府禁止在学校进行祷告、同性恋权利运动和媒体在性问题上的

宽容。这些问题促使很多福音派信徒（和保守的罗马天主教徒）相信，美国正走在一条错误的路线上。福尔韦尔的“道德多数派”和其他组织将这些担忧政治化了，并指责民主党的错误政策导致了美国道德问题。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大量福音派信徒将选票投给了里根。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里根基本上无视宗教保守派的文化诉求，反而将重点放在保守的经济政策上。在国内，里根倡导减税、放松对商业的管制、在环境保护法案方面开倒车、允许私人开发公用土地、压缩工会权力。当联邦航空管制员举行罢工时，里根直接开除了所有罢工的管制员。1981年，国会通过一项重大的减税法案，并大幅缩减了国内开支。里根声称这样做能够刺激经济、增加收入。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是经济衰退，赤字激增。此后，随着经济的改善，里根下降的支持率又有所回升。

里根信奉个人主义，反对大政府，支持自由市场，从而吸引了一大批人。里根还是一个有天赋的沟通者，能够用爱国主义、怀旧之情和光明未来的愿景包装自己的观点。尽管里根拥有众多热情的支持者，（尽管后世有人说里根得到所有人的爱戴）里根政府的国内政策却引发了深刻的争议。

里根大幅增加军事开支，称苏联是“邪恶帝国”，进而使得冷战敌对状态进一步升级；原本就因为苏联1979年出兵阿富汗而变得紧张的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一背景下，美苏进行裁军谈判时，社会活动家发起了所谓的“核武器冻结运动”，希望促使两个超级大国中止各自的核武器计划。一边是抗议者的集会，一边是电影和电视节目就核战争危险不断提出警告。针对这场运动，里根在1983年提出“战略防御计划（SDI）”，以建立足以抵抗导弹袭击的防御体系。一些专家人士认为这一计划并不现实。媒体借用当时一部大热的科幻电影名称将这一计划称为“星球大战计划”。尽管如此，国会仍然拨款支持了“战略防御计划”，核武器冻结运动也日渐式微。

1984年，随着经济的改善，里根赢得连任。里根政府继续坚持反共政策，资助被称为“勘查斯”的尼加拉瓜反抗军与尼加拉瓜左翼政府作战。美国政府还向伊朗境内反抗反美政府的隐秘组织出售军火。尽

管国会明令禁止向“勘查斯”提供资助，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官员仍秘密挪用了伊朗军火销售获得的资金，用于资助“勘查斯”。国会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里根的办公厅主任辞职，里根也免于陷入遭受弹劾的境地。

在此期间，在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下，苏联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领导的政府在国内外压力下开始了一系列自由化改革，冷战的紧张局势得到大幅缓解。局势很快失控，东欧各国脱离了苏联的控制，苏联共产党的权力也被削弱。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冰岛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核裁军进行了商谈。双方在1987年就美苏从欧洲撤回核武器签订了条约。在任期接近尾声之时，曾经的冷战斗士里根在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友好的会谈。

1988年，里根政府的副总统乔治·H. W.布什（George H. W. Bush）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布什出生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权贵家庭，后在得克萨斯州成为石油实业家，随后从政，在共和党政府中出任要职。布什在外交政策上比较有决断，在内政上却不甚成功。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苏联对东欧控制的终结，布什政府采取措施，成功地避免了苏联的核武器落入危险分子手中。1991年美俄签订条约缩减双方的核武器库。

冷战以令人意外的速度迅速终结。里根的支持者认为这应该归功于里根政府的强硬立场；其他人则认为应该归因于苏联的内部局势变化。但是，1990年又出现了新的危机，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入侵石油资源丰富的科威特。布什政府召集的国际同盟成功地击退了侵略者。尽管面临重重压力，布什决定不进军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因为他认为那样做风险太大。布什夸口称：“我们赢得了胜利。再没有敌人可以威胁我们的安全。”然而，在科威特战事之后，布什政府在对抗经济衰退和处理其他国内经济问题上没有什么作为，布什的支持率不断下降。

克林顿任期：现代化、经济繁荣和丑闻

前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获得199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与其竞选伙伴、田纳西州参议员阿尔·戈尔（Al Gore）一起，在11月的大选中击败布什。在竞选中，为了赢得因民主党长久以来的“增税再开支”的名声而有所保留的中立选民的选票，克林顿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姿态，但是在当选后，克林顿任命他的夫人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领导了一个工作小组，为美国医疗体系改革出谋划策。工作小组提出了一个大规模计划，提出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通过组建采购合作社来降低成本等措施。然而，在医生、医药公司和私营保险公司的一致反对下，该计划未能在国会通过。

受到这一胜利的鼓舞，来自佐治亚州的众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起草了被称为“美利坚契约”的政纲，列举了共和党的政策目标，包括大幅削减开支、为迎合福音派而提出的反色情法案等措施。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重新成为众议院多数派，金里奇出任众议院议长。然而，由于国会与白宫无法就联邦预算达成一致，导致美国政府一度关门，金里奇的声名一落千丈。

与此同时，克林顿签署了社会福利改革法案，削减福利开支，限制政府功能。克林顿重新成为政治中心人物，并在1996年获得连任。克林顿政府在外交上的成就包括：1993年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贸易区；1995年，在饱受民族宗教冲突摧残的前南斯拉夫，促成各方在波斯尼亚签订停火协议。克林顿在第二任期内饱受丑闻困扰。在检察官就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发生性关系的案件进行性骚扰调查时，克林顿存在不诚实的问题。共和党提出的弹劾案未能在参议院通过，但是丑闻严重损害了克林顿的声誉。

2000年大选中，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阿尔·戈尔与时任得克萨斯州州长、前总统乔治·H. W.布什的儿子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竞选总统。尽管戈尔比布什多赢得50万张选票，但是选举人团

结果要看佛罗里达票选结果而定，而这一结果存在争议。佛罗里达最高法院提出重新计票，但是（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占绝大多数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决定采取更加直接的方法，宣布布什获胜。上任后，布什倡导对富裕阶层尤为有利的减税措施；缩减商业管制和环境保护措施；开展了几项支持他的福音派提出的改革计划。在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召集下，由石油工业高管组成的小组起草了一项能源法案，淡化能源保护的重要性，提出了延长税收优惠期等有利于石油天然气公司的措施。

9/11事件的阴影

2001年9月11日，与伊斯兰极端组织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美国商用民航国内航线客机。其中，两架飞机撞击了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并导致两座大楼崩塌。第三架客机撞上了五角大楼。第四架客机上英勇的乘客制止了恐怖分子撞击目标，这家飞机原来的目标可能是白宫，客机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这次袭击共导致超过3,200人死亡，包括目标建筑物内的工作人员、警察、消防员及被劫持飞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这场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让美国人团结起来，也赢得了世界的同情。国旗销量激增；二战颂歌《天佑美国》也再次唱响。国会通过立法，授权政府对安全威胁进行全面调查。布什总统宣布发动“反恐战争”以“消除世界的邪恶势力”，矛头直指基地组织及其头目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美国和北约军队攻入了基地组织大本营、由保守的伊斯兰运动组织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境内。

然而，很快切尼、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其他政客将注意力转移到伊拉克。他们声称，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伊拉克将成为中东地区民主的灯塔，从而巩固以色列的安全环境。政府人员错误地将萨达姆与9/11事件联系起来，并坚称伊拉克在秘密地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舆论攻势下，国会批准了上述意见，随后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在2003年3月侵入伊拉克。萨达姆及其亲信逃离巴格达，布什声称“任务完成”。（萨达姆最终被抓并处以绞刑。）然而，宗教派别冲突随后爆发，伊拉克陷入内战。战后，在伊拉克并未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国内的不满情绪有所上升，记者撰写文章记录了政府如何在战前利用舆论误导民众。

尽管布什在2004年赢得连任，但是随着美国军队恶行和在伊拉克及古巴关塔那摩湾的军事监狱里的虐囚事件被不断披露，战争越来越不得民心。到2011年美国终止在伊拉克境内的作战任务时，美国死亡人数达到4,484人，受伤人数更是超过3.3万人。因为战争和宗派武力冲突，伊拉克军民伤亡惨重，并且仍然处于高度动乱之中。很多人认为，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严重误用了手中的实力。

历史性选举：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由于布什广受诟病，一个不太出名的民主党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得到青睐，赢得总统席位。奥巴马于1961年出生在檀香山，母亲安·邓纳姆（Ann Dunham）是一位美国白人人类学家，父亲老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Sr.）是来自肯尼亚的黑人经济学家。奥巴马在夏威夷和印度尼西亚长大。大学毕业后，奥巴马在芝加哥从事社区组织工作，后来在哈佛法学院获得学位，并就职于伊利诺伊州州议会，在2004年当选为美国联邦参议员。2008年，奥巴马成功击败时任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奥巴马当选后任命希拉里为国务卿。）奥巴马是一个极富煽动性的演说家，赢得了选民的热情支持，支持者成功地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为奥巴马造势，帮其在11月赢得总统大选，成为美国历史的里程碑事件。正如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提到的，就在几十年前，华盛顿的很多餐厅还会拒绝接待他的父亲就餐。

然而，2008年时，由于抵押借款人、华尔街证券公司、股票评级

公司和管理松懈的联邦机构的一系列不顾后果的行为，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股票价格暴跌；生产力停滞；失业人口爆增。联邦预算赤字激增，而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措施和两场无资金支持的战争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在激烈辩论后，共和党与民主党分别控制的参众两院于2010年通过了有关削减成本和建立全民医疗的医保改革法案。共和党人称“奥巴马医改案”是社会主义阴谋，并因此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收获颇丰。在中选胜利的鼓舞下，共和党人致力于推动有利于企业和富裕阶层的减税措施；进一步缩减商业管制和环境保护；并以缩减财政开支为由，削减包括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在内的社会项目。

宗教右派积极推动“重视家庭”、反对同性恋的议程，并因此发起了所谓的茶党运动（运动名称来自1773年波士顿倾茶运动），鼓吹政府怀疑论和仇恨奥巴马。随着两党分立日益严重，以合理方法解决紧要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与此同时，经济停滞不前，共和党领袖反对任何涉及增税的经济刺激计划和赤字缩减提案，即使增税方案只针对美国最富有的阶层。奥巴马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作出让步，意图与丝毫不愿退让的对手达成妥协，但奥巴马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效。2008年奥巴马当选所激发的热情和愿景开始消退。希腊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金融危机导致欧盟出现财政问题，因而进一步拖累了美国的经济复苏，这也凸显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所享受的安全感很快就消失了。奥巴马将军事重点重新转移到阿富汗——几个世纪以来不断有外国势力在此受挫——但是阿富汗局势仍旧糟糕。9/11后美国大幅升级了安全措施，这使得很多人担心公民自由可能受到侵害。2011年，美国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成功击毙奥萨马·本·拉登。尽管如此，美国人仍非常担忧可能发生新的恐怖袭击。

图12　2009年9月9日，在严重的经济衰退背景下，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向国会陈述政府的经济复苏计划。尽管奥巴马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仍然和其他现代政客一样使用了提字器。在图中，讲台上奥巴马左侧可以看到提字器。

2011年，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抗议者，包括长久以来受到压迫的伊斯兰政党，成功推翻或尝试推翻专制政府，包括埃及等与美国有着密切战略关系的政权。这些都让美国人既钦佩又不安。尽管以色列政府控制在强硬派手中，巴勒斯坦领导集团也出现了多次更替，但是巴勒斯坦的建国努力从未停歇，这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

在世界各地，众多跨国问题迫切需要人们的注意，包括：核扩散、化石能源枯竭、气候变化、贫困、饥饿、人口过多和疟疾、霍乱、艾滋病、肺炎、肝炎和痢疾等众多传染疾病。虽然很多美国人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仍持怀疑态度，但是在跨国挑战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这些组织必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崛起，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内将出现长期的缓慢衰退。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意外。国家和帝国总是兴衰交替。然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美国总

是有能力进行政治革新和创造性地应对挑战。美国近年来保持着在计算机和电子通讯领域的领先地位，就是近期的一个力证。虽然美国有很多问题，但是世界各地仍有无数人向往这个国度。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虽然有衰退和周期性的停滞和反作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证明它有能力扩大自由的疆界、促进平等和社会公平、推动公共利益发展。在19世纪早期，美国通过政治斗争和草根运动让更多人获得了选举权；美国经历一场血腥内战结束了奴隶制；在进步时代，美国实现了对企业的监管、赋予妇女选举权、制定了保护消费者和工人的法律；在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美国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立法；在近代，美国更是经历了数次公民权力革命，并制定和实施了环境保护措施。得益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美国成为拥有不同宗教信仰或无信仰人们的天堂。美国在科学、医疗和艺术等方面为人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美国早期在这些方面显得比较薄弱。列出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宣扬某种美国例外论的新理论，也不是为了否认美国历史上不可回避的挫败、黑暗和耻辱。然而，全面均衡评价之下，美国在促进人类福祉方面的贡献必将超过它带来的问题，而这样的贡献是比短暂易逝的帝国权力、军事实力以及物质丰饶更为持久的衡量伟大国家的标准。

从最初发现新大陆时期的殖民地，到奥巴马当选总统的当今美国，《美国简史》从政治、文化、社会、宗教、科技等多维度展现了美国三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本书虽为简史，却囊括了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大小事件，且视角客观，既论及光明和发展，又不回避黑暗和耻辱：殖民地时期，反对欧洲帝国压迫的同时伴随着对印第安人的驱逐；建国之父们将自由和平等写进宪法，妇女和非裔美国人却花了漫长的时间才取得与白人男性同等的权力；一面奉行孤立主义力图避免卷入国际纷争，一面又在各大洲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

百科通识文库

49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约翰·布莱尔 著

肖明翰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约翰·布莱尔 著

肖明翰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39**

The Anglo-Saxon Ag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4.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1984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John Blair 19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盎格鲁 - 撒克逊时期 / （英）布莱尔（Blair, J.）著；肖明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22-6

Ⅰ．①日… Ⅱ．①布… ②肖… Ⅲ．①英国 - 中世纪史 Ⅳ．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54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刘　旭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22-6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作者简介

约翰·布莱尔，牛津大学女王学院现代史研究员及讲师，已出版的著作有《中世纪早期的萨里》、《盎格鲁 - 撒克逊时代的牛津郡》、《牧师与牧区教堂》、《中世纪英格兰行业》、《修道院与世界》以及《盎格鲁 - 撒克逊时代的教会》等。

译者简介

肖明翰，美国俄亥俄大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和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近年从事英美现代文学和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主要译著有《爱伦·坡哥特故事选》等。

目　录

插图目录
地图目录
绪论
第一章　英格兰人集居地
第二章　七世纪
第三章　基督教与修道院文化
第四章　麦西亚霸权
第五章　维京人的入侵与韦塞克斯王室的兴起
第六章　艾特尔雷德与克努特：英格兰君主制的衰落
第七章　盎格鲁 - 撒克逊王朝的终结
年表
返回总目录

插图目录

图1　早期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凹陷棚屋复制品，苏塞克斯郡辛格尔顿市威尔德 - 唐兰博物馆馆藏
图2　西南威尔士卡斯特德威兰的纪念碑
图3　萨顿胡出土的油石器物细部
图4　爱尔兰高威县基尔帖南一座早期修道院或称“卡社尔”
图5　铸有奥发国王头像的银币
图6　阿尔弗雷德之宝石，发现于阿尔弗雷德的藏身处阿瑟尔尼附近
图7　温切斯特新教堂创建证书上的埃德加国王像，966年
图8　一份加有封印的忏悔者爱德华的诏书，内容为赏赐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图9　盎格鲁 - 撒克逊后期绘画，画中是一队牛拉着带轮的犁
图10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及其周围区域，约1100年

地图目录

地图1　600年前后的英格兰
地图2　10世纪的英格兰

绪论

不列颠在公元300至700年间位于正在分崩离析的罗马世界的边缘，是来自各方的潮流交汇之处。它的原住民不列顿人（“凯尔特人”）【1】大多曾处于罗马人统治之下，但只有那些居住在低地地区，也就是后来的英格兰南部和东部地区的民众，才可以说是真正融合到了罗马文化中；而在北部，哈德良长城【2】不仅仅是不列颠的边界，也是罗马帝国的边界。因此，不列颠的大片地区，如同它西部的爱尔兰一样，仍然是凯尔特和皮克特文化区域，罗马文化的影响微不足道。

4世纪后期，罗马帝国疆界之外的皮克特人、苏格兰人、法兰克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人等野蛮民族的袭击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不列颠和高卢的统治者，并将在5世纪最终将其击溃。然而欧洲的罗马文明总是那样近在眼前，那样强大富有感染力，即使是最原始的入侵者也迟早会受其影响。不列颠这个失陷了的罗马行省，夹在异教徒的野蛮北方和基督教的罗马南方之间，地位暧昧，成为多种影响交融之地。正是这种暧昧性和多样性，有助于解释即将在不列颠出现的中世纪早期各种文化的鲜明独特性。

注释

【1】 不列顿人（Briton）是生活在不列颠的凯尔特人（Celt）。下文中，原文若使用Briton，译为“不列顿人”，若使用British，则译为“不列颠人”。在盎格鲁 - 撒克逊时代，它们都是指不列颠的原住民。——译注，下同

【2】 哈德良（Hadrian，76—138）为罗马皇帝（117—138年在位），他下令在不列颠北部修筑了横跨海岛的城墙，长约117公里，以抵御北方苏格兰地区的皮克特人（Picts）。

第一章

英格兰人集居地

有关5、6世纪的资料十分稀缺，而且难以令人信服。其中一些是考古证据，主要来自异教徒坟墓里的器物。这些证据不会说谎，但它们能回答的问题却非常有限。另外就是少量文本、编年史和一些残篇。其中，唯有《不列颠之毁灭》才是内容比较充实的同时代著作。它是由一位名叫吉尔达斯（Gildas）的不列颠修士在6世纪40年代前后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其目的是用最激烈的言辞谴责当时的各种罪孽。在位于贾罗的一座诺森布里亚修道院里，一位修士，可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于731年完成了他的杰作《英格兰人教会史》，这部作品使所有其他有关7世纪到8世纪早期的史料黯然失色；而且尽管入侵对于比德已是遥远的过去，但他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值得信赖的零星传说。

图1　早期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凹陷棚屋[1]复制品，苏塞克斯郡辛格尔顿市威尔德 - 唐兰博物馆馆藏。这是5到8世纪之间居民点最典型的建筑物之一。

其他的叙述资料就只有后来收集编纂的一些年鉴残篇、少量诗作以及大陆作者们顺便提及的史料。而后编写的那些被统称为《盎格鲁

- 撒克逊年鉴》[2] 的编年史逐年简述了发生在英格兰南部各王国的事件，它们包含了遥远时代的传说，但关于570年之前的记载却很不可靠。因此，我们唯有通过不列顿人充满仇恨的眼睛，外国人不甚了了的视角，或者他们自己已记忆模糊的传说，方能对早期英格兰人的时运窥知一二。一直到6世纪末，人们都只能将审慎的猜测当作历史。

考古提供了一些看法，认为日耳曼殖民者最初是作为后期罗马军队的雇佣军来到不列颠的，但那并非定论，仍然广受争议。后世的英格兰人认为，他们祖先到来的时间比那晚了几十年，而且的确是从5世纪30年代起，移民似乎才大批到来。在考虑这个重要过程之前，我们必须问：这些入侵者是谁？他们的情况怎样？关于第一个问题，比德给出了答案，虽然答案得出的依据不详，但这段文字却十分翔实，几乎可以同当今任何一位学者所能给出的答案相媲美：

> 他们来自3个非常强大的日耳曼部落：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肯特人、怀特岛上的居民以及居住在怀特岛对面区域的那些人都是朱特人后裔，怀特岛对面的地区是韦塞克斯王国的一部分，至今仍然被称为朱特人的国度。东撒克逊人、南撒克逊人和西撒克逊人来自撒克逊地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古撒克逊区域[3]。除此之外，从盎格鲁人的国度，也就是处于朱特王国和撒克逊王国之间的地区，迁徙而来的是东盎格鲁人、中盎格鲁人、麦西亚人、所有诺森布里亚的居民（也就是所有居住在亨伯河以北地区的人）以及其他盎格鲁部落。据说自那以后，盎格鲁区域至今仍然荒无人烟。

大体上说，考古发掘证实了比德的分析：从英格兰的墓葬中发现的器物与那些出自德国北部和丹麦半岛南半部的器物类似。在东盎格利亚一些5世纪的火葬墓地出土的骨灰瓮和在萨克森州[4]发现的骨灰瓮甚至有可能出自同一批陶工之手。石勒苏益格[5]东北的一个地区至今仍然被叫做昂格尔恩（Angeln）。对于比德列出的部族名单，我们还可以加上弗里西亚人，他们同那些可能是在5世纪早期渗透到弗里斯兰沿海居民点的撒克逊人融合在一起。甚至比德关于祖居地一些

居民点被抛荒的说法，也通过在威悉河口附近的菲德森威尔德进行的考古发掘而得到了证实。在那里，一个由大原木房屋组成的村落在450年左右被放弃，那显然是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后果。同不列颠低地地区的天然沃土以及当地居民招募雇佣军的证据一道，这些沿海居民点被淹没的状况为移民英格兰提供了特定的背景，虽然在大量蛮族进入乃至跨越帝国行省的大规模流动中，这些迁徙还有更宽广的背景。

多族群区域

比德将英格兰人分为明显不同的部族，其划分有些太过齐整。那些王国和地区后来在大约600年时为自己贴上的标签——“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等等——很可能是表明其统治者和上层集团的来历。但考古发掘并未表明各地区人口的主体能够如此截然区分，到了6世纪后期，当各王国形成之时，边境地区的人口组成就更为模糊不清。于是，东盎格鲁人最精美的金属器物与肯特地区的同类物品相似，而他们的王室却似乎来自瑞典。这些移民很可能是小批、分散迁徙而来；海上航程肯定削弱了他们的部族联系，而新型定居点和社会组织也得到发展以适应早期殖民者的需要。这些殖民者具体来自什么部族，比起他们同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德国和法国北部广博的文化而言，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他们现存的最古老的诗歌包括以丹麦和弗里斯兰为背景的英雄传说；7世纪早期的东盎格利亚国王拥有瑞典和高卢的财宝；而东南部的英格兰人因为肯特的国王娶了一位法兰克公主而成为基督徒。

于是，在罗马世界与非罗马世界之间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国际”区域。最终，前者必将再次发挥影响，但最初几代盎格鲁 - 撒克逊人在本质上仍然是后者的产物。同绝大多数欧洲的“蛮族”入侵者不同，英格兰人来自罗马文明圈之外。他们所带来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俗习惯，即使经过基督教几个世纪的同化，仍然岿然不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公元一世纪的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对日耳曼人

（*Germani*）的描写中相当多的部分仍然适用于他们在英格兰的遥远后裔。同日耳曼人一样，在整个盎格鲁 - 撒克逊历史阶段，最牢固的社会纽带是血缘关系和主从关系的要求与义务。

血缘关系与主从关系

在祖居地，血缘族群最为紧密；在英格兰，也依然如此。一个男人的家族和依附人有时会组成一个定居点，共同分享资源并有自己的土地分配制度。这种延展性的“亲缘”关系对于定居地特点的影响可以从大量地名的后缀*-ing*[6]，*-ingham*，和*-ington*看出。黑斯廷斯（Hastings）的意思是“哈斯塔的族人”[7]（the people of Haesta），雷丁（Reading）的意思是“拉达的族人”（the people of Reada），沃金汉姆（Wokingham）的意思是“沃卡族人的田地”（the farm of Wocca's people），等等。虽然这些名字不大可能产生于移民的最初阶段，但它们出现很早而且十分重要，意味着大片大片的土地。它们还表明，这些领地往往是以迁徙到该地定居的部落的特点来进行区分的。社会发展了，但家族忠诚仍然极其重要。个人的安全在于他知道，他的亲族必将为他的死亡报仇，否则那将是他们永远洗不清的耻辱。不过在塔西陀的时代，杀人者已经可以通过向受害者的亲属交付一定赔偿来保持自己的荣誉，那就是后来盎格鲁 - 撒克逊法律与习俗里的赔偿制度[8]（*Wergild*）。

塔西陀还强调了日耳曼人对首领的忠诚。他们的君王有时是世袭的，但在战争中他们往往是由选举出的首领指挥：“如果在首领战死后逃离战场那将是终身的耻辱，永遭谴责。为他而战，保卫他……是他们效忠誓言的核心。”9个世纪之后，在991年，一支盎格鲁 - 撒克逊军队在埃塞克斯海岸的马尔顿被维京人击败。那时英格兰已经是一个文明国家，早已皈依了基督教；然而，同时代一位诗人让其中一位武士在首领战死后发出的豪言壮语与塔西陀有着明显的共鸣：

我发誓，我决不从我站立之处
后退一步，我将奋勇向前，
用战斗为朋友和主人复仇。
我的行为决不会给斯图尔的勇士们
带来耻辱，现在主人已经躺下，
——我决不会离开战场和主人，
流落天涯。唯有刀尖或者利刃，
才能夺去我的生命。[9]

显然，对主人的忠诚有时可能会与对家族的忠诚相冲突。为了维持秩序和他们自己的权威，后来的君王们倾向于加强王权。于是，国王阿尔弗雷德的法律允许任何人“为他的族人而战，如果那人受到不正当攻击的话；但却不能对主人作战，那是不能容许的”。但在这两个方面，盎格鲁 - 撒克逊社会都总是把忠诚和履行诺言看得极为重要。

宗教

盎格鲁 - 撒克逊社会的主要神祇是古斯堪的纳维亚后期神话中的那些神灵：提乌（Tiw）、沃登（Woden）和托尔（Thor）。他们的名字由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这些名词流传下来，并保存在图斯列（Tuesley，在萨里郡）、温斯伯里（Wednesbury，在斯塔福德郡）、吐尔斯列（Thursley，在萨里郡）等几个地名里；据推测，这些地名表明，那些地方曾是异教中心。即使在皈依基督教后，英格兰人仍然用他们过去的女神伊丝特（Eostre）为主要的教会节日之一[10] 命名。如同在日耳曼地区一样，神龛都设在偏远的地方，设在树林里或者山顶上：有几个地名包含hearg（神龛），比如佩帕哈洛（Peper Harow，在萨里郡）和山上的哈洛（Harow-on-the-Hill）。由于教廷会议后来禁止崇拜“石头、木头、树木和水井”，可以推测，那类活动属于异教性质的英格兰崇拜。至少在表面上，这个宗教看起

来与罗马统治下的异教徒不列顿人的宗教并没有太大区别。

大约公元600年之前

在大约公元600年之前，能叙述的事件并不多。吉尔达斯说，由于饱受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进攻之苦，在“骄傲的暴君”沃尔蒂格恩（Vortigern）统治下的不列颠人引入最早那批撒克逊人来保卫东海岸。比德和其他一些材料提供者补充说，那些撒克逊人是由肯特王国的创建者亨吉斯特（Hengest）和霍萨（Horsa）弟兄俩率领的，并把他们的登陆时间定在大约450年。虽然这个时间定得有些过晚，但该传闻却与考古证据非常一致：如果日耳曼雇佣军是在罗马统治时期到来，那么那些后继政权完全有可能继续执行这一政策。根据吉尔达斯之说，雇佣军后来发生叛乱，转而向主人进攻；接着就是长时期无休无止的战争，直到大约500年，不列颠人在一个名叫蒙巴多尼库斯（*Mons Badonicus*）的地方取得重大胜利，至于那个地方今在何处，已无从考证。吉尔达斯说，在那之后，和平持续到他的时代，已达50年之久，当时有5个不列颠王国由邪恶的“暴君”统治。它们的势力在未来英格兰诸王国扩张到了多大的范围，至今仍存争议，但在西南地区一些山顶遗址上恢复的防御工事标示出一个武士社会，其特性与前罗马铁器时代非常相似。

那个时代中，一位所有现代人都熟悉的人物自然是亚瑟（Arthur）。不幸的是，他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人物，没有多少历史真实性。关于他的传闻中可能具有真实性的两三个片段都写于几个世纪之后，而那些与他的名字相关的传说全都是浪漫传奇的虚构。我们只能说，似乎有一些与一个名叫亚瑟的不列颠军事领袖相关的记忆，他与蒙巴多尼库斯战役以及随后的一些军事行动有关。可能有那么一个部落首领或者超级国王，即最后一个能把先前的罗马行省在最终分崩离析成诸多不列颠和盎格鲁 - 撒克逊王国之前联合在一起的人。由于我们对主要的政治事件一无所知，所以作进一步的推测毫无意义。

《年鉴》[11] 从英格兰人的视角记录了其他一些首领到达南方海岸；他们是后来那些国王们半传说半历史的祖先：艾尔（Aelle）于477年来到苏塞克斯，塞迪克（Cerdic）和西恩里克（Cynric）于495年来到韦塞克斯。随后的几代人缓慢而持续不断地深入到不列颠南部和东部的腹地，他们的迁徙如果能被追溯的话，也只有通过墓地的发掘来考查：从东盎格利亚西进，从南海岸北上，直达泰晤士河谷地。在泰晤士河上游谷地，不同的英格兰族群在6世纪70年代前后组成了一个名为格维斯（*Gewisse*）的联邦，它对不列颠人的进犯，直达威尔特郡和格洛斯特郡，这些事件后来被收录在《年鉴》里。同时，其他一些英格兰人——东盎格鲁人、东撒克逊人、麦西亚人的王国，以及伯尼西亚和德伊勒两个诺森布里亚王国也开始出现。到大约600年，我们重新拥有一些可靠的史实，发现入侵者们已经牢牢地掌控了不列颠岛的一半。

图2　西南威尔士卡斯特德威兰的纪念碑。铭文为："保护者伏提坡纪念碑"。它的纪念对象被吉尔达斯攻击为"德莫塔的暴君"。

不列颠人的延续

原住民的情况怎样？在6世纪，苏格兰仍然主要属于皮克特人，尽管爱尔兰人（即未来的“苏格兰人”）已经在西海岸的那些居住地组成了一个名叫达尔里亚达的王国。几个世纪之后，一个达尔里亚达国王领头创建了统一的苏格兰。在北方还有3个不列颠王国：以邓巴顿为中心的斯特拉斯克莱德王国，以索尔韦湾为中心的雷格德王国，以及地处利兹地区的埃尔梅特王国。诺森布里亚人对皮克特人的图谋因为在685年遭受的重大失败而破产。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受损失的主要是不列顿人。斯特拉斯克莱德得以幸存，而雷格德和埃尔梅特却在6世纪后期和7世纪被诺森布里亚吞并。

最大的不列颠保留地自然是威尔士。来自东部的难民无疑使其人口急剧增加。基督教以及与之相伴的罗马文化的显著特征也得以幸存。在6世纪，如果不是成百个，至少也有好几十个小修道院很可能在那一地区建立起来，而东南威尔士流传下来的土地证书表明了罗马住宅区的存在。格威尼德、代费德、波威斯和格温特等王国延续到大约550年，而一些更小的王国则持续到6世纪末。至少有两个被吉尔达斯斥为暴君的人在威尔士为王：格威尼德的马格洛库奴斯（Maglocunus，马格温Maelgwn），他乃“罪孽之首，其权力之大，用心之毒，甚于众人”，以及代费德的伏提坡（Vortipor，格威瑟菲尔Gwrthefyr）。伏提坡的纪念碑在代费德的一个教堂里，至今犹存——那表明，吉尔达斯的如下斥责并非无中生有：

> 你坐在王位上，头发已在变白，你的宝座充满欺诈，从顶到底都被各种谋杀和通奸所玷污。你这个好国王的不肖之子……伏提坡，德莫塔的暴君。你的末日已经来临；你为什么就不能满足于你那些狂暴的罪孽？你像畅饮葡萄酒一样贪婪地吸饮罪孽——或者说让自己被罪孽所吞没。你为什么还要在你那些罪孽之上，再添上一重，在你妻子被排斥并体面地死去之后，竟然强奸那毫无廉耻的女儿，把你那不堪重负的可怜灵魂拽入地狱？

康沃尔、德文和萨默塞特组成了不列颠王国杜姆诺尼亚。在吉尔达斯看来，其国王与其他国王一样坏：“君士坦丁（Constantine），杜姆诺尼亚那肮脏母狮的残暴幼兽”。在7、8世纪，不列颠人的区域被盎格鲁 - 撒克逊人侵占，虽然康沃尔坚持到了9世纪10年代。正是由于对该地区的征服相对较晚，才使一些不列颠文化得以保存。考古发掘表明，在一些旧城里及周围地区，特别是在埃克塞特、多切斯特（即多塞特）、伊尔切斯特等城市，直到5、6世纪仍然存在着某种人类生活的迹象。这些地区的许多主要教堂都起源于凯尔特人：1978至1980年间在韦尔斯进行的发掘展现了包括从罗马后期的大陵墓到盎格鲁 - 撒克逊大教堂的一系列宗教建筑。在那里，如同在威尔士一样，小教堂总能被追溯到凯尔特人的修道院（*llan*）或者一片环绕一个殉教者坟墓（*merthyr*）的墓园。

要估量公元600年之前就已经牢牢掌握在盎格鲁 - 撒克逊人手中的地区里有多少不列颠人幸存下来，是最困难的。在1086年【12】，英格兰的人口很可能还不到罗马时代后期人口的一半，而且那还是在经过10、11世纪的人口增长之后，这些事实使我们很难不作出不列颠人口在5、6世纪的确急剧减少的结论。许多人逃往西部，或者逃到布列塔尼【13】，而流行病也发挥了作用。从更普遍的角度来讲，罗马 - 不列顿人遭受了被摧毁的社会里人们共同的命运；也许人口的减少正是他们的社会的确 被摧毁了的最明显标志。这并不是说，没有不列颠人存留下来：有迹象表明，人口中包含不少不列颠人，尤其是在北部和西部。有时（比如在早期肯特王国的法律里）他们是作为农民，或者也许是半奴仆性的劳动者出现。值得注意的是，wealh（“Welshman”，威尔士人，即不列顿人）这个英语单词被用来指“奴隶”，以至现在难以确知，地名沃尔顿（Walton）究竟是指“不列顿人居住地”还是指“奴隶居住地”。不论他们的人口数量多么大，他们也只是处于附属地位：他们的文化很少地而他们的语言则完全没有传给盎格鲁 - 撒克逊人。

罗马不列颠的消失

早期盎格鲁 - 撒克逊人是非城镇人口：他们的重要地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等级上【14】而非经济方面的原因。但那种认为他们眼看着罗马式城镇解体，心中唯有迷信的恐惧的观点，却有些过于夸张了。英格兰人知道ceaster（城镇）是什么（这个词的使用非常统一），而且他们通常知道其罗马名称：Mamucion变成Mame-ceaster（Manchester，曼彻斯特），Venta变成Ventan-ceaster（Winchester，温切斯特），等等。城镇处于交通系统的交接点上，城墙十分坚固，是军事领袖们防守的绝佳之处。然而没有任何遗留下来的东西可以使我们有理由将其称之为“城市生活”，而要追溯人们在罗马 - 不列颠城镇里任何形式的持续居住情况都极为困难。（一个例外可能是坎特伯雷，但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其后罗马时代的发展与其说是像一个不列颠市镇，还不如说更像一个高卢城市。）它们中的一些最终将被用作建造大教堂和修道院的场地，但那更是一种重新利用，而非真正的对过去的延续。

为什么罗马不列颠比罗马高卢遭到了远远彻底的毁灭？一个原因是迁入者不同：对于罗马文化的了解，盎格鲁 - 撒克逊人从未达到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在侵占高卢之前的程度。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从5世纪初到6世纪中期，不列顿人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有不列颠低地才真正被罗马化，而在公元400年之后，那些后继邦国的首领们似乎主要是来自更偏远更原始的区域。最早的威尔士诗歌所反映出的社会与盎格鲁 - 撒克逊社会非常相似，它也以同样的忠诚关系为核心，也同样强调财产、赏赐和武士们在首领的厅堂里的亲密关系。即使撒克逊人或者盎格鲁人从未来到不列颠，不列颠的罗马文明也很可能会被证明太脆弱，难以维继。

注释

【1】 凹陷棚屋是早期日耳曼人，包括盎格鲁 - 撒克逊人比较典型的居室，棚内地面下陷，犹如较浅的地窖。

【2】 《盎格鲁 - 撒克逊年鉴》（*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由阿尔弗雷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871—899年在位）于9世纪后期组织学者开始编纂。《年鉴》的编写一直持续到12世纪中期，是盎格鲁 - 撒克逊时代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3】 古撒克逊区域以及下文提到的盎格鲁区域在当今德国境内。

【4】 德国北部州名。

【5】 德国地名。

【6】 后缀-ing来自ingas，意思是“人”或“人民”（people）。

【7】 Haesta以及下文的Raeda和Wocca都是那些定居地的首领的名字。

【8】 赔偿金额的多少是以被杀者地位的高低决定的。

【9】 诗文引自著名的古英语史诗《马尔顿之战》，第246–253行。

【10】 指复活节（Easter）。

【11】 指《盎格鲁 - 撒克逊年鉴》。

【12】 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66—1087年在位）在该年进行了被后世称为“末日审判书”的大普查。

【13】 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现属法国。

【14】 指在这些重要地点，各等级的人集居在一起，更体现出等级制度。

第二章

七世纪

在公元600年前后那段时期，物质文化在迅速发生变化。国王们开始建造巨大的原木宫殿，并在坟墓中使用大量珍贵的陪葬品；英格兰艺术受到欧洲、爱尔兰，甚至不列颠的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变化应该被看作是整个变革的一部分，这场变革的最后一个主要组成是英格兰的统治者们皈依基督教。

国王与王国

7世纪初的英格兰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它被分裂为一些大的王国：肯特、苏塞克斯（南撒克逊人）、韦塞克斯（西撒克逊人）、东盎格利亚、埃塞克斯（东撒克逊人）、麦西亚（包括中盎格鲁人）和诺森布里亚（由伯尼西亚和德伊勒组成，随即又加上林赛）。实际状况并非那样整齐有序。诸王国是在不断变换的状态中逐渐涌现的：比如，米德尔塞克斯很可能是一个大得多的中撒克逊领地解体之后的剩余部分，而后者在任何流传下来的文献能记载下它之前就已经解体了。在大的王国之间或者内部，还有数目不详的部族。有一些小部族，如伍斯特郡的赫威赛和威尔士边境上的马贡塞特，有自己的国王，这些国王逐渐臣服于更强大的君主，成为他们的“附属王”或者“地方首领”。很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部族：比如萨里在7世纪70年代作为一个附属王国在历史上唯一出现过一次。有时我们能看到一些地方势力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对大国的怨恨。比德说，643年林赛的一个修道院拒绝接受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Oswald）的遗体，[1] 因为尽管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圣洁的人，但“他来自另一地区却君临此地”。在公元600年，英格兰国王有可能多达好几十个。

即使是那些大国，也遭遇了力量平衡的更替。比德和其他信息提供者提到一系列超级国王，他们来自不同的王国，先后对全部或大多数盎格鲁 - 撒克逊民族实施过某种形式的统治。这类控制有可能非常广泛，但全都十分短暂。比德的名单上最早的4位，苏塞克斯的艾尔、格维斯的塞瓦林（Ceawlin）、肯特的艾特尔伯赫特

（Æthelberht）和东盎格利亚的雷德沃尔德（Raedwald），把我们带回到7世纪20年代。我们不能确定，在他们的王国之外他们还有多大权威；但我们知道，在616年雷德沃尔德率领一支军队穿越麦西亚，在诺森布里亚的边界将其军队打败。第五位和第六位，埃德温（Eadwine，616—632年在位）和奥斯瓦尔德（633—642年在位）都是诺森布里亚国王。他们是比德眼中的英雄，是他心目中光辉的基督教国王的典范。从他们那里，我们第一次清楚地了解了英格兰诸王国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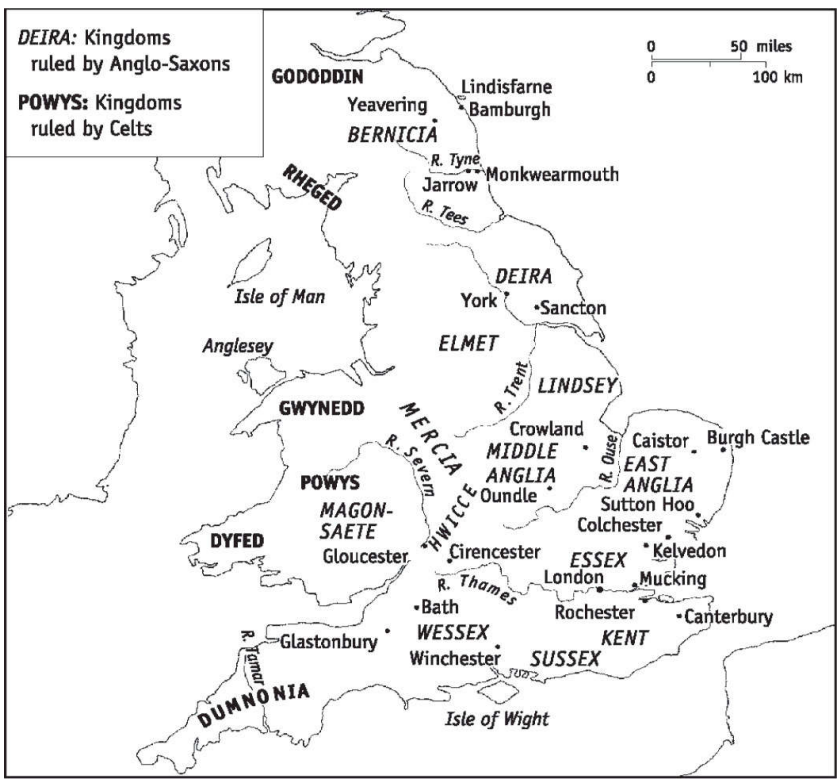

地图1　600年前后的英格兰

诺森布里亚向西部的扩张使得麦西亚同威尔士人结盟。632年，格威尼德的基督徒不列颠国王卡德沃朗（Cadwallon）和麦西亚的异教徒盎格鲁 - 撒克逊国王彭达（Penda）在对诺森布里亚的战争中取

得了一场短暂的胜利，然而在第二年，奥斯瓦尔德恢复了势力并杀掉了卡德沃朗。威尔士人继续支持彭达，642年奥斯瓦尔德在远离国土的征战中被杀。这件史实以及偶然提及的他与韦塞克斯国王之间的关系表明，奥斯瓦尔德的权力和军事行动都远远超越了诺森布里亚的边界。一组早期的威尔士诗歌从比德的对立面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的英雄成了诗中的侵略者。诗歌哀悼一个来自波威斯的贵族辛迪兰（Cynddylan），他似乎在为彭达服役中死去。在诗里，我们通过不列颠人的眼睛来看诺森布里亚人：

在一次战斗中，我的弟兄们
辛南、辛迪兰、辛乌莱斯死于非命，
他们在保卫特伦，饱受蹂躏的城镇
……
四周田野上布满血迹，
远多于刚翻耕的休耕地
……
辛迪兰的厅堂，顶棚黑暗，
因为撒克逊人已经杀掉了
波威斯的辛迪兰和艾尔凡……

655年，彭达战败，被诺森布里亚的奥苏由（Osuiu）杀死。奥苏由是比德的第七位超级国王，他此后拥有对其他王国的巨大影响力。尽管如此，真正上升的新星是麦西亚。麦西亚的贵族不久就赶走了奥苏由，并选择彭达的儿子伍尔夫希尔（Wulfhere）为王。到7世纪70年代初，伍尔夫希尔似乎已经控制了南方的英格兰诸王国，他的继任者于679年在特伦特获得的胜利最终终止了诺森布里亚的扩张。然而在南方，麦西亚的势力突然遭到正在崛起的韦塞克斯的阻止。韦塞克斯是通过汉普郡和威尔特郡的撒克逊人与泰晤士河上游的格维斯之间的联合而形成的。来自北方的麦西亚的压力似乎促进了这些部族以温切斯特和南安普敦水域为新的中心区域重新组合。从卡德沃拉（Caedwalla，685—688年在位）短暂的统治及其继任者伊尼（Ine）

的在位时期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撒克逊人的新势力，卡德沃拉吞并了肯特、萨里和苏塞克斯。他们在南方打下的坚实的势力基础在两个世纪后将决定英格兰的命运。

贵族生活

在7世纪的政治领域，人们有可能获得巨大的权力，但却难以长期保持。为什么国王们的沉浮如此迅速？原因之一是，权力与征服靠的是军事势力；而军事势力的积聚有赖于赏赐的吸引；赏赐依靠财富；而财富则要靠权力和征服来获得。社会上到处是仇杀，王位的继承充满变数，难以确定；因此有许多遭到亲族流放的王室成员和贵族四处寻求出手大方且志趣相投的君王。比德说，德伊勒国王奥斯温（Oswine）“高大英俊，善于言辞，彬彬有礼，而且对贵族和平民一样慷慨大方；于是……几乎每个王国的贵族都结队前来，做他的亲随。”这样的体系，很难稳固：当一个国王生病、变得贫困或者吝啬时，他的势力就会瓦解，而他的继承人如果能幸存的话，也会成为一个新君王的附属王或追随者。

图3　萨顿胡出土的油石器物细部。这个独特的物件也许被用作王节，有可能是仿

照罗马的权节制作的。

东盎格利亚海岸萨顿胡地区巨大的墓葬揭示出，一个国王的生活能有多么的豪华。墓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7世纪20年代，而且总的来说，墓主很有可能（尽管这一点长期以来存有争论）是比德的超级国王名单上的第四位，国王雷德沃尔德。在高大的封土堆之下，他被安葬在一只船棺里，陪葬品中有他的铠甲、武器和大量无与伦比的珍宝。里面的黄金和珠宝饰品在整个北欧流传下来的这类物品中最为精美，同样令人惊叹的是，棺木里的陪葬品竟然来自那么多不同的国度。萨顿胡的发现表明，诗歌中关于王室财富的描写并不夸张。尽管如此，它却不能被看作是传统的和代表过去时代的标志。这种豪华的棺葬在600年前后还是一种新现象，它标志着社会等级制度的加强和政治权力的发展；萨顿胡的许多陪葬品并非指向过去的野蛮时代，而是指向基督教欧洲的罗马文明，当时盎格鲁 - 撒克逊上层对它的兴趣正日益浓烈。

英格兰社会一开始就有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他们很可能拥有一定的领地。但在最初几个世纪里，国王的追随者们，或者说“随从们”，与他们自己的领地的关系远不如与国王的关系密切。他们必须跟随他，关注他的公众行为，居住在他的厅堂里，如果需要的话，为他作战甚至献出生命。贵族生活具有十分突出的集体性质：大厅作为欢乐之地，作为那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中的避难所，是盎格鲁 - 撒克逊作品中强有力的意象。对它的描绘，没有人比比德更为精彩。当一个诺森布里亚的贵族在劝说国王埃德温接受基督教时，比德让他说出了下面这段十分著名的话：

陛下，在我看来，与我们无法了解的时代相比，人在现世的生活是这样的。你同助手和随从们坐在一起，享受欢宴；火坑里大火熊熊燃烧，厅堂里暖意洋洋；而在外面，天寒地冻，雪雨交加，寒风怒号；一只麻雀快速飞过厅堂。它从一道门飞进，随即又从另一道门飞出。它在厅堂中那一刹那，冬季的风暴与严寒不能加害于它，但在那最短暂的平静之后，它掠过你的视线，从严冬的风暴中来，又回到其中。同样，人生一世也不过短暂一瞬，在

那之后，甚至在那之前的一切，我们一无所知。

在王室或者贵族厅堂里的欢聚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职业游吟诗人演唱的英雄传说。流传下来的残缺稿本里包括一部主要史诗：《贝奥武甫》。就我们现有的稿本看，这是一部相对较晚也较复杂的作品，也许是为神职人员组成的受众所撰写。但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7世纪贵族们的英雄时代，在本质上那是一个异教世界；那个贵族阶层已为基督教所改造，但并没有消失。史诗中的英雄贝奥武甫（Beowulf）来到丹麦国王赫罗斯（Hrothgar）的宫殿，为他消灭魔怪。赫罗斯出手大方，慷慨地赏赐财富和珍贵武器，所以吸引了不少高贵武士，使他十分强大。但诗中的政治领域动荡不安，充满暴力：一个失去支持的国王很快就会灭亡，他的王国也会随他而去。其主题是关于忠诚与仇杀："每一个人都最好是为他的朋友复仇，而非长期为他悲伤……让能赢得声誉之人在死前扬名。"贝奥武甫与魔怪和火龙开战，那些是前基督教时代人们头脑中的产物。当他被杀死后，他的随从们把他同大量珍宝一同埋葬，高大的陵墓眺望着大海，正如东盎格鲁人在萨顿胡的海边为他们的国王所做的那样：

接着，武士们骑马绕陵而行
……
他们赞美他的气概和武艺。
他们传播他的英名，所有的人
都应颂扬君主朋友，不遗余力。
……
人们说，世上所有君王，
他最温文尔雅，最和蔼可亲，
对人民最仁慈，也最渴望名声。

地方政府与社会

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并非只有战争、野蛮的忠诚和炫耀的富丽堂皇。在一定程度上，那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秩序井然的社会。使英格兰在中世纪中期超乎寻常强大的那些体制可以追溯到7世纪，甚至更早：新出现的超级君王们之所以能够那么迅速地建立其势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效率。各王国似乎被划分为有效管理的行政区，面积很大，占地50至100平方英里；很明显，这些区域在7世纪中期就已经存在，其中许多可能是从血缘部族的领地发展而来。在肯特，这类行政区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近期的研究发现，它们在诺森布里亚、麦西亚、韦塞克斯、苏塞克斯和萨里也存在。在行政区的中心集居地，有一些房屋提供给流动的王国政府，区内的居民可以在那里寻求公正，同时根据一个复杂的核定体制在那里交纳税费和其他公共负担。土地以“海得”[2]计算，1海得在概念上相当于维持一个自由农民及其家庭所需要的土地面积，因此往往就是一个农场的实际面积。民众的义务按海得核定，以数十个为一组计算对国王的义务。国王在中心集居地的代理人可能依此从某些海得组收缴谷物，从另外一些组收缴小牛和马驹，从其他组收缴蜂蜜、蜜酒或者次要物品。这套制度把农村划分得十分完善，不论它是如何产生的——关于这一点，现在仍有争论——很奇怪的是，在政治动荡的世界里，它却一直是非常稳定的底层结构。

因此，早期行政区域是为了司法目的和经济剥削而组织起来的。一个以经济特点划分区域的制度适用于欠发达的农村，那里地理环境差异极大，而且还有大面积没有经过清理的公共牧区。因此，当中撒克逊国王们将土地分片赏赐时，这些早期“封建采邑”往往保留了行政区的内在结构，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些采邑本身就是由行政区组成的。于是出现了那种“多重领地”，即由那些与一个采邑中心相连的许多独立村邑或者城镇组成的联合体，它在12、13世纪英格兰的许多地区仍然十分突出。这类领地的结构与中世纪威尔士的领地结构非常相似，而且在基本层面上，它很可能是罗马－不列颠农村组织形式的某种延续。当然，过于从族群的角度来对它进行定义有可能会将我们引入歧途。不论是在不列颠还是英格兰，对于包含广义上的经济区的那

些欠开发地域，这种“广泛的管辖”是适合的。发展与社会变革，而非英格兰化，最终使这种“多重领地”消失了。

这种模式也很适合那种分散的、缺乏组织并且相对较少的农民人口。在早期资料中，最突出的人物形象是自由农民，或者说底层平民（*ceorl*，现代英语中的churl，但没有其中的贬义），他通常耕种1海得的土地。但这并不等于说，7、8世纪所有的农民都那样“自由”，除了国王之外，没有其他主人。在皈依基督教后，国王们把大片土地赏赐给教会，如同他们早先对世俗随从们所做的那样（至少就短期而言是如此），这些所有者肯定想从以这种方式得到的土地上获利来满足其家庭和其他方面的需要。但在这种“庄园化”的早期阶段，那些较下等的领主们和教堂，如同国王们那样，似乎只是向小土地所有者索取岁收，很可能并没有明显改变他们的生活和耕作方式。没有证据表明那时存在有组织的“村社”，或者那种在10世纪已存在的在等级制中完全为依附性质的佃农。考古发掘表明，中撒克逊英格兰的绝大多数农户要么是单房独屋，要么是居住在非常小的集居地；即使那些核心集居地也还没有任何规划有序的街道、绿地和地界的迹象，而这些在后来的村庄地貌上为人们所熟悉。现在看来，中世纪的公地制度很有可能是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化发展而来，公地中还夹杂着一块块分散的私有地。对于7世纪的英格兰，综合性的“村社”还在未来很遥远的地方。

注释

【1】 从中世纪直到近代，基督徒，特别是重要人物，都是埋葬在教堂内。

【2】 海得不是根据面积，而是根据作物产量计算，因此在土质和气候不同的地区，面积自然相差很大。学者们认为，1海得大约相当于现在的60至120英亩，也有说相当于15至30英亩。

第三章

基督教与修道院文化

在6世纪90年代之后的3、4代人中，所有的英格兰国王和他们的王国政府都皈依了基督教。比德对这一进程的叙述简单而精彩：意大利人和法兰克人在南方传教，爱尔兰人在北方传教，当关于礼拜仪式方面的争论在664年得以解决时，双方终于成功达成统一。实际情况比起比德的说法，则要复杂得多，也更受制于政治和文化因素。在不列颠这个复杂的大熔炉里，基督教的影响很可能是从不同的来源同时涌入英格兰——甚至还来自受到鄙视的不列颠人，而比德则把他们完全排除在外。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领先，十字架紧随其后：肯特已经受到来自法兰克高卢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诺森布里亚受到的同类影响则来自苏格兰的达尔里亚达。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英格兰人随着近期在王国结构和社会等级方面的发展，已经适合被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制宗教所归化，因此也符合加入文明的基督教民族俱乐部的条件。

皈依基督教

一位名叫奥古斯丁（Augustine）的罗马修士率领传教团于597年到达肯特，那是受著名教皇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at）的扩张主义教廷派遣。根据传说，格列高利曾在罗马看见一些英格兰青少年，说他们“不是盎格鲁人而是安琪儿”。这不是一次驶向完全陌生的世界的航行；国王艾特尔伯赫特那位来自法兰克的王后已经是基督徒，很快他也接受了洗礼，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建立了一座修道院。格列高利出于对残存的罗马 - 不列颠生活方式的错误估计，曾计划把大主教驻地设在伦敦和约克，但当奥古斯丁于601年就任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时，他只得承认当时的政治现实。起初，传教似乎进展迅速。604年，罗切斯特设立了主教区；东撒克逊人也皈依了基督教，在伦敦一座以圣保罗命名的大教堂为他们而建造。同时，在肯特也建立了几座修道院，其教堂都是严格按照罗马教堂的原样修建。

然而，教会有得也有失。东撒克逊人不久就背叛了基督教，并赶

走了主教。东盎格鲁人的国王雷德沃尔德接受了洗礼，但他似乎是把基督纳入了他所信奉的诸神之中：比德记述说，他同时供奉着一个基督教圣坛和一个异教祭坛。在诺森布里亚，情况也大体相似。埃德温国王接待了罗马传教士保利努斯[1]，并与他的大臣们一道于627年接受了洗礼。但仅5年之后，埃德温国王战败身亡，他的后继者们背叛了基督教，保利努斯只得出逃。教会只是在英格兰各宫廷内迅速取得了立足点，如果它想不受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就必须建立更广泛的基础。

在对北方英格兰人进行传教方面，爱尔兰传教士，特别是那些来自苏格兰达尔里亚达的爱尔兰传教士，取得了决定性成就，而且在与英格兰广大的草根阶层建立宗教联系上，他们很可能最为成功。自5世纪以来，爱尔兰基督教一直十分兴盛，在创立地方性修道院系统方面尤其如此。到公元600年，爱尔兰各修道院在财产和成熟程度方面都已远远超过威尔士的修道院，而且还在意大利、高卢和苏格兰建立了分支。对于基督教在不列颠未来的发展，科伦巴（Columba）的传教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他前往苏格兰，使北方的皮克特人皈依了基督教（南方的皮克特人已经是基督徒），并于大约563年在艾奥纳岛建立了一座修道院。当基督徒国王奥斯瓦尔德于633年控制了诺森布里亚之后，很自然地，他向艾奥纳寻求传教士，因为他的流放期曾经是在苏格兰西部的爱尔兰人中度过的。正因为这样，爱尔兰的修士-主教艾丹（Aidan）在林迪斯凡岛上建立了主教驻地。

比德关于那些单纯、圣洁的爱尔兰传教士的描写，以及他们对没有受过教育的英格兰人传授宗教观念上的成功，一直以来决定着历史学家们的思想。但还有一个更宽广的语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们的成就。与那些意大利和高卢的传教士不同，他们来自一个与英格兰社会大体相似的没有城镇、经济低下的部落型武士社会。比起那些具有地中海城市背景的神职人员，他们更易于融入当地的贵族文化自然也就不足为奇。同样，在那些以亲族为基础的英格兰人看来，比起一位主教在城镇大教堂里官僚式地管理其主教区的罗马模式，修道院作为宗教组织和集居地的核心单位更符合情理：毕竟修道院院长，如同所有

日耳曼首领一样，是其家庭的父亲。在所有的英格兰王国里，不论它是以何种方式皈依基督教，修道院文化都会在下一个世纪获得令人吃惊的繁荣，而行之有效的主教制却难有进展。

在艾丹及其继任者们的指导下，一个修道院网络在诺森布里亚各地建立起来，而超级国王奥斯瓦尔德和奥苏由则把这种基督教生活传统传播到其他王国。在7世纪30年代，奥斯瓦尔德的影响使韦塞克斯国王西内吉尔斯（Cynegils）接受了意大利传教士比林努斯（Birinus）的洗礼，后者也随即成为西撒克逊人的第一位主教。由于奥苏由的原因，东撒克逊人再一次皈依了基督教，并接受了一位来自诺森布里亚，名叫基德（Cedd）的主教，他曾受训于爱尔兰教会。麦西亚国王彭达仍然是异教徒，但他允许一个来自林迪斯凡的传教团在他的王国传教，他儿子皮阿达（Peada）在653年接受了洗礼。到660年，只有苏塞克斯和怀特岛的居民还是异教徒，但他们不久也皈依了基督教。

教会组织

随着爱尔兰和罗马各自的影响圈不断扩展，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很可能不可避免，但其中的主要症结在今天看来却是一个令人感到荒唐的小问题：在哪一天庆祝复活节？爱尔兰人和不列颠人使用与罗马不同的计算方法，从而造成使人为难的结果：在诺森布里亚王宫里，有的时候，受教育于爱尔兰的国王奥苏由正在庆祝复活节，而他那受教育于肯特的王后却仍然在过大斋节[2]。在664年于惠特比[3]召开的宗教会议上，诺森布里亚国王奥苏由作出了有利于罗马一方的决定；自那以后，坚持庆祝爱尔兰复活节的人被日益边缘化。如果说惠特比会议并非像比德试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真的是一个分水岭，礼拜仪式的统一则肯定是作为各王国之间统一力量的英格兰教会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即使这样，在7世纪60年代，教会仍然深受许多问题的困扰。教

会组织混乱；主教太少，而且有些还是非正式任命的。其他主教[4]则死于664年的一场瘟疫，那使得东撒克逊人又一次叛教。但在669年，教皇派去一位新的大主教，名叫西奥多（Theodore），他是一位来自小亚细亚的杰出学者。在他任职的30年中，这位曾令人意想不到的候选人使教区体制合理化；在那之前，教区体制在所有地区都反复无常，而且在那些因接受由修道院体制组织起来的爱尔兰人的传教而皈依的王国里，也许几乎就不存在。非正式任命的主教们受到清理，令人怀疑的权力机构要么得到认可，要么被废除：比如，所有威尔士主教们下达的敕令都被宣布无效。672年，在赫特福德召开的宗教会议制订了第一部教会管理的基本典律。在短暂但却很辉煌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坎特伯雷的一所大教堂学校在教授着地中海地区的学问。

西奥多同那些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同在约克新设立的主教辖区内那位势力强大的主教威尔弗里德（Wilfrid），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威尔弗里德是坚定的正统主义者，他曾在惠特比会议上支持罗马一方的复活节，但他憎恨任何危及他在诺森布里亚教会中的权力的威胁。他与西奥多及前后几位国王之间长期激烈的冲突导致他两次被驱逐、两次向罗马申诉，以及流放和监禁。同时，他还设法前去为弗里西亚人[5]传教，使苏塞克斯皈依了基督教，并建立起一个布满好几个王国的修道院网络。威尔弗里德拥有大批随从和巨额财富，似乎是圣徒和世俗贵族超乎寻常的混合体。只有一个年轻且具有贵族性质的教会才可能产生出这样一个人物。

修道院

7世纪60年代是英格兰修道院的黄金时代。一方面，由爱尔兰人建立的如林迪斯凡和惠特比那样的修道院日益受到罗马方式的影响，尽管旧的价值观念仍然在继续：在圣库思伯特[6]身上，爱尔兰传教士那种孤独而苦修的虔诚与罗马教会对待修道院生活方式和纪律的态度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这时期新建的许多修道院将在后来的几个

世纪里被看作是不列颠最伟大的修道院。其中最显赫的有本尼狄克·比肖普（Benedict Biscop）所创建的蒙克威尔莫斯和贾罗，比肖普是诺森布里亚贵族，后来成为修士。他曾5次前往罗马，他的两座修道院给诺森布里亚带来了地中海教会的文化。它们最杰出的成员，即比德自己，曾描写了比肖普是如何要求高卢的石工“按他一直喜爱的罗马风格”建造一座教堂，在里面布置大量精美绘画和装饰，并用来自大陆的资料建立起一座伟大的图书馆。

虽然这些成就十分引人注目，但还需要为教会在农村的传教活动提供永久性的基础。在这方面，初期的工作仍然是由修道院或者类似修道院的机构承担。在今天看来，显然传教活动和精神关怀乃牧师而非修士分内之事。然而在7、8世纪的宗教社区里，由修士、修女以及牧师组成的形形色色的团体通常自然而然地成为构成各种宗教组织的基本单位。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后的整个时期，“修道院”（拉丁文为*monasterium*，英文为mynster[7]）包括各种机构，从真正的本笃会修道院到规模小、组织松散的神甫团体。修道院的规章差别极大（贾罗的规章是由比肖普自己制订的），标准也大为不同；除了那些最著名的修道院外，我们对修道院里的生活状况几乎一无所知。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到750年，英格兰有成百上千座小型“修道院”担负着信仰和精神方面的职责，为可以说是最初的英国牧区制度服务。

那些“老修道院”——人们后来如此称呼它们——比起后来的牧区教堂，服务的区域要大得多。绝大多数的相关资料都出现得很晚，它们表明，这些修道院已经几乎湮没无闻，只剩下一点残余的权威。因此，除了它们仍然存在之外，对于它们从事的教区工作，我们知之甚少。神甫们——如果是严格意义上的修士的话，则是其代理人——在界线清楚的“牧区”里对各地教众巡回布道。修道院管辖牧区里的教众需要向它交纳称之为“教堂款”的谷物，而且最终还得向它交纳什一税以及丧葬费。如果没有王室的帮助，如此复杂的体系不可能这样迅速地发展起来：比如，保林努斯和艾丹就是在各地国王的行宫向人们布道。交纳给教会的款项很可能是以已有的税收计算体系为基础，有一

些国王也可能是作为一种政策修建了几座修道院，比如诺森布里亚国王奥苏由在655年似乎就是这样做的。国王们掌控着地方政府的组织系统，因此教会也是如此。虽然修道院“牧区”最终被从它们内部涌现的数以千计的小教堂所湮没，但它们极为深刻地影响了未来英格兰农村教会的整个发展。

图4　爱尔兰高威县基尔帖南一座早期修道院或称“卡社尔”。典型爱尔兰修道院的

外部边界呈环状，其内部区域用来建造主要建筑。圆形的修道院场地在威尔士和康沃尔也存在，在那些地区，从地名中包含的llan（意为“修道院”）成分可以看出那里曾是修道院。

文化水平与立法

如果说国王们帮助了教会的发展，那么教会也提高了国王们的地位。那些异教徒军事首领的子孙们逐渐把自己看作是上帝指定的代理人。同时，随着基督教的到来，人们也开始识文断字：国王们能对部落式习俗进行修改和系统化，使之与文明世界的立法相似。比德说，肯特国王艾特尔伯赫特“按照罗马人的习俗”制订其法律。艾特尔伯赫特的法典，以及后来肯特和韦塞克斯的7世纪法典，表现出当地传统和大陆泊来品的混合。不论它们在实际运作中是否真正有效（这一点大有疑问），很明显，制订法典的国王们总想显得十分高明：有如古典模式的法律制订者。随着各王国对来自罗马与高卢的影响越来越开放，王权的性质也产生了变化。对于统治者们而言，维护法律和管理王国内部事务，而不仅仅是打赢战争，开始变得重要。即使是那些7世纪的法典，里面包含大量的罚款和处罚，也表现出令人赞叹的王室权威。

修道院城镇

随着最早的英格兰教堂的出现，我们也开始隐约看见最初的英格兰城镇的影子。如果说究竟有多少6世纪的君王们把罗马时代留下的城镇和要塞作为长期的统治中心还非常值得怀疑的话，那么7、8世纪的国王和主教们无疑十分喜欢把它们作为建造大教堂和修道院的场地。坎特伯雷、约克、温切斯特和伍斯特等大教堂全都是建造在罗马时代的要塞内；635年，韦塞克斯的首任主教被赐予地处泰晤士河上之多切斯特的罗马要塞来建造他的主教驻地，比德将该要塞称为一个镇子（*civitas*）。建造在被抛弃了的废墟之上的教堂和修道院建筑群

本身并非城镇。但尽管如此，那个时代最有组织的社区是大教堂和修道院，手工业者、工匠、仆人和乞丐全都集聚在它们门前。越来越多的考古研究向我们证明，不论是在罗马城镇内还是在为数更多的那些并没有前英格兰背景的地方，城市生活复苏的最初迹象都是与重要的教堂联系在一起的。9世纪后期在翻译比德的作品时，人们并非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把他使用的urbana loca这个词组译为“城镇”，而是译为“修道院所在地”。数十个英格兰城镇都是从修道院和集聚在它们门前的居民点发展而来的。

注释

【1】 保利努斯（St Paulinus，584？—644）是第一任约克大主教。

【2】 大斋节（Lent）是指复活节前为期40天的斋戒，以纪念耶稣在荒野禁食。

【3】 中世纪英格兰著名的修道院，在诺森布里亚，那里诞生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英语诗人凯德蒙。

【4】 原文（others）如此。

【5】 弗里斯兰（Friesland）在现在荷兰北部，弗里西亚人（Frisian）为古日耳曼人。

【6】 圣库思伯特（St Cuthbert，635—687）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基督教隐修士。盎格鲁 - 撒克逊时代流传下两部关于他的古英语诗体圣徒传。

【7】 Mynster是古英语，现代英语是minster或monastery。

第四章

麦西亚霸权

比起7世纪初，8世纪初期的英格兰已经是一个更为发达的地区。统一的英格兰王国仍然十分遥远，但英格兰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们在种族和文化上是一个统一体。比德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人们很容易忘记他最伟大的著作《英格兰人教会史》的书名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正是因为他看到他的种族的共同命运在统一的英格兰教会中得以实现，他才会想到使用“英格兰人”这一术语。但是否也有迹象表明，世俗政府也在变得更为全面？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而且一点也不因为现存资料更多而变得丝毫容易。一方面，反映8世纪王权强大一面的那些机构和观念也许并非新近才出现，而仅仅是首次被记录下来。另一方面，那些反映其弱点的王朝动乱也可能早已有之。很可能比德和与他同时代的人都忽略了这些问题。至少可以这样说：8世纪的麦西亚国王们拥有与早先的超级国王们同样的军事势力；但他们生活在文化和法制水平更高、权力更加稳固的社会，这使得他们的力量更稳定且更易于发展。

艾特尔鲍尔德和奥发

麦西亚国王艾特尔鲍尔德（Æthelbald，716—757年在位）继承了伍尔夫希尔所赢得的大部分影响力。这时出现了不少记载国王赏赐的土地证书[1]，所以我们能看到国王们喜欢如何称呼自己。艾特尔鲍尔德的那些称号，如果是自封的，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一份证书上对他的称呼：“不仅是所有麦西亚人之王而且还是被统称为南英格兰的所有地区之王”，回应着比德关于早期的超级国王们“控制着亨伯河以南所有地区”的说法。这一断言得到一些土地证书的支持，它们表明他影响着肯特的内部事务并控制着伦敦。但韦塞克斯保持着独立；比德的保护人塞奥武甫（Ceolwulf）国王统治下的诺森布里亚也是如此：麦西亚的霸权从未到达亨伯河以北。

图5　铸有奥发国王头像的银币。除了提供更好的货币价值，奥发的银币还具有比罗马人撤离之后在英格兰流通过的任何货币都高的艺术价值。

艾特尔鲍尔德的继任者奥发（Offa，757—796年在位）是阿尔弗雷德之前最强大的英格兰国王。当他的地位稳固之后（那用了好几年的时间），除了在诺森布里亚和韦塞克斯外，他在所有其他王国里的所作所为似乎更像一个直接统治者，而非一个遥控的超级君主。早先的国王们镇压了许多小王朝，但奥发则镇压了一些强大的王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在肯特有效地行使着权力；并且当一场发动于798年的反对奥发继任者的政变失败之后，古老的肯特王朝被永远地消灭了。苏塞克斯最后一位国王是奥发手下的一个首领；萨里一直是西撒克逊人的领地，然而在那里，我们却发现是奥发批准了一位麦西亚贵族的土地证书。在东盎格利亚（虽然当地王朝后来又重新出现），《年鉴》在794年的记载简洁而直截了当："这一年，麦西亚国王奥发下令将［国王］艾特尔伯赫特的头砍下。"在韦塞克斯，当地国王的势力和承传则更为强大：该王国仅在786至802年间承认受麦西亚保护，而且即使在那期间，麦西亚的领主地位比起在肯特来，似乎也相当模糊不清。

奥发的地位在伟大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给他的

一封著名的信中得到肯定。查理曼视其为地位平等的人，将其称为“他最亲密的兄弟”，并讲到“你的王国和艾特尔雷德（Æthelred）的王国中各主教牧区”，似乎英格兰只有麦西亚的奥发和诺森布里亚的艾特尔雷德这两位国王。与法兰克的关系十分重要（虽然有很多结论很可能是人们从这一份文献里得出的，但在高卢与英格兰南部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奥发肯定乐于被看作是另外一个查理曼，而且不论王权的实际情况怎样，其威望因为对外关系的发展而同步上升。787年，奥发通过一个庄严的宗教仪式使其子艾格弗里斯（Egfrith）登基与他同为麦西亚国王，9年后诺森布里亚也将如法炮制。王权的这种半神圣的性质正在被日益强化。

这并没有使各王朝更为稳固。王位继承变化无常：奥发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王们仍然是从王室成员中“选出”。任何可能有资格的候选人只要具有势力就能觊觎王位，在8世纪，麦西亚、韦塞克斯和诺森布里亚都因为王位争夺而四分五裂。为了确保王位的继承，奥发对他的亲属似乎像他对待邻国一样残酷无情。奥发死后不久，他的儿子艾格弗里斯也随即去世；诺森布里亚学者阿尔昆[2]把那看作是报应：“父亲欠下的血债现在报应到儿子身上，我们都很清楚，为了使儿子能继承王位，他父亲欠下了多少血债。”

如果这大多表现出奥发的残酷，我们必须记住，流传至今的关于其统治的资料大都来自外部，而且不无敌意。他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很可能比现存的那些残缺不全的记载大得多，而且在8世纪70年代，我们开始看到在政府、地方组织以及王权的行使等方面的根本性改革。这些改革部分是受法兰克王国榜样的启示，部分是受已经十分富有且地位稳固的英格兰教会的影响。有一定理由认为奥发是一个教会改革者：他在786年召开了整个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唯一一次有教皇使节参加的宗教大会，而且即使说他把利奇菲尔德主教牧区提升为大主教牧区的努力——那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是受政治目的的驱使，那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合理而且十分需要的机构。艾特尔鲍尔德和奥发经常参与并且有时还亲自主持宗教会议，他们的随从和大臣们也见证了会议如何作出决议，这些都被记载于文献中。教会处理事务

的方式不可能不会提高人们关于司法惯例以及法制程序的意识。虽然这是在宗教领域，但这类会议肯定有助于把围绕在7世纪国王周围的武夫群体改造成为更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政府和管理机构，并最终可以被称为官僚政府。

防御工事

关于土地所有者们有义务帮助建造桥梁和防御工事的记载最先出现在749年的一份文献中，而且在后来的土地赏赐中通常有明文规定。这在那个组织建设了至少两项大规模公众工程的时代有重大意义：其中一项早已久负盛名，而另外一项则直到最近才被人们所理解。当然，第一项就是奥发堤坝，人们如此称呼它，很可能是基于有事实依据的古老传说。近期的考古发掘表明，这项从海岸到海岸的巨大土石工程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连续不断的防御工事。我们知道，奥发曾袭击过威尔士，但这道堤坝看起来更像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设施，用来阻止威尔士人的进攻和越境抢劫耕牛。而仅仅它存在这个事实就证明了奥发掌控着巨大的资源。

土地证书上提及的“防御工事”是指设防的要塞而非堤坝。后来，韦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继任者们将会发展出大规模的区域性要塞网络来保卫韦塞克斯不受维京人的入侵。不过，最近的考古发掘开始表明，有一些麦西亚中心区域，比如赫里福德和温什科姆，被一些8世纪的堤岸和壕沟所围绕，甚至还有一些规划有序的街道。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塔姆沃斯，自8世纪90年代开始，王国政府就定期驻扎在那里；在前维京时代的英格兰，它已经发展成为最接近“首都”的地方：考古发掘发现，它不仅有一个环绕的防御带，而且还有一个规模巨大的9世纪磨房。很明显，盎格鲁 - 撒克逊统治者们（同他们先前那些不列颠同行们一样）第一次充分运用各种资源来建造和维持军事设防的城堡；并且由于组织起了有效的供应系统，一直在各粮食收购点之间不断流动的王国政府终能变得更为固定。

贸易与商业中心

我们已经看到了使城市兴起的两个因素：教堂与要塞。第三个因素显然是贸易，包括国内和国际贸易。贸易似乎在7世纪7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最明显的迹象是被称作锡塔（*sceattas*）的那种制作粗糙的小银币急剧增加，以至到8世纪20年代，竟然有多达数百万枚锡塔在英格兰东部和南部地区流通：那是自罗马时代之后不列颠的第一种大规模流通货币。在该世纪后半叶，在法兰克王国影响下，更为正规的硬币被铸造出来，首先是在东盎格利亚，但最著名的是那种以奥发的头像为图案的精美银币。尽管所有交易都以货币形式进行还不太可能，但货币的大规模流通除了有利于统治者们对商业利润抽税之外，必定还极大地促进了贸易。

查理曼和奥发之间发生在789年的一场争端表明，英格兰商人使用法兰克港口已是习以为常。英格兰和法兰克已成为正在成长中的国际商贸活动的一部分。实际上，近一个世纪来，商贸中心一直在北欧各地发展。那是一个威奇（*-wics*）时代，在700年前后，在西北欧海岸和英格兰南部及东部海岸出现了一系列国际商贸中心，十分引人注目。每一个主要的英格兰王国似乎都有自己的威奇：韦塞克斯有南安普敦（*Hamwic*），东盎格利亚有伊普斯威奇，诺森布里亚有约克（*Eoforwic*），桑威奇也许是属于肯特。现在看来，它们中最大的很可能是伦敦（*Lundenwic*），[3] 比德将其称为“经海上和陆地到来的各国人之商贸中心”；它并不在城墙环绕的城市之内，而是在斯特兰德大街和科文特加登[4]一带。在所有这些区域进行的考古发掘都揭示出密集的居民点和手工业生产。如果说它们主要是外国商人的货物转口港，那么证据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它们的商业腹地已经深入到内地。虽然现有资料不能让我们准确地估量经济增长，但很明显，英格兰的国内和国外经济在艾特尔鲍尔德和奥发的时代正经历深刻变革。

教会

对于英格兰教会，8世纪和9世纪初是前途未卜的时代。世俗的基础和支持也有其自身的问题，贵族们十分希望获得“特授公地”（以书面证书拥有的土地，因此纯粹是宗教性质的土地拥有形式）在土地租金和税收方面的好处，于是在他们的领地上建造修道院。比德愤怒地抱怨说，其中一些简直就是逃税的“挡箭牌”。也许完全从字面上理解比德的意思是不对的，但随着修道院文化在世俗社会中迅速发展，其水准已经从7世纪后期的最高点下降，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并非只有比德一人在为之痛心疾首：一系列宗教会议，特别是在747年召开的著名的克洛菲休宗教大会[5]抱怨说，修道院内酗酒和世俗演唱成风，修道士们过着贵族般的生活。教会与王权之间的关系有时并不融洽，特别是与像艾特尔鲍尔德那样的国王相处更是如此，他似乎把修道院改革同掠夺教堂和引诱修女结合在一起。国王与坎特伯雷大主教之间的关系由于肯特地区强烈的反麦西亚情绪而变得更加复杂。亚恩伯特大主教（Archbishop Jaenberht）由于奥发将利奇菲尔德提升为大主教区而极为愤怒，该方案在国王逝世后被放弃，理由为它是出自对肯特人的敌意。

在积极的方面，英格兰教会培养出了一位杰出的学者——阿尔昆。他受教于约克大教堂学校，是查理曼王宫里的一个领袖人物并在查理曼时代的古典文化与教育大复兴中发挥着核心作用。8世纪后期欧洲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英格兰人，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在查理曼给奥发的信件这样的语境里：同之前的比德一样，阿尔昆也是一个诺森布里亚人。麦西亚文化已经几乎完全湮没在历史中：它没有一个像比德那样的人将其成就记录下来，而它那些最主要的修道院遭到了维京人的毁灭。一些装饰艺术的残片，比如山颠布里登的教堂里的雕塑，表现出豪华的环境。艾特尔鲍尔德和奥发时代一座杰出的纪念碑式建筑是在北安普敦郡的布瑞克斯沃斯大教堂。而这座建筑在早期的文献记载中从未出现过，这意味着我们所知甚少。

有关8世纪教会的一件最了不起的事实是，英格兰人现在到他们早先在大陆上的故乡去传播基督教。说也奇怪，他们的传教活动竟然是源于圣威尔弗里德与大主教西奥多之间的争吵。威尔弗里德于678

年启程前往罗马去申述其观点，途经异教地区弗里斯兰并在那里传教一年。英格兰人已经从他们的商人那里得知弗里西亚人，而威尔弗里德为更加雄心勃勃的传教活动打开了大门。一批诺森布里亚传教士于690年在弗里斯兰登陆。他们中的领头人物是威利布罗德（Willibrord），他于695年被授予弗里斯兰大主教的圣职。他在乌得勒支建造了自己的大教堂，随后有组织的教会在法兰克弗里斯兰迅速发展。威利布罗德的传教得到圣卜尼法斯[6]率领的西撒克逊人传教团增援。从718年到达之时起，到754年被异教徒杀害，这期间，卜尼法斯一直在弗里西亚人、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中传教，在美因茨建立了主教区。除了使异教区域皈依基督教外，卜尼法斯还对整个法兰克教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将其制度化，并置于教皇的指引之下。在其传教生涯中，他依靠来自英格兰的书籍、人员和建议，遗留下一大批与国内朋友们的来往信件。把过去的法兰克教会改造为加洛林文艺复兴[7]时期不断扩张的教会，其大量工作是由英格兰人完成的。

注释

【1】 “土地证书”（charters）是盎格鲁 - 撒克逊时代流传下来的特别多的文献，它们反映出当时的封建依附关系和土地制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2】 阿尔昆（Alcuin，732？—804）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和诗人，曾任查理曼大帝的宫廷教师。

【3】 这里的中文译文都是现代地名，括号中为盎格鲁 - 撒克逊时代的古英语地名。

【4】 科文特加登（Covent Garden）现为伦敦一广场名，曾为伦敦著名的农贸市场。

【5】 克洛菲休（Clofesho）为古地名，今在何处，已不可考。克洛菲休宗教大会的重要决议之一是强调向上帝祷告。

【6】 圣卜尼法斯（St Boniface，675？—754）是历史上著名的英国本笃会修士，受教皇派遣，前往日耳曼地区传教，被任命为美因茨大主教，后被弗里西亚异教徒杀害。

【7】 加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是指加洛林王朝在查理曼大帝时期出现的文化繁荣。那是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经历的第一次文化大繁荣。

第五章

维京人的入侵与韦塞克斯王室的兴起

麦西亚的霸权在奥发死后不久就衰落了。他的继承人，国王科恩武甫（Coenwulf），控制着肯特和苏塞克斯，甚至还从北威尔士获得了一些新的领土，但韦塞克斯于802年脱离了他的控制。一个超级君主的王朝即将出现，这一次是西撒克逊人。825年，韦塞克斯国王艾克伯特（Ecgberht）在斯温登附近获得决定性胜利，把麦西亚的一个附属国王赶出了肯特，并且兼并了肯特、埃塞克斯、萨里和苏塞克斯。4年后，麦西亚自身也被艾克伯特征服，甚至连诺森布里亚也向他俯首称臣。这一惊天大逆转，以及韦塞克斯突然崛起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需要作一些解释。有两个主要因素也许可以提到：由于新近征服的康沃尔矿产资源丰富，西撒克逊君主的财富不断增加；艾克伯特家族具有以协议而非流血的形式决定财产和王位继承的能力，消除了早期王权中一个致命的弱点。

维京人的进攻

他们依靠其自身的内部力量能否最终获得超级霸权，永远也无从确知。《盎格鲁 - 撒克逊年鉴》关于789年的记载包含一项不祥的条目：一场终将摧毁韦塞克斯王室所有对手的风暴的第一丝气息，而且随着他们的毁灭，英格兰文明一些最辉煌的成就也将消失：

> 这一年贝奥赫特里克（Beorhtric）［韦塞克斯国王］娶奥发国王的女儿伊德布尔（Eadburh）为妻。他在位期间，从荷达兰驶来了第一批挪威人海船，共3艘，当地长官随即骑马前去，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人，于是极力迫使他们到国王驻地觐见，却被他们杀死。这些就是最早来到英格兰的丹麦人船只。

这次维京人的登陆只是一个小事件，虽然有其他一些资料提及那些“海上异教徒”随后对南部海岸的攻击。更为严重，同时也是难以比拟地更为惨痛的抢劫发生在北方，因为那包括对林迪斯凡（793）、

贾罗（794）和艾奥纳（795）的连续劫掠。不列颠已经有两个世纪没有遭受到外来攻击，对这3个最神圣的地方的突然亵渎，英格兰人的反应不难想象。然而这些还只是孤立的事件，要到一代人之后，维京人的骚扰才会成为主要威胁。但发生在835年的对肯特的大规模袭击开始了长达30年的几乎是连年的进攻，而且这一时期是以一支侵略大军的到来而结束。

9世纪60年代的入侵

挪威人和丹麦人的急剧扩张是一种全欧洲的现象，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袭击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两个民族参与其中（维京一词，即“海盗”，是由他们的受害者们创造的，并且同时指称两个民族），动机有几个。他们远非完全的野蛮人，而且在9世纪40年代之前，他们已经有好几代人大规模从事商贸活动。的确，正是他们的商贸活动打开了与西方和南方各国之间经常交往的通道。由于人口增加，很难在本地再找到适当的生活方式。许多冒险者们肯定听到了不少关于那些富饶地区的修道院的传说，里面满是随手就能抢到的财富；而早先的袭击如果不立即招至接二连三的抢劫，那才真是怪事。

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9世纪50年代以后有那么多的袭击者攻击欧洲各国，以及为什么随意的抢劫让位于征服和移民的政策。他们似乎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条绕道苏格兰北方到达爱尔兰西部，继续南下；另一条到英格兰的东、南海岸和高卢。因此，对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康沃尔进行袭击和移民的主要是挪威人，而那些侵入英格兰和高卢的则主要是丹麦人。

865年，丹麦“大军”由哈夫丹（Halfdan）和“无骨人”伊瓦尔（Ivarr the Boneless）率领，在东盎格利亚登陆。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月后，“大军”转而北上，进入正因为王位争夺而分裂的诺森布里亚，并于867年攻占约克。争夺王位的双方均战死，于是丹麦人把自己指定的人立为国王，将诺森布里亚变为了附属国。丹麦军队接着挥师进

入麦西亚，但在遇到抵抗之时，却没有与之交战，而是撤回约克，并在869年再一次侵入东盎格利亚。东盎格利亚人战败，国王埃德蒙（Edmund，他不久将被尊奉为殉难者圣埃德蒙）战死。3年之内，曾经强大的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两个王国都已不复存在。

870年，丹麦军队在雷丁驻扎并准备进攻韦塞克斯。但这里组织起了更加有效的抵抗。艾克伯特死后，西撒克逊人由他的儿子艾特尔伍尔夫（Æthelwulf）统治。这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国王，他制定了良好的计划，使4个儿子能够按照年龄顺序和平地继承王位。当维京人入侵之时正是他的第三个儿子艾特尔雷德在位；其弟弟兼继承人的名字，阿尔弗雷德，将成为盎格鲁 - 撒克逊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

正是艾特尔雷德和阿尔弗雷德共同率领的联军在伯克希尔丘陵地带与丹麦军队交战，使其第一次遭到惨败。但英格兰军队的胜利只是暂时的。丹麦人撤回雷丁，但几乎马上又开始了进攻，并在贝辛斯托克附近击败了艾特尔雷德和阿尔弗雷德。871年4月，一支新的丹麦军队登陆。对韦塞克斯的入侵似乎迫在眉睫，而守军却无从求援。在这场危机中，艾特尔雷德去世，其弟弟成为西撒克逊人的国王。

阿尔弗雷德

所有人都知道，阿尔弗雷德大王（871—899年在位）在似乎是毫无希望的危机中拯救了英格兰。当时的人却不大会持有这样的观点。至少从政治的角度看，“英格兰”当时还没有多大意义。现知最早使用盎格勒沁（*Angelcynn*，字面意思是，英格兰人［的土地］）一词的正是阿尔弗雷德本人，而英格拉兰（*Englaland*）这个词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出现。其他王国愿意接受西撒克逊的控制，或者宁愿选择它而非丹麦人，并不是预料中的必然结果。它们很可能会选择自己的国王，而且英格兰内部的对手、流放者或心怀不满的帮派向丹麦人求助的危险也时刻存在着。其他王朝的覆没并不能使阿尔弗雷德理所当然地成为所有英格兰人的国王，他和他的继任者们是通过综合运用

军事胜利、外交手段和好运才达到这一目的的。

阿尔弗雷德的统治在非常严峻的形势中开始，并在一年中遭受了一些小失利，此后他只得花钱媾和。丹麦人在5年的时间里没有再骚扰韦塞克斯，在此期间他们入侵麦西亚，驱逐了国王伯格雷德（Burgred），并用他们自己指定的人取而代之：第三个古老的王国永远地消失了。这时丹麦大军一分为二，其中一支由哈夫丹率领北上，为了在那里永久居住而开始分割约克郡。另一支由格思鲁姆（Guthrum）、奥西特尔（Oscytel）和阿嫩德（Anund）率领南下，在875至876年间再一次对韦塞克斯发动进攻。起初，他们进展不大；877年他们再一次撤退去瓜分麦西亚，并分出一支军队前去征服林肯郡、诺丁汉郡、德比郡和莱斯特郡。

因此，于878年第三次进攻韦塞克斯的是一支大为削弱的军队。但对奇彭纳姆的突袭使他们占了上风，威尔特郡和汉普郡的大部被占领，而阿尔弗雷德被驱逐到萨默塞特郡的沼泽地，在阿瑟尔尼的一个藏身处躲避。他的处境似乎毫无希望，但阿尔弗雷德在要塞里耐心等待有利时机和结集军队。与之年代接近的《年鉴》记录者说，五月初，

> 他骑马来到“艾格伯特之石”……，在那里萨默塞特郡和威尔特郡的所有男人以及汉普郡的部分男人前来迎接他……他们因为见到他而兴高采烈。一天之后，他从那些营地前往伊利沃克，第二天到达艾丁顿，在那里他与整个丹麦军队作战，将他们打得落荒而逃。

胜利来得十分突然，但却具有决定性意义。丹麦首领格思鲁姆和他手下几位将领接受了洗礼，两位国王签订了和约，承认丹麦人占领大片英格兰领土的既成事实。双方疆界大致从伦敦向西北延伸到中部地带的西北部；格思鲁姆须将其全部军队撤到这条线之外，在那里他被承认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到880年秋，丹麦人已经撤离了韦塞克斯和麦西亚西部，并且已经在东盎格利亚有条不紊地开始了永久性定居。

这并非冲突的结束。886年，阿尔弗雷德攻占了伦敦，那很明显是发生在他击败一支守军之后。893年，一支丹麦大军在泰晤士河河口登陆，并在随后3年里横扫英格兰，但这一次没有对韦塞克斯产生什么影响。在这之前，阿尔弗雷德一直在忙于确保自己王国的安全，同时也在加强他在丹麦防线以西和以南其他地区的权威。对于前一项任务，他似乎增强了他的陆军和海军。长期以来，国王们有权根据以海得计算的土地面积进行征兵。阿尔弗雷德重新组织了军队，根据他的改革，在任何时期都只有一半的军队在服役；他的重组预示着未来的“优选兵”（*select fyrd*）或者说民兵的出现。重组很可能已经产生出一支规模较小但更为有效的军队。很明显，打击跨海而来的袭击者的一个最好方式就是拥有更多的舰船，据说阿尔弗雷德建造的战船比维京人的大得多，每只船上有60支甚至更多的桨。

在他的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项——毫无疑问正是这一项使韦塞克斯的内地免遭进一步的袭击——是建立在麦西亚先前的成就之上，比如塔姆沃斯和赫里福德[1]。到9世纪80年代后期，韦塞克斯受到由公共要塞组成的防御体系的保护，其中几个要塞有很规则的街道网，因此只能被看作是规划有序的设防城镇。一份名为《要塞及其土地》[2]的文献中列出了30个这样的设防城镇（*burhs*），另外还有3个可能是后来增添的。也许最著名的例子是温切斯特，在它那罗马时代的城墙里，人们不顾原来的罗马街道，规划出新的街道网。同样的直线型街道网在牛津、奇切斯特、韦勒姆和其他一些地方也可以看到。市镇规划非常有序，建筑师们在规划街道时使用的似乎是一种标准的66英尺测量仪。比较大的设防城镇并不仅仅是要塞，它们很快就在当地农业经济中发挥起重要作用。要塞驻防和维修的负担按以海得计算的土地量分摊到周围的土地所有者身上，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防御体系内的区域。他们经常在设防城镇内建造“镇内房屋”来储藏他们用来销售的农产品：《末日审判书》[3]记载了城镇住宅与农村封建采邑之间的几种关联。商人和手工业者随即出现，于是9世纪后期的军事要塞在10世纪后期和11世纪成为繁荣的市镇。军事防御碰巧与成长中的经济需求相一致，这样阿尔弗雷德无意间在几个现代城镇的

道路系统中为自己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图6　阿尔弗雷德之宝石。该宝石在阿尔弗雷德的藏身处阿瑟尔尼附近发现，上面刻有“我乃阿尔弗雷德命人所造”，而且几乎可以确定它属于这位国王。它用黄金、水晶和珐琅制成，体现了西撒克逊王室的财富。

与其前任们和后继者们一样，阿尔弗雷德享有明主的佳誉，这对他极为有利。这样，那些自由的（即西部）麦西亚人可以从接受他的统治中看到自身利益，而由阿尔弗雷德的女儿艾特尔弗拉德（Æthelflaed）与麦西亚领袖艾特尔雷德之间的婚姻造就的坚固同盟将那个古老王国的剩余部分永久地纳入了西撒克逊的势力范围。“麦西亚人之主与后”同阿尔弗雷德及其子通力合作，特别是在他们对丹麦人的联合进攻中，更是如此。如果说阿尔弗雷德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更为真实地是“英格兰人之王”的话，那并非仅仅是借助于军事势力或者是因为他的对手们都已经消失：人们真诚地拥戴他是因为知道他和他的家族是公正而体恤臣民的统治者。

损害与修复

但丹麦人问题和他们造成的损害仍然存在。损害中的一部分是无法弥补的：现在无论发生什么，比德和奥发的世界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丹麦大军的规模可以争论，但不可否认的证据是，3个王国已被

消灭，许多主教教区被打乱，无数的修道院遭到抢劫，英格兰东部大片地区的土地证书和其他文献资料几乎全部丧失殆尽。修道院遭受的破坏也许最为惨重，因为那些大修道院曾经是学术与文化的宝库，而小修道院在农村地区则仍然主要负责宗教关怀。

在丹麦法区域（英格兰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后来的称呼），丹麦士兵们很快就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在约克郡、林肯郡、莱斯特郡等地到处都是以-by、-thorp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语成分结尾的地名，在东盎格利亚虽然较少一些，但情况也类似。虽然这反映的与其说是剧烈的动乱，如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还不如说是逐渐的社会变化（随着更多地以地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发展，英格兰人的居住地带也经历了重新命名的过程），但这无疑表明，讲丹麦语的族群已经是多么全面彻底地定居在这一地区。即使在丹麦法区域皈依基督教和被置于英格兰的统治下之后，它仍然保持其特有的社会组织、土地测量和法律传统。调和一个统一王国的要求与那些和英格兰人的风俗习惯大相径庭的传统令10世纪的国王们颇感棘手。

英格兰急需读写能力和学术上的复兴，为此，阿尔弗雷德在他最后的10年里全力以赴。与查理曼一样，他通过朝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来完成他的教育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尔弗雷德自己对这一事业的贡献是他最杰出的成就。他是亨利八世（Henry VIII）之前唯一著书立说的英格兰国王。由于对手稿的毁灭和学术的衰败深感痛惜，他学习拉丁语，把书籍译成英文，以利于他的臣民们学习。在其所属圈子翻译的大量书籍中（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比德的《教会史》），有几种现在几乎可以被认定是出自阿尔弗雷德的手笔。人们相信，我们现在看到的《盎格鲁 - 撒克逊年鉴》最初也可能是在阿尔弗雷德的朝中编纂的。尽管他将民族语言的读写贬低为第二位，但阿尔弗雷德时代文艺复兴最杰出的方面恰恰是以普通人的语言为基础：它预示着即将来临的商业、政府、法律和英语书面文学的发展方向。阿尔弗雷德是幸运的，未来的事件使他如此众多的各类计划得以成功。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是英格兰早期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英格兰王室

年长的爱德华（Edward the Elder，899—924年在位）、阿特尔斯坦（Athelstan，924—939年在位）和埃德蒙（939—946年在位）三朝主要致力于收复丹麦法区域。那半个世纪是全国统一王权的形成期。部分因为阿尔弗雷德对王位继承的精心安排，部分因为一些幸运的机遇，王朝仇杀得到避免。902年，爱德华那位寻求丹麦人支持试图争夺王位的堂兄战死，避免了一场危险的分裂。由于阿特尔斯坦既是韦塞克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也曾在他那位嫁到麦西亚的姑妈家中接受教育，他于924年顺利即位。到10世纪中叶，麦西亚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复辟旧王朝，至于其他王国，则更没有希望。韦塞克斯王室已经是英格兰王室。

爱德华在位时期的战争主要是与其妹妹，麦西亚的艾特尔弗拉德合作，由国王自己亲自指挥。当丹麦人在910年对麦西亚的袭击被击败之后，英格兰人开始进攻。在随后的8年中，爱德华深入到丹麦法地区，而他妹妹则把丹麦人拖在麦西亚前线，使之无暇他顾。艾特尔弗拉德现在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威胁，因为来自爱尔兰的挪威维京人已经开始攻击西海岸。她的主要成就是新建了一系列麦西亚要塞：在东部前线对付丹麦人，在西部前线防御威尔士人，在西北面则阻止挪威人从迪伊河和默西河对塔姆沃斯的袭击。917年，艾特尔弗拉德攻占德比，使爱德华能在敌军无暇他顾之时乘机入侵东盎格利亚。不久，所有南部丹麦法区域都落入爱德华之手，虽然一些孤立的丹麦军队仍然坚守着斯坦福、莱斯特、诺丁汉和林肯。艾特尔弗拉德攻占了莱斯特，但她不久死去，使得爱德华在尽力控制麦西亚之时不得不停止进攻。他随即迅速回师，夺取了斯坦福、诺丁汉和林肯；到920年底，英格兰的边界在亨伯河固定了下来。

同时，爱德华也在与那些非英格兰人的邻国建立联系。918年，他接受了格温尼德和代菲德两个威尔士王国国王的“归顺”。《年鉴》说，在923年，“苏格兰人之王和整个苏格兰民族接受他为父亲和君主；雷格诺德（Raegnald）和艾德武甫（Eadwulf）的儿子们以及诺

森布里亚的所有居民，不论是英格兰人还是丹麦人，挪威人或者其他人，也是如此；同时还有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威尔士国王及其所有臣民”。这些还只是一系列此类“归顺”的开始，其高潮是973年那非凡的场面：8个“不列颠国王”对爱德华的孙子埃德加（Eadgar）宣誓效忠，并陪同他在迪伊河上乘船游览。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只是他们个人对这些国王的归顺：只涉及到接受其领主地位和受其保护，而非永久放弃独立。实际上，苏格兰和威尔士这时都正在朝内部统一的方向发展。大约在850年，苏格兰国王肯尼思·麦卡·尔平（Kenneth Mac Alpin）吞并了皮克特王国；在随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苏格兰在苏格兰人（相对于皮克特人而言）统治下发展。在威尔士，从9世纪末开始，政治形势由于格温尼德的突然扩张而改变，小王国中只剩下代菲德。盎格鲁 - 撒克逊人从未征服苏格兰和威尔士，而且在1066年[4]之前，它们中都有一个当地的王国已经发展成为主要强国。尽管如此，威尔士还是深受英格兰和维京人的影响。

在10世纪，那些争夺不列颠领土的群体中有一个新来者——来自爱尔兰的挪威人。他们并不喜欢丹麦人，而且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夺取丹麦法区域北部的控制权。918年，由雷格诺德率领的一支军队进攻苏格兰，在诺森布里亚建立基地，第二年攻占了约克，雷格诺德在那里登基称王。挪威人的王国一共存在了35年，尽管有时被中断。在那期间，商贸获得发展，约克和都柏林这两个挪威人城市扩展迅速。约克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街道，两边是最初由丹麦人建造、后来由雷格诺德的手下进一步发展的原木房屋和商铺。在阿特尔斯坦和埃德蒙两个王朝，比起丹麦人，挪威人是更主要的敌人。

920年，埃德蒙接受了雷格诺德的效忠，因此也承认了他的地位。但当一个新的挪威人国王在926年试图夺取其继承权时，阿特尔斯坦发动进攻并攻占了约克，摧毁了它的防御体系，接受了苏格兰和斯特拉斯克莱德国王们的归顺。正是从927年起，阿特尔斯坦才能真正被看作是“英格兰人之王”。6年后，阿特尔斯坦与苏格兰人的关系破裂。由于害怕遭到入侵，英格兰人的各种对手结成联盟。但在937

年，英格兰军队在阿特尔斯坦的指挥下打败了挪威人、苏格兰人和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威尔士人的联军。[5] 作为英格兰人和丹麦人的国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不列颠人的超级领主，阿特尔斯坦的势力现在达到了顶峰。他得到外国势力的尊重，并且与法兰西和日耳曼王室家族结成婚姻联盟。他的诏书表明，威尔士君王们经常出现在他朝中；阿特尔斯坦时期的代菲德国王海威尔·德达（Hywel Dda）还模仿英格兰银币铸造货币，并且根据英格兰法典颁布律法。

地图2　10世纪的英格兰

然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王的个人因素。阿特尔斯坦于939年死去，此后不久，一支由奥拉夫·格思弗里思逊（Olaf Guthfrithson）率领的挪威军队回师英格兰。新国王埃德蒙被迫承认奥拉夫为约克及其附属地区的国王。奥拉夫死于941年，在随后的4年里，埃德蒙夺回了丹麦法区域的北部并劫掠了斯特拉斯克莱德。在一首同时代的诗里，埃德蒙被描绘成把丹麦人从挪威人的压迫下解救出来的解放者：阿尔弗雷德的敌人的曾孙们宁愿与英格兰国王而非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同伴联系在一起。但在947年，即埃德蒙死后刚一年，约克再一次落入一个挪威国王血斧王埃里克（Eric Bloodaxe）之手。随后的6年中出现了埃里克、英格兰新国王艾德雷德（Eadred）以及一个挪威对手奥拉夫·西特里克松（Olaf Sihtricson）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954年，艾德雷德入侵诺森布里亚，这一次是最终解决，最后一位约克国王被赶走并随即被杀死。

全国统一王权与地方政府

经过近50年的复杂战争，韦塞克斯王室已经获得了胜利。稳固的埃德加王朝（959—975）证明，已经建立起来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埃德加并不是一个征服者，有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他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维持先前的国王们已经在英格兰建立的和平。"但这绝非微不足道的成就：这个王国还年轻，正是通过埃德加，后期撒克逊王权的主要发展才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从阿特尔斯坦开始，国王们更加频繁地颁布法律，并使之细化。这些法律包括广泛的内容——维护和平、打击盗贼、教会等级、商人的行为与市场活动，这些还仅仅是一小部分。其中强调的一个重点是统一：埃德加的法典虽然考虑到地方习俗，特别是丹麦法区域的风俗习惯，但它坚持认为，"世俗法律将像最完美地制定的法典那样对待每一个人"。国王们以加洛林王朝的范本为基础（在这一点上以及在

其他许多方面都是如此），培养起一种公共和平的观念，国王的作用是将其付诸实现，而所有臣民的义务是维护和平。王国政府法令的证人名单中记载了定期举行的较为大型和正式的王室会议（*witenagemot*，字面意思是“智者会议”）。虽然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它都不是代表会议或“议会”，但这却是讨论严肃的公共事宜，比如选举国王和颁布法律的场合。英格兰的王权，不论是其广度还是深度，都超过了10世纪欧洲任何其他大小相当的国家。

国王的意志通过一个大为改善了的地方政府体系得以执行。在10世纪，英格兰的地方差异被不断弱化并被纳入一个统一的“郡”[6]制框架中。其中一些郡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许多是以更为古老的疆界为基础。但主要是在埃德加及其继任者的统治时期里，英国郡县制得以固定下来，直到1974年，长达一千年。这些郡由一批主要的有财有势的人，即郡长们来管理。在9世纪的韦塞克斯，每一个郡有一个郡长，但似乎是从阿特尔斯坦统治时期开始，郡长的数量逐渐减少，而其地位则随之提升。到埃德加时代，郡长变得不那么像一个地方官员，而更像他的继任者，即11世纪的郡主。不过，埃德加仍然与他管理下的那些郡政府保持着定期联系。

出于法律和管理方面的考虑，郡被划分为更小的行政单位，在大多数县里它们被称为“百户邑”，而在丹麦法区域则被称为“小邑”。每一个百户邑有自己的行政机构管理地方事物，并且负有提供士兵和水手的义务，其人数以百计算。但这还不是阶梯的底层：为了法律的实施，当地人口被划分为组，每组包括10户相互关联的家庭，或者说“耕作单位”。王室政府的权威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传达到每一个农民。在10世纪，很难说有多少东西是新的。百户邑的基本原则出现在早先的法典里，而且后来的撒克逊百户邑往往或者通常是以过去的地界为基础。但是，这一制度被阿尔弗雷德的继任者们进一步合理化和加以改进，并在埃德加时代以明显高度发展了的形式出现。

王室力量的另一个标志是铸币。甚至在阿尔弗雷德之前，韦塞克斯和麦西亚的国王们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已经就银币作为标准流通货币达成了一致意见。阿特尔斯坦在924至939年间颁布的诏书下

令："统一的硬币制度将在全国流通"。他和他的继任者们在维持硬币的大小和分量上非常一致，所有的硬币都是由受到严格控制的铸币人在各要塞城镇以及其他一些中心地区铸造。大约在937年，埃德加设计了一种新的硬币，它被定期翻新，直到诺曼征服之后很长一段时期还仍然是英格兰货币的基础。硬币优秀的质量表明，铸币受到一定程度的监控，那在当时的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

修道院改革

埃德加的一项个人成就是鼓励修道院改革。在10世纪初期的英格兰，本笃会修道院制度似乎已经濒于死亡，几座规模巨大的修道院和无数小的修道院已经被丹麦人摧毁，而那些得以幸存的，其生活方式则趋于世俗化。许多修道院的神甫们同他们的妻儿居住在单独的房屋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不像修士，而更像是大教堂的教士。对英格兰修道院体制的成功重建需要可供模仿的榜样，当然也需要钱。欧洲伟大的改革运动提供了前者，英格兰的改革在本质上是它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则由埃德加和他的贵族们提供。三位贵族出身的教会人士，圣邓斯坦（St Dunstan）、圣艾塞尔沃尔德（St Æthelwold）和圣渥斯瓦尔德（St Oswold），是把大陆上的观念介绍到英格兰修道院的主要人物。

自阿尔弗雷德起，西撒克逊国王们对严格的隐修制度就已经表现出兴趣——虽然还仅仅是作为几种可以接受的宗教生活方式之一——而且正是通过王室的赞助，有两个修道院在10世纪40年代进行了改革：邓斯坦改革了格拉斯顿伯里，而艾塞尔沃尔德改革了阿宾顿。埃德加的异乎寻常之处在于，他能全心全意地接受改革者们那种排他的、"彻底的修道院"立场，其中那个极端而好斗的艾塞尔沃尔德尤其如此。从10世纪60年代起，随着邓斯坦、艾塞尔沃尔德和渥斯瓦尔德被任命到坎特伯雷、温切斯特和伍斯特主教区，一个由王室推动的改革运动的坚实平台出现了：到这个世纪末，在格拉斯顿伯里、阿宾顿

以及渥斯瓦尔德在韦斯特伯里 - 昂 - 特里姆的修道院的影响下，有近50所修道院得以重建。

经过改革的修道院里修士们的生活方式遵循圣本笃（St Benedict）订下的教规，在仪式上精心发挥，而日常生活则与大陆上的方式一致，其影响主要来自低地地区的根特和卢瓦尔河上的弗勒里，邓斯坦和渥斯瓦尔德曾分别在那些地方学习过。大约诞生于970年的《修道院规章》[7] 集中了各种传统，成为了所有英格兰修道院遵守的规则。由于英格兰有全欧洲最强有力的君主，国王在推动运动和支持改革后的修道院方面发挥的作用比在大陆上的改革中更为显著。不过，大贵族们也对改革运动大量投入，建立修道院再一次成为在社会上深受尊敬的行为。

图7　温切斯特新教堂创建证书上的埃德加国王像，日期为966年。这是手稿插图中的温切斯特派最精美的代表作之一，它表现了王权与修道院大改革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新的修道院十分富有，深受尊重，而且拥有大量珍宝和辉煌的建筑。文学资料暗示出，在埃德加时代的英国艺术是多么丰富多彩。有一些包含精美插图的书籍得以保留至今，但黄金、珐琅和象牙饰品只

流传下一些残片，而那些主要建筑却几乎全都已经荡然无存。命运没有青睐盎格鲁 - 撒克逊时代后期的建筑，所有那些最宏伟的教堂都在诺曼征服之后被重建。温切斯特的修道院教堂在10世纪被扩建，长度达250英尺，边上有附属小礼拜堂和精巧的西方塔楼，墙上还有雕刻和彩绘的装饰带。但必须强调的是，这场精神和物质上的复兴仅仅触及到那些古老社区中的一小部分（很可能不到十分之一），其他地区依然照旧。于是，在诺曼征服时期，本笃派修道院与数目不详的——很可能有数百个——世俗小教堂共同存在，那些小教堂是前维京时代教堂的遗留。

如果说新的修道院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欧洲大陆，那么它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则大体上显然是英国式的。到1000年时，大多数英国主教都是修士，而且在国王的政务会议上，主教们和修道院院长们同世俗政要一道认真商讨问题。非凡的教会人士属于最后几位盎格鲁 - 撒克逊国王们最杰出的顾问之列。同样，对一个注重其王位之神圣性质的国王，教会改革也为他增添光环。埃德加在973年举行的加冕礼是被推迟到他30岁之时，那是神职人员被授予圣职的最低规定年龄。其加冕典礼的高潮不是戴上王冠，而是施涂圣油，使他具有近似神甫的地位，从而不受凡人的评判。正如劝诫文作者，恩舍姆的埃尔弗里克（Ælfric）所说："没有人能使自己成为国王，只有人民才有选择他们最满意的人为王的自由意志。然而一旦他加冕为王，他就拥有统治人民的权力，而他们却不能把他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除去。"温切斯特新教堂创建证书的扉页画表明了埃德加希望人们如何看待他：头戴王冠，站在两个圣徒之间，向上天之主敬献祭礼，国王们正是凭借他的权威进行统治。

注释

【1】 塔姆沃斯（Tamworth）和赫里福德（Hereford）原是麦西亚建造的要塞，后发展为城市，现分别在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和赫里福德郡。

【2】 《要塞及其土地》（*Burghal Hidage*），据学者们考证，被认为是10世纪初的文献，上面列出了33个设防城镇，或者说要塞，以及它们拥有的土

地，从最多的2400到最少的100个海得不等。这些要塞大多数由阿尔弗雷德建造。

【3】 《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是征服者威廉在1086年进行的英格兰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全国人口、土地、财产大普查的资料汇编，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4】 1066年，诺曼人在征服者威廉率领下渡海征服了英格兰，结束了英国历史上的盎格鲁 - 撒克逊时代。

【5】 这场决定英格兰命运的战役发生在布鲁南堡（Brunanburg），古英语史诗《布鲁南堡之战》描写和歌颂了这一重大胜利。

【6】 古代的“郡”（shire），即现在的县（county）。

【7】 《修道院规章》（*Regularis Concordia*，即*Monastic Agreement*）是由艾塞尔沃尔德在来自根特和弗勒里的修士们的协助下制订的，它集中了欧洲大陆各地修道院的惯例。

第六章

艾特尔雷德与克努特：英格兰君主制的衰落

随后的两朝将向我们表明，英格兰的西撒克逊王权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当埃德加在975年去世之时，朝中派系以他的两个青年王子为中心分为两大派。爱德华（“殉难者”）即位，但不久被谋杀，为其弟弟艾特尔雷德所取代。这样的开端，正好符合一个不幸王朝的状况。“准备不足的”艾特尔雷德（Æthelred “the Unready”，978—1016年在位）一直受到人们的苛评（虽然他那著名的绰号已经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它本来包含一个双关语：Æthelræd Unræd，即“高明的建议，没有建议”，“Noble-Counsel No-Counsel”）。他很可能的确缺乏对于一个国王来说仍然十分重要的素质：把信任放到正确的地方而同时又从其他方面获得信任的那种能力。另一方面，在学识渊博的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的指导下，法律与司法在艾特尔雷德统治时期继续发展。如果不是出现了新的问题——维京人的重返——英格兰王国有可能像在埃德加时代一样团结完整。

艾特尔雷德

新来的袭击者们比他们那些9世纪的祖先们更为危险。到10世纪70年代，在控制了丹麦和挪威之后，丹麦国王蓝牙哈罗德（Harold Bluetooth）正在创建一支由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组成的令人生畏的军队。988年，哈罗德被他的儿子斯维因（Swein）废黜。斯维因保持着父亲的军队，并兴建了一些大型要塞供其驻扎。其中一个这样的要塞已经在丹麦的特雷勒堡被发掘出来。它包括一个巨大的圆型土制工程，包围着成群的规模不小的船型厅堂，全都安排得像数学般精准。特雷勒堡和丹麦传说都暗示出一种让英国军队感到难以匹敌的良好配合与纪律。

在艾特尔雷德登基后的一两年内，入侵就开始了。起初，进攻的规模还比较小；但在991年，一支强大的丹麦军队在马尔顿打败了拜尔特诺思郡长（Alderman Byrhtnoth）及其率领的埃塞克斯民兵，[1] 在索取了一大笔赔偿金后才离去。同样的模式在994年、997年和

1002年的大规模袭击之后反复出现。正是因为这些赔偿金，艾特尔雷德王朝现在才如此臭名昭著。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现了大量艾特尔雷德时斯的硬币，还有一些瑞典人的墓碑记述了雇佣军人的事迹，他们曾前往英格兰，因为获得勒索的钱财而致富。在10世纪90年代，如同在1066年一样，英格兰的财富也正是其灾难的根源。

艾特尔雷德如何应对？一个措施是阻止邻国庇护维京人；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年轻的诺曼底公国是这类邻国中最主要的国家。诺曼人同他们自己的维京人祖先仅几代之隔，他们有时为那些袭击英格兰后返回的维京人敞开港口。但在991年，国王艾特尔雷德同理查德公爵（Duke Richard）签订了一项条约，相互约定反对协助对方的敌人。10年之后，艾特尔雷德娶了公爵的女儿为王后。这就开始了英格兰和诺曼底之间的重要联盟。

到此时，国王的国内政策似乎仍与以前各任国王的政策没有太大差别。他继承了一个强大而地位稳固的贵族阶层，他早期发布的证书表明，同埃德威格（Eadwig）和埃德加曾经做过的一样，他以赏赐土地的方式获取支持。但从1002年开始，维京人的威胁日益严重，暴露出王权中的一个根本弱点。国王的土地，而且很可能还有他的普遍活动，都还仍然主要集中在韦塞克斯。他用来在北部和东部收买支持的资源非常有限，而那些地区恰恰是他最需要收买支持的区域。那里还存在分裂主义倾向，而且还有许多人仍然记得他们的丹麦血统。艾特尔雷德后来颁布的证书表明，他的资助转向中部地带和英格兰东部，那些并非来自韦塞克斯的新人变得地位显赫。国王在竭尽全力保持英格兰的统一和进行防御。他的无能可能使这一使命变得更为困难，但没有人会认为它轻松。

1002年，艾特尔雷德及其政务委员会下令屠杀所有居住在英格兰的丹麦人，这反映出了政府感受到的巨大压力。这项非同寻常的命令不可能完全得到执行——在有些地方，人口的大多数是丹麦人——但它暗示出一种接近全国性的歇斯底里的状况。我们知道，当牛津地区的丹麦人躲避到圣弗里德斯威德修道院的教堂中时，市民们纵火将其焚毁。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场屠杀导致了国王斯维因在第二年率领

丹麦人入侵。斯维因劫掠了诺里奇，但他在东盎格利亚的战役中损失惨重，于1005年退回丹麦。第二年，他率军重返英格兰，横扫伯克郡、威尔特郡和汉普郡，英格兰只能再一次付出巨额赔偿金使其退军。在随后的间歇时期，英格兰政府建立了一支新的舰队，但在1008年初，由于一位英格兰舰长的叛国行为，其中80艘舰只被焚毁。这场灾难之后，紧接着，又一支丹麦军队登陆，由高大的托克尔（Thorkill the Tall）和赫姆明（Hemming）率领。1009年，他们纵火烧毁牛津，并随即进军东盎格利亚，次年他们从那里入侵肯特。1012年，托克尔对他的军队残忍杀害大主教艾尔夫赫亚克（Archbishop Ælfheah）深感憎恶，因而投向英格兰一方，这一场军事行动也因此出人意料地结束。他率领45艘舰只为艾特尔雷德效力，其余的军队则撤离英格兰。

现在，英格兰防御力量的虚弱对所有人来说都已是显而易见，而当斯维因于1013年重返之时，其目的是征服英格兰。由于对艾特尔雷德政府感到失望，丹麦法区域的人们欢迎一个丹麦国王，所以他们几乎立即就接受了斯维因。到当年年底，他已经攻占了牛津、温切斯特和伦敦，而艾特尔雷德已经出逃，流亡到了诺曼底。1014年2月，斯维因去世，他的儿子哈罗德继承了他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帝国，而在英格兰的丹麦军队却拥戴哈罗德的弟弟克努特（Cnut）为他们的国王。这时，艾特尔雷德已经返回英格兰，当年春天，他已在布置针对丹麦人的进军。克努特对此毫无准备，只得撤回丹麦。1015年，他率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返回，这时他发现艾特尔雷德的儿子铁边埃德蒙（Edmund Ironside）已经控制了丹麦法区域的北部。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克努特夺回了诺森布里亚并向伦敦进军。但就在丹麦军队到达之前，艾特尔雷德去世，埃德蒙被宣布为国王。然而，即使在韦塞克斯也有许多人没有反抗就接受了克努特的君主地位。埃德蒙结集起他的军队，一时间丹麦人似乎仍然有可能被赶回去。但在1016年秋，克努特在埃塞克斯的阿兴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后签订的条约使埃德蒙只剩下了韦塞克斯，他不久死去，克努特于是成为了全英格兰的国王。

克努特

国王克努特（1016—1035年在位）不得不应对的问题与50年后国王威廉遇到的问题相似。与威廉一样，克努特决心不以征服者，而是以合法的英格兰国王的身份进行统治。他娶了艾特尔雷德的遗孀为妻，而且以残酷的手段确保了他的王位：有好几位英格兰政坛的领袖人物被杀。当王位稳固之后，克努特满怀热情地采用了文明王权的传统方式。他颁布法律并创建修道院；用下一个世纪的年鉴编写者的话说，他把自己“从一个野蛮人”改造“为最虔诚的基督徒国王”。然而，克努特仍然是一个丹麦人，当他哥哥在1019年去世之时，他继承了巨大的北方帝国，英格兰只是它的一部分。在11世纪20年代，克努特越来越多地参与丹麦事物，这是他在英格兰的变革相对较少的主要原因，而这最终将酿成大祸。

当然，他的许多追随者都急于得到报偿。英格兰没有像1066年之后那样出现全面取代原来的土地所有阶级的状况，但有大量的丹麦人进入了贵族阶层。作为一个来自国外因而地位不太稳固的国王，克努特保持着一支王室军队，或者说“王室近卫军”，它成为英格兰相当沉重的负担。在向丹麦人偿付钱财以购买和平长达30年之后，土地所有者们现在又不得不出资供养一支丹麦常备军。对10世纪英格兰那高度整合的贵族阶层的摧毁很快对国家的统一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克努特还必须使英格兰政府在他长期呆在国外期间仍能运作。1017年，他将王国分为4个伯爵国：诺森布里亚、东盎格利亚、麦西亚和韦塞克斯。很明显，这是冒着复活地方分裂主义情绪的危险，特别是因为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的伯爵都是丹麦人。在他统治结束时，最重要的人物是诺森布里亚的斯瓦尔德伯爵（Siward earl）、麦西亚的利奥弗里克伯爵（Leofric earl，他的妻子是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来自考文垂的名门），以及韦塞克斯的戈德温伯爵（Godwine earl）。戈德温的祖先不明，但到11世纪30年代，他和他的家族已经是国王之下最富有最强大的世俗势力。克努特划分的伯爵国是盎格鲁 - 撒克逊历史上最后30年中充斥着政治斗争的主要根源。

注释

【1】　古英语史诗《马尔顿之战》描写了盎格鲁 - 撒克逊人这场英勇而悲壮的战斗。统帅拜尔特诺思战死，其坟墓现在剑桥附近的伊利大教堂。

第七章

盎格鲁 - 撒克逊王朝的终结

当克努特于1035年去世时，他有几个可能的继任人。韦塞克斯王朝的代表人物是艾特尔雷德的两个小儿子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他们这时正在诺曼底朝中，以及铁边埃德蒙的儿子，他这时在匈牙利流亡。克努特有两个儿子，分别出自他的两位妻子：哈罗德由北汉普敦的艾尔弗格芙（Ælfgyfu）所生，而哈撒克努特（Harthacnut）的母亲则是艾特尔雷德的遗孀爱玛（Emma）。克努特曾希望由哈撒克努特来继承他的整个帝国。但当哈撒克努特还滞留在丹麦之时，政务委员会指定哈罗德为摄政王（尽管此举遭到爱玛和戈德温的反对），并于1037年使他成为国王。就在前一年，英格兰王子阿尔弗雷德很不明智地来到英格兰，并在那里受伤死去，幕后指使者是戈德温。在哈罗德于1040年去世后，哈撒克努特被招为王，但他两年之后也死去，丹麦王室血统就此中断。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想恢复古老的韦塞克斯王朝。艾特尔雷德的儿子爱德华已在英格兰朝中生活了一年，他于1042年被选举为国王。

“忏悔者”爱德华（Edward“the Confessor”，1042—1066年在位）将注定被圣化为来自英格兰王室的主要圣徒。他的现代传记作者认真考查了隐藏在有关其虔诚的传说故事背后的真实情况后写道：“他不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但他也不是一个圣洁的低能者。同他那个阶层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只是一个平庸的人。”不论他有什么长处和弱点，他继承了11世纪欧洲最强有力的政府。该政府的力量部分源于它那些古老的机构，部分源于60年来的大动乱。

政府机构

自埃德加时代起，地方政府就已经在发展。一方面，在克努特时代得以巩固的强大的伯爵国使少数几个人在其领地内拥有巨大的权力。一个地位不稳的国王不得不面对来自过分强大的臣民的威胁。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新官职负责在地方上执行国王的政策。在艾特尔雷德统治时期，国王在每个郡的地方执政官（“采邑总

管”）中发展出一个“郡总管”或者叫名义郡长。他是国王在郡里的主要执政代理人，而且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本属于郡长的职责。名义郡长主要负责征收王室财税和合法收益，但他也属于正在成长中的地方乡绅阶层。在郡政府里，他向郡里的绅士们宣布国王的意志，在日常事物中发挥重大作用，并为反对横蛮的政治强人们的行为增添王室权威。郡政府和名义郡长属于盎格鲁 - 撒克逊时代留给后来的中世纪政府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图8　一份加有封印的忏悔者爱德华的诏书，内容为赏赐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艾特尔雷德统治下的英格兰十分软弱，一个高效的税收体制正是由此直接发展而来。10世纪90年代付给丹麦人的巨额赔偿金必须从全国筹措。人们后来将其称为“捐税”，以用海得计量土地的古老方法为基础，按每海得固定的税率进行征收。从1012到1051年，接连几位国王都连年征税，虽然现在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常备军。为此目的而发展起来的复杂的计量制度是后来“末日审判书”的基础，而且还是11世

纪初期英格兰官僚体制效率非凡的表现，诺曼征服之后的诺曼国王们在近一个世纪里继续运用这一体制来征收丹麦捐税。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官方文件：诏书。艾特尔雷德很可能，而克努特则肯定颁发了诏书，但现存最早的诏书原件却是来自爱德华一朝。诏书最早的形式是国王对郡长和名义郡长或者主教的简短通知，告诉他们有关土地的转让，并要求必须在郡政府里昭示。一份典型的诏书内容如下：

国王爱德华向哈罗德伯爵和他的名义郡长托菲（Tofi）以及他所有在萨默塞特的乡绅们致以亲切的问候。我宣布：阿尔弗雷德和平而安详地把卢顿的土地卖给了纪索主教（Giso the bishop）。此事发生在巴勒特，我本人在场，同时在场的还有我妻伊迪丝（Edith）、哈罗德伯爵以及其他许多人。我们也希望这位主教将保有这片土地以及它附带的一切，主教凭法律赋予的权利，如同他以前的所有者们那样，以及主教们一直所做的那样，自由地拥有这一切。如果其中任何东西被不公正地夺走，我们要求那必须归还。

它还把效率同一种证明其真实性的新方法结合在一起：一块悬挂的蜡封，被用一个保存在王宫里的模子打上了印记。作为所有权证书，诏书为以前的旧式土地证书提供了一种有用的补充，因为旧式证书使用不便而且易于伪造。它们也为国王迅速而清楚地将其意志传达到郡提供了一种方式。征服者威廉很快将使用诏书来发布命令，而且后征服时代那些更为重要的王室文件类型也是由它发展而来。

当下令征税和颁布诏书时，国王都会咨询他的秘书们。如同最迟从阿尔弗雷德开始的那些国王们一样，忏悔者爱德华有一个由神甫组成的文书班子，由一个主要文官领头，他的职务后来发展成为中世纪的国王秘书。他们的任务之一是保存文献记录：盎格鲁 - 撒克逊后期流传有记载土地所有权、多少海得的面积和应交纳多少税之类非常细化的普查的证据。比德的一些说法意味着，即使在7世纪，诺森布里亚国王们也有足够的准确信息，能以精确的海得数量来赏赐土地，7世纪时，对那些依附于麦西亚的部族和区域进行计量的备忘录保存在

现在称为“部族海得制”的文本里。所以我们能确信，9、10世纪的国王们有某种形式的财政记录，虽然还无法确知那究竟有多么详细。到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王室秘书部门拥有的卷宗列出了各郡和各百户邑的耕地面积，其中有多少王室土地，也许甚至还列出了各采邑的名称、所有者和财富。我们并非从这些文献本身（虽然有几份残篇保存了下来），而是从《末日审判书》获知此类情况。如果相关的官员们没有获得早先时代的清单，1086年举行的大普查[1]就不可能那样迅速和彻底地汇编成册。前征服时代的公众档案散失是很不幸的，但仅仅是关于它们曾经存在过的信息就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爱德华时代行政管理的质量。

社会变革

如果说从阿尔弗雷德王朝到爱德华时代，英国政府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英格兰社会也是如此。从9世纪中期到11世纪中期，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现在没有关于在“末日审判书”之前的数据，但文献、考古和地貌方面的证据有力地暗示出，未来英格兰社会的许多方面在那些年代里已开始成形。毫不奇怪，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大的城镇。到诺曼征服之时，英格兰已经出现了我们今天能够理解的意义上的城镇：拥有大量集中的人口并且有市场和商人，成群的工匠集中在特别的区域，有行会和章程以及大量的教堂，有些城镇还有迅速扩展的郊区。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后期的法律条文根据它们被容许拥有多少铸币者来区分商业中心或者说“港口”（并不一定沿海）和大型设防城镇。城镇包括大多数的阿尔弗雷德式设防城堡和许多修道院中心区域，但它们并不局限于那些在古代十分重要的地区。我们甚至不能猜测有多少地方市场，但在13世纪首次出现的大量地方市场也许比它们看起来更为古老。

图9　一幅盎格鲁 - 撒克逊后期的绘画，画中是一队牛拉着带轮的犁。

那些正在涌现的城镇是迅速发展的乡村的组成部分。地貌研究表明，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出现了居住地集中的倾向，分散在各地农场上的居民集结到村庄里。同时，农业生产变得更为复杂和更为合作协调，以至到1066年时，英格兰的许多地区都有“公地”，由混合拥有这些土地的农民共同耕种，因此很可能是遵循各种合作协商的种植模式。土地制度的早期发展情况现在仍具争议，但最早在10世纪，我们能看出中世纪英格兰的开放性田野地带和周围的“林地牧场”区域之间的差异。关于集居形式、农业生产和土地所有这些方面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尚有许多问题不能确定，但这一变革过程似乎经历了几个阶段并且一直延续到诺曼征服之后很长一段时期。而且还有迹象表明，有时变革并非自发的发展进程，而是来自上面有计划的安排。农民社会被划分为更多的阶层并被更紧密地整合在一起，而领主们对他们的佃户提出了更严厉的要求。

一个原因是有了更多的封建采邑和采邑领主。除了那些发展滞后的地区，绝大多数的旧式“多重所有领地”到11世纪已经被肢解成面积与现代牧区大致相当的区域。人口增长，种植面积扩大，原来的“广泛”体系中那些组成部分成为了独立的实体。10世纪流传下来的土地证书比8、9世纪加起来还要多，它们中大多数是授予较小单位的土

地，而且相对来说，获得者更多的是世俗人员。贵族们安居下来：虽然他们仍然是从军事的角度看待自己，但他们似乎开始显得不那么像武士，而更像是绅士。考古发掘揭示出，到1000年，农村各地散落着采邑庄园，有的还设有防御工事。下层乡绅扩大，成为农村地主阶层；《末日审判书》表明，在1066年英格兰有数百个采邑领主。

这就是大多数牧区教堂出现的社会环境。正如国王和主教们在7、8世纪兴建修道院一样，乡绅们在10、11世纪修建采邑教堂。修道院牧区在缓慢地消亡，在其内部越来越多的采邑正在获得与之竞争的属于它们自己的教堂，由采邑的神甫管理。教区组织发展史上这一关键阶段是渐进和非正规的，在本质上是民间所为。11世纪的教堂实际上是为它们的领主所“拥有”（在诺曼征服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而且它们的作用是由受谁控制而非提供精神指导的角度来决定的：教堂的作用是为领主及其家庭和佃户们的需要服务。我们几乎无法谈论像“堂区制度”这样正规的体系，虽然其原初状况已经存在：1700年的牧区教堂中很可能超过一半都建于1066年之前。

所以，英格兰乡村那些令人熟悉的标志——村庄、采邑庄园、教堂——主要是在盎格鲁 - 撒克逊后期成形的。对于大主教伍尔夫斯坦来说，后面两项是乡绅身份的正常标志，他在1000年前后写道：“如果一个下层自由民富裕起来，拥有了整整5海得的土地，一座教堂和一间厨房，一架教堂钟和一道要塞城堡门，在王宫里有一个座位和特殊职位，那么他从此之后就配被称为乡绅。”这段著名引文中的“要塞城堡门”引发了一个已无需争论的问题：在前征服时代的英格兰有城堡吗？有一位作者把私人城堡与封建主义等同，并确信后期撒克逊英格兰并非封建社会；他争论说，除社区性设防城镇外，英格兰没有其他的要塞城堡。然而如果一座严密设防的庄园建筑能被看作是城堡的话，那么城堡的存在主要说明，社会已经包括一个以土地为基础、具有相当地位的贵族阶级。实际上，考古发掘现在证明，严密设防的建筑的确存在，而且大约建造于1000至1050年间，结构复杂并被堤岸和壕沟围绕的庄园建筑，在北汉普敦郡的苏尔格拉夫和林肯郡的戈尔索都有发现。这些考古现场表明，撒克逊后期普通乡绅的住宅能同12

世纪和13世纪初大多数庄园建筑一样壮观。

战争正在变得更为专业化，因而装备自然也更为昂贵。到10世纪末，一种军事服役制度已经发展起来，根据这一制度，以每5海得为单位，负责为民兵组织（*fyrd*，即militia）提供一名士兵及其装备。这等于承认，不能期待一般的农夫能以他的财力来装备自己，因此也意味着战斗人员的地位得到提升。根据伍尔夫斯坦的说法，5海得是对一个乡绅最起码的地产要求，而铠甲和武器也成为乡绅身份的另外一个标志。一个全副武装的后期撒克逊武士并不是一个平民变成的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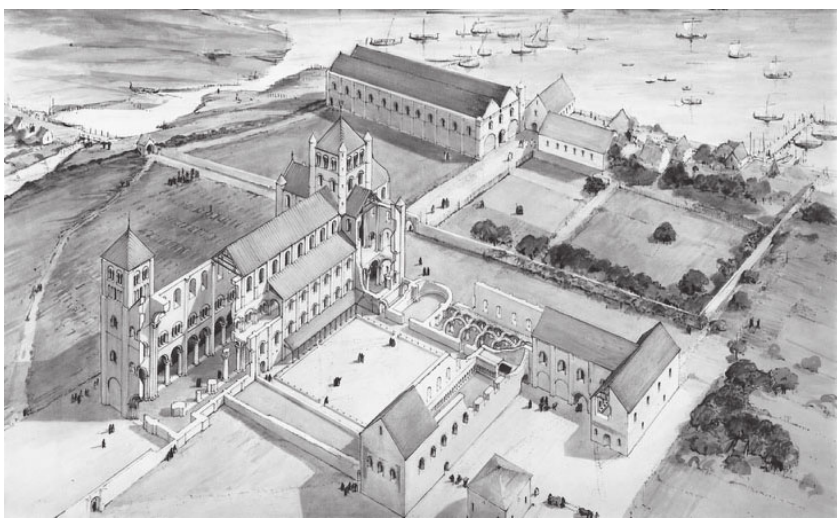

图10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及其周围区域，约1100年：根据考古发掘、文献资料和现存建筑重现的当年状况（按格姆和波尔1980年原作复制）。前景为修道院大教堂，由忏悔者爱德华所建，毁于13、14世纪。后景为威斯敏斯特大厅，为威廉二世（William II）重建。

到艾特尔雷德统治时期，修道院改革已经失去了动力。斯塔福德郡的伯顿修道院（1004）和牛津郡的恩舍姆修道院（1005）是最后的伟大建筑。因普遍的政治混乱和财力的耗尽，大规模的资助和宏伟建筑的修建很快结束了。但爱德华的虔诚的确促成了一项英格兰空前的建筑项目。大约在1050年，他以与英格兰君主身份相符的规模开始

重建在威斯敏斯特的老修道院。在英格兰，建筑艺术发展缓慢，而在诺曼底，在那之前的40年里其发展却蔚为奇观：埃德加时代最优秀的建筑若与在贝尔奈和凯恩的修道院教堂相比，几乎不值一提。所以，为了建造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爱德华把目光投向了诺曼底建筑师，他那最终建成的教堂即使按他们的标准也十分辉煌壮丽和富有创造性，而且很可能也受益于英格兰的装饰传统。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韦塞克斯王室最后的里程碑式伟大建筑竟然主要是诺曼文化的产物。

王位继承问题

盎格鲁 - 撒克逊历史上最后的年代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戈德温家族和王位继承问题。爱德华娶了戈德温的女儿为王后，但到11世纪50年代初，已经很明显，他不会生下一个王位继承人。铁边埃德蒙的儿子爱德华带着他那还在襁褓中的儿子于1057年从匈牙利返回，但随即去世。他年幼的王子埃德加是合法的继位人，但没有人乐于看到一个婴儿坐在王位上的前景。挪威国王马格努斯（Magnus）以及在他之后，他的儿子哈罗德·哈德拉达（Harold Hardroda），都把自己看作是克奴特的帝国——包括英格兰——的继承人。爱德华国王对他们都不可能有多少兴趣，他的目光如果转向什么地方的话，那就是海峡对岸。诺曼底公国的势力和内部组织都在迅速发展，流放时期他曾在那里生活了25年。1035年，罗伯特公爵（Duke Robert）去世，由他的私生子，年仅7岁的威廉即位。我们永远也不会确知，爱德华是否真的答应过将王位交给威廉，但这种说法并非一定不可能。

由于他哥哥被杀害，爱德华从未原谅戈德温，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051年达到顶点。爱德华的一个诺曼底朋友在多佛尔被卷入到一场斗殴之中，并有几个人被杀。爱德华命令作为韦塞克斯伯爵的戈德温劫掠多佛尔进行报复。戈德温拒绝并举兵反对国王，而国王则召集麦西亚伯爵和诺森布里亚伯爵率领他们的全部军队前来助阵。冲突得以避免；如时人所说，“他们中有些人认为，如果他们参加战斗，那

将十分愚蠢，因为几乎所有英格兰贵族都已来到两个阵营，他们相信，那将使国家洞开，遭受我们敌人的入侵。”戈德温的支持力量崩溃了，他和他的家族外出逃亡。在随后一年里，爱德华增加了朝中的诺曼人，但戈德温在1052年率领一支强大的舰队返回，国王不得不更为顺从。诺曼大主教逃回国内，他的一些同胞也在戈德温的要求下被驱逐。

现在戈德温实际上掌握着最高权力，但他在1053年去世。他的韦塞克斯伯爵爵位的继任人是他儿子哈罗德，他将注定成为最后一位盎格鲁 - 撒克逊国王。当诺森布里亚的斯瓦尔德伯爵两年后去世时，他的伯爵爵位落到哈罗德的弟弟托斯蒂格（Tostig）手中。由于格温尼德国王格鲁菲德（Gruffydd）的作为，戈德温的儿子们的地位很快得到进一步提升。格鲁菲德最近在威尔士夺得权势，与流放中的麦西亚伯爵爵位继承人结盟，发动了对英格兰的一系列进攻，并劫掠和焚毁了赫里福德。哈罗德与托斯蒂格的联军将格鲁菲德赶回威尔士，并造成了他在1063年的垮台和死亡。有这样的胜利为资本，哈罗德成为了英格兰的杰出人物。尽管他没有王室血统，但他似乎是王位的一个理所当然的候选人。

但在1064年，或者也许是1065年初，哈罗德造访诺曼底公爵威廉。诺曼底资料说，他是以爱德华的使者身份前去确认以前将英格兰王位留给威廉的誓言。关于誓言的说法是诺曼人伪造的这一观点，虽有此可能，但总的来说不太可信。但还有第三种解释，那就是制造贝叶挂毯 [2] 的艺术家们也许想偷偷告诉我们的：哈罗德不幸落入威廉手中，被迫起誓，十分丢脸地回到深感震惊的爱德华国王那里。不论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当时许多人都相信威廉不仅有势力，而且有合法的权利。

诺曼征服以及随后时期

最后两年的事件发展迅速。1065年，诺森布里亚爆发了反对托斯

蒂格伯爵的叛乱。哈罗德出面调停，但当地人仍然坚定地支持他们提出的人选：托斯蒂格出逃，于是成为他哥哥的敌人。1066年1月5日，爱德华国王去世。紧迫的军事形势的需要压倒了法律，政务委员会选举哈罗德为国王。对于他的两个成年对手而言，那无疑是一个信号。挪威的哈罗德·哈德拉达首先行动：在流亡中的托斯蒂格的协助下，他在夏季入侵诺森布里亚并占领约克。这时哈罗德正在等待预料中的来自诺曼底的入侵，他被迫挥师北上。9月25日，在约克附近的斯坦福桥，他与挪威军队相遇并将其击败。哈德拉达和托斯蒂格都被杀死，哈罗德国王夺回了诺森布里亚。

这时，曾被不利天气滞留的威廉公爵的舰队于9月28日在佩文西登陆。哈罗德立即赶到南方，然而他在两个月前所作的准备已经七零八落，而且他的军队主力已经疲惫不堪。1066年10月14日，英格兰军队与诺曼底军队在黑斯廷斯附近相遇。哈罗德的军队在山坡上布阵，用盾牌组成一道墙。战斗进行了一整天，起初英格兰军队的阵地似乎十分稳固。很明显，英格兰军队不是失败在势力，而是失败在纪律。哈罗德军队中的有些部分似乎受到引诱，跑下山去追击真的或者是假装的撤退，被切断退路并遭到围歼。英格兰军队逐渐被打乱，中央部分坚持到天黑，但当哈罗德在战场上倒下之时，英格兰军队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在未来的世纪里，巴特尔修道院 [3] 的圣坛标示出了哈罗德倒下的地方。

威廉进军到多佛尔，随即到达坎特伯雷，在那里接受了温切斯特的归顺。但他的主要目的地是伦敦，因为英格兰抵抗势力的核心力量在埃德加·亚瑟林（Eadgar Atheling）领导下聚集在那里。威廉在伦敦桥与抵抗力量相遇，他率军环绕城市行进，一路上彻底摧毁所遇到的一切。这时亚瑟林的军队却在分崩离析，当威廉到达伯克姆斯特德时，英格兰贵族们在埃德加亲自率领下前来晋见，向他宣布效忠。

阿尔弗雷德的王朝经受住了丹麦人、挪威人和又一次丹麦人的进攻，但最后还是屈服于外国入侵。那是韦塞克斯王室之路的尽头，但却不是盎格鲁 - 撒克逊社会，或者它的机构和文化的结束。从本质上说，诺曼国王们是用英格兰方式统治着英格兰，在经历了被征服的阵

痛之后，曾经使这个国家从埃德加到忏悔者爱德华时代那么强大的体制又重新显示出它的力量。在许多方面，1400年的英格兰看起来与1000年的英格兰惊人地相似。百户邑一直延续到现代，郡和郡长仍然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英语仍然为日常语言。最根本的是，正是在600年到1100年之间形成了英格兰的城镇、村庄和道路系统，以及农村的大多数突出特点。

注释

【1】 指《末日审判书》所记录的大普查。

【2】 著名的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可能织成于12世纪，长231英尺，宽20英寸，上面绣有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故事，现存于法国贝叶博物馆。

【3】 巴特尔修道院（Battle Abbey）的字面意思是“战斗修道院”，为征服者威廉所建，以纪念他在黑斯廷斯之战的胜利。教堂的圣坛就设在哈罗德倒下之处。

年表

约450年　撒克逊人到来：亨格斯特和霍萨迁徙到肯特（传说中的年代）

455年　亨格斯特反叛沃尔蒂格恩（传说中的年代）

477年　撒克逊人移民苏塞克斯（传说中的年代）

495年　撒克逊人移民韦塞克斯（传说中的年代）

约500年　蒙巴多尼库斯战役（传说中的年代）

577年　西撒克逊人攻占格洛斯特、基兰斯特和巴思（传说中的年代）

597年　圣奥古斯丁率领传教团到达肯特

616年　东盎格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作为超级国王，使埃德温成为诺森布里亚国王

约624年　雷德沃尔德去世，很可能埋葬在萨顿胡的墓冢中

627年　埃德温及其诺森布里亚宫廷皈依基督教

633年　黑文菲尔德战役；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成为超级国王

635年　韦塞克斯国王西内吉尔斯皈依基督教

642年　奥斯瓦尔德被麦西亚国王彭达杀死于奥斯沃斯特里

655年　彭达在温威德被诺森布里亚国王奥苏由打败，并战死，奥苏由成为超级国王

664年　惠特比宗教会议

669年　西奥多大主教来到英格兰

672年　赫特福德宗教会议；特伦特战役，标志着麦西亚开始崛起

685—688年　韦塞克斯在卡德沃拉统治下扩张，兼并肯特、萨里和苏塞克斯

716年　艾特尔鲍尔德成为麦西亚国王

731年　比德完成《教会史》

747年　克洛菲休宗教大会
757年　艾特尔鲍尔德去世，奥发成为麦西亚国王
786年　奥发主持召开雷加丁宗教大会
793—795年　丹麦人袭击林迪斯凡、贾罗和艾奥纳
796年　奥发去世
825年　韦塞克斯国王艾克伯特打败麦西亚，兼并肯特、埃塞克斯、萨里和苏塞克斯
835年　丹麦人大举进攻肯特
865年　丹麦“大军”登陆
867年　诺森布里亚被丹麦军队占领
869年　东盎格利亚被丹麦军队占领；圣埃德蒙被杀害
871年　丹麦军队进攻韦塞克斯；阿尔弗雷德即位
874年　麦西亚被丹麦军队占领
878年　（3月）丹麦人把阿尔弗雷德赶到萨默塞特沼泽地（5月）阿尔弗雷德在艾丁顿打败丹麦军队；格思鲁姆接受洗礼
899年　阿尔弗雷德去世；“年长的”爱德华成为韦塞克斯国王
910—920年　爱德华和艾特尔弗拉德收复丹麦法区域的大部
919年　雷格诺德在约克建立挪威人的王国
924年　爱德华去世；阿特尔斯坦即位
937年　阿特尔斯坦在布鲁南堡打败挪威人、苏格兰人和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威尔士人的联军
939年　阿特尔斯坦去世；埃德蒙即位
940年　邓斯坦开始重建格拉斯顿伯里，使之成为正规的修道院
946年　埃德蒙去世
954年　约克最后一位国王被废黜
959年　埃德加即位
960年　邓斯坦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约970年　编纂《修道院规章》
973年　埃德加举行加冕和圣化仪式；接受不列颠国王们的归顺
975年　埃德加去世；“殉难者”爱德华即位

978年　爱德华被杀害；“准备不足的”艾特尔雷德即位

991年　丹麦人在马尔顿打败拜尔特诺思郡长及其率领的埃塞克斯军队；英格兰和诺曼底签订条约

1002年　艾特尔雷德下令屠杀在英格兰的所有丹麦人

1003年　斯维因国王率领丹麦军队入侵

1013年　斯维因率领一支新的军队重返；丹麦法区域拥戴他为国王

1014年　斯维因去世；在英格兰的丹麦军队选举克努特为国王

1016年　（4月）艾特尔雷德去世；“铁边”埃德蒙即位

（秋）克努特在阿兴顿击败埃德蒙；埃德蒙去世，克努特成为全英格兰之王

1017年　克努特将英格兰划分为4个伯爵国

1035年　克努特去世

1037年　哈罗德即位

1040年　哈罗德去世；哈撒克努特即位

1042年　哈撒克努特去世；“忏悔者”爱德华即位

1051—1052年　爱德华国王与韦塞克斯伯爵戈德温之间发生冲突

1053年　戈德温去世；他的儿子哈罗德成为韦塞克斯伯爵

1064—1065年　哈罗德伯爵到诺曼底访问威廉公爵

1066年　（1月）爱德华国王去世；哈罗德伯爵成为国王

（9月）英格兰国王哈罗德在斯坦福桥击败并杀死挪威国王哈罗德

1066年　（10月）诺曼底公爵威廉在黑斯廷斯击败并杀死英格兰国王哈罗德

（12月）威廉加冕为王

这是一个唯有战争与野蛮的忠诚的时代，还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秩序井然的社会？国王们的沉浮缘何如此迅速？异教与耶稣基督的较量，谁将最终获胜？罗马帝国崩溃后的盎格鲁 - 撒克逊时代是英国历史的十字路口，是英格兰社会发生全方位剧烈变革的时代。

本书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律法等各方面对约六个世纪的盎格鲁 - 撒克逊时代进行了翔实而透彻的剖析，展现了盎格鲁 - 撒克逊人富有创造性的成就及对未来英国发展的影响。

百科通识文库

49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

——中世纪英国

约翰·吉林厄姆　拉尔夫·A格里菲思　著

沈弘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

——中世纪英国

约翰·吉林厄姆　拉尔夫·A格里菲思　著　沈弘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49**

Medieval Britai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4.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1984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John Gillingham and Ralph A. Griffiths 19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中世纪英国／（英）吉林厄姆（Gillingham, J.），（英）格里菲思（Griffiths, R. A.）著；沈弘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92-2

Ⅰ．①日… Ⅱ．①吉… ②格… ③沈… Ⅲ．①英国 - 中世纪史 Ⅳ．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40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92-2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插图目录
地图目录
第一章　诺曼王朝的国王们
第二章　安茹王朝的国王们
第三章　中世纪早期的政治、法律和宗教
第四章　中世纪早期的经济
第五章　战争中的英格兰，1290—1390
第六章　中世纪晚期的财富、人口和社会变化
第七章　重开战争，1390—1490
第八章　走向民族统一
年表
王室家谱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约翰·吉林厄姆，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退休教授，1965至1998年间一直在该大学教授历史，研究方向主要是中世纪历史，最近的两部著述分别为《理查一世》和《12世纪的英国人》。

拉尔夫·A.　格里菲思，威尔士斯旺西大学教授，研究中世纪历史，其著述包括《国王亨利六世的统治》以及与J. 坎农合著的《牛津插图版英国帝制史》等。

译者简介

沈弘，浙江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英语系和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任访问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目录学与版本研究以及中外文化交流。

插图目录

图1　塞勒姆古堡的航拍照片
图2　13世纪20年代带有誓约标志的契约
图3　反映托马斯·贝克特生前和被害的两个场景
图4　12世纪人们用烧红的器械来烙伤口
图5　1214年的布汶战役（马修·帕里斯）
图6　1215年和1217年的《大宪章》
图7　13世纪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修建（马修·帕里斯）
图8　13世纪末英国王室眼中一个典型的威尔士人
图9　国王爱德华二世的坟墓，约1331年
图10　一位准备比武的骑士，约1340年（《勒特雷尔圣诗集》）
图11　一位肯特郡的农民，约1390年（威廉·库尔特尼大主教的花名册）
图12　格洛斯特郡迪奇福德中部一个“消失的村庄”
图13　约翰·鲍尔在向沃特·泰勒率领的起义者们布道
图14　国王理查三世，约1512—1520年

地图目录

地图1　盎格鲁—诺曼王国，1066—1154
地图2　亨利二世的欧洲大陆领地
地图3　中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主要道路
地图4　中世纪后期英国在西欧所采取的军事行动
地图5　宗教改革前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教区图（13世纪）

第一章

诺曼王朝的国王们

1066年及当时发生的事件

在1066年的圣诞节那天，诺曼底的威廉公爵（Duke William of Normandy）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被拥立为英格兰的国王。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震天动地的英语和法语欢呼声使驻守在教堂外面的诺曼卫兵们惊慌失措。他们以为在教堂内发生了可怕的不测事件，于是把周围的房子用火点着了。半个世纪以后，有一位诺曼僧侣这样回忆那天所发生的混乱场面："由于火势迅速蔓延，教堂里的人乱作一团，成群结队地往外跑，有的人是去救火的，另一些人则趁机开始抢劫。只有僧侣们、主教们和几位教士留在了圣坛前面。虽然他们感到惊慌，但还是坚持继续完成了国王的加冕仪式，国王本人也受了惊吓，浑身哆嗦。"

虽然取得了黑斯廷斯战役[1]的胜利，虽然伦敦和温切斯特已经投降，但是威廉的国王宝座依然摇摇欲坠，他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至少还要过5年之后，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信，对英国的征服已经完成。从1067至1070年间，每年都有反抗诺曼人统治的起义爆发：在肯特郡、英国西南部、威尔士边界、东英格兰已开垦沼泽区和英国北部。诺曼人不得不像一支占领军那样生活，无论居住、吃饭或睡觉都要按军事编制一起行动。他们被迫在制高点上修筑堡垒，以便能做到由少数人来统治一个臣服的民族。生活在一个拥有一两百万人口的敌对民族中间的诺曼人总数也许还不到10,000。这并不是说每一个英国人都竭力反对诺曼人。无疑有许多英国人在跟诺曼人合作，正是这一点才使得诺曼人有可能成功接管众多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公共机构。然而有许多证据表明，英国人不愿意在自己的国家中成为一个受压迫的多数派。这些动荡不安的年代给随后的历史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它们意味着英国所接受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王室，也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一种新的文化和语言。在欧洲历史上也许找不到另一次征服能给战败者带来如此灾难性的后果。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动荡并非威廉最初的意向。在诺曼人征服的初期，许多英国人只要臣服就可以保留他们的土地。但是到了1086年，就发生了某些明显的变化。《末日审判书》[2]是一部深刻反映了诺曼征服所带来战争创伤的钦定土地调查清册。到了1086年，只剩下4位英国贵族还拥有少量的土地。有4,000多位英国大乡绅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取而代之的是不足200名的法国贵族。有一些新的土地拥有者是布列塔尼人和来自佛兰德和洛林的人，但大多数都是诺曼人。就教会而言，我们可以给威廉的反英政策定下一个日期。1070年，他撤销了几位英国人的主教职务，并且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任命英国人出任过主教或修道院长的职位。在军事问题上，1069—1070年冬季对北方的袭击也说明威廉国王的冷酷无情在当时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在约克郡，这体现为1066至1086年间，土地的价值狂跌了2/3。然而无论发生了什么或是怎么发生的，可以肯定的是，到了1086年，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这一群体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位置已经被新来的诺曼人精英们所占据。自然这些精英们保留了在欧洲大陆上自己原有的土地；其结果就是英格兰和诺曼底这两个曾经分离的国家，现在变成了一个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政治共同体，不仅分享同一个统治王朝，而且还有同一个盎格鲁—诺曼贵族体系。有了水上运输的便利，英吉利海峡对英国和诺曼底的分隔就如同泰晤士河之于米德尔塞克斯郡和萨里郡。从1086年起，直到1204年，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历史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了一起。

图1　塞勒姆古堡的航拍照片：它生动地展现了征服后第一代诺曼人所面临的困难。诺曼人的大教堂蜷缩在城堡的近旁，而城堡本身的修筑是为了保护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规模如此宏大的史前堡垒全部空间的那一小撮人。

由于诺曼底是一个由公爵统治的公国，而这位公爵又必须效忠于法兰西国王，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英格兰”政治成为了法兰西政治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跟法兰西的渊源还要更加深远。由于诺曼人是法兰西人，所以他们来到英格兰时，也带来了法语和法国文化。此外，我们所要讨论的并非1066年以后那一代人所带来的一次性、规模庞大的“法国化”，以及随后逐渐抬头的“英国化”。在1066年的诺曼征服之后还有1153—1154年间的安茹征服；尽管随着这一次征服，卢瓦尔河流域的贵族并未移居英国，但是亨利二世（Henry　II）和阿基坦的埃莱亚诺（Eleanor of Aquitaine）两人所组成宫廷的到来更加强化了法国文化在英国的主导地位。

在1066年，只有不到30%的温切斯特财产拥有者使用非英国本土的姓氏，但是到了120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超过80%，其中大多数都是威廉（William）、罗贝尔（Robert）和理查（Richard）等

法国姓氏。这种对欧洲大陆影响的接纳意味着在这段时期，英国艺术中的外来影响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如在教会建筑中，“罗马式”和“哥特式”等欧洲的术语要比“诺曼式”和“早期英国式”等更能贴切地描述当时的流行风格。虽然在英国建造的教堂，就像在英国进行装饰和绘制袖珍画的手抄本那样，经常带有某种可以辨认的英国特征，但是建筑师们或艺术家们所采纳的设计式样却来自国外，有时来自地中海区域（意大利、西西里、或甚至拜占廷），通常来自法国。在1174年坎特伯雷大教堂的高坛被大火烧毁之后，被请来进行重建的是法国建筑师桑斯的威廉（William of Sens）。同样，亨利三世（Henry III）在重建威斯敏斯特教堂时也是受到了法国修道院风格的重大影响。事实上，法国在音乐、文学和建筑等领域的显著地位是如此崇高，以至于法语在当时并不仅仅是一门民族语言，而是成为了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语言，一门任何想要被认为是文雅之士的人用来交谈和书写的语言。于是，在13世纪的英格兰，法语的重要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从12世纪到14世纪，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能够运用3种不同的语言。英语是他的母语，他懂一些拉丁语，并且会说流利的法语。在这个国际性的社会中，法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法律和产业管理中的实用语言，也是歌谣、韵文、中世纪史诗和浪漫传奇的语言。换言之，诺曼征服开创了一个使英格兰像耶路撒冷王国那样，可以被描述为法国海外（*Outremer* ）之一部分的时期。用政治术语来说，它在13世纪初以前就是法国的殖民地（尽管它并不属于法兰西国王），而之后则可算是文化上的殖民地。

在不列颠的西部和北部，即在被征服的英格兰边界之外，还有将本土的身份特征保持得更为长久的民族和王国。作为居住在这个岛国总体来说更为贫瘠部分的独立民族，他们保持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只是在12世纪和13世纪这一期间，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才逐渐开始分享这个由法国人引领的、涉及了整个欧洲的文化一元化过程。这种时间上的滞后将会带来深远的后果和影响。到了12世纪20年代，像历史学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这样操法语的英国知识分子开始把他们的凯尔特邻居们描述为未开化的野蛮人，并视他

们为无法无天、没有伦理道德约束的蛮族，即生活在原始状态、远离文明社会的游牧民族，但他们偶尔也会越过边界，向英国发动可怕的袭击。一种新的包含优越感的成见产生了，而且这种成见将会在英国人的傲慢中变得根深蒂固。

这一时期，在英国——在较小的规模上还有威尔士和苏格兰——发生的一个社会变更给历史学家们造成了特殊的困难。这就是发生在12世纪和13世纪的文字记载的激增。该时期书写成文的文件数量远远超过了以前，得以保存下来的文件数量也远远超过了以前。在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只有区区2,000份诏书和特许状得以传世，而仅13世纪存世的文件就不可胜数，动辄以上万计。当然那2,000份盎格鲁——撒克逊文件只能算是冰山一角，更多其他的文件未能流传下来。但这种情况对于13世纪来说也是适用的。例如，据估计，13世纪仅发给小农庄主和农民的特许状一项就可能达到800万份之多。即使这个数字是一种相当宽松的估计，其真实情况仍然是，包括农奴在内的整个社会阶层在这一时期对文件的关注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3] 的统治下，传闻只有国王一人才拥有一枚印章，而到了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统治时期，法令规定就连农奴也必须每人拥有自己的印章。处于这一发展过程的中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发展的原动力的，就是国王的政体。国王拥有永久性的、组织完备的文书机构和大法官法庭，后来的财政部也是如此：它们都变得越来越忙碌。在亨利三世的统治下，我们可以计算大法官法庭所使用过的封蜡数量。在13世纪20年代后期，它所使用的封蜡数量是每星期3.63磅；到了60年代后期，这一数量就猛增至每星期31.9磅。政府不仅比以前颁布更多的文件，而且还系统性地制作复本，并将复本保存起来。这方面一个关键性的日期是1199年。就在这一年，大法官法庭的文书们开始用一捆捆的羊皮纸来保存复本，其中大多数是从大法官法庭盖了章、往外发出去的信件——这当然包括所有重要的信件。大法官法庭记录本的存世即意味着从1199年开始，历史学家们所了解的政府日常工作要比此年份以前详细许多。

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发展情况。文件的激增意味着从习惯于记

忆事情到把它们记录下来的转变。这也意味着在这一时期全国人口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扫盲运动”，就连那些并不识字的人也变得习惯于通过文字的媒介来办理日常事务。显然这种识字心态的发展是与俗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紧密相关的。起初，新学问的动力都来自国外，如意大利和法国的一些城镇和大教堂，但是到了12世纪的后期，英国已经出现了一些高等学府，13世纪20年代，又有两所大学相继得以创立，先是在牛津，接着是在剑桥。在牛津大学的学院里，人们可以学到诸如产权转让、行政管理和初级法律程序等非常实用的课程。在英国各地，都出现了各层次学校不断增加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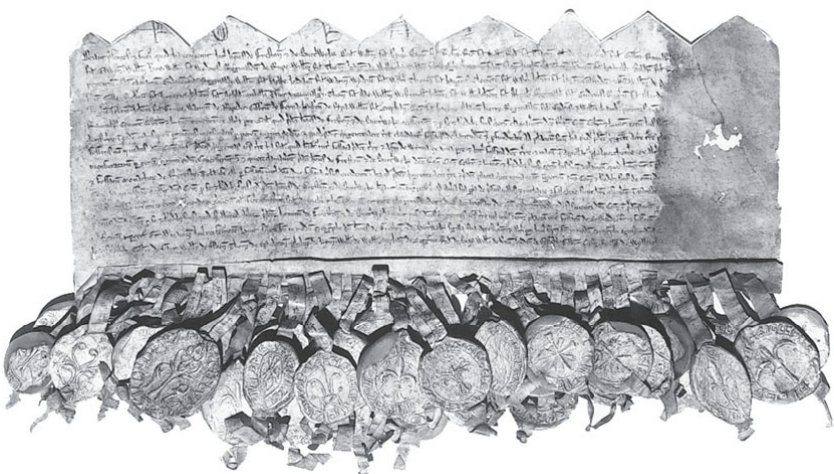

图2　带有誓约标志的契约。这份契约记载了13世纪20年代一位贵族与林肯郡弗莱斯顿和巴特韦克这两地民众签订的一项协议。在契约上连接其誓约标志的约50位村民显然生活在一个已经完全习惯于使用法律文书的社会之中。

然而这些意义深远的发展是否跟社会组织其他方面的革命性变化有关呢？显然，制作所有这些文字材料意味着社会正变得更加官僚化，但这意味着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正在被维持，还是正在被改变？经济制度是否正在改变？政治制度是否正在改变？抑或两者只是被更加详尽地记载下来而已？

这些都不是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证据需要不断积累的性质很容

易给人假象。例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形式可能是在13世纪被首次清晰地记录下来。但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关系本身就是在那个世纪最早产生的？或者这些类型的关系只是在当时才以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或者这恰好是相关文件得以传世的最早时期？一个关键的例子就是，一种被称为“扈从契约”（indenture of retainer）的文件最早就是在13世纪流传下来的。这种契约记载了扈从为贵族服务的各种条款；文件中通常会确定他每月的工资，假如是一个长期的合同，则会写明他的聘用费。在这些文件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们确定“契约扈从”和“雇佣军”都是在13世纪末才开始出现，而且它们都具有中世纪晚期、即“亚封建主义”[4]（bastard feudalism）时期的特征。然而有清楚的（尽管是间接的）证据表明，拿聘用费和工资的雇佣军和扈从至少早在1100年就已经存在。还有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难题。由于文件的激增在英格兰发生的时间要比在威尔士和苏格兰更早，规模也要大得多，所以撰写英格兰的政体、法律、教会和经济等公共机构的历史要比撰写不列颠其他部分的相关历史容易得多。但读者也应该记住，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这个岛国的绝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英格兰。在进一步探讨中世纪英国历史之前，先简单勾勒一下主要历史事件将是十分有用的，我们将焦点集中在与英格兰国王最相关的那些事件上。

威廉一世（1066—1087）

在1071年之后，威廉对英国的统治已经相当稳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并没有给他制造任何麻烦。斯堪的纳维亚的统治者们继续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英国，然而始终存在的另一次北欧海盗入侵的威胁从未成为现实。从1071年起至其统治结束止，威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大陆的战争和外交上。诺曼底是他的家乡，而且远比其统治的岛国更容易受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威廉的好几个邻居都因为他新的实力而感到惊恐，并且抓住每一个机会想要削弱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王腓力一世（King Philip of France）和安茹“粗暴的”富尔克伯爵

（Count Fulk le Rechin of Anjou）。他们最好的机会是由威廉的长子罗贝尔（Robert，1054年生）所提供的。虽然早在1066年罗贝尔就已经被确认为诺曼底的继承人，但他始终没能享有金钱和权力；从1078年起，他开始参与到一系列反对他父亲的阴谋中。在法国国王与诺曼底公爵之间发生的纷争中，一个天然的战场就是韦克辛，即塞纳河北岸位于鲁昂和巴黎之间一块有争议的领土。威廉于1063年征服的曼恩在诺曼底与安茹的敌对行动中扮演了一个类似的角色。曼恩在后两代人中间始终是一块双方争抢的肉骨头，而韦克辛被争夺的时间还要更长（直到1203年）。就这样，在威廉的统治下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主宰下一个世纪的政治模式：即家族之间的纷争与领土的争议交织在一起。在这种背景下，威廉之死的时间发人深省。法国要塞芒特的卫戍部队突袭了诺曼底。威廉采取了报复行动，当他的军队于1087年7月攻陷芒特时，威廉身受致命重伤。当时罗贝尔正参与叛乱，并选择留在腓力一世国王的宫廷里。而他的弟弟小威廉则孝顺而执意地守护在父亲的床前。1087年9月9日，威廉一世气绝身亡。他的尸体被抬到了他位于卡昂的圣斯蒂芬大教堂。威廉在晚年变得非常肥胖，当侍从们试图把他的尸体塞进石棺时，它竟胀裂了，使整个教堂都充满了难闻的臭味。对于一位一生都极为幸运和能干的国王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幸的结局。

威廉二世（1087—1100）

无论威廉的最后遗愿是什么，有许多人认为他的长子应该获得父亲的世袭财产，即父亲本人所继承的那些土地。于是，尽管罗贝尔参与了叛乱，他还是继承了诺曼底。然而一个人自己谋得的财产，无论是通过购买、婚姻或征服，则更容易为其他家庭成员所分享。所以，英格兰这块由征服者赢得的广袤土地被他的二儿子威廉所获得。罗贝尔自然反对这样的分配方案，若非因为发动叛乱，他本来是能够继承英格兰的。

显然，有关继承王位的那些习俗惯例仍然是有弹性的。它们可以（也应该）加以修改，以顾及政治现实，例如竞争对手的性格。于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坎特伯雷的兰弗朗克大主教（Archbishop Lanfranc of Canterbury），决定接受红脸威廉（William Rufus）为英格兰国王。他们也许认为他要比哥哥更适合做统治者。参照罗贝尔在1087年以前和以后的表现，这个选择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判断。然而即位国王没几个月，红脸威廉就发现自己受到了一个由男爵和权贵所组成的强大联盟的反对。根据盎格鲁—诺曼编年史家奥德里克·维塔尔（Orderic Vitalls）的记载，叛乱者的目标是重新把英格兰和诺曼底组成一个整体，这并非是为了宪法规定的某些原则，而是为了解决他们自己的政治难题。奥德里克通过叛乱者头目巴约的奥多（Odo of Bayeux）之口总结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如何才能恰如其分地服务于两个相隔很远又相互敌对的主人呢？假如我们效忠罗贝尔，我们就会触怒他的弟弟威廉，他就会剥夺我们在英格兰的岁入和荣誉。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服从于威廉，罗贝尔公爵就会剥夺我们在诺曼底的世袭财产。"这种论点诉诸强大的既得利益，并且能够轻而易举地推翻红脸威廉的统治。假如盎格鲁—诺曼联合王国只能有一个统治者的话，那么人们就很难剥夺长子的权利。对于红脸威廉来说，幸运的是他哥哥缺席了这场纷争：罗贝尔留在了诺曼底，弃他的支持者于危难之中。虽然1088年的那场叛乱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但它确实显示出，身为英格兰国王，却又不是诺曼底公爵，这样的处境将会有多么危险。

纵览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Henry I）在位的那48年（1087—1135），可以看出英格兰的几次叛乱（1088、1095、1101、1102）都集中在两个时期（总共约15年时间），即当英格兰国王不是诺曼底公爵的1087—1096和1100—1106年间。显然，英格兰和诺曼底有不同的统治者对于国王来说是不利的。然而对于贵族来说也是不利的。正如巴约的奥多所阐明的那样，局势不稳定会给他们带来许多危险。每当跨越英吉利海峡的王国被分割为两半时，就会出现一个冲突的时期，只有当一位统治者推翻另一个统治者时，局势才会稳定下来。这

样，英格兰国王最为关注的事情就是要战胜和控制诺曼底。

1089年，红脸威廉对诺曼底公国提出了所有权要求。他利用英格兰的银子来进行贿赂，从而得到了别人的支持，而且他所发动的战役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他对英格兰的控制仍然不够稳固；1095年，他面临了一场政变的阴谋。第二年，紧张的局势才得以缓和，至少暂时是这样，而且是以一种完全不能预见的方式。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巡回布道的惊人成功创造了一种舆论气氛，使得成千上万的人都决定参加一场旨在把耶路撒冷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来的远征。对于罗贝尔·柯索斯来说，这为他摆脱越来越困难的国内政治局势提供了一个既体面荣耀又激动人心的方式。为了装备自己及扈从以参加远征，他把诺曼底以一万马克的价格抵押给了威廉。

新公爵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收复在罗贝尔懈怠的统治下所丢失的曼恩和韦克辛。到了1099年，他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红脸威廉将他父亲的王国恢复到了以前的疆界。事实上，通过把埃德加（Edgar）于1097年扶上苏格兰的王位，他甚至比父亲更为有效地对苏格兰进行了干涉。

有一位12世纪初的作者杰弗里·盖玛（Geoffrey Gaimar）把威廉二世视为一位理想的统治者。但盖玛是用法语写作的。不幸的是，教会神职人员用拉丁语写成的历史著作对于威廉的名声有着更大的影响。生性严肃、并习惯于威廉一世宫廷内那种虔诚和谨慎传统的教会人士对红脸威廉宫廷内的豪华铺张、虚荣粗俗和追逐时尚——如留长发——深感厌恶，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倾向意味着柔弱和淫乱。红脸威廉从未正式结婚。按照《威尔士亲王编年史》的说法："他纳妃姘居，因此去世时没有留下继承人。"他也许对宗教主张持怀疑的态度；无疑他把教会视作是可供敲上一笔竹杠的富裕行会。他从不着急指定主教和修道院长，因为当这些位置空缺时，他就可以自己挪用教会的收入。在执行这些有利可图的政策时，红脸威廉依赖于一位机智而世故的文书雷纳夫·弗兰巴德（Ranulf Flambard）的足智多谋，并且最终让弗兰巴德出任了达勒姆主教。

1093年红脸威廉的名声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当认为自己大限将

至的时候，他指定了一位圣洁的学者贝克的安塞姆（Anselm of Bec）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这个主教职位空缺了4年之后）。从威廉的角度看，这项任命是具有灾难性的，因为它正好发生在欧洲教会改革运动——即格列高利改革[5]——期间，这项运动造成了一种有争议的氛围，使得那些圣洁的教徒很容易成为政治上的激进派。1095年，威廉在罗金厄姆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解决他与安塞姆之间发生的争执。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是，安塞姆大主教向罗马教廷提出了申诉，说身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他不能接受一个世俗法庭的评判。11世纪后半期教皇权力的提升，以及它对高级教士首先要忠诚于它的要求，把一种新的和令人不安的因素带上了政治舞台。假如教会的神职人员坚信他们对上帝的义务高于他们对国王的职责（正如圣彼得的教区牧师所定义的那样），那么人们所习惯的世界结构就会变得颠倒过来。

从建立独立的宗教等级体系这个角度来说，安塞姆的论点非常有力；他所依据的前提令他占据了争论的上风。然而红脸威廉也有很好的理由；不仅如此，他还握有权力——与一个专横国王所能得到的物质资源相抗衡时，一个学究气十足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实际上处于一个非常虚弱的地位。威廉继续骚扰大主教，从未对他改革教会的尝试表示过任何同情。结果安塞姆再以无法忍受了。1097年，他乘船离开了多佛，把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地产权全都留给了国王。从短期来看，国王在这次争执中占了上风。1100年他独享了3个主教辖区和12个修道院的收入。同时这场纷争似乎并未削弱这位受过涂油礼的国王在臣民心中的至高权力地位。就连撰写《安塞姆传记》的坎特伯雷僧侣埃德默（Eadmer）也这样评论红脸威廉："风与海洋似乎都臣服于他。"确实，埃德默继续说道："在打仗和征服领土等方面，他是如此成功，你会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对他微笑。"至于威廉二世在1100年的地位是否真的这么牢固则是另一回事；强调伦理道德的编年史家刻意把他描述成一个自负和自夸的国王，一个在似乎要到达成功的顶点时突然被命运所击倒的国王。1100年夏天，大家肯定都已经知道，由于罗贝尔公爵不在而造成的和平插曲行将结束。这位十字军东征的参与者正在回家的路上，不仅身边有一位富裕妻子的陪伴，而且头上还有一个直

捣圣城耶路撒冷的英雄光环。当柯索斯重新索要他的遗产时，谁又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那些盎格鲁—诺曼权贵们会站在哪一边？事情就是那么凑巧，1100年8月2日在新森林（New Forest）发生的一次狩猎事故使这位强悍并受到众多诽谤的国王死于非命。同样凑巧的是，威廉的弟弟在国王去世的那一天正好也在新森林。

亨利一世（1100—1135）

获知红脸威廉的死讯，亨利迅速采取了行动。他骑马前往温切斯特，接管了国库。接着他又直接来到了威斯敏斯特，于8月5日在那儿加冕成为国王。这样的神速使人猜测亨利事先知道他的哥哥即将遇害身亡，以及他“策划了狩猎事故”。但是没有同时代人提出指控，而且假如果真是亨利如此冷酷地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他所选择的时机很可能会有所不同。红脸威廉与罗贝尔之间即将爆发的战争一定会以他们中间一个人的失败或被消灭为结束。换言之，假如推迟暗杀的话，就会使暗杀者有希望同时获得 英格兰和诺曼底。而实际情况是，红脸威廉于1100年8月的死亡意味着亨利必须以惊人的速度来夺取盎格鲁—诺曼联合王国只有一半的控制权。一个在动手之前可以等待那么长时间的人肯定是会再等待一两年的。

几个星期之后，罗贝尔回到了诺曼底。亨利不得不准备防御不可避免的入侵。他的政策就是用施舍恩惠和作出广泛让步的方式来获得支持。这是他在加冕那天就宣布的一项政策，当时他颁布了自由宪章，谴责他哥哥压迫人民的做法，并且答应建立一个好的政体。另一方面，组织防御的迫切需要意味着亨利不能够承受引起过多混乱的后果。这是一个表明姿态和发表宣言、但绝非推翻整个政权的时期。形势的现实就是他哥哥留给了他一个现成的宫廷和管理机构，而亨利除了接管它们之外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当罗贝尔公爵于1101年7月在朴次茅斯登陆时，英格兰许多实力最大的男爵在贝莱姆的罗伯特（Robert of Bellême）和其兄弟们的率

领下，聚集到了他的麾下。但是以默朗的罗伯特（Robert of Meulan）为首的红脸威廉宫廷圈子那帮贵族依然效忠于亨利；英国的教会亦如此。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并且坐下来谈判。亨利得以维持对英格兰的统治，每年向他的哥哥交纳2,000英镑的俸金。

在度过了1101年的危机之后，亨利便开始着手防止这样的危机再次发生。最基本的第一步就是推翻蒙哥马利（贝莱姆）家族。1102年，他夺取了贝莱姆的罗伯特在威尔士边界最主要的堡垒，接着就将他驱逐出境。两年后，他没收了莫尔坦的威廉（William of Mortain）名下的土地。但是罗伯特和威廉这两位伯爵，就像其他伯爵一样，在他们的诺曼底庄园有根据地，可以从那儿组织力量夺回他们在英格兰的土地。通过使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分离永久化，1101年的条约使得政治动荡局面继续存在。所以当前一任国王的历史又重演时，我们发现一位英格兰的国王先是在防御，接着又转入了进攻。在坦什布赖战役（1106）中，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罗贝尔公爵本人被俘，并将作为他弟弟的俘虏在监牢里度过他28年的余生。

虽然在最初的统治年代里亨利一直专注于诺曼底的事务，但他并无太多的空余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专心做这些事。王室对教会的传统权利受到了随着格列高利改革运动而来的新思想的威胁。改革家们不仅希望净化教士们的伦理道德和精神生活，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相信必须把教会从世俗控制中解脱出来。这种控制最令人憎恶的象征就是世俗政权的主教授职仪式，即新任修道院长或主教从任命他们的世俗君主手中接受戒指或权杖的仪式。虽然教皇早在1059年就已经颁布了反对世俗主教授职仪式的第一个法令，而且此后发布了更多的禁令，但是在英格兰，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直至安塞姆于1100年秋天回到英格兰。在流放过程中，他得知了教皇对于世俗主教授职仪式的态度。于是，尽管他本人就是由红脸威廉于1093年授予大主教职位的，但他现在拒绝向亨利顶礼膜拜，也不肯给那些由亨利授予职位的高级教士们祝圣。这使得国王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主教和修道院长们是大地主，即中央和地方政权中的关键人物；他需要他们的帮助，而且必须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另一方面，与红脸威廉不

同，亨利不愿意再挑起争端，所以在许多年当中，他觉得还是拖延这个难题更方便一些，而不是试图解决这个难题。直到1107年，这件事才最终得以解决。

亨利声明放弃了世俗主教授职仪式，但是主教们仍在继续对他们的领主进行顶礼膜拜。实际上国王的祈愿仍然是主教任职的决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亨利放弃了控制的形式，但却保全了控制的现实。当安塞姆于1109年去世时，国王让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位空缺了5年。然而他已经失去了某些东西，而且他知道这一点。在伴随“主教叙任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est）而来的激烈宣传战中，格列高利派坚持认为国王只不过是个平信徒，他的身份要低于所有的教士，因为教士们所关注的是心灵，而国王关注的只是肉体。教会再也不能容忍旧的观念，即认为涂过圣油的国王就是上帝的神圣代理人。在放弃世俗主教授职仪式的同时，亨利就等于承认了他职务的世俗性质。这是王权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当诺曼底被征服、而主教叙任权的争议找到了一个妥协性的解决方案之后，亨利的注意力转向保护他所剩下的东西。虽然他提拔了一些“新人”，但他知道政治的稳定有赖于他培养跟贵族的良好关系。用奥德里克的话来说，“他用荣誉和慷慨来对待权贵们，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和地产，并且通过以这种方式抚慰他们，他赢得了他们的忠诚。”对于亨利地位的一个直接威胁来自于柯索斯的年轻儿子威廉·克里托（William Clito, 1102年生），他宣称他才是合法的诺曼底公爵，而非亨利。这个对手的要求，加上诺曼底漫长的陆地边界，意味着这个公国仍然是他整个王国中最易受攻击的部分。1106年以后，亨利在其统治期余下的多半时间都是在诺曼底度过的，以对付诺曼公爵的传统敌人，其中值得注意的有法王路易六世（Louis VI of France, 1108—1137在位）和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Fulk V of Anjou, 1109—1128任伯爵）。他组织了一个防御性的联盟——把他的至少8个私生女嫁给了邻国的君王，从北方苏格兰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Scotland）到南方佩尔什的罗特鲁伯爵（Rotrou count of Perche）。这种外交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断言，即性对

于亨利来说并非是一桩享乐的事情，而是外交事务。所有这些活动的最终结果就是亨利没有失去诺曼底，而且由于这个原因，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对此大做文章，因为这种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现状。然而对于亨利来说，这可是一桩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至少有一次，在1118—1119年间，他差点失去了诺曼底这块领土。

地图1　盎格鲁—诺曼王国，1066—1154

保卫诺曼底这一头号问题对于英格兰来说也是一件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而且不仅仅是对那些在欧洲大陆拥有地产的大地主们而言。城堡、卫戍部队、外交和战争全都需要用大量的金钱来维持。这种因果关系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关1118年的记载中有着明白

无误的表述："由于跟法国国王、安茹伯爵和佛兰德伯爵之间的战争，亨利国王这一年全年都是在诺曼底度过的……英格兰在这一年以众多赋税的形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人民整年都被这些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国王的长期缺席和他对于金钱的迫切需要是政府机器不断地变得精巧和复杂背后的动力。当国王不在的时候，英格兰是由副摄政委员会来进行管理的。这个委员会要一年两次在财政部碰头开会，在著名的格子桌布上审计各郡长的待结账目。大多数日常的管理工作，尤其是岁入的收取，是在索尔兹伯里的罗杰（Roger of Salisbury）的监督下进行的，他既能干又谨慎，似乎是一位典型的官吏，与性格浮夸的弗兰巴德截然不同。

亨利唯一合法的儿子威廉1120年因白船（the White Ship）的沉没而溺水身亡，这使得亨利精心构筑的大厦轰然倒塌。从那时起，继承人问题便主导了他统治时期的政治活动。威廉死后不到3个月，亨利便娶了一个新的王后，但是他竭力希望得到的王位继承人却并没有出生。所以，尽管亨利有20多个私生子女，但在他身后却只留下了一个合法的后代，即他的女儿马蒂尔达（Matilda）。当她的丈夫，德意志皇帝亨利五世（Henry V of Germany），于1125年逝世的时候，亨利把她召回了自己的宫廷，并让男爵们宣誓接受她为盎格鲁—诺曼王国的继承人。接着，亨利于1127年又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威廉·克里托被承认为佛兰德伯爵。假如他能动用佛兰德的财富来推动他对于诺曼底的主权要求，那么他叔叔的前景将会十分暗淡。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亨利向安茹的富尔克五世提出了马蒂尔达与富尔克的儿子和继承人杰弗里·金雀花（Geoffrey Plantagenet）联姻的建议。1128年6月，马蒂尔达不太情愿地嫁给了一个14岁的少年。毫无疑问，富尔克伯爵取得了一个外交上的胜利：即迈出了安茹家族接管盎格鲁—诺曼王国最重要的第一步。

到了1135年，亨利一世与杰弗里和马蒂尔达之间发生了公开而激烈的争吵。这件事的后果就是驱使那些忠于亨利的权贵们起来反对安茹家族的人。当年迈的国王去世时，这些权贵们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很难跟国王选定的继承人达成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亨利本人挑

起了他死后王位继承权的争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想让他的女儿和女婿来继承王位，但是他没有办法亲自采取可以使他们顺利继承王位的措施。亨利一世曾经是一位极为能干和成功的国王，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但就连他也没能妥善处理王位继承问题的紧张局面。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亨廷顿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ton）把亨利描述成一个永远焦虑不安的国王："他的每一次胜利都只能使他担心自己是否会失去已经得到的东西；因此尽管他看上去是一个最幸运的国王，但实际上他却是最痛苦的国王。"

斯蒂芬（1135—1154）

当亨利一世已处于弥留之际的消息传来时，被老国王选中的两位继承人正住在自己在安茹或曼恩的领地里。但是国王的侄儿，布卢瓦的斯蒂芬（Stephen of Blois），当时则是在他的领地布洛涅。从那儿到英国的东南部只有一天的旅程。这个地理上的巧合给了斯蒂芬一个捷足先登的机会。他首先获得了伦敦人的支持，接着又骑马赶到了温切斯特。他兄弟，布卢瓦的亨利（Henry of Blois），正在那儿当主教。在亨利的帮助下，他既得到了位于温切斯特的国库，又得到了索尔兹伯里的罗杰的支持，后者接受了他所提出的要当国王的要求。然后剩下的就只是说服坎特伯雷大主教来为他的登基祝圣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争辩说，贵族们要效忠马蒂尔达的誓言是无效的，因为当时大家都是被迫的。还有人散播虚假的消息，说老国王在弥留之际改变了有关王位继承人的主意。1135年12月22日，斯蒂芬在威斯敏斯特接受加冕和涂油仪式，成为国王。

盎格鲁—诺曼王国的政治结构意味着斯蒂芬一旦被承认为英格兰的国王，他在诺曼底也就处于了一个强有力的位置。从那时起，诺曼男爵们如果效忠于别人，就会失去他们在英格兰的地产。尤其是那些损失会最大的人都觉得他们必须支持斯蒂芬。所以杰弗里和马蒂尔达为赢得遗产而发动的战争从一开始起就遇到了盎格鲁—诺曼王国大多

数权贵的反抗。

在西部，亨利的死讯引发了一场反抗殖民者的大暴动，因为殖民者们企图将威尔士变成一位同时代人所谓的“第二个英格兰”。但在英格兰本土，斯蒂芬头两年半的统治还算相当平静：事实上，比他的两位前任国王最初的统治年份平静多了。第一个沉重的打击出现在1138年的夏天，当时格洛斯特的罗伯特（Robert of Gloucester）决定加入他同父异母的姐姐阵营。罗伯特的变节不仅意味着斯蒂芬失去了对诺曼底某些战略要点的控制，而且它也是一个信号，说明安茹家族的人即将把他们的斗争推进到英格兰本土。当斯蒂芬眼巴巴地等待着这个打击落到他头上时，他开始对形势失去了控制，尤其是在北方，苏格兰国王戴维一世（King David I of Scotland）夺取了诺森伯里亚。

斯蒂芬得罪了他的兄弟布卢瓦的亨利，因为他没有让他当上坎特伯雷大主教；他逮捕了3个有影响力的“文官”主教，包括索尔兹伯里的罗杰，于是便使得布卢瓦的亨利有理由宣称教会的自由受到了侵犯。在1139年的秋天，当马蒂尔达皇后在阿伦德尔登陆、并似乎成为斯蒂芬囊中之物时，他竟让她安然脱身，到布里斯托尔去跟格洛斯特的罗伯特会合。从那时起，英格兰便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宫廷。假如他囚禁她，那么她丈夫和儿子们的事业就会获得更多的支持。马蒂尔达是个女子这一事实曾经给过斯蒂芬一个机会，但是在一个骑士的时代，它也给了他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1141年2月，斯蒂芬在林肯郡鲁莽应战，并且在能够逃脱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奋战。结果他遭俘，被关进了布里斯托尔的大牢。现已作为教皇使节的布卢瓦的亨利公开地站到了皇后这一边。当年夏天，马蒂尔达得以进入伦敦。但是她轻蔑地拒绝了由教皇使节制订的和平条件，并以她放肆的行为举止冒犯了伦敦的居民。当斯蒂芬的王后，布洛涅的马蒂尔达（Matilda of Boulogne），率领大军向伦敦进发时，伦敦人拿起武器，将皇后赶出了伦敦城。就这样，计划在威斯敏斯特举行的加冕仪式并未举行。马蒂尔达也从未成为过英格兰的女王。几个月之后，格洛斯特的罗伯特也成了战俘。由于他是皇后阵营中的得力干将，马蒂尔达不得不同意交换战俘，即用斯蒂芬换取罗伯特。皇

后失去了得到的地位；英格兰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在诺曼底，形势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安茹的杰弗里留在法国，以便保持对诺曼底公国的压力，同时也照顾他自己在安茹的利益。从1141至1144年间的一系列战役以鲁昂投降，以及杰弗里正式受封为公爵而告终。然而安茹伯爵一心一意想要征服诺曼底的专注劲头使他无法顾及英格兰。

英格兰的内战陷入了一种僵局。作战双方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因为当时的作战兵法都是围绕着城堡来展开的，总的来说防御者占据了优势。1147年10月，格洛斯特的罗伯特一命呜呼。灰心丧气的皇后于1148年初离开了英格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1150年，安茹的杰弗里让他的儿子亨利辅佐他在公国的统治，第二年，当法王路易七世（King of France Louis VII, 1137—1180在位）为报答在韦克辛得到的让步，决定承认亨利为公爵时，上述安排就被合法化了。到了这一步，英格兰与诺曼底之间原有的关系似乎终于破裂了。然而双方都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主权要求，尽管在英格兰双方似乎仍然相持不下，但欧洲大陆的形势却显得变化多端。还不到40岁的安茹的杰弗里去世了，留下他的长子控制诺曼底和安茹。1152年3月，路易七世与王后阿基坦的埃莱亚诺离了婚。8个星期之后，她嫁给了亨利，这样亨利就可以将阿基坦这个幅员广阔的公国纳入他在欧洲大陆的财产之中。

亨利的婚姻可谓是一个大手笔——然而它也给斯蒂芬带来了新的希望。路易七世将亨利的所有敌对者组织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联盟。其结果就是1152年的夏天，亨利不得不在4个不同的战场上同时作战——在阿基坦，在诺曼底，在安茹镇压叛乱，以及在英格兰对抗斯蒂芬。一位见识广博的诺曼编年史家告诉我们，当时人们打赌说亨利在劫难逃。在这个紧要关头，亨利乘船到英格兰来继续与斯蒂芬周旋的决定给同时代人的印象是胆大妄为。尽管如此，亨利还是难以打破英格兰的僵局，而且他的整个地位仍因战线过长而显得十分危险。恰好斯蒂芬的继承人尤斯塔斯（Eustace）于1153年8月死亡，这改变了一切。斯蒂芬的第二个儿子威廉从未想过要当国王，这就为谈判解决争

端打开了通道。

双方的男爵们长期以来都急切地希望得到和平。他们的地产使得他们很容易受到战争的劫掠，以至于他们都不赞成旷日持久的敌对行动。他们不时地会漠视首领们的意愿，自己安排地方上的停火。所以当斯蒂芬和亨利屈从于顾问们的意见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根据1153年12月签订的《威斯敏斯特和约》，双方同意斯蒂芬在生前拥有整个王国，但他应该立亨利为他的继承人。威廉将继承斯蒂芬作为男爵名下的领地。从根本上来说，这个和约是重复了布卢瓦的亨利于1141年所提出的和平条件。马蒂尔达在得胜后缺乏宽宏大量的心态使得整个国家又进行了12年的内战。现在斯蒂芬终于可以在无人挑战的情况下来统治国家了，但是他已经精疲力竭，并没能活多久来享受他新得到的权力。1154年10月25日，他与世长辞，被埋在了他妻子和长子的墓地旁边，而该墓地就位于他与妻子在法弗舍姆所创办的修道院里。

斯蒂芬曾经是一位能干的军队指挥官和勇敢的骑士——但也许太勇武了，反而对自己不利。他的性格要比任何其他诺曼国王都更具有吸引力——但他缺乏他们的专横傲慢，这一点使他无法镇住自己的宫廷或国家。此外，他呆在诺曼底的时间太少，在他整个统治时期只是于1137年去访问过一次。这与他前任国王们的行程大相径庭，而且从盎格鲁—诺曼贵族的“跨海峡结构”来看，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位来自布卢瓦家族的统治者可以说是失败了，因为他作为一名国王过于“英国化”了，而没有意识到英格兰只是一个更大整体的局部。

注释

〔1〕 黑斯廷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 1066. 10. 14）是一场决定英格兰命运的战斗。诺曼底公爵威廉击败了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Harold II），继而占领了整个英格兰。1066年12月25日，威廉一世在伦敦加冕为英格兰国王。——译注，下同

〔2〕 《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是威廉一世成为英格兰国王之

后，为了便于向贵族们收税，于1085—1086年间在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勘查之后所编纂的一个钦定土地调查清册。

〔3〕 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1003—1066），英格兰国王，因笃信宗教而获“忏悔者”这一绰号。

〔4〕 “亚封建主义”是盛行于14、15世纪欧洲以保护制、扈从制和亲缘关系为内容的社会，是从领主制向以支付现金工资为条件、亲缘关系和服务为内容的扈从制的转变。

〔5〕 格列高利改革运动（Gregorian reform movement）是指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间在位）为整顿西方教会而发动的改革，内容主要是反对由国王来任命神职人员，以及修改教会法。

第二章

安茹王朝的国王们

亨利二世（1154—1189）

亨利一帆风顺地接管了政权；这是100多年来第一次有人毫无争议地继承英格兰的王位。作为一个领土从苏格兰边界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的王国君主，他可能是欧洲最有权力的国王，甚至比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还要富裕，并且完全压倒了他在欧洲大陆的财产名义上的宗主国君主，即法兰西国王。虽然英格兰给了他巨大的财富和一个国王的头衔，但该王国的中心却是在别处的安茹，也就是他父辈们的土地上。

他在英格兰的首要任务就是挽回斯蒂芬统治期间所遭受的损失。到了1158年，这项任务终于完成了。最富有戏剧性的例子就是在1157年，他施加外交压力，迫使年轻的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四世（Malcolm IV）把坎伯兰、威斯特摩兰和诺森伯里亚归还给了英格兰国王。然而在威尔士，亨利发现很难恐吓圭内斯的欧文（Owain of Gwynedd）和德赫巴斯的里斯（Rhys of Deheubarth）这两位实力雄厚的君王。在1157年和1165年，亨利使用了武力，但由于威尔士人的游击战术和倾盆而下的夏季阵雨，亨利两次均无功而返。1165年之后，亨利对威尔士君王们的态度变得更为通融。早在1155年，他就已经在考虑征服爱尔兰。然而直到1169—1170年间，对爱尔兰的进攻才真正发起。先是一些贵族从威尔士边界发兵，然后（1171—1172）才是亨利本人率大军亲征。长期拖延表明，在国王的眼里还有其他远比爱尔兰问题更为急迫的事情要办。

在他34年的统治生涯里，亨利二世有21年生活在欧洲大陆。从社会和文化角度来看，英格兰与安茹领地的法国部分相比，显得有点死气沉沉。位于塞纳河、卢瓦尔河以及加龙河流域的繁华社区是学问、艺术、建筑、诗歌和音乐的中心。阿基坦和安茹生产中世纪贸易中最基本的两种商品：酒和盐。这些商品可用来交换英格兰的布匹，而且这种生意肯定给这位君王带来了优厚的利润，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

在他的统治之下。作为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和安茹伯爵，亨利继承了他的前任国王们对于邻国的领土扩张要求。这些领土要求导致了对南特进行的干预（1156），亨利在那儿安插了自己的兄弟杰弗里（Geoffrey）作为伯爵；导致了1159年对图卢兹的远征，其结果是夺取了卡奥尔和凯尔西[1]；导致了1160年诺曼韦克辛的回归；最后，作为1166年不断入侵的结果，它导致了对布列塔尼的占领，亨利将儿子杰弗里（Geoffrey）安插在那儿作为公爵。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亨利并不是因为他所取得的胜利才被人们记住的，而是因为他在谋杀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1162年6月，贝克特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讲究体面的教会人士眼中，从1155年起就担任大法官的贝克特并没有资格担任英格兰教会中的最高职位。他却证明了他是所有可能成为大主教的人选中最称职的，使世人大为惊愕。从一开始，他就刻意反对出于友谊提拔了他的国王。不可避免的是，亨利不久就开始像一个遭到背叛的人那样作出了反应。在12世纪中期，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也通常是被善意的人们束之高阁，但它们也可以为那些一心想要吵架的人提供一个发作的机会。

亨利选择了“犯罪的教士”这个问题来跟大主教算账。就像许多其他俗人一样，亨利憎恨那些犯了重罪的教士通过要求在教会法庭审判来逃脱死罪的做法。1163年10月，在威斯敏斯特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亨利要求那些犯罪的教士应该由教会免去圣职，然后把他们交给世俗的法庭判罪。贝克特联合其他的主教同事们，反对国王提出的建议；但是当教皇亚历山大三世（Pope Alexander III）请求他采取更为和解性的措施时，亨利在克拉伦登召开了一个会议（1164年1月）。他对主教们发表了一个有关国王对教会惯有权利的声明——即《克拉伦登宪章》——并且要求他们切实遵守这些惯例。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贝克特争辩了两天之后终于屈服了。然而当其他所有的主教们都像他一样答应这个要求时，贝克特又为自己的软弱感到后悔。亨利被彻底激怒了，于是决定消灭贝克特。他将贝克特召到王宫里，捏造了指控要他进行答辩。结果大主教被判有罪，并被剥夺所有的家

产。陷于绝望的贝克特逃到英吉利海峡另一边，向教皇进行申诉。由于他先是坚持原则，后又产生动摇，贝克特使英格兰教会陷入了一个混乱的状态。

在贝克特流放期间，亨利在其后5年都专注于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他征服了布列塔尼，重整了英格兰司法系统。接着在1169年，有关王位继承人亨利王子（Prince Henry）加冕仪式的问题导致国王、教皇、大主教之间无休止的谈判被当作紧急事务得到了解决。1170年，贝克特回到了英格兰，决心要惩罚那些参加了年轻国王加冕仪式的教士们。他的敌人们不失时机地把大主教张扬的行为举止告诉了亨利。“难道没有人替我除掉这个狂暴的教士？”亨利激愤的话语被他手下4位骑士过于当真了。他们急于获得国王的恩典，便迅速赶到了坎特伯雷，于1170年12月29日在贝克特自己的大教堂里谋杀了这位大主教。这一事件使整个基督教世界感到震惊，并且使贝克特在破纪录的短时间内被追认为圣徒。在大众的记忆里，这位大主教象征着对国家权力机构的压迫所进行的反抗，但实际上没有了他，每个人都会活得更好。当抗议的风暴趋于平静时，国王对他广袤王国的控制显然一点也没有因为有关贝克特的争议而动摇。在12世纪70年代，亨利站在了权力的巅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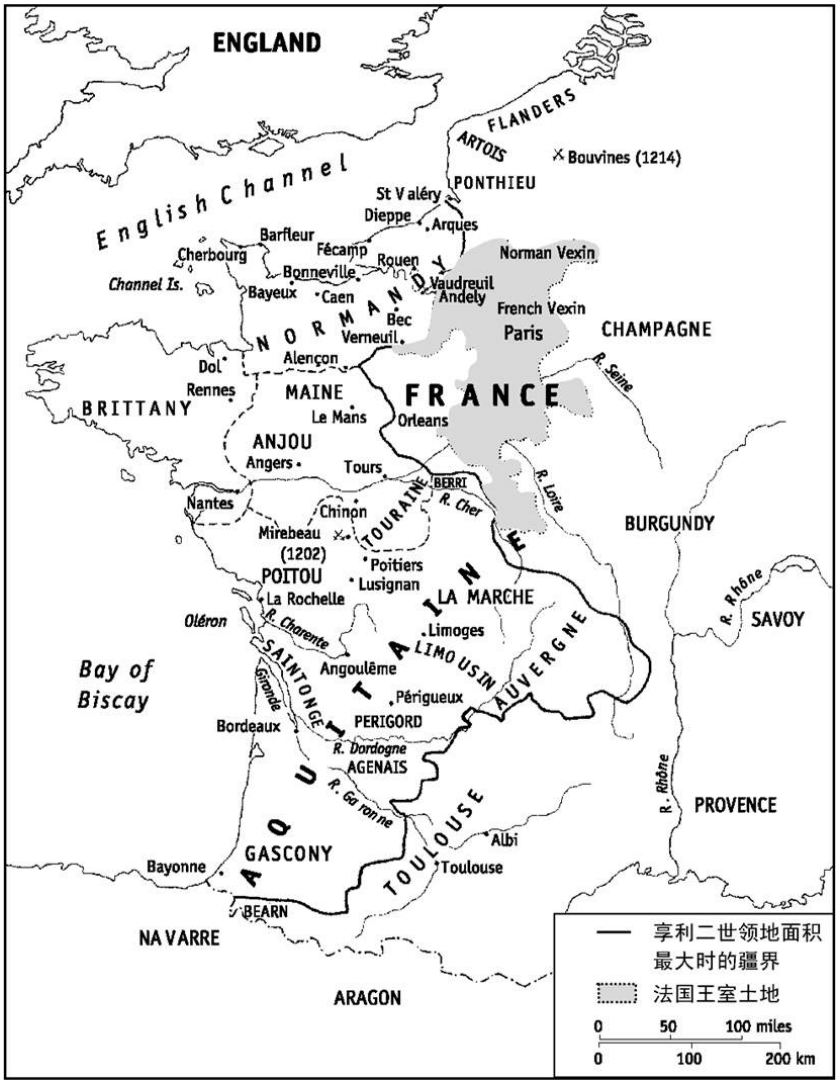

地图2　亨利二世的欧洲大陆领地

图3　反映托马斯·贝克特生前和被害的两个场景。左：亨利二世听取人们关于贝克特拒不妥协的抱怨。右：大主教被谋杀。

此时亨利二世已经决定，在他死后他的领地将在他的3个最大的儿子之间分割。亨利将得到他父亲的遗产，即安茹、诺曼底和英格兰；理查（Richard）将得到他母亲的遗产阿基坦；杰弗里将获得父亲扩张得到的领土布列塔尼。在那时并没有给约翰（John）留下什么遗产，但后来到了1185年，他得到了允诺，将获得父亲另一块扩张所得的领土，即爱尔兰。到那时，亨利二世的分割遗产计划已经遇上了麻烦。问题就在于这些计划唤起了儿子们过多的期望，而当亨利二世仍把真正的权力捏在自己手中时，他是无法满足这些期望的。就这样，从1173年起，亨利为对付造反的儿子们而不胜烦恼。不仅如此，那些叛乱者还总是能在法兰西国王的宫廷里受到热烈的欢迎。1180年之后，这事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那一年，处事温和的路易七世把王位传给了儿子腓力二世（Philip II Augustus），一位决心消灭安茹王国的奸诈政治家。亨利二世的两个儿子，即王位继承人亨利和三子杰弗里分别于1183年和1186年辞世，这本来可以减少亨利的麻烦，但是这却被老国王对约翰的明显偏爱所抵消，因为这种偏爱引起了理查的恐慌。理查与腓力所结成的联盟打败了亨利二世，老国王在失败之后于1189年7月6日在希农逝世。

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中，统治广袤领土的任务对于亨利来说才显得过于沉重。他不停地从他王国的一个角落奔到另一个角落，几乎给人一种他无处不在的印象——正是这个印象使得臣民们效

忠于他。虽然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如内廷总管处、大法官法庭和军事指挥机构等都随他一起旅行，但是王国的幅员辽阔不可避免地刺激了地方行政机构的进一步发展，以便能在国王离去的时候处理日常的司法和金融事务。于是就像别的地方一样，英格兰的政府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官僚化。这种变化，加上亨利二世对于合理改革的兴趣，使得他被世人视为英国普通法的创始人，以及一位伟大并富有创造力的国王，但是在他自己的眼里，这些都是次等重要的事情。对于他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家庭政治，所以他去世前认为自己是一位失败者。但是在30多年当中，他在这方面还是十分成功的。

理查一世（1189—1199）

理查与腓力二世的联盟意味着他作为父亲权利和领土继承人的地位是无人敢于挑战的。约翰依旧是爱尔兰的君王；届时布列塔尼也将成为杰弗里的遗腹子，即现在已经两岁的阿瑟（Arthur）的领地。其余的领土全都任由理查处置。

然而理查不希望在英格兰长期居住。他于1172年成为了阿基坦公爵，从那时起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欧洲大陆度过的。就连他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他所统治的领土远远不止英格兰。结果他就像父亲那样，有着更为广泛的兴趣，担负了更大的责任。这种责任的一个方面就是他给予耶路撒冷王国的支持，该王国是由安茹王室一个旁支的女儿所统治的，她嫁给了理查在阿基坦的一位扈从。1187年11月，当他听说萨拉丁（Saladin）在哈廷战役中大获全胜的消息之后，理查立即参加了十字军东征。因为受到父亲统治末期牵涉进家庭纠纷一事的拖累，理查现在决心一旦筹集到足够的军饷，以及为他长期缺席的情况下各个领地的妥善治理作好安排后，就挥师前往东方。

1190年7月，他和腓力二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出发了。直到1194年3月理查才重新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在此期间，他率领了一

支舰队和一支大军赶赴地中海的另一端。尽管没能重新夺回耶路撒冷，但他在与强大对手萨拉丁的作战中还是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战绩。在十字军东征的战役中，理查应对并解决了诸如威廉一世、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及亨利五世（Henry V）等其他英格兰武士国王们都未曾遇到过的巨大后勤难题。他于1192年谈判达成的《雅法和约》使得参与十字军东征的那些国家还能够继续生存了一个世纪。在英格兰的国王中，理查在世界史的重大事件中独一无二地扮演了一个积极的领袖角色。

在他参加十字军东征期间，英格兰于1191年发生了一些动乱，但是他的应变计划使王国又恢复了稳定的局面。法兰西国王腓力回国之后曾企图乘理查不在而占英格兰的便宜，但这种企图也未成功。假如理查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于1193年1月回来的话，他就会发现自己的王国领土依然完整。

他的领土所遭受的蹂躏是他被囚于德意志期间发生的。他在监狱里呆了一年多的时间（1192年12月—1194年2月），而且正如人们在1193年所认为的那样，很可能会在那儿呆上更长的时间。

即便在这些不利的环境之下，理查在英格兰的代理人也成功平复了理查幼弟的叛乱行为。真正的损失主要发生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诺曼底，因为腓力在那儿侵占了韦克辛，并且差点攻陷了鲁昂城本身。

理查于1194年2月在交纳了10万马克之后被释放，这笔钱是国王赎金中先行支付的2/3部分。在简短访问了英格兰（1194年3—5月）之后，他回到了欧洲大陆，并在之后的5年当中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收复了他被囚期间迅速失去的领土。到了1198年年底，理查纯熟的外交手腕、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与日俱增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使得他成功收复了他以前失去的几乎所有领土。就在那时，在1199年4月，理查因在围攻利摩日附近的沙吕——沙布罗尔、即镇压由昂古莱姆伯爵（the count of Angoulême）和利摩日子爵（the viscount of Limoges）率领的叛乱时受伤而死。在安茹和卡佩这两个王族的争斗中，理查之死将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

理查的伟大过人之处之一就在于他选择手下大臣的能力，尤其是他在英格兰选中的休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作为首席政法官、坎特伯雷大主教和教皇的使者，休伯特·沃尔特代表了国王与教会之间和谐的合作。在英格兰，就像在安茹王国的其他省份一样，理查的长期缺席就意味着要在沃尔特的监督下不断发展出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机制。从理查臣民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不断增加的沉重赋税，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战争的经济负担曾经使得安茹王国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

图4　12世纪人们用烧红的器械来烙伤口，图的下方可以看到有一位助手正在给这些器械加热。（该插图出自12世纪达勒姆大教堂小隐修院一位名叫赫伯特［Master Herbert］的医生之医学论著。）

约翰（1199—1216）

理查没有留下合法的后代，所以当他逝世时，安茹王国的各个不同部分选择了不同的继位者。英格兰和诺曼底的男爵们选择了约翰，安茹、曼恩和图赖讷却选择了布列塔尼当时12岁的阿瑟；阿基坦继续由约翰的母亲埃莉诺（1204年去世）代表儿子进行统治。到了1200年5月，约翰已经把阿瑟赶下了台，并且使自己成为整个安茹王国的君主，尽管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抛弃了所有的盟友，并且根据1200年1月签订的《勒古莱特条约》把韦克辛和埃夫勒割让给了法兰西国王腓力。同年晚些时候，他宣告自己的第一桩婚事无效，并迎娶了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Angoulême）。与昂古莱姆的这位女继承人结婚对他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假如约翰给她的未婚夫吕西尼昂的休（Hugh of Lusignan）支付适当的补偿的话，也许一切都会安然无恙。然而这次婚姻却引出了一系列的事件，导致休向法兰西宫廷提出了申诉，而且还导致了1202年法王腓力宣布没收约翰所有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地——即他所持法兰西国王的封地。由于他对待安茹和普瓦图首要男爵们的态度不当，从而丧失了于1202年7月在米尔博俘虏阿瑟时所赢得的所有优势；有关他侄儿被谋杀（1203年4月）是由他指使的有鼻子有眼的传闻进一步损害了他已经有污点的名誉。在一种怀疑和恐惧的气氛中，约翰觉得无法组织一次有效防御。1203年12月，他认输并撤回了英格兰。腓力侵占了诺曼底、安茹、曼恩、图赖讷和除去拉罗谢尔之外的整个普瓦图。这些令人羞辱的军事挫折使约翰得到了一个新的绰号。“无地王”[2]（Lackland）现在成了“软剑”（Soft-sword）。

1203年12月前，约翰就像其父亲和兄弟那样，大部分的统治时间是在欧洲大陆的领地上度过的。从那一年以后，他在环境的逼迫下，成为了一位英格兰国王。自从斯蒂芬的统治以来，这个国家还没怎么见过它的君主长期驻扎，然而一位总是怀疑人们在阴谋反对他的国王很难给人民带来快乐和益处。约翰的存在给人们带来的压力甚至在北方都能够感觉到，那儿的人们还不习惯英格兰国王的大驾光临。

他们的憎恨所达之程度可以在1215—1216年间反对约翰的北方人的人数上体现出来。毫无疑问，他面临着真正的困难。他责无旁贷地试图收复他失去的遗产，1203—1204年间的征服意味着法兰西国王现在已经是一个更令人生畏的敌人。此外，约翰统治初年的物价飞涨也会腐蚀皇家岁入的真正价值。结果，约翰经常征收繁重的赋税并制定严厉的森林法，其中后者是一种有利可图、却非常不受人欢迎的收入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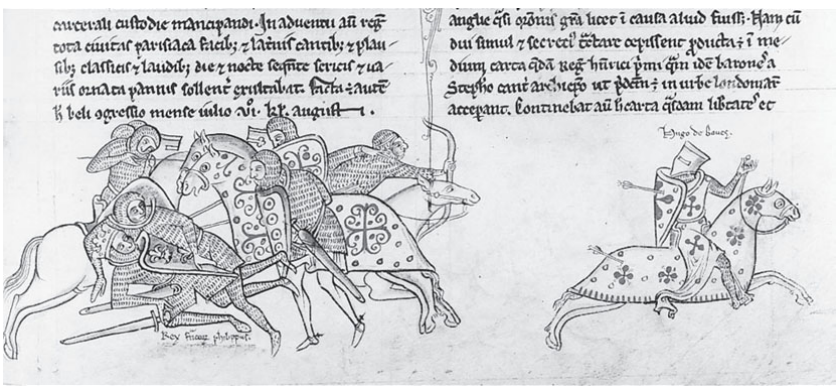

图5　1214年布汶战役中的一个戏剧性场面，圣奥尔本斯教堂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的作品，此人也许是13世纪英格兰最著名的画家。法兰西国王腓力被打下马来。假如他一直被困在地上，约翰的许多麻烦也许就可以解决了。请注意那些全副武装的骑士们的武器的多样性：剑、长矛和弓。

约翰还跟教会翻了脸。1205年坎特伯雷主教区一次有争议的选举导致了他与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的冲突。1208年英诺森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发布了一个禁令，暂停了那儿所有的教堂礼拜仪式，并且一停就是6年。1209年，约翰本人也被逐出了教会。无论约翰还是世俗社会的民众似乎都没有对这种状况表示过多焦虑；事实上，由于约翰对禁令作出的反应是没收教会的地产，它甚至还帮助减轻了他的财政困难。但是1212年一次男爵们的阴谋和腓力企图渡过英吉利海峡的计划使得约翰意识到，被逐出教会的国王特别容易遭受叛乱和入侵。所以他决定与教会和解，以便能腾出手来对付更危险的敌

人。他于1213年5月同意把英格兰作为教廷的一个采邑，以此完全赢得了英诺森的支持，于是在此后的斗争中约翰便以教皇的追随者自居。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所有的人现在都开始关注约翰试图收复他失去领土的努力有何结果。1214年，他领导了一次对普瓦图的远征，但是他所组成的联盟在布汶战役（1214年7月）中的失败必然导致他欧洲大陆战略的失败和在英格兰开始发生叛乱的局面。然而叛乱者也有其真正的困难。通常叛乱的领导权是由一位心怀不满的王室成员所掌控的。在阿瑟被消灭之后，约翰再也没有一位这样的对手。他自己的儿子们还过于年幼。唯一可能的候选人就是腓力二世的儿子路易（Louis），但是一位卡佩家族的王子算不上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叛军领袖。所以叛乱者想出了一种新的反叛焦点：即一个改革方案。1215年6月，叛乱者在夺取伦敦之后，迫使约翰接受了在一个文件中所列出的条件，这个文件后来就被称作《大宪章》。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对过去60年安茹统治中某些令人讨厌的特征所进行的敌意评论。就其本身而论，它显然是约翰所不能接受的，他把这份在兰尼米德所签订的协议只是看作争取时间的一个手段。促使《大宪章》得到实施的企图只是导致了进一步的纷争。最后，叛乱者只能邀请路易登上王位。1216年5月，他进入了伦敦。当约翰在沃什湾的流沙中失去他的部分辎重队之后不久，他本人于1216年10月逝世，之后英格兰因内战而陷入分裂，战争的局势对于安茹王朝显得非常不利。

约翰具有的某些品质使得一些现代历史学家特别喜欢他。他对政府和法律事务的细节非常感兴趣，然而在他的那个时代，这些东西被视为雕虫小技。如果认为他比前任国王们更加忙碌，那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从1199年起的大法官法庭记录的存世使得历史学家们首次可以看到，国王手下的政府是如何开展其日常工作的。其结果就是，他们有时候得到的印象是约翰非常能干。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不称职的国王，在那些真正重要的方面，即如何管束他那些位高权重的臣民这一问题上，他显得极为弱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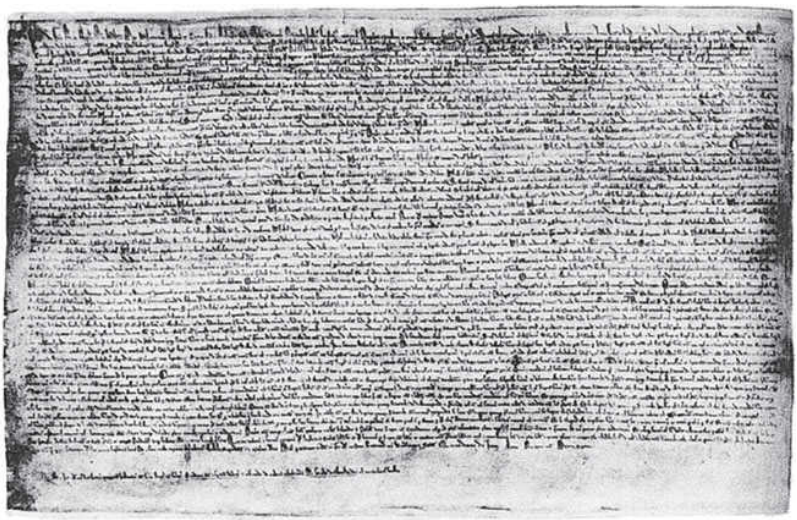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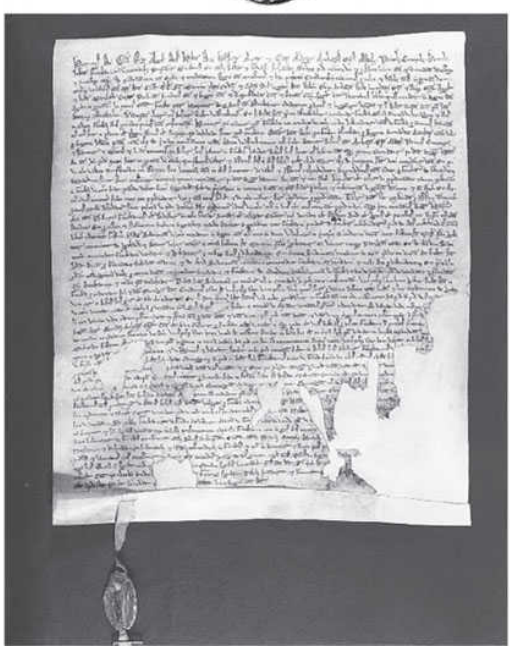

图6　《大宪章》。虽然作为一个和约，1215年的宪章（见顶部）是失败的，然而作为一个法律声明，它却一直受到很高的重视。在约翰去世以后，它被进

行了修正，并分别于1216、1217和1225年重新颁布。在1217年第二次重新颁布这部宪章的同时，还附了一个专门针对森林法的小宪章（见底部），因此它就被后人称作《大宪章》（*Magna Carta*）。

亨利三世（1216—1272）

代替约翰9岁的儿子亨利（Henry）掌权的少数派顾问委员会很快就获得了陆上（1217年5月的林肯战役）和海上（1217年8月的多佛战役）的战争胜利，这是亨利的父亲所没有得到过的。由于受到战败的影响，路易的支持者迅速减少。1217年11月，他接受《兰贝斯条约》，撤出了英格兰。

直到1232年，亨利才开始亲政。少数派往往会造成阶段性的政权不稳定；但总的来说，那些少数派的代表，尤其是在政治上辅佐亨利直至他成年的于贝尔·德布尔（Hubert de Burgh），做得相当不错。大部分的权力斗争都发生在议事室里；导致动武的事件很少，而且往往时间很短。作为一系列抚慰性举措的一部分，《大宪章》得以增补和重新颁布。但是当顾问委员会的贵族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己的竞争和在英格兰、威尔士发生的事件上时，他们对于国王在海外的遗产自然并不是那么关注。他们中间没有人在普瓦图和加斯科涅拥有地产。1224年，就在这样一次内部争吵中，他们的卡佩家族敌人，当时的路易八世，侵占普瓦图，夺取拉罗谢尔，并且威胁到了加斯科涅。1225年的一次远征巩固了英格兰在加斯科涅的地位，但是并没有为收复普瓦图作出任何认真的努力。此后1230年和1242年的两次远征规模更为庞大，但都是铩羽而归。1224年之后，亨利三世的祖先们在欧洲大陆上曾经拥有过的领土中只剩下了加斯科涅。这件事的影响就是逆转了12世纪的领土平衡。曾几何时，英格兰只是安茹王朝势力范围中的省份之一；现在它无可争议地成为了金雀花王朝领地的中心。最终，通过1259年的《巴黎条约》，亨利放弃了他对诺曼底、安茹和普瓦图的领土要求，并且为了加斯科涅而向路易九世（Louis IX）宣誓效忠。

现实地讲，《巴黎条约》是亨利三世所取得的最大政治胜利，但他只是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路易九世所提出的慷慨条件，希望能借此把自己从其他困境中解脱出来。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困境就是，由英格兰国内势力最大的权贵们所组成的一个死党联盟正威胁要举行武装叛乱来反对他。从1223年起，亨利就一直面对此起彼伏的反叛浪潮。一次又一次地引起争议的问题就是他对于朋友和顾问的选择，正是这些人获得了国王恩典的最大份额。这一问题因下列事实而进一步恶化，即国王的许多亲信并不是英国人——而这个时期英国政治正在变得日益偏狭化。亨利是一个家庭观念很强的男人，他从1236年起就跟普罗旺斯的埃莉诺（Eleanor of Provence）结下了幸福的姻缘，并且随时准备对妻子的亲属们提供慷慨的帮助。当他的同母异父兄弟们——即作为他母亲第二次婚姻后代的吕西尼昂家族成员（the Lusignans）——在法国的境遇越来越困难时，他欢迎他们来到英格兰；从1247年起，这些吕西尼昂家族成员不断地使英格兰的气氛变得更加恶化。

同样引起争议的是国王为第二个儿子埃德蒙（Edmund）而破费的计划。1252年，教皇主动提出把西西里王国送给亨利；1254年，他以埃德蒙的名义接受了教皇的馈赠。不幸的是，西西里实际掌握在曼弗雷迪（Manfred）手中，即霍恩施陶芬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的私生子。亨利不仅同意为征服该岛国出钱，而且还答应为教皇偿付现有的债务——而教皇为了与曼弗雷迪打仗，已经花去了大约有13.5万马克的一大笔钱。这是一个荒唐的承诺；在1258年，它最终导致了男爵们从国王手中夺走了政府，并且启动了影响深远的改革计划：即1258年10月的《牛津条款》和1259年10月的《威斯敏斯特条款》。从一个成年的国王手中夺取权力，并将它交给一个选举出来的贵族委员会，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步骤。在随后的5年当中，英格兰一直都在内战的边缘蹒跚而行。当战争于1264年春天终于来临时，争执的焦点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国王是否有选择外国人作为顾问的自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坚定不移地认为那些为“王国社区”代言的男爵们才具有最终决定权的人西蒙·德蒙特福特（Simon de Montfort）自己生来就是一名外国人。此时西蒙已经是权

力很大的“社区”成员：1231年以后是莱斯特伯爵，1238年以后又成为国王的妹夫。1264年，西蒙伯爵赢得了刘易斯战役，但第二年又在伊夫舍姆战役中打了败仗，战死后还被人肢解。在亨利三世统治的最后几年当中，国王权威的完全恢复是与下列事件相结合的，即在《莫尔伯勒法令》（1276）中承认，要维护包括《自由宪章》和《威斯敏斯特条款》中的某些内容在内的“王国惯例”。伊夫舍姆战役的胜利者和王位继承人爱德华对于这种中庸的气氛感觉不舒服，于是便参加了十字军东征，使他的父亲能够不受约束地专注于重建威斯敏斯特教堂。

爱德华一世（1272—1307）

1272年，正当爱德华在西西里，即从十字军东征归来的途中，他听到了父亲去世、自己被宣布为国王的消息。他放慢了回家的步伐。在巴黎，他字斟句酌地为他在法国的领土向腓力三世（Philip III）宣誓效忠说：“我为应该为您拥有的所有领土向您宣誓效忠。”他接着往南去了加斯科涅，1273—1274年间他就是在那儿度过的。1286—1289年间，他又重新访问了加斯科涅。他是最后一位在波尔多拥有王宫的英格兰国王，而当他于1289年7月离开的时候，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然而英国人在加斯科涅的统治并非是一个直线衰落的故事。例如在1279年，法国人最终交还了阿热奈，这是他们按照《巴黎条约》的条款所必须做的。阿热奈是一个重要的葡萄产地，它的归还进一步加强了波尔多与伦敦之间迅速发展的贸易联系。波尔多的葡萄酒关税在13世纪40年代每年只有300英镑，但是60年以后就达到了6,000英镑。作为回报，加斯科涅人也进口了英国的棉布、皮革和谷物。在不断扩展的商业贸易中互惠互利把这两个社区紧紧地铆在了一起。

1274年10月，在回到英格兰之后不久，爱德华就对王室成员和男爵官员们的活动进行了一番调查。就像那之前类似的调查那样，它

揭露了大量的冤情。为了对其中的一些冤案进行平反，以大法官罗伯特·伯内尔（Robert Burnell）为首的国王顾问们就一系列广泛的问题颁布了新的法律。但即使是在立法最多的时期（1275—1290），也没有人作任何努力，按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law）的方式来将英国法律编集成典，而且这些成文法既关注臣民们的自由，也给予国王的权利以同等的关注。

从1276年到1284年，爱德华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威尔士的问题上了。最初他的计划是削弱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德[3]（Llywelyn ap Gruffydd）的权力，然后把这位威尔士亲王的土地分别交给他的两位兄弟，戴维德（Dafydd）和格鲁菲德（Gruffydd）。然而在1277年的战役取胜之后，他施行了一个使威尔士人感到屈辱的和平条约，而且没有把戴维德所期待的奖赏给他。1282年，威尔士人发动了叛乱。在1282—1283年间的战争中卢埃林被杀死，戴维德被俘虏。其后对戴维德进行了审判，并以叛逆者的罪名处死了他。这是自1076年以来第一个因参与叛乱而被定死罪的人。与1277年的战役不同，1282—1283年间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征服领土的战争。由于爱德华在资源上占有巨大的优势，所以这并非是一桩十分困难的任务。

尽管征服威尔士可以视为好几个世纪战争的顶峰，但英格兰与苏格兰这两个王国之间的关系在13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却是出奇地好。但在1286年，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因坠马而死，而他唯一的孙女，绰号为“挪威少女”的玛格丽特（Margaret），被推为王位继承人。爱德华一世提出她应该与他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结婚。苏格兰的权贵们同意了这个提案（《博格姆条约》，1290年7月），但同时又坚持苏格兰应该保持它自己的法律和习惯。

不幸的是，6岁的玛格丽特于1290年9月在奥克尼去世。爱德华抓住了这个机会，要行使他作为最高领主以及裁定王位竞争者的权力。经过复杂的法律论证，他决定选择约翰·巴利奥尔（John Balliol）作为王位继承人；1292年的圣安德鲁纪念日，新国王在斯昆登基。直到这个时候，爱德华都有理由宣称他所采取的措施有助于在苏格兰保持和平与秩序；但从那时起，他对待苏格兰人的专横做法将

挑起一场长期而具有灾难性的战争。

注释

〔1〕 凯尔西（Quercy）是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地区，以养羊和生产干酪而著称。

〔2〕 约翰为亨利二世第四子。长兄和三兄早亡。父王把在法国的领地全部授予几位兄长，由于已经没有领地可以封给约翰，所以被称为无地王。

〔3〕 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德（？—1282）是占据了圭内斯的一位诸侯，曾数次举行起义，反抗英格兰的军队。1282年，他在第三次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中战败身亡。

第三章

中世纪早期的政治、法律和宗教

威尔士及其边疆地区

11世纪的威尔士是在一个多山区域中众多小王国的集合体。这些王国都是没有固定边界的。它们按照法律（在儿子们之间分享遗产的习俗）和政治（各统治者的野心和军事实力）来扩展或收缩。虽然英格兰国王们在传统上宣称在这儿有最高统治权，但他们并没有花多大力气来把定义不明的最高领主权改造成一种永久性的军事和行政控制。起初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惯性似乎会使那些新来者横扫威尔士。在赫里福德、什鲁斯伯里和切斯特的诺曼伯爵们事实上已经过特许，可以夺取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经过1067—1075年间这段迅速推进的时期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进程受到了独特地形的阻碍。结果，他们的殖民努力长期局限于低地和河道流域上，尤其是在南方。能干的威尔士君王们趁英格兰在1135年之后局面不稳定，及《大宪章》出台的时机，重新掌握了主动权，并控制了他们此前失去的土地。直到爱德华一世的统治时期，诺曼人的威尔士征服才大功告成。就这样，在这整个时期中，威尔士就是一个战场，一个堡垒林立的国家。威尔士的君王们和盎格鲁—诺曼的边疆贵族们相互打仗与谈和，因此两者都享有后来宪法律师们所谓的“主权”。

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征服是由个别的盎格鲁—诺曼的男爵家族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来承担和执行的：如克莱尔家族（the Clares）、莫蒂默家族（the Mortimers）、莱西家族（the Lacys）、布劳斯家族（the Braoses）。他们所征服的那些领土实际上是正常英国统治体系之外的“私人”贵族领地。然而，这些家族仍然是英格兰国王的臣民，偶尔国王还会以极端的方式提醒他们注意这个事实。1102年，亨利一世打垮了什鲁斯伯里伯爵蒙哥马利的罗杰（Roger of Montgomery）的儿子们，并且肢解了他们父亲的边界“王国”。1208—1211年间，约翰将威廉·德布劳斯（William de Braose）逼入了绝境。征服和殖民的基础工作留给边疆贵族们去做，而总的战略方针仍

然掌握在国王手中。例如要由国王来决定跟当地的君王们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由于一些威尔士王国被消灭，而剩下的那些王国变得越来越巩固，因此这种关系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到了12世纪下半叶，德赫巴斯和圭内斯的统治者们都非常杰出，尤其是里斯伯爵。在13世纪中，圭内斯的两位君王，卢埃林大王（Llywelyn the Great）和他的孙子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德，甚至做到了运用武力和外交，让所有其他的威尔士王朝都臣服于他们的权力之下。事实上，在《蒙哥马利条约》（1267）中，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德成功说服不情不愿的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承认了他赢得的领土和他的新头衔，“威尔士亲王”。

但是8年前的另一个条约决定了威尔士的命运。1259年，亨利三世在《巴黎条约》中接受了他损失大部分欧洲大陆财产的事实。跟法兰西的和平意味着一位英格兰国王，假如他愿意的话，可以集中精力来对付它的邻国。随后而来的就是爱德华的征服和建筑城堡的宏大计划。通过《威尔士法令》（1284），新得到的土地都按照英格兰的模式划分为郡：弗林特、安格尔西、梅里奥尼斯和卡那封。至于威尔士法律和习俗，爱德华宣布：“它们中间有些我们已经废止，有些我们允许，有些我们已加以更正，其他的我们已经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英国的普通法已经被引进了威尔士。

1287年和1294—1295年间，威尔士都爆发了叛乱，但是城堡证明了它们的价值。弗林特、里兹兰、阿伯里斯特威斯、比尔斯、康韦、卡那封、克里基厄斯、哈勒赫和博马里斯——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城堡，而且建造和维护都十分昂贵。这是爱德华为保障他的征服和防止叛乱大火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一方面是英格兰对威尔士南部和东部零敲碎打的征服，另一方面是它对威尔士北部和西部的大规模突然袭击，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在威尔士的政治地理学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爱德华一世所征服的土地大部分都保留在国王的手中；其余的则都分割给了众多的大贵族，即威尔士边疆贵族们。至于被英国人设计于1282年杀死在艾丰桥上的卢埃林亲王，他的命运就是成为有些20世纪威尔士民族主义者的

崇拜对象。

苏格兰

与支离破碎的威尔士相反，在11世纪，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最富裕的南部和东部，是由一个国王——即苏格兰国王——所统治的。尽管教皇接受威尔士主教区归属坎特伯雷管辖的做法，但他却支持苏格兰教会的独立。自从阿瑟尔斯坦（Athelstan）的统治开始，苏格兰国王偶尔也承认英格兰国王的领主地位，但是两国的关系仅限于此——或将会变得如此。一方面，苏格兰国王的力量足够强大，并不太惧怕盎格鲁—诺曼男爵们骚扰威尔士甚至爱尔兰时的那种“单打独斗”的入侵方式。另一方面，他的国土过于贫瘠，而且他住的地方过于偏僻，以至于不能引起英格兰国王的兴趣。此外，虽然发动一次针对苏格兰人的成功远征并不是太困难，但是征服和控制一个这么偏远国家的双重难题对于自己的基地位于泰晤士河流域或者更南部的国王们来说似乎——或很有可能——是无法解决的。

苏格兰人也没有因英国人的麻烦而困扰。除了国王戴维一世（1124—1153）在斯蒂芬统治时期的内战中利用时机，得到了诺森伯里亚（1139—1157）之外，它跟英格兰的边界保持了11世纪刚划清时的状况。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的扩张使得它的领土包括了最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海岸线（凯斯内斯、罗斯、马里、阿盖尔、加洛韦）。这种扩张主义政策的顶峰是在挪威国王根据《珀斯条约》（1266）归还了西部岛屿时所达到的。下列三位接连在位的国王领导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为苏格兰在这段时间的扩张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威廉一世（William I，1165—1214）、亚历山大二世（1214—1249）和亚历山大三世（1249—1286）。

与高地的领土扩张相对应的是低地的内部发展。市镇、修道院和大教堂在这儿纷纷建了起来，另外还修筑了城堡和形成了郡的建制，以便把王国变成容易管理的行政单位。皇家铸币局开始铸造银便士

（与英格兰的银币平价对等），并且还收取进口税。苏格兰统治者的婚姻显示，在12和13世纪中，苏格兰越来越成为“欧洲”政治场景的一部分。所有这些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很少涉及战争。只要英格兰国王没有对征服苏格兰怀有不现实的野心，就没有理由去改变现状。

英国政府与王室

政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国王本人。他的性格要比任何其他单个的因素都更为举足轻重——从爱德华一世的统治与他父亲和儿子的统治之间的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出。但是国王自然不能独自一人来进行统治。无论他去哪里，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人：侍臣、官员、仆人、商人、请愿者，以及形形色色的扈从。

这群随从的中心则是王室。其中有一部分是分工详细的家政服务人员：厨师、管家、贮藏食品管理人、马夫、帐篷管理员、车夫、驮马夫和国王床铺的挑夫。还有负责国王打猎的人、猎狗管理人、吹号者、箭手。另外还有兼顾政治、行政和家政的人。其中有些人有很明确的分工。大法官负责保管国王的御玺，并管理大法官法庭的文书们。司库和内侍负责照顾国王的金钱和贵重物品。王室总管和最高军务官掌管军事机构。但是王室就像国王一样，是具有全权的，任何一位王室的高级官员，例如管事，很可能发现自己身负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任务。

有些官员是教士。直到14世纪40年代，大法官和司库总是由教士来担任。但有许多官员是世俗人：内侍、管事、总管、王室最高军务官，还有地方上的行政司法长官。中世纪的英格兰国王并不是完全或主要依靠教士的行政管理能力来统治一个国家的。他们也不依赖于利益与大地主和权贵们的利益相对立的一小撮王室官员。相反，王室一般包括一些权力最大的男爵。他们虽是王室的仆人但同时也是拥有大量地产的贵族和他们自己家里的主人。通过他们的影响，国王的权威

被带往各个地区。这个非正式的权力体系经常因王室成员被指派出任地方官职而得到加强。在红脸威廉的统治下，“管事”哈莫（Hamo）是肯特郡的行政司法长官；厄斯·达贝多（Urse d'Abetôt）是王室总管和伍斯特郡的行政司法长官。在整个12和13世纪中，王室的骑士连续不断地被聘任为地方行政司法长官。

政府的主要动力就隐藏在这样一个王室之中。这对爱德华一世颁布《王室法令》的1279年来说是真实的，就像它对现存描述王室最早的“王室法令”（*Constitutio domus regis*）出现的大致日期1136年来说也是真实的一样。此外，没有理由相信在“王室法令”中所描述的王室跟威廉一世的王室，或甚至跟克努特[1]（Cnut）的王室，有什么很大的不同。

同样，王室也是军事组织的中心。人们早就认为，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军队实际上就是一支皇家禁卫军。王室的骑兵构成了一支职业化的特遣部队，可以对任何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遇到大规模战役时，它还可以迅速扩充。王室的骑士们经常要负责组织和指挥大型的步兵分遣队。王室侍从们（the *familiares*）起初拿的是年俸，后来改为按在王室的服务天数付给他们日薪。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这种做法与诺曼人时代的通行做法相距甚远，因为当时的军队基本上都是由国王土地承租人为响应国王战争动员令而召集的一定数量的骑士所组成的“封建军队”。然而对1100年前后许多残存证据所进行的仔细研究显示，不仅很难发现有这样的“封建军队”存在，而且爱德华王朝的所有基本特征当时都已经存在——聘用费、日薪、有计划扩张的框架、王室军队既是主要城堡的卫戍部队又是战场上作战的主力部队（由骑士和骑射兵构成），以及雇用王室的骑士担任增援部队的指挥官。没有理由相信克努特国王侍卫们的职责跟上述各项任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出于一些实际考虑，和平时期的王室侍从的数量有一个上限；光是交通和饮食问题就足以成为这么做的理由了。在某种程度上，国王出行路线的事先计划帮助解决了这些难题；因为商人们预先知道王室将要落脚的地方，就可以作出安排，带着商品及时赶到那儿。但国王

的到来对于任何他所要经过的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几乎难以承受的负担。王室的需求对于当地的商品储备和价格有着戏剧性的影响；它造成了一种容易受到人们辱骂的局面。坎特伯雷一位名叫埃德默的僧侣这样描写他所不喜欢的一位国王，即红脸威廉的王室侍从们："国王的侍从们习惯于掠夺和毁坏一切；他们使自己经过的国土一片荒芜。因此，当人们得知国王就要来临时，都纷纷逃往了森林深处。"在爱德华一世的统治下，仍然是那种计划和掠夺的组合。一封宣布国王要在诺丁汉过复活节的消息的官函安慰当地的人民不要过于惊慌，因为国王答应很快就会离开，就像他来时那样。

就这样，既出于政治的原因，即国王需要让人们知道他的存在，也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即不给当地人造成过于沉重的负担，国王总是在不断地旅行。领地面积的扩大意味着安茹国王们不得不比他们的前任们更加辛苦地长途跋涉，不过约翰的政治失败至少具有减轻他旅行困难的效果。在1203年以后，国王巡视的路线变得越来越局限于英格兰，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还得加上北威尔士。在1289年以后，再也没有其他国王访问过加斯科涅。与此同时，进出伦敦的那几条大路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到了1300年，国王的巡视路线已经不再像约翰王在位时那样，总是在王宫和作为古代西撒克逊国王心脏地带的"韦塞克斯中部"猎场行宫间不停奔波。

然而，就在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使得王室成员不断流动的同时，同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却指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即官僚机构得到了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考虑到王室的规模大小受到了实际情况的限制，当国王的秘书和财务官员数量变得越来越多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继续跟随国王旅行。有些人不得不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定居下来。事实上，到了1066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在温切斯特已经有了一个永久性的王室金库，即一个存放国家岁入记录和白银的场所，这就需要有一个永久性的工作班子来守护和管理它。到了1290年，英国有了更多定居的官员，包括神职人员和世俗官员，在大法官法庭和财政部任职，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定居下来，而非在温切斯特。但是这个官僚机

构的发展并没有改变生活中最基本的政治事实：国王仍然在全国各地巡视；他仍然随身带着御玺、一个秘书班子和财政方面的专家——最重要的政治和行政决定就是在这个移动的班子里作出的，而非在威斯敏斯特。在1290年，就像在1066年那样，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马背仍然是政府的主要所在地。当时仍然没有首都，只有国王的通衢大道。

恩泽的力量

官僚机构的发展也没有改变下列基本事实，即王国的政治稳定性依然主要有赖于国王掌控那个规模虽小、但能量巨大的贵族集团的能力——正如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二世（Edward II）统治时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国王土地承租人是以什么条件从国王那儿得到不动产的呢？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一样，他们必须侍奉和帮助国王：这主要意味着政治服务和战争时期的军事服务；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还要向国王提供财政援助。此外，一位国王土地承租人的继承人还必须支付一笔被称作地产继承献纳金的税款，才能够真正继承遗产，而假如作为继承人的他或她依然年幼，国王就会亲自来监管这些财产，并且按照某些协议，几乎是随心所欲地来处置这笔财产。在这些情况下，国王控制被监护人的婚姻。假如没有直接的继承人，那么在为寡妇——她的再嫁也受国王的控制——准备了养老的款项之后，国王就可以再次将这块土地授予他所喜欢的任何人。对于王国内最富裕人家之遗产和婚姻的这种控制意味着国王恩泽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他不仅可以随意授人以官职，而且还可以任意处置男女继承人和寡妇。就这样，例如理查一世将彭布罗克伯爵的女继承人嫁给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他实际上一下子就把威廉变成了一个百万富翁。当今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没有谁具有像一位中世纪国王手中那么大的恩泽力量。因此国王的宫廷成为整个政治体系的中心是不足为奇的，在这个骚动、活跃、紧张和做作的地方，男人们和少数女

人们在一起互相勾心斗角，拼命吸引国王的注意力。无怪乎12世纪的一个文学传统就是将宫廷侍从的生活描述得像地狱一般漆黑，但就在地狱的门口，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千方百计地想冲进来。在这样的环境下，恩泽就成了国王手中最牛的王牌。他如何出牌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倘若一位国王出错牌的话，很快就会使自己陷入困境。

这种恩泽制度的基本特征早在红脸威廉的统治时期就已经存在。从亨利一世于1100年颁布的《加冕宪章》条款中就可以清楚看出。显而易见，这种制度在爱德华一世的统治时期依然存在。《大宪章》就已经阐明了这一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修订了这种制度。例如在1215年以后，男爵的地产继承献纳金就被固定在100英镑这个数额上。然而，国王仍然可以操纵有关遗产、监护权和婚姻的法律，来满足他个人的嗜好，即究竟是像爱德华一世那样为自己的家庭谋求利益，还是像爱德华二世那样去培植亲信。不太清楚的是这种制度是否在1066年就已经存在。大部分历史学家也许会说那时候它并不存在。但是发人深省的是，克努特王，也许还有艾特尔雷德二世[2]，已经像1100年的那部宪章的条款那样信口开河地在向部下许诺了。

恩泽是有利可图的。人们不惜用金钱贿赂，以获得国王的恩泽：（大法官以下的）官职、继承领地遗产权、土地的保护、监护权和婚姻——或者甚至是虚无缥缈的国王亲善。所有这些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价码则是可以商量的。这是国王可以通过不断地漫天要价而获得更多金钱的一个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告诉国王他的土地承租人是多么富有的文件自然是非常珍贵的。《末日审判书》正是这样的一个记录——它显示出整个国家的一半财富掌握在不到200人手中。通过趁他们遇上政治麻烦时处以高额的罚金，或者是将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待价而沽，国王便找到了一个向富人敲竹杠的实用方法。当然，这种信息必须经常更新，于是在整个12世纪和13世纪中，王室找到了各种方法来确保信息的更新。例如，现存有一份由亨利二世的政府所制作的文件起了一个很有趣的名称：《女士、男孩和女孩的花名册》（“Roll of Ladies, boys and girls”）。这样，在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 of Wales）这位怀有敌意的观察家眼中，这位国王就像

是“一位不断地在潜行、刺探和寻找薄弱环节，以便可以随时偷东西的强盗”。杰拉尔德所谈论的是在安茹国王统治下他的立场，但也许丧夫的切斯特伯爵夫人露西（Lucy）会同意这一点，因为她得给亨利一世500马克，以换取孀居5年的特权。整个王国内大多数有影响的人都半永久性地欠债，这一事实给了国王一个强大的政治杠杆——而且国王经常运用这一杠杆。例如1295年，爱德华一世便以要收债的威胁来逼迫一群不情愿的权贵们前往加斯科涅。

现存最早记录王室岁入的详细报表，即1129—1130财政年度的卷筒案卷，显示出国王的恩泽是多么地利润丰厚。在这一财政年度，据记载亨利一世通过施与此类恩泽收取了大约3,600英镑。这相当于他有案可查之岁入的15%，比他的税收所得还要多。然而那份详细报表中的计算方法向我们透露了更多的细节。在1129—1130财政年度，当年和前些年中提出交付此类献纳金而现到期应缴的总数几乎达到了26,000英镑，所以说国王真正收取的只是这个总数的14%。例如威廉·德庞特·德拉西（William de Pont de l'Arche）提出用1,000马克来换取宫廷内侍的职位，而在1129—1130年度，他只缴纳了100马克。这意味着假如国王对于威廉的举止行为感到满意的话，其他的分期付款也许会中止或取消。对于财政大臣不至于催逼交钱过甚的期望具有鼓励人们出价更高的效果。但是失去国王恩宠的人会发现，他必须立即缴清这笔钱，否则就会惹上更大的麻烦。例如这就是威廉·德布劳斯在约翰王统治下所遭受的命运。换言之，只收取一小部分该收的钱并非表明政府长期而严重的效率低下，而是对国王恩泽这种具有无限弹性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英国王室的岁入

专横的国王总是在掏臣民的腰包。爱德华一世因“贪婪之王”（*Le Roi Coveytous*）的绰号而臭名昭著，正如威廉一世被指“最喜欢贪婪”。在一个更抽象的层次上，早在12世纪就有人提出，国王的权力

是可以用金融术语来进行衡量的。伦敦主教和英国财政大臣理查·菲茨尼尔（Richard FitzNeal）是《财政大臣对话录》（写于12世纪70年代）这部书的作者。他有一句名言："君王的权力是按照他们金钱来源的涨落而起伏不定的。"1129—1130财政年度的卷筒案卷中所记录的由郡长们和其他官员们交到财政部的详细报表显示，当时已经有一套与《财政大臣对话录》所描述的相同的税收制度在运行了。然而，财政制度本身的出现理所当然地是在1129—1130财政年度的卷筒案卷之前。概括地说，由郡长们交给财政署的年度报表是一种盎格鲁——撒克逊体制。在1066年和1086年间，有些大型皇家庄园向国王缴纳的年税仍然是按以货代款的方式来支付的。到了1129—1130财政年度，显然已经发生了改付钱款的一个大规模转变。这个改变是与欧洲总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的。郡长们所缴纳的现金越多，对用英镑、先令和便士来进行核算的一种简单快捷的计算方法的需求也就越大。这样，方格图案的桌布（exchequer［财政部］这个词就是来源于chequer［方格图案］）便被用来当作一种简化的算盘，国王的计算师 就是在这种桌布上像赌桌管理员那样，用把筹码从一个方格移动到另一个方格的方式来进行计算。Exchequer这个词最早是在1110年出现的。一年两次，王国中最有权力和最受信任的人会聚集在一起，来审计郡长们交来的那些账目表。当国王在诺曼底的时候，他们就会像副摄政委员会那样，在国王不在的情况下，聚集在"财政部"开会。据推测，当克努特王在丹麦时，一个性质相同的委员会也曾出于同样的目的，聚集在一起开会。

但这只是推测。直到1129—1130财政年间，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某种精确的程度。然而即使是有关那个时期，我们也必须非常谨慎。一份作为英国财政部年度记录的卷筒案卷对于进出于宫室的那些款项几乎一字未提。当然，这些款项是不能够量化的，尽管考虑到这个部门作为流动王室的财务办公室，很可能流动的资金是相当大的。例如据估计，到1187年，亨利二世向他的耶路撒冷银行账户中注入了30,000马克，但在他统治期间的卷筒卷宗中是看不出这笔钱的。由于缺乏12世纪的宫室账目记录，不太容易估计全部的皇家岁入。这样，

亨利二世早期统治时期的卷筒案卷总数很低一事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新国王对于宫室财政的偏爱，对于一位安茹国王来说，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偏爱，他的所有前任们没有财政大臣，日子照样过得不错。毕竟，在铸币的时候，安茹国王们在英格兰和诺曼底都选择了他们特殊的做法。但无论困难有多大，对于亨利一世统治时期仅存的这部卷筒案卷的分析无疑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在1129—1130年度，有22,865英镑入了财政部的账目。这个总数中大约有12,000英镑是来自王室拥有的土地租金。只有不到3,000英镑来自征税，其中绝大部分（几乎2,500英镑）是来自土地所有者们向国王缴纳的捐税（geld），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就有的土地税，又称“丹麦金”[3]（Danegeld）。另外有7,200英镑可以被描述为统治权或司法权的利润：这包括来自教会职位空缺的1,000英镑，来自司法罚金的2,400英镑，以及前面提到过的人们为谋取国王恩泽而交纳的3,600英镑。就这样，王室岁入中有半数以上的款项是来自土地，大约1/3来自统治权和司法权，只有13%是来自征税。假如我们把这一情况跟爱德华一世统治初期的王室岁入状况作一番比较的话，一些重要的区别就显露了出来。粗略说来，土地现在占到了岁入总数的1/3，统治权和司法权几乎还不到10%，而税收（包括关税）则超过了半数。土地、统治权和司法权相对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税收的重要性却大大增加。即使说1129—1130财政年度的税收可能会比平时要少（因为土地捐税是当年唯一征收的税），上述总的趋势仍然是能够站住脚的。

虽然王室的土地在1130年获利颇丰，但只要跟《末日审判书》作一个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土地作为资产的价值已经在下降。根据1086年的记录，王室土地和市镇的价值几乎达到了14,000英镑，而到了1129—1130财政年度，它们的价值降到了不足10,700英镑。王室土地面积缩水的速度似乎超过了通过没收和把无人继承的土地转归国王的方式补充王室土地的速度。国王必须把土地授予势力强大的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奖赏和鼓励臣民对国王的忠诚，尤其是在他们统治初期遇到继承王位有争议的问题时。这一过程延续下来，但在某

种程度上会被对王室地产更有效的管理所抵消。由休伯特·沃尔特所启动、并由约翰王和亨利三世的大臣们所延续的这些管理改革的成功可以通过下列事实来衡量：即爱德华一世仍然可以从土地这一项得到每年约13,000英镑的岁入。（然而考虑到在此前150年当中的通货膨胀，这意味着国王从这一项所得到的真正收入比1129—1130财政年度少了许多。同样，亨利一世统治时期的两万英镑也许要比爱德华一世统治下的4万英镑价值更高。）

土地税、海得 [4] 这种用以计算土地税的基本测量单位，以及收取土地税的财政机制，都是诺曼国王们从盎格鲁——撒克逊人那儿继承来的那些权利的进一步例证。虽然每海得两先令的土地税只占了亨利一世有据可查的岁入的1/10，但它显然是一笔珍贵的王室财产。到了1129—1130财政年度，它变成了一种按年度征收的税，而且偶尔还可以按更高的比率来征收（此外，免征土地税还可以被当作一种政治上的恩惠，这就给国王的恩泽这张弓上又装上了一根弦）。然而亨利二世只是分别在1155—1156和1161—1162财政年度征收了两次土地税。作为替代，他征收了其他的税，如向骑士们征收了按数额多寡而定的免服兵役税（scutage）和向市镇和城市征收了按动产价值而定的摊派税（tallage）。在约翰王统治时期，免服兵役税和摊派税合起来多少构成了一种年度税，充分补偿了王室因土地税萎缩而造成的损失。但是土地税并没有完全消亡。它在“犁头税”（carucage）这个新名称下又得以振兴，并且在1194和1220年间征收了4次。

然而到了此时，政府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和更有成效的税收形式，并非按照土地，而是按照人们的收入和动产来估价。它也许是由教会的什一税演变而来，最初是于1166年、1185年和1188年为了一个宗教目的，即为基督教圣地提供财政上的支持而征收的。可以肯定的是，约翰王在1207年是根据动产来征收这种税的，他或许在1203年也这样做了。1207年征税的账目依然存世，它所透露的数字令人惊讶。按照收入和动产1/13的比率所征收的税额居然达到了6万多英镑——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其他税种的收入。（然而在1194年，同一种税曾经以1/4的比率来征收——这是漫长税收史上最重的一次赋税

——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支付理查一世的赎金。）在12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引入了第一个国家海关制度。这些发展说明王室的岁入在理查一世和约翰王的统治时期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到了1213—1214财政年度，约翰王已经积累了大约20万马克。但是这些庞大的积累很快就被花完了。当时是战争的年代，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和保卫安茹帝国的年代。约翰王于1214年所遭受的最后失败带来了一个漫长而相对平静的年代。直到1294年，英国的纳税人才又一次发现自己在为一次大规模的欧洲战争买单。

然而与此同时，13世纪出现了另外两项重要的创新——对神职人员征税的发展和海关制度的建立。从1199年起，教会就已经开始承受由教皇征收的所得税。最初征收来的税款是为十字军东征提供军费，但它很快就被用来支持名目繁多的“慈善事业”——当然是由教皇所定义的。就这样，洪诺留三世（Honorius III）于1217年命令主教们和高级教士们帮助尚未成年的亨利三世摆脱困境。从那时起，教会就经常需要资助国王，尤其是在他加入教会之后。亨利三世于1250年加入了教会，爱德华一世也于1287年加入了教会。例如在1291年，爱德华一世从教皇为十字军东征所征收的税款中得到了不少于10万马克的资助。到了13世纪中期，事情已经非常明朗，英国教会向国王提供财政援助已成惯例——尽管教士代表大会很自然地为援助数额的大小讨价还价，争论不休，并且还趁这个机会讨论他们觉得应该采取措施的其他问题。因此亨利三世于1254年得寸进尺，在没有预先寻求教皇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请求教会拨款。1269年，他又重复了这个先例，接着，爱德华一世又在1294年以前，三次提出了同样的请求（1279/1280、1283和1290）。

在理查一世和约翰王统治下征收海关关税曾经是一项战争措施；约翰王于1206年寻求与腓力二世[5]停火期间终止了这项关税。1275年所建立的羊毛出口关税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变成了对和平时期王室岁入的一种永久性补充。这种关税随着羊毛工业的命运而变化，但是按照1275年所确定的比率，即每袋羊毛收取半个马克（6先令8便士）的关税，它在1294年之前，每年都能收取8,000英镑至13,000英镑。

这些新的措施，即教皇对英国教会所征收的税和羊毛出口的海关关税，都跟意大利在英国开设的商号和银行有关。一方面，正是那些无处不在的意大利商人们使得13世纪的教廷能够像一个国际金融公司那样来运转。另一方面，信用财政开始在政府中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爱德华一世从1272至1294年间总共欠下卢卡的里基亚尔迪（Ricciardi of Lucca）差不多40万英镑；这笔债务的48%是用对一项由越来越多意大利商人参与的贸易所征收的关税来偿还的。当然，国王们以前也借过债。在13世纪50年代，亨利三世曾在里基亚尔迪处欠下了5万多英镑；在12世纪50年代，亨利二世也曾从一位名叫威廉·凯德（William Cade）的佛兰芒商人那儿借贷，以打造安茹王朝。13世纪晚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这种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借贷与关税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与从这些新的来源可以得到的金钱数额相比较，那些来自传统的征税、免服兵役税、摊派税和封建扈从献金的金额简直少得可怜，几乎不值得费力去收取，所以它们便逐渐被废弃了。

英格兰议会的兴起

1275年的关税制度是经由国王的顾问们跟商人们讨论以后，才由议会授权通过的。所有这些税收的特征就是必须经过其他人的同意：无论是教皇，或商人们，或教士们，或全国人民。相反，土地、庄园和司法权都是些可以带来收入的权利，而通过它们进行剥削并不需要有影响力的人开会同意——事实上，有影响力的人全都享受着类似的权利（尽管规模没有这么大），大概都视其为理所当然——只要他们自己的利益没有受到侵犯。在亨利一世有记录的岁入中，有85%来自土地、庄园和司法权，但是到了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它们只占岁入的不到40%。王室岁入中来自征税的比例越高，对于用来获得人民同意的政治机制的需求也就越大。这就是所谓代表机构成长的过程；就向动产征税而言，即是指议会的成长。

在1214年以后没有海外战争的漫长岁月里，征动产的税仍是王室偶尔采用的一种措施。战争发生的频率很低，而其他可以令人接受的征税借口也很少，所以人民只是偶然才同意征税——肯定不像亨利三世所想要的那么多。但是不断增长的征税潜力在1208至1293年间的最后7次征税中显示出来：1290年所征收占总收入1/15的税据估计多达116,000英镑。关于这次异乎寻常的征税，国王又是怎么获得人民同意的呢？国王的顾问们必须为此找出一个理由。他们大概会强调国王最近在加斯科涅的居住（1286—1289）花销甚巨，而他即将进行的十字军东征的军费更是靡费国帑；他们也许要指出，国王出于基督教的虔诚而驱逐犹太人，是在牺牲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岁入来源——实际上1290年时，犹太社区已被压榨殆尽，再也拿不出什么钱来了。但是他们对谁来提出这些理由呢？他们是对着那些代表了“全王国臣民”的人，首先这些人都是权贵——即那种老是在参加重要政治代表大会的有影响力的人，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诺曼人或安茹人。1290年的政治代表大会，即现在所称的“议会”，从4月一直开到了7月，在前10个星期里完成了许多事情，包括一些重要的立法。在7月中旬，另外来了一群郡里的骑士。不到一个星期，议会就解散了。为何要在会议快结束时招来那么一帮骑士呢？因为权贵们不肯同意征税。他们“只是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才同意它。然而他们此前并没有不肯参与处理其他种类的议会事项，无论是司法的、政治的，还是立法的。换言之，这些权贵们在大多数领域之内，还是恰如其分地代表了“全王国的臣民”——可是一旦征税进入了议程，他们就消极怠工了。从12世纪后期开始，国王们变得习惯于跟个别郡的臣民们讨价还价，所以这显然促使了这些地方社区在国王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时选择能在这种场合为他们说话的代表。从13世纪50年代起，权贵们的集会便以这种形式得到了加强，而代表各个郡和市镇的骑士、自耕农和自由民——即下院——也开始逐渐扮演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角色。正如1290年的议会记录所表明的那样，正是国王想要征税的需求才是刺激这一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这个过程是否也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在13世纪是否有过一个“士

绅阶层的崛起”，使得传统的政治机构必须重新改造？士绅阶层在地方上的地位是否越来越重要，所以国王们假如想使自己的需求得到广泛理解，并且有效地向臣民们征税，就必须在王国的主要政治论坛上为他们提供一个位置？这都是些困难的问题，要给予肯定答复的难度是如此之大，使得有些历史学家索性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13世纪是士绅阶层出现危机的时期。其中有一个困难是司空见惯的：证据材料的急速增长。我们所了解有关13世纪士绅阶层的情况要比我们了解他们前辈们的情况多得多。但是西蒙·德蒙特福特及其朋友们在1258—1265年间对待士绅阶层的态度是否比约翰王和反叛的男爵们在1211—1215年间对待士绅阶层的态度更加友好？《大宪章》包括了诉诸于贵族之外更广泛社会群体的条款，但是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中也有同样的条款。当忏悔者爱德华于1051年决定停征“丹麦金”时，他到底是为了讨好谁？无论是在12世纪，还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社会都不是只分为男爵和农民这两个阶层。在13世纪后期被选为各郡骑士的人正好是那些过去老是在参加重要政治集会的人。不错，他们过去是作为权贵的随从来参加集会的，但是明智的权贵们正是从他们的随从中发现他们最好的顾问的——而且他们大概也听从了这些顾问们的意见。13世纪后期的骑士们并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些会议；他们只是以另一种身份来参加这些会议。也许13世纪政治变化的证据——13世纪的代表机构越复杂，王室岁入中的征税份额也就越大——仍必须放在底层社会连续性的框架中来加以解读。

英格兰的法律和司法

从亨利二世统治时期起，皇家法官就开始频繁地举行地方性的审判（巡回审判庭），这就使得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同一部习惯法，即在“格兰维尔”（Glanvill）和“布拉克顿”（Bracton）等时代的论著中所描述的“普通法”或国王法庭惯例，真正变得可能。总的来说，以前的司法制度是一套由地方法庭依照地方习俗来进行判决的习惯制度。

当然，很久以来，人们就认为国王们必须对法律和秩序负责，尤其是他们必须应对一些严重的罪行和对王室提出的申诉，但在一个固定的、由中央政府指挥的司法体系建立之前，国王们在司法领域的活动必然只能是零零碎碎的。当有影响力的人涉案时，国王们就会来进行干预；偶尔他们也会对偷盗行为，尤其是对家畜的偷窃，进行一场打击行动。在这一方面，盎格鲁——撒克逊司法制度在经历了诺曼人征服之后仍继续存在。1166年的克拉伦登巡回审判庭带来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因1176年北安普敦巡回审判庭而得到了加强。这些巡回审判庭在皇家法官们审判那些重罪嫌疑人时引入了固定的措施。起初，亨利二世的法官们都只是受到国王信任的人——他们也许是伯爵、男爵、主教、修道院院长或王室顾问，恰好是以前的国王们派出去执行特别的司法和调查任务的人——而最大和最有名的一次调查就是1085—1086年间的钦定土地调查。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就像他们代表国王所执行的行政、外交和军事任务那样，举行司法审判正好是这众多任务中的一个。但引入频繁的巡回审判活动意味着司法工作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到了12世纪末，我们可以发现已出现一群精通于法律事务的人，其中主要是非神职人员。当然，有一些低级的法庭专门处理那些不那么严重的罪行，但是“专业的”法庭逐渐占据了司法领域的主导地位。原因之一是低级法庭并不具有创新的权威，而国王则能够、并且确实创建了新的罪名。例如阴谋罪就是1279年爱德华一世命令巡回法官们调查企图挫败司法审判结果的阴谋时所“发明”出来的一个罪名。由于国王的法庭所要对付的不仅是罪行，也包括有关财产的争议，人们显然认为这些法官是在做有用的工作。《大宪章》批评了皇家政府的许多方面，但是却没有批评皇家巡回审判庭。事实上，它请求国王的法官们应该每年4次巡访每一个郡，即比以前所能做到的要更频繁。

法官们都是精通法律的饱学之士；因学问渊博，他们对态度和观念的转变所作出的反应自然是在有根据的意见范围之内的。当时这样的观念转变之一就是对思想问题采取一种自觉的理性主义的做法——正如阿伯拉尔[6]的箴言所说：“我们因怀疑而进行调查，因调查而发

现真理。”如果应用在法律上，这句箴言便可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在一名嫌疑人究竟有罪还是清白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在以前的许多个世纪中习惯于要求嫌疑人接受神判，通常是用烧红的烙铁或水来进行考验。在人们相信它的时候，这种体制还能够起作用——它就像现代的测谎仪那样，同样有赖于对心理的洞察——但它也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假如有一位清白的嫌疑人开始怀疑这种神判法作为上帝证明他清白这一手段的有效性，他很可能会通不过神判法。这种怀疑一旦被提出之后，就无法平息。起初这种质疑声显得令人震惊——例如当红脸威廉提出这种质疑时——但最终它们变得司空见惯了。最后，教皇英诺森三世于1215年下令禁止教士们参与这样的神判，而至少在英格兰，这就意味着这种体制被突然停止使用了。经过了最初的一段混乱时期之后，通过神判法来进行审判的制度被通过陪审团来进行审判的制度所取代：后一种方法此前曾成功地用于解决对于土地所有权的争议。1179年，亨利二世曾经下令，在涉及财产权利的案件中，被告可以选择陪审团的审判形式，而不是决斗的审判形式——后者是诺曼人引入英格兰的一种审判方法，跟神判法一样，它很容易受到质疑。但是将这一规则应用于刑事审判时，便意味着只有当被告选择审判的时候，才会有审判。显然被告受到很大的压力。根据1275年的一个法令，被告须“入狱忍受痛苦的煎熬（*prisone forte et dure*）”，直至他选择审判。因此，有许多人死于囚禁，但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审判定罪，所以他们的财产不会被王室所没收。由于这个原因，有些人选择死亡，而不是冒险要求审判。直到18世纪，这种自行选择的权利才被取消。

起初，尤其是在财产诉讼案中，陪审团只是被召来解决一些浅显的、他们理应知道其答案的问题。但是当陪审团在审判中取代了神判之后，在一些复杂的案件中便出现了问题。因为陪审团并非像上帝那样是全知全能的。于是在任何案件中，必须竭尽全力地解开谜团，以便孤立出一个能够让陪审团来决定的特定问题。但是要做好这一点，便需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巧；换言之，它需要专业的律师。所以，在13世纪，一种法律的职业便跟法律学校、法律文献和法律语言（法律

专业法语）一起得到了发展。

尽管有了所有这些变化，但是在许多基本的方面，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法律的态度仍继续得以盛行。在盎格鲁——撒克逊和盎格鲁—诺曼时期，审理严重的罪行有一个专门的程序，要求有罪的一方必须对受害者或其家庭进行补偿。安茹王朝所建立的司法新机制倾向于在强制施行惩罚时不必进行补偿。但在许多杀人、伤人和强奸的案件中，这种做法往往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尽管“格兰维尔”和“布拉克顿”这类作者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力图使我们相信新原则已经有效地取代了旧原则，但实际情况似乎是旧的法律程序依然存留了下来；它们在经过改变之后被嫁接在新的法律程序之上。这就意味着，那些可以支付赔偿的人就逃脱了惩罚，只是向受害者或其家属支付了补偿，而那些没有能力赔偿的人，则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教堂和宗教

《末日审判书》显示，村庄里的教士通常被算作农民社区中的一个成员。他的教堂属于当地的领主。假如一个庄园被分割的话，那么属于庄园一部分的教堂的利润也必须进行分割。从许多方面来说，村里的教士与普通村民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他不太可能是单身，事实上，他也许结了婚，而且他的教士职位也是从父亲那儿继承的。鉴于这种基本形势，人们只能钦佩那些致力于废除世俗权利对教堂的控制和教士家庭生活的11世纪改革家们的鲁莽。在教皇的促进下，改革运动于1076年传到了英格兰。在随后的几十年当中，这一改革运动逐渐升温，从长远意义上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成功。到了13世纪后期，结婚的教士就已经很少了。另一方面，有许多教士——包括有些权力很大的教士——继续拥有情妇。达勒姆的雷纳夫·弗兰巴德和索尔兹伯里的罗杰在200年之后还有与其对应的人物，即被诉掐死情妇丈夫的考文垂的沃尔特·兰顿（Walter Langton of Coventry）和爱德华一世的大法官罗伯特·伯内尔（国王曾两次试图把他从巴斯和韦尔斯调到坎

特伯雷去任大主教）。就世俗庇护和家庭关系而言，教会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几乎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上帝让主教们没有儿子，但是魔鬼却给了他们侄子。”

然而虽然这场反对教士结婚的改革运动只取得了有限成功，但这也是引人注目的——考虑到自从4世纪之后的700年当中，关于这一话题的国王法令是多么的不奏效。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跟12世纪和13世纪中教育所得到的普遍改进联系起来。假如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能识字的话，那么教士就可以更加容易地从世俗阶层中招募；他们不必像以前差一点就要变成的那样，成为一个世袭的阶层。上学的人越多，他们对于古老教会法的了解，以及某些人对于它的尊敬，也就更多。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13世纪的英国，人口中单身的比例要比11世纪更高。道理很简单，因为有更多的人宣誓要守贞洁。隐修的生活方式在欧洲各地蓬勃兴起，英国也不例外。例如在英格兰，1066年时大约有50个宗教团体和大约1,000名修士和修女。到了1216年，大约有700个宗教团体和大约13,000名修士、修女、律修会修士和修女。一个世纪之后，宗教团体的总数几乎达到了900个，而修道会成员的总数是17,500名。在英国人口为以前3倍的情况下，这些数字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使是这样，它们也并没有告诉我们，全英国的宗教生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变得多样化和更加丰富了。在11世纪，所有的宗教团体都是属于本笃会的。到了13世纪中期，英国不仅有几百个本笃会的宗教团体，而且还有可供男人和女人选择的一些新宗教团体——普通的律修会修士、西多会修士或修女、吉尔伯丁修会（一种特殊的英国修会）修士、圣殿骑士团成员、教会军事团体中的护理人员、加尔都西会的修士或修女、多明我会的修士或修女、方济各会修士或修女、加尔默罗会修士或修女和奥古斯丁隐修会的游乞僧。在这个框架里面，似乎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宗教生活种类，乡村的、城市的、冥想的、苦修的、积极的，当时都已经被创造出来。此外，大多数进入宗教生活的人现在这样做都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过去本笃会所招收的僧侣大都是贵族父母送来过修道院生活的儿童（oblates，即“献身修会的俗人”），而从12世纪中期起，那些进入新老宗教团体

的人都是成人。建立这种新模式的西多会禁止任何16岁以下的人入会，并且坚持实行一年的见习期。应征者被志愿者所取代。

在12世纪的进程中，英国教会建立了主教区和教堂区，这种教会组织后来存在了许多个世纪。最后成立的两个新主教区分别是伊利主教区（1108）和卡莱尔主教区（1133）。主教区被分成副主教管区，后者又分成由乡村牧师管辖的诸教区。在诺曼人统治时期，新教区跟以前一样是按照当地领主的意愿而随意创立的；但是从那以后，新教区的创立就变得更加困难了。教会的地方组织似乎冻结在12世纪的状态上。这当然不是因为人口和经济扩张现在已经趋于稳定。相反，新的定居点继续被创建，而老的定居点也继续在发展。12世纪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教会法的发展和教皇司法权趋于保护无数的既得利益。律师的崛起本身就是在一个生活领域中发生变化的结果，但它使其他生活领域要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困难。使创建牧师职位真正成为问题的地方是在城镇。主教们为解决这个难题费尽了心机，但是他们大部分努力都被教会庇护人的所有权利益所挫败，无论后者是神职人员或是世俗人员。在13世纪时人们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但是它需要采取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新的宗教生活，才能使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这种新出现的形式就是由游乞僧们所组成的托钵修道会，这种流动传教士的国际性组织超越了主教区和教堂区的界限。最早来到英国的游乞僧是属于多明我会的。他们于1221年来到英国之后便前往牛津。3年之后，方济各会的游乞僧们也来了；他们最早的游乞僧是在坎特伯雷、伦敦和牛津。加尔默罗会和奥古斯丁隐修会的游乞僧们是在13世纪40年代到来的。到1300年为止，游乞僧们在英格兰创建了大约150个宗教团体，在苏格兰创建了20多个，在威尔士创建了9个。

游乞僧的到来，就像教会法的发展那样，是反映了全英范围内教会基本形势的一场运动。虽然教会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深深扎根于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土地，但是在教会的精神、思想和社团生活中，它已经愈来愈成为了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从11世纪的后半期开始，这一趋势变得尤其明显，当时拉丁语和法语在英格兰、苏格

兰和威尔士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尤其重要的是格列高利改革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教会法的发展和教会对于整个拉丁教会的司法权。改革者们对于教会特许自由（*libertas ecclesiae*）的要求确实造成了某种戏剧性的后果，但最终结果表明，这种自由仍是难以企及的。由于自由跟特权和继续拥有巨大的社团财富有关，国王们和其他世俗庇护人不太可能放弃他们的某些重要权力，尤其是任命主教的权力，尽管到了13世纪的时候，他们必须通过类似于罗马元老院（*curia*）的司法机构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事实上，开除教籍和停止教权等教会所能运用的精神武器都是不足以遏制世俗权力的。此外，一旦滥用，它们就会失去效力。在对于世俗世界来说真正重要的一些领域，不仅是庇护，而且还有战争、比武和商业交易等方面，格列高利改革的鼎盛期在12和13世纪逐渐转向了一个适应性的调节时期。然而改革者们所真正做到的，是把教皇作为教会领袖的理论变成了一套中央集权制度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教士们学会了按照教皇的指示去做。就这样，当教皇英诺森三世在跟约翰王闹翻之后，他下令停止英国的教权，而英国教会服从了这个命令。在1208至1214这6年当中，教会的大门紧闭，把俗人们关在了门外，使他们得不到祭坛上的圣餐、婚礼的仪式和祝圣地的葬礼。就连教皇从1199年起命令教会缴税时，教士们虽然有所抱怨，但还是缴了税。从1228年起，我们可以追溯出一系列连续不断地常驻在英国的教廷收税员；他们顶着“教廷大使”（*nuncio*）的头衔，几乎全都是意大利人。在这一方面也有适应性的迁就，比如这种缴税似乎很有必要获得英国国王的赞同。于是到了1300年的时候，国王从这一缴税的过程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在整个这一阶段中，天主教始终是未受到挑战的宗教。它的权威被视为理所当然。在英国教会被关闭6年的时期，英国公众没发半句的牢骚——也没有人对其他可供选择的宗教产生明显的兴趣。在12和13世纪中，异端邪说就如11世纪那样，并不能成为教会的一个威胁：在这一方面，英国与欧洲其他许多国家都不同。在整个这一时期，从北部的纽卡斯尔到西部的布里斯托尔（即并非在城市不那么多的苏格兰和威尔士），都有一些非基督徒（犹太人）的存在，但是他们总是

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境地，有时候甚至处境非常困难，并且在1290年遭到了驱逐。大多数基督徒们都为之欢欣鼓舞。

注释

〔1〕 克努特（995？—1035）是丹麦王斯凡一世之子，1016年征服英格兰，登上英格兰王位，1019年克努特即丹麦王位。1028年击败挪威和瑞典，成为挪威国王，并占领瑞典南部地区。至此，克努特被推尊为“大帝”，建立包括英格兰、丹麦、挪威、苏格兰大部和瑞典南部的“北海大帝国”。

〔2〕 艾特尔雷德二世（Aethelred II，别名Aethelred the Unready，968?—1016）是978—1016年间在位的英格兰国王。980年，北欧海盗入侵时，有不少丹麦人在英格兰定居下来。艾特尔雷德二世因屠杀丹麦移民而招来了丹麦人的再次入侵。1013年，他败给了丹麦国王斯韦恩之后，流亡诺曼底。

〔3〕 在11世纪初，英格兰曾经被丹麦人所占领，为了向丹麦进贡或为了抗击丹麦军队而筹措军费，英格兰国王向臣民征收以土地为单位的年度税，后来作为一种每年征收的土地税而沿袭下来。

〔4〕 海得（hide）是指中世纪英国的自由农民赡养一家人所必需的土地面积，因各地的土地肥沃程度不同，这个土地衡量单位的面积也有所不同，大约在60—120英亩之间。这种土地衡量单位之所以被称作“海得”（hide牛皮），是由于古罗马神话中一则有关迦太基城起源的故事：当泰尔国王贝卢斯的女儿狄多带着一群人逃到了非洲时，他们跟当地的土著谈判，要向他们买一张牛皮可以覆盖的土地，但他们把牛皮剪成一根根长的牛筋，并用它圈了很大一块地方，在那儿建起了一座名为Byrsa（牛皮）的城堡。这就是迦太基城的开端。

〔5〕 腓力二世（1165—1223）是法国国王。1202年腓力二世宣布没收约翰王在法国的采邑，并且占领了诺曼底、曼恩和安茹等地。约翰王与他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直至英军在1214年的一次决战中彻底败北。

〔6〕 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1079—约1144）是中世纪法国的一位著名学者和神学家，著有《神学》、《伦理学》和《哲学家、犹太人、基督教徒之间的对话》等作品。

第四章

中世纪早期的经济

1086年英国经济的基本轮廓在《末日审判书》重复而又简洁的语句中有着非常清晰的呈现。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农业经济。占90％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农村，靠土地资源挣得他们每天所需的面包和淡啤酒。这块土地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开拓和耕种——书中提到了13,000个定居点。占1914年可耕地面积80％的土地在1086年就已经得到了耕种。草地、树林和沼泽地也得到了开发。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是农民和渔民。在《末日审判书》所没有涉及的英国丘陵地区，农民们种植燕麦和大麦，而不是小麦，而且养的牛数量超过了羊。商业和工业在当时都还不能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主要职业来源。《末日审判书》所提供的数据——尽管它们跟其他数据一样，必须谨慎地加以利用——能够帮助我们勾画出关于职业方面的图景。被称作“大佃农”（*villani*）的人构成了社会中人口最多的阶层（占据有记载人口的41％）。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大约是所有土地的45％。第二大的阶层（占总人口32％）是被称作“小佃农”（bordars或cottars）的人，他们只拥有5％的土地。这样，虽然有个人之间的巨大差别，但是显然我们是在描述具有鲜明特点的两个不同阶层：即拥有大部分乡村土地的人和除了一座农舍及花园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土地的人。此外还有占总人口14％的人被描述为“自由农”（free men）或“佃户”（sokemen）。由于他们拥有占总数1/5的土地，所以从经济上来说，他们似乎属于“大佃农”那个阶层。最后还有占总人口9％的奴隶，他们没有任何土地。

在社会等级另一端的是国王和极小部分的权贵，他们全都靠自己大庄园的岁入而过着奢华的生活。不到200个俗人和大约100个主要的教堂（主教管辖区、修道院和隐修院）拥有全国财产总估价的大约3/4。这些人——用法律术语来说，他们是国王土地承租人——有他们自己的承租人。例如像威廉·德瓦伦（William de Warenne）这样一位富裕的男爵把自己价值1,150英镑的庄园中价值540英镑的土地都转租给了别人。在这些次承租人中有些被描述为骑士，而他们承租的土地被称作骑士的采邑。（虽然有许多骑士并不比那些最富裕的大佃农

更加富有，但是因为他们跟自己的领主们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属于一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国王土地承租人余下的土地——通常有一半或3/4的土地——被保留为自己的“领有地”，而领主们正是从这些领有地中获取他们主要的收入和食物。具有一个固定中心的修道院需要有连续不断的食品供应，但其他流动性更强的大领主们也许会对金钱更感兴趣。因此他们的大部分领地都租出去了——其法律术语是“得以耕作”——以收取用现钱支付的租金。大多数的承租人都来自跟骑士采邑承租人同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共同构成了拥有土地的“中产阶级”，即士绅阶层。

在1086年之后的200年内，英国经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尽管这一时期很长，但是在许多基本的方面，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286年的英国并不比1086年时更加城市化。确实，城镇比以前更多和更大了，但是总的人口也比以前更多了。在船舶设计上无疑有了显著的改进——这是自8世纪以来北欧的一个一直存在的特征。在这一时期，这种船只式样的改进尤其表现在“方帆帆船”的发展上，这是一种船壳呈圆桶状、舵装在船尾、吃水很深的大型海船。这意味着长期以来把英国东海岸跟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把西海岸跟法国的大西洋海岸连接起来的海上贸易规模见长。据推测，当时羊毛、棉布、木材、咸鱼和酒类的贸易量正在增加，而商人的利润也应随之有所增长。即便如此，也没有出现英国的商业革命，没有像13世纪的意大利所能宣称的那样，出现银行和信用制度的发展。这种相对落后的后果之一就是，在13世纪，英国对外贸易越来越大的比例落入了意大利商人的手中。意大利人的流动资本储备足以使意大利公司提出更为吸引人的条件。他们不仅能够一次性买断一个修道院当年的全部羊毛产量；而且还可以预付好几年的货款。他们通过向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大量放贷的方式，获得了英国王室的庇荫和保护。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13世纪的英国被人们视为是一个经济部分发展的国家。它的大部分进出口生意都操纵在加斯科涅人、佛兰芒人以及意大利人等外国人的手中。它主要的出口商品是原材料——羊毛和谷物——而不是经过生产加工的商品。换言之，当时还没有工业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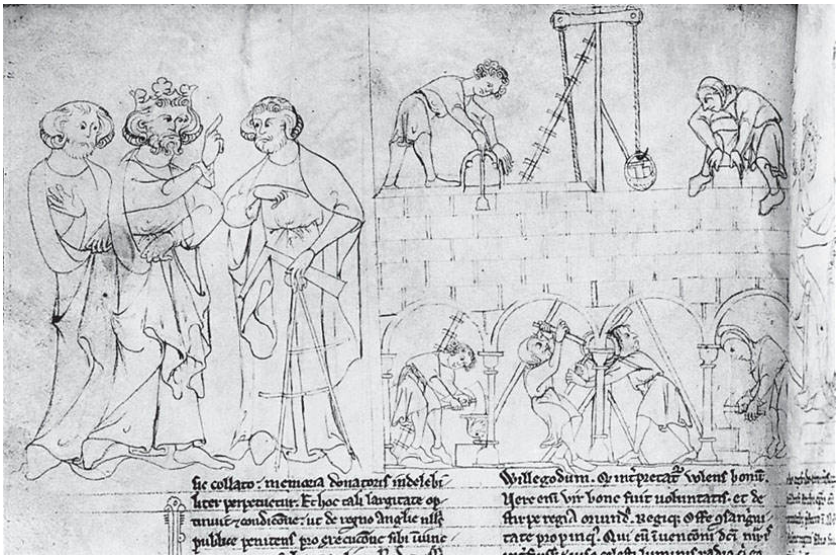

图7　王室的建筑：13世纪一幅有关建造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画中描绘了国王、建筑师和工匠。（引自马修·帕里斯的《奥发传记》。）

在这整个时期中，主要的工业仍然同以前一样：纺织、建筑、开矿和金属加工、产盐业和海上捕鱼。此外，尽管有时会有人关注当时出现的布匹漂洗厂，但是工业生产工艺并没有重大的发展。也没有出现可以跟12、13世纪佛兰德纺织工业中的高度资本发展相比拟的任何事物。另一方面，佛兰德纺织工业对英国羊毛不断增长的需求确实有助于英国保持贸易的顺差，而这种顺差在这整个时期中保证了银锭源源不断地涌入英国，足以使英国硬币银便士始终保持较高成色。（而在发展更快和货币化程度更高的地区，人们使用一种成色更低的硬币来发挥找零钱的经济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也很小。）

最主要的是这一时期没有发生农业革命。尽管像亨利的沃尔特（Walter of Henley）和伊斯特里的亨利（Henry of Eastry）这类13世纪的庄园管理专家以理性主义和科学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所处环境的技术局限性意味着当时的产量不可能有重大的增长，无论是以羊毛重量来计算的绵羊产量，还是以谷物产量来衡量的

良种培育。虽然把马作为役畜的做法正在得到推广，但是它的重要性并不是很大。农业的主要问题并不在耕地，而是在播种、收割和保持土地的肥力上。手工播种和收割费时费力。泥灰土和其他种类的肥料既成本高昂，又难以获得。只有动物的粪便可以大量采集，并且加以广泛而系统性的应用。但是喂养过冬牛羊的高昂成本意味着所能生产的动物粪便也有一个上限。除非在生产的初级阶段上有基本的改进——事实上并没有——在生产第二阶段上的改进，例如1200年左右风车的引入，其经济重要性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就这样，英国的经济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一个停滞的经济。甚至可以这么说，跟它的邻国相比，尤其是佛兰德和意大利，13世纪的英国要比11世纪的英国更为落后。但这是一个现代的视角。在12和13世纪中，英国人感觉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经济发展程度要高于其凯尔特人邻国的国家之中。

人口的增长

尽管有上述这些论断，但必须澄清的是，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该时期的英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到了13世纪的后期，英国的人口要远远高于1086年——虽然当时的男人和女人已经熟悉用“中断性交”（*coitus interruptus*）作为控制生育的方法。究竟当时有多少人口，我们无法断定。在进行钦定土地调查的年代，要估计英国的人口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当时英国的人口定在125万和225万之间。要估计13世纪后期的英国人口，其难度更大。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英国人口高达700万；其他人的估计则要低得多，也许是在500万。要估计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那就难上加难了。最近的猜测把1300年左右苏格兰的人口定于50万至100万之间，威尔士的人口定于大约25万。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们都同意，在这两个世纪中，英国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1世纪（或也许是从10世纪起）人口缓慢增长，到12世纪末人口增长加速这一假说听起来貌似有理。但是人口增长的速率不仅在时间上（很可能）有不同，而且

在空间上也（肯定）有变化。这样，约克郡北赖丁的人口在1086年之后的200年中也许增长了大约12倍；在别的地方，尤其是在那些进行钦定土地调查时人口就已经很密集的地区，即英国的南海岸和东英吉利亚的某些地区，人口增长率会低得多，尽管在沃什湾的淤泥沉积带上人口增长率特别高。

定居点和耕种地的扩张

这种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定居点和耕作地的切实扩张，尤其是在凯尔特人居住的土地上。事实上，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被现代世界的公民称为进步的许多迹象。威尔士最早的硬币是在11世纪后期铸造的，苏格兰最早的硬币铸造于12世纪。此外，12世纪见证了威尔士最早的城镇建设（如蒙茅斯、布雷肯、加的夫和彭布罗克），以及苏格兰最早的一批城镇建设（如贝里克、爱丁堡、斯特灵和珀斯）。在英格兰，城镇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它们主要的功能是作为地方上的集市。我们知道那些城镇中居民的职业：占主导地位的是饮食业主和手工艺人，其中皮革、金属和纺织店铺的店主们最为引人注目。就连在大城市中——按照欧洲的标准，英国只有一个大城市，即伦敦，根据1334年的普查，伦敦所拥有的财富是第二大城市布里斯托尔的4倍——需要长途运输和跟奢侈品相关的贸易依然处于不重要的地位。农村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意味着城镇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加。在1100—1300年间，出现了大约140个新的城镇，而且如果证据准确的话，在1170—1250这几十年间出现的新城镇数量最多：例如朴茨茅斯、利兹、利物浦、切姆斯福德、索尔兹伯里。它们大多数是由当地期望从房屋租金和计划收取的通行费中获利的领主们创建起来的。有的城镇所选的位置是为了能从海上贸易的扩张中获得好处，因为大船的通行就意味着像波士顿、金斯林和赫尔等所有这些新建城镇比林肯、诺里奇和约克等位于河流上游的港口城镇更好。

在农村，设计者的大手笔有时也可以看出来，尤其是在那些曾经被诺曼人夷为平地的北部地区重新建起来的常规形式的村庄上。在别处，例如在已经人口密集的东英吉利亚，村庄有时会被迁移到公地边缘，呈不规则形状排列，可能是为了把好的可耕地从因盖房子而“荒芜”的状态中解救出来。然而寻找生活的空间是一回事，种植足够的粮食以供生存则是另一回事。总的来说，农田的扩张往往并不是通过建立新的定居点、而是通过围绕业已存在的中心逐渐增加零星土地的方式进行的。大面积的森林、沼泽地、湿地和山地被清理出来，抽干了水，并被用作耕地。其中有些土地是相当肥沃的——沃什湾周围的淤泥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大多数新开垦的土地，例如从萨塞克斯森林地清理出来的农田，总是显得比较贫瘠。这是“向边缘进发的旅行”——人们迁移到了可耕地的边缘，在那些真正边缘化的土地上耕作：在那儿得到的收获与付出的劳动往往只能勉强扯平。对于食物的需求是如此的紧迫，面包高于一切，就连其他的“生活必需品”——燃料和建筑木材——也不得不为之让路。其他的英格兰家庭向西部和北部迁移，以寻找新的定居地。迁移到苏格兰的英格兰人一般都是受邀而来。富有进取心的苏格兰国王们欢迎英格兰人定居在他们的新市镇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英格兰家庭迁移到威尔士和爱尔兰并非出于当地统治者的欢迎，而是应了那儿新近入侵者的邀请和鼓励。在爱尔兰，他们接管了旧时北欧海盗的海港城市都柏林、沃特福德和利默里克，同时还创建了新的城镇和村庄。

尤其是在英格兰东部，人们的努力转向了对现存农田的精耕细作。在13世纪，一年种三季庄稼（而非两季）的耕作制度得到了更加广泛的采用。这就意味着每年只有1/3的土地可以休耕，而不是一半的土地。但是，倘若想要保持土地质量的话，更频繁地使用土地需要相应更频繁地施用肥料。不幸的是，可耕地的扩张有时候是以牺牲草地和林地为代价的。这种做法对于牲畜数量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不能够增加动物肥料的生产，反而会导致其下降。这反过来会引起土地肥力的贫瘠和产量的下降，而非提高。无论粮食生产在13世纪末是否确实已经下降，有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就是，假如土地的种植能力达到了实

际的顶点，而人口还在继续增加的话，那么下面这两种情况之一就必然会出现。要么英国进口更多的食物，要么平均生活水平下降。没有证据表明谷物的进口有所增加。假如粮食的进出口发生任何变化的话，那么变化的趋势也许正好相反。英国的粮食经销商用大型货船将粮食运往佛兰德、加斯科涅和挪威等工业化或专业化生产程度高于英国，而且区域性经济靠出口棉布、酒类和森林产品来换取基本食物的地区。此外，大量13世纪的英国庄园记录也表明，佃农所拥有的平均土地面积正在缩小。在这一时期，更多的人口意味着人均土地占有率越来越低。

自由人、奴婢和穷人

尽管上面所描绘的图景显得十分暗淡，但许多13世纪村民们的生活也许要比《末日审判书》时代的先辈们要好得多。相对来说，他们没有遇到多少由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他们都没有成为奴隶。奴隶制是以劳动力短缺为特征的经济的一个标志；随着人口以及劳动力的增加，奴隶制也得以消亡。确实，13世纪的英国村民中有许多是农奴，或称隶农（villeins）——他们也许占了总人口的一半——而《末日审判书》中的大佃农和小佃农（占所列人口的3/4）是自由的。但是尽管大佃农和小佃农就并非奴隶这一点上来说是自由的，但显然他们并不是很自由——这样，在《末日审判书》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占所列人口的14%）才精确地被称作是“自由人”。使大佃农和小佃农日子不太好过的事实是因为他们的领主也是自由的——不仅自由，而且权力很大。他们可以自由地任意改变习惯，以便尽可能多地增加佃农的负担，而在一个劳动力相对短缺的时期，这就很有可能意味着一个沉重的劳役制度：在当时这样一个时代中，领主们是不会满足于按照市场决定的水平来给佃农付薪的。只有在劳动力来源增加的情况下，领主们才会逐渐转向按劳付薪这个可供选择的制度。在12世纪时，许多佃农发现他们的义务从提供劳役转变成为支付租金。在这一点上，法

律原则至上的观点变得重要起来。在1200年的前后10年当中，国王的法官们制订了谁具有到皇家法庭去进行申诉的权利的规定。他们决定具有这种权利的人必须是“自由的”，而没有这种权利的人则都是属于“奴婢”。这种把社会区分为两个截然不同阶层的做法所带来的影响就是把英国人口中的一半变成了农奴，使他们在法律上失去了自由。但是律师们用左手拿来的东西，他们会用右手交出去。越是把每一样东西都加以定义并写下来，习惯保有就越能够被“冻结在”它们被写下来时的那种状态。这样，想要任意改变习惯就变得更加困难，而且习惯也可以更加有效地被用来保护现状。在这个意义上，就连13世纪不自由的佃农也会比11世纪许多自由的佃农更不容易遭受个别领主任意强征勒索的危害。13世纪想要任意改变习惯的领主们经常会发现自己陷身于漫长的司法程序，跟组织严密的乡村社区打官司。

尽管习惯法可以向贫穷的佃农提供一些保护，使他免受领主的强征勒索，但它仍然无法保护他免受经济变化严酷现实的侵扰。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英国也许有一半的村民变成了农奴，但是与贫苦的村民变得更加贫穷这一事实相比，这件事简直算不了什么。那些在13世纪末真正受苦的并非是成为农奴的佃农，而是那些无论是自由还是不自由的贫苦佃农，以及那些完全没有土地的人。关于佃农我们也了解一些情况。温切斯特庄园内的死亡率表明，自从1250年以后，贫穷的佃农们变得越来越“对收成敏感”——这个委婉的说法意味着每当遇上收成不好的时候，更多的佃农就会死去，或是因为饥饿，或是由于因营养不良而带来的疾病。对英国中西部黑尔斯欧文庄园所进行的研究表明，那儿的贫苦佃农——即《末日审判书》中小佃农的后继者们——要比境况较好的佃农——即《末日审判书》中大佃农的后继者们——预期寿命大约少10年。至于那些连土地都没有的穷人的命运，我们只能猜测；现有的证据告诉我们，他们在13世纪的文字记载中很少被提及。大庄园内的佃农们按习惯不仅能够得到现金，而且还能获得用来维持一家人性命的粮食。但是那些因没有土地而成为经济累赘的农民命运又如何呢？据推测，他们也变得“对收成敏感”。

大庄园的管理

然而，给穷人带来苦难的经济乌云对于富人来说，则是镶成了漂亮的银色边缘的云彩。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对食物的需求不断增加。食品的价格攀升，尤其是在1200年前后和13世纪后半期。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供应意味着无论计件工或是日工的工资率在整个13世纪中都保持了稳定。换言之，真正的工资降了下来。在这种环境当中，富裕的土地拥有者的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他们在市场上出售剩余产品而获得了不断增加的利润。集市大量增加。在1198—1483年间，王室颁发了大约2,400个市场准许证，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在1275年之前颁发的。同样，对于租地不断增长的需求意味着租金收入的不断增长。举一个例子，伊利主教的净收入从1171—1172年间的920英镑增加到了1298年的2,550英镑。但这并不意味着幸运的大庄园主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坐等着供需法则为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在12世纪，就跟以前一样，富裕的国王土地承租人手下的大多数庄园实际上都是由他的佃农来管理的，或是作为骑士的采邑，或是以固定的租金租给“农民”。在一个稳定或逐步扩张的时代，这样做很有道理；从领主的观点来看，它使得他的管理费用减少到了最低状态。这一体制的稳定性就在于一生或几代的长期契约很普遍，而这些长期的特许证往往会变成世袭的租约。

但是1200年前后出现的价格陡升给靠固定租金生活的领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假如他，而不是他的佃农们，想要利用市场经济的好处，那么他就必须转向直接管理他的庄园。要放弃一种历史悠久的制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许多领主都遇到了佃农们的强烈反抗，但是这种做法还是逐渐实行了。对于这一过程最有名的描述可见于布雷克伦德的乔斯林（Jocelin of Brakelond）所撰写关于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院长萨姆森（Samson, 1181—1211年在任）生意头脑的生平传记。这位大地主一手包揽了他手下所有的庄园，亲自指定管家和采邑总管们来管理它们，并且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剩余的农产品。在这种新的制度下，这位领主的费用和利润每年都不尽相同。这就使得他手下

的管家们很容易欺骗他，除非他严密地监视他们的活动。所以他就详细记录了每个庄园每年的明细账，并将它与其他庄园的类似明细账一起寄给代表大庄园中央管理机构的审计员，让他去查账。（大量这样的账目存留下来就意味着我们对13世纪英国乡村经济有很多的了解。）这些审计员扮演着制定政策和检查欺诈行为的角色。他们为每个庄园制定目标，即必须达到的粮食产量水平和存栏牲畜头数。他们作出投资的决定：是否要建造新的谷仓，是否要买肥料，等等。正是由于有这种需求存在，一种崭新的文献产生了，即关于农业和庄园管理的论文，其中最著名的作品要数亨利的沃尔特的《家畜饲养》。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以实用读写能力的广泛存在为先决条件的：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把13世纪初这场庄园管理的革命进行到底，而这恰恰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新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把领主的利润最大化，并且尽可能地以理性主义的态度来做这件事。然而，这种制度是不会去关注穷人所面对的困难的，而穷人是这个经济制度中的瘸腿鸭子，而且几乎所有这些鸭子生来就是瘸腿的。在庄园的层面上，有无数反抗领主的强征勒索的个案，既有消极的反抗，也有直接行动，有时是司法诉讼。在城市中，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着斗争。尽管有向凯尔特国家移民的机会所带来的“安全阀”，但似乎到了13世纪90年代的时候，英国是一个因为人太多而令人感到窒息的国家，传统的经济无法应对人口的沉重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处于阶级战争边缘的国家。

第五章

战争中的英格兰，1290—1390

对于那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以及那之后的历史学家们来说，大约公元1290年以后的中世纪后期似乎是一个危险、动荡和颓废的时期。英国的内战和对外战争——尤其是在苏格兰、法国和低地国家的那些战争——要比该国自从北欧海盗时期以来的任何战争都持续时间更久，战场更为广阔，花费更大，涉及的人数也更多。在不列颠岛的内部，英格兰人无法信任威尔士人，尽管英王爱德华一世数次征服了他们；以（1400年起的）欧文·格林杜尔（Owain Glyndŵr）的叛乱为顶点的威尔士人起义似乎说明了这种不信任是有理由的，并且它还使人回想起了那些说英国人终将被从威尔士驱逐出去的预言。凯尔特人对于英格兰人的偏见包含着一个被打败和受压迫的民族所能达到的所有苦涩和怨恨：“英格兰人的霸权和残暴，”一位苏格兰人于1442年宣称，“在全世界都臭名昭著，正如他们对法国、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其他邻国土地的侵占所表明的那样。”饥荒、疾病和（自1348年起的）瘟疫在15世纪初大大减少了英格兰的人口，也许减少了将近一半，而这严重地分裂了英国社会。到了15世纪末，法国的政治家们不满地指出，英国人推翻和暗杀法国国王及其后代的习惯（如1327、1399、1461、1471、1483和1485年所发生的那样），其规律性在西欧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找不到的。精神上的不稳定和异端邪说的传播使得脾气暴躁的牛津大学校长托马斯·加斯科因博士（Dr Thomas Gascoigne）得出结论，认为他所处的英国教会已经腐朽不堪，主教和教士们不能胜任他们的职责。有一位广受欢迎的诗人在1389年左右写道，他认为这个似乎已经颓废的时代的特征恰如其分地反映在人们追求装有垫肩的衣服、勒紧的腰带、紧身袜和尖头鞋等奢华和有伤风化的时尚上。

当然，接受那个时代人自己的评价是有危险的，尤其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特别紧张和动荡的年代。现在大家都接受一种看法，即战争也具有创造性的一面，在上述这个特定的例子中，它赋予了英国人一种敏锐的民族身份感；饥荒和疾病并不一定会使社会完全瘫痪，经济的紧缩也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萧条；异端邪说的发展和对宗教机构

的批评也许还会激发出人们更大的宗教虔诚；从议会的演进来看，政治危机往往具有建设性的特征；最后，文学和艺术的成就也很少会被平民的暴乱或社会的动乱所灭绝。从21世纪初的观点来看，中世纪后期当然是一个动荡和复杂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充满了活力、野心和迷人魅力的时代。

国王的君权

国王，以及以王室和皇家为中心的宫廷，是英国政府和政治的中心和支点。而对于英国政府和政治来说，最为关键的就是国王跟具有影响力的臣民之间的关系。后者首先以贵族和权贵们为主，但也包括经常想要加入贵族行列的乡村骑士和士绅、富商、主教和有才赋的教士们——所有这些人都从国王那儿寻求恩泽、地位和升迁。一位成功的国王就是要跟所有这些或大多数有影响力的臣民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政府的有效和国内的和平。这并非一项简单的任务。国王对其在王国内的君权权威的日益重视，再加上（从1216年起）去世的君主必须把王位传给长子，以及通过国王的文书和仆人所组成的网络来扩展皇家政权的原则，一定会损害大地主们的封建和地方力量。然而那个世袭君权本身，尽管减少了王室成员争夺王位的可能性，但也使得有些（由于年幼、性格或无能等原因）不适合当国王的人登上了王位。最主要的是，14和15世纪中连续不断的战争把沉重的职责压在了英国国王们的身上。从爱德华一世的统治开始，没有一个10年当中英国人是不打仗的，无论是在国外打还是在国内打。中世纪后期的每一代英国人都了解战争的需求、损伤和后果——而且他们要比前辈们更加深切地了解这些情况。

对威尔士的征服

在经历了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内战之后，英国国内的各派政治力

量成功地达成了和解，恢复了国内的和平，这也使得国王和他的臣民们能够重新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并对对方的权利和抱负都给予适当的尊重。新君王爱德华一世（1272—1307），显示出自己在管理政府方面是一位能干的、有建设性的和有效率的国王，而且决心要加强他作为君主的地位。然而他坚定不移地要把君权凌驾于不列颠群岛所有领土之上、甚至超出英国边界之外的做法，开启了一个战争连绵不绝的时代。

在威尔士，他横扫了圭内斯这个在威尔士最活跃和最独立的地方政权，随着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德于1282年的去世，英格兰在历经了200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之后，终于成功地完成了对威尔士的征服。国王因此扩展了他在威尔士西部和北部的领土，在那儿成立了一个占威尔士一半面积的诸侯国；1361年，这个诸侯国被赠给了国王的长子，后者成为了第一位在英格兰出生的威尔士亲王。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尽管也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成就。物质的损坏必须得到补偿；于是实施了一个为了保证未来安全的富有想象力的计划，这包括新建12个要塞并重建6个要塞，其中大多数都附设了一个筑有新城墙、并由效忠于国王的移民所居住的市镇；而且还为这块被征服的领土设计了一个永久性的政权。这个在1284年的《里兹兰法令》中宣布成立的政权开始只是一个军事政权，但很快就通过明智地结合英格兰的创新性和威尔士的务实性，在当地建立了和平与稳定。辅以公正与和解的强硬作风是新的统治者与威尔士人民之间关系的一个标志，在1287年、1294—1295年间和1316年分别发生的几次叛乱都没有构成广泛或危险的威胁。然而政府的代价也是惊人的。英国政府从英格兰的每一个郡甚至境外都征募了士兵、水手、建筑师、工匠和劳工，并派遣他们到威尔士服役。光是1277—1301年间在建造城堡这一项上就花费了至少75,000英镑（当时一个技术熟练的石匠每星期还挣不到两先令），而为了镇压1294—1295年间的叛乱，花费了大约55,000英镑。幸运的是，在威尔士的皇家政府执政特别成功；到了14世纪中期，它已经为英国国库创造了一笔利润，就连威尔士的士绅们也通过跟外来政权的合作而变得兴旺发达。

在卢埃林被消灭之后，爱德华一世立即转向了威尔士沼泽地（或边境）的领主们——大多数是英格兰的权贵——以便也确立对他们及其臣服者的君主权利；同时他使威尔士教会和主教们更直接地处于他的控制之下。爱德华一世征服威尔士的整个计划显示出一种想象力和决心，以及一种远远超出军事战役之外的对战略的掌握。然而被征服的威尔士人在教会和世俗政权中都受到了外族的统治，他们那种痛苦的感觉是难以轻易磨灭的。假如英格兰人的统治变得有压迫性，假如稳定的统治局面所带来的经济好处枯竭，或者假如本地人与移民之间的关系恶化，就会对英国政权带来严重的困难，殖民统治也会受到威胁。

在苏格兰的最高君主权力

爱德华一世也同样急于行使他对苏格兰的最高领主权。这是一个非常野心勃勃的任务，因为苏格兰跟威尔士不同，具有自己的君主，即坎莫尔王室（the house of Canmore），而且苏格兰人的独立意识特别强烈，尤其是在更为偏远的高地上。但与在威尔士一样，爱德华一世的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能在苏格兰行使英格兰最高君主权力的机会：1286年，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他的孙女继承人4年后也一命呜呼。爱德华一世接受了苏格兰“王国监护者”的邀请来解决王位的继承问题。他趁这项“伟大事业”（1291—1292）的机会，迫使苏格兰人承认他为苏格兰“大领主”。苏格兰人的抵制和爱德华试图将他的虚衔变为现实而作出的努力造成了两国之间互相怀有敌意的一个关系贫瘠的时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苏格兰人寻求法国的援助（1295）和教皇的支持，而且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以保护在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 1305年被处死）和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即1306—1329年在位的国王罗伯特一世）领导下所取得的政治独立。在1296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英格兰人入侵苏格兰多达20次，在低地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动荡的军事和行政

机构，但是该机构很难在一个贫穷并怀有敌意的国家里坚持下去，必须从英格兰获得大量资助。但英格兰人并没有控制苏格兰北部的海面，也没有制服或是控制苏格兰的北部和西部。这样，英格兰人在苏格兰并没有得到像他们在威尔士那样的好处——或成功，就连在战役（尤在1314年的班诺克本战役）中，他们的骑兵在机动性更强的苏格兰人面前也经历了蒙受耻辱的失败。承认罗伯特国王和放弃对苏格兰最高君主权力的《北安普顿条约》（1328）在爱德华三世于1330年亲自掌握政权之后，很快就被撕毁。从此之后，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关系便令人遗憾地出现了一系列事件：入侵、边界袭击、英格兰人对苏格兰南部各郡不稳固的占领、法国与苏格兰之间的协定得以巩固并逐渐演变为“老同盟者”（*Auld Alliaunce*）——甚至苏格兰国王戴维二世（King David II）在内维尔十字会战中被俘（1346）。在英格兰对最高君主权力的诉求和野心被苏格兰人坚定不渝和团结一致的抵抗所挫败之后，苏格兰成为其挥之不去和代价高昂的一根肉中刺。

图8　13世纪末英国王室眼中一个典型的威尔士人：长头发，质朴的手工纺织斗篷，只穿了一只鞋——还有他那珍贵的长弓。

爱尔兰

在班诺克本战役之后，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试图通过利用爱尔

兰的局势来预先阻止英格兰人在苏格兰发动的攻势。在1315—1318年间，他的兄弟爱德华·布鲁斯（Edward Bruce）得到了英——爱权贵们和盖尔人部落首领的支持；1316年，他被拥立为爱尔兰国王。不久之后，罗伯特本人访问了爱尔兰，这也许是为了刺激一场“泛凯尔特人运动”的兴起，以抵御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1307—1327）。苏格兰的干涉使英格兰政府感到震惊，并且揭示了它在都柏林政权的虚弱。在1210至1394年间，没有一位英格兰国王曾经访问过爱尔兰，就连威尔士的征服者和“苏格兰人的铁锤”爱德华一世也没有去过。相反，爱德华一世无情地剥削了爱尔兰的人力资源、金钱和物品供应，尤其用于他在威尔士和苏格兰所进行的战争和建造的城堡上。严酷的剥削和缺位的统治后来导致了行政的腐败和秩序的恶化，而那些英——爱权贵们和盖尔人部落的首领们则从中钻了很大的空子。英格兰国王的官员们经营着一个越来越软弱和被忽视的政权，而一场盖尔人政治和文化的复兴运动则在13世纪扎稳了根基。这也促成了爱德华·布鲁斯的成功。有一位同时代人评论道：爱德华·布鲁斯的崛起使爱尔兰“兴起了一股令人震颤的暴乱浪潮”。英格兰人再也没有恢复其领主权，并且从那以后再也无法将其权威施加在整个不列颠岛上。爱尔兰没有成为英格兰的一个金融资源，反而成为了一个金融累赘，其岁入在1318年以后只有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1/3，因此根本不能维持英格兰人在那儿的统治。由小人物们不时发起的远征根本不能够重振英格兰国王的权威，因此被英格兰人所直接控制的地区便缩减为都柏林周围的“辖区”。当一个政府通过以《基尔肯尼法令》（1366）为顶点的一系列法令，使用种族和文化隔绝、甚至迫害等手段时，它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失败。英格兰这个“爱尔兰领主”在中世纪晚期草率施行的君权实际上是一个代价高昂、朝纲废弛和对英格兰人统治怀有敌意的政权，它被苏格兰人、法国人，甚至威尔士的叛乱者都钻了空子。

英法关系与百年战争

英格兰君主们所要求并得到承认的对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最高领主权，在对加斯科涅提出同样要求时却遭到法国国王拒绝，而在该地，英国君主们作为兼任的阿基坦公爵，从1204年起就是法国国王的诸侯。在所谓的百年战争（1337—1453）之前和期间，加斯科涅都处于英法关系的核心：它取代了诺曼底和安茹而成为英法两国所争夺的主要领土。在爱德华一世登基时，这个繁荣的产葡萄酒的省份曾是仅存的英属法国领地，它与英格兰之间的政治联系因日益增长的干红葡萄酒出口贸易而得到了加强，与此形成互补的是通过海路运到波尔多和巴约讷的英国棉布和谷物：在1306—1307年间，该公国的岁入为17,000英镑，很值得为争夺该地而投入战争。英国与法国国王在加斯科涅的边界和加斯科涅人的权利上产生的摩擦逐渐被纳入了由自信且自我意识增强的法国政府所提出的独立国地位和主权等更为重大的问题中——法国一心想要加强对境内各个省份和封臣（包括阿基坦的英国公爵）的控制。对于英国一方来说，爱德华一世及其继位者们不愿意看到法国王室权利的加强或其对加斯科涅产生任何实际的意义。其结果就是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和谈、法国军队入侵加斯科涅的“灌木林火”战争（在这些小规模战争中法国渗透并间歇性地收回加斯科涅公国），以及英国军队的远征——甚至爱德华一世的一次亲自访问（1286—1289）。

假如不是有其他两个因素的话，英法关系也许会继续以这种方式逐渐恶化下去。英国政府痛恨法国与苏格兰结成的联盟（自1295年起），并且因为在爱德华三世入侵苏格兰之后，法国为苏格兰国王戴维二世提供庇护（1334）而感到愤怒。更有争议性的是因法国卡佩王室长子一脉的即将衰亡而引起的后果。1314—1328年间连续4位法国国王的去世，使得加斯科涅每一次都得向新国王宣誓效忠，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够恼人的了，可是最后一位卡佩家族的国王于1328年去世一事又提出了法国王位本身的继承权问题。当时新任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还不能通过他的法国母亲伊莎贝拉（Isabella）对法国王位提出要求，但是到加斯科涅的形势进一步恶化的1337年，他终于这样做了。他的这一行动也许主要是出于战术的考虑，即想使

瓦卢瓦家族的新国王腓力六世（Philip VI）感到难堪；当然，让英国国王成为法兰西国王会有不可否认的好处，能一下子解决棘手的加斯科涅问题：确保加斯科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就这样，当1337年，一支法国舰队被人发现离开诺曼底的海岸、前往苏格兰时（英国人是这样认为的），英法战争便开始了，而且将持续一个多世纪。

英国对战争目标的追求既不是连续不断的，也不是前后一致的。尤其是在14世纪，它的战争外交是由一系列紧迫的问题所主宰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维持在加斯科涅的独立统治和如何阻止苏格兰人为支援法国人而发起的对英格兰北部边界的攻击。甚至在1337年对法国王位提出要求之后，爱德华三世仍然准备让法国赎回在普瓦捷战役（1356）中被俘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John II），并且放弃他在《布雷蒂尼条约》（1360）中所提出的要求，以换取实际的让步。然而王朝之间的联姻、贸易和战略的考虑，甚至对待1308—1378年间在阿维尼翁所设立的教皇政体的不同态度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把英法之间的矛盾扩展到了低地国家、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以及苏格兰、爱尔兰，甚至威尔士。首先，众多的战役（因为这是一系列不连贯的冲突，而非一场战争）为1338—1340年间在法国北部发起的围城战役；接着就是1341—1347年间横贯布列塔尼、加斯科涅和诺曼底等法国省份且更为激烈的钳形运动战（其结果是英国人在克雷西战役中获胜，并且夺取了加来）。随后就是爱德华三世的长子，即爱德华黑王子（Edward the Black Prince），1355—1356年间从加斯科涅发动的大胆的急行军或骑兵侵袭（*chevauchées*）（最终在普瓦捷大获全胜）和国王本人1359年对兰斯的奔袭，后者是传统的法国国王加冕地。重新开始的卡斯蒂利亚战役（1367）开启了一个规模更小和时断时续的战争时期，战场设在葡萄牙、佛兰德和法国本地，双方都因持续的战争状态而感到疲惫不堪。

战争最初对于两个王国中更为团结和组织更严密的英国有利。它基于羊毛生产的繁荣经济，以及它在威尔士和苏格兰作战的经验是其在欧洲大陆发动大规模战役的珍贵基础。高度独立的法国省份的存在决定了英国的战略。1338—1340年间，爱德华三世在低地国家发动

的战役得到了佛兰德生产棉布诸城镇的支持。佛兰德尽管隶属于法国国王的统治，但是跟英国有着非常重要的贸易联系。在14世纪40年代，布列塔尼公国的继位问题使得英国军队参与了调停，甚至担负了好几个城堡的卫戍任务；而加斯科涅，尽管远在法国南部，为英国人提供了前往法国中部的直接通道。

不列颠群岛内部的战争给了英国政府一个独特的机会来采用新方法招募大量军队。由立下契约的指挥官所招募的雇佣军按新的方式支付报酬，它们的军事单位较小，纪律更为严明，要比组织松懈、行动笨拙的法国军队更为可靠和灵活；它们增补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封建军队编制。英国军队的士兵和弓箭手擅长使用大弓，并在战斗中采用防御的战术。这些特点使他们在战争的最初几十年当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并且克服各种不利条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最著名的是克雷西战役和普瓦捷战役）。海上的战争并不是太重要，而且海战的战术也没有什么新意或想象力。14世纪的指挥官们通常没有能力发动海上的战争，英国人于1340年取胜的斯勒伊斯战役对于爱德华三世的佛兰德远征来说只是偶尔发生的。英国人从来没有养护过一支常备的舰队，然而瓦卢瓦家族的国王们从他们的卡斯蒂利亚同盟者那儿学到了海战的技术，并且后来还在鲁昂建立了造船厂，这使得法国人在随后的海战中占了上风（如1372年他们在拉罗谢尔海域的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

英国人对于英法战争的投资是巨大且前所未有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远征组织得相当频繁，有时规模也很大（如在1346—1347年间的那次远征人数达到了一万多人）。财政上的花费极其巨大，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尚可容忍；但在1369年以后，随着英国军事优势越来越少，英国政府开始诉诸于新的且更为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包括人头税。用于防御和远征的运输船只不能光靠英国南部5个港口的传统义务来提供，成百上千艘商船（例如1347年用于围困加来的船只就多达735艘）被征用，退出了正常的商业运行。针对1369年之后日趋猖獗的法兰西和卡斯蒂利亚海上袭击者的海上防御是由英国南部和东部沿海诸郡来进行组织、并得到内陆各郡支持的——但尽管如此，也不

能够防止温奇尔西（1360）、拉伊（1377）和其他海港城市遭受劫掠。战争的费用的确非常高昂。说真的，确实有许多士兵享用着被征服的法国庄园，而且在胜利的年代里，赎金的收益非常大（光是法王约翰二世的赎金就高达500,000英镑）。然而成千上万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的生活和职业因战争服役而被迫中断；食品、物质和设备的供应被转用于完全是破坏性的作战行动；羊毛和酒类的贸易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引人注目的是，英国能够在海外打仗数十年，而没有造成国内政治和社会的严重紧张，与此同时它还防御了苏格兰边界，使威尔士保持平静，并且避免了爱尔兰的暴乱。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爱德华三世和黑王子的雄心、榜样力量和领导才能，他们两人体现了受到贵族夸耀和全社会仰慕的骑士美德。对于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1] 这个认识爱德华三世父子、并且记录了当时最感人骑士之事迹的埃诺人来说，那位国王“高大魁梧、相貌堂堂，自从亚瑟王的时代以来，还没见过像他那么英武的骑士”。他的儿子看上去也是个“最魁伟的男子和富有骑士精神的王子”，他于1376年比爱德华三世早一年去世时，“人们为他的崇高品质而感到深深的哀悼”。英王爱德华三世所掌握的英国政权要比爱德华一世的政权更为温和，而且远比爱德华二世的政权能干。

为战争筹措资金、政治改革和国内纷争

这些战争是英国社会变革、宪政发展和政治矛盾的催化剂，假如没有战争，这些变化都会来得更加迟缓。此外，跟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英国在14世纪也经历了人口和经济的波动，从而加剧了紧张和动荡的局势。其结果就是一系列的危机，它们反映出国王与臣民（尤其是那些自认为是代表了整个“王国社区”的权贵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微妙，以及国王本人对于个人君主体制来说有多么重要。爱德华一世及其顾问们也许能干而又坚定，甚至富有远见，但是国王顽固和专制的本性使他与那些有影响力的臣民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在1290

至1297年间，有产阶级、商人，尤其是教士们，不得不为国王在法国和不列颠群岛的征战计划交纳极其繁重和花样翻新的赋税（其收缴频率是爱德华一世统治上半时期的4倍）。人们曾经有过抵制的行为，1297年的财产税只收缴了预期数目的一小部分（35,000英镑）。此外，国王所召集的军队长期在王国境外服役。爱德华一世压制反抗行为的做法令教士们十分震惊，也使商人们深感怨愤。权贵中的头面人物，包括那些怨恨爱德华一世侵犯他们所珍视的特权的威尔士边境的领主们，重操他们自封为王国代言人的古老角色，对此作出回应，分别于1297年和1300年两次向国王提出了他们的抱怨。他们利用《大宪章》作为反抗旗帜，反对未经纳税人的许可就强行征税，反对具有压迫性和前所未有的苛捐杂税。然而，当爱德华一世于1307年7月7日即将穿越索尔韦湾、对苏格兰发动第六次远征之际不幸遇难，在巴勒–拜–桑兹死于侍从怀抱之中时，战时的困难依然存在。国王留给了他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二世（1307—1327）一场在北方进行的、还远未能看见胜利且代价高昂的战争，以及因君王与臣民之间的信任逐渐丧失而造成的英格兰政治动乱。政治稳定和战争这两个头等问题在其后的200年当中主宰了公共事务，并且对英国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以及对它的经济繁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国王若想避免王权的进一步危机，就需要有超乎寻常的老练圆通。

但老练圆通并非是爱德华二世的突出品格。由于童年缺乏关爱，青少年时期又受到父亲的冷落，而且登基时面临着众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所以爱德华二世从彼得·加弗斯顿（Peter Gavaston）和休·德斯彭瑟（Hugh Despenser）这类野心勃勃的亲信那儿寻求建议、友谊，甚至感情，而这些人却并不值得国王信任，他们的影响力招来了许多权贵的怨恨。以上这些事实，与以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Thomas, earl of Lancaster）为首的权贵们想要迫使爱德华二世作出爱德华一世所不愿意的妥协和改革的决心合在一起，把治理一个面对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和法国破坏的王国所需克服的巨大困难转变成了一场争取政治改革和个人晋升的斗争。冗长而更为明确的加冕誓言（1308）制约了新国王，使他能更坚定地遵循英国的法律和习惯，而1311年权贵

们又制定了法令以限制国王的行动自由；这些法令在议会内宣布，以便获得广泛的支持和赞同。爱德华二世具有他父亲的顽固个性（尽管没有具备他的能力），而加弗斯顿被谋杀一事（1312）又把这种个性转变成了一种不可动摇的决心，即绝不受他朋友之谋杀者们的控制。与此同时，战争和防御对国王的臣民们所造成的负担丝毫也不比爱德华一世进行征服的时期更加轻松，而且这正是1315—1322年间，一连串自然灾害和牲畜瘟疫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苦难和贫困。1321—1322年间的内战和1326—1327年间的国王被废黜都是国王与臣民为相互的利益而进行合作失败的必然后果。爱德华二世于1322年在议会里废除了那些法令，同样是在1322年，在巴勒布里奇打败他的对手之后，国王在（约克的）议会里处死了兰开斯特伯爵。到了1326年，爱德华二世被废黜、把王位让给同名的儿子和继承人。对于一个因残忍、具有压迫性和失败的统治而酿成了国内纷争的政权来说，这似乎是唯一的抉择。这一令人生畏的行动是伊莎贝拉王后密谋发起的，得到了爱德华王子的默认，获得了大量权贵和其他人的支持，并在议会中得以宣布。这种事件是前所未有的：自从诺曼底征服以来，还没有一个英国国王被赶下过王位。所以在1327年，人们尽了一切努力，想要隐藏那隐藏不了的事实，并试图为无法辩解的事情作出辩解。那位愁眉苦脸、热泪盈眶、几近昏厥而令人生厌的国王被迫同意自己的退位，而议会召开了一次会议，把责任推卸在尽可能多的人身上。尽管爱德华二世的儿子的继位保证了世袭原则免遭损害，但是受膏国王的不可侵犯性已经被破坏了。

爱德华三世的统治

虽然在1327年时只有14岁，但是爱德华三世很快在1330年便有了孩子。事实证明他比他的父亲更有能力，且对权贵们的态度和志向更为敏感——实际上他分享着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和志向，而且接受贵族社会的骑士义务。与此同时，新国王在法国那些宏大和颇得民心的

计划所引起的问题与爱德华一世所提出的那些有关不列颠群岛和加斯科涅的计划情况类似。倘若这些计划最终证明是不成功的，英国很可能会发生类似于在爱德华二世统治下所出现的那些事件。旷日持久的战争于1337年再次爆发，这意味着赋税的增长甚至超过了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最后几年的水平，而爱德华三世对待商人、银行家和大地主们的态度，就像爱德华一世一样冷酷无情。不仅如此，由于国王长期在国外打仗，跟权贵们一样迷恋于冲锋陷阵，因此国内通常由国王亲自指挥的复杂行政管理机构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爱德华三世于1338年在泰晤士河畔的沃尔顿颁发的有关从国外指挥英国政府的法令使位于法国北部的国王及其顾问与留守国内的政务会委员们产生了矛盾。有人甚至担心，假如英国在战争中取胜，英格兰也许会在爱德华三世的心目中沦为二流国家，而法兰西王国则会成为他的最爱。就这样，1339—1343年间又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权贵们、商人们和议会下院（现在已成为国王征税要求的论坛）的议员们联合起来对国王提出了抗议。爱德华三世被迫对权贵、教士和臣民们采取显得更为慎重和体贴的做法。最终的妥协和恢复臣民对国王的信任（自从13世纪90年代以来，它已变得难以捉摸）之所以可能，则因为爱德华三世是一位通情达理和讲究实际的君王，既具有自信，但又不流于傲慢。他指定了能够被权贵们所接受的大臣，迎合了议会的妄自尊大，而且还发展了跟臣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使他得以在1/4个世纪中维持了对英格兰的统治以及对法兰西的野心。进一步的危机得以避免，尽管英格兰已经涉足于它最重要的战争。

图9　英王爱德华二世，爱德华一世与卡斯蒂利亚的埃莱诺（Eleanor of Castile）在世的长子；他于1308年跟法兰西的伊莎贝拉结婚；1327年被废黜并被谋杀。他在格洛斯特的精美雪花石膏坟墓（约1331）成为了一个朝圣地。

14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形势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对比。对于当时那一代英国人来说，从1369年起在法国重新开始的战争遭遇失败和在爱尔兰和苏格兰边境令国力衰竭的小规模战斗是令人不安的；而新一轮的赋税，在英格兰享受了战争带来的利润和暂缓纳税10年之后又重新被提出来，遭到了人们的怨恨。英国南部港口城市遭受的频繁袭击、英吉利海峡不可靠的海上控制威胁到了商业贸易，令商人们感到烦恼。在法兰西境内代价高昂的骑兵侵袭偶尔也显得引人注目，但很少有赢利的。然而1375年英国的政策突然发生逆转，与法国订立了屈

辱的停火协议，还得向不被信任的教皇支付款项，其结果是冒犯和激怒了英国人民。此外，堪称王后楷模的菲利帕王后（Queen Philippa）于1369年去世之后，爱德华三世逐渐变得老态龙钟，不仅体力衰退，就连判断力也受到了损害。黑王子也因参战过于频繁和劳累而开始元气大伤；事实上，他先于父亲在1376年6月去世。然而，加在英国人身上的财政、人力和其他负担并没有得到减轻。人们，尤其是议会的下议院议员们，对国王身边的顾问和官员们的诚实和能力纷纷提出了质疑。再加上因罗马教廷和教会形象一落千丈而引发反教权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在爱德华三世手下担任大臣的神职人员迫于群众的抗议而于1371年提出辞职，其他的大臣也被控腐败甚至叛国等罪名。另一个政治危机也出现了。在1376年的“好人议会”这个历时最长和最富有戏剧性的会议中，那些据说腐败和无能的大臣们，甚至还有老国王富有影响力的情妇艾利斯·佩雷尔斯（Alice Perrers），都受到了下院议员的指控，并且经过一种新颖和非常有效的弹劾程序，在上院接受了审判。从此以后，根据这种弹劾程序，凡是权居高位的人都必须公开为他们的公众行为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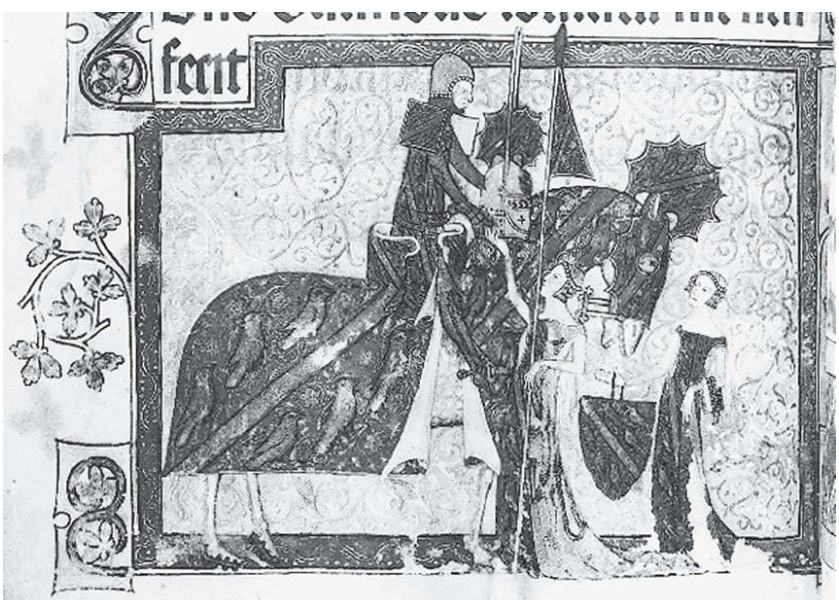

图10　一位骑士正在为比武作准备，所谓比武，也就是为战争作准备的一种操练和骑士的一种户外运动。图中，杰弗里·德勒特雷尔爵士（Sir Geoffrey de Luttrell）在妻子和女儿的帮助下披挂甲胄。（选自著名的《勒特雷尔圣诗集》，约1340。）

理查二世登基

当爱德华三世本人于1377年6月去世的时候，这场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王位由黑王子唯一活下来的儿子和继承人，即当时刚10岁的理查二世（Richard II，1377—1399）所继承。英国面临自1066年来第二次和自1216年以来第一次由未成年人继位的前景。在年幼的亨利三世登基之后曾经围绕他出现过一段政治动乱的时期；在1377年之后也出现了类似的情景，并由于这个原因在英格兰的东部和东南部引发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参见第六章）。1377—1380年间，英国推行了一系列的人头税，以筹集军费。这些人头税的税率要比一般的赋税高，1379年的人头税被称为“罪恶津贴”。它们在东英吉利亚激起了暴力抗击收税人及试图强迫人们纳税的法官的浪潮。但把这些让人恼火的事情转化成大规模叛乱的因素有：因战争失败而在国内引起的长期混乱、不断发生的瘟疫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当时的反教权主义情绪。叛乱者们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年幼的理查王身上，但是这种想法被证明是无望的，尽管他在1381年面对伦敦的叛乱者们时显示出了相当的勇气。

理查二世才14岁，统治集团内的贵族纷争依然在继续，国王的叔父们也是其中主要的参与者。正是这一点以及英国在法国缺乏进一步军事胜利的事实损坏了以理查的名义统治英国的顾问委员会的名誉，甚至损坏了国王本身在臣民眼中的形象。理查也正在变成一个任性的君王，因其不安全感而导致他依赖卑鄙的心腹小人，使人们回想起爱德华二世的密友。当他逐渐长大以后，自然想要扩大他随从和侍从的人数，以超过他以前作为孩子来说合适的数目。在他的朋友和伙伴中有一些刚刚成为贵族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受到了国王慷慨的庇护，而

那些没有得到理查恩惠的人（包括他的叔父格洛斯特）的利益则受到了损害。1386年，议会和一些权贵们攻讦理查二世最亲密的伙伴，甚至威胁到了国王本人。具有安茹王朝成员那种顽固不化个性的理查二世拒绝屈服。这就导致了格洛斯特公爵、沃里克伯爵、阿伦德尔伯爵、诺丁汉伯爵和国王的堂兄德比伯爵等5位主要的“上诉”贵族对他的顾问们提出了进一步的控告或上诉，还导致了1387年12月在拉德克特桥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国王最亲密的朋友牛津伯爵被击败。在具有重大影响的“无情议会”（1388）上，国王被迫接受贵族们的惩罚——假如这种做法能够延续下来的话，将会大大地改变英国君主制的性质。战争的压力、个人统治所造成的紧张局面，以及英国权贵们的野心，又一次造成了最严重的政治和宪法危机。世袭君主制的机构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这样的危机之后，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损害，但是对国王顾问们的批评却达到了一个新的有效水准，而来自广大社会阶层的意见对事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就是中世纪后期改变英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更深层变化的政治和个人维度。

注释

〔1〕 让·傅华萨（1333？—1400）是曾经长期在英国王宫里服务的法国诗人和宫廷史官。他所著的《闻见录》记录了英法百年战争中的许多史实。

第六章

中世纪晚期的财富、人口和社会变化

中世纪后期英国的财富就是它的土地，大多数的英国人口都在从事这些土地的耕作和利用：种庄稼、生产奶制品和养牲畜。英格兰最重要的工业，即纺织业，也是间接地以土地为基础的，经常是从数量庞大的羊群身上生产出欧洲最好的羊毛：格洛斯特郡的圣彼得修道院在1300年就拥有一万多头绵羊，而当时英格兰所拥有的绵羊总数据估计在1,500万头和1,800万头之间。最富有的地区就是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各郡的低洼地区和绵延起伏的丘林地带，一直延伸到威尔士的边境和威尔士南部沿岸地区。其他的工业在创造财富和雇用劳动力方面显得较为次要，但是康沃尔郡的锡矿却是国际著名的，锡还被出口到欧洲大陆。铅矿、铁矿和煤矿的规模较小，尽管从泰恩山谷和斯旺西的周边地区向外运煤的沿海航运反映了家庭和工业用煤的日益增长。至于财政和贸易机构，国民经济从中收益甚微，但是到了现代，它们却成为了英国主要的财富来源之一。除了赫尔的德拉波尔家族（the de la Poles），很少有英国商人能够与在伦敦建有分行的意大利银行家们进行竞争，尽管事实上，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向这些意大利公司借贷的战争军费往往逾期不还。英国的商船队，除了沿海地区外，往往要比外国的船只稍逊一筹，然而运往低地国家的加斯科涅的酿酒和羊毛产品确实是越来越多地落入了英国商人的手中和英国商船队的货舱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间分布着1,000多个市场和集市——到了1350年时，它们的数量超过了以往——它们主要是为位于半径20多英里内的当地社区服务的。这些小型城镇和乡村的大多数——包括蒙茅斯、伍斯特和斯特拉特福——跟它们的乡间腹地紧密联系，那儿的富裕居民经常在城镇生活中担当相应角色：参加行会、购买和出租城里的住宅，以及出任城里的职位等。有少数城镇，包括有些港口城市，面积更大，具有更为广阔的贸易视野：什鲁斯伯里的商人们在15世纪时经常前往伦敦，而伦敦和加来的商人们在1347年以后经常访问威尔士的边境地区，以寻求优质的羊毛。与波尔多有密切联系的布里斯托尔正在很快地变成中世纪后期塞文赛德的货物集散地，而约克、考文垂，尤其是伦敦，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中心。

地主、农民和商人们

这些财富带来了个人、机构和王室的繁荣。最大的地主就是世俗的权贵们（就像“平原上的摩天大楼”，人数很少）、主教们、修道院和其他宗教机构。在1300年，这些人和机构仍然从因前一个世纪人口增长而创造的市场繁荣中大量获益。物价上扬，来自土地的收入相当可观：当格洛斯特伯爵于1314年在班诺克本去世时，他的庄园每年收益据估计为6,000多英镑，而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堂小隐修院于1331年获得了超过2,540英镑的毛年收入。因此地主们直接从庄园中得到收益，并对庄园的有效管理产生个人兴趣。他们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权利最大化，试图从佃户们的身上压榨出更多的租金，在庄园法庭仔细地记录与财产相关的各项义务。这种源于土地的财富是贵族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影响的基础。许多贵族同时在好几个郡县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拥有庄园：例如赫里福德和埃塞克斯伯爵汉弗莱（Humphrey）就在埃塞克斯、米德尔塞克斯、亨廷登郡、赫特福德郡和白金汉郡，以及在布雷肯、海伊、亨廷顿和威尔士边境的卡尔迪科特继承了财产。土地同样也是士绅阶层家产的基础，尽管是在一个更为地方化的郡县层次上，而土地也使教会机构具有一种世俗的权威，以辅助它们对于人们心灵的控制。这种财富可用以支持个人在一个更为全国性的舞台上的要求和野心，例如兰卡斯特伯爵托马斯（1322年死）这个当时英格兰最富有的伯爵。

1300年的农民们生活在一个土地缺乏而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又受到地主们的严密控制的世界里。物价很高——与13世纪前半期相比较，1270年以后的小麦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在购买了食品、衣服和农具以后，农民的余钱很少。在一个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很低，无论是熟练工，还是非熟练工，其购买力都很低：一个木匠每天只能挣3便士（不管饭），一名苦力只能挣一便士，或一个半便士。牢骚、抱怨，以及阵发的暴力都是针对地主及其手下管事的，抗租和拒绝按习俗服劳役的事件时有发生。

1300年的商人们大多数从事羊毛的出口和葡萄酒的进口，他们在

从波罗的海一直扩展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市场上生意兴隆，尤其是在开通了从地中海到意大利北部的海上通道之后。在1304—1311年间，羊毛出口平均每年为39,500袋（每袋至少含有从250只羊身上一次剪得的羊毛），而且只有30%至40%的出口羊毛是由外国人运送的。在英国商业界逐渐兴起的排外情绪反映出本地（或外来定居）商人的自信和果断。爱德华一世曾经在13世纪80年代为他们的利益立法，最主要的就是有利于商人们用法律手段来追回债务，这对于扩大商业贸易是十分关键的。但是当战争爆发时，正是商人们首当其冲地抵制高额的赋税，尤其是1294年的“罪恶赋税”（*maltolt*），以及对商船的征募。

赋税、工资和就业

国王是全英国最大的地主，甚至在爱德华一世得到威尔士的一块领地和1399年兰开斯特家族的庄园被王室兼并之前就是如此。在爱德华一世及其继承人的统治下全国税制的发展使得王室也可以向地主和商人们索取财产。就连农民也不能幸免，就像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人们在通俗小调《农夫之歌》中所唱的那样。接着，在1327年，所有拥有价值至少在10先令以上财产的人都必须支付1先令8便士的赋税，毫无疑问，纳税的负担被间接地转移到了不那么富裕的人身上。对于战争的全神贯注使得国王严重依赖于臣民的财富和宽容。假如这种财富停止增长，或假如个人和机构的繁荣被破坏，那么国王异乎寻常的投入也许最终会被釜底抽薪，而他臣民的忍耐力也会达到危险的临界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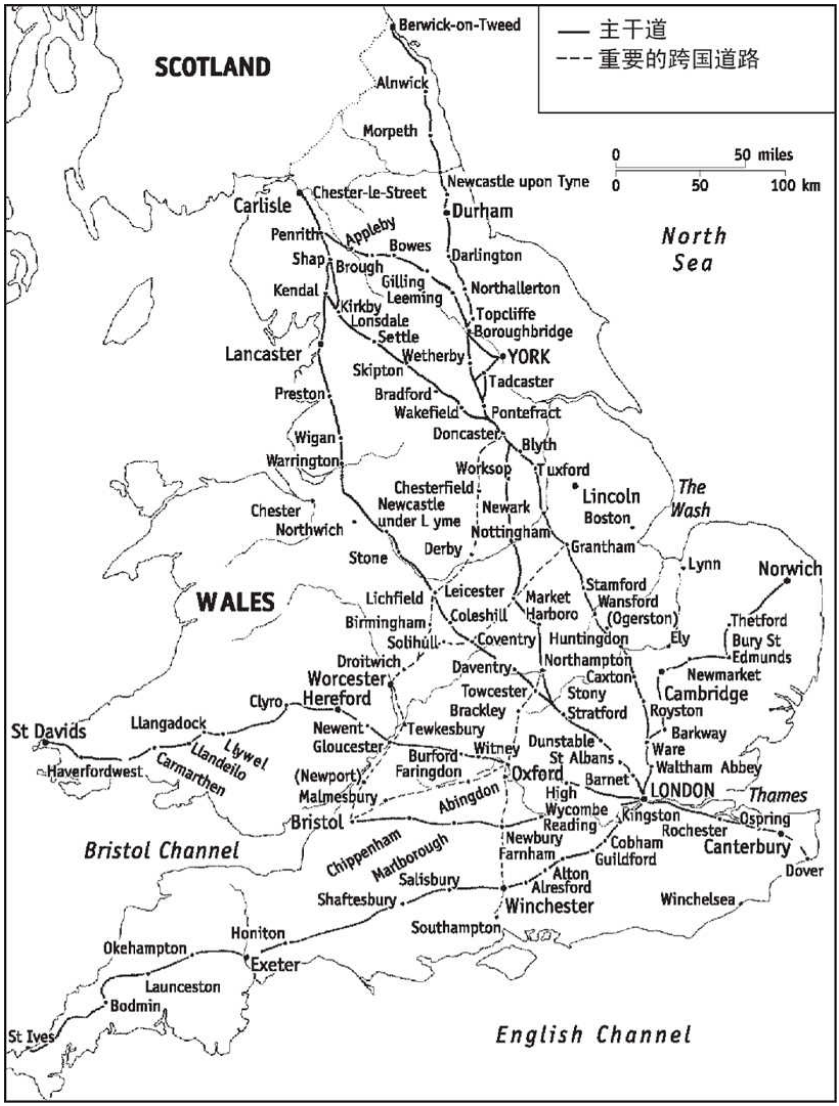

地图3　中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主要道路

到了14世纪中期，“全盛农作”的繁荣时期已经基本结束。物价低迷，使为市场而耕种变得不那么有利可图。工资上涨，农业工人的工资涨得比手工艺人的更快。雇用妇女也不再有利，因为男女同工同酬——事实上，为了招徕干活的人，妇女的工资甚至更高！大规模耕种

之所以失去它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人口增长已经停止，甚至迅速出现了负增长。当劳动力市场紧缩之后，工资便增加了；人口减少之后，对于食品和日用品的需求也随之减少，于是物价也降了下来。

人口、贫穷和瘟疫

大约在13世纪末，英国人口达到了400多万的顶峰。当时没有足够的耕地来保证所有农民的家庭都能够过上像样的生活。大量人口加上低生活水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贫穷、饥荒、疾病和不断上升的死亡率，人口的快速增长随之停滞。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人们，其生活状况又因为14世纪初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和极其恶劣的天气带来的一系列自然灾害而变得更加窘迫。收成不好对于一个没有适当粮食储备条件的社会来说是灾难性的：食物越来越少，而且人们也没有钱去购买价格越来越昂贵的食品。1315、1316、1320和1321这几年的收成尤其不好；牛羊的瘟疫在1319年和1321年非常猖獗，剑桥郡拉姆齐修道院的庄园花了20年才使牛羊的头数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而在1324—1326年间，英格兰部分地区遭受好几次洪灾，光是肯特郡就淹死了成千上万头羊。饥荒和疾病到处传播，1315—1317年间，伍斯特郡的黑尔斯欧文农庄有15%的男子死于饥荒和疾病。农业的混乱在英国颇为广泛，谷物价格飞涨（1315—1316年间，黑尔斯欧文一带的谷物价格从每夸特5先令7¼便士涨到了26先令8便士），羊毛出口暴跌。然而，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灾难，在14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逐渐恢复；但是穷人最易受伤害的特点显露无遗。

持续时间更长和影响更为深刻的是瘟疫所造成的后果。从16世纪以来被称作“黑死病”、但是被同时代人叫作“速死病”的瘟疫首次于1348年在英国南部爆发；到了1349年，它已经往北传播到了苏格兰的中部。一位同时代的牛津郡教士杰弗里·勒贝克（Geoffrey le Baker）描述了它从港口城市开始传播的路径——因为瘟疫是由老鼠肆虐的船只带到英国来的，以及人们在诊断它的起因和对付它的病征

时所显示出来的茫然无助：

起初它在多塞特感染了这个海港城市几乎所有的居民，接着它又传染给了住在内地的人们，并从那儿经过德文和萨默塞特，一直传到了布里斯托尔。所以住在格洛斯特郡的人们拒绝让布里斯托尔的居民入境，大家都认为那些住在瘟疫区的人的呼吸都是有传染性的。但是瘟疫最终还是袭击了格洛斯特，是的，还有牛津和伦敦，最后全英国都受到了该瘟疫的严重袭击，无论男女，只有1/10的人活了下来。由于墓园装不下这么多的死尸，人们选择了农田来埋葬死人……无数的平民和大量只献身于上帝的修士、修女和教士都死于瘟疫。而且被瘟疫袭击的主要是那些年轻力壮的人……这场于8月15日在布里斯托尔爆发和9月29日在伦敦爆发的瘟疫在英国肆虐长达一年之久，使许多村庄变得空无一人。当这场大灾难横扫英格兰之际，苏格兰人欢欣鼓舞，以为他们能够打败英国人，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但是紧随着欢乐而来的却是悲伤，上帝的愤怒之剑离开了英国人，并将苏格兰人逼入了绝境……第二年，瘟疫又降临了威尔士和英格兰；最后它搭上风帆，去了爱尔兰，在那儿它杀死了大量的英国移民，但是居住在山上和高原的纯爱尔兰人却几乎毫发未伤，直到公元1357年，它才不期而至，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杀死了大量的爱尔兰人。

图11　一位肯特郡的农民在1390年前后被迫在公众面前赤脚背着一口袋干草和麦秆，从温厄姆前往6英里之外坎特伯雷的红衣主教宅邸。14世纪后期的佃农

们试图避免为领主们干这种令人感到屈辱的劳役。（选自红衣主教威廉·库尔特尼[Archbishop William Courtenay]的花名册［1381–1396］，337页。）

黑死病所造成的经济影响

黑死病一下子就把英国的人口削减了1/3。到了1350年，泰恩河边的纽卡斯尔“就像战争时期遇到各种其他灾祸那样，因致命的瘟疫”而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卡莱尔“也因近来（苏格兰人）的经常袭击和在这些地区肆虐一时的致命瘟疫而变得荒芜和极其萧条”。萨塞克斯郡的锡福德据称甚至到了1356年，“还因受到瘟疫和战乱的蹂躏，使得那儿的居民如此稀少和贫穷，以致于他们付不起赋税，也无法保卫自己的城市”。牛津郡的塔斯莫是瘟疫的另一个牺牲品：到了1358年，国王准许把那儿的农田改为公园，因为所有的隶农都已经病死，村里已经没有任何纳税人了。然而黑死病的影响并非马上就是、也非永久都是灾难性的。住在里辛的一个威尔士人的行为颇有代表性：他“在瘟疫来临时因贫穷而离开了他的土地”，但是在1354年他又回来了，“因领主的恩惠而被允许为原来的领主服务并保持原来的土地”。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里，死去的佃农可以被别人所取代，地主们在其后20年中的收入只减少了不到10%。然而在下一个世纪中重新爆发的瘟疫——尤其是在1360—1362年间、1369年和1375年流行的瘟疫——才具有持久性的影响，哪怕这些疾病的爆发更加具有地方性和更多是在城市里。到了15世纪中期的时候，英国人口稳步地降到了大约250万，或者更少。

对于那些在瘟疫中幸免于难的人来说，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的生活无疑并不像以前那么可怜。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野心和富裕的时代：乔叟（Chaucer）可以用轻松乐观的笔调来描写《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那些朝圣者，而不是营造一种愁苦和沮丧的气氛。在紧缩的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可以摆脱几个世纪以来的不利条件，把租金压下来，并且在被雇用时坚持索要较高的佣金；而且随着

物价的崩溃，他的生活水准得以提升。比较成功和有抱负的农民租下了新的土地，把多余的现钱投资高利贷借给其他农民；尤其是在南部和东部，在农民史上头一次建起了高大的石头房子。

图12　英国的中部和东部1,300个“消失的村庄”之一。格洛斯特郡的迪奇福德中部也许是在15世纪中期被放弃的，因为人口的减少和其从街道、小巷和开阔的田野到田园式的农业的转变。过去的田野仍然有很明显的标志，在图的前面部分可以看到田埂和犁沟等耕种的痕迹。

另一方面，地主们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有关小麦、羊毛和其他商品的市场化生产并不挣钱，英国的耕地面积紧缩，农业投资减少。工资和其他费用上涨，似乎有必要放弃“高效农业”技术，而把小块的土地出租给有进取心的农民。整个整个的社区都空空如也——即英国“失去的村庄”——有许多这样的村庄是因为人口危机和持续不断的战争这两大折磨而被放弃的：在英格兰地区，“失去的村庄”数量最多的是靠近苏格兰边界的诺森伯兰郡和成为敌人劫掠目标的怀特岛。只是在15世纪的最后10年中——东安吉利亚是从15世纪60年代开始

——英国的人口才开始有了比较大的上升；有可能直到17世纪，英国的人口才重新达到了1300年的水平。

英国的经济在14世纪后期有了显著的紧缩，但并不是全面萧条。当人们克服了瘟疫袭来时的心理震惊之后，社会调整得非常好，尽管混乱依然存在。地主们必须进行最痛苦的调整，他们的反应有好几种不同的方式，其中并非所有的方式都是为了维护国内和平的。有些人，包括心态更为保守的教会地主们，例如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院长，采用了强制的手段，甚至包括压迫和勒索，以保持他们对于剩下的佃农的控制。有的人无情地剥削他们的庄园，以便保持他们的收入，而像莫蒂默家族（the Mortimers）等在威尔士拥有众多庄园的权贵家族所持的严厉态度，也许正是引起格林杜尔叛乱（1400）的原因之一。其他像15世纪稍晚一些的白金汉公爵等人，采用效率更高的管理方法来改进庄园的利润。然而其他人认为把田野和公地圈起来作为草场和农田的方法成本更低，并把它视为支撑不稳定的租金收入总额的一种替代手段；于是在15世纪后期，北部和西部圈地的做法逐渐升温。大小地主们集体采取行动，“来遏制佃农们的怨恨，他们懒散成性，在瘟疫之后因得不到高额的工资，就不愿意再侍奉主人”。爱德华三世关于恢复瘟疫之前的工资水平和阻止被解放的劳动力流动的法令（1349）很快就变成了议会的成文法（1351）。此外，占据了显赫位置的权贵或乡绅还有补充性质的财富资源：如以分封土地、金钱和职位为形式的国王恩典（就像亨利六世［Henry VI］的博福特［Beaufort］亲戚所熟知的那样）；使约克公爵理查（Richard，1460年去世）成为当时最富有的权贵的家庭财产继承；以及与嫁妆丰厚的女继承人或富有的寡妇结合的幸运婚姻。还有人靠为国王效劳而发家致富，这不仅仅是在战争时期。亨利五世辉煌胜利时的英国人捕获了可交纳大笔赎金的战俘，以及得到了法兰西北部的庄园，甚至晚至1448年，白金汉公爵还可以每年从法国的佩尔什郡获得超过530英镑的收入。有人在15世纪中期大肆挥霍为国王服务和打仗而获得的利润，用它们来建造富丽堂皇和美丽优雅的城堡：例如约翰·法斯托尔夫爵士（Sir John Fastolf）在诺福克的凯斯特所建造的城堡，或赫伯特

家族（the Herberts）在格温特的拉格兰所建造的巨型宫殿式城堡，或拉尔夫·博梯勒爵士（Sir Ralph Botiller）在格洛斯特郡的苏德利所建造的城堡。上述手段和资源促成了贵族阶层的崛起，他们的权力丝毫也不亚于前几个世纪中的贵族，并经常具有很高的地区地位，就像北部的内维尔家族（the Nevilles）和珀西家族（the Percies），以及西部的斯塔福德家族（the Staffords）和莫蒂默家族。

类似的调整也发生在英格兰的城镇和商业之中。羊毛生产仍然是一项主要的牧业，但是羊毛工业的模式却在14世纪发生了改变。部分是由于战争，以及因为战争而造成佛兰芒工业中断的结果，部分是因为英国人趣味和需求的改变，纺织生产吸收了数量越来越多的、以前专供出口的羊毛；有一些专门从事羊毛出口的港口城市，如英格兰东部的波士顿和林恩，便开始衰落。斯坦福和林肯等主要的纺织生产中心被坐落在靠近水流湍急的溪流和河流附近、有漂洗作坊的村庄和城镇里的一大批新的纺织生产中心所取代。约克因利兹、哈利法克斯和布拉德福德等城镇的崛起而相形见绌；再往南，东英吉利亚、英格兰西部，甚至威尔士，都发展了繁荣的纺织工业，而布里斯托尔则成为了英格兰西部的一个主要出口城市。伦敦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城市：它是14世纪后期唯一一个人口也许已经超过了5万的中世纪英国城市。它是全王国的贸易中心，是波罗的海、北海和地中海商业的终点站；它吸引了来自伦敦周围各郡和东英吉利亚的移民，尤其是偏东部的中部地区的移民；而它的郊区沿泰晤士河匍匐而上，一直延伸到威斯敏斯特。在乡间也同样如此，这些变化撼动了一些城镇的生活，那儿的自由民寡头政治力图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维持其控制。英格兰的地主们就是这样来试图对抗经济危机的，其代价是造成了他们与越来越自信的农民和已经确立的城市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

农民起义

14世纪英国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张力的累积效果最

生动地反映在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上。它的猛烈程度、持续时间和在全国各地引起的反响都是异乎寻常的，但它的基本特征，正如随后的其他阴谋叛乱所体现的那样，却是司空见惯的。1381年如星火燎原般的暴力浪潮是由新一轮的人头税所引发的，这一次的税率为每个人一先令，是1377年和1379年那两次人头税税率的3倍。人民对此作出的反应是逃避征税和对收税人及进行调查的法官采取暴力对抗，最终在1381年6月，爆发了武装起义。城镇和伦敦的居民也都加入了英格兰东部和东南部农业工人的起义行列。东英吉利亚生产谷物和羊毛的乡村感受到了因一个越来越过时的封建社会中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挛缩和破坏性而造成的巨大冲击力。此外，14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的政治管理不善和新近在法国的累累败绩使起义者感到幻灭，而且他们害怕敌人会在沿海地区发动袭击。尽管异端邪说并没有在这次起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起义者对英国教会的教义和组织所持的激烈批评使得许多人倾向于谴责似乎正在失职的教会。

图13　教士出身的1381年农民起义煽动者约翰·鲍尔（John　Ball）正在对由沃特·

泰勒（Wat Tyler，左面站在最前列者）率领的起义者们进行说教；图中的旗帜宣告了起义者们对国王理查二世的效忠。

对政府的压力和对新国王的吁请（“支持理查王和真心的下院议员们”是起义者的口号）给人们带来了消除苦难的最佳希望，而伦敦的人们则成为起义的潜在支持者。起义者们随后从埃塞克斯郡和肯特郡（沃特·泰勒和教士出身的约翰·鲍尔就是在那儿成为起义领袖的）聚集到了伦敦。他们打开监狱，劫掠国王手下大臣们的居所，将伦敦塔洗劫一空，并且试图迫使理查二世作出意义深远的让步和妥协，这些让步一旦实行，将会打破现存农奴制度的桎梏，并且彻底颠覆教会和政府对土地的控制。但是这次起义的计划和组织工作都十分糟糕，更像是属于因失望而自发揭竿而起的性质。到了6月15日，起义者们就已经各自分散回家了。

第七章

重开战争，1390—1490

1389年，当时22岁的理查二世宣布：“我已经成年，可以治理我的家庭、我的王室和我的王国。因为我认为自己目前的处境要比王国中最卑微的臣民都更加糟糕。”在1386—1388年间发生的事件，即上诉贵族们试图决定国王对朋友和大臣们的选择，并且控制他的政治行为，使不原谅人的国王与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关系恶化了。在这些批评者中有一些是王国中最有权力的权贵们，他们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所拥有的庄园面积加起来可以与王室在更为遥远的威尔士、柴郡和康沃尔郡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大致相等。然而在1389年之后，理查王开始谨慎地行使他作为英国国王的权力，并且凭借他的悟性和勇气，试图解决在前一个世纪中由于前任国王的野心和政策所造成的问题。在一个政治相对平静的时期，理查二世以王室及其遥远的领地，尤其是柴郡和威尔士北部为基地，小心翼翼地组建了一支保王党。阿伦德尔伯爵所丧失的爵位使他在威尔士边境这个贵族力量最具有独立性的地区掌握了更大的权力。1394—1395年间对爱尔兰所发动的大规模和代价高昂的远征是自1210年以来由一位英国国王首次发动的侵略战争，它成功地重振了英国的统治，并且通过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手段，使盖尔贵族和盎格鲁——爱尔兰贵族都归顺了英国国王；理查二世心里也许还想着如何将长期搁置的征服英伦诸岛的计划最终变为现实。这次远征无疑加强了他作为最高领主的权力，并且显示出他的王室组织和资源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尽管这只是暂时的。对于苏格兰，1388年英军在奥特本打了败仗之后，理查二世采取了鼓励持不同政见的苏格兰权贵和策划军事行动的传统政策；但是在14世纪90年代，他开始觉察到和平所带来的好处。1396年与法国签订的一个和平条约和理查二世与瓦卢瓦的伊莎贝拉之间的婚姻中止了一场会使英国力量更加衰弱的战争；假如这次敌意的化解能够按照预想的进程一直保持到1426年的话，它将会是整个百年战争中最长的一段和平时期。在国内，国王能够集中精力来恢复皇家政府，因为在14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国王个人性格和政治上的软弱，政府已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礼仪和视觉象征被富有创造性地用来作为皇家的宣传手段。

理查二世富有想象力、精明且专横跋扈。他的其他品质则不太适合于一位国王。他的教养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使得他有一种不安全感，导致他过于自信、不够理性且任性多变。尽管对朋友慷慨得惊人，但他也会出尔反尔、讳莫如深，对待敌人十分严厉。在1397—1398年间，他流放了沃里克伯爵，处死了阿伦德尔伯爵，谋杀了格洛斯特公爵，接着又流放了德比伯爵和诺丁汉伯爵。理查二世无情地施展了自己作为君王的个人权力（“他推翻了任何想要违反君权的人”是他为自己所撰写的墓志铭的一部分），他在位最后两年中的表现使他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暴君。教皇在他的劝诱下威胁要将任何“企图对王室的权利、王权和自由持有偏见，并且恶意诋毁国王”的人开除教籍，而理查二世在与法国签订的和平条约中答应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帮助法国国王镇压自己的臣民。他于1399年5月对爱尔兰的第二次访问使得德比伯爵，和现在的赫里福德和兰开斯特公爵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有机会回到英国，重新获得他的地位，并恢复他从父亲那儿继承的、但最近被理查二世所剥夺的兰开斯特公国的庄园。国王的做法已经超出了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以及他手下权贵们所能容忍的限度。但是，同年9月29日理查二世的下台，结束了英国人为解除战争负担而作出的最持续的努力。

15世纪的英格兰及其邻国

废黜理查二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尽管有1327年的先例，但1399年的形势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这是自从狮心王理查去世以来，英国国王第一次在结束统治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个儿子和继承人，所以王国现在面对王位继承有争议的可能性。自从1216年以来的习惯是把王位继承权托付给长子的那一脉，哪怕这也许意味着让一位孩子当国王（正如亨利三世和理查二世本人那样）。在长子那一脉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王位继承办法。1399年的王位继承人若按血缘来排列的话，那就得在7岁的马奇伯爵（他的祖母是爱

德华三世第二个儿子莱昂内尔［Lionel］的后代）和33岁的亨利·博林布鲁克（他的父亲是爱德华国王的第三个儿子约翰）之间来选择。博林布鲁克因获得被理查二世所疏远的珀西家族的支持而夺取了王位。但是在理查二世被废黜和囚禁所造成的特殊环境下，马奇和博林布鲁克都没有明显的优势。无论博林布鲁克一方如何歪曲、隐瞒和争辩，都不能掩饰其政变（*coup d'état*）的真相。因此，就像12世纪那样，英国政治中被注入了一种使朝代不稳定的因素，它造成了国内的混乱局面，并且鼓励了下一个世纪中外来的阴谋和干涉。

与此同时，英格兰并不能逃脱它早先试图在英伦三岛上让凯尔特人归顺而带来的后果。在理查二世富有想象力的政策失败之后，英国需要有一个更为稳定的关系来保证王国目前的安全，因为进一步的征服和殖民明显超出了它资源的限度。英格兰的国王们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所有要求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大部分地区得到最高领主地位的企图。在15世纪，他们对苏格兰人采取了防御的手段，部分是因为跟法国的重新开战，部分也是因为英格兰在亨利四世的统治下（1399—1413）和1450年之后所面临的内部困难；苏格兰人甚至于1419年派遣了大量的增援部队去帮助法国人。在一个短时间内（1406—1424），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在英格兰被捕一事威慑住了边界对面苏格兰人的敌意，但此后苏格兰人变得更加大胆，希望能收复罗克斯堡城堡和伯威克城堡，他们在1460—1461年间便实现了这一愿望。袭击、海上冲突和海盗行径，再加上行之无效的停火协议，它们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没完没了的“冷战”状态。只有在百年战争结束（1453）和英国确立了约克王朝政权（1461）之后，英国才开始了对更稳定关系的认真寻求。英格兰与苏格兰于1475年签署了和平条约。1502年又取得了“永久性的和平”，尽管在法国方面还有些担心，在苏格兰也偶尔有一些由英国人发动的战役，如格洛斯特公爵理查（Richard, duke of Gloucester）于1482年夺取了伯威克。这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重大改变，尽管边境地区仍然时有突袭，而且混乱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关系所达成的平衡，英格兰人并不像

盖尔人和盎格鲁——爱尔兰人那么满意。理查二世大胆地要求在爱尔兰行使国王权威的做法已经失败，并且在中世纪再没有人重复这种做法。国王在爱尔兰的领主权，尽管花费了英格兰大量的财政支持，始终是虚弱的：盖尔人享有独立和相对的繁荣，盎格鲁——爱尔兰人珍视他们自己的权力，并且与他们的盖尔人同僚达成了协议。英格兰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安全（“爱尔兰是英格兰下面的一段撑墙和一根桩，”15世纪30年代的一位同时代人如是说），只是在这种安全局面受到威尔士人叛乱（1400—1409），以及15世纪50年代的威胁时，英国人才有更多的兴趣来关注爱尔兰事务。其结果就是爱尔兰内部的政治分裂和从英国分离出去。盎格鲁——爱尔兰大权贵们是政府唯一可以依赖的力量源泉，以保持某种权威的样子：大多数英国人甚至都不愿意去爱尔兰，从都柏林进行有效统治是不可能的，而征服爱尔兰所需的资源根本就不存在。在15世纪，爱尔兰的真正统治者是像奥蒙德伯爵和基尔代尔伯爵这样的权贵们；即使政府想要驱逐他们，也难以做到。英爱关系虽然达到了平衡，但其代价是英国人放弃了有效的控制。

在威尔士，完全征服也带来了它自身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在14世纪后期紊乱的经济气候中，人们把怨恨集中在英国移民居住的城镇上，并把矛头对准了教会和政府的官员们，而他们大多来自英格兰的边境各郡，甚至更遥远的地方。从1400年起，这种怨恨转变成了欧文·格林杜尔的叛乱，在这次不愉快的经历之后，大多数英国人都用一种怀疑和恐惧的眼光来看待威尔士。有一个同时代人这样敦促道：

> 提防威尔士，耶稣基督保佑我们，
> 别让它使我们的孙辈们哭泣，
> 假如真的会这样，也别使我们
> 因不警觉而受伤；因日复一日
> 人们都惧怕在那儿会发生叛乱……

于是威尔士便给英国带来了一个安全问题，而且是一个紧迫的问

题。它不仅为外来的敌人提供了一个登陆之处（正如发生在格林杜尔叛乱的高峰时期和在玫瑰战争中不断出现的那样），而且还是一块因管理不善和秩序混乱而被破坏的土地。亨利五世在挫败叛乱之后对付威尔士人时表现出刚柔相济的手段，还命令边境地区的贵族们管辖他们的领地。但后来，无论是王室，还是边境地区的贵族们都不能维持有效的统治，而威尔士的乡绅阶层，即英格兰乡绅的战友们，表现出越来越微弱的责任心。然而王室和边境地区的贵族们都需要这些威尔士乡绅们来统治威尔士，因为王室沉陷于内战，而且到了15世纪，少数贵族因收入锐减和威尔士人的敌意而不敢摆出贵族身份。整个国家到了1449年“治理不善的情况屡见不鲜，并且日益增加”，因此该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出现了秩序以及安全问题。从亨利六世到亨利七世（Henry VII）的一系列英国政权都试图使威尔士保持和平，改进政府统治的质量和控制地方乡绅，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对于边境各郡县和国家稳定所构成的威胁。在15世纪上半期，目标是完善现存的执法机构，依靠皇家的官员和边境地区的贵族们来完成他们的职责。最后采纳了更为激进和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法，尤其是爱德华四世（Edward IV）于15世纪70年代把自己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安插在拉德洛，以管辖威尔士的领地、边境地区的贵族们，以及英格兰边境的各郡县。这是一个大胆将权力下放的行动，他给予了未来的威尔士亲王们管辖威尔士的职责。

英格兰权贵们（由低到高依次为男爵、子爵、伯爵、侯爵和公爵）的领土权力对于保持王国的和平和政府统治的成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们在15世纪时成为了一个有严格定义和世袭的社会群体，并且几乎一定持有议会上院的贵族席位。君王能够册封贵族（就像亨利六世和爱德华四世所做的那样），并能够提升现有的贵族爵位，而国王的恩典对于保持权贵的财富和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凡是不注重这一点的君王往往会跟权贵们产生严重的矛盾（如理查二世和理查三世就为此付出了代价）。尽管他们的数目很小——最多不过60个家族，而且在几十年的内战之后也许还不到半数——但他们的作用至关重要，不仅因为有些权贵在威尔士边境地区具有独立领主的权力，以及

内维尔家族和珀西家族在英格兰北部的主宰地位，而且还因为他们对英格兰诸郡县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控制力。对于王权来说，他们是比官僚系统或民事政府更为有效的一个支柱。对于有3个王朝是用暴力夺取王位，以及在国内外均有权贵积极参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15世纪来说，上面这一点则显得尤其真实。英国在法国的失败和在那儿丧失的英国领地，直接使英格兰的权贵们蒙受耻辱，并且这也是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后来所竭力想要避免的。

这些权贵们跟英格兰的乡绅们具有相同的利益——约有6,000至9,000名乡绅、候补骑士和骑士仰仗于权贵们的“仁慈领主权”，并且向权贵们回报以“忠诚的服务”。权贵们则给予酬金、土地和职位，以及贵族阶层的建议、支持和军事援助：在1454年，白金汉公爵将自己的徽章给了2,000名扈从。城镇和城镇居民们也是这种相互利益和服务的一部分，历史学家们毫不客气地将这种体系称为“亚封建主义”。权贵、乡绅和市民们在议会两院（即上院和下院）中的行为是这种连锁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权贵及其扈从们的合作对于15世纪中那些篡夺王位的朝代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兰开斯特家族根基深厚，因为亨利四世继承了他父亲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所创建的利益关系网。年收入12,000英镑的冈特是中世纪晚期英国最富有的权贵，而他那些幅员广阔的庄园和大量的皇家恩赐现在由他作为英国国王的后代们（1399—1461）来支配。作为1399年另一位国王候选人马奇伯爵的继承人的约克王朝（1461—1485），除了威尔士的边境地区之外，则没有继承这么多的土地和财富。他们没能获得大部分权贵的支持，这对于一个王朝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弱点：它只存在了24年。不仅继承了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而且还有内维尔家族和博福特家族的，以及其他内战受害者的家族庄园、领地影响和赏赐的亨利七世建立了对所有英格兰权贵和乡绅们的最稳固的控制。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叛乱

第一位篡夺王位者亨利四世的优势就在于他推翻了一位已经疏远了很多人的国王，而凡是同情国王的贵族都已经身败名裂。亨利四世的冲劲、毅力和调解能力——更别说他的慷慨——以及他的兰开斯特家族背景和联系使得他能够打败任何英国国王所面对过的最吓人的敌人组合。理查二世的铁杆支持者企图在温莎城堡暗杀亨利四世及其儿子们的阴谋被挫败，而这些叛乱者遭到逮捕，并于1399年12月在赛伦塞斯特被处死。来自这种“理查追随者”的危险导致了理查二世本人不久之后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神秘死亡。堪称1399年国王拥立者的诺森伯兰和伍斯特的珀西伯爵们，在1403年时对于国王想要赢得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的支持的目标是如此地不满，以致于他们策划了好几次叛乱。诺森伯兰的儿子霍茨珀（Hotspur）在前往参加威尔士叛乱的途中被英军打败，并战死在什鲁斯伯里附近。在英国北部，珀西家族与约克大主教斯克罗普（Archbishop Scrope of York）之间建立了联盟，但是亨利四世又一次占据了主动，于1405年处死了那位大主教。诺森伯兰最后一次得到苏格兰人援助的叛乱在布拉姆汉姆沼泽地被击败，伯爵本人也被杀死（1408）。

威尔士叛乱在殖民地社会中根源更深。深受瘟疫折磨的苦难经历、那些一心想要维持自己收入的外来地主的压迫、一种对怀有雄心壮志的威尔士人关上机会大门的倾向、甚至对于理查二世被推翻的怨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威尔士人揭竿而起（1400）。各种不同的叛乱动机和威尔士社会的分裂意味着这并不是一次纯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起义。然而这是亨利四世所要面对的有着最严重威胁和最高昂代价的镇压行动。欧文·格林杜尔从他在威尔士东北部的庄园出发，摧毁了所有的城堡和英格兰移民所居住的城镇。他和他的游击部队利用山区的地形来骚扰和拖垮敌人，然后消失“在岩石间和洞穴里”。他们所获得的成功可以从叛乱的持续时间之长、没有决战和皇家军队远征无功而返等方面来衡量。格林杜尔偶尔可以集合起一支8,000人的军队，他还从法兰西（1403），以及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同胞们（1401）那儿寻求援助。在于1404年和1405年举行的“议会”上，他制订了一个关于独立威尔士的宏大计划，这个国家拥

有它自己的教会组织和大学（这些目标要等4个世纪之后才得以实现），他与珀西家族之间的联盟是打算作为肢解亨利四世所统治王国的一支序曲的。

由国王和他长子亨利王子率领的英军发动了好几次威尔士战役（1400—1405），这些战役所采取的战略与英法战争中的战略颇为相似——钳形运动战、毁灭性的骑兵侵袭，以及水陆并进的协同后勤供应。最沉重的战争负担经常落在边境地区的各郡县以及中西部等地区，因为英军不断地从这些地区招募士兵赴威尔士服役。这些军队的人数相当多——在4,000人以上——相比之下，派往法兰西的英军人数很少会超过5,000—6,000人。但是在威尔士服役没有在草木更为茂盛的法兰西服役那样的吸引力；英国政府很难筹集足够的现钱来支付士兵和守军的军饷。1403年9月，亨利四世被告知“你将找不到一个愿意在你所说那个国家停留的乡绅”。

总的来说，在威尔士北部和西部比较安全的欧文在人力、后勤补给和金钱上也有他自己的困难，1405年他向伍斯特进军的失败使他的光环逐渐消退。当詹姆斯一世被英军捕获（1406）时，他失去了苏格兰人的同盟军；1407年，又签订了一个英法停战协议。到了1408年，亨利四世所遇到的最大危险已经过去：通过毅力、果断和随时奔赴沙场的决心，亨利四世追击敌人，将他们横扫出英格兰、威尔士和爱丁堡以北，并且将他们统统打败。通过调解，他在没有放弃任何重要王权的情况下得到了议会的支持，而且他的4个儿子，亨利、托马斯（Thomas）、约翰（John）和汉弗莱（Humphrey），均在战争中逐渐成熟，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当他于1413年去世之后，对他的王朝构成进一步威胁的情况只发生过两次。第二年，当某些侍臣的反教权主义变成了异端邪说时，亨利五世甚至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老朋友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Sir John Oldcastle）判了刑。1450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叛乱跟1399年的篡夺王位有着直接联系——即1415年由马奇伯爵的支持者所发动的——它是在国王哈尔[1]率军前往法国之前被镇压的。亨利四世在奠定王朝坚实的基础方面可谓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布列塔尼和勃艮第佛兰德的联盟

关系使他获取了广泛的国际承认。

亨利五世和英法战争

亨利五世所继承的王国足够和平、忠诚和团结，使他能够从1415年起对法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在其后7年中有一半的时间在国外度过。亨利五世在作为威尔士亲王时就有了指挥作战和治理国家的经验，被证明是一个能干、无畏和专制的君王，他放弃了父亲那种小心谨慎的处世方式。就连他身在法国的时候，他在国内的王权也是稳固和积极的，这使他能够打一场如爱德华三世早期战役那样深得人心的战争。他对英国的统治是兰开斯特王朝的巅峰。

亨利是通过与残存的理查二世支持者达成调停以及与外国重修同盟的形式来进行备战的。法国国王发疯和贵族争吵不休的形势鼓励了他征服的梦想。到了1415年，他感到可以对超出爱德华三世想象的领土提出主权要求，甚至像爱德华三世那样，要求继承法国的王位。亨利的野心恰好符合他的臣民们的期望。于是在热心的权贵和骑士们的领导下开始了大批军队的组建工作；整个王国经常投票表决以征收高额的赋税，国王也得以公开解释他的目标，以赢得人民的支持。他甚至组建了一支海军以主宰英吉利海峡。在他去世之前，这种热情一直没有消退，尽管议会的下院对于最终征服法国给英国带来的后果表达了同样的不安（1420），就像他们的前任在爱德华三世时所做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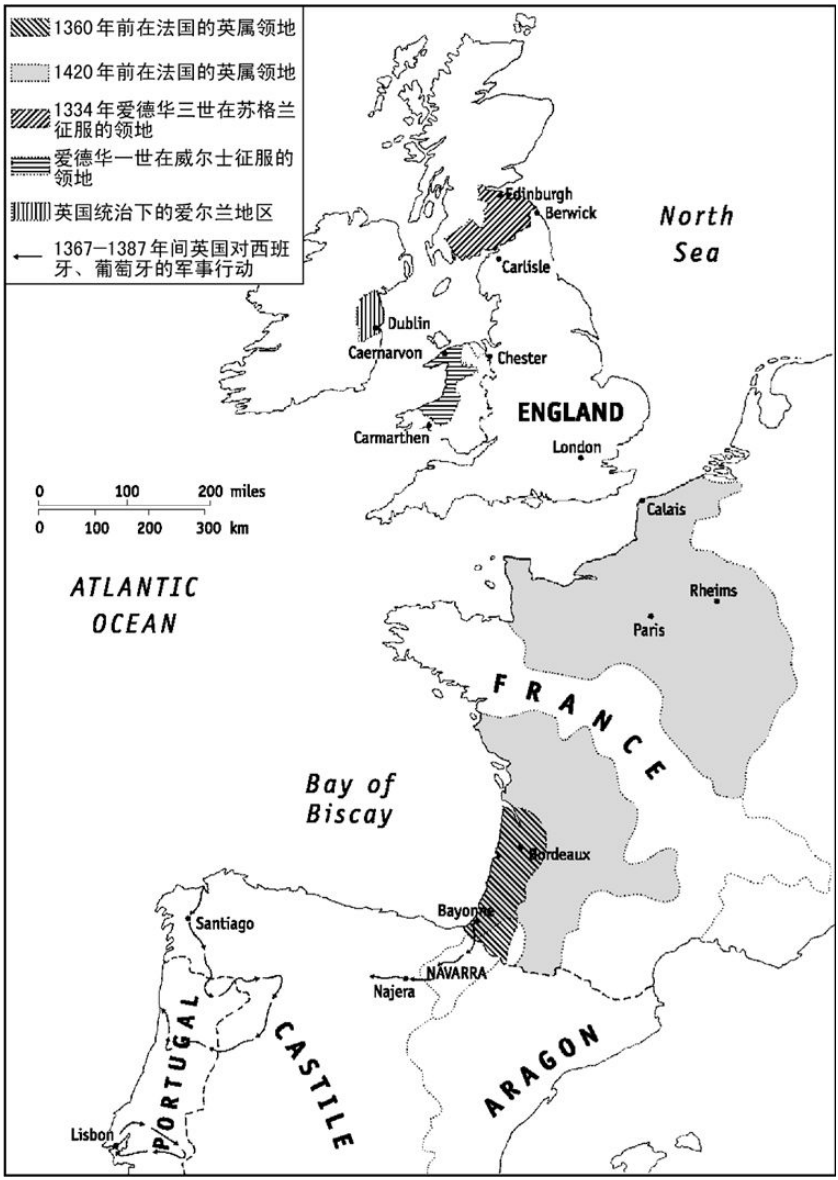

地图4　中世纪后期英国在西欧所采取的军事行动

亨利五世的战略就是爱德华三世的战略——跟法国的贵族形成同盟，从他们的分歧中获利，推行他建立自己王朝的主张。在整个战争中，勃艮第的支持对于英国所取得的胜利至关重要。然而，侵略者的

目标很快就扩展到了进行前所未有规模的征服以及殖民运动。1415年的远征只是试了一下水，而阿让库尔战役的胜利验证了传统的英国战术。因此，在1417—1420年间，亨利五世着手征服诺曼底，此地与邻近的省份一起，成为亨利五世统治时期和他死后这段时间的主要战场。他跟查理六世（Charles VI）签订的《特鲁瓦条约》（1420），使他成为了法兰西摄政，并取代皇太子成为了瓦卢瓦王位的继承人。这个非同寻常的条约在历经几代人的时间内支配了英法关系。虽然亨利五世从没有成为法兰西国王（他于1422年死于查理六世之前），但他尚在襁褓的儿子，英格兰的亨利六世，或者对亲英的法国人来说，法兰西的亨利二世，继承了双重的王位。他需要不断地努力，才能够勉强维持这个地位。

在1417—1429年间，亨利五世和他的弟弟、继任驻法英军指挥官的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将诺曼底的边界向东和向南推进，并且接连在阿让库尔（1415）、克拉旺（1423）和韦尔讷伊（1424）等地成功地击败了法军。这些是英军在法国最辉煌的时刻。在贝德福德领导下，英军寻求一种“坚定和安抚相结合的建设性平衡”，以便使其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和（往南在安茹和曼恩的）进一步战役中能够就地解决各自的费用问题。但是由圣女贞德（Joan of Arc）所发动的法国人起义和查理七世（Charles VII）在兰斯的加冕（1429）挫败了这个计划，英军在帕泰打了败仗之后，进军步伐受阻。从那以后，处于外国人统治下的诺曼人变得焦躁不安，英国的布列塔尼和勃艮第同盟者也动摇起来，英国议会不得不为在法国北部进行的战争寻找更多的军费，因为那儿的卫戍部队和野战军正在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英国人不仅落入了一个军事陷阱，同时也落入了一个财政陷阱——而且没有了亨利五世的天才来指引他们。

亨利六世和寻求和平

在15世纪30年代，寻求和平成为了一件更为紧迫的事情，对英国

来说尤为如此。阿拉斯会议（1435）和格拉沃利讷的协商（1439）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主要是由于英国人在对和平的渴求度和作出重大让步的利弊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查理七世时运的恢复、为保卫兰开斯特王朝统治下的法国的英军远征军费的不断增长、贝德福德于1435年的去世、尤其是勃艮第的变节，这些都是决定性的因素。英国政府释放了自从阿让库尔战役以来一直囚禁在英国的奥尔良公爵，以便能促进与他同辈的那些法兰西亲王之间的和平（1440），但是他并没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1445年，亨利六世与法国王后的侄女安茹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Anjou）结婚，但即使是这样也只促成了一个停火协议，当时提出来的两国国王之间的会晤始终没有发生。最后，亨利六世答应归还在曼恩的得来不易的领地，以显示他个人渴望和平的诚意。此事并没有得到他臣民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在法国有领地、并在打仗时冲锋陷阵的权贵和乡绅们——这导致了被激怒的法国人于1449年对诺曼底发起攻击。法军在大炮的支持下所发动的进攻大获全胜，使得英国人在鲁昂和福尔米尼一败涂地，并很快于1450年8月底撤出了这个公国。“……从未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征服，而且给人民和士兵造成的伤亡这么小。不仅被打死的人很少，而且对乡间的毁坏程度也不大，”一位法国编年史家这样报道说。

在亨利五世和亨利六世的统治下很少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加斯科涅，遭到了大胜的法国军队的入侵。法国于1453年7月17日在卡斯蒂永打了胜仗之后，英国人在西南部的领地全部丧失。这是最具毁坏力的一个打击：加斯科涅自从12世纪以来一直是英国的领地，长期以来与法国西南部建立起来的葡萄酒和棉布贸易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对于亨利五世的“帝国”来说，现在只有加来还在英国人手里。被打败和理想破灭的士兵们回到英国之后，都认为声名狼藉的兰开斯特王朝政府应该为他们的狼狈境地和亨利五世赢来的战果得而复失一事负责。在国内，亨利六世面对着失败所带来的后果。

在卡斯蒂永战役之后的3周之内，亨利六世的一场大病造成了他精神和身体的崩溃，而且这场病持续了17个月，也许他再也没能从这

场病中完全康复。法兰西王国的丧失（亨利六世是唯一在法国加冕的英国国王）也许是造成他崩溃的直接原因，尽管在1453年，他统治的其他方面也出现了令人十分担忧的问题。亨利六世最信赖的那些人，尤其是萨福克公爵（the duke of Suffolk, 1450年被谋杀）和萨默塞特公爵（the duke of Somerset, 1455年在圣奥尔本斯战死），被证明辜负了他的信任，并遭到了广泛的憎恨。那些得不到国王恩宠的人——包括约克公爵理查、内维尔家族在索尔兹伯里和沃里克的伯爵们——心怀不满和嫉恨，他们试图改善自己财富的努力受到了国王和王室的阻挠。亨利六世的政府濒临破产，它在边远地区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权威正在逐渐陷于瘫痪。1450年夏天，英国爆发了自从1381年以来的首次民众暴动，其领袖是默默无闻但又才华横溢的约翰·凯德（John Cade），暴动者占领了伦敦好几天，并且谴责了国王的大臣们。国王对于英国所处的困境无疑负有重大的个人责任。

玫瑰战争

亨利六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他对教育和宗教具有值得赞赏的抱负；他寻求与法国的和平，并希望奖赏他的朋友和仆人们。但是没有一位中世纪的国王能够单凭良好的愿望来治理好他的国家。此外，亨利六世还是一位浪费、随心所欲的人，对人和政策缺乏精明和稳妥的判断力。他才思敏捷，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却缺乏作为一个国王的经验，并且从未摆脱年轻人的那种对别人的依赖性，这一点不可避免地是他长期作为一名未成年国王（1422—1436）的最显著特征。诚然，他的许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由他父亲所创立的双重君权与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等主要作为军事征服者的身份相比较，提出了更为繁重和更为复杂的要求。他的未成年时期是一个由权贵们进行统治的时期，而他们所获得的各种既得利益在国王成年之后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尤其是他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以及他的叔祖，温切斯特的红衣主教亨利·博福特（Henry Beaufort）。此外，在格洛斯特

于1447年去世之后，亨利六世成为了亨利四世长子长孙这一脉唯一的后代，这一事实导致他不信任约克公爵，即1399年没能当上国王的马奇伯爵的继承人。于是，在兰开斯特王朝统治的后期就有了很多令人幻想破灭的理由，而约克公爵理查也就成为了一名潜在的反对派领袖。

尽管国王身患疾病，他那位性格暴躁的王后于1453年生下的一个儿子无疑巩固了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但是它并没有改善王国或约克公爵理查的近期前景。作为英国首屈一指的公爵和亨利六世的堂兄弟，约克在国王重病期间（1454—1455，1455—1456）曾两次被任命为英国的摄政王。但正由于权高位重，他激起了王后深深的敌意。在布洛尔荒野和勒德福德桥上的“战斗”（1459年9—10月），以及随后在考文垂召开的，使约克公爵、内维尔家族，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受到惩处的议会上，王后的敌意终于爆发出来。这种由一个政权来疏远一群掌握权力的大臣的做法在国内外留下了一个灾难性的记录，它最终导致约克公爵于1460年10月提出了继承王位的要求。公爵不久之后在韦克菲尔德去世，但他的儿子爱德华在沃里克伯爵的帮助下于1461年3月4日夺取了王位。在自从15世纪50年代以来就已经逐渐成熟的条件下，俗称玫瑰战争的王朝之战正式拉开了帷幕。

这位新的约克王朝的君王爱德华四世处在了一个极为不利的条件之下：被废黜的国王、王后和王子仍然在逃。这样，他们就为吸引追随者以及苏格兰和法国的同情者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对象，而亨利六世的境外同情者们正巴不得有机会来使一个尚未站稳脚跟的英国政权陷入困境。当亨利六世在英国北部被捕（1465）之后，爱德华四世才算是松了一口气，尽管当时前国王被囚禁在伦敦塔内，而他的王后和儿子则是在苏格兰，随后又到法国避难。更为严重的是，爱德华四世并没有得到英国权贵及其扈从们的广泛支持。此外，在15世纪60年代后期，他逐渐疏远了那位权力很大的“国王拥立者”沃里克，而沃里克就像1399年以后的诺森伯兰公爵那样，开始对爱德华四世越来越强的独立性感到不满。爱德华还被他那位不负责任的弟弟克拉伦斯公爵乔治（George, duke of Clarence）所抛弃。这些不同的因素加在一起，

便构成了1469年暴乱的阴谋。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一（Louis XI of France）的鼓励之下，爱德华四世与流亡的兰开斯特王后玛格丽特于1470年7月签订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协议。沃里克、克拉伦斯、兰开斯特家族的支持者和持不同政见的约克家族成员都回到了英国，这种局面迫使爱德华四世逃到了他的同盟者勃艮第公爵那儿。于是人们又把亨利六世重新推上了王位，使其成为第一位两次单独统治整个王国的英国国王（1422—1461，1470—1471）。当亨利的议会于1470年11月召开时，大法官特意把下面这句话当作他开幕词的开场白，其诉诸的对象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而是针对全国民众："主曰：背道的孩子们，回来吧！"[2]

但是那位被废黜的爱德华四世，正如在他之前的亨利六世一样，仍然在逃，他可以借助勃艮第公爵的帮助组建起一支军队。此外，亨利六世新建立的政权也因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忠诚和相互排斥的利益而受到了损害。就这样，当爱德华四世于1471年3月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可以在巴尼特打败并杀死沃里克，然后又向西进发，在蒂克斯伯里击败刚刚从法国归来的兰开斯特王后及其王子。爱德华四世的地位终于变得极为稳固：王后玛格丽特在蒂克斯伯里战役之后被捕，而她的儿子则在战斗中被杀，就在爱德华四世胜利凯旋、回到伦敦的那天晚上（5月21日），亨利六世死于伦敦塔，很可能是被谋杀的。兰开斯特王族的主脉至此已丧失殆尽，而持不同政见的约克家族成员也都要么隐退，要么去世。克拉伦斯虽然在一个时期内与其兄弟达成了和解，但最终在1478年还是因进一步的言行失检而被处斩。

爱德华四世在15世纪70年代所享有的相对政治稳定，使得他有机会来尝试进行具有建设性的统治。他试图通过与布列塔尼、勃艮第和苏格兰结盟，以及用沿着前辈国王的足迹远征法国的方式来重振英国在国外的名声。他于1475年发动的远征几乎以灾难收场，因为他的布列塔尼和勃艮第同盟者被证明是变化无常的，但在《皮基尼条约》中，路易十一向他提供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赔款，以让他退兵。爱德华四世试图重组政府财政机构的企图与兰开斯特王朝时期所提出的设想正好相符。假如他为了取悦于议会而宣布自己准备在此后的统治时期

不再征收特殊的赋税，那么他想要奖赏朋友和吸引政治支持者的愿望就意味着他不可以采用一贯的方法来增加他的岁入。他为了讨好商人和伦敦市民们而亲自独立经商，并与佛兰芒人和德意志港口城市的汉萨同盟[3]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后期统治的稳定性尤其有赖于极为能干和忠诚的政府官员，他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政策的连贯性。

那么，玫瑰战争究竟为什么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后代们不知道一个都铎王朝只存在于威尔士北部的乡绅阶层之中？约克家族的成员们在1483—1485年间成为了个人君主制所要面对的两样最常见的危险的牺牲品：一个未成年君王和一个残酷无情、野心勃勃的皇亲国戚。当爱德华四世于1483年4月9日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Edward）才12岁。他的未成年监护期并不需要很长，而且无论如何，英国在此前已经有过未成年国王的情况，且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麻烦。但是自从15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的政治行为每况愈下，爱德华四世、沃里克和克拉伦斯等人的反复无常、残酷无情和违法行径使得爱德华五世的登基显得特别危机四伏。爱德华、克拉伦斯和格洛斯特等约克家族的兄弟们在约克王朝短暂的在位期间似乎无法摆脱贵族的态度而承担起家族王朝的义务。爱德华所依靠的是一些权贵们，他们大多数都跟他自己或他妻子的伍德维尔家族（the Woodville family）有关联，以此来扩展他在英国的权威：格洛斯特在北部，伍德维尔家族在威尔士，黑斯廷斯勋爵（Lord Hastings）在中部地区。爱德华在世期间，这一关系网运行正常，但是在1483年这种依靠一个具有排外性的小集团的做法出现了危险。相互不信任，尤其是格洛斯特与伍德维尔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损害了统治集团成员的利益，而处于统治集团以外的那些人——其中包括在英国北部根基深厚的珀西家族，在威尔士和英国中西部的白金汉公爵——则看到他们的机会来了。

在这种环境下，约克家族唯一存留下来的长兄，即30岁的格洛斯特公爵理查的个性和野心致使他阴谋夺取他年幼侄子的王冠。他于6月26日篡夺了王位，囚禁（而且也许谋杀）了爱德华五世和他弟

弟“这对伦敦塔里的王子”，并且处死了王后的兄弟和黑斯廷斯勋爵。他对于继承王位传统规则的唯一让步就是他肆无忌惮地宣称：爱德华四世和他的儿子们是杂种；他对克拉伦斯的孩子们不屑一顾。理查三世的行动和方法导致了王朝战争的复活。1483年10月，白金汉公爵，其父亲是爱德华三世的第五个儿子托马斯，发动了叛乱。更为成功的是亨利·都铎于1485年8月从法国归来时的登陆，尽管他是通过母亲的家族那条线对王位提出了要求，而他母亲的家族代表了爱德华三世的儿子约翰的私生子博福特那条支脉怎么说都有点牵强。然而，1485年8月22日，他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中打败并杀死了理查三世。至此，理查这条王室血脉似乎已经中断：他的王后和唯一的儿子均已死亡。

图14　国王理查三世，约克公爵理查与塞西莉·内维尔（Cecily　Neville）的第3个儿子；1472年与安妮·内维尔（Anne　Neville）结婚；1483年篡夺了王位，并在博斯沃思被杀。这张图是他的一幅年代较早的肖像画（约1512—1520），可能依据了他本人所处时代的一幅画像。

有一些因素使得亨利七世能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之后保持他的王冠。在15世纪的篡夺王位者中，只有他幸运地在战斗中杀死了没有留下后代的前任国王。那些幻想破灭的约克家族成员对他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爱德华四世的王后给予他的支持。还有，英国的权贵们对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他们队伍中的人数越来越少，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领地权力或是受到削弱，或是完全被毁。其结果就是想要推翻亨利七世的企图在英国得到的支持很少，而约克家族的觊觎王位者（如1487年的兰伯特·西姆内尔［Lambert Simnel］）无法令人信服。1455—1485年间真正的战争时间加起来只有15个月左右，而其涉及到的军队人数也不是很大；但是一次战斗的重要性并不需要与参加的人数或造成的伤亡人数有关。玫瑰战争几乎毁灭了英国君主世袭制度的基础，而亨利·都铎夺取王冠一事也很难说是加强了这种世袭制度。亨利声称自己是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代表和继承人，但是实际上，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才成为国王并决心一直把国王当下去的。

注释

〔1〕 即亨利五世，“哈尔”（Hal）是亨利的昵称。

〔2〕 出自《旧约·耶利米书》第三章第12节。

〔3〕 汉萨同盟（Hanse League）是德意志北部港口城市为了维护相互间商业贸易利益而建立的一个行会组织。

第八章

走向民族统一

皇家行政机构和议会

英国国王在自己的王国中享有也许会令法国君王钦羡的主宰地位，而王冠体现了英国的统一。戴王冠者不同于其他人。加冕仪式强调了国王君权神授的特质，而国王的触摸具有治愈皮肤病瘰疬之功效的传说似乎证实了这种特质。理查二世坚持所有来见他的人都必须屈膝，而“陛下”在15世纪成为了对国王的一种通行的称呼。

皇家行政机构的触角——即那些使国王的决定、赋税的允准和法律的公告得以执行的机构——伸向不列颠群岛每个方向的最末端，只有北部和西部除外。德拉姆主教和切斯特伯爵的管辖权势在英国的郡县制度之外，具有一种特殊的独立性。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并不在国王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德拉姆的主教人选几乎总是由国王亲自决定的，而且他们就像安东尼·贝克（Anthony Bek，1311年去世）和托马斯·兰利（Thomas Langley，1437年去世）那样，经常担任皇家的顾问；而自从1301年之后，切斯特伯爵同时也是威尔士亲王和国王的长子，而且在中世纪后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柴郡的行政管理都是由国王亲自负责，因为切斯特伯爵均未成年。

国王的行政管理是一种合作的产物。在每一个郡县中，郡长和更为新颖的治安法官在贵族和乡绅的帮助下才能发挥其最佳功能。这两者的利益也是跟君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国王是王国中的财富和恩典的唯一来源。议会下院的代表来自卡莱尔和康沃尔郡之间，以及什鲁斯伯里与萨福克郡之间的每个郡县和城镇，在中世纪晚期的政府中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到了爱德华一世的统治时期，战争和国内的动荡增加了国王跟臣民们（同时代人将其称之为“王国社区”）进行商议的需求，并就如何作出并执行影响整个王国的决定而征求他们的意见。另一件似乎同样明智的事情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召集地方上的代表，以及世俗和教会的权贵们，集中举行一次大会，即议会。想要向除贵族之外的市民和小地主索取财富的愿望、在战争和政治危机中

获得物质援助和口头支持的需求，以及在法律、经济和社会安排中有争议或新出现的变化的背后有一个代表大会来进行表决的可取性——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议会有经常召开的必要（1327—1437年间，议会每年召开一次），有明确的功能和既定的程序，且自1337年起下院的代表成为了一种永久性的角色。这一机构在中世纪欧洲的议会中是独一无二的，它既讨论国家大事，也讨论个人小事。它赢得了向英国人征税的垄断权，是全国的最高法院，而且它通过立法来制定新的法律和修改现存的法律。甚至连下院的代表们也为自己赢得了特权，其中包括在参加议会期间具有言论自由和免遭拘捕的豁免权。它仍然主要是一个由国王控制的政府工具，但是它有时也可以批评国王的政策和他手下的大臣（如像14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和15世纪的40年代那样），尽管议会几乎从不批评国王本人。当使得议会成立并鼓励它发展的实际需要消失之后，议会召开的次数就不那么频繁了：从百年战争结束的1453年至1509年之间，议会平均每3年召开一次。

交流、宣传和政府

下院的代表们在回到他们的选区之前还会收到信息通报，会有人向他们献殷勤，并试图说服他们。有相当数量的选民渴望得到有关国家事务的信息。说到底，是他们在支付赋税，在战争和国防中服役，并按国王要求合作和服从。因此，政府必须仔细权衡它所要传递给全国人民的新闻，以及希望国王的臣民们接受的舆论观点。为达到这个目的，有一套很完善的交流和宣传方法。官方声明的开场白总是能够使一项政策深入人心或向人们证明一种做法的正当性：爱德华四世声讨被废黜国王亨利六世的王后玛格丽特的那张公告详细回忆了被亨利六世的祖父所处决并且此后被戴上了殉教光环的约克大主教斯克罗普的生平事迹。这是一种巧妙的宣传，以唤起人们对兰开斯特王朝的反对，因为这样的公告要被送往每一个郡，并在各地公开宣读和张贴。歌曲和民谣也能赢得广泛的听众，有些官方授意的作品把阿让库尔的

辉煌胜利吹捧得简直天花乱坠。布道文在左右舆论和争取支持方面也相当有效：1443年，亨利六世将能说善辩和善于激励人心的牧师派往每一个主教区，以便他们能从布道坛上响应国王为下一次远征法国的战役而募捐的号召。加冕仪式、皇家巡行，以及国王或王后进入约克、布里斯托尔、格洛斯特（以及伦敦）等地的正规仪式等，都是集神话、基督教和爱国主义为一体，用华丽而铺张的场面来进行官方宣传的机会。1417年，亨利五世在伦敦的凯旋招待会上被公开描绘成一个从对法国的圣战中归来的基督的战士。假如任何公民对于他侵略法国的正义性尚存有一丝怀疑的话，这次招待会就是专门用来消除这种怀疑的。

通过信件的流通来告知、说服和辩护是前印刷时代最接近于出版活动的行为；这样的信件很快就出现在通俗的编年史中。亨利五世就是用这种方法向他的臣民们报告他在法国战役的进展。就连当时喜欢时髦的作家们也成为了官方的宣传家。在15世纪，作者们很少是在未经请求的情况下就创作他们的作品的。托马斯·霍克利夫（Thomas Hoccleve）当时是一位卑微的政府小职员，他在接受了亨利五世的报酬之后创作了歌颂阿让库尔战役和英军围困鲁昂的诗歌（1419）。约翰·利德盖特（John Lydgate）曾长期受到亨利六世及其王室的赞助，他往民众的心目中灌输了从1436年英军在加来成功抵御勃艮第军队攻击这件事中所能榨取出来的所有沙文主义。

国王、王室和大臣们——这些交流渠道的主要利用者——最常住的地方就是威斯敏斯特、伦敦或温莎城堡。英国君主制的神龛就是威斯敏斯特教堂，议会通常也是在威斯敏斯特召开的（1339—1371年间，以及1459年之后的所有议会都是如此）。政府的各个部门逐渐在威斯敏斯特或伦敦这个全国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设立了永久性的办公处。在中世纪晚期，伦敦毋容置疑地在每一个方面都成为了整个王国的首都，只有教会除外（坎特伯雷仍然是全英首主教的所在地）。与威斯敏斯特和位于两者之间、正在发展的河岸郊区一起，伦敦成为了全王国行政、商业、文化和社会的中心。在中世纪晚期，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政府的广度、复杂性和节奏性都得以增加或增强：征收和管

理正常的赋税，召开频繁的议会会议，海关服务得到了发展，战争和国防的实际事务得以组织，全王国的法律和秩序有人监督。其结果就是一个集权的、合作的和固定的政府。当14世纪的头三分之一时间里英国跟苏格兰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被更受人关注的英法战争所代替的时候，约克失去了它作为一个可与伦敦竞争的中心城市的地位。此外，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因国外的战役而长期不在国内的情况越发加强了成立一个没有国王本人参加也可以运作的、固定和集权的政府大本营的趋势。1339—1341年间的危机使得爱德华三世意识到，他再也不能像爱德华一世及其前任国王们那样把政府机构带在身边了。到了1340年，财政部就已经回到了威斯敏斯特，而且从此再没离开过。国王的大法官法庭、财政部和法庭等官僚机构在首都得以发展，并且就像一群野心勃勃的小地主那样，向周边的郡县扩展。在伦敦城里或附近买了客栈或住宅的权贵、主教和修道院长们，以及伦敦居民的姓氏和他们所说的语言告诉我们，有许多地位更为卑微的人们也从王国的各个角落，以及从威尔士和爱尔兰移民到了这个首都。

趋于英国化的教会

英格兰教会的英国化特点是它在中世纪晚期第二个最为重要和经久不变的特质。它的首要特质就是它与其他拉丁语教会所分享的天主教信仰和教义。但是人们广泛接受如下事实，即以罗马教皇为首领和精神教父的整个基督教会，是一个由众多个体教会组成的大家庭，其中每一个教会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自主权。作为英国民族性在教会层面的表现，英格兰教会的英国化特征在中世纪晚期变得更加突出。部分原因是由于英语语言和英国人民的独特经验，而更多的则是由英国的法律和习惯——即英国人（包括教士们）生活在其中、而且国王在加冕仪式上发誓要维持的社会体系所造成的。此外，英国教会，包括它的建筑，也是在英国国王、贵族、乡绅和市民的鼓励和赞助下建立起来的。这使得他们对各教堂及其教士们怀有个人或家族的兴趣。主教

们是大地主——温切斯特主教在15世纪中期每年有3,900英镑的岁入——他们都是议会的成员，同时又是国王的顾问。他们，以及比他们职位更低的下级，通常会因为受到国王的信任或是对国王有用而得到晋升，并且能够在教会内部得到奖赏，而不需要财政部掏钱。于是我们便有很好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英国人应该控制英国教会，并且塑造它的特点，培养它的人员。在跟法国人打仗期间，这件事似乎显得更为紧迫。1307年以及其后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教皇在英国教会的组织和行政管理上，甚至在指派主教的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都受到了拼命的抵制。毕竟，14世纪的大多数教皇都出生于法国。1308—1378年间，他们都住在阿维尼翁，在那儿他们有成为法国人叭儿狗的危险（人们当时就是这么广泛认为的）。与其形成对比的是，只有一个教皇是英国人（12世纪中期），而且从未有一位教皇访问过英国——直到1982年才有教皇这么做。

教会英国化的趋向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来加以说明。基于早期教父法典、并得到教皇立法机构补充的教会法一般会被英国教会的法庭所接受和执行，教皇在教会事务中的最后裁决权也得到了承认。但是在实际运用中，教会法受到了皇家权威的限制，尤其是当被控犯罪的教士试图要求获得“神职人员免受普通法庭审判的特权”时。从爱德华一世的统治时期起，教皇向英国教士们征收赋税的能力便受到了严厉的限制，而大部分教皇的赋税进入了英国国王的钱柜，而不是像许多人所相信的那样，用来为敌人的战争行为加油。更为严重的是，自从14世纪中期起，以及在教会大分裂期间（1378—1417，当时出现了两个教皇，甚至三个，他们都同时要求教民们归顺），英国对教皇指定英国教会中主教和其他重要成员的权力进行了限制，英国所支持的教皇根本没有能力来抵御这种限制。反教皇的《禁外国人任圣职法》（1351，1390年重新发布）和《禁尊教宗法》（*Praemunire*，1353，1393年得以扩充）被英国的国王们用来迫使教皇作出妥协，因为这些文件规定，国王拥有提名神职人员的权力。其结果就是在15世纪，很少有外国人被指定在英国教会中任职，至于亨利七世任命3位意大利人为主教一事，是获得了政府的特别批准的。

在英国很少有教士对这种情况提出抗议。主教们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都是英国人，而且他们都是首先由国王提名的。教会没有集体这么做是因为它害怕教皇的征税。教士们没有这么做是因为英国国王们是反对异端邪说的信仰保护者，以及抵御反教权主义攻击的中流砥柱。1433年，就连圣奥尔本斯修道院院长都可以宣称：“在王国境内，没有任何人的地位可以高于国王。”

地图5　宗教改革前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教区图（13世纪）

虔敬作品和罗拉德派教义

中世纪晚期，在主流的英国教会机构之外有两种表达宗教热忱的

方式具有鲜明的英国特征：在礼拜方式上是严格遵循正统神学的，而由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发起的罗拉德派运动则属于异端邪说的性质。14世纪见证了人们对于神秘和虔敬的作品兴趣渐增，其中大部分这类英语作品创作于14世纪的后半期，而它们的受众是正在不断增长的文化阶层。这些读者将教会的教诲和做法视为理所当然，但他们更喜欢一种个人的和凭直觉的虔敬礼拜，其对象主要集中在《黄金传说》[1]中所收集的基督受难和升天、圣母马利亚和圣徒生平传记等故事上。这些作者往往是离群索居的人物，他们向读者推荐一种冥思的生活方式。这类书中最流行的要数约克郡一位隐士理查·罗尔（Richard Rolle）的作品，以及后来另一位女隐士，诺里奇的朱莉安娜夫人（Dame Juliane of Norwich）的作品。《玛杰丽·肯普之书》是林恩一位自由民妻子的精神自传，它展示了世俗男女们所追求的美德，以及他们在获得这些美德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启示、幻觉和狂喜。像兰开斯特公爵亨利（Henry，他于1354年用法语写了一部有关他自己生平虔敬的作品）这样的俗人和像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Margaret Beaufort）这样的虔敬女子，都转向了这种强烈的精神生活，以示他们不屑于学者们枯燥无味的神学讨论，尽管他们并没有与离经叛道的罗拉德派同流合污，但是两者的精神根基不乏相同之处。

罗拉德派（也许这个名称来自lollaer，即有口无心的祈祷者）是唯一席卷了整个中世纪英国的重大异端邪说运动，威克利夫是中世纪异端邪说史上唯一的大学知识分子，他发起了一场民众参与的异端邪说运动来反对教会。这种异端邪说主要是一种通过书和阅读积累起来的英国本土思想体系。虽然威克利夫不太可能用英文写作，但他确实给一系列辩论文章，以及于1396年首次全部译成英文的圣经提供了灵感。首先他诉诸当时反教权主义的情绪，通过批评教会的财富以及众多卑鄙无耻的教士们而出了名，并在贵族、侍臣和学者中获得了支持。然而他越来越激进的神学思想，以及对《圣经》过分的信任，导致了人们对他的谴责和他被迫离开牛津大学。当他不得不面对亨利四世严格的正统观念（1401年他有关火刑的命令在镇压持异端邪说者的

武器库里又增添了一件法宝）时，他逐步失去了从那些有影响力的人那儿所赢得的同情；当罗拉德派跟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的反叛扯上了关系之后，这种同情便几乎丧失殆尽了。在被剥夺了思想源泉和有权势的保护者之后，罗拉德派变成了一个由威尔士边境地区和英格兰中部工业城市的工匠、手工艺人和穷教士们所参加的一场支离破碎、缺乏组织，但又顽固不化的运动。他们的信仰变得越来越差异悬殊和古怪，然而对教会当局的基本敌意，对《圣经》的全身心投入，以及他们对英语《圣经》的信任，所有这些都预示了宗教改革，并将成为后来英国新教的核心信念。

识字的普及与英语

识字的普及和使用英语的人越来越多是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的两个相对应的发展。它们表明英国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意识不断增强，也反映了爱国主义和民族性的情绪。

相信这个论点显然要比详细地论证它要容易得多。对于当时人们识字程度的普及究竟有多么迅速，同时代人并没有留下任何估量性的文字；我们也不可能用那些不懂数学的同时代人所提供的资料来对它进行量化。假如我们把1351和1499年定义“教士特典”（当时的识字阶层）的法令作一个比较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有关识字阶层人数增长的指数。1351年的法令里宣称，所有能够阅读的俗人也应该享有“教士特典”。150年后形势发生巨变，以至于在法令中必须把世俗的学者跟属于不同修会的教士们加以区分，只有后者才能享有“教士特典”。也许识字的阶层已经扩展到了使clerical（教士的、文书的）这个形容词失去原有意义的程度，尽管1499年的法令将作出这种改变的原因归结为防止“滥用”这种特权，而非识字阶层得到了扩展。

一个同样普遍的提示可通过比较中世纪晚期的两次民众起义——1381年的农民起义和1450年约翰·凯德的叛乱——而获得。1381年，来自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的农民诉状（据我们所知）是以口头的形式

呈交给理查二世的，而且在起义期间跟国王的所有其他交流似乎都是通过嘴巴来进行的。在伦敦塔里的时候，理查二世不得不要求叛乱者把在那以前都是向他喊出来的那些抱怨用纸写下来，以便他能够进一步考虑。把这一点跟1450年的叛乱作一个比较，同样来自肯特郡和英国东南部的凯德追随者一开始就把他们的诉状以书面形式呈交给国王，而且还抄了好几份，让大家传阅。它们都是冗长的文件，有着连贯和具有综合性的论点，并且用英语来进行表达，有时也用口语表达方式。出版手抄本的生意在这段时间也扩展了范围。约翰·雪利（John Shirley，1456年去世）据说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4个租来的店铺里做起了这种生意，并且印制了“短小的民谣、怨诗和回旋诗”，以供出售或出租。20年后，海关的进出口账单记录了经伦敦进口的大量手抄本——光是在1480—1481年间就进口了超过1,300本。

我们可以谨慎地举出一些数字来表明，在中世纪晚期，识字的人并不仅限于贵族、教士和政府职员。也许就跟凯德手下那些反叛分子那样，工匠和手工艺人们现在也能阅读和写作。在1373年的一次法律诉讼中，28名证人里有11个人自称是“文人”（*literatus*），即能够理解拉丁语，因此也肯定能认英语；还有一份15世纪中期的遗嘱，见证人中识字的人所占比例与上述例子类似，他们中包括了商人、管家、裁缝和水手。无疑还有别的人，无论识字与否，人们是决不会想让他们当证人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正在逐步接近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在16世纪初所作的乐观估计，即英国人中大约有一半的人是识字的。

假如我们不能够笃信无疑地接受这样的数字，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来观察一下在各行各业中工作的识字男人——识字的女子很少。他们占据了这个国家中此前专门为教士保留的最高政治职位：从1381年开始，俗人经常成为英国的财政大臣，而担任这个职位的一项基本条件，除了计算之外，就是阅读和写作。识字的俗人可以被雇用为政府的职员，诗人托马斯·霍克利夫就曾经当了35年的文书。显然，到了1380年，商人们就已经开始保存书面账单了；不久之后，乡间的自由民就在写——肯定会读——私人信件了，就连在他们的小庄园里当管

家的农民也是在做行政工作，他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在纸上或羊皮纸上写字。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有些手工艺行会的规章和制度坚持其学徒必须要达到某个识字的标准。

至少家境好的俗人的阅读习惯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阅读编年史变得越来越热门，而且不仅仅是在伦敦；光是存世的这类编年史手抄本就成百上千，并且有证据显示出，在15世纪时出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编年史，其中大多数是英语的。商人和其他人开始拥有“摘记本”，把那些诗歌、预言、编年史，甚至食谱，摘抄在一个私人和微型的集子里，以供闲暇时阅读。他们拥有了书籍，并且在遗嘱中仔细地为它们找好继承人——尤其是那些信教和虔敬的人。

这个识字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英语的世界。在14世纪结束之前，说法语和懂法语（因而也会法语读写）的优势已一落千丈；就连在政府和私人组织中的官方和正式事务中，英语也变成了至少跟法语使用同样普遍的语言。议会里的讨论到了14世纪中期就已经是用英语来进行的，而第一份用英语写成的讨论记录日期为1362年。尽管一些例子只是粗略的指南，但也值得指出，用英语写成的第一份财产契约是在1376年，最早的英语遗嘱是在1387年。坎特伯雷的教牧人员代表和主教会议的会议记录到14世纪70年代时往往是用英语写的，而亨利五世1399年使用英语向议会致词，他的话被仔细地记录了下来。引起这一悄然变革的理由很复杂，但其中有因长期的英法战争而造成的爱国主义情绪，使许多英语书和布道文得以传播的罗拉德派的流行，王室和贵族的带头作用，当然还有说英语的臣民在全王国事务中——尤其是在议会中——更大的参与性。这些都确立了英语作为书写文字的最后胜利。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还需要解决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地区方言的问题。只有这样，英语作为一种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的所有潜力才能够实现。必须承认，在头一个世纪里，清晰流畅的英语、发音古怪的康沃尔方言、风格迥异的威尔士语，以及很难听懂的约克郡方言不可能完全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但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15世纪前半期，政府不断伸展的触角对此有着很大的帮助，它发展和推广

了一种文字的使用，以作为整个王国的官方交流工具。另一个因素就是伦敦在14世纪的崛起，成为全王国确立的首都，而约克作为一个辅助性的行政中心，布里斯托尔是全国第二大商业中心，这3个城市各自发展出一种的方言，它不可避免地逐渐被其他城市的人所理解，并且逐渐融合成为一种标准的英语。这种方言主要是英国中部的英语，它超越了局限于城市的方言；由于这个原因，它更容易被乡间各郡所采纳。中部方言成为胜利者，主要是因为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居民在14和15世纪大量涌入伦敦的缘故。罗拉德派也要负部分的责任，因为它在中部地区和西部乡间尤为活跃，而它的大部分书面作品都是用中部方言的不同形式写下来的。这种中部地区方言的口头和书面形式通过占领伦敦而占领了整个王国。

杰弗里·乔叟曾经严重担忧自己的作品是否能为全英国的人民所理解——而他为一个狭窄而着迷的读者圈子写作：

> 然而英语有很多种类，
> 写成文字也风格迥异，
> 故我祈祷别写错上帝，
> 也别因方言而念错韵。
> 基督所在，都要读和唱，
> 以免误解，我请求上帝。

在1426年的一个法律诉讼状中特别说明，在英国的不同地方，单词的发音是不同的，“但它们之间没有好坏之分”。一个半世纪以后，威廉·卡克斯顿可以更为乐观地说，他所刊印的好几百种书，只要仔细阅读，各个不同郡县的人都能看懂。他意识到，“在一个郡所说的普通英语，到了另一个郡说法就不一样了”；但只要通过使用“不那么粗鲁和古怪的英语，而且要用经上帝恩典就能够明白的那种说法”，这样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与此同时，使得口语和书面语更容易理解的发展状况对于有效的交流、共同的意见表达和形成一种民族感是至关重要的。

英语已经成为了“征服者的民族语言，而非被征服者的民族语言”。英语作者的自信在乔叟身上达到了天才的高度，而且它吸引了全王国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人——国王、贵族、乡绅和市民们。14世纪和15世纪，抒情诗和浪漫传奇、喜剧和悲剧、讽喻作品和戏剧等各种韵文体裁在质量和流行性上远远胜过英语散文。有许多诗歌作品是属于北欧诗歌传统的，而14世纪英国西北部和中部的文学振兴形式主要是没有韵脚的头韵诗。但它是由当地乡绅和像博恩家族（赫里福德伯爵）和莫蒂默家族（马奇伯爵）这样的权贵们所赞助的，并产生了像《高文爵士和绿骑士》和《农夫皮尔斯》这样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在同一个地区，仪式化的基督教宗教戏剧“英国奇迹剧连台本戏”在14世纪也有了发展，并在约克、贝弗利、韦克菲尔德和切斯特等北部城市里极为流行，那儿的戏剧是由城市里的行会所组织和演出的。

与此同时，在南部和东部地区，一种新的诗歌模式正在出现，它更多地受到了法语和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语作品中时尚风格和内容的影响。通过乔叟的笔，以及在一个较低的程度上，通过他朋友约翰·高尔（John Gower）的笔，它创造了英国文学中的杰作。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词汇的丰富性、想象力和对人性理解的深度，以及在作品的纯艺术性等方面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写于1380—1385年间的《特洛伊罗斯与克莱西达》，尤其是《坎特伯雷故事集》（写于1386—1400年间，但从未完成）这部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全景画式的作品，决定性地拓展了英语文学的成就。它们显示出智慧、精通世故和创新，以及对当时各种英语习语的驾轻就熟，这一切都奠定了乔叟作为最伟大的英国中世纪作家的地位。

高尔这位肯特郡人先是受到理查二世的庇护，后又投入亨利·博林布鲁克的门下。乔叟出生于伦敦的商人之家，在贵族和皇家的圈子里长大，而且他是所有时代中最受抬举和赏赐最丰厚的诗人之一。这不仅反映出他作品那异乎寻常的优秀品质，而且也反映出那些有影响力的同时代人愿意承认经他所充实的英语的应有地位。假如说乔叟的追随者霍克利夫和利德盖特跟他们的老师相比尚属二流的话，那么这些

作者从国王、王室和伦敦市所受到的庇护保证了英国首都这个基本上以英语为主的文坛有了一个光明的前途。

英国的建筑

英国的建筑师和建造者们有着同样的财富资源和品味。他们对在欧洲大多数地区占主导地位、并以圆拱尖顶为最主要特征的哥特式风格理念进行了发展，创造了足以称得上是具有鲜明英国特征的建筑风格。自从19世纪起，这些风格被称作盛饰式（更准确地说，是自由流畅和曲线的风格）和垂直式（或立式的和直线的风格），而这些风格最容易从英国大教堂、大型教区教堂和学院建筑的窗户和拱形设计中辨认出来。为了使这些新建筑的发展过程能够得到精确的解释，一般认为13世纪末西方跟埃及和波斯的穆斯林世界以及蒙古王国的频繁外交接触和十字军东征把东方建筑风格和技术知识传到了西欧。作为一种新的盛饰式风格的纤细窗花格和华丽的自然主义饰物体现在了爱德华一世于13世纪90年代为埃莉诺〔2〕立的3个依然存世的十字架上，这是纪念王后的遗体从林肯送往威斯敏斯特下葬这一路上3个阶段的标志。东方的影响还可以从布里斯托尔建于14世纪初的圣玛丽·雷德克利夫教堂的六角形北门廊和门道上看出来。这些在欧洲哥特式建筑中无与伦比的、并被称作“整个英国中世纪建筑史上最杰出的创造性发挥”的繁复风格流行了半个世纪（1285—1335）以后，开始出现了一种相反的风格。这种新出现的垂直式是最具有英国特色的风格。在英国的战争时期，这种风格很少被欧洲大陆的人模仿。它质朴而清晰的线条和更大、更亮的空间也许首先出现在威斯敏斯特的圣斯蒂芬皇家小教堂（1834年被毁），或在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1666年被焚毁）。无论如何，通过王室的影响，特别是位于格洛斯特的爱德华二世神龛的影响，它很快就传播到了英国的西部地区。至今，人们仍然可以在建于14世纪30年代中期的格洛斯特大教堂高坛的宏大规模，以及时间更晚一些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建于1379年）和温切斯特大教堂

（建于1394年）等建筑上欣赏到这种风格。此时的装饰主要集中在拱顶建筑的英国风格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赫里福德的牧师会礼堂（现已被毁）和格洛斯特修道院等处的扇形拱顶，这两处建筑都建于1351年之后。

然而垂直式建筑的最佳例子最常见于赛伦塞斯特、考文垂和赫尔等英国大教区的教堂。就连在15世纪的一段时期中抑制了很多大规模工程的瘟疫和战争也没有阻止东英吉利亚和西部地区的布匹商和地主们将其财富慷慨地花费在这些体现英国品味和技能的纪念物上。垂直式建筑于15世纪后半期在一些最著名的英国建筑上经历了一种狂热的振兴，这些建筑大部分都是由王室所赞助的——伊顿公学、圣乔治小教堂、温莎城堡（建于1474年）、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小教堂，以及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亨利七世小教堂。这是无可置疑的“英国中世纪建筑的小阳春”。

中世纪晚期的教区教堂垂直式钟楼都是无可比拟的英国式风格，从坚固的雷克瑟姆圣吉尔斯教堂，到波士顿圣博托尔夫教堂高耸的门柱、汤顿[3]教堂、布里斯托尔的圣斯蒂芬教堂和加的夫的圣约翰教堂的优雅。同样还有14和15世纪有雕刻装饰的木头屋顶，最早的是1291年以后为约克的牧师会礼堂而设计的木头拱顶，还有为替代伊利大教堂钟楼（1322年倒塌）而建的木头拱顶和灯塔。这种屋顶建筑以理查二世委托建造的威斯敏斯特市政厅（1394—1400）椽尾梁的栎木屋顶为最高典范，并被评判为“整个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品”。石匠、木匠和建筑师们从13世纪起一直受到国王、侍臣、贵族和其他人资助，而且不仅仅在建造宗教建筑上是这样；他们还建造皇家和私人的城堡和庄园建筑。虽然他们主要是在伦敦形成一个行业基地并主要从事与国王相关的建筑任务，但这些工匠们也被派往英国和威尔士各地去接受建筑任务。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都是为贵族和主教们服务的，因此他们为英国的民族趣味创造了一种民族风格。

英国的民族性

英国人的民族感和他们对于自身的英国人特性的意识是不容易判定的。但是他们有时候会把自己跟不同人种、不同语言、不同国家或不同文化和政治传统的人民加以比较——并被他人所比较。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人在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大陆上与很多其他民族发生了对抗，而且经常是兵戎相见。这些对抗是民族性和英国人自我意识的温床。这样的经验产生了一些使英格兰人意识到他们的本性、团结，以及共同的传统和历史的情绪。

当英格兰被诺曼公爵们或安茹伯爵们所统治，以及盎格鲁—诺曼男爵们在英吉利海峡的两岸都拥有庄园，而其他男爵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都拥有庄园的时候，统治阶层的精英们是不可能认为自己是纯粹英国人的。可是一旦诺曼底和安茹被法国人所侵占，并于1259年正式向他们投降时，这就变得有可能了，因为跨英吉利海峡的贵族们那时不得不决定，他们最首要的忠诚应该是在哪里。随着苏格兰王国的自我意识变得越来越强，尤其是当爱德华一世的战争使得在边界两边都拥有土地的日子变得一去不复返时，这种可能性就变得更大了。因此，英格兰的与世分离便跟它四周环绕的海洋顺理成章地联系在了一起。15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个小册子作家告诫道：

> 尤其要保护周围的海洋，
> 它们就像是英国的围墙，
> 而若把英格兰比作城市
> 那城墙的外面就是海洋……

从爱德华一世起，英格兰国王的教养和世界观就要比自哈罗德以来的任何国王都要更加真正地英国化。事实上，亨利六世在他长达39年的统治中，从来没有访问过苏格兰或爱尔兰；他只有一次踏上了威尔士——在蒙茅斯过了一天——而且在9岁时的加冕访问之后，再也没有去过法国。

作为外国人，在13世纪主宰了英国海外商业的佛兰芒人和意大利人的贸易成功引起了英国人对他们的憎恨。在亨利七世统治期间，英

国人据说“对外国人有一种反感，因为他们从未来过英国，却要成为它的主人并侵占英国的货物……”说到底，来自跟英国交战国家的公民，就像附属于法国修道院的外国隐修院院长那样，有可能给敌人送钱；或者就像是亨利四世的王后，布列塔尼女公爵的仆人们那样，有可能为法国充当间谍。百年战争刚爆发的时候，英国国王的文书们在国家文件上写“不要给外国人看！”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英国靠卑微的弓箭手和骑士、贵族而打赢的战争在社会各界中创造了一种自信，使得英国人热血沸腾。有一位见识广博的观察家于1373年这样说道：“英国人自认为了不起，而且打了那么多的胜仗，以致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不会输。在战场上，他们是世界上信心最足的民族。”他们对于自己的胜利充满了无限的骄傲，而作为个人的国王则体现了这些成就。在爱德华三世的统治下，“英格兰王国得到了广泛的改进，其受尊敬和富饶的程度是以前任何一位国王的统治时期所没有过的”，而亨利五世在其臣民中的声誉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英国人对于自己超人一等的信仰——离骄傲和自恃只差一小步——甚至到了英国好运不再的15世纪中期仍然毫不动摇。野性的盖尔人被戏称为“纯粹的爱尔兰人”，而佛兰芒人则在1436年受到了毫不掩饰的蔑视：

> 你们这些佛兰芒人，记住自己耻辱；
> 在围困加来时，你们真是罪该万死；
> 英国人跟你们相比，名声要好得多，
> 他们的血脉更高贵，历史也更悠久。

1500年左右的一位意大利访问者，在英格兰的海外“王国”几乎完全失去时，还可以报道说：“英国人对自己和属于自己的所有东西都充满了自恋。他们认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就没有别的人，除了英国之外就没有其他世界；当他们看见一位漂亮的外国人时，他们就会说，‘他看上去就像个英国人’，或者‘真可惜他不是一个英国人’。”优越的感情很容易变成蔑视，甚至仇恨。在跟法国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战

争之后，仇法症普遍存在，只有法国人的仇英症可与之相比拟，因为法国人把英国人视为“一个受诅咒的民族”。对于任何跟法国沾边的事物的憎恶在亨利五世的统治下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亨利五世也许可以宣称拥有了法国王冠，但在英国，他并不鼓励在政府和文化阶层中使用法语。伦敦酿酒商们从这位广受尊崇的国王那儿受到了启发，当他们用英语来写行会条例时，他们注意到“我们的母语，即英语，近来开始受到大量的扩增和修饰……我们最杰出的国王，亨利五世，已经促成了一种被大家都认可了的语言……通过写作练习的方式来加以推荐”。

有关不列颠历史的故事和一种实际的不安全感，以及直至爱德华一世——也许是爱德华三世——的英格兰国王的精力和野心交织在一起，把英国人带进了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他们吞并这些领土的成功是有限的；无论他们如何试图在文化、语言和习惯上将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英国化，英国人及其附属的领地政治上的民族性在中世纪晚期并没有得到承认。参加康斯坦茨教会会议〔4〕的英国代表团这样宣称：

> 无论一个民族是否因血缘关系、团结习惯或语言特征（在神圣和世俗法律中作为一个民族的最不容置疑和肯定的迹象和本质）与别的民族相区别而被视为一个民族……它都是一个真正的民族。

但由于他们补充说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是英格兰民族的一部分，因而无法自圆其说，输掉了他们的政治地位。

注释

〔1〕 《黄金传说》（*Aurea Legenda*）是由热那亚大主教沃拉吉纳的雅阁于1275年编纂的一部拉丁语巨作，内容是基督和圣母在世的事迹和圣徒生平传记，在中世纪影响很大。1483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将它译成了英语，并且在伦敦刊印出版。

〔2〕 埃莉诺（1246—1290）是英王爱德华一世的王后，她曾经陪同国王参加了十字军东征，并在战争中拯救过受伤国王的性命。

〔3〕 汤顿（Taunton）是英国萨姆塞特郡的首府。

〔4〕 康斯坦茨教会会议（Church's Council at Constance）是1414—1417年间召开的天主教第十六次大公会议，以解决当时出现的三位教皇鼎立的局面。在会议期间，企图抵制会议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被逮捕和废黜。第二位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被迫同意退位。第三位教皇本尼狄克十三世因拒绝退位而被废黜。最后会议选出了新教皇马丁五世。

年表

1066	（1月）爱德华国王去世；哈罗德伯爵成为国王
	（9月）英格兰国王哈罗德在斯坦福桥击败并杀死挪威国王哈罗德
	（10月）诺曼底公爵威廉在黑斯廷斯击败并杀死英格兰国王哈罗德
	（12月）威廉就任国王
1067—1070	英格兰人举行起义
1069—1070	对英格兰北部的劫掠
1086	进行末日审判土地测量
1087	威廉一世去世；威廉二世（红脸威廉）登基
1088	支持罗贝尔·柯索斯的叛乱
1093	安塞姆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1096	罗贝尔把诺曼底典当给红脸威廉
1100	红脸威廉去世；亨利一世登基
1101	罗贝尔·柯索斯的入侵
1106	坦什布赖战役；柯索斯被囚禁；亨利一世夺取诺曼底
1107	英格兰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得到解决
1120	白船失事
1128	马蒂尔达女王与安茹的杰弗里结婚
1135	亨利一世去世；斯蒂芬登基
1139—1153	英格兰的内战
1141	林肯战役；斯蒂芬被捕；后来跟格洛斯特的罗伯特进行交换
1141—1145	安茹的杰弗里征服诺曼底
1149	诺森伯里亚被割让给苏格兰国王戴维一世

1152	安茹的亨利（后为亨利二世）与阿基坦的埃莱亚诺结婚
1153	亨利入侵英格兰；他与斯蒂芬达成妥协
1154	斯蒂芬去世；亨利二世登基
1157	亨利重新获得诺森伯里亚
1162	贝克特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1164	克拉伦登会议与宪法；贝克特被流放
1166	克拉伦登的巡回审判
1169—1172	英格兰开始征服爱尔兰
1170	年轻的国王加冕；贝克特被谋杀
1173—1174	反对亨利二世的叛乱；苏格兰国王“狮王”威廉侵略英格兰北部
1183	年轻的国王去世
1189	亨利二世去世；理查一世登基
1190—1192	理查一世参加十字军东征
1193—1194	理查在德意志被囚禁
1193—1205	坎特伯雷大主教休伯特·沃尔特（1194—1198任首席政法官，1199—1205任大法官）
1197	德赫巴斯的里斯去世
1199	理查一世去世；约翰登基；大法官法院档案卷宗建立
1203—1204	腓力·奥古斯塔斯征服安茹和诺曼底
1208—1214	天主教会停止在英格兰的教堂礼拜活动
1214	布汶战役：法兰西取胜
1215	《大宪章》；英格兰的内战；路易

	（即后来的路易八世）入侵；约翰去世；亨利三世登基
1217	林肯战役和多佛战役；路易撤军
1221—1224	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游乞僧们来到英国
1224	路易八世完成对普瓦图的征服
1232	休伯特·德伯格被解职
1240	卢埃林大王去世
1254	亨利三世接受教皇提供的西西里王位
1258	男爵们接管皇家政府；《牛津条款》
1259	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的《巴黎和约》
1264	刘易斯战役；亨利三世被俘；西蒙·德蒙特福特的政府
1265	伊夫舍姆战役；西蒙·德蒙特福特被杀
1267	亨利承认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德为威尔士亲王
1272	亨利三世去世；爱德华一世登基
1276—1277	第一次威尔士战争
1282—1283	爱德华征服威尔士
1286—1289	爱德华一世在加斯科涅
1291	爱德华一世宣称对苏格兰行使最高领主权
1294	英法战争开始
1295	法国与苏格兰结成联盟
1296	爱德华一世入侵苏格兰；他与教会产生矛盾

1297	爱德华一世与权贵们产生冲突；他对佛兰德进行远征
1306	罗伯特·布鲁斯叛乱
1307	爱德华一世去世；爱德华二世登基
1314	苏格兰人在班诺克本取得胜利
1315—1316	大饥荒
1321—1322	英格兰内战
1327	爱德华二世的下台和去世；爱德华三世登基
1330	爱德华三世开始亲政
1337	百年战争开始
1339—1341	英格兰政治危机
1346	英军在克雷西战役和内维尔十字会战中取得胜利
1347	英军攻占加来
1348	英格兰第一次暴发瘟疫
1356	英军在普瓦捷取得胜利
1361	瘟疫第二次大暴发
1376	“好人议会”召开；黑王子爱德华去世
1377	爱德华三世去世；理查二世登基
1381	农民起义
1382	宣布没收约翰·威克利夫的著作
1388	“无情议会”召开；反对苏格兰人的奥特本战役
1389	理查二世宣布自己已经成年
1394—1395	理查二世对爱尔兰的第一次远征
1396	《英法和约》
1397—1399	理查二世的“独裁”
1399	理查二世被废黜；亨利四世登基

1400	欧文·格林杜尔的叛乱开始（一直延续到1410）
1403	亨利·霍茨珀在什鲁斯伯里被击败
1405	约克大主教斯克罗普被处决
1408	诺森伯兰伯爵在布雷厄姆沼泽地被击败
1413	亨利四世去世；亨利五世登基
1415	英军在阿让库尔战役中获胜
1419—1420	英格兰征服诺曼底
1420	特鲁瓦的《英法和约》
1422	亨利五世去世；亨利六世登基
1435	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去世；阿拉斯的《法国——勃艮第和约》
1436—1437	亨利六世成年
1445	亨利六世与安茹的玛格丽特结婚
1449—1450	法军侵占诺曼底
1450	萨福克公爵被谋杀；约翰·凯德叛乱
1453	法军侵占加斯科涅；亨利六世发病
1455	在约克公爵理查和保王党军队之间进行圣奥尔本斯战役
1459	约克公爵在布洛尔荒野和勒德福德桥上被击败
1461	亨利六世被废黜；爱德华四世登基
1465	亨利六世被俘
1469	沃里克伯爵理查和克拉伦斯公爵乔治叛乱
1470	爱德华四世被废黜；亨利六世重新归来
1471	爱德华四世归来；沃里克伯爵在巴

	尼特去世；亨利六世去世
1475	爱德华四世远征法国；《皮基尼英法和约》
1477	威廉·卡克斯顿在英格兰刊印的第一本书问世
1483	爱德华四世去世；爱德华五世登基、被废黜并去世；理查三世登基；白金汉公爵亨利叛乱
1485	理查三世在博斯沃思去世；亨利七世登基

王室家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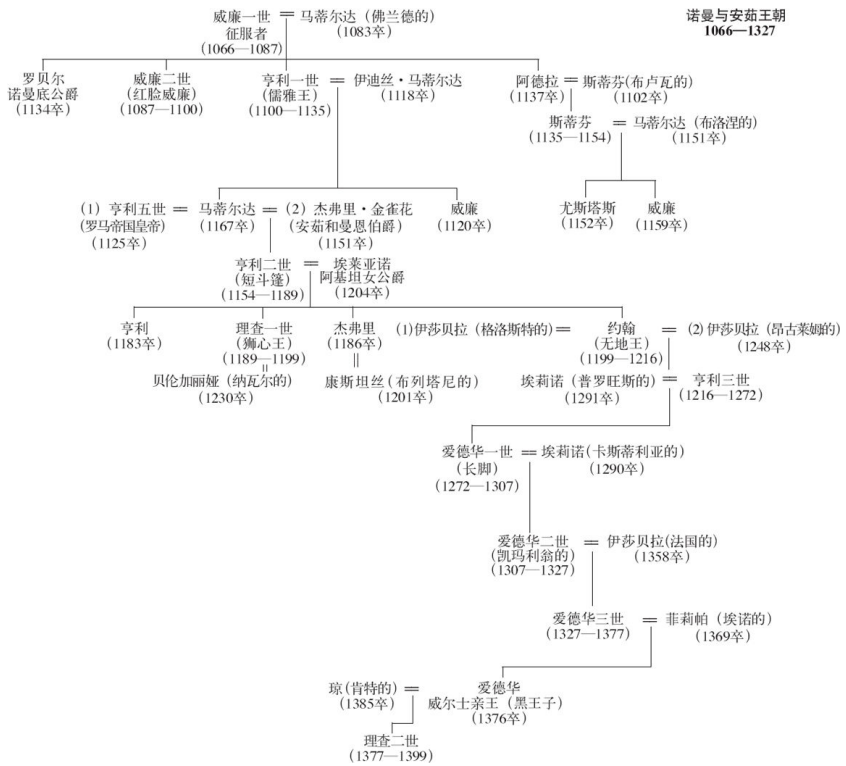
诺曼与安茹王朝
1066—1327
威廉一世 征服者 (1066—1087)
马蒂尔达（佛兰德的）(1083卒)
罗贝尔 诺曼底公爵 (1134卒)
威廉二世 (红脸威廉) (1087—1100)
亨利一世 (儒雅王) (1100—1135)
伊迪丝·马蒂尔达 (1118卒)
阿德拉 (1137卒)
斯蒂芬(布卢瓦的) (1102卒)
斯蒂芬 (1135—1154)
马蒂尔达（布洛涅的）(1151卒)
尤斯塔斯 (1152卒)
威廉 (1159卒)
(1) 亨利五世 (罗马帝国皇帝) (1125卒)
马蒂尔达 (1167卒)
(2) 杰弗里·金雀花 (安茹和曼恩伯爵) (1151卒)
威廉 (1120卒)
亨利二世 (短斗篷) (1154—1189)
埃莱亚诺 阿基坦女公爵 (1204卒)
亨利 (1183卒)
理查一世 (狮心王) (1189—1199)
贝伦加丽娅（纳瓦尔的）(1230卒)
杰弗里 (1186卒)
康斯坦丝（布列塔尼的）(1201卒)
(1)伊莎贝拉（格洛斯特的）
约翰 (无地王) (1199—1216)
(2) 伊莎贝拉（昂古莱姆的）(1248卒)
埃莉诺（普罗旺斯的）(1291卒)
亨利三世 (1216—1272)
爱德华一世 (长脚) (1272—1307)
埃莉诺(卡斯蒂利亚的) (1290卒)
爱德华二世 (凯玛利翁的) (1307—1327)
伊莎贝拉(法国的) (1358卒)
爱德华三世 (1327—1377)
菲莉帕（埃诺的）(1369卒)
琼(肯特的) (1385卒)
爱德华 威尔士亲王（黑王子）(1376卒)
理查二世 (1377—13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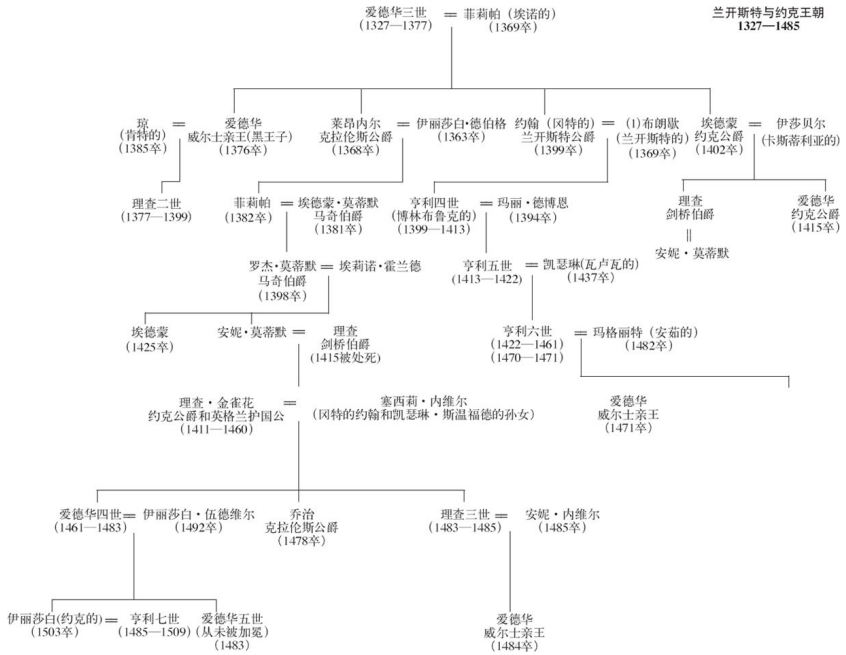
兰开斯特与约克王朝
1327—1485
爱德华三世
(1327—1377)
菲莉帕（埃诺的）
(1369卒)
琼
(肯特的)
(1385卒)
爱德华
威尔士亲王(黑王子)
(1376卒)
莱昂内尔
克拉伦斯公爵
(1368卒)
伊丽莎白·德伯格
(1363卒)
约翰（冈特的）
兰开斯特公爵
(1399卒)
(1)布朗歇
(兰开斯特的)
(1369卒)
埃德蒙
约克公爵
(1402卒)
伊莎贝尔
(卡斯蒂利亚的)
理查二世
(1377—1399)
菲莉帕
(1382卒)
埃德蒙·莫蒂默
马奇伯爵
(1381卒)
亨利四世
(博林布鲁克的)
(1399—1413)
玛丽·德博恩
(1394卒)
理查
剑桥伯爵
安妮·莫蒂默
爱德华
约克公爵
(1415卒)
罗杰·莫蒂默
马奇伯爵
(1398卒)
埃莉诺·霍兰德
亨利五世
(1413—1422)
凯瑟琳(瓦卢瓦的)
(1437卒)
埃德蒙
(1425卒)
安妮·莫蒂默
理查
剑桥伯爵
(1415被处死)
亨利六世
(1422—1461)
(1470—1471)
玛格丽特（安茹的）
(1482卒)
理查·金雀花
约克公爵和英格兰护国公
(1411—1460)
塞西莉·内维尔
(冈特的约翰和凯瑟琳·斯温福德的孙女)
爱德华
威尔士亲王
(1471卒)
爱德华四世
(1461—1483)
伊丽莎白·伍德维尔
(1492卒)
乔治
克拉伦斯公爵
(1478卒)
理查三世
(1483—1485)
安妮·内维尔
(1485卒)
伊丽莎白(约克的)
(1503卒)
亨利七世
(1485—1509)
爱德华五世
(从未被加冕)
(1483)
爱德华
威尔士亲王
(1484卒)

这是一个征服与扩张的时代，还是一段压迫与反抗的历史？诺曼征服、十字军东征、百年战争、玫瑰战争，它们造就了怎样的一个中世纪英国？诺曼、安茹、兰开斯特和约克，这些王朝各自又有什么特点？

本书以1066至1485年间英格兰王室的更迭浮沉为主线，以英国疆域的扩张与收缩为背景，将四百多年的历史以及此期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百科通识文库

49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

——十八世纪英国

保罗·兰福德 著

刘意青 康勤 译

百科通识文库

49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

——十八世纪英国

保罗·兰福德 著

刘意青 康勤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57**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4.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1984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Paul Langford 19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十八世纪英国／（英）兰福德（Langford, P.）著；刘意青，康勤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93-9

Ⅰ．①日… Ⅱ．①兰… ②刘… ③康… Ⅲ．①英国 - 近代史 - 18世纪 Ⅳ．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36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93-9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插图目录
地图目录
第一章　革命及其反响
第二章　罗宾政府的兴起
第三章　工业和赋闲
第四章　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
第五章　不同政见的斗争
第六章　叛乱和改革
第七章　结束语
年表
历任首相名录1721—1789年
译后记
译者简介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保罗·兰福德，牛津大学现代历史学教授（自1996年起），林肯学院现代历史学研究员、导师（自1970年起），艺术和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自1998年起）。其著作有《一个彬彬有礼的商业化民族1727—1783》（Oxford，1989；1999再版）和《英国的公众生活与有产阶层1689—1789》（Oxford, 1991）等。

译者简介

刘意青，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英国18世纪文学、英美和加拿大小说以及《圣经》的文学阐释。专著和编著有《圣经故事100篇》、《女性心理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英文）、《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与罗经国联合主编）、《英国18世纪文学史》。翻译过英美诗歌、英国和加拿大短篇小说、诺贝尔获奖小说节选、美国文化方面的著作等。还在国内重点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康勤，专职翻译工作者，文学硕士，持有联合国T2翻译级别资格。通晓法语和英语，除了在联合国从事了数年英汉、汉英笔译工作之外，还翻译过英美文化和文学作品。在法汉翻译方面，参与翻译过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如莫泊桑的小说，以及若干现当代作家如杜拉斯等的作品。

插图目录

图1　教会陷入危难：1711年的一个扇面图案
图2　罗宾政府的政治：沃波尔时代的政治漫画
图3　宗教自由主义式的办学：1708年创建于剑桥郡巴勒·格林镇的慈善学校
图4　悠闲的贵妇们：约翰·科利特的大众文化研究
图5　绞刑架的阴影：费尔斯伯爵被公开处决，其尸体被解剖
图6　“时髦社会”：1777年的漫画
图7　外行人的科学：詹姆斯·弗格森的太阳系仪（德比的约瑟夫·赖特绘制，当时的印刷品）
图8　海边：描绘黑潭魅力的早期独特速写，以及威廉·伯奇于1788年创作的描绘拉姆斯盖特的雕版图
图9　王室的辉煌：佐法尼描绘王室家族的画作和1767年描绘比特的漫画
图10　小皮特：赞许和反对，庚斯博罗的肖像画和吉尔雷的漫画
图11　父与子：吉尔雷创作的乔治三世与他的妻子，以及乔治亲王与菲茨赫伯特夫人
图12　文明教化的使命：1745年时一个苏格兰人在伦敦
图13　文明教化的使命：Lee Boo和Ludee

地图目录

地图1　1741年收税路网络
地图2　1770年收税路网络

第一章

革命及其反响

1688年革命被称为“光荣革命”，后人对其历史重要性一直不断地进行着重新阐释，结论褒贬不一。20世纪的评价尤其糟糕，而且按现代史学研究的眼光来看，这场革命的重要性可能就荡然无存了。深为托马斯·麦考利 [1] 和维多利亚时代辉格党人所称道的那场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决定性胜利已沦为自私的寡头统治集团所采取的保守的应对举措。特别是与现代革命相比较，它似乎更像是一场宫廷政变，而非一种真正的社会或政治权力更迭。然而，它却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后果，其影响并不亚于那些更触目惊心的动乱。即使说它是相对无暴力，可能都有些言过其实。在苏格兰，不得不通过武力来镇压被废国王的拥护者，这种镇压直到1689年才结束。在爱尔兰，肯定发生过一场大屠杀，至今其仍在有关爱尔兰的神话和回忆录里占有突出地位。在伦敦德里的围困被解除，而且詹姆士二世在博因河战役中被彻底击败之时， [2] 北爱尔兰省的新教徒们肯定认为他们所进行的是光荣的拯救，但他们却不会认为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使不合法变得合法化

英格兰本来很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前保王党人尼古拉斯·艾斯特朗奇 [3] 曾证实，英格兰能够避免一场犹如世纪中叶内战那般凶残的战争纯粹是靠运气，詹姆士二世的支持者队伍松散混乱，尤其是国王竟然没能在自己的王国中树起王室的旗帜。艾斯特朗奇也对其家族不必再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做更多牺牲而感到如释重负，这也许提供了一个启示，让我们看到英格兰的革命是相对平静的。在英国，一种清晰可见的妥协意识，即懂得从边缘上退回一步，自1689年1月伦敦议会全体会议的辩论开始一直存续了几个世纪。当时非君主召集的国会会议仅凭通过一项法案这种简单的权宜之计就摇身变成了正式的两院制议会，此举表明了它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愿望：想尽可能遵循1660年王政复辟时采用的程序形式来使明显不合法的变得合法化。在实质

问题上，首要的当然是要达成一种共识，而不是去检验双方中任何一方所提出的那些更为极端的解决办法。结果，奥兰治的威廉〔4〕被立为国王，玛丽为王后。丹比〔5〕领导的托利党人本希望玛丽成为单独的君主，或成立某种摄政政府，以此种形式代替詹姆士二世进行统治。但这位信仰新教的英国救星不肯接受任何低于王位的头衔，所以只能如此。

尽管这样，议会仍然尽了一切努力来掩饰当时发生的是一场革命。虽然詹姆士那些所谓的违法行为——特别是他依赖一支常备军和为自己追索回豁免权和中止权——被正式宣布有罪，但《权利法案》却想尽招数，伪称被废国王其实是自动退位，王位空缺之后英国别无选择只能寻求奥兰治王朝的保护。尽管这似乎无法自圆其说，但它足以获得统治阶层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当然，有例外是不可避免的。一些教士在坎特伯雷大主教桑克罗夫特〔6〕和曾在“七主教案”中帮助挫败詹姆士二世的两名主教领导下，拒绝宣誓效忠，即使效忠誓言经过了非君主召集的国会会议的慎重措词。另一些人，如诺丁汉的托利党人，他们是1681—1687年反抗运动中的宫廷支持者，则竭力想搞清合法国王的概念，即为什么国王的头衔应该这样由议会两院决定授予，而不是神授。

议会君主立宪制

然而，议会君主立宪制还是得到了广泛接受。但此中的深刻意义却被掩盖了，这不仅是因为在1689年人们有意想避免教条规定，而且还因为随后开始了漫长的苦难。被动服从和不抵抗仍是很有影响力的观念，它有周密的论据支持，强调1688年刮起的“新教之风”（the Protestant Wind）是神意，每个公民都应当与不管何种形式的当局合作而不应屈从无政府主义。这些观念持续影响一代人的头脑，给许多曾认为1688年革命是必要的但却难以承受其全部后果的人所感到的愤怒和绝望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此外，他们囿于18世纪英国国教的

正统观念不能超脱出来，也帮助维护了这种正统观念背后的独裁主义，这种独裁主义后来仍然是美洲和法国革命时代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除此之外，可以说1688年发生的重大变革是真正革命性的。《权利法案》明确废除了曾构成1660年复辟政体基础的世袭权，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议会表达的民意。先是威廉和玛丽，然后是玛丽的妹妹安妮，最后，在安妮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于1700年夭亡后，是汉诺威选帝侯（即詹姆士一世女儿的后代），他们的头衔都是经过有产阶级决定后授予的。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专制主义似乎都蒸蒸日上，因此这样一种变革的重要性不容低估。18和19世纪的辉格党人夸大了似乎在1689年获得了胜利的契约论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却低估了这种理论带来的紧张、矛盾与冲突。不过，他们将该理论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断然摈弃了原来的一整套政体观念，这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

对外关系

君主地位是1688年革命党人有意识要解决的问题。不清楚他们当中是否有许多人预见到了其行动给英国与外国间的关系造成的影响。确实，在这方面，革命的重要性没有被否定，也是不容否定的。1688年以前，奥利弗·克伦威尔[7]、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接连几任统治者的政策基本上都是亲法国和反荷兰的。1688年以后，法国多少成为了一个长期敌人，而且必然会不断与英国争夺海外霸权。冲突的规模也不同于过去。九年战争（1688—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使得自伊丽莎白时代与西班牙争战以后就不曾再参与战事的英国既卷入了欧洲大陆战争又卷入了殖民地战争，而在此期间，作战技术和战略的复杂性都大大提高了。

英国人所担当的角色在这种即使不是不可预测，但至少也出人意料的革命结局中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就大方针而言，首要的任务

是抵抗路易十四在低地国〔8〕的扩张主义政策，防止形成一个包括西班牙和法国君主政体在内的新的强大波旁帝国。商业的利益曾一度需要保护，以抵制荷兰的经济活动，而当时对来自法国的更持久竞争和挑战则必须采取一种主动出击的态度。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即使不能分享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领土，也要维护英国分享其贸易份额的权利。辉格党人把这些论点系统化，以支持其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威廉三世和马尔伯勒公爵〔9〕在欧洲大陆进行的战役便非常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干预政策。但如果不是为了王朝问题，上述因素并不能促使许多英国人去同意在这些年中消耗如此庞大的费用和资源。九年战争曾被很恰当地称为英国王位继承战。若不是当初认为自己介入了英国事务后逻辑上必然导致英国国内的反法联盟，威廉很可能就不会于1688年在托尔湾武装登陆。〔10〕而事实上，由于路易十四贸然支持詹姆士二世，结果使威廉更有希望获得来自其新臣民的外交和军事支持。有一段时间，法国撤回了对詹姆士二世拥戴者的支持，并于1697年与英国达成一种不稳定的和平局面。可4年之后，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受到威胁，欧洲再一次处于战争边缘，这一次又是因为路易十四支持了斯图亚特王朝，这回是支持詹姆士的儿子老僭君，致使许多本不赞同的英国人也认为应当参与欧洲大陆的战争。

这些战争最惊人的一个方面是英方军事行动大获成功，特别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马尔伯勒公爵指挥的战役。不只是王位由新教徒继承这一点至少在当时得到了切实保证，更引人注目的是，不久前这个国家在众人眼中还只不过是法国的一个随从，而现在却赢得了新的声望。马尔伯勒公爵在布伦海姆和拉米利斯两地的胜利，更不要说乔治·鲁克爵士〔11〕在直布罗陀以及詹姆斯·斯坦厄普〔12〕在梅诺卡岛的胜利，使英国成为了欧洲大陆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力量、地中海地区一个有实力的强国以及法国在海外的一个劲敌。这场战争后期阶段，军事方面的进展似乎随国家军费开支的削减而相应减少，这使得战争早期在布伦海姆取得辉煌胜利时所激发的远大抱负从此消匿，但是在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签订时，英国还是获得了足够多的筹码继续保持其早期军事胜利的影响，〔13〕甚至在欧洲制造了一种被法国外交历史

学家称为“英国霸权”的印象。

国内影响

战争造成的国内影响几乎同样重要。在那个年代，和平时期军费每年支出200万英镑都会被认为过高，而这些战争的费用几乎达1.5亿英镑。如此高额的费用必然需要相应提高税收水平，从而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反响。但事后看来，更有趣的是账单上一大部分费用，将近三分之一，是靠借贷来支付的。这样的金额只有在一种活跃和灵活的货币市场中才能见到，比如17世纪末期的经济条件所生成的那种市场。尽管土地价值受到农业衰退的严重影响，但贸易在17世纪80年代中仍有极大增长，由此带来的投资盈余使经济受益多年。革命后的政府急需现金，准备以未来几代纳税人的收入作抵押来使利率具有竞争力，于是提供了前景看好的投资机会。

那些曾倡议并最终促成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的金融业者基本上并未从事什么新活动。只要进行战争，政府就不得不依赖商业界的贷款。但这个时期不同的是，由于借款量特别大，因此必须具备政治基础的支撑。新政权的信誉实际上是以议会名义为基础的，依赖的是一种明确的默契，即有产阶级最终会准备好付账。〔14〕如果政权方面不能相应地认识到它必须与那些有产阶级及其代表密切合作，则不可能有这种默契。国债及其所涉及的一切都建立在这种把一个不合法的王朝与金融界以及广大纳税者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的利益关系上。

战争一场接着一场，一个十年后又一个十年，债务负担增加了。一届届政府越来越难以避免借款，而那些提高的税收的主要作用往往只是用来偿还债务利息。事后看来，这种方式在当时的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其优势显而易见。政权的政治安全由此得到了加强，否则这个政权就多少有些不稳固。国家资源在战争中也激增，因为这种机制将个人财产汇入了公共开支。当时，种种弊端引起了更多关注。那些声称国债实际上能得到偿还，国家能够摆脱破产威胁的托词越来越无

力。百姓历来对各种税收，尤其对新形式的税收没有好感，他们的焦虑使财政部和岁入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越来越难做。

然而，即便在那时，也有人敏锐地觉察到新制度有一种相当可贵的政治优势，这来自它对议会，特别是对下议院的影响。因为新的制度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在这个复杂程序中的作用，而议会则很珍惜自己在财政事务中的权利，这是可以理解的。土地税是保证纳税人承付国债的基本税收。但出于谨慎，一次投票所定的土地税额只管一年。海关税和消费税批准后虽然可以维持较长时期，但要想延长或更新则需经过极长久的争论和讨价还价。“预算”这个说法第一次使用是在亨利·佩勒姆 [15] 担任财政大臣期间（1743—1754年），它表面上是18世纪中叶的一项成就，但其基本特征却可以追溯到光荣革命时期，而且正是1689年的这一成果在此时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最终确保了议会在宪政发展中的核心位置。

在17世纪人们有时可能会认为立法机构有点荒谬并且特别令人恼火，是英国中世纪的遗物，不合理地阻碍了有效的君主制政体，彻底摈弃它反而有利。现在新政体的未来已有保障，自1689年起，议会每年都举行相当长时间的会议。在这个意义上，光荣革命使老问题有了全新的意义：18世纪政治家想的不是如何取消对议会的需要，或如何压垮它。相反，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去操纵它。操纵议会的技巧将是乔治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关键。

教会

17世纪末进行政治革命，不可能不唤醒基督教会革命的希望或幽灵（这儿的提法取决于一个人的立场）。在这一点上，1688年革命之所以重要，可能不只是因为它所实现的，可能还因为它所未能实现的。当时许多人希望彻底修改17世纪60年代的教会决议案。曾经有过确立一种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国家教会之说，而对于一些不信奉国教的人，特别是长老会教友来说，与国教和解的可能性似乎比1604年汉普

顿宫会议〔16〕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大。但结果他们的希望破碎了。正如1662年的情形那样，英国国教会的地主势力不允许削弱国教的等级和主教制结构。这一次虽然没有激起劳德派〔17〕或高教会派那样的反应，但是任何与不信奉国教者诚恳和解的迹象很快就被消灭了。相反，在当时事态下，不信奉国教者所得到的少得不能再少，即一种勉强的宽容。1689年的《宽容法》（The Toleration Act）实际上允许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在英国国教主教特许的教区内自由信教，但他们必须遵守得到《教会统一条例》（The Act of Uniformity）承认的、《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中所规定的教义规范。这似乎还远不如詹姆士二世为各类非国教徒所展示的前景。

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向来都贬低《宽容法》的重要意义。对于曾抵制住《赦免宣言》（Declarations of Indulgence）的诱惑并欢迎过奥兰治的威廉的人来说，以条件限定他们的信仰，准予他们一种有条件的自由这种奖赏似乎太可怜了。〔18〕但这种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场。对于在17世纪80年代初还遭到过残酷迫害的非国教徒来说，《宽容法》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法定保障。而在那些焦虑的教会人士眼中，更重要的是维持《王政复辟决议案》（The Restoration Settlement）的内容。1662年的《祈祷书》（*The Prayer Book*）直到20世纪一直是英国国教礼拜仪式的依据。但是在1689年，《祈祷书》似乎为教义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随意讲解的平台，如果没有它，已确立的新教恐怕就会失传。〔19〕

自相矛盾的是，由此形成的英国国教的独霸地位却对18世纪英国被视为野蛮世界中的一个文明社会的声誉贡献甚大。一个除了很少几个教派和天主教之外几乎无所不容的包容性国教毕竟和一种与大量非国教徒并存的限制严格的宗教机构完全不同。其中的差异也许就是社会的宽容和多元化。从法律上认可信仰自由是欧洲大多数国家远远做不到的，伏尔泰〔20〕将之视为自由政体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如果是这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的结果。

这些成就的一个代价就是社会局势紧张和政治矛盾重重，它们成为奥古斯都时代〔21〕的突出特点。最明显的紧张迹象实际上是宗教机

构的困境。这个时期最强烈的呼声就是“教会陷入危难”。事后来看，似乎说不准它当时是否真的陷于危机。对于那些曾梦想复兴劳德教会的人来说，《宽容法》显然是个沉重打击。但在日益高涨的不拘泥于教义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情感影响下，似乎多数人都觉得这个法案无关紧要。而且，《革命决议案》[22]（The Revolution Settlement）没有触动英国国教徒根据《宗教考查法》（The Test Act）和《市镇社团法》（The Corporation Act）所享有的政治垄断权。[23]但是，症结就出在这里。在现实中，一切迹象都表明非国教徒能够挑战和规避这种垄断权。许多非国教徒愿意偶尔遵奉国教会，每年按照国教礼拜仪式领圣餐，以满足法规要求，至于其余的仪式则在其自己的非国教徒礼拜堂中进行，这一直令他们的敌人很恼怒。偶尔遵奉国教的这种做法是否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不能肯定。但它此时毫无疑问更加明显了，因为非国教礼拜堂已得到公众认可，而且此时那些去做礼拜的人遵从了双重标准是人人都清楚的。

图1　教会陷入危难。这是1711年的一个扇面图案，颂扬了神父萨谢弗雷尔，画中还有在审判中支持他的6名主教以及其他英国国教英雄，包括玛丽时代的殉教者。画面左边是受到女王和上帝保护的英国国教。右边展示了共和主义和天主教会的威胁。

此外，17世纪90年代和18世纪头10年的大环境惹得国教教徒们焦虑不安，甚至歇斯底里。神学推测和自然神论趋势得到大量讨论并令人感到十分畏惧。约翰·托兰德[24]所著的《基督教并不神秘》是企

图推广“自然神论”用以反对“天启”宗教的最早和最系统的尝试之一，它在1697年时掀起了一连串关于这类问题的争论。其中一些最尖锐的国教攻击者本身就是英国国教的牧师，这就让局面更加严峻。辉格党的怀疑论者塞缪尔·克拉克〔25〕1712年时由于攻击三位一体论而招致了圣公会主教区会议的公愤；本杰明·贺德利〔26〕虽连续三次担任主教，但却否认其职务以及英国国教本身的神性。他们只是异端思想的较为突出的一些例子，这种思想似乎标志着英国早期启蒙运动的发展。

政党政治

高教会派对这些趋势的反应在安妮女王时代达到巅峰，有这么一个虔诚而且信仰上保守的女王在位更使他们有了动力。但是其动力更多是源于其他事态的发展，其中许多都与政党政治有关。托利党人经常将自己称作“教会党”，他们的号召力要极大地依赖国教会中的危机感。他们还广泛地争取边远地区的国教会地主势力在情感上的支持。对于这些地主来说，革命所开启的世界除了坏处什么也没带来。这个时期的一系列战争迫使直接征税达到了17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每镑4先令的土地税对于当时已经遭受农业衰退影响的阶层而言是一个沉重负担。这些奉献都是为了战争，但战争却似乎恰恰是要让土地贵族的敌人获益，即那些在斯图亚特王朝末期的商业和金融扩张中十分活跃的商人、制造商，尤其是“金融业者”。这些人似乎往往是非国教徒，除了间接税以外他们几乎逃避了所有税收，而且始终如一地坚持辉格党的政治主张。

新旧政党体制之间的联系有时很薄弱。安妮统治时期的新托利党人常来自有清教或辉格党背景的家庭；他们的领袖罗伯特·哈利〔27〕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辉格集团铁定心思争夺地位和权力，结果落了个不讨好的“党派先于原则”的名声，他们似乎不是1679年的乡村辉格党〔28〕的后人。但是，毫无疑问，18世纪初党派派性确实非常

鲜明，并在1710年时达到高潮，辉格党人因为托利党神父萨谢弗雷尔博士〔29〕宣扬不抵抗的旧教条而控告他。随后在民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清楚表明了光荣革命附带了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1694年通过的《三年法案》（The Triennial Act）主要目的是为了迫使君王定期召集议会，但后来证明这是不必要的。不过，它还规定要经常进行选举，致使这段时期内选举矛盾无比紧张并且持续不断，远胜过了以往，以至在20年中进行了10次大选。此外，1695年《许可证法案》〔30〕（Licensing Act）失效，从实际上废除了国家审查制度，从而切实地为公众辩论提供了一个宽泛且不断扩大的论坛。因此，这些年中发生了一些关键的事件，比如建立格拉布街〔31〕，出现期刊印刷，以及发展形成了一批真正关心政治的民众等，并非偶然。

历史学家一般将安妮统治时期视为实现政治稳定的天然的背景环境。但当时人们从所见到和了解的情况来看，似乎建立君主立宪制和实现财政安全的代价就是政治混乱。

注释

〔1〕 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 1800—1859），19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和历史学家。——译注，下同

〔2〕 除去新教占据的北爱尔兰省，整个爱尔兰都极力支持詹姆士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给他配备了军队，他的第一仗就是围攻伦敦德里，但遭到居民们的坚决抵抗。他们坚持到英国救兵赶到，詹姆士不得不弃城而去。第二年威廉亲自率军到爱尔兰，在博因河战役（Battle of the Boyne, 1690）中击败了詹姆士。

〔3〕 尼古拉斯·艾斯特朗奇（Nicholas L'Estrange）属于罗杰·艾斯特朗奇（1616—1704）为首的家族。罗杰·艾斯特朗奇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有名的保王党人，写了不少政论传单和册子，后流亡国外。复辟后他主管过出版和印刷的许可证，以他狭隘的立场阻止了不少宗教和政治上持不同见解的作品的发表。

〔4〕 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 1650—1702），奥兰治亲王，荷兰威廉二世之子，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外孙。光荣革命前夕他在荷兰联合省任最高行政长官。1677年他娶了詹姆士二世的新教徒女儿玛丽，因此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挑选的取代詹姆士二世的人选，光荣革命后成为英国国王威廉三世。

〔5〕 托马斯·奥斯本，丹比伯爵（Thomas Osborne, Earl of Danby, 1631—1712），托利党人，查理二世时的重臣。他促成了奥兰治的威廉与詹姆士二世之女玛丽的婚姻，后与辉格党妥协，共同迎进奥兰治的威廉。

〔6〕 威廉·桑克罗夫特（William Sancroft, 1617—1693）由于反对加尔文主义，他在清教革命后期一直流亡在外，于1660年复辟后回到英国。1678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并同6名主教一起联名反对《赦免宣言》。

〔7〕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议会军首领，革命后的护国公，成为独裁者。

〔8〕 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9〕 约翰·丘吉尔，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John Churchill, 1st Duke of Marlborough, 1650—1722），英国将军和政府要员，历史上最善战的军事将领之一。

〔10〕 1688年七位辉格和托利领袖联名致函奥兰治的威廉，请他率军来英国保卫百姓自由。数月后威廉于托尔湾（Torbay）武装登陆。

〔11〕 乔治·鲁克爵士（Sir George Rooke, 1650—1709），海军司令。他曾参加过英国与荷兰、法国等国的战争。

〔12〕 詹姆斯·斯坦厄普（James Stanhope, 1673—1721），将军。他在马尔伯勒公爵手下任过军职，参加了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后来在政府中担任财政大臣时协助沃波尔解决国债问题。

〔13〕 指Ultrecht Peace Treaty（1713）。这个条约已经与战争的起因无关，因为腓力仍旧继续做西班牙国王。在11年的战争中形势发生了变化，法国已经被战争拖垮，不再是英国的劲敌。条约中牵涉英国的主要内容是法国承认英国的新教国王，英国保有直布罗陀等领地。

〔14〕 原文...depended on without the clear understanding that the propertied classes would ultimately be prepared to foot the bill可能有印刷错误，似乎不应该有without这个词。

〔15〕 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 1696—1754），辉格首相。他执政期间进行了改革，减少了国债。

〔16〕 汉普顿宫会议（The Hampton Court Conference）是查理一世下令召开的。当时清教势力遍及全英国，他们激烈反对英国圣公会，认为它是与罗马天主教妥协的产物，并发动了约千名教会人员签名抗议国教会的一些仪式。但汉普顿宫会议并没有完成国王设想的调和任务，双方愤怒地互相指责，以致会议破裂。但是这个会议决定了编译权威英文《圣经》。这就是后来出版的钦定本《圣经》。

〔17〕 劳德（William Laud, 1573—1645），坎特伯雷大主教，是查理一

世的心腹和坚定支持者。他对非国教信仰者深恶痛绝，采取极端举措，并因为干涉苏格兰长老会而引发那里的叛乱。他在清教革命后遭监禁，而后被斩首。

〔18〕 《赦免宣言》是詹姆士二世为了笼络非国教信徒以反抗议会而于1687年制定颁布的，给予了非国教信徒信仰自由，但他们仍然拒绝支持他。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登基后不久《宽容法》出台，准许非国教信徒有信仰自由，但有很多限制，如不得担任任何职务。相比之下，《宽容法》在平等对待非国教信徒方面甚至还不如《赦免宣言》。

〔19〕 《祈祷书》全称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最早由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编写，于1549年问世。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被禁止。复辟之后它被宣布为唯一合法的教堂礼拜用书。它几经修订，最后的大修订是在1662年。

〔20〕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法国著名文人，既是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又是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

〔21〕 这是对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一种比喻称呼。

〔22〕 《革命决议案》指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形成的规定，其中的一部分，即《革命法》（The Act of Revolution），规定詹姆士二世的非国教信徒的后代不准继位。

〔23〕 1661年通过的《市镇社团法》要求所有的市镇团体必须清除那些不肯按照英国国教会仪式领圣餐的成员，并要求每个成员公开宣布自己认为不得用武力反对国王，那是非法行为。1673年颁布的《宗教考查法》禁止罗马天主教徒、非国教信徒和犹太教徒担任政府和军队的官职。这样，实际上所有官员都只能由英国国教教徒担任了。

〔24〕 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 1670—1722），英国自然神论者。

〔25〕 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 1675—1729），英国有神论哲学家。他欢迎科学，但用第一原因论来证明上帝是一切的最终起因。

〔26〕 本杰明·贺德利（Benjamin Hoadly, 1676—1761），主教，低教会派的领袖。

〔27〕 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 1661—1724）曾是辉格议员，后倒戈加入托利党。1714年他就任安妮女王的财政大臣，领导内阁。他是托利党和英国国教领袖，安妮女王的宠臣之一。

〔28〕 查理二世复辟后英国政界和宗教界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两派，其中一派叫做“乡村派”，受到保王的“宫廷派”排挤。辉格和托利两党就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

〔29〕 亨利·萨谢弗雷尔（Henry Sacheverell, 1674?—1724）的主要冒犯是在1709年的两次布道中攻击辉格党政府对非国教信徒太容忍。他被起诉犯有诽

谤罪，在1710年被判停止布道三年。他的审判引发了轩然大波，使萨谢弗雷尔成为公众英雄。

〔30〕 《许可证法案》实际是新闻和舆论检查和管制的一个手段，比如1737年议会通过的《许可证法案》就取缔了菲尔丁的剧团，因为他的喜剧嘲笑了国王和政府。

〔31〕 格拉布街（Grub Street）位于伦敦中心商业区，是穷苦文人聚居的街道，在18世纪成为舆论中心。

第二章

罗宾〔1〕政府的兴起

1714年汉诺威选帝侯即位，使已经紧张的局面雪上加霜。安妮在世时，即使不从逻辑上，起码从感情上说，还可以把她视为斯图亚特家族的真正后人，守住了其家族的王位，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其家族托管着王位。但是，一个讲德语的汉诺威选帝侯到来后，坚决要干预国外事务并在国内大行辉格党之道，于是上述表象就很难再维持。从朝代的立场来说，在1714年有关王位的一切都没有定数。许多人怂恿老僭君回伦敦，劝他说为此值得放弃天主教弥撒；如果詹姆士三世能回归英国国教，肯定会为斯图亚特王朝第二次复辟创造更多的机会。但是詹姆士三世没有做出这种个人牺牲，所以1715年的詹姆士二世党人谋反就成了没有响声的湿爆竹。路易十四也死于这一年，之后，法国无力再参与在英国的冒险。即使在苏格兰，虽然那里是叛乱的发源地也确是叛乱中心，斯图亚特王朝的前景也不那么光明灿烂。1708年在一种相当紧迫的气氛中英格兰与苏格兰完成了联合，成为大不列颠王国，大大缓解了王位继承问题带来的麻烦。令许多苏格兰人感到悲哀的是，他们失去了自己民族的议会，也由此丧失了他们的独立。但是建立联合王国之举甚是精明，一方面可以维持苏格兰的法律和基督教机制，而同时又通过将其纳入英帝国体系为苏格兰提供了实际的商业利益。在这种形势下，1715年谋反的失败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是注定难免的结果。如果说老僭君错过了他的机会，那么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那显然成功了的对手乔治一世其实也错过了机会。

新政权

到安妮女王统治末期，老百姓厌恶战争，选举人疾呼“英国教会陷入危难”，尤其是女王自己也对辉格党集团感到恼火，这些都将托利党稳稳地置于驾驭地位。对于大多数托利党人来说，英国国教的利益优先于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忠诚。如果新政权能明智地采取一种与1689年威廉三世的策略类似的两党政策，本可能起到较大缓解作用，

使1714年的过渡顺利进行。然而，乔治一世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太露骨地表明要让辉格党人独揽汉诺威王位继承的相关事务。[2] 1714—1721年间掀起了一场旨在确立辉格党统治地位的运动，全面疏远了托利党人，不必要地加剧了詹姆士二世党人谋反的危险，并很有可能导致重拟《革命决议案》。

首先通过了《七年法案》[3]（The Septennial Act），以确保新的辉格党政府在完成其大部分工作之前不会去面对无法驾驭的选民。据当时谣传，辉格政府到时候将取消对议会期限的所有法定制约，从而可能使“长议会”[4]或“退休金领养者议会”[5]再现。同时，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托利党人为约束非国教信仰而采取的《偶尔遵奉国教法》[6]（The Occasional Conformity）和《分裂法》（The Schism Acts）等措施也先被叫停，后于1718年被彻底废除。《大学法案》（The Universities Bill）的制定是为了让国王能完全控制牛津和剑桥的奖研金和奖学金，以便将主要培育英国教会及各种职业所需人才的院校变成辉格党人的独霸领域。尤其是1719年的《贵族法案》（The Peerage Bill）打算将贵族院（即上议院）大致限制在其现有规模。这将确保辉格党在上议院中的永久霸权，不管君王是否会改变主意，而且还将使辉格党人能够对影响其利益的法律进行内部核查。通过这个方案，他们开始在郡治安长官和治安官员中，在武装部队中，以及在政府各级行政机构中有计划地稳步清除托利党人。

如果这项宏伟的计划能够大获全胜，就会创建一种与当时瑞典形成的体制很类似的制度，不过瑞典的这种体制致使该国50年虚弱无力，并充满了贵族间的党派之争。或者也可能确立一种寡头政治，像曾令17世纪英国几代人畏惧的绝对君主专制政体一样权力无限。再或者，它可能会使18世纪几乎无法实现其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即形成稳定而灵活的政治结构。然而，这项计划最终失败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辉格党人内部产生了分歧。乔治一世统治初期，一些辉格党大家族联合起来打垮其对手，他们的计划当时进展顺利。但事实证明这种联合都不长久。

新国王的对外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局面，他明目张胆地动用英

国海军力量来满足汉诺威在波罗的海的野心。而且，内阁中争夺优势地位的斗争也日益激烈。最终，辉格党于1717年分裂，使沃波尔〔7〕和汤森〔8〕成为在野反对派，而斯坦厄普和森德兰〔9〕在宫廷的位置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固。宫廷政治也发生剧变。国王的儿子，未来的乔治二世及其妻子卡罗琳公主明确表示愿意站在汤森一边，由此开始了汉诺威王位继承人搞政治阴谋的长久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斯坦厄普建立辉格主义之乐土的宏伟计划几乎无望完成。在下议院，沃波尔亲自领导击败了《贵族法案》，并迫使议院废弃了《大学法案》。如果说此时内阁还对其计划不会彻底失败抱有一线希望的话，那么这种希望在南海泡沫事件之后就很快破灭了。

南海泡沫事件

事后来看，南海泡沫事件以及随之发生的金融大崩溃有某种必然性，它似乎是此前几年中伴随“金融行业”兴起而极度膨胀的重商主义的必然结果。然而，导致这场动荡的计划方案最初还是不错的。英格兰银行代表的金融利益集团在战争期间从其投资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且国家债权人之间的竞争显然还存在更大空间。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托利党大臣们确实鼓励于1711年成立南海公司，想要以此有效地替代辉格党的银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资金是有的，不只是伦敦商业中心区有，小规模储蓄者那里通常也有，可以对国债进行更长期和更合理的投资。1719年的南海公司计划似乎筹划得很好，一方面要重新分配国债，另一方面要为国家财政部提供更优厚的条件。

麻烦不是出在计划的基本逻辑上，而是出在它所涉及的众多不同利益集团上。对于南海公司的董事，尤其是发起这一计划的核心集团而言，不只要为自己，而且要为许多朝臣、内阁成员和下院议员谋取厚利，因为这些人的支持在政治上至关重要，可以保证他们的提案获得通过。这种支持是通过提供价格优惠的股票，甚或通过公开贿赂、赠予股票这样的代价换来的。简言之，参与经营南海计划的许多人的

强烈兴趣都在于迅速获利，而迅速获利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公司的潜力，使之远远超越与其竞争的其他投资机会。

这一计划的实行仰仗该公司南海贸易的吸引力。1713年的《英西条约》使该公司得以垄断西班牙奴隶贸易并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欧洲产品市场中占有重要份额。理论上，这预示了一个最有希望的前景。但实际上，要管理这种离伦敦如此遥远的贸易困难极大，而且英国与西班牙政府之间的矛盾常常很激烈，根本无助于解决这些困难。在短期内，贸易不太可能获利，即使经过一段时间，恐怕也很难达到1719年时那些异想天开的人所期望的那样。但是在1720年初盛行的疯狂投机买卖中，这些现实很快便被遗忘。只要股票价格上升，新投机者便不断受到蛊惑去投资，使那些已经买入者能以相当可观的利润抛出他们所持有的股票。资金不断流入成为发行新股的正当理由，也使宣称投资能够持久获利的声音益发理直气壮，更不用说给政客们带来了更丰厚的报偿。这种局面是由一个腐败的政权、一群天真的投资民众和一笔既成事实的国债共同造就的。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

南海的泡沫一步步增大，同时促使更多骗人的泡沫在一些令人更难以置信的项目中出现。当最终信心严重缺失，并且泡沫破裂以后，所出现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对那些卖掉了大量地产或其他形式的财产去以荒唐的虚高价格买进股票的人而言损失更是惨重。几乎没法对这些受害者作任何补偿，他们绝不只来自最富有的阶层。议会快速通过了一项条例，严格限制此后的合股公司，但这实际上是亡羊补牢的做法。必须采取更激烈的行动才能尽量减少对政权的危害。国王和威尔士亲王公开言和，在野辉格党被迎回重掌职权，汤森开始争取国王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的亲善，而沃波尔则设法让下议院通过了一项解决泡沫危机的办法，这样至少能保护国债并挽回朝廷的脸面。

沃波尔因此得了一个“庇护”高官腐败和欺诈行为的永久名声。其实沃波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受到了当时极其严峻局势的助推。牵连进1720年肮脏交易的也有许多是托利党人，他们并不比其辉格党对手更愿意公开曝光。而且，南海泡沫事件是一场国际性危机的一部分，这场危机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都引起了程度相当的灾难；因此将一部分

罪责归咎于一些与伦敦商业中心区或朝廷中的个人皆无关系的客观经济力量也并非全无道理。不管怎样，国王的内阁大臣们，除两三个适当的替罪羊外，都获准逍遥法外。对沃波尔来说，这一切都代表了一项重大的政治胜利，最终以幸运地消灭了对手而告捷。两年内，斯坦厄普和森德兰相继去世，英国即将步入一个由沃波尔独掌大权的新时期，或如其反对者所说的，“罗宾政府”（Robinocracy）时期。

疾病和死亡

当然不能指望当时的人能够预见到后来的相对稳定局面。18世纪20年代多灾多难，尤其是在最基本的人类健康和生存方面。20年代一开始，不只是发生了南海泡沫事件，而且还弥漫着对鼠疫降临的恐惧，该疾病当时正在法国南部肆虐，随时可能从马赛经海运航线传播到伦敦。但结果证明这种恐慌是没有道理的。自大约400年前黑死病第一次暴发以来便定期蹂躏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病菌，此时即使没有灭绝也正趋于休眠状态。但这种趋势在当时并不容易看出来。而且不管怎么说，还有非外境传入的、本土滋生的疾病仍在继续固执地左右着人们的生死。

18世纪20年代末期，这方面的情况尤其悲惨。乔治二世统治的头三年，从1727年开始，英国连续三年一波又一波地遭到天花和类似流感感染的折磨，当时众说纷纭，人们很不准确地把这种感染描述成发冷和发热病。人口统计显示其后果是极严重的。17世纪70年代起一点点缓慢增加的人口，在这场显然是16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死亡危机中似乎多半都被吞噬掉了。到1731年时，英国总人口约为520万，很可能比17世纪50年代中期克伦威尔统治时的英国人口还要少。

腐败和犯罪

这个时期流行的疾患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南海泡沫事件所凸现

的贪婪、欺诈和疯狂也在蔓延，它们被报刊和布道者指斥为随后几年中最主要的罪恶。如果说生活奢侈和浪费是原因，那么道德沦丧和腐化堕落则是后果。

当时将公共生活搞得乌烟瘴气的一些重大丑闻似乎可以为此提供触目惊心的证据。一系列议会调查揭露了高官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调查发现，德文特湖地产托管人曾纵容以人为的低价格将没收来的詹姆士二世党人的财产出售给他们自己人。慈善团体的职责本是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和帮助，但其经管人和行政人员却营私舞弊、挪用甚至公然侵吞钱财而被判罪。这两起案例都牵涉到地位显赫的下院议员和政府支持者。而更轰动一时的是大法官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10]因组织出售法官职位而遭到控告。当发现这个蒸蒸日上的商业法部门的经费竟来自委托大法官法庭管理的私人财产获取的收益时，就连其内阁同僚也拒绝替他辩护。居然连衡平法的护卫者们都这样以身试法，当场被抓，这在当时那个极其尊重财产权的年代似乎特别令人震惊。

此外，公开的犯罪行为可能一点也不亚于私下犯罪。犯罪虽是反映社会情况的一面哈哈镜，但仍然是一面镜子。它似乎越来越有组织、越来越商业化，并越来越玩世不恭。小偷团伙头目乔纳森·怀尔德就是其时代的一个恰当代表。他主要靠指使自己的手下去偷盗，然后再将盗来之物归还其所有者来牟利。他的成功依赖的是治安官们与他们在大都市的警官之间的狼狈为奸。他的团伙只是日益兴旺的犯罪经济中发展出的一支。皇家狩猎场的偷猎者往往是有组织、有秩序地向伦敦市场供货的团伙。南部和东部海岸的走私者会遵照市场原则和经济准则行事，他们也频频得到官员和广大民众的配合。

当局几乎是竭尽全力来对抗这些威胁。依据一条法律细则，怀尔德最终被绳之以法，于1725年被处决，他也因此成为一个大众传说人物。温莎皇家狩猎场以及其他狩猎场的偷猎者成为了新法律，即严厉的1723年《黑色法案》制裁的对象。他们不得不一直等到20世纪才获得民间英雄的身份，而这也是因为历史学家们要将他们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真正代表才给予了他们这种身份。至于走私犯，政府越是要

奋力查禁他们，他们似乎还越发猖獗起来。18世纪30年代走私犯最为活跃，他们甚至能够与乔治二世的骑兵队展开激战，义无反顾地为消费社会效劳。

讽刺与辩论

讽刺与辩论是汉诺威王朝初期出现在英国的现象。谈到这方面，最好不要把南海泡沫事件看成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大结局，而应看成是18世纪中期繁荣、庸俗和重商主义的一个壮观开场。这种戏剧比喻在此特别恰当，因为这个时期在表演艺术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18世纪20和30年代，伦敦剧院数量显著增加，而且其政治作用日益加强。在朝廷采取行动于1737年获得广泛的审查权力之前，[11] 伦敦的剧院以及报刊一直充当论坛，掀起一场愈来愈激烈的批评运动，矛头直指泡沫事件期间和之后新兴的那个社会。

最能体现这种批评力度的是1728年获得巨大成功的约翰·盖伊[12]的《乞丐的歌剧》。虽然不能肯定该歌剧是否真的意在进行政治讽刺，但很说明问题的是当时的舆论氛围立刻认为它是这样一部作品。盖伊反映的就是当时人们普遍忧虑的问题，即英国社会制造出的错觉和虚假幻觉。它很明显地将乔治二世的宫廷描述成小偷的厨房，将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与伦敦黑社会的道德观等同起来。菲尔丁[13] 后来又更进一步，毫不留情地把乔纳森·怀尔德与罗伯特·沃波尔作比较。在蒲柏[14] 的《群愚史诗》、斯威夫特[15] 的《格利佛游记》，以及博林布鲁克[16] 的《手艺人》中也都有非常相似的主题，所有这些都是令人瞩目的十年辩论和讽刺的产物。其中许多东西是人们所熟悉的，比如退回到古典主义中去，呼吁乡村价值观念，展现乡村田园生活的魅力，尤其是对18世纪初期的重商主义造就的那所谓人造金钱世界进行不懈的批判。在这些方面，的确可以说沃波尔时代文学和新闻中的谩骂是这股奔流了多年的潮流的最后一次喷涌。但是，这种批评在启示未来方面，或正面地积极地分析其他可能性方面，显然存在着欠

缺。

沃波尔的发迹

当盖伊的观众们在麦基斯身上窥到沃波尔政治的实质后，他们就抓住了这个时期形势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汉诺威政权的政治特性与当时认为的社会弊端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即使这种联系还没有稳固确立，至少已可为人们所见。除个别的例外（特别是漫画家威廉·贺加斯[17]，他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讥讽礼仪和品行），伦敦的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们都不约而同地将沃波尔作为自己作品中主要的恶人。他的典型形象是一个诺福克的暴发禄虫，靠着一贯腐败致富（1712年时，他曾因在公务上侵吞公款遭到托利党人的起诉），因为不讲原则和屈从于朝廷观点而得以升迁，掌握最高权力。1727年以前，其内兄汤森分享着他的权力并与他一样不得人心。但是，乔治一世死后，新国王的即位将沃波尔彻底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沃波尔机敏地操纵乔治二世，尤其是卡罗琳王后，排挤所有与他争夺权力的对手，就连汤森也在1730年时被排挤出局。由此，他很快便独揽大权，这恐怕是自17世纪70年代丹比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而国王本身不得人心肯定也助长了这种局面，国王毫不掩饰自己对德国环境和随从的偏爱，而且根本不想提高自己在英国公众心目中的声望。

沃波尔的霸权必然使他本人成为格拉布街的众矢之的。他被描绘成“大伟人”、“英国大人物”、“人山”[18]。他有时也以制造幻觉政治的完美代表——诺福克的骗子、萨沃伊的表演者[19]、魔术师帕里努儒斯[20]、巫师墨林[21]、总庇护人等面目出现。无数攻击文字和出版物中都将他描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魔术师，对喜怒无常的乔治二世的把持和对原本难以收服的议会的控制正是他高超技艺的体现。

沃波尔在当时及之后的成功被归结于他巧妙地利用了影响力甚至贿赂。与前几年政治混乱的状况不同，稳定似乎成了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照此观点，这种稳定可以被视作是各种对这届政府有利的因素

自然累积的结果。由于战争，特别是由于新财政系统的运转所需庞大机构的出现，政府得到了扩充，由此产生了大量支持和赞助政府的新的庇护人关系。此外，由于革命后政府绝对需要在下议院获得足够的多数，这更是有力地刺激了其利用这些关系来操纵议会的做法。于是便出现了一派更加庞大、更听话的朝廷和财政部门人员，来弥合国王与下议院之间由来已久的隔阂，并逐步开创一个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和睦相处的新时代。

这种观点很有意思，但并非它的所有前提都可靠，而它所有的结论也并非全是必然的。沃波尔的管理之术远算不上新奇。至少从查理二世起便接连有内阁大臣用这些方法来确保下议院中有相当数量的朝廷派。为私利而任命官吏和追逐名利，更不用说普遍存在的腐败事实，一直是安妮及其后继者统治时代的显著特征。从某些方面说，沃波尔内阁时期的和平年月确实减少了可利用的庇护关系的数量。沃波尔及其得力的后继者亨利·佩勒姆的确是机敏过人，御局有术，两人都把朝廷派变成了一种特别有效的控制工具。但是要建立乔治王朝时期英国那种正统的议会体制，单靠庇护人制度是不够的。

这并非要否定沃波尔无与伦比的个人才能。作为一名朝臣他的确是个盖世奇才。他对王后和国王的操纵（对后者的操纵一部分是通过王后来实现的）确是将谄媚奉承和威逼利诱发挥到了极致，这在赫维勋爵〔22〕的回忆录中有精彩描述。赫维勋爵曾与卡罗琳王后关系亲密，所以有大量机会目睹沃波尔的种种手段。朝臣能左右逢源并不新鲜。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富于才智，善用权谋，且能收放自如，沃波尔凭着这种能力同样游刃有余地操纵着下院议员们。

在这方面，沃波尔身为首相仍决定留在下议院的决定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以前的大臣历来都去上议院，但沃波尔却打定主意要留在能够最终控制政府财政大权的下议院。作为辩论家，他虽有些生硬（这不一定是个缺点），但却很有技巧且极有说服力。作为调解人，他特别能够探明并执行具有代表性的乡绅的意见。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政策，确与其辉格党老同僚的派性做法大不相同。他不想加深旧恨，这在他对待教会的方式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借助《免罪法》（The

Indemnity Acts），不信奉国教者可以享有信仰自由，甚至能享有一定的地方权力。但是，原则上他并没有真想打破英国国教会的垄断局面，因此英国不得不又等了100年才废除了《宗教考查法》和《市镇社团法》。在其他地方，如各种团体和市政机构、大学甚或议会自身，也没有任何关于大规模变革的认真讨论。辉格党与法国和平共处的政策到沃波尔执政时变成了一项与所有人和平共处的政策，而且该政策有一个异常可贵之处，那就是低税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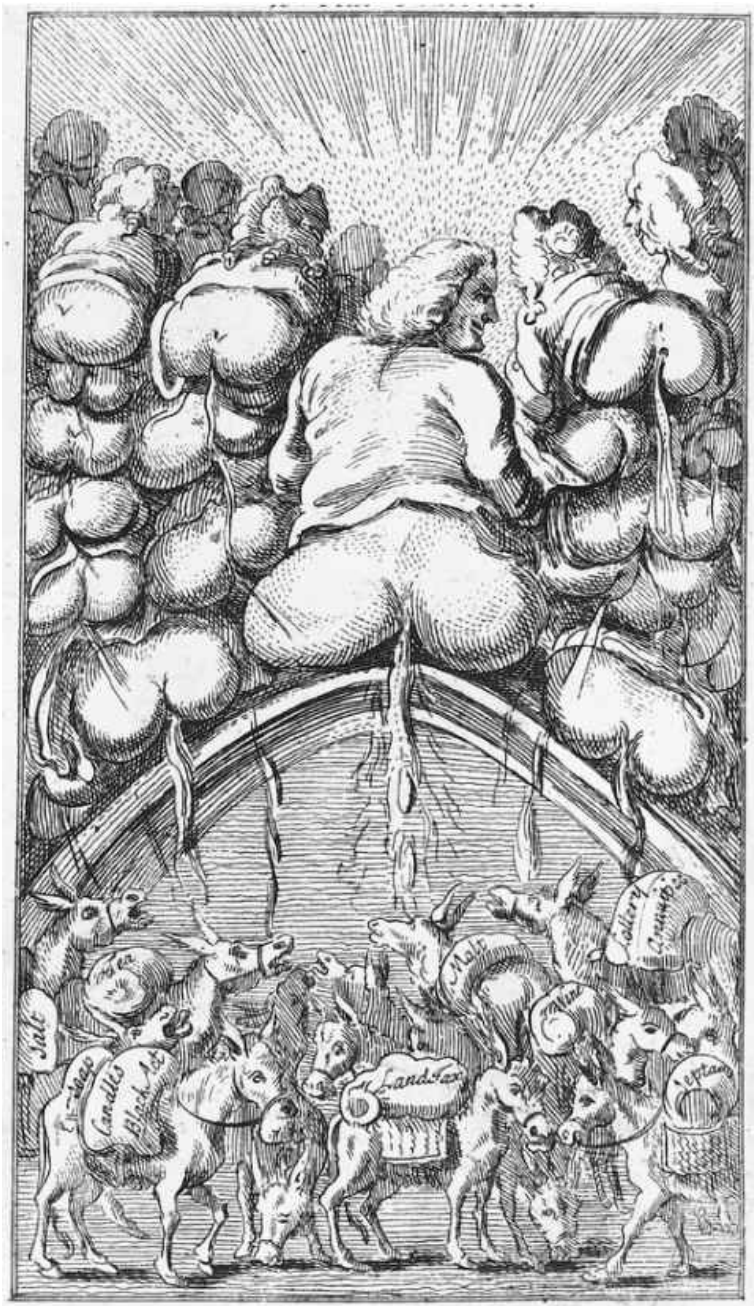

图2　罗宾政府的政治。沃波尔时代的政治漫画粗俗但有力。（上图）：沃波尔（手拿魔棒）和王后卡罗琳正在用魔水控制暴躁易怒的乔治二世（被画成半

人半兽的森林之神模样）。（下图）：大屁股用来暗喻继沃波尔之后的联合内阁，它表明了该漫画创作者对其保证减税和打击腐败等承诺的看法。从这些作品顺带可以看出当时人物漫画发展的不成熟；不论是上图中的沃波尔还是下图中央的托利党领袖约翰·海因德·科顿爵士（Sir John Hynde Cotton）在形象上都与本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理论上，辉格党继续保持了无上权威。而实际上，沃波尔却巧妙地改变了汉诺威政权的基础。不再采取强制胁迫手段，而是试图达成共识；不再以排斥异己的寡头政治为目标，而是代之以一种虽不那么令人振奋但却稳固的统治联盟，这种联盟向所有人敞开，只要他拥护那些模糊的“革命原则”，哪怕只是口头上支持。

庇护人制度和政治稳定

即使没有沃波尔，汉诺威政权最终也会对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单就腐败而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沃波尔的新管理方式，而是一边倒的庇护人制度。1714年以前，朝廷政策的无常或不连续，使得官吏和庇护人很难进行投机钻营。从位于选民金字塔顶端的市镇商人到位于底部的卑微收税官或普通议员，都弄不清该去何处谋权谋利。安妮女王时代政党政治的不稳定也多半源自这种心态上的摇摆不定。1715年以后，公众生活的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为不只一代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反对让托利党人进入内阁，除了1743年在沃波尔倒台后的动荡局势中产生的为期不长的联合内阁外，托利党40多年一直在野。

然而矛盾的是，这种排斥异己反倒进一步保障了内阁的稳定。托利党在朝廷的朝臣们毫无疑问首先是朝臣，其次才是托利党人。他们当中许多人无法忍受永远与官爵和名利无缘的前景。而且，沃波尔式的辉格主义并不很严格，其中许多人的家族过去曾站在托利党一边，但他们几乎轻而易举地就认同了辉格党的新原则。那些出于利益或本能自然向朝廷政治靠拢的人尤其如此。康沃尔郡的临近市镇在世纪之

初时曾为辉格党和托利党分踞，到18世纪30年代时，已全部成为辉格党的可靠地盘。尽管1712年时哈利曾使托利党成为了上议院的多数派，但上议院只有少数托利党贵族继续忠于他们在下议院中的朋友。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一下子发生的，而是稳步和持续出现的，而且18世纪最重要的一些政治人物，包括皮特和福克斯家族都牵涉其中。

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事态发展与此有些类似。让苏格兰政治家进入威斯敏斯特〔23〕的举措为他们开辟了新的庇护领域。同时也有效地激励了伦敦的政治家对他们出手相助。这样，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辉格党人都能从中得益。爱尔兰虽没有失去自己的议会，但实际上很少能挑战威斯敏斯特的最高权威。伦敦和都柏林的国王拥护者们大多时候能够协调合作。在爱尔兰，大多维系政府顺利运转的赞助费用出自爱尔兰人自己。苏格兰的情况和爱尔兰的情况还有其他一些差别。在苏格兰，最具威胁性的怨恨情绪来自被挫败的詹姆士二世党人。而在爱尔兰，虽然被疏离的天主教农民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新教徒，但心存怨恨的其实是那些心怀不满的辉格“爱国者”。

沃波尔和佩勒姆执政时的政治稳定局面是汉诺威体制的一个主要成就，但也不能言过其实。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的政治并没有落到波澜不兴的地步，尽管人们通常这样认为。汉诺威王朝支持辉格主义，尽管这种主义有些软弱无力，这样做的代价是永远疏离死硬的“地方”托利党家族。这些家族虽然很少培养出一流政治家，但一直保持着某种在野党的活力，并成为其他潜在敌对力量的核心。他们让那些改变立场的同党的日子很不好过。例如，当他们的一位贵族领袖高尔伯爵〔24〕加入亨利·佩勒姆的阵营后，1747年的大选在高尔的家乡斯塔福德郡就造成了几乎空前的骚乱。事实上，托利党在各郡都有自己的据点。在那些享有40先令终身不动产的选民中，尤其在英格兰中部诸郡、西南部诸郡以及威尔士，他们得到了一贯的，甚至是越来越多的支持。在其他地区，他们即使不占优势也很有影响力。英国教会的托利主义在辉格党持续不断的徇私舞弊行为影响下注定要被削弱，但教会最大的神学院之一，牛津大学，始终忠于英国国教，而且托利党家族有着足够的教会庇护来维持其强有力的影响。在许多城市中也蕴藏

着有可能反对当时政权的潜在力量。例如，在伦敦、布里斯托尔、诺维奇和纽卡斯尔，都有民众参与政治的悠久传统，还有许多托利党煽动者可以利用的导火索。沃波尔体制的基础非常广泛，不能将之视为狭隘的寡头政治，但是如果一大部分地主和教士阶层以及城镇中大量中层和下层民众都反对它，那么当时的稳定局面可能只是徒有其表。

图3　宗教自由主义式的办学。这是剑桥郡巴勒·格林镇的一所典型慈善学校，于1708年由该村镇的教区长创建，提供校长的膳宿。校长按要求应当“勤勉并如实地教授巴勒·格林镇最贫穷的孩子以及其他居民阅读《圣经》、写一手好字和学会算术”。

政权面临危险

很自然，只有当政权本身分裂了，才具备爆发真正危机的条件。18世纪30年代初期，朝廷中出现了一个由沃波尔对手组成的危险联盟与沃波尔对峙。众所周知，沃波尔曾企图扩展其消费税制度，这个计

划在财政上是合理的，但在众多厌恶新税收和惧怕政府官僚机构扩大的英国人当中却激起了最深、最强烈的反感，这便使沃波尔的对手有机可乘。沃波尔不得不在1733年决定撤销其计划，[25] 再加上乔治二世坚决支持他、反对其朝中的对手，这才保住了他的政权。即便如此，1734年的大选仍引起了对他的广泛反对，并严重地削弱了他在下议院的多数优势。

四年后出现了甚至更加严峻的局势。1738和1739年间出现了一种鼓动对外扩张的、势头强劲的煽动言论，要求对西班牙帝国采取进攻性姿态，这种煽动因得到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26] 的支持而愈加危险。随之形成了由遭疏离的托利党人、心存不满的辉格党人、怀有敌意的商人、有公众影响力的政客以及王位继承人组成的联盟。这个联盟的确很危险，它最终不仅迫使沃波尔进行了一场令他深恶痛绝的战争，甚至导致了他于1742年下台。期待权益问题[27] 特别令人不安；它后来也给佩勒姆带来了相同的问题，直到1751年弗雷德里克去世。

即使没有这些内部压力，辉格党的至高权威也遭到了极大反对。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威胁很可能被夸大了；那些曾为“海峡对岸的国王”[28] 举杯祝福的人当中是否真有很多会为了斯图亚特王朝而拿自己的财产或性命去冒险，恐怕还很难说。他们的抗议用的是象征性的酒杯和盾牌，而不是步枪和刺刀。不过，他们当中一些更忠心的人得到了一定的鼓励。英国参与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年），不只是在海外反对西班牙，而且还在欧洲大陆反对强大的波旁家族联盟。在这场战争中，乔治二世主要关注的似乎是保护其热爱的选帝侯领地；由此他与国内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尤其是把英国的钱财和英国人的鲜血投洒到德国和荷兰的做法更是不得人心，给了爱国的政治家们大量的把柄来攻击当时的政权。

沃波尔很久以前曾预言，战争将意味着在英国土地上争夺英国王位继承权，事实证明的确如此。1745年詹姆士二世党人侵入，给汉诺威王朝造成了全面威胁。按照欧洲的标准，英国的常备军规模很小；1745年12月小僭君带领一小支胡乱拼凑起的部队深入英国中部腹

地，即便这样一支队伍也使防御者们精疲力竭。由于没有托利党的支持，政府早已放弃了有战斗力的民兵力量，许多乡绅至多也是不很情愿地表示中立。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军队被击退并最终在卡伦顿被镇压，之后对苏格兰高地地区展开的凶猛而恐怖的清剿说明了伦敦当局有多么担忧，多么恐慌。从这些方面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来看，1745年的危机有助于纠正一些关于辉格政府对自己甚为满意之类的过分平和的描绘。惯常所见的政治上冷漠和贵族式优雅的画面可能会误导人。它与1745年叛乱者杂乱但却血腥的造反情形很不相符，即使18世纪50年代初相对安静的年月也不完全是平和的。例如，尽管佩勒姆曾用机敏高超的手段引导其国家安全但也许有些不光彩地走出了战争，并凭其财务方面的聪明才智降低了国债所面临的风险，但是事实证明他也会错误判断政治气候。他于1753年出台的《犹太法案》（Jew Bill）旨在缓解英国犹太社区一些公民权利被剥夺的状况，但却引发了高教会派的敌视和抵制浪潮，结果他被迫放弃了这项得罪人的措施，以免在1754年大选中为此而尝苦果。再者，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威胁和征讨还远未结束。一直到1753年，伦敦仍在津津乐道一个詹姆士二世党的叛乱者被当众绞死的场面。毫无疑问，18世纪的政治在某些方面是较为温和，但并不总是如此。

注释

〔1〕 罗宾是罗伯特·沃波尔的昵称。

〔2〕 为了感谢帮助他登基的辉格党，乔治一世登基后解散了托利政府，起用辉格党组阁。辉格党当权后马上开始弹劾前托利内阁成员，党派争斗变得激烈起来。

〔3〕 辉格党政府为了保证继续执政，就立了这个法，废掉了原有的《三年法案》，把当时的议会任期延长为七年。

〔4〕 “长议会”指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查理一世在解散了1640年成立的议会后，出于对苏格兰开战的募款需要又于同年召集的议会。被查理解散的寿命不到一年的议会叫“短议会”，而后召集的这个议会持续到1653年，因此得名“长议会”。

〔5〕 “退休金领养者议会”指查理二世复辟后解散了“特别议会”，于1661

年召开了新一届议会，其议员大多是保王党分子，很多都上了年纪，或者是退伍军人，因此得名“骑士议会”，又称“退休金领养者议会”。

〔6〕 安妮女王时第一届托利议会的下议院提出了《偶尔遵奉国教法》，为的是应对《宗教考查法》，给非国教信仰者提供遵从双重标准的可乘之机。

〔7〕 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诺福克郡世袭辉格大家族之子，在安妮女王时就担任议员和政府官员，到乔治二世时期他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

〔8〕 查尔斯·汤森（Charles Townshend，1675—1738），政界人士。安妮女王时他曾参与英格兰与苏格兰成立联合王国的协商，1715年镇压了詹姆士二世党人叛乱，并带头迫害失利的托利党人，与沃波尔长期合作。

〔9〕 查尔斯·斯潘塞·森德兰（Charles Spencer Sunderland，1674—1722），政界人士。他是辉格党主将，1708—1710年间主持党务。1710年辉格失利，他也随之倒台。但1718—1721年间，在乔治一世治下他又回到政府并任要职。

〔10〕 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Thomas Parker，1st Earl of Macclesfield，1666—1732）的名字是托马斯·帕克。他于1725年被判罪，送进了伦敦塔，后通过付30,000英镑赎金被释放。

〔11〕 这里指的就是1737年通过的《许可证法案》（The Licensing Act）。菲尔丁的剧团就因此解散。参见此处。

〔12〕 约翰·盖伊（John Gay，1685—1732），作家，蒲柏和斯威夫特的好友，著有诗歌、寓言等，但最知名的作品就是《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

〔13〕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著名小说家，著有《约瑟夫·安德鲁斯传》、《弃儿汤姆·琼斯传》等小说。这里提到的把乔纳森·怀尔德与罗伯特·沃波尔作比较是他的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The Life and Death of Jonathan Wild the Great*，1743）。

〔14〕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诗人，18世纪英国新古典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他在英雄双韵体诗歌创作方面成就斐然，达到了这类诗歌的顶峰。

〔15〕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讽刺散文大师和小说家，著有不少政论性散文。他最知名的作品是《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

〔16〕 亨利·圣约翰·博林布鲁克（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1678—1751），子爵，下议院议员。《手艺人》（*The Craftsman*）是1726年由尼古拉斯·阿默斯特（Nicholas Amhurst）创办的一份杂志。博林布鲁克从1730年5月至

1731年负责编写该杂志的“英国历史评论”（Remarks upon the History of England）栏目，还于1733年发表了名为《论党派》（*Dissertation upon Parties*）的文章。

〔17〕 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画家和雕刻家。他在19世纪得到的评价比18世纪更高。

〔18〕 “人山”（the Man Mountain）是斯威夫特寓言小说《格利佛游记》第一卷中小人国上下对格利佛的称呼。

〔19〕 萨沃伊（Savoy）是伦敦一个剧场的名字。

〔20〕 帕里努儒斯（Palinurus），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他的故事见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

〔21〕 墨林（Merlin）是《亚瑟王传奇》中的巫师和魔术师。

〔22〕 约翰·赫维（John Hervey, 1696—1743），政客和作家，著有《乔治二世王朝回忆录》（*Memoirs of the Reign of George II*），对后世认识18世纪具有重要意义。

〔23〕 指伦敦英国议院或政府。

〔24〕 约翰·勒维森-高尔（John Leveson-Gower, 1st Earl Gower, 1694—1754），曾是托利议员，后改变了立场。

〔25〕 这里指的是Excise Bill，用来阻止当时严重的走私活动。由于引起了强烈反对而被迫于1733年撤销。

〔26〕 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Louis, Prince of Wales, 1707—1751），威尔士亲王，乔治二世的长子。他反对沃波尔，是他与乔治二世的争吵最终决定了1742年沃波尔的下台。

〔27〕 the reversionary interest是个法律术语，但在18世纪它有特殊含义。在18世纪这个词牵涉到托利和辉格两派中一派得到国王支持，另一派就支持王位继承人，以期望将来得益。这里指的是国王和沃波尔的反对派支持弗雷德里克亲王，期望亲王继位后得到权力和好处。在这一具体情况下，the reversionary interest译成“期待权益”比较贴切，它是到18世纪中后期才凸显的现象。本书此处谈到老皮特搞两党平衡时再次使用了这个词。

〔28〕 即居住在法国的安妮女王的弟弟詹姆士三世。

第三章

工业和赋闲

詹姆士二世党人垂死挣扎之时也恰好是工业化之前的社会消亡之时。根据较早的记述，被称作工业革命的巨大经济发展和变革开始于18世纪中叶。但这个事后看来似乎为工业腾飞提供了平台的时期在当时却被普遍视为令人担忧的衰退时期。如何评价这个时期，现在仍存有争议未决的问题。

18世纪30和40年代，农产品价格格外低；一些重要的工业区，特别是老的纺织中心，遭受严重失业和动乱的影响。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前景较好的发展势头。食品价格低廉使得人们能够将更多的开支用于消费品，由此刺激了更新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即便农业经常会受到这些低价格的抑制，它也会受其刺激而增加产量。例如，东英吉利亚（East Anglia）的情况便是如此。改良过的混合耕作技术通常与“芜菁汤森”[1] 时代联系在一起，它们其实并非这个时期所专有，但此时其重要性肯定得到了更广泛的重视。

收税路

在其他行业也有了非常显著的进步。例如，18世纪30年代取得了运输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进展之一——建立了全国范围的收税路体制。1730年以前，只成立了少数收税路托拉斯。多数主要道路，包括北安普顿郡外的大北路和几乎整条大西路的养护都依赖碰巧位于附近的那些倒霉的教区。乔治王朝初期，由于客流量迅速增加以及主要消费中心之间的货运服务越来越繁重，英国的道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时的道路状况确实让国家很丢脸。收税路托拉斯也许不总是受欢迎，但却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有一个分级慎密的通行费征收制度作保障，可以把在地方上筹集的大量资金用于道路维修和养护。

这个世纪中间的40年是这些托拉斯的全盛时期。它们有力地证明了大都市以外地区的活力，英格兰北部和中西部修建了大量新道路。到1770年时，运河开始拼命争抢货运业务，它们提供了一个相对高效

的真正全国性的运输网络，对旅程所耗时间的影响十分巨大。在18世纪20年代，从伦敦前往约克、曼彻斯特和埃克塞特等郡府需要远远不止3天的时间；而到1780年时，24小时左右便可抵达这些郡府。由于几乎所有重要的道路都这样竭力缩短运输时间，当时的运输在技术利用方面似乎已达到了极限，之后一段时期未见太多提高，直到1820年左右由于约翰·麦克亚当〔2〕和托马斯·泰尔福特〔3〕的功劳，旅途所用时间才再次被大大缩短。

如果不是内陆消费、贸易和资本大大扩展，收税路也不可能有此发展。但是，这些年英国在海外的扩张一点也不比国内的发展逊色。在这方面，当时的表面现象也可能会迷惑人。爱国政治家们继续在公众面前坚持本质上已陈旧的帝国观念。人们仍然倾向于把殖民地主要视为原材料的宝贵来源地、过剩人口的倾卸地或者是增加国家金银储备的手段。西印度群岛被称作是帝国王冠上的宝石，那里有蔗糖种植园；1739年的英西战争与此前的战争一样，被认为是为了闯入南美的黄金国，人们想象着那里有诱人的金银和热带产品。但事后看来，英国当时的海外贸易格局显然正在朝着一个全新帝国的方向转变。欧洲之外出现了越来越多异常活跃的出口市场，尤其是在北美洲。纺织品这种主要的传统商品因这种方向的改变而受益。但是，更加显著的增长势头出现在一些新兴的制造业中，尤其是在与金属工业相关的制造业中，在家用商品、工具、武器以及各种器皿生产方面。总之，对“伯明翰产品”的需求在激增。

地图1　1741年收税路网络

地图2　1770年收税路网络

重商主义的理论能够变通来适应这些新趋势，但当时的人们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清楚理解这一进程。到18世纪50年代，十三个美洲殖民地的重要性开始得到足够的重视，商人和行政官员都开始将目光转向与法国争夺北大西洋地区的统治地位。战略重点的改变对国内环境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乔治王朝时期伦敦的发展十分迅速，并已毫无争议

地成为了当时西方世界里最大、最活跃的城市。但事实是，严格地从比较角度来看，伦敦并没有那么重要。在美洲兴起的新贸易一大部分流向了西部一些新兴或正在扩大的港口城市，主要是利物浦、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等，怀特黑文在短期内商业活动也曾非常活跃。这些港口的外围地区，即塞文河谷和中西部地区、约克郡和兰开夏地区，以及苏格兰西部地区的发达，正毫无疑问地在将英国的工业基地由南部、东部和西部移向北部和中部地区。

人口和经济的增长

这种转移可以从这个时期人口的变化趋势中清楚地看出来。18世纪20年代的灾难过后，人口又开始回升，尽管18世纪30年代的增长幅度非常缓慢。1750年提议进行的人口普查夭折了，否则统计出的人口总数很可能为580万左右，比20年前多50万。1770年时人口约为640万，1790年时接近800万。按19世纪的标准看，这个增长速度并不惊人，不过这仍是现代人口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工业和城市总的发展情况可以说也基本如此。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一直不断有重要的创新发明和新兴企业出现。但是在亚伯拉罕·达比〔4〕时代和乔赛亚·韦奇伍德〔5〕时代之间仍存在极大差异。在这方面，18世纪中叶再一次成为分水岭。人们所熟悉的工业革命早期的巨头，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塞缪尔·加贝特、理查德·阿克赖特以及韦奇伍德本人，〔6〕在18世纪60和70年代里深刻地影响了民族意识。到18世纪60年代初七年战争爆发之时，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诸如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等地出现的新发展是多么振奋人心。

城市进步本身也反映了经济的增长以及人们对这种增长的普遍兴趣。当时一些能记得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状况并一直活到18世纪最后25年的人都把18世纪60和70年代看作是城市，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一些较小城镇，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生巨大变化和改善的时代。这主要是指空间、卫生和秩序上的变化。不断向外扩展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

广受游客的称赞，因为它们有宽阔的广场和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和大货栈。相比之下，老商业中心则景象杂乱，狭窄的街道和用木料加茅草盖成的房屋看上去显得过时甚至原始。任何一个城镇，只要有自尊心和荣誉感，都会抓住机会获得议会批准来成立一个具有大规模重建权力的改良委员会。今天许多维护得较好的城镇都应将其良好的形象归功于这个时期对城市的重建。在富有想象力的城市规划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实例也许要数英格兰与苏格兰边界以北的地区；爱丁堡的新城至今仍在证明着这个城市的先辈们在这方面的魄力。

位于英国南部的首都也不甘落后。作为一次象征性的，同时也是实实在在的现代化行动，伦敦于1761年摧毁了商业中心区的那些中世纪城门。其中的卢德门，就在距当时不到30年以前曾被人们信心十足地加以修复和装饰过，准备再使用数百年。附近的威斯敏斯特区几乎同时于1762年开始了独一无二的最大城市重建项目。威斯敏斯特铺路委员会的委员们与他们在各教区的合作者意图让首都一大片地区旧貌换新颜。在那里大面积铺设或重新设计了下水道和供水主管道，并用鹅卵石铺砌街道和人行道，其中许多是第一次铺砌。广场得到清理和整修，并用各种各样的雕像和花草加以装饰。房屋被系统地编号；老旧的招牌五颜六色但很笨重，甚至对过路者有危险，于是都被清除掉。到18世纪80年代时，首都的外观，除贫民窟外，令其市民感到骄傲，也让游客，特别是外国游客感到惊叹。

变化并不局限于城市和市镇。村庄建筑的变化多是渐进式的，但土地本身正在呈现新的格局。议会的一系列圈地法案是农业革命最昭著的表征，这些法案主要集中在18世纪下半期。它们带来的经济影响可能被夸大了，因为从统计上看，它们并不比已经悄然进行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非议会圈地运动更重要；而且这种圈地主要是英格兰南部和西部从约克郡到格洛斯特郡这一地带的特征。但是，作为贫瘠和可改造土地上的农业可盈利的标志，它们是有力的证据，而且它们对地貌的影响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1776年亚当·斯密[7]发表《国富论》时，议会圈地法案对经济持续增长表现出了一种近乎于自负的信心。奇怪的是，亚当·斯密本人并不是那么有信心。不过，斯

密是个学者，他的作品基本是理论性的，而不是对实际的观察，而且这部作品的大部分是在18世纪60和70年代的大发展出现之前构思的。在这方面，他的同乡约翰·坎贝尔 [8] 则是一位更有信心的指导者，他的《政治调查》（1774）一书公开颂扬了英国的经济发展。

社会变化

物质增长的步伐越来越快，对英国社会的性质也产生了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结果与此前的商业多样化和资本主义普遍发展所表明的趋势是一致的。在社会结构方面，可以说主要影响是拉大了社会等级差距。财富分配极不均衡，而且税收的水平和性质几乎无助于这些财富的再分配，社会中层和上层的实际生活水准的提高幅度明显要比社会底层大许多。

这并不是全新的现象。例如，在16和17世纪，农业发展已经显著改变了典型的农村社会结构。圈地、垄断式收购和整体上的改良正逐步将以小资产者、世袭地继承者或为热衷于老英格兰的人所喜爱的自耕农为特征的村落，变成某种全新的东西。农村地区正逐渐被殷实的资本主义化的农场主所统治，他们通常是大地主的土地租用人，本身不是土地所有者，所有在他们之下的人正日益沦为无土地的劳动者。这一进程有时被夸大其词了，这种情况是否真会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条件。但这一进程在18世纪肯定加快了。而最重要的是，在工业和城市发展方面也出现了极其相似的情况。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18世纪的英国正在逐步走向一个更加两极化的社会。

更糟的是，两极分化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远远要更加明显。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更不要说当时总体识字水平和通信能力的大大提高，使得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照更加鲜明，令人担忧。统治阶层生活奢侈，大肆铺张浪费，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上升得虽不很快，但累积起来影响更大。这些都使一个以金钱为基础的高度商业化社会的不平等现象鲜明而刺眼。这种疾患，如果确实是一种疾患的话，在首都表现最明

显。在伦敦，由于相对缺乏已牢固确立的社会约束和习俗，可怜的穷人总是能近距离地接触到舒适的中产阶级乃至巨富阶层但却无利可图，这必然引发我们在菲尔丁和贺加斯作品中看到的那种道德愤怒和社会批判。

对这方面的关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生活水准的恶化，很难判断。1750年以前，食品价格极低，加上人口相对无变化且工资稳定，穷人的实际所得很可能有所增加。当时伦敦人特别嗜爱杜松子酒，这带来了严重问题；而较穷的人则特别喜爱饮茶，这虽没那么大破坏性，但在当时也同样遭到批评。尽管如此，这些都至少表明当时人们不缺钱花。但是，世纪中叶以后，许多人的状况似乎恶化了。他们重新回到了先前那种收成一般甚至不足的状况，外加工业经济不时衰退并导致失业，底层人们的生活就变得窘迫而悲惨。此外，人口的迅速增长，加上机械革新，致使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也使得地位低下的新兴无产者无法分享工业大发展带来的好处。

不满情绪

18世纪对社会问题的敏感程度比有时看似的要高，不过这些社会问题并没有简单或全面的解决办法。贫民自己进行了反击，主要靠传统的武器来维护陷入四面楚歌的经济秩序。他们求助于限制中间商和垄断的古老法律来对抗匮乏和高价格。他们结成联盟来挫败其雇主，组织互助会以提供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险，由此抵制工资的削减和机器的引进。在极端情况下，他们会时常起来造反和制造骚乱。

虽然贫民不是没取得过胜利，但这注定是场要失败的斗争。民众对富有的商业中间商的所作所为的怨恨虽然得到了地主阶级一定的同情，但发展一个专门市场来销售日益改良的农业所提供的产品对地主与对粮食商来说同样重要。在陈腐过时的工业关系机制方面情况也是类似：由于拥有资本的生产商和非熟练工人的共同欺骗，企图贯彻实施原有《学徒法》的努力根本无效。即使成功实施这类限制性措施的

公司也只能做到保证不参与新的投资和新工业。各种行会受到的待遇更为简慢。纯粹旨在提供养老金和疾病补助的互助会得到上层社会的鼓励，但联合会（或工会）经常遭到镇压，即使它们反对的是18世纪雇主较明显的不公正做法，如在英格兰西南部诸郡的服装工业中采取的实物工资制等。联合会有时也会成功，例如伦敦成衣业或皇家造船厂的工会运动，这要归功于地位已稳固的工业集团的决心。在大多数新兴工业中，都是雇主获得彻底的胜利。

从某些方面说，下层阶级不满情绪的最极端表现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宽容，这无疑是因为家长式的统治者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遗憾但却必要的安全阀。政府很少采取过分的措施来镇压暴动，而且只对其中少数人进行惩戒性的处罚。即便那样，只要挑衅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就算看上去非常极端，处罚也都往往轻得令人吃惊。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多半时间里选举骚乱可以说几乎不可避免。像考文垂这样一个喧嚣的城镇拥有广大的选民，而且无选举权的人也积极参与，每次选举必然会发生骚乱。反复发生的粮食暴乱与18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的饥荒有关，也被当作是乡村生活一个令人不快但多少必要的方面。在一定限度内，当局对这类事件广泛采取了宽容态度。例如，1765年，伦敦斯皮特尔菲尔兹的缫丝工人认为贝德福德公爵支持进口法国丝绸使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因而暴怒，全面围困贝德福德府邸。暴乱严重到足以动用军队的地步，但就连伦敦上流社会也认为把这当作一种有趣的消遣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值得人们从旁观者的立场对它进行审视。

执意坚持当然就可能会带来更严厉的后果。18世纪30年代反收税路最初的暴乱得到了相对宽容的对待，甚至有些有产阶级还暗暗给予鼓励，因为他们与比自己地位低的同胞门一样厌恶通行费。但是，随后便不可避免地招致了惩戒性判决。而且，从18世纪60年代起，有迹象表明当局对民众骚乱的态度有所改变。约翰·威尔克斯〔9〕为维护选举权和新闻自由而发起了持久而有争议的运动，引发了激烈的街头示威行动。随后群众以“威尔克斯与自由”之名同当局发生了冲突，造成了太大的政治影响，已无法让人熟视无睹。1780年由戈登〔10〕煽动的

反天主教暴乱第一次在伦敦制造了一种真正的恐怖状态，它标志着对待暴乱态度的转变进程中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只需等随后10年中的法国大革命来彻底摧毁旧的宽容态度，并在有产阶级头脑中形成民众暴乱为洪水猛兽的概念。

贫困和犯罪

最下层阶级人数不断增长及其生活日益贫困所造成的问题没有永久的解决办法。18世纪继续根据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和1662年的《定居法》来救济贫民。在最坏的情况下，一个贫困劳动者及其家人的生活水平可能与一个美洲奴隶或俄国农奴的水平相同，或许还不如他们。对贫民的救济可能包括由吝啬的邻里提供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或在济贫院短期逗留，结果可能遭遇一个残忍的主管，他通过一系列手段剥削其所照管的人来牟利。关于居留的法律规定凡是住在价值不足每年10英镑（这是一笔不小的数额）的房屋内的人必须居留在其出生地。

实际上，这些严厉的条例并没那么令人生畏。济贫支出是多数教区的一个主要开支项目，到18世纪末期时已经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它经常扩展到定期进行户外救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不断上涨的费用和生活水准。居留方面的法律只得到有限执行。不幸的是，这些法律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恰巧是这些人可能成为他们所要依附的教区的负担。但是即便如此，对搬迁的限制到该世纪下半叶时实际上已微不足道。如果真要认真执行这些限制规定，工业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也许就不能够得到满足了。

这个时代的有产阶级与其他时代的一样对贫民抱有明确的态度，但他们对犯罪的态度更加鲜明。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诱惑，且由于纵容违法行为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挑衅。历来最引人关注的是拦路抢劫等较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或是非法狩猎等在社会学方面极为有趣的犯罪行为。那些令道德家愤怒的人也令历史学家们感到

困惑。18世纪最初20年以及后来在80年代曾定期开展“改善举止”运动，发动中产阶级志愿者反对卖淫、酗酒、骂人和赌博。建立了各种教养机构，包括慈善学校、育婴堂（1739）和面向悔过妓女的妓女收容所（1758）。但是，绝大多数犯罪是某种形式的小偷小摸，是对财产私有价值的侵犯，而且似乎正在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特别是在城市地区。这种犯罪趋势无疑是被夸大了，但在这个时期，面对这种犯罪势头，财产的确未受到应有的保护。

城市犯罪迫切要求建立得力的警察队伍，以提高破案和定罪几率（而不是要求采取更温和的措施！）。但是，一支警察队伍可能会带来许多危险，尤其是它可能被用于政治庇护。而且，一支政府控制的组织有序的武装力量可能造成的持续威胁在当时被视为很严肃的问题。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应该在以最低限度保留一支常备军的同时去允许一种与军队同样邪恶的新队伍发展壮大。

结果，除了极少数和部分情况以外，如菲尔丁兄弟为维持伦敦秩序所做的努力，这个时期在此方面没有显著改善。相反，当局被迫重新采取严厉的威慑措施，即使是不太严重的违法行为也可能被处以流放或死刑。结果这个时期对轻罪处以死刑的现象激增，对此，19世纪初期的改革者们曾严词谴责。但这似乎是阻止侵犯财产罪行的唯一合理办法。不过，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也是不击自溃的。因为，除非案情非常清楚，否则陪审团不愿定罪，法官也不愿判刑。与实际犯罪数量相比，定罪的数量很少。即使已经宣布死刑判决，也极有可能应法官或应一位有权势庇护人的要求而得到缓期执行。这样，司法程序在这个时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政策矛盾和政治操纵的混乱局面。

教会

如果说贫民对国家的指望是徒劳的，那么他们指望教会希望也很渺茫。18世纪的英国教会在我们今天称作的社会政策方面名声欠佳。它牢牢固守乔治王朝时期的庇护人制度，很难期望它对当时盛行的观

点系统地提出挑战。但是，它也并不完全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差。18世纪的大量慈善行为有时会被遗忘。这可能主要是因为这种慈善绝大部分是自愿和非正式的，不像后来或者甚至早些时候进行慈善活动时有官方或国家的公文，所以18世纪的慈善活动很容易就在人们眼前消失了。然而，在捐赠和一大批教育、卫生和娱乐机构的维持方面，其记录是相当惊人的。慈善活动常以一副优越屈尊的姿态出现，其部分动机是急于控制贫困无着的民众给社会和政治带来的威胁。但这种做法在其他时期也同样很典型，而且数量也都令人吃惊。这个时期慈善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捐款和成立社团——修建学校、向医院捐赠、成立济贫院、监督福利团体。在这方面英国教会，或不如说各礼拜堂，都大力参与。而遭到后来改革者谴责的英国国教中的显要人物——其主教、副主教、教长和大教堂教士们也并非最不积极。

然而，在18世纪关于教会的地位问题存在着某种自相矛盾。在这个世纪初期的“自然”神论影响下，宗教越来越强调善行而不是信仰。基督徒是那些行为举止像基督徒的人，宗教虔诚的最明显表现是慈善行为。但是理性的宗教不管怎么慈善，也无法给予那些缺乏教育或领悟力的人很多精神抚慰。在自由主义宗教趋势的影响下，所有主要礼拜堂的精神力量明显衰减。由于自然神论者对三位一体学说提出挑战，神学方面出现紧张局面，为此主要的非国教信奉派在大众生活中的影响力明显减弱，至少在当时退回到了历来支持它的城市中产阶级当中。农村地区的教会继续着其没有太多章法而且也不固定的工作，像以往一样取决于当地是否有神职人员以及这些人是否愿意无私奉献。城镇中的教会则极力倾向于将活动范围回缩到，或倾向于像非国教信奉者那样求助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教众，这些人有能力补贴穷困城镇教士的俸金以及装饰或重建礼拜堂。

图4　悠闲的贵妇们。18世纪末的讽刺作家被妇女的优裕及其潜在的独立性所吸引。约翰·科利特（John　Collet）的大众文化研究（上图和背面的图）强调了某些上流社会女子的活动不像是淑女该参加的。

循道宗 [11]

结果只有让英国教会的反叛之女，循道宗运动，来为穷人今世所受的苦难提供来世的补偿。卫斯理的循道宗教义错综复杂，因此很难泛泛谈论其重要性。约翰·卫斯理本人是牛津大学高教会派观点和反启蒙政治学的知名学者。 [12]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他的影响似乎体现了某种17世纪清教徒的精神。他自己的精神之旅是狂风暴雨式的，

可以说是轻率和任性的。但他赠予其追随者的严格组织性和纪律性却接近于专制。

从神学上来讲，卫斯理是个阿米尼乌斯派〔13〕教徒；但是，加尔文主义对循道宗运动具有深远影响。事实上，卫斯理在该领域的前驱是威尔士的格里菲斯·琼斯和豪威尔·哈里斯以及英格兰的乔治·怀特菲尔德等加尔文主义信徒。〔14〕对其敌人来说，所有这些人似乎都是危险的甚至会煽动叛乱的人物。露天布道可以说是对教区教士独霸布道坛的公开冲击；按世俗权威的观点，卫斯理乐于向所有阶层的人传播其救世福音的做法令所有乡绅和郡选议员不寒而栗。然而，其政治观点确是专制性的，没有对社会秩序提出挑战。他和他的追随者们自始至终唯一关心的一点是：是否能让所有人，尤其是让穷人，让英国采矿和制造业中那些被抛弃、被更入时的神职人员所忽视的社区都能获得福音传道者的救助。他的成就有可能被夸大了，因为到他死时，坚定的循道宗信徒可能也未超过7－8万。但是，其动荡不安的生活和四处游历布道所引起的忧虑和争议表明了他对乔治王朝时代社会的影响力度。循道宗信徒常被指责犯有数不清的罪过，其中有些指责彼此矛盾。他们的传道士既是天主教徒又是清教徒，既是詹姆士二世党人又是共和党人。他们或让家庭主妇心旌摇曳或鼓动她们放弃一切肉体享乐；他们或垂涎他人的财产或不准许人们享用尘世财产。对循道宗教义的指控也多种多样，这清楚表明卫斯理触及了当时人们良知的痛处，并暴露了当时信仰中令人尴尬的缺陷。

注释

〔1〕 18世纪30年代，汤森勋爵把三叶草和芜菁引入大田，改三轮制为四轮制，开始农业革命，他因此获得了“芜菁汤森”的称号。

〔2〕 约翰·麦克亚当（John McAdam, 1756—1836）是碎石路发明者。

〔3〕 托马斯·泰尔福特（Thomas Telford, 1757—1834）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桥工程师之一，一生设计建造了许多桥梁和道路。

〔4〕 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 1678—1717）发明了焦炭炼铁法。

〔5〕 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 1730—1795）被誉为“英国陶瓷之父”。

〔6〕 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 1728—1809），工程师和制造商，与瓦特合作制造蒸汽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是苏格兰发明家，发明了蒸汽机；塞缪尔·加贝特（Samuel Garbett, 1717—1803）是铸铁和金属冶炼巨头；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 1732—1792）发明水力纺纱机，并开设了多处纺织场，变得十分富有，成为工业革命的先驱人物，因此获得爵位。

〔7〕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知名苏格兰思想家和政治经济学家。

〔8〕 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 1696—1782），伯爵，政客和外交家，在沃波尔政府中任职，曾出使丹麦和俄国，后担任苏格兰在议会的贵族代表等职位。

〔9〕 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 1727—1797），议会议员，在《北不列颠人》（*The North Briton*）中攻击了乔治三世1763年3月在议会的讲演，指责其为谎言。为此他被政府越权送进伦敦塔。当被依照法律释放后，他立刻以妨碍人身罪控告国务大臣，最后赢得了官司。此后围绕他回归议会和当选议员的问题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斗争。

〔10〕 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 1751—1793）是新教协会的会长，他的活动导致了1780年6月的暴乱，示威者抵制政府取消对天主教徒公民权方面的限制。有大约800人在这次暴乱中受伤和死亡，21名肇事者被处死刑。戈登本人被辩护律师以没有直接介入这次事件为由救了下来。

〔11〕 另一个常用的译法是“卫理公会”。

〔12〕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在牛津就读时就开始组织包括他弟弟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在内的宗教团体，强调自省和自律。他于1738年在布里斯托尔开办了循道宗教堂，并巡游英国布道。但循道宗真正大规模发展是在他们兄弟去美国之后。

〔13〕 Arminian这个词来自主张宗教改革的荷兰神学家阿米尼乌斯（Jacobus Arminius, 1560—1609）。他的原名是雅各布·哈门森（Jacob Harmensen），于1603年起任莱顿大学的神学教授。他的神学理论被称为Arminianisn。

〔14〕 格里菲斯·琼斯（Griffith Jones, 1683—1761），兰道罗尔教区牧师（rector of Llandowror），福音教士，用乞讨的钱办学来解决威尔士的文盲问题，被认为是现代威尔士的奠基人之一；豪威尔·哈里斯（Howell Harris, 1714—1773），信仰加尔文主义，后成为威尔士主要循道宗领袖之一；乔治·怀特菲尔德

（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福音教士，卫斯理的积极拥护者。他的布道很吸引人。他于1741年前后脱离了卫斯理兄弟，成为威尔士循道宗领袖。

第四章

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

循道宗运动发展初期的历史肯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当时社会关系相当紧张，存在着大量问题。但这有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举例说，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英国社会避免了最糟糕的极端情况。令外国人深有感触的是英国社会结构的灵活和紧凑，而不是其紧张和僵化。

一些相继来访的法国人，从伏尔泰到格罗斯雷修士[1]，都在其作品中证明这个国家没有“等级制度”，尤其是人们可以自在地上下于社会阶梯。特别令他们称道的是，这里的贵族没有欧洲大陆贵族所享有的那种特权和优势。贵族也许可以由上议院审判，但一旦被判处了绞刑，就会与普通罪犯一样被当众处死。1760年费尔斯伯爵因谋杀其仆人而被处死，舆论普遍认为他的命运清楚地证明了在犯罪和死亡问题上英国法律一视同仁。在一个不太紧要但也许意义同样重大的问题上，格罗斯雷惊讶地发现，新收税路的通行费针对所有人，不论其等级如何，而且对贵族也没有减免。此外，英国城市贫民所面临的生活水平下降和物资匮乏状况似乎远远好于法国或德国农民的状况。英国的体力劳动者（必须承认评论家通常指的是伦敦的体力劳动者）工资似乎不低，吃得也不错，特别独立而且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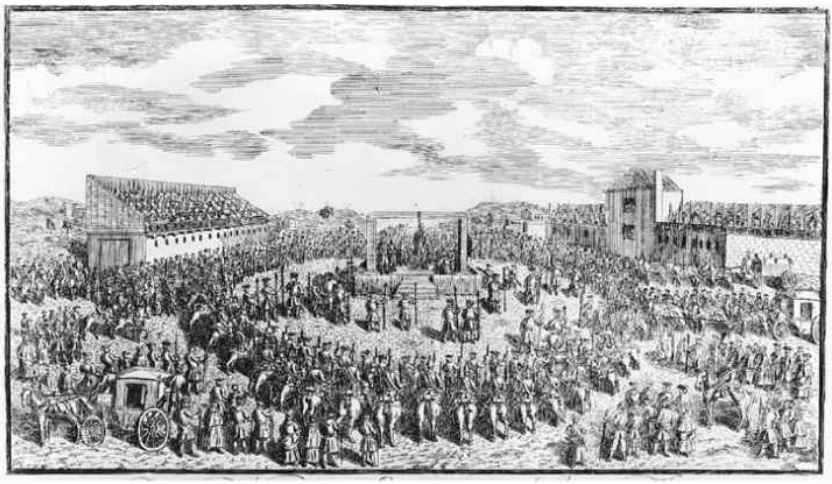

图5　绞刑架的阴影。被判犯有谋杀罪的贵族费尔斯伯爵遭遇了与普通罪犯相同的命运：在泰伯恩行刑场被公开处决，其尸体被解剖以支持医学事业并以示惩戒。

最重要的也许是外国人所强调的那种对英国绅士的灵活定义。任

何人似乎只要穿得像个绅士便被当作绅士一样对待。伦敦中产阶级乃至下层人都模仿上流社会的时尚、举止和观点。这显然便是一个金钱至上社会的真正标志，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价值观、社会差异和习俗统统让位给至尊无上的金钱。英国是18世纪欧洲富豪统治社会的一个突出例证。

财产与阶级

这种富豪统治的性质为解释这个时期的社会稳定状况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表面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财产所有权的基本结构在发生剧烈变化。没有看到中产阶级将资本大量集中投入地产，也没有看到拥有土地的贵族或地主被大量剥夺财产。小的职业或商业家庭被稳步吸收进来，逐渐改变了拥有地产的阶层的确切构成，而没有对其总体特性产生显著影响。

至于社会的更高阶层，在18世纪，大地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但是土地只是一种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财产形式。从这个世纪一开始土地的首要地位就在不断弱化。光荣革命时期国家收入概算表明，农业创造的收入将近占总收入的一半，但是这一比例在变化，到1780年时，很可能已降到三分之一。

实际上，土地本身只是英国经济普遍商业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在土地开发和改良过程中，越来越将土地视为一种投资，与对股票、贸易和制造业的投资完全一样。显而易见的是，尽管暂时的农业衰退对贸易没有什么影响，但反之则不然；商业不景气对土地价格的影响极其严重。美洲战争期间，当海外贸易遭受惨重损失时，其影响立即反映在了财产价值上，同时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果地产阶级拥有的非土地财产的比例再大一些，则情况可能会非常不同。但无论他们在某些领域，如采矿权和政府公债方面，有多重要，他们显然没有占有较大部分非土地财产。工业资本、个人财富以及贸易余额这些动产绝大多数为广大的中产阶级所拥有。国家经济的活力和增长都主要依

赖他们；而且深为外国人所羡慕的社会灵活性和稳定性也有赖于他们。

图6 “时髦社会”。这幅1777年的漫画嘲讽了中产阶级妇女对法国时尚的狂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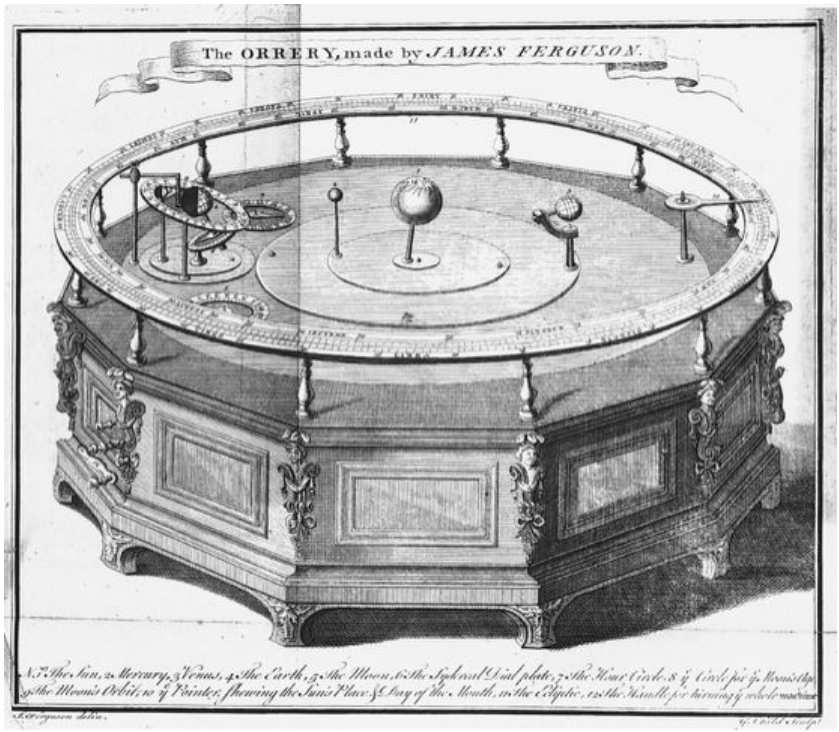

图7　外行人的科学。（上图）：当时的一幅印刷品展示了科学讲演者、作家詹姆斯·弗格森用以演示行星运动情形的太阳系仪。弗格森的讲座在18世纪50年代让各郡和大都市的中产阶级听众都很着迷。“太阳系仪”这幅画（背面的图）由德比的约瑟夫·赖特绘制，他既是科学主题的热心诠释者，也是利奇菲尔德业余科学爱好者社团中的成员。

当然，中产阶级或“中等的一类人”自我的社会认同意识并不强，归类标准也不是特别一致，在财富的形式和从事的活动方面始终是形形色色的。从拥有大量商业财富并控制着首都的城市老板到相距甚远的小零售商或工匠都属于此，后者代表了商业英国这个新“店主之国”的中坚力量。人们通常认为称英国为“店主之国”的说法是世纪末期由拿破仑开始的，其实亚当·斯密早已经使用过。乡村中产阶级，也就是可能即将因乡绅头衔而变得有身份的殷实的土地租用人，与城市中他们的对应者，那些靠早期工业社会而发达的商人、医生和律师之间也未必有太多相似之处。

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往往都是白手起家，靠积极主动利用自己的才能致富，他们将自己的劳动和利润投入商业或职业性经营活动，就这点而言，他们是真正的“资本家”。他们共同拥有、控制或经营着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并逐步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对英国“绅士”所惯有的概念。在政治上，他们的至高地位在任何规模的城镇中都很少受到质疑，甚至在许多乡村教区，几乎多是他们代表统治阶级而不是那些看似在怀特霍尔〔2〕和威斯敏斯特特别重要的老爷式的大资本家和寡头政治的执政者。

教育和启蒙

这个阶层的主导格调，其注重实效的态度及其坦白的商业逻辑到处可见。它对教育的影响尤其明显，18世纪因此而名声不佳。审视一下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代重要的教育学术机构，文法学校和大学，这方面的情况并不令人欣慰。

能够坚持不懈地履行其职能，向出身较卑微的儿童提供正规系统教育的文法学校其实很少。多数捐款要么就不足以维持开支，要么就无法逃避那些掌管者的贪婪。在这些学校中任教的神职人员往往是尽了最大努力，但几乎仍无法克服由于工资低和资助少所导致的令人沮丧的情形。少数老学校，如伊顿公学、威斯敏斯特公学和温彻斯特公学则有效地利用了贵族越来越偏爱寄宿制的公学而不选择由私人教师教授这一状况。

英格兰的大学给人一种自负的印象，尤其是与苏格兰一些大学相比较而言。英格兰与苏格兰边界以北的学术活动以宗教冲突甚至偏狭为特征，但也显现出巨大的活力，正是在其基础上苏格兰启蒙运动蓬勃发展。对于那个时期欧洲在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医学等各个领域中取得的成就，苏格兰做出了重大贡献。按此标准衡量，英格兰的大学显然要逊色不少。其职能部分是培养神职人员，部分是为上流社会和富人提供内容广泛的教育。对此，他们投入了高度的热情。牛津的哈福德这样的新学校中推行了严谨治学和创新教学，剑桥大学在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真正进展，这些无论如何也与托马斯·罗兰森[3]的作品或反教权主义宣传给人的印象不相符。即便如此，这些大学也显然没有满足中产阶级的需要。

但事实上也没人指望它们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要。因缺少文法学校和大学，中产阶级便采取其典型的捐款和收取学费等手段，创办了大量适用于中产阶级孩子的实用而进步的教育机构，为不同职业和商界培育人才。这些学校通常存在时间不长，渐渐消失后几乎不留痕迹，所以维多利亚时代那些吹毛求疵的人很容易认为它们根本没存在过。即使是18世纪最大的一些学校，包括北安普顿和沃林顿那些同类

中最优秀的学校不久便也消失了。但在它们存在的期间，它们所提供的正是商业阶级所仰赖的朴实却实用的基础教育，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完全忽视了高雅艺术和社交风范。上流社会的教养与身份与物质财富一样令人渴望。18世纪出现了大量女子学校，很符合那些想提高社会地位的人们的需要。但是，尤其对于男孩子来说，所谓“现代”学校教育的主要优点是其实用性。

结果显然是形成了一种中产阶级文化，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如果说英国曾有过启蒙运动，恐怕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实用思想头脑的启蒙。18世纪中叶人们迷恋的主要不是神学辩论，也不是哲学思考，而是应用技术。成立于1758年的行业会（Society of Arts）便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精神。该协会成立初期最有争议的项目也许就是其要通过陆路将沿海的鱼产品运往伦敦的计划，由此打破泰晤士河鱼贩的垄断局面，并大幅度降低这种重要而且有营养（这一点被特别强调）的产品的价格。这的确有点不可思议，但其目的极为实际。

行业会是全国的一大关注点，但是在诸多依赖对科学或伪科学知识的兴趣发展起来的或正规或非正规、或持久或短暂的会社和协会中，它只是最知名的一个。这种兴趣在各郡至少和在首都一样强烈。在许多热衷于科学的业余团体中，就数与伊拉斯谟·达尔文[4]有联系的利奇菲尔德业余科学爱好者社团和月亮学会最有名。从这些会社助推下产生的大量文章、作品中也可以大致看出民众对科学问题有了更强的兴趣。甚至连一些娱乐性的月刊中也大量刊登了这个醉心于探索物质世界奥秘的时代的众多发明创造和推测遐想。

娱乐

中产阶级在工作和学习之余需要有属于自己阶级的游戏和娱乐。18世纪永远会让人联想到一个时髦的寡头政治社会的那些娱乐活动，尤其具代表性的是全盛时期的大温泉城中的No.1——巴斯。但如果没有中产阶级顾客的光顾，巴斯则可能早已失去其在乔治王朝时的活力

而名存实亡了。开发者伍德家族和它的首位主持“纨绔子”纳什[5]的事业不只要依赖大人物的名声还要依赖中产阶级的金钱。每个贵族去进行温泉疗养或参加议会，都必须有一群人为分享那高雅氛围出钱付账。在这方面，与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是中等阶层对比他们身份高的上流阶层的风尚和习惯的忠实拥护支撑了休闲与奢侈给商业带来的活力，同时也维持了贵族仍然高高在上和屈尊俯就的印象。

巴斯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独特。毕竟，温泉疗养既是地区性的也是全国性的现象，各郡都有一些与著名的巴斯极其类似的温泉城。18世纪20年代初丹尼尔·笛福[6]周游英国时，他发现了许多温泉城。他惊讶地注意到，在坦布里奇城，“社交聚会和娱乐是该地区的主要活动。”但是，在首都周围有若干与坦布里奇竞争的城镇，包括埃普瑟姆、达尔威奇和西德纳姆韦尔斯，都是吸引那些寻求乡间空气和矿物盐的伦敦人的胜地。在为现代旅行者的祖辈们所钟爱的皮克区，笛福发现巴克斯顿和马特洛克所能提供的膳宿已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尤其是巴克斯顿，它在18世纪中叶得到迅速发展，不过到80年代它与坦布里奇争做仅次于巴斯的第二大温泉城时，又面临来自一个新对手，即切尔滕纳姆的压力。

温泉水的供应当然有限，但另一种有价值的商品——海水的供应却不会短缺。在这一点上与温泉的情况一样，医疗界急切地想证实海水和海边的空气对身体有难以估量的好处，在他们的协助下健康与娱乐得以很好地结合起来。布赖顿在18世纪90年代以前未得到任何大的发展。但对海边胜地的开发却早已开始。拉塞尔医师[7]于174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腺体疾病治疗中海水的应用》的论文，对这一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韦茅斯极力就英吉利海峡水中含有大量矿物质做文章，到1780年时它已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休闲胜地。马盖特和拉姆斯盖特与伦敦之间往来便利，成名的时间甚至更早，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复杂多样的活动安排。约克郡海岸的斯卡伯勒也同样很发达。

医学当然是这些发展中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不能不看到其基本动力来自更世俗的社会需求。上流社会每年的传统社交季节里会有各种社交活动和围绕宫廷的活动安排，下层阶级的市集和假日多遭到鄙

夷，而新的胜地则非常成功地弥补了这之间巨大的空档，并获取了巨额利润。它们主要面向中产阶级，将中产阶级的城市生活暂时搬到新环境中，就像贵族退隐到乡间别墅一样。中产阶级想要有自己特色的娱乐活动这一普遍存在的需求是它们发展的基础。而收费和预订措施则保证了它有体面的来客和像样的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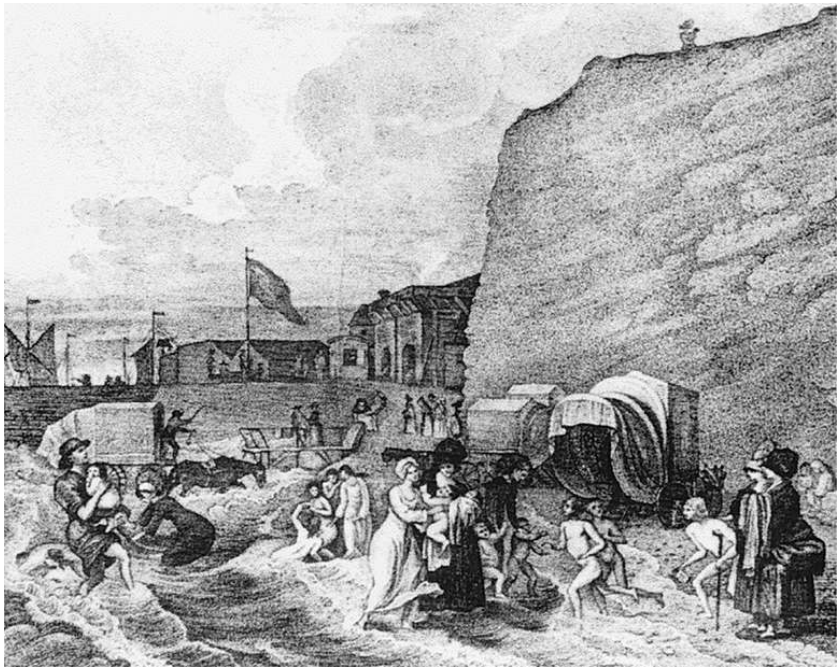

图8　海边。（上图）：一幅描绘黑潭魅力的早期独特速写。（下图）：本杰明·韦斯特之后威廉·伯奇创作的一幅雕版图，描绘了拉姆斯盖特海水浴的场面，顺带也展示了浴场更衣车的使用。

在某些方面，妇女是富裕新生活最明显的受益者，这样一种灵活但受到保护的环境对于她们来说尤其重要。早在休闲胜地出现之前，笛福就已充分描绘了其特征，称其为“新的时髦集会交际”。集会上可以跳舞、打牌、饮茶，还可以认识和结交不同的人，到世纪中叶时这已是很常见的活动。甚至在许多集镇上，集会都成为婚姻市场这类有目的的活动和乡间闲聊这类十分随意的活动的重要中心。在大城市中，这种集会可能还有壮观地集中展示该城市自豪感的目的。在诺里奇，18世纪50年代建造的剧院和会馆突出体现了当地建筑师托马斯·艾沃里〔8〕个性鲜明的设计特色。与这些同时兴建的还有为非国教信仰者修建的一座宏伟的新教堂，也恰好体现了宗教与娱乐之间的社会联系。许多平时交钱参加几乎每天在会馆举行的盛大晚会的人星期天也会去附属于会馆的小教堂做礼拜。

文化趋势

若试图将一个复杂时代的所有文化发展趋势归纳为一种单一的模式似乎不够审慎。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乔治王朝中期艺术的主要格调极其符合富有且自命不凡的广大中产阶级的需要。从严格的贵族古典主义退而转向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回归。实际上，古典主义传统继续得到重新诠释，就像文艺复兴后几代人一直做的那样。但此间有迹象表明出现了一种崭新的，甚至是反贵族的精神。奥古斯都艺术〔9〕的成功是精英们的成功，主要消费对象是上层人物。注重秩序、结构和形式是18世纪初期文学艺术的特点，对其在古典艺术中的重要性的深刻理会是阐释它们的关键。同属一类的还有对罗马教皇进行贺拉斯式的讽刺，〔10〕对伯林顿建筑采取的帕拉弟奥风格的设计，〔11〕以及威廉·肯特〔12〕等古典主义者所钟爱的本质上仍很正规的园林艺术。但20年后，中产阶级教育所培养出来的那些注重实效的人很少能欣赏一部讽刺作品在语言上的微妙之处，而能够理解或认同威尼斯文艺复兴风格作品的人就更少。

相反，18世纪中叶取得的文化成就既不讲求华丽高雅也不讲求细腻精妙。威廉·申斯通〔13〕宣扬的风景园艺和更时尚的、由“能人”布朗〔14〕所采用的“自然”景观，都表明18世纪初时竞相模仿和影射古典主义的那股热情已不再。新的文学发展趋势显然也是如此。几乎无须强调，无论是关于流浪汉冒险故事的小说，还是那些拘谨古板的小说都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有时，这种性质会表现得异常鲜明，比如理查逊在其《帕美勒》和《克拉丽莎》中对放荡贵族带有偏见的描写。〔15〕而另外一些时候，如在斯摩莱特〔16〕和菲尔丁的冒险故事中，这种资产阶级性质则表现为对下层和中等阶层社会生活的一种道学兴趣。

不管怎样，这些趋势聚在一起，使得情感至上变为18世纪60年代最典型的表现方式。例如，劳伦斯·斯特恩〔17〕的《商第传》，不仅进入了王宫，而且进入了普通人家的客厅，既吸引了富豪也吸引了商贩。但是，不能因大众普遍对情感运动〔18〕怀有热情而削弱其作为中

产阶级价值观和观点的载体的重要性。情感可以通过想象把一个消费社会营造得文明而高雅，那正是英国商界通过财富在现实中力求要实现的。情感使“自然”品味成为文雅的真正标准，那是有道德的人的品位，不论这人有何种成长背景和教养。它还宣扬了中产阶级的家庭道德，强调家庭生活和加尔文主义的美德观念，反对关于个人荣誉的英雄观和等级观。

1760年乔治二世死后，新国王和王后将会证明他们恰恰是这种理想的典型象征，使宫廷上下有了一种近乎维多利亚时代的气氛。在这方面，他们忠实地反映了众多臣民的道德观念。早些时候，中产阶级只是去模仿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现在，至少在理论上，不必再去模仿了。在这个崭新的世界中不用再去努力培养风度举止，一个多情善感的人，正如麦肯齐〔19〕的颇有影响力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实际上是无阶级的。

文化自信心

如果说中产阶级的文化是多愁善感的，那么它还明显地带有某种偏狭性，只有在艺术家本人渴望表明自己愿意坦然接受外部影响时，此种情况才会有所缓和。但知识界的标新立异者在这方面的活动多少会令人误解。乔舒亚·雷诺兹爵士〔20〕是英国新政权时期公认的艺术大师，他有意识地借助欧洲大陆的模式，向一个庸俗但期盼文化的大众群体传播优秀的欧洲艺术传统。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他也体现了本国的许多新趋势。雷诺兹与其他许多靠肖像画为生的人一样，既依赖新兴的富有阶层也依赖更有贵族气派的庇护人。

另外，雷诺兹的影响也恰好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生机和活力，以及当时典型的行业组织化现象。1768年成立的皇家艺术学院，从某个角度说，相当于一个有代表性的协会，可以与那些正日益涌现的代表医生和律师的专业组织相类比。在另一个层面上，该学院促使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本土艺术达到了巅峰，贺加斯就是这种艺术的先驱，但他没

能见到其鼎盛时期。这并不是说在这个或其他文化活动领域中外国影响不重要。安杰莉卡·考夫曼〔21〕是最受伦敦时髦人物欢迎的装饰艺术家，约翰·佐法尼〔22〕是伦敦最成功的肖像画家之一。但是这两个人都没有像这个世纪早些时候定居在此的外国人那样发挥作用。没有像韦里奥〔23〕那样的人统摄富丽堂皇的装饰艺术，没有像亨德尔〔24〕那样的音乐家鹤立于英国音乐家之上，也没有像赖斯布雷克〔25〕或鲁比利亚克〔26〕那样的人引领墓碑雕刻和雕像艺术。相反，这个时期有亚当兄弟〔27〕装饰英国人的住房，有勃尔尼〔28〕或博伊斯〔29〕教他们欣赏音乐，死后还有威尔顿〔30〕用雕塑纪念他们。

新获得的文化自信心在英国文学爱好者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演员大卫·加里克〔31〕个人为莎士比亚戏剧的宣传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最终于1769年在斯特拉特福德举行了莎士比亚纪念庆典。不过在画家当中也有可与之相比的爱国情怀。贺加斯曾有意识地努力创立一种真正的本国传统，而且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完全单枪匹马地在开创这一伟大事业。而他创立的英国画派的继承者们最突出之处则是，他们能够自如地借用欧洲大陆的技巧却既无自卑感也无依附感。德比的约瑟夫·赖特〔32〕在世纪中叶的艺术家中虽不是最受赞赏的，但也许是最富创新性的，他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也难怪他成了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朋友，他本人也是一位著名医生、科学家和诗人。赖特最擅长的是带有部分教育目的的、以科学实验和发现为题材的作品。但同时，他也很会巧妙地运用光线，其手法不会使卡拉瓦乔〔33〕蒙羞。与所有人一样，赖特也去过意大利，但那是在他创作出了他的主要杰作之后，而非之前。他回来后许多人都觉得他似乎失去了而不是获得了灵感。

优雅和身份

并不只是在高雅艺术中才能见到这种主要受中产阶级愿望驱使的越来越强的民族自信和凝聚力。外国来访者和国内的人都常评论的一

个现象是，乡下人的行为举止与伦敦人越来越相似了。剧作家乔治·科尔曼〔34〕1761年时评论说，半个世纪以前“偏远郡县的居民被视为一个完全不同于大都市居民的人种，几乎就像好望角的土著居民一样”。而现在却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了。

伦敦的风尚、伦敦的文化修养、伦敦的口音还有伦敦的疾病，都沿着英国新修的主干公路传播，随后蔓延遍及乡村地区。爱丁堡和格拉斯哥、斯旺西和都柏林都是这一扩展进程中最先到达的前站城市，自18世纪60和70年代起旅游业成为不列颠群岛那些所谓偏远地区的主要产业后，又有许多大城市相继出现。当然这种影响有可能被夸大了，不过很明显，当时的许多见证文字都对下层百姓的服饰、举止和道德规范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如同其对中产阶级的关注一样。很可能在世纪末时，一些地区的工业呈现爆炸式增长再次造成了一种较强的外省人身份感。但在世纪中叶时人们觉察到的差不多全是对文化统一的强调。“宫廷和乡村”以及“市民和乡下人”这类二分状况似乎已成为过去。

注释

〔1〕 格罗斯雷修士（Abbé Grosley, 1718—1785），全名为皮埃尔-让·格罗斯雷（Pierre-Jean Grosley），法国教士、旅行家和游记作家。

〔2〕 即白厅。

〔3〕 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 1756—1827），英国漫画家。

〔4〕 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 1731—1802），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是一名医生，也是诗人，利奇菲尔德文学社团成员。

〔5〕 伍德家族（the Woods）主要指约翰·伍德（John Wood, 1704—1754），一个出生在巴斯的建筑家，他设计了巴斯的街道和旅馆；还有杰罗姆·伍德（Jerome Wood, 1730—1780），他也搞建筑。理查德·纳什（Richard Nash, 1674—1761）对巴斯休闲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6〕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18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中产阶级作家，著有游记、传记、行为指南和政论文章等。他最知名的小说是《鲁滨孙漂流记》（*The Life and Strang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19）。

〔7〕 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 1687—1759）的这篇论文虽然现在看来科学性是不够的，但在当时影响很大。

〔8〕 托马斯·艾沃里（Thomas Ivory, 1709—1779）是18世纪很有创见的建筑家，原来做木材生意。他的代表作是诺里奇的八角教堂（1756），即文中提到的非国教信仰者的教堂。

〔9〕 奥古斯都艺术指18世纪上半叶的新古典主义文学和艺术。因为这一潮流是以古代希腊罗马的大师为仿效对象的，所以有此别名。

〔10〕 贺拉斯（Horace, 65—8 BC）是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他的讽刺诗歌很有成就。这里说的是18世纪古典主义作家效仿他的诗歌来讽刺罗马教皇。

〔11〕 伯林顿指理查德·博伊尔，伯林顿伯爵（Richard Boyle, Lord Burlington, 1694—1753）。他是当时的艺术庇护人，主持建造了英国著名的帕拉弟奥建筑。“帕拉弟奥风格”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设计师安德烈亚·帕拉弟奥（Andrea Palladio, 1508—1580）的风格。

〔12〕 威廉·肯特（William Kent, 1685—1748）是英国的园林艺术家、建筑家和画家。

〔13〕 威廉·申斯通（William Shenstone, 1714—1763），风景园艺师，也发表了一些诗歌。他的家是英国18世纪风景园艺的典型一例。

〔14〕 兰斯洛特·布朗（Lancelot "Capability" Brown, 1716—1783）是18世纪非常有影响的建筑家，他主张风景不能只供欣赏，还应带来经济效应，要能产生财富。

〔15〕 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著名书信体小说家，以描写女性婚恋和心理著称。这里提到的是他的两部主要小说，女主人公都遭遇同放荡贵族斗争的命运。

〔16〕 托比亚斯·乔治·斯摩莱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 1721—1771）是18世纪后期的重要小说家，小说《汉弗莱·克林克出征记》（*The Expedition of Hamphry Clinker* ，1771）为其最出色作品。

〔17〕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情感（或感伤）小说的鼻祖。他的主要作品《商第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 ，1759—1767），是一部实验性很强、别出心裁的小说。

〔18〕 情感运动，又称感伤主义运动，是起自英国而后波及欧洲的一种文学潮流，得名于斯特恩的小说《穿行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之旅》（*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1768）。

〔19〕 亨利·麦肯齐（Henry Mackenzie, 1745—1831）主要的小说作品就是这里提到的《有情人》（*The Man of Feeling* ，1771）。

〔20〕 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 1723—1792），著名英国肖像画家，也参加了一些文学社团。他为当时的许多知名作家、思想家、演员等画过像。约翰逊博士画像是他最著名的肖像画之一。

〔21〕 安杰莉卡·考夫曼（Angelica Kauffmann, 1741—1807），瑞士新古典主义风格初期女画家。

〔22〕 约翰·佐法尼（Johann Zoffany, 1733—1810），德国出生的英国画家，皇家艺术学院奠基人。

〔23〕 安东尼奥·韦里奥（Antonio Verrio, 1639—1707），意大利装饰画家。1671年定居英国，为白厅、温莎堡和汉普顿宫绘制了大量的壁画。

〔24〕 乔治·弗里德利克·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 1685—1759），德国出生的大作曲家，后移居英国。

〔25〕 迈克尔·赖斯布雷克（Michael Rysbrack, 1694—1770），佛兰德斯雕塑家。出生于佛兰德斯一个艺术世家，1720年定居英国。

〔26〕 路易-弗朗斯瓦·鲁比利亚克（Louis-Francois Roubiliac, 1702—1762），生于法国，活跃于英国，为欧洲开创了制作雕像纪念天才人物的先例。

〔27〕 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 1728—1792）和詹姆斯·亚当（James Adam, 1730—1794）是苏格兰兄弟建筑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设计了很多重要的公共和私人建筑。

〔28〕 查尔斯·勃尔尼（Charles Burney, 1726—1814），音乐史家、作曲家。

〔29〕 威廉·博伊斯（William Boyce, 1711—1779），英国教堂音乐作曲家的先驱之一，知名的管风琴乐师，音乐编辑，以其多首交响曲而享有盛名。

〔30〕 约瑟夫·威尔顿（Joseph Wilton, 1722—1803），英国古典雕塑艺术家，在佛兰德斯和巴黎学艺，回国后担任乔治三世的王室雕塑师，并经营画廊和画室。这里用他和外籍雕塑家鲁比利亚克对比。

〔31〕 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 1717—1779），18世纪英国著名演员、剧院经理和剧作家。

〔32〕 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 1734—1797）是第一个将工业革命精神直接注入到艺术中的职业画家，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实验为主要题材的画家。

〔33〕 卡拉瓦乔（Polidoro Caldara da Caravaggio, 1496—1543），著名意大利画家。

〔34〕 乔治·科尔曼（George Colman, 1732—1794），英国戏剧家和剧院经理。

第五章

不同政见的斗争

乔治王朝中期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对英国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对未来极其重要。但在当时，由于世袭权利和习俗的力量压倒一切，很难估量这些变革对政治结构的直接影响。表面上，世纪中叶前后政治的性质几乎没有变化。诺思[1]（任期：1770—1782）和小皮特[2]（任期：1783—1801）在执政手法和政策方面可与沃波尔和佩勒姆相比。事实上宪制方面几乎没有很大变化。19世纪威胁“旧制度”的那股躁动不安和改革的洪流，在事后看来似乎来得过激了。

然而，这方面的表面现象非常具有欺骗性。由于意识到怀特霍尔和威斯敏斯特之外有广大的政治民众，所以政治语言、目标甚至手段都受此影响。不说别的，光是18世纪50和60年代报纸、印刷品和政治小册子中所展现出的唇枪舌战的范围广度和激烈程度就足以证明公开辩论的活力和政客们急于参政的心情。在这群政客中，有一位似乎占有特殊位置。

老威廉·皮特

老皮特[3]的名声是如此褒贬不一，以致两个世纪后仍难以给予他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所应得的评价。1754年以前，皮特的事业还远未获得成功。他出身于一个惯于挥霍且有些怪癖的家庭，是家中的幼子，加入了辉格党并最终通过婚姻进入了一个大辉格党家族，即斯托的坦普尔家族[4]。年轻时，他作为一名爱国演讲者，以令人生畏的雄辩和张扬奔放的激情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声望。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期间，他言辞激烈地反对汉诺威王朝，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而且让他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但这些却使他在国王面前成了几乎永远不受欢迎的人。当1746年佩勒姆起用他时，那个官职也只是有利可图而没有前途。身为财政部主计长，皮特被排除在了高级决策之外，而且在议会辩论中他的言论被有效地钳制。这似乎是又一个爱国者谋求发展时为了晋升而放弃原则的例证。

但是，18世纪50年代的事件使皮特时来运转。1754年佩勒姆突然去世，这即使在当时也似乎是个转折点，国王本人对此事的言谈起码可以说明其重要性，他说："现在我将不再有安宁的日子。"佩勒姆的继承者是其兄弟纽卡斯尔〔5〕，一个精明且经验丰富的大臣，绝不是传说中描绘的平庸可笑之才。但是在上议院里他发现很难再施加其兄弟或沃波尔的那种控制性影响。皮特在下议院的主要对手亨利·福克斯〔6〕则缺乏政治勇气，也没有足够的分量，无 法替代佩勒姆。辉格党的"老骨干人员"，即自汉诺威即位后议会中的支配力量，这时几乎群龙无首。他们的对手托利党由于持续遭排斥此时也越来越难驾驭，而且不再认真考虑迎候一位来自海峡对岸的国王〔7〕之事，他们也在寻求出路。皮特不正是能使两者的需求都得到满足的人选吗？

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多亏当时的环境，尤其是国际形势。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明确了将来的主要冲突领域，但并没有着手开始解决。海外的主要着眼点不再是西班牙帝国的命运，而是英法这两个重商主义时代最成功的商业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的世界范围的冲突。在北美洲，法国试图建立一条从魁北克贯穿到路易斯安那的领地链带，切断英国的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岛，他们不断为有争议的产糖岛屿发生争吵，正如在西非他们经常为奴隶和橡胶贸易发生争执一样。在印度，本土的王公们热衷于派系斗争且虚弱无力，法国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则强取豪夺，这两种因素综合起来搅得那里局势十分不稳定。这一切都预示着将为帝国展开一场决定性的殊死之战。

皮特和七年战争

战争爆发了，开始时对英国和皮特的政敌来说损失都很惨重。1755—1756年中，海军行动不成功，英国丧失了地中海上的梅诺卡岛，海军上将宾〔8〕被无情地当作替罪羊，使得老辉格党政权信誉扫地。而这却成就了皮特，或许也成就了第一英帝国。

接下来几年是历史上格外重要的一个阶段。七年战争取得一系列

胜利，英国在北美和印度彻底击败了法国，在其他地方也成功挡住了波旁王朝的威胁，代表了帝国成就的巅峰，皮特也因此成为英国历史上战功最辉煌的大臣。此外，他成功地痛击了辉格党的“老骨干人员”这帮政客，似乎预示了一批新派政客和一种新型政治的出现，这可以从约翰逊博士〔9〕对沃波尔和皮特所作的巧妙对比中看出，前者是“国王派给百姓的首相”，而后者则是“百姓派给国王的首相”。然而，皮特得以飞黄腾达更多的是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以及纯粹的运气，而不是公众的赞誉。

就算有民众支持他，这种支持也是他在伦敦城中的朋友和在外省新结识的托利党伙伴费心策划的。他第一次尝试执政，即1756—1757年的皮特 - 德文郡公爵内阁，软弱无力且为时不长；第二次，即1757年的联合内阁，远远成功得多，这部分是因为他与纽卡斯尔做了笔交易，部分是因为得到威尔士亲王，即未来的乔治三世的支持。这种兼顾“期待权益”与“老骨干人员”的做法与皮特的各届前任和政敌们的那些政治伎俩一样地不择手段，与沃波尔在1720年的所作所为也极其相似，当时沃波尔和乔治亲王（后来的乔治二世）又是恐吓威胁，又是甜言蜜语，最终重返宫廷，荣登王位。

皮特在战争中的作为也不像他的敬慕者后来所宣扬的那样毫无瑕疵。他所实行的基本战略与他先前支持的爱国方案完全相左。他坚持不惜重金与普鲁士结成同盟，并将英国的钱财和人力大量用来在德国维持一支军队，这些都自然地遵循了佩勒姆和纽卡斯尔的外交策略。皮特自己对战争最具代表性的贡献是对法国海岸实行联合作战，旨在转移法国对德国战争的注意力。这是他拼命试图向其朋友们，那些对他的“汉诺威”政策已经越来越感到失望的托利党人，证明他仍然爱国的做法。就军事而言，此举不仅铺张浪费而且收效甚微。

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这也大多归功于皮特难以驾驭的一些因素。大体上说，法国因为没能加强海军和殖民地战争的财力和物资供给而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占的优势不是太多，但却是决定性的，尤其是加上了罗伯特·克莱武〔10〕的才干。皮特把克莱武称为“上天选派的”将领，就是借用辞令来表示他不能将任命

克莱武的功劳据为己有。

即使是曾英勇攻克魁北克、被国民寄予厚望的詹姆斯·沃尔夫[11]，也只是在北美指挥作战的司令官中的最后一个，况且他也不是屡战屡胜。但是，胜利的到来解决了战争的一切问题，至少在不得不进行和平谈判之前是如此。在奇迹迭出的1759年以前，也即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形势彻底改变之前，皮特与纽卡斯尔的联盟已濒临瓦解。皮特施行的政策令他那些托利党支持者深感惶恐，他们在不断谈论要放弃对他的支持，而他的同盟纽卡斯尔则不断威胁说要甩掉一个花钱如流水、付出昂贵代价却常换来败绩的同僚。而在1759年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化解了。

七年战争有如此运气的结局不应全都归功于皮特，但是在两个重要方面他所赢得的历史声望似乎是当之无愧的。即使说皮特的人气被夸大了，但他在改变18世纪政治的性质方面所起的作用不管怎样说都很重要。18世纪50年代中期，已有的政治模式显然在破裂。托利主义遭排斥的状况和辉格家族在狭小圈子内维持对任命权的控制都没有持续很久。皮特至少带来了一种与老式政治决裂的希望，特别是在大都市，他在那里联系深广，拥有一批真正的民众选民。同样，作为一名战争领袖，他确实具有一种当时任何对手都不具备的重要品质。没有这一品质，战争不可能得以继续，更别说最终获胜。这种品质就是政治勇气以及与其相伴的近乎轻率自大的自信。这种勇气为其他更有能力和更审慎的人提供了一个他们需要的道德基础，由此而去战斗并赢得辉煌胜利。就在老辉格党领袖纽卡斯尔和福克斯明显张皇失措的时候，皮特对自己领导才能的信心成了关乎战争何去何从的一个关键要素。如果政治殊荣归根结底属于那些甘冒一切风险的人，那么至少在这个意义上，皮特理应得到这份殊荣。

托利党人的重返

不论皮特成就的性质如何，他那些有争议的活动已为随后不久发

生的戏剧性事件拉开了序幕。18世纪60年代政治性质的改变将永远与新国王乔治三世及其最不安分的臣民之一，约翰·威尔克斯联系在一起。就国王来说，这些年将会证明是极其痛苦的。然而，乔治三世所做的多半是顺理成章地将其祖父统治时期的趋势推向顶点。他决意废除老的党派区别的所谓变革决心尤其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区别实际上已经由于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和皮特成功地吸纳了一些托利党人来任职而被削弱。1760年时的党派区别更多的是一种论调而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不情愿或勉强的宽容态度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老托利党人能够参与新政权而怀有的一种心照不宣的自豪感。朝廷张开臂膀欢迎托利党人归来，并明智地授予他们官位、荣誉和贵族头衔。在各郡，他们重又掌握了过去十年中不曾问津的治安官职权。在中部各郡，这些治安官职位再一次变得好像是为乡绅而设的，其中许多是老托利党人，甚至是老保王党人。

一个令人敬畏的托利党人获授特殊的地位。当时的文坛巨匠约翰逊博士颇受新政权的嘉许和赏识，1762年时他从比特伯爵〔12〕那里获得一笔年金。他重新被政府接纳一事不乏讽刺。18世纪30年代里，约翰逊曾写过尖刻的爱国檄文，抨击沃波尔在加勒比的亲西班牙政策以及英国在那里宣称的权利。现在，在新国王统治下，他将挥笔书写一篇同样铿锵有力且更令人信服的文章，为英国宣称福克兰群岛归自己所有后乔治三世对西班牙所采取的所谓绥靖政策辩护。约翰逊将这些岛屿描述成“凄凉阴郁的荒凉之地，是被人类遗弃的岛屿，冬天多风暴，夏天荒凉贫瘠。”然而，在英国外交政策史中，福克兰群岛的问题并未就此完结。

约翰逊这种个人变化的意义，从牛津大学建制史的变化中体现得更加鲜明。46年以来，牛津大学一直是感伤怀旧的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大本营和神殿，由于几代辉格党教士相继把持着有名有利的职位，它一直在政治上受到冷遇。汉诺威王朝初期英国教会的执教人员通常是由剑桥大学或牛津的一些很小的辉格党学院培养的。在新的统治时期，哪所大学得以扬眉吐气重返朝廷的怀抱，是毫无疑问的。最奇怪的是，牛津大学曾为政府，甚至早期汉诺威政府，培养出了不止一名

首相。但是，佩勒姆却几乎没有阻拦其兄弟将教会的庇护权给予剑桥大学，而皮特曾一度很不光彩地利用了自己母校牛津大学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协会。在乔治三世统治下，牛津大学终于有了首相诺思，他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他恰好能代表保王党郡县中那些老托利党家族。

如果说托利党人重返朝廷并不让人吃惊，那么乔治三世的其他新措施恐怕也就不足为奇了。新政权一开始是怀了良好意图和崇高愿望的。任何以为新的“爱国君主”可能会力图加强王室特权的想法很快便被击碎。《王位继承法》（The Demise of the Crown Act）规定法官不得像过去那样在君主死后辞职，这样就消除了对国王可能利用自己的法定权利清除辉格党把持的司法机构的一切疑虑。同时，《王室费法案》（The Civil List Act）规定要严格控制王室每年80万英镑的津贴。这与拨给乔治二世的津贴相同，但是有重要的补充条款规定王室费的任何盈余今后将归财政部而非国王。随着通货膨胀的出现，这项规定严重限制了国王应付日趋增加的宫廷开支的能力，并不无嘲讽地成为国王为爱国所作出的极其得不偿失的让步。这是真正继承了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领导的莱斯特下议院派的传统——它不是一个要创建一种新的仁慈的专制统治的花哨计划，而是对国王的特权进一步予以了限制。

和平

然而，这些与新政权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即和平问题，比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老阁员皮特和纽卡斯尔都相继辞职。皮特于1761年辞职，因为乔治三世和比特拒绝听从他力主将战事扩展到西班牙的主张；纽卡斯尔则因反对达成的和平条件于第二年辞职。但事后看来，他们所阐述的多数论据都无足轻重。如果不将战争中获得的一部分利益归还波旁王朝，就不可能获得和平。将主要的法属西印度群岛归还法国以及保留法国在加拿大水域的捕鱼权等让步并不过分。皮特和纽

卡斯尔在1762年那种外交局势中，如果不想继续激战下去，恐怕也得作出同样的让步。

此外，那些年军事上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却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到1761年时已开始引发普遍的惶恐。反对将战争继续下去的呼声非常强烈，反复地出现在报纸和小册子中，伊斯雷尔·摩迪特〔13〕在《德国战争思考》中率先发出呼吁。把战争进行到底将导致破产；而且战争的目标是继续获得腓特烈大帝〔14〕的支持并取得更多的殖民地，这似乎没有太大的价值。乔治三世和比特过多地放弃了一些本不需放弃的东西，尤其是在与西班牙达成的条件方面，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考虑到这场战争无论多辉煌毕竟不是他们的战争，另外还可能因为要急于尽快讲和。但从本质上讲，他们谋求和平的举措是谨慎合理的，得到议会和公众舆论压倒多数的支持。

个人仇恨

既然如此，为什么新政权还引起如此争议？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新政府中的掌权者在他们本来并无害的活动中夹杂了对注定要制造麻烦的旧政权的某种个人敌意。乔治三世选择他先前的家庭教师比特伯爵来实行改革。比特是一名热爱知识、但经验和技巧并不足的苏格兰贵族。他在教诲年轻国王为将来的统治做准备时，教授的技巧多半较天真而不够狡诈。当时既不存在反对自由和宪制的重大阴谋，也没有要推行一种新独裁制度的决心。但是，新国王和他的首相无疑对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独霸大权的那些人存有根深蒂固的憎恨，而且即使不是坚决要弃他们不用，起码也已准备好要随时剔除他们，甚至要羞辱他们。被认为在1757年时背叛了王子的朝廷的“黑心”皮特更是遭到了公然仇视，所以很难想象皮特和比特如何能在新局势下合作。不过，皮特是个妄自尊大之人，只有圣人才能与其长久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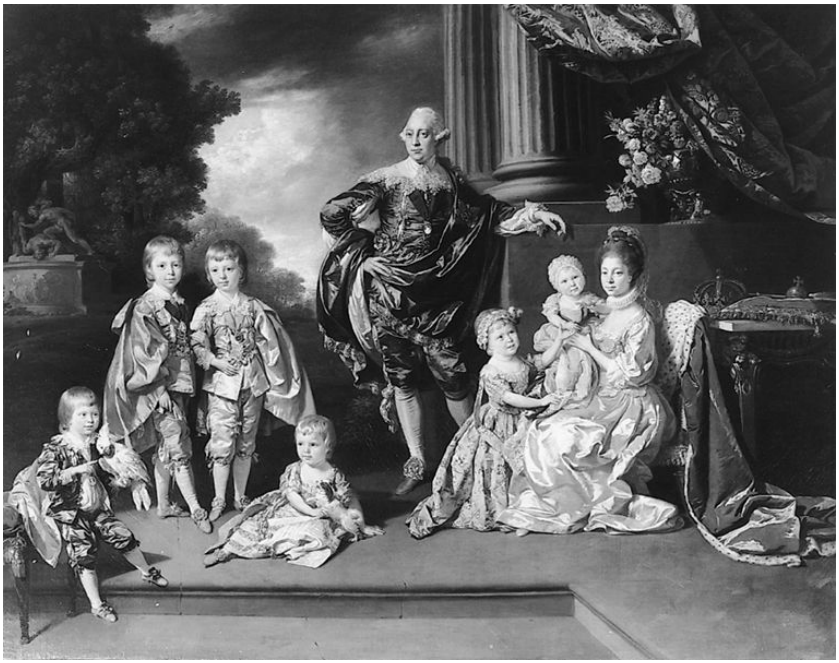

图9　王室的辉煌。（上图）：佐法尼所画的王室家族，既描绘了新国王乔治三世作为君主的自信，也展示了18世纪60年代带有些戏剧性的新古典主义。新国王不怕与他的斯图亚特家族祖先进行比较，正如他那凡·戴克[15]服饰所表明的那样。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威胁已过去，可以放心地用查理一世的魅力来颂扬汉诺威血统。（下图）：比特伯爵作为王室宠臣的角色使他倍受报刊的中伤。这幅1767年的漫画采用了18世纪刻画首相们常用的“巨人”形象，但同时也明确将比特的成功归因于欺骗（他利用了王室的影响力）和色欲（据说他曾勾引国王的母亲，威尔士亲王的遗孀）。

大的辉格党家族是另一个问题。他们的社会地位、分量以及承袭

来的重要声望都会使他们成为危险的敌人。他们无疑会有些居高临下地对待新国王。卡文迪什这样的家族〔16〕喜欢把自己视为国王的拥立者，对于他们来说，汉诺威选帝侯至多是同辈之冠。纽卡斯尔在执政一辈子后，当然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一个主要以腿部线条优美和庇护植物学家著称的无用的学究式苏格兰贵族认真采纳，这也是有情可原。简言之，新政权有充分理由谨慎行事，而且尤其有理由确保尽可能顺利地由旧政治过渡到新政治。

但这绝不是没有问题的。辉格党的“老骨干人员”很清楚比特的要求必然得到准许。由于缺乏一个极富个性魅力的领袖，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还是愿意在新政府管理下继续效力。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诺思。他是纽卡斯尔公爵的表亲，未来的首相，在新统治时期只是被动地效力于乔治三世的宫廷。即使是那些资深人士，他们虽认为自己是新秩序的受害者，也不愿对之宣战。哈德威克伯爵〔17〕是辉格党律师中资格最老的，而且曾是佩勒姆政府的台柱之一，他也只是为自己的朋友们争取不辱体面的条款，以及为自己的家族寻求继续在朝廷任职的待遇。

在这种背景下，比特和乔治三世〔18〕将纽卡斯尔及其朋友驱逐出政府的做法很不明智。他们这样做，表面上是借了1762年春的和平条件的名义，结果却制造了现代英国政治中最持久的仇恨之一。

如果新计划真成功了，那么疏远旧的政界领导人物的代价也许是值得的。但结果是，在陷自己辅佐的年轻国王于劲敌包围之后，比特本人上台仅一年后便决定辞职，傲慢地打算从普通议员席上，或不如说（就像必然被认为的那样）想从幕后，操纵事务。所以，他除了愚笨地与老辉格党家族对抗之外，还极不明智地授之以自己搞阴谋诡计和暗地里施展影响的把柄，更进一步加强和煽起了他们的敌对情绪。这种敌对情绪以及比特的暧昧之举共同确立了一种持续了20多年的政治模式。

就短期而言，18世纪60年代见证了不稳定内阁的恶性循环。乔治三世一直想找一位在议事时能与他意向相投而又能领导议会的首相。于是在这个过程中，相继试用了罗金厄姆侯爵〔19〕、皮特和格拉夫顿

公爵 [20] 等辉格党人，但均发现不太令他满意，直到1770年诺思出现，才成为能够继承沃波尔和佩勒姆衣钵的人。通观这些年经历的曲折和派性政治，总是有比特从中无关痛痒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地插手干预，还有对辉格党家族的怀疑，以及传说中关于某种持续的、不正当且秘密存在的影响挥之不去。当埃德蒙·伯克 [21] 撰写《关于当前不满的原因之思考》（1770）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进行全面和经典的分析时，正是这种传说中的影响给了他对新王室及其体制进行系统抨击的依据。这篇《思考》将作为由辉格党核准的权威版本进入历史，后来许多代人也将它视为乔治三世罪行的标准记述。

威尔克斯运动

18世纪60年代还存在其他一些一触即发的因素。战争之后出现严重经济衰退，清楚表明了企业时代的经济收益分配不均。这个时期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劳资纠纷，在曼彻斯特和纽卡斯尔等主要城市里造成动荡局面，并可能进一步发展成政治动乱。即使在乡村，这些年的收成也很糟，物价不断上涨，物资匮乏现象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约翰·威尔克斯的活动得到了广泛支持。威尔克斯在历史上有“和蔼可亲的无赖”之名，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其政治上的精明和独到之处。环境和机会主义成就了威尔克斯。他所利用的那些不满若在十年前恐怕不会产生什么影响。通用拘票是汉诺威政府常用的一种手段，凭此可以以政治罪任意逮捕人。当威尔克斯的新闻活动促使乔治三世的大臣们使用这种手段时曾引起大量争议。皮特和纽卡斯尔当政时也曾使用这一手段，但当时是以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威胁作为理由，而且是用来针对被放逐的托利党人而不是针对气焰正盛的辉格党人。

同样地，当1768年威尔克斯作为米德尔塞克斯郡候选人，却被下议院拒之门外时，也有说得过去的先例和充分的法律论据证明应当将他排除在外，但是米德尔塞克斯郡是个很有名气的郡，与首都的狂热

政治密切相联系，该郡的选民绝不甘心他们被当作一个腐败选区的一小撮投票者来对待。三年后，威尔克斯及其朋友对下议院所拥有的禁止报刊公开报道其辩论的权利进行了抨击，这实际上是在抨击立法机构一直小心护卫的一种陈旧特权。但事实证明在新的气候下维护这种特权是根本不可行的。

威尔克斯运动的激进分子是些典型的小商人、工匠和手艺人。他们代表最为集中、最勇于直言和最不稳定的“中下阶层”。当他们把不满带到乡村时，不仅获得了担心选举权受到威胁的乡绅们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地各城镇中与他们地位相同之人的支持。中产阶级是他们运动中极其关键的因素，这部分人没有统一的政见，而进行抗议通常不是他们喜爱扮演的政治角色。但是，他们在威尔克斯运动中的作用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在乔治三世统治时期政治中的重要性。

然而，他们自己只是部分地促成了这种重要性。汉诺威王朝早期的政治游戏规则已不再适用，不论提出什么先例也无济于事。因为那些曾觉得这些规则对自己很有利的人，现在认为应当废弃它们。老辉格党人愿用一切武器来报复乔治三世，他们极力让民众反对宫廷的新敌对情绪合法化。没有统治阶级中极有名望人物的这种配合，与威尔克斯有关的民众动乱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了。

真正的不列颠人

18世纪60年代发生的事无一能威胁到乔治三世对其王国的控制。然而，作为王国精神支柱的公众情感方面却出现了棘手的问题。世纪中叶的战争催生了许多歌颂不列颠精神的爱国主义言辞。但是，“统治海洋的大不列颠”在英格兰很可能被认为是英格兰而不是不列颠。1707年实现的联合王国将这个岛分为北不列颠和南不列颠〔22〕。但这种称谓对边界以南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

乔治三世公开炫耀他为自己“代表大不列颠人”而感到荣耀，有些人却宁愿他因英格兰人的声誉而自豪。随着比特及他那群同乡成为了

新爱国主义的主要受益者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楚，对此的愤恨情绪也越来越强烈。苏格兰移民在伦敦的商业和职业生活中都是非常优秀的。苏格兰大学培养出的许多训练有素的医生，能够满足一个有钱进行保健的新兴阶层的医疗需要。但是，社会和民族融和的过程并不是毫无痛苦的。威尔克斯派聪明地利用了民粹主义者的反苏格兰情绪。威尔克斯本人那动荡起伏的激进活动生涯开始于一份名为《北不列颠人》〔23〕的煽动性刊物。对苏格兰人的成见在18世纪末期大部分时间仍固执地存在着。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另一段持久战争时期，赞颂不列颠精神的言辞才使得这些成见有所缓和，虽然仍没有彻底将其消除。

反爱尔兰的情绪也很常见，但只是表现为随意的伤害和偏见，并没有发生政治骚动。即便如此，18世纪60年代它也破坏了爱尔兰政治本身的稳定。在都柏林与在伦敦一样，目的是要赶走那些长期独揽大权的人士和家族。但这同时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为后来带来了许多难以驾驭的因素。结果是出现了一些棘手的要求，要求由议会更多地控制爱尔兰事务，要求获得更大的贸易自由，以及（并不总是来自相同的声音）要求给予罗马天主教徒一定程度的解放。在宗教问题上态度矛盾、但对来自伦敦的管理和统治却表现出极明显厌恶的新爱尔兰民族主义蠢蠢欲动，再加上狂暴的农民动乱，导致了后来英格兰－爱尔兰事务中的一场危机。然而，这场危机的诱因并非来自不列颠岛内部，而是来自更遥远的英国的属地。

注释

〔1〕 弗雷德里克·诺思（Frederick North, 1732—1792），伯爵，先任下议院议长，1770年在乔治三世治下担任首相，主张在美国独立问题上让步。1782年议会通过了同意美国独立的议案，一个月后诺思辞去首相职务。

〔2〕 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老皮特的二儿子，持自由托利主义观点，1781年进入议会，1783—1801及1804—1806年间两次任首相。他执政期间在减少国家开销、施行新税收制度以降低国债等方面做出了成绩。

〔3〕 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 1708—1778），伯爵，1735年进入下议院，担任过掌玺大臣，两度成为实际上的首相，第二次是同纽卡斯尔组成联合内阁。

〔4〕 斯托的坦普尔家族（Temple of Stowe）指以理查德·格伦维尔-坦普尔伯爵（Richard Grenville-Temple, 1711—1779）为主的辉格大家族。他是乔治·格伦维尔的兄弟，老皮特的连襟，在纽卡斯尔内阁任大臣，反对他的兄弟，支持皮特，在朝政中很有发言权。

〔5〕 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纽卡斯尔（Thomas Pelham-Holles Newcastle, 1693—1768），公爵，亨利·佩勒姆的兄弟。他1714年进入议院，1754—1756及1757—1762年间两次任首相。第二次是与老皮特联合组阁。

〔6〕 亨利·福克斯（Henry Fox, 1705—1774），霍兰男爵（第一）（Holland, 1st Baron），坚定的辉格党议员，是该党的中心人物，致力改革。他还是作家和文学庇护人。

〔7〕 即詹姆士三世。

〔8〕 约翰·宾（John Byng, 1704—1757）因撤退而被送上军事法庭，并判处死刑。

〔9〕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18世纪英国文坛领袖，持保守的托利观点。他编纂了第一部英文词典，编过期刊杂志，为英国诗人写过传记，并发表过诗歌、游记和小说。

〔10〕 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 1725—1774）曾就职东印度公司。1748年在对法战争中表现出色，1751年在攻占阿尔果德的战役和1752年解救被围困的特里奇诺波利要塞的战役中起了决定作用。

〔11〕 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 1727—1759）曾在欧洲战场作战，后被任命为司令官派到北美战场，主要与法国争夺那里的殖民地，比如魁北克。战争有胜有负，他于1759战死在亚伯拉罕平原上。

〔12〕 约翰·斯图亚特·比特（John Stuart Bute, 1713—1792）是威尔士亲王的好友，当亲王继位成为乔治三世后比特被任命为重臣，后接替皮特的首相职位。

〔13〕 伊斯雷尔·摩迪特（Israel Mauduit, 1708—1787），著名的非国教牧师，在政治上十分活跃。

〔14〕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在位）。在七年战争中他与奥地利、法国和俄国交战，只有英国是他的同盟。后来仰慕他的俄国彼得三世及时登基并退出战争，他才取得了胜利，普鲁士也成为欧洲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

〔15〕 凡·戴克（Van Dyck, 1601—c. 1672），佛兰德斯画家，英王查理

一世的宫廷画师。

〔16〕 卡文迪什家族（the Cavendishes）大约指的是纽卡斯尔公爵（第一），即威廉·卡文迪什（1593?—1676）的后人。威廉·卡文迪什是清教革命中的保王党。查理一世失败后他逃往欧洲。1660年复辟时，随查理二世一道回国。

〔17〕 菲利普·哈德威克（Philip Hardwicke, 1690—1764）1737—1756年间任大法官，积极支持镇压詹姆士二世党人。

〔18〕 英文是“乔治二世”，可能是印刷错误。

〔19〕 查尔斯·罗金厄姆（Charles Rockingham, 1730—1782）是乔治三世时期反对党辉格党的领袖。1765年出任联合政府首相，1782年诺思下台后他再次出任首相，但没有等到和平条约签订就去世了。

〔20〕 奥古斯都·亨利·菲茨罗伊，格拉夫顿公爵（第三）（Augustus Henry FitzRoy, 3rd Duke of Grafton, 1735—1811）于1768—1770年间任首相，是他在任期里逮捕了威尔克斯。

〔21〕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出生于爱尔兰，著有不少政论和文学、文艺理论文章，对政治很投入，持辉格立场。他做过爱尔兰总领汉密尔顿以及辉格首相罗金厄姆的秘书，为争取下议院的自由、为反对英国对美洲殖民地课税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22〕 这里指北部的苏格兰和南边的英格兰。

〔23〕 即苏格兰人。

第六章

叛乱和改革

新政权统治的初期由于政治上出现了一些鲜明的特色已是很引人注目。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期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英国人在海外的角色，特别是对七年战争后必然形成的帝国有了新认识。

西方和东方

实现对北美洲的有效霸权是极具诱惑力的。帝国的公务员和大臣们在18世纪60年代初曾沉浸在一阵短暂的海阔天空的设想与规划中，他们为大洋彼岸的殖民地设计了一个崭新而美好的未来。魁北克盛产鱼虾和皮毛，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丰饶之地。由于增添了加拿大和佛罗里达的新拓居地，北美殖民地将成为一个忠实于英国产品的巨大而广阔的市场，一个基本原材料的持续来源地，甚至成为国库收入的一个新来源（这个前景对于一个债务累累的宗主国来说十分诱人）。西印度群岛被牢牢置于一个受到更有效监控的商业体系中，它会让当时日益繁荣的奴隶贸易利润最大化，保证热带产品源源不断的供应，并成为商业入侵西班牙帝国的重要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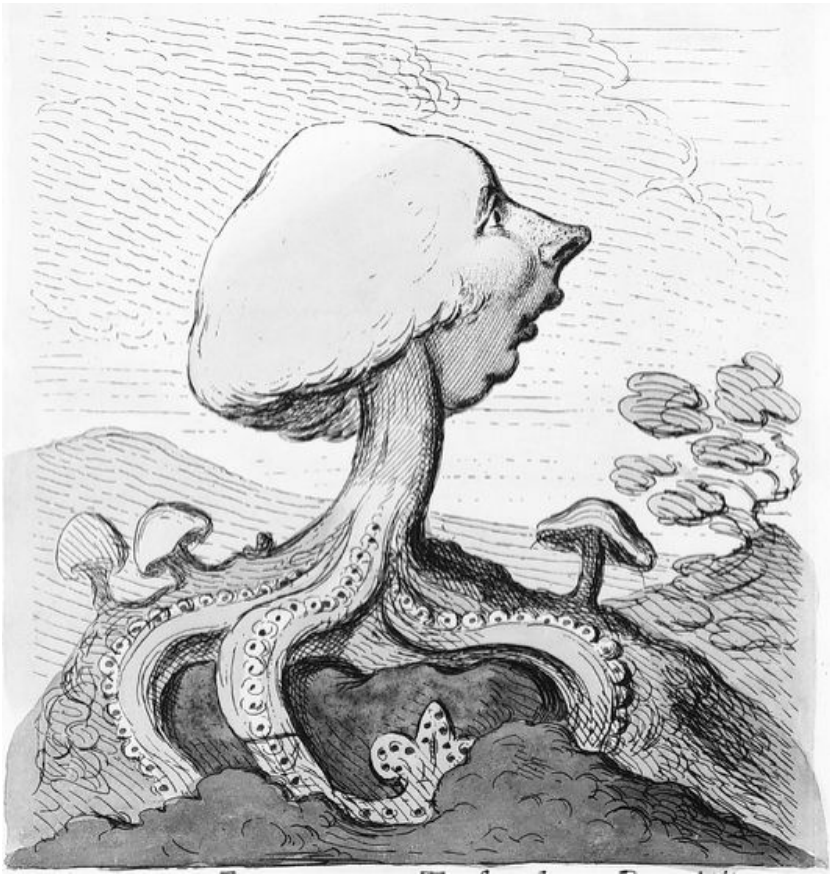

图10　小皮特：赞许和反对。表达好感的肖像画（上图）的作者是庚斯博罗，表达反感的漫画（下图）由吉尔雷创作。将第二幅画与图2　的漫画比较可以看出，政治漫画自沃波尔时代以来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

在东方，出现了更加壮观更加激动人心的前景。自克莱武于1757年在普拉西取得胜利后，不列颠成为次大陆上头号欧洲强国。严格说来，英国在东印度群岛没有殖民地。但事实上，从此时起，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已经无可避免地参与到了实际的拓殖活动中。在这方面，1765年与普拉西之战一样，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尽管它是普拉西战役之后的必然结果，克莱武在这一年正式代表该公司接受孟加拉的迪瓦尼（即土地税），由此开始对该地进行直接的政治控制，而不再只是进行商业活动。

这些事件改变了英国人对印度的看法。新领地充满异国情调，而且让人们见识了一种先前不被欣赏的文化，这些特点让新帝国的影响显得格外有力。弗朗西斯·海曼[1]的巨幅肖像画较早地表现了这种影响，画中描绘了克莱武接受当地王公臣服的场面，这幅画于1765年被立在莱内拉这个当时上流社会出入的娱乐之地。亚洲奇珍异品的进口量剧增，人们第一次因了解而开始对印度社会产生了某种真正的兴趣。

图11　父与子。乔治三世与儿子之间的反差比其他汉诺威王朝的父子要更明显。国王与他的妻子（上图）为吉尔雷提供了一种稳重朴素的家庭生活的样板；在这幅画中，他们正在前往他们所喜爱的温莎，他们的举止更像是从市场归来的一个农夫和他的老婆。而乔治亲王（下图）却相反，不仅行为放荡，政治上更是企图颠覆破坏；画中描绘的是1785年他与菲茨赫伯特夫人婚后的早晨，这次未经准许的婚姻没能被隐瞒住。

从其他方面来看，在东方取得新领地的过程可没那么文明高雅和浪漫动人。在1768年大选中，新闻突出报道的是一些选区中出现了一批从东印度公司退职回来的人，他们利用据说是以不正当手段敛取的财富来买通进入议会之路。“在印度发财的人”回来了。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的违法和罪恶行为总是被夸大。其实，他们大体上与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土耳其商人”、“财界人物”以及让缺乏“多样化”生财之道的老式家族憎恨的其他拥有非常规收益的人没有差别。但是，他们的出现必然引起强烈的好奇并最终引起广泛的关注。

克莱武本人就是贪婪的“印度发财归来者”的化身。他在东印度公

司供职期间不择手段地大肆敛取个人财富，极典型地代表了整整一个阶层的人，他们把帝国作为迅速牟取财富，哪怕是罪恶财富的手段。诱惑似乎不只限于印度。在得到孟加拉的迪瓦尼后出现了疯狂投机买卖东印度公司股票的情形，导致该公司不断发生财务危机，而且政府对其活动的关注也在不断加强，这一切都使东印度政治的复杂性和腐败频现的特点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美洲战争

美洲方面没有出现发财归来的人这类问题，但是美洲殖民地的维持和扩张造成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甚至比在东方扩张的后果更大，而且其后续的影响更广泛。英国的大臣们非常清楚他们大洋彼岸那些臣民的价值，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伦敦的干预问题上，这十三个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态度。而且，他们也没弄明白那群大约只有250万人的遥远、富足、机智的移民有多大的能力来阻挡和抵制帝国的力量。结果导致在十年内英美关系危机不断，首先是1765年的《印花税法》，令美洲殖民地人民发出“无代表，不纳税”[2] 的抗议，并逐步升级，最终在1775年爆发叛乱和战争。

从英国的立场出发，即使在两个世纪后，也很难确定问题归根结底出在哪里。到1775年，战后大臣们的多数目标都已被明确或暗暗地放弃。1775年时，即使最乐观的人也不会认为美洲将成为罗金厄姆侯爵所说的“岁入宝矿”。以武力镇压殖民地的代价注定会很昂贵，而且镇压的最终结果也同样难以预料。欧洲的敌人明摆着会把独立战争视为一个重新寻求均势的机会，借此摆脱七年战争给他们造成的不利处境。此外，还有些人不同意把整个美洲战争看作是商业法则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独立宣言》同年发表（而且碰巧与爱德华·吉本对罗马帝国历史作出悲观评价的史书[3] 第一卷同时出版），系统地推翻了帝国发展背后倚赖的经济理论。

然而，除少数人，即大都市的激进政治家和一些不信奉国教者以

外，大多数英国人强烈支持对美洲的战争。其中心原则，即维护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威，自然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个倡导该原则的伟大时代。威廉·布莱克斯通[4]于1765年发表著名的《英国法律评论》，毫不含糊、清楚明白地宣布了“君临议会”的无限法律权力；与美洲的冲突可能是其最清晰的表现。此外，事后看来似乎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论点在第一次被提出时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大多数英国人而言，他们唯一认可的是那个陈旧的重商主义帝国概念。对他们来说，拒绝完全接受议会最高权威的殖民地不仅毫无价值，而且十分危险。即使是许多更富有想象力的头脑也没能驳斥失控的帝国比根本没有帝国更糟这个信念。

这里，如果要说有的话，可以说是有年代与文化上的差异与冲突。定居美洲的人内心里维护的是17世纪英国人的权利。对他们而言，抵制印花税与约翰·汉普登[5]反对造船税的情形是一样的，一种凌驾于各州议会和地方权利之上的最高权威是不可思议的。而另一方面，英国本土的人却在利用18世纪的武器，即议会的无上权威，来维护18世纪最珍视的信条之一，即一个商业体制中宗主国的权力是不可分割、不受限制的。于是只有凭武力来决定胜负了。

最终较量的结果是新的合众国获胜。在此过程中，战争对英国来说是一场灾难，远比1665—1667年第二次荷兰战争以来的任何局面都糟糕。这场战争由殖民地叛乱演变成一场反抗波旁君主政体的全面战争，且最终引起了与荷兰的战争并与其他列强形成一种“武装中立”的状态。1782—1783年的和平谈判挽回了部分损失。尽管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十三个殖民地，但1782年，海军上将罗德尼[6]在桑特群岛取得辉煌胜利，保住了英属西印度群岛，尤其是避免了乔治三世陷入难堪局面，他因此而不必放弃奥利弗·克伦威尔一个世纪前赢得的牙买加这个宝岛。在地中海，西班牙企图重新征服直布罗陀，但被击退。在印度，沃伦·黑斯廷斯[7]勇猛地捍卫克莱武取得的领地，击退了法国的报复和当地王侯的叛乱。

在家门口，英国甚至得更拼命地来维持对爱尔兰的控制。北美独立战争一方面给爱尔兰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也使

决心摆脱英国控制的爱尔兰爱国者获得了宝贵的时机。1780年，诺思实际上使爱尔兰商人在帝国经济中享有了同等的权利。1782年罗金厄姆正式承认爱尔兰的立法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能使爱尔兰留在帝国内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胜利。当时的人认为美国独立好似一粒难以下咽的药片，但除了十三个殖民地以外，帝国的大部分仍完好无恙，而且至少避免了战争最黑暗时期他们所惧怕的那种彻底的耻辱结局。

会社运动

美洲战争给国内带来的影响比其海外后果几乎更重大。一场世界战争给一个新兴工业社会带来了众多经济问题同时也对贸易造成了巨大的限制。在随后出现的经济衰退中，股票市场和土地价值跌到了多年未见的令人担忧的低水平。空前的高税收和迅速增加的国债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危机，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于是人们对政府、议会以及总的政治体制提出了根本质疑。在接踵而至的混乱局面中，比较保守的势力，尤其是乡绅，随着1779—1780年会社运动的展开也卷入了一场似乎是针对宪制的公开抨击活动中。各会社在郡县、首都以及外省城市都获得了广泛支持，他们要求改革的呼声超过了威尔克斯运动之外的一切狂热的激进分子。约克郡的牧师及乡绅克里斯托弗·维威尔〔8〕几乎成为这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领袖，但他本人不算是那种激进分子。不过，他要求消除有名无实的选区，要求扩大公民权以及要求推行不记名投票等，这些在当时都颇具前瞻性。此外，会社运动传递出了某种信息，或者说是由大都市的煽动者嘴里传达出了某种暗示，如约翰·杰布〔9〕和卡特赖特少校〔10〕在言谈中都明确表示，如果议会抵制改革，就应被郡代表们替代。

当时对这种新现象充满极度恐惧。事后看来，会社运动的气势和广度确实惊人。不少人认为它几乎促成了英国的改革，使得其可能性比随后50年中任何时候都更大。当该运动1780年达到顶峰时，在全国范围内就改革问题达成了程度不凡的共识。这时候，甚至下议院也

不顾政府内外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国王的影响力有所增大，并在不断增强，应当予以削弱”。这成为了随后近五年之久的激烈政治争论和持续思想冲突开始的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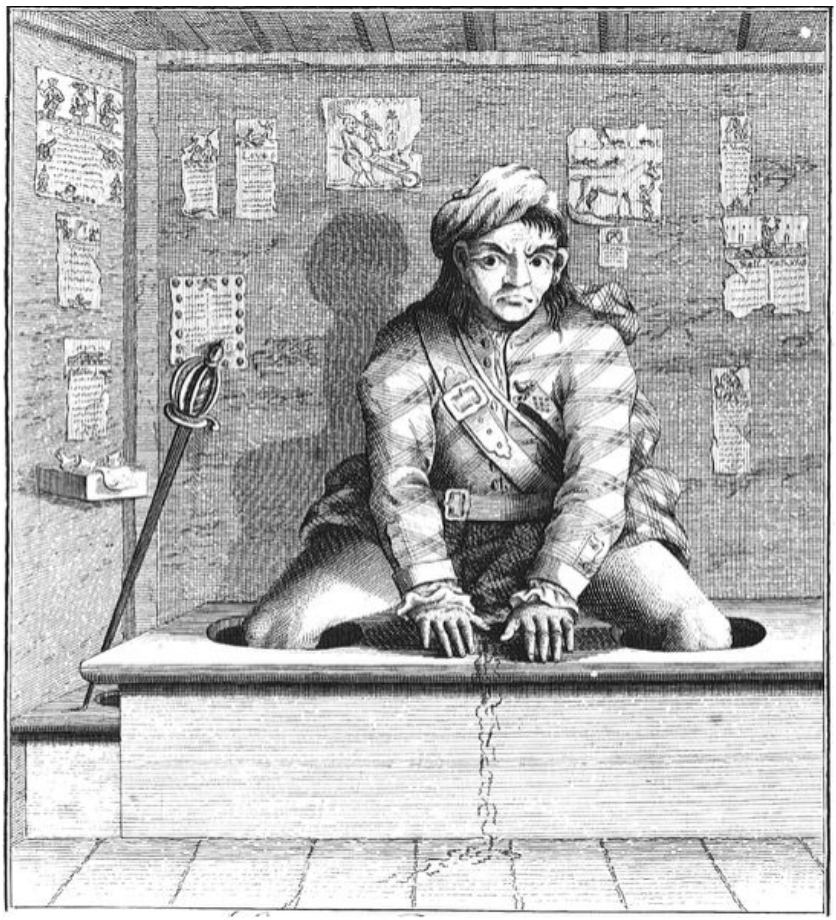

图12　文明教化的使命。尽管联合王国这种形式是成功的，苏格兰人在英格兰仍然遭遇不少敌意。这幅画最初发表于1745年詹姆士叛乱时，后来又多次被复制，它描绘的是一个苏格兰人不熟悉伦敦的公共厕所。

那么，为什么会社运动没能完成其任务？当1782年诺思让位而由辉格党短暂执政时，伯克及其同僚设法对议会进行了几项改革，撤掉了一些名声不好的挂名职位，并规定要更加仔细地审查国王的经费。

但事实上，议会改革困难重重。即使当小皮特于1783年获得最高执政权以及议会中的财政部官员经首相批准正式提出了改革建议时，它并没有获得议会中多数人的支持。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会社运动兴起的环境有关。当时进行彻底改革的热情有限，而且主要局限于善于发表意见的人和城市居民中。有时声响虽超乎寻常的大，但真正得到的支持，即使在城市资产阶级中也很有限。18世纪的议会，不论其在选举方面有多少缺陷，对小资产者和中产阶级的要求还是非常敏感的。许多法律都以他们的商业和产业利益为目标。还有更多的法律赋予了他们在各自地区的诸多权力，使他们能够控制各种法定机构，从收税路和运河托拉斯到改良委员会和执行济贫法的团体。对于那些受益人来说，进行议会改革的理由看上去很不充分。

会社运动源于一场全国危机，在此期间，对现有政治的任何系统批评都会引起关注。改革者针对朝廷体制的浪费和低效发出的大声抗议似乎特别合情合理。30年后也因为相同的原因又出现了相同的现象，由于与拿破仑一世的战争开支巨大，引起经济危机，激起了类似的抗议。但是这些状况没有持续很久，对改革的兴趣也大多随着这些状况的结束而消失。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日益感到商业在复苏，财政状况在恢复，这都是小皮特的政策发挥了效力。繁荣比任何争论都更有效地消除了激发改革的因素。

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人们普遍对极端分子的举措越来越感到担忧。改革运动的狂热分子似乎不只是指责朝廷的腐败政治，而且还质疑背后支撑它的宪法框架，甚至抨击有产阶级本身。在早期改革运动的论著中已经可以看见后来“人权派”的影子。按照后来的标准，像理查德·普赖斯〔11〕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2〕这样的人其实都算是相当温和的。但是，他们所挑战的是他们那个时代一些最顽固的看法和很习以为常的思想，因此要攻破他们与边远地区贵族和外省商人的脆弱联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图13　文明教化的使命。对南太平洋的探索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兴趣，给予了人们更多机会去释放他们那略带好色色彩的对高贵野蛮人的狂热崇拜，如G.济慈的《帛琉群岛记述》（1788）中的这些插图所描绘的一样。Lee Boo（上图）被当作一个奇特罕见人物在英格兰展出，而且被当作一个活的教育实验品；这一实验尚未持续6个月，Lee　Boo便死于天花。Ludee（下图）留在她那天堂般的岛屿上，但作为土著美人的典范，她也同样很有启发意义。

暴乱和反响

在这种情况下，戈登暴乱尤其具有破坏性。改革者与戈登领导的暴乱者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这些暴乱者在1780年春将伦敦置于自己摆布之下近一周，并大肆进行谋杀和破坏。他们的行为乃是赤裸裸的宗教偏见，旨在取消1778年在政府和对立派双方支持下通过的针对罗马天主教徒的宽大措施。与1753—1754年《犹太法案》的情况一样，立法机构显然很容易与民众的情感脱节。反天主教的领袖乔治·戈登称自己的运动为新教会社运动，受到惊吓的有产者很容易将暴乱者与更体面的会社会员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随后数年中在英国出现的有名的保守主义浪潮或许可以上溯至这个时期。

18世纪80年代初期不仅从超议会层面上说是动荡的，而且，这些年还与60年代一样，政治局面极其不稳定。这也是改革失败的一个因素。1782年以前，议会中的改革者松散地聚集在两个主要辉格党集团周围，即罗金厄姆侯爵一派和谢尔本伯爵〔13〕一派。这两个得到认可的派别分别代表辉格党主张的不同传统，罗金厄姆一派的传统可以追溯至纽卡斯尔和老辉格党家族，而谢尔本一派的传统则可以上溯至老皮特。每一派中最有前途的人才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14〕是罗金厄姆派最激进的支持者之一，也是这一派中最得人心的。他是老皮特的一个对手亨利·福克斯的儿子，在新的统治时期曾是比特伯爵短暂利用的工具。在谢尔本派中有小皮特——用伯克的话说，他不只是“酷似父亲的儿子”，而简直就是“他父亲的再现”。这两人都是真正的改革者，似乎都能给一个已经倦怠但仍然乐观的时代提供一条全新之道，并且都使人们看到了迎来新领导人的希望，一改此前由那些曾在美洲战争中决策失当而名誉扫地的人所维持的政治现状。

不幸的是，他们两人成了对手而不是同盟，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在诺思首相1782年辞职后的复杂、严峻政治环境中，事实证明他们之间的敌意事关重大。福克斯主动采取行动，企图全面控制内阁，而国王对由这样一个令他讨厌的人独揽大权感到厌恶。在1782年夏罗

金厄姆死后发生的斗争中，福克斯采取的手段是与他的旧敌诺思结成肮脏的联盟。这个联盟令人极其恼火并遭到普遍蔑视，但在福克斯看来，通过它能够控制下议院，并由此控制政府，这似乎太重要了，足以让他忽略言行需要前后一致这一点。

但是，福克斯的逻辑还是存有缺陷。他的内阁，即臭名昭著的福克斯 - 诺思联盟，没有持续多久。国王本人对此强烈反对，并有步骤地筹划将其摧毁。皮特也强烈反对，他不想依附福克斯，而且由衷厌恶诺思。当福克斯热切地提议彻底重组东印度公司时，他实际上是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皮特和国王可以提请国民公断解散议会。乔治三世授意上议院否决《印度草案》，之后皮特受命执政，1784年春季宣布举行大选。

结果可想而知。福克斯全面受挫，不只是在财政部可以施加影响的范围内，而且在公众舆论相当重要、民众明显厌恶他的更广泛和更开放的选区范围内。事态平息之后，皮特稳稳坐上首相之位，辉格党被彻底挫败。最重要的是，人们期望福克斯与皮特能够结成联盟反对乔治三世和诺思，实现众盼的改革，但这种期望被葬送了，似乎被福克斯这个“人民宠儿”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行为所扼杀了。

经济和行政改革

也许改革无论如何都行不通。皮特曾按照他年轻时的意向，提出过一项改革动议，但他知道没有国王的支持那是不会成功的，作为首相的皮特对激进政治活动没有什么兴趣。他证明了自己是个改革者，但改革不能触及影响教会和国家体制的问题。“经济改革者们”就减少朝廷腐败和浪费现象提出的许多要求都将在皮特执政时期得到落实。而且，在他指导下，英国极其踌躇不决地向自由贸易迈出了第一步，其中突出的事件便是1787年与法国签署了商业条约。

棘手的帝国问题也得到了谨慎而富有创见的处理。爱尔兰人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要不是英格兰中部地区和兰开夏郡的生

产商反对，皮特会给予爱尔兰与母亲国同等的商业机会，以确保他们的忠诚。由于他没能这样做，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关系便陷入一种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状态。《东印度公司法案》最终使政府在东印度公司的事务上，至少在不专门涉及贸易的事务上有了决定权，从而使得印度这个英国政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得以解决。美洲战争后，反对独立的亲英殖民者流入加拿大，此间魁北克面临着难以处理的“种族”问题，在这种形势下，1791年英国给加拿大立了一项法案，[15] 尽管不易维持，但仍持续到了1867年。

皮特的至高地位在许多方面显得非常传统。从根本上他受惠于朝廷并得到国王的支持。他于1784年获得的胜利，就像丹比或森德兰们所斩获的，也同样可以看作是国王的胜利。皮特的对立派似乎也很传统。福克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王位继承人，即未来的乔治四世，而这个未来的国王在政治、财政和性关系方面哗众取宠的行为与他之前任何王位继承人的行为一样令国王感到失望之极。

但是，在其他方面，皮特和他的活动体现了那几年的改变。当时正值大量观念发生变化之时，他所进行的行政和经济改革很容易被当作当时的政治保守主义。尽管已可看到功利主义这一启蒙运动思想最兴盛的产物，杰里米·边沁[16] 和哲学激进主义者此时尚未在实用政治方面取得巨大突破，不过他们所带来的或采用的风格已经随处可见，正如福音主义的宗教影响一样。

新情感

这个时期真正具有影响的改革恰恰是那些道德、仁爱和实用主义方面符合福音派观念的“改善和进步”。约翰·霍华德[17] 于18世纪70和80年代中进行了著名的监狱改革运动。用伯克的话说，霍华德的“发现之旅”或“慈善环航”有力地促进了他所察看和描述过的慈善机构的改造工作。在这个积极进取的时代还涌现出许多主日学校，并且各处都在踊跃地成立由神职人员监督的互济会。下层阶级的传统娱乐活动，

特别是诸如斗鸡和纵狗咬牛等残忍虐待动物的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上层人士的指责和监督。

对帝国责任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伯克反对英属印度的救星沃伦·黑斯廷斯的运动旷日持久。尽管黑斯廷斯对某些指控显然负有罪责，但对他的弹劾仍然失败了。〔18〕不论有无获罪，黑斯廷斯都可以被视为公众道德标准变化的牺牲品。克莱武那类人原先还可能得到宽恕，而现在却不再被容忍。殖民地人民的待遇在宗主国不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从北美印第安人到库克船长的南海岛民，对这些“未开化”民族的兴趣，就像伯克为那些更文明更进步但同样被征服的亚洲人感到的愤慨那样，都表明了当时的人们对帝国受害者的境况怀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的新情感。

这种新情感首先发难的目标当然是最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虽然格兰维尔·夏普〔19〕在18世纪70年代最初几年以及威廉·威尔伯福斯〔20〕在80年代领导的运动要等到多年后才能最终取得成功，但在此期间一直不断有胜利。1772年的詹姆斯·萨莫塞特〔21〕案中，一名被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带到伦敦的黑奴获得了自由，理由是英国没有法律授权准许“奴役这种高度支配的行为”。这一判决的社会效应远远超过了其法律意义，但它所引起的关注却体现了18世纪末期思想的精髓，即强调人人平等、宗教救赎和政治保守主义。威尔伯福斯及其同伴是教会和国家当权派的坚定捍卫者，对激进政治完全不感兴趣。在这方面，他们表现出新工业时代英国的商业阶级那种严肃认真的福音派热情。不论这种政治体制被认为多么不具代表性，但威尔伯福斯的朋友皮特正是这些阶级的最好代表。而且，也正是他们对财产权益出于本能的坚决维护，加上积极的商业进取心和极其严肃认真的道德观念在后来把美洲战争后的英国带入了法国大革命时代。

注释

〔1〕 弗朗西斯·海曼（Francis Hayman, 1708—1776），英国著名画家，以肖像画、公共场所装饰画等作品知名。他在作品中引入了法国的洛可可风格。

〔2〕 《印花税法》：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把英国的印花税征收

扩大到北美殖民地，要求所有出版物和法律文件都必须盖印。这引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极大的不满和各种抵制行动，最后他们召开了专门的《印花税法》代表大会，发表了文献声明，指出既然殖民地在英国议会里没有代表，那么这个议会的一切决议和法令对他们就是无效的。1766年英国议会被迫撤销了这个法令。

〔3〕 《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历史巨作，共6卷。

〔4〕 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 1723—1780），爵士，法学家。他写了一部四卷本的著作，对英国法律进行评介。

〔5〕 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 1594—1643），17世纪反对查理一世的议会领袖之一。1636年他拒付查理强征的造船税而被捕。这件事成为引发革命的一个导火索。

〔6〕 乔治·罗德尼（George Rodney, 1719—1792），男爵，海军上将，主要在西印度群岛一带的海上与西班牙和法国作战。在桑特群岛（the Saints）他击败了法国的格拉塞上将，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7〕 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 1732—1818），英国驻英属印度的第一任总领事（governor general）。他在印度实施了强硬的司法和金融改革，并镇压匪盗活动。1784年他辞职返回英国，1787年被国内民主自由派人士指控，埃德蒙·伯克是最激烈的指控者之一。他的案子拖了很久，最后被宣判无罪。在本章后面的“新情感”一节里提到了对他的审判。

〔8〕 克里斯托弗·维威尔（Christopher Wyvill, 1740—1822），约克郡牧师。他于1779年发起成立了约克郡会社，并召集会议向政府提出抗议，引发了全国范围内郡县的会社运动。

〔9〕 约翰·杰布（John Jebb, 1736—1786）的身份很多。他曾是剑桥的教师、学者，后又进入教会，成为非国教牧师。他还是作家和社会改革者，观点十分激进。

〔10〕 约翰·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 1740—1824）曾在海军中任职，是个改革者，主张给所有男性以选举权，倡议废除奴隶制，要求进行议会和军队改革。

〔11〕 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 1723—1791），非国教牧师，富兰克林的好友，支持北美独立和法国革命。

〔12〕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长老会教派牧师，后转为一神教派成员。他在政治上很激进，曾在演讲中比喻性地表示应该把旧的政体炸毁，并公开支持法国革命。后移民美国。

〔13〕 威廉·谢尔本（William Shelburne, 1737—1805），伯爵，曾任国

务卿。他于1782年任首相，美国在他任期内获得独立。1783年他被托利和辉格连手整下台。

〔14〕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政客，特别擅长演讲。他在诺思手下得到重用，推进议会改革多年。1774年他被辞退，转而反对诺思，四处讲演攻击诺思的对美政策。谢尔本上台后他又与诺思联合，以保证击败谢尔本。

〔15〕 即1791年的《加拿大法》，把加拿大分为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前者是英国人的定居地，后者是法国人的居住点。

〔16〕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英国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他系统地阐述了功利的政治和伦理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世界观。

〔17〕 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 1726—1790），英国监狱改革的推动者。他在改善监狱的卫生状况和人道主义管理方面取得的成绩在欧洲和美国都有影响。

〔18〕 伯克曾就英国与印度的关系发表过一系列讲演和文章，其中最有名的是涉及黑斯廷斯案件的文章。他对东印度公司盘剥印度人民提出了异议，呼吁公正执法。

〔19〕 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 1735—1813），改革家和学者，主张废除奴隶制度。

〔20〕 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下议院议员，人道主义者。他是皮特的支持者，后受福音教派影响，在议会中领导反对贩卖奴隶运动达20年。

〔21〕 詹姆斯·萨莫塞特（James Sommersett）是1771年从美洲弗吉尼亚被带到英国的奴隶，从主人那里逃走后被抓回来并押上开往牙买加的船。这个案子上了法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判定他的主人无权强迫一个奴隶去外国。萨莫塞特因此获得自由。这个名字在网上拼写为Somerset。

第七章

结束语

1688年革命过去一个世纪后，有人想纪念其一百周年，当然对于某些相关者来说，“纪念”一词不完全准确。18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运动的失败使其拥护者陷入一种理想破灭的精神状态。不信奉国教者再次试图取消《宗教考查法》和《市镇社团法》，但在议会中受到重挫。1788年乔治三世出现明显精神错乱，辉格党想乘机在其子摄政王统治下组建新政府。但是，国王于1789年康复，使皮特的内阁得到保全，让全国上下感到宽慰，令该政权的反对派十分气馁。有些人认为乔治三世和皮特1784年的胜利使宪制时钟倒退回了查理二世时代，因此他们觉得没什么理由为革命一百周年感到高兴，倒是有很多理由为其遭背叛感到悲哀。

维护该政权的人更愿意赞扬其近期的成就，而不愿去搜寻17世纪的先例。18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的速度令那些将丧失十三个殖民地视为英国繁荣之丧钟的人感到困惑。自1783年起，联合王国在欧洲大陆和海外的外交声望和影响都显著恢复。1788和1789年法国事态的惊人发展表明，这个英国长期以来的敌人和对手，即使不消亡，至少也会伤筋动骨，元气大伤。一个控制世界贸易和版图的帝国重新焕发了活力。

许多外国观察者和访问者都对英国印象深刻，认为它是18世纪国家中的奇迹。对权力与财富的传统分析无法解释其成功。当时国际上的多数成功都与统治者的性格或政府体制的特点有关。英国的几代乔治几乎无法与路易十四或腓特烈二世[1]相比。英国靠其国债，及其显然无穷尽的自我借贷能力证明了其作为一部战争机器的威力。但它缺乏欧洲大陆军事国家所拥有的大部分军力，并且曾在此前那个世纪与自己的臣民发生龃龉时在较量中失利。从任何外部标准来看，其新闻都非常自由。总体说，人身自由方面英国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宗教自由和宽容具有比其他多数社会更久远和更稳固的基础。国家的慈善机构得到了，如果不能说是普遍的，至少也是广泛的支持。所有这些都表明，英国不是一个高度军事化、君主专制或官僚国家，而是一个充满自信的私有制政体，虽然有些自负。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几乎感觉不到这场革命预示着什么。外国人以及不列颠人很容易把大不列颠群岛视为一个新式而现代之地，集经济增长、政治成熟及帝国力量于一身，其规模非其他国家能比。与一个世纪前的路易十四相比，路易十六遭到的羞辱只会更加突出英国取得的明显进步，巴士底的废墟鲜明地衬托出温莎的辉煌。1689年时不安全感是英国国内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1789年时则几乎没有了这种迹象。

注释

〔1〕 即腓特烈大帝。

年表

1688年	詹姆士二世之子降生；奥兰治的威廉入驻；詹姆士二世逃亡，（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和玛丽即位
1689年	《权利法案》解决了王位继承问题并宣布各种不满为不合法行为；《宽容法》[1] 给予非国教信仰者中信仰三位一体的新教徒一些权利
1690年	博因河战役：威廉三世击败爱尔兰和法国军队
1694年	英格兰银行成立；玛丽女王去世；《三年法案》规定一届议会最长期限为三年
1695年	《许可证法案》失效
1697年	奥格斯堡同盟军与法国之间达成《里斯维克和平条约》；《王室费法案》提议划拨资金维持王室生活
1701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开始；《王位继承法》决定由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娅的后代继承王位
1702年	威廉三世去世；安妮继承王位
1704年	布伦海姆战役：英国、荷兰、德国和奥地利军队击败法国和巴伐利亚军队；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直布罗陀
1707年	英格兰和苏格兰成立联合王国
1710年	弹劾萨谢弗雷尔；罗伯特·哈利内阁
1713年	缔结《乌得勒支和约》，就此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

1714年	安妮去世；乔治一世即位
1715年	企图推翻汉诺威王朝继承王位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叛乱失败
1716年	《七年法案》规定一届议会最长期限为七年
1717年	辉格党分裂；停止召集议会会议
1720年	南海泡沫事件：许多投资者在对南海公司股票进行投机买卖后破产
1721年	罗伯特·沃波尔内阁
1722年	阿特伯里（Atterbury）阴谋，知名的詹姆士二世党人阴谋
1726年	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出版
1727年	乔治一世去世；乔治二世即位
1729年	亚历山大·蒲柏的《群愚史诗》出版
1730年	沃波尔／汤森分裂
1733年	消费税危机：沃波尔不得不放弃他改革关税和消费税的计划
1737年	卡罗琳王后去世
1738年	约翰·卫斯理经历了“信仰皈依”[2]
1739年	与西班牙之间爆发“詹金斯的耳朵”战争[3]
1740年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
1741年	塞缪尔·理查逊的《帕美勒》出版
1742年	沃波尔倒台
1743年	亨利·佩勒姆内阁
1745年	詹姆士二世党人叛乱
1746年	卡伦顿战役：坎伯兰公爵打垮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军队

1748年	《亚琛（Aix-la-Chapelle）和约》结束奥地利王位继承战
1752年	采用公历
1753年	《犹太人归化入籍法案》
1754年	纽卡斯尔内阁
1756年	七年战争：英国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联手对抗法国、奥地利和俄国
1757年	威廉·皮特和纽卡斯尔内阁；普拉西战役获胜
1759年	从法国手中夺取魁北克
1760年	乔治二世去世；乔治三世即位
1761年	劳伦斯·斯特恩的《商第传》出版
1762年	比特内阁
1763年	《巴黎和约》结束七年战争；乔治·格伦维尔内阁；约翰·威尔克斯和“通用拘票”
1765年	罗金厄姆内阁；美洲印花税风波
1766年	查塔姆内阁
1768年	格拉夫顿内阁；米德尔塞克斯选举危机
1769年	詹姆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获得专利
1770年	诺思伯爵的内阁；埃德蒙·伯克的《关于当前不满的原因之思考》出版；福克兰群岛危机
1773年	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4年	通过《强制法案》以反击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6年	《美国独立宣言》；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亚当·斯

	密的《国富论》出版
1779年	克里斯托弗·维威尔的会社运动
1780年	戈登暴乱反对《天主教徒解救法案》
1781年	美国在约克镇战役中获胜
1782年	第二届罗金厄姆内阁
1783年	谢尔本内阁；《凡尔赛和约》承认北美殖民地独立；福克斯 - 诺思联盟；小皮特内阁
1784年	《东印度公司法案》
1785年	皮特关于议会改革的动议受挫
1786年	与法国签署《伊甸条约》
1788年	摄政危机
1789年	法国大革命

注释

〔1〕 《宽容法》也有人翻译为《信仰自由法案》，它给予除天主教和一神教之外的所有不信仰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以信仰自由。

〔2〕 这一年的5月24日在伦敦的一个小型宗教集会上当卫斯理聆听牧师诵读路德为《罗马书》写的序言时，他忽然经历了虔诚信仰耶稣所带来的被拯救的感觉。

〔3〕 “詹金斯的耳朵”是战争爆发的借口，或称导火索。

历任首相名录1721—1789年

罗伯特·沃波尔	1721年4月
威尔明顿伯爵	1741年2月
亨利·佩勒姆	1743年8月
纽卡斯尔公爵	1754年3月
德文郡公爵	1756年11月
纽卡斯尔公爵	1757年7月
比特伯爵	1762年5月
乔治·格伦维尔	1763年4月
罗金厄姆侯爵	1765年7月
查塔姆伯爵	1766年7月
格拉夫顿公爵	1768年10月
诺思伯爵	1770年1月
罗金厄姆侯爵	1782年3月
谢尔本伯爵	1782年7月
波特兰公爵	1783年4月
威廉·皮特	1783年12月

译后记

由于这本历史是特别短小型的，因此它重在表述作者的观点，并试图纠正人们通常对这段历史的看法，而不在于介绍史实。结果是对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一带而过，或跳过许多细节，或前后重复提及。这样就可能造成对18世纪历史不够熟悉的读者阅读时的困难。为此，译者加了一些注释。另外，原作者常使用短小的、类似标题或结论的句子，没有较缜密的上下文联系，而且常常缺少中文句式习惯的主语。为此，译者在遵从原文的大原则下有时添加了主语（如英国）、连接词、转意词等。比如第六章的“美洲战争”一节的第一句话“美洲没有从印度发财回来的人”（America had no nabobs...）本身意思很不清楚，不能死翻。它实际是承接着上面一节谈东印度公司带给英国的问题后的转折语句。所以我们就翻译成“美洲方面没有出现发财归来的人这类问题”，但这类灵活翻译的例子是很少数的。

考虑到这是译著，所以书中提到的历史人物我们没有用括号在人名后面给出英文，而是大多都用作注的办法给出了英文全名、生卒年代和简单的事迹介绍，为的是便于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去查找。但是在插图中出现的人名，除了凡·戴克外，就不作注了。

关于人名和地名译法，我们尽量做到有根据，如来自英汉词典、网上资料，或其他文学和历史著作。有个别的译名处理带有较浓的译者个人喜好色彩，比如英国国王James，我们一律译成“詹姆士”，而其他的所有叫这个名字的人都译成“詹姆斯”，就好像Charles I和Charles II大家都接受“查理”的译法，而指普通人的话就译成“查尔斯”了。

最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咨询过钱佼汝和韩加明两位教授，特此向他们致谢。

2008年春于北京

译者简介

刘意青： 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英国十八世纪文学、英美和加拿大小说，还有圣经的文学阐释。专著和编著有《圣经故事100篇》、《女性心理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英文）、《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与罗经国联合主编）、《英国十八世纪文学史》。翻译过英美诗歌、英国和加拿大短篇小说、诺贝尔获奖小说节选、美国文化方面的著作等等。还在国内重点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康勤： 专职翻译工作者，持有文学硕士和联合国T2翻译级别资格。通晓法语和英语，除了在联合国担任了数年笔译工作，进行英汉和汉英双向翻译之外，还翻译过英美的文化和文学作品。在法译中方面，参加翻译过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如莫泊桑的小说，以及若干现当代作家如杜拉斯等的作品。

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没有波澜壮阔的变革景象，但18世纪这百年间英国无论在经济发展方面、政治制度与体制方面，还是在文化思维意识方面，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个岛国一步步迈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是无意间开启了神秘的崛起之门？是偶然发现了现代之路？还是其中蕴含了必然？

百科通识文库

49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

——十九世纪英国

克里斯托弗·哈维 科林·马修 著
韩敏中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

——十九世纪英国

克里斯托弗·哈维　科林·马修　著　韩敏中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46**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0.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0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Christopher Harvie and the estate of H.C.G. Matthew 2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十九世纪英国／（英）哈维（Harvie, C.），（英）马修（Matthew, H. C. G.）著；韩敏中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91-5

I．①日…　II．①哈…　②马…　③韩…　III．①英国 - 近代史 - 19世纪　IV．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39号

地图审图号：GS（2007）第439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91-5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哈维和科林·马修都在爱丁堡长大并接受教育。哈维曾执教英国开放大学，后成为德国图宾根大学的英国与爱尔兰研究教授，是现代苏格兰和北海石油方面的史学学者。科林·马修编撰了《格莱斯顿日记》，还为这位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家写过传记并获奖；他从1992年至1999年逝世的这段时间，一直担任《新编英国传记大辞典》的主编。

译者简介

韩敏中，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19世纪英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专著有《欧洲文学史——十九世纪卷》（合著），译著有《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和《殖民与后殖民文学》（合译）等。

目　录

插图目录
地图目录
第一章　对革命的反思
第二章　工业的发展
第三章　改革和宗教
第四章　海外战争
第五章　通向自由之路
第六章　应对改革
第七章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第八章　“隆隆作响的变化之辙”
第九章　政治和外交：帕默斯顿时代
第十章　融合
第十一章　自由贸易：不受节制的工业经济
第十二章　人口流动：城市和乡村
第十三章　大众和阶级：城市工人
第十四章　职员和商业：中产阶级下层
第十五章　有产阶级
第十六章　典仪
第十七章　“移风易俗”
第十八章　“城郊托利党人”：保守党的复兴
第十九章　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自治法受挫
第二十章　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
第二十一章　世纪末的反拨：新的国家观念
第二十二章　老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劳工主义及关税改革
第二十三章　爱德华时代：控制国家危机
第二十四章　“你那英国的夏季已经结束”

大事年表
历任首相名录 1789—1914
译后记
返回总目录

插图目录

图1　乔治四世，1792年时的威尔士亲王，詹姆斯·吉尔雷作。
图2　一家人，布拉泽霍尔的约翰·哈登作，1826年。
图3　戴维·威尔基爵士作，《爱尔兰的威士忌酒厂》，1840年。
图4　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中皮克顿将军之死。
图5　1848年4月10日在坎宁顿公地上举行的最后一次宪章派大集会。
图6　铁路时代的英国工程师群像，约翰·卢卡斯的作品，可能作于1849年。
图7　奥·韦·诺·皮金在他的《对比》（1840年）中描绘的一座工业化城市。
图8　1888—1889年正在建造的第四座大桥。
图9　维多利亚时代的折中主义：1868年大选时伯明翰的广告。
图10　1874年，在多塞特郡米尔波恩·圣安德鲁被扫地出门的农工。
图11　“家中的天使”，1865年。
图12　作巡回竞选演说的格莱斯顿，1885年。
图13　约瑟夫·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计划，弗·卡拉瑟斯·古尔德作，1903年。
图14　格拉斯哥的母子俩，约1910年。

地图目录

地图1　19世纪初期的运河体系
地图2　铁路，1825—1914年
地图3　城市人口增长，1841—1911年
地图4　英帝国的扩张，1815—1914年

第一章

对革命的反思

1881年，牛津大学的青年历史学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就“工业革命”的话题作了系列讲座，他在演讲中将工业革命视作英国历史中如同玫瑰战争似的一个明确的“时期”。这样的提法很容易误导，让人轻易想到这是一个“双重革命”的时期——在法国是政治革命，在英国则是工业革命。然而，攻陷巴士底狱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可工业化的影响却是渐进的，相对的；其效果只有在事后反观时才显现出来。“革命”的观念对英国人来说有点不知所云，他们听见这个词就不寒而栗，不像欧洲人能身临其境地理解革命。事实上，是一位法国人、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在1827年时首先使用了革命这个比喻；1848年以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则使革命的概念在欧洲流传开来。

于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有些棘手，他必须比较衡量对现在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和过去看重的事情。前者引导我们注意工业上的变革以及在不受关注的工场车间中出现的新的作业方法；后者则提醒我们，前工业时代统治阶级权力的衰落有多么缓慢，而科学时代里的宗教势力又是多么坚韧。只是到了1830年左右，人们才意识到发生了实质的和持久的工业变革；就连中产阶级自身也还要再过20年才相信，工业化是好的转变。

统计与社会背景

发生的变化难道不应有简明的事实记录吗？在理论上说是这样的。然而那个“事实至上”的年代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加之又特别注重个人主义，所以记录发生的事情和对之作出评价就是另一回事了。直到1801年英国才开始官方的人口普查，而在这以前，有关英国人口究竟是增长了还是减少了一直就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后来普查发展为涵盖职业和住房状况的非常成熟的社会分析工具，但是这个过程进展缓慢；同样缓慢的是绘制全国地形图的进程：1791年至19世纪60年代，全国地形测量局分几个阶段逐步进行了全国陆地地形的测量

工作。普遍的“自由放任主义”意识和政府紧缩经费的政策都对统计数字的汇编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受到监管或是要纳税的货品或者企业都减少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大陆的独裁政府却热衷于搜集它们国内工业企业的数据，虽然这些企业的发展规模都不算大。）就这样，英国国内仍在激烈地争论着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特别是工业化对广大民众有无裨益的话题。

在这一问题上，现代政治也投下了阴影。和汤因比同时代的人都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及至1848年，资本主义工业化没能改善劳工阶级的状况。1917年后，苏维埃俄国似乎证明有另一种可行的选择，即“有计划的工业化”。但是苏联的做法在人的生活和自由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很快就显露出来；那些关注“发展中世界”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便重申通过自由市场的运作实现工业化的观点。他们论证说，即使在过去的短时期内，在很难提供投资资源的情况下，英国资本主义也已做到既增加了投资又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准。这场激烈的争论没有得出什么确定的结论；如考虑到英国的经济发展对爱尔兰、印度和美国南方诸州产生的直接的负面影响，那么上述争论的后果也仅限于一定的地理范围之内。

思想意识

如果说统计和社会环境方面存在着问题，那么意识的问题也同样存在。工业化的概念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产生。无论统治精英信奉什么样的经济学说，地方长官和土地拥有者的口号是稳定，他们的价值观仍是前工业社会的。但是，1829年时，工业化的大势突然明朗起来。就在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最后一部小说问世才11年后，《爱丁堡评论》杂志上一个粗嗓门的新声音描述了“时代的征兆”：“我们搬走大山，把大海当成平坦的大道，什么也挡不住我们。我们征战不开化的自然；我们的引擎所向披靡，我们总是满载战利品，得胜回朝。”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生动地、饱含感情地概括了

当时令人目不暇接的一幕幕情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在多部“威弗利”小说中曾描写过的从英雄政治向经济政治的转型；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那规划有序的新拉纳克工厂社区；走投无路的手摇纺机织工的空想政治；欧洲观摩者流露出来的惊恐和讶异等等。几个月后，卡莱尔的话在乔治·斯蒂芬森的“火箭号”[1] 中变成了铁的事实。

但是，从诸如此类的形象中，我们是否能得出同我们、也同那个时代相关的、前后一致的一整套思想呢？对那个时代作出开拓性探索的乔·马·扬（G. M. Young）在《时代肖像》（1936）一书中看出，“控制并激励了行动者的是福音教规之不可估量的强制力，以及几乎普遍的对进步的信念”。然而扬的历史记录的是“举足轻重者的言谈”，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精英的历史；它忽视了广大的民众——矿井和工厂的工人、爱尔兰的农场雇工、伦敦的街头流浪儿等，即便提到，也只是将他们当作“麻烦制造者”来看待。它缺乏列·托尔斯泰（Leo Tolstoy）在《战争与和平》中体现的那种极其犀利的洞察，即波澜壮阔的事件起源于普通人所作的无数次个人的决定。在与托尔斯泰笔下的法国、俄国士兵同时代的英国人中，很少有人同意那些“举足轻重的”决策者的看法：据我们所知，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走进过教堂，而从他们写的和读的东西来看，他们对进步几乎不抱任何信念。然而，无论那些受到“后人极端轻慢”的人的行动自由受到多大限制，他们的决定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倾听他们的言谈。

图1　“生活在消化不良恐惧之中的酒色之徒”。乔治四世，1792年时的威尔士亲王，身边全是他骄奢淫逸生活的物证——未清偿的赌债（尽管在1787年，议会经投票决定用16.1万英镑帮他渡过难关），还有透过窗子可以看到的、他在伦敦的豪华住宅卡尔顿公馆。这幅漫画是英国最具才华和最不讲情面的讽刺画家詹姆斯·吉尔雷（1757—1815）的作品，其漫画常以乔治四世为调侃对象。

法治

“后人极端轻慢”一语出自爱·帕·汤普森（E. P. Thompson）。他认为，一种持续性的解释框架确实存在，那就是“法律”。无论司法的施行中存在多大的偏颇——18世纪常见赫然无情的司法不公——可“法治”仍被视为全体共有的制度。在工业化的冲击下，这种对权利的要求仍然正当。1832年，年轻的议员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以保护法治不受滥用权力的侵害：“被法律压垮的人除了诉诸强力没有别的希望。假如法律以他们为敌，那么他们就会以法律为敌。”让法律“收编”新的团体，那么这些人就会尊重国家体制。这一思想抵消了工业变革引发的“革命性”后果，化解了企图从变化中创建新政治制度的多次尝试。

此外，法律法规的渐进式演变也为其他方面的社会政治变革提供了范型。1859年，在一次牛津的就职演说中，“上帝自然法则中那最美最妙的”部分变成了经济学，不过也同样可以是法学或是地质学。将法律与进步等同起来，就是将个人道德、技术革新、英国概念等等所有这些事物裹入进步的大潮，令一切顺流而行。

对所有的阶级而言，贿赂、无信仰、豪饮、淫荡、赌博等旧时的道德品行，即使说不上是反社会，但也已渐渐被视作是陈规陋习。从苏格兰或法国传过来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还有价格便宜的消费品，和“生命宗教”一样，都表明人的寿命可以延长，人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加精致而高尚。塞缪尔·佩皮斯曾把海军部里他下属的妻子们看作是他合理享有的“额外福利”；但是同样好色的詹姆斯·鲍斯韦尔却为妻子和家庭深感苦恼。[2] 这预示着将有新的道德规范出现，无论那是由腐败堕落的罪恶蓄奴制、普通大众的骚动或法国人催生，还是因天谴所致——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其诗作中就动人心魄地表现了这种天谴。

必须拿出证据，证明现状是否有所提高，有所改进。1839年，有英国游客很吃惊地发现匈牙利人自己的水域上竟然没有帆船，而他们的穆斯林邻居却在多瑙河上驾驶着三角帆船。无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出于保护桨手和骑手的利益，出于匈牙利贵族的自由运输权，还是出于对一切土耳其事物的厌恶——总之，那位游客的态度很

典型，将匈牙利人无航船当作一个实例，说明有“罪恶的利益集团”在阻挠改革和进步。

“进步”

“进步”和法治都不是必然而然的，只能在同国内“老的贪腐”和新的愤懑、国外的强大对手这些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得到。进步的意思是道德成长，而不是经济和政治的操作。克雷克夫人（Mrs Craik）的小说《约翰·哈利法克斯绅士》（1857）中的主人公就表现了这样的价值观：

图2　一家人，布拉泽霍尔的约翰·哈登作，1826年。哈登（1772—1847）是个有才气的业余画家，在英格兰湖区过着小康生活。湖区是那时英国著名的思想中心，威廉·华兹华斯、托马斯·德·昆西、拉格比学校的托马斯·阿诺德等都比邻而居。哈登的画作传达出“英国的比德迈式”[3] 的中产阶级生活的细致感觉。

能做的事他决不会撂在一边，直到做好为止；他的经营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的工作都当日完成。无论是作为地方长官和田产所有人，面对着每时每刻都在冒出来的无数小事，还是在有关时世走向这个自己有广泛兴趣的问题上，他都用同一种方法处理，从不变更。在同外面世界的关系上，他就像在自己的小山谷中一样，似乎决心“趁着白日做工”[4]。只要可能做到，他不会忽略任何一个请求，不允许一桩职责没有完成，不让任何的善得不到承认，不让任何恶得不到补救，或至少不让它得不到原谅。

法治是英国的传统，然而法治作为一个“高效”政府的思想体系这一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却是英国内部边陲地区的发明创造。苏格兰人在努力使苏格兰地区摆脱落后状态的时候，以自己独特的法律制度为工具，用于巩固土地资本，探索和组织“市民社会”。在爱丁堡，亚当·斯密（Adam Smith）、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和戴维·休谟（David Hume）将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与法学交织起来，产生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综合性成就。将这些成就的价值传到英格兰去的是帕特里克·科尔克霍恩（Patrick Colquhoun）、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以及《爱丁堡评论》的一批撰稿人。爱尔兰方面的贡献则完全不同。教士长斯威夫特（Dean Swift）曾写道，“法律设定天主教徒在爱尔兰不得生存。”新教法律依照其释义就只能是强制的法律。因此，1814年，爱尔兰成为英国第一支国家警察部队的成立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法律战促使苏格兰在1799年终止了矿工和制盐工的农奴待遇，也让英帝国在1807年废止了奴隶贸易，然而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佃农却并未从法律对乡村的“改善”中获得什么利益。与以往相比法律现在更是有产者的工具，这一功能在面对欧洲的进犯威胁时倒是发挥了作用，使一个本来互不相干的社会中的地方统治者联合了起来。宗族首领和领主曾于1745年聚集在法国支持的查尔斯·爱德华（Charles Edward）[5]的周围，现在他们则成了与革命者不共戴天的地主。雅各宾党对他们来说就像詹姆斯二世党一样，是异己族类。但是，接下来使用法律手段强行推进民族团结并保护经济变革的做法，直接让法

律迎面遭遇最严峻的检验。

注释

【1】 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1781—1848），铁路机车的主要发明家，1825年设计出第一辆牵引载人列车的铁轨机车（达灵顿至斯托克顿），标志铁路运输业的诞生；参与修筑曼彻斯特至利物浦的铁路（一般认为是英国的第一条铁路），1829年落成前，由他设计的新机车“火箭号”在机车比赛中以58公里的时速胜出。本书中所有的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下面不再另行说明。

【2】 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是17世纪人，以日记著称于世。他除了记录如斯图亚特王朝复辟、黑死病流行等亲历的大小事件外，还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情色生活。塞缪尔·约翰逊的好友、为其作传的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则生活在18世纪后半叶，他因无法克制情欲，数次使妻子染上梅毒。详见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abridged ed. (New York: Harper, 1979) 340-379。

【3】 比德迈（Biedermeier），19世纪初期德国中产阶级家庭流行的家具式样和室内装潢，因“比德迈”（几位诗人的托名）发表的讽刺德国中产生活的诗作得名，被用于指称中产阶级缺乏想象力和灵感的平庸生活，意思和阿诺德所说的“非利士人”接近。

【4】 典出《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9章第4节：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5】 指小僭君，被光荣革命推翻的詹姆斯二世的孙子，其父是老僭君，1715年企图复辟。追随詹姆斯二世的子孙，图谋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人被称为詹姆斯二世党人。

第二章

工业的发展

1815年时，对于詹姆斯党人在1745年集结穿行曼彻斯特、从而在伦敦引起大恐慌尚存记忆的老人，会强烈感到国际上的一个重要变化——现在英国和法国的地位颠倒过来了。这不只是因为英国同法国打了20年仗，最终在滑铁卢获得了胜利，更是其工业持续发展和接管了许多重要市场的结果。英国封锁法国的大海港，摧毁了那里的经济：波尔多的街道上长满了荒草。而这个时期内，英国则赢得了20%左右的世界贸易量，以及一半的制造业产品的贸易份额。

英国和法国

工业的发展并非遵循着一条预先确定的、可预测的成功之路；其过程是缓慢的，带有偶然性的。亚当·斯密曾经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工业；甚至在19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仍无法确定技术能否改善普遍的生活水平。当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一直按1688年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的估算在发展，即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产值占英格兰和威尔士国民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不列颠王国的数字要低一些，因为包括了经济上落后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到1800年时，对不列颠“制造业”产值数字的测算已经调整为国民收入的25%，而商贸和运输业占了23%。然而这样的增长并没有超出法国的能力。真正使英国胜出的是质的变化，尤其是市场运营方式、技术和政府干预等方面的质变，以及1800年时占国民生产33%的资本主义农业。法国革命提高了农民的权益，却滞缓了农业的发展，然而这个时期英国的封地契约文书却已成为实在的土地所有权证明，这是对土地进行商业开发的关键。

1745年时，法国人口2,100万，是英国的两倍。在王室的庇护和国家的控制下，法国的经济不仅产量巨大，而且技术翻新和发展之迅速，与英国都不相上下。然而英国的技术发展受到新需求的驱动，可在法国，技术发展不仅受到政府干预的掣肘，更因传统资源的丰富而缺乏推动力。法国仍在采伐大量木材制成木炭，英国的铁厂主却不得

不转用煤炭。法国有着与农耕作业一体化的庞大毛纺业；在英国，圈地[1]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限制了国内同类产业的发展，却促进了新型的、需要利用水动力和蒸汽动力进行系统化生产的大工厂的兴建。最重要的是，到了18世纪70年代，英国已经在贸易战中占了上风，将法国赶出了西班牙的属地、印度和加拿大——甚至丢了北美殖民地的损失也很快在兴旺的棉花贸易中得到了补偿。

人口

1801年，第一次官方人口普查表明，英格兰人口830万，苏格兰163万，威尔士58.7万，爱尔兰522万。关于人口数字的争论尘埃落定：自1750年以来，人口增长似乎达25%，增长率比欧洲平均值高出50%。但有关导致人口增长的原因的争议则仍在继续。1750年以前，死亡率已经有所下降（因为食品供应和卫生条件改善了，流行性传染病的杀伤力减弱了），继而又反映在出生率的增长上，因为有更多的儿童存活下来，到达了生育年龄。

在不列颠，呈上升势头的制造活动以及家庭农场的消逝，使儿童成为有价值的收入来源。“去吧，小伙子们，生孩子去，”农业作家阿瑟·扬（Arthur Young）如此劝导说，“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值钱”。在爱尔兰，人口则以一种不同的波状方式上升。地主想获得更高的土地收益，18世纪20年代以来的土豆栽培使一块地的营养产出增加3倍，于是地主意识到，在更多的农场上有更多的人耕种就意味着每英亩地可生产出是原先3倍的收益。结果是1780至1831年的50年间，人口翻了一番：

人口（单位：百万）

	1780（估计数）	1801	1831	1851
英格兰	7.1	8.30	13.1	16.92
威尔士	0.43	0.59	0.91	1.06
苏格兰	1.4	1.63	2.37	2.90
爱尔兰	4.05	5.22	7.77	6.51
联合王国总数	12.98	15.74	24.15	27.39
英格兰（占%）	54.7%	52.7%	54.2%	61.8%

据最近的一种分析计算显示，在19世纪初期，英国的农业产量是法国的2.5倍多，而法国农业本身就已经比欧洲其他地方效率高得多。结果就是，一个不断从乡村流向城镇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的人口能够有饭吃。1801年，不列颠本土上有30%的人居住在城镇，21%生活在超过一万人的城镇——这个比例比任何一个北欧国家都高得多。但是在这个数字中，工业城镇还不足四分之一，居民人数也不及生活在海港城市、有造船业的城镇和地区都城的人数多。伦敦在当时已是独一无二的大都市，人口有110万，占全部城镇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

从别的方面说，人口仍呈比较平均的分布态势。郡县居民的绝对数字继续增长，“凯尔特外围”仍占联合王国将近一半的人口（45%）：大城市中，都柏林（16.5万）和爱丁堡（8.3万）仍紧随伦敦之后；科克和利默里克 [2] 的规模仍大于大多数工业城镇。这些地区中心的复杂结构反映出当地士绅、神职人员、农场主和高级职业人士在社会中有重大影响力，这是几十年来商贸活动持续增长的结果。

商业与流通

英国经济的特色仍是商贸业而非工业。欧洲大陆的城镇受到严格

的监控——或者对之监管刚刚有所松动，商贸规模有限，还有复杂的税制层层盘剥。为了防止“外邦人”进入自己的市场，德意志小城市中那些中世纪的城门一到黄昏就紧紧关闭。然而英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国内贸易几乎没有任何障碍，而崇尚“重商主义”的政府一直积极鼓励“通过对外贸易”获取“财宝”。18世纪时英国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吉利海峡的战事似乎一直不断，以马恩岛为据点的大规模走私产生巨大吸引力，这些都使商贸通道向北转移。利物浦靠粮食和奴隶买卖及后来的棉花和棉制品交易而兴旺起来；格拉斯哥靠烟草、亚麻以及后来的棉花交易和工程技术而发达。然而它们曾经的贸易中心地位却在渐渐地改变，因为从它们那里开辟了连接后方贸易区的高效交通运输纽带，而制造业则极大地改变了后方地区的面貌。

商贸和货品流通提供了工业化最重要的推动力。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有30％的人口住在城镇，有饭吃，有衣穿，可取暖，或是掌握着如此庞大的海外市场。英国的商人通过一些机制来驾驭所有这些事务。法律虽然不见得鼓励，却也允许商人建立这样的机制，它们提供了一种运作架构，使生产率的提高能转化为利润、信贷和进一步的投资。国内“体面阶级”的队伍在壮大，为服装、餐具、建材和瓷器提供了市场；1750—1800年间，诸如此类的“内”需上升了42％左右。而同期出口产业的增长则超过了200％，其中最大的增长发生在1780年以后。

图3　戴维·威尔基爵士作，《爱尔兰的威士忌酒厂》，1840年。这是用浪漫的眼光看到的大饥荒之前爱尔兰的乡村社会场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时期正经历马修神甫发动的爱尔兰最大的反烈酒运动。注意画面中身体健康的农民和放置在左下角的土豆。

煤炭、铁和纺织品

除了农业，英国还有三大产业部门：煤、铁和纺织业。前两者提供了大量的资本设备、基础设施和未来发展的选择权；但纺织品在1750年时占出口总值的50%以上，而到1800年时已经超过60%。棉织品在1750年还微不足道，可是1810年时已经占了39%的份额。煤炭产量在18世纪下半叶翻了一番，这是因为蒸汽泵使更深的、产量更高的矿层得以开采，而畜力牵引的铁轨车辆则能跑越来越远的距离，将煤拉到水运码头。战争的需求、使用煤而非木炭进行熔炼、18世纪80年代搅炼和轧制锻铁方法的完善，凡此种种都刺激了铁生产，1788至1806年间铁的产量增长了200%。但是，纺织业才是那牵引着

工业化的滑翔机飞上天空的动力。

毛织品一向是英国的特产；当然，在政府的支持帮助下，亚麻制品这种原先欧洲大陆的优势产业也正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发展起来。棉织品的上升势头一来得益于其容易适应机器生产，二来也因为美国南方种植园的蓄奴制能够满足激增的棉花原料需求量。新的机器还十分粗糙，但是对机器需求的上升说明劳工抵制机器的问题已经解决。18世纪30年代，当约翰·凯（John Kay）想推出他发明的（使织工产量翻倍的）飞梭织机时，机器被捣毁了；到了70年代，不仅凯的机器被重新推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的手动詹妮纺纱机（一种多纺锤的纺车）和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的水动纺纱机也一起问世。这最后一种连同容纳细纱精纺机所必需有的大厂房从德比郡的河谷向兰开夏郡和苏格兰一路铺排过去。在竞争迫使价格下降之前（1784—1832年之间降幅达三分之二），业者可以赚到大钱。阿克赖特精明地利用自己的专利权，赚了20万英镑，还得到了准男爵的爵位。托利党未来首相的父亲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靠棉布印花起家，最终竟雇用了1.5万名印染工。据罗伯特·欧文的估算，1799至1829年间，他的新拉纳克纱厂在回报5%的红利之后，还为他和合伙人净赚了30万镑的利润。有20年左右的时间，即便使用手摇纺织机的织工也能挣得一份殷实的财富。后来引进了机械动力织机，爱尔兰移民充斥劳动力市场，1815年后，退役军人也加入了劳动力大军。这些都使织工的境遇成为那个时代最触目惊心的一幕悲剧。

制造工程和蒸汽动力

棉纺技术向其他织品行业延伸——很快传到约克郡的精纺毛纱业，也慢慢影响了亚麻和毛织品业。它还推动了机器制造工艺和金属结构建造业的发展和改进。要带动数千个锭子，就必须制造出强大而牢靠的机器；厂房——换种说法就是火药筒——必须安装金属柱子和

金属托梁以达到防火效果。1770年时，阿克赖特使用水车匠和钟表匠在克劳姆弗德为他安装木制的机器。然而，随着功率达150马力的水车、复杂的走锭精纺机（一种结合了多锭纺纱机和细纱精纺机的动力型纺机，可纺出“支数”很高的细纱）的问世，随着蒸汽动力的推广使用，厂房设计和机器制造也很快变成了专门化的作业。

1774年和1781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明的分离式冷凝器蒸汽机和旋转轴蒸汽机分别获得专利。1800年以前，使用蒸汽机的主要是棉纺厂，因为它能为走锭精纺机提供可靠的持续的动力。从蒸汽机方面来说，其制造所需的技术越来越高级、成熟，也促使它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水上运输和机车分别从1802年和1804年开始使用蒸汽机。不但如此，技术的成熟还带动了机床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与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ay）和他发明的螺纹切削车床相关的产业。这种车床（及其相关发明“千分尺”）使得机器可以加工出极为精密的零部件。从那时起，机器便可复制自身，并被构造得越来越复杂。达到18世纪钟表匠的生产水平不再是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学到的技能，它已成了机械工程学中的常识。

交通运输

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迎来了土木工程的黄金时代，詹姆斯·布林德利（James Brindley）、约翰·斯米顿（John Smeaton）、托马斯·特尔福特（Thomas Telford）、约翰·伦尼（John Rennie）等工程师都在探索如何尽可能高效地利用水运和畜力运输。相应地，在更好地利用风力的探索中，帆船变得如此精美完善，乃至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它们仍保持着与汽船竞争的能力。至于国内的道路，则由收费公路联合托管团体、甚至是政府出面，负责维修和管理状况糟糕的道路，有时是兴修全新的道路。1745年从伦敦到爱丁堡要走将近两个星期，1796年时需两天半，而1830年时，乘坐公共马车或汽船的话，36小时就够了。

凭借17世纪河流航运稳步增长的势头，18世纪30年代爱尔兰开凿了使用多道船闸的“死水”运河。然而，真正表明水运对于工业增长的重要意义的，是布里奇沃特公爵（Duke of Bridgewater）的计划。1760—1771年，按公爵的计划，地方上的一片煤田与曼彻斯特连接起来，后来曼彻斯特又和利物浦连接起来。[3] 布里奇沃特的工程师布林德利设计出“窄”运河，可以在“干旱”的中部地区防止河水流失。[4] 在1764—1772年的和平日子里，由英国的士绅、大商人、制造业者和银行家组成的许多公司团体将英国所有的大河流航道都通过运河连接起来了。这类私人商业机构的红利收益，如牛津运河，可达30%，但一般也就是8%。80年代又掀起一波兴建水上交通系统的高潮，从商业上看，这已经超出了适宜性范畴，但是英国却也拥有了欧洲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交通运输网，而在兴建交通过程中，农业和工业界的“改良人士”的团结克服了进一步合作的许多障碍。

地图1　19世纪初期的运河体系

注释

【1】　指英国历史上将无地界标志的可耕地和社区公地转为私有土地的过程。1760—1800年间，为改变田地条块状，所有权复杂，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情况而申请圈地并获得议会批准的达1,944件，大大超过18世纪上半叶。

【2】　分别为爱尔兰西南和南方海港，现都是郡级市。

【3】　布里奇沃特公爵在其沃斯利庄园有煤矿，他聘用布林德利于1761年建成16公里长、深入煤田、连接其与曼彻斯特的运河，使曼城的煤价降低一半，后又延长48公里，使曼彻斯特和出海口利物浦通过运河连接起来。

【4】　布林德利自学成功，在大兴水路交通的18世纪后期，他负责设计了英国几乎全部的运河，做到因地制宜，形式多样，有许多发明创造，在隧道、高架桥等方面都有贡献。在“窄”运河上只能运行窄体船（尺寸见地图1的说明）。后来出现铁路等现代交通工具，水系日渐衰落，许多运河堵塞。如今运河体现出英国的历史文化价值，重新得到保护，也成为观光旅游的去处。

第三章

改革和宗教

旧英国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没有扮演，或者并不想扮演积极的角色。正如后来1815年的谷物法表明的那样，它并不为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利益而放弃作为。然而，政府越来越奉行一些大体上说是系统的原则，和对待其他阶级相比，这些原则对工业资本家并非十分不利——当然，其他阶级并不包括土地拥有者，后者通常自身就是投资矿山、交通和不动产开发的资本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定理就是：连续性、权力分割、政府、经济和社会互相渗透，更重要的是有关政府是自我调节机制的观念。这些定理对古典经济学、科学发现、甚至上等阶级精心培植的自然神论都是完美的补充。

改革

但是理念需要更新。腐败和低效已经在美洲战争中造成了惨痛的损失。虽然聚众暴动的情景——尤其是1780年的戈登暴动——使有名望的改革者变得更加审慎，改革却仍是不争的紧迫需要。亚当·斯密和卫斯理 [1] 就曾以不同的方式确认了改革的必要性。问题在于，如何在宪政体制的范围之内进行改革？诸如“协会运动” [2] 之类的旨在使政治策略变得更富有原则性和规整性的种种尝试，只不过揭示出“利益”的盘根错节和一目了然的腐败。在苏格兰“广袤的衰败选区”中，仅4,000来个选民却要选出45个官职议员 [3] （114人中仅1人有选举权，英格兰是7人中1人有选举权），而且这些选区还从其“当家人”邓达斯家族那里得到肥差，尤其是被派往东印度公司和海军部。1782年以后，天主教徒仍然不能投票给爱尔兰的“自由”教会。

由于政治权力分配的极大不公，制造业大城镇的意见不得不通过“制造业者总理事会”这样的压力集团得到表达。1801年，70万人的约克郡只能有2名郡议员和26名选区议员，而18.8万人的康沃尔却能推选2名郡议员和42名选区议员。 [4] 虽说1793年以后，已经允许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和天主教徒参加投票选举，但他们仍没有当选议员

的资格。另一方面，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而欲跻身其中的代价又如此昂贵，所以对有些人来说，被排除在外倒实在是幸事了。如贵格会，虽然他们的总人数减少了，但教会内部繁复的家族关系（与非本教派的人结婚者是不可能继续留在贵格会的）则大大巩固了他们在工商界的地位，他们的经营从铁和铅的冶炼厂到银行和铁路，跨了许多行业。思想开明的、认为“最多只相信一个上帝”的唯一神教派的教徒，则成为活跃在地方科教启蒙事业中的领军人物。

福音教派的复兴

福音教派的复兴有些不同。福音教在历史上属于持平民主义的传统的高教会派，其精神启示来自以约翰·班扬（John Bunyan）为典范的、后来由约翰·卫斯理广为传播的17世纪宗教遗产，它也从威廉·劳（William Law）等作家的虔信文学传统中汲取了灵感。福音教教义不同于旧时的不从正教者的教义，也不同于加尔文宗的“上帝拣选”[5]；它强调，只要按照圣经的训导生活，人就有可能获得神的恩宠。福音教令人尊敬，它既不排外、也不提倡大一统，更不四处播撒“热情”（许多后来从不可知论和高教会派立场对其进行最为严厉的批评的人，最初就是虔诚的福音教信徒）。这是危机中的信仰，面对无神论革命、无情的劳资关系、无人道的个人行径等等的冲击，福音教不失为有效的办法。威廉·皮特（William Pitt）酗酒，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好赌，但两人对身居高位的福音教人士施加的压力都很敏感，受到了影响。[6]

循道宗

福音教复兴运动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它很快就走上了特殊的发展轨道。1795年，由卫斯理创立的“循道宗”正式与英国国教分裂，因为循道教徒无法再接受传统的神职授予方式。他们仍是托利党派的，

但后来又分出来的一些循道宗派变得更加独立和激进，如“原始循道派”（1811年退出国教）。循道会属于北方，是“约克郡真正的宗教”；在其他地区，浸礼会和公理会在工业城镇扩张势力，而这些地方的上层通常都是唯一神教和贵格会的信徒。在《费力克斯·霍尔特》这部关于1832年的“政治小说”中，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这样描写不从国教派新教徒的价值观：

> 这里的人都不相信“旧时的英国”要多好有多好。这里许许多多男女都明白，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统治者的宗教不太一样，这么说来管人的兴许比他们好一点，要是真的比他们好，说不定就可以让许多事情改一改了，那些事情把这个世界搞得好像更让人苦不堪言了，当然也更加罪孽深重了。

“生命宗教”在威尔士成就了一场宗教革命。1800年时，威尔士80%以上的人仍追随国教。18世纪中叶，在国教的传教努力下建立的“流动学校”提高了（威尔士语）读写能力，也培植起国教最终无法再支持的宗教热情。于是，倾向加尔文教的循道宗和形形色色的非国教宗派就流入了这个真空地带。到了1851年，威尔士已有80%的人去礼拜堂[7]。

在苏格兰，长老会是确立的正教。长老会掌控教育、济贫，实际上还是二级立法机构。由土地拥有者及其世俗的、自由开放的教牧人员掌管的教会不仅日益受到来自独立派长老会的攻击，还受到那些欲将权力交给会众的福音信徒的严厉批评。在爱尔兰，不从国教的传统开始时有自由主义倾向，其领袖人物将自己法律上的不利地位同天主教教徒的遭遇相比。但是18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件，以及福音基要主义的再起，最终大大加深了信奉新教的东北部与其他地方的分裂。

注释

【1】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8世纪英国宗教改革者，创立卫斯理宗，亦称循道宗或卫理公会，在英美均有相当影响。

【2】 旨在促成政治改革，尤其是选举改革的协会，如18世纪60年代末组

织的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90年代查尔斯·格雷组织的人民之友协会等。

【3】　按18世纪惯例，官员可以选为议员，当上议员后也能谋到官职，在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地方势力之间，议会选举和官职委派之间，存在着重重的金钱利害关系。

【4】　英国议会中的下院（也称平民院）由各地推选出的代表组成，名额分配是固定的：每个郡有两名郡议员，其身份应是有爵士衔的准男爵和爵士，即贵族制度中不能参加上院议事的下等贵族（故郡议员的英文名称为knights of the shire），每个选区，即有资格向下院选送代表的市镇（borough），可推选两名。19世纪初，英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人口版图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代议制的构成却仍采取几百年沿用的定式，对国家经济生活影响最大的人群得不到代表，引发了尖锐的矛盾。

【5】　这里应该指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清教”以及对清教徒产生巨大影响的加尔文的思想，如上帝有拣选并赐予灵魂得救升天的绝对权力，人是否得救完全是先定的，人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行善争取到神的恩宠，等等。清教中最激进的派别脱离了国教，如后来乘坐“五月花”去美洲，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的人，但是也有留在正教内的，如稍后建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徒。

【6】　二人均为18世纪末英国政治家，皮特曾两度任英国首相，福克斯是下院领袖，在废除奴隶贸易等改革中起重要作用。关于英国上层的福音教徒及其改革活动，可参看第四章“边沁主义者”中对克拉珀姆派的描述。

【7】　指80％的人都在非英国国教的教堂（chapels）听布道，即他们不再是国教信徒。

第四章

海外战争

英国对法国革命普遍抱着热情的态度。革命搞得再糟，也会削弱老对头的力量；搞好了，则会创立又一个君主立宪国家。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詹姆斯·瓦特，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年轻的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还有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or Colerige）都盛赞法国革命；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受到鼓舞，写下《苏格兰人》，诗篇有明显的现实意义。[1] 在革命看上去仍然像温和的宪政运动时，甚至英国政府也不急于呼应伯克的那篇严厉责难的《法国革命随想录》（1790年11月发表）。但不管怎么说，伯克表达了英国建制的感觉，特别是在1791年6月巴黎突然变得左倾时：那就是，一旦打破遵从的习俗，暴力将横行。改革只应在保留基本政治架构的条件下进行。伯克攻击法国，也生动形象地体现出布莱克斯通对英国政治体制的辩护。从英国去美国的激进主义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发表了《人的权利》（1791—1792年），回应伯克的批评，提出大胆的个人主义民主改革的意见；这时英国政府真的恐慌了。可能正是伯克本人引发了他努力想避免的事情。6个月内，《法国革命随想录》售出1.8万册，而《人的权利》却售出20万册——这在一个半文盲的社会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自从英国内战以来，宣传小册子的出版还没有出现过如此广泛的接受面，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

与法国交战

令英国政府最恐慌的有两件事：一是法国的“民族自决”观念对低地英属国[2] 的影响，二是法国革命思想的蔓延。更有理由担心的欧洲君主们于1792年夏天一改18世纪战争中恪守规则的打法，把法国人当成了必须射杀的疯狗。法国则以人民十字军、“全民武装”的战争观念回敬。英国的外交恐吓引发了政治威胁：对法国的频频警告增强了巴黎某些乐观的革命家对战争可能会导致英国出现革命的信心。1793年2月1日，法国宣战了。

英国没有准备好。军队只有4.5万人，战舰中只有不到一成能勉强出海。再者，这次战争和以往的英法冲突很不同。新式的军队风气，革命军进攻的猛烈，法国新一代将领的干练，所有这些都让英国的盟军从一开始就陷入困难。到1797年时，奥地利已经被击垮出局，英国只得单独抵挡波拿巴（Bonaparte）进攻英国的军队。

战争早期，英国政府有三项当务之急：入侵威胁、战争费用和对付国内纷争。法国曾有三次企图入侵英国，一次经由威尔士，两次通过爱尔兰。1797年法军在威尔士西南的彭布鲁克企图登陆，但无人拥护。然而，1798年，在英国血腥镇压了长老会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起义（可能有3万人死去）之后，由安贝尔将军（General Humbert）率领的一支军队在爱尔兰西北部的梅奥登陆，后被迅速打退。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建造圆形石堡加固海防线，启用（防守家园的）国民军以及将“国民军法令”施行至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多项措施，来防卫英国本土。所有这些事情都让相关的非专职地方官[3]头痛不已。及至1795年，光是付给盟军的津贴就达数千万之巨，捐税激增，1799年后还包括了新发明的所得税，每1英镑收入课税2先令（10便士）。至于对付内部的问题，政府对企图同法国媾和或联合的团体采取了断然的打击行动。1793至1794年，“皮特的恐怖统治”，加之地方上官员、实业家和爱国社团采取的各类行动，最终摧毁了许多激进组织。苏格兰的镇压行动尤其严酷。一口苏格兰腔的布莱克斯菲尔德勋爵（Lord Braxfield）用苏格兰式的诙谐，粗暴地不容置辩地捍卫着“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政体”。

一位受到布莱克斯菲尔德迫害的人告诉他，耶稣也是改革者，他回答说，“他还真当个事儿嘞，还不是没得好死。”他那讥讽语气象征着苏格兰启蒙运动所代表的上层社会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随之而来的是30年差不多持续不断的镇压，大权在握的就是皮特在苏格兰的律师盟友——邓达斯家族。

在爱尔兰，形势的逆转更为激烈。战争迫使皮特向爱尔兰议会施加压力，1793年时终于令后者授予天主教徒以选举权，这是企图将天主教徒从对“无神论”法国的热情立场上拉回来的努力。然而，“爱尔兰

人联合会”这个非宗派性质的激进主义组织 【4】 却迅速发展起来。1798年，联合会在乌尔斯特遭遇到极端新教组织奥兰基社团 【5】 的抵制；对新教特权忿忿不平的天主教农民，又受了点有法国教育背景、满怀革命理想的神甫的影响，他们发动的地方暴动也阻遏了联合会的推进。在安贝尔登陆前夕，联合会在爱尔兰东部的威克洛曾发动酷烈而短暂的起义，足以让新教统治者明白自己的孤立地位。1800年，爱尔兰统治阶级效法1707年苏格兰人的做法，与英国达成了政治合并 【6】 。

战争后果

除了1801至1803年短暂的间歇期外，“海外战争”一直持续到1815年。这时，英国已经在战争上耗费了15亿英镑。可是战争的后果却是模糊不清的，甚至说来奇怪，其影响也很有限。战争很快就从大众的记忆中被抹去了。很长时间内英国都是个武装军营：国民军持续征兵，任何一个阶段，全国成年男性中都有六分之一的人在服役。和法国相比，他们中只有很少数人参加过海外作战，但许多人——差不多有21万人——死去了。法国人口上升滞缓，1800到1850年期间，只有32%的增长，而英国同期人口增长达50%，看来战争对英国的影响不同，冲击小些。然而从1805年以后，英国的海上霸权再也没有被撼动；法国最有活力的部门都建立在通商口岸，英国的海上封锁大大打击了法国的产业界。

亚当·斯密曾写道，在一些行业中，战争会误报需求，造成“卖方市场”。事情果然就是这样的。以炼铁业来说，不仅中西部的传统冶铁基地仍很发达，就连苏格兰中部和南威尔士的炼铁业也繁荣起来。1780至1820年间，东南威尔士的梅瑟蒂德菲尔市人口增长20倍，而它原先不过是一个未开发的偏远小市镇（远归远，不可思议的是那里居然也有运河交通）；它所在的地区，18世纪中叶时最大的城市卡马森最多不过4,000人。纺织业本来就是英国的优势，海上封锁扼止了

竞争对手，英国更是遥遥领先，甚至连法国军队的军服都是英国生产的。至于造船业，查塔姆、朴次茅斯、德文波特等港市巨大的海军造船厂继续扩大规模，成为大生产的先驱。它们创造的大型战舰得到显著的改进；19世纪50年代，蒸汽动力的普遍应用无异于一场小革命。

事实上，海军典型地反映出政府的许多问题。1797年，水兵的恶劣待遇引发了斯皮特海德哗变和诺珥哗变。哗变并没有什么政治企图；参与哗变的人尽管一肚子委屈不平，却基本上仍然是爱国主义者。对他们的处理是恩威并施，其实对待组织良好的造军舰工人的抗议也是既使用高压，又作出一些让步。其他领域，英国政府对企图减轻劳工阶级痛苦的种种努力态度含糊。1799年通过的结社法将工人联合会视作革命社团，定为非法组织；政府还成功地阻挡了确立法定最低工资和恢复传统劳资关系的努力，尽管这些提议得到了制造业者（主要是中小业者）的支持。诸如此类的举措，加上投资转向政府公债以及贸易战所引发的经济衰退，那么1790至1814年间平均实际工资没有任何增长也就是必然的了。不过，18世纪90年代后，很多乡村教区采用了相对宽松的济贫方法，即所谓的斯品汉姆兰制度[7]，维持了传统的救济权利，无疑有助于缓和尖锐的社会冲突。

国外后果

在战争期间，英国基本避免卷入欧洲事务，而宁愿为它先后同各欧洲国家结成的这样那样的反法国革命势力同盟和反拿破仑同盟支付津贴，这种做法其实就是采用改进了的18世纪战争的雇佣军模式。1811至1814年英国出兵伊比利亚半岛[8]，这时英国军队才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作用。然而，英国在其他地区斩获颇丰：对印度的掌控加强；通过新加坡取得对荷属马来群岛的实际统治地位；1795至1816年征服锡兰；从荷兰手中接管了南非，还将势力插入埃及。英国还非正式地获得了对中美和南美地区前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霸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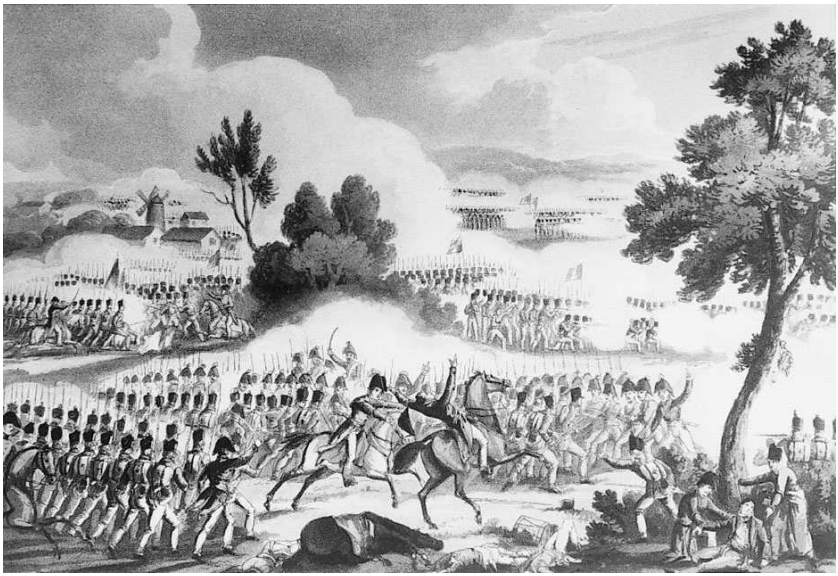

图4　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中皮克顿将军之死。画面表现了前装式“布朗·贝斯”火枪时代中一丝不苟的步兵团正规作战场面，训练和纪律弥补了低效武器的不足。

英国在战争中获胜，然而战争留给欧洲的是深深的法国烙印。拿破仑军队所到之处，无不留下（或由其对立面复制了）革命的法律、度量衡[9]和行政管理方式，尤其是革命的民族主义精神。英国版图完全变了。1789年以前，英国是大陆大家庭的成员。戴维·休谟和亚当·斯密在巴黎就像在爱丁堡一样自在，或许他们在巴黎感到比在伦敦更舒坦。1815年后，经济发展吸引数以百计的外国人来英国参观访问，尽管如此，英国仍游离于欧洲大陆生活之外。

国内后果

战争和经济不景气使英国国内政治理念分裂，要么拥护革命，要么拥护现有制度。“皮特的恐怖统治”、爱国社团、“教会与国王”帮等等，都逼得早先司空见惯的民主思想家不是隐退，就是同爱尔兰人或劳工阶级等真正受压的群体联手。“雅各宾传统”对于工业和经济的变

化也像以前对现行政府的种种“罪恶”一样，变得十分敏感。在其名下集合着从无政府主义到宗教上的千禧年主义等一切散漫的不稳定的组织；在宪章主义出现之前，也包括宪章主义在内，“雅各宾传统”一直是劳工运动的标识。

边沁主义者

然而，上层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其无情的实用主义，一味使用镇压手段巩固国家权力，无视契约政治理念的做法，同样在上层精英中引出了一个激进的对立面。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克拉珀姆派[10]所奉行的福音主义旨在转变上层统治阶级；当然，具有同样目的的还有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那些反复申述的计划。边沁是富裕的律师，他多少相信可以通过一套类似经济原理的自明原则对社会加以治理。其中最容易掌握的就是“功利主义”，即社会行动的目标应该是产生“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好处”。边沁本是一切“社会契约”理念的宿敌，他反对法国革命，努力游说一届又一届的英国政府，希望它们能对自己的改革计划产生兴趣，尤其是司法和监狱改革。他取得的成果可能比自己看到的要多一些，但一次次的挫折将他推向了民主改革派；到1815年时，他已经赞成实行普选。

边沁的门徒被称为“哲理激进派”，提出体制改革与政治连续性结合的改革方案；1815年后，已有一群温和的劳工阶级领袖追随其后，这时他们向统治者和劳工阶级两边都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从他们的设想中衍生出中央集权的国家行动模式和公共干预理论。这两点对19世纪后来的历史进程始终发生着巨大影响。

边沁的理论设想地方政府应在规模适当的地区内增收不动产税和采取行政行动。地方政府会受到领薪水的稽查员的监管，后者对一个中央管委会负责。通过这些手段，“以往的贪腐”和流行的肆意挥霍现象应能得到遏制，而地方的职责则仍然可以保留下去。然而，事实上

还是官员说了算。边沁及其门徒穆勒父子和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可能已经倒向民主一边，但他们并不情愿让民众代表做更多的事情，至多是可以否决官员的行动。他们只是在英属印度才取得最耀眼的成就也就不足为怪了。

法律

司法已经演化为一种阶级斗争模式。本来习惯于自己在法庭上争伤残补贴的劳工现在失去了传统权利，他们的独立行动受到了制约。有产阶级惊惶失措，致使本来一直疲软的处罚条款变得强硬而有约束力。“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战争、工业化和压迫之合力所作出的反应，意味着他们对不公正法律的反抗。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对于“那玩意儿”——富人们结成秘而不宣的同盟，对穷人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不存什么敬意；罗伯特·欧文视若无睹，置若罔闻。甚至边沁派的人也认为司法部门是“巨大的邪恶利益集团”。虽然最终只有爱尔兰人真正挺身而出同它斗争，然而法治的胜利就像滑铁卢，只是“千钧一发的惨胜而已”[11]。其成功可能只是因为公众对之期盼已久，竟至等到了又一波宪政改革浪潮的兴起。

注释

【1】 “Scots Wha Hae”是彭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歌，用13—14世纪苏格兰民族英雄的抗英事迹影射时事。

【2】 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光荣革命时，英国国会请新教的联合省（荷兰）都督、奥兰治的威廉和妻子玛丽·斯图亚特一起统治英国，其他两国也因历史上与荷兰的关系，一度由英国奥兰治王室管治。

【3】 原文“part-time local officials”，英国的历史习俗一直是让并未受过专门训练的当地士绅贵族兼任司法和管理事务。

【4】 由受到英国圣公会排挤的新教长老会和受剥削压迫的天主教徒组成，目的是在爱尔兰成立共和国。

【5】 奥兰基社团的前身是以光荣革命时的英国君主、新教派奥兰治朝的

威廉王命名的秘密组织，18世纪发展为北爱尔兰、大不列颠以及英国自治领的全国性组织，有明确的捍卫新教的使命。

【6】 政治合并指的是议会的合并，1707年苏格兰议会并入英国，1801年爱尔兰议会并入联合王国议会，英国（议会）成为（the Parliament of）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联合会”的起义应指本节第三段提到的死去3万人的那次行动。

【7】 1795年由伯克郡的斯品汉姆兰地方长官确立，即从教区地方税中拿出一部分补贴贫困工人的措施。

【8】 指1808—1814年的半岛战争，或称西班牙独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拿破仑最终垮台。拿破仑占领葡萄牙、西班牙，1811年起又东进欲占领俄国，此时英国军队在威灵顿率领下进军西班牙，后威灵顿任半岛战争统帅，一直到攻入法国，迫使拿破仑退出，让西班牙国王复位。

【9】 1795年起，法国正式采用米制，而米制又随拿破仑的军事行动带到欧洲各地。英国则仍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继续使用复杂的英式单位制。

【10】 克拉珀姆派（Clapham Sect）系英国政界的福音教改革派，其中不少是议员，主张废除奴隶贸易和蓄奴制度，在现行制度内大力推进监狱改革等多项改革措施，自上而下奉行仁慈。威尔伯福斯为该派领袖。

【11】 原文是“a damned close-run thing”。这是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争胜利后说的话，有两军其实旗鼓相当，难分上下，胜败仅隔一线，胜者赢得艰苦、勉强，败者亦荣，偶然因素起作用等复杂意味。

第五章

通向自由之路

英国人，何苦为地主耕植，
他们把你们当牛马来驱使？
何苦辛勤地、细心地织造——
为你们的暴君织造锦袍？
……
还是钻进你们的地窖和破屋去；你们造的楼厦别人在安居。
何必挣脱你们自己铸的铁链？看，你们炼的钢对你们瞪着眼。

雪莱，《给英国老百姓之歌》[1]

1815年后，战后的托利政府遭遇到一批新的文学激进分子。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已经被拉入既定秩序的怀抱，接替了他们的是拜伦勋爵（Lord Byron）和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812至1827年间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的政府事实上是中产阶级当政，其成员有小乡绅、医生和商人之子，甚至（在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的班子里）还有女艺人。虽然政府被指责为反动派——有些内阁成员也确实如此——它仍然紧张地保持着中间偏右的立场。对外，它采取自由政策（以王政复辟时期的欧洲标准看），对内则妥协调和。然而，战争债务需要偿还，复员军人需要安置，此外，政府还继承了可怕的战后衰退，极度紧张的劳资关系。其反对派能干的辉格党不但不帮忙，还通过新的文学评论对它大张挞伐。再者，从亨利·赫瑟林顿（Henry Hetherington）和理查德·卡莱尔（Richard Carlile）的“地下”报纸[2]，到威廉·科贝特那坚持乡村理想的激进主义，还有在威廉·布莱克的幻视中的千禧年景象，可以说英国深厚的民间抗议文化也让政府的日子不好过。土地所有者对政府施加压力，并终于在1815年的谷物法中如愿以偿地维持了粮食补贴。在十多年时间里，这个法案可能平息了种田农民的不满情绪；但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和1811至1812年相比，现在对秩序的威胁更是来自新兴工业城镇：战后繁荣的结束造成大量的失业和大幅度的降薪。1800年后，劳工们与其说有阶级认同感，不如说他们越来越尖锐地意识到自己在工业行业中的地位；地方政府官员、制造业者和治安官深深感

到孤立。

伦敦和地方

官员、制造业主和治安官等士绅们经常表露出对于雅各宾派暴民围在自己的门前大吼大叫这种景象的恐惧情绪；有些劳工阶级的领袖也明确表示了革命的思想；那么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是否真正造成了（事实上也差点造成）推翻政权的威胁？假如所有的行动得到协调，假如有一种共同的经济目标将产业工人同议会中的激进分子和首都的专门技术行业联结起来，假如统治阶级真的吓破了胆，那么推翻政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这一切都很难做到。伦敦并非像巴黎那样，是“绝对”的中心城市；即使伦敦的激进人士能大规模发动群众，他们也缺乏可以抓住的有力的权力工具。

伦敦和地方上步调不一。议会反对党不赞成使用暴力，抨击暴力手段。内政部长西德默斯子爵（Viscount Sidmouth）力主镇压，他下面的地方官员恐吓反抗者——但付出了代价。事情于1819年8月16日在曼彻斯特达到顶峰：庞大的人群聚集在圣彼得广场前举行要求改革的和平示威活动，曼彻斯特的行政长官命令义勇骑兵逮捕集会上的演说者，士兵冲向人群，在“彼得卢”事件中造成11人死亡。激进人士要进行报复，政府则通过暗探和内奸渗入激进运动内部，这些都进一步造成了接下来一年中的数次冲突，如苏格兰的织工起义和企图在伦敦暗杀内阁成员的“加图街阴谋”事件。绞刑和流刑这样的镇压手段严厉、野蛮，行之有效；但从长远来看镇压反而加剧了对宪政的反抗，政府越来越受到怀疑。

社会毁灭与拯救

政府本身对无限制的工业化也抱着怀疑态度。在走向自由贸易、系统化管理和改革刑法典的过程中，它仍然依靠农业利益集团，惧怕

进一步发生劳工阶级的暴动。支持政府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为产业向城镇转移感到遗憾，因为他相信，在乡间的工厂中，制造业者“对于那些依靠他和他的事业前景、并与这些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施加了良性的影响”。他脑子里想到的可能是罗伯特·欧文和他的新拉纳克纱厂。欧文推广实行自我管理的工业社区模式时，旨在遏制工业的发展，希望通过用铁锹耕种的方式，使农业重新成为吸纳大量劳力的重要行业。他的“新道德世界”正契合战后空气中弥漫着的社会崩溃和乌托邦救赎论：

> 天下最厉害的毒药
> 莫过于恺撒那载誉的王冠。
> 没有什么比盔甲的铁箍
> 更让人类变得丑陋不堪。
> 当金子和宝石装点起耙犁，
> 怨恨定向和平的技艺把腰弯。[3]

工匠们不必理解天才的手艺人威廉·布莱克的宇宙论，也会领会其中的寓意。对许多人来说，未来一定会像约翰·马丁那些细节具陈的巨幅训诲画作一样，展现出大毁灭的景象。19世纪20年代中期时，马丁这些作品的雕版曾风行一时。[4]

政治仗

然而，辉格党在这场政治仗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1820年，乔治四世（George IV）企图同妻子离婚，致使王室的家丑被公开抖搂出来。《爱丁堡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坚决捍卫卡洛琳王后（Queen Caroline，她实在不怎么像殉难者），对国王和阁员们毫不留情，赢得公众喝彩。1822年8月，曾在梅特涅的会议上为英国摆脱保守势力重压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自杀。[5] 道路畅通了，现在利物浦政府可以表示出比较自由

主义的一面了。

1823年，继卡斯尔雷之后任外交大臣的乔治·坎宁站在美国总统门罗（Monroe）一边，同意对南美的新兴共和国进行隔离[6]，并顺带确认了英国进入一个巨大新市场的特权。两年后，内阁废除了1819年通过的反激进主义的“六法案”和反工会组织的立法，1826年终止了邓达斯家族对苏格兰的“管理”。1829年，威灵顿政府通过了解放天主教法案。1828年，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当选爱尔兰克莱尔郡议员，却因他是天主教徒，不被准予就职。奥康奈尔老练地控制了爱尔兰舆论，政府在民族起义的威胁下只好低头。

议会改革

现在只剩下实行议会改革了，但这里却直接牵扯到党派问题。对于工会、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各种压力集团，还可以通过明智的让步来平息；然而改革却意味着辉格党人会获胜，那么议会中的支配权、官职委派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将归他们所有。1828年，威灵顿公爵顶住“极端分子”的巨大压力，坚决不让步。第二年，他们在天主教解放的问题上与他分道扬镳。与此同时，国内的动荡在蔓延，辉格党人毫不迟疑地鼓动其激进的对立面。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格雷伯爵（Earl Grey）和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领导的辉格党获得议会选举胜利，要求改革的压力也达到顶峰。辉格党的选举法修正议案被贵族院否决后，组织良好的“政治联盟”在各个城市举行大型集会；动乱者袭击诺丁汉城堡和布里斯托尔主教官邸，两处均为反改革的贵族的居所；在默瑟市，骚乱后处决了工人领袖狄克·潘德林（Dic Penderyn）。1832年4月，贵族院以9票之差退让，格雷政府总算松了口气。不过，政府先前却残酷镇压了英国南部农场工表达不满情绪的所谓“斯温船长”[7]动乱，显出它其实十分保守的本性。

注释

【1】 杨熙龄译，《雪莱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75、77页。此处有个别改动。

【2】 原文为“'unstamped' newspapers”，意思是未加印花税戳的。英国从18世纪初就通过纳印花税盖戳的方式控制思想言论。反对印花税法的始终大有人在，印花税事件还直接导致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报纸不纳印花税，自己印刷，发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非法刊物或地下刊物；按当时的英国法律，“未盖戳”的刊物被发现的话，出版者、出售者、阅读者都会以犯法论处受到监禁。

【3】 以上诗行出自布莱克的诗《纯真的征兆》（Auguries of Innocence），第97—102行。

【4】 约翰·马丁（John Martin），英国画家，主要使用圣经题材，从弥尔顿等文学家的作品中吸取灵感，其作品达到了伯克所说的“崇高”的意境，具有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对西方大文学家产生过很大影响。他的作品也制成雕版，印刷出版，扩大了影响。“大毁灭”，原文为apocalyptic，即《启示录》所展示的情景。《圣经·新约》的末卷The Revelation也叫The Apocalypse，因写千禧年来到前的大量灾难性“异象”（马丁著名的画都是表现基督教圣经中的罪恶之城——巴比伦、尼尼微、所多玛等——之毁灭），而在西方思想中具有了强烈的末世论意味，虽然“天启”最终要说的是否极泰来。布莱克本人擅长制作铜板蚀刻，也是雕版的一种。

【5】 指维也纳会议。1812—1822年，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在解决欧洲问题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滑铁卢后又遏制了联盟对法国的报复。拜伦、雪莱等年轻作家都把他当成自由的敌人。

【6】 即门罗主义，主张欧洲（旧世界）和南北美洲（新世界）互不干涉，欧洲不得再在美洲设立新的殖民地或转让原殖民地。

【7】 原文是“Captain Swing”，Swing有晃动，动摇的意思。这并非一个人的称呼，而是1830年冬天英格兰东南部农业工人起义中，抗议领袖所使用的团体标识，至今被认为是个“神秘”的名字。农工的不满因1820年以来农场主越来越多地使用脱粒机械，致使大量农工冬季失业，生活无着。起义遭到严厉镇压，19人处死，500多人流放澳大利亚，600多人入狱。

第六章

应对改革

尽管鼓动改革的势头已近乎革命，1832年的法案却将最会惹事的工商部门的力量拉了过来，但它所做的也仅此而已。在苏格兰，有选举权的从4,579人激增到64,447人（即增长到原来的1,407％），而爱尔兰的选民只增长了21％。曼彻斯特、布拉德福德、伯明翰等41个英国大城镇首次获得推选议员的资格，但是英国选区的选民人数平均不足900人，而总共658名议员中有将近半数（324名）是从不足900人的选区推选出来的。白金汉选区的349个选民和利兹选区的4,172个选民选出的议员数完全一样。英格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4％，却继续推选出下院中71％的议员；1832年以前，英格兰的议员数占下院的74％。“实际上的代表权”，是利益集团的而非人民的代表权，这仍然是一条原则；在日后将近半个世纪中，议会仍掌握在土地利益集团手中。

劳工阶级

这时，一些保守人士害怕坚持边沁思想的人会攻击贵族和教会。不过，议会中没有多少认死理的人，辉格党人的改革热情很快消退下去。1833年，人道主义者如愿在英帝国废除了蓄奴制度[1]，并通过工厂检查员制度对纺织厂的童工劳动状况进行管理。1834年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其设计者埃德温·查德威克视之为系统地、经济地重建英国地方政府的基础；然而，它始终只是一块孤立的纪念碑：人们憎恶济贫法，也同样憎恶其标志——凄凉的教区联合济贫院或济贫“巴士底狱”。

《泰晤士报》也大声斥责新济贫法，可能感到“哲理激进派”已经走到了头。1834年是多事之秋。爱尔兰倒是一时消停下来，辉格党慢慢地和奥康奈尔达成了、并在30年代后半期维持了相互谅解；然而在本土，形成之初的劳工阶级发起的“替代社会”运动却迎来了高潮。约翰·多尔蒂（John Doherty）等人领导的工会运动，“地下”发行物的论辩，激进主义者对选举法修正案的失望情绪，重返政治的罗伯特·欧文

等等，全都结合起来，产生了一个计划，即成立“全国大统一工会”，通过“全国大假日”亦即全国大罢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从此社会将有大家认可的合作基础，工资报酬的价值将以实际工时计算。3月里政府反扑，拿6名多塞特郡工人开刀 [2] ，后者即“托尔普德尔蒙难者”。全国大统一工会频繁举行抗议罢工活动，其组织者却未能妥善地协调行动。8月间，欧文退出，等于结束了这场运动。10月16日，议会意外着火烧毁，假如此事早半年发生，可能就不只是象征的问题了。

地方政府改革

辉格党真正的胜利随着地方政府的改革而到来。1833年，原先自行推举的苏格兰自治城镇政务会开始由地方纳税人行使选举权选出。两年后，英格兰城镇也开始改革。大城镇里，辉格党人和激进主义者取得了公职，基本上也一直当权。但是，这时候的政府却严重分裂了。1834年11月，托利党上台，政府在皮尔（Peel）的领导下，或多或少承诺要在改革的框架下执政。但那只是虚幻的成功：1835年4月，辉格党重新上台，但其首相却是极度保守的墨尔本子爵。1841年辉格党再度失势，这时皮尔似乎越发鲜明地反映出渐进主义改革的精神。年轻女王那位认真的丈夫、撒克逊 - 科堡 - 哥达的艾伯特亲王（Albert of Saxe-Coburg-Gotha）也很赞同皮尔的观点。

反谷物法联盟

皮尔上台后则受到两方面的压力。制造业主迫于利润下降，要求降低工薪，他们相信只有面包降价了，才有可能做到低薪（面包是那时劳工阶级的主食，他们每人每周要吃大约5磅面包）。要降低面包价格，只有允许粮食自由进口，也就是说，只有废除1815年的谷物法。激进主义者在受到辉格党人立场后退的挫折后，赶上了这波浪

潮，抓住了运动的指挥权。1838年10月于曼彻斯特会议上成立的反谷物法联盟中，成为联盟领导的是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在大洋彼岸有生意，成就平平的棉布商），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来自罗奇代尔市的贵格派地毯商）和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1843年创立《经济学家》的苏格兰记者）。反谷物法联盟既代表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了具有商业头脑和个人主义精神的英国中产阶级——德国人称之为“曼彻斯特人”（至今仍如此称呼他们）[3]。联盟通过请愿、示威、不合作大动员等活动，并通过富有创意地使用新的便士邮政制，广泛煽动起人们对土地贵族和皮尔本人的仇恨情绪。

事实上，在财政政策方面，皮尔基本上一直遵循着政治经济学的准则：大大减少进口关税，重组英格兰银行，允许自由企业主负责铁路募资（尽管贸易委员会主席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主张全盘国有化）。然而，联盟成员则孤注一掷。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好日子和越来越有反抗精神的劳动大军绑在了一起。[4] 一位绝非正统的曼彻斯特纺织厂主、年轻的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目睹了一波又一波不满浪潮在工厂内涌动；他预言说，“当工人们决心不再任人买卖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决定劳动价值，成为不仅有劳动力也有意志力的人的时候，就在那样的时刻，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就走到了头。”恩格斯所选择的是经济不景气时期的极端手段，是宪章运动所表达、组织起来的劳工阶级的力量。

宪章运动

“俺才不愿理政治啥的，可俺是宪章人。”这是1848年时，一个伦敦清道夫对社会调查的先导者亨利·梅休（Henry Mayhew）说的话。《人民宪章》提出成年男性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平等选区、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规定、议员薪酬制、年度选举议会[5]等著名的六点要求，在当时的影响不亚于法国革命和奥康奈尔在爱尔兰发起的运动。

然而，团结只是一时的、表面的现象——宪章运动是非常复杂的、高度地方性质的运动。形式上它追求彻底民主（虽然只是就男性而言——女性选举权的提议很早就被否定）。它那规模浩大的全国性运动阶段也是短暂的，只从1838年延续到1842年。但是，地方上有组织的运动和离经叛道的主张却此起彼伏；当地的经济危机、政治传统乃至领导人性格都会对运动产生影响。“暴力派”和“道义派”的分歧又和对待不同政治党派、酗酒、爱尔兰、财产和教育等问题的态度纠缠在一起。苏格兰和英格兰中部地区的运动领袖是做点小生意的小商人和职业人士。约克郡失业情况严重，加之新济贫法的影响，运动的领导人就十分好战，但他们又和托利党站在一起，鼓动工厂改革。威尔士的“边远”工业城镇已多次发生“集体暴动交涉”事件，因此1839年11月4日在纽波特举行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演变成同武装部队的流血冲突，也许就不奇怪了。当场有14人被杀，后来的审判中有人被判流放塔斯马尼亚，但没有人被判处绞刑。

相对于1831年时的墨尔本或1819年时的利物浦而言，皮尔显得温和些，比较讲究策略。他的政策取得了成效。1843年和1844年的经济繁荣使宪章运动人心涣散；1848年运动的最后爆发其实反映出爱尔兰的苦难，而不是表达英国工匠的抱负，或是在英国发动欧洲式革命的意愿。后期宪章运动更带有实验性，更为多样化，当然也更具爱尔兰特点。费格斯·奥康纳（Feargus O'Connor）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欧文主义和社会主义主张卷土重来；与之并行的还有从欧洲革命人士那里拿来的思想，这些革命者中有不少最后流亡到了英国。不过，无论朱利安·哈尼（Julian Harney）和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友情具有多大的思想魅力，群众性的运动这时已告终结。老宪章派领袖仍活跃在争取单项目标的事业中，如禁酒运动、合作社运动（1844年成立的罗奇代尔先驱合作店，根子就在宪章运动）和工会运动。另一些人则移居外国。运动领袖中有不少人最后很体面地成为维多利亚中期的地方政府官员，或从事着新兴的地方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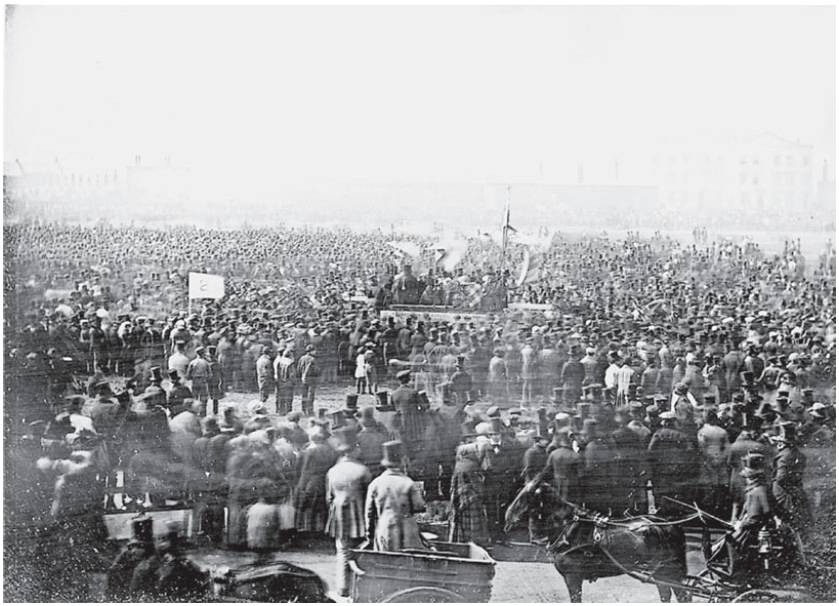

图5　1848年4月10日在坎宁顿公地上举行的最后一次宪章派大集会。尽管根据达盖尔银板制版的这张照片被反复印行，其原件却放在皇家档案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发现。照片证实了法国政论作家托克维尔的评论，即英国的阶级很难凭衣着区分；它也表明，世纪中叶参加激进运动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

注释

【1】　16世纪中叶，英国介入新世界贸易，其中包括奴隶买卖。18世纪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等地靠贩奴发达起来（在西非以英国产品交换奴隶，将奴隶贩运到美洲种植区，以奴隶劳力交换英国市场所需的烟糖等产物）。英国人在加勒比海地区也有自己的殖民地，实行蓄奴制。18世纪后期的福音教改革势力强大，议员威尔伯福斯领导了废奴运动，1807年英国取缔奴隶贸易，1833年在英帝国废除蓄奴制。

【2】　这6人是农业工人，因在托尔普德尔村组织农工联合会被捕，并判流放澳大利亚，在全国抗议下，两年后当局撤销了原判。

【3】　德语为Manchestertum，即（主张）自由贸易主义（的人），指一种经济政策上的自由主义（者），要求摆脱一切国家干预和侵犯，获得完全的、充分的经济自由。

【4】　如第五章已经谈到的，1815年的谷物法满足了土地阶级的利益，平

息了农业劳动者的愤怒，但使城镇工商阶级和工人的利益受损。与粮食补贴、维持高粮价的保护主义做法相反，工商阶级要求取消谷物法，开放市场，降低进口粮食关税，真正做到贸易自由。如这一节所说，三四十年代时，在激进主义者的鼓动下，工人阶级也加入进来，形成资本家和工人的反贸易保护联盟。一时间，是否取消谷物法的问题凸现了城乡矛盾。

【5】　指要求每年选举下院议员。事实上，在1838年宪章派提出六点要求后的大半个世纪中，英国除了举行年度选举外，已经陆续实现了宪章运动的各项要求。

第七章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1】

1832年，由中东传来的可怕流行病霍乱席卷欧洲，在英国造成3.1万人死亡。1833年，议会表决同意为小学教育拨款3万英镑，约翰·基布尔（John Keble）则在牛津大学作了“国家的叛教”[2] 的宣道演说。这些事件只是恰好与政治改革同步发生——议会在温莎堡的马厩上花的时间和金钱比教育经费还多——但它们却成为很重要的因素，影响到日后国家行动的方向以及维多利亚早期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理性阐述方式。

住房与卫生

霍乱流行凸现了城市迅速扩张带来的问题，尽管它在乡村同样会造成毁灭性后果。新兴工业城镇面积小，人口密集，因为那时普遍是步行去上工。城镇的土地使用和经济实力存在相应关系：在数字上只占极小部分的有产阶级，如在纺织城可能不到人口的5%，却往往占据50%的土地面积。做工的人住在有工厂、道路、运河以及后来有铁路可及的地方。结果是19世纪的城镇肮脏不堪，烟雾弥漫，臭气熏天；可是对工人来说，无论房租还是过日子都十分昂贵。一处过得去的房子租金为一个熟练技工四分之一的周薪，但是能租得起的家庭还是少而又少。结果，老内城区的贫民窟倍增，如伦敦的“秃鼻鸦”贫民麇集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滚地笼”，苏格兰自治城里的“地盘”，梅瑟蒂德菲尔市的“支那”。不仅如此，土地所有者和投机建筑商还制造出带有地区特色的新贫民窟来，如约克郡的“背靠背”式的密集住房，又如小小的“一房加厨”或“单人房”公寓，到1870年为止已经有70%的格拉斯哥家庭居住其间。

如果说居住条件很差，那么卫生情况更糟。境况好的市民可以联合起来，成立各种委员会，负责提供给排水系统，街道照明和一定的治安管理；但这些做法事实上让他们的穷邻居的日子更加难过了。中产阶级居住区的新式水冲坐便器往往将污水排进了劳工阶级居住区的水源。

卫生改革

流行病的暴发为劳工阶级报了一箭之仇。处在仆人、小业主等大批穷人的包围之中，平日从来不把他们当回事的富人们，这时突然变得异常脆弱。例如，在1856年卡莱尔的那场瘟疫中，日后将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阿·坎·泰特（A. C. Tait）的7个子女中有5个死于猩红热。1831年，为对付霍乱，政府迫使地方显贵协助临时的卫生署工作。鉴于因养家活口的主力死去和健康恶化而陷入贫困化的人数众多，1841年，埃德温·查德威克代表济贫法专员主持了“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调查报告于1842年发表。因报告的后果和此后的骚动，更加之新一轮霍乱暴发的危险，便有了1848年的法案出台，将建立地方卫生局的权力下放到市政当局，卫生局接受包括查德威克在内的3名公共卫生专员的指导。除了边沁主义者，还有别的力量也被动员起来，如部分宪章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但可能更多的是托利党人、专业人员和慈善家。从阿什雷勋爵（Lord Ashley）的身上可以看到整个的卫生改革运动。这位将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的人可能是个偏见十足的低教会派托利党人——麦考利用“埃克塞特大厅[3]的驴叫声”来形容他的风格——但是他继承了威廉·威尔伯福斯的能力，能娴熟地驾驭公众舆论和统治集团的意见，以获得政府的有效干预。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他在这方面的才能被用来帮助矿工、工厂的雇工、移居国外的穷人和贫民窟居民。有些人认为，行政改革具有自身的动力，与议会行动或意识形态均无关系。“托利党的历史阐释”（这是对上述观点多少有失公允的说法）对比了两类人的行为：一方面是官员——“果敢的行动者”，以及阿什雷勋爵那样的热心家，他们有事实上创立自己的法则的能量，另一方面则是议会对社会状况的漠不关心。

然而，这只是对改革进程的部分解释。官员的行为准则因部门而异，因人而异。一部分人专注于工作，甚至不惜自我牺牲；可另一些人身上则反映出委任制度下文职人员的闲适、懒散的风气。作为邮政局的高级职员，安东尼·特罗洛普（Antony Trollope）仍有时间每周

狩猎两次，并且稳稳地年产1.7部小说。他的一部小说《三个职员》（1857）生动地展示出改革前死气沉沉的文职部门，也表现了特罗洛普本人对改革者酸溜溜的观感。

这是“地方自治”和向专业化演进的黄金时代，所以改革最强大的能量来自于大城市，来自于主要是在苏格兰接受职业训练的新一代医生，他们正处于从地位低下的外科医师和药师[4]向一支自我管理的专业队伍转变的过程中。1847年，利物浦任命了第一个医务卫生官；一年后，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危险、俗称“平方英里”的伦敦城也指派了强悍的约翰·西蒙医生（Dr John Simon）作为其卫生官。及至1854年，指派医务卫生官已经成为强制性规定。实际情况也证明这个职位至关重要，医务官不仅促使各个城市着手进行给排水系统和拆除贫民窟等方面的重大规划，而且确保有关限制建筑和过度拥挤方面的规章得以贯彻实施。

教育

新的工业社会引发了对教育组织的关注。这方面存在不同的意见：福音教徒汉娜·莫尔（Hannah More）相信，要做到灌输宗教思想但又保存秩序的话，孩子们就只应学习阅读而不应学写作；亚当·斯密则担心分工会造成劳工阶级智力愚钝化的后果，他寻求通过办国家教育的办法来削弱这种影响。苏格兰因加尔文教改革了教会，所以有国家教育机构，但是英格兰却不存在相应的组织。19世纪以前有文法学校（其历史往往可追溯到宗教改革前），独立学校或曰“冒险”学校[5]，以及慈善学校。学校质量差别甚巨，也根本无法适应正在壮大的年轻人群的需求，更别说为新兴城区服务和改善办学标准了。然而，1800年前后，舆论却转向了教育——可以用教育防范革命的发生，就连乔治三世（George III）本人也这么看。发生这个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出现了新的、廉价的因而也十分诱人的教学形式。由约瑟夫·兰开斯特（Joseph Lancaster）和安德鲁·贝尔（Andrew Bell）创立

的“导生制”——年长学生记住所学功课后再去教小的学生——直接导致1808年成立了不列颠和外国学校协会，1811年成立了全国协会。但是，和这两种旨在普及全国教育的尝试同时展开的，却是它们各自的发起者，即不从国教派别和国教之间的日趋激烈的对立。宗教态度的重要性超过了教育规范，这种倾向继续了差不多一个世纪。

改造私人捐助的“公学”中所遭遇的宗教对立因属于英国国教内部矛盾，所以没有那么激烈。18世纪末，公学的境遇十分可怜，但这种情况在激进的广教会人士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于1829年就任拉格比学校校长之前就已经有所改善。事实上，阿诺德进行的改革类似于1832年那个基本上是保守的政治解决方案，但却持久得多。“人文教育”（即拉丁文和希腊文）对于想上大学的学生来说仍是主修课业，但已经得到提升，从训练贵族青年的毫无意义的仪式化教育改造成了竞争性进取的科目，使中产阶级子弟可以通过奖学金和牛津、剑桥的学院研究助学金得到深造机会。中产阶级子弟的目标是最终获得资助进入专门职业行当，但他们的作用更为深远：他们引导着其他工商阶层子弟，去实践一种净化了的土地贵族的价值观。阿诺德于1842年去世，这时其他历史更久的公学已经都在效法他的改革；铁路系统的扩展以及1857年托马斯·休斯[6]那部极为成功的《汤姆·布朗求学记》对于这种模式的推广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基督教社会主义

公学的再造为新一代的改革者提供了一种范式，他们中有许多人就是公学出身。和边沁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发展出完整统一的计划，而是谋求改造那些只有贵族和国教教士才能进入的机构，使其为全社会服务。1848年，追随弗·丹·莫里斯（F. D. Mourice）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其中就有汤姆·休斯）力图使英国国教成为劳资纠纷的仲裁者，表达了“国民化”[7]的理想及其必然的结果，即让劳工阶级“融入”“政治社会”。他们并不孤独。在布拉德福德，激进的毛纺业

者、年轻的威廉·爱德华·福斯特（William Edward Forster）（他曾是贵格教友）这样写道：

> 如果不对群众作出让步，如果不是所有的阶级都在认真地争取使大众的日子能过得好些，那么动乱迟早会发生。不过我相信，防止动乱的最佳政治手段是使中产阶级能感受、体谅工人，帮助他们实现合理的要求，从而自己也会获得力量拒绝他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

福斯特的妻子是拉格比校长阿诺德的女儿，学校巡视员兼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姐姐。思虑高远而主张温和改革的“精神贵族”已经从原先的福音宗教向政治干预的方向转化。

牛津运动和广教会

阿诺德，英国的公学，以及大多数政治家都属于“广教会派”或说是国教的自由主义传统。按广教会的原理，教会被设想为国家的合作者，神学教义要严格服从这一合作关系。福音派则颂扬宗教的律令，然而他们朴素的神学观越来越受到自由主义的冲击，后者的侵蚀作用在1832年的改革法案中似已达到顶点。教士们担心一个边沁主义的、从而也是无神论的改革大潮将到来；约翰·基布尔在牛津大学的一次布道中宣告了教士对之的抵制，其依据就是英国国教的使徒传统。“书册派”，亦即牛津运动，并不是通过社会改革或“高教会派”的仪式来反对自由主义；它是对国教传统的守护性的、智性的诉求。12年后的1845年，牛津运动分裂，那时一些领袖人物断定他们和罗马之间已经没有阻隔，于是就“过去了”；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就是其中之一，他这样做一定程度上是回应了低教会派的迫害，但也有纯粹的智性信念的因素。尽管敌视运动者不看好，然而牛津运动还是通过像威廉·尤厄特·格莱斯顿（W. E. Gladstone）那样虔诚的平信徒，以及它对宗教教育和建筑的影响，巩固了国教精神。

广教会派采用一种更为社会学的眼光来评估宗教，既然有这样的

定位，那么当英国似乎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去教区的教堂时，他们也就陷入了困境。1851年那次绝无仅有的宗教人口普查表明，英国人口中只有约35％的人会去参加星期日的礼拜仪式，而且这中间有一半的人在“听”不从国教的牧师“讲经”，尽管各地区差别很大。1848年和以后的日子里，广教会派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投入很大精力去接近劳工，但是，如果说有1个工人是被这个团体的领袖莫里斯的神学说服了的话，那么有10个人是因为被莫里斯的同事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小说打动了，还有更多的人是因为得到了切实的帮助，如约·马·勒德洛（J. M. Ludlow）在工会的工作和爱·凡·尼尔（E. V. Neale）发动的原初阶段的合作运动。

国教至少拥有传统、财富和能够控制的广大地区，所有这些非国教教派都是得不到的。在宗派分裂、总是受到统治阶级的怀疑的情况下，有好几位持保守观点的不从国教宗的首领——著名的有循道宗联合会的杰贝兹·邦廷（Jabez Bunting）——力图互相联合起来。乡村和矿区的不从国教派则往往以政治激进主义为特征——威尔士南部发生的变化尤其剧烈；城市的精英团体，如唯一神教徒或贵格会友等，在政治上也往往十分激进。只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在反谷物法获得胜利之后，不从国教宗派才显示出实力，同自由党站在一起，要求改善自己的公民地位，或者如“解放协会”（1844年成立）的纲领所提出的，要求撤销圣公会的国立宗教地位。组织起来的不从国教派别在自由主义内部渐渐发挥了重大的——也是惹麻烦的——体制性作用。但是，富有的不从国教人士如一股细流似的连续地流入国教，这个倾向表明有组织的不从国教派也是一种损耗性资产。

在苏格兰，有关圣职授予权的争论在1833—1843年的“十年斗争”中达到高潮[8]，最后以确立的苏格兰长老会的“分裂”和新的独立“自由苏格兰长老会”的成立而告终。教会在世俗中发挥的作用迅速减弱——1845年济贫法付诸实施——但是，宗教政治在19世纪后半叶仍然困扰着苏格兰的中产阶级。

注释

【1】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见《圣经·旧约·诗篇》第127章第1节。

【2】 英文为“national apostasy”，指国家政府干预教会事务的背信行为。此演说被认为是牛津运动的开端。

【3】 Exeter Hall，1831年在伦敦斯特兰德大街上开设的公共会所，英国的宗教和慈善机构的年会往往在此召开（会议一般在五六月举行，也称五月会议），对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和推行人道主义的措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该建筑于1907年拆除。又，阿什雷是第七任沙夫茨伯里伯爵。

【4】 药师（apothecary），是经批准不仅可以售药也兼有处方权的人。

【5】 指英国的私立学校，不接受政府资助，靠学生缴费、捐助等手段运作。

【6】 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就读于拉格比学校和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成为出庭律师，自由党议员，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强身派基督教”代表人物之一，热衷劳工教育事业。他尊敬拉格比校长阿诺德，畅销几十年的《汤姆·布朗求学记》就是以拉格比学校为原型的小说。

【7】 原文用nationalization，意为应不论贫富，能代表所有人采取政治和经济行动的一种社会纲领，针对着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放任个人主义的不干涉主义（laisser-faire）。

【8】 苏格兰的确立宗教是长老宗，牧师由会众选出。1712年，英国议会批准由苏格兰的地主推选出地方教会的牧师，自此教会内的对文化和社会事务更感兴趣的“温和派”获得了统治权，信奉加尔文主义的福音派日渐不满。所谓授予权之争涉及应该由地主选神职人员还是将权力交还给会众的问题，反映出对教会和国家权力的不同看法。

第八章

“隆隆作响的变化之辙”【1】

即使用古典经济学的标准衡量，19世纪40年代也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英国工业的主导力量仍是纺织业，纺织品的市场有限，况且面临着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对该产业投资过多，每采用一种新发明就意味着投资回报的减少；商业的萧条一次比一次更甚，时间也延续得更长。实际工资增长缓慢，往往增长的部分还不足以抵消手工艺行业的急剧衰落带来的影响以及城市高昂的最低生活费用。马克思通过他那厂主朋友恩格斯的描述审视英国，对他而言，这都是一个图像的一部分。资本主义注定会断送在自己的剩余资本积累上；下一次经济不景气到来时，工资日趋低下的劳工一定会起来坚决反抗资本主义。马克思很可能会重申雪莱的挑战：

起来吧，像雄狮初醒，
你们人多势众，不可战胜；
快摇落你们身上的枷锁，
像摇落睡时沾身的露珠；
他们有几人？你们却众多。[2]

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事态似乎到了革命一触即发的地步。1845、1846、1848年的几次马铃薯枯萎病的爆发，摧毁了爱尔兰人口增长的基础。1845至1850年间，有近百万人死于营养不良；1845至1855年间，有两百万人移居外乡。爱尔兰贫穷移民愿意拿远低于英国标准的工资，他们已经被视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卡莱尔在《宪章运动》（1839年）中写道：“只要肯摘下统计数字的眼镜去看一看的人都会发现，在城镇或乡村……英国下层劳动群众的境况已经越来越接近那些在所有的市场上和他们争饭碗的爱尔兰人……”。事态之所以没有爆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那段时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工业发展，吸收了过剩的劳动力和资本供应，将它们转移到新的更多样化的经济中。这种经济的主要工具，从心理上说也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工具，就是铁路。

铁路

自17世纪初开始，各种类型的原始轨道就一直在将煤从矿井运载到港口或河岸。到1800年时，全国各地已经有大约200英里的畜力牵引轨道，它们的规格、样式各不相同，先是木轨，后来有了铁轨。18世纪70年代使用了铸铁，从90年代起开始使用可靠得多的轨道，也就是上面可以跑带凸缘轮的锻铁条形轨道[3]。这时出现了两种形式的蒸汽牵引机：低压的固定发动机牵拉着车辆上坡，而轻便的高压“动力”机车则在轨道上自行推进。1804年，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在威尔士演示了移动的蒸汽动力机车，北部的煤田很快采用了这种机车。那时，乔治·斯蒂芬森等“观摩”过动力机车的北方矿区人正在建造一种能承载大运力的凸缘轮式铁轨；1800至1825年，煤产量翻了一番，对凸缘轮式铁轨大量需求的结果使畜力牵引车荷载量大增。到1830年时，整个大不列颠已经在议会的授权下建造了375英里的铁路。

19世纪20年代中期商业繁荣，随着铺设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的宣传募资活动，建设铁路的高潮再次到来。1820至1830年间，棉纺业产量几乎增长一倍，曼彻斯特的人口增长了47%，然而生产生活必需物资的运输却因垄断性质的布里奇沃特运河而受到限制，因此有必要出现一个大规模的竞争对手。这种需要甚至超过了当时技术上的可行性。只是在公开竞争的压力之下，斯蒂芬森父子才在最后一刻造出了足够有效的动力机车。获奖的“火箭”号（1830年）和后来上生产线的“专利者”号（1834年）[4]之间的差异不亚于“火箭”号和其可靠却笨拙的前身“动力”号机车之间的差异；此后的半个世纪中，机车设计不再有什么更改。

地图2　铁路，1825—1914年

19世纪30年代，又一波投机热推动了铁路建设。到1840年，将近2,400英里的铁路将伦敦同伯明翰、曼彻斯特、布赖顿等城市连结起来。有些新铁路线很成功，其他投资过度的铁路则面临土地罚金和司法诉讼而陷入困境。早年的股份公司并没有多少规矩可言，一些能

够做到“股息票换金”的公司名声大振，如“铁路大王”乔治·哈德孙（George Hudson）在1845年就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一的铁路系统。哈德孙大把赚取利润的办法是卖股分红，也就是使用为建造新路线募集的资金支付已有铁路的股利。40年代由哈德孙推波助澜兴起的铁路投资狂热终于在1848年破灭，哈德孙的行径被揭露，他逃离了英国，然而，这时铁路线总长已经超过8,000英里，铁路网也已经从阿伯丁一直延伸到了普利茅斯。

铁路巨头

铁路时代也产生了铁路英雄，如自学成才的斯蒂芬森和他那极其聪慧的儿子罗伯特（Robert），约瑟夫·洛克（Joseph Locke），丹尼尔·古奇（Daniel Gooch），还有博学多识的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等。布鲁内尔的庞大计划——轨距为7英尺的大西部铁路[5]，首创的采用铁船体和螺旋桨的“大不列颠”号汽船，1.8万吨的“大东方”号巨型远洋轮——既使公众痴迷，也吓坏了他那些不幸的投资赞助人。吉·基·切斯特顿后来发问道：“哪个诗人族向星星发射了如此巨拱？”[6]。被卡莱尔称为“工业大亨”的这类实业巨子比棉纺业主更引人注目，后来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将他们树立为“自助自立”的样板。

图6　铁路时代的英国工程师群像，约翰·卢卡斯的作品，场景显然设在1849年秋天梅奈海峡边的一个工棚内。那时罗伯特·斯蒂芬森负责的建于克鲁 - 霍利海德铁路线上的梅奈大桥（见背景）正在架设锻铁管桁架。斯蒂芬森坐在中央，坐在最靠右边的是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再加上（坐在右二的）约瑟夫·洛克，就是铁路工程三巨头了。1859至1860年这一年里，三人都因劳累过度，在五十多岁时就相继去世。

建设和成本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在没有任何现代建造技术的情况下，新的运输系统创建起来了。是掘土工创造了这些带着英国早期铁路特色的巨大土木工程——据说1848年时，有25万名壮劳力在啤酒和牛肉的激励下做着挖掘土方的苦工。19世纪30年代，英国劳工的形象不是工厂里可怜的奴隶就是饿肚子的棉布织工。到了50年代，劳工的形象变成6个月内让水晶宫拔地而起的肌肉强健的工人，成了被送往克里米亚战场，用修筑铁路、搭建营帐的劳动挽回了军事无能的一支力量。[7]　然而，铁路耗费的资金量是空前的，到1849年为止，投资在铁路

上的钱已经不少于2.246亿英镑。1849年，总的收益仍不高，只有1,140万英镑；尽管到1859年，收益提高到22,460万英镑，但铁路始终不过是一种收入有限却还算稳定的投资项目，而有些公司却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1852年以前，铁路从客运赚的钱多于货运；此后货运量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铁路公司有计划有步骤地收买了运河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迄今为止运河的业主们一直享受着过分的高额利润，他们很不情愿在竞争中眼看着自己沦落下去。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运河体系的战略部门均已归属铁路所有，运河运输业务已经彻底地转移到铁路上。在工业发展最生机勃勃的领域中，亚当·斯密所抨击的资本家的共谋已经赫然成为事实。

注释

【1】 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的名诗《洛克斯利厅》（Locksley Hall，1842年）中的用词，从上下文看，这里的意象显然是新生的铁路："远处的召唤并不徒然。向前，让我们向前冲去，／让大世界沿着隆隆作响的变化之辙永远旋转下去。……／宁愿在欧洲只活五十年，也不想在华夏活满一辈子。"（181—182，184行）

【2】 杨熙龄译，《雪莱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III页。这段诗出自雪莱的《无法无天者的假面舞会》（The Mask of Anarchy）第38节，151—155行。

【3】 威廉·杰索普（William Jessop）于1789年发明。稍早的铸铁（即生铁）铁轨先后在外侧和内侧带L型的导向凸缘，以防车辆出轨，杰索普将凸缘从轨道转移到车轮上，这被认为是铁路发展史上的重大改革。

【4】 英文是*the Planet and Patentee*："行星"号是1833年由斯蒂芬森的儿子罗伯特·斯蒂芬森设计制造的、带有6个引擎的机车，获得专利。该机车后来有一些改进，成为蒸汽发动机时代的标准火车头。

【5】 布里斯托尔至伦敦的铁路，19世纪30年代末接近完工。

【6】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的诗句，他在想象遥远的未来有人对着伦敦国王十字架车站建筑的废墟感慨，就如我们对着公元前罗马人在法国南部建造的三层拱形高架引水渠（Pont du Gard）发出感慨一样。诗行中的"巨大"用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作比喻（cyclopean）。

【7】 克里米亚战争第一个冬天，英国军队指挥不灵，供给跟不上，士气

不振，英国铁路公司遂派挖土工去紧急修筑一条战时用的窄轨距铁路，主要使用畜力车运输，只在后期才用蒸汽机车。相比之下，俄国只有马车运输，所以有人认为是铁路挽救了这场战争。

第九章

政治和外交：帕默斯顿时代

铁路热的时代里，政治上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1842、1843和1844年的收成都很好，粮食充足，价格低廉。可是1845年，恶劣的天气摧毁了庄稼，爱尔兰的马铃薯遭遇第一次晚疫袭击。反谷物法联盟的意见似乎得到了证实。皮尔力争在内阁通过自由贸易法，未果，遂辞职，然而在辉格党无法组阁的情况下又回来当政。1846年2月，他提出在3年期内取消进口谷物税的一揽子措施；他通过对济贫法和地方警察部队的资助，赢得了——或说希望赢得——土地贵族士绅对废除谷物法的支持。然而，皮尔所在的党内存在深刻的分歧，当年5月他因镇压爱尔兰而遭受质询时，替他说话的人寥寥无几。在接下来的大选中，罗素回来了，组建了辉格党内阁，从此辉格党及后来的自由党便主宰了政治舞台。皮尔班子中包括格莱斯顿、阿伯丁伯爵（Earl of Aberdeen）和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Sir James Graham）在内的主要成员倒向辉格路线，受到重创的托利土地贵族士绅现在的领袖反倒是原先辉格党的德比勋爵（Lord Derby）和乔治·本廷克勋爵（Lord George Bentinck），还有那从前的激进分子、外来的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托利作为一个党派仍挺立着，只是接下来的30年中，托利党只执政了5年。

党派操纵，土地权势

那时党派的操纵力有所加强，其中心是圣詹姆斯宫的两个新俱乐部：一个是改革俱乐部，另一个是（托利的）卡尔顿俱乐部，两者均成立于1832年。但是，如果把政治设想成从左到右的不同态度，那就未免给前人强加上了后世的标准。当时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全国性的党派组织，也没听说过有什么党的纲领，公众演说十分罕见。选举之前（那时每7年举行1次选举），领袖人物——主要仍是辉格党巨头——会向最亲近的幕僚（往往是其亲戚）就政策问题吹吹风。有望当选的人便前往可能推选他们的选区，发表演讲，在当地名人显贵中拉选票，只有在得到可观的支持的情况下，候选人才会真正“付诸投票”。

选举耗资巨大，因此辩论式竞选并非惯例，而只是个别现象。土地贵族在很多存留下来的“口袋选区”中仍是不可撼动的势力。可以设想，在众目睽睽之下，地方上的一个农场主或是商人投票反对伍德斯托克的布莱尼姆宫 [1] 的话，那几乎就是自杀式的举动。郡县也同样捏在显要家族的手中。中等大小的选区比较开放一些，但很昂贵；有时候选举人严重腐败，和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匹克威克外传》中描写的伊墩斯维尔一样。新获得选区资格的大城镇有时会选出无经济实力但是有活动能力的人——如麦考利就代表利兹当了议员，但更多的情况是支持富裕的当地商人当选，后者往往负担了竞选的大部分经费。不过，有些事情直到今天仍是熟悉的现象：英格兰地区比较保守，而“凯尔特边缘地带”则更为激进。

1834年威灵顿那短暂的看守内阁后来证明是英国最后一次由一位公爵担任首相的政府；尽管如此，权力却仍然掌握在土地拥有者手中，可是在议会中，辉格党的势力仍然强大，和托利党平分秋色。要说起来，辉格党里有很多人是新近才得到了议员资格，这也应该算是上层统治阶层机动性的表现吧。皮尔和格莱斯顿都是牛津的两科优等生，可他们的上一代还不过是地方上的工商业者。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杰明·迪斯累里的成功：这位冒险家和小说家出自犹太教背景，而犹太教教徒直到1860年才获得充分的公民平等权利。

防务

政府部门在国内立法问题上花费的时间很有限，但在外交和防务上却费心得多——这也并不奇怪，防务开支在国家预算 [2] 中占三分之一以上。1815年以后，海军和陆军的变化都不大。1822年，海军购买了第一艘蒸汽拖船“猿猴号”；1828年，政府老大不情愿地又订购了几艘汽船，海军部的大臣们感到“引进汽船就是打算给帝国的至高权力以致命的打击。”明翼轮 [3] 意味着损失舷侧炮力，再说风帆大战舰还可以服役多年，所以，到1848年时，德文波特仍有全部使用风帆

的、三层甲板的大型战舰下水。不过这个时候，较小的船上成功地使用了螺旋推进装置，大型风帆舰队已经来日无多了。旧时的长期服役的军队约有13万人——1830年时，兵员中42%是爱尔兰人，14%是苏格兰人；在军饷低下，食宿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这支军队维持了爱尔兰和殖民地的秩序。在许多小型战役中，军队扩张了英国在印度的势力范围，推进了同印度的贸易，而在1839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则侵入了中国，攫取了非法的经贸利益；当然，此时军队代表的已经不是江河日下的特许公司[4]，而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商人的利益。

撤出欧洲

英国从欧洲事务中抽身也从外交上反映出来。打败拿破仑后，欧洲大陆的保守派领袖，尤其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I of Russia），力图通过经常性的大国协调会议建立一种欧洲的合作制度。但是，甚至早在1814年时，英国的外交家就更愿意通过传统的权力均衡方式取得安全保障，哪怕这意味着重新扶植起法国作为平衡俄国势力的砝码。在1814年到184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法之间都维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协约关系，但1830年时，这种关系曾受到干扰。那年，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脱离荷兰，看样子它可能会落入法国的势力范围。后来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利时保持中立，新王室同英国有密切关联——这一切都由1839年的伦敦条约确立下来，得到保障。1914年8月，德国违背了这个条约，致使长期的和平局面告终[5]。

英法之间的其他问题因同土耳其帝国[6]的不断衰落搅在一起，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了。英国希望维持土耳其帝国，以缓冲奥国和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这个时期，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830年，已46岁的他才刚刚步入外交界，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挤入了白厅那脏兮兮

的外交部（其权力鼎盛期也不过只有45个雇员），并一呆就是三十多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奉行了一种富有侵略性的爱国主义、然而在一定限度内仍不失为自由主义的政策。不过，1847年时，在欧洲名气最大的英国政治家并非帕默斯顿，而是自由贸易的使徒理查·科布登[7]。他在欧洲的一个个首都受到款待，而他的东道主全都相信一件事，那就是保守的君主政体行将就木，自由主义的时代已经曙光在望。

革命之年

184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起草了《共产党宣言》，代表德国的一个社会主义小组预言欧洲将爆发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将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2月24日，巴黎起来反对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接着，柏林、维也纳和意大利诸国也爆发了革命。然而英国却没有跟进。4月14日，当宪章运动者聚集在伦敦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请愿活动时，也曾出现短暂的恐慌；有一万名临时警察[8]宣誓上岗，内政部还买通电报局，令其在一周内不准宪章运动者使用电报。因中产阶级的志愿大军曾充当了欧洲大陆起义的先锋，故警察有可能比宪章运动分子更令人担忧。但是这些警察却绝对忠诚，于是革命成了在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坎宁顿公地上宪章派的人群散去，议会笑着看到了大请愿的结束。

然而，欧洲也没有重演1793年的情景。巴黎的共和政府希望维持与英国的协作关系，对国内的激进分子毫不手软，也不打算输出革命。[9]帕默斯顿并不希望改变大国均势，但更偏向于立宪政体，主张奥地利从意大利撤军。这种温和政策不怎么成功，英国未能保住自由主义者一时获得的成功。在匈牙利和奥地利方面，土地改革赢得农民支持，加上俄国的援助，使得匈牙利垮台了，奥地利可以腾出手来管别的地方了；就这样，旧制度又回来了。但是现在奥地利已经面临崩溃，俄国在东欧地区取得了令人忧虑的支配地位。[10]

注释

【1】 18世纪初，英国将领、第一任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在伍德斯托克的布莱尼姆打败法国和巴伐利亚军队。布莱尼姆宫是为他建造的。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是马尔伯勒公爵的后人。

【2】 一般用大写，the Estimates，即英国财政大臣每年向议会提交的国家财政开支预算。

【3】 早期的蒸汽动力船（paddle steamer）在两边舷侧中央有动力驱动的、周边带有一圈桨的大轮子（paddle wheel），而风力驱动的战舰上，炮眼安置在舷侧（三层甲板的有两排炮眼）。

【4】 与印度和中国有关的特许公司是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1874年解散）。早期英国开拓殖民地和对外贸易活动都通过类似的特许公司进行。

【5】 法国曾占领比利时，拿破仑战争后，根据国际条约，比利时划归尼德兰王国（荷兰）。比利时不愿意接受新教统治，始终进行反抗，欧洲各强国均想插手。英国为保证自己的根本利益，主张比利时独立和中立，并于1839年与其他四国用条约形式确定了这个安排。亦见第二十四章“战争爆发”一节及有关注释。

【6】 即奥斯曼帝国，或称奥托曼帝国（the Ottoman Empire，1290—1922）。

【7】 理查·科布登（Richard Cobden），下院议员，曾反对对华侵略战争，主张和平和国际合作等。参见第六章“反谷物法联盟”一节。

【8】 英国在紧急时期协助维持社会治安的特种警察（special constables）。

【9】 1848年的法国革命主要因国内阶级矛盾引起，是日益壮大的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为争取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革命中，奉行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与城市工人阶级的反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主义纲领发生冲突，故中产阶级联合右翼民族主义分子镇压工人，以维持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秩序和法国的民族主义。

【10】 除了匈牙利以外，欧洲各地的革命风潮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先后被压下去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的主要对立面是受到它统治的不同民族。匈牙利的最大民族是马扎尔，他们反抗激烈，提出了许多政治改革方案（“四月法律”），尤其是坚决主张民族独立（虽然他们在内部对克罗地亚等少数民族采取了沙文主义态度）。1848年底，奥匈军队终于正面冲突，匈牙利革命军队坚守在东部地区，并于1849年4月宣布匈牙利为独立的共和国，废除奥皇。奥军增兵匈牙利，并于6月请出俄国军队从东面亦即背部袭击革命军，终于击垮了革命的匈牙

利。此后奥皇对匈牙利分而治之，但也采纳了一些改革建议，如1848年奥国议会就通过议案，废除农奴制度，使农民能获得一些土地，而地主的损失也可从国家得到补偿。五六十年代，到处有民族独立战争，奥国四面受敌，才又同匈牙利达成妥协，于1867年成立奥匈帝国。

第十章

融合

谷物法的废除，1848年紧急事态的妥善处理，铁路的迅速发展等等，不仅使经济好转有了更大的希望，而且新的政治共识也为经济好转奠定了坚定的基础。农业利益集团受到遏制，但高效的农业生产也使它们经受住了外国的竞争。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意识到，他们既需要和老的统治集团联合起来控制产业工人，但也需要对工人作出一定的让步，以避免爆发政治动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尤其是同纺织业比较之下），铁路、蒸汽机和电报都极为有用，魅力十足，成了吸引眼球的工业化的广告。它们所起的作用是将土地、商业和工业拉到了一起。它们尤其让律师们发了大财。

渐进的改革

到了19世纪50年代，法律已经将劳工阶级或至少是劳工领袖们“融合”进来。由技师和木匠等技术工人组成的“新型”工会不再竭力要求国家采取断然的干预，而是要求合同上的平等权利。他们不再进行公众示威，而是通过对两党议员有策略地施加压力而发挥作用。他们在程序上和形象上摒弃了旧时类似阴谋团体的盟誓和种种神秘主义的形式，几乎学究式地恪守着法律条文；他们十分在意捍卫自己作为劳工阶级上层人物的尊严。

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也朝着“融合”的思想发展。更早些时候的古典经济学具有颠覆性，并持悲观主义态度；其中的一支在马克思的手中发展起来，仍然保持颠覆性和悲观主义。但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他1840年的《逻辑学》和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中，则将功利主义同渐进的改革以及同情温和劳工领袖的目标调和起来。穆勒惊讶地发现，他那大量借鉴了亨利·德·圣西门（Heri de Saint-Simon）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之法国社会学传统的《逻辑学》，居然成了古老大学里的正统，当时那些大学正在从牛津运动的创伤中恢复元气。不过，穆勒这位“理性主义的圣徒”也正因其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热爱，才终于使他那种混合了功利主

义、伦理个人主义和改良派“社会主义”的思想能够被体制内的改革者所接受。这些改革人士在19世纪中叶迅速发展起来的、品位甚高的文学评论杂志上著文，使穆勒的思想广为人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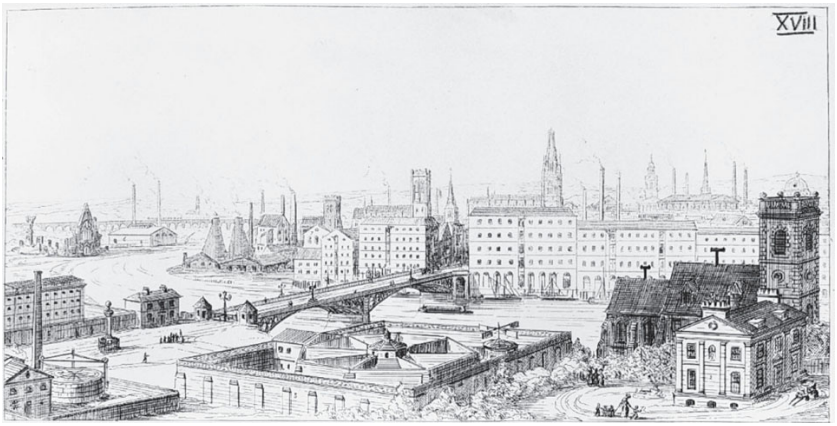

图7　奥·韦·诺·皮金在他的《对比》（1840年）[1] 中描绘的一座工业化城市，书中这位仿哥特建筑的大师抨击了古典建筑，宗教上的离经叛道（图中显示的就有不止9个宗派的礼拜场所），还有那些阴沉的、机器般的建筑所体现的工业社会的冷漠无情。图下方的监狱就是杰里米·边沁提倡的一种环形监狱。

在准备参与政治融合体的人的眼中，“法治”却远非完善。将“法治”一语用于19世纪政府的艾·凡·戴西（A. V. Dicey）后来在60年代写道，“作为约翰·史密斯的约翰·史密斯是压不下去的，然而作为技工的约翰·史密斯却会受到压制。”不过，他期望选举权的扩大将会终结这种不公正——而这点后来基本上做到了。

“法律以外的”[2]

那么，还有哪些人仍身处“法律以外”？爱尔兰人以前受到了太深的伤害，奥康奈尔留给新一代爱国者的遗产就是“撤销联合”[3]。尽管信奉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就像苏格兰人一样，实际上迫切希望能在不列颠的现有社会体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但爱尔兰民族主义

者却因大饥荒而变得更加好斗，后来他们还得到已经移居美国而心怀怨恨的同胞的支援。在各个殖民地定居的人可能为自己在当地移植了英国的体制而感到自豪，可是殖民部很清楚，拓居者有关法律的观念中根本没有当地人的权利这一说。当法庭支持了广教会派那套模糊的、包容一切的教义时，无论高教会派还是低教会派都是满腹怨言。他们虽然扳不倒广教会派，但其影响力却能给维多利亚城市的概貌和宗教虔敬活动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有知识的人早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之前很久，就接受了政治和社会进化的观念，如丁尼生说的，“自由缓慢地向下扩展／从一个判例到又一个判例”[4]。卡莱尔虽说对自由主义并不友好，但他对自立精神和工作伦理的赞誉使个人主义获得了近乎宗教的品格。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成为维多利亚中期自由党的栋梁之材，他的古怪[5]只在于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愿——要将“融合”延伸到政治无视其存在的人口的另一半，即妇女（她们在公民和法律权利方面的平等待遇变化缓慢，不过，在19世纪50年代里，进步已经开始加快了）。还有两位智识之士有更多的困扰不安，其态度很难一言以蔽之。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这位“牛津毕业生”所写的《现代画家》在1843年造成轰动。虽然和欧文相比，罗斯金直接的政治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他对贵族的尊重同他在经济和环境问题上越来越具有颠覆性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至于狄更斯，没有人比他更激烈地抨击了司法的延宕和不公，然而也没有人比他更忧虑革命和无法制的后果：前者有“弯弯绕绕事务部”，泰特·巴纳克尔们[6]，庄迪斯诉庄迪斯案[7]，但另一方面，也有与之相当的斯莱克布里奇（Slackbridge），德伐日太太（Madame Defarge）和比尔·赛克斯（Bill Sikes）[8]。不过，戴西的意见大致是正确的：在经过比较权衡之后，他将狄更斯放在了沙夫茨伯里[9]一边，作为推动公众舆论走向“积极”改革立法的力量。

小说与歌谣

好战的不从国教者和老的激进分子有自己的世界观，同体制内的作家的见解差异甚巨，但后者也向他们伸出了触须。19世纪40年代，中产阶级阅读着“工业小说”，如迪斯累里的《西比尔》等作品对大城市的情况既感到担忧也十分着迷，试图将城市的问题人格化，并用个人主义的道德去化解问题。但是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的《玛丽·巴顿》和金斯利的《艾尔顿·洛克》却不能给人以这样的确定性；对于小说中最有英雄气概的人物来说，最实在的解决办法只有移居他国。《艰难时世》中，当需要考虑怎样改善焦煤镇居民的未来的时候，狄更斯便从对曼彻斯特的那种卡莱尔式的辛辣讽刺笔锋中退缩了，无力再继续下去。

然而，焦煤镇却不大有人会花时间或花钱去阅读文人心目中对他们苦难的构想，况且他们究竟读些什么东西也很少为人所知，虽说文学激进分子被中产阶级阅读大众所接受同化，但他们显然会对劳苦大众的阅读产生影响。梅休（Mayhew）这位《记事晨报》的社会调查人差不多是将科贝特和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的新闻工作传统坚持到了19世纪60年代[10]；可是出自同样的反世俗圈子的狄更斯则抛弃了这一传统。我们知道，工会组织中的“劳工贵族”阅读那些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希望他们读的东西；我们知道，信奉宗教的人仍在读着他们的《圣经》和《天路历程》；但是说到“粗人”，“小酒馆社团”，他们读些什么我们知道吗？在渔港、在织工中、在农庄上，民间口头文学仍流传了下来并继续发展着。19世纪后期，一个美国教授发现，著名的英格兰民谣中有三分之二仍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乡镇上传唱着；当地还有更加平民化的“茅屋歌谣”在农夫和车夫中传播着有关农场主的种种消息；而“骑手闲话社”则保持了一种朴素却实在的工会主义。

乔伊斯·卡里（Joyce Cary）的小说《若不是耶和华》（1953）写一个激进的政治家在维多利亚中期度过的青年时代。卡里让他的主人公切斯特·尼莫（Chester Nimmo）走进一个游乐场的帐篷，戏班的演员正在表演《玛丽亚·马登，或红谷仓谋杀案》，那是大体上根据1830年“斯温船长”起义前夕发生的一桩真实谋杀案改编的情节剧，在

19世纪是个常演不衰的剧目。下面就是尼莫的反应：

我们看的这出戏，数百万人看过的这出戏，讲的是富人对穷人造成的种种痛苦中最最残酷的伤害。全剧竭尽所能地表现了穷人的美德、纯洁和无助，以及富人那毫无节制的残忍和无情的自我放纵。

而这只是一出戏，类似的戏剧还有好几百种。我常常觉得纳闷，这样的宣传怎么就没有在英国引起流血的革命呢，就像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几乎所有别的国家那样？这宣传的力量是惊人的啊。我说过了，它对我的人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一个敏感的有历史意识的小说家，卡里似乎在这里觉察到一种深深的怨恨和痛楚，这些可以被正规的劳工阶级政治的体面名声和自助风尚所掩盖，然而，无论是政治“融合”，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卫生条件不差的工人住宅，越来越富裕的非国教的教堂，还是仍紧锁着的礼拜日公园【11】，全都无法抚平深处的伤痛。

注释

【1】 奥古斯塔斯·韦尔比·诺思莫尔·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 1812—1852），从小随父亲（法国移民）这个哥特建筑模型家学习绘制哥特建筑，并在欧洲各地有广泛见识；1834年皈依天主教后更是坚持唯有中世纪的哥特建筑才代表基督教的优异，而古典、新古典建筑丑陋低下，是异教的东西。1836年自费出版的《对比》就是两种建筑样式的一系列对比图示，并有文字说明，立场鲜明。此书产生很大影响，是维多利亚哥特复兴的重要作品，也开创了建筑道德批评的先河，罗斯金的《建筑的七盏灯》等明显受到他很深的影响。皮金短短的一生担任过近70所教堂等建筑的设计、施工、装饰工作，在重建被大火烧毁的英国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的设计和装饰中起了重要作用。

【2】 《圣经·新约》中有不少“without the law”的提法，意思是“没有律法的”（人／民族／国度），“律法以外的”。如《罗马书》：“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第2章12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第3章21节）；《哥林多前书》：“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第9章21节）。本节中主要应指尚未获得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责任的人。

【3】 指撤销1801年爱尔兰（议会）并入联合王国（议会）的法案。参见第四章“与法国交战”一节。

【4】 出自丁尼生的诗《你问我，为什么》（"You ask me, why, tho' ill at ease"），第11—12行。该诗可能写于1834年，于1842年首次发表。

【5】 “古怪”，此处的英文形容词“eccentric”应来自穆勒在他著名的《论自由》（，1859）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为了防止民主社会中多数人实行强行趋同的“暴政”，保持社会的活力，应该保护少数人的意见，甚至可以说，人应该“古怪”才对。穆勒所说的eccentricity，与一个平庸社会中的“天才，思想的活力，道德勇气”等指标有关，参见J. S. Mill, *On Liberty*，ed. Currin V. Shield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1956) 81—82页。此处所指，是他在泰勒夫人的影响下，在议会提出妇女权益的议题，见他于1869年发表的《论对妇女的统治》。

【6】 出自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讽刺文官制度改革前英国政府部门繁文缛节的官僚作风。巴纳克尔的原意是“藤壶”，一种紧紧附着在船底或岩石上的海洋甲壳类生物，狄更斯将占着位置却不干任何实事的政府部门官员取名为泰特·巴纳克尔（Tite和tight同音，紧贴，紧附的意思），比喻政府官员当闲差，做社会寄生虫的生活。

【7】 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中所描述的英国衡平法院（大法官庭）中一桩久拖不决的案子。

【8】 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双城记》和《雾都孤儿》中的人物，分别是工会组织者、法国革命者和盗贼，均是比较负面的形象。

【9】 参见第七章第二节“卫生改革”中提到的阿什雷勋爵。

【10】 《记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1769年创刊的辉格党报纸，1862年停刊。哈兹里特曾为之写作。科贝特参见第四、五章。

【11】 英国中下阶级中大多为不从国教的基督徒，19世纪时，受清教影响很深的各教派和国教内的低教会派主张坚守安息日，即星期日应该是“心智、道德的更新之日”，只能上教堂和主日学校，研习圣经，检讨自己，必须严禁一切商业、工作、旅行和娱乐活动；星期日甚至不准许递送邮件，图书馆和博物馆不准开门，更毋庸说戏院、公园等游玩场所了。虽然维多利亚时期，守安息日在英美均已体制化，但工商业的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兴起，终于使这个习俗走向衰落。

第十一章

自由贸易：不受节制的工业经济

1851年的大博览会展示了联合王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当然，展会上有许多欧洲大陆的，尤其是德意志诸邦国的产品，其优异的技术品质也让细细察看的英国厂主们不由得驻足思量。由宫廷赞助发起并由贵族组织的这次博览会，反映出英国致力于经济进步、从而也致力于自由主义事业的决心。博览会点燃了公众的热情。一列列特别火车则满载着游客从全国各地驶往伦敦；对许多普通人而言，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坐火车来到伦敦，参加漫长的、让人疲惫不堪却也兴奋不已的一日游。博览会的成功令那时的人惊讶。报上每天公布参观人数，到展会结束时，共售出600万张票，有一天竟有10多万人参观了“炫目的透明玻璃大拱”——那座设在海德公园内的、由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设计的展览馆：“水晶宫”。展会丰厚的收入后来用于建造南肯辛顿的博物馆。

巨大的人群举止得体，公开拥戴君主政体。有产阶级人士感到庆幸：19世纪40年代那种紧张不安的、随时会爆发冲突的氛围已成过去，50年代的氛围趋于平静，而到了60年代，已经是一派自信的声音了。博览会上出售的一首街头歌曲就突出表现了工匠的自立精神、自由贸易的国际眼光和君主政体沙文主义的奇特混合，其用语定下了19世纪后半叶英国公众生活的基调：

哦，英国最大的财富
当然是诚实的劳工……
看到数千人聚在一起，
不分宗教或地域，
友好地互相问候，
是一种辉煌的景象。
如同大家都是一个强大祖先的子孙，
愿这神圣的联系永不终止。
愿沾着鲜血的战争之剑
让位给和平的橄榄枝。
但是听啊！号角声响成一片，

维多利亚女王真的来了。
我们首要的祝词就是
愿她为我们而长寿。
我相信每一颗心，它会响应
我下面的祝愿——
让她的朋友们发达，繁荣，
让她的敌人见鬼去吧。

不少像这样的歌曲的语调说明亨利·坦普尔（Henry Temple），即帕默斯顿勋爵是多么深得人心。当1852年组成的阿伯丁勋爵联合政府陷入同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并因战果不利被披露而解散时，帕默斯顿从其废墟上冒出来，担任了首相。从这时直到他于1865年去世期间，除了一次短暂的间歇外，他始终在首相的位置上，领导着自由党联合政府。帕默斯顿象征着英国这唯一世界大国的膨胀的自信心；他集贵族、改革家、自由贸易商、国际主义者和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等多种角色于一身，并成功地同时扮演了所有的角色。

1851年的共识

在1851年的大博览会上所显示出来的那个社会在同一年进行的人口普查中更是得到了统计学的分析。有两个事实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联合王国本土上，城镇（尽管往往是规模很小的城镇）的居民数第一次超过乡村居民数，从而同过去和任何别的经济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由贸易运动不是预料到，而是伴随着英国经济投向了基于城区的制造业、运输业和服务业。19世纪20年代时，自由派的托利党人还幻想着能使经济在农业和工业之间多少取得平衡，可随着自由贸易黎明的到来，这个梦想已经被人遗忘。农业无疑仍然是最大的一种产业，在五六十年代，农业生产的能力和产量也确实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人口的增长发生在城镇，劳动者离开土地进入了城市。

19世纪70年代中，随着北美大草原的开发，农业面临着危机，可这时为农业辩护的人却寥寥无几。70年代发生的“田头造反”是桩错综复杂的事件：当薪水下降时，失业的劳动力奋力地组织起来，而治安官和农场主则调军队来收割庄稼。其实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尤其是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南威尔士和苏格兰南方——并非通过有意识的政治决策，而是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世界贸易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乘坐上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过山车；搭车行路者除了眼前突高突凹的急遽变化，什么也看不见：前方是从未走过的路。城市国家没有先例。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英国如此执着于乡村的形象和传统的原因。

1851年人口普查吸引当时人们关注的另一项统计是它所揭示的宗教状况。这是唯一的一次力图评估英国人参与或不参与宗教礼拜活动情况的人口普查。关于统计数字有分歧和争执，但是其要义却不容置疑并令人惊讶：只有一部分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去教堂，而英国国教信徒在全体做礼拜的人中只勉强占多数。在17,927,609的总人口中，各大教派中做礼拜的人数为：

英国国教	5,292,551人
罗马天主教	383,630人
新教中的非国教宗派	4,536,265人

在可能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中，有超过525万人呆在家中。这次普查是非国教教徒的胜利。他们声称自己有更广泛的政治代表性和关注度，现在这一宣称已得到“事实”的支撑，而“事实”则是维多利亚中期的武库中最强有力的武器，对此狄更斯笔下那个兰开夏郡制造业主葛擂更（Mr Gradgrind）[1]十分赞同。

于是，19世纪50年代，英国越来越城市化，或许还越来越世俗化，当然整体感觉上也越来越非国教化。维多利亚中期的政治反映出这种种倾向，它们全都朝向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

1847至1868年间，托利党（1846年的分裂[2]之后，托利党中的剩余部分作为保护贸易主义者离开了该党）一连6次大选失利（分别为1847、1852、1857、1859、1865、1868年）。托利党大选失败是明确的，但是究竟谁赢得了大选就不大好说了。多数党政府依靠的主要是四个方面力量的支持：辉格党，激进分子，自由主义者，皮尔党人（1846年追随皮尔的人）。这样的支持者总是很容易散伙。经典的维多利亚中期社会的政治模式就是由上述四种派别或其中的大多数派别组成联合政府，搞折中妥协，讨价还价，直到有一天互相无法取得一致，就到了崩溃的地步：于是在不解散议会的情况下政府下台，然后由托利党组织起少数党政府，在此期间非托利党的党派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挫败托利党，强行解散议会，赢得大选，重新执政。这一总的模式解释了何以出现1852、1858—1859和1866—1868年的托利少数党（德比／迪斯累里）内阁。

1848至1868年间的政治体系就这样既将托利党排除在权力之外，却又让其在一些时期内临时组成少数党政权。在同一时期，由阿伯丁勋爵在1852年首先组阁的多数党联合政府也渐渐地融为一体，成为“自由党”；尽管如此，即使到了60年代，在这个联合体已经通常被称作“自由党”的情况下，它仍然具有分裂倾向，动辄解体。行政班子则以辉格党人、皮尔党人以及帕默斯顿勋爵为主。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是靠容忍进行统治的。19世纪40年代，反谷物法联盟所体现的中产阶级政治意识的高涨使政治家清楚地看到，要维持老的政治架构，唯有对中产阶级的期待作出让步妥协。1853至1855、1859至1865年间，皮尔党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提出一系列大型预算报告，力图从财政方面满足这样的期望。制造业界想要自由贸易权，格莱斯顿就确保他们得到贸易自由。

“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的意思当然比起单纯的取消贸易保护关税要复杂得多。“自由贸易”或“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只是简略的用语，它们所代表的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方面的一整套基本原理。1848年，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堪称维多利亚中期自由主义的指南，它言简意赅地点出了要义：“总而言之，放任自由应该成为普遍的做法：任何偏离此做法的行为，除非是出于某种大善的要求，否则肯定是恶行。”这套原理设想的是国家应该靠边站。穆勒等人分隔“国家”和社会的做法，是基于个人能够、并且应该特立独行的认识预设。个人主义、自尊、自立、组织各种自愿捐助和合作的社会团体，这些都是维多利亚中期自由主义的主导原则。由此，应让经济自行调节，而一个个手捧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自助》一书（1859年）的人，无论他们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应该有充分的自由，在经济活动中按自己的所能朝前走。

这种个人主义观念因广为流传的社会进化论著述而获益。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并非突如其来；它自然而然地汇入已有的论进化的文字，并且超越了其他同类著作。无论从个人的，国家的或是世界的层面看，进化的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进步”的概念，都渐渐渗透进维多利亚生活和思想的方方面面。进化既然由科学规律所决定（这个观点通常被表述为“实证主义”），于是人类的责任就是要发现并遵循这样的规律，而不是干预规律。就这样，大多实证主义者（如担任很有影响的周刊《经济学家》编辑的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还有写了许多社会学著作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都强烈支持自由放任主义。

免征知识税

个人想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知识储备和训练，因此对于自由社会说来，至关重要的是知识的可用性和评价知识的自由。道德选择必须是有见识的选择：乔治·艾略特（玛丽·安·埃文斯）小说的主题就是

在富有人类同情心的环境下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她本人的一生所见证的，不仅是维多利亚中期社会中自由精神的释放，也是其经历的磨难。

1855年和1861年两次取消“知识纳税”（报纸印花税及纸张关税和消费税）的举措集中体现了备受重视的自由主义法规。废除了知识税，才可能出现大城市和地方上的自由报业，而自由报业的现象正是自由主义英国的缩影，也是其保障。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地方的日报和星期日报惊人地发展壮大，占压倒多数的报纸在政治和一般观念上都是自由主义的。到1863年时，英国的报纸已经超过1,000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新近创办的报纸。例如，在约克郡，1867年的86家地方报纸中，1853年后开办的就有66家。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于1855年再次创业，成为一便士日报和自由主义报纸的旗舰，1871年的发行量几近20万，大大超过了《泰晤士报》。新办的地方报刊比照着《每日电讯报》的感觉，毫不掩饰地热情鼓吹进步主义。下面的这篇评述1862年格莱斯顿巡视纽卡斯尔造船厂的社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 如果我们为德比勋爵［托利领袖］献上一朵政治三色堇，并告诉他“留个纪念”，那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凶暴谬误和疯狂不可以仅仅由于得到了原谅而被忘却……自由贸易戴上荣耀的绿色桂冠已有10载，她的手上还握着法国条约［1860年签订的自由贸易条约］这一未来征服的象征，我们总算是将自由贸易请进了永久的神座。

财政政策

到了19世纪60年代，特指不设保护性关税的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英国政治的重要正统信念，几乎像新教传统一般不容更改。经典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彻底获胜，这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中最根本的信条已经牢固地确立为一种政治准则，而这条准则已得到如此普遍的承认，以至于只有故意作对或自认死脑筋不转弯的政客才会否认之。议会中的前座

[3] 托利政治家很快认识到，如他们还想再次成为多数党的话，那么就像迪斯累里说的，他们必须接受保护贸易“不但死了，而且还遭受永罚”的现实。托利党的预算案变得像自由党的一样，无可挑剔地奉行了自由贸易。

教会

在财政政策以外的领域中，人们对于“自由贸易”应该走得多远的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压力集团在大范围内倡议“否定”性的自由贸易措施，例如撤销国立教会，取缔强制性的教堂税，废除就任牛津、剑桥职务及公职时的宗教宣誓[4]，撤除对转让和使用土地的限制，终止基于恩赐委任的文官制度，等等。除此以外，60年代在各选区中还有要求进一步改革议会的大运动；自由党议员虽非个个赞同这个要求，但许多议员是支持的。

对这类问题进行立法的自由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它其实是各有其属的、错综的、相互牵连力量的松散联合，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各方都忠于自由贸易经济。在联合体内部有多种促成改革的权益考虑，尤其是宗教方面的权益。19世纪60年代的宗教大复兴使自由党内增加了许多宗教活动家，也唤起了他们更大的热情来抒发己见，积极争取自由党的成功。罗马天主教，不从国教各宗派，甚至连现世主义者都在这场有广泛基础的进步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他们对圣公会和国立教会的敌视使得这些声音形成了共同的强音。整个19世纪中，非国教势力的联盟恐怕就是把选票投给自由党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

然而吊诡的是，自由党这个联合体的领导人清一色的全都是国教教徒，当然是比较温和的主张改革的国教徒。因此，联合体的领导人和拥护自由党的更为好斗的人士之间在改革速度的问题上少不了争辩。总的说来，帕默斯顿、约翰·罗素勋爵和格莱斯顿等领袖人物希望有节制地进行适度的改革，那样大体上会巩固圣公会的地位；然而基

层的激进分子则希望改革一步步走下去，直到最终撤销圣公会的国立宗教地位。于是，两方面能够达成一致的是诸如取缔强制性教堂税等有限的措施，可在政策的终极目标上却无法统一认识。这样的议政方式下达到的最高成就便是1869年时撤除了爱尔兰圣公会的国定宗教地位。

选举改革

自由党内有能够清晰表达思想的劳工阶级成员的参与，尤其是在选区层次上参与，是极为重要的。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初期，宪章运动提出的六点要求 [5] 按当时的政治状况看，是不可能被执掌政权的阶级所采纳的。到了50年代后期，不少从前的宪章运动人士领导的激进的宪政改革运动却只提出了选举权改革的要求，即使在这个问题上最多也只是要求将选举权赋予一家一户的男性家长（即所谓的“一户一票” [6] ）。对这样的要求作出让步，这对于两党（尤其是自由党）的政治领袖都不是难事。

两党想改变现有的选举制度，也是打着各自的算盘。一些托利党人思变，是因为他们自1847年以来的经历表明，在现有的选举制度下他们不可能获得大选胜利。包括格莱斯顿和约翰·罗素勋爵在内的自由党人则想稍许扩大选举权，以便拉进更多的倾向自由主义的技工，这些都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会支持自由党的紧缩开支和改革的纲领。像约翰·布赖特这样的激进分子则希望实行“一户一票”制，让自由主义获得更加坚定的基础；尽管如此，甚至激进分子都很快表态，不希望把选举权交给大家所知道的“底层”（也就是贫民、失业的人、“无用之辈”、身无分文之人）。像罗伯特·洛（Robert Lowe）这样的自由党人在普通的立法问题上可以相当激进，但他们并不相信任何走向“民主”的变革，因为他们认为那样的话，“聪明的阶级”就会被淹没。托利党人，如日后的索尔兹伯里勋爵 [7] 等非常害怕“一户一票”制度会通过增加所得税等直接税种的手段侵犯财产权。一些辉格党人则看不出

一个总是能选出非托利议会的选举制度有什么理由要改革。

帕默斯顿就反映了上述最后一组人的意见，1865年他在没有许诺进行选举改革的情况下赢得了大选。同年秋天，帕默斯顿去世。1866年，继任首相罗素同格莱斯顿一起搞了个主要针对城镇的极其温和的改革议案，引起内阁分裂，党内有一部分人不满议案太过分，另一部分则不满议案做得太少，他们都收回了支持。这时第三届德比／迪斯累里少数党托利政府 [8] 推出了自己的城镇选举改革，从而放弃了过去反对改革的立场。

某种形式的改革已经成为必然：在迪斯累里出人意料地宣布自己接受“一户一票”的修正案时，自由党已经开始了习惯性的重组；接着选举法修正议案通过，它在形式上比前一年罗素 - 格莱斯顿提出的方案更富有戏剧性，也彻底得多。1832年的选举制度告终，从这时起直到1915年，英国城市政治的界限和范围已经确立（1884—1885年，类似的选举权也给予了生活在郡县的男性）。在1868年极度混乱的形势下，自由党似乎再度证实自己在1865年选举中的优势地位，以超过对方112票的高票多数赢得了大选。

事实上，1867年的选举法修正案改变了政治游戏的规则，竟使托利党成立多数政府的可能性再度出现。不过，那是1874年在迪斯累里领导下的托利政府，它不想做任何认真的努力去逆转自由党在前30年中取得的重大成果，尤其不会更改自由贸易这个核心要件。

第一届格莱斯顿政府

在格莱斯顿首届政府（1868—1874年）工作的初期，种种改革压力达到了顶峰。到1874年时，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提出的许多要求都已经得到满足。除了撤销了原爱尔兰教会的国立宗教地位以外，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早期，自由党还取缔了强制性教堂税、“知识纳税”、出任牛津和剑桥职务的宗教考查、以及军职买卖；他们就爱尔兰的土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教育等问题制定了法律；他们开放了

行政服务机构，搞文职人员考试竞争上岗；他们还倡导有限责任的做法，使投资人感到资本主义变得比较安全了——凡此种种举措之上，自由党最重要的思虑仍是自由贸易财政、适当的行政决算、最小的预算以及削减费用。

虽然在改革过程中少不了通常的政治较量和磋商，但是改革的洪流并未受到严重的阻碍。完整保留圣公会的国立宗教权势地位曾是19世纪上半叶托利党最大的号召力，然而这时圣公会的统治地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清晰地有效地削弱了：19世纪30年代时，削弱圣公会的统治还只是激进分子的梦想，可到70年代已经实现，而且几乎没有遭遇明显的抵制。托利党还有最后一张牌，那就是不经选举组成的贵族院，但他们只在很有限的情况下出牌，例如拖延取消纸张税，推迟取缔教堂税，延缓通过秘密投票制和废除大学任职的宗教考查。在自由党的国家大船彻底清洗甲板的时候，有产阶级和劳工阶级采取了协作态度。

经济繁荣

“自由贸易”的思潮风行起来时，也是经济繁荣的时期，这一繁荣期从19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当时的人认为是自由贸易造就了经济的昌盛，而经济史家则对此表示怀疑。或许去除关税壁垒只对英国经济产生过很有限的影响，然而，在全国都致力于经济进步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自由贸易”的优势地位却和各阶级共有的创业热情密切相关。

图8　1888—1889年正在建造的第四座大桥形成了完整的铁路交通网；90年代铁路建设达到顶点。

世纪中叶的繁盛反映在数字上并不惊人，而且那时还有轻度的通货膨胀。但这个时期的长足发展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似乎表明，在1820—1850年间备受关注的“英国状况”问题可以，并且正在通过现有社会政治架构内部的市场力量运作得到解决。甚至19世纪60年代兰开夏郡的“棉花饥荒”造成的困境——美国内战切断了南方诸州种植园一直以来对英国棉纺厂的原料供应——都没怎么引起持久的政治反响。有产阶级感到庆幸，地方立法和自愿募捐似乎足以让威斯敏斯特的政府免于承担兰开夏劳动力困苦境遇的直接责任（当然，政府的贷款计划事实上也起了重要作用）。

同其他国家相比，1850至1870年间的英国经济在复杂性及其所涵盖的产品和经济活动的范围来看，都非同一般。它在煤和铁这些早期工业经济的基础原料方面有优势；欧洲大陆的国家为满足自己搞工业化时的基本原材料所需，从英国进口煤和铁，英国因而加强了这两种商品在世界上的优势。一个充满活力的制造业部门奋力地向前迈步，从船舶和蒸汽机，到纺织品，再到装点了维多利亚家居的林林总总的小商品，它的产品真可谓包罗万象；出口商品装在英国船上运出

去，使整个贸易世界都染上了维多利亚色调。支撑这种紧张的工业活动的，是可靠的通货，以及尽管有故障却仍不失为比较稳固的银行系统：从70年代起，银行在经济活动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注释

【1】 葛擂更是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偏执奉行功利主义理念的商人、议员，他注重实际到了扼杀心灵的地步，在矿区开办的子弟学校称为“事实学校”。

【2】 参见第九章第一段关于取缔谷物法引起的保守党分裂。

【3】 议会的议席分左右边，各坐着执政党（右边）和反对党（左边），两边坐前排的是资深议员和内阁成员，坐后排的是资历较浅的议员。

【4】 17世纪宗教改革后，国教为稳固圣公会（即安立甘宗）的地位、限制非国教的清教派别和天主教的势力，曾有一系列立法将非圣公会信徒排除在行政和军队职务之外，所有出任职务者必须进行效忠宣誓，宣布自己忠于国王，并至少从前一年内起已经参加圣公会的圣餐礼；事实上，是否公开宣誓参加圣公会圣餐已经成为“宗教考查法”（the Test Act）规定的领受公职的条件。此后一两个世纪，英国实行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政策，但是宣誓礼仍继续，到19世纪才逐步真正取缔对非国教信徒公民权利的各种法定限制。

【5】 参见第六章最后一节。

【6】 19世纪中叶，“household suffrage”是一种扩大选举权的方案，顾名思义似乎是每家每户都有投票权，可其实家庭户的概念首先是对男性户主而言，女人自然没有投票权；家庭户也意味着拥有或租有相对固定的居所，这就排除了英国社会中居无定所的流浪人群（下一段中提到的所谓“社会渣滓”，也就是在社会底层的人）。在罗素和格莱斯顿的议案中，将1831—1832选举法中规定的住宅本身每年10英镑的租金底线降至每年7英镑，表面上是大大降低了门槛，实际上这7英镑是经过非常细致的估算的：假如6英镑年租的住户就可获选举权，那么选区中必然会造成劳工阶级占多数的局面，而自由党的领袖只希望劳工中的精英阶层“融合”进来。参见H. C. G. Matthew, *Gladstone, 1809—1898* (Oxford: Clarendon, 1997) 139—140页（该传记作者为本书作者之一）。亦见第十章。

【7】 本名罗伯特·阿瑟·塔尔博特·加斯科因·塞西尔（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 1830—1903），第三任索尔兹伯里侯爵，日后将三度出任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他是伊丽莎白时期的重臣、第一任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的直系后裔。

【8】 1866—1868年。德比勋爵（其1851年前的称号是第十四任斯坦利伯

爵）和迪斯累里的三次组阁年份见本章“自由主义”一节。德比勋爵第一次组阁时是贸易保护党的首领。

第十二章

人口流动：城市和乡村

1870年时，经济进步的浪潮造就了一个主要关注工业和城市的国家和经济体。1851年还有人认为城市发展难以为继，而事实却是增强了发展势头。到了19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还住在可以被称作“乡村”的地区，也就是说，80%的人口已经城市化了。这个比例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欧洲国家，并且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基本保持不变。1901年时，超过5万居民的城镇有74个，而在伦敦——维多利亚人称之为“大都会”——人口则从1851年的230万人增长到1911年的450万人（如果算上所有的郊区人口，则达730万）。

发展最迅速的还不是早已建立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等“工业革命”城市，而是像索尔福德这样的环绕着工业中心地带的许多城镇。这种城市无序扩展生成的地区被维多利亚后期的城市规划理论家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称为“都市圈”[1]：一大片工业和城市地带，由区内好几个城市集合在一起，构成事实上的单一非农业统一体。1911年时，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有两个以上的集合城市，而同时期的英国已经有7个，它们分别是：大伦敦（730万人）、东南兰开夏（210万人）、西米德兰兹（160万人）、西约克（150万人）、默西赛德（120万人）、泰恩赛德（80万人）和中克莱德赛德（约150万人）[2]——这一切都出现在1911年时只有4,000万人口的英国本土。有些城镇，如生产钢铁的米德尔斯伯勒，原先几乎渺无人烟，在半个世纪内发展到有12万人口的规模。大多都市圈内都有一个规模可观的爱尔兰社群，故他们的政治态度比起其他地方更倾向于“橙色和绿色”[3]。19世纪末时，东欧国家遭遇了严酷程度不亚于爱尔兰饥馑的“乡村减员”，伦敦和利兹因此又吸纳了大量的犹太灾民。

城市状况

当然，这样的城市发展速度，在日后20世纪的不发达国家中将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在19世纪，这速度却没有先例。工业城镇很难笼统地加以概述：各自的建筑风格和标准差异甚大，有格拉斯哥坚不可摧

的石结构廉居公寓，有次等砖瓦建造的约克郡“背靠背”式联体房和矿区城镇的“两上两下”式蜗居，[4] 还有市郊中上阶级和中下阶级中规中矩的住宅。所有这些住房有个共同点，即它们几乎都是有租契的或付租金的住房；居住者拥有房产所有权的情况虽说到了世纪末渐渐多了起来，但在当时甚为鲜见。有些地方的市政会关心市民福利，城市就规划得很好，有公园、图书馆、音乐厅和公共浴室。还有一些城镇则完全任由投机建筑商摆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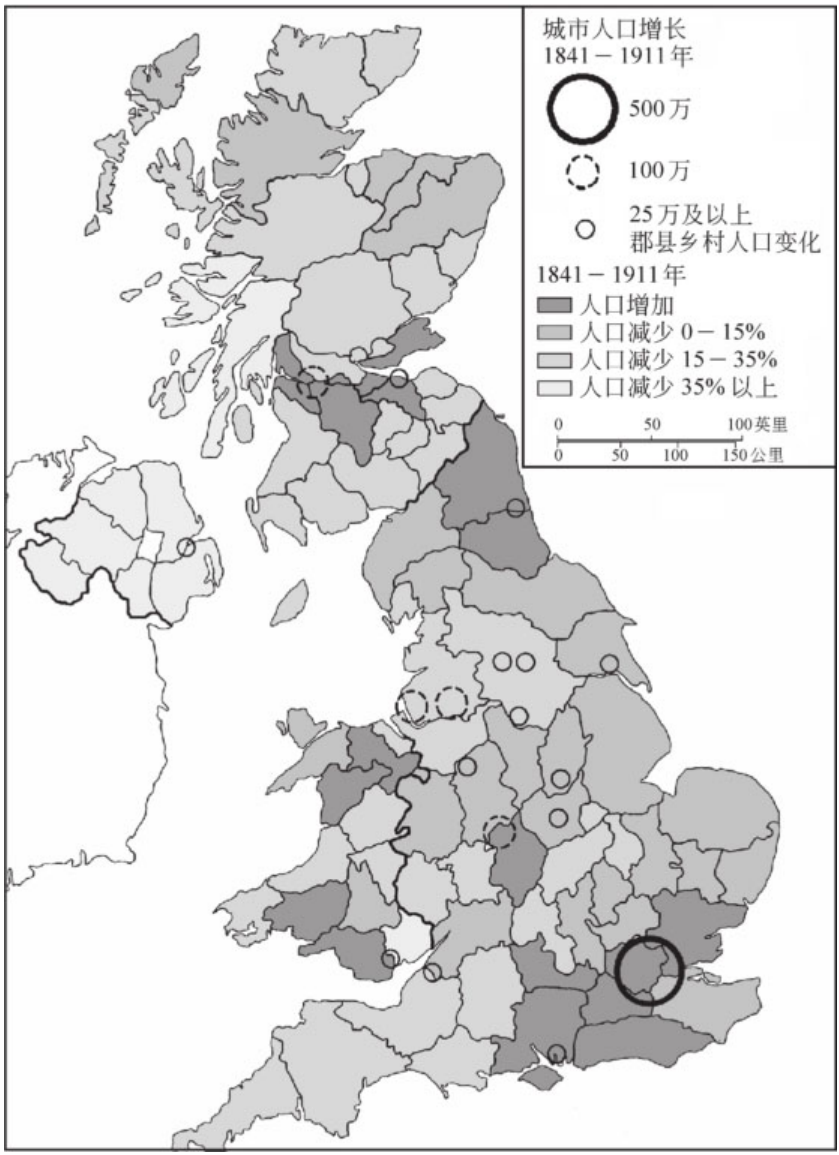

地图3　城市人口增长，1841—1911年

这些大城市地区的发展中，铁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铁路交通首次创造出一个全国一体化的经济。火车站和列车编组场占用的城市空间改变了市中心的面貌；铁路提供了从郊区到市内的便宜交通方式，

使得境况较好的人有可能离开市中心而在效外居住；也是铁路使煤烟笼罩一切。污秽和喧闹是维多利亚城市的特征——火车、工厂和住家的烟囱，还有马，都在制造龌龊的城市，而在圆石路上奔跑的大车、马车和马则使噪声不绝于耳。20世纪初，当机动车开始代替马的时候，人人都注意到，和过去比较，市中心已变得多么安静和干净。

但是，喧闹声、肮脏、居住条件差等等，都和人们对现存环境的适应性有关：经过很缓慢的过程，人们才渐渐有了改善城市生活环境的强烈需求。对许多维多利亚人来说，生产本身就是其存在的正当理由。这种观点在佛洛伦斯·贝尔夫人[5]的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她的《在工厂》是研究典型工业城市米德尔斯伯勒的经典著作，整个米市从事的唯一活动就是冶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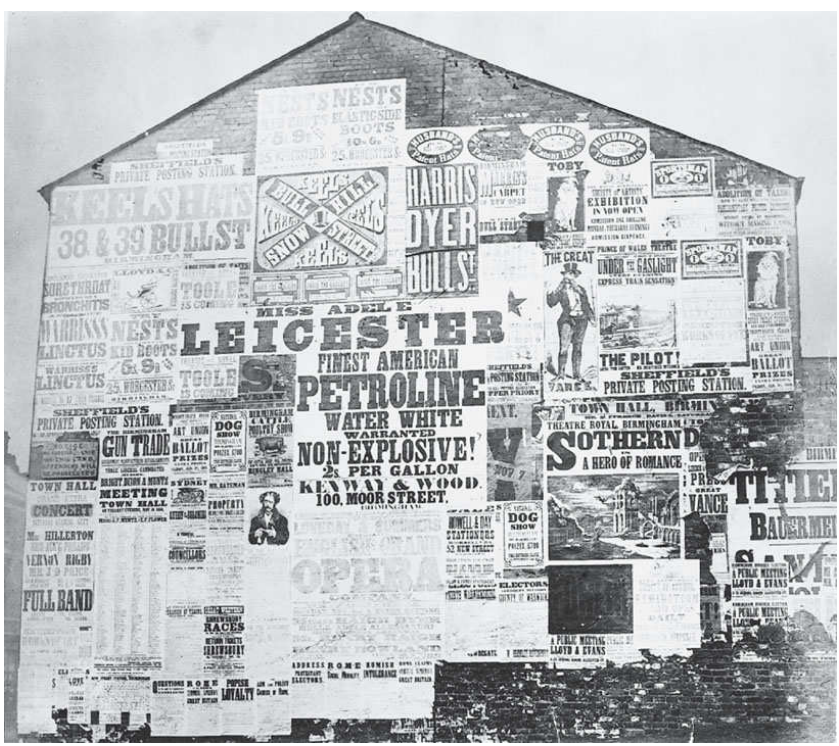

图9　维多利亚时代的折中主义：1868年大选时伯明翰的广告。

米德尔斯伯勒没有浪漫的过去，没有庄严的传统，因此，这飞速的巨大的发展就给了它别样的浪漫和别样的尊严；那是力量的尊严，是没有历史的根基、不靠时间厚重的基座支撑、而纯粹凭着自身的力量拔地挺立的尊严……虽说它可能缺乏古迹的魅力与美色，然而没有一座制造业城市……会缺乏自己独特的意趣和风景……冬日下午的烟雾中隐现出的高耸的烟囱，粗笨的窑和熔炉，如同建筑物的塔楼和尖顶。要观看一座冶铁城，要趁黄昏和夜晚：白天看是烟云柱，到了夜间就成了火焰柱。

城市的动能在大博览会后的20年间也在乡村反映出来，博览会上展示的机械起了一定的激励作用。投资搞化肥、排水系统、建筑、收割机和脱粒机等农业机械，以及和新修铁路连接的道路建设等等，这些“高级农作”的实施本身显然驳斥了所谓自由贸易将导致乡村毁灭的说法。其结果是，不仅在物质上，也在精神层面大大推动了现代化。许多人倒向不从国教派，一些人甚至信奉起物质至上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就连乡村都出现了担忧传统宗教难以为继的情绪。

农业萧条

充满活力和积极进取精神的一代农业人赢得了财富，过着特罗洛普的巴塞特郡小说系列中描绘的那种安谧的、悠闲的郡县上层社会生活。1868年，联合王国80%的粮食消费仍由本土自给。然而，尽管有了“高级农作”，许多地区，尤其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乡村，仍然是令人遗憾地匮乏资金投入。直到20世纪初期，苏格兰高地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一般仍使用人力耕地和人力扬谷。

19世纪70年代，连年歉收，北美大草原的开发，加之从那里以及海外羊毛产地到英国的海运更快捷更便宜等因素，引发了“大萧条”的局面。只有牛奶、干草和麦秆儿产品没有受到外国激烈竞争的冲击。具体说来，粮食价格大降，打击了英国以产粮为主的东部地区；可是农场主，尤其是小农场主却在很长时间里不愿接受粮价会一直低迷的现实，或者也无法顺应对奶产品的新需求。畜牧业为主的西部地区受

到的影响则不那么严重。

图10　农业不景气。1874年，多塞特郡米尔波恩·圣安德鲁的农工因参加约瑟夫·阿奇的全国农工联合会而被扫地出门。

随着城市的发展，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而农业的萧条更使其下滑加速：1851年时，农业占国民收入的20.3%，而到了1901年时只占6.4%；英国的食品和羊毛等农业原料已大半靠进口，正是这一事实将会大大影响战略决策。保护农业的呼声甚至在托利党内部都引不起多少反响，当然就绝对谈不上会改变自由贸易的财政制度。一些自由党的土地改革者认定不搞保护主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鼓吹用小农场的方式解决问题（1885年发起了“三英亩地加一头母牛”的运动）。为苏格兰高地设立的小佃农委员会（1886年）得到授权，建立不受地主干涉的小佃农团体，[6] 这是英国本土土改取得的唯一实质性成果，然而从其长远的成效看，也是很显著的成果。

有种种原因造成了大面积的乡村人口缩减，如工时较短而报酬较高的城镇工作的吸引力、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机械化和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农业大萧条等。大规模出走的人群多数流入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城镇，有些进入煤田（尤其是威尔士的煤田），有些去了殖民地，

还有的入伍当兵。1861至1901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乡村男劳力总数减少了40%多一点；妇女在城里不易找到工作，故总人数减少得不那么显著，由此造成乡下性别比的显著失衡。不过许多未婚女性通过诸如青年女子友好会[7]这样的援助机构进入城市当家庭佣仆。

乡村的衰落

以上这一切都使乡村社会变得人心涣散、无人照管，表现出衰败群落的那种听天由命的特点。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小说的出版跨度（1872—1896年）几乎恰好覆盖英国的农业大萧条时期；哈代在其小说中以庄重的笔调将那些似乎对乡间社会及其居民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无法控制的、遥不可及的力量永久地保存下来。哈代写出了业已消逝的乡村习俗和传统，他的小说形式上虽属于过去，但也具有针对当下情况的弦外之音。《卡斯特桥市长》描写谷物商迈克尔·亨查德（Michael Henchard）的命运，他因不能顺应新的贸易方式而致破产。哈代评述面临生意崩溃时刻的亨查德说："他思绪奔突，似乎倾向于认为有什么力量专门在和他作对。"威塞克斯小说所描绘的"四处上演的苦戏"其实是一种文明的蜕变和解体。1895年，哈代谈到他的全部小说时说：

> 最根本的变化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维系着当地传统和气质的农舍常住居民被大体上是流动性的劳力所替代了，从而造成当地历史连贯性之断裂；对于保存地方的传奇、民俗、社会阶层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古怪的个性而言，没有什么变化比这种断裂更具毁灭性。所有这些传统的存续之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一代又一代人附着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

所幸的是，在英国乡村生活彻底消失之前，塞西尔·夏普（Cecil Sharp）、马乔里·肯尼迪-弗雷泽（Marjorie Kennedy-Fraser）等民俗和民间歌舞史学者已经将具有这种生活的品质特征的东西记录了下来。

破坏乡村习俗连续性的行为得到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支持。教育方面，如1872年苏格兰教育法之类的措施致力于让说盖尔语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以及说威尔士语的威尔士人全都使用英语，并训练农民使之具备在城市生活的能力。1850至1900年间乡村的变化和教育政策沉重打击了盖尔语和威尔士语的生存条件，在苏格兰几乎造成方言的灭绝。然而，在威尔士，地方上的立法努力确保了1889年起学校的威尔士语教学。

城乡关系

一些地区城乡之间的流动频繁，如季节工离开城市去乡下收割，小城镇居民经常闯入周围的乡村偷猎。有些工人，尤其是煤矿工人，他们就住在村子里，出门就是荒野或田地，再说，像赛灵狗和赛飞鸽等他们常玩的运动项目也都和乡村生活有关。中产阶级的人趁着土地低价时买下了乡间宅院。对于有产阶级中精于理财的人来说，乡村已经成为昂贵的游憩地，一个“度周末”的去处。但是对很多居住在大城市的人来说，乡村成了遥远的、甚至危险的地方，那里的人很古怪，口音、衣服和举止都特别。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喜剧《认真的重要》就准确地再现了大都市人的腔调：

布莱克奈尔夫人（Lady Bracknell）：……土地已经不再是收益或者乐趣。它给人的是社会地位，却不让人保持地位。关于土地能说的也就如此了。

杰克（Jack）：我有座乡间宅邸，当然周围有一些土地，我想大约有1,500英亩，但我真正的收入不靠田地。事实上，就我所看到的情况来说，偷猎者是唯一能从土地上得到点东西的人。

布莱克奈尔夫人：乡间宅邸！……你有城里的宅邸吧，我希望？简直不可能要求像格温德林（Gwendolen）那样天性单纯、完好无损的少女住到乡下去。

尽管如此，往日的欢乐乡村这一形象却久久地留存在城市居民的脑际。无论什么阶级的人，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住在带花园的房子里，甚或租种一小块菜地。他们不理会乡村实际经受的苦难，却在城市中再造了乡村。房屋建筑和城市规划越来越反映出人们对乡村的怀旧情绪，最后产生了卡德伯里的伯恩维尔实验[8]、贵格会雇主以及世纪末的“花园城”运动。

注释

【1】 “conurbation”现在一般指（有计划发展的）带卫星城和市郊的大城市。20世纪初格迪斯对19世纪英国大城市无计划的发展颇有批评，例如借用前人的语言，说伦敦像长了“息肉”，像“珊瑚礁”等等。参看Asa Briggs, *Victorian Cities* (Berkeley, CA: U of California P, 1993), 12, 34—35页。

【2】 这七个都市圈依所提到的次序分别围绕着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利物浦、纽卡斯尔和格拉斯哥等七个中心城市发展而成。

【3】 1848年，爱尔兰的绿、白、橙三色旗首次向公众展示；1921年爱尔兰独立后三色旗正式定为国旗，而从前爱尔兰的非正式国旗图案是一片绿色背景中央的一把竖琴。三种颜色代表了爱尔兰的政治生态：橙色代表北爱尔兰的新教（奥兰治朝的威廉王称William of Orange，王朝名同英文中的橙色orange；亦可参见第四章“与法国交战”一节中的奥兰基社团），绿色代表爱尔兰的天主教和主张共和的力量，白色则表明希望各派和解，使爱尔兰有长久的和平。

【4】 联体的“背靠背”式住房往往和隔壁紧邻共有三面墙（有时后墙紧贴工厂的墙根），两家合用一个烟道，缺少门窗，照明和通风条件差。“两上两下”指两层楼、每层一前一后两室的住宅。

【5】 贝尔夫人（Lady Bell）的丈夫休·贝尔爵士是米德尔斯伯勒最大的铸铁厂主。

【6】 苏格兰高地的土地所有者为追逐利益，越来越将佃耕的土地收回挪作他用，造成可耕地匮乏。在佃农的努力下，1886年通过一项法案，使小佃农的土地使用期限得到保障，小佃农委员会被授权可以确定公平的租金。高地的佃农只要求地主接受一些行为和责任标准，而并没有像爱尔兰小农那样要求拥有土地。

【7】 1875年创始，开始是英国圣公会的慈善组织，为乡下到纺织厂等地方打工的青年女性提供帮助、心灵的慰藉和友善的环境。后很快发展到爱尔兰和美国，现在是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世界性的宗教慈善组织，提供服务的对象是5

—21岁的未婚女性青少年。

【8】　热心的贵格会友乔治·卡德伯里（George Cadbury）和哥哥在伯明翰经营巧克力和可可饮料生产；1879年将公司迁往4英里外的伯恩维尔，创办私人社会保险并致力改善工人生活；1893年购地一百多英亩，实验性地建造带有宽大花园和其他舒适生活设施的工人阶级住房；后更是主动放弃产权，成立伯恩维尔村社信托基金，住房对社会各界（不唯自己公司的雇员）开放，成为后来“花园城市”和“园林市郊”的样板。

第十三章

大众和阶级：城市工人

大规模的人口城市化以及乡村地区的衰落对所有的阶级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点并不奇怪。19世纪上半叶，有产阶级最担心的是会出现革命的劳工阶级，但这样的阶级居然没有产生，这可能是19世纪下半叶最令人称奇的事情了。大多数从事工业劳动的人除了其生产的产品外，并没有留下什么事物作为纪念：他们人生的曲折、他们的追求、希望、信仰、喜好、憎恶、习惯和热衷的事物，多已湮没无闻。在大英帝国，对陌生的异族着迷的、训练有素的行政官员以极高的效率起草了一份份详尽的报告，将以上提到的当地各方面情况记录在案；可是在英国国内，一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有对城市贫穷人口生活习惯的系统观测报告。梅休以他那印象式的《伦敦劳力和伦敦穷人：愿意做工、不能做工和不愿做工者的状况与收入大全》（1861—1862）一书为这项工作开了一个头，但很不系统，而且只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有后续的观察。我们仅有的知识表明，穷人中存在非常复杂繁多的生活样式，其中乡土观念和宗教往往起了重要作用。

工薪提高，出生率降低

劳工群体中有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准开始迅速提高。1860至1914年间的实际工资涨了一倍。1868至1874年以及1880至1896年的经济繁荣时期也是收入快速增长的年份；后一个时期中，实际收入上升了差不多45%。19世纪80年代时，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开始享受闲暇时间，这是19世纪以来的第一次。除了用于食品、住房和衣服等生活必需品的花销外，人们手头已开始有了点富余的钱（尽管数量并不多）。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有了盈余，出生率不升反降；这一现象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出现在有产阶级之中，效法其社会上层阶级的劳工阶级在稍后也受到影响。于是，多出来的钱并没有花费在多出来的孩子身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令人吃惊的变化。从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到马克思，经典政治经济学家都曾预言，由

于“工资铁律”的作用，劳工阶级注定只能过勉强糊口的生活，因为任何多余的钱都会被多生出来的孩子用光；可出生率下降却证明经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预测全都错了。19世纪80年代以来，控制家庭人口的做法为英国劳工阶级达到相对富裕提供了机会。对于这一切如何发生，为何发生，人们知之甚少。但男女结婚年龄推迟了，他们可能使用了1870年以后普及起来的一些不怎么可靠的避孕措施，妇女可能经常用流产作为终止怀孕的手段。

“劳工阶级”这一用语（维多利亚时代几乎总是使用复数形式的“阶级”）当然涵盖了很大的范围。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调查系列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其《伦敦人的生活和劳作》将劳工归入6个主要类别：“高报酬劳动”，“定期标准收入”，“定期低收入”，“间或收入”，“临工收入”，以及布斯所说的“底层阶级”。人数最多的是有“定期标准收入”者，相当于其他5个类别人数的总和。正是这个具体类别的男女们缩小了家庭规模，经历了实际收入的增长，并开始意识到他们在经济中的潜在能力。

工会

“定期标准收入”类工人的日子过得红火起来，便加入工会，以求保障所得，并通过谈判争取更好的工薪和工作条件。19世纪中叶的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员面不广的“新式”同业工会，其成员或因在学徒期获得了技能和资格，或因有能力熟练地操作机器，而在工人同事中崭露头角，从而警惕心十足地守护着自己那高人一等的、好不容易得来的优越地位。对熟练工的稳定需求巩固了同业工会的势力和特权地位；铁船制造等技术的发展也扩大了而非缩小了其名声。19世纪70年代，但尤其在80年代，同业工会开始增补会员，吸收了许多有固定工作的人。生活水准提高了才有可能使同业工会得到发展，因为会费是很贵的。

工会之所以存在，不仅或甚至主要为了进行工资谈判，而且还涉

及名目繁多的一系列“自助”救济：同业工会和“互助会”紧密相关，有时就是“互助会”的代名词。对一切有自尊心的工人来说，所有的贴补中首要的一条就是丧葬补助，有了这笔费用就可以避免让贫民院付埋葬费。不过，许多工会还设立了疾病补助和失业补助，因为那时政府还没有为一时遭遇灾祸的人提供帮助的举措，而且政府除了贫民院这张最后的安全网之外，更缺乏为始终处于贫困线上的人提供救济的机制。

对于1945年之后的观察者来说，工会活动增强的背景十分奇特。1874年之后的20年中发生了明显的实质性的通货紧缩，也就是物价下跌了（在较小的程度上薪水也下跌）。从另一方面说，有正式工作的人的实际薪水上升了。然而，工会会员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谁会相信，雇主减了他的薪金却仍可能让他过得更好？所以19世纪80年代的“新工联主义”关心的是捍卫劳工的工薪；这是对局势的反应，同样也是一股积极的实际的力量，其中除了团结起来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作用。

一些社会主义者参与了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几次罢工：1888年布赖恩特和梅的火柴厂罢工，1889年伦敦码头为“码头工人的6便士”而举行的罢工。这两次罢工很可能因为发生在伦敦，就在激进分子的眼皮底下，颇引起中产阶级的关注。不过，它们并非典型的罢工（事实上，伦敦码头罢工甚至不是工会领导的，工会在罢工结束之后方成立），也不应过于强调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等发起罢工的“社会主义者”的作用。大部分同业工会的领袖仍坚定地站在格莱斯顿一边。卡尔·马克思在英国度过几乎整个的写作人生，然而除了一个小圈子外，这个国家里实际上没有人知道马克思和他的著作；19世纪80年代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团体的著述只涉及到极小的听众面。事实上，劳工阶级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抵制已经使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他们感到绝望。

足球和板球

如果说，工会是劳工阶级自我意识成长的制度性表达，那么特别是男性工薪族共同爱好的休闲活动更是促进了这一团结的意识。英式足球最初是公学和大学业余社团搞起来的竞赛游戏，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上职业化了；此时从朴次茅斯到阿伯丁的工业城市中，观看足球赛已经成为男性（几乎毫无例外的只有男性）的常规娱乐活动。在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中，所有注重自我的工业城市都成立了足球队。有些足球队反映出所在城市的宗教分派（如格拉斯哥有天主教的凯尔特人队和新教的皇家园林卫队，默西赛德有天主教的埃弗顿队和新教的利物浦队）。所有的球队都激励其追随者对当地的忠诚、热情和个人归属感，令许多政治组织者羡慕不已。足球比赛是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社会的产物：足协杯赛（自1871年起）和足球联赛（自1888年起）的规则性和复杂性，掀起眼前兴趣和维持恒久兴趣的需要，每周入场费、或许还有客场的火车旅费的预算编制，自我制约的庞大人群——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一支有纪律有秩序的劳动大军，他们在工余时间里心甘情愿付费入场，观看别人为由当地企业家组织的俱乐部踢球。整个“赛季”中，人们对足球（或如苏格兰边境区、南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对橄榄球）的持续关注使产业工人获得了更为宽广的时间观，而那正是农工们从天气的季节变化中早已熟悉的时间观。

板球是一种比赛时间长得多、更彰显个人风格、社会交融程度更高的运动；自1873年起，郡际板球锦标赛组织的板球比赛越来越深入人心。以上对足球的简单解释对板球则完全不适用：或许可以说，板球见证了工业化和劳动分工时代中个人主义精神的延续。格洛斯特郡的医生威·吉·格雷斯（W. G. Grace）当时威风凛凛地控制着投球和参赛选手，创下了许多至今都无法超越的击球、投球和守场记录，因此几乎和1874至1886年间的赛马冠军骑手弗雷德·阿彻（Fred Archer）一样，成了民族英雄。格雷斯那经常被画进漫画的一把大胡子，使人们往往将他和索尔兹伯里勋爵混淆，这可能对后者比较有利。

旅行和赌博

一直以来，对于劳工阶级而言，旅行意味着四处拼命寻找新工作或住处的经历，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旅行已开始成为一种消遣方式。对许多人来说，在某个新设的法定假日由个人或公司发起去海边旅游，已经成为一年一次的远足活动。黑泽、莫克姆、斯卡伯勒、绍森德、伊斯特本、波托贝洛等许多度假胜地应运而生，既满足了也进一步刺激了需求。劳工阶级的假日几乎总是在城市里度过，对他们来说，“海滩”意味着伸入海面的突堤，杂耍表演，更衣小木舍，及其后面的旅馆，供应膳宿的公寓，还有商店。90年代，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徒步和自行车俱乐部去组织乡村旅游，来拓宽度假传统，但是乡间旅行更吸引中产阶级的下层，而不是劳工阶级。

廉价报纸的发展，通过电报实现的国内快速通讯，都在促使另一种大型劳工阶级娱乐方式的形成：那就是赌博，尤其是赌马，以及通过刚露头的普尔集合赌金业押足球赛的输赢。赌博呈现了挂在彩虹尽头的一罐金子：休闲能娱乐身心，说不定还有利可图——当然了，这种好事难得出现。

生活水平的提高

劳工阶级中比较富裕的阶层现在也开始分享了一点半个世纪前工业革命给有产阶级带来的成功和期望。平日的饮食有些改善，除了面包、土豆和啤酒外，能吃到肉类、牛奶和蔬菜了。住房的品质略有提升，因为肥皂便宜了，而且到处都能买到，房屋和人们的卫生都有所改善。书、照相和零星的装饰家具也开始用于装点有固定工作的劳工家庭。体面已成为目标：体面的意思是有了可支配的钱，用以展示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生活方式，有了稳定地过日子的意识，可以不总盯着每星期的薪水袋，而能扩大一点眼界了。体面的目标得到正普及开来的分期付款公司的支持，这些公司掌管着工薪家庭盈余的多项花销。

人口中工薪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确实重要，但此事也要客观、全

面地看待。19世纪下半叶，几乎每10年中都会发生短暂的经济混乱。那个时代有许多人相信，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就是“大萧条”时期，这期间利润和收益下降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大萧条”的说法对于农业来说当然很贴切。对于工业总体来说，与其说是萧条期，不如说是调整期，但是“调整”对于工人而言通常意味着悲惨的境遇。正是在19世纪80年代时，“失业”一词获得了其现代意义。

宗教

在上教堂做礼拜这个意义上的宗教，并未在大多数英国城里人的生活中起过什么直接的作用。“并不是上帝的教会失去了大城市，而是它从来没有得到过大城市，”这是阿·福·温宁顿 - 英格拉姆（A. F. Winnington-Ingram，圣公会牧师）在1896年写下的话。从乡村劳工走进城市的时候起，新教教会就规劝他们继续去教堂做礼拜，但无论国教还是不从国教派，这一努力都没有成功过。至于在城市出生的人群，尽管有慈善施舍和主日学校所提供的教育等间接的诱惑，更有传教团、奋兴派圣斗士、救世军和教会军的直接上门，但是各教会同样无法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施加影响。1902至1903年时，伦敦人口中只有19%定期上教堂做礼拜，这些主要是来自社会中上层的人。在伦敦以外的地方大城市，参加礼拜的比例数可能会稍微高一些，在小城市会高得多。只有罗马天主教的礼拜活动才吸引了数量可观的劳工阶级成员。天主教组织顺应了劳工听众的需要；教会工作人员熟练地通过教会的社会团体和俱乐部吸引会众，不仅诉诸其天主教信仰，更用“爱尔兰性”打动了会众。

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仍然十分虔诚，而英格兰的劳工阶级也并非对宗教一无所知。标志人生转折的“通过礼仪”（尤其是婚礼和葬礼）即使在有世俗形式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也仍然十分流行。不做礼拜的人群看来也并不敌视宗教，只有在宗教披上罗马天主教仪式主义的外衣，并且与爱尔兰移民和本地社群之间的摩擦发生关联的时候，才有

敌对言行出现。其实，真正让不去教堂的人心怀怨愤的，是宗教——特别是圣公会——如此明显地同有产阶级的地位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社会上能说会道的人大力提倡人人去教堂做礼拜，在这样的社会中，不上教堂不仅是宗教态度冷漠的表现，也是一种抗议方式。

第十四章

职员和商业：中产阶级下层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1850年以后的几十年迎来了扩大队伍的黄金时代。1851年时，中产阶级还是一个相当小的也比较容易鉴别的群体，成员是职业人士，实业家，银行家，大商店店主等等。这个群体同劳工阶级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到了世纪末，一个复杂得多的格局已经显现。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在经济变化中应运而生，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下层。经济体系中的服务行业已经发展成大得多也复杂得多的部门。英国逐步走向商业和工业并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造就出一支浩大的白领从业人员大军，在零售、银行、会计、广告和贸易等商业部门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

一个新生阶级

工业企业的管理层已开始从父系家族传承制向新的职业经理人阶级转化，制造业中的管理人员队伍迅速壮大。因为政府在新的职责方面投入更多，特别是对1870年教育法所开创的教育体系的投入，所以地方和中央各级行政机构开始迅速扩大。商店、办公室和电话局为妇女的就业提供了新的机遇。

伦敦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尤其显著，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商业金融区从业人群。他们在新式理工学院受到专门训练，搭乘火车或新建的地铁上下班，居住在当时正在伦敦边缘兴建的市郊，或者是克罗伊登这样的城镇：自19世纪70年代起，这些城镇作为伦敦城职员的郊外住宅区迅速发展起来。市郊化是19世纪下半叶城市生活有特色的发明：或联立或半独立、往往前后都带小花园的一排排整洁的房屋，见证了这个新阶层成功的置业追求。

价值观

这些家庭从自由主义时代获得了很大的好处。自由主义提倡个人做出成就，这个阶级响应了号召。它看重功绩、竞争、体面、效率和

目标感。它尊重成果、金钱和成功。它对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没有把握，便听从那些自信有发号施令权的人；它尊重等级制度。在这点上，它和19世纪5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有很大的不同：支撑了老自由主义者不屈的个人主义的，是那种“昔日的光荣事业”中的前工业时代精神和17世纪的战斗口号。这个新阶级因为想在社会等级中找到牢靠的位置而成为保守党的工具，保守党因之变成在城市有拥趸的党。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有不从国教传统的小城镇，如威尔士和苏格兰的集镇，它掌控着大局；但因地位赋予其自信，加上不从国教，小城仍是自由党的天下。在大城市，它往往扮演合作阶级的角色，帮着贵族和中产阶级上层获得权力；作为交换，它获得了承认和社会地位。

哈姆斯沃思兄弟于1896年创办的《每日邮报》以其高效的全国发行网，使地方报纸很快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它是下层中产阶级的典型读物；开始时唱自由主义 - 帝国主义的调子，在布尔战争期间转变立场，站到统一主义一边。“小办事员写给小办事员看”，索尔兹伯里勋爵曾这样不屑地评论过该报及其读者。

第十五章

有产阶级

中产阶级上层分为两个部分。职业人士——医生，律师，国教教士，行政高官——有共同的大学教育背景，而且其中上过公学的人也日益增多。在许多城市，他们搬出市中心，住进了很气派的市郊大宅，比19世纪上半叶时更加离群索居。送子弟离家就读寄宿学校的习惯扩展了这个阶级的全国性视野，削弱了其成员的区域性根基。拉格比公学的阿诺德精神，那种由阿诺德的后继者所阐发并有所修正的精神，已渗透在职业界的思想观念中。在希腊文、拉丁文和古代史为主的课程的培育下，在英国国教广教会派道德观念的教化下，在“为人生做好准备”的无间断竞技运动的训练下（冬天是英式橄榄球，夏天是板球和田径运动，为的是占领所有的空闲时间）所养成的职业阶级的性格是值得尊敬的，然而它缺乏想象力。它越来越把提供管理帝国的人才作为目标，而忽视了一个工业国家的需求。

制造业的中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职业中产阶级风气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者不再早早让孩子进家庭商行，而是让他们经受培养职业阶级的整个教育过程。棉纺厂主和造船厂主的子弟研习希腊文，打橄榄球，而不是像德国的制造业子弟那样，学习科学和会计学。接受如此教育的青年往往不再有兴趣回到制造业生涯，因此要保存作为19世纪上半叶工业进步之首要原动力的创业和生产的劲头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这样的人发现商业比工业更加适宜，于是加入了正在扩大的银行部门：工厂生产车间里流淌的血汗和劳资关系在银行里都已净化为一行行数字。

金融服务

英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依赖这些干练的银行人。那时已经开始出现商品进出口支付中的巨大逆差（1851年为2,700万英镑，到1911年已达1.34亿英镑）。这个逆差却被银行、保险和海运的利润，英国资金的海外投资收益等“隐形收益”转化为总顺差。服务业的收益（1851年为2,400万英镑，1911年为1.52亿英镑）和在外国投资的红利收益

（1851年为1,200万英镑，1911年为1.88亿英镑）似乎已经成为英国繁荣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这些收益产生了一个中产阶级，其专长是管理金钱，而非人或工业产品。

英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这一重大发展就像早期的制造工业大发展一样，并不是计划中的事情。后来的发展却又是早期工业化的产物，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当“世界工场”将其产品销往国外时，它也刺激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后者迫切需要自身无法提供的资金；英国同别国经济的竞争，以及19世纪80年代一些制造业部门的不景气，使英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了，于是那只“看不见的手”便指向了服务业的扩展。

吸纳“业界”

然而，对金融服务扩张的趋势既不能过分夸大，也不应过于强调其新奇性。英国早就牢固确立了土地、工业和商业三者结合的传统。这个传统使英国贵族没有成为欧洲大陆的那种特权等级，也给制造业者提供了身份地位作为奖赏。有些制造业者领受了奖赏，另一些则不予理会，尤其是不从国教的人。制造业及制造商在英国仍有强大的势力。但是，世纪上半叶十分期待又十分畏惧的所谓制造业者居于首位的“中产阶级君主政体”，却没有在英国出现。对此，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这样解释，即贵族吸纳、同化“业界”的规模之大抵消了其政治、社会影响。

中产阶级信奉新教，而且是活跃的信徒，他们在圣公会教士团和大学里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学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他们的要求；在1854年诺思科特 - 特里维廉报告 [1] 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使通过专业和公务员资格考试成为必要条件。体面，就是要供得起住宅，雇得起仆人，交得起学校和大学的学费；体面的需求促使中产阶级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控制家庭人口，从时间上说，早于劳工阶级缩小家庭规模的行为。

图11 “家中的天使”。这幅精心设计的照相（1865年）反映出许多中产阶级妇女对优雅的追求，但也捕捉了她们的某种落寞感。

妇女

中产阶级妇女也力求缩小家庭规模，她们现在除了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也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期望。因少生孩子而获得部分解放的妇女在慈善事业、教会、地方政治、艺术，尤其是音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人不顾艰难，迫使大学接受了自己（她们可以听课，参加考试，但不能得学位），19世纪70年代后期起，牛津、剑桥和伦敦等都设立了女子学院。 [2] 职业领域仍然不对妇女开放，但有少数女性成功地当上执业医生。看来，大多数妇女能够得到的最接近职业

生涯的工作，也就是高级护理和旅店经营了。

注释

【1】 由当时英国财政部两位官员，斯塔福德·亨利·诺思科特（Stafford Henry Northcote）和查尔斯·爱德华·特里维廉（Charles Edward Trevelyan）呈递给议会的调查报告。这份《关于建立英国常设文官制度的报告》成为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奠基文件，150年来虽有多次改革，但报告的基本原则至今有效，其中首要的是设立考试，择优录用行政服务人员（东印度公司在华官员推荐中国的科举制度，19世纪初该公司参照科举制度在伦敦创办学院，培养自己的行政服务官员，此后几十年一直有英国官员推荐中国式的考试制度；特里维廉就有长期在孟加拉、印度的管理经验）。报告还建议严格区分行政高官（负责制定和实施政策的官员）和从事日常的机械工作的人员这样两个层次（本章一开始将高等公务官员归入中产阶级上层）。

【2】 妇女教育活动家埃米莉·戴维斯（Emily Davies, 1830—1921）于1869年在悉钦（Hitchin）办了一所小型实验性女子学院，1873年迁往剑桥，成为隶属剑桥大学的格顿女子学院（Girton College）；1870年她积极参与促成女生首次进入伦敦大学学院的课堂听课。戴维斯的朋友芭芭拉·博迪雄（Barbara Bodichon, 1827—1891）也为格顿学院出资出力。

第十六章

典仪【1】

贵族（和士绅）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英国社会生活的三大阶级中，它可能是维多利亚女王治下变化最小的一个阶级。正如社会主义作家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所说，贵族是“一种出奇坚韧的物质”。它继续行使着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威斯敏斯特的两个政党中不少成员出自贵族，帝国的高位几乎全都由贵族把持，郡县地方政府由贵族控制，统率军队的军官是贵族——但相对说来，海军在社会阶层上不那么排外。贵族和士绅从19世纪50到70年代农业的繁荣中获得利益，在农业萧条中又蒙受损失。不过，他们熟练地投资城市用地，在城市扩张中发了一笔横财，挽回了农业上的部分损失：原先越来越不值钱的农田因被征用兴建市郊而让土地所有者成为富翁。

英国贵族一向参与工业化，同矿山、运河和铁路开发的关系尤其密切。现在贵族又精明地和商业扩张的新浪潮联手：许多银行和保险公司里都有一个爵爷为理事会增色。贵族还通过睿智的联姻挽救自己的财产，特别是同美国新生的财富贵族联姻，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第九任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娶了康斯薇洛·范德比尔特（Consuelo Vanderbilt）。[2] 通过这种种手段，即使在农业衰落的时代，许多大贵族庄园仍得以保存下来。但是，庄园不仅可以用来谋取财富，还可供人享乐，而且后来就被当作了游憩场所。城里人了解贵族的主要途径是通俗报刊杂志上对贵族的描写：他们是一群悠闲的男女，在乡下赛马、打猎、射击、钓鱼，到伦敦来就是赌博，出席社交季活动。在休闲对于英国人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贵族并不因悠闲自在而变得不受欢迎。

宫廷

宫廷起了示范作用。艾伯特（Albert）亲王让南方的宫廷生活变得十分严肃，他还以同样的固执，使王室在北方消夏这一重要的休闲活动具有了庄重的气氛。19世纪50年代，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在迪河岸

边修葺扩建了巴尔莫勒尔宫；他们对农夫生活及其有关知识乐此不疲，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被大肆宣扬；他们庇护了埃德温·兰西尔爵士，一位享有盛誉的描绘乡间猎杀的画家[3]——所有这一切都使苏格兰变得令人起敬，也使类似的英格兰北部和西部以及威尔士的荒野和山地获得声誉。那时浪漫运动已十分衰落，但也因衰落而成了流行之风；宫廷将自己同浪漫运动联系起来，重塑自己为大众喜爱的声望，象征着城市文明对自然的控制。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中被复制得最多的《幽谷君主》是兰西尔的一幅牡鹿肖像，其实这只鹿并非眺视其王土的君主，而是在捕猎者枪口瞄准下的困兽：安全的幽谷没有了，自然被驯服了。

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在巴尔莫勒尔过着愉快的、却也是有高尚情操的生活，始终如一地履行对农民的责任。维多利亚的儿子爱德华，就是1901年继位的威尔士亲王，却是个纯粹的享乐主义者。他一系列的丑闻使母亲震惊，但报纸却因得到有新闻价值的题材而欣喜。亲王及其小圈子里的富人，如在新的食品杂货零售业中发了大财的托马斯·利普顿爵士[4]，就是“富豪统治”的缩影。福音运动和书册派运动在后摄政王时代曾经对贵族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使帕默斯顿的纨绔派头显得出奇地不合时宜，可看来这些旧时的思潮已经让位给炫耀似的消费和道德放纵的风气。尽管环境富丽堂皇，但是一些贵族仍然过着老派的简朴生活，如托利党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是如此，其家族以宗教虔诚著称。索尔兹伯里是最后一个留大胡子的首相，到了19世纪90年代，也就是他生活的最后10年里，他正在变成一个与其生活时代格格不入的老古董。他的侄子、继任他当首相的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被视为唯理论的自由思想家。贝尔福和爱德华七世代表了新派贵族的特征：一个显然是怀疑论者，另一个则公然地骄奢淫逸。

尽管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儿子在风格上有显著的区别，但是作为宫廷和整个上流社会至高点的君主国在他们二位的统治下均兴旺发达。维多利亚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中（1837—1901年）小心翼翼地护卫着君主制特权，她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只有保守党政府才是君主

权力的最大保障。1861年，艾伯特亲王逝世后，维多利亚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共生活中露面，这点很不得人心，使得英国在巴黎公社的激励下出现了相当严肃的共和运动；19世纪70年代初，自由党领袖用了一些手腕阻止了共和运动的发展。引起广泛负面评论的，正是君主缺席公众生活和整日的无所事事，而不是她的临在。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当等级制度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群中仍大受欢迎的情况下，在成长中的传媒产业的精心包装下，注重家庭、连续性和宗教信仰的君主政体似乎成了一个守恒点。沃尔特·白哲特在其经典研究著作《英国政体》（1867年）中指出，英国人“尊重我们可称之为上流社会的舞台演出的那种东西……这戏的高潮就是女王”。君主政体参与了权力的合法化：它“在通常情形下如秘密般深藏不露，可有时又如庆典游行般招摇过市”，就像它在1887年和1897年女王继位的周年盛典上那样获得了巨大成功。维多利亚本人显而易见是个平常人，她的悲痛被广为宣传（“温莎堡的遗孀”勇敢地履行着职责），事实上她是个年老有病的女人，所有这些都鲜明地昭示出人之脆弱与体制的威严之间的悬殊差别，使人们益发崇敬体制。

君主制代表了被认为是前工业社会秩序的那种永恒的品质。在日益城市化的社会中，君主制调和了工业革命的作用：英国越是城市化，其君主制就越加变得程式化、仪式化和大众化，因为它声称自己所体现的价值游离于主张平等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外。

注释

【1】 原文Pomp and Circumstance语出莎士比亚悲剧《奥瑟罗》第三幕第三场第354行：中了伊阿古奸计、相信妻子不贞的奥瑟罗，满腔悲愤，告别自己的宁静心绪和戎马生涯：“Farewell … /The royal banner, and all quality, /Pride, pomp and circumstance of glorious war！”（3.3. 351, 353-354）（“永别了……庄严的大旗和一切战阵上的威仪！”，朱生豪译文，见《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343页）。此后pomp and circumstance在英语中用于指称庄严的典礼（尤其如君主加冕礼等仪式），富丽堂皇的大排场等。这个短语最著名的例子当数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爵士（Sir Edward Elgar, 1857—1934）的5首《威风凛凛进行曲》（“Pomp and Circumstance March”，亦译为

《威仪堂堂进行曲》），其中第一首最为著名，曾献给爱德华七世作为加冕礼颂歌之一。

【2】　这是19世纪末著名的联姻，美国铁路大王之女嫁给英国公爵，她带到英国的巨大财富挽救了马尔伯勒家族的布莱尼姆宫。但看来婚姻并不幸福，康斯薇洛后来离婚，嫁给法国人。

【3】　爱德华·亨利·兰西尔爵士（Sir Edwin Henry Landseer, 1802—1873），雕版家，画家，以描绘动物著称，尤其是马、猎狗和牡鹿；有些画描摹了贵族猎园（如奇林翰）中射猎白牛的活动。他的画几次在年度的皇家艺术院展览上展出，他本人于1850年被册封为爵士。

【4】　全名是托马斯·约翰斯通·利普顿（Thomas Johnstone Lipton, 1850—1931），出身小杂货商，移民美国后又返回出生地格拉斯哥，在东南亚购买大片茶业、咖啡、可可种植园，在芝加哥建立肉类加工厂，在英国拥有各类食品生产和加工企业，1898年创建了著名的“立顿”茶业王国，同年被封为爵士，1902年再次受封为男爵。

第十七章

“移风易俗”

考虑到工业和社会的变迁中潜伏着异常的紧张局势，那么19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爱尔兰除外）称得上是个出奇有序的、谐和稳定的社会。政治动乱虽然并未完全匿迹，却只是间或发生，不足以引发普遍的不满。英国本土上，盗窃和暴行等罪案的绝对数字和相对比例都下降了，这在一个人口迅速膨胀的国家是了不起的变化，强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导致犯罪率上升的说法。1901年，刑事登记局长评论说，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我们注意到社会风俗有很大的变化：现在光动嘴，不动手，过去不管吵嘴与否，总是拳脚相加；不同阶级的行为习惯已很接近，无法无天的态度已不多见。”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调节的社会依靠自愿捐助组织——各个教会、互助会和分布广泛的慈善团体系统——为精神和物质匮乏的人提供帮助。在教育这个重要领域，光靠教会自愿捐助所得不可能提供适合工业国家需要的初级教育体系，这点在进入60年代时已得到承认。1870年，自由党政府通过一项法案，要建立地方教育委员会，其责任是在没有教会学校的地方建立教委会学校[1]（不过，1880年以前还没有实行儿童的强制性教育，1891年前上学还要付费）。

地方上、特别是伦敦和北方的一些制造业城市发挥了首创精神，在小学中植入了一个有效的，多门类的技术教育体系，面向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然而，这个体系因各个委员会的思想活跃程度各异，故发展很不均衡，和德国的同类教育没法比。制造业城市，特别是曼彻斯特和伯明翰成立了城市大学，对于进入传统职业领域的人来说，这些大学和牛津剑桥相比大大淡化了古典文学教育的定位。在当时人看来，政府负责教育属于穆勒说的少数违背规则的例外情况，而没有看到这只是开端，日后政府将更广泛地接受对社会机构的责任。

注释

【1】 1870年的教育法规定，凡是对法案投赞成票的地区都可通过选举产生教育委员会，由委员会建立并监管的学校可以收学费，但也有资格获得政府拨款，还可从地方政府的税收中得到资助。1902年的教育法出台后，地方教育委员

会终止使命。

第十八章

“城郊托利党人”：保守党的复兴

1867年和1884年的两次选举法修正案使城市成年男性中的选民比例从20%增加到60%，郡县则增加到70%，这给政治家出了难题。一户一票制使他们面对的是规模大得多的、尽管并非普遍的选民群体（即使男性也远远达不到普选程度）；1872年后的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而从前每个人的投票情况都是公之于众的。[1]

自由党联合体从未输掉大选，对此它们习以为常。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组织形态的、非正式的联合体还能再获胜吗？1873至1874年间这个问题更加鲜明地被提出来：第一届格莱斯顿政府以自由党的传统方式解体，接着却不合传统地输掉了大选，1846年以来第一次将政权交到托利党人手中。

自由党的反应

自由党对失利作出了双重反应。在一些城市地区，特别是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政治上具有影响力的伯明翰，开始形成政党组织中严格的“地区决策委员会”系统。所谓“决策委员会”是一个小组，其成员是自封的当地名流，往往是不从国教的实业界人士，通常会激烈批评过分谨慎和过分贵族化的自由党领袖。1877年组织起来的“全国自由党联盟”致力将五花八门的地区决策委员会在行政制度上统一起来。另一方面，仍主要由贵族构成的自由党领导层则十分惊慌。

横跨两大派别的是领军人物格莱斯顿。他是利物浦（原籍苏格兰）谷物商之子，却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基督堂学院；他本人是坚定的圣公会信徒，然而在其政治生涯的后期却同情不从国教派别的意愿，故而能投合维多利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心思。格莱斯顿没有“地区决策委员会”为其撑腰，他追求的是统率全国的政权，而不是只有地方根基的权力。他越过了地方组织的首领，诉诸于一切持自由主义观点者的整体。他的方法就是发表政治演说和写作政论性的小册子。

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通过电报连接起来，形成新的巨大的新闻网；这个网络使得英国首次形成即时的全国性辩论：政客演说后的第二天早晨，其演讲文稿就可以出现在国内每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早餐桌上。格莱斯顿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在1868年的大选竞选活动中、在1876年抗议迪斯累里政府处理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屠戮基督徒事件不力的运动中、在1879至1880年对保守党在帝国主义功业中犯下的道德过错和财政违规的挞伐（即“中洛锡安郡竞选运动”）中，开辟了一条新路，致力创建表达道德义愤的大众阵线。“公开演说”成了维多利亚后期政治的特色：格莱斯顿发明了新的政治辩论论坛，当时无论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都不得不加入进来。

托利党的复兴

1867年的选举法修正案为托利党人带来了新的机会。本来已经习惯于、甚至安于失败的托利党开始获胜了；1867年成立了“全国保守党和宪政协会联盟”[2]，1870年，中央党部办公室开始改善选战的协调工作。托利党将目标锁定在城镇选区：想取得政权，他们就必须扩大根基，从郡县进入正在延伸的城市和市郊。这点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均大获成功。在迪斯累里的领导下，他们令人信服地赢得了1874年的大选。1881年迪斯累里逝世，他们在索尔兹伯里的领导下成为强势的党派。

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将一个本质上属于等级制、贵族和奉圣公会信仰的党，同大城市中壮大起来的中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下层人士的追求联系了起来：托利党成了有产者和爱国主义的党。迪斯累里看到，政治上的成功不仅是方针政策的问题，而且正日益成为如何表述和如何宣传的问题。他在兰开夏和1872年在水晶宫的著名演说中，都将自由党描绘成不爱国的、会危及财产、威胁英国的习俗体制、背叛英国的世界和帝国利益的党。他也以一个更加积极的心态倡导社会改革，据信其政策对劳工阶级中新近成为选民的一部分人尤其

有吸引力。这些演讲的主题，特别是有关爱国主义的主题，很快为其他保守党人效法，成为下一个世纪中大多保守党竞选演说的原型。

社会改革

1874至1880年间，保守党政府执政，初期的特点是强劲地开展了主要由内政大臣理·艾·克罗斯（R. A. Cross）提出的多项社会改革，如工匠住房、公共卫生、互助会、河流污染、食品和药品销售、商船运输、工会、工厂、酒类经营许可、教育等等均是立法的项目。其中有不少本来已“进入渠道”、在完成之中的改革，大大受惠于曾推动前一届格莱斯顿政府改革的皮尔派 - 自由党传统。改革对中产阶级利益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劳工阶级的；因为社会改革措施只规定准许做什么，而没有强制要求实行什么，所以和期待的情况相比，成效更有限（例如，至1880年，威尔士和英格兰的87个城镇中只有10个决定执行“工匠住房法”）。虽然如此，这些改革在保守党的神话中占据重要位置，它们表明托利党是可以有效处理城镇问题的党，还为“托利民主”已经实现的说法提供了依据。同德国保守派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对照，英国的改革显出整体性、安抚性和建设性。

不过，保守党真正的兴趣在于巩固城市中产阶级的基础，赢得劳工阶级的支持只是额外的收获。丑化自由党缺乏爱国精神的做法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这是因为19世纪70年代后期，保守党对南非和阿富汗的事端处理不当，军事行动花销巨大，致使它吹嘘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奉行帝国主义的声言大打折扣。既要做帝国主义者，又要讨好中产阶级缩减财政开支的道德诉求，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这种自相矛盾在格莱斯顿的中洛锡安郡竞选演说系列中被很巧妙地揭示出来。

自由主义的谷底

1880年，托利党在大选中失利，格莱斯顿的雄辩固然是其倒台的

原因，那年的工商业衰退也有影响。此后，1880至1885年格莱斯顿执政的时期，自由主义跌入谷底，自由党焦躁不安，内阁分歧重重。帝国的事务似乎证实了托利党的指责：迟疑和混乱引发一系列灾难，1885年最终导致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死在喀土穆。[3] 自由党人已经太习惯于听从殖民部“官方脑袋”的意见，不可能拒绝扩大帝国的责任范围。于是自由党一面占领领土，一面却又公开表示遗憾，如此便丢掉了两边的选民——因做得太多而疏远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又因似乎很勉强的态度而失去了拥护帝国主义者的信任。

图12　1885年，作巡回政治演说的格莱斯顿正在竞选专列上，对兰开夏沃灵顿的群众发表讲话。

在国内事务上，格莱斯顿决心控制和缩减开支，使得改革计划很难取得实效。同1868至1874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只有一项重大改革受到关注，即1884年郡县选举法修正案。获得选举权后的农工们想来会把郡县的议席交到自由党手中，于是索尔兹伯里来个“针锋相对”，利用上院手中阻止议案通过的权力，捞了一大把：议席重新分配议案得以用对托利党有利得多的方式重新划定城市选区席次范围。[4] 就这样，托利党利用了自由党的改革，创建出推举一名

议员的中产阶级城市及市郊选区的政治架构，在日后一个多世纪中，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成功所依赖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治架构。

如此重分选区和议席的结果就是使自由党日益依靠“凯尔特边缘”，即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议员，于是这三个地区所关心的事情及其想要优先处理的事项也就挪到了英帝国舞台的中央。

注释

【1】 一般来说，选民排成队，在两位候选人各自委派的两名计票员和监票员前高声说出自己所选的人的名字。

【2】 后者后来发展为“统一主义协会”或曰“统一党”（Unionists），即原自由党中反对格莱斯顿的爱尔兰自治案的人。

【3】 戈登在中国是指挥火烧圆明园、参与镇压太平军的英国将领；在当时受到帝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煽动的英国公众心目中，他是“中国戈登”，是民族英雄。后来戈登又在苏丹屡建功勋，他镇压起义，但也坚决镇压奴隶贸易；1884年，他再次被派往苏丹，解救被起义军围在喀土穆的埃及军队；他曾不止一次要求英国政府派援兵，均被拒绝。1885年1月喀土穆陷落，戈登被杀，在英国引起很大反响，公众称戈登为“喀土穆的戈登”，视之为殉道的勇士和圣徒，并谴责政府不派兵救援的失职行为。

【4】 格莱斯顿小心翼翼地将选举法改革和议席重划的问题区分开来，以避免重蹈1867年的覆辙。1884—1885年选举改革和选区重分案的出台是自由党和保守党讨价还价的结果：“重划”案规定以每5万人口一个选区的原则重新划分选区，除了5—15万人的城市以外，原先的一个城镇选区两个议席改为一个议席，将当时不足1.5万人的城镇选区议席归并到附近的郡县中去。如此归并的城镇达79个，有36个人口1.5—5万的城镇去掉了一个议席，使托利党获益匪浅。

第十九章

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自治法受挫

“爱尔兰问题”的存在，没有人会否认，但是究竟是什么问题，则几乎没有共识。迪斯累里的一番话表现了大城市人困惑的口吻：“我想看到哪个官员能上前说说什么叫爱尔兰问题。有人说这是个物质问题，有人说是精神问题；一会儿是没有贵族的问题，一会儿又成了缺少铁路的问题；一天说是教皇的问题，隔了一天又成了土豆问题。”

爱尔兰农业

爱尔兰的农业是这个地区占压倒性地位的大产业，并压倒性地为新教徒所拥有，后者和民间流传的说法相反，就在自己的庄园上或附近居住。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爱尔兰的农业兴旺发达，并取得了一定的技术进步，但是和英格兰相比，仍然明显缺乏资金投入。爱尔兰自身拿不出资金，也无法吸引多少英格兰的资金。爱尔兰经济无法养活爱尔兰人口，不知有多少人迁移到英国本土，在那里凡是有点规模的城镇都有爱尔兰社群。1841至1925年间，“漂洋过海”迁徙异国他乡的人口中，到美国的475万，到加拿大的7万，另有37万多人去了澳大利亚。

芬尼亚派和巴涅尔派

19世纪60年代产生的芬尼亚爱尔兰独立运动有其历史渊源：1798年的起义，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丹尼尔·奥康奈尔力图取缔1800年联合法的失败行动，以及1845—1846年和1848年的爱尔兰大饥荒。芬尼亚运动在美国、加拿大和爱尔兰发动了起义。1867年，它在英国搞了一系列炸弹爆炸事件，举国震惊。其中著名的一起是炸伦敦的克拉肯威尔监狱，致使一百多名无辜的人死亡。芬尼亚运动绝不代表爱尔兰普遍的观点，但是考虑到它有朝一日可能会变成爱尔兰普遍观点的危险性，自由党政治家们还是准备让步，格莱斯顿尤其如此。1869年撤销爱尔兰圣公会的国定宗教地位，1870年的土地法，

1873年的一部未通过的大学改革法（被爱尔兰自己的议员否决了）：这些法案都有意表明，威斯敏斯特可以给爱尔兰大众他们想要的东西。然而，这些改革还不够。艾萨克·巴特（Isaac Butt）领导的自治协会十分活跃，而原本一直在爱尔兰政治上占优势的自由党则迅速后撤。19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农业不景气更使形势大大恶化。

1877年，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Charles Stuart Parnell，他和巴特同是新教徒）成为自治党领袖，并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直到1890年因离婚丑闻而下台。巴涅尔总是毫不犹豫或毫无窘迫感地准备利用一切可能的政治形势，但即使这样的强硬路线在某种程度上也赶不上为农民争取个人拥有土地权的土地同盟。1879年，巴涅尔多少带着复杂心情担任了同盟主席。土地同盟使“暴力”型的芬尼亚派和“道义”型的巴涅尔派强有力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民族主义的、天主教的人民阵线。在1879至1882年农业最萧条时期的“土地战争”中，土地同盟发动持续的斗争反抗驱逐佃户的行为；他们用暴力处理驱赶事件，用联合一致、不与之交往的办法“杯葛”驱逐佃农的人（“杯葛”因查尔斯·博伊科特上尉［Captain Charles Boycott］而得名，他在面临社会、经济上被孤立起来的局面时精神崩溃）。爱尔兰乡村的暴力事件，1882年爱尔兰事务首席大臣、格莱斯顿的内侄婿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Lord Frederick Cavendish）的遇刺事件，使英国的有产阶级感到震惊并骇惧，因为正如我们了解的，英国早已习惯很低的暴力犯罪水平。

爱尔兰自治

1880年，格莱斯顿政府处理爱尔兰危机时，一手采取高压政策，另一手则妥协退让，通过了1881年的土地法，满足了农民的不少要求，但是不给他们合法拥有土地的权利。自治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影响力增强（1884年的郡县选举改革亦起了作用），1885年12月的大

选中赢得86席，从而在议会中成为自由党和托利党之间举足轻重的力量。

格莱斯顿曾私下谋求索尔兹伯里同意两党共同处理爱尔兰问题，但遭到拒绝，遂明确表态支持爱尔兰自治，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格莱斯顿的决定和自由党思想的大方向完全一致，但选择这个时机推出却是认准了政治上的需要；此后，自由党无需爱尔兰自治党议员为其游说支持而取得政权的，唯有1906年这一次。大多数自由党人支持权力下放，支持格莱斯顿所说的“正当地争取自由”的各民族的权利。1886年时，爱尔兰已经证明自己是这样一个民族，这点很难否认；问题在于，应该承认这种民族性还是粉碎之？此外，虽然1886年格莱斯顿推出的温和的自治议案并不承认爱尔兰的独立地位，可是反对议案的人争辩说，首先，不管巴涅尔如何保证，这个议案从长期看会导致爱尔兰的独立；其次，新教徒大多聚居在阿尔斯特的首府、工业城市贝尔法斯特，议案并未给他们任何保障，让其免受“罗马统治”之苦。

这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导致英国政治中的重大转折。1886年夏季，面对格莱斯顿提出的爱尔兰自治议案，自由党分裂了；93个议员随托利党人对议案投了反对票，其中多数是哈廷顿勋爵（Lord Hartington）领导下的辉格党人，但也有一些约瑟夫·张伯伦领导下的激进议员。这次投票造成自由党政府下台，开始了长达20年的托利党（或曰统一党，反自治联盟的名称）独霸政权的局面。随着自由党统一主义派（即背叛了自由主义的人）的倒戈，相当数量的自由党报纸，还有一直以来为自由党支付了大部分选举经费的所有土地贵族也都随之而去。虽说自由党在贵族院里成了一支很小的少数派，但对自由党来说，影响更大的可能不是有多少议员倒戈，而是损失了舆论号召力和金钱。

1886年的分裂削弱了自由党，但格莱斯顿也因此控制了自由党，控制了全国自由党联盟[1]。1891年，联盟在纽卡斯尔集会，格莱斯顿接受了其激进计划，从而巩固了自己对联盟的掌控。就这样，爱尔兰自治问题让自由主义听命于格莱斯顿。1886年以前，爱尔兰阻碍了

二级议案的通过 [2] ，因此提出自治案不但正确，而且很有必要。但是，1886年以后，考虑到贵族院存在的事实，自治案是不可能通过的。 [3] 可以说，爱尔兰自治问题既激励自由党人为正义而战，也让他们被挫败感折磨了二三十年。

苏格兰和威尔士

爱尔兰的事态自然影响到苏格兰和威尔士。在这两个地区，取消国立宗教亦成为政治问题，两地也都经历了土改运动。发生在爱尔兰部分地区的暴力行动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很少见到，不过1882年在斯凯岛动用了军队镇压小佃农的示威活动。两地都有议员要求实行“全面地方自治”；19世纪后期的威尔士和苏格兰同爱尔兰一样，也经历了民族文化的复兴；地方自治运动在文化复兴的推动下兴起，19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在自由党内部取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然而，和爱尔兰不同的是，自由党成功地将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准民族主义运动抑制在内部。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同爱尔兰相比，在苏格兰占支配地位的工业部门，以及在威尔士比重越来越大的南威尔士煤田，使这些地区同帝国经济的联系紧密得多。在苏格兰南部和南威尔士，自由党的帝国主义湮没了民族主义。

托利大联合

自由党分裂了，尽管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末作出各种努力，仍然无法统一。托利党则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们并非活跃的倒行逆施派。索尔兹伯里从50到70年代里曾激烈反对自由党的政策，但他现在没有做任何事情去推翻自由党在那段时间里取得的成就。他们的立场，他们同自由党统一派的联合，靠的并不是做什么事情，而是不让事情做成。这个时期也有一些立法通过，特别是1888年建立经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的议案，1890年一项改善劳工阶级住房条件的议案，后

来还有1902年那部为建立中等教育系统做了一些努力的教育法；但是1886至1905年间统一党独自掌权的时期并不具有立法上的重要性，统一党亦无意着力立法行动。

城市选民是托利党的基本依靠对象，他们希望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国家能延续下去，而不要新增加的如地方自治之类的自由主义内容。他们拒斥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并非因为它背弃了世纪中叶自由贸易的年代里所取得的进步，而是因为格莱斯顿式的自由主义者似乎已走得太远，超出了这个时期的目标。所以说，反格莱斯顿联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治这个议题将其成员拢在一起，并把自由主义者关在门外。联盟的冒险甚至超出反自治案的姿态，承担着危及选举结果的风险；后来在20世纪的头几年里联盟将会认识到选举失利的危险。

自由党继续提出自治案，等于为联盟维持下去帮了忙。1892至1895年自由党少数政府短暂执政（这是格莱斯顿的最后一任，1894年他退休后由罗斯伯里伯爵［Earl of Rosebery］继任首相），花了很大的精力搞了第二个自治议案，虽总算让下院通过了议案，到了上院却又被扔了出来。自由党可以把英格兰郡县、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等相互各异的力量拼凑起来，成为多数派，但他们无法使局面持续下去，无法重复这个多数。统一党令人信服地赢得了1895年的大选，1900年再次证实多数地位，后面这一次是利用他们在南非战争中的暂时胜利突击举行了“卡其大选”[4]。

注释

【1】 原文中的Liberation可能为Liberal之误，该组织应是十八章提到的由张伯伦等组织起来的比较激进的全国自由党联盟（1877年）。本书第二作者所著并得到广泛好评的《格莱斯顿传》中（H. C. G. Matthew, *Gladstone, 1809-1898*［Oxford: Clarendon,1997］），多次提到这个联盟，尤其515页提到1891年联盟在纽卡斯尔的大会。

【2】 巴涅尔在议会中带领自治党人坚持不懈地采取阻挠议案通过的方针，使议会的议事停滞不前。他的目的是强迫英国议会听取爱尔兰人的诉求。

【3】 1893年格莱斯顿提出第二个自治议案，下院勉强通过，但被上院否决。详见本章最后一节和二十三章。

【4】 英国军装使用的土黄色卡其布或卡其毛料。后用于指非常时期大选，突击大选。

第二十章

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

统一党反对地方自治的理由中始终有一个帝国的层面：帝国的权力是不可以移交的，1800年通过英爱合并法时的情形本身就说明爱尔兰的重要战略地位，而自治案会再次将爱尔兰置于危险境地。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中，帝国的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现在必须看看这些问题对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贸易和国旗

总体上说，英国并不寻求更多地直接行使帝国权力，无论在公众中还是在政治上，要求扩大帝国权势的压力集团都没有什么影响力。在一些老的白人移居地区，压力团体甚至追求并促成了权力移交，1867年通过了加拿大自治领法，1900年通过了澳大利亚联邦法。然而，19世纪的最后40年中，英国在非洲、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吞并了大片土地。1851年时，英国就已是世界的商船，在国际海运方面占绝对优势，甚至1870年以后，当英国的制造业产品在走下坡路时，它仍保持着贸易的优势。因此，即使缺少正式的英帝国的权力机构，但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英国的利益。这么看来，在正式的领土兼并之前就有非正式的帝国主义存在：没有什么话比“贸易跟随国旗而来”这个谚语更不符合实情的了。在几乎所有的具体事件中，事实都正好相反。正如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无论多么遥远的小港湾，都不会没有英国的代表在那里组织煤油和土产的运输事宜。

在东非和中非地区，欧洲人最初来到时往往带有宗教性质，像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的福音派医务传教士一边传播福音，一边治病救人，并且揭露了不人道的内陆奴隶贸易。1871年亨·莫·斯坦利（H. N. Stanley）“援救”利文斯通的事件经前者娴熟的自我宣扬[1]，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一则著名的冒险故事，并大大增进了人们对“黑暗大陆”的兴趣。

在有些地区，英国的贸易企图得到了武力支持。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印度政府把持着鸦片专卖[2]，英国通过一系列“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政府全面开放通商口岸；事态发展的顶点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那是英帝国主义功业中最不光彩的一笔，因为该条约并非处理地方危机的附加结果，而是出于深思熟虑的一贯政策。有时政府通过特许公司的机制间接参与殖民管理事务，使初始规模很小的贸易得以发展。特许公司是政府担保其在一个地区享有贸易和行政管理权利的贸易公司；尼日利亚、东非和罗得西亚都以这样的方式最终落到英国的统治下；这是因为当一个公司破产时（或实际破产时，如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英国南非公司在1920年前从未分过红利，1923年被接管），英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担当起公司的行政管理责任。

印度

除了巨大的、主要是非官方的贸易网络之外，还有处于正中央的印度这颗“镶在帝国王冠上的大宝石”。虽说现在印度的利润已经不那么丰厚，但就安全问题而言，它在英国思想中仍是除了欧洲事务以外的焦点。1857—1858年的印度兵变后，老的东印度公司结束，它的领地由英国直接治理。1876年，因女王的明确要求，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封她为“印度女皇”。

为了保护印度的安全，也为了保护往返次大陆通道的安全，英国吞并了许多地方，如在印度附近的缅甸和马来亚。这样做多半是应加尔各答的印度政府的迫切要求；印度有自己推行帝国主义的计划，它做这件事情和它做每件事情一样，都经过系统周密的计划，和伦敦那种无计划的任意行事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在这条路线上，埃及和苏丹归属英国控制了，帝国向东非和南非的扩张至少部分地出于保障印度安全的考虑。当然，这么简单的说法遮盖了有关每一次领土兼并的极其复杂的叙述。最有争议的是对埃及和南非的占领，对这些地区应给予一定的关注。

克里米亚

印度通道使地中海东部，尤其靠近俄国那一带的安全问题成为英国长期的困扰。1854至1856年间，英国和法国派遣强大的舰队和军队去支持土耳其，皮埃蒙特 - 撒丁国后来也加入进来。克里米亚战争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起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俄国向散乱、疲弱的奥斯曼帝国扩张。英、法这两个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同“落后”的俄国交战，其表现令人失望，有些方面简直是无能，虽说从海上如此远距离地为庞大的军队运送给养确实造成前所未有的问题。通过电报传来并出现在报纸上有关部队艰难处境的报道，便赤裸裸地凸现了这类问题，也凸现出自由国家发动战争的悖论。也是在报道中，有“执灯的夫人”之称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成了名人。战争的凝滞状态很像日后1914—1918年战争中的僵局，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围困行动，最后才在克里米亚和小亚细亚土耳其的卡尔斯血腥地决出了胜负。土耳其是保住了，英国就这样又扶起了奥斯曼帝国，而埃及就是其中的一个行省。

CANADA
NEWFOUNDLAND
Bermuda*
Bahamas*
St Lucia*
Barbados*
Tobago*
Trinidad*
*Jamaica
*BR. HONDURAS
*Mosquito Coast
(British until 1850)
BRITISH
GUIANA
Falkland Is
至 1815 年的百慕大群岛 * 地区
1914 年增加的吉尔伯特群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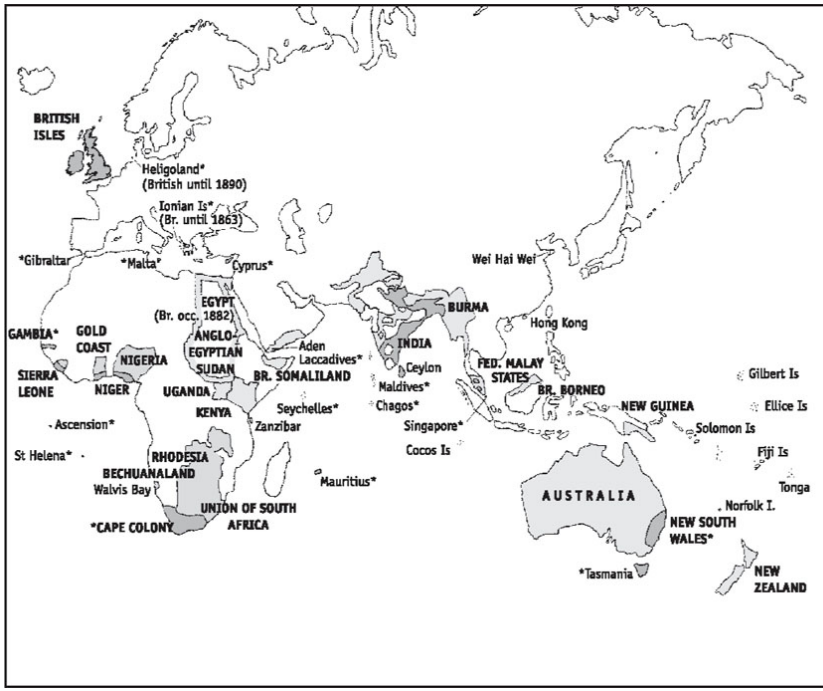

地图4　英帝国的扩张，1815—1914年

土耳其

对土耳其的希望是它会实行改革，按现代自由国家的方式办事。但这个希望破灭了。到了19世纪70年代，土耳其又一次面临解体，并遭遇俄国袭击。1874至1880年间的迪斯累里政府仍延续了克里米亚战争时捍卫土耳其领土完整的方针。格莱斯顿领导的反对党自由党则反对说，这个方针已无可行性，支持将“欧洲境内的土耳其”之大部分领土瓜分为数个独立的基督教国家。出席1878年柏林会议的“欧洲同盟”[3]　就肢解土耳其达成一致。迪斯累里带着“和平加荣誉”回到伦敦，英帝国得到了被认为对地中海东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塞浦路斯岛，可实际上塞浦路斯完全无法用作海军基地。

埃及

土耳其在土崩瓦解，埃及也面临动荡的局面。变得日益自立的埃及组织兴修苏伊士运河；运河于1869年开凿，成为英印交通线的重要环节。开凿运河的引入资金破坏了埃及的稳定，使埃及的社会和政治开始解体。1875年，迪斯累里买下赫迪夫（Khedive）在运河管理公司的大宗股票。[4] 因此，当埃及债台高筑，濒临破产，国内发生图谋政变的起义的时候，英国对局势的关注不仅出于一般的战略考虑，而且与直接的经济利益相关。格莱斯顿寻求其他解决方案未果，不得已于1882年代表运河债权人入侵并占领了埃及，英国占领军一直到1954年才撤走。不过埃及从未被正式并入英国，因此它的地位类似于理论上独立的印度各土邦。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同苏丹的起义者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在陆军元帅基奇纳（Field Marshal Kitchener）的指挥下，最终于1898年的恩图曼[5]战役中，无情地粉碎了1885年杀死独行者戈登的马赫迪所领导的起义，接下去自然就是英国正式吞并了苏丹。[6] 就这样，土耳其的衰落使英国变成了地中海东部和东北非洲的强国。

南非

在南非发生的情况没什么不同，只是那里的布尔人使事情变得复杂。1795年英国为保护去印度的通道而占领了开普殖民地。[7] 19世纪30年代，布尔人有组织地赶着牛车北迁，南非内陆的安全形势对开普殖民地产生影响。曾有各种计划提出来，要将布尔人合并为一个联盟；1877年，迪斯累里政府趁布尔人力量被祖鲁人削弱之际，将联邦强加给了布尔人。[8] 将领的无能（这是英国南非军事行动的特征）致使800名英军在伊桑德尔瓦纳的战役中丧生，这是殖民战争中很少见的长矛战胜枪炮的情况。当然，英国人只是暂时受挫，后来祖鲁人在乌隆迪之战中惨败（1879年）。布尔人又想重新赢回独立。在一次短暂的战争中[9]，英军一支小部队在1881年的马朱巴山战役中战

败，英国巧妙地向布尔人发动了完全超出该战役军事意义的宣传攻势，同布尔人达成了语焉不详的协议：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独立，但服从英国的宗主权。

钻石矿投入开发和1886年在德兰士瓦发现的黄金矿改变了局势。就财政而言，南部非洲已经切实成为英国最大的皇家宝石。就如在埃及发生的情况一样，塞西尔·罗兹等人引导资金流入，破坏了布尔人农耕经济的稳定性。德兰士瓦和埃及一样经济破产了，但布尔人在保罗·克留格尔（Paul Kruger）的领导下仍保持了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控制。[10] 1896年罗兹的密友詹姆森（Dr Jameson）挑动外侨（居住在德兰士瓦但不享有政治权利的英国人）起事，但遭到失败。新来的高级专员艾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声称英国权利高于布尔共和国，决心用战争击溃克留格尔。1899年，在米尔纳的挑衅下，克留格尔对开普殖民地发动进攻，于是一场预计将是速决的有限战争开始了。可是布尔人是德国装备，而英国人在殖民战争中惯于同未经训练的、没有火器的土著打仗，故显得笨拙无能，打了一系列败仗，后来在重型武器助阵的情况下，才于1900年攻下布尔人的主要城池。战争似乎已经结束，殖民大臣张伯伦力劝索尔兹伯里举行“卡其大选”，统一党轻易成了赢家。然而布尔人不接受失败，用游击战频繁骚扰英军。英军施以报复，烧毁布尔农庄，扫荡草原，把布尔人家庭统统赶往“集中营”。营内死亡率居高不下，引发英国激进人士的抗议。继罗斯伯里担任自由党领袖的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问道，“什么时候战争不再是战争了？”他自答道，“就是当它在南非用暴虐的方式进行的时候。”1902年谈判议和：米尔纳失败了，他没有达到粉碎南非白人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目的。

注释

【1】 利文斯通在1866年去非洲探索尼罗河源头后与外界失去联系，1871年美国记者斯坦利接受搜救任务，冒险来到坦噶尼喀湖边，找到了身陷困境的利文斯通。这段经历被他写成书，《我怎样找到了利文斯通》于1872年发表。

【2】　印度政府指英国在印度的代理机构，即东印度公司。18世纪末，英政府着手治理腐败，将东印度公司置于政府监管之下，公司渐失去原有的决策和贸易专权，1834年后基本上只是英政府在印度的管理机构，1857年印度兵变（孟加拉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士兵起义），此后东印度公司撤销，英政府开始直接治理印度。18世纪后期，东印度公司从葡萄牙和荷兰商人手中夺取印度的鸦片专卖权，在孟加拉建立了垄断性的鸦片种植和制造业，主要出口对象就是中国。

【3】　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出现的奥、俄、普、英四国同盟，也译作“欧洲协调”、“欧洲一致”、“大国协调”、“欧洲协商”等。这是欧洲大国间协调、合作的机制，尤其是对领土问题进行协商的形式，对维护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和平、稳定发挥了作用。

【4】　赫迪夫是1867至1914年间土耳其苏丹授予埃及执政者的称号，相当于埃及总督。运河开凿耗费两千多万英镑，主要是法国等欧洲国家用社会公众认股方式募集，引发埃及的财政危机。

【5】　又译乌姆杜尔曼，苏丹中部城市。“马赫迪”是伊斯兰教救世主的意思，起义领袖的本名是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他成立的“马赫迪”国定都恩图曼；起义于1881年开始，马赫迪本人于1885年去世，此后他的儿子继任。

【6】　1879年英法共同托管埃及，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1915年宣布埃及为其保护国；1870年代，英国插手苏丹，镇压马赫迪大起义，1898年攻陷恩图曼后，宣布与埃及共管苏丹，实质是英国控制。

【7】　1795年英军攻陷好望角（位置在开普敦南面），后放弃，19世纪初又重新占领。18世纪时从英国到印度要绕道好望角。

【8】　白种布尔人是17世纪移民南非的荷兰人的后裔，以农耕畜牧为生。19世纪初，英国以重金强取荷兰的开普殖民地，布尔人不满臣服英人的地位，遂有向北方内陆的大迁徙。迁徙也是布尔人对南非的黑人国家祖鲁王国进行殖民征服的过程。30年代末，骁勇的祖鲁人和布尔人进行激烈的战争，英国殖民者也曾派兵援助布尔人，最终祖鲁王国失败割地，但布尔人的共和国在40年代初也被英殖民者吞并。50年代以后，布尔人摆脱英殖民统治，成立或恢复了两个布尔人国家，即奥兰治自由邦和南非共和国（称为德兰士瓦）。这个时期祖鲁新一代领导人起来为保卫独立和尊严而战。英国既想控制布尔人——将两个共和国纳入南非联邦，又想占领祖鲁人的土地（下文提到的伊桑德尔瓦纳战役是英军和祖鲁人之间的战争）。南非问题不仅在于这几方互相之间的复杂关系，还牵涉到英国殖民部和南非英裔殖民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后者和布尔人都抵制南非联邦。

【9】　即第一次英布战争，1880年12月布尔人宣战，1881年2月英军在马朱巴失败（92名士兵阵亡），战后签订《比勒陀利亚条约》。据本书第二作者的研究，格莱斯顿“圆满地处理了这场危机”，将马朱巴之败归咎于指挥官科利

（Colley，已阵亡）失去常识，草原部队协调不力；说本来内阁已经提出要派皇家调查委员会同布尔人交涉，委员会几乎肯定将提出终止兼并的方案，但科利的莽撞把停战的事情搞砸了；他维持了媾和谈判的现行政策，即英方不再要求兼并，但也要布尔人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英国在这个地区的最高地位。H. C. G. Matthew, *Gladstone, 1809—1898* (Oxford: Clarendon, 1997) 406-407。

【10】 克留格尔当时是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1883—1902），因德兰士瓦发现金矿，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蜂拥而至，克留格尔的政策是移民住满14年才给公民权，引起英国不满；米尔纳到任后要求降到5年，克不允，终于爆发第二次英布战争。

第二十一章

世纪末的反拨：新的国家观念

布尔战争极其昂贵，其耗费超过19世纪英国所有帝国主义行动费用之总和。它没有摧毁布尔人，但却摧毁了格莱斯顿的财政体系，提高了政府的开支水平，此后再也降不下来。这场战争也使此前知识界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以鲜明的具戏剧性的通俗形式表达出来。战争中，白人殖民地派兵支援，表明帝国的力量和对帝国的忠诚，但战争也揭示了帝国的虚弱。它好像摊子铺得太大，协调配合很差。英国海军已经不再具有绝对优势，法国海军加上德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的力量对英国形成威胁。“光荣的孤立”政策开始显出危险性。

19世纪70至90年代，帝国之间的竞争曾意味着法国通常看上去最有可能成为英国的敌人，而德国则最有可能成为英国的朋友。德国1898年的海军发展计划，它欲找到“太阳下的一个位置”的努力，同一时期的布尔战争中它助长克留格尔志气的做法，都使德国看起来像强有力的威胁；厄斯金·奇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的经典间谍小说《沙岸之谜》（1903年）就准确地捕捉了时人对这一威胁的感觉。1902年英国同日本的结盟加强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海军安全。继这一限定帝国责任范围的努力后，[1] 有更多的协议（法文称“协约”）签订，1904年同法国签订条约，解决了英法帝国之间在北非问题上的分歧；1907年同俄国订约，解决了两国在波斯问题上的分歧。就这样，布尔战争导致英国外交政策走上了“新路线”。这些“协约”的正式条款涉及欧洲以外的地区，但其真正的重要性却在于欧洲内部关系；签订协约尽管并非结盟，然而在日趋紧张的欧洲局势中，却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承诺站在法 - 俄联盟一边，反对德国和奥地利。至于英国究竟会卷入到什么程度，当时并不清楚。

经济

布尔战争引起的对世界安全的焦虑也使英国的相对经济地位问题成为大众的话题，因为国家的力量最终依靠的是经济实力。19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的那种绝对优势地位已大大下降。美国、德国、法国和

俄国现在都是富有的工业强国了，美德两国的某些经济部门更是超过了英国。英国只是列强中的一个，而不再是无同道人的开路先锋了。然而，英国的上流社会和政府在大部分情况下仍若无其事，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自由贸易，最低政府开支，自主的自我调节的经济等，这些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主义国家奉行的规则仍在延续，保守党执政时几乎和自由党一样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们。1851年，中央政府的人均支出是2英镑，到了1891年只增加到2.5英镑（到1913年是人均4英镑）。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情况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其中很多意见似乎在布尔战争中得到证实，并传播开来。

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缓慢的军事进展导致许多对上层统治阶级无能的批评。南非战争中的军事低效，招募的士兵素质低下，在有产阶级中引发了公开的呼声，要对国家整个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安排作出重新评价。

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仔细考虑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各类批评之前，应该先看一看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先前我们已经看到，实证主义者大力支持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力开始采取一种不同的形式；“适者生存”的斗争已较少被视为人与人之间在市场上的竞争，而更多地被看作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这一转变戏剧性地减少了所讨论的单位数，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即是否应将一个个的“种族”而非无数的个人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先进的种族”是否能够通过政府的、社会的组织，或许甚至是遗传因子组织，来控制自身的命运。当时关系到民族国家间竞争的帝国主义也激发了同样的问题。

这一将英国的进化科学和德国的有机国家概念结合起来的观念对当时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政治谱系上属于哪家哪派的改革者，从看似属于右派的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到新自由主义哲学家约·阿·霍布森（J. A. Hobson），再到被认为是左派剧作家的萧伯纳（G. B. Shaw），全都共同使用“种族”的语言。随着通俗报刊对许多小规模殖民军事远征成果的大量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通俗版迅速变成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对种族优越论的轻易认定。适合大众口味的远征报道强调的是个人的勇敢，道德品质和进取精神，是“赢得了帝国的业绩”；它们很少谈到交战双方技术装备方面的巨大差距：一方是用来复枪武装的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在90年代还间或使用机关枪，而当地的武装力量依靠的是集中使用的长矛，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几杆零星的火枪。

“国家效率”

对自由主义国家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批评来自三大政治阵营：一是心存不满的保守党和统一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过分墨守皮尔 - 格莱斯顿的财政政策准则；二是自由党里认为自由主义必须朝前发展以应对新挑战的人；三是社会主义者，至少乍看之下他们是在挑战整个国家秩序。从这些阵营里出来的人物走到一起，提出了“国家效率”的口号，意在表明愿意为一个适合于应对世界挑战的“帝国民族”使用政府的组织和立法权力。

自由贸易国家的批评者

对自由贸易国家的批评从未停止过。19世纪后半叶，自由贸易国家的批评者中最具影响的当数艺术批评家、社会评论家约翰·罗斯金。虽说在政治上无法归类，但在《给那后来的》（1862）等著作中，罗斯金那铿锵有力的散文抨击了工业社会的美学，然而他并未作系统的批评性讨论。他的美学批评后来被前拉斐尔兄弟会接了过去。后者是一个画家、作家和工艺家的团体，强调英国前工业社会的价值，尤其是体现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作品和设计中的价值：所

谓前工业社会是由手工艺匠人、心满意足的农民和传奇故事构成的神话般的国度。在此种种影响之下出现了设计和建筑的全面革新，诺曼·肖（Norman Shaw）以及世纪之交埃德温·勒琴斯（Edwin Lutyens）的“英国式”住宅建筑风格浓缩地表现了这种变化，“英国风格”成了新市郊最好的住宅的特色。莫里斯的作品中还产生了一种经久不衰的社会主义修辞：那个强健的自耕农社会，那个田园式的、自给自足的平等社会，成了深入人心的形象。莫里斯并不直接对抗工业化，他绕过了工业社会。

前拉斐尔兄弟会的美学，以及他们对中产阶级道德规范的全面批判，被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唯美主义者赋予了新的动力，其中最著名的是才智出众的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王尔德和他的爱尔兰同胞巴涅尔一样，因其性行为习惯被公开揭露而身败名裂。他那篇题为《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的出色文章体现了唯美主义同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联。

左派

1884年起，在以上各种社会主义倾向之外还出现了总部设在伦敦的费边社。费边社的成员中有悉尼·韦布（Sidney Webb），比阿特丽斯·韦布，萧伯纳，赫·乔·威尔斯（H. G. Wells），后来还有年轻的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他们都是坚定的社会进化论者。与其说他们批评的是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不如说是其低效和浪费；他们认为，一个有中央计划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在训练有素的专业精英人士的管理之下，会消除效率低下、商业的周期性盛衰循环以及由此产生的失业和贫穷等问题。费边社要通过立法而不是革命的手段，渐进地达到目标（以罗马将军[2]的名字命名的费边社仿效了费边的策略）。

费边社的主要贡献可能在于帮助英国左派发展出新的“进步”观；19世纪80年代，关于地方自治问题的争吵没完没了，英国左派的视野

越来越受到束缚。费边社针对的是当时的整个知识界，它不是一个大众性的运动。然而，当时在大众中也酝酿着对格莱斯顿自由主义之局限性的不满。原苏格兰艾尔郡煤田的矿工基尔·哈迪（Keir Hardie）就代表这样一种观点，即日益被工会组织起来的劳工阶级应该在议会下院中有自己的代表（那时议员仍不取报酬）。哈迪曾于1888年参与组建苏格兰劳工党，1892年代表西汉姆被选进议会，1893年在布拉德福德创立独立劳工党。该党自视为社会主义政党，但它很难建立起得到群众广泛支持的组织。它和自由党一样也使用反帝国主义的语汇，支持“全面地方自治”，但它还提倡国有化。亨·迈·海因德曼【3】的社会民主同盟因有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更有活力，但它在大众中也没有站稳脚跟。

注释

【1】 19世纪后期，尤其在迪斯累里和索尔兹伯里任首相时期，英国在外交上奉行“光荣的孤立”，即不加入军事同盟，不同强国订立盟约，而是自己进行海外扩张。但是面临世界上其他新老帝国主义日益强大的力量，英国不得不改变政策，同他国立约，划分并相互承认各自的势力范围。

【2】 指昆塔斯·费边·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前203年），他在与强敌的周旋中避免正面交锋，而采取谨慎、拖延待机的办法。

【3】 曾就读于剑桥三一学院的亨利·迈耶斯·海因德曼（Henry Mayers Hyndman, 1842—1921）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世纪80年代曾对当时的英国社会主义领导人产生很大影响，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都不认可。

第二十二章

老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劳工主义及关税改革

上述种种运动均影响有限；自由党仍然是有压倒性强势的“左派”党（19世纪80年代，“左派”一词首次在英国的政治讨论中被经常使用）。然而，运动中提出的种种思想，及其组织上获得成功的危险，也凝聚了自由党的思想。

土地改革

自由党对19世纪最后20年的思想大辩论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一向主张土地改革，现在受到美国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进步与贫穷》（1880年）等一类书籍的影响，对土改的热情又一次被点燃起来。“在财富增进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贫穷？”乔治提出这个问题后，给出了答案；粗略地讲，产生贫穷是因为土地所有者收取的地租，是因为劳动者不能自由使用乡村和城市的土地。解决的办法是实行彻底的、切实有效的土地税，即“土地单一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大战之后，土地战始终是激进主义的一大主题。

阿诺德·汤因比问道：“我们曾将妇女儿童从矿山、工厂的恶劣条件中解救出来，现在为什么坐在一旁，平静地眼睁睁地看着比那种劣境更恶劣的堕落发生？”汤因比是自由主义基督教历史学家、激进派，他和托·希·格林（T. H. Green）的激进思想对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牛津大学产生很大影响。[1] 汤因比的追随者（如1884年在伦敦东区创建汤因比服务所[2]的巴尼特教士［Canon Barnett］）首先鼓励知识分子个人的（往往是宗教的）奉献精神，要他们亲自到劳工阶级中间去，观察那里的问题；其次，也是后来，鼓励他们接受这样一种认识，即只依靠自愿捐助本身是不够的，不足以解决劳工阶级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

“先行的激进分子”已在期望政府大大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期望有多得多的“积极的自由主义”，以确保人人都有发挥他或她的最大个人才能的途径。要做这些事情肯定要花很多钱，自由主义者相信应该用增加直接税的方式征得，尤其要征收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在增加国家税收的同时也起到适度的财富再分配的作用。1892至1895年的自由党少数政府就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一次通过有效征收遗产税获得了用于加大社会改革力度和海军建设所需的经费。

渐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运动力图让自由市场“公正地”运作，用以证明市场体系的合理性；它试图对资本主义作出理性的解释，而不是要取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最得力的作者是约·阿·霍布森，他还猛烈抨击了“不道德的”帝国主义。这个运动希望改变自由党人，让他们接受“新自由主义”，从而使自由党成为有宽泛基础的党而延续下去，使它能够持续不断地吸收城市劳工阶级，将他们融入自由党。这样做可以避免出现德国的情况，即劳工阶级组织起以本阶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拒绝承认德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这一观点也因自由党的政治权宜考虑而得到强化。在塔夫河谷罢工案（1900—1901）[3] 中，司法部门作出一系列不利于工会的裁决，质疑他们有派出工人纠察队及免去损失赔偿的合法权利；这之后，一些在19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会便同独立劳工党联手，于1900年成立了劳工代表委员会。在布尔战争中分成三派的自由党正值其最疲弱的时刻，对于迄今一直站在自由党一边的工会积极分子，他们似乎无法给予任何补偿。劳工代表委员会书记拉姆齐·麦克唐纳和自由党进行谈判，在1903年2月达成了关于选举的协议，商定在自由党和劳工党的选区里对代表进步的一方不分散投票，以免使统一党人渔翁得利，但是在地方上将达成协定，使一定数量的工党候选人有可能当选。

两个左派党之间的通融妥协表明它们之间在许多方面意见一致：工党（劳工代表委员会于1906年更名工党）成为“进步党”的组成部分，至少暂时如此；它赞同进步党的许多改革目标，对自由贸易同样坚定不移。

关税改革

统一党人——自由党统一主义派领袖约瑟夫·张伯伦和哈廷顿勋爵于1895年进入索尔兹伯里的内阁以后，托利党和自由党统一主义派联盟就应称为统一党了——希望原汁原味地保留英国政体，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保留了那时的财政安排，仍然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索尔兹伯里尽管在两院都是高票多数，但他并没有做什么切实支持保护贸易的事情。他的党内拥戴帝国主义的那一派却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实行某种形式的帝国贸易保护。

他们有三大理由要实行保护制。首先，他们认为美国和德国的经济之所以日益增长，是因为这些国家保护了自己刚发展起来的工业；在化工、电力、汽车等使用复杂精密技术的工业新时代里，如果没有保护制、一定程度的计划性以及工业和教育之间的密切合作，英国必输无疑，而唯有政府才能对所有这些事情进行指导和监管。其次，他们认为帝国关税同盟（类似于19世纪早期德意志诸邦间的关税同盟）可以整合帝国的经济，让英国生产工业品，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再者，要想筹集足够的款项进行社会改革，使帝国民族适应将来必然要发生的大国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那么征收包括粮食税在内的关税是除了直接税以外的唯一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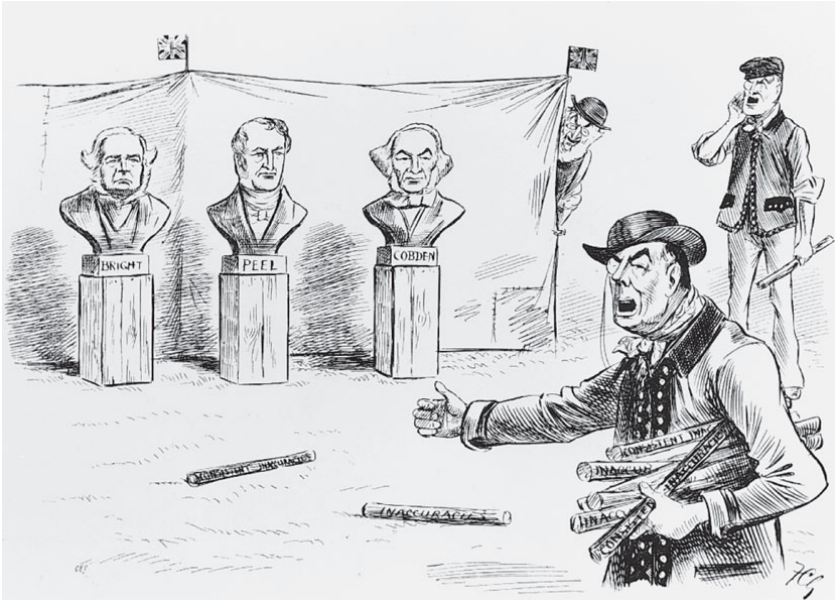

图13　约瑟夫·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计划攻击自由贸易传统，弗·卡拉瑟　斯·古尔德的漫画作品，载1903年11月12日的《威斯敏斯特公报》。

这个项目具体见于1903年时任殖民大臣的张伯伦推出的关税改革计划[4]；他的举动让前一年继伯父索尔兹伯里勋爵担任首相的阿瑟·贝尔福不无尴尬。关税改革运动经费充足，组织和宣传工作圆熟得力，它使统一党分裂了（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等少数议员则脱离了统一党）。在一系列的补缺选举和后来1906年的大选中，选民拒绝关税改革，自由党和29名工党议员以悬殊比例胜出。19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拒绝了地方自治，但没有背离自由贸易的道路。皮尔 - 格莱斯顿的开放市场和粮食低价的传统仍有强大势力："大面包小面包"仍是自由党的响亮口号。

维多利亚时代的终结

然而，尽管1906年自由党赢得大选主要是否定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人们对关税改革的反感，不从国教者对贝尔福的1902年教育法的

厌恶（宗教复兴使他们的队伍大大壮大了），对统一党人处理帝国事务不力的普遍批评——但整个氛围变了。“老自由主义”（还有“老托利主义”）虽仍有相当势力，然而左派、右派以及自由党自身对维多利亚自由主义国家的批评影响至深。

20世纪开初的几年（关于20世纪应从1900年还是1901年的元月1日算起有不少争论），经济状况好的人家已经普遍使用电灯、电话、打字机、留声机、汽车，不久还有无线电和飞机；这些20世纪的典型器具用品在19世纪90年代就有，只是技术尚不够完善，所以市场推广很慢。1907年，世界上第一座作为电影院设计的建筑在兰开夏郡的科恩开业。倏忽之间，维多利亚年代及其专注的事物已恍如隔世。格莱斯顿1898年去世，维多利亚女王1901年去世，索尔兹伯里1903年去世，这三个最耀眼的公众人物的相继辞世强调了变化的来临。

注释

【1】 阿·汤因比在牛津贝利奥尔学院任教期间讲授英国工业革命经济史，他去世后讲稿被结集发表，《工业革命》（1884）是最早研究18至19世纪英国工业经济史的重要著作之一。他的侄子阿·约·汤因比（1889—1979）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研究世界文明兴衰的12卷《历史研究》。亦见第一章第一段。

【2】 亦称汤因比馆，用以纪念汤因比在那里兴建住房和图书馆的努力。该馆是一种social settlement，即为在工业区居住并服务于贫困人群的大学毕业生建造的住宅，坐落在伦敦东区的怀特查珀尔；作为社会福利机构，它致力于成人教育、社会调查、改善环境等社会工作，至今该服务所仍很活跃。创建人巴尼特曾在该所现址附近的圣犹大教堂任职，他邀请牛津、剑桥的教师来这个工业区度假，了解劳工的生活工作状况。

【3】 塔夫铁路工会罢工所引起的工会和铁路公司之间的诉讼案，法院裁定工会赔偿，等于否定工会有组织罢工争取工人权益的权利。这起案子对工党的早期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4】 张伯伦主张实行英国和殖民地附属国的共同市场，对外收高额关税（使英国的制造业少受美德等国竞争的压力），对内则实行关税特惠。这个计划构思了20世纪英国的政治方针，但在当时的英国属于超前计划，因为自由贸易对广大英国人来说主要意味着进口的便宜粮食；自由党拿便宜的面包大做文章，挫败了关税改革。张伯伦曾因领导自由党左派抵制爱尔兰自治案造成自由党分裂，

转而和保守党结盟，但关税改革案造成统一党的分裂和保守政府下台。

第二十三章

爱德华时代：控制国家危机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的最初几年，对劳动市场的运作和社会状况的一系列调查增强了对19世纪的国家作重新评估的趋向。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伦敦百姓的生活和工作》（4个系列共33卷，1889—1903年间陆续发表），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的《贫穷：城市生活研究》（1901年）都属于这类调查。布斯和朗特里首次企图将“贫穷”界定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像济贫法那样，将贫困界定为一种司法范畴）。朗特里发现，约克郡有超过27%的人口生活在他所说的“一级或二级贫困”之中。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对有工作的工人来说，生活水平可能是提高了，但人口比例中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过着“贫穷”的生活（“贫穷”是个相对词语），挣扎在经济崩溃的边缘。这同我们此前注意到的一些王公贵胄耀眼的“富豪”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差不多30%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也确实使当时的人感到震惊。但这个数字也意味着，有70%的人生活相对富裕，这个比例在19世纪中叶“工资铁律”[1]当道的年代里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19世纪60年代，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承认，经济运行中必然伴生着“庞大的穷人群”，维多利亚人模糊地也是无奈地意识到，在他们的四周存在着破败、荒凉与苦难。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年）中描写道，伦敦东区有“数量巨大的、穷乏悲苦的、难以控制的劳苦大众”[2]。因此维多利亚人将穷人问题看作是地区性的、个人的问题，应对措施也主要靠个人的慈善行动，去减轻他们所认识的穷人的痛苦，或者是帮助那些属于某些具体类别的“应得到救济的穷人”，例如上等出身但生活艰难的人。到了世纪之交，系统的调查研究不仅敲响了警钟，让人们看到“帝国民族”竟然会如此穷困潦倒，而且还通过具体的数字表明问题是可以得到控制和补救的：只有搞清楚问题的大小，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由贸易经济学领军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说，“1834年的问题是贫民救济的问题，而1893年的问题则是贫穷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贫穷已经成为可以明确界定、因而也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图14　社会底层。格拉斯哥的母子俩，约1910年，这是朗特里说的10%生活在一级贫困状态中的一例。不常见的早期闪光摄影照片。

贫穷和国家

1905至1914年间，尤其是1908年坎贝尔·班纳曼去世，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接任首相之后，自由党政府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开始学会接受并着手处理贫穷的问题。学校的免费餐（1907年）、养老金计划（计划是1908年阿斯奎斯成为首相之前就做好的，在接任他当财政大臣的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的主持下通过下院审批），先于凯恩斯赤字财政的发展法（1909年）、温斯顿·丘吉尔的劳工介绍所（1909年）、劳合·乔治的国民保险法（1911年），即由国家、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的、作为劳工生病和失业救济金的强制性保险——所有这些立法以及许许多多小范围的举措组成了现代福利国家的首批立法的界碑。维多利亚时代相信个人的德行和勤奋可以确保社会适度的兴旺发达，而以上法案则建立在拒斥这个信条

的基础之上：改革就是承认资本主义是浪费、低效、伤害个人而不论其功绩的，也等于承认光有“自愿捐助制度”是不够的。但无论怎么说，这些仍然是主张自由贸易的人实行的改革，他们相信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少量的调整就可以逐次消除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现象，使之变得“公平”。

征税与贵族

这些改革是昂贵的，但要进行改革是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具体引发了争议的是用提高税收的方式来获得改革所需要的经费，加之为了和德国扩充海军的势头匹敌，英国要筹措巨资建造一支无畏级战舰舰队，使争论更加激烈。主张关税改革的人提倡通过保护贸易的间接税来筹款，自由党则要立法扩大直接税。1909年劳合·乔治的预算推出了向最富有阶层征收财产“超额附加税”并征收有效土地税的方案，致使很长时间以来充满怨气的争论趋于白热化。贝尔福和统一党利用上院否决了预算案。

上院越来越被用来作为挫败自由党立法的工具：1893年的第二自治议案以及1906至1908年内提出的一系列议案不是被修改得支离破碎就是被完全推翻，否决预算案是这种做法的极致。财政权一向是下院的特权，否决预算案等于打击了英国代议制政府的根本信条。[3] 统一党争辩说，免除上院财政立法权的惯例意味着自由党在利用这个惯例将财政立法转向实际上的社会立法。然而，从结果来说，最终一切征税问题都是、而且向来就是社会性的问题。1910年的两次大选，自由党不得不依靠工党和爱尔兰的支持，不过他们仍然以明显多数获得了对上院权力的限制：统一党的领导层虽然不是人人赞同，但最终让步，1911年的议会法将上院的否决权限定在两年之内。

自治法

这一场体制大战开始时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结构的根本问题：增收的税费由谁来负担——是通过超额附加税加到富人头上，还是通过粮食税加到穷人头上？在争论过程中，又提出了另一个关系到英国宪政结构的问题：自由党在其爱尔兰支持者的要求下，又提出了第三个爱尔兰自治议案。根据议会法，这个自治案连同撤销威尔士圣公会国教地位的法案都在1914年正式成为法律[4]，但因几年战争期而延期执行。

统一党勉强吞下了预算案的苦药，但自治案他们无法容忍。在新领袖安德鲁·伯纳尔·劳（Andrew Bonar Law）（1911年接替任贝尔福担任统一党领袖）的默许下，他们接过了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在1886年设计的口号并按其字面意思行动起来："乌尔斯特为正义而战，正义在乌尔斯特一边"。枪支运进了北爱尔兰，其中不少是德国造；军队对国家的忠诚受到怀疑。统一党已经三次被英国选民整体剥夺了执掌权力的机会，尽管自由党已经在乌尔斯特的问题上作出了实质性让步，而且让步可能是比较早就提出的，然而1914年，统一党还是将爱尔兰拖入内战的边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后人无法了解统一党在当时是否会越过界线发动内战。

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对于政治和政治家来说都是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自由主义的复兴，自由党愿意对许多久拖不决或长期被否决的问题作出妥协的姿态，都让统一党感到棘手；无论执政还是在野，统一党仍然自视为英国理所当然的统治者。

妇女

如果说老的统治阶层江河日下，引发了极大的动乱，那么新崛起的势力也在四处出击。妇女选举权运动回到穆勒要求将妇女选举权写入1867年改革议案的立场。[5] 那时有的妇女已经可以参加地方选举和国教的宗教会议选举，并有资格成为地方议会、学校董事会和济贫委员会的候选人。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产阶级妇女被赋予了

很有限的公共角色，如辅助牧师、医生或议员的工作；担任慈善机构的秘书——这类机构的主席几乎总是男性；参加大学考试但是不被授予学位，等等。可是现在，光有这些权利不够了。不准参加帝国议会的大选已经被视为一种剥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也是推动新公民概念的运动。

1897年，米莉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Fawcett）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同盟联合了一批有名的争取选举权团体，成为有广泛基础的、无疑具有自由主义背景的运动，并取得很大进展。但是潘克赫斯特（Pankhurst）领导的妇女社会政治协会（1903年）后来居上，势头盖过了前者。妇女社会政治协会日益提倡针对财产和政治家个人的激烈行为[6]，同时也因被判监禁和进行绝食抗议而使其成员备尝艰辛，甚至有人因此死去。妇女社会政治协会究竟促进了还是阻碍了妇女争取选举权的事业，这个问题不好下定论：一方面它戏剧性地渲染了妇女的理想；另一方面，其暴力主张也疏远了许多本来可能支持她们诉求的议员，尤其是首相阿斯奎斯，从而降低了立法成功的可能。尽管在自由党和工党内都有议员承诺支持，有少数统一党人也表示过支持，但是到1914年为止，议会没有通过任何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法案。

工联主义与劳工

爱德华时代还经历了工会运动的大发展，工会会员从1901年的200万人扩大到1913年的410万人。1908年以后，物价飙升而工资滞涨，促使工会运动风起云涌，发挥了自己的威力。1910到1912年间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其顶峰是1911年的首次铁路工人大罢工；当时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缓和了紧张局势，这本身也成了一个先例。由于工党党员资格必须通过加入工会获得，也由于大多数工会陆续成了隶属工党的组织[7]（此前一直支持自由党的煤矿大工会于1909年加入工党，是该党一大胜利），工党实力大大加强了。随着意识形态讨论

的激增，工党又成立了涵盖面很广的选区党组织系统[8]；关于意识形态的许多讨论必然带有乌托邦性质（并且受到了威廉·莫里斯的启发），因为实施的手段仍然十分有限。

工党在议会下院内有牢靠的基础，但是规模很小，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与自由党的结盟，如1906年的大选中，这种结盟为工党带来29个议席。工党在议会选举中收获有限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它能期待成功的工业中心里，有60％的成年男性尚未获得选举权。那时，下院的工党议会党[9]基本上将自己看作是为工会谋利益的压力集团，在塔夫河谷案之后、1906年劳资纠纷法的出台过程中，它成功地修订了自由党提案中的条款，阻止了工会在法律上被兼并改组。工党也介入社会问题和对外政策。威斯敏斯特的这种缓慢的进步使一些工联主义者（如著名的威尔士矿工工会）转向了工团主义运动[10]，即避开议员、议会和代议制政府机构，而用工会的“直接行动”去提高劳工的控制力。

工党的存在和成功同工联主义的扩张及其遭遇的困难有密切联系，反映出他们和自由党之间不同的社会基础以及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劳工运动之所以团结，是基于其文化和社会上的亲和力，也就是工人们在劳动和闲暇中共享的经历；这些经历和阐述他们是一个单独的阶级的道理同样重要。工人们并不感到自己和有产阶级完全疏离，但他们确实觉得自己是不同的阶级。这一感觉因自由党未能选择工人作为候选人而变得强烈起来：无论自由党和工党在政策问题上有多少一致的看法，自由党联盟的中产阶级成员——在选区选民中有决定性影响的人——是不会让他们认为应该从仆人出入的门走进他们居所的人当候选人的。

注释

【1】 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指人口过剩将导致工资下降至勉强糊口的水平。亦见第十三章。

【2】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年，179页。

【3】　按英国政治惯例，财政法案只能由内阁向下院（平民院）提出并在下院通过，上院（贵族院）只能讨论和建议，没有否决权。下院如否决重要议案、财政预算案等，内阁就应辞职或请君主解散下院，提前大选，故一般下院会提批评，但不轻易否决财政预算。1909年上院否决财政预算案，被下院认为是严重的违宪行为，两院两党争执不下，最后爱德华国王从中斡旋，议会拟定并通过了议会法（1911），规定财政法案在下院通过后，如上院一个月内未予通过，即可直接交国王批准成为法律，对是否属于财政案有争议的交给下院议长裁定（按英国惯例，担任议长的议员应退出原属党派，在议会中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被认定为财政案的，上院无修正或否决权；其他议案，上院只能否决两次，或者说只有两年的延搁否决权，只要下院连续三次通过并得到君主批准，即可成为法律。

【4】　第三自治案由阿斯奎斯政府于1912年提出，并在下院通过，但上院动用了延搁否决权，不予通过，保守党还策动北爱尔兰新教徒制造事端；根据议会法，凡是下院两年内连续三次会议通过的法案都可绕过上院直接请国王签字，为缓和局势，乔治五世于1914年批准了爱尔兰自治案，但不久后英国对德宣战，政府以战争为由宣布自治法暂缓实行。战后政府又提出了新的法案，爱尔兰南部成为自由邦。

【5】　穆勒作为议员提交了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妇女选举权委员会的请愿书，委员会征集了1,500多人签名。这里说的回到穆勒，主要指争取妇女在全国选举中的投票资格。此后多年中，妇女选举权议案屡提屡败；但如下文中说到的，从1869年起，妇女（指纳税妇女）在地方上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利。

【6】　妇女协会的强硬行为包括多次冲击议会，焚烧车站，捣乱会场，向政府部门投石示威，冲击艺术馆并毁坏藏画，炸毁劳合·乔治的宅邸，等等。有一名成员甚至以死明志，在赛马场与国王的马冲撞而死。

【7】　职工大会（相当于总工会）下的工会组织是工党内影响最大的力量，工会以集体名义加入工党，可以说工党基本上是工会党，其党员绝大多数是工会集体党员，很少个人党员；工党基本受工会操纵的情况直到1993年工党的改革以后才有所改变。工党初创时期其他的成分有费边社等社会主义团体、独立劳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等。

【8】　选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一样，也是附属于工党的团体，都属于工党的基层组织，但不同的是选区党吸收个人党员（1918年后），不过在领袖选举中，选区党也是由团体领袖凭投票卡进行集体投票（1993年以后才废除集体投票制，采取一人一票制）。按选区来建立党组织有很明确的围绕竞选的目的，这是西方政党的通常做法。

【9】　议员进入议会后不能自行其是，而必须由属于同一政党的议员组成

议会党团，统一本党议员在议会中的行为。第十九章中多次提到的巴涅尔的自治党就是下院内的议会党。包括工党在内的政党通过督导员制度对议会党进行监督和严格的纪律约束。1993年以前，参加工党领袖选举的有三个选举团，工会等附属团体有40%的表决权，选区工党30%，议会工党占30%，只有议会党是个人投票，其余均为集体投票。

【10】 “工团主义”（syndicalism）原是法语，按大英百科的解释，它“又称无政府工团主义或革命工团主义，主张工人阶级采取直接行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国家）……工团主义源于法国工人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反议会主义传统”（中文版，16卷，377页）。英国一般用“工联主义”（trade unionism）。

第二十四章

“你那英国的夏季已经结束”

如前所说，爱德华时代面目一新的自由主义面对着许多困难。在20世纪两届厉行改革的政府[1]中第一届政府的任内，新自由主义富有活力和想象力地通过立法克服了这些困难。它成功地遏制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财政政策、福利政策、社会主义、军国主义等方面的危机，当时军国主义使很多欧陆国家在1914年陷入政治困境（虽说爱尔兰的危机可能仍未解除）。最后导致自由党政府在英国终结的，并不是国内的分裂，而是外交事务。

英德对立

贝尔福的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及1905至1914年间自由党政府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一直在努力缔约，我们先前已注意到这一缔结协约政策的模糊的后果。英国虽未明确阐明，但它对于欧洲均势中的法、俄同盟作出了含蓄的、情感上的承诺。1905年以后英法之间秘密的军事对话更加强了这种承诺。英国虽然是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对欧洲大陆的事态却施加不了什么直接的影响。理·伯·霍尔丹（R. B. Haldane）整编了陆军，发展了一支打算派遣欧洲的远征军。尽管这是一支精锐部队，但是和欧洲列强通过义务兵役制征召的庞大军队相比，它在规模上微不足道。事实上，德国就完全低估了英军，结果付出了代价。

随着“欧洲大国协调”概念的消退和公然宣扬民族主义势头的高涨，英国的影响力衰退了。格雷本人虽有强烈的反德倾向，但他仍然延续了避免正式结盟的政策。然而，到了1910年，事情已经很清楚，假如英国会有一个敌国的话，那就一定是德国。在北非、巴尔干半岛诸国和土耳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在海军建设计划持续升级的情况下（尽管英国曾努力商谈一个限制军备的协定，尤其在1911—1912年），英德之间确立了敌对关系。那不仅是外交和军事的对立，而且还呈现出文化上的敌视。英国本来对德国在19世纪90年代取得的成就既怀有敬意又不无忧虑，现在这种情绪则变成了惊慌和恐惧。

战争爆发

1914年六七月间，巴尔干半岛和欧洲中部的事态迅速导致战争，德国估计自己称霸的时刻已经到来，然而此时英国却发挥不了影响。相对其他欧洲列强而言，英国可能是除俄国以外从战争中得不到多少好处的另一个国家。假如德国没有入侵比利时，自由党内阁是否会参战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德国既无视英国一向关注低地国家战略重要性的传统，也无视1870年德国和英国都签字同意的、在普法战争期间保证比利时独立的真正含义。[2] 德国进军比利时，使事态有了决断，阿斯奎斯带领内阁宣布参战，只有约翰·莫利（John Morley）和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两位阁员辞职。阿斯奎斯心情沉重，那种充满激情地奔向国旗、去参加“圣诞节前就会打完”的战争的好心情在英国的政治领袖那里是感觉不到的。

英国对在欧洲大陆打仗的心理准备很不充分，从整体上说，物质准备也很不够。甚至就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南非战争中，陆地战被当作由职业军人和一些志愿兵来完成的不甚重要的事情。军人价值观在贵族士绅中很有影响力，而且对公学的影响也日益加深，但是在其他地方就不那么被当回事了。有些团体企图将社会军事化，但从19世纪初有人想搞的国民军法，到1859年的来复枪志愿者，再到20世纪初的国家军人联合会，显然都失败了。“特拉法尔加日”是每年的军事庆典日，反映出英国公众热衷于海战和防卫战的惯性思维，也就是所谓的“蓝海政策”。除了一些乡村地区外，对普通人来说，“去当壮丁”，“拿入伍先令”，都是在失业或遭遇灾祸的情况下不得已的下策。

英国公众喜欢军乐队和鲜亮的军服，因为这些都是供消遣的娱乐活动，这和它们预示着战争即将发生的意思恰好相反。讲究盛大场面和注重国内事务是英国的风格。进入爱德华时代，政府签下的枪支、舰船合同已是价值不菲，而且成为英国东北部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总的说来，军事问题很少让政府和上流社会烦心。军事事务已经渗透到每个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织体之中，但在英国则当然不是这样。第一个工业国家为世界呈上了令人瞩目的自由资

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公众实验，其成功的前提是自由贸易和世界和平。1914年8月4日的这个星期二让实验戛然而止。

一声低低的叹息从那一年将收成全部捧出的田头传来，
干草垛立在田头阴沉沉地对着太阳，
那声音低吟："完了啊，来吧，蜜蜂已经飞离了三叶草，
你那英国的夏季已经结束。"

拉迪亚德·吉卜林，《长长的小径》

注释

【1】 应指20世纪初的两届自由党政府：1905.12—1908年，坎贝尔·班纳曼任首相，1908—1916年，阿斯奎斯任首相；阿的后期以及此后1916—1922年劳合·乔治任首相的政府是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联合政府，这是最后一个由自由党主导的政府。

【2】 比利时夹在德、荷、法之间，地势平坦，对岸就是英国东南沿海地区，所以对于英国本土防卫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让比利时成为独立的中立国家对英国最有利。英国经过很大的努力，于1839年使五个国家（英、法、俄、普、奥）签订国际条约，保证比利时成为独立的、永远中立的国家。1870年的普法战争爆发，刚崛起的德国比较痛快地同意了英国的意见，重申保证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条约中，英国曾写入一条规定：交战国任何一方破坏比利时中立，英国将和另一方合作，协同保卫比利时。19世纪90年代后，五国之间除了英国，已经形成两个对立的军事同盟：法俄同盟和德奥同盟，英国可能维持中立，但比利时问题是关键。亦见第九章"撤出欧洲"一节及相关注释。

大事年表

1789	法国革命
1790	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随想录》发表
1791—1792	托玛斯·潘恩的《人的权利》发表
1792	煤气用于照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妇女权利辩》发表
1793	英法开战；自愿捐助的农业委员会成立；商业萧条
1795	“斯品汉姆兰”户外救济制度开始采用，弥补工资以达到基本生活所需
1796	首例接种牛痘，预防天花
1798	托·罗·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发表；对收入超过200英镑的人开征10%的所得税
1799	工会遭到压制；拿破仑任法国第一执政官
1799—1801	商业繁荣
1801	同爱尔兰合并；英国第一次人口普查
1802	同法国订立和约；罗伯特·皮尔的第一部工厂法
1803	对法战争；通用圈地法简化了公地的圈地程序
1805	特拉法尔加海战：纳尔逊大败法国 - 西班牙联合舰队
1809—1810	商业繁荣
1811	封锁拿破仑的枢密令造成萧条；诺丁汉郡和约克郡的“勒德”派动乱；威尔士亲王乔治成为摄政王

1813	东印度公司失去贸易垄断权
1815	滑铁卢之战击溃拿破仑；欧洲和平：维也纳会议；通过谷物法，规定小麦每夸特80先令为进口基准价
1815—1817	商业繁荣
1817	物价下跌；织毯工反饥饿游行和其他骚动
1819	彼得卢惨案：骑兵队干涉群众改革集会，死11人伤400人
1820	乔治三世逝世；乔治四世登基
1821—1823	爱尔兰的饥荒
1824	商业繁荣
1825	工会组织合法化；斯托克顿 - 达灵顿火车开通；商业萧条
1829	天主教解禁法，终止了对天主教徒公民权、拥有财产权和担任公职权等方面绝大部分的否认和限制
1830	乔治四世逝世；威廉四世登基；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开通
1830—1832	第一次霍乱爆发；以格雷伯爵为首的辉格党执政
1831	乡村地区反对农业机械化的“斯温”船长动乱
1832	议会选举法修正案使这个时期的政治改革达到高潮，扩大了选举权，调整了议会代表结构
1833	工厂法限制童工；英国国教内发起牛津运动；英帝国废除蓄奴制
1834	济贫法修正案设立教区间联合济贫院；罗伯特·欧文创建全国大统一

	工会：政府反对工会“非法盟誓”的行动导致全国大统一工会运动失败和6名“托尔普德尔蒙难者”被流放
1835	市政改革法将地方政府选举扩大到所有纳税人
1835—1836	商业繁荣：“小”铁路热
1837	威廉四世逝世；维多利亚女王登基
1838	反谷物法联盟成立；《人民宪章》起草
1839	宪章动乱
1840	便士邮政设立
1841	托利党执政：皮尔内阁
1843	苏格兰教会分裂；香港被租借
1844	银行特许状法；罗奇代尔合作社成立；皇家城镇卫生委员会
1844—1845	铁路热：大规模投机投资铺设了5,000英里铁轨；爱尔兰土豆重灾，饥馑开始
1845	爱尔兰饥馑
1846	爱尔兰饥馑；取缔谷物法；辉格党执政
1847	威尔士教育报告
1848	爱尔兰饥馑；青年爱尔兰组织起义；欧洲各国革命；霍乱流行；公共卫生法
1851	大博览会；天主教圣统制在英国恢复
1852	德比伯爵第一届保守党少数政府
1852—1855	阿伯丁伯爵的联合政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改革

1853	威廉·格莱斯顿的第一个预算报告
1854	诺斯科特－特里维廉设立文官制度的报告
1854—1856	克里米亚战争，保卫欧洲在中东的利益不受俄国侵犯
1855	帕默斯顿子爵的第一届政府
1857—1858	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欧洲贸易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印度兵变
1858—1859	德比的第二届保守党少数政府
1858	印度法
1859	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
1859—1865	帕默斯顿的第二届自由党政府
1860	英法“科布登”条约及格莱斯顿的预算报告确立并扩展了自由贸易原则
1861	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逝世
1862	股份有限公司法为以股份形式融资提供了强大动力
1865	帕默斯顿逝世（10月）
1865—1866	罗素伯爵的第二届自由党政府
1866	霍乱爆发；罗素－格莱斯顿的温和改革议案失败
1866—1868	德比的第三届保守党少数政府
1867	德比－迪斯累里选举法修正案；加拿大自治领法
1868	本杰明·迪斯累里继德比任首相（2月）；职工大会（或工会联盟）组建
1868—1874	格莱斯顿第一届自由党政府
1869	苏伊士运河开凿；爱尔兰教会撤销

	国教地位
1870	爱尔兰土地法；福斯特 - 里彭的英国初等教育法；已婚妇女财产法扩大了妇女在婚姻内的权利
1871	废除大学任职的宗教考查
1872	苏格兰教育法
1873	格莱斯顿政府在爱尔兰大学法提案失败后辞职；迪斯累里拒绝就职；欧洲经济衰退
1874—1880	迪斯累里第二届保守党政府
1875	迪斯累里购买苏伊士运河股份，英国获得支配性债权；农业不景气加剧；劳资争议法，规定罢工设置纠察线合法
1875—1876	理·阿·克罗斯的保守党社会改革议案通过
1876	维多利亚宣称为印度女皇；土属保加利亚屠杀基督徒事件在英国激起格莱斯顿领导的反土耳其运动
1877	英国与布尔国在南非成立联邦
1878	柏林会议；迪斯累里宣布“荣耀的和平”
1879	工商业不景气；祖鲁战争：英国在伊桑德尔瓦纳战败，在乌隆迪获胜
1879—1880	格莱斯顿的中洛锡安竞选活动斥责在阿富汗和南非的帝国主义
1880—1885	格莱斯顿第二届自由党政府
1880—1881	第一次英国 - 布尔战争
1881	爱尔兰土地法和镇压法
1882	英国占领埃及；德、奥、意三国缔

	结军事同盟
1884—1885	选举改革法和重分选区法
1885	查尔斯·戈登死于喀土穆；兼并缅甸；索尔兹伯里第一届保守党（少数）政府；柏林会议瓜分非洲；苏格兰土地法
1886	皇家尼日尔公司获得特许状；德兰士瓦发现金矿；格莱斯顿第三届自由党政府提出第一个爱尔兰自治议案；自由党分裂
1886—1892	索尔兹伯里的第二届（保守党 - 自由党统一主义）政府
1887	英国东非公司获得特许状
1888	地方议会法确立代议制地方权力机构；苏格兰劳工党成立
1889	伦敦码头工人罢工；英国南非公司获得皇家特许状
1890—1891	巴涅尔使爱尔兰民族主义党分裂
1892—1894	格莱斯顿的第四届自由党（少数）政府
1893	第二个爱尔兰自治议案遭贵族院否决；独立劳工党成立
1894—1895	罗斯伯里伯爵的自由党（少数）政府
1895—1902	索尔兹伯里侯爵的第三届统一党内阁
1896—1898	苏丹被征服
1898	德国海军开始大发展
1898—1902	第二次英国 - 布尔战争
1899	（8月）英国在南非连连失利

1900	索尔兹伯里赢得“卡其大选”；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澳大利亚联邦法
1901	维多利亚女王逝世；爱德华七世登基
1902	阿瑟·贝尔福的教育法；英国同日本结盟
1902—1905	贝尔福的统一党政府
1903	约瑟夫·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运动开始
1904	英法缔结协约
1905—1908	坎贝尔 - 班纳曼的自由党政府
1906	自由党赢得大选（1月）；工党成立；英国皇家海军无畏级战舰服役
1907	英俄缔结协约
1908—1915	赫伯特·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
1908	阿斯奎斯的养老金计划提案
1909	温斯顿·丘吉尔的劳工介绍所提案；戴维·劳合·乔治的预算案遭贵族院否决；南非法
1910	（1月）大选：自由党政府继续执政
	（5月）爱德华七世逝世；乔治五世登基
	（12月）大选：自由党政府再次保持执政权
1911	议会法削减了贵族院的权力，确立每5年进行一次大选的制度；劳合·乔治的国民保险法；摩洛哥危机
1911—1912	铁路、采矿、煤矿罢工
1912	英国和德国有关限制海军的商谈失

	败；泰坦尼克号沉没
1912—1914	第三个（爱尔兰）自治法和撤销威尔士教会国教地位法获得通过，但因战争延期实行
1914	（6月28日）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 （8月4日）英帝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历任首相名录 1789—1914

（威廉·皮特	*1783*年*12*月）
亨利·埃丁顿	1801年3月
威廉·皮特	1804年5月
威廉·温德姆·格伦维尔	1806年2月
波特兰公爵	1807年3月
斯潘塞·珀西瓦尔	1809年10月
利物浦伯爵	1812年6月
乔治·坎宁	1827年4月
戈德里奇子爵	1827年8月
威灵顿公爵	1828年1月
格雷伯爵	1830年11月
墨尔本子爵	1834年7月
威灵顿公爵	1834年11月
罗伯特·皮尔爵士	1834年12月
墨尔本子爵	1835年4月
罗伯特·皮尔爵士	1841年8月
约翰·罗素勋爵	1846年6月
德比伯爵	1852年2月
阿伯丁伯爵	1852年12月
帕默斯顿子爵	1855年2月
德比伯爵	1858年2月
帕默斯顿子爵	1859年6月
罗素伯爵	1865年10月
德比伯爵	1866年6月
本杰明·迪斯累里	1868年2月
威廉·尤厄特·格莱斯顿	1868年12月
本杰明·迪斯累里	1874年2月
威廉·尤厄特·格莱斯顿	1880年4月
索尔兹伯里侯爵	1885年6月

威廉·尤厄特·格莱斯顿	1886年2月
索尔兹伯里侯爵	1886年7月
威廉·尤厄特·格莱斯顿	1892年8月
罗斯伯里伯爵	1894年3月
索尔兹伯里侯爵	1895年6月
阿瑟·詹姆斯·贝尔福	1902年7月
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	1905年12月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	1908年4月

译后记

译本中全部注释为译者添加。注释参考了各类普通词典，专门词典（其中特别是《英国传统插图词典》），中英文版百科，已出版的中英文图书和地图册，电子词典，电子数据库，并大量依靠电子搜索引擎锁定所需要的背景资料。译文中的译名尽量采用国内的通译。注释中确切使用他人作品中文字的部分会给出处，但为简洁起见，大多数注释不一一写明出处，只在下面按词典百科类、图书类和电子类列出曾参考的出版物或电子资源。译本中的引文若采用他人译文均注明了出处，未注明的为译者自己根据原文译出。另需说明的是，绝大多数注释都是至少参考两三种材料后写出，材料中不乏矛盾的提法，判断由译者作出（如第一章图2中的“比德迈”的意思），理解不当和错误均由译者负责。

最后，译者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电子数据库提供的方便，对于刘锋、丁宏为、韩加明、陆建德和盛宁等老师为译文提供的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词典百科类

《英汉大词典》（缩印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第6版，2004年。

《英语发音词典》（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Daniel Jones）（英文），第15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商务印书馆，1998年。

《牛津英国文学词典》（英文），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第6版，2005年。

《牛津美国文学词典》（英文），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第6版，2005年。

《牛津 - 杜登英汉图解词典》（双解），化学工业出版社，1984年。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总20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注释内简称大英百科）

Brewer's 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 Centenary Edition, 4th corrected impression, 1975.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Dictionary of British Heritage, Cambridge UP, Market House Books, 1986.

Merriam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 10th ed., 1993.

Webster'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 1st ed., 1943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 , 2nd college ed., 1980.

图书类

《旧约新约全书》（无出版说明）。

《欧洲文学史》，李赋宁总编，商务印书馆，第1卷，1999年；第2卷，2001年。

《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下），安德鲁·桑德斯著，谷启楠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英国诗选》（注释本），王佐良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奥瑟罗》，《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The Oxford Annotated Bibl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Oxford UP, 1962.

Webster's Concise World Atlas ，Barnes & Noble, 1997.

M. H. Abrams, gen.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 & II* , 5th ed. (New York: Norton, 1986) .

Asa Briggs, *Victorian Cities*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3).

E. J.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London: Penguin, 1990).

H. C. G. Matthew, *Gladstone, 1809-189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J. S. Mill, *On Liberty* , ed. Currin V. Shield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1956).

William Blake, *The Complete Poems* , ed. Alicia Okstriker (London: Penguin, 1977).

Alfred Tennyson, *Poems of Tennyson* , selected, intro. and notes by Jerome H. Buckle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

Percy Bysshe Shelley, *Selected Poetry* , ed., intro. and notes by Neville Rogers (Oxford: Oxford UP, 1968).

电子数据资料类

《金山词霸》，2005专业版。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北大图书馆提供服务。

JSTOR (Journal Storage, The Scholarly Journal Archive，《西文过刊全文库》），北大图书馆提供服务。

google search；百度搜索等。

韩敏中

2007年9月于蓝旗营

随着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的突飞猛进，恪守传统自由主义的英国在19世纪遭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为此英国进行了哪些社会变革和制度创新？它如何能在没有爆发革命的情况下就化解了危机，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转型？本书在详述19世纪英国历届政府更替和社会变迁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出了精彩的分析和解答，这对我们思考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现代化问题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百科通识文库

49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

——二十世纪英国

肯尼斯·摩根 著

宋云峰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

——二十世纪英国

肯尼斯·摩根 著

宋云峰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26**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0.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0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Kenneth O. Morgan 2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二十世纪英国／（英）摩根（Morgan K.）著；宋云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90-8

I．①日… II．①摩… ②宋… III．①英国 - 近代史 - 20世纪 IV．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76号

地图审图号：GS（2008）第332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90-8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插图目录
地图目录
译者序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章　20年代
第三章　30年代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五章　战后的世界
第六章　从70年代到90年代
第七章　走向新的千年
年表
历任首相名录1914—2000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肯尼斯·摩根，威尔士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研究讲座教授，牛津大学女王学院荣誉学者。1989—1995年间曾任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校长，1993—1995年间任威尔士大学校长。2000年4月，他被授予终身贵族的爵位。

译者简介

宋云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国社会、英语电影以及跨文化交际学。曾任1998年度“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高级访问学者（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英欧关系）以及2007—2008年度美国“富布赖特项目”高级访问学者（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研究英美电影比较）。著有《电影英语一本通》、《西蒙高级英语语法》等。

插图目录

图1　1915年秋按照“德比计划”在萨瑟克市政厅进行的自愿报名参军活动
图2　1916年9月，劳合·乔治在索姆河畔弗里考特附近与印度士兵交谈
图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卡通画像，作者为戴维·洛，1933年10月28日刊登在《新政治家和国家》上
图4　1929年牛津考利的莫里斯汽车厂的批量生产
图5　（上图）1939年战争爆发时，儿童们被撤离到萨塞克斯郡的伊斯特本；（下图）儿童佩戴防毒面罩
图6　亨利·摩尔创作于1941年的《地铁防空洞透视图》
图7　1945年8月23日组成的由艾德礼领导的工党内阁
图8　玛格丽特·拉瑟福德、斯坦利·霍洛韦和保罗·迪普伊在《买路钱》（1949）中
图9　1958年4月，从特拉法尔加广场开始的到奥尔德马斯顿武器研究所的第一次游行
图10　北海石油钻塔“海洋探险号”
图11　1997年9月，戴安娜王妃葬礼前肯辛顿宫外面的哀悼者

地图目录

地图1　帝国的衰退，1947—1980

译者序

对于想了解现代和当代英国历史的读者来说，《20世纪英国：帝国与遗产》是一本言简意赅、提纲挈领的好书。作者将全书按年代顺序分为七章，每一章不仅对该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重大事件娓娓道来，还涵盖了文化发展和艺术进步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另外各章中插入的历史图片有助于读者对各个时代的社会变迁有更为直观感性的认识，而附录的历史大事记和历任首相列表凸现了20世纪英国所经历的主要事件以及政治上的演变。这样的体例形式可使读者便捷地了解20世纪英国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

20世纪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世纪。无论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方面还是在教育科技文化方面，世界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社会主义在俄国与中国的建立、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霸权的崛起等。而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英国的衰落。这一衰落过程见证了欧洲列强殖民体系的瓦解与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英国在这个世纪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与政策以适应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变化，仍然维持了其世界大国的地位（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五位，仅次于美、日、德、中；与美、俄、中、法并列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20世纪的英国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适应世界变化、调整心态与对策的丰富经验和珍贵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给英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为战胜国之一，英国攫取了更多的领土，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在英王乔治五世统治下的1922年，大英帝国的领土面积达到了创纪录的3,66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由于战时需求，女性大量进入就业领域，从而在1918年争得了投票权；产业工人工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从而使工党在战后成为取代自由党的第二大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对英国的影响更为广泛。在外部，迫于美国的压力和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等因素，英国在战后不得不允许其大部分殖民地独立。在内部，战时的动员和对主要工业部门的集中管理给英国在战后实行混合经济并建立福利国家创造了条件。工党在战后大选中获胜，随即在经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实施了系列改革，使英国成为较为平等的社会。与改革所获得的社会广泛支持相对照的是30年代的经济萧条与贫富分化给大多数人带来的灾难。此后虽然保守党与工党轮流执政，但从40年代到70年代，英国的混合经济体制与福利制度基本未变，被称为两党之间的“政治共识”。

二战后对英国来说最大也是最痛苦的冲击就是面对、接受和适应其国际地位逐渐衰落的事实。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1956年10月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该事件意味着英国在世界列强中巨无霸地位的终结。虽然不得不面对从世界大国到区域大国的衰落，但帝国情节与怀旧心理一直不时影响着英国政治家的外交政策。这体现在80年代与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夺战上；也体现在90年代追随美国的海湾战争与2003年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上。

尽管如此，英国还是意识到作为欧洲国家，其切身利益仍然主要在于欧洲，所以逐渐调整了国策。几经努力和挫折，英国终于在1973年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来的欧盟），并试图在其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

70年代以来英国国内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保守党在撒切尔首相领导下对积重难返、不断衰落的英国经济进行以私有化为主要对策的改革。改革使90年代以后的英国在效率上赶上了其他欧洲列强，但也付出了高失业率及制造业衰落的代价。另外一个变化是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摒弃了党章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款，并在上台后基本接受了保守党的既定国策，试图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走出“第三条道路”。

总的来看，面对纷繁的内部和外部变化，英国在20世纪的应变与调整是较为成功的。肯尼思·O.　　摩根的这本小书原为英国畅销图书

《牛津英国史》的一部分，其篇幅虽然不大，但却是最为全面且权威的介绍20世纪英国史的简短导论。这本书论述精辟，语言生动，不失为英国史爱好者和英语学习者的必读佳作。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7月17日，伦敦市长在他的市长府邸举办年度宴会。就在这个宴会上，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对英国社会的不祥形势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在国内，由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组成的“三方联盟”正威胁要发动大规模联合罢工，以支持铁路工人提出的承认工会和每周工作48小时的要求。在英国面临全国性工业瘫痪前景的同时，隔海相对的爱尔兰也到了内战的边缘——信奉新教的爱尔兰北部地区和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地区有20多万人武装起来，使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爱尔兰民族主义似乎到了用血腥内战解决的时刻。在国外，印度和埃及产生了民族主义纠纷。在离英国不太远的东南欧，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6月28日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遇刺，重新引发了巴尔干地区的种族纷争。

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似乎面临着文明世界的自由民主即将解体的危险，而政府及其政策措施又因无力控制紧张局势而显得捉襟见肘。然而，正如过去惯常出现的情景，一旦战争这个最高危机爆发，这些冲突因素迅速减弱，成为次要问题。全国上下被一种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英国于8月4日宣战之后，在敌对状态下的最初几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恐慌。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采取了激进措施才维持了国家的通货和信用。为了适应战争的挑战，制造业与商业界几近绝望地努力保持其职业道德规范并宣称“生意一切照旧”。英国远征军早期的实战经历几乎都是灾难性的。这是一支匆忙之中拼凑起来开赴佛兰德斯和法国的队伍，在伊普尔遭遇严重挫败，不得不从曼斯撤退，损失惨重，溃不成军。英军兵力减少到三个军团，其战斗力几乎从一开始就遭到大幅削弱。只有法国军队在马恩河畔的拼命抵抗才阻止了德军向巴黎的进军和德奥联军的过早胜利。

虽然如此，在经历了最初的灾难后，英国及其领导人作好了持久战的准备。重大的国内问题，如爱尔兰的自治问题，由于战争的持续而被搁置起来。所有政党宣布了它们之间的无限期和解。1914年夏天的劳资关系纷争也逐渐平息了；英国工会联盟所表达的传统爱国主义热情甚至盖过了企业主们。一种奇特的平静氛围笼罩着全国，而这种

平静是基于广泛的——尽管远远不是全体的——关于战争正义性的共识。要使一个自由社会接受这一点，就需要从某种宽泛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解释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这一工作是由劳合·乔治来完成的。他本人曾是1899年南非布尔战争的强烈反对者，并且多年以来一直是阿斯奎斯（Asquith）自由党政府最大胆直言的左翼阁员。在最初的几周里，劳合·乔治一直保持着令人疑心的沉默。但1914年9月19日在伦敦女王大厅对一群威尔士同胞发表的雄辩演讲中，他毫无保留地承诺要将战争进行到底。他站在，或者宣称站在，最高的道德立场上。他宣称，这是一场事关自由主义原则的战争，是一场代表“弱小国家”而打的圣战。这些小国包括被德国公然入侵的比利时，或者当时正面临奥匈帝国威胁的塞尔维亚和黑山。神圣战争的说法不仅得到所有基督教教会领袖们的支持，也得到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格拉德斯通（Gladstone）等所有自由主义英雄们的支持，所以劳合·乔治的立场立即得到全国性的响应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甚至英国国内较小的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也作出了同样的回应。

赞成参战的共识

在接下来的可怕的4年里，赞成参战的广泛共识基本没有改变。当然，这期间还是有不少的变化，尤其是在1916年5月不受欢迎的征兵决议开始实行之后。最终，到了1917年，不考虑其他因素，如劳工组织变得愈加激进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救世主般的魅力，单是厌战情绪就已开始动摇这一共识。当然，这种共识的维系也是由于政府对新闻媒体进行了软硬兼施的控制、审查以及编造“德国佬”危言耸听的暴行。政府对激进派或反战分子进行了大量迫害。尽管来自政府的压力很大，到1917年时，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反征兵组织”和民主监督联盟（主张媾和）等组织对公众的思想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对和平的呼吁（1917年11月29日）也产生了很大的轰动。尽管如此，现存的战争史料表明当时绝大多数

人依然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且必要的，而且不管代价有多大，必须打到德国人完全投降为止。军队对志愿者进行了大规模且热情高涨的招募——1914—1916年招募志愿军以充实赴法部队的做法也确实证明了这种方式在扩充军队数目上远比此后实行的强制招募成功得多。长年的陆上和海上冲突从最初1914年秋西线的对峙，持续到1918年9月同盟国的突破，而大众对这些都坚忍地挺过来了。

这些可怕年月从心理上和道德上给英国人的记忆和人生观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它极大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塑造了一战结束以后20年间英国人对外来战争威胁的反应。西线的战争以一种陌生的形式进行着：双方采取守势进行久拖不决的深壕战，而无法采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历经考验、引人注目的新式机动攻击战。法国在这将近4年的时间里，战线几乎没有推进。虽然英国偶尔也尝试抓住战争主动权，但总是以巨大伤亡告终，这对于奢侈地享受了百年和平的英国人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1915年9月英国对卢斯的进攻很快被击退。更大的挫折是1916年6月英国在索姆河的进攻，第一天就损失了6万人，而此役的伤亡总数达到了42万人。最糟糕的战役是1917年8、9月份的帕森达勒之战，超过30万名英国士兵在战役中伤亡，其中相当一部分葬身于佛兰德斯大雨滂沱的泥沼中。地面部队和坦克等作战机械在这种毫无机动可言的战役中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新型战斗机也成效甚微。和在其他场合一样，指挥官与普通士兵之间存在的阶级分野阻断了他们之间的沟通，这对于整个战役期来说都是致命的。事实上，英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基本上停止了进攻。1918年3月到4月英军在亚眠防区拼命阻止德军新一轮的进攻。直到当年8月英军在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爵士（Sir Douglas Haig）领导下实现了戏剧性突破，战争的胜负才初见分晓。与此同时，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等人主张绕开西线僵局，转而在相对边缘的“东线”作战，但这种战略也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挫败。1915年夏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是一项巨大的军事失误，导致了严重的损失；一年后对萨洛尼卡的远征也是如此。尤其是达达尼尔远征的失败让丘吉尔作为理性政治家的声誉一落千丈，数年后才得以挽回。即使在英国

拥有传统霸权地位的公海地区，1916年6月英德间的日德兰海战至多也就打了个平手。英国主力舰队在指挥不力的交战中损失了3艘作战巡洋舰、3艘其他巡洋舰以及8艘驱逐舰。

图1　1915年秋按照“德比计划”在萨瑟克市政厅进行的自愿报名参军活动。1915年10月，德比勋爵提出了一个计划，旨在保留自愿服兵役的制度，要求人们登记以“证明”他们参军是出于自愿。当时公众自愿参军的热情很高：1915年10—11月该计划下的志愿者人数就高达23.5万人。但该计划被1916年初对所有适龄男性进行强制征兵的规定所取代。

后来在几乎所有剧院中，反战宣传片描绘了愤怒的民众对英军陆海指挥官的猛烈抨击，指责他们为灾难的罪魁祸首。“战地诗人”们，如在战场上牺牲的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和艾萨克·罗森堡（Isaac Rosenberg），以及在战争中幸存的西格弗里德·沙逊（Siegfried Sassoon）和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被帕森达勒的血腥场面震惊了。他们强烈呼吁民众反对战争，反对会使一半的年轻人失去生命的残杀。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也强有力地支持这一

观点——在这场战争中，一共有75万人牺牲，250万人受伤，其中不少人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虽然事实如此残酷，但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西线总指挥约翰·弗伦奇爵士（Sir John French）于1915年底被调离后，其职务由黑格接替。这位沉默而严厉的苏格兰人勇敢而正直，因此逐渐在民众中树立起很高的声望。这一声望只有埃德温·勒琴斯爵士（Sir Edwin Lutyens）在蒂耶普瓦尔为纪念英军阵亡将士而修建的高大纪念碑能够比拟。陆海军的其他将领，如比提（Beatty）海军上将以及艾伦比（Allenby）将军（1917—1918年在埃及指挥英军由巴勒斯坦攻入叙利亚，扫除了德军的重要同盟土耳其军队的威胁），也成为备受欢迎的战争英雄。战壕象征着一种严酷但不可避免的解决方法。布鲁斯·班斯法瑟（Bruce Bairnsfather）笔下著名的漫画人物“老比尔”，鼓励他的战友，如果他知道哪儿有“更好的活儿”就不会来当兵了，这幽默地表达了人们对堑壕战恐怖气氛的容忍。军事危机度过后，英法得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军事和经济援助。英法联军终于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战前突破了德军防线并逼近德国边境，而大众的拥战热情也达到了顶峰。英国似乎面临着一种军事崇拜的危险，而这种情绪是自从安妮女王（Queen Anne）统治时期的莫尔伯勒时代之后在英伦三岛上从未有过的。

全面战争

战争之所以广受欢迎——或者其后的不得人心——是因为全面战争牵涉到了全体民众以及所有的社会经济资源。在轻松地开始之后，战争在1915—1916年期间给工业和社会领域带来了大规模的变化。它使得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集体控制权空前膨胀。工农业的生产力及其分配都被用来满足强大战争机器的需要。1915年5月新建立的军火部开创了新的模式，由劳合·乔治亲自掌控。设立此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军火供应中诸多瓶颈问题。通过“雷厉风行的工作人员”，该部成为整合整个工业结构为战争机器服务的发动机。它对其他领域，例如社

会福利、住房政策，以及妇女地位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煤矿、铁路、商业以及船运均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战前旧的自由经济模式，包括被视为神圣的自由贸易原则，都被绕过或者架空了。同样，劳资关系的传统体系也以全新的形式出现。1915年3月由政府与工会（不包括煤矿工会）达成的《财政协议》禁止罢工，但保证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并间接给予工会领袖全新的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

《财政协议》并没有达到实现战争期间劳资关系全面和平的目的。煤矿业出现了很大的纠纷，引人注目的是1915年7月南威尔士矿工联盟成功的正式罢工。军火部试图让非熟练工人（主要是妇女）进入工程类工厂以“稀释”劳动力并试图控制军工企业工人流动，这招致了很大的麻烦，特别是在克莱德赛德的工厂。1916—1917年期间，苏格兰和设菲尔德工人代表的非官方活动提醒我们，战争年代的共识非常脆弱，远远不是毫无异议的一致。然而，战争的确确保了工会以及工厂主们的集体地位，后者因新成立的英国工业联合会而联合起来。一种新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产业关系体系似乎成为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商界巨子如艾瑞克·盖德斯爵士（Sir Eric Geddes）、约瑟夫·麦克雷爵士（Sir Joseph Maclay）、德文波特勋爵（Lord Devonport）以及荣达勋爵（Lord Rhondda）等人都在中央政府关键部门担任职务。这象征着工业与政治领导阶层的关系正在发生转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的自由主义英国正逐步变成公司式的国家，差不多就像下一代人形容的“大不列颠有限公司”。

社会改革

在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广泛领域，大战的整体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左翼反战者，如工党的拉姆赛·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极具讽刺性地指出战争的需要所带来的社会改革远远大于过去半个世纪工会和进步人道主义者的所有运动所带来的变革效果。政府的新远景正在展开。新的元素正在注入和平时期统治英国的技术型、职业化公

务员精英阶层。行政和经理阶层得到大规模扩张。像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或希波姆·隆特里（Seebohm Rowntree）这样的社会改革家，甚至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那样的社会主义者都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受到中央政府部门的尊重，尤其是1916年12月劳合·乔治接替阿斯奎斯担任首相之后。工资提高了，工作条件改善了。1917年的《玉米生产法》复兴了英国的农业，给佃农和他们雇用的工人带来了新的生机。技术性以及其他形式的教育也得到了重视。特别是随着1918年《费舍尔法案》的实施，免费的初等教育得到了普及，该法案还试图为大众创造从初等到中等甚至高等教育的机会阶梯。政府的一系列调查，包括保守派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牵头进行的一项调查，为国家住房计划开辟了新的远景，而这一领域在1914年前几乎被新自由主义完全忽视。主要的原则定了下来，即建立一种地方政府负责的补贴住房体系，为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建设廉租房，并且拆除城市中心和老旧工业区的贫民窟。关注公共健康的呼声也出现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造成大规模生命损失的战争，促使国内对生命更加重视，主要表现为改善医疗环境、关注儿童和老人、重视哺乳期母亲，以及像建立医学研究学会那样的医疗创新。到了1918年底，政府承诺建立新的卫生部来协调卫生服务和国民保险，并且接替地方政府委员会在这些方面的职责。

妇女

英国社会从战时经历中获得的最重要成果就是解放。的确，对于他们（事实上是英国人口的大多数）来说，这是一个解放的时代。战争期间的英国妇女是最大的受益者。成千上万的妇女在前线服务，主要是在战地医院。护士伊迪丝·卡维尔（Edith Cavell）的杰出事迹在公众中提高了妇女的声望。她因在比利时协助英法战俘从战俘营中逃走而被德国人杀害。在国内，女权运动领袖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及其长女克丽丝特布尔（Christabel，而不

是她那个社会主义者的次女西尔维娅［Sylvia］）积极协助政府的征兵运动。妇女在较广泛的领域得到了大量新机会，如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军火生产和其他工程工厂的工作以及许多以前为男性所独占的众多陌生职业。全面战争所造成的大融合对消除过去几十年来限制妇女的性别障碍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那些认为妇女没有能力完全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的论调已站不住脚。因此，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赋予30岁以上的妇女投票权。这几乎是反高潮的，因为妇女遭受迫害和偏见的长期苦难史如此轻易地就结束了。如同在别的领域，政府强调的是战争的正面和进步的影响，并且为公众描绘出战后和平时期大规模“重建”（重建的定义在这儿是扭曲的）的宏伟蓝图。也许并非有意，但政府设法扩展和巩固当时的那种共识。

政治

战争给英国的政治造成了巨大而混乱的变化。战争爆发时，下议院仍由自由党和保守党（或者统一党[1]）之间那种滑稽可笑的竞争所主导。然而对于自由党来说，战争给它带来的是灾难。一部分原因是战争造成的对个人与公民自由权利的侵蚀，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许多自由党成员对战争本身的价值所抱的模棱两可的态度。1915年5月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变成三党联合政府标志着自由党的进一步衰落。此后，党内就征兵问题产生的严重分歧与阿斯奎斯毫无生气的笨拙领导风格一直形影相随。作为“血战到底”承诺的象征，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都主张强制征兵。其他的老派自由党员，如约翰·西蒙（John Simon）和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则犹豫不决。阿斯奎斯本人也很踌躇。最后的决定是对18岁到45岁的男性强制征兵，但这使得对阿斯奎斯以及自由党的道德的批评声音继续增加。

图2　1916年9月，劳合·乔治在索姆河畔弗里考特附近与印度士兵交谈。作为战争大臣（1916年7—12月）和首相（1916年12月之后），劳合·乔治以到法国前线慰劳士兵的方式树立起自己的领导风格。

危机终于在1916年12月来临。数月以来公众一直在抱怨政府的失败，不仅仅是在战场上，而且还表现在处理国内爱尔兰问题和劳资纠纷时的无力表现。1916年12月1日至9日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变动。关于这个问题的真相，历史学家们一直像中世纪的学者们那样争论不休。劳合·乔治与两位统一党领袖博纳·劳（Bonar Law）和爱尔兰人爱德华·卡森爵士（Sir Edward Carson）一起向阿斯奎斯建议成立一个最高战时委员会来指挥作战。几天的犹豫不决之后，阿斯奎斯拒绝了这一建议。劳合·乔治随后辞职。经过12月4日至9日的不同政治力量的关键性较量，劳合·乔治成为一个所有党派都参与的联合政府的首相。除在下议院占有约半数的自由党人之外，联合政府不仅包括了所有的统一党人，还包括在全国行政部门占有微弱多数的工党。此

后，从1916年12月到1918年11月，劳合·乔治的权力达到了无人匹敌的接近总统的程度。他担任最高战时内阁的首相，由一个新的内阁办公室以及私人秘书组成的“花园郊区”或称厨房内阁作为后援。在这个顶峰的下面是一台巨大的集权机器。劳合·乔治的胜利有助于赢得这场战争，但对于他所在的自由党而言则意味着灾难。自由党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基层组织遭到削弱，在议会里没有效率且四分五裂，而且在媒体与知识分子圈子里显得缺乏道德与激情。新自由主义在1914年之前发起过如此多的社会改革，现在却偃旗息鼓了。当战争在1918年11月结束时，自由党变成了四分五裂并遭到极大削弱的残余小党，成为全面战争的最大受害者。

出人意料的是，自由党的地位被工党取代。工党也曾因这场战争的爆发而分裂。与工会领袖们的爱国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麦克唐纳和许多左翼社会主义者反对参战。麦克唐纳不得不因此辞去了议会工党领袖的职务。由于战争期间对一些问题的争议，如强制征兵的影响（军事上，可能还有工业上）、是否参加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的决定等问题也困扰着该党。然而，从长远来看，战争对该党来说是有利的。工党所依赖的工会组织由于战争而加强了。到1919年初，工会会员增加了大约一倍，达到了800多万。工党还受到俄国革命以及战争最后两年广泛的反战激进主义的鼓舞和影响。事实上，工党既参与政府，同时又扮演着正式反对党的角色。这是个理想的位置，可以利用自由党的内部困难。最后，1918年的选举权改革使投票人从大约800万人扩大到超过2,100万人。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选民的剧增以及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两极化趋势得到鼓励。1918年的工党章程赋予该党对社会主义全新的承诺。更重要的是，工党对选区组织和党总部的结构进行了重组，自始至终都由工会主导。工党的快速发展是战争所造成的强大政治后果，但在当时却没有人预料到。

真正的受益者是保守党。战争的进程使该党成为自然的多数党。自诩为爱国者的保守党被战争团结起来。此外，在1914年之前因关税和其他问题闹过内讧之后，保守党日益被商业与制造业利益所主导。保守党人的选民基础现在主要是在城市和近郊，而不是乡村。战争结

束时，随着像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和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这样的重商新人物的出现，保守党和工党一样摆好了毁掉爱德华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的架势。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时，劳合·乔治取得了对国家的完全控制。他在政党联盟中的自由党人残余力量与保守党结盟，对抗反政府的自由党“反战主义者”以及工党中的“布尔什维克”。右派主导的新时代正在来临。

大英帝国

在国外，战争岁月促进了更多的变化。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讲，这都是一场帝国战争，为大英帝国与英王和国家而战。英国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和印度得到很多军事和其他方面的协助。澳新军团日（纪念加利波利半岛苏弗拉湾的战役）成为澳大利亚日历上悲情的、象征性的事件。1917年，劳合·乔治实际上召集过一次大英帝国诸国首脑参加的帝国战时内阁会议，讨论协助宗主国内阁的事宜。像南非的扬·史末资[2]（Jan Smuts）将军那样有权势的帝国政治家甚至曾被请来参与英国的内阁讨论。在商业上，帝国特惠制正成为现实。在这个时期，大英帝国的神秘感是强大的。当时一位主要的建筑师埃德温·勒琴斯，年轻时曾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发起的艺术与手工运动的追随者。现在，他与赫伯特·贝克（Herbert Baker）正将他们的才智用于重建德里城上。德里城将以一座巨大的总督府为中心，配以秘书用的办公大楼，作为古典权威的象征。在战争期间，帝国的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膨胀。的确，战时的秘密协定确保了战后和平时期英国的殖民体系及战略，使它成为规模空前的帝国，新增加的领地范围包括中东和波斯湾的广阔地域。在像“阿拉伯的劳伦斯”[3]那样的个人主义者的古怪行为鼓舞下，加之以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东其他地区丰富的石油前景，大英帝国的疆土扩张到无远弗届。

然而，事实上帝国正日益变得难以维系。早在1914年之前，帝国

政策受到的财政与军事上的限制已经凸现出来，尤其表现在印度发生的日益高涨的国大党运动上。而此时其他问题也出现了——反抗英国统治的民族主义起义此起彼伏并愈演愈烈。威尔士几乎是以盲目的爱国热情追随着如日中天的劳合·乔治，但与威尔士截然不同的是爱尔兰对英国殖民统治进行了剧烈反抗。由几位共和派和新芬党人领导的1916年4月复活节起义遭到了惨烈的失败。但是，由于阿斯奎斯政府残酷的镇压，到了1918年中期，新芬党及其共和信念赢得了爱尔兰南部几乎全部26郡的民心。主张自治的老资格人物，如约翰·狄龙（John Dillon），正在被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和埃蒙·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这样的新民族主义激进派所取代。战争接近尾声时，爱尔兰南部几乎处于戒严法控制之下，他们抗拒服兵役，反抗王权及新教徒（或其余威）的支配。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从19世纪40年代的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到19世纪80年代的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以及1900年之后的约翰·雷德蒙（John Redmond），几十年里采取的大都是合法与和平的方式，现在却似乎到了猛烈爆发的边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战争岁月政治与社会的共识，在克莱德赛德和威尔士矿谷已经相当脆弱，更是一点也没能延及爱尔兰南部。随着爱尔兰共和主义强有力的策动，反抗帝国统治与压迫的全新民族主义运动就要展开。印度、埃及以及其他殖民地将对此密切关注。战争留下的遗产是一个更加统一但却更加孤立的英国。它庞大的帝国角色已经无法应对战后世界的广泛变化。

注释

〔1〕 英国政党之一，主张爱尔兰与英国的统一。——译注，下同

〔2〕 扬·史末资（1870—1950），又译斯穆茨，南非政治家、军人和政府总理（1919—1924，1939—1948），国际联盟与联合国的创始人之一，曾积极促成南非加入英联邦和其他国际组织。

〔3〕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 1888—1935）：英国军官，熟谙土耳其和阿拉伯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劳伦斯

利用他与阿拉伯地区头领的关系策动联合起义，使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1916—1918）。他因此获得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美誉。劳伦斯的传奇形象因美国记者洛厄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图文并茂的战时报道以及他本人的自述《智慧的七根支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而广为人知。1962年，英国电影大师戴维·利恩（David Lean）将他的传奇改编成史诗电影，更使劳伦斯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第二章

20年代

和平重新到来时，似乎一切都很少改变。1918年12月大选中劳合·乔治压倒性的胜利确保了战争到和平的平稳过渡，同时也表明了人们对战时的爱国主义和团结一致的认可。这场选举被称为“优惠券选举”，因为政府给那些支持联合政府的候选人发送了背书信。首相几乎被所有的人称为“赢得战争的人”，所以劳合·乔治成为继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以来最炙手可热的政治家。确实，大选的结果是极其悬殊的。联合政府的支持者获得了不少于526个席位（其中自由党136席，统一党获得剩下的几乎全部席位），而工党只获得57席，自由党独立参选人仅仅获得26席。如果仔细研究的话，这一结果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工党在议会的57个席位掩盖了该党在大选中获得多达250万张选票的事实，所以工党实际上正处于大规模选举突破的前夜。在爱尔兰，新芬党获得南部81个议席中的73席；其议员退出了英国议会并在都柏林成立了自己的非正式议会，被称作“代尔”。尽管如此，首相和他战时同事们的权威似乎仍然是无可置疑的。

大选似乎也证明在许多方面社会经济秩序正在迅速复苏。很多战时的管制和国家的集体主义机制消失了，好像它们从未存在过似的。主要的工业产业交还给私人——包括铁路、船运、甚至煤矿，而煤矿企业主们也许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最为人们痛恨的人了。政府还开始实施连贯的财政政策以确保英国最终恢复金本位货币制度。该政策要求实行稳健的货币紧缩措施，以消除战争期间迅速扩张的货币发行量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伦敦城、阶级制度以及私有化的资本主义似乎注定要无可争辩地延续它们的统治。为了表明英国的资本主义有一张人道主义的脸，政府在1919—1920年间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活动。的确，劳合·乔治在竞选时更像是一位急于将英国建成“适合英雄生活的国土”的社会改革家，而不是决意要绞死德国皇帝或者叫嚷“对德国毫不留情”的沙文主义者。因此，大选后政府的确实施了虽然短暂但积极的计划以扩展卫生和教育服务、提高养老金以及普及失业保险制度。这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自由党大臣克里斯托弗·艾迪生（Christopher Addison）博士启动的住房补贴计划。尽管财政部很不

情愿支持，该计划还是在1919—1922年间取得了建成总数超过20万套公房的成就。虽然数量有限，但这是解决英国一个主要社会痼疾的弥足珍贵的开始。

经济与政治问题

然而很快人们就不安地注意到，生活并没有恢复常规，1914年之前人们熟悉而安适的生活框架不可能轻易复原。由于海外市场丧失以及为支撑战争而出售海外投资，英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破坏性经济问题。这一问题最不祥的表现、同时也是报纸头条的焦点，就是国债的剧增。1914年未偿还的债务为7.06亿英镑，而6年后这一数字猛增到78.75亿英镑。其结果是人们强烈呼吁在公共支出方面厉行“节约”，杜绝“浪费”，以及在1918—1919年快速通胀之后回到平衡预算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上来。

政治形势也远非正常。劳合·乔治的联盟在不愉快的环境中上台，因为有人批评政府在1918年的大选中搞“优惠券”阴谋。政府的当选遭到道德上的质疑。再者，作为联合政府，发生内讧是家常便饭。在国内、国际以及帝国事务上，自由党首相与他的保守党同事之间一直关系紧张。劳合·乔治本身是个冷漠的、巨头式的人物，忙于参加各种国际和谈会议，与下议院若即若离。他是个没有自己政党的首相，一个对自己的金钱花费和性生活不检点的冒险家，这些特点使他无法赢得普遍的信任和拥戴。所以，停战时期的共识很快灰飞烟灭，而新的矛盾冲突取而代之。

一系列的挑战逐渐削弱了联合政府的执政能力。新的格局正在成形，而且将影响英国此后20年的政治进程。左派方面，劳合·乔治受到许多自由党人的猛烈抨击，主要批评他对待自由贸易等广受尊崇的传统原则时漫不经心的态度。他在爱尔兰的政策似乎更令人震惊，因为政府在1919—1921年间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报复政策与爱尔兰共和军（IRA）开战。被派去支援英军和警察的皇家增援部队大开杀戒，造

成许多血腥暴行。1921年12月，天生善于谈判的劳合·乔治最终与新芬党领袖阿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和柯林斯缔结和平条约。从1922年1月起，由爱尔兰南部天主教的26个郡组成的爱尔兰自由邦诞生了。仅仅东北部厄尔斯特的以新教为主的6个郡留在联合王国。但这种态度上的大转变（*volte-face*）对于修复劳合·乔治在自由派舆论中被败坏的形象来说已经太迟了。

在工党和工会中，首相已完全丧失了长久以来建立的劳工庇护人的声誉。1919—1921年间，在对付煤矿工人、铁路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甚至包括警察）的全国性罢工时，劳合·乔治的政府采取了粗暴的方式，包括动用应急权力和军队来阻止罢工。此后，政府没能防止大规模失业现象（失业人数很快超过了100万）的恶化，造成了老旧工业区的灾难。政府弃用了建议在1919年对煤矿实行国有化的桑基报告，这是对煤矿工人的明显欺骗。“黑色星期五”（1921年4月15日）“三方联盟”的进一步削弱使矿工又一次受挫。这些事件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影响深刻。以促进国家统一和社会团结为宗旨的当选政府反而使阶级分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了。联合政府不但受到左翼的批评，也受到右翼日益猛烈的攻击。保守党人渴望回归到以前独立政党执政的健康制度上来，摆脱独裁式首相及其拥护者肆无忌惮的统治方式。尽管联合政府当政近4年，但却已经陷入深渊，劳合·乔治本人作为首相也举步维艰。

在这一切现象之外，最重要的是，人们普遍对和平条约及“凡尔赛体系”怀有一种幻灭的情绪。1919年的和平安排越来越不受欢迎。这种安排与英国和其同盟国在战时的秘密协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以不公平的条件对战败的德国要求巨额经济赔款并强制划分边界。经济学家J. M. 凯恩斯（J. M. Keynes）所著《和平的经济学后果》（1919年）一书最能有效地表达这种情绪。他当时是财政部的经济顾问，但在巴黎和会期间因抗议不平等条约而辞职。这本书在大西洋两岸很快成为畅销之作。该书的结论是，对德国苛刻的赔款要求将会导致其经济破产，进而造成欧洲经济的长期衰弱。凯恩斯还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语言形象地描述了巴黎和会上混乱腐败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

里，凡尔赛的和平使者们进行着各种讨价还价的秘密交易。劳合·乔治被批评为“没有根基”的人。首相在接二连三的国际会议上充当欧洲和平缔造者的努力变得不受欢迎。用博纳·劳的惊人之语来说，英国拒绝再充当“世界警察”。帝国也许空前强大，但要统治它英国需要从欧洲事务中抽身而退。否则，就会再次发生1914年8月的悲剧。对劳合·乔治联合政府的最后一击发生在1922年10月。当时英国为了保卫希腊在小亚细亚的地位以及保护达达尼尔海峡几乎到了与土耳其开战的边缘。保守党以及左翼均奋起反对这种新侵略主义的做法。政府的右翼根基由此轰然倒下。1922年10月19日，劳合·乔治黯然下台，并由此终止了他的政治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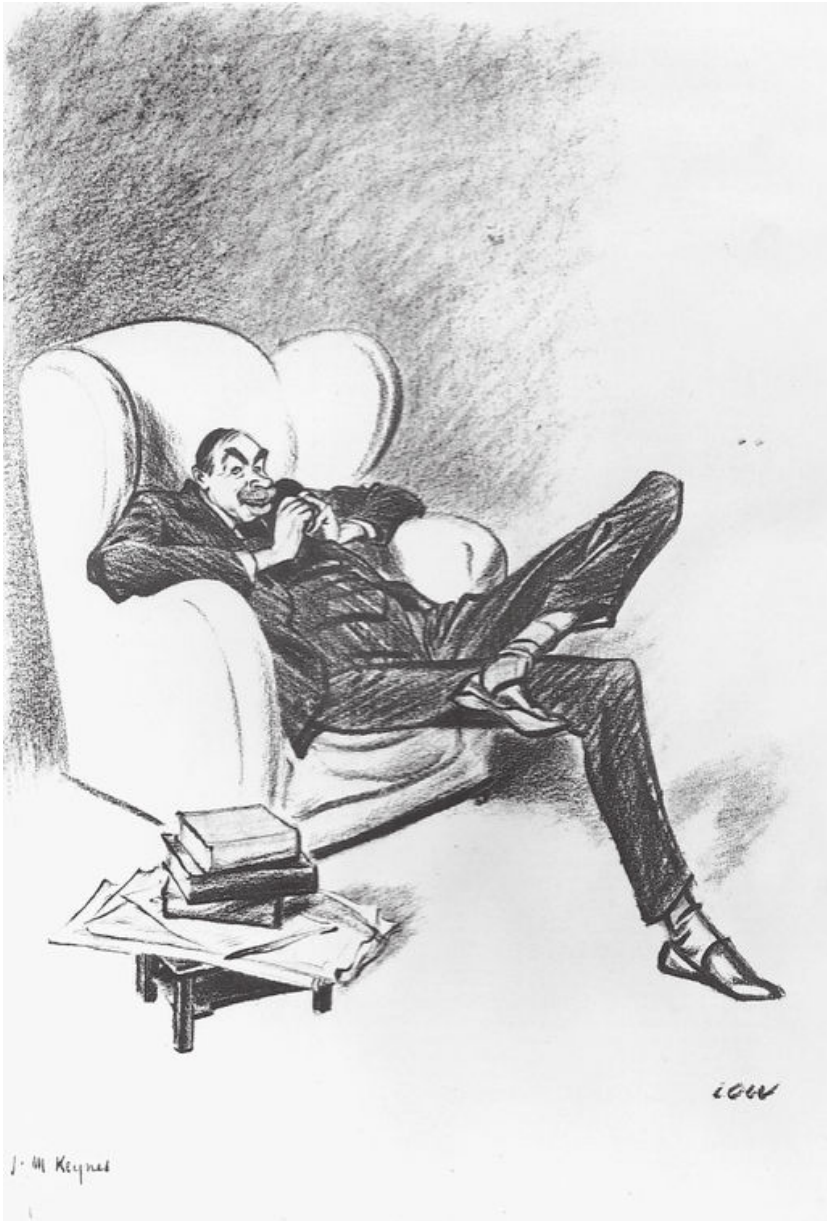

图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卡通画像，作者为戴维·洛（David Low），1933年10月28日刊登在《新政治家和国家》上。凯恩斯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的《通论》（1936年）一书使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产生了革命，而《和平的经济学后果》（1919年）一书则传播了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果的幻灭感觉。

接下来出现了对劳合·乔治政府的两种反应。它们分别由麦克唐纳和斯坦利·鲍德温所代表。两人在促使1922年10月劳合·乔治政府下台的运动中均发挥了突出的作用。麦克唐纳具有乐观的乌托邦式的国际主义和“勇敢新世界”的理想主义，是日益成长的工党完美的代言人。工党的席位在1922年和1923年的大选中迅速增加。麦克唐纳可以在克莱德赛德的社会主义与伦敦政府的传统社会思想之间左右逢源。与此相对照的是，更有影响力的鲍德温领导的保守党根植于城郊体面的中产阶级和正统的爱国主义，并且对战后劳合·乔治的政治试验和英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国际冒险主义都非常警惕。鲍德温于1923—1924、1924—1929、1935—1937年间任首相。对于渴望回归宁静与社会和平的英国来说，他是个合适的领导人。

民族主义和艺术

公众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不断发生变化和产生混乱。战前的许多固定模式现在似乎都受到了侵扰。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知识分子发起了小规模的运动，这意味着联合王国的统一本身可能会受到威胁。两个规模不大的民族主义政党按照爱尔兰的模式建立起来——1925年成立的威尔士民族党和1928年成立的苏格兰民族党。然而，它们的意义在遥远的未来才会显现。

艺术方面，在文学、音乐、绘画以及建筑领域，像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以及勒琴斯等战前巨人依然活跃，从而掩盖了先锋派运动表达“现代主义”和反叛现实的汹涌暗流的挑战。小说家中，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主要作品。的确，反映战争岁月混乱情绪的《恋爱中的女人》在1920年出版之后，劳伦斯的后续作品似乎并不是很出色。更具创新性的作品是与“布鲁斯伯里学派”有关的一群知

识分子和艺术家创作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家弗吉尼亚·吴尔夫（Virginia Woolf）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意识流”作品。对人物性格的细腻描绘以及小说新奇的意识流形式证明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活力。比较正统的是E. M. 福斯特（E. M. Forster）的《印度之行》（1924年）。他与布鲁斯伯里学派有着间接的联系。这部小说描写了东西方文化的互动冲突，表现出西方的自由人道主义正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诗歌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开创性发展是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1922年）。这首诗的韵律和意象令人不安，其基督教的遁世主题以及个人的伤感情绪捕捉到了20年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萧伯纳（Bernard Shaw）最具哲学意味的《圣女贞德》之外，当时的戏剧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在艺术、设计和建筑方面，这同样是个缺乏想象力的时代。像本·尼科尔森（Ben Nicholson）那样的画家正在探索新的风格，而其他人，如保罗·纳什（Paul Nash），显然也是在原地踏步。在艺术界，布鲁斯伯里学派中再次出现了几个著名的叛逆者，如艺术批评家和赞助人罗杰·弗赖（Roger Fry），以及画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和瓦尼莎·贝尔（Vanessa Bell），他们都试图打破现实主义绘画的樊篱。的确，布鲁斯伯里学派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人物，如经济学家凯恩斯，散文家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及该学派的哲学家导师G. E. 摩尔（G. E. Moore），体现了英国20年代文化舞台的许多优势与不足。该学派真诚希望在英国的艺术中注入欧洲大陆现代主义诗人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的灵感。它把对新事物的迷恋与对传统有效的反抗结合起来，其中最能体现这种做法的是斯特拉奇对维多利亚时期女王及其他风云人物的致命弱点的讽刺性研究。较为负面的是，布鲁斯伯里学派对艺术沟通持一种鼓励近亲联姻、甚至是部落化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了家族式的封闭小圈子。30年代的作家们将会批评该学派是新的文化集团。他们抨击该学派对道德（而不是纯美学）强调不够，而且缺乏对政治与公众的关心。或许，布鲁斯伯里学派的宗旨鼓励了艺术与大众渐行渐远的趋势。

虽然如此，艺术领域在表达反叛和解放方面的发展却与当时更广

泛的社会运动相呼应。妇女先后在1918年和1928年取得了部分和全部的投票权。她们也能够享受其他的自由权：抽烟、看电影之类的消遣、追求更加开放和不受限制的“性生活”、更为丰富大胆的衣着等。20年代回忆录中大加赞赏的“鲜亮年轻一代”其实是有很大局限的。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就以这些人为对象写了很多讽刺文章和戏剧。他们通常来自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与私立学校、牛津和剑桥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牛津成为自由文化自我表达、腐化堕落和虚无主义的中心，正如30年代它被（同样错误地）认为是反战抗议运动的中心一样。更为古老的大学也许并不像后世神话创造者们所宣称的那样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当然它们确实融入了当时尚无定形的世界的试验探索氛围。

教会

当然，道德标准的旧裁判者的权威在战后似乎遭遇了危机。在这方面，没有哪个机构比教会更明显。除了拥有坚定的爱尔兰信众的罗马天主教会，其他教会显然都是全面战争的受害者。在维多利亚鼎盛时代对许多人来说是道德灯塔的各种新教教堂，现在遭遇到信奉者减少、资金紧缩以及权威削弱的情况。即使在教会视为堡垒的威尔士和北方地区，其威信也出现了逐渐衰退。更严重的是，战争造成的对清教主义和安息日习俗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教会本可以使用的惩戒措施。战后的英国国教也很难继续发挥其既定的全国性作用。兰德尔·戴维森（Randall Davidson）和科斯莫·朗格（Cosmo Lang）等大主教宣扬回归传统道德秩序，但是他们传达的信息似乎越来越苍白无力。

从正式意义上讲，英国仍是一个明显的基督教国家。其教会领袖仍然受到尊崇，并且与王室以及拥有土地的贵族联系密切。星期日仍然安静肃穆——列车停驶，商铺与剧院歇业，威尔士和苏格兰的酒馆也关门谢客。1927—1928年对英国国教祈祷书的修改引起了激烈的

公众辩论；教会内部盎格鲁天主教与新教福音派之间的战火又重新燃起。正如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宗教节目后来表明的那样，教会仍然认同中产阶级价值观、家庭、社区以及正统的爱国主义。同样，通过诸如童子军和教会旅这样的青少年活动，教会也和帝国联系在一起。战争本身鼓励了一种世俗的宗教形式，体现在勒琴斯在白厅为阵亡将士竖立的纪念碑和一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上。然而，尽管各种正式仪式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他们几个世纪来的宗教传统，基督教的影响力和神秘性正在显著消退，尤其是对战后的一代人和退伍军人来说。

大罢工

教会对影响历史进程的无能为力戏剧性地表现在1926年大罢工事件上。那一年，工业衰退、失业率上升以及社会积怨所构成的可怕怪圈导致了英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阶级冲突。1919—1921年的大罢工已成为历史。鲍德温首相在祈祷："主啊，赐给我们时代和平"。但是在英国最大的工业——煤矿领域，工资减少、工人失业以及矿区家庭生活水平下降等因素造成了持续的紧张局势。1926年4月，政府拒绝继续给予煤矿工业补贴。5月2日，鲍德温与英国工会联盟（TUC）代表团的谈判破裂。由此，工会几乎是突发性地发动了一场大罢工。连续9天（5月3—12日）全国实际处于瘫痪状态。工会挑战政府与宪法秩序的经济力量从未像现在这样显示出它的威力。教会领袖们呼吁双方和解的努力显得尤其有气无力。

实际上，这场大罢工进行得足够平和。没有发生针对罢工破坏者的暴力行为（这些人员还包括因此而停课的许多牛津和剑桥的大学生们）。罢工破坏者们开动公交车并从事其他反罢工的活动。罢工者与警察和武装部队之间也没有发生暴力冲突。最后，TUC在5月12日取消了罢工令，约克郡、卡姆布里亚、泰尼塞德、南威尔士以及苏格兰工业区一如既往地服从了决定，而几个关键的工人团体（如电力工程

师团体）自始至终都没有参加罢工。这是工会的一场彻底的失败，尤其是对于煤矿工人来说，他们又痛苦地坚持罢工达数月之久。英国的阶级战争成了一场短暂而没有流血的冲突。对于旁观的中产阶级来说，它无关痛痒，甚至显得很有趣。

然而很明显，大罢工所揭示和加深的裂痕成为以后20多年里持续影响全国团结的重要因素。直到1984—1985年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时，1926年的情景——当时的胜利与背叛——对英国煤矿工人来说也还历历在目。在1926年的形势下，大罢工是没有成效的。当时，工会本身三心二意，政府则准备充分（一些阁员，如财政大臣丘吉尔）甚至蓄意挑衅。但是，1926年——一位威尔士矿工后来在回忆中称之为“元年”——的确展示了英国工人阶级内部非凡的忠诚和阶级团结。这不仅表现在较老的采矿、钢铁和造船领域，也表现在公路、铁路运输和销售等“半技术”行业的新型服务业工人中。即使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国内的阶级分野也昭然若揭。人们对警察或公务员所宣称的严守中立的态度表现出深度的怀疑，甚至对事实上顶着政府压力努力保持其独立性的、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立场也表示怀疑。在矿区，大罢工带来的后果是矿主对罢工者的惩处、工资的大幅削减以及削弱工人的喉舌矿工联盟的企图。如果说像阿瑟·库克（Arthur Cook）那样具有煽动性的矿工领袖靠边站了的话，工会和工党的继任者们对公然扭曲工作报酬与机会的社会体系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容忍度。这对战争年月建立起来的所谓社会团结是个极大的讽刺。当英国继续艰难地度过经济大萧条的岁月时，大罢工的记忆与阶级抗争的传统也在延续下去。

社会分野

20年代后期，国家的局势终于安定下来，并一直持续到40年代。人口继续增加，虽然更加缓慢。英国人口从1911年的4,083.1万增加到1921年的4,276.9万和1931年人口普查时的4,479.5万。但是人口中

存在着日益深刻的差异，正像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那样的年轻一代作家后来所强调的那样。对于英格兰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来说，20年代是个日益满足和繁荣的时代。出现了许多以城市中产阶级房产为主的房地产开发。这源于1919—1921年有始无终的艾迪生住房计划以及后来内维尔·张伯伦给予私人房地产开发商直接补贴的计划。战后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满怀着中产阶级的梦想——拥有自己的住房、安静的家庭环境、更多的休闲追求（例如，到1930年时英国私人汽车的拥有量就超过了100万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宝贝”奥斯汀牌汽车），以及各种便捷的家用机电设备，如胡佛电动吸尘器。英国广播公司将娱乐与教育节目送到私人家庭里，这显示出了广播的影响力。对于1880年至1918年间急剧扩张的白领行政与专业人员阶层（包括初级经理人员、公务员、学校教师、熟练工人等）来说，20年代并不是很糟糕，因为物价开始下降，房屋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更加轻易地获得，此外还有更多的休闲活动可以追求。更新的、采用先进技术的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赫伯特·奥斯汀（Herbert Austin）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朗布里奇以及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牛津附近的考利建成的现代化汽车厂。在它们的周围，居住于城市郊区这种新生活方式繁荣起来。对这一部分人来说，在经历了令人厌恶的战争与大罢工的不安刺激之后，由热爱自然的首相鲍德温所宣扬的“安定为先”理念和他所象征的日常安稳价值观似乎更有吸引力。

图4　1929年牛津考利的莫里斯汽车厂的批量生产。在这里，车身在第一次喷漆后进行进一步的打磨。由威廉·莫里斯在考利以及赫伯特·奥斯汀在朗布里奇创立的汽车工业对20年代英国的经济生活和休闲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对于许多其他地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逐渐绝望和幻灭的时代。例如，在战后短暂而忙乱的恢复之后，英国的乡村深陷于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中。农村人口逐步减少，尤其是在英格兰南部以机械化农业为主的小麦种植区。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村收入水平降低；从苏格兰高地到英格兰的康沃尔，乡村小镇的活力荡然无存。表面上，英国的乡村生活保存了自身不变的传统面貌；1918—1926年间发生的“绿色革命”极大地增加了小型农场主的数量，这是自诺曼征服以来在土地所有权方面最大的变革。但在这一切表层之下掩盖着的是负债的模式、月供和银行贷款的负担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生活质量上日益扩大的差距。因为大多数的英国文学作品是以乡村作为基本参照系的，所以这些现象暗含着严肃的文化与社会意义。

在老旧工业区，尤其是英格兰北部和东北部、威尔士南部工业区、苏格兰中部克莱德赛德一带，以及爱尔兰海对岸贝尔法斯特的贫

民窟里，这是一个令人极其痛苦绝望的时代。20年代工人阶级住房和生活条件的不足和贫瘠日益为人们所注意。同时像贾罗、威根和梅瑟蒂德菲尔这样的老旧工业区的环境日益恶化。伴随住房潮湿肮脏、学校和公共服务匮乏等恶劣条件的，是儿童患病与死亡率、中年人肺结核、矿工肺病以及老年人残疾等数字的惊人上升。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和苏格兰老旧工业区居民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英格兰东南部和英格兰中西部的乡镇和温泉区。20年代的社会鸿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这一状况又因钢铁、造船和煤矿等传统行业因缺乏投资而造成的失业率上升而加剧。1925年回归战前实行的金本位制的决定是由财政大臣丘吉尔作出的。该政策（事后）受到凯恩斯的严厉批评，但却得到正统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的广泛支持。金本位制意味着对英国煤炭与钢铁出口价值的严重高估以及这些行业工人失业率的进一步攀升。至于在教育和医疗设施以及诸如图书馆、游泳池、公园等公共设施的质量方面，鲍德温安静领导下的英国实际上存在着比以往更加明显的社会分野。所谓“安定为先”的时代，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世俗化，（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学家R. H. 托尼［R. H. Tawney］在1929年发表的一些著名演讲的说法）意味着一种新的“不平等宗教”的建立。其中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全国三分之二的社会财富为40万人（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所占有，与之相伴的是整个社会在生活质量上的巨大差距。

传统秩序

虽然如此，令人诧异的是，当时日渐扩大的社会分野几乎没有引起反叛与抗议。其部分原因是，工人阶级世界的温暖与团结使其生发出自己的价值观、文化和娱乐活动，甚至在大萧条时期也是如此。那个时期的遗迹——工人俱乐部和图书馆，充满活力的矿工生活区、合唱团和铜管乐队，工人社区“互助会”提供的信贷基础——现在人们甚至在《加冕街》那样的肥皂剧中看来都显得那么遥远和无关紧要。但

是它们确实见证了那些黑暗岁月里工人阶级生活的力量和乐观主义。大众娱乐这剂止痛药也为统治者们所提倡，以促进爱国忠诚。这种“面包加马戏团”的传统源于维多利亚时期的音乐厅。其中的许多明星，如乔治·罗比（George Robey，他拒绝了王室加封的爵士头衔），当时仍然很受欢迎。但是这种艺术形式正快速地被新的无声和有声电影所取代——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和玛丽·碧克馥（Mary Pickford）的电影成为音乐厅的新宠。英国之所以能保持相对和平与统一，除了英国工人阶级天生的韧性和尊严，还有其他因素。这些因素或许应该归功于当时广受诟病的政府。张伯伦在担任卫生大臣期间（1924—1929）很有积极性和创造性，他最引人注目的举措是废止了旧的《穷人法》，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戴鸭舌帽的工人足球迷和郊区房地产开发潮中追求新型生活方式的新兴中产阶级被共同的爱国主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熟悉的符号象征可以将他们团结起来——也许是一直深受欢迎的乔治五世（George V），也许是鲍德温平和而缺乏激情的许诺。1925年在新建成的温布利体育场举行的帝国博览会是让整个国家骄傲自豪的事件。20年代的体育英雄当属杰克·霍布斯（Jack Hobbs）——一位来自英格兰萨里郡的板球击球手。他在1925年打破了由传奇人物W. G. 格雷斯（W. G. Grace）保持了数百年之久的击球纪录（125个）。谦逊、平和、笃信宗教、滴酒不沾以及家庭中模范男人的品德使杰克·霍布斯成为忠于国王和国家的典范人物。他是职业“球员”，但却安于被公学的“绅士们”这些业余选手领导（他们由不同的门进入贵族赛场）。他打球恪守规则，总是毫无怨言地接受裁判的裁决，不管这些裁决多么错误和令人失望。在战后社会转型的大潮中，霍布斯平和、善良的品格为努力保持传统秩序的英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标准。

第三章

30年代

20年代在怀旧和创新的迷茫气氛中结束。“上流社会”和宫廷生活的浮华富足与以往一样绚丽多彩。香烟卡和杂志上充满了对社会名流的个人魅力的溢美之词，例如年事已高的茶叶巨头“汤米”利普顿（Lipton）和伦敦德里夫人（Lady Londonderry）那样的派对女主人。其他领域也有人们熟悉的巨匠。埃尔加直到1934年一直担任国王的御用音乐家；吉卜林的活跃创作延续到1936年；享有高寿、满载荣誉的哈代于1928年逝世。“安定为先”的氛围只允许最保守形式的创新。这种政策在20年代后期的政治代表人物是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他受命于1929年组建了第二届工党政府。麦克唐纳具有1914—1918年期间参加反战抗议运动的背景，但作为大罢工期间给人以安全感的人物、社会主义极端派的代表以及上流社会沙龙的常客，他似乎与贵族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被允许的叛逆者，麦克唐纳是倾向于稳健变革的英国社会象征性的安全人物。当时劳合·乔治已沦为备受孤立的老派人物，丘吉尔则因其对印度自治的强硬态度游离于保守党主流之外。所以麦克唐纳似乎是一个可以引导英国社会向着既定目标稳健前进的可靠人选。

第二届工党政府

事实上，第二届工党政府被证实是个灾难。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控制力之外的因素。面对1929年10月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崩盘和随之而来的贸易与就业率锐减，任何政府都无能为力。工党政府显然无法提供社会主义式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政策来缓解加剧恶化的失业问题。加入保险的失业人口在1932年后期达到了接近300万的顶峰。尽管失业人数在30年代晚期逐渐下降，实际上工业停滞和社会衰退仍在继续。除了生产过剩和需求滑坡等世界性的因素，英国还有着自己的独特原因。英国的产业结构过度集中于传统的夕阳行业，例如煤炭、钢铁、纺织以及造船，而且一直存在着投资少、人员过剩以及工作效率

低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因数十年来强调人文精神、培养绅士而不注重商业教育和企业家技能培养的传统而加剧。所以整个工业和制造业基础发生了剧烈的萎缩。直到1935年，人们还看不到复苏的迹象。在此之前，人们早已对矿区和其他地区的绝望、对失业者的反饥饿游行和示威、对意味着无助和无望的“靠救济生活”等现象司空见惯和熟视无睹了。

有些人认为英国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动力来重启和振兴国家和经济，并且推动它们向新的方向发展。在左翼一派的中心，30年代时的劳合·乔治年事已高，只是个不大受人重视的预言家。他敦促政府实行美国式的“新政”。在极左翼，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从主张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联盟，到后来的左翼图书俱乐部，再到弱小的共产党的纯宗派主义。西德尼（Sidney）和比阿特丽斯·韦布认为苏俄式的制度才有未来。在极右阵营，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先后脱离了保守党和工党。他试图建立一种混合了企业计划制和反犹太主义的英国版法西斯主义。与此同时，老派的社会主义作家，如萧伯纳和H. G. 韦尔斯（H. G. Wells），则以不同的方式推销一种有计划的、单纯的科学乌托邦制度。但是最受欢迎的解决方案仍须在英国政治体制的传统框架内寻找。到1931年8月时，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显然已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危机的到来是以英镑的大幅贬值为标志的，五月报告随之发布，宣称政府的高额花费和预算失衡是造成工业瘫痪的根本原因。报告敦促政府削减社会开支，包括失业者赖以生存的社会福利开支。内阁出现了不可挽回的分歧，而银行家与英国工会联盟之间的斗争又使形势进一步恶化。8月23日，麦克唐纳辞职。

国民内阁

然而，第二天早上麦克唐纳并没有被保守党-自由党组成的政府所取代，而是继续担任新的“国民内阁”的首相，只不过几乎所有他的工

党同事都将被新政府排除在外。在随后于10月举行的大选中，新政府（这届政府后来取消了英国的金本位制并使英镑贬值）以556个席位的压倒性多数重新当选。工党的议席减少至51个；几乎其全部重要前阁员在大选中均遭失败。这届国民内阁将为30年代的英国定下基调，而其象征性的首脑麦克唐纳逐渐从政治舞台上淡出，成为日益可悲的人物。鲍德温则坚持到1937年。那时他仍然能集聚足够的政治力量和谋略。例如，1935年他推动议会通过了给予印度更多自治权的法案；1936年，当尚未加冕的爱德华八世既想继承王位又想与离过婚的美国女人沃利斯·辛普森（Wallis Simpson）结婚而违反政治惯例与政府产生矛盾时，鲍德温自始至终都占据上风。但是这届政府的主要力量来自于保守党自身。该党摒弃了维多利亚时代乡绅的刻板形象，转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技术官僚的风格。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张伯伦。他是著名的伯明翰集团的继承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后来）在国外，他在3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都是一个突出人物。正是张伯伦领导了30年代早期英国经济的部分复苏。政府对住房与耐用消费品进行了大量投资，英格兰中东部地区和英格兰南部的先进工业区出现了新的富足现象。诸如南威尔士、达勒姆、坎伯兰以及苏格兰等老工业区出现的人口流失则因为城市郊区和轻工业中心的新增长而得到平衡。政府采用了鲜明的、管理和管制的风格，在经济政策上走的是“中间路线”。农场主们从牛奶和其他市场计划以及生产配额中得到了实惠，而城市城郊居民得到的好处则表现为改进的交通（最明显的例子是伦敦的地铁）、扩展的煤气和电力服务以及廉价的住房。在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上，英国放弃了奉行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自由贸易政策。新启动的关税政策与帝国特惠的商业体系持续运行到70年代。关税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引起了深刻的争论，但是垄断化了的钢铁工业成为显现出盈利迹象的工业巨人。选民们因此对国民内阁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在1935年的大选中再次选择了国民内阁——此时几乎是清一色的保守党人——并给予张伯伦的管理式的保守主义政治主张广泛的支持。这种支持一直持续到在外交政策上出现新分歧的30年代末。

阶级与地区差异

国民内阁的政治极为明确且毫不愧疚地建立在阶级差异和地区分野的基础上。老旧工业区被置于“特别地区”计划的保护下。按当时流行的说法，工业化的苏格兰、英格兰东北部、坎布里亚郡、约克郡和兰开夏郡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南威尔士属于“萧条地区”并且自我封闭。只有当来自这些地区的难民出现在伦敦和伯明翰街头参加反饥饿游行或向剧院观众队伍乞讨时，外部世界才注意到它们的存在。这些所谓的“萧条地区”的生活方式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自力更生。在这些地区，工业正在萎缩，意味着其应税收入的进一步下降；而这又意味着社区设施的进一步破败、工业衰落速度加剧，这样整个循环怪圈比以往更加严重。

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一些文学作品——乔治·奥威尔的有些晦涩难懂的长篇小说《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沃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充满同情心的《救济之爱》、刘易斯·琼斯（Lewis Jones）在《马尔蒂》和《我们活着》中对威尔士矿区生活的描述——深刻揭露了这种结构性贫困对当时社会与文化造成的影响。但是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当地的贵格教徒们和其他理想主义者有一些慈善之举。政府通过从特别地区的收益提供了一些援助，但是实质上政府没有采用任何新的地区政策来彻底改造这些地区的工业基地并使其多样化。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讽刺性地建议将这些地区改成露天考古博物馆，而这些地区的居民们则可乘火车去往达格纳姆或豪恩斯洛等地获取工作。政府也提出了建立商贸机构的新计划，这些商贸机构对集体搬入老旧工业区的企业家们提供便宜的房产税或优惠投资贷款。例如白金汉郡的斯劳镇就成为30年代大量工业活动的焦点，虽然它丑陋的建筑成为约翰·贝奇曼（John Betjeman）毫不留情冷嘲热讽的对象。但是总的来说，财政部与英格兰银行联合采取的紧缩政策以及政府的缺乏紧迫感使这些主要工业区没有得到有效的支持。直到1935年国防白皮书发表之后，在重新备战的影响下，对工程与飞机制造的重视才使就业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然而，受到大萧条冲击的工业化地区被冷落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相对自足且规模有限。英国其他地区的大部分人口发现大战浩劫之后的生活还过得去，并且在许多方面还相当令人愉悦。30年代通货膨胀率很低，私有住房便宜，而且消费者的选择越来越多。1933年至1937年之间，年平均建造住宅达34.5万套。汽车工业以及电气、化工和纺织工业的大公司出现了持续繁荣。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像莱斯特和考文垂这样的城市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富足。生活的回报从未像现在这样明显。赫伯特·查普曼（Herbert Chapman）的阿森纳足球队的职业球员们尽管报酬不高，但却顿顿吃牛排、喝香槟。在外伦敦地区，地铁在扩展，向北通到赫特福德郡边缘的柯克佛斯特，向西通到白金汉郡边界的阿克斯布里奇，这表明了白领人口在服务和专业领域的扩张。在亨登、哈罗和金斯伯里等成长中的郊区出现了方便的购物区以及许多电影院和足球场。中产阶级缺乏规划的半独立式房屋带沿着交通主干道延伸，直到周围的乡村，并没有受到旨在保护城市周围“绿化带”的环境控制计划的多少限制。伦敦市郊的西大道成为无控制的产业与住宅开发的笑柄，充斥着毫无风格依据的各种工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的一代经常认为这些建筑是现代艺术的里程碑）。如果对30年代大失业与大萧条中英国缺乏社会变革的一种解释是人们对这些老旧工业区的政治与经济缺少关注，那么另一种解释则是大战浩劫后相对未受影响的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持续追求令人惬意的市郊生活方式。

因此，30年代的英国在欧洲展示了令人惊异的稳定局面，而欧洲大陆则目睹了被极权与独裁涂炭的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以及陷入混乱的法兰西与西班牙共和国。英国的社会与文化等级制度变化极小。议会、法庭以及以公学为基础的高度分层教育体系（以牛津与剑桥为主导）的声望和以往一样高。君主制通过巧妙回应大众民主面貌的微小变化而保持了自己的威信，其中的范例之一是乔治五世出席一年一度的工人节——温布利体育场足球决赛。国王1935年的银婚纪念引发了全国性的欢庆。即使与爱德华八世逊位有关的短暂危机也基本未对君主制造成破坏。英国悠然地孤立于欧洲大陆之外，而这块大陆

正被英国人知之甚少的遥远民族闹得四分五裂。

艺术

在艺术领域，30年代在许多方面都是一段极为繁盛且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在诗歌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仍然是艾略特，他是一个出生于美国的保守派盎格鲁天主教徒。他的《四个四重奏》在1930年开始发表，并一直引人注意地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事实上，艾略特对戏剧这种艺术形式的兴趣越来越浓，并出版了《教堂里的谋杀》（1935年）。此剧对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的殉难进行了有力的评说。然而，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对20年代布鲁斯伯里学派不问世事的价值观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时代的漩涡中，更年轻的诗人，如W. H. 奥登（W. H. Auden）、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以及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等，则反映了时代的政治激情。奥登著名的诗篇《西班牙》（1937年）的灵感源于他本人对西班牙内战的短暂参与，颇能代表当时的文学氛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话，所有这些年轻诗人都对新马克思主义抱有好感。与此相反，当时更有才华的两位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和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尽管具有不同的政治面目，都皈依了罗马天主教。

30年代英国的音乐成就则不那么突出。国王的御用乐师埃尔加于1934年去世，但事实上自从1919年创作悲情凄凉的大提琴协奏曲之后，他几乎没有再创作什么重要作品。古斯塔夫·霍尔斯特（Gustav Holst）和弗雷德里克·戴流士（Frederick Delius）的浪漫音乐不得不与伊戈尔·斯特拉温斯基（Igor Stravinsky）和阿诺德·舍恩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追随者们无调性甚至无结构的实验作品竞争。用全音阶技巧进行当代创作但却深深根植于英国风格和主题的阿诺德·巴克斯（Arnold Bax）和拉尔夫·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的交响诗向人们展示，现代形式可以和民族音乐传统相结合。

在视觉艺术领域，30年代在雕塑和绘画方面都是个令人激动且充满创新的时代。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作品开创性地为英国雕塑带来了新的生机。他是约克郡一位矿工的儿子，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的学生。另一位先锋则是画家本·尼科尔森的妻子芭芭拉·赫普沃思（Barbara Hepworth）。这段时期英国的绘画也很有活力，例如斯坦利·斯潘塞（Stanley Spencer）乡村风格的基督教象征主义以及纳什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成功结合。有了在建筑和设计方面急需的创新，30年代英国的面貌总的来说比以前更好看了，这是自从诺曼·肖（Norman Shaw）、查尔斯·沃伊齐（Charles Voysey）和查尔斯·伦尼·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在1914年之前创造辉煌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从体现沃尔特·格罗皮厄斯（Walter Gropius）和德国包豪斯建筑学派影响的戏剧性公共建筑，到具有新艺术或装饰格调的工业厂房和奥迪恩连锁影院，再到像弗兰克·皮克（Frank Pick）和查尔斯·霍尔顿（Charles Holden）为伦敦交通局设计的新地铁站那样世俗但却地标式的建筑，英国的建筑在许多方面背离了传统，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在普通人能够参与的水平，皇家学会与亨利·伍德爵士（Sir Henry Wood）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舞会”音乐会所展现的新生活标志着一定的文化进步，如果说还达不到文化革命的程度的话。

外交

因此除了老旧工业区之外，30年代的英国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个保持着内部和平的国度，而且由于一些文化想象力而充满了活力。但是这种氛围在1937年陡然发生了转变，不是因为国内的不团结或对此的重新评价，而是因为外交事务上的外来冲击。20和30年代英国内部的和谐建立在一种平静外交政策的基础之上。这种由凯恩斯1919年所

倡导，并且使劳合·乔治在1922年下台的氛围弥漫于整个社会。右翼采取的对外不进行军事干涉和冒险的方针遭到了左翼的强烈反驳。他们认为1919年的和平安排是报复性的，并且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这是国家利益与帝国利益对抗的产物，而不是政府真正渴望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20年代，英国的国防力量逐渐削弱，而这几乎没有受到公众的反对。其根基在于“十年之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的前提设想。在这个时期，战舰的数量尤其遭到当时的财政大臣丘吉尔的削减。刚刚竣工的新加坡巨型海军基地已然成为不合时代的东西。主要的军事投入是在印度的统治，但是对圣雄甘地和国大党运动的逐渐和部分的容忍使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驻军从1925年的5.7万缓慢减少到1938年的5.1万人。同样，与爱尔兰自由邦日渐和谐的关系导致了1936年英爱“协议”的签署以及实际上免除爱尔兰所欠英国的所有债务。这极大地消除了军事或海军开支的另一个潜在来源。

甚至在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就任德国总理之后，30年代初期英国公众的情绪仍然是被动的。除了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领导的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等少数例外，英国的劳工运动是倾向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贝文的工会则坚决反对右翼国民政府进行的军备评估。在代表社会主义的左翼，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等人民阵线的代言人则敦促与苏联结盟并且主张只有社会主义才是解决国际纷争的真正良方。与此相反，大多数保守党人不希望采取冒进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鲍德温，他使人们相信未来真正意义上的国防是不可能的，因为防御将主要由空军的力量来决定。轰炸机总是能够突破防线。对于1931年的满洲危机[1]或1935年的阿比西尼亚危机，英国保守派政府对维护国际联盟的权威缺乏起码的兴趣。右翼人士，特别是一些报业大亨们，宣称大不列颠与希特勒的德国之间有着同源于条顿民族以及反共产主义的共同基础。在泰晤士河畔马洛附近，贵族阿斯特（Astor）夫妇的克莱夫登庄园，成为一个包括了政客与新闻记者等各色成员的团体经常光顾的理想地方。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团体改变了外交部的政策，使之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当行动的时机来临时，公众仍持反对意见。希特勒于1936年初将军队开到了莱茵河畔，直接违反了《凡尔赛公约》不许驻军的规定。当时只有像遭到孤立而且不受欢迎的丘吉尔等少数人呼吁英国对此采取军事回应。更早些时候，英国公众，尽管非常尴尬，普遍认可了外交部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后采取的绥靖政策。事实上，意大利占领非洲之角这个古老帝国时，英国几乎没有进行经济与军事干预。英国对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的原则进行过正式承诺，但事实上没有起多大作用。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充当了阿比西尼亚危机的替罪羊，但是对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领导下的意大利采取绥靖政策很明显是政府的集体决定。现有的内阁记录证实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几个月后霍尔重新进入政府，而且没有受到什么反对。当西班牙民选的左翼共和政府遭到佛朗哥（Franco）将军领导的右翼民族主义部队入侵，并且该侵略行为后来进一步得到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军事援助时，英国政府再次死板地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即使这意味着西班牙民主的最终覆灭。1937年10月，自信的政治强人张伯伦取代了推行被动无为的绥靖主义的鲍德温。张伯伦积极主动地寻求与法西斯独裁者妥协，这代表了英国对欧洲不干涉主义情绪的增长。政府官员中的关键人物，如霍勒斯·威尔逊爵士（Sir Horace Wilson）和内维尔·亨德森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英国驻柏林大使），对这一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公众情绪的变化

然而在各种不同的层次，公众的情绪突然开始转变。甚至政府也开始转变观念，认识到加强国家防御系统的需要，尤其是在空军方面。从1935年起，以新型战机为基础的空军正在形成，这种机型由投入到雷达系统的最新科技以及其他防空防御系统作为后援。通过像亨利·蒂泽德（Henry Tizard）和他的对手弗雷德里克·林德曼（Frederick Lindemann）等人的努力，科学创新的呼吁又一次零星

地传到了权力阶层那里。到了1937年，重整军备的计划已经依稀可见，虽然财政部由于担心预算的平衡极力阻挠该计划。现在已知的情况是，当时仅与美国私下达成的财政援助安排就足以支持经济困难的英国实施扩军计划。在更广的范围里，公众的心理已被西班牙内战事件所深深触动。不仅仅是诗人奥登或散文作家奥威尔这样的人物，连许多参加过国际纵队的英国工人志愿者都倾向于对国际主义作出新的承诺。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使英国人认识到了希特勒政权及反犹主义的现实。甚至工党的左派，如工会领袖贝文和沃尔特·西特林（Walter Citrine），也转而竭力反对工党政客的新和平主义。这些政客没有向被法西斯德国和奥地利镇压的工会和劳工组织提供武装援助。张伯伦的平衡主义更难维持了。特别是作为首相，他缺乏灵活性。

德国在1938年的武装推进、吞并奥地利以及随之而来以波希米亚西部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利益为借口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导致了英国国民良心上的危机。张伯伦对此表现出了处理上的决断性。在贝希特斯加登、巴特戈德斯贝格以及最终在1938年的慕尼黑，张伯伦与希特勒达成了妥协协议。事实上，张伯伦允许德国人选择在任何时间去吞并苏台德地区而法英两国不会进行军事报复。在短时间里，这种投降政策似乎反映了公众的心态。张伯伦带着胜利的成果回到英国，以一种不祥的语句宣布，《慕尼黑协议》将给一代人带来和平。但是这种放弃责任的行为已不能自圆其说。有人认为张伯伦是在制造喘息的空间，以使英国以后能够以更有力的军事条件挑战德国。但是内阁讨论的记录并没有找到支持此种说法的证据。丘吉尔和他的幕僚、甚至因抗议张伯伦的外交政策而从外交部辞职的艾登（Eden）等人的批评则与公众的情绪更加一致。到了1938年底，当《慕尼黑协议》意味着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以满足德国武装扩张的事实昭然若揭时，英国人的愤怒情绪是非常强烈的。仅仅几个月前，张伯伦还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被认为是自1916年劳合·乔治以来最有权势的首相。而现在，他却像个要落荒而逃的人。扩军备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政府与工程工会进行了新的磋商，以便提高军火与飞机的产量。

当希特勒最终于1939年3月入侵布拉格时，公众的愤怒爆发了。

鉴于苏联不能承诺协助保护波兰的东部边界，外部压力迫使张伯伦承诺在军事上保卫这个远离英国的东欧国家。自1812年半岛战争以来英国保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对欧洲大陆不干预的政策现在突然发生了逆转。政府几乎被可怕的公众意见吓倒了。政府甚至正式尝试与苏联结盟，但进展太慢而最终以苏联在8月与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告终。整个夏季，全国沉浸在一种决心集中国家和帝国的全部资源抵抗德国侵略的新情绪中。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发动了决定其命运的对波兰的入侵。几次与德国进行的最后谈判失败后，张伯伦在9月3日广播宣布了英国对德国的宣战。在这一点上全国的意见是一致的，甚至弱小的共产党也给予了支持。该党许多领导人反对莫斯科的官方路线并投身于反法西斯事业。在下议院，工党议员阿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代表英格兰”的发言后来证明也代表了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所有自治领的声音。

在绥靖政策论争的最后阶段，公众辩论的气氛史无前例地激烈。30年代初期的平和自足被抛到了一边。在涉及到无尽的失业悲剧、“救济”丑闻以及“救济资格审查”等问题上，国民内阁与工党一直针锋相对。除此之外，右翼内部也存在巨大分歧。分歧的双方是张伯伦、西蒙、塞缪尔·霍尔等《慕尼黑协议》缔结者及其追随者和以丘吉尔为首的谴责懦弱可耻的绥靖政策的民族主义批评者们。捷克斯洛伐克等事件的深远影响把左派和右派的抗议者们越拉越近，而这一点是西班牙和阿比西尼亚事件所没能做到的。国内和国际冲突汇聚成一股波涛汹涌的激流。张伯伦这位30年代繁荣的主要设计师、城郊中产阶级的代言人、30年代叱咤风云的领袖，突然变成了令人憎恶的、虚伪和堕落的政治秩序的象征人物。在绥靖“罪人”中，他首当其冲地受到两位激进青年新闻记者迈克尔·富特（Micheal Foot）和弗兰克·欧文（Frank Owen）在1940年的猛烈抨击。这也许是自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以来政治宣传所取得的最大成就。

在这样的时刻，张伯伦领导下的任何社会都很难为一种共同事业团结起来。然而，正如1914年8月发生的那样，英国团结起来了。的确，当战争在1939年爆发时，所有地区和阶层的人们都意见一致。正

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公众认为现在英国是代表被压迫民族和被迫害种族进行的神圣之战——事实也的确如此，比1914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本家和工人、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们因为不同的动机参战，或者怀有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各不相同的动机汇聚并形成了新的共识。正如20年前所做的那样，英国在全面战争的挑战和动乱中重新获得了团结和国家意志。

注释

〔1〕 满洲危机：指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广大地区的“九·一八”事变。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公众情绪明显没有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那样激昂高涨。那时的军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冲突此时也没有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这需归结于战争初期几个月怪异的特征。在1940年4月之前的所谓“假战”期间，战事似乎是遥远的，甚至几乎是学术性的。伊夫林·沃的小说《多升几面旗》贴切地描绘了这个怪异的黎明时期。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防空袭措施，在公园里挖了战壕，在空中放了许多防空袭阻塞气球，并且在公共建筑上布置了防空武器。3,800万个防毒面具被分发到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手里；数十万学生被从主要城市撤离到边远和较为安全的乡村地区（尽管许多人后来又溜回了家）。对食品、衣服、汽油以及其他商品的定量供应突然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战争初期并没有发生大的事件，但当1919年底德国战舰格拉夫·斯佩号在蒙特维的亚港附近的柏拉特河口被三艘较小的英国战舰围困时，人们对英国海军的胜利举行了传统式的长时间欢庆活动。

图5　战争期间的儿童。1939年战争爆发时，儿童们被撤离到萨塞克斯郡的伊斯特本（上图）。1939年秋季，总共有827,000名学生被从主要城市疏散到沿海和乡村地区以躲避德国飞机的轰炸，不过许多人后来自行回家了。人们把

防毒面罩分发给了在校儿童以防德国人使用毒气（下图）。事实上，防毒面罩被证明没有必要。

公众情绪的不确定反映在政府模棱两可的性质上。尽管内阁在重组时吸纳了丘吉尔本人回到海军部（正如1914年发生的那样），但政府仍然是由一帮老派人物所掌控。1931年建立的国民内阁基本未变，只是扩大了。工会对于他们的老对手兼阶级敌人张伯伦为首的政府尤其持有深深的怀疑。然后在1940年4月，冷战升温。德国入侵了挪威，分散了英国在纳尔维克驻扎的海陆军部队。之后不久，荷兰与比利时也遭到占领；法国军队则溃不成军地后撤。英伦三岛本身的安全现在处于显而易见且日益临近的危险中。

30年代的旧政权已经不能维持下去。1940年5月7—8日，下议院发生了致命的分裂。80名保守党议员奋起反抗张伯伦的领导。两天后，张伯伦辞职；丘吉尔成为战时首相，吸纳工党和自由党人加入政府。此次首相的更迭不同于1916年12月的那次明显的阴谋。的确，比起当年的劳合·乔治，丘吉尔在报界和议会有着更为广泛的支持基础，而且也得到陆、海、空高级将领更大程度的忠诚。

丘吉尔身上体现出他的同辈们所没有的传统的爱国团结精神。战争赋予他的政坛生涯以新的动力和重要性。他在广播和下议院里鼓舞人心的演讲促使他的国家在“最光辉的时刻”集聚起新的爱国意志和力量。他能够把敦刻尔克撤退的屈辱军事灾难描绘成体现了英国人机智和决断的胜利事件。当法国于六月中旬向德军投降时，英国的国土安全受到自1804年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时期以来前所未有的威胁。的确，英国是在孤军奋战。

陆上、海上和空中

英国进行陆海自卫的准备程度是存在争议的。在国内战线，除了发动起来的后备军，由平民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后来被颇为幽默地戏称为由业余乌合之众组成的“老爹军”。幸运的是，这支部队的军事力

量从未得到检验。但是真正的战役发生在空中。在报业大王、现任战机生产部长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督办下，英国喷火式战机和飓风式战机的数量储备有了很大增加。从8月中旬起，德国空军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闪击战，先是对英国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工厂，后来在1941年则针对伦敦、考文垂、普利茅斯、利物浦、赫尔、斯旺西以及其他港口和主要城市。国民的士气和国家防御系统在这场可怕的狂轰滥炸中坚不可摧，这几乎是个奇迹。空中的“少数人”，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机传奇般的飞行员们（他们中包括许多波兰人、捷克人以及加拿大人）从8月到10月给予德国空军以沉重打击。到圣诞节时，逼近的侵略威胁已经过去了，虽然德国对伦敦和其他城市的闪击战仍在进行。丘吉尔的声望陡涨；同样高涨的是英国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敦刻尔克和空中不列颠之战催生出千百个神话。这些神话助长了英国潜在的孤立主义以及对国家自力更生能力不切实际的自信情绪，同时它们也使英国在战后对西欧的联盟态度冷漠。英国人意识到在卷入战争的西欧民主国家中，只有自己的国家逃脱了被占领的命运，正如他们自1066年以来一直做到的那样。因为所有这一切，1940年“最光辉的时刻”的措词捕捉住了人们对历史成就辉煌时刻的自豪和激情。

随后在陆上、更重要的是海上和空中的战事发展对英国的国际地位与帝国地位产生了重要的长期影响。战争的起因是保卫国家安全、平衡西欧大国势力的传统欧洲冲突。英国海军对北海和大西洋北部的西岸一线进行了广泛的军力部署以便控制英吉利海峡。事实上，这种策略在1941年夏天成功奏效。德国人对英国的入侵行动（对此希特勒在许多方面一直犹豫不决）受挫，德国空军的进攻也以失败告终。英国商船队的运输以及（自1941年初起实施的）美国《租借法案》的安排确保了英国在战争的余下阶段有最起码的食品和原材料供应；英伦三岛本身即使在德国潜艇战加速击沉英国船只的情况下也不存在迫切的危险。丘吉尔对中立国爱尔兰的港口及其反英派总理德·瓦莱拉（de Valera）的动向进行严密关注。1944年夏秋德国从荷兰基地发射的V1和V2制导导弹造成的进一步危害使人们深感不安并造成英格兰东南部生命与财产的很大损失。但这基本上也没有引发国家安全的大问题。

帝国主题

然而从1940年末起，这场战争展现出了更加宽泛的帝国主题。这场战争最初是一场保卫西欧和中欧免遭德国法西斯威胁的一场冲突，后来却很快演变成通过更广泛努力来维持英联邦国家和大英帝国的战争，就如同他们在过去的数十年所做的那样。白人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有些犹豫不决的南非——均迅速给予英国在原材料和海军武装等方面的援助。除此之外，英国在印度与埃及所欠债务急剧增长。虽然这种“英镑结存”在战后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它们在协助支付英军供应，尤其在解决英国海外资产损失和“无形”收入下降的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1941年6月苏联的参战以及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美军舰队后美国的参战使这场战争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在每个大陆和大洋展开。这也意味着无所不在的大英帝国将会处于切实的威胁之中。

英国陆、海、空军的大量兵力投入到保卫中东地区的传统运输线上。这条运输线以苏伊士运河为中心、以波斯湾及其腹地的丰富石油储藏为基础。在意大利于1940年8月参战后，英国部队成功地压制住了在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兰的意大利军队。更多的军力则用来保护埃及和北非沿海地区。1941年，英国军队在阿奇博尔德·韦弗尔爵士（Sir Archibald Wavell）将军的指挥下夺取了昔兰尼加并且向的里波利推进，但后来又被迫退守埃及。1942年初托布鲁克的失守导致了国内的政治危机，险些使丘吉尔下台。

1942年后半年最重要的战事是英国第八军在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 Auchinleck）上将和后来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将军领导下英勇阻击德军向开罗和苏伊士的挺进。然而，蒙哥马利于1942年11月在阿拉曼的最终突破使得英军成功攻入现今的利比亚并继续挺进，通过的里波利攻入突尼斯。在这里，蒙哥马利与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将军率领的美军会师，并从最初的着陆点阿尔及尔附近向东推进。随后的联合行动，包括攻下西西里和从安齐奥海滩到阿尔卑斯山一线对意大利的持续挺进，又一次

体现了英国对确保帝国战略运输线以及控制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关注。那些主张1943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以缓解俄国红军压力的人们对这种集中兵力于地中海地区的做法非常失望和愤怒。然而丘吉尔的地中海战略占了上风。1944年，英军再次在希腊登陆。他们赶走了德军并镇压了当地的左翼运动者：希腊民族解放军。

在远东，这场战争同样涉及到拼命保护帝国根基的问题。日本军队通过中国侵入印度支那与荷属东印度，并且攫取了在菲律宾的所有美军基地。鉴于印度次大陆受到的威胁，这一切都使丘吉尔把远东放在甚至比中东更高的军事优先位置上。英军的损失是惨重的。其中最可怕的事件是“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舰在1941年12月10日被日军炸弹和鱼雷击沉。然后是日军快速挺进马来亚以及1942年2月15日在新加坡的8万多名英国和帝国部队军人投降。这场灾难源于指挥官珀西瓦尔（Percival）将军以及丘吉尔本人（他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的错误估计。丘吉尔在下议院将此描述成“英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投降”。这标志着大英帝国的衰落。例如，从此以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太平洋地区转向美国寻求保护，而不是向帝国的宗主国。

然而，之后并没有出现更糟的灾难。日军对缅甸的进攻受到了遏制；英军涌现了一些英勇作战、表现出色的部队，例如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领导的缅甸远征军特种部队。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虽然受到次大陆本身国大党运动以及日军在缅甸骚扰的威胁，仍然得以维系。到1944年底，英国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即使是丧失了马来亚、新加坡和香港，仍然是强有力的，虽然它得借助于美国陆军和海军的协助。

终于，1944年6月，在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和蒙哥马利将军指挥下，盟军从诺曼底海滩登陆，攻入法国。战争重点又转移至欧洲。英军在这最后阶段采取的战略导致了军事史学家的争论，尤其是对挺进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的拖延。在阿纳姆的空降是个严重的失败。即使如此，英军很快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蒙哥马利将军于1945年5月9日在吕讷堡荒原正式接受了德军的无条件投降。希特勒本人在几天前自杀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遭受到

原子弹袭击，11万人丧命。日本于8月15日投降。

战争的影响

自始至终，这场战争紧紧攫住了国人的心，没有出现类似1914—1918年第一次大战期间公众的质疑或者乐观的沙文主义。最令人满意的事实是，比起1914—1918年持续了艰难4年的堑壕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6年间英国的人员伤亡要轻得多。这一次，总共有27万军人在6年里丧生，在国内遭遇德军的空袭中则有超过6万平民死亡。二战中，战役大多在外围进行，更具分散性，而且因为以技术为基础而最终更加有效。甚至如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样的和平运动前辈都感到这几乎算是一场高水平战争。与此同时，围绕英国在外部世界的作用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中东和远东，即使英国重新控制亚洲的香港、沙捞越、马来亚和新加坡以及非洲的英属索马里兰，帝国体系正在承受极大的压力。在战时会议和1945年7—8月的波茨坦和平会议上，美国人关心的则是加速非殖民化的进程。丘吉尔忧心忡忡，因为他成为英国首相或者血战6年并不是为了解散大英帝国。但是局势的发展并非他所能料到的。

在国内，全面战争的影响也同样巨大。和先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人口的类型和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对一些行业进行新的集中化控制以便调控社会和经济生活。但与1914—1918年不一样的是，国家机器这一次的运作似乎更加公正——而且这种势头很可能在战后继续下去。这场战争清晰地表现了极大的平等精神，而这在英国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是没有过的。奥威尔（在《狮子与独角兽》中）感到一场社会革命正在发生。定量供应本、毒气面罩、身份证以及其他战时管制品的发放是平等的，包含着一种“平等分享”的精神。这种精神也体现在德国闪击战的共同受难经历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成就是由“被疏散者”所取得的，这些学童们被从伦敦、伯明翰、利物浦以及其他城市疏散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有史以来，英国的不同阶层

第一次有了交汇，尽管他们可能不了解或不喜欢对方。为被疏散的城市贫民区儿童提供医疗和食品服务意味着他们身心健康得到了极大改善。对他们的家长来说，战争奇迹般地意味着，经历了30年代的可怕失业后，充分就业得以恢复。平均主义也激发了对社会规划的新理想，尽管普通工人与伦敦官僚的规划之间可能并不一定有明显和必然的联系。然而其结果是，由于战时团结、平等的牺牲精神，人们就公共政策开始提出崭新的问题。同样在军队里，一种新的信念产生了，即这一次“适合英雄的国度”将不会再像1918年后那样被随便抛在一边。这种情绪被一些媒体精确地捕捉到。例如，汤姆·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主编的战时画刊《图片邮报》、报纸《每日镜报》，以及约克郡作家J. B. 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颇受欢迎的广播谈话节目。其中后者极具地方激进主义的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式风格赢得了广泛的认同。

社会革新

体现这种情绪的最重要文件是1942年11月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这是一位严肃学者型经济学家的作品，它勾画出由中央税收保证的普遍社会保障计划。这一激动人心的计划包括产假福利和儿童津贴、普惠保健和失业保险、老年退休金和死亡补贴。用当时的话来说，它提供的保障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热烈的公众反应赋予毫无魅力可言的贝弗里奇以“人民的威廉”再世的明星地位，因为他的报告确保在战后的公共议程中，社会政策与其他诸如全民免费保健服务等问题一样占据优先的地位。巴洛（Barlow）报告（实际上发表于1940年）则展望彻底改造停滞的“萧条地区”的前景。随后，1945年的《工业分散法》开始了早就应该实施的扭转诸如英格兰东北部和威尔士南部等地区经济衰落的局面，主要方法是经济多元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1942年的厄思沃特（Uthwatt）报告则提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城镇规划新方法，即在主要城市周边建设“绿化带”，控制土地的使用，

以及建设“新城镇”以满足老城市扩张的需求。在所有这些战时蓝图中，最重要的是对充分就业的承诺，这体现在1943年预算和1944年的政府白皮书里。30年代的滞胀和经济及人力资源的浪费摧毁了许多社区，这一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那时失业游行抗议者的领导人，例如1936年反饥饿游行的主要人物、贾罗选区议员、“红色艾伦”威尔金森（Wilkinson），现在则积极参与政府的工作。

在这一切社会革新的潮流下，最为重要的是财政政策的转变，包括对反恶性循环政策的承诺、增加人力资源预算以及对需求的管理。甚至持传统观点的战时财政大臣如金斯利·伍德（Kingsley Wood）和约翰·安德森爵士（Sir John Anderson）也接受这些计划。在财政部任职的凯恩斯本人对内阁里负责经济事务的阁员们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是1919年战后安排的主要批评者。而现在，无论是在国内预算政策方面还是外部的财政安排（包括试图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将国际贸易和货币理性化）方面，凯恩斯都是个关键人物。以往最保守的领域中出现了最激进的设想：对主要工业和英格兰银行实施国有化、收取遗产税，以及建立国家支付并控制的医疗制度。这些建议在保守党和工党阁员之间引发了日益激烈的争论，其中还有来自靠投机取巧成为后座议员的愤怒诽谤，比如直言不讳的格拉斯哥犹太人伊曼纽尔·欣韦尔（Emanuel Shinwell）与聪明过人的前威尔士矿工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但是在传统战时领袖丘吉尔领导下，社会各界和知识界的这种热烈争论的确是一种新气象，比1917—1918年的“重建”讨论更加切中时弊而且更加深入人心。

图6　《地铁防空洞透视图》是亨利·摩尔“防空洞绘画”系列作品之一，根据1941年利物浦街地铁站的延伸段而创作。战争岁月共同苦难的象征之一就是在伦敦闪击战期间地铁站被用作防空洞。到1940年9月时，有17.7万人在地铁系统里过夜。始自利物浦街地铁的未峻工延伸段就容纳了1.2万人，其中许多人连续数周待在地下铁道中。

艺术

在文化和艺术方面，这场战争给旧的价值观带来了一些新的生机。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方面没有取得1914—1918年期间那样的成

就。没有产生那个时期“战地诗人”式的一代。战时艺术家们则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鼓励；政府资助他们描绘闪击战和其他战役的经历。摩尔、约翰·派珀（John Piper）和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是其中三个最有名的例子。

有趣的是，音乐在当时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它尤其受到战时创立的音乐和艺术促进委员会的支持。伦敦闪击战时期由迈拉·赫斯夫人（Dame Myra Hess）主办的午餐钢琴音乐会展现了公众对音乐新的热情。作曲家的成果则体现在迈克尔·蒂皮特（Michael Tippett，他是创作出感人的人道主义作品《我们时代的孩子》的和平主义者）和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的伟大作品里。后者的《彼得·格兰姆斯》首演于1945年6月。它在很大程度上从50年前吉尔伯特和苏利文的轻松作品中汲取养分，给英国歌剧注入了引人注目的新活力。战争期间，电影成为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创新艺术形式。像《与祖国同在》和《相见恨晚》这样的影片实际上植根于战时的主题——分离、迷惘、牺牲——并赋予商业化的电影业创新性现实主义的色彩。

然而在所有文化传播媒体中，英国广播公司对公众的影响力最大。喜剧演员汤米·汉德利（Tommy Handley）、流行歌手薇拉·琳恩（Vera Lynn）以及战地记者理查德·丁布尔比（Richard Dimbleby）和温福德·沃恩·托马斯（Wynford Vaughan Thomas）等成为他们时代伟大的娱乐明星和信息传播者。在受到陌生的社会和知识思想影响的世界里，英国广播公司基本上保持了它的保守和稳妥性，尊重上帝、国王、家庭、生活的连贯性和民族传统的持久性。在6年的战争浩劫中，这似乎是大众所要求并需要的。

教育和社会变革

无论如何，英国人口的知识觉悟和教育水平越来越高。英国的教育制度自1918年以来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发展教育的预算被1922年格迪斯（Geddes）的经济政策残酷地削减了。大部分的工人阶级社

区都没有中学，就读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人口比例到1939年止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且除了在威尔士以外几乎全是富裕阶层或中产阶级的子女。因此，1944年的《巴特勒教育法案》是战争期间又一个社会里程碑。它为一套新的全面中等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在该体制中，学校像法国一样划分成三类——现代中学、文法学校和技术学校。与此同时，通过赋予文法学校新的生机以及规划未来增加对学校建筑与设备的投资，该法案有助于确保识字率的极大提高以及社会与职业更大的流动性。在战后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对吸纳不成功的大多数人的“现代”中学的水准存有什么疑虑，文法学校毕业生的时代一定会到来。[1]

无论工人阶级和知识阶层对社会变革甚至革命的热情有多么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政府致力于回归传统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则小得多。的确，公众对变革的要求与资方对战前社会不公和分化危险的认知所达成的一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英国人民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其中一个主要方面是现在的工会再也不会像1918年之后那样被政府抛在一边了。当时最有权势的工会领袖是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贝文。在丘吉尔于1940年5月任命他担任劳工大臣后，贝文成为英国国内具有支配地位的内阁大臣。在他的主导下，工会与政府合作制定了工作条例、改善了劳资关系而且取得了在经济计划战略上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英国工会联盟的书记西特林实际上成了政府的助手。

战争期间的确发生过罢工，主要是1942年肯特的矿工、1941年克莱德的男学徒们以及1942—1943年的南威尔士工人。但是与正在形成的、更广泛的共识相比，这些事件都是相对简短的插曲。到1945年战争接近尾声时，工会联盟起草并修改了它的公共优先议程名单。这些议程包括对主要产业及公共服务业的国有化、保持充分就业、建立以贝弗里奇报告为依据的福利国家以及基于战时“平等分享”原则的更加公平的财政政策。

政治激进主义与重建

在各个阶层，人们的这种感觉与一种明显的政治激进主义情绪相呼应。的确，1940—1945年期间英国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地转向左倾。丘吉尔政府里的工党大臣们对国内形势影响巨大。贝文、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格林伍德、休·多尔顿（Hugh Dalton）以及其他阁员们成为公众熟悉和信任的人物。他们是战后重建能够切实实施的信心保证。人们同样信任革新派的保守党大臣，例如起草了教育法案的巴特勒。他们的观点与计划者们的新思想相一致，而后者中的许多人是像凯恩斯或贝弗里奇那样的自由派理论家，或者干脆是没有政治派别的技术官僚。

在议会和政府控制之外，很明显公众的情绪日益激进——至少这反映在报纸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记录上，虽然当代人很少注意源于美国的这种收集社会学证据的陌生形式。在补选中，倾向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均富党获得了几次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和苏军挺进柏林后，公众对苏联红军的热情普遍高涨。甚至在军队里，据说左翼等新思想在热衷时事的圈子里传来传去。西非沙漠或远东军人的家书也发出要求战后建立一个更公平世界的坚定呼声。

战争结束时，重建成为一个越发清晰和深入人心的观念。而在1918年，许多设想不够周全而且很快就遭到财政部的否决。这一次则更像是一场人民战争。重建构想更加清晰精确，而且有着更加民主的基础和更多知识分子的参与。战争一结束其结果就戏剧性地展现出来。丘吉尔的联合政府在1945年5月突然解体。这时，德国投降仅仅数日，而远东的抗日战争仍在继续。令丘吉尔不可思议的是，代表底层民众的工党全国执委会坚持要求工党大臣们退出政府。大选定于7月举行。

1918年的“优惠券选举”自始至终都是虚假的。即使不像凯恩斯所批评的用“绞死德国皇帝”的狂热沙文主义破坏选举那样严重，这一因素毫无疑问也是存在的。普遍的爱国热情使得1918年11—12月的大

选没能体现公众的真实情绪。然而1945年6—7月，公众更加清醒并将精力更精确地集中在住房与医疗、充分就业、工业振兴等战后社会问题上，而不是外部的和帝国的问题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受人敬重的战时领袖丘吉尔的权威和声望不但与主题无关，甚至令保守党尴尬。

大选的结果令人震惊。这是自1906年以来结果最悬殊的选举。工党在议会增加了203席，总共获得了394席，而保守党仅获得210席。了无生气和沉默寡言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就这样被推进了唐宁街十号，成为以压倒性多数选出的政府的首脑。同时进入政府的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人物，例如外交大臣贝文、副首相莫里森、财政大臣多尔顿以及贸易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这场选举是对战争岁月氛围变化的鲜明评价，毫无疑问是对充满了痛苦记忆（慕尼黑协议、西班牙内战、加尔洛事件以及反饥饿游行）的30年代迟到了的判决。英国历史上极少有类似这样展现出与传统决裂情景的时刻。左翼大臣们和广大选民们一样感到既激动又迷惘。正如工党新大臣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在这场巨变中所表达的迷惘之词，“在这之后——会怎样？”

注释

〔1〕 英国的文法学校相当于中国的重点中学，一般成绩优秀的学生才能入学，其毕业生上顶级大学的比率也远高于一般的公立学校。

第五章

战后的世界

事实上，政策在一个阶段的延续后接着是另一个阶段的延续。1945—1951年的工党政府6年的执政在国内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虽然偶尔也遇到困难。这届政府创立了一种新的共识，即以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这种制度使英国顺利地度过了战后的转型期并将其精神传给了下一代或好几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出现之时，战后形成的艾德礼遗产才受到决定性的挑战。在此之前，战后政权引入的革新与稳定相平衡的体系似乎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

公有经济部分与福利国家

在一定程度上，艾德礼政府实施了持久而出色的改革计划。主要的产业和机构被纳入公有制体系——煤炭、铁路、公路运输、民用航空、煤气、电力、有线及无线广播，甚至英格兰银行。全国总计有20%的产业被纳入“公共部分”。与百姓脱节的私有公司资本家集团被同样与百姓脱节的公共公司官僚组成的董事会所取代。直到1948—1949年钢铁行业国有化导致政府内部分歧浮出水面，1945年在工党竞选宣言中提出的公有制的前提才开始受到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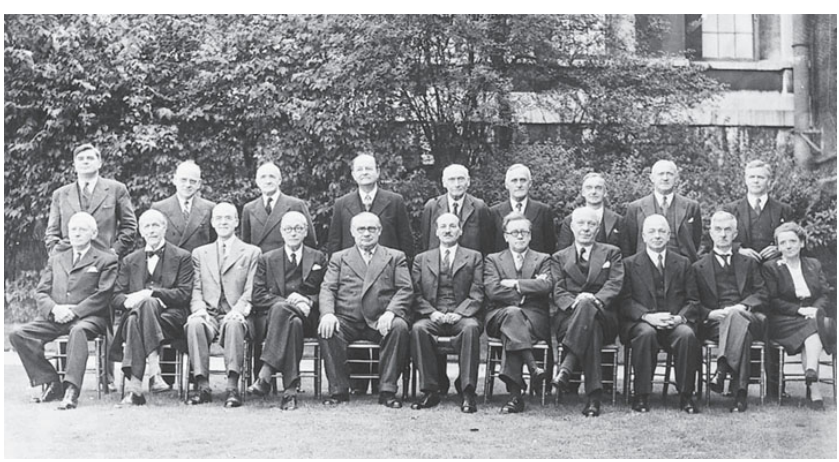

图7　1945年8月23日组成的由艾德礼领导的工党内阁。前排（从左到右）包括艾迪森勋爵、乔伊特勋爵（Lord　Jowitt）、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阿瑟·格林伍德、欧内斯特·贝文、克莱门特·艾德礼、赫伯特·莫里森、休·多尔顿、A. V. 亚历山大（A. V. Alexdander）、詹姆斯·丘特尔-伊德（James Chuter-Ede）以及艾伦·威尔金森。工党是以超过150席的压倒性多数重新执政的。

公共财政支付的社会福利（被大众称为“福利国家”）也有极大的扩展。其中最引人注目且最具争议的是1946年由比万提出并于1948年7月实施的国民保健服务体系。该体系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论，其中很大的阻力来自医生们。他们警觉地认识到实施政府支付体系将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雇员，而且会废弃例行的私人行医制度。然而，战后的大众共识非常强大，迫使该法案通过并使全民公费医疗成为现实。其他重大措施包括1946年引入的全民保险制度（基于贝弗里奇的战时建议）、国家补贴的“廉租住房”运动（截至1952年建成了超过100万套新住房和临时住房）、养老金的提高、义务教育年限的增加，以及儿童补贴。

这些措施在当时并不是像有人宣称的那样得到所有人的支持。政府对其批评者作出了许多妥协。比万本人不得不同意允许保留职业医生的私人行医权，以及在公立医院里保留“付费床位”，这是典型的英国式妥协。在中等教育方面，公学〔1〕与国立文法学校共存。的确，在1945年之后社会主义管理盛行的岁月里，伊顿公学和其他私立教育机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的慈善社会地位受到国内税收的保护。公房计划迫于鼓励开发商卖房和“有产民主”原则的压力而弱化。

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福利国家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且在之后的20年里被视为一个平衡人道社会的重要特性。1951年4月，大臣们就镶牙和配眼镜在保健制度内是否应收费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这导致了安奈林·比万和另两位大臣的辞职。虽然如此，全民支持的普惠福利的主要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下来，没有受到太大损害。同样延续下来的是政府对充分就业和振兴威尔士谷地、达勒姆、坎伯兰和苏格兰中部工业带等败落地区的承诺。鉴于得到的这些利

益，英国的工会会员们愿意克服工资冻结、货币贬值和其他困难。他们对自己政府的忠诚超越了所有的分歧。

变化中的生活水准

后来的传奇故事将这一时期描绘成艰难和黯淡的时代。从某些方面来说的确如此。一开始，英国就面临偿还巨额战后债务的问题。原材料和基本食品的供应出现持续短缺。缺少美元所造成的与北美洲贸易失衡使形势雪上加霜。这一时期引起人们恐慌的事件还有1947年7月的外汇自由兑换政策实行后英镑的挤兑、1949年9月实行的英镑对美元贬值以及1951年7—8月朝鲜战争期间的财政支付困难。对食品、衣服、汽油和许多国内商品的定量供应持续到1954年。由白厅千人一面的官僚们所实施的（以及被投机倒把者和“黑市”所破坏的）计划和控制成为当时惯常印象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人口中的大多数，即工人阶级，认为1945年之后的岁月是维多利亚晚期顶峰之后他们所经历过的最好时期。与1938年相比，他们的工资增长了30%。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业得到保证，此外环境和教育设施也得到令人满意的改善。在一个足球与板球等流行运动、电影院与舞厅等随处可见的社会里，舒适生活的休闲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海布里、维拉公园或老特拉福德等体育场每周吸引超过6万名热情（并且完全平和的）观众。

1951年，工党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启动了不列颠展，以纪念1851年在英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国内经济短缺、国际事务焦头烂额之际，一些怀有偏见的批评者认为这似乎不是一个全民欢庆的时刻。然而不列颠展举办得很成功。除了其他的好处，它促使人们一举改造了泰晤士河南岸的杂乱地区，建起了罗伯特·马修（Robert Matthew）为音乐和其他艺术设计的超级新型节日大厅。展会使得建筑家、雕塑家和设计家的创造力得到发挥。同时，它还体现了英国人民的技术和制造技能。泰晤士河沿岸的巴特西地区的游乐场成为欢乐

和创造的海洋。不列颠展证明英国人民在文化方面仍然充满热情与活力，他们安逸满足而且对其传统充满信心。

政治和谐

事实上，不列颠展的活力在1951年之后被保守党发扬光大。从1951年到1964年，保守党实现了连续执政，分别由丘吉尔、艾登、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以及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Sir Alec Douglas-Home）任首相。他们均遵循社会和平的政策。工会被允许扩展他们在战争期间得到加强的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甚至在北爱尔兰都没有发生重大的罢工和国内暴力事件。福利国家制度得到加强，其条款几乎没有受到损害。充分就业仍然被给予优先的地位。人们认为是体现凯恩斯需求管理方法的“巴茨克尔”政策（巴茨克尔是保守党人巴特勒与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的合并缩写，反映了当时的中间路线）对此提供了财政上的保证。

当失业率在1959—1960年间再次抬头时，保守党采取了与其工党前任相同的对地区进行干预的政策。这个时期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被左翼报纸漫画家“维基”（半是崇拜地）称为“超级麦克”。因此，1951—1964年间保守党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偏离艾德礼建立起来的共识。1964年，工党在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领导下以微弱多数重新执政——1966年又以较大优势再组政府——表明在过去20年建立起来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政治和社会框架不会有太大变化。

文学、戏剧和音乐

国内政治和谐的气氛为艺术领域创造了更大的试验和创新空间。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的荒芜之后，50年代出现了许多著名作家的主要作品，其中有一些早在战前就开始创作：乔伊斯·卡里（Joyce Cary）、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安格斯·威尔逊

（Angus Wilson），以及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就是其中最有名的几位。英国的戏剧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复兴，出现了从爱尔兰裔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与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先锋派作品到忠实于现实主义的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等人的作品。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1956）在斯隆广场激进主义的堡垒皇家宫廷剧院上演。这出剧因其对1945年以来英国社会变革的蔑视和否定而引起了极大反响。由是诞生了“愤怒的青年”模糊而浪漫的社会现象。在《另类人》中，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抓住了被异化的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困境。

诗歌也表现出极大的活力，主要体现在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的作品上。他因酗酒于1953年在纽约逝世。北爱尔兰也出现了“阿尔斯特文艺复兴”。在英国之外，到美国访问的人注意到了英国戏剧家和演员在百老汇的垄断地位。由此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即使英国在经济上衰落、技术上落后，但它的文化成就仍可与美国抗衡。

英国的音乐也非常活跃。布里顿在作曲以及歌剧创作方面尤为突出。而其他老牌人物如威廉·沃尔顿（William Walton）也充满活力。也许更鼓舞人心的是，音乐创作不再显得深奥或者仅专属于中产阶级。校园乐队和业余音乐组合遍地开花。地方举办的文化艺术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最突出的是1947年举办的爱丁堡文化艺术节。这些活动背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国家通过“艺术委员会”给予的支持，尽管“艺术委员会”的建立及其影响引起过不少争论。

很不幸，没有取得任何进步的领域是建筑和城市规划。所谓“新城”大多是些单调的斯大林式统一风格的建筑，而重建闪击战中被毁旧城的机会往往被抛在一边。这些城市包括曼彻斯特、斯旺西以及圣保罗教堂附近的伦敦城。丑陋的高层公寓划破了天际线。新的民用住宅和大学建筑常常是严肃并缺乏吸引力的。“平板玻璃”的应用还没有成为受到追捧的观念，主要城市中心和老教堂城市的设计也相应地受到了负面影响。

广播、电视和电影

在其他艺术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无论是在广播还是在电视（相对弱一些）方面都显露出文化先锋的姿态。1946年开播的第三套节目对音乐和戏剧是个极大的促进。虽然存在公认的缺陷，1950年之后，电视在全国普及并且在国家信息宣传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社会作用。由广告资助的“独立”电视开播于1954年。英国广播公司在迎合像知识分子、威尔士语使用者以及亚裔和其他“有色”移民等少数派口味方面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图8　玛格丽特·拉瑟福德（Margaret Rutherford）、斯坦利·霍洛韦（Stanley Holloway）和保罗·迪普伊（Paul Dupuis）在《买路钱》（1949）中。这部电影是战后伊灵影片公司出产的最为成功的喜剧电影之一，由迈克尔·鲍尔康（Michael Balcon）监制。

电影逐渐成为创新艺术实验的媒介。它的低价和随意气氛所吸引的大量观众以及面对竞争对手电视的挑战时体现出的即时自由加强了它的地位。20世纪40年代后期最引人注目的电影是伊灵影片公司的喜

剧。这些影片以适度的幽默和宽容诠释了传统的英国主题。《买路钱》、《仁心与冠冕》以及类似的喜剧证明了英国社会的延续性和统一性。较为无趣的则是大量反映英国阶级制度负面影响的影片。它们用同情、居高临下和不理解的态度向西区的几代观影人描绘工人阶级。外国人的形象通常是可疑甚至可笑的（正如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的儿童作品所体现的那样）。像友好村民“波比”那样永恒的电影人物形象则在影片《寒夜青灯》或在电视连续剧《警察狄克逊》中得到了情感丰富的刻画。

更有积极意义的是，50年代后期席卷了法国、意大利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影坛的新浪潮对英国也真正产生了一些影响。通常具有尖锐社会批评色彩的社会现实主义电影的浪潮标志着文化态度的变化。剖析工人阶级价值观及其对人际关系影响的流行影片《甜言蜜语》或《年少莫轻狂》反映了英国电影产业的新的深度和敏感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反映了英国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安全和稳定。

对外政策

国内的这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政策的稳定。1945年的英国仍然是个世界大国，国际和平会议上的“三巨头”之一。它以能制造原子弹和氢弹来证明自己的实力。直到积重难返的经济衰落给予英国致命打击之前，这种表面现象一直维持到1963年签署莫斯科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时候。英国拥有自己的强大防御系统、自己的独立核武器、自己的英镑经济区，以及自己所独有且强大的（如果说正在解体的）帝国成员之间在战略、贸易和金融上的联系。在医学、物理和化学方面，英国仍然很突出。这表现在具有国际声望的诺贝尔奖获奖名单上——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和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发现了青霉素，英国人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他的美国同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发现了DNA。

帝国的撤退

战后历史见证了英国从帝国版图逐步但必然的撤退，英国的国际地位因此而受损。这是一个残酷而持续不断的进程，即使是在老牌帝国主义者丘吉尔执政时也是如此。艾德礼政府1947—1949年间允许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斯里兰卡）自治是权力转移的关键时刻。这清楚地表明英国在军事、财政，尤其是在意志上已经不能用武力来继续保留它遥远的领地。非殖民化进程在50年代达到高潮。西非和东非以及其他地方的属地获得了独立，甚至白人与地方民族主义武装发生流血冲突的肯尼亚和塞浦路斯也获得独立。在非洲南部，1963年中非联邦的最终解体也意味着北罗得西亚（赞比亚）和尼亚萨兰（马拉维）的独立。

到了60年代初期，英国所直接统治的领地只有零散的一小撮——英属洪都拉斯、加勒比海较小的一些岛屿、福克兰群岛、直布罗陀、香港、亚丁、斐济以及其他一些边远地方。对神秘帝国的怀旧渴望已荡然无存。帝国日从公立学校的日历上消失了，在印度的公务员们全部回国，英王也不再是印度的皇帝。

然后在1956年10月，当埃及宣布把苏伊士运河这条重要的水上航道收归国有后，当时的首相艾登令人震惊地与法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了秘密的军事行动入侵苏伊士运河区。世界舆论，甚至包括美国，都纷纷谴责这一行动。英镑受到了威胁，石油供应被阻断；在联合国的谴责下英国军队灰溜溜地撤走了。国内对这一事件的愤怒并不持久，老牌帝国主义者也沉默无言。在1959年的大选中，保守党以国内繁荣为基础的竞选获得了较为满意的胜利——麦克米伦的竞选口号是“你们从没有享受过现在这样的好日子”。

从另一方面讲，美国政客丹尼尔·莫伊尼汉[2]完全可以撰文赞扬英国在非洲和亚洲第三世界的新声望，因为英国不费一枪一弹地解放了世界上偌大比例的人口，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荷兰在印度尼西亚以及比利时在刚果却以流血的痛苦方式结束统治。世界曾经倾听过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戴维·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

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和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的自由主义理想，而现在的世界听到的则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拉斯基（Laski）和托尼、《新政治家》期刊以及（甚至在野时）工党所倡导的社会民主信条。

在后殖民阶段，英国成为一个更倾向于内省的国家；它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尽管与英联邦国家的联系有实用的一面，例如对英镑区的维持和对黄油和肉类所实行的帝国特惠制，但英国与这些国家的联系越来越成为象征性的。而与美国的关系，尽管在许多方面并不事事如意，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要。从1949年起，美英两国通过战略和地缘政治组织北约绑在一起。另一个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则紧随其后。从此以后，无论英国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英美的政策一直密切配合、齐头并进。

英国人对于这两个英语国家之间的这种所谓平等的“特殊关系”颇为自豪。然而很清楚的是，在实际关系中英国总是拼命维持自认为独立的地位。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在应对共产主义中国的问题上（而不是正式承认它）、在中东，以及最重要的面临俄国威胁的欧洲问题上，英美两国的政策，如果不是一模一样，也是相似的。1956年英国在干涉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上对英美关系的背离很快就被制止了。1962年拿骚会议的结果是美国向英国提供它的“核威慑”与北极星潜艇。这使英国在国防和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比以往更为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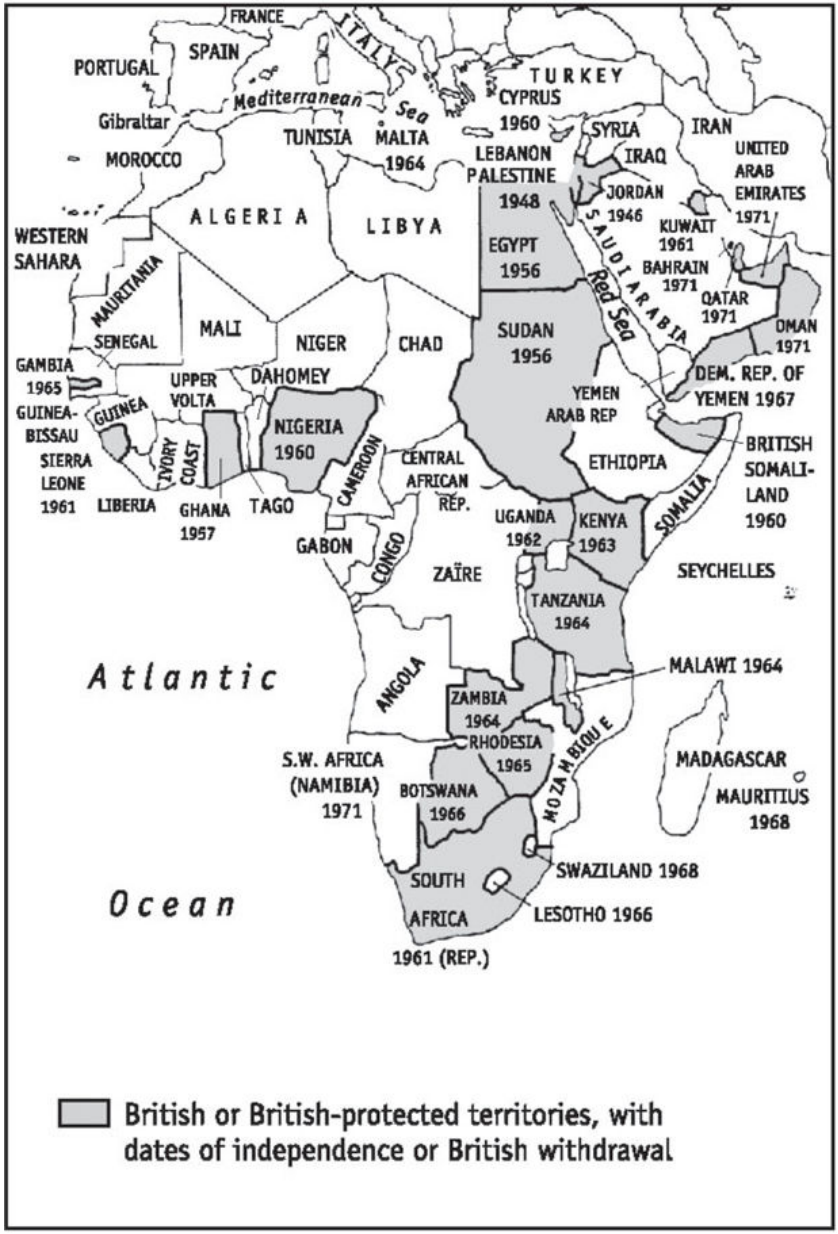

地图1　帝国的衰退，1947—1980

在离英国更近的地方，从1947年起西欧就试图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联盟。战后这一设想甫一提出，英国政府就颇为怀疑，如果说没有公开敌视的话。英国人反对西欧联盟的理由有：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联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宪法和法律制度的独特性以及英国社会主义规划的自主性。更为强大的阻力是大部分英国人由于英吉利海峡的阻隔而缺乏与西欧的自然联系，所以他们将其他欧洲人看作是不可理喻的陌生人。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第一次尝试在1963年被法国总统戴高乐（de Gaulle）否决了。多年之后，英国才进行第二次努力。可以说，英国人对于尝试加入这个陌生组织时的失败没有流露出多少遗憾，因为加入就意味着更贵的食品和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亲欧派们很显然是在逆公众意见而动。

社会变革

在这个自给自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世隔绝的社会里，社会趋势是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富足水平所决定的。在这一表象之下，作为时代新的预言家的经济学家发现了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生产效率的下降。社会学家们揭示了阻止这个“停滞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根源在于深层次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化。英国人则对政府机构和传统惯例相当满足和自豪。对于英国人来说，现在的生活似乎特别好。出生率的下降意味着家庭人口更少，家境更为富裕。家庭居室装修得更好了。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汽车；人们可以用便宜的按揭购买住房；他们每年夏天可以到西班牙、法国或意大利度一个像样的假期。

这些日益增长的乐趣和好处并不局限于在城郊拥有半独立式房屋的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也能坐飞机到阳光灿烂的地中海海滨度假，在酒吧、俱乐部等场所吃喝玩乐，以及享有工资增长与工作时间缩短带来的自由选择。工人阶级中年轻的一代由于其更加古怪的生活方式和日益扩张的流行文化而成为社会学家最喜欢的分析对象，但传统人士则对此直摇头。像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那样留着长发的北爱尔兰人和曼彻斯特联队球员等体育英雄体现了与20年代杰克·霍布斯等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60年代初期的音乐突破是由利物浦一群年轻人组成的甲壳虫乐队实现的。他们预示着所谓“放纵社会”在英国即将登场。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饮酒、吸毒，裙子变得越来越短，对性的限制越来越少。英格兰足球队在1966年世界杯上夺冠给年轻人的放纵增添了些许爱国主义的光环。

除此之外，中产阶级进行了其他的社会改革。这些改革得到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的首相麦克米伦和主张兼收并蓄的工党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支持或容忍。法律对性骚扰、同性恋以及其他类似罪过不再严加惩处。人工流产以及极易获取的避孕丸和其他避孕用具为无尽的性自由提供了条件。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离婚和单亲家庭。青年文化热似乎一度席卷全国，据说该浪潮因受美国总统肯尼迪“新边疆”演讲的影响而得到加强。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几种不同文

化在英国的大学里碰撞融合。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与更具进取精神的中产阶级同龄人融合，这从数量上加强了青年文化的吸引力。1963年之后的十年里出现了许多新大学，而原来的老大学也得到了扩展。一些批评家认为“数量增多意味着质量的下降”。其他人则反驳说，当只有5%的适龄人能够获取高等教育时，英国大学的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开发。既然生存的基本问题显然正在被繁荣的经济解决，能言善辩的大学生们可以将他们的精力转向别的地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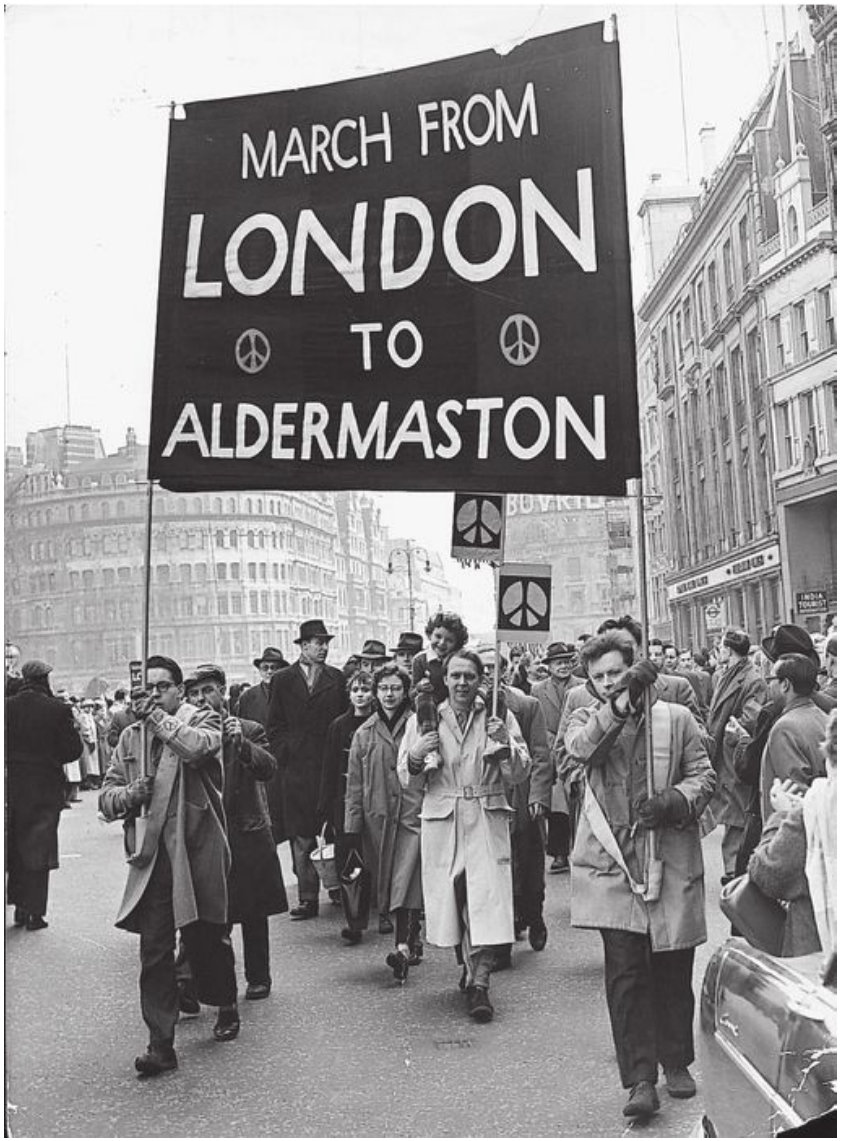

图9　奥尔德马斯顿游行。1958年4月，从特拉法尔加广场开始的到50英里之外位于伯克郡的奥尔德马斯顿武器研究所的第一次游行。这标志着（发起于1958年2月的）核裁军运动的开始。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主张英国单方面放弃核武器。

50年代后期的核裁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产阶级里年轻

一代的理想主义。这一运动曾一度威胁并削弱作为潜在执政党的工党。后来在60年代，同样的热情流向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的抗议运动。学生的反叛在伯克利和索邦[3]司空见惯，在英国的校园里也一度出现。但和前者一样，后来这一运动也神秘地消失了。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这些运动有着更广的含义。在公众满足的表象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几种根深蒂固的分裂势力。这些不同的势力在威尔逊第一次首相任内（1964—1970）引发了反叛活动。年轻一代发现消费主义和循规蹈矩的价值观在一个生态受到破坏以及生存受到不可想象的恐怖武器威胁的世界里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在别的方面，威尔士与苏格兰的年轻人发动了民族主义的抗议运动，这种运动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和加拿大讲法语的魁北克地区尤为常见。20世纪50年代的威尔士与苏格兰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他们的民族愿望不是专为苏格兰以及后来（1964年）为威尔士所设置的国务大臣的正式机构所能满足的。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们正当地抱怨说，连伊丽莎白二世的称号在苏格兰都是很不恰当的。[4]在威尔士，还有一个主题是其古老语言和文化正受到英格兰化了的流行文化的威胁而面临消亡。1966年威尔士民族党在卡马森的议员补选中获胜，其后则出现了新的针对保护威尔士语言的民权抗争运动（以及几次爆炸企图）。政府针对这些运动的成功统战反应是1969年授予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威尔士亲王”的称号。在苏格兰，民族党人夺取了汉密尔顿的席位并掌控了几个地方政权。新的反英情绪似乎正在席卷苏格兰的高地与低地。

较少涉及到宪法制度或者说较为平和的是“有色”少数族裔的要求，他们当中有100多万人是1950年之后从印度、巴基斯坦、西非以及西印度群岛移民到英国的。除了遭受破败的住房待遇以及就业上和（有时在）治安司法方面的种族歧视外，他们还要忍受老旧城市地区的种族偏见。这种情形又被特立独行的右翼预言家伊诺克·鲍威尔

（Enoch Powell）的言行火上浇油。有鉴于美国出现的种族骚乱，他预言英国的城市里也会“血流成河”。

更令人不安的是北爱尔兰。自1920年以来被新教多数派控制的政权现在正处于混乱状态。罗马天主教少数派（他们通常是主张与爱尔兰统一的民族主义者）发动了强大的民权运动。然而在实践中，努力维持宗教与种族和谐的尝试很快失败了。军队开进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以维持秩序。英格兰城市所遭受的一轮令人警醒的炸弹攻击表明爱尔兰共和军和新芬党人将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古老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令人不安的阶段。在60年代后期，少数族裔从布里克斯顿到贝尔法斯特的游行使英国自由主义共识荡然无存，正如1910—1914年间几乎要发生的那样。

经济压力

到目前为止，由于人口的整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和改进，社会组织基本上保持了相对完好。但是60年代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益增长的经济压力使新的社会矛盾雪上加霜。英国在这个不幸的年代进行了一轮又一轮鲁莽的财政改革，以致经常出现财政赤字和英镑挤兑。1967年英镑的贬值没有产生任何持久的改善效果。通货膨胀继续大幅上升，尤其是在70年代初保守党执政的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时期对货币供应进行贸然扩张后；这一政策是对凯恩斯主义的误读。鉴于高通货膨胀伴随着高失业率，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们所有的预言正在被推翻。

开始，这种情景仅限于英格兰东北部、苏格兰和南威尔士的老旧工业区。后两个地区民族主义的高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关闭矿井和工厂以及解雇工人有关的。但是到了1973年，很明显英国的经济问题正在造成越来越普遍的后果。国家创造财富以及保持在世界贸易与产品中应有份额的能力正在遭受严重的、或许终极的衰退。英国似乎要取代土耳其而得到“欧洲病夫”的绰号。

为了对付下降的生活水平，工会的回应是使用集体谈判权。工会会员数量出现了快速增长，1979年时达到了1,300多万。罢工的次数在增加，主要发生在煤矿区。1972年2月煤矿工人发动了全国性大罢工并获得了成功。尽管自50年代以来煤炭工业一直在萎缩，希思政府还是完全感受到了煤矿工人破坏全国生产和能源供应的能力。另一次大罢工发生在1974年2月。它迫使政府就“谁来统治英国？”的议题进行重新大选。结果是工党出人意料地以微弱优势获胜，而保守党政府则下台。矿工们再次实现了自己的要求并恢复了就工资问题与政府谈判的地位。

日益扩散的抗议情绪，不愿接受传统做法和观念，工会的权力直指衰落中的生产基地——正是在这种不祥的背景中，英国在享受短暂而令人迷醉的“富足”后要应对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陌生挑战。

注释

〔1〕 英国的public school翻译成“公学”，但实际上是私立性质的。因其没有学区的限制，可负担寄宿费的学生均可就读，强调“公开给大众”，故名。

〔2〕 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Moynihan，1927—2003），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家，美国民主党成员，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73—1975）、美国驻联合国大使（1975—1976）和美国参议员（1977—2001）。

〔3〕 此处伯克利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索邦则为法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位于巴黎。

〔4〕 苏格兰与英格兰在17世纪合并时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已经过世，故有此说。

第六章

从70年代到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为宏观经济学和社会学疗法提供了一个长期而痛苦的案例。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相比，甚至在绝对值上与其早期生产水平相比，它的经济衰落在继续。这一情景又因1973—1974年间能源形势的戏剧性变化而雪上加霜。能源危机使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价格增加了4倍。这给英国在这个十年里的自身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即开发北海的石油及天然气储藏。

与其竞争对手相比，正在开发核电和水电并拥有丰富煤炭供应的英国在许多方面具有更好的条件来应对这些新困难。然而石油价格的狂涨终于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自1919年以来规模空前的通货膨胀。工会要求在1975年底之前增加工资30%的压力使形势变得更加糟糕。英国的通货膨胀持续攀升直至历史新高，在1980年曾一度超过20%，然后在1982—1983年间才降至可以驾驭的10%以下。此后，对货币发行的控制辅以工资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许多商品真实价格的相对下降才使通货膨胀率在1987年秋降至4%左右。

价格的狂涨和工资以及其他成本的压力使失业再次成为国内经济的主要问题。1980年的失业人数超过了200万，这是自30年代以来闻所未闻的。随着政府对投资与货币发行量的限制，失业人口到1983年春时攀升至300多万。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持续了3年之久，甚至有些上升，直到恢复性的经济增长使之在1987年略微下降至300万以下。英国的经济似乎已经病入膏肓——成千上万的人，其中许多是少年和青年，注定要多年依赖国家救助，而公共福利和服务却遭到逐渐削减。

其他方面也有经济衰退的证据。尽管人口数量起初仍在增加，从1951年的5,000万增至1961年的5,600万，但是在1975—1978年间，人口实际上是在下降的。经济衰退期间出生率急剧下降，而总人口中的很大比例是老年人，这给社会福利带来了沉重压力，不得不依赖仍保有工作的青壮年所创造的那部分财富。

社会混乱

这样的结果对于社会基础来说是最具破坏性的。1975—1978年期间，工党的威尔逊以及后来的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han）政府与工会达成脆弱的所谓“社会契约”，这使得1974—1975年间脱缰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工会同意降低对工资的要求来换取政府针对他们需求的明确政策，尤其是在就业保证方面。此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罢工，直到1978—1979年间的所谓“不满之冬”。这是一场突然爆发的公共服务人员（甚至包括地方政府的掘墓工人）的大罢工。它实际上帮助了保守党在新的大选中获胜。

此后，工会继续支持要求“工作权力”的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对公共支出的削减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不仅仅是在像苏格兰、默西塞德以及英格兰东北部这些传统上就业易受打击的脆弱地区，就连英格兰中西部这样一度繁荣的地区失业率也攀升至20%。在钢铁行业，像康塞特、萧顿和科比这样的大型工厂也永远关门了。更间接的影响是，生活的质量由于政府对保健和教育（包括大学）投入的减少以及对艺术和环境预算的削减而恶化。现在的英国是后凯恩斯时代“滞胀”现象的典型例证，即工业衰退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

北爱尔兰

这些经济方面的压力导致70年代的社会更加不稳定。它们还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其他的社会、群体或种族紧张关系。最令人不安的例子仍然是北爱尔兰。在这里，联合王国中最高的失业率加剧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根深蒂固的宗教与种族仇恨。整个70年代，北爱尔兰的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民权运动的成功动摇了老派的统一党在北爱尔兰的统治地位。1972年斯托蒙特议会解散，由威斯敏斯特[1]直接统治北爱尔兰。但是与爱尔兰共和军重启的暴力相对应的是同样强硬的反教皇的牧师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的蛊惑宣传。

斯托蒙特议会的终结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和平希望。英国部队继续在伯格塞区和福尔斯路等重要街道上巡逻。由于爱尔兰共和军从爱尔兰得到资金与武器，北爱尔兰与南边的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发生了紧张的边界事件。有时，北爱尔兰的暴力活动也以对英格兰城市进行炸弹袭击甚至暗杀政治家的形式跨过海洋扩大到不列颠岛。女王的亲戚、著名海军上将及政治家蒙巴顿勋爵（Lord Mountbatten）就是在其游艇里被北爱尔兰共和军用炸弹杀害的。

英国政府进行新的努力促使都柏林政府直接参与北爱事务的处理，这是自1922年以来的第一次。努力的结果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与爱尔兰统一党总理加勒特·菲茨杰拉德（Garret FitzGerald）于1985年11月签署了《英爱希尔斯伯勒协议》。但该协议引发了北爱尔兰统一党的强烈抗议，使其发起对威斯敏斯特的抵制。在这个不幸的岛屿上实现真正的全爱尔兰统一还是遥远的理想。爱尔兰长久以来的种族纷争还没有平息。两派都自由拥有枪支。一次又一次的暴力行动，包括爱尔兰共和军1991年2月针对唐宁街十号不成功的迫击炮袭击使公众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民族主义、种族关系和社会骚乱

这一时期的其他紧张关系虽然不那么暴力但同样令人不安。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们继续奔走呼号，虽然通常是在宪法框架内合法地进行。在1979年的“地方分权”措施失败后，凯尔特民族主义似乎在退缩，但是在威尔士仍然存在许多政治和文化冲突。对威尔士语言的保护仍然吸引着大家的热情，甚至有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威胁要绝食到死。英格兰人在威尔士乡下拥有的“第二居所”有时会被当地纵火者烧毁。要求中央政府权力下放的呼声在苏格兰仍然很高，甚至因80年代该地区经济的相对衰落而加强。尽管如此，威尔士和苏格兰依旧是平衡与和平的社会，与被民族主义者的痛苦所撕裂的隔海相望的凯尔特邻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更令人忧心的是发生在大型黑人社区的骚乱。这些居民大都居住在大城市贫穷破败的贫民窟里。伦敦的诺丁山地区和布里斯托尔的圣保罗地区发生了零散的骚乱事件。1981年夏季，英国似乎在经历着美国式种族骚乱的恐怖局面——利物浦的托克斯泰斯地区和伦敦南部的布里克斯顿地区的黑人青年与白人发生了持续的骚乱。这些情景都被电视报道记录下来（也许是进一步煽动）。另一次骚乱则发生在伦敦北部托特纳姆的布洛沃特农场，是因当地一名警察的被害（显然是黑人青年所为）而引发的。这些事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移民社区与警察队伍之间缺乏信任。随着失业，尤其是黑人青年失业的加剧，伴以工作、住房和社会机会方面普遍存在的歧视，种族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和感到不安的大事。

其他的麻烦问题堆积如山。例如，工会反对在伦敦北部建立格伦维克工厂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威胁的性质似乎已经超出了抗议活动的范围。足球比赛和其他体育活动被青少年观众愚昧鲁莽的暴力行为所破坏。因此，英国传统的稳定局面正日益处于许多因素的威胁之下。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悲观地评论道，英国正变得“像美洲的智利一样无法统治”。

事实证明这是一种荒诞的夸张。几乎没有几个社会能像英国一样冷静地应对、并安然度过高失业率、高通胀率以及公共开支紧缩等危机。尽管有证据表明人们越来越不把历史上深受尊崇的机构和制度当一回事——牛津大学成为“静坐示威”的对象；警察、法官、教会领袖（以及足球裁判）无法维持他们以前享有的权威；甚至皇室成员也成为公众批评或骚扰的对象——英国社会制度与公民生活的大体基础仍然牢固。但是毫无疑问，矛盾和潜在瓦解的因素如此之多，不列颠文明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义陈旧的制裁和约束制度。

欧洲

在这个有些混乱的时期，英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反思

的阶段。实际上，一种根深蒂固的孤立心理支配着公众的看法，就像1918年以来经常出现的那样。与美国在北约的盟友关系仍在继续，但是公众对其热情很低。的确，70年代末核裁军运动（单纯的和平抗议形式）的短暂复兴说明这样一种建立在具有恐怖杀伤力的大量核武器基础上的联盟仍然引起了公众的不安。商议中的巡航导弹部署引起了更多的关注。经历了许多外交政策上的内部分歧之后，英国终于在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1975年一次独特的全民公决中大多数人，几乎三分之二，支持英国留在欧洲共同市场。然而“欧洲”的吸引力主要是在非政治方面。欧洲大陆的便宜假期、欧洲汽车与食品的流行以及欧洲的足球赛都不足以使英国人更加喜欢英吉利海峡对面的邻居们。英国人对共同市场的态度在1975年之后仍被阴郁的敌视所支配；民意测验的记录说明英国人对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一贯持反对态度。总之，欧共体不能赢得像英国这样独立的国家人民的喜爱，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欧共体是由一大堆无名官僚人员组成的巨型杂乱组织，没有多少民主的性质，而且其总部位于远离英国的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共同市场与高价食品、过剩黄油和葡萄酒等产品的关系广受英国人的批评。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自1846年废除《玉米法》以来，英国人已经习惯于廉价食品的政策。他们既不愿意当欧洲人，也不愿意当美国人。

另一方面，许多迹象表明，到了80年代后期英国人开始接受欧共体成员资格给英国带来了经济利益的事实，反欧情绪开始消退。到1987年6月大选时，工党已经不再提出英国退出欧共体的动议，尤其因为现在欧共体也包含了法国、西班牙和希腊这样的社会党政府。1986年撒切尔与法国总统密特朗（Mitterrand）达成协议，在英吉利海峡底部修建连接英国与法国的高速铁路隧道。隧道于1993年底完工并投入运行。这至少戏剧性地标志着英国部分放弃了孤立主义。

英国在1986年同意加入欧洲统一市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最终，在经过内阁的多次内部争论后，撒切尔在1990年10月被迫同意英国加入欧洲货币汇率机制（ERM）。然而与欧洲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关系在保守党和政府的各个层面仍然是个引起深度分歧的问题。这

一问题在撒切尔执政11年之后于1990年11月被迫下台时起了主要作用。

英联邦与福克兰群岛

英国人对英联邦国家仍然存有一定的感情；女王毕竟是联邦的元首。但是这些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虚化。无论是在黑人移民到英国城市的问题上，还是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应对问题上，它们之间有的只是摩擦而不是亲善友好。与此同时，1989年与中国达成的8年后从香港撤离的协议见证了英国从一个世界大国不可逆转的后撤。

从帝国版图的后撤继续进行，而公众中并没有出现多大的反对。经济与军事上的疲弱使英国采取了一种有步骤的后撤政策。最棘手的是南罗得西亚问题，因为它正受到一场种族屠杀的威胁。而且该地区紧临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1979年12月，不顾当地白人定居者的抗议，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态度发生戏剧性的逆转，允许罗得西亚（更名为津巴布韦）完全自治。议会与公众对这次帝国撤退报以欢呼和支持。吉卜林和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殖民主义阴魂终于被彻底驱散了。看来，帝国问题再也不会困扰英国人的神经了。

接下来，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82年3月底阿根廷侵入了遥远荒芜的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公众的激昂情绪中，英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应。两艘航空母舰、十几艘战舰、多架战斗机以及1万名士兵组成的特混部队长驱8,000英里到南大西洋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作战。多亏了美国在技术上的协助，英国人很快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夺回了福克兰群岛。6月14日，“联合杰克”[2]重新飘扬在斯坦利港上。

福克兰群岛之战受到广泛的支持；反对者们、核裁军运动者以及其他人的声音被不公正地淹没了。与此同时，用战争来留住这些遥远和几乎毫无价值可言的属地不可能重新激发人们对曾经拥有的庞大帝国神秘的怀旧感；在开战之前人们对这些属地的认识仅限于邮票。战

役之后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关心是否应动用海军力量或财政力量来维持南大西洋的安全。福克兰群岛事件可能起的作用是确认了英国人急躁孤立情绪的抬头。面对国际怀疑主义的氛围，英国仍能显示其大国地位，展示其对阿根廷共和国这样的军事独裁政权在军事、海军和技术上的优势。公众对国家的自豪感得以复兴。

国内纷争与政治两极化

然而，福克兰群岛之战所产生的民族自豪感来得快，去得也快。英国很快就回到工会罢工、经济衰退和社会不满的老状态。其中的一个典型例证是1984年3月开始并持续了一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警察与煤矿工人纠察队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英国矿工工会内部也存在分歧，表现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重要煤矿一直在工作。结果是矿工工会遭遇惨败，更多的矿井被关闭了。

由于石油、天然气、电力以及核能的普遍存在，煤炭在英国能源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遭到削弱。所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矿工罢工迫使政府让步的这一招术已经不再一试就灵。然而，煤矿工人大罢工引发了白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一系列罢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中学教师与政府的长期争端导致了1985—1987年间英格兰与威尔士中学教学的许多中断。

80年代初期的这些矛盾被撒切尔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激化了。这届保守党政府似乎是20世纪英国历届政府里最偏右的。与此同时，托尼·本（Tony Benn）发起的回归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草根运动使工党急转向左。两党的战后共识似乎荡然无存。有人引用W. B. 叶芝（W. B. Yeats）的话来评价当时的情景："最好的缺乏任何信念；最糟的充满无限热情。"工党内部持不同政见的右派人士组成了一个新的党派，这就是坚持凯恩斯式的经济中庸路线、坚持工资政策、欧洲主义以及核威慑的社会民主党。令人不解的是，尽管人们对经济悲观失望，1983年6月的大选中撒切尔与保守党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

们获得了397个议席，而明显被削弱的工党获得209席。自由党获得17席，而社会民主党只得到6席。

对中间立场将会被政治大潮卷走的新恐惧因其他方面更有希望的发展而减轻。英国经济的变化并非没有好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变化是国民经济向好的方面转变的结果——北海石油的自给自足加强了英国在能源方面的独特力量和地位。财政收支突然间朝着有大量和持续结余的方向发展（直到1986年）。这也意味着制造业在英国经济中支配地位的减弱。英国人在创新与科技方面的聪明才智远没有用尽，这表现在石油、电子、以协和飞机为代表的航空、亨伯大桥、高速列车、海峡隧道以及电脑芯片等科技成就上。

在80年代中期，许多迹象表明这些发展有助于产生新一轮的富足现象，至少在英格兰南部、英格兰中部的部分地区以及东安格里亚是这样，而后者的发展尤其明显。像斯温登和贝辛斯托克这样的城镇发展迅速。英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并在1987年初达到了4%的增长率。这得益于英镑的贬值和一些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人们注意到，这次的增长较多地依赖于金融服务、信贷、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加，而较少依赖于制造业方面的传统优势。英国的制造业在生产率方面仍然落后于1970年以前的水平。

在这方面引人注目的事件是1986年10月27日发生的伦敦城的“大爆炸”改革，主要表现是几乎隐形的、高度复杂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取代了传统的股票交易所依赖的交易员。这反映了资本市场新的国际化趋势。这次改革还顺带促成了邻近的伦敦东区几十年的破败和无人过问状况的改善。社会上出现的“雅皮”现象引起了广泛争议并经常遭受诟病。“雅皮”指的是年轻、会挣钱的职场人士，他们大多从事股票交易、投资或商业银行等职业。

对许多英国公民来说，在经历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危机后，生活似乎突然变得轻松了。自有住房率继续攀升。到1987年底，总人口中三分之二的人拥有了自己的住房。股票持有也更为普遍。政府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例如，电信体系、英国天然气公司、英国石油公司以及机场（接下来还有80年代末的水

电）被先后私有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工会在公众中的信誉似乎在下降。工会的会员数量则更是如此，从1980年的大约1,300万会员下降到1987年的900万，到1999年时，会员数还不到600万。

图10　北海石油钻塔“海洋探险号”。英国于1969年在北海发现了石油储藏。1975

年钻出了最早的石油。到1978年中期，英国领海区的9个油田投入生产。到1980年，英国实现了石油自给并成为石油出口国。这大大有助于实现财政的收支平衡。北海的天然气则是另一种主要的能源来源。

文化的发展

这一时期英国在文化与知识探索方面并不是乏善可陈。英国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保持了出众的创造力。几位英国最优秀的建筑大师——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师）——获得了国际声誉。英国的音乐在80年代更加繁荣；伦敦可以说是世界音乐之都。利兹、加的夫以及其他城市的管弦乐与歌剧也有重要的新发展。英国的文学周刊保持了很高的质量。尽管与撒切尔政府多有冲突并且因下降的士气和收益而削弱，英国广播公司一直是英国主要的传播机构。虽然政府从1981年起实行了削减预算的政策，英国的大学仍然是艺术、理论科学与实用科学包括医学创造力的源泉。

美国评论家伯纳德·诺西特（Bernard Nossiter）甚至在70年代末宣称，英国表面的经济衰落与失业掩盖着更加积极的因素——英国的中产阶级和熟练工人可以创造性地利用闲暇来反抗与日俱增的大规模生产的规约，逃避枯燥的自动化劳动过程而获取更大的自由。这种观点也许过于乐观而忽视了英国古老工作惯例与管理惯性的悠久传统。正是这一传统控制着英国的经济和（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的发展。

再者，英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受到了企业和技术创新新一轮失败的威胁。英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问题在80年代中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主要是年轻有才的科学家流向北美的“人才流失”现象。在工业革命启动两百年后，英国仍然不愿意实行现代化并激励自己的科学才俊，这很奇怪。但这个明显的缺陷并不能说明英国的人才一定不具备解决社会动乱与产业相对衰退问题的能力。这与几百年来他们担负起商业领导者与国际大国的责任是一脉相承的。

“两个国家”

上述以及其他进展给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注入了新的活力。在1987年6月的大选中，虽然工党在新领袖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的领导下进行了积极的竞选，保守党又一次以375席轻松获得了胜利。工党获得219席，而摇摆不定而且内部分化的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只获得22席。撒切尔因此成为自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1812—1827年连续执政以来首个连续三届当选的首相。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保守党在竞选中重点突出其恢复国家繁荣局面的成就以及保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工党依赖单方面实行核裁军的策略，没能得到广泛支持。而在繁荣的英格兰南部地区，工党似乎显得分裂、过时并且不可当选。

另一方面，这次大选结果所揭示的地区分化相当明显。保守党在南部和英格兰中部地区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在北部的工业城市则失利。而工党在威尔士的支持率上升了5%，在苏格兰则上升了7.5%。人们开始较多地谈论国家的社会分野——日益繁荣和满足的南部与普遍失业、城市凋敝以及公共服务垮掉、逐渐衰落的北部。19世纪40年代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小说中描写的“两个国家”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明显地存在着。

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展现出分崩离析与稳定因素脆弱并存的奇特局面。破坏性的势力显然很大，例如北爱尔兰、英国工业以及城市贫民窟等随处可见的骚乱和麻烦。政治共识受到不同形式的新挑战，例如以托尼·本为首的新马克思主义工党左派，准法西斯主义民族阵线的极端种族主义者以及当时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分裂。传统的社会关系——年轻人对父母、“女权主义”的妻子对她们的丈夫、工人对雇主和工会领袖、学生对教师、市民对执法者——似乎都处在急速的变化中。1979年引起争议的一本书是《不列颠正在死亡吗？》。与此相反，英国的稳定则反映在对古代惯常制度和祖先几近宗教般的尊崇上，包括尊敬皇室或者“遗产”这个模糊的概念，而这又体现为人们对英国历史选择性的、充满感情的解读。

国家的不稳定局面因1987年大选之后撒切尔政府的冒失政策引起的混乱而明显加剧。整个80年代保守党政府尊崇货币主义信条、私有化以及市场机制，挑战像教会、大学和地方政府这样的机构，而且撒切尔个人的权势如日中天。这一切似乎说明“撒切尔主义”取得了胜利。但在接下来的3年里，保守党政府遇到了严重困难。在国内政策方面，政府的一些激进建议遭到极力反对。将市场机制引入教育甚至国民保健制度的企图引起了很大的公愤。废除住户税制并代之以社区税（或“人头税”）的建议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对浪潮。毕竟，热爱自由的英国人早自1381年就在沃特·泰勒（Wat Tyler）的领导下反抗过人头税。对这一事件的记忆仍然留在人们的传说里。

最严重的是，经济的表面复苏开始失去可信度。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的减税政策导致了创纪录的200亿英镑巨额财政赤字。失业率急剧上升，英镑受到压力。更糟的是，政府引以为豪的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又受到消费者信用和消费热潮的威胁。银行的利率狂升到15%；全国每一个按揭买房的人都感受到了压力。雪上加霜的是，在欧洲政策上与首相进行激烈争论后，劳森辞去了财政大臣的职务。

撒切尔本人现在越来越不受欢迎。她强硬、霸道的领导风格似乎更像是政府的负担。她自福克兰群岛之战以来采取的“强硬”外交方针似乎也不那么受欢迎，尤其表现在就货币联盟与其欧洲伙伴的一次次争吵上。与此同时，工党采纳金诺克提出的“新现实主义”，变得更加稳健因而增加了当选的筹码。该党放弃了对大规模国有化、单方面核裁军以及敌视欧洲政策的主张。在这一过程中，工党使追随托尼·本的极左分子回心转意。1990年夏天，英国的政治舞台上似乎马上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撒切尔的倒台

到了秋天，变化果然来临。面对阁员的辞职、补选的失利、欧洲

问题和国内经济的困难，撒切尔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焦头烂额。接着在11月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又对其党内领袖（其实是首相）的地位提出了挑战。赫塞尔廷是从撒切尔政府内阁辞职的成员之一。尽管撒切尔赢得了第一轮投票（204票对赫的152票），党内反对她的呼声迫使其辞去了领袖和首相职务。正如1922年的劳合·乔治和1940年的张伯伦所遭遇的，是保守党内的后座议员、而不是选民们将撒切尔拉下了台。在第二轮投票中，鲜为人知并且秉承稳健路线的财政大臣约翰·梅杰（John Major）胜出。梅杰任首相后领导英国从“撒切尔主义”的风暴走向更具共识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注释

〔1〕 威斯敏斯特：指英国议会。

〔2〕 联合杰克（Union Jack）是英国国旗的外号。

第七章

走向新的千年

和1922年的劳合·乔治一样，1990年撒切尔的下台是个创伤性的事件。正如劳合·乔治的离职一样，这一事件似乎引出了一个更加平稳的时期——梅杰所说的“一个自在的国家”。梅杰摆出团结的姿态，将撒切尔的主要对手赫塞尔廷揽入内阁。在一段时间里形势和缓了许多。不受欢迎的人头税被放弃了。1991年2月英国介入了海湾战争，其装甲部队和喷气战机十分突出，协助美国人和其他“联合”部队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伊拉克军队赶出了科威特。即使不像“福克兰群岛因素”那样给保守党加分，这次参战也使政府受欢迎的程度一度提升。

最重要的是，约翰·梅杰在弥补保守党内在欧洲问题的分歧上似乎取得了进展。在1991年12月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加速了欧洲的融合，包括1999年将要启动的共同货币）进行谈判时，英国政府似乎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梅杰就未来的货币联盟和工人“权利”与最低工资的“社会条款”等问题上从欧洲伙伴那里得到了“选择退出”的待遇。保守党表面的团结得以成功维护。

另一方面，撒切尔执政后期出现的基本困难仍然存在，尤其是经济仍处于衰退状态。由于就业率下降、按揭利率提高、负资产和房价下跌等现象的出现，这次的衰退对英格兰中部的中产阶级造成的损害最为明显。政府对铁路系统新一轮的私有化改革引起了激烈争论。

1992年大选及其影响

鉴于保守党的天然支持者面对的所有这些问题以及该党在欧洲问题上没完没了的困难，大家普遍认为保守党最终会在1992年4月的大选中输给工党——至少这是民意测验的结果。但是，人们恰好看错了。梅杰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平易、诚实、没有城府的形象。他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保守党获得了336个席位；工党获得271席；而自由民主党仅获得20席。保守党政府得到了“埃塞克斯人”的支持，

即那些爱国的、喜读《太阳报》、居住于巴西尔登这样新兴城市里的熟练或半熟练工人。事实上，保守党41.85%对工党34.16%的得票率比它们在议会获得的席位更能说明问题。他们总共获得的1,420万张选票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看来选民们无法真正信任工党及其领袖金诺克管理经济的能力。对多数选民来说，工党似乎仍然是代表消亡的过去而不是光明未来的、有着强烈阶级意识的政党。保守党连续赢得4次大选胜利，是自19世纪辉格-自由党废除《玉米法》以来的最佳表现。这似乎说明保守党在未来一个时期里注定会在政坛上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事实上这次选举将带来长期的分歧和烦扰并最终将保守党击垮。崩溃开始于1992年9月16日的“黑色星期三”，这次重创使保守党及其首相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因承受不了对英镑的巨大压力，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并且英镑对所有主要货币贬值。这对梅杰和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Norman Lamont）是个致命打击，一举毁掉了保守党能够管理经济的声誉。政府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大幅下滑；而工党的领先则一度上升到创纪录的超过30%，并在接下来的四年半里保持大幅领先。政府对此似乎束手无策。

经济复苏带来的是支持率的下降和税收的提高。1993年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e）接替拉蒙特任财政大臣，形势慢慢有了改观。政府的其他一些政策也不受欢迎。撒切尔主义的精髓——对工业及服务设施的私有化——失去了光环。公众所见到的是私有化的列车不能准点运行、私有化的自来水服务夏季断水以及这些公司主管工资的大幅提升。

北爱尔兰与欧洲

北爱尔兰问题的确曾一度出现一些进展。1993年底，梅杰与爱尔兰总理成功地在唐宁街达成了一项协议；次年，新芬党宣布停火，持续了两年。和平似乎回到了贝尔法斯特多事的街道，英国军队也减少

了巡逻。然而1996年2月在伦敦东部的金丝雀码头发生了大规模的炸弹爆炸事件。这意味着脆弱的和平局面被打破了。忠于英国的新教徒与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政治鸿沟自1922年爱尔兰分治以来还是那样宽阔而无法跨越。和他的前任们一样，梅杰也无法解决自古以来的派别分野，无法减少北爱尔兰所遭受的痛苦。

最重要的是，保守党被同欧洲的关系问题搞得一团糟。1991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不但没有成为构建和谐的平台，反而成为导致大选不可避免灾难的定时炸弹。在麦克米伦和希思的领导下，保守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更倾向与欧洲合作的政党，而工党则对欧洲较为不友好。现在它们的立场完全颠倒过来了。工党全力主张英国发挥在欧洲中心的作用，包括工会热情支持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社会条款和最低工资的规定。而保守党则被撒切尔执政后期逐渐形成的狂热欧洲怀疑派或恐欧派搞得四分五裂。

这一次鼓动反欧情绪的不再是帝国危机的警报，而是欧盟对英国国家独立的威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为激烈论争的根源，因为它建立一个超国家组织和将会摧毁英镑重要历史地位的“欧元”货币的构想对英国的议会主权构成了威胁。保守党内阁对此产生了严重分歧，正如1903—1905年间英国政府就关税改革与帝国问题发生的争吵。现在的梅杰就像当时的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一样束手无策——而1906年纷争的后果是保守党在大选中惨败。

在下院，保守党不同派别之间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洲问题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激烈辩论。党内分裂导致其在议员补选和地方政府选举中损失巨大；保守党在基层的组织几乎荡然无存。在199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工党获得64席，保守党获得18席，自由民主党只获得2席。在此之后，形势越发糟糕。关于食品的各种纷争使情况更加混乱。牛肉、羊肉，以及在英属水域捕鱼的权力据说都会受到欧洲联盟的威胁。雪上加霜的是，导致数人死亡并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的疯牛病的爆发导致以德国为首的欧盟禁止英国牛肉出口到欧洲大陆。疯牛病是撒切尔开放动物饲料政策的结果，但是它却导致了英国肉牛农场主、保守党后座议员以及欧洲怀疑派极大的愤怒。1996年夏季见证

了自50年代以来闻所未闻的反德偏见的复活。流行小报，尤其是默多克的《太阳报》，煽动起公众的排外情绪。但是欧盟的牛肉禁令仍没有解除。被恐欧派批评家刺激得几乎失去理智的梅杰甚至在1995年5月辞去党领袖的职务重新选举以使他们闭嘴。梅杰以相当的优势击败了右翼挑战者约翰·雷德伍德（John Redwood）。然而这一事件只能凸现梅杰长期的政治弱点。

丑闻与腐败

政府在公众生活中的基调与风格，也许比其政策更能反映实质，并加重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理想幻灭与悲观主义的情绪。政府陷入了像该党长期一党执政的60年代初期那样没完没了的性丑闻和经济腐败。含义隐晦的“肮脏”一词主导着人们对政治的感受。这又被通俗媒体无情地用来煽动公众反对梅杰及其政府。一系列的低级别政府大臣们陷入了不同的性丑闻而不得不辞职。即使是在一个道德宽容的时代，这样的行为在政治上仍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尤其对于不明智地宣扬恪守“家庭价值”以及敦促人们在道德上“回到实质上来”的保守党更是如此。这种模糊的辞藻本身便隐含着极大的危险。

更糟的是，商界和金融界与保守党政客之间日益增加的隐性联系似乎说明了威斯敏斯特深层的腐败。大臣和后座议员被揭露出从私有公司或中介说客那里接受不明钱财。好几位大臣因此辞职。

政策的层面上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道德问题。斯科特调查报告公开批评内阁大臣们在1991年之前向伊拉克出售武器的问题上误导和欺骗议会（这些武器在海湾战争期间被用来对付英国部队）；而诺兰公众生活规则委员会则批评政治家们公众生活的标准并呼吁更大的透明度。

以美国或者意大利的政治标准来衡量，英国政坛的违法乱纪现象似乎相对不多。但对于早在18世纪末就开始铲除腐败行为的英国，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足够令人震惊。政府如果不是腐败的话似乎也表现得

漫不经心；作为领袖的梅杰对此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毫不关心。

公众理想的幻灭

保守党的衰落和普遍存在的“肮脏”政治使90年代中期显然成为公众理想幻灭的时代。像威尔·赫顿（Will Hutton）的《我们所处的国家》（1995年）这样的著作对后撒切尔时代英国的社会不公、极权主义以及社区归属感的衰落进行了谴责。赫顿呼吁复兴公民意识和加强国民团结。英国的许多机构和组织受到了抨击。甚至君主制本身也面对自摄政时期以来最严重的公众批评。皇室的私人问题，例如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和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的分居和离婚、君主聚敛财富、生活奢华而且脱离时代，更是给公众情绪火上浇油。温莎城堡的一场大火导致了猛烈批评，因为王室动用了公共资金来修复损坏。女王提到1992年时认为这是“可怕的一年”。共和主义有了一些有限的进展迹象，正如在澳大利亚一样。

另外，人们对伦敦城的信任由于罗伯特·马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退休金的丑闻和劳埃德保险公司的麻烦而遭到削弱。刑事司法制度揭露了证据不足的伯明翰六人案这类案件中的司法不公现象。内政部则因限制公民自由以及用政治干涉法律而遭到批评。

公众对于英国社会所处的状态也非常厌恶。在伦敦东区，高雅的后现代塔楼区、一座生态公园以及道克兰公司在金丝雀码头附近修建的一个游艇港与风餐露宿于斯特兰德或林肯因河广场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财富、收入、健康以及生活方式方面存在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除了艾滋病等带来的新问题，像肺结核这样早就消灭了的疾病在穷人区卷土重来。此外还有其他引起不稳定的因素。家庭的解体在加速：每三对夫妇中就有一对离婚。英国在欧盟国家中离婚率最高，甚至比北欧国家都高。在默西赛德这样的地区，大批青年人长期失业，有许多住宅区发生骚乱，城市里则存在着普遍的毒品文化现象，正如电影《猜火车》所描写的那样。这部影片是根据爱丁堡

作家欧文·韦尔什（Irvine Welsh）令人不安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从未像现在这样富足的英国在精神上似乎是贫瘠的、在社会层面上是分裂的。

增长的繁荣

然而在许多方面，这种感觉是不平衡的，人们的绝望被夸大了。虽然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梅杰执政时期的英国日益繁荣，而多数市民对生活颇为满意。尽管黑人青年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谋杀案反映出的警方种族歧视令人不安，少数族裔在经历了撒切尔时期种族冲突之后还是取得了进步。由于多数妇女，无论已婚还是未婚，现在都出来工作，家庭的收入提高了。像保姆和保育员这样的家政工人的数量自爱德华时代以来首次出现上升。年轻人中，上大学的比例增加到适龄人群的三分之一，而半工半读或“继续”教育则成为普遍现象。在年龄组的另一端，预期寿命稳步上升（女性为77岁），而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常常意味着更加舒适的老年生活。

在1994年开通的公路和铁路海峡隧道的便利条件下，到国外度假成为普遍的现象。绝大多数人家里拥有中央暖气系统、微波炉、录像机或个人电脑等舒适设备。信息科技，包括因特网，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自己家里工作，同时也能更加自由地获取知识。英国手机的数量超过了1,200万部。城镇生活显示了恢复的迹象——像格拉斯哥、加的夫、纽卡斯尔或利兹这样的城市繁荣起来，其街头出现了更休闲和更都市化的餐馆和酒吧。国家彩票的设立（其收入用于慈善事业）给人们带来了博彩的乐趣，很受欢迎。休闲活动反映了在更加广泛领域的富裕生活。由于从卫星电视转播获得巨额资金以及从欧洲大陆或南美引进明星球员，足球业尤其获得巨大成功。除了其他因素之外，黑人足球球员、田径运动员或板球球员在物质上的成功也有助于改善种族关系。

英国的文化大体上保持了活力。伦敦仍然是伟大文学作品的中

心；像诺曼·福斯特和理查德·罗杰斯这样的建筑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作为业界的泰斗，福斯特设计了重建的柏林国会大厦，该大厦于1999年底落成。由于多银幕影院吸引了更多的观众，电影业尤为繁荣和具有创造力。成功的电影包括《乔治国王的疯狂》（电视第四频道出品）这样的经典历史片以及描写六位设菲尔德失业钢铁工人利用他们的才能表演脱衣舞的喜剧《光猪六壮士》（1997年）。报纸上充分展示了英国艺术与设计的活力；像辣妹这样的流行音乐偶像不但证明了“女孩的力量”，还催生了一种新的爱国主义感情。人们一度在谈论“潇洒的不列颠”，正如在甲壳虫乐队和“快乐的60年代”的辉煌时期那样，英国成为了流行时尚的市场引领者。1995—1997年，经济开始以出口增长的形式复苏，但评论家们对明显缺乏一种“好感觉因素”感到困惑。公众情绪奇怪地表现为消沉。

新工党

政治是这种失望的主要根源。但也似乎正是政治给人们带来振兴的希望。过去作为陈旧社会主义和工会麻烦的象征，工党似乎注定永远在野，但正是工党出人意料地成为更加美好社会的希望。在金诺克领导下放弃左倾政策是工党复兴的开始。他的继任者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以削弱工会势力和将“一人一票”制引入党代会的方式继续现代化的进程。

真正的变革是1994年史密斯去世后发生的。他的继任者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放弃了旧的意识形态，领导工党走向戏剧性的复兴。42岁的布莱尔是受过公学和牛津教育的律师。他给人一种年轻、富有活力和喜欢新事物的印象，并因此成为英国现代史上最成功的政党领袖。他不是简单地提“工党”，而是提“新工党”。他更诉求于英格兰中部按揭供房的中产阶级，而不是工党腹地更为老派的工人阶级。他讲着爱国主义的语言，挥动着英国的国旗。他宣称，从根本上讲，英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他还能以惊人的熟练技巧利用现代通信技术

来保持党内的“统一”并提升自己的领导地位。布莱尔曾经在下院这样奚落梅杰：“你跟你的党走，而我的党则跟我走。”

新工党比以前更能兼容并蓄。布莱尔公开诉求英国工业联盟（CBI）的领导人的支持；向在过去诋毁过工党的默多克报业集团示好；他甚至对撒切尔国有产业私有化、提升自有住房率和结束工会的控制作用等成就大加赞赏。布莱尔所依靠的模式似乎不是一个世纪以来从基尔·哈迪（Keir Hardie）到卡拉汉领导的旧工党，而是澳大利亚工党或者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领导下的美国民主党所奉行的“市场社会主义”。

其结果是，不再教条化的工党扬弃了国家计划、国有化、普惠福利、收入再分配以及1945年艾德礼领导下工党与工会的密切联系。1995年初，布莱尔成功地发起了从工党党章中删除承诺国有化的第四条款的运动。在保守党政策失败和工党在民意调查中领先形势的鼓舞下，布莱尔支配着英国的政坛。

1997年的大选

1997年的大选体现出了新工党改革的效果。民意测验的结果这一次被现实印证了。保守党遭受了比1945年或1906年更糟的失败，也许是自惠灵顿勋爵（duke of Wellington）1832年抵制伟大的《改革法案》以来最糟的惨败。工党的选票增加了10.9%，获得了419个席位，而保守党只获得165席。自由党获得46席，是20年代以来的最好成绩。5位政府阁员丢掉了他们的席位。英格兰的城镇议席大规模地转而为工党所有，包括撒切尔在芬奇利的席位。主要城市都转向了工党，而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保守党竟连一个席位都没有获得。

这次大选的另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是，120多位女性当选为下院议员，其中100多位为工党议员。她们全部来自中产阶级，而工党内的工会势力则大大减弱。这是英国历史上最翻天覆地的大选之一，是十年前人头税引发反撒切尔浪潮以来积聚起来的反对保守党统治的滞

后反应。44岁的布莱尔由此成为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最年轻的首相，并且立即树立起个人的权威。

工党接班执政的过程是极其平顺的。近期以来经济一直在快速改善。这是工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执政时没有遇到财政危机。新的财政大臣遵循谨慎的政策，兑现了不突破保守党政府税收与花费顶限的大选诺言。股市在1998年创下新高。股票交割指数从1997年5月的4,300点狂升到2000年1月超过6,800点。在国内政策方面工党趋于谨慎甚至保守，尤其是在削减福利花费以减少对国家的依赖方面。而来自左翼的抗议被置之一旁。医疗服务的资金不足引发了许多争论。其他方面，政府采取的政策有对工商业界示好、加强法律秩序以及对大学教育收费。这对一个中左立场的政府来说是很了不起的。另一方面，家庭信用、对儿童和老人福利的加强以及引入工人最低工资政策则说明某些程度上的财富再分配以及政府真实进步的议程。

在欧洲问题上，这届政府似乎比其前任更加积极。然而布莱尔并不比梅杰更倾向于在第一轮就加入单一欧洲货币体系。他的直觉是欧洲与美国并重。然而在北爱尔兰，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暴力冲突之后政府似乎确实取得了罕见的政治突破。新芬党和统一党的领导人坐到谈判桌前，并在1998年4月的耶稣受难节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内容包括以苏格兰模式组成一个108名成员的民选议会；成立由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的部长组成的跨边界部长委员会来处理安全与其他事务；以及建立一个英-爱不列颠群岛委员会。这似乎是自1922年爱尔兰分治以来北爱尔兰的政治家们所能取得的最接近的一致，并且代表了布莱尔又一项了不起的外交成就。一个月后在北爱尔兰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协议得到超过71％的多数（包括新教徒的多数）支持。在经历了解除武装的困难之后，北爱尔兰议会在1999年11月开始运作。新芬党的部长们在统一党领导人戴维·特林布尔（David Trimble）手下任职，这是历史性的新进展，尽管该议会不久就被终止了。

北爱尔兰协议中潜在的联邦主义与工党政府就另一个国内问题所进行的激进改革遥相呼应。工党政府提出的宪法改革计划将世袭贵族赶出了上议院，到2000年时仅剩下92名世袭贵族上院议员。更惊人

的是，工党政府在1997年9月提出就中央政府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权力下放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苏格兰人以压倒性多数的结果支持成立一个具有税收权力的苏格兰议会；形成对比的是，威尔士成立民选议会的动议只得到微弱多数的赞同。全民公决的结果也许预示着自1707年《合并法》[1]以来联合王国的中央政府将要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有人认为，联合王国甚至不再能够保持统一。1999年开始运行的苏格兰议会包含一个少数派的工党政府，但议会里的苏格兰民族党代表比重却很大，此外英国政府也参与到更加融合统一的欧盟中来。这看上去很可能引起更进一步的变化。国内的多元主义和外部的欧洲融合可能会导致更加松散的国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法律、议会和内阁的作用将会改变，英国的国家认同概念将大不相同。少数人以英格兰式的民族主义对此进行强烈回应。而多数人认识到这是一个后帝国主义时代、信息革命时代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他们似乎以传统的平静心态接受了未来变化的前景。

公众的平静

当布莱尔政府尘埃落定时，英国人民正期待新千年的到来。他们似乎比撒切尔倒台后的那段时间更加平静和自信。经济出现了复苏的景象；社会（包括北爱尔兰）更加稳定；男女平等正取得进展；少数族裔比以往更广泛地融合到社会中来；苏格兰人与威尔士人正忙于对地方分权进行建设性的准备。不列颠目前似乎找到了感到放心满意的一种风格和一届领袖。

当然，在最近几十年里也有很多社会混乱的迹象。阶级、性别、隔代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像婚姻、家庭以及为人父母这样的社会基石，经历了很大的冲击而且其结构变得不那么完整。历史悠久的组织机构发现很难适应时代的变化。英国圣公会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举步维艰；妇女被授予神职这样的问题增加了它的烦恼。现在只有少数人遵从宗教礼仪。非国教徒信仰已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遗迹，而天主教

会对堕胎等问题的态度也遭到猛烈抨击。除了苏格兰西部群岛上严格遵守安息日的加尔文教徒，星期日成为人们购物、驾车兜风以及从事群众性体育活动的休闲日。

君主制是近年来社会混乱的更大受害者。许多人猜测，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百年之后查尔斯王子甚至不能继承王位。然而当查尔斯王子离异的妻子戴安娜王妃在1997年8月31日的巴黎车祸中身亡时，人们对此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情绪宣泄。在她的葬礼上，人们极尽悲伤。对他们来说，戴安娜既是充斥通俗小报的光彩照人的媒体明星，又是对艾滋病患者、无家可归者、单身母亲以及亚裔少数民族深表同情的现行制度的局外人。她的葬礼使人们重新产生了对君主制度的依恋，尽管对它的态度更加随意平和。

图11　1997年9月，戴安娜王妃葬礼前肯辛顿宫外面的哀悼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莱尔代替了戴安娜的位置，尽管他只是权威的灯标而不是（戴妃在其葬礼上被人们所称呼的）风中的蜡烛。即使媒体把现实描绘得一团黑暗，民意测验的数据却表明大众对于其英国人的身份具有普遍认同感并且对自己的国家表示满意。这在西方世

界中并不多见。没有什么人想移民国外。在新千年到来的2000年1月，一个巨大的塑料穹顶 [2] 在格林威治的河边矗立起来。它可以比肩1851年世博会的水晶宫和1951年不列颠展的节日大厅。和以往一样，这样的建筑遭到媒体的批评，但并不激烈。和君主制一样，新千年可以用来加强对一种新的文明文化的基本承诺，新移民也会从中找到归属感。

结语

从1914年到2000年，英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不列颠仍然是依稀可辨的同一社会。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以及70年代和80年代的社会动荡，大不列颠的面貌，就像斯诺登山或者哈代笔下的埃格敦荒野，可能出现光和影的表面变化，但是潜在的本质却始终如一。在2000年如同1914年，人们对家乡的崇敬与包容还是没有改变。当地市民对于伦敦（2000年它有了自己的民选市长）、对于“北方”、或对于泰恩赛德、或对于东英吉利亚、或对于康沃尔的忠诚仍然是现实——的确，随着中央政府对苏格兰和威尔士以及也许会对广大英格兰城市地方政府的权力下放，可界定的地方社区归属感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

人口的构成仍然是多元的、有差异的和个性化的。在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里，乡村仍然固守着自己（也许夸大了）的功能和身份感。90年代末的英国仍然是个相对和睦的社会——人们寻求自己的兴趣爱好、珍视自己的花园并在自己家里自娱自乐。最强有力的是，尽管人们使用“一个年轻的国家”这样的修辞来形容英国，英国人仍然对他们集体共有的过去怀有一种自豪感——即使“英国历史”（在千禧穹顶里基本上被忽略了）一词需要用凯尔特民族地区的权力下放、美国化了的流行文化、英联邦国家的移民以及欧盟成员国等所体现的多元主义、多种文化来重新定义。

对戴安娜之死的影响或新千年含义的辩论使人们对英国历史的共

同记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历史意识充分展现在无数的地方节日、古老教堂城市和温泉镇的礼节、威尔士民族文化节、苏格兰高地的体育运动、甚至具有30多年历史的诺丁山多种族狂欢节上。像议会这样的公共机构体现了这种历史感。同样，也许较为痛苦的是，还有战争与外来威胁所激发的坚定团结。通过大众媒体，电视与电影制作的历史作品复兴了古代身份的神秘感。2000年1月进行的民意调查中人们认为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是上个千年的代表人物。

尽管经历了几十年几乎不可忍受的动荡，英国仍然是个不可分割、相对和平、结构紧密的社会，有能力进行自我更新。当地人的抗议活动的种种形式，常常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宽容精神；对个性与怪异行为的尊重体现在包括像性取向这样的困难领域；以及对强权与统一标准的拒绝。1998年，“自由之树”[3] 仍然被环保压力集团浇灌着。环保武士“死顽皮”（Swampy）[4] 是掘地派或汤姆·潘恩（Tom Paine）等持不同政见者的天然继承人。在新千年来临之际，正如在过去惊涛骇浪的紧要历史关头，作为一个英国人的价值仍然能够得到肯定和传承。因此，英国人再度自信地迎接未来将展开的很多个世纪。

注释

[1] 该《合并法》于1707年5月1日通过，苏格兰与英格兰正式合并为一个国家，成为大不列颠王国（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2] 此建筑是2000年1月1日盛大开幕的格林威治千禧穹顶（The Millennium Dome），斥资将近7.6亿英镑兴建而成，是全球最昂贵的雄伟建筑，也是全球最大的穹顶，连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都可横躺其中。

[3] 自由之树：出处为托马斯·潘恩所写的一首提倡自由，反抗强权的诗歌《自由之树》（*Liberty Tree*），1775年7月刊在《宾夕法尼亚杂志》或《美国博物馆月刊》上。

[4] Swampy：丹尼尔·胡珀（Daniel Hooper）的外号，此人是英国有名的环保主义者，多次参加反对修建地铁延长线的抗议活动。

年表

1914	（6月28日）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 （8月4日）大英帝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5—1916	达达尼尔海峡远征，以英国军队从加里波利撤退告终
1916	索姆河战役；日德兰战役；劳合·乔治接替赫伯特·阿斯奎斯任首相
1917	帕森达勒战役
1918	人民代表法将投票权扩大到30岁以上的妇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月11日）；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以“优惠券”的方式再次当选（12月）
1919	凡尔赛条约确立了欧洲的和平
1921	大罢工期间煤矿工人寻求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工会的支持（“三方联盟”）：在“黑色星期五”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退缩，三方联盟破裂；劳合·乔治与新芬党签订条约
1922	劳合·乔治倒台；博纳·劳领导保守党政府
1923	斯坦利·鲍德温成为保守党首相；大选
1924	（1月）拉姆赛·麦克唐纳领导第一届工党政府； （11月）保守党在鲍德温的领导下重新执政
1925	英国恢复金本位制

1926	总罢工（5月3—12日）
1929	大选；麦克唐纳领导第二届工党政府
1931	金融危机与英镑挤兑；英国放弃金本位制；麦克唐纳辞职并在大选后领导国民内阁
1932	关于帝国贸易的渥太华会议实施保护性关税
1935	保守党赢得大选：鲍德温接替麦克唐纳任首相；阿比西尼亚问题的霍尔-拉瓦尔条约；《印度政府法》
1936	国王乔治五世去世；爱德华八世逊位：乔治六世成为国王
1937	内维尔·张伯伦接替鲍德温任保守党政府首相
1938	张伯伦在贝希特斯加登、巴特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会见阿道夫·希特勒
1939	英国保证波兰的安全；大英帝国向德国宣战（9月3日）
1940	温斯顿·丘吉尔接替张伯伦任首相；敦刻尔克撤退；不列颠之战
1941	德国空军继续在许多英国城市进行闪击战；苏联和美国参战
1942	新加坡陷落；蒙哥马利取得阿拉曼战役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关于社会保险的贝弗里奇报告发表
1943	北非战役成功；英美军队攻入意大利
1944	攻入法国的D日（诺曼底登陆）；

	R. A. 巴特勒教育法出台
1945	战争在欧洲（5月8日）和远东（8月15日）结束；大选：工党获得巨大胜利，克莱门特·艾德礼成为首相
1947	煤炭和其他工业国有化；自由兑换危机；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独立
1948	比万发起建立国民保健服务体系
1949	北约成立；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将英镑贬值
1950	大选：工党以微弱多数继续执政；朝鲜战争爆发
1951	不列颠展；大选：保守党击败工党，丘吉尔再任首相
1952	乔治六世国王去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
1954	英国部队从埃及撤出
1955	艾登任首相；保守党赢得大选
1956	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区，随后撤出
1957	安东尼·艾登辞职；哈罗德·麦克米伦成为首相
1959	大选：保守党以较大多数获胜
1963	法国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申请；在莫斯科签署的禁核条约对核试验进行限制；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接替麦克米伦任首相
1964	大选：工党在哈罗德·威尔逊领导下以微弱多数获胜
1966	大选：工党以较大多数获胜

1967	英镑贬值
1968	英国限制英联邦国家的移民
1970	大选：保守党在爱德华·希思领导下重新执政
1972	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北爱尔兰的斯托蒙特政府被废止
1973	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1974	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两次大选：工党在威尔逊领导下均获微弱多数
1975	全民公决支持英国留在欧洲共同市场
1976	经济危机：英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援助
1979	威尔士和苏格兰就地方分权问题举行公决；大选：保守党在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下重新执政；津巴布韦（罗得西亚）独立
1980	北海石油使英国自给自足
1981	社会民主党成立
1982	英国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击败阿根廷
1983	大选：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以压倒性多数继续执政；英国部署巡航导弹
1984	煤矿工人大罢工
1985	持续了一年后煤矿工人结束罢工；《英爱希尔斯伯勒协议》签署
1986	英吉利海峡隧道条约签署；股票交易所“大爆炸”改革
1987	大选：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以超过100席的多数继续执政；秋季股市

	崩盘
1989	人头税率先在苏格兰实施
1990	英国加入货币兑换机制；撒切尔辞职；约翰·梅杰成为首相
1991	针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
1992	在大选中保守党出人意料地获胜；“黑色星期三”：英国退出ERM
1994	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在北爱尔兰停火
1996	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离婚
1997	工党以179席的优势赢得大选：托尼·布莱尔成为首相；戴安娜王妃在巴黎车祸中丧生；苏格兰与威尔士就地方分权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英国从香港撤出
1998	北爱尔兰达成耶稣受难节协议
1999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启动（1月1日），英国未参加；苏格兰与威尔士议会进行首次选举；北爱尔兰议会开幕；世袭贵族在上院的席位被废除
2000	千禧穹顶开放；第一位民选伦敦市长诞生

历任首相名录1914—2000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　*1908*年*4*月起）
戴维·劳合·乔治　1916年12月
安德鲁·博纳·劳　1922年12月
斯坦利·鲍德温　1923年5月
詹姆斯·拉姆赛·麦克唐纳　1924年1月
斯坦利·鲍德温　1924年11月
詹姆斯·拉姆赛·麦克唐纳　1929年6月
斯坦利·鲍德温　1935年6月
内维尔·张伯伦　1937年5月
温斯顿·丘吉尔　1940年5月
克莱门特·艾德礼　1945年7月
温斯顿·丘吉尔　1951年10月
安东尼·艾登爵士　1955年4月
哈罗德·麦克米伦　1957年1月
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　1963年10月
哈罗德·威尔逊　1964年10月
爱德华·希思　1970年6月
哈罗德·威尔逊　1974年3月
詹姆斯·卡拉汉　1976年4月
玛格丽特·撒切尔　1979年5月
约翰·梅杰　1990年11月
托尼·布莱尔　1997年5月

20世纪的英国经历了纷繁复杂的内外部变化。在内部，固守传统与改革创新持续对立，经济萧条、阶级矛盾和地区分野时常引发社会和政府内部的冲突；在外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均遭受巨大冲击，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声势渐大，大英帝国不断衰落。

然而，20世纪对于英国来说又是一个社会进步、成功转型的时代，历经沧桑的不列颠仍然维持了其大国的地位。那么，这个世纪的英国遇到了哪些危机和挑战？它又是如何应变与调整的？本书在详论这些问题的同时，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给读者展现了一幅20世纪英国的全景图。

百科通识文库

49

简析荣格

安东尼·史蒂文斯 著

杨韶刚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简析荣格

安东尼·史蒂文斯 著

杨韶刚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50**

Jung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4.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1994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Anthony Stevens 19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析荣格 / （英）史蒂文斯（Stevens, A.）著；杨韶刚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02-8

Ⅰ．①简… Ⅱ．①史… ②杨… Ⅲ．①荣格，C.G.（1875～1961）－分析心理学－研究 Ⅳ．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20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徐　宁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02-8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前言
第一章　其人及其心理学
第二章　原型与集体潜意识
第三章　生命的阶段
第四章　心理类型
第五章　梦
第六章　治疗
第七章　对荣格所谓反犹主义的指责
第八章　结语
译后记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安东尼·史蒂文斯，毕业于牛津大学，杰出的荣格分析学家、精神病学家和荣格学说著述家，除了医学博士学位之外，还拥有两个心理学学位。其他著作包括：《原型：自性的自然史》（1982）、《论荣格》（1990）、《私人的神话：梦和做梦》（1995）和《阿里阿德涅的线索：人类象征指南》（1998）等。

译者简介

杨韶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道德教育与心理教育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西方心理学史、道德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尤其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荣格分析心理学和西方道德心理学思潮等研究方面多有建树。著有《寻找存在的真谛》、《精神追求：神秘的荣格》、《超个人心理学》、《道德教育心理学》等学术专著。

图　目

图1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图2　位于劳芬的教堂和教区长住宅
图3　荣格的父母，1876年
图4　海伦妮·普赖斯威尔克
图5　伯格尔斯利精神病医院
图6　尤金·布洛伊勒
图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图8　1911年国际精神分析大会，集体照
图9　荣格和家人，1917年
图10　卡尔和爱玛·荣格，1903年
图11　卡尔和爱玛·荣格，1953年
图12　菲利蒙
图13　荣格的曼荼罗
图14　波林根的塔楼，1956年
图15　荣格的精神模型图解
图16　外倾思维——感觉型的态度和功能

前言

要在这样一本165页的小书里，对荣格及其心理学（通常被称为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以便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以及实验心理学［experimental psychology］这种学院派的纯科学区分开来）进行全面的描述绝非易事。荣格既是一个博学的人，又是一个多产作家：除了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医学之外，他对神话学、宗教、哲学、诺斯替教〔1〕和炼金术也拥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他懂英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他的母语德语，而且对每种语言的文学如数家珍。尽管他毫不浮夸，他的博学多识仍在他的一切著述中显而易见，而由于他不擅长组织材料，即使是对并非初学的读者，洋洋20卷的《荣格全集》也令人心生怯意。

荣格认识到他不是一个好的交流者（他说："没有人读我的书，我要费很大的劲才能使人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这种认识并没有促使他像弗洛伊德那样系统地修订自己的著作。因此，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心力才能通过荣格的论著来理解他。如果一个人希望分享到一部分荣格丰富的思想遗产，虽然这不可能毫不费力地实现，但通过阅读这本旨在提供这种简要介绍的小书，至少可以使这项任务不那么艰难。

注释

〔1〕诺斯替教（gnosticism），一种融合多种信仰、把神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的秘传宗教，强调只有领悟神秘的"诺斯"，即真知，才能使灵魂得救，公元1至3世纪流行于地中海东部各地。——译注

第一章

其人及其心理学

图1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

荣格（Jung）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个体主义者，一个非常古怪的人。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在他身上又

活生生地体现了人的普遍性。他奋力以求在自己的一生中实现人的全部潜能，但与此同时，他又决心以某种不妥协的独特方式生活。如果这通常意味着使人们感到困扰不悦，那么，总的来说，他自己似乎并不在意。他说："成为一个正常人是那些不成功人士的理想目标。"

尽管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性的科学家，但他更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通常被视为非理性的或有奥秘的问题上，而当这些兴趣超出了科学的界限时，他并没有为此而感到过分不安。按照他的观点，对人类心理学采取一种完全理性的态度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也是很荒谬的。他必须坚守对他所看到的真理的信仰，如果这种信仰导致他进入那些与其时代的偏见和成见有深刻分歧的理论和经验领域，那也并不是他的错。他写道："沿着自己的道路独自前行，把他在探索旅程中的发现告诉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职责。"

> 决定这些发现之对错的不是同时代人们的批评，而是未来的后代。有些事情可能在今天看来还不是真理，或许我们还不敢认为它们是真理，但明天它们可能就是真理。因此，每一个命中注定要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的人，都必须充满希望和戒备地继续走下去，永远要意识到他的孤独及其危险。（《荣格全集》第7卷，第201自然段）

这种为命运所牵引、抗击时代潮流的意识，使他成为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人物。而且这意味着，任何一本论述荣格心理学的书都必须全面考虑其创立者的生活和人格，因为荣格对人性的理解直接起源于他对自身的理解，在这一点上他更甚于任何其他心理学家。

在其漫长的一生中，荣格始终是一个深刻内倾的人，和人与事件构成的外部世界相比，他对梦和意象构成的内部世界更感兴趣。从童年时期起他就具有一种内省的天赋，这使他能够密切地注意到在意识界阈处或其之下发生的那些体验——我们中大多数人对这些体验几乎完全没有觉察。这种天赋至少部分地源自他出生和教养的独特环境。

背景

荣格于1875年7月26日出生在瑞士康斯坦茨湖湖滨一个叫凯斯维尔的小村庄里，他是这个村庄的牧师保罗·阿希莱斯·荣格（Paul Achilles Jung）和母姓为普赖斯威尔克（Preiswerk）的埃米莉·荣格（Emilie Jung）的唯一的儿子。他的祖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794—1864；荣格在接受洗礼时取了和祖父一样的教名）是一个很受尊敬的医生，后来成为巴塞尔大学的校长和共济会瑞士分会的会长。谣传他是歌德（Goethe）的私生子。虽然他长得很像这位伟大的诗人，但这很可能只是个传说，而不是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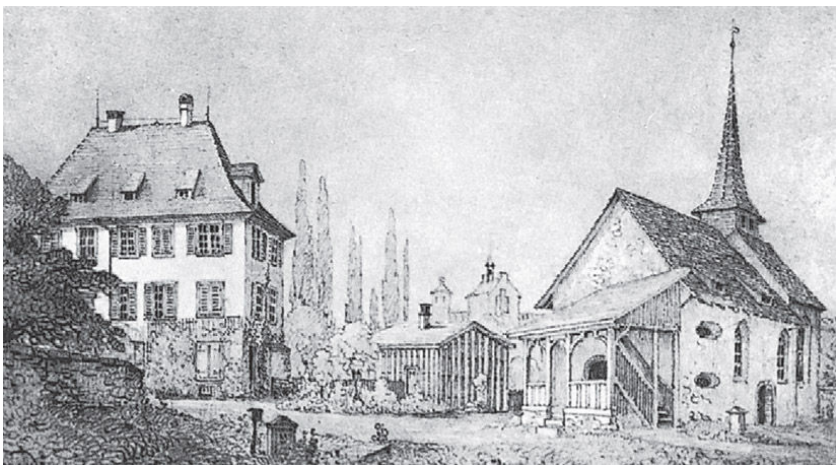

图2　位于劳芬的教堂和教区长住宅

荣格的母亲是塞缪尔·普赖斯威尔克（Samuel Preiswerk，1799—1871）最小的女儿，塞缪尔·普赖斯威尔克是一个很有名望但却古怪的神学家，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希伯来语，认为这是在天国里讲的语言。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早期倡导者，产生过幻象，曾与死去的人谈过话。他要求埃米莉在他写作布道词的时候坐在他的身后，以防魔鬼越过他的肩头窥探，这一直持续到她出嫁之前。这个普赖斯威尔克大家族的多数男性成员都是牧师，他们都和塞缪尔一样，专注于神秘学。这种荣格——普赖斯威尔克家族对医学、神学和唯灵论[1]的混合兴趣对卡尔的智识发展产生了必然的影响。

在荣格童年时期他的家搬了两次，第一次是在他6个月大的时候，搬往莱茵河瀑布附近的劳芬，再一次是他4岁时，搬往巴塞尔郊外的克莱因——许宁根。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家所居住的这两所教区牧师的大住宅都没有能提供一个快乐的环境。在他的自传体著作《回忆、梦、反思》中，荣格把他家里的气氛描述为“令人喘不过气来”；他说，到处弥漫着一种死亡、忧郁和心神不安的感觉，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也“隐约显露出有麻烦”，他为这一切所压迫。他告诉我们，他们并不住在同一间卧室里，而他，卡尔，和父亲一起睡。当他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曾有过一次精神崩溃，为此她不得不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在他成长的关键时刻出现的这次强迫分离似乎影响了荣格的余生。这并不是一种不可能出现的后果，因为正如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及其追随者所确立的，幼儿因失去母亲而表现出来的绝望，是对他们绝对需要母亲在身边但却遭受挫折的一种正常反应。如果出现了这种不幸，儿童确实通常都能设法生存下来，但其代价是，他们会形成情感疏离这样一种防御的态度，其自我专注和自我依赖会达到不同寻常的程度。通常，这会使他们长久地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获得别人的关爱和感情。他们往往还会倾向于变得举止古怪和冷淡，从而令得自己不为他人所喜爱。虽然在母亲离开期间，卡尔受到姨妈和女仆的照料，但他回忆说，由于母亲不在而使他“深感烦恼”：他患上了神经性湿疹并做了一些可怕的梦。他说：“从那时起，当有人说出‘爱’这个词时，我总是感到怀疑，而‘女人’这个词使我产生的情感联想在很长时间里是那种天生的不可信赖”（《回忆、梦、反思》，第23页）。

荣格的父亲是一个善良和宽容的人，但他的儿子却以其切身体验认为他没有力量，在情感上不成熟。在他担任牧师的早期，保罗·荣格似乎就已经失去了信仰，但由于没有可以替代的收入来源，他迫不得已地坚持履行他的牧师职责。表面上坚守虔敬行为但却失去了所有的宗教信念，这一重负促使他变成一个爱发牢骚的疑病症患者，这就很难让他的妻子和儿子爱他或尊敬他。

在他的妹妹格特鲁德（Gertrud）于1884年出生之前，荣格是家

里唯一的孩子；他在学校里很不快活，感到自己和同伴及内在自我都很疏远：他的这种类精神分裂症的举止（即逃避现实、冷淡、自我专注）使他很不受欢迎，而学校的环境又是他完全无法在其中健康成长的。一些创伤性的事件更是加深了他认为自己有异于常人的感觉，例如，一位教师批评他抄袭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是他非常认真地创作的。当他申明自己没有抄袭时，他的同学们却站在老师一边。这样的经历使他感到“受了侮辱”并且完全孤立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完全不去上学，因为当另一个男孩子把他打倒在地、他的头部受到重击之后，他变得轻易就会昏厥。（当他躺在地上、故意长时间不站起来时，他想：“现在你不必再去上学了。”）他尽可能地独自一人消磨时光。“我和我的思想独自在一起。总的来说我最喜欢那样。我独自玩耍、做白日梦或者在树林里闲逛，有一个我自己的秘密世界”（《回忆、梦、反思》，第58页）。

图3　荣格的父母，1876年

这个秘密的世界补偿了他的孤独。童年时期常有的幻想和仪式在他身上表现出尤为显著的强度，它们影响了他的余生。例如，成年后，他为自己在苏黎世湖上游的波林根建造了一座塔楼，他喜欢独自

一人在里面学习和研究，这在他童年时期的一个仪式中就有所体现：在这个仪式中，他把一个雕刻的小人放在铅笔盒里，藏在牧师住宅阁楼的屋梁上。他经常去看望这个小人，并且为它摆上用一种神秘语言写成的卷轴，在他的阁楼隐蔽处的这个僻静的场所给它提供了一个图书馆。这使卡尔有了一种“新获取的安全感”，使他能够忍受父亲易怒的情绪，忍受母亲长期患有的抑郁症，忍受他在学校的“孤独”。“谁也发现不了我的秘密并且毁坏它。我感到很安全，那种与自我不相和谐的痛苦感觉一去不复返了”（《回忆、梦、反思》，第34页）。

童年时期的另一个仪式为他后来对心理学中投射（projection）的重要性产生深刻洞见作好了准备。这是他坐在花园的一块大石头上玩的一种想象的游戏。他会吟咏道：“我坐在这块石头上面，它就在我的下面。”这块石头会马上回答说：“我躺在这里的这个斜坡上，而他就坐在我的上面。”然后他就问自己：“我是坐在石头上的那个人吗？或者我是被他 坐在上面的那块石头吗？”这给他留下了“一种奇特和迷人的黑暗的感受”，但他知道，他和这块石头的秘密关系有着某种深不可测的重要意义（《回忆、梦、反思》，第33页）。在这个游戏中我们可以追溯到荣格对炼金术的奥秘的成熟洞见之起源——炼金术士们把他们自己精神的内容投射 到他们在实验室所研究的材料中去。

荣格在成年时期喜欢独居、喜欢研究炼金术和精神转换的动力，这些在他青少年时期的一个幻想中也有预示；当他每天从克莱因——许宁根的牧师住宅走到他在巴塞尔的学校时，这个幻想一路上让他非常快乐。这是一个关于理想世界的幻想，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比现在要美好。那里没有学校，生活能够完全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安排。在一个湖中突起的一块大石头上矗立着一座防御工事牢不可破的城堡，城堡有着高耸的主楼和一个瞭望塔，周围是一个由长老委员会统治的中世纪小城市。这个城堡就是卡尔的家。他作为治安法官住在这里，只是偶尔地出来“处理政事”。在港湾里有他私人的一艘二桅纵帆船，它装备着一排小加农炮。

这一幻想的关键是那个城堡主楼：它藏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秘密，

卡尔是这个秘密的唯一知情者。在这个塔楼的内部，从城垛向下延伸到地窖，有一根像成年男子的胳膊那样粗的铜柱：铜柱顶端有一些伸展到空中的分叉或细丝。这些分叉或细丝从周遭提取出一种“精神的实质”，它通过铜柱被输送到地窖里；地窖里面有一个实验室，他在那里把这一气状物质转换成金子。“这当然不只是变戏法，而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和至关重要的自然的奥秘，而我并不知道我是怎样获知这一奥秘的；我不仅要对长老委员会的人保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还要对我自己保密”（《回忆、梦、反思》，第87页）。

创造一座城堡、使自己与世界隔绝的需要是有类精神分裂症倾向的人的特点。小卡尔的城堡筑有防御工事，而且只通过一条狭窄的地峡和陆地有微弱的联系；这个地峡为一条宽阔的运河所切断，河上面有一座吊桥。后来，他开始建造模型城堡，城堡周围是筑起工事的炮兵阵地，而他常常会花上好几个小时研究这种攻不破的沃邦〔2〕式防御工事。

在他内心的这座安全的城堡里，卡尔体验到自己由两种不同的人格组成，他分别称之为“第1号”和“第2号”。第1号人格是他父母的儿子，每天上学，尽可能地应对生活，而第2号人格年龄则大得多，远离人类社会的世界，但却接近大自然和动物，接近梦，接近上帝。他把第2号设想为“根本没有可以界定的特性——出生、生活、死亡，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体，是对生活的一种完整想象”（《回忆、梦、反思》，第92页）。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他开始了解到，这两种人格并不是他自己所独有的，而是出现在每个人身上。但是，他认识到，自己显然比大多数人更清晰地觉察到它们，尤其是第2号。“在我的生活中，第2号是最重要的，我总是试图为想要从内部产出的任何东西留下空间”（《回忆、梦、反思》，第55页）。很久以后，他把这两种人格重新命名为自我（ego）和自性（Self），并坚持认为，它们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构成了人格发展的核心动力。

他相信，他的第2号人格给予了他一种特权，这是他那位不幸的父亲所没有的，就是说，他可以直达上帝的心灵。在他看来，他的梦的揭示性质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梦包含着意象（例如，当他才3岁时

出现的一个地下的男性生殖器形状的神的意象）；他确信这些意象一定起源于凌驾于他之上的某个来源。证实这一点的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幻象，他竭力抗拒这一幻象，但却没有成功；这个幻象是，全能的上帝坐在黄金宝座上，对着巴塞尔大教堂的屋顶排泄粪便（不难理解，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上帝对他的教堂的敬意少得可怜）。这种揭示使他难以忍受他的父亲在精神上的困惑，并且在两人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每当卡尔向他提出有关宗教的问题时，这位牧师就会变得急躁易怒，并且敏感地想要辩解："你老是去想　，"他抱怨说，"不，一个人不应该去想，而是应该怀有信仰　　。"这个男孩子在内心思考道："不，一个人必须进行体验，获得　真知　！"但是，他却大声说道："把这种信仰给我吧。"而他的父亲只是耸耸肩就转身离开了。

事情因卡尔的坚信礼而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个坚信礼是他的父亲为他准备的。他到达了宗教体验仪式的最高阶段，却惊骇地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体验到。在他和他的父亲之间裂开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对父亲的感觉是"最强烈的可悲可怜"。"我一下子理解了他的职业和生活的不幸……我看到了他是多么毫无希望地陷入了教会及其神学教义的圈套……现在我发现自己因教会而与我的父亲以及其他所有人的信仰断绝了联系。"（《回忆、梦、反思》，第64—65页）。

虽然在类似的情况下其他男孩子可能会转向同伴寻求支持，但由于卡尔·荣格没有朋友，他便转向内心拥抱他的"第2号"，即自性。在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他把自性作为像上帝那样的存在来体验，他对这个内在"他者"的笃信优先于所有外部关系。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在人们之中，而是独自和上帝在一起。

这不可避免地证实了他并不身在教会之中，而是处在隔绝之中："其他人似乎关心的都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我觉得我完全和自己所确信的东西独自在一起。我比任何时候都想要向人倾诉，但却在哪里也找不到一个联系点……为什么没有人和我有类似的体验？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是唯一的一个？"（《回忆、梦、反思》，第71页）。

当有一天他偶然听到父亲向一位熟人吐露自己对儿子的未来深感忧虑时，他便自行克服了昏厥的频繁发作。他回到学校，开始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由于没有志趣相投的人可以进行交流，他便转向了文学、哲学和宗教史。他终生都十分喜爱赫拉克利特[3]，对歌德及爱克哈特硕士[4]也是如此。叔本华（Schopenhauer）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使他激动不已，这本书连同康德（Kant）的《纯粹理性批判》给他带来的启示如此深刻，以至他说，这使他对世界和生活的态度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他找到了一个与他自己的第2号人格相等同的传奇，这不仅提升了他的内在安全感，而且赋予他一种“对人类社会的归属感”（《回忆、梦、反思》，第93页），尽管这来得有点太迟了。

学生时代

1895年荣格为巴塞尔大学所录取。他决定学习自然科学和医学，与其说这是由他的阅读兴趣所决定的，倒不如说这是由他的梦所决定的，这正是他的特性。大学生活似乎对他产生了一种解放性的影响，而他的父亲在54岁时过早的去世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当时荣格只有21岁。（他的母亲阴郁地评说道：“他的死对你来说真是及时。”）“现在我开始对所有的事物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并且去求取它。我也明显变得更容易接近和交往了”（《回忆、梦、反思》，第93页）。

荣格从赫拉克利特那里所借用的一个观念对他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个观念就是，所有的实体都有一种转变为其对立物的先天倾向。赫拉克利特把这种倾向称为*enantiodromia*（字面的意思是“与……背道而驰”）。荣格相信这是所有动力体系的特点，并且把人类的家庭视为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孩子长大成人，他们表现出一种倾向，即要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补偿父母的缺点。这种倾向在荣格自己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他的生活在很多方面可以被理解为力图补

偿他父亲的缺陷。

保罗·荣格在精神上缺乏自信力，在智识上没有好奇心，倾向于接受教条，在情感上表现出不成熟的征象，并且逃避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与他相反，卡尔却表现出精神上的勇气和智识上的严密性，无论在哪里遇到教条他都会加以抗拒，他毕生致力于完善人格发展的方法，倾向于直面所有重大的问题，即便是在这样做会招致不受欢迎或不被认可的时候。

同样是这种补偿倾向使他成为一个终生信奉神秘直觉的人（gnostic；在希腊文中写作*gnostikos*，意指“有灵知的人”）——一个致力于通过直接体验和个人启示来认识精神现实的人。正是这种对神秘直觉的探求，才使他极其重视自己的梦、幻想和幻觉，使他试图通过研究文学、哲学和宗教来理解它们，并且最终使他把精神病学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他开始了在巴塞尔大学的学习之后不久，他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梦。他梦见那是一个夜晚，他在浓雾中顶着强风艰难地前行，他的双手紧拢着一簇微弱的灯火，火苗随时都有熄灭的危险。他觉得后面有什么东西，于是就往后瞥了一眼，看见身后跟着一个巨大的黑影。他心里害怕极了，但他知道，只要他能够使这一小簇灯火在黑夜和狂风中保持闪烁，他就会安然无恙。他说：“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立刻认识到，这一黑影就是‘布罗肯幻象’[5]，是我自己在旋动的浓雾中留下的影子，因我携带的那簇灯火所造成。我还知道，这一小簇灯火就是我的意识，我所拥有的唯一光亮。我自己的思维能力是我所拥有的唯一财富，也是最伟大的财富”（《回忆、梦、反思》，第93页）。

图4　海伦妮·普赖斯威尔克

他在学生时代就明显地表现出要致力于钻研学问——他终生保持了这种献身精神，其结果是，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具备了合格条件。

他从社会隔绝中摆脱出来，加入了瑞士学生佐芬吉亚协会的巴塞尔分会，并开始发现他能够通过他的观点的力量和独创性来影响人们。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向协会提交的第一篇论文的题目是“论精密科学的局限性”，在这篇论文中他攻击了科学家们缺乏弹性的唯物主义。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出，灵魂虽然是非物质的并且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但却应该是可以通过对催眠术、梦游症和灵媒交流等现象的研究进行实证调查的。他的论文演说吸引了大批听众，并且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他决心要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检验，于是在他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参加一个年轻灵媒的降神会并将其记录下来，这个年轻的灵媒也是他的一个表妹，海伦妮·普赖斯威尔克（Hélène Preiswerk）。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所收集的那些细致详尽的观察材料，形成了其博士论文《论所谓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和病理学》的基础，这篇论文是于1902年在巴塞尔大学提交的。

他探讨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受西奥多·弗卢努瓦（Theodore Flournoy，1854—1920）的一项早期研究的影响，这项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名叫凯瑟琳·马勒（Catherine Muller）的灵媒（她的化名海伦·史密斯［Helen Smith］更为人所熟知）；她在所谓鬼魂附体状态下，详尽地讲述她数个前世的生活。弗卢努瓦得出的结论是，她所讲述的是“一些阈下想象的传奇故事”，它们是潜意识[6]心灵有创作神话故事的力量的证据。

他的表妹所做的表演有两个方面给荣格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其一是，她的“灵魂”在她看来似乎是那么真实：“我看见它们就在我面前，”她告诉他，“我能够触摸到它们，我向它们讲述我希望讲述的一切，就像我对你讲话那么自然。它们一定是真实的”（《荣格全集》第1卷，第43自然段）。其二是，当海伦妮处于鬼魂附体状态时，出现了一个相当不同的、更高贵的人格。她的“控制”灵魂——她说自己的名字叫“伊文斯”——以一种非常标准的高地德语讲话，而不是海伦妮惯常使用的巴塞尔方言。荣格得出结论认为，“伊文斯”是在海伦妮的潜意识中发展起来的成熟的成人人格。降神会提供了这一发展据以

进行的一种手段。

对荣格来说，这项研究的重要性要远大于他由此而获得的博士学位。我们从中能够发现两个观点的起源，这两个观点其后将成为分析心理学实践的核心：（1）在潜意识精神中存在的部分人格或“情结”能够以鬼魂附体、梦和幻觉等形式人格化地表现出来；（2）真正的人格发展是在潜意识层面上进行的。

这些观点反过来又产生了（1）一种治疗技术（积极想象［active imagination］）和（2）一个目的论概念（个体化［individuation］）：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个人发展的目标是整体性（wholeness），即是说，要成为一个人的环境所允许的最为完满的人。我们将在后文回到这些问题上来。

在他的医学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读到了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精神病学教科书》，这促使荣格作出了要当一名精神病学家的决定。这本书的序言对他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以至他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他不得不站起身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使他感到兴奋的是，克拉夫特-埃宾把精神病（例如精神分裂症和严重的躁狂——抑郁症等主要的心理疾病，患上这些疾病时患者的理智被剥夺了）描述为“人格疾病”，而且他声称，关于精神病学的书籍势必打上主观的烙印。

荣格告诉我们，“在一道启示的闪光中”，他把精神病学视为唯一可能的职业：“这本身就使我的两种兴趣汇聚到一起，在一条联合的溪流中挖掘它们自己的河床。这就是生物学和精神事实所共有的实证领域，我曾到处寻找，但却在哪里也找不到。终于我在这里找到了自然和精神的碰撞成为现实的地方”（《回忆、梦、反思》，第111页）。

实习年代

当荣格告诉他的导师和同学，他打算专门研究精神病学时，他们

都很震惊，因为他们觉得他是在浪费自己的才能：精神病学是医学中最不受尊敬的专业，而他们相信荣格本来会成为一名大有前途的内科医生。“我的旧伤，那种自己是一个外人、与别人相疏离的感觉，又开始痛起来”（《回忆、梦、反思》，第111页）。但是，在1900年底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医学学位之后，他很幸运地被位于苏黎世的伯格尔斯利精神病医院所录用，成为尤金·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1857—1939）的一名助手；尤金·布洛伊勒是他那个时代杰出的精神病学家之一，注定会作为精神分裂症这个术语的创立者而被载入史册。伯格尔斯利医院享有苏黎世大学精神病诊疗所的盛誉，荣格把他在那里度过的几年视为非常宝贵的实习期。布洛伊勒很快便认识到荣格的才华，并尽力促进他的事业发展，把他提升为自己的副手，让他担任门诊部的主管，还在苏黎世大学给他安排了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讲师的职位。更重要的是，布洛伊勒让他研究高尔顿的字词联想测验。这项研究为荣格在心理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也赢得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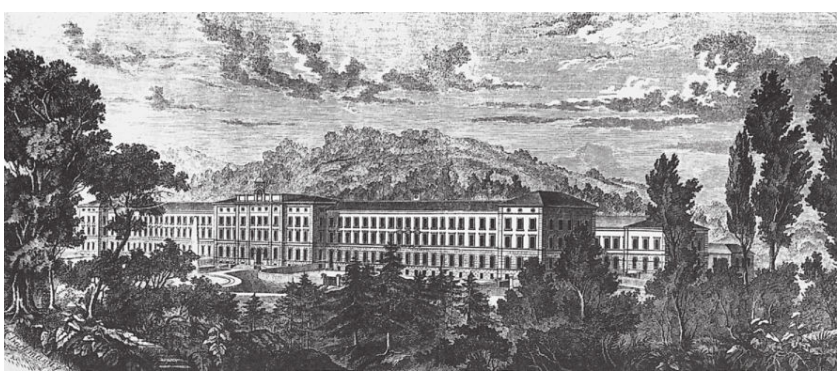

图5　伯格尔斯利精神病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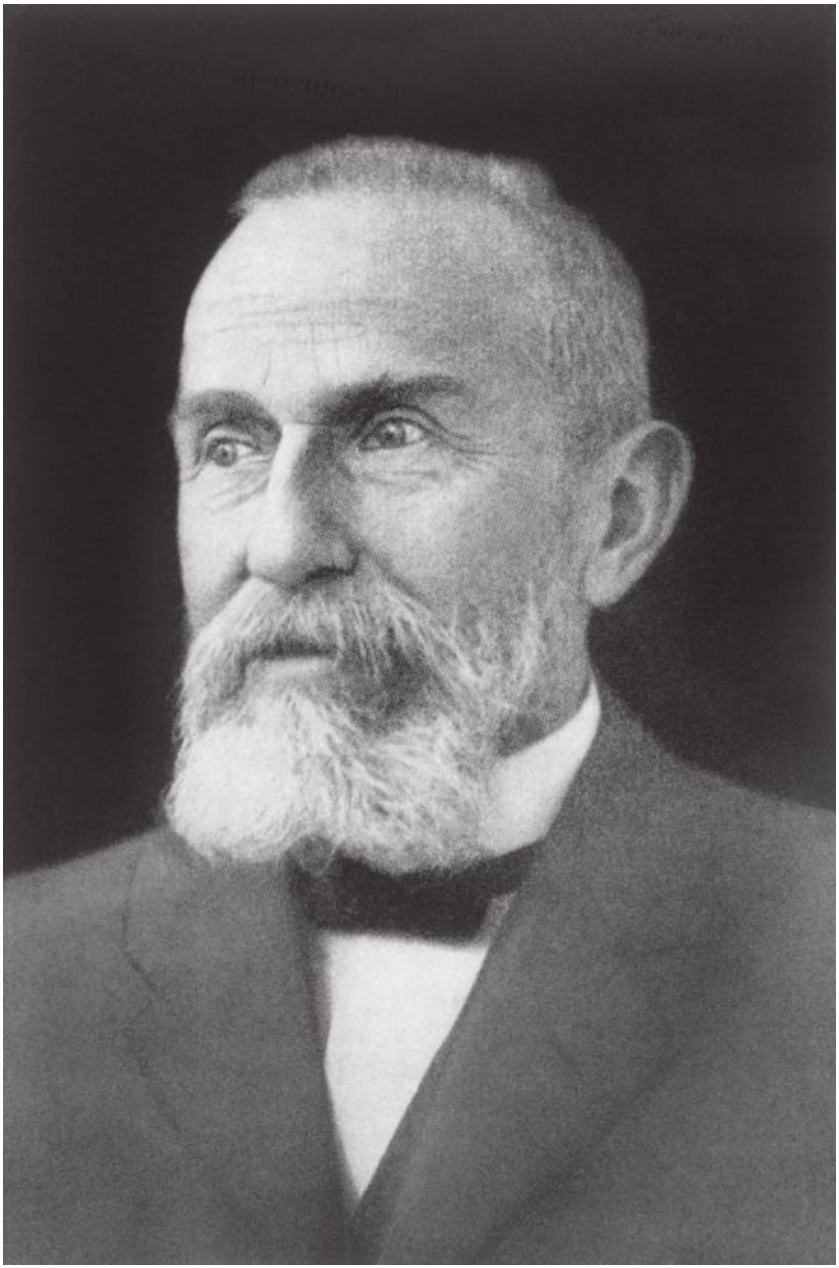

图6　尤金·布洛伊勒

所有研究心理学的学生都很熟悉的字词联想测验是弗朗西斯·高尔

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1822—1911）设计的，并且被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加以发展。测验的步骤很简单。主试把认真准备好的一个词表上的一系列单词向被试读出来，读出每个单词后稍微停顿一下，让被试用他心里想到的第一个单词进行反应。把反应词连同反应时间一起记录下来，反应时间指的是引出反应所花费的秒数。当所有的单词都念完之后，再重复这个程序，要求被试像上一次那样用同样的单词进行反应。

在荣格之前曾做过这个测验的一位研究者西奥多·齐亨（Theodor Ziehen）已经证明，当刺激词与被试心灵中某种不愉快的或引起不安的概念相关时，就会出现反应时间延长。当所有在某一被试身上导致延时反应的单词都被收集在一起时，有时候就能够在它们当中发现一系列相关的概念——齐亨称之为“一种受情绪指导的表述情结”。这个发现使荣格特别感兴趣，因为他在研究海伦妮·普赖斯威尔克的鬼魂附身状态时已经警觉地注意到，存在着一些部分人格，它们是由不相关联的潜意识成分组成的，这些成分与法国心理学家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1859—1947）描述为“下意识的固定观念”的成分很相似；1902年荣格曾离开伯格尔斯利休假，在巴黎师从让内短期学习。荣格把这些成分与齐亨的“情结”相等同，而当他读到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1900）一书时，他在“被压抑的愿望”和“创伤性记忆”中再次把它们识别出来，弗洛伊德认为，正是它们引发了神经症的症状和梦的内容。

荣格说，支配其研究兴趣的是一个他急切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在精神病人内部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以前或自那时以来的大多数精神病学家不同，他对精神分裂症病人实际说的和做的事情给予高度的关注，并且证明了他们的妄想、幻觉和动作不是简单的“疯狂”，而是充满了心理学的意义。例如，他发现，一位老妇人在伯格尔斯利住院的50年时间里一直在做缝补的动作，仿佛是在缝补鞋子，而就在她生病之前，她被情人抛弃了：正如荣格所发现的那样，他是一个补鞋匠。

虽然荣格相信精神病现象与病人血液循环中出现了生物化学毒素

有关，但他论证说，可以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把精神分裂症理解为“力比多的一种内倾”（an introversion of libido）——力比多从外部现实世界中退缩，投入到进行神话创作、幻想和梦的内部世界中。他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就是一个在醒觉的世界中的做梦者。1907年他在《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中发表了他的观察，这就使他作为一名研究型精神病学家已经响亮的名头更加熠熠生辉。

与弗洛伊德的友谊

由于认识到他的实验发现为弗洛伊德的压抑（repression）理论提供了客观依据，荣格在1906年把他出版的一本书《字词联想研究》送给他。弗洛伊德热情的反馈促使荣格于1907年3月到维也纳与他会面。他们相处得如此愉快，以至他们毫无间断地交谈了13个小时。毫无疑问，他们在智识上相互迷恋；他们之间的友谊之花盛开了，其后主要通过通信而保持下来，持续了将近6年。

和布洛伊勒一样，弗洛伊德也对荣格的活力、热情和投入精神印象深刻。他变得非常喜爱他，认为他是“迄今为止加入到我这里来的最能干的助手”，并把他看作自己作为精神分析运动领导者的最有可能的接班人。虽然当他们见面时弗洛伊德只有50岁，但他却有点疑病症，有一种迷信的恐惧，认为自己只能再活12年。因此，在他眼中，保证“接班”是最优先考虑的事情，而且表面看来，荣格是担任这个角色最出色的人选。他有一流的心智，是在欧洲最受推崇的医院工作的一位成功的精神病医生，而或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是维也纳人，也不是犹太人。弗洛伊德敏锐地觉察到反犹主义的危险，它和公众对他关于婴儿期性欲观点的厌恶结合在一起，就可能导致对精神分析的普遍拒绝甚至压制；他希望，有一个像荣格这样的瑞士基督教徒作为追随者，能够有助于挽救他的运动摆脱这种命运。

图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此外，荣格能够对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作出重大贡献。不仅他的字词联想实验为潜意识情结的存在和力量提供了不容怀疑的实证证据，而且他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把精神分析的概念带入到弗洛伊德鞭长莫及的领域。（弗洛伊德接受的是神经病学家的训练，几乎没有精神病学的经验，只是作为一名临时代理医生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

过很短时间。）再者，荣格对神话学和比较宗教的研究热情感染了弗洛伊德，尽管他们的研究存在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因为这两个人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天差地别的。

就荣格这方面而言，获得弗洛伊德的友谊既是一种职业的渴望，也是一种个人的渴望。在这个年长的、更有经验的男人身上，他发现了一位良师益友——一位杰出的同事，代表着具有智识勇气的父亲形象，而这种勇气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位持怀疑态度的神学家所没有的。两个人都明白这一点。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不久荣格写道："我享受您的友谊，不是作为两个同等的人之间的友谊，而是父亲和儿子那样的友谊。"弗洛伊德在后来的一封回信中正式宣布荣格是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他的"皇太子"。实际上，弗洛伊德需要一个"儿子"和荣格需要一个"父亲"的愿望同样强烈，但是，弗洛伊德想要的这种儿子是一个愿意无条件地遵从他的权威、毫无更改地使他所规定的教条和原则永久存在的儿子。在荣格这一方面，他需要的是一个父亲形象，通过他的影响使自己能够克服青少年时期的疑虑，并发现自身男子汉的权威。虽然荣格因弗洛伊德的认可而满心欢喜，并为被视为他的一个无愧的接班人而感到荣幸，但他知道，他不可能完全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他也不可能把他的智识追求牺牲在一套教条上，那正是他父亲的所为。尽管如此，他默认了弗洛伊德的意愿，在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于1910年成立时担任了第一任主席，并且成为了第一份精神分析杂志《精神分析年鉴》的主编。

图8　1911年国际精神分析大会。荣格戴着一个很大的领结站在中间，他的左臂前方就是爱玛·荣格。托尼·沃尔夫隔着两个人坐在爱玛的左边

随着时间的流逝，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愈来愈难以掩饰。弗洛伊德有两个基本假设是他所难以接受的：（1）人类的动机全都是性欲的；（2）潜意识心灵完全是个人的，是个体所独有的。荣格发现，弗洛伊德思想的这些方面和其他某些方面都是还原论，太狭窄了。比起把精神能量（或者像弗洛伊德所称的力比多 ）看作是完全性欲的，荣格更愿意认为它是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生命力量”，性欲只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再者，荣格相信，在弗洛伊德所假定的被压抑的愿望和创伤性记忆的个人潜意识之下，还有一层更深刻和更重要的东西，他打算称之为集体潜意识 （collective unconscious），它

潜在地包含着人类全部的精神遗产。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这一心灵的古老基础的存在就曾给他最初的暗示，当时他即认识到，在他的梦中有一些东西来自于他自身之外的某个地方。当他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妄想和幻想，并且发现它们包含着一些象征和意象，这些象征和意象在全世界的神话和童话故事中都曾出现过时，它的存在便得到了证实。他得出结论认为，一定存在着一个所有人都共有的精神的动力基础，每一个人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建构其个人生活经验的。

但是，每当他试图向弗洛伊德表达这些观点时，这些观点却都要么被归因于年轻没有经验，要么被视为是在进行抵抗（resistance）。“当你和我如此接近的时候，就不要偏离我太远，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了，我们可能终有一天被相互离间，”弗洛伊德告诫他；他又补充说：“我的倾向是，对待那些作出抵抗的同事就像我们在相同的情境下对待病人一样。”荣格对这种屈尊俯就的态度很是恼火，而由于这两个人的性格使然，他们之间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吵。1911年荣格的《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第一部分的发表预示着它的到来（荣格给弗洛伊德写信说：“鸡蛋要让自己比母鸡更聪明，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尽管如此，鸡蛋里的东西仍然必须找到钻出来的勇气。”），而1912年，随着第二部分的发表，争吵终于爆发了（在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中荣格引用了琐罗亚斯德[7]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永远只是做一个学生，那是他对老师的糟糕的回报”）。在这本著作以及1912年9月在纽约所作的一系列讲座中，荣格清楚地阐明了他离经叛道的看法，即力比多是一个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要大得多的概念，它能够以“具体化的”形式在普遍的象征或“原始的意象”中出现，而这些象征或意象在人类的神话中是显而易见的。荣格将注意力特别指向英雄的神话，把他和龙——怪物的战斗这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解释为青少年的自我试图从母亲身边解脱出来的斗争。这把他引向了对俄狄浦斯情结和乱伦禁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与弗洛伊德提出的解释大相径庭。按照荣格的观点，一个孩子之所以对母亲产生依恋，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因为她是乱伦激情的对象，而是因为她是爱和关怀的提供者——这一观点开了理论革命的先河，大约40年后

英国心理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才发动了这场革命。荣格进而认为，乱伦的禁忌是原始的：它是先验地存在的，不是像弗洛伊德所坚持的那样，因父亲禁止男孩子贪求母亲而产生。俄狄浦斯的渴望，当它们出现时，是乱伦禁忌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荣格还论证说，俄狄浦斯情结这一现象并不像弗洛伊德所宣称的那样普遍。

在把力比多重新界定为未分化的精神能量时，荣格的眼光超越了心理学，注意到了在物理学中存在的相似之处，特别是罗伯特·迈耶（Robert Mayer）提出的能量转换理论。荣格论证说，和所有物理现象一样，所有的心理现象都是能量的表现形式 ，这给象征提供了其动力转换的力量。我们将在第五章进一步探讨这种倾向。

这些观点的发表引起了他和弗洛伊德的严重不和，从而导致他们的友谊在1913年初正式终结。荣格辞去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和《精神分析年鉴》主编的职务，辞去了苏黎世大学的讲席职位，并且从精神分析运动中撤离出来。他再一次完全独自一人了。

他们的友谊终止的方式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对荣格来说，生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潜能，遵循自己对真理的感悟，并成为一个本身完整的人。正如他后来所说，这就是个体化 的目标。如果他想要对自己守信，他就不得不 走自己的路：要他花费自己的一生在一个由两个人组成的乐队中充当副手，对他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至于弗洛伊德，他绝对相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使他对不同见解如此不能容忍，以致于通常正是他引发了不同见解。他是独裁者和受虐癖者的一个奇怪的结合体：正如他有一次向荣格所承认的，他的情感生活要求存在一个亲密的朋友和一个可恨的敌人，而他在同一个人身上遇到这两者的情况经常发生。这一模式在他童年时期与其外甥约翰（John，碰巧和他年龄一般大）的关系中，以及在他与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的友谊中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和弗利斯的友谊支撑他度过了那段“非常孤独”的时期（1894—1899，当时他正在进行自我分析和建立精神分析的原则）。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友谊、争吵，以及后来荣格脱离精神分析，只是许多这类痛苦的事件之一。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Breuer）、阿德勒（Adler）、斯特克尔

（Stekel）、迈纳特（Meynert）、西尔贝雷（Silberer）、陶斯克（Tausk）以及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关系也是同样的命运。赖希患上了一种精神病，他只是短暂地康复过一段时间，而西尔贝雷和陶斯克最终都自杀了。对荣格来说，这一事件的后果也几乎是灾难性的，因为他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定向障碍状态”，时而濒临精神病的边缘，这种状况持续了4到5年。虽然他深受困扰，但事实证明这也是一段高度创造性的时期，荣格称之为他“与潜意识的对抗”，这既是由于他的家庭生活的变动所引发的，也是由于他失去了与弗洛伊德的友谊。

婚姻生活

1903年，荣格与爱玛·劳申巴赫（Emma Rauschenbach，1882—1955）结婚，她是一个富有的企业家的女儿。在1904到1914年期间，他们生了5个孩子：4个女儿和1个儿子。最初他们住在伯格尔斯利的一间公寓里。后来在1908年，他们搬到了库斯纳赫特湖边自己设计和建造的一座漂亮的房子里，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图9　荣格和他的妻子以及他孩子中的4个，1917年

爱玛·荣格是一个迷人、优雅的女人，在丈夫的鼓励下，她后来成为了一名颇具才华的心理分析学家、讲师和作家。她是一个贤妻良母，而且毫无疑问，荣格终生都很爱她。但是，正如他向弗洛伊德所承认的，他认为在自己身上存在“一夫多妻的成分”，宣称“在我看来，一桩美满婚姻的先决条件就是允许不忠”（《弗洛伊德与荣格的书信集》，第289页；1910年1月30日）。

图10　卡尔和爱玛·荣格，1903年

荣格认为，对一个男人来说，有两种女人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他需要一个妻子来营造他的家庭，并且生养他的孩子；另一方面，他需要一个精神的伴侣（*femme inspiratrice*）来分享他的幻想，为他最伟大的著作提供灵感。这种主张很可能起源于他自己的阿妮玛（anima，他的潜意识中的女性情结）的分裂，而这一分裂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源自他4岁的时候，当时他和母亲分离，由父亲教区的一位年轻的女仆照顾。后者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他80多岁的时候他仍然记得她：

> 她长着一头黑发，肤色暗黄，和我的母亲大不相同。即使是现在，她仍然在我的眼前，她的发型轮廓、她的喉咙、她那黑色素沉着的皮肤，以及她的耳朵。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似乎都很陌生，但又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这类女孩后来成为我的阿妮玛的一个成分。她传达出的那种陌生、却又似乎早已相识的感觉，是后来对我来说象征着女性的全部本质的那个形象身上的一个特点。（《回忆、梦、反思》，第23页）

这个临时的保姆是母性的附属物、精神的伴侣、对其心灵孤旅的

慰藉的第一次具体体现。尽管他对作为妻子的爱玛非常满意，但他的阿妮玛仍然要求出现另外一个爱的伴侣和知己的女友，他将与她共享他最近做的梦和最新的想法。至少有两次，这一诱人的形象以病人的面目出现在他的面前，首先是与萨比娜·施皮尔莱恩（Sabina Spielrein）的短暂关系（她是荣格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成功治疗的第一个病人），而他和安东尼娅·沃尔夫（Antonia Wolff）的关系更为持久，她成为他终生的密友和同事。此外，在荣格周围聚集了很多女性崇拜者（苏黎世的智者们不恭敬地称之为*Jungfrauen*），她们来到苏黎世跟随他进行分析和研究，却再也无法使自己离开。仿佛他早年与母亲的分离教导了他，使他决不可能信任一个女人的爱，而必须总是在许多女人中寻求安全。

可以理解的是，爱玛对这种事态感到很不高兴，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必需而且也学会了忍受。荣格和托尼·沃尔夫的私情始于1910年的某一时间。当他坚持带着她，连同爱玛一起，参加1911年在魏玛举办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大会时，引起了一阵流言蜚语。夫妻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在这些争吵中荣格拒绝爱玛让他放弃婚外情的要求，坚持认为托尼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没有她根本不行。既然不可能离婚，爱玛就必须适应这种情况，并且把托尼作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来接受。看起来是爱玛向他让步了，这既是由于决心要保住她的婚姻，也是由于害怕他神志崩溃。当然，对两人来说，这都是一段创伤性的时期，并且完全可能是从1913年底起长期折磨荣格的心理障碍的一个诱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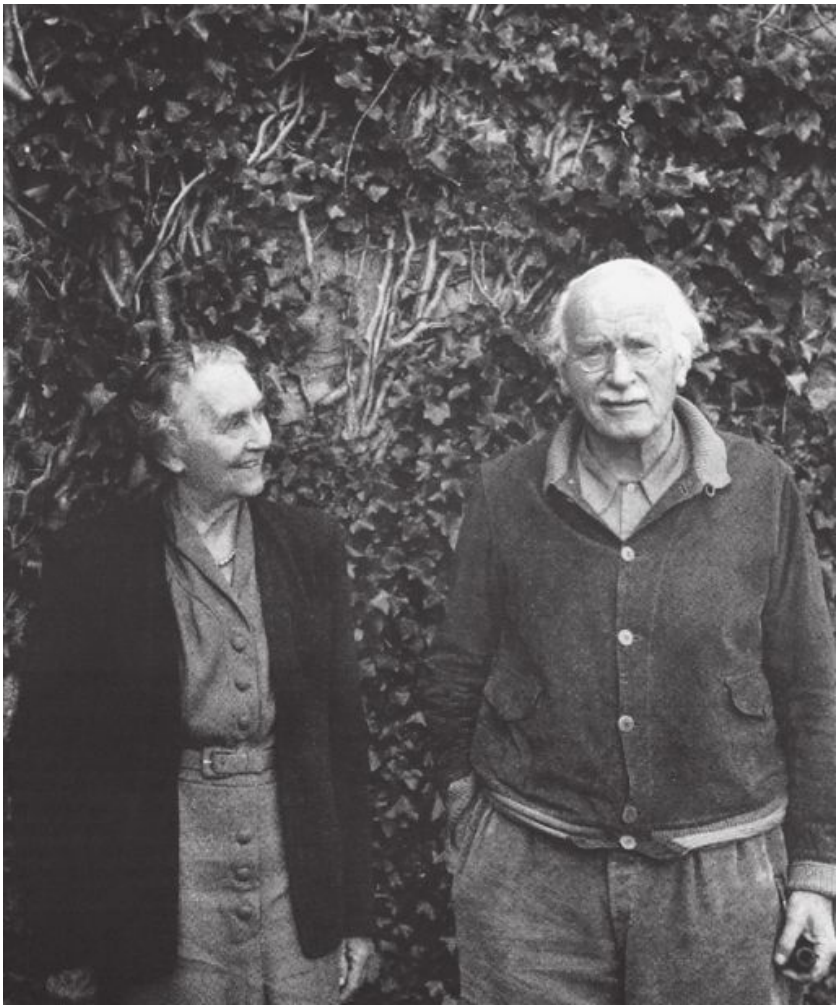

图11　卡尔和爱玛·荣格，1953年

与潜意识的交锋

这开始于1913年秋天一个反复出现的可怕幻象，在这个幻象中，他看见整个北欧被一片血海所淹没。随后他做了一些梦，在这些梦中，他梦见整个欧洲都被一个北冰洋的巨浪所冻住，还梦见当日耳曼民族的英雄齐格弗里德〔8〕驾着一辆两轮战车经过的时候，他开枪打

死了他。“一条不停幻想的溪流被释放出来……我生活在无休止的紧张状态中；我经常感到好像有巨石要翻落到我身上。一场雷暴接着一场雷暴”（《回忆、梦、反思》，第170—171页）。

有时这种障碍是如此的严重，以致把他带到了疯狂的边缘。他像孩子般在花园里玩耍，听到头脑里有讲话的声音，并且到处走动和想象中的人物交谈；有一次，他相信他的房子里挤满了死人的魂灵。不过，这也显示出他不同寻常的特质，因为他将这一灾难视为仿佛是在他自己身上 所做的一项实验 ：一个精神病学家正在经历一场崩溃，由此提供了可供研究的宝贵机会。他能够以第一手资料来研究这一完整的体验，然后用它来帮助病人。

我正在投身的这项危险的事业不只是为了我自己，而且是为了我的病人，这个念头帮助我度过了好几个关键阶段……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一个精神病学家，在我的实验的几乎每一步都遇到了在精神病中和在精神错乱者身上发现的同样的精神材料。这是潜意识意象的储藏之所，而正是这些意象造成了精神病人神志的错乱。但是，它也是神话想象的发源地，这种神话想象已经从我们的理性时代消失了。（《回忆、梦、反思》，第172、181页）

杀死齐格弗里德的梦向他暗示，体现在这个英雄人物身上的、他的第1号人格所认同的那些意识理想不再恰当了，不得不被牺牲掉，“因为有一些比自我意志更高级的事物，一个人必须服从这些事物”（《回忆、梦、反思》，第174页）。他转向内部与他的第2号人格相遇，使他在那里发现的那些强有力的能量得到自由发挥。

为了抓住这些幻想，我经常想象一种急剧下降。我甚至作过几次尝试，想要下降到最底层。可以说，我第一次到达的是一个大约1000英尺深的地方；第二次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万丈深渊的边缘。这就像是到月球的一次旅行，或者是下降到空寂的空间。首先出现的是一个火山口的意象，我当时的感受是，我来到了死者的国度。这种气氛是另一个世界的气氛。（《回忆、梦、反思》，第174页）

很久以后，这种抓住幻想的方法在他的分析实践中被作为一种治

疗手段而得到使用。他称之为积极想象 ，而对积极想象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灵媒表妹海伦妮·普赖斯威尔克的实例。急剧下降类似于进入鬼魂附体状态，在此期间潜意识人格相当清晰地出现，使他能与之交谈。从根本上说，他所发现的是一种技能——一种下降到地下世界、同时又保持着完全的意识的技能，就像奥德修斯、赫拉克勒斯或俄尔普斯那样。在这些旅程中他经常遇见两个人物，一个是名叫萨洛梅的年轻漂亮的女子，一个是长着白胡子和一对翠鸟翅膀的名叫菲利蒙的老人。荣格开始把这两个人物看作是两种原型的具体化：永恒的女性原型和智慧老人原型。

他和这些人物的谈话使他获得了重大的顿悟，即在精神中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意识的意向产生的：它们有自己的生命。

菲利蒙代表一种非我的力量。我在幻想中与他交谈，他所说的事情我从未有意识地思考过。因为我清楚地观察到，讲话的人是他，而不是我。他说，我对待思想就像是我自己产生了它们一样，但是，依照他的看法，思想就像是森林里的动物，或房间里的人，或天空中的鸟；他又补充说："如果你看到房间里有人，你不会认为是你制造了这些人，或者你要为他们负责。"是他教会了我精神的客观性、精神的现实性。（《回忆、梦、反思》，第176页）

所谓"精神的现实性"，荣格的意思是，他把精神理解为一种先验的自然事实，一种除了它自身之外不能还原到任何因素的客观现象。"精神的存在是我们能够直接 认知的唯一的存在范畴，因为只有当事物首次作为一种精神的意象出现时，它才能被认知"（《荣格全集》第11卷，第769自然段）。就像"伊文斯"之于海伦妮一样，在菲利蒙身上存在着荣格自己的成熟潜能。"有时候他在我看来似乎是相当真实的，仿佛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在花园里来来回回地和他在一起，在我看来他就是印度人所谓的宗教教师"（《回忆、梦、反思》，第176页）。与菲利蒙的这些谈话远非是毁灭性的精神病现象，而是帮助荣格发现了一种新的安全感。在失去了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这两个他的外部父亲形象、毁灭了以齐格弗里德的形象表现出来

的他们的英雄式代表之后，现在他在菲利蒙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内部权威。此外，荣格注定会发展出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格，菲利蒙则是这一人格的第一种清晰的表现形式——即库斯纳赫特的智慧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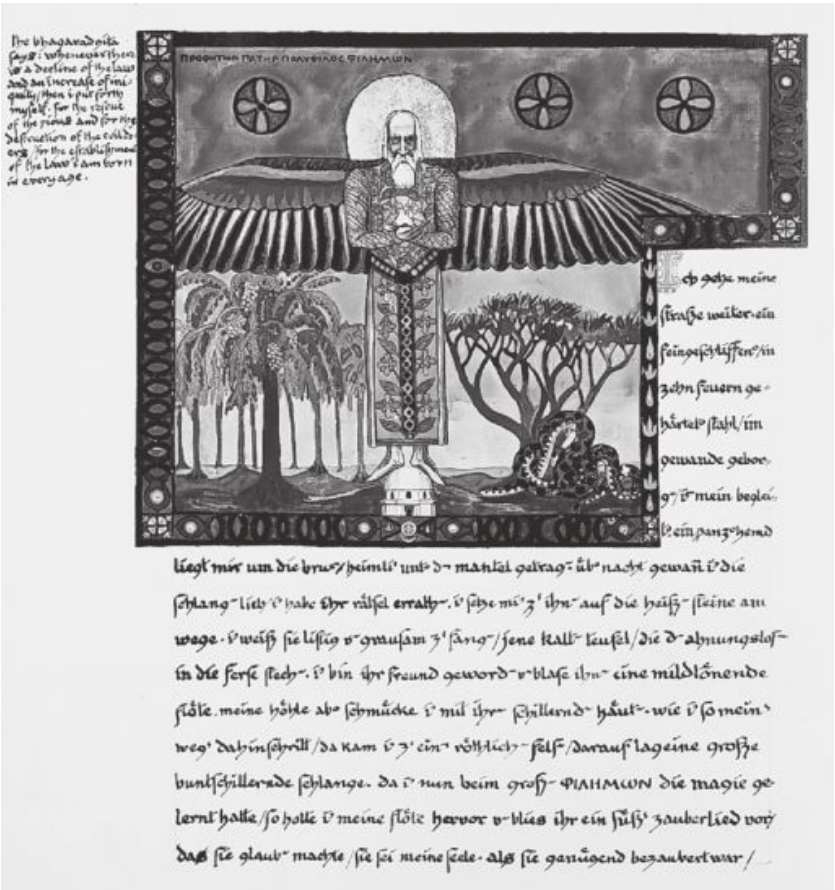

图12　菲利蒙

这些体验没有使他陷入完全的精神失常，这大概可以归因于他对这些体验所采取的态度：他说，他非常仔细地记录下在他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先是记录在被称为黑皮书的6本黑色书皮装订的笔记本中，后来他又把其中内容转抄到红皮书中，那是一本红色皮革装订、花体书写、饰以插图的对开本集子。

有一天，当他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听见一个女性的声音说道，他所做的并不是科学，而是“艺术”。他听后大为恼火，反驳说：“不，它不是艺术！相反，它是本性。”他对认为他所从事的是一种艺术活动的观点极为愤慨，因为这暗示他的体验是有意识地谋划的，而不是像他所认为的那样是从潜意识中自发地爆发出来的。但是，他对这个具有使他心烦意乱的力量的内在女人的存在作了深刻的反思，并得出结论认为，她一定是他的灵魂的化身。“后来我开始认识到，这个内在的女性形象在一个男人的潜意识中扮演着典型的或原型的角色，我称她为‘阿妮玛’”（《回忆、梦、反思》，第179页）。

在1918年停战协定签订后的几个月里，整个危机自行解除了，当时荣格担任一个英国人拘留营的营务军官。他的职责并不繁重，于是他每天早上会花上一段时间画一系列自发的图画，这些图画似乎表达了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后来他认识到，这些图画很像是古代的曼荼罗。曼荼罗在世界各地都可见到，是整体性或完整性的原始意象。虽然它们是圆形的，但它们通常会把某个含“四”的表征结合进来，例如一个十字形或一个正方形。它的中心通常包含着一个神性的所指。荣格开始把这些理解为自性的表征，人格中核心的核心，他有时称之为“原型的原型”。他发现，他的曼荼罗图画使他能够赋予自己每天所经历的精神转化以客观的形式。“我清楚地感到它们是某种核心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通过它们而获得了一个活生生的自性概念”（《回忆、梦、反思》，第187页）。

最后，他做了一个对他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的梦。他发现自己身处利物浦（Liverpool，字面的意思是“生命的池塘”，pool of life），这个城市的各区呈放射状排列，形成一个正方形。中间是一个圆形的池塘，池塘的中央有一个小岛。岛上阳光照耀，它周围的一切却都笼罩在雨水、雾气、烟雾和光线朦胧的黑暗之中。岛上只有一棵树，是一株木兰，正盛开着红色的花朵。虽然这棵树矗立在阳光之下，但荣格却觉得，与此同时，它本身就是光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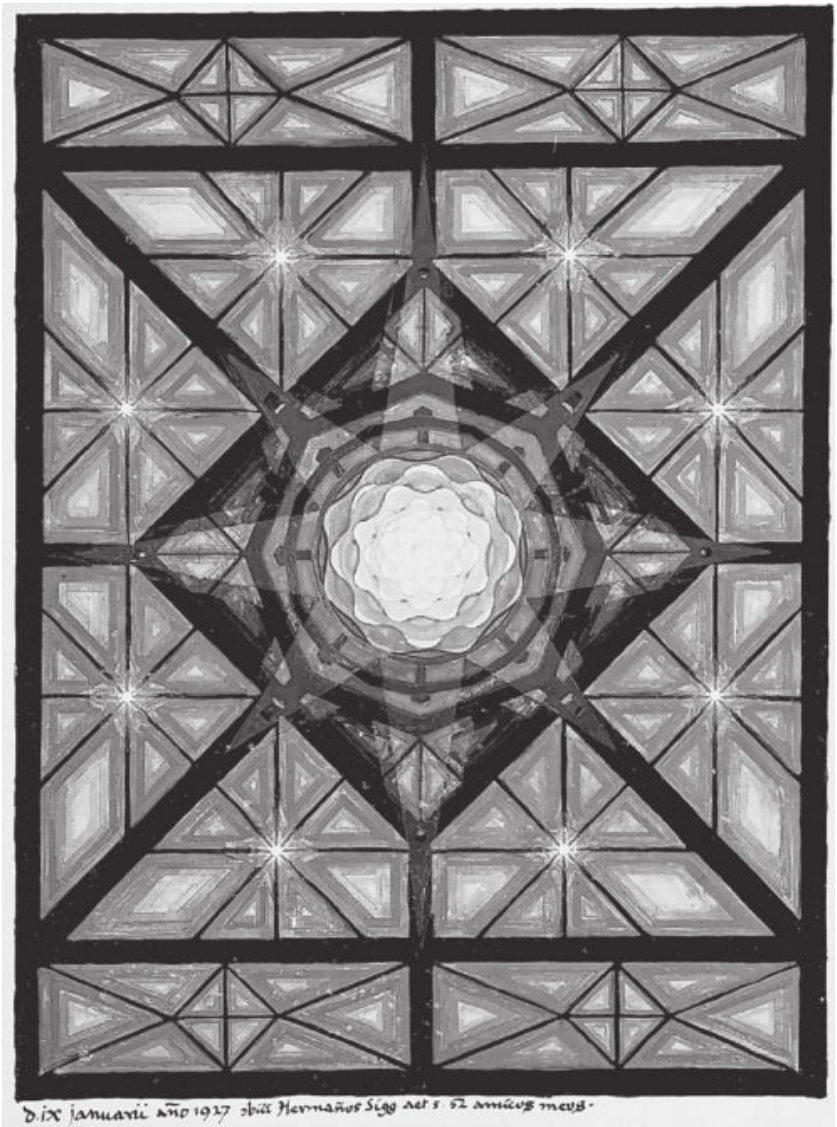

图13　荣格的曼荼罗，“永恒之窗”

这似乎概括了他所经历的一切，而且象征着他所到达之处。“当我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时候，我知道我一头栽入了未知领域。在弗洛伊德之外，我毕竟一无所知；但我却迈步走进了黑暗之中。当发生了这种情况时，这样一个梦的出现让人觉得它简直就是一项恩

典”（《回忆、梦、反思》，第190页）。

当这一切都结束之后，他把他做“实验”的这些年视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在这些年中所有基本的东西都被决定了”（《回忆、梦、反思》，第191页）。这一时期决定了他发展的未来进程，为他提供了其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心理治疗领域的基础。“然后所有的一切就开始了；以后的细节只是从潜意识中爆发出来的、最初一股脑儿地倾泻到我头上的材料的补充和阐明。它是可供终生研究的原材料（*prima materia*）”（《回忆、梦、反思》，第191页）。

创造性疾病

在其生命中的这段关键时期，荣格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此人们一直存在很多争论。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出自亨利·埃伦贝格尔（Henri Ellenberger）；在其百科全书式的《潜意识的发现》（1970）一书中，他认为荣格经历了一种“创造性的疾病”，类似于弗洛伊德在同一时期（即在38到43岁之间）所患的疾病。

这种疾病倾向于在一段时间的强烈智识活动之后发作，类似于一种神经症，或者在严重的情况下，类似于一种精神病。当患者还在与可称为发病前奏的那些问题作斗争时，他会变得越来越深信外界的帮助对自己不起作用，越来越与社会相隔离，并且更深刻地转向他自身。这种障碍能持续4到5年。康复期会自动地出现，而且和欣快症以及人格的转变相联系。主体会觉得，他已经获得了对重要真理的洞见，并且相信，他有责任与世人一起分享这些真理。因此，荣格评论道：

> 在意象中有一些东西不仅和我自己有关，而且也和许多其他人有关，正是在此时，我才不再只属于我自己，不再有权利这样做。从此时开始，我的生命属于大多数人……正是在此时，我才将自己奉献给精神。我爱它也恨它，但它是我最宝贵的财富。（《回忆、梦、反思》，第184页）

荣格的体验类似于萨满[9]和宗教神秘主义者，以及一些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的体验。凡·高（Van Gogh）、斯特林堡[10]、尼采（Nietzsche）、西奥多·费希纳（Theodor Fechner，他是心理物理学的创立者），以及灵智学者鲁道夫·斯坦纳（Rudolph Steiner）都是这样的例子。荣格自己把它比作奥德修斯的耐奇亚（*Nekyia*，对冥国的拜访），它在米勒小姐（Miss Miller）的幻想中出现过预示（这构成了他的《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一书的基础），在海伦妮·普赖斯威尔克和海伦·史密斯的鬼魂附体的表演中也有过预示。在米勒小姐的病例中，荣格首先发现的是一种“对世界的拒绝”（与力比多的一种内倾和退行有关），随后跟随着一种“对世界的接受”（与力比多的一种外倾和对外部现实更成熟的适应有关）。这种下降到冥府又返回的主题在史诗《吉尔伽美什》、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和但丁（Dante）的《神曲》中也出现过。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最有趣的类比是19世纪90年代弗洛伊德的神经崩溃；他通过自我分析将它治愈了，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对自由联想和梦的分析的运用、性欲在神经症疾病的病原学中所起的作用、童年期力比多发展的阶段、力比多的固着和退行、对被禁止的愿望的压抑等等。

当他们康复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发表了重要的和原创性的著作：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是在1900年他45岁的时候问世的，而荣格的《心理类型学》是1921年他46岁的时候出版的。由此可见，在弗洛伊德与荣格见面之前，他的大部分观点就已经形成并且固定下来了，而荣格的大部分观点是在他鼓起勇气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以及遭受了他的损失所带来的痛苦后果之后形成的。如果说，他们6年的友谊对荣格来说是一个发现和准备的时期，那么，对弗洛伊德来说，这则是一段收缩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对那些想要修正其观点的人越来越不能容忍，在他看来，这些观点已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了。

当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走进心灵的生态学》，1973）把荣格的耐奇亚描述为一种认识论的（epistemological）危机时，他并没有说错；在这个危机期他扔掉了

弗洛伊德的还原论，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础。他带着从创造性疾病中摆脱出来而获得的能量，转向了对神话、哲学和宗教的研究，期望在其中找到和他所体验到的相类似的东西。《心理类型学》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在这本书中，他开始把自己关于精神结构和功能的观点进行组织，考察他（以及阿德勒）与弗洛伊德的基础差异。他论证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开始采取习惯的态度，这些态度决定了他们的人生体验。通过对文化史的广泛考察，他得出结论认为，有两种明显的基本心理倾向，他称之为内倾的 和外倾的态度 （introverted and extraverted attitudes）。内倾的特点是兴趣向内部运动，离开外部世界转向主体的内部世界，外倾的特点则是兴趣向外部运动，离开主体转向客观现实的外部领域。荣格相信，他和弗洛伊德的差异源自他自己的内倾与弗洛伊德的外倾的截然对立。

这一解释确实有其正确性，但它对其他同样重要的因素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两个人是大相径庭的背景的产物。弗洛伊德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犹太人，在孩提时代就受到一个年轻漂亮的母亲的溺爱，他接受的教育传统是进步性的，这把他自然而然地引入科学研究；荣格则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新教徒，他患有抑郁症的、间或缺场的母亲使他怀有不安全感，这令他沉浸在神学和浪漫派的唯心主义之中。因此，毫不奇怪，弗洛伊德是一个怀疑论的经验主义者，他相信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意义，而荣格则坚持致力于精神生活的研究，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没有普遍的有效性。

他们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弗洛伊德的习惯倾向是向后看，这使他对事物的起源表现出一种还原论的关注，而荣格则倾向于向前看，这使他对目标有一种适应性的关注。在他们对艺术和心理疾病的各自看法中，这种区别是很明显的。1920年，荣格写了一篇文章，在历数他和弗洛伊德的分歧时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哲学批评帮助我发现，每一种心理学——我自己的也包括在内——都有一种主观忏悔的特点。"他写道："即使是当我正在处理实证研究的数据时，我也一定是在讲述我自己"（《荣格全集》第4卷，第774自然段）。弗洛伊德也同样如此。

个体化：自性的实现

在生命的其后岁月里，荣格专注于个人转化与成长的动力学研究。他认为，发展是超出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延续至整个中年期，而且进入老年期的；他是20世纪坚持这种观点的少数几位心理学家之一。他将这一终生发展的过程称之为个体化，并且相信，如果一个人能以荣格自己在其耐奇亚过程中所发现的那种方式来探索和直面（confront）潜意识，就会使这一过程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他所谓直面潜意识是什么意思呢？他把潜意识体验为活生生的、神圣的存在，是每一个清醒（和睡眠）时刻永恒的伙伴。在他看来，人生意义的秘密就在和这种通神意的力量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的方式就是认识它。对这个秘密，他的自传的第一句话再清楚不过地提起了我们的注意："我的生命就是潜意识自我实现的经历。"我们怎样才能使潜意识自我实现呢？通过赋予它表达的自由，然后考察它所表达的是什么。这样，自我实现就要求精神转向它自身并且直面它所产生的一切。在进行这个实验时，荣格再次把自己体验为一分为二——一方是意识的主体（subject），它体验、记录、力求生存，另一方是潜意识的他者（other），在他身上强行出现的人格和力量中表现出来，要求他予以关注和尊敬。随后便产生了两种结果：意识的提升，和对精神作为一个真实、客观的实体的认识。

结果证明，他本人就是自己理论的活广告。许多人见证了他步入中年之后所发生的改变。那个离群、敏感的年轻人逐渐让位于后期智慧而又和蔼的成熟形象。虽然仍旧喜欢离群索居，但他却形成了一种与各界人士相处的本领，而那些来向他咨询或拜访他的人不仅钦佩于他的智慧和心灵的特质，而且对他谦恭有礼的言辞和幽默印象深刻。正是他所达到的个体化的程度吸引了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苏黎世，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电视上看到老年的他时为之倾倒，并且令人们对他的兴趣在他去世后有增无减。

图14　波林根的塔楼，1956年

他从未停止对潜意识的探究，也从未停止对他在“直面潜意识”期间所收集的材料的研究。1922年，他在波林根购买了一块地，就在美丽的苏黎世湖湖边；在这里他建造了一座结构简单的塔楼，并在其后的日子里在塔楼周围数次扩建，把它变成了一个建筑上的曼荼罗。在这一氛围舒适的石头建筑群的中心，他保留了一个只有他才允许进入的房间，在那里他完成了关于他和他的心理学的最重要的研究。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他写道：“在波林根我处在我的真实生活之中，我成为内心最深处的我自己”（《回忆、梦、反思》，第214页）。这座塔楼就是他童年期幻想过的那个带有秘密实验室的城堡主楼的真实实现。

在他中年生活的危机之后出现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发现”了炼金术。这事发生在1927年，当时汉学家里夏德·威廉[11]（Richard Wilhelm）送给他一本中国道家关于炼丹术的著述的德文译本，名叫《金花的秘密》，请求他为这本书写个评论。当他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荣格兴奋地认识到，他发现了一个历史上与他的体验非常类似的事物：他关于曼荼罗的意义、对中心的绕行，以及自性现象学的洞见

得到了最异乎寻常和最出乎意料的证实。他写道："那是打破我的隔离状态的第一个事件"（《回忆、梦、反思》，第189页）。他被感受到的与这本丰富的精神材料异乎寻常的共鸣所震惊了，它竟然源自一个如此远离他自己的地方；这本书为此后占据了他余生许多时光的一系列炼金术研究起到了铺垫的作用。

有两个梦为他将要发现的事物作好了准备。在其中一个梦中，他在自己房子一个以前并不知道的附属部分发现了一个17世纪的图书馆；在另一个梦中，一些大门在他身后哐当作响地关上了，把他困在了同一个世纪。他开始耐心地搜集起大批的炼金术文本（是此类文本最为齐全的收藏之一），这时他意识到，炼金术士们使用的是一种用他们晦涩的象征来表达的神秘的语言。最初他难以理解它们所表示的意思，但是，当他采用语文学的方式、编纂出一本相互参照的关键短语词典时，"炼金术的表达方式逐渐显现出它的意义"（《回忆、梦、反思》，第196页）。

荣格认识到，他已经在炼金术中发现了他自己的心理学的前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炼金术士们的体验就是我的体验，他们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我偶然发现了我的潜意识心理学的历史对应物"（《回忆、梦、反思》，第196页）。人们迄今为止一直把炼金术视为只不过是化学的一种原始的先行而不予认真考虑，但荣格却相信，在炼金术士们努力把贱金属转变成为金子的过程中，他们是在象征性地从事一种精神转化的过程。换句话说，炼金术是对个体化的一种隐喻。

正如大自然不喜欢真空一样，对于一个人一无所知的事情，想象力就会冲进来填补这个空间。在面对一个一无所知的领域时，我们往往把自己的心理活动投射进去，使之充满意义。心理投射 测验利用的就是这种倾向，它要求被试报告他们在墨迹或模棱两可的图形上所看到的东西。莱昂纳尔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提出了一种类似的方法，通过凝视墙上的湿迹而产生风景画的灵感。荣格第一个认识到这种实践活动是用来研究其他方法无法企及的精神内容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看到新的意义在外部现实中反映出来，这些实践使我们

觉察到它们自潜意识中的产生；这就为揭示艺术治疗最有价值的一种功能提供了线索。荣格意识到，炼金术士们在不知不觉中利用了同样的机制：炼金术是一个完全建立在投射 这一心理现象基础之上的精细复杂的领域。

对炼金成果的转化的各阶段描述尤其令荣格感到着迷，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可与分析的各阶段直接相比拟之处。在炼金术士与其女性助手（*the soror mystica*）之间的关系中，荣格还发现了移情和反移情关系的一种早期模型，这种关系是在分析治疗过程中在分析师和病人之间发展起来的。炼金术的象征会在梦中自发地出现，甚至会出现在一个当代科学家的梦中，这使他进一步证实了自己洞见的有效性，即典型的精神因素决定着炼金术的象征作用；在《心理学与炼金术》（《荣格全集》第7卷）中，他描述了一系列这样的梦，这些梦是由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向他提供的。

这些研究重新巩固了他对分析的笃信，他把分析更多地看作是导致个人成长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治疗心理障碍的方法；他越来越多地把他的能量投入到对他人的教诲中，不论这些人是学生还是病人，而他所教授的正是自己在直面潜意识期间所完善的那些方法，也是他从炼金术这一17世纪神秘学的所有稀奇古怪、模棱两可的东西中所发掘出来的那些方法。

走向老年和成长

使荣格的发展心理学观点与几乎其他所有发展心理学区分开来的是以下这一点：即使在老年时我们仍然在朝向实现我们的全部潜能发展。对荣格本人来说，显然情况正是如此。如果他和许多欧洲同代人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那么他的名声远不会像现在这样卓著。事实上，当他步入晚年之后，他的声誉日隆。不仅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在他生命的后半期出版的，而且他的智识眼界不断拓宽，这

可以从他开始关注的各种主题中判断出来——例如，共时性[12]和飞碟，以及心理治疗、炼金术、《易经》和宗教。在荣格看来，变老并不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衰退过程，而是一个对最本质的事物进一步精炼的时期。“对一个人来说，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他是否和某些无限的东西存在关联？”（《回忆、梦、反思》，第300页）。这一洞见是他的生命和他的心理学的根基。对他来说，无限、永恒和不朽就像现实的基岩一样，是永远存在和日趋逼近的，并因其隐藏不露这一特质（“神秘”）而愈加迷人。他写道：“在我看来，生命一直像是一棵依靠其根茎生长的植物，其地面上的部分只持续一个夏天便枯萎了——成为了一个短暂的幽灵……但是，我从未失去过这种感觉，即有个东西在永恒的变动中存在和持续着。我们所看到的是转瞬即逝的花朵，根茎却仍然保留”（《回忆、梦、反思》，第18页）。伟大的秘密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体现某种本质的事物。因此，如果不被年老所击败，我们就能够有尊严和有意义地继续前行，而当最后的时刻到来之时，我们已经作好“与生命共同赴死”的准备。因为老年的目标并不是衰老，而是智慧。

第二次“创造性疾病”预示着荣格晚年成熟的多产生命力的到来。1944年初他68岁之时，他患上了心血管和肺栓塞，差一点病亡。当他躺在医院之际，他产生了一种濒死的体验，从1000英里之外的太空中看着地球。他感到自己正在与世界相分离，当医生把他的生命挽救回来时，他有一种愤恨的感觉。尽管如此，他还是完全康复了，并投身于写作之中，在以后的17年里，写作优先于他所有其他的活动。这场疾病似乎又使他在从第1号人格向第2号人格的转变中前进了一个阶段。这在他的两个梦中得到了证实。在第一个梦中，他看见一位呈莲花坐姿的瑜伽修行者正深陷于冥想之中。荣格意识到，这个瑜伽修行者长着一张和自己一样的脸，这把他惊醒了。他想到：“啊哈，这么说他就是那个对我进行冥想的人了。他做了一个梦，而我就是那个梦。”第二个梦发生在更久之后，在这个梦中，他体验到自己是一个未知的飞行物的投射，这个飞行物的形状像是一台老式的幻灯机。他由此的理解是，这些梦表明了潜意识是来自经验的人格的创造者，而

自性以人的形象出现，为的是进入三维现实。

在82岁的时候他写道：

最终，我的生命中唯一值得讲述的是当不朽的世界迸发出来、进入这个昙花一现的世界的那些事件……与这些内部发生的事件相比，所有其他关于旅行、人和周围事物的记忆都黯然失色……但是，我和“另一个”现实的相遇，我和潜意识的较量，却永久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在那个领域总有充裕的财富，相比之下，所有其他的事物都无关紧要。（《回忆、梦、反思》，第18页）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期荣格还在专心思考的重要主题是对立物之谜，它们的分离、它们的统一和它们的超越，以及人类意识的宇宙意义。他在3本晦涩难懂和富有挑战性的书中记录了这些思考，这3本书是：《爱翁》（1951）、《对约伯的回答》（1952）和《精秘的整合》（1955——1956）。这些书中最容易理解的《对约伯的回答》使他和神学家产生了冲突，因为在这本书中他指责上帝令人类为世界上所有的邪恶背上责任，但却使自己免受一切谴责。荣格论证说，上帝的这种缺乏自我意识只有通过人类的意识才能得到更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上帝发现自己必须化身为人的缘故。“那就是神圣的贡献的意义，或者说是人能够为上帝作出的贡献的意义，光明可以自黑暗中产生，造物主可以意识到他的造物，人能够意识到他自己”（《回忆、梦、反思》，第312页）。

这一洞见的萌芽产生于他1925年访问东非的埃塞平原之时。他和旅行的同伴一起站在一个小山上，向下眺望热带的大草原向远方的地平线伸展，种群数目庞大的瞪羚、羚羊、牛羚（俗称角马）、斑马和疣猪像缓缓流淌的河流一样边吃草边向前移动。

除了猛禽忧郁的鸣叫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声音。这是永恒之初的寂静，是世界一直以来处在非存在状态的样子；因为直到那一刻之前还没有人到来，知道它就是这个世界。我从我的同伴身边走开去，直到我看不见他们，独自一人品尝完全孤独的感受。现在就只有我了，第一个认识到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人，但他并不知道，在这一刻他第一次真正创造了它。

意识的宇宙意义在我看来变得绝对清晰了。炼金术士们说："大自然留下的不完善的事物，艺术使之完善。"人，即我，在一种不可见的创造行动中，通过赋予它客观的存在，把完善的标志印在了这个世界上……现在我知道它是什么了，而且甚至知道得更多：人是完成创造所必不可少的部分；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世界的第二个造物主，他独自赋予这个世界以客观的存在——如果没有它，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静静地吃东西，生育，死亡，点头，就这样经过千百万年的岁月，世界就会在非存在的最深沉的夜晚中持续不停地走向其未知的终点。人类的意识创造了客观的存在和意义，人在存在的伟大过程中发现了其必需的位置。（《回忆、梦、反思》，第240—241页）

由此荣格的心理学也成为了一种宇宙论，因为他把个人朝向更完满意识发展的旅程视作发生在永恒的背景之中。作为自然的一个客观部分而独特存在的精神，同样服从于支配宇宙的那些法则，而且其本身就是这些法则的最高实现：通过意识的奇迹，人类的精神提供了一面镜子，自然在这面镜子中看见了她自己的映像。

在老年时期他产生过很多濒临死亡的预感，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潜意识对这件事并不感到大惊小怪。确实，在他看来，死亡本身似乎就是一个目标，是一件应该欢迎的事情。因此，在一个梦中，他看见了沐浴在光芒之中的"另一个波林根"，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它是完满的，并作好了接收他的准备。回首他的生活，他反思道："对我来说，一定是对理解的强烈欲求导致了我的诞生。因为这是我的本性中最强烈的成分"（《回忆、梦、反思》，第297页）。这种理解和认识的需要使他的思想一直保持着创造性，直到他86岁时在一周内接连两次心脏病发作，并于1961年6月6日在库斯纳赫特平静地去世。

注释

〔1〕 唯灵论（spiritualism），主张心灵或精神为最终的实在的理论。——译注，下同

〔2〕 沃邦（Vauban，1633 - 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创造"平行壕逐次攻击法"，指挥过53个要塞的围攻战，制定"炮火攻击原则"，并著有《论要塞的攻击和防御》等。

〔3〕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40——约前4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辩证法奠基人之一，认为一切都在流动变化之中，“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4〕 爱克哈特硕士（Meister Eckhart，约1260—1327或1328），德意志神秘主义神学家、多明我会修士、神学教授，认为“存在即神性”。

〔5〕 布罗肯幻象（spectre of the Brocken），在高山地带当太阳很低时投射到云堤上的观测者后影，且常被彩虹般光带围绕。

〔6〕 关于unconscious一词的译法，在上世纪80年代曾进行过一次学术讨论。目前我国心理学史界普遍赞成的看法是：把弗洛伊德学派所使用的unconscious译作“潜意识”，它指的是潜藏在心灵深处的、没有被清晰意识到的心理活动。荣格属于精神分析学派的一员，他的集体潜意识更是指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千百万年来人类生物进化的心理积淀，并不是没有意识；而把弗洛伊德之前的学者们使用的unconscious译作“无意识”，因为他们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活动是无法意识到的，其内容也和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解有较大差异。本书的翻译即遵循这一原则。但是，在心理学界（尤其是心理学史界）之外的很多学者仍然坚持把这个概念译作“无意识”。

〔7〕 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即Zoroaster，约公元前628——约前551），古代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

〔8〕 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

〔9〕 萨满（shaman），西伯利亚和乌拉尔-阿尔泰各民族的宗教体系以及全世界其他许多民族的类似宗教体系中据说能治病并与世外世界相通的人。

〔10〕 斯特林堡（Johan 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剧作家、长篇小说家和短篇小说作家。他将心理状态与自然主义融入到一种新式的欧洲戏剧之中，这种戏剧后来发展为表现主义戏剧。

〔11〕 我国学术界通常把他的名字译作卫礼贤，他翻译了我国古代典籍《金丹要诀》（即《金花的秘密》）和《易经》等著作，荣格是通过他而对中国道家学说发生兴趣的。

〔12〕 synchronicity一词也可以根据我国的文化传统翻译为“机缘巧合”。

第二章

原型与集体潜意识

1909年，荣格和弗洛伊德双双应邀赴位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作演讲。他们离开了有7个星期，在此期间两人每天花上很长的时间进行交谈和相互研究对方的梦。在他们所分析的梦中，有两个给他们的友谊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第一个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梦，荣格竭尽全力根据弗洛伊德提供的少数几个联想进行解释。当荣格敦促他多提供一些联想时，弗洛伊德相当多疑地看着他并拒绝了。他说："我不能拿我的权威来冒险。"荣格评论道，在那一刻，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那句话在我的记忆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其中已经预示了我们两人友谊的终结。弗洛伊德把个人权威置于了真理之上"（《回忆、梦、反思》，第154页）。

另一个梦是荣格做的。他梦见自己在一栋老房子的顶层，房子里家具陈设气派，墙上挂着精美的油画。他惊叹这竟然是自己的房子，不由得想："还真不赖！"但随后他就想起，他对下面一层是什么样子还一无所知，于是他就下楼去看。在下面所有的东西都要陈旧得多。家具是中世纪的，一切都显得相当阴暗。他想着："现在我真的必须探索一下整栋房子了。"他仔细地审视着地板。它是石板铺成的。在一块石板上他发现了一枚戒指。当他把戒指拾起来的时候，这块石板抬升起来，他看见有狭窄的石阶向下通往深处。他往下走去，进入一个在岩石中凿出的洞穴。一些骨头和破碎的陶器散落在尘埃之中，这是原始文化的遗迹；接着他发现了两个人类的头骨，显然都非常古老，并且已经有些碎裂了。然后他就醒了。

弗洛伊德对这个梦感兴趣的部分完全在于那些头盖骨可能的身份。他想要荣格说出这些头盖骨是谁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很明显，荣格一定是对这些头骨的主人心怀某种死亡愿望。荣格觉得这完全不着边际。但是，按照在他们关系的那个阶段他习惯性的做法，他把自己的怀疑藏在心里。在荣格看来，那座房子是精神的一个意象。顶层的房间代表他的意识人格，下面一层代表潜意识的第一层次，他后来称之为个体 潜意识，而他所到达的那个最底层是集 体 潜意识。在那里他发现了自己心灵深处的原始人 的世界。在他看来，这些头骨和死亡

愿望毫无关系。它们属于我们人类的祖先，是祖先帮助塑造了我们大家共同的精神遗产。

当他终于鼓起勇气宣布他关于集体潜意识的假设时，这一点证明了是他之于弗洛伊德的最重大的背离，也证明了是他对心理学最重要的一项贡献。虽然弗洛伊德确实偶尔提到过，在精神中存在着“古代的遗迹”，但他却倔强地反对荣格那大胆而革命性的观点中海量的蕴意。

荣格所提出的正是整个心理科学能够建筑于其上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潜在的重要性可与物理学中的量子理论相比拟。正如物理学家研究粒子和波、生物学家研究基因一样，荣格认为，心理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集体潜意识以及构成它的功能单位——即他最终所称的原型（the archetypes）。原型是“所有人共有的同一的精神结构”（《荣格全集》第5卷，第224自然段），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古代遗迹”（《荣格全集》第5卷，第259自然段）。

从根本上说，他把原型设想为先天的神经与精神中心，具有发动、控制和调节所有人类的共同行为特点和典型经验的能力。因此，在适当的情况下，原型可以在人们身上引发类似的思想、意象、基本神话主题、情感，以及观念，而不论他们的阶级、信仰、种族、地理位置或历史时代如何。一个个体全部的原型禀赋构成了集体潜意识，其权威和力量归属于一个核心，它负责整合整个人格，荣格称之为自性。

弗洛伊德认为，个人的经验对于每一个个体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一观点上荣格从未表示过异议，但他否认这种发展发生于一个没有特定结构的人格中。相反，在荣格看来，个人经验的作用就是发展已经存在的东西 ——即激活已经存在于自性中的原型的潜能。我们的精神不仅仅是经验的产物，就像我们的身体不仅仅是我们下肚的食物的产物。

用一个示意图（图15）来表现荣格的精神模型将有助于使这一观点更为清晰。这个模型应当被直观化为一个球体，就像一个3层的洋葱。在中心、且以其影响来渗透整个系统的就是自性。在3个同心圆

的内部就是由原型组成的集体潜意识。最外面的一圈代表意识，作为其焦点的自我绕着这个系统的轨道运行，就像一颗行星围绕太阳运行，或者月亮围绕地球运行一样。在意识和集体潜意识之间的媒介物就是个体潜意识，它们是由情结构成的，每一个情结和一个原型相联系：因为情结是原型的化身 （personification）；它们是原型借以在个体的精神中表现自己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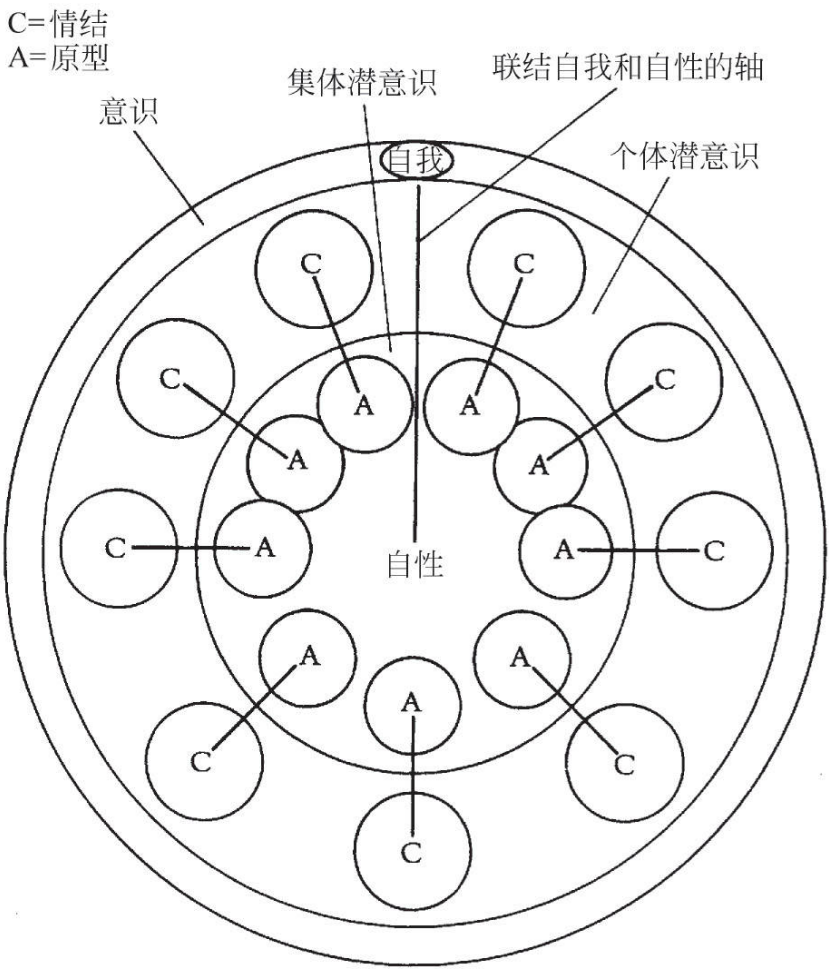

图15　荣格的精神模型图解

荣格的原型在有限的程度上类似于柏拉图（Plato）的理念

（ideas）。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在人类生活开始之前就在神的心灵中存在的纯粹的精神形式，并且由此超越了通常的现象世界。它们体现了事物的一般的 特点，但又隐含在其特殊的 表现形式之中；从此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是集体的 。例如，曲线和涡的结构可以让人一眼即识别出这是人类的指纹，而不可能弄错。但同时，每一个指纹的结构又为其拥有者所独有，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盗窃的人要想逃避侦查和逮捕就必须记住戴上手套的原因。原型同样把普遍性与个体性结合起来，把一般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它们是所有人类所共有的，但却在每一个个体身上以他或她所独有的方式表现出来。

荣格的原型与柏拉图的理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动态的、寻求目标的属性。随着生命周期在环境的背景中展开，原型积极地在个体的人格和行为中寻求实现。

原型的实现

在一个儿童的个人精神中要求实现的最重要原型是母亲原型。一个原型的实现（荣格有时也称之为“唤起”［evocation］和“群集”［constellation］）似乎是根据19世纪末心理学家们所提出的联想律来进行的。这些联想律中有两条尤为切合：它们是相似律 （law of similarity）和接 近律 （law of contiguity）。这样，母亲原型即是通过一个女性照看者的接近性而在儿童的精神中得以实现的；这个女性照看者的行为和个人特征与内在的母亲原型结构足够相似 ，使得儿童能够将她作为“母亲”来感受和体验。然后，随着依恋关系的发展，该原型就在儿童的个人精神中以母亲情结 的形式活跃起来。与此同时，通过相似性和接近性，婴儿在母亲身上群集起幼儿原型。这一二人组合的任一方创造出知觉场，后者起到唤起对方身上的原型的作用。

在荣格生活的那个时期，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儿童是母亲关怀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之所以依恋母亲，是因为他们受到母亲的喂养（即所谓的“食厨爱”理论 [1] ）。与此相反，荣格认为，儿童积极地

参与了他们与世界的全部关系的形成；他坚持认为，“把新生儿的精神设想为一块白板（*tabula rasa*），即从这其中是绝对的空白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设想是错误的［他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正是这样设想的］”（《荣格全集》第9卷上部，第136自然段）。我们天生就有一个精神结构，它使得我们能够产生我们人类独特的体验。

因此，不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男人的全部本性是以女人为先决条件的。他的系统从一开始就与女人协调一致，正如它为一个相当确定的世界作好了准备一样，在这个世界中有水、光、空气、盐、碳水化合物等等。他诞生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形式在他身上早已作为一种虚像先天存在了。同样地，父母、妻子、孩子、出生和死亡也在他身上作为虚像、作为精神的倾向而先天存在着。这些先验的范畴本质上具有一种集体的性质；它们是父母、妻子和孩子的概括的意象，而不是个人的宿命。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些意象看作是缺乏实质内容的，因而是潜意识的。它们只有在遇到经验的事实时才会获得完整性、影响力和最终的意识，这些经验事实触及到潜意识的倾向，并使之得以复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是我们所有祖先经验的积淀，但却不是经验本身。（《荣格全集》第7卷，第300自然段）

因此，对我们的近代和远古祖先来说所有这些最基本的因素，对我们来说也是最基本的，因为它们嵌置在遗传的有机系统中。（《荣格全集》第8卷，第717自然段）

最近40年来，与荣格的看法非常类似的一些观点在相对较新的习性学（行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处在自然栖息地的动物）这门学科中开始流行起来。每一个动物物种都具有一全套的行为技能。这套行为技能所依赖的那些结构早已由进化建构到该物种的中枢神经系统之中。习性学家们把这些结构称为先天释放机制（innate releasing mechanisms，或IRMs）。每一个先天释放机制事先已作好了准备，一遇到环境中适当的刺激物——称为信号刺激物（sign stimulus）——便被激活。当这样的刺激物出现时，先天机制得到释放，动物便以特定的行为模式（pattern of behaviour）作出反应；这种行为模式是通过进化适应环境的结果。这样，当一只母野鸭看到一只公野鸭漂亮的绿脑袋时就会发情，绿脑袋就是信号刺激物，它使得母鸭中枢

神经系统中的先天机制 得以释放，而这种先天机制导致了与母鸭的求偶相联系的特定的行为模式 。

这非常类似于荣格所设想的原型如何在人类身上发挥影响，而且他意识到了这种类比。他说，一个原型不是“一个遗传的观念”，而是“一种遗传的功能方式，它与小鸡钻出蛋壳、鸟儿筑巢、某种黄蜂专蛰毛虫的运动神经节、鳗鲡找到前往百慕大的道路的先天方式是相一致的。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行为模式’”。荣格得出结论认为，“原型的这个方面，这个纯粹生物学的方面，是科学心理学应该关注的”（《荣格全集》第18卷，第1228自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把习性学和荣格心理学看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就好像习性学家们致力于对原型进行外倾的探索，而荣格学者们则致力于对先天释放机制进行内倾的考察。

原型理论的流行

许多其他学科都提出过与原型假设类似的概念，但通常都没有提到荣格。例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法国的结构人类学学派主要关心的是潜意识的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s），他们认为这些结构是人类所有的习俗和制度产生的缘由；语言学家们认为，虽然语法是彼此不同的，但它们的基本形式——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称之为它们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s）——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在最深的神经与精神层面，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或“原型的”］语法，所有个别的语法都以此为基础）；一门全新的学科，社会生物学，是以下述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即所有社会物种（包括人类）所特有的行为模式依赖于遗传的反应策略（genetically transmitted response strategies），这些策略旨在使有机体最大限度地适应它于其中进化而来的生存环境；社会生物学还认为，一个物种的个别成员的心理和社会发展依赖于所谓渐成发展的规则（epigenetic rules；epi = upon，genesis =

development，也就是发展所赖以进行的规则）；而就在最近，以习性学为方向的精神病学家们开始研究他们所谓的心理生物学反应模式（psychobiological response patterns）和深刻同源的神经结构（deeply homologous neural structures），他们认为，这些模式和结构是造成个体病人在对其社会环境的变异作出反应时产生健康和不健康的适应模式的原因。所有这些概念都与荣格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提出的原型假设相符合，但荣格的假设却在当年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冷遇。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荣格的原型理论具有如此根本的重要性，以至于它不断地被许多其他学科的实践者们所重新发现，那么，当荣格提出这一理论的时候，为什么它没有受到应有的热情欢迎呢？我认为，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解释：即荣格阐明这一理论的时代和他发表这一理论的方式。

首先，在荣格人生的整个成熟期，各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者们正处在行为主义的支配之下；行为主义轻视先天的或遗传的因素，倾向于把个体视为一块白板，其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环境的因素。荣格则认为，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带有一幅完整的生命蓝图，其后它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得以执行；他的这种相反的看法与流行的时代精神是如此地不一致，致使它受到了不友善的对待。

其次，荣格没有以一种清晰的、可以检验的形式来阐述他的理论，也没有使之依赖于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他的《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一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产生“原始意象”（这是他最初对原型的称法）的集体潜意识这一观点，但这本书晦涩艰深，充斥着神话诠释，以致于除了那些最有决心的读者之外，几乎谁都读不懂。此外，在论证“原始意象”源出人类过去的历史的时候，荣格使自己暴露在人们责难的枪口之下；人们指责他和弗洛伊德一样，赞同最初由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提出的获得性遗传（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这一已被推翻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一代成员身上产生的观念或意象能够遗传给下一代和此后的各代。

实际上，集体潜意识是一个自身站得住脚的科学假设，人们看待它时不必非得采纳拉马克的生物学观点。确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和当代习性学家、社会生物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理论阐述是相符合的。为了在自己和拉马克主义之间切实地划清界线，荣格最终明确地把他所谓的原型本身（archetype-as-such，类似于康德的自在之物［*das Ding-an-sich*］）和由原型本身所产生的原型意象、观念和行为区分开来。具有原型性和遗传性的是人们产生某些经验的先天倾向（predisposition），而不是经验本身。法国分子生物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也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一切事物都来自于经验，但并非来自于为每一代的每一个个体所重复的现实的经验，而是来自于在其进化过程中该物种的全部祖先所积累下来的经验。"

这样，荣格的原型就和习性学的先天释放机制一样，在科学上是应该认真对待的。正如每一个物种的全套行为技能作为先天释放机制编码存储于中枢神经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一遇到适当的信号刺激物即被激活一样，荣格认为，人类生命的程序作为一系列原型因子编码存储于集体潜意识中，这些因子在生命周期的过程中通过对内外部事件的反应而得到实现。在这个概念中并没有什么拉马克式的或非生物学的东西。

原型对阵文化传播

那些拒绝接受原型假设的人不为从源自世界各地的神话中所发现的类似的主题所动；他们认为这些可以通过人类的迁居和文化的扩散来解释，而不必通过先天的倾向来这样做。荣格试图驳斥这种解释；他指出，同样的主题会在不谙世故、以前在现实的生活中从未遇到过这些主题的病人的梦、幻觉和妄想中自发地出现："在绝对不可能拥有任何这类知识的个体身上，曾经观察到一些典型的神话主题，"他这样宣称，并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在此面对的一定是不依赖于任何

传统的‘土生土长的’复活物，因此，‘神话构建’的结构成分必定存在于潜意识精神中”（《荣格全集》第9卷上部，第259自然段）。荣格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例；这个病人告诉荣格，如果他半闭着眼睛凝视太阳，就会看到太阳有一个阴茎状物，这个器官就是风的起源。多年以后荣格看到了一个古希腊文本，那上面描述了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幻象：“同样是这种所谓的管子，是产生风的源头。因为你将会看到从日面悬垂下来一根管状的东西……”（《荣格全集》第8卷，第318自然段）。这位病人是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男子，而且即便他能够读懂那个文本，他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读到过，因为这本书是在他住院之后出版的，而在医院里根本无法获得这样的文献。

虽然这似乎是荣格最喜欢用来论证他的论点的例子，但却无法把它简单地解释为原型在历史上的不同时代、在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不同的人身上发挥作用的结果。有一些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可以列举，例如我们之前刚刚用过的例子，即世世代代的母亲和孩子在实现亲子原型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行为。为了解释荣格的例子，必须要假定3个原型对象（太阳、阴茎和风）、一个原型原则（男性的生殖力原则）和两者之间的一种原型联系（太阳的阴茎产生了风）的存在。虽然这种联系在统计学上可能性很小，但也并非是不可能的，正如荣格的例子似乎证明的那样。但他本来是可以找到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来支持他的理论的。

从根本上说，可以把这一理论表述为一个心理学法则：只要某种现象被发现是一切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特征 时，它就是集体潜意识的某种原型的一种表现形式 。想要证明这些普遍显而易见的现象完全归因于原型因子，或完全归因于文化的扩散，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十之八九两者都参与其中。但是，可能的情况是，由原型决定的现象，与那些并非由原型决定的现象相比，具有扩散更为容易和更加持久的强烈倾向。诸如母子/母女亲密关系的形成、对支配地位的追求、性交和建造住宅等这样的行为特征满足3条关键性的生物学标准，即普遍性、持续性和进化的稳定性，而由于这类特征很有可能是以原型为基

础的，在一切人类社会中，不论其所在何处，它们都会产生典型的心理体验和典型的行为模式。

类心理原型和单一的世界

原型在根本上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一个精神结构，也是一个神经结构，既是“精神”也是“物质”，而且荣格逐渐认识到，它是所有心理物理事件基本的先决条件：“原型可以说是意识心灵的暗藏基础，或者，打另一个比方来说，是不仅在狭义上植根于土壤、而且在广义上植根于世界的精神的根”（《荣格全集》第10卷，第53自然段）。他提出，原型结构不仅是所有有生命的有机体存在和生存的基础，还和控制非有机物质的行为的结构保持着连续性。因此，不应把原型看作仅仅是一个精神的实体，而应看作是“通往普遍意义上的物质的桥梁”（《荣格全集》第8卷，第420自然段）。荣格有时把原型的这一纯粹物理的方面称为类心理原型。这一观点激起了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极大的兴趣；他相信，这为我们理解宇宙得以创造所依据的原则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泡利的热情鼓舞了荣格，使他坚持不懈地深入探索单一的现实；和许多宗教传统中的神秘主义者一样，他也相信这个单一的现实是所有表面现象的基础。为了对这个单一的维度进行描述，荣格重新起用了一个古代的术语*unus mundus*，或“单一的世界”——即所有经验存在的终极基础。他把原型设想为这个单一世界的媒介，不但组织精神中的观念和意象，而且支配物理世界中的物质和能量的基本原则。泡利论证说，通过此种对原型的构想，荣格发现了在物理事件（这是科学合乎正规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它们的科学家的心灵之间那一“缺失的联系”。换言之，安排我们的知觉和观念的原型本身就是一个客观安排的产物，这一客观的安排超越了人类的心灵和外部的世界。物理科学、心理学和神学都是在这个最高点上结合起来的。

机缘巧合

荣格以他特有的不小心把这些观点扩展到了心理玄学的领域，特别是扩展到了“有意义的巧合”现象——他称之为机缘巧合（synchronicity）：“两个或多个毫无因果关系的事件具有相同的或类似的意义时所发生的巧合”（《荣格全集》第8卷，第849自然段）——例如，当一个人梦见远方的朋友死亡时，她确实就在同一天晚上死亡了。在这两个事件之间不可能有因果联系，但我们却体验到 它们的同时发生是有意义的。

这种荣格所称的“非因果性联系的原则”是《易经》中所体现的古代中国人对现实所采取的态度——意即，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和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其他一切事件存在关联。我们的西方世界观教导我们，时间是一个纯粹抽象的量度，但是，如果我们是诚实的话，就会承认从未 感受到它就是这样的。确实，所谓“怀旧的努力”完全依赖于我们在心理上意识到时间具有它自身的特点，当事件发生时，这种特点就会施加影响于事件。荣格直觉地感受到，这暗示着在所有现象的根源处存在一种非因果性的原型安排，这种安排导致了相关的物理和心理事件同时发生所隐含的意义性。

当然，机缘巧合的事件是我们大多数人时而发生的体验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习惯上把它们当作“仅仅是巧合”而不予考虑，这样的做法固有地存在一种令人无法感到满意的性质。荣格的方法的典型特点是，他关注所有的 体验，他将人类生活中非理性的和似乎是毫无联系的外部表现，与理性的和有联系的外部表现一起，本着同样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影响

荣格把原型理论应用到人类体验的更深奥的领域，无论一个人是否被荣格的这种应用所说服，人们都很难否认，它是一个有着深刻影

响的观点。如果像荣格所相信的，原型是一切存在的前提条件，那么，它们就必然会在艺术、科学和宗教的精神成就中表现出来，也同样会在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组织中表现出来，并且它们能够提供一个立足点，使得我们对所有这些现象的理解能够进行转化。就心理学而言，原型是行为和精神事件的共同根源这样一种概念，使得我们能够超越生机论〔2〕和副现象论〔3〕的智识困境；迄今为止，生机论和副现象论已经阻碍了那些寻求探索身心之间的神秘关系的人们的进步。无论原型假设还可能达成其他什么样的目标，它至少能够在心灵科学和行为科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注释

〔1〕“食厨爱”（cupboard love）的意思是为了得到食物而表示的亲热（例如，儿童想从食厨里得到某些食物而向管理食厨的人表示的亲热），一些儿童心理学家以此来说明亲子之间的依恋关系。

〔2〕生机论（vitalism），一种认为生物的机能和活动产生于物理学和化学均无法解释的生命力的理论。

〔3〕副现象论（epiphenomenalism），认为意识是行为产生的附带现象而不起任何作用的心身关系理论。

第三章

生命的阶段

原型的最深刻影响在于它们对人类生命周期的调节。荣格认为，随着我们的成熟，我们遵循一系列自然的发展步骤；他在其论文《生命的阶段》（《荣格全集》第8卷，第749—795自然段）中对此作了描述。每一个阶段都通过一套新的原型规则来进行调节，这套规则既在我们的人格中、也在我们的行为中寻求实现。由于原型进化发展的结果是使我们为狩猎者/采集者的存在方式作好准备（我们人类99%的存在时间都是以这种方式度过的），因此，原型程序使我们准备好要经历的生活与当代的城市社会生活并非总是相协调一致的。从根本上说，这一程序提供的内容包括：受到父母的照顾，探索环境，把熟悉与陌生的形象区分开来，学习所在社区的语言或方言，获得关于其价值观、规则和信仰的知识，在同伴群体中玩耍，迎接青春期和青少年时期的挑战，被接受进入成人群体，完成求爱、结婚以及对孩子的抚养，通过采集和狩猎为经济作出贡献，参与宗教仪式，承担高度成熟的个体的责任，衰老，以及为死亡作好准备。所有这些阶段在人类学已知的所有人类社会中都是清晰可见的，因而遵从第232页所述的心理学法则。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荣格把对这一终生发展过程起协调作用的精神核心称为自性。

除了自性之外，荣格还提出了在每个人的精神发展和社会适应中发挥特殊作用的原型成分。这些成分包括自我、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阿妮玛（男性的女性意向）和阿尼姆斯（animus，女性的男性意向）。荣格认为这些成分就是原型的结构，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以情结的形式被建构到个人的精神中去。每一个成分都是一个精神器官，依据生物学的适应、稳态和成长的原则发挥作用。虽然我们以我们自己特有的方式利用它们和体验到它们，但它们却在任何地方的所有人身上发挥着相同的功能。荣格写道："归根结底，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同时就是这个物种的终极生活"（《荣格全集》第11卷，第146自然段）。换句话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天生就带有原型的禀赋，使得我们能够以和我们远古的祖先同样的方式适应现实。这一禀赋的总和包含在自性之中，而其他的

精神结构就是从这个母体中发展而来的，而且它们终生都处于自性的指导性影响之下。现在我们就来对这些成分进行探讨。

自性

动力结构支持着我们整个一生的精神存在，而自性既是这个动力结构的设计师也是建造者。使用大写的S是为了把日常使用的“自己”（self；指的是“自我”或“人格面具”）和荣格的“自性”区分开来，后者超越了自我，并且生来便继承了人类世代以来的能力。自性的目标是整体性，是在个体的生活环境中追求人类存在的蓝图的完全实现。个体化 是自性的理性存在（*raison d'être*）。虽然自性具有明白无误的生物学目标，但它也在艺术和宗教的精神成就中、以及在灵魂的内在生活中寻求实现。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体验为一个深层的谜团、一个秘密的资源或内心深处的上帝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这个原因，它在众多的文化中都被认为与神的概念相等同，并且在诸如曼荼罗等这种普遍的结构中找到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其结果是，按照荣格的观点，自性为个人的适应提供了手段，不仅是适应社会环境，而且是适应上帝、宇宙和精神生活。

自我

自我情结是在儿童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从自性中产生出来的，很像人们所认为的，当地球处于早期熔融状态时，月亮从地球中分离出来那样。它通过荣格的追随者们所称的自我——自性轴（ego-Self axis）与自性保持着联系，而人格的稳定性所依赖的就是这个轴。自我本身是意识的核心，我们在使用“主我”（I）或“宾我”（me）时所指的就是它。它为我们持续的同一性感负责，这样，即使到80岁，我们仍然感到自己和8岁时的我们完全是同一个人。荣格从未在“自我”和“意识”这两个术语之间作出清楚的区分，他将两者混用，或是有

时一起用作“自我——意识”。其结果是，他并没有考察自我在保护意识抵御那些来自潜意识的不受欢迎的内容时所表现出来的更具有潜意识性质的功能——就是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在其经典著作《自我与防御机制》（1946）中所描述的那些功能（例如，其中大家最为熟悉的有压抑、否认、投射、合理化、反向作用，等等）。

虽然我们把自我体验为我们存在的持续中心，但实际上它只是自性的执行官。“因为事实上我们的意识不是由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它是从未知的深处涌现出来的。在童年时期，它逐渐觉醒，其后在整个一生中，它每天清晨从一种潜意识状态的沉睡中醒来。它就好像是一个每天从潜意识原始的子宫中诞生的孩子”（《荣格全集》第11卷，第935自然段）。他一再强调，自我——意识依赖于自性持续的生机活力。“自我之于自性就像受动者之于施动者，或客体之于主体，因为从自性发散出来的决定因素从各个方向把自我团团围住，因而位于其上。和潜意识一样，自性是一个先验的存在，自我就是从中进化而来的”（《荣格全集》第11卷，第391自然段）。

用荣格童年体验的话语来表述，可以把自我与其“第1号”人格相等同，把自性与其“第2号”人格相等同。在一个人的前半生，如果想要胜任这个阶段的各项任务——与父母分离、在工作或职业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结婚、为自己的家庭提供一个住所，等等——发展出一个强壮和有效的自我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一个人的后半生，自我才有可能认识到它之于自性的从属地位——这是在个体化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接着，自我开始直面 自性，自性也开始直面 自我，通过（我们将在后文考察的）超越性功能（transcendent function）的中介作用，导致了人格整合和高级意识的达成。

人格面具

正如每一幢建筑物都有一个正面的外观一样，每一个人格都有一个人格面具（字面的意思是古希腊的演员们所戴的面具）。通过人格

面具，我们以一种我们希望能被他人所接受的形式把自己装扮起来。它有时也被称为社会（social）原型或从众求同（conformity）原型，因为一个人能否成功地适应社会就依赖于它。人格面具总有一些伪装的成分，因为它就像是我们拿来展示最好的商品的商店橱窗，或者也可以认为它是自我所雇请的一位公共关系专家，旨在保证人们对我们持有良好的印象。“可以稍微有点夸张地说，人格面具实际上就是并不存在的那个自己，但这个人自己以及其他人却认为他就是这样的”（《荣格全集》第9卷上部，第221自然段）。

人格面具于童年早期开始形成，它产生于遵从父母、同伴和老师的愿望和期待的需要。儿童很快就懂得某些态度和行为是受到欢迎的，将有可能获得嘉许，而另一些态度和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可能会导致惩罚或爱的撤销。儿童的基本倾向是把受到欢迎的特质建构到人格面具中去，而把不可接受的特质藏匿起来或压抑下去。在成熟过程中的人格的这些不受社会欢迎的方面通常被置于个体的潜意识中，在那里它们联合起来，形成另一个情结或部分人格，荣格称之为阴影。

阴影

荣格觉得，对这个遭到否认的子人格来说，“阴影”是一个十分恰当的术语，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包含某些“阴暗的”成分，被隐藏在弗洛伊德潜意识那个黑乎乎的杂物间里。虽然我们并不想要它，但它却作为一股强大的动力存留着，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带着它，就像是一个隐秘的同伴，步步紧随着我们——实际上，它就像是一个影子。大多数时候我们设法忽略它，但它却会以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方式提醒我们它的存在，特别是在我们的梦中。

在梦中，阴影往往以面貌凶恶或具有威胁性的形象出现，它和做梦者的性别一致，而且常常是不同国家、肤色或种族的成员。它通常带有一种陌生感或敌意，而这又引致怀疑、愤怒或恐惧等强烈情感。这就是为什么荣格觉得把阴影视为一种情结——即是说，是被共同的

自觉感情所结合在一起的一簇特质——是合理的；就像所有的情结一样，阴影也有一个原型的核心，在这个例子中就是敌人、掠夺者或邪恶的陌生人的原型。

在所有的原型中，敌人是最重要、并且可能是最不共戴天的原型之一。在生命的第一年中，其影响就已经变得显而易见。正如婴儿在母亲靠近他时会表现出高兴一样，当陌生人靠近他时，就会表现出警觉或退缩的迹象。到了第二年，这种惧生倾向会发展成熟，表现为强烈的恐惧和敌意。依恋和惧生显然都是先天倾向的产物，因为它们在所有的婴儿身上都清楚可见，无论他们在哪里出生以及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被抚养长大。甚至在那些天生就眼盲耳聋的儿童身上也能明显地看到这两种倾向，他们通过嗅觉来分辨生人和熟人。所有的社会物种都表现出这两种行为模式，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了它们的生物学意义：能够尽可能早地区分朋友和敌人，这显然关乎生存。

敌人原型是通过在人类社会环境中成长，作为阴影情结在个人的精神中得以实现的。这一情结有两个重要的根源：（1）文化灌输和（2）家庭压抑。

文化根源包括了在政治上和神学上所教授给我们的以下的一切：在政治上指被认为对我们的内部群体（即国家、部落或团队）怀有敌意的外部群体，在神学上指邪恶的概念（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撒旦、魔鬼和地狱）。不可避免地，阴影逐渐形成与人格面具的特质相反的那些特质，可以说，阴影补偿人格面具表面自称的特点，而人格面具则对阴影的反社会特点进行平衡。这两种尖锐对立的人格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存的现象在生活中和文学作品中都比比皆是。道林·格雷，那个面貌英俊、谈吐诙谐的花花公子，把他的肖像隐藏在没有人能够看得见的地方，因为它具有他邪恶的神秘生活的所有特征；杰克医生和海德先生是同一个人，一会儿是令人尊敬的医生，一会儿是可怕的妖魔；举手投足悲天悯人、脸上时时带着关爱的微笑的当红电视名人，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时可能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泼妇。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都和道林·格雷相像：将我们的阴影隐藏，不被人们看见，这并非出于自由意志，而是出于对那个内在权威

的屈服，弗洛伊德称之为超我（super-ego），荣格称之为道德情结（moral complex）。鲍尔比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发展起这个内部监察者的推动力并不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是害怕因为怀有乱伦的欲望而受到父亲的阉割报复，而是害怕因为不能令人满意而被母亲所抛弃。害怕由于自性的某个“坏的”方面而遭到厌弃的预期似乎是所有的罪疚感、所有寻求受罚的欲望、以及所有对赎罪与和解的渴求的根源。道德情结是在一条原型规则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条规则即是要求我们学习和维护我们碰巧出生于其中的这一文化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这条规则的存在，无秩序就会成为人类的自然状态：我们就都会成为精神变态者，无法进行合作和相互信任，可以想象，人类也就无法存在了。

但是，道德情结的获得对自性强加了一些严格的限制，而其中的大部分必然被归入阴影之中；在那里，当它被体验到的时候，它是被作为一种威胁来体验的。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免受这一威胁，为了保持我们心灵的平静，我们利用了各种自我防御机制，特别是压抑、否认和投射。我们不仅压抑个人潜意识中的阴影，而且否认它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存在，并把它向外投射到他人身上去。这些基本上都是潜意识地进行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这是一种自我保护行动，使我们否认自己的“坏”，把它推到他人身上，接着要求他们为此负责。它解释了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令人代己受过的行为，而且构成了针对可辨别为非自身群体的那些群体的各种偏见的基础。阴影的投射也包含在偏执狂的精神病症状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否认自己的敌意和迫害情绪，并将其投射到他人身上，于是，这些人就被体验为对自己怀有敌意和想要进行迫害。

因此，阴影的投射可能会对社会和国际和平都造成重大的威胁，因为它使得我们把那些我们认为是敌人的人视为魔鬼或害虫，从而使仇恨、攻击或消灭他们变得合情合理。无耻的领导者能够在全体人民中操纵这一机制。例如，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一再把犹太人描述为劣等人（*Untermenschen*），并且通过对宣传机器的精心操纵，令得足够多的德国人把他们的阴影投射到犹太人身上，从而使大

屠杀成为可能。在所有的大屠杀、所有的“种族清洗”和所有的战争中都包含着同样的机制。

对荣格式分析要求最高的一个方面出现在受分析者开始直面自己的阴影之时。它的困难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整个阴影情结都带有罪疚感和无价值感，以及对因其真实本性被发现或暴露出来而遭到厌弃的恐惧。无论这个过程可能有多么痛苦，都必须坚持下去，因为大量的自性潜能和本能能量都隐藏在阴影之中，无法为完整的人格所利用。遭受这种内在的自性分裂状态之苦的人通常会抱怨感到百无聊赖，对他们来说，生活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通过分析会使阴影获得意识，并且会与其内容达成妥协，这种分析的成功在经过最初的挣扎之后，就会导致一种更大的活力感，会令人感到更加生机勃勃、更加富有创造性和更加完整。承认自己的阴影就是为它负责，这样，一个人的道德就不是较为盲目的，较为强迫性的，就有可能作出道德的选择。因此，阴影获得意识不仅对个人发展来说是重要的，而且是社会更为和谐和国际理解获得增进的基础。

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

虽然荣格承认环境因素对一个人的心理发展有重大影响，但他同时认为，这些影响是通过激发出“主观倾向”而发挥作用的，所有的儿童一出生就带有这些倾向。他认为，对社会性别的觉知来说，就像对人格面具、阴影或心理类型的发展一样，这一条都是适用的。把社会性别的差异完全归因于文化，与生物学或原型的先天倾向完全无关，这种貌似合理的观点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大行其道；然而，它是建立在已经被推翻了的人类发展的“白板”理论基础上的，而且和源源不断的大量人类学及科学证据不相符合。

生理性别的差异大约在受孕后6周就开始了，此时在男性胎儿身上形成了性腺并开始制造男性荷尔蒙，这对胚胎的未来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女性胎儿身上，直到第6个月才形成卵巢，而

此时男性更大的体型、更重的体重和更强有力的肌肉力量已经确立。这是性别的二态现象的生物学基础，在人类学已知的大多数社会中，这种性别的二态现象都是清晰可见的；在这些社会中，抚养儿童几乎总是女人的责任，狩猎和战争则是男人的责任。和当代某些流行的观点想令我们相信的相反，这些差异与文化的“刻板模式”并无太大的关联。虽然不论在哪个年龄段，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共同之处都要远多于他们之间的差异，但毫无疑问地，一些差异确实存在着，而这些差异的根源就在我们人类的生物学中。对此荣格是说得非常清楚的。他一再提到，男子气概和女子气质是两条重要的原型原则，作为一个平衡的宇宙系统的平等和互补的两个方面而共存，就像道家哲学的阴和阳的相互作用所表现的那样。这两条原型原则提供了男性和女性的刻板模式发挥其作用的基础，使得对社会性别的觉知得以产生。社会性别是对自然所赋予我们的生理性别的心理认识和其社会表现方式，儿童对其社会性别的觉知早在18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最初，儿童的自性以一种神秘的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荣格从人类学家莱维-布吕尔［Lévy-Brühl］那里借用的一个术语，意指双方如此紧密地相互认同，以至于无法觉察到他（她）们各自独立的存在）的形式被潜意识地投射 到母亲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时母亲是作为自性的“承载者”而发挥作用的。对男孩和女孩来说情况都是如此，对社会性别的觉知不得不被附加在这个原初的与母亲的一体感上。对女孩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她的社会性别意识建立在与其母亲共享的 同一性的基础之上。但对男孩来说，则必须进行一种转化，以达成对以和母亲的差异 为基础的同一性的觉知。在这一时刻，父亲形象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它使得这个男孩子能从以母亲的同一性为基础的自我概念转向以与父亲的认同感为基础的自我概念。对女孩子来说，父亲的存在同样重要，因为它强化了她与男性这一基本的“他者性”形成鲜明对比的女性感，因而深刻地影响着她在与男性的关系中怎样体验 她的女子气质。

在神话学中，意识的开端是以世界父母——即天空之父和大地之母——的分离，以及光明自黑暗中创造出来为象征的。最初，天空平

躺在地面之上，世界父母就这样一直存在着，直到一个英雄在他们中间出现，给天空如此猛力的一推，致使它飞腾到苍穹之中，并且从此一直停留在那里。在这个重大事件之后出现了光亮——即意识和“精神启示”的象征。

随着传统家庭情境内部亲子关系的成熟，儿童越来越觉察到，父亲的爱不同于母亲的爱：父亲的爱是视情 境而定的 （contingent；意即，它是以采纳某些价值观、标准和行为方式为条件的），而母亲的爱则大都是无条件 的 （unconditional；就是说，通常对她来说，只要她的孩子存在 就足够了）。这种不同之处是与体现在神话、宗教和童话中的父亲与母亲原型之间的现象学差异相一致的。母亲原型普遍表现为自然之母、丰饶女神、生命的子宫和营养的施与者，而父亲原型则以统治者、长者、国王和法律制定者的人格化方式获得表现。母亲身上被充分赋予了爱欲、爱的原则、亲密和亲缘关系，而父亲则是逻各斯、理性原则、判断和辨别力的活生生的体现。他的话就是法律。荣格写道：

> 对儿童来说，母亲原型是最直接的原型。但是，随着意识的发展，父亲也进入了视野并激活了一种原型，该原型的本质在很多方面是和母亲原型相对立的。正如母亲原型与中国的阴相对应一样，父亲原型与阳相对应。它决定着我们与人类的关系、与法律和国家的关系、与理性和精神以及与自然的物力论的关系。（《荣格全集》第10卷，第65自然段）

在与父母的关系中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性别意识和对异性特征的觉察，通过与同伴群体，特别是与游戏伙伴的相互作用而得到了完善。当然，儿童在游戏中所采纳的角色是与文化相关的，是以模仿父母和社会中的其他重要成人为基础的。但是，正如来自迥然相异的社会的证据所表明的，这些文化影响是在一个原型设计的基础上进行的。几乎在任何地方，女孩子都往往比男孩子更显关爱和更合群，这表现在她们更倾向于亲近他人，并且在这样做时感到快乐。另一方面，男孩子则对社交性的交往本身并不太感兴趣，他们往往喜欢某种形式的身

体活动，例如奔跑、追逐和玩大型的、活动的玩具。他们也往往更粗暴吵闹，更具攻击性，不太受成人及同伴的控制。

阿妮玛和阿尼姆斯

正如社会性别被体验为对与自己的生理性别相称的原型原则的一种肯定一样，与异性的关系也是建立在一个原型基础之上的。在那些使我们能够适应人类生活的典型环境的所有原型系统中，与异性相关的原型系统是最关键的。这种性异原型，在女性身上荣格称它为阿尼姆斯，在男性身上称为阿妮玛。作为男性身上的女性方面和女性身上的男性方面，它们作为一对对立物 （the syzygy）在两性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所有男人和女人相互之间的关系。

荣格还发现，实际上，阿妮玛和阿尼姆斯都在梦中和想象中作为从潜意识到自我之间的媒介而发挥作用，从而为内部和外部适应提供了一种手段。他把它们描述为“灵魂意象”和“非我”，因为它们被体验为某种神秘的和超自然的事物，拥有巨大的力量。阿妮玛和阿尼姆斯的潜意识性质越强，就越有可能被投射——即导致“坠入爱河”这一体验的心理动力过程。为此，荣格把性异情结称为“制作投射的因素”。

“每一个男人的内心深处都带有女人的永久意象，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女人的意象，而是一个确定的女性意象。这个意象从根本上来说是潜意识的，是起源于原始的遗传因素……”（《荣格全集》第17卷，第338自然段）。“女人被一个男性的成分所补偿，因此可以说她的潜意识带有一个男性的印记……由此，我把女人身上制作投射的因素称为阿尼姆斯……正如阿妮玛与母性的爱欲相对应一样，阿尼姆斯与父性的逻各斯相对应”（《荣格全集》第9卷下部，第28自然段）。

和阴影一样，性异情结所具有的特质与表现在人格面具中的那些相反，因为，即使在我们这个平等的时代，人们也期望男孩子表现得像男孩子，女孩子表现得像女孩子。这样一来，一个男子越是不能够接受他的阴影和他身上的女性特质，他就越认同其人格面具。确实，

荣格甚至走得如此之远，以至宣称“阿妮玛的特性可以从人格面具的特性中推演出来”，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处在外部态度中、但却显然没在那里的所有东西，一律会在内部态度中找到。这是一条基本的规则……”（《荣格全集》第6卷，第806自然段）。

自我调节系统

这一基本的规则就是自我调节的稳态（homeostatic）规则，是荣格从生物学中借用并应用于人类心理学的。稳态是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所有有机系统保持自己处在一种平衡状态的手段。事实上，在所有层次的存在中，从分子到人类社会，从生命到非生命系统，都可以观察到稳态的调节，甚至我们的整个星球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稳态系统。由于精神是在这个世界的情境中发展的，荣格认为，在宇宙中适用的法则也一定在精神中适用。因此，他认为把精神看作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是合理的，这个系统力图在对立的倾向之间永久地保持平衡，而同时又寻求自己的成长和发展。

> 和身体一样，精神也是一个维持着自身平衡的自我调节系统。任何一个过程如果走得太远，就会立即而且必然引起补偿，没有这些补偿，就既不会有正常的代谢，也不会有正常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补偿理论视为精神行为的一条基本法则。一方的缺失将导致另一方的过量。同样，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补偿。（《荣格全集》第16卷，第330自然段）

补偿原则是荣格心理动力学的关键概念，因为它是荣格理解精神怎样在生命周期中适应和发展的核心。

生命程序

荣格的发展心理学观点与他在世时所流行的观点是如此大相径

庭，以致他十分扎眼地被许多人看作是一个持异见者。按照正统的行为主义观点，人类有机体只是一个反应系统，通过条件作用和学习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以此确立起其全套行为。相反地，荣格认为，人类生来就有一个复杂的生命程序，它预设了人类的自然生命周期，并且被包含在自性之中。他这样写道：

> 在一个人的行为背后既没有公众舆论，也没有道德规范，而是一个他还没有意识到的人格。正如一个人仍然是他过去所是的那样，他也已经是他将要成为的那个人了。意识的心灵并没有把一个人的全部包含在内，因为这个全部仅是部分地由他的意识内容所构成……在这个全部之中，意识的心灵就像是包含在一个大圆之中的小圆。（《荣格全集》第11卷，第390自然段）

当一个人从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时，自性的一些新的和适宜的方面就会变得活跃起来，并且要求得到表现；荣格相信，这一内部程序赋予了人生的后半段一种与前半段大不相同的性质。前半段主要关心的是生物的和社会的事务，而后半段则是文化的和精神的事务。他写道："人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自然的目标，即生育和保护子女；这其中包括了金钱和社会地位的获取。"只有当这个目标达成之后，新的目标——"文化的目标"——才可能达成（《荣格全集》第7卷，第114自然段）。

从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换，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潜在的危机时刻，正是为了帮助个体度过这些危机时刻，"人生新阶段"仪式（rites of passage）才在原始社会中发展起来。这些仪式——特别是进入青春期的仪式，成为猎人、战士或巫医的仪式，婚姻仪式，孩子出生以及亲属去世的仪式——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们为重要转换的发生这一事实提供了公众的肯定，并且通过仪式强大的象征作用，激活了与已经达到的这个人生阶段相称的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成分：这一原型潜能于是就被结合到了仪式接受者的个人精神之中。

原型的期待

由此，成熟过程被视为是通过一系列先天的原型期待（expectations），即是说，环境将提供以下内容：足够的营养、温暖以及保护其不受掠食者和敌人的伤害，以确保身体的生存；由母亲、父亲和同伴组成的家庭；有足够的探索和玩耍的空间；一个提供语言、神话、宗教、仪式、价值观、故事、成人仪式、以及最终提供一个配偶的社会；还有一个经济角色和/或职业地位。

尽管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些原型要求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一种文化以自己的方式成功地（或未能成功地）满足这些要求，每一个个体通过这个过程时所体验到的生活也将是独特的。这样，父母的实际特质就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它们将决定儿童的个人精神中母亲和父亲情结的性质和内容，而这些情结又反过来为成熟人格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情结从来不是真实父母的简单的“录像剪辑”：它们是父母的意象（*imagos*），是环境中的个人父母和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父母之间持续交互作用的产物。其至关重要的标准是，真实的父母应该“足够优秀”，以实现父母的原型，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充分地在场（以满足接近律）和充分地提供恰当的关怀（以满足相似律），以便与儿童的原型期待相称。如果父母并非“足够优秀”，则生命程序的剩余部分就可能会受到扭曲，原型进程的后续阶段就可能无法实现。因此，如果父亲不称职或不在场，一个男孩子可能就无法充分实现其男子气概的潜能，因而也就无法确立起他的天赋为他准备好的社会或职业角色，或者他也可能无法与一个异性成员保持足够长的关系，因而他自身也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或父亲。

“人生新阶段”仪式

对男性来说，童年和青春期的原型任务以象征的形式在英雄神话中表现出来，这些英雄神话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这些神话讲述英

雄怎样离开家乡，经受诸多考验和磨练，最终在“殊死考验”中和一条龙或一只海怪进行战斗。英雄的胜利以“难以企及的珍宝”作为奖励，即获得了王国的王位和娶了美丽的公主为新娘。在现实中也是如此：要踏上生活的冒险旅程，一个男孩子就必须摆脱家庭、父母和手足的束缚，在成人仪式的严峻试炼中幸存下来（几乎所有的传统社会都强制推行这种仪式），并且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王位）。要达成所有这些目标和迎娶一位新娘，他就必须克服仍然在他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的母亲情结的力量（和龙进行决斗）。这相当于从母亲身上的第二次分娩，对精神脐带的最终切断（在战胜龙和怪物的故事中常常包含着这样的情节，即英雄被吞进怪物的肚子里，在那里他用一种自动剖腹产的方式割破怪物的肚子获得生机：其结果是，作为母亲的儿子，他“死”了，作为一个与公主相配的人和国王，他“再生”了）。青春期成为男子汉的仪式推动了这种必要的转换。没有通过仪式的试炼或未能战胜怪物就意味着没有摆脱母亲：那么，公主（阿妮玛）就永远不能从怪物的魔爪之中被解救出来。她深陷在潜意识中，在母亲情结的拘禁下失去了活力。

对女孩子来说，向女人的转换更容易完成，因为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不要求她像男孩子那样，把对母亲世界的认同急剧转化为对父亲世界的认同。其结果是，女性的成人仪式——在存在这种仪式的地方，相较于男孩子而言，是一个不那么困难的和延续时间较短的过程（文化上罕见的和骇人的女性割礼仪式是例外），它主要由一个典礼所构成，承认一个年轻的女人现在进入了其人生的生殖阶段。这个仪式的设计仿佛是为了提高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在 生命本身的层面上具有创造力的 、能够到达男人绝不可能知道的神圣的经验领域的女人的内在觉知。（男人本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充满了敬畏：荣格写道：“阿妮玛是生命本身的原型 ”（《荣格全集》第9卷上部，第66自然段）；荣格自己以斜体强调）。

在很多文化中并没有女性成人仪式，令这一新的女性意识获得实现的任务就落在了已经通过成人仪式的男性身上。因此，在神话和童话中女主人公往往躺在那里沉睡，直到一位王子用一个吻来将她唤醒

（在这个过程中他唤醒了自己的阿妮玛）。她是被一片灌木丛包围着的睡美人，或者是在沃坦的火圈中等待她的齐格弗里德到来的沉睡着的布伦希尔特[1]。

虽然我们的文化不再提供成人仪式，但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无论是何社会性别，都存留着一个要求被接纳为 成人的原型需要 。我们可以从接受分析的病人的梦中推论出来，这些梦在他们生命中的一些关键时期表现出丰富的仪式象征意义——例如，在青春期、订婚、结婚、孩子出生、离婚或分居、父母或配偶去世的时候。人生的一个新阶段的到达似乎要求人们必须体验到仪式的象征。如果社会不能提供，那么，自我就会通过在梦中产生这些仪式的象征而对这一缺陷予以补偿。

成长的动力学

对所有的年轻人来说，成长都是一趟从熟悉的过去进入一个未知的未来的艰难旅程，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候因为这条路途上危险的不确定性而感到胆怯。有时其挑战看起来是如此地难以承受，致使个体崩溃、放弃，或退行到之前的一个发展阶段，回到带有养育者和容纳者的原型方面的母亲身边。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恰当的策略，一个以退为进（*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 ）的策略，以重新找到足够的力量和决心来面对前路上的严峻考验。

在这一阶段明显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冲突：原型程序规定，我们必须和母亲分离，长大后离开她，但与此同时，又要紧紧抓住她所代表的爱和安全："任何离开母亲身边的人都渴望回到母亲那里去。这种渴望能够很轻易地转变为一种消耗心力的激情，对已经获得的一切造成威胁"（《荣格全集》第5卷，第352自然段）。"人生新阶段"仪式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这种威胁，因为正如荣格在直面潜意识时所发现的，在一切精神发展中都有一个二元的动力在发挥作用。一方面，我们被向外和向前的力量驱使着进入未来，另一方面，我们被向内和向

后的力量拉扯着回到过去。发展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的进程：它是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过程，有前进的上升，也有退行的下降。但是，荣格从他自己的经验中了解到，退行能够服务于成长，精神疾病可能代表着精神想要治愈自己的一种努力。

从青春期到成年早期是人们寻找“第1号”人格的动机最为强烈的时期，他们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倾注到工作、婚姻、家庭和孩子身上。这是一个虽然有些片面、但却是快速发展的时期，此时很少有人有时间专注于他们的内在生活。为此，荣格认为，在心理上投身于个体化的道路在这个阶段是不适当的。相反，这是为社会作贡献的时期，目的是为了获得追求个体化的权利，个体化其后成为人生后半段的任务。

爱和婚姻

在大多数人身上，与异性建立联系的能力成熟于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达到能够和渴望结婚的程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一个人遇到一个女子或男子，而这个女子或男子似乎正是这个人自己的阿妮玛或阿尼姆斯的活生生的化身时（不管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坠入爱河”的体验就会发生。这一撼动内心的体验即是所谓的被自动情结的力量所“主导”的一个例子。

任一个原型一旦被激活，便会开始在生活中寻求其自身的实现。对阿妮玛和阿尼姆斯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挥之不去的、令人不得安宁的性的欲望使得它们对完满的求索显得更为急迫。与伴侣形成亲密的关系不仅仅只是潜意识的投射。要想令这一亲密关系足够持久，以使孩子能够得到抚养，那么它就必须得依靠以下的种种来维持：持续的性兴趣；法律的坚决要求；以及相互承认对方为真实存在的人，而且其身上的特质覆盖和超越了那些被投射的特质。如果因为配偶与自己的阿妮玛或阿尼姆斯幻想存在差距而不能原谅她/他时，就会导致心痛、相互的责难和离婚。

荣格从自己的婚姻经验中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于1925年发表的文章《作为一种心理关系的婚姻》中，他论证说，婚姻只有在超越彼此盲目的阿妮玛/阿尼姆斯投射、并且在双方都意识到 对方的精神现实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关系。否则，它一直都将只是为习俗和错觉所支配的“中世纪的婚姻”，只是一种神秘的 参与（“一颗心和一个灵魂”）。在当今的环境下，婚姻必须是更具意识和更富弹性的制度，尽管随着性异幻想的退隐这必然引起幻想破灭的情绪，并且导致分居和离婚越来越多地发生。“没有痛苦就不会诞生意识”（《荣格全集》第17卷，第331自然段）。

但是，如果这种结合存活了下来，那么，它就可以成为所谓的“个体化婚姻”（古根比尔-克雷格，《婚姻，是死还是活？》，苏黎世：春天出版社，1977），使得双方的人格通过对彼此、对其婚姻和他们自身更为丰富的理解而得到成长。荣格说：“这是在人生的中年期经常发生的情况；以此方式，我们神奇的人类本性促使我们从前半生向后半生过渡。这是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在前一种状态下，人只是本性的工具，而在后一种状态下，他不再是一种工具，而是他自己：这是一种从自然到文化、从本能到精神的转化”（《荣格全集》第17卷，第335自然段）。

荣格关于同性恋的观点利用的也是他的阿妮玛/阿尼姆斯概念。同性恋者是这样的人，即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更紧密地和父母亲中具有相反性别的那一个相认同，而同性别的潜能则保持在相对潜意识的状态下，没有得到实现。其结果是，性吸引中基本的对立性，即渴望和“未知的他者”结合的欲望，在和同性别成员的关系中被体验到，这些同性别的成员看起来具有那些他们感到自己缺乏但又渴望得到的特质。

这样，当男同性恋者前来接受分析时，这常常是因为他们无法找到他们所探求的东西，即爱的伴侣，后者被看作是他们自己未能实现的男子气概潜能的化身。分析能够帮助他们意识到这一探求的心理意义，并且为他们和另一个男子的“个体化关系”铺平道路；在这一关系中，双方都帮助对方找到了他所探求的东西。同样的思考也适用于对

女同性恋者的分析。

荣格同性恋心理理论的这些和其他影响在罗伯特·H.赫普克（Robert H. Hopcke）的《荣格、荣格学者和同性恋》（波士顿：香巴拉出版社，1989）一书中得到了详细的阐释。

正午的钟声

荣格把中年生活和正午相比源自于他把生命比喻为太阳每天的运行：

> 清晨它从潜意识的夜海中升起，眼望这呈现在它面前的广阔而明亮的世界；它在天空中爬升得越高，世界便越是延伸开去。由于它自己的升起而引起了其行动领域的扩展：在这个过程中，太阳将发现它自身的意义；它将把尽可能地向最高处爬升和尽可能地广撒恩泽视作自己的目标。怀持这一坚定的信念，太阳把它的进程推进到未曾预料到的顶点——之所以是未曾预料到的，是因为它的进程是独特的和个体性的，也因为其顶点无法提前计算得出。在正午的钟声敲响之后，下降的过程开始了。下降意味着早晨所珍视的一切理想和价值观的反转。太阳和它自身产生了矛盾，仿佛它应该吸收光线而不是散发它们。光亮和温暖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消失了……（《荣格全集》第8卷，第778自然段）

在人生的中年期出现了一个物极必反的倾向，它带有“人必有一死”这一简短明了的暗示。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危机的时刻，一个自我怀疑和质疑内心的时刻。“我的一生究竟达成了什么目标呢？”“我的余生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除了年老、体弱多病和死亡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呢？”荣格评论道：“酒已经发酵，并且开始沉淀和澄清……代之以向前看，一个人开始向后看……他开始盘点存货，看一看他的生命至今是如何发展的”（《荣格全集》第17卷，第331a自然段）。从35岁到45岁是抑郁、离婚和自杀率上升的时期。其后再过一段时间，女性将不得不面对绝经这一额外的问题。但是，正如荣格从自己身上所发现的，尽管中年期危机是创伤性的，但

它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使得意识更加觉醒，个人得到成长。

人生前半段的成功通常要求一个人把自己的精力完全贯注到某一特定的方向。这会导致相对狭窄的、“片面的”人格发展，并且无法实现蛰伏在潜意识中的大量的自性潜能。正如荣格所强调的，“人格并不一定意味着觉醒的意识。它完全可能是潜伏的或处于做梦状态的”（《荣格全集》第9卷上部，第508自然段；荣格自己以斜体强调）。中年危机可以起到“唤醒”这个做梦的、尚未被发现的自性的作用，而人生余下的部分可以为它的发展提供机会。带着这一认识，个体化的进程将真正开始，因为个体化是一个把在自己内部展开的发展过程带入到意识觉知中来的过程。

自性的个体化

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来，哲学家们就对个体化原则（*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表现出兴趣，但却只有少数几个发展心理学家在20世纪研究过这一现象；他们用“自我实现”这样的术语来指代它。但是，荣格的概念更进一步，因为他把个体化看作是在所有有生命的有机体中都清晰可见的生物学原则，而并非仅限于人类。他写道：“通过一个生物过程，任一生物成为其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的那个生物。个体化是这一生物过程的一种表达方式——无论这个过程可能有多么简单或是复杂”（《荣格全集》第11卷，第144自然段）。和对待原型本身一样，他最终开始相信，个体化也在无机物身上发挥作用，正如一块水晶从它之前作为液体的存在状态的某种隐藏结构中产生出来一样。

但是，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使他感到着迷的是他视为个体化原则的最高实现的东西——人类精神可能的最完满发展。它是自性完善的一个创造性行动：是潜意识的、无时间性的自性（荣格有时称之为“我们所有人心中的那个200万岁的人”）和当代的男人或女人为时间所限制的人格的逐步整合。这种超乎寻常的融合是怎样出现的呢？

对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它在我们睡眠时出现，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梦进行记录、反思和研究，就会不可估量地有助于这个过程的出现。

在对分析进行描述时，荣格写道：“患者和我一起与我们所有人心中的那个200万岁的人谈话。归根到底，我们大多数的困境都产生于失去了和我们的本能的联系，失去了和保存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古老而又不会被遗忘的智慧的联系。那么，我们在哪里能和我们心中的这个老人建立联系呢？在我们的梦中”（《心理学的反思》，第76页）。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将要述及的，荣格提出，梦在精神的稳态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通过补偿意识片面的局限性而促使我们适应生活的要求。夜复一夜，年复一年，这一补偿活动对个体化过程一再地作出贡献，当我们对同一个人所做的一系列的梦进行考察时，这一点会变得非常显而易见。

记住自己的梦境，把它们记录下来并且加以分析，这有助于增进这一稳态功能。但是，无论我们记得与否，梦都会发挥它们的作用。毕竟，绝大多数的梦在发生时，人们都没有有意识地觉察到它们；然而，它们必定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动物都做梦，而且做梦的头脑已经存在了1亿3500万年。如果梦没有以某种至关重要的方式对生存作出贡献，那实在是对大自然的时间超乎寻常的浪费。生态学和荣格心理学被证明对这一令人着迷的现象持有共同的看法，虽然极少有生态学家（而且实际上极少有荣格学者）觉察到这个事实。按照生态学的观点，梦所执行的任务是把动物的日常经验和该物种的基因组（即全部遗传构成）所规定的生命程序整合起来。梦提高动物的生存能力，并且提供使生命周期的基本模式得到实现的手段。这就是在自然的、有机层面上的个体化过程。

荣格所关注的个体化过程是男人和女人积极寻求完满地成为自己身上所存在的人的形象的有意识过程。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对个人的发展施加一些限制，正如没有一个母亲能够把母亲原型的全部内容都体现出来一样，也没有一个个体能够包含集体潜意识的全部潜能。无论我们的教养可能有多么幸运，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到中年时期也只求能

是自性的一个“足够优秀”的变化形式而已。但是，一个人可以遵循阿波罗的忠告“认识你自己”，留意品达[2]的格言“成为真实的你”，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习，发现“真实的自我”——使得内隐的自己清楚明白地显露出来。用荣格的话来说，这意味着要克服父母和文化环境所施加的分离，脱去“人格面具虚假的外包装”（《荣格全集》第7卷，第269自然段），放弃自己的自我防御，并且不是把阴影投射到他人身上，而是努力认识它，承认它是自己内在生活的一部分，和生活在个人精神内部的性异人格达成和解，力求令自性的最高意向得到有意识的实现。当然，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要完全达到这些目标是绝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是重点。荣格写道：“只有当目标作为一种理念时它才是重要的。至关重要的是引导我们通向目标的伟大工作（*opus*）：这才是有生之年的目标”（《荣格全集》第16卷，第400自然段）。

使自己投身于伟大的工作就是要一直到老年都过着富有成果的生活，同时履行晚年成熟期的精神义务。“如果长寿对人类来说没有意义的话，那么，一个人就绝不会要活到七、八十岁。生命的下午一定有其自身的重要意义，而不可能仅仅是生命的早晨一个可怜的附属物”（《荣格全集》第8卷，第787自然段）。

利用这些人生的下午的年份，尽可能地在我们文化的限度之内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这既有助于促成我们生命的个人实现，也有助于推进社会的福祉。个体化进程良好的老人是——而且一直都是——智慧的宝库，因为他们有时间进行反思，把他们一生的体验所习得的所有东西整合起来。无论年轻人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书本的知识”绝不可能与从一个有知识和生活过的人那里获得的灵感相比。个体化是使一个人的个人存在通过人类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得以实现，并且在一个人微小的精神世界这一脆弱的容器内，提取创造性本质的精华。在这个微观世界的实验中，伟大的宇宙开始意识到它自己。

注释

〔1〕 出自古代日耳曼英雄文学中的故事。布伦希尔特（Brünnhilde）是一个美貌而有男子气概的公主，她发誓只嫁给不仅力气胜过自己而且具有最优秀品德的男子。齐格弗里德符合这个条件，向她求爱并赢得了她。沃坦（Wotan）是日耳曼神话中相当于北欧主神奥丁（Odin）的神。

〔2〕 品达（Pindar，公元前518或前522——约前438），古希腊抒情诗人。

第四章

心理类型

荣格对人类生活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都十分关注。心理学必须对所有人都共享的精神结构和功能作出界定，然后描述这些结构和功能是怎样以独特的组合方式结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个体人格的。1921年出版的《心理类型学》（《荣格全集》第6卷）就是他想要达成这一双重目标的第一次尝试。

可以作这样一个合理的假设，即所有的人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心理装置，以此来感受自己外部和内部所发生的一切，来系统地阐述与此有关的观点，并且在事件发生时，决定怎样对其作出反应。人们之间的差异在于每个人所特有的运用这一心理装置的方式；统觉和反应的这种特有模式即是心理学中的“类型”之所指。

任何一个想要确立起一种类型学的心理学家都必须面对如下问题：（1）这个心理装置的基本成分是什么；（2）人们在利用这些成分形成其适应现实的习惯模式时有何差异？荣格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1）这一心理装置由4种心理功能构成，他命名为感觉（sensation）、思维（thinking）、情感（feeling）和直觉（intuition），所有这些功能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先验的存在；（2）个体的差异在于他们在这4种功能中偏向于使用哪一种。

要在人们之间作出进一步的区分，则依赖于他们习惯上更重视的是外部的客观事件还是内部的主观事件（即他们对待现实的态度 是具有外倾的 特点还是具有内倾的 特点）。

4种功能

在《心理类型学》一书中，荣格非常详细地描述了4种功能的不同特点，但在他去世两年之后出版的《人及其象征》中，他却对这一信息作了非常简洁的概括：“这4种功能类型与意识获得其经验定位的明显手段相对应。感觉（即感知觉）告诉我们存在着某样事物；思维告诉你它是什么；情感 告诉你它是否合意；直觉 告诉你它来自何

处，将去向何方”（《人及其象征》，第61页）。

荣格认为，思维和情感是理性（rational）功能，而感觉和直觉是无理性（irrational）功能。很少有人会不同意有效的思维必须是符合逻辑的和理性的，但是，很多人却难以想象情感是一个理性的过程。荣格说，这是因为他们把情感和情绪（emotion）或感情（affect）相混淆了。荣格所使用的这一术语“情感”当然能引起情绪，但是他所指的情感其力量必须强大到足以引起身体发生生物化学变化或神经变化；它通常的用途是对内外部事件作出价值判断，以确定它们是令人愉悦的还是使人不快的，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是值得想望的还是不受欢迎的，是好的还是坏的等等。这就需要根据过去的经验作出评价性的思考，因此，按荣格的观点，这就是一个理性过程。如果把荣格的情感功能看作是一个关乎价值观的判断过程，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不那么令人困惑了：评价（evaluating）功能或许是一个更合适的术语。

作为一种心理功能，感觉是我们在意识中对我们的官能证据进行加工处理和建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手段。直觉是我们对任何特定时刻呈现在我们的觉知面前的某一情境中所固有的可能性作出推断的手段。像荣格那样把这两种功能描述为“无理性的”是毫无助益的，因为它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他把这些功能视为病态的或“疯狂的”。所谓“无理性”，他希望表达的隐含意思是，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理性毫无关系。“非理性的”（non-rational）会是一个更好的术语。

两种态度

每一种功能在个体的心理中得以表现的方式依赖于他或她所采取的独特态度。外倾主要朝向外部世界的事件，而内倾则主要关注内部世界。通常，外倾者有“一种外向的、坦率的和随和的秉性，很容易适应某种情境，迅速地形成依恋，并且把任何可能的担忧抛到一边；他们常常怀着粗枝大叶的自信大胆地进入未知的情境”。另一方

面，内倾者有“一种犹疑的、思考的、退缩的禀性，使他们不喜欢与人来往，远离客体，总是轻微地处于防御姿态，并且选择多疑地审视一切”（《荣格全集》第7卷，第43自然段）。

酒吧前的斗殴

下面举一个例子，这将有助于我们澄清荣格使用这些不同的功能和态度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不妨想象，有4个人——分别是感觉型的、思维型的、情感型的和直觉型的——目睹了以下场景：

有两个男子摇摇晃晃地从一个酒吧间里走出来。他们叫嚷着互相辱骂。他们扭打了起来。其中一个人倒了下去，头砰的一声撞在人行道上。

每一位目击者都将以其类型所特有的方式对这些事件作出反应。我们来依次看一看他们每个人的表现。

感觉型的人 将能够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最清楚的说明。他会注意到这两个男子的身高、体型和大致相貌：其中一个身材肥胖，已到中年，秃头，左眼上方有一块伤疤；另一个年纪轻些，金色头发，体格更健壮，唇上有小胡子。两个人都随意地穿着T恤衫、牛仔裤和旅游鞋。倒在地上的是那个胖子，撞上路缘的是他的右侧太阳穴。他头着地时发出了砰的一声响等等。

思维型的人 在事件发生时寻求解释，努力思考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这两个人摇摇晃晃地从酒吧里出来，因此很显然他们喝了酒。他们叫嚷着相互辱骂，因此他们是起了争执。接着他们扭打了起来，因此他们的感受一定相当强烈，以致发生了身体暴力。其中一个倒在了地上，所以他一定是这两个人当中身体较弱的（或更醉的）一个。他砰的一声撞到了头部，那么他可能会发生脑震荡，需要进行医治等等。

情感型的人 的反应是对这一场景中的每个事件都作出价值判断：“多么不堪的事情啊！”“多么令人讨厌的家伙！”“这显然是粗人经

常光顾的酒吧，要是一个人想安静地和朋友聊聊天，就不要去这个地方。”“倒在地上的那个人可能受伤了，但他活该！”等等。

直觉型的人“看见”了全部的情况：他们是各自支持一方球队的足球流氓，由于对他们的污言秽语感到厌恶，店主要他们离开，这煽动得他们转向了暴力冲突。砰的一声撞了头的那个人总是事故不断，而这只不过是他不幸的人生中的又一次事故而已。他的头骨破裂，脑中有个血块，需要做手术。他将几个星期无法上班，而他一直受苦受累的妻子又得勉强维持生计。这就是缺乏教养的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生活除了足球和喝酒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依托。诸如此类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而且会变得更糟，因为我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社会或完善教育体系等等。

任何一个恰巧目睹这件事情的人，都有可能会产生与刚才所述的那些类型类似的观察、想法、价值判断和直觉，但荣格要说明的是，我们每个人在密切注视这些事件时，都会存在着重使用其中一种功能模式、而不是其他3种的特有倾向。对这种模式的习惯性使用决定了一个人的功能类型。此外，一个人怎样对这件事情作出反应还取决于他的独特态度；一个外倾的人更有可能进行干预，提供急救，把攻击者拉开，打电话叫救护车等等，而内倾的人则更倾向于观察、记录和在内心思索所发生的事情，他宁愿把这件事留给其他人（例如，一个外倾的人）或某个负责的官员去处理。

8种心理类型

从理论上讲，有可能从这两种态度 类型和4种功能 类型中描述出8种心理类型：外倾感觉型、内倾感觉型、外倾思维型、内倾思维型等等。荣格评论道，一个人仅仅使用一种功能是非常罕有的：他们倾向于发展两种功能，通常一种是理性 功能，另一种是无理性 功能；其中一种成为主要的 （primary）或优势 （superior）功能，而另一种则成为辅助 （auxiliary）功能。另外的两种功能相对地保持潜意识

状态，和阴影联系在一起。这两种中处于更深的潜意识之中的就是人们所称的劣势（inferior）功能。因此，要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现他形成了思维和情感、感觉和直觉功能，那是很不同寻常的。由此，理性功能思维和情感可以被看作是一对对立物，无理性功能感觉和直觉也是如此。所以，一个外倾的思维——感觉型的人会有一个内倾的情感——直觉的阴影，反之亦然。这可以用简图来表示（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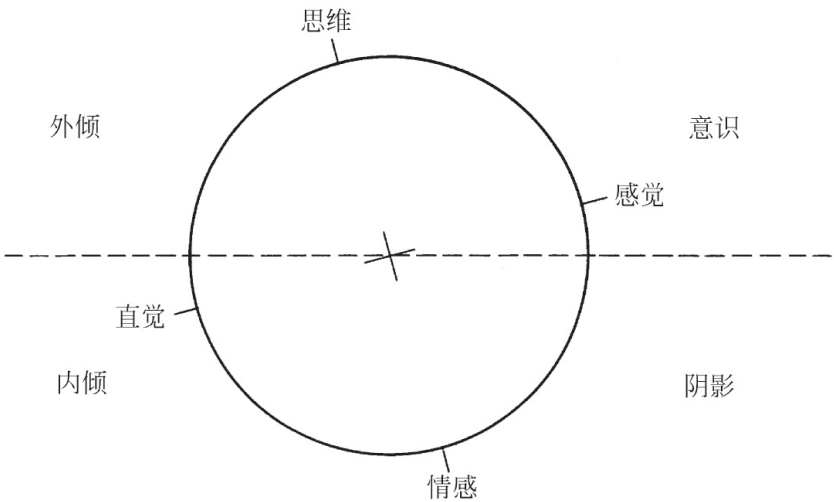

图16　外倾思维——感觉型的态度和功能

在《心理类型学》一书中，荣格对这8种理论类型的每一种都作了全面而引人入胜的说明。这里我们只可能给出每一种类型的简略概述，并且稍带提及其阴影对立面（对那些和这类人打过交道的人来说，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外倾感觉型

这种类型的人主要关心的是客观现实，是事物的本来面貌。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实事求是，讲求实际；他们热衷于细节，几乎从不考虑抽象概念、价值观或意义。荣格说，他们的一贯目标是“产生感

觉，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就享受这些感觉”（《荣格全集》第6卷，第605自然段）。他们积极地在危险运动中寻求刺激，倾向于寻欢作乐，活在当下，就像厄庇墨透斯[1]一样，几乎从不把未来当回事。因此，他们会是极好的同伴。他们的座右铭是：“吃吧，喝吧，享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但是，他们可能会显得肤浅和“没有灵魂”。如果他们引起精神病学家的注意，那么通常会是因为成瘾、恋物癖或强迫性神经症。

阴影：他们的劣势功能是直觉，它是内倾的，由内部事件引起，而和外部发生的事情没有关联。当它被激活后，会倾向于引起消极的预感，这些预感通常十分离谱。其结果是，这种类型的人可能会因为很不起眼的原因而突然变得偏执或产生敌意。他们那种不成熟的、无差别的直觉也可能会出乎每个人意料之外地把他们带入到某种神秘的狂热崇拜中去，例如人智学，或某种形式的古代神秘主义。

例如：工程师、商人、建造者、赛车手、职业赛马骑师、滑翔机运动员、登山者、狄更斯（Dickens）《艰难时世》中执迷于“事实”的葛擂硬先生。

内倾感觉型

荣格说：“相对于外倾感觉型为客观影响的强度所引导，内倾感觉型为由客观刺激所引起的主观感觉的强度所引导”（《荣格全集》第6卷，第650自然段）。爱玛·荣格认为自己即是属于这种类型；她把自己描述为就像是一块高度感光的照相底板。任一情境中的每一细节都被注意到，而且能随时被回忆起来。这样的人对情景、色彩、书中的段落、声音、谈话、气味、味道、触觉等等都有着鲜明的记忆。

阴影：他们的劣势功能是外倾直觉，它的激活是由外部事件引起的。这种直觉本质上倾向于消极，因为当内倾感觉型的人运用他们那极少的一点直觉时，他们通常获得的是某一情境中错误的信息：他们永远都疑神疑鬼。他们的预感常常是错误的，但是偶尔他们也会猜个

正着。“外倾直觉……对客观上真实存在的可能性［通常有］‘良好的嗅觉’，但是这种原始的直觉对潜藏在背景中的一切可能的危险更是有一种令人惊异的鉴别力”（《荣格全集》第6卷，第654自然段）。这可能会导致他对外部世界可能发生的事件产生阴暗的预见性幻想。当这种类型的人精神崩溃时，他们往往会变得偏执。

例如： 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其小说中对人物和地方的事无巨靡的描写表明，他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重现对现实的鲜明内心印象的法国主要印象派画家可能也是内倾感觉型的。

外倾思维型

这种类型的人把他们的活动建立在受外部标准指导的理智思考基础之上。他们擅长于解决难题、重组事务、澄清问题和分清良莠。他们几乎一成不变地关注外部的状况，而不关心理论或观点。他们热衷于基于实际经验的法则，并且寻求将这些法则运用到他们所处身的所有情境中去。由于他们使情感服从于思维，因此他们可能看起来冷淡疏离。

阴影： 内倾情感。这会导致不成熟的、不恰当的和表达方式拙劣的情感和价值判断。外倾思维型的人倾向于想当然地看待他们的个人关系，觉察不到他们周围的人的感受。他们原始的情感功能有时会将他们引向政治或宗教上的突然皈依，或在个人忠诚方面同样突然的转变。

例如： 律师、行政公务员、管理顾问、实践科学家，以及技术人员；杰出的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伏尔泰（Voltaire），他终生都被教会视为祸害，却在临终时突然皈依天主教，要求实施临终涂油礼。

内倾思维型

这种类型的人的活动同样建立在理智思考的基础之上，但这些思

考却是受内部标准指导的。他们往往对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兴趣寥寥，而一心专注于理论和观点。当我们读到荣格对这种类型的人所作的描述时，会意识到他就是在描述他自己："至关重要的事情似乎是主观观点的发展和呈现，是暗中徘徊在心灵之眼背后的最初的象征意象的发展和呈现"（《荣格全集》第6卷，第628自然段）。事实上，荣格的心理类型理论就是内倾思维活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经过缜密思考的体系，它以齐整的对立与平衡的方式设计出来，然后，像所有的类型学一样，被运用于心理学数据。这种类型的人喜欢不受打扰地独自思考，常常选择远离他人的陪伴，而且，由于他们在智识上的自给自足，他们很少关心自己的观点是否被普遍接受。

阴影： 外倾情感。在与外部对象发生关系时，这种情感可能变得活跃起来，但是对内倾思维型的人来说，认识到自己的情感和与他人分享这些情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由于情感是原始的，而且主要是潜意识的，因此它可能会以堂吉诃德式的和无法预料的方式表现出来：当人们的行动或事件的发生没有以内倾思维型的人所认为"应该"的方式进行时，这一类型的人可能会突然爆发出强烈的感情；内倾思维型的人还可能对不适合的伴侣形成依恋——就像《蓝天使》[2] 中对一个妓女激情难抑的那位教授一样——从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例如： 哲学家、"知识分子"、数学家、"纯"科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外倾情感型

这种类型的人的情感、价值观和判断倾向于常规，而且和他们习惯上经常交往的同伴的情感、价值观和判断和谐一致。因此，他们和蔼可亲，容易相处。他们讨厌独自一人，觉得内省是不健康的和令人沮丧的。他们在朋友和同事中人缘甚佳，因为在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能够来到你的身边，为你加油打气。如果你因为椎间盘凸出或流感

而被迫卧床休息，那些跑来帮你喂猫、为你购物的朋友就完全可能是一个外倾情感型的人。

阴影： 内倾思维。荣格说："这种类型的人的潜意识首先包含着一种独特的思维活动，一种孩子气的、原始的、消极的思维活动"（《荣格全集》第6卷，第600自然段）。这种思维狭隘，粗糙，愤世嫉俗。它可能会被似是而非地用来为当下的情感状态寻找合理的借口，而这种策略常常会把外倾思维型的人惹恼。如果外倾情感型的人接受了某一智识体系，他们往往会为此狂热，因为他们无法对它作通盘的思考。当这种类型的人出现精神问题时，他们倾向于患上癔症或燥狂症。

例如： 演员、电视名人、公共关系专家；歌德的（《浮士德》中的）瓦格纳；诺埃尔·科沃德 [3]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奥托莱因·莫雷尔夫人 [4] 、梅·韦斯特 [5] 、托马斯·比彻姆爵士 [6] 、萨拉·伯恩哈特 [7] 。

内倾情感型

这种类型的人有一套高度分化的价值观，而且他们往往对这套价值观秘而不宣。但是，通过其生活方式中所体现出来的标准，他们可能会对身边的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能够为一个团体提供道德支柱，不是通过说教或告诫，而只是通过身体力行。荣格说："他们通常不爱说话，不可接近，难以理解……友好亲切，不惹人注目，给人的印象是令人愉快的恬静……没有要以任何方式影响他人、吸引他人注意或改变他人的欲望……不愿对他人的真实情绪作出反应……这种类型的人奉行一种善意的、但是带有批判性的中立，伴随着一种隐约的优越感……"（《荣格全集》第6卷，第640自然段）。这种类型的人确确实实是"静水流深"。

阴影： 外倾思维。和外倾情感型的人一样，这种思维是具体的和原始的，但是，由于它是外倾的，因此它往往和客观事实盲目地联系

起来；当这种类型的人真正想要使用其思维功能时，他们会倾向于迷失在细节之中，只见树木不见林。他们若是出现精神问题通常会导致抑郁症。

例如： 赖纳·马里亚·里尔克 [8] 曾经给一位女士写信：“我爱你，但这不关你的事！”蒙娜·丽莎给人的印象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外倾直觉型

这种类型的人习惯于使用直觉来应对外部现实。和感觉型的人相反，直觉型的人对事物的“本来面貌”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能对此做点什么。荣格说：“直觉并不仅仅是知觉或幻象，而是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对客体的投入和它从客体中获得的同样多”（《荣格全集》第6卷，第610自然段）。外倾直觉型的人能迅速地发现某一情境中所固有的可能性，并且善于预测未来的发展。但是，除非他们有思维作为辅助功能，否则他们无法良好地执行自己所提出的方案，也不可能确保它达成完满的结果。他们的天赋从本质上来说是创新性的，并且他们对常规容易感到厌烦。他们会结交新朋友、迷上新爱好或接受新观点，因为这些带来了各种有趣的可能性，但是当其他的可能性出现时，他们又会迅速地将前者抛弃。

阴影： 内倾感觉。荣格说：“当然，［直觉型的人］确实拥有感觉，但是他并不受到感觉的引导；他使用感觉只是把它们作为其知觉的出发点”（《荣格全集》第6卷，第611自然段）。但是，他常常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感觉，因此，当他疲劳、寒冷或饥饿的时候，会倾向于不去注意它们。当他的内倾感觉一旦变得活跃起来，它可能会导致他对从自己的感官中获得的信息作出错误的解释，其结果是，他可能会成为疑病症患者，或者沉溺在节食和运动的时尚之中。

例如： 记者、证券经纪人、企业家、期货交易人、货币投机商、对时尚潮流具有预见性的创造性艺术家和时装设计师。

内倾直觉型

“［内倾直觉］并不关心外部的可能性，而是关注外部客体在内部所释放出来的东西”（《荣格全集》第6卷，第656自然段）。这种类型的人倾向于利用物体化 （reificaton）的机制（就是说，他们把理念、意象或洞见当作真实的客体一样来对待）。“因此，对直觉来说，潜意识的意象和事物一样，都拥有崇高的地位”（《荣格全集》第6卷，第657自然段）。荣格本人主要是一个内倾直觉型的人（思维是其辅助功能），而内倾直觉型的人和荣格一样，在简洁而有条理地表达他们的观点方面存在困难，因为他们追逐一个又一个的意象，一个又一个的想法；正如荣格所说，他们“对潜意识的子宫中的每一种可能性都紧追不舍”，但却通常忽略了这些可能性所可能具有的个人含意。“如果这种类型的人不存在，就不会有以色列的预言家了”（《荣格全集》第6卷，第658自然段）。他们可能具有一些卓越的洞见，而如果他们能够费心或者足够有条理地把这些洞见表达出来，其他人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将其发展起来。

阴影： 外倾感觉。由于这主要是潜意识的，因此它们始终处在与外部现实失去联系的危险之中，而如果他们的精神出现问题，他们就会得精神分裂症。很多人都有类精神分裂症的人格，就像荣格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时那样。由于他们对实际的细节模糊不清，对空间和时间的定向不佳，他们往往忘记约会，很少严格守时，在陌生的地方容易走失。他们与现实的微弱联系，再加上他们深刻的洞见，会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自己体验为属于“被误解的天才”的范畴。他们对性的态度可能是不成熟的和不恰当的，而且他们往往是糟糕的情人，因为他们觉察不到自己或伴侣生理上所发生的事情。

例如： 先知、预言家、诗人、心理学家（非实验心理学家或学院心理学家）、艺术家、萨满、神秘主义者、执迷某种理论而行为古怪的人；尼采（特别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斯维登堡[9]。

必须提醒读者的是，以上的描述必定是过于简单化的，不能充分

地反映荣格所提供的详细的阐释。如果希望更为详尽地研究这一类型学，那么请参阅《荣格全集》第6卷的第十章。

起源

对典型的心理特征的探求并非仅限于荣格。寻找共同特性是思维功能在面对复杂的数据资料时所一贯采用的方式，而从古典时代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提出了许多其他的类型学。有趣的是，这些类型学所划分的范畴通常都是以“四”为单位。仿佛心灵有一种自然的倾向，以4个一组的成对的对立物为方向。磁罗盘，这一不可或缺的定向工具，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认为，4种元素——土和气、火和水——是由一对伟大的原型对立物爱和冲突所支配的。大约在同一时代，人们界定了4种主要的特性——热和冷、湿和干，它们同样构成了两两对立的四元组，亚里士多德的4种血型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4种体液也是如此。这些古代的分类体系在罗夏（Rorschach）的《类型理论》（1921）和克雷奇默（Kretschmer）的《体型与性格》（1921）中以现代的方式获得表达，这些书的出版和荣格的《心理类型学》大致在同一年代。

荣格希望通过设计自己的类型学来解释他和阿德勒与弗洛伊德失和的原因，但这只是部分的动机；我认为，这也是试图补偿他的个人怪异感和孤立感的进一步的尝试。正如他必须发现自己和所有人的共性一样，他也必须解释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别。

因此，他开始广泛地研究历史上一些重大的争执（例如，圣奥古斯丁和贝拉基[10]、德尔图良和奥利金[11]、路德和兹温利[12]之间的争吵），以及过去的一些哲学家和诗人所作的某些重要的分类（例如，尼采对阿波罗型和狄俄尼索斯型所作的比较，施皮特勒[13]之于普罗米修斯和厄庇墨透斯，以及歌德之于外推和内敛原则）。他得出结论认为，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这些划分代表了外倾和内倾这两种态

度之间的一种基本差异。

此外，他把其描述建立在以经验为依据的洞见的基础之上，这些洞见来自于对许多不同个体的观察。对这一点他相当敏感，因为当他的类型学受到学院心理学家们的攻击时，他在《心理类型学》第7版的序言中对此作了尖锐的回击："我的类型学是多年实践经验的结果，当然，这些经验是学院心理学家所无法获得的……"！

但是，这两种态度类型的一个重要来源却惹人注目地没有出现在荣格对文献的广泛回顾之中，这就是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在其《智力的实验研究》［1903］中）对两种智识态度所作的划分，他称之为"内省"（introspection）和"外省"（externospection）。他把内省界定为"我们所具有的关于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情感的知识"，而外省是"和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相反的我们的知识朝向外部世界的倾向"（埃伦贝格尔，《潜意识的发现》，第702—703页）。比奈的划分和荣格的如此接近，更不用说他所使用的术语了，因此在《心理类型学》一书中未见对它的提及令人感到十分奇怪。对荣格的缄默不语最宽厚的解释是，在提出他关于内倾和外倾的态度类型的观点时，荣格经历了一个潜忆（cryptomnesia，字面的意思是"隐藏的记忆"）的过程——虽然他失去了对比奈的研究所有有意识的记忆，但它却在他的个人潜意识中结出了果实。

类型学的应用

和所有其他的类型学一样，荣格的类型学也遭到了同样的反对，也就是说，它寻求把显然无限多样的人类心理特质限制在狭隘的、任意施加的范畴之中。然而，应该要为荣格作出辩解的是，作为一个极其强调个人独特性的人，他也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表示说，他确信"每一个人对这条规则来说都是一个例外"。他又继续说道：

对某种类型的描述无论有多么完善，都绝不可能适用于不止一个个体，尽管从某些方面来说它恰当地说明了数以千计的其他人的特点。一致性是人的一个方面，独特性则是另一个方面。分类法并不是要解释个体的精神。不管怎么说，对心理类型的理解开辟了一条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普遍心理的道路。（《荣格全集》第6卷，第895自然段）

不存在“纯粹的”类型。没有一个人仅仅只有一种功能和一种态度，而没有其他的功能和态度。我们都是各种类型的混合物。对某些人来说，很容易看出哪种功能和哪种态度在习惯上占优势，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几乎不可能看出来。对此荣格坦率地承认：“人们常常很难发现一个人究竟属于这种类型还是那种类型，特别是就他自己而言。”关于态度类型，他说：“每一个人都同时具有外倾和内倾这两种机制，只有相对占优势的这种或那种才决定其类型。因此，为了使整个画面显得轮廓分明，我们就必须对它进行大力的修饰，而这或多或少地意味着虚伪的欺诈”（《荣格全集》第6卷，第4自然段）。

实际上，荣格的类型学中得到最为广泛的承认的，是他对内倾和外倾态度类型的划分。甚至一直对各种形式的分析怀有敌意的伦敦大学的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教授，也通过使用最为审慎控制的量化手段，证实了人类人格中内倾——外倾轴的存在。但是，在实证的基础上确立荣格所提出的4种功能类型的努力却不是那么成功。

荣格论证说，一个人的类型既是由环境因素所决定的，也是由遗传因素所决定的；确实，内倾和外倾的态度看起来都好像具有生物适应性。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优势地位，一方面是我们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是我们对满足这些条件的有效方式进行思考的结果。在像人类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物种中，有些个体会在遗传上先天带有外倾的专门倾向，而另一些个体则带有内倾的专门倾向，这是不足为奇的。

内倾和外倾的态度对人的健康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两种倾向之间交替。毕竟，即使是最外倾的人，每天晚上也会入睡做梦，而这正是一种深刻的内倾状态。在睡梦状态

中，一个人完全从外部世界中撤离出来，而且只要梦境持续，它就代表着一个人全部的现实体验。

在发展心理类型理论的过程中，荣格意识到一个极端重要的、学院心理学家倾向于忽略的事实，即一个心理学家在搜集和阐释他的数据时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除非观察者能够认识到他自己“在个人观察上的误差”，并且在研究中允许这种误差的存在，否则，他的观察就不可避免地会因偏见而受到损害。即使是在物理学中，人们也已经发现，科学家会影响他正在观察的现象，可见在对人类心理的研究和分析实践中，这种情况就更会是如此了。因此，认识一个人的类型是有用的，它能使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他带入某一情境的个人偏见。

总的说来，对荣格的类型学的最佳应用方法是把它当作一个罗盘一样来使用：对自性来说，所有类型学上的可能性理论上都是可用的，但是，能够确定下一个人用来指引其人生航向的坐标十分有用。荣格承认，这个航向绝不是完全固定的；它可能随时发生改变。从这种观点来看，对一个人的心理类型的觉知并不是一种限制，而是一种解放，因为它能够为人生开辟一些新的可能的航道，它们的存在对于不了解自己心理类型的人来说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

注释

〔1〕 厄庇墨透斯（Epimetheus），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兄弟。不顾其兄弟的警告，娶潘多拉为妻。

〔2〕《蓝天使》（*The Blue Angel*），1930年上映的一部德国著名影片。

〔3〕 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1899 - 1973），英国剧作家、演员和作曲家，擅长风俗喜剧。

〔4〕 奥托莱因·莫雷尔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1873 - 1938），英国贵族，社交沙龙女主人，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圈内影响很大。

〔5〕 梅·韦斯特（Mae West，1892 - 1980），美国戏剧、电影女演员，以演色情角色闻名。

〔6〕 托马斯·比彻姆爵士（Sir Thomas Beecham，1879 - 1961），英国指挥家，英国国家歌剧院和伦敦爱乐交响乐团的创建者。

〔7〕 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 - 1923），法国女演员，以音色优美，台词、声乐技巧及感情变化丰富著称。

〔8〕 赖纳·马里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 - 1926），奥地利诗人，生于布拉格，对西方现代文学有着巨大影响。

〔9〕 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 - 1772），瑞典科学家和神学家，从研究自然科学转向神学，其通灵幻象和对《圣经》的神秘解释成为新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础。

〔10〕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354 - 430）和贝拉基（Pelagius，约354-418以后）皆为基督教神学家，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存在原罪，以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人的意志是“自由”的。

〔11〕 德尔图良（Tertullian，160？ - 220？）为迦太基基督教神学家，奥立金（Origen，185？ - 254？）是古代基督教著名希腊教父之一、《圣经》学者。

〔12〕 路德（Martin Luther，1483 - 1546），德意志人，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起者；茨温利（Ulrich Zwingli，1484 - 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两人为了圣餐的意义和礼仪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

〔13〕 施皮特勒（Carl Spitteler，1845 - 1924），瑞士诗人，191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五章

梦

对经典的荣格式分析而言，梦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荣格对梦的理论观点深受弗洛伊德的看法的影响；他最初把梦作为实际治疗的一种模型，后来则把它作为反其道而行、修改和扩展的模型。因此，我们必须以弗洛伊德对梦的看法作为出发点。

弗洛伊德相信，在睡眠状态下，被禁止的愿望从白天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寻求进入意识之中。但是，这些愿望的“被禁止的”性质意味着它们被自我体验为是令人不安的，因此可能会把人唤醒。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梦的功能就是防止此事的发生：它们通过把不可接受的愿望转化成一套可以接受的意象，从而使自我得到保护，因此做梦者能够继续睡眠。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梦都具有便利性，它们达到延长睡眠的目的，而不是将人唤醒。梦是睡眠的 守护者 ，而不是它的干扰者 ”（第330页；弗洛伊德自己以斜体强调）。

实施这一保护功能的心理机制是“潜意识压抑力”，或称超我，它使得被禁止的愿望（弗洛伊德称之为梦的潜　意的内容　）被伪装起来，以某种既不会干扰自我、也不会唤醒做梦者的方式出现。这样，梦本身即是伪装的愿望的显意的内容 。为了把潜意的内容伪装起来，潜意识压抑力利用了多种手段，例如移置作用 （displacement）、凝缩作 用 （condensation）、象征作用 （symbolization）和图示作 用 （pictorialization），这些防御性的转化是显意的梦常常呈现出怪诞或非理性的性质的原因。弗洛伊德甚至走得如此之远，以致作出了如下循环论证：梦的怪诞的性质本身就证明了对梦的真实意义进行伪装的潜意识压抑力的存在及其作用。

弗洛伊德对梦进行解释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示潜意识压抑力的作用。这是通过自由联想的方法来达到的；这种方法从梦的一个意象开始，让一个人的思想完全自由地对它产生联想。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要想恢复梦的工作所毁坏的那些联系，这项任务必须通过解释过程来完成”（同上书，第422页）。因此：“梦的解释是认识心灵的潜意识活动的绝佳途径　”（同上书，第769页；弗洛伊德自己以斜体

强调）。换句话说，梦是有待破译的密码，有待分解的乱麻，如此它的意象才能被还原到其基本意义。

弗洛伊德认为，他的这些系统的阐述已经解决了自古以来就吸引着人类的那个谜团，即怎样揭示梦的意义，这令他感到非常满意。他对此是如此的深信不疑，以至于当他1895年在维也纳附近的贝尔维城堡度假时，他产生了一个幻想：有那么一天，一块大理石的石碑上会记载着“1895年7月24日在这幢房子里，梦的秘密　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面前被揭示出来”。

起初，荣格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但他很快便发现了这种观点的局限性；他日益加深的保留态度和他对精神分析作为一个整体所持有的态度是类似的。弗洛伊德相信，梦从两个来源把出自记忆残留的显意的内容塑造成形：从前一天的事件和从童年时期的事件。荣格接受了这种观点，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走得更远，认为梦还借助于第三个更深刻得多的根源，它属于人类进化的历史，他称之为集体潜意识。此外，弗洛伊德相信，导致梦的产生的那些被禁止的愿望在本原上主要是性欲的。而荣格则坚信，梦起源于人类更加广泛的关注，也就是说，对人类存在这一基本问题的关注。

在与弗洛伊德决裂以及和潜意识相遇之后，荣格感到他可以自由地提出对梦的看法了，不过和弗洛伊德不同，他从未对梦采取过武断的态度。相反，他可能有点过分谦虚了。他写道：“我没有关于梦的理论，我不知道梦是怎样产生的，而且我根本就不能肯定，我处理梦的方式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方法’”（《荣格全集》第16卷，第86自然段）。但是，在发表了这通拒负责任的声明之后，他接下来摒弃了弗洛伊德梦的理论的基本原则，以自己的意见取而代之。

事实上，根据对梦的研究，弗洛伊德的大部分假设已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而荣格的假设则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例如，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做梦，而人类的婴儿把他们的很多时间都用在REM（快速眼动）的有梦睡眠上，在子宫里和出生后都是这样，这些已经确定的观察发现似乎驳倒了以下观点，即梦是被压抑的愿望的伪装的表现形式，或者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保护睡眠。正如荣格所认为的那样，梦

更有可能是精神的自然产物，它们执行某种稳态或自我调节的功能，它们出于个人调节、成长和生存的需要服从适应性变化这一生物学规律。

荣格关于梦的理论可以总结为以下4条：

1．梦是自然的、自发的事件，它们的进行不依赖于有意识的意志或意向；

2．梦是有目的的和起补偿作用的，它们旨在促进人格的平衡和个体化；

3．梦的象征是真正的象征，不是符号，它们具有一种超越功能；

4．要使梦的治疗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放大（amplification）和积极想象 是更好的手段，而非基于“自由联想”的解释。

我们将逐一地对它们进行思考。

纯粹本性

梦是潜意识精神没有偏见的、自发的产物，不受意志的控制。它们是纯粹本性；它们向我们展示的是未加修饰的、自然的真理，因此，和其他任何事物不同，当我们的意识偏离其基础太远、并且陷入绝境之时，梦能够向我们反馈某种态度，这种态度与我们人类的基本本性正相一致。（《荣格全集》第10卷，第317自然段）

“它们不会欺骗，不会撒谎，不会歪曲或伪装……它们一贯寻求表现某些自我既不知道、也不理解的东西”（《荣格全集》第17卷，第189自然段）。梦是“以象征的形式对潜意识中的实际情境进行的一种自发的自我描绘”（《荣格全集》第8卷，第505自然段）。

无疑地，它并非是一个旨在隐藏其背后事物的虚假外观：

大多数房子所谓的正面绝对不是一个伪装或欺骗的歪曲；相反，它遵循建筑的方案，常常泄露内部的安排。“外显的”梦境就是梦本身，包含着梦的完整意

义。当我在尿中发现糖时，它是糖，而不只是蛋白的一个虚假外观。弗洛伊德所称的“梦的表面”是梦的费解之处，而这实际上不过是我们自己缺乏理解的一种投射。我们之所以说梦有一个虚假的正面，是因为我们没有看透它。（《荣格全集》第16卷，第319自然段）

荣格喜欢引用《塔木德经》[1]，大意是，“梦是对它自己的解释”。那么，为什么梦需要得到解释呢？并不是因为它们是伪装，而是因为它们的意义是用形象化的“语言”来阐述的，只有把它们变成文字时，才能被自我所理解。

“整个梦的工作本质上是主观的；梦就是一个剧院，在这个剧院里做梦者自己就是场景、演员、提白员、舞台监督、作者、公众和批评家”（《荣格全集》第8卷，第509自然段）。

认为梦只是被压抑的愿望在想象中的实现，这种看法已经无可救药地过时了。确实，有些梦明白无误地代表了愿望或恐惧，但所有其他的内容又怎么说呢？梦可以包含必然的真理、哲学的看法、错觉、狂野的幻想、回忆、计划、预感、无理性的经验，甚至心灵感应的幻象，天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些什么。（《荣格全集》第16卷，第317自然段）

补偿功能

荣格提出，梦执行一种补偿功能，以便令自我意识那些片面的态度达到平衡，这种观点和他关于精神稳态的概念是一致的。在第248页所引用的那段话中荣格宣称：“补偿理论是精神行为的一条基本法则”；他接下来继续说道：“一方的缺失将导致另一方的过量。同样，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补偿。这是梦的解释的一条百试百灵的规则之一。当我们着手解释一个梦时，询问以下这个问题总是有帮助的：它补偿的是哪一种意识态度？”（《荣格全集》第16卷，第330自然段）。

这样，梦“把某些重要的东西添加到我们的意识知识中去”，并

且，“如果一个梦没有做到这一点，它就没有得到恰当的解释”（《荣格全集》第16卷，第318自然段）。梦“总是强调另一方面，为的是使精神保持平衡”（《荣格全集》第7卷，第170自然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荣格的补偿概念可以看作是对弗洛伊德的愿望满足理论的一种扩展，因为两者都把梦看作是意识获得之前无法得到的和潜意识的东西的一种手段。但是，弗洛伊德认为，梦的目的是欺骗性的，以便智胜潜意识压抑力，使得阴影能够以伪装的形式进入意识，而荣格认为，梦的目的是通过使重要的潜意识潜能能被整个人格所用而服务于个体化。弗洛伊德使用的是因果论或还原论的方法，把梦的内容追溯到婴幼儿时期的本能起源，与此相反，荣格提出的是一种建构性的、目的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寻求发现梦的内容可能会引向何方。在荣格看来，和梦在早期个人经验中可能的起源相比，它的未来影响对人格发展（以及对获得积极的治疗效果）更有意义。追溯象征的过去，等于是剥夺了做梦者享受象征对现在和未来的贡献的权利；采取一种本质上是还原论的观点，等于是否定了精神系统创造性的、寻求目标的力量。“心理事实绝不可能完全依靠因果关系得到解释；作为一种生命现象，它总是牢不可破地和生命过程的持续联系在一起，这样它就不仅是已经进化了的，而且是持续进化的和富有创造性的”（《荣格全集》第6卷，第717自然段）。

因此，梦服务于自性的目的论规则，而自性永不停息地为其自身在生命中的实现努力。（teleo是一个组合词，派生自*teleos*，意思是“完善的、完全的”，和*telos*，意思是“目的”；因此，teleology是关于达到完善的目标。）

象征作用

在荣格和弗洛伊德的意见分歧中，没有一个领域比他们对象征的不同态度更能清楚地反映他们之间的气质差异了。对弗洛伊德来说，象征是某种潜意识概念、冲突或愿望的比喻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替

代——形成，把它所代表的概念的真实意义有效地伪装起来：一把剑是阴茎的象征，它的鞘是阴道的象征，把剑放入鞘中就是性交的象征。

就荣格而言，他根本就不认为弗洛伊德的象征是一种象征；它是一种符号（sign），因为它通常指向已知的或可知的事物，体现的是固定的意义。荣格对象征的理解是大不相同的。在他看来，象征是有生命的实体，力图表达之前未知的事物；它们是直觉的概念，从它们创造出来的那一刻起，就不可能以任何更好的方式得到阐述（《荣格全集》第15卷，第105自然段）。因此，象征的“意思比它们所说的要多”，并且是“对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的一种永恒的挑战”（《荣格全集》第15卷，第119自然段）。

对象征作用的这些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是弗洛伊德的还原论定向、另一方面是荣格的精神及其功能的目的论定向的进一步的表现。对荣格来说，象征是自然的成长因素，它们使得人格的发展、冲突的解决和对两极对立物的超越成为可能。为此，他认为，象征具有超越功能，对所有从一种心理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的转换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对治疗和自性的个体化来说，象征是不可或缺的。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卓越地位应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是能够制造象征的动物。

对超越功能的思考把我们带入了荣格理论的核心，即他对悖论的钟爱和对对立物（opposites）的生成力量的颂扬。他写道：“对立物是所有精神生活根深蒂固和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荣格全集》第14卷，第206自然段）。所有的对立物都具有内在的不可和解性：但是，任何一对对立物之间的冲突都会产生张力，这一张力促使精神寻求超越两者的第三种可能性。如果一个人能够学会承受对立物不可避免所带来的张力，那么，问题就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善与恶、爱与恨、怀疑与确信得到了和解，在意识和潜意识、人格面具和阴影、自我和自性之间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综合体。这些和解既不是通过理性的方式、也不是通过智识的方式获得的，而是通过象征作用，通过象征 的超越功能 获得的。

因此，象征的创造性工作是个人发展和治疗实践获得成功的关键。

解释

对荣格来说，对一个梦进行研究，其出发点并不是解释，而是“放大”——就是说，进入梦的氛围，确立其情绪状态及其意象和象征的细节，以这样的方式来放大梦本身的体验。如此它对意识的影响便得到了加强。

由于每一种象征所包含的内容远非言语所能完全表述，因此不应把它“还原”到其根源，而应从原型的视角来考察其影响。我们应该围绕梦的象征而行（circumambulate），容许它们的各个方面向意识揭示出来，而不是把梦分解成一系列的智识阐述。个人的联想需要被考虑进去，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接收梦所提供的一切，那么，对梦的意图的全面评价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此。

虽然大多数被记住的梦只不过是一些片断或几个简短的情节，但许多梦都有一个要讲述的故事，并且采取了私人戏剧的形式。在这些梦中，可以感受到一个明确的结构，荣格把它分成4个阶段：（1）呈示（exposition），设定情节发生的地点，常常还有时间，以及剧中人物；（2）情节的发展（development），在这一阶段中情境变得复杂，“一股明确的张力开始形成，因为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3）高潮（culmination）或突变（peripeteia），此时“某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发生了，或某件事情完全改变了”；（4）消散（lysis），梦的工作的结尾、解决或结果（《荣格全集》第8卷，第361—364自然段）。

举个例子将有助于使这些观点清晰起来：

[我身在]瑞士和奥地利边界的一个山区。天色将近傍晚，我看见一个老人，身着奥地利帝国海关官员的制服[第一阶段：呈示]。他略微有些佝偻，从我身边走过时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他脸上带着怒气，而非仅是忧郁和烦恼[第二

阶段：发展]。还有一些其他人在场，其中一个人告诉我，那个老人并不是真的在那里，而是一个多年前已经死去的海关官员的鬼魂 [第三阶段：突变]。“他是那些仍然无法得以安息的人之一” [第四阶段：消散]。（《回忆、梦、反思》，第158页）

但是，这并不是梦的结束，因为做梦者被带到另一个地方，一个类似的叙事结构在此重复：现在他发现自己在一座城市里。

这个城市是巴塞尔，但它也是一座意大利城市，有点像贝加莫。这是夏天；烈日当头，一切都被笼罩在一股强光之中 [呈示]。一群人向我涌来，我知道商店要关门了，人们正要回家吃午饭 [发展]。有一个全身盔甲的骑士走在这股人流之中。他登上台阶朝我而来。他戴着被称为轻钢盔的头盔，头盔眼睛处开口，身上则穿着锁子甲。锁子甲外面罩了一件短袖束腰上衣，前后都缝织着一个鲜红的十字 [突 变] ……我问自己，这个幽灵意味着什么，这时仿佛有个人回答了我的问话——但是四周并没有人在说话：“是的，这是一个定时出现的幽灵。那个骑士总是在12点和1点之间经过这里，他这样做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推测，有好几个世纪了），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此事” [消散]。（《回忆、梦、反思》，第160页）

整个梦境首先令人注意到的是其气氛和意象的那种强烈的引人注目的特质，以及悲伤的、鬼魂般的海关官员和其存在异乎寻常的、超现实的中世纪骑士之间鲜明的对比。这个梦开始于瑞士和奥地利的边界，这一定有某种意义，就像那个海关官员的衣着、面貌和行为举止一定有某种意义一样。他为什么不应该在那里，他为什么不得安息？为什么那个多少年以前就已经死去的骑士会大步走在一个现代城市的大街上？前者老迈、疲惫不堪，是一个已过全盛时期的人物，而后者却浑身散发出强烈的充满生气的原型意象——盔甲闪亮的骑士。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荣格式治疗中，习惯的做法是分3个阶段来探讨一个梦。第一个阶段试图确定这个梦在做梦者的生活中的背景，以便理解其纯粹个人的意义。第二个阶段必须界定这个梦的文化背景，因为它总是与梦中的环境和时间存在关联。最后，将对这个梦的原型背景进行探讨，

以便把梦放在人类生活的整体背景中来考察，因为在最深刻的层面上，梦把我们和人类古老的经验联系在一起。

在实践中，人们几乎不可能把这些阶段截然分离，因为不可避免地，经验的个人、文化和原型成分，以及对它们意义的解释，总是在不断地发生相互作用。但是，为了清晰起见，我们将分3个主题对这个梦的成分进行思考，同时也承认这些主题间存在不可避免的重叠。

个人背景

关于这个梦的个人背景大部分已经被揭示（前文第195—201页）：这个梦是荣格在和弗洛伊德的友谊破裂之前不久做的。更确切地说，这个梦发生在荣格致力于写作《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荣格全集》第5卷，《转化的象征》）一书之时，在这本书里他表述了一些他担心弗洛伊德可能无法接受的观点。荣格记录下的有关这个梦的联想简短扼要，因为他不像弗洛伊德那样提倡毫无节制地使用自由联想。对荣格来说，只有当把联想限于梦中的意象时，它才会对梦的解释起到促进作用。在荣格看来，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把做梦者带离了梦境，只起到了把他一再地带回到其童年的情结中去的作用，而这样做违背了这个测试的目的。

荣格说，对“海关”这个词，他马上联想到“审查”，在对“边界”进行联想时，他一方面想到了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边界，另一方面想到了他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之间的分界。

关于骑士，荣格说：

> 大家可以很容易地想象我的感受：在一座现代城市里，在正午的高峰时刻，突然看见一个十字军战士向我走来。让我感到最为奇怪的是，走在旁边的那许多人似乎没有一个注意到他……仿佛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他……即使是在梦中，我也知道那个骑士是12世纪的人。那是炼金术刚刚开始的时期，也是寻找圣杯 [2] 的时期。自从我15岁时第一次读到关于圣杯的故事以来，这些故事对我来说就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我隐约地感知到在这些故事的背后仍然隐藏着

一个惊人的秘密。因此，这个梦呈现出圣杯骑士和他们的探求的世界，在我看来这是相当自然的——因为，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那是我自己的世界，它和弗洛伊德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关联。我的整个存在就是寻求某些仍然未知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会赋予平庸的生活以意义。（《回忆、梦、反思》，第158—161页）

文化背景

国界是把两个国家分离开的、双方都同意的分界线：按照梦的逻辑，这些是国家的分界线还是心灵的分界线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弗洛伊德的国家是奥地利，而荣格的国家是瑞士；而且弗洛伊德以某种官方的“帝权”角色出现，正在巡查他们之间的边境。在国境线上，一个人的个人物品要接受安全检查，手提箱会被打开，以搜寻违禁品，护照要受到查验，以确保他的证件符合规定，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海关官员来做的。这是否指向精神分析的主题呢（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边界线）？是否指向弗洛伊德这样一个怒气冲冲、烦恼和悲伤的分析大师，因为他怀疑做梦者包藏着颠覆性的和令人不可接受的观点？在对这个梦进行思考时，荣格显然作出了这种联系。但是，他问自己，为什么他会梦见弗洛伊德是一名海关稽查员的鬼魂呢？“是弗洛伊德所暗示的我对他怀有的那种死亡愿望吗？”他不这样认为，因为他没有理由希望弗洛伊德死去。相反，他把这个梦看作是他对弗洛伊德的意识态度的补偿和纠正，现在的他认为这种意识态度有些过分恭敬了。这个梦建议他在和弗洛伊德打交道时采取一种更具批判性的、更为坚定的态度。

在这个梦的第二部分，巴塞尔和意大利之间的混淆不清很可能指向和荣格同是巴塞尔人的雅各布·布尔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后者把他们家乡的文明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联系起来。这个意大利是阿妮玛和爱的世界，是但丁和贝雅特丽齐（Beatrice）、彼特拉克（Petrarch）和劳拉（Laura）的世界，是艺术的世界和人类精神的再生之地。烈日正当头时，人们从商店里出来往家涌去，这一景

象使人联想到中年时期物极必反的倾向，正如荣格（在前文第256页）所描述的：“在正午的钟声敲响之后，下降的过程开始了。下降意味着早晨所珍视的一切理想和价值观的反转。”人生的前半段是“获取与消耗”的生活，但现在商店关门了，这个阶段结束了。未来带来了什么承诺呢？答案就在这个异乎寻常、身穿盔甲的骑士形象身上；他不是一个未来的人，而是一个来自过去的原型人物，是基督教绅士、侠义的战士。他属于12世纪，荣格把这个世纪与炼金术的开端和圣杯传说的出现联系在一起。

原型背景

在这个梦中最具意义的原型意象是容器（圣杯）、骑士/战士和十字。通过联想，这些原型又引出了年老濒死的国王、受伤的医治者和萨满/魔法师的原型主题。

根据传说，圣杯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使用过的容器；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之后，亚利马太的约瑟又用它来收集和保存耶稣基督的鲜血。因此它是基督教世界最宝贵的物品。然而，关于神奇的容器的主题远比基督教要古老得多。弗洛伊德可能会第一个表示赞同，圣杯或容器是一个女性象征，是神奇的、孕育生命的转化得以发生的子宫。这个容器（拉丁文为*vas*）是炼金术传统的核心，这一传统起源于古代中国，并且正如荣格所说，于12世纪传到北欧。诺斯替教的教徒们（荣格觉得自己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相信，在最早的神灵之中，有一位为人类制作了一件被称为*krater*的礼物，它是一个用于混合的容器，那些寻求精神转化的人就沉浸在其中。诺斯替教的这一传统似乎通过潘诺波里的索西莫斯（Zosimos of Panopolis）的影响而进入了欧洲炼金术之中，他是最早和最有影响的炼金术士之一，后世的荣格对他所见到的幻象非常感兴趣。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把这个容器视为灵魂的象征，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永不休止地为圣恩所充填。

圣杯的传说和英格兰及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的联系体现在凯尔特神话中伟大的魔法师、萨满和吟游诗人墨林 [3] 这个人物身上。墨林的出生是魔鬼和一个天真的处女之间禁忌的结合所致，因此，他的出现是对基督这个人物的一种平衡。在其生涯的早期，墨林主持了一场屠龙之战，这场大战导致年老的篡位国王弗替吉尔被罢黜，尤塔国王取而代之；墨林向后者吐露了圣杯的秘密，指示尤塔再安放第三张桌子。第一张桌子是最后的晚餐的桌子；第二张是亚利马太的约瑟摆放圣杯的桌子，它是方 的；尤塔国王将要提供的第三张桌子必须是圆的。正方形之外以圆形围之是曼荼罗的基本构形，象征着整体性的达成、自性的完全实现。对圣杯的寻求就是永恒地（*sub specie aeternitatis*）对个体化的追求。

荣格的一生都为圣杯的传说所着迷。在孩提时代他就读过马洛礼（Malory）和傅华萨（Froissart）的书，并且在所有的音乐之中，他最喜爱瓦格纳（Wagner）的《帕西法尔》。如果不是因为妻子强烈地表示希望亲自来做这项研究，他会像研究炼金术那样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圣杯。就这个梦而言，除去容器本身之外，圣杯传说最有趣的部分要属“年老病危的国王”安福塔斯这个主题了。和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客戎一样，安福塔斯也遭受了无法愈合的创伤；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这个伤口的位置：它在大腿上，即生殖器附近。安福塔斯的伤口是一个与性有关的伤口，他的问题是一个性问题。他希望放弃他的王权，把它传给帕西法尔，这很像是弗洛伊德希望把他的权力传给荣格，但是，在帕西法尔就圣杯的问题向他提出质疑之前，他无法这么做。

荣格本人并没有将安福塔斯和弗洛伊德联系起来，但他把安福塔斯和自己的父亲联系了起来，在他的生活中他的父亲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前身：“我记忆中的父亲是一个遭受安福塔斯创伤的人，一个其伤口无法愈合的‘渔夫国王’——这一伤口是炼金术士们寻求万灵药来救治的那种基督的伤痛。我，作为一个‘不能说话的’帕西法尔，在孩童时代见证了这种疾病，而且，和帕西法尔一样，我无法开口。我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回忆、梦、反思》，第205页）。

弗洛伊德同样是一个“渔夫国王”，在他面前，荣格和帕西法尔一样，不能讲话，从未就弗洛伊德对性的强调提出质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关系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缘故。

在弗洛伊德人格的压力下，我把自己的判断尽可能抛得远远的，并且把我的批评压制下去。这是与他合作的前提条件。我告诉自己：“弗洛伊德远比你更有智慧，更富经验。眼下你必须完全听从他的教导，向他学习。”然而接下来，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发现自己梦见他是奥地利帝国的一个怒气冲冲的官员，一个已经过时、却仍然到处走动的海关稽查员的鬼魂！（《回忆、梦、反思》，第159页）

十字的象征意义需要进行一点放大：它暗示曼荼罗的基点，并且是整体性的基督教象征，代表着对立物通过受难而达成的和解、对耶稣基督个体化的纪念，以及上帝与人的和好。十字代表的是服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个人命运这条道路，对炼金术士和基督徒来说都是如此。

服从人性的根本对立性就相当于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精神和它自身存在矛盾。炼金术教导我们，张力是四重的，形成一个代表四种相互冲突的元素的十字。这四个一组可被视为这种完全对立状态的最小方面。作为一种遭受苦难的形式，“十字架”表达的是精神的现实，因此，带着十字架就是炼金术士在其工作中所看到的整体性和激情的一个恰当的象征。（《荣格全集》第16卷，第523自然段）

那个孤零零的十字军战士是个基督徒士兵，正要前往战场。他有一个目标，一种别无选择、必须实现的命运。它是荣格将要成为的样子的一个意象，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而是作为一个人。“如果一个人知道的比别人多，他就会变得孤独，”他在晚年这样写道：

在我的身上有一个恶魔……它把我制服了……不论我得到什么，我都绝不可能停下来。我得匆忙向前，追上我的幻象。由于我的同时代人不能感知我的幻象，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往前直冲的傻瓜……我能够对人产生强烈的兴趣，但只要我一看透他们，吸引力就会消失。这使我结下了很多敌人。一个有创造力的

人难以掌控他自己的生活。他没有自由。他是被禁锢的囚徒，为他的魔鬼所吸引……对我来说，这种自由的缺乏是一个极大的悲哀。我经常觉得自己是在一个战场上，嘴里说着："现在你已经倒下，我的好战友，但是我必须继续下去。"（《回忆、梦、反思》，第328—329页）

前面所说的这些已足以使读者体会到，以荣格所提倡的方式进行梦的分析是一个发散性的过程，要求相当渊博的知识，以及对象征的理解天赋。这其中所包含的远远不止对一个基本信息的解释，如果只是这样一个解释的话，那么这个例子一句话就可以说明："去他的弗洛伊德，走自己的路吧。"

在成为医学院学生之前，荣格曾半心半意地考虑过要研究考古学，他后来一直对此怀有兴趣。正如他经常说的，他对待梦就像是对待一个未经破译的文本；他在从事这项事业时用上了全部的考古学本能。只有在发掘到这个梦的个人、文化和原型的根基时，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个梦的蕴意。只有这样，当一个人在发掘场地周围漫步时，梦的建筑结构才会被揭示出来，同时令人对这个建筑师想要达到什么目标，以及他的全部创造性能量可能导向何方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这是一个微妙的过程，过滤、分类、比较，需要丰富的想象天赋：一定不能把梦发掘到对它造成破坏的程度，它的氛围要能被感受到，它的信息要保留完整。

正如荣格所发现的，在某人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常常会一再重复，这可以通过研究同一个做梦者所做的一系列的梦来证实。荣格本人于1938年在印度所做的一个梦中又回归到了圣杯的主题；这个梦，和他关于十字军战士的那个梦一样，让他联想到了童年时关于多岩岬角上的城堡的幻想。在梦中，他发现自己和许多苏黎世的朋友及熟人一起，在英格兰南部海岸之外一个不知名的岛屿上。这是一块狭长之地，在其南端的岩石海岸上矗立着一座中世纪的城堡。"在我们的面前升起一座气势逼人的钟楼，透过它的大门可以看到宽阔的石阶；我们只能勉强瞧见它的终端是一座圆柱围起的大厅。大厅闪烁着微弱的烛光。我明白了，这就是存放圣杯的城堡，今天晚上这里将要

举行一场‘圣杯的庆宴’……”（《回忆、梦、反思》，第262页）。

这个骑士、圣杯和墨林的世界不是弗洛伊德的世界，而是他的 世界——是矗立在岩石上的那座有着铜柱和炼金实验室的城堡的世界。和神经症的起源一样，现代世界的困境并非是性的压抑，而是“灵魂的丧失”，是对神圣的缺乏感知。弗洛伊德的贡献更加深了我们文化的困境，因为他竭力要在一种基本的本能（性本能）中发现这种神圣。作为欧洲精神最高贵的表现形式之一的骑士理想被忽视了。骑士的神圣追求退化到我们后基督时代文明的“荒原”上。

这个主题也反复出现在另一个梦中；在这个梦中他发现自己周围是一些墨洛温王朝时代〔4〕的石棺。然后他从8世纪的死者身边走过，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一些12世纪的墓前；他停在一具死尸前，那是“一个身穿锁子甲、双手合拢胸前躺在那里的十字军战士。他的形象就像是木头雕刻而成一样。我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认为他确实是死了。但是，突然我看见他左手的一根手指开始微微地抖动”（《回忆、梦、反思》，第167页）。

这个骑士在他的潜意识中仍然活着，为他指出了一条向前走出过去的道路，让他远离弗洛伊德的垂死形象，即那个烦恼的海关官员。但是，这是一个标示着基督教象征的未来和过去（十字军战士的前胸和后背上的鲜红十字），这个基督教象征标志着整体性和救赎，标志着上帝与人的和好状态。他将不得不像那个骑士一样继续前进，其行进为周围的民众所忽略，只得到自己闪动的“微弱光亮”和在自己的圆桌旁所聚集的少数几个意气相投的灵魂的支持。

注释

〔1〕《塔木德经》（the Talmud），关于犹太人生活、宗教、道德的口传律法集，为犹太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

〔2〕“圣杯”（the Holy Grail）是中世纪传说中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使用过的杯子。

〔3〕墨林（Merlin）是欧洲中世纪关于亚瑟王的传说中的预言家和幻术家。

〔4〕 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times，476 - 750）是法兰克人的王朝，传统上被认为是法兰西国王的“最初家系”。

第六章

治疗

要想在一章的篇幅之内充分说明荣格式分析在最好的情况下所能带来的深刻转化，或是对其治疗实践所基于的原则作出较为详细的概括，那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既然以荣格的名字命名的分析学派是他留给我们文化的主要遗产，我们还是必须尝试一下完成这项任务。

荣格所提出的革新，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学派，而且可以说，这种影响是仁爱的和人道主义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最初的阐述主要起源于他自己的“创造性疾病”，但是，它们也是对经典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师的刻板模式的一种反动；他们安静而远远地坐在躺椅的后面，偶尔作出权威性的论断和解释，同时又完全不参与到病人的痛苦中去。荣格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激进的提议，即分析应该是一个辩证的（dialectical）过程，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这两个人平等地参与其中。虽然在他初次提出的时候这还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它自那时起已是一个影响了绝大多数学派的心理治疗师的模型，尽管许多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它起源于荣格。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荣格对心理治疗实践所作的贡献按4个主题进行思考：（1）他对待心理疾病的态度；（2）他对病人的态度；（3）他提出的治疗原则和方法；（4）他对治疗师这一角色的看法。

疾病

在阐述他对待心理疾病的态度时，荣格反对的不仅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概念，而且是传统精神病学中曾经流行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流行的）那些观点。和这两个学科中的大多数治疗师相比，荣格的经验都要丰富得多，他的智能要有远见得多。弗洛伊德曾经分析过奥地利的一小群中上等阶层的病人，他们中大多数是患癔症（19世纪末非常流行的一种病症，但今天却很少作出这种诊断）的妇女；以这种分析为基础，弗洛伊德检测了他的假设，并且（他自己非常满

意地）认为它们都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荣格的病人（至少在最初的时候）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克拉夫特-埃宾在其《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所描述的任何一种病症几乎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此外，荣格不仅把他的阐述建立在他自己和他病人的基础之上，而且建立在对神话、比较宗教和人类学的广泛研究的基础之上，付出艰苦的努力试图确立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真理，无论他们的阶级、种族或信仰。更为重要的是，他自始至终都竭力坚持非教条化。当他的英国同事E. A. 贝内特（E. A. Bennet）于1951年告诉荣格，他正在为《英国医学杂志》撰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时，他立刻说道："无论你说什么，都要说清一点，那就是我没有教条。我仍然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搞僵化。"

从他在伯格尔斯利作为布洛伊勒的助手从事研究工作之始，他对心理疾病所持的开放的人道主义态度就已经显而易见了。我们（在前文第194页）已经提到，和当时的绝大多数精神病学家不同，荣格真正倾听了病人向他所说的话，无论这其中有多少成分是病人的妄想或幻觉。正如他很久之后所写的：

> 在精神病学的许多案例中，来找我们的病人都有一个没有讲述的故事，通常这个故事没有人知道。在我看来，只有在研究了这整个关乎个人的故事之后，治疗才真正开始。这是病人的秘密，是把他撞得粉身碎骨的礁石。如果我知道了他的秘密故事，我就拥有了一把治疗的钥匙……在治疗中，问题总在于这整个人，而绝不仅仅在于症状。我们必须提出挑战整个人格的问题。（《回忆、梦、反思》，第118页）

通过认真倾听他的精神病人告诉他的话，他说道：

> 我认识到，妄想的念头和幻觉包含着意义的一个发端。一个人格、一段生活史、一种希望和欲望的模式就隐藏在精神病症之后。如果我们无法理解它们，那是我们自身的错。从那时起我才第一次开始认识到，人格的普遍心理特点就隐身在精神病症之中，而且即使在这里我们遇到的也是古老的人类内心冲突。虽然病人看起来可能迟钝、冷漠，或是完全低能，但他们的心灵中却发生着远比表面上

所见更多和更有意义的事情。实质上，我们在有心理疾病的人身上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和未知的东西，相反，我们遇见的是我们自己本性的基质。（《回忆、梦、反思》，第127页）

在神经症的案例中，这种情况就更加如此："神经症患者的精神过程和那些所谓正常人的精神过程几乎完全一样——对现在的人来说，有谁能确信自己不是神经症患者呢？"（《荣格全集》第8卷，第667自然段）。

虽然他在伯格尔斯利时就学会了进行精神病诊断的所有程序，但他觉得这个程序的用处是有限的："临床诊断是 很重要，因为它们能为医生确定某个方向。但它们对病人没有帮助。至关重要的是那个故事。因为它自身即已表明了人的背景和所遭受的痛苦；只有那时医生的治疗才能开始发挥作用"（《回忆、梦、反思》，第124页）。

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普通精神病学中的旧有的病理学方法，把心理疾病描述为独立的"实体"（ens），每一种都呈现出独特的、有明确定义的临床描述。荣格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但它亦存在害处，它把病症所有无关紧要的特征全都推到了前台，而将一个本质的方面掩盖起来，即"这种疾病从来都是一个带有强烈个体性的现象这一事实"（《荣格全集》第17卷，第203自然段）。

非常笼统地来说，他相信，精神分裂症（精神病）和癔症（神经症）是两种基本态度类型的极端表现：极端内倾导致力比多从外部现实中抽身而出，进入一个完全私隐的幻想和原型意象的世界，极端外倾则远离内在的完整感，转向过度关注一个人在社会关系的世界中的影响。换句话说，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在潜意识中，而癔症患者生活在他们的人格面具中。

因此，放在最广阔的概念背景中来说，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都是个体的需要和集体的要求之间稳态平衡或不平衡的功能。人们患上神经症是因为在他们内部出现了分裂，意识和潜意识过程在稳态平衡中不再发挥作用。这种"与潜意识的分离"是"本能丧失和无根感的同义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发展起我称之为超越的那种功能，

不和谐就会停止，我们就能享受到潜意识有利的方面。这样，潜意识便给予我们慷慨的大自然所能为一个人奉上的所有鼓励和帮助”（《荣格全集》第14卷，第502自然段）。

确实，荣格总是强调个体的内部精神生活，但他并没有忽视适应社会要求的重要性：

> 这样，从心理学（而不是从临床）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把精神神经症划分成两大组：一组由个体化未得到充分发展的集体人构成，另一组由集体适应能力萎缩的独立人构成。相应地，治疗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因为很显然，一个患神经症的独立人只有通过承认他自己身上的那个集体人——从而有了集体适应的需要——才能被治愈。（《荣格全集》第16卷，第5自然段）

荣格认为，精神病症状是自然的心理生理反应持续存在的夸张表现形式，这种看法不仅和弗洛伊德的相一致，而且得到了当代一些精神病学家的一再证实，这些精神病学家在其心理疾病的观点中使用了习性学的概念。例如，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医学中心的布兰特·韦内格拉特（Brant Wenegrat）医生把所有的心理病理症状，无论是精神病、神经症还是病态人格，都看作是所有个体（无论他们是心理健康的还是有心理疾病的）共有的先天反应策略（innate response strategies，这是他对原型的称谓）在统计学上的异常表现形式。

荣格把这一洞见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他论证说，症状形成本身即是个体化过程的一个产物，疾病是一种自主的创造性活动，是精神成长和发展的责任不得不在异常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功能。因此，神经症是适应的一种形式（尽管它是一种“低劣的适应”），是存在健康潜能的有机体对生活的要求作出的反应。“由于某种障碍——体质的虚弱或缺陷、不当的教育、有害的经历、不适宜的态度等等——使人在生活所带来的困难面前退缩……”（《荣格全集》第13卷，第472自然段）。个体在达成成熟的适应时体验到了困难，因为某些对于发展的进程至关重要的原型需要未在过去某个适当的时候得到满足，由此个体化发生了扭曲或出了岔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荣格赞同弗洛伊德的以下观点，即神经症总是起源于童年早期。相反，神经症是由于和现时的环境斗争失败所导致的。它可能作为对外部事件的一种反应，在生命周期的任何阶段出现，例如，进入一所新学校、失去父亲或母亲、开始一份新工作、被征召入伍、结婚、生第一个孩子等等。确实，早期的心理创伤可能使个体预先具有表现出神经症状的倾向，但这些创伤并非神经症的起因。因此，按照荣格的观点，神经症在本质上是对具有挑战性的生活事件的一种逃避，因为个体觉得尚未作好应对的准备。所以，他教导他的学生在面对一个新病人时，要问问自己："这个病人想要回避的是什么任务？"

病人的困境常常使他们濒临丧失行为能力的完全崩溃，而且他们把生活体验为在本质上是无法令人满足的和没有意义的。

> 我常常发现，当人们满足于对生活问题的不充分的或是错误的答案时，他们就会患上神经症。他们寻求地位、婚姻、名誉、外部的成功或金钱，但即使已经获得了他们所寻求的东西，他们仍然感到不快乐，并且表现出神经症的症状。这种人通常被局限在过分狭窄的精神世界内。他们的生活没有足够的满意度和足够的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为更宽广的人格，神经症通常就会消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发展的观点在我看来总是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荣格把症状形成理解为一种创造性活动，这对于在病人和治疗师两者身上都形成治疗的乐观态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理解并非把症状视作是一种无谓的受罪，而是把它们视为灵魂在逃避恐惧和寻求实现的挣扎过程中经历的成长的烦恼，一个获得意识和成长的价值无量的机会。他最接近于一个明确定义的说法是，神经症是一个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灵魂所遭受的痛苦。

病人

许多向荣格咨询过的人都说他们受到了热诚、温暖和有礼的对

待。他那无处不在的幽默感使他不可能显得高傲自负；作为一个人他自己也易犯错误，但他从未试图对此加以掩饰。例如，他用令人打消疑虑的笑容向一位极度忧虑的新病人表示问候，说道："这么说你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了！"[1] 他相信应把人们当作人来看待，而不是当作"病人"，并且教导说，每一次约诊不但是一次临床访谈，还是一个社交场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从未使用过睡椅，或任何明显的手段或花招，他把每个人都当作本质上正常和健康的人来看待，但同时承认他们可能有某种问题。他说："如果这个人患有神经症，那是一个额外的问题，但是应该把人看作是正常的，并且以社交的方式来交流"（贝内特，《与荣格的会面》，第32页）。

令他的大多数病人感受最深的是他参与 分析情境的程度，他完全投入其中 ：他没有冷漠超然，没有处身在病人的视线之外，他不是一个投射的屏幕，不是一个移情的操纵者，也不是一个临床管理者，他是一个真实的 人，完全参与到工作之中，把病人当作一个平等的人来尊重，而不是当作一个有病的劣等的人。他愿意把个人的优越感或自己知道所有的答案这样的观念完全抛开，承认自己的弱点，相信"只有受过伤的医生才能治愈病人"。他说："并非知道所有的答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并不知道，即使我们知道，也不会带来什么益处，因为让病人自己找到答案才更具意义"（同上书，第32页）。

我自己的分析师艾琳·钱珀瑙恩（Irene Champernowne）曾接受过荣格本人的分析，她告诉我说，他给人一种感觉，即他之所以在那里，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你的分析师，而是因为他正通过你从事自己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有所收获。这使人感到这些分析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荣格本人在他的自传中也承认这一点："我的病人使我如此紧密地接触到人类生活的现实，以至我不自禁地从他们身上学到实质的东西。对我来说，和如此多种多样的人以及如此多种多样的心理层面接触，远比和名人只言片语的谈话重要"（《回忆、梦、反思》，第143页）。

首要的一点是，他从未忘记，每一个病人都是独特的，一般规则、教条观点和普遍程序绝不适用于单个病人。他教导他的学生

说："首先要学习理论。然后，当病人从门口走进来的时候，忘掉它们。"他反对集体治疗，反对一切依靠群体的治疗法。"在应对个体的问题时，只有个体的理解才能发挥作用。"

我们将会看到，荣格对病人的态度和传统的精神病学家有根本的不同，后者将"医学模型"应用到所有来向他咨询的人身上，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疾病的征兆和症状上，以便确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接着作出诊断，开出治疗处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临床距离和专业权威。与之相反，荣格并非从病理学的立场来看待病人，而是以对健康的期望为出发点，努力确定"怎样才能恢复健康"；他关注的焦点是象征和意义，而不是症状，是发现什么样的原型要求受到了挫折，需要得到满足，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私人的亲密关系和分析情境的"相互性"与病人建立起联系。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精神病学家把病人看作是疾病的受害者，而荣格分析学家则把病人看作是有望实现个体化的人。

治疗

同样地，荣格对待治疗的态度也与传统的精神病学大不相同。精神病学家关注的是通过提供药物和支持来减少痛苦，而荣格分析学家则鼓励病人参与 到自己的痛苦之中，从而直面其意义，调动起潜意识的治愈力量。直面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可能会带来许多痛苦，但这是对自省的极具意义的激励，是促使病人"认识到"自己的困境并且超越它的一个诱因。荣格曾有一次谈到过一个病人："感谢老天他患上了神经症！"因为就这一病例和许多其他病例而言，神经症是让病人注意到其生活中所缺乏的东西和有问题的方面的一种呼唤，是让病人踏上自我发现之旅和重生之路的一种呼唤。

由于常常要不胜重负地面对大量的病人，在精神病学家看来，心理疾病是一个要斗争和击垮的敌人（他把自己的患病阴影投射到这个敌人身上），是一个必须驱逐的"魔鬼"。在荣格分析学家看来，疾病

是一种来自潜意识的象征性交流，表明病人在努力满足生命的原型规划的要求时究竟是在哪里受阻了。在精神病学家的诊所里，病人要经历咨询、诊断和治疗的例行程序，在与疾病分离的过程中要与精神病学家共谋，并且受到鼓励要将解决其困境的责任交付到医生的“能手”中。荣格分析学家则治疗完整的病人，鼓励他为自己的情况负上全部的责任，把自己的疾病理解为其全部生活经验的一种表达方式。通过医生的教导，病人认识到自己的症状是源自一种不平衡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本身是原型意图受到阻挠的结果。治疗包括以下的内容：帮助他认识到其原型挫折，并找到纠正它的途径；放弃他的片面性；使其整个人格中相互对立的力量之间产生一种新的平衡。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令自己仅限于应对意识情境是不足够的。了解潜意识的情境至关重要。在这里对梦和移情的分析变得不可或缺。精神病学的观点则大相径庭：其目的不是要打开潜意识，或者接受它必须传达的信息，而是要压抑它，使用药物令它沉默。精神病学的目标是进行急救和“恢复”——让病人回到社会中去。它极少考虑以下可能性，即精神崩溃可能是一次充满了存在的意义的危机，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然而，也要为精神病学专业公平地说句话，即，必须承认，在荣格离开伯格尔斯利之后，他的病人就极少是精神病学实践所接收的那些平民大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优裕，都处在人生的后半段。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心理学上富有经验，因为在向他咨询之前，他们已经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而且，他们当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并没有精神病问题。“我的病例中大约三分之一并未患上可明确界定的神经症，他们所受的痛苦是生活的无意义感和无目标感。如果把它称之为我们时代的普遍的神经症，我不会反对”（《荣格全集》第16卷，第83自然段）。

他把“我们时代的普遍的神经症”归因于什么呢？归因于集体的“灵魂丧失”：归因于和我们的文化伟大的神话和宗教象征的联系的丧失，归因于使我们和我们的原型本性相疏离的社会制度的出现。这是对以下观点的一种扩展：即文明的好处是以牺牲本性的幸福为代价

的；后者由狄德罗（Diderot）和尼采等哲学家提出，后来在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得到发展。荣格相信，我们的文明变得越世俗，越物质主义，越强迫性外倾，我们的生活就越不幸福，就越“没有意义和目标”。答案何在呢？不是“回到教会”，因为他自己的经验已经教导他——除非以神秘直觉的启示的形式出现——有组织的宗教意味着精神的死亡。同样出于自身的经验，他觉得，我们别无他法，只有放弃我们的文化中如此典型的对有形的外部世界中的意义完全外倾的追求，代之以与我们自己的精神本性中潜在的象征形成能力建立联系。为了在现实中实现我们自己追求整体性的能力，我们所需要的是进行艰苦的心理努力，使我们的心灵打开通往潜意识的内藏财富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意义和目的大量地涌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荣格把分析划分为4个阶段，这些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重叠，当然也并不总是以某种规定的顺序来进行。这些阶段是：

（1）忏悔 （confession）：这是进行最初宣泄的阶段，此时一个人把他扛在身上的秘密告诉分析师。这个阶段通常和强烈的解脱感、或是卸下重担或排出毒素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罪疚感减轻了，孤立感、自卑感以及为社会所不容的感觉也同样如此。阴影的整合开始进行。

（2）解释 （elucidation）：这个阶段大致等同于弗洛伊德的“解释性”分析。症状和移情现象得到考察，未能得到发展的区域被确定下来。在这个阶段很少发生激进的转化，但是认真地发掘潜意识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3）教育 （education）：阶段（1）和（2）所获得的顿悟现在被投入到生活之中。一个人开始对自己产生不同的体验，并且开始探寻新的存在方式。这通常伴随着对社会要求的一种改进的适应。

（4）转化 （transformation）：对潜意识的发掘使得一个人直面阴影、阿妮玛/阿尼姆斯，以及其他被激活的原型成分，这些原型成分是对之前狭隘的、神经症的或片面的发展的一种自然的稳态补偿。在这个阶段，象征的超越功能开始发挥作用。对个体化的追求在

进行之中，而且和达成“自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超越了仅仅是“正常”或“社会适应”、对自身即是一个完整实体完全肯定和接受的状态。

荣格是根据他对炼金术的研究来阐明这个分析过程的。他承认，和炼金术一样，分析并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一门炼金术的艺术（*ars spagyrica*，即spagyric art）。spagyric这个词是从两个希腊单词派生而来的，*span* 的意思是撕裂、分离或伸展（即分析），而 *ageirein* 的意思是积聚或集结（即综合）。炼金术的口号“分解和凝结”（*solve et coagula*）准确地表述了这两个步骤：“炼金术士认为这门艺术的本质，一方面在于分离与分析，另一方面在于合成与合并”（《荣格全集》第14卷前言）。分析的阶段与弗洛伊德的还原论方法以及荣格分析的前两个阶段相对应，而第二个合成阶段与荣格分析的后两个阶段相对应。

分析是否成功地达到了其目标，这取决于病人和分析师带到分析情境（相当于炼金所使用的蒸馏甑；容器）中的那些素材（相当于炼金术的原料），以及通过他们的互动而发生的转化。其首要的要求是，双方都为自己以及自己对这一关系所起的促成作用承担全部的责任。“医生必须从其隐身处浮现出来，就他自己作一个陈述，正如他期待病人所做的那样”（《荣格全集》第16卷，第23自然段）。

最初，大多数病人发现难以为自己和自己的疾病担负责任，而宁愿让别人负责，并且对分析师采取一种被动的或依赖的态度。如果想要使分析的进展超越第二个阶段，就必须对此加以改变：“只有当病人认识到挡在他路上的不再是父亲和母亲，而是他自己的时候，真正的治疗才开始……”（《荣格全集》第7卷，第88自然段）。

劝说病人为其疾病承担责任需要有高超的技巧，否则他可能会因此而采取一种自我谴责的道德态度。他必须理解，疾病并不是他的“错”，但是只有他自己能够发现其意义并且找到治愈的方法。在这里，目的是鼓励他与疾病和整个人格都建立起一种创造性的关系，而不是引发罪疚感或悔恨。

荣格式分析的技术——两把椅子、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辩证互动、在一系列面诊期间相对频繁的休息和进展性的还原、在分析情境

之外个人对梦的探究和“积极想象”——这些都旨在提升病人对自己的成长过程所负的这种责任感。

荣格把躺椅从咨询室里搬出去就是出于这个原因。由于躺椅使病人变得消极和依赖，它因此助长了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向婴幼儿情结的退行，并且对合作的、期盼中的冒险的发生造成了阻碍，而这种冒险正是荣格所设想的分析过程。虽然荣格将病人过去的情况完全考虑在内，但他更感兴趣的是病人在当前的成长 过程中的状况。面对面地坐在相似的椅子上也使得治疗师和病人更容易把自己视作承担一项共同任务的同事，更容易对他们相互之间所发生的任何投射的现实性进行检验。

关于面诊的频次，荣格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频繁约见病人的弗洛伊德式做法持批评的态度。

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他必须连续数月每天花上一个小时面诊病人；而我即使是在某些困难的病例中，也只是进行每周三到四次的约见。一般来说，我满足于每周两次面诊，并且一旦病人开始踏上正轨，就减少到一次。在间歇的当儿，他必须进行自我探索，但会是在我的控制之下。我为他提供必要的心理学知识，使他尽快地从我的医学权威下解放出来。此外，我每隔十周左右就中断治疗，以便使他回到其正常的环境中……以这种程序，时间可以作为一种治疗的因素发挥效用，而又无需病人为医生的时间付费。在正确的指导下，大多数病人在一段时间之后都能对共同的探索作出他们自己的贡献——无论这种贡献最初是多么微不足道。根据我的经验，治愈的绝对时间并不因过多的面诊而缩短。（《荣格全集》第16卷，第43自然段）

荣格断言，分析所需的时间并不因每周面诊的频繁次数而缩短，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下述研究的支持：该研究不能证明每周五次面诊所产生的效果要好于每周一到两次的面诊。但是，有些分析学家，特别是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学家，还有一些后荣格“发展”学派的分析学家，坚持把“分析　就意味着每周四到五次面诊”当作一个信条，“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分析”。对这种观点荣格会不屑一顾。不管怎样，分析的过程都不能匆忙地进行。这种“炼金术的艺术”不可避免地要求花费

时间，这样其目标才可达成。

大多数分析师（常常是出于经济的考虑）选择忽视的荣格分析实践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建议每隔十周应该中断分析，让病人回到生活中去，鼓励他们不是依赖于分析师，而是依赖于自性。通过这种方法，病人就不是为了分析而生活，而是为了生活而分析。这对病人和分析师来说都会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它既有助于防止治疗师感到精疲力竭（费心费力的治疗师很容易遭受这种状态的困扰），也有助于确保他们的工作不会变得“例行公事”或死气沉沉。定期地摆脱临床责任可以让分析师探求其他的兴趣，例如研究、写作、讲座、绘画、陶艺、旅游和运动，以便他们能重新积聚创造性能量，并且加强对在治疗师、社会工作者及精神病学家中常见的精神疾病和“心理衰竭”的免疫力。

但是，必须承认，有些病人觉得无法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特别是那些由于在童年时期父母教养方式有缺陷，而患有“边缘型”或“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病人，或是那些患有鲍尔比所谓“焦虑性依恋”的病人。这些病人需要时间来和他们的分析师建立合作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他们会开始感到自己有能力保持一种持久的亲密和信任的联系。只有在达成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才能开始从这种对潜意识的想象性探究工作中获益，而这种探究工作正是荣格学派所认为的分析的关键之所在。除了这些特例以及某些其他的特例之外，不管是处于各种大相径庭的个人困境中的病人，还是患有各类迥然相异的神经症的病人，经典的荣格式分析方法在应用中都可以令他们受益。

在荣格看来，探究潜意识是他的生活方式，其目标就是处在 灵魂之中（*esse in anima* ）。这意味着对精神的独创能力保持一贯的敏锐意识。“有灵魂的存在是有生命力的存在。灵魂是人身上有生命力的东西，它有自己的生命并且产生生命……”（《荣格全集》第9卷上部，第59自然段）。当事物受到想象力的影响时，就有了生命并且带有了灵魂。“精神每天都在创造现实，对这种活动，我所能使用的唯一的表达方式就是幻想”（《荣格全集》第6卷，第78自然段）。

对分析和生命两者来说，其秘密都是参与到这种幻想之中，不管

是在我们的睡眠中还是在我们醒觉的时候。“在睡眠中幻想以梦的形式出现。但是，在醒觉的时候，我们在意识的界阈之下也在继续做着梦”（《荣格全集》第16卷，第125自然段）。灵魂是与我们相随的忠诚的同伴，但我们却通常无视它的话语，因为我们听不见它的声音。这一情况可以得到纠正，不仅是通过关注我们的梦境，而且可以通过积极想象 的实践活动。这是一种手段，可以赋予精神以自由和时间来自发地表达自己，而不会受到自我通常的干扰。这是一种“让事情自然发生的艺术”，在海伦妮·普赖斯威尔克的降神会上荣格在她身上曾经观察到，在直面潜意识期间他在自己身上也曾观察到。“就像爱克哈特硕士所教导的那样，让事情自然发生的艺术，无为而无不为，将自己尽情释放，对我来说已成为打开通往前路之门的钥匙。我们必须能够让事情在精神中自然发生”（《金花的秘密》序言，里夏德·威廉，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社，1962年，第93页）。

积极想象要求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在半睡半醒之间。就好像开始要陷入睡梦，但却在失去意识之前突然停住，然后保持在这种状态，观察着所发生的事情。把所体验到的记录下来，以便使之可以持久地为意识所获得，这是十分重要的：可以把它写下来，画出来，用黏土塑出来，甚至是用舞蹈和表演表达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一个人通常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如果想要体验到精神的现实 ，并且真正地服从其转化的力量，那么，就必须进入幻想之中，成为这一戏剧的一个全心全意的参与者：

> 你自己必须通过你个人的反应进入这个过程，就仿佛你是幻想人物中的一个，或者说，就仿佛这场在你眼前表演的戏剧是真实的。这个幻想正在发生，这是一个精神的事实，并且它和（作为一个精神实体的）你一样真实。如果这一关键的运作方式没有得到执行，那么，所有的改变就会停留在意象的流动之中，你自己则保持不变。（《荣格全集》第4卷，第753自然段）

同样地，出于他自身经验的缘故，荣格特别热衷于让他的病人们把他们的精神意象画下来。

通过这种方法（如果我可以称之为方法的话），病人可以使自己在创造性上获得独立。他不再依赖于他的梦，或他的医生的知识；取而代之的是，他通过给自己画像塑造出自 己的形象 。因为他所画的是积极的幻想……这是处在一种新的和迄今为止陌生的意义上的他自己，因为他的自我现在看起来像是他的内部活动的对象。（《荣格全集》第16卷，第106自然段）

通过学会探究自己的梦和形成积极想象的技巧，病人逐渐地为自己的生活和个体化担负起责任。

由此，咨询之间的间隔并没有毫无用处地流逝掉。以这样的方式可以为自己和病人节省大量的时间，而且对病人来说也是一大笔钱；同时他也学会了独立自主，不再紧抓着医生不放。病人通过把潜意识内容逐渐吸收所做的工作最终导致其人格的整合，从而促成神经分裂症的祛除。（《荣格全集》第16卷，第26、27自然段）

治疗师

有许多人，包括具备医学资格的人和外行的人，来找荣格说，他们希望成为分析师。他在其自传中描述了其中一位申请者：他是个医生，有着无懈可击的背景，还带有最棒的推荐信。当他表明自己想要接受培训、成为一名分析师的意图时，荣格对他说：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必须首先学会认识你自己。你自己就是工具。如果你自己都不健全的话，又怎么可能使病人恢复正常呢？如果你自己都不确信的话，又怎么可能使他信服呢？你自己必须是真正的素材。如果不是的话，老天保佑你！那么，你将会把你的病人引入歧途。因此，你必须首先接受对你自己的分析。”（《回忆、梦、反思》，第134页）

结果是，荣格在倾听了这个人的第一个梦之后，就把他回绝了：这个梦揭示了他有潜在的精神病。但是荣格的话却表明，他所强调的

是，治疗师要完全经历他想要指导别人经历的这个过程。“一位古代先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错误的人使用了正确的手段，那么，正确的手段也会产生错误的作用。’不幸的是，我们所信奉的是不论使用这种方法的人是谁，只要方法‘正确’就行；这一信条和前面那条再正确不过的中国古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现实中，一切都取决于人，很少或没有什么取决于方法”（《荣格全集》第13卷，第4自然段）。

分析师不仅在培训期间有必要接受分析，而且他必须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地探究自己。

> 分析师必须永不停止地学习……我们可以不太夸张地说，每一次深刻探究的治疗，其一大部分就在于医生的自察，因为只有他在自己身上可纠正的，他才能希望在病人身上予以纠正。如果他觉得病人在攻击他，甚至把他驳倒了，那也不是什么损失：他自己的伤口正是衡量其治愈力量的标准。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才是关于受伤的医生的古希腊神话的意义。（《荣格全集》第16卷，第239自然段）

自我分析之所以有必要，是由荣格所认为的分析关系所必须包含的内容所决定的，即，分析师至少应和病人投入同样多的心力。在潜意识层面上，医生和病人都参与到炼金术士们所谓的一种精秘的整合（*coniunctio*）之中：就如同两种化学物质一样，他们在分析情境中被亲和性吸引到一起，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改变。“当两种化学物质发生化合的时候，两者都发生了改变。这正是在移情中所发生的事情”（《荣格全集》第16卷，第358自然段）。

“移情”（transference）这个术语最初是由弗洛伊德所采用的，用来描述病人把事实上为过去生活中的重要人物所具有的情感和态度归属到分析师身上的潜意识过程。这就产生了所谓的移情关系（transference relationship）；必须把它和分析关系（analytical relationship），或称治疗同盟（therapeutic alliance）区别开来，后者指的是分析师与病人之间作为真实的人的全部关系。

荣格极大地扩展了弗洛伊德对移情的看法，因为按照他的理解，

医患关系是一种从时间伊始就伴随着我们的原型关系。在分析的过程中，原型意象开始活跃起来，当它们被投射到分析师这个人身上的时候，便能赋予他强大的治疗（或破坏）力量。在荣格自己的经验中，魔法师、萨满、巫医和智慧老人等原型形象常常被投射。其次，而且从治疗效果的观点来看最为重要的是，分析师能够接受之前未能得到满足的原型需要的投射。例如，他可以成为病人在童年时期缺失的那个强有力的父亲形象，这显然是荣格自己在弗洛伊德这个人身上产生的移情的一个关键成分。最后，病人的潜意识活动在分析师的潜意识中引起了相应的活动，其结果是，他们之间的联结转化为比传统的医患关系远为深刻的东西。正是移情的这个方面，才使得以下这点至关重要，即分析师应该接受彻底的分析，并且对“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保持认识。这样，分析师才有可能认识到自己在病人身上的潜意识投射（即所谓的反移 情 ［counter-transference］），并且在治疗关系中建设性地使用它，而不是让它造成破坏。

此外，和其他学派的分析师相反，荣格强调情感 的至关重要性——不仅是病人对分析师的情感，而且包括分析师对病人的情感。情感提供的是一个无价的催化剂。它不但存在于分析关系本身，也必然存在于自我和潜意识的关系中。当病人和分析师都是男性或都是女性，治疗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任何一方与对方的潜意识建立起一种情感关系的时候，这种情况尤其如此。有些过于理性的病人“只试图用他们的头脑来理解……而且，当他们理解了之后，他们便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所应承担的认知的全部任务。还应该与潜意识内容有一种情感关系 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是奇怪的，甚至是荒唐的”（《荣格全集》第16卷，第489自然段）。然而，除非存在情感，否则成长和转化就不会发生。

因此，在任何彻底的分析中，医生和病人的人格都是完全参与其中的。在提出这种深刻参与的分析关系的看法时，荣格正把他对一生事业的设想付诸实现，当时，作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他读到了克拉夫特-埃宾的见解：心理疾病是“人格疾病”，要治疗它们，医生就必须站在“他的经验的客观性的背后”，“用他全部的存在”作出反应。

注释

〔1〕 So you're in the soup，too!是一句俚语，直译为“这么说你也在热汤里了！”意思是指一个人处在困境中。这句话带有幽默的意味，因此这里译作“热锅上的蚂蚁”更贴切些。

第七章

对荣格所谓反犹主义的指责

我从一开始就曾宣称荣格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因为他遵循的是一条独特的个人道路，力图在自己身上发现普遍意义上的人。他是如此忠实于自己的“些微火光”，以致许多人把他作为一个怪人而弃之一边，不曾费心费力深究他的著述或弄懂他的观点。在那些确实努力想要了解他的人中，却有许多对他的观点产生了错误的理解，而且常常不公平地以此来抨击他。我们可以根据荣格的心理类型来对此加以理解。作为一个内倾的思维——直觉型的人，他有一个外倾的情感——感觉型阴影。这意味着他能够作出卓越的智识阐述和产生深刻的心理洞见，但是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他以情感为基础的判断及他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两者都是有缺陷的。在保持沉默是更为乖觉和更为明智的做法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人却常常受到驱策，大胆和毫不妥协地说出他们对真理的看法。不可避免地，这为他们在赢得朋友的同时，也结下了仇敌。荣格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缺点。

> 我曾得罪过许多人，因为只要我一看到他们不理解我，对我而言就无话可说了：我得继续前行。除了对我的病人之外，我对人没有耐心。我必须遵从一条施加我身的内在法则，它使我没有选择的自由。当然，我并非总是遵从它。一个人怎么能过着毫无变化的生活呢？（《回忆、梦、反思》，第328页）

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长处，也可以被当作是一个弱点。这使他能够作出他人没有勇气在当时作出的发现，提出他们不够胆量提出的假设，从而使他能够对行为主义反精神、亲环境决定论的偏见进行补偿，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还原论偏见进行补偿，以及对我们文化的物质主义的偏见进行补偿。另一方面，这意味着他的某些观点引起了充满敌意的反对，另一些观点则没有得到理解或受到了冷漠的对待。这也意味着他使自己面临可造成严重伤害的指控，例如说，有人指责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这一指责本不该在此详细讨论，但是由于人们不时地重复这一点，并且认为荣格的所有观点都应该因此而遭到摒弃，那么，读者就

有权知道这一指控的实质内容，以及荣格对此的说法。

指责荣格的人认为，在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之后的那些年里，荣格的行为表明了他既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又是一个纳粹的同情者。他们依据两项证据来证明这一指控：其一，他发表了一些文章，论证说，在犹太人心理和雅利安人心理之间存在着差异；其二，他于1933年成为了心理治疗医学学会（其成员绝大多数为德意志人）的主席，并且把它变成了一个国际学会，他一直担任主席直到1939年——这已是在德国学会正式“遵从”（*gleichgeschaltet*）纳粹意识形态多年之后。

对这些说法的真实性，荣格并没有争辩过，但他竭力否认自己是一个纳粹分子或种族主义者。那么，他是怎样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呢？首先，所称的那些文章发表在一本名为《心理治疗杂志》的专业期刊上，它的对象是心理治疗学家，其中许多读者本身就是犹太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说得婉转些，犹太——雅利安问题在人们的心里占据着显著位置。按照荣格的观点，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个阴影投射的问题，雅利安人把他们的阴影投射到犹太人身上，反之亦然。当时所需要做的，是努力让人们意识到这两个群体之间真正的 心理差异，以期减少阴影投射，使双方更易接受彼此。

当他因为阐述这些问题而受到一位瑞士精神病学家古斯塔夫·巴利（Gustav Bally）医生的攻击时，荣格在1934年2月27日的《新苏黎世报》上回应说：

应当承认，我是很不谨慎的，是如此的不谨慎，以致做了件在当前时刻最容易受到误解的事情：我把犹太人问题摆到了桌面上 。我是故意这样做的。我的那位令人尊敬的批评者看起来是忘记了，心理治疗的首要规则就是要对所有那些最棘手的和最危险的，以及最为人们所误解的事情进行细致入微的讨论。（《荣格全集》第10卷，第1024自然段；斜体部分是后标的）

在这篇文章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他认为，弗洛伊德的观点和他

自己观点之间的差异，和弗洛伊德的犹太背景以及他自己从小所接受的基督教教育有很大关系：

多年以前我就曾经提出，每一个心理学理论首先应该被当作一种主观的坦白来批评……这一主观前提是和我们的精神特质相一致的。这一特质是受（1）个体，（2）家庭，（3）国家、种族、气候、地区和历史所制约的……我为我的主观前提而感到自豪。我热爱其中的瑞士成分，我感谢我的神学前辈将基督教前提传递给我……

类似地，弗洛伊德的犹太人心理也同样受到犹太民族的历史的制约。

在本质上属于犹太教和本质上属于基督教的世界观之间的独特差异究竟何在，难道不应该问一问这个问题吗……？难道我们真的相信说，一个作为“上帝的选民”而四处游荡了数千年的部落，它存在这样的观念不是因为某种相当特殊的心理独特性？如果不存在差异，我们究竟怎样识别犹太人呢？

人类所有的分支都起源于一个主干，但是，一个没有分支的主干如何能称其为主干呢？“当有人胆敢对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心理差异说点什么的时候，为什么会引起这种荒谬的恼怒呢？就连一个小孩子都知道差异是存在的”（《荣格全集》第10卷，第1029自然段）。

最后，荣格否认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于对纳粹观点的同情。他只是重复他自1913年以来就持有的观点。但是，“我坦率地承认，这是一个非常不幸和令人不安的巧合，在没有得到我的任何帮助以及违背我的明确愿望的情况下，我的科学项目竟然和一种政治宣言联系起来了”（《荣格全集》第10卷，第1034自然段）。

关于第二项指责，即他担任心理治疗医学学会的主席和希特勒独裁专制的前6年碰巧在同一时期，荣格的辩解是，他接受主席职位是特意为了保护学会中的犹太会员。事实如下：当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时，该学会的前任主席恩斯特·克雷奇默教授辞了职，可能是因为该学会的“划一化”进程（*Gleichgeschaltung*，字面的意思是“步调一致”）

即将到来。荣格当时是名誉副主席，在该学会的领导成员的请求下他同意代行主席职务，但他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对相关章程进行根本的修正，把学会变成一个国际 性 组织。

这一点确实做到了，其结果是，原来的德国学会现在变成了国际心理治疗医学学会，由许多不同国家的分支机构组成，包括荷兰、丹麦、瑞典、瑞士以及德国。后者（德国心理治疗医学学会）于1933年9月在柏林成立并进行了“划一化”，主席是精神病学家M. H.戈林（M. H. Göring）教授，他是帝国元帅的堂兄弟。作为国际学会的主席，荣格最先所采取的官方行动之一，就是于1934年5月在巴特瑙海姆召开的一次大会上规定，所有被驱逐出“划一化的”国家学会的德国犹太医生现在可以成为国际学会的个体会员，从而维护了他们平等的社会和专业权利。此外，在大会结束的时候，荣格向所有成员散发了一封信件，信中明确地阐明了下述原则：“国际学会对一切政治和宗教信仰保持中立。”

这些行动根本就无法表明荣格是反犹太人的或是对法西斯主义表示同情的。那么，为什么这些指控会一再出现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一项看起来确凿的罪证，荣格对此作过解释，但并没有能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这件事缘起于他主编的《心理治疗杂志》，以及他对其中发表的文章应负的责任。《心理治疗杂志》原是在德国发行的，从最早的学会成立开始便是如此。当它成为国际学会的成员机构之后，就由荣格在苏黎世担任编辑。1933年秋，戈林教授宣称他想要为德国学会的会员出版一份《心理治疗杂志》的特别增刊，要求他们忠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此荣格无权做任何事情，因为这完全是德国人的事务。然而，当《心理治疗杂志》的12月刊出版之时，荣格惊骇地发现，出版商把戈林的宣言收入了旨在国际范围内发行的那个版本中，而它的主编署名是荣格。在《反驳巴利医生》一文中，荣格声称这是在他不知情且未经他批准的情况下做的。谴责他的人却拒绝相信他的话。但是，他曾于1934年（不像有些人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在战后）公开宣称自己是无辜的，而且，如果他是在撒谎，应该会是有不少人能够揭露他的。此外，一些被公开的书信证明了荣格所说属实。

例如，他于1934年3月写信给国际学会的创建人之一丹麦人奥拉夫·布吕尔（Olaf Brüel）博士，信中说戈林宣言的刊行是和荣格的“明确要求”相违背的，荣格要求这篇文章应该刊行在一期“由戈林签名而不是由我签名”的特刊上。荣格还写信给学会的秘书沃尔特·钦巴尔（Walter Cimbal），对发生的事件表示抗议，并且要求增加一项紧急规定，即未来国际范围内发行的《心理治疗杂志》的所有期刊都应该“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政治色彩”。

荣格的另一个困境起源于他在关于雅利安人和犹太人的差异的文章中所使用的语言，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把弗洛伊德归因于潜意识的一种“消极价值”看作是对我们文化的一个威胁，因为它可能助长那些在雅利安人的精神中积累起来的破坏性力量的释放。

> 作为一个有着3000年文明史的种族的一员，和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国人一样，犹太人有着比我们更为宽广的心理意识领域。因此，总的说来，犹太人把消极价值附加于自己的潜意识之上相对而言危险较小。另一方面，“雅利安人”的潜意识却包含着爆炸性的力量和尚未诞生的未来的种子，而这些不能被贬低为没有精神危险的幼儿的浪漫主义。仍然年轻的德意志民族完全能够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这些形式现在依旧潜伏在每一个个体潜意识的黑暗之中——是一些充满了能量、可能发生强烈扩张的种子。类似于游牧民族的犹太人却从未创造出一种自己的文化形式，而且就我们所见将来也绝不会创造出，因为他的所有本能和才智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有一个文明的国家来担当使他们得到发展的宿主。（《荣格全集》第10卷，第353自然段）

荣格继续表示说，雅利安人的潜意识具有比犹太人“更高的潜能”，因为它有“一股尚未完全脱离野蛮状态的青春活力”，正如“国家社会主义这一令人畏惧的现象”所证实的那样，“全世界都瞪着惊讶的眼睛注视着它”（《荣格全集》第10卷，第354自然段）。

有人认为，在一份发行于纳粹德国的杂志上表达诸如此类的观点，这使得荣格处在与阿道夫·希特勒相同的概念框架之中。这一极端敌意的判断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当时所有欧洲国家盛行的社会态度。荣格成长于其中的文化具有内在的反犹性质。按照我们当代的标准，它

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甚至受过最良好教育的欧洲人也相信，黑人是劣等的，犹太人是一个问题。这两种主张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尽管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们很难相信这一点——这是决定性的一年，当时一股恐怖的浪潮吞噬了欧洲人的精神，转变了我们对属于一个少数群体可能意味着什么的理解。

按照20世纪前40年的标准，荣格并不是种族主义者。相反，他是人道主义的、胸怀宽广的和自由主义的。他远非是他的敌人所描述的那种典型的瑞士资产阶级，他的观点是高度革新的，远远地领先于他的时代。例如，在刚刚进入20世纪之际，他便提出了将同性恋合法化的主张，认为这既是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也是一种有用的控制生育的形式；当弗洛伊德因为其婴儿性欲的观点而受到各方的咒骂之时，他冒着自己的专业声誉受损的风险与弗洛伊德站在一起；他提出了以下具有深刻颠覆性的观点，即，在每一个男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未经触动的女性人格，在每一个女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男性人格，应该令它们获得意识、得到整合，并且存在下去。正如在和弗洛伊德的友谊行将结束之时他给后者的信中所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体内流淌着异端的血液，我最初根本就不会加入到与你的合作之中"（《弗洛伊德与荣格的书信集》，第491页；1912年3月）。

或许有人会说，荣格阐述犹太人——非犹太人问题的方式既没有讲究策略，在政治上也是不恰当的，但做了同样事情的弗洛伊德却从未受到过攻击。在他们的友谊终结之后，弗洛伊德写信给山多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承认他没有能够把"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联合起来，以服务于精神分析"；他又补充说："他们就像油和水一样相互分离。"在给费伦齐的另一封信中他写道："在犹太人和雅利安人的精神之间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这种差异。因此，他们的生活观和艺术观的差异肯定是处处可见的。但是，不应有像雅利安人的科学或犹太人的科学这样的事情。"如果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确实是科学的话（就和物理学或化学等同的意义上来说），以上这段话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它们不是科学，而是解释学科，那么，荣格的观点——即把它们都看作是染上了它们的创始人的

人格和文化色彩的“主观的忏悔”——可以说是更接近正确的。

荣格因为他前文所引的一个论点而受到诸多的批评——这种论点认为犹太人需要一个“宿主”国家，使他们在这个国家中发展他们的本能和才智——因为这可能隐含着犹太人是“寄生虫”的意思，就像纳粹分子所疯狂宣称的那样。但是，弗洛伊德却从未因为使用相同的术语而受到批评。在1938年出版的《摩西与一神教》一书中，弗洛伊德讨论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存在的差异，承认“在某些方面他们不同于他们所在的‘宿主’国家的事实……毫无疑问，他们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比其他民族更加杰出、具有更高标准、更为优越……我们知道这种行为的原因，也知道他们的秘密宝藏是什么。他们真正地将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弗洛伊德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就可以这样说。荣格则不能够，因为他是一个非犹太人。

如果这种关于荣格的反犹主义的指责是不公正的话，它是起源于何处的呢？荣格毫不怀疑地认为：“这种怀疑源自弗洛伊德”（《荣格全集》第10卷，第166自然段）。有理由相信这是真的。有一封信件被保存了下来，是弗洛伊德写给荣格的第一位精神分析病人的，这位病人是一个名叫萨宾娜·施皮尔莱恩的俄罗斯犹太人。这封信写于1913年，在她刚生了一个儿子之后不久，慕尼黑精神分析大会即将召开之前：“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已经完全改变了我对雅利安人事业的偏爱，并且希望如果这个孩子是个男孩子，他能成长为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将不会在慕尼黑向荣格表示问候，对此你非常清楚……我们是犹太人，而且一直会是。其他人只会剥削我们，永远不会理解或赏识我们。”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清楚地知道，弗洛伊德及其维也纳圈子是怎样迅速地对其对手的反犹主义下定论的。他说，他有些吃惊地开始意识到“犹太人对即使是最微弱的反犹主义的征兆也具有极深的疑虑，并且有多少话语和行动会被他们解释为是反犹主义的”。弗洛伊德也不例外。“和大多数犹太人一样，即使是最轻微的反犹主义的迹象，他都极为敏感；他的朋友中几乎没有几个不是犹太人。”

荣格非常清楚地知道，由于他的“背叛”，在弗洛伊德的阵营中产

生了怨愤的情绪，并且许多恶毒的动机被加诸于他的身上，用来解释他的行为：遗憾的是，这些偏见直到今天还在某些弗洛伊德学派和犹太人的圈子里存在着。

对荣格的这些不公正的指控受到了那些非常熟悉他的犹太朋友的谴责。格哈德·艾德勒（Gerhard Adler）、詹姆斯和希尔达·基尔希（James and Hilda Kirsch）、里夫卡·克卢格（Rivkah Kluger）、西格蒙德·赫维茨（Sigmund Hurwitz）以及荣格的秘书阿涅拉·雅费（Aniela Jaffé）都坚定地站出来为他辩护，讲述他如何给予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同事及其家人以慷慨的帮助，并且否认他曾经表现出任何形式的反犹或亲纳粹情绪。在他担任国际心理治疗学会主席期间，荣格始终坚持犹太人有权完全参与学会的事务，尽管他在1938年称当时的情况是“现时的政治精神病”。只是当这种精神病发展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才辞去了主席的职务。在整个战争期间，即使是在看起来纳粹就要取得胜利的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荣格也是联合事业的最热情的支持者，正如他的书信和许多独立见证人所证明的那样。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和声名卓著的拉比和宗教学教授莱奥·贝克（Leo Baeck）有过一次重要的面谈；贝克在塞里森斯塔特集中营被关押了3年后幸存下来。当贝克1946年到达苏黎世的时候，他拒绝了荣格的邀请，于是荣格到他的旅馆去看望他。他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在此期间贝克用他所听闻的对荣格的所有指责来谴责他。荣格对这些指责作了令贝克满意的回答，他们友好地告了别。

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荣格承认他最初对国家社会主义现象的评价“犯了错误”。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和当时的每个人一样，他对希特勒流星般地上台掌权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认识到，这个独裁者一定把日耳曼人潜意识中的某些非凡的能量发掘出来了。但是，到了1934年底，和任何敏锐的观察者一样，他也已经认识到，这股能量被导向了邪恶和病理的方向。事实上，如果说他对国家社会主义感兴趣的话，那是他把它作为一个心理 现象，而不是一个政治现象：这是原型在超个人层面上发挥作用的一个例子；这和他的观察是一致的，即被压抑的原型成分往往以原始的和破坏性的方式从潜意识中迸发出

来。

实际上，早在19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荣格就超乎寻常地未卜先知，预见到了纳粹势力的爆发：

> 基督教把日耳曼野蛮人分裂成上下两半，使得他能够通过压抑阴暗面，驯化较光明的一半，并使之适合于文明社会。但是，那个较阴暗的下一半仍等待着赎救和第二次归化。直到那时之前，它将始终和史前年代的残余以及集体潜意识保持着联系，而集体潜意识正越来越有可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激活。随着基督教的世界观失去其权威性，人们将听到这个“白肤金发碧眼的野兽”在其地下监牢中愈来愈具有威胁性的四下走动的声响，它随时可能冲破牢笼，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荣格全集》第10卷，第17自然段）

基督教和德国社会那种讲究纪律、等级分明的结构结合在一起，曾经对条顿民族潜意识中的沃坦神[1]成分起到了压抑的作用——他是充满激情和无理性的风暴与狂乱之神，是战争之神，其暴力精神会占据人们的心灵，令他们在嗜血和破坏的欲望的驱使之下暴怒发狂。这些可怕的原型残余当时正开始活跃起来。1936年，他大胆地在文章中表示，和基于经济或政治原因的理性解释相比，“以深不可测的沃坦神的性格这样异端的观点来解释国家社会主义，似乎更具说服力”（《荣格全集》第10卷，第385自然段）。

日耳曼神话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它的神话中诸神都被黑暗的力量所击败。整个神话传说以世界毁灭为终结，奥丁神接待战死者英灵的瓦尔哈拉殿堂被熊熊火焰所吞噬，就像1945年的第三帝国一样。1936年，荣格感到希特勒即将掌控这些之前被压抑的沃坦神成分：“关于德国现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显然‘着了魔的’人影响了整个国家到如此程度，以致一切都被调动起来，并且开始在朝向毁灭的过程中运行”（《荣格全集》第10卷，第388自然段）。

因此，我们可以公正地得出以下结论：荣格不是一个纳粹支持者，也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当人们读到他写的下面这段话时，一定能够体谅他：“任何一个读过我的任何一本书的人都一定会明白，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纳粹同情者，也从来就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对我所

写的东西所作的任何错误的引用、错误的翻译或重组，都不可能改变对我的真实观点的记录”（《C. G. 荣格的讲话》，第193页）。

从气质上讲，荣格不可能是一个纳粹分子。他对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持敌视态度，因为它们否认个体精神的主要价值。他憎恶任何形式的“主义”和教条。和每个人一样，他也有一个阴影，而且，在他身处的文化中长大，要是他身上没有法西斯主义或反犹主义的见解，那才是令人奇怪的。但是，和许多贬低他的人不同，有人猜想，荣格曾致力于克服他的阴影：“了解一个人自己的罪疚和自己的邪恶，这确实不是一件小事；忽略自己的阴影无疑是有害无益的。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罪疚时，我们便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我们至少能希望改变和改善自己”（《荣格全集》第10卷，第440自然段）。他正是以这种精神向莱奥·贝克坦承自己“犯了错误”的。

近年来，许多荣格学派的学者们大力地寻找证据，以便尽可能坦率地正视这些问题；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徘徊的阴影》（波士顿：香巴拉出版社，1991）一书中。这本论文集中的一些作者根据可获得的材料，认为荣格确实持有反犹主义的观点，但是，在整个荣格学界，他们的观点只是少数。那些持续不断地对荣格进行指责的人（他们中大多数来自荣格学界外部）毫无疑问有他们坚持的理由。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们没有充分地探究自身受压抑的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或反基督教的阴影，并且当他们把这些阴影投射到荣格身上的时候，享受着由此带来的那种自以为正义的激情。

注释

〔1〕 沃坦（Wotan）是北欧神话中的主神奥丁（Odin）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他朝木头吹了一口气，木头就变成了人。而Wotan后来演化为日耳曼神话中相当于奥丁的神。

第八章

结语

如果荣格是一个纳粹同情者，这会成为全盘否定分析心理学的理由吗？有人坚持认为会是这样的；他们显然相信，一个人的观点应当遵从当代“政治正确”的观念，否则他的研究便不应受到严肃的关注。如果如此紧密地起源于其创立者心理的分析心理学，被证明是浸淫了法西斯主义精神的，那么，他们的论点还说得过去。幸运的是，分析心理学强调个体精神和个人追求整体性的至关重要性，反对教条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同一化，这些使得它的智识地位完全远离了法西斯主义。

对一切寻求扩大国家权力的政治运动，荣格都怀有敌意，因为它们会剥夺个体追求本真（authentic）的权利——即忠实于他自己存在的法则：“如果一个人未能忠实于他自己存在的法则，未能起而应对人格，他就没有实现其生命的意义”（《荣格全集》第17卷，第314自然段）。那些服从于党派政策的人没有选择他们自己的道路，而是把他们追求整体性的潜能淹没在集体一致性相对潜意识的存在之中。个体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国家，这正是荣格那个时代政治发展态势的特点，而荣格视之为是极不健康的：“这意味着整个国家变成了一群羊，无时无刻不依赖于牧羊人把它们驱赶到丰美的牧场。牧羊人的牧杖很快就会变成暴政，牧羊人很快就会变成恶狼”（《荣格全集》第10卷，第413自然段）。

对有些人来说，荣格所谓的法西斯主义根本不是个问题，但是他们出于其他的理由拒绝接受他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观点是荣格因其出生的时代（1875年）、地点（瑞士）和阶级（“资产阶级”中的专业人员）而提出的典型假设，它们太过失真，因而不具有普遍的效力。例如，他们批评说：个体化理论明显是由荣格的内倾心理类型所决定的；他的治疗方法过于强调内部事件，对人际关系的关注不够充分；他的精神定向受其宗教背景的过度影响，这使得他的心理学和生活在当今世界的人们的存在问题并无多大关联。

这些批评肯定有其一定的道理：每一个人，无论他多么杰出，都一定是出生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刻、某个社会的，因此必然带有这一

命运的局限性。荣格心理学内倾的、个体主义的和精神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和不可否认的。但是，在一个致力于解决人类存在这一重大问题的人身上，至关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偏狭观念之起源的认识程度，以及他通过智识和想象的努力来超越它们的程度。而这恰巧是荣格最超乎寻常的——以及最矛盾的——天赋之一：他生活在他的时代之中，但同时又跳脱于这个时代，和历史上所有时代的人们共享着一种密切的关系。他所写下的一切都受到这种密切关系的触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观点太根本了，以至不能称为是现代的：这样的说法并不为过。正是因为他是如此内倾、如此有想象力、如此热爱内省，他才能够目光锐利地长时间凝视着他内在自性的镜子，在那里他所见到的人性的幻象远比迄今为止的一切描述更加透彻、深远和全面。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荣格超越他自己的意识局限的天赋是从他童年时代的幻想游戏开始的。这些游戏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可能是有关克莱因——许宁根的牧师住宅花园里的那块石头的游戏（前文第182页）：“我是坐在石头上的那个人吗？或者我是被他坐在上面的那块石头吗？”这个一再出现的仪式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被剥夺了情感的儿童的病理行为，这个儿童由于对人类世界缺乏“基本的信任”，就通过与一块石头建构起一种想象的关系来补偿他的社会孤立。但是，这种还原论的解释尽管可以说得通，却忽视了这个游戏对孩子以及对他的成人生涯所产生的意义深远的影响。在与石头的这番对话中，荣格心理学的种子已经萌芽——二元、对立和转化为其对立物的先天倾向的原则，想象所具有的能够赋予生命的力量（通过投射它激发出世界的生命和意义），以及对精神平衡与成长至关重要的论题、反题与合题的内在辩证法。

那块石头是荣格第一次与潜意识亲密接触的见证：从中产生了他对未知事物的迷恋，及后来在埃塞平原上得到证实的他对精神的宗教功能的理解：即它提供了造物对自己产生意识的手段。通过把他的精神投射到这块石头上，他赋予了这块石头生命、同一性和意识；他所做的就是炼金术士们在凝视着蒸馏甑中的原材料时所做的事情。他开始把想象看作是精神的水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中创造出来

的；因为除了我们在精神中所赋予它的东西之外，有形的物质世界没有任何意义。

诸如此类的洞见使他遭受到了另外两种批评，即批评他的心理学从本质上来说是自我中心的和反社会的，也是非科学的：荣格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对人格发展的影响，而且他的治疗程序并非旨在提升人们适应社会要求的能力。这些批评有其合理之处，我相信荣格也认识到了。但是，由于他是如此深刻地内倾，以至他觉得只有通过内心世界的有意识实现，与外部现实的关系才能达成。“与自性的关系同时也是与我们人类同伴的关系，只有当一个人与他自己建立关系时，他才能和人类同伴建立关系”（《荣格全集》第16卷，第445自然段）。他宣称，个体化有两个主要方面：“首先，它是一个内在的和主观的整合过程，其次，它是一个同样不可或缺的建立客观关系的过程”（《荣格全集》第16卷，第448自然段）。他说：“在埃佛勒斯峰（即珠穆朗玛峰）上，一个人不可能实现个体化”（汉娜，《荣格：他的生平与研究》，第290页）。个体化不是要把一个人阻隔在世界之外，而是要把世界聚集到他自己身上（《荣格全集》第8卷，第432自然段）。

当他最终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孩提时代的环境中所缺失的那种安全感时，他由此而产生的“内在确定性”使他能够走自己的道路，敢于挑战弗洛伊德和学院派心理学家，而且，和另一位内倾的幻想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一样，他能够生活在与其时代的补偿关系中。如果说弗洛伊德信奉因果关系和精神决定论的原则，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童年期的心理病理学上，并且宣称宗教是婴儿寻求父母保护的一种欲望，那么，荣格则与此相反，他采取了一种目的论的观点，赞同意志自由，把发展的过程从童年期扩展到整个一生，提出疾病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成长，并且认为宗教是一种人类基本需要的满足。

学院心理学家们也驱使他处在一个补偿的位置上。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内，大学中的心理学都受到行为主义的支配，它教条地坚持对外部刺激的可量化行为反应进行缜密的研究，把精神和内省手段从心理学实验室中驱逐出去，并且否认先天结构对行为的影响。相反，

荣格则强调象征体验和内心事件的重要性，坚持认为精神以及通过内省对精神进行的研究应优先于所有其他研究，并且声称先天的倾向为所有的心理知识和经验提供了基础。

他在文化上也同样起的是补偿作用。脱离其犹太教与基督教根源的西方社会强迫性地追求物质主义，精神贫乏，迷恋技术。我们正在集体犯下炼金术士们的错误，把我们的精神期望投射到物质的事物之中，误以为我们是在追求最高的价值。这怂恿我们把彼此当作是经济商品，剥削这个星球的自然资源，却忽略了自性的精神资源，从而伤及了我们自身。我们的文明“丧失了灵魂”，对此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对个体的内心生活进行大规模的再投入，以便重建个人与“神话世界”的联系，“在这个神话世界中我们曾经与生俱来地感到舒适自在”（《回忆、梦、反思》，第237页）。如果被剥夺了神话和宗教的象征作用，人们就会失去意义，社会就注定要灭亡。

正是诸如此类的观点使得学者们谴责他的学说是“非科学的”。荣格对此不以为然：“我无法将自己体验为是一个科学问题。神话比科学更具有个体性，能更精确地表达生命”（《回忆、梦、反思》，第17页）。他并非不熟悉科学方法（他的早期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是他的眼光必须超越 科学：“科学在逻辑的前沿领域停下了脚步，但自然却没有止步：她在尚未受到理论踩踏的土地上繁茂地生长着”（《荣格全集》第16卷，第524自然段）。他不能容忍的是那种流行的唯科学主义 （scientism）谬见——拒绝相信一切不能为科学所解释的事物。他要求给予那些非理性的、不受因果关系制约的、科学认为不值得关注的体验以应有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科学的”心理学是反生命的：“谨严的理性越是占据支配地位，生命就越是变得枯竭；但是，我们越是能够意识到神话，我们就越是能使生命得到整合。在这一点上，被高估的理性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存在共同之处：在其统治之下，个体成为贫民”（《回忆、梦、反思》，第280页）。

因此，和精神分析一样，分析心理学无法称自己为一门实验科学：最好是把它划归为解释学 （hermeneutics）的一个分支——一种

旨在说明意义的解释艺术。英国广播公司曾对荣格作过一次著名的电视采访，在采访结束时荣格说道：“人不能忍受没有意义的生活。”那么，意义来自何处呢？荣格的回答是，通过对自性的毫不含糊的肯定。自性充满激情地追求个体化，在我们的生活中寻求成长和发展。对自性的肯定使创造性能量得到解放，并且使人认识到，最好的生活是在永恒的外表下所过的生活：“对一个人来说，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他是否和某些无限的东西存在关联？”（前文第219页）。人类的这个终极问题导致了迄今为止所有神话和宗教的产生，每一种神话或宗教都是某个人群试图与无限和永恒建立联系的一次大胆尝试。对宇宙联系的探索，对神圣的体验，是自性的一个基本要求。否认它就会使精神腐朽；接受它就会使灵魂充满意义的光芒。“我只能充满惊奇和敬畏地注视着我们精神本性的深度和高度。它那非空间性的宇宙隐藏着不可计量的意象，这是在数百万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其宏伟壮丽堪与夜间满天星斗的天穹相比，“因为能与心中的宇宙相等同的只有外部的宇宙”（《荣格全集》第4卷，第331自然段）。

这种宇宙观使他对潜意识和未知的事物、对象征的神性（numinosity）、对想象的神奇力量和超越功能的调和天赋、对我们赋予周围一切事物的意义、对个体精神作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和伟大的宇宙本身不可测知的意图之间的联系的首要地位都充满了敬畏。他对个体无法估量的价值的强调，他对“诺斯”（gnosis，真知，即通过经验、而不是通过书本学习或信仰而获得的知识）的至高无上地位的坚持，他对非理性、自发性和机缘巧合的开明态度，他对人生丰富的创造性目的的颂扬，他把个体化的实现视为所有其他目标都必须服从的总目标，他把梦和神话视为灵魂永恒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充盈着他的生命的关于宇宙起源的灵感的表达方式。

毫无疑问，荣格是一个古怪的和不同寻常的人，但是，如果他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他的超乎寻常的成就便不可能达成。他以不同的方式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表述过他的信条，但是有一段话却可以被当作是对此最佳的总结：“人格是一个生物先天特性的最高实现。它

是在生活面前表现出无畏勇气的行动，是对构成个体的所有成分的绝对肯定，是和最大限度的自决结合在一起的对普遍的存在状况的最成功适应”（《荣格全集》第17卷，第289自然段）。

虽然他认识到，我们人类和我们的地球因我们自己未觉醒的意识而处在严重的危险之中，但他直到生命的尽头仍保持着谨慎的乐观。他相信，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东西会永远丧失，因为它的母体永远存在于我们之中，而且总是能够被以下这种人所重新获得：这些人“学会了从流行的意见的眩目光芒处移开视线，并且堵上耳朵不去听那些转瞬即逝的口号的喧嚣”。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写给塞拉诺（M. Serranno）的一封信（1960年9月14日）中，他引用了一位年老的炼金术士对他的学徒的安慰之词：“无论你有多么孤立，无论你感到多么孤独，如果你真诚地凭良心致力于你的探求，不认识的朋友就会前来把你找到。”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的格言：“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同一封信的结尾几句话可以恰当地作为荣格的墓志铭：

> 我试图发现我所能获得的最佳的真理和最清晰的光亮；既然我已经到达了自己至高的顶点，不可能再行超越，那么，我便守护着我的光亮和我的财富……它不仅对我来说是至为宝贵的，而且对造物主的黑暗来说尤其如此，因为造物主需要人类来照亮他的创造。如果上帝预见到了他的世界，那它就只不过是一个无意义的机器，人的存在就是个毫无用处的突发奇想的念头。我的理智能够设想这后一种可能性，但我的整个存在却对它说“不”。

译后记

上个世纪80年代，当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时，在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林方老师和南京师范大学刘恩久老师的启发和鼓励下，我把荣格的自性理论作为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主题，从此走上了对精神分析学派和荣格分析心理学进行理论探讨的学术研究之路。20多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荣格心理学思想产生了由衷的偏爱。这20多年的研究，也使我从一个茫然无知的学生逐渐成长为将学术研究视为生命真谛的冥顽学者。荣格对我的思想启示和学术影响可谓大矣。

无庸置疑，荣格是一个学术思想渊博，有着深厚和广博的哲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精神病学、文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功底的多产作家，也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底蕴、内倾直觉型的思想巨人。要想深入荣格的内心世界，理解其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人类勇于探索未知的学术精神，总是使人对未知和神秘现象充满了好奇。荣格对诸多神秘的未知现象的心理分析，虽然有很多尚未得到科学的证实，也许有些还会受到以后科学的否认，甚至有些所谓正统的科学家已经对他的思想提出了科学质疑，但是，这些丝毫也不能减弱人类探求心灵奥秘的学术精神。更何况，人类心灵的奥秘绝非当前的科学手段所能全部探究清楚的。学术研究需要多种思想、多种方法、多种渠道的合作。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思想为探求人类集体潜意识之谜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迪。

今年春天，当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编辑徐宁同志通过电子邮件和我联系，希望我翻译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荣格学派的心理学家史蒂文斯撰写的这本小书时，尽管我现在的教学和科研任务非常繁重，但出于对荣格的喜爱，我欣然应允。开始翻译后不久，我就被书中很多精彩的论述所深深吸引。这本小书篇幅虽短，但语言简明易懂，分析深刻感人。阅读这本书，仿佛置身于荣格的思想之中，给人带来了莫大的精神享受。

感谢徐宁同志和外研社对本书的悉心编辑，本书的出版凝聚着编辑们甘为人梯的孺子牛精神。感谢他们为读者带来这样一套令人爱不

释手的系列丛书。愿思想的共鸣促进人类精神的升华。

杨韶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白云山麓
2007年7月

为什么说英雄神话是成人仪式的象征？“人格面具”和“阴影”如何作为部分人格影响我们的成长和发展？个体之间心理类型的差异究竟何在？应该怎样释梦，又该怎样进行心理治疗？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展开个体化的进程，尽可能地在我们文化的限度之内成为一个完善的人？精神世界的宏伟壮丽堪比夜间撒满星斗的天穹，“能与心中的宇宙相等同的只有外部的宇宙”。

这本小书语言简明易懂，分析深刻感人，是了解荣格思想的入门之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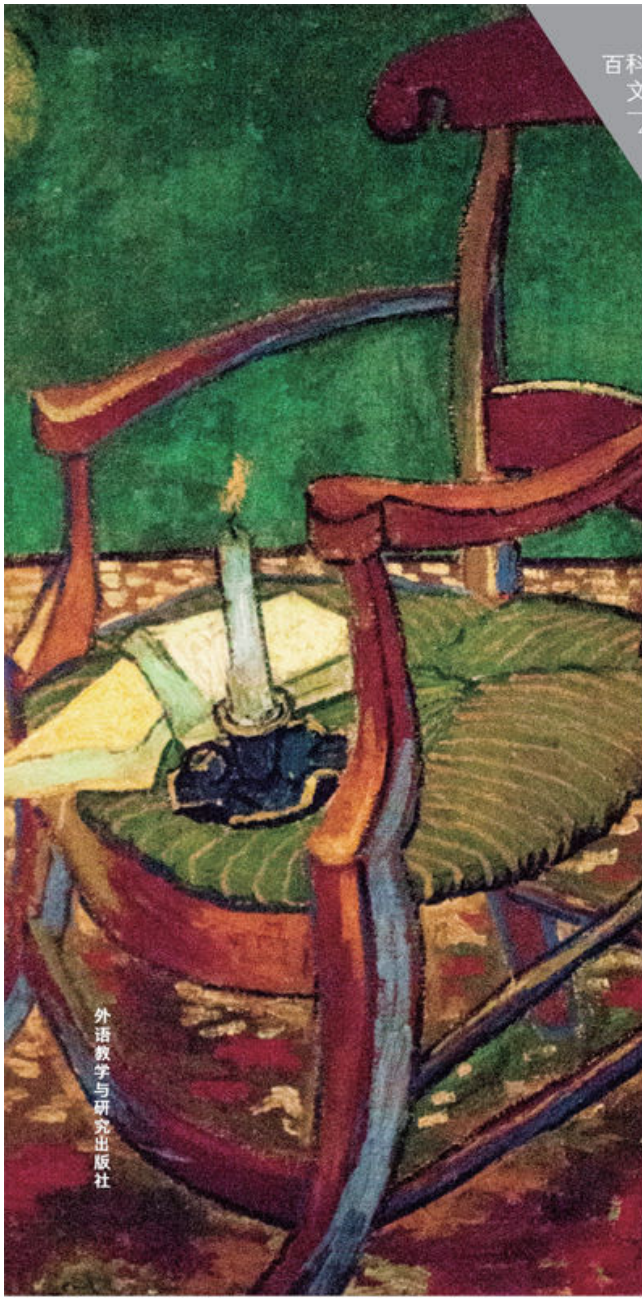

百科通识文库

49

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

安东尼·斯托尔 著 尹莉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

安东尼·斯托尔 著

尹莉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53**

Freud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9.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1989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Anthony Storr 19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 / （英）斯托尔（Storr, A.）著；尹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05-9

Ⅰ．①弗… Ⅱ．①斯… ②尹… Ⅲ．①弗洛伊德，S.（1856～1939）－生平事迹②弗洛伊德，S.（1856～1939）－精神分析
Ⅳ．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44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05-9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第一章　生平与个性
第二章　从创伤到幻想
第三章　探索过去
第四章　自由联想、梦与移情
第五章　自我、超我与本我
第六章　攻击、抑郁与妄想
第七章　玩笑与《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
第八章　艺术与文学
第九章　文化与宗教
第十章　作为治疗师的弗洛伊德
第十一章　今日的精神分析
第十二章　精神分析的魅力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安东尼·斯托尔，1944年取得医生职业资格，后专门从事精神病治疗，并接受了精神分析师培训。曾执教于牛津大学，讲授心理疗法。著有《品格的诚信》（1960）、《创作的动力》（1972）、《荣格》（1973）、《孤独》（1988）、《音乐与心灵》（1992）。现为牛津大学格林学院荣誉退休院士。

译者简介

尹莉，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心理协会、国际阅读科学研究协会会员。曾在美国的《教育心理学》，中国的《外语教学》、《中国图书评论》、《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数篇，多次在国际心理学大会、美国儿童发展研究年会及美国教育研究年会上发表会议论文。

图　目

图1　1938年弗洛伊德去伦敦途中到达巴黎
图2　1882年8月9日在焦虑中致玛莎的信
图3　1885年弗洛伊德和未婚妻玛莎·伯尼斯在他们的订婚仪式上
图4　1913年弗洛伊德在多洛米蒂与女儿安娜在一起
图5　弗洛伊德的部分古雕像收藏
图6　弗洛伊德的最后居所入口，位于伦敦西北3区梅尔斯菲尔德花园20号
图7　1887年J.M.夏尔科通过实验论证歇斯底里症状
图8　1885年前后，青年时的弗洛伊德
图9　《梦的解析》第一版的扉页
图10　1895年，美景宫
图11　1914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伯格街19号的寓所
图12　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作品《摩西像》
图13　1508—1513年，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圣母，圣婴和圣安妮》画作
图14　1901/1905年，多拉个案分析的第一版首页
图15　1922年，弗洛伊德与秘密委员会成员
图16　1938年，阅读手稿的弗洛伊德

第一章

生平与个性

1856年5月6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出生于现今捷克共和国普日博尔市的摩拉维亚弗莱堡小城。他的母亲阿玛利（Amalie）是犹太羊毛商人雅各·弗洛伊德（Jacob Freud）的第三任妻子，比雅各小20岁。1859年，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3岁的时候，一家人移居维也纳。在之后的79年中，弗洛伊德一直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和工作，尽管他反复表示过对该城市的嫌恶但又极不愿离开。1938年，为逃避纳粹分子的迫害，弗洛伊德被迫在英国度过他人生最后的时光，于1939年9月2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便离开人世。

弗洛伊德的母亲，一位活到95岁的充满活力、魅力十足的女性，在弗洛伊德出生时年仅21岁。之后她又生养了7个子女，但是被她称作“我出色的小西基”的西格蒙德无疑一直是她的最爱，弗洛伊德认为母亲的这种爱是他建立自信的一个重要条件。弗洛伊德还认为，他后来的成功与他是一名犹太人有直接关系。尽管弗洛伊德从未信奉犹太教，并认为所有宗教信仰皆是虚幻的，但他本人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有很强的意识，从不结交非犹太人的朋友，还定期参加当地犹太社团圣约之子会（B'nai B'rith）的集会，并对他那些被译成依地语和希伯来语的著作不收版税。他认为他能够独立思考正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当他第一次在维也纳大学遭遇反犹太主义抗议时，他写道，不被社会接纳使他远离群体，培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

图1　1938年弗洛伊德与玛丽·波拿巴和威廉·C.布列特去伦敦途中到达巴黎。弗洛伊德的银行账户被纳粹销户、现金被没收，玛丽·波拿巴（希腊乔治王妃）向纳粹支付了弗洛伊德获准离开奥地利所需的金额。威廉·布列特是美国驻巴黎大使，曾与弗洛伊德合著过一本（非常糟糕的）关于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书。

少年时代的弗洛伊德智力超前，异常勤奋。他连续6年学业在班里名列第一；而且到毕业时，他不但通晓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和希伯来语，而且学习了法语和英语，并且自学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基本知识。他8岁时便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莎士比亚和歌德一直是他喜爱的作家。从很小的时候起，弗洛伊德就是一个认真、专心

的学生，他的家人和老师都期望他能成名，他自己也确信他注定会在知识领域作出重要贡献。全家人的生活都以他的学业为中心。他不和其他家庭成员一块儿进晚餐，而且，因为妹妹安娜练钢琴的声音打扰了他，父母就把她的钢琴搬走了。

1873年秋天，弗洛伊德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系学习，但是直到1881年3月30日才毕业。他最初的兴趣在动物学研究上。从1876年至1882年，他在厄恩斯特·布吕克（Ernst Brücke）领导下的生理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布吕克是弗洛伊德非常崇拜的生理学权威，并对弗洛伊德的思想产生过巨大影响。布吕克和他的同事们致力于研究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可的一种观点，即所有生命过程最终都可以用物理和化学来解释，因此从生物学中摈除了宗教和生机论概念。弗洛伊德终其一生都是决定论者，他坚信，所有的生命现象，诸如想法、感觉、幻想等心理现象，都严格地受因果定律的制约。

弗洛伊德当时并不愿意行医，乐于一生从事研究工作。但是1882年，他爱上了玛莎·伯尼斯（Martha Bernays）并与之订婚。如果他继续留在布吕克的实验室的话，他的收入将不可能供养妻子和家庭。弗洛伊德因而不情愿地放弃了他的研究生涯，在接下来的3年中转而在维也纳总医院习医，积累经验，为未来从医作准备。1885年，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神经病理学讲师。1885年10月至1886年2月，他在巴黎萨尔佩特里埃尔医院跟随著名的神经学家夏尔科（Charcot）工作。夏尔科关于歇斯底里症的研究激起了他对神经官能症问题，而非神经系统的器质性疾病的兴趣。1886年4月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开办了自己的诊所，并于同年9月13日与未婚妻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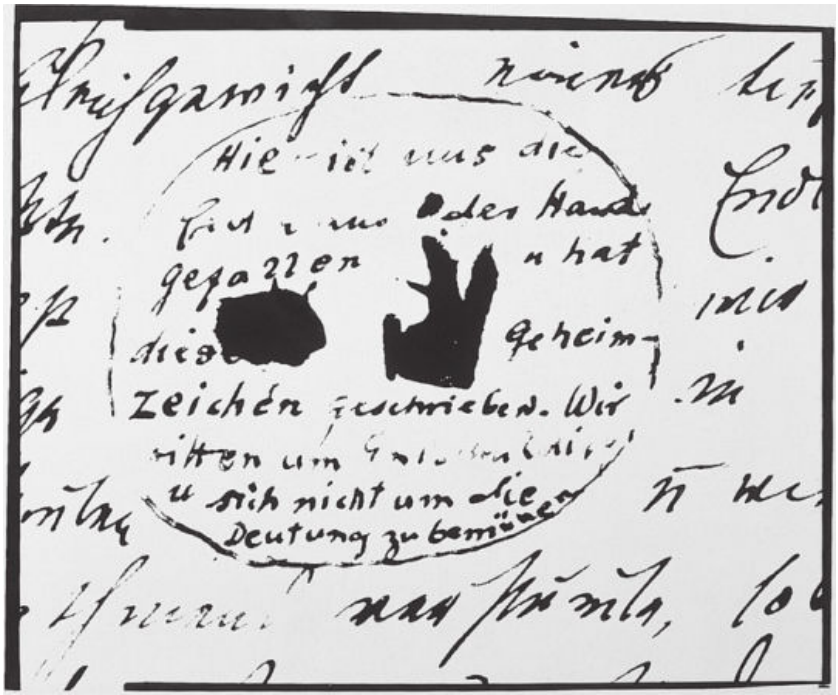

图2　1882年8月9日，（弗洛伊德）在焦虑中致玛莎的信，上面有大团的墨渍——弗洛伊德恳求玛莎不要让他作出解释。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蒂尔德，于1887年10月降生。之后他们又相继生养了5个孩子，最小的名叫安娜·弗洛伊德，出生于1895年，是弗洛伊德所有孩子之中唯一成为精神分析学家的一个。他的妻子，玛莎，在他们漫长、平静的婚姻生活中心甘情愿地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弗洛伊德及他们的6个孩子。从一些信件中我们了解到，他们的性生活较早就开始减少了，但是他们的家庭生活一直保持着和谐。弗洛伊德去世后，玛莎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 没有了他的生活是多么艰难。当身边不再有他的爱和智慧而要继续活下去是多么可怕！想起53年来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没有发生过一次口角，而我一直在竭尽全力消除生活琐事给他事业带来的烦忧，这些令我稍感安慰。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弗洛伊德的生活开始成为精神分析的

发展史。1895年，他与约瑟夫·布罗伊尔（Josef Breuer）合作完成的《歇斯底里症研究》问世了。鉴于弗洛伊德对当代思想的影响及需24卷书方可尽言的他对精神分析的巨大贡献，他的首部精神分析论著于39岁时出版是着实令人惊叹的。

图3　1885年弗洛伊德和他的未婚妻玛莎·伯尼斯在他们的订婚仪式上。

什么样的个性使一个人仅用半生的时间就能成就如此之巨？大多

数取得杰出智识成就的人都表现出精神病学家称之为强迫性的一些特质，即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力求精确、为人可靠、诚实，而且非常注重清洁、控制和秩序。只有当这些优秀的品质被过分夸大时才会表现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这种神经系统紊乱性疾病根据严重程度不同，轻者会强迫性地不断进行检查和再检查，重者会由于太过被各种程式所左右而无法正常生活。

弗洛伊德承认他本人具有强迫性特征。他对荣格（Jung）说，如果他患有神经官能症的话，则是强迫性那种。他智力的超前及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对学业及工作一如既往的全心投入都是强迫性特征。他在给朋友弗利斯（Fliess）的信中写道，他需要一种“主导一切的激情”。他声称他不能想象没有工作的生活。对他而言，创造性想象与工作紧密相连。他是一位极为多产的作家。他的大部分写作都是在周日进行的，或者是在结束了一天八九个小时非常劳累的分析治疗工作之后于深夜完成的。尽管他夏天会去度个长假，在度假时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徒步运动者，但在工作的时候，他很少放松休息。

图4　1913年弗洛伊德在多洛米蒂与女儿安娜在一起。

和大多数具有此类性格的人一样，弗洛伊德的衣着和外表极度整洁，即使在早期生活困窘时，他也艰难地保持着仪容整洁。在他给威廉·弗利斯的信中显示，有一个理发师每天来为他打理仪容。弗洛伊德

体现了这类性格的人身上最宝贵的品质：谨慎、自律、诚实及对真理的热切追求。弗洛伊德将强迫性性格描述为“极有条理 、十分节俭 和倔强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IX. 169）。他做事有条不紊，为人倔强；在他早年生活极端困顿，经济上需依靠如约瑟夫·布罗伊尔等朋友的资助时，他生活非常节俭。他一直崇尚简朴。据厄恩斯特·约内斯（Ernst Jones）透露，他只有不超过3套外套，3双鞋子和3套内衣。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不能忍受欠任何人钱；并且，尽管他收取有钱人高额诊疗费用，但他给予贫困者以慷慨的经济资助，这其中包括他的病人、亲属和穷困潦倒的学生。

他也受到了和强迫性性格中那些宝贵品质密不可分的紧张感的折磨。他对数字抱有一种迷信态度。在一封给荣格的信中（1909年4月16日），他透露说，多年来他坚信他将死于61岁或62岁。1904年，他与他的兄弟去了希腊，他描述这次行程时写道：这“太离奇了”，61或62两个数字总是和1或2联系在一起。他在雅典的旅馆房间号是31，即62的一半。他告诉荣格他的这种强迫性想法开始于1899年。

> 那时发生了两件事。第一，我写了《梦的解析》（后来拖到1900年出版），第二，我得到了一个新的电话号码，一直使用至今：14362。很容易看出这两个事件的共同因素。1899年当写《梦的解析》的时候我43岁。因此有理由断定，其他的数字象征着我生命终结的时刻，即61岁或62岁。
>
> （《弗洛伊德-荣格信件》，219）

这些迷信想法通常与强迫性程式和对死亡的着迷相结合，在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病例中较普遍。厄恩斯特·约内斯注意到，与很多其他创造性天才类似，弗洛伊德在怀疑和轻信之间特别摇摆不定。尽管弗洛伊德并不相信19世纪末期诱惑了许多科学家的灵巫术和唯灵论，但他确实对数字的超自然意义抱有非理性的坚信，对心电感应也不乏热情。

弗洛伊德还表现出其他一些强迫性习惯和特质。例如，他是个强迫性吸雪茄成瘾者。1893年到1896年期间，他患有周期性心律不

齐，这可能部分是由吸烟引起的。他发现自己长时间戒烟是不可能的。在他67岁的时候，他的上颚发生了癌变，反复发作，伴随余生，实施了30多次手术。尽管他知道，是吸烟产生的刺激导致了病症的复发，他还是不能放弃这个习惯。强迫性个性的人拥有极强的自我控制，这通常使他们显得十分拘谨、不够自然，弗洛伊德也是如此。但是抽烟这件事是他的致命弱点，是他行为中具有强迫性、无法掌控的一部分。

弗洛伊德的收藏习惯也很有特色。他的古典研究、对罗马的浪漫向往，和对人类远古历史的兴趣共同激发了他对古董收藏的热情。他的维也纳公寓照片及在汉普斯特德20号梅尔斯菲尔德花园重建后的公寓（现为弗洛伊德博物馆）照片都展示了他的古雕像收藏。这些收藏品密密麻麻地摆满他的书架及写字台，以至于其中任何一件都不能尽显其作为艺术藏品的美感。这不是一位鉴赏家的艺术品展示，而是一个强迫性收藏者的展示，他的兴趣不在于体验美而在于收集。弗洛伊德本人也意识到，他对这些物品的兴趣，就像他对雕塑的兴趣一样，源于其背后的历史联想及其承载的情感与智慧，而非其美学特征。在《米开朗琪罗的摩西》一文中，他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这篇文章体现了弗洛伊德对那些也许会逃过大多数观察者眼睛的微小细节的细心关注。这种对细节的密切关注也体现在他对患者的症状、梦境和其他心理素材的临床解析方面。

弗洛伊德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弗洛伊德本人文风之卓越早在他的少年时代就得到认可。1930年，他成为法兰克福市颁发的歌德文学奖的第四个获奖者。弗洛伊德著作集中，对歌德和莎士比亚的参引要多于对任何精神病学家的引用。他对音乐的欣赏仅限于歌剧——那种对不擅长音乐者最具吸引力的音乐表演形式。他的一个侄子把他描述成一个轻视音乐的人。

弗洛伊德拘谨、克制的个性在他的自传当中也得到了反映，自传内容几乎完全集中在精神分析的发展上，对个人生活鲜有披露。早在1885年，他曾致信给他的未婚妻，告诉她他已经毁掉了过去14年中的笔记、信件和手稿。并预见性地补充说，他并不想让未来给他写传

记的人轻易获得素材。弗洛伊德，这个毕生都在探索人们设法深藏的私密的人，却极其不愿意披露他自己。

图5　弗洛伊德的部分古雕像收藏。

在他的临床工作中，弗洛伊德像一名精神分析师应该的那样，亲切而包容。然而，他的和蔼可亲并不是基于他对人类的任何高远的期望，他对人类的态度是嫌恶、冷漠超然而非关爱。在一封信中他写

道：

总体上我从人类身上鲜有发现“好的”东西。根据我的经验，大部分都是糟粕。

（《精神分析与信念》，61-62）

一个分析对象记录道，弗洛伊德是

那样令人惊异地客观……他如此专注于正在进行的调查，以至于他本人仅充当着一种工具。

他身边亲近的人敬仰他，不仅因他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因他的正直和勇气。也许他很难让人即刻感受到热情和温暖。在（1907年9月2日）给荣格的信中，弗洛伊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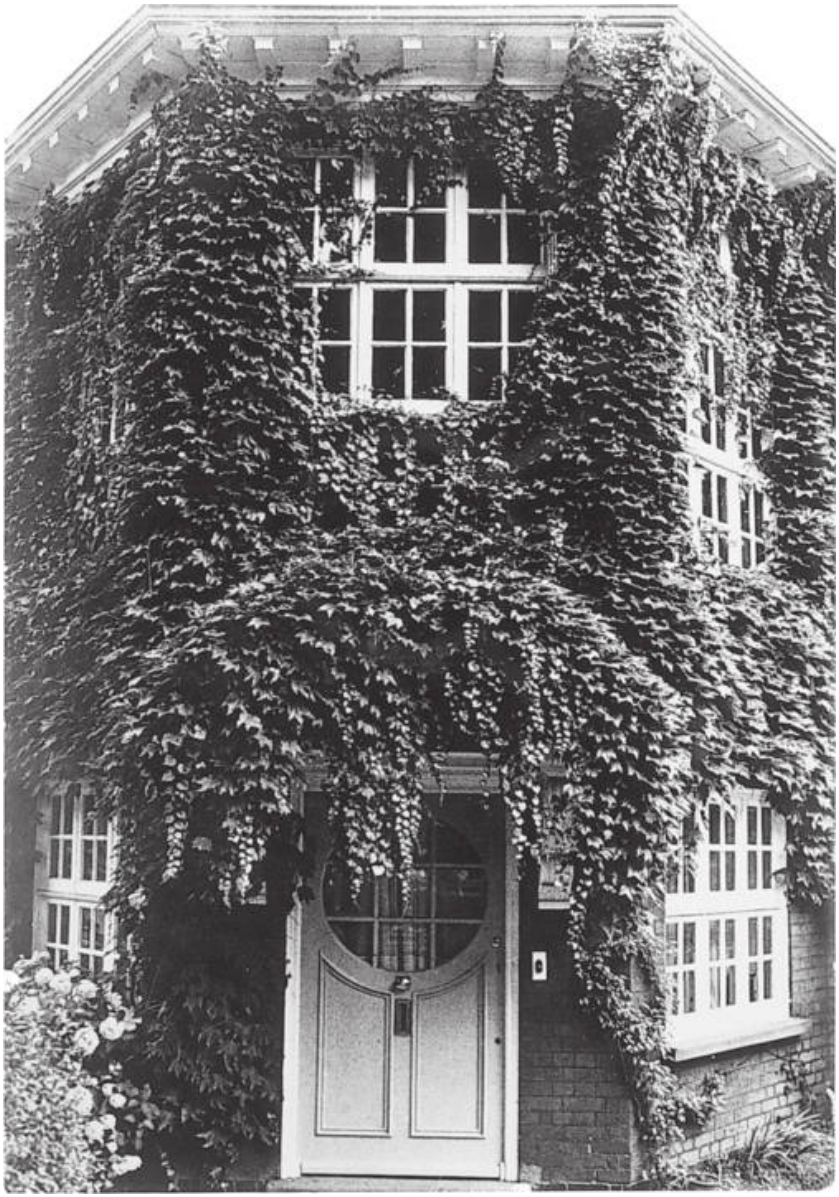

图6　弗洛伊德的最后居所入口，位于伦敦西北3区梅尔斯菲尔德花园20号，现为弗洛伊德博物馆。

我总觉得在我的性格、思想和讲话方式中，有某种东西让人奇怪和排斥，然

而人们却都向你敞开心扉。如果像你那样健康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歇斯底里类型的人，那我只能称自己为“强迫型”的人，每个这样的人都在自己封闭的世界里，单调乏味地生活。

（《弗洛伊德-荣格信件》，82）

弗洛伊德的诚实促使他在一生中几次根本性地修改了他的思想；但他这样做几乎都是因为他有了新的洞见，而不是因回应他人的批评的需要。当弗洛伊德得出某个结论时，他不能忍受不同意见，这种执拗导致了他的一系列合作者及追随者的背离，这成为精神分析发展史上的憾事。弗洛伊德视这些背离为背叛，而非思想上的分歧。第一个与他疏远的合作者布罗伊尔对福雷尔（Forel）这样写道：

“弗洛伊德的思考和表述往往是绝对的和排他的……这是一种精神需要，在我看来，这种需要导致了过度概括。”

布罗伊尔在这两点上都是正确的。在对待人性的脆弱面，弗洛伊德体现了非同寻常的宽容。这使人们对神经官能症、性偏离和其他形式的情感不适采取了更文明的态度，因此是弗洛伊德最宝贵的遗产。但是，在精神分析早期发展阶段，他不允许与他关系密切的人质疑他独创的心灵新科学中那些他所谓的基本的、绝对的原则，这不但导致了他与布罗伊尔和弗利斯的破裂，而且致使阿德勒（Adler）、施特克尔（Stekel）、荣格、兰克（Rank）等人与精神分析运动分道扬镳。

布罗伊尔关于“过度概括”的说法也是很有根据的。弗洛伊德是个大胆的、有独创精神的思想者，但是他发明的精神分析疗程的性质和长度，意味着他对人性的结论是基于对很小的人类样本进行分析而得出的。弗洛伊德的病人主要来自上层或中上层社会，而且，作为早期精神分析理论最初基础的那种女性严重转换型歇斯底里症，现今已十分罕见。

过度概括对所有独创型思想者都具有诱惑力，他们通常因为爱上

自己的想法而过高估计了它们的价值。也许，新的、不受欢迎的想法将永远无法赢得人们的注意，除非其创造者坚信它们是对的。弗洛伊德不仅确信他发现了有关人类的新事实，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他努力预测并设法应对读者对他的理论可能提出的种种批判，这是一种审慎的、让人消除疑虑的技巧。他能预料到，而且也经常遇到敌意和怀疑。但是他的写作技巧和他对自己理论正确性的笃信，最终使精神分析成为整个西方世界都认真看待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学说。

除了对新思想的高估以外，过度概括的产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源于强迫性个性思想者们具有的一种典型的欲望或需求。他们的心理模式是建立在对秩序和控制的需求之上，因此他们倾向于找寻一种吸引他们的综合思想体系，以对人类的存在作出接近全面的解释，从而使人类有望通过获取新认识来实现控制自己和外部世界的目的。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Kant）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都属此类人，他们创建了自己的体系，不理会他人的思想，通常不能从阅读其他哲学家的著作中受益或得到愉悦。

弗洛伊德声称自己是一名科学家，在专业意义上他显然不是一名哲学家，他对哲学没有特别的兴趣，尽管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翻译过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一部著作。不过，在创建思想体系方面，他与一些哲学家们有类似之处。在精神分析形成之初，它摆脱了咨询室的狭窄局限，涉猎人类学、社会学、宗教、文学、艺术和超自然领域。如果它不是一种哲学体系的话，至少是一种世界观；将神经官能症的治疗方法拓展为一种审视人性的新方法是源于其创立者的心理需求。

弗洛伊德斥宗教为幻觉，但是他又需要某种系统的方法对世界进行前后一致的解释。他将自己创立的体系称为科学；但是精神分析不是一门科学，也永远不能成为物理和化学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它的假设是回顾性的，不能用于预测，而且大多数假设没有最终证据的支持。弗洛伊德决定论的姿态和认为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的坚决主张，使他的发现在波佩尔（Popper）等哲学家和梅达沃（Medawar）等科

学家们的眼中大打折扣，以至于这些人不能充分领悟作为一种解释体系和观察人性的方法的精神分析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一部简短的著述难以尽述弗洛伊德思想的各个方面。在以下章节中，我力求借助现代知识，评述他更为重要的理论。

第二章

从创伤到幻想

1885—1886年间，弗洛伊德在巴黎的短暂停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夏尔科多年来一直研究催眠术，目的是发现一种诊断技术，以区分由中枢神经系统的器质性疾病导致的麻痹与歇斯底里性麻痹，即起因为神经疾病的麻痹。夏尔科向弗洛伊德证明，思想虽然是无形的，但是可能成为神经官能症的起因。当一个病人患上了歇斯底里性麻痹后，麻痹的类型并不取决于解剖揭示的事实，而是取决于病人对解剖的错误想法 。病人并未患上由某个外围神经损害而造成的麻痹，但他却显现出某个肢体的瘫痪，这与他本人认为他的腿或臂的起点和终点的位置是相对应的。夏尔科证明，这样的麻痹可以通过催眠治疗治愈和再次人为引发。

弗洛伊德从夏尔科那里了解到，要了解歇斯底里症，必须从心理学而不是神经病学入手。因为病人从催眠诱发的迷睡状态醒来后，不能回忆起催眠过程中他们被建议做了什么，因此催眠实验也让弗洛伊德意识到，潜意识里出现的心理过程可能对行为产生强大影响。

图7　1887年J.M.夏尔科通过实验论证一个病人在催眠状态下的歇斯底里症状。A.吕拉根据安德烈·布鲁耶的画作制作的雕板。

图8　1885年前后，青年时的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因此在治疗神经官能症患者时采用了催眠法，并一直沿

用至1896年。但是他并不只是把催眠法当作给予积极健康暗示的一种手段。催眠法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源自弗洛伊德的朋友兼同事，约瑟夫·布罗伊尔的发现。约瑟夫·布罗伊尔在治疗他的著名病例，安娜·欧（贝尔塔·帕彭海姆）时发现，如果她能回忆起某个歇斯底里症状首次发作的时刻，并重新体验一遍当时的情感，那个症状就会消失。布罗伊尔将该方法命名为精神宣泄法。因此，催眠术逐渐被用来促使病人回忆起某些症状被忘却的起源。它成为一种调查方法，而不是通过暗示对症状进行直接治疗。

弗洛伊德和布罗伊尔希望所有神经官能症症状都可以用这种实际上很简单却要花很大努力的方法治愈。他们在首篇文章《歇斯底里症研究》中写道：

> 我们发现，最初这也令我们感到无比惊讶，当我们成功地将引发症状及产生情感影响的那个事件的记忆重新追回，当病人将整个事件及其后果极尽详细地描述之后，那个歇斯底里症状便立刻、永久地消失了。

以下是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的一句名言：

> 歇斯底里症患者主要经受的是回想的痛苦。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11.6,7）

这些回想是一些特殊类型的回想。首先，它们是有意识的回忆难以触及的。病人只有在被催眠的状态下；或者如同弗洛伊德后来发现的当病人被权威地告知有这样一种记忆存在并可以被追回，在医师的手触压他的额头的刹那，这些记忆便会重现。第二，这些回想毫无例外都是令人痛苦、羞耻或心惊的回想。于是推断一定存在某种精神机制，它倾向于将不愉快的记忆从意识中驱逐，并使它们相对难以触及。弗洛伊德称这种机制为压抑 ；压抑，作为第一种“防范机制”，成为神经官能症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石。弗洛伊德假设，在头脑内部存在一种冲突 ——力图进入意识里、寻求释放的情感（自觉感情）与因厌

恶而拒绝接受或面对它的头脑的另一部分之间的冲突。

弗洛伊德假定，被否认的压抑情感因为得不到直接释放而导致了神经官能症的发生。弗洛伊德将这种心理状态类比为尚未在体表出现的疖子或脓肿，因为没能到达身体表面而无法释放它包含的毒素。这种对神经官能症“外科手术式”的观点对于作为医学家的弗洛伊德一定很有吸引力。它隐含的意思是，那种引发神经官能症、被否认了的情感可以被视作一个异物、一个外来入侵者，它不是病人个性中的一部分，因此应该被切除。

对于歇斯底里症，弗洛伊德断言，被否认的情感转变成了一种身体症状，故称“转换性歇斯底里”。很多情况下，身体症状以象征的形式表达病人的感受。因此，喉咙收缩可能表达的是不能吞咽某种耻辱，心区的疼痛可能意指病人的心灵（在比喻意义上）曾破碎或受伤。在其他一些神经官能症病例里，有很多种症状，如强迫症和恐怖症，都源自那种力图以间接的方式得到释放的被压抑的情感。

最初，弗洛伊德认为被压抑的情感总是与创伤相连，即与一些病人希望忘却的不快事件相关。这种观察对于现今称为“创伤后压力障碍”的疾病来说，仍然是正确的。病人在侥幸逃脱死亡、突发事故或酷刑等恐怖经历后会患上种种神经官能症状。就像那些治疗战后神经官能症的医师反复证明的那样，帮助病人重现这些记忆、回忆当时的细节、释放或发泄伴随这些经历的担忧和恐惧，确实取得了有益的效果。

后来，弗洛伊德将此概念进行扩展，把要么可能是由外界刺激唤起，要么可能是由病人内心自发产生的寻求释放的本能冲动包括在内。在一个较早的病例中，一位女孩发现自己如果不小便几次，就无法离开房间或接待客人。弗洛伊德将这一症状溯源到某一次女孩在剧院，发现自己被一名男性强烈地吸引，经历了生殖部位的强烈刺激，使她想要小便而不得不离开了剧院。从那以后，她害怕再次经历那种强烈的刺激，因此无法控制膀胱的恐惧替代了她对爱欲冲动的恐惧。重现她的症状源起的记忆，并使她认识和接受自己的性欲，治愈了女孩的疾病。

当时弗洛伊德还提出，有一类神经官能症直接是由未获满足或不完全的性欲冲动释放而引起。这种不完全的释放是因为手淫、性交中断或者单纯的性欲节制等导致。弗洛伊德将这些状态称为“实际神经官能症”，源于德语中的*aktuelle*，意为“现实的”。用正常的性活动取代先前的做法就足以治愈这种疾病。

即使在精神分析发展的最初阶段，人们也可识别出一些后来对弗洛伊德产生影响的思想。第一，除了“实际神经官能症”病例之外，过去的情感都是现在问题的起因；第二，这些情感毫无例外地都是令人耻辱、痛苦和恐惧的，因此遭到否认和压抑。弗洛伊德一直认为，心灵生活的主导原则要求机体通过完全释放所有紧张情绪而达到一种平静状态（后来被称作涅槃原则）。其基本假设倾向于否定地看待所有强烈的情感，将其视作必须被消除的烦乱，而不是看作要追寻的快乐。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幸福感是满足了所有需求、消耗了所有激情之后获得的。在这里，没有“对刺激的需求”，没有当人类处于一成不变、鲜有外界信息的环境中或者当在平静的状态下生活太久而感到怠倦时去找寻情感和智力刺激的需求。

弗洛伊德接下来断言，在许多歇斯底里症状中，创伤虽然表面上触发了症状，但是它的影响通常太微小不足以成为决定因素。弗洛伊德宣称，当前的创伤唤醒了更早的创伤记忆，正是当下的创伤与过去的创伤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触发病症的真正原因。在一篇基于1896年在维也纳演讲的早期论文里，弗洛伊德断言：

> 没有任何歇斯底里症状仅仅是由一次真实经历引发，事实上，在每个病例中，被唤醒的对相关过往经历的记忆也是导致症状出现的因素。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111.197）

弗洛伊德随后发表了一个重要言论。在分析了18例歇斯底里症病症之后，他断言：

> 无论我们的分析始于何种病案、何种症状，最后我们肯定会回到性经历方

面。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111.199）

在同一篇论文中，弗洛伊德继续写道：

因此我提出我的观点，即在每一例歇斯底里症的最深处，都有一次或多次未成熟的性经历。这些经历发生在童年的最早期，但是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跨越岁月在脑海中重现。我相信这是一项重大发现，是神经病理学领域中源头性（caput Nili，尼罗河的发源地）发现。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111.203）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杰·布朗（Roger Brown）注意到，这是弗洛伊德为他的病源理论提供数字证据的最后一次尝试。并且即便在此情况下，他也没有论及对照检验。虽然如此，弗洛伊德继续宣称他是一名科学家。

弗洛伊德的发现使得性欲情感成为主要情感，一旦它被压抑，就会成为诱发神经官能症的起因。尽管他承认在歇斯底里症当中还涉及其他情感，例如对难以“下咽”的侮辱的憎恨会导致喉咙收缩，但是性欲而非侵犯性的敌对情绪一直是他多年来的主要关注对象。因此认为精神分析主要与性有关的普遍看法是很有根据的，尽管精神分析事实上涉及到这种普遍看法之外的更多内容。对弗洛伊德来说，性特别适合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中心，因为它不但能产生强大的、通常由于被否认而遭到压抑的情感，而且能弥合身体和心灵间的差异。这是因为性与很多心理活动相关，如思想、幻想、梦，但又显而易见和身体相关，无论是从它的荷尔蒙起因还是最终表现形式来看。弗洛伊德恪守在布吕克的实验室受到的训练，继续希望为神经官能症最终找到物理源头，尽管1897年他已经放弃了将神经官能机制与脑解剖和生理学联系起来的尝试（所谓的“科学心理学计划”）。在1908年4月19日致荣格的信中，他写道：

在性过程中我们有不可或缺的“器官基础”，没有此，一个医生在面对精神生

活时将不知所措。

（《弗洛伊德-荣格信件》，140-141）

弗洛伊德越来越坚信，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主要特征就是缺乏正常的性生活，而性满足是幸福的关键。这暗示说，健康的人可以在反复的、满足的高潮中释放他们的性欲冲动造成的紧张，从而反复体验上文提到的那种没有紧张感的涅槃状态。

弗洛伊德起初曾下结论说，在歇斯底里症中，成人对儿童的引诱造成了婴幼儿时期神经官能症的核心问题——性发育不全。这里通常是指父亲对女儿的引诱，如弗洛伊德在《歇斯底里研究》中描述的卡塔琳娜病例，尽管患者最初是以“舅舅”之名来掩盖“父亲”是引诱者的事实。弗洛伊德意识到，不是所有被引诱过的儿童都会变成神经官能症患者，但是他坚持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保留了对那次创伤经历的有意识的回忆；而那些后来变成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人正是压抑了这种经历。弗洛伊德喜欢概括的倾向使他得出以下结论：他的所有病人在童年时代都经历过性引诱。对于这个结论，某些情况下他的病人愿意承认，但是如同弗洛伊德自己也意识到的那样，或许因为他太过坚信这一点，而将这种观点强加给了病人。

有三个原因促使弗洛伊德后来放弃了引诱理论。第一，尽管成人对儿童的性引诱无疑是发生过的，但是随着他诊断的病案的逐渐增多，他发现这并不是频繁出现。第二，如果成为事实的引诱是促使歇斯底里症状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先兆因素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就得被迫得出结论，他的父亲也应该为做过同样的事而负责，因为他的兄弟姐妹身上也发现了一些歇斯底里症状。第三，在自我分析中，弗洛伊德对性幻想的重要性越来越关注。例如，他承认自己在幼年，当看到母亲裸体时曾对她产生过爱欲。他得出结论说，很多病人都描述过被父母引诱的性幻想，而不是回忆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这是弗洛伊德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像他自己陈述的那样，这一转变引发了如下结论：

神经官能症状并不直接与实际的事件相关，而是与一些幻想有关，就神经官能症而言，心理现实比物理事实更为重要。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 34）

从那以后，精神分析从试图发现一系列导致神经官能症暴发的事件，转向探索病人想象中的世界，尤其是在童年时代曾经出现过的幻想世界。神经官能症的医学模型几乎消失了，尽管弗洛伊德依旧相信病人症状的产生与性紧张相关，是这种紧张遭到抑制，没有得到适当释放的结果。

面对苦心构建的假设瓦解是需要勇气的。弗洛伊德对引诱学说的摒弃，起初被视作是诚实的表现和对真理坚定不移的追求而被广为传颂。J.M.马森（J. M. Masson）是弗洛伊德与弗利斯来往信件的编辑者和翻译者，他在一本书中曾质疑弗洛伊德的诚实。他声称，弗洛伊德有意隐瞒他在儿童性引诱方面的发现，是为了不进一步引起已经被他激怒的精神病学家的义愤。这和我们从与弗洛伊德关系密切的人那里了解到的弗洛伊德的品性不符，所以对马森的指责可以置之不理。不过，近年来精神病学家及其他专家已经意识到，儿童受到的性引诱远比当时认为的要普遍得多；尽管这种引诱并不像弗洛伊德最初假设的那样，一定会引发歇斯底里症状，但是它通常确实会对当事人日后的情感调适造成可怕的后果。

精神分析师们很可能低估了实际生活中性引诱发生的普遍性，他们将病人对真实事件的准确报告处理为幻想记忆。没有人知道儿童时代的性引诱到底有多普遍；但是无疑，公众们对谈论这类事件的容忍度的逐步提高，及使儿童得以私下向家庭以外能够理解他们的成人述说性侵犯的机构的设立，已使很多先前没有得到报告的案例为人知晓。

对病人内心幻想世界的专注已经导致精神分析师们不但忽视了性引诱的严重性，而且忽视了其他影响人们生活的真实事件和情境。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这是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等批评家们对“传统”精神分析提出的批判之一。但是弗洛伊德对幻想的重要性的

认识是精神分析理论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他意识到，被压抑的并不通常是对实际发生过的创伤事件的记忆（尽管这种情况当然可能存在），而是以幻想形式表现出的本能冲动。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构建了他的婴儿性欲和原欲发展理论，及他对梦的解析。

第三章

探索过去

婴儿性欲的发展

弗洛伊德对引诱说的舍弃并没有影响他对神经官能症与性功能障碍密切相关的坚信，也没有动摇他认为神经官能症的病源要追溯到早幼时代这一信念。但是，他没有继续将注意力集中在创伤事件上面，而是转而研究儿童的性欲和情感发展，并指出，成年后出现的神经官能症是由于儿童的性欲发展在身心尚未发展成熟的某个阶段部分遭受阻碍的结果。如他自己陈述的那样：

> 一套理论开始形成。它阐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性欲还停留在、或者被带回到了一种婴儿状态。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VII. 172）

与他提出的心理过程应尽可能以“不可或缺的器官基础”来描述的要求相一致，弗洛伊德以身体部位，而不是以感知、认知、学习、或依附等方式，描述了他的关于婴儿性欲发展阶段的理论。在生命的第一年里，婴儿身体的满足集中在嘴部，这是“口欲期”。大约从1岁到3岁，肛部取而代之。随之而来的是“生殖器期”，在此阶段阴茎和阴蒂成为原欲投入和自慰活动的焦点，尽管幼儿还不能与他人完成生殖器交媾。在最后的“性征期”阶段，个体已经具备与异性之间建立完全满足的性关系的能力，这个阶段要到青春期之后才能到来，甚至在拥有最成熟性格的人身上都能发现原欲发展的早期痕迹。

在弗洛伊德关于婴儿性欲发展的最初陈述中，其重点放在了自体情欲 上面，即婴儿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而不是与他人关系的变化。弗洛伊德认为，幼儿在“口欲期”会短暂地依恋母亲的乳房，但是口欲本能随即使婴儿脱离乳房，转而在吸吮手指和咀嚼等活动中获得满足。尽管弗洛伊德继续认为创伤事件是形成障碍的一个原因，但他将婴儿的发展描绘为一种内在过程，仅与母亲或保姆之间的交流有细微的关联。弗洛伊德直到晚年才开始认识到婴儿与母亲之间关系的重要

性。在此之前，母亲的角色主要被认为是满足婴儿需求，缓解令其感到危险的紧张情绪。母亲没有被视作除了与婴儿交流情感、缓解其紧张情绪之外还能提供激励和学习机会的人。

弗洛伊德将婴儿性欲描述为“多形性反常”，即松散地由一些子本能组成，它们最初趋于独立存在，但后来合并成为成年人的性欲。这些子本能包括性虐待和受虐待冲动、同性恋兴趣、裸露癖和窥淫欲及恋物症。所有这些子本能在正常人身上都能找到痕迹，但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特别突出。弗洛伊德当时认为，神经官能症状是早年某些反常的性欲 冲动遭受压抑的结果。由于这种早期的压抑，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性欲一直处于未成熟状态。当一个或另一个子本能被夸大但未被压抑时，该人即会成为性变态，即他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反常性倾向。因此，神经官能症患者和性变态的心理和情感都是在性欲发展的早期就已固结，只是他们应对固结的方式不同而已。正是基于这个观察，弗洛伊德作出了以下著名的论断：

> 神经官能症，可以说是性变态的底片。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VII. 165）

19世纪末，很多研究者都对人类性活动中的古怪行为感兴趣；但是弗洛伊德在说服医生和公众相信性变态是一种精神性欲发展的失调，而不是“遗传污点”或“堕落”的表现方面最具影响力。他尤其强调男人和女人都具有的双性特征。

在有些人身上，早期原欲发展的痕迹一直如此之深，以致于人们习惯称之为“口欲”或“肛欲”性格。口欲性格的特质主要由弗洛伊德的弟子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进行了总结研究，而弗洛伊德本人的研究则集中在肛欲性格上，就像人们从第一章中对他的性格介绍里可以预测到的那样。没有人对生殖器欲性格特点特别关注，但是里克罗夫特（Rycroft）在他的精神分析学字典里，将生殖器欲性格解释为：

这种性格的人将性行为看成性能力的展示，这与“性征期”性格相反，后者将性行为看作是一种关系中的参与。

在多种口欲性格特征中，被动、依赖和对自我能力的怀疑常联系在一起。这些特质通常在反复发作性的忧郁症患者身上出现。一些体现这些性格特征的人也具有其他“口欲”习惯，例如吸吮手指、暴食、过量吸烟、酗酒。这些行为模式被精神分析师们认为是对早期被迫脱离母亲乳房的失落感的一种补偿。在性变态身上，对舔阴 和吮吸 阴茎，甚至对亲吻的特殊偏好，都可能是持续口欲型精神病理的证据。但是还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脱离乳房与后来的口欲行为或特征相关。最好是将口欲行为看作是一项有价值的临床观察病案，对它的起因不作特别的结论。

“肛欲”性格也是如此。对秩序和整洁的格外偏好被认为是对抗与粪便相连的肮脏与混乱的“反向形成机制”。固执被解释为源于对父母坚持排泄只能在某个特定环境下进行的要求的一种反抗；吝啬被解释为与婴儿渴望体会尽可能长地忍住粪便所带来的快感相关。如弗洛伊德从神话、童话和公众演讲中所发现的，金钱和粪便经常被用在诸如“肮脏的钱财”、“抠门儿”等短语中。在性变态而非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很容易看到他们对排泄和肛门的偏好，例如在萨德（Sade）的《索多玛120天》中描述的那样。

在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和“肛欲”性格特质的形成是否与严厉甚至古怪的如厕训练相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前后一致的因果联系尚未找到。但是弗洛伊德描述的相互关联的特质，确实在现实中时常同时出现。尽管弗洛伊德对原因的解释很少得到支持，他的临床观察和描述是十分准确的。

俄狄浦斯情结

我们现在来谈一下令人困惑的俄狄浦斯情结和儿童失忆问题，以

及所谓的潜伏期。潜伏期被认为是继俄狄浦斯阶段后出现的。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理论的形成源自他的自我分析。在1897年10月15日致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写道：

> 进行自我分析是我目前最为重要的事，如果它能实现目标的话，将是我最有价值的财富……但这绝非易事。对自己做到完全诚实是一项很好的训练。有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想法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我发现，我爱我的母亲而嫉妒我的父亲，现在我把这件事情视作儿童时代早期的一个普遍现象，尽管对患上歇斯底里症的儿童来说它发生得并不早。（类似于妄想症中对出身[家庭韵事]的杜撰——英雄，宗教的创立者。）如果情况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俄狄浦斯不顾理性对命定之事的所有反对而展现出的攫取的力量；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后来的“命运的戏剧”是注定要惨败的。
>
> （《弗洛伊德-弗利斯信件》，271-272）

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当他在大约四五岁进入“生殖器期”的时候，作为小男孩的他对母亲产生了性欲兴趣，他希望能独自拥有她，因此对他的父亲心怀敌视。然而，这种敌视激起了害怕父亲报复的恐惧，而报复的方式可能是阉割。“阉割情结”的出现部分上是因目睹过他手淫的成年人曾对他进行过阉割威胁而引起；部分上是由小男孩自己的假想而引起，他推断女孩没有阴茎就是因为被阉割了的缘故。迫于失掉他身体上最宝贵的部位的威胁，小男孩无意识地放弃了与他母亲性结合的愿望，认同了具有潜在攻击性的父亲，最终将注意力转向其他女性以获得性满足。

弗洛伊德关于女性俄狄浦斯情结的研究结果并不那么清晰，这与他一生中一直认为女人是个谜的观点相一致。然而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尽管小女孩首先和她的母亲产生感情，但是当她发现自己没有阴茎，并因此低人一等的时候，她将这个缺陷归咎于她的母亲，从而对她产生幻灭情绪。这使她将爱的对象转向父亲，开始幻想他能使她受孕。弗洛伊德认为，受孕后所生的孩子会弥补女孩因缺少阴茎而感到的缺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女孩不具备的器官的替代。当女孩逐渐意识到，其他男人可以成为潜在的、使她受孕、生育的对象，因

此克服了她挥之不去的自惭形秽感后，上述情感发展阶段宣告结束。

弗洛伊德将俄狄浦斯情结视为任何人如果希望成年生活稳定和幸福所必需经历的重要情感阶段，这种大胆的观点似乎很不成熟。我们已经看到，弗洛伊德一如既往地力图将心理和情感问题归于生理原因。如果只按字面意义去理解，那么他宣称所有小男孩都惧怕被父亲阉割这一论断是可笑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解释，肯定地讲，男孩子非常在意树立自己男人的身份，他会感到来自父亲的竞争，在别人轻蔑地谈论他的身材、软弱、无能和缺乏经验时容易感到屈辱和威胁，对这样的解释大多数人是会接受的。

而且，成年男子和小男孩一样，觉得他们的生殖器是他们生理构造中最脆弱的部分。弗洛伊德关于阉割焦虑在成年男子身上表现更强，而失去爱的恐惧在女性身上体现更明显的论断是有科学依据的。女性虽然恐惧阴茎插入，但是因为她们的性器官相对隐蔽，所以她们并不十分害怕受到伤害。男性的生殖器不但没有保护，而且对疼痛极为敏感，世界上的迫害者们一直深谙于男性的这个弱点。对接受儿科门诊治疗的孩子们的问询显示，只有极少数的孩子认为女孩本来是有阴茎的，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它。阉割焦虑已经成为日常话题的一部分。那些熟悉精神分析术语的人经常把它当作一种日常生活中简略的表达方式，因此，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开车或继续他的工作时，他会说，“我感觉被阉了。”弗洛伊德坚持使用这个词的字面意义而不是它的比喻意义，这导致了对他的理论的广泛误解。

同样的情况适用于“阴茎妒羡”这个概念。在弗洛伊德时代，男性的主导地位比现在更为明显。因为男性掌握大部分权力，很多女性认为自己地位低、不被认可、受轻视、软弱。生孩子是使女性感到与男人平等或胜于男人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用心理学术语而非解剖学用语表达弗洛伊德的观点的话，那么很少会有人质疑它。正如荣格所说，“毕竟，阴茎只是一个生殖象征而已”。

在提出婴儿性欲观念和俄狄浦斯情结时，弗洛伊德一直强调这样一个概念，即无论从情感、性及其他方面，儿童都是成年人的原型。在弗洛伊德写下这些理论的时候，还没有动物学家对类似人类的灵长

类动物做过相关实验，后来实验证明婴儿期与外界隔离状态的延长会削弱成年动物交配或进行正常社交活动的能力。今天，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儿童与父亲或母亲的亲密关系，包括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很可能影响他成年后与同龄人形成温暖、友爱的关系的能力。我们能够这样设想主要归功于弗洛伊德，尽管对他关于童年的理论和看法我们现在或许并不是全都认同。

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我们可以辩驳说，这是一个非常西方式的观点，尤其适合“核心”小家庭。那么在一夫多妻的大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是否也同样会有弗洛伊德从他的病人身上发现的那种嫉妒、占有和恐惧心理呢？我们无从知晓，但是轶事证据表明情况正好相反。一位尼日利亚分析师告诉我，他在训练分析过程中，花了一年多时间才使他的分析师了解那种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全然不同的情感氛围。

我们已经看到，至少在弗洛伊德思想形成的早期阶段，他更关注儿童与父亲而非与母亲的关系。而且，父亲总是被刻画成独断专行和严厉的，禁令和威胁总出自于他，他也是后来被称为“超我”的产生根源。弗洛伊德认为男性在孩提时会经历一个与父亲竞争的阶段。现代研究支持这一论点，但是研究结果暗示，男孩子后来与父亲形成的认同并不是“对攻击者的认同”，而是因为父亲做出了友好和充满爱意的举动。正如菲舍尔（Fisher）与格林伯格（Greenburg）所说：

> 男孩子似乎放弃了与父亲的激烈竞争，因为父亲传达了友好、正面的信息邀请他加入，而不是与之争斗……父亲邀请儿子走近他，形成同盟，接纳他，并接受他的价值观（p.222）。

婴儿失忆

大多数人很少记得婴幼时期的事。问询结果显示，人的“最初记忆”始于3.2岁。弗洛伊德将婴儿失忆归因于压抑，认为每个人都宁愿将最早的性冲动和性经历放逐到潜意识之中。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尤其不可能出现在将儿童之间的性游戏视为娱乐而不是恐惧的文化里。那么还有更可能的原因。研究表明，记忆力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记忆、保持记忆和回忆的能力在语言能力获得之前都是很弱的。例如，没有人知道三四岁的儿童可以回忆起多少更小时候的事，对那时的记忆都会消失。甚至对成年人而言，他们对近期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是短暂的，除非通过重温而使之鲜活起来。没有语言能力，重温便不可能发生；因此，在语言能力充分发展之前，记忆不可能被很好地留存不足为怪。

潜伏期

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结束之后会有一个“潜伏期”，大约从5岁左右一直持续到青春期。在此期间，性冲动和性行为尽管没有被摈除，已表现得并不明显。但是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个推想。在性宽容的文化里，性游戏在整个童年中期都是常见的；甚至在不赞成性游戏，性游戏因而被遮掩的文化里，也有证据表明，手淫、异性间及同性间的性游戏都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多。

然而，弗洛伊德关于人类经过两个快速成长和发育阶段的理解是正确的。从出生到5岁，这一阶段人类成长速度很快；然后是成长曲线上升相对趋缓的阶段；之后是青春期到来之前的又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人类的适应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的学习和传承，要使学习和传承有效进行，孩童时代的依赖期就要延长。大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而出现了介于两个快速发展阶段之间的一个发展相对缓慢的潜伏阶段。人类很多的问题都可以合理地归结到未成熟阶段及对父母依赖期的延长。弗洛伊德认为孩童将异性父母看成了第一个性对象，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些成年人在性方面遇到的困难。一个没有脱离对父母情感依赖的男人或女人很可能将潜在的性伴侣在一定程度上视为父母。这在性及其他方面将使彼此关系复杂化。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对异性父母的俄狄浦斯似的依附，（至少对男性来说）会伴之以阉割

威胁。继续主要或者部分地将女性视为母亲的男人，会认为女性既具有性吸引力又是潜在的危险。这种理解很可能带来一系列的性障碍，包括彻底疏远女性、部分或完全的性无能，或者一定要借助带性虐待性质的仪式或物件的慰藉，才可能性交。尽管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在很多方面都有待考证，但是它总的框架在解释很多之前无法解释的性困难和异常性行为方面，是非常有力的。

弗洛伊德的错误在于，他将性心理发展置于如此核心的地位，以至于其他所有形式的社会和情感发展都被认为源出于此。在他的关于列奥纳多的论文中，弗洛伊德甚至将好奇心和求知欲都归结于出自性欲。他一定已意识到，很多动物都表现出明显与适应环境相关的探索行为。这样的行为更类似于人类对知识的探求。但是弗洛伊德是如此坚持性欲是原动力，认为升华了的婴儿性欲研究 为人类继续追求知识提供了动力。今天，大多数研究儿童发展的学者只将性欲看作是链条上的一环，而不是根本原因。人际关系困难也许和早年经历的、与性毫无关系的不安全感有关，但是也同样可能导致日后的性问题。同样，性欲发展中经历的困难也可能导致后来出现的社交问题。

第四章

自由联想、梦与移情

自由联想

弗洛伊德在发展其神经官能症理论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他的治疗技术。从1892年开始，他逐渐放弃了催眠术，而偏好用自由联想进行诊疗。病人依旧被要求躺在躺椅上，弗洛伊德坐在病人视线之外的躺椅一头，但是他已不再试图通过催眠或者将手按在病人的额头之上的方式使其追回记忆。相反，他要求病人不受限制地讲出任何自发的想法或幻想。这种技术上的变化不仅对精神分析，而且对大多数之后出现的精神疗法及其他情况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助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自由联想的使用迫使病人采取主动，使精神分析师采取一种比人们传统上认为医生应持的态度被动得多的态度。催眠法治疗主要依赖病人的服从和医生的权威。自由联想则要求病人保持更多的自主权。因此，精神分析成为一种帮助病人自助的手段。病人需要将精神分析当作一种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手段，而不是向精神分析师寻求直接意见、正面建议或具体的指示。有了这种新的领悟后，病人被期望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梦

如果一位躺在躺椅上的病人进行自由联想，她很可能不时会告诉精神分析师她的梦境，因为梦通常是令人印象深刻或不安的精神现象。尽管在弗洛伊德研究梦之前已有很多关于梦这一主题的文献，但是弗洛伊德堪称是综合各种说法，使梦成为了一个合理的研究对象，并创立了关于梦的理论及解析方法的著名先行者。

《梦的解析》于1899年11月首次出版。1895年7月，在位于维也纳郊外的美景宫逗留期间，弗洛伊德做了著名的“伊尔玛注射之梦”。这个梦的细节（后来引发了大量研究）对我们并不重要。弗洛伊德对这个梦的解释是，它试图免除他曾误诊某病人的责任，因而代表了一

种愿望的实现。1900年6月12日，当他再度在那里停留时，他在给弗利斯的信中写道：

你觉得会不会有一天，人们会从这座房子的一块大理石碑上读到这样一段话？

在这里，1895年7月24日，

梦的秘密

展现在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眼前。

（《弗洛伊德-弗利斯信件》，417）

弗洛伊德的幻想在1977年5月6日成为现实，一块纪念匾额被立在那里。

1931年，弗洛伊德在英文第三版《梦的解析》的序言里写道：

这本书在1900年首版时对心理学所作的震惊世界的新贡献在这一版里基本保留、未作改变。即使在今天看来，它仍包含着我幸运地获得的所有发现中最具价值的发现。这样的顿悟一生只可能幸运地获得一次。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IV, XXX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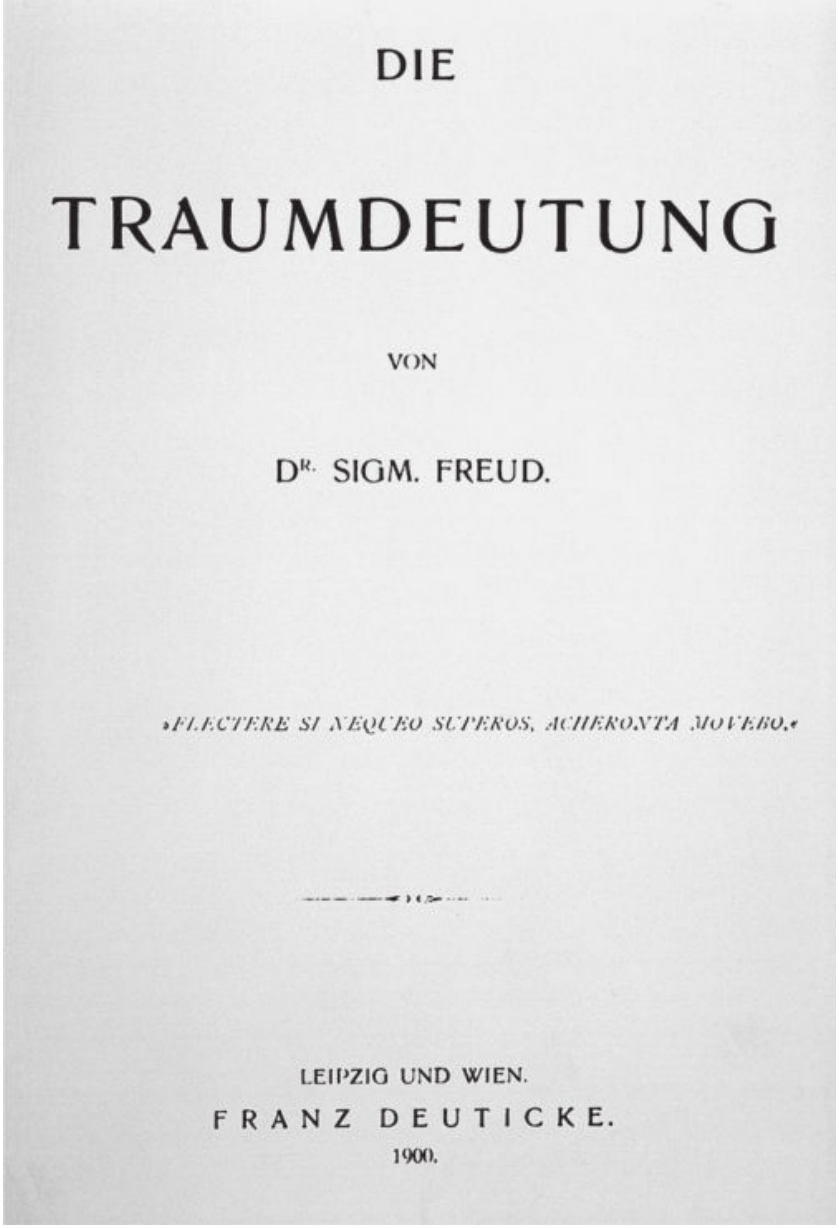

DIE

TRAUMDEUTUNG

VON

DR. SIGM. FREUD.

»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

LEIPZIG UND WIEN.

FRANZ DEUTICKE.

1900.

图9　《梦的解析》第一版的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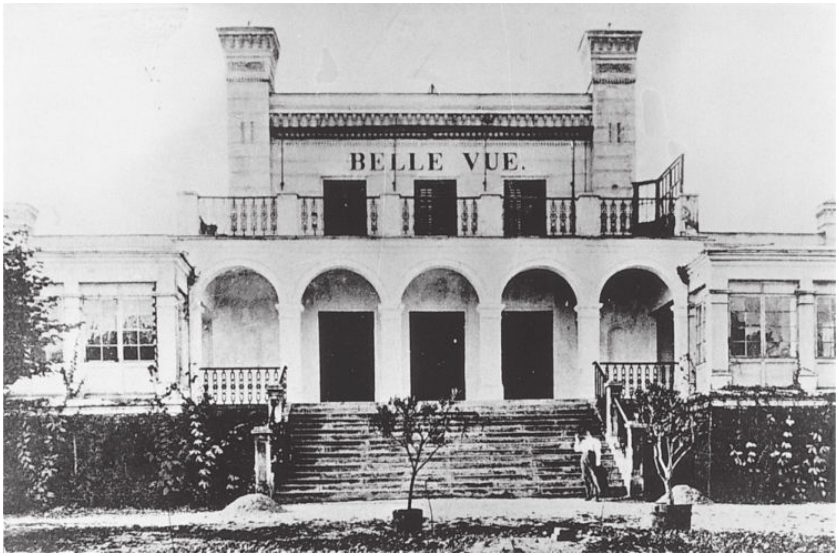

图10　1895年，美景宫。

有创造力的革新者往往都不是他们著作的最好评判者。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尽管依旧有影响力，但并没有像他相信的那样，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不用修改。他的最终理论酝酿了很长时间，在精神分析诞生很多年以前，当弗洛伊德还是医学院学生的时候，他就已对梦产生了兴趣。我们在此无需记录这个理论经历的各个阶段，仅需陈述它的最终形式。

弗洛伊德断言，除极少数情况外，梦都是被压抑愿望的一种经掩饰的、虚幻的实现。他还断言，梦不仅代表现在的愿望，而且还总是表达可以追溯到童年早期的愿望。这个理论显然源自或类似第二章提到的，弗洛伊德关于歇斯底里症的早期论述。在对歇斯底里症的论述中，弗洛伊德推想，创伤事件之所以触发了现在的症状，只是因为它激起了儿时的创伤记忆。弗洛伊德将梦看作类似于神经官能症状。因为正常人也做梦，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神经官能症患者和正常人是不能被严格区分的。这样，他为把精神分析构建成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心理理论作了铺垫。

这个独创性的理论使他更坚信几乎所有的神经官能症状都起源于童年早期。他相信，梦为被压抑了的婴儿性欲提供了间接表达，这种表达如果不加掩饰，将会使梦者非常不安以至于从梦中惊醒。

> 我们关于梦的理论认为，婴儿时期的愿望是形成梦的不可或缺的动力。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V. 589）

这些愿望是不被接受的和潜在使人不安的，因此它们被审查和掩饰。浮现出来的梦境，就像神经官能症状一样，是潜意识的压抑和直接表达之间的一种妥协。经常出现在梦中的前一日发生的事件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它们与被压抑的婴儿冲动产生了共鸣从而将其激活。

弗洛伊德描述了梦被改变得不那么扰人的精神过程，或“梦工作”。这个过程包括凝缩，即不同想法和形象融合在一起；转移，即一个潜在令人不安的形象或想法被相关的，但不是那么令人烦扰的事物所替代；表现，即思想被转化为视觉形象；象征，即某种中性的事物代表或者暗指性生活的某个方面，或者与之相关的、梦者不愿辨认的一些人物。弗洛伊德还提到了次级修改过程，即梦者力图通过将梦变成一个连贯的故事从而使它可以被理解，而这样做可能导致梦的进一步扭曲。

这个观点意味着，梦者回忆起来的梦，已经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掩饰过程，而这个过程掩藏了梦的真实含义。弗洛伊德提出了“显梦内容”概念，即梦者回忆起来的东西。与之相对的是“隐梦内容”，即被隐藏的、梦的真实含义，此内容只有在梦者与梦中形象的关系经由精神分析的审察和解释之后才能确定。

弗洛伊德的梦理论同时反映了他对目标的专一和他的概括倾向。他认定婴儿性欲愿望是神经官能症的根源，他确信他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是原始的、非理性的精神现象，它忽视逻辑、秩序和有意识接受的时间及空间标准。但是，

梦的解析是通向了解心灵潜意识活动的捷径。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V. 608）

因此，从根本上说，梦一定是与婴儿性欲这一精神分析理论的“不可或缺的器官性基础”相关的，尽管初看起来很多梦似乎与其他事情有关。

弗洛伊德解析梦的方法是极富创意的；但是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有些类型的梦并不适合他的理论。首先，有些梦不需要解析，例如饥饿的人梦见食物，口渴的人梦见喝水。这些被称作“便利性”的梦当然表达的是愿望，但是它们只与梦者的现状，而不是与他的婴儿时代相关。

第二，有些“创伤性”的梦不加掩饰地重复某些突如其来的震惊事件，如车祸、爆炸，或者无缘无故受到的攻击，如强奸或其他类型的身体攻击。弗洛伊德最终承认，这样的梦不能被视作愿望的实现。他相信，当创伤事件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人的心灵不及作好应对焦虑的准备以御防打击时，人才会做这样的梦。他写道：

这些梦努力通过产生焦虑来回顾性地控制这些刺激，而缺乏这种焦虑是导致神经官能症的原因。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VIII, 32）

尽管在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谈到了“复旧的强迫性”，但他并没有谈及有些遭受创伤的人会有意识地表现出和“创伤梦”中一样的行为：他们努力通过向任何可能的听众重述他们的创伤事件，从而接受或克服他们所经受的震惊。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过后的那类“轰炸故事”往往是冗长乏味的。

第三，有时等同于恶梦的焦虑梦也似乎与弗洛伊德的愿望实现理论相矛盾。弗洛伊德从两个方面解释了这类梦。首先，焦虑可能只是与“显梦内容”相关，而精神分析肯定会显示愿望的实现包含在“隐梦内容”中；或者可能是由于压抑和梦工作部分地失败，而使与被禁止的

冲动相关的焦虑得以显露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梦者通常会醒来，因为这样的梦没有履行它们作为睡眠护卫者的职能。应该加以说明的是，当弗洛伊德阐明他的梦理论的时候，他认为焦虑不过是没有得到释放的性欲能量的表现。后来，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书中，他逐渐将焦虑视为显示可能威胁到自我、使个体感到无助的危险的信号。例如，小孩可能感到不能释放或无法应对内心产生的侵犯或性欲冲动。或者说他可能因为失去了给予他爱和保护的父母，而无缘无故地感到受到威胁。弗洛伊德并没有修改他的梦理论以将他对焦虑的新解释包括进去。

第四，无论男女，都经常做那种达到性高潮的性梦。这类梦里的意象要么可能是象征性的，要么可能是不加掩饰的。弗洛伊德学派的人试图对此作出解释，他们断言那些公开显示出来的性愿望是梦者能够接受的愿望，而以象征形式出现的愿望则是不被梦者接受的愿望。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既包含公开表露的性冲动但又使梦者痛苦的梦。认为梦总是隐藏被压抑的愿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弗洛伊德固执地认为，被压抑了的婴儿愿望导致了梦的产生，但是大多数他提供的临床例证却关乎成人生活中的情感：竞争、不当的性欲，或者如他的“伊尔玛”梦中反映出的希望免被谴责的愿望。今天，只有很少的精神分析师支持弗洛伊德梦理论的原型。尽管有些梦与没有实现的或阴暗的愿望有关，但不是所有的梦都是这样。而且，如果梦都是以间接的方式越过潜意识的控制，表达被压抑的婴儿冲动的话，那么人们应该期待，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中做梦的时间比例应该增加。但事实上，脑电图研究表明，婴儿做梦的时间要多于成人；这个信息弗洛伊德当时是不知道的。尽管梦不是用日常语言来表达的，但是这并不说明它们一定隐藏着不可接受的内容。诗歌是一种以象征和比喻为主要特色的人类语言。诗经常是难以理解，但是我们通常并不因此认为它是在故意闪烁其词。

象征可以解释为“代表某种东西，或者有代表性功能的任何事物”。一个普通的例子是国旗。“弗洛伊德的象征物”被人们通常理解为出现在梦里或幻想中代表生殖器官的物体。因此，中空的物体，如洞

穴或手提包，可能象征着女性生殖器；而剑、雨伞，或铅笔被认为是暗指阴茎。如里克罗夫特在他文中指出的：“弗洛伊德的象征论是个谜吗？”弗洛伊德最初并不太重视性象征（符号），只是后来受威廉·施特克的影响才对此关注起来。意识到象征的重要性以后，弗洛伊德以通常的简化还原方式这样描述道：

> 梦中绝大多数的象征都是性象征。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V, 153）

然后他列出大量上述类型的物品。换言之，弗洛伊德认为象征的主要功能就是隐藏性欲，或者使性欲从解剖学角度变得更可接受。就像我们将在第八章论及弗洛伊德对艺术和文学的观点时会看到的那样，弗洛伊德对幻想抱以同样否定的看法，他认为幻想根本就是一种逃避。

与弗洛伊德的看法不同，如果我们将内心想象世界的发展和象征能力的发展看作是并肩发展的适应能力的话（人类的这种适应能力尤其发达），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象征可以发挥填补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空白、赋予外界事物以情感意义的正面作用。温尼克特（Winnicott）在《从儿科学到精神分析》（1975）一书中的一篇1954年撰写的论文里描述的“过渡性物体”就是典型例子。年纪很小的孩童对一些非生命物体产生强大的依附心理，不愿与之分离，例如，玩具熊或毯子的一角。这些物品原本象征着母亲。但是，因为这些象征性物品是真实存在的，而不能仅视其为想象而不认真对待。赋予这些物品重要意义的象征过程也不能被视为逃避主义，因为一个过渡性物体充当了真正的慰藉者。如同我们在随后的章节中即将看到的那样，弗洛伊德将精神活动严格地划分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或“次级过程”与“初级过程”，这种划分产生了无穷的问题。

图11　1914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伯格街19号的寓所。由其子拍摄。

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似乎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因为压抑是将无法接受的事物驱逐到潜意识中的一种机制，那么所有潜意识的东西都

是负面的。弗洛伊德在1915年发表的《论潜意识》一文中写道，“被压抑的没有涵盖所有潜意识里存在的东西”（《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V. 166），但是在他最初关于梦的理论里面却几乎没有谈及这一点。有很多种原因可以使我们认为潜意识中出现的事物并非只是，甚至并非主要是压抑的结果。有些梦明显具有创意或者是提供了问题的解决方案。现代理论家倾向于从信息加工的角度看待梦；梦也许是将当日发生的事情与存储在长期记忆中类似的经历相比较的结果。但是，尽管弗洛伊德的梦理论存在缺陷，我们需要承认，是弗洛伊德使梦重新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移情

弗洛伊德采用自由联想方法的另一重要结果是他发现了移情。移情最初被定义为一种病人将对他生活中的其他人物，尤其是父母的态度和想法赋予分析师的过程。现在这个词的含义得到了扩展，包含病人对分析师的所有情感态度。如果鼓励病人去毫无忌讳地讲出她[1]能想到的任何事情，那么她不仅会讲她的神经官能症状和儿时经历，而且还会讲她的希望与恐惧，成功与失败，及她现在的人际关系，包括与分析师之间存在或缺少的关系。

作为一名科学家和医师，弗洛伊德最初的希望是找到神经官能症的病源及根治它们的治疗方法。如果病人能够规避压抑，回忆起她婴儿时代的成长变迁，那么那些阻止本能冲动释放的障碍就可以被克服，那些由于压抑和释放之间的妥协而产生的症状就会消失。根据这种观点，神经官能症的治疗被比作身体疾病的治疗。就好像结核菌可能被视作肺结核的病因，应该用一种严格的疗法将其消除一样，神经官能症是由被压抑了的婴儿期冲动引起，因而要通过回忆和消除那些冲动来治愈，从而克服那些阻碍病人性成熟的障碍。精神分析因此被看作是一种如同其他医疗技术一样可以被学习的技术。精神分析师可以扮演一名技术高超的医师的传统角色：慈爱、体贴，但本质上是客

观、超然的。

这当然是弗洛伊德起初试图采用的模式，一种医患之间职业的、客观的，而非私人的关系，尽管个人因素，如感激会在有限范围内存在。弗洛伊德将自己比作登山向导。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弗洛伊德是一个特别超然的人，至少被他的一个分析对象描述为“令人惊异地客观”。当弗洛伊德放弃了催眠术和额头按压，转而青睐自由联想之后，严格意义上讲他已经没有必要让病人仰卧在躺椅上了。但是弗洛伊德保留了躺椅，而且他继续坐在病人的视线之外，这样做部分是为了方便病人自由联想，而部分原因，如他承认的那样，是他不愿意一天当中被病人盯视数小时。他坚持不公开姓名和拒绝回答关于自己的问题可能与他的个性有关。从第一章中我们得知，弗洛伊德极不愿意透露他自己的任何事情。但是他的这种不情愿结果证明是一种唤起病人幻想的有力手段，如果弗洛伊德采取的是一种更加主动的态度，那么可能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效果。医师的客观超然仍然是当代精神疗法的重要方面。正是弗洛伊德的这种超脱和拒绝与病人进行私交，促成了移情现象的出现并使这些现象明晰起来。

当弗洛伊德发现他已成为病人很重要的情感依托时，他的首先反应是负面的，尽管他很快意识到移情是精神分析过程中至关重要、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弗洛伊德最初将移情视作对精神分析师的一种爱欲依附，事实上也可能如此。然而，无论这有多么不妥，弗洛伊德仍认为，它是克服病人抵抗情绪的有效途径。后来，弗洛伊德逐渐将移情视作人为诱发的神经官能症，病人再现先前对父母的所有态度。弗洛伊德力图通过解析将这种重复再现转为回想，断言这些记忆是属于过去的以减缓病人现在情感上的紧张。

直到1910年6月5日，弗洛伊德依旧对移情表示反感，尽管他承认移情的重要性。在致费斯特（Pfister）的信中，他写道：

> 说起移情，它简直是祸根。病症里那些难以处理的、强烈的冲动甚至通过精神分析都无法彻底消除，它们使我放弃了间接建议和催眠治疗。它们只能被抑制，难以抑制的部分则出现在移情里。这部分会占很大比重。

我们能够理解弗洛伊德的感受。他希望病人只将他视作一名熟练的医师，能通过医术揭示疾病的根源，然后帮他们消除神经官能症状。但相反，病人将他视作理想的情人、父亲或者救世主。他们需要的不是他的科学知识，而是他的爱。

当然，正是因为弗洛伊德本质上是一个客观而超然的探索者，所以他将病人对他的情感冲动理解为一种病人过去情感的完全再现，而低估了病人或许在此时此地对他抱以真实情感的可能性。

> 也就是说，病人对医师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爱意（通常混杂着敌意），这种爱意并非建立在他们之间真实的情感关系的基础上，如每一个细节所示，它只能被追溯到已经成为病人潜意识的一部分的过去拥有的想望和幻想。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 51）

事实上，不管病人对精神分析师的看法是如何受到过去经历的影响，他们对精神分析师产生真心的敬重是非常自然的。很多寻求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从未从其他人那里感受到精神分析师在进行精神分析时所给予他们的那种长时间的关注。生活中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找到这样一个能专注聆听数小时的听众。很多病人感受到，他前所未有的情感被唤醒了，而不是对过去幻想的重复。大部分当代精神分析师认为，与其说神经官能症是一种被禁制或未发育成熟的性欲，不如说它是一种因无法获得平等、满意的人际关系而导致的更大失败。因此，对移情的分析取决于分析师对病人当下对他的情感的体察和评论：是害怕？顺从？进攻？还是竞争？病人表现出这样的态度是有历史渊源的，因此需要探求；但是重点在于，通过理解病人对分析师的态度是如何被扭曲的从而去理解病人对他人的态度是如何被扭曲的。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则要求精神分析师不仅要关心病人童年早期的事件，而且要承认在当下病患之间存在一种真实的情感关系。

很快弗洛伊德就意识到，精神分析师没有、也不可能成为那种超然的旁观者，仿佛病人是化学溶液一般而不受其影响。在1910年，弗

洛伊德写道：

> 其他的技术创新只关乎医师本身。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在医师心中，由于受病人对他潜意识情感的影响而产生的“反移情”，我们倾向于坚持，医师应该意识到他心中反移情的存在，并战胜它。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 144-145）

弗洛伊德最初希望这可通过类似他自己所做的那种自我分析来实现。后来他承认，自我分析应该被他人所做的训练分析取代。事实上，荣格是早期精神分析师中第一个坚持分析师自己一定要先接受分析的人。精神分析师必须通过自省来监控自己的情感反应，因为他对病人话语的主观反应是在理解病人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这与科学家应具有的思维定式大相径庭。科学家决不容许个人情感影响任何正在进行的实验。尽管精神分析师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客观地看待病人，他只有在使用自己的主观判断时才能理解病人。正如我们从弗洛伊德作为一名分析师的表现中看到的，他目标中的那种完全超然的境界从未实现过。而且完全的超然会切断他的信息来源，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的是人而不是外部世界，那么我们需要这些信息。尽管弗洛伊德承认移情和反移情的存在，但是至死他都坚持认为他是一名科学家。我们将他的精神分析事业与历史学家的工作相比可能更为合适。历史学家也试图重建过去，但是没有人指望一个完全客观的关于过去的图景会被构建出来，即使能够构建出，这样的历史也是难以理解的。历史学家对过去以及历史缔造者的动机的理解注定受他自身的经历和他对人类的理解能力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和精神分析都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原因。

注释

〔1〕 本段及下一段的“她”应为“他”，疑为英文作者之误——译注。

第五章

自我、超我与本我

虽然弗洛伊德通常拒绝根据他人的建议修改其观点，但是他自己却不断地进行着修正，他毕生都保持着创新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半期及20世纪20年代早期，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理论作了大量增补和修订。其中最重要的修订涉及自恋、心理机制结构以及对性欲冲动和对侵犯性冲动的重要性的认可。

自恋

这个词最初用来形容一种爱上自己而非他人的性变态。后来扩展为指任何形式的自恋。因为自尊对精神健康是必要的，一定程度上的自恋被认为是正常的。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将原欲指向两个方向：朝向自己（自我情欲）和朝向他人（对象情欲）。当一个人恋爱时，他的大部分情欲都投给了他所爱的人。当一个人无论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患病后，他都变得更加沉湎于自我的世界，与他人进行情感交流的能力变得相对较弱。自恋的极端形式表现为精神分裂症，病人认为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指向他自己；在癫狂的状态下病人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在忧郁状态下表现为过分担忧地一味关注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而不考虑任何其他事情。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情感发展的自恋阶段，或称初级自恋，在这个阶段只会对自己有原欲投入，而对对象产生性欲要在这个阶段之后。他将此阶段描述为性欲本能获得了自体情欲的满足。因此，精神或身体疾病的产生可以看作是回归婴儿成长的早期阶段的结果。

至此，弗洛伊德已经断言有两种本能：与自我相关的自我保存本能和与其他对象相关的性欲本能。于是他下结论说，自我保存和自恋实际上是一回事，关键是对自我的性欲程度与对其他对象的性欲程度相对不同。

正如厄恩斯特·约内斯在他撰写的弗洛伊德传记第二卷中评论的那样，弗洛伊德的文章《论自恋：导论》（《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

版》，XIV. 73-102）正好对那些指责弗洛伊德将任何事情都归于性的批评家有利。最初，弗洛伊德认为自我保存本能与性本能不同，而且可能与之发生冲突。通过强调对他人的爱只是转向外界的自恋而已，弗洛伊德似乎在表明，性欲冲动实际上是精神能量的唯一来源。这种观点很快就被修正了。

弗洛伊德本质上是个二元论者，他习惯性地将精神现象解释为两个对立面之间的交互或冲突。他可能是最先意识到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是具有强迫性个性的人的特征，这类个性的人对与之相关的人显然表现出“矛盾”心理，他们通常很难作出决定，因为他们不能调和两种对立的思考。爱和恨是人与人之间所有密切关系中可以明确区分的两种对立关系；当这种紧密关系一旦破裂，爱通常转变为恨。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恨与自我保存的努力紧密相联。他继续陈述道：

> 恨，在与对象的关系里，是先于爱的。它源于有自恋性质的自我对外界涌入的刺激所采取的原始批判。作为抗拒由对象引起的不快的一种表达，它总是与自我保存本能保持着密切关系；因此性欲和自我本能会容易发展成对立面，在爱恨之间往复。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V. 139）

“外界涌入刺激”的说法可能显得含混不清，除非我们在此重温弗洛伊德的基本思想之一，即有机体总是在寻求除掉令其不安的刺激，无论它们是源自外界还是源自内心本能的紧张。第二章谈到过“有机体希望通过释放所有紧张来达到一种平静的需求”。弗洛伊德继续谈到，

> 神经系统是这样一种机制，其功能可以是除掉感受到的刺激，或将它们降至最低限度，或者，如果可行的话，保持自身处于不受任何刺激的状态。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V, 120）

弗洛伊德最初的歇斯底里症和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研究需要将心灵划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部分。这个简单的模式假定：潜意识即使不完

全是，也主要源自压抑，因此它包括冲动、思想及感情，这些对于有意识的自我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在20世纪头20年里，弗洛伊德逐渐意识到这个模式是不恰当的。例如，根据这种模式，制造压抑的动源一定是自我，心灵中有意识的那部分。然而，躺在躺椅上的病人表现出的抗拒却表明仿佛压抑的动源存在于潜意识部分。也就是说，当危险或讨厌的话题浮现在自由联想中时，病人就会停止自由述说，声称他什么都没有想起，或者他忘记了谈过什么，或者用其他方式闪烁其词。弗洛伊德说，

> 制造压抑和保持压抑的力量在精神分析过程中表现为抗拒。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X. 14）

但是这意味着，只和意识相连的那部分自我其本身可能是潜意识的。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这个词最好被用作描述性形容词，而不是局部解剖学中的名词。尽管所有被压抑的事物都是潜意识的，但是并非所有潜意识的事物都是被压抑的。

心理机制的结构

经过全面思考，弗洛伊德构想出一种新的心灵模式。它包括三部分：自我、本我和超我。“本我”被定义为心灵深处最古老的那一部分，其他的结构都源于此。

> 它包含所有遗传下来的东西，与生俱来，融入肌体——因此，最重要的是，它包括源自躯体组织的本能，这些本能以我们尚不知晓的形式寻找到最初的心理表达。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II.145）

本我是原始的、无序的、感性的“非逻辑的领域”：

它是我们个性中黑暗的、无法触及的部分；我们是从对梦和对神经官能症症状的研究中获得了对其甚微的了解。大部分本我都是负面的，只可被当作自我的鲜明对照物来描述。我们用一个类比来描述本我：我们称之为一种混乱状态、一个充满沸腾刺激的大锅炉……它充斥着来自本能的能量，但是它没有组织，不能产生任何集合意志，只能力争使受享乐原则支配的本能需求得到满足。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I. 73）

弗洛伊德明确地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他称之为初级过 程 和次级过程 的心理功能。本我使用的是初级功能，它运用我们在第四章讨论梦时曾引用过的凝缩、移置、象征和愿望的虚幻实现等机制。本我还忽视时间和空间概念，对互相对立的概念，如黑暗/明亮、高处/深处不加区分。如弗洛伊德描述的那样，本我只受最基本的、原始的心理动力原则制约，即避免本能的张力所引起的“不快”，而这只能通过愉快地满足本能需求来实现。

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悲观看法典型体现在他认为所谓的“享乐原则”更多关注的是寻求避免痛苦而非追求享乐。这是弗洛伊德很多思想的基础。在第二章里，我们注意到，弗洛伊德将强烈的情感视作必须除掉的烦扰，而非一种要去追寻的快乐。

自我是代表意识的那部分心理。它使用次级过程：即推理、常识及对外界刺激或内心本能的推动进行延迟回应的力量。弗洛伊德将自我刻画成一个与感知器官紧密相连的“特殊的组织”，因为它最初是由外界刺激冲击感官而发展起来的。

自我首先、最终都是身体上的自我。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X. 26）

弗洛伊德旨在说明，自我是源自由身体表面而来的感觉，它是身体表面的一种投射。“我”的意义取决于将自己的身体作为独立实体的感知。自我一旦存在，“就充当本我和外界之间的媒介”。凭借这种介于感官感知和运动活动之间的中间连接，自我得以控制自发行为。自我的基础功能是自我保存。

对于外界 事件，自我这样来发挥功能：通过意识到刺激的存在，存储有关它们的经历（于记忆中），（通过逃离）避免过度强烈的刺激，（通过适应）处理温和的刺激，最后（通过活动）对外界作出利己的权宜变化。对于关系到本我的内心事件，自我如此发挥功能：它对本能的要求施加控制，决定是否允许它们获得满足，将这种满足的获得拖延至与外界契合的时间和场合，或者完全地抑制它们引起的兴奋。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II. 145-146）

弗洛伊德这样描述他心灵划分的第三部分：

漫长的童年时代——人类成长中依赖父母的时期——在自我中积淀形成了一个特殊动源，使得父母的影响被延长。这被称为超我 。当这个超我不同于自我或与之相反时，它构成了自我必须考虑的第三种力量。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II. 146）

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们先前提过的，他的那篇关于自恋的文章。弗洛伊德认为，随着儿童的成长与发展，他最初妄自尊大的自恋倾向逐渐减弱，即他不再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金宝贝”，是宇宙的中心。随着儿童逐渐习得文化和道德思想，他的原欲本能冲动经受着压抑。由于这种心理上的分裂，儿童逐渐意识到他不能再理想化自己；理想自我 是他本身的自我总无法达到的。弗洛伊德设定心灵中有这样一个致力于自我观察 的力量，它观察着自我，判定自我是否符合了，或者有没有达到理想自我。如上面引文中显示，超我最初产生于父母的禁止和批评。因为童年长期对父母的依赖，父母的标准和之后社会的标准投射于内心，即它们融入了个体心理中，或成为了个体心理的一部分，导致一旦自我没有达到理想自我的要求，就会听到良知的谴责。

弗洛伊德在此也同样可以使用巴甫洛夫的术语。超我可以被看作是由父母的命令和批评构成的重复条件反射训练的产物，例如，“你必须早餐后漱口”可能成为深植于脑海中的一条命令，以至于已经离

家很久的成年人，如果没有照做的话，依旧会感到不安。

因此，自我不稳定地平衡于外界、本我和超我三者之间。它们各自可能强调一个不同的方向。因此人类行为有时显得摇摆不定或犹豫不决就不足为奇了。

攻击本能

在本章之初我们引用了弗洛伊德的结论："恨，作为与对象的一种关系，是早于爱的。"这句话来自他1915年写的一篇名为《本能与它们的变迁》的论文。弗洛伊德是第一个将"攻击本能"确立为一个与性本能不同的自我的组成部分。在此之前，弗洛伊德曾将攻击本能视作性本能中构成施虐狂的方面，认为它是一种"掌控的强烈欲望"、一种力图拥有和主宰性对象的原始形式。

> 在这个初级阶段中这种形式的爱，在对待对象的态度上很难与恨区分开来。只有在生殖系统成熟以后，爱才成为恨的对立面。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V, 139）

弗洛伊德拐弯抹角地逐渐承认了"攻击本能"全然独立于性本能之外。

> 我记起了当一种破坏性本能的观点首次出现在心理学文献中时，自己所采取的防范态度，以及最终接受它需要的时间。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 120）

弗洛伊德频繁使用"本能"一词，现在看来有些过时，因为现代心理学家和研究动物行为的学者们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这个词汇。本能最初是指行为中被认为是天生的、不受环境影响而独立发展的方面。当今，人们普遍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既受遗传因素又受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条件的影响。除非适当的环境刺激在恰当的阶段出现，甚至一些

看似不变的典型行为，如鸟的歌唱，都未必会出现。弗洛伊德提出，环境在影响性行为模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他领先于他的时代。但是除了他自己的个人偏好之外，没有明显的理由可将本能限定为仅有两种。例如，吃饭和睡觉也基本上都是与生俱来的需求。

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一文中首次全面认可了攻击本能，这是一篇发表于1920年的思考性文章。尽管他继续坚持认为，人主要是受享乐原则的主导，这种享乐原则在自我对现实原则的接受中得以修订而不是被废除，但是他下结论说，还有另外一种原则一定也在起作用。正如我们在上一章里看到的，对“创伤后压力障碍”——一种由突发事故或震惊造成的神经官能症疾病——的患者的研究显示，他们的梦经常几乎一成不变地重复该事件。因为创伤性事件，从定义上看，都是不愉快的经历，那么它的重现显得与享乐原则相悖。弗洛伊德还注意到，小孩子倾向于重复不愉快的经历，例如与父母的分离，他们通过把这些事件变成一种重复性游戏以在幻觉中获得对这些事件某种程度的控制。弗洛伊德下结论说，曾受过惊吓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和曾有过悲痛经历的儿童都试图通过在梦中或游戏中重复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来征服它们。

在本章前一部分，我们引用了弗洛伊德的看法：恨比爱出现得要早，恨与自我将对象作为产生不安刺激的缘由而对其进行的原始拒绝相关。回顾这个观点有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弗洛伊德将攻击性与对上述震惊和悲痛的克服，及强迫性重复不愉快经历的倾向联系在一起。

> 这种要去不断重复的强迫性行为表现……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本能特征，当它们与享乐原则相背离时，就有一些“恶魔的”力量出现了。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VIII. 35）

但是弗洛伊德的分析并没有止于此，依旧坚信他的观念——心理机制的功能就是除掉到达它的刺激，他下结论说，这个“恶魔的”、本能的强迫性重复的冲动是所有本能中普遍存在的特质。他写道：

似乎，本能是有机生命中固有的一种强烈愿望，它试图将生命体在外界纷扰的压力下放弃的东西恢复到早先的状态。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VIII. 36）

那么，什么是本能力图恢复的事物的最早状态呢？在我们星球的历史上，无机物先于有机物出现，因此它只能是力图达到生命存在之前的状态。

如果我们把它作为真理，认为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因内在原因而死亡——再次变成无机物，那么我们不得不说，“所有生命的目标就是死亡”，而且回顾过去，“无机物早于生命体存在”。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VIII. 38）

死本能

以下是弗洛伊德称之为“死本能”的论断：它是涅槃原则的终极表现形式，是生物体力图到达斯温伯恩的“冥后的花园”的一种努力，在那里没有外来或内在的刺激扰乱它的永久平静。

没有星辰也没有太阳
没有任何光亮的变化
没有激荡的水声
没有声音或图景
没有冬季的树叶或春天的枝叶
没有白天及白天的一切
只有永久的沉睡
在永恒的黑夜

这些高度抽象的思考给予了弗洛伊德想要的东西：一个二元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中，精神生活的所有现象最终都可以被追溯为两个驱力或本能之间的互动或冲突。

经过长期的迟疑与犹豫，我们终于确定只有两种基础本能的存在：爱欲本能和破坏本能……第一个本能的目标是建立更大的联合体并保持这种联合统一——简言之，相结合；相反地，第二个本能的目标是取消联合并破坏它们。对于破坏性本能，我们可以设想，它的最终目标是使生命体回归无机状态。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死本能”。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II. 148）

弗洛伊德认为攻击性是源于转向外部世界的死本能。他写道：

被弱化、驾驭和抑制了目标的破坏性本能，当它指向外在对象时，给予自我以满足了重要需求的满足感和对自然的控制力。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 121）

弗洛伊德继续得出结论：攻击性成为了文明的最大障碍。他将文明描绘成：

一个服务于集体自我保存本能的进程，它的目的就是将个体、家庭、种族、国家和人民结合在一起，形成大统一，即人类的统一。但是人类自然的攻击本能，即个体对集体、集体对个体的敌对，则与文明进程对立。这种攻击本能来源于死本能，是死本能的主要表现形式。我们已经发现，它与爱欲并存，与其平分疆土。现在，我认为，文明的演变过程已经不再模糊，它是爱欲与死亡之间、生本能与破坏本能之间的斗争，正如我们人类所经历的那样。这种斗争构成了所有生命的基本部分，人类文明的演变因此可以被简单地描述成求生的斗争。它是对立的巨人之间的斗争，而我们的保姆用歌唱天堂的摇篮曲来试图平息这场争斗。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 122）

谁能想到，一位致力于揭开维也纳上层社会神经官能症之谜的医生会从他的研究中得出关于人类生存状况的这样一个宏伟论断？弗洛伊德对性和攻击本能这两个冷门研究领域的探索居然转变成了一种描述对立的善恶力量的宇宙观。上文引用的段落是弗洛伊德在与荣格分道扬镳大约17年之后写下的。如果这两位先驱者继续合作的话，弗洛

伊德可能会意识到，他将爱欲与死亡描述成永无休止地互相争斗的两个巨人的说法，正是荣格称之为“原型”的看法。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是另外一回事。它与科学无关。

第六章

攻击、抑郁与妄想

弗洛伊德确定存在着一个独立的“破坏性本能”之后，他开始思考文明是如何对它施加控制的问题。他下结论说，这主要是通过“心力内投”来实现的，即将攻击心理并入自我，使攻击心理转离外部世界而朝向自己。弗洛伊德因此提出了攻击本能的双重转向。死本能起初是指向自己的，因为每个人都最终死亡，因此死本能是最后的胜利者。但是，在人的一生中，死本能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指向外界的攻击本能：第一，对抗来自外界的不期而至的刺激；第二，表现为“虐待狂”对性欲对象进行占有；第三，反抗挫败自我欲望的个人或情势。然而，文明又确保了这种破坏性中的一部分转向内心，合并到超我之中，表现为产生自责、自恨和自罚的内疚感。

> 因此，文明，通过削弱和使人放弃攻击心理，并通过在人内心建立监察力量，如在被攻占的城市中的卫戍部队一样，获得对一个人危险的攻击愿望的控制。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 123-124）

弗洛伊德很重视超我具有的非理性严厉。他声称，一个在非常宽厚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却可能拥有非常严格的良知标准，这是合乎情理的。他对此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他相信：

> 人们放弃的每一点能带来满足的攻击本能都被超我接收，而增强后者（对自我）的对抗。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 129）

换言之，一个人越抑制他对他人的攻击本能，对自己就越可能严苛。弗洛伊德在此之前曾经在他著名的文章《哀悼与抑郁》中描述过类似的情况。

如今，抑郁症被描述成严重的忧郁性疾病。弗洛伊德准确地描述了其显著的心理特征：

它是一种深刻的、痛楚的沮丧，对外面的世界失去兴趣，失去爱的能力，抑制所有活动，自尊降低到自责和自辱的地步，最终产生一种惩罚自己的错觉愿望。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V. 244）

在哀悼中，自尊丧失的程度通常表现得不尽相同，尽管很多人失去身边亲近的人之后，的确责怪自己没能给逝者以足够的爱和关心。在其他方面，哀悼的心理特征与深度忧郁症十分相似。弗洛伊德注意到，哀悼通常是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过程，他将这种从逝去的爱人那里找回原欲的困难归因于一种更普遍的、每个人在放弃原欲时所面临的困难，例如，神经官能症患者放弃对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困难。

弗洛伊德指出，抑郁还经常因为失去所爱的人引起，尽管这种失去可能是因被拒绝或遗弃而非死亡引起。但是为什么抑郁的人会将责难堆积在自己身上呢？弗洛伊德指出，忧郁症病人对自己的谴责，大都类似于那些他可能会对离去的爱人的谴责。“我是没用的人，不值得活下去”是对“你是没用的人，不值得活下去，因为你离开了我”的一种置换。这个例子显示出，最初对外的攻击转而对内，并融入超我中，而后表现出自责和自恨。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哀悼和抑郁的区别主要在于以下事实：在哀悼中，失去是完全意识到的，而在抑郁中，失去部分上是潜意识的。这与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哀悼和抑郁的区别，即后者涉及在更大程度上丧失自尊，有什么关系呢？弗洛伊德相信，在某种意义上说，抑郁者讲出了他失去自尊的实情。

与哀悼的类比使我们得出结论：他的失落和一个对象相关，但是他告诉我们的是与他的自我相关。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V. 247）

弗洛伊德的看法具有启示性。因为失去一个对象而感到失去自尊的人是那些以认同为基础选择对象的人，也就是说，自恋式地选择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他们的对象。因此，失去对象就相当于失去了一部分

自我。在上一章引用过的一篇重要论文《论自恋》中，弗洛伊德列举了各种各样选择对象的方式。

一个人可以爱上以下类型的人：

1）自恋型：
  a）和他现在一样的人（即他自己）
  b）和他过去一样的人
  c）他想要成为的人
  d）曾经是他过去的一部分的人
2）情感依附型：
  a）养育他的女性
  b）保护他的男性
  及上述类型的接替者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V. 90）

（“情感依附”的字面理解是“依靠”。弗洛伊德这里考虑的是母子情感的最初状态：两者都得到来自孩子的某种原欲投入。）弗洛伊德的建议是，抑郁症患者退回到了，或者是从来就没有完全脱离过情感发展的原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选择的对象是自恋型的而不是依附型的。因此，当他们失去一个对象时，他们会比那些从与自己差异很大的对象身上获得依附型爱的人失去更多的自我。

弗洛伊德认为，这样的病人是被困在情感发育的“口欲”阶段的人（见第三章）。他没有清晰地阐明受困的原因，但是他断言，这种在口欲阶段的固恋可能是婴儿的口欲需求被剥夺或者过分满足的结果。尽管根据现代研究的成果看，弗洛伊德关于忧郁人格口欲阶段情感发展停滞的解释显得不够充分，但是他临床观察的精确性和深度并未因此受影响。我们在第三章里注意到，被动、依赖和对自我能力的怀疑经常是同时出现的性格特征。

今天，我们对有抑郁倾向的人可能会作出非常不同的描述。有些人因为失去所爱而变得严重抑郁，而不只是简单地度过一段哀恸时间就能恢复，他们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持久的自我价值感的人，因此一旦

受到失去或被剥夺的打击，便没有内心的力量可依靠。这样的人完全借助外部资源来维持自尊，依赖别人对他的爱或崇拜，或者依赖自身成就来支撑他的自我。我们觉得，一个孩子很有可能因为从爱他的父母那里经常性地得到一种非理性的赞美或宠爱，而获得一种内在的，但可能别人看来并不客观的自我价值感，但是当发生变故的时候，这种自我价值感会变成一种内在力量的源泉。如弗洛伊德和他的同事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相信的那样，这样的过程很可能贯穿整个儿童时代，而不仅仅是生命的第一年。

有很多种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样的过程可能不会发生，因此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人尤其容易患上忧郁症。也许父母并不想要这个孩子，或者不爱他。也许他们对孩子的期望过高而使孩子总觉得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值。或者某种基因因素（在复发性忧郁症中发现了很好的基因证据）使得这个孩子无论别人给他多少爱都不能投射于内心，从而建立内心的自尊。

弗洛伊德的自恋型的对象选择概念，即通过认同而选择对象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尤为有趣。我们称那些易患严重忧郁症的人为“忧郁型个性”，这样的人渴求得到别人的赞同并急于避免那些会使他们陷入到忧郁之中的批评或责怪。他们急于取悦他人的焦虑使他们对别人的感受非常敏感；他们通过获得认同来找到适应别人的方式。如此习惯性地顺应别人必然会导致忧郁的人抑制或压抑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尤其是他们个性中自信或攻击性的那一面。

弗洛伊德也谈到了躁狂症，它是与抑郁症相反的一种心理状态，即今天人们熟知的躁郁性精神病或双相情感障碍。弗洛伊德认为，躁狂症的通常表现是“快乐、狂喜或胜利”，特点是以前用作他途的心理能量一下子汇集于此。可以把躁狂症类比为一辆汽车突然卸掉了刹车，或者，用弗洛伊德自己的例子，把它比作“一次漫长、艰苦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在忧狂症困扰下，病人因自己的缺点而责难自己，而在躁狂症中，病人不但表现得对自己非常满意，而且还赋予自己几乎魔术般的力量，即那种弗洛伊德认为婴儿所具有的、初级自恋状态中的“无所不能”。弗洛伊德认为，在躁狂症中，理想自我和自我

的差异被消除了。因此，超我已不再关注自我在哪些方面达不到理想自我的要求，因为在二者已没有区分。

> 在对自我的分析基础之上，我们不能怀疑的是，在躁狂症患者身上，自我和超我已经融合在一起，因此，这个处于胜利和自满状态下的人，不受自我批评的烦扰，可以享受解除对自己的禁制、免去对别人的顾虑及自责后的快乐。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VIII. 132）

上文中我们评述了弗洛伊德对严重忧郁症描述的准确性，这是一种呈现多样性的心理疾病，可能需要入院治疗，但在私人诊所中也经常碰到。相比之下，弗洛伊德对躁狂症的说明不但过于简短而且也不尽如人意，这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经历的缘故。躁狂症病人在私人诊所里很少见，因为他们很少自己去寻找医疗帮助。他们被送入精神病院和诊所，要么是在亲属的安排下，要么是因为他们的反社会的行为而不得不受到约束。躁狂症病人很少显示弗洛伊德描述的那种纯粹的“快乐、狂喜或胜利”状态。而且，尽管轻度躁狂症病人的感受是愉悦的，并且他们可能会快速地产生一系列极富创造力的想法，但是大多数躁狂病人的感受是过度刺激而非愉快；在康复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经历描述为剧烈不适而非快乐。

人们经常忘记，弗洛伊德很少有处理重症精神病人的亲身经历。1885年，当弗洛伊德在等候去巴黎与夏尔科进行合作研究的经济资助时，他在维也纳郊区奥伯多柏林的一家私人诊所做了三周的临时代理医师。他向未婚妻这样描述住院的病人：“一群思维不清、行为古怪的人。”他除了与夏尔科在萨尔佩特里埃尔（Salpetriere）主要研究歇斯底里症的那段工作期间以外，在奥伯多柏林的三周就是弗洛伊德接触精神病患者的全部经历了。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他对妄想狂病人施雷伯（Schreber）法官的著名研究就是基于病人所写的书面材料，而不是与他的亲身接触。在对此研究的介绍中，弗洛伊德写道，如其他精神病学家一样，他见过很多例“妄想狂和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但是因为弗洛伊德认为这些病例不适合精神分析，他从

未声称对其进行过深入研究。在1900年到1909年期间，荣格曾在伯格霍兹利（Burghözli）精神病院任精神病医师，之后他放弃了这里的职位转而开立私人诊所。如果弗洛伊德也有类似长期的工作经历，接触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躁狂抑郁病患者及其他形式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那么他就可能构建一种建立在精神病，而不是神经官能症基础上的精神病理学。这样的精神病理学很可能会更关注个人现实感的发展，而非其婴儿性欲的变迁。弗洛伊德对精神病产生原因的解释对大多数精神病学家来说显得过于局限，然而，同以往一样他的解释中包含非常有价值的原创性的临床观察。上面提到的弗洛伊德根据丹尼尔·保罗·施雷伯法官回忆录所写的文章，就是反映他思考的敏锐与局限性的生动例子。

妄想狂精神病有几种类型，患者主要表现为产生被迫害的妄想。也就是，他设想自己遭到某个人或某群人恶意的追逐、攻击、毒害或伤害。这些想法经常伴以患者对自身重要性的深信不疑，而正是这种自认的重要性部分地解释了患者为什么会认为自己受到太多不想要的关注。他也许真的是皇家后代，或者掌握着某个敌人急于获得的至关重要的秘密。

施雷伯病例从几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不寻常的病例。大部分妄想狂精神病都是慢性的，而非不定期偶发的。但是施雷伯的精神病症在1884年10月初发并持续到1885年6月，之后他康复得很好。他又回到了法官的工作岗位，直到1893年健康状态一直良好。在51岁时，升职之后不久，他的病症复发，十分严重，使他不得不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直至1902年才出院。他的回忆录在他出院一年之后发表。他一直未从第二次发病中完全康复。1907年，他再次被送入精神病院，于1911年4月14日在医院中去世。

在他第二次发病期间，施雷伯坚信他的身体遭到了各种残忍的折磨，他受到了迫害和伤害，尤其是遭到禁闭他的那个诊所的所长弗莱克西希（Flechsig）教授的折磨。施雷伯急性的精神病症消退后，接着被一种长期的妄想系统所困扰。像其他妄想狂受害者一样，施雷伯看起来很正常，只有当他的妄想的素材被触及时才会发病。1902年，

他获许出院，尽管顽固的妄想依然占据着他的思想。

> 他相信自己身负救赎世界并使之找回福祉的使命。然而，这只有当他首先从男人变成一个女人之后才能实现。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 16）

在他的回忆录里，施雷伯宣布，当他被变成女人之后，他将由神光受孕，从而创造一族崭新的人类。

我们不知道施雷伯首次发病的情况，但是弗洛伊德对其第二次发病的解释是，它与施雷伯即惧怕又希望和弗莱克西希发生性关系有关。

> 刺激他病发的原因，是一种同性恋原欲的暴发；这个原欲的对象最开始可能是他的医生弗莱克西希；他对这个原欲冲动的抗争引发了内心的冲突，导致了症状的出现。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 43）

弗洛伊德继续解释说，施雷伯对他的精神病医师产生同性恋，是一种早期在潜意识里对父亲的同性恋感情的移情。后来他妄想上帝取代了弗莱克西希作为使他受孕的人，而这也可回溯到一个相似的来源。弗洛伊德写道：

> 人们熟悉的妄想狂症的主要形式全部可以用这个命题的矛盾来代表“我（男人）爱他（男人）”，事实上，他们穷尽了所有可能表达这种矛盾的方式。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 63）

弗洛伊德这样解释迫害妄想：病人对自己的同性恋感情首先否认：“我不爱他——我恨他”；然后通过投射演变为“他恨（迫害）我，这使我有理由恨他”。弗洛伊德深信，迫害者总是病人爱过的，与其同性别的某个人。

弗洛伊德大加利用了以下事实：施雷伯的父亲是一名著名的内科

医生和教师，他对健康教育的观点当时被广泛认可。他53岁时早逝，那时施雷伯才19岁。弗洛伊德为他的解释申辩说，施雷伯对上帝的妄想最终源于他对父亲的情感，他指出，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比大多数父亲更能激起那种“带着敬意的顺从和带着反抗情绪的不顺从”，弗洛伊德认为这是男婴对待父亲的典型态度。

尽管弗洛伊德花了一番功夫查出施雷伯的父亲是丹尼尔·戈特洛·博莫里兹·施雷伯博士，并且发现施雷伯法官有一个兄长，但是他没再继续深入调查，从而了解施雷伯法官童年的真实情况，或者他的父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继续调查，他就会发现施雷伯博士其实是一个独断专行、残暴的人。他的大儿子在38岁时开枪自尽，他的小儿子，施雷伯法官，变成了上述的精神病人。因为篇幅所限，我们在此就不赘述施雷伯博士是如何顽固地违背孩子的愿望，通过各种约束器件使孩子的身体保持绝对直立。他如何使用灌肠器来防止孩子夜间排便，及其他恐怖的做法。有关详细叙述可以参见默顿·柴茨曼（Morton Schatzman）写的《灵魂的谋杀》（纽约，1973）。

在第二章中，我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弗洛伊德坚持将婴儿性欲幻想的持续存在或再度出现视作神经官能症的起因，这有时促使精神分析师们忽略影响人们生活的真实事件和环境。弗洛伊德对施雷伯父亲的真实情况的忽略就是一个显著例子。

弗洛伊德试图对施雷伯为何在51岁时第二次发病作出了解释。弗洛伊德认为在这个“更年期”阶段，无论男女，患病的可能性都在不断增加。他还指出，施雷伯失去了父亲和兄长，他自己没有孩子，尤其是没有儿子可以使“他的未满足的同性恋爱欲得以排遣”。因此施雷伯再度萌生了成为女性的愿望，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他在童年早期对其父亲抱有的愿望。

弗洛伊德认为妄想症的产生是基于和同性恋冲动相关的冲突，这一论点引发了大量相关研究。菲舍和格林伯格在整理这类文献时得出结论，实验性调查总体来说确实支持这个想法：“妄想症患者和非妄想症患者对有同性恋暗示的刺激作出显著不同的反应。”然而，弗洛伊德认为迫害者总是与当事人性别相同的论断并没有被证实。

施雷伯在他的病症急性发作的阶段，像很多其他患类似疾病的患者一样，认为一个巨大的灾难就要降临，也许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在他基本康复出院之后，施雷伯依旧相信这个巨大灾难已经发生过了，但是至少部分地意识到，灾难是发生在他心中，而不是外部世界。弗洛伊德假定，在他病症急性发作的时候，这个妄想狂病人的世界终结了，因为他不再能维系与之的情感纽带。投射机制使他认为灾难只涉及外部世界而非他自己。随后，他在妄想系统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新世界。弗洛伊德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妄想系统应该被视为“一种康复的努力，一个重建的过程”。在一个将精神病患者的妄想斥为病态的愚蠢行为，而不是一个值得研究和理解的现象的时代，弗洛伊德的言论可以说是具有令人震惊的独创性。

弗洛伊德关于施雷伯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了他的很多思考过程和解释方法。这表明研究弗洛伊德著作时，去粗取精是多么重要。弗洛伊德关于施雷伯的疾病过程、他的嫉妒心、投射，及妄想系统的正面功能的评论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他没能将施雷伯的性格框架与他的妄想内容与可以轻易确定的、他父母可怕的抚养方式联系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疏漏。而且，有谁能真正相信，一个在中年时期出现的同性恋幻想可以被视作是这样严重的精神疾病突发的充分原因呢？即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高智商、受过良好教育、谙熟这个世界及其运作方式的法官，不太可能不知道男性和女性都有各种各样的、不愿公开承认的性想法和幻想，而它们造成的冲击不可能强烈到使他疯癫的地步。克拉夫特-艾宾（Krafft-Ebing）的《精神病理性欲》一书于1886年出版，书中描述了各种各样的性变态。性欲及其变异形式在当时的维也纳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

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婴儿性欲幻想是精神病的根源，但他对这一观点的表述很少像在施雷伯案例中那样缺乏说服力。尽管所有妄想狂病人在心理测试中都表现出对同性恋主题特别的兴趣或厌恶，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没有解决的同性恋冲突就是妄想性精神疾病的唯一根源，而这更可能是一种更深层、更普遍的障碍的一部分。

第七章
玩笑与《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

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弗洛伊德对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在精神病理方面的研究，这是精神分析向一门综合性的心理学发展的起跳板。如第一章中所讲，弗洛伊德在从事精神分析的最初阶段就开始涉猎其他领域的理论。如果他将自己的研究只局限于精神疾病的各种形式，那么精神分析就不会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但是弗洛伊德深信，他有关人类动机和潜意识的发现不仅适用于神经官能症，而且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

《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成为弗洛伊德最畅销的书之一。它讲述了著名的“弗洛伊德失误”现象，即口误、笔误、记错名字、忘记意图及其他失误。弗洛伊德通过论证这样的错误或“失误动作”是受被抑制的、潜意识想法干预的结果来支持他的观点——所有心理活动都是由特定原因诱发的。荣格记录的一个案例即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Y先生爱上了一位女子；但是他没有成功追求到她，不久后她嫁给了X先生。从那以后，尽管他已经认识X先生很久了，甚至与他有生意往来，但Y先生却一再地忘记X先生的名字，甚至好几次当他想要与X先生通信的时候，他不得不问别人。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VI. 25）

显然，Y先生对他成功的竞争对手的憎恨使他想要无视X先生的存在。

解释下面这个笔误的例子同样容易：

一个因为与妻子关系不好而离开她生活在欧洲的美国人，觉得现在可以和她和解了。他请她跨过大西洋在某日与他团聚。他这样写道：“你可以像我那样，乘坐毛里塔尼亚号（Mauretania）船。但是他不敢寄给她写有这句话的那张纸，他宁愿重写，因为他不想让她注意到他是怎样更正了船的名字。他最初写的是卢西塔尼亚（Lusitania）。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VI. 121-122）

卢西塔尼亚号船于一战中在爱尔兰海岸被德国潜水艇击沉。

弗洛伊德的例子并非都是同样地直接清楚。他的有些解释显得拐弯抹角和牵强。像我们在谈论梦时提到的，弗洛伊德会在需要时充分调动智慧为其理论提供支持。他给出的第一个例子正说明了这一点。弗洛伊德发现自己记不起来那个在奥维多大教堂画过一些著名壁画的画家的名字了。画家正确的名字是西尼约雷里（Signorelli），但是另外两个画家的名字波堤切利（Botticelli）和波查菲奥（Boltraffio）却总是浮现在他脑海。弗洛伊德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占了整整4页篇幅，包括他不愿意对陌生人谈论性、他希望忘掉一个先前的病人的自杀及描述他的被压抑的想法如何导致了将西尼约雷里这个名字分成两半，并将德语中Herr（先生）这个词替代了意大利语Signor（先生）。Herr取自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而Botticelli和Boltraffio中的“Bo”来自波斯尼亚（Bosnia）。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当时都被土耳其占领，而土耳其人的性习惯是弗洛伊德不愿意向不熟的人提起的。他在特拉伏伊（Trafoi）停留时由于得知了他的病人自杀的坏消息，因此特拉伏伊因是波查菲奥（Boltraffio）这个名字的组成部分而导致他记错名字。弗洛伊德力图说明，这两个他希望避免的话题却在错记的名字中凸现了出来。他对强迫性仪式的形成也作了同样的解释，即仪式是被受害者压抑的、无法得到直接释放的一种本能冲动的间接体现。

弗洛伊德的解释极具独创性，虽然它难以诟病但终究又很难令人信服。像很多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一样，它看起来“未免太聪明了”；借助对潜意识的精神活动过分精细的论证去掩饰实质上并不重要的东西。很多口误和遗忘的例子确实符合弗洛伊德的论证，但是并非全部如此。例如，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感到记名字这件事越来越困难，也许他们还能准确地记起名字，但是回想起它们所花的时间则需要越来越长。在第三章，我们质疑了弗洛伊德将婴儿失忆症完全归因于压抑的观点，并提出了可能的其他解释。对弗洛伊德的成人遗忘理论我们也有同样的质疑。例如，弗洛伊德没有考虑失掉记忆的社会情境，也没有考虑在最初记忆名字的时候，就有因情境不同而可能导致记忆强度的不同。一个人更可能回忆起与之度过整晚的某个新交的名字，而

不是那个在聚会上被简单介绍认识的人的名字。但是，弗洛伊德在认定潜意识愿望和想法会在某些情况下干预回忆后，便笼统地认为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如此。

塞伯斯提埃诺·丁伯纳罗（Sebastiano Timpanaro）写了一本书，名叫《弗洛伊德式失误》。书中他批评弗洛伊德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很多失误属于那种所有作者都熟悉的错误——重复刚使用过的词和因为思想比笔跳跃得更快而遗漏一些词等等。精神分析师查尔斯·里克罗夫特在评论这本书时补充了一个由荣格首次提出的、关于自由联想的批评。弗洛伊德对错误的很多解释都依靠当事人和失误有关的相关联想。更确切地说，弗洛伊德通过这个方法迅速找到令联想者不安的元素；这些元素并不像人们通常会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看到的那样总是与性有关；而是关于嫉妒、个人进步、偏见或者敌意，而这些对于进行联想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任何真实地体验过自由联想的人都知道，这种方法必然使人在脑海中很快地浮现出关乎他情感的主题。里克罗夫特指出：并不能说得到了“重要素材”就意味着找到了引发错误的原因。

弗洛伊德早期走出诊疗室而关注日常生活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对幽默的研究。《玩笑与潜意识的关系》于1905年首次出版。弗洛伊德早在1897年就开始收集犹太笑话；但是他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兴趣是源于他的朋友弗利斯在读《梦的解析》的校样时对梦里充满了太多的笑话的抱怨。在回复弗里斯的信中，弗洛伊德写道：

> 所有梦者都一样地有些诙谐幽默得过头，他们需要如此，因为他们处于压力之下，而直接释放压力的路径被阻挡……所有潜意识过程中显示的机智都与玩笑和喜剧理论密切相关。
>
> （《弗洛伊德-弗利斯信件》，371）

弗洛伊德的论证十分清晰、有说服力，即使是阅读译文，他的大部分著作也是令人愉悦的。但是关于玩笑的这本书是一个例外。这部分上是因为在翻译过程中玩笑的幽默成分损失甚巨，部分是因为对玩

笑的解释破坏了其幽默。

弗洛伊德分析了他所称的玩笑的技巧 ，并指出，玩笑运用的某些机制，尤其是凝缩和词的替换，实际上可以在梦中找到。一个英语例子是迪斯累里的一句评论：老年人容易于陷入anecotoge——将“轶事（anecdote）”和“老糊涂（dotage）”两个缩合在一起。类似的例子是称圣诞节节期为alcoholidays。弗洛伊德继续列出了其他一些梦中和玩笑中共有的机制：“移置、错误推理、荒谬、间接代表、相反代表。”然后他将玩笑分为主要两大类：“清白”玩笑和“倾向性”玩笑。前者只依靠语言上的机智，后者则要靠含敌意或淫秽的间接表达。弗洛伊德主要感兴趣的是“倾向性”玩笑。事实上，像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他在解释为什么“清白”玩笑会带给我们诸多快乐时会遇到困难，而解释“倾向性”玩笑带给我们的快乐时则没有这些困难，因为“倾向性”玩笑易于与神经官能症症状、口误和梦归于一类。

> 在这里，我们终于理解了玩笑达到的效果。玩笑使我们的某种本能（色欲或敌意）在遇到障碍后获得满足成为可能。他们规避了这一障碍，在一个那种障碍无法触及的地方提供了快乐。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VII. 100-101）

这个障碍可能来自内心的抑制也可能来自社会的压制，结果也许会导致一个人受到打击。在早期研究中，弗洛伊德就已将文明描绘成本能的敌人和压抑的诱发者。倾向性玩笑是规避由文明设立的、阻止直接表达淫秽和侵犯的障碍的一种方法。

在第六章里讨论弗洛伊德对躁狂症的解释时，我们注意到，他认为“快乐、狂喜或胜利”的状态的特点是精神能量突然而至，我们将这比作松开了汽车刹车。弗洛伊德认为，伴随玩笑的喜悦具有类似的特质。很容易看出，在倾向性玩笑中，开玩笑的人，通过把其淫秽的想法或侵犯的冲动用幽默的外衣掩饰起来，规避他的自我抑制。但是弗洛伊德也承认，纯粹的外部因素而非内心抑制也可能阻止这类冲动的直接表达。他引用了一个人们熟悉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子在人群中

看到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人后问道：

“你的母亲是不是曾经在皇宫里服务啊？”
“不是，殿下，在皇宫里服务的是我的父亲。”

通过玩笑，这个人可以向高高在上的王子表示敌意，因为后者的权势，他是不能直接对其表达敌意的。弗洛伊德认为，在这个例子中，玩笑带来了快乐是因为这个人在表达真实感受时没有遇到阻碍。

外部阻碍和内部阻碍情况的区别仅在于：在后者中一种现有的压制被解除了，在前者中一种新禁制的建立得以避免。如果我们认定不论是建立还是维护一种精神禁制都需要某种“精神损耗”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为此过于耗费心力。而且因为我们知道，在两种情况下，倾向性玩笑都能带来快乐，因此似乎有理由认为，快乐的产生是与被免除的精 神损耗相联系的。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VIII. 118）

这样巧妙的解释是必要的，因为弗洛伊德需要一个同时适用于“清白”玩笑和“倾向性”玩笑的解释。“清白”玩笑依赖语言的精妙、双关、文字游戏、将不相合的词合并在一起等等。弗洛伊德曾写道，“我不得不这样说，玩笑技巧本身也是快乐的来源”，他仿佛并不愿意承认本能释放以外的东西也是可以令人愉悦的，但是他通过提出“清白”笑话带来的快乐也是节约精神能耗带来的快乐这一观点解决了此问题。当我们重新注意并喜欢上某种熟悉的事物时（这种情形在笑话中经常出现），或者当我们用语言将两种看似不相融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时，我们是在做语言游戏，避免将力气花在批评性思考上以节约精神能量的损耗，从而达到快乐。

弗洛伊德将这种源自节约精神能耗带来的小快乐称为“前快乐”，并将其与性欲唤起的各种前快乐相比，“前快乐”即对生殖器以外身体其他部分的刺激给身心带来的快乐体验。最终，弗洛伊德这样解决了“清白”玩笑的问题，他声称：

清白玩笑，尽管它们包含的思想是非倾向性的，只能在理论意义上引发智力兴趣，但事实上它们从来不是真正非倾向性的。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VIII. 132）

原本非倾向性的、始于游戏的玩笑，接下来 被与目的相连接，而目的是所有头脑中存在的事物最终无法避开的。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VIII. 133）

弗洛伊德认为，好的玩笑留下的是一个整体的印象，即人们很难分清它带来的快乐主要是源自玩笑的形式，还是它包含的思想。他把形式看作是一种使基本思想变得更易接受的包装，就像药片的糖衣一样。我们即将看到，弗洛伊德在讨论艺术的时候运用了同样的类比。他将美学形式视为艺术家们既隐藏他们“自我的白日梦”，又使其变得对他人来说更可以接受的一种手段。在这两种情况下，弗洛伊德都否认真正的快乐可以从形式上获得。我们从一个玩笑的机智语言中，或者从一个艺术家建立的美学秩序中所获得的任何快乐都是次要快乐；“前快乐”，在弗洛伊德看来，相对于最终快乐只是感官上的快乐。这与他认为倾向性玩笑要考虑到攻击倾向和性的释放的观点并不矛盾，在论述他的观点时，他仍将攻击性视为构成了性本能中的施虐方面。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弗洛伊德没有承认，在运用权力和进行控制的过程中也有一种快乐在里面。当弗洛伊德在同一本书中谈论游戏时，他提到了一个名叫C.格洛斯（C. Groos）的作家，他在关于游戏的书中，谈到了“运用权力的快乐”和克服困难中的快乐。弗洛伊德将之斥为次级快乐。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快乐来自技能的运用，不论这种技能是身体的还是心灵的。玩笑通常是某个老掉牙的主题的变形，但是只要玩笑本身体现了语言的机智和句法的简洁，我们就不排斥它。换言之，即使在显而易见有倾向性的玩笑中，我们欣赏的既是玩笑的内容也是玩笑的形式。玩笑的形式并不简单是贿赂、一种“激励性奖金”，如弗洛伊德所称的那样，它是提供快乐的重要因素。如

果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笑话，我们将会因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欣慰。如果我们听到了一个新笑话，我们会欣赏其创造者的机智。笑话是与形式相关的、与如何将不协调的事物联系起来并建立一种秩序相关。因此它是一种美学产物，虽然属原始美学一类。

寻找秩序、解释性原则，以及使分立的事物得以联系起来的共性，一直是人类必须要做的事。当弗洛伊德自己解决了一个一直困扰他的问题时，他一定体验过什么是“找到了！”的快乐。然而，他却始终称这种快乐只是一种升华的快乐，并非最初的快乐。1930年，弗洛伊德写道：

> 这类满足，犹如一名艺术家从创作中、从赋予他的幻想实体中获得的快乐；或者一名科学家从解决问题或发现真理中获得的快乐，它们都有一种特质，对这种特质我们会有一天能从超心理学的角度去描述。目前，我们只能打个比方，这些满足看起来“更纯净、更高等”。但是，与那种从满足原始的、初级的本能冲动中获得的快乐相比，它们是温和的。它们不能令我们的身体感到震撼。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 79-80）

在下一章，我们将评述弗洛伊德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观点。

第八章
艺术与文学

在20世纪，精神分析对艺术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自由联想的运用以及他对梦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鼓励了画家、雕塑家及作家去实验偶然的和非理性的东西，去认真对待他们的梦境与白日梦的内在世界，去发现他们之前可能会斥为荒诞或非逻辑性的思想和意象中的重大意义。像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这类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弗洛伊德，还有很多文学作品，如弗吉尼亚·吴尔夫的《海浪》，都是依靠“意识流”技巧的运用。精神分析的地位确立之后，传记作者们开始感觉到，除非他们努力揭开从童年早期起就一直影响着他们笔下的人物的情感之谜，否则他们对人物的描绘就是不全面的。揭示一个人的性行为及性偏好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必须，因为弗洛伊德已下定论说，性欲是人性中的核心驱动力量。人们开始广泛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使政治家一类的人物也不可能被完全理解，除非将他们置于精神分析的聚光灯下。弗洛伊德曾与美国外交家威廉·布列特（William C. Bullitt）合著了一本介绍对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作的精神分析的书。虽然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已经发现，精神分析理念在理解历史人物方面是有价值的，但是这本书被普遍认为是极其糟糕的，因为弗洛伊德和布列特对威尔逊持有严重偏见。例如，他们称他为“一位自命不凡的道学先生”，他们还写道：“他是一个病态的、戴着眼睛的、害羞的、受父母和姐妹保护的人。汤米·威尔逊一生中从未打过架”，好像打架斗殴是拥有男性气概所必须的。他们还对他的宗教信仰予以蔑视，谴责他把自己看作救世主。这本有倾向性的传记是将精神分析作为“暗杀个性”的武器的早期例子。

弗洛伊德对艺术和艺术家表现出一种令人诧异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注意到的那样，他对文学有着深厚的积累和热爱，这从他优美的文笔中彰显出来。他对雕塑也很有鉴赏力，对绘画也有一定的艺术感觉，虽然稍弱一些。但他自己写道，他几乎无法从音乐中获得愉悦。弗洛伊德写了几本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书和一些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詹森的“格拉迪瓦”中的错觉与梦境》、《达·芬

奇的儿时记忆》、《米开朗琪罗的摩西》及《陀思妥也夫斯基与弑父情结》。

弗洛伊德相信，未得到满足的原欲的升华造就了艺术和文学。也就是说，他认为艺术家是将他们的婴儿性欲转化成非本能的形式而释放。如第三章中所示，弗洛伊德认为，对性本能中变态的、性前期成分的压抑，会阻碍性发展和导致性满足感的缺乏，这些症状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都经常出现。如果这些冲动没有被压抑，而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夸大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变成性变态而不是神经官能症患者。

处理这类素材的第三种方式涉及那些有艺术天赋的人。根据这一观点，艺术家是那些可能为了避免成为神经官能症和性变态患者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升华了他们的性冲动的人。弗洛伊德没有尝试解释艺术家拥有的天赋的本质，也没有对人与人之间在灵活性、智力，或其他认知及感知能力上的差异等这些实验心理学家们研究的问题作出更多的解释。弗洛伊德关注的是动机。在他看来，动机最终可能只是源于表现为攻击本能的死本能，或者源于性本能。而且，在弗洛伊德的思想框架中，动机应该被追溯到童年最早期出现的本能压抑。这种“本能”观点的局限性清晰地体现于弗洛伊德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著述中。如我们在上一章末尾谈到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类使其经历秩序化以理解其意义的需求因为不能直接与享乐原则联系在一起而属于次级现象。但是静观艺术和科学，它们是两种十分不同的人类活动，都是致力于从复杂中寻找秩序，在不同中寻找统一；进行这些活动的冲动从生物学角度上讲具有适应性，也同样可以被看作是“本能的”。

图12　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作品《摩西像》，罗马圣彼得镣铐教堂。

这个局限意味着，弗洛伊德抛弃了他可能对艺术作品的形式的任何兴趣，而只关注它的内容。他在《米开朗琪罗的摩西》一文中谦虚地承认了这一点。

我会立刻说我不是艺术鉴赏家，只是一个外行。我时常注意到艺术品的主题比它们外在的形式和技法上的特征对我有更强的吸引力，尽管对艺术家来讲他们的价值首先在于后者。我不能正确地欣赏很多艺术中运用的手法和达到的效果。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I. 211）

因为弗洛伊德注意的问题是内容而非形式，他自然会运用他解释梦、幻想和神经官能症的方法去解释艺术作品。因为他认定“艺术是一种升华”，那么他能做的和已经多少成功地做了的事情即是，从艺术作品中去发现艺术家在婴儿期内心有过冲突的证据。

从弗洛伊德描写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文章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深刻性和局限性。历史资料显示，列奥纳多有同性恋倾向，而且是个私生子。在他出生的同一年，他父亲娶了另一个女人。他母亲在他出生不久之后也嫁人了。列奥纳多后来被他的父亲收养，在父亲的家中长大。没有历史记载显示列奥纳多与他的母亲或继母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或者她们是什么样的人。也无从知道列奥纳多何时离开母亲转由父亲和继母抚养；尽管有记录表明在他5岁的时候已经是父亲家里的一名成员。

弗洛伊德分析了列奥纳多对童年的回忆，列奥纳多称，当他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一只大鸟用它的尾巴多次撞击他的嘴唇，使他张开了嘴。弗洛伊德认为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观点是合理的。它很有可能是列奥纳多把后来的幻想移置到了童年早期。正如人们所料，弗洛伊德将这个幻想解释为被动的同性恋的一种表达；鸟的尾巴用来替代阴茎，想要把阴茎放到嘴里的愿望根本上是源自吸吮的经历，弗洛伊德称其为“我们生命中最初的快乐之源”。

但是为什么母亲由一只鸟代表？弗洛伊德认为那只鸟是秃鹰，并详细解释了母亲和埃及神话里的秃鹰之间的关系。他说，列奥纳多选择这只鸟来代表他的母亲是因为人们认为秃鹰只有雌性，因此对于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来说，秃鹰成为一种尤其适合的母亲形象。

遗憾的是，弗洛伊德的解释是基于一个误译。这只鸟不是秃鹰，

而是鸢。秃鹰可以被认为与母亲有某种神话性质的关联，但鸢却不能。而且，尽管弗洛伊德承认没有关于列奥纳多何时被带到他父亲家中的具体记载，但他继续断言，那个幻觉暗示着列奥纳多在很小的时候是与他“穷困的、被遗弃的亲生母亲在一起，所以他一度感受到他父亲的缺失”。

我们不能责怪艺术史学家们将弗洛伊德的解释斥为无稽之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去粗取精。弗洛伊德曾详细评说了著名画作《圣母、圣婴和圣安妮》。圣安妮被刻画得与她的女儿圣母马利亚年纪相差无几。弗洛伊德认为，列奥纳多选择了“母亲、祖母和孩子”这个画家们一般很少选择的主题，是因为他可能意识到父亲家里有他的祖母及继母。他还提出，画中两个女人年龄上的相近或许反映了列奥纳多实际上有两个母亲的事实：他的生母和他的继母。

这种推断看起来更有趣，也更为合理。一个艺术家刻画的人物形象及他们选取的表现手法，经常取决于他的资助人和他所处的时代，但是它们又注定会反映艺术家的个性及个人历史中的某些方面，尽管他本人也许并没意识到这种关联。然而，画家选择的人物形象是否与其婴儿时期被压抑的性幻想有关，这一点更难以确定。

弗洛伊德认为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与莎士比亚的文学地位相差不远，他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是有史以来最宏大的小说。他声称，陀思妥也夫斯基对如此多的狂暴、任性、危险的人物的刻画，反映了小说家本人身上的类似倾向，他还指出，陀思妥也夫斯基曾承认对一个年轻女孩实施了性侵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朋友，传记作者斯特拉霍夫（Strakhov）在致托尔斯泰（Tolstoy）的信中也提到过此事。也有故事记载，陀思妥也夫斯基曾向屠格涅夫（Turgenev）承认过这一点。这个话题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中也出现过不止一次。弗洛伊德也注意到陀思妥也夫斯基表现出来的施虐受虐狂特性，以及他的嗜赌成癖。弗洛伊德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精神病病理解释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论断：小说家的父亲，陀思妥也夫斯基博士，是“特别暴力的”人。他因此设想，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这种性

情的根源在于男性（施虐狂的）叛逆与女性（受虐狂的）屈服之间没有解决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正是他与父亲关系的写照。而且，陀思妥也夫斯基良心上的自我惩罚是源于他父亲的惩罚性行为。弗洛伊德写道：

> 因此陀思妥也夫斯基的问题是，他是一个具有特别强的内在双性性情的人，他能够十分有力地保护自己，而不去依赖一位特别严厉的父亲。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 185）

图13　1508—1513年，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圣母、圣婴和圣安妮》画作。

事实上，虽然陀思妥也夫斯基博士严厉地要求他的孩子从小就要

专心致志地学习，但是他也是一个十分认真负责的父亲，他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了特别多的时间，从来没有对孩子实施过体罚，而且尽管他很难负担得起所需费用，他还是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以免他们挨打。

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在他所著的关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权威性传记中提到，弗洛伊德在一篇发表于1883年的传记中读到一个脚注，这个脚注暗示了“有一个特别的证据表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Feodor Mihailovich）的病与他早年家中的一件悲剧事件有关”。虽然本段中没有任何关于惩罚或者其父的信息，但弗洛伊德回忆起他曾在文中某处的一封致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信中读到过上述内容：

> 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传记中，我读到过一段话，将此人后来的病痛的根源归结于他少年时期其父对其极度严厉的惩罚。

这个例子表明弗洛伊德并非故意地通过歪曲回忆内容以支持他构建的关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精神病理；这是实现愿望的幻觉而导致的错误回忆，正如《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中描述的一样。疾病或“后来的病痛”指的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癫痫症。根据这个“证据”，弗洛伊德下结论说，陀思妥也夫斯基突发的疾病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是真正的癫痫病，是由情感冲突而非脑损伤引起的。他还认为，陀思妥也夫斯基在童年时代病症就“突然发作”过，这为他后来疾病的发作埋下了隐患，其特征是害怕死亡或突然陷入萎靡状态。约瑟夫·弗兰克最后作结，这些症状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童年时期都没有出现过，而是出现在1846年到1847年期间，当时陀思妥也夫斯基已经25岁。

据说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父亲在陀思妥也夫斯基18岁的时候被农奴所杀。弗洛伊德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癫痫病，不论是否是“真的”癫痫，解释为是一种对自我惩罚的受虐欲望，并认为它开始于听到父亲被杀的消息。事实上，除了他女儿记述的、未经证实的“家族传统”之外，所有的证据都显示，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第一次癫痫病发作发生在

1850年，当时他身处西伯利亚监狱。医疗记录明确显示他遭受典型的“癫痫病大发作”式惊厥（即“真正”癫痫病）的折磨，而且他的儿子阿列克谢（Aleksey）在3岁时也死于癫痫病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他可能患有癫痫病，因为有证据表明癫痫病是可以遗传的。

此处引用的约瑟夫·弗兰克对弗洛伊德猜想的详细驳斥足以说明，一旦弗洛伊德得出一个结论，对他来说修正它非常之难，他往往只会选择支持他的设想的证据。我们不禁想起他没能发现施雷伯法官的父亲的真性情的失败。要指出的是，约瑟夫·弗兰克对弗洛伊德没有特别的敌意，虽然他对弗洛伊德对陀思妥也夫斯基性格的解释持怀疑态度，但他一度认定弗洛伊德的解释是建立在精确的数据基础之上的。只是当他详细研究了陀思妥也夫斯基早年生活的一些事件之后，才发现弗洛伊德的解释在单纯的事实层面并不十分可靠。

弗洛伊德的文章《米开朗琪罗的摩西》属另外一类。文中没有对米开朗琪罗童年生活的思考，也没有对他精神病理的解释。相反，他就艺术史学家们对这座雕像的论证进行了充满见地的、详细的述评，并对米开朗琪罗选取的人物姿态的意义进行了推演。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对弗洛伊德敏锐的观察力、对细节的关注及其谦虚的主张留下深刻印象，而现代艺术历史学家是否同意下面弗洛伊德对雕像的解释并不重要。

> 它是一种人类可能达到的最高精神成就的具体的表现，是为奉献一生的事业而成功战胜内心情感的写照。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I. 233）

这篇文章既反映了弗洛伊德渊博的学识也体现出了他相当强的观察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洛伊德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最佳论文却是一篇几乎不涉及精神分析理论的文章。

如本章开头所述，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和文学是未满足的原欲升华的产物。尽管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升华是生活在人类文明的各种制约之下的正常人所必须经历的，但是其观点好像暗示着，如果原欲被完

全释放了，那么艺术和文学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同样也可推理出，因为艺术家们将他们如此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了创作升华心灵的作品的活动中，那么他们一定比正常人更容易患神经官能症。弗洛伊德确实是这样认为的。

艺术家本质上性格内向，较易患神经官能症。他经受着超强的本能需求的压迫。他渴望得到荣誉、权力、财富、名誉和女人的爱；但是他缺少获得这些满足的途径。结果是，像其他任何一个未满足的人一样，他脱离现实，将他所有的兴趣和原欲转移到去恣意构建他的幻想生活，而这又可能导致神经官能症。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VI. 376）

弗洛伊德认为幻想源自游戏。在他看来，游戏和幻想都涉及脱离现实，或者否认现实，因此在成长过程中应逐渐停止这类活动。

当成长中的孩子停止游戏的时候，他放弃的仅仅是与真实对象的联系；他不再游戏 了，而是幻想 。他修建空中的城堡，创造被称为白日梦的世界。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IX. 145）

创造性的作家所做的是和游戏中的孩子一样的事。他创造一个他非常重视的幻想世界——那是他倾注了大量情感的地方，同时他将其与现实严格区分开来。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IX. 144）

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快乐的人从不幻想，只有不满足的人才幻想。幻想的驱动力量是未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种愿望的实现，一个对令其不满的现实的矫正。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IX. 146）

神经官能症患者脱离现实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实不可忍受——无论是全部现实还是部分现实。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 218）

因此，游戏、梦和幻觉常联系在一起作为弥补现实中不满的一些

孩子气、逃避主义和实现愿望的手段。

在第五章里，我们提到弗洛伊德区分了两种精神活动，即“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前者受愿望实现原则和享乐原则支配，后者受有意识的计划和现实原则支配。

随着现实原则的引入，一种思想活动被分离出来：它不受现实的检验，始终只服从于享乐原则。这个活动就是幻 想 ，它在孩童的游戏中就已开始，后来以白日梦 的形式继续，它摈弃了对真实对象的依赖。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 222）

尽管不情愿地，弗洛伊德还是承认了艺术家们并非只是运用天赋逃避现实的神经官能症患者。

艺术中产生了一种调和这两种原则的新方式。一个艺术家最初是一个背离现实的人，因为他不能妥协于放弃满足本能需求的现实要求，他在幻想生活中让他的爱欲和野心得到全部释放。但是，他发现了一条从幻想世界重回现实的路，即通过运用他独特的天分，将他的幻想铸入一种新的真理，这种真理被人们奉为对现实的可贵反映。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 224）

这个对艺术及艺术家的奇特概念意味着，尽管艺术家可能侥幸避免罹患神经官能症，他的艺术仍旧是他间接获得本能满足的一种方式，如果他能更好地适应现实的话，他就会或者享受或者放弃这些本能满足。换言之，艺术根本上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在每个人都足够成熟，可以用现实原则取代享乐原则的理想世界里，将没有艺术存在的必要。

这个仿佛来自某个对文学和视觉艺术都极具鉴赏力、才气横溢的作家的结论，在大多数读者看来却极其怪异。如果弗洛伊德能够长寿到可以了解现代生物学思想的话，那么他也许会改变他的想法。

例如，生态学研究者普遍认为，小动物间的游戏就不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一种适应性活动。也就是说，游戏有助于探索，而

且，通过运动步骤的重复，游戏还有助于肌肉技能的发展。小动物之间及年轻人之间的打斗游戏，或许是一种学习掌控攻击行为的重要途径，它也会有助于成年以后实现性满足。

如果从生物学意义上说，游戏是一种适应性活动，那么幻想是否也具适应性的呢？有一些“无意义的”白日梦适合弗洛伊德的逃避主义范畴，但不是所有的幻想都属于这一类型。爱因斯坦将思考定义为“自由的概念游戏”，并且强调那种不受现实对象束缚的创造性思考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不受拘束地想象，他将不可能得出相对论理论，尽管这个理论诞生后尚需日后实验进行验证。我们曾提到过，弗洛伊德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最伟大的小说。虽然这本小说诞生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幻想，他还是包含了对真实人物的刻画，并且像每一部巨著一样，它提高和加深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而不是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的途径。

在第四章我们发现，弗洛伊德关于梦几乎总是一种被压抑愿望的虚幻实现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有些梦是应对创伤的方式；而有些梦是处理信息的方式。梦的后两种功能都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接受现实。

游戏、幻想和梦，这三种弗洛伊德视为逃避现实、实现愿望的手段而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可以同样被看作适应性活动，尤其可被看成是对我们的内心和外部经历进行选择并重新合并的方式。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的动机和科学家的动机是迥然不同的。艺术家创造性活动背后的驱力是表现为逃避现实的幻想的未满足原欲。科学家活动背后的驱力是对外部世界的掌控。因此艺术家所做的事情和科学家所做的事情自然有很大差异。但是，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二者都与创造秩序有关，都是从世界中和我们的经历中寻找意义，从差异中发现或构建统一。

近年来很多有创造力的精神分析师，如里克罗夫特、温尼克特、鲍尔比、玛丽昂·米尔纳（Marion Milner）和埃伦兹韦格（Ehrenzweig），都拒绝接受弗洛伊德将“初级过程”描述为古老、幼稚及适应不良的观点。幻想可能是逃避性的，但当它表现为创造性想

象的时候，就会变成人类适应世界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当戈雅（Goya）为他的《幻景》（Caprichos）作序时，以下铭文无疑是恰当而准确的。

被理性抛弃的幻想会催生可怕的恶魔；与理性相结合的幻想，是艺术之母，是艺术奇迹的源泉。

第九章
文化与宗教

总体上说，精神分析理论在人类学和宗教领域的应用是令人失望的。尽管弗洛伊德针对上述主题的观点通常并不被人类学家和神学家所接受，然而，它们的重要性在于论证了精神分析如何从神经官能症的一种治疗方法逐步演化成一种据称可以解释几乎所有人类行为的思想体系。

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弗洛伊德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但是他认为文明具有压迫性，因为在他看来，文明加于本能的限制已超过人类能够承受的限度，会导致某些神经官能症症状的出现。因此弗洛伊德热心于研究原始的、早期的、被文明牢牢约束之前的人类就不足为怪了。遗憾的是，弗洛伊德写作的时候是处于人类学的“扶手椅”时代，其特点是没有实地调查支持的大量理论的出现。当时，人们仍旧称那些属于文字出现以前的文化为“野蛮”文化，而且非常没有道理地，像弗洛伊德一样将“原始的”等同于“神经症的”或者“幼稚的”。今天我们意识到，很多所谓的原始人类都能以非常复杂的方式适应他们的环境；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多利亚时代的进化观点认为，从“野蛮的”开始发展到20世纪欧洲文明的灿烂顶峰是明显的进步，然而集中营真相的揭露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已终结了人类的这种自满。

《图腾与禁忌》这本书最初以4个部分分别面世，后于1913年首次合成一册出版。弗洛伊德对人类学的思考基于的主要资料是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zer）的《金枝》及罗伯逊·史密斯（Robertson Smith）与阿特金森（J. J. Atkinson）的理论，而这些参考资料在当今都部分地或全部地遭到质疑。

图腾是一个部落内某个特定社会团体使用的象征性符号。它可能是一种动物，或者是一种植物或自然现象，例如雨，当然这比较少见。图腾是尊敬和崇拜的对象，它受到各种禁止杀戮、食用，甚至碰触它的禁忌所保护。然而，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会进行仪式化的杀戮和圣典式的食用图腾动物的活动。对特定图腾的忠诚定义了社会关系，信仰相同图腾的成员之间通常是禁止发生性关系的。

弗洛伊德将图腾解释为父亲形象的代表。因为他从三个病例中了解到有俄狄浦斯情结冲突的男孩子都对某种似乎是代替父亲的动物产生过幻想或恐惧。弗洛伊德自己的病人“小汉斯”就有害怕被马吃掉的恐惧，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孩子受到的压抑及随之而来对父亲产生的敌意投射造成的。

按照达尔文的理论，弗洛伊德设想，原始人以小团体或“游牧部落”为单位生活，受一个强大的男性统治，他不仅将所有女性据为己有，而且还驱逐比他年轻的男性竞争对手，以此防止乱伦的发生，并鼓励其他成员在团体之外结成性纽带。弗洛伊德提出，

> 一天，被驱逐出去的兄弟们集结起来，杀了他们的父亲并吃掉了他，终结了父权制部落……图腾宴，这个或许是人类最早的节日，就这样成为这类难忘的、罪恶的行径的重复，它标志了社会组织、道德约束、宗教等诸多的开始。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I. 141-142）

弗洛伊德断言说，那些弑父者们备受这种罪恶感折磨，以至于：

> 他们通过禁止杀戮作为他们父亲替代物的图腾，来弥补他们行为的过失；通过释放妇女，放弃他们对女人的所有权来弃绝他们所取得的战果。因此，他们从因孝心而生的罪恶感之中创造了两个基本的图腾禁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其必然类似于俄狄浦斯情结中两个被压抑的愿望。无论谁违反了那些禁忌，他都会为犯下仅和原始社会相关的两项罪行而负罪。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I. 143）

仪式性的图腾宴可以被解释为“被压抑愿望的回归”，是仇恨父亲的原始冲动的暂时的象征性表达，这种罪恶感通常是潜意识的。

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原始时代的弑父事件是真实的，它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痕迹”。换句话说，他相信拉马克遭受质疑的有关习得特征遗传的假设。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当时几乎每个生物学家的头脑中已取代了拉马克学说。虽然弗洛伊德深谙达尔文的思想，但是直到临终前他都顽固地认为，习得的特征可以被遗传，宗教和道德

的起源确实可以追溯到某个具体的事件。

弗洛伊德对《图腾与禁忌》的态度似乎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他把它当作一个重大成就；另一方面，他曾提到："噢，别拿它当真——我是在一个雨天的周日下午构想出来的。"事实上，弗洛伊德除了对拉马克学说的坚信外，其理论还有几个站不住脚的地方。

第一，从人类学或者关于类人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中，并未找到只由一个男性统治的"原始游牧部落"的证据。达尔文的观点源自对大猩猩群落的组织结构道听途说的报告，而这在后来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第二，图腾宴极少见，只见于少数信仰图腾主义的部族中。

第三，弗洛伊德忽略了讨论母亲可能在图腾宗教里的重要性。这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典型遗漏，精神分析理论直到发展的后期，还一直习惯性地强调父亲的角色而忽视母亲的角色。这种强调也许是因为弗洛伊德与其父亲之间的问题要多于与其母亲的问题。

第四，作为弗洛伊德"图腾代表父亲"的理论基础的案例中，至少有一例可能得到十分不同的解释。5岁的"小汉斯"是弗洛伊德之友马克斯·格拉夫（Max Graf）的儿子，弗洛伊德只见过他一次，他通过他的父亲对这个孩子进行治疗。约翰·鲍尔比在重新审查了这个病案之后指出，像其他儿童恐惧症病人一样，小汉斯的恐惧很有可能是害怕他母亲消失而引起的。已被证实的是，他的母亲在教育小汉斯的时候使用了令人惊惧的威胁手段，如果小汉斯淘气，她就会威胁说她将离去，永不回来。

根据现代人类学、达尔文理论及鲍尔比关于"依附"的研究，人们很容易事后聪明地谴责弗洛伊德忽略了一些在他所处的时代根本不可能得到的证据。不过，《图腾与禁忌》中的观点确属比较离奇的推测，而且证明了弗洛伊德当发现可能支持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证据时，倾向于在事实基础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依然作出概括。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他1929年发表的文章中谈到，《图腾与禁忌》是弗洛伊德著作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这似乎有些令人费解，但是后来人们意识到他的评价并非基于人类学，而是完全从文学角度作出

的。曼写道，《图腾与禁忌》

毫无疑问是弗洛伊德最具艺术价值的著作之一。无论从概念上还是形式上，它都是一部文学杰作，堪称最伟大的文学散文范例。

《摩西与一神教》是弗洛伊德的最后一本成书，直到他80岁以后才完成。人们对它的批评与一些对《图腾与禁忌》的批评相同。弗洛伊德有争议地认为，摩西，这个犹太民族的领袖和创造者，原本是埃及人，正如他名字的出处所暗示的那样。据《圣经》中关于摩西的故事记载，摩西的父母为了躲避法老的迫害，将摩西藏在河边的芦苇方舟里，法老的女儿从那里救了他。这位公主视摩西如己出地将其抚养长大，弗洛伊德藉此推断摩西就是她的亲生儿子而无犹太血统，这并非毫无根据。他继续推断说，摩西接受了法老阿赫纳吞（Akhenaten）策动的用一神教替代多神崇拜的思想革命。阿赫纳吞死后，出现了威胁一神教的反乱。摩西因此决心与少数被压迫的犹太人站在一起，通过一系列行动巩固了他们的犹太身份，即坚持一神教并奉行割礼，最终领导犹太人走出埃及去寻找希望之乡。尽管《圣经》记载摩西120岁时寿终，但是弗洛伊德情愿相信摩西是被自己人所杀，依据的是恩斯特·塞林（Ernst Sellin）那个一经提出便遭到其他犹太学者口诛笔伐的观点。弗洛伊德急切地采纳了塞林的假设，因为它能够支持他关于弑父情结和宗教起源的推论。弗洛伊德猜想，摩西的被杀加强了上文描述的、始于原始弑父情结的遗传的罪恶感，使犹太人潜意识中形成了持久的罪恶感。

似乎可以推测，对杀害摩西的懊悔产生了盼望弥赛亚（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主）归来的幻想，人们希望他回来救赎他的人民，带领他们到达他们的希望之乡。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II. 89）

大多数批评家将《摩西与一神教》斥为弗洛伊德最没有说服力的

作品。像在《图腾与禁忌》中一样，拉马克学派关于习得品质的遗传假设也是这本书论点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他很多从历史学角度对本书提出的异议在此就无需罗列了。

在第一章提到过，弗洛伊德从未信奉过犹太教。虽然他承认，宗教可能有时在抑制神经官能症症状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他坚持宗教信仰是一种愿望实现的幻觉。在弗洛伊德看来，神有三方面的任务：

> 他们必须驱除自然中的恐怖事物；必须使人接受命运的残酷，尤其是死亡中体现出的残酷；必须为文明生活带给人类的磨难予以补偿。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 18）

弗洛伊德相信，宗教起源于人的无助感。成年以后，人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从地震到疾病，它们对人构成威胁而人类无法控制。在小的时候，人们就更加无助，但是那时会意识到，父亲，无论多么令他生畏，至少能保护他免受一些常见危险的伤害。

> 从婴儿的无助及对父亲呵护的渴望中衍生出的宗教需求在我看来是无可争议的，尤其是因为这种感觉不是儿时需求的简单延续，而是因害怕命运的超级力量而永久持续着。我想不出在儿童时代能有任何比渴求父亲保护更强烈的需求。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 72）

在一篇早些的文章中，弗洛伊德更着重强调了来自内心的危险。他指出了宗教习俗与强迫性仪式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他看来，强迫性仪式用于保护自我，不让压抑的幻觉、思想，或性冲动出现，同时是这些冲动置换或部分的表现。例如，一个病人总有不断洗手的强迫性冲动，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对手淫的内疚表现。而且，他还强迫自己清洗单个手指，作出表示性交的淫秽手势。弗洛伊德认为，宗教作为文明的一部分，是建立在

> 压制、放弃某种本能冲动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像神经官能症一样，这些冲动并非仅仅是性本能的组成部分。他们是利己主义的、对社会有害的本能，尽管

他们通常并非没有性成分在里面。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IX. 125）

虔诚的人在忏悔词里承认他们是有罪的人，因此他们需要通过遵守一些仪式来抵御诱惑，来控制或抵挡那些总具有突围威胁的本能力量。弗洛伊德竟然断言说，宗教可以被视作“一种普遍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宗教通过让人们遵守仪式来抗拒其内心难以驾驭的冲动；通过让人们默许用文明限制个人自私的冲动，来保护他们不受外界危险的伤害。这种对本能冲动的弃绝使他们与他人达成某种程度的团结成为可能，因此减少无助感。

另外，宗教还许诺来生。这不仅减少了人面对死亡的恐惧，而且还暗示了为维护文明而放弃了尘世的享乐的人死后将被回报以天堂的快乐。

在本章开始我们已经提到，弗洛伊德将文明视为具有过度压迫性并会引发神经官能症。他对文明的厌恶还不止于此。人们有理由认为，他对自己冲动的极端、强迫性的控制，对他来说无疑是负担。弗洛伊德当然承认，如果人作为一个物种想要生存的话，那么文明化是必须的。但是他指出了文明使个体遭受的“伤害”。下面的引文显然旨在讽刺，但是它展示了弗洛伊德心中一个“自然的”人不受束缚时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已经谈过了文明的压力导致的对文明的敌意，及文明所要求的对本能需求的放弃。想象一下，如果禁止被取消，——如果一个人可以把任何他喜欢的女人作为性对象，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死他的情敌或挡住他路的其他人，而且可以不经允许就任意拿走别人的财产——那将令人多么开心！生活中将会有多少满足啊！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 15）

这种灰暗的描写源于精神分析理论是一种“本能”理论的事实。也就是说，它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如何找到，或如何没能

找到释放他或她的本能冲动的方法。弗洛伊德理论给人的印象是，与他人关系只有在有助于本能满足时才有价值。友情或者其他种类的关系本身并没有价值。所有关系都被视作是“目的受阻的”性关系的替代。弗洛伊德对基督教戒律“你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的批判也不足为奇，他把它称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戒律，因为“它的实现是不合理的”。我们即将看到，现代精神分析理论要比弗洛伊德更关注一个人从出生开始与他人建立的关系的质量和类型。

弗洛伊德对宗教的看法因以下几个原因易遭批判。首先，它完全是以父系为基础的。虽然圣母马利亚或者其他女神的重要影响已完全成为过去，维也纳当时仍是一个以天主教信仰为主的城市。这个遗漏在《图腾与禁忌》的讨论中也被注意到。

第二，弗洛伊德没有提及类似早期佛教的宗教。佛教似乎并不要求相信某一个或多个神，但是它指出一种能带来深远满足感的生活方式。

第三，就像弗洛伊德本人承认的那样，他无法理解令人心醉、神秘的经历，而这种经历对很多人来说是他们宗教情感的源泉。在弗洛伊德寄给他的朋友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一本他反驳宗教的书《一个幻觉的未来》后，后者抱怨弗洛伊德不懂得宗教情感的真正来源。弗洛伊德写道：

> 他说这包含了一种特别的情感，一直伴随他左右，并从其他很多人那里得到过证实。他可能认为这种感觉存在于千百万人心中，他愿意称之为一种“永恒”的感动，一种无限的、无边无际的感觉——宛如“海洋般的”感觉。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 64）

弗洛伊德恰当地将这种感觉描述成：

> 一种牢不可破的纽带的感觉，一种个体与外部世界合而为一的感觉。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 65）

弗洛伊德将这种情感比作“爱到深处”的感觉，即感到与被爱的人完全成为一体的感觉。弗洛伊德将此解释为很早以前状态的极端回归。那是哺乳期的婴儿学会区分自己和母亲或自己和外界之前的一种状态。因此，陷入深爱状态和陷入海洋般的感觉都是幻觉。实际上，弗洛伊德认为陷入深爱是一种疯狂，一种“精神病的标准原型”。

弗洛伊德部分同意罗兰的观点，他承认，海洋般的情感及与宇宙合而为一的感觉也许在后来阶段会与宗教情感相连，他将此形容为：

> 一种寻求宗教安慰的最初尝试，好像它是消除自我认定的来自外界的危险的另外一种方式。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 72）

虽然每个人都会自我欺骗和产生愿望满足的错觉，但是不同于弗洛伊德，那些经历过海洋般情感的人不会满意他的解释。不同的人，从宗教神秘分子到像海军少将伯德（Admiral Byrd）一样的探险家，对那种心醉狂喜的经历的描述暗示着，这样的经历是他们一生中最意义深远的时刻，有时会永久性改变他们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经历无需用宗教术语来解释，但它们也不应该被当作幻觉而摈弃。防卫性的愿望满足即便对那些沉浸于幻想中的人来说也有些不真实，但是海洋般的体验一定是深刻的、必然存在的。我们在这里不适合冒险去给海洋般的经历一个解释，但是足可以说，如果弗洛伊德本人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可能会不得不考虑对这种经历作出其他的解释了。

弗洛伊德在结束《一个幻觉的未来》这本书时用了他处理特别有争议的问题的惯用方法，即他与一个假想敌之间进行对抗性辩论。弗洛伊德提出，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智力终将居主导地位，而宗教信仰将被摈弃。

> 我们可以一直坚持认为，人类的智力与他的本能生活相比是无力的，这一点上我们也许是对的。然而，智力的这种弱势有其特殊性。智力的声音是温和的，

但是它永不停息，直到被倾听。无数次被拒绝后，它终将取得胜利。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 53）

弗洛伊德将智识等同于科学，尽管，如前文提到的，人们不可能认可弗洛伊德的看法，认为精神分析是，或者可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弗洛伊德在书末尾写下了一句名言：

不，我们的科学不是幻觉。但是，认为我们可以从别处得到科学不能给予我们的东西则是一种幻觉。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 56）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当弗洛伊德将假想敌的神灵称为“你的神”，即传统的、宗教信仰中的神时，他是在反对他讽刺地称为“我们的神”的真言——理性的声音。弗洛伊德的这种措词方式使我们对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排他地信仰理性和科学可能会像信奉神一样是缺乏理性的。毋庸置疑的是，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绝对信奉远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

第十章

作为治疗师的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技术

在第四章，我们简要描述了精神分析技术的三个方面：自由联想、梦的解析及移情和反移情。弗洛伊德写过数篇关于精神分析治疗技术的文章。即使像这样一本简短的介绍弗洛伊德的书，也一定要包括这方面的总结，因为他的方法几乎影响了西方随后出现的每种精神疗法。弗洛伊德阐述的治疗原则与传统医生在治疗实践中的原则是十分不同的，它创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当时一定是具有革命性的。现代精神分析师很少坚持弗洛伊德的所有精神分析主张，但是精神分析和其他形式的精神疗法，大体上依旧遵循弗洛伊德的步骤，他创立的精神分析技术成为他留给后人的一份恒久的遗产。

早在1904年，弗洛伊德就针对筛选适合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设定了一定的标准。他要求病人应当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个性稳定。他拒绝接受精神病患者，即患有精神分裂症或特别严重的抑郁症（忧郁性疾病）的人。前文提到过，患有躁狂症或轻度躁狂症的病人很少咨询精神分析师。尽管有些精神分析师在这个方面无视弗洛伊德的建议，试图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作精神分析，但是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

弗洛伊德意识到，心理疾病中精神病的病种可能会表现出神经官能症症状，而且可能不会立刻被意识到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疾病。鉴于此，弗洛伊德明智地建议先有一个持续一到二周的试分析期。他十分谨慎地警告说，在神经 性食欲缺乏症 或其他需要立刻消除症状的危险情况中，不宜使用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认为，鉴于两种原因，接近或超过50岁的人不适合接受精神分析。第一，他担心病人在一生中积累的大量素材可能使治疗无限期地进行下去。现代精神分析师们已不再接受这个看法，他们经常能成功地治愈年长的病人。弗洛伊德提出的不接受中老年患者的另外一个原因更为有趣。他说，“老年人已经无法教育”，而青少年及儿童则“通常极易受到影响”。弗洛伊德经常称，精神分析治疗中直接影响

和建议的作用甚微。而他又在这段话中说明，在精神分析中建议的作用比他通常承认的要大。

在第四章中，我们谈到了要求病人仰卧在躺椅上，而精神分析师坐在病人视线之外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样做可以鼓励病人的自由联想；第二，弗洛伊德承认他害怕被人一天8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地盯视；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弗洛伊德认为，病人最好不要看到精神分析师面部表情的变化。这三个原因都有一定道理，大多数弗洛伊德派分析师们都继续使用躺椅。其他学派的分析师感觉使用躺椅太不自然，他们更喜欢病人和分析师相向而坐，实现一种面对面、看起来更平等的交流。

弗洛伊德建议精神分析师不要记笔记，因为这会干扰其保持“均匀分配的注意力”，使其无法坚持不对病人的话的重要性作预先判断的理念。弗洛伊德指出，分析师在某个特定治疗阶段听到的内容的重要性只能在日后评定。分析师

> 必须像调整接收器一样将他的潜意识对准病人发出信号的潜意识。像调整电话听筒以听清发射信号一样，他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病人。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 113-114）

任何一名从业的精神分析师都会认为这条建议是合理的。精神分析师们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给出尚未成熟的解释，即在证据不足的时候仓促得出错误结论。

人们一贯认为精神分析师漠然得不近人情；他们只关心解析病人提供的素材，而不因后者的痛苦而受触动。我们已经提到过，当弗洛伊德进行精神分析时，他的态度是“令人惊异地客观”。他写道：

> 我不能建议我的同事们在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过于急迫地以外科医生为榜样。外科医生能撇开所有情感，甚至是人类同情心，全神贯注于一个目标，那就是尽可能技术高超地实施手术……要求分析师具有同样情感上的冷静的原因是，这能给医患双方都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对于医生，是一种理想的、对他自己情感生活的保护；而对病人，是得到我们今天能够给予他的最大限度的帮助。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 115）

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超然无疑是对分析师的合理要求。如果分析师与病人关系过于密切，那么他将不能保持客观，看不出病人如何应为自己的病难负责。另一方面，如果他坚持像弗洛伊德建议的那样态度超然，那么有一种危险倾向是，他将不能把病人当作有情感的人去理解。研究表明，分析师应能给予病人真正的关怀，他们对病人热情的接纳会促进病人个性的改变。精神分析及由它衍生出的其他形式的精神疗法不能真正被视为等同于外科手术，部分原因是我们不能再像弗洛伊德那样确定可以辨明每一例神经官能症中独立存在的病源。与被压抑的婴儿性幻想相比，现代分析师们更关注的是病人完整的个性，及他一生中建立的人际关系。这种关注要求分析师们持有一种不同于弗洛伊德所建议的态度。尽管分析师无论对病人的行为认同与否必须保持客观的态度，他必须传达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恰当地言称的“无条件的正面态度”，即他必须真正将病人当作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

第四章中提到，弗洛伊德接受了荣格提出的分析师自己首先应被分析的要求。弗洛伊德接下来建议说，分析师应抵挡住谈论自己的个性和问题的诱惑，而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信任值得换取另一个信任”的时候，受这种诱惑是自然的。弗洛伊德建议说：

> 医生对病人来说应该是不透明的；像一面镜子一样，应该只向他们展示所能展现给他的东西。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 118）

虽然并非每个精神分析师都同意，我认为弗洛伊德的这个要求是完全正确的。谈论自己是一种自我沉迷，分析师应该避免这样做。分析师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只能把自己视为病人的代理人。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分析师的自我表露也会对解释移情造成无法克服的困难。

弗洛伊德警告防止说教，不要向病人推荐读物，不要试图引导获

得解脱的病人走上分析师认为他应该走的新路。尽管有些精神分析师通过书和文章向潜在的病人介绍他们将会出现的症状，但是弗洛伊德再次有洞见地质疑这样的做法。阅读有关精神分析的著作易于引起智力争论而牺牲个人体验；给予未经请求的建议是倨傲的施予，因此是对一个独立自主的病人的贬低。

弗洛伊德建议说，大部分接受精神分析的病人除了周日和公共假日之外应该每天看医生，虽然他说过“轻微病例”或在治疗中“进展良好的”病例可以来得稍微少一些。他甚至觉得周日的间歇常都会对分析工作产生某种模糊影响。绝大多数现代精神分析师约见病人的次数远非如此频繁。这部分上是因为周六工作的习惯基本上已不复存在，部分上是因为只有少数病人负担得起精神分析的昂贵费用。多看一些病人但减少诊疗次数，自然对分析师有利，因为他可以每次收取较高的费用。弗洛伊德不会赞同这种对他治疗技术的变更。

弗洛伊德对困顿的病人可以非常慷慨，但是他对钱还是绝对现实的。他的原则是每天分给每个病人一小时治疗时间，并收取一小时的诊疗费，无论病人是否来就诊。乍一看，这似乎有些苛刻，但是弗洛伊德辩解说，除非要求病人付钱，否则他们经常会不来就诊以示抗拒，常会在即将获得某个新发现的关口找出多种理由不来。

弗洛伊德公开表示拒绝接收那些在分析治疗之外和他有任何关系的病人。

> 当分析师和他的新病人或其家庭存在友情或社会关系的时候，特殊困难就出现了。当精神分析师被请求对他朋友的妻子或孩子进行治疗时，他必须准备好牺牲那份友情，不论治疗的结果如何，如果他找不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替代他的话，他必须作出牺牲。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 125）

大多数精神分析师认为这个原则是合理的，尤其因为移情已经变成精神分析治疗中的核心问题，但是弗洛伊德本人也没能坚持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例如，弗洛伊德曾花了几年时间分析了他的女儿安

娜，这是对精神分析原则的公然违背，大多数精神分析师会对此予以谴责。值得一提的是弗洛伊德的孩子当中只有安娜成为了精神分析师，她因对父亲恒久的热爱和奉献而一直未婚。在弗洛伊德患病晚期，是安娜而非他的妻子玛莎一直照顾他。

弗洛伊德经常违背他自己的训谕，时常谈论起自己，有时还聊起他的家庭。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le）曾嫁给过理查德·奥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是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朋友，据这位女诗人记载，年事已高的弗洛伊德曾用拳头捶打她当时所躺的躺椅的上端，说：

> 问题就是，我老了，你认为不值得你爱了。

但是那些批判弗洛伊德违反精神分析规定的人似乎忘记了，正是他创立了这些规定。

弗洛伊德自己的病例

弗洛伊德的病例十分闻名，既因为它们是他的精神分析方法的实例，也因为它们本身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研读。对弗洛伊德著作的细致分析显示，他顺带提到的有133起个案，但是只对其中6个作了长篇描述，其中包括弗洛伊德从未亲见的施雷伯法官和由父亲作中间介绍人的“小汉斯”。剩下的4个案例是弗洛伊德亲自诊疗分析的，包括1900年接受了11周治疗的“多拉”、从1907年开始治疗了11个月的“鼠人”、一位18岁的未提及姓名的女同性恋（她的治疗在开始后“不久”就停止了）。第4个案例是著名的“狼人”，他的案例后来被跟踪研究了60多年，他到1979年才去世。

Sonder-Abdruck aus Monatsschr. f. Psychiatrie u. Neurologie. Bd. XVIII. H. 4.
Herausgegeben von C. Wernicke und Th. Ziehen.
Verlag von S. Karger in Berlin NW. 6.

Bruchstück einer Hysterie-Analyse.

Von
Prof. Dr. SIGM. FREUD
in Wien.

Vorwort.

Wenn ich nach längerer Pause daran gehe, meine in den Jahren 1895 und 1896 aufgestellten Behauptungen über die Pathogenese hysterischer Symptome und die psychischen Vorgänge bei der Hysterie durch ausführliche Mitteilung einer Kranken- und Behandlungsgeschichte zu erhärten, so kann ich mir dieses Vorwort nicht ersparen, welches mein Tun einerseits nach verschiedenen Richtungen rechtfertigen, anderseits die Erwartungen, die es empfangen werden, auf ein billiges Maass zurückführen soll.

Es war sicherlich misslich, dass ich Forschungsergebnisse, und zwar solche von überraschender und wenig einschmeichelnder Art, veröffentlichen musste, denen die Nachprüfung von Seiten der Fachgenossen notwendiger Weise versagt blieb. Es ist aber kaum weniger misslich, wenn ich jetzt beginne, etwas von dem Material dem allgemeinen Urteil zugänglich zu machen, aus dem ich jene Ergebnisse gewonnen hatte. Ich werde dem Vorwurfe nicht entgehen. Hatte er damals gelautet, dass ich nichts von meinen Kranken mitgeteilt, so wird er nun lauten, dass ich von meinen Kranken mitgeteilt, was man nicht mitteilen soll. Ich hoffe, es werden die nämlichen Personen sein, welche in solcher Art den Vorwand für ihren Vorwurf wechseln werden, und gebe es von vornherein auf, diesen Kritikern jemals ihren Vorwurf zu entreissen.

Die Veröffentlichung meiner Krankengeschichten bleibt für mich eine schwer zu lösende Aufgabe, auch wenn ich mich um jene einsichtslosen Uebelwollenden weiter nicht bekümmere. Die Schwierigkeiten sind zum Teil technischer Natur, zum anderen Teil gehen sie aus dem Wesen der Verhältnisse selbst hervor. Wenn es richtig ist, dass die Verursachung der hysterischen Erkrankungen in den Intimitäten des psycho-sexuellen Lebens der Kranken gefunden wird, und dass die hysterischen Symptome der Ausdruck ihrer geheimsten verdrängten Wünsche sind, so kann die Klarlegung eines Falles von Hysterie nicht anders, als diese Intimitäten aufdecken und diese Geheimnisse verraten. Es ist gewiss, dass die Kranken nie gesprochen hätten, wenn ihnen die Möglichkeit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Verwertung ihrer

图14　1901/1905年，多拉个案分析的第一版首页。

“多拉”病例的研究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一个歇斯底里症的分析片段”。多拉是一个18岁的女孩，她的父母婚姻不幸福，他们与另外一对同样不幸福的夫妻是很好的朋友，弗洛伊德称之为K先生和K夫人。K夫人是多拉父亲的情人。多拉对K夫人的感情即现今所谓的“迷恋”。K先生在多拉14岁的时候曾经对她实施过性骚扰，当时她强烈地谴责了他。当她16岁的时候，她宣布对K先生十分憎恶，并说他又对她作出了性举动。从那时起，她出现了歇斯底里症状，复发性失声、巨烈咳嗽、阵发性晕厥，而且忧郁、回避社交及有自杀企图。

多拉的案例很重要，如欧内斯特·琼斯记载，多年来它一直是精神分析研究者的典范案例。如弗洛伊德希望的那样，它展示了梦在精神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证明了弗洛伊德在解析梦时的独创性。此外它还揭示了很多弗洛伊德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治疗之初，弗洛伊德就已认定多拉多年来一直爱着K先生，对于这个论断，多拉一直坚决否认，直到这个短暂治疗中的倒数第二次诊疗才接受。弗洛伊德将她一再的否认视为是对他的结论的一种证实，而非否定。

> 当一个被压抑的想法首次出现在有意识的感知中时，病人口中的“不”只会表明压抑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它成为一种压抑强度指数。如果你不把“不”视作病人客观的判断（病人无法作出客观的判断），对它不予理会而继续分析下去的话，很快你就会找到证据，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渴望的“是”。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VII. 58-59）

然而，多拉在决心终止治疗前坚持否认她爱K先生（毕竟这个人比她年龄大很多）。正如有些人评述的，弗洛伊德的解释使她不知所措。直到在倒数第二次诊疗后，弗洛伊德终于能够写下下列文字：

> 多拉不再争辩。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VII. 104）

任何不带偏见研读多拉案例的读者都会得出结论说，一旦弗洛伊

德决定了某一点，他不会接受“不”的答案，他会运用他全部的智慧及极强的说服力去迫使他的病人承认他是对的。如我们已经谈到的，弗洛伊德在写作中也是如此，尤其是当他设法预测他的假想敌可能会提出来的反对意见时，他更会这样做。

《一个女同性恋病例的心理成因》一文强调了现在精神分析师们普遍公认的一点，即被父母强行带到医师那里接受治疗的青少年很少会有改善。弗洛伊德也承认这一点，并指出，这个18岁的病人

> 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毛病（她自己并没感到任何痛苦，也没抱怨过她的状况）。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VIII. 150）

但是，6个月之前她曾企图自杀。弗洛伊德承认，同性恋偏好转化为异性恋取向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弗洛伊德提醒她的父母说，他们希望看到女儿发生上述转变的愿望很可能实现不了。在短时间内，精神分析显然没有起到作用，这个女孩批驳了弗洛伊德的分析解释。根据他的记述，基于这个女孩对父亲及所有男人的憎恨，她已经显示出了一种负面移情。弗洛伊德中断了治疗，并建议女孩从女性医师处寻求帮助。弗洛伊德关于这个女孩早期的性欲发展，关于她拒绝男性、爱上妈妈替代者的原因及导致她产生自杀企图的事件和情感的解释，都是相当有趣的。但是，为什么弗洛伊德在清楚意识到了这个病案中存在如此多与精神分析相反的指征后还是给她进行了治疗呢？答案就在这篇论文的第一句话里：

> 女性同性恋倾向并不比男性同性恋倾向少见，尽管远不那么引人注目，它不仅一直被法律忽略，而且也被精神分析研究所忽略。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VIII. 147）

很明显，弗洛伊德对她的治疗是为了弥补这个空白。他一定已意识到，对某个并没有生病而且没有主动寻求治疗的人作精神分析，对

这个人而言毫无用处，尽管对作为治疗师的他来说并非如此。弗洛伊德应该同意，在他心中好奇心和求知欲一直比他对治疗效果的任何期待都重要。他当时也许认为，正因为没有几个女同性恋者主动寻求治疗，所以他“利用”这个病人进行研究是合理的。

“鼠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案例。它是弗洛伊德最有趣、最成功的病例之一。“鼠人”是一名29岁的律师，他在1907年10月1日首次问诊弗洛伊德。他抱怨自己有强迫性思想，即一些讨厌的想法和幻想会自动进入他的脑海，无法除去（不熟悉这种感受的人可以回忆一下这种常见的经历：一支曲子“萦绕在脑海”，挥之不去）。困扰欧内斯特·兰泽（Ernst Lanzer，“鼠人”的名字）的思想确实恐怖。其中包括害怕某种可怕的事即将发生在他喜欢的人身上，即发生在他的父亲或者他倾慕的一位女性身上的恐惧。弗洛伊德惊奇地发现，他害怕父亲出事的强迫性恐惧一直持续着，尽管他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

但是最糟糕的强迫性想法与他服兵役时别人告诉他的一种东方的惩罚方式有关。那是将一个盛满老鼠的罐子系在罪犯的屁股上，目的是让老鼠从犯人的肛门进入他的体内。兰泽承认，他曾设想过将这样的惩罚施加到那位上文提到过的女性身上的情形，他觉得只有迫使自己执行某种强迫性的仪式才能抵挡这种危险。

弗洛伊德对这个病例长篇的，但并不一定全面的描述构成了标准版 第十卷的后半部分。它体现了弗洛伊德最睿智、最令人信服的一面。弗洛伊德将强迫性怀疑和正反情感并存最终追溯到爱与恨的冲突，这种分析是有说服力的。由于他自己的强迫性个性，弗洛伊德明显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有特殊的移情。他成功地为“鼠人”摆脱了痛楚、恐怖的想法，他写道：

> 持续了近一年的治疗使病人完全找回了原来的个性，除去了他的情感抑制。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 155）

怀疑论者也许会指出我们对欧内斯特·兰泽没有进行长期跟踪研究。从童年早期就开始受到强迫性思想和习惯折磨的强迫性神经官能

症患者，很少能够永久摆脱症状，在他们受到压力的时候，很容易会旧症复发。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接下来的“狼人”病例中情况即是如此。“狼人”接受了精神分析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漫长跟踪研究。

弗洛伊德将他的“狼人”病案命名为“一个婴儿神经官能症的历史”。“狼人”是一个在大庄园里长大的富有的俄国人。他于1910年2月首次问诊弗洛伊德，直至1914年7月结束治疗。弗洛伊德记录说，当时他认为他已痊愈。这个病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当1919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再次拜访弗洛伊德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精神和情感状态非常满意，而且没有想过继续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然而，弗洛伊德在听完他的自述后，却不这样认为，他建议他再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弗洛伊德从1919年11月开始继续对他治疗，直到1920年结束。之后他报告说：

> 还有一点一直没有被攻克的移情问题，现在终于得以成功地解决。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VII. 122）

像“鼠人”一样，从童年早期开始，“狼人”就一直不同程度地受到复发性抑郁和各种强迫性症状的折磨。他的别名得于他四岁起对狼产生的恐惧，更确切地说，是来自他当时做过的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看见六七只白色的狼坐在他卧室窗外的一棵核桃树的树枝上，他被吓坏了。弗洛伊德写道，他坚信在这个梦的背后隐藏着诱发病人婴儿神经官能症的原因。这里我们不可能详细描述弗洛伊德得出这个解释的具体步骤。事实上，他或许是明智地，在自己的描述中也省略了很多这方面的细节。他“从梦者潜意识记忆痕迹的混乱中”得出的结论是，患者在一岁半左右躺在小童床上的时候，他目睹了父母之间的性交行为。从精神分析的早期发展开始，弗洛伊德就坚信，看到父母性交的“原始情景”会对小孩产生创伤性后果。这表明了他的大多数病人都是来自上层社会，因为在穷人狭促的房子里，小孩子们一定会一周目击好几次这样的情景。弗洛伊德不止一次暗示说，劳动阶层不容易上患神经官能症。

弗洛伊德如此坚信他的解释，他自信地写道，他的病人的性生活因早期的这个经历而变得“支离破碎”。然而“狼人”自己并没有回忆起这样的事件。因为弗洛伊德禁止他作出评判，他当时似乎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病理重建。但是后来他显然再没有那样做。他在87岁时接受一个采访时透露：

> 你知道，我从未把那种梦的解析当回事。在我的故事里，梦解释了什么？弗洛伊德将一切起因都追溯到他从梦的解析中得出的原始情景。但是那个情景并没有在梦里出现过。他把白色的狼解释成男人的睡衣或者类似的东西，比如床单或衣服，我觉得是牵强的。梦中开着窗子的那个场景、坐在那里的狼，他的解释，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些都毫无关联。实在是太牵强了。

他在对弗洛伊德的分析描述中，反复强调弗洛伊德的个性是如何令他印象深刻，他是如何在弗洛伊德身上找到了父亲的影子。弗洛伊德

> 对我相当了解，就像他在治疗过程中经常告诉我的那样，这自然加深了我对他的依附。

“狼人”透露，弗洛伊德与他讨论陀思妥也夫斯基，谈论他儿子的滑雪事故，并且在他觉得合适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给他直接的建议。在第一阶段治疗结束的时候，弗洛伊德建议“狼人”送给他一个礼物，认为“这样他的感激之情就不至于过于强烈”。“狼人”听从了他的建议，将一个埃及小雕像藏品送给了他。毫无疑问，“狼人”这个阶段状况的改善与弗洛伊德关于婴儿性经历的分析解释毫无关系，相反与弗洛伊德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密切相关。他把弗洛伊德当作可以依靠的、充满同情心的父亲般的人物。

当“狼人”在战争之后回来接受第二阶段分析的时候，他已经失掉了所有的财产。弗洛伊德免费为他治疗，还亲自给他经济帮助，并且曾持续有好几年为他从其他途径募集治疗费。1926年，他从鲁思·麦克·布伦斯威克（Ruth Mack Brunswick）博士处接受了另外一段分析

治疗。从那以后，他断续接受了布伦斯威克博士和至少3名其他的精神分析师的治疗。精神病学家会认为这是一例典型的慢性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他最终在1979年5月7日去世，享年92岁。卡林·奥布霍尔泽（Karin Obholzer）一系列直到他去世前的采访记录显示，他在近90岁时，与女人相处仍有困难，仍会时常感到抑郁，也依然被强迫性想法和习惯所折磨。弗洛伊德的这位最著名的病人并没有像弗洛伊德与之最初接触时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宣传精神分析的活广告。

即便考虑到在呈现精神分析病例时不违反对病人的保密原则的困难，经弗洛伊德本人长时间治疗并详细描述过的病例数目还是实在太少了。而且，在这些病例中只有一例显示了病症得到实质性改善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费希尔（Fisher）和格林伯格（Greenberg）总结说：

> 弗洛伊德从来没有以统计学或者个案分析的形式展示过任何数据，以表明大量他亲手诊疗过的病人从他的治疗中获益。

这是为什么呢？有人会说弗洛伊德提供不出这样的数据是因为他的治疗没有产生多少良好的效果。我个人认为，原因在于弗洛伊德对思想理念的兴趣，要远远大于他对病人的兴趣。他想要的是能够陈述他的思想的时间和机会，从而说服整个世界都认可和接受他对人类的革命性的洞见。至于他描述的病例是否能够证明精神分析是一种有效治疗手段对他并不重要。他看重的是他选择的病例要支持他关于人性的理论。

第十一章
今日的精神分析

虽然弗洛伊德自己主要关心的是精神分析的研究和精神分析理论而非治疗法，但是读者会希望了解精神分析现在的地位如何，例如，它是否被认为是治疗神经官能障碍的有效疗法。虽然大量研究都致力于讨论这些问题，但是还是很难给出答案。这其中有很多原因。

首先，研究表明精神分析师在治疗目标和预期以及他们对待病人的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使得即使在弗洛伊德学派内部都不可能存在一种确定的、可以称之为“精神分析”的心理疗法。大多数旨在检验精神分析成果的研究都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变量。看起来相对明确的是，按照弗洛伊德最初设定的方式进行的精神分析，如使用自由联想、躺椅、每周诊疗5到6次等方法，在缓解神经官能症痛苦方面，并不比相对不太深入密集、以分析为主导的心理疗法更为有效。在20世纪50年代，艾森克（Eysenck）等人曾力图证明精神分析毫无效果。他们对精神分析的抨击引发了大量研究。虽然不能说弗洛伊德运用的精神分析比由它演变出来的其他形式的心理疗法更为有效，但是人们一致认为，一个饱受神经问题折磨的人如果能从一个经验丰富的精神治疗师处得到帮助，当然要比她坐等痛苦自然消退更有可能康复。

第二，很难定义什么是治愈。弗洛伊德最初创立精神分析时旨在除去病人的歇斯底里和强迫性症状。早期的精神分析师和他们的病人曾热切地进一步希望，精神分析能带给他们个性和性格结构上的深刻变化。当时他们十分关心的是，是否对“X”或者“Y”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仿佛这是可以实现的。弗洛伊德本人没有表达过这样的奢望。今天，大多数精神分析师已不像弗洛伊德那样自信能够确定神经官能症的“起因”。当精神分析起作用时——它当然可以起作用，是因为它可能使病人有效地控制了他的精神病理，而不是将其根除。寻求精神分析帮助的病人会感到绝望，无法应对他们的问题，而使他们对自己的长处和局限有更好的了解对他们而言经常是极有帮助的，即便他们的个性并没有因此得到本质的改变。

在另一本书中，我曾引用自己的一个病例以充分说明评价任何形式的心理疗法都是困难的。我收到了一封25年前我在国家卫生部工作

时曾经短暂治疗过的一位病人的来信。他想要我治疗他的女儿。他在信中写道："我可以真诚地说，您对我的痛苦6个月的耐心聆听，对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尽管我的异性装扮癖没有痊愈，但是我对生活及对他人的看法得以重新确立。为此，我不胜感激。这是我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

对这个病例的治疗可以被评价为可悲的失败，因为他的主要症状——异性装扮癖，没有被治愈。但是，阅读他治疗结束这么久之后的来信，人们会承认，某种重要的变化确实发生了，而这直接归因于治疗。我当时给这位病人的有限的精神治疗使他变得更能够接受自己和处理自己的病理问题，而不是对疾病不知所措。这样的治疗结果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更常见，但是如何科学地对其评价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第一章里，我们简要描述了强迫性个性的一些方面。这样的个性是容易辨认的。尽管强迫性症状可以减轻，如"鼠人"病例那样，但是构成强迫性个性的基本特质是不能被精神分析师消除的。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精神分析被过度吹捧，尤其在美国。人们期望它能实现比弗洛伊德声称它能达到的还要更多的目标。病人和精神分析师都充满信心地期望获得个性上的根本转变；精神分析治疗的时间也一再延长。我清楚地记得出现在1929年牛津精神分析大会合影中的一位年长的英国精神分析师向我讲述了他曾用几年时间治疗过一位年轻人。W博士坚信，他的病人一定是在很小时候遭受过同性恋侵犯。只要他能够突破自我防卫，回忆起这个事件，W博士确信这个病人就会康复。然而事实上根本找不到能证明这样的侵犯确实发生过的证据。

那一代精神分析师已逝去。现代的心理治疗师更是怀疑论者。事实上，"狼人"病例恰好预示了弗洛伊德自1939年9月23日去世后，精神分析思想体系上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弗洛伊德显然认为，在他结束第一次治疗以后，病人明显的痊愈是因为他在婴儿期可能看到的原始情景进入了他的意识之中。但是，"狼人"并不这样想。他批判了弗洛伊德对他的精神病理的构建，但是不断地强调他对弗洛伊德的敬仰。

如果你用批评的眼光看待所有事情的话，你会发现精神分析里没有什么东西站得住脚。但是精神分析帮助了我。他是一个天才。

“狼人”继续回忆说，他父亲死后不久他开始接受弗洛伊德的治疗；他与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因为父亲更喜欢他的妹妹；正因为他父亲的死，他对弗洛伊德产生了一种移情，这种感情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说自己“崇拜”他。

换句话说，“狼人”将他病情的改善完全归功于他与弗洛伊德的关系；归功于他找到了一个比亲生父亲更能容忍和接纳他的新“父亲”；这个人四年来随时准备倾听他私密的、有时是骇人听闻的自白，对他从不批评、厌恶或谴责。

在第四章里我们简要描述了移情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精神分析师们已经从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转向被不恰当地称为“对象——关系”的理论，即将神经官能问题归因于早年的人际关系障碍，而非被阻碍的本能发展。弗洛伊德最初使用“对象”一词，是指原欲为了获得性释放而指向的对象。这个对象通常是人，但是这个词也可以指人的一部分，例如乳房，或者人的替代物，如物神或动物，只是着重点发生了改变。弗洛伊德主要关注的是发掘被压抑的婴儿性幻想，他坚信是它阻碍了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原欲发展。因为病人的性欲仍旧停留在一种婴儿状态，所以神经官能症患者不能获得成年人能拥有的性满足，而弗洛伊德视其为精神健康必要条件 。

当然，弗洛伊德意识到了，如果一个人在早期缺乏父母的关爱，或与父母的关系有障碍，那么这也会成为影响他发展的因素，但是他的重点放在了通过解除压抑和发现儿童早幼期出现的幻想或创伤性事件来治疗封闭的个体，像他在“狼人”个案中所做的那样。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的治疗性目的定义为：

事实上，它的意图是强化自我，使自我更加独立于超我，扩展其感知领域，扩充其组织，从而使它能够容纳本我的新鲜部分。哪里有本我，哪里就应该有自

我。它是一种创造文明的开拓和耕耘——如同排干须德海[1]的水造田一样。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II. 80）

在这段话中，没有一个词提到改善病人的人际关系。

精神分析的对象——关系学派的关注点是，人从婴儿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各种人际关系。它尤其强调孩子与母亲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而弗洛伊德最初没有考虑这些。所有精神分析师都继承了弗洛伊德的以下观点：成功的性关系是人类健康和快乐的重要元素。但是他们认定，获得满意的性关系的能力依赖于之前建立起来的、与父母或其他照料人之间安全可靠、充满关爱的关系。对弗洛伊德来说，性在先，依恋在后。对约翰·鲍尔比，这位最重要的对象——关系学派理论家来说，稳定的依恋在先，性在后。

这种着重点的改变带来的后果是，现代精神分析尤其注重对移情的分析。在早幼期被误解、抛弃或虐待的病人，往往一生都会认为每个他遇到的人都会这样对待他。如果他在某种潜意识的层面上认为每个女人都会批判他或者抛弃他，那么他怎么可能获得满意的性关系呢？而且，他会对精神分析师也会采取类似的态度。我们早幼时受到的对待注定会影响我们对他人将如何对待我们的期待。精神分析师的任务就是指出这种心理重复，并且通过不断让病人注意到他对分析师作出的错误假设，给予他一种更正面的情感体验，逐渐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一种病人能从中感到被接受和被理解的关系。在严重的病例中，病人可能永远达不到这个理想的阶段；或者他可能学会了信任分析师，但是不能将这种信任给予其他人。更理想的情况是，病人会将新找到的安全感转给他人，因为他现在已经能够信任别人、找到爱和幸福。

这段简要的介绍看似偏离了弗洛伊德这个话题的主线，但是并非如此，因为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弗洛伊德精神遗产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仅读了上一章弗洛伊德对病例的简要描述的人，可能会将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大部分观点斥为无稽之谈，他这样做是有情可原的。因为除了“鼠人”以外，其他病人的症

状都只得到短暂的改善或者根本没有改善。弗洛伊德的一些心理重构似乎显得牵强。而且，今天，很多人都可以列举出几个他们熟识的人，曾经长期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但是没有痊愈，或病症没有丝毫消除。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坚持这种昂贵的、看起来没多大用处的治疗呢？为什么很多精神分析师继续收治那些并不一定会消除症状的病人呢？人们可能会对此冷嘲热讽道，只要病人愿意继续治疗，并作好继续付费的准备，那么精神分析师没有理由让他们离开。但是大多数精神分析师并不缺少病人，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治疗那些症状能消除并且病情能显示出令人信服的改善的病人，要比继续治疗不会收到效果的病人要有益得多。

事实上，今天寻求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与问诊弗洛伊德的那些病人已经十分不同了，这使情况更为复杂。弗洛伊德的病人因明显的歇斯底里症或者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而来就诊，而当今的病人经常问诊的是萨斯（Szasz）称作的“生活中的问题”，即人际关系问题，或者因对生活的不满而寻求治疗。这引发了精神分析领域里的一些争议。精神分析的目标是减缓或消除神经官能症状呢，还是获得自我认识？二者都是值得嘉许的目标，而且都可能在精神分析过程中部分地实现。但是这是病人想要的一切吗？

很多人低估了弗洛伊德治疗方法的革命性及它产生的影响，这无关乎洞察力与症状的诊疗方法。精神分析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生活中任何其他情景所不能比拟的经历。有什么其他社会场合能有一个专注的聆听者一小时又一小时、年复一年地总是那样宽容地理解和接纳他人呢？能够有一个坚定的朋友或父母替代者，他从不拒绝，从不生气，从不实施惩罚？很多寻求精神分析的病人选择治疗是因为他们感到从未有人理解他们或者接受他们；或者是因为不敢向任何人透露他们的真实感受，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将遭到拒绝。有些时候，精神分析可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但是即使症状不全部消除，这种经历也经常让人受益匪浅，以至于精神分析师们抱怨说，他们主要的困难是如何终止分析治疗，而不是如何劝说病人坚持下去。弗洛伊德在给“狼人”治疗的第一阶段遇到了同样的困难，最后他不得不定下

一个分析治疗必须终止的日子。

弗洛伊德的诊疗技术要求分析师采取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医患之间的态度，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比他的婴儿性欲理论重要得多。我们已经看到，他引以为豪的关于梦的理论经不起推敲。弗洛伊德对他的发现中何为重要的，何为有疑问的一再抱有错误的看法。他对“狼人”婴儿性欲病理的重建只是无法证实的猜测。而他低估了他对狼人的接纳、他的耐心及长久持续的关怀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影响是巨大的。

第四章曾提到弗洛伊德不愿意承认他在病人情感方面的重要性，因为他希望自己被看成是高超的技师、一个不夹杂个人情感的探索者、一名客观的科学家。他处理移情的方式是完全将其视为一种重现：一种病人父母具有的特性在他身上的投射，在现实中与他无关。对于这样看待移情的方式会有以下两个反对理由。第一，如第四章所示，有些病人对分析师持有正面的、他们未曾有过的情感；他们对父母不会有这种情感，因为后者是冷漠、敌对或是拒纳的。第二，弗洛伊德低估了他的具有长期特性的技术对眼下的重大影响。他认为精神分析注定是漫长的，因为深入病人婴儿期的秘密中需要时间。但是痛苦的、被疏离的人需要和重视的是拥有一个他们觉得有洞察力并能接受他们的，和善的且能够长时间持续关怀他们的人，无论这种接受是否会减轻病症或者提高自我认识。如果通过治疗能获得任何积极效果的话，这是最起码可以期待的效果，是不应该被低估的。最理想的情况是，精神分析及由其衍生出来的各种形式的精神疗法，能够洞察和缓解痛苦症状，并能提高建立富有成效的人际关系的能力。

现代精神分析师已经认识到准确定义精神分析的本质的困难，但却尝试作出了五个基本假设。第一，精神分析是一门普通心理学，它既适用于神经官能症病人，也适用于正常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某些神经官能症状，神经官能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类别上的差异。

第二，精神分析师们接受了弗洛伊德构建一种心理机制的做法，这种机制既从外界接收刺激，又与体内的生理系统相互作用。精神分

析不同于实验心理学家在实验室里实践的那种心理学，它主要关注一个人的主观体验，而对外在行为的关注次之。

第三，精神分析关注的是适应性及主体（或自我）如何处理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刺激。精神分析师们并不一定接受弗洛伊德的涅槃原则，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机体努力达到一种均衡，但是这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其中相冲突的刺激取得一种平衡，而不是全部被释放。因此，心灵内部的冲突、互相竞争的刺激如性欲和饥饿之间的冲突，或者心灵不同部分之间如自我和超我的冲突，都是精神分析思想的重要方面。使用压抑、投射、否认和升华等“防范机制”来对付压力的自我的概念同样是精神分析的重要方面。精神分析依然不能很好地解释“刺激饥渴”，即当人被剥夺了刺激的时候，他寻找刺激的需要。

第四，在考虑精神活动的时候，精神分析遵循的是弗洛伊德的决定论。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精神事件受因果原则的制约。如果是这样，那么自由意志的空间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尚不明确。当然可以说一些歇斯底里症状，如恐惧症和强迫症，其出现是有特定原因的。但是它们的消除一定会使病人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而选择是一种需要意愿和目的参与的自愿行为。我们承认每个人都受着遗传压力和环境压力的制约，而这在某些方面，如在性取向上限制了我们的选择，但如果我们不去假设我们及他人都能够自行作出决定和进行选择的话，那么社会生活将成为不可能。托马斯·萨斯，一位公认的非正统精神分析师，将精神分析的目标定义为“提高病人对自身和他人的理解，加大其在生活中的选择自由”。

第五，精神分析认为，精神生活的一些方面是意识所不能触及的。尽管这类精神内容会在梦中、神经官能症症状中、口误及精神疾病的一些心理状态中部分显露出来，但是大部分内容只能通过精神分析过程中的核心部分——复原和解释——进入意识中。也许这就是我们目前能界定的，当今所谓的精神分析师所持有的共同信念和理论。

注释

〔1〕 位于荷兰北部，原为北海一海湾，1932年后经筑堤坝拦截，同北海分开，内部相当大一部分已改造为圩田，所余水面称作艾瑟尔湖。——译注。

第十二章
精神分析的魅力

弗洛伊德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人物。我们可以客观地讨论他的成就和局限，既不像一个盲从的信徒那样全盘接受精神分析，也不因为个人抵触或缺乏洞见而完全将其摒弃。弗洛伊德并没有像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们所希望的那样，把我们领入期望中的乐土。但是正如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说，弗洛伊德的思想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它使精神分析“成为讨论人类性格和人际关系的主要术语”。那么，这种巨大影响是怎样产生的呢？原因何在呢？

毫无疑问，弗洛伊德有许多原创的理念。但是，即使是最富创造性的人，他们思想的形成都得益于他们的前辈。那些被誉为引发了思想革命的先驱者们都刚好出现在某些思想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从而新的整合将成为可能并将被广泛接受的时代。人们有时候仍然认为是弗洛伊德创造了潜意识概念。但是，正如L.L.怀特（L.L.Whyte）在《弗洛伊德之前的潜意识》一书中所揭示的，“关于潜意识心理过程的观点，就其许多方面而言，是在1700年左右出现的，到1800年左右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在1900年左右有效地应用于实践中。”潜意识的概念并非弗洛伊德发明，但是是他将其应用于临床，使它具有可操作性。

L.L.怀特列举了众多的哲学家、医生和其他人士，他们曾接受并传播了潜意识过程在人的心灵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思想。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形成产生最直接影响的人包括德国内科医生C.G.卡勒斯（C.G.Carus，1789—1869），他是弗洛伊德喜爱的作家歌德的朋友。卡勒斯1846年出版了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书——《心灵》，它是这样开始的：

> 要了解心灵有意识活动的本质关键在于潜意识领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真正了解心灵的秘密是那么艰难，如果这种了解不是不可能的话。

弗洛伊德收藏的图书中包括卡勒斯的作品，尽管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弗洛伊德著作的索引中。

1869年出版《关于潜意识的哲学》的爱德华·凡·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1842—1906）是弗洛伊德借鉴过的另一位作家。弗洛伊德在1914年为《梦的解析》一书增加的脚注中承认，他们的思想确有相似之处（《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V.528）。

在《自传体研究》一书中，弗洛伊德特别感谢了德国心理学家G.T.费希纳（G.T.Fechner，1801—1887）对其思想形成的帮助。弗洛伊德认为心理机制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释放扰人的刺激所引发的张力从而恢复平静。他的这个观点便是受了费希纳思想的影响。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一书中对费希纳的理论也有提及（《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VIII.8-9）。

本书第一章提到弗洛伊德对哲学缺乏兴趣。在1925年首次发表的《对精神分析的抵触》一文中，弗洛伊德明确指出：

> 哲学家们对于什么是心灵的理解不同于精神分析。绝大多数的哲学家认为只是有意识的现象属心灵范畴。对他们来说，有意识的世界与心灵的范畴是重合的。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X.216）

这个奇特和不精确的说法与他在同一年写的《自传体研究》一书中的表述很不一致：

> 即使当我远离了临床观察，我也小心地避免与哲学本身发生接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力所不能……精神分析与叔本华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的重合并不能归结于我对其思想的熟悉。叔本华不仅强调了情感的主导地位和性欲的极端重要性，他甚至也意识到了压抑机制的存在。我是在耄耋之年才阅读了叔本华的著作。另外一位哲学家尼采，他的猜想和直觉与精神分析艰辛获得的发现有着惊人的一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长期以来一直回避他的著作。我更关心的是让我的思想不受纷扰，而并不在意谁先谁后。
>
>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59-60）

包括托马斯·曼、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和亨利·埃伦伯格

（Henri Ellenberger）在内的许多作家认为，弗洛伊德受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之深超出了他所承认或者意识到的程度。曼声称，精神分析的概念相当于把叔本华的理念从形而上学领域移置到了心理学领域。里夫指出，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一书中对宗教的攻击与叔本华的《关于宗教的对话》的观点十分相似。还有，弗洛伊德是遵循独树一帜的分析师格罗代克（Groddeck）的建议才采用了尼采原创的“本我”说法。尼采的狄俄尼索斯（Dionysian）和阿波罗（Apollonian）的二元性与弗洛伊德的初级过程、次级过程的二元性极为相似。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在当时的学术圈中得到了广泛讨论。事实上，弗洛伊德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五年时间都是一个维也纳德国学生读书社的成员，萨洛韦（Sulloway）把这个读书社描述成“一个激进的泛德国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叔本华、瓦格纳和尼采的观点得到热烈的讨论”。

每一个关注思想探索的作家都曾有这样的尴尬经历：自认为是自己原创的思想出现在了另一位作者的著作中，而他早已忘记曾读到过这部作品。如果弗洛伊德有时将并非他原创的思想宣布为自己的原创，那么他是在不自觉地实践他关于潜意识的愿望实现倾向的理论，而不是有意欺骗。

人们经常将弗洛伊德与达尔文和马克思相提并论，认为他是20世纪使人类对自身看法产生巨变的三个有独创性的思想者之一。即便在弗洛伊德去世60年之后，人们对有关他和他的理论的书籍的兴趣仍然经久不衰，这无疑证明了他广泛的影响力。在20世纪初，当弗洛伊德关于心灵的主要理论形成之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人类起源理论也刚获人们接受不久。达尔文通过证明人类只是进化程度最高的灵长类动物，而不是一种特殊的造物，为一门新心理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这门心理学不是基于心灵哲学、感知、条件反射或者人的精神素质的心理学，而是基于人类与动物的亲缘关系的心理学。当时，构建一种基于“本能”的心理学的时机已成熟，基于“本能”即指基于基本的生物力量或者人和动物的行为的“驱力”，这其中性当然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达尔文甚至得出结论说，语言，作为人类特有的社会交往形式，是起源于求偶时发出的表达情感的喊叫，它逐渐演化成能够表达更加复杂情绪的词语。正如弗兰克·萨洛韦在他的《弗洛伊德，心灵的生物学家》一书中指出的，是达尔文“指出了生存和繁衍本能的生物学重要性，为医学界展示了一个动态的、二元的本能范式，它似乎包含了所有的有机行为”。

达尔文对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亲缘关系的揭示动摇了人类的自尊。弗洛伊德则因宣称人类远不像其所想象的那样能够主宰自己的心灵世界而进一步将人类的自尊击碎。智力的声音也许是持久和柔和的，但是人类受情绪和非理性的控制之深远远超出他们普遍意识到的程度。弗洛伊德还断言，人类在艺术和哲学领域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也不过是原始本能的升华而已。

达尔文对人类的描述是“还原性”的，他不仅破除了人类是上帝的特殊造物的观念，而且还倾向于把高度复杂的人类行为还原到简单的生物源头。弗洛伊德所做的也是一样，精神分析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看上去与这个新生物学理论相一致。如弗洛伊德自己承认的，达尔文深深影响了他。

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也是物理学家们开始认识物质结构的时代。19世纪90年代发现了电子，不久后又发现了一系列亚原子微粒。可以不夸张地说，20世纪初，科学的理解等同于将结构还原到基本成分，包括对心灵的还原。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精神分析的一些缺陷在当时被忽略了或者被视而不见。正如前面提到的，弗洛伊德试图从婴儿性欲升华和逃避现实的幻想角度去解释艺术和宗教，但这个尝试是非常不成功的。弗洛伊德纯粹的还原性立场忽视了任何对合成的考虑，没有考虑从明显的分离体中创造新的整合体的需求，没有考虑格式塔心理学，或者凯斯特勒（Koestler）后来提出的“异缘联想”。弗洛伊德还遗漏了对认知发展的研究，也没有从核心家庭内部的心理性欲发展的角度之外定义社会的发展。当弗洛伊德成功地将精神还原为物质，还原为他所坚持的“不可或缺的有机基础”后，他才觉得他的理论拥有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不妥协的还原主义具有相当大的情感魅力。任何所谓具有“科学性”、通过还原成几个基本元素而提供一种对人性的新理解的思想体系，都很可能吸引那些骄傲地自认为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被利他主义、自我牺牲、无私的爱或者伦理高论所蒙蔽的人。弗洛伊德是把人类所有的奋斗作最简化处理并找到共性的专家。可以恰当地说，这种诊疗技术也体现出了犹太幽默的特点。那些把精神分析当作涵盖一切的、解释人类行为的体系的人，不仅倾向于为自己激进的现实主义而自豪、为掌握别人所不能掌握的知识而自豪，而且在运用该知识时通常以一种近似于史蒂文·波特（Stephen Potter）描述的“高人一筹”的方式：“我对任何事情的理解都比你强；你是神经官能症患者，但我有真知灼见。”这种心理发展到极端时就会导致前文提到的，出现在弗洛伊德和布列特对伍德罗·威尔逊的传记描述中的“人格扼杀”。

精神分析经常被说成是一种宗教，部分上是由于学派内部的争论异常激烈，常常导致反叛者脱离组织，成立对立学派或者组成分裂的小派别，就像宗教派别之间的争斗一样。弗洛伊德一直否认精神分析提供了一种世界观，而且在他的《精神分析入门新课程》的最后一部分强调说，精神分析没有背离科学的标准，它是用科学的眼光审视世界。但是，除了为数不多的严格遵从弗洛伊德思想的人士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精神分析远不是一门科学，因为其理论不可以公开反驳，并且不能够用于预测，但是精神分析无疑提供了一个信仰体系。

在精神分析的早期阶段，尽管它的异端分子如阿德勒、施特克尔、荣格、兰克以及许多其他的人没有受到折磨和处决，而只是被称为神经质者和精神病而遭到了人格暗杀。一些用来描述这些异端分子的语言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放肆。当今，在英国精神分析协会里，以前互相争斗的派系之间暂时处于休战状态，但这是一种武装停火；私下里，协会中分属三个派系的精神分析师们相互之间常常恶语相向。那种认为只有自己学派才是精神分析“真理”的捍卫者的错觉，今天依然遗憾地存在着。

正如前面提到的，弗洛伊德倾向于从对婴儿的性欲研究中找寻对

人类的求知欲和人类对知识的热望的解释，而不能接受人类可能具有与许多其他物种相似的、喜好探索的特性的说法。也许，这种想法是来自他对自己儿时的记忆。弗洛伊德在小时候曾出于好奇窥探他父母的卧室，但是被愤怒的父亲勒令离开。弗洛伊德当然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求，有着从令人迷惑的精神现象的迷宫中寻找出路的巨大动力。他攻击哲学的原因是他认为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试图展现一个过于连贯、没有空白的宇宙的图景。而且，他还宣称，哲学只能引起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的兴趣，其他人几乎都无法理解。然而，弗洛伊德并没有只局限于对神经官能症进行解释分析。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从精神分析伊始，他就力图创立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不仅用这个体系去解释所有形式的精神疾病，还去解释宗教、艺术、文学、幽默、人类的进化和人的社会组织。精神分析的魅力，正是源自它所声称的如此巨大的解释能力。精神分析已发展成为一种运动而不只是治疗神经官能症的医疗方法。精神分析不具有宗教通常具有的许多特征，但是在一个世俗的时代，在一个人们如果不皈依旧式信仰就会感到没有根基和安全感的时代，精神分析提供了一个人们能欣然接受的解释体系。

同时，精神分析把经弗洛伊德本人或者他的弟子们，或经他的弟子的弟子们分析过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结成了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兄弟会。精神分析理念中的相当一部分似乎都依赖于口头传承而不是书面记述。精神分析，起码在最初期，似乎提供了一种世俗的拯救方式。而且，如果病人的情况没有出现好转，或者受训者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弗洛伊德定立的原则，精神分析师们往往能够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这是他们的错，而不是理论体系的错。这是所有深奥的信仰体系的典型特点，无论是普利茅斯兄弟会还是统一教团都具有此特点。

图15　1922年，弗洛伊德与秘密委员会成员。

精神分析能被广泛接受，要得益于弗洛伊德出色的、极具说服力的写作能力。即使是他所倡导的理念经不起仔细推敲，阅读他的著述，哪怕是翻译版本，仍然是一种愉悦的体验。我想不出其他任何一个阐述精神分析的作者能与弗洛伊德匹敌，尽管我想得出许多故弄玄虚、文字艰深晦涩者。试图把精神分析与语言学联系在一起的法国革新派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是当一个作者将优雅的文风、强大的说服力以及对自己理论的笃信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要抵制他是很困难的。弗洛伊德经常因其灵活变通及愿意随着精神分析的发展去修改自己理论而受到追随者们的称赞。但是，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也目睹了弗洛伊德对反对意见的不容。尽管他本人也许会修改或发展他的理论，但是可能除了忠诚于他的委员会成员，包括卡尔·亚伯拉罕和厄恩斯特·约内斯在内的少数几个圈内人士外，他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在对自己的理论深信不疑这一点上，弗洛伊德与他的最严厉的抨击者、科学哲学家卡尔·珀普

（Karl Popper）很相似。有意思的是，珀普与弗洛伊德在攻击自己对手时，采用的是相同的对抗战术。

弗洛伊德对其基本理念正确性的坚信大大增强了他对众多追随者的吸引力，尽管他的这种自信有悖于真正的科学立场。大多数人都十分愿意追随表现出十足自信的领袖人物，因为这样做能使他们消除伴随不确定的焦虑，省却思考的力气。我们不难从近代政治中找到具有类似自信的领袖人物的例子，不管这种自信的基础有多么狭隘。正像诺曼·科恩（Norman Cohn）在《千年的追求》一书中所展示的，对自己的坚信使那些远不像弗洛伊德那样具有原创力和感染力的人也闪耀着魅力。

弗洛伊德的理论使西方人对从前视为美德的行为产生了怀疑，而这又常常导致不幸的后果。在1900年，一个表现出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人会被认为是“好人”。自弗洛伊德理论出现以后，人们倾向于怀疑毫不利己是一种受虐狂式的自我惩罚，而利他主义则隐藏着一种施舍的愿望。利他和慷慨仍然是美德，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使得那些不愿意培养这些品质的人能够更加容易地为自己辩解。禁欲曾经是受称赞的，现在一律被看作是隐藏的性变态，或者是某种可鄙的性逃避，而不再被看作是自我控制或者优秀精神品质的体现。与今天相比，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即使不对同性恋行为，也对同性恋情结有着更高的容忍度。丁尼生（Tennyson）纪念他挚爱的知己阿瑟·哈勒姆（Arthur Hallam）之死的长篇组诗《悼念》今天可能将不能出版，除非这出自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诗人之手。那些像丁尼生一样的异性恋者，在表达对同性伙伴的炽热情感方面所被给予的自由空间则比从前要小。弗洛伊德声称每一个人在某个层面上都是双性恋者，这个观点似乎有些怪异。然而，从整体上说，精神分析使人们增进了对于那些不遵循传统性模式的人的理解和容忍。也许，性并不像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是主要的内驱力，但是他的巨大贡献却在于揭开了维多利亚时代假道学的面具并使性成为一个能够被公开和严肃讨论的话题。

弗洛伊德的理论还在其他方面提高了人们的包容度。弗洛伊德坚持认为，神经官能症的萌芽出现在早幼时期，我们因此对于儿童的情

感需求有了更多的关注，在儿童作出反社会行为时，我们也更倾向于去试图理解他们，而不是加以惩罚。我们对待罪犯的态度也更宽容。尽管我们对于惯犯依旧没有什么办法，但是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严刑酷罚既起不到威慑作用也不会使罪犯得到改造。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反社会行为也许反映的是与社会的疏离或者是绝望的情感，而不是先天的邪恶。

尽管精神分析在治疗神经官能症方面并不能证明比其他形式的心理疗法更为有效，但是弗洛伊德花大量时间倾听精神压抑者的诉说的方法，给源自精神分析的所有心理疗法都带来了巨大裨益。正如前面提到的，即使那些没有完全消除症状的人也能够对自我有更深刻的了解，感到被人接纳，而这是他们之前可能从没有经历过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洛伊德对于调查的热忱和对治疗的缺乏热情却促成了他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即精神分析技术的诞生。每个人都能给悲痛中的人提出“好建议”。但是，是弗洛伊德教会了我们如何去倾听。

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领域之外的探索看上去大多不被认可。只有特别坚定的弗洛伊德派支持者才能接受弗洛伊德对宗教、人类学或艺术的看法。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弗洛伊德没有试图用他的理论去解释除了神经官能症、性变态和精神病以外的事物的话，那么精神分析的地位可能会更高。但是，鉴于弗洛伊德决心构建的是一个不仅适用于神经官能症患者而且也适用于正常人的心理学体系，或许他的上述做法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此有必要重述第一章中提到的布罗伊尔的结论：

> “弗洛伊德的思考和表述往往是绝对的和排他的：这是一种精神需要，在我看来，这种需要导致了过度概括。”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即便弗洛伊德提出的每一个观点都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仍然应感激他。尽管精神分析不属于物理和化学那样的“硬”科学类别，但是思想发展的历史表明，只要可以说我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增强了，那么这种进步就遵循了珀普宣称的科学发展的

规律，即通过驳斥现存假设取得进步。弗洛伊德极具创造力。他确实给我们的思维方式带来了一场革命。他提出了数量可观的假设，这些假设即便是错的，也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仔细辩驳。艾森克认为精神分析不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是不科学的。梅达沃称精神分析是一个“智力信心方面惊人的把戏”。然而，既然精神分析对我们的思维产生了如此不容忽视的影响，它一定与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发生了共鸣。最起码，精神分析值得我们去深度地批判研究，而不应简单地予以摒弃。也许“狼人”的以下评论是恰如其分的。

“弗洛伊德是一个天才，这无可否认。他将那么多的理念纳入了一个体系中……即使很多理念并不正确，但这仍是一项光辉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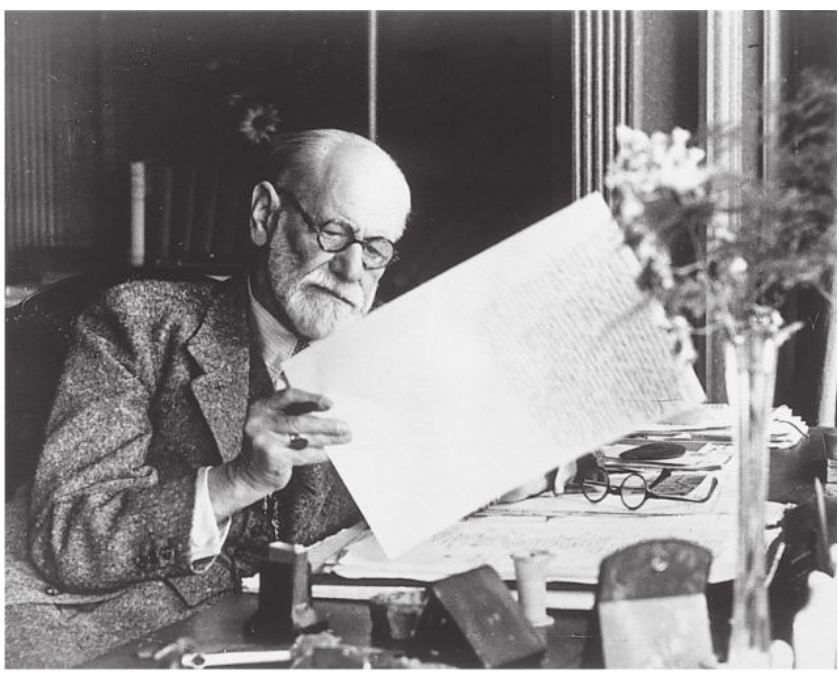

图16　1938年，阅读手稿的弗洛伊德。

什么是潜意识、阻抗与移情？自我、本我与超我有何关系？梦意味着什么又传达了什么？俄狄浦斯情结是怎样产生的？是否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人类原欲冲动的“升华”？本书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其重要影响，并客观介绍了他在艺术、文学、哲学、文化与宗教方面的主要观点以及围绕这些观点的争议。

在我们跟随作者走进这位心理学大师的同时，或许能够获得一种对自己心灵崭新的洞见。

百科通识文库

49

梦的新解

[丹]艾伦·霍布森 著 韩芳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梦的新解

J. 艾伦·霍布森 著

韩芳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59**

Dreaming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2.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2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J. Allan Hobson 2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的新解／（美）霍布森（Hobson, J.A.）著；韩芳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11-0

Ⅰ．①梦… Ⅱ．①霍… ②韩… Ⅲ．①梦 - 精神分析 Ⅳ．①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790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王 莹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11-0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绪论
第一章　梦是什么？
第二章　梦的内容分析为何没能成为一门科学？
第三章　睡眠状态下大脑是如何激活的？
第四章　大脑做梦的细胞分子基础
第五章　人为什么会做梦？睡眠中的大脑激活有什么功能？
第六章　与梦有关的疾病
第七章　梦如谵妄：睡眠与精神疾病
第八章　梦的神经心理学新说
第九章　梦、学习和记忆
第十章　梦的意识
第十一章　梦的解析
结论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J.　艾伦·霍布森，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1988年睡眠研究学会杰出科学家奖获得者，主要致力于研究精神和行为的神经生理学基础、睡眠与梦、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史，其大多数近作集中于讨论睡眠的认知特征和益处。他著有（或与人合著）多部作品，包括《做梦的大脑》（1988）、《睡眠》（1995）、《意识》（1999）、《梦如谵妄：大脑如何变得疯狂》（1999）、《梦药房》（2001）和《梦的新解：睡眠科学导论》（2002）等。

译者简介

韩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及睡眠中心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睡眠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呼吸疾病分会青年委员、睡眠学组秘书。主要研究方向为睡眠呼吸障碍的发病机制、发作性睡病的遗传基因，在国内外发表睡眠方面的文章80余篇。

图　目

图1　睡帽
图2　人类的行为状态
图3　快动眼睡眠期的视觉大脑
图4　快动眼睡眠图解
图5　人的一生中睡眠模式是如何转变
图6　睡眠时长的变异
图7　睡眠中的自发激活
图8　抑郁患者的睡眠变化
图9　来自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的数据
图10　视觉分辨任务学习与睡眠
图11　人脑构造图

绪论

有史以来，人类就一直为梦深深地着迷。梦是如此生动复杂而又富于情感，它启发了无数的宗教运动、艺术表象以及内省的科学理论。所有这些前现代表达都基于一个共同的信念：梦包含着其他任何途径都不能传递的信息。

因此，早期的犹太基督教徒们认为，上帝通过某些先知将他的意图传递给人类的信徒。这一观点是以“牛角和象牙之门”为前提的中世纪梦理论的核心内容。像伊曼纽尔·斯维登堡（Emmanuel Swedenburg）这样的宗教改革家们能够在梦中与上帝派来的使者们相会，进而得到建立新耶路撒冷大教堂的指示。

早期的西方艺术家们，如乔托（Giotto），把梦作为先知启示的图像表达载体。沉睡的圣徒和牧师们与他们的梦境出现在同一幅画面中。在现代艺术中，超现实主义者通过他们狂放的画作表达了“梦是比清醒更为真实的意识状态”这一信念。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勒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都以梦的语言作画。在这些艺术家中，达利最具超现实主义色彩，恩斯特最具“精神分析”特征，而马格里特则最具“神经心理学”方式。

20世纪初最著名的梦研究者非弗洛伊德莫属，他意欲将自己的精神理论建立于脑科学的基础上，然而他对大脑的了解是如此不充分以至于他不得不抛弃自己著名的“科学心理学方略”，转而向梦寻求灵感，即后来所谓的动态潜意识。他像之前所有象征主义先驱们那样相信梦包含着隐藏的信息，这些信息被精心包装成精神的一部分，而潜意识无时不在试图冲破意识的保护屏障。至此弗洛伊德又将梦的理论带回圣经学者阿尔米多鲁斯（Artemidorus）及其他早期释梦者的时代。

本书在弗洛伊德抛弃自己“科学心理学方略”的地方重新起步，力求在睡眠科学坚实而宽广的基石上建立一个新的梦理论。为达此目的，我对基础脑科学研究的发现、睡眠实验室研究以及睡眠和梦的近期临床研究进行了简要的总结。我在全书中使用了大量源于本人梦日

记的例子来解释我们新的梦理论（称为激活-整合理论）是如何从生理学角度来阐明梦的普遍特征，而这些特征以前总是被描述成心理动力因素。届时，梦的神秘面纱将被揭开，仅剩其内容袒露于世，理解起来无需任何复杂的解释。

本书主旨在于向读者展示过去50年里，一个科学的梦理论是如何诞生和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本书除为读者提供独特机会去重新思索自己的梦理论外，还能让读者领略到现代睡眠科学的迷人发现。

第一章

梦是什么？

梦从何而来？它为何如此神奇而又难以记忆？要真正科学地去研究梦，必须对梦有一个合理、确切的定义，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正确地界定梦并找到方法去衡量其各种特性。对大脑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梦可能源于睡眠时大脑的激活，定义和衡量梦最科学有效的方法不是去关注梦的具体内容，而应着重于其形式特点，即抛开千奇百怪的情节差异，去探寻梦的感知、认知和情感特性。

从内容到形式，这一研究重心的彻底转变，正是科学家们称为“思维转换”（某种理论或模式的快速转变）的绝佳例子。研究方向转换到形式上以后，对梦这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以前那些梦的研究者总是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同样一个问题：这个梦意味着什么？而我们现在要问的却是：做梦时大脑的活动与清醒时有什么不同？这里并不是 说梦的内容不重要，不能提供什么信息，甚至无法解析；相反，梦的许多方面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能提供丰富的信息，在心理学上也是可以解释的，但这都不过是与睡眠相关的大脑活动状态改变的简单反映而已，具体内容将在第三章详加讨论。

为了让读者对梦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差别有更加深刻的了解，我从多年来积累的成百上千个自己的梦的日志中随机挑选了一个作为例子。我引用了该日志的全文，以便读者能对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同时方便读者将我的梦和你们自己的进行比较。不同的人梦见的对象不尽相同，但我觉得其形式会大同小异。

时间：1987年5月10日

地点：去新奥尔良的飞机上（我正要去参加美国精神病协会年会上一个关于梦的辩论会）

内容：两天前，一个关于理查德·纽兰的梦

这是一个关于一场财产维护的噩梦。我有太多的财产要维护。理查德和他的一个朋友似乎在“帮助”我，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俩既不称职又粗心大意。

这个梦有很多的片断，所有片断都围绕相同的情感主题：关于保护某些物品的焦虑情绪。

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我们在丘陵起伏的乡村散步，目的不明，可能是去往

后面提到的那个房子。

一晃我们就到了一个房子里面，这个房子看起来跟我自己的一点都不像，但在梦里却被认为是我的。理查德的朋友在往白色的墙壁上喷蓝色的漆（我家的房子根本没有白色的墙壁和蓝色的房间）。喷漆的像是那种用来给葡萄藤喷硫酸铜，或是用来灭蟑螂的罐状仪器。突然，油漆喷到了挂在墙上的画上。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大声呼喊理查德，让他去制止他的朋友。

由于某种原因，他不得不上楼去关掉机器（尽管那个喷雾器看上去明明是便携式、完全自控的），而这又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我的画继续被糟蹋。

然后，我跟理查德有一段很长的对话，尽管自始至终和我对话的都是理查德，但他的相貌却在不断变化：一会儿是侏儒模样的拿破仑·卡特，有着一张胖胖的被晒伤的脸；一会儿又戴着中式的苦力帽，面带着扭曲的笑容；一会儿又变成《仲夏夜之梦》里那头小牛（该剧海报上并没有这头小牛！）……但是变来变去，就是不像理查德他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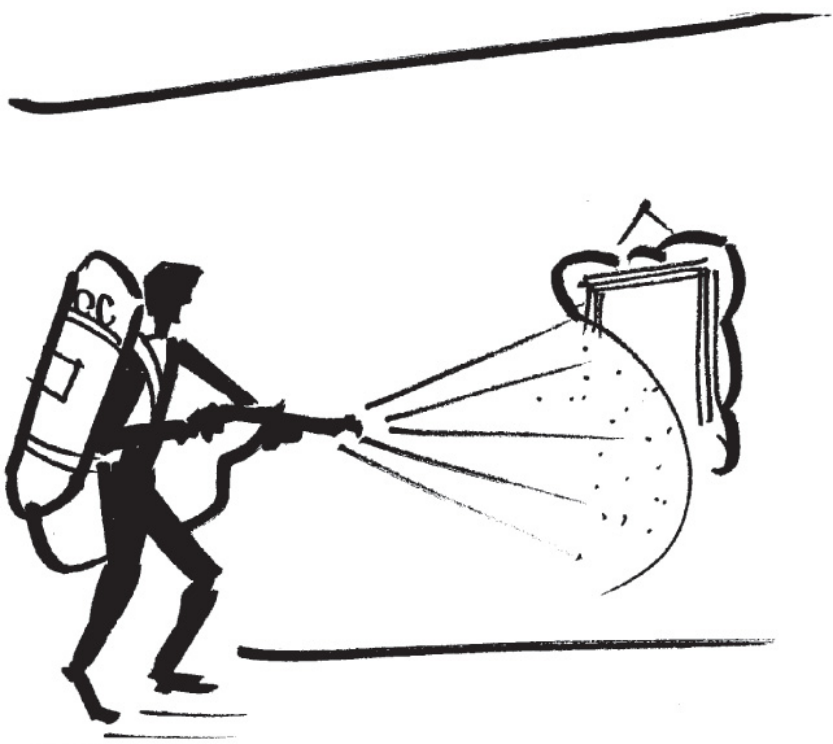

在这个长梦中，我难以记起有其他面孔或是另外的任何活动。

这个梦清楚地勾勒了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区别，在就此进行讨论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该日志记录时的情形和该梦发生的时间。当时我正在去往新奥尔良的飞机上，准备参加一个盛大的、广受关注的关于梦的辩论会。我的许多日志都是在飞机上写的。我通常在梦出现后的次日早晨马上将其记录下来，可这次是过了两天才写，所以可能有些细节丢失了。但正如我后面将要展示的，剩下的这些部分已经足以说明形式和内容的区别。

就内容 而言，该梦是有关我对我的农场维护的担忧，该农场位于佛蒙特州北部，自1965年起即归我所有。理查德·纽兰的父亲马歇尔·纽兰是我隔壁农场的主人，长期以来与我有着复杂但融洽而和谐的关系。虽然我们在事情轻重缓急的把握方面存在诸多分歧，但最终还是成功地做到了和睦相处、友爱互助。

对我而言，该梦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为自己的财产感到焦虑，担心它所托非人，因为这些人对自己的房子都毫不在意。这一特点在心理学术语中被称为“情感显露”（或关联），由此来理解该梦，不难发现，它不过是关于“安排不善”这一主题的变异形式，而这一主题在我和我大多数朋友的梦境中都反复出现过。我认为不必要也没有理由把该梦与其他相关主题（如我妻子对佛蒙特州的另一个邻居感兴趣）联系起来，而视之为对这些事情焦虑反应的一种隐诲的象征性表达，具体原因我将在第二章详述。诚然，能注意到这一联系可能是适当而有用的，但它无助于理解该梦从何而来，其喜剧怪诞色彩由什么决定，它为何如此难以记忆。

形式与内容的对立

想要解释梦的成因和特点，选择形式分析的方式是大有裨益的。

正如在大多数梦里的典型表现那样，我是如此地沉浸于梦境之中，以至于从来不曾想过自己是在做梦。当我看见理查德·纽兰和他那

身份不明的朋友时，当我看见我的房子（尽管它明显不是我的），当我看见蓝色的漆喷到墙上时，经历过这一幕幕的场景，我对所有这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全盘接受，而这一切都基于我的幻觉性感知，我对梦中事物的错觉，以及我极其强烈的焦虑和担忧。

这意味着我们的心理现实感，无论是正常做梦还是精神病症状，都是基于感知和感情的力量及我们对感知和感情的看法。内生性的感知和情感是梦的两个形式特点，而且是最主要的两个。为了解释它们为何如此强烈（与清醒时相比），我们或许可以预测：激发情感及相关感知的那部分大脑在睡眠状态下是选择性激活的。在第五章中我们会看到这一猜想得到了证实。

我的理查德·纽兰之梦不仅在感知上逼真，情绪上凸显，在认知层面上也是相当怪诞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尽管主题保持不变，但时间、地点和人物显然缺乏连贯性。比如说，理查德·纽兰的朋友身份不明，再则那个被认为属于我的房子其实根本不可能是我的，还有，尽管回忆和描述得不够完整，还是能发现梦中的各个场景是相互融合的：我们先在外面散步，然后到屋里喷漆。最重要的是，我看着理查德·纽兰的面孔在一系列非理查德的人物形象之间转换，却从来不曾质疑过他究竟是不是理查德，或者我自己并未处于清醒状态而是在做梦，尽管此刻只需一丝的自省意识，我就能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了。

梦的主要认知特点如下：自觉意识丧失、定向稳定感丧失、定向思维能力消失、逻辑推理能力下降，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梦中和梦后记忆均出现缺失。我的理查德之梦中错位和不连贯的各种片段是通过联想得以衔接起来，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解释这些联想之间的松散性。而事实上，那个怪异的喷漆装置很像某种农用工具，理查德那些变换的面孔中，第一个是佛蒙特州邻居中的另一个农场主——拿破仑·卡特；接下来是头小牛（理查德和他的奶牛场主父亲马歇尔，养了很多小牛）；最后，众所周知，莎士比亚自己在《仲夏夜之梦》中推崇角色的转换，让他们彼此互变甚至是变成动物。

如此极端联想的加工处理（超联想处理）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虔诚地相信：梦的怪诞是对某种不可接受的潜意

识愿望的一种心理防御。在1900年，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观点站不住脚，而在21世纪初，它对我们而言仍然是难以接受的。

正如我们预测并发现在快动眼睡眠时与情感及其相关感知形成有关的大脑通路被选择性激活那样，我们也可以去寻找并证实那些与记忆、定向思维、自省意识、逻辑推理有关的大脑通路和化学递质的选择性失活。

你或许基本满意这一说法，或者你可能更愿相信自己的梦是带有个人色彩的私密信息。但无论你是否喜欢这种说法，当一旦认识到梦的研究要通过形式化方法，对大脑的研究并非必需时，你肯定和我们一样失望。单凭常识至少就已经可以断言形式和内容是互补的。在其他领域，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就语言学来说，语法和句法互为补充；拿诗歌来讲，韵律和诗体相辅相成；而在视觉艺术领域，形式和题材相得益彰。那么，精神领域为什么就不能是这样呢？梦为什么不能是这样呢？梦的形式难道不是构成内容的一个重要因素吗？

正如我在第二章中将要写到的那样，确实有些勇者区分了梦的形式和内容，但他们微弱的声音被那些释梦者的鼓噪声所淹没。这些释梦者迎合了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需求，即认为梦和所有看似神秘的事物一样，被一只仁慈的手赋予了深邃的隐意，只有极少数上帝选定的布道者才能领会其中奥秘。

梦的定义及如何测量梦

对梦的分析之旅始于对梦最宽泛、全面且无可争辩的定义：梦即睡眠时大脑的活动。不过，究竟睡眠中的大脑活动有哪些类型呢？实则多多，下面举例说明：

报告1：我刚一入睡，就感觉　到自己在动，仿佛是白天钓鱼时海浪轻拍我们的小船那样。

报告2：我一直在想着即将到来的考试，想着它会包括哪些内容。我睡得很不好，因为不停地醒来，然后又照例陷入对考试的同一

思虑之中。

报告3：我在陡峭的山顶上休息，左边是直垂而下的峭壁。一支登山队正环绕右边的小道而行，突然，我不知怎么骑上一辆自行车，从他们中间驶过。很显然，我绕着山顶转了一整圈（在这样的高度上），其间居然没有离开过草地。实际上，修剪整齐的草坪平铺在岩石和峭壁之间。

尽管内容迥异，而且每一个报告都是其所属睡眠类型的典型例子，但根据我们宽泛的定义，它们均可称为对梦的描述。

报告1包含一种内在的感知，海浪给船和船上的人造成律动的感觉。这是刚入睡时梦境的典型例子，尤其容易出现在经历某种新奇运动后的晚上，例如：滑雪、划船，甚至像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诗歌《摘罢苹果》中描述的那样。报告者坐过船后，那种运动的感觉在上岸伊始就已消失，而在入睡时再现，并精确复制了坐船时的身体体验。稍后我们会更详细地阐述这种刺激所诱导的梦境，特别是在本书的后面涉及到动作学习的部分。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刚入睡时的梦境体验是多么短暂和简单。尽管它和报告3一样，有幻觉的成分，但时间的短暂、范围的狭窄、除做梦者之外其他人物的缺失和情感的贫乏，还是使这样的梦显得内容空洞。有很多刚入睡时梦境的报告比这个更加丰富多变，但仍不免显得简短，并缺乏像报告3那样复杂的情节发展。

报告2局限于思考，或心理学家所谓的认知。这里没有感知的架构，因此也没有幻觉的成分，然而这里有情感。做梦者为自己在某个测验当中的表现感到焦虑，这种焦虑导致了过多的思考，而他在清醒时情形应该也是如此。所描述的思考并非渐进性的。做梦者甚至都没有演练答卷以便进行适应性调整。像这样对某事反复思虑的例子多见于做梦者在睡眠早期被唤醒时。如果这些梦是在睡眠实验室（见第三章）收集的，就会发现它们与大脑活动的低水平有关，这种低水平在我们所说的慢波睡眠（脑电图上可见）或非快动眼睡眠时很普遍。对于夜间较晚时候的非快动眼睡眠，当其脑活动水平接近快动眼睡眠时，大脑活动的许多特征就会类似于报告3。

报告3是典型的快动眼睡眠梦例，它生动活泼，富有戏剧性，复杂而怪诞，富于幻想，有错觉成分，持续时间长，大约是报告1和报告2的8到10倍长（报告1和2都描述了全部内容，而报告3在这里只截取了其中一小部分）。报告3剩下的内容中还有场景的转换，从山顶到了马撒葡萄园岛（尽管我还骑着同样的自行车），又到了购物中心、饭店、舞会，还有一个教师会议。该梦也体现出梦的一些典型特征，如人物的不稳定性——我某位同事的妻子看起来是金发而实际上她的头发是黑褐色。那种运动的感觉一直持续着，当我进入失重状态，沿着一条高尔夫球道滑行时，感觉尤其愉快。舞会上有一支“波罗的海队”，穿着刺绣的农民服装，和着喧闹的乐队（击鼓声分外清晰）踩踏着地板。

报告3内容之丰富和报告1、2内容之贫乏几乎没有可比性，尽管报告2符合更严格的梦的定义。

报告3更为详细地阐述了睡眠期间的精神体验，具体特点如下：

1．丰富多样的内在感知，特别是感觉运动（运动）、听觉（鼓点）和抗重力（失重）幻觉。

2．把极不可能（自行车在山顶上？）而且不符合物理原理（在高尔夫球道上失重地滑行？）的事件误认为真实的。

3．内容的怪诞，表现为不连续性（6个地点）和人物的不一致性（金发的褐发女郎？）。

4．情感的强烈和丰富（恐惧、兴高采烈、生气勃勃）。

5．不合逻辑——我能在不离开草地的同时绕山顶一周！

上述三个梦境报告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又能说明什么呢？前面两个容易理解，只是做梦者既有的体验（划船旅行）和对未来的担心（对考试的焦虑）以大脑活动的形式在睡眠中的简单反映。在前两个梦例中，入睡时和睡眠早期残存的大脑活动足以如实再现很小一部分清醒时的体验。而梦例3中描述的事件则需要更加详尽地解释说明，因为其中的大部分事情都是从未发生过，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过的。强烈和高度选择性的大脑激活可以解释其中的某些方面，例如幻觉性的意象和相关的动作，但这种激活无法解释梦的怪诞和逻辑推

理的丧失。如果快动眼睡眠期间大脑是全面激活的话，那么定向力和认知能力应该会增强而不是减弱。这些变化一定另有原因，正是它改变了大脑和思维的整个运行模式。第四章和第五章将会讲到，这种模式改变同时受化学介质改变和大脑功能选择性失活的影响，最终净效应是与清醒状态相比，做梦时大脑的某些功能被增强，而另一些功能被削弱。就是这么简单！同时又是这么复杂！

每个人都做梦吗？

睡眠实验室里的所有被研究者在睡眠时都有大脑的激活。睡眠时的大脑激活时相与睡眠者的快速眼动有关。根据这种快速眼动，睡眠时的这一大脑活动时相被命名为REM睡眠即快动眼睡眠。当在快速眼动密集出现时被唤醒，95%的受试者都报告正在做梦，基于以上证据，一般认为，每个人睡觉时事实上都会做梦，有感觉不做梦的是因为难以记忆。

如果梦境不因唤醒而中断的话，很少有人能回忆起来。对梦的记忆力差或根本没有记忆，源于睡眠期间大脑激活过程中的记忆消除功能。当睡眠期间大脑被激活时，负责短时记忆的化学系统被彻底关闭，除非此时被唤醒，使这些化学物质重新为大脑所用，否则想回忆梦境会极其艰难。

有关梦的资料是如何收集的？

前面提到的那些关于梦的报告都是我本人的。我在家或在旅途中把它们写进了私人日记，这些日记现在已经多达116卷，涵盖了我过去25年的生活，包括300个以上的梦境记录。像这样的梦境报告优势明显：廉价易得，数量多，至少对我来说，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尽管我只有在读到这些报告的时候才能回忆起这些梦来，但在这些报告里

我能看出本章所强调的那些显著的形式特点。

不过，这些报告确实有其相应的缺陷，梦的科学要想具有普遍适用性就必须克服这些缺陷。为了检验我的发现的普遍性，也为了确保我不是在编造一些梦来使之符合我的理论，我们需要从多种途径和多个个体且在多种不同条件下收集梦的报告。在得到最终结论之前，我们所分析的这些梦的资料，都是来源于其他人的梦境日记、睡眠实验室和家庭研究中获得的报告。

其他梦境日记

到目前为止，我找到的最好的一本梦境日记叫做《火车人梦之记》，它的作者是一个铁路迷。我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记录于1939年（当时我只有6岁），不可能被我的理论影响。另一点让我喜欢的是，它描述详尽且少有解读，有些地方甚至还配有简单但富有表现力的图画。考虑到我和“火车人”都是男性这一事实，我们又从女性同事和学生那里收集了一些日记来作为对照。所有资料都显示出梦与意识清醒状态在形式上的显著不同，正如我一直强调的那样。

睡眠实验室报告

感谢我们的同事米尔顿·克雷默（辛辛那提大学）和约翰·安特罗伯斯（纽约城市大学），还有我们自己的睡眠实验室团队，通过实验性唤醒研究对象，我们共收集到了超过1,000份的梦境报告。

据我所知，睡眠实验室唤醒方法使梦境报告的特点至少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

1．它们带入了与实验室条件相关的想法、感情和感知，但这对梦境的幻想、错觉和怪诞没有影响。

2．它们增加了梦的回忆率，也改变了回忆起来的梦的自然特性。例如：被人为唤醒后报告的梦里，正性情绪增多，这意味着，我

们入睡后一般先是做那些令人愉快的梦，而那些不愉快的梦则多半会反过来唤醒我们，并倾向于负性情绪。

睡眠实验室报告的主要缺点在于获取的费用太高，而且实验对象几乎全部趋向于年轻人，因为实验室所在地附近的大学学生容易招募到。最后，由于费用问题，每个受试者所能给出的梦境报告数量有限，没有一个睡眠实验室里的受试者提供的梦境报告数能与“火车人”的256个或我的300多个相匹敌。

有生理学指标对照的家庭式报告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睡眠科学两个方面的资料，我们设计了“睡帽”，这是一种家庭式的睡眠监测装置，借助这种装置，我们可以知道在受试者报告的梦境之前他们处于何种睡眠状态，可以比较自发觉醒和实验室唤醒所得结果的不同，可以从每一位受试者身上获得大量的信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可以获得在自然状态下的报告（图1）。通过这种办法，我们得以实现之前从未获得的两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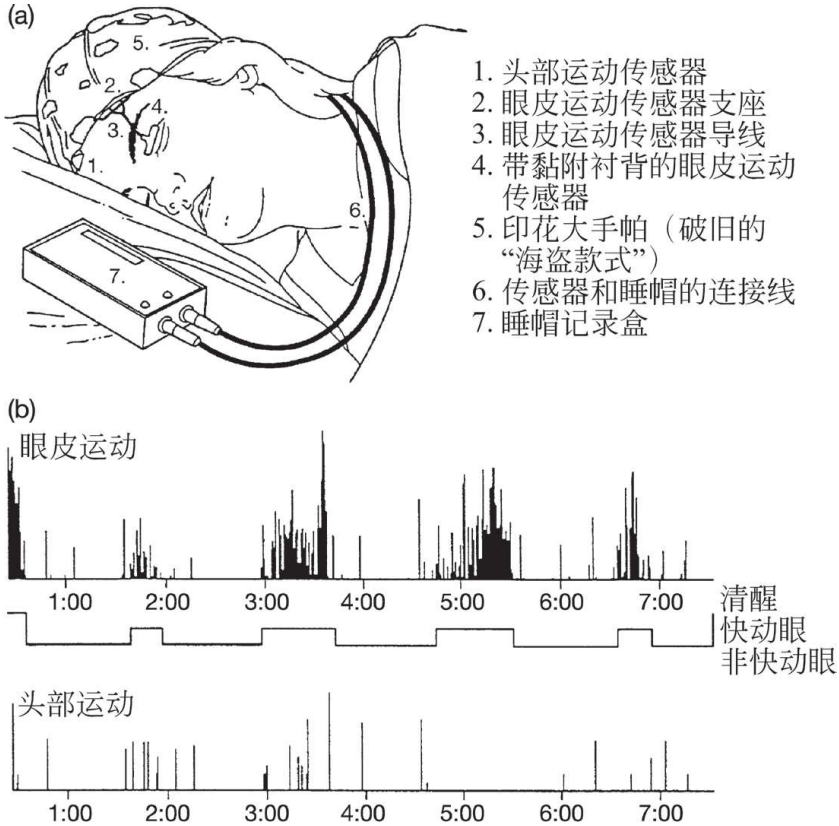

图1　根据受试者带睡帽睡觉的照片绘制的白描图，以及睡帽输出数据及其分析。第一条描记线：眼皮运动分布图；第二条描记线：睡帽输出数据经计算机判读的睡眠结构图；第三条描记线：头部运动分布图。

第一个是我们可以从入睡、非快动眼、快动眼三个睡眠时相中的任一时相获得大量的报告；另一个则是可以在白天给受试者配备家庭传呼器，动态监测他们在两种醒觉状态下的信息。这样的话，同一个受试者既可给我们梦的报告又可给我们意识清醒时的报告。我们要把对大脑活动的理解扩展至清醒状态，要获得同一个体在清醒与睡眠时的具有可比性的的定量数据，最后这一点至关重要。

小结

描述、定义和测量意识状态的两极——清醒和做梦，本是脑科学的第一要务，但直到最近这一任务才被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想来真是有些讽刺。尽管艺术家和诗人们长久以来对这一领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意识状态之间的差别也给予了适当的评价，但科学家们却避开了这一研究课题，因为他们没有客观方法去测量主观的体验，而主观体验又被认为是不可靠且难于处理的。但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把主观体验作为研究资料这一对人类意识状态的直接研究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依靠技术手段，我们现在拥有实验室和现场研究方法，可以建立大脑活动和精神体验相关的指标。另一方面则涉及概念：集中于研究精神活动状态的形式，而抛开那些令人纷扰的精神内容方面巨大的个体差异。在第二章中我们会看到，清醒和做梦之间的大部分重要差异，都可以通过形式分析解决。靠分析内容来解释意识状态之间的形式差异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今，这一重担终于可以卸下了。

第二章

梦的内容分析为何没能成为一门科学？

如第一章所述，尽管在梦的形式分析方面曾有过一些重要的先驱者，但大多数梦学的理论家们更偏爱关注梦的内容。深为梦显而易见的不可思议所困，这些理论家们设想有某种图像符号或一套转换规则（算法）可以把梦境深潜的含义以象征、隐喻和感性术语表达出来。无论是为了医学诊断（古希腊人）、算命（阿尔米多鲁斯的著作）、宗教预言（《圣经》），还是进行心理占卜（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原始科学架构），释梦从来都是内容分析的主要目的。

鉴于弗洛伊德的生活时代和时代精神都与我们如此相近，但我们以大脑为基础的理论和他的又如此不同，本章将着重讨论他在《科学心理学方略》和《梦的解析》中建立起来的精神分析模型。弗洛伊德渴望他的心理学有一个坚实的脑科学基础，这在今天已非难事，但在一百多年前，要做到这一点还为时过早。正因如此，他被迫转向了思辨哲学这一以内容分析为主体的前现代梦学理论的通用工具。弗洛伊德的内容分析体系和现代理论的差别如表1所示。

表1　弗洛伊德理论和激活-整合理论的区别：两种模型对梦的状态改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梦的现象	精神分析	激活—整合
诱因（动机）	被压抑的潜意识愿望	睡眠期间的大脑激活
视觉表象	退至感觉层面	高级视觉中枢激活
错觉	初级加工思维	DLPFC失活导致工作记忆丧失
怪诞	愿望的伪装	超联想的整合
情感	对自我的次级防御反应	边缘系统的原发激活
遗忘	压抑	器质性（生理性）失忆
意义	相当含糊不清	清晰，明显
解析	需要	不需要

DLPFC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对所有前现代梦境内容分析家们来讲，梦者所经历的梦境并非它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而是机体生病后一种异常的信息输出（古希腊的析梦诊断），或是上帝关于未来的神谕（阿尔米多鲁斯所谓的异教徒或《圣经》中的犹太-基督）。弗洛伊德则采用了“信息异常”这一观点，并表现得像一个拥有高超心理技巧的顶级牧师，可以告诉病人一些他们本不可能知道的关于他们自身的事情。上述的所有这些体系，包括精神分析，本质上都是基于对某种神秘力量的笃信，这种神秘力量可以发出秘密指令，唯有借助能够解读这种信息的人的介入才能理解这些指令。

这些观点的滋生是基于一个普遍的假设，即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上帝或神，创造了并维系着人类及其生存的世界，创立了世间万物的雏形，并因此得到人们的感恩戴德。尽管弗洛伊德是一个公认的无神论者——他对宗教的排斥实际上是一种恐惧——但他还是回到了神秘力量这一观点上，他相信有一种动态的潜意识在与意识进行着持

续的较量。在梦中，这一竞争变得像战争一样，所以意识被迫借助极端的防御以避免被征服。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所有内容分析体系在本质上都是两极分化的，即总存在两股力量——我们和他们、身体和灵魂、自我和本我、大脑和精神。从梦的内容解析到形式分析的转变证明这种架构发生了部分改变，即引入了如下哲学观念：物理世界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世界，大脑和精神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而做梦是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为睡眠时的大脑状态所引发。为对弗洛伊德公平起见，我们必须承认：他确实知道（或者和我们一样虔诚地相信）上述情况是事实，只是那种解析的传统力量过于强大和诱人，使他难以抗拒，尤其是他当时对大脑还几近一无所知。

然而，当看到如此多的梦学理论家无法领会梦的形式理论时，我们还是不免感到惊讶。当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问：

“为什么我们看同一样东西在睡梦中要比清醒时更加 清楚呢？”

我们期望这位伟大的天才能提供这样一个大胆推测但又充满自然主义色彩的答案：

“因为大脑的视觉成像系统在睡眠时被选择性激活了！”

梦能预测未来吗？

从远古时代开始，梦的神秘性——我们现在知道主要是由其形式特点决定的——就使人们相信梦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息。梦被看作是预言性讯息，经过适当的破译，就能让我们预测未来。没有任何科学证据完全支持上面的理论，但也没有明显的科学证据反对它。确实，当个体面对伤心事，如为可能失去生病的亲人感到忧虑时，他会更多地梦到自己的亲人而非其他。我们从对清醒梦的实验研究中可以知道，仅因为在睡前想着某个主题就可能改变梦的内容。因此，当亲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梦到他或她就

完全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如果梦者醒后打个电话，发现亲人死了，就认为那个梦是死亡的先兆，这也可以理解。但这是错误的，它不过是种巧合：一个人正常地对某种状况深感忧虑，而他害怕看到的事情正好发生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反过来：有什么科学证据可以证明梦的出现具有预言性。答案是我们需要做一些所谓的前瞻性研究，亦即，我们按照个体的梦中生活对其进行抽样调查，并让一些对这些个体及其梦境一无所知的评审者找出梦中事件和真实生活事件之间的预见性或一致性。但这里有个问题，相信梦境预言性的个体常常会举出一两个“命中”的典型例子，而他们从来不会告诉你他们做过多少与实际发生的事件并无联系的预言性梦。要对梦的预言进行科学的研究，我们需先积累一些信息，看看梦和清醒现实之间的巧合有多普遍。但在我们找到证据之前，最好认为这个假定是错的。

当莎士比亚（Shakespeare）将“我做了一个非常古怪的梦，真是匪夷所思”归咎于认识的根基时，他为何不继续下去，通过如下假定来终止这一循环：

“由于睡眠期间，大脑的记忆机制受到严重干扰，那 些本来只有在精神错乱时才会出现的荒诞精神体验就不可 避免了。”

实际上，梦很像某种形式的精神错乱，这一相似性正好可以为大脑创造梦的过程提供某些线索。频繁的视幻觉（在感知方面）、定向的错乱及短时记忆的缺失（在认知方面）结合在一起让诸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Carl Jung）等医师们认识到，梦境最易激发的精神疾病是谵妄，这是一种由于酒精或药物中毒、缺氧（血液循环障碍所导致的大脑供氧不足）、急性颅脑外伤等引起的急性脑功能紊乱性精神疾患。荣格曾说过：“唤醒一个正在做梦的人，你就能看到一次精神病发作。”这很正常，但你会看见什么样的精神病呢？答案就是谵妄。这一事实说明必须有大脑功能的巨大转变才能导致精神状

态发生如此改变。在第七章，我们将回到这个话题上继续讨论。

关于精神状态，我们需要注意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现象学的，一个是方法论的。在现象学方面，“精神状态”意味着整体性，当精神状态改变时，精神活动的每一个方面都会发生改变。想要使精神状态发生全面改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来一次大脑状态的全面改变。在方法论方面，精神状态的临床评估一般是通过所谓的精神状态检查来完成，它综合了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知识，是针对大脑功能的综合性量表，而这种脑功能又可以为大脑的器质性病变所扰乱。脑器质性病变指由身体状况异常而非精神状态改变所致的大脑疾病。

要想把梦科学的深远寓意引入到广义的意识科学中去，先来考虑一下精神状态检查的下述类目：

·意识：清醒还是模糊？

·注意力：集中还是分散？

·智力：敏锐还是迟钝？

·感知：外在驱动还是幻觉？

·认知：逻辑性的还是非逻辑性的？

·情绪：稳定还是不稳定/失控？

·记忆：好还是坏？

·抽象：象征性的还是具体有形的？

尽管上面只是很不完整的一部分条目，但足以使我们认识到，没有把精神状态的概念及其检查方式应用到梦和梦境分析中来确是考虑欠妥。

以下这个例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做梦时精神状态改变的整体性。

1981年3月9日　红色汽车　第16号梦例

我正在努力组织一队人马出发。我在某个山脚下靠近水的地方，找到了其中的一个成员，敦促他赶快上山到出发的集结地去。

突然，也可能一直都这样，他坐在一辆红色汽车里，从我身旁一路驶上山。奇怪的是，车的前半部分包括司机本人，都在地底下，但车走得很平稳，地面也没有裂开。

我们爬山的时候，车子跑在我前面，我努力想赶上它，但无济于事。然后，

车从左拐到右，径直撞上了一堵墙——前半部分依然在地下。我在想司机的头会不会在撞车时受伤。

场景突然变了。

我在一间更衣室里，向我的儿子伊恩走去，他受伤了。一开始，他的双腿看起来像是从膝盖以下被截断了，我感到十分恐惧。当我逐渐走近的时候，我发现原以为是残肢的东西实际上是他沾满血污的护膝（鲜红的血，就像那辆车一样，他在笑着而不是哭），我于是释然了，并从梦中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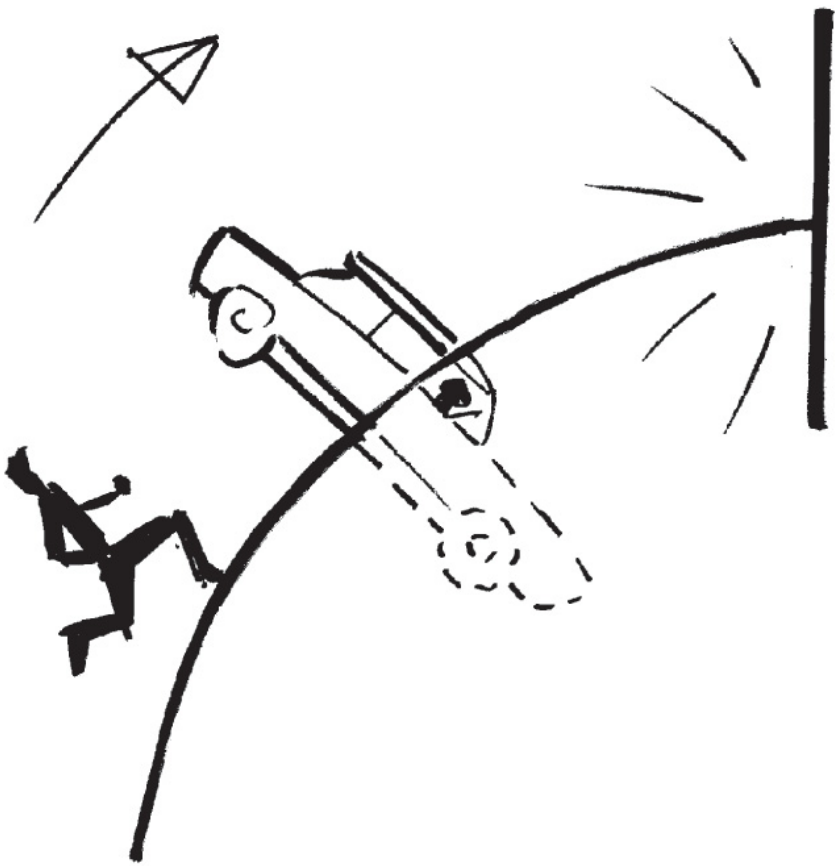

我的意识 非常清楚。事实上，我用一种超现实的强度 观看并感受着梦中的一切，这种超现实的强度一定能取悦安德烈·勃勒东（André Breton）和达芬奇。强烈的幻觉性感知牢牢地控制了我的注

意力，当那辆半埋在土里的车冲上山撞毁的时候，我只能入神且充满恐惧地旁观，尽管我竭力想要制止它。这种惊恐害怕的感觉在场景转换到更衣间时还继续存在，直至看到我的儿子安然无事时我才松了一口气。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但在梦里，我的认知是有缺陷的，逻辑推理也极差。那辆车怎么可能像我看到的那样半埋在土里开动而不破坏地面呢？只能用“眼见为实”来解释了。

我的红色汽车之梦揭示了另一种联想，一种具有高度情感显露特征的联想。我的儿子伊恩曾在车祸中严重受伤，他的一条腿险些没保住。所以，我的关联性记忆很自然地把那个红色汽车的撞车事件与我儿子伊恩联系起来。但是 （一个大大的但是！！！ ）我在梦中看到伊恩时，他所在的地点，并不是事故发生当时他真正所在的医院。而且他当时只伤了一条腿，并非双腿受伤。这种梦境情节与个人经历的长时记忆（即心理学术语中的情景记忆）相背离是很典型的，需要作进一步解释。情景记忆可能为梦境内容的情节建构提供有用的片段，但是它并不能提供那些在清醒时很容易记住的细节。这是为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该忽略这样的情况，因为没有什么比弄清记忆是如何工作更迫在眉睫的了。这意味着梦的科学是一系列用于理解记忆形成的潜意识层面的规则，但这里所说的并不等同于那些分析梦境内容的理论家们所指的规则。

将第一章的启示扩展一下，现在梦的科学需要对精神状态的众多亚型进行更为仔细的考量。表2给出了这些亚型分类的列表及神经生物学的相关解释。既然我们几近偶然地发现了一个现在看起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梦的怪诞是定向错乱的一种反映，我们还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其他记忆功能的东西。陈述记忆和/或情景记忆是否参与了梦的情节建构？这种参与是在什么条件下，又到了何种程度？“陈述”、“情景”这些词涉及到与个人经历或历史事件有关的特殊记忆，例如：我上周末去了波士顿，这种记忆与“语义”记忆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包含的是一般事实，如波士顿是马萨诸塞州的首府。另一种类型的记忆是“程序”记忆，如我知道如何开车去波士顿。

那么思维又如何呢？我们已经知道，在梦境中思维受到了抑制，

即使确实出现思维活动也是收效甚微。

在那些为梦的形式理论（大脑状态等同于精神状态）作出贡献而未曾被广泛颂扬的英雄们当中，浪漫主义运动人物——戴维·哈特利（David Hartley）的形象隐隐浮现，他生活在19世纪初，以英国联想主义之父而闻名于世。联想主义宣称：物体、人物、观念等，乃至内容的每一分类之间都有着绝对相似性，而记忆正是根据这种绝对相似性整合而来的。第一章我的理查德·纽兰之梦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往画上喷漆和往葡萄藤上喷硫酸铜之间的联想性关联。尽管目的迥异，但过程相似——如果想用液体来覆盖一大块表面，那么把液体变成微小的颗粒，再通过某种增压雾化系统喷洒出去是相当有用的。红色汽车之梦中有另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幻想的撞车事件和我儿子的车祸之间的联想。

表2　清醒和睡眠意识之间差异的生理基础。第三栏中列出的因果假设将在本书的后面部分予以解释。

功能	差异的本质	原因的假设
感觉传入	阻断	突触前抑制
感知（外源性）	消失	感觉传入阻滞
感知（内源性）	增强	储存感觉呈递的网状系统去抑制
注意力	丧失	胺能调节下降
记忆（短时）	消失	由于胺能解调，激活的呈递未被储存在记忆中

续表

功能	差异的本质	原因的假设
记忆（长时）	增强	储存记忆呈递的网状系统去抑制使得与意识的联系更为便捷
定向	不稳定	内源性间断的定向信号由胆碱能系统激发
思维	推理尤其是逻辑的严密性削弱，超联想的进程	注意力、记忆、意志丧失导致程序化的失败和规则的不连续性，类比替代了分析
自知力	自省力消失	注意力、逻辑性、记忆的丧失致二级和三级指令的传递弱化
语言（内生的）	虚谈的	胺能解调使描述的合成不受逻辑限制
情感	阶段性增强	大脑中杏仁核及相关颞叶结构的胆碱能过度刺激引发了不受胺能抑制调节的情感风暴
本能	阶段性增强	下丘脑和边缘前脑的胆碱能过度刺激启动了固定动作运动程序，这一程序可以被模拟体验而不需付诸实践
意志	弱	下行性运动控制和额部的执行能力难以抗衡去抑制的皮层下网状结构的激活
输出	阻断	突触后抑制

摘自艾伦·霍布森和爱德华·佩斯-肖特，《基础神经科学》第二版，2002年11月

梦的精神分析理论为何会失败？

当弗洛伊德创造了“日间余思”这一名词并称之为梦刺激时，他一定也想到了情景记忆掺入的片断性。但是后来对梦的记忆来源所作的科学研究显示：就连这个观念也是错误的。根据托雷·尼尔森（Tore Nielsen）的资料，对某个给定夜晚的梦境来说，它之前那个白天的记忆在已完全确认的记忆来源中掺入的程度是相当低的。其参与度随时间回溯而增加，至做梦前的第六天达到顶点。根据法国神经生物学家米歇尔·朱维特（Michel Jouvet）的梦例数据，参与度的峰值出现在梦前第七天，而且从不包括那些与他刚刚到过的地方有关的内容。这对那些强调近因以及情感显露的理论，都是一个不小的意外。

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有两个致命的科学缺陷，都是他的巧言雄辩难以掩饰的。一个是相关脑科学的缺失，他本人也很清楚这是必不可少的，并且终有一天会迫使他的理论作出修正。关于这一点，他不应该受到责备，因为他也是所处时代的产物，而他的雄心已使他超前于自己的时代整整一个世纪。但既然他曾接受了作为生物学家的教育，我们就可以不失公正地发问，他为何像旁观者一样粗心大意？他所掌握的资料为何如此有限？他的关注点为何如此狭窄而僵化？

仅就数据而言，弗洛伊德并未尝试从自己以外的人那里收集梦例，积累的梦境报告也是数量极少（在他《梦的解析》一书中，700页里只引用了约40个例子），而且都是片断性的（字数不到100，比现代大多数样本少很多）。在19世纪90年代，和今天一样，想要收集一个广泛而有代表性的样本，并把这个数据集视为整体，而不是用弗洛伊德那种零敲碎打、先入为主且颇具争议的方法去逐个研究，其实并非难事。

弗洛伊德的学识在他详细讨论20世纪以前的科学文献时显露无遗。但是，在论述他人作品时，他总是制造争论、心存排斥，而不能保持公正客观、平和的心态。在很多情况下，他嘲弄性的批驳看似合理，但作为一个深知大脑重要性的人，他在对待像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他正确地假定做梦时大脑的某些功能如视力选

择性增强，而某些功能如记忆、逻辑则选择性衰退）这样的天才巨匠时，却表现得那样目空一切。对弗洛伊德来讲，认为“梦的内容都是无意义的亦即无理由的联想”的观点该被唾弃。他于是认为，冯特关于“梦的怪诞特性反映了松散相连的内容之间无序混乱的关联”的想法也是错误的。

弗洛伊德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先驱。一个是戴维·哈特利，他把梦的怪诞特性归因于联想太多，并建立了一套功能理论以配合自己的假说——一个很有可能是正确的假说。梦，对哈特利来说，其功能在于让联想变得松散，否则它们就近于妄想性偏执。“那就是精神错乱，”哈特利宣称。当然，梦是一种超联想状态（亦即一个各种联想大量产生的状态），如果弗洛伊德能在急于释梦之前先审查一下梦例，他也能很快得出上述结论。

第二个伟大的先驱是冯特的老师赫尔曼·赫尔姆霍茨（Herman Helmholtz）。他还启发了弗洛伊德的启蒙者——赫尔曼·缪勒（Herman Muller），并为反活力论思想的建立作出了贡献，而弗洛伊德的理论正是植根于反活力论思想的时代。当在其经典著作《生理光学》中讨论到梦时，赫尔姆霍茨就是从形式的角度去分析幻觉运动。正如赫尔姆霍茨指出的那样，贯穿梦境空间的那种自体运动感觉是梦最显著的形式特征之一。今天，当我们提到“感觉运动幻觉”时，我们只是在引用赫尔姆霍茨的观点：睡梦中的大脑能够非常逼真地模拟运动行为。赫尔姆霍茨认识到，这意味着清醒时的运动控制一定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他还详细阐述神经系统创造了其所预测的运动结果的影像。

这一观念即所谓“传出复制假说”已在运动生理学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当且只有当我们能够预测和投射一个动作输出的影像，我们才能有效地运动。这种看似神奇而毫不费力的梦中运动（以我的失重滑行和某些清醒梦者的飞行模式为证）源于睡眠时运动模式自启的、闭环式的激活，而这种激活可被我们自身感知并加以完善后输出。当然，这意味着大脑中各种运动模式发生器的激活，现在已有很多证据支持这一点。

对于飞行的梦，可怜的老弗洛伊德能做的只有争辩说它们代表转移的性欲。你可以回忆一下，弗洛伊德的文字游戏，即潜意识愿望和需要被封存在潜意识之中的性欲望，在睡眠使自我弱化时，逃脱了潜意识监督的抑制。现在，这种性冲动可以自由表达了，但它们如果不经过那种愉悦的但非性幻想的飞行的伪装，感知到这些被禁欲望就会将梦者唤醒。弗洛伊德从未提及过自己的性梦，或许他从没有做过或是完全没有记忆，但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一个他的研究参与者或病人，都应该告诉过他：爱做带有性高潮的性梦的人，正是那些同样爱做飞行梦的人。

我现在进行的这种讨论被批判为“反弗洛伊德运动”，饱受很多精神分析狂热支持者的抨击。确实，我坚决质疑弗洛伊德理论，但这只是因为我们还都处于接受某些续惯的心理学释梦理论的危险之中，而这些梦象的生理机制所包括的心理学内涵很可能与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大不相同。例如：我们可能在梦里经历一些奇特的动作，包括性动作，以更新那些对生存至关重要的动作程序。我们也可能把梦看作是以情感显露或重要记忆为手段，为修正那些程序所作的努力。例如我儿子的事故就是我自行车之梦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在我们阻止他骑自己那辆电机受损的车之前，他曾遭遇过另一次严重的事故。伊恩的自行车事故深深扎根于我的记忆里，时时警告我事故可能再次在我和他的身上发生。

联想真的能够无所依托而自由存在吗？

联想之所以成为联想，是因为之间存在有意义的关联。而这些关联的意义，是由引发它们的场景及其历史渊源共同决定的。所以，弗洛伊德这个无神论者，由于其独裁式的思维，注定要创造一种新的以自己为最高领袖的狂热信仰，他也因此注定要为其病人梦境的内容作出某些联想的暗示，即便他得拼命让自己与催眠术划清界限并逃避对暗示的批评。这一点在他对癔症病人的研究中体现尤为突出。他已经

认识到这种病人具有高度的可催眠性。同时还从1885年在巴黎萨尔佩特里艾尔（Salpêtrière）医院的经历中知道，神经病学家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和让 - 马丁·沙尔科（Jean-Martin Charcot）可以从癔症病人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结果，尤其是在医学教学的阶梯教室那种戏剧性的场景中。

弗洛伊德认为让病人躺在躺椅上（建议处于睡前放松状态），而自己坐在病人身后（消除人为因素的影响），就可以避免对内容作出暗示，回想起来，这种想法真是太幼稚了。入睡是大脑梦幻活动尤为频繁的一个时期，这种梦幻状态可以随意掺入任一局部状况。而最迟到1910年，任何病人，不管是否为癔症患者，都应该知道弗洛伊德通过“各种联想”期待什么样的结果。现在假记忆现象已经广为人知，我们轻而易举就能看出弗洛伊德的“科学”预警对他产生了怎样的毒害。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需要比弗洛伊德更富有批判性和普遍性。

要想从自我应验预言的控制下把梦境形式分析法解放出来，就应该对心理学解释不存先入之见，反对任何公式化的解析法，拒绝任何不够直白且与生理学无关的解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目标降低，不能像弗洛伊德期望的那么高。本书在第十一章还将说明，梦的很多方面还是我们现在无法解释的，尽管像本书努力阐述的那样，梦的很多内容可以 通过形式分析法进行解析。对那些还不能解释的方面仍需假以时日，但以该领域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这种等待不会太久，而且也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终将得到弗洛伊德梦寐以求的——一门洞察秋毫、确定无疑的心理学。

大脑 - 精神相形论及梦的科学

“相形论”这个词意为形式或形状的相似，大脑-精神相形意味着精神活动的每种形式都有类似形式的大脑活动。因此，如果我们监测到一个梦境，就能够找到一种相应的大脑活动。做梦的时候，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脑的激活。要想解释睡眠中意识的觉醒，我们应该可以找到

一个相似的（当然不一定是相同的）大脑觉醒。在第三章中将看到，我们确实找到了，大脑的电活动在睡眠中被激活的同时，意识也开启了。就这么简单。

下面这个更详细的例子可以证实我们的观点。当我们研究睡眠中的大脑时，如果我们发现生理学证据表明记忆系统是失活的，就可以预期记忆力在做梦时发生了变化，梦会变得难以回忆。我们已经知道后一个预测是真实的，只是还不能准确说出到底有多真实。而前一个预测却很少被接受。难道我真的不能在做梦时运用自己的情景记忆吗？这会影响梦的内容吗？

选择这些例子是为了强调大脑-精神相形论中的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从大脑映射到精神和从精神映射到大脑是同样富有成效的。第二个是我们必须谨慎选择两者的适当层面，以便将我们相形性分析的努力集中于此。开始时，而且现在基本上仍处于开始阶段，我们会发现整体的、具有心理学普遍性的层面会比具体的、具有心理学个体性的层面更易有所收获。心理学研究在个体差异方面从来都所得甚微，就是这其中又能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关注相应的形式特点，应该成为科学理解梦的通行做法，尽管这可能会使期待释梦算命的你大失所望。本书后文中我们会看到它是如何被用来帮助解析个体的梦，从而使梦的解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成为可能，并有助于我们去认识梦里那种常见的十分清晰的情感显露。

第三章

睡眠状态下大脑是如何激活的？

意识清醒度在睡眠状态下如此快速而急剧地下降，以至于我们自然而然就作出这样的推测：在入睡时大脑只是简单地关闭，于觉醒前重新开启。确实有部分人整晚都睡得很沉，忘乎一切，不受干扰，但也只是部分而已，绝不可能人人都会如此，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总是能够睡得那么好。人生中总会有生活变故或压力应激的阶段，而此时的精神活动似乎整夜不断。这是否会导致我们在这些时期难以入眠呢？或许是的。那么梦又该作何解释呢？在这么一个沉寂的大脑里边，怎么会出现如此复杂而又兴奋的精神活动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错误答案。由于梦的记忆通常不尽如人意，而且需要不断从睡眠中觉醒，所以很多科学家——包括弗洛伊德本人——都错误地认为梦只出现在觉醒前的一瞬间。现在知道梦确实可以出现在正要觉醒时，并且我们还注意到梦的刺激可以令人不快以至于引起觉醒，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错误的观念，即所有的梦都是不愉快的，即都以负性情绪如愤怒、焦虑、恐惧等为特征。

还有一个错误的理论认为梦的产生是对外源性感觉刺激的反应，这种刺激强到可以激活大脑，但又不足以引起觉醒。我们也承认火车的呼啸声、消化不良、配偶的晚归等确实能影响梦的内容，但这种影响并不那么频繁。即便它们确实进入了沉睡中的大脑，梦也不会依赖这样的刺激。

现已证明大多数的梦境都发生在看似平静的睡眠状态下，是大脑激活这一内在机制的作用结果，它在我们每个人漫长生命中的每个夜晚都发挥着作用。本章的目的就在于描述睡眠状态下大脑的激活是怎样被发现的，它是如何逐步引发梦从内容解析到形式分析这一思维转换或策略转变的，而后者正是我前面两章的主题。在开始我们的阐述之前，有必要郑重申明，人们花了整整半个世纪（1900—1953）去发现睡眠状态下大脑激活这一事实，而我们又花了50年（1953—2003）来接受这一事实，但现在仍然有很多老顽固不肯放弃自己的无望幻想，死守内容分析所提供的对梦的解析。

睡眠状态下大脑激活的发现为何用了如此漫长的时间？

我们倾向于认为是技术发展的缓慢阻碍了梦科学研究的进展，而事实上这不过是某些人用来保全体面的幌子而已，因为他们在概念上如此盲目，以至于无法设想本能得出大脑激活结论的简单实验。正如米歇尔·朱维特在小说《梦的城堡》中描述的，我们所吹嘘的那些20世纪的睡眠科学发现，其中的大部分本可以通过最有用的科学手段更早发现，那就是直接观察。对婴儿和儿童的睡眠进行直接观察尤其容易实现，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行为最形象地揭示快动眼睡眠时的大脑激活。

人们总是在几乎就要发现大脑激活这一事实时与其失之交臂。那极少数有足够兴趣去做一些类似睡眠或梦实验的科学家，总是在研究中扰乱受试者的睡眠，而非纯粹地观察他们——用自己的双眼去观察周期性出现的脸部和眼睛的小动作以及隐约的哭像、阴茎的勃起、肌张力低下、脊髓反射受抑，还有许多其他自主或自动调节的生理指标（如呼吸快慢这一简例）。这些学者，其中大部分是法国人，所关心的是梦的诱导，通过在受试者的鼻子下打开一瓶香水，是否能诱导受试者梦到某种特殊的气味？根据他们的实验结果答案是肯定的，但非常、非常困难。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错过了观察自然睡眠的机会。

诚然，没人会认为整晚熬夜去观察别人睡觉是一件趣事，即便这样做可能带来重大发现，也还是需要非同寻常的动机和些许自律。如果弗洛伊德曾设想过梦中的行为可以被观察到，他笃定会有十足的动机去这样做，他本可很快发现要做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所需要的不过是在白天睡觉而已。而他本可以除了观察什么也不做，更不必为暗示感到恐惧担忧了。

在现实中甚至比上面说的还要简单。任何想要直接观察快动眼睡眠行为的人都可以通过观察同床而眠者达到目的，尤其是利用凌晨一两点钟的时间。最方便的莫属夏季度假的时候，在黎明的微光中，可以看见角膜凸起部在紧闭或半开的眼睑下来回滑动，眼睑本身也会偶发舞动或颤动，此时，只需在梦者肩上轻轻一拍，然后问他脑子里正

在想什么。在这种非正式情况下进行观察和在大学里的睡眠实验室做实验一样，最好要取得被观察者的知情同意，但别因为这一点阻碍了你的观察。

如果找不到一个愿意合作的同眠者，也可以观察你姐姐的小宝宝或是其他人的宠物猫或爱犬，这会体验到同样惊喜的发现。当然如果你想要问它们 是否在做梦，不要奢望会得到任何回答。不过既然你已经知道成为大脑激活的睡眠最流行名字的快动眼睡眠是内部激活机制的直接反映，你就可以自己回答这个问题了。但这并不是说做梦只发生在快动眼睡眠期间，绝不是！快动眼睡眠只是碰巧提供了梦境产生的最理想环境。

在第四章，我们将探讨做梦时的大脑，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只有我们的动物实验合作者才能回答；在第五章，我们将考虑充足的快动眼睡眠产生对所有新生哺乳动物具有的意义。在这里我的观点相当简单且客观。任何自然史研究所作的第一步努力都是安静、仔细地观察和全面、系统地记录。有点令人尴尬同时又颇具启示意义的是，1930年之前所有致力于睡眠或梦科学的研究者中从没有人这样做过。如今还有多少突破性的发现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被这样一个毫无道理的假设——没什么可观察的及/或我们可以通过直觉或思辨来代替直接观察——所束缚而与我们失之交臂呢？

脑电图和睡眠实验室

和心理学家一样，神经生理学家推动梦科学向前发展的速度也很缓慢。他们知道反射但不懂得自发的激活，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大脑和睡眠中的思想一样，其所有的激活状态都依赖于外界刺激。

科学史上有两位伟大人物研究了反射并且认为精神活动依赖刺激。诺贝尔奖得主查尔斯·谢灵顿（Charles Sherrington）争辩说反射是大脑的功能单位，很有说服力。他从未认真听取过他那富有想象力的学生——托马斯·格雷厄姆·布朗（Thomas Graham Brown）的意

见，后者一直试图说服谢灵顿成对的“半中枢”的自发活动是反射反应的基础。谢灵顿反射理论和布朗半中枢概念的根本差别在于，“反射”大脑完全依赖于外源性刺激，而“半中枢”大脑有能力产生自发活动。谢灵顿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从自己的意识经验出发认为大脑在入睡后完全关闭。

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因为揭示了条件反射的存在而声名鹊起，他持有与谢灵顿相同的观点，即睡眠状态下思想一片空白（错！），因为此时大脑不再兴奋（再错！）且未受任何刺激（又错！）。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看到，直到快动眼睡眠被发现之后，人们才证实神经的基本单位——即所谓神经元在睡眠状态下是持续激活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大脑从来不会彻底关闭，因而大脑总能维持一定水平的精神活动，即使清醒或睡梦时的意识都有赖于一定活跃程度的大脑激活。

1928年德国精神病学家阿道夫·伯格（Adolf Berger）利用一个放大器和记录仪——即后来所说的脑电图仪，成功地从病人的头皮表面记录到了脑电波，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从此大为改观。正如其改变临床神经病学一样，脑电图也让睡眠和梦科学发生了彻底变革，因为它为评估癫痫患者和正常个体大脑动态活动提供了客观工具。图2对脑电图和现代睡眠科学研究的其他测量指标作了图示说明。人们对伯格提出质疑，认为他所谓的“脑电波”只是运动伪差或肌肉活动的假象，而伯格通过显示脑电图在睡眠状态下出现独特变化而赢得了胜利。简而言之，行为学上的睡眠与脑电波的频率减慢和幅度增大趋势有着固定不变的联系，这一变化标志着我们现在所说的慢波睡眠或非快动眼睡眠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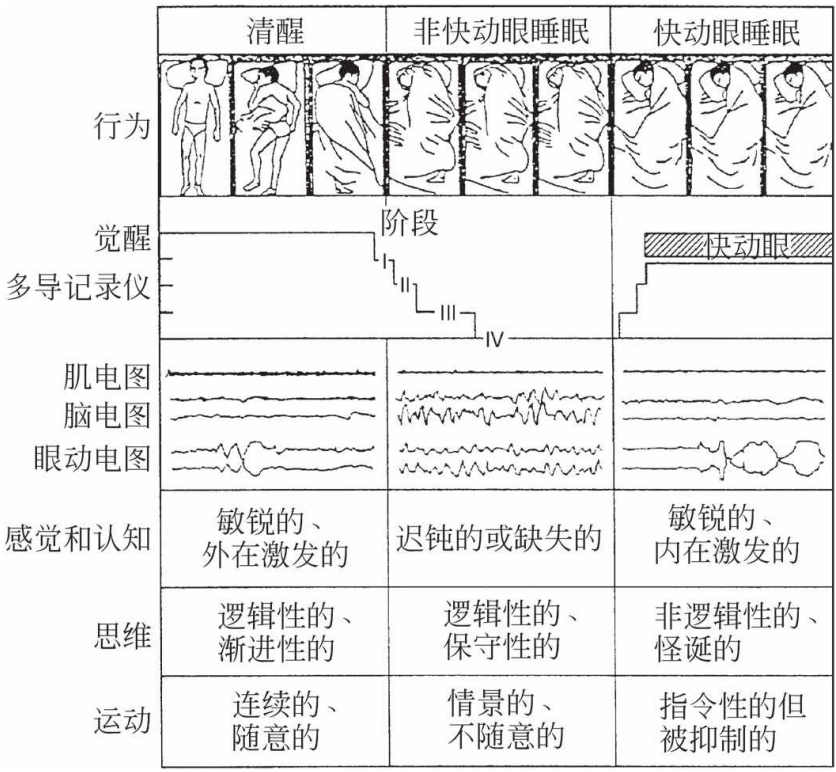

图2　人类的行为状态。清醒、非快动眼睡眠、快动眼睡眠状态有行为学、多导记录仪和心理学表现，这些状态次第发生的顺序以多导记录仪的导联表示。三个用于区分不同状态的描记图例也显示在图中：肌电图，清醒时最高，非快动眼睡眠其次，快动眼睡眠最低；脑电图和眼动电图都是清醒和快动眼睡眠时激活而非快动眼睡眠时静止。每个图例持续约20秒。

脑电图问世不久就被当今睡眠实验室的先驱者们用于进行睡眠研究。记录生理指标的能力在20世纪增长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几乎忘记了早期的装置是多么简单，而先驱们利用这些装置获得了多么惊人的发现。今天的多导记录仪都直接源自“伯格的发明”，一个所谓的电压表可将电信号强度增加3级，使体表微电压的范围达到记录仪需要的电压范围。脑电图的测量指标包括广为人知的原先记录心脏活动的心电图（ECG）及从中发展出记录眼球运动的眼电图（EOG）和记录肌张力活动的肌电图（EMG）。

睡眠状态下大脑的激活是如何被发现的？

脑电图和眼电图的结合，成就了尤金·阿瑟林斯基（Eugene Aserinsky）和内撒尼尔·克莱特曼（Nathaniel Kleitman）在1953年关于睡眠状态下大脑激活的发现。由于眼动（动眼神经的激活）和大脑激活的密切联系，他们把睡眠状态下大脑激活期称为快动眼睡眠，他们曾断言做梦可能是另一个与此相关的事件。而肌电图（加上脑电图和眼动电图）使米歇尔·朱维特和弗兰克斯·米歇尔（François Michel）得以证明肌张力维持姿势，因而姿势运动在快动眼睡眠状态下是被主动消除的。

在1953年之前，人们认为睡眠是不均一的，难以追踪且毫无生机。换言之，脑电波活动的电节律不断改变，既代表大脑的整体活动，又预示局部的变化。错误的观点认为只有快动眼睡眠期的强烈大脑活动能够维系梦的存在。由于快动眼睡眠每隔90分钟周期性出现一次，且每晚占据1.5到2小时的睡眠时间，所以看起来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做梦，频率肯定也很高，而不仅仅是在觉醒前的片刻。

但后来证实，梦也可以出现在刚入睡时（这并不奇怪，因为此时的脑电图还是相对活跃的）和所谓非快动眼睡眠的其他时相，尤其是深夜的II期睡眠，此时的大脑几乎和常被称为I期的快动眼睡眠时同样活跃。而剩下的出现在夜晚早些时候的III、IV期睡眠，与梦关联的可能性就相当小了。

我们的梦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

现代实验室证据有力地证明：梦是彩色的。那我们为何会误认为梦是黑白的呢？答案显而易见，是由于糟糕的记忆。对梦的回忆不仅需要睡眠状态下大脑功能的激活，也需要清醒时大脑的参与，两者决定了梦是否能被回忆、是否能被清晰地回忆、是否能被详尽地回忆。在所有清晰、详细的梦例中，我们都能看到丰富

的色彩描述。我们的梦确实是彩色的。在我们成百上千的梦例中，没有一例清晰回忆的梦是黑白的，若确实如此，也在意料之中。

对睡眠实验室科学进行介绍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一点：尽管技术手段并不是科学地阐述梦或从行为学上描述睡眠所真正必需的，因为二者都可通过仔细进行直接观察来完成，但要显示睡眠状态下的大脑活动是连续且不断变化的，这些技术又不可或缺。

谁发现了快动眼睡眠和脑电图睡眠周期？

尤金·阿瑟林斯基一直致力于研究儿童的注意力，所以睡眠对他而言实在是个麻烦事，因为无论他如何费尽心机想让孩子们保持警觉，睡意总能占领他那些小受试者的头脑。像很多儿童的老师们曾看见的那样，阿瑟林斯基也留意到当受试者注意力下降时，他们的眼睛总是趋于闭合。他于是决定把电极放置在孩子们的眼睛附近以记录他们清醒时的眼动，这一招确实奏效。但阿瑟林斯基惊讶地发现，当他那些小受试者们最终被睡意征服时，他们的眼球会在闭合的眼睑下面前后上下快速地跳动。他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快动眼睡眠——第一个受试者是他7岁的儿子阿曼达。阿瑟林斯基是一个坚持不懈的科学家，但他又仅仅是比较幸运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入睡时的快动眼睡眠只出现在儿童当中。

正如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所言：“在观察这一领域里，机遇只青睐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当阿瑟林斯基把他的观察结果报告给他的导师克莱特曼时，后者意识到这一发现对梦科学的重要性。通过把这种对睡眠时眼动的观察拓展到成人领域，并记录脑电图、心跳和呼吸频率，阿瑟林斯基和克莱特曼得以观察到规则起伏的激活影响着整个睡眠过程中的大脑、眼睛、心脏甚至呼吸。当这种激活达到最大，伴随清醒样的脑电图、集簇的快动眼、快速的心跳以及

快而浅的呼吸，这时人们觉醒后就会提供长而复杂的梦例报告，类似下面这个例子。

1981年7月11日　冬季的乡村小屋　第19号梦例

我们在一个冬季的乡村小屋里，有些像东伯克郡的农场但又略有不同。K.D.K.也在那里，我们在滑雪。我怀着性动机寻找A.T.，但我已经至少20年没见过她了，且从未爱过她。她或许在小屋的楼上，那个小屋可能是我的，也可能不是。到二楼需要爬上一个变形的木架，上面有一些残缺不全的树枝样的阶梯。爬上去可真不容易，等我终于爬上去时，注意到暖气是开着的，因此这个房子应该有人居住，而我发现自己躺在熟睡的J.C.的怀里。

J.C.突然醒来，脸上带着意料之中的恐惧表情，想要弄明白自己究竟在哪里。当他艰难判断我到底是不是我，我是不是真的的时候，我看见并感受到了他的杀气和自我保护的恐惧。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集中体现出我们之间的关系所包

含的复杂情感。我试着安抚他："J.C.，是我呀，我爱你"，然后……

像这样明确以性为主题的梦在睡眠实验室环境中是相当罕见的，在那里，梦的内容更易反映受试者对睡眠的种种担心，诸如被观察或被唤醒。事实上，这个梦是我到中国广州旅行时在一家酒店睡觉时做的，可我的梦与此毫不相干。但我这个梦却是从快动眼睡眠觉醒后的典型梦境报告，无论这种快动眼睡眠发生在运用阿瑟林斯基 - 克莱特曼理论的睡眠实验室，还是发生在家里借助便携式睡帽监控系统来监控，或者是发生在中国广州的酒店里。

1981年7月11日　冬季的乡村小屋　第20号梦例

我又在爬向一个朦朦胧胧的卧室。这次，山坡从左侧盘旋而上。面前有两条路，一条安全但是很长，并穿越一座石山底部的草丛；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更陡一些，沿着岩石边缘垂直向上。我很高兴有人（是C.？）预先警告我说那些石头都已风化，因为这使我迅速适应了悬崖边不断滑落的大石块。我每踏出一步，就有一些花岗岩掉下去。这些巨大的石块悄无声息地从我的左侧掉落，直至消失。最终我如释重负地登上了顶峰，那是一个烤肉架样的门栏，我用双手对准它攀了上去。感谢我的女恩人，也是我的房东（是C.？），让我作好充分准备来应对这次危险的攀登。

这个快动眼睡眠之梦体现出的普遍特性包括，强烈而频繁的幻觉（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幻觉症，在这个例子中表现为攀爬运动都是危险的抓握）和自我意识完全缺失。梦的环境充满了典型的不确定性，“我的房子”其实不是我的；人物设定也模糊不清，尤其是这个例子中的C.；情绪方面无论担惊受怕还是兴高采烈均表现得颇为强烈。

我的大脑就像是在以一种特别的、极具选择性的方式激活，形成的幻觉和情感以人物的感觉运动即感知和行动的组合为特性，这些元素都以一种极为新奇却又富有个人色彩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罗伯特·麦卡利（Robert McCarley）和我在我们1977年的激活 - 整合论文中所要探询的梦的整合过程。在第五章，我们将通过影像技术在睡眠和梦科学中的应用获得更多关于这个假说的证据。

在睡眠实验室时代（1953—1975）的早期，研究目的在于确立受试者叙述的梦境细节与脑电图或多导记录仪描绘的生理细节之间的

关联性，这种试图把精神活动与外周实时生理功能建立关联的理论被我称为有说服力的一对一相形假说。但目标并未实现。因此，早期认为做梦者幻觉性凝视方向的改变次序可以预测快动眼睡眠的眼动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证实。尽管梦的内容确实偶尔反映出呼吸的突然增强和减弱，就像在转身、交谈或绘画时那样，但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

回过头来看，这一雄心勃勃的理论走向失败并不意外：对于清醒状态它也并不有效。它继承了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观点，即情感是对外周生理活动的感知，例如焦虑情绪是在我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加快后出现的。这一观点受到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和菲利普·巴德（Philip Bard）的质疑，并在他们所创立的情感中枢理论面前黯然失色。坎农和巴德认为，我们所具有的情感是大脑某个部分即大脑边缘系统（见图11）被选择性激活的结果，同时可以与各种各样的外周生理变化相随而生。

梦心理学和脑生理学之间的关联性甚至受到了更加严竣的挑战。首先由戴维·福克斯（David Foulkes）并有随后的其他很多心理学家报告，梦可以 与脑电图显示的任何睡眠阶段相关，当时他们得出了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结论，即梦的精神活动与睡眠神经生理学之间毫不相干。不管相信与否，这一精神-大脑分离假说至今仍受到某些人的狂热支持。不言自明，其中大多数是内容分析学说失落而坚定的拥护者，有不少甚至是顽固的弗洛伊德派，而无一是睡眠生理学的践行者。

在试图驳回大脑-精神分离假说众多令人信服的理由当中，有一个至今仍具强大说服力的证据，即对那些逼真而持久的梦来讲，快动眼睡眠为它们提供了最有利的生理基础，非快动眼睡眠的作用最多也只有快动眼睡眠的一半，至于睡眠伊始就少之又少了，而清醒时做梦那更是天方夜谈。就现有的科学知识水平来讲，我们只能说当快动眼睡眠的若干大脑条件具备时，做梦的几率更大。这一关联性对应的心理学部分只能由梦的形式分析而非内容分析给出。因此，在梦例里我们努力寻求度量受试者幻觉（并非真实所见）和幻想（并非实际所想）

的程度。

睡眠和梦科学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

正当梦的辩论进入白热化阶段，变得缺乏新意时，睡眠实验室揭开了一系列宝贵的生理学发现，对梦科学和行为生物学都意义重大。阿瑟林斯基 - 克莱特曼的发现是在1953年，同年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DNA双螺旋模型。这一巧合有两个重要意义，即生物学进入了分子时代，而梦科学同时进入了生理学时代。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生物学已经变得让我们无法辨识，事实上，现在的生物学面临着完全变成基因分子生物学的危险。

与此同时，睡眠和梦的科学才刚刚开始在概念上或方法学上接近分子生物学。这一方面是因为睡眠和梦科学的描述性任务过于庞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引入这一领域的概念，特别是来自心理学的概念，远不像这一领域所提供的科学机会那么多。即使在今天，也不是每个人都希望把精神活动物质化。太多的文化和民间信仰体系会因为这一观念，即梦中的意识和清醒时一样都是大脑的功能而受到威胁。灵魂不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如果大脑死亡了，精神不会与之一同消亡吗？

梦科学的生物学革命迫使我们去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梦构成了一个绝对有趣而又内涵丰富的、以意识改变为特点的状态，但梦本质上并无特殊的功能。作为意识体验，梦只不过是我们睡眠中偶然觉察到的大脑活动。从这个角度看，正是引发快动眼睡眠的大脑激活完成了梦的各种夸张的功能，建立心理平衡、整合新旧知识，并将蓄积的个人信息以情感显露（或相关形式）的形式投射出去，所有这些重要功能可以而且必须被完成，无论我们对其是否有意识。如果这些功能依赖于我们对梦的清楚意识，那我们将陷入巨大的麻烦之中，尤其是那些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梦的人。

进行实证的艰巨任务显然落在了那些坚持认为知道梦的内容确实

会有帮助的人身上。例如通过对第19号梦例的回忆，我受到了启发，关于我和一个故友及其妻子的性心理冲突仍然贮存在我的脑海中。但即使我对这个梦的解释是正确的，它又如何能帮我认识这一事实呢？通过让我意识到：是啊，毕竟潜意识是存在的；或是啊，毕竟性欲是多面而含糊的，或尽管与表象相反，潜意识中的一切并不全是那么循规蹈矩。

这样的诡辩或许能令我受到精神分析同道们的喜爱，导致我的思想被更广泛地接受、我的著作版税增加，甚至为我招揽病人，如此一来，我的肉体存在价值和精神传承都将得以提升。但看起来更有可能的是，如果我从未做过那个螺旋扶梯的梦，或更甚，从未回忆起来因此也从未解析过它，我也能过得很好，甚至更好。所谓梦的工作，如果真有的话，也是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由快动眼睡眠及其存在于我潜意识中的朋友们完成的。

这正是那些反对梦理论以生理学为基础的心理学家们所害怕的“还原论”。福克斯就曾对他认为“让梦的问题摆脱心理学干预的生理学努力”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正确的，如果能证明梦的主要形式特征由生理学决定，那么内容分析就不需要为此作出解析。看着这个沉重的担子终于卸下，梦心理学本可以好好长舒一口气，而不是去为目前的状况惋惜。弗洛伊德自己在试图将梦幻觉症解释为一种心理防御的时候，被推向了精神分析的阵营。他试图以主动的压抑（而不是单纯的健忘）来解释对梦的糟糕记忆同样是迫不得已。最糟糕的是，他用愿望的满足或伪装来解释梦中情感的努力完全失败了，因为有如此多的梦包含的都是负性情感，有如此多的梦是未经修饰的。

还原论是弗洛伊德坚固的外衣。像所有想要成为科学家的人那样，他试图用最少的假设来解释最多的变量。当他想出愿望满足-伪装模型时，他是一个极端的还原论者。凡 凸出的都是阴茎，凡 凹陷的都是阴道。问题在于，弗洛伊德的还原论是错的，而且大部分是错的，因为他没有去观察行为、测量神经功能或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和工具去系统地收集梦例。

现在，我们有了人类睡眠生理学；现在，我们确信无疑地知道清醒、睡眠或做梦的意识都是一种大脑功能。是时候进而创造伟大的、大胆的、连弗洛伊德本人都渴望的以神经生理学为基础的理论了。还原论不能对所有现象给出解释，梦将永远都是生动的、怪诞的、情绪化的、不合理的、难以记忆的。但是应用生理学手段我们可以科学地探索有关梦怎么样（机制）和为什么（功能）的问题。梦的内容分析理论揭示，正是循环论证的危险毁了这一主观臆断性学说的声誉。如今在科学梦理论的美好新世界中，循环论证可被超越，梦仍然可以被享受、讨论和解析。

在本章，我们认真讨论了快动眼睡眠为梦提供理想的生理条件这一观点，并试图运用动物睡眠研究中细胞和分子水平的数据来进一步详解梦学中的“如何”和“为何”等问题。

第四章

大脑做梦的细胞分子基础

到1980年科学界已经知道，大脑包含着数十亿个被称为神经元的细胞个体（据最新统计有1,000亿）。在20世纪前半叶，当睡眠与梦的科学还只停留在宽泛的的脑电图层面上时，神经生物学家们正在对神经元进行深入了解，而且已经超出了任何思辨哲学者所能想象的范围——这里说的任何人也包括弗洛伊德、谢灵顿、巴甫洛夫这样的大家。

到1950年，有一个科学事实真相大白，那就是由于神经元外包着一层半透膜，它能通过钠、钾、氯等离子的主动泵进泵出，富集一个跨膜的电负荷，这一电负荷被称为膜电位。相邻分子可通过一种被称为突触的特殊连接分泌化学分子流，膜电位可在此化学分子流的影响下上升（抑制）和下降（激活）。由于它们使大脑细胞间的信号传递成为可能，这种神经末梢分泌的化学物质被称作神经递质。

当神经元兴奋到一定程度时，其膜电位会骤然逆转极性，生成的电位差又称动作电位，可从胞体扩散至神经元的整个表面，包括末梢，进而诱导其分泌自己特有的化学神经递质。与神经元兴奋度直接相关的神经递质包括谷氨酸（兴奋）和γ氨基丁酸即GABA（抑制）。

细胞神经生物学的大多数杰出成就都诞生于谢灵顿反射学说的保护伞之下，该学说为解决神经回路的构成问题提供了充分的信息。反射回路模型可以说明以下几点：与姿势和运动有关的脊反射；神经元动作电位后续的刺激编码导致感觉的产生；感觉和运动系统的协调作用是解释运动行为所必需的。

但反射学说对研究睡眠和梦的先驱科学家们帮助有限，因为在神经元回路活动（神经回路）和脑电图之间无法建立任何联系。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脑电图是大脑活动电压改变（即动作电位）的反映，除非大脑的神经活动是连续的，即自发的、自反射的，否则这还不能解释睡眠期间所见的脑电图模式（如纺锤波和慢波）。因此，细胞学和脑电图层面的研究独立开展，并行不悖，就像笛卡儿（Descartes）思想中上帝为人类的思想和身体设立了完美而又独立的运动方式那样。笛卡儿二元论的影响并未消散，它之所以仍然根深蒂

固地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脑海里，是因为人们还不能理解：大脑这样一个物理客体，怎么能有主观体验？这就是哲学上所谓的“大难题”。

大脑激活的基础

就在20世纪中叶前，芝加哥西北大学医学院两位著名的感觉运动生理学家——朱塞佩·莫鲁齐（Giuseppe Moruzzi）和霍勒斯·马古恩（Horace Magoun）发现：给猫的脑干予以实验性刺激，可使脑电图模式从睡眠转换到觉醒。换言之，他们建立了睡眠期间大脑激活的实验基础。他们的实验结果发表于1949年，比快动眼睡眠的发现早4年。这一结果向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所有的大脑激活都需要来自外界的感觉刺激——提出了挑战，从而为睡眠期间大脑激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莫鲁齐和马古恩的假说认为大脑的某种网状结构激活某一非特异系统，而该系统的运作不依赖感觉输入。这一假说遭到了强烈的抵制，直至他们随后的研究证明激活与感觉通路之间相互的独立性，这一抵制才逐渐平息。当网状系统被破坏，而感觉通路完好无损时，出现了长时睡眠样的无反应状态。这些后续研究的进行与快动眼睡眠的发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就连发现地点都是在芝加哥）。

对猫的快动眼睡眠研究如何有助于我们的研究？

1957年，阿瑟林斯基和克莱特曼的同事威廉·迪蒙特（William Dement），饶有兴趣地研究了人类快动眼睡眠与梦的关系，他还发现猫在睡眠中也有快动眼和脑激活期。这一发现为睡眠脑激活的细胞分子基础研究提供了必需的实验模型，使我们有机会把细胞分子水平上的现象与脑电图及人类睡眠时大脑活动的独特形式整合起来。完成这一整合并不需要知道猫是否做梦，只需假设猫快动眼睡眠的发生与人类一样。

动物会做梦吗？

所有哺乳动物在睡眠时都有和人类一样的大脑激活，但它们是否做梦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再提出一个问题：动物有意识吗？这一问题的答案一直处于激烈争论中。当今很多科学家觉得动物可能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意识，但其意识缺乏语言，亦无建设性和象征性思维能力，与人类意识大不相同。
动物即使真的能做梦，也无法报告出来。但是，有哪个宠物的主人会怀疑自己最爱的动物朋友没有意识、记忆和情感呢？这是意识的三个主要方面，不论动物是否有我们这样的口头语言，它们都可以体验到这三方面。当动物的大脑在睡眠期间激活时，何不假定它们也有某种意义上的认知、情感和记忆体验呢？
在科学意义的重要性方面，我们可以将动物的睡眠纳入人类梦的研究中，至于动物做梦与否，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要从动物身上学习，我们只需知道它们在睡眠中有和我们一样的大脑激活，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而相当稳妥地认为：动物睡眠时的大脑激活机制与人类一样。

快动眼睡眠的物种一致性假说得到后续研究发现的强有力支持，所有最原始的哺乳动物在睡眠期间都有周期性的大脑激活。如果它们有眼睛的话，在激活的睡眠时相也会有快速眼动。除了能支持同源性假说之外，这一惊人发现还表明快动眼睡眠对所有哺乳动物都具有生物学重要性，不论这种快动眼睡眠与人类的梦之间有何联系。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在考虑睡眠期间大脑激活功能的重要性时，研究快动眼睡眠和梦境的关系意义不大。

结果表明，这些研究睡眠的新方法都是有用且重要的。例如现在已经明确快动眼睡眠有益于体温调节，这或许是所有哺乳动物的看家本领。众多实验显示快动眼睡眠还可促进程序性学习的巩固和强化。由于程序性学习是一种后天获得的可在无意识情况下做事的能力，对

梦境的主观体验绝不可能蕴含这样高水平的功能性原理。此外，我们从梦中如何得知调节自身体温的能力是由快动眼睡眠保障的？

法国神经生理学家米歇尔·朱维特，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里昂工作，他采用了莫鲁齐和马古恩发现大脑网状系统激活理论时所用的方法——电刺激和对大脑的手术改变——一劳永逸地证实睡眠期间大脑激活确实存在并且是自发出现的。他还证明快动眼睡眠是由脑干（包括网状结构）产生的。朱维特发现了与快动眼睡眠固定相伴的肌张力的主动抑制，以此帮助我们理解大脑如何可以在不导致觉醒的情况下激活。尽管上位脑精心制造了人们在梦境中感知到的丰富行为，并发出相应的指令，但运动系统在脊髓层面被主动阻断，故现实动作不可能出现。

1980年3月12日　跳伞　第29号梦例

一队伞兵依序先后下降——蓝蓝的天上漂着白色的降落伞——突然，一个伞兵出人意料地快速超过另一个伞兵——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一场竞赛——这个来自海军的新兵，将轻松获胜。且慢！他的降落伞张开了吗？当然了！为了控制自己的下降速度，他沿着降落伞的吊绳往上爬——像一个胎儿吊在自己的脐带上晃悠！

在这个梦中，跟之前的例子一样，我自己是不动的，但我所感知到的三个伞兵的动作依然是持续而扣人心弦的。这种梦中动作引发的紧迫感其实很常见，它不仅体现出边缘系统压力激素被同时激活释放，还显示了在脑干自身层面产生的不熟悉或本质上不可能的动作模式，而脑干正是控制空间体位的神经元所在的部位。

朱维特通过一些极端但有决定意义的实验证实了上述观点。他把脑干从大脑的两个重要部分——桥脑和中脑的连接面以下独立出来，甚至把此平面以上的所有脑组织都移除掉，仍然能观察到肌张力的周期性抑制及偶发的眼动和身体运动，包括可见于正常猫清醒时的真实动作中的节律性颤动。换言之，人类梦境的一个关键形式特征——持续性动感，可能来自能够激发动作模式的脑干的极低部位。总之，这

样的发生器都位于 脑干中，并在快动眼睡眠时激活 。

和阿瑟林斯基及克莱特曼一样，朱维特清楚地知道如何利用偶然的发现。当时他正在研究其他的课题（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突然他的猫就像阿瑟林斯基实验对象中的孩子们一样睡着了。他正试图去监控猫在清醒时的注意力，颈部肌肉电极发现了快动眼睡眠时的肌无力。科学研究和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久，朱维特又有了另一次机遇，当时他是一个研究猫的神经外科学家，想要整合脑干、丘脑等皮层下结构的脑电图，结果他成功观察到了大脑不同区域——脑干网状结构的桥脑（P）、丘脑外侧膝状体（G）、枕叶皮质（O）——进入快动眼睡眠时出现的阵发波（PGO）。清醒状态下这些波显著减少，表明快动眼睡眠期的大脑激活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是独特的。图3描绘了从皮质、丘脑、脑干记录到的阵发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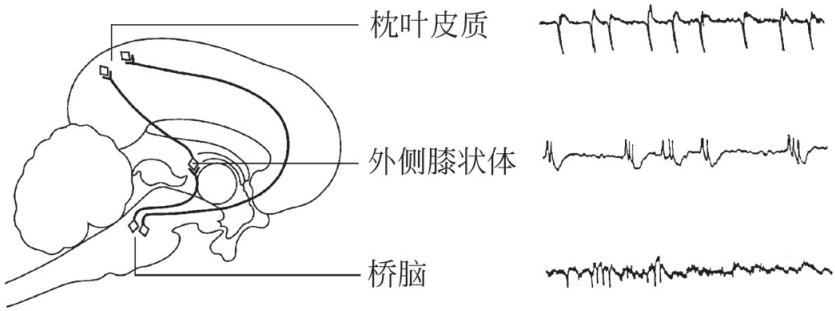

图3　视觉大脑通过一种在脑电图上表现为阵发波的机制在快动眼睡眠时产生自我刺激。桥脑（P）神经元发出信号使眼睛运动，这些信号同时传递到丘脑的外侧膝状体（G）和枕叶皮质（O）。（图示的3条曲线不是同时记录的。）

大脑 - 精神状态的化学调控机制是什么？

那些研究梦的科学家们读了睡眠时的大脑激活理论后，觉得豁然开朗，尽管与直觉相悖，他们还是很快接受了这一理念。在接下来为清醒和做梦意识的相似性兴奋时，很少有人会停下来想一想能否从这种依赖睡眠的大脑激活理论中找出一点，来解释清醒和做梦意识之间的差别，毕竟，差别和相似性同样重要：

·梦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即使清醒时最生动的幻想也难以比拟的感觉运动性？

·为何梦的意识自省成分如此之少，而清醒时的意识常被内生的思维主宰？

·为何关于梦的记忆是如此贫乏，特别是我们为何丧失了对陈述性记忆（有意识地、快速学习的记忆）主动详述的能力而获得了唤醒遥远记忆的能力？

·为何几乎所有的梦都被遗忘？

·为何梦如此怪诞？

生理学是否也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只注意大脑激活及其在睡眠和清醒时出现的一般特征，当然不能。

想回答所有这些关于梦意识特征的问题，不仅要知道大脑在睡眠

时重新开启，还要知道这一开启过程的影响机制与清醒时是完全不同的。毕竟，我们一般不会从快动眼睡眠中醒来，而且根据朱维特早期的研究成果我们已经知道人之所以不会动，部分是因为肌肉活动被主动抑制，这使得活动能力持续丧失，并有助于理解为何我们常在醒来时觉得在梦里是瘫痪的。

此外，从阵发波的发现中我们知道，快动眼睡眠有明显的脉冲特征。猫一天大概能产生14,000个阵发波，每个阵发波都向大脑输送一个激活脉冲，就如同我们在清醒时被意外刺激吓了一跳。这一事实意味着梦是一个由持续脑电激活和极强极离散的觉醒刺激共同组成的意识状态。因此，阵发波就可以介导梦中精神活动的各个不同方面，如强烈地关注（感知胜过思考）、怪诞（时间、地点、人物的不连续性和不一致性）及持续的感觉运动内容（仿佛自我激活过程迫使大脑去激发一个接一个的动作情节）。

神经调制与大脑状态

上面这些既不能解释为什么有关梦的记忆被预先消除，也不能解释阵发波如何出现在快动眼睡眠中。想要解开这些谜团，我们需要一把钥匙，神经元调控的发现就提供了这把钥匙。神经元控制即神经调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化学性神经递质，可使大脑状态发生全面改变。大脑状态取决于信息呈递模式：当大脑从外源性信息来源转换为依赖内源性信息时；当大脑从储存并记忆转换到不储存并遗忘时；当大脑从线形-逻辑性转换到平行关联时。所有这些模式的转换在清醒时不明显但很重要，而一旦大脑进入快动眼睡眠，它们都变得具有强制性、显著性和固定性。

我们现在假设大脑状态的改变源自神经调制的显著变化，从而将快动眼睡眠与清醒状态区别开来。1960年，瑞典神经解剖学家谢尔·富克塞（Kjell Fuxe）报告脑干细胞中存在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两种神经递质。人们由此而知，当动物入睡时，这些细胞会改变它们

的输出，这一改变在动物进入快动眼睡眠时最为显著。概括而言，那些在清醒状态下调节大脑的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细胞，在非快动眼睡眠时将自身的输出下调一半，而在快动眼睡眠时则彻底关闭，这意味着介导清醒状态的两大化学系统并不参与大脑的再次电激活。那些清醒状态的大脑功能，如注意力、记忆、反射思维等在梦中丧失殆尽，正好有力地反映出这些系统的存在。

要理解这一简单而又令人百般思虑的假说，必须认识到这些神经调节神经元及其化学信使的特殊性：

1．它们相对来讲数量少而且分子量小。

2．它们高度集中在少数一部分脑干核团中。

3．在不受抑制时，它们是具有节律性和自发性的起搏细胞。

4．它们有节律地放电，但其放电速率相对较低。

5．它们通过又细又多的树枝状凸起投射到整个大脑和脊髓。

弗农·芒卡斯尔（Vernon Mountcastle）将这一独特的细胞群称为“脑中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该细胞群构成一种模式转换机制，可以自动并强制性地改变大脑其他部分的微环境。这就好比把现代家庭的那种居于一室却可影响全屋温度的中央空调控制系统搬到了人脑里。

图4显示了脑干（桥脑）神经调节细胞是如何向上方丘脑、皮质及下方脊髓投射以使快动眼睡眠的脑电图发生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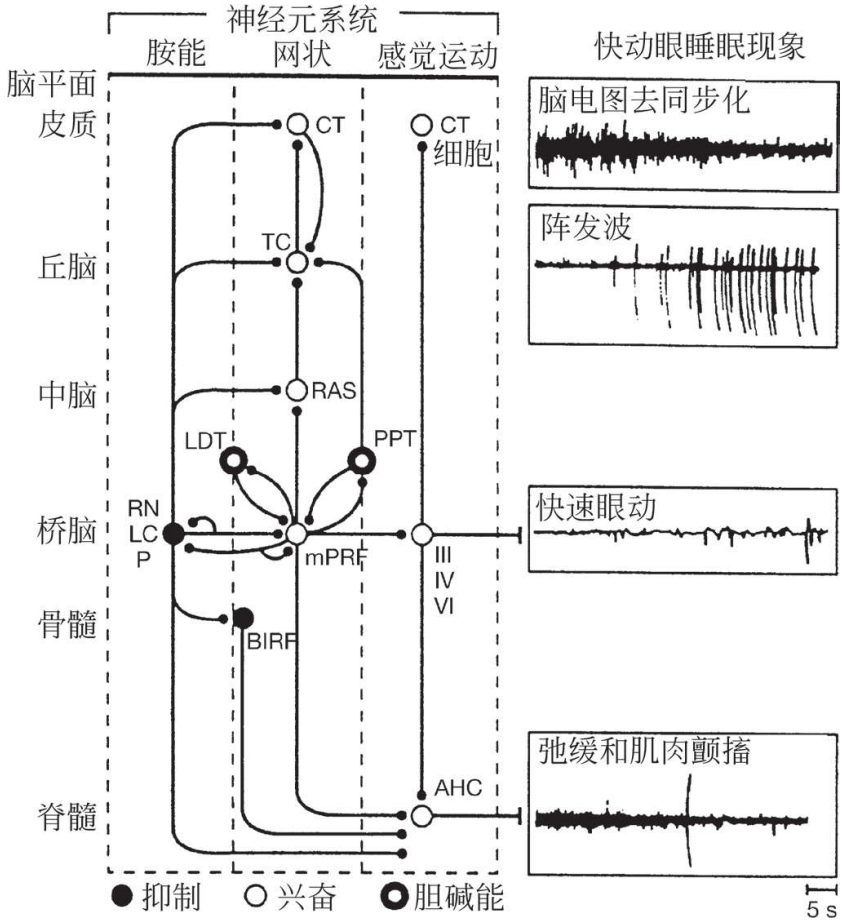

图4　快动眼睡眠激发过程图解。包含不同大脑层面细胞的分布网（左）。该网络包含三个介导快动眼睡眠多导记录仪上电生理现象（右）的神经元系统（中）。

现在，即使是那些还迷恋于释梦的魔力，做着预测命运美梦的人，也能清楚地看出形式分析方法在梦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了。我们发现，大脑在睡眠时自我激活，改变自身的化学自控指令，而精神则别无他选，只能按既定程序行事。它能看、能动、能去深切感受，但不能思考、记忆，也不能很好地集中注意力，这反过来清楚地说明，我们所谓的精神只是大脑的功能状态。精神并非它物——不是灵魂，也不是某种独立的存在，它只是自我激活的大脑，其主观能动性尚待解

释，但其主观性在形式方面的表现已然明了。

这是现代梦科学最极端的断言。清醒和做梦是两种不同的意识状态，依化学基础而有所不同。你能理解这一观点吗？是否觉得骨鲠在喉，咽之不下？你会不会说“是啊，但是……”，然后提出一大堆问题，目的在于表达你对那些尚不能解释的细节的好奇，以免因自己的梦降格为简单的大脑状态而自惭形秽？你知道自己不仅仅是一种大脑状态，是吗？但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的回答是，通过你的主观臆测（我还没有对此作出解释，是吧？）。这样你就还能有一线希望，但是请承认吧，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同时，请耐心点，让我试着展示给你看：能拥有这样一套惊人的、自动的、可信的大脑机制，可以在睡眠中做梦、想象、创造和感受，你是何等幸运！我还会适时地让你相信，作为大脑确实有其主观的一面，你其实像你一直以为的那样自由自在。虽然没有太多的自主选择，但仅有的那一点已经绰绰有余了。

快动眼睡眠的生化药理基础

现在应该回顾一下梦与睡眠的关联，并阐明我的观点。我认为这一关联是持续的、部分的、定量的，而非间断的、完全的、定性的。因为大脑状态的改变是持续性的，所以其模式的改变也只会是渐进性的，它不会突然从一种转变为另一种，更进一步讲，这种持续而渐进的调节变化不会以相同方式或同时去影响每一个神经元。这种研究脑干状态控制系统的神经生物学工作成果，对于精神的一般理论和梦的特殊理论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像清醒和做梦这样的大脑意识状态，与清醒和睡眠时的大脑一样，具有丰富多彩的细节。例如：清醒时可以出现内生性和外源性感知，接近幻觉强度的幻想可出现在清醒状态下的意识中，而火车的呼啸声、电话铃声也能进入梦境。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在清醒和梦中这两种现象出现的概率是很低的，且这种概率是由神经调节系统——芒卡斯尔所谓的脑中脑——设定的。与做梦时相比，外界刺激在清醒

时被准确感知的可能性更大，而内生刺激在梦里远比清醒时更易引发幻象。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这一矛盾现象的机制，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精神健康。稍后当我们探讨神经调节理论对精神疾病的影响时，就会发现当前用于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无一不与神经调质有关。同时，它们的作用方式也与那些改变大脑清醒-做梦平衡的化学物质相同。

化学微刺激

一旦脑干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的行为可用微电极记录并在整个睡眠周期进行全程动态描绘，人们会很自然地思考，如果我们实施一些更主动的实验，有意识地干扰这些细胞的自然特性会发生什么事呢？由此被称为化学微刺激的实验技术诞生了。不过它尤其奏效之处却是在研究脑干的另一种神经调节系统——胆碱能系统，之所以这么命名是因为该系统对靶神经元的影响是通过乙酰胆碱介导的，而人们很久以来就知道乙酰胆碱可通过改变肌纤维的电荷——即去极化，导致肌纤维收缩从而使肢体活动。

结果表明，乙酰胆碱既是肌肉也是大脑中枢状态的始动者之一。乙酰胆碱能神经元在清醒和快动眼睡眠时都放电，所以它们在两种状态下都参与脑电图激活的调节。由于快动眼睡眠时5–羟色胺能神经元被关闭，胆碱能神经元受到的抑制减弱，因此其兴奋度明显增强。这些复杂且多样化的神经生理学细节可能令人费解，不过记住主要的一点，尽管大脑在快动眼睡眠期间的电生理活动方面与清醒时一样，但二者激活的化学基础却完全不同。

这一结论得到了化学微刺激实验的有力支持，因为后者明确显示向脑干的特定区域——桥脑注射极微量的胆碱能药物即可诱导快动眼睡眠。而且，快动眼睡眠增强效应的模式和时程取决于脑干桥脑的哪一部分被化学性选择激活。若将药物置于大脑的特定部位（大脑中线任一侧的网状结构），与无活性的对照药物相比，猫将更快入睡，更快进入快动眼睡眠，快动眼睡眠将持续更长时间，而且是长得多的时

间。正常情况下，猫自发的快动眼睡眠周期持续时间大约4到10分钟，而受到胆碱能药物刺激后快动眼时间可长达60到70分钟。这种化学性增强的快动眼睡眠不仅更长，而且更密集，用药期间出现频率也更高。

我们做梦是由化学物质引起的吗？这个问题对猫来讲是有争议的。虽然在人类身上发现了类似的效应，我们也只会说我们可以通过增强快动眼睡眠来增强梦。从科学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所有的梦都是化学介导的。所以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做梦是化学刺激促使大脑这样做。

上述结果经受了反复验证并被广为接受，这意味着梦科学的大脑基础已牢固确立，但科学界对快动眼睡眠受胆碱能强化现象的接受却姗姗来迟。我们需证明多种胆碱类药物都可产生上述作用，并且其作用可被抗胆碱（阿托品）治疗阻断，甚至是像新斯的明这样通过阻断乙酰胆碱的正常酶解过程来发挥作用的药物，也可以强化快动眼睡眠。由此我们可稳妥地推论快动眼睡眠的梦是由乙酰胆碱介导的，此时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都处于极低水平。

所有这些对解释快动眼睡眠的功能有何意义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大脑在快动眼睡眠期间被如此强地胆碱能化，这对学习和记忆有什么影响呢？人们很早就认为乙酰胆碱与学习和记忆有关，所以快动眼睡眠对于此方面的新兴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这些研究与我们大脑思维不完全的、统计学模型相一致。这里有一个代表性的假说，乙酰胆碱可以触发记忆片断，但没有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的参与就不能产生新的记忆。

我说过胆碱能药物应用于不同的地方效果截然不同。在桥脑的最边缘部位（远外侧桥脑）进行微注射，和在靠近乙酰胆碱能神经元发现地的大脑区域注射效果大不相同，也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信息。我们看到了延迟而非即时的快动眼强化，还有一点尤其令人吃惊，就是这些药物确实即时增强了阵发波，而我们原以为是阵发波导致了快动眼睡眠的产生。但从与快动眼长时强化不一致来看，它们并不是快动眼的成因。此外，通过阵发波与快动眼睡眠暂时的解偶联，被延迟的

强化作用持续时间会更长，可达6到10天，而中线网状结构在接受更多的注射后其持续时间也仅为4到6小时。

我们自己只是在慢慢理解这些发现，它们似乎要引领我们走向分子生物学领域而不是梦学理论。这可能和本领域的其他征象一样，意味着快动眼睡眠和DNA，这两个同为半个世纪以前的发现之间的鸿沟可能被填平。理由如下：网状结构——在此处的胆碱能刺激制造即时而短暂的快动眼强化——是触发带；相反，前面提到的外侧桥脑点——在此处产生的效果是阵发波即时增强和长时程快动眼睡眠强化——是控制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控制区事实上包含了胆碱能神经元，而触发带则没有。

正常情况下，快动眼睡眠（及梦）的时程和数量是由胆碱能神经元的兴奋水平控制的。这一水平取决于一系列遗传和环境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导致了睡眠或长或短的差别，这些差别则与正常发育、学习、记忆，甚至心境和个性相关。大脑-精神功能的正常发挥有赖于胆碱能系统在一定限度内的运行，该限度由生物学和行为学机制设定，而快动眼睡眠的化学微刺激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机制。

第五章

人为什么会做梦？睡眠中的大脑激活有什么功能？

人为什么会做梦？我们已经给出了基于生理机制的答案，那就是因为睡眠中大脑的自我激活。我们也曾暗示，做梦本身可能是大脑自我激活的一个附带现象，所以梦出现的真正原因可能与我们从快动眼睡眠做梦的心理研究中推断出的结论大相径庭。

此外，在上一章里我们还注意到，快动眼睡眠见于所有的哺乳物种，总是伴随强烈的大脑自我激活，并且由一种基因调控的化学系统精确控制。这意味着快动眼睡眠对哺乳动物生物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所有物种中都可见到，只是各物种进行自身量的调节，并且依大脑发育程度而有所不同。本章我们将通过探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变化及扰乱调节系统使快动眼睡眠难以发生或至少变得十分困难来审视后两方面。

婴儿做梦吗？

人类的新生儿为直接观察快动眼睡眠行为提供了一个最佳机会。这不仅因为快动眼睡眠出现在入睡时（正如阿瑟林斯基从他的小受试者那里观察到的），还因为与成人相比，新生儿与大脑激活脉冲有关的动作更为强烈，受抑制的程度也更低。此外，不仅是人类，所有新生物种都会出现四肢、躯干的显著抽动，伴随着面部肌肉极富表现力的收缩，就像梦的情感被直观地表现出来。婴儿在快动眼睡眠时可以显现出愉快、恐惧、惊讶、厌恶等面部表情，他们确实经历到了这些情感吗？这些情感是梦的基石吗？简而言之，婴儿做梦吗？我们对这种复杂问题的科学回答只能是：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我们个人也许认为，为什么不会呢？

人类胎儿早在子宫时，就已经开始表现出具有高度组织性和自发性的动作。到孕30周时，这些机体内的动作模式涵盖了眼睛（快动眼）、脸（早期或原始的情绪表达？）以及肢体（原始运动？）。所有这些发现对我们的大脑-精神理论及其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很显

然，大自然为其最精巧的创造——人脑和精神提供了独有的自我激活方式。神经生理学家鲁道夫·利纳斯（Rodolfo Llinas）在他的新书《漩涡中的我》中提到，内源性活力有助于基本存在感的诞生，而后者又是自我意识产生的根本！

我们睡觉时可能会做梦，而做梦必然会重新激活与人类固有运动能力直接相关的自我意识的大脑基础。换句话说，我们的梦是如此连续而精巧、栩栩如生，提醒我们自己在出生时就拥有运动和感知运动的巨大天赋，而后者最终成为我们自我存在感的核心。更进一步我们可能想到，每天晚上，在入睡后90分钟开始，持续至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重获新生”，这个词虽然是借自原教旨主义宗教，但在这里却有了完全的肉体和现世含义。如果我还没能完全让您理解我的意思，请允许我再补充一点，梦的形式研究发现，虚拟动作即梦境中的运动感强有力地支持着利纳斯理论。还有一点就是梦中方位感唯一可靠的一个方面就是对自身的感觉，即我总是处于梦这一漩涡的中心。

做梦缘起何时？

现代睡眠科学研究最惊人的发现之一就是未成熟个体，不论是人类的婴儿，还是小猫小狗，其睡眠时的大脑活动量比成年后要多得多。这意味着做梦所需的大脑结构基础在出生时就已具备。婴儿是否做梦，跟动物是否做梦一样，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婴儿的意识处于形成阶段，且具备原始的认知、情感和记忆，但是他或她尚未掌握语言。命题或象征思维依赖于语言，如果婴儿确实做梦的话，他们的主观体验不可能具有和成人一样的质量。研究过儿童梦发展的心理学家们发现，儿童在大约3岁时开始出现类似于成人的梦境描述，此时他们正在学习语言和命题思维。此后，儿童的梦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有趣，到7岁左右，已基本具备了成人梦的大多数形式特点。再加上来自动物的证据，这些都表明单凭大脑激活还不足以产生梦。梦的出现还需要支持语言和

命题思维的上位脑环路发挥作用。人类新生儿和其他新生哺乳动物睡眠时的大脑激活比已成年者多得多，但儿童的梦相对贫乏，这说明快动眼睡眠以一种梦无法预知的方式，对发育起着重要作用。

下面这个梦例充满怪诞色彩，同时还显示出梦者贯穿整个梦境的持续运动感。不管我是在宾馆、寺院还是佛蒙特的小山上，我始终在移动、在察看、在关注或者在说话。

1984年6月18日　寻找　第33号梦例

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寻找——我在寻找某样东西，抑或某条路（“路”在这里既有地理学含义，也指策略、方法）。

有一个场景是在一家餐厅或酒店，跟往常一样，房间、楼层和人物都模糊不清。不过看起来餐厅里好像在举办一场校友会，因为里面有些人来自哈佛，尽管我一个也不认识。我的任务是找到后门，直接跑到街上去而不用回到大厅里。我打开了数扇门，结果发现它们实际上只是一些用木制窗格从外面封上的窗户。在窗框和窗格之间还嵌着一些楔形木块，设计颇为精巧但功能不明。奇怪的是，窗格之间是分隔开的而非严密贴合的。

我放弃抄小道离开的想法，回到了大厅。

这时场景变成一个经典的、希腊或埃及式的寺院。那儿有一个石拱，拱顶石凸出来，一段狭窄的阶梯从其下穿过。鉴于在哈佛工作的一大乐趣就是能享受哈佛的美景，这一点似乎足以解释上述奇怪的场景转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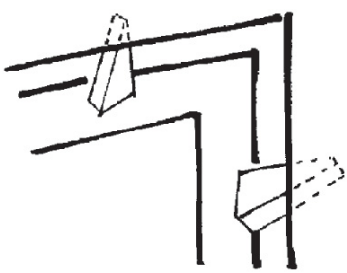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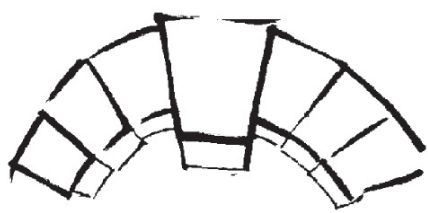

但突然间，我又漫步在佛蒙特州一座白雪皑皑的山脚下，寻找一位老妇人。那里的雪略带灰白色，使我不由得想到雪下会不会有新鲜的粪便。尽管有（吃到粪便的）风险，我还是决定吃点雪解渴，结果发现雪根本没什么味道。

然后我跟一个像马歇尔·纽兰德的人谈起了那位我还不曾找到的老妇人。他说了一句经典的佛蒙特传统谚语来总结当时的状况：“我或许很难找，但你一旦到达那里，是可以指望我现身的。”

这句话似乎意味着锲而不舍会终有所成。

尽管地点和行动扑朔迷离、断断续续，梦中的“我”却惊人地镇定自若。这个梦例还证实了梦中奇怪的“思维贫乏”，代表了一大类同样生动形象的梦。这意味着在我们所讨论的发育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感觉运动行为而非认知，换言之，自我存在感首先与动作相关，然后才被思维加工。

胎儿做梦吗？

孕30周时的人类胎儿几乎每天24小时都处于大脑激活状态，正是这种激活状态构建了最初级水平的快动眼睡眠。到出生时，在每天16小时以上的睡眠中确定的快动眼睡眠至少占据了一半的时间。这保证了每天至少有8小时自主的、自由的大脑激活。问问你自己这是为什么？让答案自己浮现出来：为了发育大脑，为了建立思想，一言以蔽之，为了成为一个越来越有效的行动者、一个越来越独特的个体。

所以，如果运动-存在-自我假说有任何可信度的话，胎儿是否做梦或许没那么重要，除非主观能动性必须与运动能力共同发展。现在我们无需任何理由就可否定一切认为婴儿梦境内容丰富或是精神分析学说所谓的愿望满足之类的说法。快动眼睡眠早期出现的动作和情感并没有暗示心理防御，反而证明情况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可靠而明显但并无必要的主动进攻，目的在于自主行为并与主观能动性关联。图5展示了人类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睡眠和清醒时出现的显著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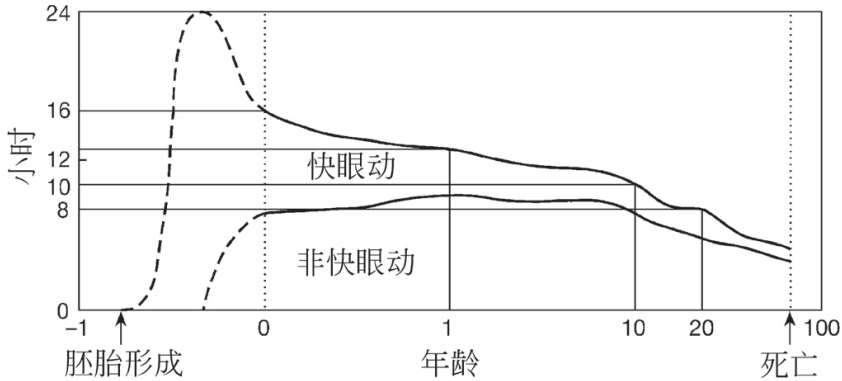

图5　清醒、快动眼睡眠、非快动眼睡眠在每天24小时中所占的相对比例随生命进程发生了显著改变。在宫内期这些状态出现在什么时候、具体又如何发展尚不清楚（用虚线表示），但是来自早产儿的数据表明，在孕26周前快动眼睡眠几乎占据全部时间。到26周后，清醒的时间开始逐渐且不可逆转地增加，直至死亡。

婴儿的快动眼睡眠为何如此之多？调节系统又是如何随着生长发育被关闭的呢？这些重要问题尚无明确答案，因为睡眠研究本身也还处于婴儿期（请原谅我的用词）。但下述内容却很有可能是生物学事实：

1．脑干：　作为最基本一线调节系统（例如体温、心血管、呼吸），脑干的发育必须先于上位大脑，尤其要在丘脑和皮质所处的大脑部位（丘脑——皮层大脑）之前，因为这二者以后将支持意识的产生。

2．脑干的胆碱能系统　：作为内源性激活的介导者，该系统的发育必须在早于5–羟色胺能和肾上腺素能系统（即与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相关的结构），后两者是个体使清醒状态多于睡眠状态所必需的。

3．其他化学系统如胺能系统（包括组胺和多巴胺在内的化学物质）的后期发育 导致了婴儿睡眠特别是快动眼睡眠的减少，从婴儿到成年早期降低了至少400%。

我们到底需要多少睡眠？

如果我们得不到足够的睡眠会怎样？我们到底需要多少睡眠？你完全可以和我一样自己回答这个问题，但在回答之前你应该意识到两件事：第一，睡眠具有其他所有生物学现象都存在的变异性，也就是说，每天只睡4到6小时的短睡眠者与每天睡8到10小时的较长睡眠者都属正常。尽管大多数成人每天睡6到8小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天天如此。睡眠就像体重一样，随内在调定点、社会习俗、气候和个人经历的多重影响而波动起伏。第二，我们即便睡得极少，也有能力很好地弥补，尤其当回报很高的时候。一旦我们具备某种动机——无论是为了获得奖励还是为了逃避灾难——我们通常能设法从疲乏的大脑中再挤出一点认知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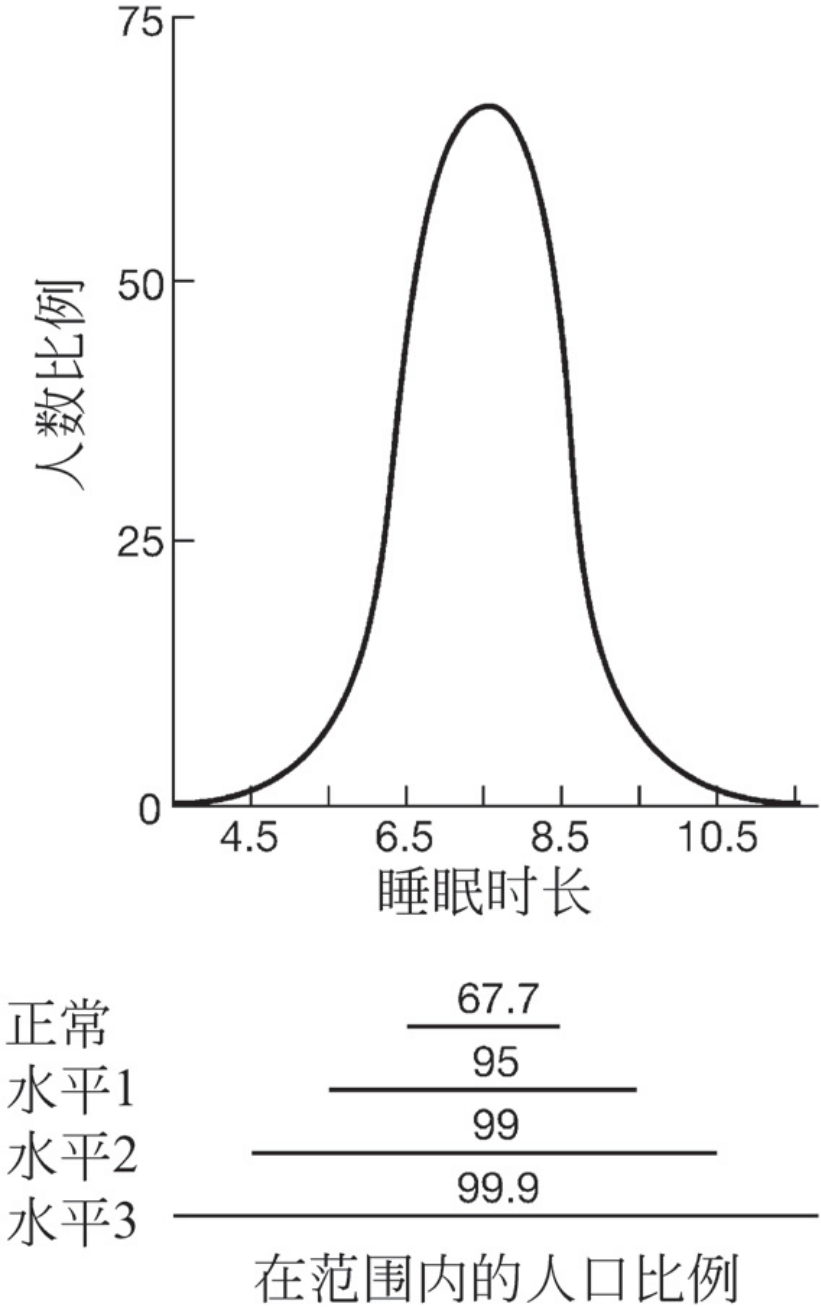

图6　与所有的生物功能一样，睡眠时间长短的变异范围很大。如果将需要不同睡眠时间的各种人的数量标在图上，结果会得到一条钟型曲线。图下方显示的

是落在距均值的标准差为1、2、3范围内的几率估值。只有千分之一的人超出该范围，但像这样的短或长睡眠者确实存在。

现在请给出你的答案。我的答案是我现在需要8到10小时的睡眠，而且仍感到没有完全休息好。我年轻时只需睡4到6小时。作为医学工作者和睡眠研究人员，我有时需要连续坚持36小时不睡觉。不管基础状况如何，我始终感觉睡眠剥夺使我集中注意力和高效思维的能力都大打折扣，要想好好地读、写、听、说，我需要一夜安眠。意识到这个事实后，我总是尽力做到这一点。当睡眠不足并/或处于压力之下时，我更可能做一些情感强烈而怪诞的梦，就像我在本章早些时候描述的那样（第33号梦例，95页）。

为什么睡眠剥夺的实验室研究难以就丧失睡眠的代价及由此推断获得睡眠的益处达成共识？要理解这一点，最好回顾一下20世纪60年代早期，那时快动眼睡眠的发现掀起了一场实验性探索的风暴。

好消息是这场风暴终被掀起，坏消息是该研究常常受到精神分析这一在科学上极其幼稚且有诸多缺陷的学说的左右。所谓“梦剥夺”的经历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由于快动眼睡眠与梦相关，人们总是趋向于将二者等同，认为剥夺实验受试者的快动眼睡眠，就会剥夺他们的梦。这可以说正确，但不完全。

尽管梦出现在入睡时或非快动眼睡眠期间也是正常的（从未有人研究过当快动眼睡眠减少时，这一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是否会增加），威廉·迪蒙特及其同事精神分析 - 神经科学家查尔斯·费希尔（Charles Fisher）依然肯定地认为，剥夺梦（实际上是快动眼睡眠剥夺）会使人精神失常，因为梦——也唯有梦——能为其提供精神逃避的出口。毋庸置言，某些受试者在长期的睡眠剥夺后确实出现了精神失常，经历过这一时期的每个人都会记得在10天的快动眼睡眠剥夺之后学生们精神失常的故事。作为宣传噱头，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彼得·特里普（Peter Tripp）被要求在自己的播音室里保持清醒达72小时，结果他平常催眠曲般的广播评论逐渐被偏执幻想所取代。

回想起来，上述这些研究都是不合伦理道德的，因为其研究假说

是基于“梦剥夺到一定程度的话能够使人疯狂”。尽管我对笼罩在该科学领域的重重迷雾不能拨云见日感到失望，但我绝不会让别人对我做这样的实验，更不会对别人这么做。

以安东尼·卡莱斯（Anthony Kales）为代表的怀疑论者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结果都发现正常人对睡眠剥夺有相当程度的耐受性。他们在用一些量化的心理学测试来评估睡眠剥夺的后果时发现，选择性减少快动眼睡眠与减少全部睡眠相比并无差异，而且这两者都只造成了极少的功能障碍。这些研究看来说明快动眼睡眠或者说梦本身对维持心理平衡并无特殊意义。这些结果还间接动摇了幼稚的“压力假说”——梦的压力一旦被释放，就会导致精神失常。

然而，这些研究并不意味着睡眠对精神没有任何益处，就像许多人误认为的那样。“睡眠是在浪费时间”这一观点仍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文化当中，而同样深入人心的是，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地去争取成功、贡献和物质胜利。如果让你说出一位最有成就的美国企业家，你多半会推荐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我们的这位候选人（作为灯泡的发明者）可以为自己只需极少睡眠就极富成效的能力而自豪。爱迪生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短睡眠者，天生拥有一个高能量的大脑，这使他比大多数人更活跃、更清醒、更有创造力。

与爱迪生们相反，还有另外一类人，他们永远不会有任何发明，永远休息不够，永远别指望上医学院，但这些“长”睡眠者们应该对自己的敏感度、感受力、潜力和反应能力感到满意。诗歌和文学从来都是与蜗居床上的生活方式共存的，像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之类的文学巨匠们莫不如此，他们都对睡觉和做梦怀有极大的热忱，并开创了内反射文化，建立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技巧，创作了大量的文学故事，而这些都和灯泡一样，是这个世界所必需的。毕竟，我们在夜间清醒的时候总得有东西可读吧？

在本章余下的部分，我们将看到睡眠对大脑-精神的认知能力来说绝不仅仅是一块邦迪牌创可贴，它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只不过其作用方式是心理学难以想象的。在第六章中，我们将了解到睡眠丧失时认

知能力确实会大大受损，尽管只有用那些需要复杂思维过程并要求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任务来考验睡眠被剥夺个体时，这一效应才能体现出来。而在后面第七章讨论抑郁时，我们会回到睡眠-精神疾病的联系上，并将发现情绪和思维模式的调节也是由控制和激发梦的同一大脑-脑干系统完成的。

睡眠是生命必需的吗？

如果我们不能生存，就不能繁衍。作为哺乳动物，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生存呢？我们需要进食，然后把食物的热量转化成机体运转的动力；我们还需要避免被捕食，尤其是在我们易受攻击的时候，如夜晚。还好我们只需要在吃的同时避免被吃。

但要人体高效运转我们还必须保持温暖或凉爽，亦即维持核心体温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波动，不超过0.83摄氏度或1.5华氏度。如果体温过高，大脑就不能很好地工作，实际上它会入睡，这就是为何热带文化出现更多午睡而非“爱迪生”。如果体温过低，大脑同样会失常。根据登山家对经历严寒的记忆，首先你需摸索前行，然后言语不清，接着是步履蹒跚，最后会跌倒。

对于我们这万兽之中的技术之王来说，“被捕食”似乎算不上什么威胁。但想象一下旧城区的生活，告诉我你能有多乐意漫步于夜间昏暗的街区；想想感染的威胁，我们必须不断地与之抗争，避免患上肺炎（感冒和咽喉疼痛已经够难受的了），防止寄居在肠道内的微生物侵入血液（而通常它们只帮助我们消化部分食物），维持免疫力以阻挡众多破坏性病毒（如甲型流感、乙型肝炎以及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入侵。这些才是我们的捕食者，就像狮子捕食斑马那样。

研究结果表明，当睡眠剥夺达到极限时，上述的所有功能都会受到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作为梦和睡眠科学诞生地的芝加哥大学，艾伦·赫特夏芬（Allan Rechtschaffen）及其小组在最近的实验中让两只大鼠中的一只无法入睡，或至少令其入睡十分困难，而另一只

大鼠可随时自由入睡。这样就可以大大缩减一只老鼠的睡眠而另一只则不受太大影响。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些实验条件都极其苛刻，在自然条件下很难发生。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最严重的破坏效果两周后才会显现，时间长得令人吃惊。最后，令人稍感宽慰的是，在实验过程中的任何阶段，只要允许睡觉，实验对象就可以完全恢复正常。但我们不应认为，这种我们可能永远不会亲身体验的实验性睡眠剥夺研究所得的结果对我们自己的睡眠健康观念毫无意义。只要有人曾注意到即使是轻微的睡眠不足也能导致感染的风险增加，他就能轻而易举地理解我的意思。

睡眠剥夺老鼠起先是皮毛趋于干裂，不再顺滑而完整，这是必然发展成致命征候的最初症状。到第二个周末，老鼠出现了强烈的觅热动机，它们总在寻找笼子最温暖的角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老鼠的体重下降，并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以至于不停进食也无法弥补体重的下降。换言之，食物的热量值降低了，可能是因为老鼠自身的能量被越来越多地消耗以保持体温恒定。体温调节能力也丧失了，哺乳动物最基本的适应能力和大脑功能赖以发挥作用的反射特性就是温度调节。没有睡眠，就不能维持温度调节和正常的脑功能。这无疑表明所有人每晚睡觉时都在恢复自己的温度调节能力。

到第三周和第四周末，睡眠被剥夺的老鼠开始死亡，它们是被代谢“饿死”的，尽管它们拥有充足的食物，而在相同环境下对照组老鼠可以保持皮光肉滑、体态丰盈、心满意足。当睡眠剥夺老鼠再也无法抵御感染的时候，它们就走向了死亡。它们受到肠道定居菌的侵害，被那些不再满足于搭便车的共生菌吞噬。

现在你可能会说我们已经远离了梦，甚至是睡眠中的大脑激活，但我不这么认为，并且我希望片刻的沉思能告诉你为什么。要解释正常睡眠为何能保护我们免受这样的噩运，须先假定正是大脑状态的改变，包括其所有的化学和电转化，使我们保持健康。第二个原因是理论上的，我们的睡眠需求如此强烈、如此旺盛、如此执著，因而它必定 有着重要的生存功能。

那么我们又怎么看大脑激活部分呢？怎么看待梦呢？梦和温度调节又有何关联呢？我的答案是只有哺乳动物才能进行体温调节，也只有哺乳动物才会出现快动眼睡眠，所以很可能这两者和梦有着某种联系。至于是何种联系，我们在这儿只能加以推测，但在此之前，我还要讲明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哺乳动物仅在快动眼睡眠时无法 进行体温调节。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汇总起来进行推理，并留待后续实验去研究。

觅食和摄食都是清醒状态的行为，而后者又反过来依赖大脑激活。对于清醒时的大脑激活，与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等化学物质相关的系统发挥作用，我们已知温度调节就依赖于这些系统。所有清醒状态下的功能都要消耗能量，还使生存遭遇威胁，尽管它们也是生存所必需的。

睡眠中的大脑激活则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出现，胺能系统被关闭，以至于温度调节无法进行，尽管快动眼睡眠时并不需要温度调节，因为动物在巢穴中体温可以保持稳定，没有损失热量和被捕食的危险。睡眠中的大脑激活由神经纤维完成，这些纤维与一种已知的化学物质乙酰胆碱具有同样的效应（这种效应被称为胆碱能）；这种激活是节能且安全的，但同样是生存所必需的，因为它使动物得以恢复其核心调节系统的效率。同时，大脑 - 精神摆脱了束缚，可以自由地重新配置认知能力及一些更基本的身体功能。关于这一点，后面还将详细讨论。

梦的功能是什么？

哲学家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最近提出，梦只是一种附带现象（某种因果事件或功能不显著的现象），亦即其本身并无作用。这一观点相当极端，但在科学上又是站得住脚的，因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梦的内容对清醒状态的行为有显著影响。梦或许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类是复杂的情感生物，但这是已知的事实。梦的回忆也可能

不那么重要，因为有很多人对梦的回忆很少或压根就没有，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身体机能相当正常。

即便梦的意识体验及其回忆是附带现象，但引发梦的大脑活动过程依然有很多功能。时下最流行的一个理论认为，睡眠中的大脑激活是我们重排脑内信息、丢弃某些过时的记忆、更新记忆并把新的体验加入记忆系统所必需的，我们将在第九章详细讨论这一理论。除了这种认知功能外，睡眠中的大脑激活还可能扮演终生发育的角色。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新生儿的快动眼睡眠比成人要多得多，这意味着大脑自身的建设也是睡眠中大脑激活的功能之一。没有理由认为一旦掌握了语言，发育就会停止，其实我们终生都需要重建大脑和思想。

梦的形式分析能告诉我们认知能力是如何恢复的吗？我们记忆的丢失是否和温度调节能力的丧失有着同样的原因——二者所依赖的胺能系统的失活？夜间休息和胺能系统复元的净效应在于增强次日温度调节和获取知识的能力。除记忆和温度调节外，我们还可以把警觉性、注意力甚至分析能力都归因于胺能的效应。在第六章，通过讨论局部的大脑激活，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些可能性。

我们的梦都是情绪化的，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超联想”，因为我们的大脑是被胆碱能而非胺能物质激活的，由此我们恢复了认知能力最基本的方面——以一种适应生存的方式来组织记忆的能力。情感显露或关联是一个普遍的记忆规则。我们的情感能力水平具有极高的生存价值，是履行社会功能所需的更精确信息的基础。换言之，首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何时该接近，何时该配合，何时该害怕，何时该躲避。我们生命中的每个夜晚，睡眠都在通过激活大脑来修复这些技能，而不关注陈述性记忆（快速且有意识获得的记忆）的细节。与温度调节和抗感染的免疫力一样，我们逃跑、战斗、摄食、交配的本能对生存和繁殖都是极为重要的。

第六章

与梦有关的疾病

本章将探讨调节梦的大脑系统如何被夸大或变得异常，从而导致各种不良后果。此刻我们已涉足现代睡眠科学的热门话题——睡眠障碍医学的边缘。

噩梦和夜惊

本书一直强调睡眠中的大脑激活在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做梦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实它同样适用于理解那些噩梦。我们已经强调过梦境中包含着强烈的情绪，而且通常是负性的。事实上，那些能让人自发觉醒的梦通常都被焦虑、恐惧和愤怒所主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噩梦因何而生与梦中的消极情绪从何而来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答案也相同，这就是大脑激活，尤其是一个古老而重要的区域——被称为脑边缘系统的激活。

什么样的大脑激活会导致噩梦而非愉快的梦呢？答案显而易见，噩梦时被激活的肯定是介导负性情绪的大脑情感中枢，而介导正性情绪的中枢则在美梦中才会大显身手，赋予其愉悦特性。除此以外，对于造成精神创伤的梦，区分夜惊和噩梦之间的差异也很重要。

夜惊是从睡眠中醒来时出现的单纯情感体验，与由于创伤后压力反复重现的梦境类似，它一般与非快动眼睡眠相关。从非快动眼睡眠中觉醒的同时，还伴随心脏的剧烈跳动、呼吸频率加快，血压可能极度升高；梦者多在极度惊恐中醒来，大汗淋漓，通常对醒前刚做的梦几乎没有记忆。

与此不同的是，我们中大多数人普遍有一两次这样的经历，在梦中为躲避某些假想的追捕者而疲于奔命，最后在极度恐惧中醒来。这后一种情况多见于快动眼睡眠期，人们已经形成了试图逃离受攻击处境的知觉情节，而情感也与梦里的动作协调一致。图7所示为与快动眼睡眠相关的、非人为控制的大脑激活（即自动激活），还可以看到心率、血压、呼吸速率的上升始于非快动眼睡眠时期。

对于夜惊，尤其是创伤后的夜惊，不论梦境中是否出现相关内容，情感可能与清醒时体验到的一样。睡眠时大脑被激活，而调节情感的大脑中枢则被选择性激活，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第七章讨论大脑影像数据时明确地加以阐述。到时可以发现，无论多么不愉快的噩梦，都是睡眠中的正常事件，这意味着维系这些保证人类生存的大脑情感系统，可能是睡眠中大脑激活的功能之一。很不幸，做噩梦是避免不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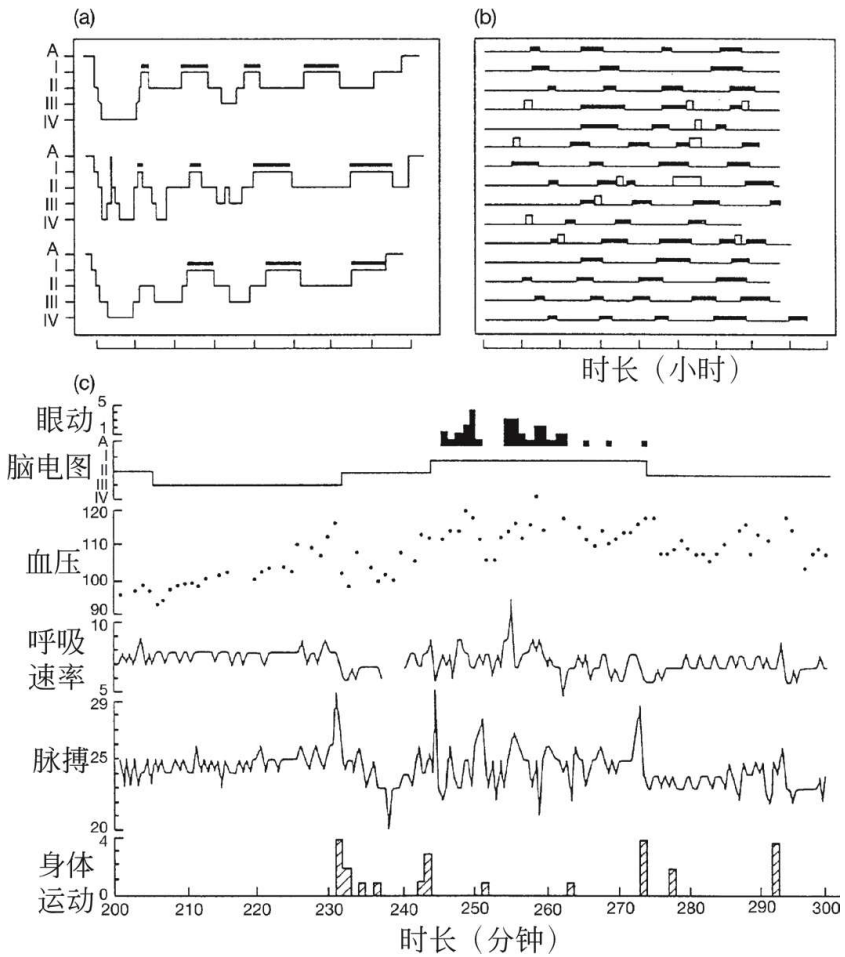

图7　激活的睡眠周期。A、B图为3名实验对象的超日睡眠周期中，快动眼和非快动眼睡眠的详细睡眠时相图（A）和15名实验对象的快动眼睡眠周期图

（B）。C图是其中一个睡眠周期，显示出与快动眼相关的眼动（EM）、脑电图（EEG）、血压（SBP）、呼吸速率（resp）、脉搏和身体运动（BM）的变化。

睡行症（梦游）

梦游、梦呓、磨牙是所谓异态睡眠中的三种，是睡眠中意外出现的动作行为。想一想，既然前面诸多问题都可用睡眠中的大脑激活来解释，那么当我们发现上述三种动作行为都是位于皮质下脑组织中的运动系统激活的功能之一时，就无需惊讶了，该系统就是曾在第四章提及的动作模式发生器（MPGs）。当该运动系统被过度激活，且程度超出大脑通过抑制作用阻止动作输出的能力范围，就会导致前述行为的发生。

在快动眼睡眠期间，最常见的梦体验之一就是假想动作。为保证人在梦中不动，系统必须启动一个抑制或阻滞程序，来防止动作指令（即幻想的梦中动作）转化为现实动作。大脑保证睡眠时身体不动的机制之一是抑制，二就是简单地减少运动系统的使用。这一点众所周知，因为入睡的前提是保持静止；如果不能停止运动，人就无法入睡，所以睡眠的开始依赖于运动系统的失能。随后，当大脑在快动眼睡眠中被强烈激活时，就需要主动地阻断运动输出。

而介于这两个极端情况之间，在非快动眼睡眠时，大脑运动指令中枢可能被激活，从而导致诸如梦游、说梦话及磨牙这样的行为。这些动作行为之所以被认为是“分裂的”是因为它们通常只出现在清醒时。而现在它们出现于睡眠期间，有两种可能：要么是醒了，要么是在做梦，但这两种假设都是错的。此时大脑部分激活，足以支持运动，但又不足以导致觉醒。这些状态是兼具睡眠和清醒状态特征的混合体。

要理解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需要知道大脑在分多层次对动作进行控制。控制清醒时随意运动的上位脑，在睡眠状态下几乎不发挥作用。而运动所必需的很多下位脑结构，则可能在上位脑失活时被激

活，其结果就是无意识动作的产生，例如某些沉睡的个体需要排尿，就会起床去厕所或其他一些不适当的地点如花园，并试图在那里排尿。

在执行这样一些梦游行为时，这些个体是部分清醒的，但上位脑仍然处于深睡眠状态。这些知识来自实验室研究，人们在研究中记录脑电波，结果发现当个体梦游时，仍能持续记录到深睡眠的高电压慢波。一个关于梦游的无稽之谈认为，把人（通常是年轻人）从梦游中唤醒是错误的，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尽管试试好了"。通常情况下不大可能做到，但无需担心，因为无论你能否唤醒他们，都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创伤后的梦

创伤对梦有何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矛盾对立的答案——影响巨大和影响甚微。人们不能理解为何在有些情况下创伤几乎总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对梦的影响又如此之小。有一种可能的说法是创伤的受害者，如曾经历过战争暴力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有着某种特殊的觉醒体验。他们的睡眠被一种类似儿童夜惊的恐惧打断，并且与儿童夜惊相同，他们的睡眠中断并非出现在梦正常产生的时段——快动眼睡眠相，而是出现在非快动眼睡眠相，此时大脑未被完全激活，却能感受到强烈的情感。

曾遭受过侵入性、扰乱性创伤的个体可能会在睡眠时出现侵入性、扰乱性的情感体验，这些体验造就了自己独有的大脑激活状态。创伤没有破坏睡眠中大脑激活（梦正是来源于此）正常生理过程的完整性，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创伤体验者从未在梦中有过该体验，只是因为其程度还没有强烈到足以创造自己的精神活动，故而在本人梦的构建中只能占据极少的部分。

我曾在大街上被三个男人袭击，险些丢掉性命，我的鼻骨被击碎，鼻中隔从颅骨上严重脱位；结果需要在未经麻醉的情况下做痛苦

的整形手术。但这一幕从未出现在我的梦境中，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可怕的攻击性冲突，尽管这些在创伤事件发生前后都出现过。这丝毫不令人惊讶或显得非同寻常。人最害怕的事之一就是被罪犯和暴徒攻击时无回击之力，自我孩提时代起，这就是我生活中的一大恐惧，所以我可能总会反复梦到与强大而难以抗衡的敌人对抗的画面。我跑，他们追，有时他们甚至能抓到我，就像现实中的那次创伤事件，但随后我就醒了。他们从未像现实生活中那样继续下去，打断我的鼻子。事实上我在梦里很少体验到疼痛。

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详细的科学研究表明，所有人的睡眠中都会重新浮现那一事件的恐怖记忆。这一事实与战后退伍军人中出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共同说明，正如清醒时的思维易被这些不愉快体验的担忧主宰那样，睡眠时的思想活动也易被它们所左右。

现在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研究以查明从快动眼和非快动眼睡眠中觉醒后能否给出不同的梦境报告，这不仅对于回答创伤如何影响梦很重要，对于解释梦的功能也很重要。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何大脑要在睡眠时自我激活，不过有证据显示它肯定不只是为了重现之前的经历。

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

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RBD）是梦疾患队伍中的新成员，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综合征，患者通过动作来表现自己的梦。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并非睡行症，尽管后者曾被误认为是前者，那么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通常只有对动作或运动输出的抑制在量上超过神经元的兴奋时，梦中动作指令才会被消除，如果抑制减弱或兴奋增强，或两者都出现，运动就会发生。

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发生时，个体开始表现自己的梦境，他们通常是中年男性，将来会进一步发展成为运动障碍——帕金森综合征。我的一位病人挥动手臂击打妻子，而当时他正梦见自己开着一辆车在

急转弯；另一位患者梦见自己在游泳池边，于是从床上跳了下来。

每一次，被唤醒的病人给出的梦境报告总是与快动眼睡眠做梦时观察到的运动行为相符，睡眠实验室的证据证实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快动眼睡眠中。

这些证据听起来倒像是倾向于支持梦心理生理学的“一对一”理论，而在20世纪60年代，实验者们费尽心机也找不出支持该理论的证据。它还提示大脑的遗传变性可以导致快动眼睡眠生理机制发生病理性改变。对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而言，人们怀疑控制神经元的系统（神经调节系统）可能是多巴胺，一种对正常睡眠作用未知的化学神经递质。

我们知道多巴胺缺乏是帕金森综合征的病因，而很多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患者最终会发展成帕金森综合征。此外，尽管我们还不知道原因，但很显然，长期服用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这一类抗抑郁药会引起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这表明5–羟色胺作为已知的快动眼睡眠强效抑制剂，可能与大脑多巴胺系统产生交互作用，从而扰乱睡眠时运动系统的抑制-兴奋平衡。

梦和其他任何精神状态一样可能出现病理异常，第七章和第八章将详细讨论这一主题，并阐述正常的做梦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精神病理学的物质基础和梦本身的物质基础，以及梦的疾患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正常的做梦和精神病理学。

第七章

梦如谵妄：睡眠与精神疾病

如果梦和清醒状态下的精神失常不能实现弗洛伊德模式中的动态互换，我们又怎会牵强地将二者相提并论呢？归根到底，梦是一种精神病态，与人们在清醒时体验到的精神病态别无二致。内生性感知所具有的幻觉力量足以使我们陷入不可救药的妄想之中。梦幻觉的情节是如此详细，对思想的控制力又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已为一种改变了的意识状态所掌控却浑然不觉。我们坚信自己是清醒的，笃信自己的感觉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感，罔顾梦的稀奇古怪及不协调性和不连续性，而这一切倘若出现在清醒状态时，马上就会被识破。

倘若这种情感出现在真正的清醒状态之下，人们对这种不可信也不可能的梦境的第一反应会说："掐我一下，我莫不是在做梦吧！"如果掐起来不疼，人们可能就会试着让自己清醒，接着就会想：难道有人在我的鸡尾酒里偷下了蒙汗药？还是我用来治疗高血压或偏头痛或肠痉挛的药出现了某种医生没有告知的副作用？人们肯定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睡好。尽管我们知道自己因某些身体原因而发疯，但可能还是会在历经上述过程后才得出需要看精神科医生的结论。

这意味着从形式上讲，梦与严重的精神病不只是类似，根本就是一码事。这反过来又说明，轻而易举就会想象到，不仅大脑状态的生理改变可以导致精神病，就连完全正常的睡眠变化也会对我们的心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否每晚的疯狂只是为了避免同样的事情在白天上演？抑或人之所以精神错乱是因为大脑暂时放弃了控制权，以便在一觉醒来后以一种更为井然有序的方式将其重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有证据表明，在这一系列并未尽数列举的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些更为复杂的真相。

梦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病态？

精神病被定义为一种以幻觉和/或妄想为特征的精神状态。在不

被诱导的情况下，很难产生幻觉；稍后我们将详细探讨“眼见为实”原则的含义。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被诱导但不产生幻觉却很有可能。正常的怀疑（也可称之为谨慎）让我们相信关于爱人、同事、政府的一些完全虚假或过分夸张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并不需要听到什么才变得偏执，尽管那确会推波助澜。

梦最像精神病的哪一种自然分类？精神分裂症，或是抑郁、躁狂之类的主要情感障碍，还是某种器质性精神病如药物或高热导致的谵妄？如果理解我的推理，你就会很快意识到答案正是器质性精神病。若你对此有任何怀疑，求助于形式分析！

首先从梦的幻觉开始。它们使用什么感觉模式？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视觉。幻视在精神分裂症和主要情感障碍中都极为罕见，但却是器质性谵妄的标志。

接下来谈一谈错觉，它们仅限于认知或智力层面，从无精神分裂症那样典型的偏执妄想。它们很少像抑郁症（其常见特征之一就是错误地坚信身体某一部分丢失、缺损或患病）那样与机体相关。梦中的精神失常具有躁狂症夸张而无畏的情感高涨特征，但这些特征也见于器质性谵妄，尤其是在其慢性、宿醉期后。

讨论转到认知缺陷时，关键点出现了。当我们做梦时，时间、地点、人物没有任何预兆地变换。这种定向不稳定性其实是器质性谵妄定向障碍的变异形式。谵妄病人和梦者一样，只知道自己是谁，而不知身在何处，今天是什么日子，甚至连跟他们在一起的是谁都不知道。为了应对短时记忆丢失带来的定向障碍，器质性谵妄病人会编造故事，这些故事不是谎言而是错误的信念，它们被真诚地——通常是愚蠢地——提出，以掩盖记忆的巨大空洞，我们把这一特质称为“虚构”。虚构这个词用于描述梦境并不常见，但它确实很贴切。描述梦常用的一个相关词汇就是“难以置信”。

当我们精心编织梦的情节时，我们在自叙关于自己的故事、小谎言、善意的撒谎或荒诞事件。事实上，我们坚信这些虚构的故事是真实自我的反映，以至于我们很少，而且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得出我们做梦时在妄想的结论。由此看来，至少可以这样认为，梦的内容既是

黄金也是渣滓，既是稀世珍宝也是认知垃圾，既是重要信号也是信息噪音。我和罗伯特·麦卡利（Robert McCarley）在1997年关于激活-整合假说的原创论文里就已提出这种观点，但从未获得广泛认同。

不过，还有很多其他理由让我们重视“梦如谵妄”的观点。即使你相信你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阿姨那古怪的话语里隐含或深藏着某种意思，你也能认识到这些都缘于她脑细胞的丧失。事实上，阿尔茨海默病及其诸多退行性病变家族成员，都累及神经元，包括已知的在睡眠状态下功能被抑制的胺能或功能被增强的胆碱能成分。在此我想表达的是，梦与谵妄不仅在心理现象上类似，其潜在的大脑机制也雷同。

听起来很糟糕，不是吗？一旦入睡，一个类似谵妄的独特大脑激活过程就应运而生，谵妄是一种特殊的状态，我们曾以为它的出现只能通过生病或服用酒精、安非他明、阿托品之类的药物或让大脑到达衰老的境地，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这一状况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晚，可能健康时比生病时更频繁，年轻时比年老时出现更多！

好消息是，要治愈与梦有关的谵妄，只需从梦中醒来即可。从多方面看来，这都是一个令人宽慰的想法，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喜欢音乐，就可以关掉它，正如治疗焦虑和抑郁的治疗师们所发现的那样，但这也意味着，一直以来如此诱人而强大但到目前为止又如此模糊的化学平衡概念最终可以被详细说明。精神状态是清醒时的精神健全和做梦时的精神错乱这两个极端之间持续的交涉妥协。下面的梦显示出当大脑被胺能系统抑制和被胆碱能系统过度刺激时，思想可以变得多么疯狂。

1983年8月28日　一座失火的房子　第32号梦例

我能看见浓烟，起先看似桑拿房然后又像是农舍着火了。这次，它看上去又很像（我的）那幢房子，但是位置不对（在马路对面），当我把水管拖往冒烟处的时候，我忘了水管不够长。地上覆盖着雪。我丢掉水管跑过去，结果发现烟是从一个与地面齐平的烟囱里冒出来的，所以就没什么危险了。那个房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知怎么地像我梦境中的农场里那一套熟悉的建筑。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谷仓，我经常凝视它的修补处——它其实不像我在现实中常常凝视的那

个真实谷仓的修补处。

“谁放的火？”我生气地问。

“一个男孩，”某个依稀有些像童子军团长或教师的人回答，他的表情暗示那个“男孩”是伊恩，但由于伊恩身患残疾，我不能生他的气。那人带着一副职业的、自认为道德上高人一等的忍耐表情，以后的某些时候，当我自己面对一些被令人头疼的孩子激怒的家长时，也会摆出这种样子。

“他就在这附近。”

虽然他并不在场，但那里有很多好心的、客观的人，有足足一研习班的行善之人在讨论善良和爱的奇迹。这稍稍缓解了我的怒气。但我还是记挂着这场火灾，并急切地想惩罚纵火者。

转眼之间场景完全转换。在一条清澈见底急流而下的小溪边，一个橙色的球射向漩涡中。球一旦到瀑布那里，肯定就找不回来了。我大声呼喊朱丽叶，她那时动不了，但至少可以爬到高地上绘出球的运行轨迹来（她一直在跟卡伦·拉文玩，卡伦那天刚到，带了一个橙色的球来）。但是，她一头扎进水里，像一个孔武有力的男性那样，游过急流，抓住球带到了对岸。这一切立马显得不可思议却又很正常。

如果这还不算妄想的、精神病样的经历，那我所有的精神病学训练就都失去意义了。我有视觉幻象、妄想、强烈的情感（愤怒、焦虑、喜悦），还有最明确的定向障碍及其类似现象——虚构。这个对清醒大脑而言如此疯狂的故事，在梦中的我看来却是如此正常。

精神疾病中的睡眠有什么变化？

这能告诉我们有关化学失衡理论的什么信息呢？对此大多数人能凭直觉给出一个普遍的答案，焦虑和其他诸如喜悦等能够增加清醒式大脑激活的情感会妨碍睡眠，这一点可通过提高介导清醒及抑制睡眠的胺能系统的调定点来实现。除引起令人不快的失眠外，它们还能导致睡眠剥夺，或至少是睡眠减少。从第五章的讨论中我们了解到睡眠剥夺不仅仅是功能障碍，而且可能确实不健康。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当病人的精神逐渐变得病态时，睡眠也会受

到干扰，由于极度的睡眠剥夺能使人进入谵妄状态，故睡眠受影响会增加正常的睡眠谵妄转变为精神分裂症或情感性精神障碍的风险。想象一下洗脑、恍惚状态以及政治、心理、文化礼仪压迫下对背叛的忏悔，无一不牵涉到睡眠剥夺。到最后睡眠被剥夺的人愿意做任何事情，说出任何秘密，只求换得片刻的睡眠。

因此，睡眠丧失在精神病的发展中极其常见，且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就精神分裂症（现在被认为是多巴胺释放过度和/或多巴胺效应增强导致的精神障碍）来说，我们可以假设多巴胺系统与清醒状态的其他调节者——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有间接而积极的交互作用，而与乙酰胆碱系统有直接而消极的交互作用。对我的“梦如谵妄”理论来讲，值得关注的是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睡眠没有显著变化。

对于主要情感障碍性疾病，情况则变得异常多样化。首先是抑郁，现在被认为源于5–羟色胺和/或去甲肾上腺素缺乏，突出特征是与年龄匹配的对照者或自身好转后相比，其快动眼睡眠倾向于更早出现、更为强烈且持续时间更长，这意味着同样为胆碱能系统所强化的抑郁也具有与睡眠控制相同的神经元系统的功能障碍。将这一观点稍作延伸，它还表明容易抑郁者也容易进入快动眼睡眠，反之亦然。抑郁患者的睡眠改变及其推定的神经调节机制见图8。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梦不像是抑郁型精神失常，而抑郁也不似谵妄！

该怎样解释这些明显的差异呢？首先得承认现有的知识还不足以作出解释。其次，要指出最有希望产生成效的研究途径。其中之一肯定来自以下事实，即尽管最有效的抗抑郁药通过增强受抑制的胺能系统并削弱超激活的胆碱能系统从而抑制快动眼睡眠，但它们的作用时程却大不相同。快动眼睡眠障碍可以即时修复，而治疗情感障碍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起效，这意味着睡眠和情绪之间的关联是长期的、顺流式的脑过程，这一过程我们现在尚无法描述，但几乎可以肯定是依赖于基因表达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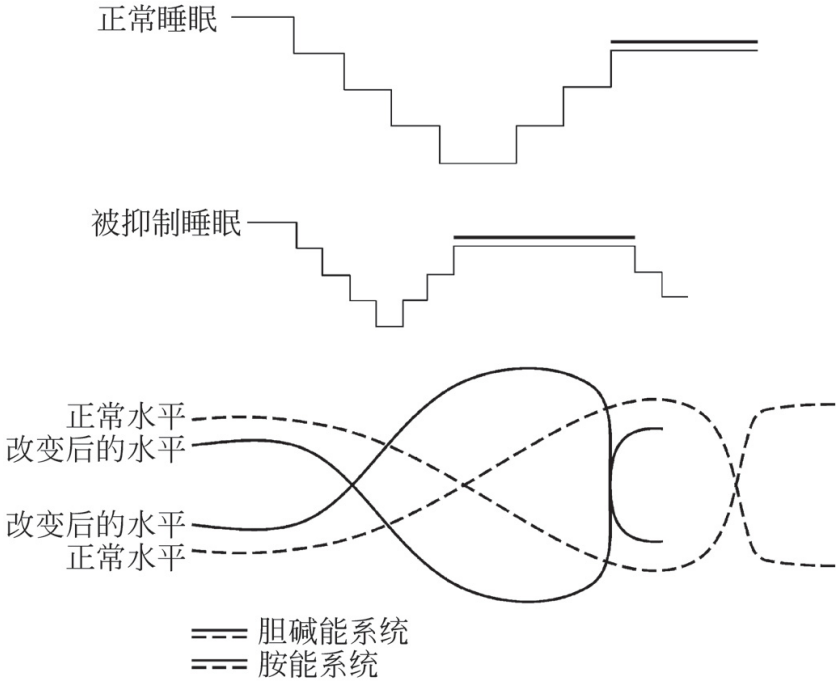

图8　很多抑郁患者在第一个睡眠周期经历了早发的快动眼。第一个快动眼期也可能比正常情况持续时间更长，程度更强烈。抗抑郁药可通过增强胺能系统并削弱胆碱能系统来使这一过程发生逆转。

另一条希望之路是仅一夜快动眼睡眠剥夺可以迅速释放白天的压抑。这一发现表明，如果在情绪控制方面已经存在问题，快动眼睡眠化学体系将诱发抑郁。快动眼睡眠过度胆碱能化能否诱导抑郁？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已知那些急剧增加快动眼睡眠的胆碱类药物会加重抑郁。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两种模式，一种控制睡眠，一种控制情绪，它们如此接近，让人充满期待，即将但尚未完全融合。那些渴望大脑和精神拥有统一理论的人必须保持耐心，对现状知足，至少现在“杯子”已经超过半满，而就在25年前，“杯子”还是空空如也。

第八章
梦的神经心理学新说

睡眠实验室的梦学研究很快遭遇瓶颈，这是因为“一对一”的梦内容分析理论过于雄心勃勃且缺乏科学性，难以导引一个由于太过表面化因而无法提供大脑详细数据的生理学项目，结果1975到1995成为睡眠和梦学研究史上极富争议、成果贫乏的20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基金委员会开始削减睡眠实验室的研究经费，特别是那些描述性相关性梦研究项目的经费，这一点令人失望却又情有可原。

与此同时，有关动物睡眠的神经生理学研究却在飞速前进，并提供了关于大脑的详细信息，但这些只能通过运用梦形式理论勉强与人类心理学抗衡。很多心理学家对此感到不满，其中有些人对从猫身上获得的细胞分子证据能否应用至人类表示怀疑，这可以理解；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不能或不愿放弃梦的内容分析理论。以戴维·福克斯为首的一些心理学家坚信自己尽失支持并不公平，因而对生理学导向的梦研究进行了激烈抨击。

脑成像成为救星

20世纪最后十年被美国国会正式宣布为“大脑十年”，在这十年的后半期，脑成像技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直观观察与意识状态改变相关的大脑局部激活及失活成为可能。上面提到的意识状态改变中最主要同时也适合我们挑出来作为首选切入点的几个分别是：清醒、睡眠与做梦。这一科学方法虽然还很年轻，但正在飞速发展，并已经在梦科学领域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使我们有机会对梦及清醒与清醒及快动眼睡眠局部大脑激活的形式特征作出比较。

在描述这一方法是如何工作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应用脑成像的数据来解释梦形式主义的两个例子——幻觉的强度（在做梦时通常变得相当夸张）和定向思维（在做梦时通常减少或完全消失）。由于其空间分辨率远胜于脑电图，脑成像技术使人们可以记录到与幻觉和思维关联的局部大脑活动。运用一种称作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

（PET）技术进行的研究显示，大脑多形区域激活增强，而这些区域正好是我们预测幻觉感知时会激活的部分（顶叶皮质区）。这些研究还发现前额叶背外侧皮质（见图9）有与之相对应的激活受抑，该区域被认定是工作记忆、自省、定向思维的脑区或发源地。换言之，由于局部大脑激活的改变，与清醒时相比，快动眼睡眠时幻觉有所增强、思维受到激发。

这些观察是如何实施的？这又与我们已知的大脑化学物质整体变化及其潜在的生理机制有何关联？

如果你曾做过计算机断层显像（CT）或磁共振成像（MRI）这些在医学和神经科学领域已取代X线摄片的检查，那么你已经享受到了脑成像技术革命的成果。这两项技术及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都是通过计算组织之间的密度差异（CT）或功能激活的差异（MRI和PET），生成大脑组织本身而不仅仅是颅骨的影像。它们利用了大脑组织密度随血流变化、随神经元激活或失活而改变的事实。当神经元变得更为活跃时，它们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而氧气供应来自激活区血供的增加，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和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使这样的区域激活（和失活）变得“直观可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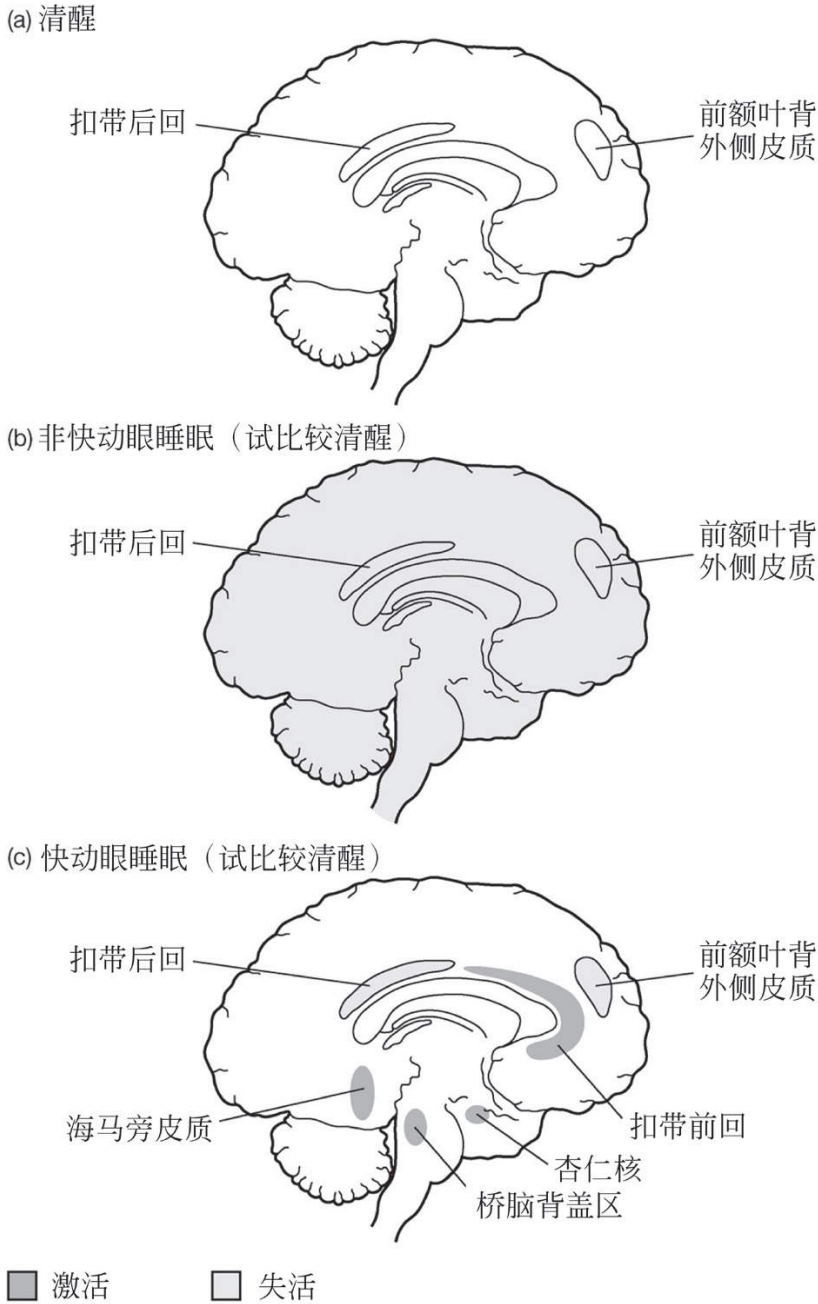

图9　在非快动眼和快动眼睡眠时大脑区域激活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研究证据概览。与清醒（a）时对比，非快动眼睡眠（b）时观察到血流分布的全面下降

显示出与夜晚早期意识体验能力大幅下降一致的普遍失活。在快动眼睡眠（c）时，很多区域的激活超出其清醒时的水平（纯黑），而另一些则处于失活状态（阴影）。

随着计算机技术被用于三维数据的组织和处理，人们就可能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同时观察多个不同大脑区域的活动。根据研究者的指令，电脑决定从哪个角度摄像，在多少深度上聚焦进行密度分析，然后输出无数度量密度的像素或点，把它们绘成一张二维图即我们平时看的断层成像片，还可以应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密度模式，以使读片更为容易。

从研究角度来说，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因其空间分辨率较高而颇具吸引力，但必须认识到，即使是应用该技术也难以达到基础睡眠研究中微电极和微注射技术实现的细胞分子水平，二者依然存在差距。我们之所以能够容忍这个差距，是因为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能给我们提供即便微注射技术能应用于人类（事实上不能）也将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能认识到的许多信息，还因为我们知道在动物研究中要填补这一差距只是个时间问题。

同时，我们为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在人类睡眠和梦研究方面获得的重大发现而欢欣鼓舞。表3显示了与清醒时相比人类快动眼睡眠时激活和失活的大脑区域，还对疾病尤其是因中风意外损伤部分大脑后分析梦境变化所得的数据进行了比较。为有助于理解，可以参考图9，该图显示出快动眼睡眠期较清醒时更活跃或更不活跃的脑区位置。

表3　快动眼睡眠时大脑激活的图像及脑损伤对梦的影响

大脑区域	快动眼期激活的PET研究	脑损伤对梦影响的研究
桥脑背盖区	↑	–
缘脑结构	↑	↓
视皮质	–	–
缘上回	↑	↓
前额叶背外侧皮质	↓	–
额叶中基部	↑	↓

说明：↑，增加；↓，下降；-，无变化。

接下来的发现尤为有趣：与动物快动眼鲜明化学性激活模式重要发源地相对应的人脑区域的激活；介导情感、驱动人类行为的边缘前脑广大区域的激活；控制情感特别是恐惧感的边缘系统的激活；大脑多形“联想”区域的激活。

形式学观点认为梦与清醒不同在于：与清醒状态相比，梦多被内源性因素所控制，更易引发幻觉，更加情绪化，更多地为本能所驱使。而上述区域激活信息与形式分析的这些观点是相符的。梦科学家们在比较这两个状态各自的精神和大脑形式的过程中是在“做减法”。在比较的第一步我们要问：大脑的哪些部分在快动眼睡眠时更活跃，它们与做梦时强化的精神状态的形式方面是否相对应？

梦与清醒时相比的另一个特征是一系列相关联的认知特征的缺乏，包括自我意识及对现实测验能力的弱化、记忆力减退、逻辑推理能力缺损，最显著者莫过于定向思维能力的丧失。现在的影像实验研究告诉我们，前额叶背外侧皮质的正常激活可以维持清醒时的各种功能，而其在快动眼睡眠时处于失活状态。换句话说，这种情况下的“减法”显示清醒状态拥有更多的心理特征和潜在的局部大脑激活。

这些惊人的联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这促使我们去思考每种情况背后的因果联系。梦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认知特性，如此本能而又情绪化，有如此多的超联想，是因为支持这些功能的大脑区域更为活跃。我们之所以不能正确地分辨自己处于什么状态，弄不清时间、地点和人物，不能缜密或主动地思考，是因为支持这些功能的大脑区域相对不够活跃。难道就这么简单？为什么不是呢？很多看似复杂的谜团在简单的科学真理出现后逐渐被解开，这才是还原论的真谛。

现在我们不由得记起，对梦时心理功能弱化相关的大脑局部进行分析揭示，这与快动眼睡眠激活的大脑中缺乏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有关，而这两种化学物质是注意力、学习、记忆（暗含方向感和主动推理）所必不可少的。反过来，在该状态下不仅未受抑制而且被激活的胆碱能系统可能有助于那些为大脑区域激活介导的征象出现，其中包括幻觉、超联想和超感情化等。

故事越来越精彩了。人们甚至会想梦内容的精神分析现在还能做些什么呢？在第十一章我们还会回到这个话题，现在简单地讲，那些弗洛伊德试图用其愿望 - 满足、伪装 - 监察理论来解释的梦的特征，已经被一种他认为终将成为可能的方式——生理学和大脑化学成功地解释了。

我们的整合程序能更进一步吗？有可能。举个例子，假设人类快动眼睡眠时局部大脑激活的改变因某种原因与神经元调制的转变有关，这其实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既然身体其他部分的血流都是由这样的调节系统所控制，在大脑里当然也不会例外。换言之，要改变局部大脑激活和失活的复杂模式，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改变神经元调制的平衡，以此改变血供，进而激活神经元。调节系统很可能通过直接（突触性）和间接（血管性）两种作用来影响神经元的功能。从脑科学中找到答案已为期不远。

关键是人们现在可以看见自己的大脑活动，而在15年前这只是梦想而已。

1984年7月6日　头痛　第34号梦例

自从1984年1月19日患上丛集性头痛综合征后，我发现5月和6月病情有所好转，头痛发作的频率和强度都在下降。

昨晚，我梦见我在检查自己的大脑（好像是在死后，但这一点梦里并没有提示）。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掀开了头皮和头盖骨，心想：“至少我能知道是什么导致了我的头痛。”然后，你瞧！病因找到了——一个大气球形状的包块（或许是空气）把脑组织挤压到了颅腔的下1/3，脑组织表面还能看到凹陷。

在仔细观察大脑左半球时，我注意到那里被虫蛀过，这可以解释为何我总是难以记住某些特殊的名字（几乎可以肯定这与年龄有关）。我对看到的一切兴致勃勃，没有半点恐惧；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矛盾（紊乱的体系？），我在看着我自己的大脑，而这一状况出现的前提是我必须有两个大脑，但那样的话，脑中脑就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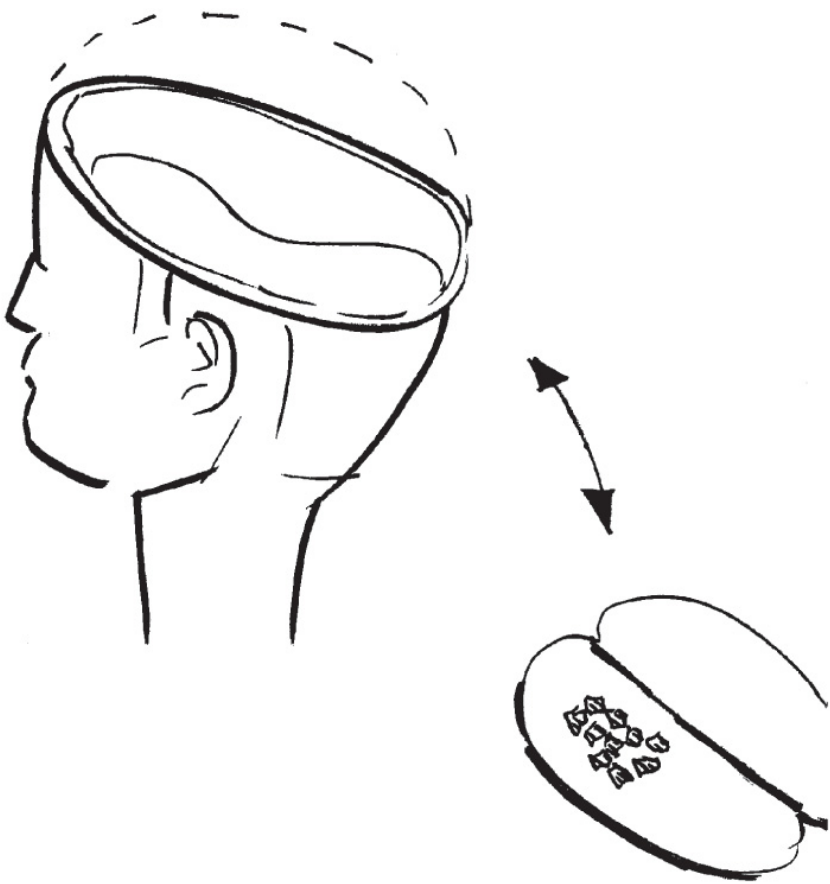

记得我还自言自语道："嘿，快醒醒，这样你就能想起刚才那奇妙的一幕了！"

我能有如此的清醒度来唤醒自己，使我怀疑这个报告具有意识的自我暗示性，但据我所知，我并不曾有意去诱导它。相反它只是简单地反映出我当时的无意识神经生物学自我分析。

脑损伤会导致梦的改变吗？

先是心身问题造成了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之间观念和政治上的裂痕，随后弗洛伊德不慎的二元论又使这一裂痕变得更深，结果梦科学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脑血管意外（俗称中风）和癫痫发作可分别导致梦的形式特征减少和增加。

中风发生在脑血管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堵塞或被来自心脏的血栓阻塞时，受累区域的脑组织得不到工作所需的氧气。当大脑的多形感觉皮质（顶叶的一部分）或深部额叶白质受损时，梦可以完全丧失。读者可以从表3中看到，这些都是快动眼睡眠时选择性激活的大脑结构，几乎可以肯定这并非巧合，它表明这两个区域是做梦所必需的。

你可以通过任何你喜欢的方式来激活睡眠时的大脑，但如果不激活顶叶皮质或深部额叶白质的话，将不能产生梦的心理体验。为什么不能？难道这些有限的、分散的大脑区域就是梦的温床？也许不是。看起来更像是这些区域提供中继，使其他大脑区域之间以一种可维持梦意识的方式互相交流。

当中风位于枕叶的视区，又一相关区域而非原始处理区，病人会报告说梦里没有视觉图像。要理解这些发现，我们必须认识到当视网膜编码的视觉刺激到达初级视皮质时，呈现的只是图像的一些简单特性（如边缘或栏杆），复杂的完整图像（如房屋或人脸）是在其他区域构建和呈现的。大脑皮质中有20个以上这样的次级或相关视区。

盲人在梦里有视觉吗？

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失明是先天的还是后天造成的。
先天失明的人不论是在清醒时还是在梦里都不会有任何视觉成像，这是因为他们的视觉系统与外部认知世界从无必要的交互作用，以致视觉认知或视觉编码不能产生。因此，当他们的大脑在睡眠时被激活，由于没有图像编码存在，他们就无法调出任何图像。当然视力并不是视觉受损个体唯一的感觉通道，他们的体觉或空间位置感显著增强，且增强程度与视觉系统信号的损失成比例。所以这些个体做梦时确实会经历其他的幻觉体验，只是表现模式与视觉不同。
后天失明的人以前曾有过视觉，他们的大脑已经发育出认知能力和回忆图像的能力。他们在清醒时闭上眼睛可以创造图像，在睡眠中大脑自动激活时同样可以创造精巧的图像。事实上，梦是后天失明的人看得最清楚的时候，这让我想起了达·芬奇的问题："为何我们的双眼在梦里看得比清醒时更清楚？
有一个盲人受试者告诉我们，他特别喜欢做梦时看见的情景，因为在梦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看见自己的家人。这说明我们可以并且应该教会后天失明的人去回忆自己的梦，甚至去塑造梦的内容，因为在清醒时他们长期不能看到自己的家人，而在梦里他们可以与家人有逼真的知觉接触。我们有个受试者可以详细描述在梦里拜访父亲时，看见他那邮政局长帽子上的金色镶边。

癫痫是受累大脑区域的正常活动被强化和损伤后的一种异常状态，它提供了一个与中风完全相反的天然实验模型。蒙特利尔的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潘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及其同事神经生理学家赫伯特·杰士伯（Herbert Jasper）对颞叶癫痫进行了详细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直接电刺激颞叶可产生与自发癫痫毫无二致的"梦样状态"。

这些癫痫状态之所以是“梦样的”，就是因为它们与正常的梦有某些共同的形式特征——它们可以有幻觉，过度情绪化，认知不清，而且难以回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颞叶在快动眼睡眠时被选择性激活，我们不得不问“难道这只是另一个巧合？”答案可能又是否定的。我们须认真看待如下观点，拥有胆碱能系统引发的脉冲样活动的快动眼睡眠获得对颞叶的电刺激后，这一刺激向周围相连的结构扩散，使人出现类似癫痫和精神病某些方面的梦样状态，而癫痫和精神病都有明确的物质介导机制。

尽管成像技术近乎完美地呈现出梦中发生的一切，但相关神经心理学领域依然很新很年轻，发展非常滞后。随着脑损伤对梦产生的其他影响被纳入研究，我们可以期待获得更多的信息。不过此刻我们可以肯定，鉴于梦是大脑功能的一种，脑损伤当然会对梦有影响。若非如此，那又能如何呢？

第九章

梦、学习和记忆

梦参与记忆重组的观点被提出至少已有30年，但直到最近五年一系列强有力的明确证据才得以发现。我的同事罗伯特·斯迪科高德（Robert Stickgold）是研究这一领域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正是他的工作奠定了本章的基础。

本章最基本的假说是快动眼睡眠有助于巩固记忆，这一假说以前一直有很多正面的证据支持，但均不够分量。它的诱人之处在于大脑处于激活状态，而梦却由记忆片断组成。最近的实验证明了这一假说，尽管现在看来非快动眼睡眠也同等重要，更有趣的是，梦 - 记忆设想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了加强：

1．由于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人们可以更好地描绘和区分可能受睡眠影响的学习和记忆过程。

2．由于基础睡眠神经科学的发展，在看起来支持学习和记忆不同方面的大脑动态变化方面，人们所掌握的细节已足以对睡眠学习过程进行建模。

正如我在本书里不断强调的那样，梦是一种意识体验，而快动眼睡眠或出现在深夜的非快动眼睡眠是引发意识体验的大脑生理状态，我们必须坚持这二者是有区别的。就像人们可以不记得梦而快动眼睡眠照样能进行，我们认为学习和记忆重组也能在人们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发生。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就是，新的梦形式分析方法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记忆重组的规则。

动物的快动眼睡眠和学习

早期应用实验动物研究睡眠和学习时，两种互补的理论得到证实。大鼠成为这一研究的对象，尽管人们对猫的大脑了解更多，但后者的学习能力实在太差。养猫者可能会反对这一令人不快的比较，他们确信自己的宠物就算不比老鼠聪明，至少也不比老鼠笨。但猫是家养动物，无需学习太多就可以生存；而大鼠是野生物种，需要适应更

艰难的生存环境。

第一个理论通过监测受试者学习新知识后的睡眠情况，发现快动眼睡眠随学习的增加而增多；第二个理论则通过剥夺快动眼睡眠发现学习能力受损。这两个理论的关注点都在快动眼睡眠。对前一理论而言，快动眼睡眠的增加常呈现惊人的滞后，且时间有限，这引导卡莱尔·史密斯（Carlisle Smith）提出了记忆巩固的“快动眼睡眠窗”概念。这一概念类似于同样与学习密切相关的发育关键期，鉴于快动眼睡眠状态在未成年动物中普遍存在，该发育关键期可能还与快动眼睡眠有关。

一些在旅行时记录梦的学者，如米歇尔·朱维特，报告说新地点的信息掺入梦境呈现惊人的滞后现象，特瑞·尼尔森（Tore Nielsen）对梦掺入个人经历进行系统的实验室研究后也有类似发现，就梦而言，这些都是与考虑学习时机和人类快动眼睡眠窗最相关的内容。如前所述，两个信息来源都显示，大脑需要好几天甚至是一周的时间才能用新信息改变自己的思想，如此一来，在考虑行为成分时我们显然要面临一个长期的过程，切勿期望所有的学习都能在一夜之间一蹴而就。

如何解释梦的重复出现？

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个夜晚到另一个夜晚，梦明显具有始终如一的特征，我们把这种特征叫做“形式”以彰显其与“内容”的区别。形式是指梦具有可视性、强烈的情感和古怪的逻辑特质，其时间、地点、人物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和可变性。换句话说，梦境的怪诞会反复出现，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反复出现的怪诞特征使大多数人认为梦的内容是重复的。

我们知道内容本身可以重复，特别对于第六章讨论的那些创伤性梦例，但当正常人将其所谓复现的梦记录下来时，我们惊讶地发现重复出现的只是梦的形式特征，如焦虑可能是梦最常见的元素。那么人们为什么焦虑呢？譬如说考试。只要我们想想焦虑和情绪在梦的构建

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就会觉得那不足为奇。人们都焦虑些什么呢？他们为自己的表现及相应的评价而紧张，那么还有什么评价比考试成绩更具压力或更重要呢？因此，考试常常成为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然而，与考试有关的梦常在定向细节上大相径庭，它们发生于不同的房间、不同的地点，涉及的科目也不同，但其共同点在于做梦者都觉得准备不足。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尤以忙碌、竞争激烈者为甚。这可能与我们在梦里难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有关，也就是说梦的另一个形式特征是无法记忆。在梦里，人很少能记住什么事情；尤为奇怪的是，尽管梦包括了很多的记忆片断，人们却不会在梦里突然停下来说“咦，那让我想起了什么”，或记起一些诸如某个梦中人物最近刚去世的事实。可能正是这种思维的缺乏，加上焦虑及其最常见的搭档——对失败的恐惧感，共同引发了个体所谓反复出现的考试梦。

读者可能认为我们是在试图辩解而不是解释再发的梦，但事实并非如此。反复出现的只是特定的情感显露场景，它们取决于梦的某些形式特征且具有高度的可重复性。每个梦都以视觉感知和强烈情感为特征，情感以高兴、愤怒和焦虑最为常见。随之而来的还有我们自己过去的经历，与这些情感相关的种种的经历可能会出现在梦里。

人类的学习和记忆

学习和记忆最显著的差别体现在程序性任务上，此时个体需要面对感觉运动挑战，其中一些还是在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面对的。

在执行视觉分辨卡尔尼 - 萨吉（Karni-Sagi）任务时，个体的表现不知如何也不知为何得以改善；睡眠之后再测试会发现他们做得更好，但同样原因不明。在视觉分辨任务（VDT）中，人必须紧盯屏幕中央的某个标志如L或T，然后当屏幕的另一部分闪现一个异常刺激排列（\\\代替了///）时予以示意。我们采用了认知科学常用的反应时间快慢作为测量指标，经过不到一小时的训练，大多数人的下意识识别变得非常迅速。

尽管人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他们确实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并在训练期间得到显著改善，“改善”是通过接受刺激的时间缩短时作出正确判断比率的高低来衡量的。我们并不认为这是记忆（其与梦可能关系不大或完全无关），但它可能是我们学习大多数东西时的典型表现，故而相当重要。换言之，人们学会了无数的过程却难以言表。大多数学习都是无意识的，这种学习被称为程序性记忆，以区别于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

当受试者第二天再次接受卡尔尼 - 萨吉测试时，人们发现其表现与睡眠质量密切相关。如果被剥夺快动眼睡眠，他们会表现得像新手一样，既往接受刺激的体验显示不出任何优势；但如果他们能在前夜熟睡且/或在深夜有长时间的快动眼睡眠，那么第二天所学技能将会保持甚至还会有所改善。如果上述两种睡眠都能保证，改善效果可以达到最佳。如图10所示，两种睡眠测量值的乘积和行为改善之间的相关度几乎是百分之百。我们进行了在睡眠时程和困倦度两方面都匹配的对照，证明正是睡眠本身有益于技能的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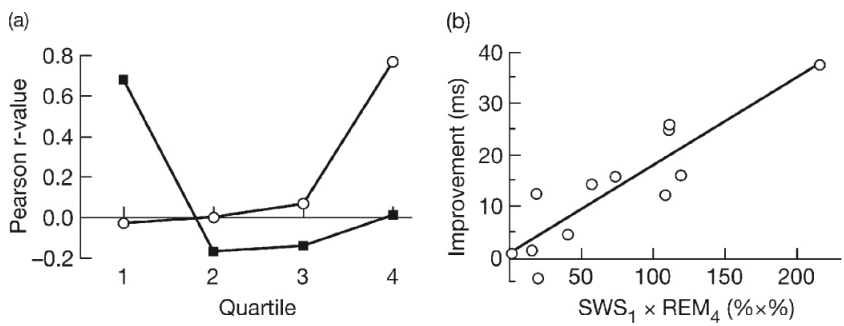

图10　视觉分辨任务学习。（a）夜间慢波睡眠（SWS）和快动眼睡眠（REM）与学习的相关度。对夜间的每四分之一时段计算SWS的百分比和次日改善度（实心方块）及REM的百分比和次日改善度（空心圆圈）的直线相关系数。（b）记忆巩固的二阶段模型。改善度作为夜间前四分之一的SWS量和后四分之一的REM量乘积的函数被绘制成图。两种睡眠的量都以其占夜间总时长的百分数表示。图示的强相关表明一个两阶段巩固过程即一个早期的SWS依赖过程和一个晚期的REM依赖过程的存在。

这一结果由于下述原因而显得颇为重要：一、它很有说服力；二、它具有高度的可重复性；三、由于它是完全无意识的，所以无法伪装；四、学习可能发生在大脑的某一特定的、可界定的区域即初级视皮质，这使得该实验性理论适于应用成像技术来研究。不幸的是大鼠无法学习这样的任务，所以我们还不能轻而易举地揭示睡眠促进作用的细胞神经生物学基础。至于猫就更不能指望了。

梦是由消化不良引起的吗？

当然不是。19世纪的科学家们最早提出梦的“消化不良”论，否则他们就无法解释睡眠时的大脑激活。他们认为这样的激活一定来自外界刺激。当然，如果某人感觉胃痛或暴饮暴食一顿，食物的消化过程及其导致的化学紊乱很有可能导致觉醒，而这些觉醒可能与梦的回忆相关。当人在这种胃肠大脑激活的状态下入睡时，思想内容与饮食不当相关并非不可能，这或许会使人们误以为梦一般是由外界刺激造成的。

事实上，白天经历的外界事情对梦的发生影响很小。弗洛伊德认为梦是由近期记忆诱发的，但我们发现进入梦境的近期记忆极少，传记性事件情景记忆的某些片断可能会掺杂其中，但类似的完整回忆从未发生过，实际上近期记忆只有部分片断进入梦境的构建，与来自远期记忆的其他材料一起成为大脑激活进程中随机涂鸦的情节的一部分。

做梦本身和学习的关系

那些从未掌握卡尔尼 - 萨吉任务的人不会以任何与其能力相关的方式梦到自己正在做这个测试。是不是有些清醒时的学习体验如此深刻，以至于在酣睡者的精神状态或想法中能明显窥见其踪迹？我们在

前面曾经提到一些滑雪者和水手的报告，他们注意到在入睡时会再次出现滑雪或航行运动的幻觉，我们还知道入睡时的精神体验也与梦类似。

所以，想知道学习对精神内容的影响就得接受入睡时做梦这一事实，如欣然接受这一大自然馈赠的礼物，就能从中学习，就像我们最近在研究初学者学习视频游戏“俄罗斯方块”和“动感滑雪”时所发现的那样。

学习玩这些流行游戏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会报告在刚入睡时有插入性的游戏画面，亦即在睡眠时他们仍然有习得的陈述性记忆或情景记忆。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大脑为自己的经历制作了一个可恢复的记录，并将其保存于记忆中，稍后在转入睡眠这一状态时进行回放。这给我们追踪睡眠过程中大脑在清醒状态时的体验提供了绝佳的观察点和标识物。

幸运的是，人们为这一现象找到了一个动物模型。当大鼠学习走迷宫时，在其大脑的海马区经常能发现成对神经元随学习而增加的相关放电，似乎神经元在制造一条物理链接来代表老鼠的方位地图。这种交叉联系在入睡时再现，仿佛老鼠的大脑和那些玩“俄罗斯方块”或“动感滑雪”的人一样，在睡眠时会重复白天经历的大脑编码。该现象的细胞分子机制目前已能被研究。

现在我们可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睡眠时的大脑激活，它的确能反映以往的经历，至少有些时候能。你会说：“当然能了，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你怎么能肯定呢？你又怎能在没有任何标识的情况下准确判断大脑如何处理白天的体验？现在有了标识物，我们就更有理由提出下述问题：

1．既然来自意识清醒和联想的陈述性记忆如此强烈地依赖于海马结构的完整性，那么是否可以认为白天的经历被暂时储存在海马中等待进一步处理呢？

2．在快动眼睡眠中大脑被再激活时，陈述性记忆的片断而非全部情节是否会从海马中输出？

在等待一个更加系统化的答案前，先来看看下面这个有关直升机

的梦，它展现了我将要阐述的关于记忆的许多观点。

1977年7月14日　直升机　第3号梦例

有一天我带着克里斯去比萨，我们在市郊看到了两架直升机。当天晚上，我梦见两架直升机向反方向飞去，然后它们似乎停在了我位于佛蒙特州的牧场上（前一天，克里斯曾说过，飞机有时降落在阿尔卑斯山的高峰上，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当其中一架飞机接近凹凸不平的地面时，我注意到飞行员是罗杰·霍恩（Roger　Horn）（梦工厂的展览设计者）！我以梦特有的无声方式大声呼喊，提醒他小心。突然，不等我明白过来，直升机就变成了拖拉机，而且是那种有着巨大轮子的农用拖拉机，它在撞上地面时突然散开了，一个巨大的轮子失控般向山坡下滚去，而拖拉机的剩余部分则转向左边，罗杰在后面奔跑着追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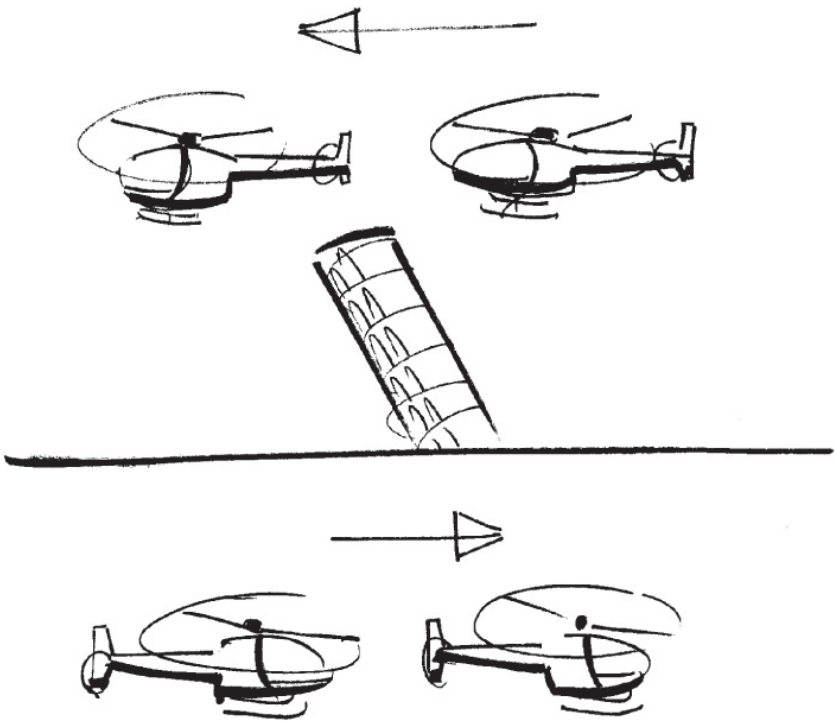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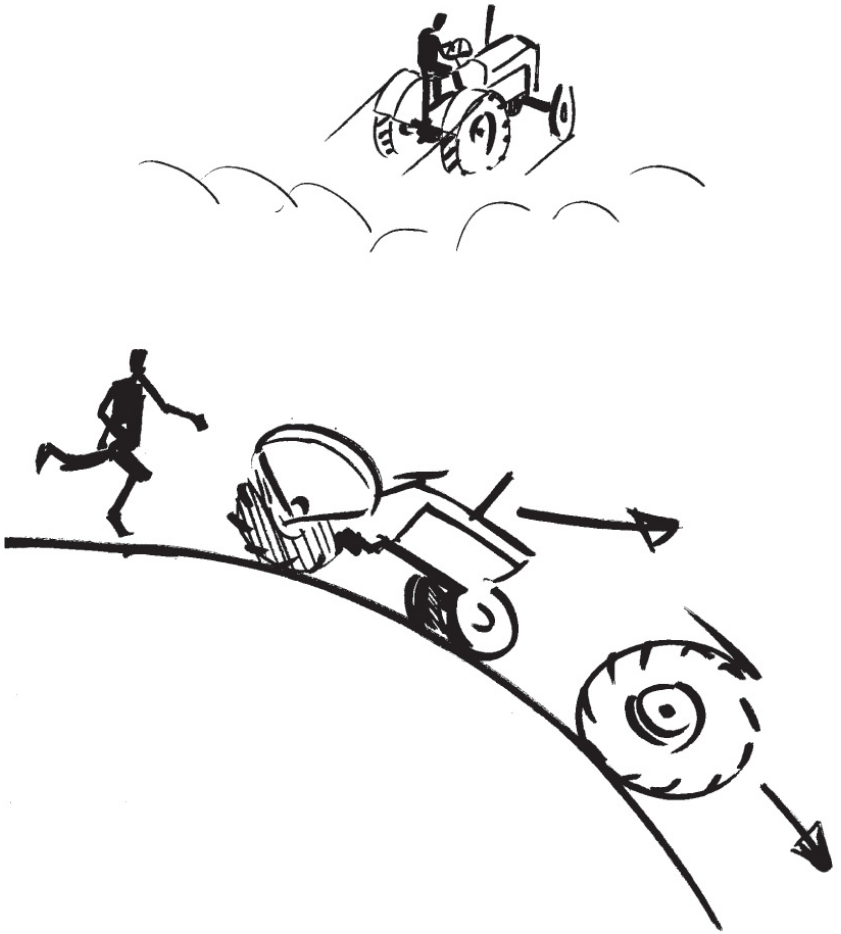

这个梦就像卓别林的电影一样，充满了喜剧性突变同时又有些吓人。罗杰现在和拖拉机分开了，眼看他径直冲向一堵墙，然后脑袋砰的一声撞在墙上，头晕眼花，连续后退了几步。

根据实验数据和类似的梦例，我们现在能够建立一个新的超越所有现行技术分析方法的睡眠学习和梦的记忆模型。在给出的梦例中，除了观察直升机诱发与危险相关的情感显露（或重要性），还有另外两个危险因素：佛蒙特州的拖拉机驾驶以及我那脆弱的朋友罗杰。这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大脑对信息的储存不同于磁带记录仪、缩微胶卷生成系统，甚至是内容寻址存储器，也就是说，它并不只是简单地

提取体验，然后将其存放在某个大脑深处以备将来参考之用。

相反，大脑只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清晰地保留体验记录，可能就在海马区及直接相关的皮质结构。在大约一周的时间内，人们在白天可以提取这段记录而在夜间则不能。这一模型可以解释为何我从来不曾梦到当天的经历而在次日却很容易就想起来。大脑利用睡眠以一种兼顾效能和效率的方式对其学习和记忆的长期组分进行一点一滴的调整。

先说效率。假如大脑如弗洛伊德及其众多追随者们所说对每件事情都保留了详细记录，那任何事情都不会被遗忘。这种说法要成立，大脑根本缺乏足够的存储空间，所有证据都不支持，而它本身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一些现象，例如信息检索如何进行？我需要一个事实上无限大的查询系统，而这将耗费大量时间和空间，这从生理学角度来讲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记忆经过大脑的再加工，变成一系列更具普遍性的思维定式，从而在特定条件刺激下以特定方式去行动和感受。

就效能而言，这是程序性记忆的模型，但其涉及的不止感觉运动一个方面，它还包括本能优先及情感显露的考虑，从而成为弗洛伊德式潜意识的拓宽型，且更易接受。我的潜意识进程不再是一口沸腾着恐惧欲望的大锅，而是拥有丰富的资源并能随时作出反应，我在做大多数事情时都是不假思索的，它就那样自然而然、适度而合时宜地发生了。我的情感大脑“知道”直升机、佛蒙特州的拖拉机和紧张的展览设计者有某些共同之处。

但我确实 也需要一个有意识的陈述性记忆系统，它必须充足、精确、可以更新，尤其是要与定向事宜相关。

·我是谁？我生命中的关键人物是谁？

·我在哪？我怎么能找到通往那些对我至关重要的地方的路？

·这个或那个显著的事件是何时发生的？

·我当前的任务是什么？未来的目标又是什么？

这些是我思想的意识部分，尽管我希望它能像潜意识那样工作，我还是愿意且能够承受约束，并精心制作一些小道具和通过一些小技巧来使之发挥作用，例如：我用日记及时记录自己的经历；我用地址

簿来保存一些关键人物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以与其保持联系；我用日程表对未来进行计划。我根本无法把所有的事情都记住，但只要我运用这些记忆工具，也就不想也毋需把所有的事情都记住。

我的梦揭示了睡眠状态下的程序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系统是如何交错又相互影响的，它们总是很重视行为中的共性部分而对方位细节则不那么在意，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亦即它们为获取历史的准确性而牺牲了整体的情感关联度。换句话说，我的梦显示在其程序组分中展现出来的日间经历是多么少，而情感显露又是多么多。毕竟，大多数的细节都是繁冗的。我已经知道我是谁，我的关键人物是谁，我在哪里居住和工作，我做过什么，正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这就够了！

第十章

梦的意识

弗洛伊德释梦理论的重点在于潜意识，这一精神力量在其理论中被看作一种具有持续威胁性、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不为社会心理所接受的欲望集合体。把这一观点倒过来想，将潜意识主要视为盟友和通往生存和衍生合理社交行为的向导时，我们在重新定义潜意识，这种新的定义方式要求人们以全新的眼光审视一般的意识和特殊的梦意识。近十年来，人们对意识的大脑基础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本章旨在描述现代睡眠科学对此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以及这种理解是如何让我们把梦的模型转向意识状态改变——这一自20世纪60年代的迷幻时代起就已为人们所认识和赞美的改变。

在开始阐述这两个主题之前，我们需要以一种与梦的形式分析理念及其相应大脑机制的认知神经科学方法相匹配的方式来定义意识。

意识可被简单而无可争辩地定义为人们对外部世界、自己身体和自我的察觉。最后一个特性即对自身的察觉，包括对察觉的察觉，即知道自己是有意识的。

意识是大脑功能的一种，兼具整体性和局部性，糅合大脑-精神诸多不同方面的整体状态就是正常的意识。其中某些方面见表4（生理构造见图11）。

表4　负责处理意识不同组分的大脑区域

意识组分	大脑区域
1. 感觉	外周感觉器官
2. 知觉	皮质和皮质下加工
3. 注意力	丘脑皮质
4. 情感	边缘皮质下（杏仁核）
5. 本能	边缘皮质下（下丘脑）
6. 思维	额叶皮质
7. 定向	顶叶、额叶皮质
8. 叙述	左颞叶皮质
9. 意志	前额叶皮质
10. 动作	脊髓、肌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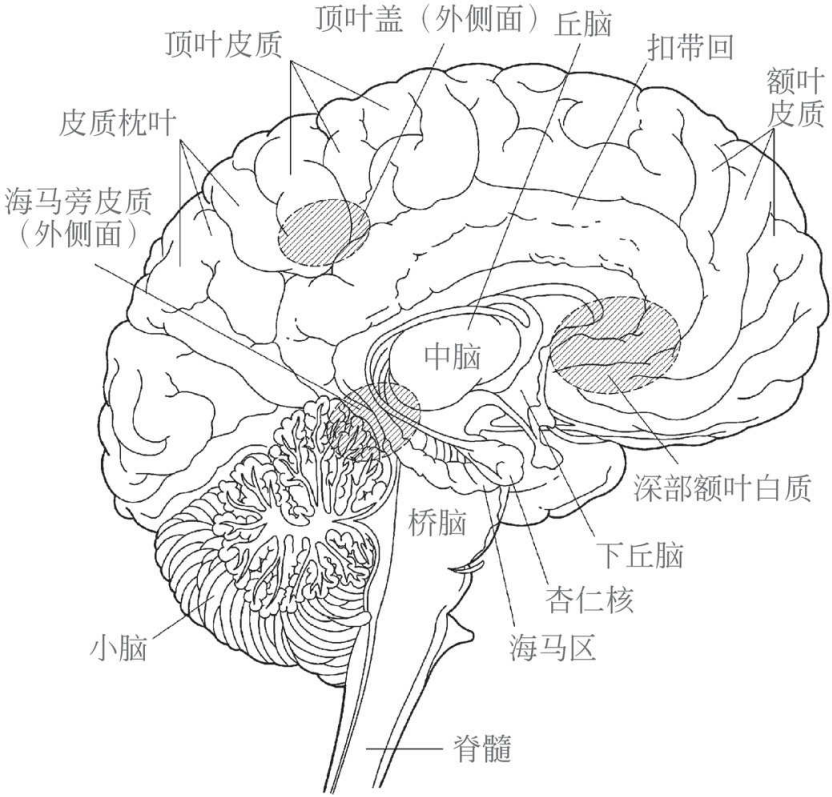

图11　人脑构造图

表4暗含两个重要模型。其一是反射学家们钟情的循序处理模型，该模型认为所有神经信息包括意识的处理加工都是自外向内、自下而上的；在终端经过整合后，再向下向外传递。其二是模块理念，认同此理念的多为想要评估精神状态的神经科学家或是希望理解精神特定部分的认知神经学家，抑或是那些既与神经科医生有共同临床目标又采纳科学家生理研究方法的梦形式分析学家。

意识的完整性怎能如此轻易实现，这是所有面对这样一系列模块或循序处理过程的人需要理解的核心问题。人们随时随地会接触到许多信息来源，但意识体验却能令人感觉如此天衣无缝、一气呵成而又集中专一。这一困惑被称为整合问题，学者们一直试图用各种方式来破解这个谜团。“整合”在这里是指把分散的部分连接成无瑕的整体。

初次接触这一概念的人可以从构成认知的五种感觉入手来考虑。多数科学家认为，不同大脑区域为意识提供信息，它们之间的同步性是通过彼此间众多相连部分节奏一致的激活来实现的。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意识体验的整体性，尽管它并未提及那些体验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或怎样能像做梦或服用某些药物后经常发生的那样去改变其完整性。

这些正常而人为的意识改变需要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整合机制，借此以化学方式将掌控不同意识组分的各个大脑部分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样的化学统一是在脑干中化学编码神经元（神经调制）的影响下完成的。睡眠科学已经表明，当我们的意识状态由清醒转为做梦时，神经调制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胺能-胆碱能交互作用的模型为理解日常生活中正常体验的意识转换提供了基础，不过它同样有助于理解那些药物诱导的或在精神疾病中意外出现的意识改变。

同步性介导的整合可在几毫秒到几秒的时间内发生，而由化学调节介导的整合需要数分钟到数小时。两者我们都需要，并且我们必须充分加以利用直到我们了解所有问题的根源。首先，脑细胞的同步化学协调性激活如何引发意识体验？其次，神经系统如何参与主观体验，即哲学家所谓的“感质”和戴维·查默斯（David Chalmers）所谓的“意识难题”。查默斯宣称，神经科学还不曾，或许永远都不会解决这一难题。如果你喜欢神秘并想要避开神经科学可能的影响，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出路。神经科学家们不再比那些挥挥手说“奇迹就这样发生了”的人更可信。大脑是神经元的集合体，它思 故它在 。

感质和意识难题：身心合一

我本人坚信，即便是意识难题、感质问题和身心问题都能够被有效解决，只要我们知悉世界是经由两个截然相反的过程在大脑中展现出来的。一个是自我组织的因果机制，它与高度的自我决定性一起与生俱来，由基因决定；另一个是我们的历世体验，它使我们体验的象

征性表达进入神经环路，通过行为后天获得。

这两个过程无论源于先天还是后天获得，都有大脑特殊激活程序的例证。如此看来，清醒和做梦互为镜像，其交互作用贯穿我们一生，先创造意识，然后根据生活中不同的调适目的为其提供相应的信息。

你可能会觉得我们仍然不足以解释察觉或“察觉的察觉”的机制。让我们一起想想我们如何看，然后如何发现我们在看。就（自动的）反射视觉来说，眼睛以视网膜（内层）放电模式编码不同角度的光线，这些信号被传送至大脑，在那里被整合为对外部世界完全抽象但又高度特异、富有意义的描绘（以图像形式呈现）。我认为目前为止尚无人对这个模型提出质疑。如果你确实接受这个模型，那么精神-大脑问题就得到了有效解决。视觉世界不过是一系列神经元激活模式所展现的图像，描绘这一图像（察觉）只需一步，而描述察觉（亦即对察觉的察觉）则只需更进一步，直至我们完全清醒，每一步都涉及神经元的激活模式。

梦意识

梦意识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毫无疑问，即使没有任何即时的外界输入或输出，大脑仍然能够产生异常丰富的意识状态。我们还知道，梦意识状态无疑取决于睡眠时的大脑激活，而激活（包括其高频同步性和化学性神经调制）最佳的提供者是快动眼睡眠，这是一种存在于清醒前且为清醒始终依赖的大脑状态。当然反过来说也是对的，至少就梦的内容而言是如此。我们需要清醒时的意识体验以便在梦里依葫芦画瓢，我们需要语言来使梦意识具有可叙述性，使梦的报告成为可能。

那么梦的形式方面又如何呢？难道我们现在还无权断言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吗？当我们还呆在子宫里时梦就已经存在于大脑之中了？在生命早期就已经行使功能，给我们提供组织结构基础，以发展出完全

的意识？是否至少说明某些意识组分可能在其他组分出现前就已存在？鲁道夫·利纳斯一路追踪感质到单个神经元，我沿袭他的观点提出，大脑的感觉运动自我激活可能是感质概念的前身。请仔细阅读下述报告并特别留意其中的动作成分。

桥　第7-8号梦例/1977年

昨晚，一个恐怖的桥之梦：伊恩、克里斯和我坐在一辆旅行汽车里沿着桥拱上行。我们飞了起来，降落在一截栏杆上，摇摇晃晃的，但肯定不会掉下去。我下车寻求帮助，这意味着我必须跳下栏杆去，下落40英尺后掉进水里，在水中继续下沉约20英尺，才触到底。然后我像子弹一样射出水面，并试图爬上桥拱，回到车里。但这是一条单行道。路边有个男人很轻松地把车举了起来。

受利纳斯大胆理论的启发，我们先来考虑这类梦衍生的两个相关问题，一是不间断的运动感，二是“我”是否是运动的主体。我从梦中的桥上跳下去；我下落40英尺后掉进水里；我“像子弹一样”射出水面。这样的梦动作完全是不现实的，它是虚幻的。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其实纹丝不动，但却坚信自己正在这么做。这意味着当利纳斯宣称在早期基本水平上自我感深藏于神经元群激发动作模式的能量中时，他一定相当兴奋。尽管这不能完全解释自我感如何出现，但它对解决另一个棘手的难题大有裨益，即如果“我”不是运动的主体，那么谁是，或什么是？环境？感觉？反射？那样想根本不合情理，除非你懒到认为这一切是上帝所为。

有一个定向标志在梦里永远不会消失，那就是自我，梦中的“我”，游泳、飞行、逃跑、做爱、害怕和战斗的我。确实，有些梦者把自己看作梦的表演者而不是动作的核心，但自我是永远在那里的。它是概念的构成物，是意识的组织单位。我梦故我在。

清醒梦是什么？

在大多数梦里，我们坚信自己是清醒的，但有时梦事件如此难以

置信，以至于我们开始疑窦丛生。这一疑惑感逐渐增加，最终使我们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做梦。因此，清醒梦是指在梦里重新获得清醒意识的一个经常被丢失的重要方面——对自己所处状态的准确认识。清醒时我们知道自己是清醒的，并很容易加以验证。我们能随意做出动作；我们能控制自己的思维；如果对此有疑问的话，还可以掐自己一把，看看自己对事物的感受能力和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如何。在梦里，我们常常丧失自省意识，不知道自己所处的状态，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不能作出评判。

某些人在梦里能自发地意识到自己在做梦，这通常出现在8岁以上的儿童中，并且持续到青春期，再往后就很难指望睡梦中自省意识自发出现。但清醒仍然可以任何人都能习得的方式被诱导。我曾在床边放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来记录梦体验，然后在入睡之前，我告诉自己：作为一个正常人，今晚我有可能做上两个小时绝对精彩的梦。为了抓取到一些细节，当某些怪诞的事情出现时我要特别留意。我告诉自己注意那些在清醒时绝不会出现而在梦里经常会出现的事情，即时间、地点、人物（尤其是异常出现的身份不明的人，或是先像某个人然后突然又变为另一个人，等等）的改变。这种定向功能如时间、地点、人物的变移性将告诉我自己在做梦。

当我成功时，部分大脑 - 精神被唤醒，我注意到自己在做梦并告诉自己。这样之后，我出现一种分裂状态：我的部分大脑处于清醒状态，而另一部分则在梦的状态中。这样就好玩了。我可以观察梦，可以诱导觉醒以增加梦的回忆率。最棒的是我可以对梦的内容施加影响。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几乎是随心所欲。我可以想当然地飞翔，与我所选择的梦中人物有各种各样的亲密关系。达到清醒梦的状态通常足以让人们感到万分自豪且欣喜不已。

梦如何改变意识？

表5可用来轻松地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表5是一系列已知事实的总结，不过很重要的一点要明确，你仔细阅读这些事实，这是我们转向梦的解析前你反驳或拒绝形式分析方法的最后一个机会。问问你自己，表中这些对你的梦是否适用。

表5　梦中的意识改变

意识组分	与清醒相比发生的变化
1. 感觉	几乎完全是内源性激发
2. 知觉	几乎完全是内源性激发
3. 注意力	被梦事件占据，难以支配
4. 情感	夸张的喜悦、愤怒和焦虑
5. 本能	常见斗争并逃跑
6. 思维	非逻辑性的，不受控制的
7. 定向	时间、地点、人物（除自己外）严重缺乏
8. 叙述	高度交谈性
9. 意志	弱
10. 动作	虚拟的持续的活跃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对照表5中的大脑功能和表4中列举的大脑区域来说明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一劳永逸地从抛掉反射模型开始。第一项（感觉）和最后一项（动作）都是完全内生的，其原因有二：一是输入-输出的大门被主动抑制所关闭；二是大脑皮质和皮质下感觉运动的中枢表现是自我激活的。

由于认知依赖于感觉而随意运动依赖于肌张力，故知觉（表5第2项）和意志（表5第9项）的改变是继发的。在外部感觉缺失的情况下，知觉来自皮质及相应皮质下大脑区域多形感觉区的自我激活。唤起形式视觉如房屋或人脸的图像是复杂广阔的皮质区的义务，其中某些与皮质下系统如边缘叶有关。所以至少我们可以开始想象大脑是如何通过快动眼睡眠的自我激活变戏法般地制造出梦的图像。我们推测动作指令可能同样因工作记忆的弱化而受到抑制，具体过程将在后文进一步详述。这样我们就简要地解释了上表10项中的4项。

注意力需要进行特别说明。梦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不断将其保持下去。人们往往对梦事件的急转直下如此震惊，以至于难以像在清醒状态下那样给予其应有的关注。我们认为这种注意力缺失部分是寄生性知觉对象自发出现的后果，但也有可能源于限制运动和思考能力的随意运动控制能力的缺失。我们沉浸于自己的认知产物中，这还包括无论喜欢与否都在快速更替中运行的感觉运动程序组分。于是我们推测梦意识中注意力减弱还有两个原因：一是胺能系统对感觉运动程序去抑制的后果；另一个则是前额叶大脑的局部失活。

在快动眼睡眠期，情感和本能（原始行为）都因边缘系统的激活而增强。快动眼睡眠时大脑特定区域，即颞叶的杏仁核和前脑基底区的白质均开通，这是迄今为止进行的所有脑成像研究的一致发现。此即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现代神经科学对其激活的证实使我们得以肯定地将本能和情感纳入梦境情节的主要策划者范畴之内。我们甚至可以认同梦意识将其通常最原始的特征归因于那些在清醒时将其抑制的大脑程序的“释放”。如此看来，自我/超我相当于前额叶背外侧皮质，它构成那个在清醒时决定是否创立真实生活情节并最终激发本能行为的“我”。在梦意识中，“我”在睡觉（如弗洛伊德所言）。如此一来，表4和表5的第4项和第5项现在就能从神经生物学角度来理解了。

思维（第6项）和定向（第7项）都因胺能系统的失活和大脑整体和局部记忆系统的区域性失活而受损。我们想详细了解为何陈述性记忆（据推测其先储存在海马，然后输送到皮质）在梦境意识中几乎完全失效。显然，所有依赖于记忆的认知功能（情感显露可能除外）在

快动眼睡眠中都被削弱，因此梦意识对其内容的分析和组织都很糟糕。主宰梦意识的规则是超联想和情感显露，而非线形逻辑性的、特异的、准确的历史细节。

将所有这些分散的元素汇总成一个可信的梦情节是执行官“我”接下来的工作。此刻我们如履薄冰，因为不知道梦情节究竟是如何组成的，就像我们不知道清醒时的观点是如何产生的一样。我们强调叙述是因为我们所获得的梦例报告看起来像故事。这很危险，因为这些报告必须在清醒时才能提供且完全依赖于语言，而梦本身的经历过程则更像是一场电影。它们是多媒体事件，包括很多即使是在最尖端的高科技电影里也难以创造的虚拟动作。只有主体自身动作可影响认知的虚拟现实才与梦意识接近。因此我们审慎地采用“叙述”一词表示梦体验的连贯性，考虑到快动眼睡眠梦的明显混沌，这种连贯性显得尤为引人注目。

即使没有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帮助进行化学整合，甚至没有前额叶背外侧皮质对思维和动作实施控制和集中，我们在做梦时的体验仍然是完整、真实且有说服力的。再一次强调，如下观点难以质疑，即意识的基本真实感包括并强烈地依赖于人类大脑创造虚拟现实的能力，它所有的形式细节都与清醒意识的各方面如此接近，以至于几乎每次都能让我们产生错觉。

第十一章
梦的解析

随着本书内容的展开，我先打倒弗洛伊德再把他扶起，拂去其身上的尘埃将其重新扶上神坛，但那并非我期望自己的梦理论所处的位置。我们现在该如何总结现代神经科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观点的异同呢？我的同事鲍勃·斯迪科高德说得好：“弗洛伊德50%是对的，100%是错的。”在最后一章我们将解开这个矛盾，希望能让读者明白思辨哲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让大家看到只有实验性脑科学有望纠正仅凭直觉产生的自我印象。

为什么弗洛伊德50%是正确的？

言规正传，弗洛伊德的正确之处在哪里？他对梦的讨论正确地强调了其原始情感特征。梦确实源于睡眠时大脑原始驱动机制的释放，而这些原始驱动机制确实包括性欲、攻击和逃避的本能，也包括伴随趋向行为的情感如喜悦、高兴、快乐、爱，伴随回避行为的情感如害怕、焦虑、恐惧，以及伴随一决雌雄的对抗行为的情感如战斗、攻击、射击。弗洛伊德称之为“初级进程”以区别于清醒意识更加平淡、文明且合理的次级进程。

然而，事实上梦的性成分远比弗洛伊德设想的要少，由于他过分强调欲望满足对梦的影响，梦中众多的负性情感反而让他感到措手不及。

关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梦起源问题暂且先讨论到这里。那么其理论中梦情节建构部分是否有正确之处呢？情感显露和超联想活动似乎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肯定的回答。换言之，我们认为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对的，梦部分由本能力量即与思想内容松散相连的情感所驱动。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成果当数其对情感重要性的强调，而这些情感常被推理心理学和哲学贬为次要角色。梦确实有力地提醒了人们：我们拥有非常强大的本能和情感，甚至还有在清醒时必须被制止的发疯倾向。

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的正确之处还在于，他坚持认为来自本能或情感大脑即现在所谓大脑边缘系统的清醒意识多到超出我们的想象。此外，通过注意梦，或许把梦当作一连串联想思维的起点追踪其到本能中想象的源头，我们可以期待更多地了解自身，之所以说“或许”是因为这一推论尚未被证实。即使是在精神分析实践百年之后，我们依然没有实证显示梦内容能像清醒幻想甚至是中性词表刺激那样有激发一连串相关情感显露的力量。确实就像我坚持的那样，当涉及到联想思维时情感显露几乎成为必然。

为什么弗洛伊德100%是错误的？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模型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性行为，他认为潜意识极具诱惑力，但虚伪、不诚实。在梦里，潜意识愿望总想击败意识，就像清醒时表里不一的性行为旨在敷衍社会习俗。基于此，弗洛伊德梦理论采用了伪装和监察这一有着致命缺陷的假说作为梦怪诞性的基础。梦的原始驱动必须被改头换面成无明显意义的怪诞梦境。精神分析梦理论的核心是，只有被记住的梦内容是显性的，其中隐藏着沉睡的本能，此外除去对本能和情感的强调就别无其他了。如果像我们推测的那样，梦彰显情感和本能而非将它们隐藏，那么伪装-监察理论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误导性的，事实上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没有了伪装-监察，精神分析学说建立的梦的解析理论还剩下什么呢？如果诱导梦的本能没有被伪装和监察，而是直接进入梦境，那么显梦就是梦！！！如此一来，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记录并“仔细”阅读自己的梦。说到“仔细”，我的意思是要注意联想，这些联想可能遥远而含糊，但对建立一个符合现实的自我观意义重大。如此看来，所谓隐梦不过是与梦内容各方面相关的大量联想。无论我们是否将其当作梦的启动者或正因为它们是直接、无伪装的情感显露而将其当作梦建构的元素，作为一种更好地了解那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思想成分的方式，研究这些依然是很有用处的。

男性和女性的梦有差别吗？

当我们对一些男女大学生进行梦中情感调查时，结果让我们十分惊讶。我们本来满心期望这两组人的情感表现会像清醒时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不同。我们预期男性的梦会更具侵略性、更暴力，而女性的梦则更有归属感、更温柔，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对我们的受试者来说不是。男性和女性在梦中的情感表现惊人地相似。男性和女性在梦中出现视觉图像和怪诞梦境的倾向几乎没有差异，最让人震惊的是，情感的出现频率和强度也几乎没有差别。这些告诉我们：梦的情感强度是既定的、以大脑为基础的现象，男性和女性均会经历到。

通过其生活规律和社会交往，男性和女性在清醒时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控制自己的情感能量。女性通常更关心抚养保护孩子，而男性则更关心挣钱以及与同类竞争。由于性别差异，男女的行为发生了我们所说的改变。但男女梦中的情感表现显然变化不大，情感显露对两性来讲同等重要。

尽管男性和女性会体验到相同的梦中情感，但与其相关的内容却有着高度个体化的差异。正是把握了“各人有各自的梦”这一精髓，梦的解析才能依旧在个体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方面占据一席之地，这极有可能是精神动力心理治疗所一直经历着的状况。

看看我下面的报告，它既与第四章的生理学讨论相关，也涉及到这里提到的个体意义问题。我想我是这世上唯一会做这种梦的人。

1980年3月12日　向朱维特致敬　第12号梦例

我到达一个会场（可能是1969年在新墨西哥举办的亚太睡眠学会会议），正跟同事打招呼时突然注意到朱维特也在那里。他认出了我并豪放地大笑（他平常不这么打招呼）。我正要叫他，突然两腿发软瘫倒在地，口不能言，完全不知所措。

紧跟这段报告，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如下评论：

·软弱无力的腿：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法语说法是在维勒弗朗什的艺术酒店举办的一场浪漫聚会上，在那里需要谨言慎行。当我回到实验室时，朱维特说我看上去像les jambs coupées——纵欲过度的一种表达方法。对朱维特我借口说自己离开实验室是去见大学中心实验室的老朋友D.B.。我曾告诉朱维特D.B.非常迷恋J.S.，有许多笑话是关于D.B.同性恋情结的。其实艺术酒店的那个聚会上没有任何与同性恋有关的事情，但朱维特可能感觉到了那种气息。

·朱维特的笑：在经历长达将近十年个人和职业竞争的紧张之后，气氛终于开始出现缓和。请注意1963—1964期间我在里昂工作，而这个梦发生于1980年。如果说日本是破冰器（1979），那么墨西哥（1980）就是破冰的钳子。朱维特与一个既是朋友又是竞争者的墨西哥人埃尔南德斯 - 佩翁（Hernandez-Peon）之间的决裂发生于1962年的里昂，当时我正在那里工作。今天，我收到了朱维特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信虽正式但很热情。

·肌无力：朱维特的重大发现即快动眼睡眠相关的肌张力低下表现为我梦中的猝倒。这就像现实生活中的发作性睡病那样，强烈的情感尤其是惊讶会导致脱力。可能我现在就是用行动来认识朱维特的巨大成就。

这些解释可靠吗？我如何知道？当然，我与精神分析患者一样觉得这些解释“听起来像是真的”，但这正是为阿道夫·格伦鲍姆（Adolf Grunbaum）成功推翻的“计数议论”。确实这些联想对我来说有丰富的意义，它们拥有强烈的情感显露，但这并不能赋予其可靠性并证明它们是梦的激发者，或准确解释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梦，也无法证明这就是该梦真正的 意义所在！

科学需要预见

正如道格拉斯·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在其杰作《哥德

尔、艾舍尔、巴赫》中指出的，梦内容分析学说的失败之处在于不能预测。它就连简单的的回顾性分析都难以完成。以回顾的视角看来，一切似乎变得清晰且有说服力，我梦见朱维特是因为我刚看见过他。好吧，有证据表明先前经历的事件可能形成梦境的晶核，其后梦的故事围绕这一点铺开。并且我确信自己很在乎他对我的感受，也非常了解他的重要发现。如此一来，该“解析”（我更喜欢称之为讨论）就不能作为弗洛伊德所谓的“伪装-监察”的明证，因为我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该梦境描绘的所有导致焦虑的矛盾与冲突。

我能否预测这个或其他任一我曾经做过的梦？如果确实有规则在控制每个梦的情节，而我又确实了解这些规则的话，我应该有能力这么做。但我觉得我不能，你也不能。若你能在梦后指出原因，你对梦的解析就属于“以果为因谬误”，它破坏了你解析的逻辑性，对我而言也是如此！

以下两点申明有助于澄清我的观点，一是很多甚至是大部分的情感显露体验难以激发梦。尽管我们确实知之有限，但据我们了解，很多引人注目的人物、事件和冲动刺激从未在梦境中出现。

作为有志向的大学教师，我确实曾梦到过自己考试准备不充分、资历不足、幻灯片丢失、讲稿放错地方、迟到等，我以“安排不善”梦境予之以一个简洁的解释。

但我从来没有，真的从来没有 梦见过自己坐在办公桌前写论文，或是阅读一篇有关我经费申请书的评议，尽管这些潜在的梦刺激一直伴随着我。它们为何没有进入我的梦境呢？它们当然是情感显露的，它们关系到生存、攻击、防御，还有其他种种方面。换句话说，一个科学的梦理论必须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情感显露经历难以成为梦境刺激？相反，我会梦到另外一些即便出现过也相当罕见的相关问题。

另一项申明是人类会臆想出梦的因果关系，尽管它们不可能存在。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通过一种被称为“梦的剪接”的实验。这一实验设想首先由罗伯特·斯迪科高德提出，然后由我们实验室的研究小组付诸实施。我们选了10个梦例报告，在场景显著转换处把它们剪开，然后将得到的20个梦的片断拼接起来。我们将其重新汇

聚，有一半保持原样，而另一半是混杂的，杂合的两个部分来自不同的人不同的梦，这样杂合梦起始片断中的事件无论如何不会与后面片断的事件存在因果联系。

在实验开始之前，我坚信尽管穿越了不同的场景，自己依然能从梦的亚情节顺序上看出端倪。但很快，当我试图判断某个给出的报告是否剪接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判定，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即使是受过良好培训、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学家也无法通过这一包含场景转换的梦剪接测试。这样一个简单的实验带来了很多烦心的问题：

·我们为何如此肯定自己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历史了解这个人？

·我们为何如此肯定在假定因果连续性前提下，任何内容都是可读的？

这两种情况都是日常所见，每天都会发生，在其中我们都有与梦解析者相同的问题，必须将因果性叙述结构作为原因推演到每件事上。在自然中寻觅并找到因果联系一定是思维的一种。幸运的是因果联系经常是存在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能生存，为什么尽管人们为推演叙述性因果关系的错误倾向所累，科学仍能进步。但人们在判定因果关系时犯的错误不会比作出正确推断的次数少，人们有时能看到这一点，但大多数时候不能。

梦科学

科学方法旨在使人们免于犯上述推演性错误。科学实验是能阐明原因的实践活动，而最佳的实验既能展示真正的因果关系又能揭露虚假的因果关系。只要我们新的梦理论是对的，我们就能预言，既定的化学性和局部类型的大脑激活总会产生幻觉、超联想、超情感、错误的信念以及其他认知错误。现阶段梦的科学预测只能到此为止，但它足以让梦的形式心理学分析胜过内容分析。

人做梦并不是因为受未经伪装的潜意识愿望或冲动的激发，而是

因为大脑在睡眠时被激活，即使这激活会开启原始冲动。事实上，这些冲动不仅未被隐藏反而在梦里显露。决定梦意识特性的是激活过程的特异神经生理细节而非心理防御机制。

梦的解析超出了自己狭义的范围，我们一直在致力于进行某种形式的梦的解析。为何要这么做，为何要那么说？为何我拿起电话时会感到焦虑？为何我会生儿媳妇的气？梦的解析经验告诉我们假定因果关系是危险的，对上面这些问题的答案最好不要局限而狭窄，不要只分析梦的内容。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套真正普遍的规则，以帮助人们接受这一事实，即我们的梦、恐惧和愤怒实质上只是睡眠和清醒时大脑激活的表达，有其深刻而强烈的存在意义。在21世纪，脑科学研究将揭示更多的深层机制。

结论

如果问我如何理解梦的奥秘，简单回答就是已经不再存在什么奥秘，至少没有什么奥秘值得为之创造一个过去那样的神秘梦理论。当然，睡眠科学尚有很多未竟的工作，我们尚未弄清大脑-精神是如何在睡眠中重组自我，以及如何利用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功能。不过，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细节更有可能揭示睡眠中渐进的、适应性的信息处理过程，且可能性远远超出我们之前的想象。

我们立志建立梦科学来揭开梦的神秘面纱，我们要建立的梦科学具有坚实而广阔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最近发展起来的动态脑成像技术尤其是核磁共振成像让这一计划如虎添翼，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清醒、睡眠和做梦时的大脑局部活动。这是一场真正的复兴、一次真正的革命，将迎来大脑和精神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正如我努力想要指出的那样，没有什么比人类意识的 科学理论更重要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意识是一种大脑功 能，大脑状态决定人意识体验的种类，那么我们可以开始 在脑科学坚实而广阔的基础上构建意识状态决定的模型。 如此一来，梦的研究就可以被看作是将会动摇哲学、心理 学和精神病学根基的更宏伟目标的一个关键部分。

梦的研究必然要联系到睡眠科学，而睡眠科学又必然要联系到神经生物学，因此梦的研究必然要联系到神经生物学。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些联系有何了解？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下面这些重要结论来总结我们的成果。

第一个重要结论是：梦及意识其他状态都与大脑激活水平的变化相关。睡眠时大脑激活发生有条理的改变，该功能的峰值与梦高度相关，但即使是睡眠时大脑激活的波谷也远高于通过内省察觉到的彻底失活。换句话说，大脑的激活总是多于失活。即使意识完全消失，大脑仍能以相当复杂的方式运行。它在干什么呢？这一问题的重要答案是呈递信息、巩固修正记忆和学习新掌握的技术。这意味着约90%至100%清醒和睡眠时的意识只出现在大脑激活的上层水平。

第二个重要的结论是：大脑之门的开关不依赖激活，这里

的“门”指的不是预示梦应验与否的“牛角和象牙之门”，而是感觉输入和运动输出之门。大脑在睡眠中自我激活时将门关闭，所以外界信息难以进入大脑，而睡眠激活的大脑想将自己激发的运动行为付诸实践也同样困难，我们能有意识地体验到这种梦运动，但幸运的是它们不会表现为现实的运动。这意味着睡眠激活的梦中大脑脱离了正常有效的输入和输出，它一直都我行我素，这一次它忙着处理的正是我们在梦里意识到的感觉运动和情感资料。

最后或许是最重要的结论是：大脑不仅自我激活，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而且还彻底改变自身的化学环境，特别是清醒意识必需的两个化学系统在睡眠中大脑自我激活时被完全关闭。没有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梦中的大脑就无法执行诸如控制思维、参与问题的分析解决、记住自己的活动等功能。可能正是这一大脑化学系统的差异决定了清醒意识和梦意识之间的区别。

在20世纪后半叶各种发现出炉之前，上述结论没有一项是梦理论家们事先预料到的，但它们都深深影响了人们对意识体验的看法。没有这些知识的帮助，我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而拥有它们，我们就会对人类最有趣的特性——意识开始有所了解。

梦是黑白分明的还是色彩斑斓的？盲人在梦里能看见吗？梦为何如此怪诞？梦的目的何在？梦如何维系和拓展精神活动？人们在梦中肆意疯狂是不是为了避免同样的疯狂在清醒时上演？为什么说睡眠不仅有益健康，也是生命所必需？

本书对基础脑科学研究的发现、睡眠实验室研究以及睡眠和梦的近期临床研究作了简要的总结，并使用大量梦例来解释新的激活整合梦理论如何从生理学角度阐明梦的普遍形式特征，从而让读者在领略到现代睡眠科学迷人发现的同时获得机会去重新思索自己的梦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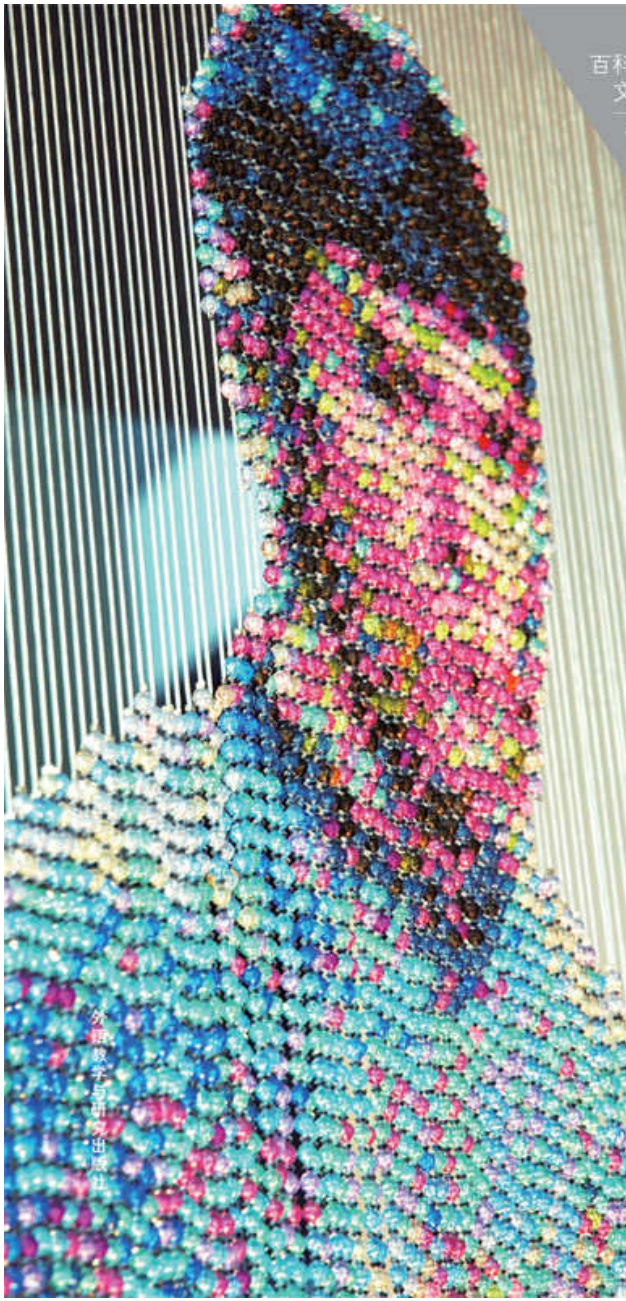

百科通识文库

49

情感密码

迪伦·埃文斯 著

石林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情感密码

迪伦·埃文斯 著

石林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56**

Emo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1.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1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Dylan Evans 20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感密码 / （英）埃文斯（Evans, D.）著；石林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09-7

Ⅰ．①情…　Ⅱ．①埃…　②石…　Ⅲ．①情感 - 通俗读物　Ⅳ．①B84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799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09-7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作者简介

迪伦·埃文斯，曾任英国巴斯大学进化机器人学研究员、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哲学研究员，现任教于西英格兰大学计算机、工程和数学科学学院。业余心理治疗师、电影制片人及舞厅DJ。曾出版《演化心理学导论》等著作，并经常为《卫报》撰稿。2001年被《星期日独立报》评为英国最佳新生代作家之一。

译者简介

石林，美国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心理学、健康心理学、心理健康与工作压力。译有心理学专著十余本。

目　录

图目
前言
第一章　共通的语言
第二章　为什么自然永远无法演化出斯波克
第三章　通向幸福的捷径
第四章　头脑和心灵
第五章　哭泣的电脑
后记　心自有其道理
资源材料
返回总目录

图目

图1　各种基本情绪的面部表情。取自P. 埃克曼和W. V. 弗里森《摘下面具：从面部表情辨认人的情绪》一书的插图3.2
图2　伦勃朗的两幅蚀刻自画像（创作于1630年）。两幅画分别表现了惊奇和愤怒／鄙视的表情
图3　一个新几内亚高地居民带有不同面部表情的4幅剧照（由保罗·埃克曼博士拍摄）
图4　弗兰克·迪克西爵士（1853-1928）的画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创作于1884年）
图5　伦纳德·尼莫在《星际旅行II：天汗的愤怒》中扮演的斯波克（1982）
图6　“你太情绪化了……”，杰基·弗莱明的卡通画
图7　扁桃形结构的高低路径
图8　暴怒的小猫，临阵以待。托马斯·威廉·伍德的木版画（创作于1855-1872年间）
图9　海马、扁桃形结构和周围的皮层区域的位置
图10　海恩斯·金（1831-1904）的画作《嫉妒和调情》
图11　英国国家彩票的海报，上有“可能就是你”几个大字和一只从天而降的大手
图12　头戴耳机、双眼紧闭的成年男子
图13　女祭司伊哈特在嗅荷花香，埃及浮雕（约创作于公元前2494-前2345）
图14　锐舞派对上舞动的人群
图15　克里斯琴森和洛夫特斯所做的实验中关键的第8张幻灯的三个版本
图16　麦凯和沃斯的实验结果图
图17　希特勒在1934年5月1日对200万人演讲

图18　电影《2001太空漫游》（1968）中一台名为哈尔的电脑
图19　“克斯梅特”，麻省理工学院研制的机器人，可以模仿各种“人类”情绪，此处是悲伤、幸福、惊奇的情绪
图20　美国Xybernaut公司推出的第四代移动助理，一种便携式声控电脑
图21　索尼公司制造的人工智能娱乐机器人
图22　哈里森·福特正在亲吻肖恩·扬，电影《银翼杀手》（1982）中的一幕

前言

如今，“感性”（sentiment）一词已遭遇冷落，很少有人用了，其相关词“感性的”（sentimental）也有着消极的含义。而两个半世纪以前，在启蒙运动的末期，情况则完全不同。那时，“感性”与今天的“情绪”（emotion）一词含义基本相同。

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对于情绪研究非常着迷。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都曾就感性和激情写过长篇大论。这些思想家们认为情感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斯密不仅发现了“沉闷科学”（经济学），还帮助创立了“感性科学”（情绪心理学）。在他的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中，斯密提出，如果社会是件衣服的话，情感就是将衣服缝在一起的线。与休谟和里德一样，斯密认为情绪与思想并非不可调和的敌人。对于所有这些思想家来说，情绪化是合理的，一门关于思想的科学如果不讨论心灵就是不完整的。

而浪漫主义者则反对这一观点，他们重新采用了以前的情绪观点，认为情绪与理智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人类面临着情绪和理智的矛盾抉择，智者选择跟随心灵而不是被理性牵着走。卢梭认为理性将人从无邪的“自然状态”引向了堕落。重返无邪意味着要倾听自己的感觉而不是诉诸逻辑。感性之谜要通过诗句来揭示，而不是由科学来破解。

我用了“感性”一词作为本书的副标题，以此来表示我对启蒙运动时期的情绪观的支持。与浪漫主义者不同，我认为情绪与理智在本质上并不矛盾，我们也不应该总是跟随心灵而不听从大脑指挥。相反，与亚当·斯密一样，我认为智慧的行动来自于感性和理性的和谐交融。没有情绪的生灵比人类还缺少理性，而非更加理性，但我也相信有时候倾听理性的声音要比跟随情感的指引更好一些。知道什么时候跟随情感，什么时候不要被情感支配，这就是一种被称作“情商”的宝贵天分。

在本书中我提出要回到情绪是理性的同盟、而不是敌人这一观点。与斯密和休谟一样，我认为对情绪的科学研究不仅可行，而且有

着巨大的价值。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情绪体验可以被提炼成枯燥的公式。然而对情绪分析得更清楚不一定就意味着无法获得更深刻的感受。我希望了解更多的情绪运作知识能有助于我们活得更丰富，而不是更贫乏。至少，了解科学在解释这些神秘现象方面的最新进展是非常有意思的。

科学界对情绪的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次复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情绪的研究仅局限于少数心理学家和更少的几位人类学家。而在21世纪初，情况有了很大转变。现在情绪是一个热点话题。人类学家开始质疑以前关于情绪体验的文化相对性的观点。认知心理学家也不再一味关注理性、感知和记忆，他们开始重新探索情感过程的重要性。神经科学家和人工智能的研究者也参加了讨论，为这张拼图又添加了几张图片。而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将其中的一些图片拼在一起。

显然，我不奢望这样一本小书能够覆盖一个复杂领域的方方面面。我必须将情绪研究中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放在一边。例如，本书不会讨论儿童的情绪发展，虽然这是一个迅速发展的领域。本书也没有提到有关情绪体验的个体差异的研究文献，虽然这方面的文献也越来越多。我所选择的话题反映了我个人的兴趣，以及我认为读者最感兴趣的题目。

本书从对不同文化中的各种情绪体验的讨论入手。每一种文化都有独特的情绪气氛，这些差异在人类学研究中都有文献证明，我会予以借鉴。然而，现在许多人类学家认为与情绪体验的共通性相比，世界上情绪体验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在第一章中，我提出情绪构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它像一根纽带，将人类联结成一个大家庭。与那些将我们分隔开来的文化差异相比，我们传承下来的情绪的共通性更为厚重。

这种共同的情绪来自于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都是1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平原上的几千个原始人的后代。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的许多情绪都已塑造成形。更多的情绪则可以追溯到更远，那时我们的祖先尚未进化为人类。第二章中，我探索了情绪的进化史，提出无论过

去还是现在，情绪都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情感不只是奢侈品，更不像柏拉图（Plato）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智行动的障碍。《星际旅行》的创作者认为瓦尔肯人——一种想象中的外星种族——由于缺乏情感而比人类更加智慧，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尽管《星际旅行》中有斯波克这个人，缺乏情感的智慧生命还是根本无法进化出来。

当然，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与祖先进化时的大不相同。特别是我们现在拥有许多祖先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激发幸福感的方法。在第三章中，我介绍了一些“情绪技术”，从心理治疗、艺术到药物和冥想，这些东西都许诺会让我们通过捷径获得幸福感。它们是否有用呢？自然选择留给我们的通往幸福的路是曲折的，企图绕过这条路就会有危险，我会在这一章进行讨论。

第四章解释了情绪如何影响“认知”能力，如记忆、注意、感知。情绪对这些能力的影响使得情绪技术颇受广告商和政客们的青睐。煽情提供了一种无需通过有力的论证和举例就可以改变人们思想的方式。该章的结尾讨论了各种说服他人的情感技术，如隐性广告。

在有关情绪话题的争论中，人工智能是最新加入的一门学科。20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科学家对制造有情感的机器越来越感兴趣，机器人制造者在这一方面已经有所进展。最后一章讨论了这些最新进展，并对今后将走向何方进行了一番推测。我们能够成功制造像人类一样有情感的机器人吗？这样的技术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我没试图对情绪问题作一定论，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建立一套完善的情绪理论。然而，对我来说，尝试建立这样一种理论本身就是一件趣味无穷的事情。希望你们通过阅读这本书能感受到我的热情。

迪伦·埃文斯

伦敦

2000年9月

第一章

共通的语言

15岁时，一些朋友邀我加入他们的朋克摇滚乐队。先前的主唱在排练时非常好，但是害怕上台，不能在公众面前表演。而我正好相反，我声音糟糕，但一点也不怕出丑，正是一个朋克摇滚歌手所需要的！

第一次排练后，我们坐在一起筹划我们的音乐生涯。就在那时蒂姆告诉我他非常高兴我参加了他们的乐队。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话在我身上引起的强烈反应。一股暖流从胃里升腾蔓延，很快温暖了我的整个胸膛。这是一种从未感受过的喜悦。它是一种接受感、一种从属感、一种被一群引以为豪的朋友所重视的感觉。我被那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所震惊，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自那以后的许多年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完全相同的感觉，我也从未忘记过这种体验。

体验过这种特殊情感的绝不只是我一人。数百万的足球迷和教徒们似乎每周末都有类似的体验，而英语中却没有恰当的词来表达。在刚才的描述中，我不得不用几个词："喜悦、接受感、从属感、被一群人所重视的感觉"。要形容这一情感，最恰当的莫过于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创造的"海潮般的感觉"（oceanic feeling）这一表达了。然而，即使是这一诗意的表达也要用两个词。如果我们只用一个词就能表达岂不是更简单？

在日本似乎就有这样的词。日文"甘え"（*amae*）一词指的就是"被他人完全接受的欣慰感"，也就是我对蒂姆那句话的感受。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则是用一个哺育婴儿的胸脯来表示，它指的是一种不离不弃的情感，是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中，母亲和孩子融为一体的感觉。

为什么在英文中没有"甘え"这样的词呢？不同语言用不同的方式塑造这个世界，反映了不同的文化需求。也许正是因为"甘え"所表达的情感与日本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一致，日本人才需要这个词。与崇尚独立、自我肯定和自治精神的英语世界不同，在日本，与其他人配合并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群体中更重要。"甘え"是一种帮助人们遵从这些价值观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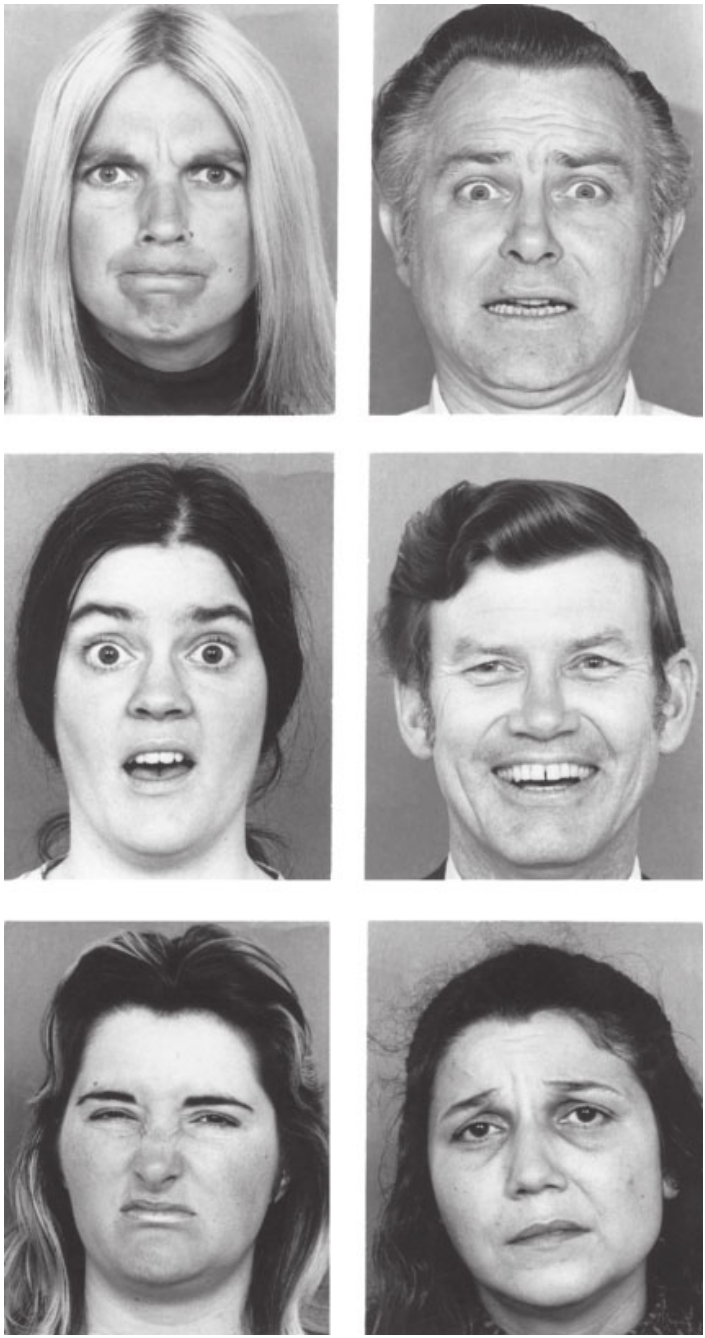

图1　一些表达不同情绪的美国人的照片。保罗·埃克曼在他的跨文化研究中使用

了这些照片。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英语和日语这两种语言 之间的这一差异，由此并不能看出英国人和日本人这两个民族 之间有什么根本不同。作为一个讲英语的人，我没有确切的词来描述我在蒂姆家里所经历的情感，但这并不妨碍我当时的感受。相反，那种情感毫无征兆地出现了，让我想方设法寻找描述它的词汇。多年以后，当我读到对“甘え”的一段描述时，我立刻意识到它指的就是那天傍晚我在蒂姆家时所感受到的情感。全世界的人都有这种情感，但只有某些人才有特定的词来形容它。

情绪文化论

前面所说的看起来都很明确。然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许多人类学家对上述观点不屑一顾，因为他们持有一种叫做情绪文化论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情绪是后天习得的行为，是通过文化传递的，与语言极其相似。正如你必须先听到英语才会说一样，你必须先看到其他人表现喜悦，你才会感到喜悦。除非生长在一个“甘え”经常被提及和讨论的文化中，否则你不会感受到“甘え”。根据这一理论，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应该体验到不同的情绪。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这种情绪观点仍占统治地位时，一位叫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的年轻的美国人类学家决定为这一理论找到坚实的科学依据。让他非常惊讶的是，最后的结果截然相反。埃克曼的研究提供了第一份证明情绪文化理论有误的科学证据。

埃克曼的研究方法巧妙而简单。他到了一个没有文字的偏远文化地区（新几内亚的福尔），以保证研究对象没有看过西方的图片或电影，因此无从了解西方人的情绪。埃克曼给他们讲不同的故事，然后让他们从三张美国人表达不同情绪的照片中选出与故事内容最贴切的照片。

例如，一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人独自呆在小屋里时遭遇一只野猪

的情景，这个情景会让西方人感受到害怕这一情绪。福尔人很肯定地指出了与故事贴切的西方人害怕的表情。为了更确定一些，埃克曼让一些福尔人作出与每个故事相关的表情并录了下来。回到旧金山后，他又进行了实验，请美国人将福尔人的表情与各个故事相联系。他们的判断仍然正确。

当埃克曼第一次将研究结果在美国人类学协会上公布时，他受到了阵阵嘲笑。当时，情绪文化论根深蒂固，任何对它的批评都会被摒弃。然而，最终还是埃克曼赢得了这场争论。现在，情绪研究者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至少有一些情绪不是习得的，而是共通的、天生的。

埃克曼称这些情绪为“基本情绪”。尽管研究者对于有多少种基本情绪各持己见，但是他们逐渐达成了共识，即基本情绪包括：快乐、痛苦、愤怒、恐惧、惊奇和厌恶（见下框）。

基本情绪

基本情绪是共通的、天生的。它们的每一次出现都很突然，只持续几秒钟。研究者对于有多少种基本情绪各持己见，但是多数人会认同如下几项：

- 快乐
- 痛苦
- 愤怒
- 恐惧
- 惊奇
- 厌恶

一些研究者对这些情绪有不同的提法。例如，在基本情绪中常常出现“高兴”和“悲伤”等字眼。我认为这些词更适合描述心情而不是情绪（见第三章），因此在本书中我用“快乐”和“痛苦”等词表达基本情绪，而用“高兴”和“悲伤”等词来形容心情好坏。

任何文化中都有这些情绪。而且这些情绪并非习得的，而是人脑中所固有的。先天失明的婴儿也会作出传达这些情绪的典型面部表情——微笑、做鬼脸等，这就足以证明以上观点。语言因文化之不同而各异，而情绪表达则不一样，它们更类似于呼吸，是人类的一种天性。

当然，情绪文化论的坚决支持者可以辩驳说，埃克曼的研究只是表明与基本情绪相关的面部表情 是普遍和天生的，但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些表情背后的主观感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所有 私密和主观的东西都是如此。比如，我永远不能确定你我对红颜色或糖的甜味的感觉是一样的，但如果主观体验果真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我们就很难进行交流。相同的词可以用在类似的语法结构中，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些词来代表完全不同的概念，最终必然会深陷误解的泥沼。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无法达成一致。

虽然争议和误解是常见的，但是它们并不至于到了妨碍有效沟通的程度。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可以清楚地传达信息。当我第一次在一本关于情感的书中读到有关“甘え”的描写后，我立刻明白了它的含义，尽管在英语中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对应词。同样，在读到来自其他文化的作者所写的诗歌和小说时，我们也能了解到其中所描写的情感。如果情感是文化的产物，像语言一样变化迅速，那么这些文章就会显得陌生而不可理解。

图2　在这两幅蚀刻自画像中，伦勃朗（Rembrandt）表现了两种基本情绪的面部表情：惊奇和愤怒。

没有语言的交流也是可能的。这主要归功于我们共有的基本情绪。当人类学家首次接触一个曾经与世隔绝的民族时，他们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其中很多是专门用于表达情绪的。当人类学家微笑时，这个表情马上就会被部落成员识别。他们也会报以微笑，向人类学家表示他们有着同样的感受。

于是，我们共同的情绪传承使得人类超越了文化差异联结在一

起。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人类都有着同样的基本情绪。不同文化对这些情绪有着不同的阐释，尊崇某些情绪，贬低另一些，以文化间的细微差别装点共同的情感，它们之间的差异更像是同一音乐作品的两种演绎方式间的差别，而并非不同的作品。正如两个乐队在演奏同一支交响乐时会各有千秋，两种文化在表现他们的情绪时也不尽相同。然而，大家都清楚，乐谱是相同的。

基本情绪的共通性为情绪的生理本质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如果基本情绪是文化的产物，那么它们的共通性确实令人惊奇。但如果认为它们是人类共同生理遗传的一部分，那么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普遍存在就很容易解释了。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身体构造，只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同样，我们的情感也是相同的。这一共同的本质融在了人类的基因里，是我们共同的进化史的产物。

今天，世界上有60多亿人，他们遍布全球。而10万年前，地球上只有几千个人，他们都居住在东非的一小块区域中，现存的人类都是这一小群人的后代。在后来的某个时候，这群人中的一部分离开了非洲，开始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漫长的殖民活动。

离开非洲时，我们的祖先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比如他们都有黑皮肤。后来，随着不同的人群迁移到新的地区，他们的进化就有了细微的差别。肤色是最明显的差异，而这一差异也的确只是表面上的。至于我们的内脏器官——包括脑——全世界的人基本都是相同的。既然基本情绪主要由脑结构决定，所有文化中的基本情绪在本质上都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类的心理共同性现在已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于是人们很难理解情绪文化论为什么会风靡一时。答案也许在于人类（同样普遍地）倾向于夸大不同人群之间的小差异。在寻找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与他人的区别上，而不是共同点上。相应地在谈到情绪时，我们常常会注意细微的文化差异而忽视普遍的相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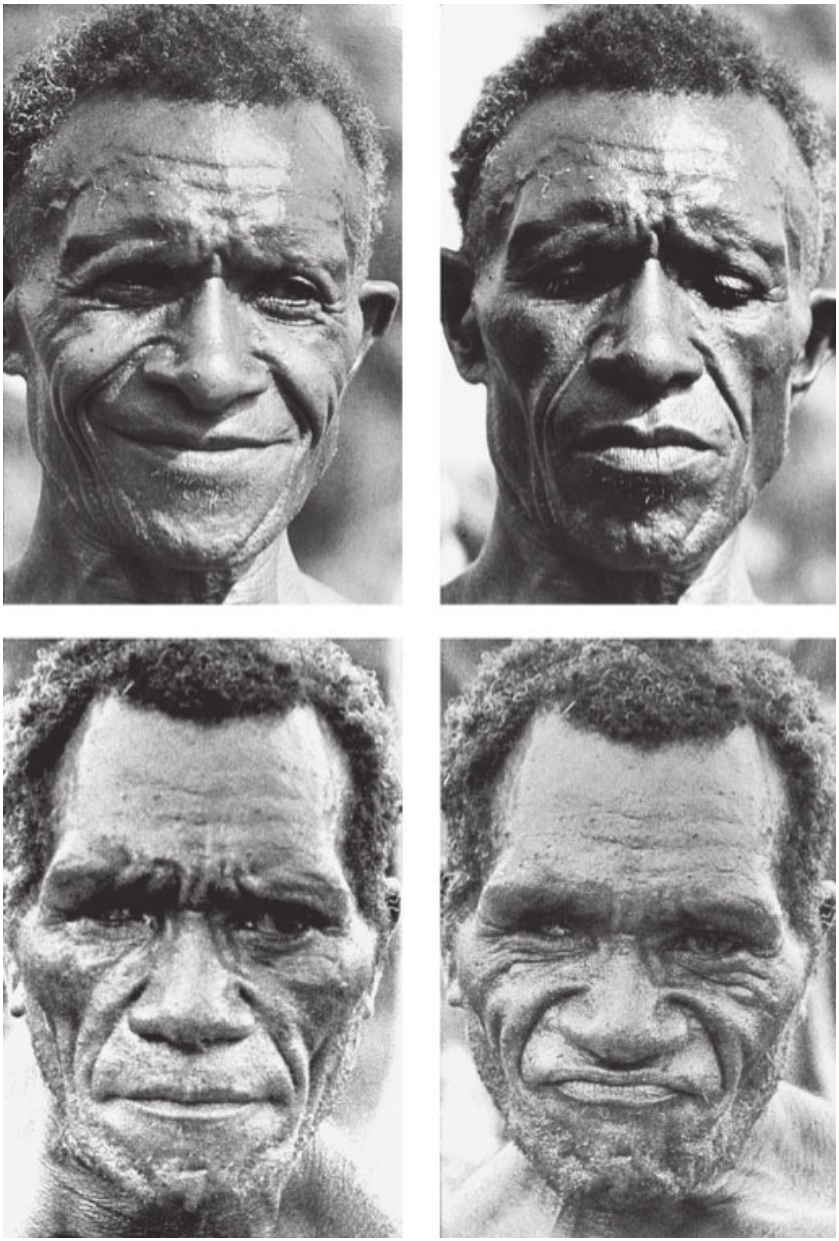

图3　表达基本情绪的面部表情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欧洲人对东南亚民族的态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很长时间里，英国人和欧洲其他地区的人用神秘、深不可测来形容日本人、中

国人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人。“费解的东方人”这一成见的主要根源在于欧洲旅行者们发现东方人的情绪很难懂。他们想知道在日本人不露声色的面孔后是否隐藏着与他们极为不同的情绪。

事实上，日本人确实比欧洲人和北美人更竭力地去隐藏情绪。对于哪些是社会接受的情绪表达方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规则。在欧洲和北美，这些“展露规则”提倡用鲜明的面部表情来表达情绪，面无表情一般被认为是乏味无趣或者具有欺骗性。而在日本，过多的情绪展露常被视为无礼，因此日本人会努力减少情绪的表达。

然而，这些展露规则背后的情绪是相同的。保罗·埃克曼和华莱士·弗里森（Wallace Friesen）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让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几名男性看一些电影片段，并给他们录像。其中一些片段是中性或者愉快的事件，如去划船游玩，而另一些则是很恶心的场景，如割礼、吸力辅助分娩和鼻腔手术。电影片段播了两次，一次播放由研究对象独自观看，另一次有一位访谈者在场。在独自观看时，可以观察到美国人和日本人的面部表情是相似的，而当访谈者在场时，日本人笑得更多，厌恶表情比美国人要少。

然而，这个实验的有趣之处在于慢速播放录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访谈者在场时，日本人起初与美国人表现出同样的厌恶表情，但在不到一秒钟之内，就成功地掩盖了这些表情。换句话说，美国人和日本人感受到了同样的基本情绪。这些生理反应是自动的，无法自主控制。只有在几百毫秒过后，当知觉跟上之后，习得的展露规则才会压制住基本的生理反应。

因此，费解的东方人所掩盖的并非是极为不同的情绪，而是和世界上其他人类完全相同的情绪。欧洲旅行者怀疑东方人不露声色的面孔下隐藏着不同的心，实际上是对不同情绪展露规则的误解。

对美国男性和日本男性进行的实验表明，诸如害怕、厌恶之类的基本情绪反应是自动的，像反射作用一样，我们对其有意识的控制很少，它们比我们的主动行为快得多。因此，由文化决定的展露规则总是在基本情绪反应出现之后才会显示出来。基本情绪是与生俱来的，是通过基因而不是通过文化根植入我们的神经系统的，是人类共有的

基本心理模式。

野猪般的情绪

然而，并不是所有情绪都是与生俱来的。有些情绪看起来确实具有 文化特殊性。例如，新几内亚的古鲁姆巴（Gururumba）人所感受到的一种情绪对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来说显然是陌生的。这种情绪状态被称为“野猪般的情绪”（being a wild pig），因为体验到这种情绪的人表现得就像野猪一样：他们狂奔着、抢劫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并且攻击旁观者。

这样的情绪显然不符合埃克曼所说的“基本的”。它们不是共通的，也不是先天的。“先天的”一词现在用得很多，且表达的意思千差万别，于是一些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最近提出应该放弃使用这个词。我认为这个词没有问题，只要我们在用的时候注意它所指的意思就可以了。我所说的有些性格特点是“先天的”指的是它们的形成几乎不需要特殊条件。换句话说，只要满足一个孩子生存的基本需求，如食物、住所和同伴，这个孩子就能形成人类所有先天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语言能力就是先天的，一个小孩不需要太多专门的教材就能掌握一门语言。你要做的就是让孩子在一群有语言能力的人中间成长。当然，讲英语或日语等某种特定语言的能力并不是天生的。除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一特点的形成还有一些特殊需求，而这些需求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可以满足的。

我所说的特定文化下的情绪不是先天的这一观点指的是只有具备了某些特殊条件，这些情绪才能得以发展，而只有特定的文化才能提供这些条件。这种条件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在儿童期学习 这种情绪的。换句话说，与自发形成的基本情绪不同，特定文化下的情绪只有置身于某种文化中才能形成。因此，对于“野猪般的情绪”，你只有听说过才会 感受到它，而对于恐惧或者愤怒这样的基本情绪，即使从未听说也能够感受到，这就将二者区分开来。

不同文化可以孕育出具有不同情感的人，这一事实证明了人类大脑惊人的可塑性。如果你相信人脑是以特定方式运转的，那么即使你的理论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的心理，你 这个个体的部分心理活动可能也会符合这一理论的预测。换句话说，关于脑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可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你的文化告诉你有这么一种情绪叫“野猪般的情绪”，那么你可能就会体验到这种情绪。这种体验不是精心策划的欺骗行为。如果有欺骗的话，也是一种自我 欺骗，虽然这种说法不太好，因为对特定文化的情绪的感受 不是伪装的。事实上，它们和先天的基本情绪没什么两样。古鲁姆巴男人（只有男性才能体验到这种情绪）有种似乎被“野猪般的情绪”所控制的感觉，就像恐惧或厌恶等基本情绪一样“突然出现了”，丝毫不受意识的制约。“野猪般的情绪”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受这种情绪影响的人并不是在伪装这种情绪。

有趣的是，特定文化下的情感往往会成为人们摆脱困境的方法，“野猪般的情绪”就是这样。人们对于被这种情绪所控制的古鲁姆巴男人非常宽容，虽然这种情绪被看作是负面的，但由于它不受控制，人们就会体谅受这种情绪影响的人，包括暂时免除他们的债务。有一点很奇怪的巧合，这些人多数是25到35岁的男性，而这一时期也刚好是他们在婚姻初期第一次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多么幸运啊，当一个男人的经济负担加重时，他可以通过体验到某种情绪而使其他人允许他在承担这些责任时有一些回旋余地。

只有能够从中获益的人才会受到“野猪般的情绪”的影响，这当然不是巧合。心理学家詹姆斯·埃夫里尔（James Averill）认为很多情绪的功能就在于能够帮助人们应对文化中的特殊要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也只适用于特定文化下的情绪。基本情绪不是为了迎合某种文化的具体要求，而是为了帮助我们应对所有的人都要面对的最基本的挑战，下一章会谈到这一点。

永恒的爱？

根据前面的介绍，情绪似乎可以被明确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情绪，它们是共通的、先天的。另一类是特定文化下的情绪，如“野猪般的情绪”。但是，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先天性并不是两个极端的问题，而是程度的问题。在研究情绪或者任何其他的生理或者心理特点时，我们不应该去问它是不是先天的，而应该问它在多大程度上 是先天的。除了基本的生存需要，某个特点的形成所需的“特殊条件”越多，其先天性就越少。学习一种语言比长出两条腿的先天性成分要少，因为后者只需要正常的基因、基本的营养，以及免于灾难的运气，而前者除了需要这些条件，还要加上 与其他有言语能力者的交流。学习英语的先天性成分就更少了，因为它要求其他有言语能力的人讲英语。

因此，我们应该把基本情绪和特定文化下的情绪看作一个连续体上的两端，而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根据某种情绪的形成所需的特殊条件的多少，以及这些条件的特殊性，我们可以把情绪放在靠近“基本”的一端或者靠近“特定文化”的一端。基本情绪比特定文化下的情绪更具有先天性，但它们也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

对于某些情绪，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判断它们在先天性这一连续体上的位置。有很多证据表明恐惧和愤怒是非常基本的情绪，而“野猪般的情绪”明显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但是，对于其他情绪就没有这么清楚了。争议很大的一种情感就是爱情。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共通的情感，像恐惧和愤怒一样根植于大脑。另一些人则不同意，认为爱情更像那种被“野猪般的情绪”所控制的状态。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曾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有些人从来没有听到过爱情一词，那他们就永远不会谈恋爱。”有人认为爱情是特定文化下的情感，他们的观点更极端：如果以前没有听到过爱情故事，就没有人 会谈恋爱。

这一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是作家C. S. 刘易斯（C. S. Lewis），他认为爱情是在12世纪早期的欧洲创造出来的。就是在这一时期“典雅爱情”成为欧洲许多诗歌的主题。在这些诗歌中，绅士会爱上皇宫里的贵妇。他会成为她的骑士，为她效劳，然而他对她的激情很少会有

圆满的结果。兰斯洛特（Lancelot）对亚瑟王（King Arthur）的妻子格温娜维尔（Guinevere）的爱可能是这一文学体裁中最著名的故事了。

如果爱情确实是 一些中世纪诗人创造出来的，那么，在中世纪之前，就没有人可以体验到这种情感了。C. S. 刘易斯很乐意接受他的这一煽动性的论点所产生的结果，并且宣称“在荷马（Homer）和维吉尔（Virgil）生活的那个年代没有人恋爱”。

图4　爱情：仅仅是文学作品创造出来的吗？

这一定可以位居20世纪最荒谬观点排行榜的前几名。很难相信像C. S. 刘易斯这样敏感的人没有发现《旧约》的《雅歌》中所表述的显

而易见的激情：

> 我妹子、我新妇，
> 你夺了我的心！
> 你用眼一看，
> 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

然而这篇诗歌比中世纪的描述典雅爱情的诗歌早了一千多年。事实上，爱情的出现比这篇诗歌还要早，可能出现于人类初期。10万年前，当我们的祖先还在非洲平原上时，他们的身体活动与我们大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情感生活可能与我们非常相似。最早的人类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平原上寻找可以吃的植物，建造暂时的居所，现在这些活动只在极少数人类聚居地中存在，但是许多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他们也花很多时间热恋、做爱、嫉妒、心碎，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人类学家所研究的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我们相隔甚远，而在这些文化中也可以找到爱情的存在。然而，如果浪漫的爱情是欧洲的发明，那么与欧洲没有接触的人就不会体验到这种感情。这一简单的设想让两位人类学家能够对爱情文化理论予以检验。首先，他们需要一个可操作的爱情的定义，为此他们确认了这一概念的核心要素：对一个人强烈的性吸引感，当所爱的人不在时感到愤怒和渴望，当对方在场时感到强烈的欢乐。他们还列出了其他成分，包括精心策划的示爱行为，如送礼物、用歌和诗表达爱情。然后他们考察了人类学的文献，统计了对这些特点有过描述的文化。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发现所记录的90％的文化中都有这样的描述。如果人类学家确实观察并记录了这90％的社会中的爱情事件，我们可以打赌这一情感在另外的10％中也存在。

根据这些证据，似乎不应该有人再怀疑爱情的普遍性了。然而，将爱情看作欧洲的发明也有一点道理。即使是基本情绪在不同的文化中也有差异，尽管这种差异很小。回到音乐的那个比喻，尽管乐谱是一样的，不同乐队演奏同一支交响乐时也会有所不同。与此类似，不

同的文化中的爱情也会表现得稍有差异。在西方，爱情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点。这些独有的特点包括：爱情必须是突然发生的，它应该是一生承诺的基础，是自我实现的最高形式。因此，虽然爱情是人类共同的主题，但这个主题可以有一些小差别。

和“野猪般的情绪”不同，爱情可能不属于特定文化下的情感这一范畴，但它也不是恐惧之类的基本情感。哲学家保罗·格里菲思（Paul Griffiths）提出，情感不是分为两类，而是三类。他认为除了基本情感和特定文化下的情感之外，还有“高级认知情感”。这样分可以，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些分类并不是非此即彼就行。如前所述，基本情感和特定文化下的情感之间的差异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类别上的。我们把先天性看作一个连续体，基本情感位于“先天性程度最高”一端，特定文化下的情感位于“先天性程度最低”一端。加上第三类“高级认知情感”，这个连续体就会被分成三段而不是两段。高级认知情感的先天性比基本情感要少，但比特定文化下的情感要多。

除了在先天性程度上与基本情感不同以外，高级认知情感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不同。它们不像基本情绪反应那样本能而迅速，也不是普遍只用一种面部表情表达。爱情就是一个例子。一见钟情是可能的，但这种情况较少，更常见的爱情是在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内逐渐成长，而恐惧这种情感通常在几毫秒内就会发生。另外，恐惧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典型的面部表情来识别，而爱情却没有特定的面部表情。

格里菲思认为像爱情这样的情感应该称为“高级认知情感”，因为它们比基本情感需要更多的脑加工。基本情感大部分是在大脑的下皮质结构生成，而像爱情这样的情感更多地发生于新大脑皮层中。在过去500万年人类进化过程中，新大脑皮层是大脑发展最快的部分，它支持着大多数复杂的认知能力，如条理清晰的逻辑分析。由于高级认知情感比基本情感与脑皮层的联系更紧密，它们更容易受到有意识思维的影响，这就可能使高级认知情感比基本情感更具有文化差异性。然而，尽管如此，高级认知情感仍然是普遍的。它们与基本情感一样，是人类特性的一部分，由我们共同的演化史塑造而成，这一点不同于特定文化下的情感。

除了爱之外，还有什么属于高级认知情感？可能的选项包括：内疚、羞愧、尴尬、骄傲、羡慕、嫉妒（见下框），也许“甘え”也应该被归为高级认知情感。这几项体现了高级认知情感更深层的特点：所有这些情感本质上都是社会性 的，而基本情感则不是。你可以害怕或厌恶无生命的物体和非人类的动物，但是爱和内疚感的产生则需要他人的存在。伤害了一只动物可能会让你感到内疚，有些人也可能宣称爱上了他们的宠物，但内疚和爱似乎并不是因为这些才进化形成的。高级认知情感是由自然选择决定的，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的祖先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这些情感是将人类社会连在一起的黏合剂，我们在下一章将会有所了解。

高级认知情感

高级认知情感与基本情感都是普遍的，只是前者表现出更多的文化差异性。与基本情感相比，高级认知情感的形成与消失需要更长的时间。下面所列的是一部分高级认知情感：

- 爱
- 内疚
- 羞愧
- 尴尬
- 骄傲
- 羡慕
- 嫉妒

一些基本 情感也可以具有高级认知 情感典型的社会功能。比如某人看到粪便时会感到厌恶，这是一种基本情感。然而，当你对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感到厌恶时，帮助你避开传染性的或者有毒的东西的基本情感反应也具有让你避开不值得信任的人这一社会 功能。

第二章

为什么自然永远无法演化出斯波克

如果你看过《星际旅行》这部电影，一定会记得斯波克，那个尖耳朵的外星人。他一半是人类一半是瓦肯人——一种各方面看起来都很像人类的外星人，但命运的捉弄让他们长着一双尖尖的耳朵，暴露了他们的身份。

然而，在相似的外表下隐藏着深层次的差异，酷似人类的面孔背后是外星人的大脑，远比人类要发达。值得一提的是，瓦肯人没有任何情感。他们在历史上的某个阶段去掉了原始的动物特性，不再受到强烈情感的困扰，具有超人类的理性。

《星际旅行》的创作者延续了西方文化中一个古老的主题，即没有情感的动物要比人类更有智慧。从柏拉图开始，许多西方思想家都认为情绪是理性行为的障碍，至少是一种无害的奢侈品。我将这种观点称为情绪的消极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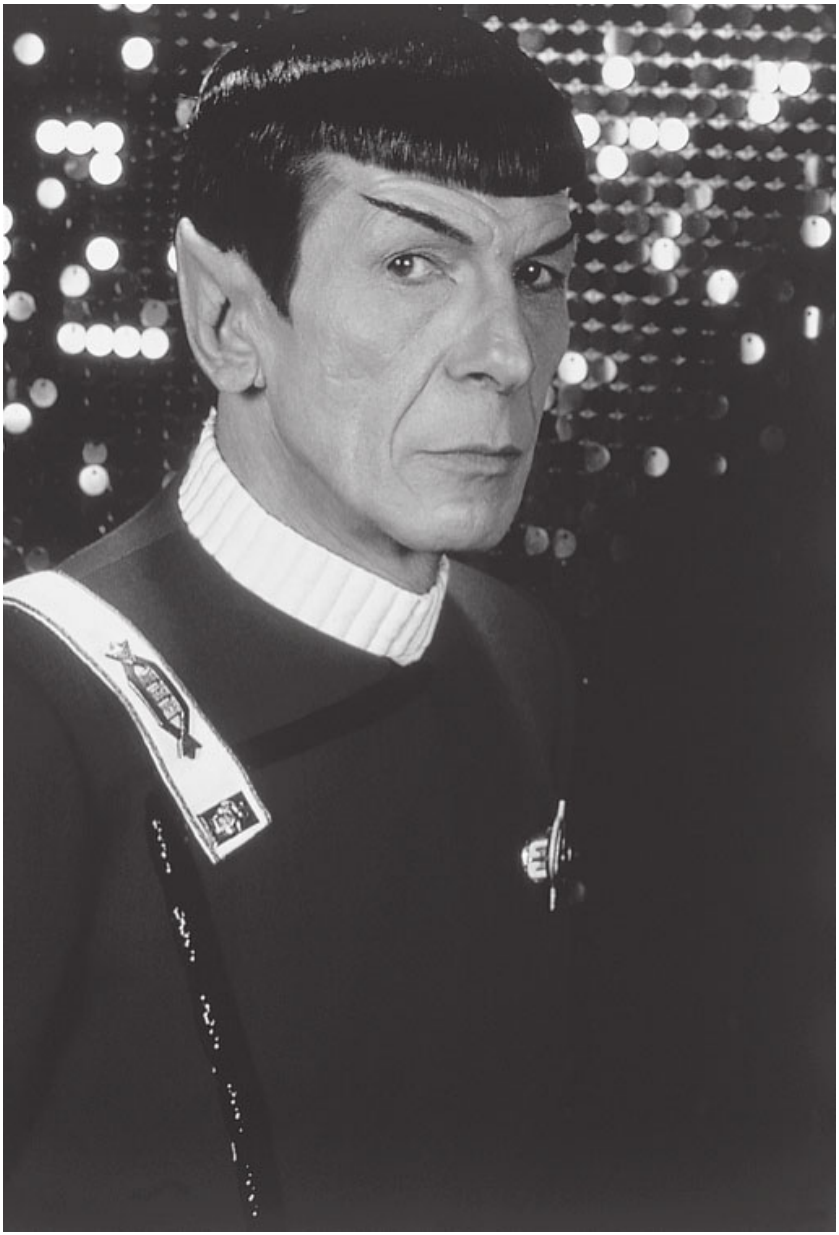

图5　伦纳德·尼莫在1982年的《星际旅行II：天汗的愤怒》中扮演斯波克先生。

相反的观点——对情绪的积极观点——认为情绪是理性行为的关键。根据这一观点，像斯波克这样没有情感的生物实际上比我们的智

力更低 ，而不是更高。直到最近，这一观点在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中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然而来自进化理论和神经科学的证据似乎为该观点提供了支持。

支持消极情绪观点的例子有很多。过度的感性会使人们行动起来缺乏理性，这样的事例我们都很熟悉。比如一个人受到了一帮流氓的侮辱，如果他无视这种侮辱并且走开就会更安全，但是自尊心可能会让他反击，使他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一位受到老板批评的女性可能会伤心地辞掉了工作，但是最聪明的对策也许是咬紧牙关修正自己的行为。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

图6　对情绪的消极观点

凭一时的感性做事以后可能会后悔，我们不应否认这一点。情绪的积极观点并不认为情绪总是 有用的，而是（与情绪的消极观点相反）主张成功的秘诀在于理性和感性的结合，而不是单凭理性。像斯波克这样完全没有情感的人有时可能比我们优秀，但在其他时候会比我们更糟。总的来说，拥有情感的益处要远远大于其害处。

如果拥有情感只会 弊大于利，那么情感生物从一开始就不会演化出来。情感是很多特点的综合体，这些特点如果没有益处是不会演化出来的。因此，我们现在拥有情感意味着至少在进化过程的某个阶

段，情感曾帮助我们的祖先生存下来并且繁衍后代。问题是，通过何种方式？

基本情绪的价值

我们很容易明白恐惧和愤怒等基本情绪是怎样帮助祖先生存下来的。在一个四处都隐藏着饥饿的捕食者的世界里，恐惧的能力非常有用。一旦出现危险信号，它可以使动物迅速作出反应，使它们浑身上下都充满了荷尔蒙，以便能快速逃跑，让它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逃！（见下框）愤怒也是一样，只是它会让机体进入战斗状态而不是准备逃跑。

恐惧的两条通路

美国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发现恐惧是由大脑中两条不同的通路所控制的。第一条通路与基本情绪相连，它传递信号快，但是经常出错。第二条通路传递信号较慢，但是更准确。最理想的状态是两条通路一起工作，使这两部分都能达到最好的状态。第一条通路让我们迅速对潜在的危险信号作出反应，但是它常常被错误警报所激活。而第二条通路会认真判断形势，如果它认为危险不真实，就会切断由第一条通路引起的恐惧反应。在恐惧症患者中，第二条通路功能不正常，因此就会不断对无害刺激产生恐惧反应。

惊讶和厌恶的情绪也比较容易解释。惊讶可以帮助动物对新刺激产生反应。当出现意想不到的事物时，惊讶的反应迫使我们停下来仔细观察。我们的眉毛耸起、眼睛睁大，尽可能多地观察新情况，身体随时准备调转方向。同样，厌恶的能力也是有用的。在一个充斥着腐烂食物和粪便的世界里，传染病菌在里面安营扎寨，而厌恶感能让动

物远离这些东西，使它们避免中毒或者被感染。

另外两种基本情绪——快乐和痛苦——的进化原理较为复杂。它们的演化是为了促使我们从事或者避免某些行动。在石器时代，快乐源于那些能帮助我们传宗接代的行为和事件。发生性行为、遇见老朋友、得到礼物等之所以会让人感到快乐，是因为这些事情都有利于祖先顺利地繁衍生息。相反，朋友死亡或重要物品丢失会使人悲伤，因为这些事情都不利于我们祖先的成功繁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祖先认为这些情绪和基因的成功遗传有关。自然选择并没有赋予我们直接去思考基因如何才能更好地遗传这一问题的能力，而是给了我们感受快乐的能力，后又使我们的快乐体验和那些有助于基因遗传的事情联系起来。

如果快乐和痛苦是作为驱动力演化而来的，就像谚语中的胡萝卜和大棒一样，那么它们应该是通过预测来起到驱动作用的。如果这些情绪无法预测某一具体行动会让人感到快乐还是痛苦，它们就无法告诉我们该不该采取此种行动。如果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情绪所作的预测来决定该怎么做，那么感到快乐或者痛苦就没有意义了。这意味着不管愿意与否，为了明白什么事情会让我们快乐或痛苦，我们首先要体验过这些情绪，然后根据对这些情绪的记忆来掌控自己的生活。因此童年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时期里我们尝试着发现个人的好恶。

幸运的是，我们不必完全依靠自己的经验。尽管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但快乐或者痛苦的根本原因对于所有人来说都相同，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恐惧和厌恶等其他基本情绪也是如此。看到父母害怕在某一条河里洗澡，孩子们不用自己体验就知道那条河有危险。同样，看到父母讨厌某种食物，他们自己就不会去品尝那些不好吃的东西。对智人 这样的社会生物来说，情绪的作用是双倍的。一方面，内在感觉和情绪引起的身体变化使得机体采取或避免某种行动。另一方面，情绪的外部表现会为他人提供信息，使他人可以借鉴我们的经历。

其他社会生物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包括许多灵长类动物。在一个实验中，一群实验室中饲养的猕猴第一次见到蛇时并不害怕。然而，

在看到电影中的另外一只猴子见到蛇时的恐惧反应之后，它们对蛇也有了恐惧的反应。然而，从经验中学习也是有限度的。当看到电影中的其他猴子对一朵花或一只兔子感到害怕时，生长在实验室中的猕猴并没有对这些毫无威胁的东西表现出恐惧。情绪的学习取决于环境影响以及个体选择性地学习某些东西的内在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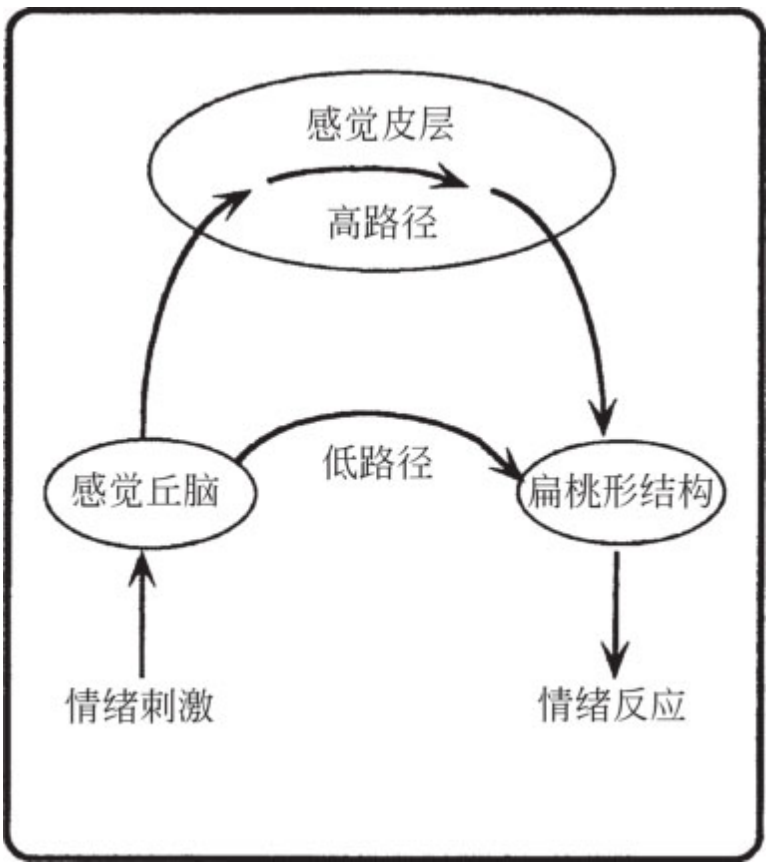

图7　恐惧情绪的两条神经通路（摘自约瑟夫·勒杜的《脑中有情》）。

不是所有的情绪表达都能让其他生物来间接学习。有些情绪表达不是真实情绪的反映，而是欺骗行为。例如，当一只猫受到威胁时，它的毛会竖起来。然而，这一信号不是为了让其他动物知道它受到了威胁。相反，它希望其他动物——捕猎者——不　知道自己受到了威

胁，因为这会刺激捕猎者对它进行攻击。毛竖起来是要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更强大，以此来防止捕猎者或者其他猫对它的攻击。

因此，在考虑情绪的演化时，我们必须考虑每种情绪反应的所有要素。只注意内部感觉是不够的，还必须要考虑面部表情和其他信号。达尔文是第一个强调这些信号的重要性的人，在其著作《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达》（1872）中，达尔文考察了很多情绪信号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的连续性。达尔文对这些信号很感兴趣，他认为它们能很好地证明人类是从其他动物进化而来的。例如，当我们害怕时毛发会竖起来，他认为这是从祖先那里继承的特点，那时他们浑身上下都长着浓密的毛发，害怕时毛发就会竖起，就像今天的猫一样。当然，现在我们头上的几根头发就算竖起来也很难使我们显得更大，因此这样的反应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但它仍然存在，这是我们的类人猿祖先所遗留下来的一个特点。

恐惧时毛发会竖起，愤怒时会露出牙齿，这些情绪表达的进化原因很容易理解。然而，其他情绪表达就非常神秘了。流泪就是如此。我们在悲伤时为什么流泪这一问题让进化论者很困惑。表达情感的泪水是人类独特的现象。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有泪腺，但是泪腺的存在只是为了保护眼睛不受到伤害。没有其他的生物会在悲伤时哭泣——甚至我们最近的亲戚猩猩也不会。

图8　猫在害怕时毛会竖起来，使它看起来更强大些，以免遭到攻击。

达尔文否认悲伤的眼泪有任何作用。他认为泪腺是为了在婴儿期保护眼睛才进化出来的，因为长时间的哭喊会导致视觉损伤。达尔文认为成人在悲伤时流出的眼泪只是摩擦眼睛时泪腺被压迫所导致的偶然结果，就像笑或者打喷嚏时同一部位的肌肉收缩也可以导致流泪一样。

最近，有研究者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表达情绪的眼泪有许多功能。威廉·弗雷（William Frey）发现悲伤的眼泪与其他类型的眼泪在生化成分上不同，于是他提出眼泪可以消除身体中的压力激素。他声称这就是人们在痛快地哭一场后感觉会好很多的原因。一种更普遍的观点是眼泪是悲伤的真实表达。表达情感的信号如果是发自内心的，那它们一定不容易假装，而且有意去哭也确实很困难，演员要经过反复练习才能哭得自然。根据这一观点，哭过之后感觉会好一些不是因为排除了多余的荷尔蒙，而是因为哭泣通常会使我们得到他人的帮助。如果这是一个合理的进化解释的话，那么哭泣这一情绪表达应该出现在同情之后，或者与同情同时进化出来。然而，这一理论仍存在一个问题，它不能解释为什么独自 哭泣有时也会让人感觉好一些。

既然人类是唯一在悲伤时哭泣的动物，这种情绪表达一定是在相对较近的年代——也就是人类从猩猩的谱系中分开来以后才出现的。其他大多数情绪表达则更古老一些。我们害怕时毛发会倒立的现象可能起源于5,000万年前，那时地球上居住着哺乳类动物的共同祖先。而害怕这种情绪比它本身的生理表现还要早。事实上，它可能是最早出现的几种情绪之一。大约5亿多年前出现的第一批脊椎动物可能就具有这种情绪。这些早期脊椎动物的后代——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都继承了害怕的能力。人类并不是唯一会害怕的动物。

快乐和痛苦等基本情绪则出现得晚一些，但也有很长的历史了，因此不只是人类才有这些情感。一只猫蜷伏在温暖的火炉旁大声地打着呼噜，有谁能怀疑它的快乐呢？证明其他动物也会感到悲伤可能会更难，但是大象就有这种情感。在小象被猎杀后，尽管有危险，母象仍然舍不得遗弃孩子的尸体，并且经常到它们的坟地去。

你也许会认为我多愁善感，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神经解剖学上的证据吧。当我们拿差异很大的动物作对比时，我们发现它们的大脑惊人地相似。例如，在所有脊椎动物中，脑都被分为了三个明显的区域：后脑、中脑、前脑，每一个区域都有相同的基本结构和通路，这

表明脑的进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系统的变化都极其微小，尽管身体的其他部分可能有很大的改变。调节害怕和愤怒等基本情绪的神经系统尤其如此。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证实了各种动物调节愤怒反应的神经机制是相同的，无论是鸽子和老鼠还是猫和人类。其他动物与人有着相似的情感体验，这一观点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并不是将动物拟人化。

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来说，恐惧和愤怒等基本情绪是由一组被称为边缘系统的神经结构来调节的。这些结构包括海马区、有色带环绕的脑回、前丘脑以及扁桃形结构（见图9）。这些结构位于脑中央，处于新大脑皮层的神经组织之下。顾名思义，新大脑皮层是近期才进化出来的。虽然鱼类、两栖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也有新大脑皮层，但是哺乳动物的新大脑皮层更大，它完全包住了边缘结构，这一点是哺乳动物与其他脊椎动物在脑结构上的主要差异。神经科学家保罗·麦克莱恩（Paul Maclean）认为，哺乳动物的脑进化主要在于新大脑皮层的扩展，而较早的边缘结构变化较少，当然也不是完全 保持不变。在对不同物种进行比较时，所有的问题都是程度上的，比如我的边缘结构与乌龟的不同（但愿如此），但是我的大脑皮层与乌龟的差异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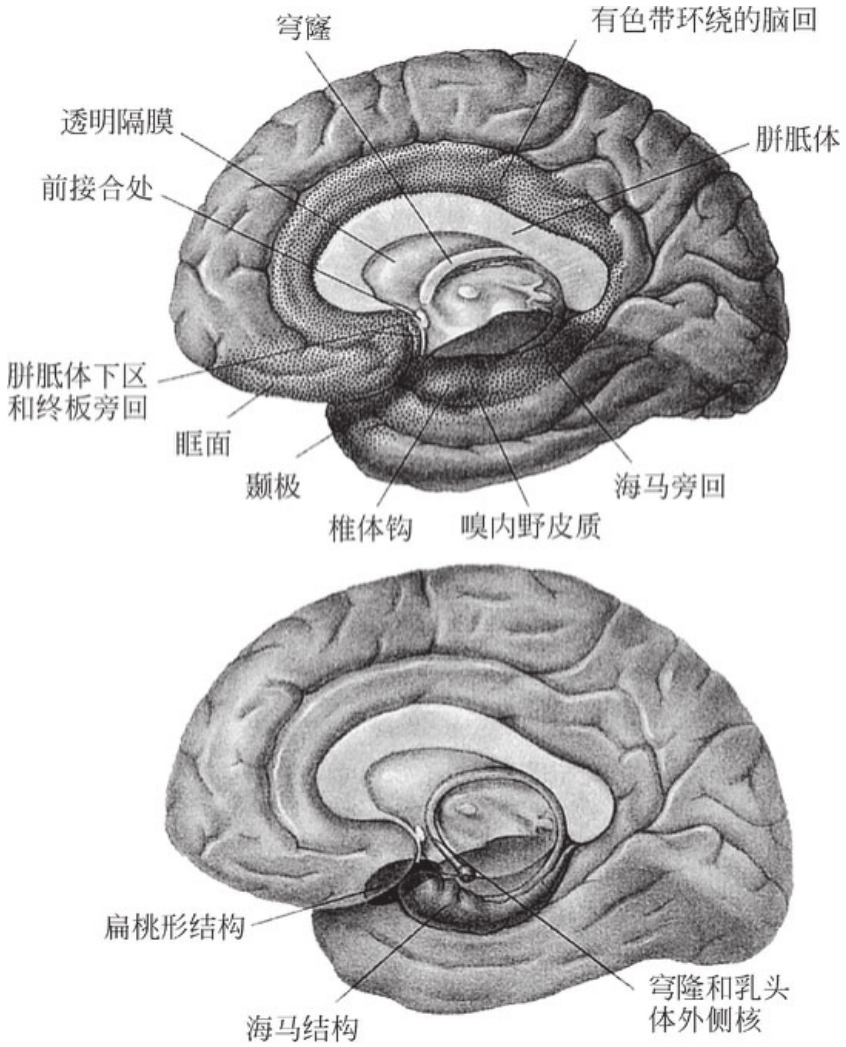

图9　人脑，突出了一些边缘结构。

如果恐惧等基本情绪完全由边缘系统来调节，那么爱和内疚等高级认知情感就主要在大脑皮层中生成。这就意味着高级认知情感的进化比基本情绪要更晚，随着高级哺乳动物的出现，新大脑皮层开始扩展，在此之后高级认知情感才出现。换句话说，高级认知情感的存在不会超过6,000万年，事实上还有可能更　短，而脊椎动物的脑以及基本情绪自形成已有约5亿年的历史，远远长于高级认知情感。

内疚、爱和报复的进化

如果说内疚和爱等高级认知情感开始进化的时间还很不清楚的话，那么它们进化的原因则更加令人迷惑。恐惧或厌恶能帮助我们的祖先生存下来，这一点很容易明白，但是爱或者内疚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就很难理解了。有人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建议，它们也许可以解释这些情绪为什么非常重要。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推测，因此我们不能全盘接受，但它们确实提供了深一层的想法，使我们认识这些情绪可能带来益处。

拿内疚感来说吧。从表面上看很难明白为什么自然会选择让我们有内疚这种情绪。生活中有很多情况下是可以欺骗的——不付出代价就得到好处。如果你有把握自己不会被发现，那么欺骗就是最有利的方法。然而，如果你有良心，欺骗过后的内疚感可能会阻止你这么做。这样的话，会内疚的动物就会输给那些肆无忌惮的对手，内疚能力因此就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朗克（Robert Frank）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弗朗克认为会内疚实际上是有益的，因为人们更容易信任那些他们认为有良知的人。他用下面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试想史密斯和琼斯两个人想开一家饭店。史密斯是一个有天分的厨师，而琼斯是一个精明的老板，他们联手可以经营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这样他们的收益要比各自单干高得多。然而，他们都知道对方有可能欺骗自己而不被察觉。例如，史密斯可能会从食物供应商那里拿回扣，而琼斯可能做假账。如果只有一个人欺骗，这个人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而另一个人则会遭受损失，但如果两个人都欺骗，他们的收益要比两个人都诚实时少得多。如果史密斯和琼斯都能保证不欺骗，那他们都会因此而受益。但是怎样承诺才能让人信服呢？光保证不欺骗是没有说服力的，对于无所顾忌的人来说，作出承诺与违背承诺同样容易。

这时内疚感就派上用场了。如果欺骗后你会感到内疚，这种感觉就会促使你诚实守信，即使你知道欺骗行为不会暴露。同时，如果别人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在寻找诚实的合作伙伴时他们就会来找你。当

然，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内疚感需要一些可靠的线索，比如脸红。只有当这些线索表明你是有良心的人时，别人才会知道一个可靠的人和一个无赖之间的区别。这些信号必须是难以伪装的，否则它们就不可靠了。弗朗克认为，脸红等情绪表达通过自然选择根植于人类的生理结构，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种可信任性。

言出必行在生活中许多其他情境下也是至关重要的。弗朗克将这些情境统称为“承诺问题”。他认为每种高级认知情感解决的是不同的承诺问题。内疚要解决的承诺问题是作出不欺骗别人的许诺。同样，爱情解决的是另一种承诺问题——一方必须作出令人信服的承诺，保证对另一个人永远忠诚。例如，杰克和吉尔都认为对方是合适的伴侣，但只有他们确信对方不会见异思迁时他们才会结合。这种确信来自于对方的爱。假设在两种情况下杰克向吉尔作出了承诺：一是出于情不自禁（也就是不能自已）的、让他失眠、心跳过速的感情；二是经过了一番理性分析，衡量了她的优缺点之后。在这种情况下，前者更有可能打动吉尔。就像道格拉斯·叶茨（Douglas Yates）所写的，“一个对爱保持清醒的人无法去爱”。

另一种承诺问题是威胁说一定要报复。假设你是班里最小的孩子，班里的霸王扬言要偷你带的午饭。你可能会威胁说，如果他敢这样你就会照鼻子给他一拳。但是，如果他知道你是一个理性的人，那他就不会把你的威胁当真。毕竟，给他一拳后你们必定会打起来，而打起来的话你几乎注定会输，那时就更倒霉，不仅丢掉了午饭，还 多了一两个黑眼圈。然而，如果大家都知道你有仇必报，问题就好办了。复仇的冲动使你不管结果如何，在受到侮辱后就要报复，这样，那个坏小子在偷你的三明治之前就要好好想想了。情绪于是再次表现出一种“全盘理性”，使人们不被纯粹理性所禁锢。

因此，根据弗朗克的观点，高级认知情绪如内疚、爱以及复仇的冲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有助于解决只靠理性无法解决的承诺问题。然而，这些情绪并不是没有缺点。它们也许能帮助我们作出有效的承诺和威胁，但如果有人看穿了我们是在虚张声势该怎么办？尽管我心跳加快、脸色通红，但如果我的表白被置之不理，那么在几

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我都会陷入无谓的痛苦。单恋是自然最残酷的惩罚之一。同样，尽管学校里的那个霸王知道我有报复心，但他如果还是去偷了我的三明治，那报复他会让我更惨，不但丢掉了三明治，还 会被打得青一片紫一片。

当然，一种理想的状况是我们既获得了这些情绪带来的好处，又不会有任何因被人识破而引起的危险。比如，我们可以诚挚地表白自己的爱，而当表白被拒绝时爱也会迅速消失。我们也可以扬言要复仇，而当他人信以为真时反而不敢付诸行动。但是这种行为会使将来任何承诺和威胁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要让威胁有效，就必须表现出你迫不得已 必须付诸行动。这样看来，高级认知情绪似乎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双刃剑。

只有向别人证明你会不惜代价让承诺和威胁兑现，承诺和威胁才是有效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表明为某种情况所迫，你“不得不”兑现这些承诺或威胁。我们将其称为“手铐原则”（handcuff principle）。这些情绪要发挥作用，它们就必须有一种不可规避性，这样，当别人不相信你时，你别无选择，只能兑现这些承诺和威胁。这些情绪让你不得不违你所愿地执行某种行动。而且，这副“手铐”必须能让他人清楚地看到，如果别人看不到，这种机制就没有意义了。对于内疚感来说，脸红等生理信号就能表明这副“手铐”的存在。人们希望“手铐”的可见性能有效地防止自己被识破——比如学校的坏孩子看到你怒不可遏，就不敢动你的三明治——但这种方式偶尔也会失败。那个坏小子还是偷了三明治，使得你不得不报复。于是你被复仇的欲望所控制，迫不及待地想要狠狠地揍他。虽然理性告诉你要谨慎，但这一声音早已被强烈的情感所淹没。

当对峙双方都被这副“手铐”所控制时，就会出现另一种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一方先揭对方的底，一场永无休止的循环报复就开始了。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用一个小故事说明了这种危险。巧合的是，故事里有真正的 手铐：

为了阻止修建核电站，一群抗议者们躺在通向工地的铁轨上。理智的火

车司机别无选择，只好先停车。为了对付这群抗议者，铁路公司让火车司机固定住节流阀，使火车缓慢移动，然后自己跳下火车在旁边走，这样抗议者们肯定会乱作一团。而下一次抗议者们用手铐将自己铐在了铁轨上，这样司机就不敢跳下火车了。但是，抗议者们必须肯定火车司机能够看到他们并及时停车。而再下一次铁路公司就会派一个近视眼司机来开车。

可能正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了意大利和北美的黑手党家族之间的仇杀不断，激起了北爱尔兰和中东的宗派主义屠杀。每当法律处于弱势的时候，攻击和报复常常会永无休止地循环下去。由于报复的冲动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血液，尽管对双方都毫无益处，这种冤冤相报还是始终存在。让人悲哀的是，人性的这一特点有着充分的理由发展进化。如果没有报复的愿望，我们就很容易被压榨。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拥有这种情绪显然利大于弊。

情绪在今天还有用吗？

现在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复仇等情绪对于靠狩猎与采集为生的祖先来说是有用的，他们用棍子和石头作为复仇武器，造成的伤亡可能很少。然而，在今天这个枪支唾手可得的时代里，这样的情绪肯定有不利影响。也许所有的情绪都是如此。也许瓦肯人确实比我们更高级。也许斯波克和他的瓦肯同胞们在进入高科技世界时抛弃情感是很明智的。

这似乎与达尔文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其著作《情绪的表达》中，达尔文认为情绪表达在过去是有用的，而在今天已失去了它的价值。例如，人们在愤怒时往往会龇着牙，这一点继承了类人猿祖先原始的愤怒表达方式。达尔文似乎在暗示情绪及其表达就像阑尾这个残余的器官一样，它源于人类早期的进化，而现在已失去了作用。因此，达尔文的观点似乎强化了对情绪的消极认识。

与祖先生活的世界相比，我们的世界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我们没有了被捕猎者吃掉的危险，被其他人攻击的可能

性也大大降低了。如果恐惧情绪的演化是为了帮助我们避免这些危险，那么今天没有这种情绪可能会更好。显然，过度恐惧会导致许多问题，如恐惧症和恐惧发作。很少有人因为恐惧感太少而感到困扰。然而，这可能是因为那些没有恐惧感的人早在意识到他们的问题之前就已经性命不保了。恐惧不光能帮助我们防御侵略者，它还能帮我们避免很多可能是致命的鲁莽行为。恐惧会阻止你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随意穿行，或者在悬崖边上跳舞。没有了恐惧感，生活中可能会少一些痛苦，但生命也可能会更短。

愤怒的情绪在今天看起来也没什么用处。与类人猿祖先不同，多数现代人很少发生身体上的暴力行为。保留这种促使我们发生冲突的情绪有什么好处呢？一种答案是发生冲突不一定是身体上的行为。我们今天的争端以其他形式体现出来，但仍然需要勇气和决心，而愤怒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内在动机。不会愤怒的人永远无法领先。另外，今天的世界并非完全不需要身体暴力。即使在富裕且法制健全的发达国家，武力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正如电影《超级战警》所描述的，在未来世界，人类的愤怒情绪完全消失了。当凶险的罪犯由20世纪受到惩罚后的假死状态中恢复过来时，没有人能够制服他。只有当另外一位20世纪的人——一位与罪犯一样会愤怒的警察——复活之后，罪犯才被抓住。

当然，过度愤怒也会造成一些麻烦。公路暴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近年来在一些西方国家，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由于在拥挤的路上开车带来的压力，一些司机的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有时愤怒的司机只是按喇叭，或者咒骂那个惹恼他的人。然而在其他情况下，他可能会跳下车来，将另外一个司机拖到路上，对其拳脚相加以泄愤怒。适当的愤怒是有益的，但过度的愤怒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情绪。情绪的最佳状态是要有合适的度，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甚至性嫉妒在占有和纵容之间也有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见下框）。亚里士多德的整个伦理系统就基于这一简单的观点。他认为美德就是某种情绪的两个极端之间的平衡点。勇气是恐惧感过多或过少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平衡点。友善则处于极端暴躁与谄媚

之间等等。

嫉妒：好还是坏？

与其他高级认知情绪一样，嫉妒的进化是要帮助我们的祖先在复杂的社会群体中生存和繁衍。嫉妒能督促他们对自己的配偶保持警惕，从而帮助我们的祖先确保他们的性伴侣不会出轨。然而，与其他情绪一样，过分的嫉妒不是好事。过多的嫉妒会使人变得暴躁和强横，这会导致同伴的离去甚至死亡。盯梢者往往是那些被抛弃的情人，他们的嫉妒导致他们以极端的甚至是可怕的情感追求以前的伴侣。这种关于嫉妒的反例很容易使人们认为所有的嫉妒都是不好的。如果这样想的话，那就是把婴儿与洗澡水一同倒掉了。过多的嫉妒不好，但过少也不好。如果伴侣从来没有嫉妒的表现，有多少人会认为伴侣是爱自己的呢？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与今天心理学家所说的“情商”非常相似。情商包括在感性和理性之间保持平衡，双方都不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情商高的人知道何时该控制情绪，何时该跟随情绪。情商还包括正确解读他人情绪的能力。人们在流泪时的心情很容易猜测，但是这种信号并不总是这样明显。我们经常试图掩盖情绪，让其他人很难猜出我们的感受，尽管一些本能的动作常常会透露我们内心的想法。通过这种微妙的信号猜测某人的情绪是一种少见的能力，虽然经过练习这种能力可以得到提高。

图10　一位女性嫉妒地看着男人与其他人调情。

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面部情绪表达的识别能力是由特定的神经通路实现的。这些通路包括扁桃形结构等边缘结构。当这些结构受到损伤时，通路被打断，区分不同面部情绪表达的能力就会下降。例如，扁桃形结构的双面损伤降低了人们区分恐惧和愤怒等消极情绪的能力。进化似乎并不只是形成了感受和表达情绪的能力，也给了我们识别情绪的具体机制。

我们现在应该清楚这种机能的用途了。如果没有猜测他人情绪的能力，就会失去许多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的机会，使我们不得不以一种更困难的方式学习——自己摸索。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们也很难判断该相信谁。无意识的情绪信号能帮助我们清楚地判断人的个性。在一个实验中，一群陌生人被随机分成两人一组，他们有30分钟的时间进行交流。然后让他们自己作一个简单的决定，即是否会与此人合作，以及是否会欺骗对方。他们还要猜测另外一个人可能会怎么做。结果准确率非常高。这些实验的研究对象都有正常的头脑，而在相似

的实验条件下，由于大脑损伤导致探测他人情感信号能力消失的人的表现则差得多。

现在我们应该很清楚了，一个完全没有情感的动物不会长久地生存下去。没有恐惧，当它面对走过来的狮子时可能还在考虑这是不是真正的威胁。没有愤怒，它就会受到无情的攻击。缺乏厌恶感，它可能会吞下粪便和腐烂的食物。没有感受愉快和痛苦的能力，它可能什么也不想做——这对于生存非常不利。尽管有着《星际旅行》这样的幻想，但自然永远无法进化出瓦肯人。

道德情操

如果自然真的进化出了瓦肯人，他们可能也不是理想的人。绝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道德行为背后都存在着情感。没有这些情感我们就不会有美德。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很多思想家都强调了情感对于道德行为的根本指导作用。我已经提到过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德是极端情感之间的平衡点的观点。亚当·斯密也将情感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虽然联系的方式极为不同。他认为有些情感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的行为合乎道德而形成的，现在这一观点似乎得到了进化论的支持。斯密将这些情感称为“道德情操”。

在情感与道德的关系方面，其他思想家有着非常不同的观点。霍布斯（Hobbes）认为人类的自然情感总是使我们倾向于做出自私的行为，而唯一能使我们的行为合乎道德的方式就是超越动物本能，按法律行事。康德（Kant）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康德并不否认情感有时可以让我们做出正确的事情，但是他认为受情感驱动的行为并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例如，如果一个人出于恐惧而服从道德律，对于康德来说这就不是一种道德行为。根据康德的观点，使行为合乎道德的唯一方式就是排除情感的因素而服从道德律，就是为了服从法律而服从法律。这种冷冰冰的道德观只适用于瓦肯人。

然而不幸的是，康德的道德观对西方思想有很大影响。一方面，

他提倡的是情感的消极观点，因此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当行为由情感驱动时，就会失掉道德价值。几年前英国一位保守党政治家为这一荒谬的论据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为了驳斥对手关于在社会各阶层重新分配财富的政策，他指责对手是在宣扬“嫉妒政治”。其潜在的理由很清楚：嫉妒是一种情感，而且不是什么好的情感，因此由这种情感驱动而制订的任何政策都是不对的。但嫉妒并非一无是处。事实上它是正义感的关键所在，驱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嫉妒是民主的基础”，伯特兰·罗素曾这样写道。也许它的进化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因为当我们的祖先生活在靠捕猎和采集为生的小群体中时，防止过度的不平等是非常重要的。嫉妒的进化也可能仅仅是促使人们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原因，嫉妒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政治家不能通过立法将其消除。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决定怎样表达这种情感，或者通过财富重新分配政策，或者通过暴力和偷盗。那位保守的政治家是否认为后者更好一些呢？

另一方面，康德的道德观为人们如何进行道德判断也提供了一个误导性的观点。根据道德律理论，当我们要决定哪一种行动更道德时，我们就会针对具体情况用一些普遍规则来判断，就像法官根据拿破仑一世时的法律制度来履行职责一样。这样的观点使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梦想创造一种可以套用规则的机器，使道德判断自动化，最终排除道德生活中的所有不确定因素。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一件事情是对还是错，只要咨询一下自己的道德电脑就可以了。

今天，许多关于道德行为的心理学著作中仍然存在关于道德程序的幻想。大部分关于儿童道德判断能力发展的理论仍然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在于掌握一系列的规则。《星际旅行》再次将这一观点用拟人化的手法表现了出来，尽管这一次的人物是《星际旅行：下一代》中的，而不是来自原初系列。指挥官戴塔是一个酷似人类的机器人，很难看出他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在戴塔的硅脑中是一个只考虑道德行为的特殊软件。在有一集中，这一“伦理子程序”失灵，于是戴塔突然变得不体谅他人，然后精神错乱。

精神病患者确实无法用道德标准来评定，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

少“伦理子程序”。我们多数人所具有的、而精神错乱者没有的道德能力不是基于像电脑程序指令一样的一组规则，而是基于同情、内疚、骄傲等情感。因此儿童道德能力的发展不能用命令或者规则来教导，除非他们的情感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培养。精神错乱者执行规则的能力只会更强。没有道德情操来指导你的道德判断，你遵守的就仅仅是法律条文而不是法律的精神。

第三章

通向幸福的捷径

能够让我们高兴和痛苦的事情太多了。看美丽的日落、做爱、吃冰激凌、听巴赫的康塔塔是四种截然不同的活动，但它们都能引起愉快的感觉。相反，丢失最喜爱的玩具熊、考试不及格、听到所爱的人死亡的消息都会让人感到痛苦。在这种令人迷惑的差异背后是否有任何模式呢？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心理学家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数据库，把能让人感到幸福的事情收录了进去。幸福与愉快虽然不同但却紧密相连。愉快是一种基本情绪，与其他基本情绪一样，每次只持续几秒钟，很少超过一分钟。而幸福是一种心境，它持续的时间很长——从几分钟到几小时。心境是一种背景状态，它能增强或者降低人们对情绪刺激的反应。例如，心情好时更容易对好消息作出高兴的反应，而在悲伤的心境下，反应就不会很强烈。相反，悲伤的人听到坏消息时更容易哭泣，而心情愉快的人对此可能只是一笑了之。焦虑的心情更容易让我们害怕，而烦躁的心情更容易让我们愤怒。

比起愉快，人们对幸福更感兴趣，因为幸福持续时间更长，而且更容易让人产生愉快感。看见美丽的日落产生的愉快感并不比日落本身持续的时间长，但是这种体验可能会让我们连续几小时都处于一种幸福感当中。当心理学家对总体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时，他们调查的是幸福感而不是愉快感。针对生活满意度的几百个调查结果构成了世界幸福数据库（The 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

仔细考察这一数据库，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物质财富并不能让人感到幸福。幸福不能用钱来买这句老话似乎得到了科学印证。当然，有钱可以使你远离那些因为最常见的原因而导致的不幸，如饥饿和缺医少药，但是离获得幸福还相差很远。

然而，今天仍有许多人幻想着物质财富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因此，赢得彩票成了人们共同的梦想。

如果这些人知道对那些大奖获得者所做的研究，这样的梦想可能就没那么普遍了。研究表明，多数人在中奖之后并不是非常幸福。当人们赢得巨额彩票后，很少有人觉得生活满意度提高了，多数中奖者

的幸福感会迅速消退，感觉又回到了中奖之前。以前幸福的人仍然幸福，以前抑郁的人仍然抑郁。

一夜暴富引起的幸福感很少能持久。当最初的兴奋消失后，突然的落差甚至会降低 你的幸福感，至少亚当·斯密这样认为（见下框），尽管最近的研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斯密认为突然的好运气——不管是钱还是别的什么——都可能有副作用。约翰尼·埃斯（Johnny Ace）就是一个例子。约翰尼·埃斯是一位摇滚歌星，1952年他的第一支单曲就荣登排行榜榜首，他也由此一夜成名。接下来的三张唱片也迅速走红。默默无闻的牧师的儿子突然间成为了一位摇滚明星。然而他的运气随后慢慢消失了。虽然他的第五支单曲也很成功，但效果不及前几张。第六张唱片甚至都没有进入排行榜。在1954年的平安夜，约翰尼用一支左轮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开枪自杀了。有人认为是他在摆弄那支枪的时候枪走火了，但更可信的解释是：突然成名使他无法应对挫折，而大多数音乐家在成名前对这种挫折早已习以为常。

亚当·斯密论好运气的危险性

一个人由于命运中的一些突然变化，所有的一切一下子提高到远远超出他过去经历的生活状态之中，可以肯定，他最好的朋友的祝贺并不都是真心实意的。一个骤然富贵的人即使具有超乎寻常的美德一般也不会让人感到愉快，而且嫉妒的情感通常也会妨碍我们由衷地替他感到高兴。如果他有判断力，他就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不会因为自己交了好运而洋洋自得，而会尽可能地努力掩饰自己的高兴，……然而他很难在所有这些方面取得成功。我们怀疑他的谦恭是否真心实意，他自己对这种拘束也逐渐感到疲惫。因此，不用多久他可能就会忘记所有的老朋友，除了一些最卑鄙的人之外，他们可能会沦落为他的扈从；他也不是总能交到新朋友；正如他的老朋友由于他的地位变得比自己高而感到尊严

受到冒犯一样，他的新交发现他同自己地位相等时也会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只有时时刻刻保持谦逊才能补偿对两者造成的伤害。他通常很快就会疲倦，并被前者阴沉的充满疑虑的傲慢神气、后者无礼的轻视所激怒，因此对前者不予理睬，而对后者动辄发怒，最终他变得傲慢，失去所有人的尊敬。如果像我认为的那样，人类幸福的主要源泉来自于感到被爱，那么命运的突然改变就很难对幸福产生多大作用。最幸福的人是逐渐提升到高贵地位的人……”

资料来源：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1759）

如果物质财富和突然的好运不能让人幸福，那么什么能让人幸福呢？根据幸福数据库，最能让人感到幸福的是那些最熟悉不过的事物：好身体、好朋友，以及良好的家庭关系。与父母、孩子和配偶的良好关系是幸福生活的关键。爱一个人、养育一个孩子，这些事情最容易让人感到持久的喜悦。古老的格言再次得到印证。

如果幸福的关键就是得到并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缺乏这种关系就会让人感到悲伤。损失钱财会让人伤心，但是失去所爱的人会更让人痛心。如果悲伤与失去有关，那么最痛苦的事就是失去其他的人：孩子离家、朋友背叛、配偶逝世。

在前面几章中，我们了解到愉快和悲伤的情绪是作为驱动力进化而来的，就像躯体内的胡萝卜和大棒。幸福和悲伤的作用也与此类似。自然选择在塑造人的心灵时并没有让它直接去思考怎样最好地传递基因。但是，它给了我们感受幸福的能力，然后将幸福的体验与那些帮助我们传递基因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恋爱会让我们感到幸福，其原因是那些喜欢恋爱的祖先比喜欢独处的祖先更容易传递基因。

这个观点成立的前提是：那些让我们高兴的事情也能帮助我们复制基因。几百万年以来，情况确实是这样的。早在石器时代以前，我们祖先获得幸福的唯一方式就是做一些有助于传递基因的事情，如交朋友和谈恋爱。然而，在过去几千年中，技术的发展使这一切都改变

了。在所有的动物物种中，只有人类发明了能够人工制造快乐的方式。这些情绪技术缩短了通向幸福的自然之路。我们不用再花几个月或者几年去寻找爱人了，吸毒就可以让我们在瞬间得到快感。我们不一定要做那些帮助我们传递基因的事情才会快乐。我们的聪明才智似乎已经胜过了自然选择。

图11　英国国家彩票的广告宣称“可能就是你”，它利用的就是人们的幻想——物质财富会带来终身幸福。

把抑郁说出来

我们祖先创造的第一种情绪技术是语言。人们以各种方式通过语言来人为地激发幸福感，这些方式对遗传并没有明显的益处。这里我会提到三种方式：安慰、娱乐和“释放”。前两种使听者受益，后一种使说话人受益。

早在我们的祖先学会交谈之前，他们可能就已经用拥抱和爱抚来互相安慰了，但是语言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安慰方式，即用言语表示同情或提出建议。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发现语言是抗抑郁的良药。这一方法存在了许多年，现在几乎成为了一种本能。当朋友情绪低落时，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通过聊天让他们高兴起来。当我们情绪低落时，也会自然地通过语言来自我调整，对自己说一些鼓励的话。由阿龙·贝克（Aaron Beck）在20世纪60年代创建的认知疗法就是基于这种内心独白的一种心理疗法。认知疗法的创新之处在于它试图将这一过程系统化，但是，通过和自己对话来自我安慰这种做法可能与语言一样古老。

认知治疗师会教给人们如何识别自己的消极思想，并且用更积极的想法来代替它们，从而使人们成为情绪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一做法隐含着一个古老的观点，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情绪可以影响思维也可以被思维所影响（下一章会进一步探讨）。通过努力克服消极的思想，鼓励积极的思想，我们可以学到一些控制情绪的方法，从而凭借意志的力量使自己走出忧郁的阴影。但这种方式不是任何时候都行得通。有时我们牢牢地被情绪所控制，无法再有任何其他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认知疗法并非总能奏效。对于稍感沮丧的人来说，建议她换个角度看问题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对于严重抑郁的人来说，这种建议就显得很轻率。告诉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要积极地思考并不能让他乐观起来。

认知疗法并不是给一些轻率的建议，而是教给人们识别和消除消极思维的具体方法。加上训练有素的治疗师的辅导，认知疗法可以像“百忧解”等抗抑郁药一样有效。然而，尽管认知疗法宣称拥有种种

具体的治疗技术，我仍然怀疑发挥作用的并非治疗师的建议，而是同情的表达。

另一种用语言使人们高兴起来的方法是讲故事和笑话。故事迎合了我们对社会信息的需求。尽管故事是虚构的，但它也能够满足这种演化出来的兴趣。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奇怪的。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观点——语言的进化是为了让我们的祖先交换其他社会成员的信息，那么获得这样的信息能否引起满足感应该取决于是否相信其真实性。追求虚假信息并从中获得满足并不能让我们取得进化上的优势，但人们对故事和戏剧的喜爱似乎说明了他们能从这些虚构的信息中获得满足。笑话迎合了人们的幽默感，它给人类进化带来的好处就更加神秘了。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认为，故事和笑话之所以能让我们高兴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即讲述者的智慧。当某人讲故事时，他是在吸引人们关注他的创造力。当某人讲笑话时，他是在表现他对这个笑话的理解。因此，讲故事和讲笑话并不是技术而是本能。

第三种与语言有关的情感技术是释放。释放指的是通过倾诉来消除不愉快的情感。安慰和娱乐可能与语言一样古老，但释放则不同，它是一种较新的方式。几千年来，人们可能一直在使用语言来“排解心中的苦闷”，但释放不仅是说出困扰你的想法，而且是要用语言来消除不愉快的情绪。释放这一观点的主要创建人是维也纳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9—1939），他认为将消极情绪说出来是消除它们的唯一 方式。为了理解弗洛伊德是怎样得出这一观点的，我们先来看一看“水力理论”（hydraulic theory），它是弗洛伊德许多观点的基础。

水力学是关于液体在管道中的运行的科学，而情绪的水力理论将情绪看作在脑中循环的精神体液，就像血管中流动的血液一样。当人们告诉你“不要把感情闷在心里”，或者警告说你会被“压爆”时，他们就在无形中认可了这种观点。由于一些液体很容易变成蒸气，“撒气”等有关气体的比喻姑且也可看作是水力理论的一部分。

情绪的水力理论至少可以回溯到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勒奈·笛卡尔

（1596—1650）。笛卡尔将神经看作气压泵，它把“动物精气”由神经末梢传到脑部，然后再输送到各个肌肉部位，这与体液理论非常一致。从希腊时代一直到18世纪，这一理论在西方的医学思想上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根据这一理论，决定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体内的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黑胆汁和黄胆汁。多数疾病被认为是这些体液的失调或者阻塞引起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两千年中放血治疗术如此盛行。

随着笛卡尔将水力原理应用于精神领域，体液医学理论的应用范围就不可避免地由身体疾病扩展到了精神疾病。这在本质上与弗洛伊德创建的精神分析法相同。弗洛伊德明确指出，由于人的精神中充满了里比多（libido）这种精神体液，它也应该被“放血”治疗，就像医生对生病的机体进行放血一样。情绪表达是释放精神体液的正常途径，如果情绪表达受到阻碍，精神体液就会寻求其他出口，从而可能导致危险。

弗洛伊德的一番论证告诉我们，自然的情绪表达一旦受阻，后果将非常严重。如果你生气了却没有将怒火发泄出来，怒气不会自行消散。如果这种怒气没有通过自然出口释放出来，例如朝那个惹你生气的人发火，它就会像有毒的体液一样留在体内，直到后来你向那些无辜的人发火。弗洛伊德认为，如果所有这些情绪表达都受到了阻碍，它将寻求其他宣泄方式，甚至是一些有害的方式，如引起身心失调。幸运的是，还有其他“清除毒素”的方式，它们可以让积压已久的情绪得到释放，而不用违反社会规范或让自己生病。

倾诉的作用好比安全阀，它使心理压力得到释放，就像多余的气体得以从阻塞的管道中释放出来一样。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为情绪的“宣泄理论”。任何能将负面情绪“排出体外”的事都可被称为“宣泄”体验。宣泄（Catharsis）一词源于希腊语，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但那时这个词有着不同的含义，它与情绪的水力理论毫无关系。该词现在的用法源自弗洛伊德，他用“宣泄”一词来描述他所假想的“精神体液”的释放。于是，弗洛伊德无意中使人们误以为情绪的水力理论来自古希腊，这真是大错特错。对于亚里士多

德所说的宣泄一词的确切含义现在仍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撒气”无关。哲学家马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认为宣泄是一种高级智力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情绪与人类活动的关系通过体验和反思过程逐渐清晰起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剧院是进行宣泄的理想去处，也许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以托马斯·舍夫（Thomas Scheff）所说的“最佳审美距离”体验情绪。如果我们被一种强烈的情绪直接控制，我们可能无法从这种强烈的情绪体验中学到什么。相反，如果离情绪事件太远，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感触。戏剧的功能也许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境，使我们能在安全的距离内去体验种种情绪，从而学会今后如何更好地应对。

如果情绪的水力理论不是古希腊时期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宣泄理论也无关，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正如前面所说，这一理论的一部分源于疾病的体液理论和笛卡尔的神经好比气压泵的观点。然而，用语言表达情绪的作用与安全阀类似这一观点则是近期才出现的。自从20世纪初弗洛伊德使这一观点得到普及后，它就日渐盛行，时至今日已成为许多西方国家的共同观点。让我们回头看一下梗着脖子、优越感十足的维多利亚人。在维多利亚时代，“情感素养”（emotional literacy）受到高度的重视。不能公开交流情感的人被认为是心理上不成熟的人、是情绪被普遍压抑的旧时代的产物。然而，心理学家逐渐意识到情绪的水力理论过于简单。自然的情感宣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非常有益，但在其他情况下就会带来危害。

最近的证据表明，如果讨论情感的时机不对，也有可能产生危险。该证据与一种叫做“疏泄”（debriefing）的心理疗法有关。在许多西方国家，创伤事件的受害者都会接受疏泄治疗。每当发生重大灾难，如火车出轨或者劫机事件，咨询师就会与紧急救护人员一起飞到现场。在医生完成对身体创伤的治疗后，咨询师会针对其“心理创伤”进行治疗。治疗包括回忆创伤事件以及说出对这些事件的所有感觉。

疏泄疗法与弗洛伊德经典的精神分析法在许多方面差别很大，但它们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与精神分析法一样，疏泄疗法也是基于情

绪的水力理论，主张把创伤引起的负面情绪说出来，而不要积在心里，这样负面情绪就会烟消云散，不会留下任何伤害。如果情绪的水力理论成立，那么在创伤事件后立即接受疏泄治疗的人应该比没有得到治疗的人的长期症状要少。然而，根据心理学家乔·里克（Jo Rick）的研究，情况正好相反：疏泄实际上会使情况恶化。在对交通事故受害者的一项研究中，乔·里克发现接受过疏泄治疗的人比没有接受过的人在事故发生一年后表现出更多的闪回和恐惧。

随着近几十年来脑研究的发展，我们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说出创伤记忆会使情况恶化。不愉快的记忆不同于未经处理的伤口，如果你不予理睬，它们并不会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溃烂下去。它们会消失，这是一种“消退”过程。相反，如果最初的经历被复述，负责记忆编码的神经通路就会不断被激活，从而阻止消退。谈论旧的记忆并不能使它们消失，反而会让它们更活跃。早在神经科学研究发现消退过程之前，亚当·斯密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他说，“在谈到他们的不幸时”，那些寻求同情的人“激活了对痛苦情景的回忆。于是眼泪比以前流得更快，自己陷入了痛苦的无助之中。”

进化论也对情绪的水力理论提出了一些严肃的质疑。水力模型将情绪视作不惜一切寻求宣泄的力量。就像河水既可以通过正常河道也可以通过分流注入海洋一样，情绪压力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到很好的“释放”，不论是交谈和写作，还是神经症状与艺术创造。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种很奇特的精神设计。为什么自然选择会创造出这样一种变幻莫测的心理能量？头脑的进化使我们能够解决很多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生存和繁衍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定的行为模式——比如逃跑——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捕食者靠近时——会有正面效果，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危害极大，如离开一个可能成为自己配偶的人。如果不同情绪的进化是为了激发不同的行动，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它们在得不到宣泄时会像废品一样“堆积”，更不要说为什么毫不相关的行为可以使它们得到“释放”了。

看来语言并不是通向幸福的最有效的捷径。虽然一些仔细斟酌过的话有时会带来安慰，一个有趣的笑话可以引起阵阵笑声，但它们并

不能治疗严重的抑郁。正如我们刚刚谈到的，把不快说出来未必是舒缓情绪的最佳方法。因此，人类一直在寻求除语言之外的情绪技术，它们会成为更快、更安全的通往幸福的捷径。

感官愉悦

颜色的运用就是这样一种技术。几千年来，人类用极其鲜亮的颜色装扮自己的身体和周围环境，就像巧克力能够刺激味蕾一样，这些颜色刺激着我们的视觉系统。自从第一种人造染料——譬如大约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用来描画身体的红赭石——被发现之后，人类就开始利用鲜亮的颜色来达到影响情绪的目的。

颜色通常不会直接影响情绪。对于有自闭症等精神障碍的人来说，光是看到一种颜色就可能引起一阵心慌，但对于多数正常人来说，颜色是通过影响心情来间接影响情绪的。呆在红色的房间里并不会让人生气，但可能会使人处于一种易被激怒的状态，导致人们很容易发火。为了拍摄一些情节紧张的镜头，意大利电影导演米凯兰杰洛·安托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曾经将餐厅漆成红色，以使演员进入状态。几周后，他注意到使用那个餐厅的其他工作人员变得更有攻击性，有几次甚至打了起来。

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所做的一些实验为颜色对情绪的影响提供了部分强有力的科学依据。他将猴子关在特制的笼子里，这个笼子有两个小间，中间由一条隧道接通。当一个小间亮蓝灯，另一个小间亮红灯时，猴子们都喜欢呆在亮蓝灯的地方。它们也会出于好奇跑到红色的小间里去，但很快就会跑回来并一直待在亮蓝灯的小间里。如果两个小间都是红色的，这些猴子就会在这两处来回跑，哪个地方都呆不下去。红色使猴子们紧张易怒，而蓝色会使它们处于放松状态。

红色和蓝色对人类的情绪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当处于红色光线下时，人们会出现血压升高，呼吸加速，心跳加快等反应。而蓝色光

线的作用刚好相反。在红色的房间里，人们主观上感觉更温暖，但也更易紧张、更易产生攻击性。这些反应不只是文化的产物，两个月的婴儿在蓝色光线下比在红色光线下更容易安静下来，这表明人们对某些颜色的情绪反应是先天的。但是自然选择为什么将我们的头脑设计成这样？对某些鲜艳颜色的喜爱或对其他颜色的厌恶对于祖先的生存有什么帮助？红色具有温暖效应是不是因为我们祖先拥有的两种热量来源——阳光和火——都是这个颜色呢？红色光线会引起焦虑又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它与血的颜色相同吗？

不管我们对颜色先天的偏爱是出于什么原因，自然通常不会只呈现出一大片单色。美丽的落日有时会将整个天空染成一片粉色或紫色，但是自然的美通常是由许多不同的颜色组成的。孔雀的尾巴和美丽的风景在观赏者面前展现出的是不同层次的色彩，而不是像安托尼奥的红色餐厅那样的一大片单色。油漆和光线就是自然色中的一种，它们通过占满人的整个视野来增强颜色的自然影响。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说，人工颜色是“超刺激”。它们对于颜色的选择与自然是一致的，只不过更加浓墨重彩一些，从而达到它们的效果。正如画家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所说，与洛可可艺术霓虹般的光彩相比，自然显得“太绿而且亮度不够”。

然而，一整片单色不一定比马赛克式的图案更有感染力。马赛克图案虽然简洁不足，但极具设计感。与单色对人的情绪影响相比，它的感染力更加因人而异，因此同一张画可能使一个人产生很大的反应，而另一个人则无动于衷。然而，人们的审美倾向还是有一些明显的规律的。当人们在一些抽象画中进行选择时，多数人的喜好是相同的。另外，人们通常更喜欢著名画家的原作，而不是由电脑随意修改过的版本。原作中一定体现了某些特点，而这些特点正好符合人类视觉系统固有的偏好。目前，科学家不知道这些特点是什么，但是那些颇受欢迎的画家一定对这些特点有一些直觉感受。正如风景画家约翰·康斯太布尔（John Constable）所说，绘画是一种科学，画作就是实验。抽象画和具象画都需要画家有足够的技巧，至少要知道哪些实验能够成功哪些不能。

正如不同颜色可以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一样，不同频率的声音也可以谱出一支动听的旋律。与视觉艺术一样，音乐也是一种纯粹生产快乐的技术，它可以直接触动我们的感官。用史蒂文·平克的话说，音乐是一块“满足听觉的奶酪蛋糕”；对于莎士比亚来说，音乐还是爱情的养料，这说明音乐可以引起除幸福之外的情感。

与视觉艺术一样，音乐通过改变心情来间接影响情绪。虽然针对哪些音乐会使人们处于什么心情的科学研究很少，但如今，多数人能体会到从邻居的房间或者路人的随身听里传出的吵闹、单调的音乐会让人易怒。听到这样的音乐通常并不会立即让你愤怒，而是让你的心情慢慢变坏，使你更容易被激怒。同样，超市里播放的轻音乐也不会直接让我们感到高兴，否则就背离了他们的目标，因为超市老板并不希望音乐就能让你感到满足。他们的目的是通过音乐让你放松心情，从而使你更易被某些想法所引发的幸福感而打动，例如买一块昂贵的巧克力蛋糕所带来的快乐。

在这一领域为数不多的科学研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即莫扎特的许多曲子——如《G大调弦乐小夜曲》（Eine kleine Nachtmusik）——都能让听者感到心情愉悦，即使那些并不喜欢古典音乐的人也是如此，这说明好的作曲家能够触及人们共同的音乐偏好，就像好的画家能够触及人们共同的视觉偏好一样。近来的神经科学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听古典音乐时，大脑不同区域的神经元比听相同音符随意组合出来的声音时跳动得更协调。音乐的这一益处仍然是个谜。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视觉系统高度发达，其次就是听觉系统。其他感官系统则相对简单，或者是我们对其复杂性缺乏了解。因此，我们自然会最推崇满足视觉和听觉的情绪技术，而满足其他感官的技术就没那么受关注了。尽管如此，嗅觉、味觉、触觉等感官并未被忽视。虽然香薰治疗师对不同气味的影响进行过一些有趣的分类，但人们对不同气味对情绪的影响仍然知之甚少。气味对情绪的影响是香水工业的基础，从佛教到基督教，许多宗教信徒都会通过熏香使自己进入冥想状态。

图12　音乐是我们创造的最有效的情绪技术之一。

人们对触摸对情绪的影响了解较多。被另一个人抚摸可以使大脑释放出让人放松的天然镇静剂。这一现象可能源于灵长类动物时期，即大约500万年前人类和大猩猩拥有共同祖先的那个时期。同现在的猩猩一样，灵长类动物经常会梳理毛发，每天花很多时间互相清除对方身上的虱子。互相梳理毛发不只是为了清除对方身上的寄生虫，也是可靠的表达友谊的信号。对这种友谊信号的偏爱促使满身毛发的祖

先去寻找朋友。不喜欢别人为自己梳理毛发的个体会发现自己在打斗时没有同盟。

就像我们演化而来的视觉喜好是视觉艺术的基础一样，我们的触觉喜好是按摩术的基础。与美术和音乐一样，按摩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古埃及人会通过按摩进行治疗，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建议医生“在各方面都要有经验，尤其是一定要有按摩的经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按摩一直是替代治疗法的核心之一，在今天，它的治疗价值又在传统医学中得到了体现。

味觉上的情绪技术当然是烹饪。烹饪对自然味道的加工就像绘画对自然色彩和音乐对自然声音的加工一样，它用各种方式加工自然食品，并根据一些经典的食谱将它们组合起来。烹饪将自然食品加工得更加诱人，刺激着我们的味蕾。如果草莓的美味在于甜，厨师可以做出草莓冰激凌等更甜的东西，比草莓更好吃。然而，由于我们没有沿着自然选择所安排的曲折道路去寻找幸福，而是大胆地走了捷径，我们也因此遭到了报复。自然选择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廉价而又简便的方法来吸收糖分，那就是吃甜食，但这也会导致我们摄取过多的糖分。在石器时代并不存在这种危险，因为只有水果中才有糖分，而且是经过稀释的。然而在今天，糖分来自浓缩而成的块状糖果，嗜食甜食会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肥胖症现在成为了许多富裕国家的流行病，其主要原因在于烹饪这一新奇的技术刚好满足了人们对糖分和脂肪的大量需求。

通过刺激味蕾或者在消化过程产生其他化学反应，味觉技术也可以使人产生愉快的心情。巧克力可以很有效地改善情绪，多数含糖的食物和饮料也是如此。然而，研究表明，虽然多数人在吃过巧克力后会感到心情愉快、精力充沛，但这种影响很快就会消失，1小时过后，人们的感觉往往比吃巧克力之前还要差。茶和咖啡也是这样，它们有短期的兴奋作用，然后这种作用会慢慢减弱。多数药品的效果也是一样。事实上，食品和药品[1]（drug）的区分是任意的，时至今日，仍然没有科学根据来区分药品和我们所摄入的其他物质。如果我们摄取某种东西主要是为了作用于精神，而不是满足营养或味觉上的

需求，我们往往就会称其为药品，但是多数食品和饮料都对精神状态有一定 影响。例如，农家鲜干酪和鸡肝都富含色氨酸，它能使大脑分泌出一种叫做血清素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能够让人心情愉快。我的一位兽医朋友曾经给他的狗吃了一周的农家鲜干酪和鸡肝，结果这条狗看上去比平常更兴奋。因此，我们应该将药品看作食物连续体上的一端，而不是单独的一类物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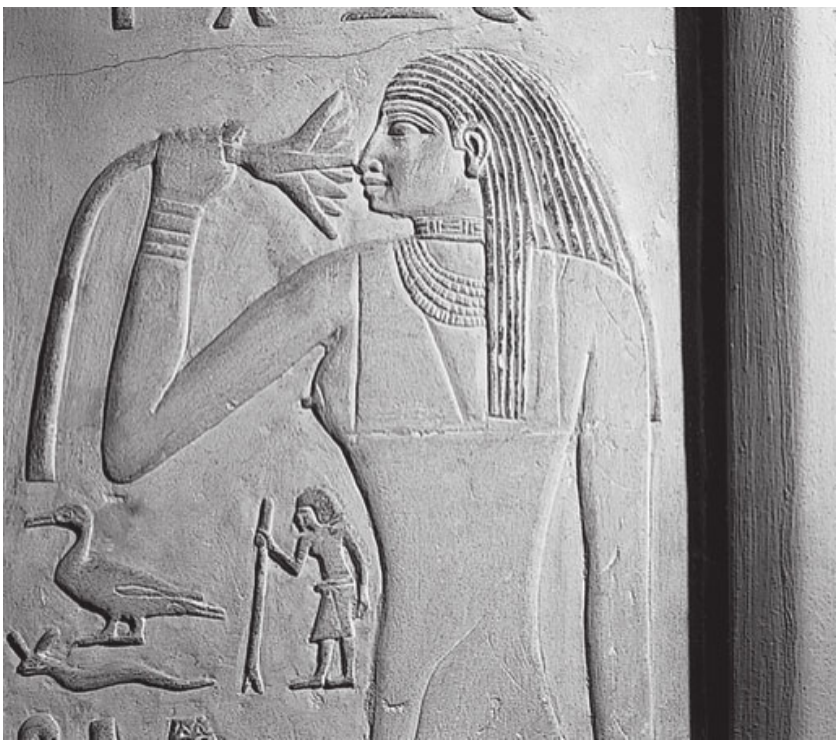

图13　几千年前人类就了解到嗅觉对情绪会有影响。这是公元前400年左右的一幅埃及石刻，图中的女祭司伊哈特在嗅荷花香。

通向快乐的化学途径

药物可能是通向快乐的最快捷的途径。对于那些有严重抑郁症的人来说，通向快乐的唯一途径也许就是化学途径。即使这样，许多人

还是不愿意让医生给他们开抗抑郁药，尽管没有其他办法能让他们有所好转。这些人可以心安理得地喝酒、吸烟、甚至为了消遣而吸食可卡因，但是一旦要用调节情绪的药物来达到治疗目的时，他们就有一种奇特的厌恶感。他们认为抑郁是必须自己去克服的事情，用药物来治疗抑郁会暴露出精神上的懦弱。精神科医生杰拉尔德·克勒曼（Gerald Klerman）创造的“药物卡尔文主义”一词指的就是这种对抗抑郁药物的奇特态度。

无论改变情绪的药物是用于治疗——如给抑郁症患者开百忧解，还是用于娱乐——如在聚会上服用迷幻药，其化学作用都是相似的。百忧解和迷幻药都能提升血清素的水平。这使得一些人提出血清素是情绪的化学基础。根据这一理论，当脑中的血清素水平高时，我们就会情绪高涨，当血清素水平下降时，情绪就会低落。然而，这一简单的假设并非与所有的证据都吻合。尽管有观点认为有自杀倾向者的脑中没有血清素，但并不是所有抑郁症患者的血清素水平都不正常。另外，百忧解等抗抑郁药物就像迷幻药等娱乐性药物一样，它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迅速提升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但它的抗抑郁效果并没有迷幻药的兴奋效果来得快。多数抑郁症患者需要连续两到三周每天服用百忧解才能感到症状有所减轻，而迷幻药只要服用一次，45分钟之内就能见效。因此，情绪不只是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的问题。由于血清素的简单假设非常适合产品营销，各医药公司都纷纷借题发挥。事实上，我们现在仍然不太了解情绪的化学构成或抗抑郁药的作用原理。

除血清素之外，其他的脑化学物质——如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也对情绪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影响这些化学物质的药物也可以用来改变人的心情。可卡因和安非他明可以提高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因此这些药品会让人产生兴奋感。其他药物，如氯丙嗪，虽然也可以像可卡因和安非他明一样快速提高这些化学物质的水平，但并不能同样迅速地产生兴奋感。因此，情绪的神经基础一定更复杂，远不只是有多少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问题。

与巧克力、茶和糖一样，多数娱乐性药品的对情绪的改善作用只

是暂时的，当人们从这种快感中清醒过来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的痛苦。你也可以在第一次快感消失前再用一剂药，但是，快感维持的时间越长，清醒之后就越痛苦。为了无限制地推迟这种快感的消失，有些人成为了瘾君子，持续服药以维持永久性的快感。这样，服药就成为了生活中唯一有价值的活动，因为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詹姆斯·奥尔兹（James Olds）曾做过一个实验，他把一只老鼠放在笼子里，笼中有一个与导线相连的杠杆，而老鼠脑中的奖赏中枢被植入了一个电极，每当老鼠按压杠杆时，导线就会向电极通电，受到电极刺激的鼠脑就会分泌出一阵多巴胺，就像人类吸入了一撮可卡因一样。不用多久，老鼠就开始不停地反复按压杠杆，无视周围的一切，甚至食物，完全就像一个吸毒成瘾的人。

当成瘾者的身体和脑适应了药物之后，他们就需要更大剂量才能获得同样的快感。大剂量药物进入体内带来的长期影响会严重危害身体的各个器官。长期有规律的吸食可卡因往往会导致鼻窦炎、流鼻血、鼻隔膜穿孔，最终导致心力衰竭、中风和精神病。酒精是最容易上瘾的物质之一，它几乎影响到所有的器官，因此酒精上瘾者得肝硬化、胃癌、心脏疾病和健忘症的概率更高。而香烟中的其他物质——如焦油、二氧化氮等——对身体的危害比尼古丁还要大，它们能够诱发心脏疾病和肺癌。滥用迷幻药的长期影响还是未知的，但是它可能增加患抑郁症和老年痴呆症的危险。

通过控制自己的习惯，多数药物使用者可以避免这些危险。正如多数饮酒者不会成为嗜酒者一样，许多使用大麻、迷幻药和可卡因的人也没有成为瘾君子。任何成瘾物，无论是香烟和茶，还是可卡因和海洛因，只要适当注意就可以正确使用。在19世纪晚期，许多有地位的人都在服用可卡因，特别是那些含杂质的，原先的可口可乐中就含有这种成分。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子常常在伦敦各地的聚会场所中吸食鸦片。夏洛克·福尔摩斯也注射吗啡。人们今天对这些成瘾物的过度紧张主要是由于当前的监管部门造成的。

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即使是最新的策划药（designer drugs）也有除治疗以外的其他作用。百忧解在减轻抑郁的同时会增加焦虑，

至少在前几个星期的治疗中是这样。服用百忧解还会使人难以达到性高潮（尽管这未必是件坏事）。其他轻微的副作用包括：情感上的麻木和疏远，对他人情感需求的敏感度降低。因此，作为通向快乐的捷径，精神药物是把双刃剑，如果我们能负责任地恰当使用，它们就会为生活增添光彩。但是，对那些毫不警惕的人来说，就会有上瘾（甚至是被捕）的危险。

与语言、色彩、音乐一样，药物是一种古老的情绪技术。酒精是最近5,000到6,000年前才发明出来的，而考古证据表明，早在这之前人类就开始使用其他精神药物了。这些物质的使用最初与宗教典礼和其他仪式有关，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用于享乐。1,000年以前，印加人限制古柯叶的使用，只有皇族和牧师才能使用这些可以提炼出可卡因的叶子。

无论一个人使用药物是为了享乐还是为了作用于精神，药物对情绪的影响基本上是稳定的。神圣的种子可以让穴居人得到快感。如果这些物质对于情绪没有影响，将它们用于宗教就毫无意义了，因为情绪是宗教体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宗教体验所激活的大脑区域与迷幻药所激活的区域是一样的。与冥想和祈祷相比，通过服用药物来进入状态不一定就是不够虔诚。反过来，不信教的人也可以通过冥想等“宗教”行为来达到稳定情绪的目的。

情绪的身体技术

冥想可能是调节情绪的最安全的技术之一。东方的冥想形式包括长时间的静坐、排除杂念以及均匀呼吸，这在许多方面与西方新近发明的一些放松方法类似。今天这些新奇的疗法和几千年前就已存在的方法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穿上了一层科学的外衣。

冥想和放松通过身体反馈来达到平静心情的目的。均匀的呼吸和肌肉的放松有助于使思想处于宁静状态。不同的躯体动作或姿势可以引发不同的情绪。跑步可以让人处于兴奋的精神状态，作出某种面部

表情可以让你感受到那种表情所表达的情绪。所有这些通过身体动作引发某种情绪的方法都可以被称作情绪的身体技术。

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882年所指出的，情绪的身体技术对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情绪工作原理提出了质疑。按常理来说，情绪产生于身体动作之前，是身体动作的起因。出汗或者微笑等身体活动是情绪的表达，而不是它的原因。例如，我们看见一只熊时会马上跑开，这是因为看见熊而产生的害怕情绪会促使我们跑开。然而，当我们用冥想来获得宁静时，或通过跑步来让自己感到高兴时，情况则刚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通过身体动作来引发某种情绪，而不是通过情绪来改变身体动作。

詹姆斯指出，身心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有一种。通过某种反馈机制，身心之间可以相互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反馈而得到增强。詹姆斯将身体描述为精神的“音箱”，就像吉他的音箱可以放大弦音一样，身体动作也会强化某种情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努力改善自己的情绪”。詹姆斯以他独有的文采对此进行了描述：

> 逃跳会让人更加惊恐，陷入悲伤会让人更痛苦。每一声哭泣都会使悲伤更加强烈，使下一声哭泣更加悲痛，直到筋疲力尽的机体最终平静下来。

而情绪的身体技术表明：我们可以通过主动控制身体变化来对情绪加以控制。如果哭泣使悲伤更加强烈，那么忍住眼泪应该会让我们平静下来。詹姆斯这样写道：

> 如果我们希望控制自己不愿有的心情，我们必须狠下心来，努力用身体动作来表现出我们所希望拥有的那种情绪……抚平眉毛，睁大眼睛，收紧背部而不是腹部，提高音调，由衷地赞美他人，如果你的心还有被融化，那它就真是铁石心肠了！

有证据表明这种方法是有用的。我在第一章中曾提到研究面部表情的人类学家保罗·埃克曼，他在开发一种面部肌肉动作测量术时就遇

到了这种情绪的身体技术。埃克曼和他的同事华莱士·弗里森发现，当他们作出某种面部表情时，他们能强烈地体会到这种表情背后的情绪。在后续实验中，他们一步步地教被试作出几种基本面部表情，而被试并不知道这些动作最后会形成何种表情。当他们问被试是否体会到某种感情时，这些人的回答与该表情所表现的情绪完全一致。

当然，这也是有限制的。强迫自己微笑并不能让自己更快乐——尽管有些自助书籍会建议你这样做——这是因为情绪表达牵动的许多肌肉运动都无法自主控制。例如，当你自发地微笑时，眼睛周围的视轮匝肌（*orbicularis oculi*）会收缩，两颊会向上提升，使皮肤向鼻子处皱起。由于这一肌肉不容易被自主控制，因此我们很容易区分真心的微笑和假笑。仅是嘴角上扬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快乐表情，因此这样做也不会让人产生快乐的感觉。

然而，可以自主控制的肌肉和无法自主控制的肌肉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通过瑜伽或者生物反馈技术，人们可以有意识地控制那些不受意志支配的功能。如果我们能加强对身体的自主控制，情绪的身体技术不仅会比前面提到的其他技术更安全，也会更有效。

许多情绪的身体技术不仅能暂时改善心情，从长远来看，它还会使我们的人生观更积极。出去跑一圈可能会带来短暂的愉悦感，但是每天跑步就会提升整体的健康水平，这种健康水平能有效地反映出人们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运动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影响情绪的身体技术，舞蹈也是如此，它能改善人的情绪。毒品则不同，它虽然能带来短暂的快乐，却牺牲了长久的幸福，而情绪的身体技术无论从短期和长期上来说都是有益的。

图14　锐舞派对：它们是通向快乐的终极捷径吗？

运动和舞蹈不仅能让参与者更快乐，如果舞姿优雅，技巧娴熟，旁观者也会更快乐。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一些祖先更愿意和行动矫捷的人交往或做爱，因为与石器时代的那些“沙发土豆”们相比，行动矫捷的人更有可能养育出健康的后代。观赏性运动和表演艺术就利用了这种对技巧和灵活性的先天喜好，正如绘画利用的是我们对某种色彩和形式的偏好一样。

在选择通向快乐的捷径时，我们并非只能选择一种情绪技术，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价值观进行筛选并予以结合。浪漫派艺术家就非常推崇不同艺术形式的混合，并且创造出“通感”一词来形容这种混合。歌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把戏剧、诗歌、音乐、歌曲、舞蹈、绘画结合起来，打造出一场感官上的盛宴。电影、音乐剧、电子游戏都是更为现代的通感组合。然而，对感官最强烈的刺激形式则非锐舞莫属。

在锐舞派对上，情绪技术的全部领域——语言、感觉、化学、身体——结合起来产生一种极端强烈的愉悦感。旋转的彩灯刺激着人们的视觉，强烈的节奏冲击着心脏，迷幻药使大脑冒出大量血清素，提

神饮料中的咖啡因使人情绪高涨，狂野的舞蹈让人精神恍惚。如果某人的旅行不愉快，温柔的言语可以让他平静下来。如果肌肉酸痛，替代治疗师的按摩可以缓解这一症状，这些治疗师有时也会出现在一些更注重精神的锐舞派对上。这也再次证明了情绪技术的结合并不是新事物。人类自出现以来就经常聚在一起跳舞和服用药物。派对可以称得上是通向快乐的终极捷径。

注释

【1】 本书中的药品一词着重强调作用于精神的药品，包括毒品在内。——译注

第四章

头脑和心灵

基本情绪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多数——如果不是全部——高级认知情绪也是很短暂的状态。在绝大多数时间内，我们不会被恐惧所控制，也不会沉迷于爱。在这种中间状态下，我们通常可以进行逻辑的思维。由于头脑清醒，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蹩脚的论据。然而，当我们的情绪变得汹涌澎湃，或者完全沉浸在某种心情中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此时头脑就成为了心灵的奴隶。

长久以来，情绪对认知能力的影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著作中指出："情感会促使我们发生变化，并且能够改变我们的判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验研究帮助我们确认了这些影响的本质。本章讨论了与注意力、记忆力和逻辑推理能力这三种认知能力有关的一些研究。

精神聚光灯

心理学家把能够集中在某一思想或行动上的能力称为注意力。它就像是头脑中的聚光灯，指向不同的精神活动。即使我们的脑中有数百件事情，我们也可以使聚光灯在同一时间内只集中在几件事情上。当我们完全沉浸于某件事中时——如一个字谜或者一道难题——我们就不会想其他事情。如果我们突然被一个大的声音所惊扰，恐惧就会使聚光灯转向新的事件上。

聚光灯的聚光程度可高可低。当程度最高时，很强的光就会射在很小的区域上。当不聚光时，它可以照射很大一片区域，但是光线较弱。注意力也是一样。当我们处于放松状态且不受任何情绪制约时，注意力就不会太集中，更多的思想就会跳入我们的意识。然而，当某种情绪出现时，注意力就会突然集中在某个小的念头上，将其他想法排除在外。这种念头能够反映出引起该情绪的外界事物。例如，当我们害怕时，注意力就会集中在让我们害怕的事情上；当我们愤怒时，注意力就会集中在惹恼我们的事情上。爱使我们除了爱人以外无暇顾及其他。我们常埋怨情绪会让人分心，因此，情绪有助于人们集中注

意力这种说法听起来就很奇怪。事实上，这并不矛盾；我们从一个念头上分心就是为了把注意力放在另一个念头上。

注意力也会受到心情的影响。我们讲到过，心情与情绪是不一样的。心情持续的时间更长，它通过调节人们对情绪刺激的感受性来影响情绪。然而，与情绪一样，心情也能迫使人们集中注意力，尽管不如情绪的作用明显（快乐的情绪可能是一个例外，它能够扩大人们的关注范围，使人们的注意力不那么集中）。处于焦虑状态的人常常会为自己的安全而忧心忡忡，但是与处于恐惧状态的人相比，他们还能够想一些其他的事情。

与情绪一样，心情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引起这种心情的事情上。当处于易怒状态时，我们可能会为最近的那些烦心事而闷闷不乐。然而，有时一种心情可能会使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无法集中注意力。我们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焦虑。这种“飘忽不定的”焦虑也会影响到注意力。它会清除我们头脑中的一切想法，使我们关注周围的世界。如果我们深夜走在一条黑暗的小路上，焦虑的心情会使我们对周围的任何动静都保持警惕。

在这种情况下，焦虑显然是有益的。心情焦虑的人会对可能的威胁保持警惕，因此他们会对潜在的危险作出更迅速的反应。当然，这些威胁不一定是身体上的。任何妨碍你实现目标的事情都可以看作是威胁。如果你的目标是在好朋友的婚礼上作一番精彩的发言，你最大的威胁可能就是紧张时会口吃的毛病。因此，焦虑的心情会让你对讲话中最细微的停顿都十分警惕。一旦发现了这样的停顿，你就会更加焦虑，你会发现自己紧张不安，说话也结结巴巴。在这种情况下，焦虑就会起到反作用。

心理学家用一种名为“斯特鲁普情绪测验”的实验考察了焦虑对注意力的影响。最初的斯特鲁普测验与情绪无关，它的实验方法是给人们看不同颜色的墨水印出的字，并让人们说出墨水的颜色，然后统计出字出现在屏幕上的时间与个体给出正确答案时的时间差。这个实验的秘密就在于：有些字就是颜色的名字，而有时候字的墨水颜色与该字所代表的颜色不一致。出现这种情况时，人们就会感到困惑，反应

时间也会比较长。当墨水的颜色与字所代表的颜色一样时——例如用红墨水印出“红”字，人们说出墨水颜色所花的时间更短。

斯特鲁普情绪测验使用的词不是颜色的名字，而是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与原来的斯特鲁普测验一样，这些词也是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印出的，实验对象的任务就是说出墨水的颜色。与那些中性词相比，当个体看到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时，他们反应的时间更长。当然，不同的词的感情色彩也因人而异。和强奸相关的词对于强奸受害者来说感情色彩就更浓一些。这一点在斯特鲁普情绪测验中有所表现。一项研究发现，当强奸受害者看到与强奸有关的词时，他们说出词汇颜色的时间比其他人要长。这表明：人们在看到与创伤体验有关的词时会产生焦虑感，这种焦虑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词的意义上，从而忽略了附带的细节，如这个词的颜色。

情绪和记忆

除了影响注意力以外，情绪和心情对记忆也起着重要作用。与注意力一样，记忆也具有高度选择性。我们只能记住自己所经历的一小部分事情。由于记忆空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需要节省空间，只储存少量的记忆，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尽快忘记，否则生活就会异常痛苦。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博闻强记的富内斯》这个故事中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名叫伊雷内奥的男孩坠马后不幸瘫痪，他的大脑也由此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他的记忆变得准确无误。从那时起，他能清楚地记住每一个景象和声音。不用说，这使他的生活很痛苦（见下框）。

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他记得1882年4月30日黎明时分南面朝霞的形状，并且在记忆中与只看过一次的皮面精装书的纹理比较，与克夫拉乔暴乱前夕船

浆在内格罗河激起的涟漪比较。这些并不是单纯的回忆，每一个视觉形象都与肌肉、冷暖等等的感觉相连。他能够再现所有的梦境。他曾两三次再现一整天的情况，从不含糊，但每次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他对我说："我一个人的回忆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的回忆的总和。"……
然而，我认为他思维的能力并不强。思维是忘记差异，是归纳，是抽象化。在富内斯的头脑中，有的只是触手可及的细节。

记忆并不是按照事情的细枝末节来储存的，而是根据几个关键词来分类保存。当我们要回忆什么事情时，就会提取几个关键词，然后根据经验来猜测，从而填补空缺。因此，回忆永远不会是精确的。回忆的过程更像是由几块碎片重新拼起一个古董罐子，而不是重放一部老电影。有时我们的回忆非常鲜活，让我们感觉像是在重新经历那一事件，但这只是一种幻觉，是我们在想象中进行重构的结果。当我们对同时、同地、经历相同事件的人的回忆进行比较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叙述有很大差别，但每个人的叙述对于本人来说都非常生动而真实。

在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预知死亡纪事》中，一个男子回到了几年前曾发生过凶杀案的村子。在和村民交谈时，他发现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记得这次凶杀案。然而，他们的记忆各不相同。村民们用不同的关键词将那个事件储存在记忆里，在回忆时运用自己独特的想象力来填补空白。很显然，被害者的亲友与他的那些泛泛之交以及死对头们对凶杀案的回忆是不同的。这说明情绪在记忆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既影响到事件的存储方式，也影响到回忆时对事件的重构。

事件发生时的情绪和回忆时的心情都会影响到回忆的难度和准确性。弗洛伊德认为，人们会"抑制"一些不愉快的记忆，因此这些记忆很难再重现，但事实上刚好相反。创伤性的记忆并不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会退回到大脑中的某个角落。相反，它们会执意闯入我们的

意识，在我们想要忘掉时困扰我们，甚至在梦中惊扰我们。这种情况严重时就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症状的特点是鲜明的闪回，使个体重新经历那些痛苦的细节。

情绪会使人们对事件的记忆更深刻。任何产生强烈情绪的事件，不管是消极情绪还是积极情绪，都比中性的事件回忆起来更容易、更准确。在一项研究中，三组学生观看了一组15张的幻灯片，每张幻灯片都是你在走路上班时可能看到的情景。每组学生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幻灯片，只有第8张不同，这一张有三个不同的版本（见图15）。

一个版本是一位女士正在骑自行车。另一个版本则是这位女士将自行车扛在肩上。在第三个版本中，这位女士躺在路边，自行车倒在一旁，像是被汽车撞倒了。在让学生回忆这些情景时，看到女士躺在地上的那一组比其他组更清楚地记住了这位女性的外衣颜色，但他们对其他细节的记忆则不太清晰，如远处汽车的颜色。这表明与中性事件相比，人们对情绪事件的核心特征记得更清楚，而那些次要的特征很快从记忆中消失。

回忆的难度和准确性还受到回忆时的心境的影响。心理学家戈登·鲍尔（Gordon Bower）所做的很多实验表明，在我们心情好时，回忆愉快事件比回忆不愉快的事件更容易、更准确。心情不好时则刚好相反。这一现象称为“心境一致性记忆”。在实验中，鲍尔让人们任意回忆并描述童年时发生的事件。第二天，当这些人处于中性心情时，鲍尔让他们将这些事件分为愉快的、不愉快的、或者中性的。第三天，他用催眠术使每一个人出现高兴或者悲伤的心情，然后让他们回忆尽量多的事件。鲍尔发现心情高兴的人回忆了许多愉快事件，只有极个别的不愉快事件；而心情悲伤的人则记起了更多不愉快的事件。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心境一致性记忆现象：当事件储存在记忆中时，它们被贴上了情绪的标签，以此来表示经历这一事件时的情绪。当我们从记忆中提取这些事件时，与当前心情一致的标签就会更突出。基思·奥特丽（Keith Oatley）和珍妮弗·詹金斯（Jennifer Jenkins）认为，回忆起与当前心情一致的事件有助于我们更从容地应对当前的情景。

图15　上一页介绍的实验中的第8张幻灯片，它有三个版本。

对人和观点进行评判

情绪和心情不仅会影响注意力和记忆力，它们对决策和判断也会产生很大影响。例如，我们对一个人的评判通常和遇见这个人时的心情有关。心情好的人对同一个人的判断可能比心情差的人更正面一些。在一个实验中，实验者通过告诉一些学生他们在模拟考试中的成绩好坏来人为地引起积极或消极的情绪，然后让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一些问题——如“你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去面试别人。而这些学生并不知道被面试者也是实验人员，这些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而且故意回答得很模糊，既表现出自己积极的一面（“我很友好”），也表现出了消极的一面（“我很固执而且没有耐心”）。然后，面试官要从个人和专业背景上评价应聘者。结果显示，虽然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但心情好的面试官对应聘者的评价更积极，他们更有可能雇用应聘者。

不只是快乐和悲伤的心情会影响我们对他人的判断，焦虑也会影响我们对他人的态度，但它的影响方式却很奇特。焦虑的心情不仅不会让我们对陌生人有消极的看法，反而会让我们对陌生人感到更亲近。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著名实验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实验如下：几名男子在穿过一座很高、很危险的吊桥时被一位年轻女性拦住了，她想邀请他们做一个调查。随后，这位女士发给他们一张写有自己电话号码的卡片，并且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进一步向她询问。当天晚些时候，她又在一座更低、更安全的桥上重复了上述实验。接下来的几天，在危险的吊桥上遇到的那些人打来的电话更多。焦虑似乎使他们更友好，甚至会对彼此产生好感。

焦虑的这种联结作用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被绑架的人质会深切地关心绑架者这一奇怪现象。虽然人质与绑架者在短时间内的近距离相处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更有可能的是人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焦虑感强化了这种关心。1914年的圣诞节，英国和德国士兵离开战壕在一起踢足球。这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虽然有可能是杜撰的，但是它也说明了焦虑的联结作用。焦虑和好感并存似乎与常识不符，但也有一定道

理，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面临危险时联合起来，这样会更安全。

心情除了影响我们对他人的判断，也会影响我们对蹩脚论据的接受程度。这种影响不仅与个体听到该论据时的心情有关，也涉及他有多少时间来思考这个论据。当人们心情平静或者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时，蹩脚论据就不具备说服力，但当人们心情好并且没时间思考时，人们就很容易被站不住脚的论据所影响（而较少受到坚实论据的影响）。这表明在心情好且时间紧的情况下，人们似乎不得不走捷径，通过背景线索——如论证者的地位——来判断是非，忽视了逻辑分析。

为了检验这一观点，黛安娜·麦凯（Diane Mackie）和莉拉·沃斯（Leila Worth）对美国学生进行了小测试，看他们是否赞成加强对枪支的控制。实验者给一半学生看了5分钟的喜剧，唤起了他们积极的情绪。其余学生观看了一段关于酒的中性节目片断。随后，实验者向两组学生出示了有关枪支控制的观点，但他们出示的观点和两组学生所持的观点刚好相反。赞成加强枪支控制的人看到的是反对的观点，而反对枪支控制的人看到的是赞成的观点。在这个实验中，有一半学生读到的是站不住脚的论据，而另一半读到的则是有理有据的逻辑推论。一些学生被告知这些观点来自一位专家，其他人则被告知这些观点来自一位一年级学生。另外，有些学生只有很少时间来读，而其他学生则有足够的时间。在学生看完这些论据后，实验者再次对他们进行了测试，以观察他们对枪支控制的观点是否有所改变。

实验表明，坚实的论据比蹩脚的论据更具影响力。但是，对于那些心情好且时间紧张的人，这一差异非常小。他们认为二者在说服力上相差不大，而其他组则认为蹩脚论据的说服力远远不够。进一步考察发现，心情好且时间紧的一组更看重论证者的地位。无论心情好坏，那些可以自己掌握时间的人都认为蹩脚论据的说服力更小，这似乎表明时间是关键因素而不是心情。然而，当麦凯和沃斯比较时间充裕的两组人实际用掉的时间时，他们发现心情好的人比心情坏的人花了更长 的时间。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好心情使人更易被蹩脚论据所动

摇，但是多数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当思辨的力量由于快乐而有所减弱时，他们会主动用时间来进行弥补（见图16）。

麦凯和沃斯的研究表明：对于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判断。一种方式慢而准确，另一种方式快而粗糙。前者主要依赖逻辑，后者主要依赖情感。因此，理智与情感可以看作是人脑的两个互补系统，共同帮助我们作出决策。当准确度是关键、并且时间和信息充足时，我们就可以用慢而准确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当时间和信息不充足、或者准确度不是关键问题时，我们可以转而采用跟随感觉这一快捷的方式。

然而，我们有时也会使用错误的系统。我们可能会高估自己所拥有的时间和信息，或者过于重视决策的正确性，结果对一些本应跟随感觉的事情进行了理性分析。神经科学家安托尼奥·达马索（Antonio Damasio）就讲述了一个他的病人的故事。由于脑损伤，这位病人会不由自主地过度运用理性思维。在一次检查后，达马索向他确认下次见面的时间。达马索提出了两个相隔不远的日子，于是这位病人拿出了日历，开始列出在这两天见面的优缺点。他几乎花了半个小时权衡了这两天可能出现的天气状况、需要取消的其他约会，以及其他许多相关因素。达马索耐心地听着，最后小声建议这位病人选择第二个日期。“好吧，”病人微笑着说，把日历合上，好像什么怪事也没有发生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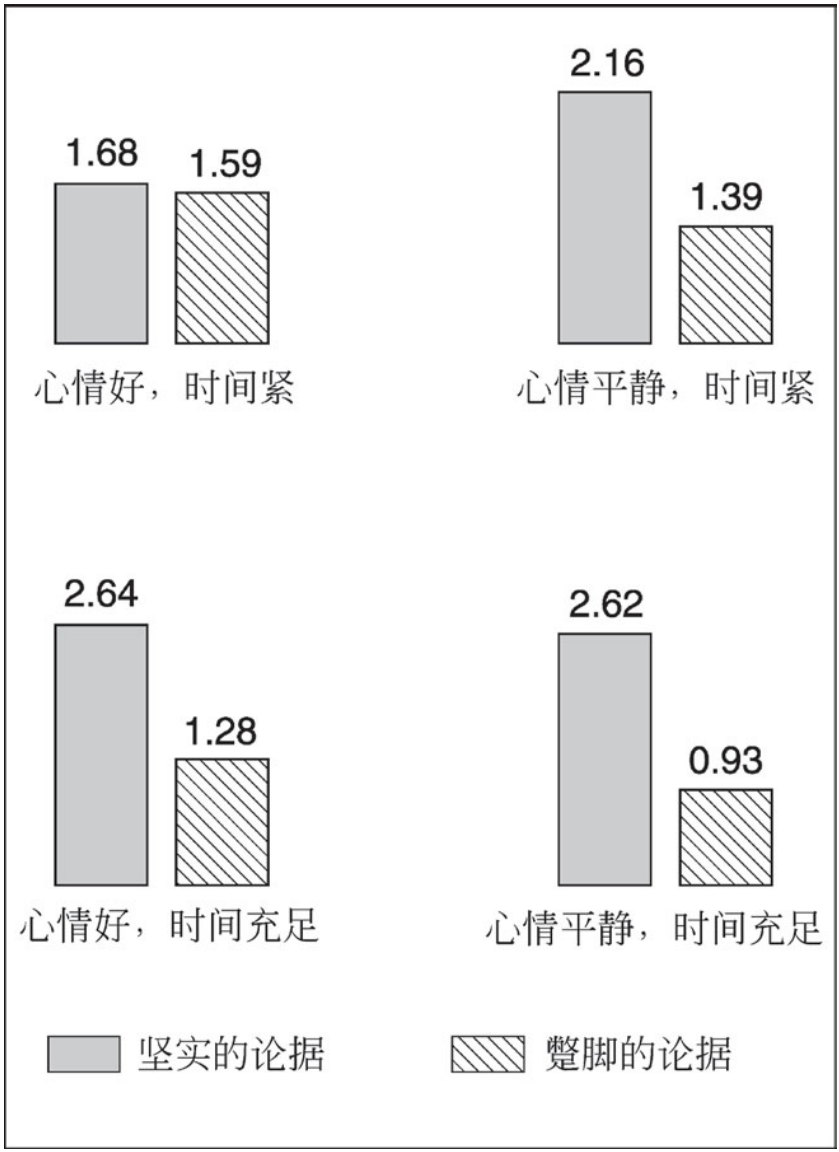

图16　黛安娜·麦凯和莉拉·沃斯的实验结果图。心情好且时间紧的人认为蹩脚的论据几乎与坚实的论据一样具有说服力。其他组的人认为蹩脚的论据说服力很小。柱的高度和数字大小代表了他们对这两种论据的说服力大小的看法（柱越高，数字越大，证明该组认为论据越有说服力）。

这则故事表明，当决定并非至关重要时，我们最好节约时间，运

用快而不精确的感性思维，而不是慢条斯理的理性思维。在某些情况下，作出正确的判断非常重要，此时我们最好不要考虑时间问题。例如，当我们要判断一个人是否犯有谋杀罪时，或者想要了解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时，答案的准确性就至关重要，为此我们要准备好牺牲时间。在这些情况下，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就是负面的，因此我们要设法消除这些影响。

人多真的力量大吗？

很多人认为消除情绪对决策影响的方式之一就是使决策过程机构化，使其从个人行为变成集体行为。这样做是希望通过集体讨论，个体的情感偏见能够相互抵消，从而使理性成为判断的唯一基础。人多应该力量大，因为集体的感性成分应当较少。在科学界，同行评审过程可以消除争论各方之间的敌对情绪，通过理性的方式达成共识。如今，在多数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对重要案件的审判不能由法官一个人来进行，而是要由12个人组成的陪审团来进行。这样做也是希望12个人的力量比一个人大，因为12个人的情感冲突会相互抵消，从而使纯粹的理性成为最后的裁决者。

不幸的是，这种把决策过程机构化的想法可能太过乐观了。首先，我们选择根据情感作出决定并不只是因为时间紧。即使时间充足，我们在作出某些重大决定时还是应该把情感放在首位。结婚就是一个例子。当达尔文决定是否结婚时，他在一张纸上列出了两栏，一栏列举了结婚的好处，另一栏列举了单身的好处，然后看哪一栏的列举项更多。这一方法似乎有效：达尔文与他的表妹埃玛·韦奇伍德（Emma Wedgwood）结了婚，这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然而，多数人可能认为这种决策方式过于理性，并不适用于心灵层面的事情。但是，达尔文也并非完全是理性的。在为每一项给权重时，他一定是听从了自己的情感，因为某种偏好所起的作用是无法用科学的计算方法来衡量的。

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信赖最好也基于感觉而不是推理。因不同原因的脑损伤而失去部分情感能力的人很容易被无耻之徒所欺骗。他们不得不完全依赖逻辑推理，这样就使得他们会误信他人，从而酿成大错。而多数正常的人可以清楚地区分值得信赖的人和不值得依赖的人。他们可以通过直觉来很好地判断一个人。扁桃形结构受损伤的人则缺乏这种能力。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谈到的，这一区域是脑中与情感有关的重要区域，因此通过直觉判断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情感过程来掌控的。

因此，当谈到情感会影响理性的决策时，我们不能把它看作一件坏事。基于情感因素作出决定是有益的，这些益处有时我们会意识不到。如果集体决策能 让科学发展得更快，如果陪审团比单个的法官更能 体现正义，其原因可能是集体比个人的情感成分更多 ，而不是更少。陪审团比一个法官能更公平地对被告作出审判的原因也许是十二颗心 比一颗心的力量更大。

心理学家早就意识到社会群体能够扩大情感的力量，但他们并不推崇这一点，而是对此持怀疑态度。在19世纪末期，法国心理学家格斯塔夫·勒邦（Gustave LeBon）描述了人们如何被群体的激情所左右，从而做出独自一人时不可能做出的疯狂举动。根据近期心理学家的推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蛊惑人心者得到并保住权力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利用了原始的“群体思维”，这种思维会使个体理性的声音被集体情感所淹没。集体情感的力量很强大，但是，多数知识分子则惧怕这种未受过教育的群体，认为这种力量是危险的，并不具有解放性。卡尔·马克思却明显不这么认为。

不管这种力量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是具有两面性，我们都需要解释为什么社会群体能使情感得到放大。是不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是服从者，内心里艳羡权威的力量，就像法兰克福学派的心理学家在二战后所提出的假设那样？这种情绪的感染力有更深层的生理原因吗？

有些进化心理学家提出，当我们的祖先无法自己解决问题时，群体的影响可以为他们提供有用的指导。如果不知该如何行动，最好的办法是随旁人而动。这样，别人至少不会笑话你犯的错误，因为他们

也犯了同样的错。标新立异则是一个冒险的策略。当你成功时，别人会羡慕你。但是当你失败时，你就会显得很愚蠢。

同情和建议

为什么我们在一个紧密连接的社会群体里易被“群体思维”所左右？不拘什么原因，似乎都来源于同情这一能力。同情是指感同身受。有人称之为移情，“同情”一词则留作一种语气较弱的表达感同身受的方式，从而保持某种关键性的距离。不论使用什么术语，如果没有这种感同身受的能力，社会群体对情感的放大功能就显然不可能实现。

亚当·斯密将同情视为最高尚的美德之一，在其首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开篇就讨论了这一问题。他对“同情”和“移情”的深刻程度有着同样的赞赏，为情感智慧成为当今潮流奠定了基础。然而，同情也有负面影响。由于同情可以让我们受到他人情绪的影响，因此他人就可以通过激发情感来说服我们。有关情感对判断影响的研究表明，与理性论证相比，唤起情感这种方式在改变思想方面更直接。

到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人已经积累了大量运用情感进行说服的技术和理论。今天，广告商用类似的方法来促使我们购买某种产品。他们可能会用幽默来为我们制造好心情，希望这样会使我们更容易被诱惑，否则他们的叫卖就没有吸引力。广告商还会使我们因为没有买他们的产品而心存疑惧。萨奇（Saki）的一部短篇小说就描写了这样一种场景：某品牌卖相不佳的谷物早餐在做了一次投巧的广告后销量大增。广告中显示了这样一幅画面：一群衣冠楚楚的年轻魔鬼手捧透明碗，碗里盛着该品牌的谷物，被罚入地狱的人由于吃不到而再次饱受折磨，情形十分悲惨。画面下方用粗体字写着一句触目惊心的话：“他们现在想买也买不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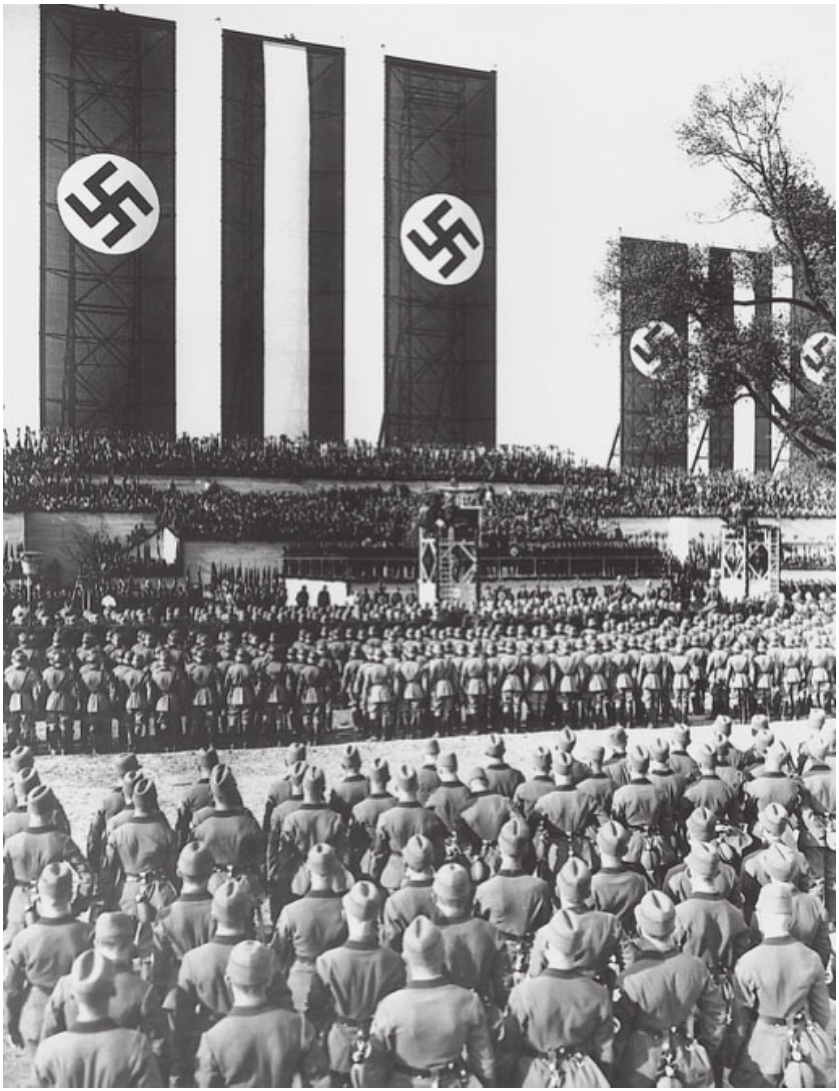

图17　希特勒在1934年5月1日向200万人发表演讲。与许多蛊惑人心者一样，希特勒知道集体情感会淹没个体理性的声音。

潜意识广告就是一种依靠情感力量来影响判断的说服技巧。与许多人想象的相反，多数潜意识广告不是在屏幕上闪出一句话："快买下吧"或"投我一票"，使你来不及思考。潜意识广告的很多形式都会高明一些。"潜意识"指的是有些东西在进入你的头脑中时你没有注意

到；它通过意识阈（threshold，其拉丁语形式为*limen*）下的秘密通道进入你的头脑。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并不需要玄妙的技术。当走过广告牌时，你通常不会停下来仔细看上面的东西，甚至都不会有意识地注意它。但是，就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你大脑中的某一部分也许已经对这一图像进行了加工。大型的广告不用担心其广告词是否缺乏逻辑，它们可以通过感官轰炸来引起大众对产品的熟悉感，从而使广告发挥作用。

熟悉并不一定会招致轻蔑。相反，已知事物会带来一种安全感。和未知事物相比，它带来的威胁更小。哈姆雷特拒绝自杀并非因为害怕死亡，而是因为死之后可能会出现未知的痛苦。喜欢怀旧以及与老朋友相聚也是基于此种对已知事物的偏爱。与大多数情感现象一样，这一先天的保守性也有其缺点。这种保守性再加上强烈的群体认同感会导致各种偏见——从种族主义、仇外主义到种族优越感和宗教偏见。

对熟悉事物的普遍偏爱在心理学上称为“多见效应”。这一概念是由罗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提出的，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的研究使得情绪重新成为认知科学的主流。扎伊翁茨在一系列独创的实验中证明了这种效应。为了表明对事物的偏好可以仅仅基于熟悉性——基于多见——他在屏幕上快速闪过一些图形，使观看者来不及去注意。随后，当被试应要求辨别一组图形时，他们无法辨认出刚才看到过的图形。然而，如果问他们喜欢哪些，他们的选择正是之前见到过的那些。也就是说，在他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大脑的某一 部分已经对那些形象进行了加工。

最有趣的是，如果你问这些被试为什么喜欢那些图形，他们会给出形形色色的理由——某个对称的图形很美，另外一个图形像一张笑脸。但这些不可能是真正的原因，因为其他人对于完全不同的图形也给了类似的解释。人们所喜爱的图形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曾经见过的图形，尽管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见到的。

如果某些事物是潜意识注意到的，通过有意识的回忆就无法记起。然而，它们可以通过无意识的回忆表现出来，正如扎伊翁茨的多

见效应实验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无意识的回忆形式往往会通过某种有意识的感觉表现出来。扎伊翁茨的实验表明，如果潜意识记忆没有被贴上某种情绪的标签——即人们是在中立的状态下注意到这些事件的——那么无意识的回忆系统就会将该回忆归为积极的。由于该实验的被试在注意到那些图形时处于一种中立的情绪状态，这足以使潜意识的感知引起积极的反应。多见效应也适用于熟悉的音乐和食品等其他事物。可以说，人类是被习惯支配的动物。

如果潜意识记忆被贴上了负面情绪的标签，那么情况就不同了。例如，在害怕时无意识地感知到的事情可能就会被贴上负面情绪的标签，储存在无意识记忆中。以后，当我们遇到那件事时，我们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直觉就会告诉我们避开那件事，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见下框）。这种情况会导致不好的结果——如让人丧失行为能力的恐惧症，但也会让我们避免犯愚蠢的错误。

对表情的潜意识反应

在1998年，爱尔兰神经科学家雷·多兰（Ray Dolan）与同事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和阿尼·奥曼（Arne Öhman）发现，大脑可以在无意识和有意识的层次上对面部表情进行加工。在一个实验中，他们给人们看了两张表现愤怒面孔的幻灯片。在放一张片子时，他们播放了一阵令人心烦的“白噪音”，以此使人们对这一面孔的记忆被贴上负面标签，而在展示另一张幻灯片时没有播放任何的声音。

接下来，一张幻灯片很快闪过，紧随其后的是一张面无表情的脸。这称为“后掩蔽效应”，因为人们对第二张幻灯片的感知会覆盖第一张。当他们问被试看到了什么时，他们的回答是第二张幻灯片，而不是第一张。

尽管被试这样回答，他们肯定还是在某种无意识的状态下感知到了第一张幻灯片，因为在展示第一张幻灯片时，他们的脑部活动

会根据那张幻灯片是否伴有噪音而有所不同。换句话说，他们对第一张片子的感知是潜意识 的。右扁桃形结构是识别消极表情的主要脑区，这种识别是无意识的。这样，扁桃形结构再次对无意识的情绪加工起到了关键作用。当你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有一种直觉反应时——也就是当你“看到某人就讨厌”时——这也许是因为你的扁桃形结构在告诉你，这个陌生人酷似某个伤害过你的人，尽管你丝毫记不起这个宿敌是谁。

来源：J. S. 莫里斯，A. 奥曼，R. J. 多兰，“人类扁桃形结构中的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情感学习”，《自然》，393/6684（1998），467-470

有时自然会拿人来做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很残酷。人类可能会因疾病或者事故而丧失有意识的记忆系统。手术失误也会导致完全失忆。不论是什么原因，遗忘症患者的潜意识记忆通常完好无损，我们不需要透过有意识的记忆就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有这样一个著名的病例：一位遗忘症患者无法回忆起她出事以来的任何事情。例如，她认不出自己的医生，尽管每天都会看见他。一天，那位医生进入她的房间时在手掌里藏了一枚很尖的别针。在和她握手时轻轻地扎了她一下，于是她立刻将手抽了回来。第二天，她像平常一样和这位医生打招呼，仿佛是第一次见到他，但这一次她拒绝握医生伸出的手。就像扎伊翁茨实验中的被试一样，这位女士无法解释她为什么 不愿握医生的手，但她就是不想握。由此可见，无意识记忆的表现就像某种情绪一样，即使在她的有意识记忆被破坏后也是如此。

看来，头脑并非总是心灵的主人，但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即使我们自认为非常理性，我们的决策还是会受到情感的影响。当然，心灵也不是完全处于控制地位。与休谟的名言相反，理性并不总是情感的奴隶。有时候我们要排除情感因素才能进行最严密的分析。然而，最理想的情况是既不完全理性也不完全感性，努力平衡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情商。

第五章

哭泣的电脑

科幻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机器终将会有感情。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当哈尔——一台与“发现号”宇宙飞船的宇航员对抗的船载计算机最终电路断裂时，它发出了痛苦和恐惧的声音。在影片《银翼杀手》中，当一个类人机器人得知她的记忆不是真实的，而是由程序设计员输入她的硅脑中时，她痛苦万分。在电影《二百岁的人》中，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扮演的机器人重新设计了自己的电路，使自己能够体验到人类的所有情感。

这些故事取得效果的原因之一就是情感通常被认为是人与机器的一个主要区别。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机器肯定是这样。我们从电脑那里得到的都是像“系统错误1378”那样的反馈，千篇一律，枯燥乏味。这与哈尔痛苦的叫喊声相差甚远。人们有时候会对电脑生气，对它们大喊大叫，好像它们也有感情，但是电脑毫无反应。它们既没有自己的情感，也无法识别你的情感。

科学幻想和科学事实之间的差距看似巨大，但是一些人工智能的研究者现在认为，跨过这一鸿沟只是时间问题。在创造简单的情感机器过程中，情感计算机这一新领域已经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然而，一些批评家认为机器永远不会像人类一样具有真正的感情。他们声称，优秀的程序最多只能让电脑模拟 人类情感，但也仅仅是逼真的模仿。到底谁对谁错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知道情感到底是什么。

你也许会奇怪，为什么我们到了最后一章才给情感下定义。大多数入门书以定义开始 ，但我更愿意将这个任务放在最后，这种做法危害性更小。定义在解决争议时是有用的，但它很容易成为智力的束缚，使人们误以为某个词汇有着一成不变的含义，可以抵御文化变革和科学进步的大潮。简要讨论一下情感“到底是什么”对于我们确定电脑何时可以被称为有情感也许会有帮助，但是我们想出的（一些）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可以修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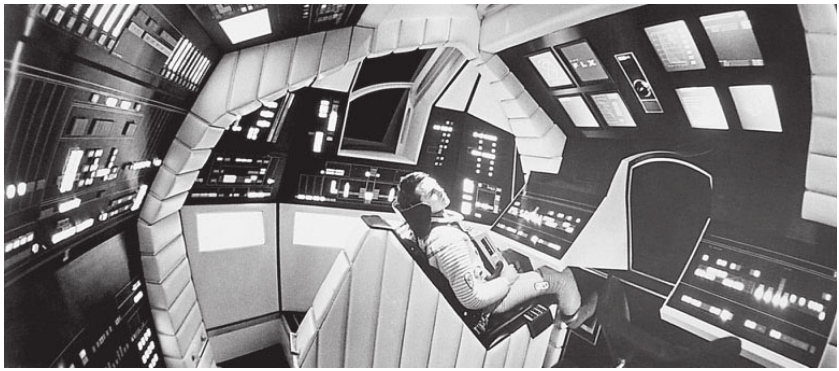

图18　哈尔，《2001太空漫游》中的宇宙飞船上的计算机。

我们可以用几种方式来构建情感的定义。一种是以神经生物学为出发点，另一种从行为方式的角度来下定义，第三种则以功能为标准，根据情感在精神领域中的作用来下定义，最后一种把主观感受作为情感的本质。最常见的定义方式就是最后一种，至少在公众心目中是这样。

这些定义都涉及一些广为人知的情感的特点，但是当代多数研究情感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反对用单一标准来定义情感。现在的共识是，情感包括几个相关的过程，将其中任何一个单列出来作为情感现象的“本质”都是毫无意义的。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于感觉和情感的其他方面。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感觉是情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像我们不能认为面部表情或注意力的集中是情感的必要条件一样。通常情况下，情感的所有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情绪事件。当缺少某个因素时，如某人有某种情绪但是没有相应的面部表情，我们不会仓促地否认某种情绪的出现。同样，仅仅因为电脑只缺少一种情感成分——如有意识的感觉——就断定它没有真正的情绪也是愚蠢的。

在本章结束时我会回到情感的问题。但是，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情绪的神经生物学、行为以及功能上的定义，以便了解电脑在这些方面能取得多大进展。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定义情绪是相对直截了当的。例如，既然我们知道基本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脑边缘系统调节的，那么我们可以进而将情绪定义为边缘系统的脑过程。根据这一

定义，电脑永远都不会有情绪，因为它们没有边缘系统。高智商的外星人也不能说有情绪，除非他们碰巧具有酷似人类的脑结构。然而，这种定义过于狭隘。仅仅因为外星人没有我们从毛茸茸的祖先那里继承的一些奇形怪状的神经结构就断定他们没有情绪，这么做似乎过于武断，甚至有点唯我独尊的味道，这就像欧洲殖民主义者根据美国土著人的肤色就否认他们拥有灵魂一样。

情绪就是情绪之所为

另外一种不那么偏隘的替代方式是以行为而不是某种脑结构来定义情绪。根据这种观点，情绪的本质在于表现情绪的行为 ，而不是调节这种行为的大脑通路。情绪就是 情绪之所为 。根据这一定义，如果电脑以情绪化的方式行动，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有情绪的。现在的问题就转化成了什么是情绪行为，以及它与非情绪行为的区别。

在人类和其他动物中，当观察到某种面部表情和声音——如微笑或咆哮时，或者看到某种生理变化——如头发倒立或者出汗时，我们就会称其为情绪行为。既然多数电脑还没有脸和身体，它们就无法表现出这些行为。然而，近年来计算机科学家研发出一系列名为“活跃的脸”的程序，这些程序可以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类似于人脸的形象。经过巧妙处理，这些形象可以活灵活现地作出各种表情。还有人更进一步，设计出三维合成的头部。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和他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们制造了一个名为“克斯梅特”（Kismet）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的眼睑、眼睛、嘴都可以活动。“克斯梅特”的情绪表达虽然有限，但足以让和他交往的人产生共鸣。布鲁克斯让人类父母每天陪“克斯梅特”玩耍。当“克斯梅特”独处时，它就会很伤心，但当它发觉有人时就会笑，希望引起对方的注意。如果照顾它的人走得太快，它就会作出害怕的表情，表示出了问题。这让陪“克斯梅特”玩的人不由自主地对这些简单的情绪行为产生共鸣。

那么，“克斯梅特”是否有情绪呢？它当然表现出了某种情绪行为，因此，如果用行为概念来定义情感，我们就必须承认“克斯梅特”是有情绪的。虽然“克斯梅特”没有表现出人类所有的情绪行为，但是情绪的有无并非那么极端。大猩猩并没有表现出人类的全部情绪，但它们显然具有某些情绪。狗和猫的情绪与人类的极为不同，但那些溺爱宠物的主人却认为它们具有人类一切的情绪，这样做显然犯了将动物人性化的错误。然而，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动物没有任何情绪就走入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另一个极端，错误同样重大。

情绪是一个由极简到极繁的连续体。也许“克斯梅特”有限的情绪使他处于该连续体极简一端，但相对于目前安放在桌上的、根据大多数定义什么情绪也没有的电脑来说，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随着情感计算技术的发展，我们可能会制造出越来越多具有复杂情感的电脑。“克斯梅特”现在还无法说话，但是布鲁克斯计划将来为它安装一个语音系统，使它可以发出表达情绪的视听信号。今天的语音合成器音调单一，无法传递情感。今后，计算机科学家可以通过调整语速、声调、音量等非语言因素来使电脑的发音听起来更像人类。

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进展。珍妮特·卡恩（Janet Cahn）设计了一种可以用带情感的声调讲话的程序。在一项实验中，她往计算机中输入了中性的句子，如“我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名字”，然后让计算机以悲伤的语调说出这一句子。当人类听众被问到这个声音合成器在表达什么情绪时，91％的人都猜对了。这个程序不善于表达其他情绪，但人类若只通过语音信号来表达情绪也并非次次都能传达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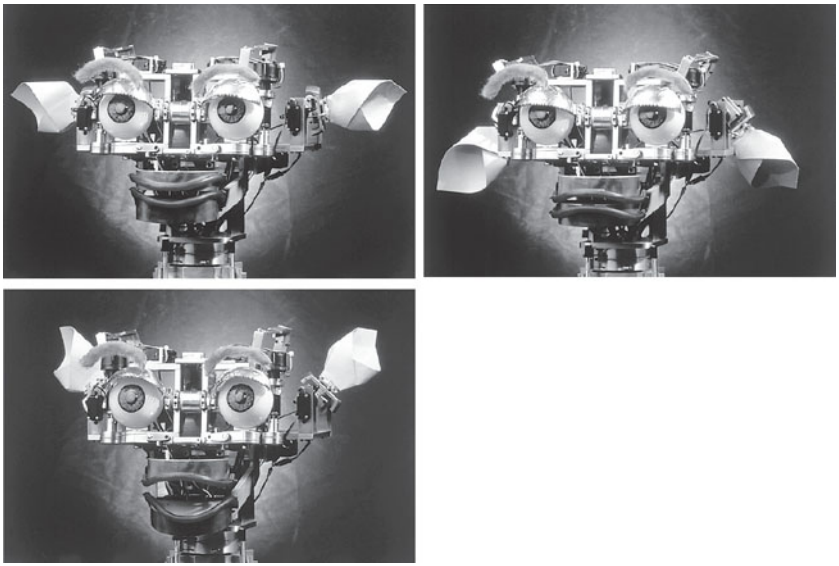

图19 “克斯梅特”，麻省理工学院发明的机器人，它有着各种表情，包括幸福、悲伤和惊奇。

面部表情和语调不是情绪行为的唯一形式。情绪还可以通过行动表现出来。例如，当我们看到一只动物突然停下、转身跑开时，我们可以猜出它感到害怕，尽管我们看不到令它害怕的东西。如果要让计算机表现出这种情绪行为，它们就要能够走动。用人工智能的术语来说，它们必须是“移动机器人”（mobots，即mobile robots）。

1999年的秋天，我参加了一个移动机器人展示会。会上展示了一些很简单的移动机器人。比如有一个机器人只有一只鞋大小，它的任务就是在地上走动时不撞到任何东西。它身上的传感器能够探测到墙和其他移动机器人等障碍物。这种机器人尽管简单，但其行为类似于动物。当探测到障碍物时，这个移动机器人会停下来、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观众明显能够看出这个移动机器人害怕被撞到。

那个移动机器人真的在害怕吗？还是包括我在内的观众犯了把机器人拟人化的错误？人们曾经对动物也持有同样的疑问。例如，笛卡尔认为，动物并没有人类的情感，因为它们只是没有灵魂的复杂机器。当它们因为疼痛而尖叫时，它们只是在听从内部机制的指令。既

然我们知道人类的疼痛机制与其他动物并没有什么不同，笛卡尔对有感情的人与“类似机器”的动物之间的区分就没有意义了。同样，在我们开始制造越来越像人类的机器时，机器所拥有的情感是“真”是“假”这个问题就没有太大意义了。目前人们大都认为机器没有情感，这主要是因为：即便是现在最先进的机器仍然还很初级。

有专家估计，到2050年，我们可以制造出像人类一样有着复杂情感的机器。但这是一件好事吗？制造有情感的机器意义何在？情感难道不会妨碍计算能力吗？更糟的是，情感会不会使电脑与我们对抗，就像哈尔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表现的那样？

为什么要赋予计算机情绪？

赋予计算机情绪是非常有用的，这有很多原因。首先，与一个情绪化的电脑互动要比和现在这些呆板的机器互动更容易、更愉快。想象一下：每次你坐下来打开电脑时，它就会扫描你的面部表情，从而识别你的情绪状态。星期一的早晨，当你开始工作时，你的电脑发现你心情不好。这时，这个有情绪识别能力的台式电脑不会像今天的电脑那样只是要你输入密码，它可能会给你讲个笑话，或者建议你先读一封令人愉快的电子邮件。也许根据以前的经验，它知道你讨厌这样的方式，此时，它就会不理你，直到你平静下来或者喝完一杯咖啡。和现在这些呆板的电脑相比，用这种情绪智能电脑工作要更有效率。

上述情节并不只是幻想。计算机已经能够识别一些情绪了。伊凡·埃沙（Ifran Essa）和亚历克斯·彭特兰（Alex Pentland）两位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设计了一种程序，可以使计算机识别6种基本情绪的面部表情。当志愿者作出某种表情时，电脑识别的准确率达98%，比人类识别的准确率还要高。如果电脑识别情绪的能力已经超过了我们，它们肯定不久就能够获得表达情绪这一更高级的能力，甚至还能够感受到这些情绪。也许在今后，计算机反而会认为人类是没有情感的。

除了为台式电脑提供情绪智能型界面外，情绪电脑还有什么其他

用途？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计算机科学家罗莎琳德·皮卡德（Rosalind Picard）列举了如下用途：

- 人工面试官，通过对应聘者的肢体语言给予反馈来训练应聘者；
- 情感语音合成器，使有语言障碍者能够开口说话，而且能真正有感情地说话；
- 失败监视器，使生产者对产品的便捷程度进行评估；
- 穿戴式电脑（“智能服装”），对情绪状态给予反馈，使人们知道何时需要休息，以便缓解压力。

所有这些用途都和赋予电脑识别人类情感并给予反馈的能力有关。但是如果赋予电脑感受自己情绪的能力呢？这种能力又有什么用途呢？

我在第二章中谈到自然永远不会进化出斯波克时，已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一个没有情感的生物在这个危机四伏、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是无法生存的。情绪不是奢侈品，更无碍于明智的举动。情绪对于任何高级动物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这一点也适用于移动机器人。机器人一旦离开实验室的安全环境，它就会遇到活动的物体或深坑等危险。如果这个机器人是由人遥控的，人可以指挥机器人绕开障碍。但是让机器人总是依赖于人的指挥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也不总是可能的。当宇宙飞船“深空一”号在1999年7月飞过小行星布拉耶时，由于离地球太远，地面控制无法指挥它的所有行动。无线电波从地球传到宇宙飞船上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它必须立即作出决定，用机上的自动导航（auto-nav）软件来自己设计路径，甚至要决定拍照的时机。

美国宇航局需要更多这样的“无线”技术，因为这样可以使昂贵且不堪重负的深空网得以从事更有价值的工作，而不只是对航天器进行日常监控。这种技术还可以使无人驾驶的飞行器能够实时应对突发事件，而不是等待地面指令。由于多数像“深空一”号这样的航天器的飞行速度为5万公里／小时，因此，节约时间就尤为重要。

自动导航软件刚刚起步。智能机器可以自己作决定、应对突发事件，它除了应用于空间飞行器之外，还可用于许多其他领域，例如炸弹拆除、显微外科手术、搜救行动，以及间谍活动。在这些情况下，一个无法探测危险并作出反应——即没有恐惧感——的机器人是不可能长时间生存的。一个机器人可能同时有几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如避开障碍物、加油、照相、尽快返回地球，这就需要有内部目标管理系统。目标冲突的问题被计算机科学家称为“机器人的困境”。早在1967年，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人工智能的先驱之一——就提出，要解决这个难题，就需要使机器人具有情绪。

西蒙的论证简单而巧妙。任何一个动作主体在同一时间内能做的事情都是有限的，不管它是动物还是机器人。因此，如果该主体有一个以上的目标，为了使每项活动都能达到目标，它就必须合理安排时间。然而，除非环境极为稳定和良好，否则该主体必须保持警惕，根据外部变化迅速改变行动。假设一个机器人有下面两项任务：第一，从一个小行星上采集岩石样本并当场分析；第二，将这些样本安全带回地球。设想一下：当这个机器人正兴高采烈地坐在小行星上对刚收集到的石块进行化学检测时，一块碎石朝它飞驰而来。除非这个机器人具有某种“中断机制”，否则即使它可以成功完成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西蒙认为，情绪就是这种中断机制，并以此来定义情绪。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自己和其他动物身上观察到这种中断机制时，我们把它命名为了“情绪”。这一定义不是神经生理学或 行为上的，而是功能上的。功能定义和行为定义都是根据可观察的行为来定义心理过程，但是与完全的行为主义者不同，功能主义者认为发生这些行为并非产生这一心理过程的必要条件。其他心理过程也可导致这种行为的出现。根据西蒙的功能定义，情绪是一种导致中断行为的心理过程，它使主体对突发的环境改变作出快速反应。

图20　穿戴式电脑现在还很笨拙，但是每年都越变越轻巧。很快这种“智能服装”就能够监控我们的情绪状态。

这一定义中的关键词是快速 。很多心理过程都可以使其他过程中断，但并不是所有的心理过程都能对突发的环境改变作出快速反应。许多小变化都可能导致某种心情的逐渐积累，直到它强大到能够打断我们的思维。西蒙将情绪定义为迅速反应 的中断机制可能过于狭隘了。他的定义适用于突如其来的基本情绪，但是对于爱和嫉妒等高级认知情绪就不太适用了，这些情绪通常出现得较慢——至少长于几秒钟。与许多恰当的定义一样，西蒙的这一定义虽然突出了一个重要特点，但并不全面。

如果机器自己进化出情绪怎么办？

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情绪机器的潜在用途都是非常实用的。这没有问题，但我认为未来大多数情绪机器并非用于任何实用的目的，而是纯粹用于娱乐。如果你想展望一下情感计算技术的未来，不要去想宇宙飞船和智能服装——想一想玩具和视频游戏。

目前，许多视频游戏已经开始使用一些简单的学习玩家操作的算法来控制计算机控制的角色，如怪物和恶人。例如，在游戏《古墓丽影》中，劳拉·克罗夫特（Lara Croft）的敌人只需要让你打几枪就可以知道你的射击风格。如果你在暗中伺机袭击恐龙，它可能会呆在阴影里，引诱你出来打一枪，这样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袭击你。虽然这些只是相对简单的程序，但是随着我们对更高级的游戏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软件也在不断升级。第一批真正的情感电脑很可能是游戏机控制台，而不是空间飞行器。

其他具有初级情绪的娱乐软件也可以用于电脑里的虚拟宠物。许多孩子现在把狗和猫作为屏幕宠物，近期还出现了虚拟婴儿。一个名为“模拟人生”的程序可以让你自己创造人物，但这些人很快就会有自己的生活，让人惊叹不已。“模拟人生”中的人物有种种酷似人类的情绪行为。他们会生气、会抑郁、甚至会相爱。

这些生物都是虚拟的——它们生活在电脑中，唯一的“身体”就是

屏幕上的画面。然而，第一个有着实实在在的身体的电脑生物已经进入了玩具市场，它们也有一些最初级的情感。首先上市的是名叫“福比”的小毛绒机器人，它困的时候会睡觉，如果长时间被冷落还会发出抗议的哭声。现在还有机器狗和机器猫，它们可以在你的起居室里跑来跑去而不会弄得一团糟。

就像对“克斯梅特”一样，人们对这些人工生物也有着自然的同情反应。人们并不会满腹疑问，怀疑这些情绪是“真”是“假”。人们只是愿意和它们玩耍，就像对一个真正的宠物或婴儿一样。一种有硅脑和橡胶脸的娃娃甚至会在饥饿时皱起脸，露出悲伤的表情。

科学幻想和科学事实之间的鸿沟正在缩小。今天的计算机和机器人虽然远远没有哈尔那样高级，但它们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事实上，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有人已经开始担心：如果电脑和机器人进化出人类的情感该怎么办。它们会像哈尔那样与它们的制造者反目成仇吗？在影片《终结者》中，一个叫“天网”的巨型电脑具有自我意识，为了阻止人类将其关闭，它企图进入军队的指挥系统并发射核导弹。情感计算技术会不会最终导致人机大战？如果会的话，谁将是赢家呢？也许未来机器人将不再是我们的玩具——我们可能会成为它们的玩具。

图21　情绪计算技术未来会应用于娱乐产业吗？由索尼公司制造的爱宝机器狗（人工智能娱乐机器人）有6种情绪：快乐、悲伤、愤怒、惊奇、害怕和厌恶。它的情绪状态会根据外部刺激而变化，并对行为产生影响。

给电脑编程也许可以使它们服从于我们，从而避免这一悲剧。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编程使它们服从“机器人三法则”，就像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他的短篇小说《二百岁的人》中所提议的那样，同名电影就是受到了该小说的启发（见下框）。

然而，许多情绪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们是不可预测的。一个真正的情感机器人可能会不遵守或是重新解释这些法则。另外，人们近来越来越尊重动物权利，部分原因是人们认识到：非人类动物与人类一样能感受到痛苦和情感，由此可以预见，未来人们会越来越注重机器人权利的保护。正如有些人准备用暴力手段来保护动物权利一样，有些人可能会和受压迫的机器人联合起来，帮助它们从被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机器人三法则

1．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不能通过不作为来使人类受到伤害。
2．机器人必须遵守人类的命令，除非命令与第一项法则相冲突。
3．机器人必须自我保护，除非这种保护与第一或第二项法则相冲突。

来源：艾萨克·阿西莫夫，《二百岁的人》

许多人可能认为，电脑是可以预测的，因为它们只是按照程序工作。这使人们无法相信电脑有一天也会有情绪。即使我们能设计出高超的软件，使电脑可以模仿情绪行为，那也不是真正的情绪，因为它们只是按照指令去做。电脑不会像真正的情感动物那样不可预测。

但如果计算机程序能够自我进化，这些人又会怎么说呢？这样的机器可能会拥有真正的情绪，而不是由人来设计。计算机科学一个较新的分支——人工生命——就在尝试开发这种自我进化的软件。研究人工生命的计算机科学家并不是自己写程序，而是创制随机指令序列，让这些微型程序（称为进化算法）在电脑硬盘上竞争空间。当前任务完成得较好的程序可以进行自我复制，从而占据更多的存储空间，而任务完成得不好的程序就会被删除。由于复制过程被故意设计成了有缺陷的，因此复制时偶尔会出现错误。这就使变异程序得以出现，有些程序比它们的母本更好地完成了任务，于是成为了硬盘的主宰者。如果这一过程经过多代反复，有益的变异品种就能得以积累，形成人类用常规方法无法设计出的超强程序。

你可能注意到，人工生命与自然选择的进化非常相像。事实上，它就是 自然选择的进化。它具备自然选择所有的因素：遗传（自我复制）、变异（复制品并不完美）、差异复制（一些程序比其他程序有更多的复制品）。这些自我进化程序的术语——“进化算法”——清楚地表明它与DNA进化的相似性。虽然这一过程中的主角是硬盘上的编码序列而不是染色体上的核苷酸序列，但这并不能否认人工生命可以进化。因为电脑没有脑器官就否认它具有情绪是一种狭隘的看法，同

样，仅仅因为电脑没有DNA就认为它不能进化也是一种偏狭的观点。不管是情绪、进化，还是生命本身，所有这些生理过程的本质并不在于它们的物质构成，而在于这些物质是如何表现的。只要程序可以自我复制——有些程序可能并不完美，只要复制品的数量取决于该程序本身的某个特点，这个程序就完全可以说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

人工生命中最著名的实验之一是一个名为Tierra（西班牙语，意为地球）的虚拟世界的创建。Tierra由计算机科学家托马斯·雷（Thomas Ray）设计，最初这一虚拟世界里只有一些单一程序的复制品。正如刚才所描述的，这一程序可以自我复制，它是一种“进化算法”。但是这些复制品并不都是完美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Tierra中的数字生命越来越多样化。当雷在观察他的虚拟生物圈的进化时，他发现了从未见过的生命形式，其中包括虚拟病毒和形成了人工免疫系统以保卫自己的虚拟宿主，他万分激动。这些人工生命形式还没有获得情绪，但是不难看出，如果时间充足，它们会进化出这些能力。由于设计过程中的随机因素，这种人工情绪将会很难预测。

有人认为机器不会有情绪，他们的理由是真正的情绪是不可预测的，而人工生命技术可能会改变这些人的观点。当然，这一技术可能还无法和否定情绪机器的最极端顽固的观点对抗。这一观点认为电脑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情绪，因为它们不可能有意识。虽然电脑可能会表现出情绪行为，但它们永远不会有主观感觉，这种感觉构成了情绪的本质。

正如前面提到的，许多人认为感觉是情绪的根本，但多数当代研究情绪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不赞成这一观点。根据现代科学的观点，就像不能仅仅因为瘫痪病人不能表现出相关面部表情就否认他有情绪一样，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电脑没有意识情感就否认它有情绪。

另外，声称电脑永远不会有意识只不过是一种直觉。有人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论据来支持这一观点，但是这些思维实验（包括中文屋和怪人）比它们所反对的观点更加离谱（见下框）。事实上，在21世纪初，没有人真正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意识。由于对意识没有很好的定义，对怎样研究也缺乏共识，因此对所有认为不可能有意识机器从而

否认情感计算技术的观点我们一定要有所保留。

计算机未来会有意识吗？

一些人工智能的研究者认为，在今后的100年内，计算机将会有意识。有些哲学家认为这是荒谬的。他们认为机器永远 不会有意识。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设计了一些奇怪的思维实验。
在一篇现已成为经典的关于思维的哲学论文中，约翰·塞尔（John Searle）提出了“中文屋”这一概念。一个男人坐在一个房间里，人们给了他一系列中文字符并告诉他一些规则，使他知道该如何对这些中文字符作出反应，他都照做了。房间外面的人以为这个人懂中文，但我们知道他不懂。他只是按照规则做。塞尔认为计算机也是这样，它们只能遵守规则，永远不会“知道”任何事情。因此，塞尔认为计算机永远都不会有意识。
另外一位哲学家——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认为，意识不是仅通过行为就可以表现出来的。他让我们想象一个怪人，它外表酷似人类，唯独没有意识。如果这种生物存在的话，那么电脑就不可能有意识，不论它看起来 多么像有意识的生物。
这些思维实验的问题套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想法太多，实验不足。我们不应该根据一些荒唐的故事来断定计算机是否会有意识，因为这些故事中的事我们了解得更少——比如中文屋和怪人，进行更多实验可能会对我们更有帮助。总而言之，真正使我们知道机器是否会有意识的唯一方法就是尝试制造一个有意识的机器。

在为数不多的几个较贴切的意识定义中，有一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认可。这种定义认为，主观情感主要取决于身体类型。这可能意味着Tierra中的数字生物永远不会有意识，因为它们是虚拟的，只是计算机硬盘上的编码序列。然而，在最近，计算机科学家开始将

人工生命的技术扩展到真正有实体的电脑上。这一新兴学科称为进化机器学。与人工生命一样，它的原理也是让控制机器人的程序自己进化，而不是由人类来设计。如果Tierra中的生物不可能有意识，这种被赋予形体的程序也许就会有意识。

如果情绪对于任何半智能生物的生存都很关键的话——如我在第二章中提出的观点——我们会看到这些复杂的机器人像高等生物那样自己进化出情绪。如果让机器人自行发展，它们可能会进化出与人类非常不同的情绪。生命存续所需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物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如果这一生物的存在基本上是静态的，它就不需要社会情绪，如内疚和嫉妒。如果没有捕猎者的追捕，它可能就不需要害怕这一情绪。鉴于机器人与人类在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上的差异，它们可能会进化出截然不同的情绪。

图22　是人类与机器人的恋爱？还是两个机器人之间的恋爱？在影片《银翼杀手》的这个镜头中，德卡德（哈里森·福特扮演）亲吻了雷切尔（肖恩·扬扮演）。雷切尔是一个机器人，德卡德可能也是。

即使机器人的情绪在表面上与人类情绪相同，机器人对它们的感觉 也可能大相径庭。如果意识和身体构成之间确实有紧密的联系，对

于情绪的主观感受就可能取决于生理细节。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有着塑料或金属躯体的情感机器人和有着血肉之躯、七情六欲的人类一定有着极为不同的内在感觉。由于同情就是感同身受，因此机器人和人类不同的生理状态可能很难让我们同情他们，即使它们表现出的行为与人类极其相似。更危险的是，也许机器人同样很难同情我们。未来人机大战的噩梦似乎正在向我们逼近。

也许我们对于未来人机争霸的恐惧是一个错误。进化出情绪的复杂机器人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二百岁的人》和《银翼杀手》表现的都是人类与机器人的彼此相爱。

在日本，这种机器人的友善形象比在西方更普遍。在不远的将来，几乎注定要出现的情感机器可能还会成为我们的救星，通过教育我们学习它们更细腻的感受力来使我们不再对它们抱有敌意。

后记

心自有其道理

布莱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曾写道：“心自有其道理，非理智所能知晓。”当人们提起认知和情绪时，或者是（更加传统的说法）理智与情感时，人们通常所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官能。一种冷静而镇定，通过清晰的逻辑推理一步步得出结论。另一种炽热而多彩，通过直觉得出结论。然而，心灵不受理性 的制约并不意味着它没有道理 。相反，正如我想向大家展示的，一切受情感驱动的行为都是有理由的，无论是逃离危险、追求爱人，还是集中精力、影响判断，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有充分的理由。理智中有情感，情感中也有理智。

拿多见效应来说。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谈到的，我们之所以偏爱已知事物是因为我们对它比较了解。人是按习惯行事的动物，“已知的魔鬼比未知的好”已成为了一句箴言。这种行为看似愚蠢，但事实上会对我们有利。最近，由德国心理学家格德·基根泽（Gerd Gigerenzer）、丹·古德斯坦（Dan Goldstein）及柏林适应行为和认知中心的其他同事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人们面临多个选择时，那些选择已知事物的人往往比深思熟虑后再作决定的人表现得更好。甚至在知识测验中，依赖这一“再认启发策略”的人也常常会取得更好的成绩。例如，当基根泽和古德斯坦让几个美国人判断哪两个德国城市更大时，一些人选择了他们知道的城市，另一些人则试图根据自己的显性知识来判断，结果前者的得分更高。

情绪和心情影响判断的另一种方式是众所周知的好心情和过度自信之间的关系。心情好的人常常会高估自己成功的几率，而心情不好的人对自己的预测则较为准确（这一现象被称为“抑郁现实主义”）。你可能会认为，既然其他方面都相同，而准确预测又优于不准确预测，那么不好的心情应该对人更有利。问题是，其他方面并不 一样。如果你成功的几率很低，而且心情也不好，那么你的准确预测只能使你根本不敢去尝试。然而，如果心情好，你可能会高估成功的希望，从而有勇气去尝试，结果你可能就成为了一名幸运儿。如果你的努力不太可能白费，成功带来的回报又很高，那么过度乐观就是有益的。

任何使期望值与成功的客观几率齐平的做法都会降低成功的可能性。而且，即使过度自信并未增加成功的几率，它也会使你变得更善于社交，并从中获益，如更具人际吸引力或者更值得信赖。

上述例子看起来有些矛盾。一方面，心情好会让人们对成功的期望超出了客观现实，使人们理性的成分变少 。而在另一方面，与面对现实相比，过度自信可能是一种更理性的做法，因为有些奖励只属于勇敢的人。情绪有时似乎表现出一种超理性，使纯粹理性不至于作茧自缚。

情绪也并非总是有益的。若是如此，那根本就不会有对于情绪的消极观点，更不用说这种观点的影响力了。许多西方思想家都曾批判过情绪，这说明感性战胜理性并非总是好事。有时，情绪对理性思维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由于多见效应的影响，我们可能会花钱去买熟悉的品牌，而不是那些不太知名的商家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心情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骗人高手的伪善会使我们心情愉悦，从而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出他话语的破绽。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

本书为情绪的积极观点作了辩护，但这并不意味着情绪不会对理性思维产生不利影响。情绪的积极观点只是宣称情绪对理性思维的有利影响要多于不利影响。总体说来，缺乏情感的生物不仅没有我们智慧 ，也没有我们理性 。

这说明我们对理性的看法应该区别于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对理性的定义过于技术化，他们将理性定义为预期价值的最大化。也就是说，理智者的行动通常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偏好。这样定义虽然并无不可，但是它没有说明这些偏好来自哪里，也没有说明具有某些偏好的人是否会更理性。严格地说，后一个问题对于经济学家的确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对理性的定义是满足这些偏好。在经济学中可能有非理性的消费者 和非理性的购买 （即偏好不“一致”的结果），但是没有非理性的偏好 （也没有理性的偏好，偏好就是 偏好）。

我完全不赞同经济学家的这种观点。我们完全有理由知道某种偏

好是否理性。例如，想要受几个朋友的欢迎是可以理解的，而想要让世界上所有人都喜欢你就没有道理了。如果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观点很荒唐，那是因为他们 与世界上其他的人不合拍，而不是其他人和他们 不合拍。心灵也是有理性的，但这种理性不是手段——目的这种思维模式 的理性。情感关乎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达到既定目标，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追求什么目标。如果我们要给这种广义的理性概念起一个名字的话，我们可以仿效基根泽（Gigerenzer）称其为“生态理性”，也可以称其为“进化理性”，因为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物遗传的影响。如果心也有理性，这是因为情感是由自然选择来设计的，就像其他心理官能一样，它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大千世界中尽可能地生存和繁衍下去。

资源材料

这里为学生和专家读者列出本书使用的文献材料。

第1章

保罗·艾克曼在“关于基本情绪的论证”中介绍了他的基本情绪理论，并介绍了他的证据。《认知和情绪》，6，（1992），169—200。古录姆巴人“像野猪一样”的情绪在P. L. 纽曼的“新几内亚高地社区的野人行为”中介绍，《美国人类学家》，66，（1964），1—19。有关文化具体情绪有重要社会功能的观点来自于心理学家杰姆斯·埃沃瑞，他在“情绪的建构观点”中详细论述了这一观点，这是由R. 普拉提其克和H. 克勒曼编辑的《情绪：理论、研究和经验，I情绪理论》（纽约：学术出版社，1980）一书中的一章。人类思维的自我实现倾向这一观点来自于严·海清的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重写心灵：多重人格和记忆科学》（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

第2章

有关猴子学会害怕的实验研究是由S. 米尼卡和M. 库克报告的。发表于“害怕的观察条件反射机制”一文，《实验心理学：普通》，122（1993），23 - 38。哈拉·萨米埃在“我们为什么哭”一文中对于哭泣的进化解释进行了很好的综述，《华盛顿邮报》，2000年1月12日，p. H06. 威廉姆·弗雷在《哭泣：眼泪的秘密》（明尼安那波力斯：文斯顿出版社，1985）一书中提出，哭泣通过消除压力激素使我们感觉好一些。让道夫·卡尼留斯在《情绪的科学》（上鞍河，新泽西：普兰提斯豪尔，1995）一书中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是哭泣之后得到的社会支持使我们感觉好一些。在卢瑟福·勒多克斯的《情绪脑》（伦敦：卫登菲尔德&尼克森，1998）一书中清楚地解释了情绪的神经解剖。尽管勒多克斯对于保罗·麦克林边缘系统的观点有异议，但还是值得看一下麦克林的经典论文，《脑和行为的三位一体的概念》

（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3）。

对罗伯特·弗朗克理论的一个很好的总结在斯蒂文·平科的《脑怎样工作》（纽约：诺顿，1997；哈们德斯沃斯：企鹅：1998）的第6章中可以看到。有关抗议者的故事和引用道格拉斯·叶斯的话来自于这一章。情商的概念首先由皮特·萨勒维和约翰·麦尔在“情商”一文中提出。“想象、认知和个性”，9，（1990），185—211，更多有关精神病和道德发展的信息见杰姆斯·布莱尔的“道德的认知发展方式”一文，见《非适应的脑：进化精神病学的经典阅读》一书，西蒙·巴伦—克根主编（豪夫：心理出版社，1997）。

第3章

对最近心理学有关幸福研究的几篇综述发表在2000年的《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对于亚当·斯密有关好运气的危险性持怀疑态度的研究一篇是H. 罗伊·卡普兰德的“彩票赢家：传说与现实”，“赌博研究杂志”，3，（1987），168 - 78，另一篇是马克·阿伯拉汉姆森的“突然的财富，满足于与获得：对德克海姆有关富裕的灾难的重新思考”，“美国社会评论”，45，（1980）49 - 57。汉特·戴维斯介绍了一个与“赢得大奖并不会使你不幸”的理论有关的彩票赢家的案例，《为彩票而活》，（伦敦：利特，布朗，1996）。

阿伦·拜客在《认知疗法和情感障碍》一书中讨论了认知疗法（纽约：莫瑞迪安，1976）。杰弗瑞·米勒在《求偶心灵》（伦敦：黑尼曼，2000）的第10章中提出笑话和故事让我们高兴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有关讲话者智力的信息。有关情绪的水利理论的介绍以及情绪表达的“宣泄传说”见伊林·肯尼迪 - 摩尔和詹妮·C.　　华生所著的《情绪表达：传说，现实，治疗策略》一书，（纽约、伦敦：吉尔福德出版社，1999）。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约瑟夫·波尔在1895年第一次发表现在仍有很高可读性的《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第一次介绍了“谈话治疗”。该书的简装本是派力肯弗洛伊德图书馆系列的第3卷（哈蒙德

斯沃斯：企鹅，1974）。玛莎·纳斯巴姆在《好人的脆弱：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一书中探讨了亚里士多德“宣泄”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关于“剧场最适于宣泄，因为它使我们在”最好的美学距离“体验情绪的观点是托马斯·谢夫在《治疗、仪式、戏剧中的宣泄》（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9）一书中讨论的。宣泄的消极影响由周·瑞克和罗布·布瑞娜在“创伤管理与压力宣泄：负责任的组织应该如何做？”这篇文章中介绍，该文可以通过访问网址http://www.employment-studies.co.uk上的新闻和文章栏目下载。

尼克拉斯·汉弗瑞在《脑的历史》一书（纽约：克潘尼库斯，1992）的第八章中介绍了他的关于颜色效应的试验；在该书的第六章中也有相关信息。对《最著名的弦乐小夜曲》的情感影响是P. M. 聂登涛·和M. B. 塞特兰德在“知觉的情感一致性”一文中介绍，“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布告”，20，（1994），401—11。安如道·帕特尔和伊万·巴拉班在他们的论文“人脑皮层反射声音结构活动的颞叶结构”介绍了神经对曲调反应的非常有意思的数据。“自然”，404，（2，2000，3月），80—4。情绪的神经化学反应、百忧解的影响由大卫·黑力在他的信息丰富的《抗抑郁时代》一书中介绍（剑桥，马萨诸塞，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药物用做治疗、娱乐、仪式目的的脆弱历史在J. 古德曼和P. 莎瑞特主编的《消费习惯：历史和人类学中的药物》详细介绍。（伦敦：如特勒之，1995）。威廉姆·杰姆斯在他1884年的经典论文“什么是情绪？”中第一次推出了他关于情绪的新奇理论，这篇文章以各种版本被重印，如在玛格答·阿诺德主编的《情绪的本质》中。（哈默德斯莫思：企鹅，1968）。保罗·艾克曼和华莱士·弗瑞森在他们的论文“区分情绪的自主神经系统活动”中描述了他们所做的采取某种表情的情绪效果的实验，作者是艾克曼、李文森等，《科学》，221（1983），1208 - 10。

第4章

最初的斯特鲁普测验由J. R. 斯特鲁普自己在“系列语言反应干扰研究”一文中解释，“实验心理学杂志”，18（1935），643 - 62。A. 马休斯在文章“情绪加工中的偏见”中，综述了各种基于情绪斯特鲁普测验所作的实验的结果。“心理学家”，6（1993），493 - 9，S. A. 克里斯坦森和E. 洛夫塔斯在文章“情绪事件的记忆：细节信息的命运”中报告了情绪对视觉记忆影响的实验。“认知和情绪”，5，（1991），81 - 108。格登·波尔在文章“情绪和记忆”中介绍了他自己的几个记忆依赖于心情的实验，“美国心理学家”，36（1981），129 - 48。R. A. 拜伦在文章“面试者对工作申请者的心情和反应”中报告了心情对面试者判断的影响的实验，“应用社会心理学杂志”，17（1987），911 - 26。

D. G. 杜顿和A. P. 阿伦在文章“高焦虑下性吸引增高的一些证据”中介绍了焦虑的吸引效应的精彩实验，“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30，（1974），510 - 17。戴安·麦吉和利丽亚·沃斯在文章“加工缺陷和积极心情在说服上的调节作用”中解释了他们关于心情对于弱论据易接受性的作用的实验，“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57，（1989），27 - 40。安托尼奥·达马索所讲的高度理性的病人的故事来自于《笛卡尔的错误：情绪、理性与人脑》一书的193页。（伦敦：皮卡多，1995）。罗伯特·弗朗克关于信任感的准确性的实验在他的著作《理性中的激情：情绪的策略作用》第7章中介绍。（纽约和伦敦：诺顿，1988）。罗伯特·再因思在文章“感觉与思维：偏爱不需要推理”中介绍了他的多见效应实验，“美国心理学家”，35，（1980），151 - 75。

第5章

我反对以神经生物学的术语定义情绪的观点来自于希拉里·普特楠姆反对脑的认同理论的著名的观点，该观点见1960年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心理学的断言”。这篇文章在威廉姆·G. 里堪主编的《脑与认知：文

章选编》第2版（剑桥：布莱克维尔，1999，27 - 34）中以“思维状态的本质”为题重新发表。詹尼特·卡恩在文章“合成语言情感的产生”中介绍了她的情感语言程序，“美国语音工业社会杂志”，8，（1990），1 - 19。埃弗兰·埃萨和阿里克斯·潘特兰德在文章“面部表情的编码、分析、解释和再认”中介绍了他们的电脑识别面部表情的工作，“IEEE模型分析转换和机器智能”，19，（1997），757 - 63。

赫伯特·西蒙有关需要给电脑和机器人某种情绪系统的预见性观点可以在他的文章“动机和情绪对认知的控制”中看到，“心理学综述”，74（1967），29 - 39。在玛格丽特·伯登主编的《智能生命哲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一书中选录了关于智能生命的一些很好的文章。这一册中的一篇文章是托马斯·瑞1992年所写的，题目是“一种合成生命的方式”，文中介绍了他的“泰拉”项目。

后记

生态理性和“识别法则”在格德·吉格任则，皮特·M.　塔德和ABC研究小组所著的《简单法则使我们更聪明》一书中介绍（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

爱到底是中世纪的欧洲诗人创造出来的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赢得彩票是否能让人更幸福？怎样才能更快乐？未来的机器人会有情感吗？

本书以跨学科的独特视角，从人类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等方面解读人类情感，引领你体验一种别样的心灵之旅。

百科通识文库

49

破解意识之谜

苏珊·布莱克莫尔 著

薛贵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破解意识之谜

苏珊·布莱克莫尔 著

薛贵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65**

Consciousnes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5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Susan Blackmore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解意识之谜 /（英）布莱克莫尔（Blackmore, S.）著；薛贵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18-9

Ⅰ．①破… Ⅱ．①布… ②薛… Ⅲ．①意识 - 研究 Ⅳ．①B8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786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18-9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第一章　为什么关心意识之谜？
第二章　人类的大脑
第三章　时间与空间
第四章　一个巨大的幻觉
第五章　自我
第六章　意识意志
第七章　异常的意识状态
第八章　意识的演变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苏珊·布莱克莫尔，心理学家、自由撰稿人和大学讲师。曾在西英格兰大学任教，并编写过一本关于意识的本科生教材。她不仅发表了无数的科学论文和专著，同时也为好几份杂志和报纸撰稿，还经常在英国国内外的电台和电视台做客，出品了多档电视节目，包括在第四频道播出的关于类人猿智力的纪录片。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在修炼禅宗。其著作包括一部自传、《寻找光明》（1996）、《文化基因的机器》（1999）、《意识导论》（2003）以及《关于意识的对话》（2005）。

译者简介

薛贵，心理学博士，现工作于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系和脑与创造力研究所，主要致力于探讨人类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其研究领域包括语言和第二语言（英语）习得、风险决策、学习与记忆以及创造力的神经机制。迄今在国内外专业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二十余篇。同时受邀为《中国神经科学手册》以及《脑与行为——21世纪的科学前沿》等专著撰写部分文章。

图目

图1　巨大鸿沟
图2　笛卡尔的反射理论
图3　哲学家的无意识躯体
图4　笛卡尔剧院
图5　内克尔立方体
图6　半侧忽视
图7　双视觉通路
图8　盲视
图9　皮肤兔子
图10　注意“探照灯”
图11　全局工作空间理论
图12　视幻觉
图13　寻找盲点
图14　变化盲
图15　佛陀
图16　裂脑病人的实验
图17　远程运输机
图18　参与意志的脑区
图19　利贝特的实验
图20　魏格尔的意识意志理论
图21　老女巫
图22　映射大脑的意识状态
图23　成为蝙蝠会有怎样的体验？
图24　照镜子的黑猩猩
图25　看冰箱里面

第一章

为什么关心意识之谜？

一个困难的问题

什么是意识？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实则不然。在人们探讨的问题中，意识是一个看似再明显不过，却又最难解释清楚的概念。我们要么必须用意识来探讨其本身（这个想法本身就略显怪异），要么就得让自己从想要研究的这个概念中解脱出来。难怪几千年来哲学家、科学家一直在这个概念上苦苦探索，也难怪科学家曾长期抵制它，甚至拒绝研究。令人欣喜的是，进入21世纪，“意识研究”逐渐兴起。心理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已准备好探讨这样一些难题：意识的功能是什么？如果没有意识，人类有没有可能进化到今天？意识有可能是一种幻觉吗？不管怎样，到底什么是意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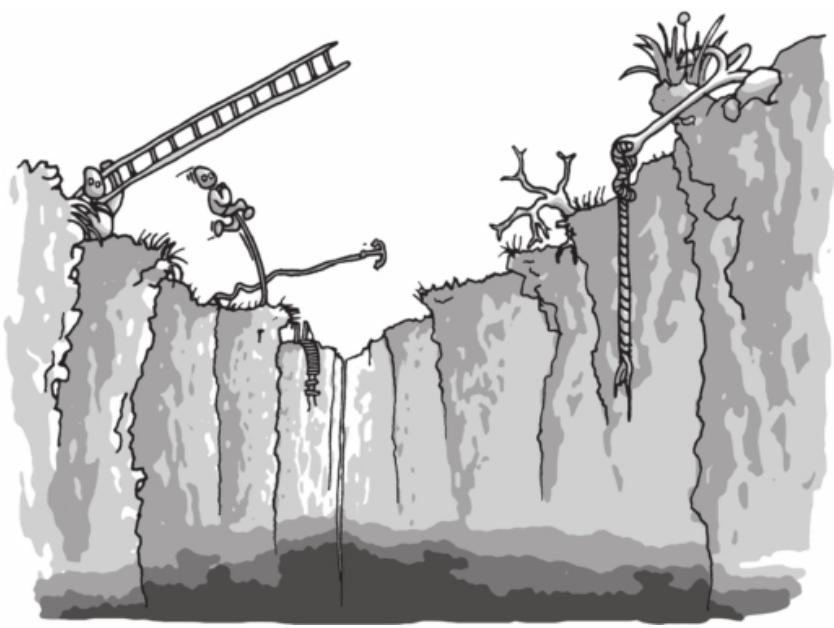

图1　还没有人能成功跨越内部和外部、精神和大脑、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巨大鸿沟或者解释空白。

这并不意味着意识之谜已经消失。事实上，它还是一如既往地深

奥。不同的是，我们现在对大脑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已经能够直面意识这个问题。人脑中有数百万细小的脑细胞，它们的放电究竟是怎样产生个人、主观的意识体验呢？

想要在认识意识的征途中取得任何进展，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许多人声称他们已经揭开了意识之谜：他们提出大统一场理论、量子力学理论或精神的“意识力”等许多理论来解释意识，但其中大部分人完全忽视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巨大鸿沟或“无底深渊”。只要忽视这个问题，他们就根本不是在探讨意识。

这其实是哲学家2,000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著名的心-身问题的现代版。人们面临的困难在于：在平常的人类体验中似乎存在两类完全不同的事物，但还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方式使二者融为一体。

一方面，我们有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可以看见远处山上的房子和树木，听到汽车从大道上驶来，享受自家房屋的温馨和熟悉，同时也想知道是不是因为那只猫想进来才发出那抓挠之声。所有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个人体验，很难向别人表述清楚。我可能会想你对绿色的体验是否和我一样，或者咖啡对你我是否具有完全相同的香味，但我永远弄不明白。这些难以言传（或无法形容）的特质就是哲学家所谓的感质（虽然在是否存在感质这个问题上还存有许多争论）。那个晶莹剔透的红杯子的红色是一个可感受的特质；我的小猫身上的皮毛的柔软感也是可感受的特质；咖啡的香味也同样如此。这些体验似乎都是真实的、生动的，不可否认。它们构成了我所生活的世界。事实上，它们就是我所拥有的全部。

另一方面，我深信世界上存在着一个物质世界，是它产生了这些体验。我可能会对这个物质世界的构成或更深层的本质存有疑问，但我并不怀疑它的存在。如果我否认它的存在，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我来到门口时，可能会见到猫跑进来——如果你恰好经过，你也会同意说现在正有一只猫拖着沾满泥的脚踩过我的书桌，留下一串脚印。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两种事物似乎截然不同。有一些是真实存在的实物，它们的大小、形状、重量及其他种种属性大家都可以测量并达成一致。但同时也存在个人体验——疼痛感以及我现在所看到的

苹果的颜色。

历史上多数人都采用过某种形式的二元论，即认为确实存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和世界。在当今绝大多数的非西方文化中，情况依旧如此。调查显示，多数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也这样认为。几乎所有的主流宗教都采用二元论：基督徒和穆斯林相信永恒、非物质的灵魂，而印度教教徒则相信阿特曼[1]（Atman）或心中神圣的自我。在宗教中，仅有佛教否认存在连续的内在自我或灵魂。即使在非宗教人士中，二元论也普遍存在于西方文化中。流行的新时代理论唤醒了心灵、意识或精神的力量，仿佛它们是一股独立的力量。替代疗法治疗师赞同精神对身体的影响，仿佛精神和身体二者完全不同。这样的二元观是如此深地植根于我们的语言之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愉快地谈论“我的大脑”或“我的身体”，仿佛“我”与“它们”可以彼此分离。

17世纪，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正式提出了人所共知的二元论。这个叫做笛卡尔二元论的理论认为心和脑由不同的物质构成。在笛卡尔看来，心是非物质的，不可延伸（即不占空间或没有位置），而身体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由有形的、可延伸的物质构成。该理论的漏洞显而易见：身心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笛卡尔认为它们在大脑中心一个叫松果体的细小组织里相遇。但这只是暂时回答了这个问题。松果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结构，但笛卡尔二元论没有解释为什么单单只有它可以通向精神世界。

任何一个试图建立二元论的努力都会在身心相互作用这个问题上受阻，这也许正是大多数哲学家和科学家完全拒绝一切形式的二元论，而主张某种形式的一元论的原因。但他们的选择并不多，而且同样也面临很多问题。唯心主义者认为精神是最根本的，但他们必须解释为什么存在协调一致的物质世界以及它是如何产生的。中性一元论者反对二元论，但他们对世界的本质及其统一方式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第三种选择是唯物主义，目前这在当今的科学家中是最受欢迎的。唯物论者认为物质是最根本的，但他们必须面对本书要探讨的问题：如何解释意识？完全由物质构成的大脑如何产生出意识体验或不可言喻的感质？

图2　笛卡尔用机械反应和小管子里流淌的“生命力”来解释疼痛反射。但当说到意识体验时，他认为它们隶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并通过大脑中心的松果体与身体相连。

这个问题被称为意识的“困难的问题”（hard problem）。这个术语最早由澳大利亚哲学家大卫·邱玛斯（David Chalmers）在1994年创造。他想把这个重要的、无法抗拒的难题同被他称作“容易的问题”区分开来。在邱玛斯看来，“容易的问题”指那些我们原则上知道该如何解决的问题，即使我们目前尚未解决，它们包括诸如感知、学习、注意力或记忆之类的问题，也包括我们如何辨别物体、如何对刺

激作出反应以及如何区别睡眠状态和清醒状态等等。他说，相对于体验本身这个真正的难题而言，这些问题都很容易。

并不是人人都赞同邱玛斯的观点。一些人声称“困难的问题”并不存在，认为这不过是由于人们对意识的错误理解，或对“容易的问题”的严重低估而造成的。美国哲学家帕特里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称其为“伪问题”（hornswoggle problem）。她认为我们并不能预先决定哪个问题才是真正令人费解的问题。她声称“困难的问题”源于人们错误的直觉，即认为在解释了知觉、记忆、注意和所有其他细节之后，仍然会遗漏“意识本身”这个问题。

这些反对意见非常重要。在深入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把“意识本身”的意义弄得更清楚，如果它有意义的话。

界定意识

成为一只蝙蝠会有怎样的体验？[2] 这个古怪的问题在意识研究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提出。1974年，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使它闻名于世。他用这个问题来质疑唯物论，探讨我们对意识的定义以及阐明为什么心-身问题如此棘手。他说，我们讲的意识是主观性 。如果成为蝙蝠能够体验到什么——对于蝙蝠自身来说的体验 ，那么蝙蝠是有意识的。如果成为蝙蝠什么体验也没有，那么蝙蝠便没有意识。

例如，想象一下你桌上的茶杯、壶或塑料饰品，然后我问你成为茶杯会有怎样的体验？你可能会回答根本就没有体验，或茶杯没有知觉，或瓷器是死的等等。认为壶和茶杯没有意识对你可能并不难。但如果谈到蠕虫、苍蝇、细菌或蝙蝠时，你或许会遇到较多的困难。你不知道——事实上，你无法知道——成为蚯蚓会是什么样。即便如此，正如内格尔指出的一样，如果你认为成为蠕虫能够有某种体验，那么你会认为蠕虫是有意识的。

内格尔选择蝙蝠作为例子是因为蝙蝠与我们大不相同。它们能够

飞翔，大多数时间生活在黑暗之中，倒挂在树上或者潮湿的洞穴里，并用声呐而非视觉来观察世界。也就是说它们在飞行时发出快速而尖锐的吱吱声，然后通过分析反射到自己灵敏的耳朵中的回声来了解周围环境。

界定意识

目前意识还缺乏普遍公认的定义，但是下列观点会让你对其含义有所了解。

“成为……会有什么体验”：如果成为某种动物（或计算机、婴儿）会有体验，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有意识的，否则就没有。

主观性或可感性： 意识意味着主观体验或可感知的体验。这是事物对于“我”的所是，而非其客观所是。

感质： 体验中无法言传的主观特质，比如红色的红或松节油那种无法形容的气味。一些哲学家声称它们不存在。

困难的问题： 客观的、物质的大脑如何产生主观体验？

如此体验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想象自己变成一只蝙蝠毫无用处，因为受过教育、会说话的蝙蝠肯定不正常。反之，如果你成为一只正常的蝙蝠，不会思考也不会说话，那么你就回答不了你自己的问题。

内格尔认为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成为蝙蝠会有什么体验，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因此被称为神秘论者 。另一个神秘论者是美国哲学家科林·麦克金（Colin McGinn）。他认为人类在意识理解方面是“认知封闭”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望了解意识，就

像狗根本无法阅读它愉快地从商店叼回来的报纸一样。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对此表示完全赞同：我们也许可以了解心理活动过程的大部分细节，但是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意识本身。

像内格尔一样悲观的人并不是很多，但他的问题有助于让我们记住什么才是意识研究中最关键的问题，这一点已被证实。如果仅仅将感知、记忆、智力或解决问题看成是纯物质过程，然后声称自己已经解释意识，这毫无用处。如果你真的是在讨论意识，你必须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解决主观性问题。你要么必须切实解决那个困难的问题并解释主观性如何产生于物质世界；抑或，你若认为意识等同于那些物质过程，或意识只是一种幻觉，甚至根本不存在，那么你必须解释它的存在缘何看起来 如此真实。不管怎样，你只有在讨论“成为……会有什么体验？”这个问题时才能说自己真正在论述意识。

意识这个术语的核心含义也可称为可感性或现象意识。这两个术语是美国哲学家内德·布洛克（Ned Block）提出的。布洛克比较了现象意识 和取用意识 两个概念，前者指在某种状态下的感觉体验，而后者指其能否用于思考或指导言行。内格尔所谈论的是现象意识（或可感性或主观性），它也是意识问题的核心。

了解这些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探讨意识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这关乎下面这个问题：意识是我们人类具有的除了感知、思维和体验能力以外的额外能力呢，还是作为一个能够感知、思考和体验的造物身上固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关键，是所有其他问题的基础。你可能想现在就决定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其含义都颇为惊人。

一方面，如果意识是额外附加的一种能力，那么我们自然会问：我们为什么具有这种能力？我们想要问意识有何用，它有什么功能，我们是如何具备这种能力的。按照这个观点，不难想象我们的进化并不需要它。因此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意识会进化生成，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是否其他生物也进化生成了意识。依照这个观点，那个困难的问题的确非常难，而今后的任务就是要回答这些难题。

另一面，如果意识为复杂的大脑过程所固有，且不可分割，那么

问这些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按照这一观点（在有些版本中叫做功能主义），问意识为什么会生成的问题毫无价值，因为任何在进化中获得智力、感知、记忆和情绪的造物必然是有意识的。同样，谈论“意识本身”或“不可言喻的感质”也毫无意义，因为除了这些过程和能力之外并没有额外之物。

依据此种观点，实在没有什么深藏的奥秘，也没有“困难的问题”。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也颇为不同：即是要解释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好像 存在，以及为什么我们似乎 拥有不可言喻的、非物质的、有意识的体验。正是在这里，意识是一种幻觉的观念产生了，因为意识和“困难的问题”都不是其看起来的那样，因此我们必须解释幻觉是如何产生的。

如果你认为上述两种观点的含义不易掌握，下面这个思维实验可能会有所帮助。

无意识躯体

想象这么一个人：他长得和你一模一样，行为举止像你，想法像你，说话也和你一样，但他却没有意识；他没有自己的意识体验，一切行动都在无意识下进行。这个无意识的造物并不是某个半死不活的海地还魂尸，它是哲学家所指的无意识躯体。

无意识躯体当然容易想象，但他们真的存在吗？这看似简单透顶的问题却引发了大量哲学难题。

那些认为无意识躯体真的存在的人相信世上确实有可能存在两种功能相当的系统，一种是有意识的，另一种是无意识的。邱玛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声称无意识躯体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即使没有出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也会存在于其他某个世界。他想象他的孪生僵尸（无意识躯体）行为举止和他完全一致，但没有意识体验，也没有内心世界和感质。在僵尸大卫 [3] 的内心世界，一切都是黑暗的。其他哲学家虚构了一些有关一个住满了无意识躯体的僵

尸王国的思维实验；或者推测有些活生生的哲学家可能只是假装有意识，而实际上就是无意识躯体。

那些不相信无意识躯体的存在的人认为整个无意识躯体的想法都很荒谬。这其中包括丘奇兰德和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他们声称，无意识躯体的说法荒唐可笑，因为任何一个系统如果能够走路、讲话、思考、玩游戏、选择衣着、享受大餐以及做其他一切我们能做的事情，那么它必然会拥有意识。问题在于，他们抱怨说，人们在想象无意识躯体时只不过是在骗人：他们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这个定义。如果你不想骗人，你一定要记住无意识躯体必须在外表上与正常人完全没有区别。也就是说，问诸如无意识躯体拥有什么体验之类的问题或者测验其哲学水平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根据定义 ，无意识躯体必须表现得和有意识的人一样。批评者认为，如果你真的遵守这些规则，无意识躯体的说法就变得毫无意义。

现在应该容易看出无意识躯体确实只是思考下面这个关键问题的一种形象方式：意识是我们人类有幸具备的一种特殊附加才能，还是随感知、思维或感情等技能进化而来的必然产物？如果你认为它是一种附加才能，那么你就会相信我们可能都进化成了无意识躯体而非有意识的人，甚至会相信你的邻居可能就是个无意识躯体。但如果你认为意识是人类拥有的各种技能所固有的一部分，与它们不可分割，那么无意识躯体根本不可能存在，整个说法也是愚蠢的。

在我看来，无意识躯体这一说非常愚蠢。尽管如此，它仍然非常具有吸引力，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想象一个无意识躯体容易至极。但想象某事有多容易并不是认识真理的一个好向导。那么让我们从另一个颇为不同的层面来思考这个问题——意识是否具有功能。

图3　哲学家构想的无意识躯体只会让人糊涂。

“意识力”这个词常见于流行话语，指意识是能够直接影响世界的某种力量。它要么通过作用于我们自身得以体现，比如当“我”有意识地决定移动我的胳膊，于是它就动了；它要么体现在治疗心理创伤、心灵感应或“意识胜过物质”等方面，但在这方面的争议更大。与无意识躯体一样，这种“力量”也很容易想象。我们可以想象自己的意识以某种方式延伸出去并对事物产生影响。但这种说法有道理吗？一旦你想起意识意味着主观性或可感性，那么这种说法就变得不太合理。“成为……会有什么体验？”怎么可能变成一种力量或能力？我对那棵树的绿的体验 怎么可能会引发某件事情呢？

探讨意识能否成为一种能力或者力量的一个方法是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将其取走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显然，如果意识具有力量，剩下的绝不可能是无意识躯体，因为根据定义，无意识躯体必须与有意识的人完全一致。所以留下来的会是一个与有意识的人不同的人，因

为他们不能……他们不能干什么？

也许你觉得需要意识来参与决策，但我们对大脑作决定的过程已经有很多了解，它似乎并不需要额外的力量来作决定。同时，我们也可以制造这种计算机，它们不需要特殊的意识模块就能作决定。视觉、听觉、运动控制以及其他许多人类能力也都是如此。也许你认为需要意识来参与审美、创造活动或谈恋爱，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必须证明这些事是由意识单独完成的，而不是由聪明大脑的机制完成的。

所有这些探讨会得出意识可能没什么用这一尴尬的结论，而其他一些奇怪的事似乎也指向这一结论。例如，想想人们接住板球、打乒乓球或打断快速的交谈时的情形：所有这些快速的行动似乎都在有意识地进行，但是不是意识自己产生了这些行动呢？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些行动的发生都非常迅速，它们由似乎并没有参与意识体验的脑区所协调。

那么意识是不是完全没有作用呢？副现象论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派别。它认为意识不起任何作用，只是一个副产品或伴随现象。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观点，因为这实际上承认意识确实存在，但却不会对其他任何事物产生影响。但如果意识没有任何作用，那么很难解释我们到头来何以会担心它，甚至讨论它。

认为意识没有作用不仅只有副现象论这一种论点。另一种观点认为，所有像我们一样可以看、感觉、思考、恋爱并且欣赏美酒的造物最终无一例外地会相信自己拥有意识。他们也可能想象无意识躯体，并且认为意识有功用。这种理论的底线就是我们被欺骗了：我们觉得意识仿佛是一种力量或附加的能力，但我们错了。如果需要给这种理论起一个名字，我们不妨称之为错觉主义。

我认为这是思考意识的正确方式，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有关意识的一般假设是大错特错了。我们真的错成这样吗？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审视其中一些假设及其可靠程度。

心灵剧院

最自然地思考意识的方式可能是这样：心灵像是一个私人剧院，“我”在剧院里面，大概在头部的某个位置，并通过眼睛观察外面世界。但这是一个多感觉通道的剧场，所以我感受到触摸、气味、声音和情感。我也可以动用我的想象力，凭空想象出图像和声音，就像投射在心理屏幕上一样，可以凭内眼看，让内耳听。所有这些都是“我的意识的内容”，“我”是感受这些内容的人的观众。

这个剧场的意象正好与意识的另一个常见意象吻合，即意识像一条流淌的河或溪流。在19世纪，“现代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创造了“意识流”这个词，感觉足够贴切。我们有意识的生命的确感觉像一条不断流淌的溪水，其中充满了各种景象、声音、气味、触觉、思想、情感、忧虑和喜悦。所有这些，一个接着一个，不停地发生在我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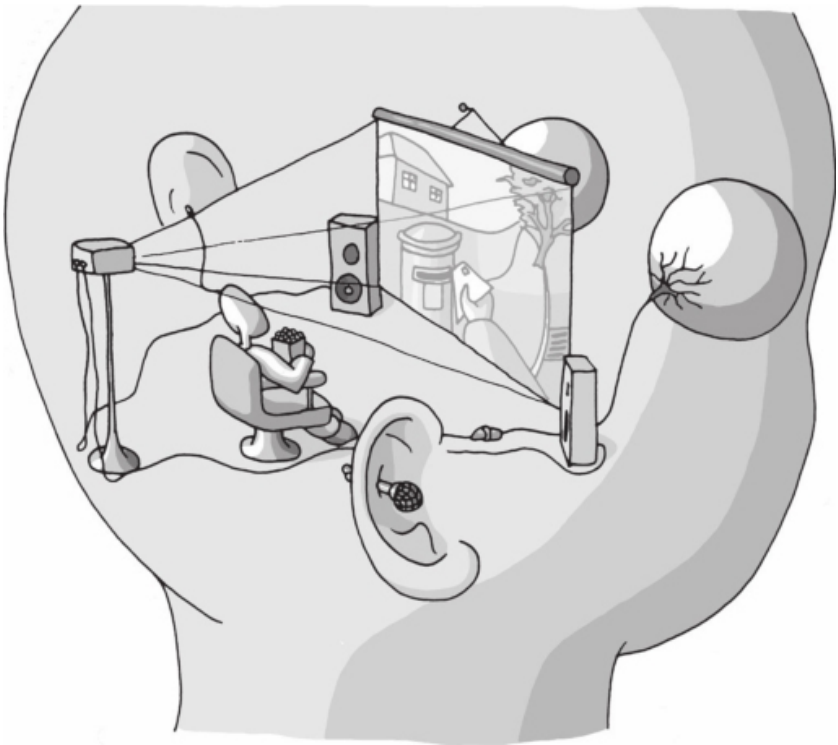

图4　我感觉自己好像从大脑的某个地方向外看：我通过眼睛和耳朵体验外部世界，在我的脑海中想象事物，指挥我的胳膊和双腿上街去寄信。但大脑并不是这样工作的。这是丹尼特所谓的那并不存在的笛卡尔剧院。

如此构想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是这么轻松、自然，几乎不值得质疑。然而当我们遇到智力上的困惑时，正如我们研究意识问题时所遇到的那样，质疑我们最基本的假设有时是有价值的，就这个例子而言，就是需要质疑这些太过天真的类比。

最强烈的质疑声音来自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他辩称，虽然多数人乐于否定笛卡尔的二元论，但他们还是通过他所说的笛卡尔剧院的形式保留了明显的二元论思维的痕迹。丹尼特反对的并不只是把心灵与剧院作类比的问题，他反对的乃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心灵或大脑的某个地方，一定存在着一个时空，在那里所有的事情汇集在一起，于是“意识产生了”；脑部活动存在某种终点，过了终点线之后事物就

神秘地变成有意识的了或“进入意识”。

这肯定是不对的，丹尼特声称。首先，大脑内部没有一个能与该观点相符的中心脑区，因为大脑是一个完全平行的处理系统，根本没有核心总部。信息进入各个感觉器官，因为不同的用途而被分配到各个地方。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并没有一个中心位置让“我”可以坐观各种事物穿过我的意识。没有哪个脑区可以标记思想或感知变成有意识的时刻。决策不是单独从某个脑区发出的。相反，大脑的许多不同脑区只是执行它的本职工作，必要时相互沟通，但并不存在中央控制系统。如果是这样，对应于意识剧院的是什么呢？

丹尼特补充道：从认为剧院确实存在转变到认为它是某种分布式加工过程或广泛的神经网络的努力也都是徒劳。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所以仍然是错误的。根本不存在任何脑区或心理过程或任何别的东西可以与大脑活动的意识部分相对应，同时让其他部分都是无意识的。所有的输入都汇集在一起，呈现在“意识”中给人看或听，这种想法毫无道理。大脑里面也没有什么“小人”对他们所看到的作出反应。大脑不是这样组织的，如果是这样它就无法运转。不管怎样，我们必须理解自己这种拥有一系列体验、有意识的自我的感觉是如何在大脑中产生的，虽然大脑内没有内部剧院，没有表演，也没有观众。

丹尼特创造了“笛卡尔唯物主义者”这个新术语来形容那些声称拒绝二元论但仍相信笛卡尔剧院的科学家。需要注意的是，笛卡尔剧院和笛卡尔唯物主义这两个术语都是丹尼特而非笛卡尔提出的。世上没有几个科学家承认自己是笛卡尔唯物主义者，但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绝大多数人都假定存在某种类似于意识流的东西，或者将心灵看成内部剧院。当然，他们可能是正确的。如果他们真的正确，那么意识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那个比喻性的剧院与大脑的哪个部分相对应，它又是如何工作的。不过我倒是对此表示怀疑。只要对大脑的工作原理稍加探索就会帮助我们明白个中原因。

注释

〔1〕　阿特曼，字面意思是自我，有时也译成灵魂。它是印度教和吠檀多（古代印度哲学中一直发展至今的唯心主义理论）所使用的一个哲学术语，指超越了一切外部存在的表面现象的真正自我。——译注，下同

〔2〕 这个问题的英文原文是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直译为“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样？”。在内格尔看来，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蝙蝠是否拥有主观的体验。

〔3〕 大卫是邱玛斯的名。

第二章

人类的大脑

意识的统一

人脑堪称已知宇宙中的最复杂之物。就所占身体的比重而言，人脑是所有物种中最大的，并且大得多。与和人类最接近的物种类人猿相比，人脑大约是类人猿大脑的3倍。人脑将近1.5公斤，由10多亿神经元（神经细胞）及数十亿的神经联结构成。这些联结产生出我们所具备的非凡能力：知觉、学习、记忆、推理、语言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意识。

我们知道大脑与意识密切相关，因为脑部的变化能引起意识的改变。例如，一些药物在影响大脑功能的同时也会影响主观的体验；刺激脑部很小的部位能够产生一些特定的体验，如幻觉、生理感觉或情绪反应；而脑部受损能够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意识状态。虽然我们对上述事实都相当确定，但我们为什么应该拥有意识仍然是一个谜。

从某种意义上讲，大脑似乎并不是按照产生我们所拥有的意识所需要的方式设计的。大脑最独特的特征是它采用大规模并行分布式加工的设计。信息通过感觉器官传导进来，并用来控制言语、行动及其他输出。但大脑并无一个中央组织，也没有一个运行着关键信息的内部密室。大脑更像是一个庞大的网络——或者说是一个庞大的相互连接的网络集群，而不是拥有中央处理器的个人电脑。人脑中没有什么是集中控制的，不同的脑区处理视觉、听觉、言语、身体意象、运动控制、前瞻性策划以及无数的其他任务。这些脑区相互连接，但是这一连接并不是通过将所有信息输入一个中央处理器来实现的，而是由大脑各处数以百万计的横纵联结来实现。

相反，人类意识似乎是统一的。常常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意识的统一”。天然地思考意识的方式是将其看成心灵剧院或体验流，它包含了所有三个方面。

首先，这意味着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都存在一个整合体，它涵盖了“我”正体验的一切。换句话说，有些事情出现在意识中，而其他

许多东西却在意识之外。意识里的事就被称为“意识的内容”，并形成了当前的体验流或者心灵剧院舞台上的演出。第二，意识在时间上似乎也是统一的，因为从某一时刻到下一时刻、甚至跨越意识体验的整个历程中似乎都有一个连续体存在。第三，这些意识内容都由同一个“我”所体验。换言之，既存在单一的体验者又存在单一的体验流。

意识科学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要解释意识的内容、意识的连续性以及有意识的自我这几个问题，同时也必须以并行和非中央集权加工的大脑为出发点来解释。我们稍后会回到自我这个问题上，这里我们先解释存在意识的内容这一看似天真的观点。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人脑中发生的大部分事情好像都在意识之外，甚至无法被意识所理解。我们看到树木被风吹动，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视觉皮层中发生的所有快速的神经元电活动，正是这一活动让我们产生了知觉。我们坐在计算机旁有意识地回复电子邮件，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如何敲字或者那些词语从何而来。我们都有意识地争取赢得那场乒乓球比赛，却觉察不到快速的视觉-运动控制过程，正是该过程让我们挥出致胜的一拍。

在上述例子中，每一个脑细胞以及数十亿计的神经联结都处于活动状态——一些放电快，一些放电慢，其速度取决于我们所做的事情。然而绝大部分活动永远不能进入意识流或我的心灵剧院，因此我们称之为无意识或潜意识，或将其归入边缘意识之列。

但是，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问题在于这种区别意味着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存在不可思议的差别。是否如二元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大脑的意识活动受一个超自然的灵魂或非物质的自我控制？大脑中是否存在一个产生意识的特殊部位？大脑里是不是有产生意识体验的特殊“意识神经元”？是否有特定的神经元连接方式能够产生意识？还是什么别的方式呢？我们将会看到，所有这些可能都有与之对应的理论，但它们都面临严峻的困难。

这个问题归根到底似乎变成——我们是要在熟悉的意识观（如心灵剧院或体验流）上继续努力，并试图让其能够发挥作用，还是一改所有的习惯思维方式而另起炉灶？在探讨一些将意识和大脑功能相关

联的有趣研究时，我们有必要将这个问题铭记在心。

联觉

有的人能够听到形状、看见噪声或触摸声音。这种奇怪的意识整合是出人意料地普遍。许多小孩都有联觉，但联觉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到最后每200个成年人里会有1个成为联觉患者。联觉会遗传，在女性和左撇子中更常见。联觉患者通常具有很强的记忆力，但数学和空间能力较差。联觉尤常见于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当中。

联觉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是将数字或字母看成是带有颜色的。这些体验不能被自觉抑制。即使许多年后再次测试，大多数联觉患者都会报告说同一刺激物还会使他们产生完全相同的形状或颜色体验。许多联觉患者都会隐藏自己的能力，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心理学家都怀疑联觉患者是否真的存在。但最近的研究证实了联觉的普遍性和稳定性。

联觉患者大脑中跨感觉通道的神经联系可能比常人更多。拉玛钱德朗（Ramachandran）认为，因为数字和颜色的加工中枢相毗邻，这有可能是这种联觉形式为什么最为常见的原因。

意识的神经机制（NCCs）

人人都有疼痛的体验。疼痛令人恐惧。它让人痛苦，因此没有人喜欢它。但疼痛是什么呢？在研究意识的神经机制，即与主观体验相关联的大脑活动这个问题上，疼痛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从主观上说，疼痛本质上是个人的一种体验。我们无法向其他人

描述自己的痛苦；除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们也无法知道别人的疼痛究竟有多厉害。即使看到了，我们也可能认为他们是在虚张声势，虽然我们永远不能肯定。当疼痛消失后，我们甚至记不起它曾经有多疼。实际上，人们常说，如果一个女人记得生第一个孩子时的痛苦，没有人会再要第二胎。归根结底，只有当我们正在受苦时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是痛苦。

从客观角度说，疼痛在比如身体受伤时就会产生。受伤部位会发生各种化学变化，然后信号通过专门化的叫做C-纤维的神经元传导至脊髓，然后再传至脑干、丘脑、体感皮层（它包含着与身体各个部分相对应的中枢）以及扣带回皮层。脑部扫描显示，人们经受的痛苦程度与上述脑区的活动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对疼痛的一些神经机制有所了解。

现在重要的是要记住："相关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正如这个简单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很容易从相关性出发，作出错误的因果推论。假定弗雷迪（Freddie）有一个走进客厅就要打开电视的习惯。他几乎每次这样做的时候，辛普森一家很快就会走进来。当其他人走进客厅和按下电视开关时，则会发生完全不同的事。如果相关隐含着因果关系，我们就会断定弗雷迪的动作导致了辛普森一家的出现。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当然不会相信这样的结论。但我们却可能会在其他很多例子中误判误信。

我们要记住这样一个经验法则：如果A和B存在可靠的相关性，有3种可能的因果解释，即A导致B、B引起A或A和B均由其他事物引起。此外，A和B事实上可能是相同的东西，即使它们看起来不一样（如同水和H_2O，或晨星和昏星）。

那疼痛属于哪种情况呢？也许是身体上的变化引起了疼痛，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解决那个困难的问题。也许疼痛才是身体变化的原因，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一个超自然的理论。也许是别的原因同时导致了疼痛和身体上的变化，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别的原因是什么。或许疼痛和身体上的变化本身就是一回事。许多唯物论者都赞同最后一种解释，但如果这种说法正确，我们完全无法证明

它为什么是正确的。我大脑里那可怕、难堪和讨厌的感觉怎么可能是由几个C-纤维的放电而产生的呢？

这个问题清楚地表明我们目前对意识是多么的无知，但我们不应该绝望。科学已经习惯于解决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因此，让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看设计者如何用它来探究意识（本例是视觉意识）的神经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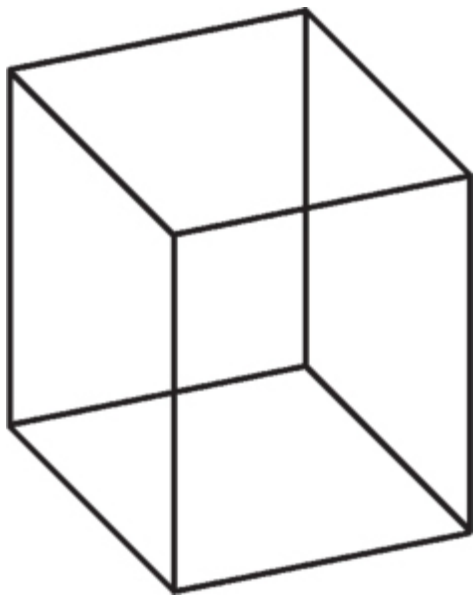

图5　这个两歧图形叫做内克尔立方体。如果你盯着它看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它摇摆于两种同样可能的解释之间，仿佛这两种见解都在争夺意识。但这是描述该现象的正确方式吗？

请看图5中的内克尔立方体。当你盯着它看时，立方体将在两种不同的图像中切换；你甚至可以有意控制它。感觉好像一个图像首先进入意识，接下来是另外一个，就像两种图像在争夺意识。

此类两歧图像为研究特定体验的神经机制提供了一个理想机会。例如，我们或许能够确定当体验发生切换时大脑的哪些部分发生了改变；这就可能意味着我们找到了感知进入意识的地方，或是找到了特殊的意识神经元，或视觉意识的中枢。

在20世纪80年代，希腊生物学家尼克斯·罗格西特斯（Nikos Logothetis）设计了一系列猴子实验来检验这种观点。他用的是另一种叫做双眼竞争的两歧图形，也就是给双眼呈现不同的画面。与内克尔立方体类似，本例中的两个画面也会争夺意识。猴子的反应显然跟我们一样，因为它们能够通过按压杠杆告诉我们它们当时看到的画面。然后罗格西特斯在猴子大脑的不同部位插入电极，包括初级视觉皮层（V1）、次级视觉区（V4）以及颞下皮层的部分脑区——视觉信息经过初步加工后传导的目的地。结果表明初级视觉皮层的神经元活动一直保持不变，但是当猴子的体验改变时，颞叶皮层的神经元活动发生了变化。最近，用大脑扫描技术对人进行的实验也得到同样的结果。

这是否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并且我们已经找到了大脑中意识产生的地方？有些研究者似乎就持这样的观点。例如，邱玛斯认为意识就产生在这些脑区。美国神经心理学家V.S.拉玛钱德朗认为这些脑细胞承载感质，而其他脑细胞则没有。诺贝尔奖生理学奖获得者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2004）也得出类似结论：我们无法意识到初级感觉区的信息加工，只知道这些加工后的结果。

但根本问题依然存在。说一些神经运算“承载感质”，或者说意识“产生”在某个脑区，而不是别的脑区，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我们对此全然不知。在我们找到相关的脑细胞后，我们一定还会问：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是它们？其中有什么神奇的差别？为什么有些细胞能产生主观体验而另一些却不能？

了解这些过程的发生地点固然重要，但仅仅具有相关性并不能解开意识之谜。事实上，这些相关性只会更清楚地表明：意识仍旧是一个谜。

受损的心智

脑血管阻塞会导致中风，那么失去氧气供应的神经元就会受损。

这经常会引起另一侧身体的瘫痪，或者一侧的失明及其他损伤。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左脑控制右侧身体；同时左脑也接受右侧视野的信息（也就是说，左脑并不控制右眼，但只是处理所见事物右半部分的信息）。但是右脑损伤有时会引发更为不可思议的后果：即单侧或半侧忽视。

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不只是失去了某些具体的能力，而是仿佛失去了一半的世界。这不仅仅是说当他们向右侧看时，他们看不到房间的右边，或画的右边，而是说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还存在右侧的世界。这一点从他们的古怪行为中显露无遗。例如，除非有人把盘子转过来，他们可能只吃盘子右半边的食物，完全无视其余部分。他们可能只刮右脸，或只对站在右边的来访者作出反应。

意大利神经学家埃德瓦尔多·比西阿奇（Edoardo Bisiach）在这类病人身上做了一个独特的实验。他让病人想象米兰著名的大教堂广场。他们对这个广场都非常熟悉。首先，他们必须描述从北边到达大教堂时所看到的情形。他们都描述了位于其右边的事物：许多漂亮的建筑、商店和咖啡馆。如果他们真的站在那个位置，他们的报告完全忽视了自己左边的一切事物，比西阿奇也无法让他们告诉自己那里有什么。但接下来，比西阿奇让他们想象从南面进入广场。这回所有被遗忘的建筑都被仔细地描述出来，而先前记住的建筑则被遗忘了。

图6　半侧忽视。这些画是一个名叫PP的病人所画。她于1987年罹患右半球中风。请注意她每幅画的左边都不翼而飞。这种视觉忽视一直持续了17年，直至她逝世。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人的体验竟然如此支离破碎，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我们喜欢这样想：如果我们中风了，我们一定能认识到自己的愚蠢错误，并将所见到的两部分景色合二为一。但显而易见，这种事不会发生。对这些病人来说，世界的一半已经消失，没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有意识的自我来克服这个问题。

记忆也是一个容易被我们视作当然而常常忽视的东西，直到我们意识到失去它的后果才会明白其重要性。记忆主要有两种类型：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但这种划分会掩盖许多不同的、与具体任务和能力相关的微妙的记忆形式。这对老年人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记忆事件的

能力在逐渐退化，但他们仍可以认路、处理日常事务并且学习新的运动技能。同时，小范围的脑损伤会影响非常具体的记忆形式。尽管如此，最引人注目，同时对于思考意识来说也最有意思的损伤是前行性失忆症。

前行性失忆症的出现通常是由于海马（脑边缘系统的一部分）遭到损坏。这种损伤可能是由于酒精中毒导致的科尔萨科夫综合征或由外科手术或疾病引起，也可能是某些意外事故造成大脑缺氧的结果。但其后果都是病人的短期记忆能力和已有的长期记忆能力保持完好，但失去了形成新的长期记忆的能力。所以他们之后的生活就成了不断滚动的现在，只持续几秒钟，然后消失成空白。

H.M.是迄今研究过的最著名的失忆症案例之一。他曾在1956年被摘除了大脑两侧的海马——这是为了控制他严重的癫痫发作所做的最后尝试。这个手术留下了严重的失忆症：他可以学习一些新技能，并且提高了在辨认某些刺激物上的反应速度，但他始终否认自己曾经做过那些任务。C.W.是一个音乐家，因为脑炎而失去了记忆。病愈后，他仍然可以欣赏音乐、即兴演奏，甚至指挥合唱团，但他记不得排练或病后发生的任何事情。

神经学家奥利佛·萨克斯（Oliver Sacks）描述他当年治疗吉米·G.（Jimmie G.）的经历。吉米患有科尔萨科夫综合征，他虽然已有49岁，但依然相信自己才19岁，刚刚从海军退役。出于好奇，萨克斯让吉米看了一眼他在镜子中的样子，但他很快就为自己的做法感到后悔，因为当吉米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满头花白时，他变得疑惑、恐惧和狂乱。萨克斯于是马上把他带到窗前向外看，他看到一些小孩在玩耍，这时吉米的恐惧消失了，他开始微笑。萨克斯接着偷偷地溜掉了。当他再次回来时，吉米像从来没有见过他一样跟他打招呼。

变得如此健忘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呢？H.M.和C.W.有充分的意识吗？他们的意识是否与众不同？还是别的怎么回事？如果我们能觉察意识、测量它，甚至恰当地予以定义，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但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观察病人的言行。根据观察，他们显然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意识：他们清醒、警觉，对世界充满兴趣，能够描述

自己的感受。但从其他方面来说，他们的体验一定有很大的差异。

在C.W.的日记中，他不断重复同样的句子：“我刚刚第一次拥有了意识”。其他人则一遍又一遍大叫：“我刚刚醒来”。也许大家都熟悉那种突然变得十分清醒的生动体验，仿佛我们之前一直都在做梦或深陷于沉思之中。这种被唤醒的感觉可能由我们周围的美景所引起，也可能是由不经意说出的一个词或发表的评论所引起，甚至是由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现在有意识吗？”所引起。但无论原因是什么，这都是一个奇怪而特殊的时刻。但想象一下过这样一种生活：你时刻保持清醒，但什么都记不住。

上述例子能够引发我们对意识的连续性的思索。虽然遗忘病患者可以和常人一样把当前作为一个统一的意识流来体验，甚至会感觉到自己的体验是连续的，从一个时刻延伸到下一时刻，但他们无法体会昨天变成今天，也不能规划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未来。如果你相信存在任何形式的内在自我、灵魂或精神，面对这些事实你会觉得非常尴尬。是否在某处有一个真的自我，它能够记忆一切，只是无法将之传递到受损的大脑？灵魂或自我也会随着大脑的物理损伤而受到伤害吗？更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对这种持续的有意识自我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功能完好的大脑的产物，但这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些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大脑功能如何与体验产生关联。还有一些更不可思议的脑损伤病例对统一意识的观点提出了严峻挑战。

视而不见

D.F.患有视觉物体识别障碍。尽管她的初级视觉能力和颜色视觉正常，但她不能靠视觉识别物体的样式或形状，叫不出简单的线条图的名字，也不认识字母和数字。但她能够非常准确地取用日常用品，虽然她说不出它们叫什么。

在一个有趣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让D.F.看一排狭槽（像信箱上的那种槽），并让她画出槽的方向，或根据槽的方向来调整线条的角

度。她根本完不成这项任务。但如果给她一张卡片，她可以快速调整好方向，并把卡片投进槽里。

乍看上去，D.F.似乎能够看见（因为她可以邮寄卡片），但缺乏看见的真实体验 。这好像意味着视觉可以和意识相分离，仿佛D.F.是一个有视觉的无意识躯体。这个结论基于我们对视觉和意识的天然想法，但研究表明，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思考视觉的最自然方式大概是这样的：大脑加工从眼睛进来的信息，因此我们有意识地看到一幅世界的图画，并以此指导我们的行动。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看到某物后才能据此行动。但事实证明大脑根本不是按这种方式组织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能就无法生存。事实上，人脑（至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觉通路，它们执行着不同的功能。

腹侧通路从初级视觉皮层传导至颞叶皮层，参与形成对世界的准确感知，但这个过程需要一些时间。所以与此同时，背侧通路传导至顶叶皮层，协调快速的视觉-运动控制。这意味着早在你看清球和障碍物之前你就能做出一些在视觉系统指导下的快速行动，例如回球、接住球以及跳起躲避障碍等。从这个意义上讲，D.F.的例子是符合道理的。准确地说，它并不是视觉和意识的分离，而是行动与知觉的分离。她丧失了大部分负责物体识别的腹侧通路，但保留了准确执行视觉-运动控制所需的背侧通路。这一点得到了其他许多实验的证实。因此，我们对视觉自然产生的想法肯定有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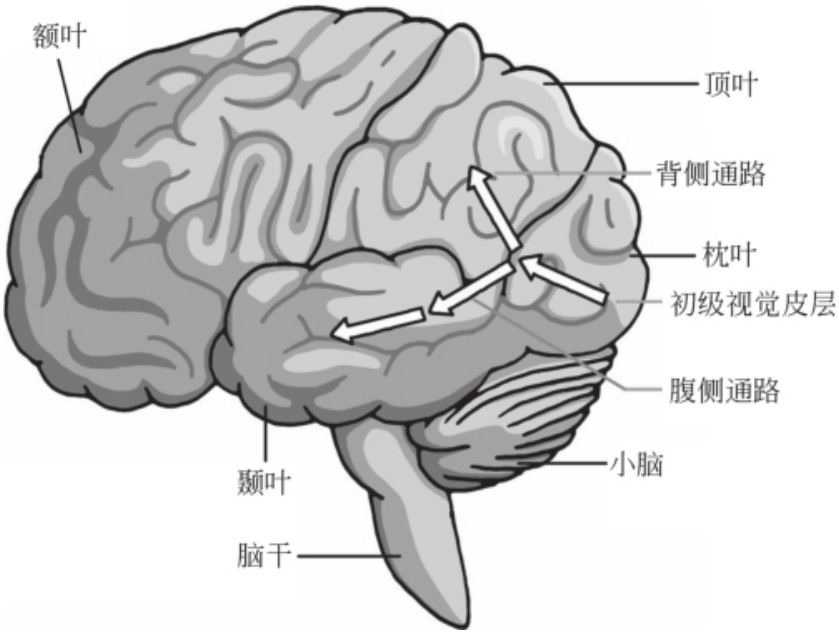

图7　双视觉通路。腹侧通路负责感知而背侧通路负责快速的视觉-运动控制。

在20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神经心理学家劳伦斯·维斯克朗兹（Lawrence　Weiskrantz）作出了一个更不寻常的发现。他那时在治疗一位名叫D.B.的病人。这个病人的初级视觉皮层，即V1受到了损害。由于该区域的细胞和外部世界存在对应关系，所以该区域受损就会形成一个盲区或盲点。也就是说，当他平视前方时，有一部分区域他什么也看不到。这在日常生活中不会造成多大的麻烦，因为你总是可以转动眼球。但在实验中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证明。如果你把一个物品或一张图片放在人们的盲区，他们会说自己看不到那样东西。

这个奇怪的发现是这样的：维斯克朗兹让D.B.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一些条纹，并问他那些条纹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D.B.自然说他不知道，因为他看不到任何条纹。但维斯克朗兹让他猜。D.B.还是坚持说自己看不到那个区域，但他作出了猜测——他的答案的正确率接近90%。换句话说，虽然他自称看不见，但数据表明他能够看见。维斯克朗兹把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称为“盲视”。

人们后来在其他盲视病人身上做的许多实验都得到了类似结果。他们虽然都否认自己能有意识地看见事物，但有的人能够把眼睛转向物体，指出物体的位置，或者模仿盲区里亮点或物体的运动；其他一些人能对刺激物作出瞳孔放大和其他情绪反应；还有几个人能够正确地猜出刺激物的颜色，虽然他们说自己“看不见”。

乍看上去，盲视为意识的各种理论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据。他们或许会这样论证：盲视患者拥有客观的视觉但缺乏主观意识；他部分是一个无意识躯体，在没有看的感质的情况下却能看见；这就证明意识是一种额外的附加能力，独立于视觉的客观功能；它证明了感质的存在，也证明功能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错的。

图8　盲视患者虽然声称自己看不见刺激物，但是可以猜对。

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最可能的解释是：人脑中存在大约10条独

立的、并行的神经通路可以把视觉信息传导至大脑。大约85%的细胞沿着主要的通路到达初级视觉皮层，但是其余的细胞可能经由其他次要通路到达其他皮层和皮层下区域。这些次要通路不会受到V1损伤的影响（V1受损引起盲视）。因此，盲视患者具有的这种奇怪能力可能是由于这些次要通路的存在。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控制眼球运动的通路完好无损，那么病人转动眼睛来跟踪盲区里的物体就不足为奇。他甚至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眼球在转动，因此能够猜到那里有一个物体。但如果失去了V1，他不可能认出物体或者识别其形状、大小或其他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真的是失明了。

如果这个解释正确，那么盲视仍然不失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但它并不能证明意识是独立于视觉过程的。如果说盲视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意识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就是：我们普遍认为存在单一的、中央的视觉体验的想法恐怕是完全错误的。同以往一样，视觉体验如何进入意识这个问题还远未得到解释。

第三章

时间与空间

体验的时间进程

意识会滞后于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吗？这个稀奇古怪的问题起源于神经科学家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研究。他的发现催生出“利贝特延误”或“滞后半秒”理论；同时，他的发现对自由意志和责任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六章看到。

利贝特最早在病人的大脑上进行实验。为进行必要的外科手术，这些病人的头皮已经被揭开。同时，他们也许可利贝特用电极刺激他们的大脑皮层。人们早就知道大脑中有一个体感皮层区，其中有中枢和身体各个部分相对应。刺激体感皮层的任何部分都会产生知觉，仿佛身体相应部分被触摸了一样。如果刺激运动皮层，身体的某个部位就会动；如果刺激视觉皮层，我们就会看到事物；如此等等。

采用一系列持续数毫秒（1毫秒为千分之一秒）到几秒不等的电刺激，利贝特发现：在一系列短电脉冲刺激下，病人毫无感觉；但在较长的脉冲刺激下，他们会报告自己感到手臂好像被摸了一下。利贝特的研究表明电刺激需要持续半秒才能让病人报告“我感觉到了”。这似乎表明：有意识的体验在刺激开始足足半秒后才产生。

很多采用意识感觉阻断或掩蔽技术的实验都证实了这一奇怪的发现。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在触摸手臂后刺激体感皮层可以阻止个体感觉到这一触摸。于是利贝特改变触摸和电刺激之间的时间间隔。如果在触摸半秒后刺激大脑，病人仍然感受得到被触摸的感觉；但如果电刺激在触摸半秒钟以内，这种被触摸的感觉就被埋没了，仿佛从未发生过。

最显而易见却未必正确的解释是：神经活动必须持续半秒以上才能产生意识。利贝特把它称为“意识的神经充分性”。这种解释非常奇怪。它意味着意识必须远远滞后于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件，因此在对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作出反应方面意识也就毫无用处。这里非常重要

的一点是要从大脑的角度来认识半秒是一个什么概念。触摸手臂的信号在几十毫秒内就可以传导到脑部，听觉刺激传导的速度则更快。对光亮的正常反应时间为200毫秒，这其中涉及到大量检测光亮并协调反应的神经元的激活。因此，意识在整个进程中如此晚才产生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就是利贝特的结果似乎要证明的。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为什么意识不到这个延迟？利贝特本人用“事后推定”或“主观预期”现象来解释个中原因。他认为意识的产生确实需要大脑皮层的活动持续半秒以上。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延迟是因为一旦神经充分性达到后，我们会把事件的时间往前推。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当刺激（比如光亮一闪或者快速的触摸）产生时，大脑会立即产生一个叫做诱发电位的及时效应。根据利贝特的理论，在我们有意识地感受到了手臂被触摸时，体感皮层的活动一直在增强，直到达到神经充分性。一旦达到充分性，那么触摸发生的表面时间就被提前到诱发电位产生的时刻。否则，我们什么也感觉不到。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感觉不到意识的任何延迟。

医学上的进步使得再做那种侵入性手术变得毫无必要，利贝特的实验因此也不可能再重复了。不过，那些实验结果通常都为该领域的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但他们还未对实验结果的正确解释达成一致。利贝特本人是反唯物论阵营中的一员，他们相信这些结果对心脑等同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像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爵士（Sir Karl Popper，1902—1994）、神经生理学家约翰·埃克尔斯爵士（Sir John Eccles，1903—1997）这样的二元论者则以该结果作为非物质的精神力存在的证据。数学家罗杰·彭罗斯爵士（Sir Roger Penrose）则声称这些结果需要用量子理论来解释。

丘奇兰德和丹尼特对此完全不赞同。他们认为，这些结果只是表面上拥有这些奇怪的意义，因为人们不愿放弃自己对意识的错误想法，还深陷在笛卡尔剧院的观念中。这些错误想法让意识这个问题变得似乎无法解决，但事实本不该如此。

有必要对这一反对意见略作进一步的探讨。关于半秒延迟的天然想法大概是这样：触摸手臂（或其他任何刺激）诱发的神经信号从胳

膊传导到脑部，然后在大脑相关脑区进行加工，直到最终进入意识。与此同时，人感觉到了触摸。这种看法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现象，它们拥有各自的时间进程。首先有一些客观事件，其物理时间可以用仪器测量，比如电刺激的时间或某个特定的脑细胞放电的时间；其次，存在一些主观体验，它们有自己的时间进程，比如触摸感觉产生的时间或触摸进入意识的时间。

这个描述看似相当合理，无懈可击。你可能对此完全信服，认为它必对无疑。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它带给我们的所有麻烦。如果你接受这个看似显而易见的思考大脑的方法，那么你不是局限于物质活动在大脑某个地方对应着精神活动的想法中，就是认为在某个时间无意识过程会神奇地变成有意识的过程，即无意识过程“变为意识”或“进入意识”的时间。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这么想，你马上就遇到那个“困难的问题”和看似无法解决的意识之谜。

推进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坚持这种天然的意识观，并试着解决问题，也就是要解释无意识过程如何变成了有意识的过程。这种方法产生了量子理论、各种形式的二元论以及我们已知的大部分有关意识的科学理论。利贝特本人的观点是：当一群脑细胞的物理活动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时，该物理活动在某个时刻就从无意识变成了意识，但他并没有解释怎么变或者为什么会变，因此这依然是一个谜。

另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是摒弃意识体验可以被测时的假设。要放弃这种对意识的天然想法极其困难，但还有其他一些奇怪的例子会使这种可能性更具吸引力。

钟表和兔子

想象你正坐着看书。正当你翻页的时候，你意识到钟在报时。之前你并没有意识到钟在报时，但此刻这个声音突然进入了你的意识。在这一刻，你能记得之前你没有刻意听的声音，也可以数你之前没有听到的钟声的次数。钟声已经响起了3次，你继续听下去，然后你发

现已经是6点了。

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因为你可以核实你数得完全正确。类似的事情在存在背景噪声的环境下一直在发生。你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外边马路上钻孔的声音。这一刻之前你毫无察觉，但现在你似乎能够记起在你觉察到噪声之前那声音听起来像什么样子。仿佛有一个人（如果不是你）一直在听。这些体验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以至于我们通常都会忽视它们，但它们真的值得我们更仔细地思考一下。

以时钟为例，如果对意识的一般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该可以指出哪些体验在剧院中或意识流中，而哪些不在。那么钟发出的前3声“哨 ”声该在哪里呢？如果你认为它们一直在流（即意识）之中，那么你无法解释为什么你非常肯定它们是在后来才意识到的；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它们是在流之外（即无意识的），那么你必须解释当你意识到它们时发生了什么。是否像利贝特所认为的那样，直到第4声时才是有意识的，然后再从主观上向前回溯？或者对它们的记忆一直停留在无意识状态，直到你的注意转换时才进入到意识中？除了难以解释转换的意义以外，这也让我们的流变得非常奇怪，因为现在它似乎成了一种混合物，包含了我们一直都意识到的东西以及那些向前追溯时才加进来的东西。

其他许多例子也同样表明了这个特性。在一个满是人说话的嘈杂房间里，你可能会忽然转移你的注意，因为背后有人在说：“你猜杰里米昨晚说了些什么关于苏的事……她……”。你竖起了耳朵。此时，你似乎已经知道说出的这一整句话。但果真如此吗？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提到了你的名字，你永远不会听到这句话。那么这句话是在流之中还是流之外？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任何言语中都存在。你需要在积累大量连续的信息之后才能理解句子的开头。所有这一切发生时意识流里有什么？它仅仅是无意义的噪声还是难以理解的天书？它是否在中途从难解的天书变成了词语？但你的感觉不是这样：你感觉到人们在说那句话时，你在听并且听到了一句有意义的话，但这是不可能的。听一个词、或听知更鸟唱歌也是一样。只有当一曲唱完或整个词都说出之

后，你才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但在这一刻之前，你的意识流中有什么呢？

有一个叫做“皮肤兔子”的独创性实验最能够清楚地阐明这个问题。为了获得这种效果，需要一个人伸出胳膊，眼睛看着另一边，与此同时，实验者轻敲他的胳膊。原实验使用的是一台机器来控制敲打，但让经过仔细训练的人用尖的铅笔来敲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实验的要点是要采用完全相等的时间间隔和力量，在手腕敲5下，肘部附近敲3下，然后在靠近肩膀处敲2下。

这个人会感觉到什么呢？令人奇怪的是，他只感觉到一连串轻敲迅速地从手腕传到肩膀，而不是3种不同的脉冲，就好像有一只小兔子从手腕一路蹦跳上去。“皮肤兔子”因此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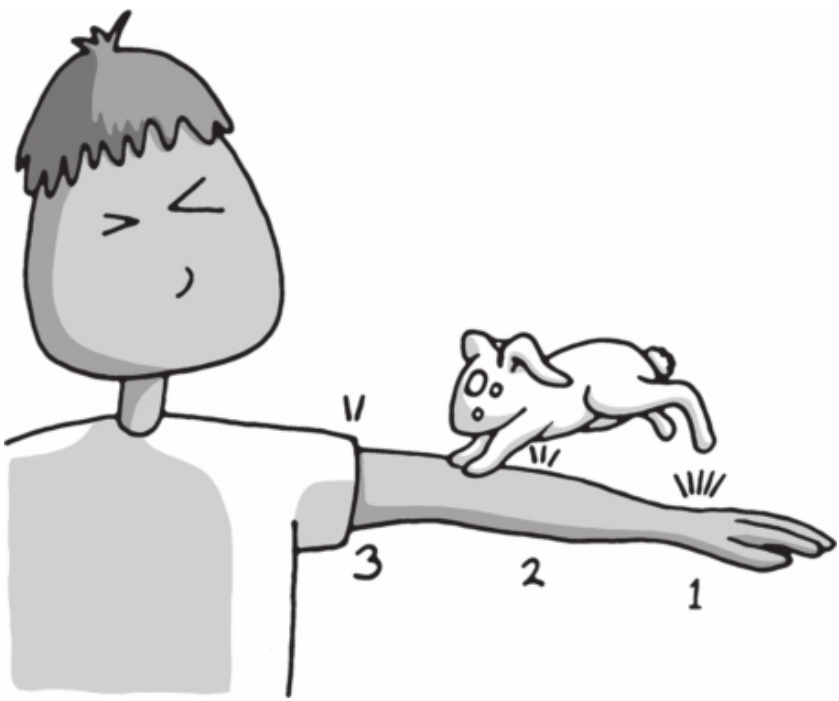

图9　皮肤兔子。实验者在手腕迅速敲5下，肘部敲3下，然后在上臂敲2下，但产生的感觉却像是有一只小动物从手腕往上跑。如果还没有开始敲击肘部，大脑怎么知道把2至4下敲打归于什么位置？最初的感觉是不是被覆盖了，进入

意识的时间被延迟？或是别的什么原因？

这个效应很奇怪，让人忍俊不禁，但它引出的问题却是很严肃的。当肘部的敲打还没有完成时，大脑怎么知道把第2、第3、第4次敲打归于什么地方？如果你坚持自然的观点，即认为任何一次敲打（比如说第4次）不是已经被意识到，就是在无意识中（在或不在流之中），你就会遇上大麻烦。例如，你可能需要说个体在正确的位置（即手腕处）意识到了第3次敲打，但稍后在第6次敲打完成后，先前的记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有意识的体验，即敲打发生在腕肘之间。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解释，你可能更愿意说意识停顿了一段时间，等所有的敲打进来才决定敲打发生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在第6次敲打完成之前第4次敲打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然后第4次敲打从时间上回推，以便被放在意识流的正确位置。

我们似乎要再一次面对不愉快的选择：要么解决这些问题，要么放弃意识体验的流的自然观念。最后一个例子或许能揭示意识流的更多问题。

无意识驾驶

什么是注意？1890年，威廉·詹姆斯作出了一个有名的论断：“人人都知道什么是注意”。但在经过许多场争论和成千上万次的实验之后，似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注意，甚至可能没有一个单一的过程可以研究。意识的很多方面乍一看似乎都非常简单，也容易理解，但你思考得越多你就会发现它们越是奇特，注意就是这其中的一个方面。

思考注意最自然的方式是把它看成探照灯。我们可以用它照亮一些事物，把其他事物留在黑暗中。有时这个“探照灯”会违背我们的意志，被巨大的声响或某个喊我们的名字的人所夺走；但其他时候“探照灯”则服从我们的指导，如现在愿意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正读的这本书，然后再去窗户边向外看一两分钟。指引注意的这个能力不仅是我们所看重的，而且似乎也是由我们的意识完成的。这看似我能有意识

地决定注意的对象，但我真的可以吗？

如果我们想一想大脑内部发生的事情，这个自然的想法就会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大脑内有无数同时并行发生的过程，包括协调知觉和思维以及控制我们的行为。也许思考注意最好的方式是将其看成分配大脑加工资源的一个系统或系统集。所以当我专注于对话时，有更多的加工资源分配给大脑负责听觉和语言的部分，而给视觉和触觉的资源则较少。当我在关注一场比赛时，更多的资源就分配给了视觉，等等。

现在我们可能会问“究竟是什么在指挥资源的分配？”心理学家做了成千上万个实验来研究不同的刺激物如何指引注意，如何分配注意以及发生这一切时，大脑哪些部分处于活动状态。但意识究竟在哪里起作用呢？从大脑的角度看，什么能够对应于我在大脑中有意识地指挥演出这种强烈的感觉呢？这只是说明意识与注意的关系并不明显的一个原因，其他原因还有很多。尽管我们在理解注意的问题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理论能够把注意和意识联系起来。有些理论家把意识等同于注意，其他人则声称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现象。有人认为没有注意意识就不存在，但其他人却并不赞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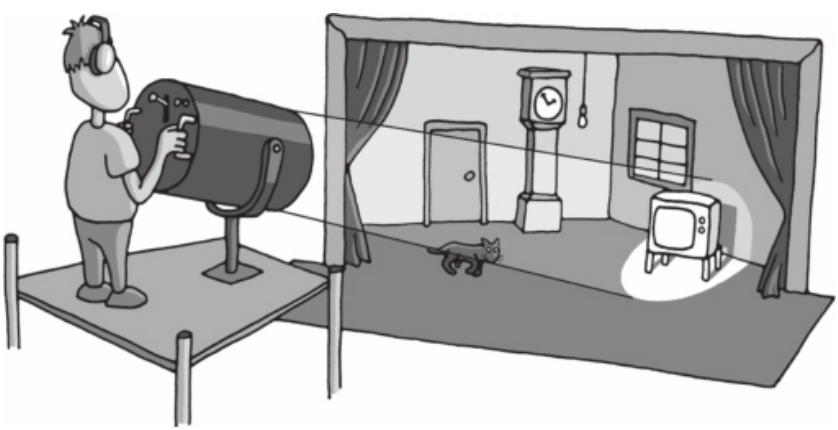

图10　注意“探照灯”。我们是否像导演一样，有意识地决定把我们的注意一会儿指向这儿，一会儿指向那儿？

无意识驾驶的现象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任何一个驾驶技术高超、娴熟的人大概都有这种奇特的经验。你沿着一条熟悉的道路去单位、学校或朋友家。你一边开车一边开始想别的事，不一会儿你就到了。你知道你一定是开车过来的，但你一点儿都不记得开车的事，就好像你对开车的过程完全无意识，即使你当时非常清醒。

这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你关注的只是自己的白日梦而不是开车。但如果把注意看成一种加工资源，那么这就是不正确的。开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必须要分配许多加工资源给它。在整个路途中，你可能会碰到好几个红灯，你需要停下来等红灯变绿时再起步；你会通过交叉路口，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遇到上下坡和弯道时需调节车速，看到限速牌时要放慢速度，并向在你从路边并入行车道时给你让路的司机挥手致谢。这些任务都需要娴熟的技巧；它们需要在视觉、听觉、运动控制、作决策以及更多方面进行复杂的协调。因此，这里的重点是：你的大脑不是没有注意这个任务，而是它能够自动完成这项任务，只是你没有意识到。看起来就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你不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着。

这如何解释呢？引入寻常的剧院或流的比喻来描述这个差异看起来最轻松自然不过。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所有那些变化的交通灯、斜坡、弯道以及其他车辆都出现在我们的心灵剧院中，并在我们的意识流中得到体验；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白日梦取代了表演，交通灯、弯道和汽车从来都没能进入意识流。

只有当我们试图将该想法与大脑活动相联系时，这个问题似乎才会出现。让我们考虑开车过程的一个小小的方面，如观察到信号灯变红并停车时所涉及到的大脑加工过程。不论是否意识到，在视觉皮层、在负责计划功能的额叶皮层和在协调手脚动作的运动皮层一定进行过很多的加工过程。在两种情况下，你都成功地停下了车。但在一种情况下你意识到了这一活动，在另一种情况下你却并没有意识到。区别何在？

我们已经知道大脑中并没有一个可供自我观看演出的中央屏幕，也没有一个产生意识信息的中央处理器，但其中必然有某种重要的差

异。是什么差异呢？这是任何一个讲得通的意识理论都必须解释的问题。现在是时候考察一些最流行的理论并了解它们如何看待这个神奇的差异了。

意识的理论

我收到过很多人的信和电子邮件，他们都自称已经解决意识之谜并愿意告诉我他们的理论。其中绝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张独立的心思、灵魂或精神的二元论观点；另一类则是引用现代物理学的伟大发现。

二元论（身心分离的观点）总是很具诱惑力，因为它与我们对意识的感觉是那么契合。但只有极少数哲学家或科学家相信二元论是对的。当代几乎仅有的例子就是波普尔与埃克尔斯在70年代提出的互动二元论。他们认为存在一个非物质的、自知的精神，独立于无意识的物质的大脑。这种精神能够通过在数十亿计的突触（神经元之间的结合点）上发生的准确地平衡过的交互作用来影响物质的大脑。波普尔与埃克尔斯可以很容易地解释无意识驾驶，他们认为非物质的精神只与负责白日梦的那部分大脑相关，而与负责视觉和驾驶的脑区无关。但与其他类型的二元论一样，该理论没有解释主观体验从何而来（主观体验只是被假设成自知的精神的一个特性），也没有说明互动的机制。

我见过的所有用二元论来解释意识的尝试都面临类似的问题。独立的心灵被创造出来以完成获取意识的工作，但始终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来说明它是如何与世界或大脑交互作用的，除非用魔力来解释。

建构在近代物理学基础之上的理论则另辟蹊径。一些人把量子物理学中出现的非局域性及特殊的时间行为与意识领域的类似效应相类比。其他人借用了这样一个有争议的观点，即需要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来解释量子力学中的波函数坍塌。但最有名的理论是基于微管的量

子计算。麻醉师司徒华·汉莫洛夫（Stuart Hameroff）和数学家罗杰·潘洛斯爵士（Sir Roger Penrose）认为在每个脑细胞中发现的细小的微管并不是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结构简单，微管的设计是为了实现量子相干和全脑范围的量子联系。他们认为这解释了意识的统一性和自由意志的可能性以及利贝特发现的奇特的时间效应。这里真正的困难在于主观性。即使大脑确实出现了量子计算（这一点还极具争议），这还不能解释个人的主观体验是如何产生的。许多人作结说意识的量子理论只不过是用一个谜替代另一个谜罢了。

我接下来要讨论的理论都是基于传统哲学与神经科学，如哲学的“高阶思维”（HOT）理论。这些理论都表明，只有当人同时也拥有高阶思维并达到能意识到它的程度时，感觉和思维才是有意识的。例如，只有司机有见到红灯的高阶思维相伴时，他才能意识到自己看见了红灯。高阶思维理论不用引入任何特殊的意识神经元就可以解释这个神奇的差别。有意识的思考指的是那些存在着与之相关联的高阶思维的思考。因为高阶思维的建立需要时间，所以这也能轻而易举地解释那些奇怪的时间效应。但高阶思维理论否认动物拥有意识，因为它们不具备高阶思维。高阶思维理论也难以解释深度冥想之类的状态，因为这时人们声称自己拥有清醒的意识，只是没有任何思想。如果要用高阶思维理论解释无意识驾驶现象，那么我们只有假设那名司机一直在想“我在做白日梦”。

更牢固地植根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理论是全局工作空间理论。这一理论首先由心理学家伯纳德·巴尔斯（Bernard Baars）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该理论源于大脑是按功能组织起来的全局工作空间的观念。在这个空间中，一次只有少数项目能够得到加工。同时该理论也非常依赖心灵剧院这个比喻。在任何时刻，意识中这极少的几个项目都相当于处于舞台中心由注意的探照灯照亮的事物，亮点周围还环绕着意识程度较低的边缘区。在舞台之外则是无意识的观众坐在黑暗中，里面充满了无数能够影响舞台上的演出的无意识的背景系统。

根据这个理论，让一件事变得有意识需要在全局工作空间里对其进行加工并能够传播到其余的（无意识）系统。因此，当你有意识地

驾驶时，有关红灯和其他汽车的信息在全局工作空间里得到加工，并传播到大脑其他区域，使其可以影响其他行为，如言语和记忆等。一旦你的工作空间被白日梦所填满，红灯和汽车则被发派到边缘区，甚至是黑暗里，并且不会被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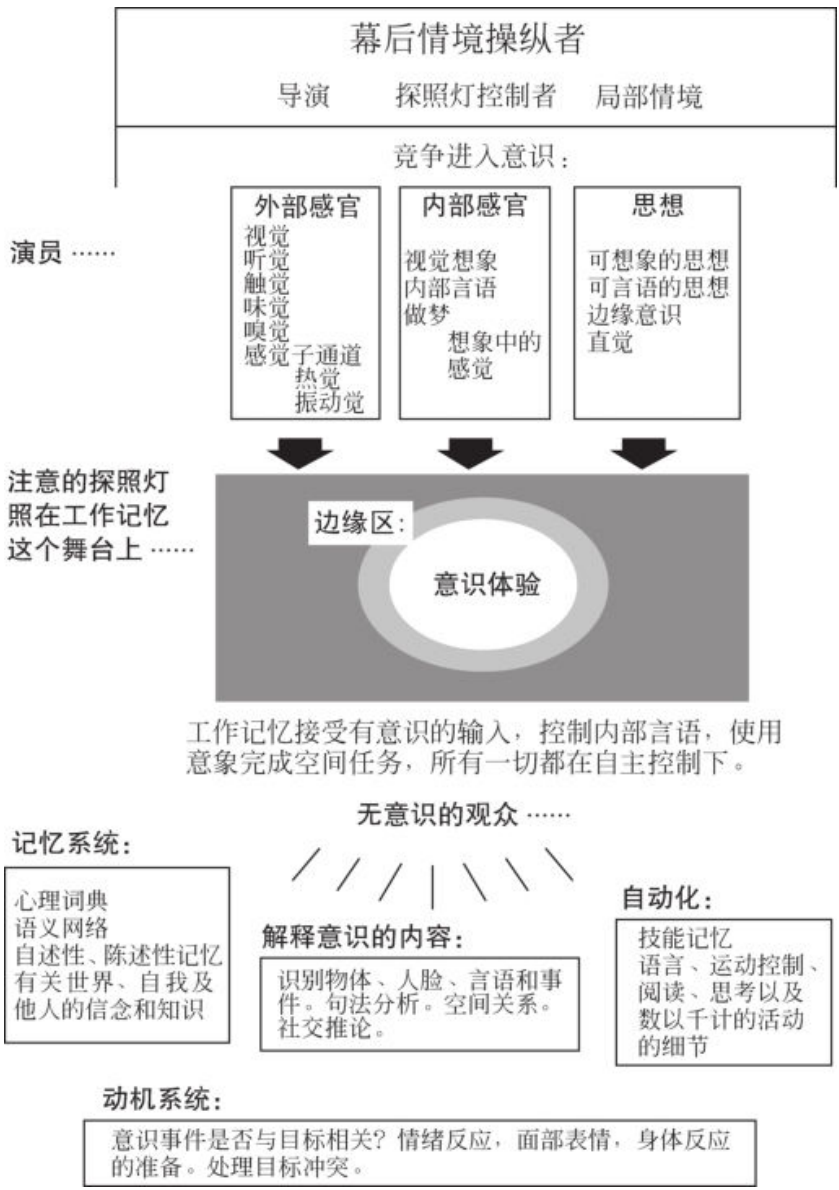

图11　全局工作空间理论。依据巴尔斯的理论，意识的内容就是一个全局工作空间的内容，对应于心灵剧院中被照亮的舞台。

全局工作空间理论的优势在于它清楚地描述了哪些事件应该被意识到，即那些存在于工作空间里并且可以被全局取用的事件。该理论遇到的困难在于无法解释为什么被传播的信息或无意识观众可全局取用的信息因此就成为有意识的了（即有所体验），而其他信息则不能。事实上，主观性这个核心问题仍然是一如既往地神秘。

这一点对于当前的多数理论来说都是如此。例如，神经生物学家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和朱利欧·托诺尼（Giulio Tononi）提出，当巨大的神经群在脑中形成动态核时，意识就产生了。这个动态核中包含了丘脑和皮质之间的往返神经联系。药理学家苏珊·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认为意识不是一个全或无的现象，它随着神经集结或相互连结并协作的大群神经元的数量的增大而增多。这一看法也许是对的，但这些理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神经网络（无论有多大或者组织得有多恰当）能够首先产生主观体验。

这些理论可能最终解释这一点。同时，试图提出可能与意识相关的神经结构，并努力揭示其工作原理，这是一个十分有效的策略。埃德尔曼和托诺尼就在朝此方向努力，他们试图发现神经元群的特性与意识的特征之间的联系。沿着这个方向，这个策略最终可能会有所收获。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没有哪个理论能够解开主观体验这个根本的谜。所有这些理论都接受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任何时候都有一小部分事物在心灵剧院或者意识流之中，而其余事物则不在，但它们不能说明为什么任何一种客观的大脑活动都可以产生一系列有意识的体验。

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办法是放弃解释意识剧院的努力，这不是说要变成一个神秘论者，也不是说卑微的人类永远不能揭开这个巨大的谜团。相反，这是要说心灵剧院的存在只是一个幻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丹尼特声称笛卡尔剧院并不存在。在他数易其稿的理论里，他甚至走得更远，完全抛弃了心灵像一个剧院的观念，甚至也完全否认有

些事情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而有些则没有的想法。在丹尼特看来，大脑一直都在并行处理来自世界的各种信息，而且没有一个信息是意识之中或者之外的。当用某种方式探测该系统时——比如问他们意识到什么，或者让他们对某个刺激作出反应，这时他们可以决定并告诉你他们意识到了什么。但在这之前，你无法知道那个事物究竟是在意识之中，还是在意识之外。

你现在意识到什么？

你可能非常肯定现在自己的意识里究竟有什么，但果真如此吗？多年来，我一直鼓励学生每日数百次地问自己一系列难度渐增的问题，如“我现在有意识吗？”，“现在谁有意识？”或者“我是有意识地做那件事的吗？”。通常，他们从确信自己整天都是有意识的，变成了对此表示严重怀疑的人。他们认识到正是由于问这个问题而让自己发生了变化。

“我刚才意识到什么？”这个问题特别有趣，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冥想。如果真有意识流，那么必然有一个答案——我意识到这一点而非那一点。但一旦你开始认真寻找，就会发现自己可以回过头来从几种思绪中任选一种，如车流的噪声、呼吸的感觉或草的样子。起初，选择其中一种似乎会赶跑其他思绪。但随着练习的增加，意识会发生改变。你会清楚地发现，总有许多思绪同时在进行，确实没有任何一个思绪是真正在意识之中的，直到你抓住它。

对意识的探索能够改变意识本身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我们可能很容易被蒙骗，也可能学会抛弃错觉。

这一理论严重违背直觉。它推翻了我们一直深信不疑的观念，即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确切地知道自己意识到的是什么——或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感质。但该理论也有自己的优势：它能够很好地解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奇特的时间效应。利贝特延误的产生是因为语言探测到这个信息需要时间。时钟的报时声和开车从未出现在意识之中或之外，因此不会遇到种种问题。但这岂不是消除了我们试图解释的现象？有人认为确实是这样，并指责丹尼特将意识“解释跑了”。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显然还有一些我们称为“意识”的东西需要解释。但这真的是我们所认为的整合的体验流吗？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当前的意识中有什么吗？我认为我们可能必须打消这个念头，并开始承认我们可能被自己对心灵的看法深深地迷惑住了。

第四章

一个巨大的幻觉

幻觉的本质

意识是一种幻觉吗？人类对自身精神的看法有可能大错特错了。这种可能性表现在很多方面——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笛卡尔剧院是一种幻觉，自我是一种幻觉，丰富多彩的视觉世界也是一个“巨大的幻觉”。

我们应该首先搞清楚“幻觉”这个词的含义。词典的定义如下：

> 被外表迷惑和欺骗的事实或情形……错误的理解或观念；欺骗、错觉或幻想
>
> （《牛津英语词典》）

或

> 导致对客观存在的真实本质作出错误解释的知觉方式
>
> （《韦伯斯特词典》）

换句话说，幻觉并不是不存在，只是事情与其表象是两回事。

图12中的视错觉是大家最熟悉的视错觉现象。这条隧道造成了一个高大凶猛的男子正在追逐一个惊恐的小孩的印象，而实际上这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简单的错觉的原理是：我们看到向后延伸的隧道，这表明两个人离得非常远。视觉系统的自动机制断定距离远的人比近的人高大。虽然这两个人不一样大的视觉印象会不断回到我们的脑海里，但通过本例和其他许多视错觉现象，我们可以认清这些错觉的原理，并提醒自己不要再次上当受骗。

类似的原理是不是也适用于整个意识？如果是，那么结论就是：意识并非不存在，只是它似乎不像看起来的那样。这意味着我们对意识的天然想法肯定有误，必须要将其抛弃。既然我们似乎在认识意识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这一想法可能会有所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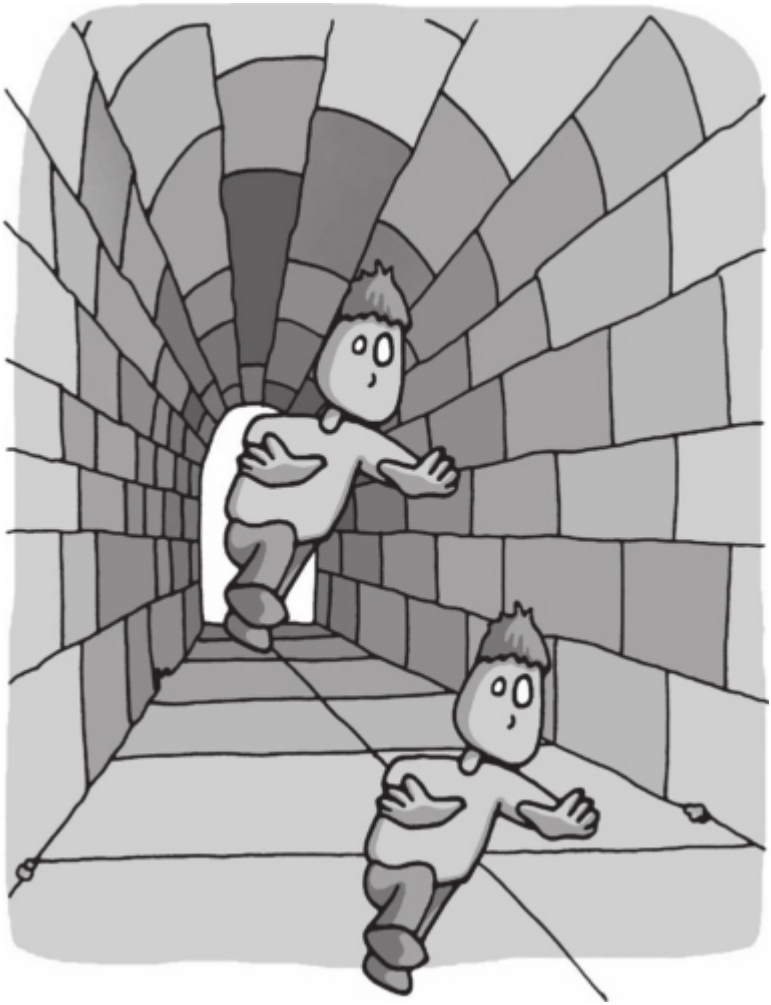

图12　幻觉是指某物并非它看起来的那样。在这个视错觉中，上面那名男子看起来较高大，实际上他们却是完全一样的。

为了探讨这一观点，我们必须从意识的表现方式开始，然后考虑这种想法为什么可能是错误的。把心灵看成剧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诱惑（我们已经探讨过它可能错误的原因）。另一个诱惑是我们感觉到意识是某种力量或权力，我们需要它来完成那些最需要智慧或最困难的事情。创造性思维、作决定和解决问题可能是一些很好的例子，但事实证明其中一些事情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完成得最好。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请看下面这则儿童谜语：

有一天，天空晴朗无云。我步行穿过一片田野，突然看见草地上放着一条旧围巾、一根胡萝卜和两块煤。它们怎么到那里去的呢？

如果你不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你会为此绞尽脑汁：你苦苦思索，试图有意识地找出答案，或者想象出一个十分生动的场景，竭尽了全力。而一旦看到答案，你会觉得这真的是再明显不过。如果你还不明白，那么就让这个问题再“捂”一会儿，看看后面会发生什么事。（答案在此处 ，但现在请不要看。）

对深思的研究表明：有时人们先思考一下某个问题，然后又放下去想别的问题，而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有时会不自觉地自动跳出来。类似情况在富于创造力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身上也时有发生。绝妙的创新方法和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法并不只是奇迹般产生的；通常出现的情况是：科学家或发明家会花上数小时、数天甚至数年的时间来解决一个难题，他们将所有的片段放在一起，击破各个难点，但始终未能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于是他们停止思索，想想别的事。然后答案忽然呼的一下跳了出来——我找到了！这看起来就好像大脑的某个部分在一直不停地工作，并自己找到了解决方案。

有些实验也探讨了一类特殊问题，它们虽然有解，但往往过于复杂而难以用逻辑思维解决。它们需要别的、被我们称为直觉的方式来解决。在一个著名的实验里，人们玩模拟工厂制糖的电脑游戏。人可以控制职工人数和工资等变量，但并不知道背后的公式。很快，他们能够更好地稳定食糖的产量，但他们并不清楚自己是如何做的。事实上，那些自认为知道怎么做的人反而比不知道的人表现得更糟。

在我们这个高度复杂的社会里，类似的情况也许一直都在发生。我们遇到一个陌生人，很快就能根据他的表情、衣着、手势和声音判断他是敌是友，是否值得信赖、聪明与否。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除了具有各种先天的能力外，我们一生之中都在与人接触并观察他们后来的种种表现。我们不可能确切地记住所有这一切，或得出一些公式

来计算其中的概率，但这些都是在大脑的某个系统中完成的，所以我们最终作出可靠的判断。

这种内隐加工能够解释很多我们称为情绪性决策或者直觉的现象，因为我们不知道答案从何而来——我们只是隐隐觉得什么是对的，或“知道”该怎么做。这些往往都是被忽视的重要技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推崇理性，但往往以牺牲情感为代价；他们将纯理性思维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把理性精神从身体中独立出来。这就是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欧（Antonio Damasio）所说的“笛卡尔错误”。他所提供的证据表明情绪感受能力是思维和决策所固有的组成部分。比如，额叶受损的病人情绪波动很小，但他们不会变成超级理性的决策者；相反，他们似乎拿不定主意。

我们还可以对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各种刺激，即潜意识（或阈限下）刺激作出反应。潜意识感知的名声很差，可能是因为有人声称做广告者可以在电影或电视节目中插播简短的讯息而使人们购买其产品。其实，这种花招并不起任何作用，人们的购买行为很难受此影响。潜意识的录音带也同样没用。比如，有人声称，听一盒含有无法听到的信息的录音带，或者在睡觉时放给你听，这样就能教会你新的语言、新的技能，甚至改变你的生活。事实上，除非你能听到这些信息，否则你几乎什么也学不到。

抛开这些说法不管，潜意识感知现象是真实的。例如，当人们被一个飞快闪过的、无法有意识地看清的词启动后，这个词仍然能够影响他们接下来的反应。所以如果闪现的词是river（河），那么下一个词bank（河岸或银行）更有可能被解释为河岸，而不是存钱的地方。同样，如果闪现的是一张笑脸或眉头紧锁的一张脸，人们更可能对紧接着出现的无意义符号作出积极反应。这些连同其他许多实验都表明，我们随时都会受到周围无数我们没有察觉的活动的影响。我们聪明的大脑用极其复杂的方式加工这些信息，但是我们对此知道得少之又少。

我们很容易这样想象：人脑大部分都由无意识构成，然后有小部分的前意识或潜意识，最后才是意识，这就是我们所知道或直接体会

到的。但我觉得这种传统看法肯定不对。

填补空白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你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一副你以为丢了的眼镜、一本你没有注意到的书、邻居花园中的一个　雪人？在那一刻之前，你的意识中有什么？正如威廉·詹姆斯在1890年感叹道：“世界本应存在许多空白，但我们却感觉不到”。在我们对房间形成的图像中没有眼镜形状的空白，也没有像书那种形状的空白，在草坪上也没有雪人形状的空白。是不是我们的大脑填补了空白？有没有这个必要？

这种寻常的体验看起来非常奇怪，其中可能的原因如下：我们设想在自己的头脑或心灵的某处有一幅世界的完整图像，这就是有意识的体验。毕竟，环顾四周，我们看不到空白，因此，我们认为内部一定有一个没有空白的世界。几十年以来，这种认为头脑中存有一个详尽的对世界的内在表征的观点一直是绝大多数认知科学的基本假设。但正如一些简单的实验所揭示的那样，以这种方式来思考大脑有可能是错误的。

首先，人眼有一个盲点。人眼的设计方式非常奇怪，这也顺带揭示了进化的偶然性。在远古的某个时候我们的祖先发展出了简单的眼睛，眼睛里的神经元携带几粒光感受细胞所接受到的信息一直前行，然后返回简单的大脑。自然选择总是在已有的构造上进行，无论它是什么，因此原始的眼睛经过修改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眼睛：拥有肌肉、镜片和成千上万个紧紧地挤在一起的感受器。此时，神经元已经阻挡了光线，然而进化却未能发现它已误入歧途，应该回头重新开始，所以它继续照原先的计划进行。这样带来的后果是：神经元阻挡了感受器，汇聚成了一个大束，也就是视神经，然后从视网膜中穿出，结果在视网膜上面形成了一个没有感受器的洞（离中心约15度）。在这一部分，我们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们注意到了吗？根

本没有。如果你想证实，照着图13的说明试一下。

图13　寻找盲点。举起书，伸直胳膊。用一只手遮住右眼，然后用左眼盯住右边的小黑点。现在你缓慢地来回移动这一页。你会发现，到某个距离时，左边这个笑眯眯的小猫突然消失了。这是因为现在它正落在你的盲点上。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根本注意不到这两个盲点。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有两只眼睛，每只眼睛都能弥补另外一只留下的空白。但即使遮住一只眼睛我们也看不到视野中存在一个洞。为什么不会呢？这个问题和前面那个问题一样。是不是大脑填充了缺失的信息，从而遮盖了空白？如果是的话，它是用什么呢？在这个填充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激烈争论。

丹尼特认为大脑不需要用细节填补空白，也没有这样做。这是因为看并不像复制图片那样，是为内在的自我构建一幅世界的图像的过程，而更像一个猜测或假设那里存在着什么的过程。这种概念上的填充时时都在发生。现在你大概可以看到很多物体遮盖了其他物体：书遮住了部分案头；地毯在桌腿后面消失了；汽车遮挡了风景。你当然看不到风景里存在一个汽车形状的洞，但你也无需用貌似合理的大树或者灌木来填补空白。你的视觉体验是：这是一片完整连续的风景，即使你看不到它的全部。

丹尼特现在让我们想象进到一个房间，里面贴满了同一幅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的画像。他说我们会在几秒钟内看到房间里有数百幅一样的画像，而且如果有一张画上的梦露戴着帽子或者留着搞笑的胡子，我们也会很快注意到。我们自然而然的结论是：现在我们头脑中一定有一幅详尽地描述所有玛丽莲画像的图像。但丹尼特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位于视网膜中心的中央凹才能看得清楚，而我们的眼睛每秒只能进行约4次或5次扫视（大的眼动），因此我们不可能看清每一幅画。我们能看到这么多有赖于眼睛的特征觉察器，它

能够发现整个房间中重复出现的模式，以及专门的“弹出”机制，它能让我们注意一些独特的特征，如搞笑的胡子或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看到的根本不是一幅详尽的内部图画，而更像是猜测或假设房间里有很多相同画像，或者有很多相同画像这样的表征。大脑不需要把每个梦露单独反映在内部图像上，它也并没有这样做。我们有一种清晰的感受，即每一个细节都在大脑里面，但实际上它们只是停留在外部世界。填充缺失的梦露画像显得毫无必要，大脑也不是这样做的。

但在心理学家理查德·格雷戈里（Richard Gregory）和V. S. 拉玛钱德朗看来，填充过程确实存在。他们采用下面的方法创造了人工盲点：他们让人盯着看一个闪着“雪花”的屏幕的中心，但在偏离中心6度的地方有一个灰色的小方块，其中就没有“雪花”。最初，实验参与者能看见这个灰块。但大约过了5秒钟后，方块也如其他地方一样充满了“雪花”。接下来，当整个屏幕全变灰后，“雪花”仍显现在那个方块中，并持续两三秒的时间。其他实验则揭示了颜色、纹理和运动填充等不同的机制。例如，在一个实验中，一个粉红色背景上面闪烁着稀疏的黑点，而方块中则是一些黑点在灰色的背景中水平运动。如果你一直盯着屏幕，你会发现方块会在几秒钟后消失，但这个过程分成两个不同阶段：首先，灰色变成粉红；然后，圆点由移动的变成了闪烁的。

另一个类似实验使用英文或拉丁文作背景。方块的填充方式跟上面一样，但奇怪的是，实验参与者说他们现在在方块中看到了字母，但不会念。有趣的是，这种现象也出现在梦境中，人们梦见了书报或者巨大的标牌，他们能够看到文字但是却读不出来。那么他们看见了什么？也许，他看见的更像是字的这种想法 ，而不是一个真正有字的区域。

关于填充的争论远没有平息，但这些实验提示填充的过程确实存在，虽然它不太可能是在内心的图画中一点一点地填充细节。

变化盲

假设你参加了这样一个实验，你的任务是看图14中左手边的这幅画。正当你移动眼球的这一刻，你看到画突然变成了右手边的这一幅。你能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别吗？大多数人都确信自己能，但他们都错了。

这种现象就是变化盲，已经在很多不同的实验中都得到了验证。20世纪80年代的首批实验使用了眼动仪这种设备。从实验参与者眼睛中反射回来的激光束能够检测到眼睛的移动，并据此立即改变实验参与者正在看的文字或图画。参与者甚至无法注意到一些非常明显的大变化。眼动仪很昂贵，但我试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稍微移动图片，迫使人们移动眼睛，同时改变他们看到的图像。我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丰富多彩的视觉世界只是一个幻觉。

后来人们还使用过许多其他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两幅照片之间快速闪现一个灰块；照片可以来回变换，从一幅变到另一幅，直到观察者发现变化。一般来说，人们需要好几分钟才能发现一个很大的物体改变了颜色，或者整个消失了。这种体验极其令人沮丧。你看来看去，却看不出任何变化。如果你和别人在一起，你会听到他们在笑话你；然后你突然看出了那个明显的差异，你无法想象自己之前怎么没有看出来。

图14　变化盲。如果在你移动眼球或者眨眼的时候交换这两幅画，你不会看出任何变化。变化盲的实验表明，看见并不需要建立视觉世界的详细表征。

这个效应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上述所有方法都让“弹出”机制和运动

觉察器失去作用，正是这两种机制常常提醒我们有东西发生变化了。没有这些机制，我们只能全凭眼球移动前后的记忆——正如上述实验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对刚刚看过的东西的记忆是出乎意料地差。

但我们为什么会惊讶呢？原因很可能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当我们环视一个地方时，每多看一眼我们接收的图画就多一分，直到我们对那里有什么已经完全心中有数。这就是我们感觉到的看的过程，这也是我们所认为的看的原理。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记住画中的栏杆，我们也会注意到其顶部消失了。变化盲现象有力地表明，视觉建构方式的天然理论一定有不对之处，但我们并不清楚它究竟错在哪里。

一种可能的解释认为注意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那么密切注意某事是否能让你不至于错过变化呢？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Daniel Levin）和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用实验检验了这个问题。他们制作了一些短片，其中有些物体要么就是消失了，要么改头换面或变换了颜色。在一部影片中，剧中唯一的那名演员坐在房间里，当他正要起身向门口走去时电话响了。然后画面切换到门外，接下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接起了电话。只有三分之一的观察者发现了这一变化。

你可能会认为这是电影中的一些花招所致。但令人惊讶的是，莱文和西蒙斯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普通人做实验也证实了同样的效应。在一个例子中，他们让实验者在康奈尔大学校园里接近一名行人，并向他问路。实验者让行人一直不停地说话，这时两名扮作工友的助手抬着一扇门粗鲁地横在他们俩中间。这时，实验者抓住门的背面，并与其中一个抬门的人作了交换。现在跟这个可怜的行人说话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但只有一半的行人注意到这个替换。同样，当人们被问到他们是否能够觉察到这个变化时，他们都确信自己可以——但他们错了。

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很有启示。例如，在发生变化的那一刻出现的“溅泥”或毫无价值的污点也可以引起变化盲。这种情况经常在路上和空中发生，这就意味着如果在需要进行一些关键操作时正好有泥点

击中挡风玻璃，司机或飞行员就可能犯下严重错误，这完全可以酿成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故。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其对意识的意义。

大幻觉理论

变化盲和非注意盲的发现对我们大多数人思考自身视觉体验的天然方式提出了挑战，即如果我们相信有一系列丰富详尽的图片一个接一个地穿过我们的意识，我们必定错了。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大幻觉”理论——或整个视觉世界都是一个大幻觉的理论的基础。

我们怎么可能犯如此的错误呢？如果错了，我们就需要理解幻觉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我们为何会对它信以为真。有好几种不同的理论都试图解释这些现象，它们共同的出发点是：每次移动眼睛时，我们就会丢掉大部分已知信息。显然，我们必须保留一些信息，否则世界将变得完全无法理解，因此这些理论的不同就在于解释当我们环顾四周时，我们保留了多少信息，这些信息又是什么。

非注意盲

非注意盲这个奇怪的现象提示，除非我们集中注意，否则有些东西我们可能根本看不到。心理学家阿伦·麦克（Arien Mack）和欧文·拉克（Irvin Rock）要求实验参与者盯着一个注视点看来保持他们的注意。当十字符号飞快出现时，他们要判断是不是其中有一划更长。当一个十分清晰的物体突然闪现在十字符号旁边时，大多数参与者都没有看到它。更令人惊讶的是，如果他们必须要注意的那个十字稍微偏向一侧，那么他们也不会看到就在眼前闪烁的物体。这似乎表明注意一侧会让你无法看到你先前所看的地方。麦克和拉克的结论是，没有注意就没有有意识的知觉。

魔术师千百年来一直在注意上耍花样，但上述这类实验则表明我们会一直上当。如果真是如此，这会很奇怪。它意味着当我

们环顾房间时，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注意到的很少一部分物品——无论我们的感觉是怎样——我们确实没有看到任何别的东西。

在莱文和西蒙斯看来，每当眼睛专注于某个物体时，我们确实有丰富的视觉体验，并从中提取出场景的意义或要点。然后，当我们移动眼睛时，细节已被扔掉，只保留了要点。这样我们对正在观看的东西有了牢固的认识，总是能够仔细看清其中一些部分。他们认为，这样就让我们对连续性有一种知觉体验，不至于有太多的混淆。

加拿大心理学家罗纳德·雷森克（Ronald Rensink）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来研究非注意盲和变化盲。他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他认为视觉系统根本没有建立完整而详细的世界表征，即使在注视的时候也没有。相反，当我们的注意转换时视觉系统都会构建单个物体的表征，一次一个。每当我们注意到某个物体时，其表征就得以建立并保持一段时间。但当我们停止注意时，该物体的整合性就丧失了，并重新还原成乱成一锅粥的单个特征。他解释说，我们之所以会产生一个丰富的视觉世界的印象是因为：每次我们重新观看的时候，一个新的表征总是能够及时建立起来。

这似乎很奇怪。很难相信的是，当我看着自己的猫时，房间里其余的东西都从我的视觉系统消失了。但这就是雷森克的理论的含义。究竟怎样才能核实呢？如果我试图非常迅速地看一个东西（好像它存在一样），却发现它不存在，我这样做注定不会成功，因为新表征建立的速度和我看的速度一样快。我能够看到整个房间的印象是正确的，但这是因为我总可以一看再看，而不是因为我的意识中有整个房间的图画。

这让人回忆起威廉·詹姆斯一个多世纪以前在探索意识时所描述的问题。他把内省比喻成“试图调亮煤气灯，看黑暗是什么样子”。我想他也会喜欢用电来做同样的比喻，或者用这个更现代的比喻——试图很快打开冰箱门，看灯是否一直亮着。

在冰箱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在里面放一个摄像机，或者在冰箱一侧钻一个可以看到里面的洞，这样就很容易检验灯是否一直亮着。要在大脑上做类似的事却困难得多，但神经科学在大脑扫描技术的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果我们发现视觉系统确实是这样工作的，即一次只保留非常少量的绑定的物体信息，那么我们必然作出这样的结论：大脑内没有任何东西与我们认为自己体验到的详尽的视觉流相对应。

这对于我们寻找意识的神经机制很有启发。例如，克里克说他想找到“我们眼前看到的生动世界”或者被达马西欧称为“大脑电影”的神经机制。但如果视觉世界是一个大幻觉，那么他们将永远无法找到他们所要寻找的，因为头脑中既不存在大脑电影，也没有生动的图片。两者都是大幻觉的一部分。

还有最后一个理论更进一步打破了我们平常的视觉意识观。这就是心理学家凯文·奥里根（Kevin O'Regan）和哲学家阿尔瓦·诺亚（Alva Noë）提出的“视觉的感觉运动理论”。他们采取了全新的研究角度，认为视觉根本不是在构建内部表征，而是在外部世界中的一种行动方式。视觉是为了获得感觉和运动的关联性，也就是认识到自己的行动如何影响你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信息，同时通过与视觉输入的相互作用来探索眼球运动、身体动作、眨眼和其他行动如何影响视觉输入的方式。换句话说，看就是行动。根据这个观点，视觉不是在构建世界的表征；相反，看、注意和行动都是同一回事。因此，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某个场景中你正在“视觉操纵”的那些方面。如果不是在操纵世界，你什么也看不见。当你停止操纵世界的某个方面，它又返回到虚无。

这种理论与传统感知理论存在巨大的差别，但与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发展的具体化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或生成认知（enactive cognition）理论非常相似。在这种情况下，机器人的研究者已经发现，通过给机器人详细而复杂的内部表征以使其在真实世界中移动的方法是极其低效的，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更好的方法是建立简单一些的系统，让机器人在真实世界中玩耍、犯错误并且自己学习

如何与其互动。

这种方法有助于了解视觉意识吗？提出内在表征的传统理论不能解释那些表征如何变成了有意识的体验，为什么有些视觉表征是有意识的而大部分不是，也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看上去像是那个观看表征的人。感觉运动理论颠覆了这个问题，将观看者看成演员、视觉看成行动。所以现在就必须解释行动如何能成为主观体验。这一点能否被证明我们还将拭目以待，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彻底改变了这个问题。由于传统理论只会带来混乱和那个“困难的问题”，因此视觉是个大幻觉这一观点值得认真对待。

谜语答案：

是孩子把它们带到那里堆雪人，雪人在阳光下溶化了。当我在此处 提到雪人时，你可能已经想出了答案，或者答案自然而然地跳出来了，也可能你根本还不知道答案。

第五章

自我

精神和灵魂

我是谁，抑或我是什么？诸如“我是我的身体”或“我是我的大脑”之类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我感觉不像是一个身体或大脑。我感觉像是拥有身体和大脑的某个人。但这个好似深居在大脑里面，并透过眼睛往外看的人，她可能是谁呢？那个仿佛过着这种生活并拥有这些体验的人是谁呢？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无需这样一位主人，也无需一个内在的体验者来观察大脑的活动，也不需要一个内在自我。大脑虽然很复杂、难以理解，但它们是因果封闭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经元如何影响其他神经元，神经组织如何形成和消解，一个状态如何导致另一个状态，这一切都不需要更多的介入。换句话说，我的大脑并不需要“我”。

即便如此，我仍有“我存在”这种无法抑制的感觉。当我考虑有意识的体验时，在我看来似乎是某个人拥有它。当我想到身体的行动时，在我看来似乎是某个人在行动。当我想到生活中难以取舍的决策时，仿佛是某个人必须作出这些决定。当我问在这个世界上究竟什么才重要时，仿佛是一定是要对某人很重要的事。这个某人就是“我”，我的真实“自我”。

自我的问题与意识的问题息息相关，因为每当有自觉的意识体验时，很容易假设它们必然发生在某个人身上，不可能存在没有体验者的体验。我们于是陷入了僵局。科学不需要一个内在的自我，但大多数人都颇为确信他们是拥有自我的。此外，许多人相信摒弃自我这个概念会导致混乱、破坏动机并摧毁道德秩序。许多东西都取决于我们是否相信自我的存在，但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往往是非常糊涂的。

为了理清混乱，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对自我派理论家和羁束派理论家进行了区分。他以我们好似 单一、连续、拥有体验的自我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为出发点，并进一步询问其中的原

因。自我派理论家的答复是：这是因为它从字面上讲是对的；我们的确是连续的自我。相反，羁束派理论家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自我体验必须要有其他解释。

羁束理论的得名源于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的著作。休谟描述了自己如何盯着自己的体验寻找正在体验的自我，但发现的仅仅是体验本身。他总结道，自我不是一个实体，它更像是“感觉束”；一个人的生命是一连串印象，看似属于某个人，但其实仅仅是由记忆或者其他类似的关系连在一起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二元论只是自我理论的一种形式，你无需变成二元论者才会相信一个连续自我的存在。事实上，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许多反对二元论的现代科学理论仍然试图找到自我的神经机制或用大脑内部持久的结构来解释自我。因此，这些都是自我理论。

主要的宗教流派为每种类型都提供了清楚的例子。它们几乎都是直接的自我理论；无论那些自我是被设想成为灵魂、精神、“真我”或其他任何东西，它们都是建立在自我是存在的这一假设之上。这种人性自我的存在就成为了同一性学说、死后生命学说和道德责任学说的基础，也是基督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信仰的核心。虽然有些科学家信仰宗教，也有些科学家声称科学与宗教并非互不相容，但自我这个问题却显然是关键所在。如果每个人都在拥有大脑以外还拥有精神或灵魂，那么科学应该能够探测到它，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探测到。这并不是说它永远不会被探测到，但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在各种宗教中，仅有佛教否认自我的观念。历史上的佛陀（释迦牟尼的尊称）生活在约2,500年前的印度北部。据说他在树下冥想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成了佛。他否认当时流行的宗教学说，包括永恒的内在自我或者“真我”。相反，他教导说，人类的苦难乃是由于无知，特别是由于坚持一种错误的自我观所造成的。摆脱痛苦的出路在于抛却全部让自我愉悦的欲望和依恋。因此，他的学说的核心是非我的观念。这并不是说自我不存在，但它是虚幻的，或与表象并不一致。自我不是过着人的生活的连续实体，而只是赋予一整套元素的传统名

称。他还教导说，一切都取决于先前的因，没有任何事可以自己发生；这与认为宇宙是相互依赖和因果封闭的现代观念非常一致。因此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宣称“行动及其后果都是存在的，但行动的人并不存在”。帕菲特把佛陀看成是首位羁束理论家。

羁束理论极其难以理解或接受。它意味着你必须完全摒弃你是一个拥有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实体，或你在过这个特定身体的生活的观念。相反，你必须接受“自我”这个词并不代表任何真实或持久的东西，虽然它很有用。它只是一种观念或者一个词。至于有体验的自我，它不过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感觉，随着每次体验而产生，随后又再次消失殆尽。产生连续性的错觉是因为每个短暂的自我都伴随着记忆，是这些记忆引起了连续的感觉。

图15　佛陀否认存在连续的自我。

这种违反直觉的理论大概不值得考虑，但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会

面临自我是什么这个巨大的难题。在我们思考一些更为奇怪的自我现象时，自我是一种幻觉的想法至少值得记在心中。

分裂的大脑

如果把你的大脑分成两半，你会有怎样的体验？这听起来好像只是一个思维实验，但实际上，人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做过这类极端的手术。癫痫病有时非常严重，几乎持续不断的抽风会让生活难以忍受。今天可以用药物或微创手术治疗这种疾病，但在当时，治疗最严重的患者的方法是切断大脑两大半球的联系，以防止癫痫发作从一侧半球扩散到另一侧。胼胝体是连接两个半球的主要组织，大多数这类病人因此被切断了胼胝体，但留下脑干和其他一些连接。因此说他们的大脑被切成了两半显得有些夸张，但由于没有胼胝体，左右半球间的大部分常规传导中断了。

结果如何呢？万幸的是，它造成的影响很小。病人恢复良好，似乎过着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他们的性格、智商和言语能力很少或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心理学家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1913—1994）和迈克尔·伽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所做的实验揭示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设计这些实验需要理解感觉器官与大脑连接的方式。从右耳进入的信息传到大脑右半球（左耳的信息进入左半球）。但如图16所示，从左侧视野进入的视觉信息传入大脑右半球（反之亦然）。这意味着如果你直视前方，所看到的左侧的事物都进入右脑，而所有右侧的事物都进入左脑。控制身体的神经也是交叉的，左半侧身体受大脑右半球控制（反之亦然）。正常人的左右两半球是彼此相连的，因此信息能够迅速传导到两个半球，但裂脑病人的两个半球却失去了联系。了解了这一点后，实验者可以与病人的其中一个半球单独沟通。这两个半球会像两个独立的人一样行事吗？是否每个半球都独自拥有意识？

在一个典型的实验中，病人坐在屏幕前并直视屏幕中心。整个屏

幕被分成两半，然后文字或图片闪现在屏幕的左侧或右侧，这样信息只传导进入一个半球。患者可以口头回答，也可以用其中一只手作反应。

假设图片出现在右侧视野。由于大多数人的言语功能都局限在左半球，因此病人可以相当正常地描述图片。但如果图片出现在左侧视野，那他就无法用言语描述。这表明拥有言语能力的左脑只能看到呈现在右侧的事物。同时，右半球能看到呈现在左侧的事物。这可以通过让病人用非言语方式回答而得到证明。例如，你可以给他们一堆藏在包里的东西，让他们用左手选出刚才看到的东西。这样，对于“你能看到什么？”这个问题两个半球能同时给予两种不同的回答。而这两个半球似乎都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这是否让它们成为了两个有意识的人呢？

在一个著名的实验里，研究者在裂脑病人P.S.的左侧呈现了一幅雪景，右侧呈现了一只鸡爪，然后让他从他面前的一堆图片中选出与看到的东西相符的两幅图。他的左手选择了铲子（铲雪用），但右手却选择了一只鸡。从每个半球所看到的东西来看，这么选择是说得通的。不过当要求他解释这样选择的原因时，他（即说话的左脑）却说：“哦，很简单。鸡爪跟鸡是一块的，你需要铲子来清理鸡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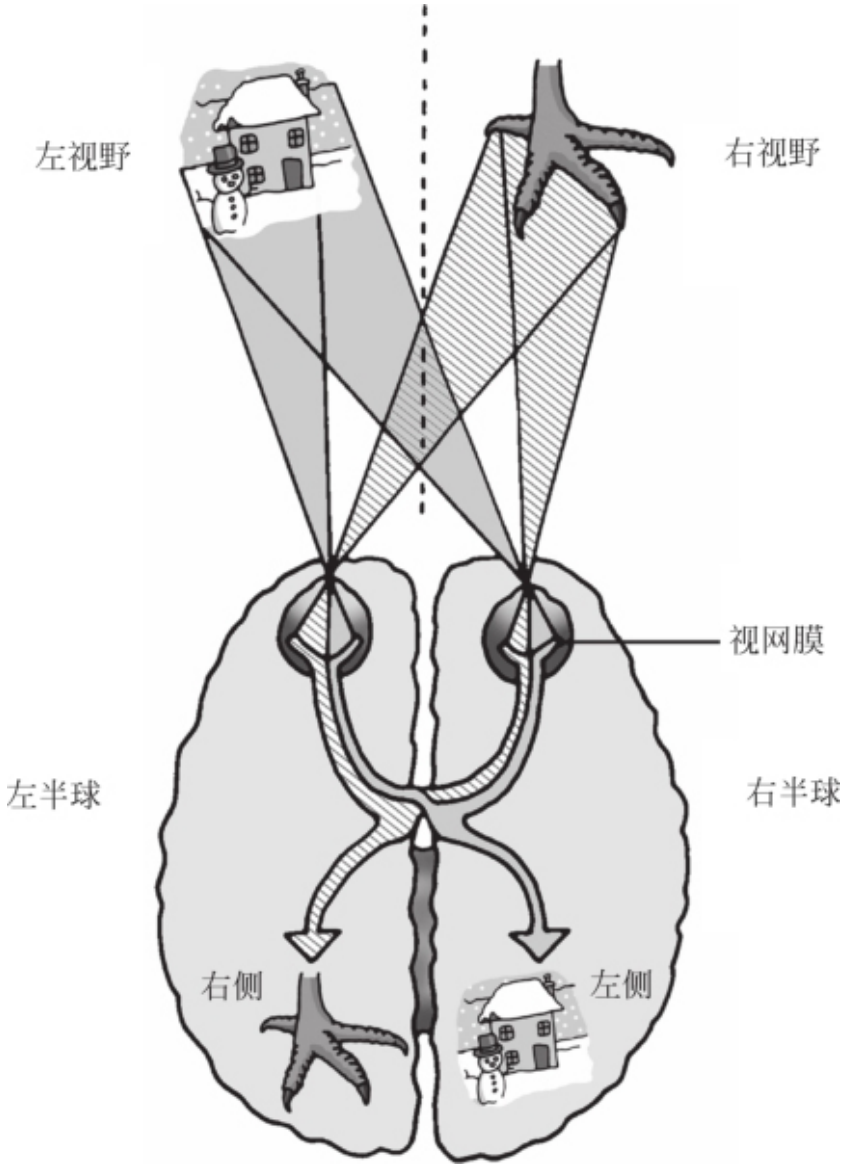

图16　人脑的交叉连接。如果在裂脑病人P. S. 的左侧呈现了一幅雪景，右侧呈现了一只鸡爪，负责言语的左半球因此只能看到鸡爪。

这样，说话的左脑用虚构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当呈现给另一半球的是一张情绪图片时，它也会故伎重演——编造一个貌似合理

的借口来解释大笑、微笑、害羞或其他被诱发的情绪反应。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病人能够显得这么正常。但这也应该让我们对自己有所怀疑。我们的大脑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单元组成，言语单元不可能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但它经常能够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这其中有多少是看似合理但却是虚构而非真实可靠的理由呢？我们能区别开吗？

斯佩里从这些实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他病人的头脑中存在两个有意识的实体；每个都有自己的感觉和自由意志。相反，伽扎尼加则认为，只有左半球起着“解释者”的作用——使用语言、组织信念、把行动和意图归因于人。只有这个半球拥有高级的意识，另外一个半球虽然具有各种技能，但并没有真正的意识。

哪种观点正确呢？问题在于我们根本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去问每个半球，但如其他人、宝宝或动物一样，我们还不能确定他们除了说话和选择图片外，还有没有意识体验。这立刻将我们带回到第一章的争论之中。如果你认为意识是一种额外的附加能力，那么你自然想知道是两个半球都有意识还是只有一个半球有，但你找不到答案。同样，说到自我，如果你坚信持久自我的存在，那么你自然想知道是不是两个半球都有自我，但你依然无法找到答案。

你会按下按钮吗？

你相信自我的存在吗？会不会是你的心思告诉你的是一件事，而理智告诉你的却是另一件事？下面这个哲学家的思维实验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好方法。

想象你能钻进一台机器，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旅行。当你按下按钮，你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被扫描、摧毁，然后在你选择的目的地重新创造。由于这只是一个思维实验，因此我们必须假设整个程序是百分之百的安全和可逆。你也完全不必担心中途会迷

路。问题是——你会去吗？

如果你真的是一名羁束理论家，你应该没有任何疑虑。旅行开始后你身体的每个细胞不会有任何变化，你所有的记忆都会完好无损。在其他人眼里，你看上去毫无变化。你也会像从前一样，拥有存在内在自我这样的幻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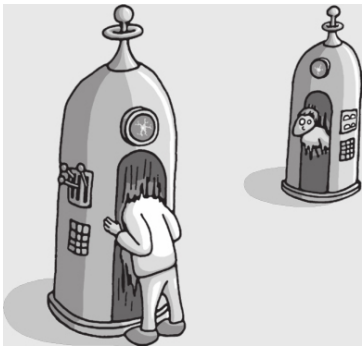

图17　远程运输机：哲学家的思维实验

如果你还不肯按下按钮，那你肯定还在固守另外一个想法：真正抵达的不是“你”。换句话说，你还相信一个内在自我的存在。

这个问题似乎关系重大。同样关系重大的是，裂脑病人身上是否存在另一个不能正常地说话、也不能对所发生的事情施加影响的自我——这听起来非常恐怖。但在帕菲特看来，所有问题都是由于相信自我存在而产生的幻想。羁束理论完全摒弃了该问题。裂脑病人身上既没有一个自我，也不存在两个自我，存在的只是体验，但是没有任何人拥有它们——正如在你我身上发生的一样。

催眠和分离

想象这样一个情景：你正身处一个表演现场，舞台上一名男子正在邀请想要上台被催眠的志愿者。你自己不敢去试，但你看到不少人举手。催眠师使用各种游戏和测试逐步进行筛选，直到选出大约6位准备好进入“深度催眠状态”的志愿者。若干分钟后，经过睡眠暗示、想象美景、或者想象乘电梯下楼之后，志愿者都逐渐沉睡下去了，有趣的事出现了。很快，一个人在照想象出来的宽衣镜，另一个人的举止就像是马戏团的一匹马，第三个则在观众中间晃悠，让他们把自己叫醒。

催眠也可以用作一种治疗方法。催眠被用来帮助人们戒烟、减肥、舒缓压力或应付情绪障碍。虽然很多宣传都有些夸张，但其中一些治疗方法确实有帮助。催眠也可以用于减轻疼痛，并在一些手术中替代麻醉药。

催眠源自于名声很差的催眠术。催眠术使用磁石和“动物磁性”理论，曾在19世纪末达到鼎盛时期，被广泛应用在医药、精神病治疗和娱乐业中。招魂术在当时也很盛行。巫师有时催眠灵媒，以让他们的精神从身体分离出去——这只是很多看似能够证明精神分离的现象之一。

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多重人格。1898年，一位名叫克里斯汀·波茜普（Christine Beauchamp）的年轻女子遭到疼痛、焦虑和疲劳的折磨，前来向波士顿的莫顿·普林斯（Moton Prince，1854—1929）博士咨询。普林斯催眠了波茜普小姐，她因此变成了一个非常被动的人。接下来，一个全新的人出现了，她开始把波茜普小姐称为“她”而不是“我”。后来人们叫她莎丽，一位活泼、风趣、直率、坚强和健康的女孩；而克里斯汀则呆滞、紧张、软弱并极其善良。当克里斯汀理智地写信时，莎丽就会出来将信撕碎；当克里斯汀拒绝吸烟时，莎丽会接过来并点燃。换言之，莎丽将克里斯汀的生活变成了地狱，但她们却寄居在同一具身体里。

波茜普小姐这个病例是一个典型的多重人格病例。1840年到1910年间报告了数百例病例。精神病学家、医生和研究人员都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格可以控制同一个身体。例如，威廉·詹姆斯认为

这种情况以及其他催眠现象都证明一个大脑能支持多个有意识的自我，要么是交替支持要么是同时支持。这些被称为并存意识或下自我（underselves）。

随着人格数量的增加以及理论解释的缺乏，一些病例变得愈加离奇。因此在20世纪初，反对这个概念的声音出现了。专家声称整个现象都是由催眠以及男医生对顺服的女病人所具有的信服力引起的。确实有很多多重人格现象是由催眠造成的，同时也有一些显然因催眠而得到治愈。然而，有些多重人格却是自发产生的，并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三面夏娃》与70年代的流行故事《十六重人格的女魔西比尔》。

这些情况宣告了新一轮流行的开始。到1990年，美国确诊了20,000余例病例。同时，电视剧和书籍对这个概念的传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一次，专家对此进行了批评，此类病例报告的速度得到放缓。1994年，“多重人格”这个术语被弃用，取而代之的是“同一性分离障碍”。现在，很少有专业人士使用多重人格这个术语。

这些病例的离奇之处在于精神可以分裂成或者孤立成单独的部分这个概念。其他一些催眠现象中也会出现同样奇怪的东西，它们引起的激烈争论至今仍未平息。传统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观点认为，催眠是一种分离状态，在这一状态下一部分精神从其余部分中分割出来。催眠师接管了控制权，直接对被分割出来的精神说话，从而使梦游者（他们常被这样称呼）做出不同的事和进行不同的思考，甚至做出在正常清醒状态下不可能做出的“壮举”。

19世纪以来，批评家抗议道，催眠状态是虚假的，或者被催眠的受试者只是对实验者的服从或扮演某个角色。同样的争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还一直持续。他们争论的中心围绕着一个主要问题：催眠状态是不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分离状态？“状态理论家”的回答是肯定的，而“非状态理论家”的回答则是否定的。

不少人都试图检验这两种理论。其中关键的实验是要比较真被催眠者和被要求假装被催眠者或不经任何感应过程就想象和体验催眠师

的建议的控制组受试者。所依据的理由是，如果控制组受试者与“真被催眠”的受试者表现出的现象相同，那么特殊的催眠状态的观点就是多余的。

许多实验都发现这两组之间并无差异，这倾向于支持非状态论。许多心理学家都乐于断定催眠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即便如此，还是存在一些怪现象。例如，一些被催眠的受试者会表现出“恍惚逻辑”，他们会接受不合逻辑或者不可能的情形，比如一下看到同一个人的两个版本，或者能够透视物体，并看到它们后面的东西，但控制组的受试者则不会。

另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心理学家欧内斯特·希尔加德（Ernest Hilgard，1904—2001）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实验表明，当手浸在冰水中（这是心理学实验中常用的引起疼痛的无害方法）时，容易被催眠的受试者否认自己感觉到疼痛。希尔加德相信，在内心深处，人的某个部分仍能感觉到疼痛。所以他对受试者说：“当我把手放在你肩上时，我就可以跟你的隐秘部分说话……”。当他这样做时，受试者开始描述自己的疼痛和痛苦。在另外一些实验中，“隐藏的观察者”会描述明显被忽视的刺激或遗忘的事件。这看上去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一直拥有意识体验。

希尔加德根据这些发现提出了新分离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正常状态下，个体存在多个控制系统，受决策自我的指挥，但在催眠状态下，催眠师占主导地位，让行动变得不受控制，幻觉变得真实。先前的分离理论认为精神的各个分离部分就像单独的有意识的人，在这一点上新理论与它们并不一致，但它保留了同一个想法，即一个大脑能同时支持多套意识体验。

毋需置疑，该理论只是众多理论中的一个，到现在也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经过100多年的研究，我们仍然不知道催眠是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也不能肯定催眠是否真的能够分裂意识。

自我的理论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我是谁或者我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只是更有点儿糊涂了。所有这些现象都对一个身体存在一个有意识的传统自我假设提出了挑战，并让我们想搞清楚如何能够同时解释这些特殊的例子以及正常的自我感。因为如果人可以同时拥有多个意识体验，为什么我们感到自己是统一的？

许多理论都试图解释自我感，包括哲学中关于人的本性、个体同一性和道德责任的理论，心理学中社会自我的建构、自我归因和各种病态自我的理论以及神经科学中关于自我的大脑机制的理论。这里我们没有办法探讨所有这些理论，所以我只选了几个对意识具有显著影响的理论加以说明。

威廉·詹姆斯1890年的著作《心理学原理》被称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心理学专著。在这部两大卷的书中，他探讨了心理功能的方方面面，包括感知、记忆，也因为探讨体验自我的本质而苦恼。他称其为“心理学必须探讨的最令人困惑的谜”。

詹姆斯首先区分了“我”（me）和“自我”（I），前者是经验上的自我或客观的人，而后者是主观的、认识的自我或纯自我。似乎是“自我”接收发生在意识流中的感觉和知觉，它是注意的来源，也是努力和意志的起因。但它会是什么呢？詹姆斯否定了他称为灵魂理论的观念，也否认另一个极端，即自我是虚构的观念，它不过是“自我”这个代词所指的虚构现象而已。

他本人的解决办法是一个隐晦的理论，这同他的一句名言“思想本身是个思想者”放在一起也许最容易理解。他认为我们自己的思想有一种温暖和亲切的感觉。他试着这样解释道：任何时刻都可能存在一种特殊的思想，它拒绝意识流中的某些内容，但会挪用其他内容，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并称之为“我的”。下一刻，另一个这样的思想又产生了，它取代了先前的思想并把它们与自己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整合感。这样，他说，思想似乎就是一个思想者。这听起来像一个极现代的理论，无需任何连续的自我。不过，詹姆斯拒绝极端的羁束理论，并且仍然相信意志力和个人的精神力量。

100年以后，神经科学家继续在研究这个问题。拉玛钱德朗引用

自己在视觉填充上的研究发现（第四章），它们似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图片是为了谁而填充的？"通过这项研究，他说："……我们可以开始着手解决科学与哲学上的最大谜团——自我的本质"。拉玛钱德朗表示，填充不是为了某个人 ，而是为了某件事 。这件事是其他大脑加工过程，一个发生在大脑边缘系统的加工过程。

这与全局工作空间理论提出的论点如出一辙，它将自我等同于特殊的相互作用的神经元群。例如，巴尔斯的理论认为：一个分等级的情境决定了什么能进到意识剧院的探照灯里去。这些情景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我系统，它让信息能被报告和利用。多重人格现象可以如此解释：不同的情景等级相互竞争进入全局工作空间，进入记忆和感觉，但这种机制并不包含詹姆斯和希尔加德所描述的那种并存意识。

另一个理论是达马西欧的多级图式理论。简单的有机体有一套神经模式，时刻对应于有机体的状态，这就是他所谓的原型自我。更复杂的生物体有与核心自我相连的核心意识。它不依赖于记忆、思维或语言，并提供了此时此地的自我感。这是一个短暂的自我，但它可以因为每一个与大脑互动的物体而得到无止境的重构。最后，依靠思维能力和自传体记忆，延伸的意识和自传体自我产生了。这就是你的人生故事中所讲述的自我；它是你大脑电影的主人，它出现在那部影片之中。

所有这些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把自我等同于某个大脑过程。它们或许开始解释自我的起源及结构，但它们尚未解开意识之谜。每个理论都认为，大脑加工过程被自我体验到了，因为它们显示出来了，或者能够被另一个大脑加工过程所用，但这如何将它们变成有意识的体验及变化的原因仍未得到解释。

最后，丹尼特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视角。他否定了笛卡尔剧院，同时还否定了观看演出的观众。他声称，自我虽然需要加以解释，但它的存在方式并不像自然物体（甚至大脑加工过程）那样。这就像物理学上的重心，它是一个有用的抽象概念。实际上，他称自我为"叙述重心"。我们的语言讲述了自我的故事，因此我们开始相信除了单一的身体外，还存在单一的内在自我，它拥有意识、持有见解并作出决

策。实际上，内在自我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多重并行的加工过程，这些过程造成了亲切的使用者幻觉[1]（benign user illusion）——一个有用的虚构。

看来我们在思考自己的宝贵自我时需要作一些艰难的选择。我们可以仅仅依靠感觉，假想存在连续的自我或灵魂或精神，虽然它们无处可寻并带来艰深的哲学困惑；我们也可以把它等同于某种大脑加工过程，并把大脑过程为什么会有意识体验这个问题束之高阁；或者我们也可以拒绝任何与自我感相对应的持续实体的存在。

我认为理性上我们必须走最后这条路。问题在于，我们很难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接受它。这意味着需要对每个体验都采取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接受没有谁真正拥有这些体验的看法；这还意味着我们需要承认自我看似每次都存在，但这只是暂时的虚构，现在的“我”并不是刚才、上周或去年的那个“我”。这确实非常困难，但我想通过不断地练习，这会变得容易些。

注释

〔1〕 亲切的使用者幻觉，这是丹尼尔·丹尼特在描述自我时所使用的一个比喻。它指因为我们常常用“我”来进行各种描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我”存在的错觉。

第六章

意识意志

我们有自由意志吗？

伸出你的手，只要你想，并顺服自己的自由意志，你随时都可以弯曲你的手腕。

你这样做了吗？如果没有，你一定是决定不必麻烦了。不管怎样，你作出了一个决定。你在某一时刻翻转手掌，或根本就不做。现在的问题是，是谁或是什么作出了这个决定，或发出了这个动作？是你的内在自我吗？是意识力吗？我们的感觉是这样。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内在自我的概念有严重的问题。即使内在自我确实存在，我们也不知道它如何产生了这个动作。因此，也许只是大量的、一个接一个的大脑加工过程决定了你是否弯曲了手腕，又是何时弯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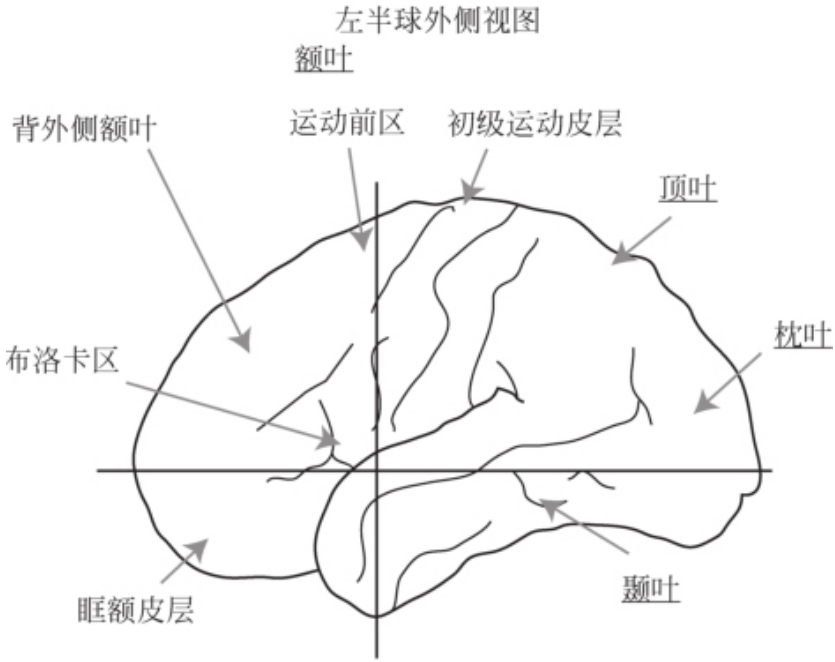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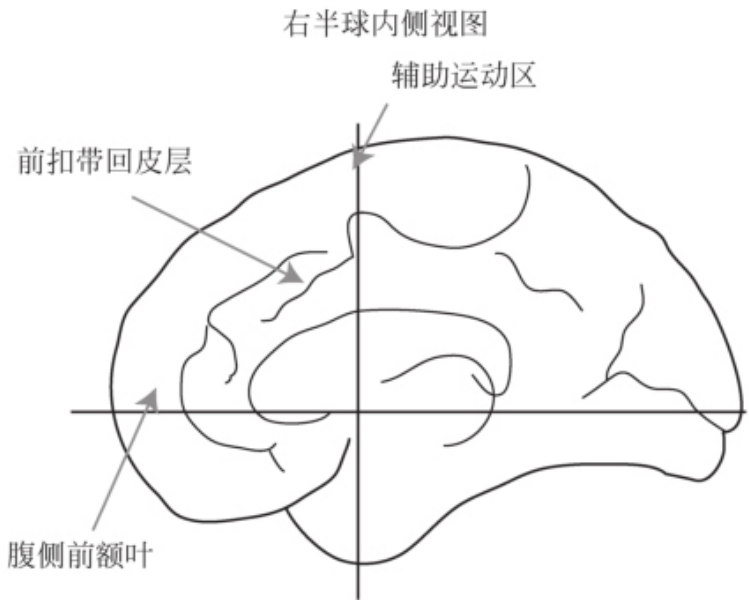

图18　参与意志的脑区。在按照意志行事时，神经活动从前额皮层传导至前运动皮层和运动皮层。本图标记的其他脑区也可能参与其中。在哪里需要意识

的介入？内在自我在哪里发挥作用？如何发生作用？

这正好符合解剖学上的证据。从人体和其他动物的实验中，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有关自发运动的控制的知识。执行任何一个诸如弯曲手腕之类的自发运动都涉及到大脑很多区域。整个过程的大致顺序如下：首先是前额叶活动，然后传导至前运动皮层，这是运动计划阶段；接下来传导至初级运动皮层，然后发出肌肉运动的指示。

其他脑区参与到特定的运动当中。比如，讲话时，布洛卡区产生运动输出。对于大部分惯用右手的人来说，布洛卡区位于大脑左半球。然后是辅助运动区负责先前计划好的行动的精确序列和编程，以及前扣带皮层参与情绪、疼痛和运动。最后，人脑扫描的证据显示，那个名叫背外侧前额叶皮质的脑区是与决定何时及如何行动的主观体验唯一相关的脑区。

问题就在于此。科学能够揭示当感觉信息传入以及在运动计划和执行时处于活动状态的神经元。但决定行动感觉并不像神经元放电那样，无论放电是在前额叶皮质或大脑其他地方。它感觉就像有个其他东西——我自己，我的意识——使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作出反应。

这就是经典的自由意志问题。大卫·休谟称自由意志问题为形而上学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实际上，它据说也是哲学界讨论得最多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甚至更早。因为自由意味着责任，这个问题引起的感受也就非常强烈。我们认为自己是负责任的，我们也认为别人应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所有这些的前提假设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行为的方式。如果没有自由意志，那么人类的道德责任和法规似乎都会受到威胁。

这个问题部分取决于决定论。对许多早期的哲学家以及现代科学家来说，宇宙似乎是确定的，即所有事件都由先前的事件决定。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必然的；如果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必然，那么自由意志就没有立足之地，因为我的所有行动一定都是事先确定的。这意味着选择做任何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另行其道也没有任何意义。

有些哲学家承认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水火不容。他们认为要么是决定论错了（可能性不大，并且极难证明），要么自由意志一定是个幻觉（因为它等同于魔力——一种不可能的非物质的干预）。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确定的世界中添加真正的随机过程（如在放射性衰变或量子物理学中那样）并不会给自由意志任何机会，因为如果这些过程真是随机的，它们就完全不会受影响。

相比之下，兼容论者发现在很多不同情况下，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可以是同时正确的。例如，有些确定性的过程是混乱的。这意味着虽然结果完全由起始条件决定，但这些过程能够引出异常复杂、难以预测的结果，即使是从理论上也难以预测。另外，即使在一个确定的世界，人也需要作出复杂的选择。人同其他动物和某些机器一样，也是非常复杂的机体，必须作出许多决定。事实上，如果不这样，他们将无法生存。在有些兼容论者看来，这种决策足以为道义责任和法律提供基础。有人乐意将此当作自由意志。

那么意识在哪里起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意识让这整个问题更有价值。在有些人看来，人不同于其他动物和机器之处在于人类的自觉思维能力。他们相信，正是因为我们能够有意识地权衡各种可能性并考虑后果，所以我们拥有自由意志，并且能够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然而，这直接将我们带回到了同一个问题中。如果意识被当成成就自由意志的力量，那它就无异于魔力——在因果封闭的世界这种介入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如果意识不是这样的力量，那么我们拥有的种种意识控制的感觉就一定是幻觉。一些实验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哪种解释才是正确的。

有意识行为的时间进程

你完成了那个简单的伸臂屈腕的任务吗？如果还没有，你现在应该做一下，或者再重复几遍，因为这个简单的动作在心理学关于自发运动的研究史上可以说是尽人皆知。

1985年，利贝特报告了一个数十年后仍在争论的实验。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人自发和故意地弯屈手腕时，是什么引发了这个动作？是有意识的决定在行动，抑或是某个无意识的大脑加工过程？为了找到答案，他让受试者重复至少40次这个屈腕动作，每次开始的时间由受试者自己决定。他测量了如下3项指标：动作产生的时间、大脑运动皮质开始活动的时间以及他们有意识地决定行为的时间。

前两项时间都很容易测定。动作产生的时间可以用手腕上的电极（肌电图）测定。大脑开始活动的时间可以用头皮的电极（脑电图）测定。脑电图可以探测到一个逐渐增强的、名叫“准备电位（RP）”的信号。难点在于测量受试者决定行动的时间，利贝特称之为W（意志）。问题在于，如果你让他们大喊、按键或做别的动作，这个新动作的发出都会有一个滞后，就像屈腕运动一样。同时，作出喊的决定可能干扰正在测量的主要决定。利贝特因此设计了一个特殊的方法来测定W。他在受试者前面放置了一个屏幕，上面有一个点在绕圈走，就像钟表上的指针一样。然后他让受试者看着那个时钟，并记下自己决定行动时点所在的位置。这样，他们可以在行动结束后报告在那个重要时刻屏幕上的点所处的位置。这样利贝特就可以确定他们决定行动的时刻。

那么最先发生的是哪一个呢？是W还是RP呢？你可能希望决定自己会期待哪个答案，因为它很可能体现你对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总体看法。

利贝特发现决定行动的时间W在行动前200毫秒（1/5秒）产生，但准备电位大约出现在决定行为之前350毫秒，也即在行动前约550毫秒。换句话说，大脑准备运动的过程比人有意识决定行动的时间至少早1/3秒。从大脑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人有意识地决定运动之前一定产生了大量的神经加工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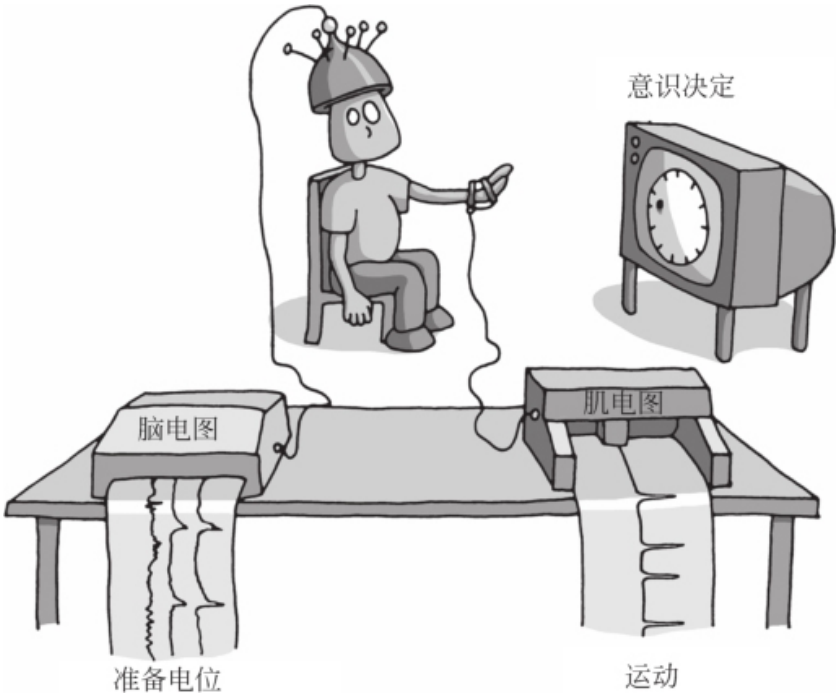

图19　在利贝特的实验中，受试者自发弯屈手腕，开始时间自己决定。他测量了：（1）准备电位开始的时间；（2）运动开始的时间以及（3）有意识地决定行动的时间。哪一个最先发生呢？

毫不奇怪，该发现引发了不少争议。毕竟，它似乎威胁到“我们的决定引发了行动”这一关于意识行为的最基本假设。但如果你想想看，有意识的决定先于大脑活动这种想法简直就是一个魔法。这意味着意识可以凭空产生，并且影响脑部的物质活动。唯有二元论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如笛卡尔、波普尔和埃克尔斯的理论。我们已经明白为什么这些理论让人看不到希望。

这表明任何人都不应对利贝特的实验结果感到惊讶。但是他们却非常吃惊。这些结果究竟意味着什么，哲学家、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都卷入了这场漫长而复杂的辩论当中。

一些人从表面上接受这个结果，认为意识来得太迟，不能启动自发运动过程，因此意识不能成为最终的原因。他们的结论是：我们没

有自由意志。

在质疑该结论的人群中，有人试图否定实验结果的有效性，比如他们对测量W所使用的方法、使用的任务或实验的设计有争议。但利贝特做了许多控制实验，排除了其中大部分问题。后来的重复性实验也都基本上验证了利贝特的结果。

还有人认为实验结果不能放大到自由意志真正起重要作用的行为上。例如，在这项任务中，受试者只能选择什么时候 行动，而不能选择采取何种行动 。而且简单的腕部运动不能和起床或读书之类的复杂动作相提并论，更不用提诸如是否接受一个职位或如何培养孩子这类艰难的选择了。因此，人们争辩道，利贝特的结果并没有提供反对这类真正重要的自由意志的证据。

利贝特本人并不接受这些批评；他也不承认自由意志是一个幻觉。相反，他找到意识在自发行动中扮演的另一个角色。他注意到有时受试者报告他们在运动发生的前一刻取消了行动。于是他又做了另外一个实验来检验它。结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准备电位起初很正常，但是很快就减弱了，并在行动应该发生前的200毫秒内消失了。据此，他主张“自由否决”存在。他说，意识不能启动屈腕动作，但是可以阻止它发生。换句话说，我们虽然没有自由意志，但我们却拥有“自由否决”（free won't）。

利贝特认为这个发现对自由与责任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我们虽然不能自觉地控制自己的性情或冲动，但我们能够自觉地防止其表现出来。例如，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想象要杀人、强奸或者盗窃而承担责任，因为这些冲动不在意识控制之下，但我们应该可以阻止这些事情发生，因为我们有意识否决力。这样，利贝特能够接受自己的实验结果，同时也不用放弃意识力的说法。事实上，他更进了一步，发展出“意识精神场理论”，主张主观体验是自然界独特而基本的属性；它是一种场，产生于大脑活动中，进而对脑部的活动施加影响。他声称，这个统一而强大的场能够解释意识的两个最困难的特征：精神活动的整合性以及我们的自由意志感。

最后，对该实验最尖锐的批评是认为它完全是在误导人，因为该

实验建立在能够测定意识体验的时间这一错误想法上。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看到的那样，有关时间和意识的实验引出了种种困惑和相互矛盾的结论。其中一个解决办法是对意识的时间进程这种说法采取彻底的怀疑态度。要记得利贝特的实验的核心部分是测定W，也就是决策出现在意识中的时刻，或者决策变得有意识的时刻。但是认为存在这样的时刻有道理吗？

整个测量意识体验的时间的想法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假设存在两类时间：大脑活动产生的时间和这些大脑活动“变得有意识”或“进入意识”的时间。换句话说，如果你承认W能被测量，你就承认了意识体验不是大脑活动。

另一种办法是否认意识体验这个事件发生在特定的时间。这意味着对整个实验完全不同的解读。我们可以说受试者报告的是他们知道运动即将发生的时刻，但并不能说这是有意识决定的时刻。据此观点，意识意志不能启动行动不是因为它来得太迟，而是因为它不能独立于大脑里进行的各种过程，因此它并不是任何控制力或力量。

自愿的感觉

所有这些论证和实验都质疑意识是我们行动的起因的观念。但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感到的确是意识引起了行动。所以，了解这种感觉是如何产生的或许会有帮助。当行动发生时，我们得决定这是由自己还是别人引起的。我们可能犯两方面的错误，但这两个方面都会对我们有所启示。

首先，我们会做一些事情，并错误地认为别人应该为此承担责任。1853年，以研究电学而闻名于世的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进行了一个关于意识控制问题的重要实验。那时，即19世纪中叶，正是人们对招魂术最狂热的时候。招魂术最初出现在纽约州的一个小镇上，后来传遍欧美大陆。媒体也大肆报道所谓的与死者灵魂进行交流的见证。当时一个广受欢迎的交

流方式叫做“翻桌子”。

在这种招仙会上，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双手平放在面前的桌面上。然后通灵者开始请神，并让它们介绍自己。然后桌子开始神秘地移动。大家可以问神灵很多问题，而神灵的回答则是通过轻敲桌子（一次代表“是”，两次代表“否”）或使用更复杂的字母代码来实现。随后这些人回家了，他们都相信自己已经与去世的父母、配偶或子女交流过。据报道，在最神奇的招仙会上，桌子不仅可以用桌腿敲地，它还可能倾斜，或单腿站立，甚至完全离开地板。

当然，指控其骗人的说法也很多。一些通灵者被发现秘密雇用同伙，使用伸缩棒或者隐藏的细绳。然而有些通灵者看上去没有任何机会作弊，甚至在表演期间被捆住或蒙住眼睛。法拉第想要找出其中的真相。毕竟，如果真的发现其中有一种新力量在起作用，这个发现能够改变整个物理学。如果逝者的意识真的能够移动一张沉重的桌子，他想知道这是如何实现的。

为了找出原因，法拉弟用软的黏合剂把一张张卡片粘在桌子上。如果坐着的人的手朝某个方向移动，黏合剂会微微下陷。他的逻辑是，如果神灵真的可以移动桌子，那么卡片将会滞后于桌子的运动；但是如果是坐着的人在推拉桌子，那么卡片的移动应该先于桌子的移动。结果非常清楚，卡片沿着桌子移动的方向移动了更远的距离。换言之，是坐着的人而不是神移动了桌子。

法拉第仔细询问了坐着的每个人，并确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实验里，他使用了一个量规来显示他们对卡片施加了多大的侧压力。当他们看到量规时，所有的运动都停止了。法拉第总结道，这些坐着的人并没有作弊，他们只是在使用“无意识的肌肉运动”。这个实验首次证明，我们有时会做一些自己认为没有做的事情。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更为现代的显灵板。在显灵板上，各种字母和数字沿桌子边缘摆放，参与者把手指放在倒扣过来的玻璃杯的底部。当他们提问时，玻璃杯似乎能够在没有人有意识地控制它的情况下自己移动。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手臂肌肉很容易疲劳，从而

让我们难以觉察到自己手指的位置。当轻微的运动发生时，每个人都会调整自己手指的位置，从而造成更大的运动。这类调整颇为正常。实际上，它们对我们静止站立时保持笔直姿势，或者端稳一杯热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哪块肌肉能够保持绝对静止，所以我们的身体永远处于不断的轻微运动状态，并伴随着不断的微调。

需要注意的是，无意识肌肉运动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有一种叫做“无意识”的东西可以引起动作。它只是表明人们可以做一些自己意识不到的动作，因为他们的身体以及所有的多重并行控制系统都在一刻不停地工作。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可以发现类似的错误，但是趣味性要逊色一些。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发生，有1%左右的人口会受此影响。它之所以如此骇人是因为其导致个人控制感的缺失。精神分裂症最常见的症状是幻听，很多患者都听到有许多声音在对他们说话。有的笃信死者的亡魂、墙上的精灵或外星人在试图和他们交流；有的发现自己的想法被广播出去让所有人都听到；有的认为周围的人把观点塞进自己的头脑中。大脑扫描实验已经表明声音刺激会伴随着大脑某些脑区的活动。这些脑区在人们想象某个声音的时候也被激活，因此，我们有理由假设他们正在想象某种声音。但他们却确信自己并没有这样做。如果能够发现这种幻觉是如何产生的，那么我们就会更接近于找到有效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方法。

最后一个这类错误的例子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所做的一个奇怪的实验。当时的脑外科手术往往需要打开颅骨才能接触到脑部的大部分区域。作为治疗的一部分，英国神经外科医生威廉·格雷·沃尔特（William Grey Walter，1910—1977）曾在患者的运动皮层植入电极。然后他让患者控制幻灯机，并研究大脑此时的反应。在某些实验条件下，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通过按按钮来看下一张幻灯片。在另外一些条件下，格雷·沃尔特从他们的大脑中取出信号，将其放大，并用这些大脑信号来翻看幻灯片。患者为此颇感不安。他们说，他们正想按下按钮时，幻灯片自己就换了。虽然实际上还是他们在控制幻灯片，但他们却没有这种自愿的感觉。不管这个实验还告诉了我们别

的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意志感有时可能是错误的。

有意识意志的幻觉

人类能够异常迅速地作出这样的推断，即他们观察到的事件都是造物有计划、有意识地引起的。即使是幼儿也会对自己移动的物体和被其他东西推动的物体作出不同的反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发展出所谓的“心理理论”，也就是能够理解他人拥有愿望、信仰、计划和意图。这就好像我们是被事先设定好来发现生物，并将动作的原因归给它们一样。的确，可能恰恰就是这么回事；这种能力的进化形成可能是出于一些积极的生物学原因。生存很容易取决于正确地把一个活动解读成无关动作或其他生物的有意行为。

运用这种能力会使人们很容易匆忙得出结论，即事件是由某种媒介引起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其实，动画片和电脑游戏的成功就有赖于此。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使你一方面可以简单粗略地表现生物，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你的观众激动地冲Jerry〔1〕叫喊，让它逃脱Tom的追击，或者是冲可怜的Kenny〔2〕叫喊，可别再次遇害了。把无生命的生物当成有思想的生物来谈似乎也是非常自然的。如果我说“我的手表认为是星期四”或“这个笔记本电脑决心要毁掉我的演讲”，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丹尼特把这叫做“意向立场”（intentional stance）。也就是说，我们将其他人（或电脑、时钟、卡通人物）看成是有思想的。他认为，这通常是了解周围情形的一个有效捷径。

同样，我们也在自己身上使用该习惯。我们不仅是把愿望和意图加给他人，还相信我们有一个内在自我，他有同样的愿望和意图，并使事情得以发生。所以当我们感觉到已经让某件事发生时，我们的感觉是“我”做的。就进化而言，即使意志的中心是一个虚构也不要紧，只要它是一个有用的虚构就行。

同以往一样，我们可以从出错的情形中了解到许多有关大脑的加

工过程。我们先前已经考虑过这样的例子，即人们引起了某件事，但却没有已经做过这事的相应感觉。还有些时候，情况则恰恰相反。

有一个例子就叫做“控制幻觉”，这在彩票和游戏中很常见。如果让人自己选择彩票的号码，他们感觉自己获胜的几率会更高。如果真的赢了，他们觉得仿佛是因为自己选对了才中奖的。同样，如果不是由于控制幻觉，赌场可能赚不到钱，因为正是这种持久的、认为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不同效果的感觉让人们一直玩下去。相信超自然力也是受到控制幻觉的影响。举例来说，如果人们心理上想象某个结果，而且恰巧发生了，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是自己引发了该事；如果他整晚都在思念自己的朋友，然后她打来了电话，他们就强烈地感觉到是自己的思念让她打来了电话。这种感觉可以很轻易就掩盖了从逻辑上对思想的长距离效应的否定。

超自然信仰

为什么人类这么容易相信鬼怪和神明？进化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认为为了了解天气、太空、健康与疾病的模式，我们使用了为其他用途而进化的大脑和感觉系统。我们只是情不自禁地想使用意向立场，于是认为肯定有人引发了我们所看到的事情。

同样的本能倾向使得招魂术和精神见证如此具有欺骗性。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重现维多利亚时代的招仙会时，里面那些坐着的人看见了黑暗中漂浮的物体，感觉到有东西触摸自己的皮肤，听到钟声响起，就认定神灵已经在他们中间移动。这些现象都是魔术师伪造的。但是即使不信神灵的人也会被这个伎俩所迷惑，因为当我们看到物体移动时，我们猜想一定有人在移动它们。当物体移动方式像有人带着它走路那样时，我们就会想象有个人在那里。这样，鬼和神也就很容易被召唤出来了。

正是我们自己的 想法导致了行动，这种感觉甚至更加强烈。心理学家丹尼尔·魏格尔（Daniel Wegner）将有意识的意志体验比作另一种因果判断形式。他认为，自由意志是一个幻觉，由我们所犯的一个大错引起。幻觉的发生可以分成3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都可能出现得很快。首先，我们的大脑开始酝酿一个行动。其次，大脑活动引起对该行动的思考。最后，行动出现——刚好这时候（好比魔术师说“变”的时候），我们匆忙作出自己有意识的思考导致了行动这一结论。

让我们假设你决定拿起电话打给你的朋友。首先，大脑活动开始计划这个行动（这可能由先前的脑部活动和外部事件导致）。这一大脑活动引起打电话的想法。最后，你伸出手拿起电话。你就匆匆得出这个错误结论：有意识的思想引起了行动。

难道果真如此吗？魏格尔设计了好几个实验来一探究竟。他提出自愿体验的发生有3个前提条件：思想必须在行动前；思想必须与行动一致；行动不能伴随其他原因。为了检验这些假设，魏格尔根据传统的显灵板的启发设计了一个实验，它与法拉第的翻倒桌类似，也是依靠无意识的肌肉动作。在魏格尔的实验中，玻璃杯被一个装在鼠标上的小板子所替代。两名参与者把手指放在板子上，并通过这个小板子移动了屏幕上的光标。屏幕上有约50个小物体。他们通过耳机听到物体的名称，并要一直移动鼠标直到听到停止的信号。事实上，其中一名参与者是实验者的同伙，他在控制何时停止。这让魏格尔能够证明在某些条件下受试者完全确信是自己停止了鼠标，但其实是另有其人。正如魏格尔所预言的那样，当停止信号正好出现在他们听到那个物体的名字之后，他们就会产生是自己停止了鼠标的感觉。

魏格尔声称有意识意志的幻觉犹如变戏法一样，其产生的原因也完全一样。魔术师可以让观众相信他们选择了卡片，或者自己想出了号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会上当。魏格尔的结论是：相信我们有意识的思想引起了我们的行动，这是一个错觉。无论你同意与否，这些揭示出我们所犯错误的例子肯定了一点，即用意志做某事的感觉既不能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也不能证明它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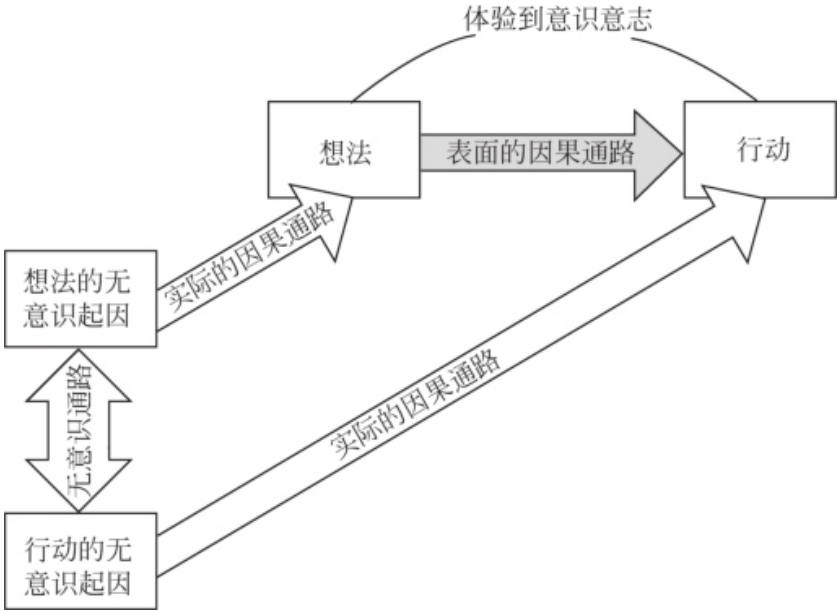

图20　有意识意志的幻觉。魏格尔认为，无意识的过程既产生了有关行动的思想，也产生了行动本身。我们于是错误地推断出是我们的想法引起了行动。

如果你对此表示赞同，并也认为自由意志是一个幻觉，那你该怎样度过你的一生呢？有些人的结论是既然做任何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了，还不如干脆放弃。但上述论断并不必然得出这种想法，何况这也不容易实行。如果你觉得你不如放弃，那么问问你自己打算做什么，因为你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你不能完全什么也不做。整天躺在床上不是什么事都不干，你得起床吃东西或上厕所。结束你的生命也不是什么也不做，何况这既不容易也不愉快。勇敢地面对没有自由意志这种信仰的生活，忘掉这个幻觉会变得容易些。

这又怎么样？即便自由意志从理论上讲是一个幻觉，它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幻觉，因此自由的感觉也会一直持续，即使对不再相信自由意志为真的人来说也同样如此。有时这类人会说，他们过着自由意志“仿佛”存在的生活，“仿佛”他们和别人都拥有自我。那样，他们可以坦诚面对生活，无需相信一些他们知道不可能为真的东西。对另外

一些人来说，这种感觉终会消失。

注释

〔1〕 Tom和Jerry是迪斯尼动画片《猫和老鼠》中的猫和老鼠的名字。

〔2〕 Kenny是美国喜剧中心制作的《南方公园》中的四名主角之一，总会因某种原因死掉，但下一集又会复活。

第七章

异常的意识状态

睡眠与做梦

虽然有人声称从不做梦，但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做梦。证据很容易找到。如果在大脑出现快速眼动（REM）睡眠的典型特征时将这些自认为不做梦的人唤醒，那么他们几乎肯定会报告一个梦。所以不做梦的人实际上只是健忘；大不相同的是对梦的回忆，而不是做梦本身。另一种证明方式是给他们纸和笔，请他们每天早晨都记下醒来后回忆起的所有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对梦的回忆的急剧增加。短短几天后，大多数人会发现自己已陷入梦的沼泽，并颇愿意回想起有点儿不那么可靠的回忆。

在典型的一晚的睡眠中，大脑在四个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中循环往复。首先通过阶段一到四，然后回到第一阶段，接着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时期。这种模式一晚上会重复四五次。如果在不同的阶段唤醒人们，他们会描述不同的体验。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他们通常说自己在做梦，虽然不是那么绝对；而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期间，他们可能会描述自己正在思考或琢磨一些事情，观看颇为静止的图画，或什么也没做。儿童，甚至婴儿，也会表现出同样的生理阶段，但是做复杂而生动的梦的能力则是随着认知能力和想象力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目前人们对睡眠的生理过程以及某些病理机制都有较深认识。但如果把睡眠当作一种意识状态，这些知识只是掩盖了一幅不那么确定的图画。

与意识一样，意识状态和异常的意识状态（ASCs）的观点看起来再明显不过。比如，我们都知道醉酒或发烧到神志不清时的感觉有异于正常状态。即便没有亲身经历，我们也可以猜出吸毒后轻飘飘的感觉，或处在某种神秘体验时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因此称它们为异常的意识状态。

但是任何试图界定异常的意识状态的努力都会立即遇到问题。有

两种明显的方式可以尝试。首先，你可以进行客观的测量，例如一个人喝了多少酒，或者对他使用了哪种催眠方法。这种方法并不理想，因为有可能两个人在喝完同样多的酒后，一个烂醉如泥，而另一个什么事儿都没有。同样，感应技术对不同的人的效果也不尽相同，有些人根本不受影响。很少有意识状态伴随着独特的生理模式，因此测量大脑的状态只会得到令人迷惑的结果。行为测量也没有帮助，因为人们可以声称自己正处于深度的异常状态，而行为上却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无论是哪种情况，所有这些客观的测量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一点，就是异常的状态是你所感觉到的，是个人私自拥有的。

为此，人们往往倾向于采用主观的定义。例如，心理学家查尔斯·塔特（Charles Tart）将异常的意识状态定义为“整个心理功能模式的质的改变，体验者感觉到其意识功能与正常情况下截然不同”。当然，这个定义把握了异常意识状态的要旨，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如何知道什么是“正常”状态。同时它还需要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有些人（在别人看来）明显处于一种怪异的状态，但他们却声称自己感觉完全正常。

同样令人奇怪的是，当我们来看做梦这个最明显的意识状态时，该定义也同样碰到了问题。普通的梦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我们不觉得自己的“意识处于截然不同的状态”，至少做梦的时候不这样想。只有到后来，我们才醒过来，并且说“我一定是做了个梦”。为此，有人甚至怀疑梦境能否算作一种体验。毕竟，我们当时似乎并没体验到它们——只是后来记住了。那么梦真的是像它看起来那样发生的吗？还是只是在醒来的时刻被人们编造出来的？我们能知道吗？

有意思的是，我们有找到真相的办法。例如，我们可以在人们的梦中添加某些成分，比如给他们播放一些声音或者往他们的皮肤上滴水。有时，他们后来会报道自己梦到了教堂的钟声或者瀑布。如果让他们估计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结果会显示梦的确发生在它看起来应该发生的时刻。

一个更好的方法是研究极少数那些能随心所欲做清醒的梦的人。所谓清醒的梦是指你在做梦时就知道这是一个梦。调查显示，约有

50%的人声称做过清醒的梦，有20%的人经常做清醒的梦。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做过清醒的梦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听起来相当奇怪。当某件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而做梦的人开始感到疑惑时（如我怎么会来到这座建筑的顶部，以及为什么我的祖母会在这里，我以为她已去世），一个典型的清醒的梦就开始了。与我们通常做梦时都会接受这些奇怪的事不同，做清醒的梦的人意识到这不可能是真的。这种意识改变了一切。梦境变得更加生动，做梦的人感觉自己更像在正常清醒的状态，他们甚至能够控制梦的进程。此刻，许多人开始飞翔，享受乐趣。但清醒的梦并不会持续太久，大多数人会很快回到平常做梦时的无知状态。

图21　处于睡眠性麻痹状态时，全身的肌肉都处于麻痹状态，只有眼睛可以动。

大多数文化都有关于睡眠性麻痹的神话。如《纽芬兰的老女巫》就是描绘一个像魔鬼一样的老妇人出现在夜间，她可以压住睡觉者的胸部以防止他们移动。

有少数非常难得的擅长做清醒的梦的人参加了一个实验室研究。他们在研究中学会如何根据梦的内容发出一定信号。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几乎全身的肌肉都处于瘫痪状态，否则你可以把梦的内容表现出来。但这时你的眼睛仍然在动，呼吸也仍在进行，因此有时候，正在做清醒的梦的人可以通过移动眼球来发出信号。这就使得实验者能够测量梦开始的时间，并观察做梦期间的大脑活动。总的说来，这些研究证实了梦发生的时间是实时的；同时它们也表明，无论人们在做什么梦，如沿街跑步、打网球、唱歌等等，大脑的反应模式确实和他们真的在做那些事一样。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真的在做。

梦是一种体验吗？

目前还没有普遍接受的梦的理论。此外，还有一些奇怪的事实有待解释。例如，在醒来时，我们记得自己做了梦，但当时并没有意识。虽然实验表明梦在实时地进行，但很多奇闻轶事里描述的梦都是在醒来的那一刻编造而成的。最有名的例子是法国医师阿尔弗雷德·莫瑞（Alfred Maury，1817—1892）的梦。他梦见自己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拖上了断头台，结果醒来时发现自己的脖子被压在床头下。

有一个理论允许两者都是真实的。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大脑里发生了很多平行的加工过程，其中没有一个是‘在’或‘不在’意识里。苏醒时，通过选择记忆里残留的很多片断，我们可以编造出许多故事。最后所选的故事只是众多候选故事中的一个。没有任何实际的梦，也没有任何故事真的发生在“意识中”。根据这个“回溯选择”理论，梦并不是穿越沉睡心灵的体验流。

快速眼动期间的麻痹还会带来另一个后果。有时人们在麻痹消失前就醒来，结果发现自己无法动弹。这被人们称为睡眠性麻痹。如果你不了解它，这种体验会非常吓人。它通常伴随着辘辘或碾磨的声音、阴森的灯光以及有人在身边的强烈感觉。大多数文化中都有睡眠性麻痹的神话，如在夜里坐在人胸口上的纽芬兰老女巫，或者中世纪传说里的男女梦淫妖。现代版的例子则是被外星人绑架的体验——一种在半梦半醒之间、并且处于极度痛苦的麻痹状态时所编造出来的生动体验。

药物和意识

药物对意识的影响为意识取决于大脑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这看似再明显不过，但我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有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精神独立于大脑，甚至能够在死后继续存在。一旦明白精神类药物的效果后，这种理论就站不住脚了。

精神类药物是影响心理功能的药物，在每个已知的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人类似乎在寻找改变自身意识的方法中找到了无穷的乐趣。如果使用不当，许多精神类药物都可能带来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大多数文化都拥有非常复杂的程序、制度和传统来限制谁、在什么情况下以及采取什么准备措施后才可以吃哪些药。现代西方文化则是一个例外，在西方，对精神类药物的禁止意味着此类天然的保护系统未能发展起来。许多烈性的精神类药物可以在大街上买到，年轻人在没有任何认识或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服用。

精神类药物可以分为几个大类，各有不同的效果。麻醉剂可以完全消除意识。最初的麻醉剂是结构单一的气体，如一氧化二氮，或笑气；虽然高剂量下会引起昏迷，但在低剂量下，很多人都宣称它能够产生神秘状态，并增强哲学洞察力。现代的麻醉药品通常分为三类，分别能减少疼痛、放松和消除记忆。

有人会认为研究麻醉剂会是一个了解意识的好方法。我们可以系

统地增加或减少剂量来观察相应的意识状态。事实上，我们现在很清楚，虽然麻醉剂的原理五花八门，但它们大多会影响整个大脑；没有迹象表明大脑有一个“意识中心”或某个特定的大脑过程被开启或关闭。

其他精神类药物用于精神病人，包括安定药、抗抑郁药和镇静剂。有一些镇静剂和其他一些镇静剂已被滥用为毒品，这些都是能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其中包括酒精（有兴奋和抑制双重功能）和巴比妥类。麻醉药包括海洛因、吗啡、可待因和美沙酮。它们的作用类似于大脑中的内啡肽——一种与压力和奖赏有关的化学物质。这些药品会让有些人感到非常愉快，但极易成瘾。

兴奋剂包括尼古丁、咖啡因、可卡因和安非他明。其中大多数也都极易成瘾。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你必须不断增加剂量。中断药物会引起痛苦的症状以及对药物的渴求。可卡因通常是用鼻子吸食，但也可以变成可以抽的“快克”，这样见效更快，因此效力更强，也更容易上瘾。安非他明是一个大类，包含许多现代的化合致幻药，其中一个例子是麻黄素（MDMA），也叫摇头丸，它兼具刺激、迷幻和改变情绪的效果。

从理解意识的角度来看，致幻剂是最有意思的药品。“致幻剂”这个词也许不太恰当，因为有些药物根本不会让人产生幻觉。实际上，严格地说来真正的致幻剂会让体验者混淆幻想与现实，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笃信她头脑中听到的声音来自所处房间的墙壁。根据这个定义，大多数致幻剂只是产生“伪幻觉”，因为使用者依然知道它们都是不真实的。因此，这些药物也被称为迷幻药（让人敞开心扉）或松弛剂（让人精神松弛）。

大麻，有时也称为小迷幻剂，自成一类。它是从美丽的大麻作物中提取出来的。5,000多年来，这种植物一直被当作药材和编织绳子和衣服中用到的硬纤维原料。许多19世纪的艺术家在其作品中使用过大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也曾用它入药。在20世纪，很多国家宣布它为非法。尽管如此，它仍被广泛使用。通常它被做成大麻（晒干的叶子和雌花头）或哈希什（从大麻上刮下的树脂、花粉、树叶或花的粉

末混合而成的固体）吸食。哈希什也可生吃、做熟了吃或溶于酒精、牛奶之中。

大麻的主要活性成分是δ-9-四氢大麻酚，同时也包含了60多种大麻化学成分和其他许多对大脑和免疫系统略有不同影响的成分。这些成分还会产生交互作用。大部分成分都是脂溶性的，可以在身体里停留数天甚至数周。大麻的药效很难形容，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效果复杂多变，部分原因在于使用者认为任何言语都难以解释发生的一切。有些人吸食大麻后产生狂想症。由于人们不断培植出药效更强的大麻作物，这种情况似乎也在不断增加。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大麻的影响相当微妙，包括放松、感觉增强、简单感知的愉悦性提高、易笑、性快感增强、对人敞开心扉、时间的流逝变慢以及各种影响记忆的效果。实验表明，大麻会导致主动性降低，短时记忆严重受损。

这种使用如此广泛的娱乐性药物的效果会如此模糊不清，这似乎有点奇怪。当然，我们还缺乏科学的意识理论来充分解释人们吸食大麻后意识所发生的变化。

主要致幻剂的效果则强烈得多，通常也更持久、更难控制，这或许是它们使用没那么广泛的原因。致幻剂包括二甲基色胺（DMT，南美发现的致幻剂死藤水的一种成分）、墨西哥致幻毒素（发现于“神奇蘑菇”中），麦司卡林（发现于仙人球毒碱中）和许多合成药物，包括LSD（麦角酸酰二乙胺）和各种苯丙胺类和色胺类毒品。这些毒品大多类似于四种大脑神经递质中的一种，包括乙酰胆碱、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5-羟色胺，同时还能与其功能产生交互作用。在超大剂量服用时它们都是有毒的，并能加剧原有的精神病症状，但它们一般不会让人上瘾。

最著名的致幻剂恐怕要算LSD。LSD出名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人们崇尚“打开心扉、加入迷阵、脱离现实”。LSD会诱发持续大约8至10小时的“旅程”（即迷幻感觉）。称其为“旅程”是因为它持续的时间似乎没有尽头，常常给人的感觉是好像穿越人生的一次伟大旅行。不仅颜色会变得更加鲜艳，普通物体也可能具有奇异的形状：如壁纸扭成彩蛇，驶过的汽车变成长有50英尺长的翅膀的飞龙。这种幻觉可以

让人感到高兴和荣耀，但也可能是极度恐惧，从而导致一次“糟糕的旅程”。它常常会产生一种超自然的感觉，并伴随着神秘的幻觉以及平常的自我感的消失。人似乎成为一种动物或另一个人，或完全融入整个宇宙之中。LSD之旅不是轻轻松松就可以走完的。

1954年，《勇敢新世界》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首次服用了麦司卡林，并形容它打开了“感知的大门”。普通的东西变得色彩斑斓和稀奇古怪；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整个世界在其自身的“所是”里显得那样完美无缺。他的描绘类似神秘主义的体验。确实有人把这些药品形容为“恩斯阿金”[1]，或心中神的释放剂。

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即药物能否诱发真正的宗教体验。在一个著名的研究中，美国牧师兼医师沃尔特·帕恩克（Walter Pahnke）在传统的周五弥撒中给20名神学院的学生服用了一些药丸。一半的人服用安慰剂，他们只有轻微的宗教体验；但另一半人服用墨西哥致幻毒素，其中8人报告说有强烈的神秘体验。批评家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比不上“真正的”神秘体验，但这就意味着我们知道“真正的”神秘体验是什么样子。

超常体验

从灵魂出窍体验到神游和幻想，大批人（约30%至40%）报告自己有过生动的、自然产生的异常意识状态，这一点让人非常惊奇。这有时也被称为“超常人类体验”，特别是当它们涉及到一个人自我感的改变以及它们与世界的关系的改变时。

灵魂出窍体验（OBEs）是指人感觉到自己似乎已经离开身体，从身体外面的某个地方观察整个世界。约有20%至25%的人声称至少有过一次这样的体验。虽然有时人们报告似乎在进行长途飞行或进入到其他世界，但这种体验通常都很短暂。灵魂出窍体验通常是令人愉快的，尽管有时也会很吓人，特别是伴随着睡眠性麻痹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定义并不一定意味着真有什么东西离开了身体，这只是人的感觉而已。在这一点上，不同的理论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例如，有些人相信他们的精神、灵魂或意识已经离开自己的身体，并且能在身体死亡后继续生存下去。根据“星体投射”理论，一个微小的“星体”已经从身体的器官中取出来了。许多实验都试图检验这一想法，但均未获成功。例如，科学家使用了很多探测器，包括物理仪器、体重计、动物和人等等，都没能可靠地检测到星体或灵魂。另外，如果让有灵魂出窍体验的人看隐秘的数字、字母、物体或场景等目标，虽然许多人都自称能看到，但他们的描述的准确性一般不会超过概率水平。这并不能证明没有东西脱离了身体，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有东西脱离了身体。

心理学理论用个体身体意象和现实模型的改变来解释灵魂出窍的体验。据发现，容易梦见自己鸟瞰世界或善于想象各种变换了的视角的人更可能产生灵魂出窍的体验。灵魂出窍的体验几乎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但最常见的是在快要入睡、深度松弛、恐惧或感受到压力的时候。通过电刺激大脑右颞叶那部分负责建构和控制身体意象的脑区也可以产生灵魂出窍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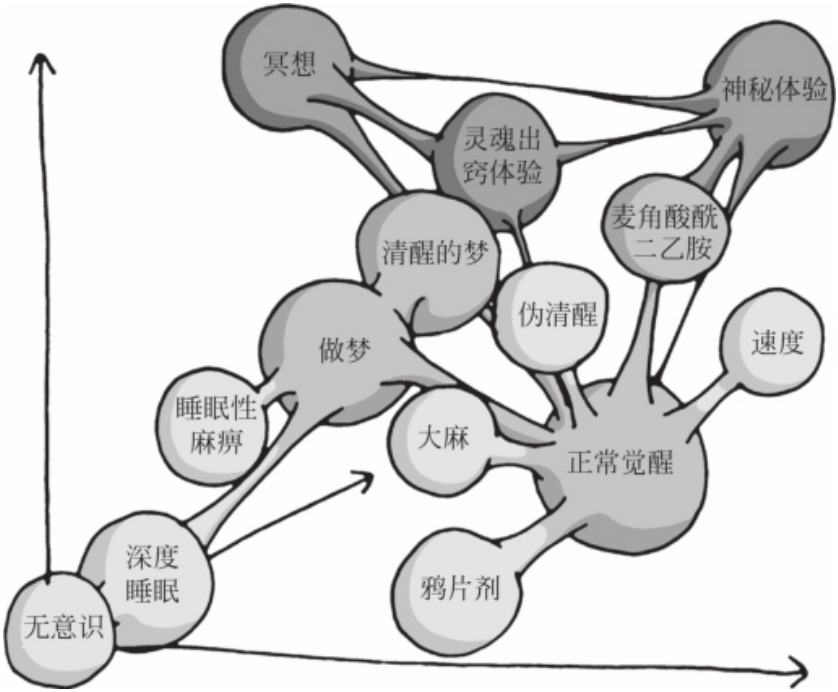

图22　意识状态能被映射吗？从一个状态变化到另一个状态感觉就像是在一个广阔的多维空间里运动一样，一些状态容易达到，另一些则非常遥远。许多人试图绘制这种地图，但很难知道相关的纬度。

有时人们在濒临死亡时会报告一系列奇特的经历，它们被统称为濒死体验（NDE）。虽然顺序可能略有不同，并且也少有人能够感受到全部体验，但濒死体验最常见的特点是：沿着一条黑暗的隧道或穿过一个黑暗的地方，走向明亮的白光或金色的光；看着别人救活自己的身体或在上面做手术（灵魂出窍体验）；喜悦、被接纳或极度满意的心情；一生中各种事件的闪回或全景回顾；看见另一个世界——里面是已经死亡或被称为“光之灵”的人；最后决定回到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进入那个世界。经过这样的体验后，人们常常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自称不那么自私或功利了，也没那么惧怕死亡了。

濒死体验的报告来自于不同文化和不同年龄的各种人群，总体上似乎都非常相似。主要的文化差异体现在细节上。例如，基督徒往往

看见的是基督或天国之门，而印度教教徒会遇到主罗摩（Ram）或看到自己的名字写在一部大书上。信教者往往声称这种体验的一致性证明了他们信仰的宗教对死后生活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对这种一致性的更好解释是：所有的人，无论年龄和文化有多大差异，都有相似的大脑；而所有的大脑对压力、恐惧、缺氧和其他许多诱发濒死体验的因素所作出的反应模式都是相似的。

所有这些诱因都会释放内啡肽，从而产生愉悦感，同时也会引发大脑多个脑区随机的神经活动。随机活动的效果取决于所在的脑区：视觉皮层的活动产生隧道、螺旋和光（致幻类药物也产生类似的神经效应）；颞叶活动导致身体形象的改变和灵魂出窍体验，同时也能够打开记忆的闸门；其他脑区的活动能引起不同的幻觉，其内容取决于人们的期待、先前的心理状态和文化信仰。毫无疑问，很多人确实被濒死体验所改变，通常是往好的方面改变。但这可能是由于大脑的巨大变化，以及他们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死亡这一想法所引起的，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灵魂短暂地离开身体所引起的。

人不需要濒临死亡才能获得如此深刻的体验。许多颇为普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相当不寻常的体验。如果这些体验与天使、神灵或者上帝有关，它们通常被称为“宗教体验”，如果没有则被称为神秘体验。目前还没有一种简单方法来界定甚至描述神秘体验。人们往往认为它们不可言状或难以形容，涉及到超自然感，并传达一种意想不到的知识或对宇宙不能说清的理解。也许该体验的最核心之处在于自我感的改变，无论这是表现为独立自我感的完全消失，还是与宇宙完全合一的感觉。

这些体验通常都是自发产生的，并且持续时间非常短暂，但有些方法可以使这些体验更容易发生，或可以逐渐引发类似的心理状态。

冥想

冥想通常给人的印象是盘腿而坐，进入深度的放松状态并与世隔

绝。有的冥想是这样，但还有很多别的种类，包括步行冥想以及一些比较警觉和积极的形式。

冥想以前主要是在宗教背景下进行练习的。尽管基督教、苏菲派和其他宗教的沉思传统中也有类似方法，但冥想在印度教和佛教中体现最为突出。今天有许多非宗教的冥想形式，大多是作为放松和减压的方法而加以提倡的，其中最著名的是超脱静坐（TM）。

大多数冥想都会采用特殊的坐姿，如莲花坐或半莲花坐，即双脚或一只脚搭在对侧的大腿上。不过，很多人采用相对简单一些的打坐姿势，如使用硬座垫、或者坐在矮凳上并将双脚放在下面。这些坐姿并无什么神奇可言，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是为了提供一个既轻松、又不失警觉的姿势。打坐通常面临两种危险：要么变得昏昏欲睡并睡着，要么由于某些杂念的搅扰而变得兴奋或坐立不安。特殊的坐姿能保证坐得稳、脊椎笔直和呼吸顺畅，从而有助于避免上述两种危险。

那冥想对精神有什么影响呢？技术不同效果也是千差万别，虽然有时人们认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抛弃种种念头并训练注意，但这两者都不容易达到。如果你从未尝试过冥想，你也许会想做下面这个练习：低头，一分钟内什么也不想。

结果会怎样？你完全无法照着做。思绪像从内心喷涌而出，注意被外面发生的事情所转移，心思几乎没有一刻是安宁的。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毕竟，我们大脑的进化是为了应对世界和保证我们的安全，不是为了听从指挥保持安静。尽管如此，经过大量的训练，还是有可能排除一切干扰并保持内心平静的。

大多数冥想都需要学习如何抛弃不必要的想法。这里最好的忠告是：不要试图同它们争斗，也不要以任何方式同它们有牵连，仅仅是让它们走开就可以了。这可以当作整个训练方法的全部，但由于做起来并不容易，所以人们还发展了其他各种技术。专注式冥想采用了别的方式来保持注意，也就是让心灵有事可想。这可以是像超脱静坐一样，使用一个咒文（反复默念一个词或短语），或者也可以使用某个物体，如石头、花、蜡烛或宗教符号。最常见的办法是数呼吸的次

数，就是留意自己自然的呼吸，感觉空气的进出，然后开始数呼吸的次数，从1数到10。数到10以后，回到1又重新开始。

其他种类的冥想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辅助。例如，在禅宗里，常见的做法是双眼半闭地坐着，注视白墙。这么做的目的是“仅仅坐着”——这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冥想时双眼可以睁开也可以闭着。闭眼的危险是你有可能进入到大的幻想之中而毫无察觉，或者干脆睡着了。睁眼虽然比较容易保持警觉，但是其危险是容易被搅扰。

所有这些做法的意义是什么呢？许多人练习冥想是因为他们认为冥想可以帮助他们放松和应对压力。事实上，成千上万的实验已经研究了冥想的效果，结果相当令人吃惊。如果对放松进行标准的测量，如心率、呼吸、耗氧量、皮肤电或大脑活动，人们发现冥想并不比静坐、阅读或听音乐更让人放松。实际上，它甚至可能使人处于高度觉醒状态，比如当不必要的想法不断冒出来而冥想者又拼命控制自己的情绪时。显然，在短期内冥想似乎远非一个迅速缓解压力的方法；如果你想减轻压力，更好的方法可能是多锻炼，而不是冥想打坐。

但是从长远来看，冥想的效果则更为深远。那些已练习冥想多年甚至数十年的长期打坐者确实会进入到深度的放松状态。他们的呼吸频率可降至每分钟3次或4次，脑电波会从平常的β波（清醒状态）或α波（平常的松弛状态），放慢到慢得多的δ波和θ波。但多年练习冥想的人通常不只是为了寻求一种放松方式。他们通常是出于宗教或神秘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冥想是寻求救赎、帮助别人或是获得顿悟。

佛教的冥想当然是这样，禅宗更是如此。禅宗是佛教的一种，但其宗教成分已经少了很多，并且享有用艰苦的方法直接洞察心灵本质的美誉。有的禅宗学生练习静默照禅，学习静心以直接洞察意识的本质。其他人则使用一些称为公案[2]（koan）的特殊故事或者问题。这些问题通常不是可以依靠智力回答的问题，甚至难以按一般意义去理解。相反，这些问题能让提问者进入一种深度的质疑和困惑状态，从中产生出新的洞见。最终极的公案恐怕非“我是谁？”莫属。这是一个自我否定的问题，它让冥想者深入洞察瞬间的体验。找不到明显的“我”只是漫长旅途的第一步。

在练习禅宗的过程中，人们报告了很多受到教化的体验，很多传统观念被打破，并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但这些体验可能只是暂时的，很像自发的神秘体验。禅宗的终极目标据说是得到完全的启示，彻底抛弃二元论的幻觉（独立的自我和有人在行动的幻觉）。

这种实践给意识科学提出了一些引人入胜的问题：我们能否研究冥想状态下大脑活动的变化，并进而了解真相？是否真的存在不同的阶段，或者是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路线？是否真如人们所宣称的那样，经过冥想以后，人们变得更富同情心和不那么自私了吗？最吸引人的可能是，他们的领悟是真实的吗？在神秘体验和长期打坐中，人们形容自己看穿了独立自我的幻觉，或者看到世界真实的一面。他们对吗？这与意识的科学研究中还在努力探讨的幻觉是同一回事吗？现在我们能说的是：意识研究还远没有发展到能回答这些问题的程度，但至少我们可以开始提出这些问题。

注释

〔1〕 恩斯阿金（entheogen）一词源于古希腊的entheos和genesthai。entheos的字面意思是神（theos）在心中，也可以翻译为“受启示的”。希腊人用这个术语来赞美诗人和其他艺术家。genesthai是“造成”或“变成”的意思。因此，恩斯阿金的意思就是“将神（或神灵的启示）带到人心中的事物”。

〔2〕 公案，在佛教禅宗中，以似是而非的形式出的谜语，能帮助思索，同时也是获得直觉性知识的一种手段。

第八章
意识的演变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你凝望着森林里的一棵大橡树，绿叶在微风中翻飞招展，斑斑点点的树阴在地上跳舞，小鸟在树枝间飞来飞去。更近些瞧，你看到树干上错综复杂的树皮纹路，瞥见一只小甲虫快跑着想躲藏起来。你闻到撒满橡树果的泥土的芳香，感觉到湿润的空气围绕在身旁。这是你的意识体验。这棵树为你而存在。

但是甲虫有什么体验呢？还有那些鸟，藏在树上睡觉的蝙蝠以及隐藏在草丛中的蛇？在动物的眼中，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很想知道答案，问这样的问题似乎也很合理。问题是我们无法知道。这正如我们问“成为一只蝙蝠会有什么体验？”一样，仅仅想象你是一只蝙蝠或一条蠕虫是毫无用处的。这是一个关于动物意识的问题。这里它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哪些生物拥有意识，以何种方式拥有意识；另一个问题是意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演变的，又是如何演变的。

我们可以考虑各种各样的造物，并问它们是否有意识，这或许会有所帮助。让我们首先从躺在树下的石头开始。说成为石头并没有什么体验，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实际上，四周的泥块以及从树干上脱落的树皮都是如此。然而泛灵主义者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有意识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没有无意识的造物，意识从一开始就一直存在。

但是树呢？大多数人会说树木和其他植物都没有意识。但我们有理由说意识的首要特征是拥有感知并与世界互动，而树木是可以感知世界的。它们能对重力、光线、温度和湿度作出反应。如果快速放映一段橡树果从萌芽到长成大树的影片，我们将会看到小小的幼苗扭曲着向上探寻，鲜嫩的叶子寻求阳光。因此，我们更会倾向于认为树可能拥有意识。类似的论证也适用于地衣、藻类，甚至细菌。

那下一个是什么呢？如果有几个人试图根据意识程度的高低从低到高给各种生物排序，他们不会达成一致意见。有人会将婴儿排在最后因为他们尚未学会很多东西，而其他人会考虑到宝宝的潜力而将他们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有人会把黑猩猩放在很靠前的位置，因为他

们与人类非常相似；另一些人则会说乌鸦、鲸鱼和海豚更聪明，而聪明才是衡量意识的重要指标。

还需要考虑的是动物具有的不同感官。比如蛇有敏锐的嗅觉，而另一些动物拥有特殊的器官可以感知红外线，因此能够捕获猎物。鸟几乎没有嗅觉，但它们可以看到人类无法看到的紫外光。事实上，许多鸟都拥有四色视觉系统，这使它们能够比拥有三色系统的人类看到更丰富的颜色。看到人类看不到的颜色会有怎样的体验？我们甚至难以想象这种情形，因为我们得利用大脑的视觉系统来进行想象，但这个系统缺乏对紫外光的表征。

与此同时，与鸟类和哺乳动物只有单一的眼球不同，昆虫的复眼包含了成千上万独立的镜片。它们也能看到紫外光。许多昆虫都有敏锐的嗅觉，它们用带有气味的臭迹将同伴引到有食物的地方，或用信息素进行交流，并通过触角探测这些化学物质。它们的体验会是怎样的呢？用敏感的触角嗅到腐烂的老鼠尸体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对那些将卵产在动物尸体身上的苍蝇来说，这种臭味大概极具吸引力。从对其他动物的感觉器官的了解中我们一定会作出这样的论断：在那片森林里，每一种造物都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它们各自都栖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或客观世界中。

我们可能还是忍不住会问这个问题：哪些动物才真正拥有意识？一方面，意识可能是一个走极端的现象，一些动物有而另一些则没有。笛卡尔认为，只有人类才有灵魂，所以其他动物都是“无感觉的自动体”。另一方面，意识可能是一个连续体，一些动物拥有的意识比另一些多。任何有效的意识理论都应该明确地说明哪些动物有意识，以什么方式拥有意识，以及为什么有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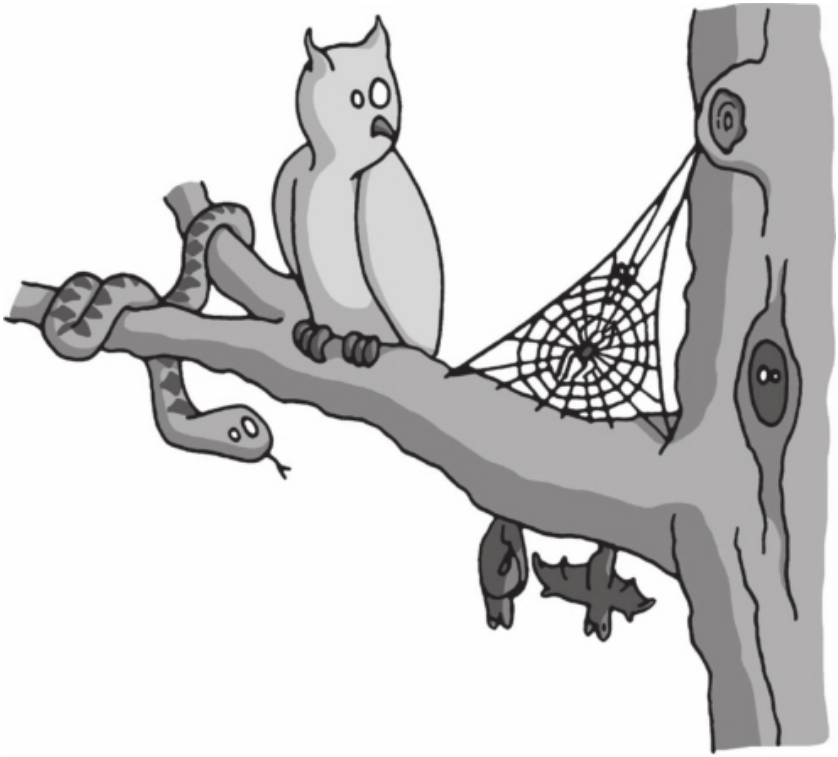

图23　成为猫头鹰、蜘蛛或蛇会有怎样的体验？这些动物都有适于自身生活方式的感知系统，并活在自己的环境中或客观世界中。但它们有意识吗？我们如何才能知道？

我们如何才能找到答案？我们再次碰到意识那个无法破解的奇妙特征。世上没有探测意识的机器；也不是说我们可以在某些动物的大脑中发现产生意识的密室，但在其他动物身上却找不到。因此这个问题依旧是一个问题。如果一个问题无法回答，那最好就不要再问了。

就算仅仅是因为我们关心动物苦痛的缘故，这个问题也不会消失。无意识的自动体不会有痛苦。如果笛卡尔和他的后继者是对的，那么我们不必担心动物会受痛苦。但动物看起来的确是在受苦。一只皮毛厚实光亮、双眼有神，正在嬉戏的猫，心情显然是高兴的；而那只皮毛稀疏湿软、目光呆滞、举步维艰、腿上的伤口还在流血的猫显然是非常痛苦的。但我们可以肯定自己的直觉是正确的吗？

人的这种直觉是出了名的变化无常。比如，人们通常赋予温柔、惹人怜爱以及与我们相似的动物更多的感情，比如有一双目光前视的眼睛的猫和兔。人们会对有目的前进的任何物体采取有意图的立场，即使对最简单的机器人也是如此。使用较复杂的机器人做的实验表明人们是多么愿意赋予那些模拟人微笑、皱眉或侧耳倾听的金属脑袋以感情。所以我们不能相信这些直觉。

为了打破这一僵局，生物学家玛丽安·斯坦普·道金斯（Marian Stamp Dawkins）认为如果动物真的在遭受痛苦，那么它应该愿意想办法避免不幸。考虑到层架式鸡笼里的母鸡没有可以抓挠的干草，她设计了一个实验，让母鸡必须扒开很厚的帘子才能进入有干草的笼子。母鸡显然更喜欢有干草的笼子，但不会付出努力进到里面去。这种行为测量能够帮助我们衡量动物的痛苦程度，但可能仍有一些人会说："这虽不错，但会不会只是它们表现得很痛苦，抑或是它们真的感觉很痛苦？"

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找到一个理论可以区分哪些能力和行为意味着意识，而哪些没有。就动物意识而言，目前有几种这样的理论。

镜子、自我和其他精神

照镜子，你从中看到了什么？当然是你自己。这个问题看似毫无价值，但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能看到自己意味着你必须有自我感，这就是为什么镜子自我认同已成为一个如此著名的测验的原因。如果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意识取决于拥有自我感，那么镜子测验就能让我们对动物意识有所了解。我们需要找出能从镜子中认出自己的动物。

养宠物的人会证明猫、狗和兔子都认不出镜中的自己。在第一次看到镜子时，它们会饶有兴趣地跑过去，甚至绕到镜子背面去找它们从镜子中看到的另一只狗或兔。但它们很快就对此失去了兴趣。有些

鱼会跟镜子中的自己打斗，鸟会向镜子中的自己展示美丽的羽毛。它们显然以为自己看到了另一条鱼或另一只鸟。但猴子和类人猿会怎样呢？

1872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尝试着给动物园里的两只小猩猩一面镜子，并记述它们如何玩耍，以及如何试图去亲吻镜中的影像。但达尔文并不能肯定它们是否认出了自己。一个多世纪以后，心理学家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设计了一个实验来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给一群年幼的黑猩猩很多时间照镜子，然后把它们麻醉并在它们的脸上画了两个明显的红点，一个在眼睛上面，另一个在对侧的耳朵上。当它们清醒过来后，他让它们照镜子。你我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马上看到红点，并试图去摸它并把它擦掉。黑猩猩也是这样做的。它们摸红点的时间明显多过摸脸对侧的相应部位的时间。

自那以后，人们还对其他许多物种进行了测验。婴幼儿从18个月左右开始就可以通过这个测验。在其他4种生物中类人猿、黑猩猩、倭黑猩猩和猩猩大多数情况下也会触摸红点（虽然它们之间差异也很大），但大猩猩却不会。实验表明，虽然猴子能够用其他方式使用镜子，如伸手够只能通过镜子才能看到的东西，但它们没有自我认知。这表明类人猿和其他动物存在巨大的差别。但这里面还有许多疑点和问题。例如，有些鲸鱼和海豚极其聪明，它们喜欢玩镜子，也可能有自我概念，但却没有手来摸红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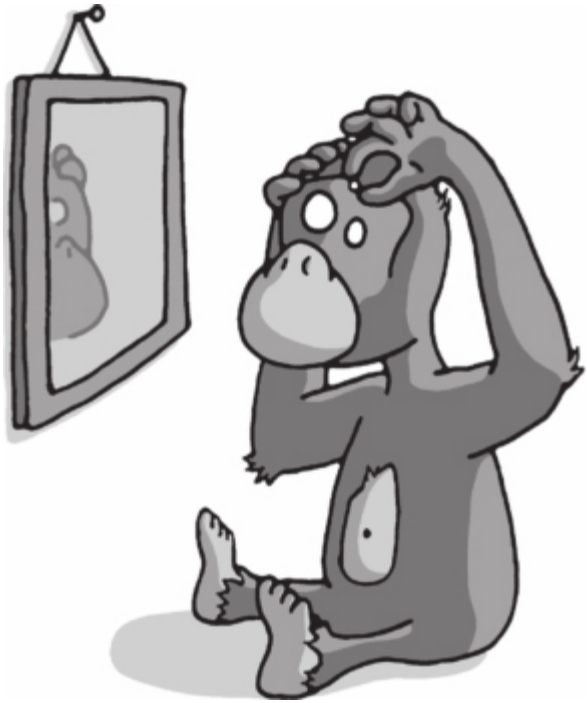

图24　镜子自我认知被用来检验自我意识。在盖洛普的实验中，黑猩猩试图擦掉只能通过镜子才能看到的点。

这个测验虽然很有趣，但并不能明确地回答意识的问题。实验设计者盖洛普确信黑猩猩不仅能够认识镜子中的自己，而且也有自我概念、个体过去和将来的概念以及自我意识。怀疑论者则仅仅赞同黑猩猩能够用镜子中的影像审视自己的身体，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自我意识。

另一种了解自我意识的方式是考察动物的社会智力，包括它们是否能明白其他动物心中的想法。其中的原理是，如果动物能够像人类那样具有心理理论，那么它们就可能反过来理解自己的内心，将自己看成是有愿望、意图和感受的。欺骗也与心理理论有关，因为为了欺骗别人，你必须考虑他们知道什么，他们想要什么。人们观察到黑猩猩在抢食物时会不断分散其他动物的注意，或躲在石头后面干一些非法的事。但灵长目动物学家丹尼尔·鲍威里尼（Daniel Povinelli）做的

一些巧妙实验对黑猩猩的社会洞察力提出了质疑。

黑猩猩本能地会从人和其他黑猩猩那里乞讨食物。因此鲍威里尼在一些不常发生的情形下测试它们的乞讨行为。在一个实验中，两个实验者给黑猩猩提供食物，其中一个人用眼罩蒙住眼睛，另外一个则蒙住了嘴。但这在黑猩猩看来并没有任何区别，它们向这两个人乞讨的次数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甚至以同样的热情向另一个头上罩着木桶的实验者乞讨。看来它们似乎并不知道向眼睛看不见的人乞讨是毫无意义的。目前的结论是，黑猩猩没有心理理论。但即使这个结论也不是肯定的，它对动物意识的意思则更不确定。

最后一个分界线是语言，这似乎是人类所特有的。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要把真正的语言和其他形式的沟通方式相区分。比如，黑长尾猴至少有3种不同的报警声来警告同伴不同的危险；蜜蜂会跳复杂的舞蹈来传达有关食物源头和距离的信息；雄鸟会通过歌声的长度和变化来向其他鸟显示自己不一样的身份。这些方式连同许多其他沟通方式，对于动物的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些信号的含义是固定的，不能重新组合产生新的意义。在真正的语言中，任意的声音或符号都可以通过接近于无穷的方式组合起来，并产生同样接近无穷的意义。这些新的组合于是就成为文化基因[1]（meme），并且可以从一个人身上复制到另一个人身上。

试图教会其他动物语言的努力差不多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尽管早期人们还看到成功的希望。有几只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学会了美国手语，有的掌握了几百个手语词汇。还有一只名叫科科（Koko）的大猩猩甚至通过了镜子识别测试，这表明手语培训还有其他方面的作用。但这些类人猿大多只在要食品的时候才使用手语。它们不会像幼儿那样自发地命名物体，玩文字游戏，或告诉大家他的最新情况。

这些研究与意识的关系是这样的。有些人认为语言的加入完全改变了精神，并带来了意识的关键要素：包括自我感、心理理论以及思考过去和未来的能力。换言之，如果没有语言，任何动物都不能拥有意识。由于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其他动物也有语言，所以一定只有人类才具有意识。但我们如何得知？如果你认为这个问题难以回答，

但与围绕着意识如何、何时以及为什么最先进化而来的困惑相比，这简直不值一提。

意识的功能

我们为什么会拥有意识？你可能会认为，既然我们拥有意识，意识本身一定具有进化的功能。

乍一看，这种观点似乎非常有道理。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是伟大的科学洞见之一，简单却异常强大。有人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提出的最好见解。正如达尔文所意识到的那样，一个简单的反复过程能创造出看似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的最错综复杂和功能最强大的设计。其原理是：首先以某个东西为基础制造很多只存在细微差别的复制品，选出其中之一，然后重复这个过程。仅此而已。

这个过程的效力在于选择的效果。达尔文以解释人工选择开始，如有些人选择性繁育某种动物，而不是别的动物，从而增加某些理想的特征。但他意识到同样的过程一定也在自然选择中暗自进行。也就是说在食物、空间、光照和空气不足的世界，有些生物不可避免地会比别的活得好，而那些帮助它们赢得生存竞争的特征——无论是什么特征——将会遗传到后代身上。这种过程一直延续。正因为如此，眼睛、翅膀、头发和牙齿等特征都开始出现并不断演变。这些都是有助于动物生存的适应性变化，并且也将在繁衍中一直遗传下去。

意识是一种适应性变化吗？表面上看它可能必须是，因为适应不良的特征很快就会被选择所淘汰。但还有其他两大可能性：意识可能是一个无用的副产品，或者可能是某个适应性特征（即使看似不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3类观点在意识理论中都存在。但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它们都会让我们遇到难题。

让我们从一个看似极其自然的观点开始，即我们人类的进化有可能不需要意识。换句话说，意识是一种可选的额外之物，我们都可能是无意识躯体。“这有什么不可能呢？”有人这样陈述自己的观点：“我

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世界，里面的人看起来完全一样，行为也毫无差异，只是内心没有意识；成为我也不会‘有什么体验’”。这种直觉引发了各种思维实验，如无意识躯体的双胞胎，甚至整个无意识躯体的世界。但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想象一下如果进化重演，我们的祖先中有的是无意识躯体，有的则拥有意识——我们称他们为意识人。在这个混合着无意识躯体与意识人的人群中，自然选择开始起作用了。结果会怎样？肯定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根据定义 ，无意识躯体和意识人毫无差别。他们长相一样，行为一样，并且说的话也一样。这意味着自然选择没有任何机会起作用。相对于意识人来说，无意识躯体数量的增减将是完全随机的。这一有趣的结论让意识是一种可选的额外之物、无用的副产品或副现象的观点变得毫无意义。最好是完全抛弃整个无意识躯体的想法而另寻他路。

于是还剩下两种可能性：意识要么本身是一种适应性变化，要么它必然伴随着其他适应性变化，或成为其他适应性变化的一部分。

如果意识是一种适应性变化，那么下面这种说法应该是有道理的：我们的进化可能不需要它；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成为哲学家所说的无意识躯体，而更可能成为好莱坞影片中的海地僵尸——缺少某些重要特征，欠缺一些关键能力的造物。那么进化可能更喜欢意识人。如果你持这样的观点，你必须解释意识添加了什么；你会回想起我们在意识本身的功能这个概念上遇到的麻烦。首先，很难理解主观体验或成为……有什么体验 能够真正影响什么事情。然后，种种证据都表明，所有的体验都来得太迟，难以引发行动，也不会产生人们普遍认为它应该产生的效果。

尽管如此，还是有好几种理论持这种观点。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心理学家尼古拉·汉弗莱（Nicholas Hamphrey）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的祖先能进化出意识是因为他们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有着复杂的婚姻关系和人际关系。能够最准确地预测他人行为的个体会占据优势，而这么做的最好方法是进化出一种“内眼”来观察自己。这样，反省的能力被进化出来，我们也因此变成有意识的了。

由于强调社会智力和心理理论起源，汉弗莱的理论产生了极大影响。但仅就意识而言，该理论受到了很多批评，其理由是认为反省不能很好地指导行为，内眼的说法有近似二元论的危险，而且该理论还是没有解释主观性 。还有一些理论建立在汉弗莱理论的基础上，但也面临同样的困难——主观性从哪里开始适应的，以及为什么体验本身 能提供任何选择优势。

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可能性是：抛弃体验自身 能起任何作用的想法。根据这种理论，意识不是一种适应性变化，这么说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无用的副产品，而是因为它离不开智力、感知、思维、自我概念、语言或其他进化而来的能力。也许大多数唯物主义的科学家都这样认为。他们以为，当所有这些能力都得到解释后，我们终将理解意识。问题在于，这一天似乎遥遥无期。而且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拥有其中任何一项能力就可以让我们过上有意识的精神生活——为什么主观性 必然伴随着其他所有能力。这并不是说这一切不可能得到解释，但在我们能够作出解释之前，我们会不断陷入相信无意识躯体的境地，并与那个困难的问题不断纠缠。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意识的进化理论包括从那些把意识的起源追溯到生命的产生的理论，到将其与感知、智力或其他一般能力的进化联系在一起的中间理论，再到那些将其与语言、模仿或文化基因联系在一起的理论，不一而足。但没有人会一致同意哪个理论是对的。更重要的是，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能搞清楚。

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是通过模仿而在人群中复制的习惯、技能、行为或故事。同基因一样，文化基因的复制需经过竞争；文化基因不是锁定在细胞内的化学物质，而是从一个大脑跳到另一个大脑，或由大脑跳入电脑、书籍和艺术品中的信息。得胜的文化基因在世界各地传播，所到之处塑造我们的思想和文化。

文化基因通过彼此协作形成巨大的文化群。许多这样的文化群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例如金融体系、科学理论、法制、体育和艺术等。但另一些则像传染病或寄生虫，从一个寄主跳到另一个寄主身上，如江湖医术、邪教、连锁信和计算机病毒等。这些文化基因的基本结构是以威胁和承诺的方式发出“复制我”的指示。

许多宗教都只是运用这种结构。这就是为什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称它们为“思想的病毒”的原因。天主教徒被规劝要将自己接受到的教化这一文化基因传给他人，尤其是给自己的子女。祈祷、餐前感恩、唱圣歌、上教堂以及为宏伟的建筑物捐款，这些统统都是为了文化基因的利益，并通过永远的地狱或升入天堂等无法检验的威胁或允诺来加以鼓励。同样，伊斯兰教的律法通过严惩那些背信弃义的教徒来保护其文化基因。没有依据的信仰受到崇拜并禁止怀疑，通过这种方式，宗教的文化基因就可被完全复制，无论其核心信仰是否真实或存在任何价值。极端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文化基因杀害其传播者，或者将人们的精力从抚育孩子转移到传播文化基因上，比如为自己的信仰而死的殉道者或禁欲的教士。传统的宗教主要通过垂直传播（父母传给子女）得以保存。文化基因的理论应该可以让我们预言它们如何应付越来越快的横向传播，以及哪些新兴的宗教与邪教有可能保存下去。

自我也能成为一个文化群，即一群共同繁殖的文化基因，它们在每次使用“我”字时都得到加强。诸如“我想……”、“我相信……”、“我知道……”之类的短语都会产生这个错误的观点，即持续的内在自我拥有意识体验。实际上，只是被复制的字句和互相竞争的文化基因使我们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被迷惑的文化基因的机器。

意识的未来

我们遇到的困惑是如此复杂和严峻，我认为它可能揭示了思考意识的一般方式中存在的根本缺陷。也许我们需要抛弃最基本的假设从头再来。

有两个几乎人人皆知的最基本假设：一是体验发生在人身上，没有体验者就不可能有体验。这并不意味着需要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我，但它确实意味着知道自己在读这本书的“你”和昨晚入睡并在今早醒来的“你”是同一个人。这一点必须被抛弃。

第二个假设是体验像一股思想、情感、图像和感知流一样流经有意识的头脑。流可能会暂停、改变方向或中断，但在心灵剧院里它仍是一系列意识活动。如果你问“吉姆现在的意识中有什么？”，这里的底线是一定得有一个正确答案，因为吉姆的部分思想和感知在意识流中，而其余的则不在。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被抛弃。

所以我们从一个新的起点重新开始。这次的起点已大不相同。我们从这个最简单可行的观察开始，即每当我问自己“我现在有意识吗？”，答案永远是“是的”。

但其他时候是怎样的呢？有趣的是，我们无法知道。每次问这个问题，我们都得到肯定的答案，但我们无法确定不问这个问题时会是什么情形。这让我们回想起变化盲或视觉的“大幻觉”理论。但对视觉而言，你可以重复看，每次你都会看到一个丰富的视觉世界。于是你以为它总是在那里。你可以试图瞥一眼某个东西，但永远无法知道没看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这就像试图很快打开冰箱看里面的灯是否一直都亮着一样：你永远赶不上灯灭的时候。

图25　当你没问“我现在有意识吗？”这个问题时会有什么样的体验？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就像试图迅速打开冰箱门看里面的灯是否一直亮着一样。

意识的大幻觉理论由此而来。我们人类很聪明，能说话，会思维，能够问自己“我现在有意识吗？”这样的问题。接下来，因为得到的回答总是肯定的，我们就立刻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即认为我们总是有意识的。其余的观点也由此产生。我们认为在生活中每一个清醒的时刻我们都必须意识到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因为无论何时我们问自

己那个问题，都发现这确实是事实。所以我们发明了与这一结论相符的比喻，如剧院、探照灯和意识流。但我们错了，彻底错了。

事实是，当我们没有问这个问题时，没有任何意识的内容，也没有任何人能体验到意识。相反，大脑不断运行，并行执行多个过程——正如丹尼特的多重草图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这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在意识之内或者意识以外的。事实上，大脑活动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整个观点都可以被抛弃，两者之间的“神奇差异”这个问题也可一并抛弃。

于是乎，意识是一个大幻觉。这个幻觉是通过问“我现在有意识吗？”或“我现在意识到什么？”这样的问题而产生的。在提问的那一刻，答案被编造出来：现在、意识流以及观察它发生的自我，一并产生出来，而在下一刻，这一切又都消失殆尽。下次你再问的时候，凭着记忆，一个新的自我和新的世界被编造出来。如果你到现在还相信你一直都是有意识的，并继续创造流和剧院之类的比喻，那么你只会在困惑中越陷越深。

用这种崭新的方式来思考意识，大部分老问题都会不复存在。我们不需要解释意识如何从大脑的客观活动中产生或出现，因为它没有。我们不必解释有意识的大脑活动和无意识的大脑活动之间的神奇差异，因为它们并没有任何差别。我们不必为主观体验如何进化而来或者它是否有功能之类的问题感到好奇，因为原本就没有体验流，只有造成错觉的稍纵即逝的事件。

根据这个观点，只有能够被如此蒙骗的造物才可能像人类这样拥有意识。这可能意味着人类是独特的，或几乎是独特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语言、心理理论、自我概念以及其他有助于创造错觉的因素。其他动物过自己的生活，其间不断创造瞬时的知觉世界——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认为是在创造体验，但这种体验不同于发生在人身上的体验流。它们永远不会问让自己陷入困惑的难题。

那么，成为这些动物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呢？也许有点类似稍纵即逝的构建；或像鸟飞回到栖息处时向后飞逝的丛林；或像骏马驰骋或兔子逃难时肌肉伸展带来的疼痛；或像声呐指导蝙蝠飞行时昆虫身上

所体验到的迫近感。但除了说与我们绝大多数时间的体验有点相似以外，“成为蝙蝠会有什么体验？”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的答案。只有当我们问这个问题时，这个问题才会有一个答案。

电脑可能有意识吗？这又是一个棘手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很复杂。有人认为只有生物体才有意识，但其他人认为这个问题只关乎电脑所执行的功能，而非它由什么构造。根据意识的幻觉理论，答案很简单。如果任何机器有语言，或文化基因，或能问出“我现在有意识吗？”这个问题，并且能够编造有关内在自我与自身精神的理论，那它就可能像我们一样被迷惑，并以同样迷惑的方式认为那是意识。否则，它会像非人类的动物一样，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建构临时的感知世界，但从未想过自己在经历它们。

采取这种新的研究角度，还存在一个大问题，就是质问的本质是什么。一个造物，或者为这个问题而设计出来的机器能够问自己问题，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探讨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研究当一个人这样深深地质疑时，他的大脑里发生着什么。大脑活动的流动模式是否会以某种方式汇到一起？可能会出现特殊的模式和连接吗？使用类似于大脑神经机制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我们或许可能找到答案。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人类是否能完全抛弃幻觉，并且还能够体验世界。那些练习某种形式的冥想或静观的人声称可以做到。他们说那个平常的世界已经瓦解，存在的只有体验而没有体验者。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的大脑活动模式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能够找到答案，我们或许能更进一步理解幻觉是如何产生的。虽然我们并不能保证这一定是一个更简单的方法，甚至也不能保证它是否可行，但它肯定不同于现在的方法。

参加这种研究的受试者要求必须拥有高度熟练的技术。有一种可行的技术是禅宗的冥想，它使用叫做“公案”的特殊故事或问题，还利用相关的下列问题：“我是谁？”、“现在是何时？”以及“这是什么？”。照这种方法练习能一直保持一种质疑的心境，并不断探寻。还有的人修炼静观，他们无论是否在冥思，都试图保持警觉，并完全敞开地呈现在当前时刻。经过长期修炼，这种看似简单的技术能够产

生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种现象不断出现又消失，但没有任何时间或空间的感觉，也没有人在体验它们。

通过这种方式探索意识，科学家可以对练习者进行研究，但可想而知的是，同一人既可以修炼也可以做研究。事实上，已有一些科学家采用这样的方法修炼，也有一些修炼者研究科学。这给我们带来希望，即科学与个人修炼最终可能走到一起，以便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抛掉错觉，深刻洞察自我和他人的幻觉，把我们留在单一的世界中——没有二元性，也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注释

〔1〕 文化基因，理查德·道金斯用meme（米姆）来表述这个新的复制基因。meme这个希腊词词根，听上去有点儿像gene（基因）。在道金斯看来，我们可以遗传给后代的东西有两种：基因和米姆。gene是生理基因，meme是文化基因。

什么是意识？意识有什么作用？物质的大脑怎么会产生对世界的主观体验？意识本身会不会只是一个幻觉？

本书作者根据当前心理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发现，运用简明的图示、生动的漫画和大量有趣的实验深入探讨了意识的特征及其核心理论，并详细剖析了各种理论所面临的问题，为我们重新认识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填补客观物质世界和个体精神体验之间的鸿沟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百科通识文库

49

浅论精神病学

汤姆·伯恩斯 著

田成华 李会谭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百科通识
文库
49

浅论精神病学

汤姆·伯恩斯 著
田成华 李会谱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32**

Psychiatr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6.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6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Tom Burns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浅论精神病学 / （英）伯恩斯（Burns, T.）著；田成华，李会谱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25-7

Ⅰ．①浅… Ⅱ．①伯… ②田… ③李… Ⅲ．①精神病学 Ⅳ．①R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73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徐　宁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25-7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作者简介

汤姆·伯恩斯，牛津大学社会精神病学教授，英国国家医疗服务执业的精神科顾问医师。他的著作包括《精神卫生的主动式外展服务：从业者手册》（2002，合著）和《社区精神卫生队伍：现行方法导论》（2004），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曾作为精神病学顾问为议会委员会审查《英国精神卫生法案》，并于2006年因在精神卫生方面的贡献获得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译者简介

田成华，1996年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博士毕业，2003-2004年于美国哈佛医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学。曾在沈阳军区当军医，军龄18年。2000年转业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并担任过《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编辑部主任。现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特诊科主任，兼任北京和睦家医院精神科顾问。

李会谱，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七年制，获临床医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精神卫生相关工作，曾在2008年于北京举行的世界心理治疗大会上担任同声传译。业余喜欢阅读、写作、运动和自然，精神性上接受儒道释和《圣经》影响。

目　录

图目
前言
第一章　精神病学是什么？
第二章　收容院和精神病学的起源
第三章　走进社区
第四章　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
第五章　内外夹击下的精神病学
第六章　肆意滥用
第七章　进入21世纪
返回总目录

图　目

图1　“愚人塔”，毗邻欧洲第一家现代综合医院——维也纳综合医院，1787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建造
图2　位于米利奇维尔的佐治亚州立疗养院：美国最大的州立精神病院。1950年顶峰时收治了1万多名病人
图3　埃米尔·克雷佩林（1856—1926）：他区分了早发性痴呆（后称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并为精神障碍的合理分类奠定了基础
图4　尤金·布洛伊勒（1857—1939）：1911年首次使用了“精神分裂症”这一术语
图5　弗洛伊德（1856—1939）：精神分析之父
图6　“袋子女士”：几乎没有财物、无家可归、患精神疾病的妇女——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地城市中日益常见的景象，往往被归罪于迅速关闭精神病院的行动
图7　《飞越疯人院》：米洛斯·福尔曼1975年拍摄的这部电影描写了一家压抑的精神病院，杰克·尼克尔森扮演反叛的兰德尔·麦克默菲
图8　1910年前后弗洛伊德位于维也纳的咨询室，内有他的著名长椅。房间内布满了弗洛伊德着迷于古埃及和神话学的证据
图9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法国哲学家，他批评精神病学作为一种阻抑性社会力量将权力滥用合法化
图10　R. D. 兰恩（1927—1989）：20世纪60和70年代反精神病学运动家中最具影响力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图11　东京一精神病学系的废墟——学生们在听了1969年R. D. 兰恩的讲座之后跑去烧毁了它
图12　旋转椅：旨在耗尽其体力来使过分激动的病人“恢复平静”的众

多发明装置之一

图13　锁在贝德兰姆疯人院的威廉·诺里斯，1814年

图14　磁共振成像扫描仪：对大脑结构首次真正的细节造影

图15　单次磁共振扫描的一系列脑部图片。每一幅图片都是大脑结构的一个“切片”，并可由此构筑三维图像

前言

当前倾向于强调精神病学“只是另一个医学分支”，就像心脏病学或肿瘤学一样。这样做一方面是通过强调精神病学的科学性，以及它致力于精确诊断和循证治疗的决心，来努力使精神病学获得与之身份相称的声望，提升这个专业在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少一直以来伴随精神疾病的歧视。强调精神疾病和其他任何疾病并无二致（“精神疾病是大脑疾病”），会减轻患者体验到的偏见，以及很多病人和家庭感受到的责任和羞耻。如果家里有人患了关节炎，我们不会感到羞耻或自责，那为什么他们患了抑郁症，我们就会有这种感受呢？鉴于这种不必要的额外痛苦，强调精神病学作为医学的合法性是相当正确的。

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精神病学是 不同的。甚至我们这些在精神病学领域工作的人也受到不同的对待。人们常常半开玩笑地问我，我们是不是因为古怪才成为精神科医生，或因为成了精神科医生才变得如此古怪。《纽约客》杂志将自己的漫画辑录成册时，由于有关精神科医生的内容总是如此之多，以至于需要定期出专辑。

精神病学还会激起恐惧。毕竟这是唯一可以进行强制治疗的医学分支。所有发达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既要保护精神病人不受惩罚，又要强制他们接受治疗。对于精神疾病，虽然没有简单、客观的定义（随着全书的展开，大家将会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对于其现实性和重要性，人们似乎有明显的共识。

对精神病学的着迷超越了想要了解身体或心智如何运作的天生好奇心。精神分析师提出，这种着迷（常混有恐惧）是因为精神疾病演出了我们内心的戏剧。我们看到自己正在抗争和控制的抑郁呈现在眼前，又或者，当我们可能害怕或是暗自希望摆脱束缚、释放抑制时，看到的是失控的个体。

这一观点肯定有其正确性。正如我在第一章中将会探讨的，精神病学所应对的疾病是基于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的体验和情感作出诊断的。但是这些疾病同时也显露出一种“不同”。我们会发现自己认同这些描述，但也知道有个重要的界限被越过了。精神病学在科学上的日

益精细化，已使诊断的一致性有了巨大进展，从而令这一界限愈见清晰。然而，第六章会对这种增加的确定性提出质疑，认为它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

精神病学和所有医学一样，是一种务实的、解决问题的活动。它会使用科学理论，但并非源于科学理论，或受限于科学理论。与心理学或物理学不同，精神病学不能通过理论“自上而下”地作出解释。精神病学由它需要（而且同意）治疗的疾病塑造成形，又经过当时的治疗方法进一步打造。因此，第一章描述了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还有这些疾病及其治疗如何塑造了这个专业的雏形。精神病学的发展依赖于所在社会的价值观和结构。如果不了解第二章和第三章涉及的一些历史的话，几乎不可能理解当前的实践。同样的，现在相对被忽略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的贡献将在第四章中阐述。

自从精神病学作为一个专业甫一诞生，在它的外围和内部就争议不断；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的正是这样一些争议。对本书一个公正的批评是，它花了更多的篇幅去讨论争议而非不可否认的进步。我本来可以更多地介绍精神病学在新药、心理治疗和可行实践上的进步，这些进步对人类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有谁想要了解这些情况的话，在其他地方会很容易找到这些信息（网上的这类信息越来越多）。对于精神病学已有和正在发生的进步，我不想表示任何怀疑。精神病学和神经科学正在大步前进。

我用这么多篇幅讨论精神病学的各种争议有两个原因。首先，精神和躯体疾病有真实的哲学和伦理差异，这些差异并不会因为我们想让它们消失就消失。技术进步也无法抹去这些矛盾；相反，正如第六章所探讨的，更有效的治疗可能使问题更加尖锐。随着治疗精神的方法越来越复杂、强大，21世纪的精神病学可能在伦理和社会问题上面临尤为紧迫的挑战。其次，精神病学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所在时代的许多重大问题——哲学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都不得不在真实的人类关系和痛苦中经受锤炼。在法庭上激烈的精神错乱辩护中，在针对病态人格患者管理的决策中，有关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哲学思辨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人们围绕权力和社会控制问题展开的政治

活动曾经促成了收容院的拆除，现在又成为强制治疗辩论的框架。心智-大脑二元论一直都在精神病学中徘徊不去。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精神病学运动家不断发动攻击（第五章），提出了个体异于他人的权利（实际上，他们会说这是存在的义务 ）。

所以，欢迎来到一个既神秘又激动人心的医学领域，在这里，脑科学的进步不断迎头撞上人类混乱的现实。欢迎来到这样一种活动，即虽然有各种扫描仪和策划药，它仍然基于建立信任的人际关系。欢迎来到这样一种追求，它不断挑战我们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不断提醒我们未解决的哲学问题（自由意志、心智-大脑二元论、个人自主和社会义务的矛盾），而我们通常为了生活将这些哲学问题抛在脑后。

第一章

精神病学是什么？

唯一正常的人，是你不太了解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认识一些出现心理问题（焦虑、抑郁或精神错乱）的人。我们大多数人自己有时候也有过那种感觉（青春期往往是一段容易怀疑自己和郁郁不乐的特定时期）。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会难以抗拒、难以预料、不可控制，我们的想法也变得稀奇古怪。

出现这种情况是否意味着我们得了精神疾病，或者需要看精神科医生呢？幸好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答案是否定的。然而，在阅读有关精神病学的知识时，我们会发现其中描述的体验与上述情形惊人地相似。精神病学之所以令人着迷，是因为它涉及意识、选择、动机、自由意志、人际关系——实际上使我们之所以为人的一切事物。虽然精神病学往往掩藏于令人望而生畏的术语中（用“情感”代替情绪，用“焦虑”代替担忧，用“恐怖”代替害怕，用“认知”代替想法），但是它所描述的情况还是很容易识别的。

精神病学中有一些由来已久的矛盾之处，上述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点将在本书中反复出现，这就是：其主题既牢牢扎根于常见的人类体验中，又多少“有那么点不同”。从病人的描述中，我们会发现自己有过类似的体验。我们对这些体验非常熟悉，然而这些熟悉的体验却被用来对我们非常陌生的疾病作出诊断。但愿你看完本书以后，对于这种困境会有更多的理解，但是我不能保证给你满意的答案。从精神病学诞生之日起，人们就一直在争论这一现象，而且这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然而，也许最好的方法是从定义精神病学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开始，然后再考虑有关精神病学的哲学和政治争议。

所有的“心理”或“精神”：心理学、心理治疗、精神分析、精神病学

psyche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心理”或“精神”。上述四个术语描述的是了解或帮助有心理和情绪（精神）问题的个体的不同途径。它们相互之间多有重叠；有时候，同一个资深学者所做的工作可以用其中几个术语进行描述，难怪人们将这些术语弄混。但是，这几个术语是不同的，弄清楚其差别将有助于阐明精神病学是什么。

心理学

心理学是关于人类思维和行为的学科。一个世纪之前，它起源于内省哲学的传统（通过了解我们自己的心智来尝试了解他人的心智），现在则已经是一门稳固的科学。它还是一门大学课程。心理学研究和了解心理过程的各个层面，拥有许多分支。实验心理学家 通过实验来探索心理功能（知觉、记忆、唤醒、冒险等）的基础。实际上，实验心理学家并不局限于专门研究人类，他们也研究动物心理本身，或将其作为了解人类行为的模型。实验心理学一般被认为是“硬科学”，它遵循的是与物理或化学研究相同的科学准则。

有几种职业衍生于心理学（如教育心理学家、工业心理学家、司法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学家 受过变态心理学方面的研究生教育，并且利用这方面的知识帮助人们解决存在的问题。这种方法最明显的早期例子，是在行为治疗中应用到学习理论（即通过持续的奖励与惩罚来塑造行为）。在帮助心理失调或有学习困难的儿童改变其行为方面，行为治疗尤为有效。它不需要病人详细了解自己的问题就可以发挥作用。当然，现代心理治疗已经高级得多了，目前最成功、最广泛使用的心理治疗方法之一（认知行为治疗）就是由临床心理学家开发的，而且也主要由他们来应用。临床心理学家是所有现代精神卫生（“精神病学”）服务机构必不可少的成员。

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是19世纪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维也纳创立的治疗神经症的方法。在精神分析中，分析师鼓励病人放松，并说出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件事（“自由联想”）；病人还被要求留意自己的梦及思维的非理智方面。弗洛伊德认为，病人感到痛苦的原因，是他们试图将自己无法接受的思维和情感保持在无意识状态（即

潜抑它们），这种做法导致其出现神经症的症状。分析师仔细倾听病人的讲述，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些“冲突”的模式和线索。通过与病人分享这些认识（顿悟），可以帮助病人面对和解决这些冲突。精神分析花费精力较大，时间很长，病人通常每天需要就诊1个小时，每周5天，持续数年。病人躺在长榻上、大胡子精神科医生坐在长榻后面的漫画形象，就来源于精神分析。

虽然弗洛伊德是医生，但是精神分析师并不要求接受过医学训练。在美国（那里的精神分析一直极有影响），分析师通常也是精神科医生，但是这种情况日益减少。即使接受过医学训练，分析师也极少使用其医学知识，他们推崇除却分析之外不加“干涉”的原则。精神分析有几个学派，是由弗洛伊德的弟子（如荣格［Jung］、阿德勒［Adler］、克莱恩［Klein］）创立的，其中一些学派已经远离了其原型（如瑞克［Reich］、拉康［Lacan］）。在精神病学之外，精神分析也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弗洛伊德式的”、“弗洛伊德式口误”等术语已经成为了日常语言的一部分。然而，因为精神分析缺乏确凿的科学证据来证明其疗效，它在现代精神病学实践中日益远离主流。

心理治疗

人们很快发现，精神分析的内容并不仅限于最初弗洛伊德对无意识进行的疏离而中性的探索。在这种密集的治疗中建立的关系本身也有影响作用。分析师开始对这些关系加以探索，并采用更积极的方法和不同类型的治疗（限时治疗、结构化更强的治疗、集体治疗和家庭治疗等）进行实验。人们笼统地把这些心理方法——通过谈话积极地利用人际关系，提升自我意识和促使改变——理解为是“心理治疗”。早期的心理治疗大多明显依赖于弗洛伊德理论（常称为“精神动力治疗”，以此强调思维和情感的动态影响），但是几个较新的流派并非如此。这些流派（如非指导性咨询、存在主义治疗、相互作用分析、认知分析治疗和认知行为治疗）以一系列广泛的理论为其基础。

心理治疗的共同之处是，在正式且安全的关系中，运用沟通手段探索困境，并设法适应或者克服这些困境。大多数精神动力治疗还要

求治疗师本人也接受治疗，将其作为培训的一部分（这一点与精神分析类似）。精神分析一直控制得非常严，它严格规定什么人可以成为精神分析师，心理治疗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一些心理治疗学派对于资格认定很严格，但是直到不久之前，“心理治疗师”的头衔还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大多数心理治疗师并不是精神科医生，但是大多数精神科医生都接受过一些心理治疗训练，具有这方面的一些技能。一些精神科医生甚至主要作为心理治疗师开展工作。我们在第四章中将就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展开详细的讨论。

什么是精神病学？

那么，如果精神病学不是心理学、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它究竟是什么呢？它与其他“心理”或“精神”存在重叠，但是也有根本性的区别。首先，精神病学是一个医学 分支——若想成为精神科医生，首先要有医师资格。获得医师资格后，未来的精神科医生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接受进一步训练。他们处理和学习精神疾病的方式，与皮肤科医生通过治疗皮肤病患者，或者产科医生通过接生得到训练完全一样。在医学范畴内，精神病学被简单地定义为治疗“精神疾病”（现在常称为“精神障碍”）的分支。

医学从根本上说属于实用主义的学科。它虽然主要依赖于基础生物科学及科学方法，但是治疗正确与否的最终检验标准在于病人是否好转。我们不必 知道治疗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因此，精神病学的定义不像心理学或精神分析那样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把什么当成精神疾病（这已经随着时间而发生了改变），对于这些疾病能够进行什么治疗，将决定着精神科医生是什么和做什么。

什么是精神疾病？

有关这个问题，存在一个明显的循环定义（“精神科医生是诊断和治疗精神障碍的人”，“精神障碍是由精神科医生诊断和治疗的疾

病”）。关于精神疾病诊断的可靠性，甚至精神疾病是否存在，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第五章）。精神疾病的诊断为什么如此有争议，这值得花些时间进行探讨，因为这个问题反复出现，而且对于整个医学领域来说也是个基本问题（尽管极少如此地突出）。

诊断的主观性

精神科医生的职业标志是精神检查。我们通过与病人面对面的讨论作出诊断（而且还同时进行许多治疗）。我们详细地了解病史（与所有医生一样），但是接下来，我们不做体格检查（触摸腹部、测量脉搏、用听诊器听诊），而是进行所谓的“精神状态检查”，或者在做完体格检查之后，再进行精神检查。在精神检查过程中，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病人烦恼的事情、他们的心境以及思维方式等。这一检查有时只是记录病人的描述（他们听见奇怪的声音，或者每次一想到要出门就感到恐慌），但是有时则需要我们采用“定向移情”来理解病人的体验。定向移情指主动将我们自己放在对方的位置，“穿上对方的鞋子”，了解他们的感受和想法，即使他们难以将这些感受和想法表达出来。例如，一个病人描述陌生人和朋友都对他作出过一系列恶意行为，我们据此得出的结论是，病人实际上过于多疑（偏执），导致对普通事件的错误解释。

拼凑出他人的体验及当前感受的能力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能力。了解他人如何从他们自身的角度看待世界（常称作拥有一套“心理理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缺乏这种能力属于严重的缺陷，如自闭症或阿斯波哥尔综合征。精神科医生对这种技能进行培养，再加上日益熟悉此类病症，就可以主动地使用这种技能来理解病人描述的令其烦恼也让他人困惑的体验。

根据病人精神状态作出的诊断不包含实体证据——没有血液化验，也没有X光片。书面记录下来的病人的话，或对其行为的详细描述（如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只是该过程的一部分。精神疾病诊断取决于对某人为什么 做某事作出的判断，而不只是观察他们在做些什么。也正因此才有了精神疾病诊断不科学、不“客观”的批评。以一个严重抑郁的老人为例，他有可能不会诉说自己感到抑郁，而是主诉自己

疲倦、身上疼痛、睡眠不好和感到内疚。病情加重时，他可能整天躺着不动，甚至一句话不说。精神科医生也许会将其不动解释为抑郁症的特征。在作这种解释时（通常还有其他线索的支持），医生假定不动现象是失望和绝望的结果。对于不动现象（或者最严重时的“木僵”），有许多其他可能的原因；精神科医生通过构造病人精神状态的整体情况，即为什么 他不动或不说话，将抑郁性木僵与激素或神经问题造成的木僵区别开来。

对范围进行分类

人类的差异性是我们所珍惜的。若世界上每个人的人格都相同，没有敏感的人，没有喜怒无常的人，没有勇敢而莽撞的人，等等，这个世界将是可憎的。与此类似，没有情绪变化的生活将是无法忍受的。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服用一种名为“唆麻”的药物而永远保持满足）描绘的是噩梦般的景象，而不是乌托邦。正常强度的悲伤（如失去亲人时）或害怕（如处在失火的建筑里）都可以在精神疾病中找到相应的表现。在正常与异常之间没有一刀切的分界线，没有绝对的差别——这不是单纯的程度问题。甚至旁边没人时听见说话声音（幻听）也可以在“正常人”中发生。在荷兰的研究发现，相当数量的健康人经常“听见说话声音”；丧偶者经常很清楚地听见已故配偶的说话声音（而且往往发现这种声音让自己感到欣慰）。那么，精神科医生怎么能声称幻觉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呢？

重性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DSM IV*）

在同一次历时两周的时间内，存在下述5项（或更多），且与既往活动相比发生了变化；这些症状中至少有一项是（1）心境低落或（2）丧失兴趣或快乐。

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感觉心境低落（如感觉忧愁或空虚），或他人观察到如此（如看起来泪汪汪的）。

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里参加所有或几乎所有活动的兴趣或快乐都显著减低（主观叙述或他人观察）。

明显体重减轻或增加（一个月内变化5%以上），或者几乎每天食欲减退或增强。

几乎每天失眠或嗜睡。

几乎每天躁动或迟缓（他人可以观察到）。

几乎每天疲倦或精力减退。

几乎每天感觉无价值，或者过度或不相称的内疚。

几乎每天思考或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减退，或犹豫不决。

反复想到死亡，反复出现自杀意念。

这些症状不符合混合性发作的标准。

这些症状导致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者社交或职业活动受到损害。

这些症状不是药物滥用、治疗用药或一般躯体疾病造成的。

这些症状用离丧解释不了。

* DSM IV = 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的《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这是全世界通用的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的编纂。“统计”指使用这些类别来记录诊断和治疗。

医疗实践包含了模式识别。大多数病症具有一套该病特有的症状和体征。作出诊断不必所有症状和体征都有，尽管都有的话显然更容易诊断。若一些症状非常突出，则几乎不必证实其他症状是否存在；但若所有症状都不显著，我们就会尽力构造出整体情况。症状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也很重要（焦虑持续的时间长短，幻听持久性和破坏性如何，等等）。作出的判断必须考虑到文化的差异。北欧人通常远远不像南欧人那样情绪外露，因此痛苦表现到什么程度才令人担心就存在着不同，如在芬兰人和意大利人之间。

在传统上，医学训练要求尽可能多看病人，以便了解这些模式的正常表达范围。新近的诊断系统则已经更为格式化，往往要求绝对具

备一些特征，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特征，正如抑郁症的现代诊断标准所示。这样当然使一致性得到改善，但诊断过程依然是相同的。在这个例子中，“情绪低落”被视为是/否、有/无的性质，而众所周知心境在不同的人之间，以及在一段时间内，是不断变化的。精神科诊断要求将实际上具有范围 的事物（一点、有些、稍多、很多、过多）归入类别（是/否，有/无）。

这在精神科中是很明显的，但是无疑并非它所特有。我们对疾病的常见观点通常建立于感染性疾病或外伤之上——你要么受到感染要么没有，要么腿断了要么腿没断。没有模糊不清，也不需要意见一致或达成共识。但是，很少有几种疾病是这么简单的。甚至感染这个例子也没有那么简单——你会在许多完全健康的人身上发现可导致肺炎的细菌。作出肺炎诊断并非只是找到这种细菌就行了，而是要在存在发热和咳嗽的同时又发现细菌才可以。甚至客观的、可以证实的数据也并非总是能够解决问题。什么是“病理性的”，这会因有关疾病的知识和能够采用的治疗方法而改变。治疗方法的进步导致我们降低了诊断抑郁症的门槛，与此类似，一些明确的、可以测量的疾病，如糖尿病和高血压，也不断地被重新定义。

因此，精神病学不适合于无决断力者或一味讲求理智的人。在所有医学分支中，精神病学最清楚地揭露出作出诊断背后的过程。这里使用的语言是耐人寻味的——医生“作出”诊断，他们将自己的模式加于其上，而不是单纯地发现这些模式。精神病学也是最明确地承认社会因素影响其实践的医学分支。精神科医生使用的病症定义及其在个体身上的表现均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例如，现代社会将战争中的战场应激或炮弹休克作为一种精神障碍加以识别和治疗，而一个世纪之前，我们是将其作为胆怯进行惩罚的。21世纪初的青年人在为自身问题而求助时，使用的方式与其坚忍的祖辈完全不同。这并不会使得精神病学特别不科学或不可靠（精神科诊断与整个医学的诊断差不多同样可靠）。然而，精神病学提醒我们，和医学一样，（撇开目前有些一厢情愿的想法不谈，）它仍然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科学，仍然既借助于社会科学又借助于自然科学。

精神病学的范围——精神病、神经症和人格问题

精神科医生处理的问题范围十分广泛。最严重的病症通常被称为“功能性”（或非器质性）精神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现在通常被称为双相型障碍）。器质性和非器质性的区分相当混乱，但是仍然有用。虽然我们越来越相信大多数精神疾病都会发生器质性（通常为大脑）变化，但是我们将“器质性”的称谓专门保留给因另外一种通常很明显的疾病引起的精神病。这包括了各种引起意识错乱和精神紊乱的原因，例如外伤、慢性中毒和痴呆，以及各种较短期存在的躯体原因，例如严重感染、激素失调等。功能性精神病则是老旧的术语“疯狂”所描述的那类疾病。患有功能性精神病的人被说成是已经“失去理智”。大体上，接近3%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一阶段会患上功能性精神病。因此，虽然这些疾病不太常见，但也不是那么罕见——就中等规模的中学班级而言，每班大约有一个人会在成年期患上精神病。

精神病的决定性特征是对奇异体验的个人起源丧失自知力。病人没有能力进行“现实检验”——将自己可怕或忧郁的想法和感受与外部现实进行对照并作出判断。他不会认为“我什么事都责备自己，看不到前途，因为我情绪沮丧。”相反，他认为“我情绪沮丧是对我做过的事情的惩罚，我没有将来。”他可能极力否认自己病了，不接受周围人为消除这些误解而做出的努力。如此固执于内心体验，无法因相反的证据而对其作出改变，这常常被称为“失去了与现实的接触”。他否认自己有病，看不出家人或精神卫生人员想帮助他。精神病会是伴有高度焦虑和痛苦的可怕体验。前述两种主要精神病清晰地勾勒出精神病学的发展，因此现在值得我们花一些时间来详细了解它们。

精神分裂症

在所有精神疾病中，精神分裂症可能是最严重的。这种病指的不是分裂人格——《化身博士》中的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并不是精神分裂症的案例。1911年，瑞士医生尤金·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首先提出了这个名称，用于强调精神功能的瓦解（“分裂”）。该病累

及全球人口的近1%，通常起病于成年早期（20多岁），但是最早可以在青春期发病。虽然男女患该病的人数相当，但是男性往往起病较早，后果也较严重。其突出特征是幻觉、妄想、思维障碍、社交退缩和自我忽视。

幻觉 是“没有刺激的感觉体验”。最为常见的是幻听——病人听见与自己讲话或谈论自己的声音。幻视也并不罕见（但是极少像幻听那样完整和持久）；许多病人还会有体内发生变化的奇异身体感觉。幻觉不是单纯地把我们的思想想象成脑子里的一种声音——我们大多数人都这么做。对幻觉的体验强度等同于对外界事件的体验，并且是在大白天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发生的；幻觉没有“好像”的性质，病人认为这些感觉完全是真实的。

妄想 是“与病人所处文化不一致的、稳定而牢固的错误观念”。与识别幻觉相比，确定某事为妄想需要更多地了解背景。妄想引人注目之处是其被坚持的强度 ，以及面对合理论辩或相反证据时不受影响的强度 。病人对妄想的真实性或重要性都丝毫没有怀疑。

当今世界是个明显地存在多元文化混合的世界，对于任何特定个体，其观念是否确实那么古怪往往必须作出判断。例如，两个差异明显的病人向我描述，她们坚信有看不见的力场穿过其卧室并影响她们。第一个是年轻的“新世纪”女性，痴迷于雷线 [1] 、德鲁伊特文化和神秘主义。此人没有病。第二个是退休女教师，她坚信该力场有电学性质，从邻居家发出，说明邻居想在性生活上影响自己。这后一例是晚发精神分裂症的经典妄想，病人为此拉出房子中的电线来查找其源头。在精神分裂症中，妄想通常有迫害性质（“偏执”），迫害的来源（如警察、共产党人、魔鬼、共济会会员）则因时间和地点而异。

思维障碍 往往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最具特征性的症状。精神分裂症与其他精神障碍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其思维内容 不同寻常（由于它受到幻觉和妄想的影响，所以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而且其逻辑和语法形式 也出现紊乱。发生思维障碍时，尽管病人的单个词语都可以理解，但有时却完全不能明白他们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在最极端的病例中，病人的谈话内容中夹杂许多自己创造的词语和混乱的句子，

完全无法让人理解。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病人的句子似乎有逻辑性，但是不知走向哪里，或者无法回忆起。对于可以回忆起的部分，即使重复和探讨之，也还是无法理解。

显然，在诊断思维障碍之前必须慎重，要确定这不是因为病人比你聪明或知道的比你更多（这两种情形总是有可能的）。然而，康复了的病人常告诉我们，当时他们感觉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思维。他们可能体验到有思维直接插入或撤出大脑，或突然意识到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事物之间的新联系。这种对独特的新意义 的意识罕见于其他病症，可导致不同的、令人困惑的用词。例如，一个病人刚刚“意识到”绿色“意思是亲密”（不是暗示亲密或与亲密有关，而是“意思是”亲密），并用他自己所理解的这个意思来造句；他坚信我们也能理解这个句子。

退缩 和自我忽视 或许是精神分裂症最令人苦恼和最具致残性的特征。首先使用精神分裂症这个术语的布洛伊勒认为，从与他人的交往中退缩是该病的核心，并用“内向性”来描述之。虽然布洛伊勒最早使用了精神分裂症这个术语，但他并不是识别出这一病症的第一人。克雷佩林（Kraepelin）于1896年即识别了精神分裂症，但是他将其称为“早发性痴呆”，依据是该病随时间逐渐恶化（他认为这个过程是必然的）。这两位早期研究者都认为，我们现在所谓的“阳性症状”（幻觉、妄想、思维障碍）继发于退缩和内向化这一核心过程——也就是所谓的“阴性症状”。

过去半个世纪里，随着抗精神病药（针对阳性症状）的发展，我们已经倾向于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即假定阴性症状是阳性症状的后果。每次急性发作过后，病人不能完全康复，而是更为退缩一点，对他们自己或周围世界的兴趣更少一点。然而，我们关注的焦点正逐渐回到阴性症状上来，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目前的药物治疗对阴性症状的效果要差得多。

克雷佩林对精神分裂症非常悲观，认为实际上没有病人能真正好转，布洛伊勒则更为乐观一些——两人当中，后者距离事实更近。这是一种波动性疾病，大部分病人会有数次发作。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恢

复得较好，仅发作一到两次。然而，大部分人有数次发作，每次发作后好转过程都较前一次更为缓慢，并且很少能够百分之百回到病前状态。一小部分人结局很差，成年期的大部分时间处于该病所致的功能残疾状态，不能独立生活。现代治疗，尤其是抗精神病药的采用，意味着大部分病人只需在复发时住院数周或数月，而不像战前那样在精神病院一住就是数年。精神分裂症有家族聚集性，对遗传因素在该病中的作用不再存有争议（参见第五章）。

躁狂抑郁症（双相型障碍）

现代精神病学的知识结构归功于克雷佩林对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的区分。躁狂抑郁症现在更名为双相型障碍，在后文中我们将使用这一术语。在克雷佩林的时代，精神病院来者不拒；有些病人好转了，但是大部分病人都没有好转。那时除了对学习障碍和精神病加以区分外，对诊断并不太关注。克雷佩林注意到有一组病人在数次严重的紊乱发作中激动和退缩、抑郁交替出现。他们与精神分裂症病人（当时他称之为“早发性痴呆”）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些病人在两次发作之间能够完全恢复，并且他们中有较多的人最后离开了医院。该病的病程 ——而不是症状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见第二章）。

双相型障碍的病人可以 有与精神分裂症相同的全部症状（幻觉、妄想、思维障碍等），虽然这些只是在最严重的躁狂和抑郁发作时才会出现。然而，这些症状伴随着心境的严重紊乱——或者低落或者高涨。这种高涨称为躁狂（或者又常称为轻躁狂）。心境的这种改变在重要性方面超过了该病的所有其他表现。在抑郁期，病人严重抑郁，并可能有自杀倾向。在躁狂期，病人过度活跃，信心和精力爆满。轻躁狂病人可能会对自己具有极大破坏性——他们过度挥霍，行为不受抑制（酗酒、性生活过度活跃且不计后果、超速驾驶等）。他们的精神病性症状反映了心境。若病人抑郁，则幻觉是批评和迫害性的；若情绪高涨，则幻觉是赞美和鼓励性的。抑郁性的妄想通常是自责和自我贬低；轻躁狂性的妄想是膨胀的、夸大的：“我会应邀在外交政策方面为总统提建议”，“我的绘画作品价值数百万元”。

不是很极端的轻躁狂病人可以很有娱乐性，常说话快（“言语迫促”），一语双关，善于发现事物之间幽默的联系（“思维奔逸”）。很多著名演艺人员和艺术家患有双相型障碍，他们承认当自己“情绪高昂”的时候能够获得灵感。对于一些轻度的轻躁狂，确诊可能存在困难，因为往往缺乏精神分裂症发作那样的“古怪性”。心境是否发生了紊乱是个判断问题——毕竟我们都喜欢花钱或希望自己的画作卖出天价。诊断常常需要家人朋友能确认这个人平时不是这样的。一个花枝招展、举止轻佻的电视主管由担忧的母亲带来了诊所。故事本身没什么特别的——与几个同事大搞风流韵事，在夜总会里使用娱乐性药物，数次对老板无礼或缺勤。这样生活的媒体人大有人在。起决定作用的是母亲对她平时情况的描述，她说病人通常是一个过分谨慎、相当焦虑的女性，而现在的这些行为完全不符合她的性格。这位母亲对这个问题产生警觉是因为她已故的丈夫也有过这样的发作。

和精神分裂症一样，人群中双相型障碍的患病率略低于1%，呈家族聚集性，起病于成年早期（虽然常比精神分裂症晚），男女患病率相同。高涨期更有戏剧性，但是抑郁发作更为频繁和持久。双相型障碍的抑郁相与更常见的抑郁症不容易区分。

精神病性障碍的治疗

本书不讲述具体治疗的细节。和所有其他医学分支一样，精神病学的治疗日新月异，任何描述都会很快过时。

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系列药物被开发出来（“抗精神病药”，例如氯丙嗪、氟哌啶醇、利培酮、氯氮平、奥氮平），它们在精神分裂症的急性期发挥了有效作用。与更早的巴比妥类等药物不同，这些药物是安定药，而不是镇静药。它们使病人平静下来，但并不导致病人入睡（病人确实常会感到困倦，但这只是副作用，而不是用药的目的）。抗精神病药彻底改变了急性精神病发作的治疗，使得住院时间更短、更平静。病人病情恢复后继续用药可以降低复发的风险，因此

大多数精神科医生都鼓励精神分裂症病人坚持多年用药（“维持治疗”）。这一点显然并不容易，因为所有药物都有些副作用，而且没人喜欢无休止地用药。然而，很多病人在得到支持的情况下，确实能够成功地坚持用药，由此复发次数大大减少。

双相型障碍病人的严重抑郁发作可以用抗抑郁药进行治疗，而对于一些极端的病例，还可以用电休克治疗。这些我们会在后文讨论。现在还有很多“心境稳定剂”可用于双向障碍的维持治疗，显著降低了复发的风险。药物当然不是治疗精神病性障碍的唯一方法（第三章），但目前它们可以称得上是治疗的基石。

强制治疗

当精神病人感到遭受威胁或迫害时，会试图躲避或自卫，在这种情况下，自知力缺乏可使其面临自伤或伤害他人的切实风险。由于病人对治疗需要的判断力受损，以及精神病状态下切实的风险，精神病学成为了医学中病人拒绝治疗的权利可以被否决的唯一学科。这一点在第二章和第六章中会有更详细的论述。在精神科服务中，强制治疗的规定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其总的原则已被广泛接受。但是其实施条件（谁来实施、是否仅限于住院治疗、是否必须有迫在眉睫的躯体风险等）在不同国家差异很大，反映出地域之间不同的价值观。

对于严重精神异常的病人（“极为疯狂者”，第二章），在有效的治疗问世之前，强制性禁闭的方式逐渐形成。这种现象反映出一种认识，即精神疾病并不仅仅是偏常（“疯狂”不是“坏”）。否则，我们就会任由那些只对自己有危险的人自生自灭，而将那些对他人构成危险的人直接交给法律处置。人们认识到，精神疾病患者是正常的自我发生了改变，他们还可以变回去。禁闭病人起着保护他们的作用，使疾病走完自然病程，直至病人康复（“恢复理智”）。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好转，但相当数量的病人确实好转了，这使我们可以维持希望，并使禁闭背后的人道主义保护冲动合理化。

抑郁症和神经症性障碍

并非所有精神障碍都存在精神病中见到的与现实的分离。事实上，精神科医生看过的大多数病人患的不是精神病，而是破坏性较小的精神障碍。它们中大部分以持续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为特征。这些精神障碍曾经一度堆置在“神经症”的名下，但是这个术语在精神病学中已经不再流行了。然而，神经症这个术语虽然相当模糊，却十分有用，并且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故本书仍然使用它。神经症对当事人来说引起苦恼和痛苦，但对其他人来说可能一点都不明显。神经症在严重程度上差异很大，很多人在应对神经症的同时，能过正常的生活（结婚、工作）。但是对于一部分人，神经症可以像精神病一样致残。

抑郁症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人群中终生患病率约为15%。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世界范围内仅次于心脏病的导致终身残疾的原因。抑郁症似乎越来越常见（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不过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检测手段的进步、公众意识的增强和病人更愿意寻求帮助。有幸的是，随着抗抑郁药和更有效心理治疗（例如认知行为治疗）的发展，抑郁症通常好得很快。大多数病人由家庭医生治疗，只有最严重的病人才转诊给精神科医生。一部分抑郁症病人最终确诊为双相型障碍，但我们在这里将只集中讨论“非精神病性”群体。

抑郁通常被体验为深刻的苦恼，对未来失去希望，并且常伴有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病人往往处于紧张和焦虑的状态，睡眠紊乱，体重下降，无法有效地集中注意力或者正常做事。他们常常落泪和想到自杀，疼痛和对健康的担心也经常出现。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病人报告“没有感觉”（冷漠和空虚的状态，不能享受任何事物）而不是悲伤。病人也可能沉溺于饮酒或吸毒，以此作为自我治疗，结果几乎总是使情况更糟糕。抑郁与一般悲伤的区别在于，抑郁状态持续不缓解，而且体重下降和失眠更是延长了这种状态。

抑郁症在女性中的发病率是男性的3倍。有些人在体质上或气质上得抑郁症的风险更大，但是抑郁症显然受到生活处境的影响。在穷困、失业、独居、朋友极少以及患有痛苦的或致残性的躯体疾病的人

群中，抑郁症要常见得多。早年丧母和童年困苦会使成年期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升高。抑郁症还更容易在发生严重的个人问题（分手、考试未能通过、丢掉工作等）之后发病。

要帮助抑郁症病人，光靠抗抑郁药几乎总是不行的（虽然抗抑郁药很有效）。咨询、帮助寻找出路、实施针对性的心理治疗以及确保支持性的社会网络都是需要的。随着对抑郁症理解的加深，人们认识到社会网络和友谊对我们有多么重要。社会网络和友谊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这些，几乎没有人能生存。为孤单的年轻母亲及其孩子提供社会网络的全国性项目，如美国的Head Start和英国的Sure Start，都包括了抑郁症预防策略。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在一生中数次体验到具有上述所有特征的抑郁阶段。大部分人会很快地自发度过这些阶段。确实，可以把抑郁看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人生过程——一个我们可以正确地处理自己失去的东西、恰当地认识这一损失、找到新的平衡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稍微退缩到自己的世界里是合宜的；一些精神分析师认为，产生抑郁的能力是迈向人格成熟的重要一步。那些似乎从来不抑郁的人反而会让我们觉得不同寻常或古怪。精神科医生多年来致力于明确区别“临床抑郁”和“正常抑郁”，但坦率地说，这种努力失败了。其区别更多的是程度上的，而不是遗传上的或症状模式上的。若抑郁持续不断，或症状变得难以忍受，则需要治疗；若几周后自行好转，那就没问题了。

焦虑

焦虑是拉薄了的恐惧。我们都体验过焦虑，而且焦虑无疑是有益的——一定程度的焦虑使我们保持警觉，有利于更好的行为表现；例如，对不及格的恐惧促使我们为考试埋头苦读。然而，心理学研究发现，随着焦虑水平上升，行为表现只能提高到某一点，而当焦虑超过某一水平以后，行为表现会急骤下降。焦虑障碍或许和抑郁症一样常见，但是焦虑障碍的病人中寻求帮助者较少。“广泛焦虑障碍”的病人持续地过度焦虑。我们大多数人时不时地会体验到类似的焦虑水平，但在焦虑障碍中，焦虑水平不会下降。广泛焦虑障碍令人筋疲力尽，

病人不能睡眠，体重下降，并且常常无法集中注意力。若持续时间很长，病人可能会转为抑郁状态。

恐怖症更为戏剧化和明显。恐怖症的意思是一种夸大了的恐惧。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恐怖症——即所谓的单纯恐怖症，它始于童年期，并持续终生。动物恐怖症是典型的例子（蜘蛛、老鼠、蛇）。我自己则有恐高症——我不能登上高塔或走近悬崖边缘。大多数人平常忍受着单纯恐怖症，除非这些情况开始严重干扰他们的生活（例如，一个有飞行恐怖症的人工作上需要频繁旅行，一个害怕注射的女性怀孕了且需要抽血做检查）。单纯恐怖症通过行为治疗中的“逐级暴露”方法很容易治愈。按照预定计划，逐渐增加对所恐惧对象的暴露水平，同时监控自己的焦虑，就会习惯所恐惧的对象（例如，开始时拿着一张蜘蛛图片，然后逐步拿小的死蜘蛛，大一点的死蜘蛛，装在玻璃瓶里的活蜘蛛，自由爬动的活蜘蛛，然后是一只狼蛛！）。

精神科医生接触到的大多数恐怖症不是单纯恐怖症，而是广场恐怖或社交恐怖。这些病症始于成年期，并不是持续的（遇到压力时加重），并且致残性可能很强。广场恐怖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对开阔场所的恐怖，而是对拥挤人群和拥挤场所的恐怖。“广场恐怖”（Agoraphobia）这个英文词源于希腊语*Agoros*，意指市场，而不是拉丁语*Ager*，意指空地。患广场恐怖的女性远远多于男性，它与惊恐发作相伴，常导致病人待在家里，躲避人群。而正是这种“躲避”使这一障碍得以持续。惊恐发作是可怕的（心跳加快、出汗、口干，认为自己要晕倒、尿在身上、甚至死亡）。难怪病人要以最快的速度从拥挤的场所逃离，并躲避这类场所。遗憾的是，如果他们不离开，就会很快发现惊恐是短暂的（不过几分钟，不是数小时），而且会自行消退。然而，当我们逃离并且惊恐停止之时，我们会认为是逃离使惊恐停止了，从而无法知道惊恐可以安全度过。当再接近这样的情景时，我们对上次惊恐的记忆引起焦虑，这种“对恐惧的恐惧”使下一次惊恐发作更容易发生。

对此的治疗通常采用行为治疗，即教会病人如何度过惊恐发作，从而减少发作。治疗过程常比治疗单纯恐怖症复杂一些。社交恐怖是

对见人的过度焦虑。至于它究竟是一个合理的诊断，还是单纯的严重害羞，尤其是对此是否应进行药物治疗，还存有一些切实的争议（第六章）。在社交恐怖中，问题通常在于躲避，而不是惊恐；治疗方法是通过咨询帮助病人建立应对社交情景的技能。

强迫障碍

大多数人小时候都有过强迫行为——最常见的是竭力避开人行道上的缝隙，似乎不这样做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运动员和演员更是出了名的多有如此——某位网球运动员发球之前必须 要颠三次球，某位主演的女明星戏服上没有一点绿色就不能表演。这些迷信行为与强迫障碍有很多相似之处。强迫症病人必须以某一固定的次数或某种特定的顺序重复一些活动或想法（经典的有洗手，以及检查和计数仪式），以避免焦虑或所害怕的后果。当强迫尚处于思维阶段时（常没有外显的仪式），问题在于重复的想法，其内容常常关乎可怕的后果（沾染到污物或细菌，或害怕冲口而出亵渎或冒犯性的言语）。强迫障碍的特征在于思维或行为是重复的、被病人抵制的、令病人痛苦的。强迫障碍不是无害的迷信或怪癖，而是能够主导和破坏生活。例如，强迫清洁者最后会筋疲力尽，因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清洁，永无终止。强迫思维者不能保住工作，因为他们受重复想法或计数的干扰，还可能因为就担心的事情不断寻求确认而使同事厌烦。

强迫障碍倾向于与特定的人格特质相关——整洁、谨慎。我们大多数人在自己身上都能找到强迫的特征，然而真正的强迫障碍看起来还是那样的古怪。实际上，病人常常并不很快寻求帮助，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非常奇怪、不可理解——他们为之尴尬。一直以来，强迫障碍为心理学所过度解释（第四章），直到最近才发展出有效的治疗（对轻度病例可采用行为治疗和抗抑郁药）。

癔症性障碍

歇斯底里不再是一个流行的术语。一般人们往往用它来指过度情绪化（通常在女性中）——“噢，不要这么歇斯底里吧！”最初，人们认为癔症性障碍只发生在女性身上。*hysteros* 在希腊语中是指子宫的意思，曾有异想天开的理论说这些症状是由子宫在体内游走所导致。

在精神病学中，癔症性障碍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精神分析中（第四章），它对癔症作出的解释仍然是最好的。

癔症性障碍大多表现出显著的躯体或神经症状，但找不到器质性原因。在“转换”障碍中，焦虑或冲突表达为（“转换为”）疼痛或残疾。最戏剧化的是瘫痪或失明。病人坚持说他们看不到东西或上肢不能活动，但所有检查都表明他们“事实上”可以。在分离障碍中，病人坚称自己不能发挥精神功能的某些方面（与之“分离”），以此来应对冲突。在最极端的病例中，病人可能坚持自己有多重人格，而且对不同“人格”的作为不负责任。癔症性障碍一个令人诧异的特征是，对于一般人都会感到非常害怕的躯体疾病，病人却似乎感到相对满意。19世纪法国伟大的神经病学家夏尔科（Charcot）称这种满意为“泰然漠视（*la belle indifférence*）”。

在重大应激时，转换和分离机制十分常见（而且往往暂时地大有帮助）。战场上士兵常常貌似镇静地在枪林弹雨中作战，但事后完全不记得这些经历。我们大多数人曾有过严重头疼或无法解释地感到不适，过后才意识到那是逃避不能面对的某些事情的一种途径。有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怀疑其机制是否真是无意识的，如将这一机制用作司法辩护时（例如谋杀案中的自动症）。

在相对“心理成熟”的社会里，成年人中癔症越来越不常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难以承认自己感到恐惧的士兵发生了炮弹休克（双手粗大颤动，易受惊吓），这无疑是癔症性的。这些士兵确实不知道是对战斗的恐惧引起了他们的症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们已经充分理解士兵会被战斗吓倒。那些不能应对的士兵不再发生炮弹休克，而是发生了“战斗应激”。他们感觉到了恐惧，无法发挥自己的功能，但是能认识到这种情况并寻求帮助。他们不必否认恐惧，不必将其转换为“可接受的”症状，如震颤或瘫痪。尽管现在转换症状在精神科病房已经相对罕见，但在其他医学专科它们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不过这些专科使用的是一个更中性的术语——“躯体化”。治疗通常基于识别应激，以及帮助病人找到其他应对方法。治疗急性癔症性障碍时，采用宣泄的方法（即给病人服用镇

静药，让病人在镇静药的作用下诉说情况）常常是戏剧性的、有效的。

人格障碍

我们都有人格。人格是使我们不同于他人的相对持久的特征之集成。它概括来说就是我们对个体的第一想法或描述。精神科医生不可避免地会对人格产生兴趣。这首先是因为精神科医生必须区分疾病和人格（这个人是患了抑郁症，还是他一直就郁闷悲观？）。但是他们很快就注意到，有些人格类型更多地与他们治疗的某些精神障碍相伴随，因此他们使用了相同或类似的术语。分裂型人格相当冷漠古怪，而偏执型人格过度敏感多疑。癔症型人格倾向于情绪的强烈波动，需要充满激情的关系及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强迫型人格则谨慎、僵化。病态人格（有时称为社会病态人格或反社会型人格）不但犯有违法行为，而且以对周围人没有感情或缺乏悔恨自责之心为特征。他们与一般的罪犯是如此不同，以至于监狱和精神病院一样，在如何对待他们的问题上存在困难。

在极端人格（“人格障碍”）的治疗中，精神病学的作用是有争议的（第六章），而且大多数精神科医生对人格障碍是否有特定疗法表示怀疑。然而，人格影响到一个人的方方面面，所以对任何精神障碍的治疗都无法忽视人格。不同社会呈现出不同的人格问题，人格障碍的分类也在变化之中。在男女之间，两种最突出的诊断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当前，女性更容易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情绪强烈波动、关系困难、自伤、低自尊，与以前的术语“癔症型”人格障碍相当类似），男性则更容易被诊断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暴力、犯罪、冲动，非常类似于“病态”人格障碍）。不难看出，这两种障碍可能同样是个人疏远和失望的外在显现，但因为我们的文化对男性和女性行为的塑造方式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障碍。

成瘾

精神病学在酒、药滥用治疗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一点非常不明确。大部分滥用者并没有精神疾病。然而，对于精神病学为什么要介入，有许多令人信服的理由。有精神卫生问题的人使用酒、药的风险要高得多，这或许是为了减轻生活中的痛苦（尤其是抑郁症和人格障碍）。另一方面，酒、药滥用使精神卫生问题的好转变得更为困难。若过度饮酒，抑郁症几乎不可能完全康复；滥用药物的年轻精神分裂症病人则很难控制自己的疾病。

成瘾也有可能导致 精神疾病。严重酒滥用可导致偏执性精神病、震颤谵妄、抑郁症，最终更可导致痴呆。苯丙胺和可卡因与相当严重的偏执性精神障碍有关，可导致暴力；LSD [2] 和摇头丸使用者常见急性精神病性反应。此外，与吸毒如影随形的贫穷和社会动乱可导致抑郁症和绝望。因此，精神病学不可避免地要涉入酒、药滥用的治疗。然而，精神病学是应该起引领作用，还是仅仅作为一系列帮助方法中的一种，这是可以探讨的；同样，将成瘾归入疾病的利弊也是可以探讨的。

自杀

自杀是悲剧，但在精神病学实践中并不少见。自杀者中约四分之一当时在看精神科医生；在英国，自杀者中三分之二在自杀前一个月内曾咨询过全科医师（40%是在自杀前一个星期内）。自杀风险最高的精神障碍是酒依赖和抑郁症，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精神病性障碍和神经性厌食患者中，自杀是一个长期的风险。虽然自杀行为在年轻人和女性中比较常见，但是成功自杀的男性是女性的3倍，并且随着年龄增大自杀成功率持续升高。因为自杀总是伴随着痛苦和歧视（自杀未遂在许多社会里被当作犯罪来进行惩罚；在英国，20世纪60年代以前自杀一直是非法的），一些人试图证明几乎所有自杀者都有

某种形式的精神疾病。这种说法不太令人信服，却可以理解，因为自杀者的心理状态过去曾牵涉到许多重要问题（例如失去埋葬在神圣处所的权利）。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于1897年出版的著作《自杀论》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此书集中探讨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中自杀率的不同，强调社会隔离的重要影响。他相信天主教信仰可以防止自杀，而天主教国家报告的自杀率确实较低。但这可能是因为天主教国家不太愿意将死亡认定为自杀；20世纪70年代在都柏林，应约评估猝死原因的精神科医生得出的自杀率是当地法医认定的4倍。然而，不同国家之间自杀率存在差异是无可置疑的。

与长期以来的说法相矛盾的是，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不是瑞典，而是中欧和东欧国家——例如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前东德。当前自杀率在解体中的前苏联高得惊人，在男性中高达70/100,000（与之相较，美国为17，英国为12）。立陶宛的自杀率最高，为76/100,000，这强有力地证明了社会因素对自杀率的影响。当讲俄语的人从特权精英变为不受欢迎的少数族群时，他们的自杀率高过了讲立陶宛语的人。从前的情况是正好相反的。各国的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由于报告自杀案例情况的不同。在美国，这些国家移民的自杀率排名与他们原来国家的自杀率排名相一致。

由于存在这样的环境效应，可以说自杀不是一个纯粹的精神病学问题。但令人鼓舞的是，精神病学能够影响自杀行为。现阶段还没有特定的“抗自杀治疗”（除了用于减少慢性抑郁症中自杀观念的一些相当专业化的心理干预）。然而，积极识别精神疾病并加以治疗可能会有一定作用。传统说法认为，谈论自杀的人不会实施自杀，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正如40%的自杀者在自杀前一个月内[3]咨询过全科医师这一事实所证明的）。在瑞典的一个岛屿上进行过一个项目，培训全科医师如何询问抑郁症和自杀观念，然后治疗抑郁症，结果显示自杀率下降了。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存在一些风险期（例如刚从精神病院出院时）；在这样的时期如果能够提供特别的帮助，可以使结局完全不

同。自杀冲动是不稳定的——时有时无。因此仅仅是使自杀难度增加就能降低风险——在英国，缩小危险镇痛药的包装尺寸，引入不致命的燃气代替传统的煤气，就已经大大减少了自杀死亡者。甚至给桥梁加护网也有帮助——或许是因为这样能够延缓行动，增加考虑的时间，使自杀冲动消退。全世界范围内帮助热线的设立——例如提供共情式倾听的撒马利亚会——则证明了自杀者彻底考虑问题及与他人接触的需要。

尽管上个世纪自杀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自杀率明显下降），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世界范围内年轻男性自杀率稳步升高，而且某些高风险群体（小农场主、年轻南亚女性）自杀率仍然高得令人沮丧。这其中部分原因是致死手段容易获得（对农民来说是杀虫剂和猎枪，使用汽车废气自杀的人也越来越多），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或许在于家庭纽带的弱化、无能为力感的增强以及酒、药滥用引发的问题。

或许更大的挑战来自社会对待自杀态度的变化。尽管自杀对当事者家庭来说仍然是巨大的创伤，但却已经不再伴随多少社会歧视了。对于那些身患重病、痛苦不堪的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高风险群体），或者那些感到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人来说，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自杀看作是多一个选择而已。瑞士已经将这些情况下的爱助自杀合法化，但是通常将精神疾病患者排除在外。随着“生前嘱咐”[4] 日益被广泛接受，而且如果合法的爱助自杀从瑞士扩展到其他地区（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自杀可能慢慢地被重新看作是个人自主权的道德和伦理问题，而不是精神病学问题。到时候更重要的是，应该预防因判断力受精神疾病扭曲而导致的自杀，以此保护真正的自主权。

为何精神病学是医学活动？

并不是人人都认为精神卫生服务机构应该由精神科医生来运营（尤其是在这些服务机构内部！）。毕竟，它们是“精神卫生服务机

构”，而不是“精神病学服务机构”。争议大多集中于“医学模式”上，人们认为它过于狭隘，主导性过强了（第三章）。心理学和社会照料都可以提出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精神卫生护理则常常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从之前谈到的情况来看，显然良好的临床实践（无论叫做精神卫生还是精神病学）要求关注的范围更为广阔，而不仅仅局限于医学。那么，精神病学是如何变得具有如此优势的呢？

一种论点源于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的重叠。几乎所有精神疾病状态都可为躯体疾病所模仿，对躯体疾病的漏诊会有很大风险。甲状腺疾病可表现得像抑郁症（“黏液水肿性疯狂”）或焦虑状态。维生素B_3缺乏可表现得像痴呆（糙皮病）；肌无力和早期多发硬化很容易被误诊为癔症性障碍。这样的例子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单子。但是，这个论点其实非常无力。大部分病人是经过家庭医生转诊到精神卫生服务机构的，之前已经排除了躯体问题。即使不是这样，也很快就能发现病人“不像其他抑郁症患者”，于是很容易会去寻找医学或神经病学方面的原因。以前精神科病人住在大型精神病院，接触不到其他医疗服务，那时这个论点可能会比较有说服力；但在21世纪，这个论点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另一个论点是，许多最为成功的治疗方法都是通过医学途径开发出来的，而且因为其中许多是药物，所以需要医生来管理。这一论点的后半部分不太令人信服——在休养所和孤独症学校这样的居住机构，精神科医生就只参与治疗和开药，并不负责管理。然而，还有一个论点，即“医学模式”一直以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这里所说的医学模式指的是这样一种方法，它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理论和方法，但从本质上说是实用主义的。若有用，继续这样做；若没用，停止这样做；若不确定，做严格的实验来确定。精神病学总体上不依赖于某种特定理论，并且其科学方法较为宽泛，这两点或许是其主要的优势。此外，精神病学内部还有一种良性的家长作风，以及承担责任的意愿；这一点在公开场合虽然受到责难，但是在私下里却常常受到欢迎。

然而，医生在精神病院居于领导地位实际上是出于其他原因。在

19世纪，对于精神病症和躯体病症的重叠，几乎没有什么疑问。很多精神病院的住院病人患有梅毒的脑并发症，并很快因此死亡，还有更多此类患者遭受严重躯体疾病的折磨。然而，医生并没有成立 精神病院，而是被指定负责精神病院（第二章）。这并非因为他们能够为病人提供有效的治疗，而是因为医生的社会地位和责任使其成为保护病人免受虐待的有效卫士。这种虐待曾一度是后来被收容院所取代的疯人院中普遍存在的丑闻。当时针对疯病的医学方法恐怕破坏大于帮助。医生最初获得主导地位的原因或许让人意想不到，但是他们现在保持这一地位的原因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医生将来是否仍然会处于主导位置，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会在第七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找精神科医生咨询

如果全科医师把你转诊给精神科医生，情况会怎样呢？精神科医生的做法各不相同，但遵循大体上可预见的模式。几乎肯定会有一次会谈——大部分咨询完全是对话，没有体格检查或抽血检查。会谈通常持续30到60分钟。

首先，精神科医生很可能会让你用自己的话告诉他们近况如何，有什么苦恼的事，你认为问题在哪里。虽然全科医师已将情况总结在转诊单上，大部分精神科医生希望听听你的亲口讲述，以得到一幅清晰的图景。接下来，精神科医生可能会引导讨论的话题，获取关于你和你的人生更广泛的背景知识（你的“历史”）。他会了解你的成长情况、家庭环境，通常还会详尽地询问家族疾病（尤其是精神疾病）。接着他会询问你一直以来的健康情况——包括躯体和精神健康，还会询问酒、药使用方面的问题（尤其是针对年轻人），因为酒、药使用常对精神疾病问题有重要影响。更详细的询问可能和你的具体问题有关（重要关系、工作压力等）。

采集完病史后，精神科医生会做所谓的“精神状态检查”。这是对你的症状的具体评估——烦恼、心境、睡眠、先占观念。通常这也是

以对话形式进行的，但是有时会有一些相当正式的问题和简单的记忆测查。这些一般来说简短而且容易——不像做智商检查那样。

在病史采集和精神状态检查之后，精神科医生通常会得出关于问题是什么的意见（常叫做“简单陈述”）。这个简单陈述通常包含了一个诊断，同时还有许多其他内容，如他对引起问题的眼前困难和应激的看法。他会和你讨论这些内容，听听你的意见，然后说出他认为合适的各种选择。这可能包括一系列治疗方法（谈话或药片），或者住院治疗（极少见的情况）。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建议和安慰常常就已经足够了。在英国，近四分之一转诊给精神科医生的病例只咨询一次，咨询结果是精神科医生给病人或全科医师提出一些建议。

因为很多精神疾病问题影响到家庭成员，精神科医生常常要和家人谈谈，这既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病情，也是为了向他们解释准备使用何种方式的治疗（他们可能非常担心），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病人。当然，这样做并非总是合适的——涉及的情况可能非常私密，成年病人愿意的话，有权要求完全保密。

精神科医生不 会识透你的心思，也不 会问你带有陷阱的问题。有时似乎看起来是这样的，因为他好像知道的东西比你告诉他的要多。这并不是魔术——而是仅仅因为他曾听到过类似的故事，从而能够理解你的情况。毕竟这是他的工作——理解抑郁、焦虑是什么样的感受，知道人们怎样应对生活中的困难。很多人发现这本身就是一种安慰——他们的问题不是独有的；别人有过类似的困难，并且将其克服了。同样，精神科医生不是要通过带有陷阱的问题“把你抓出来”。他们想知道你的情况，想告诉你应对这些情况的建议。他们也不会违背你的意愿突然让你住院。没有什么精神疾病诊断是需要立即强制住院的。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大量证据显示真正有风险的时候，而且通常要经过许多讨论以及家人和全科医师的参与。

作完评估并和你讨论了治疗方法之后，精神科医生可能和你约定下次就诊的时间，或许是来看他本人，或许是治疗团队里的其他成员（例如护士或心理学家），或者他会说你不必复诊了。无论哪种情况，他都会书面通知你的全科医师。

现在我们对精神病学的范围有了一点了解——它与其他理解人类心智的手段关系为何，它治疗哪种类型的障碍或疾病，以及主要的治疗方法。你可能开始后悔读这本书——这么多不确定性、重叠和矛盾。难道就不能简单点吗？也许不能。如果我们从头发明精神病学，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然而，我们现有的精神病学是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一点一滴发展起来的。它是相互对抗的强大力量和重大的历史性发展的产物，又刚刚开始面临神经科学惊人进步的挑战。所以请继续读下去，读到最后应该就有些明白了——当然，你还记得我从来没向你保证过确定性吧。

注释

〔1〕 一译“地脉”，指散布在大地上的多个古迹组成的直线排列，1921年由业余考古学家阿尔弗雷德·沃特金斯（Alfred Watkins）在《古老的直线》（*The Old Straight Track*）一书中提出。现在有些神秘主义者相信雷线与超自然的或神秘的能量存在共鸣，且雷线之上具有电磁场。——译注，下同

〔2〕 即二乙基麦角酰胺（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一种致幻药物。

〔3〕 结合上文，这里可能是作者的一个笔误，应为“自杀前一个星期内”。

〔4〕 一种书面声明，表示如本人将来由于患不治之症等原因康复无望时，可任其自然死亡，不必再用人工方法延续生命。

第二章

收容院和精神病学的起源

想要了解精神病学的历史不算困难，因为它比较短——只不过200年。精神错乱者的存在是人们早已认识到的，而当家庭内部无法照料他们的时候，一些权宜之计就出现了——对富人设有私立疯人院和疗养所，对穷人则设有济贫院。济贫院里住着所有不能照顾自己的人——智力低弱者、病人、游手好闲者以及失业的人。那里的条件严酷（这是故意的，以减小公共财政的负担），而且其他同住者常常对精神病人没有耐心，或是占他们的便宜，因此他们的生活过得很糟。私立疯人院也好不到哪里去。开设或运营疯人院没有任何培训要求。其主要目的似乎是把富有家族的疯人藏起来避人耳目，或为保护家族声誉，或为侵吞他们的财产。在18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深受爱戴的国王乔治三世[1]受到了残酷对待，这激起了人们对私立疯人院的强烈反感。

1685年在伦敦开设的贝德兰姆是最早的大型公立疯人院，它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后存在至今，即现在的贝特莱姆皇家医院。展览公立疯人院里的病人在18世纪早期是一项流行的公众娱乐，尽管这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当中遭到厌恶。法国于1656年建立了主宫医院和综合医院（为女性设的是比合翠医院，为男性设的是萨贝提利耶医院）。这些机构名为医院，但实际上是更类似于济贫院的一般性监护机构。愚人院设立于中世纪的欧洲。美国最早的疯人病房1729年开设于波士顿的一家救济院，第一家美国精神病院则于1773年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成立。

约克疗养院

将精神病人分离出来并提供更恰当照料的推动力并非来自于医生，而是来自于社会改革家，这反映出人们开始关注人的尊严。当时提出设立收容院更多地是为了保护精神错乱者不受社会的伤害，而不是相反，在我们现今这个一味强调消除风险的时代里，认识到这一点

不啻让人警醒。1792年在法国，皮内尔[2]戏剧性地、同时也是象征性地将比合翠疯人院里被收容者的锁链去除了。在英格兰，一个贵格会教徒家族（图克家族）提议并最终在约克郡建立了第一家收容院。图克家族在读过了皮内尔和埃斯基罗尔[3]的著作之后确信，宁静和谐、贴近自然的环境，亲切体贴的态度，以及可预期的既定程序（即“道德治疗”），会给受到困扰的心智带来平静。约克疗养院建立时能容纳30个病人；1796年它开放后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很多早期的病人病情改善甚至治愈后出院回家了。它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美国和全欧洲的参观者都来此学习并加以效仿。由此，英国较早地建立了宽容的管理体制，轻易不使用锁链或皮带等机械约束（后来由约翰·康诺利[4]在“不约束运动”中所倡导）。

收容院运动

19世纪20年代，收容院运动发展起来；在此后的70年间，数百家收容院建立于英格兰的每个郡、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以及全美国，它们的目的是收容穷困的“疯子”。这一投资的规模放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从其可以容纳数百病人、设备良好的巨型建筑可见一斑。收容院的硬件（空间、供暖、食物、娱乐）要大大好于大部分病人家里的条件，因为道德治疗的原则要求收容院拥有开敞的空间和广阔的面积，位于远离拥挤城镇的乡下。至于它们常常选址于高处通风的位置，则是因为当时的理论认为薄雾或“瘴气”影响到疾病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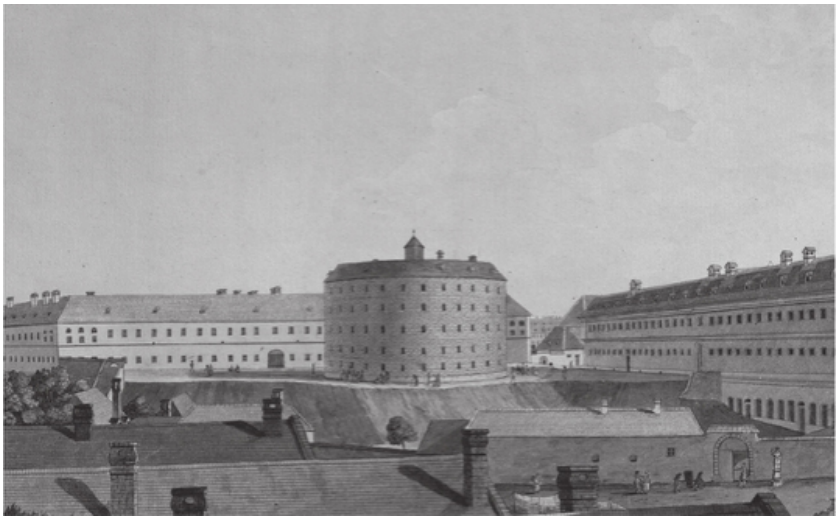

图1 “愚人塔”，毗邻欧洲第一家现代综合医院——维也纳综合医院，1787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建造

董事会安排了医生来主管收容院，其主要原因是医生能够负起明确的责任。当时没有什么有效的医学介入手段，这些医务主管的角色主要在于行政和纪律方面。医生甚至没有权力接收病人或决定病人出院——这通常是地方执法官决定的。

收容院一开始运作良好，它们常常接收新发病的病例——其中很多人康复了。但是很快地，收容院里住满了那些没有康复的病人，变得十分拥挤。从整个19世纪后半期直到20世纪初，精神病院里病人的康复率持续下降，原因就在于这些较严重的病例越来越多。逐渐地，对治疗的乐观态度消退了，收容院的条件恶化了（虽然比济贫院还是强得多）。

图2　位于米利奇维尔的佐治亚州立疗养院：美国最大的州立精神病院。1950年顶峰时收治了1万多名病人

对收容院的投资贯穿了整个19世纪，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在美国，由于有影响的社会改革家多罗西娅·迪克斯（Dorothea Dix）和内科医生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的倡导，收容院始终得到高度重视；在英格兰，受颇富影响的社会改革家沙夫茨伯里勋爵[5]的推动，收容院得到强大的中央财政支持。收容院起初规模都很小，但是它们在欧洲迅速扩展为每个可容纳数百名病人的机构，在美国更是每所可容纳数千人，因为那里的建设工程开始得略晚，持续的时间更长。在1903至1933年间，美国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数量翻了一倍还多，从143,000人增长到366,000人。这些病人中的大多数住在床位1,000张以上的机构里，而且美国的精神病院还在继续扩张。其中最大的是在米利奇维尔的佐治亚州立疗养院，到1950年时它容纳的病人超过了1万人。

不约束运动

对精神病人的照料强有力地反映了文化价值观，这即便是在精神卫生研究全球化了的今天也仍然如此。收容院运动初始之时，英国和美国都十分注重人权，英国更是特别强调治疗病人时尽可能地减少身

体约束。约翰·康诺利当时是汉韦尔收容院的医务主管，他带头提倡在管理病人时不用约束衣或锁链。他重视受过良好训练的、沉着冷静的工作人员的价值，并使用隔离的办法使病人平静下来。一位拜访康诺利的美国参观者评论道，英国病人一定比较温顺，这种办法“在美国肯定行不通”。这一传统在英国持续下去，英国成为第一个拥有完全不锁房门的精神病院的国家（苏格兰的丁格尔顿医院到1948年已经是一所完全“门户大开”的医院——这还是在新药物出现之前，见第三章）。英国在控制激越病人时完全不用机械约束的做法至今仍然是不寻常的。当然，它是依赖药物来实现的，这究竟是否总是一件好事，还值得商榷。

精神病学作为一项职业

医务主管对收容院的运作负责——确保食物充足，解雇醉酒的工作人员，防止虐待，如果病人康复了便向董事会提议让他们出院。这当中的一些能人（如约翰·康诺利）在人事管理方面变得极富经验，并且开始带头设计新型的收容院。早期的收容院运动取得了显赫的建筑成就，但治疗成就相对较少。做一个收容院的医生不必接受特殊的培训——不过就是去到那里，和主管并肩工作，如果幸运的话，最终取代他的位置。然而，这些医生一般都善于思考（他们都是男性），并且对科学感兴趣。19世纪40年代，他们成立了自己的职业团体——1841年的英国医务主管协会（之后于1865年更名为皇家医学心理学协会，1971年又再度改名为皇家精神科医师学会）。该职业协会在1841年的成立刚好与恐龙的命名发生在同一时间——这个职业的诽谤者们没有放过这一巧合。

“德意志”——精神病学的诞生地

19世纪下半叶，讲德语的欧洲地区智识领域一派繁荣景象。组成

现代德国的那些邦国相互之间是竞争者，它们以各自的地方政府为中心，拥有声名显赫的大学和机构。与当时的法国不同（在法国所有事情都发生在巴黎），德意志地区有数个文化和语言上相关、但各自独立的革新中心——慕尼黑、柏林、维也纳和苏黎世。在这些中心诞生了现代精神病学的伟大先人：格里辛格（Griesinger）、莫雷尔（Morel）、阿尔茨海默（Alzheimer）、克雷佩林、布洛伊勒、弗洛伊德和荣格。1864年在柏林，格里辛格成为了第一位精神病学教授，而到了1882年，这一数字已经变成了6个。相比之下，英国在1948年才任命了第一位精神病学教授。

这些学术职位基本上没有安排在精神病院内，也并非专为治疗精神病院中大批患有精神病和痴呆的病人而设。大部分研究在大学诊所里进行，其中大多集中于细致的神经系统检查，其目的是试图阐明当时认为引发了精神疾病的“变性”机制。在精神病学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当中，有三位进入这个领域是出于私人的原因。克雷佩林和弗洛伊德都是因为坠入爱河，布洛伊勒则是因为家庭原因。弗洛伊德和克雷佩林都在大学里拥有成功的研究职位（弗洛伊德正忙于解剖鳗的神经系统）。在当时，研究生涯与婚姻和家庭是不能兼容的（无论是从收入还是从时间上而言）。然而，这两位都遇到了心仪的结婚对象，所以别无选择，只好放弃前途光明的研究职位，寻找“现实的”工作。幸运的是我们知道这两位后来的婚姻生活都很长久而且幸福。布洛伊勒出生于瑞士苏黎世州并在那里长大，他不想搬迁。他的妹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他们两人的关系十分亲近。因此，回到她所在的伯格尔斯利医院工作看起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正是这三个人塑造了现代精神病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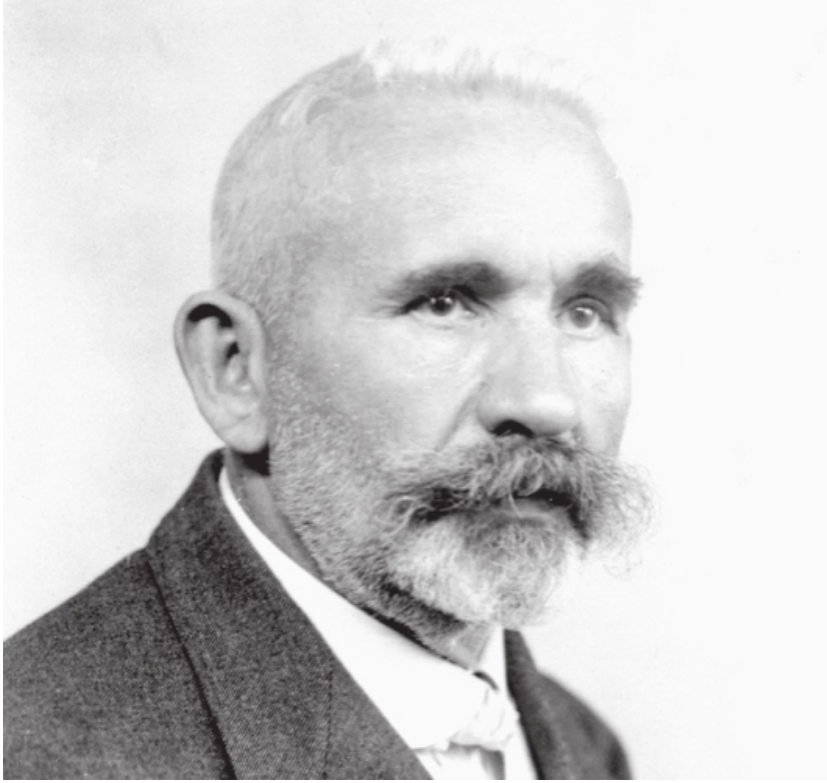

图3　埃米尔·克雷佩林（1856—1926）：他区分了早发性痴呆（后称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并为精神障碍的合理分类奠定了基础

克雷佩林（**1856—1926**）

克雷佩林与他的新婚妻子于1886年搬到了多尔帕特（现属于爱沙尼亚）做收容院医生。当时的专业人士阶层讲的是德语，但他的病人却不会——结果是他一点也不明白他们说了些什么，无法有效地与之会谈。他于是研究他们的病例记录，观察他们的病情波动。由此他作出了精神分裂症（他称之“早发性痴呆”）和躁狂抑郁症之间的区分。虽然这两种病症在急性期的时候难以辨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重要的差异便显现出来。（他认为）早发性痴呆病人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康复，并且随着每次急性发病残疾程度越来越重。基于疾病的病程，他确立了两种主要的功能性精神病的分类，这一分类直至今天还在沿

用。

“克雷佩林式的”一词暗指对精神分裂症的消极看法（若依据其结局较差来定义精神分裂症，那么只有在结局确实 较差的情况下才会下这一诊断），而且夸大了精神分裂症与躁狂抑郁症之间的差异。然而，仅仅是证明能够成功地对精神病进行分类这一点就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一旦能区分不同病人群体，就可以对结局作出合理的预测（“预后”），并绘制出这两种疾病各自更为清晰的图景。在区分出了这两种疾病之后，精神科医生开始能够区分其他疾病（痴呆、脑梅毒、中毒）。从最简单的层面来说，这一分类使得精神病学更加关注病人的病情，并为一些基本的预测和治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克雷佩林一生到处周游，并且声誉渐隆，影响日增。他还是一位禁酒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他到意大利的一次演讲中，他激进的诊断理念还不及他拒绝饮酒这一事实更令他的意大利同行感到惊异。实际上，他认为倡导禁酒是自己为人类做出的主要贡献。

尤金·布洛伊勒（**1857—1939**）

布洛伊勒于1911年首先提出了精神分裂症这个术语。此前他在苏黎世的伯格尔斯利医院进行过多年的认真研究。布洛伊勒的状况可以说和克雷佩林天差地别。他从小时起所讲的方言就与他的病人一样；他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妹妹住在同一家医院里；他晚上常常和病人聊天。他通过各种方式试图理解和弄懂他们的内部世界，而不是像克雷佩林那样仅仅进行观察。他对精神分裂症的定义基于病人体验的内容。这种途径使他在疾病结局良好的情况下也能下诊断（假定特征存在的话）。当然，很多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结局较差，但布洛伊勒确认了有些病人可以是结局良好的。

布洛伊勒认为，精神分裂症主要的紊乱是从亲密关系中的退缩，以及思维和心境的紊乱。他认为幻觉和妄想是病人试图弄明白这些紊乱体验的努力。他用他著名的“4个A”来定义精神分裂症——孤独（Autism，指退缩）、情感（Affect，指心境紊乱）、联想（Association，指思维障碍——将不同寻常的联想或含义加诸词语）和矛盾性（Ambivalence，指缺乏方向和动机）。布洛伊勒的方法近

年来被对“阳性”症状（妄想、幻觉、思维障碍）的关注所取代，因为阳性症状更容易识别，并且能够通过药物有效地治疗。对于这种最具破坏力的精神疾病，布洛伊勒的方法显然更为人性化，因为即使是对最严重病人的体验它也赋予了意义。

图4　尤金·布洛伊勒（1857—1939）：1911年首次使用了“精神分裂症”这一术语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

和克雷佩林一样，弗洛伊德也不得不为了婚姻放弃自己喜欢的职业。作为一个犹太医生，他当时可能的选择就只有一条路——私人执业。弗洛伊德没有在收容院工作的经历，所接触病人的几乎都是神经症患者；他对自己的方法在治疗严重病人时的局限性一直都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在仔细阅读他记录的病史后会发现，他无疑治疗了一些紊乱情况相当严重的病人。他的探索将他引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

向：即精神分析的建立（第三章）。他认为自己既是一个治疗精神问题的医生，又是一个探索精神世界的科学家。他始终相信，躯体治疗（即通过药物治疗）最终能治愈精神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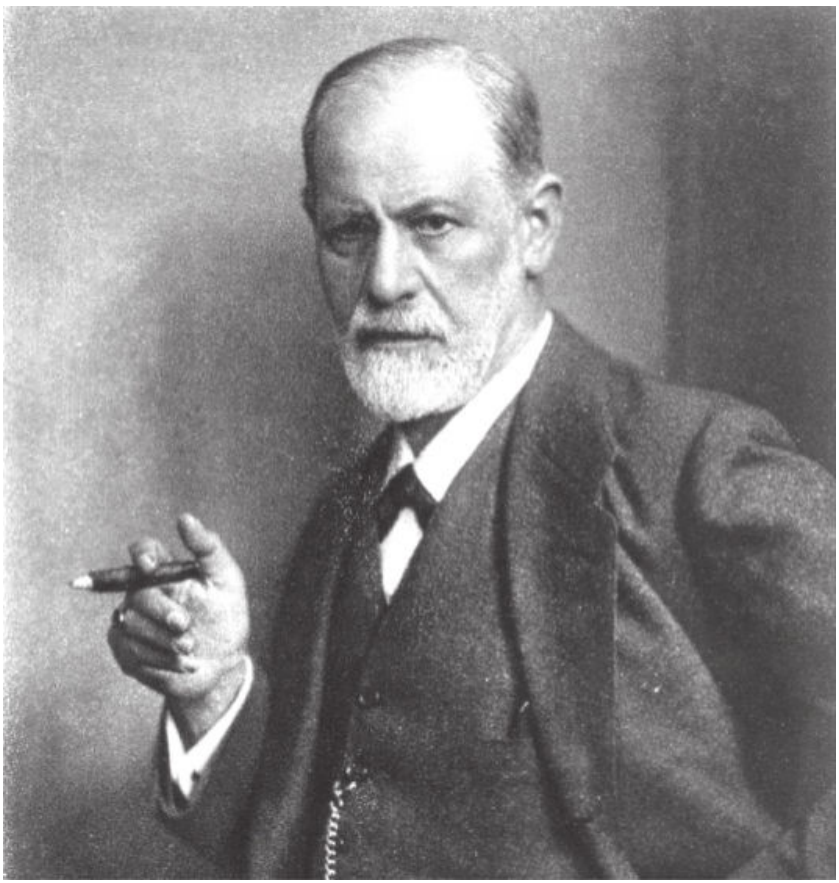

图5　弗洛伊德（1856—1939）：精神分析之父

我们可能会以为，这些一个世纪之前的群体之间是相互对抗或回避的，但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这时的精神病学仍然处于“前医学模式”阶段。在大型收容院工作的医生将病人按粗泛的诊断群体分类之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和病人交谈。道德治疗演化为粗糙和简易的心理治疗。没几个人相信这种方法能治愈疾病，但医生的角色从来就未局限在仅仅是治愈上，它还包括了减轻病人的痛苦。这一时期收容院

医生的日志见证了他们花在和病人交谈上的时间——他们试图给病人带来安慰，并且靠讲道理使他们平静。

另一位伟大的德国精神科医生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著作正反映了这一点。雅斯贝斯30岁时在海德堡撰写了名著《普通精神病理学》（1913）。这本书现在仍在印刷，在描述精神病性疾病的心理过程方面，至今还没有超越它的著作。开始的时候，雅斯贝斯对精神分析师们的著作秉持接受的态度，并且在自己的书中清晰地区分了研究精神疾病的两种途径。第一种是“理解”（*verstehen*），第二种是“解释”（*erklären*）。他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是合理和必要的：病人说的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导致了病人这样说？这在精神病学中仍然是引起争论的二分法——尤其是在心理学观点和生物学观点之间。但是，雅斯贝斯最终对弗洛伊德失去了耐心，因为他感到弗洛伊德在暗示理解就是解释。在精神病学发展之初，两种途径都是需要的、有价值的。

首个医学模式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首个医学模式”的出现预示着收容院时代的结束（第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治疗士兵炮弹休克的需要，人们对精神病学的兴趣大增，而与此同时，收容院更加拥挤不堪，愈受冷落。20世纪20年代起，真正有效的治疗才被发现并得到推行。这些治疗引起了态度的普遍转变，恢复了人们的乐观情绪。“精神错乱者”代之以“精神病人”，“收容院”代之以“精神病院”，“对精神病患者出具正式证明”为“非自愿住院”所取代，而自愿住院更是第一次成为寻常之事：这是在观念上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性变化。

在这之前，控制激越的药物取得了稳步的进展，但是这一时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两种新的治疗方法——脑梅毒的疟疾疗法和电休克治疗。

尤利乌斯·瓦格纳-尧雷格（1857—1940）和疟疾疗法

在弗洛伊德于1939年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之前，瓦格纳 - 尧雷格（Julius Wagner-Jauregg）是唯一获得该奖的精神科医生。他被授予该奖是因为他在1917年首创了脑梅毒（当时称为麻痹性痴呆，即GPI）的疟疾疗法。在梅毒的有效治疗问世之前，一小部分慢性感染的病人大脑发生病变，导致了灾难性后果。病人发展到这一步常需要20年的时间，到那时他可能已经结婚生子、生活安定。这种病给19世纪社会带来的恐怖在易卜生（Ibsen）的戏剧《群鬼》中被生动地表现出来。精神症状的发生突然而又剧烈。哲学家尼采（Nietzsche）就是一个例子；他不明原因地抱住了在都灵街头受到虐待的一匹马，几天之内就被禁闭在了精神病院里。尼采11年后去世，从未能够康复。恶化是悲剧性的，且令人感到羞辱。它常伴随夸大妄想（所有那些在漫画中确信自己是拿破仑的病人就是这么来的），并最终发展为痴呆。

瓦格纳 - 尧雷格的治疗首先使用疟疾寄生虫感染病人，然后等待，并在病人出现高热时悉心护理。经过10到12个周期，高热就杀死了梅毒细菌。在这之后可以用奎宁来治疗疟疾。这种治疗十分困难，而且风险很大，但是总好过没有希望。就这样，远在有效的抗生素问世之前，麻痹性痴呆就被从精神病院完全清除了。疟疾疗法使人们重拾对精神病院的乐观情绪，并且对实施这种困难但有效的治疗的医生和护士来说，这种疗法增强了他们的职业自豪感。疟疾疗法还使精神病院与综合医院之间建立起了更为明确的联系，因为病人常常需要去综合医院进行治疗。通过这些治疗过程，人们开始认识到，非自愿住院的病人常常会配合治疗，于是引发了对是否需要强制病人住院的重新评估。

电休克治疗

疟疾疗法如今仅仅剩下历史意义了，而电休克治疗（ECT）仍在

广泛使用。精神科医生知道癫痫发作常导致心境的明显变化——在发作后数小时内使病人保持兴奋或平静。再加上人们认为在精神分裂症病人中癫痫较为罕见，于是一个想法产生了，即或许癫痫发作可以防止精神分裂症。自1935年起，精神科医生开始通过诱发癫痫发作来治疗精神分裂症病人，方法是让他们吸入樟脑或给他们注射一种叫做戊四氮的化学物质。治疗效果令人鼓舞，很多病人的病情得到了改善。不幸的是，这种体验让病人非常难受（尤其是注射戊四氮后癫痫发作前的那几分钟），以至于病人恐惧日深，很多人都拒绝接受治疗。

意大利人切莱蒂（Cerletti）想出了一个主意，即利用微弱电流来启动癫痫发作；1938年他在病人身上首次使用，效果显著。几个精神科医生随后也开始使用电休克治疗，并且同样收到了明显疗效。电休克治疗确实能使激越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平静，不过它最戏剧化的效果是作用在抑郁症病人身上；很多抑郁症病人经过治疗不但康复了，并且能够维持。如果说这种治疗听起来有点野蛮的话，那么不妨记住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30年代的抑郁症病人常常在精神病院一住几年（即使是在条件非常好的精神病院里），并且有高达五分之一的病人在住院期间死亡 。

起初，在进行电休克治疗时是不用麻醉药的，这显然是一种令人恐惧的体验，常伴有头疼、记忆丧失和小的骨折（如果发作很厉害的话）这样的并发症。在过去的50年里，医生会给病人使用短效麻醉和一种防止肌肉收缩的化学药品，所以治疗时看不见癫痫发作，也没有骨折的风险。头疼和记忆丧失仍然是问题，但病人不会回忆起实际的癫痫发作。

电休克治疗的发明和持续应用是精神病学发展中的典型例子。最初引发这种治疗的想法（癫痫能对抗精神分裂症）是错的，但治疗却起了作用（尽管对抑郁症比对精神分裂症更有效）。我们仍然不知道电休克为什么起作用，但它确实起作用了。电休克仍然是精神病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而且（即便是名声不好）大部分做过电休克治疗的病人都说自己愿意再度接受这种治疗。

精神卫生立法

精神病学在医学领域内是独特的，因为它能够违背病人明确表达的愿望进行强制治疗。由此，大部分国家都专门立法，允许强制治疗并对之进行监控。整个收容院运动就牢牢地建立于这样的立法基础之上。追寻19世纪英格兰立法发展的脉络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它是较早有中央政府的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不大。

最早的立法是为了规范疯人院。当时只是要求疯人院注册。法律没有设置标准，但是如果某家疯人院发生极为恶劣的虐待事件，可以将其关闭。1808年的《收容院法案》和1845年的《精神病法案》均是为了保证病人能够得到照顾，并防止对脆弱的精神病人进行剥削。它使得“将极其疯狂者”从济贫院“转到”收容院成为可能。

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公众注意力的焦点从关切贫穷的精神病人是否遭到忽视和虐待，转向担心为了掠夺财富而恶意禁闭精神健全者。“所谓精神错乱者朋友会”拥有一位身为海军元帅的主席，它在19世纪末的英国得到了议会和公众的大力支持。1883年，乔治亚娜·韦尔登（Georgina Weldon，一位“活泼、迷人、富有、人脉颇广的女性”）在伦敦的科文特花园歌剧院发起了一场集会，质疑对她最近的禁闭；她最终获得了胜利。公众日益加剧的不安在1890年《精神病法案》中反映出来。这部满是法律条文的法案长达数百页，有342款；它在保护病人权利的优先性方面走得太过，以至于实际上不可能进行早期自愿治疗。精神卫生立法方面的杰出历史学家凯瑟琳·琼斯（Kathleen Jones）写道：“这一法案阻碍了精神卫生政策的进步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公众对精神卫生的态度就这样一直摇摆不定。几乎每个发达国家都在法律权利和治疗需要之间、在社会需要和病人需要之间努力寻求平衡。我们在第六章会再对此进行讨论，这里提醒一下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

收容院踉踉跄跄地又向前走了五六十年，既陷于立法困境之中，又在革新方面受到阻碍（只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治疗方面取得的喜

人进步是个例外）。又过了30年，这一遍及全世界的令人畏怯的设施才最终受到挑战并走向尽头。这是本书第三章的主题。

注释

〔1〕 乔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是1760至1820年在位的英国国王。他晚年患有间歇性（最终成为永久性）的精神错乱，于1811年由其子摄政。当时的医生对他的病束手无策，现在则一般认为他患的是卟啉症。

〔2〕 皮内尔（Philippe Pinel，1745—1826），法国医师，提倡改进对待精神病患者的态度，著有《疾病的哲学分类》等。

〔3〕 埃斯基罗尔（Jean-Etienne-Dominique Esquirol，1772—1840），法国早期的精神病学家，创立现代临床精神病学的巴黎学派成员。他曾师从皮内尔。

〔4〕 疑为作者笔误。应为John Conolly，英国医生。1839年成为米德尔塞克斯郡精神病院的住院医师后，他在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中大力提倡完全的“不约束”原则，其影响遍及英国。后文中出现的John Connelly或Connolly应皆为此误，不再另注。

〔5〕 疑为作者笔误，应为Lord Shaftesbury。

第三章

走进社区

在被遮遮掩掩了数十年之后，精神病人现在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几乎每个星期报纸上都会出现有关的大字标题，不是提及那些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的困境，就是涉及某个精神紊乱者的事件。“社区照料”已是全世界都关注的事业，同时也伴随着深刻的反省，以及对暴力和动乱的恐惧。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是否真是灾难性的呢？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去机构化

西方国家的精神科病床数已缩减到1955年的三分之一以下。在英国，几乎所有大型精神病院都关闭了，美国的大部分精神病院也是如此。剩下屈指可数的几所精神病院容纳的病人只及原来的一小部分。为长期住院的病人设置的慢性病房都取消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有50万精神科住院病人，英国有16万人。现在美国不足10万人，英国则不足3万人。这种趋势几乎是世界性的。这一过程有个并不优雅的名字，叫“去机构化”，它始于减轻病房的拥挤，接着就开始关闭病房。在过去的15年间，最终出现了整所精神病院的关闭。

图6 “袋子女士”：几乎没有财物、无家可归、患精神疾病的妇女——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地城市中日益常见的景象，往往被归罪于迅速关闭精神病院的行动

人们通常将收容院的人去楼空归因于20世纪50年代初抗精神病药的发明。这显然是主要的动力，但却不是全部原因。在抗精神病药出现之前，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态度就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新型药物所产生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在有些国家病人大批大批地出院，在有些国家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社会态度和精神病学内部的根本性反思同样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之后，经济因素也成为了原因的一部分。不过，还是让我们先从药物开始谈起。

药物革命

正如很多重要的发现一样，发现氯丙嗪的抗精神病作用也纯属偶然。一位研究创伤和休克的法国海军麻醉师注意到，氯丙嗪能使术后的病人平静下来，但又不是处于镇静状态。1952年，两位精神科医生德莱（Delay）和德内克（Deneke）在巴黎圣安妮医院试验了这种药物，结果令人吃惊。试验到第十个病人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取得了突破。在接下来的4年里，氯丙嗪成为治疗精神病性疾病的一线疗法，精神科病房的气氛完全改变了。

药物的使用最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使病房人性化了。工作人员可以开始更多地了解病人，而不仅仅是控制他们。疾病发作的时间短了，紊乱程度轻了，由此康复和早日出院（在家庭关系和工作永久性受损之前）成为了现实的可能。起初，药物只是用于治疗急性发作，但到了70年代，人们意识到坚持用药能降低复发风险。这种“维持治疗”自此成为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病长期治疗的基石。

在过去的50年间，一系列抗精神病药被开发出来。大部分药物的疗效相当，但是不良反应不同。最初的氯丙嗪类药物常使病人僵硬、嗜睡。新型药物避免了导致僵硬，但是可能造成体重增加和糖尿病。有些药物有了长效注射用剂型，这意味着病人忘记了服药也没关系，只要每2到4周注射一针就可以了。

药物革命不只局限于抗精神病药。第一种抗抑郁药（丙米嗪）于1958年问世。抗抑郁药比电休克治疗的效果持久，而且对更多的病人而言更易接受——到了80年代初，美国医生每年要开出1000万张抗抑郁药处方。1949年，人们注意到碳酸锂（一种自然界里存在的物质）有安定效果。1968年，碳酸锂被作为长期“心境稳定”的疗法用于躁狂抑郁症，显著降低了复发风险。

这里不便细谈现代精神科药物的发展，只需指出一点，即这个过程是逐渐加速的。现在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药物来治疗大多数已认知的精神病症。然而，这些药物不是“灵丹妙药”。虽然没有一种药物能将患某种疾病的所有病人都完全治愈，但是经过慎重选择，药物治疗能在大部分精神病人身上收到明显的疗效。不过，这些新型药物的成功也带来了过度使用和伦理困境的风险，这一点我们会在第六章讨

论。

社会态度的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精神病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由于其贡献得到高度重视（既在士兵选拔方面，也在对战争精神障碍的急性治疗方面），精神病学重拾了信心。精神病学关注度和重要性的上升，吸引了很多医生进入这个领域，换作以前，这些医生是绝对不会考虑在收容院工作的。也因此古老的问题有了新思想的参与。另一方面，本来健康的人在经历战争之后产生了严重的精神问题，这种现象挑战了旧时宿命式的遗传假说。通过实用性治疗（例如，注射巴比妥盐以释放或“宣泄”近期恐怖经历产生的情绪）使战争创伤戏剧性地痊愈这一点，更是证实了应激和创伤在这些精神障碍中所扮演的角色。精神病学成为了积极的、乐观的、几乎是魅力四射的一个医学分支。

治疗社区

用药物治疗急性战争神经症不是二战期间唯一的进步。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精神科医生在美国和英国都受雇为重要的军事顾问。他们对组织本身如何影响精神健康和康复进行了探索，并发展出了“治疗社区”。

治疗社区强调医院（或监狱、学校、工作场所等）的组织 对组织中个人的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对精神科病人来说，组织可以是自我学习和康复的机会。军队精神科医生注意到，治疗普通士兵的心理障碍存在问题，因为医生本身是高级军官。等级和地位构成了治疗的阻碍。于是，他们主动缩小病房内的地位差异，鼓励非正式化，强调病人有能力进行合作，以相互帮助和解决问题。这就使得患神经症和有残疾的个体可以在一个民主、宽容、探索的团队环境里学习应对问题的新方法。

治疗社区运动先是改善了精神病院的照料水平，随后也改善了监

狱和有障碍儿童及青少年寄宿学校的照料水平。不过，治疗社区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者，当其理念得到广泛接受时（甚至在商业组织内），这些理念的来源就被忘记了。精神分析的命运也与此类似。

“机构性神经症”和“全控机构”

大约是在同时，人们开始意识到传统精神病院的环境可能对病人造成极大的损害。医院本身可能导致 它们努力治疗的一些问题。长期住院的病人（通常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数年或数十年后，会变得情感淡漠、自我忽视、孤立隔绝。这种情况一直以来被看作是精神分裂症的后果（所谓“精神分裂症缺陷状态”），这些病人的困境和他们对医院的依赖是主张维持精神病院的理由之一。

精神分裂症的这个方面（不同于急性期症状幻觉、妄想和激越）对新药没什么反应。但是，医院本身似乎对病人有不同的影响。人们一直以来就知道精神病院有好有差。20世纪60年代，一项研究在三所规模相等、员工相似、病人的严重程度也相当的医院里展开，结果发现病人情感淡漠和自我忽视的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该研究表明，这种差异与医院日常的活动和多样化水平有关。

精神科医生拉塞尔·巴顿（Russell Barton）进一步探究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情感淡漠主要是对居住在否定个人责任的机构中的一种反应。它是失用的后果——你不再照顾自己，因为总是有人在照顾你。巴顿称之为“机构性神经症”，以此强调这种情况是医院造成的，而不是精神分裂症造成的。他对此作出了改变，为病人提供更大的独立性，其效果显著。很多病人在这种新制度下活跃起来，并且很快就出了院。康复治疗（帮助病人重新获得失去的技能）成为大部分精神病院的工作重心，人们开始乐观地认为大部分情感淡漠、功能残疾的病人将不再需要住院治疗了。

“机构性神经症”激发了变化，但是它的严重程度无疑被夸大了。情感淡漠状态本身确实是 长期精神分裂症发展的一个方面，只不过这个方面被医院的日常程序所放大了。甚至有些病人已经康复，但是工作人员却没有注意到！巴顿早期的许多病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接受了给予他们的独立，但是这种“被忽视的”病人现在已很罕见，病人通常需

要持续地获得支持帮助。

埃尔温·戈夫曼和全控机构

上述对三所医院的研究和拉塞尔·巴顿提出的机构性神经症震动了专业界，但是它们的影响远不能与美国社会学家埃尔温·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著作《收容院》（1961）出版后在世界范围内激起的冲击波相比。在这项开创性的研究中（他以清洁工身份“隐藏”在华盛顿某大型精神病院的病房工作了一年），他清晰而激进的见解和优美的文笔使整个体制都为之惊叹。戈夫曼通过令人信服的细节描述了收容院里实际的 情况——而不是人们以为的 情况。医生和护士认为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共识，但是戈夫曼的研究表明，这种共识并不存在——医生基于疾病和治疗的模式判断病人，护士则更多地基于病人的行为和动机。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医生以为自己在管理着病房，但事实上在日常运作中，显然是护士和护工（甚至是其他病人）在制定规则和文化，并握有权威。戈尔曼对收容院体制持反对的态度。

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说，病人去人性化和降格的原因在于机械的常规和个性化照料的缺失，但这些原因并不仅仅是工作人员训练不足和缺少资源所导致的（尽管通常的解释是这样）。他提出，这样的机构会主动地 侵蚀个性。这一特征在他所称的“全控机构”——收容院、监狱和军队之类——中尤为典型。这些机构通常满足其成员的所有需要——例如食物、居所、伙伴、休闲等。它们依赖于工作人员和病人（或囚犯和看守、军官和士兵）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以及贬低性的仪式，以此侵蚀和压制个体的身份。他认为这些机构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强化纪律，使一大群人更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在他工作过的那所医院，严格的入院程序不仅包括医学检查，还包括对所有病人去虱、洗澡和理发，这就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性降格。

尽管最初戈夫曼的著述在专业界不受欢迎（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它们成为了推动精神病院关闭的一股主要力量。他的著作《收容院》在出版40年后，仍然是现代社会学领域引用最 多的文本。1962年，肯·凯西（Ken Kesey）的小说《飞越疯人院》（1975年被搬上银

幕，由杰克·尼克尔森［Jack Nicholson］主演，影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就生动地描绘了这类非人性化的大型收容院令人不可接受的面目。

精神病人的权利和所受的虐待

到目前为止，我的讨论集中在业界内部导致去机构化的力量。然而，正如收容院的起源一样（第二章），当时的社会气候至少有着同等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欧洲就燃起了变革的烈火和对社会公义的渴望。旧有的秩序失了宠，陆续返家的士兵和已经归位的政府都将普通人的权利放在首位。无论是在教育、卫生还是住房方面，民主和社会包容（虽然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叫法）都主导了各国的议事日程。弱势群体充分参与新社会的权利得到强有力的捍卫，这其中也包括了精神病人群体。他们在纳粹德国遭到的迫害清洗更加表明他们亟需得到受保护的权利。这一点在精神卫生法的变化中获得了最为清晰的体现。举例来说，英国1890年的《精神病法案》强调保护勿将精神正常者判为精神错乱者的权利（对精神错乱者的权利和福利却少有考虑），而1959年的《精神卫生法案》则强调对精神病人的照料和收容需要确保必要的程序和审核，以此来保护精神病人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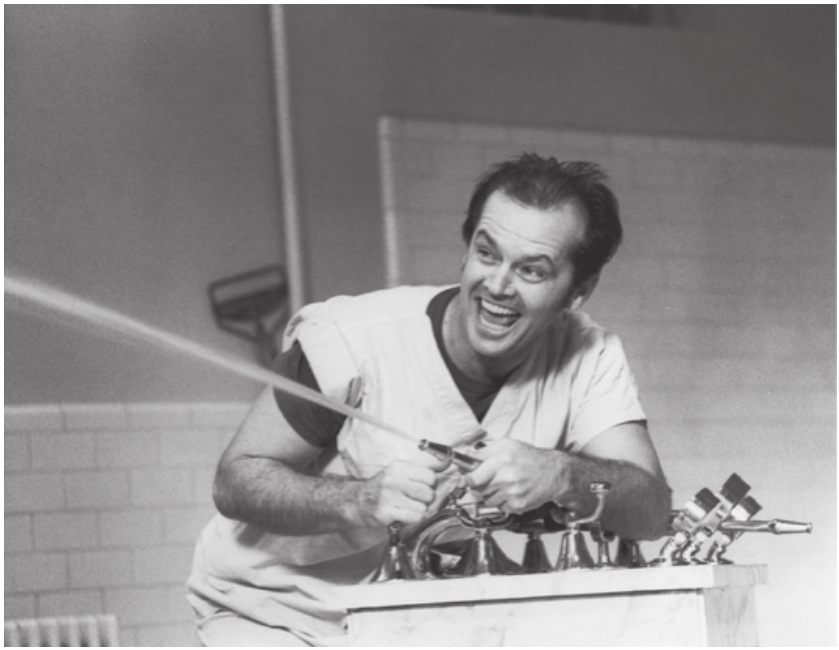

图7　《飞越疯人院》：米洛斯·福尔曼（Milos　Forman）1975年拍摄的这部电影描写了一家压抑的精神病院，杰克·尼克尔森扮演反叛的兰德尔·麦克默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系列有关虐待精神病人的丑闻浮出水面。对几所精神病院的调查不断揭发出辱及病人人格和对病人疏于照料的事实。报告所述内容从对病人尊严的蔑视到赤裸裸的虐待和殴打，不一而足。这类丑闻为公众反复描绘了孤立隔绝的大型机构的状况（规模似乎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在400个病人以上的机构中，风险急速上升）；这些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受过的培训很少，但是关系紧密，很多人选择这个职业都是追随父母的脚步。大量的证据证实了戈夫曼所描述的医院的种种做法确实存在，它们根本不关心个性化的治疗或照料。

揭露出来的这些真相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也加深了人们改革或关闭收容院的决心。1960年，英国卫生大臣预言收容院将要寿终正寝，但预测专业界的旧有态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持续。意大利的改革验证了这一点。这场改革极具人格魅力的发起者精神科医

生和哲学家佛朗哥·巴萨格利亚（Franco Bassaglia）认为，精神病院本质上是不可改革的（见第五章），关闭是前进的唯一道路。1978年的《180法令》宣布立即禁止强制入住精神病院，并要求在3年内将精神病院全部关闭。

这一时期，精神病学的整个合理性都受到质疑。反精神病学运动（第五章）在1968年学生骚乱的基础之上诞生了，它由R. D. 兰恩（R. D. Laing）、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领导。他们的著作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整个欧洲和美国校园里的《圣经》。

到了80年代初，精神病院的缩减和关闭已经作为一场世界范围的运动扎下根来。这场运动的引领者和发声者都是精神卫生专业人士——其中主要为精神科医生。然而，尽管住院病人的人数减少了，精神卫生事业的花费却增多 了；一方面因为工作人员的标准与一般医疗的标准更趋一致，另一方面因为数十年来的忽视开始得到解决。对于在过去20年中推动这些议程的政府而言，关闭整所整所的精神病院（现在常常遭到专业人士的反对 ）在财政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位敏锐的美国观察家指出，推动过去30年来去机构化运动的，是“治疗上的自由主义者和财政上的保守主义者的‘邪恶’联盟”。

“跨机构化”和“再机构化”

收容院初建的时候，最早的病人不是来自家庭，而是来自监狱和济贫院。去机构化令人担忧的一个方面就是缩减意味着更多的精神病人要回到监狱。随着精神科规模逐渐缩小并且越来越以治疗为导向，很多比较难治的病人（这些病人从前会在封闭病房长期住院）被拒之门外，最终入狱。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这一令人遗憾的趋势正在恶化，因为这些地区强制住院的标准非常严格，必须证明当前就存在危险才行。在加利福尼亚，现在监狱里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比精神病院里的还多。

因此，去机构化的速度其实并不像关闭精神病院的速度所显示的那样惊人。实际上，从大约5年前以来，出现了略微反转的迹象，即更多的精神病人处于某种形式的监管住宿状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有很多（见下），但是其中一个因素无疑是对风险容忍度的降低。

社区照料

“任何傻子都能关闭一所精神病院。”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一位高级卫生官员这样评论道。他很快补充说，关键并不在于关闭精神病院，而在于提供其他可替代的照料方式。自20世纪30年代起，初具雏形的现代社区照料形式就已经发展起来——俄罗斯的精神科日间医院、美国和英国的门诊部，以及荷兰的流动诊所等。然而直到60年代，人们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将社区服务作为精神病院的替代物 ，而不仅仅是作为精神病院的补充。

地区综合医院病房和日间医院

在地区综合医院内部或旁边建立小型病区代表着对精神病人的去歧视化，以及让病人走出精神病院。这些病区规模较小，常有40到100个床位。它们以急性、短期的病人为收治对象，并且通常能够依赖精神病院作为后盾。这是一种国际性现象，但具体做法则反映出各地习惯的不同。在美国，这些病区体现的是精神病学与综合医院保持密切联系的强大传统；在德国它们体现的是对躯体疾病进行心理治疗的学院心身传统；在英国是适应更快速出院要求的精神病院传统。意大利的改革坚持与精神病院彻底决裂，代之以非常小、住院期非常短的病区。

然而，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经过扩张的新欧洲，一半以上的精神科住院病人仍在传统精神病院中接受照料，无法或很少获得真正的社区服务。美国的做法在州与州之间差异巨大，有的州高度基于社区服务，有的州则广泛依赖旧式精神病院，不一而足。将精神科置于综合医院中并控制在较小规模，这能防止收容院中的很多问题；但是这种做法自身也存在问题，例如空间狭窄、不够宽容等。在应对非常棘手的病人时，这些病区也可能会陷入困境；它们通常不能像大型病区那样提供范围更广的活动和治疗。然而，这些精神科是精神病

人走出收容院、走进社区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社区精神卫生团队（CMHT）和社区精神卫生中心（CMHC）

打破精神病院主导地位的方法是使服务机构更接近病人。服务机构要做到便利，并且不会令人感到畏惧，这样病人和家庭才会及早求助。面对这个挑战，“分区化精神病学”出现了。收容院原来收住规定地区内的所有病人（常常是一个县郡或一个城市）。分区化精神病学这种方法则将其划分为可管理的小片地区（4万至10万人口），以便提供容易获得、相当全面的照料。

法国和英国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作用。法国的“分区”源于社会学理论，强调危机干预。这种服务局限于重性精神病患者，并且只在部分地区施行。英国的做法更为全面，但它完全是实用性的，不谈什么理论。20世纪50年代，由于立法规定要向强制收容的病人提供门诊随访，并要求社会福利机构的参与，地区照料应运而生。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与远距离的精神病院合作是不可行的；与社会工作者和家庭医生保持联系只有在小社区内才现实。分区化方法意味着精神科医生、护士和社会工作者开始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

在英国，这一发展过程是通过“社区精神科护士”（CPN）来实现的。这些护士几乎只在医院之外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家访重性精神病患者，以确保他们坚持用药，但也帮助解决日常的实际问题。1953年起步时，英国只有两个社区精神科护士，现在英国的社区精神科护士比精神科医生还要多。社区精神科护士和精神科医生的携手合作确立了多专业团队的传统，逐渐将社会工作者、临床心理学家和职业治疗师都吸纳了进来。

社区精神卫生团队评估的精神卫生问题范围十分广泛（从抑郁症到精神病），并在诊所、病人家里、日间医院对病人进行治疗，必要时也可让病人住院。这种团队成为整个欧洲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标准。意大利的改革是对这种照料模式的最清晰概括，它强调非正式性、当地知识和灵活的获得途径。

大多数社区精神卫生团队大体上都很相似。在意大利和英国，同一团队通常既照看院内也照看院外的病人，但是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

和美国，这些责任是分离的。在有些服务机构，社区精神卫生团队处理所有的精神卫生问题；另一些机构则将其服务范围限定在重性精神病上。最近的一个动向是用一些专业化团队（例如，处理危机的团队、为病人提供长期支持的团队或应对首发病人的团队）来替代社区精神卫生团队。虽然这些团队的工作重心不同，但是其做法（人员组成、评估、审查等）惊人地相似。

社区精神卫生团队不是提供地区服务的唯一模式。1963年，美国的肯尼迪总统（President Kennedy）签署了《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建设法案》，由此创建了社区精神卫生中心。社区精神卫生中心是雄心勃勃、相对大型的机构，其目标是降低病人照料被切割成小块的程度，并提供多种服务，包括日间照料、评估、治疗、援助弱势群体，以及面向精神卫生的预防和教育。但是这样的目标野心过大了，结果证明其在人员配备和运营上都不可能实行，于是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很快收缩，改以日间照料和诊所为工作重心。这种模式现在在荷兰和欧洲的某些地方运行良好。

日间医院

（与综合医院精神科协作的）日间医院的建立最初是作为精神病院照料的替代形式，但是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随着社区精神卫生团队的发展，对日间医院的需求从来没有完全成为现实。很多对焦虑和抑郁的治疗本来计划是由日间医院实施的，结果却由新获得了技能的社区精神卫生工作团队完成了。对病情较重的精神病人的有效援助也降低了对日间医院的需求。另一方面，日间中心（提供社会照料而不是医疗照料）持续发展起来。这些日间中心减轻了很多精神病人的隔离感和孤独感，尤其是在千人一面的大城市里。

歧视和社会整合

人们普遍认为，向社区照料转移的头20年在全球取得了成功。不需要住在昂贵、阴沉的精神病院里的病人出了院，找到了更有益的生

活。由社区精神卫生团队向他们提供的支持是有效的，也是简易的。然而，随着精神病院的关闭，残疾更重的病人出了院。病院已经关闭，足够的替代服务却常常远未能跟上，尤其是缺乏病人能支付得起的当地住房。很多病人因此变得无家可归（特别是在美国，这种情况成为了一件全国性的丑闻）。这些病人生活在环境肮脏的街头，不但令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耻辱，而且他们还常常成为低级犯罪和他人剥削利用的受害者。当然，情况在各地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一些州很快就形成了高度发展、值得称赞的社会服务，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也是如此。然而，大城市（伦敦、罗马、纽约、洛杉矶）仍在挣扎应对这一问题，而且总体上是失败的。

对公民自由的关切驱动了立法的改变，这就更激化了这一问题，因为现在法律规定，除非当前就存在危险才会送院治疗（例如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即使有床位，功能残疾严重的病人也会拒绝住院，而新法律不允许对他们施行强制住院。很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在街头和医院都待过的病人宁可选择贫困和没有安全保障的街头生活，也不愿住在相对舒适的病房。这不能够仅仅用病人缺乏自知力来解释——我们大部分人都将个人自由和选择看得比舒适更重要。然而，捡破烂的老妇、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显然有精神问题的个体流落街头的景象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广义的道德问题，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歧视

歧视被认为是精神疾病的主要负担之一，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些以减轻歧视为目的的项目。歧视表现为我们避开某些特定个体的愿望（“确立社交距离”），其最极端的形式是对这些人的驱逐流放。精神病人一直以来都受到歧视，就像过去很多其他疾病的病人也受到歧视一样。虽然比较极端的歧视表现，如给麻风病患者戴上铃或给病人烙上印，已消逝在古代历史中，但是歧视和忽略仍然阻碍着社会对精神病人的完全接纳。在工作和住房上，歧视是常见的现象。现在有迹象表明，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在年轻一代中比在年岁较大的人中程度要轻。这个发现显然令人鼓舞，但是它的原因却不甚明了。是因为当今的年轻一代更多地接触到精神疾病，由此加深了对其的理解吗？还

是因为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反而越发缺乏宽容了？希望答案是前者。

我们通常试图避开（即“歧视”）那些我们认为对自己构成风险的人。在过去这主要是害怕被传染（麻风病、结核等），但是对于精神疾病，人们害怕的则是病人可怕或危险的行为。精神疾病总是和更高的暴力风险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不可否认，否则就是一种误导。对大部分病人来说，这种风险是针对病人自己的（自杀和自伤），但重性精神病患者威胁或伤害他人的风险比没有精神疾病者仍然要高4倍。这样看来风险似乎很大，但实际上风险是很小的，因为人群中只有2%到3%的人患有这种重性精神病。就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真正的风险还不如说来自各方面都很健康的醉酒年轻人。然而，大部分国家都过分忧虑这一风险，而这种忧虑通常是由受到高度关注的精神病人杀人的极端案件引起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案件还导致了新法的产生，新法常以受害者的名字命名（例如美国的肯德拉法）。在英国，对精神卫生服务机构的全面改革是由两起声名狼藉的杀人案引发的，其中一起的杀人者是一个被忽视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另一起则是一个有严重人格障碍且吸毒后意识不清的男子。类似的改革在瑞典发生在外交大臣安娜·林德（Anna Lindh）被谋杀之后。

虽然这些个别事件对所有相关的人来说都是悲剧，但却并不能说明这类事件的数量在激增。举例来说，在英格兰，过去40年中精神病人杀人案的数量恒定保持在每年160起上下（而非精神病人杀人案则从1980年的300起出头增加到2000年的800多起）。大部分精神病人杀人案发生在家庭内部，或由并发有酒、药滥用的人格障碍患者犯下（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典型“精神病人”）。然而，公众中存在着恐惧，害怕遭到“过早从精神病院出院”的精神病患者的突发攻击，而这一恐惧强有力地控制了舆论。其实在英国，被超速的警车撞死的可能性要比被陌生的精神病人杀死的概率还要大。

社会共识和后现代社会

有人提出，担心风险和规避风险是后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当共同的核心价值消退时，保护自身的生存和福祉成为压倒一切的关注。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令人信服，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社会变得越来

越个人主义，社会共识越来越少，对风险的意识越来越强。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强调的是共享社会资产，例如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等，现在它已经不同程度地让位于强调个人化照料的消费主义。这一点由大幅增加的区域性和国际性社会流动反映出来，而社会流动又反过来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在我们作为成年人的活动中，家庭的核心地位已经受到削弱，而且家庭本身也不再如从前般稳固。

现代工业社会很少是“同质的”——社会被切割为大块的部分，在出身、宗教、价值观和种族上差异甚大。虽然这种现象有显著的益处，却可能给精神病学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只要不侵犯到他人的自由，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就能作为个人选择被接受，并为人们所容忍。我们大多数人都高度珍视这些自由。然而，对不同生活方式选择的容忍度增加了，却可能意味着对精神疾病敏感度的下降。当人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着装和行事时，想要分辨某人古怪的着装和行为并不是单纯的自我表现、而是疾病的一部分就变得更加困难了。躁狂病人过度活跃和脱抑制的行为就常常被误解为只是不负责任或喜欢自我表现。

酒和娱乐性药物的使用在西方社会的大量增多，令社会规范的不确定性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醉酒通常使得精神疾病恶化，并使其治疗更加困难。这也显著增加了识别精神疾病的难度——经常遇到这种不幸的情况，即在评估某个年轻学生时发现，他已经患病数月，但他的室友却将其症状归因为药物的使用，结果延迟了治疗。

歧视（对来自精神病人的风险的夸张认识），家庭破裂，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和酒、药使用的大幅增长，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对精神病人进行社区照料的难度比这个过程刚刚起步时要大得多。这一点从人数不多、但普遍出现的强制住院个案的增加，以及“再机构化”有所发展上反映出来。这种情况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一代人之前可以想象的程度相比，这种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要复杂得多，而且深入人心——构成了一种平衡。对于社区照料，我们可能会继续反思，或许还会对机构/社区的轻重作出调整。不过，在未来若干年内，大规模回归长期住院机构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在可预见的未

来，不论采用何种形式，社区照料仍将会是主流。

第四章

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

对不同的人来说，心理治疗的含义是不同的。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对心智的治疗”，但是也可以解读为“用 心智来治疗”。我这里使用第二种理解（否则所有的精神病学活动都会是心理治疗，我们就无法继续了）。在本章中，心理治疗包括了对治疗师和病人之间关系 的任何有意识的、体系化的利用，其目的在于帮助病人改变或更好地理解自己。心理治疗一般通过谈话来进行，因而现在有“谈话治疗”的说法，但是有的治疗不以言语为关键元素，有的治疗“对话”是内在进行的。

心理治疗与通常的善意有何区别？

心理治疗的很多特征是平常生活的特征。当我们的家人、朋友难过时，我们都试图通过给予支持鼓励和与他们谈心来帮助他们。许多收容院的医生都花时间与病人进行支持性谈话，旨在使病人恢复平静和理智。就目标而言，这些在广义上都是心理治疗性质的。然而，心理治疗的特殊性在于，病人和治疗师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协议 ，几乎可以说是一份契约，即专门拨出时间来集中 进行治疗。心理治疗还遵循已知和约定的方式，双方清楚地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要花多长时间。

英国国民保健制度将心理治疗称作“谈话治疗”或“心理学治疗”，以避免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心理治疗的旧有派别争论。它有一个相当有用的等级体系：

类型**A** 包括了在任何治疗中都使用的简单的心理治疗性理解（例如开抗抑郁药的医生提供的咨询和支持）。

类型**B** 包含了致力于心理理解和情感支持的专门时段。它们使用一般的心理治疗原则，但不遵循严格的理论，也没有规定治疗的次数。举例来说，一个护士和一位抑郁症住院病人经常见面，并谈论病人的处境，这种情况就属于该类型。

类型**C** 是“严格意义上的心理治疗”。治疗师受过得到认可的心理

治疗训练，并且病人和治疗师之间对心理治疗的特定过程存在明确的共识，也共同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我不惜笔墨地将这个等级体系列在这里，是因为有些较早期的心理治疗更多地属于类型A和类型B，在“严格意义上的”类型C心理治疗中没有用到这些方法时，它们往往就会被忽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起源

讲到心理治疗，就不可能不提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不论对他是爱是憎，都不可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心理治疗，而且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方式。我们在第二章提到过他。当时的他不得不离开研究生涯，在维也纳通过私人执业谋生。他的病人大部分是“神经症”患者，并且大多数都是女性。他所见最多的问题不是“神经衰弱”（缺乏动力、轻度抑郁），就是找不到躯体原因的明显躯体症状（瘫痪、疼痛、癫痫发作等）。在见弗洛伊德之前，这些病人都经过了全面彻底的医学检查和治疗，但却丝毫不起作用。

弗洛伊德笔耕50多年，著书24卷，在这一过程中，他的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时甚至自相矛盾。因此，下文的概括肯定是简化的、片面的，不过，读者可以找到很多详细的介绍书籍（例如本系列中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所著的《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的思想受到他身边科学模型的深刻影响。达尔文（Darwin）的《物种起源》为人类在自然界之中找到了明确的位置（并非是神的特殊造物），于是心智成为科学探索的合理对象。热力学定律（20世纪的物理学大部分都是由此产生的）主导了当时的科学思想。这些定律提出，能量永远不会消失——它只是转化了。19世纪的欧洲经济急速发展，工业受到火车、锻压机、船舶发动机等机械发明的推动，而这些发明都利用了“保藏的能量”。无论是水、蒸汽还是

内燃机，都表明蓄积能量后再通过设限的出口释放出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弗洛伊德对人类心智的观点完全可以拿这种现象来作比喻——他认为我们最大的破坏性和创造性成就来源于无法自然释放的力量，不论它是被阻断的本能驱动，还是受潜抑的记忆。

无意识和自由联想

如果能量守恒定律适用于心智，那么新的想法和情感必然得出自某处。法国神经病学家夏尔科使用催眠术治疗癔症性障碍（如癫痫发作或缄默症）；弗洛伊德在参观了他的研究之后，注意到了“无意识的”力量的释放。弗洛伊德起初发现催眠和暗示对自己的很多病人都有疗效，但这一结果只是暂时性的。在病人处于催眠状态下时，他鼓励病人回忆发病前的一系列事件，并推论创伤性记忆是很多疾病的原因。

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病人对他们大部分的“思维”都没有察觉——有些心理过程是无意识 的。越是努力回忆，越是回忆不起来。对此弗洛伊德采用了“自由联想”法——即鼓励病人停止努力回忆，而是说出头脑里出现的任何内容。通过这些“随机的”言语，再加上对梦的详细叙述，被潜抑的思维以隐晦的方式泄露出来（我们几乎能够看到弗洛伊德在这里想象的是蒸汽驱动的活塞）。分析师用他自己的无意识“倾听”这些言语，发现模式，并由此将病人引向苦恼的源头。因而“弗洛伊德式口误”是某人无意中透露出了真实的想法。弗洛伊德一心追求不打断这种自由联想。他认为一位治疗师应该是“白屏”的，不会透露关于自己的任何信息，常常坐在病人身后，既不回答问题，也不给予安慰。但是，只要看过他咨询室的照片，想到伴随他一生的争议，就很难想象为什么弗洛伊德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白屏”治疗师。

19世纪资产阶级的维也纳是一个非常禁闭的社会。因此，弗洛伊德发现的很多无意识冲突都是关于性的，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起初他认为自己的病人遭受了性虐待，但是他后来改变了想法，转而相信

这些描述更多的是幻想和非直接的愿望满足。他接着提出了幼儿性欲理论——即甚至非常小的孩子对父母都有强烈的“性”情感。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骚动，并且至今在很多圈子里骚动仍未平息。弗洛伊德的用词可能不够得体，但是他的观点对于理解孩子在家庭内部引发的强大动力体系确实起到了帮助。俄狄浦斯情结是他最著名的构想。弗洛伊德提出，男孩在大约3岁的时候开始渴望自己的母亲，并将父亲看作是争夺母亲感情的竞争者（基于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弗洛伊德对他理论的表达令人难以接受，然而这确实是一种深刻的见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某些人为什么永远学不会分享重要的关系。在追求排他性的亲密关系的过程中，他们破坏了自己最想要的东西。这种视角使得弗洛伊德理解了很多病人的情况（甚至今天它仍然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

图8　1910年前后弗洛伊德位于维也纳的咨询室，内有他的著名长椅。房间内布满了弗洛伊德着迷于古埃及和神话学的证据

自我、本我和超我

弗洛伊德起初认为，有意识的心智是完全理性的，它与比较原始的、缺乏逻辑的、无意识的心理过程形成了对比。这或许可以解释他在讨论中使用的一些夸张的术语。然而，他被一些病人残忍的、惩罚性的良心所震撼。像良心这样高尚的东西，怎么会驱使病人因内疚而自杀呢？他的解决办法是，将良心描述为不仅源自有意识的思维，而且源自父母和社会要求的残余，这种残余是强大且无意识的。他绘制的心智图从两个领域（无意识和意识）扩展为三个。他将原初的无意识称为“本我”（“它”），有意识的心智称为自我（“我”），良心称为超我（字面意思是“在我之上”）。这三个术语现在都十分常用。

防御机制

早期的精神分析是为了使病人能够发现受潜抑的冲突。起初，弗洛伊德及其越来越多的追随者认为这就足够了。然而，随着分析时间延长，以及分析变得愈加复杂，分析师遇到了“阻力”，即病人似乎利用各种心理防御机制来阻碍作出改变。弗洛伊德遇到的最麻烦的“阻力”之一是病人不断地爱上他（或至少将他当作父亲形象）。在某种层面上这是有助益的——如果病人喜欢你，他们更倾向于去做你要求的事情。然而，这些强烈的情感（他称之为“移情”，因为他认为这些情感是自病人过去生活中重要人物的身上转移 过来的）使探索自由联想变得几乎不可能。开始的时候，弗洛伊德将移情完全看作是一个问题，但后来他开始在分析中利用移情。“对防御机制的分析”成为治疗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确实有很多死胡同——对于一个著述如此之多的人来说，这一点并不奇怪。但是，他让我们认识到了无意识思维的力量，以及过去的经历如何持续影响人们的生活。或许更重要的是，他向我们表明，勇敢地尝试去面对和理解痛苦的源头（而不仅仅是提供支持和安慰）可以带来真正的解放和宽慰。他还向我们表明（无疑与他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开诚布公建立起的思考型人际关

系本身就可能是从严重精神疾病中康复的途径。

弗洛伊德是个悲观主义者（尤其是在经历了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从来不向病人允诺幸福。他写道，精神分析的目的是帮助病人“去工作和去爱”，仅此而已。但是，他的很多后继者的僵化和自大玷污了他的名声。他声称自己是个科学家的说法受到质疑；他的治疗方法——精神分析——因不能证明其有效性而遭到围攻。然而，他为精神病人照料中的理解和宽容做出的贡献不逊于任何一个人。他认真对待病人过去的执著态度，以及他对心理过程的形象比喻，不论对治疗师还是对病人都有着吸引力。这些都为人道的医患关系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点上，他应该得到比现在更多的认可。

荣格

弗洛伊德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追随者，而在如此富于创造力的群体里，总是难免会有紧张、冲突和分裂。其中一些人将精神分析带向了各自不同的方向，他们个人的名气也是起落不定。在他们当中，或许以卡尔 - 古斯塔夫·荣格 （1875—1961）的影响力最为持久。弗洛伊德自称是个“不信神的犹太人”，没有什么精神上的或超验的观念，荣格的理论则倾向于神秘主义。在这些理论的结构中包括了带有“原型”（所有人共有的象征性形象）的种族无意识。荣格还强调人格之中对立面的重要性，以及“影子自我”如何从那些我们未曾意识到的人格方面发展出来。荣格本人可能遭受过一次精神病性的崩溃，但他转而利用了这些强烈的非理性体验。与弗洛伊德不同，他相信治疗可以促成深层次的个人实现。他的方法受到治疗重病患者的专业人士的欢迎，对艺术圈子也颇具吸引力。不过，荣格称得上最经久不衰的贡献也许是他对内向型 和外向型 人格类型的阐述。这些阐述已经融入了日常的语言，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使用这些词汇，尽管他们甚至不知道荣格是谁。

精神动力治疗

精神分析最初与犹太治疗师密切相关，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纳粹迫害的目标。其结果是大部分治疗师不得不离乡背井，其中大多移居到了美国、英国和南美。在所有这些地区，精神分析的工作和教学都开始对精神病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影响远远大于在其发源地德语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精神分析师产生了额外的需求。精神分析师不但将注意力转向受创伤的士兵，还令人惊讶地转向了对组织机构的理解（尤其是军队）。从这一趋势中诞生了集体分析和集体治疗。5至8个病人为一小组，一起接受治疗，互相支持，分享顿悟。集体治疗促成了治疗社区（见第三章）的形成；在治疗社区中，分析和心理顿悟被应用于运作一个单位（而不是用于个体治疗）。这种非正式的、社区性质的途径（工作人员和病人共同承担单位运作的很多任务）被称作“社会治疗”，它已成为现代精神病学实践、药物成瘾康复机构以及一些监狱的标准特征。

经典精神分析的过程十分漫长（每周会面3到5次，常常要持续数年时间），这一点一直以来都受到强烈的批评。此外，它的费用也高得令人不敢问津。很多人相信较短期的治疗能够让心智更加专注，并改善治疗效果。如今，典型的“短期”治疗一般持续3到6个月，每周一次，一次一小时。人际关系治疗把重点放在人际关系上，认知分析治疗则将写信等特定的练习和布置家庭作业作为治疗的一部分。治疗师虽然仍保持着严格的专业界限，但同时也越来越活跃了。

这些治疗通常被称为“精神动力”治疗，因为它们认为过去和现在之间、意识和无意识过程之间的动力学相互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人生故事，他们的“叙述”，是理解和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核心。所有这些都要求治疗师退后一步，不要给太多的直接建议，这样病人才能够在指导下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这些治疗通常与其他精神科治疗（抗抑郁药、医院照料等）结合起来使用。

心理治疗中的非特异因素

大多数精神动力治疗师非常忠实于他们的模型，确信他们的治疗有特异性。遗憾的是，目前的证据并不支持他们的观点。不同于认知行为治疗，对精神动力治疗的研究非常之少；尽管如此，其现有的研究仍然令人很感兴趣。这些研究表明，严格按照所受培训进行治疗的有经验的治疗师，其治疗效果要比新手或不严谨地使用模型的治疗师要好得多。然而，究竟使用哪种 治疗模型并不那么重要——它们差不多同样有效。这项研究主要证实了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的重要意义。

一位治疗师是否优秀比任何不同的思想学派都要重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治疗师必须具备以下必不可少的条件：准确共情 （治疗师必须真正理解病人的状况，仅仅为病人感到难过是不够的）、无条件尊重（治疗师必须喜欢和尊重病人，如果对病人十分厌恶，是无法进行治疗的），以及非占有性的温情 （治疗师必须能够表达温情，同时不使病人感到受了自己的恩惠）。这些能力在精神病学实践中特别有用。病人和治疗师之间的搭配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并不是能和每个人都融洽相处。举例来说，治疗暴力犯罪者或性侵犯者就需要特别宽容的治疗师。

存在主义和经验主义心理治疗

有些心理治疗学派在经过发展之后使用精神动力治疗的技术，但并不接受其理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就是其中之一；正如其名字所示，它对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不作假设，而是将重点放在帮助病人用自己选择的方式表达身份上。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与荣格的方法有些接近，并随着社会的僵化和划一程度日益降低而越来越流行。

弗洛伊德的病人通常知道家庭和社会对自己的期望，并且因为不能达到这些期望而痛苦。但在21世纪初，人们更倾向于体验到的是无目的和空虚，而不是无法实现期望的内疚。情感疏远和意识错乱现在

已成为病人主要的症状，因此心理治疗正变得越来越结构化，以为病人提供界限和包容。

这些更加注重此时此地的治疗不知不觉地融入到了个人成长运动中。有时很难区分诸如格式塔治疗[1]或碰面小组是为了减轻痛苦进行的治疗，还是为了提升个人幸福和自我实现所作的练习。或许目标是什么并不像谁达到这个目标那样重要。不可否认地，抑郁和沮丧的精神科病人从这类改善精神面貌和自信心的活动中极大地受益了。在对自伤的年轻女性进行治疗时，直接针对自尊问题可能是最有效的干预之一。

精神动力治疗目前在精神病学中受到攻击。其遭受批评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研究能够证明它们确实行之有效。另外，它们要求治疗师自己也接受治疗，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持续接受督导，这种做法损害了客观性，并且使得精神病学有点像一个“宗教秘社”，而不是一个专业。对短期动力治疗进行的一些研究显示，其疗效大体上是不错的。然而，尚需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以识别哪些方面是有效的，哪些是多余的。这样的机遇甚至可能已经错过了。精神动力治疗的许多核心特征现在已经被吸收进常规照料中（前面提到过的类型A和B治疗），因此它们作为特异性治疗的贡献可能很难剥离出来加以评价。

精神分析遭到如此强烈的批评并不奇怪，因为它确实过度地推销了自己。从1940年到1970年，精神分析在美洲（北美和南美）几乎将所有其他理念都逐出了精神卫生服务——以至于大部分人以为精神科医生就是精神分析师。由于精神分析对精神病患者起不了什么作用，因此这些人被忽略了，同样被忽略的还有基本的诊断和治疗技术。批评家们指责说，这一时期美洲的精神病学虽然受到尊崇，工作人员人数也越来越多，但却完全背弃了严重的精神病人，也完全背弃了科学。肯尼迪总统在60年代初曾经试图给这个专业重新定位，但却没有成功；这一重新定位直到药理学革命时才真正实现。一种更科学、更具自我批判力、建立在确凿研究数据基础上的精神病学出现了，它对精神分析进行了报复（也有人说，现在这种精神病学正在犯下许多同样的错误——第六章）。

新型心理治疗和咨询

在过去40年间，一系列迥然相异的新型心理治疗方法发展起来。这些治疗远不那么注重对病人过去的理解。治疗师通常更具指导性——他们给予病人指示和意见，而不仅是进一步鼓励病人思考。很多治疗包含了特定的练习和“家庭作业”，并在每次会面时对此进行检查。这些治疗持续数月而不是数年。心理治疗师的做法和其他精神卫生专业人士更加相似，并且竭力避免笼罩着精神动力治疗师的神秘气氛。

以人为中心的（常称作罗杰斯氏）咨询就是这样一种治疗方法。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之间的界线是多变而又模糊的。在人们遇到个人危机的时候，我们常常向他们提供咨询，这些人我们通常并不认为是“病人”。咨询的目标比那些正规的治疗要低。它依赖于前文所述一个优秀治疗师应该具备的特质，并且为个人提供了一个探讨其忧虑的“安全空间”。在这里，治疗师是 非指导性的。他们很少给出意见，也很少建议病人去做什么或去想什么；他们常常只是重复病人最后说的话，来鼓励病人继续思考。咨询这种技术受到许多精神卫生专业人士的高度赞扬，而且显然也得到病人的珍视。

家庭治疗、系统治疗和危机干预

家庭治疗在治疗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方面已经变得十分重要。家庭治疗师一般避免暗示是家庭导致了这一疾病（见第五章），但有时候家庭若不改变其反应方式，病人就不可能好转。例如，在神经性厌食中，父母可能对女儿的病非常担心，以至于不允许她有任何冒必要风险的自由，也因此她无法成熟起来。父母可能需要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后退一步，并收敛他们的焦虑。有时在成年病人中也会发生相同的情况，这时家庭治疗常常帮助夫妻就相互之间的关系作出调整。家庭治疗通常依赖一种“系统”途径，它将重点放在整个家庭上，而不是个体成员。

“行为的家庭管理”以问题解决型的方式为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家庭提供帮助。病人如果生活在高度情绪化的家庭里（尤其是存在紧张和

批评时），他们的病更容易复发。让家庭避免这种情况非常困难，所以治疗的目标是识别相互关系中的导火索，并找到替代方案（例如，走进另一个房间而不是反唇相讥）。实践已经表明，这种方法降低复发率的效果几乎与药物相当，不过它实施起来时间漫长，而且相当困难。

在这里我们把危机治疗和系统治疗摆在一起，这是因为它们处理的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危机治疗或家庭治疗中，你不需要到处深挖——问题就在眼前。危机治疗是戏剧性的，持续时间常常非常短；它应对强烈的情绪，往往对情绪的起源关注有限。家庭治疗总体上得到了有力的证实，但对危机治疗人们仍然存有疑虑。例如，有些研究者提出，创伤发生之后向受创者了解事情的经过甚至可能使情况更糟。这可能是因为它干扰了忘记不愉快事件的健康过程。

行为治疗

行为治疗的原则与精神动力治疗截然不同。这些原则基于学习理论；学习理论不把“意识”作为考虑因素，它将变化解释为反射性学习。说到行为治疗，就不可能不提到B. F. 斯金纳（B. F. Skinner）；他证明了只要通过奖励想要的行为（“操作性条件作用”），或“惩罚”想要制止的行为，就可以训练老鼠完成相当复杂的行为。行为是每次一小步、一步一步地被“塑造”出来的。行为治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受试者是否同意、甚至是否知情无关——这种学习完全是无意识的。

行为治疗有惊人的效果——想想你骑自行车有多容易，然而你也许从来就没有“有意识地”学过骑车。你只是试着去骑，每次开始出错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作出纠正，而现在你骑车的技术非常高超。行为治疗就是像这样发挥作用的。它对于有学习障碍的人和儿童特别有效。一个操作性条件作用的简单例子是为夜间遗尿（尿床）设置的铃 - 垫系统。床垫一旦被尿湿，铃声就响了，将病人叫醒。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病人通常是男性）在膀胱充盈时就会开始醒来，因为这种膀胱充盈的感觉与铃声和被叫醒联系在了一起。尽管关于尿床有互相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尿床是神经症问题的征象，另一种相反的

观点则认为尿床主要是遗传决定的），这种成功的治疗方法仍然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行为疗法广泛用于对恐怖症和强迫症的治疗。治疗师将病人逐渐暴露于所恐惧的刺激（例如，对担心沾染细菌的人来说，一只脏手），同时限制其躲避行为，并监控其焦虑水平，以确保焦虑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在实践中，行为治疗师仍然采集详细的病史，因为没有良好的治疗关系，病人就会退出治疗。

认知行为治疗

认知行为治疗可以看作是行为治疗的一种复杂延展，但也可以看作是精神动力治疗的一个改造版本。它介于这两种治疗之间。这种治疗方法是由美国精神科医生阿伦·贝克（Aaron Beck）研制出来的。这位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精神科医生发现，自己的一部分病人不能从精神分析中获益。这部分病人总体而言更加重视掌控自己的症状，而不是理解它们。他的探索——尤其是对抑郁症的探索——使他确信，让病人陷入困境的不仅是情感，还有无意识的、病理性的思维 。他由此发展出一种治疗方法，使病人能够识别“自动的负性思维”（自我批评、自我挫败的看法和结论），并训练病人如何挑战和质疑这些思维。

他的方法强调“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苏格拉底认为，传授真理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提出合适的问题，人们自然会从中找到答案。每当病人表现出病态怀疑时（例如，“我今天工作出错了。我的前途全完了。”），治疗师会要求病人解释这个说法（“请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希望了。”）。他将病人的这些想法和现实情况两相对照（“请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虽然你犯了这些错误，但是仍然被提拔了？”）。认知行为治疗现在是精神病学实践和培训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且是抑郁和焦虑治疗中的标准构成要素。它还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许多其他疾病，其中既包括表现出顽固性幻觉或妄想的精神分裂症，也包括带有明显心理因素的躯体病症。

自助

自助可能算不上是精神病学，但自助运动是从心理治疗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嗜酒者互诫协会”、“体重守望者”、“抑郁症联盟”，这些组织都将已知的心理治疗知识付诸实践，但是它们并不止是这样。准确共情和无条件关注——还有谁会比亲身经历过的人在这两点上做得更好呢？普通人和有着相同问题的人相比，谁谴责病人的可能性更小呢？非占有性的温情——还有什么比共同的痛苦体验和真正的相互了解更能带来这种情感呢？自助团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间运动，它们缓解痛苦和隔绝，并且减少歧视。对于常见病症，如焦虑和抑郁，相关的自助书籍和电脑程序越来越容易获得。对自助的影响作出判断还为时尚早，但是它无疑已得到了大众的支持。

在精神病学创立200年之后的今天，将心理治疗局限于短短的一个章节中似乎是件奇怪的事情。它真的能说是独立于精神病学的吗？又或者，精神病学真的能说是独立于心理治疗的吗？心理治疗已成为精神科技能的定义性特征——就像外科医生做手术、放射科医生读X光片、产科医生接生一样。150年前，收容院的医生会花时间与痛苦的病人交谈，带给病人理解和宽慰。到20世纪下半叶，这种个人关系已成为大多数人从事这一专业的原因。然而，随着我们步入21世纪，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越来越被看作是平行的活动。精神病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吗？时间将证明它们是会再次结合，还是会继续追寻日益独立的道路。在以下几章中，我们将会谈到驱动这些变化的一些力量。

注释

〔1〕 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又称完形心理学，20世纪初由德国的苛勒（W. Kohler）和考夫卡（K. Koffka）等首创的一个心理学派，强调整体不是其组成部分的相加，而是有其本身的特性。

第五章

内外夹击下的精神病学

自诞生以来，关于精神病学的争议就从未间断——从来就没有过一个较长的“黄金时代”，风平浪静，人人意见一致。或许你就是在经历了一场关于精神科医生一些做法对与错的激烈争论后，才买下这本书的。因为精神病学是针对心智的，也因为精神科医生可能违背我们的意愿行事，所以精神病学总是会激起一定程度的怀疑和恐惧。这一点无法仅仅归咎于人们的无知，无法用“如果人们知道更多的话，就不会有这些顾虑了”这样的说法轻轻带过。关于精神病学，确实存在很多真正的问题——既关于它的合理性，关于它“只是另一门医学专业”的地位，也关于它的实践。现代医学的力量总会带来伦理上的挑战和争议，精神病学也不例外。这些我们会在第六章进一步讨论。本章讨论的重点将是精神病学固有的 、源于自身性质的矛盾和对立，而不是关于实践的问题。

心智-躯体二元论

法国哲学家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常因西方思想里心智和躯体的区分（常称作“笛卡儿氏二元论”）而遭受指责。他的“我思故我在”生动好记；这个说法表达了他对认识物质世界是否存在确定性的怀疑。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尽管同时代的大部分经验主义哲学家都和他一样，纠结于心智和躯体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单单把他挑出来，承担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指责”。关于心智的问题并不是他发明 的；他只是将其中一些论题阐述得更为清楚明白，而且这些论题在35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心智是什么？它与物质世界是如何互动的？这些仍是谜团。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确实 认为心智和物质世界之间具有差异，并且承认二者之间确实 存在互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必须相信自己能够直接影响物质世界（例如，我决定伸出手臂、我期望打开电脑）。我们也需要相信自己能够了解他人的心智（例如，我肯定你会去图书馆，或者我肯定你会把论文交上

来）。没有这些信念，我们实际上就会瘫痪。

在精神病学中，心智-躯体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心智和大脑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大问题。如果精神病学仅仅是关于“大脑疾病”的话，问题就简单了，就像肾脏病学是关于肾脏疾病的，心脏病学是关于心脏疾病的。然而，精神病学却是关于“精神”疾病的。我们知道有很多精神疾病涉及大脑病症（例如，在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中，会出现细胞间化学递质的紊乱），但并非所有的大脑疾病都是精神疾病，这些疾病也并非都是精神科医生的职责所在。多发性硬化和帕金森病毋庸置疑都是大脑疾病，但治疗它们的是神经内科医生，而不是精神科医生。这些神经病症常常引发 精神疾病问题，正如许多躯体病症能够引发精神疾病问题一样。很多精神障碍包括躯体症状（例如疲劳和疼痛），正如躯体病症包括精神疾病症状（例如抑郁、焦虑、甚至幻觉）一样。

精神障碍指的是主要紊乱出现在思维、情感和行为的疾病（第一章）。躯体疾病并非只有躯体病因和疗法，精神疾病也并非只有精神病因和疗法。疾病可以有躯体病因，甚至可以有躯体疗法（例如，完全由帕金森病导致的抑郁症可通过抗抑郁药有效治疗），但仍可算作是“精神疾病”。其划分在于，何种紊乱是主要的 ，以及需要何种技能来帮助病人。“精神病症是大脑病症”常被一些精神科医生和病人群体挂在嘴边。它的目的是强调精神和躯体疾病的相似性，尽力减轻歧视和指责。其目标令人钦佩，但说法却过于简单化。精神病学不得不在两个主要战场上与意义的含糊不清作斗争。

先天和后天：精神疾病是家庭造成的吗？

一个人是高是矮，是否擅长运动，大多数人都相信这取决于基因（天生的生物学潜能）和成长环境（饮食、锻炼，甚至所上的学校）的共同作用。在此问题上并不存在争议。然而，一提到心理，争论就冒出来了。智商是遗传的吗，还是只要机会同等，每个人的智商就会

同等？人格或犯罪行为是与生俱来的吗，还是可以后天改变？我们通过健康的生活能否避免抑郁症？没有什么问题比我们对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的看法更两极分化了。这些争论不完全是和风细雨的学术讨论，它们还会火上浇油，激化反映了根本不同的世界观的政治和社会信念（并反过来又为这些信念所激化）。

精神病学起初完全是站在“先天”这一边的——即认为精神疾病在家族中代代相传，是遗传上的缺陷。精神病学当时的任务是改善病况，尽可能使得生活容易一些，并希望能够达成迅速的康复。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开始改变这一切，将天平倾向“后天”。精神分析牢固地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早年生活的经历，以及对这些经历的记忆，是很多疾病的起因 。更令人信服的是，弗洛伊德向我们表明，解决这些记忆问题能够治愈 一些精神疾病。因此，一个病人的个人史（即他们的“叙述”）不仅可作为理解其疾病的背景，还可能是其疾病的源头。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精神分析主导了精神病学的理念和培训。精神分析对美洲的吸引力应该不足为奇。毕竟，这些社会是由那些逃离欧洲的人建立起来的，他们逃离了欧洲悲观的宿命论，逃离了其不可撼动的社会等级及世袭的君主制和贵族制。这些迁往西方的人们拒绝接受这种状况，抓住了为每个人打造自己未来的机遇。因此理所当然地，他们会支持这一将个人的成长潜力奉为神圣的心理学派，因为它倡导个人能够克服早期的限制，塑造自己的命运。此后，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对战斗创伤的观察资料，后天和人生经历所起的作用进一步得到了证明（第三章）。而对纳粹德国人种改良和种族主义政策的揭露（其中包括对“遗传上低下的”精神科病人的清洗），最终奠定了后天论在道德上无懈可击的地位。

强调后天作用的吸引力之一是，它为治愈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如果精神疾病从根本上说是由人际关系引起 的，那么，通过人际关系（即心理治疗）它们便应该能够得到治愈。然而，这一理念有其不利的一面，即可能对责任进行归咎——尤其是归咎于父母。当弗洛伊德开始怀疑病人报告的受到父母性虐待的情况（起初他认为这是自己的病人所患神经症的病因）可能是幻想的时候，他本人很快就意识到了

这些风险。伟大的德国精神病理学家和哲学家雅斯贝斯指出，尽管理解症状的个人相关性在精神病学中至关重要，但它并不等同于理解引起 疾病的原因。然而，在公众对此问题的争论中，这一精细的区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体现。

精神分裂症的起源

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是精神分裂症的起源。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精神分裂症会在家族中代代遗传，而且也观察到这些家族看起来会显得“古怪”（怪僻或退缩），常常还会伴随紧张或过度干涉的家庭关系。由于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表现在思维和与人相处方面的病症，因此很明显地，它和早期的教养之间可能存在着联系。毕竟，家庭生活是通过思考和相处来进行的，而其目的则是为了使成长中的孩子能够掌握这些方面的技能。随着精神分析理念应用于精神分裂症（这是弗洛伊德本人明确避免的），很多理论被提了出来，其中一些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成为了精神病学语汇的一部分。

“精神分裂症源性母亲”

这些理论中最臭名昭著——而且也许是最具破坏力——的，是关于冷漠、敌对但控制欲强的家长的理论——即“精神分裂症源性母亲”（字面意思是“导致精神分裂症的母亲”）。这个说法由分析师弗里达·弗洛姆 - 赖希曼（Frieda Fromm-Reichmann）提出，她曾与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一道，对美国的住院精神分裂症病人进行了长期的高强度精神分析。她最著名的病人乔安娜·格林伯格（Joanna Greenberg）后来在自己的畅销自传体小说《我从未向你承诺过玫瑰园》中叙述了这一治病经历。

弗洛姆 - 赖希曼描述了一个强势但又冷漠和拒绝与人亲近的母亲形象，她将病人紧紧捆绑在自己身边，阻止病人健康的独立能力和自我意识的成长。精神分裂症于是被理解为一种“自我发展”障碍，其结果是个人边界的薄弱（所以才有了幻觉当中内部和外部体验的错

乱）。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弗洛姆 - 赖希曼的结论简直是荒谬的。她的结论完全基于对病人陈述的分析，从未亲自见过或访谈过病人的母亲。有传言说，她的想法仅仅来源于对11位病人的分析。尽管在专业领域内这一结论早早就遭到了摒弃，但仍有人确信家庭能够“导致”精神分裂症。这使得很多父母无休止地责怪自己，在有些情况下他们还受到了精神卫生工作者的白眼和排斥。

“矛盾性支配”

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提出，与一个孩子进行逻辑错误、自相矛盾的持续交流，会对这个孩子正常自我意识的形成和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建立造成妨碍。贝特森深受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怀特海（A. N. Whitehead）的数学著作的影响。这两人提出的其中一个理论是，规定某一数列的那个数字本身不能是该数列的一员——因为这个规定数字属于“逻辑上不同的序阶”。贝特森宣称，交流中也存在类似逻辑上不同的层次；在我们（常常是以曲折隐晦的方式）互相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信息的一部分指明了它的主要部分应该如何理解。他将这些曲折隐晦的信息叫做“元交流”（即关于交流的交流）。典型的元交流是感情上的、非语言的，并且成为了对家庭的自动假设（例如，“母亲只能够爱孩子，对孩子永远只有正面的感想”）。

贝特森将非语言信息和语言信息互相抵触的情况称为矛盾性支配：例如，一个明显愤怒的母亲说，她对孩子打碎杯子一点都不介意，并伸出双臂要拥抱孩子。矛盾性支配需要三个组成部分：简单明确的信息、构成矛盾的元交流，以及对承认矛盾的绝对禁止。这三个部分都是必需的，但其中最具病态的恐怕是家庭文化对矛盾的拒绝承认。毕竟，所有家庭都会发出矛盾和令人困惑的信息。“矛盾性支配”这个术语现在用来宽泛地表示任何矛盾的交流，但是贝特森的理论要精确得多。

这些理论最后都被细致的科学研究确凿无疑地驳倒了。其中一种方法是让独立的研究者分别认真听取有和没有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家庭的对话录音，评定矛盾性支配的发生率，或对这些家庭进行访谈，然

后评定其冷漠、敌对、过度干涉等的等级。这些研究的结论是没有发现可靠的差异。而对收养的研究则给了这些理论致命的一击。对从一出生就被健康家庭收养的儿童进行的缜密研究发现，他们长大之后精神分裂症的发生率与由患精神分裂症的母亲抚养长大并无二致。与此类似，对刚出生就被不同家庭收养的双胞胎所作的研究表明，同卵和异卵双胞胎之间精神分裂症发病率的差异同他们在亲生父母家庭长大的发病率差异也相同。当然，这些风险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抚育和环境显然仍发挥着很大的影响。

虽然家庭影响是精神分裂症的病因 这一理论已被肯定地推翻了，但它仍涉及疾病的病程 。生活在情绪高度激化的家庭中的精神分裂症病人更常发病。当然，这有可能是因为病情较重病人的家庭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见第四章）。然而，训练家庭减弱反应的情感强度的确能够降低发病率，因此高强度表达的情感大概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社会和同辈群体的压力

虽然家庭影响受到质疑，但是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却在过去半个世纪内越来越得到重视。例如，紧跟着女性以瘦为美的文化观念，进食障碍（神经性厌食和贪食）的增长趋势从西方社会蔓延开来。自伤的盛行（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服药过量和自我割伤）显然受到群体规范和期望的影响。区域性的爆发常常可以与电视肥皂剧中的自杀情节等特定事件联系起来。

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饮酒和使用药物的差别极大（不论在国与国之间、还是在一国之内都是如此），而群体期望对这些行为的影响力是不可否认的。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至于这些行为是否可称为“精神疾病”，则会在第六章再次予以讨论。

进化心理学

先天——后天之争本来已渐渐退去，最近却又因进化心理学的兴起而重新活跃起来。随着对达尔文进化论（适者生存）更为深刻的理解，产生了一些认为某些精神障碍可能具有进化价值的理论。若从过度简单化的观点出发，预测结果将是所有带遗传成分的精神疾病都会降低生存几率，因而会逐渐灭绝。然而，依据“广义适合度”，评价一个特征的进化价值并不仅仅基于它是否有助于该个体 的生存，而是基于它是否更有助于该个体后代 的生存。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1976年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对当个体为了他人牺牲自己时，群体支持和利他主义的进化优势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此之后，针对各种行为差异和精神疾病的进化优势，有一系列猜测性的假说被提了出来。这些假说中有很多借鉴了行为游戏理论（即，要理解任何行为的益处，只能通过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行为）。因此，抑郁症或许可以视作是对在等级群体里“被打败”的安全反应，因为它使得个人在恢复过程中退出冲突。躁狂症则正相反，它表现为异常欣快和性活动的增加，这被认为是在等级争斗中获胜的反应，目的在于促成该个体基因的传播。当灵长类动物在主导其生活的尊卑等级中移上落下时，可以明显地见到其类似抑郁和轻躁狂的行为变化。

针对精神分裂症个体表现出的习惯性隔离和对社会接触的有限需求，提出了一个相当具有想象力的假说：即，这是对食源缺乏的偏远栖息地的一种适应（同时也是对传染和流行病风险的一种防护）。进化心理学对精神病学理念无疑将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为许多的精神病症与传统的“医学模式”并不契合。而且可以看到，进化心理学已经帮助建立起了在讨论中不再非此即彼的方式。然而，这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领域——这倒不是主要因为精神病症，而是因为它同社会行为、特别是特定性别行为的关系。在这一点上，进化心理学常被看作是合理化以男性为主导的剥削性世界观的一个借口。好在这场论战是别人的。

家庭成员为何自责？

如果这么多家庭理论都已经被推翻了，那为什么还要在这个问题上花费这么多时间呢？尽管证据指向相反的方向，有关精神疾病的家庭理论仍然对我们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并且不只精神分裂症的情形如此，抑郁症、神经性厌食症、人格障碍、药物滥用和酗酒等等亦都如此。不管孩子发生了什么，父母似乎都会没完没了地怪到自己头上（或许孩子也会这样责怪父母）。这或许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相信。就像我们需要相信自由意志和自己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一样，家庭成员需要相信他们之间能够相互影响。如果不是这样，那何必费事建立家庭呢？进化心理学家会说，父母需要相信这一点，这样他们才会把经年的时间投入到抚养孩子上。生物学程序设定了我们必须照顾孩子，因此我们需要某个信念体系来支撑它（正如他们会说，生物学程序设定了我们必须交配，因此我们需要相信爱情来支撑它）。这样的信念被认为是维系我们关注生物学使命的一种机制。

当然，这就有了不好的一面，即内疚和责怪。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具有影响力，那么一旦情况未能顺利如愿，我们就会感到自己失败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在情绪表达治疗中，尽管治疗师会一再强调责任不在任何人身上，治疗的目标也纯粹是为了找到更有效的应付策略，家庭成员仍然会感到受责怪。“如果我们不是干涉太多的话，他不会发作那么多次。”“别的家庭肯定做得更好，要不然治疗师怎么会知道该提供什么样的建议呢？”对一些家庭来说，虽然内疚伴随而来，但感到有责任会让心里更好受一些。因为这暗示着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即他们一定能够做些什么 来影响结果。在重视认命的文化里，自责的可能性便较小（强烈的情绪表达在印度就比在欧洲要少）。

反精神病学运动

关于心智和大脑、先天和后天的争论一直以来都是精神病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这些争论支撑了对精神病学最为持久和著名的“外部”攻击。这就是后来所称的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反精神病学运动”。60年代初的精神病院丑闻和埃尔温·戈夫曼《收容院》的发表为这场破坏力极大的袭击奠定了基础。这不是针对精神病学某些实践或体系内某些失误的批评，而是对精神病学本身地位正当性的攻击。

反精神病学运动想要传达的信息是，精神病学需要的不是改善，而是应该整个废弃。往好里说，精神病学不但唬己，而且唬人，往坏里说，它就是披着仁医羊皮的狼，是用于压迫的极恶工具。三位颇具个人魅力的作家涌现为这场运动的化身。其中两位是执业的精神科医生。在学生骚乱正势成燎原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他们的著作成为了大学校园里的《圣经》，并在1968年的巴黎学生革命及其国际影响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托马斯·萨斯是个移居美国的匈牙利人，他因1961年出版的著作《精神疾病的神话》而声名鹊起。在这本书中，他提出“精神疾病”是为了剥夺离经叛道个体的合法权利而虚构出来的。他强烈反对非自愿治疗，主张将精神病学和政府分离，要求废除以精神失常为由的辩护。他认为，被判定患有精神疾病的个体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也应该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是说，精神病患者应该有权拒绝治疗，而如果他们违犯了法律，同样应该被送进监狱，即使他们病状明显也一样）。他常常将癔症作为自己的精神疾病模型（这或许反映了他在纽约做精神分析师的经历），这局限了他论点的说服力。有人提出，他的极端自由意志论立场和对强制手段的反对都源于他在苏联占领下的个人经历。基督科学教经常引述他的论点，作为他们反对由政府掌控和强制性的精神病学的依据。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哲学家，他认为精神疾病的概念是后启蒙时代出现的一例异常。他反对将身份分类，认为疯狂　的存在不等于疯人身份的存在。他的著作《疯狂和文明》直接对精神病学实践的基础发起了挑战，把它描绘成阻抑的、控制的（而不是治疗的、解放的）。

他的著作对欧洲大陆产生了巨大影响（于巴萨格利亚在意大利进行的改革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他的文笔晦涩难懂，他的著作也是被人引用的多，阅读的少。

反精神病学运动家中思想最易懂、影响最广泛的是R. D. 兰恩。这位格拉斯哥的精神分析师凭借卓绝的头脑和明快的散文式文风，写出了一系列的畅销书，颠覆了整个精神病学界。他见解独创、言行冲动，整个职业生涯里观点都一直在不断变化，而且和弗洛伊德一样，他不觉得自己有必要承认这些根本性的变化，甚或是解释它们。他的第一本、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1960）。他将自己的立场称为“存在主义现象学”（还是不要深究的好！），提出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妄想性思维只不过是对世界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他认为这样的思维我们理解起来会有难度，但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创造性的，并且如果有足够的想象力和道德勇气，它是可以被理解的。然而，这些不同的世界观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因此我们试图以强加诊断的方式拒绝接受它们，将它们“病态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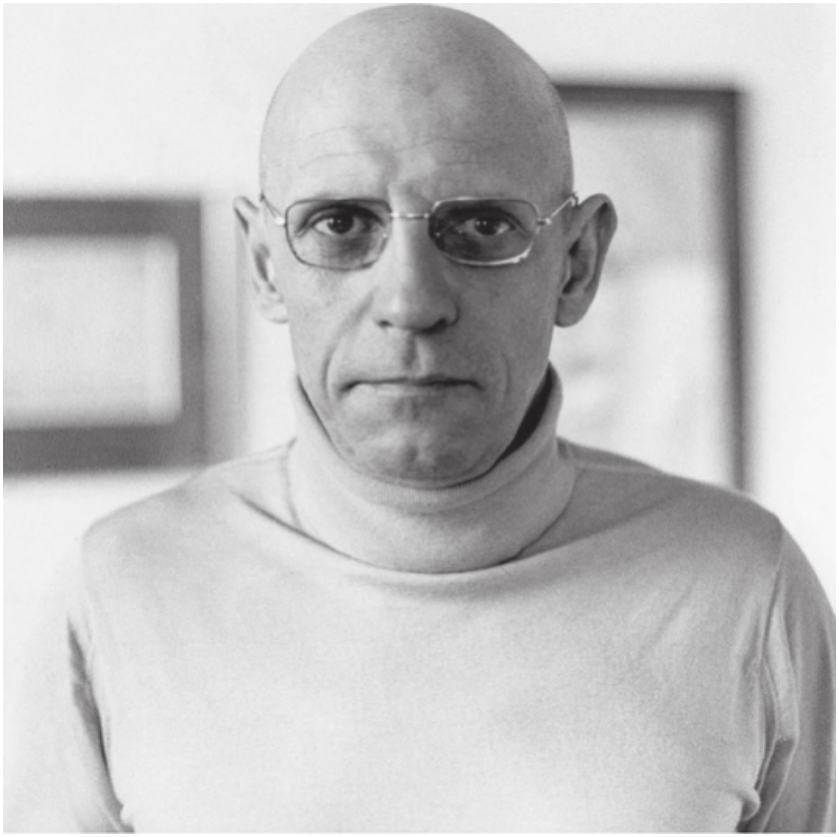

图9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法国哲学家，他批评精神病学作为一种阻抑性社会力量将权力滥用合法化

这本著作中充满了对兰恩治疗过的病人生动鲜活的描述，对他们所处困境的诠释触动人心、天马行空。《分裂的自我》一书给人留下的关于精神病的印象是，这是一个饱受折磨仍英勇顽强的个体在传达自己清晰、真实的体验，却遭到社会怯懦和卑鄙的拒绝。虽然兰恩并不否认精神疾病患者的痛苦，但他对疯狂本质上抱着罗曼蒂克的看法，因此在攻击精神病学的同时，又（自相矛盾地）为精神病学吸引到了新的生力军。和萨斯一样，兰恩从未自称是个反精神病学运动家（这一称谓是1967年由他的同事戴维·库珀［David Cooper］创造的），他一直都在执业，虽然方式离经叛道。

图10　R. D. 兰恩（1927—1989）：20世纪60和70年代反精神病学运动家中最具影响力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兰恩在他的第二个“阶段”提出，家庭拒绝接受孩子逐渐形成的身份促成了精神分裂症的发生。他与阿龙·埃斯特森（Aaron　Esterson）合著的《健全、疯狂和家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将精神分裂症看作是对阻抑和拒绝的教养方式的反应。由此书获得灵感拍摄的电影《家庭生活》（1971）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反响。兰恩的第三个阶段出

自他大量服用致幻药物LSD的亲身体验（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1967年出版的《经验政治与天堂鸟》一书视精神病为一次迷幻的发现之旅，在这一旅程中，知觉和意识的边界扩张了。

图11　东京一精神病学系的废墟——学生们在听了1969年R. D. 兰恩的讲座之后跑去烧毁了它

兰恩担当起这样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角色听上去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他在职业生涯之初是个军队精神科医生。他的个人生活风波不断，结过数次婚，有很多孩子。他的讲座精彩起来会启发灵感，糟糕起来的话坦白说是痴言胡语、不知所云。他激发人们反体制情绪的能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1969年他在东京对一群学生作了演讲之后，这些学生跑去烧毁了精神病学系！他一生直至62岁去世时都是个激进分子，而他的离世方式也令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惊讶：他突然倒下时正在法国的度假胜地蓝色海岸从事着小资得不能再小资的活动——打

网球。

21世纪的反精神病学活动

精神病学生来固有的矛盾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引发了那场反精神病学运动，而这些矛盾至今没有消除。心智和大脑、自由和强制、与他人不同的权利（或许甚至可以说与他人不同是一种义务 ）、先天和后天，这些仍然是活生生的问题。很多（尽管绝不是所有）由从前的患者组成的团体都成为了激进的反精神病学人士，他们常称自己为“幸存者”，而不是患者、求治者或服务的使用者。在德国和荷兰，国家出钱为那些“逃离”了常规精神卫生服务的个人提供宿舍和临时住处。最高调的反精神病学团体也许要算是基督科学教了。尽管它反对的重点在于一些存有争议的治疗手段，例如脑外科手术和电休克治疗（第六章），但它对整个精神病学也是持批评态度的。该组织提出，我们应该避免用人工和技术的方法缓解人类的病痛，而应该寻求其他的、个人的途径。

不过，总体上来说，联合起来把矛头指向精神病学这整个学科的反对声浪现在是小多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许部分要归结于对快速扩张的“生物学”解释的过度信心，以及认为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的进展很快将会使整个问题学术化的过分乐观。然而，尽管对精神病学这一概念的反对少了，对其实践的方方面面，反对之声仍然此起彼伏。我们接下来即会在第六章讨论这些问题。

第六章

肆意滥用

精神病学实践中的争议

精神病学实践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其易遭误用和滥用的可能。它包含着一种高度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病人非常依赖和脆弱，他们的观点和申诉很容易被看作是“疾病的一部分”而置之不理。诊断过程的主观性也是一大原因，这一过程依赖于精神科医生在没有可见疾病标识的情况下，对病人的动机和精神状态作出评估。精神病学的历史同样不能给予人们多少信心。可耻的政治滥用、不经的理论学说，以及在我们看来既危险又野蛮的治疗手段在它的历史上都层出不穷。现代精神病学广受监督（机构的大墙已经不再能够阻挡视线），再加上信息通达的公众，以及它犯了错误愿意承认的态度，这些或许是针对此类滥用最好的防卫。令人欣慰的是，精神病学也已完全投入到了世界范围内科学的、循证的医学运动——事实和数据优先于权威和观念得到考虑。因此，尽管本章的重点在于精神病学可能会犯什么错误，但不要忘记，更多的时候它是对的，而且其进步是巨大的。

在公众的想象里，精神病学滥用的最大风险来自于它无边的权力。邪恶精神科医生的形象在电影中频频出现：他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操纵受害者的心智，并以把精神痛苦者和易受暗示者握在手心为乐。《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莱克特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非常善于洞察受害者的思想，并运用这种力量引他们入套、利用他们。在另外一些电影里，精神科医生生出了用自己的力量统治世界的夸大妄想。

在较小的程度上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精神科医生因为确信自己绝不会有差错而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为确认性别认同是由社会决定的而进行改变性别认同的实验；其他的例子还有：在一时的疯狂之下，毁伤了数百人的牙齿和肠道，只为了消除其中被认为是精神疾病病因的感染源；在20世纪40和50年代大规模地

施行脑白质切断术。然而，大部分精神病学的过分做法却恰恰是出于相反的缘由，它来自精神科医生因无能感和挫败感而转向寻求更为极端的干预手段，以帮助受疾病折磨的病人。

这样的态势正在发生变化。职业领域不再如此权大势强、不受控制。对权威的服从和推崇正在遭受全球攻击。精神病学实践中当前的风险或许较少地来自职业上的隔绝和自大，更多地来自社会责任。监督精神科医生可能只是任务的一半——我们需要对其他强势的游戏参与者（跨国医药公司、政府、压力群体）保持警惕。这是一个不断发散和变化的课题，所以下文只是略作启发。

旧罪

和所有医学一样，精神病学的历史上有过一些现在看起来危险甚至野蛮的治疗手段。在对其严厉谴责之前，不妨先设想一下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夭折和暴毙是一种持续的威胁，极度的疼痛不得不被忍受，并且常常数周、数月不见尽头。可以确定的事情屈指可数，有效的疗法更是凤毛麟角。两个世纪以前医生愿意做的，以及病人准备忍受的，必须以非常不同的标准来判断。此外，尽管我们有把前工业社会罗曼蒂克化的倾向，但民间对待精神失常者也远远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残疾的个体常常得到收容，偶尔还得享尊崇，但是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常常被社会摒弃（这可能意味着死亡），或被当作女巫之类而受到迫害。

早期精神科医生在当时使用的标准医疗方法包括：放血、导泻和拔罐（将热杯附到背部来“吸出”毒素）。后来出现的较早的收容院摒弃了这些方法，转而强调道德治疗（第二章）；不过，为了迫使“狂暴地”激越的病人平静下来，各种极端的手段也多有试用。这些手段包括冷浴（直到进入20世纪后仍能见到）和一系列为了让病人精疲力竭而发明的装置，例如臭名昭著的“旋转椅”。然而，收容院时代的主要罪恶是忽视——限制人身而不给予关注，损辱尊严的条件而不是主

动的虐待。

长期波动的疾病尤其容易招来牵强的理论和疗法。这是走投无路和纯粹巧合（某一疾病可能正巧在使用某种毫不相干的治疗方法时康复了）一同作用的结果。在19世纪晚期，曾经掀起一阵风潮，即移除精神病人原本健康的器官，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是“脓毒症”（低度感染）的发病部位。成千上万健康的牙齿和扁桃体被拔除或摘除了，甚至发展到切除大段大段的肠道。在新泽西的特伦顿州立医院，亨利·科顿医生（Henry Cotton）一直倡导这种做法，直到他本人在1933年过世（这其中包括了将他自己两个儿子的牙齿全部拔光，甚至还对其中一个儿子做了腹部手术）。这些治疗手段在当时就存有争议，但仍然得到了一些素有名望的精神病学界人物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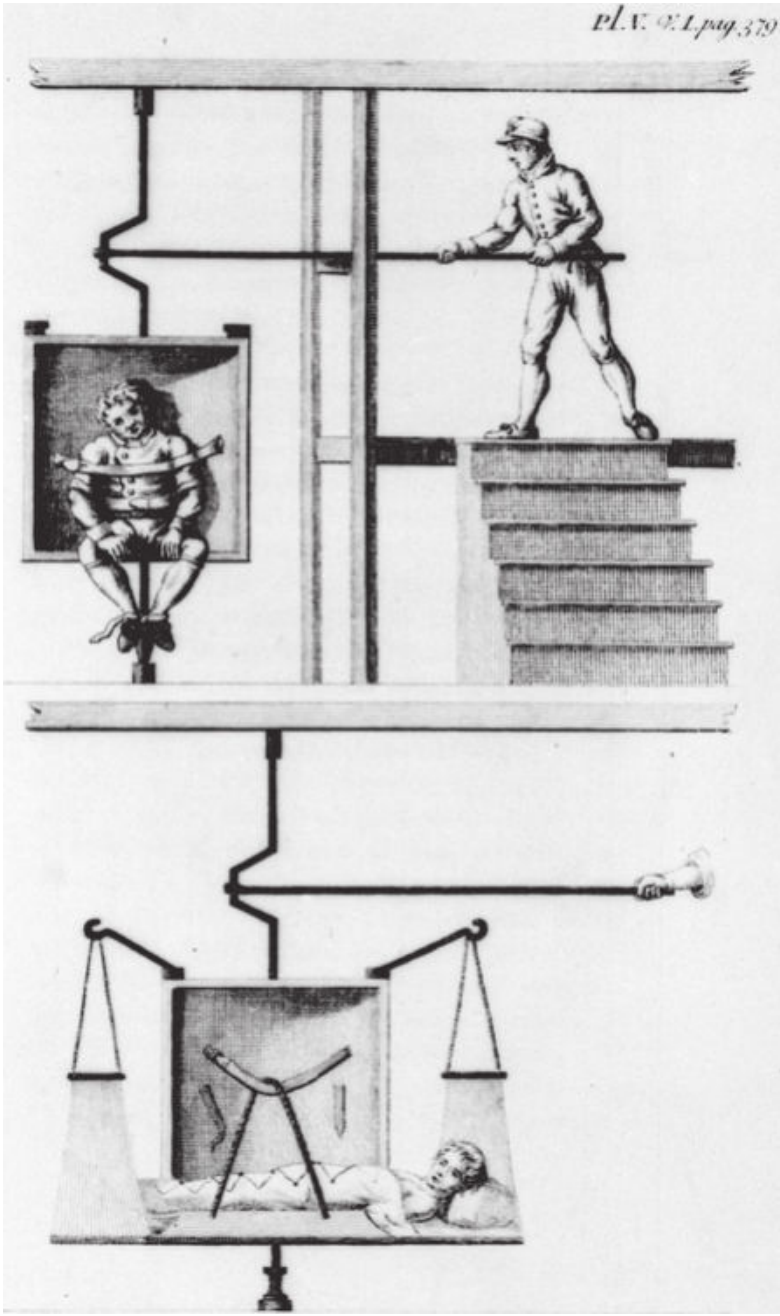

图12　旋转椅：旨在耗尽其体力来使过分激动的病人“恢复平静”的众多发明装置之一

图13　锁在贝德兰姆疯人院的威廉·诺里斯（William Norris），1814年

霍桑效应

令问题复杂化的一个因素是，即使治疗本身是无效的，围绕治疗方法而引发的争论和关注却能带来真正的变化。这一点在胰岛素昏迷治疗中得到了显现。长期以来，精神科一直在使用胰岛素刺激病人食欲及平静激越的病人（否则这些病人可能真会饿死）。胰岛素昏迷疗程被认为对治疗精神分裂症具有疗效，并在20世纪30至60年代成为了常规疗法。这种治疗方法具有潜在危险性，需要熟练和细心的护理——如果昏迷太深，病人可能会死亡。它是第一个采用对照试验 验证其疗效的精神科疗法。一半病人服用安定药后进入浅睡眠，另一半则置于胰岛素昏迷之下，医护人员不知道哪些病人用的是哪种治疗。结果显示，两组的疗效是相同的，这迫使精神科医生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专心的护理和由治疗激发的希望发挥了作用，而不是胰岛素。这种治疗手段被放弃了。这一效应即“霍桑”效应，而精神病学研究也从此必须始终考虑热情的作用。

热情不应该从精神病学中剔除。许多医学可能最好在一个不带感情的、科学的心智框架中来施行，但精神病学要求其医护人员心怀希望，保持乐观。病人常常会失去希望，需要通过帮助才得重新获得它。希望本身便有治疗作用，正如胰岛素昏迷研究显示的那样。很多研究证实，乐观情绪能够对疾病结局产生影响（甚至在癌症病人中也是如此）。然而，乐观可能会导致过度热情，治疗（包括有效的治疗）的使用也会明显超出其适应证范围。

电休克治疗和脑外科手术

电休克治疗自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60年代的施行之中，肯定是被过多使用了。在此之后，它的使用并未停止，依旧被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反常行为，尽管很明显它主要的作用在于治疗抑郁症。最初的治疗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实施的。由于它公开声称“治疗”反常行为，因此它的使用，或是威胁要使用它，无疑有时被作为惩罚而误用了。一些耸动的和具有误导性的描绘（例如在《飞越疯人院》中对杰克·尼科尔森的角色实施的未经改良的电休克治疗），仍在激起人们的争论。

在很多国家，公立精神科几乎不可能进行电休克治疗——例如在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还有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在英格兰，以及美国的好几个州，已经数次提出议案要求禁止电休克治疗，只是仍未成为法律条文。这其中部分的原因无疑是因为早期的过度使用——很多最猛烈的批评者是那些接受了不当的电休克治疗而没有获益的人。然而，即使对支持电休克治疗的人来说，它多少还是有些令人反感。它看似是对人类最精细、最重要的器官——大脑的“粗暴”伤害。作为具有创造力和知觉力的生物，电休克治疗的体验像是对我们这一本性的冒犯——尤其是我们并不真正地知道它究竟如何起作用。电休克治疗一直遭到基督科学教等团体的激烈反对。

比电休克治疗的过度使用还要令人震惊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由沃茨（Watts）和弗里曼（Freeman）发起的脑外科手术运动。精神科中的脑外科手术源于在匹兹堡一家钢铁厂发生了一件离奇事故后观察到的结果：监工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遭一根钢条穿透脑部，但却幸存了下来。事故造成的唯一能够看出的损害是他个性的一些变化——他变得随和友善了许多（但也更加行为无忌和满口脏话）。为了减轻无可忍受的慢性焦虑或反常行为，切断与前脑的联系（在钢条穿过的部位）被拿来作为了孤注一掷的尝试。这种手术在欧洲称为脑白质切断术，在美国称为叶切断术，1935年由葡萄牙精神科医生埃贡·莫尼斯（Egon Moniz）首创。他因此于1949年获得诺贝尔奖，但命运的捉弄是讽刺的，他在1955年被一个心怀怨恨的病人开枪射杀。

精神外科或许能够帮助非常有限的一群个体，即因严重的强迫性神经症或慢性抑郁症而完全致残者。它似乎是通过使病人不再对自己的症状感兴趣来起作用的，而不是消除症状。病人体验到强迫性想法，但不会纠结于此，而是能够将它们忽略。手术会带来个性的一些变化——据说病人会变得有点“钝”。

脑外科手术激起了与电休克治疗同等的不安。该手术看起来侵入性过强，过于残酷。对它如何起作用的解释则表浅又难以令人信服。弗里曼和沃茨发展出了这种手术的一个极简易版，仅仅需要局部麻醉

即可施行。他们两人淡化手术的风险，巡游美国各地，在大型精神病院里实施了数千例这样的手术。1939至1951年间，在美国施行的此种手术超过了5万例，其中仅弗里曼一个人就做了3439例。当代的技术已大为不同（通常只会损毁数立方毫米的脑组织），而且受到高度的管制。现在在英国，每年只有数十例这样的手术，美国的数字也是一样。尽管如此，脑外科手术仍然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的问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甚少改变看法。

精神病学中的政治滥用

精神病学一直以来都有着双重义务——照料个体病人和保护社会。这一“社会控制”的方面必须与个人权利进行谨慎的权衡，尤其是在强制治疗中。在大多数国家，如何掌握这种平衡仍然是激烈辩论的议题。对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以及美国南部各州种族隔离期间的黑人，精神科提供的治疗与它提供给白人的治疗差异极大，这常常被视作是政治滥用。类似的，在英格兰，对少数族裔病人强制收容的比率很高（特别是非裔或加勒比裔黑人），这也被引为对不同文化近乎压制的不宽容之一例。这类政治滥用中的政治大概是“小写的政治”[1]。不平等的医疗条件是众多医疗保健体系的特征。这或许是无可辩解的，但很难称它是旨在迫害某一特定群体的有意政策。

然而，前苏联毫不掩饰地利用精神病学压制政治异见，或令其失声，这确实是有意识的迫害。苏联人采用了一种叫做“迟滞型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意思是缓慢发展、没有阳性症状（幻觉、思维紊乱等）的退缩和反常。迟滞型精神分裂症被用作了拘禁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工具，他们反对政府，但并没有明显表现出精神疾病的迹象。当然，一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个体确实反对政府，认为政府在迫害他们。苏联在其司法精神科诊所里关押了数字庞大的明显健康的个体。这是一个丑闻，它严重损害了精神病学的公信力（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

苏联精神病学的滥用也带来了一个积极的结果，那就是在精神病学内部发展起了一场挑战此类实践的国际运动。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组织定期访问和监督全世界的监狱和拘留所，现在它们将精神病院也纳入到这项例行工作中。国际社会对该问题增强的认识为防止政治滥用提供了最强有力的保护。

无限的精神病学：包罗一切的诊断

精神病学已踏上了公共卫生的中心舞台。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前十名全球终身致残疾病中，精神疾病就占了四种。抑郁症目前位列第二，并且预计会在2020年登上首位。已有4400万美国人接受过抑郁症的治疗。这应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这可能是久已盼之的对精神疾病负担的认识，因为歧视的减轻改善了精神疾病的发现和记录（并且大概也改善了治疗和康复）。另一种可能是，现代生活和人口的老龄化引发了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精神疾病。然而，一些早已确认的严重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和双相型障碍）的发病率似乎并没有变化。

精神疾病的增多会是一种错觉吗？是否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如果我们不密切注意这些因素的话，精神病学会不会误入歧途？精神病学现在所处的环境与其起源时天差地别。在步入21世纪时，医学已经能够有效地发现和控制它在20世纪初期的那些弱点（职业上的自大和无知）。但是，当前的风险可能更多地源自精神科医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务于他人的目的（福柯认定他们一贯如此）。那么，还有什么人另有目的呢？

病人

精神疾病诊断源于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对话。病人诉说自己的担忧，精神科医生将这些忧虑对照自己所知的疾病种类进行检验。在这一交流中，双方都能对什么是“精神疾病”的阈限产生影响。我们作为个体怎样解释自己的体验？什么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即使是不愉快

的、困难的），什么是我们认为不可接受、值得报告和需要帮助的？我们现在比以前更愿意寻求帮助，而且是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要换了是在从前，我们可能就忍了，或只是求助于亲朋好友。对抚养孩子的焦虑、对感情关系的失望、丧亲之痛以及创伤后的苦恼——所有这些现在都被认为是精神病学评估及可能进行干预的合理领域。

社会已经放弃了无动于衷的态度，转而拥抱心理学和心理治疗。这样做的结果是，社会已变得大为宽容和公平。我们的感情和内心生活得到了严肃的对待，分享它们、“理解我们的情感”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因此，我们寻求帮助以理解它们，也在它们变得难以承受时寻求帮助以释放它们。

这些变化导致了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需求剧增，对抗抑郁药和抗焦虑药的需求也同样如此。在英国医生所开的抗抑郁药中，96%来自家庭医生的处方。这些药所开的对象中，大部分是这辈子都不会去瞧精神科医生的，而且其中很多人在20年前几乎不会被视作有病。这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很多病人从这些治疗中获益。但是这里面存在风险。随着治疗门槛的降低，需要治疗的病人遭到忽视的风险减小了，但并不能获益的人反而得到治疗的风险却增大了。依赖药物缓解情绪还可能妨碍我们寻求其他的途径。死守不幸的婚姻，寄望药物令其改善，这不是明智的长远策略。与此类似，我们的期望值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个人的适应力可能受到侵蚀。

我们从精神科医生那里寻求的治疗甚至可能使情况更糟。医生过多地开安定等镇静药物导致了依赖性迅速增强，而且这种依赖扭转起来非常困难。一些研究显示，严重交通事故或孩子流产后接受例行咨询不只是没有帮助，甚至可能延缓 康复。或许对有些体验来说，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将其抛在身后，完全忘记。在自然灾害中，提供咨询可能会分散促进自助和社会凝聚力的精力和资源。

“巨无霸制药公司”

一边是医学界，一边是研究、制造和贩卖我们所使用药物的公司，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人们越来越感到不安。在美国，开发一种新处方药的费用估计为8亿美元。因此制药业越来越集中于一小群触

角无所不在的跨国公司手中。统计数据是令人瞠目的。从分离和专利注册一种分子，到各种试验和检测，再到向病人初次开出常规处方，这中间平均要花上多达10年的时间。而新的分子中只有1%能够成功地走出试管阶段，真正发展为处方。所以研发费用是极其高昂的。辉瑞（2005年最大的制药公司）的研发费用比一些欧洲国家全国的科研经费都还要高。

因此这些药物的市场营销残酷无情也就不足为奇了。医生和这些公司的经济关系暧昧可疑。在美国，为精神科医生举办的教育会议超过一半由制药公司资助。提供给这些医生奢华的住宿和旅行条件成为常例，几乎不加掩饰地诱使他们开出处方。直到不久之前，精神病学一直对此免疫，因为精神科药物价格极为低廉。然而，新一代的抗精神病和抗抑郁药要昂贵得多（在美国，较新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要花费每个病人2000至3000美元一年，而过去的药物则为100至200美元一年甚至更低；较新的抗抑郁药每年的花费也要达到数百美元，而旧有药物（如丙咪嗪和阿米替林）只需要花上“几个子儿”）。一种新药的专利有着严格的时限，因此制药公司通常必须在药物上市后10到15年的时间内收回所有的研发成本。随着制药公司的财力开始对精神病学专业施加影响，社会和心理干预（两者都没有这样的财力支持）地位开始降低也就不奇怪了。

“巨无霸制药公司”受到指控，说它们扩大了可治疗精神病症的范围，从而达到增加药物销量的目的；说它们正在创造对其药物的需求，而不是为已存在的需求开发药物。百忧解巨大的成功导致了临床抑郁症这个概念的扩展。越来越轻的病例接受了治疗。百忧解的标志性地位帮助减轻了对抑郁症的歧视，但也使自己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药物。大部分大学生都认识有在服用抗抑郁药的同学——这在一代人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些药物的市场营销作用下，诊断模式发生了变化。在针对某些病症的药物获得了治疗许可后，对这些病症的诊断明显增加了，如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社交恐怖症（一些人认为这一病症只是极端的害羞）。

更令人担忧的是，开给儿童的精神疾病药物大量增加。儿童精神

科医生给儿童开出精神药物的情况在过去难得一见，现在却成了常态。这其中，增加最显著的是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诊断和治疗：7%的美国小学生被诊断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它在男孩中的比例为十分之一，因为男孩被诊断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可能性是女孩的三倍），其中一半在使用刺激性药物。

20世纪90年代美国利他林（哌甲酯）的处方量上升了6倍，并占了全世界处方量的85%，但是欧洲正在迅速追上来（2002年英国开出的处方为15万张）。儿童精神科医生坚持说，诊断是谨慎的，而且只会在心理治疗无效之后才开始使用药物，但是这样的数字明显是说不通的。且不论诊断是否合理的争议，这无疑是一个精神病学实践受商业目的急促推动的例子。

在结束关于制药业的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承认制药业对人类健康和福祉做出的极为积极的贡献。无视因惊人研发费用产生的经济压力，对各种营销手段表现出惊讶，那就实在是太过天真了。然而，制药业因其规模和影响力的剧增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并不仅限于精神病学。这些问题包括了利用伦理标准可能不那么严格的较贫困国家开展研究，而在那里参与药物试验的病人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资源来从成药中受益。创造欺骗性的健康需求来销售产品，这一诱惑力在心理学领域尤其强大，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能“感觉好一点”。这就需要开诚布公的辩论和更为严格的指导标准。

信度和效度

精神病学的诊断已开始向基于标准的系统发展（见第一章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传统的方法是通过广泛熟悉正常和异常行为来进行模式识别和反映共情，现在的方法则是一个仔细列出所存在的病症特征的过程。这种改变是针对诊断方法存在令人无法接受的各种不同版本而作出的反应。新的诊断体系（在《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现在又在第四版中进行了阐明）还竭力避免对精神病学理论的依赖，这些理论在以前曾经导致了众多的争论。当然，是否真正能有一个完全“非理论性的”诊断体系是可以探讨的。

新的诊断体系更强调信度 （即确保不同的精神科医生在面对同样

的症状时，总会得出同样的诊断），而不是效度（即确保某一特定诊断的病患都有类似的结局或治疗反应）。当然，目标是达到最大的信度和最大的效度。然而，良好的信度并不一定能保证良好的效度。我们都对界定的特征达成一致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真的是“什么东西”。例如，17世纪的搜巫者被认为非常可靠——他们都同意什么是能泄露女巫身份的种种迹象，因此总是能对谁是女巫达成一致，然后再将她们烧死。我们不会说他们真的“识别出了”一个女巫，因为我们不相信女巫的存在，但搜巫者的方法无疑是非常可靠的。

信度可能会被错误地和效度联系在一起，于是，基本上只是因为精神科医生就如何界定和识别某一疾病达成了共识，该种疾病就被赋予了某一诊断地位。我已经提到了数个这种有争议的诊断——例如社交恐怖症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但是还有一些实际上可信性更低。尼古丁和咖啡因“使用障碍”现在都是正式的精神病症，但没几个人会认为这些是精神疾病。与此类似，有一些行为模式获得了高度可疑的诊断地位（因此可能要接受“治疗”）。一个例子是青少年的“对立违抗障碍”，这听上去非常可疑，因为它非常接近对一个怎么都不听父母话的别扭青少年的描述。

精神病学的轻信性

精神科医生总体上来说都是些容易相信他人的家伙。他们倾向于病人说什么就信以为真。这一点在心理学家戴维·L. 罗森汉姆（David L. Rosenham）的著名研究“疯狂场所的清醒”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1973年，他让8名志愿者跑进美国的急诊室，向医生主诉说自己头脑里有声音在说“空的”、“中空”或“砰的一声”。这8名志愿者全都被收治进了精神科病房，即使是他们进了病房后行为完全正常也不让走。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每个人平均在医院住了接近三星期才获准出院。更糟糕的还在后头，他们中的大多数出院时获得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缓解期”的诊断。因此，当时出现对信度的强烈呼声就毫不令人奇怪了。

由此可见，存在数种力量作用于精神病学（包括研究者固有的好奇心），导致其有持续扩张的态势。至于这是否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发

展，这个问题不应该仅仅留给精神病学这一职业领域自身来决定，而是需要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即你们）进行讨论。

人格问题和成瘾

精神科医生一直在应对药物和酒精成瘾的后果。他们一直以来也认识到某些个体组群的人格显著异常，会导致无穷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人类苦恼的程度是无需争辩的，而且此类个体在精神卫生事业中能够大量遇到。然而，对于它们在根本上 是否是精神病症的问题，以及精神科医生是否应该负责治疗它们，正反双方都掌握着有力的论据。这不是简单的学术争论，可以让双方各自作出适合自己的决定。存在这些问题的人可能、或者已在接受违背自己意愿的治疗。

对立违抗障碍的DSM IV诊断标准

A　抗拒的、敌意的和违抗的行为模式持续至少6个月，在此期间存在下述其中4项（或更多）：
常情绪失控
常与成人争吵
常主动违抗或拒绝遵从成人的要求或规则
常故意激怒别人
常把自己的错误或不当行为归咎于他人
常易发火，或容易被他人激怒
常愤怒和怨恨
常怀恨在心或心存报复

注意：只有该行为的发生频率高于一般观察到的同龄和同发展水平的个体时，才认为符合诊断标准。

B　行为紊乱导致有临床意义的社交、学业或职业功能损害。

C　这些行为不只是在精神病性障碍或心境障碍的病程中发生。

D　不符合品行障碍的诊断标准，而且如果个体年龄为18岁或以上，不符合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

精神病学中的强制

在任一社会里，精神病学都允许强制治疗——这包括西方社会在内，尽管它们建立在把对个体自由的尊重置于法律之前的原则上。这一引人注目的例外情况是基于如下的观察：在疾病的发病期间，个体的判断力受损，没有能力作出理性的决定；精神疾病常常包含正常功能的“断绝”，并导致病人脱离正常的自我。举例来说，学习功能不良的人同样可能无法作出有依据和理性的决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发展出这种能力，精神疾病则不同，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变化 。大多数社会本着保护显然“不是他们自己”的个体的人道主义愿望，都准许执行强制治疗的家长式条款。对于患病期间的行为，病人在康复后与我们大家一样也表示担心，这种情况更增强了强制治疗的决心。很多人甚至为接受了强制治疗心怀感激。

律师会认为这些是棘手的领域。就儿童、学习能力不良者和痴呆患者来说，对他们是否具有作出治疗决定的“能力”（理解　信息的能力、信任　信息提供者的能力，以及记住　该信息并据此作出决定的能力）的标准评估是适用的。然而，当问题出在判断力和心境、而不是智力的时候，这样的评估就不管用了。违背病人的意愿对其进行强制治疗，这最终取决于精神科医生的结论，即病人患有某一精神疾病，这一疾病导致他们目前所作的决定不是本人通常会作出的。需要注意的是，这其中包含了精神科医生对病人没病时通常会怎么做 或想要什么的一个判断。强制有时也作为一种短暂的安全措施用于那些“一时精神错乱”的人——例如，在陌生的环境中极度惊恐的个体，分手后在绝望中有自杀或自伤倾向的年轻人。

严重人格障碍

对于通常发生于男性的病态人格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以及通常发生于女性的边缘型人格障碍，精神病学的态度带来了伦理和概念上

的问题。病态人格者是冷酷、麻木的个体，他们对他人无法产生共情，由此可能犯下可怕的罪行。他们毫不考虑给他人带来的后果，而且事后不会表现出任何懊悔。这些人常常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杀死宠物、纵火等）。由于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不会顾及他人的感受，因此可能会极其成功；有人开玩笑地提出，轻度的病态人格对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一样，病态人格者常被和脾气暴躁、行为暴力的个体画上等号。这个群体给监狱和刑事司法系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

在一些国家，精神科医生以满足拘禁精神病人的同样条件拘禁这些个体。这种做法被批评为是滥用权力。强制治疗的正当性主要基于这样一种信念：病人现在并未作出正常情况下会作出、康复后仍会作出的决定。为证明强制的合理，病情通常不应是永久性的，并且有一定的信心相信治疗能够加速康复。严重人格障碍的情况不满足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条。严重人格障碍者的行为反映着他们的人格——他们真实的身份认同；这些行为于他们本身而言既不是反常的，也不是一时的，并且至今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强制治疗会使这些行为发生显著改变。

这些人对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们常常犯下严重的性或暴力罪行，而且在监狱工作人员看来，由于他们几乎没有作出什么改变，很明显这些人会再次犯罪。在英格兰，这些人被贴上了患有危险严重人格障碍（DSPD）的标签，并且建起了配备大量人员的新病房来对他们进行治疗。但是，与苏联制度下对政治犯的拘禁相比，精神科医生对这些病人有可能无限期禁闭的做法（不同于违法后在监狱服一定的刑期），滥用权力的程度就要轻一些吗？相关人员所表达出的人道主义关切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伦理困局。

在西方世界的年轻女性中，各种自我伤害行为出现了急剧上升。服药过量和割伤成为精神病院和监狱中女性病人或犯人的常见现象。病人看似失去控制，明显处于痛苦状态，并且作出常常看起来是愤怒和绝望求助掺杂在一起的自我伤害行为。精神科医生对此感到负有责任却无能为力，他们常试图通过将病人强制禁闭在提供监护的病房里

来“控制”局面。不幸的是，情况可能会更加恶化——病人作出更多自伤行为，精神科医生为控制局面不断对病人加强约束。一个大声疾呼的压力团体主张，这些女性对她们的身体做什么是她们自己的事，精神病学违背她们的意愿对其进行治疗是踩过了界。他们指出自残是有文化先例的（在很多社会里，宗教和仪式性地划伤自己是常见现象），并且强调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一再地剥夺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我决定权。

药酒滥用

对药酒滥用存在着类似的一系列争论。药物或酒精的滥用都可能伴随精神疾病，两者也都可能导致精神疾病。在这些情况下，精神病学参与其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药物或酒精的滥用本身是精神疾病吗？将成瘾当作疾病来对待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种人道主义冲动，这发生在1939年嗜酒者互诫协会成立之后，目的是帮助成瘾个体脱瘾和戒酒。世界上最大的自助团体（嗜酒者互诫协会（AA）和吸毒者互诫协会（NA））都认为成瘾是一种终身的疾病，尽管它们依赖人际的和精神的支持来对付成瘾，而不是医学治疗。

AA和NA认为成瘾者与其他个体存在根本性的差别，他们将永不可能再明智地使用药物或饮酒。然而在精神病学内部，观点却并不一致。很多人将成瘾看作是和任何其他精神病症一样需要治疗的疾病。另有一些人则将药酒滥用视为能够导致精神疾病的危险习惯，但认为它们本身不是精神疾病，因此说到底是个体自身的责任。物质滥用的医学化受到了批评，说它削弱了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例如提高价格和限制可获得性。这后两种措施均被证明能够减少饮酒，以及与饮酒相关的疾病和死亡。

提供帮助（如为应对戒断反应开出药物）和支持（以建立有度的生活方式）是没有争议的。人们的顾虑来自对强制手段的使用，而在大多数国家，强制手段虽然普遍，但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然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欧和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广泛存在专门的精神病院来对酒药成瘾者进行较长期的禁闭和治疗。这种做法正当吗？酗酒或药物滥用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甚至会导致死亡。但我们中

很多人都会作出愚蠢的决定并承受其后果——吸烟或许比饮酒更危险，但我们并不会强制治疗吸烟者。醉酒时混乱的思维和糟糕的判断力作为精神科干预的理由也是值得质疑的，因为醉酒的明确目的便是通过模糊灰暗的现实来改变判断力。

越来越先进的遗传学和流行病学有助于识别那些酒药滥用风险较高的人。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在酒精的耐受和代谢能力上人种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这些发现更加强了这样的论点：即这些情况并不纯粹是个人的选择，而是病症，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症一样——我们只不过是还不像了解精神分裂症那样了解它们。有人甚至提出，自毁式的酒药使用肯定 是精神疾病的结果。显然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定论，而且精神病学对药酒滥用病人的干预将会继续引起争议。

精神错乱辩护

精神病学中对强制的争议涉及的是对个体权利的不公正剥夺。然而，早期精神卫生立法的一个重要动机则是为了保护病人不因患病时犯下的罪行受到惩罚。社会一直对这样的惩罚心存不安。在19世纪时，杀婴不被当作谋杀来对待，因为对在患产后精神病期间杀死婴儿的母亲，陪审团拒绝将她们定罪和送上绞架。

确立犯罪意图（“有罪的思想”）的重要性使得精神科医生和法庭之间建立起了长期的痛苦关系。确定某人在犯罪时是否精神错乱（即不能判断其行为的意义并意识到它们是错的）原则上简单明了。但是到了个案中，它常常远没有那么容易。与此类似，病情严重的病人因为不能充分理解法庭上发生的事情，可能会被认为不适合答辩而送院治疗。大多数国家会基于精神病学评估接受不适合答辩的判定，或基于精神错乱作出无罪裁决。

法庭上真正的问题是基于精神疾病的责任减轻——尤其当犯罪行为本身是疾病最明显的表现的时候。对于严重紊乱的病人来说，这个问题不大，因为其犯罪行为只是该疾病很多迹象的其中之一（例如因危险驾驶而出庭受审的躁狂病人同期还有不作睡眠、穿着奇装异服、花光所有钱财等表现）。将人格障碍作为辩护理由（如病态人格者不

注意或不关心其造成的痛苦）则不然，因为它冲击了作为刑事司法体系根基的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概念。大多数罪犯都有梦魇般的童年经历。很多人遭受过虐待。很少有人拥有技术性工作或稳定的家庭可以依靠。所以在审判中我们可能会徇情枉法并不奇怪。但是，引述这些导致犯罪的特质作为减轻惩罚的借口，这是不是循环论证呢？这种伦理困境在患有阿斯波哥尔综合征（孤独症的一种较轻形式）的个体身上表现得格外尖锐；他们无法以他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也无法理解他人的动机，尽管他们可能极渴望这样做。

在实践当中，罪行越严重、风险越大，作出决定就越容易。当代替有罪裁决和入狱的是住院治疗（有时是监禁下的住院治疗）时，法庭和陪审团作出宽恕犯人的决定就会感到更放心些。在罪行较轻的案例中，惩罚不是那么严重，而且只是为了震慑犯人让其不敢重犯，这样的情况下有人就提出精神病学辩护是不正当的，并且从长远来说也许对个体没有好处。托马斯·萨斯（第五章）坚持认为，精神病学辩护是对个体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一种剥夺。精神病学辩护通常得以接受的情况是在个体的病症对所有人来说都明显可见的时候。

有时病症唯一的证据就是犯罪行为本身。有过几个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谋杀案例，案中罪犯否认对犯罪有任何记忆，声称它是在一种“自动状态”（梦游般或分离神游的状态）。在一些更极端的案例里，“多重人格”被提了出来，即是说某一单一个体拥有数个充分发展的身份认同，它们彼此之间完全独立。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概念，激发了大众的想象力（例如，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85年的小说《化身博士》，还有1957年的电影《三面夏娃》）。

假定存在的机制如下：某些精神功能得到极为成功的潜抑，只有通过深入的心理治疗才能触及，或只有在高度特定的情形下才能“激发”出来。这在所声称的童年期性虐待案例中，具有极其巨大的精神病学/法学意义。长期以来，儿童遭受家庭成员性虐待的程度在精神病学中一直富有争议。钟摆来回摇摆于两个极端，一端认为童年期性虐待是常见创伤，能够导致神经症，另一端则认为这种情况十分罕

见，大多数报告都是源于当前痛苦和困惑的“虚假记忆”。目前的推断倾向于相信诉说儿童时期性虐待经历的成人。这种情况导致在一些广为报道的案例中，当“恢复的记忆”被挖掘出来之后，家庭出现了分裂。这一论点的正反双方都有精神科医生站队，一方强调被潜抑多年的虐待的破坏性作用，另一方则相反，强调过度热情的治疗对病人的暗示作用。

精神病学：存在争议的实践

精神病学实践大概永远都会是有风险的和存在争议的。很多精神科医生主张更有限度的方法，将其限制在可明确识别并达成共识的那些精神疾病上：“我们应该坚持治疗已诊断出的疾病、精神分裂症、神经性厌食、抑郁症，并接受除了精神疾病之外，人类的苦恼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我们应该将社会政策和伦理留给政治家和哲学家。”这一论点是很有吸引力的。精神病学的历史充满了越界的例子。但正如我们从本章了解到的，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精神科医生——还有其他的利益相关方和强大力量在起作用，其中还涉及宽泛的道德问题和重要的潜在利益。

科学的发展扩大了我们能力的范围；家庭和病人不断提高对我们的期望；政府和制药业以新的需求、诱惑和机遇来挑战我们。我们只有放弃进步和创新才有可能避免争议和潜在的犯错风险。但那样做的话，就意味着违背了精神病学的承诺或义务。骑跨在硬科学和人类行为及雄心的领域之间，精神病学想要不引发争议是完全不可能的。争议与生俱来，而且正如我们即将在第七章探索的那样，它可能会变得更糟。

注释

〔1〕 即广义的政治，指任何关系中权力不同形式的相互作用。

第七章
进入21世纪

新的技术和旧的困局

无论他做什么，他都不可能成大器。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老师，1895年）

未来计算机的重量可能至多不超过1.5吨。
（《大众机械》，1949年）

我们不喜欢他们的声音，而且吉他音乐正在失宠。
（迪卡唱片公司对“披头士”乐队的评价，1962年）

预测未来是有风险的。21世纪之初的精神病学与其仅仅几十年前的面貌就已经大为不同。谁能想象得到，我们不仅能够视觉化呈现活的大脑的细微结构，而且还能在它出现特定情绪或幻觉时看到不同区域高亮起来？谁能预见得到，计算机可以作出诊断，心理治疗可以在网上进行，而且都没有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学家的参与？精神病学正发生变化，而且其变化的速度更加激化了第六章提出的困局。乐观主义者相信，随着精神病学科学基础的日益牢固，这些困局会逐渐消失，但现在并未有证据显示这种情况的发生。产生顾虑的领域可能会有改变，但它们看起来似乎一如既往地紧迫。

脑科学的进步

我们对大脑功能的了解将会继续不断加速。在越来越强大的大脑造影和测量工具的驱动下，神经科学已成为生物医学研究中最“热门的学科”。长久以来，大脑一直是个神秘的、似乎惰性的器官，没有活动的部分。现代成像技术揭示了大脑的动态，使我们观察到它在刺激下单个区域按照一定顺序激活，活动在其中传布。而且不仅对外界的刺激是如此，解决数学问题、甚至区分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人的图

片时也是如此。

这一飞跃源于成像技术的发展。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内，解剖学家已经对大脑的结构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通过检查因中风而丧失不同功能的病人的大脑，他们识别出了不同脑区的功能。脑部的萎缩或损害可以由尸解或X射线技术显现出来。显现的方式后来发展为向血流中注射染料或向脑室（脑部通常存在的充满液体的空腔）中注射空气。随着计算机化轴向断层显像（CAT）扫描及后来磁共振成像（MRI）扫描的出现，身体结构的造影向前飞跃了一大步。这些技术利用磁场创造出身体任何部位（包括脑部）的“切片”图像——图像细节之清晰令人惊叹，再通过这些图像建构三维画面。但是，尽管这些技术在诊断脑肿瘤和确认痴呆方面极为得力，对大多数精神病症却起不到什么帮助。确实，“功能性障碍”这个术语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各种精神疾病简称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些疾病中没有显现出结构异常。

功能成像是精神病学的又一个进步。现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功能成像——测量增加的血流、通过使用标记性化学物质测量细胞代谢，以及现在甚至可以直接测量神经细胞的电活动。我们现在能够证实，思考和感受反映在大脑不同部分的活动中，而当病人出现幻觉时，其大脑活跃的部分与我们听到真实的声音时是相同的。功能成像确认了脑活动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

图14　磁共振成像扫描仪：对大脑结构首次真正的细节造影

这些成像技术已经改变了精神病学吗？当然，它们扩充了知识，并帮助我们了解与疾病相关的脑内生物化学系统，而这又帮助改善了药物研究。不过到目前为止，在临床实践中还没有作为成像技术直接结果的巨大进步。针对帕金森病的一些早期实验正在进行，研究人员试图将脑细胞移植到已被证明活动有缺陷的脑区。甚至还有研究人员试验将极小的“电池”植入某些慢性抑郁症患者的脑中，以观察它们是否能够刺激神经递质释放的增加，从而缓解抑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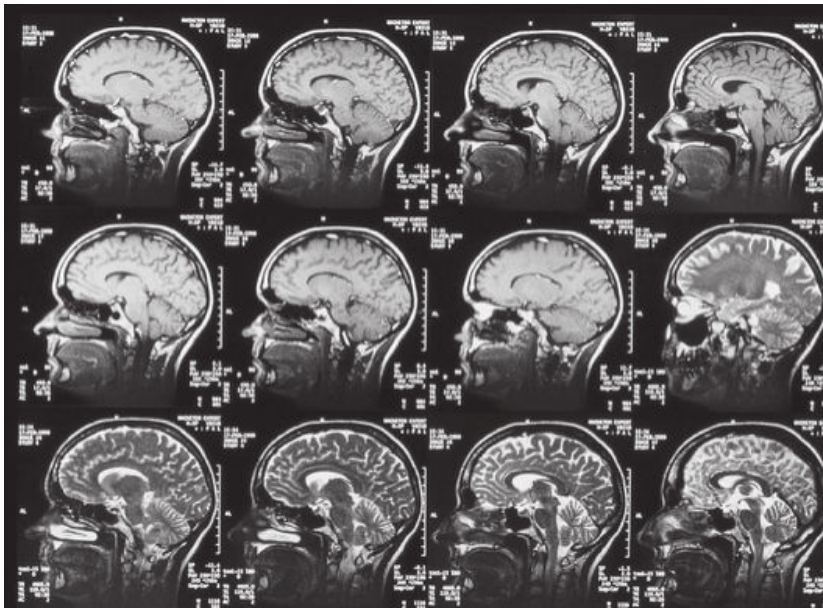

图15　单次磁共振扫描的一系列脑部图片。每一幅图片都是大脑结构的一个“切片”，并可由此构筑三维图像

这距离很多电影里将微型计算机芯片插入大脑、控制行为的“电子人”幻想还非常遥远。神经科学家明显并不情愿开发干预大脑的方法来治疗精神疾病。直接干预个体的意识，使其脱离本人的控制，这会在科学家中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就如同我们其他人也会对此强烈抵触一样。不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采用外科手术和细胞移植治疗帕金森病等大脑疾病，因为这些方法不牵扯到自我人格。

人类基因组和遗传学研究

自从克里克（Crick）和沃森（Watson）于1953年阐明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以来，遗传学研究就处于超速发展状态。原来占据遗传学这一领域的是应用孟德尔定律的动植物育种家，以及追踪血友病、亨廷顿病等家族性疾病的医学研究者。现在它已经发展成绘制出染色体和基因本身图谱的工程。过去，遗传学家只能告诉病人他们将疾病遗

传给后代的统计学概率。而如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能够确知病人是否携带某一疾病，甚至预测存在风险的个体未来数年内是否会患上这种疾病（例如亨廷顿病的情况就是这样；它是一种罕见的既有精神表征、又有行动表征的痛苦疾病）。

然而，没有多少精神病症具有简单的“孟德尔氏”遗传模式，即一半（显性）或四分之一（隐性）的后代注定要患病。大部分主要的病症（例如精神分裂症、双相型障碍）确实存在家族聚集性，并且有不可否认的遗传成分，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其中有数个基因在起作用，而且识别它们非常困难。已经出现过很多次虚假的曙光了。当前最可能的候选基因是神经调节蛋白 - 1（它在冰岛和苏格兰西部的精神分裂症家族中被识别出来）。然而，这个基因比精神分裂症的分布要广——可能携带这一基因的人群高达30%。神经调节蛋白 - 1似乎是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某些生活经历（或者可能是与其他基因的结合）对发病也是必需的。由此，它表明了先天和后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的“非此即彼”理论怎么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它给了我们希望，那就是即使致病基因的携带者也有可能防止精神分裂症的发生。

尽管遗传学研究还没有对临床产生重大影响，但在实践中它已经切实地激发起了思考。如果知道自己的孩子患精神分裂症或抑郁症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我们愿意承担何种水平的风险？一旦致病基因确定无疑地被识别出来，开始对这些病症进行筛查在伦理上是可接受的吗？如果我们也能够识别聪明的基因——可以对聪明进行筛查吗？筛查意味着选择。通常只在某一个体想要知道是否开始或继续怀孕时才会进行筛查。

早期识别

一些有精神分裂症病史的家庭已经在面对这些问题了。在澳大利亚，一个致力于尽早治疗年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机构已经开始成功地识别具有高发病风险的个体。他们通常是有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中的青少年，本人亦表现得“古怪”或“退缩”，并报告不同寻常但并不明确是精神病性的体验。如果相当肯定某个年轻人很可能会发病，这个

医疗团队应该提供抗精神病药的治疗吗？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对一半的参与者提供了药物，对另一半人则给了安慰剂。接受药物的实验者较少患上精神病。然而，并不是所有未接受药物的实验者都发了病（换句话说，如果这不是实验的话，他们可能会不必要地用药）。对处于这样一个发展的敏感阶段的年轻人来说，其影响显然会是巨大的。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将越来越多地面对此类决定，以上只是其中的一例。

精神疾病中基因识别的明确性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了避开精神病症而进行任何大规模的遗传学筛查，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人类行为的丰富类型会稳定地减少。进行这种筛查会让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感到快乐呢——一个没有凡·高（Van Gogh）或舒曼（Schumann）的世界？

洗脑和思想控制

大多数关于精神病学令人恐慌的幻想通常都和它“可怕的力量”有关。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洗脑”这个术语首次得到使用，自此关于它的恐惧就越积越深了。事实上，除了认知和集体心理学中众所周知的知识以外，精神科医生对此类手段知道的并没有多多少。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确实在如何劝说他人方面给予政府和军方建议，但是他们的方法并不比成功的广告公司更先进（甚至可能不及 它们先进）。

米尔格拉姆（Millgram）的著名实验常被错误地引证为体现这种力量的例子。他使用演员证明，如果被告知这是心理实验的一部分，寻常人会对他人实施重度的、甚至威胁生命的电击。这个研究并没有证明心理学的可怕力量，而是证明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更令人害怕、但很常见的将判断力交给“权威”的倾向。

一些较早的“科幻”作品证明无误的情况是，改变情绪的药物被广泛使用。在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唆麻”是一种

在极权国家里麻痹大众、使其满足和顺从的药物。那么，当20世纪90年代末30%的法国成年人在使用精神药物，当10%（而且还在上升）的美国学龄男孩在服用利他林的时候，我们距离《美丽新世界》中描绘的景象还有多远呢？这些药物越来越容易获得，它们不仅用来治疗精神疾病，而且用来增强健康人的舒适感。现在很多人用“比健康还要好”来形容这些“特制”致幻药的效果。人们一直以来都在用娱乐性药物自我医疗，但是现在处方药被广泛用于应对正常的生活压力。

精神病学有可能侵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人的境况“医学化”，而对更简单、更可靠、但依靠民主协商的诊断方法的强调（我们在第六章讨论过）愈加增强了这一风险。过去，只有感觉到病人的体验和行为在根本上“不同”时，精神科医生才会确诊，这就限制了精神疾病人群的规模。如果仅仅因为病人的一系列主诉就自动得出诊断（而不经过以上判断的过滤），那么对其扩张就没有什么限制。我们越来越鼓励自我表露和留意自己的感受，这也许是为什么认为自己抑郁或焦虑的人数剧增的原因。大多数人欢迎这种对人的体验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方式。同样，大多数人支持在精神病学咨询中体现出一种更为平衡的关系，即更加严肃地看待病人的症状，而不是精神科医生的先入之见。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生活组成部分被贴上精神病症的标签，我们是否对这样的结果感到高兴呢？

旧困局的新形态

尽管有着以上提到的种种问题，我们进入21世纪时所遇到的困局其实和进入20世纪时惊人地相似。精神病学中的强制没有消失——某种程度上来说还增加了。与此类似，对精神病学可能抹杀个体差异、将人类物化的恐惧依然强烈。这一冲突从前体现在大型收容院压倒性的同一和病人的尊严之间的斗争，现在则体现在“循证医学”和“后现代个人主义”之间的较量。社会和精神病学一直都会维系（或许也应该一直维系）一种脆弱的关系，在对一小部分具潜在危险性的个体进行

社会控制的过程中平衡对病人和对社会两者的责任。这些辩论的经久不衰表明，它们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们折射出精神病学作为一门学科与生俱来的张力和矛盾，而这些也正是我们开始本书时所讲到的。

精神病学会在21世纪存活下来吗？

在精神病学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预测说它的终结近在眼前。乐观主义者（特别是医学和生物学研究者）认为会出现惊人的突破，像抗生素打败结核病或种痘根除天花一样驯服精神疾病。精神卫生运动也曾希望理性的子女养育、酒精消耗量的下降和社会条件的改善能够令精神分析师和心理治疗师无用武之地。这种情况至今还没有发生。现代医学的成功带来了老龄化人口的挑战，抑郁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例都出现了增长。随着对待个体情感的态度愈发开放和尊重，对咨询和心理治疗的需求出现剧增。精神科医生和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人数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呈不可阻挡的上升之势。单纯从精神病学从业人数和对精神卫生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来看，显然精神病学应该会持续繁荣。

但是精神病学将来的面貌会跟现在一样吗？情况毫无疑问是在变化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手段会从更为传统的医学治疗精神病手段中分离出来吗？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精神病学才刚刚从神经病学中独立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听到强烈的呼声，要将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重新联合起来，这一要求被视作是未来更为强大的医学精神病学一个符合逻辑的发展。很多精神科医生已经自称“神经精神科医生”。在许多德国式体系中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在一些医疗体系里，精神科医生负责诊断和住院病人的治疗，强调高度科学化的医学模式。对残疾病人的长期离院治疗由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来承担，并更多地借助人际的力量。这些压力并不是新出现的。新的情况是，受过高度培训、掌握必要技术的临床心理学家、护士和社会工作者大量

涌现。责任和权力结构正发生转变，大相径庭的医疗实践正各自不断发展。

这些发展是合乎逻辑的。知识的拓展促进了专业化，所以精神病学出现一些细分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精神病学正在坚守自己作为一门学科的阵地。独立于神经病学或内科学之外建立精神病科仍被视作进步的标志。与此类似，当人们能够选择的时候，他们仍然希望医学专业知识（或者说是权威？）能够与精神病学传统上对心理和情绪的敏感结合起来。精神病学的医学血统使人们放心，然而很少有人相信它真的只是 医学的一个分支。

心智和大脑不是一回事。精神疾病（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病学）的界定特征仍然对我们的自我意识和最亲密关系产生着影响。解决这些问题是精神病学的标志，而且没有证据表明社会正对它失去兴趣。即使过了一百年，仍然可能会有这样一本关于精神病学的小书。

“唯一正常的人，是你不太了解的人。”

什么是精神病学？它为何腹背受敌，逃不脱易遭误用和滥用的争议？精神疾病是家庭造成的吗？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都有哪些？

欢迎来到一个既神秘又激动人心的医学领域，在这里，脑科学的进步不断迎头撞上人类混乱的现实；欢迎来到这样一种活动，虽然各种扫描仪和新型药层出不穷，它仍然基于建立信任的人际关系；欢迎来到这样一种追求，它不断挑战我们怎样成其为一个真正的人。

百科通识文库

49

恐龙探秘

戴维·诺曼 著

史立群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恐龙探秘

戴维·诺曼 著

史立群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60**

Dinosaur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5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David Norman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龙探秘 / （英）诺曼（Norman, D.）著；史立群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12-7

Ⅰ．①恐… Ⅱ．①诺… ②史… Ⅲ．①恐龙 - 普及读物 Ⅳ．①Q915.86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773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文雪琴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12-7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绪论
第一章　恐龙大观
第二章　恐龙复兴
第三章　禽龙新知
第四章　恐龙系谱解析
第五章　恐龙和热血
第六章　如果鸟类是恐龙会怎么样？
第七章　恐龙研究：观察和推断
第八章　对过去进行研究的前景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戴维·诺曼，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塞奇威克地球科学博物馆馆长，古脊椎动物学高级讲师。他致力于古生物学、解剖学和进化等领域的研究，已出版多部图书并获奖，包括《恐龙百科图解》、《恐龙！》等。

译者简介

史立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古脊椎动物学报》的编辑工作。已出版多部科普译著，包括《绝灭动物大全》、《鸟类》、《恐龙的奥秘》、《与野兽同行——史前探秘》、《完全恐龙宝典》等。

图目

图1　理查德·欧文教授
图2　水晶宫恐龙模型的素描图及照片
图3　狮身鹰面兽与原角龙的比较
图4　地质年代表
图5　黑瑞拉龙
图6　第一件被收集的禽龙骨骼
图7　禽龙牙齿
图8　“曼特尔标本”骨架
图9　曼特尔的禽龙复原素描图
图10　欧文的巨齿龙复原图
图11　路易斯·道罗
图12　禽龙骨架的素描图
图13　始祖鸟标本
图14　美颌龙骨架
图15　正被复原的禽龙
图16　恐爪龙和始祖鸟骨架
图17　兽脚亚目恐龙、始祖鸟以及现代鸟类的锁骨
图18　贝尼萨尔煤矿地质剖面
图19　一具采自贝尼萨尔的禽龙骨架的平面图
图20　拉瓦莱特绘制的禽龙骨架
图21　禽龙的手
图22　新的禽龙复原图
图23　禽龙皮肤印痕
图24　恐龙的肌肉复原
图25　禽龙天然颅腔铸模化石

图26　禽龙的头骨
图27　禽龙的牙齿和颌骨
图28　恐龙的进化分枝图
图29　恐爪龙
图30　三叠纪的蜥臀目恐龙
图31　侏罗纪恐龙
图32　变化的大陆
图33　鸟类的气囊和肺部
图34　始祖鸟的复原图
图35　恐龙足迹
图36　脓毒性的恐龙胫部骨骼化石
图37　伪造的“古盗鸟”
图38　异龙头骨三维有限元图

绪论

恐龙：真实与虚构

恐龙正式“诞生”于1842年，源自英国解剖学家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 图1）的真正杰出且富于直觉的探索工作，他主要研究英国某些已灭绝的爬行动物化石的特性。

图1　理查德·欧文教授（1804—1892）

在欧文的时代，可供其研究的只是到当时为止所发现的少量骨骼和牙齿化石，这些化石散布于不列颠群岛各地。虽然恐龙的诞生相对来说不算顺利（最早只是作为补记出现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第11次会议发表的报告中），但它们很快就成了全世界关注的中心。其中的理由很简单。欧文在伦敦的皇家外科医学院博物馆工作，而当时的大英帝国大概正处于势力范围最广阔的巅峰时期。为了庆祝这样的影响和成就，有人提议在1851年举办大博览会。为了举办这个活动，人们在伦敦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建造了一个巨大的临时展览大厅（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的钢铁和玻璃“水晶宫”）。

1851年底，人们并没有拆毁这座绝妙的展览大厅，而是将它迁到了伦敦郊区的锡德纳姆（即后来的水晶宫公园）这一永久地址。展厅周围的公共绿地得到了美化并按主题布置，其中的一个主题描述了自然历史和地质学方面的科学探索，以及它们对阐明地球历史的贡献。这个地质主题公园大概是同类公园中最早的之一，其中既有对真正地质特征（洞穴、灰岩路面、地质层）的重建，也包括了对远古世界居住者的再现。欧文与雕刻家兼主办人本杰明·沃特豪斯·霍金斯（Benjamin Waterhouse Hawkins）合作，在公园内安放了巨大的有着铁制骨架的混凝土恐龙模型（图2）以及其他当时已知的史前生物模型。在1854年6月移址后的“大博览会”重新开放之前，进行了前期的宣传活动，包括1853年的元旦前夜在完成了一半的禽龙模型肚子里举办的庆祝晚宴，这使欧文的恐龙得到了公众的极大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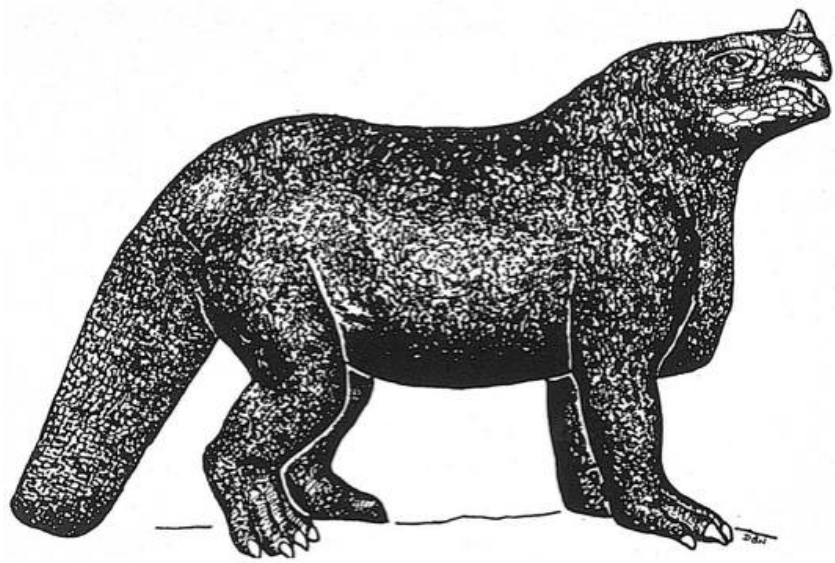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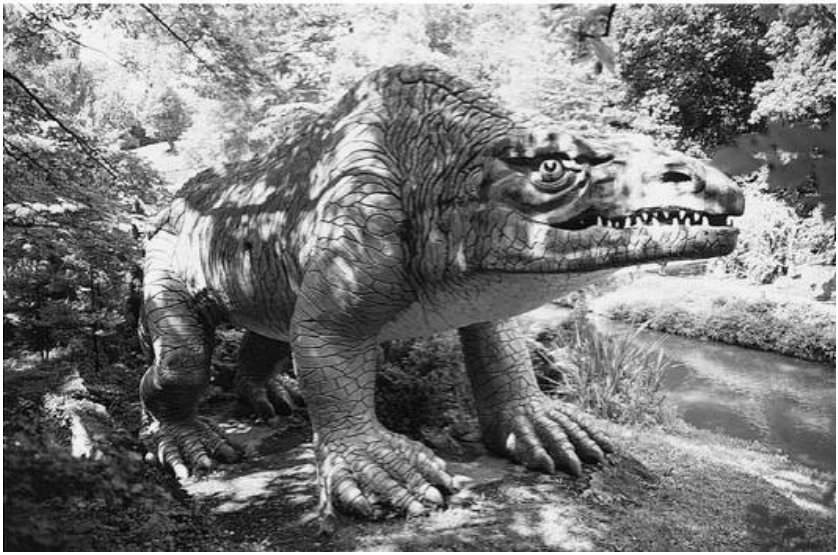

图2　上图：水晶宫中禽龙模型的素描图
　　下图：水晶宫公园巨齿龙模型的照片

恐龙是生活在迄今不为人所知的远古世界的已绝灭动物，也是神话和传说中的龙的实际化身，这些事实或许保证了它们被社会所广泛

接受；它们甚至出现在与理查德·欧文私交甚笃的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作品中。从这些令人记忆深刻的开端起，公众对恐龙的兴趣就被培养起来，并一直保持下去。至于为什么恐龙的吸引力如此持久，人们有很多推测：这可能与讲故事的重要作用有很大关系，因为故事是激发人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手段。这让我想到，人类智力增长和文化水平提高的关键时期是在大约3到10岁之间，这也常常是对恐龙的喜爱最狂热的年龄段——许多父母可以证实这一点——这并非巧合。孩子们第一眼看到恐龙骨架时的兴奋模样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已故的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可以说他是最伟大的自然历史科普作家——精辟论述的那样，恐龙之所以深受大众喜爱，是因为它们“庞大、可怕，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已经灭绝”。的确如此，它们嶙峋的骨架对富于想象力的年轻人来说极具吸引力。

恐龙的潜在吸引力与人类心灵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很多神话和民间传说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阿德里安娜·梅厄（Adrienne Mayor）曾指出，早在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人就与中亚的游牧文化有所接触了。当时的书面记录中有对狮身鹰面兽（英文作Griffin或Gryphon）的描述：据说它是一种贮藏并警惕地守卫着金子的动物；它的身体像狼一样大小，长有喙，四条腿，脚上有尖利的爪子。此外，至少是公元前3000年的近东艺术中描绘了类似狮身鹰面兽的动物，而迈锡尼文明也有此类描绘。狮身鹰面兽的神话起源于蒙古和中国的西北部，与天山和阿尔泰山地区的古丝绸之路和黄金勘探有关。（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拥有非常丰富的化石遗存，并因其保存完好的大量恐龙骨架而闻名；白色的骨骼化石在埋藏它们的松软红色砂岩的衬托下格外醒目，因此这些骨架特别容易被发现。更有趣的是，在这些砂岩中保存最丰富的恐龙化石是原角龙。它大致像狼一样大小，长有突出的钩状喙，四条腿的末端长有带尖利爪子的脚趾。它们的头骨也有向上生长的醒目骨质饰角，这很可能就是狮身鹰面兽形象中常常描绘的翅状结构的来源（比较图3中的两幅插图）。人们对狮身鹰面兽的叙述和描绘持续了一千多年，但是在公元3世纪以后，它

们的故事越来越显示出寓言的特征。基于这些事实，狮身鹰面兽的传说似乎极有可能来源于穿越蒙古的游牧旅行者对恐龙骨架的实际观察；它们展示了奇异的神话怪兽与真实的恐龙世界之间的惊人联系。

图3　神话中的狮身鹰面兽展示了原角龙所有关键的解剖学特征，穿越蒙古的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或许曾经观察过原角龙的骨架。

透过客观现实的苛刻镜头来看，恐龙文化的普遍性是异乎寻常的。要知道，没有人曾见过除鸟类之外的活恐龙（不管一些颇为荒诞的创造主义文学作品如何声称）。可鉴定出的最早的与我们同种的人类成员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1] 相反，最后在地球上漫步的恐龙存在于大约6,500万年前，之后它们很可能在一场因一颗巨大的陨星撞击地球而引发的灾变中与许多其他动物一起灭绝了（参见第八章）。因此，在它们突然灭亡之前，恐龙作为一群具有相当令人迷惑的多样性的动物，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6亿年。这无疑将促使人们对人类生存的时限以及目前人类对这个脆弱星球的主宰（特别是有关我们对资源利用、污染和全球变暖的争论）等问题有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

如今，对恐龙及其所生活的迥异于今的世界的认识本身即证明了科学非凡的解释能力。盘根问底、探究自然界及其所有产物，以及不断提出那个令人着迷的简单问题——为什么？——的能力，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之一。为了确定这种一般性问题的答案而开创出缜密的方法是一切科学的核心，这一点丝毫不令人惊讶。

毫无疑问，恐龙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它们的生存本身就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作一种手段，向相信科学的观众介绍令人兴奋的科学发现，以及使科学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正如对鸟类鸣叫的着迷一方面可以引起对物理学上声音传播、回声定位乃至雷达的兴趣，另一方面则能激发对语言学和心理学的兴趣，对恐龙的关注也有可能开辟通往同样惊人且异常广泛的多种学科的新途径。概述某些这类通向科学的途径是本书的根本目的之一。

古生物学是建立在化石研究基础上的科学，化石是早于人类文明开始对世界产生可确定影响——亦即1万多年以前——的年代已死亡的生物体的遗存。这一科学分支代表了我们努力使这些化石恢复生命的尝试：并不是指真正意义上的使死亡的动物复活（在虚构的《侏罗纪公园》中的方式），而是通过运用科学方法来尽可能充分了解这些动物到底是什么样子，以及它们是如何适应当时的环境的。每当一块动物化石被发现，它便向古生物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的谜题，与小说中

的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所面对的谜题没有什么两样：

·它活着时属于哪一类动物？

·它是多久以前死亡的？

·它是因年老而自然死亡的，还是被杀死的？

·它是恰好死在被发现的地点并被埋葬在岩石中的，还是死后从其他地方被搬运到这里的？

·它是雄性还是雌性？

·这种动物活着时是什么模样？

·它是色彩鲜艳的还是灰暗的？

·它行动迅速还是迟缓？

·它吃什么？

·它的视力、嗅觉和听力如何？

·它和生活在今天的动物有什么亲缘关系吗？

这些仅仅是可能提出的问题中的几个例子，但所有的问题都旨在对该动物及其所生活世界的画面进行逐一重构。我的一个亲身经历是，由于电视系列片《与恐龙同行》里的虚拟恐龙栩栩如生，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从该片首次播出开始，许多人因纪录片中的所见所闻而激起了极大的好奇心，并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知道它们是那样行动的？……长那个模样？……有那样的行为？"

由并不复杂的观察和基本常识所引发的问题构成了本书的基础。就其本身而言，每块化石的发现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有可能会告诉我们当中那些寻根究底者一些知识，关乎我们作为这个世界的成员所拥有的遗产。然而，我应该对这一说法加以限定，亦即本书将要讨论的这一特定类型的遗产是指我们和这个星球上所有其他生物共同分享的自然遗产。根据最新的推测，这份自然遗产延续的时间超过38亿年。我将探讨的仅仅是这段漫长时间中很短的一部分：2.25亿年前到6,500万年前这段时间，当时恐龙主宰着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命活动。

注释

〔1〕 人属（*Homo* ）包括了许多个种，它们的中文俗名都通称为“某某人”，比如100多万年前的元谋人是人属直立种（*Homo erectus* ），而200多万年前的东非能人的种名为*Homo habilis* ，与我们现今的人类（即智人*Homo sapiens* ）都不属于同一个种，不是“human members of our species”。至于我们同种的人（即智人）起源的年代，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差别很大，至今尚无定论，因此作者说其存在于50万年前不能算错。——译注，下同

第一章

恐龙大观

石化的恐龙遗体（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它们的直系后裔鸟类——参见第六章）发现于岩石中，这些岩石被确定是属于中生代的。中生代岩石的年代范围是从245百万年前到65百万年前（下文中以缩写符号Ma代表百万年前）。由于这些数字太大了，简直难以想象，为了将恐龙生活的时代置入历史背景中，较简单的办法就是请读者参考地质年代表（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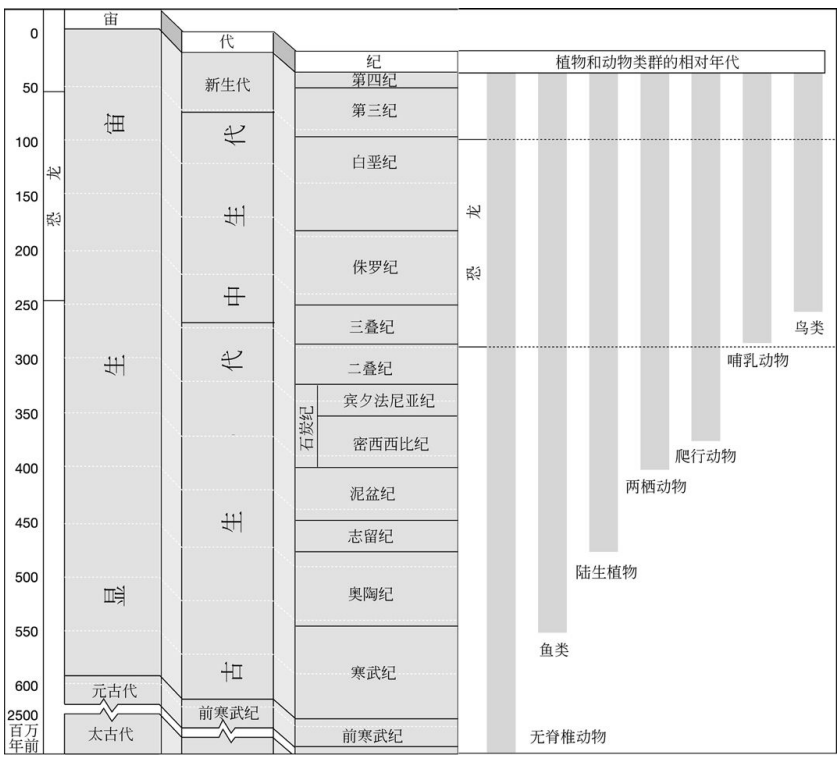

图4　恐龙在地球上生活的时期在地质年代表中所处位置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地球的年龄以及构成地球的不同岩石的相对年龄，一直是科学家认真研究的课题。在19世纪早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尽管不无争议），地球上的岩石以及其中包含的化石可以从性质上分为不同的类型。有的岩石似乎不含化石（通常被称为火成岩，或“基岩”）。位于这些明显无生命的基岩之上的是四

种类型的岩石序列，标志着地球的四个年代。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年代被命名为原始纪、第二纪、第三纪和第四纪——字面意思就是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年代。含有古代贝类和简单的鱼形动物遗迹的年代为“原始纪”（现在更普遍称其为古生代，字面意义上是指“古代生命”）。古生代之上的岩石序列中含有贝壳、鱼和陆生蜥蜴类（或称“爬虫”，现在包括两栖类和爬行类）的组合；这些岩石被粗略地归入“第二纪”（现在的中生代，“中期的生命”）。中生代之上的岩石中含有的生物与如今的生物更为相似，特别是因为其中包括了哺乳动物和鸟类；这些岩石被命名为“第三纪”（今天亦称为新生代，“新近的生命”）。最后是“第四纪”（或称全新世），它标志着可辨认的现代植物和动物的出现以及大冰期的影响。

这个基本模式一直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所有现代地质年表都仍然承认这些相对粗略但又基本的划分：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和全新世。然而，研究化石记录方法的改进，例如，高分辨率显微镜的使用、与生命相关的化学特征的鉴定，以及放射性同位素技术的应用使岩石的测年更加准确等，使得地球历史的年代表更加精确。

在本书中我们最关注的地质年代部分是中生代，其中包含了三个地质时期：三叠纪（245—200 Ma）、侏罗纪（200—144 Ma）和白垩纪（144—65 Ma）。注意这些时期的持续时间是完全不同的。地质学家不可能创造一个像节拍器一样滴答作响的时钟来测量地球时间的流逝。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地质学家通过鉴别特定岩石的类型以及其中的化石组成，从而划定了各个时期之间的界线，这通常反映在对特定地质时期的命名上。“三叠纪”这一术语源自三组独特的岩石类型（称为里阿斯、玛姆和道格）；“侏罗纪”则来自一组发现于法国侏罗山脉的岩石序列；而“白垩纪”这一名称的选择则反映了极厚的白垩层（希腊语中称作*Kreta*），例如构成多佛白色悬崖的岩石，以及在整个欧亚大陆和北美广泛发现的白垩层。

已知被鉴定出来的最早的恐龙发现于阿根廷和马达加斯加年代为225 Ma的岩石中，这是三叠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一时期被称为卡尼期）。非常棘手的是，这些最早的化石并不是同一种动物罕见的、

个别的标本：即所有后来出现的恐龙的共同祖先之标本。到目前为止，至少识别出了4种、也许是5种不同类型的恐龙：3种是食肉的（始盗龙、黑瑞拉龙和南十字龙）；1种是叫做皮萨诺龙的植食者，它的标本很不完整，令人无奈；还有1种是仍未命名的杂食者。显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它们不是最早的恐龙。在卡尼期无疑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早期恐龙。这表明，在中三叠世（拉丁期至安尼期）一定有恐龙生存，它们是卡尼期多种恐龙的“父辈”。因此我们知道，关于恐龙起源的故事，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肯定还是不完整的。

为什么恐龙化石很罕见

对于读者来说，很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化石记录是不完整的，以及或许更令人烦恼的是，它们注定是零零碎碎的。这种不完整性是由石化过程决定的。恐龙都是生活在陆地上的（陆生）动物，这造成了很多特殊的问题。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首先考虑一下生活在海里的贝壳类动物的情况，例如牡蛎。在今天牡蛎生活的浅海环境里，它们变成化石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它们生活或附着在海底，不断受到小颗粒（沉积物）的“洗礼”，这些小颗粒包括正在腐烂的浮游生物、粉砂或淤泥，以及砂粒。假如一只牡蛎死亡了，它的软组织会很快腐烂或被其他动物吃掉，而它的坚硬外壳将会逐渐埋在细细的沉积物之下。一旦被埋藏，随着它陷入越来越厚的沉积层之下，贝壳就有可能变成化石。经过数千年或数百万年，埋藏外壳的沉积物逐渐被压缩，形成了粉砂岩，这些砂岩可能被沉积的碳酸钙（方解石）或二氧化硅（硅石/燧石）胶结在一起或石化（从字面上讲就是变成石头），而这些胶结物是由渗入岩石结构的水携带进来的。要发现当初的牡蛎化石，原先埋藏很深的岩石需要经由地球运动抬升起来，形成干燥的陆地，然后经受常规的风化和侵蚀过程。

相反，陆生动物成为化石的可能性就小多了。当然，任何在陆地上死亡的动物的软组织和肌肉都很可能被吃掉并进入再循环；然而，

要使这样的动物成为化石，它们必须经过某种形式的埋藏。在很少见的情况下，动物可能被迅速埋在流动的沙丘、泥流或火山灰之下，也有一些因其他灾难性事件而被埋藏起来。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陆生动物的遗体必须被冲进附近的小溪或河流，最终进入湖泊或海底，之后才能开始缓慢埋藏的过程，并逐渐变成化石。从简单的概率角度来说，任何陆生动物的石化过程都更为漫长，而且往往伴随着更大的风险。许多在陆地上死亡的动物被吃掉了，它们的遗骨彻底分散开来，这样即便是它们身体的坚硬部分也进入了生物圈的再循环；另一些动物由于骨骼散落，只有一些破裂的碎片真正走完了最终埋藏的道路，从而给后人留下该动物的惊鸿一瞥，令人无奈；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动物的大部分，甚至是整个骨架才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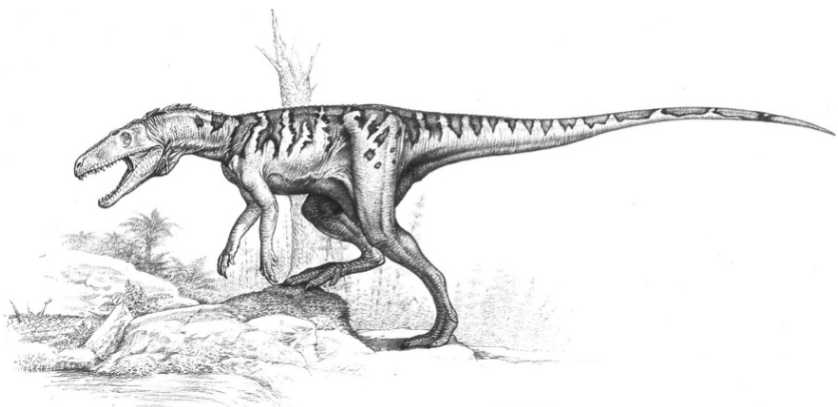

图5　食肉恐龙黑瑞拉龙

因此，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说，恐龙的骨架（如同其他任何陆生动物的骨架那样）应该是极为罕见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尽管有时媒体给人们留下了不同的印象。

恐龙的发现以及它们在化石记录中的面貌也无疑是不完整的，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正如我们通过上文所认识到的那样，化石的保存是一个充满运气而无法计划的过程。岩石的露头[1]并非像书的页码一样排列整齐，能够按照层序或按照我们的想象来取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化石的发现同样具有偶然性。

相对脆弱的地球表层（用地质学术语来说，就是地壳）曾经在千万年或上亿年里被巨大的地质力量在分离或碰撞大陆板块时弯曲、撕裂、挤压。结果，含化石的地质层被打碎、抛升，并且常常被贯穿于整个地质时期的侵蚀过程完全毁灭，以后又被重新沉积，进一步造成了混乱。作为古生物学家，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战场”，坑坑洼洼、伤痕累累，遭受过各种方式的破坏，令人摸不着头绪。解开这团“乱麻”一直是无数代野外地质学家的工作。他们研究这里的一个露头、那里的一个悬崖剖面，慢慢拼合成大陆的地质结构。因此，现在我们才有可能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大致准确地识别出中生代的岩石（属于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时期）。但是，对于寻找恐龙来说，这些帮助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撇开在海底沉积的中生代岩石，例如白垩纪极厚的白垩沉积层以及侏罗纪丰富的石灰岩。在那些较浅的滨岸或河口环境沉积着寻找恐龙的最佳岩石类型；这里有可能埋藏着冲刷到海里的陆生动物零星的肿胀尸体。但其中最好的是河流和湖泊沉积，这里的自然环境距离陆生动物的源头要近得多。

寻找恐龙

首先，我们需要系统地探讨寻找恐龙的过程。根据目前我们所了解的，首先需要通过查阅我们感兴趣的国家的地质图来确定在哪里能找到年龄合适的岩石。同样重要的是要保证这些岩石的类型至少是有可能保存陆生动物遗迹的；因此，为了预测发现恐龙化石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第一次访问一个地区的时候，我们需要掌握一些地质学知识。

通常，这包括熟悉将要调查的地区的岩石及其外貌；这与猎人需要潜心研究猎物生活的地域极为相似。另外，还需培养发现化石的“眼力”，这完全来自于寻找且最终认出化石碎片的过程，而这需要花费时间。

发现会带来令人激动的狂喜，但这时也是最需要发现者谨慎小心

的时候。从科学角度来说，因为骄傲的发现者急于将标本挖出来进行炫耀，化石发现常因过于仓促的挖掘而遭到毁坏。这种缺乏耐心的行为可能给化石本身造成巨大的破坏。更为糟糕的是，该标本可能是更大骨架的一部分，这样的标本由训练有素的古生物学家组成的更大团队来仔细发掘要有收获得多。而且，就像侦探可能会指出的，埋藏化石的岩石除了包含有关标本的实际地质年代这样较明显的信息外，还有可能讲述有关动物死亡和埋藏环境的重要故事。

化石的寻找和发现既可以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个人奇遇，同时也是一个技术上令人着迷的过程。然而，发现化石仅仅是科学研究过程的开始，这项研究可能达到了解化石动物的生物学特征和生活方式，以及它曾经生活的世界的目的。就后一个方面来说，古生物科学表现出与法医病理学家工作的某些相似之处：它们显然都对了解尸体发现处的周围环境有着强烈兴趣，并且严格说来，就是要翻遍每一块石头，千方百计地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并理解尽可能多的线索。

恐龙的发现：禽龙

一旦发现了化石，就需要对其进行科学研究以揭示它的身份、它与其他已知生物的关系，以及有关它的外形、生物学和生态学等方面更详细的信息。为了展示所有这些古生物学研究项目必然经历的艰难困苦，我们将分析一种大家非常熟悉而且研究比较透彻的恐龙：禽龙。选择这种恐龙，是因为它有趣而又有合适的故事可讲——这个故事是我所熟悉的，因为它意外地成为我作为古生物学家的事业起点。意外发现珍奇事物的才能似乎在古生物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于我自己的工作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

禽龙的故事贯穿了几乎整个有关恐龙科学研究的历史，也贯穿了如今被称为古生物学的这门科学的整个历史。因此，这种动物无意中阐明了过去200年间有关恐龙（和古生物学其他领域）科学研究的进展。这个故事还展现了科学家具有的激情和付出的艰辛，以及在学科

历史上不同阶段被推崇的理论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后来被命名为禽龙的骨骼化石的第一个真正记录可以追溯到1809年。这些化石包括采自萨塞克斯的库克菲尔德一个采石场的无法确定的脊椎碎块和一个巨大的、很有特点的胫骨（小腿骨）下端（图6）。这块特别的化石是由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他常被称为“英国地质学之父”）采集的。史密斯当时正在研制第一张不列颠地质图，并于1815年完成了这项工作。尽管这些骨骼化石显然是因为很有意义而被采集和保存起来（它们至今仍被保存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但人们没有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受邀确定它们的身份时为止，这些骨骼一直被冷落在一旁。

图6　第一件被收集的禽龙骨骼，由威廉·史密斯1809年在萨塞克斯的库克菲尔德采集。

然而，1809年对于这样的发现来讲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在欧洲，涉及化石及其意义的科学分支取得了一些成果。那个年代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是一位在巴黎工作的“博物学家”，同时也是拿破仑皇帝政府中的一位行政官员。在那个时代，“博物学家”是一个宽泛的范畴，指那些研究领域广泛的哲人科学家，这些领域都与自然界有关：地球、地球上的岩石和矿物、化石以及所有的生物有机体。1808年，居维叶重新描述了采自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一个白垩矿场的著名巨型爬行动物化石；它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曾经在1795年拿破仑军队包围马斯特里赫特期间被要求作为战利品。这个动物最初被误认为鳄鱼，居维叶正确地将其鉴定为巨大的海生蜥蜴（后来被英国传教士和博物学家威廉·D.科尼比尔［William D. Conybeare］牧师命名为沧龙）。这一新发现揭示了在地球历史的更早时期生存过一种异常巨大的蜥蜴，影响极为深远。它鼓舞着人们去寻找和发现其他已绝灭的巨大“蜥蜴”，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先于《圣经》纪事的“更早的世界”的存在，并且还确定了观察和解释这些化石动物的特定方法：将其看作巨型蜥蜴。

在拿破仑战败、英法两国恢复和平以后，居维叶终于得以在1817—1818年访问英格兰，并与有着相同兴趣的科学家会面。在牛津，有人向他展示了地质学家威廉·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收藏的一些巨大的化石骨骼；这些骨骼似乎属于一种巨大的、但生活在陆地上的、像蜥蜴一样的动物，它们使居维叶想起了在诺曼底发现的类似骨骼。威廉·巴克兰最终在1824年将这种动物命名为巨齿龙（科尼比尔提供了少许帮助）。

然而，从这个故事的角度来说，真正重要的发现直到大约1821—1822年才出现，地点是在库克菲尔德怀特曼绿地附近、威廉·史密斯13年前考察过的那个采石场。这一次，一位居住在刘易斯镇、精力充沛而又雄心勃勃的医生——吉迪恩·阿尔杰农·曼特尔（Gideon Algernon Mantell，1790—1852），正在用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致力于完成一份有关他的出生地英格兰南部威尔德地区（这个区域包括萨里郡的大部分、萨塞克斯郡，以及肯特郡的部分地区）地质构造和化

石的详细报告。他的工作最终汇集为一本插图精美、令人难忘的巨著，于1822年出版。书中包括了对几个他不能确证的罕见大型爬行动物牙齿和肋骨的清楚描述。这些牙齿中有一些是曼特尔从采石工那里买来的，而其他的则是他的妻子玛丽·安（Mary Ann）收集的。在随后的三年里，曼特尔为了鉴定这些巨大的化石牙齿可能隶属的动物类型而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尽管没有受过比较解剖学（这是居维叶的专攻）训练，但他怀着了解自己手中化石的亲缘关系的愿望，陆续与英格兰的许多博学之士建立了联系；为了鉴定，他还将一些珍贵的标本送到巴黎的居维叶那里。最初，曼特尔的发现被当作是全新世动物的碎片（或许是犀牛的门齿或是咀嚼珊瑚的大型硬骨鱼类的牙齿）而得不到承认，甚至居维叶也这样认为。百折不挠的曼特尔继续研究他的问题，并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答案。在伦敦皇家外科医学院的藏品中，他见到了一副鬣蜥（iguana）的骨架。鬣蜥是不久前在南美洲发现的植食性蜥蜴。它的牙齿在基本形态上与曼特尔的化石很相似，这使他认识到那些化石属于现生鬣蜥的一个巨大且已经灭绝的植食性近亲。1825年，曼特尔就这个新的发现发表了一篇报告，并且为这种化石动物选择了禽龙（*Iguanodon*）的名字，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按照其字面意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鬣蜥牙齿”，这也是在科尼比尔的建议下确立的（显然，科尼比尔所受的古典教育和才能使他在命名许多这样的早期发现时显露出了天赋）。

图7　曼特尔夫妇发现的最初的禽龙牙齿之一

毫不奇怪，根据当时可以利用的比较，这些早期发现证实了一个栖息着罕见的巨大蜥蜴的远古世界的存在。例如，利用现生（1米长）鬣蜥的细小牙齿与曼特尔的禽龙牙齿进行一个简单比例缩放得到了超过25米的体长。由描述禽龙所带来的兴奋和个人名望驱使曼特尔

更加努力地去探索有关这种动物以及远古时期威尔德的化石栖居动物的更多信息。

1825年之后的几年里，威尔德只出土了一些化石的碎块；随后在1834年，人们在肯特郡梅德斯通的一个采石场发现了一具关节分离的不完整骨架（图8）。最后有人为曼特尔买下了这件化石，并命名为“曼特尔标本”。它成为曼特尔后期许多工作的灵感来源，并促成了某些最早的恐龙形象的诞生（图9）。在后来的若干年里，他继续钻研禽龙的解剖学和生物学，但可叹的是，他的许多工作因一个才华横溢、出身名门、野心勃勃、不讲情面的强硬对手——理查德·欧文（1804—1892）（见图1）的崛起而黯然失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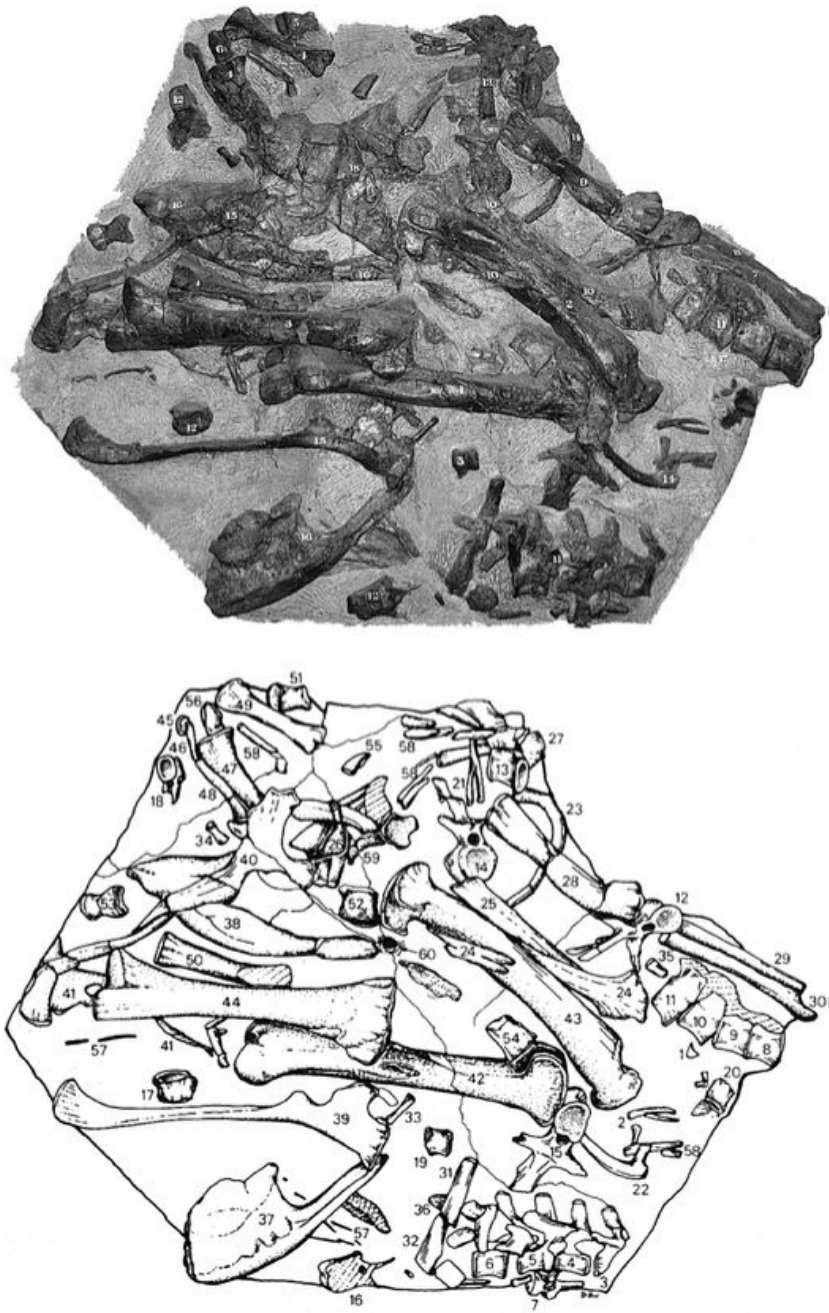

图8　1834年发现于肯特郡梅德斯通的不完整骨架“曼特尔标本”的照片和素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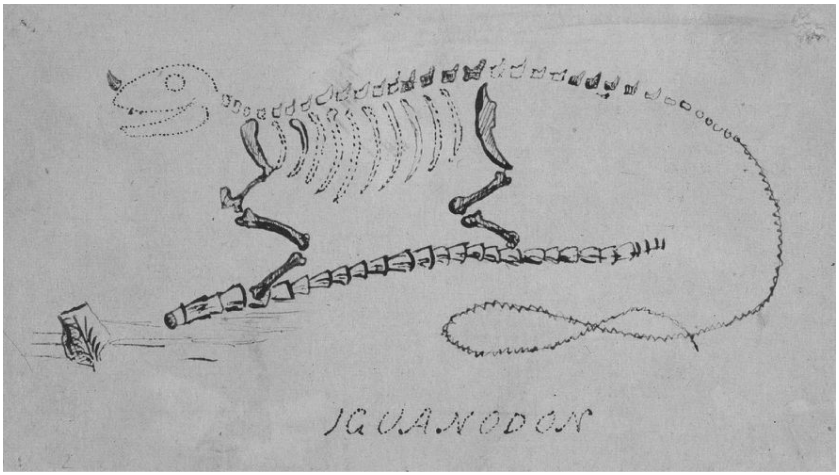

图9　曼特尔的禽龙复原素描图（约1834年）

恐龙的“发明”

理查德·欧文比曼特尔年轻14岁，也学医，但特别专注于解剖学。他赢得了著名解剖学家的声誉，并在伦敦皇家外科医学院获得了一个职位，这使得他能够接触到大量的对比材料。由于他异乎寻常的勤奋和才能，欧文获得了“英国的居维叶”的声誉。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他说服英国（医学）协会资助他重新详细研究所有当时已知的英国爬行动物化石。最终的成果是一系列配有精美插图的大开本图书的出版，这些著作可以与居维叶在19世纪早些时候发表的极为重要的著作（尤其是多卷本的《关于化石骨骸的研究》）相媲美，也进一步巩固了欧文的学术声誉。

这个计划成就了两本重要的出版物：一本出版于1840年，主要是关于海相化石的（科尼比尔的海龙类）；另一本在1842年出版，是关于包括曼特尔的禽龙在内的其他化石的。1842年的报告是一份不寻常的文献，因为欧文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族或亚目……我将其……命名为……恐龙类”。在这份报告中，欧文确定了三种恐龙：禽龙和丛林龙——两者皆发现于威尔德地区并由曼特尔命名，以及巨齿龙——

藏于牛津的巨型爬行动物。基于几个详细而又明显不同的解剖学观察结果，他认识到恐龙属于一个独特且迄今尚未被确立的类群。这些观察结果包括增大的荐椎（臀部与脊柱之间的一个非常强壮的连接构造）、胸部的双头肋骨以及柱状结构的腿（见图10）。

图10　欧文的巨齿龙复原图（约1854年）

在逐一研究了每种恐龙之后，欧文大幅缩减了它们的尺寸；他认为它们很大，但其身长在9—12米之间，而不是像居维叶、曼特尔和巴克兰在早些时候所认为的更夸张的长度。此外，欧文对这些动物的解剖和生物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推测，这些推测与现今科学界盛行的对恐龙生物学和生活方式的解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报告的结语中，他这样评论恐龙：

> 在我们这个地球曾经见证过的卵生［产卵的］冷血动物中，它们拥有最庞大的体型，不论是作为肉食者还是植食者，必定都扮演了最引人注目的角色。
>
> （欧文 1842：200）

还有：

> 具有与鳄类相同胸部结构的恐龙可以推断为拥有四腔心脏……几乎接近于现今温血哺乳动物的心脏特征。
>
> （同上：204）

因此，欧文的观点是，恐龙是一类非常粗壮、但产卵且有鳞的动物（因为它们仍为爬行类），类似于现今地球上热带地区生存的最大的哺乳动物。实际上，他所构想的恐龙是那个时代地球上最壮观的景象，在那个时代，产卵、皮肤有鳞片的爬行动物统治着一切。欧文的恐龙在远古世界的地位相当于现今的大象、犀牛和河马的地位。纯粹从科学推测的逻辑上讲，建立在如此稀少的化石上的这个推断不仅仅是极其敏锐的，而且其关于远古动物的见解完全是革命性的。当与“巨型蜥蜴”的模型并置比较的时候，欧文这个激动人心的构想显得更为引人注目，虽然前者是建立在已获确认并受人尊重的居维叶比较解剖学原理之上的、完全合理且符合逻辑的解释。

恐龙超目的建立在当时还有其他重要的意义。这些报告也对19世纪前半叶生物学和地质学领域中普遍存在的进化论者和生物演变论者的论调进行了彻底的批驳。进化论者指出，化石记录似乎表明生命逐渐变得更加复杂：最早的岩石展示了最简单的生命形式，而更新的岩石则展示了更复杂生物的证据。生物演变论者注意到，同一个种的成员并不完全相同，并思考这种变异性是否也可能使得物种随着时间而改变。居维叶在巴黎的同事让·巴普蒂斯特·德·拉马克（Jean Baptiste de Lamarck）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动物物种可以通过获得性特征的遗传而改变形态。这些观点挑战了受到广泛支持并为《圣经》所支持的信仰——上帝创造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从而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辩论。

恐龙（实际上还有虔诚信奉上帝的欧文在报告中认可的其他几个生物类群）证明了地球上生命的复杂性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事实上正好相反。恐龙在解剖学上属于爬行动物（换句话说就是产卵、冷血且有鳞的脊椎动物类群的成员）；然而，与欧文提出的曾经生活在中生代的健壮恐龙相比，生活在今天的爬行类是一个退化的动物类群。简言之，欧文曾试图扼杀当时激进的、以科学作为驱动力的唯理智论，以重建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基础与威廉·佩利牧师（Reverend William Paley）在其著作《自然神学》中所表述的

观点更接近，在这本书中，上帝作为自然界所有动物的缔造者和设计师占据了中心舞台。

19世纪40和50年代，欧文的名望稳步上升，并且参与了与1854年大博览会移址计划有关的委员会。相对于欧文迅速上升的声望来说，一个奇怪的事实是，他并不是作为恐龙造型科学指导的第一人选——吉迪恩·曼特尔才是。曼特尔以身体一直不好为理由拒绝了，这也是因为他对与科学普及工作相关的风险，特别是对并不完善的观点可能造成曲解的风险过于谨慎之故。

曼特尔的故事以悲剧结束：他对化石和建立私人博物馆的着魔使他丧失了其医生职业，家庭也破裂了（他的妻子离开了他，他幸存的孩子们长到能够离家的年纪就移居国外了）。他保存了大半生的日记里满是忧伤的文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孤独无依，深受背痛痼疾的折磨，最终他因服用了过量的鸦片酊而逝世。

尽管被野心勃勃、才华横溢，并且关键是全职的科学家欧文的光环所掩盖，曼特尔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大部分时间仍在继续研究“他的”禽龙。他出版了一系列的科学论文和深受欢迎的著作，总结了他的许多新发现。此外，他最早认识到（1851年）欧文将恐龙（或者说至少是禽龙）想象成强壮的“像大象一样的爬行动物”很可能是错误的。带牙齿的下颌骨的进一步发现，以及对部分骨架（“曼特尔标本”）的进一步分析显示，禽龙具有强壮的后腿和较弱小的前肢。因此，他得出结论，它的姿态可能更类似于“直立”的巨型地懒（似乎很矛盾的是，曼特尔的灵感来自于欧文对地懒化石磨齿兽属的详细描述）。遗憾的是，这一工作被忽略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文的水晶宫恐龙模型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又过了30年，曼特尔怀疑的真实性以及他的智慧才通过另一件偶然发现的惊人标本显露出来。

复原禽龙

1878年，比利时贝尼萨尔一个小村庄中的煤矿有了惊人的发现。

矿工们在地下300多米深的煤层中挖掘时，突然打到了一层页岩（软的薄层状黏土），随后发现了看起来像是大块木化石的东西；人们迫不及待地采集这些东西，因为里面似乎满是金子！经过更仔细的检查，发现那些木头原来是骨化石，而金子则是“愚人金”（黄铁矿）。在骨化石中还发现了少许牙齿化石，经鉴定，它们与曼特尔在多年前描述的属于禽龙的牙齿非常相似。矿工们并没有意外发现金子，而是发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宝藏——完整的恐龙骨架。

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队来自布鲁塞尔比利时皇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现在的皇家自然科学研究所）的矿工和科学家发掘出将近40具禽龙的骨架，以及保存在同一页岩层的大量其他动植物化石。许多恐龙的骨架是完整的，而且完全以关节相连；它们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布鲁塞尔的一位年轻科学家路易斯·道罗（Louis Dollo，1857—1931）因此交了好运，他得以研究并描述这些非凡的宝藏。从1882年开始，直到20世纪20年代退休，他一直从事这项工作。

图11　路易斯·道罗（1857—1931）

在贝尼萨尔发现的完整恐龙骨架最终证明了欧文的恐龙模型，例如他的禽龙模型，是不正确的。正如曼特尔所怀疑的那样，它的前肢不如后肢那样大而强壮，而且该动物有一条巨大的尾巴（见图12），总的比例与大袋鼠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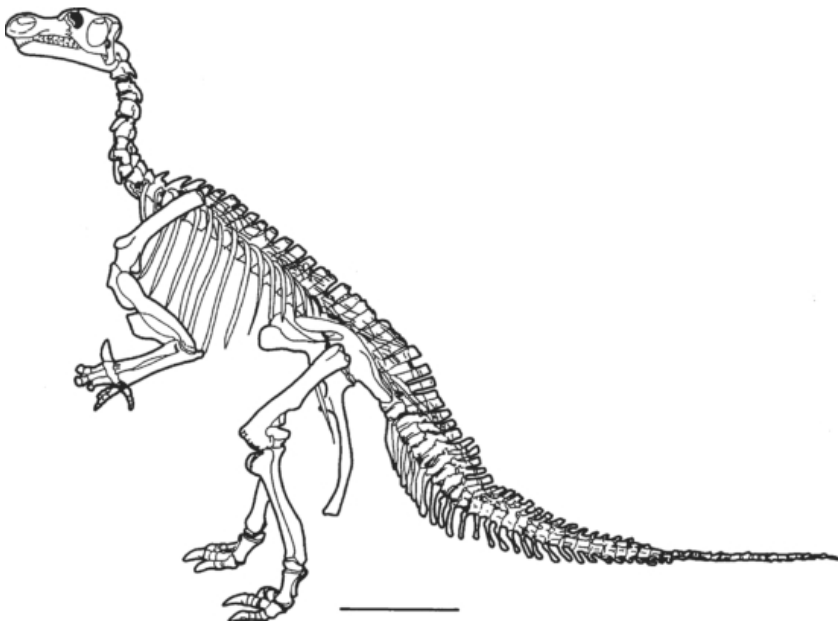

图12　禽龙骨架的素描图

骨架的复原以及复原的过程特别具有启迪性，因为它们显示了当时关于恐龙外貌和亲缘关系的解释是如何影响了道罗的工作。欧文对恐龙“像大象一样的爬行动物”的想象早在1859年就因发现于新泽西州的一些不完整的恐龙而受到了质疑，这些恐龙化石是由约瑟夫·利迪（Joseph　Leidy）进行研究的。利迪的学术地位与欧文相当，他的研究基地是费城自然科学院。然而，欧文还将受到一位来自伦敦、更加年轻且雄心勃勃的竞争者的全面批评，他就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

到了19世纪60年代晚期，人们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从而为恐龙

与其他动物亲缘关系的争论增添了大量新的证据。最早的保存完好的鸟类化石（叫做始祖鸟，意为“远古的翅膀”）发现于德国（图13）。它最终被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从私人收藏家手里买下，理查德·欧文于1863年对其进行了描述。这件标本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具有保存完好的羽毛印痕，这是所有鸟类最重要的鉴定特征，这些羽毛在基岩中像光环一样围绕着骨架；然而，令人相当费解的是，它有着不同于任何现生鸟类、却与现代爬行动物相似的特点，即它的每只手上有3根很长的手指，末端有锋利的爪子，上下颌长有牙齿，还有一条很长的骨质尾巴（某些现生鸟类或许看起来长有长尾，但这其实只是它们附着在很短的尾巴残迹上的长羽毛的外形轮廓）。

图13　一件保存完好的始祖鸟标本，发现于1876年（长约40厘米）

发现始祖鸟之后不久，在德国的同一个采石场中又出土了另一件小的、保存完好的骨架（图14）。它没有羽毛印痕，前肢非常短，无论如何都无法作为翅膀使用；从解剖学上看，它显然是一只小型的食肉恐龙，被命名为美颌龙（“漂亮的颌骨”）。

图14　美颌龙骨架（长约70厘米）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两个发现出现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时期。1859年，仅仅在发现第一件始祖鸟骨架之前大约一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发表了题为《物种起源》的著作。这本书非常详细地论述了支持早先的生物演变论者和进化论者观点的证据。最重要的是，达尔文提出了一个这种演变有可能发生的机制——自然选

择，以及新的物种如何在地球上出现。这本书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因为它向几乎被普遍接受的《圣经》教义的权威发起了直接挑战，提出上帝并没有直接创造世界上已知的所有物种。达尔文的观点遭到了诸如理查德·欧文等虔诚的权威人士的强烈反对。相反，激进的知识分子对达尔文观点的反应则非常积极。据称托马斯·赫胥黎在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以后叹道，“我以前怎么没有想到这些，真是愚蠢啊！”

尽管本书不想过多地牵涉达尔文的问题，但有关恐龙的发现确实在一些争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赫胥黎很快就认识到，始祖鸟和小型食肉恐龙美颌龙在解剖学上非常相似。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赫胥黎不仅提出鸟类和恐龙在解剖学上相似，而且利用这一证据得出了鸟类是从恐龙进化而来的理论。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为在比利时的发现铺平了道路。到了19世纪70年代晚期，路易斯·道罗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学生，应该已经完全意识到了欧文–赫胥黎/达尔文之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必定是：这些新的发现与当时的科学大争论有什么关系吗？

对禽龙完整骨架进行的详细解剖学研究显示，它具有被称为鸟臀目（“像鸟的臀部一样”）的髋部结构；此外，它后腿较长，末端长有巨大的、但明显像鸟类一样的三趾脚（在形态上与一些已知最大的陆生鸟类诸如鸸鹋等的脚非常相似）。这种恐龙还有着与鸟类极为相似的弯曲颈部，上下颌的前端没有牙齿，而且还覆盖着像鸟类一样的角质喙。鉴于在这些激动人心的发现之后道罗所面对的描述和解释的任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布鲁塞尔第一具骨架被复原时所拍摄的早期照片中，就在巨大的恐龙骨架旁边，可以看到两种澳大利亚动物的骨架：一种是小袋鼠（袋鼠中体型较小的一个种类），还有一种是叫做鹤鸵的不会飞的大型鸟类。

在英国刮起的争论风暴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新发现显示，赫胥黎的论点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且还清楚地表明，曼特尔在1851年的想法是正确的。禽龙并不像1854年欧文在他的宏伟模型中所描绘的那样，类似于笨重的、长有鳞片的犀牛；它身型巨大，其姿态更像一只正在休息的袋鼠，只不过它还具有许多类似鸟类的特征，

正如赫胥黎的理论所预言的那样。

道罗证明了他在研究自己所描述的化石动物时具有永不衰竭的创造力——他解剖了鳄鱼和鸟类，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些动物的生物学特征和详细的肌肉组织，以及如何利用它们来确定恐龙的软组织。在许多方面，他是在采用法医式的方法来了解这些神秘的化石。道罗被认为是古生物学（Palaeontology）一个新流派（Palaeobiology）[2]的创立者。道罗认为，古生物学应该扩大范围，从生物学——即生态学和行为学——的角度研究这些已绝灭动物。他对禽龙故事的最后贡献是一篇发表于1923年、纪念曼特尔最初发现100周年的文章。他简要总结了自己对这种恐龙的看法，认为它的生态与长颈鹿相当（或者说，确实是曼特尔所说的大地懒）。道罗推断，它的姿态使它能够伸到高处的树上以采集树叶，然后用肌肉发达的长舌头将食物卷入口中；锋利的喙用来咬下坚韧的叶柄，而其特有的牙齿则使它能够在咽下之前嚼碎食物。这一权威解释得到了非常坚决的采纳，由于它基于一系列完全以关节相连的完整骨架，因而在随后的60年中，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它始终都没有受到挑战。在20世纪早期，复制并安装好的禽龙骨架从布鲁塞尔散布到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博物馆，从而增强了道罗解释的权威性，有关该学科的许多流行的和颇有影响的教科书也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点。

图15　1878年布鲁塞尔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正在被复原的禽龙。注意旁边用作比较的鹤鸵和小袋鼠的骨架。

恐龙古生物学研究的衰落

似乎矛盾的是，道罗在恐龙研究中堪称巅峰的卓越工作，以及他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新的古生物学流派之“父”得到国际公认的声望，却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的实用意义开始在更大的自然科学舞台上急剧衰减。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里，古生物学，尤其是恐龙的研究，出人意料地停滞了下来。继那些令人激动的早期发现，尤其是在欧洲的那些发现之后，是更加引人注目的“骨化石战争”，它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席卷美国。这集中体现在激烈的——有时甚至是狂暴的——发现和命名新恐龙的竞争上，其特点相当于学术界的“蛮荒西部”。这场竞争的核心人物是爱德华·德林克·科普（Edward Drinker Cope，他是儒雅谦逊的利迪教授的门徒）和他的“对手”、耶鲁大学的奥思尼尔·查尔斯·马什（Othniel Charles Marsh）。他们雇用成群的暴徒冒险进入美国中西部地区，尽可能多地采集新的恐龙骨骼。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科学出版物的疯狂发表，这些文章命名了大量新的恐龙，其中有许多名字在今天仍能引起反响，例如雷龙、剑龙、三角龙和梁龙。

在20世纪早期，欧美之外的一些地方也有引人注目的发现，部分原因也是出于偶然，例如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和探险家，是神话般的“印第安纳·琼斯”的原型）在蒙古的发现；以及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沃纳·詹尼斯（Werner Janensch）在德属东非（坦桑尼亚）的发现。

更多新的恐龙不断在世界各地被发现并命名；尽管它们成为了博物馆引人注目的中心展品，但古生物学家们除了在已绝灭动物的花名册上增添新的名字以外，似乎什么都没做。失败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以至于一些人甚至用恐龙作为基于“种族衰退”的绝灭理论的例子。总的论点是，它们已经活得太久了，因而它们的基因组成完全衰竭，不再有能力产生该类群作为一个整体生存所必需的新特质。它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恐龙仅仅是动物构造和进化过程中的一次试验，并最终与地球擦肩而过。

毫不奇怪，许多生物学家和理论家开始越来越带有偏见地看待这个研究领域。新的发现尽管令人兴奋，这一点无可否认，但似乎没能提供可以导向任何特定方向的资料。这些发现需要借助既定的科学程序来对这些动物进行描述和命名，但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兴趣似乎基本上都集中于博物馆学：说得残酷一点，当时这项工作被看成相当于“集邮”。恐龙，以及许多其他化石的发现，为人们提供了化石记录中丰富多彩的生命画卷的一瞥，但除此以外，它们的科学价值似乎令人怀疑。

几个因素证明了这种观念转变的合理性：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有关颗粒遗传规律（遗传学）的著作（发表于1866年，但在1900年以前一直被忽视）为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机制。在20世纪30年代，孟德尔的成果与达尔文的理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新达尔文主义”。孟德尔的遗传学一下就解决了达尔文对自己理论最主要的困扰之一：有利的特征（即孟德尔新术语中的遗传基因或等位基因）如何能够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在19世纪中叶，人们对遗传机制不甚了解，达尔文曾假定，特征或性状——根据他的理论，就是受到选择的特征——在遗传给下一代的时候被混合了。然而，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达尔文意识到，任何有利的性状如果在一代代繁殖的过程中被混合，就自然会被稀释而不复存在。新达尔文主义极大地澄清了事情的真相，孟德尔的遗传学使该理论具备了某种数学上的严谨，而且这一恢复活力的学科迅速催生了新的研究方法。它导致了新的遗传科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兴起，而1953年克里克（Crick）和沃森（Watson）的DNA模型，以及行为进化和进化生态学领域的极大发展更是使其达到了顶峰。

遗憾的是，这片丰饶的知识沃土并没有为古生物学家带来明显的益处。人们无法研究化石动物的遗传机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20世纪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似乎没有给进化研究的学术突破提供实质性的证据。达尔文已经预见到古生物学在他的新理论范畴中的局限性。他运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推理认识到，对于有关他的新进化理论的任何争论来说，化石的贡献都是有限的。在《物种起源》专门

论述“化石记录的不完整性”这一主题的章节中，达尔文指出，尽管化石提供了地球上生物历史进程中进化的实物证据（回到以前进化论者的论点），但可惜的是，岩石在地质时期的连续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化石记录都是不完整的。达尔文将地质记录比作一本描绘地球生命历史的书籍，他写道：

> ……在这一卷中，只有这里或那里的一个很短的章节被保存下来；在每一页上，也只有这里或那里的少许几行。
>
> （达尔文，1882，第6版：318）

恐龙古生物学新流派：一个新的开始

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化石的研究才开始复兴，成为引起人们更广泛和更普遍兴趣的学科。推动这一复兴的是一代富有进化思想的更年轻的科学家。他们渴望证明，来自化石记录的证据绝非达尔文所说的是“看不懂的天书”。支持这项新工作的前提是，进化生物学家显然被限制在以二维世界为主的范围内与现生动物打交道——他们可以研究物种，但不能亲眼目睹新种的出现——相反，古生物学家的工作是在包含时间的三维空间里。化石记录提供了可使新物种出现、老物种绝灭的足够时间。这使得古生物学家可以提出与进化相关的问题：地质年代表是否提供了更多的（或者说不同的）有关进化过程的观点？此外，化石记录是否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对它的分解能否揭示某些进化的秘密？

详细的地质调查开始展现丰富而连续的化石记录（特别是贝壳类海洋动物）——比查尔斯·达尔文曾经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因为在他所处的19世纪中叶，古生物学研究工作还处在相对初期的阶段。这项工作产生的观察结果和理论，向生物学家有关地质年代中长期的生物进化模式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达尔文的理论所无法预见的、突然的、大规模全球性绝灭事件和动物群复苏时期被记录下来。这些事件似乎顷刻间重新调整了生物进化的时间表，这也促使一些理论家对地球上的

生命历史采取更倾向于“片断式”或“偶然”的观点。历史上全球动物群多样性的大规模变化，或者说宏观进化，似乎是可以证明的；这在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没有预见到，也需要进行解释。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奈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提出了“间断平衡”理论。他们指出，进化理论的现代生物学解释需要扩展或修改，以适应在化石记录中反复出现的物种变化模式。这些模式由长期的平静（“平衡期”）和与其相对的短时间里的快速变化（“间断”）所组成。在平衡期，可观察到的物种变化幅度相对较小。这些看法与达尔文的预测并不一致，后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种的面貌发生缓慢而逐渐的变化（被称为“渐进演化论”）。这些观点还促使古生物学家对自然选择在何种水平上可能发挥作用提出质疑：或许某些情况下它能够在个体水平之上起作用？

结果是，整个古生物学领域变得更有活力、更引人探寻，而且视野更开阔；人们还准备将这个领域的工作与其他科学领域更广泛地结合在一起。甚至非常有影响的进化生物学家，例如几乎从不和化石打交道的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也承认古生物学家对该领域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在古生物科学这个综合领域重新建立自己威信的同时，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是产生重要的恐龙新发现的时期；这些事件注定激发出直到今天仍然重要的观点。这场复兴运动的核心是耶鲁大学的皮博迪博物馆，这也是“化石战士”奥思尼尔·查尔斯·马什最初工作的地方。但此时的复兴运动是一个叫做约翰·奥斯特罗姆（John Ostrom）的人引领的，他是一位年轻的古生物学教授，对恐龙怀有浓厚的兴趣。

注释

〔1〕 露头：露出地面的岩层部分。

〔2〕 原文的两个词Palaeontology和Palaeobiology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古生物学名词》中都被译为“古生物学”。具体说来，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新流派，侧重于研究化石生物的生物学特征。为符合国内业界的惯例译法，本文未对这两个词进行区分。

第二章

恐龙复兴

“恐怖的爪子”的发现

1964年夏天，约翰·奥斯特罗姆正在蒙大拿州布里杰附近的白垩纪岩石中勘探化石时，采集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新型食肉恐龙的破碎遗骸。进一步的工作采集到了更加完整的化石。到了1969年，奥斯特罗姆已经可以详细地描述这一新恐龙，并将其命名为恐爪龙（“恐怖的爪子”），这是因为它的后腿上长有像大鱼叉一样可怕的钩状爪子。

恐爪龙（图16）是一类中等大小（2—3米长）的食肉恐龙，属于被称为兽脚亚目的类群。奥斯特罗姆注意到若干异乎寻常的解剖学特征；这从知识上为一场革命奠定了基础，这场革命将打破当时受到坚定支持的观点，即恐龙是古老、过时的动物，在中生代结束的时候拖着缓慢而沉重的脚步走向绝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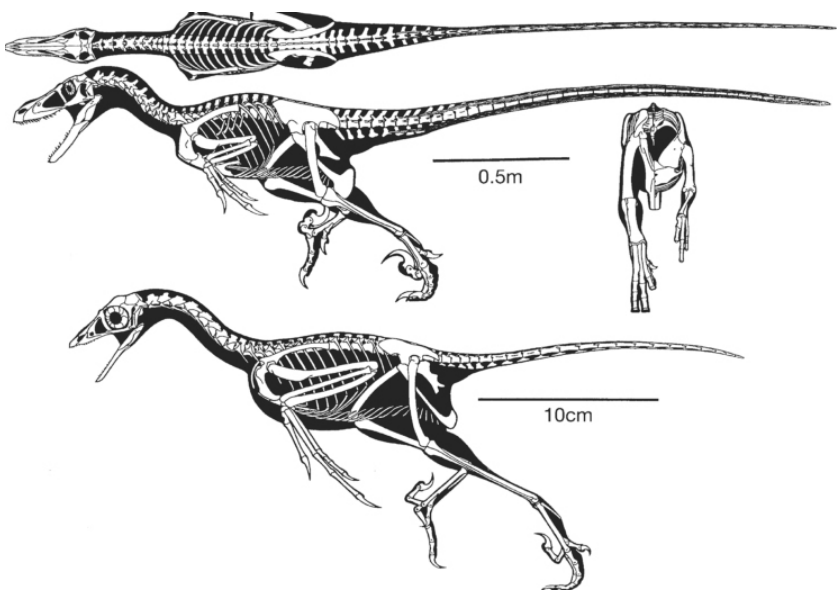

图16　上图：恐爪龙骨架的三个图解。
下图：去掉羽毛的始祖鸟的图解可显示出它与兽脚亚目基本上是近亲。

然而，奥斯特罗姆对了解这种谜一般的动物的生物学特征更感兴

趣，而不仅仅是罗列它的骨骼特征。这种研究途径大异于以前人们对古生物学“集邮”的轻蔑形容，而与路易斯·道罗试图了解第一具完整禽龙骨架（第一章）的生物学特征的早期方法相呼应。作为一种研究途径，它与现代的法医病理学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因为它是在可获得的证据的基础上，将来自若干不同科学领域的、范围广阔的研究结果汇集在一起，以便得出缜密的解释或假说；这是当今古生物学背后的几个驱动力之一。

恐爪龙的特征

i）该动物明显是双足行走的（仅用两条后腿奔跑），具有细长的腿。

ii）它双脚的奇特之处在于，在每只脚上的三个大脚趾中，只有两个脚趾的结构适于行走，内侧的脚趾抬离地面并“翘起”，好像在准备战斗（有点像猫脚上可伸缩的锋利爪子的放大版本）。

iii）该动物身体的前部由臀部的一条长尾巴保持平衡；但它的尾巴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这类动物应该具有的那种厚重而肌肉发达的类型，而是在靠近臀部的地方灵活而有力，其余部分则变得很窄（几乎呈杆状），紧密排列的细骨棒使其变得僵硬。

iv）胸部短而紧凑，长有很长的前臂，其末端是带锋利爪子（如猛禽类）的长有三指的手，能在腕关节处转动，使得手臂能够像耙子一样呈弧形旋转（就像正在捕食的螳螂的手臂一样）。

v）颈部细长、弯曲（很像鹅的脖子），但它支撑着一个很大的脑袋，上面长有伸长的颌骨，上下颌排列着锋利、弯曲、边缘呈锯齿状的牙齿；很大的眼窝似乎是朝前的；脑颅比预想的要大得多。

推测恐爪龙的生物学和自然历史特征

让我们来看一看运用这种“法医式”分析方法，恐爪龙的这些特征能告诉我们哪些有关该动物及其生活方式的信息呢？

颌骨和牙齿（锋利、边缘弯曲、带锯齿）证明它是食肉动物，能够撕开并咽下猎物。眼睛很大，向前，应该能够提供某种程度的立体视觉，这对精确判断距离来说是很理想的：既非常有益于在三维空间里监视运动的物体，也有益于抓捕快速移动的猎物。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该动物相对较大的大脑（大的脑颅意味着大的大脑）：为了处理大量复杂的视觉信息，视神经叶必须很大，这样该动物才能反应敏捷；大脑的运动神经区必须很大、很复杂，才能执行高级大脑指令，然后协调身体肌肉的快速反应。

考虑到它的腿部较轻而纤细，就更强调需要一个复杂的大脑，这与现代快速移动的动物相似，表明恐爪龙是一个短跑健将。狭窄的双脚（仅用两个脚趾行走，而不是更稳定、更常见的三个脚趾的“三脚架”效果）表明，它的平衡感觉一定发育得特别好；下列事实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点：该动物是双足的，当它仅用两脚保持平衡的时候，显然能够行走（这种本领就像蹒跚学步的孩子每天所体验的那样，需要通过大脑和肌肉骨骼系统之间的反馈来学习并完善）。

与这个平衡和协调问题相关的是，每只脚上的“恐怖的爪子”显然还是进攻的武器，是该动物捕食生活方式的证据。但确切地说，它是如何使用的呢？人们可以立即想到两种可能性：其一是它可以每次用一只脚猛踢猎物，就像现在的一些大型地栖鸟类，例如鸵鸟和鹤鸵那

样（这意味着它可以不时地用一只脚保持平衡）；其二是它可以用双脚踢打来攻击猎物，扑向猎物或将其抓在手中，给予致命的“双重踢打”——这种方式是袋鼠在攻击对手时所使用的。我们未必能够确定哪种推测更接近真实的情况。

长的前臂和带有利爪的手是有效的抓握工具，在两种捕食猎物的情景中都可以抓住并撕开猎物，腕关节使它的手能够像耙子一样奇特地活动，这极大地提高了它们的捕食能力。此外，鞭状的长尾巴可能起着悬臂的作用——相当于走钢丝的人手里的长杆，在它用一只脚踢打的时候帮助平衡身体——或者它也可能作为动态稳定器，在恐爪龙追赶能够迅速改变方向的快速奔跑猎物或扑向猎物的时候发挥平衡作用。

尽管这并不是对恐爪龙作为活的动物的详尽分析，但它的确概述了奥斯特罗姆的某些推理，这些推理使得奥斯特罗姆断定，恐爪龙是一种适于运动、有着惊人的协调性，并且智力水平很可能较高的捕食性恐龙。为什么人们会认为这种动物的发现对于恐龙古生物学领域来说非常重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将恐龙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更全面的考察。

关于恐龙的传统观点

在整个20世纪早期，人们普遍（而且非常合理地）认为，恐龙是一个已绝灭的爬行动物类群。不可否认，与现代爬行动物相比，有些恐龙大得令人吃惊，或样貌相当奇怪，但关键在于，它们仍然是爬行动物。理查德·欧文（以及他之前的乔治·居维叶）确认，恐龙在解剖学上与现生爬行类最相似，例如蜥蜴和鳄鱼等动物。在此基础上，人们从逻辑上推断，它们的大部分生物学特征与这些现生爬行动物即便不是完全相同的，也应该是相似的：它们产带壳的卵，皮肤上有鳞，从生理学角度来说是“冷血的”或外温的动物。

似乎很多证据表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发

现，蒙古的恐龙产带壳的卵，路易斯·道罗（还有其他人）鉴定出它们有鳞的皮肤印痕；因此可以预期它们总的生理学特征应该与现生爬行动物相似。将这些特征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对恐龙完全符合惯例的看法：它们是大型、有鳞，但最重要的是智力迟钝、行动迟缓的动物。它们的习性被认为与蜥蜴、蛇和鳄鱼的习性相似，而这些动物本身大多数生物学家也只是在动物园里见到过。只有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是，大部分恐龙的身体即便是与已知最大的鳄鱼比起来都要大得多。

科普书籍和科学著作中都有许多对恐龙的描绘，它们在沼泽中打滚，或蹲伏着，仿佛几乎不能支撑自己庞大的身躯。一些特别令人难忘的例子，譬如O. C. 马什的剑龙和雷龙，也强化了这些观念。这两类恐龙都具有庞大的身体和最小的大脑（甚至马什在评论中都不敢相信他的剑龙的脑腔“大小像胡桃一样”）。剑龙的脑力是如此缺乏，以至于人们认为有必要在它的臀部创造一个“第二脑”，起到某种备份或中继站的作用，接收身体远端的信息，这就不容置疑地确认了恐龙“愚蠢”、“低下”的地位。

尽管相对证据的分量无疑支持这种对恐龙的特定观念，但它忽视了，或者简直就是掩饰了与之相矛盾的观察：已知的许多恐龙，例如较小的美颌龙（图14），身体结构较轻，适于快速移动。这意味着它们的活动水平应该与爬行动物截然不同。

考虑到这一连串流行观点的存在以及奥斯特罗姆基于恐爪龙的观察和解释，我们就更能想象得到这种动物一定给他的思想带来了莫大的挑战。恐爪龙的大脑相对较大，是移动迅速的捕食者，能用后腿快速奔跑并攻击猎物——常识告诉我们它不是普通的爬行动物。

奥斯特罗姆的一个学生罗伯特·巴克（Robert Bakker）将这项研究继续进行下去，他大胆挑战了恐龙是迟缓、愚蠢的动物的观点。巴克认为，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恐龙与今天的哺乳动物和鸟类更为相似。不要忘记，这一主张与1842年理查德·欧文令人难以置信但颇具远见的评论相呼应，当时欧文是第一次考虑恐龙的概念。哺乳动物和鸟类被认为很“特殊”，因为它们能够保持较高的活动水平，而这归因

于它们“温血”，或者说内温的生理机能。现生的内温动物保持着较高而且恒定的体温，具有高效率的肺，以保持稳定持久的有氧活动水平，无论周围的温度如何，它们都是高度活跃的，并且能够维持大而复杂的大脑；所有这些特征将鸟类和哺乳动物与地球上的其他脊椎动物区分开来。

如果从我们现在略微经过“调谐”的古生物学观点来考虑，巴克所使用的证据范围是很有趣的。他利用奥斯特罗姆所作的解剖学观察，提出了与他之前的欧文相一致的主张：

i）恐龙在其躯干之下长有像柱子一样的腿（像哺乳动物和鸟类一样），而不是像我们看到的蜥蜴和鳄鱼那样，腿向身体两侧伸展。

ii）某些恐龙具有像鸟类一样复杂的肺，这使它们能够更有效地呼吸——就像精力非常旺盛的动物所必须的那样。

iii）根据四肢的比例，恐龙可以飞快地奔跑（不同于蜥蜴和鳄鱼）。

然而，通过借用组织学、病理学方法和显微镜，巴克在报告中陈述，在显微镜下观察恐龙的骨骼薄片，可以看到复杂的结构和丰富的血液供应的证据，这使得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矿物质可以在骨骼和血浆之间快速周转——这一点与现代哺乳动物完全相同。

巴克又转向生态学领域，分析了化石样品中捕食动物及其假定猎物的相对丰度，这些样品代表了来自化石记录和现代的按时间平均划分的群落。通过比较现代内温动物（猫）和外温动物（捕食性蜥蜴）群落，他估计，在相同的时间间隔里，内温动物平均消耗的猎物量是外温动物的10倍。当他考察古老的（二叠纪）群落时，通过计算博物馆中收藏的这个时期的化石，他观察到可能的捕食者和猎物的数量大致相当。当检验白垩纪时期的一些恐龙群落时，他注意到，与捕食动物的数量相比，可能的猎物的数量要大得多。在研究了第三纪哺乳动物群落之后他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利用这些相当简单的替代研究，他提出，恐龙（或至少是食肉恐龙）一定具有与哺乳动物更相似的代谢需要；为了使群落达到某种程

度的平衡，就需要有足够的猎物来维持捕食动物的需求。

他也在地质学和“新的”古生物学领域寻找来自化石记录的宏观进化证据（化石丰度大规模的变化模式）。巴克考察了恐龙起源和绝灭的时间，以寻求可能与人们所推定的恐龙的生理机能有关的证据。恐龙起源的时间，即三叠纪晚期（225 Ma），与某些最类似哺乳类的动物的进化时间相吻合，真正的哺乳动物最早出现的时间大约为200 Ma。巴克指出，恐龙之所以发展成为一个成功的类群，就是因为它们比哺乳动物略早发育了内温的代谢作用。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恐龙将永远无法与最早的真正内温哺乳动物相抗衡。在进一步为这一观点寻求支持的过程中，他注意到，在整个中生代，恐龙统治着陆地，早期的真正哺乳动物都很小，可能是在夜间活动的食虫动物和食腐动物，只有当恐龙在白垩纪末走向绝灭的时候，这些哺乳动物才开始演化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种类。在此基础上，巴克指出，恐龙必须是内温动物，否则所谓“更高级的”内温哺乳动物必定会在侏罗纪早期征服陆地，取代恐龙。此外，当巴克考虑到恐龙在白垩纪末（65 Ma）绝灭的时间之时，他相信，有证据证明地球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全球性温度下降的时期。在他看来，由于恐龙体型很大、具内温性，而且“裸露”（也就是说，它们身上覆盖着鳞片，既没有毛发也没有羽毛来为身体保暖），在气候快速变冷的时期无法存活下来，因而走向了绝灭。剩下的哺乳动物和鸟类则活到了今天。恐龙太大了，无法像显然从白垩纪的大灾难中幸存下来的现代爬行动物那样在洞穴中躲避寒冷的天气。

将这一连串的论证结合起来，巴克提出，恐龙远非缓慢而迟钝，它们是有智慧而且高度活跃的动物，在中生代余下的1.6亿年里从传统上被认为是更高级的哺乳动物那里窃取了世界的统治权。它们不是因为高级哺乳动物的进化崛起而被逐出了地球，而仅仅是因为6,500万年前某个异常的气候事件而放弃了它们的统治权。

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古生物学的研究过程是建立在相当广泛的知识基础之上的。“专家”再也不能只依赖他或她自己狭窄领域里的专门知识。然而，故事的这部分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约翰·奥斯特罗姆在这

个传奇中还扮演了另一个重要角色。

奥斯特罗姆和始祖鸟：最早的鸟类

在描述了恐爪龙以后，奥斯特罗姆继续研究恐龙的生物学特征。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德国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发现又将他带回了激辩的中心。在观察会飞的爬行动物的收藏品时，奥斯特罗姆注意到一件采自巴伐利亚一个采石场的标本。它并不像其标签所显示的那样，属于翼龙，或者说会飞的爬行动物。该标本是一条腿的一部分，包括股骨、膝关节和胫骨。该标本的详细解剖形态使奥斯特罗姆想到了恐爪龙的形态。通过更细致的检查，他还辨认出极微弱的羽毛印痕！这显然是传说中的早期鸟类始祖鸟（图13）的一件未被认出的标本。奥斯特罗姆因自己的新发现而激动，同时自然也因为该标本与恐爪龙明显的相似性而迷惑不解，他开始重新仔细研究所有已知的始祖鸟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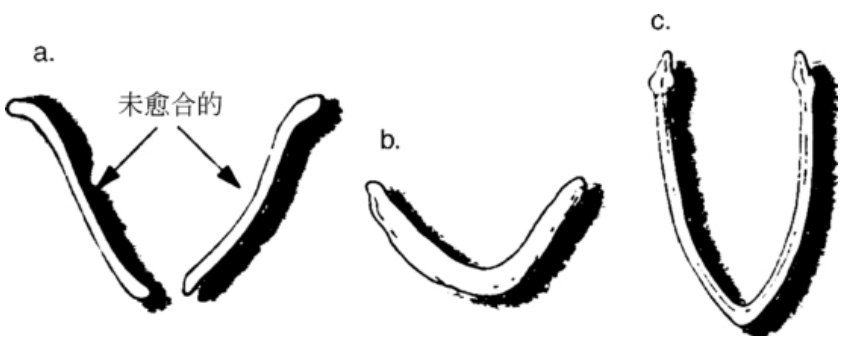

图17．早期兽脚亚目恐龙的锁骨（a）、始祖鸟的锁骨（愈合[1]在一起）（b）以及现代鸟类的锁骨（c）的比较

奥斯特罗姆对始祖鸟研究得越深入，就越是觉得这种动物与他自己发现的大得多的食肉恐龙恐爪龙（图16）的解剖特征非常相似。这促使他重新评估鸟类学家和解剖学家格哈德·海尔曼（Gerhard Heilmann）1926年所撰写的有关鸟类起源里程碑式的、在当时颇具

权威性的著作。食肉的兽脚亚目恐龙和早期鸟类在解剖学上的大量相似特征使得奥斯特罗姆对海尔曼在其著作中关于相似性只能归因于进化趋同的结论提出了质疑。

在掌握了世界各地更新的恐龙发现之后，奥斯特罗姆指出，许多恐龙确实都具有小的锁骨。这一举搬开了海尔曼在恐龙是鸟类祖先问题上所搁置的大绊脚石。受到这一发现的鼓舞，再加上他自己对兽脚亚目恐龙和始祖鸟的详细观察，奥斯特罗姆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海尔曼的理论发起了全面进攻。这使得绝大多数古生物学家逐渐接受了兽脚亚目恐龙是鸟类祖先的理论，也无疑会使颇具远见的赫胥黎感到欣慰，而使欧文深感不快。

兽脚亚目恐龙和最早的鸟类在解剖学上——也就意味着在生物学上——密切的相似性给有关恐龙代谢状况的争论添了一把柴。鸟类是高度活跃的内温动物；或许兽脚亚目恐龙也可能拥有较高的代谢水平。带羽毛的鸟类具有独特的解剖学和生物学特征，这使得它们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纲，即鸟纲，而区别于其他所有脊椎动物，但它们与其他更典型的爬行纲（恐龙只是其中一个已绝灭的类群）成员之间曾经清楚划分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而令人困扰了。这个模糊界线的范围在最近几年变得更加显著了（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所看到的）。

注释

〔1〕 愈合：该词在生物学上指原来为两块骨头，后来长在一起，变成一块了。

第三章

禽龙新知

20世纪60年代古生物学的复苏，以及由约翰·奥斯特罗姆的重要工作所带来的对恐龙的新见解，促使人们开始重新研究某些早期发现。

路易斯·道罗在描述贝尼萨尔禽龙的惊人发现时塑造了一个巨大的、像袋鼠一样的动物形象（5米高，11米长）。它具有：

> 强有力的后腿和帮助其保持平衡的粗大尾巴……（而且）是植食性动物……它用长舌头卷住一把树叶，然后吸入口中，用喙切断。

对禽龙的描绘相当于“吃树叶的动物”——以绝灭时间距今较近的南美大地懒和现在的长颈鹿为代表——在恐龙中的对应物。道罗自己认为禽龙属于“像长颈鹿一样的爬行动物”。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禽龙构想的几乎每个方面都是不正确或具有严重误导性的。

贝尼萨尔：禽龙的死亡之谷？

在贝尼萨尔所进行的一些最早期的工作集中在这一最初发现的特殊环境上。这些恐龙发现于一个煤矿，位于地表下356米到322米的深度之间（图18）。这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开采的煤层的年龄为古生代，而人们尚未在这么古老的岩石中发现过恐龙。然而，禽龙骨架并不是发现于煤层本身，而是在白垩纪时期的页岩矿穴中，这些页岩穿过了产煤的更古老岩石。采矿地质工作者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而想探明这些黏土的范围以及它们可能对煤矿开采的影响程度，因此，他们开始绘制这个区域的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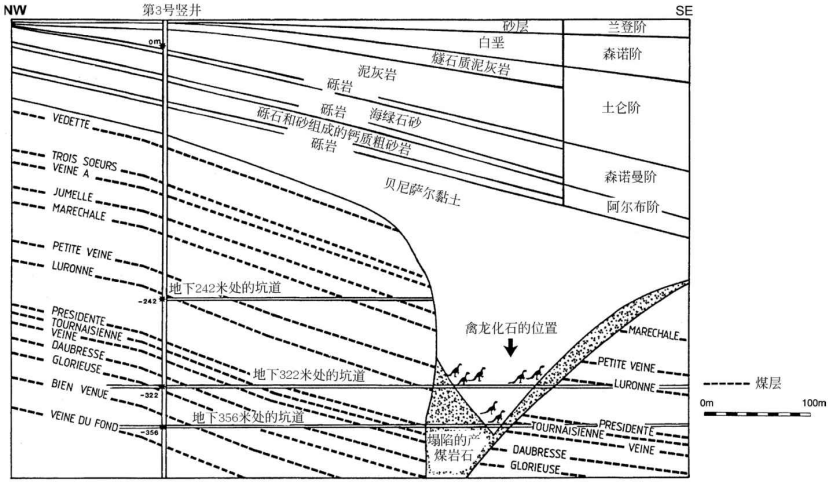

图18　贝尼萨尔煤矿地质剖面图 [1]

在这些地质调查过程中所绘制的煤层剖面图显示，水平的古生代岩层（其中含有宝贵的煤层）有时会被很陡的中生代页岩层（细的薄层状黏土）穿过。剖面图给出了边缘陡峭的深谷切入古老岩石中的最初印象，这构成了一个生动而颇具吸引力的观点的基础。这个观点就是贝尼萨尔的恐龙代表了一个突然跌入死亡深渊的群体（图18）。道罗本人不是地质学家，他更倾向于认为这些恐龙曾经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山谷并最终死在那里。然而，越富戏剧性的故事产生的影响就越为广泛。又有人进一步添枝加叶，提出它们是因为被巨大的食肉恐龙（巨齿龙类）追逐，或者是因为某个异常事件，例如森林火灾而惊跑跌下山谷的。这并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产禽龙的岩层中发现了非常稀少的大型食肉恐龙的碎片；而在产煤的岩石和产恐龙的页岩层之间的一些砾状沉积物中找到了像木炭一样的煤块。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贝尼萨尔的发现给物流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长达11米的完整恐龙骨架在一个深矿井的底部被发现；它们是当时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但是如何将它们挖掘出来并进行研究呢？

比利时政府资助的布鲁塞尔皇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学家和技术

人员与贝尼萨尔煤矿的矿工和工程师合作开展了这项工作。每一具骨架都被小心地发掘出来，它在煤矿中的位置也在平面图上系统地记录下来。所有骨架都被分成大约1米见方、便于搬运的块体。每一块都用熟石膏外壳保护起来，并在平面图上详细编号和记录（图19），然后才抬出来运到布鲁塞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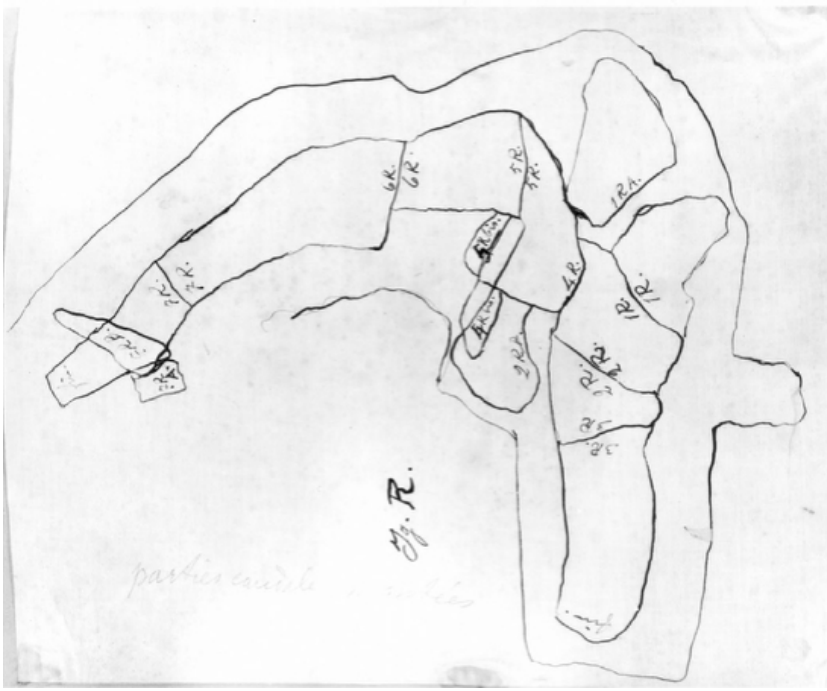

图19　贝尼萨尔一具被挖出的禽龙骨架的平面图

回到布鲁塞尔，这些化石块根据记录被重新组合起来，就像巨大的拼图玩具。石膏被极为小心地剥掉，露出每具骨架的骨头。这时，在开始任何进一步的处理或提取工作之前，为该计划特聘的一位画家古斯塔夫·拉瓦莱特（Gustave Lavalette）会首先绘制出保持死亡姿态的骨架（图20）。一些骨架被从页岩中完全取出，组装成动人心魄的展品，直到今天还可以在布鲁塞尔利奥波德公园的皇家自然科学研究所（即原来的皇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其他骨架只清除了一侧的页岩基体，以埋藏的姿态排列在支撑着巨大的石膏块的木制展台上。

这些展品是仿照它们在贝尼萨尔的煤矿中最初被发现时的埋藏姿态来布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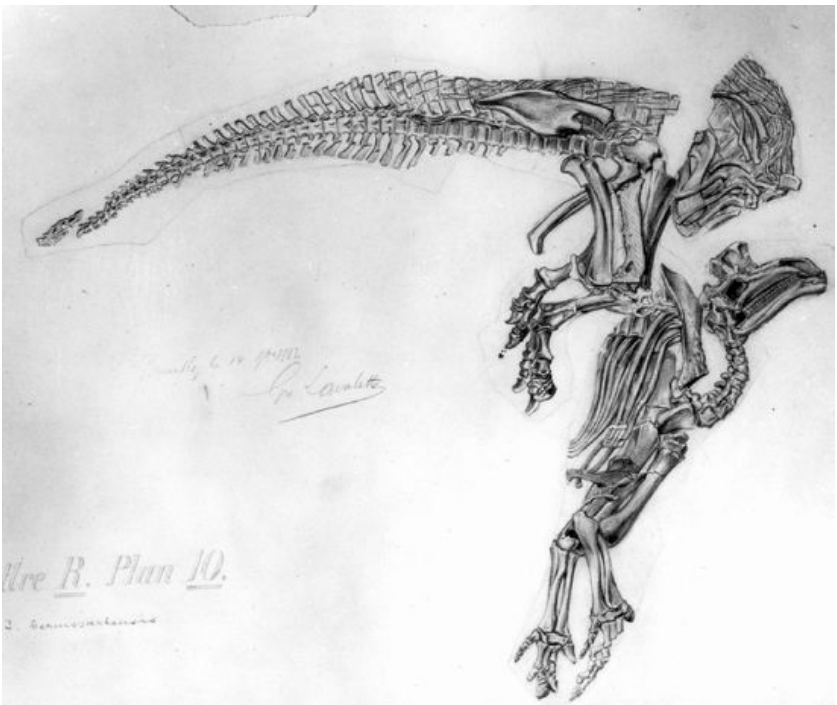

图20　拉瓦莱特绘制的图19中的禽龙骨架的图样

每一次发掘的最初平面图，以及一些粗略的地质剖面图和所发现恐龙的素描图都保存在布鲁塞尔皇家研究所的档案里。这些资料被“开采”出来，而这次是为了寻找有关恐龙埋藏地点地质特征的线索。

贝尼萨尔村所在的蒙斯盆地煤矿区的地质状况在发现恐龙之前就已经是研究的课题了。1870年的一篇重要评论指出，蒙斯盆地的产煤地层中分布着“鲱斗”状斑点（自然形成的地下坑洞）。每一个“鲱斗”的范围都很有限，且为页岩所填充。据推断，它们是地下深处的古生代岩石溶解所形成的。在上层所覆盖岩石的纯重力作用下，这些洞穴的顶面会发生周期性塌陷，从而洞穴也就会被它上面所覆盖的物

体所填充：在本案例中是软的黏土或页岩。在蒙斯地区，这样的沉积物塌陷在当地的记录中表现为恐怖的、像地震一样的震动。惊人的巧合是，1878年8月在贝尼萨尔发掘恐龙的时候，就发生了一次这样的小“地震”。人们注意到了地下通道内的小塌陷和涌水，但水一抽干，矿工和科学家们又立刻投入了工作。

尽管掌握了所有这些区域的地质资料，但非常奇怪的是，布鲁塞尔博物馆的科学家们错误地解释了贝尼萨尔“鲱斗”的地质特征。煤矿工程师绘制了发现恐龙的坑道的地质剖面略图。图上显示，在紧邻产煤层的地方，有10—11米厚的角砾岩剖面（破碎的岩层，含有不规则石灰岩块和混有淤泥与黏土的煤矿，即图18中的“塌陷的产煤岩石”），之后才是坡度很陡、但分层比较规则的产化石页岩。接近“鲱斗”的中部，黏土层呈水平分布，当坑道接近“鲱斗”相反的一侧时，岩层再一次向相反的方向急剧倾斜，然后又进入角砾岩区域，最后重新进入产煤沉积层。穿越“鲱斗”的对称地质特征恰恰可以认为是上覆沉积物填入大的洞穴中所造成的。

埋藏恐龙的沉积物也直接否定了山谷或河谷的解释。分层很细的含化石页岩通常是在低能量、相对浅水的环境下沉积的，大概相当于大的湖泊或潟湖。完全没有证据显示成群的动物跌入山谷造成灾难性死亡。事实上，恐龙骨架发现于不同的沉积层中（与鱼、鳄类、龟、数以千计的树叶印痕，甚至罕见的昆虫碎片共同存在），由此证明它们肯定不是死于同一时间，因此绝不会是同一群落的一部分。

对煤矿中化石骨架进行的定向研究显示，恐龙尸体是在不同时间、从不同方向被冲入埋藏区域的。似乎携带它们尸体的河水的流动方向会不时变化，这与今天在流动缓慢的大型河流中发生的情况完全一致。

因此，早在19世纪70年代人们就清楚地认识到，贝尼萨尔的恐龙既不是在“山谷”、也不是在“河谷”中死亡的。非常有趣的是，贝尼萨尔恐龙的戏剧性发现似乎太需要一个关于其死因的同样戏剧性的解释了，以至于尽管这些想象与当时可获得的科学证据相抵触，它们还是被不加批判地采纳了。

禽龙作为巨大的袋鼠型动物的形象已经变成了标志性符号，因为其完整的骨架模型被慷慨地送给世界各地的许多博物馆。但是这种复原的证据经得起进一步的仔细研究吗？

“歪曲”的尾巴

根据基本原理来重新观察骨架证据，贝尼萨尔骨架的解剖结构显示出了一些令人迷惑的特征。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与禽龙硕大的尾巴有关。众所周知的禽龙复原模型显示，该动物（图12）像真正的袋鼠那样，用尾巴和后腿像三脚架一样支撑起身体。为了采用这种姿态，尾巴朝臀部方向向上弯曲。与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所有的文献记录和化石证据都表明，该动物的尾巴一般是笔直的或者有点向下弯曲。从博物馆陈列在石膏块上的标本中，以及从标本展出之前用铅笔所绘的精美骨架速描图上（图20）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当然，或许可以争辩说，这种形态只不过是保存过程所造成的现象，但这个解释在这里肯定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脊柱的两侧都由像格架一样排列的长骨质肌腱“捆绑”在一起，从而使得脊柱变得很直；这可以在图20中看到。因此，肌肉发达的沉重尾巴起着巨大悬臂的作用，在臀部平衡身体前部的重量。事实上，从身体结构的角度来说，在道罗的复原中所看到的向上弯曲的尾巴在这些动物活着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对骨架的详细检验显示，尾巴在若干地方被有意弄断，以达到向上弯曲的目的——这种情况或许是路易斯·道罗过于急切地想使骨架适合他个人想法的缘故。

这一发现打乱了骨架其余部分的姿态。如果尾巴变直了，以使它的形态更为“自然”，那么身体的倾斜度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脊柱变得更水平，在臀部保持平衡。结果是胸部变得更低，使前肢和手更接近于地面，这就引发了有关它们可能的功能的疑问。

手还是脚？

出于一个明显的原因，禽龙的手已成为恐龙民间传说的一部分。拇指上锥形的钉状刺最初被认为是长在禽龙鼻子上的角（图9），就像犀牛一样，而且这个形象由于矗立在伦敦水晶宫公园的巨大混凝土模型（第一章，图2）而流传于世。直到1882年道罗首次提供了禽龙的权威性复原，人们才确信这块骨头的确是恐龙手的一部分。然而，这种恐龙的手（以及整个前肢）还有更多的令人惊奇之处。

拇指，或者说第一指，由一块大的、锥形、带爪子的骨头组成，其突出方向与手的其余部分垂直，几乎不能活动（图21A）。第二、三、四指的排列方式与第一指大不相同：三块长的骨头（掌骨）构成了手掌，它们通过坚固的韧带结合在一起；手指与这些掌骨末端以关节相连，短而粗，末端长有平而钝的蹄。研究者将这些骨头排列起来，操控它们，看它们真正的活动范围可能如何，结果发现，手指向外张开（互相远离），完全不能像预想的那样，弯曲握成拳头，及执行简单的抓握功能。这种独特的排列方式看起来与它们的脚很相似：每只脚上中间三个脚趾的形态和关节都很相似，互相分开，末端有扁平的蹄。第五指与所有其他指均不相同：它与前面的四个手指明显分开，与手的其余部分构成很大的角度；它也很长，每个关节处的活动范围都很大，可能异乎寻常地灵活。

这次重新观察促使我大幅度修订了早期的观点，并推断禽龙的手是整个动物界中最奇特的手之一。其拇指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匕首般的防御武器（图21B）；中间的三个手指显然适于承重（而不是像普通的手那样用来抓握物体）；而第五指足够长且灵活，可以像真正的手指一样充当抓握的器官（图2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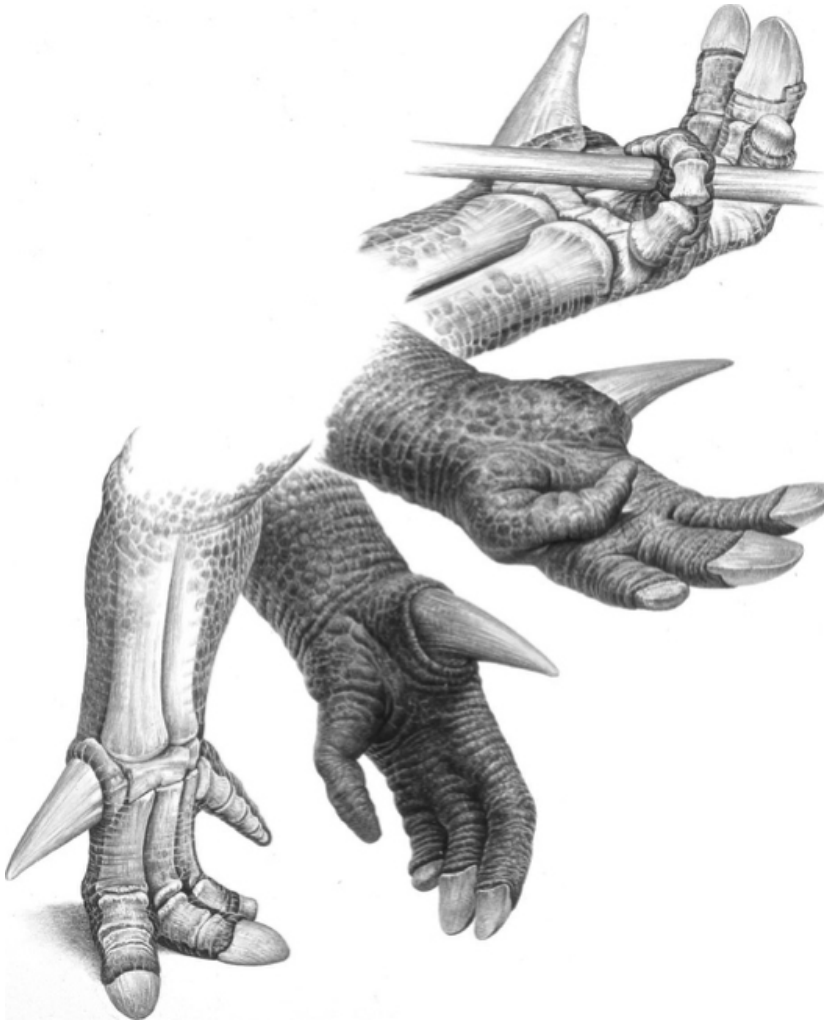

图21A　禽龙的手及其使用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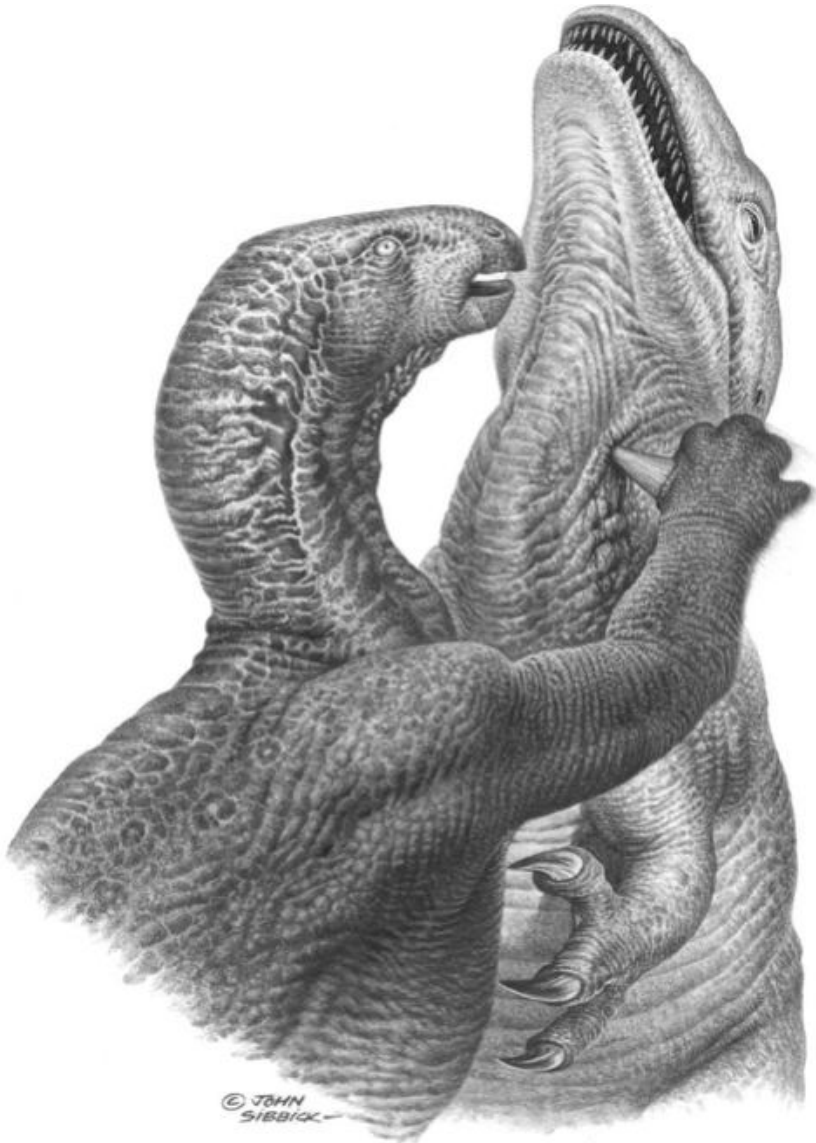

图21B　禽龙匕首一样的拇指的活动

手可以像脚一样用来行走，或者至少可以承担部分体重，这个观点是革命性的——但它是正确的吗？这促使人们对前肢和肩部进行进一步研究，以便寻找可能支持这一全新解释的补充证据。

首先，腕关节被证明是很有趣的。腕部的骨骼愈合在一起，成为

一个骨块，而不是一排光滑、圆润的骨头，可以相互滑过，以便手在前臂上旋转。所有单个腕骨都由骨质胶结物结合在一起，其外周还有骨质韧带束进一步加固。显然，这些特征结合在一起，是为了将腕骨牢牢固定在手和前肢骨骼上，以抵抗承重过程中作用于它们的力，如果手真的要起脚的作用时必须如此。

前肢骨骼的其余结构非常强壮，主要也是为了加强承重时的力量，而不是像比较标准的真正前肢那样为了取得柔韧性。前肢的僵硬程度对于手的着地方式具有重要影响——手指应该是朝外，而手掌向内——这是将手转换成脚所造成的一个不寻常的结果。禽龙这种相当笨拙的手的姿态已经通过研究这种恐龙留下的前脚印的形态得到了证实。

前肢上部（肱骨）巨大，很像柱子，并显示出它上面曾固定巨大的前臂和肩部肌肉。前肢也特别长，超过了后肢长度的四分之三。在原来的骨架复原中，前肢的真正长度在某种程度上被掩盖了，因为它们折叠在胸前，看起来 总是比它们的真正长度要短。

最后，肩部骨骼大而有力，如果前肢起到腿的作用，这就完全合乎道理了。但肩部还显示出另一个出乎意料的特征。在贝尼萨尔的较大骨架中，胸部中央有一块不规则的骨头，长在胸部中央两个肩关节之间的软组织中。这块骨头是病理性的——当动物用全部四足行走时，胸骨内部所产生的损伤会促使这种骨头的形成（被称为胸骨间骨化）。

根据这些观察重新评估禽龙的姿态，则它的脊柱比较自然的姿态很显然是水平的，体重沿着脊柱分布，主要在臀部保持平衡，并由大而强壮的后腿支持。骨化的肌腱沿脊椎骨在胸、臀和尾部上方分布，显然起着张力器的作用，使体重能够沿着脊柱分布。这种姿态使前肢能够着地，在动物静止时用于支持体重。禽龙很可能用全部四肢缓慢行走，至少在部分时间里是这样的（图22）。

图22　新的禽龙复原图

大小和性别

贝尼萨尔的发现尤为著名，因为其中包含了两种类型的禽龙。一种（贝尼萨尔禽龙——顾名思义就是“生活在贝尼萨尔的禽龙”）大而强壮，有超过35副骨架属于这种禽龙；另一种（阿瑟菲尔德禽龙，以前称为曼氏禽龙——从字面上讲，就是“曼特尔的禽龙”）较小而纤细（大约6米长），仅有两具骨架。

这些标本一直被认为属于不同的种，直到20世纪20年代，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贵族、古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巴伦·诺普乔（Francis Baron Nopcsa）对它们重新进行了评析。两种显然生活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的非常类似的恐龙类型的发现，促使他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明显的问题：它们是同一个种的雄性和雌性吗？诺普乔试图在若干化石

种中确定性别差异。就贝尼萨尔的禽龙来说，他推断，较小且较稀少的种是雄性，较大且较多的种是雌性。他相当合理地评论道，实际情况通常是雌性爬行动物要比雄性大。其中的生物学原因在于，雌性通常必须生产大量的厚壳卵；卵在产出之前要从身体吸取相当多的资源。

尽管这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但事实上它很难得到科学的证实。从总体上看，爬行动物体型大小的变化范围大得惊人，远非诺普乔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是稳定的特征。除此之外，在现生爬行动物中用于区分性别的特征通常见于性器官本身的软组织解剖、皮肤的颜色，或者行为。这一点特别遗憾，因为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化石才会保存这些特征。

最有价值的证据是发现禽龙性器官软组织结构的化石，但遗憾的是，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且，由于我们永远不可能知晓它们真正的生物学特征和行为，因而我们必须谨慎一些，还要实事求是。从目前来看，较为稳妥的办法是记录这些不同点（或许我们可以保留自己的猜测），但也只能到此为止。

对产自贝尼萨尔的、更丰富的大型禽龙的详细研究显示，其中有少数体型比平均值要小。对所有这些骨架比例的测量显示了出人意料的生长变化。较小的、据推测是未成年标本的前肢比预期的要短。前肢比较短的幼年个体可能更擅长于双足奔跑，但在达到大型的成年尺寸和高度后，它们可能就逐渐变得更习惯于以全部四条腿行走。这也与仅在较大的、可能为成年的个体中观察到胸骨间骨化现象相一致，因为与较小、较年轻的个体相比，成年个体在更多的时间里是四足着地的。

软组织

化石动物的软组织很罕见，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才能保存下来，因此古生物学家逐渐探索出各种方法，来直接和间接地解读有关

恐龙这类生物学特征的线索。

路易斯·道罗描述过禽龙部分骨架上的小片皮肤印痕。出自贝尼萨尔的许多骨架是按典型的“死亡姿态”来展示的，强有力的颈部肌肉在死后僵直（*rigor mortis*）过程中收缩，牵拉颈部产生强烈弯曲，使头向上和向后转动。在死亡和最终埋藏的这段时间里，骨架一直保持着这个姿态，这表示动物的尸体已经变硬、变干。在这样的状态下，它像羊皮纸一样坚韧的皮肤表面会变硬，埋藏它的细粒泥浆就会形成其皮肤的印模。如果埋藏恐龙的沉积物足够结实，就能在恐龙的有机组织不可避免地腐烂和消失之前保留它们的形态，那么（就像简单的陶器模子一样）皮肤表面结构的印痕就会保存在沉积物中。

在禽龙的例子中，保存下来的皮肤结构印痕证实了人们的预想：它显示了细鳞状、柔韧的表面，在外表上与现代蜥蜴的皮肤非常相似（图23）。显然，原始组织的消失意味着任何有关皮肤颜色的痕迹也早已消失了。

图23　禽龙皮肤印痕

除了描述恐龙骨架中的各种骨骼所必须做的详细工作以外，研究也可以集中于恐龙身体的某些部位，特别是臀部、肩部和头部，以便获得有关肌肉排列的线索。其中的原因是，肌肉和肌腱在骨骼表面附着的地方经常会形成指示性的表面标志，例如骨头上突起的脊，或独

特的凹形肌痕。骨骼是一种可塑性大得惊人的物质。在身体的生长过程中，或者在受到骨折之类的外伤后自行恢复时，骨骼都必须改变形态。即便当身体完全长成以后，骨骼也会对不断变化的压力和张力作出反应，继续重新塑造，但这可能不那么显而易见。例如，一个进行负重训练的人会沉积额外的骨骼，以便应对增大的负荷，特别是当这种训练模式持续很长时间的时候。

在身体的特定区域，大的肌肉会对骨骼施加压力，这样骨骼上的肌痕就会相当明显，甚至在化石上也清晰可见；据此可以绘制出一张复原了一些原始肌肉组织的草图（图24）。这种复原以相关现生动物的已知肌肉排列为依据，同时考虑到所研究的化石动物的解剖差异或新特征，是将两者融合在一起而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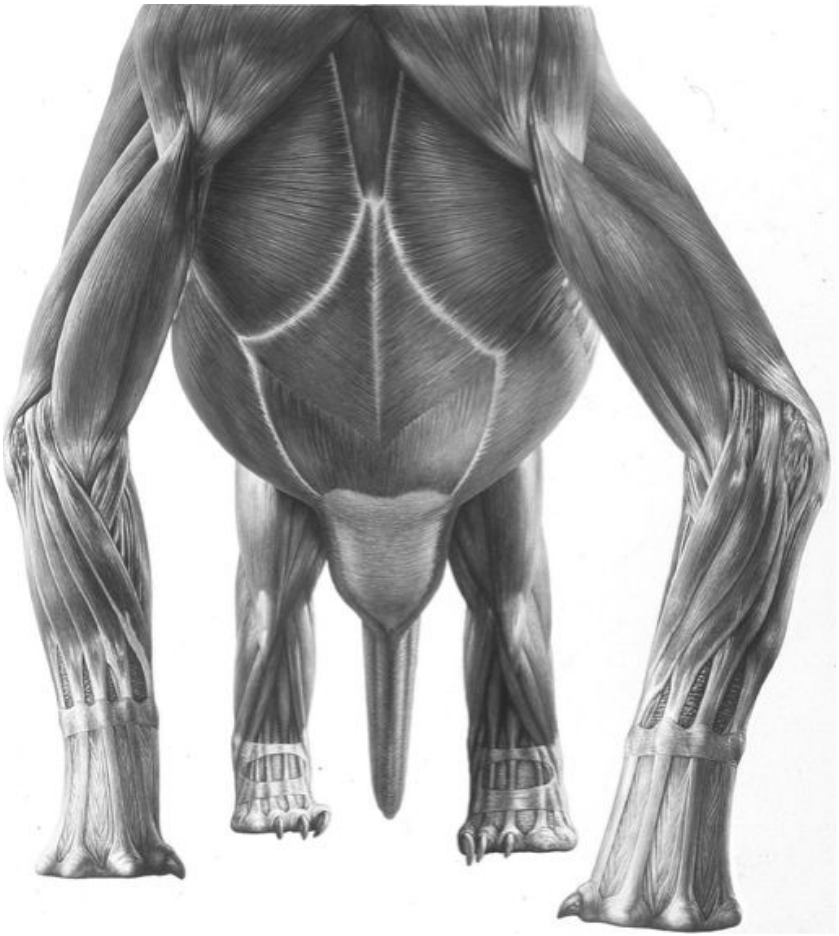

图24　恐龙的肌肉复原

虽然在科学性上远远不够理想，但这种类型研究的一个例子是当研究者在试图了解禽龙肌肉组织的时候，用与恐龙关系最近的两个现生近亲——鸟类和鳄类的资料作为起点。显然，这两种类型的动物都不能完全准确地代表禽龙的解剖学特征：鸟类因飞行而大大改变，没有牙齿，尾巴极小，髋部和腿部的肌肉也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鳄类虽然在形态上更接近传统的爬行类，但作为水生捕食动物，它也是高度特化的。尽管存在这些实际问题，但它们为复原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或样板——称为“现有系统发育框架”（EPB）——在此基础上再

用禽龙更详细的解剖学特征来对其进行补充。

这些特征包括来自骨架或头骨的整体物理结构（骨骼的形态和排列）的综合证据，以及它们对肌肉分布和功能的影响。这样的复原还需要考虑一些其他因素，譬如所提出的运动方式。例如，肢骨之间关节的详细特征，它考虑的是与肢骨定位和每一个肢骨关节处可能的活动范围相关的单纯力学因素；又如在某些情况下，恐龙以足迹化石的形式所留下的真实证据，可以指示它们活着时实际上是如何活动的。

现有系统发育框架（EPB）

通过建立与恐龙关系最近的近亲的系统发育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鳄类在恐龙出现之前演化，而鸟类则在最早的恐龙出现之后演化。因此，从进化角度上讲，恐龙处于现生鳄类和现生鸟类之间。

现生鸟类和鳄类共同拥有的解剖学特征也应该存在于恐龙身上，因为事实上它们是被这些现生动物“括在中间”的。有时这种方法可以在即使没有确凿实物证据的情况下，帮助推断已绝灭类群的生物学特征。然而，鉴于像恐龙这样的动物可能非常特殊，在与现生鳄类和鸟类进行比较的时候，必须慎重使用这种方法。

在研究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许多破碎的禽龙骨骼时，一件与众不同的标本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由一个大而残破的部分头骨组成。上颌骨上暴露的几颗牙齿显示它的确属于禽龙，但除此之外，对于解剖研究来说，它似乎毫无用处了。出于兴趣的缘故，我决定将该标本切成两半，看看它内部是否有任何解剖特征更好地保存下来了。结果展现出来的特征出乎意料地有趣并且令人兴奋。虽然骨骼已遭破坏和侵蚀，但很明显，该头骨被埋藏在柔软的粉砂质淤泥中，淤泥渗入了头骨的全部空间。经过数百万年以后，淤泥变硬（石化），密度

变得像混凝土一样。石化的过程非常彻底，以至于泥岩已变得不具渗透性，因此含有矿物质的地下水不能透过岩石渗入并将头骨矿化；结果骨骼相对较软、易碎。

这种罕见的保存条件为探索头骨解剖特征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小心剔除易碎的头部骨骼（而不是硬的泥岩基质），便可暴露出已成为天然泥岩铸模的头骨内部空间的形态（图25）。其中包括大脑所在的空腔、内耳的通道，以及许多通向颅腔和从颅腔发出的血管和神经束。鉴于这一特定动物在大约1.3亿年前就已经死亡，能够复原这么多的软体解剖特征真是非同寻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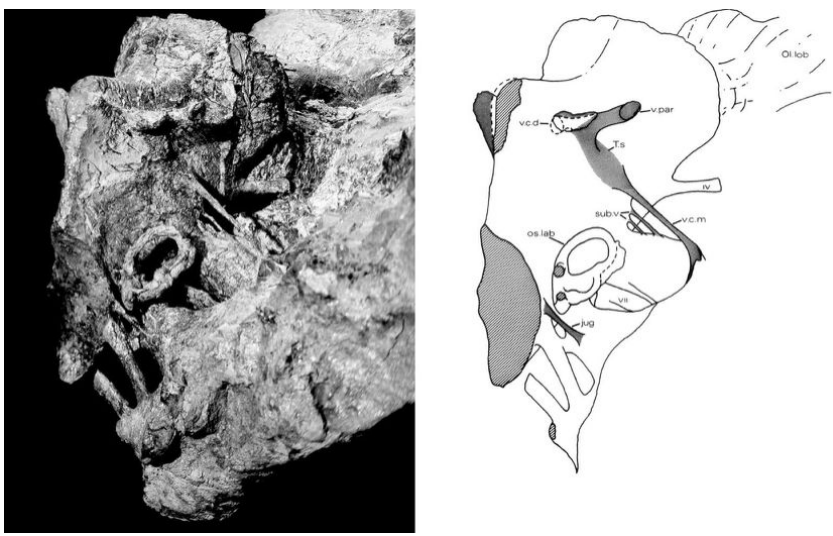

图25　左：禽龙天然颅腔铸模化石的斜视图。右：颅腔的线条图，展示耳区结构、神经、血管和嗅叶。

禽龙和食性适应

最早可识别的禽龙化石是牙齿，它的指示性特征显示它是植食动物；这些牙齿的形态像凿子，能够在嘴里将植物切断和磨碎后再咽下。

切断和磨碎植物性食物的需求提示了一些有关已绝灭动物食性的重要信息，以及它们的骨架可能包含的一些线索。

禽龙的大脑

颅腔的结构显示前部有大的嗅叶，表明禽龙的嗅觉很发达。粗大的视神经朝着大眼窝方向穿过脑颅，显然证实了这些动物具有良好的视觉。大的脑叶表明它是一种协调性很好、很活跃的动物。内耳铸模显示出为动物提供平衡觉的环形半规管，以及一个指状结构，是它听觉系统的一部分。在颅腔之下悬垂着一个豆荚状结构，其中容纳着脑下垂体，它负责调节内分泌功能。在铸模的两侧向下，可以看到一系列粗大的管道，代表了12对脑神经穿过原来的脑颅壁（当然，在这里已破碎了）的通道。其他穿过脑颅壁的较小的导管和管道也保存下来，这提示了一组血管的分布。它们将血液从心脏（通过颈动脉）带到颅底，当然，也通过向下返回颈部的大的外侧头静脉将血液从大脑排出。

食肉动物的食物大部分由肉类组成。从生物化学和营养学的观点来看，对于任何动物来说，肉类食物都是一个最简单和最明显的选择。世界上大多数非食肉动物具有与捕食它们的食肉动物大致相似的化学物质组成。因此这些猎物的肉是现成的、可迅速吸收的食物来源。当然，条件是能够捕捉到猎物，用像餐刀一样的简单牙齿在嘴里将其切成大块（甚至整个吞下），然后在胃里很快消化。整个过程有可能比较迅速，而且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来看，效率也非常高，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浪费。

食草动物所面临的是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与动物的肉相比，植物既不是特别有营养，也无法被迅速吸收。植物主要由大量的纤维素构成，这种物质赋予了它们强度和硬度。对于动物来说，有关这种独特化学物质至关重要和极为棘手的一点是，它完全不能消化 ：在我们

肠道里的化学物质储备中的确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分解纤维素。因此，植物中的纤维素部分就像我们所谓的粗粮一样，直接通过了动物的肠道。那么，食草动物是如何依靠看起来这么没有价值的食物存活下来的呢？

植食性动物已成功地适应了这种食物，因为它们表现出许多独特的特征。它们拥有一副好牙齿，耐磨、持久、复杂，具有不光滑的研磨表面，还拥有强有力的颌骨和肌肉，能够将植物组织在齿间磨碎，把包含在植物细胞壁之内的有营养、能利用的“细胞液”释放出来。为了从这些比较缺乏营养的物质中摄取足够的营养，食草动物需要吃下大量的植物性食物。因此，食草动物往往拥有圆桶状的身体，以容纳大而复杂的肠道，这是贮存它们不得不吃下的大量植物并给予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消化所必需的。食草动物的大容量肠道中储藏着种群密集的微生物，它们生活在消化道内壁的专门腔室或袋囊中；我们的阑尾是这种腔室的一个小的退化残迹，提示我们的灵长类祖先是食草的。这种共生关系使得食草动物为微生物提供一个温暖、受到庇护的环境以及持续不断的食物供应；反过来，微生物能够合成纤维素酶，这种酶能消化纤维素，并将其转化为糖，然后就可以被宿主吸收了。

从大部分标准来看，禽龙（长11米，重约3—4吨）属于大型食草动物，应该会消耗大量的植物。已知这一背景信息，就可以详细探讨禽龙究竟如何取食以及消化食物等问题了。

有关禽龙取食方式的一种长期的看法是，它们用长舌头将植物卷入嘴里。这一观点由吉迪恩·曼特尔提出，他对最早的、近乎完整的禽龙下颌骨之一进行了描述。这一新的化石包括一些标志性的牙齿，所以其归属是没有疑问的；它的前端没有牙齿，呈喷嘴状。曼特尔推测，这种形态可以使长舌头从嘴里滑进滑出，就像长颈鹿的舌头那样。曼特尔不可能知道，这个新发现的下颌骨前端并不完整，“喷嘴”里实际上覆着一块前齿骨。

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20年代路易斯·道罗进一步支持了曼特尔的推测。道罗描述了位于下颌骨前端的前齿骨上的一个特殊开口；它构成了一个直接穿过前齿骨的通道，使得长而纤细、肌肉发达的舌头

可以伸到外面抓住植物，并把它卷到嘴里。在禽龙的颌骨之间曾发现大的骨骼（角鳃骨），有人认为它们的作用是供控制这类舌头的肌肉附着。这一结构与道罗的观点非常吻合，即禽龙是啃食树木的高大动物，具有像长颈鹿一样可以抓住食物的长舌头。

在对许多采自贝尼萨尔的禽龙头骨上的下颌骨重新进行检查后发现，并没有道罗所说的前齿骨通道。前齿骨上部的边缘很锋利，支持着一个龟状角质喙。前齿骨及其上面的喙与同样没有牙齿、覆盖着喙的位于上颌骨前端的前颌骨相对咬合，这种结构使得这些恐龙可以非常有效地啃食它们所获取的植物。角质喙的优势在于，无论它们啃食的植物多么坚硬和粗糙，它都会持续不断地生长（不像牙齿那样会逐渐磨损）。对角鳃骨则仍需作一些解释。在本例中，它们应该是用来固定肌肉的。这些肌肉使舌头在嘴里来回移动，以便在咀嚼时将食物变换位置，并在吞咽时将食物推入咽喉。这与人类口腔底部的角鳃骨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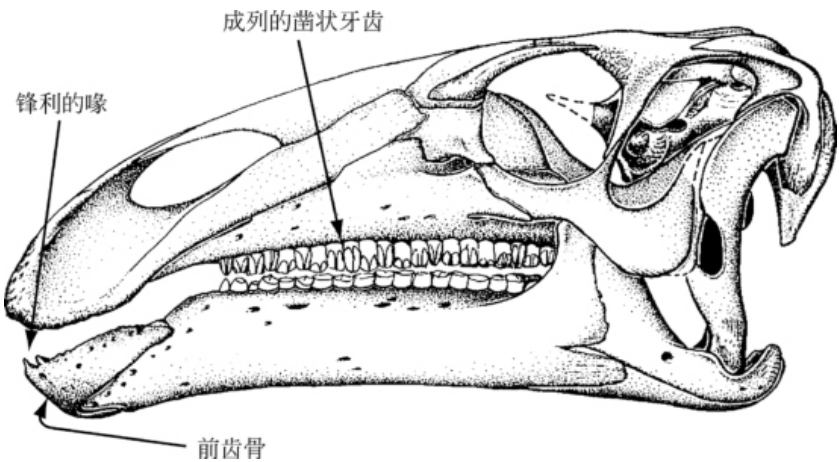

图26　禽龙的头骨

禽龙如何咀嚼食物

除了位于嘴前端的、能够咬断植物的角质喙之外，颌骨的边缘还

排列着令人生畏、近乎平行的凿状牙齿，它们的形态像边缘不规则的刀刃（图26）。每个工作齿都靠着相邻的牙齿整齐地排列，在工作齿的下面是替换齿的齿冠，当工作齿磨损的时候，它们便补入这个空隙，实际上相当于牙齿的“弹匣”或电池组。一般来说，这种持续替换的模式对于爬行动物而言是很平常的。但是，即便以爬行动物的标准来看也非同寻常的是，工作齿和替换齿在一个不断生长的匣中被固定在一起，就好像它们都是一个像磨石一样的巨大牙齿的一部分。在恐龙的一生中，相对的（上牙和下牙）牙齿匣之间保持着一个研磨面。它们不具有永久性的（像我们一样的）耐磨臼齿，而是可以描述为抛弃型的模式，它依靠的是单个简单牙齿的不断替换。

每个相对的牙齿切面边缘都具有一些典型特征，保证了它们切割动作的效率。下牙的内表面覆盖着非常坚硬的厚釉质层，而牙齿的其余部分则由较软的、像骨骼一样的牙质组成。与其相对的是，上牙的布局是相反的：外边缘覆盖着厚釉质层，牙齿的其余部分由牙质组成。当颌骨闭合时，这些相对的切面彼此滑过：在剪/切动作中，下颌牙齿匣的坚硬釉质前缘与上牙的釉质切边咬合，很像一把剪刀的两个剪切面（图27）。一旦釉质边缘彼此滑过之后，（不同于剪刀的剪切面）釉质边缘切在对面牙齿匣较不坚固的牙质部分，进行撕扯和研磨动作，这对于磨碎坚硬的植物纤维是很理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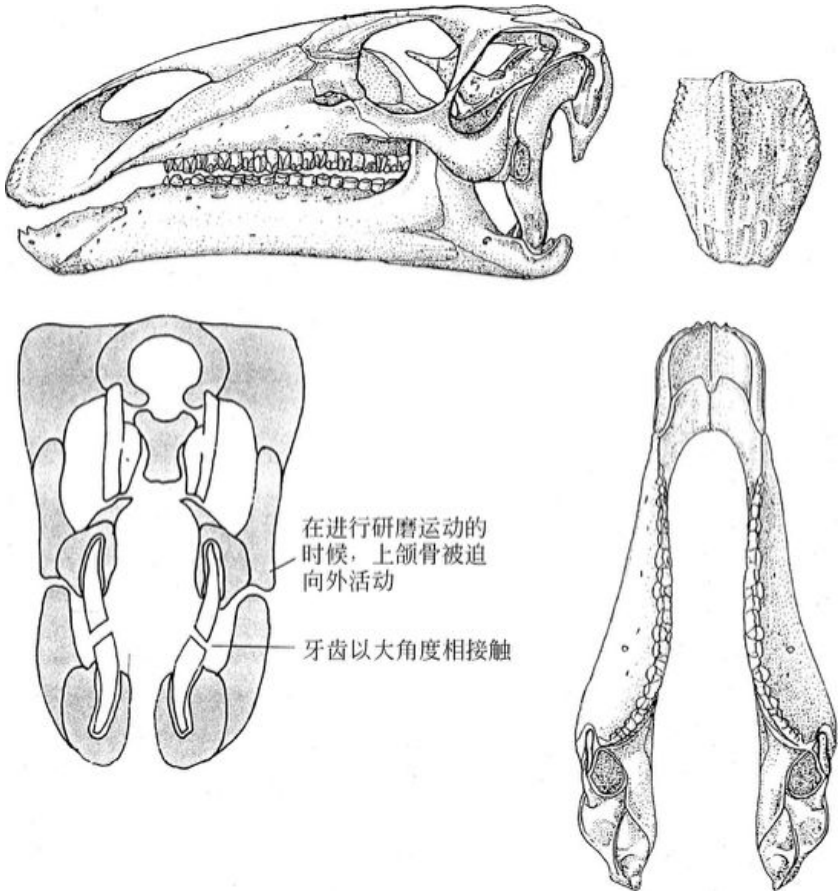

图27　禽龙的牙齿和颌骨

上牙和下牙“弹匣”研磨表面的几何形态特别有趣。磨蚀面是倾斜的，下牙的磨蚀面向外、向上，而上牙的磨蚀面则朝内、朝下。这一模式带来的结果很有意思。在传统的爬行动物中，下颌骨的闭合是由简单的铰合作用完成的，嘴两边的颌骨在所谓的同颌（isognathic）咬合过程中同时闭合。如果禽龙使用这种咬合方式，那么显而易见，嘴两边的两组牙齿就会永远卡在一起：下颌卡在上颌里。这就意味着，倾斜的磨蚀面当初是如何发育而成的，根本无法想象。

如果要形成倾斜的磨蚀面，颌骨在闭合的时候就必须有某种侧向活动的能力。这种活动类型在现生食草哺乳动物中是通过发育上下颌

牙齿不同的（anisognathic）颌骨闭合机制来实现的。它依靠的是下颌骨宽度必然小于上颌骨这一事实。每个颌骨两侧呈吊索状排列的特殊肌肉能够准确地控制颌骨的位置，因此同一侧的牙齿互相接触，然后下牙在里面用力滑动，这样牙齿便互相研磨。我们人类即采用这种类型的颌骨机制，特别是在吃坚硬食物的时候，但在一些标准的食草哺乳动物中，例如牛、绵羊和山羊，动作则要夸张得多，颌骨的摆动非常明显。

所有类型哺乳动物的颌骨机制都需依靠非常复杂的颌部肌肉、复杂的神经控制系统，以及一套具有特殊结构的头骨，以便承受这种咀嚼方式所带来的压力。相反，较传统的爬行动物——禽龙就是其中之一——不具备上下颌牙齿不同的颌骨配置，缺乏能使下颌精确定位的复杂肌肉系统（它们是否具有控制这一运动的神经系统则无关紧要），而它们的头骨也没有特别加固，以承受作用于头骨上的侧向力。

禽龙似乎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它与任何预期的模式都不相符。是解剖结构错了，还是这类恐龙有某些出人意料的行为？

禽龙的下颌骨很强壮，而且相当复杂。在前端，每块下颌骨都由前齿骨将其同相邻的下颌骨固定在一起。牙齿的排列基本上与下颌骨纵向平行，在后方有一块高高突起（冠状突）的骨骼，该区域起到附着强有力的颌骨闭合肌的作用，同时也作为一个杠杆，增加作用于牙齿的咬合力。在冠状突之后，是一组呈紧密束状排列的骨骼，支持着像铰链一样的下颌关节。上颌骨在咬合的时候不仅会受到由下颌骨向上闭合以及下牙对上牙咬合所产生的垂直方向的力，而且随着咬力的增大，还会受到下牙插入上牙时所产生的横向力。

在所有作用于禽龙头骨的力中，最不具备承受条件的是作用于牙齿的横向力。伸长的口鼻部（眼窝前面的区域）横切面呈深的倒U形。为了抵御作用于牙齿的横向力，头骨需要由连接两侧上颌的骨质“托梁”来支撑；这种装置可见于现生哺乳动物。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撑，禽龙的头骨很容易沿中线破裂，这是因为作用于牙齿的力使颧骨的纵深对口鼻部顶面产生巨大的扭转力矩所致。在每侧头骨下面成对

角线排列的铰合构造避免了头骨沿中线破裂；它使头骨侧面在下牙用力插入上牙的同时向外活动。头骨内部更深处的其他特征帮助控制沿着这条铰链方向可以接受的活动量（这样上颌骨就不会耷拉着乱动）。

我将这个奇特的系统命名为侧向运动（pleurokinesis）。一方面，可以将该系统看作是在正常啃咬时避免其头骨发生灾难性破裂的一种手段。然而，侧向运动机制允许相对的两组牙齿之间进行研磨 运动。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模仿了食草哺乳动物所完成的研磨运动。

这一新的咀嚼系统可以与另一个和禽龙等恐龙相关的重要观察结果联系在一起。它的牙齿从脸部侧面凹进（位置朝内）。这就产生了一个凹陷，可能被多肉的面颊所覆盖——另一个迥异于爬行动物的特征。假如切碎食物时上牙滑过下牙，合乎逻辑的预见似乎是，每次它们用嘴啃咬食物的时候，至少一半的食物会从嘴边掉出去……当然，除非它们被某种多肉的脸颊挡住，并在嘴里再加工。因此，这些恐龙似乎不仅能够以令人惊讶的复杂方式咀嚼食物，它们还具有跟哺乳动物一样的面颊。当然，为了在咀嚼之前将食物在牙齿之间定位，它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肌肉发达的大舌头（和强壮的角鳃骨——舌肌骨）。

一旦确认了这一新的咀嚼系统之后，我便认识到，侧向运动并不是只与禽龙联系在一起的“一次性”的新发明。它实际上普遍存在于被称为鸟脚次亚目恐龙的基本类群中，禽龙就属于该类群。追溯鸟脚次亚目在整个中生代的总体进化历史，很明显，这些恐龙类型最终变得越来越多样和丰富。鸟脚次亚目在白垩纪最晚期的生态系统中达到鼎盛；经常有报告称，在所有这个时期已发现的陆生动物化石中，鸟脚次亚目是数量最多的。在全球的某些地区，在这一时期以鸭嘴龙类为代表的鸟脚次亚目恐龙极度丰富和多样化：北美的一些发现显示出数以万计个体的鸭嘴龙兽群。鸭嘴龙具有最复杂的臼齿（每只鸭嘴龙在任何时候都有多达1,000颗牙齿），以及发育完善的侧向运动系统。

一个说得通的解释是，这些恐龙之所以变得丰富和多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能够利用侧向运动系统有效地食用植物性食物。它们的成功进化很可能是继承了首先在禽龙中得以确认的新式咀嚼机制的

结果。

注释

〔1〕 图中未译的词均为法语命名的煤层名。

第四章

恐龙系谱解析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焦点大部分集中在探讨禽龙的解剖、生物学及其生活方式等方面。很明显，禽龙仅仅是中生代更加恢宏的生命舞台上的一类恐龙。古生物学家肩上的重任之一是努力探寻他们所研究的种的系谱，或者说演化历史。为了对恐龙作为一个整体有正确的认识，就必须简要说明用于进行这项工作的方法，以及当前我们对恐龙进化历史的了解。

化石记录的一个特点是它提供了不仅仅在几代人的时间跨度内（这是现代系谱学家的研究范围），而是跨越数千或数百万代，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追溯生物系谱的诱人可能性。目前进行这项研究的主要手段是被称为系统发育系统学的方法。这一方法的前提其实非常简单。它承认生物体都服从于达尔文的总体进化过程。这只需要一个并不深奥的假设，即从系谱的角度来说，亲缘关系较近的生物往往比关系较远的在身体上有更大的相似性。为了研究动物（在这里是化石动物）的亲缘关系，古生物系统分类学家最感兴趣的是在保存下来的化石硬体部分识别出尽可能多的解剖特征。遗憾的是，大量真正重要的生物学信息已全部腐烂，并在骨架石化的过程中丢失了，因此，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只能充分利用所遗留的部分。直到不久之前，系统发育重建还完全依靠动物硬体部分的解剖特征；然而现在，科学技术的创新使得收集基于现生有机体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结构的资料成为可能，这为研究过程增加了重要的新信息。

恐龙分类学家需要做的就是开出一张长长的解剖特征清单，以便识别出在系统发育中重要的或含有进化信息的特征。这项任务是为了将较密切的动物归在一起，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亲缘关系分类体系。

这一分析还会确定某一特定化石种的独特特征；这些特征十分重要，因为它们确立了一些特殊的性状，比如可以将禽龙与所有其他恐龙区分开来的性状。这听起来或许再明显不过了，但实际上，化石动物经常只保存了数量很少的骨骼或牙齿。如果在原产地以外但时代非常相近的岩石中发现其他不完整化石，要令人信服地证明新发现的遗

骸属于（比方说）禽龙，或者一种以前没有发现过的新动物，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除了确定禽龙的独特特征以外，还需要确定它与其他同样独特、但关系非常密切的动物所共有的解剖特征。可以说这就相当于它解剖学上的“家族”。恐龙“家族”所共有的特征越普遍，就越能将它们归到更大、范围更广的恐龙类别中，这些类别将逐渐拼合成有关所有恐龙关系的总体模式。

重爪龙的例子

200多年以来，英格兰东南部的早白垩世岩石一直为化石猎人（开始于吉迪恩·曼特尔）和地质学家（以威廉·史密斯最为著名）所大力勘探。禽龙化石很常见，有限的其他几类恐龙化石也是如此，例如“巨齿龙”、丛林龙、多棘龙、怪异龙、威尔顿龙和棱齿龙。鉴于如此大的勘探力度，人们曾一度认为不大可能再有任何新的发现了。但在1983年，业余化石采集者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在萨里的一个黏土矿坑里发现了一块大的爪骨，这促成了一种8米长、对科学界来说全新的食肉恐龙的发掘。为了纪念它的发现者，该恐龙被命名为沃氏重爪龙，它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展品中占据了显要的位置。

这个故事的教益在于，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化石记录可能充满了惊喜。

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获得这个关系的总体模式？长期以来，人们所使用的一般方法可以被简单描述为“只有我最了解”。这实际上完全是自封专家的观点，他们花大量时间研究某个特定的生物类群，然后总结出该类群相似性的总体模式；他们进行这项工作的方法可能差别很大，但最终首选的关系模式不外乎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偏爱，而不是严格的、经过科学论证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一方法在有限的生物

类群中还算行之有效，但事实表明，要想恰当地讨论一种解释与另一种相比的有效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归根结底，这些论点都是循环论证的，依靠的是选择某个个人的观点。

当生物类群数量众多、在许多细微方面都存在差异时，这一基本问题就凸显出来。昆虫或一些种类多到让人晕头转向的硬骨鱼类群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科学界普遍乐于承认某位科学家在某一时期的权威性，那么表面上一切都好。然而，如果专家们不能达成一致，最终的结果就是令人沮丧的循环争论。

在过去的40年里，一个被证明更有科学价值的新方法已逐渐被采纳。它不一定会给出正确答案，但它至少更能经受严格的科学检验和真正的争论。现在这种方法已被普遍称为分支系统学（系统发育系统学）。这一名称在很大程度上让一些人感到恐慌，但这主要是因为关于分支系统学在实践中如何运用，以及它的结果在进化关系中的总体意义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激烈的争论。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过多考虑这种争论，因为其原理实际上非常简单和明确。

进化分枝图是将当下研究的所有种联系在一起的分枝的树状图解。为了建立分枝图，研究者需要编制一张表格（数据矩阵），其中一栏列出所研究的种，与其相对应的是每个种所展现的（解剖、生物化学等）特征的汇编。然后根据它是拥有（1）还是没有（0）某个性状来给每个种“记分”，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不能确定，就用（？）来表示。接着利用一系列专用计算机程序对产生的数据矩阵（可能非常大）进行分析，这些程序的作用是对1和0的分布进行评估，并产生一套统计数据，以确定不同的种所共有的性状的最简约分布。最后产生的进化分枝图是大量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这些研究的目的是确定和了解共同模式或总体相似性的范围，以及数据可能具有的误导性或错误的程度。

由这种分析所产生的进化分枝图代表的只是所研究的动物关系的一种可行假设。树图上的每个分枝所指向的节点可以定义由共有的许多性状特征联系在一起的物种所构成的类群。利用这些资料可以有效地建立一种系谱或系统发育关系，以代表该类群总体进化历史的模

型。例如，如果将已知每个种出现的地质年代标在模式图上，就有可能揭示该类群的整个历史，以及各个不同的种可能起源的大致时间。这样，进化分枝图就不仅仅简单代表了各个种的空间排列，而是开始类似于真正的系谱了。显然，以这种方法产生的这些系统发育关系实际上仅对应于可利用的数据，随着新的、更好或更完整化石的发现，以及新分析方法的出现或旧方法的改进，这些数据以及评估它们的标准也会发生变化。

这项工作的目的是帮助绘制一幅尽可能精确的生命进化历史的图画，在本书的特例中，就是恐龙的进化历史。

恐龙的进化史：简介

对恐龙进化的这类系统研究的一个有趣例子是芝加哥大学的保罗·塞雷诺（Paul Sereno）的工作。在过去的20年里，塞雷诺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恐龙的分类和总的进化史。图28总结了这一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简略的概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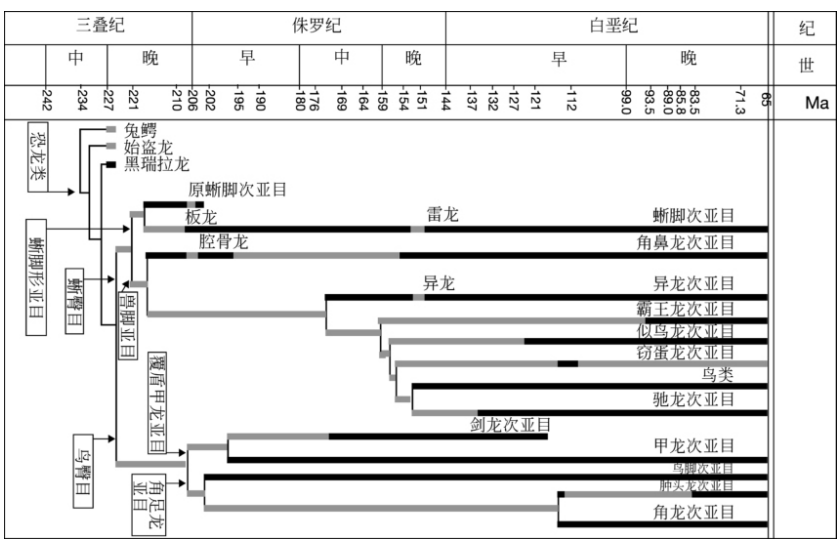

图28　恐龙的进化分枝图

恐龙类在传统上被认为（正如欧文极具洞察力的预见）属于爬行动物，腿呈直立姿态，髋部和脊柱之间有特别牢固的连接，以帮助柱状的腿有效地承担身体的重量。这些变化赋予早期恐龙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优势：柱状的腿可以非常有效地支持惊人的体重，因而恐龙可以长成体型巨大的动物；而且，柱状腿可以跨越很大的步幅，这意味着一些恐龙能够很快地移动。在恐龙统治地球的整个过程中，它们都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两个特征。

尽管所有恐龙都享有这些关键特征，但它们还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蜥臀目（从字面上来讲，就是“具有蜥蜴状的臀部”）和鸟臀目（“具有鸟类状的臀部”）。正如其名称所示，这些恐龙的差别主要在于它们髋部骨骼的结构，尽管其他一些较细微的解剖特征在区别这两个主要类型时也很重要。这两个恐龙类群的最早成员都在卡尼期的岩石中（至少225 Ma）得到了确认，但一直未能识别出最早的恐龙，或者不能确认最早的恐龙严格来说是蜥臀目、鸟臀目，还是不属于两者中任何一类的恐龙。

蜥臀目恐龙

蜥臀目包括两个主要类群。蜥脚形亚目以体型较大的恐龙为主，具有柱状腿，特别长的尾巴，长脖子上长着小脑袋，颌骨上排列着钉状的简单牙齿，显示它们主要以植物为食。这个亚目包括梁龙类、腕龙类（图31）和雷龙类等巨大恐龙类群的成员。兽脚亚目与它们的蜥脚形亚目近亲明显不同。它们几乎全部为双足行走的恐龙（图30、31），动作敏捷，多为肉食动物。臀部一条肌肉发达的长尾巴起着平衡身体前部的作用，使前臂和双手可以用来自由地抓取猎物；它们的头往往相当大，颌骨上排列着像餐刀一样的锋利牙齿。这一类型的变化范围从类似美颌龙这样通常被归入腔骨龙类的体型颇为小巧的恐龙，一直到像霸王龙这样颇具传奇色彩的巨大恐龙，而其他同样巨大且可怕的兽脚亚目包括巨霸龙、异龙、重爪龙和棘背龙。尽管这些恐

龙中的某几个可能很有名，但这一类群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多样性，某些个例还相当奇特。例如，最近发现的镰刀龙类看起来似乎是动作迟缓的巨大恐龙，手上长有像镰刀一样的长爪子，腹部巨大，脑袋却小得有点滑稽，颌骨上排列的牙齿更容易使人联想到植食性动物，而不是传统的肉食者。但是，其他被称为似鸟龙类和窃蛋龙类的兽脚亚目恐龙的身体结构很轻，与鸵鸟颇为相似，完全没有牙齿（因而像现生鸟类一样长有喙）。在这个类群的所有恐龙中最有趣的当属被称为驰龙类的亚群。

图29　恐爪龙。从骨骼到肌肉的复原。或许它也具有细丝状的覆盖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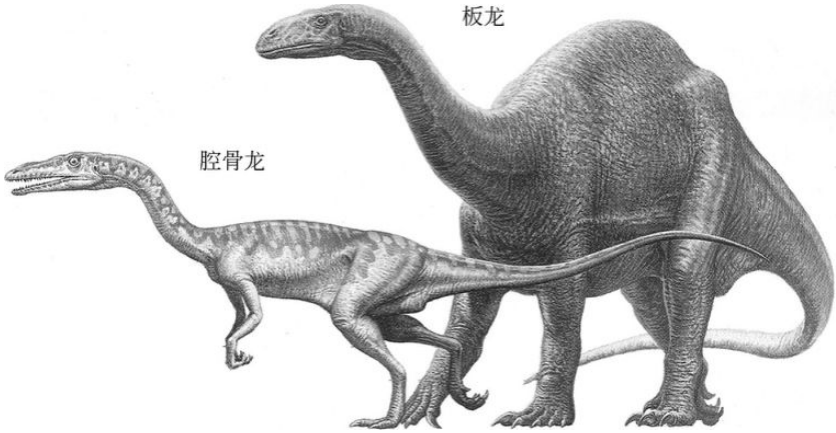

图30　三叠纪的蜥臀目恐龙。早期兽脚亚目腔骨龙和蜥脚形亚目板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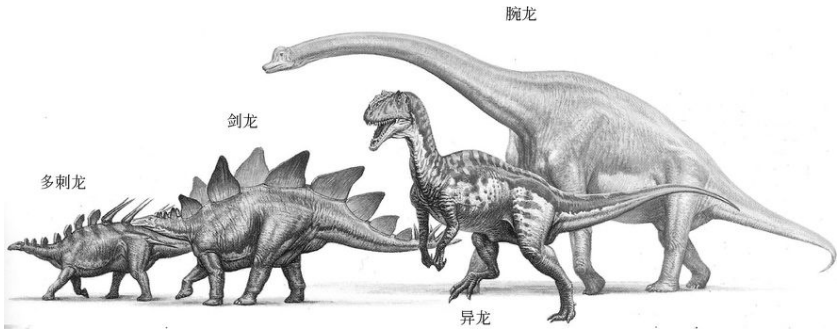

图31　侏罗纪鸟臀目的覆盾甲龙亚目：多刺龙和剑龙。蜥臀目的兽脚亚目异龙和蜥脚形亚目腕龙。

驰龙类包括像迅猛龙和恐爪龙这样的著名恐龙，以及最近发现的许多相似的、但不如它们有名的恐龙。它们的特别有趣之处在于其骨架的解剖特征与现生鸟类非常接近；的确，相似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被认为是鸟类的直接祖先。中国辽宁省一些地方引人注目的新发现展示了保存条件异常良好的兽脚亚目驰龙亚群恐龙，它们的身体覆盖着角蛋白纤维（类似形态粗糙的毛发），在一些例子中，还覆盖着像鸟类一样的真正羽毛，这强化了它们与现代鸟类的相似性。

鸟臀目恐龙

所有鸟臀目恐龙都被认为是食草的，并且与今天的哺乳动物类似的是，它们似乎比其可能的捕食者要更多样化，数量也更丰富。

覆盾甲龙亚目（图28）是鸟臀目中的一个主要类群，其特点是它们的体壁上具有骨板，尾巴上装饰有尾槌或长钉状构造，运动方式几乎毫无例外地为四足行走。这类恐龙包括以标志性的剑龙（因其极小的脑袋、背上排列的大骨板，以及长钉状的尾巴而著名，参见图31）命名的剑龙类，以及披有重甲的甲龙类，它包括像真板头龙这样的恐龙。后者是像坦克一样的巨大动物，身上覆盖有非常厚重的甲板，甚至眼睑上都有骨片加固，尾巴末端长有一个巨大的骨质尾槌，据推测可能用它来击打潜在的捕食者。

角足龙亚目（图28）与覆盾甲龙亚目差别很大。它们的典型特征是体重很轻，不披甲，双足行走，但也有少数的确又回复到四足行走的运动方式。鸟脚次亚目是角足龙亚目中的一个主要类群。这些恐龙中多数体型中等大小（2—5米长），数量相当丰富（很可能填补了今天的羚羊、鹿、绵羊和山羊所占据的生态位）。这些动物，例如棱齿龙，在臀部保持平衡（就像兽脚亚目一样），具有适于快速奔跑的细长腿和能抓握的手，此外最重要的是，其牙齿、颌骨和面颊适于吃植物性食物。在恐龙统治地球的整个时期，小型至中等大小的鸟脚次亚目恐龙相当丰富，但在中生代期间，许多较大型的恐龙演化出来；它们被称为禽龙类（因为其中包括像禽龙这样的动物）。在所有禽龙类中，最重要的是北美和亚洲晚白垩世特别众多的鸭嘴龙类。在这些恐龙中，有些（但不是所有的）确实具有很像鸭嘴形态的口鼻部，另一些具有变化范围很大的、颇为张扬的中空嵴状头饰（参见第七章）；这种头饰可能被用于在社交时发出信号，特别是发出响亮的、像喇叭一样的声音。头饰龙类是角足龙亚目中的另一个主要类群，出现于白垩纪。这个类群包括奇特的肿头龙类（“厚头恐龙”）；它们身体的大致面貌与鸟脚次亚目恐龙十分相似，但它们的头看起来很奇特——大多数头顶上有一个高高的骨质隆起，看起来隐约有点像鸭嘴龙类的头

饰，只是肿头龙类的头饰是由实心的骨骼构成的。有人认为这些恐龙是白垩纪地球上“以头相撞的动物”——或许以类似于今天的某些偶蹄动物那样的方式。

最后还有角龙次亚目，这一恐龙类群包括序言中提到的传说中的原角龙，以及著名的三角龙（“长有三只角的脸”）。它们的颌骨前端都长有狭窄的单个喙，头骨的后缘往往具有皱领状的骨质颈盾。虽然它们中有些——特别是早期类型——保持了双足行走的生活方式，但相当多的种类身体长得很大，具有增大的头部，头上装饰有褶边似的巨大颈盾，眉毛部位和鼻子上长有大角。它们巨大的身体和沉重的头部导致其采用了四足行走的姿态。另外，人们还注意到了它们与现代犀牛的相似性。显然，正如这个过于简短的概述所示，根据过去200多年所获得的发现来判断，恐龙数量多、种类杂。即使到目前为止已有大约900个恐龙属为人们所知，这也仅仅是中生代统治地球1.6亿年的恐龙中的极小部分。遗憾的是，这些恐龙中有许多将永远不会为人们所了解：它们的化石根本没有保存下来。另一些将会在未来的日子里被坚韧不拔的恐龙猎人们找到。

恐龙分类学和古生物地理学

这类研究可能产生有趣的、有点令人意想不到的副产品。这里要提及的一个副产品将系统发育学与地球的地理历史联系了起来。事实上，地球可能对生命的总体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地球的地质年代表是通过悉心分析裸露于世界各地的岩石序列的相对年龄而拼接起来的。有助于完成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岩石中所包含的化石证据：如果采自不同地区的岩石中含有种类完全相同的化石，那么就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这些岩石具有同样的相对年龄。

以大致相同的方式，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化石相似性的证据开始显示，各个大陆的位置可能不像今天看起来那么固定。例如，有人注

意到，南大西洋两岸的岩石以及其中包含的化石似乎非常相似。而在巴西和南非面貌极为相似的二叠纪岩石中都发现了一类小型水生爬行动物，即中龙。早在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就指出，美洲、欧洲和非洲的海岸线看起来非常相似（参见图32d），就好像它们能像两块巨大的拼板玩具一样组合起来。基于化石、岩石以及总体形态相一致的证据，德国气象学家艾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Wegener）于1912年提出，在过去的年代里，地球上的各个大陆一定占据着与它们今天所处的地方不同的位置，例如，在二叠纪时期，美洲与欧洲和非洲紧靠在一起。由于魏格纳不是一位经过训练的地质学家，他的观点被人们忽略了，或者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和无法证明的猜测而不予接受。尽管它的说服力似乎不言而喻，但魏格纳的理论缺乏一种机制：常识告诉我们，不可能在地球的固体表面移动像大陆那么大的物体。

然而，常识被证明是靠不住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系列的观察资料积累起来，支持了魏格纳的观点。首先，所有主要大陆的详细模型显示，它们的确可以非常完美地组合在一起，其一致性无法以偶然来进行解释。第二，当各个大陆像拼板玩具一样重新组合在一起时，不同大陆的主要地质特征是连续的。最后，古地磁极的证据证明了海底扩张现象——即大洋底像巨大的传送带一样承载着各个大陆移动，大陆岩石地磁的历史遗迹亦证实，各个大陆确实在时间的长河中发生了移动。实际上，推动大陆移动的“发动机”就是地球内部地核中的热量以及地幔层中岩石的流动性。板块构造理论解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大陆在地球表面移动的现象，现在这个理论已经得到了普遍接受和证实。

从恐龙进化的观点来看，板块构造理论所带来的启示非常有趣。主要依据古地磁和详细的地层学研究而对过去各大陆形态所进行的重建显示，在所有大陆起源的时候，它们都聚集在一起，是一个单一的巨大陆块，称为泛古陆（“整个地球”）（图32a）。可以说这时恐龙能够在地球上到处漫步，而与这种现象相对应的情形是，种类颇为相似的化石遗存（兽脚类和原蜥脚类）在几乎所有的大陆上都有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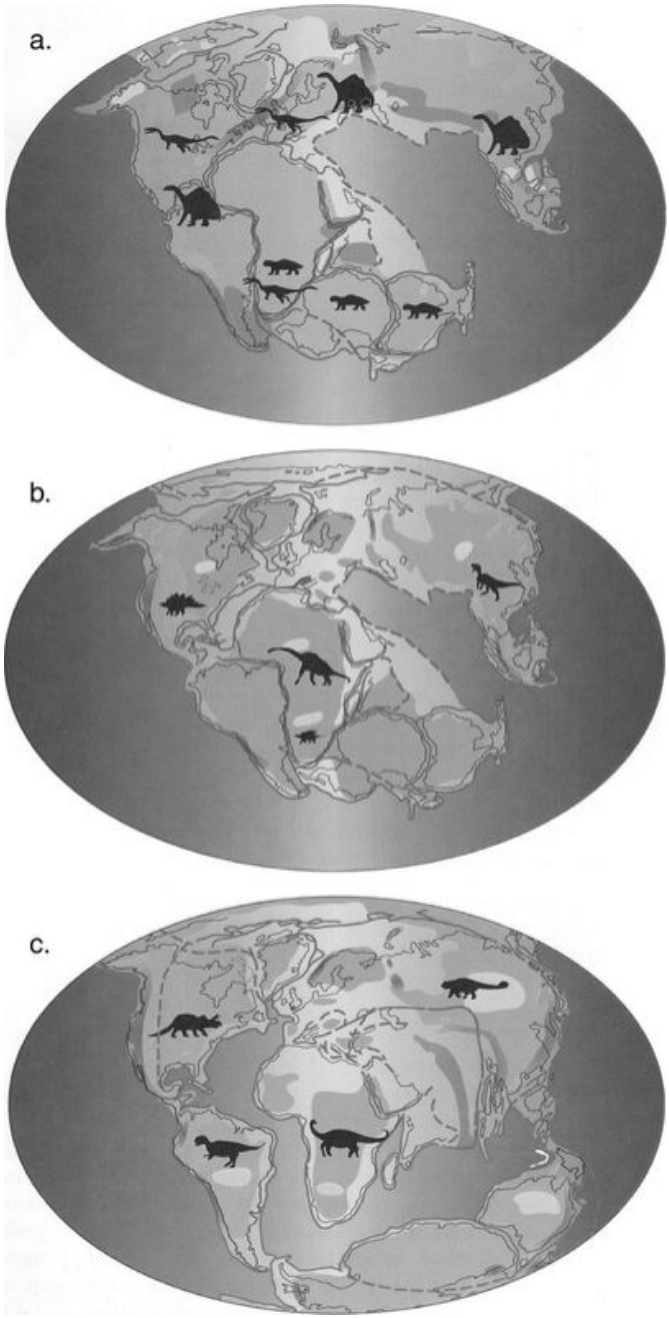

图32　变化的大陆。a．三叠纪时期，被称为泛古陆的单一超级大陆。b．中侏罗世时期。c．早白垩世时期。注意，随着各个大陆彼此分开，恐龙的外貌变

得越来越多样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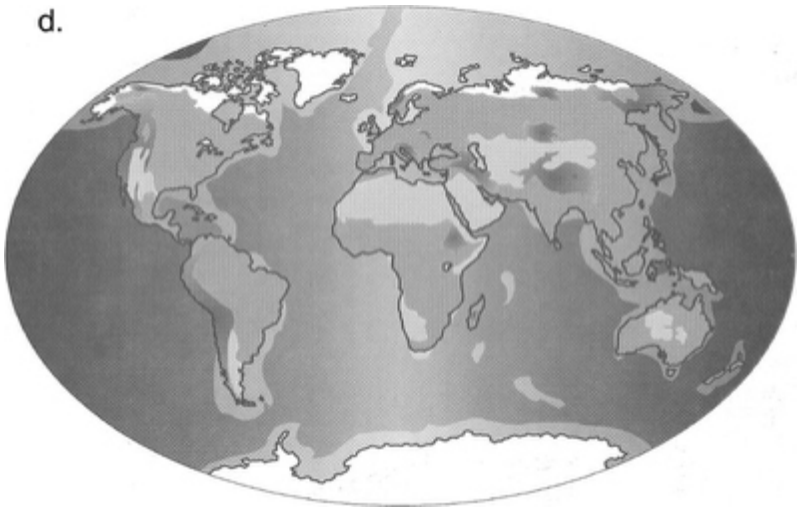

图32(d)　今天的各个大陆。如果将大西洋封闭，美洲和西非便会完美地组合在一起。

在随后的时期，即侏罗纪（图32b）和白垩纪（图32c），很明显，力量超强的地壳构造传送带缓慢但不停地使泛古陆扭曲、瓦解，超级大陆开始分裂。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在白垩纪结束的时候，尽管在地理布局上仍存在差异（特别注意图32c中印度的位置），但地球上已出现了一些我们看起来非常熟悉的大陆。

根据化石判断，最早的恐龙似乎分布于泛古陆的大多数地区。然而，在侏罗纪和随后的白垩纪时期，实际情况显然是，统一的超级大陆逐渐被涌入其间的海道分开，成为和大陆一般大小的碎块，这些碎块又逐渐漂移、分离。

大陆分离这一固有（受地球制约的）过程在生物学上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曾经世界性分布的恐龙居群开始逐渐分化和隔离。隔离现象是生物进化的基础之一——一旦被隔离，生物种群往往会经历进化的过程，以适应它们周围环境的局部变化。在本书的例子中，虽然我们涉及的是比较广大的地区（大陆），但每个陆块都包含着自己的恐龙居群（以及相关的动物和植物群）；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个居群都有

机会独立进化，以适应环境的局部变化，这些变化是由诸如纬度、经度、附近的洋流以及盛行的大气条件等因素的逐渐变化而引起的。

逻辑推理告诉我们，实际情况显然应该是，中生代的大陆构造事件影响了恐龙进化历史的范围和总体模式。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祖先类群的逐渐分化一定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该类群作为一个整体的多样化，这样的推测似乎非常合理。正如我们可以用进化分枝图来代表恐龙的系统发育关系，我们也可以将整个中生代地球的地理历史描述为随着各个大陆区域与泛古陆地球“祖先”的脱离而产生的一系列分枝事件。当然，这一大致的方法只是对真正地球历史的简化，因为有时大陆块会拼接在一起，使先前相互隔离的种群融合起来。但至少作为初步概括，它为研究地球历史上一些更大规模的事件提供了一个丰饶的领域。

如果这个恐龙自然历史的模式大体上是真实的，我们也许可以期待通过调查各种恐龙的详细化石记录，以及整个中生代大陆分布的构造模式来发现某些支持它的证据。这种研究方法近年来已得到发展，用于探索恐龙进化历史上出现的一致模式，以及它们的进化历史是否与其地理分布相呼应。

鸟脚次亚目恐龙的进化

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早工作开始于1984年，所涉及的是一类与我们所熟悉的禽龙关系相当密切的恐龙类群。这类恐龙在总体上被称为鸟脚次亚目（“鸟类般的脚”——源自这些恐龙足部结构与现代鸟类表面上的细微相似性）。通过详细比较当时已知的许多鸟脚次亚目恐龙的解剖特征，得出了一个进化分枝图。为了将这个分枝图转化为真正的系统发育关系，还需要将该类群已知的时间和地理分布标在分枝图上。

通过这样的分析，这些鸟脚次亚目恐龙的历史呈现出一些令人惊讶的模式。首先，它似乎表明，与禽龙亲缘关系最近的类型（就是被

称为禽龙类的类群中的成员）及与其关系最近的近亲（鸭嘴龙科的成员）的起源很可能是晚侏罗世时期大陆分离的结果。可能演化出这两个类群的祖先居群在这个时期被一条海道分开。伴随着这次隔离，一个居群在亚洲演化成鸭嘴龙类，而禽龙类则在其他的地方演化。这两个类群从晚侏罗世到早白垩世时期似乎是彼此独立演化的。然而，在白垩纪的后半段，亚洲又与北半球的其他各大陆重新连接在一起，于是生活在亚洲的鸭嘴龙类显然能够几乎不受阻挡地扩散到整个北半球，无论在哪里接触到禽龙类，便将它们取而代之。

虽然禽龙类在晚白垩世时期被鸭嘴龙类替代的模式看起来相当一致，但还有一两个令人迷惑的反常现象需要进行研究。

曾经有一些写于20世纪初的报告，描述了产自欧洲（主要是法国和罗马尼亚）白垩纪最晚期岩石中的禽龙类。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这类恐龙应该不会存活到晚白垩世时期，因为在任何其他地区，进化模式都是鸭嘴龙类替代了禽龙类。20世纪90年代早期，人们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发现了保存最为完好的这类恐龙化石。然而，系统发育分析促使考察队重新调查这些发现。新的研究证明，这种恐龙不是禽龙的近亲，而是代表了鸟脚次亚目一个较原始类群的延续时间异常持久的（残遗种）成员。这类恐龙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查摩西斯龙。因此，初步分析的成果之一是有关一类古老的、但显然不为人们所深入了解的恐龙的大量新资料。

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篇报告指出，在早白垩世时期的蒙古生活着一类与禽龙非常相似的恐龙。这篇引人浮想连翩的报告也需要进一步调查，以检验这类恐龙异常的地理分布范围——亚洲早白垩世时期——究竟是真实的，还是像罗马尼亚的例子一样，又是一个错误鉴定其类别的事例。这份破碎的化石材料保存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古生物博物馆，必须对其进行重新检验。得到的结果又一次出乎预料。这次早先的报告被证明是正确的，禽龙属本身似乎确实存在于早白垩世时期的蒙古，那里发现的化石碎块与欧洲非常知名的禽龙没有区别。

这第二个发现与1984年的分析中所建立的进化和地理假说并不完全一致。的确，近年来在亚洲以及北美能被最恰当地描述为“中”白垩

世的时期出现了一批非常有趣的类似禽龙的鸟脚次亚目恐龙。这些最近的、正在不断积累的证据表明，最初的进化和地理模式存在许多重大缺陷，而后续的研究和新的发现会使这些缺陷逐渐暴露出来。

恐龙：全球展望

近年来，这个方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目标也更为远大。伦敦大学学院的保罗·厄普丘奇（Paul Upchurch）和剑桥的克雷格·胡恩（Craig Hunn）希望通过考查大量的恐龙来探索整个恐龙类的系谱树，以便寻找地层分布模式以及进化分枝模式中相似性的证据。他们接着又将研究结果与当前确立的在整个中生代的时间段内大陆的分布相比较，试图查明是否的确存在一个总的信号，表明地壳构造格局对整个恐龙进化历史的影响。

尽管这个研究体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杂音”——主要是由于恐龙化石记录的不完整而引起的，但令人鼓舞的是，研究者注意到在中侏罗世、晚侏罗世和早白垩世的时间段内出现了统计学上有效重合的模式。这说明，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地壳构造事件的确在决定特定的恐龙类群繁盛的地点和时间方面起到了某些作用。不仅如此，这种作用在其他生物化石的地层和地理分布中也保存下来了。因此可以说，大量生物样本的进化历史都受到了地壳构造事件的影响，而且其印记至今仍伴随着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新鲜。我仅需指出有袋类哺乳动物的不寻常分布（现今仅发现于美洲和澳大拉西亚），以及现代世界的不同地区都拥有自己特有的动、植物群这样的事实。这项新的研究给予我们的启发是，我们可以比自己曾料想的更精确地追踪这些分布的历史原因。

第五章

恐龙和热血

恐龙的许多研究领域引起的关注度远远超出了人们对这些动物纯学术兴趣的范畴。这一普遍兴趣的出现似乎是由于恐龙唤起了公众的想象力，几乎没有其他对象能有这种魅力。以下各章节集中介绍这些主题，以便阐明在我们试图解开恐龙及其生物学之谜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极为多样的研究方法和信息类型。

恐龙：热血、冷血，还是不冷不热的血？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理查德·欧文在他发明“恐龙”一词的时候，就对恐龙的生理特征进行了推测。从他科学报告相当冗长的最后一句摘录大意如下：

> 恐龙……也许可以断定……能较好地适应陆地生活……接近于现代内温脊椎动物［也就是现生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特征。
>
> （欧文 1842：204）

尽管欧文为水晶宫公园创造的“似哺乳动物”的恐龙复原模型明显反映了他的观点，但当时他所暗示的生物学含意却从未被其他科学工作者所领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文富有远见的分析被理性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中和了：恐龙在结构上属于爬行动物，因此它必然皮肤有鳞，产带壳的卵，而且，像所有其他已知爬行动物一样，是“冷血”（外温）动物。

将近50年以后，托马斯·赫胥黎提出了与欧文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应该将鸟类和恐龙看作是近亲，因为现生鸟类、已知最早的化石鸟类始祖鸟和新发现的小型兽脚亚目恐龙美颌龙之间表现出了相似的解剖特征。他推断：

> ……一点也不难想象一类完全介于鸸鹋和美颌龙［一种恐龙］之间的动物……以及这个假说，即……鸟纲的祖先是恐龙类爬行动物……

（赫胥黎 1868：365）

如果赫胥黎是正确的，那么可能就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恐龙究竟是传统的爬行动物（在生理学意义上），抑或它们与“热血”（内温）的鸟类关系更密切？这样的问题似乎没有显而易见的解答方法。

尽管有这样颇具智慧的“暗示”，但在赫胥黎的文章发表将近一个世纪以后，古生物学家才开始以更大的决心寻找可能与这个中心问题相关的资料。与对该主题重新恢复的兴趣相呼应的是，人们采用了更广泛和更综合的方法来解释化石记录：即正如第二章中所概述的，古生物学新流派　的兴起。我们看到罗伯特·巴克是如何将一些范围广阔的观察联系在一起，成为恐龙具有内温性的证据的。现在，就让我们更详细地评述这些观察以及其他论据。

新的研究方法：将恐龙作为气候指示器？

研究者们曾试图探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化石来重建古代地球的气候。人们普遍认为，内温动物（主要是哺乳动物和鸟类）并不是特别好的气候指示器，因为从赤道到极区，到处都可以发现它们的踪影。它们内温的生理特征（以及巧妙运用身体隔热的方式）使得它们的日常活动或多或少不受主要气候条件的限制。相反，外温动物，例如蜥蜴、蛇和鳄鱼，则依赖于周围的气候条件，因而它们主要生活在较温暖的气候带中。

运用这一方法来检验化石记录中明显的外温动物和内温动物的地理分布被证明是有益的，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几个有趣的问题。例如，在二叠纪和三叠纪时期，内温哺乳动物在进化上的直接祖先是怎样的？它们也能够控制自己身体内部的温度吗？如果能，那么这会如何影响它们的地理分布？而且就本文而论，更加突出的问题是，恐龙似乎具有广泛的地理分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们能够像内温动物那样控制自己的体温？

化石记录中的模式

巴克探讨恐龙内温性的基础是中生代早期动物类型演替的模式。在一直到三叠纪末的这段时间内，下孔类爬行动物显然是陆地上最丰富多样的动物。

恰在三叠纪结束、侏罗纪开始的时候（205 Ma），地球上出现了最早的、真正的哺乳动物，以鼩鼱这样的小型动物为代表。与其完全相反的是，三叠纪晚期也记录了最早的恐龙的出现（225 Ma），而且在越过三叠纪/侏罗纪的界线之后，恐龙变得分布广泛，种类分化，而且显然是陆生动物群中占优势的成员。这种生态平衡——稀少、小型、很可能是夜间活动的哺乳动物和丰富、大型，以及越来越多样化的恐龙——从那时起一直保持了1.6亿年，直到白垩纪末（65 Ma）。

作为生活在现今的动物，我们所熟悉的一个概念是，哺乳动物连同鸟类是最引人注目和分异度最大的陆生脊椎动物。不言而喻，哺乳动物是行动迅速、有智慧、通常适应能力很强的动物，而我们将其在当今的“成功”主要归因于它们的生理特征：允许它们保持较高而恒定的体温的较高基础代谢率、复杂的身体化学组成、比较大的大脑和由此而拥有的较高的活动水平，以及它们作为内温动物的地位。相反，我们通常注意到，爬行动物的分异度要小得多，而且非常明显地受到气候的限制；这主要有如下原因，即它们具有很低的代谢率，依靠外部的热源使身体保持温暖，从而保持化学活性，并且具有很低的和间歇性的活动水平：一句话，归因于它们的外温状态。

无可否认，这些观察是很笼统的，但能使我们对化石记录有一些预测。在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会预期，如果真正的哺乳动物在三叠纪/侏罗纪之交首次出现在本来被爬行类动物统治的地球上，将引发前者迅速的进化崛起和多样化，而后者面临的情况却相当不利。因此预计哺乳动物的化石记录应该在早侏罗世时表现出数量和多样性的快速上升，直到它们完全主宰中生代的生态系统。然而，化石记录却显示了截然相反的模式：（属于爬行类的）恐龙兴起，在晚

三叠世（220 Ma）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哺乳动物只是在白垩纪末期（65 Ma）恐龙走向绝灭以后才开始在规模和多样性上有所扩大。

巴克对这一系列违反直觉的事件所作的解释是，面对真正的哺乳动物的威胁，恐龙只有在拥有像内温动物一样高的基础代谢率、能够像同时代的哺乳动物一样活跃和有智谋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进化上的成功。恐龙必须是活跃的内温动物——对于巴克来说，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尽管化石记录所展现的模式确实很清楚，但支持他的“真理”的科学证据仍需收集和检验。

腿、头、心脏和肺

恐龙的脚垂直于身体之下，长在直立、柱状的腿上。在现生动物中，只有鸟类和哺乳动物也采取这种姿态；其他所有动物都是腿朝身体侧面伸出“趴卧”。许多恐龙也具有纤细的四肢，身体结构明显适于快速运动；这一系列的论据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自然界往往不做不必要的事情。如果一个动物的身体结构看起来能够快速奔跑，那么它很可能就是这样的；因此预测这样的动物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发动机”，即内温的生理特征，使得它能够快速移动，这或许看上去就是合理的。然而，我们的确需要小心，因为事实上外温动物也可以非常迅速地移动——鳄鱼和科摩多巨蜥可以追上并抓住毫无戒备的人类！关键在于，鳄鱼和科摩多巨蜥并不能持续快速奔跑——它们的肌肉很快就会积累大量氧债，于是该动物就不得不休息，以使肌肉得到恢复。相反，内温动物能够快速移动的时间要长得多，因为它们高压的血液系统和高效的肺可以很快补充肌肉中的氧。

对这一论据进一步细化，可以联想到双足行走的能力是内温动物所独有的；许多哺乳动物、所有鸟类，以及许多恐龙都是两足动物。这一论据不仅与姿态有关，而且关系到如何保持这个姿态。四足着地的好处是行走的时候相当稳定。而双足动物天生不稳定，要想顺利行走，就必须有一个复杂的传感系统来控制平衡，还要有一个敏捷的协

调系统（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以及反应迅速的肌肉，来调整和保持平衡。

大脑是这整个动力“问题”的中心，必须具备持续快速和高效工作的能力。这意味着身体能够提供恒定的氧、食物和热量补给，以使大脑的化学组成一直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这种稳定性的先决条件就是“平稳”的内温生理机能。外温动物周期性地停止活动（例如在寒冷的时候），并减少对大脑的营养供应，因而大脑必然较不复杂，且与整个身体的功能紧密结合在一起。

另一个与姿态有关的观察可以与心脏的效率及其承受高水平活动的潜力联系在一起。许多鸟类、哺乳动物和恐龙采取了直立的身体姿态，其头部的位置通常保持在略高于心脏的水平上。头和心脏位置的差异具有重要的流体静力学意义。由于头位于心脏之上，动物必须能以较高的压力将血液输送到“上面”的大脑中。但每次心跳的同时从心脏输送到肺部的血液必须以较低的压力循环，否则就会使布满肺部的脆弱毛细血管破裂。为了实现这个压力差，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心脏实际上从中间分隔开了，因而心脏的左侧（体循环，或者说头和身体的循环）运转时的压力比右侧（肺循环）高。

所有现生爬行动物的头部都与它们的心脏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它们的心脏不像哺乳动物和鸟类那样从中间分隔开，因为它们不需要区分体循环和肺循环。奇怪的是，爬行动物的心脏和循环系统为这些动物带来了好处；它们能够以哺乳动物所不具备的方式向身体各处分流血液。例如，外温动物花大量时间晒太阳，以使身体暖和起来。在晒太阳时，它们可以优先将血液分流到皮肤，以更好地吸收热量（颇像太阳能电池板中央加热管中的水）。这个系统的主要缺陷是血液不能在高压下循环——而对于任何行为非常活跃、必须将食物和氧供应给辛勤工作的肌肉的动物来说，这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

综合所有这些因素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其身体的姿态，恐龙具有高压的血液循环系统，这与仅发现于现生内温动物中的较高且稳定持久的活动水平相一致。这些更全面和详尽的考虑因素极大地支持了理查德·欧文引起争议的推测。

与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效率密切相关的应该是给肌肉供应足够的氧的能力，以使动物能够进行高水平的有氧活动。在一些恐龙类群中，尤其是兽脚亚目和巨大的蜥脚形亚目恐龙，存在某些与肺部结构和功能有关的解剖迹象。在蜥臀目（而不是鸟臀目）恐龙的这两个类群中，脊柱的椎骨侧面有明显的袋状或腔状痕迹（称为侧腔）。孤立地看，这些特征也许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然而，现生鸟类显示了相似的特征，也就是气囊的存在。气囊是一个像风箱一样的结构中的一部分，它使得鸟类可以非常有效地呼吸。蜥臀目恐龙极有可能拥有像鸟类一样的肺，因而它们的肺非常高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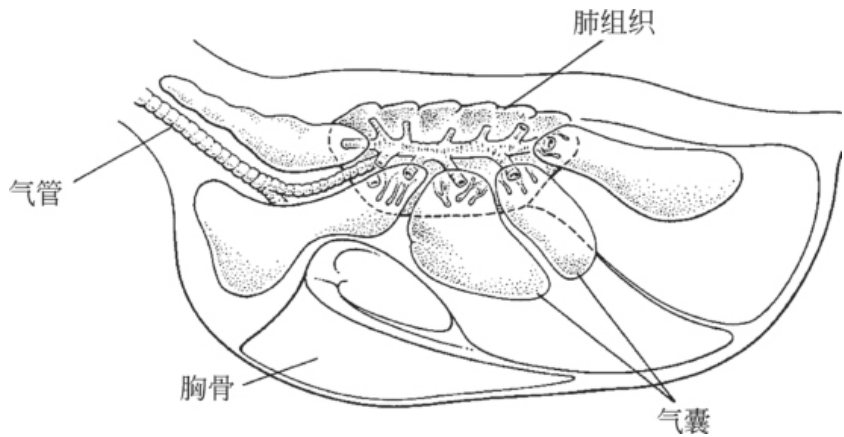

图33　鸟类的气囊提供了非常高效的呼吸系统

这一观察结果无疑支持了某些恐龙（兽脚亚目和蜥脚形亚目恐龙）具有保持高水平有氧活动能力的论点。然而，它也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能认为所有恐龙（蜥臀目和鸟臀目）的生理机能在所有方面都是相同的，因为鸟臀目没有显示出气囊系统的迹象。

恐龙的“复杂性”和大脑容量

尽管以下的一连串论据对于恐龙来说并不具有普遍性，但它们在显示某些恐龙具有哪些能力等方面是有意义的。典型的例子是约翰·奥

斯特罗姆的驰龙类的恐爪龙（图29）。正如在第二章中所总结的，这类恐龙是大眼睛、视觉良好的捕食者，从其四肢比例和大致体型判断，它显然能够快速奔跑。此外，它有一条奇特的窄而僵硬的尾巴，后腿长有像鱼叉一样突出的内趾，以及长有锋利的爪子并且能抓握的长前肢。人们认为这种动物按其身体结构应属于追击型捕食者，能用狭窄的尾巴帮助保持动态平衡（将尾巴向一侧或另一侧拍打可以使该动物极为迅速地改变方向），很有可能迅速扑向猎物，然后用后腿上的爪子使其失去反抗能力，这些看法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从未见过活动中的恐爪龙，但这个情景依据的是骨架上可观察到的特征，同时也得到了一件发现于蒙古的不寻常化石的部分支持。

这块化石包含了两只恐龙，小型的食草角龙类原角龙和一个叫做迅猛龙的恐爪龙近亲。这件与众不同的标本显示，这两只恐龙陷入了生死搏斗；它们可能是在互相格斗的时候在尘暴中窒息而死。化石中的迅猛龙用伸长的前臂紧紧抓住猎物的头，正要向它不幸的受害者的喉咙踢去。

这种在身体结构、（推测出的）功能以及生活方式上的全方位的“复杂性”强有力地表明，它们的活动水平与现代内温动物所展现出来的活动水平更为相似。

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大脑都很大，而且两个类群都表现出看起来颇有智慧的行为，这在讨论有关恐龙双足运动能力时所呈现出的一些论据中有所反映。相反，外温的爬行动物具有较小的大脑，通常没有智能超凡的声誉（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杜撰）。然而，大脑总容量与内温性之间似乎的确存在普遍的联系。较大的大脑是高度复杂的结构，为了有效运转，它需要不断的氧和食物供给，还要保持恒定的温度。外温爬行动物显然能够有效地给自己的大脑提供食物和氧，但它们的体温会在正常的24小时周期内不断变化，因此它们不能满足一个大而复杂大脑的需要。

传统上认为，恐龙缺乏脑力是出了名的（剑龙像胡桃一般大小的脑经常被作为典型例子引用）。然而，芝加哥大学的吉姆·霍普森（Jim Hopson）做了大量工作来纠正这个在某种程度上错误的观点。

霍普森通过比较包括恐龙在内的一系列动物脑容量与身体体积的比值，证实了大多数恐龙都具有相当典型的爬行动物尺寸的大脑。然而，有些恐龙的“大脑区域”出人意料地得天独厚——或许并不令人惊讶，它们就是高度活跃、双足行走的兽脚亚目恐龙。

纬度分布

本章开始的时候曾提到过，绘制分布数据图是从事恐龙生理状况研究的推动力之一。最近，有研究报告记叙了出自北美育空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和南极洲的许多恐龙。这些区域在白垩纪时期应该都属于各自的极地范围，并且一直被用来支持恐龙要想存活下来就必须是内温动物的观点。毕竟，今天的情形显然是，外温的陆生脊椎动物无法在这样高的纬度生活。

然而，进一步的认真研究发现，这些观察结果并不像它们初看起来那么令人信服。来自植物化石记录的证据表明，在白垩纪时期，这些极地区域生存着地中海和亚热带类型的植物。异乎寻常的是，这些植物共有季节性落叶的特征，很可能是适应冬季较低的光线水平和温度的结果。白垩纪时的地球没有显示出存在极地冰盖的证据，很可能甚至在高纬度地区，起码夏季气温是非常温和的。在这种环境下，食草的恐龙极有可能依季节变化而向北或向南迁徙，以便利用丰富的牧草。因此，在中生代纬度很高的地区发现它们的化石遗迹可能只是反映了它们迁徙的范围，而不是在极地的定居。

生态因素

测量中生代的群落结构是巴克在寻找恐龙生理机能替代模式的过程中提出的最具创新性的观点之一。这个想法说来十分简单：内温动物和外温动物生存所需要的食物总量有所不同——这个总量反映了与作为内温动物或外温动物相关的基本“运行成本”。内温动物，例如哺

乳动物和鸟类，具有较高的运行成本，因为它们吃掉的大部分食物（超过80%）都燃烧了，以保持身体的温度。相反，外温动物所需的食物要少得多，因为它们只用很少的食物为身体产生热量。大致说来，在身体大小相同的情况下，外温动物仅需要内温动物食物需求量的大约10%，有时则更少。

根据这个观察结果，以及认为自然界总的经济体制往往是保持供给和需求大体平衡的观点，巴克提出，对化石群落的种群普查或许能显示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平衡，也能揭示这些动物的生理机能。他详细考察了各博物馆的标本，收集他所需要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远古（古生代）爬行动物、恐龙（中生代）和相对较近的（新生代）哺乳动物群落。他的结果似乎很令人鼓舞：古生代的爬行动物群落显示捕食者和猎物的数量大致均等；相反，恐龙和新生代哺乳动物群落显示被捕食动物占优势，捕食者的数量则非常少。

最初，这些成果引起了科学界的关注；然而现在，原始资料的价值引起了颇多怀疑。利用博物馆的标本来估计捕食者或被捕食者的数量是极不可靠的：首先，没有证据显示被统计的动物都生活在一起；从博物馆当时收藏什么（或不收藏什么）的角度来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倾向性；有关捕食动物吃什么或不吃什么，学者作出的都是形形色色的假设；而且，即使存在某些生物学信息，也必然是仅适用于捕食动物的。此外，对现生外温捕食动物及其猎物的群落所做的研究显示，捕食动物可能少至它们潜在猎物数量的10%，与巴克所推测的内温动物群落的比例相仿。

这是一个由于资料原因无法产生有任何科学意义的结果，而使一个充满智慧的想法令人惋惜地不能获得支持的极好例子。

骨组织学

研究者对了解恐龙骨骼的内部详细结构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恐龙骨骼的矿物结构一般不受石化作用的影响。因此，通常可以制作骨骼

的薄片，揭示骨骼内部结构（组织结构）的惊人细节。初步观察显示，恐龙骨骼的内部结构与现生内温哺乳动物的骨组织极为相似，而不同于现代外温动物。

大体上说，哺乳动物和恐龙的骨骼显示了高度的血管化（它们是多孔状的），而外温动物的骨骼则血管化程度很低。高度血管化的骨骼结构类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形成。例如，血管化的一个模式（羽层状纤维化）反映了非常快速的骨骼生长阶段。另一个模式（哈弗氏系统）则代表了在动物个体生命的晚些时候发生的通过重建来强化骨骼的阶段。

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恐龙化石显示出的证据表明它们能够快速生长，并且有能力通过内部重建来强化其骨骼。在恐龙的生长模式中有时表现出周期性的中断（这与现生爬行动物骨骼中所存在的间歇模式极为相似），但这种生长方式并非在所有恐龙类群中一律如此。同样，某些内温动物（包括鸟类和哺乳动物）显示出血管化程度极低的骨骼结构类型（带状的），而现生外温动物骨架的有些部分则可能呈现出高度血管化的骨骼，尽管这些情况出现的概率要小得多。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动物的生理机能及其骨骼内部结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

恐龙的生理机能：概述

上述讨论举例说明了在试图研究恐龙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所运用方法的范围和种类。

罗伯特·巴克在评价早侏罗世哺乳动物在陆地上被恐龙所取代的意义时采取了不加怀疑的态度。他主张，这个模式只能这样解释，即恐龙能够与他的“高级”内温哺乳动物模型相抗衡；而要做到这一点，它们就必须是内温动物。这是真的吗？实际上答案是：不……不一定。

在三叠纪结束、侏罗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地球对于作为哺乳动物的人类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宜居住的世界。当时泛古陆的大部分地

区都受到季节性的、但总的来说干旱的气候条件的影响，沙漠在全球广泛分布。这种温度高、降雨量小的环境以极不相同的方式对内温和外温的代谢作用施加选择性的压力。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外温动物所需要的食物比内温动物少，因而在生物生产率低的时候幸存的可能性更大。爬行动物的皮肤上长有鳞片，在干旱的沙漠环境下可以极大地防止水分丢失；它们也不排尿，而是排泄干燥的面糊状物质（与鸟粪相似）。较高的周围环境温度对于外温动物来说很有利，因为它们内部的化学性质在最适宜的温度下可以相对容易地保持下来。总而言之，可以预测，按典型的爬行动物模式构成的外温动物能够很好地克服像沙漠这样的环境条件。

内温动物，例如哺乳动物，在高温条件下会受到生理应力的作用。哺乳动物“适应”了从身体向周围环境散热（它们身体的恒温调节装置使它们保持着高于正常环境温度的平均体温），并相应地调节它们的生理机能。在冷的时候，哺乳动物可以通过竖起毛发阻挡空气，因而增强隔热效率来减少热量从身体散失；利用“颤抖”使肌肉迅速产生额外的热量，或者提高基础代谢率。然而，在周围环境温度很高的情况下，向环境散热以防止致命过热的需要就变得至关重要了。蒸发冷却是少数可利用的选择之一；这可以通过喘气或皮肤表面排汗来实现。这两个过程都要从身体流失大量的水分。在水供应不足的沙漠环境下，水分流失的结果可能是致命的。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因素是，哺乳动物通过排尿将代谢的分解产物从身体排出，也就是通过含水溶液将废物冲出体外。除了热负荷和水分流失等问题，哺乳动物还需要大量的食物来维持它们内温的生理机能。沙漠是生产率很低的地区，因而食物供应有限，不能支持大量的内温动物种群。

从单纯环境的观点来看，晚三叠世/早侏罗世的世界或许是异乎寻常的。那个时候的环境很可能更有利于外温动物，并将早期哺乳动物限制在很小的体型和以夜间活动为主的生态位。在现今的沙漠中，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除了骆驼这一着实不同寻常的动物之外）体型都很小，且全部为夜行性的啮齿类和食虫类。它们通过穴居在沙漠表面之下挺过白天的极度炎热，那里的条件比较凉爽、潮湿；而夜里一

旦温度下降，它们便爬出来，利用自己敏锐的官能寻找昆虫猎物。

随着泛古陆开始解体，较浅的陆缘海遍布在陆地之内和陆地之间，晚三叠世/早侏罗世极度干旱的气候终于得到了改善。总的气候状况似乎变得极其温暖和潮湿，而且这样的气候条件在很宽的纬度带内盛行。需要强调的是，在整个恐龙时代，极地区域均没有被冰所覆盖。与地球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相比，我们今天居住的世界是很不寻常的，它拥有被冰覆盖的北极和南极，因而具有纬度方向上界限非常狭窄的气候带。在侏罗纪这样草木相对繁茂的环境条件下，生产率显著提高；侏罗纪主要的含煤沉积层就是在长期拥有茂密森林的地区埋藏的。因此，发现侏罗纪时期恐龙的分布范围和多样性呈爆发式扩增或许就不令人惊讶了。

恐龙的生理机能：是唯一的吗？

恐龙因体型巨大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即便是身长5到10米之间的中等大小的恐龙，以一般标准来衡量也仍然是非常大的——现今所有哺乳动物的平均身型可能约为猫或小狗一般大小。确实没有像老鼠一样大小的恐龙（除了刚孵化出来的小恐龙）。

在某些条件下，体型较大者具有优势。最显著的是，较大的动物向环境散热或从环境获得热量的速度往往比小动物要慢得多。例如，成年鳄鱼在白天和晚上保持了非常稳定的内部体温，而新孵化的小鳄鱼所显示的体温变化范围则恰好反映了白天和晚上温度的变化。因此，像恐龙一样大小意味着在时间改变时内部体温变化很小。大的体型也意味着保持身体姿势的肌肉需要努力工作，以防身体被自己的重量压垮。这种持续的肌肉“工作”会产生相当多的热量（与我们在肌肉锻炼以后热得“满脸通红”的情形是一样的），而这些热量可以帮助保持内部体温。

除了这些身型方面的优势，我们看到恐龙可能很敏捷，而且许多恐龙的姿态是头通常处于远高于胸部的位置。这两点表明它们很有可

能拥有高效的、完全分隔的心脏，有能力使氧、食物和热量在体内快速循环，以及清除有害的代谢副产物。蜥臀目恐龙很可能拥有像鸟类一样的肺部系统这一事实，进一步强调了它们供氧的能力。这些氧是它们的组织在充满活力的有氧运动过程中所需要的。

假如仅仅考虑这些因素，恐龙似乎很可能拥有许多我们今天与内温性联系在一起的特征，正如现生哺乳动物和鸟类所呈现的特征那样。另外，恐龙通常很大，因而体温相对稳定。它们还生活在一个全球气候持续温暖、季节性不明显的时期。

实际情况可能是，恐龙是一种理想的生物类型的幸运继承者，这一类型使它们能够在盛行于中生代的独特气候条件下大量繁衍。然而，无论眼下这一主张看起来是多么令人信服，它都没有考虑到最近几年出现的另一条非常重要的证据：恐龙和鸟类的密切关系。

第六章

如果鸟类是恐龙会怎么样？

自从20世纪70年代约翰·奥斯特罗姆富于创造力的研究工作以来，恐龙和鸟类之间关系的解剖证据到现在已非常详细了，以至有可能重建驰龙类兽脚亚目恐龙向早期鸟类转变的各个阶段。

早期的小型兽脚亚目恐龙，例如美颌龙，具有像鸟类一样的外貌——细长的腿、长脖子、相当小的脑袋和非常大、朝前的眼睛——尽管它们仍然保留了明显的恐龙特征，例如带爪子的双手、颌骨上长有牙齿，以及厚重的长尾巴。

驰龙类兽脚亚目恐龙

这些像鸟类一样的恐龙显示出许多有别于兽脚亚目恐龙身体基本结构的有趣的解剖变化。有些变化相当细微，而有些则不然。

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尾巴“变细”：紧密排列的细长骨骼束使尾巴变得非常狭窄和僵硬，唯一灵活的部位是臀部附近（图16的上图）。正如先前所讨论过的，这个细长的杆状尾巴可能很有用，可以作为动态稳定器，帮助抓获快速移动、难以捕捉的猎物。然而，这种类型的尾巴明显改变了这些恐龙的姿态，因为对于身体的前半部分来说，它不再是一个肌肉发达的沉重悬臂。假如它的姿态不发生其他改变，那么这样一只恐龙就会失去平衡，不断向前摔倒，碰到鼻子！

为了补偿失去的沉重尾巴的作用，这些兽脚亚目恐龙的身体结构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标志着肠道最后部的耻骨向后旋转，因而与坐骨（另一个位置较低的髋部骨骼）平行，而在兽脚亚目恐龙中，耻骨通常从每个髋臼指向前下方。由于这一方向上的改变，肠道及相关器官可以向后转动至臀部之下。这一改变使身体的重量后移，补偿了失去起平衡作用的沉重尾巴的缺憾。这种耻骨向后旋转的髋部骨骼结构不仅存在于手盗龙类兽脚亚目恐龙中，而且在现生以及化石鸟类中都可以看到。

另一个同样微妙的用于补偿失去保持平衡的尾巴的方式就是缩短

臀部之前的胸腔，这种现象也见于这些似鸟的兽脚亚目恐龙。此外，胸腔还显示出变硬的迹象，这或许反映了这些动物捕食的习性。伸长的前臂和长有三只爪子的双手对于抓捕和制服猎物来说是很重要的，必须非常有力。胸部区域的加强无疑可以帮助安全地固定前臂和肩部，以承受与抓紧和制服猎物相关联的巨大力量。鸟类的胸部区域也较短并且非常坚硬，以承受固定强有力的飞行肌所需的力量。

在胸腔前方、两个肩关节之间，有一块V字形骨（实际上它是愈合的锁骨——图17），其作用是像一块弹簧隔板那样将肩关节分开；在该动物与猎物搏斗时，它也帮助将肩关节固定在适当的位置。鸟类也具有愈合的锁骨；它们构成伸长的“愿骨”，即叉骨，它同样也起到机械弹簧的作用，在振翅飞行的时候将肩关节分隔开。

前臂和手部骨骼之间的关节也发生了改变，因而它们能够以相当快的速度和相当大的力量向外和向下转动，以所谓的“耙式”动作攻击猎物。在不用的时候，前肢可以紧靠着身体巧妙地收拢起来。这一系统的杠杆作用对于这些动物来说也有相当大的好处，因为给这一构造提供动力的前肢肌肉的位置靠近胸腔，它控制着从前臂向下延伸到手部的长肌腱（而不拥有沿前肢更靠外侧的肌肉）；这一遥控系统使体重更靠近臀部，帮助这些兽脚亚目恐龙将棘手的平衡问题减小到最低限度。前肢击打和收拢的机制与鸟类在飞行过程中和飞行之后张开和闭合翅膀时所采用的方式极为相似。

始祖鸟

似鸟的早期化石始祖鸟（图16的下图）显示出许多手盗龙类兽脚亚目恐龙的特征：尾巴是一组颇为细长的椎骨，两侧均固定着尾羽；髋部骨骼的排列形式是耻骨朝向后下方；在胸腔前面有一块像回飞棒一样的叉骨；颌骨上排列着小而尖的牙齿，而不是像更典型的鸟类那样的角质喙；前肢很长，带有关节，因而它们可以像兽脚亚目恐龙一样伸展和收拢，双手的三根手指上长有锋利的爪子，在排列和比例上

与手盗龙类兽脚亚目恐龙相同。

图34　始祖鸟的生活复原

始祖鸟标本是在特殊环境下保存为化石的，这使得一系列飞羽印痕的精美细节展现在人们眼前。这些长在翅膀上以及沿着尾巴两侧排列的羽毛决定了该动物被定义为鸟类：羽毛被认为是鸟类独有的特征。因此，毫无疑问，它指示了该动物与鸟类的亲缘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始祖鸟被认为是如此重要的化石，以及为什么它一直是这类比较的焦点的原因之一。假如在这一事件中羽毛没有得到保存下来的机会，那么该动物可能会被怎样分类这个问题会很有趣。它极有可能在最近几年被重新描述为一类不寻常的小型驰龙类兽脚亚目恐龙！

中国的奇迹

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东北辽宁省的采石场所进行的勘查出土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保存特别完好的早白垩世化石。最初，这些化石中包含了保存精美的早期鸟类，例如孔子鸟，并且这些骨架包含了羽毛、喙和爪子的印痕。然后在1996年，季强（Ji Qiang）和姬书安（Ji Shu'an）描述了一具完整的小型兽脚亚目恐龙骨架，它在解剖特征和比例上与众所周知的兽脚亚目美颌龙（图14）十分相似。他们将该恐龙命名为中华龙鸟。这只恐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沿着它的脊柱和整个身体边缘分布着细丝状结构，表明它的皮肤上长有某种覆盖物，类似于粗制地毯上的“软毛”；在眼窝和肠道区域还有软组织的证据。很明显，一些小型兽脚亚目恐龙具有某种类型的身体覆盖物。这些发现促使人们共同努力在辽宁寻找更多这样的化石；标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土，并带来了一些真正激动人心的新发现。

中华龙鸟发现之后不久，又出土了另一具骨架。这种动物被命名为原始祖鸟，它首次显示了尾巴上及沿身体侧面分布的真正像鸟类一样的羽毛的存在，而且它的解剖特征比中华龙鸟更像驰龙类。另一个发现揭示了一类与迅猛龙极为相似的动物，但这次它被命名为中国鸟龙（它身上也同样明显覆盖着短的细丝状“软毛”）。更新的发现包括尾羽龙，即一类较大的（像火鸡一样大小）、前肢相当短的动物，以其一簇显著的尾羽和沿前肢周围较短的羽毛而著名；较小、长有浓密羽毛的驰龙类；以及在2003年的春天，一类相当引人注目的、长有“四个翅膀”的驰龙——小盗龙被公之于世。这最后一类体型较小，是典型的像驰龙一样的动物，具有标志性的长而窄的尾巴、像鸟类一样的骨盆、能抓握的长前肢，此外其颌骨上也排列着尖利的牙齿。尾巴周围长有初级飞羽，身体上覆盖着绒毛。然而，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它沿着前肢保存了飞羽，构成了像始祖鸟一样的翅膀。颇为出人意料的是，在它腿的下部也有像翅膀一样的羽毛边缘——因此得到了“四个翅膀”之名。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辽宁的采石场中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这些崭新的、令人震惊的发现，几乎难以想象接下来可能会发现什么。

鸟类、兽脚亚目，以及恐龙的生理机能问题

来自辽宁的惊人新发现对前文有关恐龙生物学和生理学特征的讨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它们能够回答的问题仍然无法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多。

首先，现在已经很清楚的是，我们维多利亚时代前辈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归根结底，有羽毛并不等于就是鸟类。兽脚亚目恐龙中似乎广泛存在着许多类型的皮肤覆盖物，从粗糙的细丝状覆盖物，到柔软的、类似羽毛的身体覆盖物，再到完全成形的外表轮廓和飞羽。辽宁的发现促使我们思考这种身体覆盖物的程度有多广泛，不仅是在兽脚亚目恐龙中，甚至在其他恐龙类群中或许也是如此。鉴于已知身体覆盖物的分布，对于像霸王龙这样的巨大恐龙（它是与中华龙鸟有亲缘关系的兽脚亚目恐龙），认为其体表可能具有某种类型的覆盖物就不是毫无道理的——即便只是在它们幼年的时候。目前，这类诱人的问题尚不能得到解答，还有待于在新的地层沉积物中发现保存质量与辽宁采石场中的化石相类似的遗迹。

很明显，相当多样化的带羽毛兽脚亚目恐龙和我们今天公认的真正鸟类（具有发育完好的飞行器官）在侏罗纪和白垩纪时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始祖鸟的年代是晚侏罗世（155 Ma），它具有明显的羽毛和鸟类一样的外貌。然而，现在我们确切地了解到，在距今更近的白垩纪（约120 Ma），大量这种类型的“恐龙鸟”，例如小盗龙及其近亲，与真正的鸟类共同生存。这些“恐龙鸟”如此程度的多样性，或者说其生物丰富性令人相当困惑，在某种程度上使人难以辨别我们今天到处所见的真正鸟类的进化起源。

然而，从生理学的观点来看，兽脚亚目恐龙存在某种类型的保温覆盖物的证据无可置疑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恐龙（至少）是真正的内温动物。有两个理由让我们相信这一点：

i）在这些带羽毛的恐龙中，有许多体型很小（20—40厘米长），而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小型动物具有相对较大的表面积，身体热量会很快向环境散失。因

此，如果这些动物的身体内部能够产生热量，那么利用丝状体（酷似现生哺乳动物身体上的皮毛）和绒羽保温很可能就是必需的。

ii）同样，皮肤的外表面拥有保温层也会使晒太阳变得即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保温层会降低它们从太阳获取热量的能力。晒太阳是外温动物得到身体热量的方式。因此，一只长有毛皮或羽毛的蜥蜴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

鸟类源自恐龙：进化上的述评

这些新发现的深远意义确实引人遐想。前文已经论述过符合逻辑并带有一定说服力的观点，即小型兽脚亚目恐龙是高度活跃、移动迅速和在生物学上“复杂”的动物。在此基础上，认为它们是潜在的内温动物候选者似乎是有道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关于它们生活方式的推论表明，它们作为内温动物会获得最多的好处。辽宁的发现进一步证实，这些高度活跃的似鸟恐龙中，有许多是小型动物。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小的体型给内温动物带来了最大的生理应力，因为身体内部所产生的热量中有很大一部分可能通过皮肤表面散失了；因而我们可以预期，活跃的小型内温动物会为身体保温，以减少热量的散失。因此，小型兽脚亚目恐龙发展出保温层来防止热量损失，是因为它们是内温动物——而不是因为它们“想要”成为鸟类！

辽宁的发现显示，各种类型的保温覆盖物演化出来，这最有可能是通过巧妙改变正常皮肤鳞片的生长模式而实现的；这些类型包括从类似毛发的丝状体，到发育完全的羽毛。真正像鸟类一样的飞羽很有可能不是为了飞行的目的而演化的，而是出于平淡无奇的缘由。产自辽宁的几个“恐龙鸟”在尾部末端似乎长有成簇的羽毛（很像艺妓的扇子），前肢、头部和脊柱边缘也有羽毛。很明显，保存几率的偏差可能对这些特征如何得到保存以及在身体的哪些部位得到保存方面有一定的影响。但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早在发育出任何真正的飞行功能之前，羽毛已有可能作为与这些动物的以下行为相关的结构而演化出来：像现生鸟类那样提供识别信号，或用作它们交配仪式的一部分。

就此而论，滑翔和飞行并不是鸟类起源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而是后来“附加”的优势。显然，羽毛有可能具有空气动力学的功能；就像现代鸟类一样，跳跃和振翅的能力可能大大增加了“恐龙鸟”交配时炫耀的筹码。例如，就小型动物小盗龙来说，沿着前后肢和尾部边缘的羽毛组合应该能使它从树枝或其他同样有利的位置飞到空中。站在这一出发点上，滑翔和真正的振翅飞行相对而言似乎的确就是向前的“一小步”了。

一直存在的问题

然而，我们不应该太陶醉于上面所描绘的情景。尽管辽宁的发现的确极为重要，即它们提供了一个窗口，使得我们能丰富而详尽地了解白垩纪恐龙和鸟类的进化情况，但它们未必能够提供所有的答案。必须记住的关键一点是，辽宁采石场的年代为早白垩世，因而其中所产出的化石比具有高度发育的复杂翅膀、保存完好的最早带羽毛恐龙——始祖鸟要年轻得多（至少相隔约30 Ma）。无论通向最早的会飞恐龙、最终通向鸟类的进化道路是怎样的，这条路上也绝没有产自辽宁的、奇特的带羽毛恐龙。我们在辽宁所看到的是似鸟兽脚亚目恐龙（以及一些真正的鸟类）进化多样性的惊鸿一瞥，而不是鸟类的起源：鸟类起源仍然隐藏在中侏罗世、甚至可能是早侏罗世时期的沉积物中——在始祖鸟拍着翅膀来到地球上之前。目前为止我们所了解的一切都只能表明，兽脚亚目恐龙与早期鸟类具有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但早侏罗世或中侏罗世中作为始祖鸟祖先的极其重要的兽脚亚目恐龙仍然有待于人们去发现。希望在未来的几年里能够出现一些激动人心的发现，以填充故事的这部分内容。

在第五章结束时我们提出了以下观点，即恐龙生活在地球历史上一个对体型巨大、高度活跃的动物有利的时期，这些动物能够保持较高的恒定体温而不必付出作为真正内温动物所需的大部分代价。产自辽宁的“恐龙鸟”似乎表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小型、保温的兽脚亚

目恐龙必须是内温动物，它们与鸟类（我们知道鸟类是内温动物）的密切关系更加强化了这一点。

我对此的反应是：嗯，既是又不是。现在看来，似鸟兽脚亚目恐龙是真正意义上的内温动物，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认为大多数更传统的恐龙是惯性的恒温动物（巨大的体型使它们能够保持稳定的内部温度）这一主张仍然成立。在现生内温动物中发现的一些证据支持了我的观点。例如，大象的代谢率比老鼠低很多就是由于这些原因。老鼠很小，向环境散失热量很快，为了补充热量的损失，必须保持较高的代谢率。大象身体庞大（大致和恐龙一般大小），它们保持恒定的内部体温是由于它们体型很大，而不仅仅因为它们是内温动物。的确，作为大型内温动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生理挑战。例如，大象如果跑得太快就会遇到问题：它们保持身体姿势的肌肉和腿部肌肉会产生大量额外的化学热，因此必须用能“扇风”的大耳朵帮助它们将热量迅速散发出去，以防止致命的过热现象。

总的来说，恐龙是极大的动物，它们的身体应该能够保持一个恒定的内部体温；从大象推测，在一个任何情况下都非常温暖的世界里，成为真正的内温动物对恐龙来说未必有利。恐龙在生理上已进化成为大体型恒温动物（由于体型巨大而使内部体温保持恒定）。与恐龙向巨大体型进化的总趋势相反的唯一恐龙类群是驰龙类兽脚亚目，它们进化成为体型较小的类群。

仅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很明显，驰龙类是高度活跃的，应该能从恒温的生理特征获得好处，它们相对较大的脑需要持续不断的氧和营养供应。与其相矛盾的是，如果没有保温的覆盖物，那么体型较小的动物就无法保持恒温，因为它们无法阻止热量通过皮肤散失。小型兽脚亚目恐龙所面临的选择非常明确和简单：它们必须要么放弃它们高度活跃的生活方式，变成传统的爬行动物；要么提高体内热量的生产，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内温动物，通过发育皮肤保温层来避免热量损失。因此，我主张，这不是一个“全都是或全不是”的情况；大多数恐龙基本上是大体型恒温动物，能够维持较高的活动水平而不必付出哺乳动物或鸟类这样的内温类型的全部代价；然而，小型的、特别是驰

龙类兽脚亚目恐龙（以及它们的后裔，真正的鸟类）不得不演化出完全的内温机制，以及与之相关的保温覆盖物。

第七章

恐龙研究：观察和推断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化石动物的生活，就必须运用许许多多的方法。在本章，为了强调这一要点，我们将探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

恐龙足迹学

恐龙研究的某些方面有着与侦探工作非常相似的性质，或许没有什么比足迹学更能体现这一点的了——足迹学是研究脚印的学科。

在侦探科学中没有哪个分支像追踪足迹的艺术这样重要且被如此严重地忽视了。

（柯南·道尔［Conan Doyle］，《血字的研究》，1891）

恐龙足迹研究的历史之长令人惊讶。一些最早采集和展出的标本是年轻的普利尼·穆迪（Pliny Moody）1802年在马萨诸塞州耕田时发现的。这些标本以及其他大型三趾脚印最后由爱德华·希契科克（Edward Hitchcock）于1836年以图示说明并被其描述为巨大的鸟类留下的足迹；一些标本仍被收藏在阿默斯特学院普拉特博物馆中。从19世纪中叶开始，足迹化石在世界各地被频繁发现。随着对恐龙解剖特征、尤其是它们足部形态了解的增多，人们认识到，发现于中生代岩石中“像鸟类一样”的大型三趾脚印属于恐龙而不是巨鸟。尽管这些足迹引起了局部的兴趣，但很少有人认为它们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然而近年来，主要是受到位于丹佛的科罗拉多大学马丁·洛克利（Martin Lockley）的工作的鼓舞，人们开始更普遍地认识到，足迹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

首先，最明显的是，保存下来的足迹记录了恐龙活着时的行为。单个脚印还记录了足部的总体形态和脚趾的数目，这通常可以帮助缩小造迹恐龙的可能范围，特别是在附近年龄相似的岩石中发现恐龙骨架的时候。尽管单个脚印或许具有其内在的价值，但一连串的足迹则记录了该动物活着时是如何运动的。它们揭示了足部与地面接触时的

方向、步幅的长度、行迹的宽度（左、右脚之间的距离）；通过这些证据，有可能从力学的意义上重建腿部的运动。此外，研究证明，运用对大量现生动物的观察资料来计算造迹动物的运动速度也是有可能的。仅通过测量脚印的大小和步幅，并推测腿部的长度即可获得这种估算结果。虽然腿部长度初看起来似乎很难精确地估计，但事实证明脚印的实际大小是一个非常好的指南（从现生动物判断）；此外，在某些情况下，生活在脚印形成时期的恐龙的足部和腿部骨骼或骨架已被人们所了解。

单个脚印的形态也有可能显示出能推断这些动物运动方式的信息：比较宽和扁平的脚印显示整个足部与地面接触的时间相当长，表明它运动比较缓慢；在另一些情况下，脚印可能显示仅脚趾的末端与地面接触——表明该动物差不多是用脚尖快速奔跑的。

恐龙足迹的另一个有趣之处涉及到使得它们被完整保存下来的环境。足迹在坚硬的地面上无法被保存。相反，保存足迹的地面必须相对较软，通常是潮湿的，较理想的是具有泥泞的黏性。脚印一旦留下以后，重要的是它们在变硬之前不会受到大的扰动；如果脚印被快速埋藏于另一层泥土之下，这种不受扰动的情况就会出现。这或是因为表层在太阳下被烤硬，或是因为矿物质快速沉淀，在脚印层中形成某种凝结物。通常，研究者有可能从保存足迹的沉积物细节推断出恐龙留下脚印时的确切环境条件。这些细节包括泥淖被动物脚印扰乱的程度、脚陷入沉积物的深度以及沉积物看起来对脚的活动所作出的反应等。有时候仅从脚印主体部分之前或之后的沉积物磨损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一只动物正在上坡还是下坡。因此，恐龙留下的足迹所提供的大量信息不仅有关恐龙如何移动，而且有关它们所进入的环境类型。

足迹的研究还可以揭示有关恐龙行为的信息。在罕见的情况下，会发现多种恐龙的足迹。一个著名的例子记载于德克萨斯州罗斯峡谷的帕卢克西河，是由一位名叫罗兰·T.伯德（Roland T. Bird）的著名恐龙足迹探索者发现的。该地有两排平行的足迹，一排由一只巨大的雷龙留下，而另一排属于一只大型食肉恐龙。足迹似乎显示，大型食肉恐龙正在向雷龙靠拢。在足迹的交汇处，一种脚印消失了，伯德猜

想这表明了攻击的地点。然而，洛克利通过研究足迹地点的图指出，雷龙（有若干只）在过了假定的攻击地点后还在继续行走；而且，尽管那只大型兽脚亚目恐龙当时正跟随着雷龙（它的一些脚印中有一部分盖住了雷龙的脚印），但没有“混战”的迹象。很有可能这个捕食者只是在安全的距离内追踪潜在的猎物。更有说服力的是伯德在达文波特农场观察到的一些足迹，该地点也位于德克萨斯。在这里他记载了23只类似雷龙的蜥脚形亚目恐龙在相同的时间朝着同一个方向行走的足迹（图35）。这强有力地说明有些恐龙是成群活动的。成群或群居的习性是不可能从骨架推测出来的，但足迹却可以提供直接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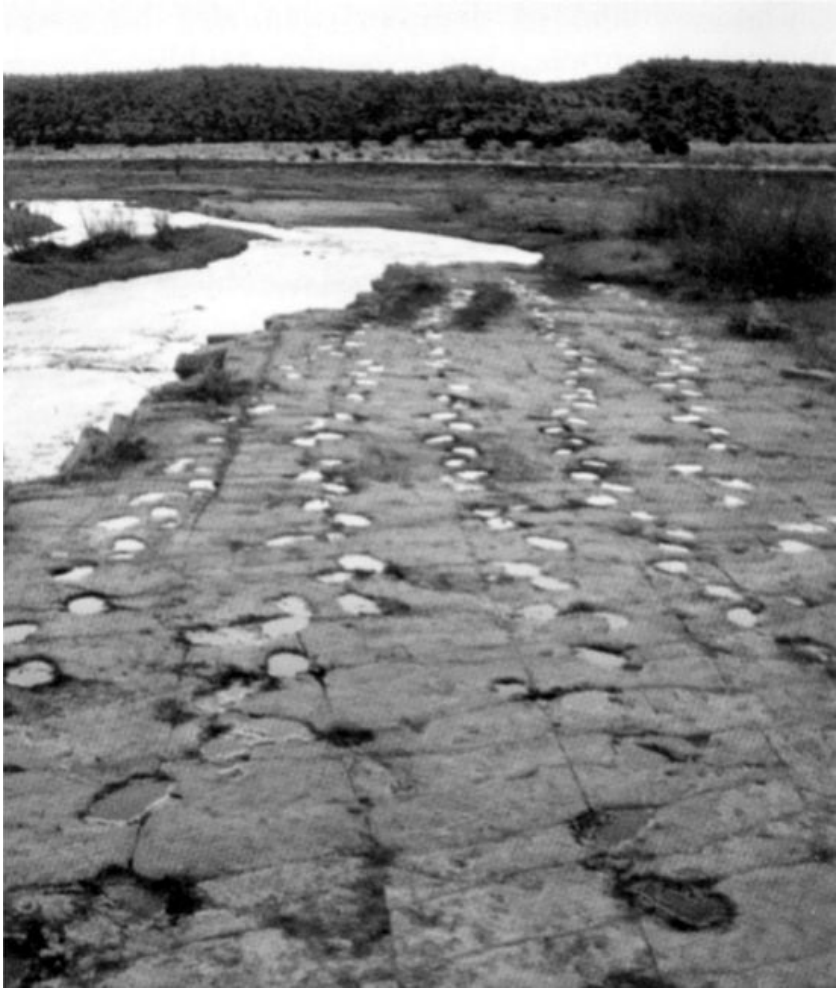

图35　一群蜥脚类恐龙在穿越潮湿的低地平原时留下的平行足迹

近年来人们对恐龙足迹逐渐增长的兴趣揭示了许多具有潜在吸引力的研究途径。恐龙足迹有时会在从未产出过恐龙骨架化石的地区发现，因此足迹可以帮助填补已知恐龙化石记录上的某些空白。在考察恐龙足迹性质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地质概念。一些大型蜥脚形亚目恐龙（上文的雷龙即属于这一类群）活着时可能重达20—40吨。这些动物行走时会对地面施加巨大的压力。在松软的基底上，来自这些恐龙脚掌的压力会使地表之下1米或更深的泥土变形——由此

产生了一系列的“底印”，与原来地表上的脚印相对应。如果单个脚印通过许多“底印”得到了复制，那么“底印”的幻象就意味着化石记录中的一些恐龙足迹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重复代表了。

如果这些成群的巨大动物在大片区域踩踏，就像它们在达文波特农场所做过的那样，那么它们也就具有极大地破坏脚下土地的能力——将其压碎并破坏其正常的沉积结构。这个相对而言新近认识到的现象被命名为“恐龙扰动”。“恐龙扰动”也许只是地质现象，但它提示了另一个明显与恐龙活动相关联的生物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生物效应有可能是可测量的，也可能不可测。这就是恐龙对全部陆生生物群落在进化和生态上的潜在影响。大群若干吨重的恐龙走过一片土地，有可能将当地的生态全部摧毁。我们知道，今天的大象能够给非洲的稀树草原造成相当大的损害，因为它们能够毁坏并推倒成年树木。一群40吨重的雷龙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这类破坏性的活动对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其他动物和植物会有影响吗？我们能够识别或测量这种影响的长期性吗？它们在中生代的进化历史中是否重要？

粪化石

另一个稍微不那么浪漫的古生物学研究分支聚焦于恐龙等动物的粪便。这些材料被归为粪化石（*coprolites*，其中*copros* 意为“粪便”，*lithos* 意为“石头”），其研究历史之长令人吃惊，而且成绩卓著。对保存下来的粪化石重要性的认识要追溯到牛津大学威廉·巴克兰的工作（他描述了第一只恐龙，巨齿龙）。巴克兰是19世纪上半叶地质学家中的一位先驱者，他花费了大量时间采集和研究产自他的出生地多塞特郡的莱姆里吉斯周围的岩石和化石，包括海生爬行动物化石。在这个过程中，巴克兰注意到大量独特的砾石，它们通常具有微弱的螺旋形态。通过更详细的检查，将它们切开并观察磨光的切面，巴克兰识别出富集的闪光鱼鳞、骨头，以及箭石（一种头足类软体动物）触手上锋利的弯钩。他推断，这些石头最有可能是发现于同一种岩石中的

食肉爬行动物的石化排泄物。很显然，虽然粪化石研究乍看起来有些不雅，但它有可能揭示有关曾经生活过的动物食性的证据，而这样的证据是难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

像脚印的情形一样，虽然“谁留下这些”的疑问非常有趣，但却可能成为大问题。偶尔，粪化石，或者说实际上是胃容物，被保存在某些脊椎动物化石（特别是鱼类）的身体内部；然而，将粪化石与特定的恐龙或者即便是与恐龙类群联系起来却是很困难的。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凯伦·钦（Karen Chin）一直致力于粪化石的研究，她在可靠鉴定恐龙粪化石方面遇到了特别大的困难——直到最近。

1998年，钦和她的同事们报告了他们的发现，这篇文章就题为《特大 的兽脚亚目恐龙粪化石》。文中的标本发现于萨斯喀彻温的马斯特里赫特期（最晚白垩世）沉积中，由相当大的一块材料组成，超过40厘米长，体积大约为2.5升。标本外围以及紧临的内层是骨骼碎片。此外，这块标本中遍布着更细微的沙状骨质粉末。对该标本的化学分析证实，它所含钙和磷的水平非常高，表明了骨质的高度集中。对骨骼碎片的组织学薄片的分析进一步确认了骨骼的细胞结构，同时也显示被消化的猎物最有可能是恐龙；正如人们所猜测的那样，该标本极可能是一类大型食肉动物的粪化石。通过调查该地区岩石中已知的动物群可推测出，足以留下这样大的粪化石的唯一大型动物是巨大的兽脚亚目霸王龙（恐龙之“王”）。对粪化石中保存的骨骼碎片的观察显示，该动物能在嘴里将猎物的骨头嚼碎，而可能性最大的猎物是幼年的鸟臀目角龙亚目恐龙（可从骨骼组织学切片的结构中看出）。该粪化石中并非所有的骨骼均被消化这一事实表明，这些物质以相当快的速度通过了肠道，有些人将这一点作为霸王龙可能是一类饥饿的内温动物的证据。

恐龙病理学

鉴于这类兽脚亚目恐龙的总体解剖学特征，证明霸王龙食肉的习

性显然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然而，在霸王龙的骨架中还发现了因食物中富含红色肉类而产生的一个有趣的病理学现象。

大型霸王龙骨架“苏”正在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展出。该标本很有趣，因为它显示出许多病理特征。它的一个指骨（掌骨）在与第一指骨的关节处表现出某些独特的光滑圆形凹陷；现代病理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对此都进行了详细研究。古生物学家发现，其他霸王龙也显示出这样的损伤，但在博物馆收藏的标本中这些损伤却相当罕见。在将其与现生爬行动物和鸟类的病理特征进行了详细比较之后，病理学家确定这种损伤是痛风的结果。这种疾病也见于人类。它通常侵害手部和足部，引起剧痛，造成被侵害部位的肿胀和发炎。它是由关节周围尿酸盐晶体沉积引起的。尽管痛风可能是脱水或肾衰竭的结果，但在人类中的一个发病因素是食物：即由于摄取的食物中富含嘌呤，这是一种发现于红色肉类中的化学物质。因此，霸王龙不仅外表看起来像食肉动物，它的粪便以及它患的一种疾病也证实了这一点。

“苏”还显示出很多更常见的病理特征。这就是具有指示作用的旧伤的遗迹。如果动物在活着的时候遭遇骨折，它们会有自愈的能力。虽然现代外科手术能够相当精确地修复断骨，但在自然状态下骨骼的断面通常不能自动准确地愈合在一起，在骨骼愈合部位的周围会形成骨痂。这种不完整的修复过程会在骨架上留下痕迹，可以在动物死亡后观察到。很明显，“苏”在“她”活着的时候曾多次受伤。在一次事故中，“苏”的胸腔遭受了较大的外伤，其胸部显示出几根明显断裂后又修复的肋骨。另外，“她”的脊柱和尾部也显示出许多损伤，同样在活着的时候愈合了。

这些观察结果的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像霸王龙这样的动物显然能够在受伤和生病之后存活下来。一般的预测会是，大型捕食动物，例如霸王龙，在受伤之后很容易遭受攻击，它本身会成为潜在的猎物。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至少在“苏”的例子中），这表明要么这种动物特别皮实，因而不会受到严重外伤的过多影响，要么这些恐龙可能生活在团结的群体中。该群体有时会表现出合作精神，帮助受伤的个体。

人们在各种恐龙中也注意到了其他病理现象，包括由牙周脓肿引起的破坏性骨损伤（在下颌骨的病例中）、在头骨或骨架其他部位的脓毒性关节炎和慢性骨髓炎。一个特别严重的腿部伤口长期感染的例子来自对一种小型鸟脚类恐龙的记录。该动物的部分骨架发现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早白垩世沉积物中。它的后肢和骨盆保存完好，但左腿的下半截严重变形并缩短（图36）。虽然无法证明这种并发感染的最初原因，但人们猜测该动物左腿胫部靠近膝关节处可能遭受了严重的咬伤。结果，石化的胫部骨骼（胫骨和腓骨）处长出了一块严重过度生长的、像硬茧一样的巨大不规则块状骨。

图36　脓毒性的恐龙胫部骨骼化石，已严重变形

对骨化石的检查和X光照相显示，最初受伤的部位一定是被感染了，但感染并没有保持在局部，而是向下沿着胫部骨骼的骨髓腔扩散，这种感染所到之处使骨骼遭到了部分破坏。随着感染的蔓延，骨骼的外面增生了额外的骨组织，好像身体在试图产生自己的“夹板”或支持物。显然，该动物的免疫系统无法阻止感染的持续扩散，在骨骼外层的下面形成了大面积的脓肿；由此产生的脓液必定会从腿骨渗出，并且流到皮肤表面形成溃疡。从感染部位骨骼生长的总量判断，该动物在遭受这种可怕伤残折磨的同时，很可能又活了一年之久才最终死亡。保存的骨架没有显示出其他病理感染的迹象，也没有牙咬的痕迹或其他食腐活动的迹象，因为它的骨骼没有散落。

在恐龙骨骼中很少能够识别出肿瘤。试图研究恐龙中癌症发生频率的最明显障碍是该研究需要破坏恐龙骨骼，以便制作组织切片——对于博物馆馆长来说，这显然是没有吸引力的事情。最近，布鲁斯·罗思柴尔德（Bruce Rothschild）开发出利用X射线和荧光透视法扫描恐龙骨骼的技术。该方法限于直径小于28厘米的骨骼。出于这个原因，他测量了大量的恐龙脊椎（超过1万个）。这些脊椎来自数目众多的博物馆收藏标本，代表了所有主要的恐龙类群。他发现，癌症不仅很罕见（＜0.2%至3%），而且仅限于鸭嘴龙类。

为什么肿瘤有这样的局限性呢？这一问题很令人迷惑。这促使罗思柴尔德怀疑鸭嘴龙类的食物是否可能与这种流行病有关。一些“木乃伊化”的鸭嘴龙类干尸的罕见发现表明，其肠道内积累的物质中包含了相当大量的针叶树组织；这些植物含有高浓度的致癌化学物质。这究竟是鸭嘴龙类具有遗传性易患癌症体质的证据，还是环境诱导（含诱变因素的食物）致癌的证据，目前都还完全是推测。

同位素

被称为地球化学的另一个科学分支利用放射性氧同位素，特别是氧–16和氧–18，以及它们在微体海洋生物外壳所包含的化学物质（碳

酸盐）中的比例，来估算古代海洋的温度，进而推测更大范围的气候条件。从根本上说，人们的观点是，这些生物体外壳化学物质中锁定的氧–18比例越高（与氧–16相比），它们原来所生活的海洋的温度就越低。

20世纪90年代早期，古生物学家里斯·巴里克（Reese Barrick）和地球化学家威廉·肖沃斯（William Showers）合作，尝试是否可能对骨骼中的化学物质进行同样的研究——特别是构成骨骼矿物中磷酸盐分子的一部分的氧。他们首先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一些已知的脊椎动物（牛和蜥蜴），从它们身体的不同部位（肋骨、腿和尾部）提取骨骼样品，测量氧同位素的比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内温哺乳动物（牛）来说，腿骨和肋骨之间的体温几乎没有差异；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该动物具有恒定的体温。然而在蜥蜴中，尾部的温度比肋骨低2到9ºC；外温动物身体热量的分布不像内温动物那样均匀，它们身体外围部分的平均温度要比核心部分低。

接着，巴里克和肖沃斯对采自蒙大拿州一具保存完好的霸王龙骨架中的各种骨骼进行了同样的分析。从肋骨、腿骨、趾骨和尾骨上钻下的样品显示了与哺乳动物颇为相似的结果：氧同位素比例的差异很小，这表明整个身体的温度相当均匀。这一结果被进一步用来证明这样的观点：恐龙不仅是恒温的，而且是内温的。这两位作者最近的研究工作似乎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初步发现，并将这种观察成果扩大到其他一系列的恐龙身上，包括鸭嘴龙。

正如通常的情况那样，这些结果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有人担心骨骼的化学成分在石化过程中可能已被改变，而这会导致同位素信息毫无意义；注重生理特征的古生物学家则认为这一结果的意义远不能令人信服：恒温的信息与大多数恐龙是体型巨大的恒温动物（第六章）的观点相一致，并未提供内温或外温的确凿证据。

这显然是一个有趣的调查方法；虽然其结果还不是确切无疑的，但给未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恐龙研究：扫描革命

近年来，技术手段的平稳进步，以及利用它们解决古生物学问题的可能性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中已崭露头角。下面的小节将探讨几个这方面的应用；它们并非没有自身的局限性和缺陷，但在某些例子中，现在提出的问题可能是十年前做梦都想象不到的。

古生物学家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之一是期望对任何新找到的化石作尽可能彻底的探究，在此过程中又要把对标本所造成的破坏降到最低。发现X射线在照相胶片上形成身体内部图像的潜力对于医学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最近，由于与强大的计算机数据处理直接相连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核磁共振成像（MRI）技术的发展，医学透视显像领域产生了彻底的变革，这使得三维图像的产生成为可能。这种图像使研究者可以看到物体的内部，例如人体或其他复杂的构造，而这在通常情况下只有通过大的探测手术才有可能实现。

利用CT扫描观察化石内部的可能性很快被人们意识到了。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是蒂姆·罗（Tim Rowe），他与其团队的研究基地位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他成功建立了专门用于研究化石的最精密的高分辨率CT扫描系统之一，正如我们将要在下文中所看到的，他已经利用该系统进行了极为有趣的工作。

研究鸭嘴龙的头嵴

CT扫描应用的一个范例是针对一些鸭嘴龙类鸟脚次亚目恐龙一系列变化幅度极大的头嵴进行的研究。这些恐龙在晚白垩世时期非常丰富，具有非常相似的身体形态；它们真正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头部嵴突的形状，但这种差异的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难解之谜。1914年，当第一个具有“冠饰”的恐龙被记叙下来的时候，人们认为这可能仅仅是有趣的装饰特征。然而1920年人们发现，这些“冠饰”或头嵴是由纤细的骨质外层组成，里面包裹着相当复杂的管状腔室。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解释这些头嵴用途的理论层出不穷。最早的观点主张，头嵴为从肩部延伸到颈部的韧带提供了一个附着区域，以支撑又大又重的头部。从那以后，各种观点不断出现：它们是用来作为武器的；它们支持着高度发育的嗅觉器官；它们是性特征（雄性具有头嵴而雌性没有）；此外还有最具远见的观点，即这些腔室可能用作共鸣器官，就像现代鸟类那样。在20世纪40年代，人们偏爱水生的理论：即它们形成了气闸，当这些恐龙在水下吃水草时，可以防止水流进肺部。

大多数更加古怪的观点已被摒弃，或是因为有悖于自然法则，或是与已知的解剖学知识不相符。从中脱颖而出的理论是，头嵴可能起到若干相互关联的、社会/性方面的作用。它们大概为特定的种提供了可见的社会识别系统；另外，一些复杂精美的头嵴无疑是为了性炫耀的目的。还有少量鸭嘴龙的头嵴足够强壮，可以用于侧面攻击或以角相顶的活动，作为交配前仪式的一部分或雄性之间的竞争方式。最后，人们认为与头嵴或面部结构相关联的腔室或管状区域起到了共鸣装置的作用。而且，这种仍属推测的发声能力（可见于现今的鸟类和鳄类）可以与这些恐龙的社会行为联系起来。

与共鸣器官理论相关联的最大问题之一是直接获取能够重建空气在头嵴中流动的详细情况的头骨材料，而不必破坏细心发掘的珍贵标本。CT技术使得这样的内部探查成为可能。例如，新墨西哥州的晚白垩世沉积物中发现了一些头嵴非常独特的鸭嘴龙类小号手拟棘龙的新材料。头骨相当完整，保存很好，包括一个长而弯曲的头嵴。人们对头嵴进行了纵向CT扫描，然后将扫描图片进行数字化处理，从而得到了头嵴的内部空间而不是头嵴本身的图像。最终呈现的空腔内部图像显示它的复杂程度非常高。数个平行的狭窄管道紧紧缠绕在头嵴内部，产生的效果相当于一串长号！现在研究者们几乎毫不怀疑，像拟棘龙这样的动物头嵴上的空腔是它们发声系统的一部分，可以起到共鸣装置的作用。

软组织：心脏化石？

20世纪90年代晚期，南达科他州晚白垩世砂岩中出土了一具新的中型鸟脚次亚目恐龙的部分骨架。该骨架的一部分已被侵蚀掉，但剩余部分保存得非常好，仍然可以看出某些软组织的迹象，例如软骨，而通常这些软组织会在石化过程中丧失。在对标本进行初步清理的过程中，在胸腔的中央发现了一个大的含铁（富含铁质）结核。这一构造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他们得到许可，利用一台大型兽医用扫描仪对该骨架的主要部分进行了CT扫描。扫描的结果令人兴奋。

这块含铁结核似乎具有独特的解剖特征，而且其周围还存在与之相关联的结构。研究者将此解释为，这显示结核内保存了心脏以及一些相关联的血管。结核似乎显示出两个腔室（研究者将其解释为代表了原来的心室）；稍微向上一点有一个弯曲的管状结构，他们将其解释为主动脉（血液从心脏流出的主要动脉之一）。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这表明该恐龙具有与鸟类非常相似的、完全分隔的心脏；这一看法支持了越来越令人信服的观点：恐龙通常是高度活跃的需氧动物（参见第六章）。

早在1842年，理查德·欧文作出非常有预见性的推测时，就有人认为，恐龙、鳄类和鸟类具有比较高效的四心室（也就是完全分隔的）心脏。站在这个基础上来看，这一发现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真正惊人的是这样的看法：通过某种异常的石化情形，这只特定恐龙的心脏软组织的大体形态可能被保存下来。

据知，软组织能够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被保存在化石记录中；这些条件通常包括非常细的沉积物（泥和黏土）的混合物，它们能够保存软组织的印痕。而且，软组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们经过化学反应后的残余，通常在缺氧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化学沉淀作用被保存下来。但这两个条件都不适用于前面描述的鸟脚亚目骨架。该标本发现于粗粒的砂岩中，而且应该是在含氧量很丰富的条件下，因此从简单的地球化学观点来看，这样的条件似乎应该不大可能保存任何形式的软组织。

毫不奇怪，这些研究者的观察结果受到了质疑。铁矿石结核在这些沉积中很常见，而且经常与恐龙骨骼一起被发现。沉积环境、可能保存这些结构的化学条件，以及所有这些据称类似于心脏特征的解释都引发了争论。目前该标本的身份还不能确定，但无论提出其他任何主张，如果这些特征仅仅属于铁矿石结核，那么奇怪的是它们与心脏的特征竟然如此相似。

伪造的“恐龙鸟”：法医古生物学

1999年，一篇文章出现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其中强调了由中国辽宁省的新发现所揭示的恐龙与鸟类之间的相似性。它向人们展示了另一件令人兴奋的新标本，这件标本被命名为古盗鸟，以一具近乎完整的骨架为代表，看起来几乎与人们所能想象的中间类型的“恐龙鸟”一模一样。该动物具有与鸟类非常相似的翅膀和胸部骨骼，但保留了颇似兽脚亚目恐龙的头部、腿部和僵硬的长尾巴。

最初，《国家地理》通过一系列公共活动庆祝这件标本的发现。但很快该标本便招来了颇多争议。尽管它显然来自中国，但它是由犹他州的一家博物馆从亚利桑那州图森的一个化石市场购得的。这很不寻常，因为中国政府将所有具备科学价值的化石都视为国家财产。

该标本引起了科学界的怀疑：与类似兽脚亚目恐龙的腿部和尾部相比，它身体的前半部分简直过于 像鸟类了。保存该标本的石灰岩表面也很不寻常，它由一些像碎石路一样的小石板组成，被许多填充物拼接在一起（参见图37）。没过多久就有人宣称它大概是伪造的——可能是用采自辽宁的各种各样的剩余部分加工排列起来的。在普遍疑虑的氛围下，犹他博物馆的研究馆员与两位研究这些中国恐龙类型的古生物学家取得了联系。他们是阿尔伯塔皇家蒂勒尔博物馆的菲利普·柯里（Philip Currie）和中国北京的徐星（Xu Xing）；此外还联系了得克萨斯的蒂姆·罗，看他是否能够通过CT扫描证实这件化石的性质。

A. 化石的X光照片

原型图例

相对密度

骨骼

石板

空气

示意图图例

骨骼

相关联的鸟类骨骼

无法证实的“附加”骨骼

相关联的石片

1a-w 处于自然位置上相关联的石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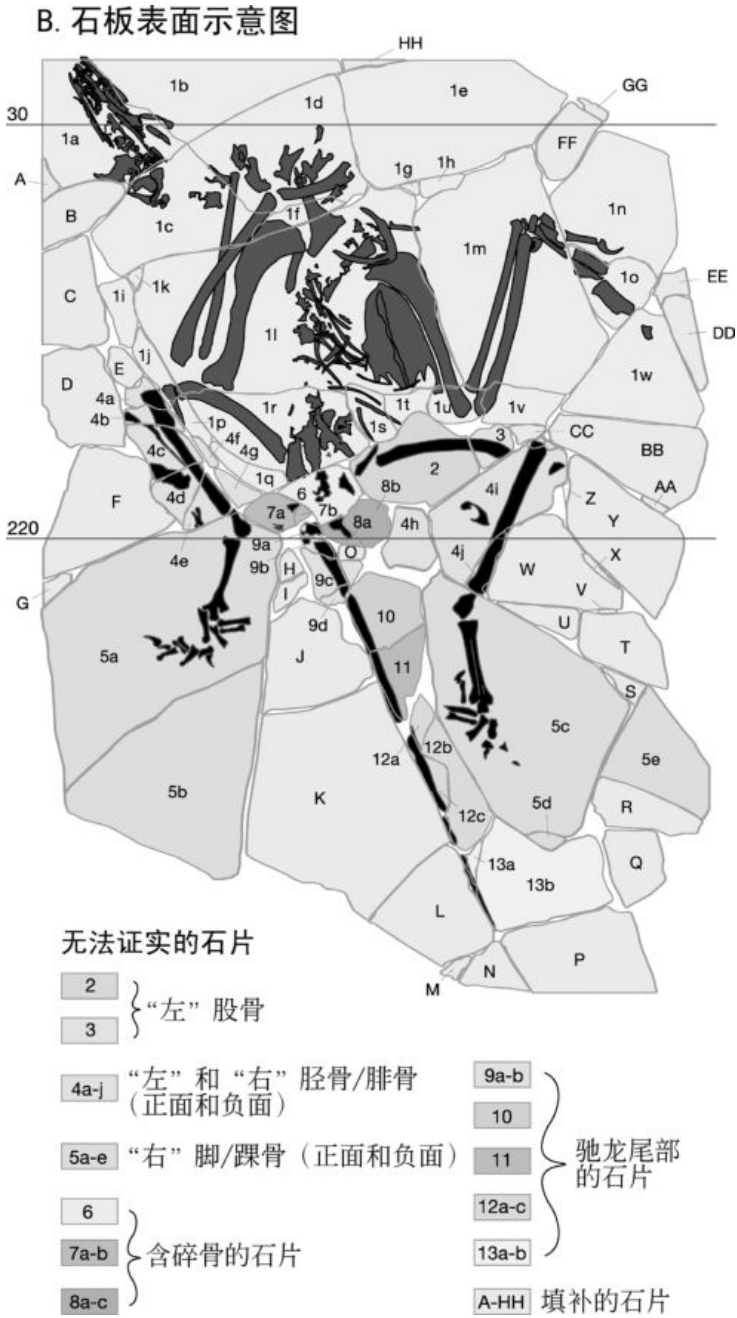

图37　在石板上伪造的“古盗鸟”

惊人巧合的是，徐星回到中国后，找到了一件采自辽宁的岩石，其中包含了一具驰龙类兽脚亚目恐龙的大部分。对该标本进行研究之后，他确信，这件化石的尾部是他最近在古盗鸟身上所看到尾部的纵切反面。回到华盛顿和《国家地理》的办公室以后，徐星将他新近发现的化石与古盗鸟标本相对照，结果证明原来的古盗鸟石板毫无疑问是拼接而成的，它至少包含了两种不同的动物（前面一半是一只真正鸟类的一部分，而后面一半则是一只驰龙类兽脚亚目恐龙的一部分）。

罗在注意到事件的这一发展之后，详细研究了他为原来的古盗鸟石板所作的CT扫描的照片。CT照片不能分辨真正的和伪造的化石。然而，石板每个部分精确的三维图像使人们能够准确地比较每一块标本。事情弄清楚了：一只鸟的部分化石构成了石板的主要部分，此外又加上了一只兽脚亚目恐龙的腿部和足部骨骼。罗和他的同事证明，该标本是只用了一条腿骨和足部骨骼拼接而成的。在这个例子中，正面和反面被纵切为二，制造了一双腿和脚！最后，又加上了兽脚亚目恐龙的尾巴；而且，为了完善这幅“图画”，添加了额外的小块碎石和填充物，造成了看起来更令人满意的矩形总体效果。

这些戏剧性的发现并没有对有关恐龙–鸟类关系的争论产生任何影响。它表明的是某些令人遗憾的事实。在中国，报酬很低的工人在帮助挖掘一些真正奇妙的化石的过程中，显然逐渐获得了良好的解剖学知识，了解科学家们正在寻找的动物类型。这些工人也认识到这些化石的市场很兴旺，如果他们能够将化石卖给中国以外的交易商，便会给自己带来高得多的经济利益。[1]

恐龙力学：异龙如何取食

事实表明计算机断层摄影显然给古生物学研究带来了颇有价值的帮助，因为它能够以几乎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到物体的内部。剑桥大学的埃米莉·雷菲尔德（Emily Rayfield）及其同事开发了一些利用CT成

像的技术革新方法。利用CT图像、复杂的计算机软件，以及大量的生物学和化石生物学数据，研究者证明了探索恐龙活着时如何活动是有可能的。

正如霸王龙的例子那样，我们大体上知道异龙（图31）是一类捕食动物，它的猎物很可能是生活在晚侏罗世时期的一些动物。有时在骨化石上可以发现齿痕或抓痕，而这些痕迹可以与异龙颌骨上的牙齿完全对上，这可以作为异龙“有罪”的一种“证据”形式。但是这些证据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其答案可能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多。我们不能确定这些齿痕是否是由以死亡动物为食的食腐动物留下的，或者留下齿痕的动物是否是真正的凶手；同样，我们无法断定异龙可能是哪种类型的捕食动物：它是经过长距离追逐扑倒猎物，还是潜伏然后突袭？它是毁灭性地咬碎骨头，还是以切割和砍击为主？

雷菲尔德获得了一个保存异常完好的晚侏罗世兽脚亚目异龙头骨的CT扫描资料。利用头骨的高分辨率扫描产生了一幅整个头骨非常详细的三维图像。然而，雷菲尔德不仅仅制作了像全息图一样的漂亮头骨图像，她还将图像资料转化成了三维的“网格”。网格由一系列的点素坐标组成（颇似地形图上的坐标），每个点都由短的“元”与紧邻的点相连接。这样就建立了工程学术语上所说的整个头骨的有限元图（图38）：以前从没有人尝试过构制如此复杂的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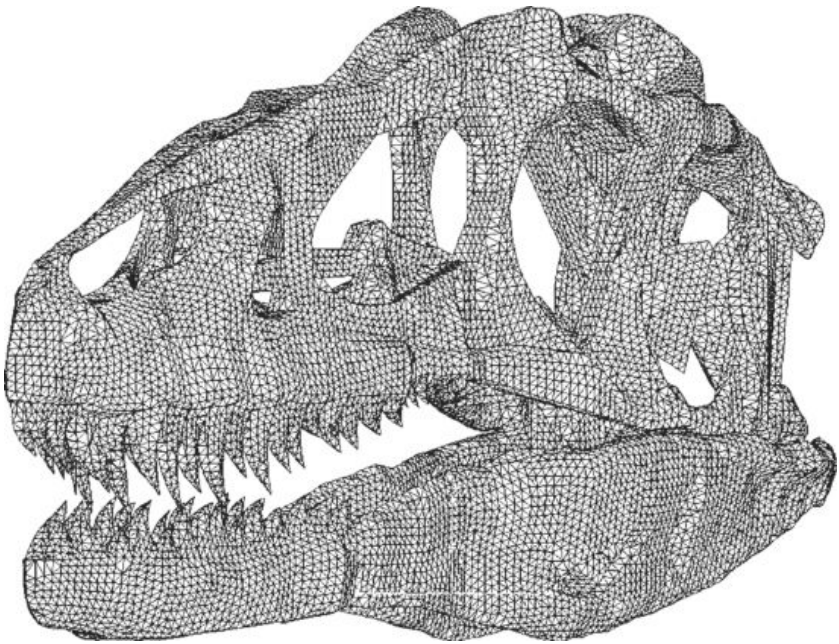

图38　CT扫描的异龙头骨三维有限元模式图

这类模型的突出特性是，利用适当的计算机和软件，可以在有限元图上记录头骨的物质属性，例如头骨、牙釉质或骨骼之间关节上软骨的强度。这样，可以促使每个“元”就像一块真正头骨的组成部分那样起作用，而每个元都与相邻的元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单元，就像恐龙活着时一样。

绘制了这只恐龙的虚拟头骨图像以后，就需要计算出它活着时颚肌的力量。利用黏土，雷菲尔德做出了酷似该恐龙的颚肌的模型。当她完成这项工作后，便根据它们的尺寸——长度、周长，以及与颌骨附着的角度——计算出它们能够产生的力的总量。为了保证这些计算尽可能符合实际情况，生成了两套力的估算模式：一套基于这类恐龙具有颇似鳄类（外温）的生理特征，另一套则假定它具有鸟类/哺乳动物（内温）的生理特征。

然后，利用这些数据组，就可以在异龙头骨的有限元模型上添加这些力，精确地“测试”头骨对最大咬力有怎样的反应，以及这些力在

头骨内部是如何分布的。这项实验的目的在于探明头骨的结构和形态，以及它对与进食相关的压力的反应方式。

产生的结果令人着迷。该头骨异常坚固（尽管有人认为它表面上如此多的大孔洞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它的强度）。事实上，这些孔洞证明是该头骨强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测试虚拟头骨直到它开始“屈服”的时候（也就是说，它受到的力开始使骨骼断裂时），研究者发现它能够承受的力高达异龙尽全力咬合时颚肌可以产生的力的24倍。

从这个实验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异龙的头骨被非常过分地加固了。自然选择在大多数骨架特征的设计上通常会提供一个“安全系数”：构建那部分骨架所需要的总的能量和材料与它在正常生活条件下的大体强度之间的一种平衡。这个“安全系数”是变化的，但一般在正常的生命活动中通常所受到的力的2—5倍范围内。异龙的头骨结构具有24倍的“安全系数”的假设似乎是荒谬的。对头骨进行再次检验并重新考虑它可能的取食方式后，得出了如下的认识：下颌骨构建的方式实际上相当“脆弱”。因此，与总的头骨强度相比，该动物的咬力很可能真的很弱。这表明该头骨的结构能够承受非常大的力（超过5吨）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最明显的是该头骨可能被用来作为主要的进攻武器——作为斩碎机。这些恐龙可能张大下颌突然扑向猎物，然后用头向下猛撞猎物，给予其毁灭性的巨大打击。由于这个动作所附加的身体重量以及猎物的抵抗，头骨必须能够经受住短时间内极高的负荷。

在第一次攻击之后，一旦猎物被制服，那么该恐龙就要用颌骨以传统方式咬下肉块，但在此过程中可能在相当程度上需要用腿和身体来帮助拉扯坚韧的肉块，这就再次通过颈部、背部和腿部肌肉所产生的力给头骨增加了相当高的负荷。

这一特定的分析有可能使人们对异龙类是怎样取食的产生一些认识，而这在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这再次说明，新技术和不同的科学分支（在本例中是工程设计）的相互结合可以用于探索古生物学问题，并产生新的有趣的观察结果。

古生物分子和组织

在本章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不能不提到《侏罗纪公园》中的情节：发现恐龙的DNA，利用现代生物技术重组这些DNA，由此使恐龙复活。

过去的十年中，有零星几篇科学报告声称发现了恐龙DNA片段，接着又利用聚合酶链反应（PCR）的生物技术来增强这些片段，以使它们更易于研究。遗憾的是，对于愿意相信好莱坞剧情的人们来说，所有这些报告都没有得到证实，而且实际上从恐龙骨骼中分离出任何真正的恐龙DNA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理由很简单，DNA是一个长而复杂的生物分子，在缺乏维持并修复它的代谢系统（正如在活的细胞中所发生的那样）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DNA会降解。任何这样的物质被埋在地下（而且在那里遭遇由微生物、其他生物和化学污染源，以及地下水造成的各种污染风险），经过6,500多万年而未被改变的可能性实际上为零。

到目前为止，所有报告的恐龙DNA均被证明是已受到污染的。实际上，被确认的唯一可靠的化石DNA在时间上要近得多，而且即便是这些发现，也是由于不寻常的保存条件才成为可能的。例如，棕熊化石遗存的年代追溯至大约6万年前，人们获得了它的线粒体DNA很短的序列——但这是因为自从这些动物死亡以后其化石就一直冻结在永冻土中，这为降低这些分子的降解速度提供了最佳条件。当然，恐龙的遗迹要比北极棕熊古老1000倍。尽管我们或许有可能在现生鸟类的DNA中识别出一些与恐龙相似的基因，但使恐龙复活是科学界无能为力的。

最后一组极为有趣的观察结果涉及到对采自蒙大拿州的一些霸王龙骨骼的外表和内部化学组成的分析。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玛丽·施韦策（Mary Schweitzer）和同事得到允许研究由杰克·霍纳（Jack Horner，电影《侏罗纪公园》中“艾伦·格兰特博士”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采集的一些保存非常完好的霸王龙骨骼标本。对骨架化石的详细检验表明，长骨的内部结构只有极微小的改变；的确，它们的改变是

如此之小，以至于霸王龙个别骨骼的密度与现代骨骼仅仅晾干之后的密度相一致。

施韦策找寻的是古代的生物分子，或者至少是可能留下的残余化学标记。她从骨骼内部提取了材料以后，再将其研成粉末，对其进行广泛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分析。这项研究背后的想法是，不仅要尽最大可能“捕获”一些痕迹，而且如果标记出现的话，还要得到一系列支持它的半独立证据。研究者肩上的重任实际上是找到某些能证明这样的生物分子存在的确凿证据；死亡和埋藏以后时光流逝，任何这些分子的残迹都已被全部破坏或冲刷掉的可能性似乎是无法抗拒的。核磁共振和电子自旋共振揭示了类似血红蛋白（红血球的主要化学组成物）的分子残余物的存在；光谱分析和高性液相色谱（HPLC）生成的数据也显示出残余血红素结构的存在。最后，将恐龙的骨组织用溶剂冲洗，以便提取任何遗留的蛋白质碎片；然后将这些提取物注入实验大鼠的体内，看它是否会引起免疫反应——结果确实引起了反应！大鼠所产生的抗血清与提纯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血红蛋白所发生的反应呈阳性。从这一系列的分析可以看出，似乎这些霸王龙的组织中很有可能保存了恐龙血红蛋白混合物的化学残迹。

更令人着迷的是，在显微镜下观察部分骨骼薄片的时候，在骨骼内部的血管中可以识别出小的圆形微结构。对这些微结构进行分析以后发现，与周围的组织相比，它们明显富含铁（铁是血红素分子的主要成分）。而且它们的大小和总体面貌与鸟类的有核红细胞特别相似。尽管这些结构并不是真实的血细胞，但它们确实像是原来的血细胞在化学上发生了改变的“幽灵”。这些结构在这种状态下是如何经过了65 Ma而存留下来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谜题。

施韦策和她的合作者还识别出（利用类似前面提到的免疫学方法）被称为胶原蛋白（天然骨骼以及韧带和肌腱中的主要组成成分）和角蛋白（构成鳞片、羽毛、毛发和爪子的物质）的“坚韧”蛋白质生物分子残余。

尽管这些结果受到了整个研究界相当大的质疑——而且，由于上面详细叙述的原因，这种质疑也是合理的——但是，被用来支持他们

结论的一系列科学方法，以及发表这些观察结果时所持的堪称典范的慎重态度，仍然代表了古生物学这个领域中清晰的模式和科学方法的应用。

注释

〔1〕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私人买卖这些化石是违法的。

第八章
对过去进行研究的前景

K-T绝灭：恐龙的终点？

自19世纪早期起，人们就已经了解到，不同的生物类群在地球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类群之一是恐龙，而古生物学调查则稳固地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即恐龙绝对不会在比白垩纪末（大约65 Ma）更年轻的岩石中发现。事实上，人们得到的认识是，白垩纪的最末期，一直到第三纪的开端（现在被普遍称为K–T界线），标志着一个较大的变革时期。许多的种走向了绝灭，在第三纪早期被各种不同的新类型所取代：K–T界线似乎代表了一个较大的生命间断，因而是一个大绝灭事件。在这个时期发生绝灭的物种类型有：大名鼎鼎的陆地恐龙，它们到晚白垩世时期已有了许多不同的种类；多种多样的海洋动物，从巨大的海生爬行类（沧龙类、蛇颈龙类和鱼龙类），到极为丰富的菊石类，以及范围非常广泛的白垩质浮游生物；而在空中，会飞的爬行动物（翼龙）和反鸟类也永远消失了。

显然，人们有必要去努力了解造成这一生命急剧消亡事件的可能原因。这个总的问题的另一面也同样重要：为什么一些动物幸存下来了？毕竟，现代鸟类幸免于难，哺乳动物也是如此，还有蜥蜴和蛇、鳄和龟、鱼和许许多多其他的海洋动物。这仅仅是幸运吗？直到1980年前，人们提出了解释K–T绝灭和幸存的各色理论，从识见幽明到荒诞可笑，不一而足。

1980年以前比较持久的理论之一是以详细研究距K–T界线最近的时间带的生态组成为中心的。多数人的意见是，在白垩纪末期，气候条件逐渐变得季节性更明显、变化幅度更大。那些在压力较大的气候条件下适应能力较差的动植物的衰落可以反映出这一点。这与白垩纪末期的构造变化相关联（尽管对此并无定论）；这些变化包括海平面的显著上升和大陆分区的大大加强。总的印象是地球的特征正在逐渐改变，最终以动植物群引人注目的剧变而达到顶峰。显然，这样的解

释需要为绝灭事件的发生提供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但其致命的弱点是无法为同时在海洋生物群落中所发生的变化提供一个充分的解释。在缺乏更好材料的情况下，争论此起彼伏，得不出明确的结论。

1980年，这一研究领域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这出乎意料地是由一位天文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斯（Luis Alvarez）实现的。他的儿子沃尔特（Walter）是一位古生物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K–T界线附近浮游生物多样性的变化。一个合乎逻辑的假定是，晚白垩世和第三纪早期之间的间隔可能代表了一个稍长的“缺失”时期——连续化石记录中的一个真正缺环。为了帮助沃尔特研究有关浮游生物群落在地球历史上这一重要时期的变化，路易斯提议，他可以测量界线沉积中积累的宇宙尘埃的数量，以便给这个假定的地质间断的程度提供一个评估。他们的结果震惊了古生物学界和地质界。他们发现，由一条薄的黏土带所代表的界线层中包含了数量巨大的宇宙碎屑，这只能由一颗巨大的陨星撞击地球、并随后发生汽化来解释。他们计算得出，这颗陨星的直径应该至少有10公里。考虑到这样一颗巨大陨星撞击的影响，他们进一步提出，撞击后所产生的大量碎屑云团（含有水蒸气和尘埃颗粒）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完全遮盖地球，或许达数月乃至一年或两年之久。以这种方式遮盖地球将使陆生植物和浮游生物停止光合作用，并导致同时期的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的崩溃。阿尔瓦雷斯父子及其同事似乎一下子就发现了K–T事件的统一解释。

像所有有价值的理论一样，撞击假说吸引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研究小组在世界各地的K–T界线沉积物中识别出宇宙碎屑和与强烈撞击有关的信号。到了80年代晚期，许多工作者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加勒比海地区。有报告显示，在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上，例如海地，K–T界线附近的沉积中不仅显示出撞击的信号，而且紧靠它的上面有一层极厚的角砾岩（混合在一起的破碎岩块）。这层角砾岩以及比此处更厚的陨星碎屑层和其中的化学标记促使研究者提出，陨星撞击了这个地区浅海中的某个地方。1991年，研究者宣布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上确认了一个很大的地下陨星撞击坑，他们称之为希克苏鲁伯撞击坑。该陨石坑本身已经

被6,500万年的沉积物所覆盖，只有通过研究地壳的地震回波（颇似地下雷达的原理）才能显现。该陨石坑大约跨越了200公里，与K–T界线层恰好吻合，因而阿尔瓦雷斯的理论得到了这一惊人发现的支持。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K–T事件的研究从原因转向尝试将这时的绝灭与单一的灾难性事件联系起来，因为原因在当时似乎已经确定了。这一灾难性事件与核冬天的相似点相当明显。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发展，再加上人们对“目标”岩石（浅海沉积）中可能的化学成分以及它们在高压冲击下的行为等知识的了解，已经将撞击的早期阶段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清楚地揭示出来了。在尤卡坦，陨星必然撞击了富含水、碳酸盐和硫酸盐的海底；这将向同温层排放分别高达2,000亿吨的二氧化硫和水蒸气。基于陨石坑表面形状的撞击模型显示，撞击是倾斜的，来自东南方向。这样的轨迹必将使排出的气体向北美聚集。化石记录的确显示植物群的绝灭在这个区域特别严重，但在这个模式得到证实之前，还需要在其他地区进行更多的研究。阿尔瓦雷斯和其他人在撞击影响方面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尘埃和云团会使地球陷入冰冻和黑暗之中。然而，对大气条件所制作的计算机模型显示，由于海洋的热惯性以及大气层中颗粒物质的稳步沉降，数月之内光照水平和温度就会开始反弹。不幸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情况都不会好转，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和水会结合在一起，产生硫酸气溶胶，它们会在5到10年内大大减少到达地球表面的光照量。这些气溶胶将会起到使地球冷却至接近冰冻和使地表浸透酸雨的双重作用。

很明显，这些预测仅仅建立在计算机模型的基础之上，可能会出现误差。然而，即使只是部分正确，撞击以后环境影响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总体规模也将真正是毁灭性的，这可以从许多方面很好地解释白垩纪末期的陆地和海洋绝灭。在某种意义上，奇怪的是竟然还有生物能够在这种世界末日般的条件下幸存。

动摇

虽然近年来的许多研究都集中在解释一颗大的陨星对全球生态系统所造成的环境影响，但对希克苏鲁伯地区的研究工作仍在继续。为了对撞击带进行详细探测，现已在撞击坑中打下了一个1.5千米深的大钻孔。初期的研究成果略微打乱了前文所解释的总体模式。钻孔资料的一组解释指出，撞击坑可能在K–T界线之前30多万年就已经形成了。这个时间间隔由0.5米厚的沉积物所代表。有人以此为根据提出，白垩纪末事件并非只是单独的一次大的陨星撞击，而是发生了几次大的撞击，一直到K–T界线时为止——它们累积的影响可能导致了这样的绝灭模式。

显然，这些新的发现预示，在未来的很多年里无疑将会进行更多的研究，发生更多的争论。其中相当重要的是与白垩纪末事件同时发生的大规模火山活动的资料。印度的德干地区呈现出一系列极厚的溢流玄武岩，估计有数百万立方千米。这样巨量的火山喷发对环境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以及这是否与地球另一面的陨星撞击有着任何方面的联系，这些问题仍然有待于确定。

大绝灭是地球生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间断标志——确切指明它的原因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恐龙研究的现在和不远的将来

至此，我们应该很清楚地知道，像古生物学这样的学科——正如目前它被应用于研究像恐龙一样令人着迷的动物时所表明的那样——本身具有明显的不可预知性。为了探讨特定的议题或问题，人们可以订立许多古生物学研究计划。这些计划也确实能够满足人们在理智上的要求；这对所有学科来说都是正常的。然而，机缘巧合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将研究引入开始时意想不到的方向。它也有可能受到惊人的新发现的极大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没有人能够预料到1996年神奇的“恐龙鸟”在中国的发现，而且这些发现持续至今；物理学和生物科学方面的技术进步在研究中也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同样使我们能够以仅仅在几年前还难以想象的方式研究化石。

为了利用许许多多这样的机会，存在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是很重要的。首先，他们必须对地球的生命历史怀有持久的兴趣，而且具有与生俱来的好奇特质。他们还需要在一系列广泛的领域中接受某些训练。虽然科学家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独立工作和创造性思考仍很重要，但越来越多的情况是，需要多学科的团队带来与每个问题或每个新发现有关的更广泛的技术，以便获取能够推动科学稍稍前进一步的信息。

最后……

我的中心思想比较简单。我们作为人类，可以简单地选择无视地球上生命的历史，而这一历史通过研究化石至少可以部分地获得解释。的确有许多人坚持这样的想法。我要说，幸好我们中的少数人不这么看。生命的华彩乐章已经跨越了过去的36亿年——这是一个惊人的漫长时期。目前我们作为人类直接或间接地统治着大多数的生态系统，但我们仅仅是在过去的1万年里才上升到地球生命中的这个位置的。在人类出现之前，形形色色范围很广的生物占据着统治地位。恐龙就是这样的一个类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无意间充当了它们那个时代地球的管理者。古生物学使得我们能够部分追溯它们的这一管理地位。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并运用它们来帮助我们，以使我们在最终消亡的时候为其他后继的种群留下一个适于居住的地球？鉴于当前呈指数增长的人口、气候变化，以及核能所造成的全球威胁，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责任。地球不仅仅是“此时此刻”，而是具有久远历史的。我们是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第一个物种。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不会同样是最后一个。在研究了浩瀚无边的化石记录中物种的起伏盛衰以后，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是，人类不会永远存在。

自从我们作为智人在大约50万年前起源之后，我们人类可能会再延续100万年，或者如果我们特别成功（或幸运）的话，也许甚至是500万年，但我们最终将会重蹈恐龙的覆辙：这一点已经无可置疑地记录在岩石中了。

人们对恐龙的迷恋似乎是永无止境的，众多有关恐龙的热门电影和纪录片声称准确再现了这些动物，从而愈加突出了恐龙的魅力。但是这些复原的可靠性如何？它们能够真正反映恐龙世界的新发现或最近的研究成果吗？

戴维·诺曼的这本小书阐述了从古代神话到现代科学人们解读恐龙的详细历史，着重展现了科学家是如何将解剖学、遗传学、法医学，甚至工程设计学结合在一起，来研究和描绘恐龙的外表特征、食性、运动模式以及相互交流方式的，可谓古生物学研究者和恐龙爱好者的必读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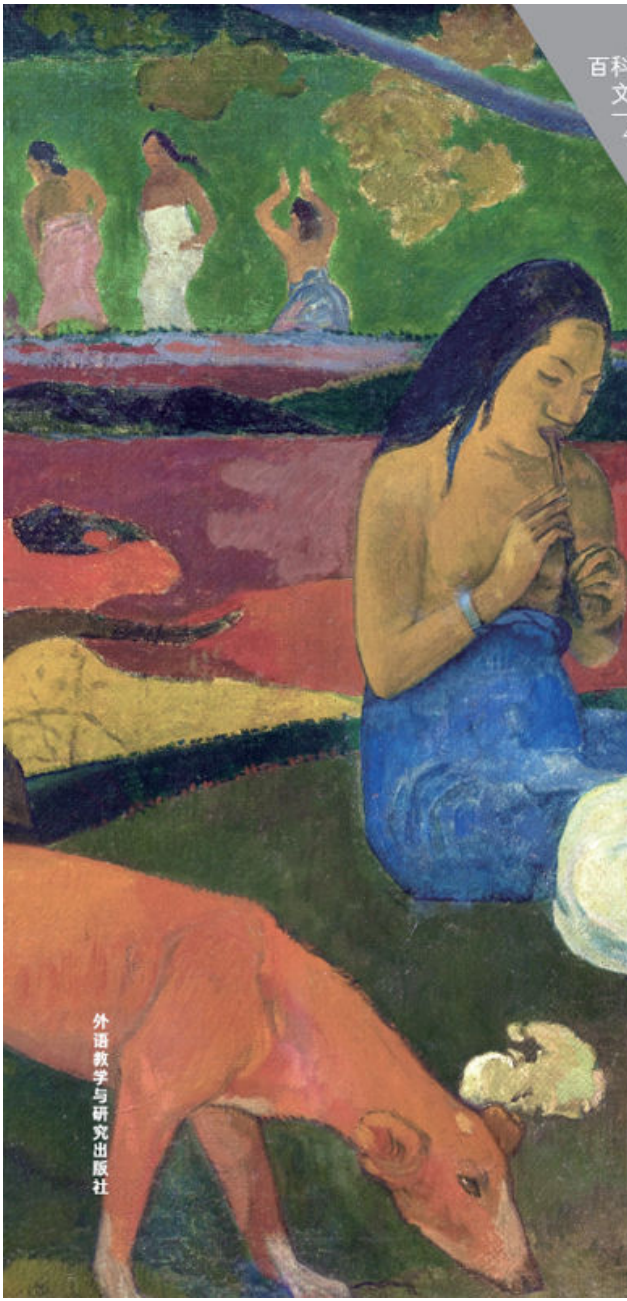

百科通识文库

49

人类进化简史

伯纳德·伍德 著

冯兴无 高星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人类进化简史

伯纳德·伍德 著

冯兴无 高星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15-5163**

Human Evolu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5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Bernard Wood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进化简史 / （英）伍德（Wood, B.）著；冯兴无，高星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41-7

I．①人… II．①伍…②冯…③高… III．①人类进化 - 历史 IV．①Q9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946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执行编辑 罗来鸥 詹莹玥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41-7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表目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找寻我们的位置
第三章　化石人类的发现及相关背景
第四章　化石人类的分析与解译
第五章　可能的最早人类
第六章　早期猿人和过渡猿人
第七章　晚期猿人
第八章　现代人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伯纳德·伍德从事人类进化方面的研究已有30多年。1997年他成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史密森学会的人类起源学教授。此前，他是利物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医学院院长。他著述颇丰，主要论及分析方法的发展及其在化石研究方面的应用。

译者简介

冯兴无，中国科学院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现任《人类学学报》副编审兼责任编辑。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20年，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编著有《天道酬勤桃李香——贾兰坡院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大窑遗址研究——四道沟地点（1980～1984）》等。

高星，中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图目

图1　生命树图的脊椎动物部分
图2　古人类学研究的发展示意图
图3　C. K.（鲍勃）·布莱恩演示斯瓦特克朗洞穴人类化石遗址的复杂地层关系
图4　古人类化石的一些测年方法及其覆盖的年代范围
图5　过去6百万年间氧同位素水平波动情况
图6　进化的两大假说："种系渐变"和"间断平衡进化"/66
图7　现生高等灵长类分支和对应等级的比较
图8　主合派／简单分类（A）和主分派／复杂分类（B）对生命树上高级灵长类分枝的解释
图9　"可能的"最早人类化石种的时代分布
图10　复原的"露西"骨架
图11　早期猿人和过渡猿人化石种的时代分布
图12　晚期猿人化石种的时代分布
图13　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起源说和走出非洲说"强"和"弱"模式图解

表目

表1　传统分类（A）和现代分类（B）；现代分类考虑了分子和基因的证据，黑猩猩更接近现代人类，而与大猩猩关系较远
表2　主分派和主合派对化石人类分类假说的对比
表3　现代人和现生黑猩猩骨骼之间的主要差别
表4　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形态和行为的主要差别

第一章
绪　论

生物学家在过去150年里所取得的许多重大进展可以简化作一个比喻，即包括动物、植物、真菌、细菌、病毒等在内的所有现生生物，和所有曾经存在的生物体都可以在一棵“生命树”的大枝小杈上找到其位置。

我们人类通过生命树的枝杈与地球上所有现生的生物和曾经的生物连接了起来。通往生命树根部的树干上的灭绝生物是我们的远祖；而与人类分枝直接相连的分枝上的其他物种，虽然与现代人的关系密切，但并非我们的祖先。

人类进化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大约30亿年前位于生命树根部的最简单的生命形式。沿着生命树主干向上，先经过的是汇集了所有动物的较小区域。再往上，可见所有脊椎动物，然后是大约4亿年前演化出的所有四足脊椎动物；接着便追溯到约2.5亿年前的所有哺乳动物，以及其后分化出的灵长类动物。最早的灵长类动物距今也至少约5,000万—6,000万年。

沿生命树继续向上，就先后进入猴与猿、猿类、巨猿分枝。大概在1,500万—1,200万年前，才进入到我们现代人和现生非洲猿小分枝；在1,100万—900万年前，大猩猩分化出去，剩下了现代黑猩猩和现代人类祖先分枝；大约在800万—500万年前，这一小分枝又分化出两个更小的细枝：现生黑猩猩位于一个细枝末端，现代人类位于另一细枝。古人类学就是一门致力于重建人类分枝进化历史的科学。

这本书集中介绍了人类进化历程的最后阶段——即从黑猩猩与智人的共同祖先到现代人的演化阶段。要理解这一过程，我们需要使用一些专业术语来表述：生命树的“细枝”在生物学上的正确表述为“进化分支”；进化中绝灭的分支称为“进化旁支”。位于人类进化分支或其旁支上的物种均为“人族”；同样，位于黑猩猩进化支上的物种称为“黑猩猩族”。我们不用“百万年”与“百万年前”，而用缩写“MY”和“MYA”；同样，“千年”与“千年前”记作“KY”和“K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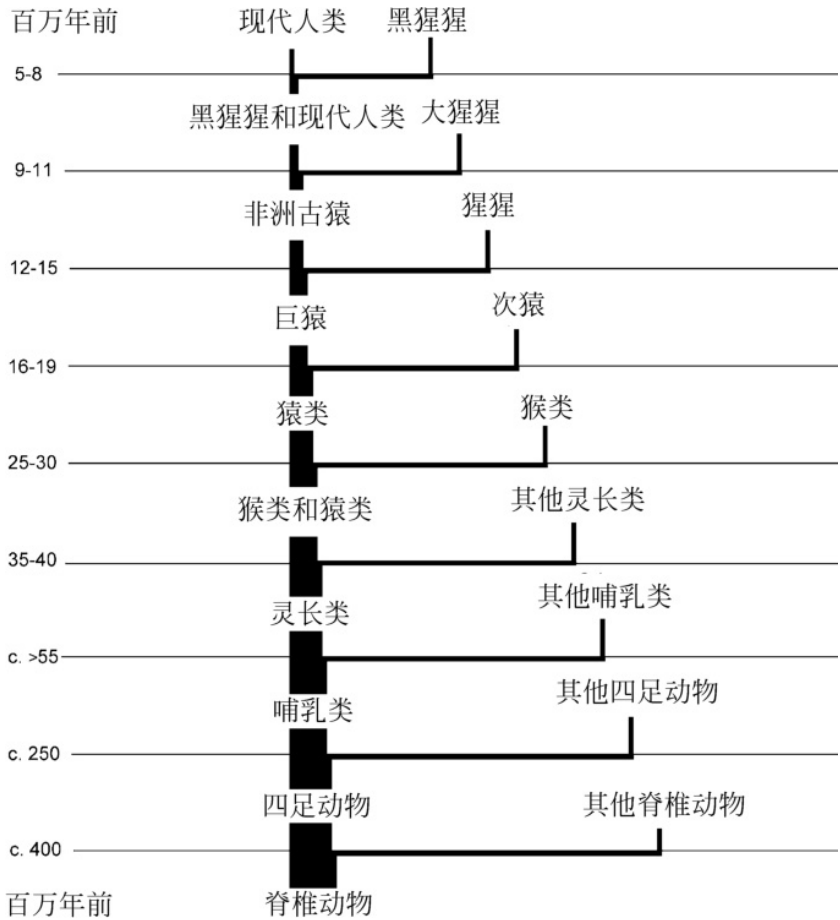

图1　生命树图的脊椎动物部分，强调了脊椎动物演化成现代人类的过程

本书有三个目的：一是试图解释古人类学家如何从事考古学工作，以促进我们对人类进化历史的理解；二是阐述我们认为已了解的人类进化历史；三是说明我们在探知人类进化史时知识上的主要欠缺。

我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增进对人类进化史的了解。第一种方式是获取更多的资料信息，即发现更多的化石或从现有化石材料中提取更多信息。在现有的地点或新发现的地点都能发现更多的化石材料。利用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可以很精确地观测到化石外部的形态数据。

我们还可以通过新技术采集到化石内部的形态和生物化学数据：使用非侵入性医疗影像技术，如电脑断层扫描成像获得内耳等结构的图像；用新型显微镜观察牙齿的显微解剖特征；用最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从化石中检测少量的D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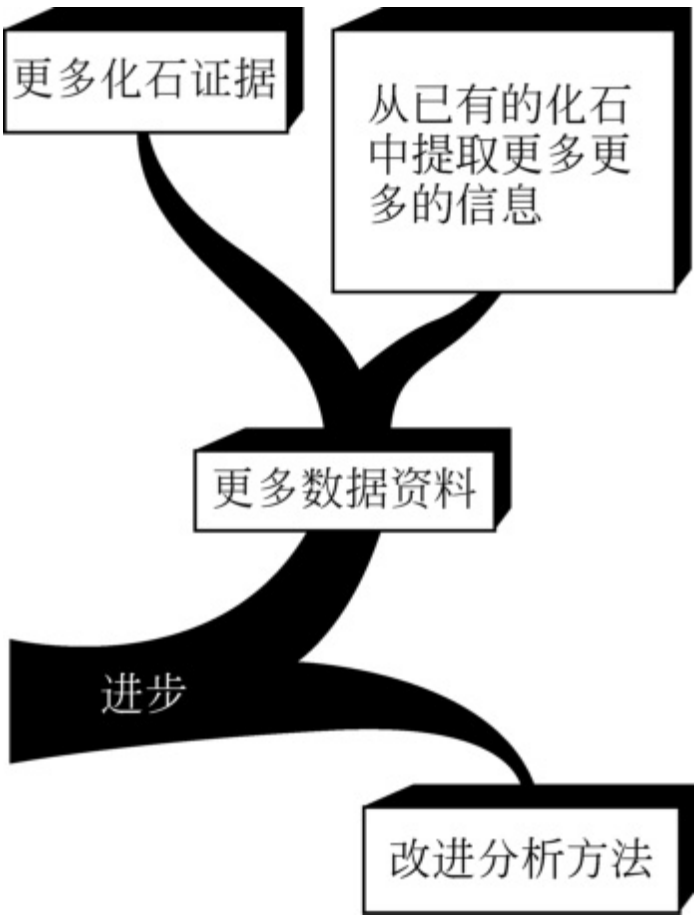

图2　古人类学研究的发展示意图

第二种方式是，改进我们分析数据资料的方法。这些改进包括使用更有效的统计方法，以及采用更新颖的功能分析方法等。研究者也努力改进创立和检验假说的方法，以了解人类化石记录中人类种的数量以及这些种之间与现代人类及黑猩猩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先回顾了哲学家及后来的科学家们是如何认识到现代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然后解释科学家为什么认为黑猩猩比大猩猩与现代人类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什么认为黑猩猩和人类的共同祖先生活在距今8百万年到5百万年间。

第三章回顾了距今8百万年到5百万年间的系列人类化石证据，探究了人类进化分支的形态。人类进化分支是否“茂密”或是否如细长植物的主干那样笔直？通过研究现代人的变异，确定进化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重构。通过寻找、发现和解译化石和考古学证据确定未来研究在何处着力。本章还介绍了研究者在哪里能找到新化石地点以及他们如何测定化石的年代。第四章解释了研究人员如何确定人类进化分支的种的数量，并回顾了他们是如何确定旁支的数量以及旁支间的关系的。

第五章探讨了“或许存在”、“可能存在”的最早人类，回顾了四组生物化石，它们被认为代表了位于人类进化分支最底部的类群。第六章介绍了“早期”猿人和“过渡”猿人类群；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属于人类进化分支的成员，但仍距现代人类很遥远。第七章介绍了研究人员认为的最早的人属成员，即所谓的“前现代人”（晚期猿人）。它们起源于非洲，然后走出非洲迁徙到旧大陆的其他地区。

第八章介绍了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即智人的起源及其迁徙的证据。何时何地我们发现了最早的现代人化石证据？是否在世界的几个不同地区发生过几次从前现代人到智人的演变？智人是否从一个地方起源而后扩散，然后因外来迁入或与异种交配最终替代了这一地区的前现代人？

最后，需要说明一下本书未涉及的内容。这本介绍“人类进化史”的小书集中阐述了人类体质而非文化方面的演进；人类文化演进通常被称作“史前考古学”，将在另一本《走出黑暗——人类史前史探秘》里专门介绍。

第二章

找寻我们的位置

研究人员很早就开始收集人类与其他动物相似性的物证。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为我们理解生命世界关联性的基本原理和机制奠定了基础。但远远早于他们，古希腊学者们就已推断：现代人是自然界生命系统的一部分，而非脱离于自然界存在。人类何时开始尝试通过推理研究自身的起源？这种推演是如何发展的？人类又是何时开始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进化的研究？

在公元前5世纪和6世纪，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提出了关于人类起源的最早构想。早期的这些希腊哲学家们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意味着人类和其他动物以相同的方式起源。公元前1世纪，罗马哲学家卢克来修（Lucretius）在他的著述中指出，最早的人类与现代的罗马人不同，他们像动物一样过着穴居的生活，既不会制造工具也不会使用语言。古希腊和罗马的思想家都把制造工具、用火和使用语言看作是人类的重要特征，因此，西方人的思想里很早就萌生了现代人起源于早期某种原初形态的生物的观念。

宗教信仰取代理性

罗马帝国在五世纪衰败之后，古希腊—罗马时代关于世界形成和人类起源的观点被《圣经·旧约》的《创世记》中的讲述所取代，即依据推理的解释被基于宗教信仰的解释所代替。

《创世记》的主要内容众所周知，即上帝首先创造了一个叫亚当的男人，然后创造了一个叫夏娃的女人。因为都是上帝亲手的杰作，亚当和夏娃必须具备语言能力、理性思维和社会文化意识。根据人类起源的这个说法，最早的人们能够和谐相处；他们拥有一切高于并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心智和道德意识。

《圣经》对现代人类中不同种族的解释是，在最后一次大洪水后，诺亚（Noah）的子孙迁移到世界各地繁衍生息，形成了现代不同

的人种。拉丁文的“洪水”一词为“diluvium”，因此，任何古老的，或发生在“洪水前”的事件被称为“antediluvial”。对生物界的形成包含对后来洪水的解释，影响了后来人们所知的古生物学这门科学。在一次洪水后诞生的所有动物不可避免地消亡于下一次洪水，因此，洪水前的动物不会和后来替代它们的动物共存。本章后面将深入探讨这一话题，以及大洪水的其他影响。

《圣经》对人类语言的多样性也进行了解释。上帝创造出相互难以理解的语言造成了建造巴别塔的人们的混乱。在讲到人类起源的《创世记》中，魔鬼在伊甸园成功地诱惑了亚当和夏娃，迫使他们及其子孙后代重新学习农牧业。因此，他们不得不重新发明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工具。

处于“黑暗时代”及随后时代（公元5至12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支持《圣经》对人类起源的解释。直到自然哲学（而后被称为“科学”）被重新认识并迅速发展起来，这种状况才发生了改变，但悖谬的是，19和20世纪，科学方法刚开始运用到人类起源的研究中不久，一些宗教团体对科学家试图不完全照字面意思诠释圣经的做法给予的回应却是：进行更严格的直译。这一蜕变就是被错误地称作“创造科学”的“神创论”的起源。

在中世纪黑暗时期，希腊的经典文本很少能在欧洲幸免于难而存留下来。幸存的版本被穆斯林哲学家和学者阅读并珍藏，其中一些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在12世纪，当穆斯林被逐出西班牙后，几个中世纪基督教学者对这些手稿很好奇，并把它们从阿拉伯文翻译成为拉丁文。这些翻译的文本中有包括人类起源在内的对自然界的论述。例如，13世纪意大利的基督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把希腊人关于自然界和现代人类的观点与一些基督教的阐释进行了融合。托马斯·阿奎那和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把科学和理性重新引入到了欧洲。

科学复苏

对我们当今所称的“自然科学”如生物学和地球科学感兴趣的人而言，脱离对《圣经》教义的依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对科学调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神学家使用的是先有某种信条再推导结果的演绎法，但是培根认为，科学家应该采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即他命名的“归纳法”。归纳开始于观测结果，也称之为证据或“数据”。科学家先提出一个“假设”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然后通过更多的观测来验证这个假设，或通过做更多的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实验来验证。在人类进化的研究中使用归纳推导法应该行之有效。

关于如何观测自然界，培根用谚语总结了自己的观点，并在1620年发表了专著——《新工具——解释自然界的真实建议》。他要传递的讯息非常简单，即不要仅仅满足于书中的解释，应该亲自走出去观察、研究自然现象，然后提出和检验自己的假说。

解剖学开始发展成为科学

在培根发表其观点的75年前，解剖学就已经发生了一场重大变革，成为了自然科学中与人类进化研究最为密切的学科之一。这一变革归功于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他在1514年出生于现在的比利时，1537年完成医学学习，并被派到意大利的帕多瓦（Padua）从事解剖学和外科学的教学工作。

维萨里自己接受的解剖学教育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教授坐在椅子上（教授职位被称为“chairs”因此而来），大声朗读只有在当地才能得到的教科书。他的椅子与尸体之间有一段安全距离，解剖由他的助手完成。没有多久，维萨里和他的同学们就意识到，教授讲的和其助手展示的东西不一致。1540年，维萨里在博洛尼亚（Bologna）访问参观时，才第一次比较了猴子的骨骼与人的骨架。他发现，教授使用的教科书把人、猴子和狗的解剖结构混在了一起，因此他决心自己写一本准确的人体解剖书。在1543年，他出版了包含7卷内容的《人

体结构》一书。维萨里亲自解剖并绘制了草图来演示解剖过程，此书是生物学历史上的杰作之一。他的努力成功地使解剖学成为一门更为缜密的学科，为后来科学家进行人体结构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

地质学的兴起

地质学（现通常称为“地球科学”）是另一门与研究人类起源十分相关的科学，相对解剖学，其发展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按字面意思解读《创世记》就会认为，自然界的历史不长，因而人类的历史也不可能久远。基于《圣经》创立的年表有很长的历史，这些年表最初分别是由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和圣比德（the Venerable Bede）在6世纪和7世纪制定的。最多被引用的年表是詹姆斯·厄舍尔（James Ussher）在1650年发表的，后来他成为了爱尔兰阿马（Armagh）的大主教。他用《创世记》中的“谱系”数精确计算了创世的年代，即公元前4004年。后来，英国剑桥大学的神学家约翰·莱特福特把厄舍尔推测的《创世记》年代精确到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时。地质学研究，特别是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记年法，揭示出地球及其生物的起源远比圣经年表的年代久远。

地质学的发展受到工业革命的极大影响。修筑隧道和铁路时因挖掘形成了许多剖面，使业余地质学家有机会看到以前隐藏的岩层。在早期的地质学家如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和詹姆斯·赫顿的大量工作基础上，查尔斯·莱伊尔（Charles Lyell）在1830年出版了《地质学原理》一书，客观地解释了地球的历史。莱伊尔的书影响了包括达尔文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其中河成论和均变论对地貌的解释取代了基于《圣经》的大洪水理论。河成论认为，河流和地表径流的侵蚀作用降低了山脉的高度并形成了峡谷，在塑造地球的轮廓方面起主要作用。均变论认为，过去塑造地球表面的地质过程如侵蚀和火山活动，

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相同的。莱伊尔也提出，在任何相对简单的地质层序中，越靠下的地层年代越古老，除非有明显而重大的异常隆起或被特别填埋；同样的原则也一定适用于岩石中所含化石的年代或石器时代的判断；化石所在岩层越往下，年代应该越古老。

新地质学理论的兴起具有深远的意义。地质学家不再需要借助《圣经》中的洪水论或神灵介入来解释地球的外观。当时的地质学先驱者认为，他们所观测到的现今地貌的形成所经历的时间远比《创世记》中暗示的6,000年要久远许多。

化石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作家承认化石的存在，但他们大多把化石解释为在其神话和传说中占据显要位置的怪兽的遗存。到18世纪，地质学家开始认可岩石中栩栩如生的结构就是已绝灭的动物和植物的遗存，不再赋予化石以超自然的因素。同一层位中，奇异的绝灭动物化石与现代生物的密切联系有力地反驳了大洪水理论。本章前面提到，大洪水理论并不允许现代动物与古代或者大洪水前的动物同时存在。

除了地质学开创者得出的关于地球历史的重要结论，还有其他几个因素也影响着17和18世纪的科学家，促使他们在《创世记》外寻求关于人类起源的其他解释。有一支欧洲远征探险队亲眼目睹了一群栖居在简陋住处的现代人；这群人使用简单的工具，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的生存状态与欧洲人相距甚远，被描述成处于“野蛮”状态。而根据《创世记》的讲述，人类是神创造的，不应该生活在“野蛮”状态。

生物分类

这支探险队带回了现代人在原始状态下的生活行为方式的种种故事，同时也带回了对许多奇特植物和动物的描述以及一些保存良好的

动、植物标本。当将这些新发现的标本添加到当时欧洲较为熟悉的植物和动物序列时，结果令人大为迷惑，生物界急需一个体系对其进行描述和组织分类。早期有过几种方案，比较有名的是约翰·雷（John Ray）的方案，他提出了物种的概念；但是最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是瑞典人卡尔·冯·林奈（Karl von Linné）提出的方案，大家可能更熟悉他的拉丁文名字Carolus Linnaeus。

分类方案尽可能把相似的生物归入广泛性和包容性递增的类别。以汽车分类为例。汽车可划分为7个级别或类别，第一级别最具包容性，最后级别是个小类；即依次为“车辆”、“机动车”、“汽车”、“豪华轿车”、“劳斯莱斯”、“银影”和“1970年的银影II”。林奈的分类系统也采用了七个基本级别，相当于“车辆”的级别是“界（Kingdom）”，下面依次为“门（Phylum）”、“纲（Class）”、“目（Order）”、“科（Family）”、“属（Genus）”、“种（Species）”；“种”是最小的、最不具包容性的正式分类单位。林奈原来的七级分类体系现在已经得到扩展，在“属”和“科”之间加入了“族（Tribe）”，在类别上引入了前缀“超-（super-）”，在类别下引入了“亚-（sub-）”和“次-（infra-）”。这些增补使“目”以下的分类单元增加到12个。

在林奈的分类系统中，每一层次划分出的类群叫做“分类群”。每一个独特群体称为“分类”，因此“智人种”是分类，“灵长目”也是分类。当这个体系被用于描述相关的生物群体时，被称为“林奈分类学”，常缩写为“分类学”。林奈的分类体系也是“双名制”体系，即每一个物种的学名，由属名和种名两个部分组成，都用拉丁文拼写，构成独一无二的拉丁名。例如，智人（现代人）为*Homo sapiens*，黑猩猩为*Pan troglodytes*。

“属名”可以缩写，但“种名”不可以缩写；如智人和黑猩猩可以分别写作*H. sapiens*和*P. troglodytes*，而不能为*Homo s*.和*Pan t.*。这是为了避免混淆，因为在一个“属”里面可能有两个种名的首字母相同的情形，如智人（*Homo sapiens*）和梭罗人（*Homo soloensis*）。

生物间相关联的证据

人们常用树来进行比喻。在基督教等宗教中，“存在巨链”有时用树来表示。现代人类位于树梢，其他现存动物在树上的高度与其所处级别的复杂性相对应。但是，在当代生命科学中，生命树并不是一个比喻，而是确实被应用在研究中。在现代生命系统树中，特定生命群体在树上分枝占比的大小反映了分类单元的数目，分枝的模式反映了科学家们所认为的动植物间相互关联的方式。

在19世纪末当基于科学研究的生命系统树最初创立时，两种动物关系的远近还必须采用形态学证据来评定。这些证据可以通过肉眼或常规的显微镜观察获取。科学家们假设生物体间结构相似的部分越多，在系统树上的分枝就越接近。在20世纪前半段，生物化学的发展表明，科学家除了利用传统的形态学证据之外，还可以利用分子的物理特征来确定生物间的亲缘关系。从红细胞表面和血浆里发现的蛋白质分子被用于通过生物化学信息来鉴定亲缘关系的最早尝试中。上述两方面的证据都强调，现代人类和黑猩猩的亲缘关系最为接近。

蛋白质是构成糖类和脂肪等分子进而构成人体组织的基础，而组织又构成了如肌肉、神经、骨骼和牙齿等人体器官。1953年，在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的帮助下，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发现，蛋白质的特性是由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缩写）分子决定的。科学家已经弄清楚，父辈遗传给子孙的DNA中含有的密码指令，即遗传密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孙身体的形态。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表明，科学家在确定生物间的关系时，可以不再采用传统的生物学形态比较或蛋白质分子形态比较的方式，而是通过对决定蛋白质结构和形态的DNA进行比较的方式。

当最初的传统解剖学，其后的蛋白质分子形态以及再后来的DNA螺旋结构（DNA比较方法下文详述）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生命系统树上生物间的比较时，显而易见的是，具有相似解剖结构的动物种类，也具有相似的分子结构和遗传密码。研究人员还发现，即使昆虫的翼

和猿猴手臂的形态完全不同，但它们发育过程中的基本遗传密码是相同的。这些发现也为所有的生物都能通过生命系统树连接起来的理论提供了又一令人信服的证据。对这种关联性的解释唯一能经受住科学检验的就是进化论；而唯一能经得住科学检验的进化机制就是自然选择。

进化——对生命树的解释

进化意味着逐渐改变。在动物界，这通常是（但不总是）指动物从相对简单变得越来越复杂的过程。这些变化多数发生在新物种的形成时期，即一个老物种迅速演变为一个不同的“全新”物种的过程中。虽然希腊人较容易接受动物的行为可以改变，但他们不接受动物（包括人类）的身体结构在自然产生后会发生改变的事实。事实上，柏拉图提倡，生物是不变的或是永恒的。他的观点直到19世纪中期还影响着哲学家和科学家们。

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学哲学》一书中，法国科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 Baptiste Lamarck）首次对生命树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他于1844年出版的《自然创造史的遗迹》一书在英语国家的影响很大，他的观点被广为接受。这本书也影响了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两个人，激发他们各自提出进化的主要驱动力是自然选择的观点。

达尔文的科学贡献并不在于进化观念，而是他提出了进化如何作用的系统理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说明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生命树的分枝模式。影响达尔文思想的书还有罗伯特·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的《人口原理》（1798）和查尔斯·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马尔萨斯强调资源是有限的，达尔文由此认为，资源供应和需求之间存在的不平衡矛盾可能是自然选择的驱动力，促使了进化的发生。达尔文提出的形态渐变论与莱伊尔解释地球表面演变的河流作用理论很相似；达尔文认为，形态渐变导致现有物

种变化为新的物种。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坚持认为，动物对栖息环境的良好适应性不可能是偶然因素导致的，一定是某个设计师的作品，而且这个设计师一定是上帝。佩利的观点激发达尔文提出一个新理论来替代早期神创论的解释。

达尔文对进化理论做出了两项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一是，他认识到没有两个动物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个体不可能有它的复制品；二是，他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观点。简言之，自然选择理论认为，由于资源有限，由于偶发的变异，一些个体比其他个体更利于获取资源。这样，获取资源多的个体就有足够的优势，其后代就比同种其他个体的后代有更强的生存能力。生物学家认为，这种优势能够不断提高动物的“适应性”。达尔文记录了许多动植物饲养者人工对动植物有效进行优胜劣汰的例子，于是，他推断优胜劣汰在自然状态下也一样存在。

在自然选择的情形中，只有在杂交后代完全继承了优势遗传基因时，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进化才起作用。达尔文当时不知道（同时代的其他著名生物学家也不知道），当他的《物种起源》一书接近完稿时，有人正在在捷克共和国一个叫布尔诺（Brno）的园寺里刻苦钻研变异的遗传学基础和遗传的基本定律。

遗传学的繁荣

遗传学法则是建立在格雷戈尔·孟德尔在修道院花园里进行的人工培植豌豆实验的推论基础上的。格雷戈尔是孟德尔在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僧名，他原名叫约翰。1865年，孟德尔把他的育种实验结果发布在布尔诺的《自然科学协会》杂志上，当时他并没有使用基因（遗传的最小单位）或遗传学术语。直到1909年，孟德尔开创性的实验成果被进化科学家关注后的第9年，“基因”（gene）一词才被创造出来。孟德尔是幸运的，他的多种植物育种实验提供了数个例子，证明一个基因和一个性状之间简单的对应关系，即单一基因或单倍体基因效应。

孟德尔选取的简单的对立性状，黄色或绿色、光滑或褶皱，被称

为“不连续”变量。对于灵长类和类人猿生物，我们通常需要研究它们的“连续”变量，如牙齿的大小、四肢的骨密度等。这些变量有平滑的曲线分布，并不同于来自孟德尔数据的整齐纵列。从不连续的数列中是怎样获得连续曲线的呢？答案是：牙齿的大小或四肢骨密度性状是由许多基因共同决定的，因此，看起来的曲线实际上是多组基因序列的组合。

人类的近亲

不久前出版的一本关于人类起源的书，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灵长类动物进化的化石证据。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在灵长类动物演化的每一阶段，都有一个化石灵长类被认定为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然而，我们知道，出于各种原因，这些类群中的许多代表都不可能是高等灵长类动物的祖先。我们将集中描述我们所知的巨猿的进化及其相互关系，同时也将回顾西方科学家研究巨猿的历史，以及他们就巨猿间以及巨猿与现代人类间关系的看法是如何改变的。我们还将探究究竟哪一类现生猿猴与现代人类的亲缘关系最为密切。

欧洲探险队和贸易商带回的关于奇异动物的故事，实际上描述的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巨猿，也就是来自非洲的黑猩猩与大猩猩和来自亚洲的猩猩。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动物历史》一书里提到“猿”、“猴子”和“狒狒”，但他描述的“猿”与早期解剖学家解剖的来自北非国家的短尾恒河猴为同类。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是系统考察现代人类、黑猩猩、大猩猩三者之间差异的首批研究者之一。在一篇题为“人与低等动物的关系”的短文里，他提出，现代人类、黑猩猩、大猩猩之间的解剖学差异不明显，而非洲猿与猩猩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这篇短文构成了他1863年出版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的核心内容。

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里采纳了上述证据。

他指出，非洲猿在形态上更接近于现代人类而非来自亚洲的唯一巨猿，所以现代人类的祖先更有可能被发现在非洲而不是其他地方。这一推论的重要影响就是，它引领许多研究者走进非洲，充满希望地寻找现代人类的祖先。正如在下一章要介绍的，那些认为猩猩与我们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的人，把东南亚地区看作是最有可能找到现代人类祖先的地方。

20世纪前半叶，生物化学和免疫学的发展使得对现代人类和猿类间关系本质的探索从传统形态学转向分子形态学。用蛋白质来确定灵长类的关系的最早尝试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这新一代分析方法的首批研究成果才公布。著名的美国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将该领域研究称为“分子人类学”。他在1963年发表的两份报告为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证据。另一个分子人类学先驱是埃米尔·祖克坎德尔（Emile Zuckerkandl），他描述了用酶从红细胞中将血红蛋白分解成多肽组分的过程；当用小电流分离它们的时候，现代人类、黑猩猩和大猩猩三者的多肽结构无法区别。另一位有开创性贡献的是莫里斯·古德曼（Morris Goodman），他毕生的时间都在从事分子人类学研究，他借用免疫学的技术研究了现代人类、猿类和猴子的血清蛋白（血清就是血液凝块后剩余的部分）。研究的结论是，现代人类和黑猩猩的血清蛋白的结构非常相像，难以区分。

蛋白质由一系列氨基酸组成。许多情况下，一种氨基酸可以被另一种氨基酸所替代，但并不会改变蛋白质的功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两名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化学家，文斯·萨利奇（Vince Sarich）和阿兰·威尔逊（Allan Wilson）对灵长类动物和人类进化非常感兴趣，为了确定生物的分子及其所属类群的演化历史，他们深入研究了蛋白质结构中的这些细微变异，也得出现代人类和非洲巨猿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结论。

基因组的意义

DNA分子化学结构的发现意味着生物体之间的亲缘关系可以在基因组层面上探讨。这可能不再需要依靠形态学来获取亲缘关系的信息，无论是传统解剖学还是蛋白质分子的形态都不再需要。研究人员现在可以通过比较DNA的异同来探讨生物间的亲缘关联。细胞内的DNA或位于细胞核内，称为核DNA，或位于细胞器中，称为线粒体DNA。在DNA测序中，每个动物的基本碱基序列是确定的，可以进行比较。

基因测序方法已成功地应用于现生类人猿的研究，并且研究的样本个体数量每年都在增加。目前，已测定了几组现代人的基因组和几组黑猩猩的基因组。核DNA和线粒体DNA的信息表明，现代人类与黑猩猩之间的亲缘关系非常近，且都与大猩猩较远。如果用古生物学目前获得的“最优”证据来标定这些差异，从而确定出猿和旧大陆的猴子分离的时间的话，假定DNA差异没有偏向性，那么我们可以预测，现代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在距今800万年—500万年间开始分化。按照原来较旧的标定法，这个分化时间可能更早些（大于1,000万年）。

解释人类化石记录的意义

最近，骨骼和牙齿的解剖学形态分析，以及软组织如肌肉和神经解剖学的形态分析，也都提供了与强有力的DNA证据一致的结论：即黑猩猩更接近现代人类，而与大猩猩关系相对较远。当然也有些人按照惯用的传统形态学来研究化石人类类群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现现代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特别密切的关系，从而认为黑猩猩与大猩猩可聚为一类。

对于研究人类类群之间关系的学者来说，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要么需要使用能够确定黑猩猩和现代人类有密切关系的头骨、颌骨、牙齿等信息，要么需要寻找其他形态学证据资料，例如肢体骨骼的形状信息，并研究这些数据是否能够揭示基因证据所支持的

现生高等灵长类之间关系。

表1　传统分类（A）和现代分类（B）；现代分类考虑了分子和基因的证据，黑猩猩更接近现代人类，而与大猩猩关系较远

A．人猿超科 Hominoidea（hominoids）

长臂猿科 **Hylobatidae（hylobatids）**
　长臂猿属 Genus *Hylobates*

猩猩科 **Pongidae（pongids）**
　猩猩属 Genus *Pongo*
　大猩猩属 Genus *Gorilla*
　黑猩猩属 Genus *Pan*

人科 **Hominidae（hominids）**
　南方古猿亚科 Genus Australopithecinae（australopithecines）
　　地猿属 Genus *Ardipithecus*
　　南方古猿属 Genus *Australopithecus*
　　肯尼亚人属 Genus *Kenyanthropus*
　　原初人属 Genus *Orrorin*
　　傍人属 Genus *Paranthropus*
　　撒海尔人属 Genus *Sahelanthropus*
　人亚科 Genus Homininae（hominines）
　　人属 Genus *Homo*

B．人猿超科 Hominoidea（hominoids）

长臂猿科 **Hylobatidae（hylobatids）**
　长臂猿属 Genus *Hylobates*

人科 **Hominidae**（**hominids**）

猩猩亚科 Ponginae（pongines）

猩猩属 Genus *Pongo*

大猩猩亚科 Gorillinae（gorillines）

大猩猩属 Genus *Gorilla*

人亚科 Homininae（hominines）

黑猩猩族 Panini（panins）

黑猩猩属 Genus *Pan*

人族 Hominini（hominins）

南方古猿亚族 Australopithecina（australopiths）

地猿 Genus *Ardipithecus*

南方古猿 Genus *Australopithecus*

肯尼亚人 Genus *Kenyanthropus*

原初人 Genus *Orrorin*

傍人 Genus *Paranthropus*

撒海尔人 Genus *Sahelanthropus*

人亚族 Hominina（hominans）

人属 Genus *Homo*

第三章

化石人类的发现及相关背景

正如在第1章指出的，人类是指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和在生命系统树的现代人分枝上或与该分枝相连分枝上的所有绝灭动物种。本章将讨论人类化石的组成、发现与如何研究等问题。

人类化石记录

化石是曾经存活的生物体遗存或遗迹。在人类有了埋葬仪式前，只有非常少的生物体能够以化石形式存留，早期人类化石也一样少。几乎可以完全肯定，保存下来的化石也无法准确反映原始生物群体的特征，下一章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一问题的影响。化石不总是但通常保存在岩石里，科学家分出两种主要类型。一是类别较小的遗迹化石，如第6章要讨论的在坦桑尼亚莱托里（Laetoli）发现的360万年前的脚印和化石粪便；二是类别较大的遗体化石，即常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化石，是动物体或植物体在死后的身体遗存。在人类化石记录里，遗体化石数量远远超出遗迹化石的数量，因此，人类化石通常指其遗体所形成的化石。动物化石通常由硬组织如骨骼和牙齿所形成的，因为硬组织比软组织如皮肤、肌肉或内脏等更不易被分解。软组织仅发现在较晚阶段的人类化石记录里，如在丹麦和欧洲其他一些地区发现的沼泽人。

石化过程

早期人类骨骼保存下来成为化石记录的几率非常小。人类的尸体最先可能会成为食肉动物，如现代狮子、豹子、猎豹的远祖的盘中餐，其次可能会遭到鬣狗、野狗和小猫科动物等陆生食腐动物的蚕食，再后可能会被猛禽、昆虫所消食，最后可能会被细菌消化干净。在令人惊异的两至三年短的时间内细菌就能把任何一个大型哺乳动物分解得几乎不留痕迹。

人类骨骼和牙齿等硬组织若要变成化石存留下来，死后的尸体需

要能被溪流挟带的泥沙、海滩上的沙粒，或被冲进山洞里的泥土迅速填埋。这样，未来可以形成化石的硬组织就不会被进一步分解，石化作用才能发生。骨骼的石化最先是周围沉积物中的化学物质替代硬组织里的有机质，接着是替代骨骼和牙齿里的无机质。这些替代过程可能需要进行许多年之后骨骼才能变成化石。化石实质上就是骨骼或牙齿形态的岩石。与此同时，化石周围的沉积物本身也被变成了岩石。牙齿是生命体的最坚硬和最耐久的器官，但同样会发生化学交代作用。

成岩作用是科学家用来描述骨骼和牙齿在石化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变化的词语。由于周围化学环境的小差别，不同地点的、甚至同一地点不同部位的化石所表现的石化程度都不尽相同。保存在坚硬岩石里的化石刚暴露出来时耐磨蚀，但遭受风吹雨淋一段时间后，这些骨骼化石就会变得像湿纸巾一样脆弱。碰到这种情况，研究人员就必须给脆骨里注入一些液体塑料或类似的物质以免化石碎裂。显然，人类对尸体的精心埋藏使得骨骼得以完好保存的几率大大提升，这也是距今6—7万年以来的人类化石保存相对好得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大多数人类化石发现于河床、湖滨或洞穴底部的沉积岩中。一般来说，老岩层位于新岩层的下部，因此，下部岩层里的化石的年代要比上部岩层里的久远，这就是地质学的叠覆原理。但是，由于挤压而引起的岩层的相对运动，如沿地壳断层发生的剪切作用等，会使这一通用法则变得不适用。洞穴内的沉积岩也容易经过更加复杂过程而发生层位的抬升。渗滤下来的地表水能够软化并溶蚀老的沉积物，产生似瑞士干酪上的孔洞，随后孔洞被晚期的沉积物充填，因此，洞穴中的新沉积物可能位于老沉积物下部。

地球科学家使用外观、质地和化学特性来描述岩石并给岩石分类。举例来说，他们把一个层位描述为“粉色凝灰岩”，而把另外一个类似层位描述为“泥质砂岩”。正像新物种命名有一些规则，一个新发现的地层序列的命名也有一些规则和惯例，即岩石也有一个类似林奈生物分类的分类体系。

埋藏化石的层位被称为化石的“母岩层”。在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

化石是被刻意埋藏时，可以推断人类化石的年龄与其母岩层的年代一致。发现化石的岩层被称为化石的原生层位。但是，大多数人类化石由于受到侵蚀而脱离原生层位，被称为“表面脱层化石”。若要找到脱层化石的原始层位，化石上仍附有的或包裹的一些原岩或母岩的存留物将是很好的线索，因此严谨的科学家从不把化石上的母岩附着物完全清理掉。

寻找人类化石

古人类学家从哪里能够找到早期的人类化石呢？早在19世纪，达尔文就认为，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黑猩猩和大猩猩主要生活在非洲，因而，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也可能生活在非洲。因此，在过去的75年里，特别是近50年来，非洲成为寻找人类起源的野外工作中心。当然，研究人员不可能搜遍非洲所有地区寻找人类化石。是否有某些特定的区域可能搜寻到人类化石呢？

古人类学家主要到可能存在人类化石的地层（如1,000万年的地层）中寻找因自然侵蚀而暴露出来的岩层。当大陆板块之间发生碰撞时，地壳就会弯曲并破裂，裂隙处继而发生侵蚀。主要裂隙或断层之间的区域向下沉降，同时，主断层外围的地壳向上抬升，这就形成了裂谷的谷底和谷壁。裂谷的边缘断层通常很深，以至于地球中心的液态物质会通过这些断层涌出。在非常大的压力下，地球的熔融核心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出，或者以熔岩流的形式慢慢溢出。火山喷发物通常由火山灰组成，含有丰富的钾和氩等化学物质。由这些火山灰层组成岩石称为凝灰岩。凝灰岩是测定许多东非古人类遗址时代的重要原始材料。凝灰岩还具有独特的化学形态或“指纹”，地质学家可以利用这一特征不仅在大范围的同一化石地点，也可在相隔数百公里的两个地点，追索到某一凝灰岩。

有时，热火山灰不是落在陆地上而是落在了水面，这种情况下会产生许多气泡并形成带有许多孔隙的火山浮石。人们会购买这类火山

浮石用于洗浴。

溪流与河流不断冲蚀断层处沉积物形成了峡谷，化石就暴露出来或被遗留在峡谷的两侧和谷底。这些地点被称为“暴露面”，化石出露的地方被称为化石地点。在东非，科学家主要到年代合适的岩层中寻找人类化石，这些地层因受到火山活动（构造运动）以及裂谷内和周边侵蚀的共同作用而暴露出来。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是非常有名的裂谷类地点的例子，构造运动和侵蚀作用正好使含有人类化石的岩层暴露了出来。

在南非，发现早期人类化石的地质环境非常不同。人类化石多被发现于石灰岩的岩洞里。石灰岩受雨水的冲蚀而形成许多裂缝，裂缝越变越大后就形成了孔洞，最后这些孔洞连接在一起就形成了岩洞，被冲蚀下来的地表土所充填。豹子经常利用生长在岩洞入口的树木隐藏猎物尸体，鬣狗使用洞口作为巢穴。科学家认为，非洲南部岩洞里发现的大多数人类化石是被豹子、鬣狗、或尸骨搜集动物如豪猪等带到那里的。

虽然非洲现在是寻找早期人类化石工作的中心，但在20世纪之前，这一工作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亚洲。欧洲是首批史前史学家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因此可以预料到，他们首先会利用本地的任何机会寻找人类的祖先，而后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异邦。就在1871年达尔文预言非洲会是人类的发祥地之后，著名的德国博物学家恩斯特·赫克尔（Ernst Haeckel）在1874年提出，当时的荷兰东印度地区（现在主要在印尼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存在唯一的非非洲巨猿——猩猩，因此这里才可能是人类的发祥地。在赫克尔对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发表的前两年，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在1872就在他的关于马来群岛自然史的书中详细记录了猩猩的形态和生活习性。

图3　C.　K.（鲍勃）·布莱恩通过图说明在南非斯瓦特克朗发现的洞穴人类化石遗址的复杂地层关系

赫克尔的逻辑推理和华莱士对猩猩的生动描述明显吸引了年轻的见习医生尤金·杜波伊斯（Eugene Dubois）的兴趣。他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转到荷兰东印度地区工作，以便在那里找到人类的化石。他最著名的发现是1891年在爪哇特里尼尔河岸边发现的一件带眉脊的脑颅，眉脊的形态与现代人类的大不相同。并非所有亚洲发现的人类远祖化石都是在河流冲蚀后的沉积物剖面上找到的，著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就发现于中国北京郊区周口店的一个山洞里。

团队协作

如今在乍得、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寻找人类化石的团队都需要有多学科的专家。除了古人类学家、地质学家、测年专家，以及能鉴定和解释与人类化石一起发现的动植物化石的古生物学家。一个多学科的学术团队还应该包括研究各种影响化石记录准确性的因素的专家，也应该包括能通过解释土壤的化学成分来重建古人类栖息环境的

地球科学家。团队成员需要到偏远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地方在当地雇工的帮助下寻找和挖掘化石，他们不能缺少水、食品和燃料的供应。团队的领队除了有科学素养之外，还必须有良好的组织技能。组织大型团队进入条件艰苦的非洲中部和东部化石地点的花费相当大，最大规模的团队年度预算高达数万美元。非洲南部的洞穴地点大多较方便前往，大部分地点从约翰内斯堡或从比勒陀利亚驱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这种便捷性使附近城市的科学家在大学和博物馆工作的同时，得以兼管遗址的研究。

重新发现的化石

有些人类化石的发现戏剧性地发生在博物馆里。从人类化石地点发现的“非人类”化石总是值得细查。即使是最优秀的古生物学家在梳理那些数以百计的骨头碎片时也可能错过一些发现机会。过去，一些重要的人类化石发现后有时要送到一些专家处进一步鉴定和评估，如果工作不足够仔细，这些标本也可能与其他动物化石混杂在一起或被错误地标定。例如，记录表明，莫斯特（Le Moustier）地点出土了一具尼安德特婴儿特别完整的骨架，后来被送到马塞林·布列（Marcellin Boule）那里作年代鉴定。但是，直到一研究者从莱塞济（Les Eyzies）的石器工具中发现了这个婴儿的一些骨片，这一完整骨架一度消失，踪迹全无。所幸的是，一些骨骼仍处于原始的环境中，并与流过莫斯特地点的维塞勒河（Vezere River）的岩样相一致。

人类化石年代的测定

地质学家通常能够在一个化石地点范围内确定出化石的年代序列，但是，如何比较相距数百公里的化石地点的时代，以及如何比较不同大陆上的化石地点的时代？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了解测年方

法。测年方法包括两类，即绝对测年和相对测年。绝对测年方法主要应用于发现人类化石的岩层的年代测定，或用于从相同层位发现的非灵长类化石的年代测定。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地保存化石和与其出土层位关联的证据。绝对测年方法依赖对自然进程如原子衰变所需时间的了解，或者能将化石层位与精确标定的全球性事件如地球磁场方向的反转相联系。这就是为什么绝对年代能够精确到日历上的某一天。绝对测年方法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放射性碳的测年，但只适合于人类演化的后期阶段的测年。当生物体死亡后的5730±40年，一半的碳-14就转化成为氮-14（这个时间长度被称作是“半衰期”）。放射性碳测年已成功用于测定发现在澳洲和欧洲的智人化石的年代。放射性碳测定范围不能超过4万年，超过这个时间的化石中因为剩余的放射性物质太少而无法精确地测量，数据就不可靠了。

大部分东非的人类化石地点，如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肯尼亚的库比福勒（Koobi Fora）和埃塞俄比亚的哈达（Hadar），都夹在火山灰或火山碎屑层中，火山灰层含有丰富的放射性元素——钾和氩。放射性钾和氩的衰变周期比碳-14长很多，因此，钾氩和氩氩测年方法可以用来测定距今超过10万年的含有化石和石器工具的岩层的年代。古地磁测年利用了复杂的地球的磁场的反向记录。在地球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磁场的方向曾经与现在正好截然相反。现代的方向被称为“正向”，与之相逆的方向为“反向”。地球的液态核的流动造成了地球磁场方向的转变。当悬浮微粒沉积形成硬沉积岩之前，微粒中的每个微量磁性金属元素都像一块磁铁。这些微粒沉积之后沿当时的地球磁场方向排列，使岩石整体具有可测量的磁向或磁极。研究者把保存在含人类化石的沉积物中的磁场方向变化序列与深海岩芯的磁性记录（古地磁柱）相比较，并试图找到最匹配的序列。一些序列可能在被参照的古地磁柱上会出现不止一次，因此，若能使用另一种绝对年代测定方法将有助于研究人员寻找到要着重比较的古地磁记录片段。一个相对长的古地磁稳定时期被称为“极性时”，在某一极性时中一个相对短暂的磁场变化时期被称为“亚时”。奥杜威峡谷是应用地磁地层学测定年代的第一个早期人类遗

址，对亚时进行了命名但没有编号，其中一个亚时被称为“奥杜威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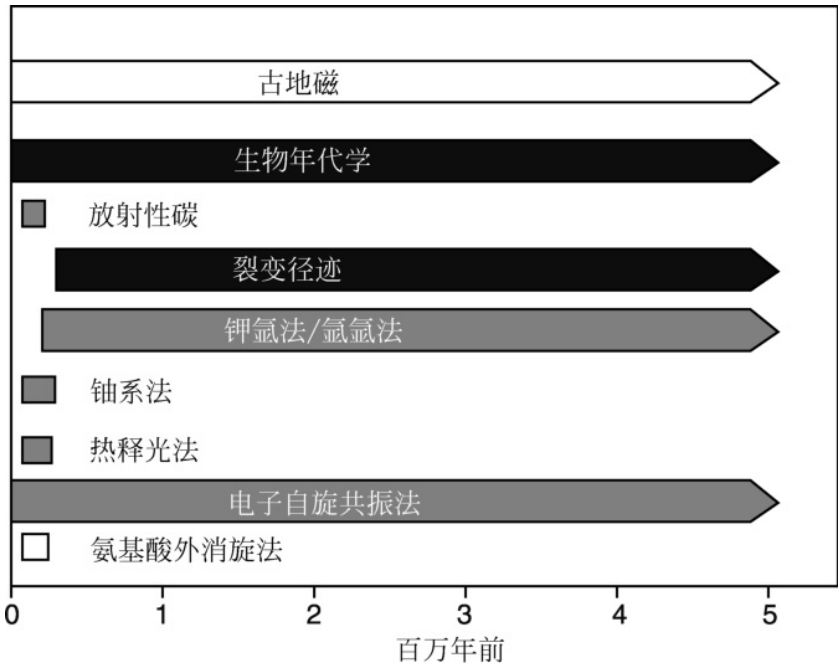

图4　古人类化石的一些测年方法及其覆盖的年代范围

另一组绝对测年方法被称为氨基酸消旋法，利用生化反应作为时钟。例如，蛋壳含有的氨基酸被称为亮氨酸；当蛋壳最初形成时所有的亮氨酸为L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L型就以较为稳定的速率转变或外消旋成D型。这样，两种形式的比率加上转化率就提供了蛋壳形成的时间。许多较晚的非洲人类化石遗址中含有鸵鸟蛋壳碎片，假设文化层中包含的蛋壳与人类化石具有相同的地质年龄，则鸵鸟蛋壳（OES）测年法将很有助益。鸵鸟蛋壳测年法被用来测定在放射性碳和钾氩法所测年代范围之间的人类化石地点。其他方法还有电子自旋共振法（ESR）和铀系法（USD），这类测年方法测定距今30万到4万年间的遗址特别有用。

相对测年方法多依赖于对动物化石的对比。两遗址动物化石相

同，则一遗址可以根据另一个有可靠的绝对年龄的遗址来确定年代。如果发现在A地点的动物化石与发现在B地点的相似，则可以假定A地点与B地点的年代大致相同。与绝对测年相比，相对测年只是提供了化石的大致年代。利用动物遗存测年被称为生物年代学，曾经对测定非洲南部洞穴遗址中早期人类化石的年代尤为重要。这些地点几乎都出土了羚羊和猴子的化石。因为在东非的主要遗址相同的动物化石都进行了绝对年龄测定，所以研究者能够将这些年代数据应用到非洲南部洞穴遗址含有同样化石的层位。生物年代学也被应用于确定乍得的人类遗址和格鲁吉亚的德曼尼西遗址的年代。

树木年代学是依据树木的年轮来测定相对年代的科学，已被用于提高碳-14测年的精确性。树木的年轮非常可靠，被用来对碳-14所测年代进行校准，近代人类活动引起了大气中碳同位素水平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了碳测年的准确性。

重建古环境

正如地球表面的轮廓与几百万年前的不同，一个地区过去的环境并不一定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一致。研究人员利用地质和古生物的证据可重建过去的环境。化学分析能分辨出土壤最初是处于潮湿还是干燥环境。古生物学家依据与人类化石共生的动物化石的种类能够判断出古生物栖息地的众多情况。他们利用大型哺乳动物和小型哺乳动物（如小鼠和沙鼠）化石能够重现当时的环境。小型哺乳动物化石特别有价值，相对大型哺乳动物而言，它们活动的地域范围较有限，因此可能提供更精确的重建信息。含猫头鹰粪便的化石是了解小哺乳动物的一个很好的信息源，因为猫头鹰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捕食小型哺乳动物。研究人员利用大型哺乳动物，如灵长类动物，重构过去环境时则需十分谨慎，不能假定化石灵长类在选择生活环境时的偏好与现代灵长类相同。举例来说，虽然现代疣猴以食树叶为主，生活在茂密的林地，但它们的祖先生活在更空旷的环境，所以在5百万年前的

遗址发现疣猴与发现现代疣猴的意义并不相同。

全球气候变化

人类进化发生在全球气候出现最显著变化的时期。研究人员通过观察深海岩芯来研究气候的变化。微生物有孔虫在世界大洋各处漂浮。这些有孔虫吸取海水中两种形式的氧同位素，一种是较轻的氧-16，另一种是较重的氧-18。当全球气温升高时，更多的轻型氧就会挥发掉，这样，轻氧与重氧的比率就会降低；当全球气温降低时，情况正好相反。因此，研究人员利用两种氧同位素的比率跟踪海洋的温度，利用海洋水温作为全球气候的标尺。然而，一个地区的气候是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除了全球气候影响，还受到当地环境因素如纬度、海拔、山脉等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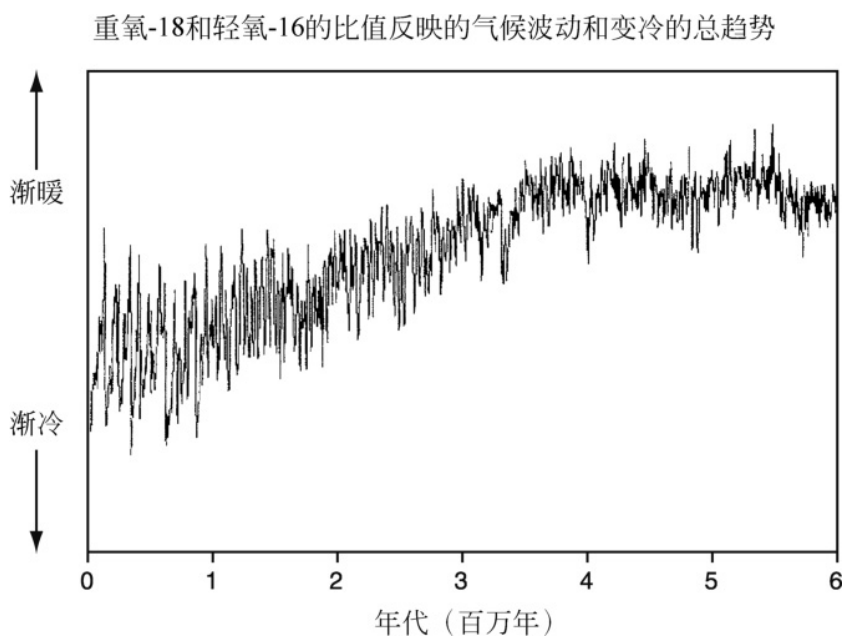

图5　过去6百万年间氧同位素水平波动情况，表明3百万年以来全球气候显示出总的变冷趋势。

在距今8百万年到5百万年之间，地球气候开始了长期干燥和寒冷的趋势。非洲早期人类进化就发生在这一气候变化阶段，在第5章将进一步讨论这一气候变化对人类起源可能产生的影响。

深海岩芯的记录表明，在人类进化的稍晚阶段全球气候在长期变冷的趋势下发生着周期性波动。在距今3百万年前，全球气候以23千年为周期发生着干热与冷湿的交替。大约距今3百万年时，周期变为41千年；距今1百万年时，又转变为以100千年为周期波动。这些100千年周期包含非常寒冷的时期，解释了在过去的几百万年中在北半球有明显记录的极寒时期。这些长周期的气候变化对人类进化也有很大影响，南北两极的冰盖扩大必然引起海平面的下降，使很多大陆架暴露出来。如此大规模的海平面下降也使得现代人类的祖先能够从旧大陆迁徙到了澳洲大陆和新大陆。

第四章
化石人类的分析与解译

古人类学家使用多种方法来探究新发现化石的科学意义。他们把人类化石归入到特定的、可再分类的类群，探明了它们与其他化石和现生类群的关系并重构化石人类的生活习性。

分类与分类法

西方科学界采用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在1758年创立的分类体系来给生物分类。种是这一体系的基本单位，由一群形态相似、相互能持续繁殖后代的动物组成。单一动物个体都可归入一个物种，相似物种构成一个“属”，相似的属构成“族”，相似的族构成“科”，依次向上类推到“界”。现代人、智人都属于智人种，直立人属，人族。

“命名法”是分类学的一个分支，专门规定怎样用林奈分类体系给生物命名。命名是有一套规范的编码，科学家给一个新发现的物种命名都要遵守这一编码。这一编码规定了新种或新属的名称规则。商业产品的名称被禁止采用，例如，不允许使用Burgerking（汉堡王）ipodensis作为新人种的双名制名称。“双名制”确保现有的分类不被新分类所取代，可以避免产生混淆。

研究者确定出一个新物种时，需要选择一件化石作为这个种的“模式”标本。通常的选择是最初发现的一件保存相对完好的化石标本，而这件标本无须是这个种类中最典型的成员。模式标本的重要性在于它承载着不可改变的分类单元名称。因此，举例来说，如果尼安德特人的模式标本被发现不同于其他所有的尼安德特人标本，那么，就需要给其他标本另外一个新的种名。尼安德特人的名称不能脱离它的模式标本，模式标本的名称不能再变化。如果研究者最终决定应给予某一标本一新种名，那么这件标本就是一个新种的代表。命名法有优先命名的规则，即如果两件模式标本被发现是同一个种，那么种名只能沿用先命名的那件标本名。

就像“种”是一个类群，在林奈体系中所有类别都是类群；而研究者描述某“类群”时，他们通常指的是一个“物种”。描述“物种”在等级

的包容性越来越强（即物种的群体越来越大）的体系中是如何排列的科学被称为“分类学”，即字面上的“分类体系”。分类分析是确定人类化石应该被置于哪个分类单元的过程。首先，研究者必须确定新发现的化石是否属于一个现有的人类类群。只有当他们确信它不能被归入到一个现有的物种时，才考虑给这个新物种确定一个新种名。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所有林奈的分类阶元，因此，如果确信新物种不能被现有人类的属所容纳时，研究者应当另外建立一个新属，依此逐渐向上类推。

下面介绍的分类学分析方法与其他方法都是基于对一件化石形态的详细评估。化石的形态包括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形态可以是肉眼看到的、整体的大结构，也可以是微观的、需要在各类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小结构。研究人员不仅对化石的大小和形状作了详细的定性分析，而且也试图提取标本的测量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定量描述的最简单的形式是测量化石上两个解剖标志间的距离，即线性测量。目前，研究者借用医学影像的激光束和其他技术，能够比过去更准确地提取到化石外部形态的和内部的细微结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古人类学家格伦·康罗伊（Glenn Conroy）和医学影像学专家查尔斯·维尼尔（Charles Vannier），率先使用电脑断层成像（CT扫描）研究了出自非洲南部汤恩（Taung）的一件化石人类颅骨的内部结构。随后，乌得勒支大学的医学影像学专家弗朗斯·宗尼维尔德（Frans Zonneveld）和伦敦大学古人类学家弗雷德·斯普尔（Fred Spoor）改进了这些方法，他们现在能够提供内耳的结构信息。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数据确定人类化石的种类，重建其体态和听觉。

研究者必须确保化石的测量能够准确反映出骨骼或牙齿在形成石化前的大小和形状。如果每天暴露于热和冷交替环境一段时间，骨骼和牙齿就会产生裂缝。岩石碎屑进入到裂缝里，就增大了骨骼或牙齿的尺寸。同样，如果一件化石骨骼在石化前后若裸露于地面干燥和多风的环境下，风挟带着沙粒会产生“喷沙”效应，从而会去除皮层质骨的部分外皮层。这样的侵蚀作用就会使骨骼化石的尺寸变小。一件新发现的化石的测量数据和非测量性状可与现有的化石类群进行相似度

比较。亲缘关系相近的现生动物（如人科中的现代人类与非洲猿）通常被用来作为模型，以帮助决定在一新化石种类中可以允许有多少变化。纽约大学研究灵长类的专家克里夫·朱利（Cliff Jolly），花了30年时间研究不同狒狒群之间的分界；他认为，狒狒和其近亲在某些方面是研究人类进化更好的参照样本。他同时指出，狒狒不仅比黑猩猩和大猩猩分布广泛，而且在近期的进化史中的模式和时机方面都与人类的相似。

化石碎片的复原

几百万年的人类化石很少能处于完好的状态。头骨和面骨尤为脆弱，容易受到有蹄动物的践踏或洞顶落下的岩石挤压而破碎，有时剩下的只是颅骨的一小块碎片。在少数情况下，也许会发现多块碎片；但如果这些碎片太小，复原就是一个挑战。拼合工作就像完成一个有许多天空插片但没有云彩的三维拼图，而且也没有图画可参照。一种选择是竭尽全力地手工拼合它们，但即使是熟悉头骨每一个细节的专业解剖学家也要花费数百个小时。

苏黎世人类学研究所的玛西娅·庞塞·德·李昂（Marcia Ponce de León）和克里斯托福·朱里库佛（Christoph Zollikofer）都是新兴研究领域——“虚拟人类学”——的专家。他们利用计算机的优势和软件设计的进步发明了一种替代手工复原人类化石的方法。化石经过激光扫描，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出一个“虚拟”的化石形态。研究者可以沿任何方向移动和旋转每一件碎片，以找到相对应的部分。该软件还可通过镜像成像根据一侧颅骨信息获得另一侧缺失的对称部分的图像。朱里库佛和李昂最近已经使用这一方法虚拟重建了可能属于早期人类的撒海尔人乍得种的颅骨。同类软件与CT扫描一起使用可清楚地看到隐藏在颅骨深处的结构如上颌窦、内耳的骨管或牙根等。

年龄和性别的鉴定

即使有完整或者接近完整的骨架，确定人类化石遗存的性别和发育年龄仍然可能相当困难。当这些遗存都是很小的颅骨碎片时，鉴定的难度就更加大。化石个体停止生长的年龄比较难精确确定。牙齿的发育程度可以帮助确定未成熟个体的年龄；一旦所有的牙齿都萌出，牙根形成，就不能用牙齿确定其年龄了。

骨头和牙齿的大小与形状，肌肉留下的深浅痕迹以及骨盆的大小和形状（虽然骨盆碎片在人类化石中非常稀少）是确定化石个体性别常用的方法。基本假设是，因为许多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雄性的体格基本都大于雌性，那么，在早期人类中，男性的体格也同样应大于女性。这是性别二态性的一个方面，二态性指与性别有关的个体间的所有差异。然而，当你处理一个包含信息量很少的化石记录时，个体的大小并不总是性别判定的可靠标尺。

如果把现代人类的性别二态性简单推演至早期人类身上，就会增加研究的复杂性。例如，在现代人类中，许多骨盆的性别二态性的出现是两种需求折中的结果，即要满足两足直立行走的需要，也要满足生育大脑袋婴儿要有较宽骨盆的需要。但是，相同的二态性未必适用于小脑袋的早期人类，他们与现代人类两足直立行走的方式不同，早期人类的骨盆的性别二态性可能会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模式。

种及其鉴定方法

生物物种概念是最广泛使用的对物种的科学定义，由哈佛大学已故杰出的进化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提出。生物种是指“与其他群体在繁殖方面相隔离的一个自然群体”。当你有机会观察现生动物并了解其交配情况，就很容易对生物种加以区分。但是，这种方法显然不能用于鉴定化石种。不过，因为相同种的成员之间才能够交配繁殖，异种之间不能交配繁殖，所以同种之间的相似性比异种之间更为密切。这样，在缺少交配习性信息时，我们可以通过化石的外观、结构和基因组成（如有DNA保存）来确定化石的种类。

然而，要用这些方法来确定化石的种类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发现的人类化石中并没有完整的生物躯体。我们习惯把生物体的组成分为两类，一类是软组织，如肌肉、神经、动脉等；一类是硬组织，如骨骼和牙齿。人类远祖化石仅限于硬组织的遗迹，而且许多都是骨头和牙齿的碎片，因此问题是，当仅发现了几块磨损的牙齿或一块颚骨或部分股骨时，古人类学家如何鉴定这些化石的种类。

第二是时间问题。每个物种都有一段生命史，即有一个形成、生长和消亡的过程。物种要么灭绝而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后裔，要么成为一个或多个新“继承种”的共同祖先。化石哺乳动物的种一般能延续到1至2百万年。经历这么悠久的历史，物种的外形不可能保持不变。偶然的变异和气候变化引起的形态改变都将引起物种的改变。但只要种的个体仅与同种的个体交配繁殖，则该种还能保持它的独特性。即使科学家花费一生的时间观察一个现存物种，也只能是这一物种自存在以来的一个瞬间。因此，在博物馆藏品中看到的，百年来采集的现代种的骨架并不是一个模式种，你无法参照它来鉴定一份采集于数十万年前的遗址中的化石样品。

此处用长跑比赛来比喻很恰当。一件化石就像长跑比赛中的一张静止的画面。长期存在的物种可能在其历史中被数次取样。古人类学家需要找出办法鉴别他们观察的是同一赛跑中的几张照片，还是几个不同比赛的照片。在研究人类进化时这意味着应先观察现代人类和高等灵长类动物的骨骼，然后参考这些现生类群的形体大小和形状的变量来推定在单一物种化石中应容许多大的变异。如果变异少于现生类群，那么，有充分的理由来断定，在这批化石中代表的是一个种。对于涉及时间跨度大的化石标本，古人类学家在宣布其变异太大而不能包含于一个单一物种之前，会试图对化石样本中可能的变异数量进行有根据地预测，但要声明，这仅仅只是一种预测。

要确定在早期人类化石中有多少个种则更加困难，因为人类包括化石人类的生物学变异持续存在。因此，化石类群的分界往往是科学推断和争鸣的结果，新化石的发现或新分析方法的引入往往意味着须

重新分类，或须重新考虑原有分类和标准的适用性。只有当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化石种不属于现有的物种时，那就应该建立一个新种。而要建立一个新属，则需要有更强有力的证据。

物种的形成

一些研究者认为新种是整个种群逐渐演变的结果；这种理论被称为“种系渐变”，相应的物种形成模式被称为“进化”。另一部分人认为，物种的形成是一些生物亚群体由于地理上的隔离而在进化过程中发生突变的结果；这种解释被称为“间断平衡进化”。在后一种解释中，突变之间的长间隔期中形态演化应没有持续的趋势，只是形态学上的“随机”波动；物种形成的这一模式被称为“分支演化”；“静态平衡”一词用来描述物种形成过程中的形态的稳定时期。几乎所有研究者现在都接受，进化过程中的大部分的形态变化都发生在物种的形成时期。

在某些情况下，物种的形成可能是由于染色体的重排而引起的基因型的大规模变化。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高等灵长类物种形成的潜在机制。

种的形成与种多样化密集期被称为“适应性辐射”，往往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开拓新环境的机会，或因为其他种群的灭绝意味着适应性机会在现有的环境中成为可能。在类似阶段一些族系往往比其他族系能产生更多的物种，因此，具有较高的“物种丰富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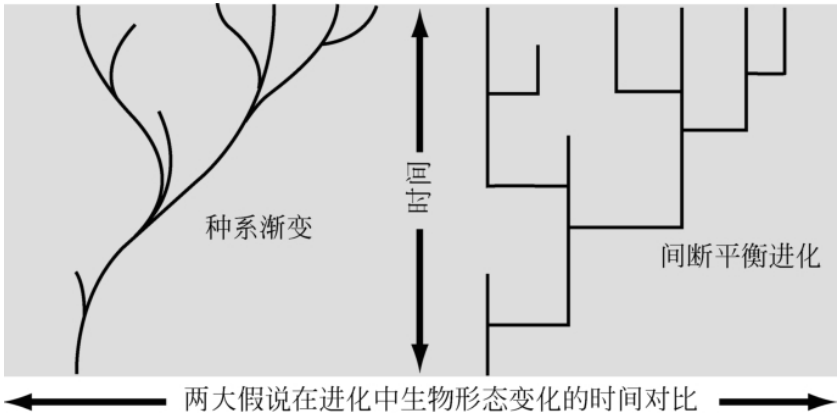

图6 “种系渐变”（左）和“间断平衡进化”（右）两大假说关于进化中生物形态变化的时间对比

所有物种，包括现代人类，最终都将灭绝。不确定的是，灭绝是由物种内在的特性决定的，还是由物种外在的因素如环境的改变决定的，或内外两种因素兼而有之。这些竞争性假说的验证可以通过在实验室里改变果蝇等迅速进化的生物体的环境条件，或观察生物的发育情况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把化石与过去气候变化的直接证据相比较来实现。

主分派和主合派

本书使用的分类法倾向于分出相对多的人种，并非所有研究者都赞成分出如此多人种。赞成分出多个人种的学者被称为“主分派”，相反，中意于综合人种的学者被称为“主合派”。两组科学家研究同样的证据，只是各自的解释不同而已。古人类学家对化石人种数量认定的不同源于他们对化石变异解释的差异。强调化石记录连续性的学者一般“主合”，而强调化石记录非连续特点的学者一般“主分”，但说来说去，所有的分类法都是基于假设。如果一些科学家用一种分类法研究了某件标本，其他科学家也能够以不同的分类法重新研究这件标本，只要各自能清晰地把标本归入他们认定的分类体系。

表2　主分派和主合派对化石人类分类假说的对比

群　体	主分派分类法	年　代（距今百万年）	模式标本	化石主要产地
可能的最早人类	撒海尔人乍得种	7.0—6.0	T M 2 6 6 – 0 1 – 060–1	乍得：托罗斯 – 米那拉
	原初人图根种	6.0	BAR1000’00	肯尼亚：卢凯诺
	地猿始祖种	5.7—4.3	ARA–VP–6/1	埃塞俄比亚：戈纳和中阿瓦什
	地猿始祖种祖亚种	5.8—5.2	ALA–VP–2/10	埃塞俄比亚：中阿瓦什
早期猿人和过渡猿人	南方古猿湖畔种	4.2—3.9	KNM–KP29281	肯尼亚：阿利亚湾和卡纳波依
	南方古猿阿法种	4.0—3.0	LH4	埃塞俄比亚：博罗德里、迪吉卡、斐热、哈达、玛卡和白沙；肯尼亚：阿利亚湾、塔巴林和西图尔卡纳
	肯尼亚平脸人	3.5—3.3	KNM–WT40000	肯尼亚：西图尔卡纳
	南方古猿羚羊河种	3.5—3.0	KT12/H	乍得：羚羊河地区
	南方古猿非洲种	3.0—2.4	Taung 1	南非：格莱蒂斯威尔、马卡潘斯盖 [Mb 3 和 4]、斯泰克方丹 [Mb 4]、汤恩
	南方古猿惊奇种	2.5	BOU–VP–12/130	埃塞俄比亚：博日
	傍人埃塞俄比亚种	2.5–2.3	Omo 18.18	埃塞俄比亚：奥莫的舜古拉组；肯尼亚：西图尔卡纳

续表

群　体	主分派分类法	年　代（距今百万年）	模式标本	化石主要产地
	傍人包氏种	2.3–1.3	OH 5	埃塞俄比亚：奥莫的舜古拉组；肯尼亚：切苏旺加、库比福勒、西图尔卡纳；马拉维：莫勒马；坦桑尼亚：奥杜威和佩宁伊（纳塔隆）
晚期猿人	傍人粗壮种	2.0–1.5	TM 1517	南非：库博斯、德里莫兰，贡多林、克罗姆德拉 [Mb 3] 和斯瓦特克朗斯 [Mbs 1，2 和 3]
	能人	2.4–1.6	OH 7	埃塞俄比亚：奥莫的舜古拉组；肯尼亚：库比福勒；南非：？斯泰克方丹和？斯瓦特克朗斯；坦桑尼亚：奥杜威
	鲁道夫人	2.4–1.6	KNM–ER 1470	肯尼亚：库比福勒；马拉维：乌拉哈
	匠人	1.9–1.5	KNM–ER 992	格鲁吉亚：？德马尼西；肯尼亚：库比福勒和西图尔卡纳
	直立人	1.8–0.2	Trinil 2	旧大陆的许多地点，如：埃塞俄比亚：玛卡龚杜雷；中国：周口店；印度尼西亚：桑邦马坎、桑义兰和特里尼尔；坦桑尼亚：奥杜威
	弗洛里斯人	0.095–0.018	LB1	印度尼西亚：梁布亚、弗洛雷斯
	先驱人	0.7–0.5	ATD6–5	（西班牙）阿塔普尔卡；格兰多利纳
	海德堡人	0.6–0.1	Mauer 1	非洲和欧洲的许多地点，如德国：茂尔；英国：博克斯格罗夫；赞比亚：卡布韦
	尼安德特人	0.2–0.03	Neancierthal 1	欧洲的许多地点，近东和亚洲
现代人	智人	0.2– 今	未指明	旧大陆的许多地点和新大陆的一些地点

（续表2）

群　体	主合派分类	年　代 （距今百万年）	归并的主分派分类
可能的最早人类	地猿始祖种	7.0—4.5	地猿始祖种，地猿始祖种族祖亚种，撒海尔人乍得种，图根原初人
早期猿人和过渡猿人	南方古猿阿法种	4.2—3.0	南方古猿阿法种，南方古猿湖畔种，南方古猿羚羊河种，肯尼亚平脸人
	南方古猿非洲种	3.0—2.4	南方古猿非洲种
	傍人包氏种	2.5—1.3	傍人包氏种，傍人包氏种，南方古猿惊奇种
	傍人粗壮种	2.0—1.5	傍人粗壮种
晚期猿人	能人	2.4—1.6	能人，鲁道夫人
	直立人	1.9—0.018	直立人，匠人，弗洛里斯人
现代人	智人	0.7—今	智人，先驱者，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

支序分类分析

新发现的化石一旦归入一个类群之后，研究者就会进行下一步，应用支序分类学推导这个化石人类与现代人类以及其他化石人类类群间的关系。

“进化支”包含拥有同源祖先的所有生物体。最小进化支只由两个类群组成；最大的进化支包括所有现生的有机体。支序分类分析根据共同的形态性状数量来划分类群，但形态性状需要具有一定独特性。为了更好地了解两个种之间的亲缘关系，所选的形态性状必须是两个或多个类群的共有特征，但也能要反映出类群内的差别，以便能再划分出次一级的组群或较小的分支。举例来说，所有高等灵长类都具有哺乳动物的一些特征，如拥有乳头和温血，但对厘清巨猿间的关系并无助益。另一方面，只在一个类群所具有的形态性状，也不能用来确定与其他类群间的亲缘关系。

两个类群若共有某特定的形态性状则被称为姊妹群。这对姊妹群本身又有自己的姊妹群（例如，大猩猩是黑猩猩和直立人分支的姊妹群等。）表述上述分支关系的图叫“分支图”。这一姊妹群关系也可以用套括号表示，例如，（（（人属，黑猩猩属）大猩猩属）猩猩属）。

支序分类分析先假设，如果两个类群有共同的形态性状，那么它

们都是继承于前一个共同祖先。这个假设往往论据充分，但也有例外。我们知道，灵长类动物包括高等灵长类经历了趋同进化，不同谱系能各自独立演变出类似的形态。趋同是指在两个物种上出现类似的形态性状，但这一性状不是源于前一个共同祖先，即非同源相似。举例来说，厚牙釉质性状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很可能不止一次出现，于是成为人类分支中的一个趋同现象。

化石DNA

分类分析的最新形式是依靠提取和分析DNA（脱氧核糖核酸）来找出人类类群之间的相关性。在一个家庭中，亲缘关系密切的个体如兄弟姐妹具有比亲缘关系远的如堂兄弟更多相同的DNA。类群也是如此，同一类群的个体间比不同类群的个体间平均拥有更多相同的DNA。然而，尽管DNA在我们生命中具有重要性，石化会很快降解核酸。比如，5万年后只有少量的DNA存留下来，而且剩下的只是DNA片段。德国莱比锡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学家施温提·柏保（Svante Pääbo），率领他的研究小组首先从人类化石中发现了DNA，在本书第7章介绍尼安德特人时将讨论化石DNA证据的作用。做化石DNA分析的研究者，要特别注意防止和发现其所受的污染。当人们处理化石时，难免会在化石上留下头发和皮肤细胞等潜在的污染源。科学家们必须确保，他们观测的DNA来自人类化石而不是其他途径。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在一件洞熊化石上检测到了20多个不同的现代人类DNA序列。大多数人类化石都被几十甚至几百人接触过，尤其是许多年前发现的化石，因此，在一件现代人类化石中分离出属于化石本身DNA序列的工作会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等级划分

“趋同现象”使按进化支划分早期人类变得复杂。一种替代方案是

把人类类群分成等级。一个等级就是基于动物行为本身而不是它的系统发育关系的分类阶元。举例来说，越野车相当于一个等级，而包括越野车在内的所有由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相当于一个进化支。等级可以是进化支，但并不一定如此。举例来说，食叶猴属于一个等级，但不是一个进化支，因为旧大陆的食叶猴和新大陆的食叶猴都是各自大陆更大猴类进化支的成员。一个进化支必须包含一个共同祖先的所有后裔，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古人类学家更可能就分级而非分支达成一致，但决定系统树分支模式的问题必须探索，即使结果仍有争议。在随后的章节，本书将探讨一些争论的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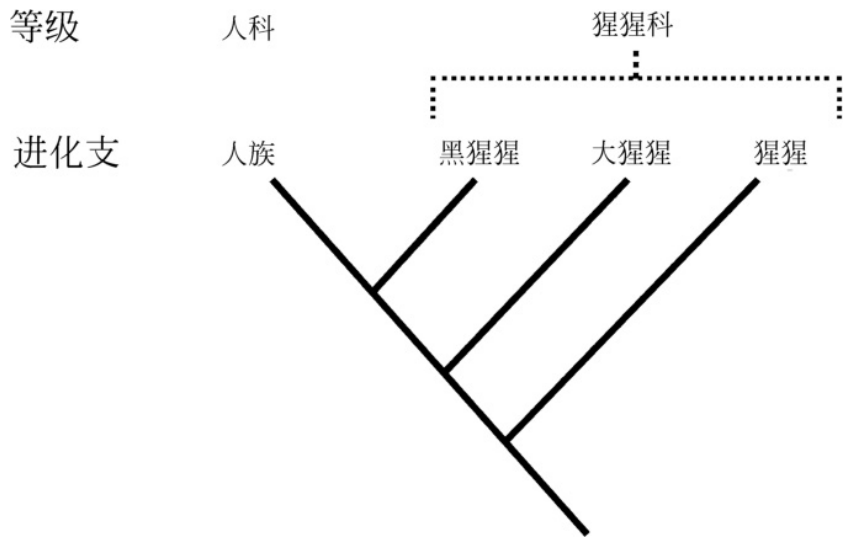

图7　现生高等灵长类分支和对应等级的比较

功能和行为形态学

除了分析化石在进化支图中的位置和种系发育关系之外，古人类学家还利用化石了解人种的适应特点。他们设法重建同一类群的个体的生活方式，然后把这些信息与生活环境证据整合并得出这一物种如何适应环境的假说。与期望了解现生动物一样，研究者也要努力更多

了解灭绝动物的生活。它们吃什么？怎样活动？是群体生活，还是独自生活？古人类学家试图通过功能或行为形态学的研究来解答这些问题。

功能形态学是指观察骨骼或牙齿并推测其最擅长且最经常使用的功能。例如，经常在树上攀爬的动物的指骨就需很弯曲，因此动物的指骨弯曲就表明攀爬是其活动的一部分。指关节的形状和手指的长度也都能提供早期人类抓握物体强度的线索。要抓住锤子，需要有力的抓握。同样，使用锋利石制小工具须精确的抓握以及上臂、前臂和手部肌肉的交替配合。类似地，身体全部重量由后肢承担的动物，其大腿骨的形状就与体重由四肢共同承担的动物的完全不同。

功能形态学也有助于重建早期人类的食谱。牙齿的形状反映了所吃食物的类型。齿冠大、齿尖低而圆且覆盖有厚层釉质的牙齿，反映出饮食可能包含坚硬食物，或食物被包裹在某种坚硬外壳如坚果的壳里，需要破壳才能食用。科学家使用显微镜能够观察到肉眼无法看到的牙齿上的微痕。生长在地下的食物如植物块茎含有大量的沙砾，而这会在牙釉质的表面留下许多凹槽。有时牙齿被践踏或受到风沙中硬沙粒的撞击也会有擦痕，但这类的损伤不仅仅在牙齿的咬合面上，也会在牙齿的侧面出现。当通过食物遗留的微痕证据来找寻早期人类的饮食线索时，研究者必须确保没有把动物死亡后产生的微痕与动物存活期间留下的微痕相混淆。

人类食物种类的直接证据来自于稳定同位素分析。这种分析方法首先是测量化石骨骼或牙齿里的氧、氮和碳同位素含量，然后，把化石的食谱模型与已知的现生动物的食谱进行对比。例如，叶食动物有别于草食动物，也有别于主要食肉类动物。布拉德福德大学考古学系的同位素化学家朱莉亚和她的同事利用这种方法证明，发现于斯瓦特克朗斯的距今1.5百万年的傍人化石有稳定的同位素模型，属食肉类型。这一结果引发了研究者对早期认为其以素食为主的观点进行重新思考。

人类化石记录的偏缺

几十年来，古人类学家采集了数千件的人类化石，其时代可追溯到六至七百万年前。虽然这个数字听起来令人振奋，但大多数都集中在人类进化的后一阶段。除了时代偏缺，人类化石记录还存在其他偏向性和薄弱环节。发现并设法弥补这些偏缺的工作是埋藏学的重要课题。骨骼中一些最硬的部分如牙齿和下颌骨被发现的较多，而颅下的脊柱及四肢，尤其是脊椎、手和脚的标本都发现的较少而且保存得不好。骨骼不同部分的相对耐久性（例如，下颌骨普遍较重，且骨密度比椎骨高）可以解释为何身体各部分保存情况不同。较轻的骨头如椎骨很可能在倾盆大雨之后被洪水席卷到湖里，与鱼和鳄鱼的骨骼化石混杂在一起。相比之下，较重的骨骼如头骨和颌骨会沉落到溪流或河流底部的石头缝隙里，与其他陆生动物的重骨骼一起保存在河流的沉积物里。

造成保存状况差异的另一个因素是，许多人类的尸体成为了食肉动物的美餐。豹子喜欢咀嚼猴子的手和足，如果灭绝的大型食肉类动物有类似的偏好，那么人类身体的这些部分就会很少变成为化石。因此，我们掌握的牙齿演化知识要比掌握的手和脚演化知识多。体型大小对类群是否可能形成化石也有很大的影响。大体型类群比小体型类群更容易形成化石；同样，在一个类群中，大个体比小个体成为化石的可能性更大。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偏缺现象同样存在于人类化石中。

某些环境更利于形成化石，也更容易发现化石。因此我们不能说，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地方的化石多就意味着出现在那个时候或那个地方的人类个体就多。只是那个时期或那个地点的环境可能比其他时期或地点更有利于化石的形成。同样，某一特定时间或地点缺少人类化石并不能表示那时那地缺少人类。正如俗话所说，没有证据并不表示不存在证据。类似的逻辑表明，某些类群在其最早化石记录之前可能已经存在，也可能存活超过了化石记录的时代。因此，某类群化石人的最早出现记录（FAD）与最晚出现记录（LAD）可能是对这个

类群起源与灭绝时间的有保留的说法。

同样的保留态度也适用于对化石地点地理分布的描述。几乎可以肯定，人类生活的地方远比发现的化石地点要多。古老的环境往往不同于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在我们认为不宜生存的一些地方在远古时期未必如此；反之亦然。

最后，并非所有的环境有利于保存骨骼和牙齿。骨骼和牙齿也很少能在强酸性的土壤环境里存留。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在古森林环境中不会找到人类化石，因为那里的腐殖酸水平很高，但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有些地点，考古学家曾期望可以发现石制工具和骨骼一起，而他们只发现了石制工具，骨骼和牙齿在形成化石之前已被分解了。

第五章
可能的最早人类

在8百万年前，非洲大部分地区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其间散布着河流和湖泊，大部分灵长类动物生活在树上。在距今8百万年至5百万年间，地球经历了一段长时期的干燥和寒冷气候。气候干燥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地球水分冻结在了冰原上；而且冰原逐渐由两极向四周扩展。全球气温普遍下降，甚至在高纬度的非洲地区，白天变得很凉爽，夜晚变得很寒冷。

人类正是于这一气候变化时期开始了在非洲的演化。由于气候越来越干燥，茂密的森林逐步被开阔的林地所替代，片片草原出现在大片林地之间。我们可能认为适应现代非洲大草原的食草动物如羚羊和斑马长期以来就一直生存在那儿。而事实上，这些食草动物和所居住的热带草原只是近期才出现。现代人类和现生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可能就生活在这里的密林中，它们的一些子孙随着森林变得稀疏而开始适应广阔的地面生活。

在可能是最早的人类化石地点发现的其他动物化石和化学证据表明，这曾是一个多元的居住地，有林地、草地、湖泊和沿河的森林长廊等各种生态环境。目前还没有早期人类化石发现于单一的、茂密的森林环境。这表明，如果这些化石确实属于早期人类，那么，它们应该能够适应树居和地面两种生活方式。树林将提供水果、筑巢地点和天然保护，而不被食肉动物猎杀。成片的草原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如植物块茎。湖泊和河流提供了鱼类和软体动物资源。虽然一些早期人类的化石被发现在洞穴里，但当时的人类不太可能生活在洞穴里。没有可依赖的光和热源，岩洞不会成为灵长类动物偏爱的栖息地。

早期的人类和早期黑猩猩的区别

现生的黑猩猩和现代人类的骨架有很多差别，尤其是在脑量、面部、头盖骨底部、牙齿、手、骨盆、膝盖和脚等特征方面；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差别，如它们发育和成熟的速度以及四肢的相对长度。但是要看出这些差别，需要找到比已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保存更

好的化石骨架。

表3列举的是现生的黑猩猩和人类分支的差别。要在距今8—5百万年的沉积物中寻找到早期的人类化石，科学家必须清楚最早的人类与最初的黑猩猩的差别。这些差别比现生的黑猩猩和人类之间的差别还要细微。虽然，黑猩猩和人类的共同祖先既不像现生的黑猩猩，也不像现代人类，但大多数研究人员还是认为其可能更像黑猩猩。这种看法主要基于遗传学与形态学的证据：现生灵长类动物中，大猩猩与黑猩猩／人类的共同祖先的亲缘关系最近；大猩猩与黑猩猩所拥有的共同形态性状要多于大猩猩与人类的共同形态性状（大猩猩的骨头和牙齿更容易和黑猩猩的混淆）。因此，黑猩猩和人类的共同祖先可能更像现生黑猩猩而不是现代人类，其骨骼很可能会显示出更多的适应树居生活的特征。例如，它的手指为了能抓紧树枝而变得更加弯曲，其肢体既适应四肢行走也适应后肢行走。口鼻部突出，面部不像现代人的平，有长下颌，相对适中的颊齿、突出的犬齿和大的中上门齿。

表3　现代人和现生黑猩猩骨骼之间的主要差别

	现代人类	黑猩猩
前额	凸出	低陷
面部	扁平	前伸
颅顶	上部最宽	底部最宽
脑量	大	小
犬齿	小	大
颅底	角状	平齐
胸骨	侧边笔直	锥状
腰椎数	5	3–4
四肢骨	平直	弯曲
四肢比例	下肢长	下肢短
腕关节	灵活性差	灵活性高
手	杯形长拇指	扁长手指，短拇指
脚	有足弓，大脚趾直	脚掌扁平，大脚趾呈一定角度分开
骨盆	空间正好适合新生儿头部	空间大于新生儿头部
骨和牙齿的发育	慢	快

最初的原始人类

研究人员推测，现代黑猩猩和人类的共同祖先与最早的黑猩猩之间的外形差异可能不是很大，但是，最初的人类在哪些方面不同于现代黑猩猩和人类的共同祖先，也不同于最早的黑猩猩呢？研究人员预测，不像最早的黑猩猩，最初的人类应该有较小的犬齿，较大的颊齿以及宽厚的下颌骨。联想到最初人类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站立，并更多地依赖于后肢直立行走，因此，其颅骨和骨骼也应该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应该包括枕骨大孔的前移，枕骨大孔连接着大脑与脊椎骨，前移有利于头部与身体各部位之间更好地保持平衡，最初的人类的躯干更直，臀部更宽，膝更平直，脚更稳固。

简单化与复杂化

主分派和主合派对人类进化早期阶段模式的认识大相径庭。有一件距今8—5百万年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标本，显示出化石动物与现代人类和黑猩猩的亲缘关系比与大猩猩或猩猩的更为近。对于这件标本，主合派仅承认存在3种可能性：1）黑猩猩／人类的共同祖先；2）现生黑猩猩的始祖；3）现代人类的始祖。主分派则认为早期人类和黑猩猩只是许多密切相关的谱系中的两个分支。他们认为，除了以上所列的选择之外，这件标本还可以属于黑猩猩／人类分支姊妹类群中的一个绝灭的分支，或属于一个或更多的绝灭的黑猩猩和人类次分支。

主分派也期望找到距今8—5百万年期间趋同性的证据。趋同使从或许已独立演化的类群中鉴别出真正的人类变得复杂。独立演化的类群或许共享研究人员曾假设的一个或多个只有人类才有的性状特征。一些研究者包括笔者都认为，我们还需要更好的证据才能更可靠地从非人灵长类中区分出最早人类的可靠性。

可能的最早人类

研究人员已经将四个种（它们分属3个属）暂定为最早的人类。判定化石是否是真正的原始人类的主要困难之一是：目前的化石证据太少。这四个种的化石很少，全部放到超市手推车中空间还绰绰有余。而且，手推车中四个种的化石证据也不一定相同。目前，其中1个种的化石是一件扭曲的颅骨，几件下颌骨和牙齿的残段；第2个种的主要是牙齿和一些手、脚的小骨头；第3个种的是一些牙齿和大腿骨的残片；第4个种的是颅骨碎片、下颌骨、牙齿和极少的有用的四肢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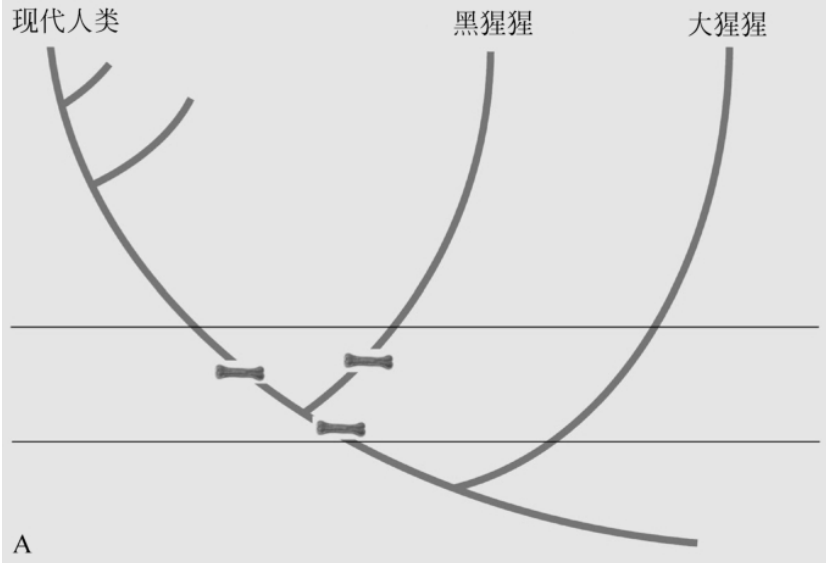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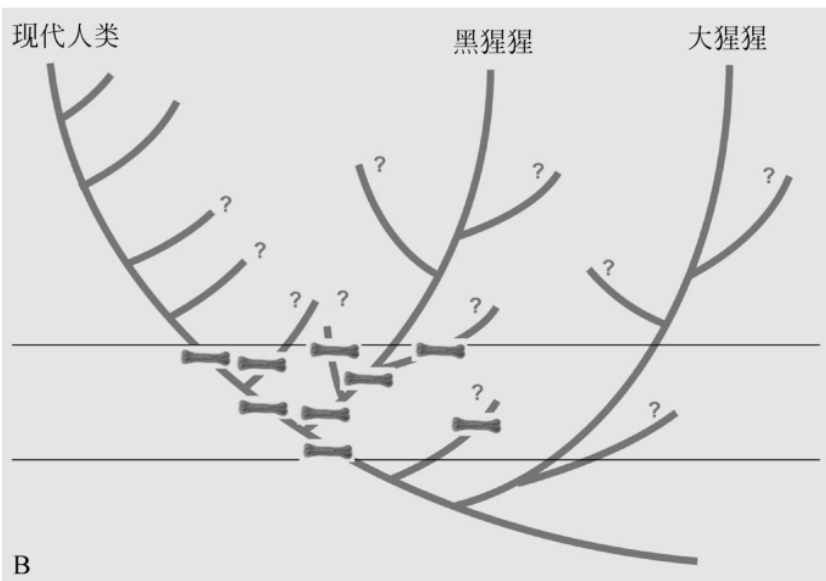

图8　主合派 / 简单分类（A）和主分派 / 复杂分类（B）对生命树上高级灵长类分枝的解释

撒海尔人（*Sahelanthropus*）

目前，最古老的是撒海尔人乍得种（*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由米歇尔·布吕内（Michel Brunet）及其研究小组2001年以来发现的。根据生物学相对年代方法测定，它的年代在距今7—6百万年之间。

撒海尔人乍得种是一个重要类群，其原因有几个。首先，它被发现于非洲西中部乍得的托罗斯 - 米那拉（Toros-Menalla）地区，这一地区是萨赫勒（Sahel）的一部分，其北部就是今天的撒哈拉沙漠。但距今7—6百万年前这一地区地貌非常不同。地质和古生物证据表明，早期人类生活在一个由湖泊、草地、林地以及靠近森林的河流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生态环境中。这个判断的依据是该地点发现的具有湖岸沉积物特点的岩石，以及发现的淡水鱼和生活在森林、林地、草原等脊椎动物的化石。第二，人类化石包括一个罕见的完整但扭曲的头骨以及两个下颌骨。参与撒海尔人乍得种化石的研究者使用虚拟人类学技术“矫正”并复原了颅骨，这使得将它与其他稍晚的人类和黑猩猩的比较更有意义。

撒海尔人乍得种的脑颅如现生的黑猩猩的一般大小，但面部的眉脊却和地质年龄只有它一半的猿人一样，都很宽。下颌骨比现生的黑猩猩的厚，而犬齿同黑猩猩的一样，只是尖部有磨蚀，两侧完好。宽且阔的眉脊、强劲的下颌骨以及只有尖部磨蚀而两侧完整的犬齿，是否这些特征足以确定撒海尔人乍得种是原始的人类，而不是黑猩猩和人类的共同远祖，或不是黑猩猩系或另一个已绝灭分支的成员？

并非所有的古人类学家确信，撒海尔人乍得种属于人类分支。但有一种几乎可以肯定是错误的看法是，撒海尔人乍得种是一化石大猩猩。如果撒海尔人乍得种是最早的人类，那么这个遗址在非洲中西部的位置表明，最早人类在非洲活动的领域比古人类学家曾想象的广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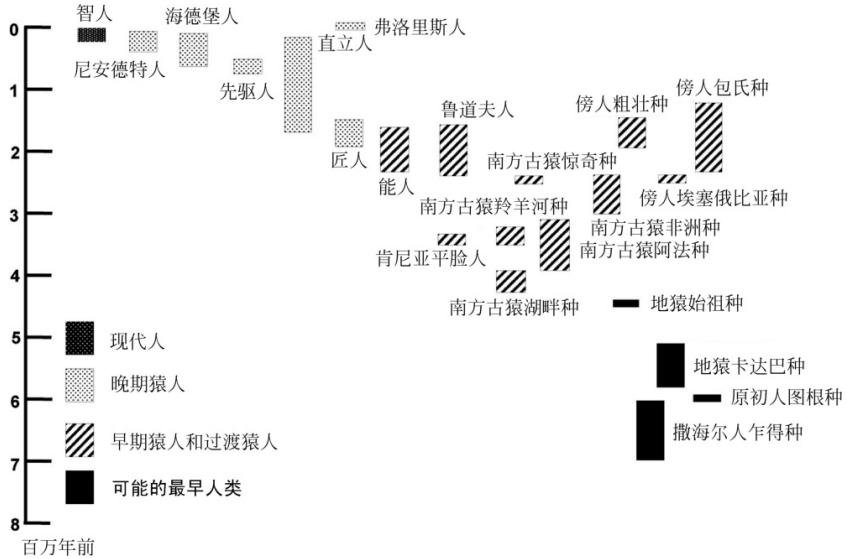

图9　可能的最早人类化石种的时代分布

原初人（*Orrorin*）

第二古老的早期原始人种是原初人图根种（*Orrorin tugenensis*），因发现于肯尼亚北部图根山的沉积物中而得名。钾氩法测定其年龄为距今大约600万年。1974年发现了一件下臼齿齿冠；2,000年以后又发现了其他12件标本。

到目前为止，原初人图根种的化石材料仍然细碎得让人沮丧。巴黎的法兰西公学院的古人类学家布丽奇特·森努特（Brigitte Senut）和马丁·皮克福德（Martin Pickford）认为原初人图根种是早期人类，其证据主要来自一件头盖骨化石碎片和一件颅下骨骼化石碎片。

布丽奇特和马丁所列举的颅骨证据是，原初人图根种的臼齿和前臼齿上附有厚的珐琅质。他们认为，这么厚的珐琅质在黑猩猩家族中没出现过，只是出现在后期已确定的人类分支中。发现原初人图根种的研究人员非常重视股骨近髋骨的部分。在爬行的灵长类动物中，股骨颈附近的皮层质骨各处都同样厚；但习惯直立行走的动物的在股骨

颈的顶部和底部的皮层质骨最厚。布丽奇特和马丁认为，原初人图根种的股骨颈也应是顶部和底部更厚。但遗憾的是，他们利用CT（电脑断层成像）扫描股骨颈得到的图像很模糊，无法确定股骨颈周围软骨的厚度。

反对将这些化石归于早期人类的批评者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原初人图根种的股骨形态与活跃于树上的灵长类的并无太大的差异；第二，至今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牙齿厚珐琅质仅是高等灵长类中的人类分支的特性；第三，布丽奇特和马丁也承认，原初人图根种的许多牙齿形态类似猿类。

直到我们找到更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初人图根种确实属于人类之前，我们最好把它当成与黑猩猩和人类的共同远祖有密切关系的一种生物。

地猿（*Ardipithecus*）

其他两组可能的早期原始人类都归于地猿属。第一组化石较古老，可追溯到距今5.7—5.2百万年前，取名为地猿卡达巴种（*Ardipithecus kadabba*），发现于埃塞俄比亚中阿瓦什（Middle Awash）。这组化石包括1件下颌骨，一些牙齿和颅下骨。化石的许多方面特征，如高而尖的上犬齿，类似于黑猩猩。化石的形态与下面要讨论的早期猿人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目前，把地猿卡达巴种归入人类分支还没有有力的证据。

第二组地猿化石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中阿瓦什和戈纳（Gona）地区。距今大约4.5百万年，且可能向前延伸到距今约4百万年前。化石包括牙齿、几块颌骨、一些手和脚的小骨骼和一头盖骨的下侧部分。这一组化石被命名为地猿拉密达种（*Ardipithecus ramidus*），因为发现者认为它的犬齿不如地猿卡达巴种的犬齿那样像古猿。

拉密达猿人的一些形态特征使之被认为与人类相关。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枕骨大孔的位置。拉密达猿人的枕骨大孔比黑猩猩的进一步

前移，虽然没有现代人类的前移得远。

目前，我们缺少拉密达地猿脑量大小、体态与运动方式的证据。就体形大小，卡达巴地猿和拉密达地猿都与现生的成年小黑猩猩相似，大约70—80磅重。尽管牙齿和头盖骨的底部有些变化，类似早期猿人，但拉密达地猿的整个外形更像黑猩猩，而不像现代人类。

上述四类可能属于最早人类的化石中，乍得猿人和拉密达猿人各自有合适的理由归入到人类分支中。尽管主分派用我上文提到的双名制把它们分为4个类群，主合派认为所有这4个类群是地猿属的不同种，或者它们都是（广义的）地猿拉密达种。

黑猩猩几乎没有化石遗迹

如果现代人类和黑猩猩具有最近的亲缘关系，那么它们各自演变经历的时间应该相同。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要看到的，现代人类有非常充实的化石材料，丰富程度大大超出其他哺乳动物种类。但是，几乎没有发现过黑猩猩的化石材料；过去8百万年以来，黑猩猩唯一的化石证据是发现于肯尼亚的巴林戈（Baringo）的70万年前的一枚牙齿。

这很奇怪是不是？过去的解释是，黑猩猩生活在森林里，森林受侵蚀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化石的埋藏地不会因侵蚀而暴露出来。另外一种解释是，森林土壤中有高浓度的腐殖酸，使骨头未经石化就溶解得无影无踪了。这两种解释都不完全令人信服。虽然，森林中很难发现化石，但毕竟有化石存在，只是碰巧没有发现黑猩猩的化石而已。当然，曾经鉴定的属于地猿、原初人和撒海尔人的化石也可能是黑猩猩的化石，但人们更热切地成为最早人类而非早期黑猩猩的发现者。

这有些匪夷所思，因为从宏观的生物学意义来看，找到早期黑猩猩祖先的化石证据要比找到又一个人类祖先的化石证据更有意义。如果能发现早期黑猩猩的模样，这将意味着研究者会有更好的机会辨别出真正的“人”。找到早期的黑猩猩化石的作用和意义不止于此。目

前，研究者假设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像现生的非洲黑猩猩，但如果真实“知道”而非只是“猜测”早期黑猩猩长什么样那会有益得多，这也将对试图分析黑猩猩／人类分支的类同性的研究者有很大帮助。

需关注的几点

- 如果分子生物学证据表明，人猿分离的时间接近5百万年前而不是8百万年前，那么早先归入最早人类的古猿，如撒海尔人乍得种等可能应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出现在人猿分离之前的时期。
- 当有更多的从5百万年前至8百万年前的化石证据时，我们就能弄清楚人类演化的早期阶段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
- 如果研究人员能够找到来自更茂密的森林栖息地的合适年代的岩石样品，他们也许就能够找到更多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化石证据。

第六章

早期猿人和过渡猿人

本章介绍的是基本可以确定为人的生物。他们的形态与现代人有较多的相似性，而与黑猩猩差异较大。但在下颌骨与牙齿的大小、体型和形态等方面，他们还没有显示出我们人属中人种的特征。因此，他们被称为早期猿人。在本章末，我也要给大家介绍一组“过渡”人类（过渡猿人），他们既有早期猿人的性状特征，也有现代人的性状特征。

东非的早期猿人

目前已发现的有比较丰富的化石证据的早期猿人是距今3至4百万年的南方古猿阿法种，它比拉密达猿人晚50万年。南方古猿阿法种毫无疑问应属早期人类，它比上一章介绍的原始人类有丰富且完整得多的化石证据。

南方古猿阿法种1978年得名，其化石集中发现于坦桑尼亚的莱托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哈达遗址。阿法种的化石包括一个颅骨、几个保存完好的头盖骨、许多下颌骨以及大量的四肢骨；通过这些四肢骨，能够准确地估算出南方古猿的体格大小以及体重。

哈达发现的人类化石包括著名的“露西”。“露西”是一名成年的女性，遗留有近一半的骨骼。唐·约翰森（Don Johanson）和他的研究小组的这一发现轰动了整个世界，因为这是研究人员首次发现了保存较完整的早期人类化石。在确定这些骨骼来自同一个体之后，研究者能够将肢骨和下颌骨及牙齿匹配，将下肢骨和臂部骨骼匹配；同时，也能够准确地估计出她的身高、体重以及四肢的相对长度。

南方古猿阿法种的体重在75—125磅之间，脑量介于400—500毫升，大于黑猩猩的平均脑量，也大大超过了所估计的撒海尔人乍得种的300—325毫升的脑量；但是，把脑量和体型大小关联起来看，南方古猿的大脑比同等体型的黑猩猩的大脑大不了多少（蓝鲸比现代人类有更大的大脑，但它们的体重也比我们重许多）。阿法种的门齿远远小于非洲黑猩猩的门齿（即人们微笑时露出的四颗牙），但颊齿却

大于黑猩猩的颊齿（位于颌骨后方，口腔两侧各有两颗前臼齿和三颗臼齿，只有当人们大笑时才能够看到）。这些特征表明，南方古猿的食物比黑猩猩的食物更为坚硬。南方古猿阿法种的骨盆和下肢骨的形状和大小显示，它能够双腿直立行走，虽然只是短距离行走。

最古老的人类足印和足迹化石是由玛利·利基（Mary Leakey）发现于坦桑尼亚的莱托里，化石距今360万年。人类足印化石发现于诸多大型和小型动物的脚印之中；其中最大的为马蹄印，最小的为野兔的爪印。这些足和蹄的印迹得以完好保存，是因为这些动物碰巧穿越了被暴雨淋湿的覆有一层火山灰的平坦地面。莱托里的火山灰很细腻，且有一种化学成分使得它具有水泥一样的活性，经过太阳晒干后就变得非常坚硬。这很像一个好莱坞餐厅为在餐厅外保存电影明星的手足印时采用的流程。这些遗迹化石生动地证明，那时的早期人类（据推测为南方古猿阿法种）能够双腿直立行走。同时，这些脚印的大小和步伐的间距与通过其四肢骨所估算的体型大小相一致，表明个体直立时的高度在3—4英尺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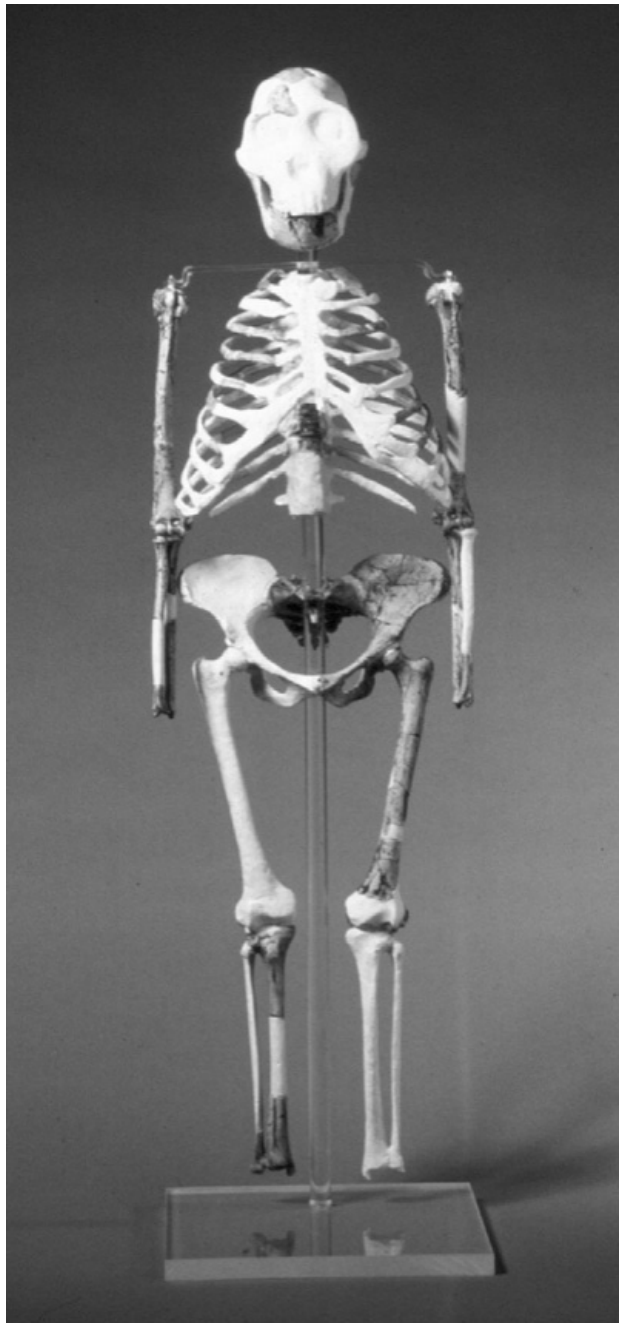

图10　苏黎世人类研究所彼得·施密特复原的“露西”骨架

发现在肯尼亚卡纳波依（Kanapoi）地点的南方古猿化石距今390万—420万年，被称为湖畔种，可能是阿法种的祖先。湖畔种的犬齿比阿法种的更像黑猩猩，但其颊齿与黑猩猩的有很大的不同。1995年，在乍得巴赫尔 - 加扎勒（Bahr el ghazal），距离撒海尔人乍得种地点不远处发现了距今350万年的人类化石，被定名为南方古猿羚羊河种。但是，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羚羊河种可能不是一个新种，而是阿法种的地理变种。

第四个在东非发现的早期猿人是250万年的南方古猿惊奇种（*Australopithecus garhi*），出土于埃塞俄比亚阿瓦什中部的博日（Bouri）地点，惊奇种在许多方面都异常奇特。四肢骨骼的特征表明它能够两腿直立，但其颊齿却比其他三个东非的南方古猿大许多。惊奇种周边没有石制工具，但附近发现的动物骨骼上的痕迹表明，骨骼上的肉是被利刃工具切割下去的。只有使用有锋利刃缘的石片才能把骨骼处理的如此干净。这是目前最古老的证据，表明在250万年前人类已能熟练地处理动物的尸体。

南部非洲的早期猿人

以上介绍的所有南方古猿类群都发现于非洲东部和中部的旷野地点。发现人类化石的地方并非一定是其化石人类居住或露宿的地方。也许是自然或其他原因使这些化石聚集在这些地方，也许是暴雨把这些化石冲到这里，或者因为这个地点毗邻食肉动物的穴居或是其食物储藏室。大部分化石地点都通过火山灰的同位素测年法测定了年龄，火山灰或取自人类化石所在的层位，或取自富含化石的层位之上或之下的层位。

然而，在1924年，比南方古猿阿法种化石发现还早近50年，在南部非洲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里一个小孩的头骨遗骸就被发现。这一遗骸是在汤恩巴克斯顿石灰场中一个暴露在外的小山洞里发现的。洞穴是工人开矿时发现的，头骨就发现于一些碎骨片中。这一新的人类

化石的发现立刻引起了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教授的注意，他首先认识到了其具有的重要意义。

达特把这一新类群称为南方古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字面意思是“非洲的南方猿类”。1925年，他在《自然》杂志上把这一新发现公之于众，但反响冷淡。大多数研究者都不了解或者忘记了达尔文提出的非洲是人类发源地的预言。不过，达特设法聘请了一位杰出的盟友——古生物学家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Broom）。布鲁姆因收藏形似哺乳动物的爬行动物化石而出名。布鲁姆相信达特已经找到了猿和现代人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他开始寻找其他洞穴，以期再找到一些南方古猿非洲种或类似生物的化石。

布鲁姆寻找了十多年后才发现了第二个含人类化石的洞穴——斯泰克方丹（Sterkfontein）地点。现在，科学家们认为这里发现的人类化石与汤恩小孩是同一个种类。不久之后，又在克罗姆德莱（Kromdraai）和斯瓦特克朗斯（Swartkrans）两个洞穴发现了颊齿和下颌骨在特征上与南方古猿非洲种完全不同的生物，定名为另外一个种，即傍人粗壮种（*Paranthropus*）。其颊齿稍大的特点使其被归入到“巨型早期猿人”类型。最近，南部非洲的其他洞穴，如德里莫兰（Drimolen）和格莱蒂斯威尔（Gladysvale）中都发现了人类化石，但似乎这些新发现的化石不是属于非洲种，就是粗壮种。

非洲南部早期猿人的解译

要解译非洲南部洞穴的人类化石，首先要考虑到其年代测定结果的可靠性不及非洲东部人类化石。所有在非洲南部洞穴地点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都与其他动物骨骼混杂在一起。混杂物通常在含化石的坚硬岩石中，或在含丰富骨骼的洞穴填充物和角砾岩中。研究人员一直在尽力寻找能够有效测定洞穴角砾岩的绝对年龄的办法。目前，遗址的年代测定只能是通过将洞穴哺乳动物遗存与有较好测年结果的非洲

东部遗址化石进行比对。通过这种方法估算出含南方古猿非洲种的角砾层的年龄是在240—300万年。编号为Stw573的人类骨架非常完整，出自斯托克方丹山洞深处，年代可能相对较老，估计有400万年，但现在判定它是否属于南方古猿非洲种还为时尚早。在加科维克（Jacovec）（斯托克方丹洞穴系中更深的溶洞）发现的人类化石与南方古猿非洲种很相像，年代也可能超过400万年。

我们目前对南方古猿非洲种的认识是，它的体型非常像南方古猿阿法种，但其颊齿更大且头骨不像猿类。它的平均脑量比阿法种稍大一些。颅下骨显示，虽然非洲种可以双腿直立行走，但它也能爬树。伴生的动物化石和植物遗存表明，非洲种的生活环境是长满草的林地。与150—200万年前的傍人（*Paranthropus*）的不同在于，它有较大的颊齿，面部较宽，脑袋稍大。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傍人粗壮种的运动行为方式可能与非洲种不同，但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对此进行确定。也没有证据表明，非洲种和傍人粗壮种生活在洞穴里。他们的骨骼或者是被豹子拖进了洞穴入口处，或者是被鬣狗或豪猪带入到洞穴里。一些出自斯托克方丹洞穴如Stw573这样完整的化石人类可能是失足落进洞穴，或者是探索洞穴时被困在了里面。

东非有巨型牙齿的早期猿人

1959年玛莉·利基和路易斯·利基在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发现了一个190万年前的破碎颅骨，这为傍人不同于南方古猿非洲种的说法提供了更多证据。该OH5颅骨的颊齿和下颌骨比傍人粗壮种的大，但门齿和犬齿都很小，这与其前臼齿和臼齿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无论这些生物的食物是什么，显然它们不需要大门齿去咬碎食物。

OH5头骨是东非人包氏种（*Zinjanthropus boisei*）的典型标本，但多数研究人员把东非人属降级到南方古猿或傍人属下的一个种，本书把它称作傍人包氏种。在坦桑尼亚纳塔隆（Natron）湖畔的佩宁伊（Peninj）河边又有傍人包氏种的新发现：一件比较粗大的下颌骨和

一些大的颊齿、小门齿及犬齿。此后，更多的属于傍人包氏种的化石被发现于奥杜威峡谷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马拉维的一些地点中。

傍人包氏种和其他种的区分主要见于颅骨、下颌骨及齿列。它是唯一既有大而宽平的面部又有大颊齿、小门齿及犬齿的人类。尽管其下颌骨和颊齿都很大，但脑量（大约450毫升）却相当于南方古猿非洲种的脑量。东非发现的最早傍人化石具有更为突出的面部、大门齿和更似猿类的颅底，因此，一些研究者把早于2.3百万年的人类化石单独归为一新种，即傍人埃塞俄比亚种（*P.aethiopicus*）。

虽然发现的傍人包氏种的颅骨化石很多，但没有发现过其颅下骨，因此，我们只能猜测其体态和行为模式。

多数古人类学家认为，颊齿齿冠大且珐琅质厚、下颌骨较宽以及大型个体的头骨上的顶嵴都表明，包氏种的饮食高度特化，可能以植物的种子或具有坚硬外壳的果实为主。少数人持不同的意见，认为傍人可能是类似于薮猪的高等灵长类，其大的颊齿和下颌骨使得它能够吃多种食物，如肉类、植物和昆虫等。

大量的头骨和颅骨化石足以显示，傍人包氏种的脑量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温和增长的趋势。没有任何形态学上的理由说明傍人包氏种或傍人粗壮种不能制造原始的石器工具。与傍人粗壮种一起发现的带尖的木棍上有磨损痕迹，这与现代的猎食者和采集者伸入到白蚁巢穴里捕食富能而味美的白蚁所使用的木棍上的磨损痕迹相一致。

傍人包氏种里最大的个体几乎可以肯定为男性，它的体重几乎是最小女性个体的两倍，大约分别是150磅和75磅。在现生灵长类动物中，男性个体与女性个体体格间差异如此大的原因在于，男性个体只有通过相互竞争才能接近女性。在相似的现生灵长类中，男性个体通过露出自己的大犬齿传递威胁，建立其社会等级。傍人没有大的犬齿表明，如果男性居统治地位，那么他们必须利用其他特点来建立其社会等级，也许是庞大的面部，或许还要加上与猩猩一样的皮肤褶皱。

肯尼亚平脸人（***Kenyanthropus***）

最新发现的早期猿人种被定为一个新的属种，即肯尼亚平脸人。这是2001年梅亚维·利基（Meave Leakey）和她的同事们给在距今330—350万年的地层中发现的人类化石定的名。其中最好的一件化石标本是一个颅骨，但是因其上许多裂缝被基质填充而变得畸形，裂缝充斥于颅骨的面部及其他部分。尽管面部有诸多裂缝，有些特点还是能表明肯尼亚平脸人的面部与同期的著名的阿法种的面部不同。梅亚维·利基的研究小组确信他们找到了与南方古猿阿法种截然不同的人类化石，同时也指出这些化石和下面要讨论的鲁道夫人（*Homo rudolfensis*）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在这个阶段的调查中，他们不清楚面部的相似性是遗传于最近的共同祖先（即衍生特征），还是两个类群独立演化而形成的（即非同源相似性）。

过渡猿人（*Transitional hominins*）

1960年，在奥杜威峡谷距离傍人包氏种化石地点（1959年发现）不远的地方，路易斯·利基和玛莉·利基首次发现了在他们看来比前面谈到的早期猿人更像我们现在人类的人属化石。即便今天，科学家们还一直在争论这些化石是属于同我们一样的人属，还是属于脑颅更大的早期猿人？

最初发现的化石包括几颗牙齿、一块顶部颅骨、一些手骨和左脚的大部分骨骼。次年，利基夫妇发现了一个青少年个体的不完整头骨、更多的颅骨碎片、一件下颌骨和一些牙齿。颅骨上没有大体型傍人包氏种所具有的顶嵴，臼齿和前臼齿也远远小于包氏种。虽然脑子小，路易斯·利基和菲利普·托比亚斯（Phillip Tobias）认为，颅腔内面的压痕提供了布罗卡氏区（Broca's）的证据；布罗卡氏区当时被认为是唯一的控制话语肌肉的中心。菲利普·托比亚斯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一位杰出的南非解剖学家，最初由利基夫妇招募来研究1959年发现的东非人颅骨化石。

路易斯·利基、菲利普·托比亚斯和他们的解剖学家同事约翰·内皮

尔（John Napier）提出，这些材料完全可以建立一个人属的新种并为之取名为“能人”（*Homo habilis*），字面直译为“手巧的人类”。在他们的此提议之前，研究者一致认为所有人属的脑量至少应该都不小于750毫升，但是，奥杜威峡谷新发现的化石的脑量在600—700毫升之间。路易斯·利基和他的同事们坚持认为，奥杜威峡谷的能人化石满足人属具有的功能性标准，即双手灵巧（他们确信，奥杜威峡谷里和化石同层发现的石器是能人而非傍人包氏种制造的工具）、身体直立和完全用双腿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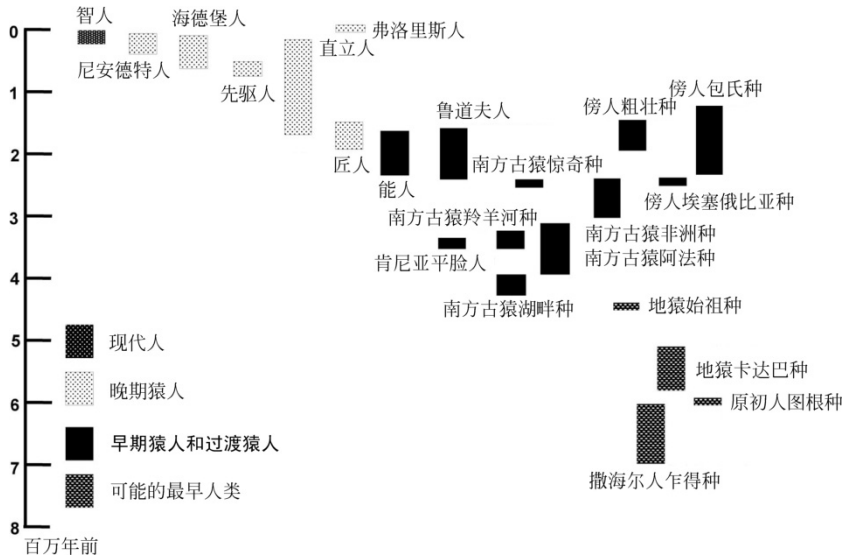

图11　早期猿人和过渡猿人化石种的时代分布

自那以后，在东非和南非的其他地点也发现了许多相似的化石，尤其是肯尼亚的库比福勒地点发现的数量最多。能人系列化石的脑量范围从不到500毫升扩增到800毫升。有些化石面部小而前突，有些面部大而稍平，下颌骨也有不同的大小和形状。与能人颅骨一起发现的四肢骨表明，能人与早期猿人相似，都有较长的手臂，当然这是相对腿的长度而言。目前已有足够的化石证据估算出能人的肢体比例与南方古猿阿法种的非常相似。

综合所有这些新发现的证据还是很难把能人与南方古猿区分开来。当根据下颌骨和牙齿大小估计能人体型时，发现其与南方古猿有更多的相似性，而与后来的人属差别较大。能人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的结论是建立在布罗卡氏区和语言的产生相关联的假设之上的，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一假设不再正确，因为研究表明语言的功能更广泛的分布于大脑。能人的颅下骨骼与南方古猿和傍人的差别很小。奥杜威峡谷手骨化石的发现表明，能人能灵巧地制造和使用一些简单的石制工具；但南方古猿阿法种和傍人粗壮种也能做到这一点。

研究人员也普遍认为，能人的颅骨、下颌骨和牙齿变异性较大，难以归入单一种。许多研究者把能人化石归为两个种：严格种（*H. habilis proper*）和鲁道夫种（*Homo rudolfensis*）。与严格种相比较，鲁道夫种具有更大的脑量（700—800毫升），更大、更宽、更平的面部和更大的颊齿，这些特征显示其饮食可能有别于能人。我们目前还不能确知鲁道夫人的肢体情况。

需关注的几点

- 南方古猿湖畔种和阿法种的其他化石证据可以证明，他们与傍人埃塞俄比亚种和傍人包氏种一样，是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种类型。
- 研究人员一直在争论，发现于东非和南部非洲的巨牙人种是彼此间的亲缘关系更为密切，还是与其他灭绝人种的关系更密切。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有新的化石证据或找到新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现有证据，以证明傍人类群的特征不可能是非同源相似。
- 如果鲁道夫人的四肢骨骼与匠人（*H. ergaster*）的相像，这可能进一步证明过渡猿人存在能人和鲁道夫人两个类群。当然，这还需要发现更多的鲁道夫人骨骼来证明。
- 研究人员正在从形态、功能及同位素研究方面寻找证据，复原傍人的饮食习惯，以确定他们（尤其是傍人包氏种）的衍生形态是因食物类型发生变化，为满足集中处理几种储备食物的需要造成

的，还是因要适应很多不同种类的食物造成的。

- 研究人员想知道早期猿人制作的石器工具的类型可能很困难，因为人类在早期阶段制造工具的频率很低以至于很难在传统的考古地点找到。

第七章

晚期猿人

本书以上介绍的所有人类化石的体重大约为60—120磅，相对大多数现代人类来说都较小。目前，只知道几个早期猿人和过渡猿人个体的脑量和四肢的比例数据。根据这些已知个体，我们可以得到足够的信息大致估算出脑量，结论是：这些个体的脑量都低于后期人属的绝对或相对脑量。所有早期类群中的个体的腿比现代人的要短，所以他们没有现代人两足行走的效率高，但这却可以说明他们一直都有能力把树林作为庇护所和摄取食物的地方。早期猿人和过渡猿人的大颊齿和宽厚的下颌体以及巨齿猿人所具有的超大颊齿表明，和现代人类的饮食相比，他们惯常或偶尔食用更加坚硬或难咀嚼的食物。所有早期猿人和过渡猿人似乎与现代人类属于不同的等级，那么在人类进化史中，何时何地最早出现了更加接近现代人类的类群呢？

匠人（*Homo ergaster*）

肯尼亚北部的库比福勒和西图尔卡纳出土了一些距今近200万年的化石，在这些化石中我们首次发现了比任何早期猿人或过渡猿人更像现代人类的类群证据。这些化石被称为匠人。并非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喜欢使用这个种名，一些研究者把它称为“非洲早期直立人”。

匠人是最早的在体型大小和身体形态方面比早期猿人或过渡猿人更像现代人类的类群。相对体型而言，匠人的牙齿和颌骨比早期猿人和过渡猿人的都小。这表明匠人要么与早期猿人或过渡猿人的饮食习惯不同，要么食用同种食物但在入口之前食物经过了某种加工处理。显而易见，加工处理食物的方式是把食物做熟，因此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匠人可能是最早的惯于烹调食物的人类。烹调使一些难嚼的食物变得容易食用，同时也使一些会使营养物质产生毒性的化学元素失去活性。

与石制工具发现时间相近的最早的烧土证据距今100万至200万年。这一发现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用火证据，引起了许多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雷电击中并引燃大树后的树桩残存非常容易与炉膛

内人类有意生火后的遗留物相混淆。人类生的火通常比点燃树桩的自然火燃烧更充分，尽管理论上有可能把两种火的遗存区别开来，实际上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目前，考古学上发现的人类能够有控制地用火的最早证据来自于以色列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Gesher Benot Ya'aqov）距今约80万年的遗址，但发现石制火炉的年代却要再晚些（约30万年前）。

匠人的长下肢类似于现代人类，长腿使两足能够高效地长距离行走。显然，一些成年现代人类善于攀爬树木取食坚果和蜂蜜，但现代人类并不适应在树上的远距离穿行。他们的长腿成为阻碍，手臂也失去了似猿的那种有效利用树枝移动的能力。在所有这些方面，匠人比其以前的人类更加特化。然而，在重要的脑量方面，与两种过渡猿人之中脑量较大的类群——鲁道夫人相比，匠人几乎未表现出进步的特征。为什么增大的脑量在人类进化史的较晚阶段才出现一直是古人类学家的难解之谜，也许和防控在怀孕后期出现其他风险有关。匠人实际骨盆的形状和大小以及从成年匠人脑量推断出的婴儿脑量表明，婴儿脑袋已小到足以横向通过产道，从而在通过骨盆入口后不需要旋转。这可能使匠人有效地避开了造成现代人类难产的一个常见因素。

走出非洲：谁？什么时候？

目前，发现于非洲的人类化石和考古记录在时间上不超过200万年。但是，“缺少证据并不表示没有证据”，所以我们必须小心以免掉进在非洲以外的地区不会发现更早的人类的误区。

目前，非洲以外保存良好的最早人类化石出自高加索德马尼西（Dmanisi）的一处遗址。虽然没有遗址沉积物的绝对测年数据，沉积物之下的熔岩的放射性同位素和与人类化石一起发现的动物化石的测年数据表明，年代大约在170万—180万年。虽未对那里发现的人类化石详加研究，大致可看出该化石人类属于一个相对原始的、类似匠人的类群。然而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是，在德马尼西人类化石层位发

现的石器却与非洲最早的石器相似，考古学家认为后者属于奥杜威文化（奥杜威这个名字源于石器的首次发现地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继德马尼西遗址之后，距今150万年的以色列尤比迪亚（Ubeidiya）遗址是第二古老的，年代清楚的有人类活动遗迹的地点，但目前仅在该遗址发现了几颗人类牙齿。

直立人（*Homo erectus*）

有证据表明，大约一百万年前，在非洲、中国、印度尼西亚出现了新型人类，即直立人。一些研究者相信，直立人也许早在170万年前，甚至可能更早在190万年前就首次到达了印度尼西亚。果真如此的话，人类很有可能在这之前就已在亚洲大陆开始生存了。目前，可追溯到150万年前的石器是当代中国版图内出现人类的最早的可靠证据。

如果在大街上遇到一位直立人，你不会把它与现代人类相混淆；但是，与早期猿人和过渡猿人相比，它更像我们现代人类。最有名的直立人化石证据来自于印度尼西亚梭罗河（Solo River）的沿岸地区和中国的北京人遗址（现称为周口店遗址）。正如我们第3章所讲的，杜布瓦在爪哇首次发现了直立人化石。在爪哇北部的科东布拉布斯（Kedung brubus）遗址发现的一小块人类下颌骨鼓励了杜布瓦，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爪哇境内梭罗河流域有沉积物出露的区域之一，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沉积物可追溯到距今约200万年的时间。他在旱季组织人员细致地发掘了特里尼尔村附近暴露在河岸上的沉积物。1891年，发掘人员发现了几颗牙齿、一块股骨和一块头盖骨（严格讲是一块颅顶）。起初他发表文章认为这块颅顶属于一个灭绝了的巨型长臂猿类；但后来，他显然改变了主意，因为两年后，也就是1894年，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给这块颅顶取了一个不同的属名，叫爪哇猿人。现在，研究人员把爪哇猿人置于人属之中。要知道在1894年仅有两个已知的现代人属类群，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特里尼尔的标本没有现代

人类的较大的脑部和高而圆的脑颅；其脑量也大约只有现代人类平均脑量的60%；但因为在其附近发现的股骨与现代人类的股骨非常相像，所以杜布瓦把它确定为一个新种，并取名为爪哇直立猿人。然而，并非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认为这块股骨与那块颅顶来自同一时代；有些人认为，它也可能属于一个时代更晚的骨架，有可能是被“重新埋藏”在河流砾石中的。在特里尼尔寻找人类化石的工作持续了10年，最后一次在该遗址发现人类化石碎片是在1900年。

在爪哇搜寻人类化石下一阶段的重点地区是特里尼尔的上游，在那里梭罗河切断了桑吉兰高地的沉积物。1936年德国古生物学家拉尔夫·凡·孔尼华（Ralph von Koenigswald）在那儿开始了他为人类进化寻找证据的工作。他发现了一块头盖骨，与特里尼尔的头盖骨很相似，但脑量却还要小些。虽然后来又发现了更多的标本，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爪哇使研究工作被迫终止。孔尼华暂时把人类化石埋藏在花园中，以防被日本人夺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寻找早期人类化石的工作得以恢复，研究工作继续在桑吉兰高地及其周围展开。研究人员又发现了人类的下颌骨、几块颅骨和一些颅下骨骼化石。

20世纪20年代，在爪哇的早期人类研究工作暂停，但在中国寻找早期人类化石的工作却拉开了大幕。1921年和1923年，瑞典的古生物学家贡纳尔·安特生（Gunnar Andersson）和来自奥地利的年轻同行奥拓·师丹斯基（Otto Zdansky）在北京周口店洞穴组织了两季的野外发掘工作。他们发现了一些石英石器，但显然没有找到人类化石。然而，在1926年，当审查运到乌普萨拉（Uppsala）的发掘材料时，师丹斯基发现周口店1号地点的两颗标有“猿类牙齿”的标本应当属于人类。两颗牙齿分别为上臼齿和下前臼齿。解剖学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在1926年对这两颗牙进行了记述；连同在1927年发现的1件保存完好的第一下臼齿一起，步达生确定它们为一个新属、新种——中国猿人北京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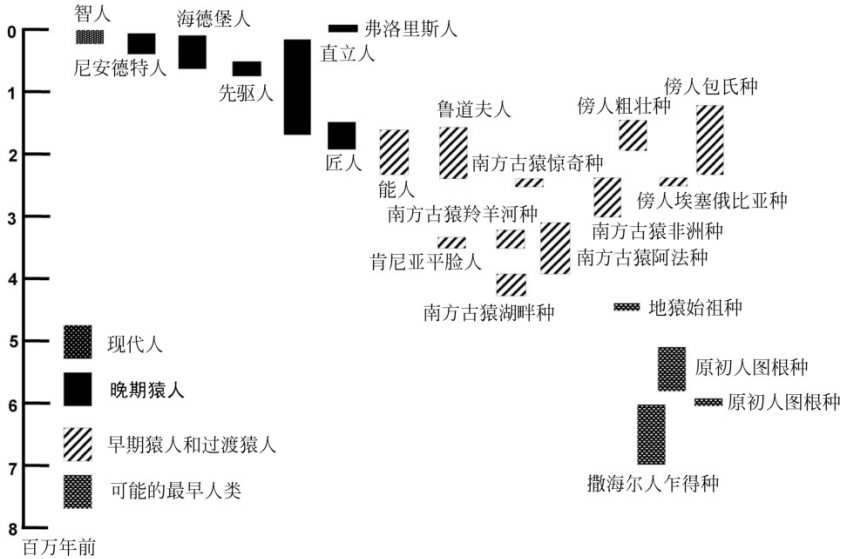

图12　晚期猿人化石种的时代分布

1926年，步达生和一位中国同事翁文灏以及安德斯·步林（Anders Bohlin）一起恢复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第一块头盖骨发现于1929年，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在周口店1号地点发现的所有化石全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遗失；当时，这些化石本来要被运到美国，但始终没有到达目的地，直到现在仍然下落不明，成为一个谜。这些化石是被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护送，要运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化石是遗失在海军陆战队到达港口前还是海上运输中，目前也尚不清楚。甚至到现在还有人声称一个亲戚遗赠给他们一箱无价的早期人类化石。幸运的是，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在此之前精细地做了这批人类化石的模型，博物馆的一位科学家弗兰兹·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对这些化石作了详细的定性和定量描述。北京猿人化石具有某些鲜明的形态特征，但在许多方面与爪哇直立猿人化石很相似。因此，魏敦瑞在1940年建议把这两套化石合并成一个物种——直立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也在其他一些遗址发现了与爪哇猿人和中国猿人相似的化石，如爪哇的雅威（Ngawi）和桑邦马坎（Sambungmacan）、中国的蓝田、非洲南部的斯瓦特克朗斯与东部

的梅尔卡昆特瑞、中阿瓦什、奥杜威峡谷和布伊亚（Buia）。尽管上世纪在爪哇、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头骨化石，但是我们对于直立人的四肢进化还是了解甚少。这种情况随着在东非发现一系列重要的人类颅下骨骼化石而发生了改变。这些发现包括从奥杜威峡谷（OH 28）找到的一块盆骨和股骨，从库比福勒（KNM-ER 803和1800）找到的两个残缺的骨架以及从西图尔卡纳（KNM-WT 15000）找到的一个保存异常完好的骨架。

如果在莫乔凯托／博尔宁（Modjokerto/Perning）发现的小孩头骨的年代和昂栋（Ngandong）遗迹距今的年代得到确认的话，那么，即使非洲东部的匠人被排除在直立人这一种群之外，这两组年代数据也可表明直立人生活于大约190万年前至5万年前。

直立人的头盖骨都较低矮，颅底部最宽。眼眶上方有一个坚硬的且或多或少连续的骨嵴（也叫枕外隆凸），脑后面有一个凹陷（也叫沟）；一个突出而圆钝的骨嵴在脑颅中线处从前延伸至后，即所称的矢状圆枕；在头骨的后面的枕角区上方有一个清晰的沟；脑颅壁由两层骨板组成。直立人颅顶内外的两层骨板比较厚。直立人的脑量大小不同，最小者是OH12头骨，脑量大约为730立方厘米（如果包括德马尼西D2282头骨的话，则为650立方厘米）；最大者是昂栋6号Solo V头骨，其脑量约为1,250立方厘米。

直立人四肢的比例（即四肢组成部分的绝对与相对长度）与现代人类的相似，但前者粗壮，长骨干的前后向（股骨）和侧向（胫骨）都比现代人的扁平。骨盆有一个大的臼窝，与股骨（髋臼）连接，且连接髋臼和髂嵴（在身体任一侧与臀部同高度的地方可摸到）的骨头很厚。这两个特征与习惯性的直立姿势和长距离的两足行走相一致。目前还没有能够评估直立人灵活性的相关化石证据，但是如果手斧是由直立人制造的，则其灵巧性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主要是因为在昂栋发现的化石）似乎也属于直立人的最后哨所。在非洲，有证据表明，后期的直立人可能进化成为了早期的现代人——海德堡人，但印度尼西亚后期的直立人化石材料显示其似乎更特化。这表明，印度尼西亚的类人猿不太可能进化成

为早期现代人，很可能到亚洲直立人就“终结”了。

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

在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博多（Bodo）、赞比亚的卡布韦（Kabwe）等遗址发现了距今60万年的人类头骨，但都缺少直立人特有的、平而粗的眉脊。这些头骨的平均脑量为1,200立方厘米，显著大于匠人不足800立方厘米和直立人不足1,000立方厘米的脑量。此外，下颌骨和颊齿的尺寸进一步减小。颅下骨骼也缺少直立人的一些特征，如骨干扁平；但即使这样，海德堡人的四肢骨骼相对现代人类的还要粗而强壮，关节面也更大。作为非洲化石发掘记录中首次出现的人类化石，海德堡直立人这个名字似乎比较奇怪，但我们还是采用了这个名字，原因是1908年在德国海德堡附近发现了一个很可能属于同一类群的人类下颌骨。

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

在晚期猿人中，最知名的类群是尼安德特直立人，一般称为尼安德特人（有些研究者倾向于用现代德语的“Neandertal”，但由于其名来自必须保留原始拼写的双名法则，因此“Neanderthal”也是正确的）。尼安德特人的头骨、牙齿、颅下骨在形态上都具有独特性。尼安德特人似乎仅仅生活在欧洲及其邻近地区，而形态特征最鲜明的晚期尼安德特人则长期生活在非常寒冷的冻原上。

在西班牙一处名为胡瑟裂谷（Sima de los Huesos）的遗址最早发现了体现尼安德特人特征的化石。最初由埃米利亚诺·阿吉雷（Emiliano Aguirre）、现在由胡安·刘易斯·阿苏瓦加（Juan Luis Arsuaga）领导的一个西班牙研究小组，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人类化石。这些化石残遗来自大约30—40万年前，是在建筑工人修筑新铁路时挖开的一个山洞里发现的。

这一物种被命名为尼安德特直立人，这是因为，同一类型的标本——尼安德特1号，一个残缺的成年人骨架，是于1856年在德国尼安德峡谷中的克莱恩 - 菲尔德霍费尔 - 格罗特（Kleine Feldhofer Grotte）遗址发现的。事后看来，这并不是首次发现尼安德特人化石。1829年在比利时昂日（Engis）遗址发现的一块小孩头骨和1848年在直布罗陀福布斯采石场发现的一块成人颅骨，也都显示出了明显的尼安德特人形态特征。在费尔德霍费尔洞穴没有发现动物化石或考古学证据，那里似乎也不会再发现此类线索了。然而，归功于档案研究对古人类学作出的显著的贡献，拉尔夫·施密茨（Ralf Schmitz）和尤尔根·西森（Jürgen Thissen）设法收集了关于费尔德霍费尔洞穴足够的位置信息从而追溯到已经发生极大变化的尼安德峡谷，并找到了1856年矿工丢弃的洞穴沉积物残存。1997年进行的发掘发现了动物化石、手工制品和人类骨骼碎片。他们报道说，“发现的一小块人骨（NN 13）正好是尼安德特1号的左大腿骨外侧”。2000年的时候，发现了更多的动物化石、考古证据和人类骨骼碎片，“两块颅骨碎片……能与尼安德特1号的颅骨相拼合”。对重新发现的沉积物的年代测定表明，尼安德特人这一典型标本的时代距今大约4万年。

在发现尼安德特人典型标本之后，1880年在希普卡的摩拉维亚（Moravia）也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化石。后来又在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化石：比利时的斯拜（Spy）（1886年）、克罗地亚的克拉皮纳（Krapina）（1899年至1906年）、德国的埃林斯多夫（Ehringsdorf）（1908年至1925年）、法国的莫斯特（1908年），在海峡群岛的圣布雷拉德（St Brelade）（1911年）还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遗骨。1924年首次在西欧以外的地方，克里米亚的基克 - 科巴（Kiik-Koba），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化石。此后的发现是在1929年在地中海东部地区黎凡特（Levant）卡梅尔山的塔邦（Tabun）洞穴和1938年在中亚的特什克 - 塔什（Teshik-Tash）。与此同时，在意大利的萨科帕斯托（Saccopastore）遗址（1929年）和古塔日 / 奇切奥（Guattari/Circeo）遗址（1939年）也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化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一些新发现，首先是在伊拉克的沙尼达尔

（Shanidar）遗址（1953年），然后在以色列黎凡特的阿木德（Amud）遗址（1961年）、卡巴拉（Kebara）遗址（1964年），再后来在叙利亚的代德里耶赫（Dederiyeh）遗址（1993年）。在欧洲和西亚也不断发现了尼安德特人新的化石证据，例如1979年在法国的圣沙塞尔（St Césaire），1983年在西班牙的扎法拉亚（Zaffaraya），以及1999年在希腊的拉克尼斯（Lakonis）。

多数具有其所有独特形态特征的成年尼安德特人化石发现于距今10万年—3万年的遗址。这些特征包括大鼻孔、中间前倾的流线型脸庞、顶部和后部都呈圆形的头骨、平均比现代人大的颅腔、骨干粗关节面大的独特肢骨。这些基本上都属于欧洲和近东类群的特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没有尼安德特人化石发现的记录，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人类无法适应那里非常寒冷的气候环境。在过去的几百万年里，尼安德特人居住的地区经受了以10万年为冷暖交替周期的气候变化。

关于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之间的关系，有两种相反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尼安德特人的形态非常特化，对现代人类基因库没有重大的贡献，而且与现代人的差别太大，无法归入智人范畴。相反的观点认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之间的差别相对较小，支持将其列入智人范畴。

来自尼安德特人的线粒体DNA

幸运的是，研究人员已经从尼安德特人化石中提取到了线粒体DNA的少许片段，所以现在可以从这另外一条证据研究尼安德特人所属的类群。在关于从一些人类化石中首次成功提取到线粒体DNA的报告中，马塞厄斯·克陵斯（Mathias Krings）和在莱比锡斯万提·皮耶博（Svante Pääbo）实验室的其他研究人员解释说，他们已成功地从尼安德特人1号典型标本的肱骨上获得了少许线粒体DNA片段。在这个单一的化石线粒体DNA片段里，其核苷酸的序列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类多种样本的变异范围。随后，线粒体DNA片段也从典型遗址（见上

文）中新发现的第二个个体化石上获得，从俄罗斯玛兹梅斯卡亚（Mezmaiskaya）发现的幼儿骨骼中获得，从克罗地亚的温迪加（Vindija）的两个个体上获得，从比利时昂日尼安德特人的幼儿遗骨中获得，从最早在法国拉沙佩勒欧桑（La Chapelle aux Saints）发现的尼安德特人骨架上获得。被研究的化石的线粒体DNA片段之间的差异与随机挑选的相同数量的非洲现代人样本之间的差异相似，但与现代人类线粒体DNA片段之间的差异巨大且显著。被研究的线粒体DNA片段很短，但如果通过研究所得出的结果能够复制出染色体其他部分的基因片段，那么把尼安德特人置于一个区别于现代人的单独的种的观点就会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传统的观点认为，尼安德特人进化成了现代人类。这一观点得到近东尼安德特人化石初步年代测定结果的支持。初步的测年结果认为，发现在塔邦和阿木德两个洞穴的尼安德特人化石在时间上要早于在卡夫泽（Qafzeh）等遗址发现的更像现代人的化石。但是，更精确的测年方法颠覆了传统的观点。最近发现的证据表明，更像现代人的卡夫泽人化石在年代上要早于尼安德特人的化石遗存。

就算埋葬死者的风俗不是开始于尼安德特人，他们肯定也是最早有此风俗的人类之一，因为他们的化石遗存在质和量方面远远超过他们之前的人类。一些墓穴表明，尼安德特人有为死者举行仪式的习俗，甚至研究人员认为尼安德特人对艺术也有追求。

尼安德特人的遗存特别容易引起病理学方面的错误解释。例如，来自拉沙佩勒欧桑用于提取线粒体DNA的骨架有严重的骨关节炎病，但它恰巧被用于某次重要的复原尼安德特人的工作中，因此所有的尼安德特人都被假定有弯曲的背部和浑圆的肩。也有人认为，尼安德特人是具有先天性甲状腺机能减退症或称呆小症的现代人类。这一结论建立在尼安德特人遗址的分布与其同时代从欧洲延伸到近东的“甲状腺肿分布带”大致相对应的基础上。但是，这个例子忽略了相关性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区别。呆小症能在骨骼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但在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化石上却并未见此痕迹。

需关注的几点

- 如果匠人是第一批离开非洲的人类，那么这也正是许多次形态变革和行为变革“迁徙浪潮”中最早发生的一次——这些“迁徙浪潮”起源于非洲，然后传播到欧亚大陆，并最终遍布世界各地。研究人员称，现代人类的基因型保留有这些迁徙浪潮的若干证据，随着分子生物学家搜集的关于现代人核基因组的区域变异的资料越多，相关证据也会发现越多。
- 研究者热衷于寻找更多的像德马尼西一样的遗址，他们能从这类遗址得到更多首次走出非洲的人类化石资料。一些研究人员推测，更大范围寻找肉食的需要是人类迁徙的根本动力。如果能找到有组织地狩猎活动的化石和考古证据，这个假说将能得到验证。
- 对于类似海德堡人的早期猿人的起源和命运，我们知之甚少。与他们相关的最早证据来自非洲，但测年结果在50万年前至30万年前的可信的化石证据很少，这使研究人员无法研究他们与其后的种群如尼安德特人和智人之间的关系。
- 关于绝对和相对脑量与行为的联系，研究者还是一无所知。在可以稳定获取高品质的肉类等食物之前，人类需要克服的认知和行为障碍是什么？

第八章

现代人

传统观点

关于现代人类起源问题，上个世纪的传统观点认为，从早期人类向现代人的过渡可能独立地发生在旧大陆的主要地区，即非洲、欧洲和亚洲。例如，欧洲的尼安德特人进化为欧洲的现代人类，亚洲后期幸存的直立人进化为亚洲的现代人类。这种多地区起源说偏激地支持现代人类（“种族”一词对于现代人类而言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生物学意义）的地区变种都是各有明显不同进化史的单独人种这一观点，好在这一观点的可靠性已受质疑。

多地区起源弱假说得到魏敦瑞（此人在研究周口店直立人遗骨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等德国研究者的支持。这一假说综合了早期猿人的地区变种各自进化成了现代人类这一假说，并提出他们各自进化之后，这些地区变种之间的差异也因地区间的基因流动（由迁徙或近亲繁殖造成）最终被减弱。然而，多地区起源弱假说的当代支持者认为，即便存在基因流动，各地区保留了足够的自身特点，使得其现代人的群体独特而易辨别。他们支持多地区起源弱假说是因为他们在世界各主要地区的晚期猿人和现代人群体在形态学方面具有连续性的证据。例如，他们称牙齿和头盖骨方面的连续性表明直立人和现代澳大利亚人之间有联系，明显的面部形态连续性表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欧洲人之间都有联系。

根据这种对现代人类进化情形的假设，很难划清尼安德特人和欧洲早期现代人之间以及直立人与亚洲早期现代人之间的界限。多地区起源弱假说的支持者认为，这些分类加上地理区域之间基因流动的融合效应，将直立人及其之后所有地区间的人类变种归为同一类群是合理的。如果直立人和其后的所有人类都可以归于同一类群，那么这一类群必须是智人种。与后来给予晚期猿人的其他称呼（如尼安德特直立人和海德堡直立人）相比，林奈对现代人种的命名因历史原因有优先权。

古人类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公布于众的第一个现代人类的化石可能要算“红色女士”骨骼（骨骼上沾满红色赭石），它是在1822—1823年于威尔士斯旺西以西的高尔半岛巴维兰（Paviland）的一个洞穴中发现的。然而，惯常被当作例子引用的欧洲最早的现代人（即智人）化石是1868年发现于法国多尔多涅省莱塞济地区的克罗马农（Cro-Magnon）岩棚的化石。克罗马农明显的历史优先性，结合在欧洲其他遗址考古发现的精美小石钻、骨针和骨鱼叉，让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欧洲大陆不仅是现代文明的摇篮，也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属和种，即人属和智人种的发祥地。

欧洲中心论面临的挑战

欧洲是现代人类进化之地这一先入之见由于两方面研究的进展而受到挑战。首先，从19世纪后期开始，发现了比亚洲尼安德特人更为原始的人类化石，在20世纪第二个25年里发现了更多的这类化石证据。当然，紧接着就是人们意识到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最有可能发生在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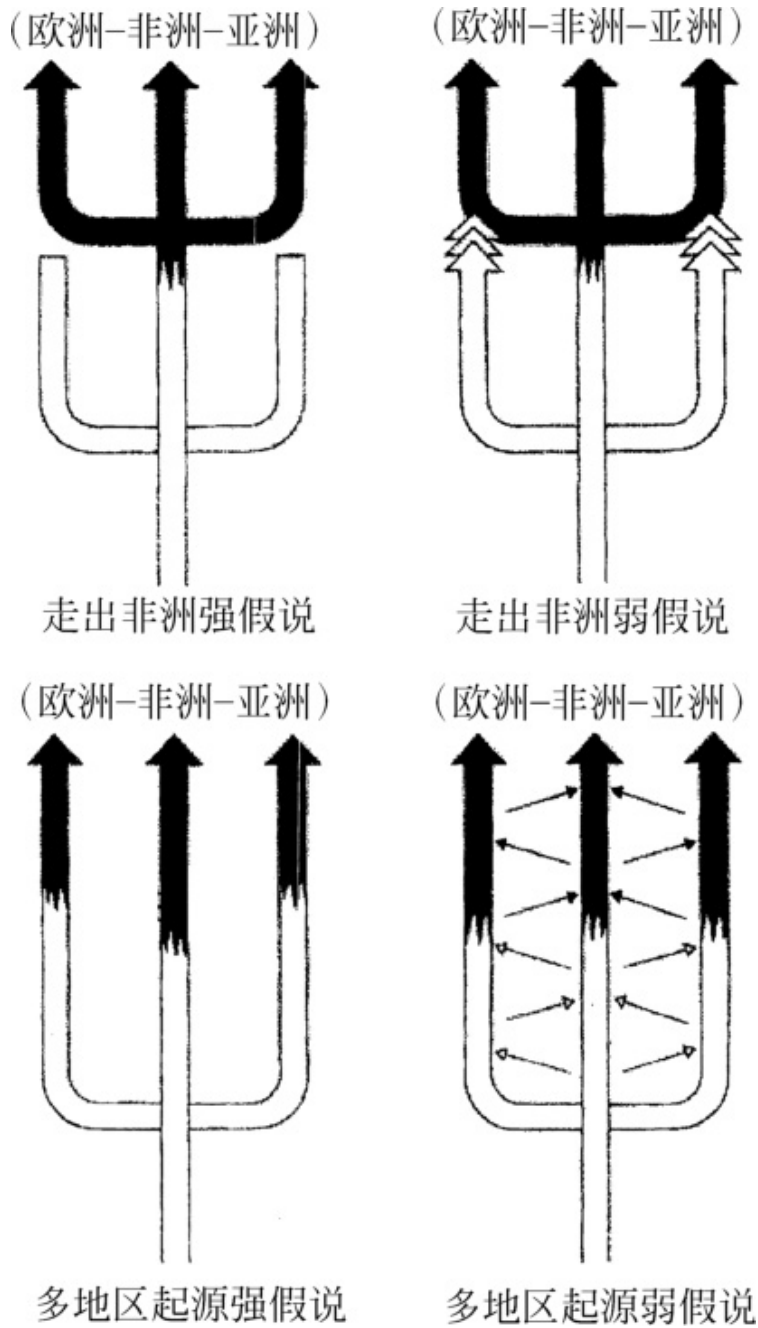

图13　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起源说和走出非洲说的“强”和“弱”模式图解

另一方面的进展发生在英国剑桥大学。这一进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考古学家多萝西·贾洛特（Dorothy Garrod）在那时还是巴勒斯坦的卡梅尔山（Mount Carmel）洞穴发现了类似现代人的化石。利基夫妇和汤普森（均来自剑桥大学考古系）还分别在肯尼亚和埃及发现了似现代人的化石和明显属于古代的石器工具。上述这几处发现开始使视角更加开阔的欧洲考古学家相信，在人类进化的早期和稍晚阶段，欧洲以外的地方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1946年，贾洛特在剑桥大学向本科生推出了“世界史前史”这门考古课程；继任者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认同她的理念，鼓励他自己的研究生到非洲去发掘。关于史前史这个题外话是为了说明，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时候，部分学生已经认同了现代人类进化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可能发生在欧洲之外的观点。

新发现、新的测年数据和分子学证据

在20世纪80年代，来自三方面的证据共同促使一些研究者开始认真思考那个激进的主张，即非洲既不是进化史中的次要场所也不是文化死水，反而可能是现代人类及其生活行为的发祥地。

第一方面的证据是对在黎凡特发现的人类化石重新测定后得到的年代结果。这一结果明确表明，卡巴拉和阿木德的尼安德特人化石的年代并不是早于，而是晚于斯库尔和卡夫泽更似现代人类的化石。卡夫泽更似现代人的化石比明显属于原始直立人的卡巴拉和阿木德化石还要早。这意味着，研究人员不能再用测年证据来支持尼安德特人进化成为了现代人类的假设。

第二方面的证据是，在非洲南部和埃塞俄比亚发现了现代人型化石。1968年在非洲南部克莱西斯河口（Klasies River Mouth）的发现最有影响力。研究人员在这里发现从各方面看都有可能属于现代人的头骨碎片，但是它们却距今约有12万年。在埃塞俄比亚南部奥莫地区基比什河（Kibish）一处地点发现的似现代人头骨的化石也初步显示

来自相似的年代。根据比较不充分的生物年代学证据，奥莫I号头骨的年代为距今约12万年，但最近用同位素年代测定法对奥莫I号头骨测年的结果表明，它的年代还要更早，距今约20万年。在埃塞俄比亚另一个遗址荷图（Herto）发现的一批化石也表明，这些似现代人的化石在非洲存在了15万至20万年。

第三方面的证据并非来自古人类学，而是在将多种分子生物学方法应用于现代人类变异的研究时发现的。同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家的丽贝卡·凯恩（Rebecca Cann）、马克·斯通金（Mark Stoneking）和艾伦·威尔逊（Allan Wilson）于1987年发表了应用了这些方法的开创性研究。出于几方面的原因，该研究集中在线粒体DNA而不是核DNA上。线粒体DNA发生突变的速率远远高于核DNA发生变异的速率，而且在生殖细胞分裂时，线粒体DNA的染色体之间不会像核DNA的那样发生重组，也没有在核内发现的DNA先天的修复机制。这可能导致了它较高的突变速率，也说明了为什么只要线粒体DNA发生突变这些突变就会持续下去。凯恩等人的研究比较了147名现代人的线粒体DNA，其中46名来自欧洲、北非和近东地区，20名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34名来自亚洲，26名来自新几内亚，21名来自澳洲。他们发现了133种不同类型的线粒体DNA，并把它们用最短的树状图排列起来，将所有变量连接的同时把变异的数量减到最低。他们根据研究结果构建的树状图和不同类型线粒体DNA之间的差异在地理上的分布一样，很令人惊讶。这一树状图有一非洲深枝，另一分枝包含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外的人群中发现的线粒体DNA变异。线粒体DNA变异甚至没有跨越这一树型体系。撒哈拉以南非洲分枝的变异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而且大部分的线粒体DNA变异似乎有一个非洲起源。

线粒体夏娃（Mitochondrial Eve）

这些结果表明存在着下面一种或两种可能。一是现代人类在非洲

生存的时间比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长；二是非洲现代人类的人口规模大于世界其余地区的总和。这样就说得通了，因为那里的人越多，那里发生基因突变的可能性就越大。

凯恩和她的同事们在论文中做了其他三点说明。首先，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线粒体DNA的差异不受自然选择的影响（即突变是“中性的”），而且大部分线粒体DNA的差异并没有影响由其编码的细胞机体基因的功能，因此这表明在两种人群样本的线粒体DNA里积聚的一些差别仅仅说明这两种人群经历的独立进化的时间长短。

其次，凯恩等人认为，撒哈拉以南和非撒哈拉以南地区现代人群之间的差别是经过了大约20万年才逐渐形成的，因此他们预测，现代人类大约在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第三，他们声称线粒体DNA的变异分布表明，现代人类从非洲迁徙到旧大陆其他地区的过程中，并没有与遇到的任何一个早期人群有过基因交配。凯恩和她的同事们认为只有非洲的直立人对现代人类的基因库有贡献，并支持世界其他地方的早期人类对现代人基因组没有任何贡献的推论。实际上，他们还声称所有距今小于20万年的人类都来自非洲。

人类的绝大多数的线粒体DNA是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因此，线粒体DNA的进化史实际上是一部母系遗传历史。因此，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研究者，都把凯恩等人的诠释称为“线粒体夏娃”假设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么称呼是因为它的含义之一就是全人类的母亲是大约20万年前的一名非洲女性。我把它称为“现代人走出非洲强假说”（简称为SROAH），但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大部分支持“现代人走出非洲强假说”模式的研究人员现在也支持一个温和的版本。

论战开始

对立态势已然形成：“红色阵营”支持多地区起源弱假说（WMRH），“蓝色阵营”支持走出非洲弱假说（WROAH）。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不支持多地区起源强假说的研究者却倾向于支持地区之

间存在基因流的这一较温和的诠释。而其他研究人员试图用最先进的分子学方法和更严格的统计学技术重现凯恩等人的研究结论时，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仍然表明大量现代人类线粒体DNA的变异起源于非洲，但其中的一些研究证据显示，非洲以外地区的前现代直立人也对现代人类线粒体DNA基因组有贡献。

男性与核基因

一些研究人员一直在想方设法从现代人类线粒体DNA地区差异中找出证据以完善现代人类起源理论，同时，另一些研究小组也开始着手探索基因组。他们特别注意的核基因组的一部分就是来自男性Y染色体的DNA，它在女性X染色体上没有对应部分。因为女性没有与之对应的部分，所以Y染色体上的那一部分DNA在生殖细胞分裂时并不会重组，即，从专业的角度说，它和线粒体DNA都是基因组的“非重组”区域。因此，除了通过男性而不是女性传给下一代外，Y染色体DNA的这个部分同线粒体DNA是一样的。

Y染色体的研究结果和线粒体DNA的研究结果相同。27个Y染色体变异中的21个起源于非洲，并且非洲人Y染色体的变异远多于世界其他地区所有人加起来的染色体变异，因此，线粒体DNA的研究结果不是“昙花一现”。核基因研究也得到许多相同的结果，同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的研究一样，核基因研究也提供了早期人类与现代人类基因型混合的证据。

不管是对线粒体DNA、Y染色体还是对常染色体核基因组的研究，得到的主要信息就是，大部分但绝非全部的现代人类基因都起源于非洲。另一个信息是，非洲在过去的200万年里似乎是人类进化“迁徙浪潮”的源头。首次浪潮是匠人型类群的迁徙，然后是海德堡型类群的迁徙，再后也许是现代人型类群的几次迁徙浪潮，各次迁徒也许看起来没有差别，但各自带有不同的文化传承和技能。现在普遍认为，现代人类是在大约5—4.5万年前走出非洲东部的人类的后裔。研

究者阿兰·邓普顿（Alan Templeton），作出的重要贡献是指出了一系列迁徙的证据，他的论文用了一个恰当的题目叫“不断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 Again and Again'）。

迁徙还是基因流

新基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到达非洲之外的地方：一是人类迁徙带过去的；二是通过异种交配而输入。后者的机制涉及非洲人与旧大陆毗邻地区人类的交配，这些地区的人类又与距离非洲更远地区的人类交配，以此类推。基因就像一场接力赛中的接力棒，被不断传递着。

这是近期现代人类起源理论之一所指的基因遗传模式，被称为“扩散浪潮假说”。这一学说认为，新基因像波浪一样扩散。它与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一致，该研究表明“遗传距离”和实际距离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现代人类起源地和非洲大陆之间只有几英里的最短陆路距离。

非洲之外的现代人类

关于现代人类到达非洲之外的欧洲或任何其他地方的问题存在两种声音。一种关注的是现代人类本身的到达，即发现现代人类最早的化石证据；另一种关注的是现代人类行为的“到达”，即考古专家认为只有现代人类才能从事的活动的最早考古学证据。

毫不奇怪，关于现代人类行为构成的讨论远比对现代人类形态学构成的讨论更加激烈。一旦古人类学家成功逃离把现代人类形态学与现代欧洲人形态学等同的陷阱，他们就很容易辨识出世界不同地区的现代人类。考古学家也承认，现代人类的行为比约4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欧洲的行为更复杂。举例来说，所谓的非洲缺少洞穴艺术被认为充分说明那里不是现代人类行为的潜在起源地。但有两个很好的理由可以驳斥这种说法。首先，非洲确有洞穴艺术，只是考古学家没有努

力地去寻找；其次，非洲的许多地区并不存在洞穴。

欧洲现代人类

欧洲最早的现代人类化石发现于欧洲东南部罗马尼亚的欧亚瑟洞（Pestera cu Oase）遗址，距今大约3.5万年；我们知道，现代人类在大约3万年前就已经到达了英格兰的肯特岩洞（Kent's Cavern）。欧洲目前最早的人类行为证据发现于保加利亚的贝科基洛（Bacho Kiro）遗址和泰姆娜塔（Temnata）遗址，距今4.3万—4万年之间；西欧有许多小于4万年的遗址，这些遗址都有现代人类行为的证据。根据发现地点的不同推测出，欧洲的现代人类与尼安德特人并存了大约1万年或不到1万年。最近发现尼安德特人化石材料的几个遗址，比如法国的圣瑟塞尔（St Césaire）、西班牙的扎法瑞亚（Zaffaraya）、克罗地亚的威迪亚（Vindija）等，年代都在距今3万年左右。

表4　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形态和行为的主要差别

	现代人	尼安德特人
形态		
脑量	大	很大
眉脊	不明显	厚且上拱
鼻和脸中部	平	凸出
颅顶	直边	鼓边
枕叶区	圆	鼓
门齿	小	大
胸腔	狭窄	宽大
骨盆	小且窄	大且宽
四肢骨	平直	弯曲
四肢关节	小	大
手拇指	短	长
骨和牙齿的发育	慢	快
行为		
石器	小且专业化	大而较原始
复合工具	有	无
有形的骨工具	有	无
个人装饰品	有，且制作精良	无

亚洲萨乎尔和大洋洲的现代人类

研究人员已经指出现代人类在4万年前可能就已经占据了一部分或大部分萨乎尔陆地，被占据的大片陆地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大陆和塔斯马尼亚岛。由于大量的水被冻结在极地的冰盖和冰川中，现在被淹没在海面以下的大陆架的部分陆地应该曾连接着如今隔水相望的这几片陆地。如果现代人类在4万年前到达了萨乎尔，那么他们之前必定也到过巽他（Sunda），即包括东南亚大陆和现今组成印度尼西亚群岛在内的大片陆地。

如果在这一地区的昂栋、爪哇发现的晚期直立人的时代正确的

话，那么现代人和晚期直立人有一段共同存在的时期。但是，直立人的“矮人”版弗洛里斯人在弗洛里斯岛一直生存到距今1.8万年前，这一发现又提醒人们时间上的重叠并不意味着生存的地域也相互重叠。不同种类的人类可能住在不同的岛屿，而且不一定有过相互接触。

巽他的这些早期现代人类肯定已经能够用竹排或其他类似竹排的工具出行，并能够设法在海上生活至少几天以横渡巽他和萨乎尔之间的开阔水域。到3.5—3万年前，太平洋地区的现代人类能够像海员般技术熟练地到达很多偏远的大洋洲岛屿，包括帝汶、摩鹿加群岛、新不列颠和新爱尔兰。

萨乎尔现代人

现有的人类化石记录表明，现代人类是唯一进入萨乎尔地区的人类，所以不存在与早期人类共存的问题。人类最初迁徙到澳大利亚的时间还不太清楚。化石证据表明，他们可能在5万年前到达那里，但在4万—3.5万年前他们肯定是在那里的，那时的气候比现在潮湿多雨。

澳大利亚的现代人类化石显示出了大量的形态变异。生活在蒙哥湖（Lake Mungo）周围的人类有尖峭的前额、高高的脑颅和扁平的脸，而生活在维多利亚北部的科斯旺普（Kow Swamp）和库布尔河（Coobool Creek）周围的人类则有更倾斜的前额、较低的脑颅和突出的脸。一些研究人员把这些形态差异解释为这里不只发生过一波迁徙，但其他研究人员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新类群在一大片新的领土上，如澳大拉西亚，扩散时出现的一种变异。

新大陆的现代人类

从旧大陆到新大陆有三条路线：一是穿过白令海峡；二是从阿留申群岛的一岛到另一岛；三是横渡大西洋。今天所有三条路线都需要

海上航行，但在过去4万—3万年间的几个时期里，极寒天气造成海平面下降且形成了厚厚的冰面，这就封闭了白令海峡却把阿留申群岛中的某些群岛连接了起来，结果使横跨大西洋变得比较容易。这三条路线的难点在于沿途要经历严寒的考验。

证据表明，现代人类最早涉足北极圈的时间是在距今2.7万年前，到距今1.5万年前人类已开始在那里长期居住。在此期间，现代人类有可能会随猛犸畜群的迁移而不知不觉间冒险闯入新大陆，但我们在阿拉斯加没有发现任何早于1.2万年的现代人类的生活遗址。传统的观点认为，移民沿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西部相对无冰的走廊向南行进，然后很快扩散至美洲北部、中部和南部。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人类进入新大陆是沿着假定的南线。一些新大陆的考古学者据此提出其他说法，包括认为新大陆的第一批居民可能是直接从欧洲过去的这一观点。

现代人类在新大陆中最知名的考古学证据是克洛维斯（Clovis）文化，以鲜明的石制工具——克洛维斯尖状器为特征。最古老的克洛维斯文化遗址可以追溯到约1.1万年前，发现遗址后不久，在北美未冻结的大部分地区发现了相当多的克洛维斯尖状器工具。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考古学家公认克洛维斯遗址是新大陆上现代人生存的最早证据。但最近，研究人员声称，他们已找到了比克洛维斯遗址更为原始的石器工业。在北美发现的这些前克洛维斯遗址中，最知名的是阿拉斯加的杜克泰（Duktai）、宾夕法尼亚州的麦道克劳夫特（Meadowcroft）、弗吉尼亚州的仙人掌山（Cactus Hill）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塔波（Topper）。南美最知名的遗址是委内瑞拉的泰马-泰马（Taima-Taima）、巴西的佩德拉富拉达（Pedra Furada）和智利的蒙特沃德（Monte Verde）。这些遗址中的大部分是通过相对测年方法确定的时代，只有麦道克劳夫特和蒙特沃德这两个遗址的年代比较确定。麦道克劳夫特遗址的放射性碳测年表明，人类至少在1.4万年前就开始在这里生活了，也可能早到2万年前。

蒙特沃德遗址提供了在南美洲保存很好的距今约1.25万年的现代人类行为证据，甚至保存有把兽皮系到杆上的细绳，以及能够容纳20

—30人生活的住所的遗迹。蒙特沃德常年有人居住，因此，它是人类在新大陆半永久性居住的最早证据。

假设克洛维斯人是第一批在新大陆生活的居民，那么一个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是，多数克洛维斯文化遗址是在美国东部及加拿大发现的。如果克洛维斯人是跨越了当时的白令陆桥，那么如何解释遗址的分布呢？

来自史密森学会旗下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丹尼斯·斯坦福（Dennis Stanford）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说。他认为，新大陆的第一批居民是来自西班牙的现代人类，并指出伊比利亚的梭鲁特（Solutrean）文化传统和克洛维斯工具组合中的石片之间有相似性，这说明居住在北美的现代人类源自“伊比利亚”而不是“西伯利亚”。

现代人类进入新大陆很可能有过几次迁徙潮。不同时期的不同群体迁移并定居下来，每一个群体都对新大陆居民在遗传和文化的多样性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无论现代人类何时、从何地以及如何到达新大陆，他们都迅速地扩散到了不同自然环境中。最近宣布在墨西哥发现了距今4万年的人类脚印，这给本来就有争议的论题又增加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说法。

需关注的几点

- 研究人员希望在非洲找到更多的距今30万年以内的遗址，并设法可靠地确定其年代。一些研究人员确信，直立人进化成智人前，先演化成了颅骨类似赞比亚的卡布韦人和埃塞俄比亚的博多人的类群。不过，这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释。研究人员还需要在靠近非洲的地区不断地寻找人类化石证据。
- 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不断改进，更多的基因将会被采集，并且在每个地区都会采集大量的个体样本。研究人员将重点关注核基因，以确定非洲以外的前现代人基因对现代人类基因库的贡献是微乎其微还是相对重要。
- 对人类进化晚期阶段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仍不清楚形态和行为之间

有什么联系。头骨形状的变化与文化的改变有联系吗？例如，现代人类在什么阶段开始使用复杂的口语？我们仅仅通过观察脑的形状和大小就能辨别出他们已达到那个阶段了吗？朝着制作小而复杂的石制工具的转变是手进化的结果吗？或者，这些创新完全是认知的结果吗？

我们是谁，都是线粒体夏娃的后代还是拥有不同的远祖？我们来自何处，是一次次走出非洲还是在多地区各自繁衍生息？为什么与我们血缘最近的是黑猩猩而不是大猩猩？在茂密的生命树图谱上我们的位置又是在哪里？

本书从地质学、分子生物学、解剖学、形态学等诸多研究角度抽丝剥茧，探寻人类演进之谜。

百科通识文库

49

走出黑暗

——人类史前史探秘

克里斯·戈斯登 著

陈炳辉 陈星灿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走出黑暗

——人类史前史探秘

克里斯·戈斯登 著

陈炳辉 陈星灿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15-5161**

Prehistor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3.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3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Chris Gosden 2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黑暗：人类史前史探秘 / （美）戈斯登（Gosden, C.）著；陈炳辉，陈星灿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44-8

Ⅰ．①走… Ⅱ．①戈…②陈…③陈… Ⅲ．①原始社会 - 世界史 - 研究 Ⅳ．①K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771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44-8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绪论
第一章　何谓史前史？何时为史前史？
第二章　史前史的诸多问题
第三章　人类的技能和经验
第四章　各大陆的史前史
第五章　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
第六章　未来的史前史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克里斯·戈斯登，牛津大学皮特河博物馆馆长，并且在牛津大学任教。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太平洋史前史和欧洲的晚期史前史。

译者简介

陈炳辉，台湾大学人类学学士及硕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发表论文20余篇。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工作。论著有：《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 - 1949）》、《考古随笔》等。

图目

图1　博克斯格罗夫原人猎马图
图2　正在叙述的翁卡
图3　B类线形文字示例及其翻译
图4　公布布里克瑟姆洞穴中考古发现的首次报道，该洞穴中后来发现石器与灭绝动物伴存的证据
图5　史前史历经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
图6　过去500万年间的人类进化系谱图
图7　戴着项链的宋格海尔墓葬人骨
图8　胜利者的进化
图9　人类散布全球的迁徙过程
图10　智利青山遗址的复原
图11　典型的克洛维斯石矛
图12　阿布胡赖拉遗址的人类活动年表
图13　世界各地被驯化的部分主要动植物
图14　尤芬顿的白马山
图15　斯堪的纳维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燧石匕首
图16　塞浦路斯的德黑尼亚出土的红色板状磨光陶制的双头人形塑像，展现出了个体的面部特征与首饰装饰
图17　下维斯特尼采遗址的三人墓葬
图18　太平洋地区
图19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爱尔兰岛上，正在发掘中的马顿库普库姆洞穴

绪　论

史前史如此漫长，要为其撰写一个简短的导言确非易事。人类的起源目前可追溯到600万年前，这段时间涵括了许多不同的史前时代和地质时代。史前史是现在的我们试图去理解过去的诸多遗迹遗址、人工制品和地形地貌，并将我们已掌握的考古证据置于其同时代的自然和社会双重背景之中加以考察。在讨论到过去的各个时代时，难免涉及一些常用术语，为了避免在文中一一解释，我先在这里进行一下概述。

现在我所坐的位置处于英国南部的中心地域，脚下的地层中包含许多沉积物和考古学证据，按照下列大致顺序排列。在表土层和底土最上面1米厚的土壤中的考古证据来自过去1万年间的各个时代。首先是被当地称为“中石器时代”的时期（公元前8000—前4000年，“公元前”意为“基督前”，指传说中耶稣基督诞生以前），当时人们生活在现代气候条件下，以采集和狩猎为生；接下来是新石器时代（公元前4000—前1800年），这时出现了最早的农民；再后来是青铜器时代（公元前1800—前800年），是人类开始广泛使用金属的第一个时代；最后是铁器时代（公元前800年—公元43年），史前史于此结束。比1万年以前更早的时期，我们称之为“旧石器时代”，向前可一直追溯到人类直系祖先的出现。在过去的200万年间，地球经历了多次大幅度的气候冷暖交替的时期，一般称为“冰川时期”。在下一章中我们会谈到，这一时期的古迹主要在河流的砾石层、洞穴沉积物和其他相对罕见的古老沉积物中发现。目前来说，我们认为旧石器时代开始于600万年前的非洲。约180万至100万年前，人类最早的直系祖先从那里扩散到欧亚大陆和东南亚地区（请参阅图6中人类进化的系谱图）。在英国，年代最久远的考古证据也没有早于这个时代。人类演化到这个阶段时被称为“直立人”——一种拥有有限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文化、身躯粗壮、脑袋较小的早期人类（不过他们的生活可能并不像我们描述的那么乏味）。由于过去200万年间所谓的“冰川时期”的气候波动幅度大，在我脚下的泰晤士河的砾石层中的遗迹既包含适应寒冷气候的动物群（如猛犸象、长毛犀等），也有喜欢温暖气候的生物

——其中也包括可能只在温暖时期才在欧洲居住的早期人类。但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肇始于4万年前，在1.8万年前达到顶峰的最后一次冰期。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欧洲生活着两种人类——即我们这种现代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后者是一种可适应严寒气候的人类，从英国到中亚地区都曾发现过。其灭绝的原因已经成为人类演化史上的最大悬案之一：到底是我们直接消灭了他们？还是与他们的竞争间接导致了他们的灭绝？抑或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环境变化而最终灭绝？在最后一次冰期的冰盛期，北极的冰盖一直往南扩张到了泰晤士河流域，其南部变成了冻原，而开阔的热带草原则接着向南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地区。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被冰雪覆盖，南半球冰原的扩大则导致塔斯马尼亚、澳洲大陆和阿根廷等地形成了冰川。由于地球上大部分水都结成了冰，导致全球海平面下降，使得英国和欧洲、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婆罗洲和马来半岛等地连接了起来。此时热带地区的干旱使得沙漠、热带草原面积扩张，并在赤道雨林地区造成植被缺失。随着地球气候在公元前1.4万年后开始回暖，冰川消退，南北半球的植物、动物、昆虫和鸟类皆移居到更高纬度的地带，并重新占据了以前的沙漠地区。陆地消失在海平面上升的海洋之中，这在东南亚地区尤其明显，而延绵的雨林则在热带地区形成一些屏障。这种气候冷热交替的循环在过去200万年间重复发生了好多次。

虽然现代智人的历史只占整个人类历史的一小部分，却是我们最感兴趣的焦点。我们的祖先大约于12万年前在非洲出现，约9万年前迁徙到中东，7万前又迁徙到印度次大陆和其他地区。欧洲和澳洲在大约5万年前被现代人占据，这也是人类第一次移居澳洲。人类向大片陆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迁徙发生在2万至1.5万年前的美洲。在此之后，人类最后一批较大规模的迁徙的目的地是岛屿地区——加勒比海和地中海群岛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被人类永久占据；公元前1500年之后，人类到达遥远的太平洋群岛，而在距今大约1000年前，北半球的冰岛和南半球的新西兰成了人类到达的最后一片面积较大的陆地。

史前史的年代学框架，即所谓的“三期论”，主要是在欧洲发展起

来的。石器时代由于农业的起源被划分为两个阶段——旧石器时代（又分为早、中、晚三期）及紧接其后的新石器时代。一般认为，在青铜器和铁器这两个金属时代里，部落社会得以发展，既拥有了复杂的农业生产模式，又具备了建造山丘堡垒之类遗迹的能力，还可以制造出既能用来使用又可用作远途交换的金属器物。三期论适用于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日本除外），但东南亚地区却不尽然。澳洲和太平洋地区只经历过石器时代，其第一批金属物品是欧洲人引入的。非洲的青铜时代可能在铁器时代之后才出现，而美洲只生产了铜器，却略过了青铜器和铁器。美洲人为了说明自己与众不同的历史，发明了他们特有的专门术语，有时专门用于分析中南美洲的文明与国家的发展（如远古时代、成形时代、古典时代等）或北美洲各地的发展时序（如森林期、阿纳萨齐期）。自20世纪60年代起，人类在确定精确年份方面，尤其是通过放射性碳定年法取得巨大进步，为史前史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使我们得以探究公元前1.8万年或公元前5000年时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精确年代的测定并未解决我们所有的年代学问题，但已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事件的发生时间转移到了发生原因上面。

精确年代的测定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进化过程的看法。例如，在世界许多地区，农业的出现以往常被视为戏剧性的突发事件，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农业的发明其实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公元前1万至3000年间，欧亚大陆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逐渐完成了对绵羊、牛、猪、小麦、大麦和燕麦的成功养殖，其间过程缓慢，手段复杂。水稻可能是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由中国最先栽培，历数千年才传到了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地区；非洲的小米和高粱、美洲的玉米和豆类作物的传播也无不如此。实际上，现在许多人认为农业的起源已不再是一个关键问题，了解人类整个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历史及其变迁过程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包括动植物的驯化，也包括对石器、陶器、篮篓、纺织品和金属的生产和使用。在过去的1万年间，人类利用更古老的技术和资源为自己创造了一连串纷繁复杂的世界，但这些问题已超出了导言的范畴，我将留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讨论。

第一章

何谓史前史？何时为史前史？

平原上有一匹马倒毙在地。一群原始生物紧紧将其围住，他们有的狠狠盯住绕着死马转来转去的鬣狗，不时扔石块驱赶它们，有的则紧握木矛，全都专心致志，不敢稍有懈怠。

还有6个成员正埋头打磨燧石。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些不错的燧石块，是从当地不远处的海蚀崖上剥落下来的薄石片，然后将它们粗略打磨成了手斧的形状。而此时，他们每个人都在打磨一个准备好的石块，手法娴熟，技艺精湛。其他食腐动物和食肉动物都离他们远远的——它们之前曾与这些原始人打过交道，学会了要保持距离。待有人第一个将如剃刀般锋利的、被我们现在称为“手斧”的人工制品打磨完毕后，他们就迅速爬上马的尸体，开始分割马肉。他们从马的腿部和臀部割下大块的连骨肉，等骨头一露出来，就会把它们敲碎以吸食骨髓。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场面：大人帮忙喂小孩，年轻人照顾老年人，不过那些较为羸弱的成员可能只能抓住什么就吃什么了。有些肉当场就已吃掉，而精选出来的大块肉则被他们扛到悬崖顶上的营地里慢慢享受。让我们再想象一下接下来的情景：他们可以休息上一两天，换一把新的矛，挑选一块合适的马骨头来制作用于打磨燧石的新锤头，或者陪他们的孩子玩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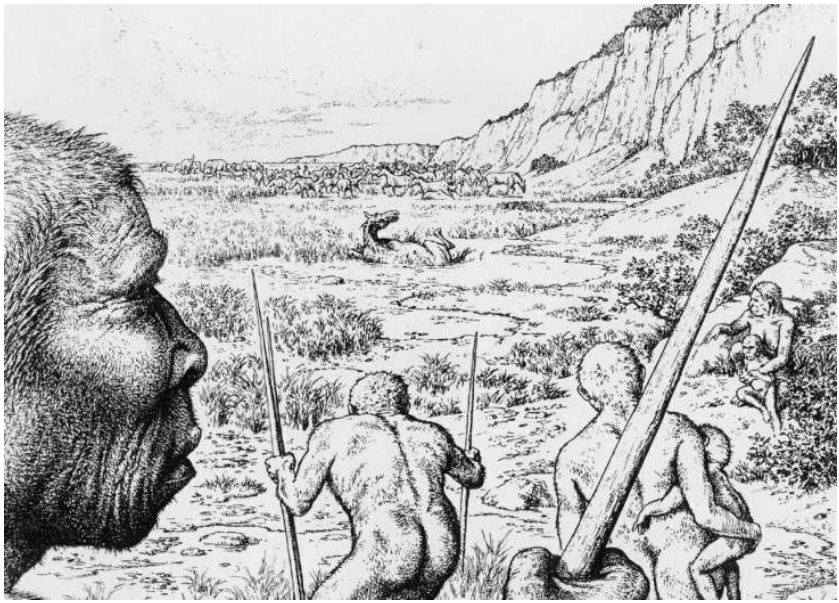

图1　博克斯格罗夫原人猎马图

上述情景发生在一个50万年后被称为博克斯格罗夫的地方，靠近当今英格兰南部的奇切斯特。故事的主人公们绝不会想到他们的踪迹会因被坍塌下来的悬崖沉积物迅速掩埋而保存至50万年后。没有任何口口相传至今的故事可以为我们讲述这个过程和数不胜数的其他事件，但我们还是能给出不少问题的答案。由于博克斯格罗夫是一处极为与众不同的遗址，我们从中能够确切了解的事物多得出人意料。精细的考古发掘和遗址记录已经揭露出6处（或许7处）打磨燧石、制作手斧的不同地点。考古学家的工作好比拼合一幅三维拼图，但工作顺序跟早期原始人恰好相反。早期原人是将一大块燧石敲去多余的碎石片，制成一柄大手斧，而考古学家则是把碎石片重新拼凑在一起，以拼成一块完整的石块，只不过它的中心部分——手斧本身不见了。石块中心的空洞让我们想到，在世界上某些地区，生活年代更近的石器制造者已经不再将他们的工作视为制造一件石器，而是将石器从四周包裹的石头中解放出来。这些手斧自从被“解放”出来，就躲过了考古学家的探寻，至今未能寻得。也许它们就躺在同一处遗址的其他地

方，被一个饱食完肉食的原始人在寻找安全的歇身之所时随手丢在了那里。事实上，在博克斯格罗夫出土了许多近乎崭新的手斧，其中一些通过显微镜可以观察出曾用作屠宰的痕迹。

马骨头本身则道出了它们自己的故事。首先，这种马是迄今为止在英国境内发现的体型最大的真正的马种，对于当时的狩猎群体而言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猎物。而那些散布在燧石碎片之中的马骨显示出了屠宰的证据：原始人在剔骨割肉的过程中，在骨头表面留下了细微的划痕。为了取出骨髓，骨头也被砸碎了，可能是用燧石锤子砸的。显微镜下的观察显示，骨头上还有动物的啃咬痕迹，说明在原始人离开之后，鬣狗就凑上了前来。我们可以得知不同动物来到马尸旁的先后顺序，因为动物的齿痕交错出现在既有的燧石屠宰划痕之上，这说明鬣狗是在原始人离开之后，才上来咬啮骨头（在此期间还不经意地把一些燧石碎片弄散了）。在生活在海岸地区的生物群体里，鬣狗并不占绝对优势。虽然它们也是有组织结构的社会性动物，但仍不是拥有工具、智慧和组织的原人的对手。

我们是怎样知道他们使用了矛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推测带有一丝不确定。我们在一块马的肩胛骨上发现了一个浑圆的孔洞。将其与在现代骨骼上进行实验所做出的孔洞进行比较，可判断该圆孔只可能是由高速飞行的尖状物穿刺而成，而这与从远处以极快的速度投矛击中该马的推测并不矛盾。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语言呢？一个无关紧要的原因是，马骨在历经50万年的埋藏之后，骨质变得疏松，使我们对于孔洞的性质和成因有些疑问，但我们可以非常确定这是一处伤口。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事情都取决于这些早期人类是否狩猎。很多人认为狩猎是于大约5万年前在充分进化后的现代人类中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早期人类没有足够的社会协作力、技术或才智从事狩猎，而只能拣食大型食肉动物吃剩的猎物，或采集植物充饥。要弄倒一匹高大健壮的马匹，将其杀死并屠宰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让我们禁不住思考他们究竟具备怎样的团队组织、身体技能和敏锐头脑。如果只具备石器时代的技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去做的。

我们的人性存在于社会协作中，也存在于身体和头脑对外界作出的灵活反应之中，而所有这些能力的起源都令我们着迷。由于5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似乎就已拥有人类的很多特质，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有关人类存在的某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早期人类在体型上与我们大不相同，那么身体和大脑的本质（简言之，即生物学）与文化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呢？他们的物质文化内容似乎缺少装饰和风格方面的元素（至少留存至今的的确如此），而这些元素却是过去5万年来已知的现代人类物质文化所具备的。这个问题重要吗？这是否意味着早期人类对于物质和社会的理解不够全面深刻？他们的物质文化缺乏明显的风格和象征性内容，这是否表示他们缺乏最为复杂的符号系统——语言？他们之间是否只靠肢体动作、咕噜做声与分享食物进行沟通？或者他们之后会坐下来讨论一下这次猎马行动，说上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当然，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并不知道，而且永远也不会确切地知道，但却是最让我们兴趣盎然的。

考古发掘经常被描述为从已知到未知的探索过程，或是基于遗址区域中已了解透彻的沉积物和层序去研究待解谜团的工作过程。创立史前史的推理过程也遵循了类似的顺序。我们从分析打制石器的行为实质和被屠宰猎物的残骸开始，过去一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再现技术让我们对这方面的分析有相当把握。接下来，我们由那个已经复原、中心缺少了手斧的燧石石块分析出手斧是如何手工制作出的，分析这件失踪的工具曾用于切割马肉的功用，继而分析出这些行为背后的社会和身体技能的本质，以及对个人与社会产生的种种影响。为了对自己及他人负责，史前学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以决定自己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跨越“某事比较确信”和“某推论的证据不够确实”之间的界限。我们迫切想要了解的问题永远属于最不确知的范围，因而如果研究方法过于谨慎，我们就会困在研究石器技术和屠宰方法这类虽然有趣却琐碎无比的问题上止步不前。或许我们可以把谨慎抛到一边，尤其是在像本书这样的综论性著作中，可以追求更宏观的思考，逐渐偏离那些石头和骨头分析者所能提供的可靠证据，激起他们理所当然的鄙视——“你绝对没有办法证实那么荒谬大胆的想法。”

撰写史前史的关键在于掌握“平衡”。漫长的史前史（目前已知大约有600万年的时间）向我们抛出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我们这些既是个体又是群体成员的人类呢？证据的缺乏和搜集难度使我们尴尬地认识到，了解过去所需的想象力很容易会沦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很容易就会让我们把对当今世界的常识观生搬硬套进史前史的大背景中去。撰写史前史，一方面要基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基于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来并研究透彻的出土物，另一方面则要求我们要对自身的偏见和想当然的思想具有批判意识。史前史研究的核心矛盾就是，我们之所以对过去感兴趣是因为它不同于现在，因此研究史前史可以让我们对过去与现在的人类获取一些至关重要的新见解；但也正是因为史前时代的不同，我们就无法像认识当今世界那样去解读史前史。

假如有一台时光机可以将我们带回到50万年前博克斯格罗夫的海边浅滩上，我们会为自己目睹的一切震惊不已。这些原人群体的行为方式并不是我们马上就能理解的（他们的行为既不同于猿类，也与完全进化的现代人有别），而我们可能更想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不是对他们进行研究。他们会让我们加入其群体，还是视我们为威胁？对此我们如何能在不招致杀身之祸的前提下获知呢？双方是否都会认识到彼此之间具有一些相同的人性，从而将我们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呢？或者他们是否会觉得与我们相比，鬣狗作为他们生活中一直存在且彼此熟悉的一部分，与他们的关系要更加密切？如果我们加入了该群体，我们能掌握什么造福群体的有用技能吗？我不敢肯定我可以学会用一支紫杉木矛射倒一匹奔跑的马，或制作一把好的手斧，或是在鬣狗靠近之前切割马肉，但也许我有能力照看小孩。马肉中的石砾对我们嘴里的补牙材料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对这个群体应该担负什么责任？我们是否应该告诉他们，英国史上最严酷的冰川寒流会迫使他们的后裔离开这片土地？或是建议他们食物烧熟了会很好吃？当我们回到现在后，媒体和学术界成员一定都会冲上前来，观看我们详细的实地记录和录像片段，但50万年前的生活片断就一定能比考古学家提供的断断续续却更为长久的历史说明更多的信息吗？所有这些问题都很难有明

确的答案。

博克斯格罗夫遗址把我们带回到了欧洲史前史的早期阶段。它一度称得上英国年代最早的遗址（现已发现有些遗址的年代可能要比它早一倍）。《时代》杂志还把该遗址出土的一根胫骨描述为“第一个欧洲人”存在的证据。当然，迄今为止，它还是如此早期的年代中保存最好、发掘技术最高的一处遗址。显然，那个年代没有任何语言和文字的记录留存下来（在我们假设的时光旅行者缺席的情况下），这就是史前史的定义。史前史就是语言和文字出现之前的历史。史前史是我们对实物证据分析得出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像有了语言和文字之后那样对史前史进行各种详细描述，那么史前史应该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出来呢？史前证据在年代上的跨度和内容上的宽度，是否能够弥补我们由于无法了解史前人类的日常生活、思想与感受而对他们的了解所缺乏的深度呢？这些就是接下来我要努力阐明的核心问题。

终结史前史

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史前史的可能面貌，但尚未明确它的时间问题。博克斯格罗夫遗址为我们了解英国的远古时代打开了一扇窗。尤利乌斯·恺撒在距离博克斯格罗夫不过几英里远的英国南部海岸登陆，无意间宣告了英国史前史的结束。在《1066年及以后》一书中，两位作者在记述令他们记忆深刻的英国历史（只包括大多数人能够记住的时间和事件）时说道：“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年份是公元前55年。那一年，尤利乌斯·恺撒（一位值得纪念的罗马皇帝）和成功入侵这片群岛的其他人一样，在赛尼特岛登陆。”恺撒当时并非皇帝这个事实并不影响这一说法总体上的正确性，即英国历史断断续续地开始于恺撒对其此次入侵的描述。英国这一原史时代只有到了后来的罗马时期才有了更为全面的历史记载，但即便那时仍有很多生活领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叙述。虽然与美索不达米亚这种在早于恺撒入侵3000年前就已经有历史的地方相比还是很晚，但英国史前时代的终结要远远早于世

界上其他许多地区。在一些地方，譬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史前史的结束仍存在于如今最年长的老人的记忆中。

翁卡当时被吓坏了。我应该让他亲口描述（通过翻译）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的原话能保留下来的意义非同一般。

> 当白人的第一批飞机到来时，我正在小溪边上。当时我身边还有几个人，有老人也有小男孩，大家都在打制石斧。我以为听到了某种有袋类动物呼啸而过，长着蜥蜴一样的尾巴。我们穿过矮树丛追踪那个声响；它好像一直就在我们前面，但我们却追不上它。然后我们抬头看，发现它在天上。这时我们说道："这是一种巫术，是来攻击我们，把我们吃掉的！"大家开始议论纷纷：真是巫术吗？还是一只大犀鸟或老鹰呢？还有人说，那是发疯的雷电从天而降。然后它消失了，大家说过后一定会弄明白它到底是什么……结果过后我们遇见了吉姆·泰勒本人（泰勒是陪同米克·莱希和丹·莱希这两位黄金勘探者进入新几内亚高地的一名政府官员）。他一路走过来，希望我们能给他为数众多的搬运工们提供一些补给。大家纷纷拿来了甘蔗、甜薯、香蕉和猪。他从长裤口袋里掏出一枚大大的带斑点的货贝给大家看，那是我们觉得非常珍贵的一种贝壳。大家说："啊！他有一枚很大的货贝，是从他的屁股里拿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初次与白人打交道的情形。

对于翁卡和卡韦尔卡部落的其他成员来说，他们的史前史终结于1933年3月8日上午10点。那一刻，莱希的探险队正坐着一架租来的德国容克双翼飞机，首次飞过新几内亚高地上空，探寻潜藏的金矿地点。

两周之后，他们走进了人口密集的新几内亚高地，是来到这里的第一批白人，并在此过程中终结了该地区的史前史。翁卡从事的石斧制造业恐怕要在卡维尔卡部落中消失了，因为石器不再是砍伐工具，已经被钢制品代替；也不再当做一种婚娶聘礼，已由现今普遍的海贝所替代。米克·莱希用一台16毫米镜头的电影摄影机拍下了这个史前史终结的全过程。他不仅拍了数小时的影片，还用35毫米镜头的莱卡相机拍摄了不下5000张照片。这些影像资料，连同当地土著对于这些事件的回忆，后来被安德森和康诺利加工成了一部名为《第一次接触》的电影。

大多数地区的史前史并不像新几内亚高地的那样戛然而止。新几

内亚内陆的各个族群属于世界上最晚一批被载入史料的群体。人类史料的记载早在5000年前就开始了。人类已知的最早文字形式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乌鲁克的恩娜神庙遗址（在今伊拉克境内）。这种文字以“印章”的形式呈现，就是表面刻有印记的中空泥球，通常还会有若干小的泥土圆币。不久后，这种印章记号就改刻到了泥土平板上，虽变化多端，但依然可以辨认出就是诞生于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楔形文字的前身。这种印记最初是象形的——按照某种格式来表示其指代的事物的小图画，且指代的大多为动植物。最早的文字源于影像而非声音。表音的音节文字以语音音节为基础，诞生过程缓慢，却不仅能够表达图像所不能表示的抽象概念，也能够表达语音。直至公元前2300年，阿卡得语取代苏美尔语成为主要的口语形式后，表音文字才真正开始流行。最早的文字书写并非用于诗歌创作或其他有创造性的表达形式，而是出于会计工作的需要，比如记录动植物产品和手工艺品从生产到交易的各个环节。这也正是史前史让人一见倾心之处——要知道这可是在会计这个行当风靡全球之前的事情。再后来才出现文字记录下来的史诗，其中《吉尔伽美什史诗》堪称留存至今的最古老的诗篇。其他地区的文字也大致在相同的时代发展起来，不过可能都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埃及的象形文字与楔形文字形式迥异，但有证据显示其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字的影响，且并无任何迹象表明还有比美索不达米亚“印章”文字诞生时期更早的文字。伊朗的埃兰语文字曾受到楔形文字的启发，而这两种文字或许都给印度河流域（今巴基斯坦和印度地区）的早期文字带来了影响。中国的文字显然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但亦使用了象形文字；中美洲地区的一些群体，如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也一样。历史并非始于一个单一事件或过程，而是出于多种原因才逐渐拉开序幕。

图2　正在叙述的翁卡

史前史缓慢结束的原因不一而足。由于最初的文字是为了记录来往账目，大部分生活内容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很少真正进入史料记载。家务安排、童年情境、男女关系、人神关系、日常工作和休闲等方面都只能根据后来时期的情况加以重构，再用来理解早期历史的情况。早期象形文字缺乏抽象概念，这意味着在文字出现后的最初1000年里，我们试图通过文字理解抽象的哲学概念或爱恨等情感表达方式的愿望皆无法得到满足。在许多地区，已经出现文字的时代还穿插着人们不能读写的“黑暗时代”。大约公元前1600年开始出现的米诺斯象形文字最初是由迈克尔·文特雷斯利用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密码破译技术破解成功的。这种文字是象形文字，看起来像希腊文字的一种早期形式，这表明从青铜时代晚期一直到现代，文字一直长期存在着延续性，这令许多人大吃一惊。生活在克诺索斯之类的宫殿里的米诺斯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一样，也痴迷于列出物品清单，把生产和交易方面的琐事巨细靡遗地记录了下来，记录的形式让人觉得眼前一亮并惊叹不已。我们从中可以得知很多有关饲养绵羊、纺织和锅碗瓢盆等方面的内容，却难以一窥人们的生活状态。

后来，大约公元前1200年，这里的文明中断了。克里特岛和希腊大陆上的宫殿倒塌，文字记录的需求也随之消逝。人们又重新回到史前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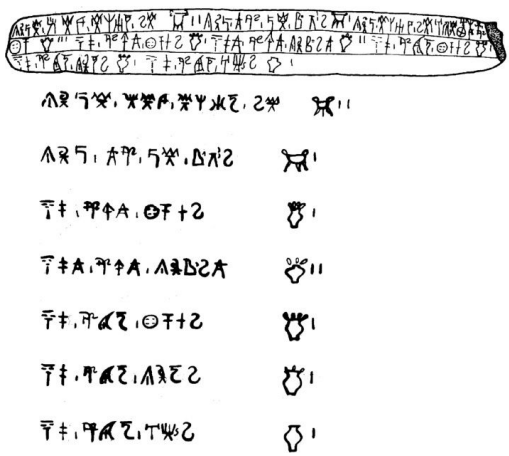

文字说明：“两口克里特岛工艺打造的三足锅，ai-ke-u 类型；一口三足锅的其中一足上有一个（？）把手（？）；一口克里特岛工艺打造的三足锅因足部烧毁而无法使用（？）；三个（？）酒罐；一只有四个把手的大号杯子；两只有三个把手的大号杯子；一只有四个把手的小号杯子；一只有三个把手的小号杯子；一只没有把手的小号杯子。”

图3　B类线形文字示例及其翻译

到公元前8世纪，文字又重新出现。不过这次延续下来的是希腊

音节文字（从腓尼基文字而来），虽历经发展演变，但成功流传至今。与之前出于会记工作需求写下的B类线形文字不同，我们终于听到了诗人的吟颂。有关诗人荷马本人及其作品仍存有不少争议。比如，历史上荷马是否确有此人，还是只是为了将诸多传统诗歌成集而冠以的虚构人名？《荷马史诗》中的故事究竟从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早先青铜时代的世界观？还是更多反映了写作时期的观点？但我们能够肯定的是，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流传至今，并和后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一道，成为构建西方文化的基石。虽然古代历史传统后来历经罗马时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重塑和革新，虽然亚里士多德对欧洲的诸多影响是借助阿拉伯世界产生的，但从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直至今日，文字确实得以代代相传地延续下来，这种情况在更早的时期并不存在，因此那时的文字也就需要重新发现和破译。文字系统的延续和中断使我们认识到文字的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因此并非所有历史时期留下的历史记录都是同一类型。在文字出现后的大部分时期里，唯有精英阶层才有读写能力，因而文字记述下的多是他们的旨趣和世界观。对于芸芸众生，我们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历史时代开始前有一些模糊的历史时期，介于其与史前时代之间，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原史时代”。例如，尤利乌斯·恺撒在公元前55年和54年对英国发起的两次入侵期间均以失败告终，他在此期间对英国南部的记述即属于这样的时期。虽然“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听起来是一位艺术大师发出的令人动容的华丽感慨，却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也缺乏精准的历史信息。因此我们不必对这位（未来的）胜利者的豪言壮语的字面意思煞费苦心。更有意思的可能是古希腊地理学家皮西亚斯于公元前3世纪由高卢到达英国的旅行记录。虽然他的记录并没有存留至今，但人们已煞费苦心地通过间接资料成功重现。另外，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印加人没有文字，只靠结绳记事的传统（被称为“结绳语”）呢？结绳语在西班牙人入侵后不久便消失了，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是怎样使用的。在绳上打结很可能是一种知识体系的记忆术，主要是由专业人士在头脑中记住，并通过不同绳子、不同

位置的绳结费力地唤起自己的记忆。一旦这些专业人士消失（西班牙人入侵的毁灭性后果），绳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印加帝国也许是罕见的唯一一个没有文字和记账方法却依然存在的国家机构，既不符合历史时代也不符合史前时代的定义，因此应定位于二者之间。

如果史前史是一个如此模糊的概念，我们又为何自寻烦恼研究它呢？研究它又有何用处呢？“史前史”一词最早出现于1832年，但直至1865年约翰·卢伯克的《史前时代》一书出版后，才被广泛使用（1912年该书仍在版，是一本维多利亚时代的真正畅销书）。其他如“前历史”之类的同类词汇却没有流行开来。史前史的概念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19世纪人们的想象空间大大拓展，再就是生物学和人类历史所研究的时间跨度也增大了。19世纪初，对史前史毫无概念的人多数都信仰《圣经》中的年表，把《创世纪》视为信史。18世纪末，厄舍主教推测地球是在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出来的。现在看来，我们会觉得这个结论滑稽可笑，不仅仅是因为时间过于短促，也因为它过于精确。若不是现在坚信地球年代如此之短的风潮又有所重视，这种说法似乎只是更古老的人类思想史上一个略显滑稽的副产品（但我们也都能意识到，我们自己现在犯下的错误，百年之后也会被后人取笑）。神创论的思想核心是既强调《圣经》是世界历史的指南，认为这一点不容置疑，又鼓吹上帝作为神圣的造物主，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考古学家与神创论者之间的争论被视为科学与宗教之间一直持续进行的论战的一部分——神创论者责难乏味的科学动摇了人们的信念与信仰的根基；考古学家则强调科学概念和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并对外界质疑、批评和重新评估持开放态度。史前史彷佛是一个不同世界观之间论战的战场——考古学家认为人类的祖先最早可追溯到600万年前的远古时代；神创论者则相信人类的全部历史已经被《创世纪》囊括殆尽，否定任何史前史的存在。

史前史常常受到文盲般的不能言明之苦。文明意味着要能读会写，因此为使我们成为文明和敏锐的人，阅读和写作是对我们进行的教育和培养的基础和大部分内容。缺乏读写能力的人会被隔绝于有关想象、教育和经验的世界之外。这不仅因为我们没有有关史前时代的

充足证据，还因为史前时代的人类生活由于缺乏文字的文明影响而存在缺陷。这些看法隐晦地体现在我们对于过去的态度上，虽然并非直接表达出来的偏见，但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当然，文化价值观有别的人会提出反对意见。例如，对于澳洲土著居民来说，史前史这一概念是大有问题的。他们对于人类和人类诞生以前的历史的认识全被囊括在一个叫“梦幻”的概念里。“梦幻”指一段时期，可以无限追溯到过去。那时，各种生物的原始祖先跨越过大地旷野，使其初具雏形并富有了宇宙论的意义。一片树林、一块岩石或一条小河皆由蛇、鲨鱼、巨蜥或其他原始生物创造出来，不仅由此具备了外形，还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此有些地方很危险，有些地方可施惠于人，而有些地方的作用则模糊不清。当今人类有责任保护这些自然景观，以正确的方式对待它，而这种责任则通过故事、舞蹈及其他艺术形式记录和体现了出来。社会的启蒙便是通过这些形式来教授这些知识而实现的，其中最有效力的知识形式仅限于少数人掌握。在1788年白人到来之前，这里并没有任何文字资料，但是所有的重要历史都以适当的文化形式记录和传承了下来。史前史讲述的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需要考古学家去发掘的、被遗忘了的时代。这个概念本身就令人困惑，也容易冒犯土著居民，因此造成土著居民与非土著的考古学家之间关系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史前史乃是关乎过去的辩论和知识的竞技场，且最终与我们对现世生活的掌控息息相关。

史前史是沉默无声的，是剔除了文字的历史。对许多人而言，这样的历史缺憾太多，因为他们渴望得到可以了解史前人类的思想、情感和经历的直接证据。然而去追寻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不仅浪费时间，更重要的是，还会丧失领略史前史风采的机会。文字仅仅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作为本书的读者和作者，你我都是“拜文字主义者”——我们喜欢文字，喜欢它们的发音和意涵，尤其是它们的书写形式。我们接受的所有学校教育和大部分人生经验都将文字放在我们生活的中心，但生活的内涵远非仅此而已。我们的许多身体技能以及我们感知和欣赏物质世界及他人的能力并非源自文字；此外，世界给我们带来的喜悦、困扰或烦恼的种种感受也难以诉诸文字。正是这些

文字以外的、我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的体验将我们和史前史连接起来，这种体验的本质才是我要探索的目标。

史前史之谜（一）

在继续下面的讨论之前，让我们先考虑一下我们自己的“史前史”。“史前史”是生活中文字无法触及的层面。大多数史前史都属于“过去时”，但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有许多难以诉诸文字的元素，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是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细节。熟悉身边事物并掌握使用它们的技术是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基本能力。熟悉容易导致视而不见，但熟悉也能塑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和行为。我曾在墨尔本某大学教授过一门有关物质文化的课程。为了引起学生的兴趣并让他们思考一下个人层面的物质文化，我要求学生们在一个想象出来的1立方米大的空间里填满东西，这些东西必须既能代表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又对他们具有特别的意义。有两个学生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个学生说，他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这样做过了。1983年，他家里在位于墨尔本郊区的房子受到了圣灰节引发的火灾威胁，他和家人被要求撤离出他们的房子。一家四口只被允许用一辆车装载要带走的所有东西。他们必须立即选出那些可以讲述他们个人生活与家庭回忆的物品——一把小提琴、一套绘画工具、珠宝、小孩们最喜爱的玩具和家庭相册，还有每人一套换洗的衣服。他说当时根本来不及多想，他们都知道如果失去了某些东西，他们的生活就再也无法恢复正常，而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最后决定要带走的。幸好，他们的房子最后并没有被烧毁，但是经此事变，他们对房子及房内物品的情感却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第二个讲故事的学生，她的父亲不久前才刚去世安葬。她说葬礼上最感人的时刻莫过于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在父亲的墓穴里放上一件最能让他们想起父亲及父亲与他们之间亲情的物品。墓穴被填埋起来，那些物品也随父亲一起被埋葬。她说在挑选那些物品的时候，他们深深地怀念父亲以及与父亲的亲情

并为失去父亲感到痛苦，为父亲的意外死亡感到悲哀。

假如你也来做相同的实验，结果会是怎样的呢？生活中哪些部分对你来说至关重要，且主要源于对物品的情感，而又部分超越了文字所及的范畴？你会在1立方米的空间中放些什么？或者怎样用它来总结与某位亲近人士的关系呢？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史前史”，即便在这个记录手段完备的时代亦复如此。它对于我们的情感、心智与社会幸福感都至关重要。

第二章

史前史的诸多问题

“史前史”这一概念滥觞于16至19世纪初叶之间，直到19世纪中期由于出现在有关进化论的辩论中才得以广泛传播而卓有影响。确定人类拥有漫长的史前史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以其独特的方式改变人们的世界观而言，其重要性不亚于300年前的航海大发现。美洲的发现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引导他们去探询美洲人从何而来，因为这在《圣经》中并未提及；去思考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的诞生和分布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发现远古的史前史与发现新大陆具有同样的冲击力，因为二者都是发现了形形色色的“异己”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某些大陆上的史前居民确是后来撰写史前史的人的祖先而已。对于像英国这样的地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祖先的起源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英国人的祖先是应该追溯到诺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罗马人还是目前认为的凯尔特人，或实际上可能是“前凯尔特人”？如果英国人的祖先是由不同的民族混血而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判定古往今来混杂了不同民族元素的语言、基因、手工艺品和地形呢？尼日利亚人、巴西人、美国人和中国人身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民族认同和个人认同方面都存在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种族认同和阶级认同方面亦复如此。但是还有更深层次的认同问题在19世纪的争辩中浮出水面后，就从未销声匿迹过。1860年6月30日的那个星期六，在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过一场具有传奇色彩的会议，由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举办。在该次会议上，牛津教区的主教——人称“油腔滑调的萨姆”的萨姆·威尔伯福斯在大约700名观众面前，与号称“达尔文之牛头犬”的托马斯·赫胥黎上演了唇枪舌战的对决。这是一次让人情绪高涨的会议，巴克斯特女士当场晕倒，观众们时而惊叹，时而大笑，时而鼓掌喝彩，大家口无遮拦、如痴如醉（至少在记忆最清晰的传奇般的叙述中的确如此）。“油腔滑调的萨姆”的确问过赫胥黎，到底是他的祖母一方还是祖父一方起源于猴子？但“源自猴子总比源自主教要好”这一回答并非来自于赫胥黎，而是另一位达尔文主义者胡克。

这场存在于部分人记忆中的论战点出了贯穿整个世纪的争论的实质，即人类起源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有关远古的事情，实际上则关系到当今人类的身份认同。达尔文在完成《物种起源》一书后，因担心引发争议并有可能影响其学术地位，将该书推迟到1859年才出版。但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引发的反响还是比他预期中要复杂得多，不光被持有各种不同思想和信仰的人加以利用，还成为了检验人们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拥护经验主义还是宗教信仰的试金石。对于我们来说，史前史起源之谜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承认漫长的史前史的存在，就意味着拒绝接受声称世界是从公元前4004年开始的《圣经》年表，从而也就意味着理性战胜了迷信，科学战胜了宗教。人们现在对1860年那场论战仍感兴趣，并视其为体现了当时各种社会价值冲突的一个缩影。然而，当时的科学家常常具有某种非传统的宗教背景，比如可能是公谊会教徒，就会强调实证考察和个人独立获得真理的重要性，这与其他很多笃信《圣经》才是绝对真理的保守的宗教派别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19世纪是宗教盛行的时代，故所有争论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宗教派别间的争论。只有到了20世纪，在一个更加世俗化的社会，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立才得以以比较单纯的形式出现。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宗教一边的极端看法中，进化论和史前史都已是习以为常的概念，但在涉及儿童教育时依然是重要的试金石。史前史学家被认为是站在猿猴一边，而不是天使一边，而且他们通常都以此为荣。

1858年，布里克瑟姆洞穴的发掘是从科学层面接受人类有远古时代所迈出的重要一步。经典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是“兼变传衍”的概念，认为世世代代经过不断的变异，后世子孙要么会更加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要么会更不适应，亦或不会有什么改变。若变得更加适应环境，则增加了他们可存活至繁衍后代之时的机会，使他们能将自身优点传承下去；若变得更不适应环境，则更有可能在繁衍后代之前便已死亡。因此，“适者生存”是了解资本主义竞争精神的生物学密码。根据达尔文理论，变异是通过一点一滴的细微变化循序渐进的，并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以实现。当考虑到从单细胞生物发展到复杂的人体结构所需的整个变化过程时，就更能体会到这一点。在《圣经》年表

中，地球在6000年前才被创造出来，因此上述变化过程所需要的时间是不可能符合这一年表的。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为人类历史的时段更长提供了大量实证。19世纪上半叶，用当时的流行术语来说，就已有关于“人类古老性”的争论围绕一些考古遗址展开。这些遗址可能存有可证实人类曾与已灭绝动物（比如猛犸象和长毛犀）共存的确凿证据，而这一点在《圣经》中并未提及。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眼见才为实，而布里克瑟姆遗址的确为远古人类的存在提供了切实可见的证据。1858年7月29日，彭杰利——这位托基博物学会的创始成员和后来被称为“骨骼洞穴”的布里克瑟姆裂隙的考古发掘组织者，在石笋下方3英寸处发现了第一件打火工具，且有犀牛和鬣狗骨骼与之伴出。来自地质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学会的学者们纷纷前来参观。彭杰利缜密精确的发掘和记录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无疑出自人类之手的人工制品与生存于地球历史中更早期的另一阶段的灭绝动物曾经伴存的事实更令他们感到震惊。其他遗址也迅速被重新评估，例如在法国索姆河的阶地砾石层（那里后来曾发生过战争），也曾在地表下若干米处发现石器与犀牛骨伴存，但此前却被英国人讥讽为法国式的夸张而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BRIXHAM.

GREAT NATURAL CURIOSITY.

INTERESTING EXHIBITION ! !

THE

"Ossiferous Cavern"

Recently discovered on Windmill Rea Common, will be exhibited for a short time only, by Mr. PHILP, who has just disposed of it to a well-known scientific gentleman.

Those who delight in contemplating the mysterious and wonderful operations of nature, will not find their time, or money mis-spent, in exploring this remarkable Cavern, and as the fossils are about to be removed, persons desirous of seeing them had better apply early.

Many gentlemen of acknowledged scientific reputation, have affirmed that the stalactitic formations are of the most unique and interesting character, presenting the most fantastic and beautiful forms of crystallization, representing every variety of animal and vegetable structure.

Here too, may be seen the relics of animals that once roamed over the Earth before the post-tertiary period, or human epoch.

THE BONES AND TEETH, &c., OF

HYENAS, TIGERS, BEARS,

LARGE FOSSIL HORNS

of a Stag, all grouped and arranged by an eminent Geologist.

N.B. Strangers may obtain particulars of the locality, &c., of the Cavern, on application to Mr. BROWN, of the Bolton Hotel; or at the residence of the Proprietor, Spring Gardens.

THE CHARGE FOR ADMISSION TO THE "CAVERN," SIXPENCE.

Children will be admitted for FOURPENCE.

Brixham, June 10th, 1858.

EDWARD FOX, PRINTER, &c., BRIXHAM.

图4　公布布里克瑟姆洞穴中考古发现的首次报道，该洞穴中后来发现石器与灭绝动物伴存的证据

当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爵士在参观了布里克瑟姆洞穴和法国北部的阿布维尔遗址之后，打消了早先对于“人类时

代”的怀疑，并于1859年9月18日在阿伯丁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大会上就此发表了演讲。莱尔在这一问题上观念的转变，标志着英国的权威学者开始意识到史前史极为悠久漫长的可能性，并打算以全新的视角看待近代人类生活方式。在该次演讲中，莱尔还提到了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他认为此书对于人们思考人类历史的时间跨度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等都将带来一定影响，这本书就是当年11月24日出版的《物种起源》。

应用达尔文思想的成就之一就是现代遗传学。人类基因组计划首次尝试测定出人类基因的整个序列，断定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3万个遗传基因，只是先前预估数量的大约三分之一。从许多方面来说，人类基因数量之少是对达尔文思想的明确体现，即强调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大多数基因与其他物种相同。在一位读者写给《卫报》的一封信中，他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人还是老鼠，因为两者之间的基因差别小得惊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与其他物种的基因的相似性反而突显了我们之间的差异。由于我们与其他物种的大多数遗传基因相同，也就难以认定人类文化的形成是由基因决定的。人类独有的遗传基因的数量亦不足以解释人类文化的复杂性。我认为人类是有文化的，原因并不来自生物学方面，而是我们把物质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社会关系中的缘故（参阅第三章）。有些人认为文化与自然有重大差异，因为人类的生活全都是创造家园、种植植物、驯化动物和制造人工制品，处处留有人类的痕迹，以至于我们把以上这些成绩全部归因于文化而非自然。而自然是“血腥和野蛮”的代称，属于并未受到人类行为影响的世界的一部分。但自然并非完全是身外的世界，也存在于我们身上，赐予我们生活的本能和天性。当个人（或其基因）为了生存下来而与其他生物（人类或其他物种）进行斗争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会本性尽显，展现出“自私”的一面。但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将自然和文化完全区分开来。

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既有其社会基础，又通过人类行为进行构造，而行为本身让我们认识到了世界的各种特质。所有人都对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有先入为主之见，通过个人行为展现出时就会面临风

险。毫无疑问，我们都以自己的视角认识世界，事实却证明我们可能是错误的。当个体作为遴选和人与人之间竞争的基本单位时，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对于西方人来说不言自明，因为在过去200年间，整个西方社会和文化都鼓励他们将自己视为至高无上的独立个体，但并非所有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都完全一致。

比如，生活在非洲扎伊尔的伊图里热带雨林中的姆布提矮人认为，森林是他们的“母亲”或“父亲”，因为森林不仅为他们提供了食物、温暖、衣服和藏身之所，也像父母一样赋予了他们爱。马来西亚的巴特克矮小黑人认为，他们与植物、动物及“哈拉”（创造并守护人和森林的造物精灵）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蒂姆·英戈尔德认为，为了理解这种对世界的感觉，我们不应把社会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视为首要关系，并将其投射到自然界（森林）中去，而应该把所有这些概念和关系视为一体。社会并不先于自然存在，反之亦然，两者都存在于一个通过行动展开的完整严密的关系网络里。人类必须意识到森林也有想法和情感，所以在森林里打猎和采集不仅是要运用恰当的技术和训练的问题，还需要学习尊敬和理解人类牵涉的所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若沿着这条思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有必要或可能性的话）去创建一门进化生物学，那么它不会是从“自私的基因”或“个体”开始的，因为“自私”和“个体”之类的概念是很难和姆布提矮人之类的群体搭界的。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2万年前欧洲的狩猎和采集群体，我们能否假定他们与现今的狩猎和采集群体有着相似的意识和世界观？很明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能进行这样的假定。同样，我们显然也不能假定我们研究世界的方法，即宇宙论是完全恰当的，但许多人的分析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宇宙论展示了人与人或人与世界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会如何展开的种种可能性，也具体说明了这些关系应该如何运作，是应通过尊敬、敌视、关心还是回避的态度。宇宙论兼具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方面，一方面描述世界如何运作，一方面也讨论世界在道德层面上应该如何运作，以及人们必须为此承担的责任。西方科学，比如生物学，都具有宇宙论的基础，源自更为普世的

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具备富有想象力的理解能力，才能欣赏他者的宇宙论；我们还需要清醒意识到想象与幻想之间的界线，这是在研究史前史时一直存在的问题。

我们需要一些心智工具去理解他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没有文字资料辅助的情况下去理解人工制品、遗址和景观的时候。这个工具就是“关系”这个关键词。我们所理解的实体，比如人或物，并非透过他们（或它们）本身而存在，而是透过他们（或它们）与其他人或物的关系而存在。我们都清楚，在不同的情境下，我们要进行某些角色变换。比如，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会跟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不同；我们会和一些朋友谈论体育和政治，也会和其他一些朋友探讨我们的心理状态或家庭关系。与一群朋友聚会时，你可能会感觉不自在，因为他们会以特定的关系和性格对你有所期待。如果我们同意“关系会改变人”，并将这个说法推广开来，我们会发现不同的社会形式珍视不同的关系，并将其重要性置于其他关系之上。当个人处于不同的关系网络中时，他也会发生改变。一个社会由其特定的、独一无二的关系网所组成，而人的一生就是经历这些关系的过程。我们不应该期待男性总要展现其阳刚（各地定义的）之气，而是在某些情形下，也应具备某些女性特质，而女性亦可培养阳刚气质。性别的特质从不全然是固定不变的，人类特性的其他方面亦然。这要视人们是以个体还是群体成员的身份出现而定。比如，当我们必须在公众场合发言，或在法院出庭作证，又或以派对的主角出现时，我们作为个体的身份就会突显出来。在这样的场合，个体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也必须承担起个人行为的责任。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例如看一部好电影或和家人交换圣诞礼物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作为群体中的一员而存在，与他人分享着情感，并通过分享加深了这种情感。

我们已经提到，关系不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人与物之间。想象一下生活在1.8万年前宋格海尔的一位女士吧！她戴着由3,000颗珠子串成的一条项链，站立在位于现今俄罗斯北方的雪原上（参阅第三章）。她可能穿着针脚齐整的毛皮大衣，大衣上可能缀有装饰；也许她还戴着护目镜，以遮挡雪原的刺眼光芒；她脚蹬雪鞋走

来走去，可能会使用雪橇和其他器具。她定居的聚落里随处可见石头、骨头和鹿角制成的工具，房屋则由猛犸象骨搭建而成。有两个小孩被埋葬在宋格海尔的聚落里，他们的帽子和衣服上缝着象牙珠子，还陪葬有小雕像和象牙矛头。在最后一次冰川时期，在远达北极圈这样的边缘环境里，人们为他们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是通过错综复杂的物质文化形式建构起来的。让我们再想想6000年前还没有翁卡居住的新几内亚高地的情景吧！那里的热带温度只随海拔升高才略有降低，而此地也是一个独立发展农业的地方。住在中部山脉高地的人们为了种植芋头之类的大型根茎作物和香蕉之类的乔木作物，学会了排除沼泽地的积水。那些有机会开垦并已学会有效利用沼泽地的人就能更好地参与交换斧头、贝壳和天堂鸟羽毛的活动，而所有这些交换活动最终都得在食物生产的保障下进行。人们通过他们制造和使用的物品在社会中创造和定义着自己，从而不断探索人性的新维度。人性的多种维度才是我们的终极关怀，而史前时代正是这些维度被开发和拓展的时期。

要了解过去，也许就要部分忘掉现在，要质疑甚至抛弃我们熟知的价值观。研究史前史既为一种实证研究，又是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行为。我们需要进行发掘和调查，以获取有关远古的可靠信息；同样，我们也必须质疑自己的生活、思考和感知方式，借此打开我们的想象力，去了解赋予同一个世界以不同意义的其他生活秩序。

史前史很大程度上就是探究像“我们”一样的人的起源。当史前史在19世纪兴起的时候，从事史前史研究的主要是中产阶级的白人男性，他们似乎都对自己的身份满怀信心且优越感十足。然而，他们在参与针对进化论和人类古老性的早期争论时所表现出的高涨热情，足证这些参与者毫无安全感。在那个时期，宗教与科学对峙，国际帝国主义阵线重新定义了阶层问题与民族国家的角色，且利用“原始”之类的概念努力与工人阶级和殖民地民众划清界限。达尔文是那个时代的主角，不过他长期多病的身体状况却反映了他本人对于进化论给人类造成的影响及他的同辈是否接受进化论等问题的忧虑。史前史被认为是人类一步步从“他们”——生活在恶劣环境里、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可

怜的野蛮人，逐步进化到“我们”——能够享受城市生活方式的文明人的一系列过程和阶段。这些过程和阶段的实现是通过逐步运用理智的力量，使人类能够通过发明农业（野蛮时代）、城市（文明时代）、工业主义或帝国主义而得以征服自然界。

不过，即使对于欧洲人来说，被人类用来炫耀胜利的史前史故事也一直遭到更黑暗的故事的挑战——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是以精神贫乏为代价的；韦伯悲叹专业分工、制度规范和官僚体系使世界丧失了其原有的魅力；弗洛伊德分析文明及其令人不满之处；伍迪·艾伦则干脆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生不逢时”。史前史连起了“过去”和“现在”这两极的叙事主线，而拉紧连线的拉力则取决于我们对这两极的理解。今天仍在讨论的史前史概念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革命性时刻，那时人们要迅速对过去和现在都进行重新评估，因此那时两极间连线的绷紧状态显而易见。到19世纪末，人类已经塑造了一个通过运用思维能力，具体来说是科学技术把自己从原始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故事，成功掩盖了我们在得知自己具有动物本性时的惊骇。到20世纪末，人类文明的合理性变得更难被接受。帝国的分崩离析使得以西方优越性为前提来书写历史的做法受到质疑，而且人们开始加速探索人性的其他方面，而不仅仅是其思维能力。因此“过去”和“现在”的紧张关系再次被书写到史前史之中。不过，当今“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因世界各地学术和政治氛围的不同，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状态，而这种多样化正是我要在下文中进行探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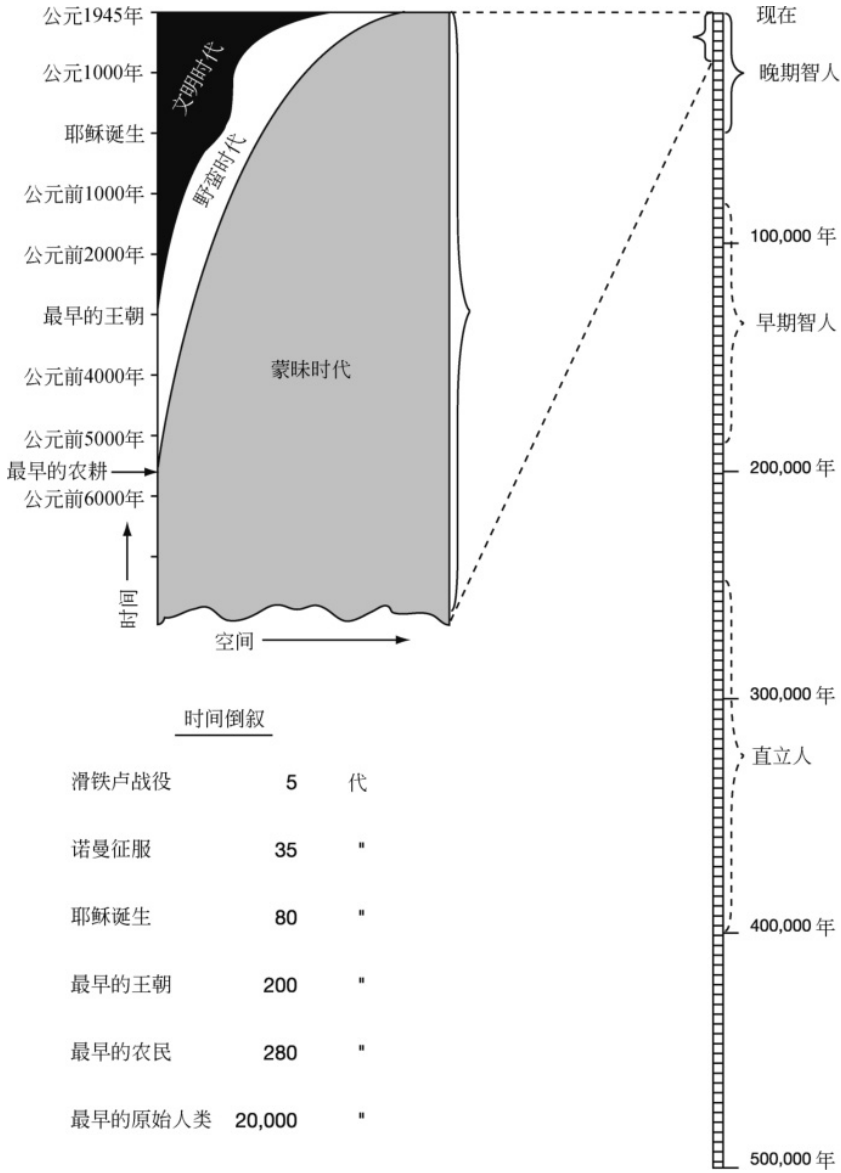

图5　史前史历经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

史前史之谜（二）

考古学被称为研究垃圾的科学，而史前史就是我们赋予这些垃圾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初，一群考古学家成立起一个所谓的“图森垃圾研究项目”。他们在比尔·拉思杰的领导下，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的图森市开展研究工作，目的是查明人们丢弃的东西如何反映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图森市大约有36万居民，其中四分之一有墨西哥血统。该研究从该市66个城市人口普查区域进行抽样调查，以挑选出包括不同种族背景、经济状况和年龄层次的人群的区域。

图森环境卫生部门和300多个学生志愿者（已注射防疫疫苗）最终对来自于19个调查区的垃圾进行了分析，并将它们分为食品和生活垃圾等不同种类。他们还对其中3个调查区的居民进行了访谈，以核查人们的说法与垃圾箱中的垃圾在内容和数量上是否吻合。结果表明，“门前”（口头所说）和“门后”（垃圾箱中所见）的垃圾存在相当大的出入。有些差别完全在意料之中，比如，虽然中产阶级家庭的说法比工人阶级家庭更准确些，但啤酒消耗量显然都被低估了。有33个家庭表示他们从来不买啤酒，但其中只有12个家庭的垃圾里没有发现啤酒罐。还有一个说“从不喝啤酒”的家庭，它丢弃的啤酒罐足以填满3个半箱子。与事实不符的部分原因是，许多贫穷家庭依靠领取政府食品券过活，而食品券不允许用来买啤酒，所以他们不想让政府注意到他们买啤酒的习惯。

贫穷家庭的消费模式较富裕家庭更不经济。因为收入少的关系，他们买不起大包装的、更为划算的洗涤液或粮食，因此在购买时往往只买他们买得起的东西。而在收入较多和较稳定的家庭，购物往往具有规模效应。在1973年牛肉短缺期间，牛肉被丢弃的数量不降反增。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当牛肉有货时，人们会大量购入牛肉，但最后却不能全部吃掉，因而丢弃的数量比平日更多。拉什杰和他的团队估计，在1974年间，约有9500吨可食用的食品最后被送到了垃圾掩埋场，而这些食品以1974年的价格计算，总共价值900至1100万美元。随后，拉什杰又对一个垃圾掩埋场进行了考古式研究，发掘了垃圾层，以助其完整地了解废物的处理周期。

你有没有想过你丢入垃圾箱的东西从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你的

年龄、收入和阶级等情况？你如何才能精确估算出你消费和丢掉的东西？我们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我们制造的垃圾一旦离开垃圾箱后会归向何方？又需要有什么样的公共策略和个人行为来处理我们制造出来的堆积如山的垃圾？

“图森垃圾研究项目”进一步说明了我们的“言语”与“我们和物的关系”之间存在出入，尽管有些出入是意料之中的。我们嘴上、脑中的消费情况是一回事，我们实际制造出的垃圾却是另一回事。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垃圾就是全部的证据；而当文字可以被保留下来的时候，垃圾则又展现出了有意识的思维、语言和行动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三章

人类的技能和经验

变化多端的发型、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对时尚的热衷——贝克汉姆身上这些特点可能令许多人难以接受或欣赏他的智慧（如果你不熟悉贝克汉姆或足球的话，也可以换成其他运动员，比如迈克尔·乔丹或大威廉姆斯，亦能说明这个问题）。而我关心的只是贝克汉姆的正职，也就是他在足球场上的专长。他的身体能展现出许多人无法完成的超群技艺；一场比赛下来，他的奔跑距离能达到差不多16公里；他还能把球准确地传给60米开外的奔跑中的队友，之后又能恰到好处地跑到球场的另一个位置，接回他刚刚传出的球，然后腾挪躲闪，最后晃过守门员把球射入球门。一个人需要拥有哪些才能才会成为大卫·贝克汉姆？那就是最为基本但要超出常人的体能、身体柔韧性和力量，还要对自己的身体技能和赛场局面了如指掌，这不仅对赢得比赛至关重要，对于说明我的观点也同样要紧。贝克汉姆很清楚他该用脚的哪个部位和什么力道踢出他想要的球来。虽然他并非总能做到天衣无缝，但他确实能在非常泥泞或狂风突起的球场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更重要的是，他能判断队友和对手的动向，甚至预测他们希望出现的局面。当赛事顺利的时候，他会一边带球，一边冷眼观察敌我双方的位置变化，踢出使训练有素的对手措不及防却能让队友心领神会的妙球。这种快速移动的足球比赛将诸多社会和身体技能天衣无缝地巧妙结合了起来，每种技能都可以不假思索就立即体现出来。当然，训练是必不可少的。运动员们每天要花很多时间练习射门、跑步、再射门，以增强肌肉的记忆——即肌肉以恰到好处的力道和准确度完成连续动作的能力。甚至连休息一两周都会使一名运动员落伍。他们还要讨论战术，比如对手的强项和弱点是什么，上次比赛有哪些情况，从以往比赛的录像中能够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等都是不能回避的话题。但是，战术讨论只是准备工作的次要部分，它的意义或许在于给予队伍信心，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备而来。而球场上的失误、有如神助的临场发挥和意外情况的发生才是扭转整场赛事的关键。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博克斯格罗夫的原始人类，他们正手握长矛，偷偷靠近一群马（这里我们是要迅速沿着一条可说明某个问题的

思路思考）。他们和足球运动员一样，要想狩猎成功，也需要掌握好身体与社会技能的平衡。马群正在开阔的草地上吃草，猎人们匍匐在旷野四周的矮树丛里。他们看不见所有同伴的位置，也看不见所有的马匹。他们必须预知同伴和马匹可能会采取的行动，而且要迅速完成这一判断。一旦整个群体从隐蔽处跳出，要将其中一匹马包围起来，他们就要奔跑过高低不平的土地，随时准备投掷长矛，一切都要在瞬间完成——那可是一匹高大、危险、敏捷的马。个人的勇猛会有帮助，但作为群体行动，知晓其他成员的意图并相应调整自己的行动才是真正不可或缺的。群体行动是成功的基石。正如大卫·贝克汉姆和许多其他运动员那样，当他们作为群体中的一员发挥作用时，他们的技能和才智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些都是生活中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比如长矛的重量、考虑风的因素以及马匹奔跑时会突然转向，这些事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口头传授，但却只能通过实践掌握。我们可以指导小孩学骑自行车，但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练习才能真正学会，比如塑造正确的肌肉记忆，知道如何掌握平衡，懂得要用多大劲儿才能登上山顶，更不要说还要注意其他司机、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了。我们的大部分生活需要亲身实践而不是停留在言语表面，包括我们亲身体验物体的物理特性，也包括通过行动去理解他者（可以是植物、动物或人）的社会行动。我们可以谈论骑自行车，但谈论永远无法真实反映出实际的体验。这种技能不是我们了解的知识，而是我们本身的一部分。

西方在智力方面的观念是强调抽象思维。如果贝克汉姆能把一场足球比赛抽象简化为一系列方程式，用以描述足球在不同条件下的飞行速度和飞行方式的话，大概很少会有人怀疑他的智力，但不会有很多人愿意花钱看他踢球。他在没有预先计算的前提下能够做到使足球以很多不同的方式飞行的这一事实，并不符合我们对高智商的定义。但我想说的是，要了解世界如何运作以及人们在其中的行动方式，是构成我们日常技能和智能的基础。没有这些技能，我们就不配做人类。

身为人类，我们能做事，也能思考、说话、写下我们所做的事或

者我们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有关智力的传统观点强调语言对于塑造和表达思想的重要性。我并不想否定有意识的思维或语言的重要性，也不是要把行动的重要性凌驾于两者之上。更确切地说，我认为人类生命的真正奥秘在于惯常而技能熟练的行动与有意识的思维结合之时。例如，早上骑自行车上班时，我很少会意识到自行车本身的存在，但会想起刚刚在家里发生的事，想起工作上即将发生的事，还会考虑当天打算或不打算做的事。只有当自行车掉链子时，我才不得不停下来并注意到它的存在，还会因为满手油腻、思路中断而顿生烦恼。如果我必须考虑骑自行车的事，我便不能关心许多我认为真正重要的其他事情。我的日常生活也和其他人的一样，是由不怎么需要有意识思维的行动和需要进行有意识思维的行动所组成的。我们的注意力徘徊于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为什么那个该死的打印机这么慢？”）和我们必须有意识地认真考虑的世界（“我怎样才能让琼斯明白他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让论文通过？”）之间。只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给我们带来麻烦（比如打印机在关键时刻坏了）或是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比如琼斯同意立即去图书馆，让我多拥有了四分之三个小时的空余时间）时，我们才会有意识地考虑我们当下正在做的事。

史前史因为缺乏文字记载而显得空洞无物。我们对于大部分历史时期里人们的技能熟练的习惯性行为缺乏了解，因为没有此类证据存留下来，但人们很少意识到这方面的不足。要制作一把手斧，你需要考虑石块的形状、为最终打造成手斧的样子而剥离石片的次序，以及随着石斧的塑形而调整动作等等。这项需要打去形状和大小准确的石片的技能，通过考古学家对石片的分析（假如他们方法得当的话）是可以直接被破解的。但要重现手斧制造背后的思维模式则是难度更大的事情，需要进行更多的假设，但仍然是有可能的。

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曾一度被认为是使用工具造成的。作为“工具制造者”的人类拥有黑猩猩、大猩猩或猴子所没有的诸多技能，而这被认为是人类进化的基础。从20世纪60年代起，简·古多尔就发现非洲坦桑尼亚的黑猩猩会把小树枝或草当作工具，伸入白蚁穴

并钓出小昆虫来吃。西非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的黑猩猩每天会花两个多小时把坚果敲开。它们会把坚果插进树根里，然后用石头或树枝把它砸开。敲开坚果并非易事，只有成年黑猩猩才做得到。年幼的黑猩猩则由母亲教导应该怎样制造和使用工具，但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学习这种技能。一些好用的石锤被藏在坚果树附近，黑猩猩能记住好几个隐藏石锤的地方。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当坚果树和合适的石锤在附近都能找到，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的黑猩猩群也并非都会敲坚果。一群黑猩猩的某个个体在某个历史时刻获得了敲裂坚果的技能，并将其传给后代，但这并没有在所有群体中发生。不同群体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人类已观察到，不同地区黑猩猩之间的文化差别，体现为完成同样的任务却使用不尽相同的工具。如果黑猩猩在自然环境下掌握了技术，它们和人类的区别就荡然无存。但是，我认为两者之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别——黑猩猩从未将物质文化作为它们社会关系的基础，而人类在建立社会关系时极少未用到过物质文化。

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在其一篇名为《礼物》的经典论文中，将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礼品馈赠称为“全部的社会事实”，意指人类的全部生活都根源于赠送和接受礼物的义务。莫斯发现从礼品馈赠行为衍生出来了三个义务——赠与的义务、接受的义务和回报的义务。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向他人赠送礼物（如成年仪式、婚礼或葬礼，以及为了进行正式交换活动而建立的交换伙伴关系）。如果我送你一份礼物，你很难做到拒绝它却不带有任何侮辱我的意味；而你一旦接受它，回报则是必须的。至于什么时候回报（太快看起来像是对关系的拒绝，太迟又像是你已经忘记或漠不关心），回报什么（必须好好考虑恰当的质量和数量），采用什么样的礼节，都必须做出巧妙的安排。我们在第一章里提到的翁卡就置身于新几内亚高地的仪式性交换体系里。当地人要举办盛大的公众仪式，赠送猪、贝壳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啤酒、钱和丰田越野车等。在这样的场合中，当地的“大人物”会熟练地运用花言巧语和表演天分来展示他们能够赠送得起的财富，以彰显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有一部很不错的电影名为《翁卡的大摩卡》，就拍摄了一个这样的仪式性交换过程，这是整个交换体系的一

个组成部分，被当地称为“摩卡”）。有时候人们也会进行同类物品的交换，比如斧头与斧头的交换。这种互惠的交换形式显示出关系远比交易物品本身的用途更为重要。礼品馈赠确实已被看成建立社会关系的一套系统，而并非直截了当的经济行为，它的意义可理解为：人们通过交换去维系与他人的联系，更为要紧的是巧妙地操弄权力关系，而不是去获得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在许多社会里，交换物品的形式很多样，小到家庭内部的食物分享，大到群体内常见但社会意义不大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交换，更远及群体间大型的仪式交换（或偷窃）。对于这种交换，我们已经把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关系加以考虑了，但是物质的交换和积累对于许多社会互动来说依然至关重要。所有社会关系首先都是物质关系，但这对于会使用工具的动物来说，就不见得正确。梳理毛发、交配和暴力冲突才是它们大多数社交活动的基础。它们的食品是分享的，但很少会交换。

50万年前的博克斯格罗夫人已能掌握非常复杂的技术（远远超过黑猩猩所能制造的任何东西），但这些技术有多少被他们用作社会生活的基础呢？我们不应该指望他们的社交活动看起来和我们的一样，也不会像黑猩猩的那样，让我们更想去发掘很久以前英国南部边缘地区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的真相。近来有一种权威理论提出，社会生活是灵长类动物的智力基础。艾洛和邓巴已经发现了大脑尺寸与群体大小之间的相关性——群体越大越复杂，大脑的尺寸也就越大（或更精确地说，大脑占身体的比例也就越大）。大脑尺寸和群体大小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是因为灵长类动物的生活里最复杂且最需要思考的领域就是其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这比处理物质世界的任何当务之急都更为错综复杂。用这个思路去观察人类进化问题，就可以发现人类脑容量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根据人类身材的增长所对之预期的速度。在过去的100万年里，人类大脑的尺寸大大增加，正如它的构造愈加复杂一样，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艾洛和邓巴认为，大脑尺寸的增加是由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够全面，语言和物质文化两者结合起来，才使人类祖先拥有的身体与智力技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程度。语言只是这个变化里的一部分，但不是唯一的要素，

甚至也不是决定性的要素。据我们所知，工具的使用早在25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语言的起源时间还在热烈争论中，但肯定比工具的出现要晚得多。

物质文化已表明史前史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也是我们的社交功能所需的各种社会与身体能力的历史。为了适应社会生活，我们需要具备一些技能和才智。我们认为比较聪明的其他物种大多数亦具备发达的社交模式（如灵长类、海豚和鲸鱼），但只有人类同时通过两条密不可分的途径——既操控物质世界也操控社会世界来发展其社会生活。为此，我们还融入了一系列人类特有的身体技能和心智能力。我们的生活是有双重维度的，有行为习惯也有需要考虑的事；我们有行动能力，也有思考和谈论的语言能力。思想和习惯并非完全对立，反而是以复杂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意识流。我们可以琢磨怎样骑自行车，怎样用更新颖、更好的方法骑；我们也能一边骑车一边思考我们的生活、宇宙和天地万物，只是要不时注意过往的汽车、交通信号灯和行人。我们很想知道那个技术精湛的博克斯格罗夫的石器制作者是否会一边聊天，一边翻转燧石块，为群体内的人际关系悄悄忧虑，抑或为使用什么样的木材制造长矛而犯愁？还是她必须对石块全神贯注，除了打磨什么也不想，感觉身边的整个世界似乎都消失匿迹？手斧或长矛是否会被当成礼物？他们会不会像许多现代社会的人那样把某些肉块切给某些特定的人？这些原始人类彼此间会交流思想吗？如果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么混合了意识思想和行为习惯的人类社会生活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成为人类

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呢？我刚刚已经给出了答案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是唯一一种通过物质来创造社会生活的动物。有些能力是现代人类共有的。所有人都生活在社会中，生活由必要的社会责任塑造而成——虽然社会责任有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但是如果人们希望保

留社会成员的身份，他们就必须接受、给予和回报。人们用物质文化创造社会生活，不单只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换，还通过食物、衣服、住房等各种形式的财富去创造不同类型的社会角色。人类都有音乐和舞蹈这些非语言的表达方式，也都会尝试通过药物、催眠和跳舞来调节他们的意识和情绪。人类创造并使用语言。尽管世界各地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差异显著，但人类的共性使我们联合成为一体，也使跨文化沟通成为可能。我们推测，但并不确定，这样的能力在4万年前已经存在。人类的悠久历史可追溯到博克斯格罗夫人及更早时代的人类祖先，且距今越遥远，就愈加模糊不清；人类生活的具体轨迹及世界各地之间的差异，亦复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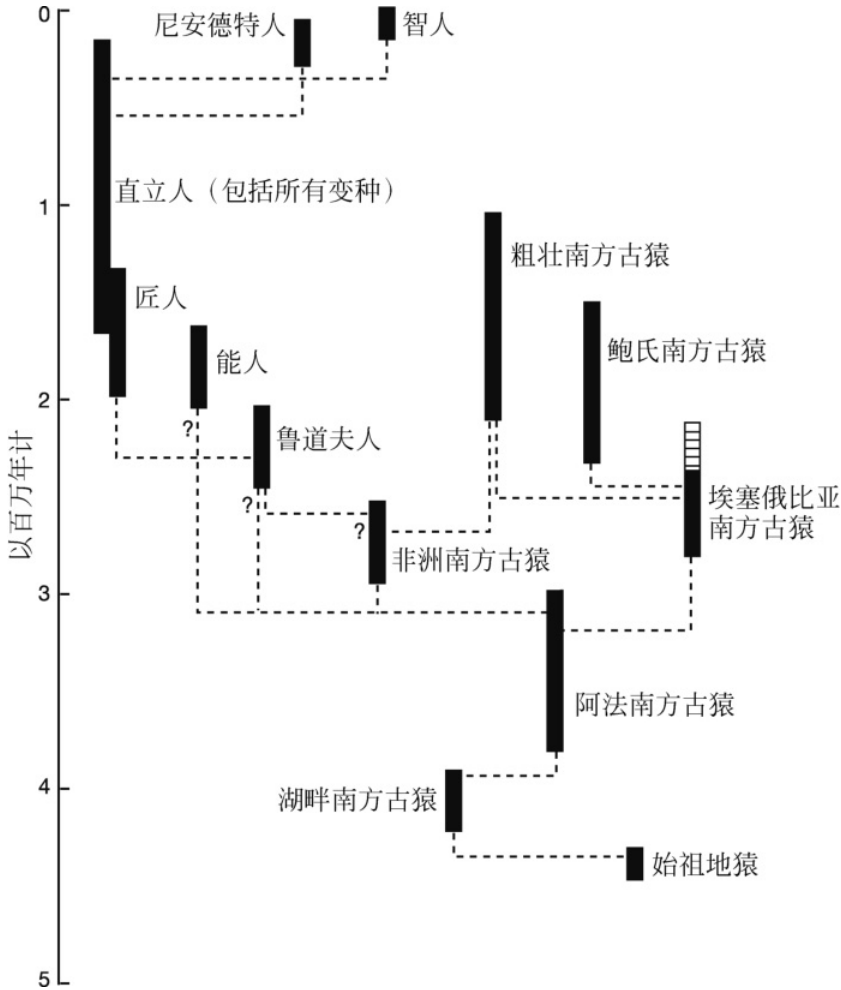

图6　过去500万年间的人类进化系谱图

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变成了真正的人类呢？请不要为这样宏大的问题有不同答案而感到意外。我们对身体的使用，对物体的创造和掌控，还有我们的语言能力，对于了解我们的人性都至为重要，下面我将逐一阐释。

从解剖学角度来说，现代人身体的进化过程已广为人知。多数人认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在12至15万年前首先在非洲出现，但此说法仍存争议。“晚近非洲起源说”（此处“晚

近”为进化术语）认为，现今世界上所有人都起源自非洲同一个祖先群体，并在稍晚于10万年前的时间，从非洲大陆扩散至中东，然后从那里进入欧洲、亚洲等地。现代人发现了许多古老的人类群体，其中最著名的是尼安德特人（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一种遍布欧亚大陆的适应严寒的古人类，可能是和博克斯格罗夫人类似的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的后裔。两者在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尼安德特人逐渐消失了（到底是被我们的祖先彻底消灭，还是无法和他们在相同的环境中存活无从得知，但已成为电视节目和小说猜测的主题），使我们成为唯一的古人类。而“竞争假说”，即“人类多地起源说”则认为现代人是由直立人（Homo erectus）直接演化而成。大约180万年前，他们从非洲迁出，进入欧洲（很可能）、亚洲和东南亚，甚至远达如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直立人与现代澳大利亚土著在头骨形态方面的相似性，比如都有突出的颧骨，使该假说得出了局部进化的结论，认为后来传入的现代人类在基因上只有很少的贡献。

上述两种学说——“晚近非洲起源说”与“人类多地起源说”，和其他讨论人类起源和多样性的理论一样，都鼓励对人类共性、人种差异和区域历史进行不同思考。“多地起源说”强调人类的差异，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不同类型的种族——正如在欧洲和亚洲发现的那些一样——都各自拥有悠久的历史，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及其历史都各自独立并各具特色。但是要将土著人群与作为人类祖先的直立人联系起来也是很危险的做法，这样就会使土著人比其他群体更显“原始”。这一观点流行于19世纪的欧洲，在今天却备受质疑（参看第四章）。虽然倡导者仍顽固地为多地起源说辩护，但以化石和基因为主的种种证据都可以推翻该学说的说法。如果全人类都起源于非洲，那么非洲人的基因应该比其他地区人类的基因更显多样化。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非洲以外地区的现代人的基因变异性只相当于非洲人基因谱系的一个分支。这不仅表明我们都有共同的非洲祖先，而且所有非非洲地区的人类的基因很可能都要追溯到现今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地区，而那里正是我们期望会发现人类迁离非洲大陆的证据的地点所在。总之，

人类基因的变异性是非常小的，远低于黑猩猩和大猩猩。有些人非常强调人类肤色、头发和脸形的差异，而这些方面只由非常少数的基因控制，而且很容易遮蔽更深层的人类共性。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证据也可以否定多地起源说，那就是从欧洲和高加索地区出土的3个尼安德特人的骨骼中提取的古代DNA显示，我们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并没有基因上的关联，表明它们不可能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所有欧洲人都是从非洲迁移而来的，而这对于地球上其他地区的人群而言也同样适用。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年代最早的“完成进化的现代人”的化石就是在非洲发现的，其他地区则相对较晚。与我们的直系祖先相关的一些石器工具的出土可能也能说明同样的事实。

大多数史前学家相信，完成进化的现代人全都起源于非洲的学说是我们合理解释现有证据的唯一方法。另一个难度更大且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哲学范畴的问题是：我们从行为上何时变成了真正的人类？我猜测，如果可以克隆出10万年前的现代人，给他们穿上现代服装，为他们洗澡和理发，让他们坐在公共汽车里，大概没有人会看出我们和他们在外形上的不同，但他们可能会表现出古怪的行为举止。即使年代最早的现代人祖先也与我们有着相近的身高、体重和大脑容量，他们的四肢、眼睛、耳朵和大脑的活动方式也和我们没有区别。虽然他们还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身体能力和心智能力，但这些都不意味着他们已学会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它们。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我的关键论点上。所有完成进化的现代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和我们一样具有相同的文化能力，却不一定已经学会或者需要锻炼这些能力。变成真正的人类不只和身体的能力有关，还关系到身体与物质世界的联系，是后者使身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展了许多能力。现在，所有人都与植物、动物和其他许多物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种关系已经有数千年之久了。我们可以将克隆出的祖先带离公共汽车，教他们骑自行车。骑车事关身体和社会技能的学习，判断其他司机和行人的动向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他们原本不具备的技能，所以能让他们得到新的发展。人类历史是通过运用与生俱来的身体能力而不断得以扩展的过程，且由于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需求和价值观，人的身体也就被赋予

不同的技能而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能力。我记得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时，曾跟一个本地人努力学习过风帆冲浪，却以失败告终。这个本地人一生都与独木舟为伍，平衡感极强，又了解如何操纵风帆，这些都是我完全不具备的能力。他一踏上风帆冲浪板，就利落而惬意地越过海湾，而我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风帆拉离水面，却又马上跌落了下去，还抱怨风力太厉害，不给我这个新手面子。我们之间在这方面能力上的差距给这位老兄平添了许多乐趣。

史前史学家要学习的重要一课就是避免年代误植——不要以为过去的世界与现在的很相似，也不要以为虽然完成进化的现代人有能力做我们能做的所有事，他们就确实做了。因此，如何判断现代人运用能力的方式何时能让我们判定他们从社会和文化意义上都已成为真正的现代人，就成为一个经验问题。目前为止，答案一般是在6万至2万年前之间，也就是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时期。正如克莱夫·甘布尔所说，此事关系到“他们变成我们”。甘布尔还认为，在此期间最主要的变化是人们逐步从生活的琐事中解放出来，使得时间和空间在社会层面得以扩展。博克斯格罗夫人制作出了漂亮的手斧，证明他们具有生产极为实用的手工制品的高超技巧，也证明他们有了不起的审美诉求（对我们如此，对他们可能也是如此）。这些手斧由本地材料制成，也经常掉落在使用过的现场附近。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4万至前1万年），制作石器时要先从很远的地方取得石料，甚至远达数百公里外。不仅如此，制造、保存、使用和交换石器等活动的链条也更长。那时的社会互动与用以建立社会关系的物质文化并不仅限于此时此地，手工制品也包含了一些与地点和重要人物相关的意义。“象征”一词的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定义是“代表其他的一种事物”——比如红色代表血，“猫”这个词代表动物。象牙和骨头被雕成了人和动物的形状，黏土和石头被用来制成所谓的“维纳斯女神雕像”。现今俄罗斯北部宋格海尔遗址出土的一条项链是最后一次冰川期（大约在1.8万年前）的人工制品，由3000颗珠子串成，很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提升或改变了穿戴者的社会地位（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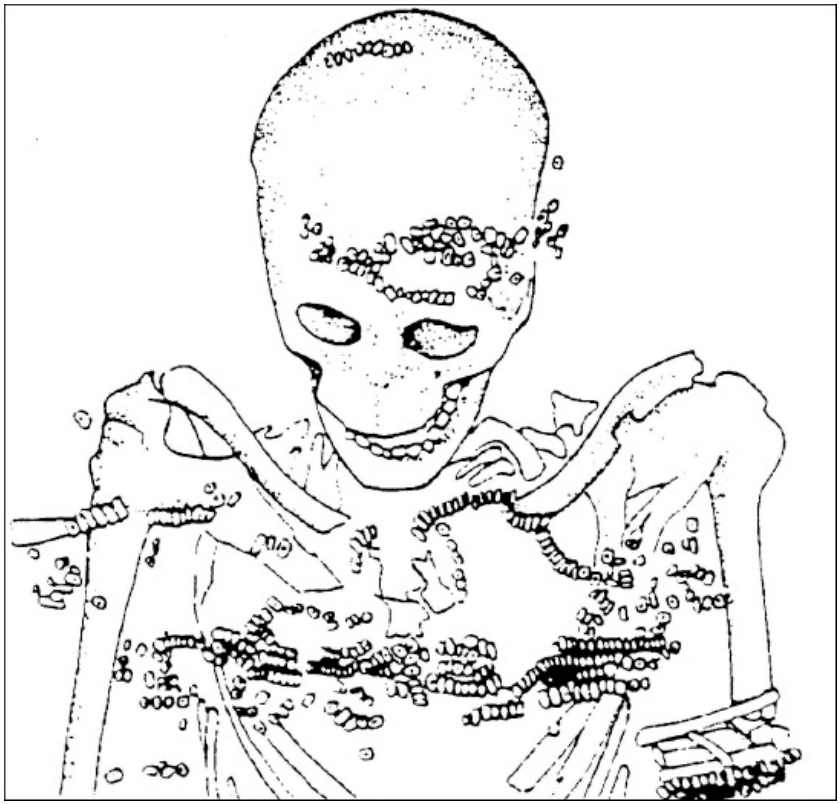

图7　戴着项链的宋格海尔墓葬人骨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制品包含的意义远超此时此地所限，使人类的社会关系跨越了时空。物质文化和社会关系紧密相连；若无他人的存在，一个人就无法以同一方式永恒存在。地点和人物很可能都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和情感。

意义和象征不只依附于事物，也和语言——现代人类最后一个要素——有着密切关系。人类的语言是从尼安德特人或更早的人类开始，还是从现代人开始？和这个问题有关的争论很多。20世纪60年代，教导黑猩猩讲话的尝试遭遇挫折。事实上，黑猩猩缺乏合适的口部和喉部构造，不具备我们的发声条件，根本无法说话。但是当研究人员改教它们学习手语时，情况就不一样了。黑猩猩和大猩猩都能通过手语去表达关于自己、它者、物质世界、过去和将来的复杂概念。

有关尼安德特人语言的许多讨论是他们能否像我们一样发声，但是由于缺乏咽喉区长度、舌头或上颚等方面的直接证据，讨论一直踌躇不前。不过即使尼安德特人不会说话，他们或许能够通过一系列的动作和声音来实现彼此间的沟通。而这实际上不仅仅是身体能力的问题，也是社会需要的问题。旧石器时代中期似乎缺乏长久而深刻的一系列活动，使得人与物事之间的关系无法获得跨越时空的扩展和深化。出于某种原因，尼安德特人的社会也没有发展出进行语言沟通的复杂形式的需要。他们可能不认为需要进行类似于“记得5年前，我们杀了一头长毛象，现在我还用那头象的骨头打制石器”之类的讨论，然而一个现代人可能会说：“我珍视这张弓，因为它是我母亲用长毛象的筋键做成的。那头长毛象是她在5年前杀死的”。当然，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任何一个尼安德特人或者现代人的情感依附，但可以猜想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人类对人与物的依附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较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人类更甚，也更有能力通过语言去表达这种依附。对人工制品和人的深刻依恋来自于事物本身及其意义，同样也来自于谈论人和物事的语言。这使得生活中那些人们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和那些虽然直接却只能部分表达人们感受的语言之间产生了某种冲突。这种存在于语言与行动之间的冲突对于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在其他物种中却可能并不存在。

全面的人性是通过身体技能、物质世界和语言特殊结合而成的，这三项因素在大约4万年前初次以现代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

大卫·贝克汉姆当然并非舞文弄墨之辈，但他确实展示出了人类才智的关键要素。他在足球场上把身体与社会两方面的技能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很少人能够望其项背。正如萨拉·伯恩哈特所说：“如果我能说出舞蹈，我就不需要跳舞了。”舞蹈不会认为自己是比戏剧低下的艺术形式，只不过完全不同而已。足球也是通过一系列动作来表现的一种戏剧形式，评论员只能对它进行不充分的描述。史前史关系到这些良莠不齐的“表演”，也关系到人类在创造对我们有意义的世界时对身体的使用，而我们迟至现在才试图用语言把它们捕捉下来。古往今来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是吸引我们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动力所

在，而这种多样化和差异的本质才是史前史谜题的核心所在。

第四章
各大陆的史前史

在本章中，我将探讨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每个大陆都有其自身的史前史。正如我接下来要描述的那样，已有证据表明每个大陆的人类起源都可追溯到1.5万年前，且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人口没有出现大规模增加。人类存在的这种连续性为其文化与历史的连续性奠定了基础，甚至在历史极为短暂的生活领域，如神话中也体现了这种连续性。如果这种长期连续性的论点站得住脚（的确很有争议），那就意味着被普遍视为人类史前史上的一大变革——农业的发明并没有引发人口的大量增加或迁徙，各地区人们的生活也没有发生迅速而重大的改变。在本章中，我首先会谈论一下能证明人类连续性的遗传学证据，这些证据源于全球人口迁徙过程和末次冰期的影响；接下来会对认为农业出现后人口增加而导致人类大规模迁徙的证据进行批判性分析；最后再提出一些分析考虑不同大陆上人与动植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多样化表现形式的新思路。以讲故事的方式解说史前史是要冒点风险的，更不要说许多史前学家对于这些证据本身就有不同解释。不过，强调大陆之间的差异其实也就是承认人类的同一性和多样性。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通过两条基本思路来理解人类的多样性和同一性。第一条思路来自19世纪中叶的社会进化论，它强调人类作为同一物种的相似性，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如何经过诸如采集、狩猎、农耕等阶段，进而发展成为不同国家和文明的整个进程。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从赫伯特·斯宾塞、皮特·里弗斯到爱德华·泰勒，无不深受达尔文观点的影响，且被人类研究的诸多方法共有一个理论基础的可能性所吸引，这与他们想要把考古学和民族学建成科学学科的目标遥相呼应。史前史“向前向上发展”的观点的提出，原是建立在进步的信念之上，但其中隐含的一层意思是人类并非以相同的速度进步或达到同样的发展程度。只有欧洲人的后裔完整经历了全部历史阶段，成为理性、文明、民主和奋发向上的强者，剩下其他欠进步的群体停留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抱残守缺——比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非洲个体农民或亚洲各地的“停滞”文明。

于此我们不难发现，为什么上述有关人类生活的发展理论和同一性的观点对于许多人，包括某些欧洲人的后裔在内会没有吸引力了。

20世纪初，美国的博厄斯发表了一套与上述意见不同的理论观点，它们脱胎于德国的传统理论，强调不同地域的特殊性和人类文化的整体性。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后来将文化定义为经常重复出现的一组特征，例如人工制品、房屋、墓葬、食品等等，其背后则存在着很难通过考古学加以辨识的人类相似性，比如亲属关系、语言和习俗。这种文化历史观把世界视为一幅由多种文化形式拼合成的马赛克般的图画，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生活习惯、世界观和历史；每种文化都只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加以理解。人类生活的特点表现为多样性而不是同一性。布鲁斯·特里格尔的考古学发展史观强调在同一性和特殊性的两种研究方法之间寻求折中，前者如19世纪的早期进化论，曾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得以复兴。博厄斯和柴尔德的文化历史观强调不同地区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卷土重来，对进化考古学在科学领域的雄心提出质疑，对西方可能出现的客观看法大加挞伐，强调要根据各自情况去了解其他生活方式的必要性。

图8　胜利者的进化

今天我们的问题已经从为何某些人没有攀上进步阶梯的顶端，转变为人们如何为自己创造出了对其有内在意义的世界了。的确，现在很多人怀疑这个形形色色的世界单用一个框架结构能否全部囊括，尤其是用为了理解欧洲的过去而建立的这样一个框架。同样，人们之前对于技术发展的重视，现在亦多少由探究人类如何通过将各种各样的技能和技术结合在一起，从而习得特定种类的社会、身体和心智技

术，以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世界所取代。人类潜能存在于各方各面，范围宽广；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和历史在发展出某些技能的同时却忽略了其他方面。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被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描述为人类心智的艺术大师，因为他们创造和保留下来大量的人类系谱和宇宙论方面的知识，却很少重视物质文化的创造和使用。这种文化形式强调知识就是力量，这种看法向以人工制品为主要考察依据的史前考古学家提出了挑战。但这确实提醒了我们，文化不能以单一尺度去衡量谁高谁低，孰优孰劣，而无视它们之间的不同。跨地域文化有比较的必要，但重点是比较彼此的不同，而不是用同一把标尺比较短长。

文化的差异性与同一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书写史前史一直至关重要。我在这里试图采用一种取巧的说法：全人类既有共同的东西，也有不同的能把我们区分开的东西。为了有助于理解我这样做的意图，让我们先来简短地讨论一下语言。所有人类群体都有语言。在人类社会里，儿童会自发地学习语言——我们能在学习过程中鼓励他们，但这个过程无需成年人助其启动；不论如何，它总会发生。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在语言学界仍有争论）认为，语言不只是我们用以表达对于世界的想法和感觉的手段，也是用以形成这些想法和感觉的手段。如果语言作为一种“概念的工具”的形式，在全球各地不尽相同，那么人们不仅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谈论和书写世界，实际上还居住在自己的思想、感觉和信仰的世界里。因此，如果我们将两个语言不同的群体，例如说英语的人与澳大利亚土著放在相同的环境里，那么这个环境对于他们而言也截然不同。这是殖民地历史已经进行过的一项实验，结果使土著人群遭受重创。我们明白了这两群人专注于世界的不同方面——白人对金属资源、能否放牧绵羊和耕种小麦感兴趣，更不用说优质的冲浪和海洋环境；土著则生活在一个图腾世界中，但凡岩石、河流、沙漠、动植物等都是由梦幻时代的祖先所创造，因此在开发利用它们的同时，还要加以细心照料。正如我前面所强调的那样，人们不是仅仅通过语言在生活，而是通过熟练的行为模式；他们不是被动地感知世界，而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模式去塑造世界，正如世界塑造他们一样。人类的同一性在于我们通过物质这种媒介建立起彼

此间关系的能力，以及我们创造语言的能力。语言与行动之间的张力无处不在，那正是人之为人的核心所在。不同的语言、人类和文化形式，都有其自身更具本地特色的历史。这些历史，从大陆范围细化到各地，在不同层面上展开。而我要在这里探讨的，是各个大陆在塑造人类差异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一个人们普遍对与自己不怎么相同的人满怀恐惧和不信任的世界里，从时间和文化的角度去强调人类差异的程度，是一种危险可能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认可各种不同的语言、风俗、信仰、思想和感觉都有其自身漫长而深刻的历史，可能会使那些差异显得无法逾越。毫无疑问，差异可以引发不信任。同时，我们又都能做出同情理解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我们可以进入并生活在他人的世界里。我们的探索精神至关重要，如果它始于跨文化交流的需求，则能够引导我们去探讨人类多样性的历史，而不是试图征服、否定或杀戮异己；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激励和挑战，迫使我们（无论我们是谁）扩展我们的概念范畴和人类的感受力。对我来说，这无疑就是史前史研究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化目标。

各个大陆的史前史有何不同？这些不同是如何造成的？又是从何地何时开始的呢？在开始回答这些令人望而却步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回到上一章中留待讨论的人类殖民历史上去。在所有大陆上都生活的唯一一种灵长类动物就是现代人。人类的扩张是独一无二的，且在过去的1.5万年或略少的时间内才完成（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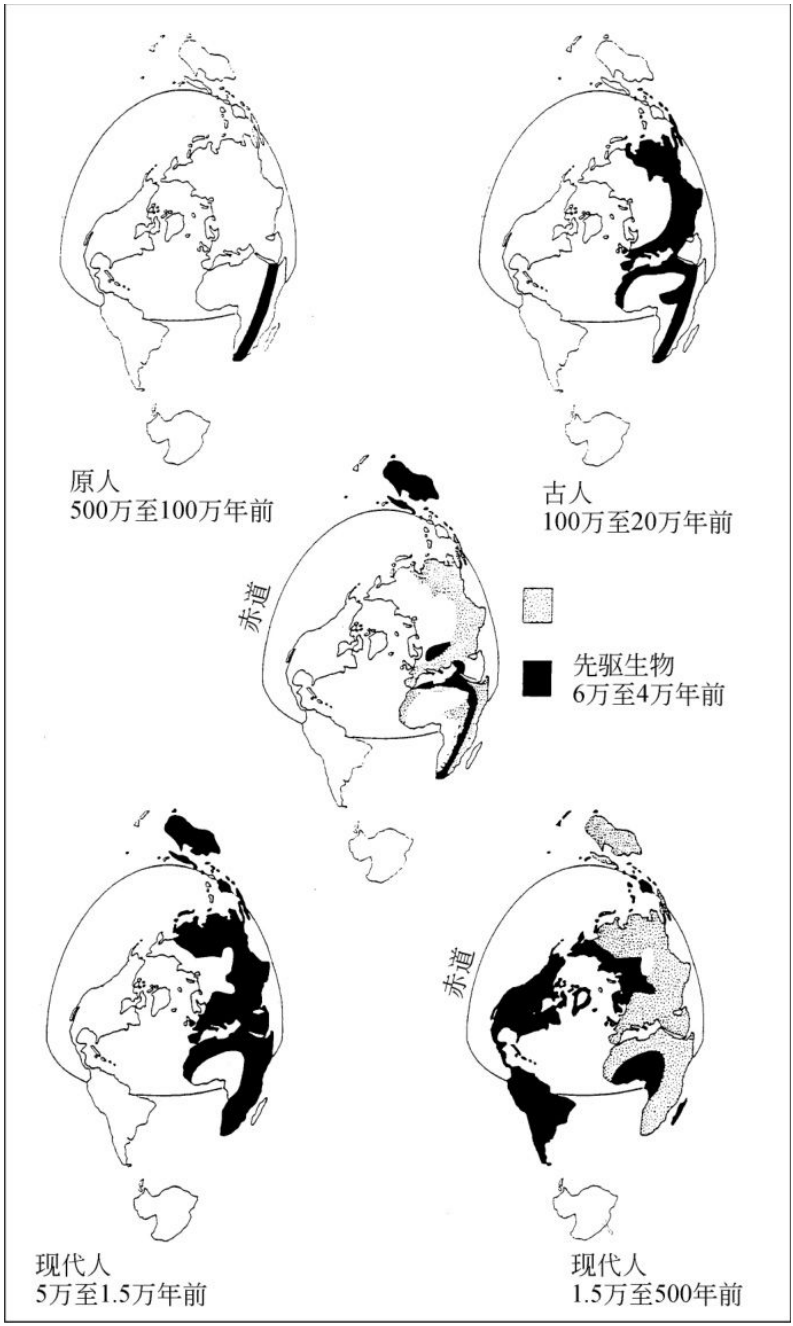

图9　人类散布全球的迁徙过程

在第三章中，我们了解到现代人的祖先大约于12万年前在非洲出现，9万年前离开非洲大陆，公元前4万年前即遍布欧洲和亚洲。这一扩张的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人类至少于4万年前就已迁移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地区（也有可能早至公元前6万年前，年代还有争议）。虽然直到公元前6000年，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海平面较低的时期合并成一个被称为“萨胡尔”的巨大地块，这个地块一直被海洋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分隔开来。与达尔文同时代的生物学家华莱士提出过一个类似于进化论的生物演变理论，发现东南亚与澳大利亚的动植物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他提出的“华莱士线”将东南亚的有胎盘哺乳动物（猴子、象、虎等）与萨胡尔的有袋动物划分开来。大陆漂移的过程形成了华莱士所称的“超大陆”（由南极洲、南美洲、非洲南部、印度和萨胡尔组成），使得有袋动物在这块大陆上繁衍起来。随着这块大陆瓦解，南极洲漂移到南方，变得天寒地冻，导致全部动物死亡；其他的大陆碎片则撞入北美洲、非洲北部和亚洲大陆地区，导致这些地区原有的大型肉食动物迅速捕食了新来的所有有袋动物。大约在1000万年前，澳大利亚到达了它目前所处的位置，由于北部海域使其完全孤立，从而使得有胎盘哺乳动物无法进入。

人类是跨越这个巨大的生物地理障碍而进入到一个充满完全陌生的动植物（胶树、金合欢树等等）的世界的第一个物种。萨胡尔从赤道地区向南延伸到塔斯马尼亚南部的次南极地区，包括喜玛拉雅山以东最高的山脉群——新几内亚高地和面积广阔的中部沙漠，人类的新鲜感必因其南北纵深的宽广而变得更加浓厚。萨胡尔简直就是一个检测现代人能力的实验室。我们的祖先从容地在此通过测试，终于在4万年前，踏上塔斯马尼亚中部的冰河向北挺进，进入澳大利亚东南部和西南部的温带地区，深入到沙漠和热带北部，采集狩猎，繁衍生息。不久，他们又到达了离今天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不远的群岛上。我曾经在那里发掘洞穴，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海上捕鱼证据和最早的人类岛屿居住证据，其年代比在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等地的岛屿上发现的人类活动遗迹都早得多。

与人类进入和穿越萨胡尔相比，人类对美洲的占据则有许多待解

之谜，既无法确定确切的年代，也不知是否否同样轻而易举。跟其他大陆相比较，美洲的人类历史存在更多争议。有人说8万年前即有人类到来，但这并不是争论的焦点所在，因为它本身就缺乏讨论的依据。如果说人类是从西伯利亚进入美洲的，那么南美洲出土的两个遗址则称得上是意外发现——巴西的佩德拉·弗拉达和智利的青山，可能比北美洲发现的任何一处遗址都要早，在大概3万年前就开始被人类使用。青山位于智利中南部，1.3万年前无疑是一个露天地点，物证都在泥炭沼泽中得以保存了下来，包括木屋的地基、一块乳齿肉、一个人类脚印、动物毛皮、植物化石以及木制和石制的工具等（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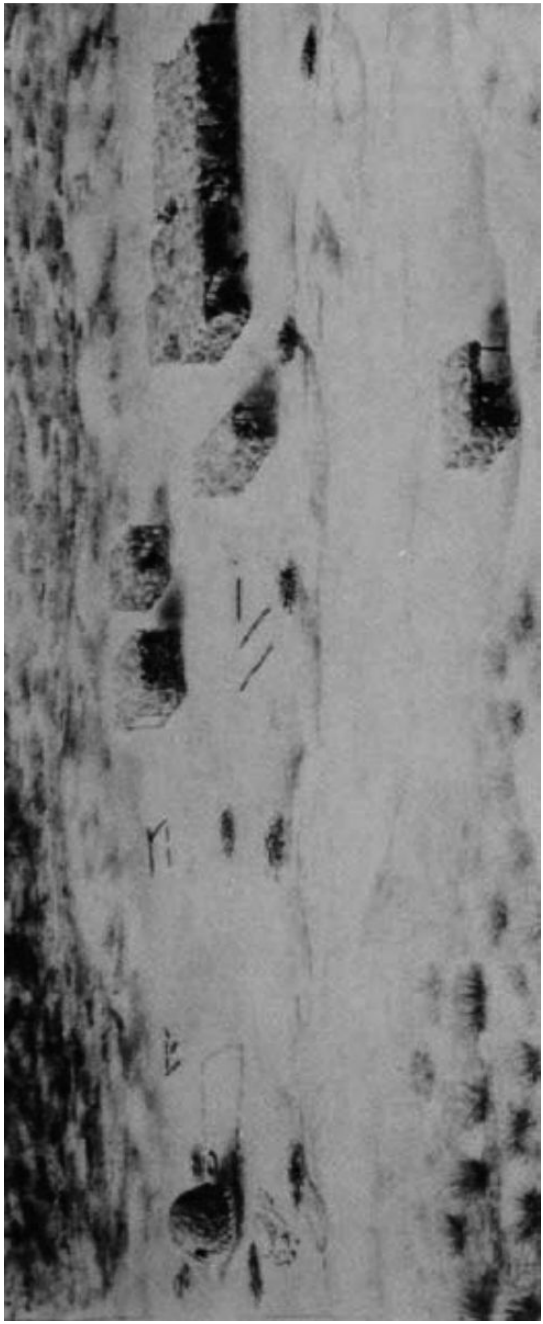

图10　智利青山遗址的复原

这一人类定居遗址使人开始怀疑早期居民都是游动的采集狩猎者这一观点，也显示出了该地居民与其他群体的贸易关系。但是，将该地认定为可能是一个2万年前的居住地会引发争议和麻烦，而且该遗址的发掘者汤姆·迪雷亥似乎越来越怀疑一点——在主层位之下可能是一个灶台和3万年前制造出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判断愈发受到重视。巴西东部的佩德拉·弗拉达遗址的年代测定为3.2万年至1.7万年之前。很多人（特别是北美的考古学家）对这个测定持怀疑态度，因为用以判定年代的木炭可能是自然火灾的遗物，而所谓石器则可能是从遗址上方悬崖顶上冲刷下来的石头，自然破裂后与人类制作的工具相仿。当然，这里也牵涉到考古学家的自尊心问题。他们花费了巨大的气力在北美洲寻找早期遗址，却没有得到公认的成果，而北美洲的专业考古学家的数量可能比世界其他地区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对于所有这些高水平的专业人士来说，找不到潜在的早期遗址实在令他们很难接受。不仅如此，由于我们的常识表明人类是从北方进入美洲大陆的，我们自然期望看到文物古迹的年代是从北向南渐次递减的，而不是相反。

1932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克洛维斯镇附近，出土了大量石矛和灭绝动物骨骼。迄今为止，克洛维斯矛头在美国各州都有发现，北面远达北极圈，向南则直至南美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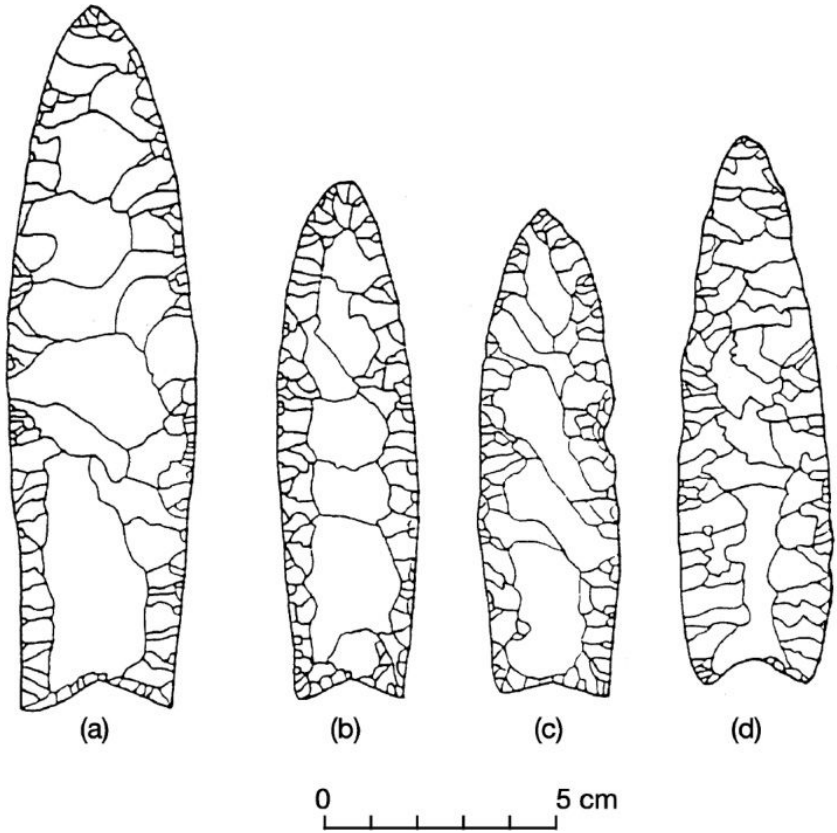

图11　典型的克洛维斯石矛

放射性碳定年法将这些古物的年代定为距今1.2万年前，另外一个以矛头为代表物的福尔松文化则晚了约2000年。克洛维斯遗址代表着美洲大陆首次被人类真正占据。当时的美洲大陆被巨型动物群主宰，包括长毛象、剑齿虎、巨型驼鹿和一种与现代熊大小相仿的海狸，是一片对猎人充满了诱惑的大陆。人类是从现在的西伯利亚走进美洲大陆这一说法似乎再合理不过了。西伯利亚至少在2.3万年前就已有人居住。到1.5万年前，叶状矛头遍布在西伯利亚东北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西部。在过去的6万年里，冰川作用造成海平面下降，在白令海峡至少形成4次陆桥（即所谓的“白令陆桥”），导致多种动物得以从亚洲迁到美洲。白令陆桥猎物稀少，阿拉斯加的一片荒凉和

巨大冰原可能把人类吓住了。他们原本也可以选择沿着海岸，像人类最初进入澳大利亚一样，走海路南下，这样就能使青山等遗址的年代更早具备了合理性。如果南美洲遗址的年代更早，我会为他们感到高兴，但目前的证据并不令人信服。根据叶状矛头在加拿大东部的分布情况，以及1.3万年前的青山不太像是人类早期迁徙时代的遗址的事实，我会把人类进入美洲的初始年代定在大约1.5万年前，这样就留出了人口增长的时间，因为3000年之后，以克洛维斯石矛为代表的遗址变得随处可见。

定下这个年代，就可以将其与欧亚大陆作一个有趣的比较。虽然现代人在9万年前进入亚洲西南部，并由此进入欧洲，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特别是在欧洲）表明，从最后一次冰期的冰盛期到大约1.45万年前，人类曾经和整个动植物群落一起迁移到了西班牙北部–法国南部和巴尔干半岛–乌克兰地区，只是在气温开始回升后才再次迁移回大陆。有趣的是，近来的遗传学证据显示，百分之八十的欧洲人都能够通过母系一方将血统追溯到大约1.4万年前的欧洲人类，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线粒体基因是后来融入的。这个研究结果十分惊人，因为有很多人认为，在大约1万年前，由于农业的发展使得食品供应变得更为稳定，人口数量增多，导致人口从早期的农业中心地区（不仅包括欧亚大陆的近东地区，还有中国、中美洲、南美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向外扩张，四面八方地迁往采集狩猎群体所生活的地广人稀地带。

这样，语言发展史方面的证据就变得相关起来，这方面最初的相关工作是由柯林·伦弗鲁完成的。1796年，印度首席大法官及皇家亚洲学会的创始人威廉·琼斯爵士发表了一篇有关印度文化的著名论文。他在其中介绍了印度的古老语言梵语和欧洲、亚洲发现的许多古老语言，如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和凯尔特语之间存在的诸多相似性。

例如，“火”字在梵语中是agnis，在拉丁语中是ignis，而英语中的ignite一词就来源于此。欧洲的所有语言（除巴斯克语、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和芬兰语等为数不多的几种语言以外）、一部分亚洲语言

（如亚美尼亚语、波斯语）和绝大部分印度语言一起被统称为“印欧语系”。琼斯认为这些语言的起源可追溯至诺亚方舟着陆之后人类的迁移，这种说法在今天很多人看来难以接受。但是，人们还是基于现今词形之间的相似形和词形随着时间发生的系统变化，努力致力于重建原始印欧语。历史语言学构建于一个令人惊奇而又无可否认的事实之上，即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存在系统性的语音变化，例如希腊语中的ph有规律地转变成了日耳曼语族中的b，因此希腊语中的phrater（意为“氏族成员，族人”）就演变成了英语中的brother（意为“兄弟”）。这种系统性变化使得寻找语言间的关联和重建历史成为可能。

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继威廉·琼斯后差不多200年，伦弗鲁开始关注是否能将印欧语系的起源与考古学证据的变化联系起来。实际上，伦弗鲁期待着有一种能将考古学、历史语言学和遗传学分析融合在一起的“广义综合理论”。对印欧语系的语言分布状况进行分析后，他相信在最近的几千年里，只有一个事件或过程能够成为这些相互关联的语言广泛分布的主要原因，那便是农耕的传播和农民的扩散。伦弗鲁及其他学者继而将这一“农业起源”假说加以扩展，用来解释其他分布广泛的语系的起源和传播，取得的主要成果有：认为遍及非洲西、中、南部地区的尼日尔–刚果语系是通过班图农学家的迁移从西非扩散开来的；东南亚地区（以及马达加斯加）的南岛语系，也就是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沿岸地区、所罗门群岛和更加遥远的太平洋深处的夏威夷、复活节岛和新西兰等地的岛屿语言最初是经由中国台湾的农民扩散开来的。

语言通过农业扩散的理论只是几个互相矛盾的假说之一。这个假说早在现代分子遗传学提供大量证据之前就已提出。它预测早期农民扩散到不同大陆的活动应会留下清晰的基因证据。但遗传学的研究结果至今并未拿出新石器时代迁移的重要证据，而伦弗鲁本人是首先承认这个事实的学者之一。欧洲人口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体现出的惊人的连续性促发了语言起源和传播的新途径的诞生，且这些新途径均与农业无关。欧洲人口的出现可能要远远早于农业的诞生，且欧洲在过去

1万年间都没有新基因融入这一点就能证明。但这种连续性也不能向前延续至现代人初现的公元前4万年。1.5万年前，人类从冰川时期的避难所中走出，开始向外扩散，这使大多数欧洲人与首批迁移到美洲大陆的美洲人有长度大致相同的历史。虽然类似的人口扩散在亚洲也有可能发生，但我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有人认为澳大利亚人由于沙漠面积扩大而被迫进入避难所，且在1.5万年前再度出现，但目前的证据也同样不足。随着末次冰期的气候变化，非洲也可能发生过类似的人口缩减和扩散。如果这样的扩散的确在所有大陆都发生过（目前还仅仅是如果），那么这些居民的祖先均可以追溯到末次冰期的结束时代。虽然晚近时期人口变动多有发生，但在过去500年期间，这种变动的规模都不大且局限在很小的区域范围内。

印欧语系的语言有没有可能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扩散，那时欧亚大陆广大地区的物质文化有广泛的相似性，随后由于文化间的接触而得以强化甚至导致某种程度上的重新组合呢？这个设想会使遗传学的解释更合理，与考古学的证据也不矛盾，却无法在语言学界觅得知音（部分原因是如此久远的事情已远超出历史重构的范畴）。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设想能使这三个学科的大多数学者满意。同样，在南岛语系的分布区，遗传学亦未能提供中国台湾是南岛语系老家的证据。虽然中国台湾被认为是农业群体的来源地，但遗传学的证据却将该语系的发源地指向了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而该地区毫无农业起源的任何依据。语言学、遗传学和考古学之间的联系看起来丝毫不清晰，而且农业传播的假说也不太受欢迎，甚至在非洲都是如此。有些考古学家并不接受班图人迁移之说，遗传学的证据亦未得到很好理解，但显然是错综复杂的。澳大利亚的语言与澳大利亚大陆以外地区的语言没有任何关系（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新几内亚高地），表明它们与其他所有语系之间自古以来就有差异。美洲土著的语言仍然众说纷纭。北美洲的纳–德内语系自成一个紧密联系的语言群体，据推测可能是晚近起源的缘故；但是美洲大陆其余的多种语言混为一团，完全无法进行分类，也没有清晰的一致性。

史前史没有文字可考，但是史前语言并非完全不能了解，以后来

语言之间的相似处和差异的分布情况为基础的历史重构工作就可以发挥作用。从现代语言特征的分布可以追溯语言的历史，同样的推理过程也能应用到遗传学中，不过从古代骨骼中提取和分析DNA还存在诸多困难。但通过对现代人类遗传学特征的分析显示，各大陆的人类群体都有贯穿古今的明显的连续性。最大的例外是欧洲人大规模地取代了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的土著居民。直至更新世晚期，各大陆的居民都生息繁衍起来，自此以后一直稳步发展，直到500年以前鲜有来往。基因的研究有效证明了人类的长期连续性，也得到了考古学证据的支持，但语言的历史状况却依然莫衷一是。无论如何，在过去1.5万年里，有关连续性的普遍证据都为假定各大陆的史前史存在差异提供了基础。

农业的发明使人口扩散至整个世界的假说并没有得到遗传学和考古学的有力支持，这促使我们转向研究更久远的历史。这也有助于人们将一直以来对于农业的本质及其起源进行的重新思考继续进行下去。

共生关系

共生关系意指某种相互支持和相互依赖的共同生活过程。现代人的生活就包含了与某些动植物和物质的紧密关系。在欧洲，人们以食用谷物和牛羊肉为生，但是这些被驯化的动植物同时也依赖我们得以繁殖、生长和生存。这种相互关系常常潜滋暗长，而不是被突然创造出来。以特定动植物为食物的行为促成了烹调和消费等特殊物质文化形式；人类与其他物种的长期关系也促生了特殊的饮食、起居、器具组合，比如陶罐、石器、炉灶和房子等。与动植物生活在一起也意味着会创造新的人文景观，而且这些景观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田野和树林、沙漠和绿洲、热带雨林和人工清理出来的林中空地等等。共生关系也是人类为自身创造世界的过程，包括特殊的社区结构、人文景观、人工制品及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地方景观能够通过地方发展来

创造，但是也有许多景观在过去的1万年里，会在人类之间迁移和散播。

在各个大陆上，人类和动植物都有着相互依存的历史。如果没有人类的技能和照料，牛羊群容易生病或遭受食肉动物的袭击；如果没有人的帮助，被栽培的谷物也难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单靠它们自己，苹果、豆类或胡萝卜的繁殖也难以为继。同样，密集的人口也需要这些物种来养活。作用不太明显但同样重要的是诸如老鼠、鸟、昆虫和肠道寄生虫之类的亲密的共生者。它们寄居在房子、田野和人体里，与人类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共生关系亦以权力的形式存在，表现在男人与女人、大人与孩童、神灵与人类、群体的核心力量和边缘人物之间等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共生关系也关系到审美和情感，关系到身体的感官运作，即赋予某种人和事物以价值，从而形成互相信任的基石。不消说，各大陆各个地区的人类生活都是不相同的，每个大陆的共生关系都有其特殊变化范围，对于共生关系的反应方式也是如此。

正如杰瑞德·戴蒙德指出的，由于在植被、温度、日照和季节方面的相似性，一块大陆上同纬度地区之间的粮食作物在建立联系时要比南北走向的地区之间更容易些。从乌克兰到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区，其间自然景观上的相似性远胜它和北方的森林地区或南方的沙漠地带，可能这就促成了这些地区间的旅行、交流和动植物及商品的流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穿越沙漠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在过去1000年里，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技术与资源的交流错综复杂，已经完全无法将亚洲与欧洲分隔开来。无论在哪个大陆，从别处引入新的作物或新的物质文化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们必须在当地既有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被接受。

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食物。在20世纪，关于食物的思考重点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强调食物生产转变为强调食物消费。戈登·柴尔德认为，人类历史上有3次大革命，即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和工业革命。无论是公元前3500年前开始的城市生活，还是晚近工业化之后的城市生活，都是新石器时代革命之后农业发展

的结果，因此新石器时代革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柴尔德把新石器时代的发生视为革命，是因为动物的驯养和植物的栽培为人类提供了更加可靠的食物保障，使得环境变得可控，人类也不必像采集狩猎者那样听任环境的摆布。稳定的食物供应使得人们安顿下来，而定居生活则衍生了闲暇和需求，从而使人类创造出更多更复杂的物质文化——陶器、纺织品、磨制石器和房屋，冶金技术稍后也应运而生。“人类从蛮荒的死胡同中逃脱出来是一场经济和技术上的革命，从此人类成为大自然积极的合作伙伴，而不再是它的寄生虫”（柴尔德）。农民不仅仅是通过对动植物的驯化来改变自然，同时也“创造了自然界中原本不存在的新事物”（柴尔德）。陶器、羊毛和亚麻纤维便是人类对自然及其特性的认识更为理性的明证。柴尔德思想中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创新是其性别视角。“根据人种志的证据判断，上述所有发明（各种农业技术、酿酒术等）都是女性的贡献。制作陶罐用到的化学、纺织的物理学、织布机的力学和亚麻与棉花的植物学知识可能也都带有同样的性别标记”（柴尔德）。新石器时代革命的重要性简直难以言表，它改变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柴尔德提到的所有发明都集中在生产上，他相信各种发明的好处不言而喻，一经出现即能得以广为接受。

我们现在知道，迈向农业生活之路并非一蹴而就，也没有表现出与之前生活方式的完全决裂。下面让我们仔细考察一番近东地区的一个遗址，柴尔德相信近东是欧亚大部分地区农业活动的摇篮。最早的动植物驯化发生在西亚，即从土耳其东部到黎凡特地区（指地中海东部附近诸岛及沿岸诸国）。在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中游的一个水坝下面有一个大湖，湖水下面埋藏着一个被称为“阿布胡赖拉”的遗址。在建设水坝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这里曾进行过考古发掘。遗址的原居民可能拥有丰富的粮食资源和生活材料，包括来自幼发拉底河潮湿的河谷、附近的绿洲、草原林地和距离稍远的山边开阔林地的动植物。阿布胡赖拉有两个叠压的聚落遗址，前者的居民以作物栽培辅助狩猎采集，后者的居民则以作物栽培和动物驯养为主。这个遗址早在1.5万年前即为狩猎羚羊的人们所占据。

每年春天，波斯羚羊群都要从它们过冬的叙利亚南部迁往北方，经埃尔金关口到达幼发拉底河。阿布胡赖拉正是羚羊群转向西面时呈扇形散开扑向大草原的所在地。在至少3000年的岁月里，年复一年如期光临的羚羊群是当地居民赖以为生的关键。

该遗址的居民住在由木头和茅草搭建的小屋内，制作燧石和骨质工具，用研磨石和杵加工处理野生植物。大约从1.1万年前起，也就是气候从末次冰期晚期的温暖变得更冷更湿润的那个阶段，人们开始种植栽培黑麦，可能还有其他谷类作物。伴随耕作而大量增加的草籽，正是田地耕作的一个可靠的间接标志。在1.15万年至9000年前之间，人们的生活可能有很明显的季节性。4月里，羚羊群的到来意味着这是一个密集屠宰的季节，有些肉可能会被腌制或贮存。同时，这也是需要采摘大量野草的季节。到了6月，黑麦就要收割。在7至11月之间的盛夏，人们则到山谷采摘谷粟和灯心草种子，到草原采摘各种野草和植物根茎，当然也不放过偶尔捕猎鹿和野猪的机会。有证据显示，女人比男人更多从事植物食品的加工工作，因为从女性背部和脚部骨骼的磨损可以判断她们生前多以跪姿承担繁重的碾磨工作；但有些男人亦会参与这类工作。在12月至次年4月之间，人们依旧采摘植物根茎，猎捕野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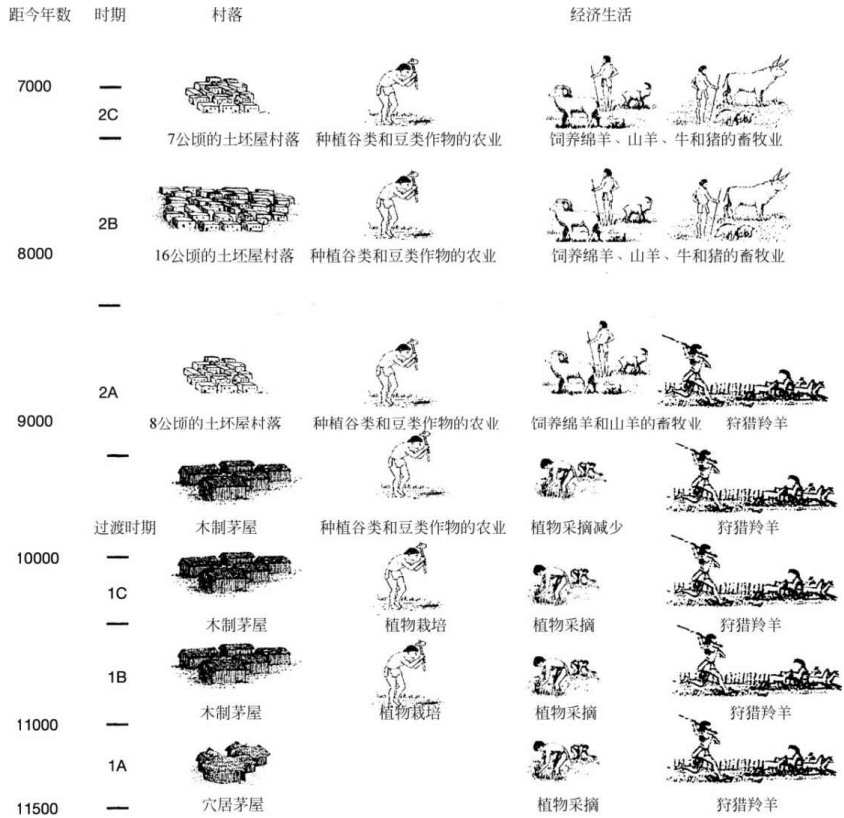

图12　阿布胡赖拉遗址的人类活动年表

被驯化的动植物渐渐加入到人们年复一年的生活周期中，却并没有取代先前的采集狩猎生活。每年，人们要先把土地准备妥当，夏天播种，冬天除草，春天收割并加工食物。到1万年以前，该遗址的常住人口约为300人，形成了一个全新类型的聚落。在这个人类早期阶段，燧石和骨器都有某种程度的连续性，说明日常生活相当稳定。炉灶固定在屋内的一个地方，从不改变，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因而也都以近似的方式，围绕在它的周围生活度日。很显然，大规模定居的出现先于农业的发生，农业也并非突然间的发明，而是点点滴滴逐步融入并扩展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年度的季节变化规律为像黑麦那样的作物塑造了种植和收割的固定模式。栽培作物的种子可以用来做成粥和面包，跟以前所用的野生种子一样。正是基于这种工作和消费的连续

性，新鲜事物才更容易融入固有的生活方式之中。人、动物和植物在许多个世代里一起成长，对于彼此的习惯和需求都了如指掌。

然而，就其规模和延续性而言，阿布胡赖拉确是一个革命性的遗址，堪称末次冰期西南亚地区（或世界任何地方）为数不多的大型村落遗址之一。大量人口生活在一起，人们可能会遇到新的社会问题。低密度的不断移动的狩猎采集者能够透过疏散来化解冲突和危机，有了争端，可以一走了之。而数百人互相依赖地住在一起却不能如此行事。伊恩·霍德认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驯化对象不是动植物，而是社会本身。他相信，如果新石器时代革命确曾发生过的话，那么它便是符号的革命，因为不同类型的房屋、石刻、墓葬、陶器（当它出现之后）等无不具有相当复杂的装饰和意义，而这种现象前所未有，其目的在于帮助处理男女之间的紧张状态。定居使性别关系具有一种全新的形式，也赋予生和死新的意义，因为生与死意味着个体进入和离开一个社区（关于前者我们所知甚少，关于后者却有许多来自墓葬的证据）。我们因此怀疑，这些居民拥有复杂的仪式活动周期，部分活动的周期是按年份计算的，也有的可能因偶发事件，比如死亡所引起。凡此均体现在器物的装饰、炉灶的位置和墓葬上。

阿布胡赖拉一期是一个大型村落形式的生活中心，由多所房屋组成，每所房屋又各自以炉灶为中心。人类的相互关系从这些新的中心，首先延伸到周围地区，然后发展至遥远的外地，正如海贝、黑曜石和其他舶来品的流动痕迹所表明的那样。这已经够令人称奇的了，更意想不到的是在距今9400年前往后建造起来的聚落却又变得完全不同。房子用土坯建造，房屋之间几乎没有间隔，建筑物的布局、排列方式和建筑形式已经持续了差不多2000年。假如一所房子每50年更新一次，那么在整个聚落的历史中大约会更新400次。这个聚落相当庞大，在距今8300年至7300年前之间，占用了大约16公顷土地，容纳了大约5000至6000人，需要约1000至2500公顷的田地。他们种有5种栽培谷物（黑麦、二粒小麦、单粒小麦、面包小麦和二棱及六棱大麦）和扁豆、豌豆及野豌豆，从距今7300年前开始，蚕豆和鹰嘴豆也开始流行起来。房子的地板下面是人类的墓葬，妇女的墓葬远比男

人的多。正如这个时代的许多遗址那样，人们重视头骨，经常将头骨从躯体上取下来，有时还会把它们包裹起来。的确，有许多证据显示，墓葬不过是在人死之后对其身体精心处理的最后一个阶段。死者通常会有随葬品，包括动物骨骼、骨珠和黑曜石，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距今7000年前后，陶器出现了，很可能引发了烹调和食物享用方式的全新变化。再加上陶器本身具有可塑性，通过塑型和器表刻画也能传达各种符号。房屋的墙壁和地面也被彩绘，这可能是定期举行的活动。此外还发现用黏土和石头做成的动物小雕像，这在亚洲西南部地区也非常普遍。

阿布胡赖拉这个庞大的土坯屋村落只是从欧洲东南部到亚洲中部发现的众多新石器时代原始社区中的一个。每一个这样的社区都有许多共同因素，比如建筑物、陶罐、农作物和石器等等，但每个地区又都有把这些因素组织起来的特殊方式。我曾经在今土库曼斯坦地区发掘过一个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小村落，遗址位于伊朗高原脚下的卡拉库姆沙漠边缘地带，沙漠由此向北延伸了1000公里。这是一个由20至30间同时期的房子组成的小聚落，生产漂亮的彩陶，以单粒小麦为主要农作物，也驯养绵羊和山羊，却没有人类墓葬的任何证据。这可能是因为遗址上的建筑虽然是永久的，但人们并不在此定居，而是在低地和山脉之间来回移动，定期修建和重建他们的房屋，以至于到距今7000年前，遗址的房屋迅速了聚积，导致最高与最低的房屋之间的年代难以区别。目前由伊恩·霍德及其同事发掘的卡塔·胡玉克遗址是土耳其境内的大型聚落，从许多方面均能显示出其与阿布胡赖拉遗址的相似连续性，但它在房屋装饰、器物和墓葬方面表现出了更明显的象征性因素。人们在欧洲和亚洲各地建立起共同的文化基础，却又以当地的特殊方式来运用这些共同因素，以满足各自通过发展人与动植物及物质世界之间的新关系而产生的愿望和需求。

关于农业起源的传统观点强调发明的重要性，而现在则认为调整更为重要。任何新事物必须先融入原来的文化规范，才有可能被接纳。在许多情况下，调整意味着器物和动物物种的外形或功能要被改造，以求得与既有实践方式的调和。人与动植物以各种不同方式共同

生长。农业与其说是一种发明，不如说是为了适应彼此不断变化的需求而出现的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杰瑞·戴蒙德估计，全世界约有148种重达45千克以上的食草动物和杂食动物，其中只有14种被驯化，这使我们对其他134种没有被驯化的动物感到好奇。更令人惊奇的是，全世界有20万种高等植物，只有大约100种被驯化并得到不同程度的利用。尽管在现代农产品生意的刺激之下，近年来涌现出许多研究项目，但几乎没有发现什么新增的食用动植物种类。今天我们食用的大多数动植物都是在史前时代被驯化的。

戴蒙德站在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待驯化，关注的是食物生产。斑马躁动不安，灰熊大而凶悍，大象的繁殖又过于缓慢，均不易于驯服或作为高产量的食物来源。这些因素确实需要考虑，就好比非洲的食草动物很多，无需加以驯养一样。但是，人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伙伴关系，双方都应该加以考察，而不能单以非人类的要素为讨论基础。人类的婚姻偶尔也会因为一方的差错而破裂，但这比较罕见，更为普遍的是双方对成败均负有责任。在每一个大陆上，人类和动植物都共同生活了数千年。驯化是一个有用的词汇，因为它抓住了这个过程的相互性。驯化通常是指通过人工手段，使动植物在形态和行为上发生改变，以使它们生产出更多的食物资源，更易于控制、饲养和加工处理。

我们已经详细考察过中东，现在让我们粗略地看看其他地区。关于非洲有一个争论，部分是由殖民主义者的立场所引发的，那便是：到底有多少事物是在非洲发明的，还是说生活中的所有要素都是从外面引进的？当人们去解释事物的时候，这些疑问很大程度上暴露了欧洲起源论的先入为主有多么严重。但是，最近有关牛和绵羊的基因分析表明，它们都可能是在非洲东部被驯化的。不过牛可能至少有两个驯化中心，另一个在印度某地，那是瘤牛的发源地。在东非，对牛的复杂的利用方式为人们如何独特地使用物品提供了绝佳的例子。虽然牛奶和牛血均很重要，但牛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动物，还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也是表现象征意义的关键因素。这对古往今来的努尔人、丁卡人和马塞人等等来说无不如此。尽管绵羊是非洲大陆南部的主要

家畜，但绵羊从没有获得与牛同样重要的社会地位。在公元前3000至4000年间，马、驴和骆驼均在西亚地区被驯化，其后引入非洲；水牛则在1000年前由阿拉伯人传入非洲。小米（珍珠小米和指形小米）首先在东非洲被驯化，然后传到亚洲。我最喜爱的水果香蕉是现今非洲某些地区的主粮，有很复杂的历史。香蕉首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南亚这两个地区被驯化，可能早在公元前1500年前即从东南亚横跨印度洋到达印度和非洲。

地区	驯化		已知最早的驯化年代
	植物	动物	
驯化的独立起源地区			
1. 西南亚	小麦、碗豆、	橄榄绵羊、山羊	公元前8000年
2. 中国	稻米、小米	猪、蚕	公元前7500年前
3. 中美洲	玉米、豆、南瓜	火鸡	公元前3500年前
4. 安底斯山脉与亚马孙河域	马铃薯、	木薯羊驼、天竺鼠	公元前3500年前
5. 美国东部	向日葵、藜属植物	无	公元前2500年
? 6. 西非荒漠地区	高粱、非洲稻米	珍珠鸡	公元前5000年前
? 7. 西非热带地区	非洲薯、油椰	无	公元前3000年前
? 8. 埃塞俄比亚	咖啡、画眉草	无?	
? 9. 新几内亚	甘蔗、香蕉	无	公元前7000年?
因外来作物而引发的本地驯化			
10. 西欧	罂粟、燕麦	无	公元前6000至3500年
11. 印度河谷	芝麻、茄子	瘤牛	公元前7000年
12. 埃及	无花果、油莎草	驴、猫	公元前6000年

图13　世界各地被驯化的部分主要动植物

我可以把这些驯化和迁移的物种名单一直罗列下去，但我不打算这样做。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情景：东非的一群马塞人坐在树下，身后是当地驯化了的牛群，在吃过小米饭和烤香蕉之后，喝上一杯放了糖（一种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植物）的香茶。想想这顿饭中每一种要

素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历史，其中只有最后两种是殖民影响下的产物（茶和糖）。世界其他地区也可以发现同样复杂的动植物驯化和迁移的历史，只不过时间和物种有所不同罢了。农业的很多发明并非出于实用的考量，而是听从味觉的支配。南美洲最早的驯化作物出现在公元前8000年前的沿海地区，既有葫芦、马铃薯和木薯等作物，也有鳄梨、胡椒和各种豆类等美味。这些美味食品与主要粮食作物一起，早在公元前4200年前即被引进到安第斯山脉的内陆遗址。每个山谷地区的居民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引进何种物种的选择。古往今来，食品都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不同山谷的人类群体在饮食方面形成了些许却相当显著的差异，从而标示他们之间的不同。正如安德鲁·谢拉特曾指出的，小麦、香蕉和马铃薯等后来成为主要粮食的作物最早可能是作为奢侈品被加入到饮食中去的，并以此形成多样化和社会差异。我们不能单靠面包来过活。在远古时代，面包可能只是正餐之外的一种特殊美味，那时候的谷物交易可能伴有某些社会仪式和影响。

无论是地方发展起来的还是由外地传入的，生活中的各种要素都会被人们组织搭配起来。这并不是一个随机的过程，正如我们从晚近物种的引进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与本地生活逻辑相调适的过程。当茄属马铃薯（正如我们刚刚提及的，这种马铃薯约公元前8000年前首先在南美洲被栽培）在19世纪初被引入新西兰的时候，毛利人很快便接纳了它，这是因为甘薯（也是首先在南美洲被驯化，但至少1000年前就已横渡太平洋）已为人们所熟知的缘故。这与瓦尔特·罗利爵士把马铃薯（跟烟草一起）传入英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马铃薯起初在英国被当作观赏植物加以种植，因为种植、烹调和食用这种根茎作物的传统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更熟悉跟各种谷物打交道。当然，现在英国没有人会认为马铃薯是外来作物。虽然新的东西将来可能会把人们的生活引向意想不到的方向，但它们只有在打动了当地人民的心弦后才会被接受。被人类接受的新东西并非只有食物，陶器也是一样。陶器是一种极具可塑性的物质媒介，不仅因为其造型、彩绘和其他表面装饰形式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可能性，还因为其造型可与陶器内放置的物品的性质呼应起来，比如欧洲出土的鸦片形罐就可能

是用来放置鸦片的。生活总是既包含了旧有生活方式的延续，又在探索着新的可能。

我把最有争议性的话题留到最后讨论：每个大陆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神话系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神话在专业考古学家那里都是一个广受争议的领域，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新时代及其精神旨趣，轻易地跨越了学术上的正宗与异端之间的界线。19世纪的思想家把历史视为沿神话、宗教和科学这个进化链条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且认为只有现代欧洲发展出了一种具有实证性、客观性和有效性的科学。这种想法仍然挥之不去，使得人们相信如果考古学家对神话表现出过多的兴趣，就难逃包庇非理性信仰的嫌疑。针对仪式的讨论充斥在考古学著述中，但讨论更多的似乎是某些具有仪式感的行为模式，而信仰的内容通常被避开了。西方思想传统有两种看待神话的方式：第一种，神话与现实相对立，神话是虚构而不是事实；第二种，神话与理性相对立，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那里，他们认为神话是比理性低下的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研究非理性和不真实的想法与感觉，看起来好像是在浪费时间，就好像我们期望自己的孩子从仙女或圣诞老人的故事里走出来，快快长大一样。但是，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我们通常使用的术语使我们研究世界的方法带有偏见，也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对许多非西方传统的人们而言，神话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更严肃地看待它。我用下列方式把神话与巫术联系起来。神话关心我们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神话无处不在地反映了人类时刻关注自身存在的价值；神话描述了人类、动植物和世界本身的起源，也可能论及世界末日及末日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神话谈论了人们应该怎样与他人及其他宇宙力量联系起来，也谈到了背离这些关系的危险性；神话时常使用夸张的语言和想象；它们不只是被讲述，也会通过行动来表现，使用各种道具帮助传达各种要素，还会借助舞蹈、灵魂出壳和药物等形式来增强表演效果。

巫术是神话的盟友，但它寻求调停和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和描述它。在许多地方，死亡都被认为是人为的，因此确认肇事者并将之绳之以法就需要占卜和巫术。同样，诸如金属冶炼或铸造这样的大动

作也需要适当的条件才能进行，包括匠人的洗礼仪式、正确的符咒和咒文，这些跟控制火候和具备合适的设备同样重要。就像科学及其实践者的关系一样，对于巫师来说，巫术是一种客观力量，而不是一种主观条件，它具有调动世界潜能的力量。把科学和巫术相提并论，并不是要贬低科学或站在反科学的立场上，而是把科学放在人类试图影响世界的更悠久的传统之中。科学与巫术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前者很少注意人类参与者的精神或道德条件，而这对巫术来说至关重要。将科学从令人困惑的道德观和宇宙观中剥离出来，大大促进了它的实践效率，这是巫术望尘莫及的。但这样做的代价也很明显，把道德问题与科学研究相分离，也就排除了对科学研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质疑。

每个大陆都有各自独特的神话和巫术形式。两者常常与某些物体相关联。例如，在北美洲，说阿尔冈京族、伊洛魁族和苏族语言的族群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与颜色以及表现这些颜色的物体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红色、浅／深蓝绿色和黑色。红色代表反社会的行为，如暴力和战争；浅／深蓝绿色代表心智的意图、知识和存在的最广泛形式；黑色表示缺乏认知和自我。具有特殊颜色的物质——比如白色的海贝、做成珠子的豪猪刺、水晶、天然铜块、银块或彩石往往与地下或水下充当各个巫术社会的守护精灵（例如有角蛇、豹或龙等）关联起来。获得和使用这些具有神秘力量的事物对于人类的福祉和自然界的繁衍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对待财富的观念也与欧洲人不同，他们更珍视药物，因为它能保证人们的健康和幸福，必须妥善加以利用。当地人通过一种“置换”过程，把原来赋予地方物品的价值也转移到欧洲人的贸易品上。这个原史阶段的欧洲人通过他们带来的贸易品被吸纳进当地的关系网络中——物质性确是某种特殊形式的社会性的前提。从墨西哥远道进入北方地区的这些物质，暗示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具有共同的信仰系统，甚至还包括西伯利亚的一部分，因为这正是美洲土著当初走过的地方。这些共同信仰必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可能经由某些中心轴线把土地、水和天空等不同领域连接起来，巫师游走其间，以沟通各个不同领域的神灵。力量的概念至关重

要，这也包括“药物”的力量，这是一套让人类受益的影响世界的方法。巫师与幻觉经验的重要性广为人知，同样重要的还有盛宴和礼物赠予，这些都是神灵赐福的明证。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力量和效能的概念处处隐藏在具体事物之中，因此在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并没有西方思想中常见的水火不容。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整个澳洲大陆共同具有欧洲人所称的“梦幻”的信仰形式。在创世之初，祖先的神灵穿越地球表面，塑造出每个地区的特征，包括地貌在内，比如岩石构造、河流、树林、水坑、植物、动物（许多祖先以鲨鱼、野狗或蛇的面目出现，然后变成相关族群的图腾或神圣动物）和人类。“梦幻”不仅涉及创造环境的物理和化学过程，也包括指明正确对待其他物种和人类的创世神话。梦幻的踪迹遍布澳大利亚，体现在歌唱、绘画和舞蹈之中（布鲁斯·查特温的《行歌》一书为这种仪式活动提供了绝佳的例证），把相隔遥远的人们联系在一起。那些在欧洲人看来可能是纯粹务实的活动，比如打猎或采集，在这里却需要以尊重为前提和土地的神力联系起来。梦幻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遥不可及的古代。考古学证据显示，今天某些岩石艺术的主题至少有3万年的历史了。澳大利亚的主要考古证据——石器由于颜色、光亮以及原料的内涵力量，很可能被赋予了美学和精神的属性，因此给待在实验室里试图了解石器的加工和使用方式而非宇宙观的史前史学家带来了挑战。

欧洲、亚洲和非洲很少有这类广泛流传、普遍共享的神话，一方面是因为大陆之间业已存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各种宗教比如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交叉重叠。在欧洲，对说印欧语系语言的人群是否共同拥有一个万神殿和共同的宗教与神话信仰这个问题已有很多讨论。这方面的争论空间还很大。这里容我提出下面这个可能性：《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传说由荷马书写的史诗——也许是最初记录下来的故事，并不仅限于希腊，也可能在广大的欧亚大陆流传。如果这是真的，伴随着文字发明而结束的史前史很可能就为我们了解欧亚大陆青铜和铁器时代的信仰系统打开了一扇窗户。

每个大陆上的人们都已经与当地的动植物建立起了亲密关系。羊驼、甘薯和辣椒构成了南美洲人的营养基础，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乐趣，这与非洲人依赖牛、小米和啤酒生活的情形并无二致，尽管内容并不相同。不同大陆见证了人们因地制宜地开发人类潜能的过程。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各个大陆的物质资源大异其趣，但也跟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巫术、神话和变形的逻辑分不开。每个大陆都在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与欧亚大陆和非洲相比，澳大利亚和美洲走上的道路与之完全迥异。各大陆在发展方向上的分道扬镳并没有阻止人、思想和事物在各大陆之间的流通，但这也意味着新事物能否被接受总是取决于是否符合当地的文化逻辑。

共生关系常常是缓慢、持续而非迅速发生和革命性的一个过程，但这并不是说革命从不会发生。其连续性植根于自更新世以来人口的长期稳定性。就物质世界而言，我在本章中把重点放在了动植物方面，只附带提及人工制品。在下一章中，我将考察物质文化并开始讨论它与人类智能的关系，“智能”一词是我们对于人类的全部技能和理解能力的简单综合表述方式。

第五章
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

河边站着一个人，冲对岸的人大喊道：“你是怎样到达彼岸的？”对岸的人回答：“因为你就在彼岸。”

身份取决于视角。“身份”的界定可能涉及两个或多个不同的方面，可能还要用到某些微妙和不稳定的特性。身份亦由我们与其他物种和对象所形成的共生关系构成，因此在进行社会分析时，在任一关系的形成中发现起到粘合作用的社会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就人类而言，很少有什么东西比身份更重要，也很少有什么东西比身份更难定义。或许就是因为其重要性和定义难度，身份的议题对于撰写史前史来说一直非常重要。因此，人们一直专注于用图表绘制出人类进化成“我们”的过程以及测量我们与异类之间的距离。“我们到底是谁”或“他们是谁”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在面向他人和物质世界时采取什么行动的各种因素的混合，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源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本质。身份和社会性这二者紧密相连，同时也与人类智能或感知力等概念紧密相关。下面我将以人类的身份认同问题为主线，探讨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这里，我会将“身份”这个概念当作“经验行动”这一特殊意义来使用。首先让我们从“智能”这个关键的核心概念谈起。

人类智能的史前史

1832年12月18日，达尔文在南美洲南端火地岛附近的成功湾上岸。他乘着“小猎犬号”航船刚踏上这次改变了他一生的旅程后不久，就在这里生平第一次遇到了“野人”，感到震惊不已。他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他们有人的样子，在寒风中赤身裸体，对船只和船上的人粗鲁地咆哮着并做着手势。他怜悯道：“野人真是不幸的生物。”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有任何形式的宗教崇拜，……各个不同的部落也没有政府或首领。按照我们的观念，这些人的语言几乎算不上连贯和清晰。他们的技能由于不能通过经验来改进，在某些方面可以比作动物的本能。”

导致野人缺乏这些能力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野性。他们对自己的情感没有任何控制，理性因而难以推行；他们不能掌控自己，也就没有能力掌控周围的世界。火地岛居民可能在此之前就与过往船只关系不睦，他们的反应概缘于此，但达尔文全然不知，才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完全非理性的。增长理性，从而控制住了情感的野性是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看待世界和人类进步的观念的核心。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了解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进化类型学将人类的进化过程分为巫术、宗教和科学三个层面，认为驱动巫术发展的是想要干预世界运转的非理性和情绪化的期望，并以此达到干预世界的目的，在将其与科学过程进行比较时对期望的定位出现错误。

给智能下定义很难，智能的定义与给它下定义的人数一样多。不过，很多定义有其核心内容，从保存讯息、解决问题，到前所未有的创新的思想和行动，范围甚广。多数定义只关注心智，对身体的技术和能力方面的关注则比较缺乏。所以当你知道我要强调身体的技能和人类生命中诸如情感之类的所谓非理性的要素，并尝试用它们描绘人类智能的历史时，请不要感到惊讶。

我曾很幸运地在英国最著名的史前遗址之一——牛津郡南部尤芬顿的白马山进行过考古发掘。白马的形状由白垩石块堆砌而成，位于山脊之上，以其漂亮的外形和线条著称。

“白马”与其他大多数历史遗迹截然不同。古代遗迹一般因其形体巨大并具纪念性，能抵抗时间和天气的侵蚀而得以保存下来。但是构成白马的白垩石块需要照料，如若不定期清洗它，除去污损的石块和杂草，换上新的白石，它就会消失在英格兰南部雨水充沛的绿色植物里。人们对白马底部最后一次暴露在阳光下的沉积物进行测年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白马可能已有3000年的历史。从青铜时代晚期建造至今，若每10年需要清洗一次的话，至少已经清洗300次了。今天，该遗址为国家信托公司所有。他们为那些不堪都市生活重负的人开设了户外课程，人们可以付钱参加一门压力舒缓课程，当中可能就包括清洗白马。回到19世纪中期，洗刷工作由尤芬顿的村民完成，这是每年“五月庆典”的节目之一。村民还会进行把奶酪滚到山下、赛马

和危险的“背后穿刺”游戏，即用木制武器把对手的头部刺出鲜血。在托马斯·休斯的小说《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中，就有对清洗活动的生动描述。在他所著的另一本名为《清洗白马》的书里，对此有详细的细节描绘。新的铁路系统建成后，这些诞生于19世纪的活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人前来参与。相关的历史文献只能将清洗活动的历史追溯到16世纪，我们对更早期的清洗活动的本质只能加以猜测，而这一活动即便在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诺曼人到来后也没有终止过。

图14　尤芬顿的白马山

白马与人类智能的讨论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创造白马或在3000年间每10年清洗一次，与任何解决问题的智能概念均不搭界，但它确实与通过物质世界的操作来悉心维持社会关系的一般概念相符合。清洗白马不是一种机械行为，而且马的意义一定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幻莫测——通过使用一个符号来建立和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创造新的符号一样困难。不论青铜时代的人们创造白马的动机为何，我们可以相当肯定舒缓压力不在其中。

对于审美方面的考量，包括物质世界对感官的冲击大概是问题的关键。暴露在地面上的洁白无瑕的白马与周围的绿草形成鲜明对比，

很可能是一套更广大的象征体系的组成部分。当早期铁器时代的人们紧挨着白马在山顶构筑堡垒时，堡垒的防护墙就是由白垩石块砌成。从远处眺望，白马和白色的堡垒相映成趣，蔚为壮观。这一景观经由在万绿丛中自堡垒向南挖进白垩地层数公里之长的一条白色沟得以强化。操纵我们认为是美感的东西，对于创造具有特殊价值归属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当然所谓“价值”是就比较宽泛的意义而言。就此案例看，我们虽不能肯定白马、山顶堡垒和线型沟槽的价值何在，但是从土地发散出来的权力与景观混合在一起的某种东西，对理解马的图案却具有决定性。景观的颜色和特质如何反映在衣服、房子和人工制品上，我们只能依靠推测，但住在不列颠这个地区的史前时代晚期的人们很可能生活在一个由陶器、金属制品、木制品和纺织品以及歌谣、故事和舞蹈所构成的内容丰富的审美世界里——在当地家庭甚至更高的社会阶层中，这些物品的制造和交换大概有助于把价值依附到他们的人际关系里。的确，在史前时代晚期，不同的物品从外地涌入不列颠，如琥珀来自波罗的海，珊瑚来自地中海或红海，金属来自西欧和中欧的许多地区。人们的视野是开阔的，个人或群体的身份地位取决于他们经营和操纵从不列颠到欧洲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也取决于他们是否有高超的品味，从而在恰如其分的社会场景中陈列他们的青铜制品、黄金和琥珀。通过操作陶器、金属制品或纺织品以形成社会关系从而塑造世界的方法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在白马山上的集会不过是此地举行大型社会活动这一古老传统的孑遗。可以肯定这项活动的意义随时间会不断变化，但却都具有一套取悦宇宙力量和提升群体形象的复杂动机。

人类智能是人类与物质世界创造性的结合，这个说法可以关联到我在第三章中提出的关键论点：我们人类是会通过塑造物质世界来构建社会生活的唯一一种物种。清洗白马是一种没有多少技术要求的行为（连我都做到了），但我们却需要对这一持久的社会影响有深刻的理解。人类智能不仅包括技术上的复杂行为和社会创造性行为，还有可能是社会和物质的各种不同组合。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加尔用“迷人的技术”一词来强调人工制品及其制造过程可以使人们生起惊奇和

敬畏之心。人工制品引发了人们惊奇情绪的力量，强化了制造者的威力，就好像一个有技术知识和通天能力的人能够把天地之精华注入他的作品中一样。尤芬顿的白马是一件令人着迷的物体，古往今来一直引人遐思也令人向往。从这个意义上看，制造者的力量还在持续之中，而他们最初的意图可能并非如此。

因此，我与达尔文的意见不同——过去的人们并不野蛮，他们并没有因为缺乏先进的理性能力而被无法自持的情感所控制。情感可能是强大的，偶尔会压倒我们；其实思想也是如此。正如思想是不可预测的、非线性的和不可控制的一样，情感也并非想来就来、无法预测或不受约束。我们可能会突然受到某些想法的震动，也可能会控制某种情绪。但是，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而言，人类历史就是理性逐渐战胜情感的过程，这种观点在今天多少还有些残留。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区分思想和感觉怎么办？灵感乍现是一种强大的智慧和情感体验，它来自于对世界的崭新感觉以及用言语和物质塑造世界的全新可能。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一种高度结构化的、可预测的情感生活，而强大的情感，若不是由于突发事件，便是通过仪式行动中的刻意激发所引起的。“仪式”和“始料未及”的确相互关联，正如许多仪式的设置目的就是处理突如其来的死亡、传达诞生的喜悦或从少年向成年的过渡。

发生转变是智能的核心意义，转变的重点是要同时掌控物质与社会世界。转变也是伴有巫术和仪式的危险过程。西方强调因果关系的观点通过所谓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把物理过程与人类的社会关系分隔开来。金属制品的生产需要理解高温技术、矿石及其化合物的化学知识，以及生产青铜或钢所需的材料组合和正确步骤。西方人把生产者视为技师，他们对整个物理过程拥有或多或少的经验和技能，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他们的宗教信仰或禁欲的程度对金属生产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于许多非洲锻工来说，金属生产不过是更大规模的生产和转变过程的一部分，不仅与其他形式的物质生产，如烧制陶器有关，也与怀孕和生孩子密切关联。许多非洲人的世界观是把人类的繁殖、食物的生产加工以及工艺制造视为一系列转变的循环，即通过

人类和神灵世界的合作保证人类的福祉。西方人倾向于把技术和巫术分开，认为前者是对物理因果关系的经验理解，后者则纯粹是没有意义的戏法，而它的重要性不过是在心理上使锻工相信事情进展顺利。对于很多非洲铁匠来说，冶炼是一个类似妇女分娩的过程。许多高炉用女性符号装饰，男铁匠担当着父亲的角色，女性则被严格地排除在整个冶铁过程之外，其间也禁止铁匠和女性之间有性接触。他们通常都会认为性交会产生热，女人的血和男人的精液因加热而生育孩子。烹饪的时候，热的使用对人类生活也非常重要。由冶铁产生的热是温度极高极危险的。铁可做成武器和用于暴力，使其成为危险物质，所以对于铁匠来说，任何不和谐的暗示，比如在铁匠铺流下一滴血，虽然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小意外，但亦被认为能导致工作失败。虽然铁匠对于工艺的专门技术和仪式的常识不加区分，对于科学与巫术也不加区分，但必须对整个工艺流程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而西方人会对这些内容进行分类，认为它们要么可以给人们的其他生活领域带来影响，要么就是应被遗弃的无用之物。

我们从19和20世纪的人种志中了解了一些近代锻工的技能和知识，也了解过在工场和工具上常见的象征符号，因此能够根据某些相同的象征符号追溯到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事实上，和冶铁相关的各种信仰广泛分布在亚撒哈拉沙漠地区，并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我们已经知道，在史前时期的非洲西部和南部，炉膛内发现有乳房和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而某些地区的炊器上亦发现类似的装饰，它们在加工过程中也要承受热的作用。现代西方思想被认为是铁器时代初期以来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这对于至少1500年前就参与冶铁业的非洲人而言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冶铁术也许只是代表了创造新型人际关系的一种可能性，代表了“世界能够转变”这一理念的拓展。这并不是判断西方人和非洲人对于金属制造的认识哪个正确，或是把它区别为科学和巫术的问题；两者都有它们的效用。不过从某个方面来看，我认为非洲人的概念更为实际。如果人类是唯一一种通过操纵物质世界来建立其社会关系的物种，那么强调人和物的共同创造就使得物理过程和人类社会生活的综合本质更显合理，因此生孩子和金属制

造就有可能存在微妙的关联。人类利用智能来思考怎样将物质的和社会的关系共同转化，该过程包括对物质和社会过程的理解。西方科学只洞察物质过程，却丢掉了理解物质世界和人类怎样合作的“巫术”。学习史前史可以帮助我们找回某些已经消失的巫术。

转变不仅发生在人和物上，也表现在具有审美特性的各种人工制品上。在欧洲，史前青铜制品很可能做成了耀眼的外观以达到金银般的效果，只不过在埋葬了4000年之后，这种效果已难以再现。从青铜到黄金造就了一系列贵金属制品，这个系列甚至延伸到了模仿青铜器的陶器上面。在中国，青铜器的表面颜色常为绿色，这或许是玉器的重要性使然。他们对玉器的偏好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或更早。约公元前65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制造的萨麦拉时期的彩陶罐上，有模仿篮子的纹饰，说明篮子早在陶器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把粘土涂抹在篮子的内壁上加以使用可能促进了陶器的发明。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有模仿红铜匕首的精致的燧石匕首，前者在遥远南方的德国北部平原和中欧地区很流行。

在西太平洋地区，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到萨摩亚一带，在公元前1500年前的拉匹塔文化陶器上发现了复杂的齿状纹饰，可能模仿自人类皮肤上用齿状工具做成的纹身。一个有纹身的人，拿着带有同样复杂图案的陶器，一边是粘土，一边是皮肤，相映成趣。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们在死后都和动物埋葬在一起，并且以相同的方式加以处理，表明动物和人可能存在意义深远的共通之处。物品、人和动物可能有天生的分解不开的联结，这些联结跨越了我们所定义的某种人工制品的范畴，开启了一个更大范围的联系网络，以考验人类的美感和技巧。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人类的审美各不相同，正如各个大陆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一样。

人类学者对物质世界各种区别——闭上你的眼睛，再摸摸你的衣服，看你能区分出多少种质地的布料。其他感官也是如此。透过嗅觉，你能知道有多少种饭菜吗？你能从楼梯上的脚步声区分出你的每一位家庭成员吗？你能看见多种蓝色吗？我会将这些区别称为美学，尽管这是日常生活中的美学。它们是我们赋予世界的价值，使我们以

特定的方式活在世上。价值需要通过感官的教育来学习。此类美感特质乃是人类通过和世界互动所激发的反应。我们的情感依附于感知——楼梯上的某些脚步声可能使我们放松或恐惧；蓝色可能具有某种奇迹或神圣的意味；某种气味可能会令人顿生厌恶。“感觉”一词有效地捕捉到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与情感之间的某些连结——对某物的身体接触可能会与某些事情连接起来。没有感知到任何东西亦可有被伤害或沮丧的感觉。感觉可以是不确定的、试探性的和直觉性的，例如我们可能对某个特定的个人或处境“就是感觉不对劲”。感觉是我们识别世界的智能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与理性思考相当不同，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混杂了身体和情感的感受，这对引导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

图15　斯堪的纳维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燧石匕首

智能并不仅仅是人脑的运作，也涉及我们所有的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听觉等单个或联合作用的感官。我们的感官需要通过特定的方式加以训练，才能懂得如何鉴识青铜的颜色变化或红铜匕首的质量。联觉是指把各种感觉混合起来的一种状态。对某些有这种状态的人来说，不同形状可能有不同味道，不同声音可能代表不同的颜色。这种跨越不同感官的状态既令人困扰，也可以是具有创造力的。有些文化就很重视用这种多重感觉感知世界，处处都可以进行类比推理，其中以中美洲文化最为明显。在前哥伦布时代的中美洲（墨西哥及其南面的近邻国家），只有铜、金和银等金属，这些金属都无法做成锋利的刀刃，所以人们就寻找其他替代物质。火山玻璃，即黑曜石，是用来制作切割工具的主要材料，在世界各地被广泛使用和传播，比如西太平洋地区从2万年前开始使用，中东地区至少从1万年前开始，东非也远在数千年前。黑曜石是玻璃的一种，与其他形式的玻璃同样锋利，今天仍用于精细的眼科手术。对于史前史学者来说，黑曜石的最大优点之一在于不同石材的化学特性是有区别的，从而使得我们可以追溯黑曜石工具的来源，可以重构长阶段的贸易模式。为了找出中美洲过去3000年间的考古遗址中黑曜石的来源，并探究黑曜石制作方法的变迁，学者们已花费了不少努力。黑曜石的功效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来理解（接下来我会返回到经济方面讨论），但其他方面的要素亦需要考虑，其中有两个方面就值得强调。首先，它与火山有关，因而也与地下世界有关，这个联系因为较晚的史前人类向地下开采它这一事实而被加强。再就是庙宇时常设置在火山附近，认为它是靠近地球的毁灭性力量。神圣、创造与毁灭之间的联系帮助解释了形成社会关系的黑曜石的力量。至少从史前时代晚期开始，黑曜石刀就被用作杀牲和献祭的工具，用来杀死祭品，取其心脏。阿兹特克人用黑曜石镜子作为占卜的巫术工具，以便与神祇沟通。这种方法在更早以前及后来的殖民时期都在使用。

黑曜石的神秘力量部分来自其罕有的锋利特性，这种力量经由与宇宙的创造及毁灭的力量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黑曜石也因为比喻和玉发生关联，玉是统治者的财富，能为土地带来绿色和富饶；它还用

来跟绿松石相提并论，可以沟通神明，释放烟雾，像云一样遮蔽蓝天。西方经济学概念有一套靠用途、劳动力或稀有程度等来衡量价值的尺度。假如你想用一个人的心脏来献祭神明，黑曜石就特别有用，但是它的价值来自于各种神秘的联系而非实际用途，它能赐予神秘而又强大的力量，能够从数英里之外影响人际关系。物质文化并非只能通过单一感官来感受，而是可以通过多重感官而形成，它让我们对世界作出联觉反应，输入各种感觉然后融合在一起。我们的皮肤能够感觉黑曜石刀片的锋利，眼睛可以看见它的颜色，耳朵可以听到刀锋的裂帛之声，放在手上可以感觉它的重量，所有这些都汇聚成我们对于这件物体及其潜能的感知。

经济学像科学一样将人和物分开，或者说只允许其在满足人类需求这个方面以特殊的方式结合。对物质需求的强调可以让我们理解到人类较晚近的历史是以人类的基本需求为首要动机的，这是由于某部分人将人口增长和资源不足的情况加诸于其他人身上。但是在更早的时代，当人口较少且权力结构不容易造成社会金字塔底层者一贫如洗的时候，为人们提供食物和住所，满足每个人的热量需求反而相对容易。超出需求和功用之外的价值流行起来后，物物之间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变得重重叠叠、纠缠不清。在更广义的人类价值还没有那么重要，且尚未让位于赤裸裸的需求之前的史前时代里，纯粹进行经济分析的作用很小。许多在现代世界久经考验的分析工具，比如经济学方法，用于分析史前时代的价值时却变得愚钝无力。

性别与性

由物的感官特质所引发的审美价值影响着人们作为社会性生物的存在方式。上面我们简短地讨论了与事物有关的价值，现在再让我们看看与身体有关的价值。所有人类社会的一个共通之处是性别的区分，但我们说所有人都会区分性别，并不是说所有人的区分都是相同的。近年来，一种性别分析的常见观点认为，文化上的性别是由生物

学上的性别区分形成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在生殖器、身体大小和形态等方面的差别是建立性别的部分原材料，但并不意味着仅此而已。许多群体区分出了两种以上的性别（如印度的“海吉拉斯”或美洲土著的“双灵人”是两个非男非女的著名例子），对于某些人来说性别并不是固定的，而是由个人所处的情境派生出来的。例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阴茎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分娩，使阴茎成为一个临时的雌性器官，而不是纯粹的雄性器官；在成年仪式上，从阴茎上抽取的血也被视为与月经血类同，对男人而言意味着生殖能力和女人不洁的危险。

纳普和麦斯乔尔曾经考察过塞浦路斯在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人形塑像的一系列身体表征。

他们认为这些小塑像提供了某种线索，让我们得以了解这个时期作为个体的含义，检讨作为一个独特个体的经验是如何滋长出来的，自我的感觉如何通过年龄、地位、性别或族群认同而变化，以及身为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在某个特殊的时间或空间里积累的文化经验。虽然某些人形塑像既有阴茎亦有阴户，但有些研究人员还是将它们按男性或女性来分类。他们也对红铜时代的石坠饰与青铜时代泥土塑成的板状人形塑像之间的差别表示怀疑。一些人会将这些人形塑像视为母神，但是纳普和麦斯乔尔则认为很多人形塑像是为了试图去协调男人和女人的性别特征，而不是强调差别。青铜时代的小塑像逐步强调个体装饰、首饰和面部刻画，后者被诠释为面具、纹身或脸部装饰。青铜时代大量的个体墓葬与较早时期的集体墓葬形成对比。对个体定义的提升亦与聚落规模和聚落数量的增加、工艺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的繁荣和社会精英的发展这个大背景有关。纳普和麦斯乔尔强调，我们不应该把个体性与现代的个人主义相提并论，更不要把人们看成按照性别、年龄和等级划分的固定不变的群体；相反，我们应该将它理解成一个社会流动性很强的时代，性别和其他认同因素都有很大的变化空间，人们可以从中选择发展他们各自的人格，甚至可能在他们生命的不同阶段重新检视和改变这个选择。人们通过首饰、衣服、化妆品或纹身在身体上留下物质世界的印记，但它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灵活和巧妙的特点中汲取而来的力量对创建显著的社会范畴至关重

要。

性别是被创造和表现出的特征，而不是通过生物学上的意外事件而遗传下来，也非一生不可改变的事实。性别认同的创造可以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且需要广泛的物质支持。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所谓的维纳斯女神小塑像广泛分布在现今的乌克兰和法国境内。这些制作精巧的泥塑或石制雕像被视为母神，与人们的生殖繁衍和文化景观密切相关。近年来，有人认为这些小塑像所表现的是女性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月经前和闭经后的状态，而且可能仅用于女性形式的教育和成年仪式，教导女孩认识女性的身体。小塑像可能由女性秘密制造和使用，因此意味着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某些隔阂。还有一种可能，正如在当代世界的许多情况下一样，小塑像也可能在男孩的成年仪式中使用，其女性繁殖力和怀孕的内涵作为大众社会再生产教育的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话，男性特质可能是通过与女性身体的关联而建构起来的，暗示了性别与性的互补性，而不是通过秘密的女性成年仪式塑像唤起性的欲望。无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性别关系是怎样的（把它确定下来显然是困难的），似乎性别角色和关系都是以物质形式如小塑像扮演，而不是通过身体的生物特征来直接解读。

图16　塞浦路斯的德黑尼亚出土的红色板状磨光陶制的双头人形塑像，展现出了个体的面部特征与首饰装饰

在如今捷克共和国境内的下维斯特尼采遗址发现了一个维纳斯小

塑像。这是一处末次冰期冰盛期的大型露天遗址，其中有许多人类居住遗迹和墓葬的证据。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一个浅坑状的墓葬，里面并排躺着3具人骨。

外侧的两具人骨在解剖学上表现为男性，而中间的一具则未能确定性别，但可能是女性。他们平躺在地上，身上有燃烧过的树枝。衣饰还有残存，包括穿孔的贝壳、狼和北极狐的牙齿。尸骸上撒着红赭石粉末，头部周围最为明显。中间那具人骨在她或他的大腿之间有一团赭石粉末。左边那具人骨将他的手伸至中间死者的裆部，有一根棒子穿过他的骨盆到达尾骨。虽然他看起来正注视着中间的死者，但她或他却转过身面向她左手边的人。体质人类学的分析揭示，位于中间的死者患有一种先天性的臀部疾病，称为“髋内翻”，会引致轻微的跛行。墓葬布局必然诱导人们视中间这个人为中心，其生理特征与众不同，模糊性和差异性使得人们对其更感兴趣。我们永远无法知晓墓葬所蕴涵的象征意义。它可能是庆祝，也可能是对性侵犯的惩罚（按照如今的流行解释，这像是小报经常披露的某种三角恋爱关系）或者意外死亡。两具人骨的盆骨部位看起来非常突出，使我们联想到性，而大量红赭石粉末的存在可能与血、月经或其他方面有关系。正如《卫报》新闻记者南希·班克斯–史密斯在一个部分内容涉及这个墓葬的节目中聪明地说：“他们被埋葬在密码中，而我们已经失去解码的钥匙。”

下维斯特尼采的墓葬结合了性的暗示和性别的暧昧，强调这两方面在许多时空里对于赋予人类行动的价值来说至关重要。性和性别是身体的物理性质及其社会影响的结合点，混合着我们试图分开的身体的生物属性和文化活动范畴。以这种方法区分自然和文化过于复杂；两者都无法成为对方的基础。下维斯特尼采的墓葬表明当事人本身及整个社群都具有颇有影响力的经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是何种类型的社会背景会导致三人埋葬的出现，但是从人骨姿态来看，他们似乎是在尸僵消失后才被埋葬，暗示了整个埋葬过程不甚迅速的事实。该过程涉及的物质的物理特性在其造成的影响中至关重要：当为他们穿好埋葬的盛装时，身体刚开始腐烂，扮演沉默的哑剧角色对于生者来说

相当重要；赭石的抛撒可能混合着真正的鲜血；一根木棒穿过其中一个死者的身体，而在葬礼尾声中火焰的忽然咆哮则可能让三位死者的姐妹、兄弟或父母们已经绷紧的情感神经更加紧张，而我们只能猜测这些情感——可能是快乐、恐惧、厌恶、解脱或所有这些情绪的混合，也感染着社群中的各个成员。我们的身体是快乐、幸福、痛苦和悲伤的场所，但身体并不完全是感觉的私人剧院。它们常常会通过性行为、身体接触或间接通过感觉和情感的教育而与其他人的身体发生联系。感官经验的运用往往是社会性的，如成人仪式经常包含着痛楚或舞蹈那样的表演形式。性和性别是身体存在和行动的两个层面，对于我们的身份认同极为重要。史前学家难以破解这些远古的身份密码，但这些问题是如此重要，值得我们付出努力和心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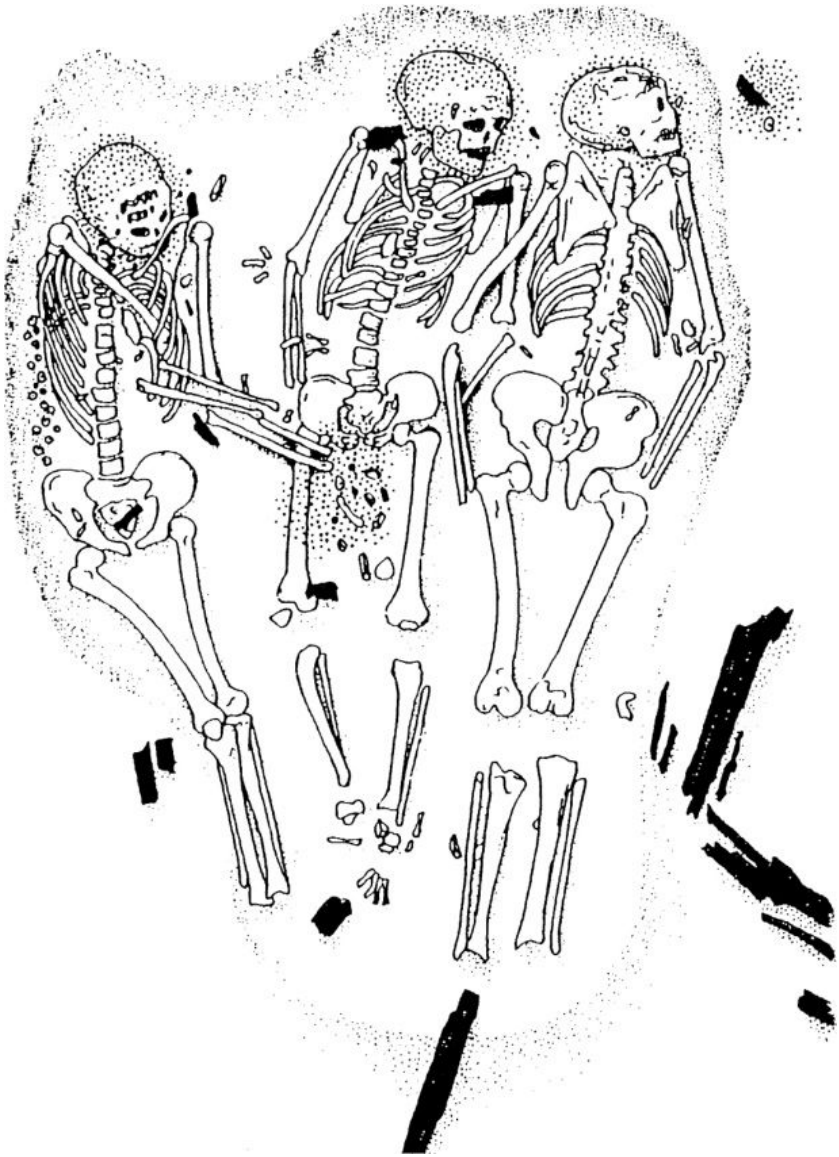

图17　下维斯特尼采遗址的三人墓葬

探索

认识世界的智慧的途径部分是通过接触新东西或创造新事物达到

的。对世界未知之地的探索和殖民扩展了人们的社会和自然知识，创造了各种新技能。正如我们所见，除了南极洲的部分地区之外，现代人在过去4万年里占据了整个地球表面。世界上最后一次大范围的人类迁徙并不发生在陆地，而是在太平洋。人类生活扩展到太平洋地区，创造出适应该地区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独特的身体技能和感官知觉，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欧洲人认为，海上航行和导航的能力是一系列技术发明和革新的结果，明确自己的经度所在的能力乃是综合定时器、天文观察和航海图的结果。在距今3500年到不足1000年间，史前人类是怎样横渡太平洋这个最大的海洋，占领了夏威夷、复活节岛和新西兰等地的呢？他们所需要的技术和能力都有一段漫长的史前史。

1985年，我正在发掘一个名为“马顿库普库姆”的遗址，那是一个干旱的大洞穴，位于新爱尔兰岛的东岸，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面积较大的一个近海岛屿。洞穴位于受太平洋海浪冲击的暗礁之上的数米处，我在发掘时远眺洞外的风景，深知横陈在我前面的是地平线后面数千公里的大洋。下一块可着陆的地点是吉里巴提（以前称为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诸小岛，一不小心便会错过这些岛屿，然后又是一望无际的海洋，直到北美洲的西海岸地区。马顿库普库姆遗址位于高出现代海滩台地上的珊瑚灰岩的大洞穴里。它的名字可译为“雨燕洞”，因雨燕在洞顶的裂缝里筑巢而得名。此洞穴是雨燕在全球长途旅行的其中一站。马顿库普库姆洞穴的中央有一根钟乳石柱，据说其上附有一名妇女的灵魂，满月的夜晚可以在暗礁上看见她，但她是慈祥的灵魂，所以洞穴也不会被当地人视为危险所在地。随着发掘的进行，我想知道怎样将洞穴里的发现融入到人类占领太平洋的故事中去，人们当初又是如何跨越这个广阔无垠的大洋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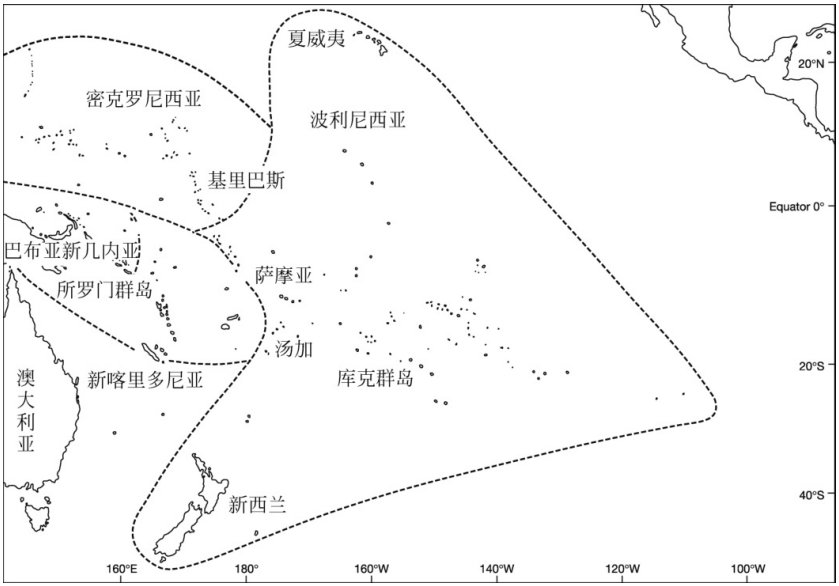
夏威夷
密克罗尼西亚
波利尼西亚
基里巴斯
巴布亚新几内亚
所罗门群岛
萨摩亚
汤加
澳大利亚
新喀里多尼亚
库克群岛
新西兰
20°N
Equator 0°
20°S
40°S
160°E
180°
160°W
140°W
120°W
100°W

图18　太平洋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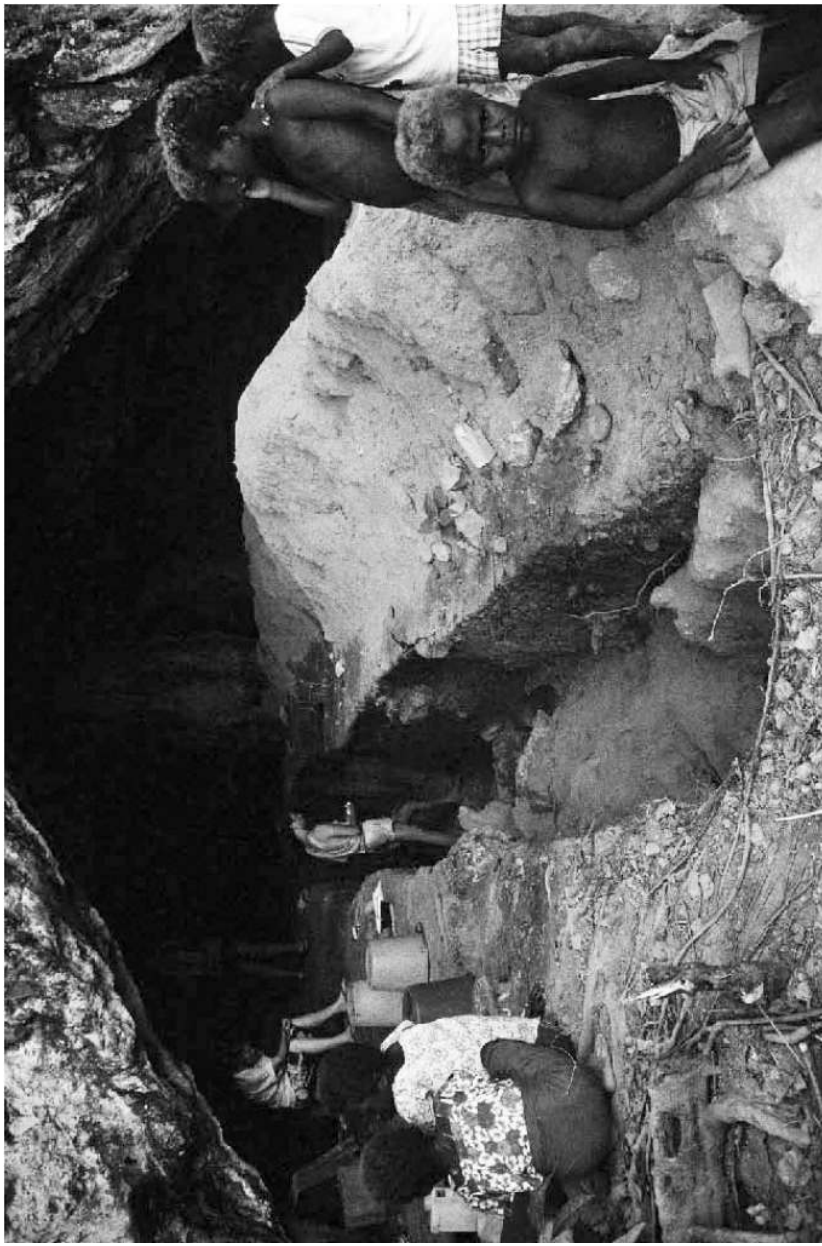

图19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爱尔兰岛上，正在发掘中的马顿库普库姆洞穴

这个洞穴拥有许多令人瞩目的发现，其中一些与流传中的太平洋

开拓故事迥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马顿库普库姆是沿海地区的一个武装地点，当时日本士兵曾在洞穴前面挖了一条沟，目的是保护一条连接不同作战中心的电话线。当我们从沟里清理出有柄平底锅、靴子、子弹和瓶子的时候，发掘工作多少变得有点哀伤。一位当地人还为我唱了一首日文歌，那是他在战时学会的，歌词是关于美国的灭亡。他看起来有点尴尬，不确定我会作何反应，而我也不确定我的感觉。这实在是让我们俩都倍感尴尬的时刻。

其他发现却大不相同。洞穴的上部地层出土了一个由大块珊瑚灰岩石板铺成的火塘，和今天许多人的做法一样。和我一起挖掘的当地人兴奋地推测，一定是他们的哪个祖先堆筑了这个火塘，不知为何没有把这件事传下来。火塘附近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包括沙袋鼠、斑袋貂（一种树居的有袋动物）和大小可供食用的老鼠，还有采自暗礁的数以千计的贝壳、鱼类及深海鱼类的骨头，以及包括细小的黑曜石片在内的许多粗糙石器。我们发掘的大部分沉积物都是火塘的灰烬。证据显示，这里曾是一个营地，之前人们曾在洞穴后面的草原和雨林中狩猎动物，但主要还是在下面的暗礁上采集贝壳和鱼类。黑曜石来自附近约350公里外的新不列颠岛的火山上，这一点我们在挖掘时就已十分肯定。尽管其他石料明显是当地出产，这一点依然暗示着长距离贸易的存在。在火塘下面约1米处，发现了不同类型的沉积物，其中还有当地的石制品、鱼骨和贝壳，但陆地动物只有蛇和蜥蜴的骨头，也没有发现黑曜岩。出土遗物也不丰富，没有任何火塘或堆烧的证据。

午餐以鱼和饼干为食，这时候我会坐下来眺望海洋，脑海里思索着我们的考古发现。洞穴里没有发现任何陶器，表明这个洞穴要么在3000多年前陶器传入这里以前即被人使用，要么就是洞穴里的人从来没有使用过陶器（这好像不太可能）。我们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时间开始使用黑曜岩或火塘，但推测到数千年以前似乎是合理的。最底部地层的占用方式看起来完全不同，但是底层的贝壳仍然保留着它们原本的颜色，像是在反驳那些暗示下层沉积物年代更加古老的证据。史前史学家常为出土遗物的年代操心。在这个人们知之甚少的地区进行考

古工作，依靠其他年代已知的遗址的考古发现来推断马顿库普库姆出土遗物的年代，是我最初理解它们的方法。但我发现并没有可供直接比较的考古发现可以帮助我了解这个遗址。

让我们把镜头切换到1年之后在悉尼澳洲博物馆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此次考古发现的研究结果要在那里公开发表。马顿库普库姆洞穴的发掘是一个拥有14支不同队伍、发掘地点遍布巴布亚新几内亚各个近海岛屿之广大计划的其中一部分，该计划由吉姆·艾伦和我组织。这是我至今为止做过的最为辛苦的事情。悉尼会议是在一系列工作完成之后的第一次汇报，大家都非常兴奋。那天早上，我们听说新几内亚第一次发现了青铜制品，是由东南亚地区传播过去的，还听说发现了一组令人惊叹的拉匹塔文化遗址，年代约在距今3300年前。由于遗址埋在水里，使得在暗礁浅水区上建造的房屋遗迹、植物遗存、贝壳工具、黑曜岩及有错综复杂的锯齿纹的拉匹塔陶器得到很好保存。一位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不无夸张地说，当他看见那些复原的陶罐时，他感到背后的毛发竖了起来，因为这些陶罐可以如此强烈地激发远古人类的技术和鉴赏力。我们还听说在新爱尔兰岛发现了另外3个洞穴遗址，其中两个的沉积物的年代可上溯到距今1.5万年前，另一个则难以定年。第四个洞穴就是马顿库普库姆。当时由一个名叫诺兰的女学生介绍该遗址的发掘成果，她此次参与发掘是为写作学位论文准备材料。我知道她很紧张，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在大型会议上发表论文，下面的听众多是优秀且相当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更何况发掘结果也多有矛盾和难解之处，但她的报告还是完成得很出色。事前我曾考虑过是否由我自己来做报告，虽说我也不想让她暴露在观众的怀疑目光之下，但是既然她已经完成了那么多很好的工作，不给她发表的机会终归是一件遗憾的事。

马顿库普库姆遗址的年代可能会引起质疑，因为其底部地层测定为距今3.5万年。即便在海平面最低的时候，新爱尔兰岛仍旧是一个孤岛，所以人们一定是通过航行到达这里，这大概是世界上人类占据岛屿的最古老证据。位于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两大岛屿群，虽然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才被永久占据，但此前已有人类短暂停留。与此相

似，马顿库普库姆遗址出土的鱼骨和贝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捕鱼和采贝证据之一。年代并不代表一切，但它的确证明了一套异常早熟的海事文化传统的存在，且为近代大规模的海洋殖民提供了一个长远背景。太平洋岛屿的证据很快就显得更为独特，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群岛北端被人类占据的时间可追溯至将近3万年前，这可是要穿过地平线，克服巨大心理障碍的旅程。

航行和导航技术只是岛屿殖民赖以成功的一个组成部分。马顿库普库姆遗址的底层显示这种技术的发展历史极其古老。遗址上层的年代在距今2.1万至1万年之间，发生的故事就很不一样。一般来说，岛屿与大块陆地相比，植物和动物物种较少，粮食可能缺乏，因此单是到达岛上大概已属不易，留下来生活就更加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群岛只有在发展起与农业有关的土地密集利用方式之后，人们才得以从小块的土地上获取更多粮食并永久定居下来。马顿库普库姆遗址最早的居民当然并非农民，而遗址最底层出土的骨骼表明，只有少量的蜥蜴、蛇和鸟儿是他们的陆生食物。人们似乎是通过在稀缺资源之间的辗转来克服这些困难，海洋作为人类食物和迁徙移动的重要资源，使游动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在距今2.1万年前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我们开始发现了灰斑袋貂和树栖有袋动物的骨头，也发现来自附近新不列颠岛的黑曜岩。我们知道黑曜岩是外来的，因为新爱尔兰没有这种材料，而灰斑袋貂看来也是外来的，与稍后出现的沙袋鼠一样，两者都来自新几内亚大陆。

物品进口代表了一种新的策略。与人们在资源之间的移动不同，现在是资源向人们移动。这些被视为采集狩猎者的群体终于不再消极地受制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而是积极地通过移动各地的野生动物（可能还包括植物）和像黑曜岩那样的重要物品来加以克服。太平洋史前史学者在提及偏远的太平洋小岛在过去3500年间被人类占居的时候，往往会提及被移植的自然景观。当拓殖者航行到汤加、塔希提或复活节岛时，他们的独木舟上装满了薯蓣等根茎类作物、面包果树和香蕉树，以及猪、狗和鸡等。登陆几个世纪之后，明显可见本地植物被取代，本土鸟类灭绝（新西兰的恐鸟是最著名的例子），外来物种取代

了本地动植物，人们时常模仿外来动植物群的原生方式对它们加以培植和使用，给脆弱的岛屿生态系统以某些保护。欧洲人会认为像塔希提或萨摩亚那样的地方是自然的天堂，实际上它们是地球上人类最为小心经营的人文景观。

这些移植景观的起源证据可以追溯到大约2.1万年前的马顿库普库姆遗址；航海和捕鱼的证据同样也可以追溯到3.5万年前的这里。人们凭借在海洋中自由航行的能力和在岛屿上应付有限资源的能力，奠定了在岛屿生活的基础。这不仅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生活方式迥异，也显示地球不同地区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生活传统。

夏威夷的史前史终结于1779年1月17日。当天詹姆斯·库克船长在凯阿拉凯夸湾上岸，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大约有1万人在那里迎接他。他和他的船员们当时正致力于一项毫无结果的搜寻工作——沿着加拿大西海岸寻找西北航道，以期找到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捷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缘木求鱼的做法。当严冬降临时，库克航行到南方的塔希提岛过冬。前两次航行已经让他熟知这个地方。出人意料的是，当他们向南方行驶的时候却遇到了夏威夷，成为首次到达那里的欧洲人，比起最早登陆这些岛屿的波里尼西亚殖民者大约晚了1000年。他们将夏威夷的部分大型岛屿绘成地图，并与当地人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接触。然后库克在1779年2月4日离开凯阿拉凯夸湾，重新展开通往塔希提的旅程，并向那些夏威夷人保证，他明年还会再来。在离开夏威夷数天之后，“决心号”探险船的前桅杆坏了，于是他们又返回到凯阿拉凯夸湾去替换桅杆，但此次他和他的船员们却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对待。偷窃和对抗逐渐升级，在2月13日夜晚因一双小艇被偷走而达到高潮。翌日早上，库克和一群海员上岸想捉拿夏威夷人的首领卡拉尼奥普为人质来换回小船。他们与首领回到岸边时被愤怒的武士包围。库克向一个攻击他的武士开枪，却没有射穿他的披甲。看见这个状况后，夏威夷武士飞奔向前，杀死库克和4名海员，或许使用的正是伯明翰制造的铁匕首，而这正是他的船员与夏威夷贵族的贸易之物。船上的人对于这位伟大探险家的死亡大为震惊，收回他的遗体时备极哀荣。

要理解库克之死，我们需站在夏威夷人的立场上。当库克和他的船员到达时，夏威夷人正忙于一年一度为时4个月的节庆活动，其间以神明“罗诺”为首的游行队伍以顺时针方向在夏威夷诸岛屿之间巡行。罗诺是祭司和百姓们的神明，而“玛卡希基”代表正常社会秩序被颠覆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酋长们会与他们的神明“库”待在一起并隐藏起来。在每一次玛卡希基的尾声，会通过仪式表现神明“罗诺”和“库”之间的对抗，结果是罗诺被赶走，直到8个月后下一个玛卡希基开始时再回来。这种对抗可以重建酋长们的权威。这一社会年会与农业周期紧密相联。随着神明“库”的复位和2月份的降雨，播种便开始了，而正是此时的暴风雨使“决心号”的桅杆遭到破坏。收获则在玛卡希基节庆的开始时进行。历法也是夏威夷人带着移植的景观横越太平洋的基础，它尤其强调如何利用动植物，以及不同季节对于人类和宇宙的重要性等等。这个仪式性的年节活动才是造成库克之死的根本原因。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提出，当时的夏威夷人试图理解与欧洲人的初次相遇，把库克看成是平民之神罗诺。当玛卡希基仪式正在举行时，库克来了。由于要测绘夏威夷诸岛屿的关系，他的船队跟罗诺游行队伍一样以顺时针方向行进。库克在1月17日上岸时，正好在游行队伍的末尾，他扮演成罗诺的形象参加了许多仪式，完全不知道正在经历与酋长卡拉尼奥普的仪式冲突。对于夏威夷人来说，库克启程去塔希提的时间稍微有点晚，但他承诺明年再回来的诺言，则确认了库克作为罗诺在仪式中循环出现的角色。问题出在几天之后，他出人意外地返回了。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是由始料不及也不愿看到的意外事件引起的，但在夏威夷人看来，则像是罗诺挑战酋长的权力以及与此相关的整个宇宙和社会的秩序。当库克把卡拉尼奥普抓来作为人质时，更加坐实了这个挑战。借用萨林斯的幽默说法，只有上帝其实是个英国人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库克之死起因于两种社会逻辑的冲突。这两种逻辑都能自圆其说，但却建立在不同的前提之下。夏威夷人的逻辑是其古老的太平洋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经由第一批拓殖者带到这些岛屿上，并与其他所

有波里尼西亚群体分享，但在夏威夷又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夏威夷的史前史是当地神圣景观的创造物，庙宇、住房、田野和鱼池等已经过1000年的发展，在库克到来之前的400年前已经初具现代的面貌。仪式系统不仅规范了当地景观，也规范了人际关系。“华基亚”（天父）和“帕帕”（地母）是夏威夷群岛和人类子孙的父母，它们为禁忌系统奠定了基础，与男人的神圣性相对立，女人被看成是污秽的。两性不可一起进食，女人禁止食用某些食物，比如猪肉、椰子和香蕉，因为这些食物都具有男性的象征涵义。等级区分也构成当地文化的一部分，以保证平民与酋长之间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这种距离的基础是具有宇宙论意义的——酋长较平民更接近神明，也更能影响神圣的权威。夏威夷的历史被建构成将哲学和行动联系起来的普遍戒律，成为人们的生活向导。

从许多方面来看，夏威夷人怀疑库克的不期而至乃是为了颠覆既有的秩序。1812年原有的禁忌体系被遗弃，人们转而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与此同时，男女之间、酋长和平民之间以及人类和宇宙之间的权力关系也被重新加以调整。今天夏威夷土著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既有对过去波里尼西亚文化遗产的继承，可以上溯到3.5万年前的新几内亚附近诸岛，也有自1779年以来的历史，同时还有作为具有多元文化的美国的一个州的现代生活。他们自以为属于自己的土地却被欧洲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后裔所使用。“过去”被拿来为现今的政治服务，一方面波里尼西亚人的文化遗产得以强调，另一方面也和美国大陆上的美洲印地安人组织具有相同的事业，他们也正试图克服遭到种族灭绝和土地被剥夺的命运。

殖民与后殖民的身份认同均由神话的冲突所致。库克被视为伟大的探险家及资本主义的开路先锋（他曾被描述为亚当·斯密的全球代理人），运用和发展新的航海技术来游历和测绘地球表面的主要部分，系统收集太平洋居民的各种信息。这种在航海图和地图里表现为对世界的理性控制，却遭遇了波里尼西亚人的传统概念，由此神圣和世俗之间的差别被混淆，一个人竟然变成了一尊神。欧洲人为一种新发现的、能在无边的海洋中航行的能力而欢欣鼓舞，却没有真正考虑到遭

遇的这些所谓原始人的能力，更不用说他们通过对风和潮水的感觉、对星空的密切观察，以及对太平洋海上航道长久以来的知识的掌握也能做出相同的事情，并通过故事、歌谣和实际的航行把它传承下去。

我们的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探索性的。不同大陆的人们进行了改变世界的试验，也因此改变了他们自己。像夏威夷的年历或非洲的冶铁工作一样，转变的循环是众所周知且被充分理解的。其他事件则无法预知，且会将普通常识置于无用武之地的危险处境。对于夏威夷人来说，库克的到来不过是一次极端事件，但是战争、猝死和自然灾害等都必须加以应付。探索世界同时也是探索人类的身体和存在，从而确定在此世界可能获得的感官经验的范畴，以及可能赋予这些经验的种种价值。撰写史前史是对过去经验的再现，也是对人类身体、物质及其各种文化逻辑之创造潜能的再发掘。

我们的身份和历史有些是以神话为基础的，建立在未经检验的原则及想当然的假定之上。时代越远，神话越发达，越不受直接经验的制约。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未经检验的生活不值一提"，深处于西方思想的核心，从而使逻辑的力量凌驾于神话之上。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既为他们的逻辑而自豪，也喜欢其他人的神话。在这方面，我们是他们的子孙。这种态度帮助我们搜集了大量神话，使神话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不再是一种信仰。史前史是使神话复活的神奇之地，这也是它最令人神往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虚构了史前史或我们应该虚构史前史。"过去"最终是为了"现在"；过去对它本身是毫无意义的。为了使过去在现在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应该赞扬和提升它的神话特质，但要保证我们正在处理的神话是健康向上的。对过去的小心求证，并不和我们利用史前史去理解男人、女人和小孩之间、不同文化之间及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之间的当下关系相矛盾。在库克死亡那天，要他理解夏威夷人的动机的确需要英雄般的同情的理解，对于卡拉尼奥普亦然。但一次成功理解外来者的社会逻辑的结果，可能就会改变1779年2月14日的历史，也可能因此将之后的文化冲突转化为某种同情的理解。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奢望，但是当今世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需要这种理想。

史前史之谜（三）

在世界许多地区，生活中一个重要且备受争议的元素就是阶级，这在英国尤其突出。很多人会把阶级划分看成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一个主要议题。虽然阶级是人们心知肚明的事情，但也都知道给它下定义并不容易。收入是相当令人困惑的测量尺度，因为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贵族式的富有之间有不少重叠之处。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关乎态度，但是态度也非常难以说清和定义。20世纪70年代，英国北部谢菲尔德的一名学者研究了厨房设备，觉得自己发现了一种毫不含糊的阶级标志——蒜头粉碎器，它可见于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厨房，却从不在工人阶级的家庭里出现。一个简单但却重要的物品似乎使整个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因素落实、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如果30年后再作同样的调查，结果是否还是如此不得而知，但人们的口味已经大变，旅行的普及和经常品尝异国美味改变了人们的食谱。谢菲尔德有大量的南亚居民，只有少数移民来自地中海。在墨尔本（据说是世界上第三大希腊裔居民居住的城市）或纽约，蒜头粉碎器广泛分布在整个城市的各个家庭中，因此阶级的标志物需要另行寻找。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各种形形色色的物品。在我们生活的地区，它们是可以用以判定阶级差别的证据（各种不同类型的房屋、家具、书、音乐和社会化的种种形式）。这让我们禁不住思考，与通过面访可以获得的收入、职业和品位等方面的证据相比，从它们身上又能获得怎样不同的判断角度。

第六章

未来的史前史

时至今日，史前史依然鲜活。它存在于我们生活中最难用文字表达的那一部分——我们与物体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往往并不是人，而是物；那些特别重要的物体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熟悉它们，喜欢它们，并与它们为伴。无论是炊具、汽车、床、电脑、锤子还是钢笔，每一件物品都有各种可能的内涵，熟悉它们的人一看就明了。史前史并不单指一个时期，更像是我们熟悉、意识到和感觉到却难以表达的种种可能性。意识到物质世界的潜能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所在。史前史引导我们去追寻无声的那部分人类故事。无论是专注于史前史、过去或现在，我们都需要让人类经验中无声的部分发出声来。我知道这样听起来有点矛盾：语言只是我们人类故事的一部分，可是故事是要用语言讲述的。

对于当今世界的史前史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正在进行重组，且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与物体的关系。一种新型空间已经出现，它改变着我们的日常行为，并创造着新的神话，那就是网络空间。这个术语是作家威廉·吉布森在其小说《神经漫游者》中创造出来的，用来描述人、机器与信息之间的互动关系，吉布森称之为“交感幻觉”。尽管这个词汇像是暗喻了某种空间，但追问“网络空间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却是毫无意义的。它是虚拟的，也就是概念性的，处于想象之中，没有形体，并不真实。当然，作为硬件、软件和湿件（也就是我们自己——充斥网络文学的新术语之一）之间的关系与连接，它又确实存在。

网络的连通在智能方面产生的成果之一，是从关注实体转变到定义各种关系。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人们为了研究世界而对其进行了划分。生物学家林奈的分类法被复制到了许多研究领域。作为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皮特·里弗斯创造了“类型学”一词，使得类型成为理解地区差异与年代差异的基础。欧洲史前时代正因为此才被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几个时期。为了使众多不同的物质变得有意义，把它们分类为石头、骨头、陶器和金属，或将旧石器时代区分为早、中、晚期是很有益处的。学科也随着这些分类应运而生——

比如考古学从民族学里分离了出来；第一批博物馆和学术系所相继成立，从而赋予这些学科以体制结构。现在我们有很多专家或是专注于新石器时代的陶罐研究，却对铁器时代的制陶业了解甚少；或熟悉新几内亚沿海地区的史前史，却对这个国家的高地史前史一无所知。这样的专攻和学术专长促成了无数成果的问世，但也确实导致了学科间的隔阂。

曾经支离破碎的部分现在要重新拼合起来，学科的分界正被打破，这样物质文化的研究就可由史前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来共同承担。研究物质文化的史前学家现在在学科内部进行分类时也变得小心翼翼，会琢磨将陶器研究与金属制品或编织物的研究分隔开来到底有多大价值，也会考虑如何将这些片断拼合起来，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人类的社会和感官经验。

考虑一下我们的生活经历过怎样的变化，强调关系的重要性便不足为奇。网络空间里的关系造成了实体的改变。多用户虚拟空间是人们可以以自己的真实身份或不同性别甚至物种的虚拟身份加入的群体。人们选用新身份时并非漫无目的，而是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其他问题。例如，一位女士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一条腿，于是在多用户虚拟空间中创造出了一个独腿的角色。在建立了一系列令人满意的虚拟关系后，她在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也就有可能建立起来。多用户虚拟空间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内容丰富的领域。尽管在虚拟空间里的创造可以无拘无束，充满各种可能性，许多新角色仍然让我们感到熟悉和沮丧；一种“唯我独尊”的心态已经主导了这一新型文化。

无论如何，实体唾手可得，通过新的虚拟关系加以重塑，并在思想领域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实体正受到网络文化中其他元素的威胁，如“半机器人”这一概念。所谓“半机器人”，是指部分是人，部分是机器，好像是属于科幻小说中的未来。或者也有可能并非如此，许多人认为我们自己就已经是半机器人。一些医学介入手段，如注射接种疫苗或通过试管受精创造人类，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化组成。我们的器官可以被移植和替换，还能以心律调整器或新的髋关节的形式将机器置入人的身体。人和物之间的区别在今后的几年里会变得更加模糊不

清。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会与机器长时间联系起来。汽车、电脑、电话、工业机械和电视等对于我们的身体、思想和感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难怪许多物质文化的研究者对主客体的区分很不满意。变幻莫测的当今世界使许多史前学家采取不同的方式去思考我们的过去，去查找人和物之间一直存在的密切关系。我们对过去的研究和对当下的理解密切地交织在了一起。

网络空间是错综复杂的，也是相互关联的；半机器人既不是机器，也不是人。学术界现在不但倾向于强调学科之间和研究对象之间都没有清晰的边界，而且强调历史、思想和行动的非线性发展轨迹。维多利亚时代信仰的不断向前、向上的前进历史观已经逐渐被强调历史的复杂性而不是单向发展的观点所取代。世界上许多地区已经开始排斥石器、青铜器和铁器的三期论，欧洲许多地区也逐渐变得如此。

网络空间还很新颖，但并非前所未有。作为一个虚拟系统，它处于一个系统发展链条的最末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系统就是语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至少在距今4万年前就已开始说话。许多话的内容可能无非就是家长里短，和我们现在说的话并无两样。至于尼安德特人或更早的人类祖先是否能说话，仍然备受争议，因为他们可能不具备像我们这样的可发声的口部和喉咙等结构。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他们是否具有幽默感，是否具有讽刺、幻想和创造神话的能力，但我们的确已经发现一条可以说明语言发展轨迹的重要线索。大约4万年前，象征符号大量涌现，表现为岩画、动物和人物雕像以及装饰物等。

符号的经典定义是“代表另一事物的某一事物”——比如红色代表血，后来可能被概括为代表危险的符号。史蒂文·米森在其所著的《心智的史前史》一书中，考察了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各时期人类祖先身上发生的一种转变。这些人类祖先在特定领域都有诸多才智，每一种都与技术、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有关，但他们无法将这些不同的才智联系到一起。假如米森是正确的话，那么我在本书开头提到的博克斯格罗夫人就是用部分才智考虑马的行为，用一部分制作手斧，再用另一部分思考他们在群体中的位置。但他们不能以任何有效的方式将这

些不同领域思想联系起来。在过去的4万年里，我们看到了米森提到的所谓“认知的流动性”的发展，它能够把自然界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当代的采集狩猎者可能将某种动物视为他们的祖先，在杀死和吃掉这种动物时必须恭敬对待。他认为这样的联系对于博克斯格罗夫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认知流动性的基础是创造符号的能力。当某些事物能够被视为代表其他事物的符号时，各种各样的连接才变为可能，这样各个特定领域的才智之间的鸿沟也就消失了。

我对才智所持的观点与米森相当不同，我把它看作身体的特质，也是头脑的特质。凭借这种才智，我们的祖先将社会与自然界天衣无缝地连接了起来。假如博克斯格罗夫人的确能够狩猎，那么他们就必须对动物行为有深刻的了解，并具备集体行动的能力。像米森所说的那样把文化和自然划分成不同的思想领域只是在最近几百年才出现。但是，言词的虚拟世界与行动和关系的现实领域之间的对立早在4万年前就开始出现。现代人类行为的关键要素是我们不仅能做事情，也能思考如何做事情。直到4万年前，各种形式复杂的象征手法出现为止，只有少数的象征手法可以建构行动世界，所以人类祖先更易被周围的物质和感官世界所束缚。语言和表达的象征形式通过与世界的联系发挥作用（血→红色→危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亦发展出了自己的内在逻辑，使得这些联系变得没有那么直截了当了。塞林在分析库克船长之死时，指出夏威夷人和欧洲人各自以自己的那套文化逻辑行事；他们的行动被一系列事件所驱使，同时也受到各自对于这些事件的理解的影响。现代人的行动和才智并不是通过将之前相互分隔的各个思想领域联系起来而发生（像米森认为的那样），而是通过在行动与思想之间建立一种紧张的关系而发生的。思想可以通过象征手段，把日常生活以虚拟的形式重新创造出来。例如，我现在正在创作的电子文字，之后会被转换成文本，从而（我希望）激发出读者的思想和感受。语言并不是世界本身，却代表着与世界的一种复杂关系。

虚拟世界最早产生于复杂的代码语言，与真实世界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但二者并非完全对立。正如伦弗鲁指出的那样，不接触有重

量的实物就很难理解重量的概念，而且重量不大可能是一种纯粹存在于头脑之中的概念。但是现在重量作为一种概念，不仅可以用于算术上的加减，还可以是一种与实际重量毫不相干的形式。重量既是一个概念，也是一种实际存在，既虚拟又真实。

网络空间是一个由关系组成的虚拟系统。它不能脱离计算机、区域网络线缆和操作键盘的人而独立存在。它既生活在我们的脑海里，也生活在我们的指尖上。网络空间创造着自己的神话，控制着我们的想象力（以网络为主题的书籍和电影日益增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从而破除一个我们坚信的谎言——我们的生活里没有神话。史前人类与陶器，或是陶器与金属器皿之间的关系，对于现在的网络文化和半机器人文化并无直接的指导意义。但实物与虚拟之间的紧张状态至少在过去4万年里就已存在，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这种长久的关系和紧张状态中得到教训。

当今世界日新月异，旧关系不断以新形式出现。我们不能确定我们是谁，是半人半物还是什么其他形式？我们也不能确定我们向何处去，因为未来的发展并非一条直线。奥斯卡·王尔德说过，我们对历史肩负的一项职责就是重写历史。不过，我们也越来越能感受到历史也正在重写我们。

我们对人类起源的探究由来已久，但沉默无声的史前时代依然充满未解之谜。那时人类刚刚登上历史舞台，而几百万年后的我们又如何用文字去讲述这个文字发明前的时代？“史前史”这一概念究竟诞生于何时，又怎样从19世纪科学与宗教的论战中脱颖而出，得到广泛的认可，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现代人类全都起源于非洲吗？各个大陆的史前史发展轨迹又是怎样？探索如此遥远的过去，对于理解当下的时代又有何意义？

本书结合考古学、生物学、地质学和遗传学等多门学科，从人类的流徙、农业的发明和语言的传播等角度，讲述了史前时代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议题。让我们穿越字里行间，跟随作者来一次跨度为600万年的时空之旅，去一探人类的史前时代。

百科通识文库

49

达尔文与进化论

乔纳森·霍华德 著

赵凌霞 何竹芳 译

小学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达尔文与进化论

乔纳森·霍华德 著

赵凌霞 何竹芳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61**

Darwi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2.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1982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Jonathan Howard 198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尔文与进化论 / （英）霍华德（Howard, J.）著；赵凌霞，何竹芳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14-1

Ⅰ．①达… Ⅱ．①霍… ②赵… ③何… Ⅲ．①达尔文学说②进化论 Ⅳ．①Q1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22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刘爱春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14-1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引用文献及其缩写形式
序言
第一章　达尔文生平
第二章　达尔文主义的基础
第三章　自然选择与物种起源
第四章　自然选择进化论的证据
第五章　性、变异和遗传
第六章　人类
第七章　完善与进步
第八章　达尔文主义与意识形态
第九章　综评：科学家达尔文
补充读物简介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乔纳森·霍华德，德国科隆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细胞遗传学教授，皇家学会研究员。

译者简介

赵凌霞，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体质人类学、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先后承担了中国青少年体格发育状况、新疆古代人骨与人种学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人骨古DNA研究、晚期智人化石研究、云南古猿和巨猿化石研究等课题，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40篇。

何竹芳，太原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外语系副教授，长期从事英语教学和翻译工作。

图目

图1　“比格尔号”在庞森比桑德
图2　年轻时的达尔文
图3　查尔斯·赖尔，约1865年
图4　系统演化2/3
图5　加拉帕戈斯群岛
图6　起源演化
图7　安芬森密码
图8　表情
图9　眼斑
图10　珊瑚礁
图11　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约1912年
图12　老年时期的达尔文

引用文献及其缩写形式

以下是我在本书中所引用的达尔文的著作。文中提到这些著作时以书名缩写字母进行标注，随后是相应卷号及参考页码。

A 《达尔文和赫胥黎自传》，由加文·德比尔编辑作序，牛津，1974.

D 《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共2卷，伦敦，1871.

F 《兰花借助于昆虫传粉的种种技巧》，伦敦，1890.

J 《“比格尔号”环球航行所到达各地区的自然史和地质学的考察日志》，伦敦，1882.

L 《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由F.达尔文编辑，共3卷，伦敦，1888.

M 《达尔文早期及未出版的笔记》，由保罗·H. 巴雷特誊写和注释，见霍华德·E. 格鲁伯的《达尔文论人类：科学创造的心理研究》，伦敦，1974.

ML 《达尔文书信续集》，由F. 达尔文和A. C. 苏厄德编辑，共2卷，伦敦，1903.

O 《物种起源》，第一版摹写本，厄内斯特·梅尔作序，第四次印刷，剑桥，麻省，1976.

T 《达尔文论物种变化的笔记》，由加文·德比尔等人编辑，《大英博物馆学报》（自然史），历史系列。第I，II，III，IV和VI部分。伦敦，1960，1967.

V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共2卷，伦敦，1868.

序言

达尔文去世一百多年来，关于他对知识的贡献及其研究成果的重要性，仍然有怀疑和非议存在。此时以简明通俗的语言简要介绍一下达尔文的科学研究工作，无疑不失时宜。在达尔文和其贬低者之间，作者并非持中间立场，本书还是有所倾向。达尔文的研究成果对整个生物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任何能够看懂和理解达尔文研究的生物学家都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但是，我希望本书能客观地介绍达尔文的思想，指出其中一些缺乏一致性或经不起严密推敲和审视的不足之处。也许有人会认为过分强调达尔文对生物学的重要意义会限制达尔文理论的范围和涵义，但这其实是无稽之谈。理解现代进化论就是要认识到：人的生命和人类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生物学问题，尽管用这些术语很难说清楚，但仍是生物学的研究范畴。出于这一原因，本书始终紧扣问题的核心，即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贡献而展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是后来衍生出来的，在达尔文当初的思想中根本没有一席之地。那时，他还看不到生物进化如何能够与社会演化进行任何类比。因此，将社会与政治哲学体系中的达尔文主义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完全分开而只讨论后者也是合乎情理的。生物学是问题最根本的落脚点，而人们恰恰可能对生物学知识知之甚少。

对于我所进行的达尔文研究，我的朋友和亲密的科研伙伴们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理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为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和负担表示歉意。我要特别感谢杰弗里·布彻，我不在的很长时间里，是他接替我管理实验室的繁重工作。

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当初邀请我写这本书，也感谢迈克尔·辛格先生，他不经意的一番话鼓励我接受了这个邀请，同时还要感谢牛津出版社新老编辑们的帮助，他们为本书的最终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乔纳森·霍华德

第一章

达尔文生平

达尔文的个人资料很丰富，令传记作家们难以取舍。他的父母都是名门望族之后，他们自己的经历也足以引起传记作家的关注。达尔文与他的表妹结了婚，从那时起这个家庭几乎就没有丢弃过任何东西。达尔文在他的私人家庭传记中记载了自己的生活，这些很自然地被保存了下来且得以发表。他毕生从事科学研究所做的笔记和记录，也几乎是完好如初地保存了下来。在长达50年的科学生涯中，达尔文只在3个地方生活过：5年在“比格尔号”考察船上进行环球旅行，4年在伦敦，其余时间住在伦敦以南几英里外的唐别墅（Down House）。他的进化理论始于“比格尔号”航行。他在船上的图书馆非常有名，他的笔记和航海日志都保留了下来。关于这次航行，达尔文写了一本很长的书，“比格尔号”的船长也写了一部。达尔文收集的许多标本至今仍在集中陈列。甚至随行的两位艺术家所创作的有关这次航行的一幅油画现在也还能看到。航海归来之后，达尔文写了一系列的杂记，以奇异独特和引人入胜的细节记录了最初进化理论的发展。进化论有两个完整的初期版本被保留了下来，一个是用铅笔写成的，比较简短；另一个是用钢笔仔细誊写的长版本。

达尔文在其生命的最后45年里，健康状况一直很不好，就只好借助大量的通信来开展研究工作。他的信件由其子弗朗西斯（Francis）汇编成五卷，一个收录了13,000多封信件的最后版本成形，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与达尔文通信的很多都是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当年与达尔文的来往信件也幸得保存。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生平和信件”可是对已故伟人的常见的纪念方式。最后，达尔文还写下了大量可供出版的科学材料，从简短的笔记、问卷到长篇论文，再到一连串的重要著作。他发表的全部著作都被收录在弗里曼编制的精彩书目中（参见“补充读物简介”）。

即使达尔文不是一个那么著名的人物，留有数量如此惊人的传记资料也足能确保他在19世纪的科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记录这位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者生活的文献竟会如此完整。那么，对这一记录及它对科学史的意义的探索已逐渐发展

成了人们有时所称的“达尔文产业”，也不足为奇。

查尔斯·达尔文1809年出生于什鲁斯伯里。他的父亲是位著名医生。爷爷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则是位更有名望的医生和推理进化论者。他的母亲是陶瓷厂创始人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的女儿。查尔斯8岁时，母亲病故，他主要由姐姐抚养长大。他先在当地的私立学校读书，后来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由于无法面对重病患者所遭受的痛苦，达尔文放弃了医学，从爱丁堡转到剑桥，想做一名圣公会的牧师。在剑桥求学时，他成了植物学教授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的门生。在亨斯洛的影响下达尔文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正是通过他的推荐，达尔文22岁时被选中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皇家舰艇“比格尔号”的考察航行。这次环球旅行历时5年，1831年开始，1836年结束。在自传中，达尔文总结了“比格尔号”航行对他一生的影响。

“比格尔号”航行是我一生中最最重要的事件，这次航行决定了我一生的事业……我总觉得自己第一次真正的思维训练或教育是在这次航行中完成的。它让我身临其境地接触到了博物学的几个分支，也让我原本就较敏锐的观察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研究所到之地的地质状况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推理在此要发挥作用。当刚开始考察一个新地区时，没有什么比杂乱的岩石更让人感到绝望的了；但是，通过把许多不同地点的岩石和化石的层理与性质记录下来，不断推测和预测其他地方将会出现的地质情况，很快便会对这个地区有新的发现，对它整个构造的理解也就变得多少有些头绪了。我当时随身携带了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并且用心地加以研究；这本书从许多方面来说都使我受益匪浅。当我考察第一个地方——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时，便清楚地体会到赖尔地质学研究方法之优越，远不是我随身携带的或以后读到的其他著作所能比的。我的另一项工作是搜集各种动物的材料……但由于不会绘画，又没有足够的解剖知识，以致于我在航行期间所写的一大堆手稿几乎都是无用的……每天，我都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写日记，非常用心地将我看到的一切仔细清楚地描述下来。事实上，这是一种不错的做法……然而，上述各种专业研究，相比起我当时养成的一种习惯——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任何工作都兢兢业业和专心致志——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我总是尽力把所想到的或读到的一切与我所见到的或可能看到的联系起来，这一习惯在5年的航海生活中一直延续下来。我确信：正是这种锻炼才使我日后在

科学上有所建树……

至于对自己的评价嘛，我在航海期间勤勉地工作，孜孜以求，既是由于对研究本身充满兴趣，也是因为我非常希望能给自然科学的大量事实再增添一二。当然我也希图能在众多科学工作者中谋得一席之地；至于这种志向与我的同仁相比，算不算是雄心大志，我就不得而知了。（A 44—46）

从“比格尔号”航海归来，达尔文已是一名大有前途的地质学家。他的两个发现：一是关于珊瑚礁起源和分布的综合理论；二是他对持续的大陆快速抬升继而形成安第斯山脉的论述说明，后者虽较传统但却同样让人印象深刻，让当时最伟大的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对他肃然起敬。他们的终生友谊便由此开始。赖尔是地质科学演化学说的杰出代表人物。这一学说乃是地球史研究方法上的一次革新，它认为如今仍在发生的并且可知的地质变化过程足以解释地壳的演化，根本不必用造物主神奇力量的干预来解释。“比格尔号”航行到南美时，达尔文得到了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二卷，此卷论述了生物进化和动植物的分布。尽管赖尔拒绝接受生物进化论，但《地质学原理》仍是达尔文在“比格尔号”上读到的唯一一本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著作。的确，他很少读到过这样的书，正如在下一章中所强调的那样，该书对“比格尔号”航行的科研成果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总感觉我的著作一半是受了赖尔的启发，对此我总是感激不尽；……因为我一直认为《地质学原理》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改变了一个人的思维模式。（ML i. 177）

对南美现有哺乳动物和哺乳动物化石之间关系的观察，以及在离厄瓜多尔海岸不远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所发现的独特动植物种类在南美洲的出现，最终使达尔文确信：赖尔的生物进化观点是错误的。

1837到1839年这3年时间里，达尔文在业余时间写了大约900页的个人笔记，其中包含了完整的进化理论。占去他余生精力的所有主要问题都被一一谈到了，观点深刻而独到，极富创见。达尔文在很多

前沿领域快速形成了他的进化观点，在他的笔记中看不到一个有序积累和逐渐合理化的过程。这个理论作为一个连续完整的论点最先出现在他1842年所写的一篇35页的概要中，随后又出现在1844年的一篇230页的论文中。这两次所写的内容原本都不打算出版，但达尔文怕万一会早逝，就提前对1844年论文的出版做了精心安排，交待给了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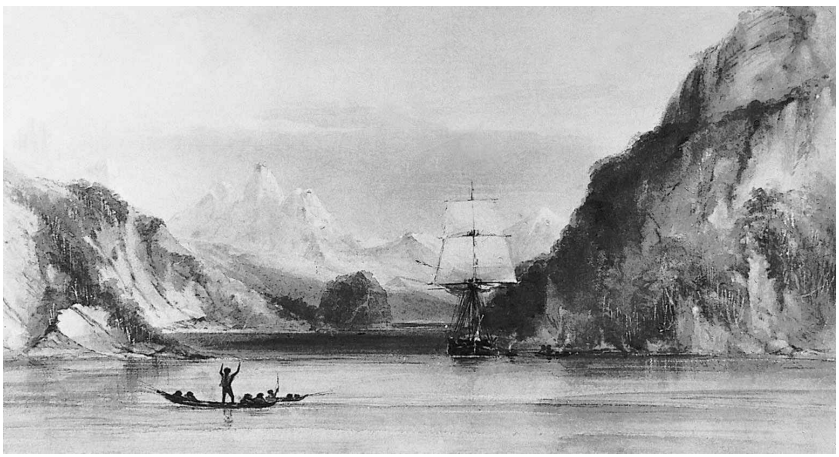

图1　“比格尔号”在庞森比桑德

这幅由康拉德·马滕斯（Conrad　Martens）创作的油画展现了1834年12月“比格尔号”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的情形。当时，达尔文参加了一项由船长菲茨罗伊发起的不同寻常的社会实验活动。在早些时候对火地岛的一次考察中，菲茨罗伊俘获了3名火地岛的印第安人并把他们带回英国接受文明社会的熏陶。在达尔文参加的这次航行中，“比格尔号”又把他们送回了火地岛，还送去了一名传教士以及一些文明服饰。9天以后“比格尔号”再次返回火地岛时，文明服饰已遭偷窃，传教士也受尽磨难。

1839年，达尔文出版了《航海日志》的首版，为大众读者描述了“比格尔号”航行的经历和发现。让他惊讶的是，这本书很快成为19世纪最广为阅读的旅游书籍之一。但《航海日志》中几乎看不出进化思想的痕迹，甚至在1845年的新版中也是如此。从1842到1846年，达尔文共出版了三卷书，讲述有关“比格尔号”航行的地质学研究成

果，作为远征考察官方记录的一部分。

1839年，达尔文与埃玛·韦奇伍德（Emma Wedgwood）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于1841年出生。此时，原本体格健壮的达尔文身体状况开始恶化。1842年，全家离开伦敦搬到肯特的唐别墅居住。此后除了偶尔到伦敦或去拜访亲戚，达尔文离开唐别墅就只是出于健康原因去进行温泉疗养，在那里接受毫无效果和乐趣的水疗。长期的研究也未搞清达尔文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他很容易疲倦、失眠，经常感到腹痛和恶心。他余生里尽管病痛缠身，但仍坚持工作。只要身体允许，每天都花几个小时详细记下关于流逝时日的点滴。

与几位杰出科学家的亲密友谊，特别是与赖尔和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的交往，使达尔文在唐别墅的独居生活得到调剂。1844年的论文刚写完不久，胡克就有幸拜读，享此权利的就仅他一人而已。在继续积累有关物种问题的资料的同时，达尔文还开始了对一个全新领域——人们知之甚少的一类海洋甲壳动物藤壶的分类研究。这是一个浩大的研究工程，其成果于1851—1854年间出版，立即成为这方面的权威著作。达尔文感觉这一成就并不足以体现他8年的工作收获，他的看法可能是对的。然而，物种的分类和定义却是达尔文希望用进化论进行革新的一个领域，这些研究工作肯定是抱了要亲自发现分类中存在的问题这一目的而开始的。尽管进化理论对达尔文总的研究方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关于藤壶研究的专著中，他并没有明确提到这个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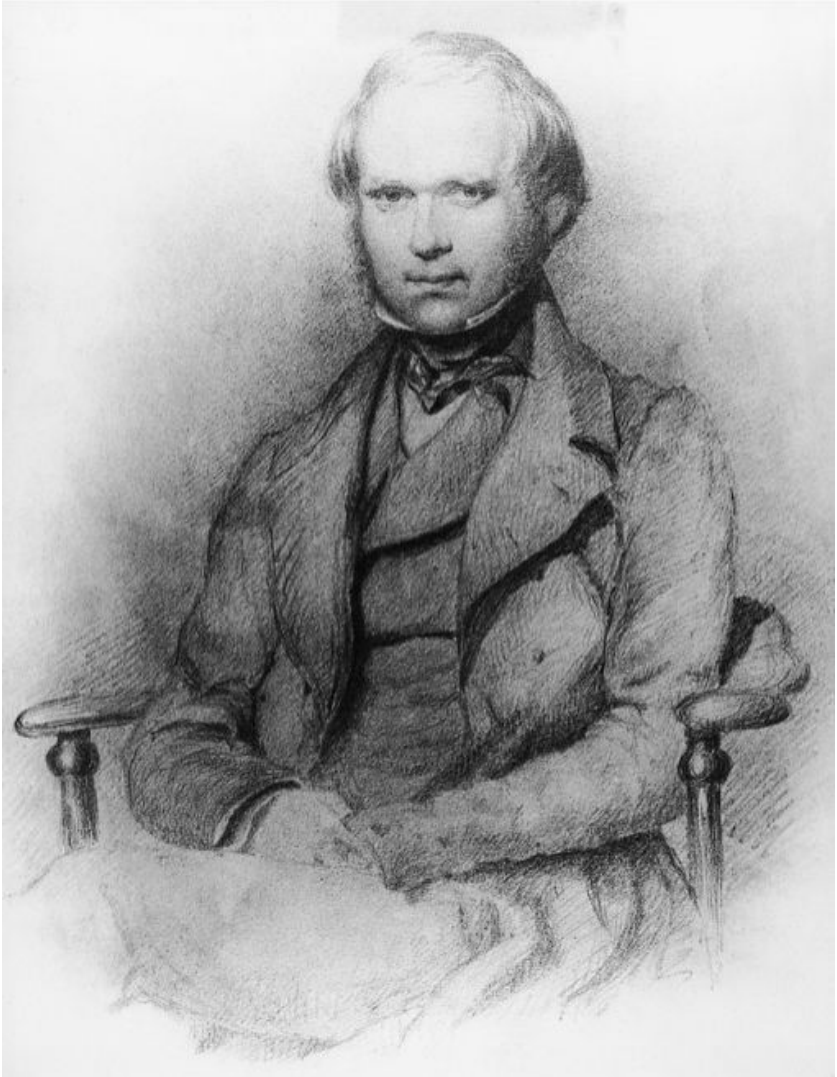

图2　1840年的达尔文，已婚，住在伦敦，之后不久即在唐别墅定居下来，当时他的自然选择进化论的主要论点已经形成。

到1854年时，达尔文感觉时机已成熟，准备把他的进化论完整呈现给公众，加上有朋友们的催促，他开始着手把17年来收集的材料加以整理，写成一本巨著。但最终他没有完成此书，因为1858年时，他收到在婆罗洲工作的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一封信，信里附有一篇简短论文，该论文简明扼要地总结出了整个达尔文理论的内容。这令达尔文既尴尬又难过，进退两难，不知该怎么办，于是他把论文交给赖尔以征求他的意见。赖尔和胡克建议达尔文将自己的部分材料，即1844年论文的摘要和1857年写给美国植物学家阿萨·格雷（Asa Gray）的信的部分内容，连同华莱士的论文一起寄给伦敦的林奈学会以同时宣读。然而这件事当时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至林奈学会的主席在对学会的活动进行年度总结时，都忽略了这一可能是所有时期的学术学会活动中意义最重大的事件，竟说道："可以说，今年……的确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能立即引起相关学科的巨大变革。"

因为懊恼和担心人们能否认可其20年研究成果的优先权，加上疾病和丧子之痛，达尔文只好把巨著的写作放到一边，着手写一本摘要性的著作。这就是1859年底最终出版的《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有利种类的保存》。

《物种起源》的出版立刻引起了公众和科学界的强烈反响。激烈的争辩随之在报纸、杂志及科学会议上展开。达尔文最狂热的支持者，年轻的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是一位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的解剖学者，他在公众面前坚决捍卫《物种起源》，而此时的达尔文则退避到唐别墅对该书此后的版本作内容上的修补和完善。1860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牛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牛津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决心"彻底击垮达尔文"，会议由亨斯洛主持，胡克和赫胥黎都出席了这次会议。由于对自然史了解甚少，威尔伯福斯

滔滔不绝地讲了足足半个小时，情绪激昂，言辞空洞，充满偏见……不幸的是，这位主教慷慨陈词之余竟然忘乎所以，结果把他原本意欲取得的优势几乎变成了人身攻击，他转向赫胥黎，神气十足地问道：我忘了准确的用词，只能引用赖尔的话，"大主教问赫胥黎，到底是他祖父的一方还是他祖母的一方，是猿猴的后代呢？"（L ii.321—322）

赫胥黎转向他的这位邻座，说“上帝已把他放到了我的手掌心里”。他轻而易举地回答了威尔伯福斯主教提出的几个科学问题后，便以压倒性的反驳灭了威尔伯福斯的威风，为达尔文赢得了胜利：

“我坚信…一个人没有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猿猴而感到羞耻。如果有会让我感到羞耻的祖先的话，倒是这样一个人，他才智出众但却头脑多变，极不安分，不满足于在自己的领域内取得的所谓成功，硬要插手他一窍不通的科学问题，结果只能是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地一味夸夸其谈，靠一些慷慨激昂但却不着边际的议论以及花言巧语煽动宗教情绪来混淆视听，蛊惑人心。（L ii.322）

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是19世纪中期的一个重要论坛。听说牛津的舌战后，达尔文马上写信给赫胥黎：

我从几处都听说，牛津辩论会给了该理论莫大的支持。这次辩论具有重大意义，它向世人表明了有一些杰出人士并不惧怕发表自己的意见。（L ii.324）

他在信中同时也道出了实情：

我由衷地钦佩你的勇气；我宁愿死去，也不会在这样一个会议上来回答那位牛津主教提出的问题……（L ii.324）

从1860年到去世，达尔文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进一步阐述了进化论的多个主题。大多数主题都在《物种起源》中有所涉及，但每本新书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有鲜明的独创性。其中两本书与人类有关，还有一本书是关于家养状态下的变异，这些著作进一步深化发展了达尔文在1837—1839年间简略提出的观点。有三本是关于花卉的有性繁殖的，其中两本关于攀缘植物和植物运动的其他习性，还有一本探讨食虫植物的书，这些都反映了达尔文对生物适应性这一普遍问题很感兴趣，也说明由于疾病缠身造成的种种限制，他只能在自己的花园和温室里做实验。他的最后一本书，出版于1881年，讲述了蚯蚓在腐殖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回到了1838年他最初出版的

科学著作讨论的主题上。

达尔文的疾病和天生羞怯的性格使他远离公众生活。对进化论他既未作过公开演讲，也未撰写过比《物种起源》更通俗易懂的读物。他的名声一半来自个人的努力，另一半则归功于其仰慕者的热情推崇。赫胥黎首次听说自然选择原理时，便如同使徒保罗受到了启示，从此开始极力为达尔文辩护。后来赫胥黎回忆起当时感到自己“简直愚蠢透顶，竟然连这都没想到”。从1859年直到1894年去世前，赫胥黎一直都在竭力说服那些异常顽固的人接受达尔文的观点。好斗善辩、聪颖机智的他迫使科学与《圣经》的冲突公开化，不给任何想让二者和解的企图留下余地。赫胥黎经常给普通劳工作通俗演讲，从而使进化论深入到这些远离高层宗派冲突的普通百姓之中。正是由于赫胥黎的努力，达尔文革命的进展才如此迅速，以至于所有亲身经历过它的人都把它看作是一场革命。

达尔文对科学的卓越贡献在生前从未得到皇家学会的正式承认。1864年，他被授予科普利奖章，这是皇家学会的最高荣誉，表彰词中明确提到他的贡献不包括进化论。在他去世后，皇家学会作了补偿，设立了达尔文奖章，它的最初三位获得者便是华莱士、胡克和赫胥黎。

达尔文从家族里继承了足够多钱财，可以保证他不必为谋生而工作。他的书销量很大，也为他增加了收入，加上擅长管理财务，到去世之前，他已变得非常富足。他受到科学界密友的尊敬和家人的爱戴，他对他们也是一片挚爱。家里先后失去了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夭折都让他极其悲伤。任何残忍的事情都会使他充满义愤：《航海日志》中他激烈抨击奴隶制度的那段话，让人感受最深。这也是引起他与赖尔争吵的唯一事件。

宗教方面，达尔文由年轻时的一个正统基督徒转变为一个不可知论者和怀疑论者，并一直到老。

对宗教的怀疑在我心中慢慢滋长，到最终还是完全不信了。这个过程是如此缓慢，以至我并未感到任何痛苦和沮丧，且从那时以来我片刻都未怀疑过我的结

论的正确性。的确，我几乎也看不出任何人会希望基督教的教义是真的。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根据《圣经》所说，那些不相信基督教的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兄弟以及我几乎所有的挚友，将会受到永久性的惩罚。这是一条可怕的教义。（A 50）

达尔文只是在他为家族所写的自传里表达过他的这种不妥协的宗教观点。若非如此，就很难想象1882年时赫胥黎会放弃与虚伪势力的斗争，协助将达尔文的灵柩运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安葬。

第二章

达尔文主义的基础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融合了三个基本概念：物种、适应和进化本身。本章主要介绍这些概念，以说明在达尔文开始其研究之初它们的结合程度，以及在“比格尔号”航行之前、航行期间和归来后不久这些概念是如何汇聚于达尔文的头脑之中的。附带也介绍一下19世纪初基督教，尤其是英国国教会对这三个概念的看法。

即便是极不经意的观察者也能看出生物界的某些分类现象。达尔文年轻时，盛行的物种概念里包含三方面的分类思想。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方面是：不可再分类型的概念，即种内关联而与别的物种是不连续的。这是通常所说的“种类”，如“猫”这一种类包括所有的个体猫，其他动物被排除在外。第二个方面是分类层级观念，所有的物种可以根据相像程度按层级进行排列。相似的物种归入一个属，相似的属归入一个科，如此类推，经过更高的分类阶元直到非常概括、非常宽泛的分类范畴，如“植物”和“动物”等。第三个方面最难理解，即天生性状的层级概念或其他某种负载了价值的观念。从初级的、静止的、无感知的植物到敏锐的、活跃的、有感知的动物，物种以数不尽的形式存在着。处在这个等级最底层的有机体，几乎很难与无机界区分开，而人类这个物种似乎占据了最顶端。物种概念的所有三方面内容，类型观念以及每种类型在分类层级和价值评估层级中的地位，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在西方思想中一直清晰可见。几种理念都在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生物的观点中留下了各自鲜明的印迹，这种观点主宰着达尔文之前19世纪的正统宗教和生物学思想。

把物种作为基本分类单位的理由有很多。一般性观察支持这一点，平时的经验也为之提供了更重要的证据：一个物种的个体只能与自己的同类成功交配并繁衍后代。如此普通的经验事实也赢得了柏拉图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认可。个体猫并非是作为个体本身而是作为一个种类的代表呈现在人们的脑海里：正是那些在个体猫身上未能全部表现出来的猫的本质属性，才是理性思维所要思考的内容。最终，《创世记》的教义把普通经验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结合在了一起：“造物主用泥土造就了所有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禽，然后把它

们带到亚当面前让他来命名，亚当给每种生物取什么名字，从此以后它就叫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最基本的具体物种概念与物种世代恒久不变的概念长期紧密地纠结在一起。《创世记》中的创世故事形成了生物起源的一个说法。动物和植物被分类而造，然后通过繁殖力得以延续，至今保持不变。依照这种说法，生物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法则发挥了作用：神奇的创造力作用于物种层面上，其次是繁殖力作用于种内的个体成员。《物种起源》中达尔文的核心成就是向这一物种起源二元论成功地发起挑战，取而代之以一个简单确知的、可观察到的形成法则：繁殖。

17世纪末的约翰·雷（John Ray）和18世纪的林奈（Linnaeus），依据经验对生物进行分类，创立了统一的分类概念。这一分类对达尔文之前的生物学和宗教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事实上不管发现了多少物种，把所有物种放到一起并不显得混乱，这一事实本身就有待解释。如果物种是一个个被创造出来的，那么这个庞大组织体系的意义何在？在神创论主宰的概念世界里，生物的层级分类在《圣经》里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明。因此，生物界的分类体系便大致与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观融合在一起，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它的运转很有规律，要受到法则的制约，这些法则确立了个体间的恰当关系。当时在生物界盛行的这种秩序体现了造物主这位神圣立法者的杰作，正如运动和重力定律主宰着物体之间的关系一样。19世纪早期，人们做了各种努力，企图从经验分类中归纳总结出生物界的正式体系，找到类似物理定律那样严格而又客观的生物分类法则。

由于生物的多样性，此种“分类体系”注定不会成功，它虽然是按等级分类，但缺乏任何规则或对称性。某些生物群体中的个体千差万别，而另一些群体情形则正相反。类群之间的差异有大有小。最糟糕的是，随着18世纪动植物标本收集量的增加及更进一步的系统研究分析，原本用来区分不同物种的差异变得不再成立。林奈开始写《自然系统》（1735）时，完全确信“种”作为分类单元的绝对性，但在他去世时，却对人们通常认可的“种”之划分的有效性不再有把握。解剖结

构方面的差异，使得一个物种和一个与其没有实质性差异的变种间的区分变得更加困难。明显属于不同物种的成员之间有时可以杂交并繁殖有生育能力的后代。为了避免以“种”为基本单位的“分类体系”的不统一，林奈最终只好采用了“种”的上一级分类单位“属”来解决所面临的一致性问题。在18世纪，认为生物是分类而造的创造论基石的瓦解是进化生物学发展中多次出现的主题。

可以看出系统生物学有两条主线：对野生物种的细致分析；同时又试图把随意的秩序强加于经验分类，它们在进化生物学发展过程中具有截然相反的作用。不过，对造物主神圣创世计划的探寻引发了系统分类中荒唐至极的想法，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研究自然界以揭示上帝创世意图的热情。科学定律被看作是在整个宇宙间尤其是在地球上实现这一意图的媒介与手段。自然现象本身不再那么神奇：物体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科学定律来解释。这些都是“次级”法则，如果解读得当，其作用结果将会显示造物主的仁慈，他创立这些法则正是为了保证世人生活得舒适。整个自然体系的各个部分在科学法则的保障之下相互适应，这意味着背后有一只设计之手。

18世纪初，英国圣公会已经基本上放弃了神启论，转而赞同自然界能顺应人类的需求，把这看作是上帝存在及其属性的重要证据。由于“自然”神学的发展，自然界中生物适应性的各个方面都可用来作为论据，不论是否明显为人所用。这种神学思想在当时很盛行：1836年当达尔文从“比格尔号”航行归来时，当时很有名气的剑桥哲学家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仍然认为“整个地球，从一极到另一极，从周边到中心，总是把雪莲放在最适合其生长的地方”。

这种荒唐的思想早在60年前就受到休谟（Hume）怀疑论的挑战。他在《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一书中指出：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的适应状况良好就去否认以前可能存在过不够理想的状态。事实上，地质学的发展似乎恰能提供证据来证明过去存在过这种状态。在这些压力面前，英国圣公会的自然神学派便退避到看似牢不可破的生物学堡垒中。他们认为只有有目的设计才能形成如此复杂的机制，才能设计出像人手或鹰眼这样适应需要、功能完美的器官来。生物界的设计观

点是由卡莱尔的执事长威廉·培利（William Paley）提出的，他在《自然神学，或自然现象中神之存在与属性的证据》（1802）一书中作了雄辩而有力的论证。1827年达尔文进入剑桥想成为一名圣公会牧师的时候，培利代表着当时国教会的观点，他的著作达尔文以前“几乎能原样背诵下来”。

毫无疑问，达尔文在剑桥大学时对自然神学的深入了解对他很有帮助。植物和动物对生活环境的适应是任何生物演化理论都必须解释的现象。在自然神学家看来，对环境的适应比物种的差异显得更为重要：不同的动物和植物可以被看作是体现了不同的适应方式。如果某种生物的适应性变化可以不用靠神迹来解释，那就可以自由地去解释所有适应现象以及物种的多样性。

自然神学首先是一种乐观主义的理念，相信造物主本性仁慈。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费尽心思以大量雄辩的言辞去解释与其理论矛盾和不符的现象，即自然界中无处不在的邪恶、痛苦和苦难等，它们在上帝最重要的杰作——人类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为使上帝免受管理不善的指责，对此的辩护则基于如下一种假设：它认为痛苦和苦难暗示了造物主的一种更高深的意图。如果该观点是正确的，则意味着生活中的黑暗面是必要的，试图通过社会进步减轻人类所遭受的苦难的做法，显然与上帝的神圣旨意相悖，注定会失败。为与自然神学思想保持一致，这种观点最终在自然界中找到了合理的现实证据。一位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指出：生物的数量往往以几何级数增加，会耗尽环境资源，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生存斗争。在他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中，马尔萨斯认为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人和其他所有生物，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因此，人类必定要遭受由于人口过多而带来的屈辱和苦难。如果要寻求安慰，那也只能是在现实困境所激发的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里寻求，而不要指望这些渴望全都会得以实现。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一个复杂时期的复杂产物，但却深深植根于自然神学思想，其中的完美创世概念显而易见。不过1838年达尔文阅读该著作时，完全来自其原著的经验性概括却为达尔文提供了生

存斗争的理念，而它也成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石之一。

构成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三个核心理念中，进化理念本身当然是最深奥也最复杂的。然而对达尔文而言，这个理念的历史，或者在他之前其所呈现的各种隐约不同的思辨形式，并不重要。当达尔文在“比格尔号”上阅读《地质学原理》时，所接受的是经过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严谨评判并去粗取精后的理念。因为正是在地质学领域里，进化理念才脱离了2,000多年的思辨哲学范畴，首次进入科学领域。

进化哲学的核心思想是整个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中。一旦假定物质世界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是受规则支配的，且反映已知时间段里事物变化关系的定律同样适用于那些未被直接经历过的时期，进化哲学的这一核心思想就成为了科学研究的对象。通过找出目前变化的原因，从理论上就有可能解释世界是如何变成现在的样子的。这就是一致性原则，它在18世纪作为信条式的原理被逐渐引入了地质学。它是所有科学进化理论的基础，无论是关于地表演化、生物演化还是宇宙演化的。

地质学把地球表层看作是一个运动和变化着的构造，是运动变化着的宇宙的一部分，这最终将会不可避免地与神学对科学发展的限制发生直接冲突。历史地质学强调缓慢的、持续的变化过程，为地球过去的演化描绘出了一个新的几乎无限长的时间跨度表，它根本不承认创世学说中那些神奇的瞬间创世故事。厄舍尔（Ussher）大主教撰写的编年史，根据17世纪初期《圣经》文本的记载，计算出从创世到基督的诞生只有4,004年的历史。而从可观察到的地质变化过程，如隆升、侵蚀和沉积来看，显然需要有数百万年的地球发展史才能解释巍峨山脉或峡谷深壑的形成过程。而且，科学演化地质学所呈现的世界画面并不需要一个即刻现身干预的神灵。一旦物质材料具备了，其中宇宙和地球的演化就能自然而然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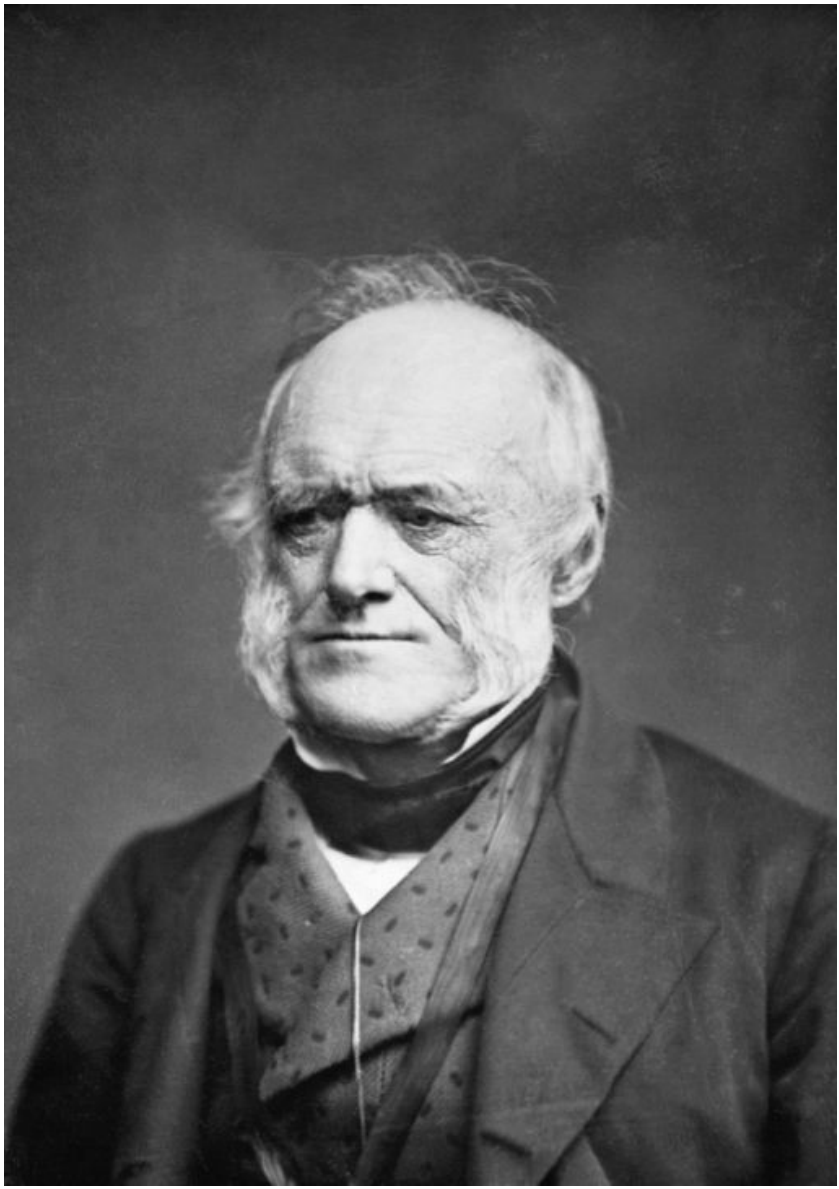

图3　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1797—1875），他的《地质学原理》是达尔文在“比格尔号”上的读物。提到他时，达尔文写道：“我总感觉我的著作一半是受了赖尔的启发。”

因为地质学家扩展了地球史的时间跨度，这也迫使人们对创造论

的概念进行重新审视。嵌于岩石中的绝灭生物的化石突然间变得不可思议地古老，即使在比喻意义上也很难与诺亚洪水时代联系起来。由此进化生物学与进化地质学不可避免地联系到了一起，18世纪地质进化的支持者也毫无例外地支持生物进化。到19世纪初，生物起源于更原始祖先的进化观点已普遍流行，尤其是在法国。同时一个可喜的巧合是，正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一位对众多领域都满怀热情的进步人士，在他的通俗巨著《动物生理学》（1794—1796）里将生物进化概念介绍给了英国读者。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19世纪初时进化地质学与进化生物学的进化概念有着显著区别。这时的进化地质学显然已经脱离了思辨哲学的范畴，凭着对自然界和特殊地质变化过程的明确认识，已经进入科学范畴。相比之下，进化生物学基本上仍是一种理论推测，对解释一些目的论现象有一定价值，对进步人士而言比正统宗教所宣扬的灾变论更容易让人接受，但却没有任何进化演变过程或机理方面的知识作为证据来支持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分级评估思想开始流行，对自然界按等级进行了分类，从最低级的微生物到最顶端的人类。整个18世纪，对自然界的等级划分都沿时间维度排列，与其间出现的进步和发展密切相关联。由于分级评估原则本身不够明确，而且最原始的类型与进化的最高级产物持续共存，加之对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演化机制完全不知，因此，等级分类体系这一形而上学的概念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总是混乱不堪。

随着进化地质学的方法论基础变得更加稳固，其践行者逐渐摆脱了进化生物学的羁绊，因后者的科学地位还是让人深感怀疑。尽管进化地质学与《圣经》直接冲突，但在与神学宗教旷日持久的斗争中，进化地质学还是凭着其无可辩驳的论据优势最终获得了胜利。进化生物学的情况则差得很远，专业的地质学家连同神职人员一起质疑它的理论基础。

透过赖尔对法国博物学家和地质学家让·巴普蒂斯特·德·拉马克（Jean Baptiste De Lamarck）进化论的态度可以把本章复杂的线索加以梳理。拉马克的进化理论1809年发表于其《动物学哲学》一书

中，它显然是沿袭了推理进化生物学传统。它对达尔文理论发展的意义在于，它引出了赖尔《地质学原理》第二卷中对生物进化问题极有见地的长篇探讨。此外，拉马克的进化理论融汇了本章涉及的所有基本概念。

作为一个博物学家，拉马克强调区分物种与变种是极其困难的，早在达尔文之前许多年他就否认物种的客观真实性。他同时也指出生物对环境有着细致入微、精妙绝伦的适应性，并注意到环境变化能影响动植物的构造和习性，使它们朝着有利于自身生存的方向发展。作为一个地质学家，他强调地球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经历了地质和气候上的巨大变化。最后，作为一个推理进化论者，他提出了一个结构变化遗传机理，但没有任何证据。拉马克提出：动物由于意识到新的需求而在其驱动下不断进化，而这反过来促使习性改变以更加适应这些需求，习性变化引起动物身体构造发生变化，进而使其习性更加高效。最终，动物一生期间应对各种内在需求形成的身体结构上的变化会被后代继承。因此，野鸭和水獭脚上都长有蹼，是缘于其祖先对在水中生存的热衷。同理，受不同需求驱使，人类得以从其类人猿祖先进化而来。

赖尔承认进化生物学和地质学的有力论证，但却无法接受拉马克的生物进化机理，认为那只不过是空想臆测。因而这位当时最伟大的进化地质学家对所有进化生物学思想都不予认真考虑，直到他最终被达尔文所发现的令人信服的进化机理所折服。

而它就是达尔文的概念性遗传。物种的起源是当时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我们的一位最伟大哲学家称之为“秘中秘”（O 1）。这位哲学家就是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他是一位物理学家，达尔文上大学时就很推崇他在科学方法方面的著作。达尔文学习神学时，培利的著作里就详细阐述了生物适应问题，接触之后达尔文认识到这个问题在《物种起源》里尤其需要加以解释。任何进化理论“都不会令人满意，除非它能说明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数不清的物种是如何发生改变，以获得令我们惊叹的完美构造和相互适应的”（O 3）。达尔文首次接触有关进化的研究是从他在“比格尔号”上阅读赖尔的《地质学

原理》开始的。那时，他开始挖掘化石，这些化石使他首次确信生物进化确实发生过。赖尔主张科学进化论必须提供一个进化机理，这迫使达尔文把这一问题而非其他进化方面的问题看作是关键的环节。从“比格尔号”回来后不到两年时间内，他就率先补出了马尔萨斯理论中的缺环，“秘中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

经过仔细的研究和冷静的判断之后，我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大多数博物学家以及我以前所持的观点——即每个物种都是被独立创造出来的——是错误的。我完全确信物种是可变的；但那些属于我们所说的同一属的物种则是某种通常已经灭绝物种的世袭后代，这与我们所认可的任何物种的不同变种都是该物种的后代是一样的道理。（O 6）

达尔文深知他的进化论与许多前辈的理论之最大差异就在于，它解决了进化机理中至关重要的附属问题。这一解决方案，达尔文称之为自然选择，事实上是一个很基本的论点，其前提非常简单且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物种起源》一问世，就遭到批评家的猛烈抨击，这无疑是人们对其推理逻辑的一种反应：由可接受的前提经过简单论证却无可避免地推导出了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结论。

第三章

自然选择与物种起源

生物进化的机理是自然选择。与地质变化过程不同，自然选择不易直接观察到，但可以从对观察到的其他现象的论证中推断出来。论证是建立在三个看似各自独立的有关生物特性的一般性结论之上。这三个结论继而又成为一个形式推理的前提条件或公理性前提，而这个形式推理得出的结论则是对生物特性的进一步归纳。如果这三个公理性结论逻辑上是正确的，且没有忽视其他相关的有效结论，那么其推论一定也是正确的，而且应该能观察得到。

第一个结论：任何物种的个体成员之间在许多特征上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无论是结构特征还是行为习性方面。即使是那些最顽固坚持物种不变观点的人也接受这一确凿事实。“没有人会认为同一物种的所有个体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O 45）

第二个结论：个体变异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遗传性，也就是说，可以从一代传到另一代。“或许应该这样认识这一问题，性状遗传是正常规律，而不遗传则是异常现象。”（O 13）

最后一个结论即马尔萨斯原理：生物繁殖的速度会使其数量超出环境所能承载的容量，结果必然导致许多生物灭亡。

一切生物，在其自然生命周期中要产生若干卵或种子，在其生命的某一时期必定会遭遇毁灭的威胁，……否则，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原理，它们将会因数量的迅速增加而变得无处存身。因此，既然繁殖出的个体数量多于可能存活下来的个体数量，生存斗争将不可避免：不是同一物种内的个体之间就是不同种类的个体间相争，或者是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之间相争。（O 63）

自然选择定律是遗传性变异、繁殖和生存斗争推导出的结果。

如果……生物在其整个构造的几个部分上存在差异……如果自然界中，由于每个物种按几何级数迅速增加，存在严酷的生存斗争；那么，……如果不曾发生对各生物体有用的变异的话，我想那将会是不可思议的……但如果的确发生了对生物有用的变异，那么具备这种特性的个体肯定在生存斗争中最有可能存活下来；从遗传的观点来看，他们也会繁殖具有类似特征的后代。为了简洁起见，我把这种存留原则称为自然选择。（O 126—127）

自然选择何以成为生物演化的一个内在机制？下面三点可以帮我们解开这个谜。首先，自然选择是一个过程：每一代生物体都会受到环境的选择性影响，其中有些成员会绝灭或者不能繁殖。构造不同的个体面临的环境选择压力也不均等，因而能成功繁殖的个体并非是偶然择定的。如果每一代生物体所处的环境条件都稍有不同，如在冰期缓慢的气候变化过程中，最能适应这种气候变化的个体，其繁殖能力往往会超过那些抵抗力较差的同类。正如流水的侵蚀作用会改变山谷的地貌一样，选择的持续作用也会改变生物种群的构造。

其次，自然选择和适应性变化很明显是同一问题的正反两面。一个生物体若能成功越过一代与一代间的障碍顺利繁衍后代，就可以说它适应其生存环境。虽然对生物学家来说，对“适应”仅能给出的总体定义是指繁殖能力，但在给定环境条件下，人们通常能具体确定那些对繁殖有利的特征是什么。以我们假想的冰期为例，皮毛厚这一特征在极其寒冷的条件下显然有利于生物成功繁衍或者说有利于适应当时的条件。但按照自然选择的观点，适应这个概念完全是以生物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为条件的。皮毛厚在冰期最寒冷时显然是一种适应，然而，随着冰期退去，它又明显成为一种不利的条件。自然神学家的“适应”概念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中适应对每一代则意味着不同的内容。

第三，自然选择显然是被理解为作用于生物种群的一个过程。个体繁殖不论成功或失败，它们都只是选择过程中的沧海一粟。谈论个体进化毫无意义，进化是指由个体组成的种群从一代发展到下一代时其总体平均结构的变化。

在《物种起源》后来的版本中，达尔文引入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用词“适者生存”来概括其自然选择的理念。这个术语经常受到指摘，因为适应性只能由生存来定义，它其实是同义反复，对自然选择理论而言等于什么也没说。由于人们对此普遍存在误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一点还是值得的。避免同义反复的最简单办法是：提醒自己记着前面的第一个公理性结论：同一物种的个体成员

间存在差异。相较于未能生存繁殖的个体，那些得以生存繁衍的个体事后被称为“适应者”：对构造不同的个体自然选择作用的结果不同。或许不仅仅是因为达尔文采用了斯宾塞的重复性术语，才给人们理解自然选择观点带来了困难。在对自然选择的原始表述中，达尔文使用了“对生物有用的变异”这一说法（上面引文中引用过），似乎暗示“有用性”是生物变异固有的特性，发生这种有用变异的个体能充分利用环境。问题是：一种变异是什么时候证明“有用”或“有害”的呢？什么时候表明生物个体是“适应”或“不适应”呢？正确的答案必须是经过选择之后，因为选择的结果是判定是否“有用”或“适应”的唯一标准。如果说达尔文没有完全解释清楚这一点，或许是因为他认识到关于自然选择的整个论证似乎牵涉到一个矛盾：个体的消亡乃是适应性或建设性变化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如果他把那些被选择出的变异标注为“有用”，则矛盾似乎就得以解决了。其实并不存在矛盾，无论生物会不会发生变异，由于存在生存斗争，每一代都必定会发生个体消亡现象。在每一代中，繁殖能力必然仅存于那些从上一代繁衍下来的幸存者，所以在进化中重要的是不要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达尔文反复强调生物体与环境各方面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在最早的一则笔记中，他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强调了生物体之间激烈的相互竞争是占主导地位的选择性影响力。

> 在观察自然时，应时时记住……我们周围的每种生物都在竭尽全力地争取个体数量的增加；每种生物在生命的一定时期都必须靠斗争才能存活；每一代中或每隔一定时期，生物种群里的幼小或衰老个体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大量灭亡。减轻任何一种抑制因素，或是稍微降低一下死亡率，不管幅度多么小，这一物种个体的数量就会立即大增。自然界的面孔好比是一个易变形的表面，上有一万个锋利的楔子簇拥在一起，在持续不断的撞击力作用下不停向里推进，有时一个楔子被击中，然后是另一个，而且力度更大。（O 66—67）

这段话讲述了自然选择的一个重要结果。自然选择作用于个体的繁殖活动：一个“有用”的变异能使某一个体为下一代繁衍出比其他个体更多的子孙。因此，自然选择意味着生物是“自私的”。这一论断对

达尔文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它把神创论和自然选择进化论区分了开来。

自然选择不可能纯粹为了使其他某个物种获益而让一个物种发生改变……如果能证明任何一个物种的任何一部分结构是专门为造福另一物种而生的话，那我的理论就会被彻底推翻，因为自然选择是不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我倒更愿意相信猫捕老鼠准备跃起时尾部的蜷曲，是为了警告厄运将至的老鼠。……自然选择永远不会产生对生物本身有害的性状，因为自然选择的发生只可能是为了各物种本身的利益。（O 200—201）

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里简要讨论这个论断的一些重要限制条件。

如果生物间的相互竞争具有比气候或地理变化更重要的选择性影响，那么，一种生物或一群相互影响的物种的进化方向就变得几乎无法确定。每一物种的变异将会在整个互动系统中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为了确保进化，似乎不必考虑任何环境差异带来的影响，除非它是由其他生物引起的。

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昆虫决定着牛的生存。或许巴拉圭的例子是最稀奇的了；因为，该地区的牛……数量从未失控过，虽然它们在野生状态下成群地南北游荡着；……这是由于在巴拉圭有一种蝇，数量极多，它们专把卵产在这些动物刚出生幼崽的肚脐中（并会致它们死亡）。这种蝇虽多，但其数量的增加似乎受到某种习惯性力量的抑制，可能是鸟类吧。因此，在巴拉圭如果某种食虫鸟（它们的数量或许受鹰或食肉野兽的调控）增多了，这些蝇就会减少，那么，牛……就会增多，变得随处可见，这肯定会极大地改变地表植被（在南美的部分地区我确曾见过此类现象）。而这种变化又会极大地影响昆虫；尔后，受影响的将是食虫鸟类……在越来越复杂的循环链中如此不断地延续着。这个循环我们以食虫鸟开始，又以它结束。其实自然状态下动植物间的关系远比这复杂。一场又一场的生存之战此起彼伏，各有胜负；虽然某一微不足道的小事件就经常足以使一种生物战胜另一种生物，但从长期看，各方的力量会达到较稳定的平衡，以至于自然界在很长时间内会保持同一种面貌。（O 72—73）

认可这个例子本身很重要，它是一个假设性场景：在动态平衡系

统中，食虫鸟数量增加这一小小变化引起各种生物的比例发生波动，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有微妙的关联。至于此处所提及的影响方式是否确切无误，理论上对这一论点而言则无关紧要。脐蝇数量的增加可能主要受制于肚脐的数量，其次才受到食虫鸟的制约。食虫鸟的数量可能主要受制于另一种昆虫的数量或者是疾病，而不是它们的捕食者。关键的问题是各种生物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一种生物的小小变化会对所有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生物产生影响；以此类推，永无终结地持续下去。

自然选择是适应性变化的推动力量，作用于各代之间。随着生物的代代繁衍，现生物种与其祖先的差别越来越大。尽管有繁衍的连续性纽带相维系，但还是很容易看到现生生物与其祖先的差别变得如此之大，乃至分类学家会将它们认定为不同的物种。这就是“物种是如何而来的？”这一问题答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正如达尔文所认识到的，它还不是一个足够充分的答案，除非所有现存物种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谱系中存活下来的成员，而这些谱系自地球有生命以来就一直保持分立状态。因此，这个答案并不能排除一个额外的创造法则在过去某个时期的干预，在它的作用下每个独立进化谱系中的原始个体被创造了出来；似乎的确需要这样一种创造干预的存在。

达尔文对于单独的造物行为没有必要存在的论证说明是《物种起源》中最复杂的一部分，对最终涤除创造法则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达尔文希望证明：作为遗传和派生的结果，不同的现生物种之间存在关联。两个物种的成员之间，就像某一物种内的两个成员一样，由于共有一个祖先实际上是表亲关系，不论关系有多远。达尔文有段时间拼命寻找证据，想证明物种不仅倾向于彼此取代，有时还会产生分支，其结果是一个过去的物种到了现在可能就不止有一个后代物种。在《物种起源》里，达尔文引入“自然体系中的位置”概念来阐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把这个概念称为“生态位”。任何物种都有一个地理上的“活动范围”或延伸区域（如从北到南），这样其中一些成员就生活在一种条件下，而其他成员则生活在另一种类似但有差别的环境中。生物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例如食虫鸟数量的增加可能会通

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改变牛的分布状况，它对一个物种部分成员数量增长的抑制作用与对其他成员的抑制作用肯定有所不同。因此，一个物种会因其分布的区域条件不同而趋向于进行不同的适应。因适应略有不同的生态位而产生差异的单一物种的不同组群被称为“变种”。鉴于一个变种的适应变化会影响与之有关的其他生物体，无论途径多么复杂，这个变种的适应性变化过程会得到强化，其生态位会进一步发生改变。正如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在扩展到新生态位的适应过程中，一个物种的变种与亲体及其他变种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明显，直到最终获得自成一种的特性。性状的分化趋异程度似乎是无限的，它通过物种的不同群体对不同生态位的相继适应而实现。

“自然体系”代表着无限多的生态空间，变种通过变异渐渐从其祖先种里分化出去，努力“楔入”各个空间。达尔文明确指出他还发现这一过程往往会不断持续下去，趋向于将所有空间都填满。由于时间、变异和生殖力诸因素的作用，自然体系的容量必定会趋向最大化；由于一种生物基本上能为另一种生物创造一个生态位，异种共生就成了一个不难推导出的结果。植物的存在为食草动物创造了生态位；食草动物又给捕食它们的食肉动物创造了生态位。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却足以说明一个原则，即“同一区域内所生存的生物越多，则它们在结构、习性和体质上的差异就越大”。最大限度的物种差异性才能保证空间的利用率最大化，因而物种的分化似乎也是物种数量增多的必要条件。然而，鉴于一个类种的适应性进化会影响到另一物种的生存环境，不只是个体成员，整个物种都会由于竞争而面临灭绝。物种的数量可能增加，但它们往往是以其他物种的减少为代价。绝灭也许可以通过适应性变化而避免，但也有可能避免不了。没有法则可以保证任何生物或生物群体无限地存续下去。

达尔文用图表达了他的观点，毫无疑问，图中不同分支的种内性状适应分化是从整个进化理论所依据的基本前提可以得出的一个合理结果。此外，只要适应性分化可以出现，哪怕是在很小程度上，逻辑上它就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然而这个观点有一个根本的漏洞，对此达尔文自己当然清楚，但始终没有完全解决。也就是，它只是解释了种

内分化，而对于一个物种如何能够演化成多个物种的关键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核心难题就在于如何给物种下定义。我们已经知道物种的字面定义确实包含着“与别的物种不连续”的含义。例如，猫看起来确实与根据分化原理当属是它的“远亲”的其他类似物种不连续。然而，达尔文的论证中似乎没有什么媒介或法则可以确立同一物种的两个分支之间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不连续性。一个物种的这一部分也许通过遗传，代代繁衍走向一个极端，另一部分则通过不同的遗传走向另一极端。但适应性变化同样适用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个体。如果个体分布是连续的，通过一连串、可以多至无穷的中间变异体，一个物种的那些极端类型必定能够融合在一起。事实上有一个强大的作用力在对抗着分化趋势，那就是性繁殖的影响力。性繁殖过程把两个个体的遗传特征结合起来，产生的后代特征一般介于父母双亲之间。因此，性繁殖所具有的“正常化”效力一定会降低一个新生态位被一个与其大种群处于性繁殖延续中的潜在分支占据的速率。正如字面定义所显示的那样，一个物种在其自身范围内确是连续的，且本质上是保守的，尽管达尔文正确揭示出的分化趋势的确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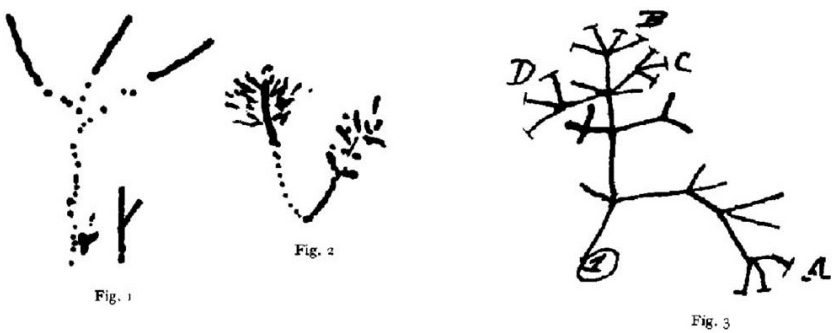

图4　达尔文首次（1837/1838年）尝试图解分化这一概念。上面的图1和图2中树枝末端代表现代物种，经过了中间许多代的绝灭类型，该物种已不再与其祖先直接相连。“生命之树或许应该被称为生命的‘珊瑚’，枝的基部死了，所以无法看到转变的过程。”在图3中，达尔文又对绝灭现象作出推测，在他看来，它要能够“使物种的数量保持恒定不变”。A、B、C和D各属均有现存物种，其他分支已经消亡，使得现存属之间产生不同程度的性状分化。

一个物种真正分化为两个物种的必要附加前提是：两个潜在的分支间存在生殖隔离。到目前为止，要去推理论证适应性分化本身能够在原先存在的繁殖延续状态中形成生殖隔离已证明是极其困难的。生殖隔离似乎不是一个物种的变种自身所能够实现的。目前人们广泛持有这样一种看法：两个变种要想成为两个物种，必须有一个物理障碍介入其间。达尔文绝没有忽视隔离在成种过程中的重要性，但他似乎在论证中逐渐忘记了它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最初关于物种变化的笔记中，达尔文反复提到隔离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在成种过程中的作用，在这些早期笔记里，他也意识到隔离的缺失所带来的问题："那些长期存在的物种是那些有着众多变种的物种，通过交叉繁殖而保持相似。但是一些物种的长期不变性是个难题。"

在《物种起源》里，达尔文再次指出物种的适应性分化趋势与性繁殖连续性会产生相互对立的影响。

> 但如果一个物种占据很大的地区，它所在的几个区域几乎肯定会提供不同的生存环境；然后自然选择会在这几个区域内改变和完善这个物种，在每个区域的边界地带，就会出现与同一物种内的其他个体杂交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选择几乎不能对冲杂交的影响，自然选择往往会根据各区域的生存条件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改良每个区域内所有的个体。而在一个连续的地区，通常生活环境从一个区域逐渐过渡到另一个区域时，变化并不很明显。（O 102—103）

但即使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个版本（1876）中，达尔文仍然坚持他的看法：尽管隔离可能确实会促进物种形成，但没有它成种过程也可以发生。这种主张就很让人感到奇怪，因为事实上不仅达尔文最初把隔离当作具体分化所需的一个几乎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德国博物学家莫里茨·瓦格纳（Moritz Wagner, 1813—1887）依据进化论的原理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这个情况相当奇怪。没有隔离，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物种形成的一个机理确实存在不足。而且，他了解隔离这一现象，曾观察到它的存在，注意到它所带来的有利结果，也注意到它的缺失造成的一些不

利情形。最后还有，当达尔文计划对《物种起源》进行最大幅度的一次修订时，一位明显倾向于赞同进化论观点的著名博物学家向他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或许是隔离的不确定性让达尔文头疼。变异、遗传和繁殖显然是生物固有的属性：它们几乎可以被作为现成的公式用来推导进化问题。而隔离只发生于物种的部分群体之中：也许是因为偶然来到了一个岛上，或因为一座大山屏障的介入，或因为其他一些杂乱、毫无逻辑的过程所致。由于这种杂乱、不合逻辑的过程确实发生过，达尔文对于隔离概念并无异议，而且它确实有助于他很好地解释地理分布上的一些实际现象。但他从未完全接受这个观点，即新种的形成也不是生物单靠自然选择就能产生的固有属性。

我们在本章谈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内容。生物体在各方面往往存在差异，无论其多么细微；变异，无论多小，往往会遗传下去；出生的生物数量会多于能够生存繁衍下去的数量。从这几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前提，我们能够推导出一个物种的适应性变化是没有确定方向、也没有程度上的限制的。今天的生物都是过去存在生物的变异后代。此外，如果种群分布空间一定，且存在繁殖隔离的机会，我们还能推导出：这些称作物种的相似但不连续的生物族群分别是数量比其要少的先前存在物种变异进化后的后代。既然适应性变化不存在必要的限制，那么两种生物的差异大小也就没有限度，它可以由不断累积的变异性状的遗传来解释。因此，似乎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论点能排除所有生物拥有共同祖先的可能；这里的生物指的是具有变异、遗传和繁殖特性者。

据此类推，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想：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起源于某一原始类型。但是类比也有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但不管怎样，所有生物都有许多共性……因此，似乎可以由类比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或许这个地球上曾生存过的所有生物都是由某一最先具有了生命特征的原始生物体衍生而来的。（O 484）

第四章

自然选择进化论的证据

正如达尔文所言，《物种起源》是一个很长的论证，不过它远超出上一章所讲述的理论的核心内容。如果核心论点正确，那么一些结果就应该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观察到。如果这些可能出现的结果确能被观察到，反过来它们又可作为证据来支持论点。《物种起源》用很大的篇幅枚举了大量事实证据，作为在基本理论框架下可能产生的结果，其中的绝大部分证据都得到了达尔文同时代人的广泛认可。进化论所涉及的范围甚广，达尔文引用的大多数“事实”实际上是归纳出来的一般性结论。与他的后期著作相比，《物种起源》一书论证非常严谨。我不同意赫胥黎的观点，他认为该书是“把大量事实杂糅在一起形成的，而不是通过明晰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

自然选择被看作是进化的机理。达尔文的第一个任务是要证明在家养动植物中，一个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产生了与自然进化相类似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动植物饲养者对变异个体的选择，不管变异多么微小，却投合了他们的喜好。“人工选择”能培育出符合饲养者心意的可育变种。换句话说，选择与适应有关。

> 我们在家养动植物品种中观察到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适应，这种适应并非是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而是契合了人类的需求或喜好……我们不能想象，所有家养动植物品种是突然一下子就变得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完美和实用。的确，在许多情况下，其形成历史不是这样的。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人类选择的累积作用：大自然使物种发生持续的变异，而人类则按适合自己需要的方向不断积累这些变异。（O 29—30）

此外，对某一个物种的家养变种的选择过程（达尔文最喜欢以鸽子为例）所能产生的变化幅度，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物种定义的范围：一群看起来基本相似的生物。

> 一共大概可以选出不少于20个品种的家鸽，若拿去让鸟类学家鉴定，并告诉他这些都是野鸟，那他一定会将它们划为界限分明的不同物种。而且，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鸟类学家甚至都不会把英国信鸽、短面翻飞鸽、西班牙鸽、巴巴

鸽、球胸鸽和扇尾鸽置于相同的属中；尤其是让他鉴定的这每一个品种都还有一些纯系遗传亚种或他可能会称之为不同物种的变种……但愿那些不承认我们的许多家养品种都源于同一亲种……的博物学家，当他们嘲笑自然状态下的物种是其他物种的直系后代这一观点时，能学得谨慎一些。（O 22，29）

饲养者的有意识干预似乎减弱了该例证的说服力，因此达尔文指出，即使没有想要改良品种的明确意图，有选择的培育也会使其性状发生改变。此外，随着家养品种的变化或一些异常变种的出现，选择的标准可能也会改变。

要不是一只鸽子的尾巴出现了某种轻微的异常状态，没有人会去试图将它培育成扇尾鸽……不过，我十分肯定，“试图将它培育成扇尾鸽”这一表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不正确的。最初选中一只尾羽稍大一些的鸽子的人，绝对想象不到那只鸽子的后代会变成什么样子……（O 39）

这段话说明了另外的一个观点，达尔文后来用它驳斥了针对自己进化理论的一种常见反对意见，即构造完美、适应性强的结构只有当它们完全形成时才会发挥出作用。那么，它们是如何通过假想的中间环节被选择出来的呢？在人工选择的复杂过程中存在一种答案，即从事后看选择似乎是有目标导向的，而事实上在中间过渡点上选择的标准可能是不同的。

与家养有关的现象实际上构成了自然选择原理的一个完整的“实验性”证据。如果在《物种起源》出版前“品种改良”从未被尝试过，那么人类通过有意识地选择遗传性变异来塑造生物特性的能力，就会被看作是证明自然选择原理正确的绝好证据。而事实上，人工选择的作用已被吸纳到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中，该观点视物种不变为当然之事，认为人工选择可作用于变种阶段，但按照物种不变律，选择作用不会超出这一范围。经人工选择后的变种或种类仍然属于亲种的成员。

由此看来，人工选择“实验”在一个关键的方面还不够完善。虽然远超出一个物种通常概念范围的外形进化显然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实验”还没有证明人工选择能够产生种间功能差异，人们长期以

来一直将这种差异，即种间不育性视作一个附加的关键标准。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杂交和不育问题。他想用大量事例说明，实验性种间杂交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

> 那么，这些复杂而奇妙的规律是要表明：赋予物种不育性仅仅是为了防止它们在自然界中变得混乱不分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可以假定避免物种混淆对各物种都是同等重要的，那么为什么各种不同物种之间杂交，所产生的不育程度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为什么同一物种的个体间，不育程度还会是可变的呢？为什么一些很容易杂交的物种，其杂交后代却极难再育；而另一些物种极难杂交成功，但杂交后却能产生完全可育的杂种呢？为什么同样两个物种之间互交（例如雄性A与雌性B互交或者相反）的结果常常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甚至还可以问，为什么还允许杂种产生呢？既然赋予物种以生殖杂种的特殊能力，却为何又要通过不同程度的不育，制止它们进一步繁殖，而且这种不育程度又与杂种亲本初始杂交的难易程度并无多大的关系，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安排。（O 260）

这样一来，神创论所认定的物种被创造出来后就保持不变的观点在大量可观察到的反证面前变得难以为继，而达尔文对所观察到的那些现象也未能完全透彻理解。他认为：两种生物体互交不育的程度本质上说是偶然的，是物种长期以来适应不同环境过程中产生的总体生理或习性分化的一个偶然结果。达尔文正确地认识到成功繁殖能力是一个很脆弱的特性，容易受到生殖系统生理变化的影响。随着物种不断趋异分化，进化变化在影响生物体其他器官的同时也会间接影响生殖系统的整个机制，使之发生微妙改变。很明显，一个物种的雄性和雌性生殖系统在选择作用下会保持完全适配，但选择作用却没有明确的理由要去维持两个不同物种的雄性和雌性生殖系统的适配性。由于它们彼此独立地进化，它们的生殖系统会越来越不相容。那么为什么一个物种的家养变种，无论外表变异多大，在一起却总能繁殖呢？达尔文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在《物种起源》出版后，他的朋友以及他的批评者们不断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家养繁殖中的人工选择仅适用于“外在”特征，育种者不能通过培育产生“生殖系统的深层功能性差异”，而这种差异被认为是造成野生物种种间不育的

原因。人工选择是快速的、表面的，而自然选择却是缓慢的、深层次的。

这个论点部分正确，但没击中要害。达尔文在讨论杂种不育时出现的问题是：他没能看到杂种不育本身也可以是通过自然选择演化的一个特征，因为“一个个体若与别的变种交配质量不高而很少留下后代，这对它来讲并不会有任何直接的好处”。因此，他只好把杂种不育看作是由于其他变化造成的偶然生理结果。这个问题的解决仍要从生殖隔离现象中找寻答案。正如在第三章中所讨论的，同一物种两个变种的适应性分化会受到性繁殖“平均化”效应的限制。如果地理障碍阻挡了两个变种间的交配，那么适应性分化就会进展得更深更快。然而，如果地理障碍只是暂时的，两个快速分化的变种再次被放在一起，持续杂交的能力实际上可能会成为一种劣势，因为一般来说，杂交后代不能很好地适应其亲体的生态位。这种情况下，选择作用有利于那些与各自变种内成员交配的个体。结果，被达尔文称为“自然厌恶”的“对动物杂交行为的厌恶”，像任何其他适应性特征一样无疑会得以演化。类似的生理隔离在植物变种的生殖系统中也会得到演化。

奇怪的是达尔文没有将这一论点进一步深化发展，但这与他没把生殖隔离作为变种形成物种的必要条件如出一辙。达尔文推翻了上帝赋予种间不育的说法，但这也因此成了一把双刃剑。他可以利用这个证据，即物种能够经常地杂交，即使其不很稳定，来驳斥传统意义上定义物种时的“功能”标准。但由于没有看到生殖隔离在成种过程中的重要性，他对不同物种一般不杂交的事实的解释缺乏说服力，还得出了不必要的结论：不能或排斥与远亲成功交配的特性肯定是普遍适用的自然选择作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例外。

家养和杂交的事实使达尔文放弃了定义物种时的形态或功能标准。然后他就选择采纳了最极端的相反观点，基本上与50年前拉马克的观点相一致：

可以看出，为了论述方便，我很随意地用物种这个术语来指一类彼此非常相似的个体；而用变种来指那些更容易变化而差异又不那么显著的类型。其实，物

种和变种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同样，也是为了方便，变种这个术语，与“小的个体差异”比起来，使用上也比较随意。（O 52）

进化中的一群个体之所以看起来与其他生物明显不同而成为一个物种仅仅是由于它们被放在了一个极短的时间框架里来观察这一偶然原因。而它真正的大背景应是它过去的历史和今后的命运，它们是生物体前后延续的整体结构的一部分。在达尔文看来，如此给物种重新定义会在科学界引起极大的争议，当时的科学界大多认为物种是本质上永恒不变的存在体。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缺陷，它完全忽视了野生物种间真正的繁殖不连续性，这正是隔离和分化演变的基础根源。

通过对自然界的实验性干预，驯养和杂交生育的成功为进化论提供了证据，反驳了物种不变论。不过正是有了达尔文对可直接观察到的野生自然界的那些事实的解释才最终使进化论得胜。在地质学、地理学、分类学和胚胎学四个主要研究领域里，已有的资料和发现已引起神创论拥护者的关注，他们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针对性的辩护。达尔文就把自己的观点与神创论观点二者的解释力进行了比较，辩证地论证了自然选择进化学说。

在地质学方面，进化论能够解释给予神创论观点沉重打击的两个公认的事实。第一，正常情况下进化一定是缓慢的。经历了世世代代的漫长时间而高度进化的复杂生物体的存在能够证明该结论是正确的，因为选择发生作用的最短时间间隔是一个世代。不能想象一头大象在30—60年的一代时间里就能迅速进化。世代的遗传变异显然说明世界一定是古老的，正如地质学所明确宣称的那样，它确实是难以置信地古老。第二，世代的遗传变异同样明确要求化石从整体上说应该不同于现生的生物，而化石记录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达尔文没有用过多的篇幅阐述这些基本观点，人们长期以来早已了解了它们作为进化生物学证据的价值。他主要关注的是如何驳斥针对这些证据的明白阐释而提出的那些反对意见。古老而奇特的地质化石证据与神创论的圣经故事之间的主要妥协是基于如下事实：含化石

的沉积岩上下按层序排列，地层之间有明显的间断。每个地层中的化石大致上体现该地层的特征，特别是在较古老的岩层中，化石的间断情形的确非常明显。大的生物类群（如菊石或恐龙）几乎是整个地突然出现或消失。最明显的是：在最古老的地层中，已经能够发现非常高等的生物，如鱼类。对神创论者而言，这些间断说明了自然秩序遭受了类似诺亚洪水事件的灾难性破坏。原先创造出的整个秩序被一扫而光，代之以新体系。生命的中间过渡类型在哪里呢？

均变论地质学没有涉及灾变问题，而达尔文对神创论也不予考虑。他的方法是抨击地球的地质史是完整的这一说法，并推测含化石岩层的间断只是地质记录里的一个空白。地球表面只有极小一部分受到过地质勘查，而且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被完整彻底地勘探过，因为每年都有全新的化石被发现。此外，化石的保存还要取决于许多有利环境条件的共同作用。含化石的沉积层只能在缓慢的陆地下沉期间堆积而成。其他时候，这些沉积物会由于侵蚀作用再次被剥蚀掉。从全球的角度看，沉降是一个局部事件。因此沉积层不可能是完整记录，除非知晓了它的全部历史，但在地质和气候变化的共同作用下，这一点根本就无法做到。既然生物显示出了对其环境持续不断的适应，那么，表明在漫长岁月里发生过环境变化的地质间断，也应该有化石记录的间断与之相呼应。

灾变论需要有灾难的同时发生作为依据。灾变发生时全球生物都被一扫而光，一个新的生物世界被创造出来替代旧有的世界。巨大间断现象的存在使灾变观点变得很有影响力。众所周知，某个地质时期之初会有大量的新生物种突然出现，而在另一个地质时期之末，先前存在的许多生物又会突然灭绝。达尔文从三方面对创造论所倚重的这最后一条地质学论据进行了批驳。首先，他重申地质间断意味着时间过渡和环境变化。其次，尽管所显示的生物间断常常会很巨大，但它们通常都不是完整记录。随着地质学研究的深入，这种间断的鲜明断层会趋向缓和，不再那么明显。最后，他用了一个纯粹“达尔文式”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大的植物或动物类群似乎会突然地出现：

某种生物要适应一种特别新奇的生活方式，例如要适应空中飞翔的生活，可能需要经历一系列漫长的时期。可是这种适应一旦成功，并且有少数的物种由于获得了这种适应性就比别的物种有了较大的生存优势，那么许多新的变异类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会被繁殖出来，并迅速地传播，遍及全世界。（O 303）

如此一来，达尔文就可以轻松地解读化石记录，好像它是一本进化书，不仅可以找到进化的清晰证据，而且许多证据很容易用自然选择进化论来解释。首先，演化的速度明显是有差异的：有些生物，如海洋生物，从已知最早的化石记录到现在，基本保持未变；而另一些生物，特别是陆生生物，变化很快。然而，不管大小，变化是永恒的规律。为什么进化的速度要有所不同？类似飞翔这类新能力的进化完成后随之而来的快速变化问题，上文已作了解释。但达尔文现在对整个问题作了更综合的阐释。

我相信发展并无固定的规律……进化的过程一定极其缓慢，每个物种的变异都是独立的。至于这样的变异是否会被自然选择所利用，以及这些变异有多少能被积累保留下来……却要取决于许多复杂的偶然因素——变异是否对生物有利、杂交繁育的能力、繁殖的速度以及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的缓慢变化，更要取决于群落中和这个变异物种相竞争的其他生物的特性。所以，某些物种保持原态的时间能比其他物种长得多，或者即使有变化，改变的程度也较其他物种小，这是毫不奇怪的。（O 314）

绝灭现象是化石记录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达尔文不仅把它看作是进化作用而且也是自然选择作用的最有力证据。

自然选择学说是基于下列认识基础上的：每个新的变种，即最终每个新的物种，之所以能繁殖和延续下来，是因为它比其竞争者拥有某些优势；而居于劣势的物种随后的绝灭，似乎是必然发生的结果……因此，新生物种的出现和旧物种的消失……是密切相关的……然而，那些被改良物种所取代的物种，不管是属于同纲还是异纲，总还有少数一些可以存续很长一段时间，或因为它们适应了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或因为它们生活在遥远且孤立的地区而避开了激烈的生存斗争……我们不必为物种的绝灭感到惊异，如果真要惊异的话，还是对我们凭一时

的臆想就自以为弄明白了物种生存所依赖的各种复杂、偶然因素而感到惊异吧！（O 320—322）

绝灭生物要么可能代表“连接化石”，是现生种群已灭绝的祖先；要么可能是没有留下后代的绝灭种类。总的来说，正是这些“连接”化石引起了达尔文的极大关注，因为进化理论明确暗示了它们的存在而神创论没有提出任何补充论点对它加以解释。即使在19世纪中期，当时的已知化石也能立即显示存在着中间连接类型。地质研究的一个指导原则就是：两个地层在沉积序列中靠得越近，它们所含的化石就越相似。无论所研究的化石年代是相对较新还是很古老，无论是两个化石层还是某个化石层与现代生物相比较，这一原则都同样适用，总的要点是生物之间的相似程度这一分类指导原则可以在时间跨度里“纵向”扩展应用，就像它可以被“横向”地应用于现存物种的比较一样。绝灭物种和现存物种

都同属于一个宏大的自然体系，生物的遗传之道立刻就可以解释这一事实。根据一般规律，愈是古老的物种，它与现存物种之间的差异也就愈大。但是，正像巴克兰（Buckland）在很久以前所讲的那样，所有的化石不是能归到现存类群里，就是可归到现存类群之间的类群里去。绝灭的生物类型，可以帮助填充现存的属、科、目之间的巨大空当，这是毋庸置疑的。假如我们只关注现存的或灭绝的物种，所得出的生物系列的完善程度就远不如将两者结合在一个系统里时高。（O 329）

随着19世纪化石记录越来越多，处于不同时期的相同物种之间或现今仍都存在但构造有所不同的物种之间或大或小的区别趋向“消匿”。但化石记录的不完整性极大地降低了可能发现某种与它所分化出的两种生物明确相连的特定生物的几率。

最引人关注的化石缺环之一在1859年时仍没有被找到。1861年，德国一古老岩层中发现了始祖鸟化石，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它立即被确认是绝灭恐龙和现代鸟类之间真正的过渡类型。在《物种起源》后来的版本里，达尔文不失时机地引用了始祖鸟的材料，不过

其基本观点已经非常明确，不会因一种新化石的发现而受到影响。

连续地层中的生物间会呈现密切相似性的一个特殊例子是：在某个特定地区发现的近代化石与那里的现存物种非常相像。这种特殊案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具有特殊地位。

当我以博物学者的身份登上“比格尔号”皇家舰艇游历世界时，在南美洲观察到的有关生物地理分布以及那里的现代生物和古生物之间地质关系的一些事实，使我深受震动。（O 1）

树獭和犰狳是非常奇特的、具有典型南美特色的哺乳动物。达尔文在比较新的沉积岩中发现了显然也属于这些类群的巨大灭绝动物的骨骼化石。为什么神奇的创造力量曾在南美造就了树獭和犰狳，而后又在同一地区而没在别的地方创造出与其密切相关的类型呢？为什么这样一种造物力量在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的作为：那儿的洞穴里发现的绝灭哺乳动物骨骼化石与澳大利亚现存的奇特哺乳动物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的相关性可以用遗传进化理论来解释。较近的祖先往往比远古的祖先距离后代的地理位置更近，因为一个物种占据的地理位置取决于当时的主要环境条件。随着不同地质时代里环境的变化，物种的分布范围将发生相应改变。

达尔文从赖尔的地质学里了解到了漫长时间里的地质运动概念，于是他推导出一个相应的空间运动概念。共同祖先的时代越近，其分支类型在空间分布上相距越近。由此，进化论作出了这样的预测：不管环境条件如何，属于某一特别类群的物种，地理位置越靠近的，相似性就越大。而神创论则认为，不管地理位置如何，环境越相似，生物应该彼此越相像。

这有可能成为进化论的一个潜在证据来源，对此达尔文首先将注意力集中于大陆板块上观察到的现象与预料结果总体相吻合这一点上。

在谈到地球表面生物的分布时，第一个使我们惊奇的重要事实就是，各地生

物的相似与否无法从气候和其他自然地理条件方面得到圆满的解释……凡是欧洲有的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相应地在美洲几乎都能找到……然而这种环境上的相似性并没有得到呼应……两地生物的相互差异是多么地巨大！（O 346—347）

其次，相似性似乎不是单纯以水平距离来划界的，而是也取决于是否有进化和分化中的生物类群难以逾越的障碍存在。换句话说，地理上的隔离越巨大，生物体的平均差异就越大。显然，大陆板块的分隔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广阔的水域形成了地理上的隔离。但从较小的范围来讲，甚至在一个大陆上，较小的障碍似乎也与相应的差异性有关系。

在巍峨连绵的山脉、大漠甚至是大河两边，我们可找到不同的生物……再看看海洋的情况，也可以发现同样的规律。中南美洲东西两岸的海洋生物差异非常巨大，甚至很少见到相同的鱼类、贝类或蟹类。而这些大的动物群只不过是被狭窄却不可逾越的巴拿马地峡所阻隔。（O 347—348）

最后一点，每个大的地理单元不仅有其特色物种，而且，每个地理单元内的同系物种之间，较其与别的地理单元中的同类成员之间，关系更近。新旧大陆上都有猴子，但新大陆的猴子之间比其与任何旧大陆的猴子更相像。

从以上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有某种深层生物联系存在于时空中，存在于同一地区的陆地和海洋中，而与地理条件无关……这种联系，用我的理论来解释，就是遗传。正如我们所确切知道的，单是遗传这一个因素，就足以形成十分相似的生物，或者是彼此十分相像的变种。（O 350）

然而，如果相对的相似性意味着它们有共同的祖先，那么巨大地理障碍的两边出现类似的生物，则意味着一些生物个体在某些时候肯定是能够越过这些障碍的。

达尔文认为大陆板块长久以来一直是以它们目前的形态存在着。而在20世纪我们已逐渐认识到：在远古的地质时代，各大陆是连接在

一起的，后来由于“大陆漂移”才分离形成现在的样子。事实上，大陆漂移学说确实解释了某些古老生物群的地理分布状况。但达尔文当时更关注距现在较近的那些演化时期。这样一来，他必须要证明还存在着其他可能的传播方式，使得生物能够在隔离的地区之间通行。

他通过实验确定陆上植物的种子经过长期的盐水浸泡后仍能存活，由此他可以推测一粒能生长发育的种子可以随洋流漂出多远。他援引了许多例证：沿河漂流的树桩上沾的土、鸟爪上沾的泥、鸟的嗉囊里携带的种子、冰山挟带泥土和其他陆上物质的远距离漂移等等。他还说明了陆上动物如何能够在盐水的浸泡里存活下来，比如蜗牛会在壳口处形成一层硬质的保护隔膜。淡水动物的扩散成为了一个特殊难题，但达尔文的实验也得出了他所需要的原理。他证明刚孵化出的淡水蜗牛能牢固地附着在鸭爪上存活“12到20小时；这样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只野鸭或苍鹭至少可以飞行六七百英里并降落在一个池塘或小河里，若是遇到顺风飞越海洋，则会到达一个海岛或是其他某个遥远的地方”（O 385）。

没有什么地方比海岛更能验证物种的传播、隔离以及选择。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生物如此奇特而富有启示性，以至于达尔文在《航海日志》中描述它们时几乎难以掩饰他的进化论观点。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而论，我们似乎都接近了一个重大的事实——新的生物在这块土地上是首次出现”（J 378）。这一点甚为重要。从地质学角度看，加拉帕戈斯群岛很明显是年代相对较近的火山活动的产物，然而，这些岛屿上却拥有许多这里特有的动植物种类，甚至一些物种是某个海岛所独有的。由于达尔文把不同岛上收集的一种鸟，即现在人们所熟知的“达尔文雀鸟”的所有标本混在了一起，他并未意识到这样的海岛成种现象有多普遍。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栖居着许多独特的物种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这些独特物种显然与达尔文在距此以东600英里处的最近大陆——南美洲次大陆上看到过的一些知名物种有密切关联。最后一点：各种动植物在岛上的呈现也很奇特。例如：岛上没有哺乳动物，没有树。正常情况下这些缺失种类应该占据的空间却被奇异的动植物变种多多少少地填充了，而后者在大

陆上亲缘最近的种群却过着全然不同的生活。类似的奇特现象也出现在其他海岛上，如夏威夷的蕨类植物长成了树；而在毛里求斯和新西兰，不会飞翔的巨鸟在罕有哺乳动物的地上吃草。

岛上生物的奇异特征创造论根本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海岛的这种孤立情形似乎正需要有创造力量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进化论则认为海岛上的栖息物种最初肯定来自别的地方。在达尔文看来，海岛上展示的似乎正是天然的进化实验的典型结果。如果最初的生物是从邻近大陆上随意挑选出来的，再经过偶然传播加以选择，得以移居到一片未被其他生物占据的土地上，又经过一定地质时期的演化，那么岛上所有的奇异反常现象就能解释得通了。对达尔文的论证而言，海岛的一大优点在于它们简化了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一片生长着各种生物的陆地上，某一群生物的进化命运基本上是无法预测的，因为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而在海岛上，因为栖息者数量少，有充裕的空生态位，竞争压力比陆地上显然要小许多。因此，对一个相对简单而能繁殖的环境来说，生物对其的适应这一共同问题在每个海岛上的表现都会稍有不同。从一定程度上说，海岛生物的进化是可以确定的，它的持续时间已知，进化方向可以预测。

动植物在时空中的分布当然是达尔文用来支持其进化论普遍原则的最有力证据。大量事实证据都能够被纳入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单一理论框架中去，这是任何创造论观点所无法做到的。在解决物种分类问题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样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为什么所有的生物会“在不同的程度上有些相像，因此可以根据相似程度的大小划分成不同的群，而且群下有群”？（O 411）

自然分类系统的古老概念意味着：如果“真正”的相似点和区别点能被确定出来，那么所有动植物就都可以被归入相应的位置。按照这种观点，分类不是随意的，而是预先规定好的。由于动植物的种类多种多样，呈现出许多相似点或不同点，着重点不同会导致归类方面的矛盾，因此探索自然系统的目的之一便是努力发现那些具有“分类价值”的关键点或单独的区别性特征，由此可建立一个明确的分类树，最终指向各个物种。这种分类通常是成功的，现在仍是很实用的分类

基础。达尔文却抨击这一传统理论，他不认为具有很高分类价值的性状能够被确定，就好像这些性状是独立于分类单元而真实存在似的。如果生物因遗传而彼此关联，那么一个具有分类价值的性状也只是一个性状，在选择作用下它的改变并不会那么明显以至于遗传下来的相似性会丢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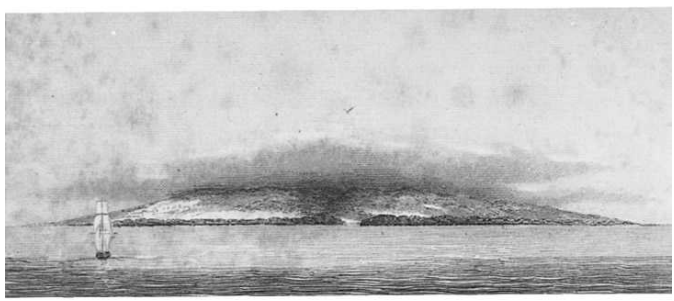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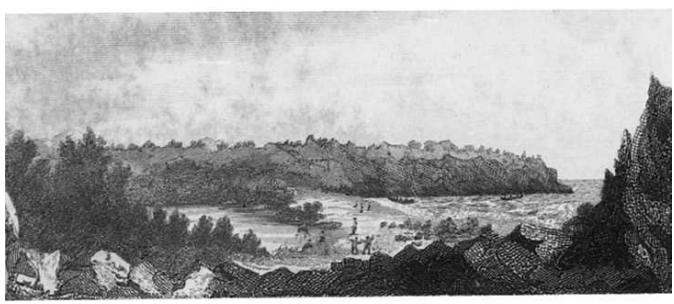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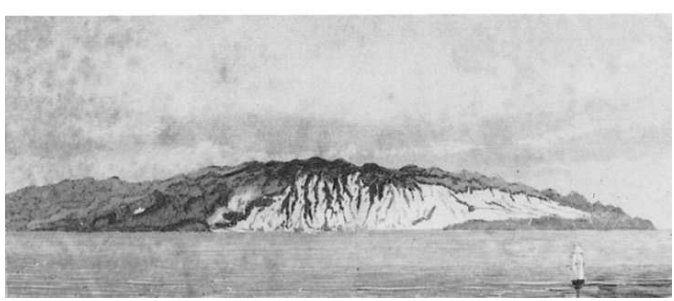

图5　达尔文着迷于海岛研究。由近代火山形成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植物群和动物群为达尔文的进化观点提供了一些启示。那里有许多不同寻常的物种，但

都与当地大陆上的物种相关联：即便在单个岛屿上都有独特的物种。“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而论，我们似乎都接近了一个重大事实——新的生物在这片土地上是首次出现。”当达尔文到来时，那里还有巨型龟。但后来大多数龟就被捕鲸者用棍棒打死了，他们把加拉帕戈斯群岛当作一个歇脚点。

既然分类法通常行之有效，也就出于方便而设了分类阶元：种、属、科、目和纲，这些高低层次本身并不反映现存生物界的任何实质性情况，虽然分类学家们渴望做到这一点。分类层级只能根据已有的知识状况以最简便的方式来设置和界定。

因此，尽管自然界有明显的分类秩序，但所有试图用一个与那些需要界定的生物比起来更严密而客观的体系来定义自然界的努力注定要失败。造物主的自然系统最终变成了一个描述性的过程，其仅有的分析内容是对此中包含的类群的定义。然而，自然类群是显然存在的且按层级排列的。进化论则直接预言类群有层级的排列是由共同祖先依次分化、不断演变的结果，其间伴有绝灭现象。它预言了这种排列，同时附带预言了想进行任何非随意性定义所面临的困难。主要生物类群不断分化出大量的亚类群。早期和中间过渡类型的绝灭使得各类群之间因巨大差异而明显区分开来，此差异程度是现存种类与共同祖先之间的漫长时间间隔以及分化速度发生作用的结果。既然变种分化会不断产生新物种，那么试图给物种本身下一个绝对定义肯定是行不通的。

在探寻有绝对分类价值的性状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规律。各器官，即结构组织之间的关系，比与功能相关联的结构在一般情况下能提供更多有用信息：适应了相似生活方式的两种生物必定表现出类似的性状。鸟类、蝙蝠和昆虫都会飞，都有翅膀，但作为一种分类性状，这种“可类比的”相似性显然没有用处。然而，从更深的结构组织层次上看，鸟类、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前肢在解剖特征上相似，因而尽管功能各异，但构成这些前肢的骨头被冠以同样的名称是可能的，也是多多少少可行的。这种结构上的相似关系，即“同源”结构，在胚胎或幼体阶段表现得特别明显，以至于瑞士籍美国解剖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1807—1873）“之前忘记了

在某种脊椎动物胚胎上贴标签……现在无法分清它是哺乳动物、鸟类还是爬行动物的胚胎”。胚胎特征似乎比其成体形态在确定生物分类位置时价值更大，因为成体形态可能会因适应某些偶然出现的异常环境而发生了很大变化。达尔文研究的藤壶在成年期变得如此特化，以至于在其变化没那么大、明显属甲壳类的幼虫被识别出来之前，根本看不出它是甲壳类动物。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生物是被分别独立创造出来的，为什么在早期发育阶段不像其后来那样个体特征鲜明而独特呢？达尔文把同源性和胚胎间的极大相似性看作是由进化进一步推测出的结果，因为可以区分任何两个同系物种的结构差异一定是由一个先前存在的物种经过一系列微小的变化而形成的。生物不断地适应环境，一个复杂且充满竞争的环境只允许现有结构发生微小的变化。正如达尔文所认识到的，尽管引起适应性结构或习性发生轻微调整的构造变异贯穿个体的整个发育过程，但它表现得并不是十分明显，一直到了相关的阶段才会有所显现。对于像哺乳动物这样的生物而言，它们的早期发育阶段大多不会受到太多环境变化的影响，适应性变化主要累积发生在成体阶段，而在更早的发育阶段虽然会有但很不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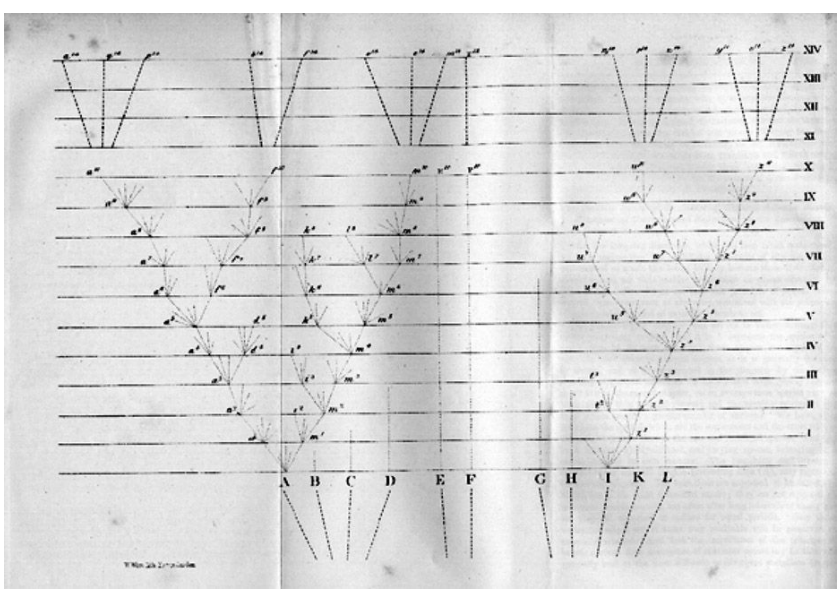

图6　第三章自然选择学说示意图的最终版本，也是《物种起源》中的唯一插图。该图描述了古代世系A—L从古（底部）到今（顶端）的演化。在每个阶段（罗马数字所示），一个物种要么保持不变，要么分化成新种，或者走向绝灭。注意：所有现代种类都起源于世系A和I，只有F例外，它把基本未变的形态遗传至今，成为“活化石”，其他世系都已绝灭。

然而，如果选择有助于生物在早期发育阶段作出针对外界环境的高度适应性变异，那么这个变异的发生基本上是没有障碍的。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许多生物的幼虫阶段在功能构造上完全不同于成体阶段，它们在该物种的生命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毛虫和蝴蝶就是很好的例证。除了最普通意义上的发育，让达尔文不解的是，发育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对变异有着强烈的抵制，就像一个物种对其环境的适应既复杂又相互作用，一般情况下不能承受剧烈变化。因此，一个新的变异要经受选择作用的考验，不仅体现在它对成体结构的影响方面，甚至更体现在其保证胚胎有序发育的能力方面。由于胚胎生命形式的发育过程是依次进行的，变异在胚胎生命中发生得越早，则它对发育的影响就越强。因此胚胎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其发育模式在庞大的生物类群内会高度一致。同源现象或相似结构则反映了这种保守性，所以达尔文认为同源相似性说明了共同祖先的存在，这无疑是正确的。

虽然《物种起源》的主要观点很容易表述，但这样的概述并不能展现其整个内容的智慧精华。在达尔文之前生物树状排列的概念已普遍流行，达尔文发展了这一比喻：用谱系概念来说明由历时遗传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的生物变异和绝灭之间的关系，这一发展将可以概括《物种起源》的主要结论：

同一纲内所有生物间的亲缘关系，有时可以用一棵大树来表示。我认为这个比喻可基本反映实际情况。绿色的发芽小枝可以代表现存的物种；此前每年长出的那些枝条相当于长期以来相继绝灭的物种。每一生长期内，所有发育的枝条都竭力向各个方向生长延伸，去遮盖周围的枝条并致使它们枯萎，这就像物种和种群在更大规模的生存斗争中竭力去征服其他物种的情形是一样的。当大树还只是一棵小树时，现在的主枝曾是生芽的小枝，后来主枝分出大枝，大枝再分出更小

一些的枝，这种由分枝的枝条联系起来的旧芽和新芽的关系，可以很好地代表所有已灭绝的和现存的物种在隶属类群中的分类关系。当大树还十分矮小时，它有许多茂盛的小枝条，其中只有两三枝长成了主枝干，它们得以存活下来并支撑着其他的枝条；物种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些久远的地质年代里生存的物种中，到现在仍有活着的变异后代的，确实寥寥无几。从小树开始生长时起，许多主枝、大枝都已经枯朽而且脱落了；这些枯死了的、大小不等的枝条，可以代表现今没有遗留下存活的后代、而仅有化石可以考证的灭绝物种的整个目、科和属。正如我们时常所看到的那样，一根细小而无序的枝条从大树根部蔓生出来，并且由于某种有利条件的存在，至今枝端还活着，这就像我们偶然看到的如鸭嘴兽或肺鱼之类的动物一样，它们通过亲缘关系，以微弱的关联把两支大的生物分支联系起来。显然，它们是由于生活在受庇护的场所，才得以避开激烈的生存斗争存活下来。一些枝芽生长后又会冒出新芽，这些新芽如果健壮，就会抽出枝条遮盖和压倒四周许多较弱的枝条。所以我认为，代代相传的巨大生命之树也是如此，它用枯枝落叶去填充地壳，而用不断新长出的美丽枝条去覆盖大地。（O 129—130）

第五章

性、变异和遗传

达尔文从1837年起就非常确信有性繁殖或异体受精在进化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关于有性繁殖过程他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有性繁殖不同于其他繁殖模式，诸如原始生物的简单分裂，或许多植物和较低等动物的芽殖，它实际上是个体变异的前提。有性繁殖产生的后代，无论差异多么微小，总与亲代不同，而无性繁殖几乎总是只产生复制品。其次，有性繁殖不同于其他繁殖机理，它是动植物的一个普遍属性。

在达尔文的笔记里可以看出这两个结论是有关进化过程的一个推理论证的组成部分。变异是自然选择进化的必要条件，而有性繁殖是变异的必要条件，因此有性繁殖也是自然选择进化的必要条件。既然只有那些能进化的生物得以存留，因此所有生物必须参与有性繁殖。

这一论证在《物种起源》里并没有深入到这一步，或许部分原因是达尔文未弄明白为什么变异与有性繁殖相关。此外，有性繁殖的另一个看似与此矛盾对立的特性是：它有助于保持物种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有性繁殖使得个体变异在杂交群体中分散开来，确保物种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同时仍以适当的速率进化着，以便适应个体自然发展和地质变化的缓慢过程。达尔文把进化看作是一个过程，它影响构造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的一群个体：严格讲，发生进化的不是个体而是种群。没有性的话，“有多少个体，就有多少物种”。

除了认识到有性繁殖在进化中起某种关键作用，达尔文对有性生殖生物学的贡献也是极其卓越的。并不难看出有性繁殖这一问题为何如此重要，因为繁殖过程是联系所有生物的纽带。但对达尔文来讲，有性生殖生物学的另外一方面有重要论辩价值。创造论者可以用目的论来解释动植物成体系有序存在的大多数现象，并且同理亦可解释性器官和性行为。但达尔文提出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有性繁殖的目的是什么？既然还有其他可能的繁殖方式，为什么有性繁殖成为了普遍的繁殖方式？唯一的答案似乎是有性繁殖的目的是为了进化。

达尔文深信由于某种原因，有性繁殖确是进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于是他研究了雌雄同体现象，希望能够发现自体受精即使有机会也绝

不会排除异体受精。尽管大多数植物和许多低等动物功能上是雌雄同体的，但是当机会来临时，它们几乎都表现出了对异体受精的适应性。在一系列重要著作中，达尔文探索了开花植物的性机理演化问题。达尔文比任何人更有资格得出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结论：花朵是确保植物能通过昆虫实现异体受精的构造。达尔文详细分析了兰花对昆虫授粉所作出的惊人的适应，发现了能证明异体受精对生物普遍具有重要意义的鲜活证据。

> 最后，如果我们考虑到植物的花粉是多么宝贵，还有我们如何精心地呵护兰花以及与兰花相关的附属器官，……自体受精比起昆虫在花间传递花粉本来会安全和容易得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自然是要明确告诉我们：她痛恨永久的自体受精。（F 293）

为了解释异体受精的必要性，达尔文开始了长期的系列实验，研究异体和自体受精对植物的影响。他发现自体受精经常会产生一些缺乏活力、颗粒偏小、繁殖能力低下的种子。许多显然可以进行自体受精的植物，却完全是自体不育的。他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如常见的樱草花等物种从结构上可区分为不同类群，相互间能够自由地异体受精，然而在一个类群内则几乎甚至是完全不育。事实上，达尔文很难解释这些现象的因果关系。表面上看，由于自体受精会产生明显不利的结果，异体受精得以演化似乎合乎情理，达尔文的确在好几处都提到这个观点，但他显然也意识到自体受精和异体受精可能有一个共同原因，他隐约认识到这个共同的“最终原因”可以解释有性繁殖这一普遍现象。

现代进化研究仍然很难解决性机理进化的问题。达尔文没有解决而是提出了这个基本难题，该问题直到现在仍未得到解决，即怎样协调这两种现象：通过自体受精或通过单性生殖等某种无性过程繁殖后代，对个体当下明显有利，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一优势几乎总是会让位于有性繁殖过程而不能发挥出来。

自然选择进化论认为：机体结构的各个细节要受到适应性的检

验，适应性唯一的检验标准是看繁殖是否成功。因此，繁殖本身直接成为了目的。认识到这一点，达尔文也意识到了雌雄异体动物物种结构分化的重要性，这些结构的功能似乎仅限于成功交配，而不受其他选择压力的影响。拥有这些结构的动物“雌雄两体一般有相同的生活习性，但在身体构造、颜色或装饰上有所不同……”（O 89）。依据自然选择的观点，在雌雄异体的物种中，唯一必要的雌雄差异是那些与繁殖过程本身的需要直接相关的差异。然而，许多动物的雌雄差别显然远远超出这一最低基本限度。达尔文用“性选择”来解释这种现象：“这并不取决于生存斗争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同一物种的雄性间为了获得雌性配偶而发生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不会让战败的一方死掉，而会使其少留或不留后代”（O 88）。因为“在世代遗传中，一些雄性个体就获得了一些微弱优势，拥有了稍优越于其他雄性的攻击武器、防御手段或魅力等，它们将这些优势遗传给它们的雄性后代，性差异也就产生了”（O 89—90）。

性选择影响结构或习性，这个例证是对人工选择这一论据的补充。在人工选择中，人是选择者，而自然选择中，“优势条件”起选择作用。在性选择中，仅雄性或雌性作出选择。这也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反复强调的可以证明下述原理的极端例子：决定生存斗争结果的因素中，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外界的自然条件更重要。既然异性的成员构成了环境中影响进化的最重要资源，那么生殖竞争应该极具影响力。

性选择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现象，因为性征是适应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涉及进化过程本身。既然选择作用只能通过繁殖成功或失败作用于个体和物种，那么性表现的各方面都要接受严格的选择。根据某种明显的外在条件，例如食肉动物应具有牙齿和爪子，并不一定能预测这种选择作用于外观或习性后的结果。因此创造论者只能辩称：鲜明的性征要么是造物主的创新，要么就只是为了取悦人类。达尔文不必费心与其直接争辩，因为性选择理论在《物种起源》论战基本获胜之后已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但毫无疑问，达尔文坚持认为把一些性状的存在简单地看作只是为了美观而没有其他原因的观点，忽视了这个

美观性状对同一物种的其他生物所造成的明显影响。

性选择的许多现象似乎可以从非人动物对美的欣赏这个角度得到最好的阐释。如果对美的欣赏能促使动物衍化出性征方面的装饰，那么就可以认为类似的情况也在人类身上发生过。事实上，整个性选择的论证在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870）一书中占了巨大篇幅，它也成为了一个更宏大论证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使是人类最独特的特质也可在其他动物身上找到相似之处。

可遗传性变异是进化的必要条件。因为生物彼此间存在差异，所以选择不是随机的，而变异是可遗传的，因此生物种群会在代代延续中发生改变。19世纪中期，还没有科学的变异理论，达尔文不得不去寻找某些可以作为一般规律的结论，倒不一定非要探索出变异的机理或对变异原理进行正式描述。达尔文始终坚持认为变异本身不能作为进化的直接推动力，这或许是他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正是这一主张引发了物理学家约翰·赫谢尔爵士（Sir John Herschel）对《物种起源》的猛烈批评，他将其视为“乱七八糟的法则”：也正是这一主张拒绝承认有任何创造者存在，也否认了进化过程中目的的存在。

达尔文相信变异是由某种原因引起的，而非上帝赋予的，这个信念对其变异观点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行有性繁殖的生物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异。然而，在其成熟的著作里，达尔文明确地试图放弃变异是繁殖过程中所固有的这一观点，他似乎觉得这是一个不科学的、几乎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正如本章开始所强调的，他很清楚繁殖和变异存在关联，但他关于二者关系的看法似乎可以最恰当地表述为：有性繁殖过程使变异的原因变得显明，但它本身并不是变异的原因。

达尔文的立场与他对待生物界每种现象时所持的坚定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完全一致。如果变异是没有原因的，那它们就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达尔文从来不认为他的哪个公理性结论是不能考证的，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允许无原因的变异存在可能会省去好多麻烦。在对遗传和变异的生理基础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达尔文在对变异进行总结归纳时援引了“外在生存环境”的积极作用作为一种动因。至于他到底是如何看待这种因果关系的，有很多的讨论，但很明显他认为生物环境

的异质性，不论差异多么细微，也是变异产生的一个必要原因：

> 每一种变异都是由变化了的生存环境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或者，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如果有可能把一个物种代代延续下来的所有个体都放在绝对一致的生存条件下的话，就不会有变异发生。（V ii.255）

这是达尔文大胆作出的为数不多的重要推断之一，现在证明肯定是错误的。可变性是生物的固有特性，尽管它不是无原因的。然而，围绕达尔文“变化了的环境”这一观点的关键问题是：变化的性质或方向与相应的变异结果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预测。如果外在环境的变化有利于适应性变异，也就是说能让生物更好地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环境和个体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建设性的，它代替自然选择成为引起适应性变化的主要原因。这种“建设性”变异理论曾是伊拉斯谟·达尔文和拉马克“哲学”进化论的中心思想。另一种情况是，环境变化只是引发变异，而变异方向却不可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对偶然的适应性变异的自然选择是引起适应性变化的原因。毫无疑问，在达尔文看来，当时的证据倾向于表明“环境条件”对变异的影响是不可预测的，并且自然选择在决定进化方向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达尔文当然也承认环境对变异有可能产生建设性影响，在《物种起源》后来的版本中，他还增添了一部分新的内容，论述习性和器官的使用与废弃所产生的遗传影响。

在后来的著作中，对于变异的本质；达尔文的观点与以前有了出入，这是因为他急于为遗传和变异的关系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遗传是指生物的性状从一代传到下一代，而变异是指在遗传过程中出现的“差错”，而这差错正如一再强调的那样，他认为是由环境变化引起的。为了得出环境作用对生物发展的作用与性状遗传之间的一个因果关系，达尔文提出了“临时性的泛生假说”。该假说认为决定向后代遗传哪些特征的生物生殖系统的性质是由它从身体组织中提取特有元素（达尔文称之为胚芽）的能力决定的，每个胚芽都以一种浓缩的或隐蔽的形式代表着原组织与众不同的特性。发育是亲体干细胞所遗传给

子代的胚芽有序聚集和展现的过程。如果环境能影响发育，比方说，由于频繁的使用而使某器官变大，那么由那个器官传送到生殖系统的胚芽数量或许还有质量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环境引起的结构变化会趋向于被遗传下去。达尔文甚至还准备把这个推论扩展到行为方面，因为他认为行为是动物身体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因而与身体结构一样遵循相同的规律。因此，后天习得的行为能够得以遗传，且似乎成为了后代的本能行为。

泛生假说存在许多缺陷。它所援引的支持其论点的大多数“事实”，特别是那些用来说明器官使用与废弃的遗传效应的现象，是基于错误的观察；那个时代对受精作用的基本过程普遍都不了解，甚至不知道组织是由细胞构成，因而使得泛生论的概念基础存在明显缺陷。生殖细胞是生物个体胚芽的“浓缩体”，通过受精过程传给新的个体，新个体的性状融合了双亲的特点。这个新个体体内含有“杂交”胚芽，正是它们控制着杂交个体中间性状的形成。然而，达尔文清楚地意识到，遗传的结果并不一定总是双亲性状的混合，而经常是一方的特性占据优势。有时，来自共同祖先、经过许多代分隔后的两个个体杂交后，明显的“祖先”特征会意外地显现出来。“返祖”现象是达尔文所收集到的、用以支持下面论点的部分证据：即使是那些经过了奇特改良而有了极大差异的家鸽品种也都源自野生岩鸽。尽管达尔文为了解释这些现象随即改进了这个假说，但泛生论基本上是一个“混合”遗传理论，照此理论，个体的新奇变异在与正常个体杂交后趋向消失。这样一来它就与达尔文的成熟观点严格保持了一致，即认为有性繁殖过程本质上是保守的，有助于维持物种性状，而不是促进多样性的持续存在或传播。

泛生论不能完成达尔文早期思想对变异和遗传理论提出的任务要求，体现在它的两个最基本特质上。第一，根据泛生论，变异只能是由于个体对环境刺激作出的适应性反应而引起。其次，它无法解释杂交品种的性状不融合或返祖现象。因此，即使依据达尔文自己的标准，这也是一个相当糟糕的假说，连他最坚定的支持者赫胥黎也对此极其不满。

如果达尔文没发表泛生论，他的名声肯定会更好一些。由于似乎排除了变异的偶然性，泛生论削弱了选择在适应过程中的建设性作用，从而为许多后达尔文主义者提供了机会，他们企图将进化视作一个有方向的或已确定好的变化过程，这又让“伟大设计者”趁机而入。然而，每当达尔文综合考虑到自然选择学说时，无论他多么偏爱他的这个理论（他曾把它称为“我的爱子”），他仍赞成变异的偶然性。在泛生假说刚形成时，达尔文用一个比喻完全否定了环境和变异之间积极的相互作用。

> 尽管每一次变异都一定有其令人激动的恰当原因，尽管每一次变异都受到法则的约束，然而我们很少能追寻到其间准确的因果关系。于是我们谈到变异时就好像它是自发产生的。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们是偶然发生的。但这仅限于在特定意义上，就如同我们说一块从高处掉下来的碎石最后会是什么形状完全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一样。（V ii.420）

泛生论的重要和独到之处是它集中阐述了代与代之间物质联系的本质。它坚持认为一定存在这样一种联系，其属性将会使遗传和变异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之答案变得清晰起来，只有从这种物质角度出发才能解决进化的机制问题。

如今，进化的基本机制问题已大致得到解决，正如达尔文所猜想的那样，问题的解决来自于对代与代之间物质联系的研究。基因物质DNA的属性决定了现在可以把自然选择进化过程看作是按一定方式排列形成的物质的一种必要属性。著名的DNA双螺旋结构在1953年由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破译提出，它既可以携带遗传信息，又可以自我复制并高度精确地复制所携带的信息，但不一定完全准确。这样一来，在一种纯粹的化学物质里就包含了达尔文进化机制所需的三个条件：由精确自我复制而产生遗传、因自我复制而数量倍增以及由于极少数的不准确复制而产生变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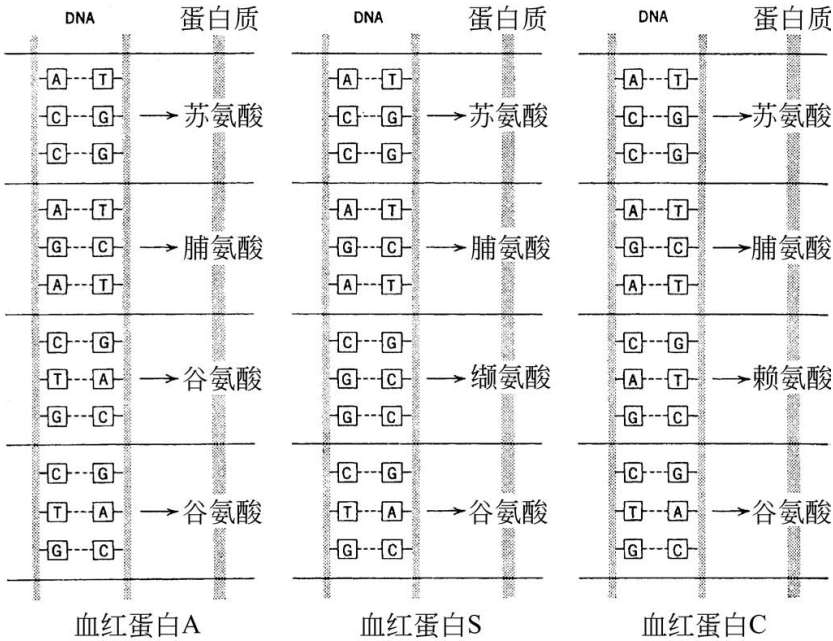

图7　一种不为人熟悉的DNA双螺旋结构图。该图是克里斯琴·安芬森（Christian Anfinsen）1959年发表的，显示了编码血球蛋白的DNA双链的一个小片段。其中一对核苷的突变使得氨基酸谷氨酸被缬氨酸或赖氨酸取代。这种变化改变了蛋白质功能而导致疾病发生。核苷三联体密码与氨基酸之间的联系准确但随意，就像达尔文竭力在其碎石比喻里描述的变异特性那样。

在此我们并不需要关注基因在生物体中是如何得以准确复制并且发挥作用的。然而，有意思的是，联系到达尔文对变异本质的见解，DNA复制错误竟恰好准确地呼应了前面引用的碎石比喻。DNA携带遗传信息，是指精子和卵子携带的DNA的精确化学结构决定了生物的生长发育方向。然而，与达尔文的胚芽概念不同，DNA并不代表浓缩后的发育特征。DNA仅携带发育的化学密码指令，但密码形式与它所代表的发育“含义”之间的联系却是很随意的，正如一个单词的形式与其意思是随性地联系在一起一样。如果把单词里的一个字母随意变换一下，单词的意思就可能发生变化，或者这个新词可能都没有意义。DNA也是如此。控制发育过程的密码指令形式，正如书写的单词一样，在复制时可能会出错。选择是通过生物的成功繁殖来进行，并不

直接作用于它的DNA。如果由于密码指令中的偶然化学变化而形成的DNA变体形式改变了发育过程，使得变异生物在生殖方面更具优势，那么新的DNA指令就会逐渐在种群中传播，替代其处于劣势的前辈。这可以称作是进化的基因学观点，依据这个观点，生物，即发育过程产生的结果，多多少少都被看作是成功地进行了DNA复制。

因为DNA以化学密码形式携带遗传信息，如果我们想确定某一变异的原因，考查解码后的信息，如已经长成的生物结构，是无用的。因为DNA指令和发育过程间是纯粹形式化或随机性的关联，环境影响可能会改变发育结果，但却无法以任何可预测的、与环境适应相关的方式改变DNA密码指令。现在还没有什么已知的或能想象出来的化学途径，能让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对生长发育产生的结果通过这个途径引起DNA密码指令发生建设性的，即适应性的变化。

达尔文不能找到变异起源准确的因果关系，这一点不足为奇。通过解码系统把基因信息与发育过程分开，这使得变异确实像是“自发”或“偶然”出现的，而与任何明显的诱因不相干。由于DNA的化学不稳定性而造成的遗传性变异，必定是发生在对其能否完全适应生殖活动的验证之前。生物生存的环境在进化中只起纯粹的选择作用。如果它看似具有建设性，那仅仅是因为它在所有变异体中选择了适应性好的变体而已。

认识到了DNA分子在生物进化中的责任意义，那么所有生物有一个共同起源似乎就是肯定的而并非只是可能的。不仅所有生物，从最原始的细菌到最高等的人类，都是用同样物质维持生命的延续，而且它们还用同样的基因密码将遗传信息转化成一个适应性的发育过程。既然基因密码是随意的，且就目前所知，绝对不受化学特性的限制，那么其普遍性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它只进化了一次。

很明显，如果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最终取决于化学物质DNA的属性，那生命起源就不会引发什么特殊的概念问题。达尔文本人也愿意承认生命可通过能为人们所理解的化学过程逐渐从非生命形式中生成并显现。

如果（哦！一个大大的“如果”）我们能设想在一个有着各种氨、磷盐、光、热和电等物质的温暖的小池塘里，由化学过程形成的蛋白质化合物正准备经历更为复杂的变化……（L iii.18）

第六章

人类

有时人们会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回避了人类进化问题。但《物种起源》的核心论证很明显是源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它阐述了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规律。而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对该问题涉及太多于论辩并无益。《物种起源》中大多数谈到人的地方主要与遗传、变异或同源结构问题有关。达尔文也用人类行为为例来说明动物普遍行为的一些方面，然而关于进化理论对人类更高级智能的起源有什么更重要的暗示，他则很少评论。“心理学将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稳固发展起来：即智力和心理能力的发展都是分阶段逐渐获得的。人类起源及其历史将会变得明朗化。”（O 488）

1863年，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一书出版，人与高级猿类之间有密切亲缘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得到有效论证。同年，赖尔的《人类的远古性》无可争辩地说明了人类起源问题应从地质时期而非历史时间中考量。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1871）中对一系列将人类纳入总的进化体系的观点进行了概括总结。人类在无数细小性状上都受可遗传变异的影响，其繁殖能力常常超出环境对其后代的容纳力，因此，人类必定受到自然选择的制约。像其他许多变种甚多的物种一样，人类在不同的地理分隔区域内也形成了不同的变异类型或种族。（当时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有着明显差异的种族是不同的物种：“白人自贬人格，让黑人沦为自己的奴隶，他们难道不是常希望把黑人当作另类动物来对待吗？”达尔文谴责这是一种无知的自私自利思想。）在身体构造方面，人与其他动物有着同样的结构基础；智力上，“人与较低等的动物尽管在程度上有巨大差异，但本质上并没有不同。而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有多大，都不能说明我们应该将人类单独放入一个不同的界别中……”（D i.186）

因此，必须把人类看作是一种动物，只不过在许多方面甚为独特、与众不同，但并非本质上的独特或截然不同，即使在智力方面也是如此，就像蚂蚁、蜜蜂与其他行为不那么复杂也不很引人注意的昆虫相比是一样的。独特性本身就是进化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过渡物

种的绝灭使我们注定无法观察到物种间完整的连续性，化石记录对人类起源的证据价值不可能比对其他任何物种的证据价值更多。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大批人类化石有可能代表了由一种绝灭猿类向人类演化的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类型，但它们在1871年时还不为人所知。达尔文认为人们将很难发现这些化石材料，因为类人猿状态下的人类演化是局部发生的，它的广泛扩散发生在人的典型特征演化完成之后。前面解释过年代较近的化石与其现生近亲在空间位置上相近，达尔文以此观点作为一种预测依据，正确地推测出非洲将会出现猿和人最早祖先的化石，因为人最近的现生近亲——大猩猩和黑猩猩——是非洲物种。最终由于只在最近的化石层中发现了人类遗骸，达尔文便得出结论：人类进化的发生距今年代较近，而且异常迅速，中间过渡类型被比他们更成功的近亲替代而快速消亡了，因而使现代人与他最近的现生近亲之间的明显差别进一步扩大。

虽然在达尔文之前的推理进化论者已对人类身体结构的演化提出了许多独特观点，但达尔文对人类已绝灭类人猿祖先如何演变成人这个过程的推测是他所构想复原的进化趋势中最富有想象力的。正如所有的进化复原理论那样，它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种看似合理的推测而没有实际证据来加以证实。在这个及其他相互关联的进化过程的复原中，达尔文的目的正是要表明如何通过可能的中间类型将看似无法连续起来的种类联系起来。要得出一个合理的进化复原构想，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过渡路径是什么？其次，为什么会遵循这样的路径？相比前者，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更多地要靠猜测。它要依靠对某种过渡变异之优势的识别或者假想自然表面出现某种裂隙，使得一个演化着的类群通过适当改变能够嵌入其中。然而，如果认可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作为确定的和唯一的机制，生物由此而获得各自的特殊性状，那么一连串的优势性状必定会促使一系列的演变发生。

由于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或者由于当地的生存条件发生了改变，灵长类系列中的某一古代成员逐渐离开树上，更多地在地上生活，这样一来它惯常的行进方式就随之发生改变；这种情况下，它要么成为完全的四足动物，要么成为两足

动物……只有人变成了两足动物；我认为，我们可以部分地了解他是如何学会直立行走的，这是人与其最近的近亲间明显的差别之一。如果不使用手，他就根本无法获得目前在地球上的统治地位，他的双手适应性之强令人称奇，完全能遵从其意志行事……但是，若双手和双臂依然习惯于惯常的行走姿势的话，它们就几乎不可能变得如此完善以至于能制造武器或用石头和投枪准确地投中目标。……如此粗蛮地使用手臂行走，还会使触觉变钝，而手和臂的灵巧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触觉。即使仅仅出于这些原因，变成两足动物对人类也是有利的；不过，双臂和整个上半身的自由活动对许多动作来说乃是非常必要的；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双脚稳固地站立住。为了获得这个巨大优势，他的双脚变平了，而且大脚趾发生了特殊的改变，尽管这使他双脚几乎完全失去了抓握的能力……毫无疑问，对人类而言这确是一大优势，用脚稳固地站立以及手与臂的自由活动使得他在生存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因此，我看不出为什么变得愈来愈直立或越来越像两足动物对人类祖先不是极其有利的。（D i.140—142）

达尔文将这种颇为合理的复原构想继续延伸扩展到其他方面，如直立姿势和脑体积变大对头骨结构、面部形态、齿列、脊柱弯曲、骨盆加阔等的影响。

这类复原重构观点并不意味着有一种超越了即时可见的好处的、迫切的外部需求导向存在，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在这一时期也同时发现了自然选择进化原理的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却无法接受下面这一观点，即人类各阶段的进化可能仅仅是因为要适应自然环境的迫切要求。他认为，人类的进化要比实际需要的完善许多，尤其是在智力上远超出了自然选择可能的要求；“有一种更高智慧指导人类朝着一个确定的方向发展，而且是有着特殊目的的，正如人类引导了许多动植物的发育方向一样。”

达尔文对引入这种“更高智慧”所作出的反应是，他坚持认为由诸多可以理解的、即便不为人们所确知的原因所引起的选择行为是没有任何限度的。显然，人类的物质和文化发明应归功于其高超的智力水平，这些发明使其成为了

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具优势的动物……处于最野蛮状况下的人类仅凭借这几项发明便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而这几项发明乃是人类观察、记忆、好奇、想

象和推理等能力发展的直接结果。因此，我无法理解华莱士先生为什么认为“自然选择只能把略优于猿类的大脑赋予未开化的野蛮人”。（D i.136—138）

人类高级智能的演化引起了语义学和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但达尔文发现比较法在一定条件下同样也可以应用于心智方面，该方法曾成功地解释了一些争议不是那么大但却同样复杂的进化过程。早在1838年他就意识到：如果只集中探讨人类思维的主观方面，势必会将讨论内容完全局限在人类的范畴里，而将动物中的任何类似情形排除在外，对其一无所知。“全都成了中心，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无周围一说了！！”（T ii.109）研究“周围”指的是探讨动物的行为，从动物的行为类推以重新描述人类的行为：“人类起源证实了——形而上学一定会蓬勃发展——了解狒狒的人会比洛克在形而上学上走得更远。”（M 281）

这牵涉到进一步研究探索将通常用来表述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语言合理延伸以解释在具体情况下似乎可与人类行为相类比的动物行为，人的行为通常伴随这类精神活动。只要这些延伸看上去合乎情理，那它们就可以作为证据支持动物和人的智能之间有连续性这一观点。如果一只狗在受到棍棒威胁时好像表现出“害怕”的样子这种说法是合理的，那么“会害怕”就可以被正当合理地扩展推及到所有狗身上。此种延伸只是表明在某种情形下动物与人的行为相似，从逻辑上来说，这就好比一个胆怯的人受到类似威胁而表现出害怕，而他害怕的心理状态我们不是通过语言来核实的。“忘掉对语言的使用，只根据你看到的来判断”（M 296）。达尔文的形而上学比较观用纯粹的本义上的拟人法来解释其他动物的精神活动。的确，“证实了人与动物的身体本质上是同属一类后：考虑其精神活动问题几乎有点多余”（T iv.163）。形而上学地反对把人的心智能力推及动物身上，在达尔文看来就是“狂妄自大”。

达尔文的拟人观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同时也有人为之辩护，把它当作一个恰当而现成的比喻。这种攻击和辩护肯定都是不恰当的。达尔文的整个观点是要表明：人与动物的行为有同源相似性，若黑猩

猩的前肢末端结构可以被称为手，那高级哺乳动物流露出恐惧、欢乐的表情以及显示出推理能力也同样不足为奇，它们只是程度上有差异而非本质上不同。动物界存在一种连续性的“思维能力”，达尔文认为它是伴随有组织的神经系统的出现而出现的，如此一来，“人与动物之间的智力差别并非如此之大，远不如没有思想的生物（如植物）和有思想的生物（如动物）之间的差别那样大”（T i.66）。

这种“思维能力”在动物界有多种表现形式。有些行为如本能行为，似乎特别适用于动物，另一些如推理能力或良心，尤其适用于人。不过，达尔文的成就之一就是说明了此类概念之间的界线是多么模糊：

> 我不想给本能下任何定义，而要证明这一术语通常包含若干不同的心理活动会相对容易一些。当说到本能驱使杜鹃迁徙，并把卵产在其他鸟类的巢内时，谁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一种行为，我们人需要有经验才能完成，而由一种动物，尤其是缺乏经验的幼小动物就能完成，并且在不知道为了什么目的的情况下许多个体都能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完成时，这样的行为一般被称为是本能性的。但我可以证明，本能的这些特征无一具有普遍性。正如皮耶尔·休伯（Pierre Huber）所说，少许的推理和判断常会参与其中发挥作用，即使自然体系中的低级动物也是如此。（O 207—208）

由于越来越多的判断和推理的干扰，用“本能”这个术语来描述高级动物的复杂行为则变得愈加困难：

> 东印度群岛的猩猩及非洲的黑猩猩，构筑平台作为住所；由于二者都遵循同样的习性，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出于本能，但我们却无法确定，这不是由于两种动物具有相似的需要和相似的推理能力而造成的结果。（D i.36）

对人类而言，“本能”这个术语常用于描述婴儿的行为以及那些不自觉的动作，特别是与知觉和情感相伴的不自觉动作。新生儿的吮吸、愤怒的号哭、恐惧的叫喊都容易被认可是人的本能行为，而无论是细节还是情境上都类似的行为也可以在较高级动物身上找到。在

《人和动物的表情》（1872）一书中，达尔文指出：高度社会化的鸟类和哺乳动物通过多种方式表达恐惧、快乐、性欲、惊慌和友爱。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通常用面部表情如皱眉或怒吼来表达情感，有时还辅以额外的动作来强调和凸显此类情绪信号。通过集中探讨婴儿行为以及蒙昧和文明状态下人类的普遍表达行为，大致是可以将先天的情感表达方式跟纯粹的习惯性表情特征区分开的。一些普遍的情感表达方式是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这突现了共同生理基础的存在，削弱了“个体独有的”能力在决定人际关系的某些特征时的作用。最后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达尔文指出了简单程式化表情的有用性。它们不仅只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而且还把有关一个人心理状态的信息传递给另一个人，不仅对表达者产生影响，也会影响接受方。

图8　在他的开创性著作《人和动物的表情》（1872）中，达尔文用了一些照片

作例证来说明问题，其中许多照片是他为此而特地委托别人拍的。他意在说明面部情绪表达的程式化特征。“总体上承认所有动物的结构和习性是逐渐演化而来的人，都将会以一种全新而有趣的视角来审视整个表情问题。”

达尔文的人类生物学最显著的特点是，他认识到社会化在人类进化中的绝顶重要性，这一考虑使他避免了像华莱士及其他人一样不得不求助于一种神秘力量，而这种求助本身就很无力。正是这条主线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把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主题——人类的起源和本质与性选择——联系了起来，因为一个物种的两性组织是其社会组织的必要构成部分。与亲代和子代之间、雄性和雌性之间、雄性和雄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伴的行为方式像其他许多性状一样，会受到有差异的生殖作用影响而进化，正如非社会化的体质或行为特征一样。在《人类的由来》中，性竞争和性选择被用来解释人类的某些体质特性，因为这些特征似乎没有直接地增强其生物学上的总体优势。相较于类人猿，人类普遍缺乏体毛，而且男女体毛分布有差异，达尔文把这归因于性偏好。显著的种族差异经常在性别差异特征中有所体现，如在体毛分布或者男女相对身高方面。最终他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的性偏好及对异性美的看法是多变的，但在特定的人群中相当稳定，这使得原始人在各大洲的扩散中外在的人种特征会有所改变。

在那个时期，人类一些习惯行为上的差异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了解。关于性行为在人种形成中的作用，达尔文的观点是相对局限的，但他并没有对其加以扩展，对决定部落、社会或家庭具体结构的生物特性进行凭空推测。合理地解释诸如语言、天分、美感、道德及宗教意识等复杂智能活动的演化过程显得更加重要，似乎正是这些特质把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达尔文把与上述智能活动相关的行为和语言看作是有用功能，它们在人类中是高度发达的，但却根源于人类之前的动物行为。的确，经过一系列方言变化的语言演化、语言的连续性、地区差异性、古老形式的变化、原初痕迹以及语言对交流功能的适应性改变等等都是19世纪早期的流行话题。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多次用语言演化作比喻来说明生物的进化过程。

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很自然地与那些认为语言起源于声音的原始表达功能的语文学家站在一起：

> 我不怀疑语言是起源于对各种自然声音、其他动物叫声以及人类自己的本能呼喊的模仿及修正，并辅以示意动作和手势……从一个广泛适用的类推中，我们可以断定：这种能力的运用在两性求偶期间一定特别突出，它可以表达各种情感，如爱慕、嫉妒及胜利时的喜悦，还可以用来向情敌发出挑战。对有节奏叫喊声的清楚模仿可能促成了表达各种复杂情感的词汇的出现。（D i.56）

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作为人类至高社会属性的语言，起源于由性关系引起的社会性。

达尔文把人类的语言天赋与人类非凡的推理能力或智力联系了起来。他把人类能形成新奇联想的能力看作是一种更复杂的能力，它替代了那种相对固定和确定的本能行为。人类真正的本能行为明显比其近亲要少而简单。人类的语言能力是一种先天的、极其独特的适应能力，它与人类的智力普遍高度发达有关，它明显区别于人类使用某种语言的天生能力，比之更精妙。“我们必须相信：学习希腊语比将它作为一种天生能力传给下一代需要一种更高级、更复杂的大脑组织结构。”（M 339）

达尔文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特殊适应性，这一点相当重要。他从“婴儿的咿呀学语”中作出推断，将之表述为“想要说话的本能倾向”。其中的关键在于：区别性特征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倾向。达尔文没有认识到身体方面的适应性变化是一个本身也要受选择作用影响的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在获得性状遗传问题上的困惑。但在一般行为问题上，特别是语言问题上，他还是牢牢把握住了适应性这一概念。

华莱士认为可为人所理解的选择作用仅能解释说明人脑功能可略微超过猿类。达尔文对语言使用之发展过程的解释部分地回应了他的这一反对意见。

经过之前一个相当大的进步，一旦半艺术、半本能的语言被运用后，智能的发展紧跟着就阔步前进了；因为语言的连续使用会对大脑产生影响，并产生一种遗传效果；反过来，这又会对语言的完善起到积极作用。同低等动物相比，人脑按其比例来说是较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早期对某种简单语言形式的使用——语言是一种奇妙的机器，它给各种物体和各种性质附上记号，并引起联想；单凭感官印象，联想绝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能进行到底。（D ii.390—391）

要知道达尔文提到“进步”或“发展”时——他在其关于人类的著作中频繁提及——总是暗含着这种进步或发展的取得乃是以不够先进者或较不发达者为代价之意，被华莱士及其他人所忽略的环境压力恰恰是来自于人类内部各演化系列之间的相互竞争，而不是某种非生命因素的影响，如气候、食物资源或来自捕食者等某种明显比人类低等的动物的影响。

一定程度的社会化显然是语言进化的一个必要条件。达尔文进而认为道德感的根源可以在社会结构的发展和维护中找到。从日常观察中能够看出，许多动物有一定的社会性。在社会性的物种中，可以看到社会生活的某些适应性结果，它们通常以互助为特征。因此，认为在正常进化过程中物种能够调整其行为以适应社群生活似乎是合乎情理的。达尔文将个别动物社群的特殊行为暂放一边，而是集中精力探究原始的交往趋向的性质。他认为社会性动物乐于交往，而这种快乐的源泉又进一步激发了社交行为。主观上对快乐的期待可成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动力。达尔文清楚地看到快乐只是行为的一个伴生结果，其效果是有生物适应意义的。它是适应性行为的结果，也是这种行为不断重复的原因，它取决于行为本身的生物价值。人类或低等动物先天倾向或本能的成功表达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但快乐的源泉是由进化中的偶然事件决定的。

达尔文认为：道德观念或良心源于想要参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倾向未得到实现而产生的情感不满足。结果，道德观念所呈现出的特定形式，如那些在特定社会中可能被认为是善举或恶行进而受到良心主观审判的具体行为，仅仅是由偶然事件决定的，这些偶然会在那个社会

中以某种社会化形式固定下来。

围绕达尔文对社会行为引起的良知进化的讨论，有一个深层的进化矛盾我们至今仍未解决。这个矛盾就是：当动物以一种“社会性”的方式进行活动时，它往往会牺牲自己的个体利益以利于群体。而就像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所指出的，自然选择应该演化出利己而非利他的生物体。达尔文从不育工蜂超级无私的行为中不仅看到了动物社会行为的自相矛盾之处，而且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这里的关键是每个蜂箱实际上都是一个大家庭，而由于遗传规律的作用，自然选择既可以在个体层面也可以在家庭层面上发生。

因此，我相信具有社会性的昆虫也是如此：身体构造和本能方面的轻微变异主要是与集体中某些成员的不育相关，这对整个集体是有利的；其结果是：同一集体中能育的雌蜂和雄蜂会发展壮大，并把繁殖有同样变异特征的不育成员的倾向传给它们有生育能力的后代。（O 238）

由此，在对待一般社会行为的进化问题时，达尔文相信它最初只能出现在包含许多亲密相关个体的大家庭群体中，因此，人类的早期进化一定发生在类似的群体中。无疑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当他希望阐明特别的道德规范起因于特殊的偶然事件这一点时，他就以蜜蜂作了例证，因为在这里个体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冲突很容易地以有利于社会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各种动物都有一定的审美观，虽然它们所欣赏的对象大不相同。同样地，它们可能也有是非观，虽然由此所引出的行为会大不相同。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人如果是在与蜜蜂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被养大，那么几乎不用怀疑的是，未婚女性会像工蜂那样把杀死其兄长视为神圣的义务，母亲也会努力杀死其能生育的女儿，而且不会有任何人想到去干涉。尽管如此，我以为，蜜蜂或其他社会性的动物似乎会获得某种是非观念或良知……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内在的告诫机制会告诉这种动物遵从某一冲动会比遵从另一冲动好。应该遵从这个行动方向：这个方向是对的，另外一个是错的。（D i.73—74）

显而易见，达尔文意识到了他把以前限用于人类的道德术语扩展延伸到非人类行为上的做法有多么激进。

> 语气肯定的“应该”（ought）一词似乎只是为了表明：人类意识到一直有一种本能在指导着他，它或是先天的或是后来部分获得的，尽管有时人类可能会违背它。我们说猎犬应该追逐猎物，指示犬应该用头指示猎物的位置，拾獚应该衔回猎物时，这里的“应该”很难称得上是比喻用法。如果这些狗没有这么做，那它们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是行为失当。（D i.92）

从道德相对论到否认上帝是唯一的道德权威仅一步之遥。达尔文接受了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观点：强大的超自然力量只是一种概念，原始条件下人类把无法解释的现象归因于它。尽管“对文明程度较高的种族来说，笃信一位无所不察的神存在，对道德观念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人类学证据并不支持这种信仰从根本上不同于信仰“存在着许多残忍和恶毒的精灵，它们的本领只比人类稍强一点；因为对它们的信仰远比对一位仁慈神的信仰更为普遍”（D ii.394，395）。

在达尔文看来，文明世界里作为道德化身的上帝只不过是一些习惯信仰的化身，在较低等动物的社会本能中可寻见其根源。当达尔文写道，完全凭良心做事的人会说：“我是自己行为的最高评判官，借用康德（Kant）的话说，我本人不会侵犯人类的尊严”（D i.86），他无疑是在讲述自己的道德观。

达尔文并没有从其关于道德观起源的自然理念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道德哲学观。他隐晦而私密地求助于康德的哲学观点大概说明：他已经看出康德个人对道德责任感的明确信念与一种希望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行事的生物本能相关。否认神是唯一的道德权威显然不等于否定宗教教化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在达尔文看来，既然道德价值是由社会的总体特性所决定，在他自己社会的道德框架内，他就可以自由地称赞他所珍视的行为或者批评他从道德上感到厌恶的行为。

达尔文有关人类道德进步之源的观点前后存在矛盾，虽然依照他

开明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他并不怀疑这种进步的确发生过，而他所处的也基本上是一个道德上比较进步的环境。同时他又认为：通过适当的婚姻，人类“通过选择可以对其后代产生某些影响，不仅在体质构造方面，而且对智力和道德品质也可以产生影响”（D ii.403）。而“道德品质得到提高，不论是直接或间接地，更多的是习惯、推理能力、教育、宗教等影响的结果，而非通过自然选择……”（D ii.404）。为了说明前一个观点，他同意他的侄儿，第一个人类遗传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观点：“如果轻率者结婚，谨慎者避免结婚，则社会的低素质成员将可能取代那些较优秀成员”（D ii.403），应该是“所有人公开竞争，最有才能的人不应受法律或习俗的阻碍，应该获得最大的成功并养育最多数量的后代”（D ii.403）。

上一代时，社会科学中最激烈的争论可能是关于人类最高级的社会特质和智力品质受内在的生物特性所支配的程度。从动物社会进化研究中吸取原理的进化社会生物学，明确地意欲把这些原理规定性地应用于人类的研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这位新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甚至准备把追求“一种天生向往幸福的文化”和“准确遗传而完全公平的道德编码”作为有望实现的理想目标。

很明显，这样的理念可以在达尔文的著作里找到根源。如果人类的社会本性不仅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且是被明确规定好的，那么认为基于生物学基础上的人类道德行为规范存在的论点，与达尔文的主张“指示犬‘应该’用头指示猎物位置，因为它们在体质结构上适合这样做”确实是一致的。此外，仍然依据达尔文的观点，如果指示犬那样做了，它们会更开心。但在具体说明人类的行为特征时，达尔文保持了一贯的谨慎。就像是最好把人的语言能力表述为一种普遍的说话倾向而不是一种会讲希腊语的特殊天赋一样，其他形式的社会性之异质性说明其也只是一些承袭通常行为类型的倾向，而并非是由遗传准确决定的。似乎我们人类潜力巨大的文化适应性最终将会捍卫自己，抵制进化社会生物学在解释人类行为时傲慢的科学态度。

第七章

完善与进步

自然界的“完善”概念是达尔文之前解释自然的理论中所不可或缺的，是造物主设计之手存在的证据。“进步”这个概念源自推理进化论：从胚胎的发育，从动植物的多样性，从最简单的有机物到人类都能推断出它的存在。在人类问题上，完善和进步代表着两种对立的、各有存在理由的原则，二者的对立与冲突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英国国教和保守政治理论坚持维护现存制度的价值，而革命、浪漫主义及民主的兴起却坚决主张发展进步的必然性。人类制度的理想模式无论是静止还是变化的，达尔文都没有太大兴趣，但将完善和进步二者的哲学内涵拓展到生物界并形成具有解释力的原理却事关重大。完善和进步是抽象概念，在达尔文的实证和相对体系中很难占到一席之地。不管如何去合理界定作为一种普遍性质特征的“完善”，自然界现实的情形必定会与之发生背离，因为变异和选择必然意味着适应性方面的差异。物种的绝灭和死亡被认为是时间推移作用于生物种群的一种必然结果而并非是神意，这样一来生物结构的“完善”就只能结合其生存环境来界定。

神创论和自然选择学说都要对结构适应这一重要现象作出解释。达尔文的辩证立场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使是按最广泛意义上的“完善”标准来看，也并非所有的东西都那么完善。如果造物主有能力创造能够适应任何环境的生物，那为什么他的创造力在一些岛屿上失灵了，如在新西兰似乎罕见有哺乳动物存在？为什么习性和构造之间经常不能实现完全对应呢？就如南美平原上的啄木鸟，“那儿一棵树都没有……其身体构造的每一个重要部分都清楚地说明：它与我们常见的啄木鸟有很近的亲缘关系；然而它却是一只从来没爬过树的啄木鸟！”（O 184）对达尔文而言，适应只不过是偶然性和时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偶然性太精确，而时间太短或竞争太激烈，灭绝现象就会发生。

退化的器官是身体结构上不适应的极端例子，如蛇或鲸完全退化的后肢和骨盆的痕迹，或者在多风岛屿上生活的甲壳虫背上始终被硬壳覆盖着的翅膀。依据完美造物论的观点，它们是没有意义的。然

而，在达尔文看来，这些退化器官都是生物过去的残迹，它们是在进化过程中为应对偶然出现的改变而发生了退化，这些器官尽管仍可显出其同源痕迹，但在生物的生活中已没有用途。

细想这些事实，无论是谁都会倍感惊异：因为推理清楚地告诉我们大多数组织和器官都近乎完美地适应了某些目的，与此同时却又同样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些退化和萎缩了的器官是不完美的、是无用的。在博物学著作中，残遗器官通常被说成是“为了对称的缘故”或“为了完成自然的设计”而创造出来的。但是，这在我看来并不能算作一种解释，而只是事实的复述。是不是因为行星沿椭圆形轨道绕太阳运行，那么就可以说卫星为了“对称的缘故”和“为了完成自然的设计”也沿着椭圆形轨道绕着它们的行星运行呢？（O 453）

除了个别相对偶然的情形，生物的构造并不符合完善的标准，同样动物行为也远未达到完善的程度。如果是完善的，仁慈的造物主就应该考虑到“让人的体味为蚊子所厌弃”（T ii.103）。显然，依据达尔文道德起源的观点，偶然性是唯一相关的决定因素。语气肯定的“应该”（ought）一词只能根据具体情形来界定。达尔文在《物种变化笔记》里将生物学中“完善”的定义简化为仅包含“完善就在于能够繁殖后代”（T vi.159）这层含义，以便能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站得住脚。确实，这也是直到今天唯一还能成立的含义。

不论从道德上还是从结构上讲，自然界都是不完善的，在这一点上证据显然对达尔文有利。不过，生物界复杂而精妙的适应常常令人惊叹不已，所以达尔文当然预料到了要让人们接受它们只是变异和自然选择的结果很困难。不过，他总是援引“伟大的分阶段演化原则”，使其观点始终保持一致。至于复杂或奇妙的结构，问题只在于程度上的区别，而非质的差异。

像眼睛那样的器官，可以对不同的距离调焦，接纳强度不同的光线，并可矫正球面和色彩的偏差，其构造之精巧简直无以复加，假设它也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那么坦白地说，这似乎是极其荒谬的。然而理智告诉我，如果可以证明，从极其简单而不完善的眼睛到复杂而完善的眼睛之间存在着无数的中间进化

阶段，且每一阶段对动物都是有益的（实际上确是如此）；再进一步假设，如果眼睛确实发生了变异，哪怕是很轻微的，且这些变异得以遗传（事实的确如此）；如果这个器官的任何变异对生活在变化环境中的动物是有利的，那么极其复杂而完善的眼睛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这一点虽然很难想象，但接受其是可能的并非真就那么困难。（O 186—187）

另外，一些神奇的适应性变化常常不是某种生物所独有的，如翅膀对飞行的适应在鸟和蝙蝠身上都发生过。如果造物主负责分派飞行能力，那他一定分派了好几次，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飞行这一个问题。起点不同、进化路径不同的独立进化群体最终可能会获得相似的功能。正是这一事实，即解决一个复杂问题的特殊方案具有不唯一性，限定了整个“完善”理念。

达尔文的许多有关植物的著作，尤其是《兰花的传粉》（1862）、《攀缘植物》（1865）和《食虫植物》（1875）进一步推翻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自然界是一个为了圆满完成某些任务而断续设计创造出的众多完善个体的集合。达尔文对所有这些神奇的适应性变化进行分析的主旨是一样的。变异遗传要求在同类生物群中存在结构相似性，而生存环境具体决定这种遗传特质如何对物种有用。任何适应，无论多么奇特或特殊，审视的人若是期待看到它与同类生物在构造上具有一致性的话，这种适应的独特之处也仅仅只是部分程度上的。兰花花朵各式各样，其完美程度令人惊叹，可确保授粉能通过某些昆虫来完成，而这些昆虫本身对兰花的适应程度也同样让人惊奇。而这种令人惊叹的完美可以看作是由更常见花的普通花朵在一些基本同源结构方面出现的多种变异不断累积的最终结果。如果这些特殊的适应是无所不知的造物主赐予的，那么就无法对这些已经稍有变异但仍较明显的小缺陷的存在作出合理解释。然而，如果先前存在的器官为了应对偶然性变化发生随机变异而获得适应性结构，那么高度特化的和较简单的花都遵从的基本潜在规则就可以得到解释。近代评论家迈克尔·盖斯林（Michael Ghiselin）很有影响地写道，所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变化都是“新奇的构造”而不是“精心的设计”，是机械性地演

生而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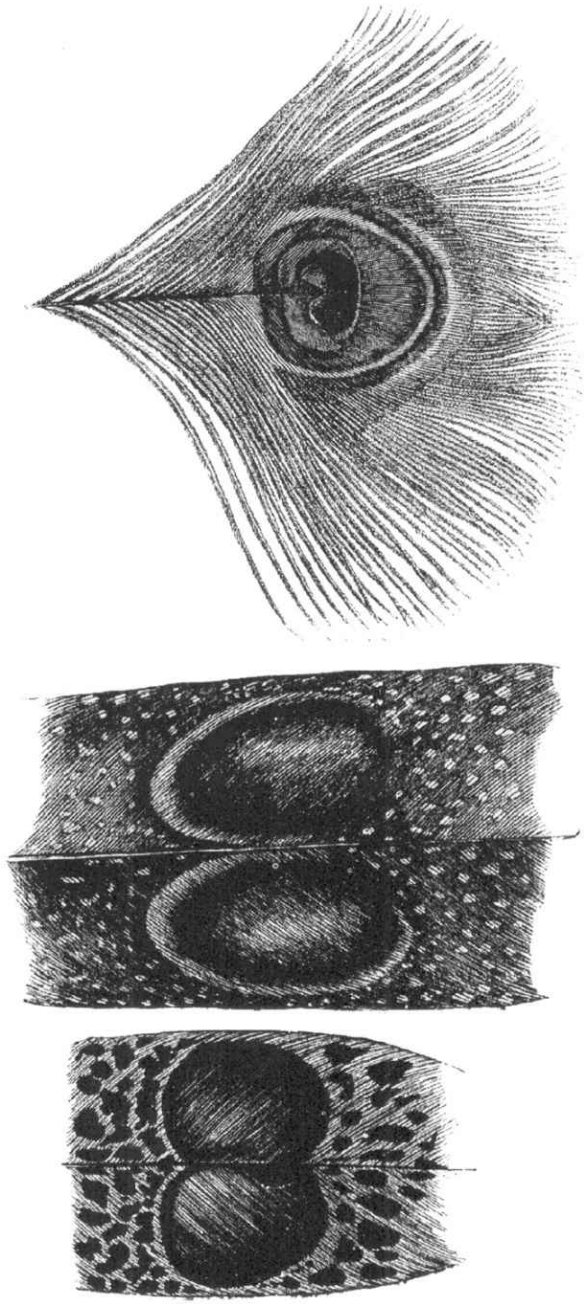

图9　许多雄鸟美丽外观的演化，在此以孔雀尾羽上的眼斑为例，需要一个以雌性选择为基础的新解释。即使是“极度完善的器官”一定也有着不甚完美的前身。达尔文注意到：位于孔雀尾羽中央的眼斑似乎是由最初在羽轴两侧对称出现的眼斑融合而成，这种演变模式有各种中间形态，他在同类的雉类中都可看到。

对达尔文而言，“完善”这整个概念毫无用处，甚至是有害的，它被随意用于表示那些合乎人类看法的变异，因为它们似乎正好与人们所认可的生物任务该如何完成的观点相吻合。如果生物任务只是简单的“繁殖能力”，那么不论一种适应性变异多么令人讨厌或效用多么差，只要它可以做到成功繁殖，就不能无端地否认其完善性。

如果我们赞叹昆虫那神奇的嗅觉，许多雄性昆虫凭此可找到它们的雌性；那么，仅为了这种生殖目的便在一个蜂群中产下数千只雄蜂，它们除此之外对群体再无别的用处，最终会被它们勤劳而不育的姊妹工蜂所杀掉，我们对此也要赞叹吗？……如果我们赞赏兰科和其他许多植物的花朵拥有某些巧妙构造，可利于昆虫完成授粉，那枞树产生出大量密云似的花粉，以便其随风飘散时其中少数几粒会碰巧落在胚珠上，我们是否也可以认为它同样是完善的呢？（O 202—203）

达尔文对上述反问的回答当然是：我们的看法其实无关紧要。总之，动植物的表现已够好了，这样，“完善”的概念就被单纯的“足够”理念所替代。即使花了很大的代价才做到了足够好，那也同样是足够好。但如果自然选择让其付出了代价，那它同时不也促使其进步令其受益了吗？自然界的不完善早在马尔萨斯之前就为人们所注意到了，整个18世纪为证实上帝创造了人类而进行的持续不懈的论争终告失败，促使人们的认识由自然体系“必然是静止的”走向了“必然是不断进步的”这一前景更光明的假说。到19世纪中期，关于物种起源问题，几乎所有的哲学推测都是进化性质的（尽管并非达尔文主义）。大自然被拟人化成了某种非物质力量，不断地致力于创造更复杂的生命形式。现有生物的丰富多样体现了物种逐渐走向完善的系统进步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对完善状态的界定则各种各样，要么隐晦难懂，让人无从捉摸，要么多多少少认同基督神学关于高级生物的传统优

点。人类这个物种代表了这一进化完善过程中所到达的无可逾越的至高点，人类在个体生存和社会生活方面表现出的神奇智慧指示了前进的方向。

人类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无端地强加于一个本没有负载这种价值的过程之上，在达尔文看来，必然的前进性进化观念是又一例证。一维性的进步法则否定了物种可通过持续的繁殖能力确保与现存物种在生物结构上保持等同的可能性。“说一种动物比另一种动物高级其实是很荒谬的，是我们主观地认为那些大脑构造或智力最发达的动物是最高级动物。蜜蜂无疑是本能最发达的。”（T i.50）心智的发展，无论是智能型还是本能型，显然不是划分生物等级的唯一参考标准，因为它没有把植物考虑在内。“看着被最美丽的稀树草原和森林所覆盖的地球表面，谁还敢说智力的进化是世界的唯一目的？”（T i.72）不过，在生物界某种可以被称作“进步”的现象显然还是发生了，尽管朝着许多不同的方向。这种进步到底包含什么具体内容并不清楚，但达尔文倾向于接受复杂性这一理念。然而他还是从本质上怀疑进步的必然性。如果生物界趋向于越来越复杂，那么这种现象应该得到一个解释，它并不是完全不言自明的。这里的关键问题还是生物进化的盲目性，它仅是对偶然事件作出反应。达尔文意识到，总的说来，偶然事件有利于多样化：一群生物的存在正好为另一群生物创造新的生态位（举个简单的例子：植物为动物创造生态位），依此无限类推，于是生物的复杂程度就取决于其环境的复杂性。从化石记录可知，开花植物的主要进化过程极其迅速，是在采蜜昆虫的进化推动下完成的。达尔文对这一新奇理念（1877年有人向他提出）很感兴趣。昆虫确保杂交快速有效，而植物用包含了花蜜的鲜艳美丽或芳香馥郁的花朵引诱昆虫。两个种群共同快速进化。但假如有适宜的环境，这一进化过程即便不能完全逆转，至少应该是可以倒退的。

大洋洲诸岛为高等生物的倒退性演化提供了机会，这在大陆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在那里复杂构造最初就已经形成。在此类岛屿上，不会飞的鸟和昆虫显然已经丧失了一项非常复杂的功能。同样，栖息在洞穴或地下的失明动物因为偶遇新环境而丧失了视觉。在讨论这种倒

退性变化情况时，达尔文引入了一个新的观念，这个观念使他的见解极为现代：演变一般趋向于最经济地使用资源，该原理是从马尔萨斯的矛盾说直接得出的，即繁殖速度往往会超出可用资源的承载能力。无用的器官，如穴居动物的眼睛纯属资源浪费，会消耗掉用于生殖的资源。在这样的动物身上，

> 经济原则可能会经常发挥作用……根据这一原则，任何器官或结构，如果对所有者没有用处，其制造材料将尽可能被节省。这往往会导致退化器官的完全消失。（O 455）

经济原则会调节生物的行为方式以使其生存环境容纳量达到最大化。这一点在达尔文对蜜蜂蜂巢中六棱柱形蜡质蜂房的构造描述中得到了体现，他用数学论据阐明了这种蜂巢结构正好能将所用蜂蜡量降到最少。蜜蜂把采来的花蜜转化为蜂蜡用以筑巢。它们也把花蜜转化为蜂蜜，储备在蜂巢里，用作蜂群越冬时一种必不可少的食粮。如果花蜜有限，最大限度地减少构筑蜂巢所需的用量显然是有利的，这样会让用来生成蜂蜜储存起来的花蜜量达到最大化。

这样一来，经济原则可以同时解释退化和进化现象，可以解释自然界中最完善的构造之一——脊椎动物的眼睛——的退化，也能解释最微妙的动物本能行为之一的进化发展。

于是，进化“盲目地”遵从着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的路线，此路线是“前进的”还是“后退的”，取决于观察者的看法。一般情况下，进化路线似乎是向前发展的，因为竞争的优势总会存在于能力较强、效率更高的物种成员一边，不具备优势的个体被同一物种中的其他成员所代替，自古至今都是如此。

这种观点否定了进化发展都必然是“进步的倾向”。由此，人类这个物种成了地球演化史上的偶然产物。理论上讲，与鸟的翅膀为飞行问题提供了独特解决之道相比，人类那些最有价值的品质并不显得多么独特。“这真是偶然的机遇……造就了人，若有这样的机会，任何猴子都有可能变得一样聪明，但几乎肯定不会演变成人。”（T

iv.166）

许多同时代人都拒绝接受达尔文关于前进性进化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不允许神造行为的存在。即使进化被广泛接受后，上帝仍被视作是引导者。如果说变异是自然选择发生作用的原材料，那么上帝的干预可以被用来解释进化中的进步倾向，特别是用来解释有目的的人类起源，他为每个进化阶段提供有利的变异。达尔文拒绝接受这种观点，并最终排除了进化过程中所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他的拒绝是建立在正确的信念之上：变异和其“用途”之间是相互独立、互不关联的。在家养物种中变异被人类所用只是一个类比，但其论点被泛化了。无所不能的造物主真的能预见哪种变异能使某种生物通过人类的作用或在野生状态下超越其近亲，更好地繁殖子孙后代吗？

他（上帝）曾规定不同鸽子的嗉囊和尾羽应该不同以便其爱好者能够培育奇特的球胸鸽和扇尾鸽吗？是他让狗的体格和秉性有所差异以便能形成某个凶猛无比的品种，其牙齿尖利无比，能咬住公牛，以供人类欣赏这种残忍的体育活动吗？可如果我们在一种情形下放弃这一原则……那就没有理由去认为：性质相似、都作为相同的基本法则之作用结果的变异是受到了有意的、专门的引导，虽然它们为自然界的动物（包括人在内）经过自然选择完美地适应环境提供了基础。无论我们多么希望，我们都无法认可阿萨·格雷的观点：“变异是被引导着沿某些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就像一条溪流沿着确定和有用的方向流淌去灌溉农田一样。”如果我们设想每种具体变异自最初始之时就是预定好的，那么，能引起许多有害的结构变异的生物体构造的可塑性，以及不可避免地引起生存斗争并最终导致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的过剩繁殖能力，在我们看来似乎都成了多余的自然法则。而另一方面，万能的上帝规定和预见了一切。于是，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一切到底是自由意志的结果还是上帝预先设定好的？（V ii.431—432）

第八章
达尔文主义与意识形态

1980年，竞争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世俗职位——美国总统的两位主要候选人，都急于公开宣称他们相信《圣经》的创世故事本身是真实的。这郑重地提醒了我们，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并不像其早期支持者所认定的那样。意识到早在一百多年前赫胥黎就在为此与当时英国前任和后来又几次就任的首相格莱斯顿先生（Mr Gladstone）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让生物学家特别苦恼。的确，我们担心随着科学认识与普通信仰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这种局面将会变得更糟。事实不幸确实如此，达尔文当时苦苦求索而没有成功解决的问题最终在基因学这门新科学里找到了答案。然而，虽然基因特性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简单明了地解释了生物进化的许多问题，但基因却无法说服一些人，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想象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物质的真实存在。

虽然达尔文的观点中暗示了将来最终会发现带有基因特征的东西，但是进化论并没有完全地依赖这一附带分析。如果进化论的正确性遭到普遍质疑，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科学假设如何才能被认可？人们常常误以为：在取得某种所谓的“证据”之前，科学家对一些所谓的科学论断总是持保留态度。其实更确切地说法应是：在“反驳证据”出现之前，科学家倾向于相信合理的、具备科学性的论断是正确的。然而，科学的论断与其他逻辑同样严密的推断之间有着显著差别，这种差别在于科学论断与现实世界直接关联，现实世界的确有可能提供反驳证据。

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现实世界始终没有能够提供反证。野生生物确实呈现出差异，许多变异遗传下来了，但并非所有的变异都具有同等适应性。人们可以直接观察到自然选择和自然种群进化，即使在人类中也可以看到。自然选择无疑是一个进化机理。它是否是唯一的进化机理偶尔仍会有争议。如果另外一个进化机理被发现，那它只能算是一个新的进化理论，与自然选择理论并列，并不能取而代之。

人们可能会问：事关久远过去的进化论主张，我们凭什么认为它们是科学的？的确这些主张不容反证，因此理论上讲是不科学的。但

过去的事情真的就那么难以了解吗？化石记录原本可能在公元前4004年就突然没有了，而事实上它可以追溯到大约30亿年前。化石记录也许会显示：我们现在所识别出的所有生物类群在最早的岩层中就已共存，但事实上它所显示出的是从一个很不同的、非常原始的过去形态持续发展成为现今形态的过程，其间偶有突发情况。而人类也许可能是以完全发育成熟的形态一跃出现在化石记录中，没有原始人祖先的证据。而事实上，现在有许多化石看起来像是原始类人猿时期的代表类型。我们得承认，地质学还没有为现代进化理论提供最佳证据，在岩层中挖掘化石按现在的标准看不是一种非常好的实验方式。然而，从已有的地质学证据来看，始终也未能对进化论提出有力的反驳证据。

将进化论用于解释人们未曾亲见过的事情，碰到的真正问题与任何科学推论所遇到的一样。对科学的头脑而言，理想的状况就是，如果一个规则每次被检验时都能得到证实，那它就可以普遍应用于具备了相应条件的所有情形。由于我们不知道时间推移过程中发生过什么事件可能使得进化过程的基本条件不再适合，而我们手中掌握的证据又与进化论相符合，且没有其他具有类似科学性的假设存在，所以我们认为进化论总的来说是正确的。的确，如果所有逝去生物均化为尘埃，我们没有任何化石记录，那么进化论是否会被科学家普遍接受就有疑问了。

至于科学头脑是否有理由认定外在世界存在规律性，这个问题已超出本书的讨论范围。不过，进化论是个特例，很难挑出它的毛病。如果进化论没有得到普遍接受，那人们一定会认为：这要么是因为对其所依据的证据无知，要么是对其结论感到不满。进化论更多地涉及到了精神生活的神圣领域，超出了其他任何科学理论。此时，指望精神领域里的权威对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变得不再容易：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地球就这样自生自灭地运行着？崇高感是什么？达尔文革命剥夺了人们通常可以依赖的许多精神慰藉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残忍的。人体和大脑的结构是进化的结果，就如同海浪的形成过程一样易于理解，认识到这一点可

能会带给人智力上的满足，但却不一定能补偿神圣上帝的缺失造成的遗憾。在人类、其他生命形式和无机物组成的物质连续体中，不存在任何空隙或余地让人类可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特殊之处。的确，我们拥有的非凡的智力天赋和清晰的自我意识似乎特别能够凸显这一缺憾。因为达尔文向人们指出了这个明显事实，不管他是以多么间接的方式，所以一百多年来他一直受到诽谤，被当作是唯物主义的传道者和造成道德堕落的一个主要源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正统的基督教很难、或许不可能与达尔文主义达成妥协，社会理论学家却获得了从进化论中寻找道德启示的机会。当恩格斯断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可比性时，人们一定认为这是对其相对科学价值的评价，而不是针对任何具体内容或应用上的相似性的评价。尽管如此，自达尔文以来，重大的社会或道德进步观念都竭力从进化论那里寻找依据以获得科学认可。但就像达尔文在19世纪初没有从积极的社会进步运动中获得进一步发展进化论的灵感一样，到临终时他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进化论纳入到新的进步哲学观中。他在1879年写道："有一个极其愚蠢的观点似乎正流行于德国，它把社会主义与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论联系在了一起！"（L iii.237）

从进化论中汲取纯粹道德原则一直是后达尔文思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后期，尤其是在美国，一种格外残酷的社会生存竞争现象，即"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赫伯特·斯宾塞"适者生存"口号的倡导下兴起。进化论的法则被解释为胜利属于最强者，它是进步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则，它为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大肆剥削提供了理由，赫胥黎斥之为"理由十足的野蛮行径"。赫胥黎努力维护达尔文主义的合理适用范围，奋力抵制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支持者们在道德上的狂热，结果却是徒然。甚至连他的孙子，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20世纪一位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也无法抵制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人文主义道德观的吸引。按照朱利安·赫胥黎的观点，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使人类

相信在他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倾向于公正的力量”；人类与盲目的进化力量在朝同一方向努力，在人类出现之前的漫长时期里，进化力量就一直在为其铸造着这个星球；他的任务不是要对抗自然秩序，而是要使自然秩序的构建圆满地完成……

对达尔文思想类似的人为利用也可在无神论个人拯救计划中看到，如科学论派的创始人罗恩·哈巴德（L. Ron Hubbard）所创的“排除有害印象精神治疗法”就宣称“其第一法则”就是“生存是存在的动态原则。”而较近时期里，我们所面临的是来自进化社会生物学赤裸裸的冲击，仿佛是注定要有此一劫，它把对动物社会行为研究的最新进展用于了描述说明人类的行为规范。

那么多内容各异的哲学构想都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当作自己的原则依据，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如果社会主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软弱无力的人文主义和社会生物学的原教旨主义等，都能在达尔文的著作中找到支持自己的依据，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认为：要么达尔文的论证极其含混不清、前后矛盾，但事实显然不是那样；要么就是进化论与道德规范之间根本没有多少关联。

第九章

综评：科学家达尔文

科学家大致可分为实验型和理论型两大类。实验科学家天生就无法抑制自己想要看看石头下究竟藏着什么东西的念头，他受好奇心的驱使，且心中怀着一种合理的信念：自己翻开石头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这类科学家就是牛顿所自称的那类科学家，“我一直就像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孩子，沉湎于不时地发现一粒更光滑的鹅卵石或一个更漂亮的贝壳的喜悦之中，却不知道真理的海洋就在我的面前。”（历史所展现的牛顿可完全不是如此，还有故事传说为证。没有证据表明，牛顿获得万有引力定律的灵感是因为他发现坐在苹果树下通常会获得意外但有用的信息。）理论科学家主要靠脑力而非体力，他的发现是通过思维而不是通过翻开石块。下面这段话正是这类科学家所写：

> 大约30年前，有许多言论认为地质学家应该只做观察工作而不应进行理论推测；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人这样说过，照这样的话，地质学家只需走进砾石坑，数一数鹅卵石，描述出这些卵石的颜色就行了。所有观察的价值在于它必定会支持或反对某种观点，若不明白这一点，那是多么奇怪啊！（ML i.176）

达尔文是一位卓越的理论科学家。对理论科学家而言，观察是为阐释观点服务的。能将众多事实涵盖在内形成一个总的论断或观点的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一项事实只有在能或不能被一个论点所解释时才有意义。理论科学家可能会翻开石头看，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可能会发现某种东西，而是因为他已经清楚地预料到可能会发现某种特别的东西。的确，对理论科学家而言，事实材料的地位是不确定的：如果观察家观察之初没有往“正确的方向”看，那么他就有可能看不“对”。正如达尔文曾经写道，“我一直相信，一个好的观察家应该是一个优秀的理论家”（ML i.195）。他的哥哥伊拉斯谟，曾对化石记录作为支持进化论之证据的不确定性特征作出过评价，更明确地为理论科学家辩护，“在我看来，演绎推理是很成功的，即使事实与理论不相符，对那些事实而言也并非那么糟糕……”（L ii.233）

达尔文的第一个科学理论是关于珊瑚礁的起源和分布的，该理论的得出正好符合上述的这种模式，它把对陆地下沉现象的总体认识与珊瑚礁的一些特征结合了起来，其中珊瑚礁的特征来自赖尔的《地质学原理》。

我的其他著作没有一本像这本那样，开篇之初带有如此明显的演绎色彩，因为整个理论是我在南美洲西海岸时构想出来的，当时我还没见过真的珊瑚礁，因此我只得靠仔细考察群居的活珊瑚虫来证实和引申我的观点。（A 57）

显然，达尔文没有进行过多的相关考察，就把这些素材构思成理论，形成了一个总的想法。这纯粹是一个形式上的论证，但却很科学，因为它能经得起批判性检验，可最初它只是作为一种复杂的思维意象存在，理论的形成取决于我们多多少少都具备的一种能力，即能够从一组正确但表面上互不相关的观点中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的正式因果关联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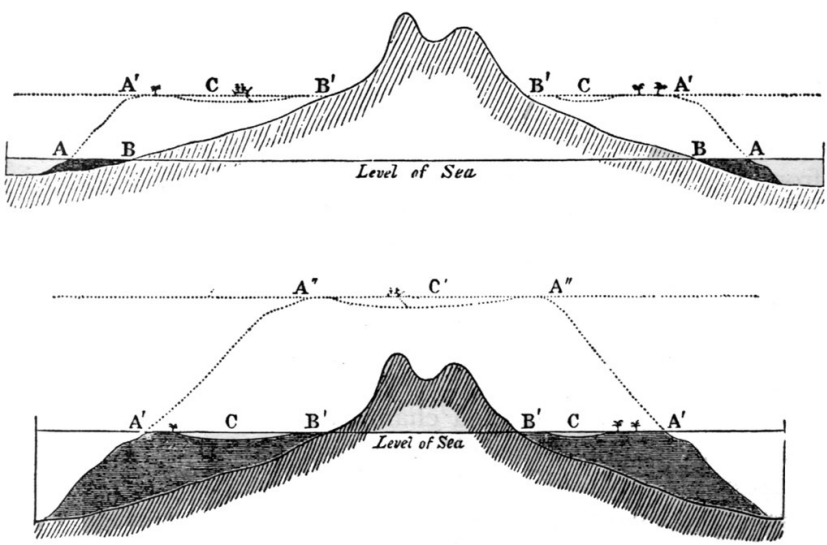

图10　这是达尔文用来说明其珊瑚礁理论的一个示意图，不是特别容易理解。上面一幅图中，我们看到一座山慢慢沉入海里的先后两个状态。第一状态中，山开始下沉之前，海平面用实线表示，陆地被海边暗礁AB环绕。第二

状态用虚线表示，珊瑚在A'处形成堤礁，在堤礁和陆地之间形成一个潟湖通道C，里面有一只小船。下面一幅图里，上图中的第二状态在这里是起始状态，当山顶沉没到海平面以下时，便形成一个新的第三状态（虚线所示）。然而，珊瑚继续在海平面附近生长，形成一个环形珊瑚岛（A''）和一个中央潟湖（C'）。

有必要指出的是，科学理论并非诞生于真空中：一个具体的问题、证据或收集到的一批事实都会引起科学家的注意。某一问题暂时没有得到解决，或事实真相还没有解释清楚，由此引起的不满足再加上好奇心的作用会引导人们进行猜测，其结论只是一个假说。最终，通过进一步的设想将假说与对可直接观察到的现实世界的推测结合起来。

自然选择进化论的诞生遵循了同样模式，只有一点例外，即达尔文从赖尔对拉马克的评论中就已经了解了进化假说的解释价值。当时的情况是，均变说地质学的方法论不能为进化假说本身还有适应问题提供合理解释。好奇心和不满足感在达尔文自传性质的回忆录里显而易见，“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A 71）。从“比格尔号”航行回来后，达尔文收集了“家养条件下动植物变异的各种事实证据”，希望“可以对理解整个问题有所帮助……我根据真正的培根实验原则进行工作，在没有任何理论影响的情况下全面地收集事实材料”（A 71）。几年前，彼得·梅达沃爵士（Sir Peter Medawar），一位坚持认为在科学研究中假设应优先于观察的执著人士，指责达尔文所记述下来的东西“不足信”。梅达沃这样说的时候，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科学家在某一段时期确实也会对如何论证一个观点把握不准，同时心头隐约会有一种直觉想法，觉得只要对它进行足够的思考就能得出一个观点。科学研究的“真正培根原则”是达尔文时代之前的事，那时候假设在指导科学行动中的价值被淹没在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即如果能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其中的结论最终会不言自明，无需进一步解释。达尔文当然意识到这种做法的渺茫性，似乎心情焦虑，坦言从“比格尔号”航行回来后的一小段时间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

随着生存斗争法则被发现，自然选择理论也近乎完整。此时，不

及达尔文那样认真执著的科学家会认为这项工作已做得足够好了。进化过程的正式机理已被确定，进化假设的解释价值与物种起源问题之间的联系也已建立起来。

此时该是其理论公布发表的合适时机了吧？可达尔文却对自己的发现保持了20年的沉默，这引起了人们无尽的猜测：此人精神是否异常，竟然会如此长时间地捂着这么重要的知识而不发表。尽管在科学论证中纯想象（如假说）和纯逻辑（如演绎）推理在19世纪中期的科学界很受认可和尊敬，完全从其现实世界中的原始材料出发到得出一个论断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和意义当然也被看作是完整论证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但达尔文却无法容忍纯粹假设性的论断，他清楚地看到它们是多么容易从有意义滑向无意义。19世纪早期流行的生物分类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即现实中的生物类群是按五个等级划分排列的。当他读到五分法体系的反对者建议将其改为四分法时，他在笔记本里抗议道："有谁会相信这种由类比和数字构成的胡言乱语呢。"此外，他也曾对进化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作过简要评述：

> 他对待每一个问题时的推理方法和我的思想体系完全相反。他得出的任何结论从来没有让我信服过：每当我读过他的一段议论之后，我都反复对自己说，"这会是一个可以钻研五六年的好题目。"（A 64）

为了验证他的论断可能会引出的各种结果，达尔文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方式探察现实世界，包括亲自观察、搜寻各种相关信息、查阅科学文献、通信交流和问卷调查等。达尔文的著作之所以延缓发表，或许部分地要归因于一种考虑，即确保自然选择进化论这样一个有争议的理论完全正确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从达尔文对整个科学事业的态度来看，这种推延完全符合他的个性。毋庸置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生物学中的推测内容在引出新观察方面的价值受到了重点关注。现在经常会看到假设性的概要也可出版，其形式在达尔文看来似乎还太不完备，太草率。但科学会因缺乏新奇想象而失去活力，现在有更多的人在做此类"推测与假设性质的工作"。

因此，达尔文推迟了著作的出版时间一直到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且自然选择在整个进化论体系中的地位得到确保。我希望通过本书读者能对达尔文探讨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各种影响时所达到的范围广度和所表现出的多种才智有所了解。达尔文首创了许多基于直觉的了不起的思想：如经济原则、性选择概念、社会行为的自相矛盾的发现及选择会在整个家庭层面上发挥作用这一解决之道的提出等，这些思想在进化理论形成之初根本不明显。达尔文作为科学家的声誉不仅取决于他发现了自然选择在进化中的有效作用，而且也因为他对此的分析相当充分完善。

关于自然选择进化论创立的大多数讨论中，人们为什么总是会优先想到达尔文的名字而不是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呢？华莱士1858年的论文和达尔文对自己观点的简要说明，都呈交给了林奈学会，就文章的简明清晰程度而言，这两者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如果这就是两位作者论证进化理论的唯一著作，那么就没有理由把达尔文高高地排在华莱士之上。达尔文与华莱士的自然选择学说同样简明精确，同样富有想象力。当然，理论成形的时间上达尔文比华莱士早了20年，但并未发表。几乎可以肯定，华莱士的成果完全是自己钻研出来的，跟达尔文没有任何关系。这两位伟大生物学家的区别最终表现在达尔文对该理论孜孜不倦的探索上：透过纷繁庞杂的枝蔓，最终他成功地论证阐释了除遗传和变异机理外的几乎所有问题。

面对达尔文获得的优先地位，华莱士勇于否定自我的精神同样很可贵，值得人们为此而记住他，就像记住他是进化论的共同创立者一样。任何科学家都明白这一点：一个假说对其发现者来说是如此宝贵，其意义就像孩子对于其父母一样。然而华莱士以其高尚的品德和非凡的勇气，把自己的两本著作命名为《自然选择》（达尔文的术语）和《达尔文主义》。他写在《自然选择》序言中的这段话，将作为本书的结束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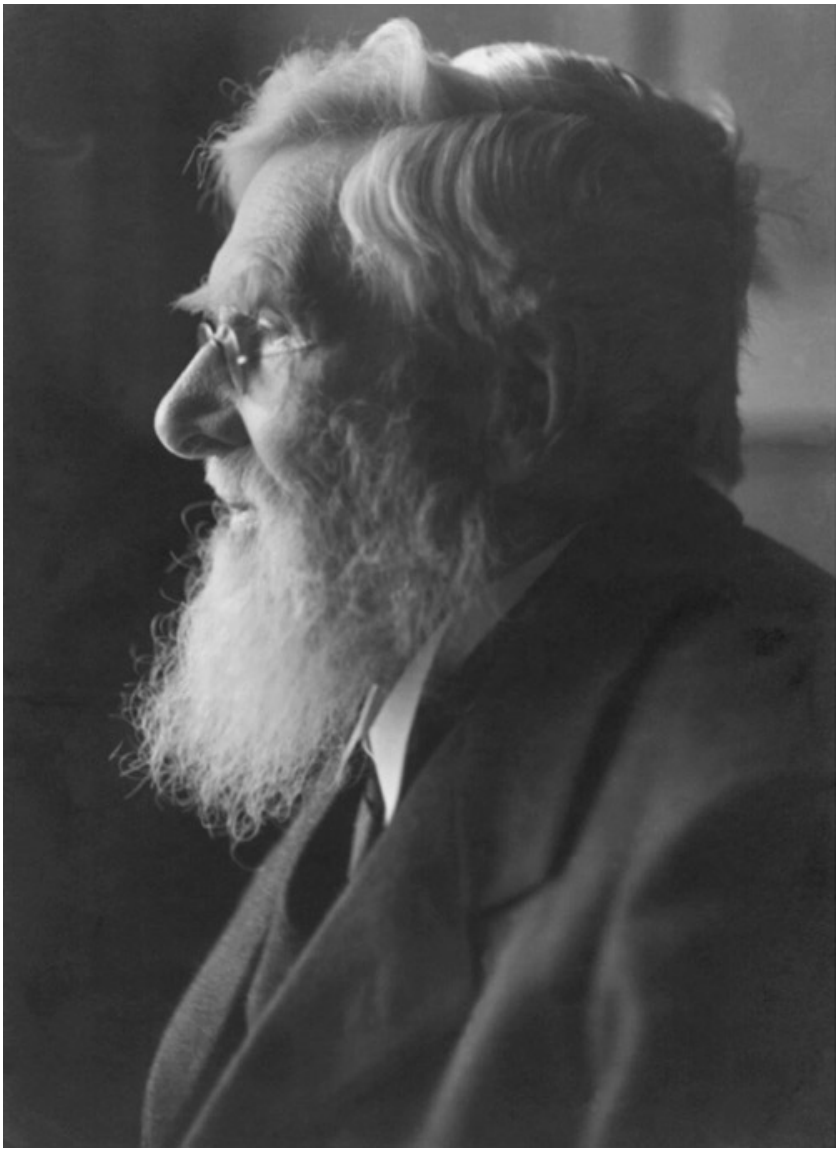

图11　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约19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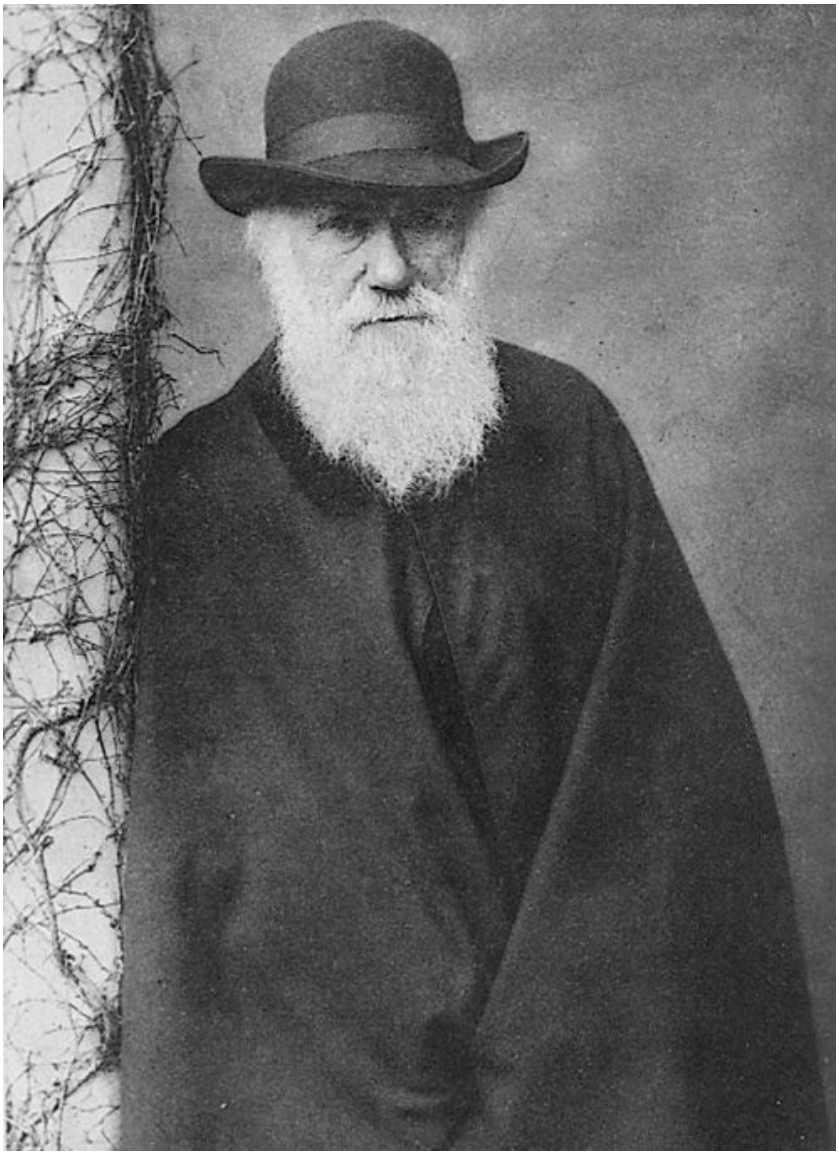

图12　老年时期的达尔文

老年时期的华莱士和达尔文，他们既是老朋友又是对手。尽管华莱士最终不肯接受自然选择进化论可用于解释人类的进化而让达尔文倍感震惊和意外，他们彼此还是高度称赞对方。华莱士还有其他一些神秘想法，在他漫长一生的最后岁月里方有著述。他于1913年去世。

我自始至终都真切地感到欣慰和满足：达尔文先生早在我之前很久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且最终不是由我尝试去写《物种起源》。我早就权衡过自己的优势，深知自己无法胜任这项工作。能力远在我之上的人可能都要承认，他们没有那种持续不衰的耐心去积累大量的证据，也不具备那种非凡技巧去驾驭和利用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事实和材料，也没有他那样广泛而精确的生理知识、设计实验时的洞察秋毫、做实验时的老练和娴熟以及令人艳羡的写作风格：简明清晰、思虑缜密、富有说服力——所有这些素质在达尔文身上完美地结合，使他成为当今世上最适合从事并完成这一伟大工程的人。

补充读物简介

达尔文的所有著作在绝版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现在已再次以英语形式出版，是由保罗·H.巴雷特和理查德·B.弗里曼编辑的（皮克林&查托出版社，1990）。达尔文的所有笔记现在几乎也都已出版（参见“引用文献及其缩写形式”），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也已由保罗·H.巴雷特整理并编辑成册出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7）。R. B. 弗里曼还特意为达尔文的著作编制了精彩的书目（道森父子出版有限公司，福克斯通，1977）。

近几年来，达尔文的大量信件也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以多卷本形式陆续出版。到2000年时，已经出版了1—11卷，收录了从早期到1863年的信件。以目前的速度，达尔文每一年的生活辑录成一卷，还有19卷要出。

对于一般性的研究，早期加文·德比尔爵士精彩的科学传记《查尔斯·达尔文》（1963出版，1976年由格林伍德出版社再版）现在已经略显得有些过时。而阿德里安·德斯蒙德与詹姆斯·穆尔合写的优秀传记（《达尔文》，企鹅出版集团，1992）极富文采，取得了全新的突破，即使还没有将前者取而代之，也已远出其右了。在所有试图对达尔文的整个科学研究工作进行综合评价的书中，迈克尔·盖斯林所著的《达尔文方法论的胜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9）是读来最令人愉悦的一本。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的两本文集《自达尔文以来》（伯内特图书出版社，1978）及《熊猫的拇指》（诺顿图书出版公司，1980）行文诙谐机智，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我也建议大家读一下他的重要专著《个体发育与系统发育》（贝尔纳普，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的第一部分，该书的题目中包含了两个专业术语，不过我设法回避了，主要是希望读者能在古尔德教授的指导下，了解胚胎发育和进化发展之间概念上的关系。

众多专门研究达尔文的书中有3本涉及了19世纪达尔文主义的一些更广泛的内容：尼尔·C.吉莱斯皮的《查尔斯·达尔文和神创论的问题》（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9），詹姆斯·R.穆尔的《后达尔文时

期的论战》（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和迈克尔·鲁斯的《达尔文革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9）。

关于达尔文之前人们对自然界的现象从理论上所作的解释，阿瑟·O.洛夫乔伊已在其著作《巨大的生物链》（1936）中作了相当完备的阐述，这一经典著作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平装本出版。一些达尔文之前的进化推测及该书第二章探讨的许多议题都在《达尔文之前的先行者1745—1859》（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1968）一书中作了详细深入的论述，该书由本特利·格拉斯、奥斯·特姆金和小威廉·L.斯特劳斯编辑。

就现代进化论而言，理查德·道金斯所著的《自私的基因》（牛津平装本，1989）以讲故事的形式完全从基因的角度出发讲述进化过程。道金斯关注的主要是动物的行为，在有关社会关系演化的棘手问题上，他表现得极富想象力，且满怀仁慈心。科林·帕特森的《进化论》（大英博物馆，自然史，1978）讲述了进化生物学目前的发展状况，简明易懂，图解丰富，是一本不错的书。约翰·梅纳德·史密斯的《进化论》（企鹅出版集团，1978）及与理查德·道金斯合著的此书的现代版本（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虽较难懂，但却绝对会让人受益匪浅。马克·里德利在《进化》（牛津平装版，1997）一书中从较高深的层面上对进化这一问题作了最新阐述。

一部《物种起源》当时何以会引起轩然大波，且时至今日仍有怀疑与非议存在？性格平和、谦虚谨慎、彬彬有礼的达尔文又遭到了当时相信“神创论”、“物种不变”的神学界怎样的非难和攻击？

本书可以让我们了解进化论观点的形成、《物种起源》的诞生以及达尔文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精彩故事。

百科通识文库

49

密码术的奥秘

弗雷德·派珀 肖恩·墨菲 著

冯绪宁 袁向东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密码术的奥秘

弗雷德·派珀　肖恩·墨菲　著

冯绪宁　袁向东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62**

Cryptograph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2.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2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Fred Piper & Sean Murphy 2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码术的奥秘 /（英）派珀（Piper, F.），（英）墨菲（Murphy, S.）著；冯绪宁，袁向东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15-8

Ⅰ．①密… Ⅱ．①派… ②墨… ③冯… Ⅲ．①密码术 - 普及读物 Ⅳ．①TN918.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785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文雪琴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15-8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作者简介

弗雷德·派珀，1975年起担任伦敦大学数学系教授，1979年开始从事安全领域的工作，1985年成立Codes & Ciphers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信息安全领域的咨询服务。现为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信息安全专业的主任。

肖恩·墨菲，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信息安全专业教授。主要从事密码学，特别是加密算法方面的研究。曾率先发表过多篇差分密码分析方面的论文，并撰写了大量有关加密算法的论文。

译者简介

冯绪宁，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代数专业。主要从事有限几何和密码学的研究。发表过若干论文、专著和译作。

袁向东，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主要从事数学史的研究与翻译，发表的论文涉及中国古代不定分析、笛卡儿的《几何》、希尔伯特数学学派、中国近代数学发展等专题。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初识密码术
第三章　历史上的算法：若干简单实例
第四章　不可破译的密码？
第五章　现代算法
第六章　实际安全性
第七章　密码术的用途
第八章　密钥管理
第九章　日常生活中的密码术
参考资料与延伸阅读建议
缩略语表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绪论

大多数人在邮寄信件之前都要将信封封上。如果被问及原因，他们瞬即作出的回答不外乎是："我还真不知道"、"是习惯吧"、"为什么不封呢？"或者"因为其他人都是这样做的"。更理性的回答可能是："为了避免信件掉出来"或"为了不让别人看信"。即使信中不包含任何敏感或是高度私密的信息，我们中的许多人仍会认为，私人通信的内容不宜公开，因此要封上口以保证信的内容不为他人所知——除了预定的收信人之外。假设我们用没封口的信封寄信，那么任何拿到这封信的人，都能够读到信的内容。至于他们是否真会这样做，则另当别论。关键在于，如果他们想要这样做的话，他们就能够毫无障碍地去做。此外，如果他们调换了信封中的信，我们对此将一无所知。

现在，许多人用电子邮件（以下简称电邮）取代了邮寄信件。这是一种快捷的通讯方式，但它不能用信封来保护信息了。事实上，人们常常说发送电邮信息就像寄信不用信封一样。显然，任何人要通过电邮发送机密的、或者可能仅是涉及私人情况的信息，都需要通过某种别的手段来保护这些信息。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法就是用密码术给信息加密。

如果加密信息落到了非预定收件人的手里，它应呈现为无法读懂的形式。目前，利用加密来保护电邮还不普遍，但是该技术正在普及，而且扩展的势头有望继续下去。确实，在2001年5月，一群欧洲议会的议员建议，全欧洲的计算机用户都应该对他们所有的电邮进行加密，"以防被一个英–美窃听网络暗中监视"。

密码术已是一门享有盛誉的科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传统上，它的主要用户是政府及军队。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作品《伽摩箴言集》（*The Kama Sutra of Vatsyayana*），作者是筏磋衍那（Vatsyayana）；其中含有这样的劝告：女人应当学习"理解密码文本的技艺"（要了解本书引用的所有著作的细节，请查阅书后列出的参考文献）。

密码术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有文献记载的。关于这一主题，戴维·卡恩（David Kahn）的作品《破译者》极富学术价值；这部书部头较

大，有1,000多页，首次出版于1967年。它被描述为“第一部有关秘密通信的全史”，读来令人兴趣盎然。近期，西蒙·辛格（Simon Singh）写了一本篇幅更短的书，名为《码书》。这是一本描写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书，通俗易懂。它不像卡恩的书那样包罗万象，但其目的在于激起外行对这一主题的兴趣。两本书同样优秀，都是我们极力推荐的。

密码术的普及和公众对其重要历史作用愈加普遍的认知，其功劳并不限于文学作品。很多博物馆及历史遗迹都有老式密码机展出。这种场所首推英国的布莱奇利公园，很多人认为这里是现代密码术和现代计算的起源地。就是在这里，艾伦·图林（Alan Turing）和他的团队破译了谜密码（Enigma）；他们的工作环境被保存下来，以纪念他们的惊人成就。现在有很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强调了破译密码的重要性。其中受到特别关注的是破译谜密码和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破译加密信息所造成的影响。此外还有若干有关这一主题的电视系列节目。这一切都意味着，世界上已经有无数的人知道了通过信息加密以保护信息机密的概念以及破译这些密码的影响。然而，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那些作品中所使用的术语的确切含义仍然是个谜，他们的理解还很有限。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密码学——编制密码及破译密码的艺术和科学——的非技术性的介绍，来矫正上述状况。当读者带着从本书中获得的知识重新阅读那些书、观看那些电影和电视系列节目时，将会理解得更深入，从而得到更多的乐趣。

20世纪70年代之前，密码术是一种黑色艺术，只有少数政府及军事部门的人员理解并使用它。现在，它已是一门得到公认的学问，很多大学都在讲授这门课程，很多公司和个人也都在广泛地应用它。这种转变是诸多力量作用的结果。其中最明显的两种力量是办公自动化的发展和作为一种通讯渠道的国际互联网的建立。现在，各公司需要使用因特网与其他公司及他们的客户进行贸易往来。政府需要通过因特网与百姓交流，例如所得税申报可以通过电子途径提交。

毫无疑问，电子商务正在变得越来越普及，但对安全的担心常被说成是防碍它全面普及的绊脚石之一。我们已经关注过与机密信息相

关联的问题，但机密性本身往往还不是人们主要担心的对象。

当两个人在公共网络上通信但彼此都无法看见对方时，他们中的一方如何来确认另一方的身份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事。然而很清楚，从网络上收到信息的任何人可能都有这样的需要：确信他们自己知道发信者的身份，以及确信他们收到的信息跟原发信者发出的信息是一样的。此外，还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收信人需要确信，发信者不能在事后否认发过那样的信息或者宣布所发送的是一个不同的信息。这些都是重要的但又无法轻易解决的问题。

在传统的非自动化商业环境中，人们常常要依赖手写签名来消除上述三种疑虑。目前安全专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发明一些“电子对等物”来代替社交机制，因为后者诸如当面相认、手写签名等在向数字化交易转变的过程中会不复存在。尽管这个问题与保守某些信息的机密没有明显的联系，但密码术已经成为应对这种挑战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在1976年的一篇定名恰当的文章《密码术的新方向》中，惠特菲尔德·迪菲（Whitfield Diffie）和马丁·赫尔曼（Martin Hellman）提出了一种可以利用密码术产生手写签名的电子等效物的方法。这篇文章的影响无论给予多高评价都不为过。在他们这项工作之前，密码术被用来确保用户的信息在传输过程中不会被更改。然而，这种通信依赖于通信伙伴之间的相互信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不是个问题——金融机构大概是当时的主要用户群，不过当时密码术的应用范围确实很有限。

现代密码术在过去的30多年中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不仅技术发生了变化，应用领域也更广泛了。而且，似乎每个人或是它的直接使用者，或是由于它的应用而受到了影响。我们都需要知道它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它可以成就哪些事情。

用好这本书

本书是密码术的入门性概论。它并非技术性书籍，主要是为外行

所写。那些希望从技术层面学习密码术的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已有太多的书籍可供选择。关于加密算法的设计与分析的基本理论，已经有了很好的文献资料，此外还有大量这类专题的教科书。（我们认为标准的参考书是由艾尔弗雷德·梅内策斯［Alfred Menezes］、保罗·范·奥尔斯霍特［Paul van Oorschot］和斯科特·范斯通［Scott Vanstone］所著的《应用密码术手册》）。本书并不属于此类图书。它不关心与算法设计有关的技术问题，而是集中讲述如何利用算法以及用这些算法来达到什么目的。如果这本书能鼓励那些有适当数学背景的读者再去读一些更专门的、技术性的教科书，这就实现了它的又一个目标。但是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力图揭开密码术的神秘面纱，消除非数学家对这门学科的畏惧感。

本书的基础是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信息安全方面的硕士所修读的一门课程。这门课程曾被叫做“领悟密码术”，但现在已改为“密码术与安全机制导论”。修读本课程的学生的兴趣与基础各不相同，但大多数学生都雄心勃勃地想成为安全方面的从业者，包括成为诸如信息技术业界的安全经理或安全顾问。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希望成为职业的密码学家。事实上，密码术在他们眼中是一种必要之恶，他们是为了获得从事信息安全工作的资格证书，才不得已来上这门密码术的必修课的。我们这些作者不能将这门课看作是“恶”，但毫无疑问的是，不能仅因为它本身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学习密码术，而是要以提供各种安全系统为背景来学习。正是这种态度印证了如下断言是有道理的：一般而言，对于信息安全的从业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理解密钥管理技术，而不是能够从数学上来分析密码系统。

对于那些并不想成为信息安全专家的人员，本书的目标是把密码术当成一个有趣而重要的话题来展现。它应该能使读者理解出现在关于密码术的大量历史书籍和电影中的术语，并意识到密码术对我们的历史产生过的、并且对我们的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它也有助于人们理解密码术的不断普及给政府和法律执行机构带来的各种问题。

无疑，尝试破译简单的密码会增进人们对密码术的理解。这也是一种乐趣。所以，虽然本书不是教科书，其中还是有一些“习题”，意

在邀请读者来破译某些算法。即使破译失败也并不会妨碍读者读完这本书。尽管如此，认真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很可能是值得的。本书中的习题一般只涉及字母代换，解这些习题不需要数学算法。

尽管理解本书的内容基本上不要求读者具有数学知识这个先决条件，但也不可否认，现代密码系统几乎总会运用到数学方法，而且大多数现代算法使用二进制数字运算而不是字母代换。基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三章添加了一个简短的附录，讲了一点相关的初等数学。我们再次鼓励读者努力去理解它们，但请放心，那些内容对于阅读本书后面的章节关系不大。

第二章

初识密码术

引言

本章将介绍密码术的基本术语和概念。我们的目标是将这些内容讲得通俗易懂，给出一个尽可能全面的概要。

基本概念

密码系统的理念就是将机密信息加以伪装，使得未经许可者难以获知信息内容。最常见的两种作用大概是安全地将资料存放在计算机文档中或使其在不安全的渠道（如因特网）中传输。无论哪种情形，将文件加密并不能阻止未经许可者得到它，但是能够保证这些人无法理解自己所得到的东西。

需被隐藏的信息通常称为明文，将它伪装起来的操作叫做加密。加了密的明文叫做密文，或称密码文。将明文信息加密所使用的一套规则称为加密算法。通常这种算法的操作依赖于密钥，密钥是与信息一起被输入算法的。为了使接收者能够从密文中得到信息，需要有解密算法，当它和适当的解密密钥一起使用时，就能从密文中还原出明文。

一般而言，构成任何一种密码算法的规则都非常复杂，需要细心设计。然而，在本书中，读者可以将这些规则看作是一种“魔术套路”，它借助于密钥可以将信息变成难以辨读的形式。

下面是一幅为了保护信息传送而使用的密码系统的轮廓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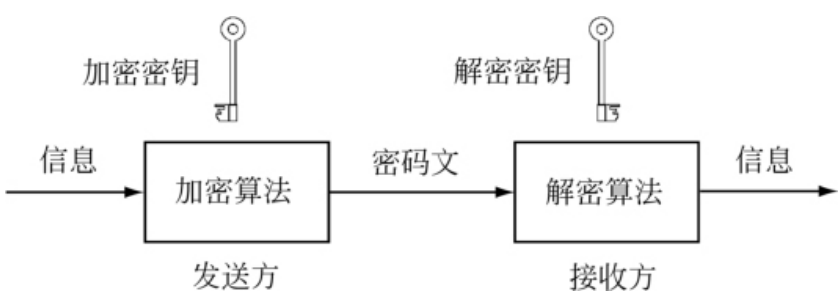

毫不奇怪，在信息传输过程中截取信息的人被称作拦截者 。其他作者可能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指称这种人，诸如“窃听者”、“敌人”、“对手”，甚或“坏家伙”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有时拦截者也可能是“好家伙”；后面我们还要讲到这点。一般情况下，拦截者即使知道解密算法，他们也并不知道密钥。正是因为他们不掌握这一密钥，我们才能够指望他们得不出明文。密码术 是有关密码系统设计的科学；密码分析 这个词是指在没有取得适当密钥的情况下，从密文推演出明文信息的过程；密码学 则是密码术和密码分析这两个术语的总称。

密码分析并不是攻击者得到明文的唯一手段，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例如，假设某人将加密信息储存在其笔记本电脑中，显然他需要一种方法来重新获取解密密钥，以为自己所用。如果他的办法是把这个密钥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把纸贴在笔记本电脑的盖上，那么任何偷走笔记本电脑的人，自然而然就得到了解密密钥，无需实施任何密码分析。这个简单的例证说明，为保证资料的安全，除了使用一个好的加密算法，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实际上，我们要反复强调，密钥的安全性是密码体系安全性中的关键。

在实践中，大多数通过密码分析所进行的攻击，都需要设法找出解密密钥。攻击者如果成功了，那么他所知道的信息就和预定的收信者一样多，从而能够破译出使用此密钥的其他所有信息，直到该密钥变更为止。当然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某个攻击者的唯一目标是解读某一特定的信息。无论如何，当设计者认为一个算法已被破译时，他们通常是指某个攻击者已经发现了找出解密密钥的具体方法。

当然，攻击者只有在拥有足够的信息，能够识别正确的密钥，或者更加常见的是能够鉴别不正确的密钥时，才能破解一个算法。鉴别不正确密钥的信息对攻击者破译密码来说可能有决定性的意义，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例如，假定攻击者知道明文是用英文写的，当他们使用一个猜测的密钥去解密一段密文，但得到的不是一段有意义的英文明文时，这就说明这个猜测的密钥必定是不正确的。

前面的介绍应该已讲明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要从密码文中得到所需的信息，并不需要知道加密密钥。这个简单的事实构成了迪菲–

赫尔曼的开创性论文的基础。这篇论文对现代密码学产生过惊人的影响，而且它将密码系统很自然地分为两种类型：对称密码和非对称密码。

对于一个密码系统，如果能够很容易地从它的加密密钥推导出解密密钥，我们则称它为常规的 或对称的 密码系统。实际上，在对称系统中，这两种密钥常常是相同的。因此，这样的系统常被称为私钥系统或一钥 系统。反之，如果不能从加密密钥推导出解密密钥，这样的系统则称为非对称 的或公钥 密码系统。之所以区分这两类体系，有一个理由显而易见：为了阻止了解所用算法的拦截者从拦截到的密文中得到明文，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对解密密钥加以保密。对于对称系统而言，还必须对加密密钥也进行保密；然而，若是非对称系统，知道加密密钥对攻击者来说并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确实，后者的加密密钥可以是公开的，而且实际情况也往往如此。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密码文的发送方与接收方不需要共享任何共同的秘密；对他们来说彼此间的信任也不是必须的。

虽然上一段的陈述看似简单而且不证自明，但其影响却很深远。在上面的轮廓图中，我们假定发送方与接收方有“配对”的密钥。实际上，他们要达到这种状态是相当难的。例如，若系统是对称的，也许需要在保密信息交换之前先配送一个密钥值。我们决不可低估要为这些密钥提供充分的保护所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密钥管理方面的问题，一般包括密钥的生成、配送、贮存、变更、销毁等，乃是安全系统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对于对称和非对称系统，相关的密钥管理问题是不同的。我们已经知道，如果系统是对称的，就需要在配送密钥时对它们的值加以保密。如果系统是非对称的，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因为此时配送的只是加密密钥，不需要保密。但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便转换为确保每个参与者的加密密钥的真实性，即保证使用公开加密密钥值的人知道相应的解密密钥的“主人”的身份。

我们在介绍对称与非对称系统的区别时，假定攻击者已经知道了算法。这当然并不一定是真的。无论如何，对密码系统的设计者来说，可能最好要假定任何一个潜在的拦截者都具有尽可能多的知识和

尽可能广泛的情报。在密码术中有一条著名的原则，它宣称密码系统的安全性必须不依赖于密码算法的保密。于是，其安全性就仅取决于解密密钥的保密了。

研究密码术的目标之一，就是使任何希望设计或使用密码系统的人能够评估他所使用的系统在实用中是否足够安全。为了评估一个系统的安全性，我们作出下列三个假设，并将其称为最坏情景条件（worst-case conditions，简称WC）。

（WC1）密码分析者对该密码系统具有完备的了解。
（WC2）密码分析者已得到了相当多的密文。
（WC3）密码分析者知道了对应于一定量密文的明文。

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必要努力从定量的角度搞清楚“相当多”和“一定量”的含义。这取决于所论及的特定系统。

情景WC1表明，我们认为安全性不应该依赖于对密码系统细节的保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系统就应该完全公开。自然，如果攻击者对于系统一无所知，那他的任务会更为艰巨，这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隐藏这一信息。例如，利用现代的电子系统，可以通过微电子手段将加密算法隐藏在硬件里。事实上，完全有可能在一个小“芯片”里隐藏整部算法。为了弄到这个算法，攻击者需要“打开”这样的一个芯片。这可能是既精细又耗时的活儿。无论如何，这个活儿还是有可能完成的，我们不应该假定攻击者缺乏这样做的能力和耐心。与此类似，算法中包含的任何一个计算机软件可以通过小心编写的程序进行伪装。攻击者凭着耐心和技巧，可能再一次揭开它的秘密。在某些情况中，攻击者甚至可能得到确切的算法。从任何制造商和设计者的立场看，WC1是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因为它能让他们摆脱保护系统机密性的许多责任。

很清楚，WC2是一项合理的假设。如果不存在被拦截的可能性，那就不需要使用密码系统了。反之，如果拦截是可能的，那么通信者并不能控制拦截在什么时候发生，因此最安全的选择是假设信息在所

有的传送过程中都可能被拦截。

WC3也是一个很现实的情景。攻击者可以通过观察通信状况并作出聪明的猜测来得到这种类型的信息。也许他甚至能够挑选出已知其密文的明文。历史上一个“经典”的例子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时对一个灯浮标进行炮火袭击，就是为了确保*Leuchttonne*（灯浮标）这个特殊的德文单词出现在那些用谜密码机加密的明文信息中。（见英国广播公司出版的B.约翰逊［B. Johnson］写的《秘密战争》。）

利用已获得的互相对应的明文和密文实施的攻击称为已知明文攻击 。如果明文是由攻击者选定的，就像上面我们所讲的被炸灯浮标的例子那样，那么可称其为选择明文攻击 。最后，如果攻击者只知道密文，就称为仅知密文攻击 。

承认这三种最坏情况会出现的一个结果是：我们不得不假定，唯一能够区分拦截者和真正的收信方的信息是解密密钥。于是，系统的安全性就完全依仗解密密钥的安全性。这就再次强调了前文中提到的论断：良好的密钥管理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强调，对密码系统安全水平的评估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所有的评估都是基于某些假设的，不仅涉及拦截者所能获得的知识，还涉及他们所拥有的设备。无疑，进行评估的最好的普适性原则是：当有疑问时，假定最坏的情景已经出现，宁可错在谨慎上。还有一点值得强调，一般而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不是“这是一个特别安全的系统吗？”而是“对于这种特定的应用，这个系统是否足够安全？”后者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的只是便宜和低水准的安全系统。对几乎所有非军事的活动而言，提供安全保证的费用是高昂的，所以需要从商业角度出发加以评估。此外，安全设备也比较昂贵，而且常常会降低整个系统的性能。于是，自然就要求能在最低的水平上保证安全即可。要决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安全水平，通常的做法是尝试估计信息需要受保护的时间长度，我们称之为系统的掩蔽时间 ，由此就可以粗略估计出所需要的安全水平。例如，一个适用于战术网络体系的密码系统，其掩蔽时间只需几分钟，要比适用于战略体系的密码系统——如政府机密文件或医疗记录，其掩蔽

时间可能长达几十年——“弱”得多。

如果假定我们的解密算法已为他人所知，那么对任何对手而言都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攻击方法。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可以挨个去试每一种可能的解密密钥并“希望”自己能找出正确的解密密钥。这样的攻击方法称为密钥穷举搜索法 ，或称蛮力攻击 。自然，这样的攻击不太可能成功，除非攻击者掌握了某种辨识正确密钥的方法，或者（更常见的）他们起码需要拥有能够排除大多数不正确密钥的方法。例如，在已知明文攻击中，如果选取的解密密钥不能将所有的密文相对应地译为正确明文，很显然这个密钥就是不正确的。但是，正如我们从一些简单的例子所看到的，除非掌握了足够数量的、互相对应的明文与密文组，否则可能会找出许多这样的解密密钥，它们虽然能正确译出已到手的所有密文，但密钥本身仍是不正确的。如果通讯使用的基础语言具有足够严密的结构，那么这种语言的统计特性亦有助于剔除某些密钥。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开始对用于特定目的的密码系统的适用程度给出一些最基本的评价准则。密码系统的用户会说明所需的掩蔽时间。设计者应该知道可能的解密密钥的数目。如果设计者能对攻击者试验每个密钥的速度作出假定，就能进一步估算出用密钥穷举搜索法破译密码的预期时间。如果这个预期时间比掩蔽时间要短，那这个密码系统显然就太弱了。因此，我们提出的第一个比较粗略的要求就是：密钥穷举搜索法所需的预期时间应该在很大程度上长于掩蔽时间。

在谈到对称与非对称算法的区别时，我们曾提到过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的信任需求问题。在迪菲–赫尔曼那篇著名的文章发表之前的若干世纪中，人们一直假定加密信息只能在相互信任的当事人之间传递。把信息发送给不受信赖的人的想法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公钥算法。但在这里我们要讲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它说明一个人如何能确保将一份礼物安全地寄给预定的接收者，尽管这件礼物可能会经过很多想占有它的敌方之手。

在这个例子中，假定发送方有一件礼物，他打算把它放在一个带

有挂锁的手提箱中，并送给某人，他对此人的信任程度还不足以让他把自己的钥匙交给对方。发送方会通知预定的接收方去买一把锁和钥匙。我们假定发送方和接收方的锁都不是任何第三方的钥匙能打开的，而且锁和手提箱都足够结实，没有人能够用蛮力从手提箱中将礼物取出。发送方和接收方用下列步骤来保证礼物的传递：

第1步：　发送方把礼物置于手提箱中，锁上手提箱，将钥匙取走。然后将锁好的手提箱发给接收方。

注：　手提箱在从发送方到接收方的路途上是安全的，不受所有敌手的攻击，因为后者无法打开手提箱上的锁。但接收方也不能得到礼物。

第2步：　接收方在手提箱上加一把自己的锁，取走他的钥匙，并把箱子送回给发送方。

注：手提箱现在锁了两把锁，所以没有人能将礼物取出来。

第3步：　发送方用自己的钥匙取下手提箱上属于他的锁，并将手提箱发回接收方。

注：手提箱上仅剩下接收方的锁。

第4步：接收方打开手提箱上的锁，得到礼物。

这一系列操作的结果是礼物送到了接收方手中，但无论接收方还是发送方都得以把他们的钥匙留在自己身边。他们不需要彼此信任。当然我们关于钥匙、锁以及手提箱的坚固性的假定看起来都是极端不现实的。但是在考虑公钥密码术时，这些假定要被替换为数学等效物，那时人们会更为信服。我们刚才举例的要点是，至少从理论上说，无须彼此信任的安全通信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太过简单的例子中，发送方无法知道手提箱上多加的那把锁是谁的，很有可能是敌手假扮接收方将自己的锁加在了手提箱上，这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手提箱例子中的问题“这是谁的锁？”类似于在使用公钥系统时出现的“这是谁的公钥？”，而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进一步阐述理论之前，下一章我们将简述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简单例证，以说明有关密码术的理论，并使大家真正理解已经给出的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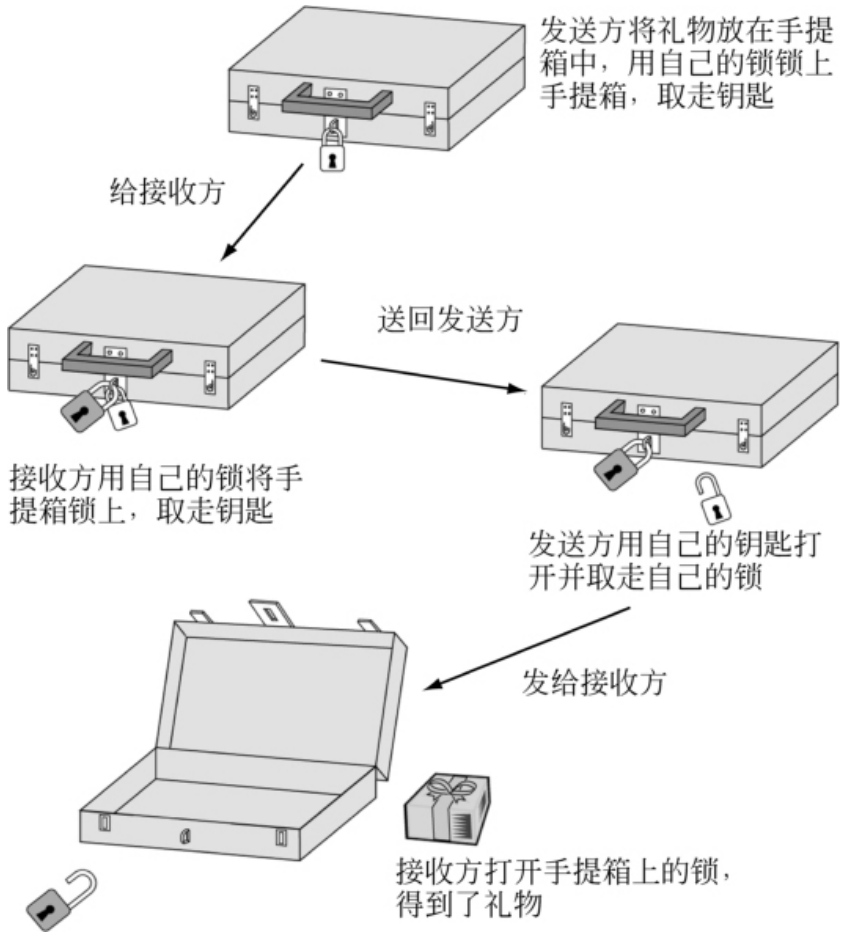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历史上的算法：若干简单实例

引言

本章我们将介绍早期的几个使用“笔和纸”的密码实例来阐释第二章讲过的基本概念。我们还要利用它们来帮助读者了解拦截者发起的攻击的类型，以及算法设计者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这里所论及的算法都是对称的，其设计和应用都大大早于公钥密码术的出现。本章是为非数学背景的读者写的，但在少数情况下我们觉得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一些基本的数学知识，特别是模算术。出现这种情况时，读者可跳过数学部分，这对他们的理解不会有什么影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提供了一些数学辅导内容（见本章后的附录），若读者希望理解全部内容，阅读此部分即可。

这里讲的算法都已过时，并不能代表任何一种现代密码技术。但是，研究早期的一些系统也是大有益处的。这些系统是通过把一个字母替换成另一个的办法，即所谓的字母代换和（或）改变字母的顺序来加密的。研究这些系统有多种益处，一是它们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例子以搞清基本概念，并能帮助我们说明密码中若干潜在的弱点。再者摆弄这些密码很有趣，由于它们并不依赖于数学，那些未接受过科学训练的密码“业余爱好者”也会很喜欢。

凯撒密码

最早的密码实例之一是凯撒密码　　。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在其作品《高卢战记》中首先介绍了这一密码。在这种密码中，从A 到W 的每个字母在加密时用字母表中位于其后三位的那个字母代替，字母X、Y、Z 则分别被替换成**A** 、**B** 和**C** 。在这里，凯撒对字母进行了3“移位”，但用从1到25中的任何数的移位都能产生类似的效果。事实上，任一种移位现在通常都视为是使用了凯撒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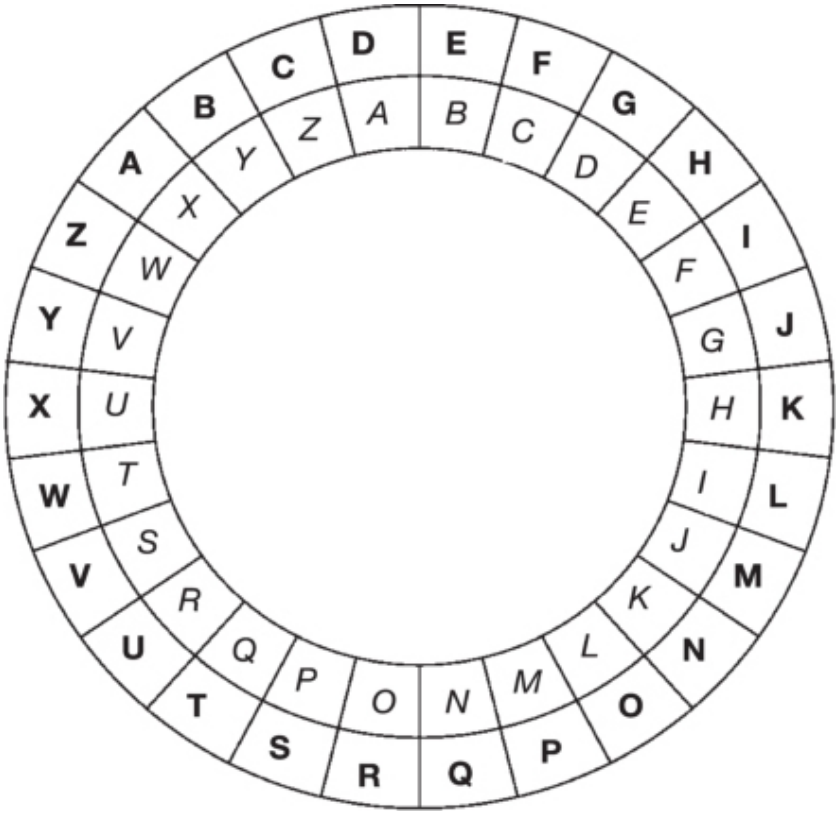

实施凯撒密码的一个“机器”

我们再次用一个图表来解释这种密码。该图表标示了两个同心环，外面的环可以自由转动。如果我们从外环的字母**A** 对应于内环的*A* 开始，经2次移位外环的**C** 就到了内环*A* 处，等等。包括0移位（当然它与26移位是同等的）在内，共有26种移位方式。就凯撒密码而言，其加密密钥与解密密钥都是用移位数来决定的。

一旦双方同意选定一种移位，那么一个凯撒密码的加密就可以这样来完成了：在内环上找到明文中的每个字母，再将它替换成图中外环上与之对应的那个字母。而解密时只要实施相反的运作即可。于是，由该图可知经3移位后明文信息*DOG* 变为**GRJ** ，而密码文**FDW** 的明文则为*CAT* 。为了使读者更确信自己理解这个系统，我们列出以下陈述供读者验证：如果是7移位，那么对应于*VERY* 的密文是**CLYF**

；而对于17移位，则对应于**JLE** 的明文是*SUN* 。

在我们所描述的凯撒密码中，加密密钥和解密密钥都等于移位数，但加密和解密的规则是不同的。不过我们可稍稍改变一下公式，让这两个规则完全相同而让加密密钥和解密密钥变得不同。为此，我们只须注意26移位和0移位具有相同的作用，对任一个从0到25的移位而言，以此移位进行的加密等同于从26中减去原移位数得到的新移位数所进行的解密。例如，8移位加密与18移位解密是一样的，因为26 - 8 = 18。这让我们能对加密和解密使用同样的规则，此时解密密钥是18，相对应的加密密钥是8。

我们已经提到过密钥穷举搜索法，很明显，因为只有26种密钥，因此凯撒密码是很容易被这种攻击破译的。在给出例子之前，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密码的另一个弱点，那就是只要知道一组对应的明文与密文（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信息量），就可确定出这个密钥。

为简单起见，我们通过讲述一个完整的例子来解释密钥穷举搜索法。因为只有26个密钥，凯撒密码对于这种破译法而言尤为简单。假定我们已经知道使用的是凯撒密码，并预料信息所用语言是英文，我们拦截到一段密码文**XMZVH** 。如果发送方是用25移位来加密的，则解密只需实施1移位，得出的信息便是*YNAWI* 。这在英语中没意义，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地在密钥值范围中将25移位排除，我们可以按降序逐一尝试从25到1的这些密钥值，其结果见表1。

表1 ．密钥穷举搜索法一例：密码文XMZVH

加密密钥	假设“信息”	加密密钥	假设“信息”	加密密钥	假设“信息”
0	*XMZVH*	17	*GVIEQ*	8	*PERNZ*
25	*YNAWI*	16	*HWJFR*	7	*QFSOA*
24	*ZOBXJ*	15	*IXKGS*	6	*RGTPB*
23	*APCYK*	14	*JYLHT*	5	*SHUQC*
22	*BQDZL*	13	*KZMIU*	4	*TIVRD*
21	*CREAM*	12	*LANJV*	3	*UJWSE*
20	*DSFBN*	11	*MBOKW*	2	*VKXTF*
19	*ETGCO*	10	*NCPLX*	1	*WLYUG*
18	*FUHDP*	9	*ODQMY*		

在这26个潜在的信息中，只有一个是英文单词，即*CREAM*，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出加密密钥为21。这使我们能够破译在此之后的所有信息，直到该密钥变更为止。尽管这一密钥搜索圆满成功，但以下认识很重要：一般而论，对于更复杂的密码，一次密钥穷举搜索可能无法确定出唯一密钥。它更可能是通过删去一些明显错误的密钥而限定了潜在的密钥数目。我们还是回到凯撒密码来解释，注意，当用穷举搜索法寻找密文**HSPPW**的加密密钥时会产生两种可能的密钥，它们皆导出了对应于假设信息的完整的英语单词（移位4，得出*DOLLS*；移位11，得出*WHEEL*）。

出现这种情形时，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信息，可能是该信息的背景或一些额外的密文，直到我们能够定出唯一密钥。无论如何，搜索的结果的确表明，我们已显著地减少了可能的密钥的数目，并且，当我们拦截到新的密码文时不需要再进行一次全面搜索。实际上，对于这个小例子，我们仅需要再试试4和11这两个值。

从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另一个有趣的结果。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读者可能会发现两个由5个字母组成的英语单词，其中一个单词可以用7移位的凯撒密码从另一个词得到。读者也许会有兴趣循此办法再找一些更长的对应的词，甚或是一些有意义的短语，它们彼此是可以通过字母移位得到的。

通过以上简单的举例说明，读者应该已经很清楚凯撒密码是很容易破译的。然而，凯撒当时很成功地使用了这种密码，这也许是因为他的敌人绝未想到他是在使用密码。而如今人们对加密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利用凯撒轮作为工具对凯撒密码的描述可以改换成用数学的方式来定义。我们将在此阐述这部分内容，不过读者若对使用数学概念感到胆怯，完全可以跳过这段文字，继续去读下一节。

在介绍凯撒密码时，我们注意到26移位与0移位是相同的。这是因为26移位恰是凯撒轮旋转了一整圈。这一推理可以应用至其他移位，即任一移位等价于0到25之间的某个数的移位。例如37移位，是通过凯撒轮转一整圈然后再经过11移位得到的。那么，这个例子中的37移位等价于11移位这种说法就可以写成37 = 11（mod 26）。

这就是使用了模**26**的算术 ，其中的26称为模 。模算术——除26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模——在一些密码学领域里起着关键作用。所以在本章末我们增加了一个附录，以使读者熟悉初等数论这一数学分支中的相关定义与作用。

凯撒密码有时也称为加法密码 。为了说明缘由，我们只需以如下方式为各个字母分派一个整数值：

$$A = 0，B = 1，\ldots\ldots，Z = 25$$

用y移位的凯撒密码进行的加密，就是用数x + y（mod 26）来代替数x。例如，N 是字母表中第14个字母，所以N = 13。用15移位对N加密，那么x = 13，y = 15，这意味着加密后的N 是13 + 15 = 28 = 2（mod 26），所以N 就被加密成了C。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加法密码的密钥个数太少了。如果想得到密钥个数多的密码系统，那我们可以试着扩展该系统，考虑引入乘法作为一个替代的加密法则。然而，如果我们要这样做，由于加密必须是一个可逆的过程，“乘法密钥”的个数就必须有所限制。

假设我们想用乘2来加密，仍利用模26的算术，这样做的结果是A和N 两者都被加密为**A** ，B 和O 则都被加密为**C** ，等等。这样只有偶数代表的字母才会出现在密码文中，而密码文中每个这样的字母可能代表着两个字母中的一个。这使得解密几乎变得不可能了，因此不能用乘2来加密。另一个更为有趣的例子是用乘以13来加密，这时字母表中有一半的字母会被加密为**A** ，而另一半字母被加密为**N** 。事实上只有1、3、5、7、9、11、15、17、19、21、23或25这些数可以用作乘数来进行加密。

简单代换密码

虽然具有大量密钥是密码安全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还要强调，有大量的密钥并不能保证密码系统一定是坚固的。简单代换密码（或称单字母表密码）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我们下面来详细地讨论它。讨论这种密码，不仅能说明依赖大量密钥作为系统强度指标的危险性，而且还能解释所用语言（此例中是英语）的统计特性是可能被攻击者充分利用的信息。

要制作一个简单代换密码，我们可以在一个严格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字母表下面，写下一个按随机顺序排列的字母表，例如：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D	**I**	**Q**	**M**	**T**	**B**	**Z**	**S**	**Y**	**K**	**V**	**O**	**F**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E	**R**	**J**	**A**	**U**	**W**	**P**	**X**	**H**	**L**	**C**	**N**	**G**

该密码的加密密钥与解密密钥是相同的，就是粗体字母的次序。

加密规则是“将每个字母替换为位于它下面的字母”，解密规则是相反的程序。例如，按照此图所示的密钥，对应于*GET* 的密文是**ZTP** ，而对应于**IYZ** 的明文信息为*BIG* 。顺便注意一下，凯撒密码是简单代换密码的一个特例，即位于下面的粗体字母排列只是将字母表移了一下位。

简单代换密码的密钥个数，等于字母表中26个字母可按不同顺序排列的方法数，它被称为26的阶乘，记为26！，也就是
$26\times25\times24\times\ldots\ldots\times3\times2\times1$，等于

403,291,461,126,605,635,584,000,000。

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数，几乎没有人会用穷举搜索法去寻找密钥。然而如此巨大的密钥数量本身也带来了问题，而且在应用简单代换密码时会出现很多有关密钥管理的问题。第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不同于凯撒密码，简单代换密码的密钥很长，很难记住。因此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这种类型的系统都是手工操作的，密钥常被写在一张纸上。如果这张纸被人看见或偷去，就会危及这个系统的安全。如果这张纸丢失，则所有加了密的信息就在下面这种意义上“丢失”了：真正的接收方不得不破译这个算法以找回信息。

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使用者试图找到能够产生容易记忆的密钥的方法。一种常见的方法是想出一个密钥短语，去掉所有重复的字母，让它作为密钥的“开头”，然后按字母表顺序加上尚未出现过的字母，使之扩展成完整的密钥。例如，如果我们设密钥短语为“We hope you enjoy this book”（我们希望你喜欢这本书），去掉重复字母后即变为“wehopyunjtisbk”，那么该密钥便是

W E H O P Y U N J T I S B K A C D F G L M Q R V X Z

显然，当限制密钥只能从密钥短语导出时，密钥的数目会大大缩减，因为在26！种可能的简单代换密钥中，相当大的比例是不可能由一个英语短语用上述方法导出的。然而，这数目对于穷举搜索法而言

还是太大而无法施行，不过此时的密钥已经容易记住了。

简单代换密码的第二个明显的问题是：很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密钥将同一信息加密成同一密文的情况。例如，假定信息为“*MEET ME TONIGHT* ”（今晚来见我）。我们使用第一个例子中的密钥来对其加密，则密文为**FTTP FT PREYZSP** 。但是任何一个将*E* 变成**T** 、*G* 变成*Z* 、*H* 变成**S** 、*I* 变成**Y** 、*M* 变成**F** 、*N* 变成**E** 、*O* 变成**R** 以及*T* 变成**P** 的密钥，都能导出同样的密文。此类密钥的个数多达

$$18！ = 6,402,373,705,728,000。$$

这显然意味着，至少对于这类密钥来说，我们不应该假定攻击者需要确定出全部密钥才能从窃听到的密文中得到我们的信息。

在讨论攻击者如何利用英语这种语言的统计特性破解一些密码（也包括简单代换密码）之前，我们通过精心选择的4个简短的例子来说明简单代换密码的一些独特性质。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假设给定的密文已被他人窃听，而且此人知道该信息是用英语写的，还知道加密者使用的是简单代换密码。

例**1**：**G WR W RWL**

因为在英语中只有两个单词是由一个字母构成的，所以可以合理地假定要么**G** 代表*A* 、**W** 代表*I* ，要么相反。此时很容易去掉**G** 代表*A* 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很快得出结论：该信息前面的几个字母为*I AM A MA* ，最后一个字母只有有限的几种可能性。如果我们恰好知道这条信息是一个完整的英语句子，那几乎可以肯定它就是*I AM A MAN* 。这一简单的推理没有利用任何密码分析技巧，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或多或少地“屈从”于英语的语言结构。还要注意到，尽管这一推理尚未确定出密钥，但却将密钥数目从26！减少到了22！。如果这只是一个更长的信息的开头部分，我们或者需要另外的论证来确定密钥的其余部分，或者需要进行工作量虽已缩减、但计算上仍然难以实行的密钥搜索。我们还需指出，为了避免这类攻击，传输信息时通常都以5个字母为一组发送，这样就隐藏了词的长度和（或）词的结尾

等信息。

例**2**：**HKC**

关于这个密文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可说的不多。由于没有别的情报可参考，这条信息可能是任何由3个不同字母组成的某个有意义的字序。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删去几个密钥，譬如那些同时把*Z* 加密为**H** 、*Q* 加密为**K** 、*K* 加密为**C** 的密钥。然而余下的可能的密钥数还是太多了，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单靠窃听到的这条密文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的确，如果我们想发一条只有3个字母的信息，那么简单代换密码就足够了，破解密文的密钥穷举搜索法将会产生所有（不同字母组成的）可能是密文的三字母词。

例**3**：**HATTPT**

对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限制**T** 所代表的明文字母的数目。我们还可以放心地推断出**T** 或**P** 中的一个必代表元音字母。此外，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拦截到的信息是一个完整的单词，那么我们就能够写出所有可能的词汇。*CHEESE*、*MISSES* 以及*CANNON* 就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例**4**：**HATTPT** （已知这条信息是一个国家的名称）

我们相信这个例子中的信息必定是*GREECE* 。例3与例4的区别在于，我们得到了关于例4的额外情报，使得攻击者的任务从不可能转化为轻而易举。这自然是“战时”情报部门的职责之一。通常正是他们的情报成为密码分析人员破译敌人密码的决定性因素。

英语的统计特性

上节讲的都是一些简短的、精心挑选出来的例子，用以说明一些具体问题。然而，即使是用简单代换密码对相当长的英文信息进行加密时，还是存在一些直接的攻击方法，它们可以破译出信息和密钥，或至少大部分密钥。这些攻击充分利用了英语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特征。表2列出了字母表中的字母使用的频率（以百分比表示）。它们

是根据大量报纸和小说中节选出的段落，共约30多万个字母样本中统计出来的（此表源自《密码系统：通讯的保护》中的一张表，此书由H. J.贝克［H. J. Beker］和F. C.派珀［F. C. Piper］编写）。

表2．英语文章中字母的相对预期频率

字母	%	字母	%
A	8.2	N	6.7
B	1.5	O	7.5
C	2.8	P	1.9
D	4.2	Q	0.1
E	12.7	R	6.0
F	2.2	S	6.3
G	2.0	T	9.0
H	6.1	U	2.8
I	7.0	V	1.0
J	0.1	W	2.4
K	0.8	X	2.0
L	4.0	Y	0.1
M	2.4	Z	0.1

这些数据与其他作者编制的大量表格的内容是相符的，可以解释为英语文本中这些字母出现的预期频率。它们清楚地表明，英语文本可能会被很少的一些字母所支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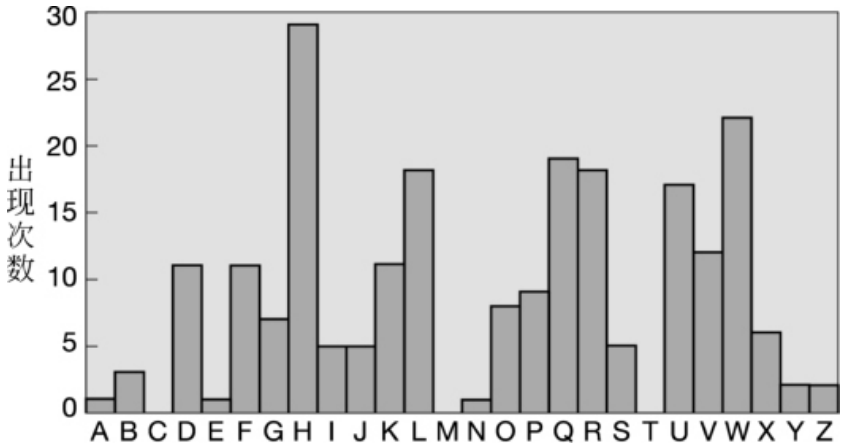

使用简单代换密码得到的一份密文中字母出现的相对频率直方图

当使用简单代换密码时，字母表中每个特定的字母不论出现在文本的什么地方，都用同一个替换字母代替。于是，比如我们在加密时令**R** 代表*E* ，那么密文中**R** 出现的频率就等于原信息中*E* 出现的频率。这就意味着，如果信息中的字母出现的频率如表2所示，那么密文中的字母出现的频率也会表现出同样的不平衡性，只是字母间的频率分布不同了。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画了一个频率直方图，用以表示使用简单代换密码得到的一份较长密文中字母出现的频率。

比较表2与这张直方图，密码分析者可以合理地猜想**H** 对应于*E* ，而**W** 对应于*T* 。因为英语中最常用的三字母词无疑是*THE* ，那么攻击者可以充满自信地假定密文中出现最多的三字母词应是**W*H** ，其中，*代表某个固定的字母。这不仅确认了最初的猜测，还暗示明文中与字母*对应的是*H* 。若读者有兴趣验证破译这些密码有多么容易，应该尝试去读下面这段文字，它是用简单代换密码加密的一段密文。

DIX DR TZX KXCQDIQ RDK XIHPSZXKPIB TZPQ TXGT PQ TD QZDM TZX KXCJXK ZDM XCQPVN TZPQ TNSX DR HPSZXK HCI LX LKDUXI. TZX MDKJ QTKFHTFKX DR TZX SVCPITXGT ZCQ LXXI SKXQXKWXJ TD OCUX TZX XGXKHPQX XCQPXK. PR MX

ZCJ MKPTTXI TZX. HKNSTDBKCOPI BKDFSQ DR RPWX VXTTXKQ TZXI PT MDFVJ ZCWX LXXI ZCKJXK. TD HDIWPIHX NDFKQXVWXQ DR TZPQ SCPKQ SCPKQ DR KXCJXKQ HCI SKDWPJX XCHZ DTZXK MPTZ HKNSTDBKCOQ MPTZ TZPQ VXTTXK BKDFSIB.

任何一位破译了这段密文的读者，几乎肯定利用了文字间的间隔所提供的信息。如将加密前的英语中的间隔去掉，破译就会困难得多。

在结束这一简短讨论之际，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定量地给出“长”密文的概念。当然，在这方面并没有精确的答案。200个字母长的密文大概就足以利用上述统计信息解出了。此外我们发现，学生们通常能破译大约有100个或更多一些字母的密文。

作为题外话，我们要强调，并不能保证每个特定信息的统计特性都精确地符合表2。例如，当加密私人信件时，“you”这个词很可能就会像“the”一样常见。为了举例说明一个信息的统计特性可以被人为地操控到什么地步，我们要告诉大家一本200页的小说，其中竟没有用到字母E（见吉尔伯特·阿代尔［Gilbert Adair］翻译的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的著作《虚无》［*A Void*］）。

上文讲述的这种攻击方式能够成功的原因是几个“最常用”的字母似乎“主导”着信息，与其密文相等价的明文能被很容易地确认出来。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有一种方法是采用双字母组 进行简单替换，双字母组是指连续的两个字母组成的字母对，如果这样做，我们的密钥将是676个字母对的一种排列。这时我们的密钥非常长，而且其数量空间达到676！，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不过，这种方法相当笨拙，并且它也会遭受同一类型的攻击，因为正如单字母的情形一样，长信息同样会被相对较少的几个双字母组所主导。

显然，要模仿上面的简单代换密码的密钥那样，把所有的676个双字母组列表，并在其下列出相应的密文，是不太现实的。因此，我们需要某种简单的方法去确定密钥，并表示加密和解密算法。现在我们就给出一种基于双字母组的密码作为例子，它可能的密钥的数量相

对较少。

普莱费尔密码

普莱费尔密码 是查尔斯·惠特斯通（Charles Wheatstone）爵士与莱昂·普莱费尔（Lyon Playfair）男爵于1854年发明的，在英国战争部一直使用到20世纪初，包括在布尔战争期间。它是“双字母组”密码的一个例证，这意味着字母是成对而不是单个加密的。密钥是一个5行5列的方阵（内含25个字母，即在字母表中删去J之后剩下的字母），密钥个数达到25！，亦即

15,511,210,043,330,985,984,000,000。

在用普莱费尔密码加密之前，信息必须稍稍重新排列一下，方法如下：

- 用I代替J；
- 将信息写成字母对的形式；
- 避免出现同样的字母组成的字母对——如果出现，则在它们中间插入Z；
- 如果写出的字母个数是奇数，则在结尾处加上Z。

为了解释该密码的运作方式，我们选取一个具体的密钥，当然我们的选择不失一般性。

S	T	A	N	D
E	R	C	H	B
K	F	G	I	L
M	O	P	Q	U
V	W	X	Y	Z

一旦信息得到了适当的重新排列，我们便给出加密规则。为了使我们的叙述更清楚，我们将原来的密钥扩充为6行6列。第六行与第一行相同，第六列与第一列相同。于是，在我们的例子中，扩充后的密钥如下图。

S	T	A	N	D	S
E	R	C	H	B	E
K	F	G	I	L	K
M	O	P	Q	U	M
V	W	X	Y	Z	V
S	T	A	N	D	

加密规则如下：

- 如果两个字母位于密钥中的同一行，则每个字母都替换为扩充后的密钥中位于它右侧的字母。
- 如果两个字母位于密钥中的同一列，则每个字母都替换为扩充后的密钥中位于它下方的字母。
- 如果两个字母既不在同一行，也不在同一列，则第一个字母替换为与它同行，但列数与第二个字母相同的字母，第二个字母替换为与刚使用过的三个字母形成矩形的那个字母。

现在我们来加密下述信息：*GOOD BROOMS SWEEP CLEAN*（好扫帚扫得干净）。

由于该信息中没有字母J，我们只须在用字母对的形式写这条信息时适当地加入字母Z，这样便得到：

GO OD BR OZ OM SZ SW EZ EP CL EA NZ

于是，根据我们选定的密钥，*GO* 变为FP；*OD* 变为UT；*OM* 变

为PO等，全部密文变为

FP UT EC UW PO DV TV BV CM BG CS DY

与简单代换密码一样，使用者倾向于使用一个密钥短语来确定密钥矩阵。方法与简单代换密码相同，即完整地写下这个密钥短语，去掉重复字母，再按字母表的顺序加上没用到的字母。因此，如果这个短语是UNIVERSITY OF LONDON，去掉重复字母后就变为UNIVERSTYOFLD，那么所得方阵就如下图所示。

解密总是加密的逆过程。任何一位希望确保自己真正理解了普莱费尔密码是如何运作的读者，不妨解密一下**MBOUBTZE**，可利用下面的方阵作密钥（答案是一个由7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单词，我们希望该词并不反映读者的精神状态）。我们就不讨论这种密码的密码分析问题了。容易描绘又很有趣的密码例子还有很多。本书最后会提供合适的参考资料。

U	N	I	V	E
R	S	T	Y	O
F	L	D	A	B
C	G	H	K	M
P	Q	W	X	Z

同音异词编码

改进简单代换密码的另一种途径是通过引入一些附加的符号来扩展字母表，使得明文中诸如E这样的字母能用不止一个密文符号来表

达。

这些附加的符号通常称为随机元素（或简称随机元），扩展字母表的过程叫做同音异词编码。我们可以通过介绍一个密码来加以说明，其中密文字母表是数字00、01、02、……、31。每个密文数字仅代表唯一一个明文字母，但是字母*A*、*E*、*N*、*O*、*R*、*T* 中任何一个都由两个不同的数字来代表。

作为例证，我们可以像下列图表那样给每个字母指定相应的数。

A	*A*	*B*	*C*	*D*	*E*	*E*	*F*	*G*	*H*	*I*	*J*	*K*	*L*	*M*	*N*
01	07	14	21	04	13	27	20	29	31	06	28	12	30	17	00

N	*O*	*O*	*P*	*Q*	*R*	*R*	*S*	*T*	*T*	*U*	*V*	*W*	*X*	*Y*	*Z*
18	26	19	09	10	25	23	02	08	24	22	05	16	15	11	03

在上述对应下，*TEETH* 这个有两对重复字母的词，可以写为24 27 13 08 31。不知道这个密钥的人，都会认为该密文的5个符号是不同的，但真正的接收者绝不会混淆。

上面选出的6个字母，可能是明文中最常用的字母。我们以*E* 为例，如果我们随机地从两个选定的数字中确定一个代表*E* ，那么我们可以预计这两个数字中的每一个在密文中占的比例为6%。一般而言，同音异词编码的作用就是保证密文的预期频率直方图能比明文的预期频率直方图更平缓些。这样就增加了利用统计法进行攻击的难度。

注1：在这个密码中，我们把0、1、2写为00、01、02等。在不使用空格时，我们需要用这种方法来区分（比方说）数字“12”与数字“1后面跟着一个2”。

24	29	25	00	20	01	12	27	10	01	12	06	29	07	08
31	29	05	07	14	20	26	01	04	26	20	06	28	29	28
05	04	31	28	18	30	01	13	21	26	25	24	26	12	29
04	26	31	18	23	15	21	25	26	31	28	26	30	10	01
21	07	31	18	16	12	12	28	18	13	05	08	21	24	30
20	21	25	24	21	30	10	18	17	19	31	28	18	05	12
31	05	24	09	21	08	26	05	08	14	12	17	27	07	04
18	20	08	12	05	25	04	13	27	31	12	28	18	19	05
24	31	12	28	05	12	12	28	18	08	31	01	12	21	08
31	21	24	08	05	23	18	19	10	01	12	12	26	23	15
26	05	25	08	21	31	21	08	07	29	12	08	29	26	05
08	14	12	17	21	04	26	25	12	21	19	14	31	28	18
30	17	30	27	10	01	20	10	26	31	12	26	20	28	21
25	12	28	18	30	10	05	21	07	12	18	16	31	30	01
12	21	18	25	24	26	01	07	04	10	27	24	09	05	23
26	13	29	31	28	11	18	20	14	21	15	30	29	20	12
01	07	31	19	17	23	12	28	26	24	23	14	30	12	01
07	01	10	14	08	12	21	25	19	01	24	31	13	20	18
05	09	21	07	00	24	21	30	28	26	20	08	27	08	27
05	10	10	14	21	07	11	29	10	11	18	08	01	15	21
16	31	27	23	26	17	19	08	24	21	18	25	12	21	19
21	24	20	18	01	08	17	07	21	25	00	05	25	04	21
07	08	30	21	20	18	04	00	27	26	08	08	06	17	23
09	21	07	12	28	21	08	24	17	25	31	18	16	31	06
26	25	17	12	18	31	28	01	12	31	28	26	24	20	14
30	12	17	00	20	01	30	28	21	24	12	18	05	15	18
15	30	10	29	14	18	04	01	31	13	10	26	12	24	28
10	26	14	30	05	23	09	21	07	24	10	27	04	26	04
30	26	17	30	10	26	06	21	12	28	05	07	01	30	31
21	31	27	04	18	19	17	23	24	20	17	08	08	06	17
20	04	30	27	03	03	10	26	08						

注2：破译普通的简单代换密码相对较易。我们希望所有的读者

都破译出了前文中的那一段密文。破译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密码就需要更大的耐心和更好的运气。任何需要被说服或喜欢这类难题的读者，不妨试着读读下列密文。仅有的情报是，这是一个英语文本，是用上文讨论过的带有同音异词编码的简单代换密码加密的。密钥未知，但不是上面所列的那张表。此外，明文中的字母是按5个一组写出的（这意味着攻击者不能识别短的词，尤其是一个字母的词）。这个练习不容易，我们并不强求读者非得一显身手不可。

多字母表密码

使用同音异词密码时，密文的频率直方图因字母表范围的扩大而变得更为平缓。这使得同一个明文符号可以用多个密文符号来代表。但实际上，每个密文符号仍然只代表唯一的一个明文符号，这样就总是存在着下述危险：对于给定的密钥，攻击者能汇编出一部已知的明文与密文相对应的词典。

另一个可以使频率直方图平缓化的方法是使用多字母表密码。在使用多字母表密码时，代替特定明文字母的密文符号，在整个密文中可能发生变化，例如根据它在明文信息中的位置或根据位于它前面的明文的内容而发生变化。对于这种密码而言，同样的密文符号可以代表不同的明文字母，这在同音异词编码中是做不到的。

我们必须再次指出，我们描述的这些简单的密码例子，现在已不再使用。我们之所以花费笔墨来讨论，是为了借此说明现代算法设计者必须避免的一些陷阱。至于我们在前面讲的那些例子，则是为了阐释一些密码分析的技巧，而且这些例子能帮我们编出一些既有教益又有趣味的练习。

维热纳尔密码

维热纳尔密码 大概是最为著名的“手工编制”的多字母表密码，它

得名于16世纪法国的一位外交家布莱兹·德·维热纳尔（Blaise de Vigenère）。虽然它早在1586年就已问世，但直到200年后才得到广泛承认，最后在19世纪中叶被巴比奇（Babbage）和卡西斯基（Kasiski）破译。有趣的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部同盟军就使用了维热纳尔密码，而南北战争时期这个密码早已被破译了。这可以从尤利西斯·S. 格兰特将军 [1] 的一段话中得到印证："我们有时花太多时间去破译拦截到的信息，得不偿失，不过有时它们提供了很有用的信息。"

维热纳尔密码利用维热纳尔方阵来进行加密。这个方阵最左边的（密钥）列是英文字母表，对于此列的每一个字母，与它相对应的那一行是字母表的一个循环，并以该字母为循环的起始字母。所以最左边这列上的每个字母实际上都对应着一个凯撒密码，其移位由该字母所确定。例如，字母g所对应的就是6移位的凯撒密码。

密钥	明文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b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c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d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e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f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g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h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i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j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k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l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m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n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o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p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q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r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s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t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u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v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w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x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y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z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维热纳尔方阵

利用这个方阵设计密码的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是选择一个无重复字母的密钥词（或密钥短语）。如果明文信息比密钥词长，那么就重复密钥，重复次数视需要而定，这样，我们就能得到一个跟信息一样长的字母序列。然后把该字母序列写在我们的信息下面。例如当信息是 *PLAINTEXT* 而密钥词是“fred”时，我们得到：

信息	*P*	*L*	*A*	*I*	*N*	*T*	*E*	*X*	*T*
密钥	**f**	**r**	**e**	**d**	**f**	**r**	**e**	**d**	**f**

下面我们利用该方阵来加密这条信息。

密钥	明文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b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c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d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e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f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g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h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i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j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k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l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m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n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o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p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q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r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s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t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u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v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w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x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y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z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利用维热纳尔方阵以密钥字母f对P进行加密

为了加密第一个字母*P* ，要使用位于它下面的密钥字母，此时是**f** 。于是，加密*P* 时我们从方阵中由**f** 所对应的那行中读出位于*P* 下方的字母，即**U** 。类似地，加密*L* 时，从**r** 所对应的那行中取出位于*L* 下

方的字母，即**C** 。用密钥字母**f** 对*P* 加密的过程如下图所示。

凡是能弄明白这一过程的读者，应该都能得出以**fred** 为密钥词对*PLAINTEXT* 进行加密所得到的密文是**UCELSLIAY** 。

这意味着我们知道：

信息：*P L A I N T E X T*

密钥：**f r e d f r e d f**

密文：**U C E L S L I A Y**

现在我们能看到，明文字母*T* 在密文中可表示为**L** ，也可表示为**Y** ，而密文字母**L** 既可以代表*I* ，也可以代表*T* 。很清楚，我们利用这种密码，能够防止密文中的字母频率具有与用简单代换密码得出的密文所显示的频率相同的模式。

维热纳尔密码有很多变种，比如其中有一种允许密钥词中出现重复的字母。每个变种都具有一些细微的不同特征，从而引发攻击方式的微小变化。不过我们将只关注前文已经定义的那种简明的系统。

维热纳尔密码是多字母表密码的特例，它以严格的轮换方式重复使用一串（短的）简单代换密码。这种密码所使用的密码组件的数目称为周期 ，显然，我们在上文所描述的这种版本的维热纳尔密码，其周期等于密钥词的长度。

在继续讨论周期性密码之前，有一点值得关注，例如，一个周期为3的多字母表密码，无非就是三字母词的简单代换密码的特例。这个简单的实例印证了一条具有普遍性的原则，即改变字母表可以改变密码的“性质”。目前我们集中讨论的密码，其基本符号是英语字母表中的字母。在讨论更现代的密码时，我们会倾向于将所有信息都看作是以二进制数字（0和1）为基础的序列。

正如我们已指出的，使用多字母表密码的目标之一就是对基础语言中的字母频率加以伪装。我们画了一个直方图来说明这一目标是如何达到的。该图显示了一篇特定的密文——使用周期为3的维热纳尔密码对一段英文加密所得——的频率图。

这个直方图与我们在前面给出的那个直方图之间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区别。最突出的几点是，在第二张图中每个字母都出现了，而且没有一个字母处于如第一张图中**H** 那样明显的主宰地位。第二张图无疑比第一张图平缓些，因此潜在的攻击者无法立即从中获得帮助。查看第二张直方图的人可能会被迷惑而推断图中的密文字母**R** 代表明文中某处的字母E ，然而他们不会知道这个字母E 出现的具体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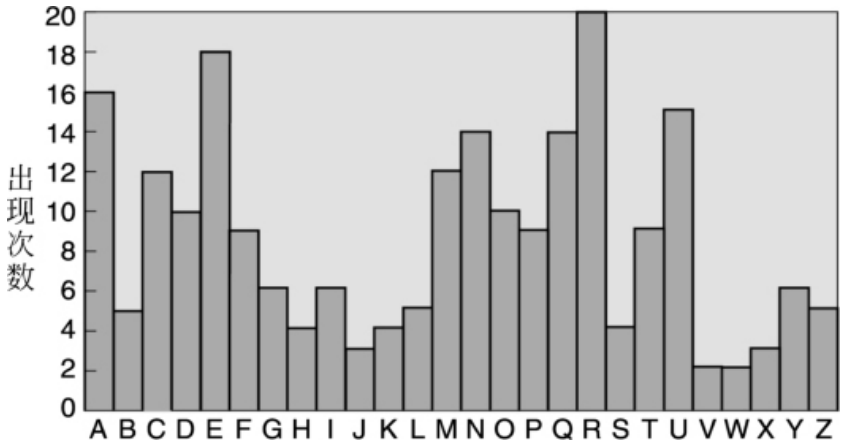

使用三个严格轮换的简单代换密码加密的一份密文的频率直方图

一般来说，我们预期该直方图的平缓性反映了周期的长度，而密码的周期越长就越难破译。在某种意义下，这一论断是正确的。然而，实际上使用周期性多字母表密码的最大好处，就是使得密码分析学家需要知道更多的密文才能开始攻击。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我们来关注维热纳尔密码。我们的某些断言对于任一多字母表密码来说都是正确的，而其他一些结论则依据我们所定义的维热纳尔密码的特征的不同而变化。对读者而言，区分这两种情况是很重要的。因此，改变多字母表密码可能会改变攻击的细节，并对密码系统有所“加强”。然而，那些密钥比信息短得多的多字母表密码，还是很容易遭受这里提到的攻击形式的某些变种的袭击。

为了破译维热纳尔密码，确定出密钥词就足够了。如果已知周期，而且周期不太长，那么可以编写一个计算机程序来对密钥进行穷

举搜索。作为具体的例证，读者不妨对密文**TGCSZ GEUAA EFWGQ AHQMC** 进行密钥搜索，假定它原是一条英文信息，是使用密钥词字长为3的维热纳尔密码进行加密后所得。任何一位读者，只要试着去做，都会面临一个有关如何认出正确的密钥词的有趣问题。基本的假定是这个三字母词是唯一的，它使所得到的明文是有意义的。而真正的问题所在，恰是如何确认明文是有意义的。有一种办法是坐在屏幕前检查应用每个密钥得出的结果。显然这是一件既乏味又费时的事。但是，必须找出各种各样的选择。

当我们要对长度为p 的密钥词进行穷举搜索时，系统地尝试所有由p 个字母组成的那些序列，也许比只考虑英文词要容易些。于是，对已知周期为p 的维热纳尔密码进行密钥穷举搜索大概需要26^p 次试算。这意味着周期加长时，密钥穷举搜索将很快变得难以驾驭。无论如何，如果周期已知，总是可以比较直接地确定密钥而无须进行搜索。一种方法是将密文改写为p 行，并使得每一列都按原来的顺序写。例如，对于$p=3$，若密文为$c_1\ c_2\ c_3\ c_4\ c_5\ c_6\ c_7\ c_8\ c_9\ \ldots\ldots$我们则可以把它写为

$$
\begin{array}{l}
c_1\ c_4\ c_7\ c_{10}\ \ldots \\
c_2\ c_5\ c_8\ c_{11}\ \ldots \\
c_3\ c_6\ c_9\ c_{12}\ \ldots
\end{array}
$$

这样排列之后，每一行都是使用同一简单代换密码所得出的，这种密码作为维热纳尔密码的一个特例，乃是一种加法密码。我们可以对每一行使用上一节提及的统计论证。事实上，对于维热纳尔密码来说，若密文长度与周期p 相比较而言很长，那么足以确定出每一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母并推定这些字母代表E 、T 或A 中的某个字母。这一观察充分利用了如下事实，即对每一行而言，其所使用的简单代换密码就是凯撒密码。正如我们已提到过的，这意味着掌握了一组对应的明文与密文就足以确定出密钥。因此，如果凭借聪明的猜想与好运，能从每一行确定出与一个密文对应的字母，那么密钥便可确定出

来。

到目前为止的论述表明，试图破译维热纳尔密码的攻击者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周期p 的确定。一种可能的办法是系统地尝试各种小值的p 。但是也有一些简单巧妙的方法可用。最为著名的是卡西斯基检测，巴比奇就使用过它——巴比奇是破译该密码的第一人。他的方法是在密文中搜索重复的（长）字母串。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可能代表了用相同的密钥字母加密的信息中一些相同的段落。它意味着两个重复模式之间的距离可能等于周期的整数倍（对维热纳尔密码进行的密码分析，在辛格所著的《码书》中有详细讨论）。

换位密码

到目前为止，我们给出的所有例子都是将信息以及替代信息的字母或字母组代换成另外的字母或字母组。所以，它们都可归入替代密码的行列。然而，还存在着另外一族基于改换字母书写次序的密码。这就是所谓的换位密码 。下面我们给出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我们的这个例子中，密钥是一个很小的数。我们用5作为密钥。在利用这个密钥加密信息时，我们先将信息按5个字母一行写好，加密时则从第一列字母开始写，然后写第二列字母，等等。如果这个信息的长度不是5的倍数，那么加密前需要在信息的末端加上适当个数的Z。整个过程通过讲解一个小例子便一目了然。

我们来加密信息*WHAT WAS THE WEATHER LIKE ON FRIDAY*（星期五的天气怎么样）。因为密钥是5，加密过程的第一步是将信息写为5个字母一行的形式，即：

W	*H*	*A*	*T*	*W*
A	*S*	*T*	*H*	*E*
W	*E*	*A*	*T*	*H*
E	*R*	*L*	*I*	*K*
E	*O*	*N*	*F*	*R*
I	*D*	*A*	*Y*	

因为信息长度不是5的倍数，我们必须加上一个Z，从而得到：

W	*H*	*A*	*T*	*W*
A	*S*	*T*	*H*	*E*
W	*E*	*A*	*T*	*H*
E	*R*	*L*	*I*	*K*
E	*O*	*N*	*F*	*R*
I	*D*	*A*	*Y*	*Z*

现在我们依此按一列一列的顺序读出如下密文：

WAWEEIHSERODATALNATHTIFYWEHKRZ

为了得到解密密钥，我们只需用信息长度除以密钥。在此例中即用30除以5，答案为6。解密算法与加密算法相同。对于此例，我们将密文按6个字母一行来书写，得到：

W	**A**	**W**	**E**	**E**	**I**
H	**S**	**E**	**R**	**O**	**D**
A	**T**	**A**	**L**	**N**	**A**
T	**H**	**T**	**I**	**F**	**Y**
W	**E**	**H**	**K**	**R**	**Z**

现在很容易看出，依次读出每一列的字母即可还原为原始信息。

这里给出的这种换位密码很容易破译。因为密钥必须是密文长度的除数，攻击者只须算出密文长度，然后依次试它的每个除数即可。

超级加密

至此，我们在本章中描述了一些简单的密码，其中多数是很容易破译的。现在我们来介绍一种概念，即组合两个或多个弱的密码可以得出比原来任一个都强的密码。这个概念被称为超级加密 。它的基本思想十分简单，比如说我们想使用简单代换密码和换位密码来进行超级加密，那么只需先用简单代换密码加密信息，然后对所得的密文再用换位密码加密。我们还是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

比如我们要用密钥为2的凯撒密码和密钥为4的换位密码对信息 *ROYAL HOLLOWAY* 进行超级加密。先用密钥为2的凯撒密码加密便得到：

信息：*R O Y A L H O L L O W A Y*

密文：**T Q A C N J Q N N Q Y C A**

再用密钥为4的换位密码加密，于是有：

信息：*T Q A C N J Q N N Q Y C A*

密文：**T N N A Q J Q Z A Q Y Z C N C Z**

超级加密是很重要的技巧，现代的很多强密码算法都可以视为是用几个相对较弱的算法进行超级加密后的结果。

几点结论

从前面几节讨论过的若干实例可以清楚地看出，诸多因素影响着攻击者破译密码系统的机会。我们也已看到，虽然掌握密钥是攻击者最主要的目标，但如果所使用的基础语言结构性很强，那么他无须找

出整个密钥就有可能破译出特定的信息。事实上，我们前面给出的例子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在估计攻击者成功的可能性时，基础语言的结构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例如，我们很清楚，对随机数据进行伪装比起成功地加密英文文本要容易得多。对英文文本而言，保护短信息的安全比保护长信息要容易得多，这显然也是事实。确实，对于单独的一条短信息，比如说它只有3个或4个字母，那么很多弱加密算法就足够用来对它加密并保证其安全了。

附录

引言

在本附录中，我们将讨论两个基本的数学概念，即整数的二进制表示和模算术。两者都在密码术中起了关键作用。二进制数常常是学校教授的内容，模算术就不然了，但是对某些特殊的数值来说，比如7与12，人们会很自然地用到模算术。

二进制数

当我们用十进制数系写一个整数时，本质上使用了个位、十位、百位、千位等位的概念。这样，3,049表示千位是3，百位是0，十位是4，个位是9。在十进制数系中我们以10为基数，各个不同的位表示10的不同幂次，所以，$10^0 = 1$，$10^1 = 10$，$10^2 = 100$，$10^3 = 1000$，等等。

在二进制数系里，我们以2为基数。基本数字就是0和1，此时我们有个位、二位、四位（请记住$4 = 2^2$）和八位（$8 = 2^3$）等。这意味着每个二进制数串都可以视为一个数，例如101，表示四位是1，二位是0，个位是1，所以二进制数串101在十进制中表示$4 + 0 + 1 = 5$。类似地，1011表示八位是1，四位是0，二位是1，个位是1，因此在

十进制中，二进制数串1011 = 8 + 0 + 2 + 1 = 11。最后再举一个例子1100011，此时我们有7个数位，所对应的2的幂次分别为1、2、4、8、16、32、64。因此，在十进制数系中，这个二进制数串1100011代表64 + 32 + 0 + 0 + 0 + 2 + 1 = 99。

显然，任何一个正整数都可以写为二进制数串的形式，并且有很多种方法可用来确定这种形式。我们以两个例子来说明其中的一种方法。假设我们希望用二进制表示53这个数。2的各个幂次的值为1、2、4、8、16、32、64……。我们可以终止于32，因为其他幂次都大于53。现在53 = 32 + 21，而21 = 16 + 5，且5 = 4 + 1，所以，53 = 32 + 16 + 4 + 1。我们所做的就是将53写为2的幂次之和。现在我们知道53 =（1×32）+（1×16）+（0×8）+（1×4）+（0×2）+（1×1），所以在二进制中，53 = 110101。第二个例子是86。这一次2的最高幂次止于64，重复上面的推理，我们得出86 = 64 + 16 + 4 + 2，于是在二进制中86即为1010110。

术语比特（**bit**）是二进制数字（binary digit）的缩写。当我们提到一个n比特数时，我们是指将它表示成二进制数的形式时所需的比特数是n。在上面例子中，53是个6比特数，86是个7比特数。一般而论，在将一个十进制d 位数表示成二进制数时，所需的比特数大约为$3.32d$。

模算术

模算术只跟整数有关。若N是一个正整数，则模N的算术只会用到0、1、2、3、……、N - 1，即从0到N - 1的整数。

当N取某几个特定的值时，模N的算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虽然他们可能并不熟悉相应的数学术语。例如我们使用的12小时的钟表，实际上是在使用模12的加法。如果现在是2点钟，那么每个人都“知道”再过3个小时是5点钟；而过了15小时仍是5点钟。这是因为15 = 12 + 3，而每过12小时，所显示的时间是重复

的。其他的自然数还有N = 7（每周的天数）和N = 2（奇数与偶数）。

如果两个数除以N之后有相同的余数，我们就说它们是模N相等的。例如N = 7时，因为9 =（1×7）+ 2，23 =（3×7）+ 2，于是我们就说9与23模7相等。如果x和y模N相等，我们记为x = y（mod N）。注意，任何一个整数必定与0、1、2、……、N - 1中的一个值模N后相等。

作为模算术的应用实例，我们假定一个月的第一天是星期二，那么很清楚第2天是星期三，第3天是星期四，以此类推。第29天是星期几？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去查日历，或是把全月的每一天都写出来。另一种方法是利用日期的星期数具有每隔7天就重复的模式。所以，很清楚，第8天也是星期二。请注意，29 = 4×7 + 1，使用上面的数学符号可表示为29 = 1（mod 7），那么第29天恰是第一天之后过了4个星期，所以又是星期二。类似的推理告诉我们，因为19 = 2×7 + 5，那么第19天就是星期六。

介绍了模N概念在生活中的应用之后，其算术运算也变得简单易懂。例如，若N = 11，则5×7 = 2（mod 11），这是因为5×7 = 35 =（3×11）+ 2。我们也可以写出模N的方程。例如解3x = 5（mod 8）这个方程，意味着要找出一个x，使得3与x的乘积等于5模8。这个特定方程的解是x = 7。限于篇幅，本附录并不打算阐述解这类方程的方法。但很容易验证，x = 7确实满足3x = 5（mod 8）这个方程，因为3×7 = 21 = 2×8 + 5。在讨论模算术时，我们必须记住只“允许”使用整数。特别是当我们求解像3x = 5（mod 8）这样的方程时，答案必须是0与7之间的整数。

本书介绍模算术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因为两个最流行的公钥密码算法都使用模指数作为它们的基本数学方法。模指数其实就是指：对给定的整数x、a和N来计算x^a（mod N）。假定x = 5、a = 4且N = 7，那么5^4 = 5×5×5×5 = 625 =（89×7）+ 2，所以5^4 = 2（mod 7）。任何使用密码术的人都不需要具备进行这种计算的能力，但理解这些数学符号几乎肯定是有益的。

在讨论凯撒密码时，我们介绍了加法密码，即给字母表中的每个字母指定一个数，然后使用模26的算法。仔细查看维热纳尔方阵，我们可以发现对应于密钥字母a的第一行代表了移位为0的加法密码，由密钥字母b所决定的第二行代表移位为1的加法密码，等等。事实上，如果我们同时考虑到字母和数的对应，即A = 0、B = 1、……、Z = 25，那么，每个密钥字母无非就显示了一种加法密码的使用，且该加法密码的移位数等于与该字母相对应的那个数。这一简单的道理可能有助于人们编写能实施维热纳尔密码的程序。

在讨论加法密码之后，我们介绍了乘法密码的概念，并且列出了那些可能作为密钥的数。尽管我们并未讲明这张列表是如何得出来的，但可以很直观地检验它的正确性。对于数1、3、5、7、9、11、15、17、19、21、23、25，用其中任何一个数乘以代表字母表中26个字母的数，将得到26个不同的答数。这意味着这些数可以作为乘法密码的加密密钥。相应的解密密钥列在本段下面。尽管仍未说明这些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但可直接检验出它们是正确的。用代表字母的数先乘以加密密钥，再乘以与之对应的解密密钥，其效果应该使字母保持不变，即等于乘以1。例如我们来检验加密密钥3，其解密密钥是9，那么，我们只须证明$3 \times 9 = 1 \pmod{26}$即可；因为$3 \times 9 = 27 = 26 + 1$，所以它当然是正确的。

加密密钥	1	3	5	7	9	11	15	17	19	21	23	25
解密密钥	1	9	21	15	3	19	7	23	11	5	17	25

注释

【1】 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北军总司令。——译注，下同

第四章

不可破译的密码？

引言

出于实际考虑，第三章给出的例子都很简单。其中大多数都是很容易被破译的，尽管在它们被设计出来的那个时代情况并非如此。密码分析通常伴随着大量的尝试与错误，随着新的技术进步，特别是计算机的出现，试错过程已变得更为容易了。最明显的一种实施试错攻击的例子，是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的密钥穷举搜索法。假设有一个具有合理长度密钥词——比如说它有6个字母——的维热纳尔密码，在16世纪要通过手工计算来试验所有可能的密钥，恐怕会令人望而却步。然而，如果我们使用计算机，它每秒钟可以试验10,000个六字母密钥词，那么不到一天就可完成全部任务。

在我们从上一章的历史例证转向讨论现代技术之前，有必要来探讨一下不可破译之密码的概念。很多设计者都曾宣称他们的算法是不可破译的，结果往往是一败涂地。我们现在讲两个历史上著名的误信其密码不可破译的例子，一个发生在16世纪，另一个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16世纪时，苏格兰的玛丽（Mary）女王在她的密信中使用了简单代换密码的一个变种密码。这些通信谈到了两个计划：越狱并且暗杀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Elizabeth），以夺取英格兰王位。这些信被拦截并破译了，成为审判她的罪证。在这些密信中，玛丽与她的同谋者毫不隐晦地讨论他们的计划，因为他们相信别人都看不懂这些信。这个错误的代价是让玛丽断送了性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使用一种叫做谜密码机的装备来加密大量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军事通讯。谜密码机用于加密的机械结构看起来错综复杂，一台初级的谜密码机有多于10^{20} 种可能的密钥，甚至超过了某些现代算法。这导致了使用者相信谜密码是不可破译的。然而就如现在广为人知的情况那样，联军在不同的时期都破译过谜密码，部分原因是他们充分利用了敌方在使用过程和密钥管理中的

错误。破译工作的中心在布莱奇利公园里，现在那里是博物馆。据估计，在布莱奇利公园进行的工作使二战提前两年结束。

在本章我们将讨论完全保密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下，它是我们在加密信息时所期望达到的最好结果。然后，我们来探讨一次填充密码，它是唯一一种不可破译的算法。

完全保密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描述的大致情景是：一个发送者试图将一保密信息发送给预定的接收者，且在此过程中发送者使用了一个密码系统使得所传输的密文在第三方眼里是篇不可识别的电文。然而，即便第三方没能拦截到这次信息传输，但也有可能（尽管大多数情形下这种可能性是极其微小的）他们已经猜到了信息的内容。所以，给信息加密并不能确保第三方无法取得信息的内容，通信者所能指望的最好结果是当第三方设法拦截时，其拦截到的东西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有助于了解信息真实内容的情报。换句话说，密码系统应该迫使截获了密文的人仍要去猜测信息的内容。当然，密码系统完全无法阻止攻击者猜测信息。

能够达到上述目标的系统即可被认为提供了完全保密 。现在我们举一个小例子说明完全保密是可以做到的。

假定X先生正准备作出一个将严重影响一家公司股票值的决定。如果他作出的决定是“买”，那么股票就将升值。但如果决定“卖”，则将导致股票暴跌。此外假定公众知道他将传送这两个信息中的一个给他的股票经纪人。很清楚，任何人只要先于经纪人得知了这个决定，那他就有机会利用这个情报，根据决定的内容或是获利或是规避灾难性的损失。自然，无论如何，任何人都可自由地猜测信息的内容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他们有50％的胜算，但这样的行动与赌博没什么区别。

X先生希望一作出决定就尽快把他的决定通过公共网络发送出

去。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他和他的经纪人约定信息在加密后传送。一种选择是使用简单代换密码，我们已经说过，这对保护短信息来说往往就足够了。但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每个信息因其长度的不同而具有独特性[1]。假定拦截者知道通信使用的密码系统，那么当他得到了密文的长度后，他将对该信息的内容有100%的把握，尽管他还不能确定所用的密钥。

另一种选择是使用下述系统，其中两个密钥k1和k2具有均等的可能性。为了描述完整的算法，我们使用标准的数学符号。对于密钥k1，明文信息“买”的密文是0，而“卖”的密文是1，我们简写为E_{k1}（买）= 0和E_{k1}（卖）= 1。表达式E_{k1}（买）= 0应读作“使用密钥k1对明文‘买’加密的结果是0”。全部密码是：

密钥k1：E_{k1}（买）= 0，E_{k1}（卖）= 1
密钥k2：E_{k2}（买）= 1，E_{k2}（卖）= 0

下列图示是上述密码的等价写法：

	买	卖
密钥 k1	0	1
密钥 k2	1	0

应用这个系统时，比如说拦截者截获了0这个信息，那么他能推断出的所有结论就是：如果通信者使用的密钥是k2，则该信息为“卖”；如果使用的是k1，则信息为“买”。于是，拦截者将被迫去猜通信者到底用的是哪个密钥，因为这两个密钥被选用的机会均等，他能猜对的概率是50%。

注意，实质上在拦截到密文之前，攻击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去猜这个信息。而一旦得到密文，他们能做的仍是去猜密钥。由于密钥的个

数与信息的数目相同，所以前后两次猜对的机会是相等的。这就是完全保密。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攻击者猜中信息的机会有50%，这是很高的几率了。这样，尽管我们实现了完全保密，但我们并没有提供额外的保护措施来增加信息保密的可能性。不管怎么说，这种弱点要归因于信息的数量太小，而不是加密手段太差。

在真实生活的一些情景中，潜在信息的数量非常有限，此时信息被猜中的危险大于加密信息被破译的危险。一个几乎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例子是在自动柜员机（**ATM**）上使用带身份识别号码的信用卡或借记卡。在此情景中，使用者都有一个身份识别号码（**PIN**）用以证实他们拥有这张卡。如果PIN要经过某财政机构的中心计算机的确认，那么从ATM到主计算机间的信息传送是有加密保护的。如果使用者的卡丢了，那么任何捡到卡的人都可以将它插入ATM中，并键入他“猜测的”PIN。大多数PIN是由四个（十进制）数字组成的，所以至多有10,000个不同的PIN。那个捡到卡的人理论上可以不断地去猜那个PIN，直到找到正确的为止，这比破译密码要容易些。何况，对此问题也不存在密码术上的解决方法。认识到这一事实，大多数系统只允许出现三次输入错误，之后ATM将把卡吞掉。可见，在某些情况下，密码术只能部分地解决安全问题，为了提高安全性，需要实施特别的管理决策，上例就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

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关于完全保密的简单例子中，两个集团一知道他们可能需要交换机密信息时，或许就已作出使用何种密钥的协定。这个协定可能是在他们两家之一的基地秘密作出的。这些密钥的保密可能会采用物理手段，比如在使用之前将它们锁在保险箱里。这一做法的意义在第八章讲述密钥管理时，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尽管上面那个关于完全保密的例子中仅含有两个信息，但对于任何长度信息的通信，都可以设计出类似的保密方案。当然，完全保密只能在密钥数量至少与信息数量一样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一次填充密码

从我们对完全保密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完全保密是可以实现的，但对于存在大量潜在信息的系统，我们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对潜在的大量密钥进行管理。一次填充密码 是完全保密的密码系统的经典例子。假设信息是一段舍去了所有标点与空格的英文文本，它包含n个字母，那么密钥就是从字母表中随机生成的n个字母的序列，每个密钥仅使用一次以保护单个信息。加密规则就是在维热纳尔密码中使用的那种，但要用密钥替代后者的密钥词。如果我们按惯例将A到Z的字母依次和0到25的数字相联系，信息记为m_1 、m_2 、……、m_n ，密钥记为k_1 、k_2 、……、k_n ，则密文中第i个分量记为：

$$c_i = (m_i + k_i) \bmod 26$$

注意，此时密钥与信息具有相同的长度，这保证了在加密过程中我们不需要重复密钥。

这个算法有另一种很常见的版本，常被称为维南密码 ，其中所用的字母表是二元的，即只有0和1，密文是信息与密钥两者相加模2所得。毫无疑问，维南密码是一次填充密码在数字通信中使用的版本。

由于完全保密是可实现的，谁都不免要问：为什么它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为什么人们要用那些可能被破译的密码系统。在提示这类问题该如何回答之前，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储存数据的加密与保护通讯的加密并不是一回事。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通常集中关注通讯方面，因为其中会涉及更多管理方面的问题。

在定义一次填充密码时，我们只列出了加密算法和加密密钥。解密密钥与加密密钥相同，但解密算法要求从密文中减去密钥字母从而得到明文。通讯系统的工程师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可能很困难的问题。如何让对方得到这个随机序列？因为这个序列是随机生成的，发信人与收信人“不可能”同时生成同样的密钥。于是他们中的一方必须首先生成一个密钥，然后将其（秘密地）发送给另一方。这时，想要保证密钥的秘密不被泄露，在发送时需要对它加以保护。如果通信者之间

只有一条通信链路可用，那他们就需要再使用一个一次填充随机序列去保护这第一个序列。很清楚，这种推理将导致一个不可企及的要求，即要有无穷多的随机序列，其中每一个都用来保护前一个序列从发送方到接收方之间通信的安全。于是，使用一次填充密码的条件是通信者必须有第二种交流信息的安全手段。读者一定记得，完全保密系统的例子中所讲到的X先生和他的经纪人之间就有这样一条信道。一般认为，一次填充密码只用于最高层次的安全链路，例如莫斯科–华盛顿热线。在这种情形下，所生成并储存起来的随机序列是通过安全信使送达另一方的。然后随机序列能被储存在受到高度保护的地方，需要时产生，用完后立即销毁。必须认识到，这第二条安全信道既缓慢又昂贵，它不可能用于发送信息，因为此时人们可能需要对方立刻作出回答和反应。

我们已经提到过，在一个安全网络中，密钥配送是个疑难问题，它不仅限于一次填充密码。对第二条安全信道的要求也是很常见的。区别在于，一次填充密码的第二条信道所承载的传输量与信息传输量是相当的，但通常情况下第二信道承载的传输量要少得多。即使有第二条安全链路，一次填充密码仍然不适合包含很多网点的系统，因为每个网点都需要有与其他所有网点关联的安全链路。此时的疑难之点似乎在于掌握已使用过的密钥的信息，也许还涉及对大量密钥资料的管理。完全保密依赖于每个密钥只使用一次。对于一个庞大而频繁使用的网络而言，要管理好它所需要的全部密钥资源几乎是不可能的。

毫不奇怪，虽然一次填充密码展示了一种终极的安全水平，但几乎没有实际的通信网络系统使用。当然，如果有人只因私人之需加密文件并储存起来，那么他们不需要配送任何密钥。在很多储存方案中，唯一的难点就是密钥的存储，因此对于其中的某些方案来说，一次填充密码像其他任何密码一样可行。

注释

【1】 “买”（buy）在英语中有3个字母，而“卖”（sell）则有4个字母，因

此用简单代换密码加密后的信息长度是不同的。

第五章

现代算法

引言

在整个第三章，我们一直强调那里列出的例子并不能代表现代实用密码，现代加密算法更趋向于使用二进制数的运算，而不是我们例子中的字母代换。本章将讨论现代算法。因为这些算法比第三章例子中的算法更为复杂，所以我们不会去详细地描述任何具体的例子，而只是集中关注在设计它们时所使用的一般技巧。

比特串 [1]

正如我们刚才强调的，大多数现代密码不涉及字母代换，取而代之的是使用一种编码模式将信息转换为一个二进制数（比特）序列，即0和1的序列（亦称比特串）。最通用的编码模式大概是美国国家信息交换标准码（**ASCII**）。然后代表明文的这种比特序列被加密，所得到的密文仍是比特序列。

加密算法可以通过好几种方式作用于比特串。它们很“自然”地分为两类：流密码 和分组密码 。流密码要求对序列进行逐位加密，而分组密码要求将序列按预定的大小分成区组。ASCII要求用8个比特表示一个字符，因此若一个分组密码每个区组有64个比特，加密算法则同时作用于8个字符。

有一点很重要，即同一个比特序列可以写成很多不同的样式。特别是，写成的样式可能取决于序列被分成的区组的大小。

考虑下列12比特的序列：1 0 0 1 1 1 0 1 0 1 1 0。如果分成长度为3的区组，我们得到：100 111 010 110。任意一个长度为3的比特串代表从0到7的一个整数，这样上述序列就代表4 7 2 6。要是读者略过了第三章的附录并且不熟悉整数的二进制表示，那么请记住：000 = 0，001 = 1，010 = 2，011 = 3，100 = 4，101 = 5，110 = 6，111 = 7．

如果我们将上面同一序列分成长度为4的区组，则得到：1001 1101 0110。因长度为4的比特串可表示从0到15之间的整数，我们得到9 13 6。一般来说，长度为n的二进制序列可以代表从0到$2^n - 1$之间的一个整数。所以，一旦我们商定每个区组的长度为s，那么一个任意长度的二进制序列都可以写为从0到$2^s - 1$之间的整数组成的序列。

具体的数学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注意，同一比特串根据所选定区组的长度的不同，可以被表示为多种不同形式的整数序列。还有一点需要记住，那就是当区组的长度确定后，那些太小的数前面可能需要添加几个0以补足长度。例如整数5的二进制表示是101。但是如果区组的长度是6，则5应表示为000101，如果区组长度是8，5应表示为00000101。

另一种写比特串的通用方法是使用十六进制表示法（**HEX**）。对于十六进制表示法，比特串被分为长度等于4的区组，表示方法如下：

0000 = 0　0001 = 1　0010 = 2　0011 = 3

0100 = 4　0101 = 5　0110 = 6　0111 = 7

1000 = 8　1001 = 9　1010 = A　1011 = B

1100 = C　1101 = D　1110 = E　1111 = F

于是，上述序列用十六进制表示为**9 D 6**。

因为密码算法是作用于二进制序列的，我们需要熟悉一种常用的将两个比特合并在一起的方法，它被称为互斥“或”运算，常记为**XOR**或⊕。它与模2加法相同，定义如下：0⊕0 = 0，0⊕1 = 1，1⊕0 = 1，1⊕1 = 0。这些运算可以用下列表格表示。

	0	1
0	0	1
1	1	0

XOR 或⊕运算表

这种简单的运算给出了将两个长度相同的比特串进行合并的方法。我们可以对处于相同位置的两个二进制数作XOR运算。例如我们想计算10011⊕11001的值。10011最左边的比特是1，11001最左边的比特也是1。于是，10011⊕11001的最左边的比特是对这两个数串最左边的比特作XOR运算而得到的，请注意10011⊕11001最左边的比特是1⊕1，结果为0。继续使用这个方法，我们有10011⊕11001 = 1⊕1　0⊕1　0⊕0　1⊕0　1⊕1 = 01010。同样的计算可用下列图表表示。

1	0	0	1	1
1	1	0	0	1
1 ⊕ 1	0 ⊕ 1	0 ⊕ 0	1 ⊕ 0	1 ⊕ 1
0	1	0	1	0

流密码

不同的作者在使用流密码这个术语时含义略有不同。很多人谈论的是以词或以符号为基础的流密码。此时的信息是逐词（或逐符号）进行加密的，其中每个词（或符号）的加密规则由它在信息中的位置决定。第三章讨论的维热纳尔密码和一次填充密码都符合这个定义。也许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是著名的谜密码。但是在现代，人们通常使

用流密码 这个术语来指对明文逐比特进行加密的密码，本文也采用这一说法。很明显，对任一特定的比特来说可能发生的情况只有两种，或者是它的值变为另一个值，或者是它的值保持不变。因为一个比特只能取两个值中的一个，改变一个比特就意味着用另一个值替换它原来的值。进而，当一个比特改变两次时，它就变回了原来的值。

如果一个攻击者知道通信者使用的是流密码，那么他们的任务就是努力鉴别出哪些位置上的比特改变了，并将它改回原来的值。如果存在易被察觉的、可用来鉴别出那些变化了的比特的模式，那么攻击者的任务就变得简单了。所以，变化了的比特的位置不能让攻击者预测出来，但又必须能让真正的接收者容易识别。

对于流密码，我们可以将它的加密过程看作是两种运算——即变化和保持不变——构成的序列。这个序列由加密密钥决定，通常称为密钥流序列 。为简明起见，我们可以认为写0意味着“保持不变”，而1意味着“变化”。现在我们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下：明文、密文和密钥流全是二进制序列。

为了澄清我们的描述，假定明文是1100101，密钥流为1000110。那么，因为密钥流中的1意味着改变相应位置上明文的比特，所以我们知道明文最左边位置上的1必须改变，而下一个比特则保持不变。重复这种论证，我们便得到密文为0100011。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一个比特改变两次的效果是变回原来的值。这就是说，解密过程与加密过程是一样的，所以密钥流也决定了解密过程。

上面我们所讨论的过程无非是将两个二进制序列“结合”生成第三个二进制序列，在我们这个特定的例子中，它所依据的结合规则即为：“如果第二个序列在某个位置是1，则改变第一个序列在该位置上的比特”。这恰恰是我们在上一节定义的XOR或⊕运算。因此，设P_i、K_i 和C_i 分别代表明文、密钥流和密文中第i个位置上的比特，则密文中的比特C_i 可由公式$C_i = P_i \oplus K_i$ 得出。注意，解密由$P_i = C_i \oplus K_i$ 所定义。

本质上，流密码就是小密钥的维南密码的一个实用的改写版本。一次填充密码存在的问题是，因为密钥流是随机生成的，发送方与接

收方不可能同时生成同样的密钥流。于是需要第二条安全通道来配送这个随机密钥，这条通道与通信通道一样繁忙。流密码同样要求一个安全的密钥通道，但其通信量比一次填充密码小很多。

流密码可以用一个短密钥来生成一个长密钥流。这是利用二进制序列的生成程序实现的。注意，在第三章讨论维热纳尔密码时，我们介绍了利用生成程序从一个短字母密钥产生一个长字母密钥流的概念。但在那个例子中，生成过程很粗糙，因为它只取一个密钥词并加以重复。在实用的流密码中，密钥流的生成程序要复杂得多。上面我们之所以关注密钥流中处于位置i上的比特，是因为$K_i = P_i \oplus C_i$可以由明文与密文中处于位置i上的比特经XOR运算来确定。它突显了流密码的一个潜在弱点：任何有能力进行已知明文攻击的人，都能够从明文与密文相对应的比特中推论出部分密钥流。于是，流密码使用者必须防止攻击者能推论出部分密钥流的攻击。换句话说，密钥流序列必须在下述意义下是无法预测的：攻击者不能根据已知的部分密钥流推论出该密钥流的其余部分。例如，一个密钥长度仅为4的维热纳尔密码，通过每隔4个字母重复而产生一个密钥流。然而，在设计密钥流的生成程序时，对于一个适当选取的4比特的密钥而言，可以使其每15个比特重复一次。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从任一长度为4的密钥开始，但0000除外。那么，一个生成过程是这样的：序列中的每个比特由它前面的4个比特中的第一个与最后一个作XOR运算而得。如果我们从1111开始，这个序列便是111101011001000，然后再不断地重复这个序列。事实上，可以直接从一个长度为n的密钥产生出一个直到第$2^n - 1$个比特才开始重复的密钥流。

设计一个出色的密钥流生成程序是很困难的，要求用到一些高等数学知识。此外，需要严密的统计检验，以确保生成程序导出的结果尽可能地像一个真的随机序列。尽管如此，流密码在若干应用领域中仍是最适用的密码类型。一个理由是，若接收的密文错了一个比特，则解密时也只有一个比特是错的，因为每个明文比特仅由一个密文比特确定。对于分组密码，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接收的密文错了一个比特，则会导致整个区组的解密失真。当密文在一个嘈杂的信道中传送

时，解密算法必须能消除这类“出错传播”；因此，人们用流密码对数字化语音进行加密，诸如在GSM移动电话网络中那样。流密码优于分组密码的另一些特点是操作速度快而且简单。

分组密码（ECB模式）

在使用分组密码 时，比特串被分为一定长度的区组，加密算法作用于区组并产生密文区组。对于大多数对称密码而言，密文区组与原来的区组长度相同。

分组密码有很多实际用途。它们可以用来提供机密性、数据完整性或用户认证，甚至可以用来为流密码提供密钥流生成程序。和流密码一样，人们很难对它们的安全性作出准确评价。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密钥的数量决定了算法的加密强度的上界。然而，就像简单代换密码所表明的那样，大量的密钥并不能保证它的强度。对于一个对称算法来说，若密钥穷举搜索法成为其最简单的攻击形式，那么该算法可以说设计得很好 。当然，即便一个算法设计得很好，但如果密钥数目太少，也容易被破译。

设计强大的加密算法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技巧。当然，强分组密码还是具有若干明显的、同时也很容易解释的性质。如果一个攻击者已经得到一个已知明文与密文的对应，但不知其密钥，那么攻击者应该并不能由此轻易地推论出对应于任一其他明文区组的密文。例如，若一个算法以一种已知的方法改变明文区组时，密文的变化是可预计的，此时的算法就不具备上述那种性质。这是要求分组密码满足扩散性 的理由之一。所谓扩散性是指：明文中的微小变化，比如一两个位置上的变化，将引起密文出现无法预计的改变。

我们已经讨论了密钥穷举搜索法所带来的威胁。在这种搜索过程中，攻击者可能会试到一个只是在少数几个位置上与正确的值不同的密钥。例如，若攻击者发现了某种迹象表明他尝试的密钥仅在一个位置上与正确的密钥不一致，那么，攻击者可能停止他的搜索并转而只

对这个特定的错误密钥的每个位置挨个作变动。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找出正确密钥所需的时间。这是另一个需要避免的缺陷。所以，分组密码又需要满足含混性 。从本质上讲，含混性是指：攻击者在实施密钥穷举搜索的过程中无法得到任何有关正在“接近”正确密钥的提示。

在讨论如何攻击简单代换密码时，我们介绍了一个逐步构造出密钥的攻击方法：首先找出字母**E** 的代换者，然后找**T** 的代换者，以此类推。如果攻击者能够独立于其他部分而确定出部分密钥，则我们称他们实施的是分而胜之的攻击。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我们需要分组密码具有完备性 ，这意味着密文的每一个比特都必须依赖于密钥的每一个比特。

统计检验是评价分组密码是否具有上述三种性质和其他性质的基本要素。所以，在对所有的对称密码的性能进行分析时，统计检验都是必不可少的。

分组密码用于长信息的加密时，最简单而且也许是最自然的途径是将二进制序列分为适当大小的区组，然后逐个独立地加密每个区组。出现这种情形时，我们说我们使用的是电子码本 模式，或称**ECB**模式。当我们选定一个密钥并使用ECB模式时，相同的信息区组会产出相同的密文区组。这意味着攻击者一旦得到一对互相对应的明文与密文区组时，他们就能通过寻找相应的密文比特而确定原信息中所有类似明文区组。由此，对于他们来说编出一本已知密文与明文的对应区组的字典是很有价值的。此外，要是存在一些占主导地位的信息区组，那么它们定会引出同样占主导地位的密文区组。这可能招致我们在介绍简单代换密码时讲过的那种基于频率分析的攻击。这是激发我们采用长度较长的区组的动力之一，诸如使用有64个比特的区组，它通常对应8个字符。使用ECB还存在另一种隐患，下面我们用例子来说明。

假定一种未知的分组密码和未知的密钥被用来加密“*The price is four thousand pounds* ”（价格为四千英镑）这一信息。我们只知道每个信息区组由两个字母组成，标点、空格等都省略，密文是：

c_1 ，c_2 ，c_3 ，c_4 ，c_5 ，c_6 ，c_7 ，c_8 ，c_9 ，c_{10} ，c_{11} ，c_{12} ，c_{13} ，c_{14}

假设一个攻击者知道了这条信息，他们已想办法掌握了c_1 代表Th、c_2 代表ep，等等。于是，他们可以巧妙地处理密文，使得只有c_1 ，c_2 ，c_3 ，c_4 ，c_5 ，c_6 ，c_7 ，c_{12} ，c_{13} ，c_{14} 可以被收到。真正的接收者使用正确的密钥和解密算法将收到的密文译出得到："The price is four pounds"（价格为四英镑）。因为解密奏效并得到了有意义的信息，接收者没有理由怀疑密文已被处理过，并以为这个价格是正确无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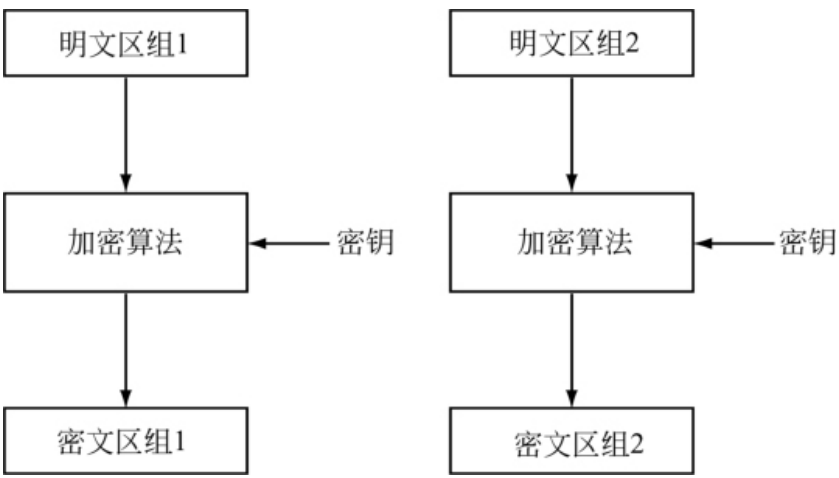

一组ECB模式的分组密码

使用ECB模式的分组密码所带来的这些潜在危险，可以通过重新安排每个区组的加密而得以消除，办法是让每个区组的加密依赖于所有位于它前面的信息区组。如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相同的信息区组几乎必定会引出全然不同的密文区组。这样一来，经过第三方处理过的密文，在解密后将不大可能得出有意义的信息。实现这一点有两种标准手法。一种叫密码反馈（**CFB**） 模式，另一种叫密码分组链接（**CBC**）模式，后面我们会讨论这两种模式。

为了解释在ECB模式中是如何使用分组密码的，我们举一个小例子来加以说明。出于举例需要，我们这里所用的算法都是比较弱的。在我们的例子中，明文区组、密文区组和密钥都由4个比特组成，我们用十六进制表示法描述它们。对任一给定的密钥K，密文区组C对应于明文区组M，C是由M与K作XOR运算后再将M⊕K所得比特向左移转一个位置而得的。

我们来加密明文比特串10100010001110101001，当密钥**K = B**（即1011）时，使用十六进制表示法则密文变成**A23A9**，具体过程如下：

记住我们使用的是十六进制表示法，第一个区组M = 1010，K = 1011，于是M⊕K = 0001。它移转后密文区组变成0010，是十六进制中的**2**。

类似地，第二区组M = **2**，K = **B**，即M = 0010，K = 1011，所以M⊕K = 1001。如果将1001移转，则此密文区组在十六进制中就是**3**。

重复这类计算，我们看到如果信息是**A23A9**，以ECB模式使用我们的密码且密钥K = **B**，则密文为**23124**。

对此，一个明显的现象是重复的信息区组会引出重复的密文区组。

散列函数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集中关注能够用来提供机密性的加密算法。这些算法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即它们都具有可逆性：知道了适当的密钥必定可以从密文重构出明文信息。然而，在很多例子中，虽然使用了密码术，但不需要从密文推论出原始“信息”。事实上，可能存在一些明确要求不可逆的情况。一个例子是计算机系统的口令保护问题。使用者被告诫应该对其口令保密，于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该系统也在力求确保这种机密性。一旦口令出现在系统中，特别是出

现在用于验证的数据库中时，它们必须得到保护。然而这时系统通常只要求核实输入的口令是否正确，而不需要从存储值中导出口令。

此外在很多密码术的例子中，需要将长信息压缩成短比特串（比原信息的长度短许多）。当出现这样的需求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如下情况：不止一个信息会被压缩为同一个短比特串，这自然就意味着这个过程不可逆。这种效应被称为散列函数 ，在不同的应用领域，它们有些会使用密钥，有些则不然。

散列函数的基本意思是，作为散列函数结果的散列值是对信息的压缩表示映射。散列值有好几种称法，包括数字指纹、信息摘要 ，或（毫不奇怪）就叫散列 。散列的应用领域很广，包括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以及作为数字签名过程的组成部分。

一般来说，散列函数接受任意长度的输入，但只产生固定长度的输出。如果两个输入产生了同样的输出，我们就说出现了冲突 。正如我们已提到的，冲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如果我们想通过数字指纹鉴定出唯一的信息，就必须小心选取散列函数，以确保冲突即使存在也不可能被发现。这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潜在指纹值的数量必须很大。我们用一个极小的例子来说明原因。如果我们只有8个可能的指纹值，那么任意两个信息具有同一指纹值的几率为12.5%。此外，任何包含9个或9个以上信息的集合，其中必定至少包含一个冲突。

公开密钥系统

我们迄今仅考虑了对称算法，其中发送者与接收者共享一个密钥。这当然表明两个参与者之间相互信任。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之前，对称算法是仅有的可以应用的算法。

公开密钥的密码系统的基本思想是，每个实体有一个公开密钥（简称公钥）和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私人密钥 （简称私钥）。选取这些密钥是为了使攻击者无法从公钥推断出私钥。任何人想使用这个系统

发送一条机密信息给某人，都要先得到后者的公钥，并使用它来加密信息。当然，他们需要确定自己使用的正是收信人的公钥；要是用错了，那么与发信者所使用的公钥相对应的私钥的所有者，就能读懂所发出的加密信息了，而预定的收信人却无法读懂。所以尽管我们无须秘密地配送这些公钥，但所有公钥都需要加以保护，以确保其真实性。还要注意，当使用公钥系统来提供保密性时，由于加密用的公钥是广为人知的，谁都可以使用它，所以密文并不能提供任何有关发信人真实身份的信息。

对于公钥系统而言，算法和加密密钥都是公开的。于是，攻击者面临的任务是从密文推断出信息，而密文是用该攻击者完全了解的方法得出的。显然，发信人需要十分小心地选择加密的操作过程，以增加攻击者破译的难度。但是一定不要忘记，发信人还应确保真正的收信人能够容易地进行解密。因此，加密过程的选取应使知道解密密钥的人能够方便地从密文中得出信息。

这是一个难以理解又不直观的概念。人们常常会问："如果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如何加密的，为什么他们不能推导出我的信息呢？"下面这个不涉及数学的例子将对提问者很有帮助。

假定你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没有电话，只有一本纸质的伦敦电话号码簿。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个名字和地址，问你此人的电话号码，那你很容易找到答案。但是假设给你一个随机选取的电话号码，而问你其拥有者的名字和地址，这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了。并不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理论上，你可以从第一页开始查所有的号码，直到找到所需的那一个。困难在于极其巨大的工作量。如果我们将"名字和地址"看作信息，"电话号码"看作密文，"找号码"看作加密过程，那么就伦敦电话号码簿而言，我们达到了保密的目的。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如果同样的过程用于较薄的电话簿，攻击者就能逆向查出信息。我们也不可能精确地认定到底人数需要达到多少才能有把握地宣称达到了保密目的。伦敦电话簿中有超过750,000个人名，我们可以很高兴地断言750,000在本文设定的场景中是个大数目。对于一个仅有100部电话分机的办公单位，逆向查电话簿大概还是容易的，但如

果数目增加到5,000又如何呢？

自然，有一些组织——比如急救中心——能够查出任何一个电话号码的拥有者。他们有按数字顺序编排的电话簿。这里又要注意，我们无法阻止别人依据数字的次序编造他们自己的电话号码簿。巨大的工作量才是确保在我们定义的条件下不让攻击者取得成功的法宝。当然了，不管是谁，如果拥有电子版的电话簿，其工作将会变得更为简单。

最实用的公钥算法是分组密码，它将信息看成是大整数的一个序列，其安全性依赖于解出某个特定的数学问题的难度。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1978年由罗恩·里弗斯特（Ron Rivest）、阿迪·沙米尔（Adi Shamir）和莱恩·阿德尔曼（Len Adleman）发明的，现称RSA。在RSA中，相关的数学问题是因子分解。此时有一个公开的数N，它是两个素数的乘积，但这两个素数的值是保密的。这些素数极为重要，因为任何人只要知道了它们的值就可以从公钥计算出相应的私钥。因此，确定信息区组大小的数N必须足够大，以使得攻击者无法推演出这些素数，即攻击者不能完成对N的因子分解。显然，如果N不大，任何人都可确定这两个素数。来看一个极简单的小例子，取N = 15，此时的两个素数是3和5。但是，人们相信，对于足够大的N，想要确定这些素数是无法办到的。我们将在第七章讨论多位数的因子分解的困难。现在，我们只须注意数N同时决定了区组和密钥的大小。

这意味着此时的密钥和区组的大小比对称密码的要大很多。在对称密码中，典型的区组大小是64或128比特，而在RSA中，它们的大小很可能至少是640比特，而1,024和2,048比特的区组也不鲜见。另一个后果是加密和解密过程包含大量涉及多位数的计算，这意味着它们比大多数对称算法要慢一些。所以，它们的主要用途不是对大量数据进行加密，更多的是用于数字签名，或是为对称算法的密钥的安全配送和贮存而对其进行加密。

另一种广泛使用的公钥密码算法是知名的贾迈勒算法[2]，它是美国数字签名标准（**DSS**）的基础。对贾迈勒算法而言，其密钥的大小与RSA大致相当，但它的安全性依赖于另一数学问题的难度，该数

学问题即为离散对数问题。然而贾迈勒算法具有的某些性质使它不太适合用于加密。

公钥密码术的基本原则和标准技巧，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在英国政府的通信电子安全组（CESG）中工作的詹姆斯·埃利斯（James Ellis）、克利福德·科克斯（Clifford Cocks）和马尔科姆·威廉森（Malcolm Williamson）所开发的。但是它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列为机密资料，在最初的公钥密码术论文出现多年以后才得以公开，在那段时间里，非对称密码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注释

【1】 比特串：指二进制数串。

【2】 El Gamal是埃及科学家，全名Tahar El Gamal，可译为“塔赫尔·贾迈勒”。此处提到的算法即以他的名字命名，故译为“贾迈勒算法”。

第六章

实际安全性

引言

“强加密”是个被广泛使用的术语，但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这一点毫不奇怪。颇具代表性的是，人们常把它理解为“不可破译的加密”，这种看法具有更多的主观性。

多年以来，人们就知道一次填充密码是唯一一种本质上不可破译的密码。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在1948和1949年发表的两篇学术报告中证明了这个论断。这两篇报告是现代包括密码学在内的通信理论的基础。可以说香农的贡献意义巨大，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我们已经看到，对大多数实用系统而言，使用一次填充密码并不可行。因此，大多数系统都使用了理论上可以破译的算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不安全。例如，如果对这类算法的所有理论上可能的攻击实施起来都太难，那么使用者就可以认为这类算法事实上是不可破译的。即便情况不是这样，在某些特定的应用中，很可能破译算法所需的资源大大超过了攻击者从破译中获得的潜在收益的价值。对于这种特定的应用情况，该算法仍能被看作是“足够安全”的。例如，假设某人要利用加密手段对某些资料实施保密，那么他必须尝试对这些资料的价值作出评估。这个过程可能并不简单。资料的价值可能不是金钱上的，而纯属个人隐私。这些无法给出定量价值评估的资料有很多显而易见的例子，比如医疗记录或其他个人详细资料。对于哪些人希望得到这些资料及其理由，也必须作出某种评估。其他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有：这些资料需要保密的时间，还有花费、有效性、使用算法的便利性等。

当把密码术整合到某个安全解决方案中时，存在两种似乎互相冲突的选取加密算法的思路：

- 使用能提供足够保护的、安全水平最低的加密算法；
- 使用实施条件所允许的、安全水平最高的加密算法。

很清楚，对于实施者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对算法所能提供的安全水平有很好的认识。这就是本章后面几节要讨论的内容。讨论将主要关注对称算法的密钥穷举搜索法，以及针对公钥系统所用的数学方法的攻击。当然，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的，密钥穷举搜索的时间只是给出了算法强度的上限，可能还存在其他更容易实施的攻击法。然而，我们相信算法设计已足够先进，出现了大量设计精良的加密算法，使得密钥穷举搜索法代表了最简单的攻击方式。此外，这些算法操作起来很可能还非常快。

过去，实施条件的限制常常迫使用户采纳他们能够使用的最低安全水平的措施。当先进技术赶超在前，能破译他们的密码系统时，常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现实的安全性

香农曾证明：本质上说，一次填充密码是唯一的完全安全的密码系统。所以我们知道至少在理论上，大多数实际的系统都是可以破译的。这并非意味着大多数实际系统都毫无用处。一个（理论上可以破译的）密码系统也是具有实用性的，只要使用者确信攻击者不会在所涉项目的掩蔽时间内成功破译该系统即可。

我们讨论过的密钥穷举搜索法是一种基本的攻击形式。在断定一个系统是否适用于某个特定的项目之前，预期密钥穷举搜索所需的时间要比掩蔽时间长得多，这是该系统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当然，我们已经知道，具有大量的密钥还不能保证系统的安全；因此，这个要求只能算是判断系统可否被接受的许多检验中的第一个标准。无论如何，如果连这第一步都不能通过，那很清楚该算法是不能用的。所以我们对密码系统的第一步“检验”就是尝试确定密钥穷举搜索所需时间是否足够长，换句话说，就是密钥的数量是否足够多。

为此，设计师需要对攻击者的可用资源和能力作一些假设。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估计攻击者每试算一个密钥所需的时间。很清楚，这个

时间与攻击者使用的是硬件还是软件有关。如果是硬件攻击，攻击者可能会使用特意建造的设备。若对这个时间估计过低，将会导致不安全性，而过高的估计又会使安全系统的花费大大超出实际所需。

幸运的攻击者在尝试密钥穷举搜索法时，可能第一次猜测就试出了密钥。使系统具有大量密钥的作用之一就是减少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另一种极端是，一个倒霉透顶的攻击者一直试到最后一个才找出密钥。实际情形往往是，攻击者并不需要进行全部搜索就能找到密钥。用密钥搜索法找到密钥的预期时间大约接近于完成全部穷举搜索所需时间的一半。

有一点也许值得一提。假如攻击者有足够的资料，那么他们可能会很确信只有一个密钥能把所有已知明文转变为正确的密文。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穷举搜索全部完成后也不能确认出唯一正确的密钥，而只是缩小了正确密钥候选者的范围，此时需要更多的资料来作进一步的搜索。

一旦密钥的数目确定下来，密钥穷举搜索所需的时间就可给出安全水平的上界。在很多情形下，设计者的主要目的是努力确保其他类型的攻击成功的预期时间要超过这个上界。这绝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我们已经指出过，时间是评估攻击能否成功的正确度量值。然而进行任何计算所需的时间还依赖于各种变数，诸如攻击者的工作效率、技术及数学能力等。工作效率与攻击者所能支配的财力相关，反过来，这种财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又随着攻击成功所能取得的预期利润不同而变化。此外，在某些环境中，像能否有效利用计算机存储装置等其他因素，对攻击者来说也都是十分重要的。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如此复杂的判断方式，确实是判定一个给定的系统对某种特定的应用来说是否足够安全的标准手段。

实际的密钥穷举搜索

虽然我们不想引入任何复杂的计算，但也许告诉读者某些事实是

有价值的，它们可以让我们对某些情况下密钥的数目有一些“感性”认识。很明显，任何一位商业应用系统的设计者，都会希望他设计的系统在（至少）几年内应是安全的，因此他必须考虑技术进步的影响。这经常要借助于一条相当粗略的经验法则的帮助，该法则就是摩尔定律[1]，它认为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计算能力每18个月增长一倍。

为了对密钥数目大小有感性认识，我们来注意以下事实：一年有31,536,000秒，它大约在2^{24}与2^{25}之间。如果有人能够每秒钟试算一个密钥，那么他一年可搜索2^{25}个密钥。如果他有一台计算机能够每秒试算100万个密钥，那么搜索2^{25}个密钥所需要的时间大大少于一分钟。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虽然看起来十分简单，但它标志着计算机的问世已经影响到系统安全所需的密钥数。在讨论密码算法时，一些作者关注密钥本身的大小，另一些作者关注密钥的数量。我们回忆一下，长度为s的信息有2^s个比特模式，它意味着，如果每个可能的比特模式都代表一个密钥，那么说一个系统有s比特长的密钥，等价于说它有2^s个密钥。还要注意，如果每一可能的比特模式代表一个密钥，只要在密钥长度上额外加一个比特，其效果则是密钥个数的加倍。

最著名的对称分组密码是数据加密标准（**DES**）。它发布于1976年，在金融部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DES有2^{56}个密钥，自它首次面世以来，有关它的加密水平是否足够“强”的问题，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在1998年，一个名叫电子前沿基金会（EFF）的组织设计并制造了一块专用硬件，用于对DES密钥进行穷举搜索，总造价约达250,000美元，它大概能用5天左右的时间找出一个密钥。尽管EFF没有宣称他们已优化了自己的设计，但该设计已被认为是提供了评价目前这项技术所处状态的标准。粗略地说，就是花250,000美元就能够建造一台机器，它能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对2^{56}个密钥搜索一遍。由上述事实我们可以推断：通过增加成本或增加密钥数目，并考虑到像摩尔定律那样的影响之后，我们可以在指定花费的条件下，非常粗略地估算出在不久的将来任一时期搜索指定数目的密钥所需的时间。

除了专用硬件之外，现在已经有了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穷举搜索

的尝试，典型的做法是把基于开放网络的密钥搜索的计算能力累加起来。最有意义的大概要属1999年1月所完成的一次搜索。它将EFF的硬件和互联网上的协作结合起来，参与搜索的有100,000台计算机，用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找出了56比特的DES密钥。

我们之所以关注DES的密钥搜索，是因为DES是一种受到高度重视的算法。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刚设计出来时，它被认为是很强的。现在，虽只过了25年，但DES的密钥可以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被找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现在的DES用户还是DES的设计者都未对近期搜索DES密钥的成功表示惊讶；设计者早就告诫说（1976年），它只能用15年。大多数DES的近期用户现在使用的是称为三重DES的算法，其中的密钥是两个或是三个DES密钥（即其长度为112或168比特）。三重DES如下图所示，用两个DES密钥k_1 和k_2 来加密，其中E和D分别表示加密和解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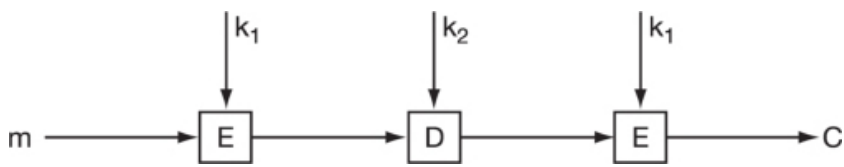

有两个密钥的三重DES

为了见识在密钥上额外添加8个比特后的戏剧性效果，我们看一下在1998年初开始的一个对所谓RC5算法的64比特密钥进行的联网搜索。经过超过1,250天对大约占潜在密钥总量44%的密钥的试算，还没有找出那个正确的密钥。

2001年，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公布了一个新的加密算法，“可用于保护电子数据资料”。它被称为高级加密标准（**AES**），是从NIST所征集的几个算法中选出来的。征集的要求是让对称分组密码能使用128、192和256比特去加密和解密区组大小为128比特的数据。被选出的这个算法定名为Rijndael，是由两个比利时人琼·达曼（Joan Daemen）和文森特·赖伊曼（Vincent Rijmen）设计的。因为AES使用的最小密钥长度是128比特，它似乎足以抵御基于

现有技术的密钥穷举搜索法。

我们已经提到过依据摩尔定律可以对现有技术在今后若干年内的进步给出粗略的估计。但摩尔定律并未考虑到革命性的新技术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量子计算就属于这类新技术。量子计算利用量子态进行演算，它允许采用平行计算的方式。目前科学家仅制造出很小的量子计算机，因此从本质上说，它还仅是一个理论概念。然而，一旦量子计算机变成现实，形势将发生巨变。现在世界各地都投入了可观的资金，支持量子计算可行性的研究。如果足够精微的量子计算机能制造成功，它将显著地提高密钥穷举搜索的速度。粗略估计它能在给定时间内搜索长度比现在增加一倍的密钥。因此，粗略地说，量子计算机搜索2^{128}个密钥就像现在搜索2^{64}个密钥一样快。

研究者对建造量子计算机的可能性持谨慎态度。无论如何，该领域存在着一些乐观的情绪，我们不应忽略其成功的可能性。

对公钥密码系统的攻击

非对称算法的密钥比对称算法的要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非对称算法就一定比对称算法更强一些。攻击非对称密码，一般不用密钥穷举搜索法。比较容易的办法是去攻击其中所使用的数学问题。例如对RSA，设法找出模N的因子要比对所有可能的解密密钥进行密钥穷举搜索更容易一些。

为了说明最近的数学进步是如何影响了公钥密码术的应用，我们来关注RSA和因子分解。其他公钥系统的情况也类似，只是各自依赖的数学问题不同。

因子分解技术在过去30年间有了惊人的进步。这归功于理论和技术两方面的进步。在1970年，一个39位数（$2^{128}+1$）被分解为两个素因子的乘积。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成就。1978年RSA首次发表时，论文中提出了分解一个129位数作为挑战性的问题，奖金为100美元。在这之后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挑战。这个数直到1994年才

被因子分解成功，而且分解过程中利用了世界范围的计算机网络。

除了摩尔定律，在数学上改进因子分解技术的可能性，也是确定RSA密钥大小所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我们来看看被称为一般数域筛法（**GNFS**） 的数学革新所引起的巨大影响，该方法发表于1993年。使用以前所知算法分解给定大小的数所耗费的资源，若用于新方法中可以分解大得多的数。例如，分解150位数这一等级的数所需的资源，现在可以用来分解接近180位的数。这个数学方面的进展比人们对纯粹的技术进步的预想领先了好几年。

1999年，有155位的挑战性数字RSA-512的因子分解就是用这种技术完成的。这次因子分解费时不到8个月，而且又一次利用了世界各地的计算机联网作业。这个数学问题复杂性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工作的最后阶段要解方程数超过600万的联立方程组。在它之后，《码书》中又提出了一个挑战，要求分解一个512比特的模。这些因子分解意义重大，因为这样大小（155位的数，或512比特的数）的模是几年前公钥密码术中常用的。

对于RSA算法，现在一般推荐使用从640到2,048比特的模，具体采用多大的模依安全性要求的强弱而定。一个2,048比特的数在十进制数系中有617位。为了显示这个数有多大，我们列出有617位的RSA挑战性数字。第一个能成功分解它的团队将获得荣誉和200,000美元的奖金。

2519590847565789349402718324004839857142928212620 4
0320277771378360436620207075955562640185258807844 0
6918290641249515082189298559149176184502808489120 0
7284499268739280728777673597141834727026189637501 4
9718246911650776133798590957000973304597488084284 0
1797429100642458691817195118746121515172654632282 2
1686998754918242243363725908514186546204357679842 3
3871847744479207399342365848238242811981638150106 7
4810451660377306056201619676256133844143603833904 4
1495263443219011465754445417842402092461651572335 0
7787077498171257724679629263863563732899121548314 3
8167899885040445364023527381951378636564391212010 3
97122822120720357

在讨论密钥穷举搜索时，我们提到过量子计算机的潜在影响。虽然它会引起对称密钥长度的极大增加，但毫无疑问的是密码界会适应它的存在，并能继续安全地使用对称算法。但对公钥密码而言就未必如此了。量子计算对公钥系统来说是个更为严重的威胁，例如因子分解会变得非常容易。幸运的是，即使是最乐观的量子计算的狂热派，他们也预言至少20年内不会出现大型的量子计算机。

注释

【1】 摩尔定律（Moore's law），又译“莫尔定律”。

第七章

密码术的用途

引言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假定密码算法是用来保障机密性的。但是，它还有很多其他用途。不论何时，当我们使用密码术时，检验它是否帮助我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很重要。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对密码术的一种可能的误用。

1983年，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MGM）制作了一部叫做《战争游戏》的影片，它曾风靡一时，影片强调了电脑黑客行为的危险性。该电影的一个剧情概要说“人类的命运掌握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手中，他在玩电脑时不经意地闯入了国防部的战术计算机”。影片开场时，这个男孩非法进入他所在大学的计算机系统，并窜改了他女朋友的分数。当时，很多大学将考试成绩存在可以远程访问的数据库中。毫不奇怪，这些学校担心这些成绩可能会像影片中所描述的那样被越权者改动，因此想要引入适当的保护机制。

有人提议给每个学生的分数加密。然而这实际上是达不到保密目的的，探究其中的原因既重要，又很有趣。不难看出给分数加密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结果是，不管是谁进入数据库后都看不到任何一名学生的分数，看到的只是每个名字后面毫无意义的数据。很不幸，这种办法并不一定能防止电脑黑客将分数改高。如果一名黑客考试不及格，但他刚好知道有一名学生得了好分数，那么他只须把自己名下那个无意义的数据改成跟那名同学一样即可。当然，如果他不知道那名同学的准确分数，那他也就不知道自己改动后的新分数。但无论如何，他知道现在他是及格了。使用加密而达不到用户目的的情况很多，上面只是其中一例。加密并不能解决人们遇到的所有问题。还要注意，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加密算法并没有被破译，实际上它根本没有受到攻击。之所以发生这种事情，是由于用户未能正确地分析问题。

名字	加密分数
优秀生	13AE57B8
差生	2AB4017E

→

名字	加密分数
优秀生	13AE57B8
差生	13AE57B8

或更过分地改为

名字	加密分数
优秀生	2AB4017E
差生	13AE57B8

现在假定，大学不是只对分数加密，而是对整个数据库加密，这是否能达到防止黑客窜改分数的目的呢？在这个例子中，给整个数据库加密就意味着整个文件对黑客来说都是无法识别的。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阻止黑客窜改分数。例如，假设文件的每一行代表一名学生的姓名和分数，如果全班学生姓名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那么在上一段讨论过的那种攻击仍可能发生。

在我们关注如何使用密码术来保护存储的信息以防别人动手脚之前，我们先花一点时间考虑如下问题：若某个人能够窜改保存在一个特定数据库里的分数，是否真有严重后果？当然，确保每名学生分数的真实性是很重要的。不过，要是被窜改了的数据库不是唯一的可供查阅分数的地方，那么这名黑客学生极有可能无法从窜改那个特定记录中的分数中得到任何好处。关键之处也许在于，应该设立某种机制，使其能够警告所有授权用户，提醒他们分数已被窜改。因此，倘若任何窜改都能被查出来，那么预防窜改也许就不是生死攸关的事了。接到警告的授权用户就不会仅依赖于该数据库而是去查阅权威记录了。在很多情况下，查出越权窜改比预防窜改更有必要。

密码术被普遍用来监测越权者对文件的变更。事实上，至少在商界，提供机密性已不再是密码术的主要用途。除了传统的用于保护隐私外，密码术现在还用于确保：

- 数据完整性 ：保证信息不被未经授权的或来历不明的手段所窜改；

- 实体认证 ：确认实体的身份；
- 数据源认证 ：确认信息的来源；
- 不可否认性 ：防止（通常是发信人）对信息内容和（或）发信人身份的否认。

自然，也可采用一些标准的（非密码术的）方法来防止数据遭受意外的损坏，例如，可以利用奇偶校验或更高级的纠错码。然而，由于这些方法只适用于公开的信息，如果要保护数据不受到蓄意的窜改，这些技巧就未必够用了。任何一个蓄意窜改信息的人都会把改变后的信息加以适当编码，以使窜改的内容无人察觉。因此，为了阻止蓄意窜改，必须使用某些仅为发信者和（可能的）收信者所知道的值，比如密码密钥。

使用对称算法的保密

我们已经认识到，如果使用分组密码以ECB模式加密数据，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一种可能的隐患是，某人掌握了对应的密文与明文区组后，可以巧妙处理密文区组来构作一篇新的密文，并使其在解密后呈现为有意义的信息。收信人将无法察觉其中的变化。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过这种行为的一个小例子。然而，这里要强调的是有意义 这个词。如果按ECB模式使用分组密码，那么很清楚，解密算法可以按任意次序作用于密文区组，同时有可能单独破译每一个区组而得到潜在的信息。然而，最后得到的被破译的资料不太可能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可以理解的信息。虽然不能忽视这种攻击存在的可能性，但其成功的机会很小。

使用ECB模式的更严重缺陷是，攻击者针对一个固定的密钥，可能会编制一本已知明文区组与密文区组相对应的词典，而且ECB模式容易受到基于明文所用语言的统计特性所进行的攻击。这类攻击的“典型”例子是第三章中演示的对简单代换密码的攻击。

易受上述两种攻击的原因在于这些区组的加密都是相互独立进行

的。所以，对于某个固定的密钥，相同的明文区组会导出相同的密文区组。克服这个缺点的一个办法是，让每个密文区组不仅随对应的明文区组而定，而且还取决于它在整篇文章中的位置。这就是维热纳尔密码所用的方法。这种技巧确实能够达到使语言统计数据“变平”的效果。但是，更常用也更有效的技巧是，设法使对应于任一给定明文区组的密文区组，随信息中所有位于它前面的明文区组的内容而定。为达到此目的，最常用的两种方法是使用密码分组链接（CBC）模式和密码反馈（CFB）模式。接下来我们描述一下CBC模式。

假定我们有一条信息，它由n个信息区组M_1、M_2、……、M_n组成，我们希望用密钥为K的区组密码来为其加密。在CBC模式下，所得的密文有n个区组：C_1、C_2、……、C_n，但此时每个密文区组都依赖于所有在它前面的信息区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除了C_1之外的每个密文区组，都是先由对应的信息区组与它前面的一个密文区组作XOR运算后再进行加密而得到的。例如，C_2是加密$M_2 \oplus C_1$之所得。如果我们用EK表示使用密钥K进行的加密，则可得出$C_2 = EK(M_2 \oplus C_1)$。显然，第一个信息区组需要与此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办法是让C_1等于$EK(M_1)$。另一种常用的方法是使用一个初始化值（IV）并设C_1是对$(M_1 \oplus IV)$加密的结果。（注意，若IV区组中全是0，那么这两种方法是等同的。）因为C_1依赖于M_1，C_2依赖于M2和C_1，所以很清楚C_2同时依赖于M_1和M_2。类似地，因为$C_3 = EK(M_3 \oplus C_2)$，所以C_3同时依赖于M_1、M_2和M_3。总体上说，每个密文区组依赖于它所对应的明文区组以及所有位于它前面的明文区组。这样做的效果就是将所有的密文区组用一种合适而特定的次序连接起来。这不仅破坏了信息所用语言的统计特性，而且实际上还排除了他人对密文动手脚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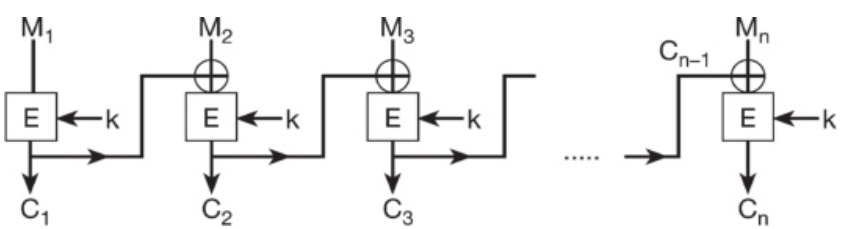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用在第五章出现过的有关分组密码的小例子来解释CBC模式是如何运作的，并比较在使用同一算法和密钥时，EBC模式与CBC模式加密所得密文的异同。不幸的是这个例子表面看起来比实际上要复杂。所以我们鼓励读者坚持看完这个例子。当然，如果你跳过这段直接去读下一节也无碍大局。

这个例子中的明文用十六进制写为**A23A9**，密钥**K** = **B**。加密算法是先对明文区组与密钥作XOR运算，然后再将M⊕K中的二进制数字向左移转一个位置，从而得到密文区组。对于CBC模式，我们使用全为0的IV，使得C_1与ECB模式加密的所得相同。于是$M_1 \oplus K = A \oplus \mathbf{B}$ = 1010 + 1011 = 0001，经移转后得到0010，这便是C_1，所以C_1 = **2**。

计算C_2的过程如下：

$M_2 \oplus C_1$ = **2** ⊕**2** = 0010⊕0010 = 0000
0000⊕K = **0** ⊕**D** = 0000⊕1011 = 1011

施行移转后得C_2 = 0111 = **7**。C_3是这样算出的：

$M_3 \oplus C_2$ = **3** ⊕**7** = 0011⊕0111 = 0100
0100⊕K = 0100⊕1011 = 1111

施行移转后得C_3 = 1111 = F。C_4的计算过程是：

$M_4 \oplus C_3$ = **A** ⊕**F** = 1010⊕1111 = 0101
0101⊕K = 0101⊕1011 = 1110

施行移转后得C_4 = 1101 = **B**。我们请读者来计算出C_5（答案在下面给出）。

这样，对同一个信息，我们用不同的加密模式得到两种密文。

信息：　　A 2 3 A 9

使用 ECB 模式得到的密文：2 3 1 2 4

使用 CBC 模式得到的密文：2 7 F B F

即便是从这个小例子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CBC模式下相同的信息区组的位置与相同的密文区组的位置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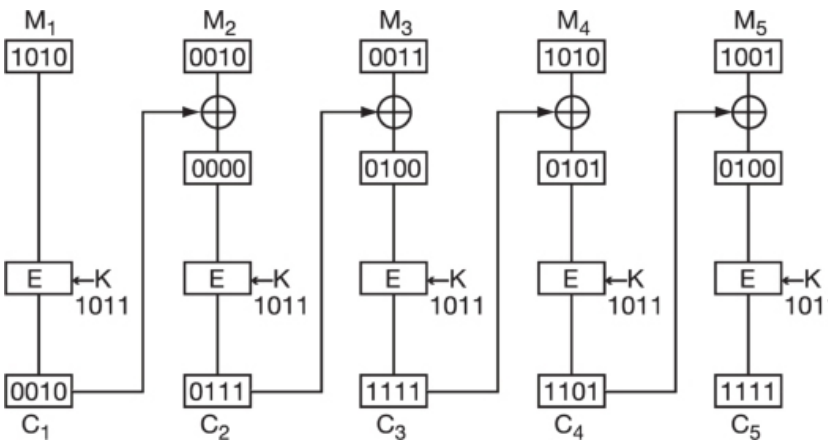

CBC模式例子的图示

在CFB模式下使用分组密码时，运作过程与此不同；但最后的效果是类似的，即每个密文区组依赖于它所对应的明文区组以及所有原信息中依次出现在它前面的明文区组。关于CFB模式的详情，可参见梅内策斯、范·奥尔斯霍特和范斯通所著的《应用密码术手册》一书。

认证

在信息安全领域，认证 一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含义是数据来源的认证，它关注的是核实所收到数据的来源，另一种含义是（对等）实体的认证，即一个实体对另一个实体身份的验证。

典型的数据来源认证都伴随着对数据完整性的确认。实体认证有很多种形式，但基于密码术的实体认证往往有赖于两个实体之间某种信息的交换。这种交换被称为认证协议 。本书中我们常常提到用户并认为用户就是指人。然而在这里所谓的实体可能指计算机，也可能指人。

当然，用户认证是访问控制 [1] 概念中最基本的要素，用户可通过多种方法在彼此之间或是在计算机网络上认证自已的身份。基本的技巧至少需要依靠下列三样东西中的一样：

- 已知物 ：例如，它可能是需要用户保密的口令或PIN；
- 拥有物 ：例如塑料卡或个人专用手持计算器等；
- 用户的某些特征 ：包括生物识别标志，例如指纹和视网膜扫描、手写签名或声音识别等。

最常用的方法大概是使用已知物或拥有物的组合体。当然，风险总是存在的：已知物可能被对手发现，而拥有物可能被对手偷去或复制。这种情形支持了下述观点：唯一能够对用户作出认证的方法应该以用户的特征为基础，诸如其生物识别标志 。然而，由于存在一些实际困难，生物识别标志还不能广泛使用。

利用对称算法的认证和数据完整性

认证和数据完整性都能利用对称密码来达成。我们首先考虑认证问题，然后是数据完整性问题。认证的类型有两种。在单向认证 时，需要一个用户认证另一个用户；在双向认证 时，两个用户需要彼此认证。第九章讨论的磁条卡在ATM上的应用，就是一个单向认证的例子。通过输入PIN，磁卡由ATM在加密的情况下加以认证。但磁卡持有人必须使用非加密的手段——比如观察ATM的位置和结构样式——来确认所使用的ATM机并非是伪造的。登录一台计算机也是单向认证

的例子。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认证都要用到事先商定的算法以及秘密信息或密钥。算法中密钥的正确使用是认证的关键。很明显，这个过程取决于密钥不被泄漏。更进一步，高级的认证技术常常要求使用双方商定的协议，其中包含质询与应答（即质询的加密版本）的交换。

必须注意，认证协议仅限于在协议生效的瞬间确立双方的身份。如果要在刚被认证的整个联络过程中对信息加以保密，或是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则必须用其他加密机制来提供保护。保密过程所需要的密钥可以作为认证协议的一部分来交换。但如果还要防止冒名顶替者对（部分）认证协议进行重放[2]，那么就需要使用诸如序列号或时间标记等额外的信息了。

为了保证信息的数据完整性，可以使用认证算法和密钥。认证算法以信息和商定的密钥为输入信息，然后计算出一个认证值作为输出信息。这个认证值只是一个（短的）比特串，它的值取决于认证算法、信息本身和商定的密钥。用第五章的术语来说，认证算法就是由密钥控制的散列作用。

当用户A 想给用户B 发一个信息时，他将认证值添加到信息上。B 收到的是该信息及其认证值。然后B 用从A 处收到的信息和商定的密钥作为输入信息，经认证算法算出输出信息。如果这个输出值与A 发来的认证值相符合，则B 可以确信这个信息确实是A 发出的，而且没有被改动过。（所以，这一认证功能同时保证了数据完整性及对A 的认证。）善于观察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这种类型的认证方式并不能阻止冒名者重放。我们已经说过，为了对抗这种重放攻击，用户还需要在信息上附加标识符，如序列号等。

这种认证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送方与接收方所作的计算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当A 和B 为到底发送了什么信息而发生争执时，将无法用密码学方面的办法来解决争端。这并不是该系统的缺点，只不过是使用了对称密码术的必然结果。在这里，A 和B 必须彼此信任。他们共享一个密钥并依靠这个密钥的保密能力保护他们不受第三方的窜改性攻击。他们不会彼此防范，因为他们是互相信任的。一般而论，对称密码的大多数用户都是这样的。互相信任的团体使用对称密

码来保护他们的信息不受他人的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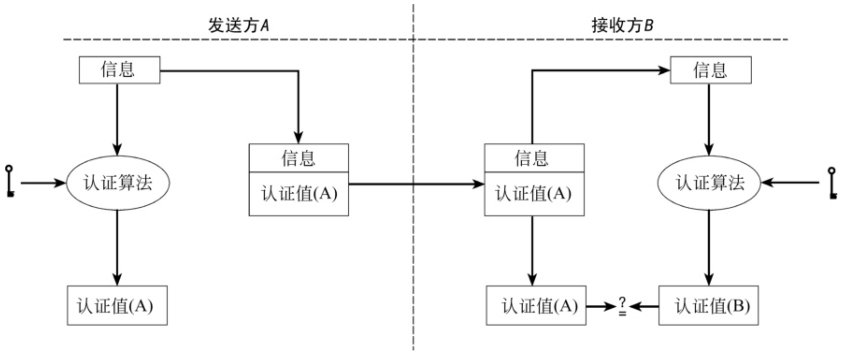

使用对称算法的认证

使用最为广泛的、特别是财政部门喜欢使用的认证手段被称为信息认证码（**MAC**）。如果信息是M_1、M_2、……、M_n，其中每个M_i 由64个比特组成，那么就可以使用CBC模式的数据加密标准。但此时仅需用到C_n这个密文区组，所以MAC由C_n的32个比特组成。

数字签名

根据第五章指出的理由，非对称算法的用途往往局限于保护对称密钥的安全和提供数字签名。如果需要解决发送方与接收方由于信息内容或信息的来源等问题而发生的争执，对称密码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就出现了对数字签名的要求。

一个特定的发信人在信息上的数字签名 是由该信息和发信人共同决定的一个密码值。与此不同，手写签名仅取决于发信人而与信息无关。数字签名可用来保证数据完整性及证明信息来源（不可否认性）。如果发送方拒绝承认他发出的信息内容甚至否认发过信息，收信人持有发送方的数字签名就能解决纠纷。它提供了解决发送方与接收方之间纠纷的一种手段，这也是数字签名机制与上节所描述MAC实施过程的区别。很显然，这类纠纷只有在发信人与收信人处于非对称的状态时才能够解决。上述情况表明非对称密码系统是提供数字签名

的最自然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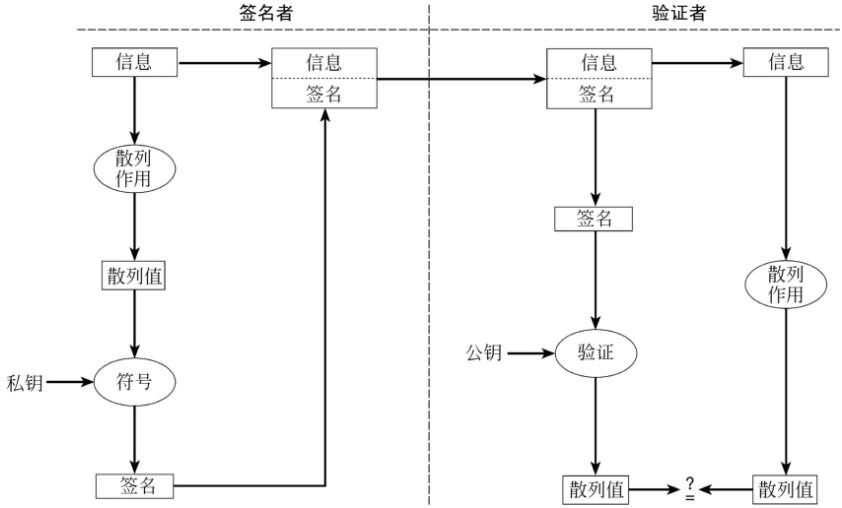

数字签名

基于公钥密码系统（如RSA或贾迈勒算法等）的数字签名模式，其基本原理是很简单的。每个用户有一个只供他们自己使用的私钥，而且使用它就能让收信人确认自己的身份。然而，还存在一个对应的公钥。任何人只要知道这个公钥便可检验与之对应的私钥是否已被使用，但不能具体地确定出私钥本身。

当收信人确认私钥已被使用后，他就会确信信息的来源和内容都正确无误。当然，发信人也会确信想要冒名顶替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人不能从公钥或验证 密钥或数字签名中推导出私钥或签名 密钥。

非对称密码的运作过程要求进行大量的计算，所以要对信息进行散列作用处理以得到它的压缩版本或简称散列。签名是应用非对称算法及对应的私钥从散列（它代表信息）中产生的，因此只有私钥的使用者才能生成签名。任何一位知道所对应公钥的人都能够确认该签名。要实现这一点，需使用非对称算法及相应公钥从签名中算出一个值。这个值应该等于信息的散列值，并且是任何人都能算出来的。如果这个值与散列值一致，这个签名就是真实的；如果它们不一致，这

个签名则是假的。

RSA和贾迈勒算法是两个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的非对称算法。RSA的加密与解密方法是一样的，所以签名和验证过程也一样。RSA的一个替代算法是基于贾迈勒算法的数字签名标准（DSS）。对于DSA [3] 而言，签名与验证过程并不相同。此外，DSA需要一个随机数生成程序（一个附加处理过程），而RSA并不需要。不过，DSA总是产生一个固定长度为320比特的签名，相反，RSA的签名区组和模数具有同样的长度：当安全水平的要求越高时，它们就越长。

假定使用数字签名作为识别身份的工具，若用户A 想假冒用户B，此时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攻击方法：

1．A 尝试去获得B 的私钥并使用之。

2．A 试着用他的公钥来代替B 的公钥。

第一种类型的攻击方法可以是试图破译算法，也可以是设法接触存储私钥的物理设备。对算法的攻击已经在第六章中讨论过；而物理设备的安全性是密钥管理中的重要环节，第八章将对此进行集中讨论。这两种攻击与针对对称系统的攻击类似。然而，第二种类型的攻击是特别针对公钥密码系统的，当前流行的大多数“防御措施”都要使用由认证中心颁发的数字证书。

认证中心 [4]

我们已经讨论过对密码系统的“传统”攻击，比如通过破解算法来确定私钥，或是经由物理手段接触密钥，比如获取一台能够使用密钥或能探测到秘密数值的装置等。然而，公钥系统还需要能对付模仿攻击 [5] 的基础设施。假设用户A 能使他的公钥看起来就像属于B 的一样，此时其他用户可能会用A 的公钥为B 的对称密钥加密。但是最终A 将会得到被这些对称密钥所保护的机密信息，B 却得不到。此外，

A 还能够用他的私钥签署信息，而他的这些签名也将被别人当作是B的签名。利用认证中心以及建立公钥基础设施（PKI）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类模仿攻击。

认证中心（**CA**） 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数字签名的“证书”，它把实体的身份与其公钥值绑在一起。为了使CA的证书也能被核查，CA自己的公钥必须广为人知并被广泛认可。在这个背景下，证书乃是一种带签名的信息，它包含了实体的身份、其公钥值，也许还有些附加信息，如终止日期等。这些证书可以看作是由广受尊敬的发证机构（即CA）签发的“介绍信”。

假定CERTA是由CA颁发的一份证书，其中包含了A 的身份和A的公钥，所以CERTA将A 的身份及其公钥值绑在了一起。任何人只要有真实的CA公钥的副本就能验证CERTA中的签名的正确性，从而确认他们知道A 的公钥。于是，确保A 的公钥可靠性的问题就被替换成保证CA公钥的可靠性的问题，同时还要确信对A 身份的验证正确无误。注意，如有人能在认证过程中假冒A ，那他就可以得到将他的公钥与A 的身份绑在一起的证书。这使他们能在那份证书的整个有效期内假冒A 。这个例子说明身份盗窃的隐患将来可能会愈发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人都能够编造出一个特定用户的证书，使得用户A 的数字证书的所有权不能用来识别A 。这个证书只是将A 的身份与一个公钥值绑在一起。此时，身份证明可以使用质询–应答协议来达成，该协议能证明A 的私钥是否已使用。这可能涉及到收到质询的A 需要给出签名。A 用他的签名作答，校验器利用A 的证书中的公钥值来证实签名是真实的。在这里，正是与A 的证书中的公钥相对应的私钥的使用，才确认了A 的身份。

现在假定有两个用户A 和B ，他们持有由不同的CA颁发的证书。若A 需要确认B 的公钥的可靠性，那么A 就需要一份B 的CA颁发的公钥的副本。这可以通过交叉验证 的方式完成，此时每个CA都要给另一个颁发一份证书；也可以引入认证阶层 的办法，即有一个“根CA”，它位于那两个CA之上并给每一方都颁发证书。

我们可以用图来解释这两种过程。图（a ）和（b ）中的X 和Y

都是CA，$X \rightarrow A$ 意指X 给A 颁发证书。图（b ）中的Z 是根CA。例如，当B 需要确认E 的公钥时，那么在（a ）中，B 需要核实由X 颁发给Y 的证书以及由Y 颁发给E 的证书。而在（b ）中，B 需要核实由Z 颁发给Y 的证书和由Y 颁发给E 的证书。因此，无论是在哪种情形中，B 都需要检验由两个证书组成的一个链。在更复杂的系统中，会遇到包括很多交叉验证和多层次认证的组合，此时需要检验的链也会更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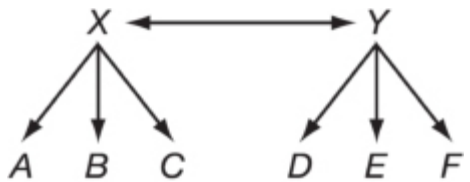

(a)

交叉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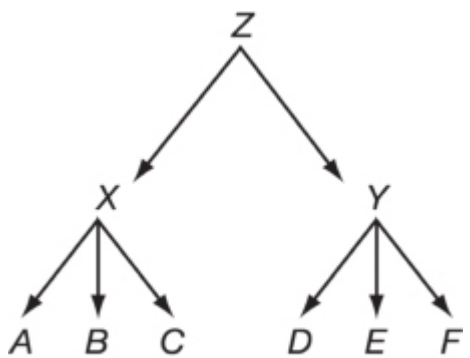

(b)

认证阶层

很多人认为数字签名是电子商务的核心问题，许多国家都在制定法律，以使数字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若有读者想对当前的数字签名机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对公钥基础设施相关课题的讨论感兴趣，我们建议其参阅由派珀、布莱克–威尔逊（Blake-

Wilson）和米切尔（Mitchell）所著的《数字签名》一书。当然其中有一些问题十分重要，需要在这里加以讨论。与证书的使用有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撤销 的问题。例如，某公司发给一名雇员一份证书，但后来该雇员离开了。第二个例子是关于密钥持有者的，他了解到他的私钥已受到侵害。在这两种情形中，都需要CA能够撤销那份证书。由于这些证书可能已经广为散布，直接去通知每个人该证书已被撤销是不太现实的。一种常用的解决办法是由CA发布一份“证书撤销表”（**CRL**），然而，这是一笔重要的管理费用，而且还有很多与此相关的问题。

第二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与责任有关。很多用户怀着信任的心理使用这种证书。假定一份证书出了差错，使得列在表中的公钥值不属于列表中的主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搞不清楚谁该负责：是公钥的所有者，是用户，还是CA。

公钥基础设施

利用公钥基础设施（PKI）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公钥密码术的使用。亚当斯（Adams）和劳埃德（Lloyd）写了一本题为《理解公钥基础设施》的书，据我们所知这是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本书。书中将PKI定义为“一种无所不在的保障安全的基础设施，它的服务功能是借助于公钥的概念和技巧实现和展开的”。

我们已经强调了身份验证的重要性、撤销证书的必要性，以及交叉验证的概念等。其中交叉验证可能是极难实现的，除非参与其中的CA使用的技术能够兼容。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它们与用户如何决定哪个CA的验证是可信赖的这一普遍性问题有关。于是，CA需要公布其政策和实际工作状态，讲明其所实行的各种安全程序等信息。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认识了PKI系统的三个关键角色。第一个是证书的所有者，他申请证书；第二个是CA，它颁发证书，将证书所有

者的身份与该所有者的公钥值绑在一起；第三个是信赖证书者，他使用（因而信赖）该证书。在某些系统中，身份识别的验证由独立的权威机构实施，该机构名叫注册中心（**RA**）。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一个拥有大量CA的大型PKI中，一个用户要认定另一用户的公钥是否可靠，可能需要对一长串证书中的签名进行核实。这可能是一次既昂贵又费时的运作，用户们不想这样做。为了使用户“节省”这项开支，证书验证中心（**VA**）的概念就出现了。其基本理念是，终端用户只须去询问VA某份证书是否仍然有效，并收到是或否的答复。于是，这项工作便从用户转移到了VA。

在密码术中，PKI和数字签名可以说是当前与电子商务关系最密切的两个领域了。但是有志于此的实践家们正亲身体验着若干技术难点，例如与可扩展性有关的问题。此外，尽管有一些断言宣称，PKI技术对电子邮件的安全、访问网络服务器的安全、虚拟专用网络的安全和其他通信的安全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组建CA这样的机构的商业诱惑力，已被证明比预期的要弱。

当PKI建立之后，需开展下列活动，当然不一定按下列的先后次序进行：

- 必须生成为CA所用的密钥对。
- 必须生成为用户所用的密钥对。
- 用户必须申请证书。
- 必须确认用户的身份。
- 必须确认用户的密钥对。
- 必须制备好证书。
- 必须检验证书。
- （需要时）必须去除/更新证书。
- （需要时）必须撤销证书。

与这些活动相关的根本问题是在哪里？ 以及由谁开展？ 某些CA制造的证书是附带着不同“水平”标识的，大致地说，水平是反映证书

可信赖程度的一个指标。例如，用户会被建议在高价值交易时不要使用低水平的证书。在这种系统里，证书的水平可能会反映出识别过程是如何进行的。例如，当识别过程是建立在使用电子邮件地址基础上的时候，产生的证书就会是低水平的，而高水平的证书必须经过手工操作的程序才能配送给用户，包括提供口令等。亚当斯和劳埃德的《理解公钥基础设施》或克拉珀顿（Clapperton）的《电子商务手册》都是很好的讨论有关PKI的问题及其潜在的解决办法的概述性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

信任需求

CA是所谓可信任的第三方（**TTP**）概念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两个参与者都信任第三个参与者，即CA，他们利用这种信任建立起他们之间的安全通信联络。TTP几乎出现在所有使用密码术的地方，而且对它们的使用常常会引发一些忧虑。一般来说，用户必须信任TTP的诚信以及技术能力。要精确地判断它们应发挥多大的影响以及用户的安全应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这通常是很难的。

例如，考虑公钥与私钥对的生成。我们已经指出，这是一个数学过程，需要专用的软件。普通人无法完成这一过程，所以密钥或密钥生成软件都须由外部提供。无论是哪种情形，无疑都需要信任。通常密钥都是在外部生成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密钥应由CA生成还是由另一家TTP生成。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出答案，因为很清楚，答案取决于具体的用途和环境。我们只是想引起对某些课题的关注。值得担心的是，如果一个组织为另一个实体生成了私钥和公钥对，该组织可能会保存私钥的副本，甚至将其透露给其他实体。对此的争论影响深远，一些人主张根本就不需要CA。

1991年，名为优良保密协议（**PGP**）的软件包的首个版本问世，任何一位希望使用强加密的人都能免费使用它。它采用RSA方法进行用户认证和对称密钥配送，并且采用称为IDEA的对称加密算法来

保证机密性。虽然它使用了数字证书，但原始版的PGP并不依赖于核心CA，而是任一用户对其他任何用户而言都可以担任CA角色。它成了众所周知的信任网 工作方式。本质上，它意味着用户判断证书的可靠性是根据签发人是否为他所信赖的人而定的。对于小规模的通信网络而言，上述方式确实不需要核心CA而仍能正常工作。然而，对于大规模网络而言，这种做法还存在许多隐患。

另一个取消CA的可能做法是让用户的公钥值完全由他们的身份来确定。如果用户的身份与公钥值（本质上）是等同的，那就很清楚不再需要使用证书把它们绑在一起了。基于用户身份的公钥密码术概念是沙米尔在1984年提出的，此后出现了多种基于此概念的签名方案，但直到2001年才生产出基于身份的公钥加密算法。这样的算法有两个，一个是博内（Boneh）和富兰克林（Franklin）设计的，另一个是英国通信电子安全组（CESG）设计的。

在基于身份的系统中，必须存在一个受到普遍信任的中心体，由它来根据客户的公钥计算出相应的私钥并交付给客户。因此这种方法不会消除对TTP的需求，必须通过它生成所有用户的私钥。然而这种方法确实消除了对证书的需求。在这种系统下，用户A声称自己是B，大概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因为只有B才具有由B的身份确定的私钥。

基于身份的公钥系统的应用代表了除传统的PKI途径之外的另一有趣的加密途径。不幸的是，它也显现出了自身的问题，最明显的是关于唯一身份的概念和公钥撤销的问题。假定用户用他的名字和地址确定了他的公钥，如果他的私钥泄密，那么他就得搬家或改名字。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实际的。对于这种身份盗窃 的特殊问题，还是有些解决办法的。一个办法是让用户的公钥取决于身份和另一个公开变量，比如日期。这将保证用户的私钥每天都在变化，但可能会给中心体带来难以承受的工作量。目前有相当多的研究都想弄清楚是否能够用基于身份的系统来代替PKI。

还有另一种极端的观点，有些人主张，保证安全的最好方法是将众多危险集于一处，然后为此处提供最强大的安全保障。如果采纳这

种想法，那么就可以由CA来生成用户的密钥。持这种观点的人争论道，如果用户对生成其密钥的CA足够信任，那么用户也应信任由它来代表其进行密钥管理。辩护理由是密钥需要这种高度安全的CA环境。这就是所谓的中心服务器 的安全手段，事实证明，它对某些组织而言是有吸引力的。

注释

【1】 访问控制（access control），又译为“存取控制”。

【2】 重放攻击（replay attack）指攻击者通过重放消息或消息片断达到对主体进行欺骗的攻击行为，主要用于破坏认证正确性。

【3】 DSA（Digital Signature Algorithm），数字签名算法，它是数字签名标准的一部分。

【4】 认证中心（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又译作“证书管理机构”。

【5】 模仿攻击（impersonation attack），又译“假冒攻击”。

第八章

密钥管理

引言

在前面各章中，我们主要讨论了各种算法及其用处。但我们也反复强调了良好的密钥管理的重要性。大体上，密码服务的有效性取决于多个因素，其中包括算法的强度、一些物理特性（例如关键硬件设备的抗窜改性以及硬件访问的控制），还有密钥管理。强算法可用来防止攻击者算出密钥。然而，如果攻击者能用其他手段得到合用的密钥，那么强算法的价值就变得极小了。任何密码系统的安全都完全依赖于密钥的安全。密钥在其使用周期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加以保护。在本章，我们将阐明密钥管理的含义，论述泄露密钥的危险性，并探讨一些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在这一章中会常常提到一些较为通用的加密标准，特别是由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为银行业界制定的一些标准。为了有效地管理密钥，我们需要小心地选择管理方案，以保证它既能满足商业的需要，又能适合密码系统的运转条件。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过度复杂的密码安全系统意味着一项经常性的业务管理开支。

密钥的生命周期

密钥管理最基本的目的就是无论何时都要保证所有密钥的安全和完整。对任何一个密钥而言，它的生命周期从生成开始，并一直持续到不再使用且被销毁时为止。密钥生命周期的主要阶段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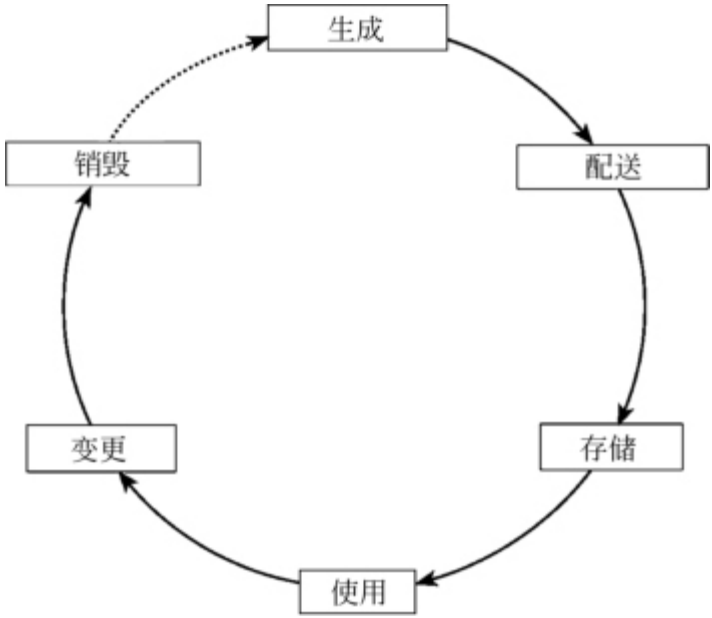

密钥的生命周期

几乎在所有情形中，每个密钥最终都会被另一个所取代。因此可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循环：某个密钥在销毁时，必有一个新密钥来替代它。然而，新密钥也可能在旧密钥被毁之前就已经经历了生成、配送和存储等过程。在某些系统中可能还会有密钥存档的要求。

任何密钥在其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都需要配备监控程序以侦查潜在的密钥攻击者。这几乎肯定会涉及到对密码使用记录的某种审查跟踪。显然，必须对这个过程加以监控，否则这种审查跟踪毫无意义。更进一步说，必须有人有权在密钥受到潜在威胁时作出反应，监控才有价值。特别是在大型密码系统里，往往都要求密钥有一个指定的、对其安全负责的主人。

下面我们来分别讨论这一生命周期中的每一个阶段。虽然很多基本的密钥管理原则都是相同的，但对称密码术的密钥管理与非对称密码术的密钥管理很不一样。事实上，PKI的建立是非对称算法的密钥管理在某些方面的基础。我们的讨论中将主要关注对称系统，但当两个系统的差别很显著的时候，我们也偶尔作些说明。

密钥生成

密钥生成常常是个困难的问题，特别是对公钥算法而言，因为它的密钥有很复杂的数学特性。对于大多数对称算法，任一个二进制数串（或偶尔也用其他符号）都能成为密钥。这意味着大多数对称算法的用户都有能力生成他们自己的密钥。主要的难点在于要找出一种方法，使生成的密钥是不可预测的。大众化的方法有手工技巧（例如抛硬币）、由个人资料派生（如PIN）或者使用（伪）随机数生成器。

对于非对称系统，情形就不同了。大素数的生成过程要求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可能还需要可观的资源支持。正如我们在前一节指出的，用户可能不得不信任外部生成的密钥或外部编写的软件。我们来看看RSA，它的安全性取决于攻击者能否因子分解模数N。如果密钥生成过程仅能产生有限个数的素数，那么攻击者就能生成那些有限的素数并且用每个素数作为因子去试。这个简单例子说明了公钥系统必须有一个好的密钥生成方法的重要性。

密钥配送与密钥存储

密钥的存储与配送都非常重要。它们所面临的难题和解决的方法往往很相似，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

使用强算法的目的是防止攻击者算出密钥。但是如果攻击者能在系统中某个确定的地方找到密钥，上述做法便毫无用处了。安全的密钥存储几乎肯定会使用某些形式的物理保护，例如，密钥可能就存储在某些物理存取受到严密控制的地方。这些密钥是否安全，其关键就在于存取控制的有效性。此外，密钥也可能存在一个设备里，如智能卡，这种卡有两层保护措施。第一层是卡的主人有责任确保这张卡一直在他的掌握之中。第二层是这张卡可能具有高水平的抗窜改性，可以防止他人得到卡之后读出其中的内容。

一条很粗略的密钥保护规则就是，理论上密钥不应出现在系统中任何确定的地方，除非对它们进行适当的物理保护。如果无法实现这

种物理保护，那么就应该对此密钥用另一个密钥加密或者将它拆分为两个或更多个组件。这条规则是在绝大多数加密工作还在硬件上进行的时期制定的。如果行得通，它仍然是很有效的，因为具有抗窜改性的硬件存储看来能提供比软件更好的保护。利用另外的密钥来加密密钥的做法导出了密钥层次 的概念，其中每个密钥都用来保护位于它下一级的那个密钥。密钥的层次很重要，我们还会在本章的后面对此进行讨论。现在，我们只需注意，若要安排一个系统使得每个密钥都被另一个密钥所保护，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必然会有一个处于系统顶端的密钥。这个主密钥 可能用组件的形式来生成和配送。这些组件分别由不同的主人所持有并且被分别安装在加密器件中。显然，为了让使用组件的概念是有意义的，应使任何人都无法以确定的形式接触所有的组件。

现在我们来讨论如何构造密钥组件而不泄露密钥的任何信息。假定有两个组件合起来构成一个密钥K，最原始的方法是用K的前一半作为第一个组件K_1 ，另一半作为组件K_2 。然而，这样的话知道K_1 就可能找出K，办法是去试所有可能的K_2 的值。例如，如果K是一个64比特的密钥，知道K_1 就意味着找出K只需对K_2 进行2^{32} 次尝试，这个数目与密钥穷举搜索法所需的2^{64} 次尝试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更好的办法是生成两个与K一样大小的组件K_1 和K_2 ，比如使得K是K_1 和K_2 进行XOR运算的结果（$K = K_1 \oplus K_2$ ）。由于K和K_2 同样大小，知道组件K_1 并不会使得找出K的速度加快，因为搜索K_2 一点也不比搜索K容易。

一种更复杂的办法是使用秘密共享模式 的概念。在这种模式中，有若干称为秘密份额的数值，将这些份额中的几个（或全部）组合起来就能得到密钥。譬如，可以用7个秘密份额来设计一个系统，使得其中的任意4个便能独立地定出密钥，但只知道其中任何3个就不能得出该密钥的任何信息。这不仅引进了与共享责任相联系的安全性，而且在需要恢复密钥时，可以较少地依赖特定的个人。

就像密码术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通信系统的密钥管理比数据存储的管理要难很多。如果用户只是要保护他们自己的信息安全，那么

就不需要配送密钥。然而，如果需要进行安全的通信，往往就需要进行密钥配送。此外，配送的数量取决于要求安全通信的终端的个数。如果只有两个这样的终端，我们称之为点到点 的情形。如果有两个以上的通信终端要连接，那么密钥配送问题的解决方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商业用途与终端环境。这里有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车轴辐条”式的环境，由一个中心终端（或称车轴）和其他若干终端组成，后者必须能安全地与中心终端进行通信。另一种是“多到多”的环境，此时可能每个终端都要求能够安全地连接到其他任何终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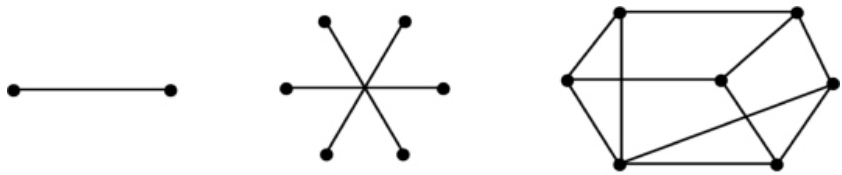

“点到点”式　　“车轴辐条”式　　“多到多”式

公钥系统的情况有所不同。这里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适用于私钥，因为像对称密钥一样，私钥需要保密。但是，公钥是通过证书来存储和配送的，第七章已对此进行过讨论。

密钥确立

密钥确立的概念是：两个参与者能通过一种方法在他们之间商立一个密钥。这种方法叫做密钥确立协议　，它是密钥配送的一种替换物。当然关键的一点是，在确立密钥前，两个参与者能够互相认证。利用公钥证书就能做到这一点。在这种类型的协议中，最著名并被广泛使用的当属由迪菲和赫尔曼所设计的那个协议。在迪菲-赫尔曼协议中，两个参与者须交换他们的公钥。然后他们要使用一种精心选取的组合规则，将自己的私钥与对方的公钥组合在一起，得出一个公用的值，再从中生成密钥。

两个用户必须能够彼此认证，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若做不到这一点，协议就容易遭受所谓“中间人的攻击”。在这种攻击中，攻击

者会拦截两方之间的通信，并且在一方面前假扮成另一方。结果是双方都相信他们有了一个彼此商定的密钥，而事实上每一方都只是跟“中间人”商定了密钥。这是数字证书失效的一种情形。

迪菲–赫尔曼的密钥确立协议的基本思想是，即使有人对确立密钥的通信过程进行了窃听，窃听者仍无法计算出密钥。量子密码术是一种有趣的确立密钥的新技术，它不依赖于密码算法的强度。两个参与者可以利用量子力学的性质来传送信息，同时又能监测传送是否被窃听。密钥的确立包括了一个用户发送一个随机序列给另一个用户的过程。如果它被窃听了，那么该窃听活动是可以监测到的，密钥确立过程就会重新开始，然后未被窃听的序列才会用来作为密钥的基础。

密钥的用途

在很多系统中，每个密钥都有指定的用途并且必须专钥专用。我们还不太清楚这个要求是否总是合理的。但是，有确凿的例子说明赋予同一个密钥多种用途的做法存在诸多弱点。现在普遍认为，坚持每个密钥有独立用途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我们在前文看到的一些例子表明密钥的专钥专用概念是一个好主意。例如，我们已经讨论过为给其他密钥加密而使用的密钥，它与给数据加密的密钥是有区别的。为了理解实践中的这种约束，我们需要再次提到抗窜改安全模块（TRSM）这个概念。当用户收到某个密文，然后把密文与适当的密钥输入TRSM时，用户期望的是TRSM输出数据。但如果用户收到的是一个被加密过的密钥，那么，用户并不希望模块输出确定的密钥。相反，用户希望该模块将密钥破译并在其中使用。但是，密文和密钥都是二进制数串，加密算法无法作出区分。因此，密钥用途的概念必须与TRSM的功能相关而不是与实际算法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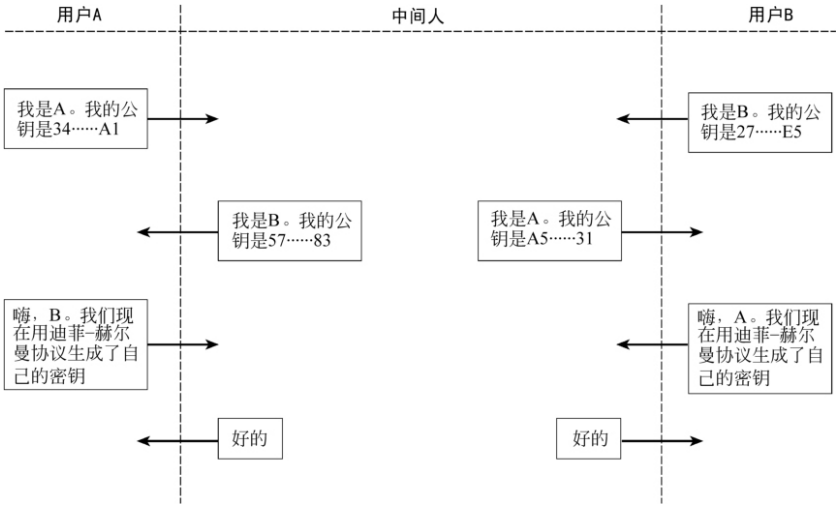

中间人

为了使密钥具有唯一的用途，我们需要给每个密钥分配一个标签。这个标签会说明该密钥的用途，例如“数据加密密钥”、“密钥加密密钥”、“MAC生成密钥”或“MAC验证”。当然，这些标签的精确形式取决于TRSM和环境。对非对称算法而言，用户可能需要两组公钥与私钥对。其中的一组用于加密，另一组用于签名。

一旦商定了标签，就必须通过某种方法将标签和密钥绑在一起，从而使对手不能改变标签，进而避免误用密钥。一种方法是使该密钥的所有加密版本都依赖于TRSM的顶层密钥及密钥标签。这可以确保该标签只能在TRSM内部“抹去”。一旦标签被绑到密钥上，就必须有某种机制来保证密钥不会被误用。TRSM的设计和结构对增强这种机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密钥变更

所有的密码系统都必须有变更密钥的能力。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变更本身可以是按计划的定期更新，也可以是对可疑危害作出的反应。如果怀疑一个密钥已被泄露，也许就要立刻变更该密钥。很多

机构会定期进行密钥变更演习操作，为应对紧急情况的出现作好准备，促使他们的职员积累解决相关实际问题的经验。

定期变更密钥可以减少密钥被暴露的几率，并降低它们对于攻击者的价值。一次成功攻击的价值显然决定了攻击者愿意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一种销售点电子转账系统（EFTPOS），它的密钥在每一次交易后都会变更。对这样的系统而言，攻击者不会为了仅得到一个密钥去破坏一次交易而投入大量资源去实施攻击。

对于多长时间必须变更密钥并无一定之规。然而很清楚，每个密钥都应该在使用密钥穷举搜索法把它找出来之前很久就加以变更。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需要在密钥可能泄露的风险和变更密钥可能带来的风险之间权衡利害得失。

密钥销毁

对于那些不再需要的密钥，我们必须用安全手段加以销毁。简单地将存有密钥值的文件删除是不够的。极详细地说明实施销毁的细节往往十分必要。例如，ANSI的一个相关标准说："纸录的密钥资料可用切割、撕碎、烧掉或制成纸浆等方式予以销毁。销毁存储在其他介质中的密钥资料时，必须保证不可能对其用物理或电子手段加以复原。"这段话特别强调了对于所有用电子手段存储的密钥，必须明确地删除，不可留下任何可能对攻击者有用的痕迹或其他消息。这在软件应用中尤为重要，因为用于存储密钥的存储器以后也许会另作他用。

密钥层次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人工操作既费时又昂贵。人们肯定希望将人工操作局限在最小的范围内。对于密钥管理，只要可能，人们更倾向于用电子配送密钥而不是用人工配送。但是，如果用电子配送

一个密钥，那么在传输过程中一定要对其加以保护以免暴露。为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常用的方法是用另一个密钥给这个密钥加密。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这就引出了密钥层次的概念，其中处于顶层的主密钥并不能用别的密钥来保护它。因此主密钥需要人工配送，此时的主密钥或是存储于抗窜改设备，或是借助于密钥的组件形式。

最简单的密钥分层形式是分为两层。主密钥是用来加密密钥的密钥，它只用于保护下层的密钥。下层密钥称为会话密钥或工作密钥 。它们的作用随应用情形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例如，它们可能因机密的需要用于对数据进行加密，或者为保持数据的完整性而用于计算MAC。会话可以用几种方式来定义，例如可以用持续的时间或多种不同的用途来定义。当会话密钥需要变更时，新的替代密钥在主密钥的保护下进行配送。但是，如果主密钥需要变更，则须人工进行。人工的密钥变动常常不太实用，因此很多系统有三个层次，在主密钥和会话密钥之间增加了一层。这一层的密钥是用来加密下层密钥的，作用是保护会话密钥。然而现在，这些用来加密密钥的密钥可以在主密钥的保护下进行配送了。这附加的一层使得用来加密密钥的密钥能够通过电子手段完成变更，并能大大降低人工变更密钥的需要。上述两种情形可用下列图解来说明，其中每个密钥“保护”着它下面的一个密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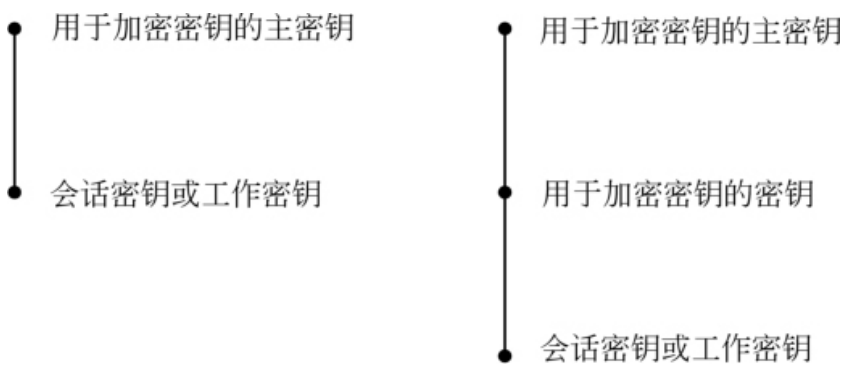

简单的密钥层次

在讨论密钥管理的过程中，我们至此一直假定工作密钥是对称

的。然而用于加密工作密钥的算法并不一定要与用于保护数据的算法相同。需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工作密钥是对称的，它也并不妨碍对顶层密钥使用公钥密码术。其实，在很多混合系统中，非对称算法被用来为对称算法配送密钥。

在网络中管理密钥

如果两个参与者希望交换加密信息，他们可选择的密钥处理方式有很多种，可以根据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所要求的安全水平来决定。用户可以碰头当面交换密码值。如果用户们同意使用一种加密产品，则该产品或许可以促成双方通过比如迪菲-赫尔曼协议那样的协议达成一份密钥合同。但是某产品可能太昂贵或者很复杂，例如，有些产品可以提供一种加密算法并建议用户建立一个字母数字混合字串式的密钥。发信人按建议需将该密钥用电话传递给收信人。此时的安全性如何是很清楚的，但大多数私人通信者或许都能接受这种安全水平。尽管如此，大多数人仍会认为这样做太麻烦，他们并不愿意仅为发送一封机密的电子邮件就必须先打电话。

如果所要求的安全水平较高，那么最初的密钥合同可能会包含某种形式的人工操作。因为人工操作比较慢而且昂贵，用户们可能会想通过电子方法来履行将来的密钥合同。如果一个网络足够小，则存在这样一种密钥配送的方式，即在每一对终端之间建立一个共享密钥。当然，这样做可能费时而且昂贵。对于一个大网络而言，会存在日常的密钥管理工作量过大而且费用太高的风险。为了克服这个难题，很多网络都设有委托中心，它们的作用之一就是促成一对对网络用户之间的密钥确立。

一种典型的情形是，每个用户与委托中心之间确立一个共享密钥。虽然这样做可能费时且花费较高，但用户只须做一次就可以了。如果两个用户希望进行私人通信，他们就可以要求委托中心利用各个用户已和委托中心确立的共享密钥来帮助确定他们之间的共享密钥。

我们讨论的这种解决办法依据的是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标准。

使用委托管理中心

我们现在考虑一个大网络的情况，其中每个网点都要求与其他任一网点之间实现安全的密码连接。这样规模的网络要求使用委托中心来帮助确立任何两个网点之间的共享密钥。我们假定每个网点已经与该中心确立固定的安全连接，这样任意两个网点都可以寻求委托中心的帮助来确立共享密钥。虽然这两个网点在他们的安全通信中使用对称算法，但中心与每个网点间的安全通信既可以使用对称算法，也可以使用非对称算法。如果整个系统全都使用对称算法，则委托中心就成为密钥配送中心，或是密钥转换中心。如果委托中心和网点之间使用的是非对称算法，则该中心就成为密钥认证中心。下面我们依次讨论这两种情况。

假定整个系统全都使用对称算法。设网点A想与网点B进行安全通信，则A可以请求委托中心在A与B之间建立一个共享密钥。若委托中心是密钥配送中心，A可以要求密钥配送中心提供密钥；若委托中心是密钥转换中心，A便自己生成一个密钥并要求密钥转换中心将它安全地配送给B。无论哪种情形，A和B与该中心共享的密钥都可以成为用来加密密钥的密钥，从而保护网点与中心之间的所有通信。如果我们将这个新的密钥记为KAB，那么KAB在任何传递阶段都会受到网点与中心所共享的密钥的保护。因此网点A和B二者都必须依赖于它们与中心共享的密钥的安全来确信只有A和B这两个网点知道KAB。

现在假设委托中心与网点之间使用非对称模式。我们假定网点A和B希望进行通信，而且都有公钥与私钥对。我们进一步假定，密钥认证中心知道这些公钥值，并且能够向网点A和B保证对方的密钥是真实的。对密钥认证中心而言，最简单的方法大概是像认证机构那样

颁发证书，把网点A 和B 与各自的公钥分别绑在一起。现假定网点A 为了与B 进行安全通信而生成一个对称密钥KAB。网点A 可以用B 的公钥对这个对称密钥进行加密，然后用A 自己的私钥来签署加密后的密钥。用网点B 的公钥对KAB进行加密，可以使网点A 确信只有网点B 也知道这个对称密钥KAB。此外，用A 的私钥签署KAB，可以使B 确信此对称密钥KAB必是网点A 所生成的。这样A 和B 都确信只有他们两个网点知道这个对称密钥KAB。

A 和B 共享的对称密钥可用来作为对密钥进行加密的密钥，也可以作为工作密钥。如果KAB用作给密钥加密的密钥，那么网点A 和B 就不再需要通过委托中心来建立工作密钥了。此外，如果A 和B 生成他们自己的公钥和私钥对，那么密钥认证中心并不能算出这个对称密钥KAB。然而，若委托中心是密钥配送中心或密钥转换中心，对称密钥KAB就必须明确地出现在委托中心了。

密钥复原和密钥备份

任何一位希望得到与某些密文对应的明文的人至少需要下述情况之一成立：

1．有人给他们提供了明文。
2．他们知道解密算法并且有人给他们提供了解密密钥。
3．他们知道解密算法并且有能力破解它。
4．他们能够在系统内找到明文。
5．他们知道解密算法并且能够在系统内找出解密密钥。
6．他们有能力推导出算法并破解它。

如果情形1成立，那么他们可以绕过密码术；而情形2相当于他们得到了与预定的接收者相同的信息。使用强加密可以挫败符合第3种情况的攻击者。但要用强加密来对付第4或第5种情况则是毫无用处

的。如果情形4出现，攻击者可以绕开加密术，而情形5意味着他们跟真正的接收者知道的信息一样多，无须去破译算法。因此，密钥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得到妥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密钥管理，但还没有提到密钥备份这一重要主题。如果使用强算法对重要信息加密，之后密钥却丢失了或出现了讹误，此时那条重要信息可能会永远丢失，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密钥的备份事关重大，且备份可以储存在本地的安全之处或委托可信任的第三方进行安全保管。上面描述的都是我们假定的最坏情形，所以不再考虑第6种情形。

在讨论加密问题时，我们通常采取这样的看法，即它是个人或公司用于保护他们的私人通信或存储信息的工具。自然，它也会给罪犯和恐怖分子以类似的保护，使他们逃脱法律的制裁和政府的其他监管。多年以来，执法机构一直坚持认为在与犯罪行为作斗争时拦截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出于这种认识，很多国家有长期沿袭的法律，允许在某些条件下对通信进行合法的窃听，诸如窃听电话等。为了抗击恐怖主义和消除其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情报机关也抱持类似的主张。不同国家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些政府试图对一切使用加密术的活动实施严格控制；另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只控制加密装备的出口。但是，近期的技术进展，特别是软件加密算法使用领域的快速扩张，已促使大多数政府反思他们关于使用加密术的各项政策。

显然，这里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一方面是私人和各种组织，他们想保护自己的机密资料；另一方面是执法机关，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有权知道拦截到的特定通信的内容，以便与犯罪行为作斗争并保护国家的安全。公司希望加密程度能够强到使有组织的罪犯不能破译的程度，而政府想要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获取任何被传递的信息内容。

英国的《2000年规管调查权力法令》是一部关于通信拦截的法规。毫不奇怪，其中关于合法拦截的那部分内容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辩论。部分争论是围绕这样一个条款进行的：执法机关可以在某些约束下，要求得到破译拦截到的密文所需的密钥，或是相应的明文。

执法机关是否有权在任何情况下要求得到密钥，这涉及了道德问题，围绕这一点的争论占了大多数。这也是有关人权和国家需要之间平衡问题的争论的一个特别现代的例子。我们不打算在本书中对这个特定的主题表明立场。然而从技术的角度看，用户如果认可执法机关在某种条件下有权读懂加密数据，那么可能会发现当只有第1和第2种情况发生时，对他们是比较有利的。如果执法机关遇到了第3至第6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那说明对掌握足够丰富资源的对手而言同样也可能出现这类情况。

曾有人预测，人们为了保证个人通信（比如电子邮件）的机密性会普遍采用加密的办法，但实际并非如此。这绝对不是因为缺少算法。确实，潜在用户所面临的可供选择的算法可以说是太多了——它们都接受过公开的科学检验，一般都很强。主要原因大概是缺少易于使用的产品。大多数人对安全不够关心，因为若要保证安全他们将不得不花费更大的力气。当用户发送电子邮件时，他往往只想到去点击“发送”按钮。然而，利用加密手段通常会激活一系列由计算机提出的问题，要求用户作答或作出回应。大多数用户不想劳这个神。使用加密手段时的很多麻烦都来自于密钥管理。不凑巧的是，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良好的密钥管理对系统的整体安全来说确实至关重要。

第九章

日常生活中的密码术

引言

本书自始至终反复强调了密码术与现代生活的关系，并且用实际生活中的例子阐明了一些重要的议题。这一章将描述数个不关联的、利用密码术为人们提供安全服务的情况。其中很多场景几乎是普通人每天都会遇到的，但是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安全风险以及加密所起的作用。对于每种情况，我们都会描绘密码术的用途，讨论有关安全的议题，指出它是如何应用的。

从ATM中取现金

当一个人从ATM中提取现金时，他需要使用一张塑料制的内含磁条的卡片，并知道相关的PIN。顾客将他们的卡片插入ATM插口，输入PIN，再输入取款数目。在一次典型的交易中，如果是在线交易，该系统需要检验卡上的PIN是否正确，再允许顾客提取他所要求的现金额。这个验证很可能是由银行的主计算机进行的，因此ATM与主计算机之间必须进行双边通信。ATM将卡中记录的详情及PIN发送给主计算机，主机回复授权交易或是拒绝交易。很明显，这些通信需要保护。

虽然取钱的数目不一定需要保密，但必须保证机器给出的钱数与用户从银行账户上提取的款项数额相同。所以，信息的完整性必须得到某种形式的保护。此外，银行方面有理由担心ATM对同一个授权交易的回复进行多次付款，这就要求在回复信息中加入序列号以避免重复执行授权交易。

所有银行都告诫他们的顾客要保守PIN的秘密，因为任何偷到或拾到卡的人，只要知道了正确的PIN就可以使用这张卡。当然，银行必须保证PIN不会在他们的系统中受到损害，因此PIN在传送时以及在用于验证其合法性的数据库中都是加了密的。这一过程中使用的算法

是ECB模式的DES。因为DES加密64比特的区组，而PIN一般是4位数，因此含有PIN的区组在加密前需要填满位数。如果对所有顾客所填充的内容都一样，那么对于任何得到加密后的PIN区组的人来说，虽然他们不知道正确的密钥，但他们能够识别出共享该PIN的所有顾客。为了消除这种隐患，我们使用一种填充内容依赖于顾客卡中的详细信息的填充技术。

使用加密的方法就可避免截听ATM与主计算机之间通信的拦截者获知PIN。加密也可以避免那些能够进入银行数据库的人读取PIN。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加密并不能预防骗子猜到某人的PIN。任何人拾获或偷到一张银行卡，都可以将它插入ATM并试试运气来猜一猜。因为至多只有10,000个四位数的PIN，猜成功的机会虽然很小，但尚未达到不可能的程度。为了对付这种情况，大多数ATM只允许试三次PIN，三次都错则将卡吞掉。这种举措是合理的，它不给骗子过多的猜测机会，又避免了卡的真正主人插入卡后因输入错误而引起的不便。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加密的方法不能抵御他人猜出PIN的危险。

一些ATM网络现在使用智能卡，其中用上了公钥密码术。此时，用户的卡中包含了他们的私钥以及由卡的发行人签署的证书，以确认他们的公钥值。ATM发出一个质询供卡签署，从而认证这张卡。就像所有依赖于证书的系统那样，为了检查证书的有效性，终端中必须存有卡的发行者的真实的公钥副本。某些系统通过将这些公钥值存在ATM中而实现这一要求。

付费电视

任何一位订购付费电视系统服务的人，都要求能看到那些他们付了费的节目，并且希望那些没有付费的人看不到这些节目。付费电视系统是访问受到控制的广播网络的一个例子。这类网络中的信息——在此例中是电视节目——传播的范围极广，但接收到信号的人中只有

一部分人能看懂信息。为达到这一目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使用密钥对广播信号加密，使得只有信息的预定接收者知道该密钥。建立和管理这样的系统的方式有很多。

在典型的付费电视系统中，每个节目在播送之前用其唯一密钥加密。那些为观看这些节目而付费的人，其实是付钱购买该密钥。显然，这就引发了一个密钥管理问题，即如何才能把密钥配送到预订该节目的观众手中。这个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发给该网络的每位用户一张智能卡，卡中包含了用户独有的私钥，对应于一种非对称加密算法。然后用户将智能卡插到读卡器上，这种读卡器可以是电视机的一部分，也可以是由电视网络运营商提供的附加装置。当用户为一个节目付费之后，用来加密该节目的对称密钥在用用户的公钥加密后传送。结合第八章的内容，这种类型的系统使用了对称算法和非对称算法混合而成的两个层次的密钥结构。

优良保密协议（PGP）

优良保密协议最初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菲尔·齐默尔曼（Phil Zimmermann）开创的。它是一种用户友好型产品，用于在个人电脑上进行的加密，使用对称和非对称两种加密术。它的很多版本现在还在使用之中。在此我们只讨论一般性概念，而不专注于任何一个特定版本或用途。

PGP使用的是两个层次的密钥结构，其中对称会话密钥用于保护数据，非对称密钥既用来签名，也用来保护对称会话密钥。PGP有多种用途，包括电子邮件保密及安全文件存储等。1991年一个公告版上公布了PGP，这招致了齐默尔曼与美国政府（声称公布PGP是非法出口密码术）及各种专利所有者之间的辩论。这场争辩直到1997年才得到解决。PGP成为一种免费软件，很多新的个人电脑的软件中都包括了它。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使用非对称加密的主要困难在于密钥认

证。我们已讨论过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在一种公钥基础设施（PKI）中使用认证中心网络。PGP针对公钥认证问题引入了一种不同的解决方法，即建立信任网 。

信任网可按下列方式建立。首先，每个用户签署自己真实的公钥，这就是说，本质上用户成了他们自己的认证中心。现在假设用户A和B每人都有这样的由自己签署的密钥。如果用户B“信任”用户A，则B会很乐意签署A的公钥并认为其是可信的。所以，用户B在本质上就成了用户A的认证中心。现在假设用户C不认识用户A，但他想确定A的公钥是可信的。如果C“信任”签署过A的公钥的任一用户，那么C会愉快地接受用户A的公钥并认为其是可信的。这个用户被称为是把A介绍给C的介绍人 。利用这种交叉签署公钥的方式，一个大型的、错综复杂的、已认证公钥的网络（信任网）就可以建立起来。它使得用户能够根据自己判断的签署了公钥的人的可信程度，对每个公钥给予某种程度的信任。

自1991年公布以来，PGP有了很多版本，最近的版本（2001年版）是第7版。早期的PGP版本使用RSA和IDEA作为非对称和对称的加密算法；而PGP的后期版本（默认值）用迪菲–赫尔曼协议/贾迈勒算法和CAST作为它们的非对称和对称的加密算法。我们现在简单勾画一下利用PGP的各种选项对电子邮件进行加密的过程。

PGP密钥选项

这个选项显示一个窗口，其中列有系统储备的该用户的所有非对称密钥对、其他用户的所有公钥及它们的可信程度，以及一张与其中每个密钥相对应的签名表。在这个窗口中还有一些工具性程序，用于验证和签署其他用户的公钥，以及导出和导入标有签名者的公钥。这个选项还允许用户根据由移动鼠标和敲击键盘导出的数据生成新的非对称密钥对。然后，用户的密钥对中的私钥是用对称加密算法和用户选择的口令短语 或密钥来加密和保存的。

加密选项

通过这个选项可以用一种带有会话密钥的对称加密算法给信息加密，其中的会话密钥是根据移动鼠标或敲击键盘导出的数据确定的。这个会话密钥要用接收者的公钥来加密，然后可将加密的信息与加密的会话密钥发送给接收者。接收者可以用他的私钥恢复对称的会话密钥从而得到信息。

签名选项

这个选项使用发送者的私钥来签署信息。接收者可用发送者的公钥来检验这个签名。

加密与签名选项

这个选项是用来签署并加密信息的，上面已分别简述过这两项操作。

解密/验证选项

这一选项使接收者能够对加密信息进行解密，或是核实签名（或两者皆做）。

安全网络浏览

现在很多人都在网上购物。为此他们几乎肯定要使用信用卡，这意味着他们的信用卡上的详细资料一定会通过网络传送。正是这些详细资料的安全问题，常被人们认为是这种购物形式尚未进一步普及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一小节里，我们将讨论在网络上，信用卡中的详

细资料是如何得以保护的，并讨论由此引出的其他安全问题。

安全的网上浏览是电子商务的本质特征。安全套接字层协议（**SSL**） 和传送层安全协议（**TLS**） 是两个重要的协议，专门用于核实网站的可靠性。它们促进对敏感数据的加密，并帮助确保网络浏览器与网站之间所交换信息的完整性。下面我们来专门谈一谈SSL。

SSL是客户–服务器协议的一个例子，其中网络浏览器是客户，而网站是服务器。客户启动保密通信，而服务器应答顾客的请求。SSL最基本的功能是用来在浏览器和所选网站之间建立一个发送加密数据（例如信用卡的详细资料）的信道。

在讨论这个协议之前，我们要指出网络浏览器一般都掌握着一些加密算法，以及若干受到广泛认可的认证中心的公钥值。

浏览器发给网站的初始信息通常被称为“顾客来了”，在其中浏览器必须给服务器发送一张表，内容是浏览器能够支持的加密参数。然而，虽然最开始的信息交换可以使加密得以进行，但该信息并不能向网站确认浏览器的身份。事实上，在很多实际应用中，网站不能验证浏览器，认证协议只是让浏览器来验证网站。这样做常常是明智的。例如，若人们想通过网上浏览器买东西，那么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去确认他们所浏览的网站是可信任的。另一方面，经销商可能有其他的方法验证用户的身份，甚至可以不去关心它。例如，经销商在收到某个信用卡号码之后可以通过信用卡核发机构来直接确证这个号码。

网站为了能通过浏览器的认证，需要给浏览器发送其公钥证书，若浏览器有合适的公钥，那么这份证书就给浏览器提供了一份该网站公钥的可靠副本。作为建立安全信道的一部分，浏览器需再向网站发送一个适用于商定的对称算法的会话密钥。该会话密钥是用网站的公钥进行加密的，这就使得浏览器确信只有被选定的网站才能用这个公钥。于是，SSL为第八章中所讨论的混合密钥管理系统提供了另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同时它也是PKI用于实体认证的一个例子。

GSM移动电话的使用

移动电话吸引用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能让他们信步漫游，并且几乎能从任何地方拨打电话。然而，因为移动电话是无线的，所以电话信息须通过无线电波传播，直到它到达最近的一个通信基站后才经固定的陆线传送。因为拦截无线电讯号很可能比拦截陆线上的电话容易，所以人们最初的要求是GSM的安全性至少应与传统的固定电话相当。为满足这个要求，从手机到最近的基站的信息传输是加密进行的。另一个更严重的安全课题是运营商面临的难题，他们需要辨认出这是谁的电话，以便知道该由谁来付账。所以对GSM而言，存在下述两个主要的安全要求：机密性——这是顾客的要求，以及用户认证——这是服务系统提出的要求。

每个用户都配发有一张个人专用的智能卡，称为SIM，它包含一个只有运营商知道的128比特的保密认证值。这个值用作质询–应答认证协议的密钥，该协议的算法由运营商选定。当用户打电话时，他的个人身份通过基站传送给系统的运营商。由于基站不知道SIM的密钥，甚至也可能不知道认证算法，中心系统需生成一个质询，连同适用于这张卡的应答一并发回基站。这使基站能够检验应答的有效性。

除了认证算法外，SIM还包含一个流密码加密算法，这在整个网络中是通用的。这个算法用来加密从移动电话传送到基站的信息。对这些加密密钥的管理是很精巧的，需使用认证协议。认证算法接收128比特的质询，并计算出一个128比特的应答，该应答依赖于卡上的认证密钥。然而，只有32比特从SIM传到基站作为应答。

这意味着当认证过程完成时，还有96比特的加密信息只有SIM、基站和主计算机知道。在这些比特中，64比特被用来确定加密密钥。注意，每次进行认证时加密密钥都会变更。

参考资料与延伸阅读建议

在本节我们将列出本书引用过的全部参考书，并对读者的延伸阅读提一点建议。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围绕密码术的各个方面撰写的著作非常多，因此我们不想列一张包罗万象的书单。

本书从头至尾都参考了梅内策斯、范·奥尔斯霍特和范斯通著的《应用密码术手册》，它可以作为详细讨论密码方面的技术课题的标准参考书。无论学术界还是密码工作从业者，都对该书评价甚高。我们将它推荐给每一位打算认真学习密码术的人。但必须指出，与读其他大多数密码方面的教科书一样，读者需要具备比较好的数学基础。对于那些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数学训练但很想知道超出本书范围的更多技术细节的人，我们推荐R. E. 史密斯（R. E. Smith）的《因特网密码术》（库克［Cooke］的《代码与密码》也属于这类读物，父母们可以借助它来激起孩子的兴趣）。如果你希望做更多的练习，可以到Simon Singh网站上一试身手。它包括交互式的加密工具，训练破译能力的密文以及虚拟的谜密码机。

对从事安全保密工作的专业人员而言，数字签名和PKI是密码术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这两个主题的内容分别包括在下列作者的著作中，他们是派珀、布莱克-威尔逊和米切尔，以及亚当斯和劳埃德。想知道密码术是如何应用于安全电子商务领域的读者可以去查阅福特（Ford）和鲍姆（Baum）的《安全电子商务》。对那些想在更广泛的背景中了解密码术的人，我们推荐安德森（Anderson）写的《安全工程》。

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密码术的历史是一个迷人的课题。这方面的“经典”当属卡恩的《破译者》，而辛格的《码书》则是更新的作品，它对提高公众对密码术的认识和欣赏能力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成为很多书籍、戏剧及电影的主题，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布莱奇利公园进行的破译密码的活动。对此事件的最早描述出现在韦尔什曼（Welchman）的《茅屋六故事》一书中。那些参与了布莱奇利公园的英勇事业的个人也写了很多与此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被汇编成《破译者》一书（由欣斯利［Hinsley］和斯特里普

［Stripp］编辑）。此外，在布莱奇利公园发生的事已经被成功地搬上了银幕，影片是根据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的小说摄制的。

纵观历史，有关密码术的冲突一直存在，冲突的一方是个人或组织，他们希望保守自己的机密信息，另一方是政府，它试图控制密码的使用。迪菲和兰多（Landau）在《命悬一线的隐私权》一书中讨论了这种冲突。

下列参考资料为本书提及的各种事实和论题提供了原始素材。

Carlisle Adams and Steve Lloyd, *Understanding Public-Key Infrastructure*（理解公钥基础设施）（Macmillan Technical Publishing，1999）Ross Anderson, Sucurity Engineering（安全工程）（John Wiley & Sons，2001）

Henry Beker and Fred Piper, *Ciphers Systems*（密码系统）（Van Nostrand，1982）

Guy Clapperton (ed.), *E-Commerce Handbook*（电子商务手册）（GEE Publishing，2001）

Jean Cooke, *Codes and Ciphers*（代码与密码）（Wayland，1990）

W. Diffie and M. Hellman, 'New Directions in Cryptography'（密码术的新方向），*Trans. IEEE Inform. Theory*，（Nov. 1976），644-654

Whitfield Diffie and Susan Landau, *Privacy on the Line*（命悬一线的隐私权）（MIT Press，1998）

Warwick Ford and Michael S. Baum, *Secure Electronic Commerce*（安全电子商务）（Prentice Hall，1997）

Robert Harris, *Enigma*（谜密码）（Hutchinson，1995）

F. H. Hinsley and Alan Stripp（eds.），*Codebreakers*（破译者）（OUP，1994）

B. Johnson, *The Secret War*（秘密战争）（BBC，1978）

David Kahn, *The Codebreakers*（破译者）（Scribner，1967）

Alfred J. Menezes, Paul C. van Oorschot，and Scott A. Vanstone，

Handbook of Applied Cryptography（应用密码术手册）（CRC Press，1996）

Georges Perec, *A Void*（虚空），tr. Gilbert Adair（Harvill，1994）

Fred Piper, Simon Blake–Wilson, and John Mitchell, *Digital Signatures: Information Systems Audit and Control*（数字签名：信息系统的核查和控制）（Information Systems Audit & Control Association（ISACA），2000）

C. E. Shannon,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通信的数学理论），*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27（1948），379–423，623–56

C. E. Shannon,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Secrecy Systems'（保密系统的通信理论），*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28（1949），656–715

Simon Singh, *The Code Book*（码书）（Fourth Estate，1999）

Richard E. Smith, *Internet Cryptography*（因特网密码术）（Addison Wesley，1997）

Vatsyayana, *The Kama Sutra*（伽摩箴言集），tr. Sir R. Burton and F. F. Arbuthnot（Granada Publishing，1947）

Gordon Welchman, *The Hut Six Story*（茅屋六故事）（McGraw–Hill，1982）

网站

http://www.cacr.math.uwaterloo.ca/hac/ *Handbook of Applied Cryptography* website

http://www.simonsingh.com/codebook.htm *The Code Book* website

http://www.rsasecurity.com/rsalabs/faq/ RSA Laboratorie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http://csrc.nist.gov/encrypti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NIST) cryptography website

http://www.esat.kuleuven.ac.be/~rijmen/rijndael/ Rijndael (AES) website

http://www.iacr.org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yptologic Research (IACR) website

缩略语表

A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高级加密标准
ANSI（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SCII（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美国国家信息交换标准码
ATM（Automated Telling Machine）自动柜员机
bit（binary digit）比特（即二进制数）
CA（Certification Authority）认证中心
CBC（Cipher Block Chaining）密码分组链接
CFB（Cipher Feedback）密码反馈
CRL（Certificate Revocation List）证书撤销表
DES（Data Encryption Standard）数据加密标准
DSS（Digital Signature Standard）数字签名标准
ECB（Electronic Code Book）电子码本
EFF（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电子前沿基金会
EFTPOS（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 at Point of Sale）销售点电子转账系统
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全球移动通讯系统
HEX（hexadecimal notation）十六进制表示法
ISO（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国际标准化组织
MAC（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信息认证码
MGM（Metro–Goldwyn–Mayer）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
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
PGP（Pretty Good Privacy）优良保密协议
PIN（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身份识别号码
PKI（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s）公钥基础设施
RA（Registration Authority）注册中心
SSL（Secure Sockets Layer）安全套接字层协议

TLS（Transport Layer Security）传送层安全协议
TRSM（temper-resistant security module）抗窜改安全模块
TTP（Trusted Third Party）可信任的第三方
VA（Validation Authority）证书验证中心
XOR（Exclusive OR）互斥“或”（运算）

密码的成功破译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前两年结束，而误信密码则让16世纪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掉了脑袋，可见密码术对我们的历史产生过极为重大的影响。然而密码术并非只与战争和间谍相关，它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动柜员机、电子邮件、付费电视、网络购物、移动通话等无不涉及加密与解密。

作为密码术的入门图书，本书没有过多纠缠高深的技术理论，却又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密码术的发展、分类及其应用等方方面面，其中穿插有大量密码术的使用实例，可以说既能丰富普通读者的密码术知识，也是对数学爱好者和密码爱好者的智力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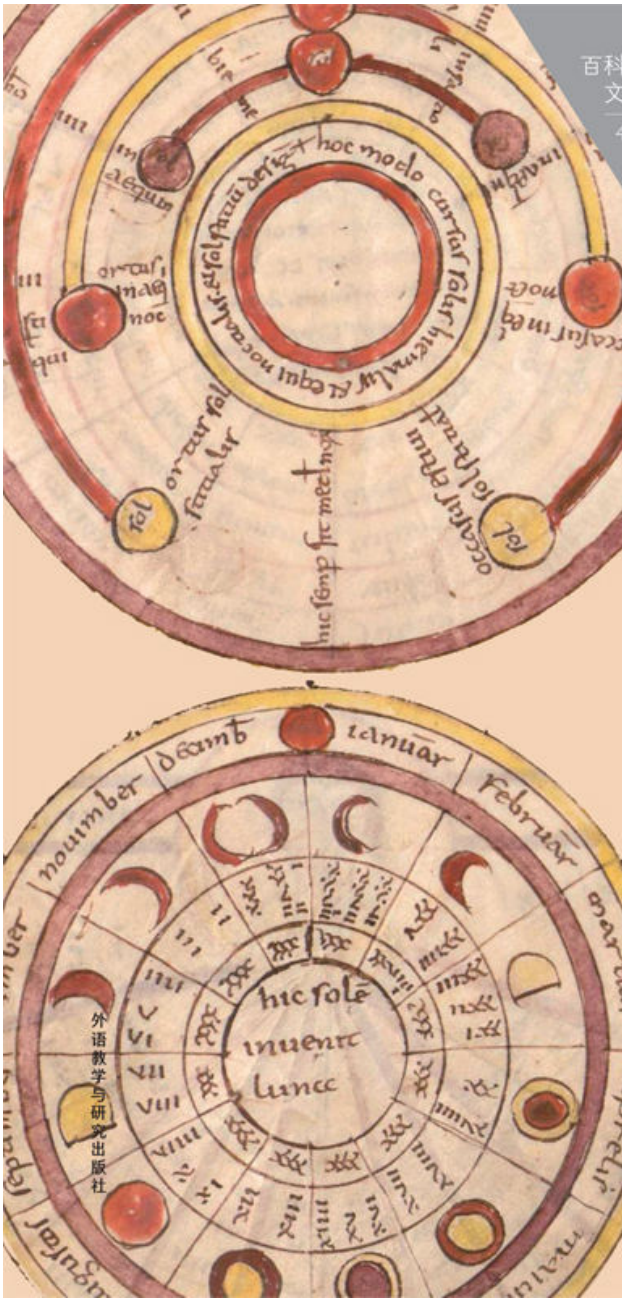

百科通识文库

49

时间简史

莱奥弗兰克·霍尔福德-斯特雷文斯 著

萧耐园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时间简史

莱奥弗兰克·霍尔福德-斯特雷文斯 著

萧耐园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34**

The History of Tim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5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Leofranc Holford-Strevens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简史／（英）霍尔福德-斯特雷文斯（Holford-Strevens, L.）著；萧耐园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03-5

Ⅰ．①时…　Ⅱ．①霍…　②萧…　Ⅲ．①时间 - 普及读物　Ⅳ．①P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45号

地图审图号：GS（2007）第716号，国审退字（2007）第78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徐　宁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03-5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前言
第一章　日
第二章　月和年
第三章　现代历法的史前史和历史
第四章　复活节
第五章　星期和季节
第六章　其他历法
第七章　年的标记
附录一
附录二
词表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莱奥弗兰克·霍尔福德-斯特雷文斯，牛津大学出版社学术顾问兼编辑，主要著作有《牛津年份津梁》（合著）、《奥卢斯·格利乌斯》，并就古典、英语和音乐学等课题发表过诸多文章。

译者简介

萧耐园，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1979至1982年曾作为访问学者到法国巴黎天文台进修。现为南京大学天文系教授，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客座研究员。科研主方向为天文地球动力学，兼及天文历法和天文学史。曾获国家教委自然科学三等奖。

图　目

图1　埃及对角线历的局部图
图2　刻有计算小时长度文字的巴比伦象牙
图3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钟面
图4　时差
图5　时区
图6　月相
图7　黄道宫
图8　二分点的岁差
图9　现存唯一的罗马共和国时期岁时记，展示古罗马儒略历之前的历法
图10　1752年的一页历书，显示9月份只有19日
图11　贺加斯的版画《选举招待会》（局部）
图12　6世纪小狄奥尼西复活节查定表的镶嵌图
图13　比德的永久性复活节查定表的9世纪摹本
图14　格里高利复活节查定表之一页
图15　土星与它的日期
图16　萨宾人的岁时记残片，在表示集市周期的字母旁边还有表示星期的字母
图17　庞贝出土的墙壁涂画，显示星期与集市周期的合并
图18　大拉比约瑟夫·赫尔曼·赫茨博士，他曾为挽救星期而呼吁
图19　载于伯特佛斯的《便览》（11世纪初）中的示意图
图20　在科利尼发现的高卢历
图21　中国历
图22　太阳石
图23　（a）veintena日期和（b）太阳年月份的马雅语名称

图24　埃及出土的“巴勒莫石刻”5块残片之一，属公元前约2470年第五王朝
图25　卡皮托利尼岁时记中的部分罗马执政官名录
图26　埃及国王名录残片

前言

本书的题目可能让人产生一连串哲学或物理学上的问题：时间是否会有开始或终结；在涉及黑洞的问题时，时空规律是否不再适用；让时间倒流、改变过去究竟是否可能——有人以为有独家本领可以这样做，热衷于这种幻想，却忘记了要是真的改变了过去，他们的父母也许永远不会相遇。

这确实是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我更为关注的是时间的定义。公元268年前后，伟大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柏罗丁[1]评说道，尽管我们不断地谈论岁月和时间，似乎我们清楚地认识它们是什么，但当我们深入探讨之际，却感到迷惑不解。大约130年之后，圣奥古斯丁[2]又精辟地复述了这一点："那么什么是时间？如果没有人问我，我知道；如果我试图解释它，我便茫然了。"

本书不敢僭越先哲；时间是否宇宙的第四维抑或是具体化的抽象概念，它是连续的还是量子化的[3]，它能否独立于运动而存在并被测量，在"创世之前"或"大爆炸之前"这类说法中的"之前"究竟有没有意义，凡此种种问题统由他人回答。同一位圣奥古丁在面对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做什么的问题时，虽然很不情愿，还是打趣地作了回答："上帝正为提出这类刁钻难题的人准备地狱。"我不打算采取把实话说成玩笑这种方式。

我也不讨论时间的进程是直线的还是循环的。晚期希腊罗马的异教徒信奉时间轮回，好比一条蛇噬咬着自己的尾巴，犹太教和基督教则反对这种信仰，主张时间径直流逝；虽然并不仅仅是他们如此主张，但还是有些哲学家谈论时间的循环往复。这提出了一些概念问题，我将不予讨论；我只局限于论述日常语言中或街头巷尾谈论的时间，并将专注于正在和曾经采用的计量其进程的方法。

在英语中"时间"一词可以指大致确定的时段，例如说"短时间"，意思是不太长久，又例如说"法老时代"，则延续了大约3000年；它也可指"无限连续的持久"，正如《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定义，一切事件在其中曾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这一概念，正是柏罗丁和圣奥古斯丁困惑的焦点，预示着抽象思维的更高能力；不仅人类学家报

告说许多原始民族不具备这种时间概念，而且在被认为由“荷马”[4]所著、自公元前8至7世纪以来被希腊人看作其文化基础的史诗里，*chrónos* 这个词也只表示一段时间的流逝，而不是我们所认知的时间概念。尽管这样，公元前6世纪初伟大的雅典立法者梭伦[5]已经有了这样的概念；他把时间拟人化为了法官：“在时间的法庭里。”从此以后，“无限连续的持久”这个概念在西方文明里相当流行，以至我们不可想象在任何发达的文化里会缺失这个概念；可是近来这一情况遭受争议，不论是《希伯来圣经》还是拉比著述都不曾体现这一概念。然而，在任何一个哪怕是最简单的社会里，即使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时间本身作为客体的存在，他们也必需计量它。本书叙述如何计量时间的进程。

荷马已使用了年、月和日这些词；他提到一些辩论和诉讼，让我们认识到时间计量的一个重要背景，也就是说，即使在他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里，某些案件也并非取决于某件事是否发生，而是取决于它是否在另外一件事之前已经发生。如果两个事件被同一些证人所目击，那么没有问题；如果不是这样，这两件事要能与第三个事件作对照，后者最好涉案两方和法官都知道，譬如当地豪门的一场婚礼。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事件，困难便接踵而至，除非案件中的事实能以社会所接受的时间计量方式确定下来发生的先后顺序。

为记录和协调人类的活动必须设计一个体系，把所发生事件与一个规则而可预测的、天然而反复出现的序列联系起来；由于这些体系是人为设计的，而且彼此部分或完全独立地演变，它们在许多细节上各不相同。然而变动的范围受制于自然界的客观事实，特别是地球的绕轴自转、月亮绕地球的公转和地球绕太阳的公转；正是这些构成了计量时间的最普遍单位，相应于日、月和年。

随着生活变得越来越繁复，对知识界提出了越来越复杂的要求，不仅要区分一年、一月、一日和一日里的更小时段（时间计量学），而且要在年份等这类时间单位间建立起相互关联（年代学）。后者包括比较不同文化为此目的而建立的各种体系，以便确定表面上类似的两种标示是否表示两个不同的事物，或者同一个事物隐藏在两个不同

的名称之下。

时间计量与自然节律的符合程度常常与使用方便相冲突；有时候牺牲前者，例如在西方历法中对日这一时间单位的计量就往往是这样；有时候牺牲后者，例如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制定的罗马历更加精确，但也更加复杂。对比之下，年的标示忽略了自然节律，怎么做全按约定俗成；不过，它却太容易具象化了。在1961年的头几个月里，据说有一个电器制造商以一位家庭主妇“1961太太”的名义为他的产品做广告。正因为她是1961太太，她就应该拥有最新款的真空吸尘器和最新款的电冰箱。公司的销售额大增，但1961太太到1962年便销声匿迹了。

年在我们特定的历法中计量并按特定的纪元排序，使我们产生错觉，以为年具有一种现实性，足以超越制定它们的规约，1961太太正是这种错觉的牺牲品。其实在其他历法里，公历纪元的1961年甚至不能完整地包含在1年里：在一种印度纪元的历法里，它的头在1882年，尾在1883年，在另一种里则是2017年和2018年，在埃塞俄比亚历里是1953年和1954年，在犹太历里是5721年和5722年，在伊斯兰历里是1380年和1381年。

这样一种具象化还扩展到更大的单位。“六十年代”表示20世纪60年代，标志那政治反叛、文化翻新的整整十年的一个时期；19世纪90年代（在此期间奥斯卡·王尔德〔6〕被判有罪）被称为“肮脏的九十年代”，因为精英阶层对要装作接受中产阶级享有体面的社会地位感到极为不满。世纪也被贴上标签：“在15世纪宗教信仰日益成为个人的情感表现”、“18世纪的英国文学是用头脑而不是用心灵表现的”——就好像在说1401年或者1701年的第一天（不一定是1月1日，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章论述），旧的思想方法和情感就已被抛弃，如同抛弃1961太太的过时真空吸尘器一般。

约在公元110年末，当图拉真皇帝〔7〕告诫普林尼〔8〕说接受匿名控告不适合“我们的时代”之时，他极具针对性地指的是“我的统治”，即他实施统治的原则。与之相比，现代的记者和政治家告诉我们政府的某些做法（尽管不是图拉真所说的那个）在21世纪不可行，似乎日

期是一种天然和法定的事实，其具象如此地不可移易。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说明我们所应用的时间计量方法本质上是偶然的和任意的，以此揭穿它的具象化。

虽然本书的主题既非政治的，亦非宗教的，可是我将在方便时阐述选择历法以及接受或拒绝改革的政治和宗教含意（例如基督教世界采用格列高利历，伊朗采用Shahänshahi纪元）：甚至在1957年当印度政府推行一种新的世俗历法时，它除了用阴历年代替恒星年之外，不敢触动各种各样的宗教历法。我还将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一个宗教节日——基督教的复活节，不是由于它的宗教意义，而是由于它在历法上的复杂性。

然而，我的阐述只涉及历法本身，而不涉及它们的应用或意义；同样，尽管关于时间作为社会的产物和构建者，或者关于它之于人的感知——年轻人和老年人、男人和女人、白领和蓝领、工人和农民等等，有着许多内容可写，还是把这些留给更有资格的人去写吧。

专业术语当其不可避免时，我会在书末的词表里加以解释；然而，我要在这里说明，我偶尔会使用单词feria、quantième、lune和millésime等代替冗长的词语“星期中的日期”、“月份中的日期”、“阴历月份中的日期”、“年份数”。数字则用科学方法表示，不加千分号：一千是1000，一万是10 000，万分之一是0.0001，十万分之一是0.000 01。

本书保留了传统的缩写ad和bc，而不用ce和bce，这有两个理由：若采用后者会使得很容易区分的bc 1和1 ad成为不易区分的1 bce和1 ce；此外，虽然该历元作为耶稣基督诞生日的日期几乎肯定是错误的，它还是保留着对这一事件的纪念意义，而且在同一年内没有具有世界意义的其他事件足以取代。尽管一种纯粹世俗的纪元可能会显得十分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但不能因想将基督纪元世俗化而否认它的起源。

注释

〔1〕 柏罗丁（Plotinus, 205—270），又译普罗提诺，古罗马宗教哲学家。公元3世纪时具有宗教天资的伟大哲人，将罗马帝国时期复苏的柏拉图主义改造成为新柏拉图主义，对于欧洲思想有广泛影响。——译注，下同

〔2〕 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354—430），又称希波的圣奥古斯丁。公元396—430年间任罗马帝国非洲希波主教，是当时西派教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公认为古代基督教最伟大的思想家。他把《新约》所揭示的信仰最完美地与希腊的柏拉图哲学结合在一起，又通过他的思想传输给中世纪的天主教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基督教（新教）。他的著作甚多，有《忏悔录》、《上帝之城》、《书信集》、《讲道集》等。

〔3〕 时间的连续和量子化指时间描述物质运动过程的次序和速度。在经典物理学中一切物理量（如质量、能量、动量等）都是连续和无限可分的，认为时间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但是在量子力学中，当人们考察原子内的亚微观体系时，物理学中的能量、动量、电荷等各种物理量取离散的天然单位，可观测值只限于由离散值构成的自然集合。这就是说，亚微观体系中的一切现象都显示量子化，包括时间。量子化时间的最小单位是10^{-43}秒。

〔4〕 荷马（Homer）指创作古希腊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一个或几个诗人。但是有关荷马本人的史料贫乏，以致后来的学者不能确认真是这样。但是，说有一个史诗的作者名叫荷马，或他在史诗的形成上起主要作用却是很有可能的。

〔5〕 梭伦（Solon，约公元前630—约前560），雅典政治家和诗人。出身于贵族，并可能当过商人。约公元前594年任执政官。约20年后获得充分权力，着手改革和立法。

〔6〕 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爱尔兰作家、诗人、戏剧家。1895年被控与青年搞同性恋，被判入狱服劳役两年。

〔7〕 图拉真（Trajan，约53—117），罗马帝国皇帝。

〔8〕 普林尼（小）（Pliny the Younger, 61/62—约113），罗马作家、行政官。出身富贵家庭，为作家老普林尼的养子。曾受图拉真皇帝之命去比特尼亚调查官员的贪污腐化，两年后死于该地。

第一章

日

自然日、人工日、民用日

在大多数社会里，时间计量最基本的单位是地球自转的周期，通常被称作日。可惜，这个词及其在其他语言里的对应词是可作多种解释的：除去别的意义不谈，它既可指称与夜晚相反的光明时段（白昼），又可表示白昼和夜晚的结合体。在某些文化里，这两者的结合体被称作夜，譬如凯尔特和日尔曼民族就曾是这样——他们以在黑夜时偃息的周期来计量旅行或战役的持续时间。这一用法在英语词fortnight（两周）中保留了下来，它的意思是14夜（以前还使用sennight，意思是1周），而现在我们预订旅馆时也是这么用的。尽管如此，通行的词仍然是“日”。

公元238年，拉丁语作者岑索里努斯（Censorinus）在写作中用了“自然日”（*dies naturalis*）和“民用日”（*dies civilis*）两个词，相应地区分了“白昼”和“自转周期”两种意思；然而，到了7世纪，知识界认定真正的日是结合的整体。因此，后者被称为了“自然日”，白昼则被重新命名为“人工日”（*dies artificialis*）；也正由于此，乔叟[1]在《律师的故事》引言中提到了太阳的“人工日”。“自然日”和“人工日”这两个术语在本书中采用的正是这样的意思。

原则上，自然日作为连续流逝的时间的一个部分，可以在任何时候开始。某些语言中对于24小时的周期有一个日常用词，而不问其起点（例如荷兰语的*etmaal*，俄语的*sutki*，瑞典语的*dygn*）；这对于计量航海的持续时间特别有用，因为它不同于陆上旅行，不会在夜间中断。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词，除了罕用的科学词汇*nychthemeron*；这是个希腊词，字面的意思是“夜晚——白昼”，使徒圣保罗在对科林斯人讲话时用了这个词：“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新约·哥林多后书》第11章25节[2]）。新版的英文《圣经》想要避免让人以为他的考验在日落时开始，改用了“24小时”。

一定要把起点不确定的自然日与民用日 的意义作严格区分：民用

日也是一种自然日，不过从一个由法律或习惯规定的特定点起计量。在现代西方，遵循古罗马人的做法，这个点是子夜，在中国也是如此；但是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日是从日落计量的，这和古希腊人和巴比伦人相同。基督教礼拜仪式日同样从日落开始（尽管子夜礼拜仪式是复活节和圣诞节的开端）。埃及人（然而不是在埃及的希腊人）从日出开始计量；本着同一精神，我们社会的大多数人在子夜后称下一个人工日为“明天”而不是“今天”。（在许多语言里，包括英语，意指“明天”的词与意指“早晨”的词有关，甚至就是同一个词，如西班牙语的*mañana*。）古代的翁布里亚人把正午作为一天的开始，在罗马人看来这简直荒谬。正午也是传统的天文日和航海日的开端，这样便于把一个夜晚的所有观测都归入一个日期；不过现代的天文学家和航海者已采用民用日。

自然的和社会的划分

在少云的天气，通过观测太阳影子的位置和长度，太阳在天空的视运动是可以测量的。在《圣经》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当犹大国王希西家〔3〕觉得不适，先知以赛亚〔4〕让太阳的影子在显然是由国王的父亲设置的器具“亚哈斯的脚步”〔5〕上不可思议地后退了10步。尽管詹姆斯国王钦定的英译本《圣经》说法为“表盘”上的“度”——意指日晷而不是钟面，希伯来文仍保留着同一个词*maʿălôt*；更为晚近的阐释者认为“脚步”指台阶或平台，设置它们是为了实用或者装饰，并非用来计时。这更符合后来的犹太教《圣经》讲解书的描述。在这类书中提到有一道划痕刻在墙上，当太阳的影子到达这个记号时，按照先知给出的预言，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

这些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日的时刻，它们的意义和鸡啼或者荷马用作时标的自然的或社会的事件（“当被染为玫瑰色的朝霞出现”，“当太阳向放牛吃草的一刻赶去”，“当一个人评判了许多争端之后起身去

吃晚饭”）差不多；更久之后出现的被称为《密西拿》[6]的犹太教律法书中也是如此。甚至正午和子夜也只是时间段而不是时间点，即太阳从升起到下落或从下落到升起的中途。

小时

相比之下，古埃及人许多世纪以来就已把人工日和夜晚都各自分为12“小时”；在前一种情况中，之前曾经有过把白昼划分为10小时再加上半明半暗的2小时。白昼的小时是用日影钟和日晷计量的，夜晚的小时则通过依次升起的星座确定。每隔10天，就有一个新的星座被确认为与太阳一起升起（在此后连续的9天里，这一星座每过一天就提前升起4分钟），这样产生了一组共36个星座，希腊语中称为*dekanoí*；这个词英语化为了decan，也用于称呼手下有10个人的官吏，由此衍生出dean（主任）和doyen（耆老）这两个词。在每一个10天的期间内，最接近黎明时分升起的这样一个星座和每个小时的开始在“对角线历”中标示了出来；这个历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每个星座所占的行都比前一栏要高出一行（参见图1）。

图1　埃及对角线历的局部图

这样的小时——在专业上称为不等长的或季节性的，因为它们的长度随一年里的时令而改变——为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所采用（虽然罗马人常常把夜晚分为4个*vigilia*，即“更”），而且一直到中世纪晚期平时还在使用。因此在《约翰福音》中才会有耶稣的这么一问：“白天不是有12个小时吗？”白天指的是人工日。这也是为什么午休会称为*siesta*，这个词在古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第6”，即白天的

第6个小时（参见加框文字）。

尽管天文学家把自然日（从正午起计量）分为相等的24小时，也称昼夜平分时（后一种称呼是因为春秋分两天的夜晚和白昼长度是相等的），但是一般人群更喜欢使用季节性的小时；只要工作和旅行都在白天进行，它就既可指示已流逝的时间，又可指示剩余的时间。有一些数表可用于将漏壶（也称水钟）计量的等长的小时转换为从日晷上读取的不等长的小时。14世纪以来机械钟在欧洲开始流行，但即使它们也未能令等长小时即时占尽上风，因为较为复杂的时钟有时不但指示日期和日月位置，还指示不等长小时。

古人如何计数小时

- 当人们说耶稣受刑那天“从第6小时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直到第9小时”，这就是说从正午直到过了半个下午。类似地，一句希腊箴言说有6小时用来工作，之后的4小时用来生活，因为希腊字母ζ、η、θ、ι是数字7、8、9、10的正规标识，拼起来成词ζηθι，意思就是“生活！”
- 天主教每日7段祈祷时间中的第3段辰时经（terce）和第5段申初经（nones）分别源于拉丁词tertia（第3小时）和nona（第9小时）。然而，比规定的时间提早吟咏祈祷的趋势使得noon这个词（即nones更早的形式）的意思成了“正午”；早在14世纪，它的这一新意义就已完全确立了。

然而，一但等长小时成了常规，从子夜或正午去计量它们就比从日出或日落计量更为方便了；因此，人们开始从正午前后计量两个12小时的序列。除了政府部门和军队专门使用0到24明确的计量体系，这一直是规范，在讲英语的国家尤其如此。不过在意大利曾经有一种从日落起计量的24小时的单一序列，时钟要随日落在一年中的提前或滞后而随时调整；即使现在，小时已从子夜起计量，意大利人还会在

日常会话中随意地使用24小时。讲英语的人不会约人“在13时”吃午餐，而是说“1点钟”，意指下午1时，但是在意大利语中说*alle tredici*（在13时）就丝毫不是矫揉造作了。

在马霍卡[7]岛上使用的从黎明起计量的24小时序列，是这类“意大利小时”的变种；它们被称为“巴比伦小时”，这种称呼源于古代作家误以为巴比伦日开始于日出。事实上，它开始于日落；夜晚和人工日各自分为3“更”，每一更又分为4个“时段”，即4个季节性小时（参见图2）；但是自然日或被分为（我们将在稍后看到）60份，或被分为12个*kaspu*，每一个*kaspu*代表一个黄道宫，有时用希腊语称为*hôrai*，但是从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出发，现在通常称为“时辰”。

图2　刻有计算小时长度文字的巴比伦象牙

时辰在公元前102年已被中国人采用，取代了之前把1日分为10

个时段的做法。法国大革命时期当局颁布的共和历也采用十进制分划制，把1日分为10小时，1小时分为100分钟，1分钟分为100秒，于共和三年葡月1日（1794年9月22日）开始实施。尽管这个方案不合实用，还是造出了按10小时分划的钟面（参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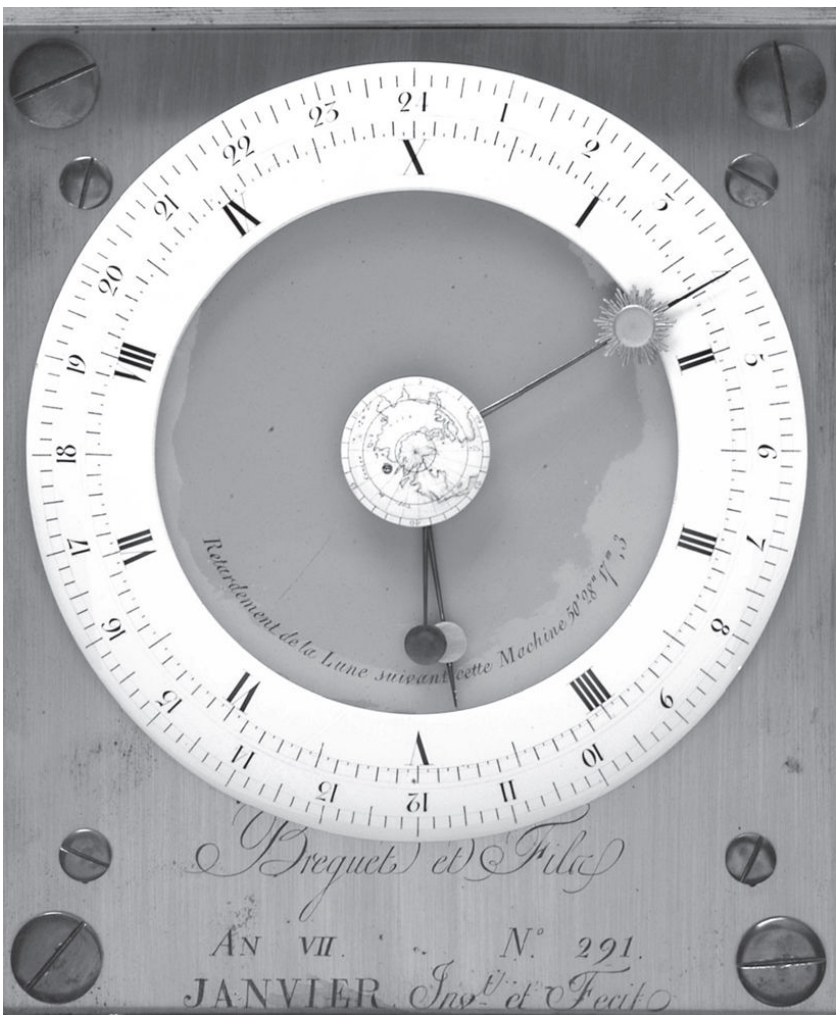

图3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钟面，分划为24小时（外圈）和10小时（内圈）

更小的划分

古巴比伦人的算术取六十进制；相应地，天文学家（尽管已存在时辰）把自然日分为60个时段，每个时段又分为60份，以此类推。例如朔望月的长度估计为29日 + 31/60 + 50/3600 + 8/216000 + 20/12960000，现代学者把它写为29；31，50，8，20日。

古希腊天文学家把自然日分为24个昼夜平分的小时，每小时分成15 *moîra*，或称“度”，即用以计量弧度的同一个词，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整体都分成了360份（公元2世纪时的托勒密更喜欢使用“昼夜均分的时刻”）；古希腊计时单位还有*stigmḗ*，即“点”，用于表示半个*moîra*。

在后古典时代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更为复杂的体系（参见加框文字）。然而，尽管小的单位可以应用于天文学和占星术中，或用于炫耀博学，这类概念上的划分超越了实际的测量，因为没有方法可以分离出时间的原子，即把1小时分成22560或25920份。

中性形容词*minutum* 指称“微小的事物”，它被用于各种情况，如1/15小时（4分钟）、1/10小时（6分钟）和1/60日（24分钟）；但是它从来没有表示过1/60小时，这用的是*ostentum*。然而，我们发现在中世纪晚期出现了新的六十进制的划分，把小时分为*primae*、*secundae* 和*tertiae minutae*（省略了*partes*）。从这一已经应用于弧度的体系中产生了“分”和“秒”；“第三分”（即1/60秒）简记为‴，其后已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十进制数。

小时的细分

拜占廷希腊语

1小时 = 5 *leptá*（“小事物”）	12分钟
1 *leptón* = 4 *stigmaí*（“点”）	3分钟
1 *stigmḗ* = 2 *rhopaí*（“脉冲”）	1½ 分钟
= 3 *endeíxeis*（“闪现”）	1分钟
= 12 *rhipaí*（“转瞬”）	15秒
1 *rhipḗ* = 10 *átoma*	1½秒

中世纪拉丁语

1 小时 = 4 *puncta*（“点”）	15分钟
1 *punctum* = 2½ *minuta*	6 分钟
或者	
1 小时 = 5 *puncta*	12分钟
1 *punctum* = 2 *minuta*	6分钟
1 *minutum* = 4 *momenta*（“脉冲”）	1½ 分钟
= 6 *ostenta*（“闪现”）	1分钟
1 *momentum* = 12 *unciae*（“一点”）	7½ 秒
1 *uncia* = 47或54 *atomi*	

7世纪时的一位爱尔兰作家令1 *minutum* 等于$2\frac{2}{3}$ moments（4分钟）；赫拉巴努斯·毛鲁斯（Hrabanus Maurus，9世纪）称其为 *pars*（参见古典希腊文*moîra*）。希伯来

1小时 = 1080 ḥ*ălāqîm*（“小段”、“小份”）

1 ḥ*aleq* = 76 *rəgāʿîm*（“刹那”）

在历法的应用上，1 *regaʿ* 是1/82080小时；但是有一部犹太教法典宣称上帝的愤怒持续1个*regaʿ*，是1/58888小时。

视太阳时和平太阳时

时钟取代日晷成为计量时间的更普遍的工具，这除了使得昼夜平分的小时得以应用之外，还带来了一个更深刻的变化：用时钟表示的平太阳时 取代了以日晷表示的视太阳时 。如果地球轨道为圆周，太阳位居中心，而且它的自转轴垂直于轨道面，那就没有差别；但是，由于地球轨道是椭圆，自转轴是倾斜的，自然日的计量相较于以时钟表示的等长的24小时，在一年里会有半小时的上下。视太阳时与平太阳时的差称为时差 ；当视太阳时超前于平太阳时时，其值为正，反之为负（参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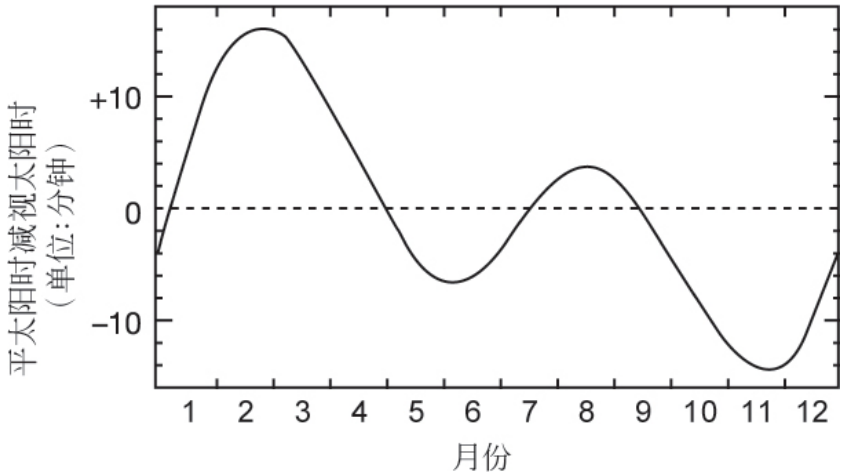

图4　时差

时间的标准化

即使平太阳时已经获得法定地位（例如1792年在英国），它还是因各地不同的子午线而变化：若一地在另一地以东，经度每相差15′，同一个标称时间就会提早1分钟。只要交通运输局限于马拉水运，通讯速度相当于马跑鸟飞，这就无关紧要；但到了19世纪，一列火车以一定速度向正西开行许多英里，会显得比另一列以同样速度向正东开行了同样里程的火车快，或者一封电报从东边发送到西边，到达的时间看起来会在发送之前，这样就乱了套。

有鉴于此，铁路公司按照相对于皇家天文台的一条黄铜标线计量的格林尼治平时制定了时刻表，在车站安置了时钟。许多意见对此表示反对，它们不仅来自某些声望卓著的人士，甚至还来自皇家天文学家。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时钟已经指示正午，而太阳还没到达时钟所在处的正上方，那么这只钟就是在撒谎。尽管如此，标准化的时间还是占了上风，并于1880年订入了法规。地方时被彻底忘记了，譬如说在牛津的基督堂学院，人们还遵循这样的传统，即若超过约定时间5分钟才算真的迟到，也就是说按照当地平太阳时（西经1°15′）和格林

尼治平时来算都已经迟了，但这个传统甚至被牛津其他学院看成只不过是一种无伤大雅的怪癖。

时区

其他国家也采用了类似的标准时间；但是，虽然这对于铁路公司来说是足够了，不过对于国际电报还是不行。它并不一定要求全世界采用单一的时间，但至少要为所有的地方时制定可供参照的单一标准。由于贸易和交通的全球化，为了方便起见，所有的地图和海图已被要求标注相同的经度系统，都是相对于一条本初子午线向东或向西多少度，不论它们由哪个国家出版；这条本初子午线也将产生标准时间。

1884年10月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国际子午线会议采纳了美国的建议，即本初子午线“通过格林尼治天文台子午仪的中心”；从此以后这就成了规范，尽管在此后多年内法国的地图继续标注0°在巴黎。（作为一种抚慰，会议采纳了法国的建议，研究角度和时间的十进制计量。）结果，格林尼治时间成为全球的参照标准，其他所有时间表达为其前或其后多少小时。法国人再次显示了他们的固执，只是在1911年才终于转圜，但直到那时为了挽回面子还将法定时间定义为巴黎平时减去9分21秒。

少数不切实际的极端主义者希望也把格林尼治平时作为全球通用的民用时；但是尽管一只钟显示正午的时刻有十来分钟的超前或滞后时，来自科学或迷信的反对声还可被立即驳回，若中午已在名义上来到而太阳仍在地平线上或者天空漆黑一片，那可不是同一回事。有鉴于此——由于一日的时间不同于季节，不受纬度的影响——把全球分成垂直的条带，称为时区，两端终止于南北极。由于政治的因素，例如国家的边界或人为的决定（冰岛采用格林尼治时间，法国和西班牙［但不包括葡萄牙］则提前了1小时［简记为＋1］），它们的界线有些不规则（参见图5）。尽管印度和中国在它们的整个领土内采用单

一时间（分别为＋5½和＋8），其他一些大国有1个以上的时区；俄罗斯独占鳌头，占据11个时区，从加里宁格勒的＋2到阿那迪尔的＋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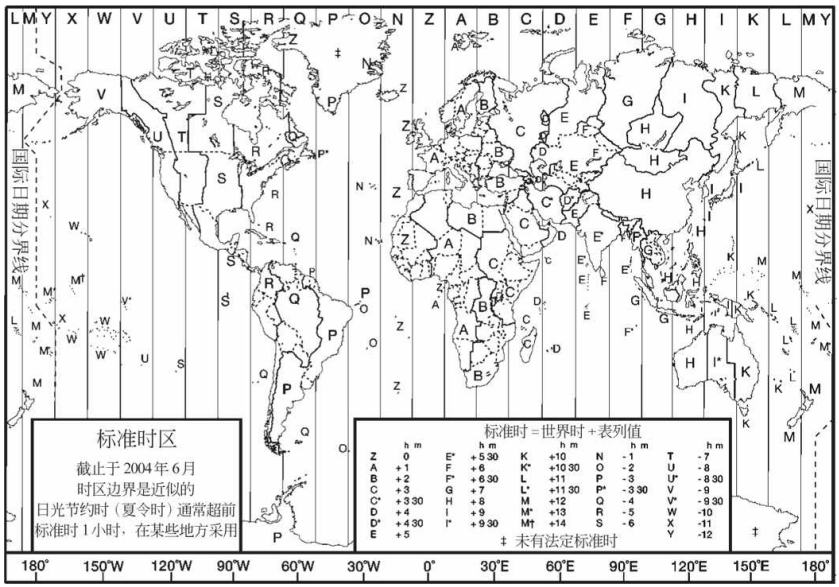

图5　时区

国际日期分界线

在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所写的菲列阿斯·福克80天环游地球的故事中，福克本以为输了打赌，但是他的仆从帕斯帕都告诉他，那一天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天；作者解释道，这是因为他向东而行，“迎向太阳，结果每经过经度1度，日子对他来说就缩短4分钟”，经过360°，正好24小时。因此，尽管他看见太阳经过子午线80次，他的呆在伦敦里福姆俱乐部里的伙伴们只看见79次。相反，倘使他向西旅行，他将失去1日而不是多出1日。

一名向东行进的旅行者穿过东经180°子午线时需要扣除多出的1日，一名向西行进的旅行者要加上失去的1日；因此东行的船舶会再

过那一日，而西行的则会少过1日，乘飞机的旅客在前一种情况下要把他的日历表拨回1日，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要拨前1日。当这条子午线穿越陆地或者把属于同一政治实体的一些岛屿分割开来的时候，就要适当地偏东或偏西作些改变；这条作过修正的子午线称为国际日期分界线。位于这条线以西的地方，1日内的时间都超前于格林尼治，最多达12小时（少许地方超过12小时），在它以东的地方则滞后于格林尼治。

世界时

为了天文学的目的，格林尼治平时在1925年以前按24小时从中午起计量；从那时以来（与华盛顿会议表达的愿望一致），根据一条距黄铜标线数米的纯理论的本初子午线，它从子夜起计量。1928年它被重新命名为世界时，记为UT。若直接由观测所得，称为UT0；当加上地极的不规则运动、即“钱德勒摆动”[8]的改正之后，它成为UT1。这是天文学和航海的标准。

UT2试图改正某些季节性的振荡[9]，是更深入的精确化。尽管如此，还是表明不可能以地球自转为依据建立均匀时标。然而，技术又一次显示了它更胜于自然的优越性：正如机械钟比太阳更均匀，原子钟则比地球更精确。由此，为了科学的目的，秒现在被定义为“铯133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间跃迁产生的辐射的9192631770周延续的时间”；以此为基础确定的时间称为TAI（*Temps atomique international*[10]）。

这种时间不像UT1那样计及地球自转，民用时于是采用了另一种标准，称为协调世界时，简记为UTC。它通过闰秒保持与UT1相差不超过0.9秒，可能是正闰秒（23时59分60秒加于0时0分0秒之前），也可能是负闰秒（跳过23时59分59秒；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按照国际地球自转和参考系服务（IERS）的指示，加于6月或12月的末尾。UTC与TAI相差整数秒；从1999年1月以来UTC - TAI = -32秒。

在讲英语的世界，人们常称它为格林尼治平时，即GMT，虽然这个词有时也用于UT1。

天文学家还应用另外一些时间计量系统，例如地球时（TT），它比TAI超前32.184秒，用于计算行星相对于地心的位置；它与UT1之间的差称为ΔT（代尔他T）。

日光节约时（夏令时）

20世纪初，切尔西建筑工人威廉·威利特（William Willett）提倡在春季和夏季的月份里把钟表拨快，以便人们可以享受早晨的阳光；起先他建议连续4次超前GMT 20分钟，最终他提出一次拨快1小时。这个建议在1916年以前一直受到冷落，而到了1916年，由于战时经济的需要，德国和奥匈帝国率先采用，中立国荷兰紧随其后。英国在战争期间也如此做了，并在1922年再度实行。从此以后，英国夏令时，即BST，每年至少在部分时间内实行。

在二次大战期间，从1940年到1945年“夏令时”持续于整个冬天；从1941年至1945年，以及在1947年的燃油短缺时期，称为双夏令时的两小时超前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里实行。一种全年的BST，重新命名为“英国标准时”，于1968年颁行；但是，冬天的早晨黑暗延续很久（在苏格兰北部最晚会持续到上午10时），这迫使人们在1971年又回归到GMT。根据欧洲联盟内部的协议，现在夏令时开始于3月最后一个星期日的GMT凌晨1时，结束于10月最后一个星期日的同一时间。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以某种方式实行日光节约时，赤道以南的国家与以北的国家在不同的月份实行。在美国按时区实行，从4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地方时凌晨2时到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地方时凌晨2时；但是各州和美国的属地可以选择规避，或者（如果它们跨越两个或以上时区）可以部分规避；这样，在夏威夷州、阿拉斯加州内的夏威夷-阿留申时区、亚利桑那州（除了纳瓦霍印第安保留地）和印第安纳州的

东部时区（实际上它包含该州的大部分）都不实行夏令时——结果在日光节约时期间，整个印第安纳州比GMT滞后5小时，比英国滞后6小时。

注释

〔1〕 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2/1343—1400），英国莎士比亚时代以前最杰出的作家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是晚年所写长诗《坎特伯雷故事集》，读者广泛，对后世影响甚大。

〔2〕 译文摘自《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1988年。

〔3〕 希西家（Hezekiah，约公元前715—约前686在位），耶路撒冷犹大国王，大卫王的后裔和第13代继承者。

〔4〕 以赛亚（Isaiah），古代以色列先知。《圣经·旧约》中的《以赛亚书》据说是他所著。他可能是贵族，甚至是王室族人，得以经常与国王谈话。

〔5〕 亚哈斯（Ahaz），《圣经·旧约》所载犹大国王。

〔6〕 《密西拿》（Mishnah），犹太教经籍。其内容是约公元前450年以来的若干口传律法的诠释，由许多学者陆续编纂，最后于3世纪由犹太亲王总其成。

〔7〕 马霍卡（Majorca），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最大岛，在地中海西部。

〔8〕 钱德勒摆动（Chandler wobble）为地球自转轴在地球本体内运动，从而它与地球相交的两个端点，即地球南北两极，在地面上移动，这种现象称为极移。极移的轨迹大致上是圆周。1891年美国天文学家钱德勒分析观测资料得出结论：极移包括两个主要的周期成分，一个是近于14个月的周期，另一个是周年周期。前一成分称为钱德勒摆动。两者合起来，极移的范围不超过24米×24米。极移使地面上各点的经度和纬度都发生变化。一地的经度变化就在于该地的子午线改变，而任何一地的时间计量都相对于其子午线。所以极移引起的经度变化会影响时间的计量。在天文学上，极移的数值由实测得到，据以按理论公式计算出对世界时的改正量。UT0加上这个改正量以后即成为UT1。实际上改正的是整个极移的影响，而不只是改正其中一个成分钱德勒摆动。作者在这里的叙述不完全。

〔9〕 UT1是与地球自转的速率合拍的。地球自转并非绝对均匀，它包含以一年和半年为周期的季节性变化以及逐渐变慢的长期变化，所以UT1并不是一种均匀的时间计量标准。20世纪50年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均匀的时间计量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UT1已不敷应用，于是天文学家设法改正包含于UT1中

的季节性变化，得到了相对均匀的UT2。不过，这只是一种近似的改正，何况还无法改正长期变化。50年代末，人们应用原子钟计量时间，建立了原子时标准，放弃了地球自转的时间标准。不过，当代天文学还在继续测量UT1，因为在大地测量和航海中需要应用它，而且它又是反映地球自转速率的地球物理参数，在科学研究中有重要价值。

〔10〕　法文“国际原子时”。

第二章

月和年

月亮绕地球公转的周期至少在理论上是“月”，它在大多数语言里以意指“月亮”的词指称，或者（如在英语里）以这类词的派生词指称；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至少在理论上是“年”。我们将会看到，没有一种历法能够同时正确处理这两种公转周期；“月”或“年”定有一种成为相机而定的计量单位——正如称为“英尺”（英语foot，此词的另一释义是“脚”——译注）的各种计量单位并不与任何一个人的脚长相匹配。

在有些社会里，日以另一种与月和年无关的方式加以组合：最广泛采用的是7日星期。许多这类体系是集市周期；在非洲存在不同长度的几种此类周期，但是最为人所熟悉的是古罗马的8日“集市周期”（*nundinum*）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旬”（*décade*）（参见第五章）。

年可以组合成世纪和千年；在印度有更长的组合，称为世界的时代，而从前在东马雅人之中则有不是基于太阳年或260日周期（参见第六章）、而是基于360日的“岁”（*tun*）及其倍数的组合。较长的单位常常与当前世界的存在期有关，一些人认为它将在基督纪元2000年时终结；此前类似的预计在俄国也曾有过，人们认为世界末日将在创世后第7000年到来，这一年相当于公历1491年9月1日至1492年8月31日。

天文学依据

地球绕轴自转，它也环绕太阳公转，不过在不知就里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太阳在环绕地球运转，恰如月亮那样。当太阳和月亮靠近时，月亮不能反射太阳光；它们的黄经完全相等的瞬间，称为合日或新月，不过新月这个名称也用于经过合日后月亮刚刚显形的那几天。相反，当太阳和月亮面对面地相距180°时，我们称之为冲，即满月（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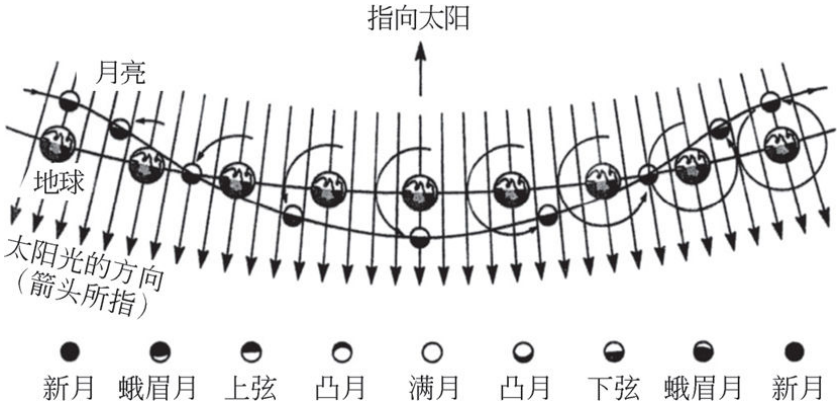

图6　月相

太阳在天空作周年视运动的路径称为黄道，来源于希腊词*zṓidia*，意谓“小动物”，因为黄道分为12段，每段30°，称为黄道宫　，按星座命名：白羊（Aries）、金牛（Taurus）等等（参见图7）。然而，这些黄道宫已与星座的实际位置不符合；这是由于地球自转极在约25780年内沿一圆周进动，导致天球缓慢旋转，这种现象称为二分点的岁差，因为它使得动力学分点——即黄道与天赤道的交点，太阳经过时赤纬由南纬变为北纬——相对于星座缓慢而持续地移动（参见图8）。标志着北半球进入春天的春分点，原先位于白羊座，当前已位于双鱼座，而且正在向宝瓶座前行；但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它还在金牛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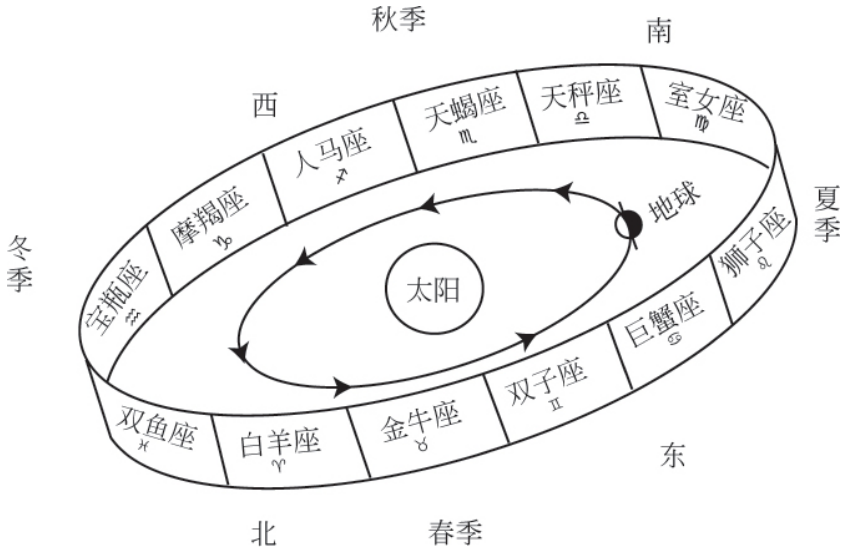
秋季
南
西
天蝎座
天秤座
室女座
人马座
摩羯座
地球
夏季
冬季
宝瓶座
太阳
狮子座
巨蟹座
双子座
双鱼座
白羊座
金牛座
东
北
春季

图7　黄道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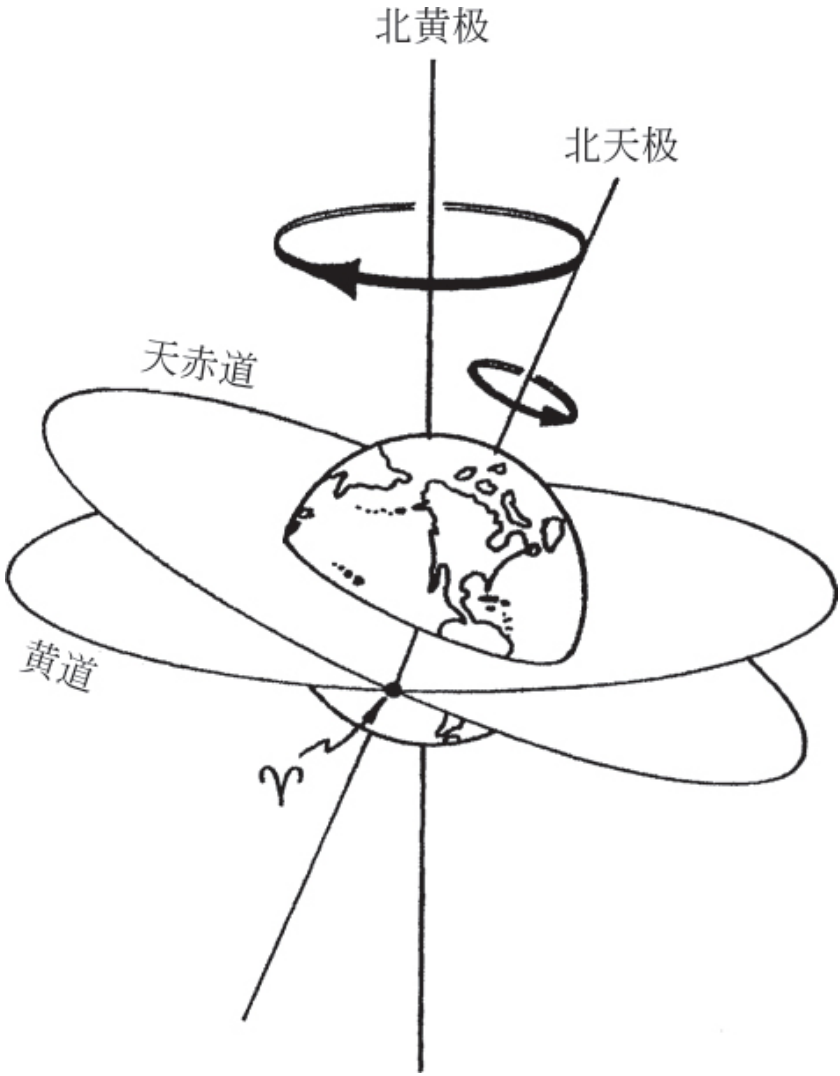

图8　二分点的岁差

大多数历法或者是太阴历，或者是太阳历。理论上阴历以朔望月（synodic month，源自希腊文*súnodos*，意即“合”），也就是太阴月为基准，它是新月至新月（在中国西藏和印度北部按满月至满月计量）的时间间隔，平均长度为29.53059日 = 29日12小时44分2.976秒；12个朔望月则集为1年。阳历以地球环绕太阳公转经历的日数作

为1年，它又被细分为较小的单位，也称为月，但与太阳月无关。大多数情况下阳历采用回归年（tropical year，源自希腊语*tropaí*，意即“太阳的至点”），这是太阳平黄经相对于动力学分点改变一整周的周期；当前的数值是365.24219日，相当于365日5小时48分45.2秒稍多。然而，如果要以从春分点到春分点的周期去拟合的话，那么更接近的平均值是365.242374日，相当于365日5小时49分1.1秒稍多。这些平均值在逐渐改变；两千年以前它们分别是365.243210日和365.242137日。

由于岁差，回归年比恒星年（sidereal year，源自拉丁语*sidus*，意即“星座”）要稍短；恒星年是太阳视圆面相对于恒星连续两次在同一位置的周期，它包含365.25636日，即365日6小时9分9.5秒。大多数精细的历法以回归年为基准，除了印度，那里有大量的地方历法，既有阳历，也有阴历，前者在1957年以前以恒星年为基准。

可惜12个朔望月比回归年或恒星年要短约11天。由于这一原因，没有一种历法能够真正兼以两者为基准；必须有所抉择。然而，大多数阴历力图兼顾太阳，而阳历除了把年分为名义上的月以外，则不顾月亮。

阴历

决定新月的最古老的方法是观察刚刚显露的月芽：主管当局或者亲自观察天空，或者接收可靠的报告。尽管原则上看起来这一体系可能是最精确的，但只要月亮被看成是一种目视现象而非天文现象，它就会受到影响，或由于宗派利益支配下的滥用职权，或由于天气变坏而受干扰。后一种情况因一条规则而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控制，但并未完全消除；这条规则是，如果这个月已过去了29天，而新月还没有在那一晚观察到，那就自动认为它在下一晚会被观察到，所以没有一个月会超过30天。

在一个太大而无法实现信息快速传播的社会里，靠观察也会带来

问题；再则，当天文学家希望确定过去的两个事件之间经过了多少日子，或者想要预告将来某个事件的日期之时，他们感到极不方便。因此，既然朔望月比29½天略长，那么交替地采用30日的“大”月和29日的“小”月就足以构成尚算精确的阴历，这样的1年有354日；现代犹太历（尽管包含多种复杂的安排）以及天文学家和换算表所用的理论伊斯兰历，都以这种概略的处理原则为基础。它的优点是能够按要求向前（或向后）扩展得很远，而不必顾及任何外部事实。

智识的进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即计算合日，而一个月的开始或采用这一日（如在中国），或采用下一日（如在印度南方）。如同由观察所定的历法，这一做法仍然考虑到了月亮的真实情况，但同时两个不论过去还是将来的日期之间的关系，能够以不亚于纯粹概略的历法的精确度建立起来，尽管这只是在可靠的计算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

大多数阴历力图通过每隔几年添加一个额外的月份来修正阴历年与阳历年之间的差异，这称为置闰。这可以在某些外部条件符合的情况下进行，例如在原先以观察为基准的犹太历中，而印度的阴历至今仍在这么做。另一个办法是可以应用一条规则；一种粗略的方法见于古代，曾在某些早期基督教的复活节查定表中应用，即在8年里加入3个闰月，但是更加精确的是在19年里加8个闰月 [1] 。这通常被称为默冬章，据说是由古希腊天文学家默冬（Meton）于公元前432年提出来的；然而，这其实首先由巴比伦人所采用，他们拥有最重要的古代阴历（参见加框文字）。默冬章用于现代犹太历和（加上了某些限制条件）中国的传统历法 [2] ，也被基督教会用来计算复活节（参见第四章）。

巴比伦历

巴比伦年开始于春分后的第一个新月，包含12个月份，每一个月开始于初现新月的那一日，称为Nisanu、Aiaru、Simanu、

Duzu、Abu、Ululu、Tashritu、Ahrasamnu、Kislimu、Tebetu、Shabatu、Addaru；每一日开始于黄昏，从1计数至30或29。存在争议的是由何时开始不再专门置闰，而改为19年的闰周，但至少到公元前4世纪Addaru在第3、6、8、11、14和19年重复，Ululu在第17年重复；新闰周开始于公元前367/6、前348/7、前329/8、前310/09各年，依此类推。

对现代西方人来说，犹太历和伊斯兰历是他们最熟悉的两种非阳历；他们把置闰的阴阳历和阴历作为两种历法区分开来，前者遵循月相变化，但也顾及太阳，后者不置闰，也就不考虑太阳。然而，属于后者的伊斯兰历是一个个别的例子；不仅犹太历，而且古希腊历、高卢历、巴比伦历和中国历都是阴阳历，以月亮为基准的各种印度历也是。应该把阴阳历看作阴历中的主要类别，不置闰历法则是其中的少数类别，而不是第三种历法，这样的看法才更合情合理。

在一月之内，日期可以连续计数，就如同犹太历和当前的伊斯兰历一样；但这并非存在的唯一方式。在一些历法中，盈月的日期和亏月的日期是分别计数的；印度的阴历遵照这种方式，古高卢历（通过一些复杂的安排）也这样做。在另一些这类历法里，亏月的月龄反向计数，所以下半月任何给定一日的月相是上半月相应一日的映像；这样的“计日”在一个大月里排列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在古典阿拉伯语中，日期有时就是按照这种方法给出的（参见第六章）。这在中世纪的欧洲也可看到，被称为“波洛尼亚习惯”（*consuetudo Bononiensis*），为那个城市的文书们所钟爱；此外，每个月照例都有两个不吉的日子，称为埃及日，一个从月初开始计，另一个则从月末往回计。在古希腊的大多数城市，在20日或21日之后，日期反向计数。古罗马标志日期的方式很复杂，取反向计数，这我们将在第三章看到。

阳历

尽管存在这样的一些历法，即把太阳到达天空一个固定点（现代伊朗和1957年以来的印度）或进入某一特定星座（1957年以前的印度）作为一年的开始，但是把1太阳年取为近似的整数值365日，这要容易得多。通常的做法是在360日的期限上添加5个“闰日”，或称附加日；360日又按习惯上称为“月”的单位细分，构成一个平年，添加的这些日子则往往被看作是不吉利的。

这是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之前的中美洲历法和印度的帕西人[3]还在使用的琐罗亚斯德[4]历法的原理；这些历法将在第六章讨论。这也是古埃及民用历的原理，它是世界古历中最早的历法，在每月30日的12个月之后紧随着5个闰日，埃及人称之为“年尾的赘日”。在它之外，还有一种宗教仪式用的阴阳历，每当阴历年要在阳历年之前开始时就在其中添加闰月；公元前4世纪，人们设计了一种25年里加9个月的闰周。公元前6世纪，正是依照这个历法给太阳历的每个月份取了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用的名字。

在人的一生，即使最长寿的人，也难以察觉1年取365天的差数，但是经过几个世纪，日期与季节便会脱节了；人们称此为*annus vagus*，即“游移年”。理论上历年开始于天狼星的偕日升——天狼星的埃及名字在希腊人听来像“索希斯”（Sothis），这预示着尼罗河泛滥的开始，与埃及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然而，事实上与实际的升起相比，它几乎每隔4年就有1天的提前（参见附录一），换句话说，天狼星升起的日期有1天的滞后；而一当实际的新年与理论的年首一致时，例如公元139年7月20日，这一天就成了盛大的节日。

到了公元前4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已经察觉到埃及年太短；据老普林尼[5]（逝于公元79年）说，他们中的一位——欧多克索斯[6]——曾经设计了一种以4年为循环的阳历，其中第一年为闰年，包含366日。支撑这一历法的假设是地球自转的周期为365日又6小时；事实上这比回归年略长，而比恒星年略短。在公元前238至237年之际，埃及的马其顿国王托勒密三世[7]敕令每逢第4年要添加第6个闰

日；这项改革没有实行，因为埃及的祭司不想按照外来统治者的训谕采纳附加的凶日，希腊的殖民者们倒是本该毫不怀疑、一体遵行的，但是他们并没有采用埃及民用历，而是仍在试图令马其顿的月份与当地的宗教历法保持一致。

第6个闰日终于再次由凯撒大帝〔8〕（不久之后授予奥古斯都的尊号）于公元前30年自封为埃及国王时颁行。切实的详情仍有争议，特别是因为发现他在统治初期可能进行过历法实验；但是看来到公元前22年改革已在亚历山大（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只是在埃及“近旁”，而不是它的一部分）植根。埃及的其他地方花了更长的时间采纳它；有些天文学家确实更钟情于旧历，因为它更简单，人们能直接讲出两次记录日期的观测之间经过的日数，而不必担心其间是否有闰日。然而，确切的基督教复活节计算法正是根据被翻译成罗马用语之前的亚历山大历法（参见附录二）；这一历法至今仍然被科普特教会〔9〕和埃塞俄比亚教会（月份名称不同）所采用。

太阳周

把4年的闰年周期和7日的星期结合起来，产生了28年的太阳周，在经过这些年之后，年份又开始于相同的星期日期，在闰年周期中占据相同的位置。这个太阳周——它在复活节的计算中极为重要——在10世纪时于冰岛成为历法的一个单位，那里一年包含实足52个星期，即364天，另外在28年里附加5个星期，以弥补不足（参见第五章）。

注释

〔1〕 原文如此，实际上是7个闰月。

〔2〕 这种在阴历中置闰的历法称为阴阳历，目的在于使历年长度，即若干年内的平均年长，尽可能接近于回归年，从而使历法与季节变换的节律合拍。我国早在商代已使用阴阳历。从战国时代起，实施19年加入7个闰月的置闰法则（闰周）。19个阴历年为354日×19＝6726日，7个闰月为30日×7＝210日，合

计6936日，历年长度即6936日÷19＝365.05日，与回归年的长度365.24日相当接近。后世对这一闰周又有改进。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颁行的《麟德历》（李淳风编制）废除闰周，完全依靠实测和计算来协调回归年和朔望月的关系。

〔3〕 帕西人（Parsi），为逃避穆斯林压迫而自波斯移居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后裔，住在孟买市和市北一带及班加罗尔，以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等地。

〔4〕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伊斯兰教出现之前伊朗的主要宗教，由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约公元前628—约前551）创立，现存于伊朗偏僻地区并盛行于印度境内帕西人中间。

〔5〕 普林尼（老）（Pliny the Elder, 23—79），古罗马作家。他在科学和历史方面对西欧精神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6〕 欧多克索斯（Eudoxus of Cnidus，约公元前400—前350），古希腊柏拉图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7〕 托勒密三世（Ptolemy III Euergetes，活动时期约公元前246—前221），马其顿人埃及国王。他的祖父托勒密一世随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埃及后，于公元前305—前304年间在埃及称王。他继其父后成为埃及国王。

〔8〕 这里指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公元14），原名屋大维，古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在他长久的统治时期，罗马世界达到和平与繁荣的黄金时代。

〔9〕 科普特教会（Coptic Church），埃及国内主要的基督教会。

第三章

现代历法的史前史和历史

罗马共和国历

今天广为人知和几乎全球通行的历法是经公元前46年儒略·凯撒（Julius Caesar）和公元158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改革后的罗马历发展而来的产物。在第一次改革之前，它是一种不完善的阴阳历，取平年为355日——多出一日——因为当时认为奇数是吉祥数字。出于同一原因，不同于通常的阴历，它不包含30天的月份；2月有28日，但是其他所有月份都取奇数日，不是31日就是29日。

有6个月的名字以数字5到10称呼，从3月起计数；但是，虽然传统上以3月作为一年的开始，以2月作为结尾（由于它最短而且在这月举行涤罪仪式），一些历史时期以1月作为第一个月，按门神雅努斯（Janus）的名字命名。雅努斯为两面人，既瞻前，又顾后，而且在公众祈祷中第一个向他祈告。罗马人自己也察觉到了这种矛盾，不过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只能说罗穆路斯王（King Romulus）——这位传说中罗马城的创建者——身兼士兵和治理者却并非才智出众之士，不曾操心把萧瑟的冬天从12月到3月加以细分。

意大利的其他文化将月初和定在满月的月中这两个日子作为标志日；罗马人把它们分别称为*Kalendae*（Kalends，意即“每月第一天”）——这个词来源于古老的动词*calare*（在现代意大利语中意为“下落”，也指日、月等“下山”——译注），因为原先是在那一天宣布新月——和*Eidus*（Ides）——来源于埃特鲁斯坎语[1]，意为“分开”，它在4个31日的月份（3月、5月、7月和10月）落在第15日，在其余各月份落在第13日。但是他们还有第3个标志日*Nonae*（Nones），在31日的月份落在第7日，在其余各月份落在第5日；我们说它们在Ides之前8日，但是罗马人说来是在第9日（*nonus* = 第9），因为他们在计数时喜欢把起点也包含在内。（基督徒仍然说耶稣基督在第3天复活，算入了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比较法国人的说法*demain en huit*，“下星期的明天”[*demain* 意为明天，*en huit*

意为8日之内，以喻1星期——译注］。）其他所有日子的名字都与下一个标志日有关：前一日称为*pridie Kalendas/Nonas/Eidus*，其他的称为“之前第n日”，仍是把起计日包含在内，所以Kalends之后的那一日是31日月份中Nones之前的第6日（*ante diem sextum Nonas*，缩写为*a.d. VI Non*.），是其他月份中Nones之前的第4日，等等。

历法中的每一日均以字母A至H为标识，指示其在8日的集市周期中的位置，这在包含起计日的计量体系下称为*nundinum*，即“9日周期”；一旦知道了任何集市的日期，这个日期旁的字母就指示一年中所有其他集市。其他标识表示在某一天是否有市民集会或者司法官审理诉讼；一些宗教庆典也按传统而不是按现实的重要性作了记录（例如参见图9）。

图9　现存唯一的罗马共和国时期岁时记，展示古罗马儒略历之前的历法。竖列表示9日周期、标志日、公众事务是否适合进行，以及宗教仪式。
C（omitialis）（拉丁词，意为“人民集会的”——译注）表示人民可以举行集会选举地方长官或通过法案，F（astus）（拉丁词，意为“法院开庭的”——译注）表示执政官能够审理诉讼（所有C日也是F日），
N（efastus）（拉丁词，意为“禁忌的”——译注）或NP（原词意义不明——原注）表示执政官不能听审，其他标志表示他仅能在这日的部分时间听审。

为了使日期不致于与季节脱节，大祭司团（*pontifices*）不时地下令插入一个额外的27日的月份，这称为“闰月”（Interkalaris或

Interkalarius），在这个月中Nones在第5日而Ides在第13日。闰月加在2月23日（Terminalia）或者往后1日之后；2月的其余日期则被删去，这样一年包含378日或377日。9日周期在闰月的Kalends中断，但是随后又如常实行，直至年末。

决定置闰并非根据科学的原则，而是出于政治的或其他的考虑（大祭司团成员本身也都是政客）；有时决定作得太晚，以致西塞罗[2]不得不在他的信中署上Terminalia之前的日期。认为额外的日子是凶日这种迷信非常流行，导致置闰在第2次布匿战争[3]期间中止，以致于历法比太阳超前了约4个月；公元前190年3月14日的日食被记录在7月11日。当大祭司团再次启动置闰时，他们又作了过量的补偿，以致造成了下面的局面：公元前153年当军事上的紧急情况迫使新的国家元首——即执政官们——立即就任、并着手部署春季战役时，他们接任是在1月1日，而不是在自公元前222年以来就成为通例的3月15日。因为这天又是新年，从此以后就作为执政期的开始保留了下来。

无论如何这更方便了，因为罗马人经常以执政官确定日期；例如儒略·凯撒出生于“7月的Ides之前的第4日，那时盖约·马略[4]第6次和卢修斯·瓦勒留斯·弗拉库斯（Lucius Valerius Flaccus）同为执政官”。按惯例换算为公元前100年7月12日，虽然我们不知道按回溯的儒略历（参见下一节）是否也在7月12日。

儒略的改革

公元前63年凯撒被选为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那时他是一名雄心勃勃的青年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军事征服者，这样他就成了置闰的负责人；在高卢战争[5]期间，只是当他未在高卢度过2月份的公元前55年和前52年这两年，才实施了置闰，而在随之而来的内战期间，完全没有置闰。结果，历法又一次超前了太阳；直到公元前46年，凯撒战胜了他的死敌之后，才得出空闲来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他

下令不仅添加正常的闰月，而且在11月和12月之间插入两个长的月份，一共包含67日。他把那一年——正如一位罗马晚期的作家所称，混乱年代的最后一年——扩展到445日，为了弥补在战争期间缺失的闰月。

从公元前45年往后，新历法开始实施：4个31日的月份保持不变，但是29日的月份或增添了1日（4月、6月、9月、11月），或增添了2日（1月、8月、12月），这样1年就包含了365日而不是355日。这些月份里的Nones和Ides未受影响；相反，Ides之后的那天成为Kalends之前的第18或第19日，而不是第17日。

不再需要闰月了；但是为了使年的节律与季节保持一致，设置了1个闰年，这年的2月24日重复1次。额外的这天称为*ante diem bis sextum Kalendas Martias*，意即“3月的Kalendas之前第6日的重复”；正式的英语词bissextile year和通常的法语词*année bissextile* 均源出于此，意思都是“闰年”。

凯撒的敕令说这额外的1日必须按*quarto quoque anno* 插入，意思是“每4年”，但是由于大多数罗马人把这句话理解成“每3年”，在他被刺杀之后，一直按每3年的闰期实行；直到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成为大祭司长，他通过消除公元前9年（这一年在正确的闰周和错误的闰周中都是闰年）之后的置闰改正了错误。他在公元8年重新启动置闰，并确认往后按每4年的闰期执行。由于公元8年是在公元前45年的52年之后，后者也一定是一个闰年，犹如欧多克索斯的4年闰周中的第一年，确实就和现代在计算公元前的年份时应用凯撒的历法无限期地回溯所预测的一样。因此我们称儒略历的第一天为公元前45年1月1日。那一天是星期五，即金星日（the day of Venus）。凯撒家族声称他们是维纳斯的后裔，而主宰这天的金星这个慈爱行星其女神正是维纳斯。（另一种说法是儒勒历开始于平年的第2天，这就不仅是认为奥古斯都犯了一个错误，而且无视星期六附着的恶运。凭着凯撒的公关意识，他是绝不会在这点上脑袋糊涂的。）

公元前44年，凯撒出生的那个月，7月，被重新命名为Iulius，以颂扬这个被神化了的独裁者；公元前8年改正历法错误的时候，8月这

个他的继承人打败安东尼（Antony）和克娄巴特拉（Cleopatra）联军的月份被重新命名为Augustus。从此以后一直到1582年，这个历法就这样执行了下来，而没有进一步的结构上的变更，只有少许语言上的改变（例如*ante diem sextum Idus*［*Eidus*的拼法已经废弃］改为*sexto Idus*，或后来为*Iduum*），和时而但并非永久性地以后来的一些皇帝的名字重新命名某些月份。以星期取代8日的集市周期和随后的异教、基督教节日的一些变化都未影响到月份的长度和顺序。

虽然罗马帝国的希腊城市有它们自己的历法，罗马历还是用来作为整个帝国范围内的时间计量系统；但是到了公元5世纪，讲希腊语的国民认为标志日的体系过于麻烦，从而采取自前往后、从1日至31日或其他月份最后1日计数的方式。尽管教皇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I, 590—604）也这样使用，但是它在拉丁区域的推行进展远为缓慢；不过它还是成为了各种民族语言中的规范。由此，闰日移到了2月29日（参见加框文字）。

闰日

- 在凯撒的历法中，法定的附加日a.d. bis VI K. Mart.（拉丁语，意为“3月第1日之前6日那天重复1次”——译注）落在我们应称为2月25日的那天，紧随在正常的a.d. VI K. Mart.（拉丁语，意为“3月第1日之前6日那天”——译注），即24日之后；然而，在非官方的使用中这个次序正相反。后者反倒成为了西方教会除挪威和冰岛之外主要的用法；这就要求把圣马提亚[6]日在闰年从2月24日推迟到25日，而这至今仍是罗马天主教会的规矩。然而，在英格兰教会，由于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7]的错误，这项延迟已在1684年取消，并由于政治原因从来没有被纠正。
- 当日期向前计数，舍弃以罗马的标志日为参照，闰日就是29日；这不仅为民用历、而且也为东正教会所采用。2月29日在

东正教中是圣卡西安[8]日。

从凯撒到格列高利十三世

凯撒的改革假设一个太阳年长为365日又6小时，它比回归年长11分钟有奇；在128年之后，差异累积达到1日。如果按太阳从春分点到春分点来计量的话，差异略为短些，131年后达到1日。

春分日正是基督教会确定复活节的依据（参见第四章）。罗马人惯用的春分日期3月25日（这是在改革之后确立的，但是源自早期希腊天文学家的推算，因为它适合于公元前3世纪而不是前1世纪）相对于真正的春分越来越滞后；在公元3世纪，真正的日期一般为21日，亚历山大的教会正是采用它作的计算，后来这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变得确定无疑，但是其后它也日益显得与实际不符。

从13世纪往后，差异已超过了一个星期，有人提出了改革的建议，原则是一次性扣除若干天数，此后不时地压缩置闰，以便缩减超量的闰年数目。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见，那不足以改正复活节所在的日期；一方面，名义春分日与真实春分日之间的差异正是推动改革者的主要动因，另一方面，复活节推算的改变引发了对改革者工作的大部分敌意。

1476年伟大的天文学家约翰·米勒——因为他来自于巴伐利亚的柯尼斯堡，大家通常叫他雷乔蒙塔努斯[9]——受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之召前往罗马，商讨历法改革，但他到达不久即逝世了。大约40年之后，教皇利奥十世（Leo X）把这个问题提交给若干大学，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解决这一问题的任何希望因突然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10]而中断；这一运动极度仇恨教廷的管辖权，不能允许教皇有权改革凯撒确立下来的历法，更不用说是为了一个并非《圣经》定下的节日了。路德[11]声称改革不是教会的事务，而是各基督教公国大公的事务；然而，为了避免混乱，尤其是避免定期集市日期

的混乱，各公国应该一起行动，否则就根本不动。这个意见对于德意志特别中肯，因为它分裂为许多小邦。

各基督教公国的大公们无所作为，从1545年开到1563年、事关罗马教会改革的特伦托公会议对此也不理不睬。然而，这次公会议的最后一期会议把弥撒书和每日祈祷书——教会礼拜仪式用书——的修订本提交给教皇时，无意间又一次触及了这个问题。虽然这些修订由庇护五世（Pitus V）正式执行（他1568年的每日祈祷书中包含对复活节阴历的拙劣修正），但是他的继任者格列高利十三世扩展了一般权力去改革这些礼拜书所依据的历法。1578年他确立了一个进程，并于4年之后颁行了新的历法，这个历法至今仍冠以他的名字。

为了让当时在3月11日左右的春分日再次回到21日，教皇下令1582年10月4日的翌日为15日；为了防止日后再生差异，取消世纪年（即以00结尾的年份）的闰日，除非它能被400整除的才是闰年。这不是最精确的改正，但是最方便，远比采用其他周期更容易实施；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1600年仍旧是闰年，第1个取消的闰年远在1700年。这项改革的产物通常称为新历。

采纳和拒绝新历

当教皇格列高利的训令诏告各地之时，不仅教廷的权威不为新教徒所承认，甚至在罗马天主教国家也冒出了强调世俗权利的声浪。在教皇国〔12〕之外，是世俗的权力当局推行改革。意大利各城邦和西班牙即时遵行——所以阿维拉的圣特雷萨〔13〕在1582年10月4日逝世，而在15日下葬，但是在教皇的干预普遍受到敌视的法国，（令教皇感到不快的是）亨利三世（Henri III）关于调整日期适应新历的要求在国会遭到强烈反对。只是到了12月份改变才得以实行，9日（那一天在国王率领下举行了隆重的游行仪式，为王储祈祷）之后紧接着20日。在有些国家推行新历还要更晚。

由于两方面的原因新历颇受排斥，一是它改变了古老的习俗，二

是它搅乱了农村传统的年节和关于天气的谚语。有一首德国讽刺歌曲唱道，最糟糕的是教皇干扰了圣乌尔班[14]日（5月25日），而这一天是葡萄酒是否丰收的指示标。如果那天天晴，意味着葡萄丰收，农民尽兴地把葡萄酒喝个够，并洒酒在圣人的塑像上；如果那天阴雨，预示着葡萄歉收，他们就把他的塑像丢在污泥中滚一滚，或者把它抛入河中。现在的情况是，要不按照日历在10天之后奉行习俗，要不完全放弃，他们要在这两者中抉择。

除了荷兰的两个省份荷兰省（它消除1582年12月16日至24日）和泽兰省（它消除1583年1月2日至11日）之外，整个非天主教世界保留儒略历。东正教（和英国高教会派信徒）宣称“尼西亚[15]318圣父”的历法不能更改，除非由主教特别会议通过；新教徒虽对尼西亚会议的决议不屑一顾，却反对说应该把春分日（如许多罗马天主教教徒所期望的那样）放在和凯撒时期一样的3月25日，何况阴历查定表亦非十分精确，但是归根结蒂这些无非都是排斥教皇的托词。即使在罗马教廷的统治之下，希腊人的威尼斯领地仍保留儒略历，正如波兰联邦的东正教徒（和“东仪天主教会信徒”）之所为。

在英国，睿智的伊丽莎白一世[16]既能察觉到改革的好处，也能相当明智地接受劝谏；她的大臣们也都赞同，但是她的主教们却不肯同意。当时顶级的数学家兼占星术士约翰·迪[17]计算出从基督降生以来已悄悄地多出了11日又53分钟，提出在1583年从1月至9月消除每月的最后1天，再消除10月的最后2天，这样英格兰将为其他基督教国家树立一个榜样，即使教皇也将仿效。这是英格兰历法例外论几种方案中的第一个，比1621年由托马斯·利迪亚特（Thomas Lydiat）提出的592年周期合理得多；后者的根据是犹太历而不是罗马历，虽然赢得了一些名声，但无人遵行。

17世纪初新历的推行取得了小的进展，例如被普鲁士公国和瑞士的瓦利斯州所采纳，但是随着1700年的临近，大多数新教徒仍旧使用儒略历，眼看差异要从10日扩大到11日。这一前景导致荷兰人、德意志人、丹麦人和大多数瑞士新教徒采用新历（虽然他们未采纳格列高利历的复活节；参见第四章）。瑞典试图通过消除1700至1740年间

的11个闰日来无痛苦地推行新历。1700年的闰日适时地消除了，但是1704年和1708年的却没有；因此在波尔塔瓦决战〔18〕中败于俄国的日期，据英国和俄国历史学家按旧历所记是1709年6月27日，在大多数其他国家按新历所记是7月8日，但是按瑞典历法却发生在6月28日。由于害怕这次灾难是天神对妄改历法的愤懑所致，瑞典人于1712年在2月加上第30日，又恢复了儒略历。

改革英国历法的一项建议成了泡影，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敌视教皇的数学家约翰·沃利斯〔19〕的强烈反对。他的许多发现中的一项即是，复活节可以通过天文观测确定，而不必改动民用年份——这正是瑞典会在1740年采纳的方案。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还是一个独立王国的苏格兰可能不会遵行，因为苏格兰教会拒绝庆祝复活节这个不见于《圣经》记载的节日，从而也没有理由要关注春分日。但是1707年的联合〔20〕消除了说服两国议会的需要，改革历法的几个建议被提了出来，有些相当激进和领先于其时代，无视与欧洲大陆的关系这种实际需求。

采用新历成了唯一合情理的改革。它终于由1751年的一项议会法案通过实施，规定消除从1752年9月3日至13日的11日（参见图10），并把英国的年首从3月25日移到1月1日，以与苏格兰以及大多数其他国家一致（参见加框文字）。

September hath xix Days this Year. 1752

First Quarter, *Saturday* the 15th, at 1 aftern.
Full Moon, *Saturday* the 23d, at 1 aftern.
Last Quarter, *Saturday* the 30th, at 2 aftern.

1	f	Giles Abbot	5	38	6	22	ſecret	□ ♃ ☿	5
2	g	London Burnt	5	40	6	20	memb.	Wind,	6

According to an Act of Parliament paſſed in the 24th Year of his Majeſty's Reign, and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1751, the Old Style ceaſes here, and the New takes place; and conſequently the next Day, which in the Old Account would have been the 3d, is now to be called the 14th; ſo that all the intermediate nominal Days from the 2d to the 14th are omitted, or rather annihilated this Year; and the Month contains no more than 19 Days, as the Title at the Head expreſſes.

14	e	Holy Croſs	5	42	6	2[illegible]	thighs	and ſtor-	7
15	f	Day decreas'd		45		2[illegible]	hips	my Wea-	8
16	g	4 hours		46		18	knees	ther.	☽
17	A	15 S. aft. Tri.		48		1[illegible]	and	Fair and	10
18	b	Day br. 3. 45		50		14	hams	ſeaſonab.	11
19	c	Clo. ſlow 6 m.		52		12	legs	♂ ☉ ♂	12
20	d	Ember Week		54		10	ancles	♂ ☿ ☿	13
21	e	St. Matthew,		56		8	feet	Rain and	14
22	f			56		6	toes	Windy.	15
23	g	Eq. D. & N.	5	58		4	head	♂ ☉ ♂	●
24	A	16 S. aft. Tri.	6	0		2	and		17
25	b	Day dec. 4, 34		2	6	0	face	□ ♃ ♀	18
26	c	S. Cyprian		4	5	58	neck	♂ ☉ ☿	19
27	d	Holy Rood		6		56	throat	Inclin. to	20
28	e	Clo. ſlow 9 m.		8		5[illegible]	arms	♂ ♂ ☿	21
29	f	St. Michael		10		5[illegible]	ſhould.	wet, with	22
30	g	St. Jerom		12		4[illegible]	breaſt	Thunder.	☾

图10　1752年的一页历书，显示9月份只有19日

哪一年更长？

在（a）英格兰、（b）苏格兰和（c）法国，哪一年更长，是1751年还是1752年？

（a）在英格兰是1752年。1751年是英格兰法定于3月25日开始的最后一年，它在12月31日结束，这样只包含282日。

（b）在苏格兰是1751年。苏格兰自从1600年以来每年都从1月1日开始，但还是奉行旧历；因此，就像在英格兰一样，从1752年的9月里消除了11日。

（c）在法国是1752年。两项改革于法国都早已实施，所以1751年包含365日，而1752年由于是闰年，包含366日。

这个法案区分两类事件，一类如教会的节庆，在“名义上的日期”举行，另一类如农产品集市、租约的终止、年龄的计算等，要延后到“自然的日期”：这样1752年的米迦勒节〔21〕是在新历9月29日，可是米迦勒节的集市要到10月10日才举行。这导致了一些不正常情况的出现，要求制定额外的法规：例如在切斯特〔22〕，在圣丹尼斯日（10月9日）之后的星期五举行的市长庆典伴随集市，1751年的法案要求前者在后者之前11日举行。于是一个修正案匆忙被提了出来，附在涉及家畜瘟疫的法案之中。

在1752年下半年，为了两个从1710年以来就未受到争夺的牛津郡的席位，各方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选，尽管投票要到1754年才举行。挑战现有“旧势力”（作为反对党的保守党人）的“新势力”（亲政府的辉格党人）候选人之一是帕克爵士（Lord Parker），他是法案的设计人麦克尔斯菲尔德伯爵（the Earl of Macclesfield）的儿子。这使得新历在1753年的头几个月里成为了一个话题；此后人们虽然对此丧失了兴趣，但是在牛津郡发生的过火的行为启发了贺加斯〔23〕创作《议会贿选》讽刺组画。其中的第一幅《选举招待会》（图11）上画有一张被丢弃又遭践踏的招贴，上面写着“还我们十一天”。这张招

贴曾经引发关于发生了反对新历的骚乱这类流言；骚乱倒真的发生过，不过那是反对犹太人入籍这一政令，政府刚刚颁布就遭受胁迫要求将其撤销。

图11　贺加斯的版画《选举招待会》，画面上有“还我们十一天”的招贴和一个悬

吊着的犹太人模拟像，隐喻现实中骚乱的真实起因

1753年瑞典终于采用新历，消除了2月的18至28日。高度背离罗马教廷的格里顺州（Grischun，或称格劳宾登州，Graubünden，1803年之后才并入瑞士）的新教徒在1784年才加入这个行列，而苏什镇（Susch在德语中为Süs）更是于1811年在拿破仑军队的胁迫下才采纳新历。从那时起，新历在新教徒中如同在罗马天主教徒中一样得到了普及。

20世纪以前没有任何一个东正教国家接受改革，即使是为了民用的目的，但是保加利亚消除了1916年的4月1日至13日，随后苏维埃俄国、塞尔维亚和希腊都采取了类似的国家行动。这些行动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新历问题。1923年5月，一些教会就一个“经过修正的儒略历”达成了一致，这包括以下三项改革：

（1）消除1923年10月的前13日；

（2）世纪年置闰的条件应改为，当以900去除，余数为200或600时（这条规则远较格列高利历精确）；

（3）与复活节的日期有关的满月，不应该按照传统的规则（参见第四章）、而是要按照耶路撒冷的子午线确定。

这最后一项改革以失败而告终。至于另外两项，第一项没有能及时实行，在许多地方至今还未这样做。希腊教会——在圣山[24]的自治区域除外——在国家的压力下采纳了改革，消除了1924年3月10日至23日；同年晚些时候，罗马尼亚国家和教会接受了这项改革。但是保加利亚教会直到1968年才作出改变，而俄罗斯、塞尔维亚、马其顿和格鲁吉亚的教会，与耶路撒冷和波兰的东正教一起，对于固定的节日仍使用儒略历，即使按照民用日期应推迟13天。在希腊庆祝圣诞节与西方世界是同一日，但是在这些国家却到了1月7日，这样就在民用历的新年之后。新年作为非宗教节日在苏联的庆祝隆重热烈，相形之下圣诞节则黯然失色。

第二项改革（一些西方人错误地认为这是苏维埃政权所推行的）的普遍采纳只体现在纸面上；2000年和2400年在这两种历法中都是

闰年，但是2800年按格列高利历将是闰年，而按照修正的儒略历则不是，只有到那时才会知道这条新规则是否会实施。

注释

〔1〕 埃特鲁斯坎语（Etruscan language），古罗马人的近邻埃特鲁斯坎人通用的语言。埃特鲁斯坎人居住在意大利现在的托斯卡纳地区，曾建立了繁荣的商业和农业文明，在公元前6世纪势力达于极盛，后被纳入罗马统治。

〔2〕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律师、古典学者、作家、演说家。

〔3〕 布匿战争（Punic Wars），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时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3次战争，以罗马彻底征服迦太基告终。

〔4〕 马略（Gaius Marius，约公元前157—前86），罗马共和国后期进入贵族统治阶层的人物，以军事才能和卓著战功著称。前109—前87年，先后7次当选为执政官。

〔5〕 高卢战争（Gallic War，公元前58—前50），罗马总督凯撒征服高卢的战役。

〔6〕 圣马提亚（Saint Matthias，活动时期1世纪），据《使徒行传》说，他是在犹大出卖耶稣后被选出取代犹大的门徒。

〔7〕 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区的大主教，在英国圣公会体制中又是全英格兰的首主教。

〔8〕 卡西安（Saint John Cassian, 360—435），基督教修士、禁欲主义者、神学家。著有《隐修生活规则》、《论道成肉身》等著作。

〔9〕 雷乔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 1436—1476），德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约翰·米勒（Johannes Müller）的笔名。

〔10〕 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是开始于16世纪初期的基督教改革运动，其宗旨在于根据《圣经》的教导，谋求基督教会在道德和教义上的纯洁。它最终形成基督教的新教，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1〕 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抗罗宗（新教）的创始人。

〔12〕 指教皇在756—1870年间拥有主权的意大利中部领土。

〔13〕 圣特雷萨（Saint Teresa of ávila, 1515—1582），又译德肋撒，天主教奥秘神学家、著名女信徒，有重要灵修著作，倡导教会改革。

〔14〕 圣乌尔班（Saint Urban I, ?—230），意大利籍教皇（222—230在位）。

〔15〕 尼西亚（Nicaea），今土耳其境内伊兹尼克，在古代为尼西亚城。基督教会的第一、第七两次普世会议曾在此举行。第一次会议所公布的《尼西亚信经》是唯一为天主教、东正教、英国圣公会和基督教新教主要派别共同承认的基督教信仰宣言。

〔16〕 伊丽莎白一世（英格兰的）（Elizabeth I of England, 1533—1603），英格兰历代最伟大的君主之一，1558—1603年在位。在位期间对英格兰的管理作出重要贡献，尤于最后15年形成繁荣景象，出现了莎士比亚、培根等许多著名作家。

〔17〕 约翰·迪（John Dee, 1527—1608），英国炼金术士、占星家和数学家，对英国数学的复兴有重大贡献。

〔18〕 波尔塔瓦战役（Battle of Poltava, 1709.7.8），俄国与瑞典的北方大战中，俄国彼得大帝对瑞典查理十二世的决定性胜利。这次战役结束了瑞典的大国地位，并标志俄国称霸东欧的开始。

〔19〕 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 1616—1703），英国数学家。他对微积分的发源有重大贡献，是牛顿以前英国最有影响的数学家。

〔20〕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自1603年起，英格兰和苏格兰由同一君主分别统治，但各自有自己的议会和法庭。1707年双方签订联合成为大不列颠的条约，成立联合议会，但保持各自的法律和法庭。联合于5月1日生效。

〔21〕 米迦勒节（Michaelmas），基督教节日，纪念天使长米迦勒。西派教会定在9月29日，东正教会定在11月8日。在中世纪米迦勒节是隆重节日，其日期恰逢西欧许多地区秋收季节，不少民间传统都与它有关。

〔22〕 切斯特（Chester），英国英格兰柴郡的城市，是该郡行政、商业和宗教中心。

〔23〕 贺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英国油画家、版画家和艺术理论家，在肖像画、风俗画和历史画方面有巨大贡献。

〔24〕 圣山（Mount Athos），希腊北部希腊正教教会所在地。圣山地区方圆336平方公里，首府卡里埃。目前，这一地区实际上的行政权掌握在修士代表组成的神职会议手中。

第四章

复活节

复活节意在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历史上是基督教所有节日中最重要的一个；现在在东正教里它仍保持其宗教意义，尽管在一些西方国家它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这种意义。然而，它值得广泛深入地讨论，不仅因为它往往既是公众的又是宗教的节日，或者因为它的日期实在是变幻莫测，即使基督徒也可能受其困扰，而且因为复活节的推算史显示出时间计量的诸多错综复杂之处。

复活节起源于犹太教的逾越节，在希伯来语里称为*pesaḥ*，但是在阿拉米语，即在罗马人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通用口语里称为*pasḥā*，后者在希腊语里又变成了*páscha*。（由此产生了英语形容词Paschal［意指“逾越节的”或“复活节的”］；“复活节”［Easter］的名字是由一个德意志的节日转用而来。）在《圣经》时代，逾越节是指在Nisan月[1] 14日宰杀逾越节的羔羊；羔羊在黄昏时食用，这按犹太人的计时法则是15日的开始，因此这也是为期7天的除酵节的开始。

据《约翰福音》记载，耶稣上十字架发生在Nisan月14日的白天；这个日期看来比其他三部福音书所说的15日更为可信，因为15日会受到诉讼活动的亵渎。因此很自然地，早期的基督徒——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犹太人——要在Nisan月14日纪念耶稣蒙难，把耶稣看作为救赎人类而牺牲的上帝的羔羊。在希腊语里*páscha*与动词*páschein*有关，后者的意思就是“受难”，这更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即使是在基督教于很大程度上成了非犹太人宗教、大多数基督徒早已放弃这一习俗之后，在小亚细亚，由于人们承认圣约翰的权威，它还继续得到奉行。这一坚持最终被归为异端，称为十四日教派。

然而，由于耶稣在星期日复活，那一天被作为每星期中的节日来庆祝。随着时间的推进，庆祝耶稣复活成了常规，而不再保持耶稣蒙难的周年祭典；在东方各省，这一天是逾越节后的星期天，在其他地方是由独立计算求得的一个日期之后的星期天，既是为了避开与犹太人的关联，也是因为庆祝之前戒斋的习俗正迅速流行开来，这要求事先知道日期。为此必须求得阴历1月的第14日，简称*tessareskaidekátē*

，即希腊语的“第14”，但是在拉丁语里为*luna quartadecima*，字面的意思是“第14个月亮”，下文缩写为*luna XIV*。一当*luna XIV*被求得，也就必须确定它之后的那个星期日。作这类计算的方法称为computus。

复活节的期限

从3世纪以来，大多数教会同意复活节应是*luna XIV*之后的星期日；但这仅仅是开始。两个原则性的问题依然存在：阴历1月何时开始，以及如果*luna XIV*正是星期日，那么是在那一天庆祝复活节呢，还是在下一个星期日？选择后者是为了与犹太人相区别，他们还没有采用使Nisan月14日永远不会为星期日的规则。后一选择成为了更为广泛地实行的习俗。在罗马，耶稣受难日为Nisan月14日的观念导致*luna XIV*即使是在星期六复活节也会被延期，这样节庆就永远不会早于阴历月份的第16日（*luna XVI*），而复活正是那天发生的；于是复活节最迟可能到22日（*luna XXII*）。另一方面，有一点至关重要，即复活节不能落在4月21日之后——这一天是纪念罗慕路斯建城的帕里斯节[2]，以免基督徒被迫在民间节日期间戒斋而遭受敌视或诱惑。阴历的期限即阴历月份的16日至22日和阳历的下限4月21日都出现在基础年份222年的一部历书中；这一历书用希腊文镌刻在一把现在立在梵蒂冈图书馆楼梯脚旁的石椅上。

在这部历书中，复活节最早可能落在3月18日；但是基督徒开始埋怨犹太人不再遵循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即逾越节不能超前于春分日。这一指控一方面是由于对犹太规则的误解，但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的犹太社会之间习俗的明显差异（参见第六章）。但是，如果说犹太教的逾越节不应该超前于春分日，那么基督教的复活节也不应该这样；到4世纪时，罗马教会看来就持有这个观点（当时春分的日期还是取为3月25日），尽管它在实践中不能维持。亚历山大城采取了更严格的规则，即*luna XIV*本身，也就是逾越节这个日子，不能超前于

春分，春分日则（更加精确地）等于Phamenoth月25日 = 3月21日；另一方面，没有下限，因为4月21日（在当地为Pharmouthi月26日）没有特殊意义。

早期的复活节周期

在用于确定*luna XIV* 的方法上也存在着一些差异，虽然这并非是基于宗教信条；其中许多方法远远落后于天文学已经达到的科学标准，因为它们对天文学与占星术的关系存有疑虑。最早的方法是*octaeteris* ，即8年周期，其中阴历月份交互地取30日和29日，民用历的闰日也作为太阴月中的一日来计算，包含30日的闰月则加在第3、第6和第8年。这意味着民用历的8年切实与8个阴历年匹配，包含2922日。梵蒂冈那把石椅上的历法按此原则计算了往后112年的日期。可惜，由于99个事实上的太阴月并不包含2922日，而是2923½日多一点，这一历表很快就被发现不够准确。一位拉丁学者以新的日期作了修正，从公元243年起实行，但是他依据的仍旧是这同一种有缺陷的原则。

更为精确一些的是84年周期的查定表，它的优点是包含完整的星期数，所以每个周期开始的一日与前一周期对应同一个星期几。在一个周期之内，有31次置闰，每当岁首月龄——即阳历1月1日回溯至阴历当月初一的日数——超过19时进行；闰日并不另外作为太阴月的日期来计算，而且为了使阴历周期与阳历周期协调一致，要消除6个阴历日期。这种消除被称为*saltus lunae* ，即“月亮的跳跃”，因为月龄跳过了中间值，例如从20到22；这或是每14年进行一次，如在由一个叫奥古斯塔利斯（Augustalis）的罗马人制定的、看起来出自3世纪非洲的历表里就是这样（这一历表允许庆祝*luna XIV* 并同意复活节落在3月16日），或是每12年进行一次，直到第72年，如在4世纪的《罗马算法》中一样（这本书非常粗劣，其中某些年份会有两个合法的复活节，而在其他年份则一个也没有）。

亚历山大的解决方案

在亚历山大城，旧的8年周期早已被弃置不用，人们钟情于19年7闰的默冬章；虽然确切的发展过程不能肯定，但是最晚在323年，复活节的算法（computus）达到了其最终形式（参见附录二）。它的依据是一种伪犹太历，其中*luna XIV* 落在Phamenoth月25日（3月21日）的春分和Pharmouthi月23日（4月18日）之间。由于当天禁止庆祝，但在次日则不禁止，因此复活节可能的最早日期是Phamenoth月26日（3月22日），而最晚日期是Pharmouthi月30日（4月25日）。

与《罗马算法》相比，亚历山大的周期为每年提供了一个而且仅有一个合法的复活节，但是由于不像84年查定表，它不能与星期通约，一旦确定了*luna XIV* 的日期，就必须每次都要确定之后的那个星期日。这是通过计算一个变量来实现的，而这个变量被称为“诸神之日”。这虽是一个异教的和占星术的名称，亚历山大教会却认为没有必要去改变它。虽然复活节的日期通常按95年的间隔重复出现，但是完全的重复则要经过532年的周期。

亚历山大的牧首形成了一个惯例，每年发送通告，通知复活节的日期，并就当前时世对教会事务发表评论。到了4世纪中叶，牧首们宣称，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讨论一个棘手的异端邪说——已经把为广大基督徒确定复活节日期的任务委托给了他们。这并不是真的，不过那之后不久君士坦丁大帝 [3] 就下诏，敕令基督徒不得“与犹太人共庆”与逾越节日期同一天的节日。尽管如此，亚历山大教会日渐赢得了信任。到公元360年，米兰教会开始采用亚历山大的复活节日期，而不用罗马的；在5世纪早期，甚至罗马也一般遵循亚历山大的日期，只要它不晚于4月21日。

到了6世纪中叶，使用与亚历山大稍有不同的默冬章的君士坦丁堡调整了月亮“跳跃”的位置，于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能得到与亚历山大相同的复活节日期。亚美尼亚教会和主要的两个讲古叙利亚语的教会都只采纳了部分改革，于是在532年的周期中有4年它们的复活节落在（儒略历的）4月13日，而君士坦丁堡的则落在6日。产生分歧的第一

年是公元570年，最后一年是1824年；下一次这种情况预计将发生在2071年。在耶路撒冷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社区时而会因为这一分歧而大打出手。

维克托利乌斯和狄奥尼西

复活节罗马阳历的期限4月21日在公元444年遭到违反，那一年教皇利奥一世（Leo Ⅰ）受人劝谏而采纳23日；之后在455年，尽管极不情愿，他又采纳了24日。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拉丁语世界的首席数学家阿基坦[4]的维克托利乌斯（Victorius of Aquitaine）受委托为天主教会编制新的复活节查定表。他的表跨度达532年，声称遵循亚历山大城的原则，完全抛弃了罗马的84年周期和阳历期限；但是他把月亮的“跳跃”放在周期的第6年而不是第19年，让*luna XIV*落在3月20日与4月17日之间，又在它落到星期六时，给出不同的“拉丁”和“希腊”日期，并拒绝支持4月25日为复活节。

结果是一团糟：对于公元482年，他给出拉丁日期4月18日，这一天是*luna XV*，而希腊日期为4月24日（一个星期六！），这一天是*luna XXII*，这两个阴历日期对它们各自的教会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这些查定表后来遭受了来自各方的嘲笑批评；不过它们还是在拉丁语世界被广泛应用，因为它们看来能给出无论何时的复活节日期，而且保留着相应于1月1日的岁首月龄和星期几的方便对照。

然而，由于维克托利乌斯放弃了罗马的传统，又未能与亚历山大或君士坦丁堡达成一致，在罗马，人们似乎仍旧对历表不满意。501年，当时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教会正闹分裂，教皇西马库斯（Symmachus）按照《罗马算法》在3月25日过节，而不是按亚历山大和维克多利乌斯的日期4月22日；525年，分裂平息之后，修士小狄奥尼西[5]应邀编制新表。他只是把亚历山大的查定表延续了95年，从原来的532年延长到626年，从而彻底告别了罗马的传统。

狄奥尼西的查定表（参见图12）呈现为5个19年周期，每一个列

为8栏：公历年份、年期 [6] （参见第七章）、岁首月龄、星期换算数、太阴周、*luna XIV* 、复活节、复活节的阴历日期。这些栏中的最后3个是不譬自明的；太阴周依照的是君士坦丁堡的版本（比亚历山大的滞后3年），参列其中纯粹为了作比较。岁首月龄依据的是亚历山大的，星期换算数相应于“诸神之日”；但是这两个名词都没有加以说明，以致于后来的使用者不得不自己解出它们的意思。事实上，人们根本不清楚究竟狄奥尼西本人是否都明白它们是什么：他能够相当容易地推断出它们的数值，而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可能未再深入探究。要知道他的另一主要成就是编制了教会法规，这要求他博学和勤奋，而不是目光深远，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的查定表是精确的，但在说明上是有缺陷的。

图12　6世纪小狄奥尼西复活节查定表的镶嵌图。每个扇形面包含的栏目显示：公历年份、年期、岁首月龄、星期换算数、在拜占廷太阴周中的位置、*luna XIV* 的日期、复活节的日期、复活节的阴历日期。

虽然是受了正式的委托，但是狄奥尼西的查定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才在罗马取代了维克托利乌斯的表，在其他地方花的时间甚至更久。维克托利乌斯的查定表是永久性的，遵循传统的形式，而且看起来容易理解（细查的时候缺陷才会暴露出来）；狄奥尼西的表在95年后需要重新计算，忽视1月1日，而且难以理解。在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7〕时期，即7世纪初，人们依据经验发现岁首月龄相当于3月22日的阴历日期；在8世纪初圣人比德〔8〕观察到星期换算日（即通常所称的“星期换算数”）与3月24日是星期几相匹配。从此以后，这些解释在西方的著作里已成为标准，而人们往往认为它们都出自亚历山大。

岛国的复活节

在不列颠诸岛，复活节的计算根据完全不同的法则，来自称为Latercus的查定表（这是一个按不规范的拼写形成的拉丁词）；这个查定表被认为出自4世纪中期的苏尔皮西乌斯·塞维卢斯〔9〕。它基于84年周期，月亮的“跳跃”按14年的间隔进行；复活节最早的阳历期限是3月26日，最晚是4月23日，阴历期限是*luna XIV* 至*luna XX*，所以当*luna XIV* 落于星期日时，那一天就是复活节。其他地方的基督教会了解此情后，深为惊骇反感。

阳历的上限是拉丁春分日的后一天；其他期限采用自奥古斯塔利斯制定的历表。新颖之处在于阴历。它放弃了大月和小月的交替：结束于阳历1月的那个大月之后连续接着3个小月；其余每一个阴历月份包含的日数比它结束于其中的那个阳历月份少1日。Latercus查定表审慎地选择初始的岁首月龄，保证了为每一年给出单一的复活节日期，这一点类似于亚历山大的算法，而不同于奥古斯塔利斯或《罗马算法》。

当6世纪末圣科尔曼，即班戈（原在爱尔兰的唐郡境内）的圣高隆班[10]离开爱尔兰前往高卢时，他的Latercus查定表触犯了当地教会，后者当时遵循的是维克托利乌斯查定表。高隆班给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写了一封言辞卑谦但固执己见的信，为自己的做法辩护。在信中他宣称：爱尔兰国内的学者拒绝采用维克托利乌斯的查定表，认为它为可悲之物，不值一哂（这一评语与狄奥尼西和比德的相比已算是宽容）；在*luna XXI* 庆祝复活节是不恰当的，更不用提在*luna XXII* 了，因为在这一庆祝光明战胜黑暗的盛典上月亮不应该在午夜之后升起；而且与犹太人在同一天庆祝也不是问题，因为逾越节不是属于他们的，而是属于上帝的（《圣经·出埃及记》第12章11节）。

与此同时，教皇派人至英格兰传教，把罗马的做法引入南英格兰，与布立吞人[11]在此问题和其他事务上产生了冲突。在7世纪，维克托利乌斯和狄奥尼西的查定表都在爱尔兰取得了某些进展，特别是在南部（虽然对Latercus的岁首月龄的记忆在西柯克郡一直保留至19世纪中期），但是由哥伦西尔（Colm Cille，圣科伦巴[12]）建立的爱奥纳隐修院和与它有关的其他隐修院坚定不移地坚持Latercus，他们的传教团又从那里将它带到诺森布里亚。

两种习俗的不同在诺森布里亚宫廷内造成了困扰，那里受爱尔兰教育的国王奥斯威[13]与肯特公主安弗莱德（Eanflæd）联姻，后者是按罗马传统教养长大的。比德的记载说有时当国王正在过复活节时，王后还在庆祝棕枝主日[14]。在Latercus详细地为人们所了解之前，这被认为是由于他在*luna XIV* 落于星期日时也过复活节的一个偶然事件；事实上，在问题解决之前，这至少在他们结婚后一半的年份内发生过，但原因从来都不是他们认为的那个。分歧主要源自他们在阴历上的差异，有时则由于他们在阳历期限上的差异；对于他们两人来说没有一年*luna XIV* 是在同一天，不论它是在星期日还是在一星期中的其他日期（参见加框文字）。

奥斯威国王的岛国复活节与安弗莱德王后的罗马复活节

M＝3月，A＝4月

年	岛国复活节阴历日期		罗马复活节阴历日期			年	岛国复活节阴历日期		罗马复活节阴历日期		
				维	狄					维	狄
643	6A	XV	13A	XIX	XVIII	653	14A	XIV	21A	XVIII	XVII
644	28M	XVII	4A	XXI	XX	654	6A	XVII	13A	XXI	XX
645	17A	XVIII	17A	XV		655	29M	XXI	29M	XVII	XVI
				拉丁							
			（24A	XXII		656	17A	XX	17A	XVII	XVI
				希腊）							
			24A		XXI	657	2A	XVI	9A	XX	XIX
646	2A	XIV	9A	XVIII	XVIII	658	22A	XVIII	25M	XVI	XV
647	22A	XVI	1A	XXI	XXI	659	14A	XX	14A	XVII	XVI
648	13A	XVIII	20A	XXI	XXI	660	29M	XV	5A	XIX	XVIII
649	29M	XIV	5A	XVII	XVII	661	18A	XVII	28M	XXII	XXI
650	18A	XVI	28M	XX	XX	662	10A	XX	10A	XVI	XV
651	10A	XVII	17A	XXI	XXI	663	26M	XVI	2A	XIX	XVIII
652	1A	XX	1A	XVII	XVI	664	14A	XVI	21A	XVIII	XVIII

到664年奥斯威国王和他王国的教士们已觉得不能容忍。他们在惠特比召开了一次教会会议〔15〕以决定在复活节的计算和教士的削发仪式上，究竟是遵循凯尔特的还是罗马的传统；与罗马人剃头顶的削发仪式不同，凯尔特人剃掉前额至耳朵的所有毛发。

林迪斯凡的科尔曼〔16〕主教力主采用凯尔特方式，而后来成为约克主教的威尔夫里德〔17〕则竭力支持罗马的方式。后者主导了这场辩论；他威吓可怜的科尔曼，辱骂圣科伦巴，曲解事实，但最终以这是圣彼得的做法这类虚幻的论断锁定了辩论的胜局。奥斯威国王选择了罗马的方式，理由为是圣彼得而不是圣科伦巴掌管着天堂的钥匙。逐渐地不列颠诸岛的其他地区也都归入罗马的行列；威尔士人是最后归化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在9世纪40年代仍旧不肯退让。

虽然这被说成是（维克托利乌斯或狄奥尼西的）19年周期和凯尔特人的84年周期之争，但其实计算方式只是枝节问题；真正引发宗教问题的是期限的差异。两种19年周期之间的对抗停留在技术层面；比德在其725年的著作《论合理的时间》（*De temporum ratione*）中给出决定性的一击，他为狄奥尼西完成了后者没有做到的事（而维克托利乌斯为自己的体系做到了）。比德完整地阐释了确定复活节的法则，列出了不需每隔95年就重新计算一次的532年的复活节查定表

（参见图13）。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比德的查定表通行于整个西方，甚至在顽固坚持维克托利乌斯查定表的高卢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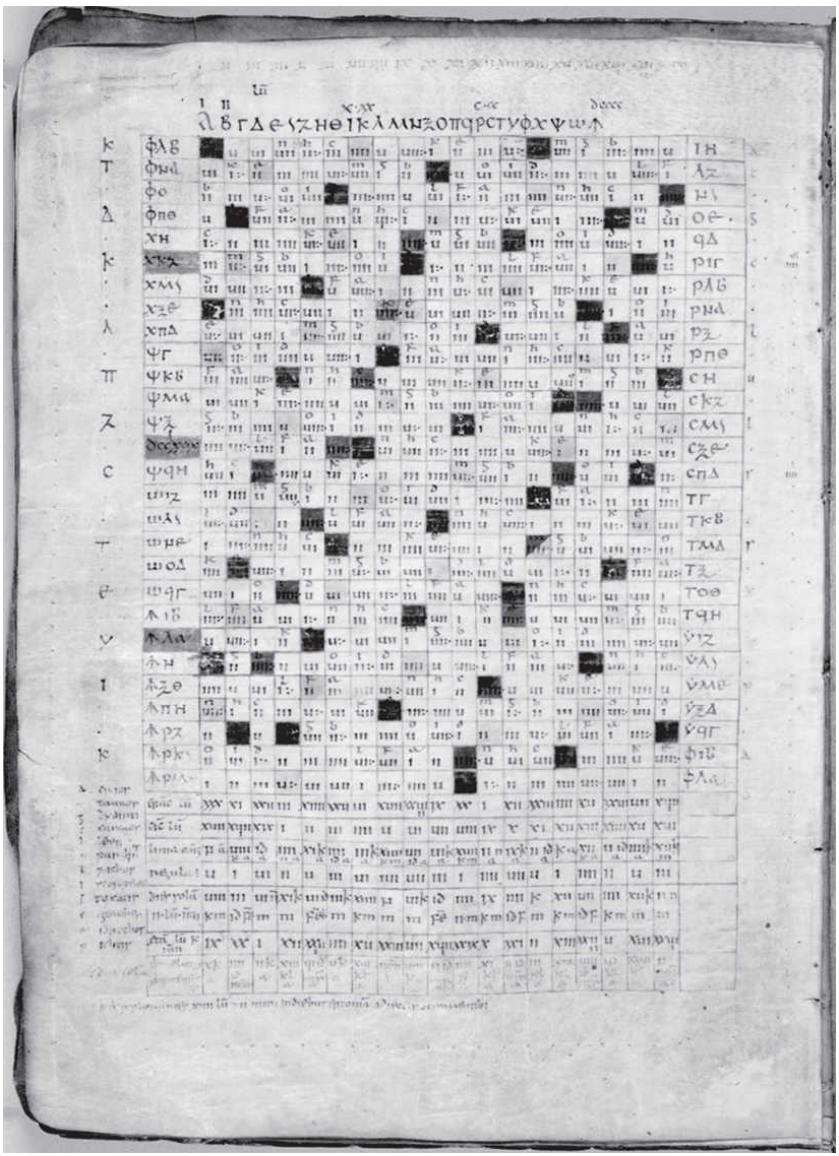

图13　比德的永久性复活节查定表。主表中的每一行表示19年周期，开始于在左边用希腊数字指示的公历年份，从532年至1045年；方格给出星期换算数，连同闰年标志和月龄表的对照；打阴影的格子表示从538年和545年往

后的第1和第8年期，以及从532年往后的每一个第28年；右端一列给出从18年至531年期间先前的复活节周期中最后一年的日期。周围的行和列给出其他各种相关信息。

太阴历

虽然亚历山大的复活节算法与其他的一样，都以一个阴历为依据，但是亚历山大人并不特别注重了解每天的阴历日期；对比之下，在西方，人们认为了解阴历日期非常重要，以至于隐修院在每日晨祷时会一同宣告当天的阴历日期和殉道者。这就要求重新计算新月：把亚历山大历的日期转换为儒略历的日期是不够的，因为，虽然亚历山大人和西方人都取阴历年里的奇数月为大月，偶数月为小月，但是它们出现的时间并不一致。

在亚历山大，大月通常在阳历的奇数月里开始，但是在西方，阴历月与它结束于其中的那个阳历月同名，大月通常在偶数月开始而在奇数月结束。这条规则诗化地表达成*impar luna pari , par fiet in impare mense* ，意思是“奇数月的月亮在偶数月里，偶数月的在奇数月里”。这就是说，在偶数月里的月亮日子为奇数（29日），而在奇数月里的日子则为偶数（30日）。

由于在7世纪推算复活节的领衔专家都是爱尔兰人（比德从他们的著作中大受裨益，虽然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看到以*De ratione conputandi* 为题的专文根据狄奥尼西的法则为年建立了完整的阴历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虽然这篇文章中的许多内容被抄入300年后圣邓斯坦（St Dunstan）所拥有的一本书里，真正获得确定地位的却是比德与它大不相同的体系。他谨慎地置闰，保证了只有3个年份里每月月龄的规则序列被打断，而且，只是在这些年份里某些阴历月份才与它们开始于其中的阳历月份同名。因此，当像赫拉巴努斯·毛鲁斯（约780-856）和弗勒里的阿波（Abbo of Fleury，约945-1004）那样博学和天才的学者提出新的方法、计算出相同的结果时，他们正是在比德的方法上加以了改进。

在比德的时代，某日的阴历日期是这样求得的：在岁首月龄（参见加框文字）上加上一些称为“阴历换算数”的参数，以获得每月1日的月龄。这样，对于岁首月龄11，3月1日的阴历日期为11 + 9 = 20，4月1日的是11 + 10 = 21。然而，从12世纪开始，它是从所谓的黄金数直接求得的，它相对于19年周期中相应年份的新月日期写在历书中；类似地，比德由星期换算数借助于“阳历换算数”求取某日星期几的方法（例如，星期换算数是2，那么3月1日的星期数是2 + 5 = 7，4月1日的星期数是2 + 1 = 3）在中世纪晚期由星期日字母所取代（参见第五章）。

岁首月龄、黄金数、星期换算数

为了求得儒略历中的岁首月龄，把公元年份数除以19；如果余数是0，那就是岁首月龄，否则把此数乘以11，除以30，那么新的余数就是岁首月龄。
为了求得黄金（即重要的）数——也称为“初始数”（来源于拉丁语*luna prima*，即“阴历初一”），在年份上加1，除以19，取余数；如果余数是0，黄金数是19。
为了求得星期换算数（只应用于儒略历），在公元年份上加上它的四分之一（略去小数部分）和参数4，除以7，取余数；如果没有余数，则星期换算数是7，而且3月24日是星期六。

改革的需要

不论比德做得有多出色，他还是不能够消除阳历和阴历的根本缺陷，这就是两者都不够精确。到13世纪，阳历已滞后于太阳太多，以至于有人建议改革。这已不再是某个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睿智的继承者所能完成的任务：在基督教的欧洲，改革涉及到复活节这个远为棘手

的问题。

在1538年，黄金数是19，表明*luna XIV* 在4月17日；由于这天是星期三，复活节落在了21日。马丁·路德评论道，根据春天第一个满月之后第一个星期日的规则，它应该落在3月17日，这自然就超前于由教会确定的21日的春分日了。如果已经实施了新历、但尚未进行任何进一步的改革的话，3月17日本该称为27日。然而，它不会是复活节，因为黄金数仍然表明*luna XIV* 是在4月17日。由于在新历中17日是星期六，复活节就将落在4月18日，相应于旧历8日，而且更接近于新月而不是满月。

此外，重新计算岁首月龄——例如，把黄金数为19的岁首月龄从18减少到11，以便使得*luna XIV* 成为3月25日，而且1538年的复活节落在27日——只能是短时期内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阴历也是错误的（正如赫里福德的罗杰 [Roger of Hereford] 在12世纪所说）。在76年期间，包括闰日在内，含有27759日，相应地940个朔望月（平均）包含27758.7546日，使得阴历月份超前历法大约5小时53分23秒。每过310年，这个差异将达到1日，再次使岁首月龄错误。因此需要更加根本的改革，而这由格列高利十三世所颁布。

格列高利历

教皇格列高利的改革有三个目标：重新确立春分日的日期在3月21日（虽然不符史实，但还是普遍认为这是尼西亚会议颁定的）；在将来仍保持春分在那一天；尽可能调整复活节历表，使之与月亮协调。前两项目标由新历达成，这已在第三章讨论过；第三项目标，即阴历的改革，是通过把简单的亚历山大的19年闰周代之以高度复杂的体系达到的，这一体系的根据是以前一年12月31日的阴历日期重新确定的岁首月龄（参见图14）。

TABVLA FESTORVM

Anni Domini	Aur.Num.	Epactæ	Lit. Dñicales Calen. Greg.		Plenilunia. media Cal Gregor. D.	H.	Lunæ xiiij. Calendarij Gregoriani		Septuagesima	Dies Cinerum	Pascha Calend. nouí		Ascēsio Domini
3664	17	xix	f	e	25.	2. M	25.	M	27 Ian.	13. Feb.	30.	M	8.Maij
3665	18	✱		d	13.	0. A	13.	A	15. Feb.	4.Mar.	19.	A	28.Maij
3666	19	xj		c	2.	8. A	2.	A	31. Ian.	17. Feb.	4.	A	13.Maij
3667	1	xxiij		b	22.	17.M	21	M	23. Ian.	9.Feb.	27.	M	5.Maij
3668	2	iiij	A	g	9.	15. A	9.	A	12. Feb	29. Feb.	15.	A	24.Maij
3669	3	xv		f	29.	23. M	29.	M	27. Ian.	13. Feb.	31.	M	9.Maij
3670	4	xxvj		e	17.	21. A	17.	A	16. Feb.	5.Mar.	20.	A	29.Maij
3671	5	vij		d	7.	6. A	7.	A	8.Feb.	25. Feb.	12.	A	21.Maij
3672	6	xviij	c	b	26.	15.M	26	M	24. Ian.	10. Feb.	27.	M	5.Maij
3673	7	xxix		A	14.	12.A	14	A	12. Feb.	1 Mar.	16.	A	25.Maij
3674	8	x		g	3.	21. A	3.	A	4. Feb.	21. Feb.	8.	A	17.Maij
3675	9	xxj		f	24.	6. M	23.	M	20. Feb.	6. Feb.	24.	M	2 Maij
3676	10	ij	c	d	11.	3. A	11	A	9. Feb.	26. Feb.	12.	A	21.Maij
3677	11	xiij		c	31.	12. M	31.	M	31. Ian.	17. Feb.	4.	A	13.Maij
3678	12	xxiiij		b	19.	10. A	18.	A	20. Feb.	9 Mar.	24.	M	2.Iunij
3679	13	v		A	8.	19. A	8.	A	5. Feb.	22. Feb.	9.	A	18.Maij
3680	14	xvj	g	f	28.	3. M	28.	M	28. Ian.	14. Feb.	31.	M	9.Maij
3681	15	xxvij		e	16.	1. A	16.	A	16. Feb.	5.Mar.	20.	A	29.Maij
3682	16	viij		d	5.	10. A	5.	A	8. Feb.	25. Feb.	12.	A	21.Maij
3683	17	xix		c	25.	19. M	25.	M	24. Ian.	10. Feb.	28.	M	6.Maij
3684	18	✱	b	A	12.	16. A	13	A	13. Feb.	1.Mar.	16.	A	25.Maij
3685	19	xj		g	2.	1. A	2	A	4. Feb.	21. Feb.	8.	A	17.Maij
3686	1	xxiij		f	22.	10. M	21	M	20. Ian.	6. Feb.	24.	M	2.Maij
3687	2	iiij		e	10.	7. A	9.	A	10. Feb.	27. Feb.	13.	A	22.Maij
3688	3	xv	d	c	29.	16. M	29.	M	1 Feb	18. Feb.	4.	A	13.Maij
3689	4	xxvj		b	17.	14. A	17.	A	20. Feb.	9.Mar.	24.	A	2.Iunij
3690	5	vij		A	6.	22. A	6	A	5. Feb.	22. Feb.	9.	A	18.Maij
3691	6	xviij		g	27.	7. A	26.	M	28. Ian.	14. Feb.	1.	A	10.Maij
3692	7	xxix	f	e	14.	5. A	14.	A	17. Feb.	5.Mar.	20.	A	29.Maij
3693	8	x		d	3.	14. A	3	A	1. Feb.	18. Feb.	5.	A	14.Maij
3694	9	xxj		c	23.	22. M	23	M	24. Ian.	10. Feb.	28.	M	6.Maij
3695	10	ij		b	11.	20. A	11.	A	13. Feb.	2.Mar.	17.	A	26.Maij
3696	11	xiij	A	g	31.	5. M	31.	M	29. Ian.	15. Feb.	1.	A	10.Maij
3697	12	xxiiij		f	19.	2. A	18.	A	17. Feb.	6.Mar.	21.	A	30.Maij
3698	13	v		e	8.	11. A	8	A	9. Feb.	26. Feb.	13.	A	22.Maij
3699	14	xvj		d	28.	20. M	28.	M	25. Ian.	11. Feb.	29.	M	7.Maij
3700	15	xxvj		c	17.	17. A	17.	A	14. Feb.	3 Mar.	18.	A	27.Maij
3701	16	vij		b	6.	2. A	6.	A	6. Feb.	23. Feb.	10.	A	19 Maij
3702	17	xviij		A	26.	11. M	26	M	29. Ian.	15. Feb.	2.	A	11.Maij
3703	18	xxix		g	14.	9. A	14	A	11. Feb.	28. Feb.	15.	A	24.Maij
3704	19	x	f	e	2.	17. A	3.	A	3 Feb.	20. Feb.	6.	A	15.Maij
3705	1	xxij		d	23.	2. M	22.	M	25. Ian.	11. Feb.	29.	M	7.Maij
3706	2	iij		c	11.	0. A	10.	A	7. Feb.	24. Feb.	11.	A	20.Maij
3707	3	xiiij		b	31.	9. M	30.	M	30. Ian.	16. Feb.	3.	A	12.Maij
3708	4	xxv	A	g	18.	6. A	18.	A	19. Feb.	7.Mar.	22.	A	31.Maij
3709	5	vj		f	7.	15. A	7	A	10. Feb.	27. Feb.	14.	A	23.Maij
3710	6	xvij		e	28.	0. M	27.	M	26. Ian.	12. Feb.	30.	M	8.Maij
3711	7	xxviij		d	15.	21. A	15.	A	15. Feb.	4 Mar.	19.	A	28.Maij

Anni

图14　格列高利复活节查定表之一页

在每个非闰世纪年岁首月龄缩减1，但是每300年它们增加1，只是每第8个这种增加要延迟1世纪；当这两条规则应用于同一年时，就没有改变。这些调整对于改正阴历与月亮之间的分歧稍嫌过头。是岁首月龄——而不是儒略历中的黄金数——被用来求取任何给定日子的阴历日期（必要的参照表见于《牛津年份津梁》第825—828页）。

改革者没有明确说明他们借以计算新月的黄经；这是必需的，因为他们经常故意地把它们推迟1至2天，以便将其与逾越节岔开。在犹太人中，逾越节已不再表示Nisan月14日，而是15日，在海外犹太人中则是16日；因此，许多基督徒认为在这些日子他们不能庆祝复活节（尽管路德曾经利用1538年3月16日至17日的逾越节来证明自己的论点）。然而，尽管至少根据当前的犹太历法，从783年以来，Nisan月15日就与儒略历的复活节相左，从1315年以来16日也不符合，格列高利历——即使是变更了岁首月龄——的复活节在1609年还是落于Nisan月15日，在16世纪末之前还有6次落在16日。新教徒们从未放过这些抱怨的机会。

天文的复活节

1699年德意志的路德派教徒投票通过了采用新历，从1700年2月18日直接过渡到3月1日，但是他们却没有采纳格列高利历的复活节查定表。相反，他们规定复活节应该按照由最优良的天文历表标明的实际春分日和实际满月来确定；这一历表以第谷·布拉厄[18]在丹麦天文堡的子午线为基准编制。这种方法被称为“天文计算法”（*calculus astronomicus*）。（约翰·迪早在1582年已建议应该以伦敦的子午线为基准编制基于天文学的复活节查定表。）丹麦和大多数瑞士的新教州采纳了改革，此外荷兰的剩余各省以“经过改良的儒略历”的名义也予以采纳。

当实际的满月落在星期六，但是格列高利历的查定表标示*luna XIV*为其后的星期日、需要将复活节延迟1星期时，通常就会出现争

论。这在1700年就发生了，那一年人们只遵循格列高利历的日期过了复活节；但是下一次发生在1724年的分歧则招致令人烦恼的争论。教皇的查定表确定*luna XIV* 在4月9日，又是一个星期日，这要求复活节落在16日，但是实际的新月 [19] 则又一次落在了4月9日前一天。因此，按照天文计算法复活节就在9日，这比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提前了1星期。

然而，出现了一个难题，更让人觉得天文复活节站不住脚，即它与逾越节的第2日相重合。这导致人们重新审视所谓的禁律。结果是德意志和瑞士的新教徒在天文日期庆祝复活节，而丹麦则不这样做。（荷兰的新教徒在所有此类情况下都按照格列高利历的日期庆祝复活节。）结果巴赫（Bach）的《约翰受难曲》在莱比锡的首演是1724年4月7日，这一天为天文历的耶稣受难日，比格列高利历的耶稣受难日超前1星期，也超前于儒略历的耶稣受难日旧历4月3日。

瑞典一直置身事外，试图无痛苦地采用新历（但是失败了）；1740年天文计算法被引入，但是按旧历计日保持到了1753年。这样，在1742年，当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的复活节两者都落在新历3月25日时，在瑞典这一天称为14日。两年之后，在天文和格里高利历的复活节之间再次出现分歧；这一次不仅德意志和瑞士的新教徒、而且丹麦人也按照天文日期3月29日庆祝复活节。瑞典在同一天庆祝，但是称它为18日。

在下一个分歧于1778年出现之前，按照腓特烈大帝 [20] ——这位国王通过第一次瓜分波兰（1772年）获得了大量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臣民——的训谕，德意志的新教徒放弃了天文计算法，瑞士人和丹麦人也紧随其后。他的虚伪托词是天文复活节期与逾越节相重合，这也令得瑞典人在1778年和1798年没有遵循天文日期，不过在于1823年放弃它之前，他们还是在19世纪早期3次按照天文日期庆祝。芬兰——在1809年以前它隶属于瑞典，而后割让给俄国——又这样做了3次，最后一次是在1845年。

然而，1798年的情况显示出天文纪元本身固有的难题：虽然在天文堡满月刚刚好发生在3月31日星期六子夜之前，可是在瑞典的大部

分地区已经是4月1日星期日，所以在那天庆祝天文的复活节必将是在满月那天庆祝，这是极不适当的。不论选择何处的子午线为基准，在天文计算法中，这种情况一定会不时地发生。

大不列颠

当大不列颠采用新历的时候，把改革归功于议会而不是教皇是政治上的必需，这使得英格兰教会免去了采纳格列高利历复活节查定表的屈辱；另一方面，高教会派也不会赞同采用在乔治二世〔21〕的汉诺威〔22〕选侯领地应用的路德派的天文复活节。因此，必须要以不同的手段达到教皇的结果。

解决的方式是设计一些查定表（它们应刊载在普通的祈祷书中），以便给每世纪的不同日期重新分配黄金数。这个方案曾被罗马教廷的改革者所考虑，但还是放弃了，因为为了查得一年中每一日的阴历日期，需要30张不同的表。他们的放弃反倒使这一方案对英格兰教会更具有吸引力；除了要求得复活节，它对阴历毫无兴趣。出于同一原因，原先相对于每年的新月写出的黄金数现在直接标出复活节节期或“教会的满月”。这样英格兰教会总是与罗马教会在同一天庆祝复活节，但是关于岁首月龄则只字不提。

东正教会

一些东正教会于1923年5月批准了“经过修正的儒略历”，它其中一个最敏感的提案就是打乱了多少世纪以来按《尼西亚信经》〔23〕的老传统——或者毋宁说按亚历山大的查定表——奉行的复活节这个节上之节，而采纳以耶路撒冷子午线为基准的天文计算法。虽然在1923年以后的几年里，某些教会按照非儒略历的日期庆祝，但是不久传统再次得到尊崇；几乎所有的东正教会还是按照儒略历庆祝复活节（芬兰的少数民族教会——但是不包括俄罗斯人社区的教会——和一些西

方教区完全采用了格列高利历）。

1997年通过了另一个决议，即从2001年起采用天文复活节，那一年它将与儒略历以及格列高利历的复活节日期一致；但是在2002年是按照儒略历的日期庆祝了复活节。如果这两个历法都不实行进一步改革，那么从6700至6799年东正教的复活节将与西方的圣灵降临节〔24〕在同一天，虽然在经过修正的儒略历中名义上的日期将会滞后一天。

固定的复活节

某些早期的基督教社区曾在3月25日或4月6日固定地庆祝复活节，分别相当于卡帕多西亚〔25〕Teireix月和“亚细亚行省”〔26〕Artemision月的14日。前者的优点在于它不仅是圣母领报节〔27〕的节期，而且是西方教会传统的耶稣受难日和东方教会传统的复活日节期。路德建议复活节应该像圣诞节一样有固定的日期，但是人们无法接受复活节不在星期日，这使得此种做法不能得到后续的响应。

1723年，由于注意到翌年新教徒的复活节将不同于罗马天主教的节期，瑞士数学家让·伯努利〔28〕建议将复活节永远固定为3月21日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1834年马尔科·马斯特罗菲尼（Marco Mastrofini）在阐明他的“万年历”方案（参见第五章）之后试探性地提出，如果他的方案被接受，复活节应固定在4月2日星期日。1926年国际联盟〔29〕建议复活节应在4月第2个星期六之后的星期日庆祝。在英国这一规定被收入了一项议会法案，准备在各地教会一致同意之后实施；这样的一致意见从来未能达成。

注释

〔1〕 这是犹太历中的第7个月份，参见第六章；其余类似月份，均请参见有关章节，不再一一列注。

〔2〕 帕里斯节（the day of the Parilia），古罗马节日，定在4月21日，

奉祀保佑牛羊群的男女神帕里斯。

〔3〕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3世纪80年代晚期—337），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皇帝。他将拜占廷城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作为永久性首都。

〔4〕 阿基坦（Aquitaine），法国西南部历史上的著名地区。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在位）定之为罗马行政区。

〔5〕 狄奥尼西（小）（Dionysius Exiguus，约500—约560），西徐亚出生的教会法学者。他既是神学家，又是有造诣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制定的新的复活节日期查定表广为采用，从而使据说由他创立的基督教历法风行各地。

〔6〕 罗马帝国15年征税周期中的某一年。

〔7〕 伊西多尔（塞维利亚的）（Saint Isidore of Seville，约560—636），西班牙基督教神学家、最后一位西方拉丁教父、大主教、百科全书编纂者。

〔8〕 比德（Saint Bede the Venerable, 672/673□735），盎格鲁 - 撒克逊神学家、历史学家。他提出以基督的生年作为纪元，现已为世界通用。

〔9〕 苏尔皮西乌斯·塞维卢斯（Sulpicius Severus，约363—约420），高卢人，早期基督教虔修士、当时高卢和罗马历史的主要权威。

〔10〕 高隆班（Saint Columbanus，约543—615），爱尔兰人，凯尔特基督教传教士。他博学多才，精通拉丁和希腊古典作品。（原作者可能把他与科尔曼混同为一人，前者也是爱尔兰僧侣，但出生于605年，参见此处。）

〔11〕 布立吞人（Briton），公元6世纪以前居住在不列颠岛南部的凯尔特居民，可能在公元前7或前6世纪开始来到不列颠岛。

〔12〕 科伦巴（Saint Columba，约521—597），爱尔兰基督教教士。约563年与门人在爱奥纳岛上建成教堂和隐修院，作为向苏格兰传教的据点。据说苏格兰信奉基督教主要是靠他的努力，因而被尊为圣徒。

〔13〕 奥斯威（Oswy, 612—670），诺森布里亚的盎格鲁 - 撒克逊国王（655—670在位）。

〔14〕 棕枝主日（Palm Sunday），基督教节日，圣周的第一天，也就是耶稣复活节前的星期日，纪念当年耶稣基督在众人欢呼簇拥之下进入耶路撒冷。

〔15〕 惠特比会议（Synod of Whitby），盎格鲁 - 撒克逊族诺森布里亚王国公元663—664年举行的教会会议，目的在于在凯尔特礼仪和罗马礼仪之间决定取舍。会议通过国王奥斯威的决定，采用罗马礼仪。此后英格兰其他各地纷纷接受罗马礼仪，使英格兰教会与欧洲大陆教会紧密相联。

〔16〕 科尔曼（林迪斯凡的）（Saint Colmán of Lindisfarne，约605—676），早期爱尔兰基督教会教士。他作为凯尔特派领袖，反对惠特比会议决定采

用罗马教会礼仪的决议。

〔17〕 威尔夫里德（Saint Wilfrid, 634—709/710），英格兰基督教教士。在664年的惠特比会议上鼓吹废除凯尔特教会的礼仪，而采用罗马教会礼仪。曾任诺森布里亚大主教。

〔18〕 第谷·布拉厄（Tycho Brahe, 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他所作的天文观测是望远镜发明前最精确的，这些观测成为17世纪天文学发展的基础。1576年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为他出资在丹麦的文岛建立了一座大型天文台，他称之为天文堡。

〔19〕 原文如此，疑为“满月”之误。

〔20〕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I the Great of Prussia, 1712—1786），普鲁士第3代国王（1740—1786在位），在领导统一的新德意志方面起过主要作用。

〔21〕 乔治二世（George II, 1683—1760），1727—1760年的英国国王和汉诺威选侯。

〔22〕 汉诺威（Hanover），前德意志西北部邦国。1692—1806年为神圣罗马帝国选侯国，从1714年起，其选侯兼任英国国王；后为王国（1814—1866），1866年为普鲁士吞并。

〔23〕 《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参见此处。

〔24〕 圣灵降临节（Pentecost），基督教重要节日，即耶稣复活节50天以后的星期日，纪念圣灵在耶稣被害、复活和升天后于犹太教的五旬节降临人间，这一天是基督教会向世界各地广传之始。

〔25〕 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古代行政区。在托罗斯山脉以北的高原。公元前6世纪初见记载，当时由波斯管辖。公元17年被罗马帝国占领。

〔26〕 亚细亚行省（Province of Asia），小亚细亚最西端的罗马行省。公元前133年建立，天然资源丰富，各大城市为教育文化中心。

〔27〕 圣母领报节（Annunciation），基督教节日，定在3月25日，为纪念“圣母领报”。事见《路加福音》所记载：天使伽百列向童贞女马利亚预告她将因圣灵感孕而生子，并指示婴儿应取名为耶稣。

〔28〕 让·伯努利（Jean Bernoulli, 1667—1748），瑞士数学家，在微积分和微分方程理论的发展上作出重大贡献。

〔29〕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由胜利的协约国首倡建立的国际合作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止活动。1946年联合国建立，取代了国际联盟。

第五章

星期和季节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见，古罗马人有一个8天的集市周期，称为*nundinum*；它独立于月份和年份，在他们的历法中每一天用A至H的一个字母作标记。这一周期最终为被称为星期的7天周期所取代。然而，我们所知道的星期是两种概念上完全不同的周期相结合的产物：其一是行星[1]星期，起初开始于星期六，源于希腊化时期的占星术，其二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星期，原本就开始于星期日。

希腊和埃及的传统都不包括占星术，然而在巴比伦，行星观测长期被用来预测国事；公元前5世纪，规则已扩展到预测个人的祸福。那时，巴比伦和埃及都已被波斯帝国吞并；虽然埃及曾有一段时间又赢得了独立，但是在亚历山大大帝打败波斯之前不久，他又征服了埃及。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取得的胜利给整个西方所知的世界带来了文化和政治的激变，使得关于未来可能发生之事的学说得以传播，而与之相随的便是行星主宰规则。

正是从此时起，占星术士们——起初在埃及，后来遍及各地——认为，按照从土星到月亮的内向序列，每一小时都在行星的主宰之下；进而每一天都受当天第一个小时的行星支配（参见图15）。由于一个自然日的24小时可容纳下3个行星周期，同时还剩余3个小时（因此也剩余了3个行星），次日于是要受隔两个以后的下一个行星支配：土星之后是太阳，太阳之后是月亮，依此类推（参见加框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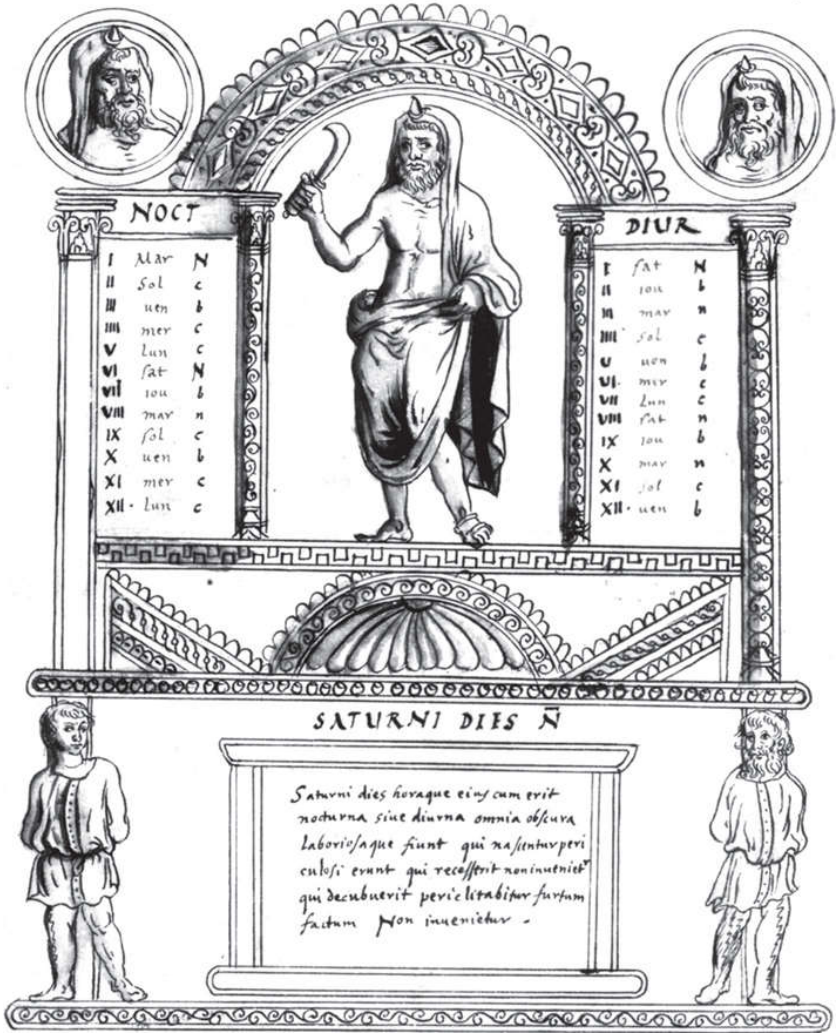

图15　土星与它的日期。星期六的小时（在右端随白天的小时开始）如果在土星或火星之下，以*N*（*ocens*），即“有害的”标注；如果在木星或金星之下，以*b*（*ona*），即“有利的”标注；如果在太阳、水星或月亮之下，以*c*（*ommunis*），即“平常的”标注。下面的文字意思是：“当土星当值那天或者当值的那个小时，不论夜晚或白天，一切事物坠入黑暗，变得困难；降生的人处境险恶；失踪的人无法找到；卧病在床的人濒于危境；被盗的财产不能复得。”

行星星期的起源

♄ = 土星，♃ = 木星，♂ = 火星，☉ = 太阳，♀ = 金星，☿ = 水星，☽ = 月亮，D = 白天，N = 黑夜

粗体 标志那一天的统辖行星

小时　统辖行星

	D	N	D	N	D	N	D	N	D	N	D	N	D	N
1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6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11	☉	♃	☽	♀	♂	♄	☿	☉	♃	☽	♀	♂	♄	☿
12	♀	♂	♄	☿	☉	♃	☽	♀	♂	♄	☿	☉	♃	☽

行星星期此后向东传播到印度和中国，向西到罗马，那里有奥古斯都（公元前31年至公元14年的独裁统治者）统治时期星期的文字记录：当时的诗人提布卢斯 [2] 提到“献给土星的日子”，还有一块碑上同时镌刻着8字母A至H的集市周期和7字母A至G的星期周期（参见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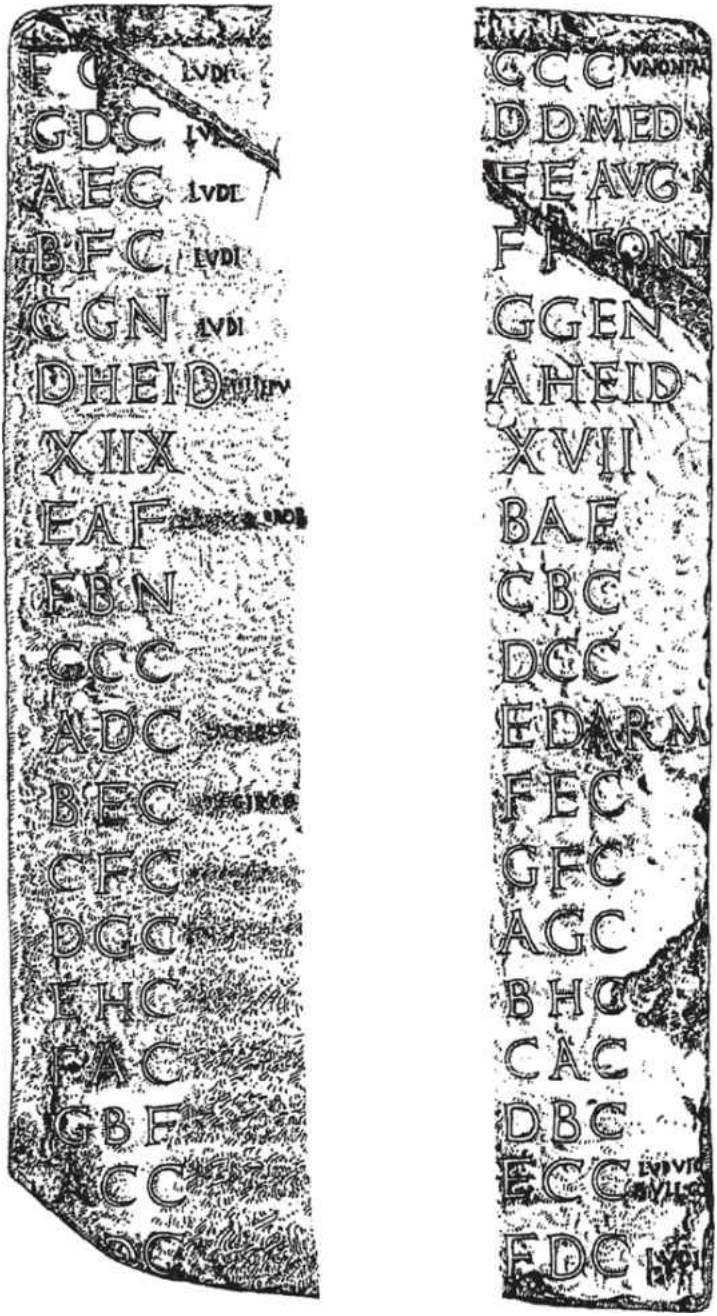

图16　萨宾人[3]的岁时记[4]残片，在表示集市周期的字母旁边还有表示星期的字母

星期取代集市周期早期阶段的情况可见于庞贝[5]的一处墙壁涂画上，这一涂画标明了各市镇举行集市的日子：虽然列出了8个地方的名字，从庞贝开始到卡布亚结束（罗马是第7个），但是相邻的一列标明从Sat.（星期六）到Ven.（星期五）的星期。可惜作者只是按列而不是按行写出，他把星期的每日列得如此宽松，而把城镇列得如此紧凑，我们甚至怀疑他是否注意到了两者天数的差别（图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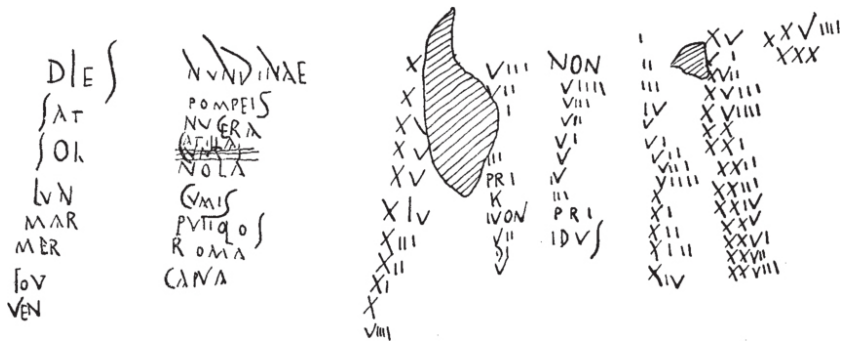

图17　庞贝出土的墙壁涂画，显示星期与集市周期的合并；右半部分标明了两个月的日期和月龄

与此同时，犹太人奉行他们自己的星期，一星期中6天为工作日，从1至6计数，接着为一个休息日，即*shabbat*，英语中的“安息日”（Sabbath）。*shabbat*与占星术的星期六同时，这是一个凶兆的日子，因为土星是一个灾星；正因为这样，非犹太教的作者误传它是一个缺少欢乐的斋戒日。确实，安息日戒律——至少是在某些地区——在当时比它们后来要严酷；例如，《禧年书》[6]禁止已婚夫妇在这一天同床，而拉比传统是积极鼓励他们这样做的，但是即使是这本书也禁止斋戒。不过，这些非犹太教徒的记述看来更符合巴比伦每月7日、14日、21日和28日这些凶兆日的情况；某些作者把它们看作安息日的起源，但是看来更可能的是它们被改造成了占星术的星期六，这个由最凶恶的行星当值的一天。

*shabbat*是犹太星期的最后一天，但是相当于行星星期中的第一天。然而，由于没有人喜欢有一个不祥的开端，到公元2世纪，占星

术士维丢斯·瓦伦斯（Vettius Valens）从星期日开始计算行星星期。虽然太阳并不像木星或金星那样是一个吉祥的行星，但它也不像土星或火星那样凶险（参见加框文字）。这个改变也起了匹配行星星期与犹太星期的作用；在一个用犹太神艾奥的名义行法术的社会里，这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星期二：幸运还是不祥？

火星日，即使按照基督教的名字“第3”，对于希腊人来说也是一个不祥的日子，这不仅仅是因为君士坦丁堡在这一天陷落。西方人遗忘了金星的吉祥，把恶运转移到星期五，这是耶稣受难的日子。相反，在犹太传统里，星期二是吉祥的，因为在《创世记》里谈到第3天时，两次提及“上帝认为它是好的”。

那时基督徒已经采用了犹太星期和它按数字标明的日子，虽然“第一日”他们称为“主日”。对于讲希腊语的人来说，星期一至星期四相应于第2至第5日，而星期五是预备日（《约翰福音》第19章31节）；讲拉丁语的人对应地称星期一至星期五为第2至第6个*feria*（“周日，平日”），它是由古典的*feriae*“假日”衍生出的新的单数词，在关于历法的专业论述中至今仍在使用，便于指称冗长的词语“星期中的日期”。在这两种语言里第7天都仍然是“安息日”，但是非犹太人的教会并不遵奉犹太人的规则；在罗马于这一天斋戒甚至成了习俗，这使东方的基督徒感到震惊。

在罗马人统治下的埃及，有证据表明法庭奉行每周星期四休息，享受它的当值行星木星的吉祥。但是在321年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君士坦丁训谕不应该在“为崇拜太阳而庆祝的日子”里接受诉讼。他没有使用基督教的词语“主日”（帝国的大部分臣民还是非基督徒），不过4年之后的一份法庭记录这样做了；后来的法规有时把这两个名词结合起来。这些法令把星期日从每周对耶稣复活的追忆转换成了休息日，

虽然即使到了6世纪阿尔勒的凯撒利乌斯主教[7]还在埋怨说当地农民在星期四休息。（直至近期这仍是法国学校的传统休息日。）

在基督教化了的帝国里，星期几用行星的名字还是用基督教的称呼，这两套体系相互对抗，在现代语言里可以辨别出这一斗争的不同结果（参见加框文字）。在希腊和葡萄牙，基督教的称呼胜出；在其他罗曼语里星期日和星期六成为“主日”和“安息日”，但是其他的行星名字普遍未受动摇（虽然在撒丁岛星期五成了*kenapura*，意为“洁净的晚餐”，以此纪念最后的晚餐）。布立吞人甚至表现得对基督教的称呼更为抵触；所有7个行星的名字都很容易在威尔士语、康沃尔语和布列塔尼语中辨认出来。

星期中日期的名字

异教希腊语	教会希腊语	异教拉丁语	教会拉丁语	法语
H ē líou*	Kyriakḗ	dies Solis†	dominicus/a	dimanche
Selḗn ē s	Deutéra	dies Lunae	secunda feria	lundi
Áre ō s	Trít ē	dies Martis	tertia feria	mardi
Hermoû	Tetárt ē	dies Mercurii	quarta feria	mercredi
Diós	Pémpt ē	dies Iovis	quinta feria	jeudi
Aphrodít ē s	Paraskeuḗ	dies Veneris	sexta feria	vendredi
Krónou	Sábbaton	dies Saturni	sabbatum	samedi

* 省略名字后的h ē méra，即“日”。
† 或者为Solis dies，以下皆然。

葡萄牙语	威尔士语	英语	德语	波兰语
domingo	dydd Sul	Sunday	Sonntag	niedziela
segunda-feira	dydd Llun	Monday	Montag	poniedziałek
terça-feira	dydd Mawrth	Tuesday	Dienstag	wtórek
quarta-feira	dydd Mercher	Wednesday	Mittwoch	środa
quinta-feira	dydd Iau	Thursday	Donnerstag	czwartek
sexta-feira	dydd Gwener	Friday	Freitag	piątek
sábado	dydd Sadurn	Saturday	Samstag	sobota

日耳曼民族几乎一样坚持。鉴于罗马人用罗马诸神替代了希腊诸神，他们也用自己的神来替代：对于Mars（火星），替换作英语里为Tīw、古斯堪的纳维亚语里为Tyr的战神，或是大会（“庭”[8]）中的军乐队之神，在碑铭中称为Mars Thincsus（由此衍生出荷兰语中的*Dinsdag*、德语中的*Dienstag*）；对于Mercury（水星），替换为智慧之神Odin；对于Jupiter（木星），替换为雷神Thor；对于Venus（金星），替换为爱之女神Frigg。在英语和荷兰语中没有进一步的改变；Saturn（土星）在日耳曼众神中没有相应的神祇，因此它第7天当值

神的位置未动。在德语中有些变更：星期三是“星期中间”（*Mittwoch*），因它是从星期日到星期六的中间；星期六或作安息日-日（*Samstag*），或作星期日-前夜（*Sonnabend*）。前者是罗马天主教徒的惯常用法，现在在新教徒中正在取代后者，因为它是缩写*Sa*.更为自然的扩展。在方言中还有别的形式：在巴伐利亚星期二是*Ertag*，来自异教希腊语*áreōs*，即“阿瑞斯神的”（希腊神话中的战神——译注）；星期四是*Pfinztag*，来自于教会希腊语*Pémptē*，即“第5”。

斯拉夫人采用一种不同的体系。星期日称为“不工作”，*nedělja*。这个词构成了所有现代斯拉夫语里“星期日”这个称呼的基础，但俄语除外；在俄语里这个词的意思是“星期”，而星期日是*voskresen'e*，意思是“复活”（这个词更为学术的形式是*Voskresenie*，意思是“复活节”），不过星期一仍是“*nedělja*之后的一天”，即*ponedel'nik*。星期六成为了“安息日”，但是虽然星期三是“中间”（比较*Mittwoch*），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的名字分别是由“二”、“四”和“五”衍生的，不是如同教会希腊语和拉丁语那样从星期日起算，而是从星期一起算，这是东正教的礼拜仪式星期中的第一天，从复活节到圣灵降临节期间除外。立陶宛人（大多数是罗马天主教徒）和拉脱维亚人（大多数是路德派教徒）也从星期一起计数，这是一个星期中展开商业和行政上的世俗事务的第一天。与之相反，公谊会[9]以星期日至星期六作为星期中的第一日到第七日。

伊斯兰教改造了犹太星期，以星期五作为祈祷日（不是休息日，除开其对西方的仿效），它有一个阿拉伯语名字*jum a*，意思是“集合”；安息日只保持其名而无其实，星期中其他日子仍从星期日起计数。（在斯瓦希里语中，星期六至星期三是1至5日，而星期四是Alhamisi，即阿拉伯语中的“第5”。）

星期日字母

在中世纪及其后很长一段时期里，在日历和历书中，年内的每一

天都循环往复地附注上A到G，这样便于知道这一天是星期几；如果今天是星期二，人们看到日历上它的字母，便知道有同一字母的其他日子也不例外是星期二，除非或者遇到闰日（它与正常的*VI K. Mart.*共用字母F），或者碰上新年。用一种巧记的方法还要更加容易，它对每月1日给出1个字母；最常见的是用繁难的拉丁语写成，但是有一个英语的例子是：

At Dover Dwells George Brown, Esquire，

Good Christopher Fitch And David Frier.

（意思是：在多佛尔住着乔治·布朗先生，好人克里斯托弗拿着油画笔，戴维手操油煎锅）

这表明1月1日是A，2月1日是D，依此类推；因此2月中任何一日的星期几将比1月中同一日的星期几在循环中推后3个字母。

对确定星期日、特别是复活节星期日感兴趣的教士们称这些字母为*litterae dominicales*，即“星期日字母”。同一术语也用于任何给定年份星期日的相应字母（参见加框文字）；复活节是在*luna XIV*后标注这一年星期日字母的第一个星期日，在3月22日（D）和4月25日（C）之间。

无功而返的改变

法兰西共和历（参见加框文字）中无基督教星期的立足之地；相反，为了迎合革命党人钟爱的十进制法则，月份被分为3个10日的旬（*décade*），每一旬的结尾立为“旬节”（*fête décadaire*），每个旬节都奉献给从“法国人民”到“祸祟灾殃”的一系列事务。

两种历法之间的争斗体现在政治小册子里革命的公民“一旬中的第10日”与反革命的“星期日”先生之间的冲突。1798年新历强制实行，奉行星期的一切活动都被禁止。在星期日休息的公务员要被解雇；新历甚至还尝试把一旬中的第10日强加给教会，以它取代星期日作为礼拜日。在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反对星期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失

败的；甚至在法兰西历仍为官方所实行时，拿破仑（Napoleon）就已放弃了这一运动。

星期日字母

为了求得儒略历里的星期日字母，把公元年份除以4，再将商数连同参数5加到年份上；把和数除以7。如果余数〔10〕是0，星期日字母是A（意即这一年内所有A日都是星期日）；如果余数是1，星期日字母是G；若为2，F；若为3，E；若为4，D；若为5，C；若为6，B。在闰年，这样求得的星期日字母在2月25日往后都有效；其前用循环中的下一个字母，所以闰年的星期日字母是BA、CB、DC、ED、FE、GA〔11〕。在格列高利历中，直到1699年12月31日要添加的参数是2，在每一个非闰世纪年这个参数缩减1：在1900到2099年是6。（关于儒略历和格列高利历的星期日字母的万年表，请参见《牛津年份津梁》，第836页。）

法兰西共和历

1793年国民议会颁布了按亚历山大历的思路编制的新历法，回溯到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成立之时。1年包含12个月，1个月包含30日，另加5天补充日（*jour complémentaire*），而在儒略历的闰年之前一年加6天；因此尽管格列高利历的1800年不是闰年，共和历7年（1798/9）是闰年（*année sextile*）。月份的名称反映法国的气候和农事，并为每个季节加上不同的后缀：秋季-*aire*、冬季-*ôse*、春季-*al*、夏季-*dor*。

另一个对星期的挑战来自苏联。在1929年的新历中，12个月被安排成等长的30天，其间穿插5个国家假日；7天的星期为5天周期所

取代，从星期一至星期五（或从“第一日”至“第五日”），取消了“资产阶级游手好闲的”星期六和星期日；5天中的每一天是五分之一国民的休息日，每个公民都收到一只彩色袖套，标明他或她的休息日。（国家假日不列入这个循环之内。）

这个方案旨在把宽松的个人休假与连续不断的生产结合起来，以及阻断宗教信仰和家庭生活；前者流于失败，后者倒是相当成功，招致怨声载道。结果，这个改革作了修正：从1931年12月1日起，恢复传统的月份以及统一的休息日，但未恢复星期；以每月的6日、12日、18日、24日和（除2月以外的）30日为休息日取代星期日。虽然当局劝服支持共产主义或历法改革的西方人说城市工人已不再记得7天的星期，但是农民却既过星期日，又过新的休息日，破坏了历法改革。1940年斯大林恢复了7天的星期，以星期日为休息日。

除了这些革命性的方案之外，时常有改革者提出要规范日期与星期的关系，以每年中的1日或闰年中的2日不计星期；这些日子称为间歇日 。虽然1834年马尔科·马斯特罗菲尼只是提议把12月31日和闰日（它紧接其后）排除在星期之外，使得1月1日总是星期日，并把复活节固定在4月9日，但是其他改革者设想用更广泛的改革方案来规范月份，或者至少是规范季节。

早在1745年，“希罗萨·阿普-伊西姆”（“Hirossa Ap-Iccim”）在致《绅士杂志》的一封信中提出：一年应包含13个月，每一月包含4个星期，年尾的一个间歇日作为圣诞节，闰年中的另一天作为国家假日；从公元前4年开始一个新纪元，旧历的1745年12月11日应成为1750年1月1日；每132年应取消1个闰年；重量、尺度和钱币应该以八进位制来计量。这位作者是马里兰州的牧师休·琼斯（Revd Hugh Jones），他把这些观点进一步发挥以后，上书给切斯特菲尔德伯爵[12]（大英图书馆，Add. MS 21893），并以“H. J.”的署名成书出版，书名为《时间计量泛论》（伦敦，1753）。此书没有引起注意；然而，1年13个月是实证主义[13]者历法的基础，这个历法以1789年为历元，由奥古斯特·孔德[14]在1849年公布于世，当前在法国和巴西仍有一定的流行度。它的月份和日期奉献给伟大人物，偶尔也纪念

伟大女性；第365日奉献给死者，闰日给圣女。

20世纪初，13月历为某些公司用于内部计账。在此基础上，两位美国企业家——英国出生的摩西·B. 科茨沃思（Moses B. Cotsworth）和伊斯曼-柯达公司的乔治·伊斯曼〔15〕——着手向世界推行国际固定历，也就是更为人们所熟知的伊斯曼计划。在此方案中，第13个月称为Sol，置于7月之前，常年的间歇日置于12月29日（年日），闰年的置于6月29日（闰日）。伊斯曼太过固执，不愿因为一年中有13个落于13日的星期五而退却，他于是称13对于美国来说是个幸运数字，因为它正是由13个反英殖民地建立起来的。

在美国之外，这个论点自然没有什么说服力。一些改革者缓和了革新的调子，建议每年保持12个月，但每隔两月后的第3个月包含5个星期而不再是4个星期。但是引起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一种“世界历”，它的3月、6月、9月和12月包含31日，其余月份为30日，同样在12月后面添加间歇日，逢闰年则加在6月后面。

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对伊斯曼计划和世界历都表示出了兴趣；但是星期的中断成了绊脚石。1931年英联邦希伯来人联合会大拉比〔16〕约瑟夫·赫茨〔17〕（参见图18）就改革向设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总部发出了激烈的声讨，强调正统犹太教徒不可能接受两个安息日之间有8天的间隔，以及他们被迫遵奉星期六以外的日子为安息日的不便。他的干预产生了效果，以至在世俗的改革者之间引起了强烈的愤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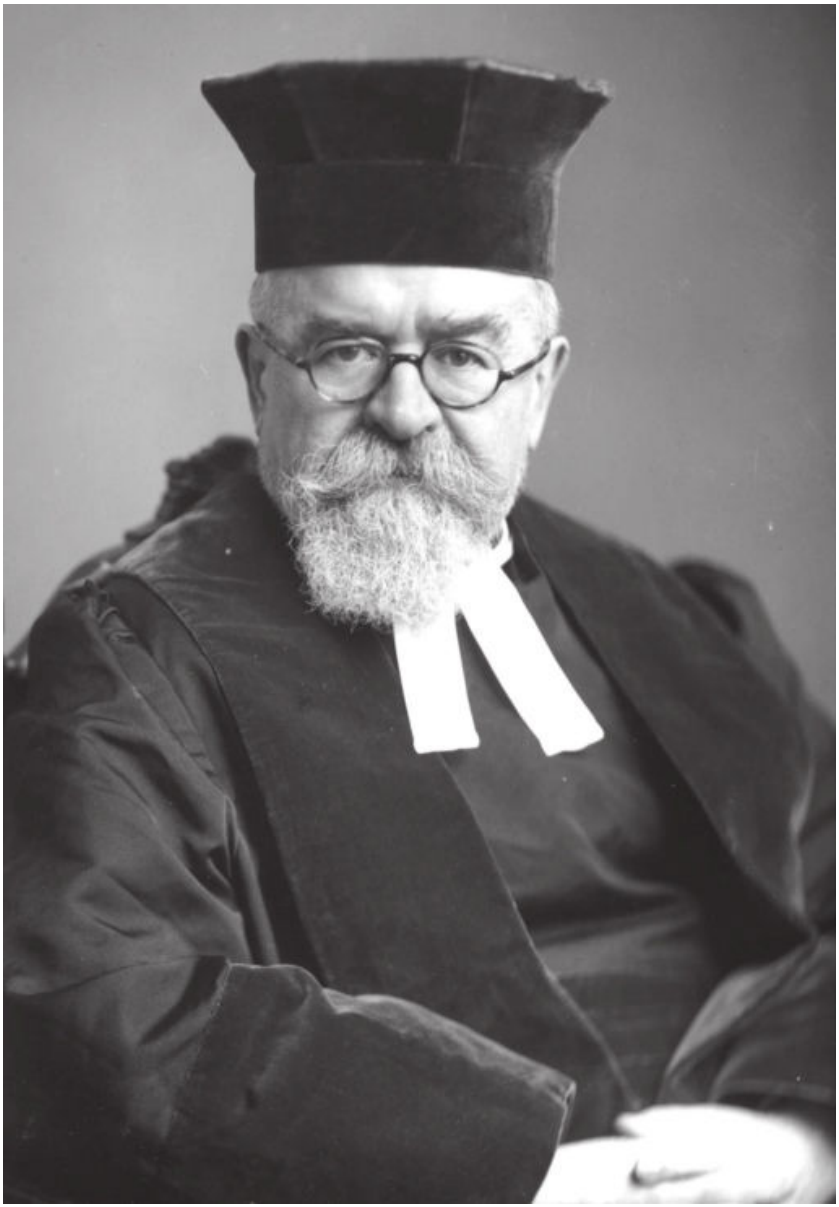

图18　大拉比约瑟夫·赫尔曼·赫茨博士（1872—1946）像，他曾为挽救星期而呼吁

遵奉第7日为圣日的基督复临派[18]也反对这种中断，而印度的

大英帝国政府意识到这将触犯许多敏感的神经，于是宣布它是不可接受的。相形之下，当20世纪50年代世界历短暂复萌时，它受到了在印度独立后执政的坚定的宗教与国家事务分离论者的青睐。然而，没有一个主要大国看到这种改革有任何好处。因而，从此之后，改良世界运动的参与者们把他们的精力集中于更紧迫的事务。这样，星期作为历法上最古老的惯例保持至今，没有发生结构上的改变。

基于星期的年份

当赫茨博士声讨国际联盟时，他宣称犹太人并不反对历法改革，只要不触及星期；具体来说，如果旨在确立星期几与日期之间的关系，这可以通过取一年52个星期即364天、并不时地加上一个闰星期来达成。这并没有得到认可，尽管在冰岛伴随闰星期的364日年已存在好几个世纪；它在那里被用来管理民政事务。它包含12个月，每月30日（或更确切地说是称为“夜”），再加4个“超日”，或称“超夜”（*aukanœtr*），并在28年中有5年加入一个“超星期”（*aukavika*）。这种历法的基础是旧时日耳曼人所用的“夏季”与“冬季”的两季交替，但又与教会的历法体系建立起了关联，即采纳了星期和太阳周。确实如此，日期通常不是按月份计数（除了在冬季的后半部分，而正是一年中的这部分人们认为罗穆路斯国王没有划分月份），而是按仲夏（或仲冬）之前剩余或之后已过的星期数计数。

然而，赫茨博士所想的364天的年份可能来自于第二圣殿时期〔19〕一些犹太教徒使用或提倡的这种年，它包含12个月，其中的每第3个月为31日，其余的为30日；星期不是从第1日（星期日）开始，而是从第4日（星期三）开始，正是在这一天上帝创造了太阳和月亮。这一历法究竟有多古老（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这一历法，或是类似的历法，在犹太人的放逐期〔20〕前是计时规范）？它在各个时期内究竟在多广的地域内使用？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争议。存在争议的其他问题还有：究竟是否加过超星期，或者拥护者是否认为当历法与太阳

不合拍时，要完全归咎于太阳。

其他组合

旧时爱尔兰法律文书认可5日和15日的组合，后者是基督纪元以前阴历中的半个月的遗迹。除了罗马人的8日集市周期之外，为期3、4、5、6、9或者10日的集市周期在世界许多地方使用或曾经使用。在尼日利亚，不止一个民族使用4日周期，并在一些情况下使用它的倍数8日和16日。

当城镇或乡村在同一周期的不同日子举办集市时，在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联系。另一方面，当某一特定地区同时存在不止一个集市周期时，共享同一周期的各个乡村之间会建立休戚相关的亲密关系；不奉行同一周期的那些乡村之间则会互争高下，尤其是如果它们的集市在同一天举行的话；这种情况可见于西非。

至此为止所讨论的星期和类似的周期与月和年并行不悖地实行：1日星期日，随后是2日星期一；2003年12月31日星期三，随后是2004年1月1日星期四。然而，在某些文化中，类星期的周期自身也并行使用：在为西班牙所征服之前的中美洲，人们使用的构成260日周期的13日周期和20日周期就是如此（参见第六章）；在印度尼西亚，存在长度为2日至10日不等、不少于9个的并行周期，其中5、6和7日的周期最重要，结合形成210日的*odalan*。

季节

西方世界继承了古罗马人的传统，把一年划分成四季，或称“年节”（*tempora anni*，由此产生了德语词*Jahreszeiten*）：很少有拉丁词比*ver*、*aestas*、*autumnus*、*hiems*（即春、夏、秋、冬——译注）更容易翻译成现代欧洲语言了。宇宙示意图显示这些季节结合在世界模型之中（参见图19）；它们也出现在另一个温带的文化中，即

中国的*chūn*、*xià*、*qiū*、*dōng*（春、夏、秋、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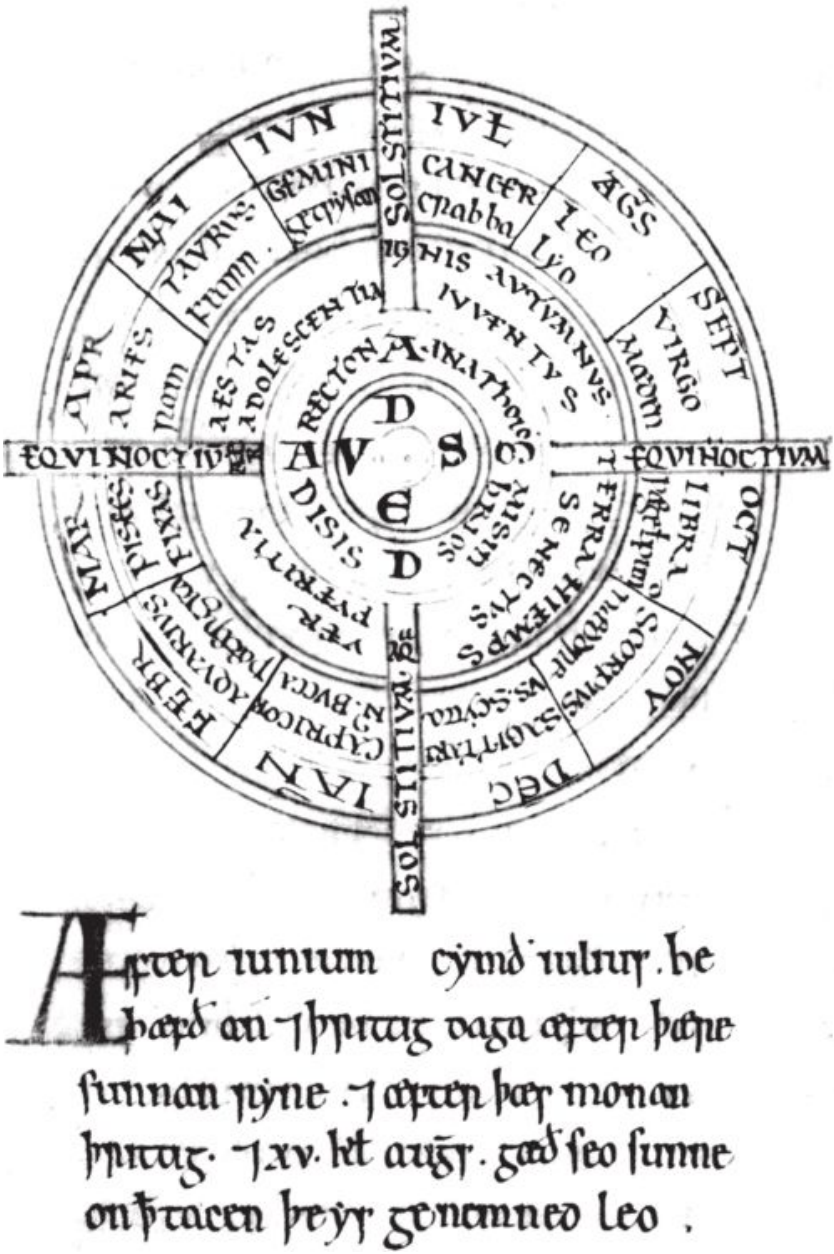

图19　载于伯特佛斯（Byrhtferth）的《便览》（11世纪初）中的示意图，标出

不过这种划分绝不是全球普适的。在尼日利亚，约鲁巴人[21]口中所说是两个半年的季节，旱季和雨季；但是印度有6个季节，它们的梵文名称是：*grīṣma*（“热季”）、*varṣa*（“雨季，季风期”）、*śarad*（“秋季”）、*hemanta*（“冬季”）、*śiśir*（“凉季”）、*vasanta*（“春季”）。每个季节包含2个月；季节的月份在各地之间互不相同，但是在国家历（参见第六章）中春季开始于Phalguna月。

古埃及采用3个季节：洪水季、冬季和夏季，每个季节包含太阳年中的4个月，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它们就径直以某季的第几月称呼（参见附录一）。然而，由于没有置闰，这使得古埃及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名义上的季节与实际季节脱节。例如，在公元前824年，当新年在3月21日开始时，“冬季”是从理论上洪水季的开端7月19日到11月15日，随后是“夏季”。

在古典希腊语里有春季（*éar*，或者方言中的变体*wêr*）、夏季（*théros*）和冬季（*cheimṓn*），但是秋季（*phthinópōron*，“歉收”）这一明确的概念和称呼过了很长时间才出现。然而，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22]（公元前5—前4世纪）虽然十分熟悉春季，还是把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23]的那些年分为夏季（战季）和冬季。

类似的两季观念存在于日耳曼各民族之中，不仅在冰岛格外深入人心，而且在斯堪的纳维亚广为流传，据说那里的夏季在圣提布尔修斯（St Tiburtius）日（4月14日）开始，冬季在圣卡利斯图斯（St Callistus）日（10月14日）开始。因此，虽然日耳曼诸语言共用“夏季”和“冬季”这两个词，但是在与罗马文化接触之前它们没有“春季”和“秋季”这两个词。在这些语言之间甚至在同一语言内部，这两个季节的名词五花八门：英国英语保留着乔叟、廷德尔[24]和莎士比亚使用的拉丁语或法语词autumn（“秋季”），美国人则用fall，这是fall of the leaf（“落叶”）的简称，首见于16世纪。在德语中，春季既可写成*der Frühling*，亦可写成*das Frühjahr*；一个古体的或诗体的词语*Lenz*相应于现代荷兰语*lente*和古英语*lencten*。后者曾经既用于指春

季，又用于指教会的一个斋戒期；这一斋戒至今还以其缩简的形式称为Lent，由它派生的词Lentern（例如在Lenten sermon“斋期的布道”中）现在作为形容词使用。从16世纪以来春季被称为spring，这是spring of the year（“一年的源泉”）的简称。

在凯尔特诸语言中“春季”和“秋季”也有变异，但是“夏季”和“冬季”是共用的；在一部爱尔兰语词典里明确地说到了两季的划分。爱尔兰语的*samhradh* 和威尔士语的*haf* 都与英语的summer（“夏季”）有关，*geimreadh* 和*gaeaf* 与拉丁语的*hiems* （“冬季”）有关；相同的词是高卢语中月名Samonios和Giamonios（参见第六章）的来源。

拉丁语作者对各季节的开端提出了不同的日期：老普林尼（逝于公元79年）给出2月8日、5月10日、8月11日和11月11日；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逝于636年）给出2月22日、5月24日、8月23日和11月23日；比德在725年写下了2月7日、5月9日、8月7日和11月7日，换句话说，即是在相应月份的Ides之前的第7日。伊西多尔和比德的日期都普遍见于中世纪的历法中；按照比德的方案，二分日和二至日大致落在相应季节的中央，所以施洗者圣约翰〔25〕诞生节是在仲夏日。同样，在规范的古英语中圣诞节的名字是“仲冬”。

在爱尔兰，春季从2月1日起计量，夏季从5月1日，秋季从8月1日，冬季从11月1日；在这些日期中，2月1日是圣布赖德（St Bride）日，或称圣布里吉德（Brigid）日，它取代了原来标志着这一新季节到来的基督纪元前所用的名字*Imbolc* （在现代爱尔兰语中为*Oímelc*），但是其他3个日期还保留着它们古老的名字*Bealtaine* 、*Lúnasa*（以前曾用*Lughnasadh* ）和*Samhain* 。《牛津英语词典》把这看作“英国”特点，相对于“北美”以3月、6月、9月和12月开始新季节的做法；但是大多数英国人更偏爱后者，这也是英国国家气象局采纳的方案。

自然，没有一种根据自然现象设置的体系能通行于全球，甚至也无法通行于北半球；更为客观的原则是把二分日和二至日作为各季节的开始，由此当前这些日子是或大约是在3月20日、6月21日、9月22日和12月21日。它们常常被称为是相应季节的“官方的”开端，虽然没

有皇家公告或议会法案正式宣布过。简明的方案往往胜过对事实的真实性的求取：前面图19所示11世纪的示意图就是根据这一原则轻率地等分各季节，长度为3个月的每季开始于4月、7月、10月和1月。

从凯撒改革的时代以来，罗马的传统是以各个Kalends日之前的第8天把二分日和二至日等分，它们是在3月25日、6月24日、9月24日和12月25日；事实上这些日期适用于约两个世纪之前的情况。教会把它们结合进历法中，相应地为圣母领报节（圣母受孕耶稣基督）、施洗者圣约翰诞生节、他的被孕节（在东方这一日移至23日；参见第六章）和耶稣基督诞生节。然而，西方教会偏好以斋戒日作为各季节的开端，分别是四旬斋第一个星期日之后的星期三、圣灵降临节、圣十字架节[26]（9月14日）和圣露西[27]节（12月13日），每个季节在随后的星期五和星期六重新开始。在英语中它们被称为四季节[28]斋戒，这个词是拉丁语中*quattuor tempora*，即“四季”的讹用（与德语的*Quatember* 比较）。（英格兰教会已经改变了这几个星期。）

虽然南半球的夏季相应于北半球的冬季，反之亦然，可是欧洲殖民者输入了许多与北半球的日期和季节有关的观念。基督教的圣诞节无情地促使巴西人在夏季的酷暑中穿上厚重的红色长袍和白色毛皮扮圣诞老人，但是在澳大利亚的拉脱维亚人于6月24日的寒冬庆祝圣约翰节时，则欢乐地穿着他们的羊毛编织的民族服装。

注释

〔1〕 指古行星，古代人认为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及土星为七行星。

〔2〕 提布卢斯（Albius Tibullus，约公元前55—约前19），罗马诗人。他是拉丁哀歌诗人中的佼佼者。

〔3〕 庞贝（Pompeii），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市东南23公里的古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与邻近的赫库兰尼姆和斯塔比奥一起被毁。1748年正式进行发掘。

〔4〕 萨宾人（Sabine），古意大利部落，至公元前290年为罗马所灭，其族人成为罗马公民。

〔5〕 岁时记（fasti），古代罗马将规定每月办理法律事务的日子编成的

神圣日历。此后它们不仅包括一年的月日以及各个节日，而且包括其他各种资料。一般刻在石碑上，也有存于手稿中。岁时记也有的指历史记录。

〔6〕 《禧年书》（Book of Jubilees），亦称《小创世记》，伪经之一。该书把七七四十九年为一禧年作为纪年单位编排，意在使犹太人得以按正确日期庆祝宗教节日。

〔7〕 凯撒利乌斯（阿尔勒的）（Saint Caesarius of Arles，约470—542），高卢基督教传教士、布道家，曾任阿尔勒地方的大主教，有许多讲道稿流传后世。

〔8〕 庭（*thing*），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地方或省自由民大会。定期开会，负责提名国王候选人、制定法律和处理所有法律问题。

〔9〕 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亦称贵格会，17世纪中叶兴起于英格兰和美洲殖民地。它主张纯朴生活，所办学校着重科学教育，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

〔10〕 这个余数即那一年1月1日的星期数。若余数为0，即星期日；若为1即星期一；依此类推。译者根据自己对公历的研究编制了一张“万年星期日字母速算表”，如下所示：

年份数字	年份指数					
	儒略历		格列高利历		十位	个位
	千位	百位	千位	百位		
0	1	5		0	0	0
1	4	4	**3**	5	**5**	1
2		3	0	**3**	4	**2**
3		2	**3**	**1**	**2**	**3**
4		1	0	0	1	5
5		0	**3**	5	**6**	6
6		6	0	**3**	5	**0**
7		5	**3**	**1**	**3**	**1**
8		4	0	0	2	3
9		3	**3**	5	**0**	4

本表适用于公元1年至公元9999年。在使用本表前须区分1582年前为儒略历，之后为格列高利历。查表和计算步骤如下：

（1）把欲查年份分解为千位、百位、十位和个位4个数字。对这4个数字分别从“年份数字”中的所在位置向右查，与相应的“年份指数”中的“千位”、“百位”、“十位”和“个位”分别相交，得4个指数。把这4个指数相加。注意：若其中“千位”和“百位”的两个指数同时是黑体时，需再加1；或者，若“十位”和“个位”两个指数同时是黑体时，亦需再加1。(2) 将以上和数除以7，得到余数。根据这一余数按下表（即书中所述方式）就得到星期日字母。若逢闰年，1月份和2月份的星期日字母要取所求得的下一个字母。

余数	0	1	2	3	4	5	6
星期日字母	A	G	F	E	D	C	B

例：求1992年的星期日字母。

由本表查得下列各位的指数，并求和

	千位1	百位9	十位9	个位2	十个位双黑	和数
指数	3	5	0	2	1	11

11 ÷ 7 = 1… 4（余数）

得1992年的星期日字母为D。但这一年是闰年，其1、2月份的星期日字母为E。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本表与书中所述方法作比较，并对结果加以验证。编制本表的原理请参阅论文“周期律在公历纪日中的快速显示及其应用”，刊载于《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31卷，第4期（1995年10月）。

〔11〕 原文如此，恐系GF之误。此外，还应添上一对AG。

〔12〕 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第四）（4th Earl of Philip Dormer Stanhop Chesterfield, 1694—1773），英国政治家、外交家。曾任爱尔兰总督（1745—1746），表现出政治家的才干，很受同时代主要人物的赞赏。

〔13〕 实证主义（Positivism），坚持以观察和经验为证的哲学思想。它必然是反形而上学和反神学的。

〔14〕 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

〔15〕 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 1854—1932），美国制造商。他创建的伊斯曼 - 柯达公司是美国摄影工业中最大的公司之一。

〔16〕 拉比（rabbi），经过正规宗教教育、学过《圣经》和《塔木德》（注释、讲解犹太教律法的著作）而担任犹太人社会或犹太教会众的精神领袖或宗教导师的人。

〔17〕 赫茨（Joseph Herman Hertz, 1872—1946），英联邦希伯来人联合会大拉比，犹太教基要派著作家。

〔18〕 基督复临派（Adventist），基督教的一派，相信耶稣基督将要重返世界，建立千年王国。

〔19〕 第二圣殿时期（the Second Temple period）大致从公元前515年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开始，直到公元70年它被罗马人毁灭结束。

〔20〕 指公元前6世纪犹太人被掳入巴比伦的时期，参见此处 。

〔21〕 约鲁巴人（Yoruba），居住在尼日利亚西南地区和少数散居在贝宁和多哥北部的民族。

〔22〕 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或更早？—前404之后？），古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从军事上、政治上、特别是伦理上论述了这场发生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

〔23〕 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431—前404年间

在希腊的两个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之间发生的大战，最终以雅典投降而告终。此后，雅典再不能奴役希腊的其他城邦了。

〔24〕 廷德尔（William Tyndale, 1490/1494—1536），英格兰圣经翻译家、人文主义者、新教殉教士。1611年英国钦定《圣经》英译本和此后的多数译本都以廷德尔的译本为主要依据。

〔25〕 圣约翰（施洗者）（Saint John the Baptist），《圣经》人物，是出身祭司家庭的犹太人先知，在1世纪初宣讲上帝的最后审判即将来临，为悔改者施洗礼。

〔26〕 圣十字架节（Holy Cross day），基督教节日，为9月14日，纪念耶稣基督受刑的十字架。

〔27〕 圣露西（Saint Lucy, ?—304），基督教殉教童贞女。西西里岛锡拉库萨市的主保圣人。

〔28〕 四季节（Ember fasts），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圣公会规定举行特别祈祷、禁食和授任神职的4个时期。四季节是分别以下列4个节日之一为首的1个星期：（1）圣十字架节；（2）圣露西节；（3）四旬斋期的第一个星期日；（4）圣灵降临节。

第六章

其他历法

犹太历

现代的犹太阴历，计算法则类似于格列高利历，但复杂得多，其起源追溯到犹太人被巴比伦人放逐返回后 [1] 所用的历法，在观测的基础上逐渐演进。在那时以前，月份的名称虽然有时用腓尼基语的叫法，但通常用数字顺序；计数从春天开始，尽管在《圣经·出埃及记》中谈到收获是在年末。这一放逐前的历法究竟是阴历还是阳历？若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它与已在第五章讨论的“后放逐时代”包含52个星期的年份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存在争议。

在放逐之后，计数月份的老习惯逐渐让位于使用巴比伦的名称（但犹太人讲希腊语时则使用马其顿名称）。在Nisan月1日的春天的新年和在Tishri月1日的秋天的新年两者在许多个世纪内仍然互争高下。后者一直用于计数7年期的安息年周期 [2] ，在这一周期的最后一年不允许耕种；《圣经》诠释所用的经验法则是，在“以色列诸王”年代（参见此处 ——译注），从Nisan月计数，在其他国王统治时期，从Tishri月计数，但其中不乏例外。最后的折中是“Nisan是各月份之首，Tishri是年份的开头”：虽然Torah [3] 明确指明主要节日的月份从春天计数，但是正规的民用年从秋天开始。

只要新月由观测决定，如果在第30夜已可靠地记录到新月，并得到犹太教公会 [4] 的确认，那么这一日（从日落开始）就被计数为该月的第1日，前面一月则是小月。若未记录到新月，则将这一日记作老月份的第30日，而新月份从下一夜开始。为了避免斋戒日、特别是赎罪日 [5] 落在安息日前1日或后1日，允许在操作上作某种程度的变通（但不禁止与安息日这一天重合）；结果Tishri月1日不能是星期三或星期五。Tishri月1日也不能落在星期日，这是相当晚久之后成为一条规则的，因为在Tishri月21日举行的住棚节最后一天的宗教仪式，被认为对于安息日来说过于喧闹了。还有一条规则，要求一年中的大月不应少于4个，但不能多于8个；在闰年这个界限升高到9个。

若下一年的逾越节将过早来临，那么把从春季开始计数的那年的最后一月Adar月重复一次，作为置闰。在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圣殿之前，人们似乎偏爱较晚的逾越节，这样朝圣者有足够的时间到达耶路撒冷；在那之后，当早到的逾越节不再产生困扰，置闰的规则是在下面3个条件中的任两个达成时进行：庄稼还是青青的，果树的果实还未成熟，再不然节期在春分日之前。人们还偏爱在安息年之前的年份置闰，而不是在安息年内或在安息年之后的年份置闰。

与基督徒所认为的相反，逾越节应该在春分之后并不是一条绝对的规则，虽然在圣殿耸立期间一定是通常这样做的。犹太人未遵循他们自己的规则这样的断言用来说海外的犹太人社区可能理由更充分些；他们愿意自己调整历法，而无意遵奉耶路撒冷的拉比们：例如，在安条克[6]，规则是Nisan月14日必须落在民用历中的Dystros月之中，而这是罗马人的3月的当地名称。

虽然没有证据支持，但传说在公元359年观测被计算所取代，因为罗马人中途拦阻从耶路撒冷派出宣告新月和置闰的使者。然而，事实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存留着各种各样的做法，包括观测和不符合现代规则的计算；直到10世纪完全的统一才真正达成。

现代的历法按两个步骤操作：第一步为找到秋季的“诞生”（*molad*）——意即秋季的第一次合日，然后由此求出Tishri月1日的日期。1日等分为24小时，每小时包含1080“小份”，每小份包含76“刹那”；它是从日落计量的。为了编历的目的——但不是为了民用或宗教生活——日落规定为耶路撒冷时间下午6时（格林尼治时间下午3时39分）。朔望月定义为29日12小时793小份。这样12个月的平年包含354日8小时876小份；闰年有13个月，包含383日21小时589小份。

置闰发生在默冬章内的第3、6、8、11、14、17和19年，1章235个太阴月＝6939日16小时595小份；默冬章从创世起算，即公元前3761年10月7日星期一5时204小份，这在我们从子夜起计的日期中是10月6日星期日晚上11时11分20秒。这样，某一Y年的*molad*发生在历元往后理论上（Y-1）年的日、时和小份之后。

一旦找到了*molad*，就要求出Tishri月1日的日期，它与前后两个Tishri月1日相距一定间隔。1年有6种可能的长度：

亏平年	353日	亏闰年	383日
正平年	354日	正闰年	384日
盈平年	355日	盈闰年	385日

molad 日被指定为Tishri月1日，除非出现以下4种情况：

（1）如果*molad*落在18时（正午）之际或之后，Tishri月1日延迟1日；

（2）由于Tishri月1日不能落在星期日、星期三或星期五，如果*molad*落在这些日子，或者如果按规则（1）操作后Tishri月1日将落在这些日子，就把它相应地延迟到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六；

（3）如果一个平年的*molad*发生在星期二的9时204小份之际或之后，Tishri月1日延迟到星期四，否则按照规则（1）和（2）这年将可能包含356日；

（4）如果闰年后一年的*molad* 发生在星期一的15时589小份之际或之后，那么Tishri月1日延迟到星期二，否则一定在星期二的正午以后开始的前一年将只有382日。

根据Tishri月1日延迟0日、1日或2日，前一年是亏年、正年或盈年。

犹太历各月是：Tishri，30日；Cheshvan（以前称为Marcheshvan），29日（在盈年30日）；Kislev，30日（在亏年29日）；Tebet，29日；Shebat，30日；Adar，29日；Nisan，30日；Iyyar，29日；Sivan，30日；Tammuz，29日；Ab，30日；Ellul，29日。在闰年Adar有30日，后随29日的Ve-Adar（也称Adar Sheni），要把原在Adar月的掣签节[7]的节期移到这个月中。

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把犹太历的日期转换为格列高利历，反之亦然；然而，数学家C. F.高斯[8]发现了一个规则，可以把Nisan月

15日（现在作为逾越节的节期）换算为儒略历的日期；它刊布在《犹太百科全书》中和《牛津年份津梁》的第851—852页。由于这一日总是在Tishri月1日之前23星期又2日，它永远不会落在星期一、星期三或星期五。

伊斯兰历

在信奉伊斯兰教之前，阿拉伯人使用一种寻常的阴阳历，结合塞琉西〔9〕纪元（参见第七章），从9月1日的拜占廷〔10〕民用新年起计数。然而，先知穆罕默德禁止置闰，主张完全按照月亮制历，当夜晚切实观察到新月之际，定为一月的开始，这样就阻断了月份与季节之间的联系；其结果是，伊斯兰历由12个太阴月组成，不以太阳运动校正，所以33个伊斯兰年相应于32个西方年，只差几天。

这些月份称为Mu arram、afar、Rab al-awwal、Rab al-'khir、Jumad 'l-'l、Jumad 'l-'ukhr、Rajab、Sha b n、Rama n、Shaww l、Dh 'l-qa da、Dh'l-ijja。日期径直按数字计数；但是在古典阿拉伯语里，还有另一种体系，其中每月1日（在白天）表达为“过去了1夜”，依次递增，直至14日；15日是“月中”；16日是“剩余14夜”，依次递减到月末1日。

由于根据不可预测的地方观察而得出的历法在天文学上毫无用处，一个纯理论的模型被设计了出来：奇数月为大月，偶数月为小月，1年为354日。由于朔望月事实上稍长于29½日，这样的1年将比12个朔望月短0.36708日，即大致为8小时48分36秒；为了补偿，某些年的最后一月改为大月而不是小月。当前额外的日子以30年为周期加于11年中，它们是第2、5、7、10、13、16、18、21、24、26和29年，这样就把误差缩小到0.0124日 = 17分51.36秒。然而，在伊斯兰的历史中，这并没有普遍地贯彻实行。

伊斯兰历的年份从塞琉西纪元933年犹太历Tammuz月16日 = 公元622年7月16日起计数，这一天是阿拉伯年的元旦，先知穆罕默德

从麦加[11]出发赴耶斯里卜（现名麦地那）的日子；阿拉伯语中称“出发”为*hijra*，这个纪元就称为*hijrī*。然而，特别是在较早的记载中，纪元可能从前一日，即7月15日起计数；天文学家保留了这一做法，他们从中午而不是从日落计量1天的开始。甚至在民用历是太阳历的伊朗，历元仍是Hijra年。

欲知纯理论的伊斯兰历和格列高利历之间的换算请参见《牛津年份津梁》第854-855页。然而，文献记载中的伊斯兰历日期所对应的实际西方日期未必能用这种换算法确定地求出，也可能根本就求不出，除非（这倒是经常遇到的）同时知道这一天是星期几。这种转换必须校正到相互一致。

希腊历

古希腊文化是多元文化互相交融、兼收并蓄的产物：每个城邦有自己的方言、自己的字母、自己的节日和自己的法律，但是承认其他城邦也是希腊人。很自然地，历法也是五花八门；在罗马时代之前，至少在理论上，各城邦无一例外采用阴阳历，每个城邦把各自认为合适的月份作为闰月。虽然有一些广泛流传的月份名称，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在城邦之间同一个太阴月按不同的名称称呼，而同一个名称也会用于不同的太阴月，也没有统一地用哪一个太阴月开始一年，或用哪一月作为闰月。

在某些城邦，1个月的中间10日与前10日分别计数，而在大多数城邦，最后10日是反向计数的；最后1日通常被称为*triakás*，即“第30”，即使该月只有29日也是这样，但是雅典的叫法是*hénē kaì néa*，即“旧与新（日）”。然而，在马其顿历中，至少在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的亚洲部分和埃及，计日径直从1日到30日，在小月中29日略去。

现在已不清楚哪些城邦依赖观察，哪些城邦依赖计算，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可能会出于政治或行政上的考虑而干预正常的日期序列。（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12]想象饥饿的众神在他们的节日里显身，却

发现人们并未按规定的日子庆祝节日。）其结果是，城邦与城邦之间月份内的日期也不是恒定的：公元前479年雅典的Boedromion月4日是维奥蒂亚的Panamos月27日；公元前422年雅典的Elaphebolion月14日是斯巴达的Geraistios月12日，但是一年之后的Elaphebolion月25日则是Artamihios月27日。传说赫罗斯特拉图斯（Herostratus）放火焚毁以弗所〔13〕的阿耳忒弥斯神庙与亚历山大大帝的诞生是在同一天，这如果不是完全的杜撰，那也只可能是名义上相应的月份的同一日期。除非借助于日月食，我们甚至不可能把雅典的日期转换成儒略日，虽然我们了解雅典历更甚于其他任何一个城邦的历法。

天文学家使用大小月交替并按规定的闰周插入闰月的太阴历，以雅典或马其顿的名称（参见加框文字）称呼月份，这些名称是取其各自的文化和政治含义，而与实际生活中雅典或被亚历山大征服的任何地方的历法毫无关系。

雅典和马其顿月份的名称

第一个雅典月Hekatombaion开始于紧随夏至日的新月；置闰通常是重复Poseideon月。虽然在马其顿本土通行的马其顿历法几乎鲜为人知，但是看来它的第一个月是Dios，在秋分之后开始；闰月不为人知。在下表中，两相对应的名称不是严格不变的，只是取比较常用的而已。

雅典	马其顿
Hekatombaion	Loos
Metageitnion	Gorpiaios
Boedromion	Hyperberetaios
Pyanopsion	Dios
Maimakterion	Apellaios
Poseideon	Audnaios
Gamelion	Peritios

Anthesterion	Dystros
Elaphebolion	Xandikos（Xanthikos）
Mounychion	Artemisios
Thargelion	Daisios
Skirophorion	Panemos

埃及的马其顿统治者试图将自己的历法与当地宗教上的阴阳历对等起来。这件事证明非他们力所能及；到了公元前2世纪，他们只是简单地用马其顿名称去称呼埃及民用历里的各个月份。他们在巴比伦遇到的麻烦较小，当地的历法更容易理解；月份被赋予马其顿名称，所以Nisanu成了Artemisios。春天的新年被保留了下来，所以按塞琉西纪元计数的年份比近东其他地区所用的年份滞后6个月；巴比伦的塞琉西1年（默冬章中的最后一年）开始于公元前311年Artemisios/Nisanu月1日。在巴比伦被安息〔14〕统治时期，仍保留着这一历法；然而，从公元17年以后，巴比伦月份所用的马其顿名称推后了1个月，Artemisios现在成了Aiaru，而不是Nisanu。正是以此为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15〕用希腊语称呼犹太月份。

在罗马时代，许多城邦采用儒略历，即使月份名称和新年各不相同：所以在安条克10月被称为Hyperberetaios，并且是一年的开始（曾继续在讲古叙利亚语的人中间这样做），直到5世纪中期新年前移到Gorpiaios月（9月）1日。其他地区采用按儒略历的原则编制的历法，但是用自己的月份；这样，在亚细亚行省月份开始于罗马人的*IX Kal.*，新年是奥古斯都的诞辰9月23日。这一天仍然是东正教会的教会新年，他们在这一天（而不是西方的24日）庆祝施洗者约翰（“先驱者”）的被孕。

高卢历

1897年在安省〔16〕的科利尼发现了用高卢语（凯撒入侵时代该地

区所讲的语言）书写的历法残片（参见图20）。它们被多方研究，并产生了许多不同看法；但看来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碑文所呈现的是包含了62个太阴月的5年周期（闰月置于第1年的开始和第3年的中间），每个月分为两半，前半月15日，后半月15或14日。每半月日期向前计数，但是某些日子会互换位置，甚至是在月与月之间，由此序列被打断。每5年的周期结合成更大的周期（起先为30年，后来似乎为25年），在大周期内，第1个5年的第1个闰月被取消。

图20　在科利尼发现的高卢历

虽然在短时期内，这个历法的阴历日期不可避免地会滞后或超前

于阳历日期，但它逐渐与太阳历相匹配。原则上平年的第一个月Samonios开始于冬至日；在实践中，它从一个周期到另一个周期逐渐稍许超前。有人设想基督纪元前的爱尔兰曾经使用类似的历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采用儒略历时，爱尔兰的夏末节〔17〕不是固定在冬至而是在11月1日，因为5世纪中期时它已超前到了这一日期。

Samonios这一名称与凯尔特语“夏季”有关；类似地，第7个月，原则上开始于夏至日，称为Giamonios，来源于“冬季”这个词。看来这两个名称与相应季节末尾的二至日的庆祝有关；11月1日的*samain*（现代是*Samhain*，即夏末节）是夏末这个概念后来又出现在一部专门词典中。

印度历

印度的宗教节日仍然由许多地方历法决定；大多数历法或者是阳历，或者是阴历，但并非全部都是如此。在1957年之前，太阳历的年直接由观测确定，并用以改正太阴历，但不是回归年而是恒星年〔18〕，分为12个月，每月相应于太阳到达一个*raśī*。但不同于西方（和中国）的黄道十二宫，它不是按习惯对黄道划分，而是按实际的星座划分。在经过了改革之后，现在太阳年取回归年，*raśī*是黄道上的固定弧段，相应于1957年时占据那一段的那个星座。

在阳历里，日开始于日出；按照地区的不同，月开始于太阳进入新的*raśī*的那一日，或者次日，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再次日。月份的名称取太阳所在的*raśī*名，但孟加拉〔19〕和泰米尔纳德〔20〕两地除外，那里使用阴历月份的名称。

在阴历里，月份被分为两“翼”，即两半，一半是“光明”（盈月），从新月到满月，另一半是“黑暗”（亏月），从满月到新月。月份有一套标准的名称，每一个在理论上都相应于一个特定的*raśī*，以此按照新月时太阳所在的*raśī*为月份命名。在南方，以及在理论天文学上，月份从明半月开始，但是在北方（除非是闰月；参见加框文

字）月份从暗半月开始，因此在新月之前，月份的名称超前于南方一个：这样北方的Magha暗半月相应于南方的Pausa暗半月，但是两者下面都紧接Magha明半月。

置闰和消除

原则上，每一个月太阳进入一个新的*raśī*；但是有两个限定性条件。

（a）当在连续两个月份的开端（按南方的体系计量），太阳位于同一*raśī*之内时，前一个月作为闰月，它的名称与后随的正常月份相同；北方也在这时添加一个闰月，把正常月份分为两半，并从明半月开始，而不像其他月份那样从暗半月开始。

（b）当冬季在同一月太阳进入两个*raśī*（也按南方的体系计量）时，相应于前一个*raśī*的月份名称将被消除。这样在北方和南方消除的都是同一个名称。

每半月的第一天紧随着新月或满月，因此日期普遍按照当前日出时的*tithi* 计数；*tithi* 是月亮合日后运行12°所需的时间。有时月份内的一个日期必须略去（如果*tithi* 在一次日出后开始而在下一次日出前结束）或者重复（如果*tithi* 在一次日出前开始而在下一次日出后结束）。月份内的日期的不规则并不影响星期内的日期：如果7日是星期日，即使下一天是9日或者仍旧是7日，而不是8日，它也总是星期一。

当前在使用的纪元为数众多，大多数对已经过去的年份计数，其中还有好几种不同的新年日期。使用最为广泛的是Saka纪元，阴历和阳历两者都使用它，历元为公元78年。但是值得一提的有Vikram Samvat纪元，它用于阴历，历元为公元前58年。还有Kaliyuga纪元，这是一个从公元前3102年2月18日开始的432 000太阳年的周期，在这个周期结束的时候，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此外，还有一些历法依据的是木星公转的恒星周期，它包含11.862年；5个这样的周期大致上是60太阳年。

1957年以来，为了世俗的应用，印度承认两种历法：格列高利历和Saka纪元的国家历；后者使用阴历月份的名称，从3月22日（格列高利历闰年时从3月21日）开始。

伊朗历

虽然阿开民王朝[21]的碑铭似乎呈现的是类似于巴比伦历的阴阳历，但使用不同的月份名称（可能还用不同的置闰方式），安息人的阿萨息斯王朝[22]（公元前247—公元226）和波斯人的萨珊王朝[23]用一种太阳历取代了这一历法；它至今还在为包括印度的帕西人在内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所使用。这种太阳历1年365日，是一种“游移年”，包含12个月，每月30日（不是按顺序计数，而是用掌辖神祇的名字称呼），还有5个月份外的日期，按5组伽泰（即琐罗亚斯德教赞歌）称呼。据说这种历法取代了早先360日、每5或6年置闰的历法。

正如埃及年原则上开始于天狼星的偕日升，同样，理论上伊朗的Nawruz（即元旦）是春分日。然而，由于“游移年”逐年超前于太阳，在公元631年Nawruz是6月16日。在伊嗣埃三世[24]，即伊朗最后一位前伊斯兰国王的年代里，琐罗亚斯德纪元正是从这个日期开始计数的。

据说由于宗教仪式的要求，每120年要置闰一次，置闰之后月份外的日子推迟到跟随在下一个正常月之后，并因此使得一年的时间回复到正常。然而，由于战争和动乱，在8次置闰之后这一做法中断了，以至于额外的日子继续后随于第8月。不是所有的学者都相信这种说法，但是在萨珊王朝时期月份外日子的移位确是事实；直到伊嗣埃375年，由于1006年3月15日Nawruz正好与春分日一致，为了应和这个吉祥的巧合，月份外的日子被重新安置到它们原先在年末的位置。

在12世纪初期，帕西人——而不是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为了能够使Nawruz与春分日相合而设置了一个额外的闰月（虽然没有移动月份外的日子），但是就只进行了一次。1746年，有人提议抵消那次置闰，将帕西历法回复到与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所用的历法相一致。只有少数人采纳了这一建议，但是他们的历法（称为Kadmi历，即“从前的”历法）在主流的Shenshai历（意思是“皇家的”历法）之外一直留存到今天。这样，伊嗣埃1374年在Shenshai历中开始于2004年8月20日，而在Kadmi历中开始于7月21日。

1906年，第3种历法被提了出来，称为Fasli（“季节历”）或Bastani（“古历”），在这种历法里Nawruz又一次取为春分日，而在格列高利历的闰年加上第6个月份外日期。大多数帕西人以违背教义为由拒绝改革；相反，在伊朗，大多数琐罗亚斯德教徒采纳了它，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它接近于由礼萨国王〔25〕在1925年推行、并一直保留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的民用历。

在这种历法里，一年里的前6个月（Färvärdin、Ordibehesht、Khordad、Tir、Mordad、Shährivar）每个月都有31日，与从春分到秋分的时间长度求得一致，接下来的5个月（Mehr、Aban、Azär、Dei、Bähmän）有30日，而最后一月（Esfänd）在平年只有29日。原则上根据11世纪提出的规则添加第30日，使得平年开始于太阳在正午前进入白羊座的那一天，而闰年开始于太阳在正午后进入白羊座的那一天；通常在前一次闰年之后4年又是闰年，但偶尔也会相隔5年。然而，在实践中事先要计算一种复杂的周期（参见加框文字）。纪元从Hijra（在法尔斯语〔26〕中的发音为Hejre）之前的春分，即公元622年3月21日起计数。

Hejri太阳历中的置闰

置闰按照一个2180年大周期的法则，包括下列程序：
21个128年的周期，包括：

1个29年的小周期；
3个33年的小周期；
1个132年的周期，包括：
1个29年的小周期；
2个33年的小周期；
1个37年的小周期。
在每个小周期中，在第5年有一个闰年，然后每第4年为闰年。
当前的大周期从AH 475 = 公元1096/7起计数；
当前的128年周期开始于AH 1371 = 公元1992/3。

类似的闰年法则存在于巴哈[27]历中，它的太阳年包含19个由19日构成的月份（19是巴哈教派的象征数字），另加4个月份外日期，当春分滞后于3月21日的日落（这是巴哈教派一日的开端）时再加上第5个；但是，在实践中往往遵行格列高利历或伊朗历的闰年。星期开始于星期六；纪元从1844年起计数。

中国历

中国年是阴阳历的，遵行19年7闰的置闰法则[28]，历经多次天文计算上的精确化，最突出的是1644年耶稣会教士汤若望[29]的工作。一日从子夜开始，正在第一个时辰（1/12日）的中间；若计算出在某瞬时对于北京的经度要发生太阳和月亮的相合（即使这恰在子夜之前），那么这一天就是这个月的初一。民用历历年的1月（天文年的3月）是冬至所在月之后的第2个太阴月。

按照当前的规则，在19年的周期内第3、6、9、11、14、17和19年加上第13个月（这里作者的叙述有误，请参见译注[30]），这一19年周期滞后于西方的“黄金数”周期9年；由于规则要求二分日和二至日必须落在2月、5月、8月和11月之内，因此所添加的闰月里太阳留在同一个黄道宫内，也因此闰月一定不会在冬季（1月、11月或12

月）；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置闰就要延迟到次年2月之后。

清朝的历算部门已把中国历一直计算到2020/1年；1931年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它已颁行了格列高利历）禁止使用这种传统历法，但是不论是这一禁令，还是共产党的反“迷信”运动，甚至都不能在中国大陆消除它，也不能影响香港（在1997年之前受英国统治）或海外华人（参见图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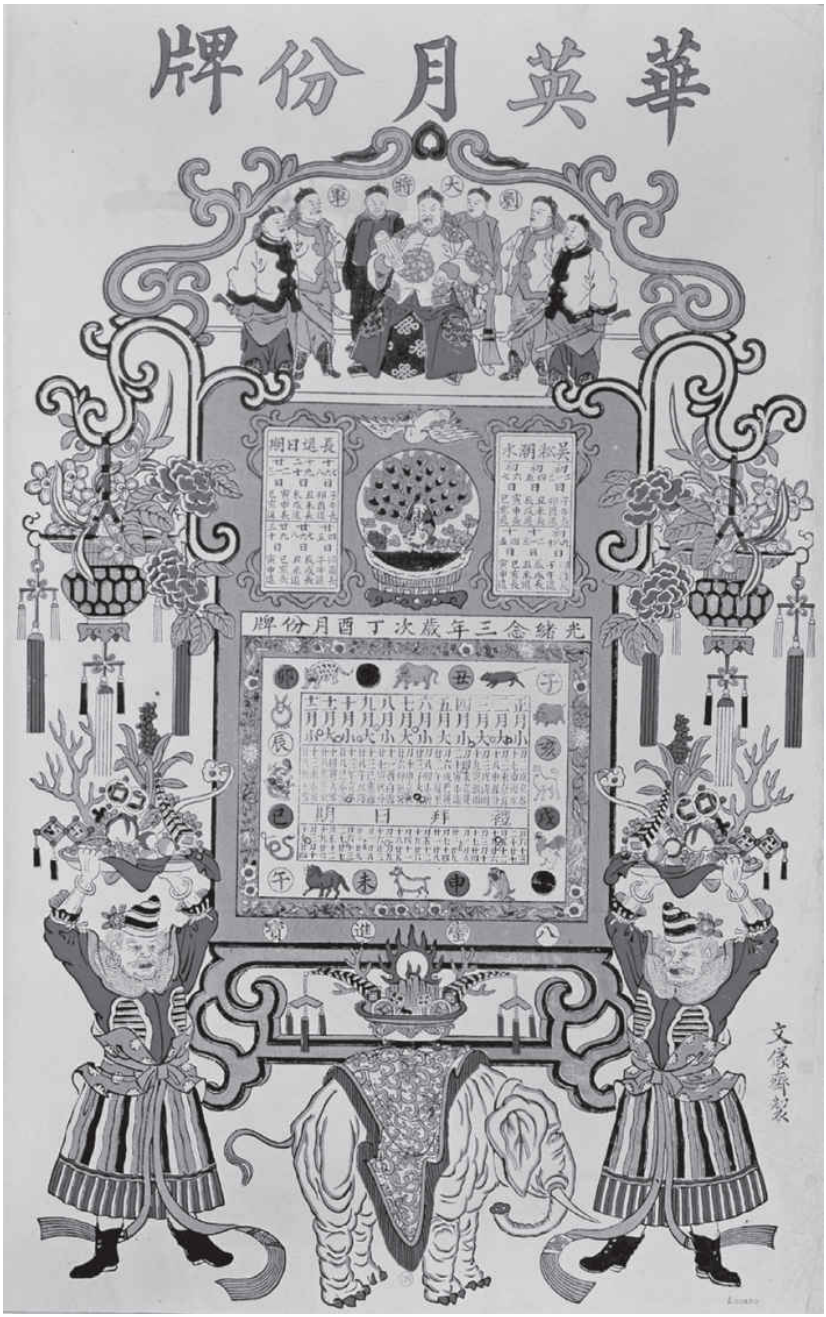

图21　中国历

除了太阴历之外，还有一个二十四“节气”的序列，相当于太阳历中的半个月，每一节气开始于太阳进入一个黄道宫或到达其中点之时；各种节日与这些节气有关，首先是清明节，正是太阳经过白羊宫的半路上，这是祭扫祖先坟墓的时节。还有六十干支周期（参见第七章），用于纪年、纪月、纪日和纪时。

还有一些类似的历法，但是相对于各处首都或首府的经度计算，正在或曾经在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和中国西藏（从满月起计算）使用。

中美洲历法

前哥伦布时期中美洲时间计量的基础是一个260日的标准的和不变的周期，分别结合13日和20日两个较小的周期，它与宗教紧密相关（参见图22）。

图22　太阳石，显示了历法、天文学与宗教之间的联系。第一（外）环：繁星密布的天空。第二环：Quetzalcoatl（阿兹特克人信奉的主神——译注）、夜神Texcatlipoca和昴星团。第三环：veintena的日期。第四环：以往“太阳”（纪元）的标志。中央：太阳神Tonatiula，他的舌头令人想到阿兹特克

人献祭时使用的刀，两侧则是抓着牺牲者心脏的老鹰。

现代学者根据尤卡坦马雅[31]语的名称，往往把大周期称为*tzolkin*，但这只注重了一种语言而不及其余；例如，在讲纳瓦特尔[32]语的阿兹特克人中它称为*tonalpuhualli*。相形之下，两个较小的周期有西班牙语的名称*trecena*和*veintena*，分别来源于*trece*“13”和*veinte*“20”。*trecena*的日期从1计数至13（少数地方从2至14）；*veintena*的日期各有名称，它们在各种语言中是不同的，而且未必指示同一事物：例如3日在纳瓦特尔语中称为Calli（“房屋”），但是在尤卡坦语中称为Akbal（“夜晚”）（参见图23*a*）。尽管如此，它们是同一日，正如星期五又称为Friday、*vendredi*、*sexta-feira*、*kenapura*、*Paraskeví*和*piątek*。

(a)

IMIX	CIMI	CHUEN	CIB
IK	MANIK	EB	CABAN
AKBAL	LAMAT	BEN	EZNAB
KAN	MULUC	IX	CAUAC
CHICCHAN	OC	MEN	AHAU

(b)

POP	XUL	ZAC	PAX
UO	YAXKIN	CEH	KAYAB
ZIP	MOL	MAC	CUMKU
ZOTZ	CHEN	KANKIN	
TZEC	YAX	MUAN	

UAYEB
字面上的意义："与没有名称的一起"
5个月份外日期的马雅浅槽饰和名称
它们规整地附加于月长 20 日的第 18 个月后面
在太阳历中构成 365 日的 haab 。

图23　（a）veintena日期和（b）太阳年月份的马雅语名称

两个小周期并行不悖地运作着：260日周期的第1日是1 Cipactli（在纳瓦特尔语中）/Imix（在尤卡坦语中；两者的意思都是“短吻鳄”），第2日是2 Ehecatl/Ik（“风”），第13日是13 Acatl/Ben（“甘蔗”），第14日是1 Ocelotl/Ix（“美洲虎”），第21日是8 Cipactli/Imix，等等，直到周期的结束13 Xochitl（“花”）/Ahau（“主人”）。

除了这一周期之外，每个社群还有自己的太阳历（参见图23*b*）。结构始终如一：365日的“游移年”被分为18个包含20日的单元，在各地语言中称为“月”，在年末后随5个不祥的月份外日期；但是每个社群不仅在月份的名称和计日上有差别（有些历法的日期不是1到20，而是0到19），而且任意选择某一天开始计数，因而在一个地方的元旦甚至不是另一地方的某月1日。

尽管复兴前哥伦布时期历法的民族主义者的说法不是这样，但是闰年和轮子一样，确实都是西班牙征服者带来的。一种历法不时地会被另一种新历法所取代，新历法或者晚1日，或者早1月开始，但是此后1年总是如以往一样保持不变的365日。

每一年按照元旦或者第360日在260日周期中的位置来称呼。由于太阳年比这一周期长105日，而105 = 8×13 + 1 = 5×20 + 5，所以年名的数字部分会逐年增加1，但是年名的日名部分在*veintena* 中要前进5位。此外，由于5×4 = 20，在任何历法中只有4个日名（称为“年的承名日”）能够用于标志年份。这样，就有52个可能的年名；当这些名称用尽的时候，人们要热烈庆祝新一轮的“历法周期”。

蒂卡尔[33]的马雅人也认可18个月即360日的*tun*，且它总是结束在Ahau日；20 *tun* 构成1 *katun*，13 *katun* 构成1 *may*，而20 *katun* 构成一个现代学者称为*baktun* 的单位；20 *may* 或13 *baktun* 构成1个长世代，总共1872000日。后者是由奥尔梅克人[34]（可能在公元前355年）构建的，开始于前一周期的最后一*tun* 结束之时；其中的日期按3个部分来标识：过去了的*baktun*、*katun*、*tun*、月和日，在日周期中的位置，最后是年中的日期。当前的长世代于前一长世代结束之后的那一天开始，这一日称为0 0 0 0 0 4 Ahau 8 Cumku，相

应于公元前3114年9月5日，并将于13 0 0 0 0 4 Ahau 3 Kankin ＝2012年12月21日冬至结束。

为了天文目的甚至确立了更长的时间单位：20 *baktun* 为1 *pictun* ，20 *pictun* 为1 *calabtun* ，20 *calabtun* 为1 *kinchiltun* ，20 *kinchiltun* 为1 *alautun* ，即299520000000日。以上对于本世代给出的结束日期因此也可重写为1（*kinchiltun* ）11（*calabtun* ）19（*pictun* ）13 0 0 0 0 4 Ahau 3 Kankin。

注释

〔1〕 公元前13世纪末古犹太人占据了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以色列王国，自公元前1020年前后至前922年前后由扫罗、大卫、所罗门三代国王治理；公元前922年耶罗波安一世发起叛乱另立北朝以色列王国，南朝王国称犹大王国。公元前721年以色列王国受新亚述帝国攻略而灭亡。公元前587年犹大王国被巴比伦人摧毁，许多居民被流放。后波斯居鲁士大帝（参见此处 ）征服巴比伦，准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

〔2〕 安息年周期（sabbatical cycle）指古犹太人每隔7年让土地休种1年的周期。

〔3〕 指《圣经·旧约全书》的首五卷，又称为律法书或摩西五经。

〔4〕 犹太教公会（Sanhedrin），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公元前65年至公元7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正式机构，具有政治、宗教和司法职能。

〔5〕 赎罪日（Yom Kippur），犹太教最隆重的节日，定在犹太教历Tishri月（公历9、10月间）初十，届时犹太人请求上帝赦罪以重沐其恩宠。

〔6〕 安条克（Antioch），一译安提阿。弗里吉亚地区古城，公元前300年由塞琉古一世建立，在今土耳其伊斯帕尔塔省亚尔瓦齐附近。

〔7〕 掣签节（Purim），犹太教的喜庆节日，定为Adar月13日，以纪念公元前5世纪犹太人在波斯统治下死里逃生的事迹。

〔8〕 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 1777—1855），德国数学家。他不仅对纯粹数学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而且对20世纪的天文学、大地测量学和电磁学也作出了重要的实际应用。

〔9〕 塞琉西（Seleucid），希腊化时代的大国之一，领土曾西至欧洲色雷斯，东至印度边境的广大地区，公元前312年由塞琉古一世建立，前64年亡于罗马。

〔10〕 拜占廷帝国（Byzantine），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东西分治，帝国东

部首府为拜占廷（后改称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7世纪以后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上已与早期罗马帝国大大不同，史称“拜占廷帝国”。1453年亡于奥斯曼帝国。

〔11〕 麦加（Mecca）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创立者穆罕默德的诞生地，也是他早期活动和悟道的地方。麦地那（Medina）是穆罕默德后期的根据地，也有他的墓地。两地都是伊斯兰教的圣地。

〔12〕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公元前450—约前388），古希腊最著名的喜剧作家。剧本多以雅典人的社会、文学、哲学和生活为题材，以对话措词巧妙、善意讥讽、独创和引人发笑的荒唐情节为特征。

〔13〕 以弗所（Ephesus），希腊爱奥尼亚城市，故址在今土耳其伊兹密尔省。那里的阿耳忒弥斯神庙（Temple of Artemis）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公元前550年为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所建，公元前356年焚毁，后重建。公元262年哥特人入侵时被毁，再未重建。

〔14〕 安息（Parthia），古代地区，大致为今天的伊朗呼罗珊地区。也指安息帝国（公元前247—公元224），版图曾经包括整个伊朗高原和底格里斯 - 幼发拉底河流域（即古巴比伦地区）。

〔15〕 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37/38—约100），犹太历史学家。曾任犹太人反罗马人起义的军官，后投降罗马人，在罗马定居。完成《犹太战争史》、《上古犹太史》等著作。

〔16〕 安省（Ain），法国东部一省份，东边和北边与瑞士交界。

〔17〕 夏末节（*Samhain*），凯尔特历法每年11月1日为夏末节，是重要而具有恐怖气氛的节日。

〔18〕 回归年和恒星年（tropical year and sidereal year），1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2日，是四季变化的周期；1恒星年为365.2564日，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两者相差为每年0.0144日，约合20分44秒，称为岁差。起因是由于地球自转轴在空间以258 00年的周期自东向西绕与地球公转轨道面（黄道面）垂直的方向旋转，导致春分点沿黄道以每年50.3″的速率向西退行。

〔19〕 孟加拉（Bengal），古名万加，是印度次大陆东北部的一个历史地区。现分属印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20〕 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印度的一邦，位于印度半岛东南端。

〔21〕 阿开民王朝（Achaemenid Dynasty），即埃及的波斯第27王朝（公元前525—前404），由波斯的冈比西斯二世建立。

〔22〕 阿萨息斯王朝（Arsacid Dynasty），古代伊朗创建和统治安息帝国的王朝。第一代国王为阿萨息斯（约公元前250—约前211在位）。

〔23〕 萨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224—651），古代伊朗王朝。在阿

尔达希尔一世（224—241在位）领导下，萨珊人推翻安息王朝，创建了一个帝国。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

〔24〕 伊嗣埃三世（Yäzdegird III, ?—651），萨珊王朝末代国王（632—651在位）。在阿拉伯人入侵的战役中惨败之后被杀。

〔25〕 礼萨国王（Reza Shah Pahlavi, 1878—1944），伊朗国王（1925—1941在位）。他锐意改革，实施政治民主化和排除外国干涉，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国家。

〔26〕 法尔斯语（Farsi），现代波斯语，为伊朗的官方语言。

〔27〕 巴哈教派（Bahá'ísm），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由米尔扎·侯赛因·阿里（1817—1892，称号为巴哈·安拉，意为“真主的光辉”）所创立。

〔28〕 原文为“默冬章”，事实上中国在春秋时代已独立提出这一置闰法则。

〔29〕 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明末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天文学家，德意志人。他1622年来到中国，曾参与修订历法，编成《崇正历书》。清朝建立后任钦天监监正，把《崇正历书》改编为《时宪历》颁行。

〔30〕 中国传统历法自西汉的《太初历》（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颁行）已经规定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二十四节气中，自冬至起每隔一个，包括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为中气。两个节气间的间隔平均大于半个朔望月，所以可能出现1个月内只出现1个节气、而没中气的情况。这个月作为前一月的闰月。这一法则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在冬季，地球到达绕太阳轨道的近日点附近，太阳在天空中移行快，两个节气之间只有14天多，所以不可能在冬季出现1个月内只有1个节气的情况，于是在冬季各月份不会出现闰月。

〔31〕 尤卡坦马雅人（Yucatec Maya），墨西哥东南部尤卡坦半岛的中美洲印第安人。他们是马雅文化缔造者之一。历法、建筑和象形文字表明他们曾经是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

〔32〕 纳瓦特尔人（Nahuatl），墨西哥中部的中美洲印第安人。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前的阿兹特克人为其主要族群。阿兹特克人曾在15世纪至16世纪初在今墨西哥中南部建立一帝国。

〔33〕 蒂卡尔（Tikal），马雅低地南部的最大马雅城址和祭祀中心，在今危地马拉佩腾省西北部雨林灌木丛中。约公元700年为全盛时期，建造了规模宏伟的广场、金字塔和宫殿。

〔34〕 奥尔梅克人（Olmec），创造奥尔梅克文化的中美洲古代土著民族。奥尔梅克文化开始出现于公元前1150年，盛于公元前1100—前800年间。其

范围自墨西哥谷地达于萨尔瓦多共和国。

第七章

年的标记

我们如此习惯用某一标准纪元中的数字来标记年份，以至于虽然我们也能理解其他文化可能应用不同的纪元，但是若发现某一文化竟然完全不用任何纪元，仍难免感到惊讶。然而，在古代世界，虽然纪元远非陌生事物，但并不是标记年份的唯一专门手段，而且它们的应用在许多情况下纯粹只在某一地区具有意义。

在农业社会，年份常常以突出事件来确定，例如特别好或特别坏的年成；最早的埃及王朝仍然使用这种方法（参见图24），而在指1665年为“鼠疫年”这类说法中，也还残留着这一痕迹。这种方法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若在某年中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就无法确指，除非与有事发生的另一年联系起来，即使这样也只在一短时期内才可能。

图24　埃及出土的“巴勒莫石刻”5块残片之一，属公元前约2470年第五王朝，记载（上方）约公元前3000年以前下埃及和上埃及前王朝时代统治者的部分

名录，和（下方）第一王朝到第五王朝诸王统治下发生的事件（公元前3000年上半期）

要说清两个事件之间经过的时间间隔也是困难的，除非存在以显要的事件书写的编年史。在缺乏这类记录的情况下，早期希腊人会说某事发生在3代之前，这时他所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字面意思：战争发生在我曾祖父的时代，因为我的祖父告诉过我，他因战争而成了孤儿。（后世的历史学家把代转换成年，有时30年为1代，有时100年为3代，以一种似是而非的确实性来代替早已被遗忘的经历。）

对于更为复杂的社会，这些不精确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于是它们设计出了不论是否有大事发生都可以确定任何年份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了人名纪年、王权纪年、特定的周期 和纪元 。

人名纪年

人名纪年 ，或称行政长官纪年，是用担任年度职务的行政长官的名字来标记年份，按如下的方式："当某某人是［职务头衔］的时候"。在亚述王国这人是*limmu* ，即亚述城的市长，在雅典是称为archon的9位执政官之一，在斯巴达是称为ephor的5名掌政官之一；但是最著名的例子是罗马以两名年度执政官来标记的方法："当盖尤斯·儒略·凯撒和马库斯·卡尔布尔纽斯·比布卢斯是执政官的时候"（*C. Iulio Caesare M. Calpurnio Bibulo consulibus* ，公元前59年）。这与这些行政长官行使的权力大小无关：斯巴达的掌政官权倾朝野，雅典的执政官在民主制度下权力缩减到只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罗马共和国手握重权的执政官丧失权力给了皇帝，但还是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每一份标注日期的文献中，而不是后者。

尽管这一方法在古代被广为采用，但是它有三个缺陷：其一，除了说"从现在起的第几年"之外，无法确定将来的年份；其二，由于希腊各城邦开始一年的时间各不相同，采用不同的月份名称，而且又不协调置闰，因此在一个城邦的单一人名纪年下发生的事件，未必能对

应于另一城邦的单一人名纪年（参见加框文字）；其三，要是没有行政长官的名录，即使是在自己的城邦内，人们也不了解X的年份是否在Y的年份之前，或者两者相隔多少年，更不用谈外邦人了；这类名录倒的确有人编制了出来，但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一样有混淆和讹误之处。公元前3世纪历史学家陶罗梅纽姆（今西西里岛的陶尔米纳）的提麦奥斯 [1] 曾经进行过各城邦名录的比较，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分歧。

人名纪年标记年份的困难

人名纪年标记年份的困难可以用以下的例子来说明：当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想要为整个希腊化地区的读者标记公元前431年春天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时，他是这样说的：

在攻占埃维亚之后所作的30年休战已持续了14年；但是在第15年，当克里西斯已经在阿尔戈斯当了48年女祭司，埃涅西亚斯是斯巴达的掌政官，而皮索多卢斯雅典执政官的任期还有两个月时，在波迪亚提底亚战役之后的第6个月，在初春［一支底比斯军队袭击了普拉蒂亚］

（《历史》，第2卷，第2章，第1节）

此后修昔底德用夏天和冬天为此次战争的事件标记年份。

即使就罗马执政官而言，尽管在共和国早期之后，与之有关的证据相当充分（参见图25），但是在私人的名录中错误还是不能避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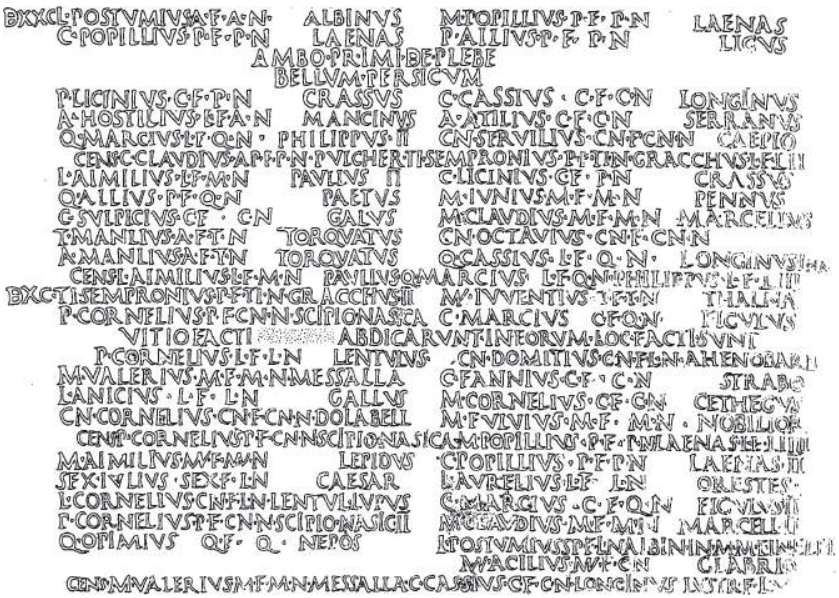

图25　卡皮托利尼岁时记的部分（罗马执政官名录）

公元29年的两位执政官是C.　弗菲乌斯·杰米努斯（C.　Fufius Geminus）和L.　卢贝留斯·杰米努斯（L.　Rubellius　Geminus）；基督教早年流传甚久的说法认为，耶稣是在两位都姓杰米尼、分别名叫“卢弗斯”和“卢贝略”的执政官的年代受难的。4世纪晚期，萨拉米斯的伊皮凡尼乌斯 [2] 试图为救世主耶稣基督编制生平年表时，使用了极不精确的执政官名录，名录中竟然把“两位杰米尼”与“卢弗斯和卢贝略”当成两对彼此无关的执政官（虽然他没有把耶稣受难定在两对中任何一对的年份上）。阿基坦的普罗斯珀 [3] 在他的编年史（公元455年）中所用的名录虽然不同，也好不到哪里去，维克托利乌斯（参见第四章）也采用了这个名录，这个名录把两位杰米尼的年份提前了1年。

王权纪年

在埃及和近东的各大君主国，独特的年份标记体系是国王统治的

年代。在这种体系下，如果人们想要清楚地知道过去，就要求手边有历代君主的名录连同他们统治的时间跨度（参见图26），而且它在应用于将来时也不太方便，因为人们无法知道在位君主的统治将延续多久，即使这位君主明白这不可能是永久的。

都灵的列王名录残片

阿比多斯名录的部分

图26　埃及国王名录残片

尽管如此，王权纪年还是在公元537年为查士丁尼皇帝〔4〕所采用，并在欧洲广泛流传，甚至在皇家大臣的官署之外也是如此；人们要求了解英格兰的国王和女王以及他们的年代不仅仅是出于爱国主义的原因，因为如果不了解这些，就无从知道爱德华六世〔5〕3年的一份公文是取代了亨利八世〔6〕23年的那一份，还是为它所取代。直到1962年这还是为联合王国的议会法案标注年份的官方方法（虽然不再是援引时最常用的方法）。

那么王权纪年从何时开始呢？从查士丁尼往后，是从君主登上宝座的周年纪念日开始计数的（参见加框文字），不论日期。另一方面，在古代王国里，通常的原则是从常规的新年起计数国王在位的年份，而不论他的统治从哪一天开始。

从加冕到登基

在中世纪的欧洲，君主常常从他们加冕时计数他们的在位年份，因为正是加冕后他们才正式当上了国王。即使是征服者威廉〔7〕也不是从忏悔者爱德华〔8〕之死计数他统治的日期的，尽管他声称自己是后者的合法继承人；他也不是从黑斯廷斯战役起计数，虽然那时他成为了英格兰的主人；他是从1066年圣诞节加冕起计数的。然而，当亨利三世〔9〕在1272年11月16日逝世之际，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一世〔10〕正在圣地〔11〕，从那里他得花两年时间才能返回；他在20日宣布为王，他的统治年代也就从这个日期起计数。从此以后，“国王的和平统治随国王而逝”被“老国王驾崩，新国王万岁”所取代——这是从法国引进的，法国的卡佩王朝〔12〕在987至1316年期间曾有8代王冠由父亲传给了儿子。

这就使得君主登基和新年之间的这段时间成了问题。在苏美尔和巴比伦，这称为统治时期的开始（或甚至将它归于前国王的王权纪

年）；由于这将国王登基的这一年与他统治时期年份的计数区分了开来对待（后者从他的第一个新年开始），这种计量方式的现代专业术语是登基 - 年份体系。

与之相反，在埃及，国王的第一年从他登基时开始，并在最后的那个月份外日期（参见第二章）结束（第18到20新王朝除外，它们使用现代的周年体系），这样他的第二年和随后的各年都在Thoth月1日开始。这称为非登基 - 年份体系；这种体系为马其顿的统治者和直到戴克里先〔13〕为止的罗马皇帝所一直使用，而且也为伊朗的萨珊王朝国王从公元3世纪到7世纪所使用（只要他们使用纪年就这样做）。在西方这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计数马的年龄的方法；在《圣经·旧约》里也能看到这种方法，但并非仅此一种。登基 - 年份体系和非登基 - 年份体系，以及秋天新年与春天新年（第六章）的并存，使得《圣经》的纪年成为一个恶梦。

除了埃及，在537年之前罗马皇帝并不用他们的统治年数来标记年份；他们完整的头衔宣告了他们获得年度护民官权力准许（他们统治的合法基础）的次数，但是这不用于纪年；举例来说，他们对法律调查的回应是按当年的执政官来标记年份的。这并未阻止他们的臣民用其统治年份计数，只要他们觉得方便就这样做，但是会根据地区的原则：当圣路加〔14〕将施洗者约翰开始布道的年份确定为提比略〔15〕15年时，这对于为他提供信息的犹太基督徒来说可能是公元28年春天至29年春天，对于在安条克的路加本人是公元27年10月1日至28年9月30日，对于亚历山大的读者来说是公元28年8月29日至29年8月28日，而对于罗马人来说是公元2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特定的周期

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名纪年中彼此各不相符的官职任期，希腊历史学家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采用了连续两次奥林匹亚竞技会之间的4年周期；根据记载，竞技会是从公元前776年开始的，而且在夏天举行。

这个体系虽然局限于作为历史参照（除了在奥林匹亚[16]之外），但它能够为任何城邦的任何希腊人所领会（尽管作者仍然把一种历法中的年份等同于另一种历法中的年份，即使它们始于不同的时间，或者把他们的叙述扩展到整个竞赛季而不顾年份的改变）。

因此，两次奥林匹亚竞技会之间的4年时间是周期纪年法的一个例子，这一纪年法取一个固定的年数作为周期，单个年份以它在这个周期中的位置来计数。这个周期本身也被计数则不常见。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年期，这是一种（通常认为）在公元312年确立的15年的征税周期；这个周期本身几乎是从不计数的，但是年固定地称为“第几年期”，意思是这个周期中的第几年。在罗马帝国晚期，年期很快就运用到非财政方面去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比官方的执政官纪年体系更为重要；在拜占廷的文献中，它比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的世界年远为可靠，因为后者可能会以几种不同方式中的任意一种计数。

年期也曾在中世纪的西方出现，部分由于前罗马帝国的残余影响，部分由于狄奥尼西复活节查定表（第四章）的流传，但它与从前相比并不具有相同的权威性。在东方，年期在君士坦丁堡从9月1日起计数，它使得我们能够确定哪一种形式的世界纪元被应用，而在西方，是公历纪年、王权纪年，或者最好是两者结合起来指明年期是从几个可能的日期中的哪一个开始计数的。

最重要的纪年周期是12年的动物周期，用于中亚和东亚，通过中国的占星术而在西方闻名。周期中的年份不用数字计数，而是根据掌辖的动物称呼：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和猪。（有一些地区性的变更：水牛可能代替公牛，而在越南，猫代替了兔。）在中国，这些动物与十二地支相关，又与十天干一起构成了60年的周期。但是这种六十干支的周期，不仅用于纪年，还用于纪月、纪日和纪时（2小时的时辰）；在古代的记载中，干支纪日比用月份和日期纪日更常见。

与60年周期并存的还有年号，通常译为“纪元”。在1368年以前，每位皇帝在他登基时都会使用某个吉祥的名称宣布新纪元，而日后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还可再次开始新的纪元；从1368年以来，每位皇帝的

整个统治时期即是自己的纪元，而他的年号应用于皇帝本人逝世之后。这样，生产中国最著名瓷器的那个年代的皇帝不是乾隆皇帝，它们是产于“乾隆”纪元之后[17]。

在日本，年号（*nengō*）纪元与君主的统治时期作为同一意义上的时间范围是始自1868年。日本人使用的是非登基 - 年份体系，而从1873年起还使用格列高利历：昭和1年从裕仁天皇登基的1926年12月26日那天起算至31日，而平成（当前的纪元）1年从1989年1月8日至12月31日。

旧中国在末代皇帝被推翻之后，曾代之以中华民国纪元；年份是从1912年根据登基 - 年份体系计数的。那一年也是金日成诞辰的年份，因此是朝鲜在1997年确立的非登基 - 年份自主纪元的历元，“自主”这一名称源自朝鲜公开表示的它的原则。这些都可以看作（政治感情排除在外）真实的纪元，而不受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或生平的限制。

纪元

“纪元”这个术语指的是年份从某一起点——即历元——开始连续计数、而不必回复到1的年代顺序排列，它源自古典时代后的拉丁语词*aera*或*era*，正是表示某一事物在数字序列里的位置，因此被用于年份的编号（现在以法语词*millésime*称之）。“纪元”在年代学上的应用起源于西班牙，在那里年份用当地的计时体系表示（参见下文），不是称为年（*anno*），而是称为（*a*）*era*（例如，*era mclxxiii*表示“第1173” = 公元1135年）；这个词推及到表示这个计时序列本身，接着又推及到与此类似的其他序列。用纪元计时的极大好处是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很容易计算，而不必累加列位君主的在位年数，或点数名录中有多少个行政长官，而且往后的年份无论多远也能随意确定。

纪元的历元可以是正确标记日期的历史事件，例如先知穆罕默德

的*hijra*，即从麦加出发前往麦地那的时间；伊斯兰历的纪元正是由此计数的（参见第六章）。但是从年代学的目的来说，如果这个日期是错误的或可疑的，或是这个事件本身只是传说，这都无关紧要；前者如基督纪元的例子，后者如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的登基，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时代，日本的年份正是从那时起开始计数的。

纪元既可以对当前的年份计数（这时第一年直接从历元后开始），又可以对已过去的年份计数（这时只有当一年结束以后才开始计数）。在计算年龄时这两种体系我们都经常遇到：当我们说一个人正处在他或她的第25年时，我们计数的是当前的年份，但是当我们说同一个人是24岁时，我们计数的是已过去的年份。除了在印度之外，在纪元计时体系中计及当前年份是一种规范；在印度的许多纪元中，最重要的是Saka纪元，它从公元78年起计数过去了的年份，印度的国家历就以它为基础（参见第六章）。

在希腊化和古罗马时代，为了纪念政治事件有为数众多的地方性纪元，但是在相关的城邦或行省之外就罕有任何意义。由于罗马人在罗马建城的正确日期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这些纪元中不包括关于罗马的现代著作中经常出现的、从公元前753年起计数的*ab urbe condita*（拉丁文，意为“在城市建成之后”——译注）；若有人说某件事发生于罗马建城之后多少多少年，这就像在英语中说“诺曼人征服后100年”一样，都是非正式的纪年。

古典时代最重要的纪元是西亚的塞琉西国家纪元。公元前311年，巴比伦的马其顿统治者塞琉古[18]总督在用军事力量重新确立其权力之后，开始从Nisanu月1日计数他的新政权的年份，在这一年该日相应于4月3日；几年之后他取得国王头衔，却并不改变这样的计数。他的马其顿和其他希腊臣民也采用它，但是在应用于开始于秋天的马其顿年时，他们把历元提前了6个月，在公元前312年下半年而不是公元前311年上半年。在他死后——此时他的王国已从土耳其延伸到塔吉克斯坦——他的继承者保持了这种纪年法。在整个古代时期这一纪元一直传承着；犹太人（他们称它是“契约的计数”）继续使用到文艺复兴（在也门甚至延续更久），而聂斯脱利派[19]基督徒则一直

存留这一纪元到20世纪下半叶；从那时起，他们称自己为东方亚述教会，采用了历元为公元前4750年4月1日的纪元，这是据猜测亚述城[20]建城的日期。

其他的一些纪元，诸如阿拉伯行省纪元（历元为公元106年3月22日），行用地区相当狭小而且大多数存续短暂；存续时间较长的一个例外是西班牙纪元，历元为公元前38年1月1日。传说这与奥古斯都大帝有关；尽管没有明确的历史根据，但它可能是用来纪念罗马征服比利牛斯地区，因为在那里发现了最早（但是存有争议）的这一纪年的实物。这个纪元从4世纪晚期就无可辩驳地被证实；它曾经用于西哥特[21]的西班牙（除了极东部地区，那里它只在复地运动[22]之后才出现），并持续地正式使用到中世纪晚期：在阿拉贡到1350年，在卡斯蒂利亚到1383年，在葡萄牙到1422年。

世界纪元

在犹太人中间最终取代塞琉西纪元的是世界纪元，这是一种从创世开始计数的体系；为此目的，他们采用了已经用于历法计算的历元，即公元前3761年（参见第六章）。这样，从2004年9月16日至2005年10月3日的犹太年份是am 5763，常常（尤其在希伯来文中）写为'763；am代表*annus mundi*，即“世界年”，这是任何世界纪元中对于年的习用标识，包括由基督徒设计的世界纪元。这样的纪元的基础是《圣经·旧约》的年代学；《圣经·旧约》远称不上简单，而且其希伯来文本和圣哲罗姆[23]的拉丁文本比称为《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24]的希腊文译本要短得多。各种世界纪元主要是由讲希腊语的学者创设的，始于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25]（约221年），他把基督的被孕放在3月25日，并把它作为am 5501年的第一日。这通常被看作是公元前2—前1年（虽然并非他的所有时间计数都与此吻合）。近一个世纪之后，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斯[26]把创世的时间定在公元前5200年，基督降生是在am 5199年；然而，他更喜欢

称这一年为“亚伯拉罕2015年”。

通过哲罗姆所翻译的优西比乌斯的《编年史》译本的流传，后者的计算在西方成为标准理论；这一直延续到比德依据拉丁文的《圣经》把创世与耶稣降生之间的时间缩短到3952年为止。然而，其他的一些讲希腊语的学者更倾向于阿非利加努斯的较长间隔，或者是与之接近的间隔，但把创世校正到在星期天发生；最受青睐的是安尼亚努斯（Annianus，5世纪早期）的纪元，其中创世发生在Phamenoth月29日星期天 = 公元前5492年3月25日，而道成肉身，即耶稣基督的被孕，是在am 5501年Phamenoth月29日星期一 = 公元9年3月25日。然而，虽然以创世的周年纪念日来计数年份在神学上具有吸引力，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则很不方便；因此历元校正到创世前的民用历新年，即公元前5493年的Thoth月1日／8月29日。这导致道成肉身和基督降生不在同一年：亚历山大人不是把基督降生的年份定为am 5502年，而是把道成肉身定在了am 5500年，这样做的好处是把它放在了公元8年3月25日星期天；根据推测基督降生应该发生的am 5501年现在开始于公元8年8月29日。这成为在埃塞俄比亚仍在使用的一种纪元的第一年，在那里恩典年2000年将开始于旧历8月30日 = 2007年9月12日。

7世纪的《复活节年代记》（*Chronicon Paschale*，这么题名是因为它以记叙复活节的计算开篇）选择了公元前5509年3月25日为历元。然而，拜占廷晚期倾向于把创世推迟到9月1日民用年的开端；另一个不成功的选择方案是公元前5508年3月25日。在俄罗斯，创世年是常见的时间计量体系，最初从公元前5508年（少数时候从公元前5509年）3月1日起计，但是到了14世纪晚期从公元前5509年9月1日起计，直到彼得大帝[27]颁布敕令，定am 7308年12月31日的次日为旧历1700年1月1日。

持久的王权纪年

某些纪元由君主去世后延续下去的王权纪年发展而来：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见，琐罗亚斯德纪元是对国王伊嗣埃三世的纪念，他即位的第一年始于公元632年6月16日。有些这类纪元是天文学家创设的，他们认为连续计数很有用：有一种那波那萨尔纪元，以埃及人的“游移年”从Thoth月1日 = 公元前747年2月26日起计数，这是巴比伦王那波那萨尔的第一年（在埃及的计数体系中），正是从他治下开始天文记录被保存下来；另一种是戴克里先纪元。

当奥古斯都（这是他后来称帝后的称号）在公元前30年征服埃及之后，他在一般的行省体系之外作为国王通过总督——或称“行政长官”——统治埃及，按照已确立的非登基体系计数他的年份。他的继承者遵循这套程式，直到公元3世纪末，戴克里先皇帝把埃及纳入经他改革的行省制度，并引入了执政官纪年体系。这对于天文学家来说是极其不方便的，因为他们需要保存执政官名录才能弄清楚自己的观测记录；于是他们对此置之不顾，继续使用戴克里先的王权纪年计数年份（他即位的第一年是公元284/5年），即使在他于305年逊位后亦然。这是在亚历山大的复活节查定表中用以标识年份的方法；它扩展到也用于一般的计时目的，而且仍然是科普特教会所喜爱的纪元。然而，由于戴克里先在他掌权的最后几年发动了对教会的大规模迫害，从7世纪以来该纪元即更名为殉教士纪元。在殉教士纪元532年（ = 公元815/6年）之后，往往年份又以532年的复活节周期反复计数，以至于（举例来说）257年可能不是540/1年，而是1072/3年或1604/5年。

基督纪元

对迫害者名字的憎恶也是小狄奥尼西在他的复活节查定表中以道成肉身纪元取代戴克里先纪元的原因：“这样我们将更懂得我们希望的开始，而人类得以救赎的缘由，即我们的救世主的受难，将更清晰地照耀前方。”道成肉身不是受难；但是狄奥尼西把他的前辈维克托

利乌斯撇在了一边，后者在其复活节查定表中使用以公元28年为历元的受难纪元来标记年份，这是他的同胞普罗斯珀对两位杰米尼所在年份的错误的认定。（已知的受难纪元不止这一个：在比德时代的罗马，年份从公元34年起计数，或可能是33年；在东方还出现过其他日期。）

狄奥尼西把他的道成肉身日期视为不成问题也毫无争议，既未说明他是如何知道的，也未宣称这是他自己的发现。由于大多数更早的作者将道成肉身定在公元前2年，这件事似乎难以解释：一种说法是他误读或者误写了编著于3世纪晚期的优西比乌斯的《编年史》（或其哲罗姆的译本）中以奥林匹亚竞技会周期表示的戴克里先登基的年份；然而，由于基督降生于公元1年已见于354年编成的历法中，另一位学者迁怨于优西比乌斯，认为他在我们所知的由他制定的复活节查定表中有计算错误。

另一种推测是狄奥尼西故意捏造数字，以使闰年继续保持能被4除尽，正如在亚历山大的复活节查定表中一样；因为虽然闰日已经加在前一年中，但是正是在4的倍数的年份它会影响到复活节的计算，例如戴克里先纪元的224年。如果戴克里先纪元248年相当于道成肉身纪元的532年，而不是531年或533年，则始终是方便的。教会历史学家索克拉蒂斯〔28〕把关于瓦林斯〔29〕皇帝于*V Kal. Mart.* 登基的报告翻译成希腊文，用通常的方式把该日期还原为2月25日，却没有意识到那一年是闰年，正确的日期应是26日。要是他像我们一样知道这一年是364年，他本该能立即看出真相的。

不过，狄奥尼西的历元与它所取代的公元前2年一样，有着相同的缺陷：它们与两部福音书〔30〕的叙述都有出入。圣马太〔31〕讲述的博士〔32〕和诸圣婴孩殉道的故事要求基督降生发生在希律大帝〔33〕于公元前4年的逾越节去世之前至少2年，而圣路加的叙述则把它放在了公元6年，当时“昔兰尼乌斯”（Cyrenius），也就是P. 苏尔皮西乌斯·基林纽斯（P. Sulpicius Quirinius）正把朱迪亚〔34〕合并到罗马的叙利亚行省中去。关于这一问题还没有任何解答既令相信《圣经》所述皆为事实的信徒满意，又令非信徒满意。

道成肉身的年份

当传教士们说耶稣基督降生于多少年以前的圣诞节时，他们总是给出当年的年份，这就意味着基督降生发生在公元前1年12月25日[35]；这正是那些从那个日期起计数纪元的教会和修道会的观点（参见下文）。相比之下，虽然这是狄奥尼西19年周期中的第一年，比德却根据爱尔兰的文献资料，认为他把道成肉身放在与这个周期的第二年相吻合的那一年，即公元1年；这更符合以当前的年份而不是以已经过去的年份来计数的倾向，虽然243年有人设计了一种按照出埃及一事计算已流逝的年份的纪元。狄奥尼西本人不大可能想过这个问题。

公元纪年的传播

狄奥尼西的道成肉身纪元与维克托利乌斯的基督受难纪元一样，原来都是为复活节查定表而设计的；有几个作者把它用于年代的比较计数，一般与和它不相一致的优西比乌斯的计年法并行使用。然而，在复活节查定表的空白处写上编年史或简要记载下一年中事件的习惯，使得纪元体系和年份建立起了更为紧密的联系；爱尔兰和英格兰的修士们更乐于这么做，因为在他们看来，罗马皇帝是外国的君主，而他们的国家分属于好几位国王和公侯。

虽然在爱尔兰确定年份的通行方式——至少在教士们的写作中——是用1月1日的星期和阴历日期，但是我们发现早至658年已存在明白无误的维克托利乌斯基督受难纪元的纪年体系。7世纪晚期在诺森布里亚，狄奥尼西的复活节计算法与维克托利乌斯的相比占了上风，因此，当弗里西亚人[36]的使徒威利布罗德[37]在日历中记录下他“于基督道成肉身以来的第690年”越海至法国，于695年被授以大主教一职，并于728年还在世时，他使用的正是狄奥尼西的纪元。

然而，最重要的时刻是比德决定在他的《英格兰人教会史》中以

狄奥尼西的纪元（而不是以他在编年史中所用的世界纪元）作为纪年之用；《教会史》立时成为经典之作，使得道成肉身纪年体系引起了欧洲大陆读者的注意，此后他们即在适当的时候开始采纳它为己用。虽然也有其他一些历元被提了出来（如10世纪弗勒里的阿波建议的公元前22年和11世纪富尔达的马里安纳斯·斯科图斯〔38〕建议的公元前23年，都是为了挽救基督受难发生在3月25日，即公元12年*luna XIV*的西方传统），且11世纪洛撒林贾的盖尔兰图斯（Gerlandus of Lotharingia）通过在公历纪年中扣除7年而在儒略历中采用亚历山大的道成肉身纪元，但是狄奥尼西的纪元还是占了上风，甚至取代了根深蒂固的西班牙纪元，而且超出基督教世界，成为了世界范围的标准。

“基督前”的日期计数

基督纪元是历元前的日期以“历元前某某日期”为标注的唯一纪元；如果说在中世纪人们还偶尔会以罗马建城或西班牙纪元之前多少多少年作为非正式的参照去比附一些事件，那么自18世纪以来，以“基督前的年份”（公元前）来计数，和以“我们的主的年份”（公元）来计数一样，成为了一种规范。主要的抵制来自于研究古罗马的德意志历史学家，他们倾向于把“瓦罗〔39〕的”罗马城建立日期视为标注，而只是在基督纪元的历元之后才转换为基督纪元，以至于在753年之后紧接着就是1年；这种用法现已废弃。

天文纪年

虽然在通常的应用中公元1年之前是公元前1年，但是在天文学的计数中，1年（“年”字并不标出）之前是0年，再前1年是-1，相应于公元前2年；相应地公元前45年是-44，公元前100年是-99，依此类推。这不仅有助于计算（从-7到3是3-（-7）年 = 3 + 7年 = 10年），

而且使所有能被4整除的年月都是闰年；在通常的计年中，这只能应用于公元后的年份，至于公元前的闰年，要看是否符合4*n*+1的形式。

纪元的意识形态内涵

虽然王权纪年可能在政治斗争中传达一种信息，但是就年代序列而言，意识形态最鲜明的形式是纪元。我们已经见到过许多实例，这里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在伊朗，当穆罕默德·礼萨国王（Mohammad Reza Shah）于Hejri（法尔斯语的发音为*hijrī*）太阳历的1354年Esfänd月24日（相应于1976年3月14日）颁布一种从居鲁士大帝[40]公元前559年登上波斯王位时计数的新的Shahänshahi（“帝国的”）纪元、于一周后（1354年是闰年）2535年的Nawruz开始实行时，这引起了一场动乱。

这一举措是为把当时的王朝与古代光荣的阿契美尼德王朝[41]联系起来的诸多尝试之一，但被人民认为是对伊斯兰教的冒犯。设想一下如果墨索里尼不是设立了以1922年10月29日为历元的法西斯纪元，并让其与基督纪元并用，而是以罗马纪元取代基督纪元，以至于1923年成为2676年，一个西方读者可能会稍微体会到民众因这一举措而感到的愤怒。民众的抗议迫使国王从1357年Shährivar月5日（1978年8月27日）起又恢复了Hejri纪元。

基督纪元的地位已牢牢确立，因其宗教的起源而向它提出质疑已不起多大作用；事实上，在基督教从来不是大宗教的中国，不信奉宗教的共产党人将它定为官方纪元。然而，它的名称遭到非议；穆斯林随意地称它为*mīlādī*，即“基督降生”年，而欧洲大陆的非教徒则更喜欢直截了当地称“我们的”纪元（*notre ère*，*unsere Zeit*）（前者为法语，后者为德语——译注）；在讲英语的群体中，在犹太人中已作为标准使用（与希伯来语*ha-sefirah*，即“计数”比较）的“公元纪元”（Common Era）这个词在美国的学术写作中流传开来。甚至一些

基督徒也接受了它，不论是出于反对改变宗教信仰的精神，还是因为没有根据去相信纪念基督诞生的这一纪元的历元是这个事件发生的真正日期。尽管如此，如果不是纪念基督的诞生，这一年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因为公元前1年或公元1年没有其他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的事件发生。

年的开始

如果要使道成肉身和基督降生都发生在同一年的话，那么它的开始一定不能晚于3月25日；但是这个日期对于计算年〔42〕是不可能的，因为复活节可能超前于它。然而狄奥尼西通常的阴历年预先假定一年开始于9月，正如在拜占廷那样（是比德从1月开始重新计算了它们）；如果不得不说明，他也许会说，他的历元年从9月1日起持续到8月31日，包含道成肉身，他是从它开始计数年份的，但不包含基督降生，他并未从它开始计数。

然而，他的西方读者要花上一些时间才能认识到道成肉身与基督降临的差别。计数年份常常并不是从公元1年1月1日——教会所厌恶的一个日期，因为它认为其未能成功废止的许多异教节日在这一天——而是从7天之前的公元前1年12月25日开始，这个日期是假定的基督降生日。尽管比德重新作了计算，这仍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的做法，也在本笃会的修道院里长期使用；但是它终于被另一与之匹敌的规则所取代，这正是从3月25日的道成肉身——即圣母领报，亦即圣母节——起计数。我们发现在10世纪晚期，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部分地区取历元为公元前1年3月25日，导致在12月31日之前的纪年数比现代的计数高1；除了在比萨以外，这一方法很快就不再受到青睐，因此它被称为“比萨的计算”（*calculus Pisanus*）。传播更为广泛的是取历元为公元1年的圣母领报，它在1月1日与3月24日之间的纪年数比现代的计数低1；这是佛罗伦萨和英格兰的特征，因此它被称为“佛罗伦萨的方式”（*stilus Florentinus*）或“英格兰教会的习

俗”（*consuetudo ecclesiae Anglicanae*）。

比萨和佛罗伦萨一直保持着它们各自的用法，直到1749年托斯卡纳[43]的利奥波德大公（Grand Duke Leopold of Tuscany）下令从1月1日起计数；英国的方式按1751年的议会法令作了改革（苏格兰从1600年起即使用1月1日）。威尼斯更愿意从道成肉身月的开端起计数，也就是公元1年3月1日，而且在官方文书中一直这样做，直到1797年共和国倾覆。如果说这种“威尼斯的惯例”（*mos Venetus*）比在一个月之内改变年份数的做法更加方便的话，那么法国的习惯——即“高卢的惯例”（*mos Gallicus*）——取一年的开始在复活节，则是更加麻烦了：但是即使在国王于1564年下令废除它之后，在法国的某些地方，当地人对这一敕令的抗拒使得它得以延用（在博韦西斯延续到了1580年）。

对文献严谨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年份数改变的日期在一国之内以及在国与国之间千差万别，其差异程度甚至比参考书中所讲的还要大。尽管如此，在拜占廷帝国以西的整个欧洲，即使是在采用从1月1日开始计数年份的现代历之前，“新年”和其在其他语言中的对应词通常也都是指称1月1日。

混合的体系

某些基督教编年史根据532年的复活节周期规定它们纪元的年份；在格鲁吉亚，从9世纪到19世纪，纪年按*Kronik'oni* 的年份给出，这是一种从公元781年或1313年起计数的复活节周期，相应于公元前5604年创世以后的第13或第14个周期。科普特教会的殉教士年份也可以归算为一个复活节周期的年份（参见此处）。

按特征标示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爱尔兰的教士普遍用1月1日的阴历月份日

期和星期内日期来标示年份；阴历日期可以根据Latercus、维克托利乌斯或狄奥尼西查定表来取，这取决于教堂的习惯。按特征标示年份也是中美洲太阳年的惯例，在那里即是年份在260日周期的*trecena* 和*veintena* 中的位置。

儒略周期、儒略日

使古代文献资料能够体现出年月顺序的工作始于博学大家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 [44] 的著作《时间校正篇》（*De emendatione temporum*，1583）；他借助了一种称为“儒略周期”的新的时间计数方法。这是一种7980年的周期，由19年的黄金数周期、28年的太阳周和15年的年期周期结合而成；由于在未曾改革的历法下，下一个与复活节周期同时结束的15年年期周期将发生在3267年，斯卡利杰把这一年定作jp 7980年（jp是儒略周期的英文缩写——译注），所以jp 1年是公元前4713年。对于公元前的任何一年，jp年份是从4714中减去这个年份，对于公元后的任何一年，则是在4713上加以这个年份；它在各周期中的位置分别是除以19、28和15的余数。这样，1583年是jp 6296，黄金数7，太阳周期24，年期11。

可惜的是，教皇格列高利的改革（斯卡利杰作为新教徒当然反对这一改革）刚刚废除了复活节周期，而年期又毫无实际用途；不过天文学家发现这个历元可以用来作为连续计数儒略日的基础，即是从jp 1年1月1日（也写为-4712 Ⅰ 1）星期一中午起，计数过去的天数的体系；这样从那时起直到jp 1年1月2日中午的24小时即为jd 0（jd是儒略日的英文缩写，这里的数字0为0日——译注）。若儒略日后随小数，代表从前一日中午以来过去了的一日的部分时间，这称为儒略日期。1925年起规定一日从子夜开始，为了与此相符并避免太大的数字，通常采用简化儒略日期mjd；它是儒略日期减去2400000.5。例如，2004年3月31日上午6时是mjd 53095.25，相应于儒略日期2453095.75.

儒略周期不应当与儒略年相混淆，后者是从公元前45年 = jp 4669年颁行儒略历的那年起计数的，岑索里努斯在公元238年曾经提到它，且一些早期的现代作者在讨论《圣经·新约》的年代学时曾经使用。这构筑了一个代替基督纪元的世俗的——而且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纷争的——极佳计时体系，它与历法、而不是与任何外部事件有关。但是它也有不方便之处，即闰年按$4n+1$的形式计算，而不是4的整数乘积，而更大的不方便则是改变人类普遍采用的纪元，即使在那些官方使用不同计时方法的国家也会导致混乱且代价高昂。

注释

〔1〕 提麦奥斯（Timaeus，约公元前356—约前260），希腊历史学家，西西里人，著有《历史》38卷。

〔2〕 伊皮凡尼乌斯（Epiphanius，约315—403），巴勒斯坦人，早期基督教教士。曾任塞浦路斯岛上康斯坦蒂亚（今萨拉米斯）主教。

〔3〕 普罗斯珀（阿基坦的）（Prosper of Aquitaine，约390—约463），基督教教义论辩家。

〔4〕 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483—565），拜占廷皇帝（527—565在位）。

〔5〕 爱德华六世（Edward VI, 1537—1553），英格兰国王（1547—1553在位）。

〔6〕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英格兰国王（1509—1547在位）。

〔7〕 威廉（征服者）（William the Conqueror，约1028—1087），法国诺曼底公爵，英格兰第一位诺曼人国王（1066—1087在位）。1066年秋领兵攻入英格兰，击溃英军，同年圣诞节加冕为英格兰国王。

〔8〕 爱德华（忏悔者）（Edward the Confessor，约1003—约1066），英格兰国王（1042—1066在位）。早年曾流亡至法国诺曼底，因尚无嗣指定诺曼底公爵威廉为继承人。临死前又指定戈德温家族的哈罗德为继承人。在后者登基后，威廉入侵英格兰并夺取王位。

〔9〕 亨利三世（Henry III, 1207—1272），英格兰国王（1216—1272在位）。

〔10〕 爱德华一世（Edward I, 1239—1307），英格兰国王（1272—1307在位）。

〔11〕 指耶稣的故乡巴勒斯坦。

〔12〕 卡佩王朝（Capetian Dynasty），中世纪封建时期自987—1328年的法国王室。其历代国王通过扩大和巩固王权为法兰西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13〕 戴克里先（Diocletian, 245—约316），罗马皇帝（284—305在位）。

〔14〕 路加（Saint Luke），根据基督教传说，路加是《新约》第3部福音书《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的作者和圣保罗的伙伴。

〔15〕 提比略（Tiberius，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帝国第2代皇帝，公元14—37在位。

〔16〕 奥林匹亚（Olympia），希腊古代宗教圣地和奥林匹克运动会发祥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当地史迹最早为公元前2000—前1600年。

〔17〕 这里作者所述有误，作者混淆了“年号”与“庙号”。年号是我国封建时代皇帝纪年的名称，历代皇帝都立年号，有时一帝换十几次年号。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起，明清两代一个皇帝一个年号。庙号是皇帝死后谥赠的尊号。例如，爱新觉罗·弘历生前在位时年号为“乾隆”，死后的庙号为“高宗”。上文所述乾隆年瓷器确系乾隆在世时制造。

〔18〕 塞琉古（Seleucus I Nicator，公元前358/354—前281），塞琉西王朝和亚细亚塞琉西帝国缔造者。曾为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部将。公元前321年马其顿帝国分裂，塞琉古成为巴比伦总督。公元前305年称王，为塞琉古一世。

〔19〕 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基督教的一派，源起于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现在该派信徒大多居住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

〔20〕 亚述城（Ashur），古代亚述的宗教中心，即今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底格里斯河西岸的舍尔加特堡。

〔21〕 西哥特人（Visigoth），哥特人（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日耳曼民族）的一个分支。4世纪时与东哥特人分离，不断侵犯罗马的领土，并在高卢和西班牙建立庞大的王国。

〔22〕 复地运动（Reconquista），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国家为从穆斯林（摩尔人）手中夺回被侵占的领土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从8世纪初开始一直延续至13世纪中叶。

〔23〕 圣哲罗姆（Saint Jerome，约347—419/420），早期西方教会中学识最渊博的教父，将《圣经》希伯来文《旧约》、希腊文《新约》译成拉丁文。

〔24〕 《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Septuagint），《圣经·旧约》现存最古老的希腊文译本，是根据希伯来文本译成的，约成书于公元前3—前2世纪。

〔25〕 阿非利加努斯（Sextus Julius Africanus，约180—约250），早期

基督教历史学家。他的最伟大著作是《年代志》5卷，叙述公元前5499至公元221年间的历史。

〔26〕 优西比乌斯（凯撒里亚的）（Eusebius of Caesarea，？——约340），4世纪基督教主教，教会史著述家。

〔27〕 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1725），俄国沙皇（1682—1721）和皇帝（1721—1725）。俄国伟大的政治家、组织家和改革家。

〔28〕 索克拉蒂斯（Socrates，约380—约450），拜占廷教会史学家、律师、第一个撰修教会史的在俗信徒，所著《教会史》叙述4、5世纪的宗教和世俗的史迹。

〔29〕 瓦林斯（Valens，约328—378），东罗马皇帝（364—378在位）。364年3月28日被其兄任命为同朝皇帝，统治帝国东部。

〔30〕 福音书（Gospels），《圣经·新约》的4卷，记叙耶稣基督的生平和受难。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31〕 马太（Saint Matthew，活动时期1世纪），耶稣的12使徒之一。据传是福音书中的《马太福音》的作者。

〔32〕 博士（Magi），基督教传说中的3位人物。他们靠导星引路，从“东方”到伯利恒，敬拜婴儿耶稣，称他为犹太人之王（见《新约·马太福音》第2章1—12节）。

〔33〕 希律大帝（Herod the Great，公元前73—前4/3），罗马统治时期的犹太国王，希律王朝的创建人。

〔34〕 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包括今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和约旦的西南部地区。

〔35〕 因为公历纪元没有0年，公元1年的前面一年就是公元前1年。

〔36〕 弗里西亚人（the Frisians），日耳曼人的一支，讲一种与英语很接近的语言，居住在弗里西亚群岛、荷兰北部等地。

〔37〕 威利布罗德（Willibrord, 658 ?—739），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传教士，荷兰主保圣人。

〔38〕 马里安纳斯·斯科图斯（富尔达的）（Marianus Scottus of Fulda, 1028—1082/1083），爱尔兰编年史家，用德文撰写了一部从创世到1082年的世界通史。

〔39〕 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前27），罗马最伟大的学者和卓有成就的讽刺家。

〔40〕 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公元前590/580—约前529），波斯政治家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开国君主（公元前559—约前529在位）。据《圣经》记载。居鲁士在巴比伦释放了囚禁的犹太人，使他们返回家园。

〔41〕 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an Dynasty，公元前559—前330），伊朗古代建立和统治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王朝。

〔42〕 原文为computistic year，指与计算luna XIV有关的年份，参见第四章。

〔43〕 托斯卡纳（Tuscany），意大利中部大区，濒临第勒尼安海，首府为佛罗伦萨。774年由法兰克人建为伯爵领地，1861年正式并入意大利。

〔44〕 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荷兰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比较各文明古国创造的计时方法，纠正错误，第一次把年代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附录一

埃及历法

月份		1年月份的第一天				
		公元前	公元前	公元前	公元前	公元前
旧名	新名	1322/1	592/1	238/7	26/5	139/40
洪水						
第1个月	Thoth	7月20日	1月18日	10月22日	8月30日	7月20日
第2个月	Phaophi	8月19日	2月17日	11月21日	9月29日	8月19日
第3个月	Hathyr	9月18日	3月19日	12月21日	10月29日	9月18日
第4个月	Choiak	10月18日	4月18日	1 月20日	11月28日	10月18日

续表

月份		1年月份的第一天				
		公元前	公元前	公元前	公元前	公元前
冬季						
第1个月	Tybi	11月17日	5月18日	2月19日*	12月28日	11月17日
第2个月	Mecheir	12月17日	6月17日	3月20日	1月27日	12月17日
第3个月	Phamenoth	1月16日	7月17日	4月19日	2月26日*	1月16日
第4个月	Pharmouthi	2月15日*	8月16日	5月19日	3月27日	2月15日*
夏季						
第1个月	Pachon	3月16日	9月15日	6月18日	4月26日	3月16日
第2个月	Payni	4月15日	10月15日	7月18日	5月26日	4月15日
第3个月	Epeiph	5月15日	11月14日	8月17日	6月25日	5月15日
第4个月	Mesore	6月14日	12月14日	9月16日	7月25日	6月14日

续表

月份	1年月份的第一天				
	公元前	公元前	公元前	公元前	公元前
下一年的开始	7月19日	1月18日	10月21日	8月29日	7月19日

*29日的月份

注意：月份的新名称是于公元前6世纪的太阳历中首次确认的；它们取自宗教仪式的阴阳历，这种历法调整得很好，使得阴历的Thoth月总是在阳历的Thoth月内开始。

附录二

亚历山大的复活节

如第四章所述，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地都成为标准的复活节的计算方法，是改造自依据亚历山大的计算结果的罗马历；在这个罗马历中，复活节的太阴历与经奥古斯都改革的民用年相对照（参见下文的亚历山大历）。

这一太阴历是一种名义上的犹太历，没有注意到应限定Tishri月1日是星期几的规则，现实中无论亚历山大或者其他地方的犹太人都没有使用过它。它包含12个月份，大小月交替，每月的开始都包蕴于相应的太阳月之内，类似于埃及的宗教历，而不同于每月的结尾包蕴于后者之内的西方历法。为了使年不早于Thoth月15日开始，在周期的第2、5、7、10、13、16、18年的末尾加上1个30日的闰月。民用历的闰日（相应于儒略历闰年中的8月29日，在周期内发生4次或5次）没有自己在太阴月中的日期；由于19×365 = 6935日以及19×354 + 7×30 = 6936日，周期的最后一年在第11个太阴月的末尾有一个“跳跃”，使得30的月龄在月份外的第5日（8月28日）达到。于是最后一个太阴月就从Thoth月1日至29日，即新周期中的第一个太阳月，而第一个太阴月从Thoth月30日开始。由于月份外的第5日的太阴月日期作为次年的岁首月龄，周期每一次开始时的岁首月龄会是30、29（由于“跳跃”使得第11个太阴月为小月）或0。

为了求得任何给定日期是星期几，亚历山大的占星术士们设计了一种两部分的算法。第一部分包括把戴克里先纪年除以4，略去余数，把商数加到整个年数上，再加上一个参数2，然后以7整除后取余数；如果没有余数，称答数为7。这个过程产生了这一年的“诸神之日”（诸神即掌辖各行星的神祇）；对于每个月在它们之上加上2，直到所求日期的所在月份，含该月在内，加上月份内日期，以7整除，取1至7的余数，这样即可求得给定日期是星期几。

然而，基督徒注意到“诸神之日”相应于一星期从星期三而不是从

星期天起计数的Thoth月1日的星期内日期，也因此相应于Pharmouthi月1日（3月27日）的星期内日期。于是他们未改变名称就采用了它，作为寻求*luna XIV* 之后的那个星期日的依据；举例来说，如果*luna XIV* 落在Pharmouthi月3日（3月29日）而且有7个诸神之日，他们就知道Pharmouthi月1日是星期二，那么Pharmouthi月3日是星期四，因此复活节将在6日（4月1日）。

由于往后每过1年给定日期的星期内日期都推后1日（如果中间隔1个闰日，那么要再推后1日），而且由于1星期内有7个日期，又4年为1闰年周期，日期与星期对应的整个周期就是7×4 = 28年（太阳周）。由于对于*luna XIV* 有19个可能的日期，复活节日期的整个周期就是28×19 = 532年；这就称为复活节周期 [1] 。然而，尽管亚历山大人知道这一点，他们通常制定的复活节查定表只覆盖5个默冬章，即95年，部分因为他们以为世界将在创世后的第6000年终结，相当于公元500年前后，部分因为按照亚历山大历法，在95年周期内同一日期在到达闰年之前会不断落在同一个星期内日期，一到闰年它就会有1个星期内日期的提前。（按照儒略历，在闰日之前，情况相同，但是从闰日往后以及因此在整个复活节季节 [2] ，次年的星期内日期将相同；另一方面，如果前 一年是闰年，那么后一年内的星期内日期将在闰日前与前一年的匹配，而在闰日后则不同。）

亚历山大历

Thoth月1日	8月29日（30日*）	1月1日	Tybi月6日（5日†）
Phaophi月1日	9月28日（29日*）	2月1日	Mecheir月7日（6日†）
Hathyr月1日	10月28日（29日*）	3月1日	Phamenoth月5日
Choiak月1日	11月27日（28日	4月1日	Pharmouthi月6

	*）		日
Tybi月1日	12月27日（28日*）	5月1日	Pachon月6日
Mecheir月1日	1月26日（27日†）	6月1日	Payni月7日
Phamenoth月1日	2月25日（26日†）	7月1日	Epeiph月7日
Pharmouthi月1日	3月27日	8月1日	Mesore月8日
Pachon月1日	4月26日	9月1日	Thoth月4日（3日*）
Payni月1日	5月26日	10月1日	Phaophi月4日（3日*）
Epeiph月1日	6月25日	11月1日	Hathyr月5日（4日）
Mesore月1日	7月25日	12月1日	Choiak月5日（4日）
月份外日期	8月24—28日（24—29日*）		

*儒略历中的闰年前年份

†儒略历中的闰年

注释

〔1〕 即复活节这天具有同一个太阳历日期、同一个太阴历日期和同一个星期内日期重复出现的周期。

〔2〕 可分别指从复活节至升天节之间的40日，或从复活节至圣灵降临节之间的50日，或从复活节至三一节之间的57日。

词表

accession-year system登基 - 年份体系：王权纪年体系之一种，其中从登基至新年的一段时期不予计数（这一术语偶尔也用于共和国首脑的登位——译注）

annus vagus（复数为*anni vagi*）（拉丁文）游移年：没有置闰的历法中的年份

apparent solar time视太阳时：按观测到的太阳计量的时间，日晷指示的即是；相对于平太阳时而言

artificial day人工日：白天期间

civil day民用日：历法中的日期，由法规或习俗确定

common year平年：没有置闰的年份

concurrent（早期为*concurrents*或*concurrent days*）星期换算数：表示年份内日期与星期内日期关系的数字；在西方的历法中以3月24日的星期内日期为标志

current years当前年份：包括当年年份的计数

decemnovenal cycle 19年周期：应用于亚历山大和西方复活节查定表中的默冬章

ekeweek超星期：作为置闰加入的星期

elapsed years过去年份：只对已经过去的年份的计数

embolism（形容词为*embolismic*）置闰：与*intercalation*同义，但特别用于指闰月

epact月龄或岁首月龄：一给定日期的阴历日期；也是一确定日期（通常这一日期选为阳历年的1月1日——译注）的阴历日期，用来表示给定的阳历年与阴历的关系

epagomenal days月份外日期：不包含在月份内的日期（在有些太阳历中，1年取12个月，每月包含30日，余下的5日即是——译注）

epoch历元：从其开始计数纪元的日期

equinox二分日：黑夜与白昼等长、各为12小时的那一天

feria（复数为*feriae*）星期内日期：在一星期内计数的日期

full month大月：在阴历中包含30日的月份；与小月相对

Golden Number黄金数：在19年周期中年份的位置

hollow month小月：在阴历中包含29日的月份；与大月相对

indiction年期：（可能）在公元312/3年确立的15年周期，也表示在这一周期中一给定年份的位置（例如，“第5年期” = 这一周期中的第5年）

intercalation（形容词为*intercalary*）置闰：在年份内添加附加的日、星期或月份；与*embolism* 同义

lunar calendar阴历：以月球环绕地球公转为基准编制的历法

lunar cycle太阴周：即默冬章，尤指用于拜占廷的复活节查定表的这一周期

lunation太阴月：从新月到新月的周期；也称朔望月

lune阴历日期：在阴历月份内的日期

lunisolar calender阴阳历：通过置闰使其与季节调适的阴历

mean solar time平太阳时：假设地球整年以等距离环绕太阳运行、调整太阳视运动而得的太阳时，即日常钟表指示的均匀时间；与视太阳时相对

Metonic cycle默冬章：19个太阴年加7个闰月的置闰周期

millésime年份数：年份的序号

Modern Style现代历：从1月1日起计数

natural day自然日：地球绕轴自转的周期，24小时；已改革的历法中的一日，若非因为改革某一事件会落到此日

New Style新历：民用的格列高利历

nominal day标称日：相应于未经改革的历法中同一日期的改革后历法中的日子

non-accession-year system非登基 - 年份体系：王权纪年体系之一种，其中从登基至新年的一段时期作为第一年（这一术语偶尔也用于共和国首脑的登位——译注）

Old Style旧历：儒略历

quantième月内日期：月份内的日期

saltus（全称为*saltusc lunae*）跳跃：从一个阴历日期到接下来第2个阴历日期之间跳过一日

sidereal year恒星年：太阳相对于恒星连续两次出现在同一位置之间的时间间隔

solar calendar阳历：以地球环绕太阳公转为基准编制的历法

solar cycle太阳周：28年的周期，年与星期之间的关系以及置闰周期按这个周期重复

Sunday Letter星期日字母：对于历法中的日期循环标注的字母A至G，或一给定年份内相应于星期日标注的字母

synodic month朔望月：与*lunation* 同义

tale of days计日：计数月份内日期的方法

tropical year回归年：从春分至春分之间的时段；天文学上定义为太阳的平黄经相对于动力学分点变化一整周经历的时间间隔

vernal equinox春分：二分日中在春天的那一日

“什么是时间？如果没有人问我，我知道；如果我试图解释它，我便茫然了。”

为什么要以种种方式计量时间？一星期为什么是7天？分和秒是何时产生的？为什么有些历法是阴历，而有些是阳历？本书列举一系列引人入胜的事例，从古罗马和儒略·恺撒设置闰年到20世纪20年代固定的复活节的方案，溯古访今，闲话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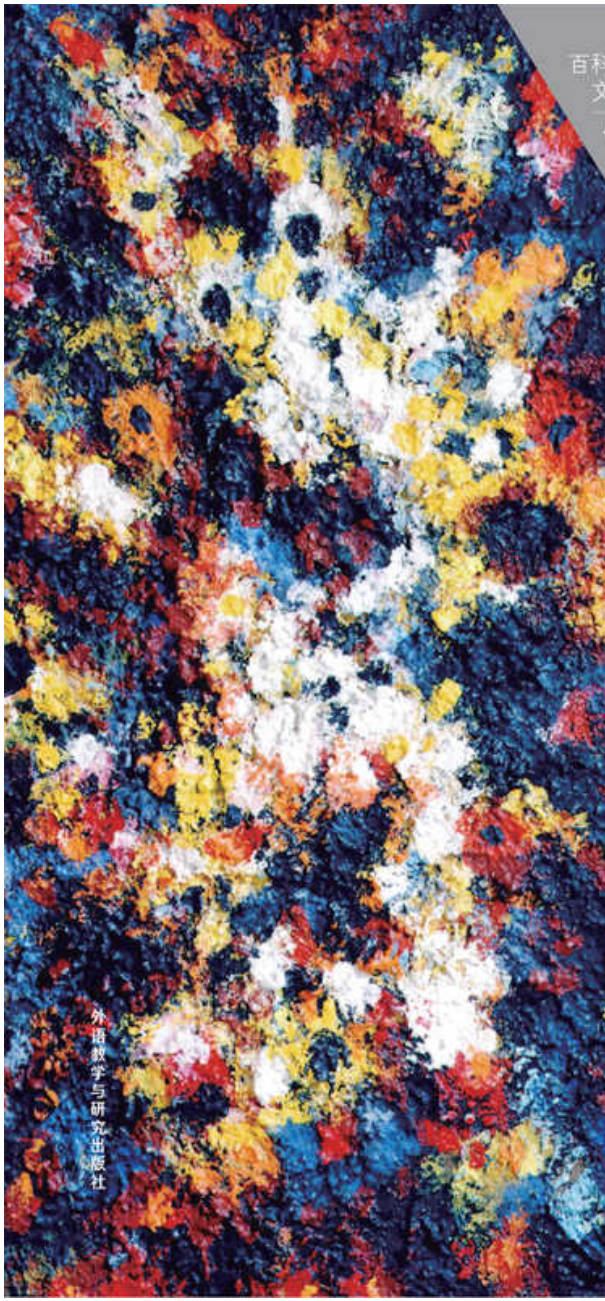

百科通识文库

49

认识宇宙学

彼得·科尔斯 著 罗阿理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认识宇宙学

彼得·科尔斯 著

罗阿理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63**

Cosmolog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1.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1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Peter Coles 20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识宇宙学 / （英）科尔斯（Coles, P.）著；罗阿理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16-5

I．①认… II．①科… ②罗… III．①宇宙学 - 普及读物 IV．①P15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789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16-5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前言
第一章　宇宙学简史
第二章　爱因斯坦的理论及其影响
第三章　第一原理
第四章　膨胀的宇宙
第五章　大爆炸
第六章　宇宙发生了什么
第七章　宇宙的结构
第八章　统一理论
后记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彼得·科尔斯，英国诺丁汉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曾与他人合作编写两部宇宙学教材，发表关于大爆炸理论的学术论文百余篇，并著有《爱因斯坦与大科学的诞生》和《霍金与上帝的心智》两本科普读物。

译者简介

罗阿理，天体物理专业博士，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目前负责我国的大科学工程“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谱望远镜”（简称LAMOST）项目的数据处理软件开发工作。多次出访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智利等国天文台进行合作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图　目

图1　古代巴比伦之神马杜克
图2　想象实验阐释等效原理
图3　光线的弯曲
图4　空间的弯曲
图5　开放、平坦和封闭的二维空间
图6　哈勃定律
图7　哈勃图
图8　红移
图9　更新后的哈勃图
图10　哈勃空间望远镜
图11　M100中的造父变星
图12　宇宙的年龄
图13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谱
图14　回溯时间
图15　物质的组成
图16　弗里德曼模型
图17　后发星系团
图18　X射线波段的后发星系团
图19　引力透镜
图20　仙女座大星云
图21　Lick（里克）星系分布图
图22　2dF星系红移巡天
图23　COBE探测的宇宙背景波纹
图24　哈勃深场
图25　结构形成的模拟

图26　BOOMERANG气球
图27　平坦的空间
图28　统一理论
图29　时 - 空泡沫

前言

本书是一本有关科学宇宙学的概念、方法和成果的入门读物。

宇宙学研究的主题是宇宙中存在的万事万物。整个宇宙包含着极其巨大和十分微小的物质，大若体积巨大的恒星与星系，小若基本粒子的微观世界。在这种巨大和渺小之间存在着由力和物质相互作用的复杂的层次结构和模式。在此中间我们能找到我们自身。

宇宙学的目的是将所有已知的物理现象统一到一个单一的、一致的框架下。这是人类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我们的知识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不过，该学科的迅速发展使得宇宙学家们相信现在是宇宙学的“黄金时代”。作者通过贯穿全书的宇宙学简史来阐释宇宙学是怎样发展的、怎样将不同的思路综合到一起、以及怎样在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对宇宙展开新的探索。

现在正是写这类书的时候，因为人们对宇宙中物质和能量的形式与分布的一致认识表明对宇宙的完整理解可能即将实现。虽然仍有一些有趣的难题尚未解决，但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期待令人惊喜的新发现。

第一章

宇宙学简史

宇宙学是物理科学的一个相对较新的分支。这种提法似是而非，因为在宇宙学探讨的问题中有些是人类在远古时期就提出的。宇宙是无限的吗？它一直就存在吗？如果不是，那它是怎样形成的呢？宇宙会有终结吗？从史前时代，人类就试图构建一些概念框架来回答有关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问题。最初的理论或模型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幼稚而毫无意义的。但这些早期的思考至少表明我们人类一直执著于对宇宙的思索。尽管当代的宇宙学家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语言和符号体系，但他们探索宇宙的动机和我们的远古祖先大致相同。本章主要是简单介绍宇宙学这一“主题”的历史发展并阐释一些重要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我希望这能成为进入其他各章的出发点，而在以后各章中将详细探讨这些重要思想。

神化中的宇宙

早期宇宙学大多是以某种形式的“拟人论”（赋予非人类的物体以人的特征）为基础的。其中一些观点认为，某些恣意而为的神赋予了物质世界生命，这些超自然力量可以帮助或阻挠人类的活动；另一些观点认为物质世界本身没有生命，但可由一个或一群神来掌控。无论哪种观点，都是用造物神化来解释宇宙的起源，而这些造物主的动机人类可以理解，至少是能部分理解。

世界上的创世神化存在着许多差异，但也有显著的相似之处。有一共同点是其意象往往都融合了顶极工匠的理念。因此自然界之美往往通过某个技艺超群的工匠的作品表现出来，这样的例子在所有的文化中都能找到。另一个经常出现的意象是秩序生于混乱，反映了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不断进步。还有一个相似之处是各文化都将宇宙看成一个生物学过程。出现在神化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将宇宙描述成形成于一颗蛋或一粒种子。

巴比伦著名的创世史诗《埃努马·埃里什》就包含了这些元素。这

个神话的诞生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450年前后，但它可能是以更老的苏美尔人的神话为基础创作的。在其关于创世的描述中，原始的无序状态与海有关。从海中诞生了一系列代表天空、地平线等世界基本属性的神。在马杜克（Marduk）和提亚玛特（Tiamat）两神的战斗中，海神提亚玛特最后战死。马杜克就用提亚玛特的尸体创造了大地。

古代中国神话中也有同样有趣的例子。其中之一是关于巨人盘古。在这个故事中宇宙始于一颗巨大的蛋。巨人在蛋中沉睡数千年，醒来后破壳而出，在这个过程中蛋粉碎了。蛋的一部分（比较轻和比较纯的碎块）上升形成天空，而那些比较重和不那么纯的部分形成大地。盘古双脚站在地上用他的双手擎起天。当天空越升越高，这位巨人也不断长高以维系天地之间的联系。最终盘古死了，而他的身体却为世界作出了贡献。他的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他的汗形成了雨，而他的毛发成了地上的植物，他的骨骼变为岩石。

创世传说的多种多样可以媲美世界文化的异彩纷呈，但限于篇幅，我在此不能举更多的例子。然而不管是非洲、亚洲、欧洲或美洲，这些传说中的相似之处相当显著。

图1　古代巴比伦之神马杜克。马杜克被认为在摧毁了提亚玛特后创造了宇宙的秩序，而提亚玛特是原始混乱的代表，这张图中他被刻画为马杜克脚下的一只

角龙。世界上许多神话都有这种秩序诞生于混乱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继续存在于现代科学宇宙学的某些部分中。

古希腊人

西方科学起源于希腊。古希腊人拥有他们自己的神和神话，其中有许多是从周边的文明中引入的。然而除了这些传统文化元素外，他们开始建立一套理论体系进行科学探索。因果关系的论述今天仍然是科学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而这一点应该归功于古希腊人。他们还认识到，观察到的现象可以用数学或几何学语言，而非拟人化的语言来描述和解释。

宇宙学理论作为可认识的科学规律开始出现于古希腊人构建的逻辑思考框架中，主要体现于泰利斯（Thales，公元前625—前547）和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610—前540）的思想体系中。宇宙学这个词本身就来源于希腊语cosmos，意为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系统或整体，既强调秩序性也强调整体性，在希腊语中cosmos的反义词是chaos（混乱）。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自然事物的基础是数字和几何。数学推理的诞生以及物质世界可通过逻辑和推理认识的思想的出现标志着科学时代的开始。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8）完整地解释了宇宙创生的过程，造物主根据“永恒至善”为原型创造了物质世界，但物质世界远非那么完美，因为这种“永恒至善”只存在于思维世界里。物质世界不断变化，但思维世界却永恒不变。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柏拉图的学生，根据这种思想勾勒出一幅世界图景，遥远的恒星和行星都作理想的圆周运动，而圆是“完美的”几何学的表现。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的球体。这个球体中从地球到月亮的范围是多变的区域，即柏拉图非完美的现实世界，而在这个范围之外的天体的运行则是理想的圆周运动。这种宇宙观在整个中世纪的西欧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希腊

人在收集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天文数据后发现，完美的圆周运动的观点并不为他们日益增多的天文数据所支持。尽管亚里士多德强调对宇宙的探索可通过思考和观测共同实现，但是直到公元2世纪托勒密（Ptolemy）在其编写的《天文学大成》中才提出了与当时收集的所有数据一致的宇宙的完整数学模型。

文艺复兴

大多数古希腊人获得的知识在黑暗年代基督教文化中逐渐失去，但在伊斯兰世界中却保存了下来。因此，中世纪欧洲关于宇宙的思考十分有限。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1225—1274）从拉丁译本中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当时并没有《天文学大成》的译本，他将异教的宇宙学思想融入基督教神学，其统治西方思想直至16、17世纪。

通常认为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但它对不同行星的运动应用了不同的数学公式，因此不能真正表示一个完整而统一的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描述了天体运动的现象而并未提供解释。哥白尼希望导出一个通用的理论，以相同的立足点考虑所有的事物。他只部分地完成了这个工作，但是他的理论成功地将地球从宇宙的中心移开了。最终是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彻底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为了解释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对行星运动的高精度观测结果，开普勒用椭圆轨道替换了亚里士多德的完美的圆形轨道。

通向现代宇宙学道路上的下一个重大发展应归功于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在他的不朽巨著《原理》（1687）一书中，牛顿指出开普勒所描绘的椭圆运动正是万有引力定律的结果。因此，牛顿重新构建了柏拉图式的理想世界，其中万物都遵循同一运动理论。在牛顿的理论中，宇宙如同一架巨大的机器，按

照非凡的造物主的意志规则地运动着，时间和空间体现了无所不在的“神”的永恒和无限。

直至20世纪初，牛顿的思想一直主宰着科学界，但是在19世纪，这台所谓的“宇宙机器”出现了瑕疵。机械论世界观伴随着第一次技术浪潮而出现。在随后的工业革命中，科学家们都热衷于引擎和热的理论。热力学定律指出，没有任何一台引擎可以完美地且永不停息地工作下去。在这个时期人们普遍开始相信“宇宙热寂”说，这种学说认为，如同一个弹起的球逐渐耗尽能量后静止一样，整个宇宙运动终将停止。

走向现代宇宙学

奥伯斯（Olbers　1758—1840）使牛顿的“宇宙引擎”再次受到重创。他在1826年提出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佯谬，尽管在他之前，包括开普勒在内的许多人都讨论过此问题。奥伯斯佯谬是源于对为什么夜空是黑色的思考。在一个稳恒态且无限的宇宙中，观测者的任何视线方向都会遇到一颗星，就像在无边无际的森林中，无论朝哪个方向看都会看到一棵树。于是可以得出结论，整个夜空应该和一颗普通恒星一样亮。观察到的夜晚的黑暗足以证明宇宙不可能既是无限的又是永恒的。

无论宇宙是否无限，可以进行合理解释的部分越来越多。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月球的轨道是基本的界限（距地球400,000公里远），超过这个范围，人类思维就无法企及。到了哥白尼和开普勒时代，可知的领域就扩大到太阳系边缘（数十亿公里远）。而到了十八、十九世纪，银河系被认为就是宇宙，而现在我们知道的宇宙至少比太阳系大10亿倍。这种银河系就是宇宙的观点遭到了某些人的反对，反对者认为，许多弥散在整个天空中的奇怪的漩涡“星云”非常像我们的银河系，却可以在极远的距离看到。这些天体后来被称作星系。两派观点的一场“大论战”在20世纪初爆发了，对此我在第四章将介绍。现在人

们终于认识到银河系的确只是数千亿个相似星系中的一个，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1889—1953）。

20世纪初，随着自然定律被重新改写，宇宙学进入了现代纪元。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于1905年提出了相对论，颠覆了牛顿的时空观。不久，他的广义相对论又取代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相对论宇宙学的第一项重大工作是由弗里德曼（Friedmann，1888—1925）、勒梅特（Lemaître，1894—1966）和德西特（de Sitter，1872—1934）共同完成的。他们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复杂的数学语言来描述宇宙。爱因斯坦的理论为现代宇宙学提供了认识基础，我将在下一章中花更多篇幅来介绍它。

尽管这些认识上的发展铺平了通向现代宇宙学的道路，但迈出最后一步的并不是理论物理学家而是观测天文学家。1929年，埃德温·哈勃发现宇宙包含了许多像银河系一样的星系，并发表了观测结果。这使人们认识到宇宙在不断膨胀。最终在1965年，彭齐斯（Penzias）和威尔逊（Wilson）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才证明（或几近证明）我们的宇宙起源于一个原始的火球——大爆炸。

现代宇宙学

爱因斯坦1915年发表的广义相对论标志着现代科学宇宙学的开始。广义相对论使对整个宇宙进行一致的数学表达成为可能。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物质和运动的性质与时空的变形有关系。这一点对宇宙学的重要性在于，时间和空间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独立于物质本体的，而是宇宙演化的参与者。广义相对论促使我们理解的不是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起源，而是时间和空间自身的起源。

爱因斯坦的理论是现代大爆炸模型的基础，而大爆炸模型是迄今对宇宙膨胀的最佳描述。按照这个模型，在150亿年以前的极高温度和密度条件下，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起源于一个原始高能辐射火球。最初的几秒钟之后，温度下降到大约100亿摄氏度，核反应出现

了，开始形成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原子。过了大约300,000年，温度下降到几千摄氏度，释放出我们现在可以观测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随着爆炸的扩张，时间和空间也在扩展，宇宙慢慢变冷变稀薄。膨胀的气体云和辐射在收缩过程中形成恒星和星系。我们今天的宇宙包含着大爆炸遗留的烟雾和灰烬。

第五章将更加详细地论述大爆炸理论。就目前来说，大多数宇宙学家承认它是基本正确的。它阐释了大部分我们已知的关于宇宙的整体性质，且能够解释大多数相关的宇宙学观测结果。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大爆炸理论并不完整。大量的现代宇宙学研究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理论的空白而使得整个理论体系更完整，更有信服力。

首先，爱因斯坦的理论本身无法适用于宇宙形成的最初时刻。大爆炸是相对论理论学家称之为奇点的一个例子，奇点处数学计算失效而可测量的量变成了无穷。尽管我们知道宇宙从某个特定阶段开始是怎样演化的，但奇点却使我们无法从第一原理推出宇宙最初的样子。因此我们只好求助于观测而不是单纯的推理来拼凑宇宙的初始状态，这如同考古学家试图从废墟中重建一座城市。所以当代的宇宙学家们正在收集大量的详细数据以便拼合出宇宙形成时的图景。

最近20年里的技术进步大大加速了观测宇宙学的发展，我们当前确实处在宇宙发现的“黄金时代”。观测宇宙学目前已经构建了巨幅的星系空间分布图，显示出那些“细丝”和“薄片”令人瞩目的大尺度结构。而配合这些巡天的是一些深度的观测，例如利用哈勃空间望远镜进行观测。哈勃深场曝光时间足够长，可以观测到非常遥远的星系，而我们接收到的光是这些星系在宇宙早期发出的。利用这样的观测我们可以揭示宇宙历史的演化。例如，微波天文学家现在能够通过观察原始火球产生的宇宙微波背景中的扰动来描绘出早期宇宙的结构。计划中的卫星实验，如MAP [1] 计划和普朗克巡天者计划（Planck Surveyor）将在未来几年里探测这些扰动的细节，它们探测的结果应该能够填补我们关于宇宙形成方面的知识空白。

天文观测可以用来测量宇宙的膨胀速率及膨胀是怎样随时间变化的，也可以通过大尺度地运用三角测量理论去探测空间几何。在爱因

斯坦的理论中，光线不必按照直线传播，这是由于大质量天体产生的引力会使空间弯曲。在宇宙学距离上，这种效应导致时 - 空自身封闭（如同球体的表面），引起平行的光路汇聚。它也可产生一个光线分散的“开放”的宇宙。介于两种观点之间的是认为宇宙是平坦空间的“习常”观点，欧几里得几何适用于其中。哪一种观点正确取决于整个宇宙的物质和能量的密度，大爆炸理论本身并不能预言。

大爆炸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经受了一次主要的检验，当时粒子物理学家试图用宇宙学方法来理解极高能量下物质的性质，而这种高能状态是他们的粒子加速器无法达到的。理论家们认识到宇宙早期可能发生了一系列巨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相变，相变过程在瞬间使宇宙迅速膨胀。这样一个阶段的“暴胀”被认为会使空间的弯曲变得平坦，由此引出了宇宙应是平坦的肯定预设。而这种观点与上面提到的宇宙的观测结果似乎是一致的。最近关于宇宙目前仍在加速膨胀的推测，暗示了神秘的暗能量的存在，它可能就是早期暴胀阶段的遗存物。

宇宙学家也已运用现代超级计算机试图理解在宇宙膨胀并冷却的过程中成块的宇宙物质是如何收缩成恒星和星系的。这些计算说明压缩的过程需要大量浓缩的外部物质，其密度大到足以帮助结构增长而不发出星光。这些不可见物被称为“暗物质”。计算机模拟的结构与通过观测得到的巨幅结构图几近一致，这更进一步支持了大爆炸理论。

新理论思想和新近获得的高质量观测数据相辅相成，将宇宙学从纯粹的理论领域带入到缜密的实验科学领域。20世纪初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研究工作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开始。

注释

〔1〕 NASA的MAP卫星于2001年6月30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9点46分从卡纳维拉尔角顺利发射——译注，下同

第二章

爱因斯坦的理论及其影响

我们都知道万有引力的作用。物体抛出后会落到地面。向山上跑比向山下跑费力。然而对于一个物理学家，万有引力的意义远不只限于其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我们探讨的物体尺度越大，引力就越重要。万有引力使地球围绕太阳运转，月球围绕地球运转，并导致了潮汐的产生。对于天文学的研究对象，万有引力是主要的推动力。所以如果想要理解整个宇宙，必须要搞清楚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

引力是自然界的一种基本力，物体之间的这种吸引作用普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间。事实上自然界共有四种基本力（引力、电磁力以及“强”和“弱”的核力）。万有引力的通适性使其与带电物体间的电磁力等有显著不同。电荷分成两种，正电荷或负电荷，而电荷间的作用力（电磁力）可以是吸引力（不同电荷之间）或者排斥力（相同电荷之间），万有引力则永远是吸引力。这也表明它在宇宙学中为何如此重要。

在许多方面，万有引力是极其微弱的。大多数物质主要靠原子间的电荷吸引力聚合在一起，相比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而言，电磁力强了许多数量级。但是尽管万有引力微弱，它在天文中仍是主要的驱动力，因为除了个别例外，大多数天体包含着完全相同的正负电荷因而彼此之间无法产生电磁力。

理论物理早期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艾萨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它把当时许多看似毫不相关的物理现象统一了起来。牛顿的力学理论可以归纳为3个简单定律：

1．任何物体在无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保持静止状态或做匀速直线运动。

2．动量的变化率与所施加的力成正比，方向与所施加力的方向一致。

3．对于每个作用力，总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

这三个运动定律具有概括性，应用到台球桌上台球的运动和天体的运动上同样精确。牛顿需做的就是对万有引力进行描述。他认为天体的圆周运动，例如月球绕地运动，就是由于指向运动轨迹中心的力的作用（就像某人抓着绳子的一端使绑在绳子另一端的砝码绕着他的头旋转一样）。同样地，引力也会使苹果掉到地上。在这两种情况下，引力都指向地球的中心。牛顿认识到描述运动的数学方程的正确形式应该是一种“反平方”律：“任何两个物体间吸引力的大小取决于两个物体质量的乘积和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

牛顿基于万有引力的反平方定律成功地解释了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约翰内斯·开普勒发现的行星运动规律。此成功是巨大的，使得以牛顿运动定律为基础的宇宙观统治了科学界两个多世纪，直至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

爱因斯坦带来的革命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年3月14日出生于德国的乌尔姆，但随后全家就迁到慕尼黑，他在那里度过了学生时代。爱因斯坦并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1894年当他家搬到意大利后他辍学了。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入学考试后，他最终于1896年被位于苏黎世的瑞士工学院录取。尽管他在苏黎世时学习成绩优异，但因为懒惰的名声，他没能在任何一所瑞士大学中谋到职位。1902年他离开学校进入了位于波恩的专利局工作。这份工作薪酬优厚，而且初级专利技术员的任务并不是特别繁重，这使他有充足的空闲时间思考物理问题。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发表于1905年。这个理论成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学术成就。更加不同凡响的是，该研究是爱因斯坦利用在专利局工作的闲暇，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完成的。他同年还发表了关于光电效应（促成了量子理论方面的许多发展）和布朗运动现象（由原子碰撞引起的微粒的振动）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狭义相对论远远超

越当时他自己的其他工作，以及世界上主流物理学同行的工作，其原因是爱因斯坦完全打破了对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相同的、具有绝对属性的时间概念。而绝对的时间概念根植于牛顿的宇宙学思想，大多数人认为是毋庸置疑而无需讨论的。只有天才才能冲破如此巨大的概念上的障碍。

相对性的思想并非源于爱因斯坦。伽利略早于他3个世纪就已经提出过关于相对性的基本理论。伽利略宣称只有相对运动的物体而没有绝对运动的物体。他给出了证明，如果乘船匀速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旅行，那么在封闭的船舱中没有任何实验可以使你感知你在运动中。当然，伽利略时代的物理学知识还有很多空白，因此他所了解的物理实验是相当有限的。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简而言之即是，所有自然定律对相对运动的观测者而言都是完全相同的。爱因斯坦特别将这个理论应用到由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创立的电磁场理论中，麦克斯韦的理论主要描述前面已提过的荷电物体间的作用力。麦氏理论的结论之一是（真空中的）光速是一个普适常数（一般用符号c表示）。站在相对论的观点看，所有的观测者无论其自身的运动状态如何不同，都将测量到相同的c值。这个结论看似简单但其影响却是革命性的。

爱因斯坦决定给自己提出一些具体问题：在一些包含信号灯切换的特定实验中将会观测到什么？他做了大量这类推理实验。例如，想象在运行的列车中央有一盏信号灯。在列车的两端分别各有一个时钟，当信号灯照亮它们时我们可以看到时间。当信号灯发光时，从列车中旅客的角度观察，列车的两端会同时收到光信号。时钟上看到的是相同的时间。

那么立于铁轨旁观察列车的人会看到什么情景呢？闪光灯的光在该参照系的传播速度与在列车乘客参考系下是相同的。但是坐在列车后部的旅客朝向信号灯运动，而坐在列车前部的旅客向远离信号灯的方向运动。铁轨参考系的观察者会看到列车后面的时钟比列车前面的时钟先被照亮。然而，当列车前面的时钟被照亮时，它的读数与后面

时钟读数相同！观测者会认为列车上的时钟出了问题。

这个例子证明了“同时”这一概念是相对的。在列车参考系下灯光到达两端是同时的，而在铁轨参考系下是不同的。其他奇怪的相对性现象包括时间膨胀（运动的时钟变慢）和长度压缩（运动的尺子变短）。这些都是在“所有观测者测量的光速是相同的”这一前提下的推论。当然，上面给出的例子有点不现实。为了达到可观测的效果，实验中的速度必需与光速c值有可比性。这样的速度在列车车厢中是难以达到的。不过已有实验证明时间膨胀效应确实存在。放射性粒子高速运动时，其衰变率会大大减慢的原因是它的内部时钟变慢。

狭义相对论也提出了最著名的方程$E=mc^2$，并推广到整个物理学中，表达了物质和能量的当量关系。这个方程也已被大量实验验证，是原子爆炸和化学爆炸等过程所遵循的原理。

尽管狭义相对论的成就无可置疑，但因为只考虑匀速运动而相当不完整。即使是牛顿自然定律的第一部分也是基于速度随时间变化而构建的。牛顿第二定律是关于物体动量变化率的定律，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加速度。狭义相对论严格限制在所谓的惯性运动中，即粒子的运动不受任何外力作用。这意味着狭义相对论不能描述任何类型的加速运动，特别是不能描述引力影响下的运动。

等效原理

爱因斯坦敏锐地洞察到如何将引力纳入狭义相对论。首先来考虑牛顿的引力理论。在牛顿理论中质量为m的粒子受到另一个质量为M的粒子的引力大小取决于两个粒子质量的乘积和粒子间距离的平方。按照牛顿运动定律，第一个粒子受力得到的加速度由$F=ma$给出。方程中的m称作粒子的惯性质量，它决定了该粒子对加速的阻滞效应。而在引力的反平方律中，质量m的大小决定了一个粒子对另一粒子产生的引力的反作用。因此它被称为被动引力质量。但是牛顿第三运动定律也告诉我们：如果物体A对物体B产生了一个作用力，物体B则对

物体A产生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这意味着m也必须是由该粒子产生的主动引力质量（也可称作引力荷）。在牛顿理论中，所有这三种质量——惯性质量、主动和被动引力质量都是等效的。但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任何等效的理由。难道它们之间不会有差异吗？

爱因斯坦认为这种等效性必须基于一个更深入的原理，这个原理称为等效原理。用他自己的语言就是“在所有局域的、自由下落的实验室中所做的物理实验是等效的”。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是我们可以不把引力当作独立的自然力来考虑，而将其看成在加速参考系中的运动学效应。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做的可能性，想象一个装配了物理实验室的升降机。如果升降机停在地面，实验将揭示引力的存在。例如，如果我们在升降机顶部安一个绑着砝码的弹簧，砝码将弹簧向下拉长。接下来，我们使升降机升至大厦顶部并让它自由下落。在自由下落的升降机中察觉不到重力。弹簧不被拉长，砝码以与升降机中其他物体相同的速度下落，即便升降机的速度在变化着。如果我们把升降机实验室移到太空，结果是同样的，因为这时已远离地球的引力场。失重状态与重力导致的自由下落状态非常相似。再进一步，我们可以想象升降机真的在太空中（地球引力场之外），上面安装着火箭。点燃火箭驱动升降机加速。在太空中无所谓上下，我们可以假设升降机加速的方向与曾经的运动方向相反。

弹簧将出现什么情况？答案是砝码沿着与升降机运动相反的方向移动，弹簧向着地板方向被拉长。（这与汽车突然加速时乘客的头向后甩一样）。这类似于一个引力场向下拉弹簧。如果升降机继续加速，弹簧保持拉伸状态，就如同升降机没有加速而被置于一个引力场中。爱因斯坦的观点是，这些情况不仅仅是相似，而是根本无法区分。在太空中加速的实验室中的任何实验结果与在地面引力场实验室中的实验结果完全一样。最后，回到我们开始考虑的升降机在重力场中自由下落。升降机中的一切都失重，弹簧没有被拉伸。这种情况等效于重力场外升降机内物体的静止情况。自由下落的观测者有理由认为他处于惯性运动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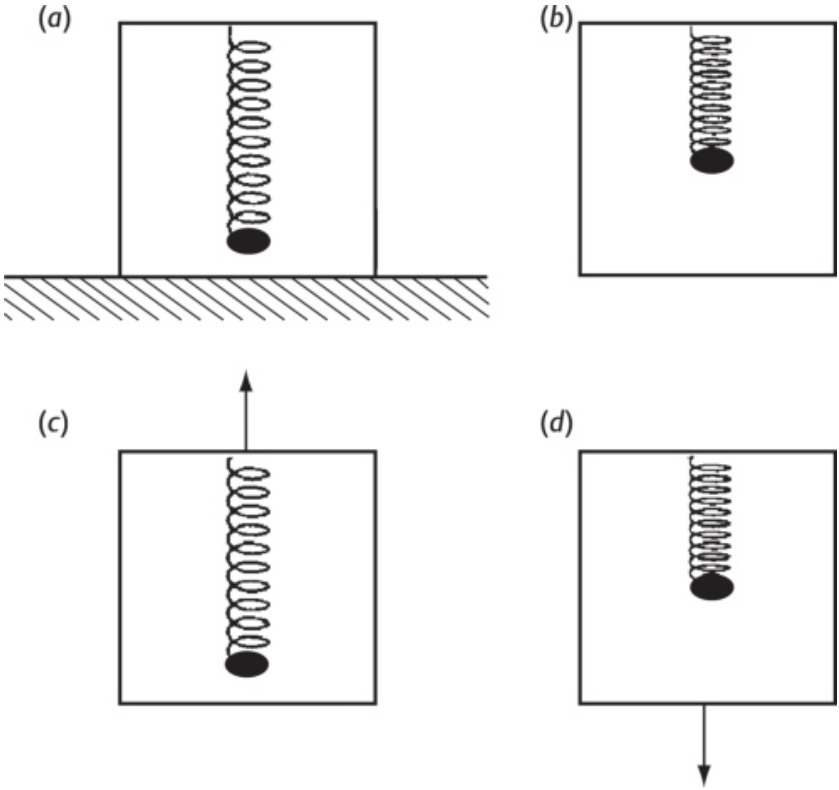

图2　想象实验阐释等效原理。升降机的顶部安装了一根弹簧，弹簧上绑了一个砝码。在图（a）中升降机是静止的，重力是向下的，弹簧被砝码拉长。在图（b）中升降机在遥远的太空，远离引力源且没有做加速运动，弹簧没有被拉长。图（c）中没有引力场，但升降机被火箭带动向上加速，弹簧被拉长了。图（c）中加速产生的效应与图（a）中引力的效果相同。在图（d）中升降机在引力场中自由下落，向下加速所以在内部感觉不到重力。弹簧没有被拉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砝码没有重量，这种情形等效于（b）。

广义相对论

至此，爱因斯坦知道了他应该怎样建立一套广义相对论理论。他又花了10年时间构建出这个理论的最终形式。建立这套理论需要他发现一套定律，能够解决任何形式的加速运动和任何形式的引力效应。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必须学习复杂的数学技能，比如张量分析和黎曼几何，并且发明一套能够真正描述所有可能的运动状态的数学表达式。他成功了，但成功来之不易。尽管1905年他发表的几篇经典文章思路非常清晰且数学计算简便，但后面的工作却陷入了技术上的困难。人们认为爱因斯坦是在完成广义相对论的过程中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的。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显然十分艰难。

理解广义相对论的细节是一件着实令人畏惧的事。即使在概念的层次，这个理论也非常难掌握。在狭义相对论中时间的相对性在广义相对论中也有论述，但又增加了由引力引起的时间膨胀和长度压缩等效应。问题还不仅限于时间，在狭义理论中至少空间不存在什么麻烦，而在广义理论中空间也出了问题：空间成了弯曲的。

空间的曲率

空间会扭曲的想法非常难以理解，即使物理学家也难于想象出这种情形。我们对自然世界的几何特性的理解基于几代希腊数学家的成就，特别是已确立的欧几里得 - 毕达哥拉斯理论体系：平行直线永不相交，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度等等。所有这些法则都可以在欧几里得几何定律中找到。但是这些定理和法则不仅仅是抽象的数学。我们从日常的经验中得知，它们能够非常好地描述物理世界的性质。欧几里得定律每天都被建筑师、测量人员、设计师、制图者以及其他任何关心形状属性和物体空间位置的人所使用。几何学是实实在在的。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熟悉的空间属性的适用范围不应仅限于建筑物和我们测量的土地。它们应该可以应用到整个宇宙。欧几里得定律应该是世界结构的组成部分。尽管欧几里得定律数学表达优美，逻辑上具有说服力，但它们不是唯一一套用来构建几何学体系的法则。19世纪的数学家，如高斯（Gauss）和黎曼（Riemann）就已认识到欧氏定律仅代表了在平坦的空间中几何的特殊情况。而在一些不同的体系中，欧氏定律并不适用。

例如，在一张平纸上画一个三角形。欧氏定理适用于此，所以这个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度（等于两个直角的度数）。现在考虑在一个球面上画一个三角形的情况。在一个球面上画一个有三个直角的三角形是完全可能的。比如在“北极”画一个点，在“赤道”上画两个点，距离为四分之一周长。这三个点形成了有三个直角的三角形，违反了欧氏几何定律。

这样的思考对于二维几何是合适的，但我们的宇宙是三维的空间。想象一个三维的曲面更加困难。但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对“空间”的思考都有可能犯错误。毕竟我们无法测量空间，而只能用尺子来测量空间中处在不同位置的物体之间的距离，或者在天文中用光线代替尺子来实现测量。将空间想象成一张平坦的或弯曲的纸张使我们能够将其本身视为可知的事物，而不是不可知的实体。爱因斯坦往往试图绕过譬如“空间”等抽象的实体，因为它存在的方式还不清晰。他更愿用推理导出实际观测者在特定实验中可能观测到的结果。

遵循这种思路，我们可能会问，按照广义相对论光线的传播路径是怎样的？在欧氏几何中，光沿着直线传播。光路的直线传播就意味着空间是平坦的。在狭义相对论中，光线也是沿着直线传播的，照此来看空间也是平坦的。但是广义相对论应用在加速运动中或存在引力效应的运动中。这种情况下光会怎样呢？

我们回到前面关于升降机的思考实验。取代安装在顶部的绑着砝码的弹簧，升降机中装备了激光束。激光束从升降机的一侧射到另一侧。升降机在遥远的空间，远离引力源。如果升降机是静止的或者匀速移动，光线可以垂直射到激光设备所对的内壁上。这是狭义相对论的预测。现在我们想象升降机装在一个火箭上，火箭已经点燃并向上加速。升降机外面的观测者看着升降机加速离去，但如果能从外面看到激光束的话，就会发现它仍然是直的。而升降机内的物理学家将看到奇怪的现象。在光从升降机内壁一侧射到另一侧的短暂时间内，升降机的运动状态改变了。升降机加速，当光线照射到对面内壁时，升降机的速度比光线射出的那一瞬更快。这就意味着，激光束射到对面内壁上的点比光线发出点略低。于是内部观测者看到，加速使光线向

下“弯曲”。

回忆一下弹簧的情形和等效原理。当没有加速但存在引力场时，效果与加速升降机相似。假设升降机静止于地球表面。观察者看到光线的传播应该与加速升降机里观察到的相似：向下弯曲。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引力使光线弯曲。然而，当光线不是直的而是弯的，就说明空间不是平坦的而是弯曲的。

空间弯曲难以理解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观察到这个现象。因为重力在通常环境下是非常微弱的。即使在太阳系中，引力也非常微弱，由引力引起的曲率可以忽略，所以光线仍然接近直线，我们根本无法看出不同。在这类情况下，牛顿运动定律基本适用。但某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准备面对强引力及其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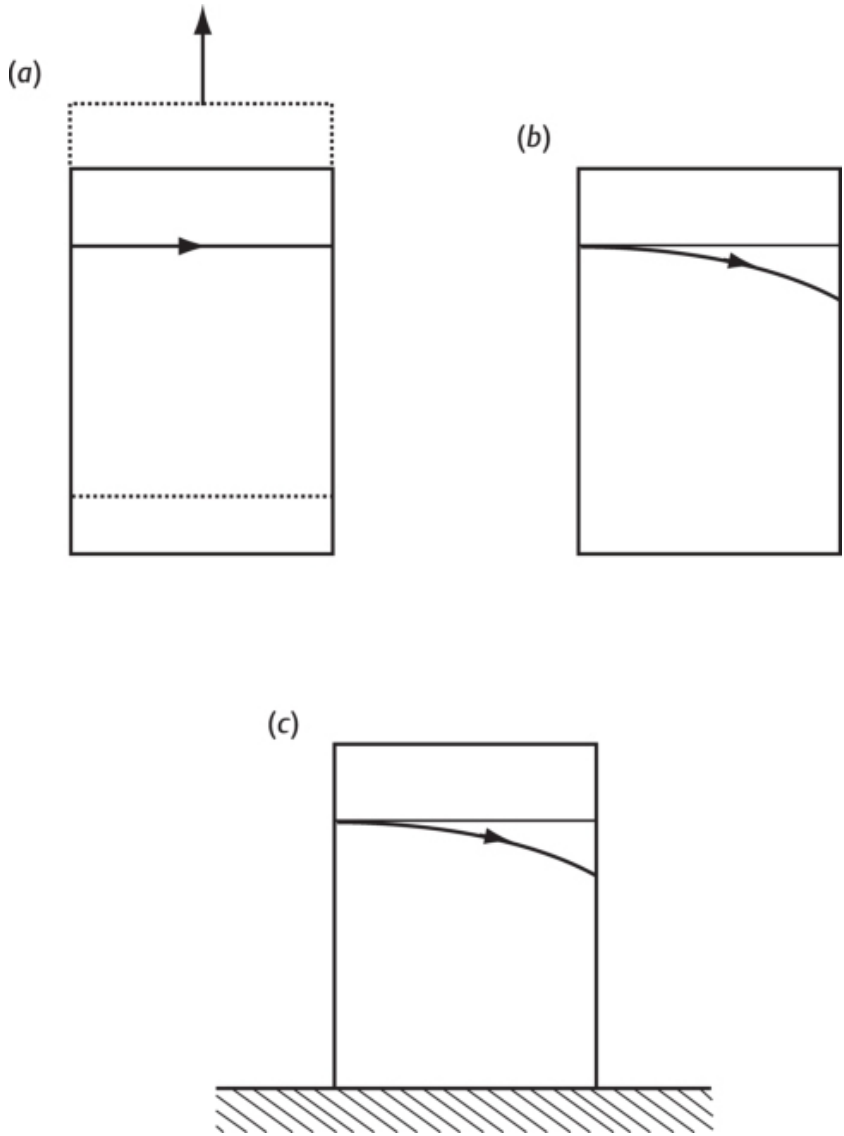

图3　光线的弯曲。（a）中升降机加速上行，如图2（c）一样。从外面看，激光束沿着直线传播。（b）是在升降机内部看到的现象，光线向下弯曲。图（c），处在引力场中静止的升降机中观察到与（b）相同的效果。

黑洞和宇宙

当大量物质聚集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中，牛顿理论会失效。此时引力非常强，空间扭曲了，光线不仅发生弯曲而且被捕获。这样的物体就是黑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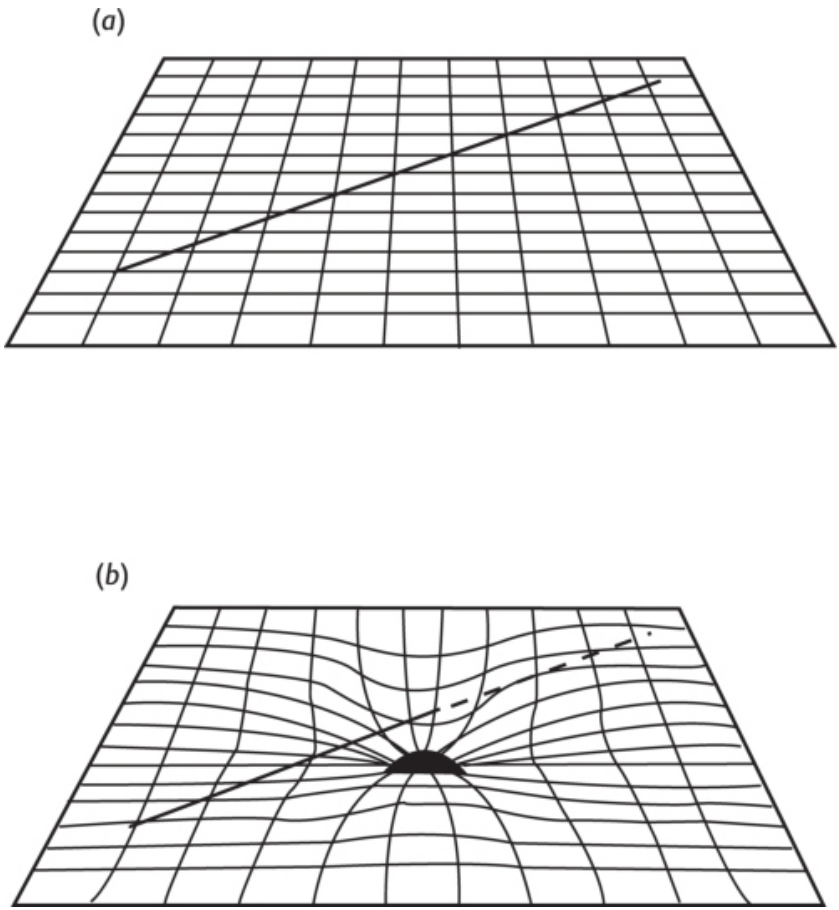

图4　空间的弯曲。没有引力源的时候光线是直的。如果一个质量巨大物体放在光路附近，空间的弯曲导致了光线的弯曲。

自然界存在黑洞的思想要追溯到1783年英国牧师约翰·米歇尔（John Michell），这个思想拉普拉斯（Laplace）也曾探讨过。不过，这样的物体通常都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爱因斯坦方程得到的第一个数学解就描述了这样一个物体。卡尔·

史瓦西（Karl Schwarzschild）于1916年，即爱因斯坦的理论发表仅一年后，就得出了著名的“史瓦西”解。不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部战线阵亡。这个解对应着物质的球对称分布，他最初的目标是试图建立恒星的数学模型的基础。然而不久人们就认识到史瓦西解意味着任意质量的物体都有一个临界半径（现在称之为史瓦西半径）。如果一个大质量物体的质量全部集中在史瓦西半径内，没有光可以从该物体表面逸出。地球质量的临界半径仅有1厘米，而太阳的史瓦西半径是3公里。制造黑洞需要将物质压缩到极高的密度。

史瓦西开创性的工作引发了黑洞研究的热潮。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严密的直接证据证明黑洞的存在，但是大量的证据表明存在许多隐形的天体。质量约为太阳1亿倍的黑洞周围的引力场，被认为吸走了某些类星系发出的强光。最近对距星系中心不远处恒星的动力学观测研究显示，存在极高质量物质的聚集，并且这些质量的大小与一般用来证实黑洞存在的质量相似。几乎所有星系在其核心都存在一个黑洞变得极有可能。质量相对非常小的黑洞则可能形成于恒星生命的终点，是能源耗尽、自身塌缩的结果。

当今人们对黑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黑洞并不是宇宙学发展的中心，所以在本书中不再进一步讨论。下一章将介绍爱因斯坦的理论在探索整个宇宙演变中扮演的角色。

第三章

第一原理

爱因斯坦于1915年发表了他的广义相对论。几乎同时，他开始应用这套理论解释大规模的宇宙运动。但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爱因斯坦由于缺乏试图解释的事物的信息而碰到了困难。宇宙究竟是什么样的？爱因斯坦缺乏天文知识，在他继续推进研究之前，他需要知道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他知道单纯通过思考是无法获知宇宙的概貌和运行方式。他需要观测结果和猜想的指引。

简单和对称

当作者试图用推理实验和图片来进行解释时，毫无疑问广义相对论提供了一套优美的概念框架，但事实是这样做需要使用最难的数学来描述宇宙。其复杂性，通过对比爱因斯坦的理论和牛顿的理论即可见一斑。

在牛顿的运动学理论中只需要解一个基本的数学方程。这就是$F=ma$，它将物体受到的力F与该物体的加速度a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十分简单，但在实际中用这种方法来描述引力就可能会非常复杂。原因是宇宙中的所有物质之间都存在引力。将这个思想应用到两个相互作用的物体的运动上是相对简单的，例如太阳和地球，但当增加物体时，情况就变得非常棘手。的确，尽管牛顿理论对两个在轨道上运行的物体有严格的数学解，但是针对这种复杂情况还没有一般解，即使仅是三个物体之间也没有。将牛顿的理论运用到众多引力物体组成的系统是比较困难的，并且一般需要超级计算机来进行描述。只有当系统具有某种简化对称性，如球体的对称性，或者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均匀分布时才有例外。

现实情况下，运用牛顿理论已是相当困难，相比之下爱因斯坦理论的运用则棘手至极。首先，牛顿只使用一个方程，而爱因斯坦的方程超过10个，且必须同时得到解。而每一个单独的方程也比牛顿的简单的反平方律方程复杂得多。由于方程$E=mc^2$ 给出质量和能量的等

价性，所有能量形式都受引力作用。一个物体产生的引力场本身就是一种能量形式，它也受到引力作用。这种鸡生蛋问题被物理学家称为“非线性”，在解这些方程时会出现难以解决的数学复杂性。这是广义相对论的情况。爱因斯坦方程的准确数学解是非常稀少的。即使是特殊的对称性，该理论对数学家和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等也是巨大的挑战。

爱因斯坦知道他的方程是难解的，除非他假设宇宙具有某种简化对称性或均匀性，研究才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在1915年人类对于宇宙物质分布还知之甚少。许多天文学家觉得银河是一个“宇宙岛”；另一些人相信银河是众多基本均匀分布于整个空间的天体之一。后面一种可能性更加吸引爱因斯坦。银河是一个由气体、尘埃和恒星组成的丑陋的混合体，如果它是整个宇宙，描述它将非常困难。第二种观点相对好一些，因为它可粗略地对银河系进行这样的描述：银河与其他系属于均匀分布的物质中的细微部分。爱因斯坦选择大尺度均匀性还有哲学原因，来自被称为马赫原理的思想。如果宇宙各处相同，他就可以把他的宇宙学理论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也就是利用物质分布定义一个特殊参考系来帮助他处理引力效应。

在继续研究缺乏观测证据的情况下，爱因斯坦决定他必须通过均匀化（各个地方都相同）来简化他所描述的宇宙，至少在比观测到的团块天体（星系）大得多的尺度上需要这样做。他也假设宇宙是各向同性的（各个方向样子相同）。这两个假设在一起构成了宇宙学原理。

宇宙学原理

这两个关于均匀性和各向同性的假设相关但不等价。在不另外假设观测者不处于特殊位置的前提下，各向同性并不必然暗示均匀性。在任何物质的球对称分布中都可以观测到各向同性，但前提是必须在其内部观测。一块圆形地毯的图案由一组同心环组成，只有站在图案

中心的观测者可以看到各向同性。人类并不是生活在宇宙中的特殊位置，这就是所谓的哥白尼原理，它揭示了现代宇宙学的历史渊源。观测到的各向同性与哥白尼原理共同构成宇宙学原理。任何一个看过夜空的人都清楚地知道银河系不是各向同性的。它的位置占据了天空的一条独特的带状区域。一个只有银河构成的宇宙与宇宙学原理相悖。

尽管“宇宙学原理”这个名称听上去很宏大，人们不应对其起源抱有错误的观点。更多时候，引入原理是为了在没有数据时使研究能够继续进展下去。宇宙学毫无例外地遵循着该规则。目前已知道这个原理所包含的猜想是基本正确的。20世纪20年代已确定星云确实位于银河之外，而后，对星系大尺度分布以及宇宙微波背景的观测研究（将在第七章中讨论）似乎表明宇宙在大尺度上是均匀的，如同宇宙学原理假设的一样。直到最近，天体物理学家才合理地、令人信服地论证宇宙具有这种特殊的对称性。大尺度均匀性的神秘起源曾被称作视野问题，也是第8章宇宙暴胀思想要涉及的问题之一。

爱因斯坦的最大失误

借助宇宙学原理，爱因斯坦建立了自恰的宇宙数学模型。然而几乎同时他陷入困境，这是他的理论无法避免的结果。因为他的理论认为，在任何一个应用宇宙学原理的方程解中，时间 - 空间必须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建立一个静态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宇宙学模型。他的理论要求宇宙或者扩张、或者收缩，尽管没有表述这两种可能性中究竟是哪一种。爱因斯坦没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但关于遥远恒星运动的问题，他请教了专家。可能是因为他提的问题有错，他得到的答案是，平均来看恒星既不是在接近也不是在远离太阳。这在我们的银河系内部的确是正确的，但是其他星系并不是这种情况。

爱因斯坦因此非常自信地认为宇宙应该是静态的，从而回到他最初的那些方程。他认识到他能保留方程基本性质而只做一个小小的修正，以抵消他的宇宙学模型随时间膨胀和收缩的趋势。他引入的修正

被称为“宇宙学常数”。这个新的理论术语表示了在极大尺度上引力作用的改变。宇宙学常数使空间自身有膨胀或收缩的趋势，在理论中它可以进行调整，来精确地平衡宇宙否则必须进行的膨胀或收缩。

有了这个暂时的解决方案，爱因斯坦继而建立了静态宇宙学模型，该成果发表于1917年。过了一些年，哈勃于1929年发表的研究结果使人们接受了宇宙其实不是静止的而是膨胀的这一思想。人们对爱因斯坦的最初模型失去了兴趣。既然无需阻止整体膨胀，他也就无需再用宇宙学常数。在随后的几年，他指出引入宇宙学常数这件事是他在科学上的最大失误。但是他真正的失误是没有预测到宇宙的膨胀而非引入宇宙常数本身。

尽管直到最近，大多数宇宙学家都不在他们的模型中引用宇宙学常数，但是它从未真正离开。如同生活在阁楼上的疯亲戚，这个常数还一直潜在于某些宇宙学研究的理论中。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宇宙学常数今天已经从隐匿中重获自由并再次扮演了主角，但在本章接下来的论述中先将它放到一边。

弗里德曼模型

在广义相对论于1915年发表以后，爱因斯坦并不是随后立即转向宇宙学的唯一一位科学家。俄国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弗里德曼（Alexander Friedmann）也是其中一人。正是弗里德曼而非爱因斯坦发展了膨胀宇宙的数学模型，这构成了现代大爆炸宇宙学的基础。他的计算是在彼得格勒被包围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因此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更加令人瞩目。弗里德曼于1925年，在他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22年）得到国际承认之前离世。斯大林后来解散了他曾工作过的研究所。再后来一位比利时牧师，乔治·勒梅特独立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正是勒梅特使这些思想在西欧得到广泛探讨和传播。

弗里德曼最简单的模型是爱因斯坦方程的一组特殊解，这组解是在宇宙学原理成立，并假设没有宇宙学常数的前提下得出的。宇宙学

原理在这个模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相对论中时间和空间不是绝对的。事件的这两个方面（“何时”、“何地”）的数学描述构成一个复杂的四维“时 - 空”，这是难以用概念定义的。总的来讲，爱因斯坦理论不能给出明确的区分空间和时间的方法。不同的观测者对于事件之间经历的时间可能有分歧，这与其运动状态和所经历的引力场有关。如果宇宙学原理成立就可以有特殊的方法来分析时间，使得问题简化。如果宇宙密度处处相同（假设宇宙是均匀的），那么物质密度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时钟。如果宇宙膨胀，粒子间的空间增大，物质密度相应降低。时间越长，物质密度越低。同样，较高的密度代表较早的时间。处于宇宙中任何位置的观测者都可以根据本地的物质密度来设定时钟，而所有时钟都会完全同步。测量时间的结果一般称作“宇宙学固有时”。

因为各处的密度相同，而且物质和/或能量的密度通过爱因斯坦场方程确定空间曲率，宇宙学原理也简化了因引力造成的空间弯曲。空间可以扭曲，但是空间中的每个点都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扭曲。事实上只能有三种情况发生。

各点都具有相同曲率的最直接的情况是，空间各点都没有弯曲。一般称为平坦宇宙。在平坦宇宙中光是直线传播的，欧氏几何的所有定律都像在“习常”世界中一样适用。但是如果空间不弯曲，引力哪里去了？平坦宇宙中的物质为何不使空间弯曲？答案是宇宙的质量确实造成了空间扭曲，而这被宇宙膨胀中的能量精确地平衡了；物质和能量相互抵消引力效应。在任何情况下，即使空间是平坦的，时 - 空仍然是弯曲的。

平坦宇宙显然是特殊的，因为它需要精确地平衡膨胀和物质的引力拖拽。当它们不平衡时，会出现两种情况。当宇宙具有较高的物质密度，其中的质量引起的引力效应将获胜并把空间拉回类似于三维的球体表面。数学上，这种情况下的空间曲率是正值。光线在这种封闭的宇宙中会汇聚。尽管平坦宇宙可以在各个方向无限扩张，而封闭的宇宙却是有限的。向某个方向出发后又会回到原点。另一种情况是开放的宇宙，但是比封闭的宇宙更难于想象，因为空间的曲率是负的。

在这个例子中光线散开，如图5所示的二维例子。

这些模型都反映了空间随时间的演化。一个封闭的宇宙是有限的空间，其存在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如果宇宙是封闭的，并在任意时刻开始膨胀，则未来膨胀将会变慢。最终宇宙将会停止膨胀并重新塌缩。开放和平坦的宇宙会永远膨胀。弗里德曼模型中，引力始终抗拒着膨胀，但只有在封闭模型中引力才能获胜。

弗里德曼模型有力地支持了现代大爆炸理论，但这些模型也引向大爆炸理论的最大弱点。如果采用这些运算来回推宇宙膨胀，从宇宙当前的状态向前追溯，我们会发现时间越早宇宙密度越大。如果继续往前推，这些计算将在一个奇异点处失效。

引力的奇异性质

在数学上，奇异性是一种病态性质，计算过程中某个特定量的数值在该处成为无穷。我们看下面的简单例子，假设来计算一个大质量的物体对一个微粒作用的牛顿引力。这个力与两个物体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如果想要计算当两个物体距离为零时该引力的大小，结果就是无穷大。奇异性并不总代表严重的数学问题。有时仅仅是因为没有正确选择坐标。例如在地图集中的某张标准地图上就可以发现一些奇怪的类似奇异点的情形。在看极点附近之前，整幅地图看上去合情合理。在标准的赤道投影中，北极并不像它本来的样子是一个点，而是从一个点延伸出的沿着地图顶部的一条直线。但如果你去北极旅行，那里并未出现任何灾难性变化。引起这个点出现的奇异性是属于坐标奇异性的一种情况。事实上采用不同的投影方式，这个点就会消失。如果试图穿越这种奇异点，也不会有任何异常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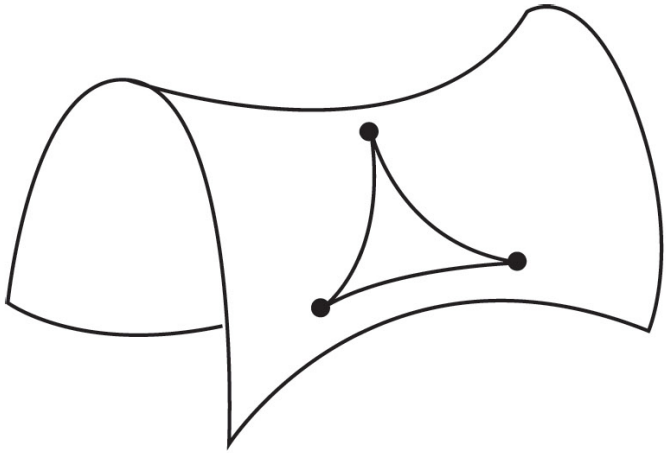

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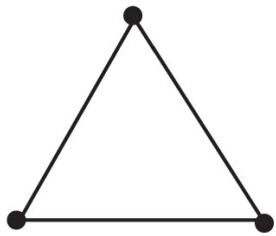

平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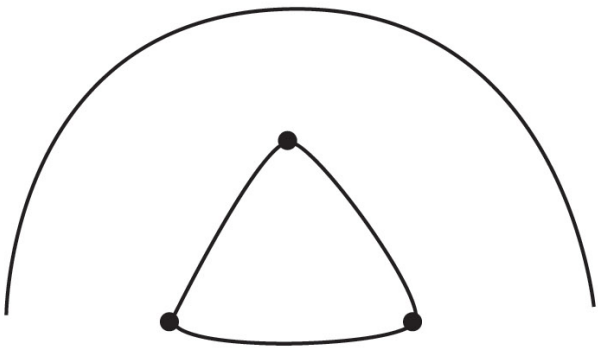

封闭

图5　开放、平坦和封闭的二维空间。在平坦的二维空间（中图）欧氏几何定律是正确的。这种情况下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度。在一个封闭的空间譬如球体（下图），三角形内角之和大于180度。而对于一个开放空间（如图中显示的马鞍形），三角形内角之和小于180度。

在广义相对论的解中出现奇异点的频率相当高。有些是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坐标奇异点，这些并不是特别严重。但爱因斯坦理论比较特殊，这是因为它预测了现实奇异点的存在，而这些奇异点处的真实物理量，诸如物质密度或温度等变得无穷大。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时－空的曲率也成为无穷。这些奇异点的存在表明在极高密度下基础物理学对物质的引力效应的描述是我们无法接受的。量子引力理论有可能使物理学家估算出黑洞内部的性质而无需把所有物理量变成无穷。的确，爱因斯坦在1950年这样写道：

> 这个理论是建立在区分引力场和物质的概念的基础上的。尽管对微弱场是有效的近似，但从推测看，对于物质的极高密度的物质是十分不足的。因此对极高密度我们不应该认为方程是有效的，而且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中是有可能不出现这样的奇异点。

最著名的奇异点的例子可能位于黑洞的中心。这个现象出现于一个标准球对称黑洞的史瓦西解中。在很多年中，物理学家们认为这类奇异点的存在仅仅是因为这种球形解的人为特殊性质造成的。然而经过一系列数学研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和其他人证明，无须特殊对称性，任何物体在受自身重力塌缩时奇异点都会出现。

好像是对预测到这些奇异点怀有歉意，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尽力将它们隐藏起来。史瓦西黑洞被视界包围着，有效地保护着奇异点之外的观测者。似乎广义相对论中所有的奇异点都以这种方式被保护着，而所谓的裸性奇异点在物理学上并不认为是真实存在的。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罗杰·彭罗斯的关于黑洞奇异点的数学性质的工作引起了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注意，他试图将彭罗斯的想法应用到其他地方。彭罗斯曾经考虑过当物体受自身引力塌缩后将会发生什么。霍金感兴趣的是这些想法是否能够应用到目前已知的膨胀的系统，比如我们的宇宙，去了解其过去发生了什么。霍金就此与彭罗斯进行了交流，他们共同来解决今天已广为人知的宇宙学奇异点问题。他们一同证明了膨胀宇宙模型预测到宇宙最初奇异点

的存在，那里的温度和密度都是无穷大。无论宇宙是开放、封闭或是平坦的，我们在理解上都存在着基本障碍：首先来自它的无穷性。

大多数宇宙学家都用与前面讨论黑洞奇异点相似的方法来解释大爆炸奇异点，也就是说在早期宇宙的极端物理条件下爱因斯坦的方程在某一点上失效。如果情况如此，理解宇宙膨胀的早期情况的唯一希望就是有一个更好的理论。由于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理论，所以大爆炸模型并不完整。特别是，我们需要知道宇宙的总能量来判断宇宙是开放还是封闭的，而光靠理论是无法得知哪种对宇宙的描述是“正确的”。这个缺憾可以解释在描述大爆炸时，为什么使用“模型”比使用“理论”更贴切。对宇宙初始状况的无知，也正是宇宙学家们仍然不能回答例如宇宙是否永远膨胀下去等一些基本问题的原因。

第四章
膨胀的宇宙

至此，我们已经集中讨论了理论物理学的进展，特别是广义相对论的提出，在20世纪20年代如何促进了宇宙学理论的重要发展。但在天文学家们用改进了的观测设备可靠地估算出了距星系的距离和星系的运动之后，这些新思想才被接受。本章将讨论这些观测结果以及它们是怎样与理论框架相吻合的。

哈勃定律

宇宙膨胀的性质可以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公式，就是著名的哈勃定律。这个定律指出，星系远离观测者的视向速度v正比于星系和观察者的距离d。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比例系数就是哈勃常数，用符号H或H_0表示。哈勃定律就写成$v = H_0 d$。v和d之间是线性关系，因为如果绘出一组星系样本所测得的速度和距离图（像哈勃所做的一样），你会发现它们在一条直线上。这条直线的斜率是H_0。哈勃定律的基本含义是，距离观测者两倍远的星系，其远离观测者的速度也是两倍，那些3倍远的星系的远离速度为3倍，以此类推。

哈勃于1929年发表了他的著名定律，他在研究一组星系样本光谱时发现了该定律。美国天文学家维斯托·斯里弗（Vesto Slipher）对这个发现也有很大贡献。早在1914年斯里弗就得到了一组星云（对星系当时的称谓）的光谱，也给出了这个关系，尽管他的距离估计非常粗略。斯里弗在1914年的美国天文学联合会第17次会议上提交了该结果，但不幸的是，此结果一直未发表。历史一直未对斯里弗作出的贡献给予应有的承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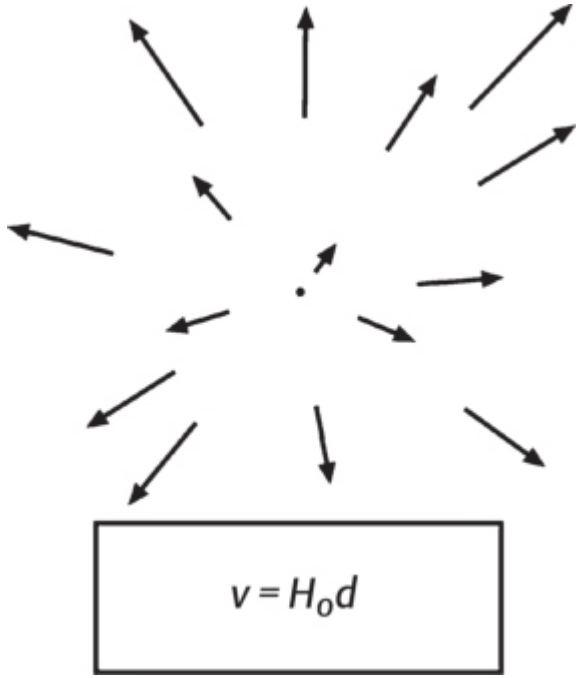

图6　哈勃定律。若从中心点进行观测，哈勃定律表明遥远星系的视向退行速度正比于它们的距离，所以越远的星系退行速度越快。而扩张并没有一个中心：任何点都可以看成是起点。

哈勃是怎样发现这个定律的呢？他使用的技术称作光谱学。来自星系的光是各种颜色的混合，是由所有其内部恒星产生的。分光镜将光分开，分成其组分的各种颜色，每种颜色可以单独进行精确地分析。使用棱镜也可以简便地达到相同的目的。普通白光可以用棱镜分光形成像彩虹般的光谱。除了也有不同的颜色外，天文光谱也包含着尖锐的特征线，称作发射线。这些线通过电子在不同能级间的跃迁产生于天体内部的气体中。按照化学元素的不同，这些跃迁出现在确定的波长；这些波长在实验室中可以精确地测量出。哈勃能够在许多他所观测的星系光谱中识别发射线。可是比较这些线在光谱中的位置与它们应该出现的位置时发现，它们通常所处的位置往往是错的。事实上，这些线几乎都向光谱的红端——较长的波长位置移动了。哈勃解释这个现象为多普勒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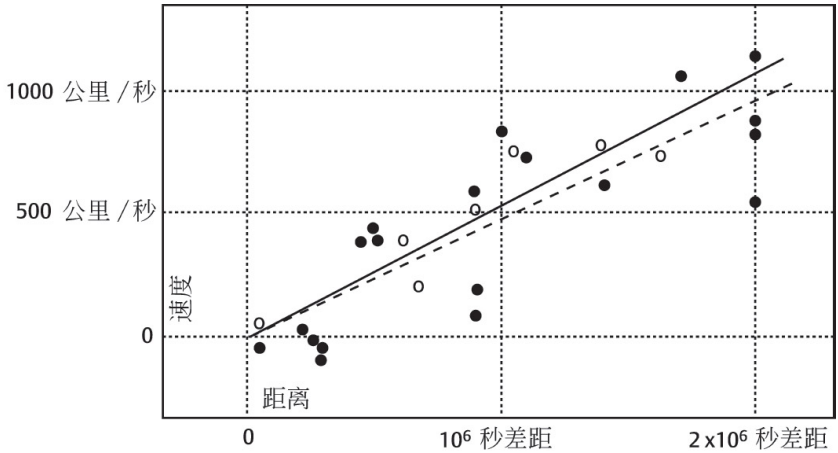

图7　哈勃图。这是哈勃于1929年发表的最早的速度 - 距离图。从图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某些近临的星系实际上正在接近银河系。在这张图中有相当大的弥散。

多普勒移动

多普勒效应最初是19世纪40年代在号声中被引入物理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第一个证明这种效应的实验是几个号兵在运动的蒸汽火车上做的。这个实验是研究当声音源和接收者之间有相对运动时声波的性质。我们从日常经验中很熟悉这种效应：接近的警笛比远离的警笛音调要高。理解这种效应的最简单方法是按照声波的波长记住不同的音调。高音调波长短。如果一个声音源以接近声音的速度移动，追赶它在前面发出的声波，视波长便会减小。相反，如果它不断离开它前面发出的声音，视波长便会增加，从而导致视音调降低。

多普勒效应在天文学中适用于光。尽管效应很弱，但当一个光源的速度达到光速的几分之一时就可以感觉到了。（声音的多普勒效应很小，除非车速相当快，与声速有可比性）。移动的发射源如果朝向观测者运动，产生较短波长的光，如果退行，将产生较长波长的光。在这两种情况下，光分别向光谱的蓝色部分和红色部分移动。换言之，就是蓝移（靠近光源）和红移（远离光源）。

但是如果光源发出白色的光，我们可能看不到任何移动。假设每条谱线都在波长上红移了一个量x，波长y处发出的光应该在波长y＋x处观测到。但是等量的光仍可以在波长y处观测到，因为波长y-x处发出的光移过来填充了移走的光的空缺。因此白光看上去仍然是白光，不管多普勒移动了多少。为了看到多普勒效应，我们必须要看出现在离散频率处的发射线，这里不会出现上述的补偿。一组射线整体在光谱中向红端或蓝端移动，但射线之间仍保持相对空间，因此很容易识别相对于实验室光源，它们移动了多少。

哈勃在他的测量样本中发现越遥远的星系红移越大，而比较近的星系红移较小。他假设观测到的是多普勒红移，所以他将谱线的移动转换为速度的测量。当他绘出“视向退行速度”相对于距离的图时，便得到了著名的线性关系。尽管哈勃定律现在用来代表宇宙的膨胀，哈勃自己并没有这样来解释他的结果。勒梅特可能是第一位用哈勃定律来解释宇宙膨胀的理论家。勒梅特发表于1927年的论文预示了哈勃的经典论文将于1929年诞生，但在当时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为该文用法语写成并发表于一本不太著名的比利时期刊。直到1931年英国天文学家亚瑟·斯坦利·爱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才将勒梅特的论文（用英语）发表在更有影响的《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用来解释宇宙膨胀的哈勃定律是大爆炸理论的主要支柱，勒梅特在天文学发展中迈出的这重要一步功不可没。

哈勃定律的解释

星系被观测到朝远离我们的方向运动的事实说明我们可能是膨胀的中心。这难道不是把我们摆在一个特殊的位置而与哥白尼原理相违背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任何其他观测者也会看到所有东西都在远离。事实上宇宙中的每一点对于膨胀都是等价的。另外，数学上可以更进一步证明，哈勃定律的成立必须要求有一个均匀和各向同性的膨胀宇宙，即要求宇宙学原理成立的宇宙。这样的宇宙的膨胀只能按哈

勃定律所描述的方式进行。

为了帮助理解上述问题，可以将三维空间缩减为气球的二维表面（这是针对封闭宇宙说的，不过为了说明情况，用哪一种几何形式的宇宙关系不是特别大）。如果在气球表面喷涂小点，然后将气球吹大，每个点看到其他点都是远离的，好像自己是膨胀的中心。但这种类推有问题，因为二维表面通常包含在三维空间中。我们似乎可以把气球内部空间的中心看作是真正的膨胀中心，然而这是不正确的。我们须将气球视作整个宇宙。它并不存在于另一个空间中，故球体的中心也不存在。气球上的每一点都是中心。难点在于，人们经常被头脑里的一个问题弄糊涂，大爆炸究竟是在哪里发生的？我们不是在远离最初的爆炸点吗？爆炸的位置在哪？答案是，爆炸发生在每一处，所有物质都在远离它。但是在最初，也就是大爆炸奇异点，这时所有地点和所有物质都在同一地方。

勒梅特之后的70年，哈勃定律仍然存在一些解释的困难。哈勃测量的是红移而不是速度。红移在宇宙学里一般用z表示，是测量观测到的射线相对其应处位置的波长变化。哈勃定律有时被叙述为红移z和距离d之间的线性关系，而不是退行速度和距离之间的关系。如果速度比光速c小很多，那将没有问题，因为此时红移大概是速度和光速之比。所以如果z和d成正比且z和v成正比，则v和d也成正比。但是当红移比较大的时候，这种关系就不正确了。此时该用怎样的形式呢？在弗里德曼模型中，对哈勃定律的解释出乎意料地简单。退行速度v和距离d之间的线性关系是严格确定的，即使速度任意大也是如此。这可能会使你困惑，因为你知道物体的运动速度不能超过光速。在弗里德曼宇宙中，离观测者距离越远，远离观测者的速度越大。一个物体的运行速度可以超过光速达到任意值。而这并不违背相对论，因为观测者无法看到它，这时红移已经达到了无限。

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是，距离d的意义是什么？怎样测量它？天文学家往往并不是直接测量一个天体的距离。他们不能将尺子延伸到遥远的星系，也不能像测量员用三角测量法测量，因为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取而代之的测量方法是靠天体发出的光。由于光是以一个有

限的速度传播的，而且哈勃让我们知道宇宙是膨胀的，所以天体现在已不在它发光时所处的位置了。天文学家不得不用间接的方法测量距离，并试图修正宇宙膨胀的影响来确定物体的实际位置。

但事实上哈勃定律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有用的。弄清天体的速度和距离未必很复杂。尽管红移一般被认为是多普勒移动，还有另一种更加简单且更加准确的方式来理解这个效应。在膨胀的宇宙中，任意点之间的距离在所有方向上都是增加的。想象一张绘图纸的扩展，纸上的方格在某个特定时刻是前面一时刻的放大。由于保持了对称性，只需要知道方格放大的倍数就可以将方格恢复到从前。同样，由于宇宙膨胀保持均匀性和各向同性，只需要知道尺度因子就可以从现在的数据获得过去物理条件下的图景。这个因子一般用符号a（t）表示，而它的值是由前一章讨论过的弗里德曼方程决定的。

我们需记住光是以有限速度传播的。从一个遥远光源到达我们的光一定是过去某个时刻发出的。在它发出光的时候，宇宙一定比现在年轻，因为宇宙在不断膨胀着。那时候的宇宙也一定小一些。如果宇宙从光的发射到光被望远镜探测到这一过程中按照某个因子膨胀，发射的光波在空间行进的过程中也以相同的比例拉伸。例如宇宙膨胀的因子是3，波长也变为3倍。这个增长为200%，观测到的源红移也就是2。如果膨胀因子只增加10%（即因子为1.1），红移就为0.1。红移就是由宇宙膨胀引起的时空拉伸。

这个解释如此简单以至于在许多年中都没有引起物理学家的注意。1917年德·席特（Wilhem de Sitter）发表了他构建的一个宇宙学模型，他发现在该模型中光线应该被红移。因为他使用了奇怪的坐标来阐述他的结果，他没有认识到他的模型代表了一个膨胀的宇宙，而是试图将其发现解释为某种奇怪的引力效应。对“德·席特效应”的困惑持续了多年，现在才知道它其实非常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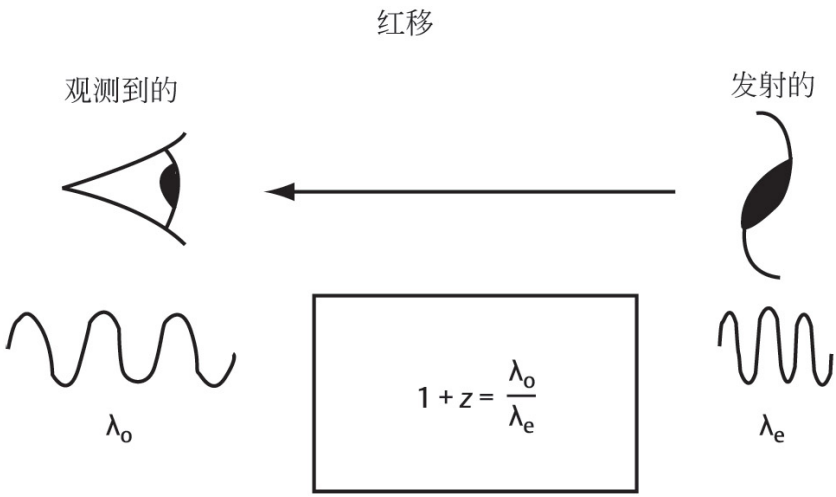

图8　红移。当光从星系光源传到观测者时，被宇宙膨胀拉伸了，最终到达的光波的波长比发出时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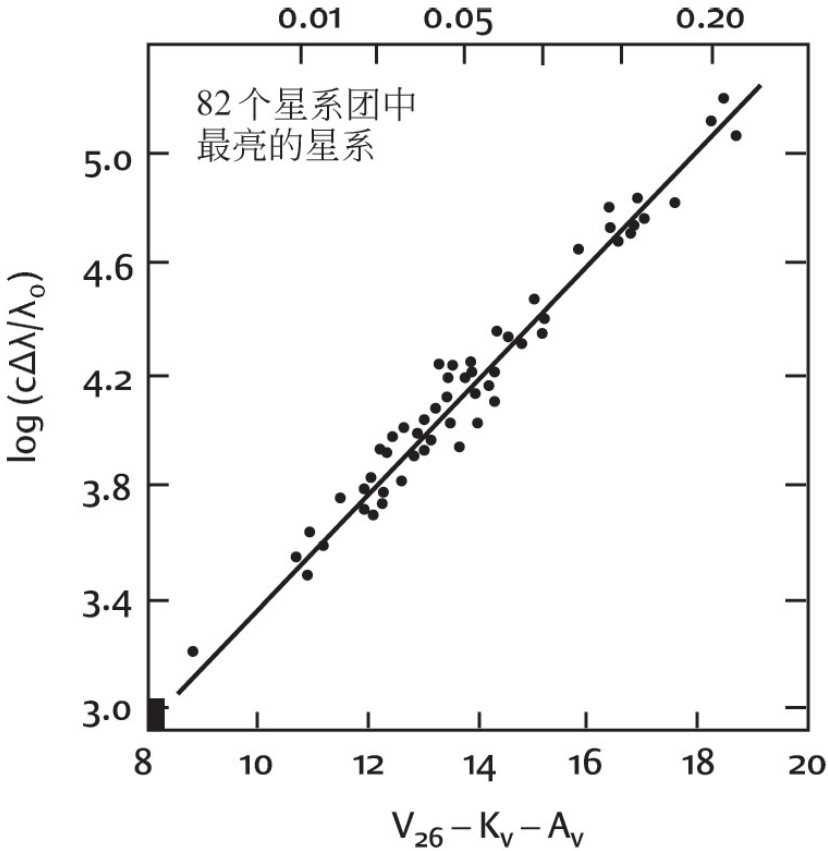

图9　更新后的哈勃图。这是根据阿伦·桑德奇（Allan　Sandage）的工作整理的较新的速度和距离关系。距离范围比哈勃原始图大很多。图中的左下角黑色小长方形包含了哈勃1929年的数据。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并非所有东西都参与膨胀。靠引力之外其他力结合在一起的物体不参与膨胀。这些物质包括基本粒子、原子、分子和岩石。当宇宙在它们的周围膨胀时，这些物质将保持固定的物理尺寸。类似地，内部引力为主的物体也抗拒着膨胀。行星、恒星和星系都是由非常强的引力束缚在一起而不随宇宙膨胀。尺度比星系更大的物体中，也不都是相互远离。例如仙女座星系（M31）实际上是朝着接近银河系的方向运动，因为这两个天体是由它们之间的引力相互吸引而靠近的。一些大的星系团也是同样地抵抗着宇宙膨胀而结合在一

起的。更大的天体不一定要被束缚（如单独的星系），但是它们的引力可能仍足够强，从而会导致哈勃定律失效。尽管哈勃定律的线性已经适用于相当远的距离，但这条直线有相当大的“弥散”。部分弥散是由统计误差和距离测量上的不确定性造成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在一个理想的、均匀的、各向同性的宇宙中运动的天体，哈勃定律才是严格正确的。我们的宇宙在足够大尺度上满足上述条件，但并不是完全均匀的。在哈勃图上，宇宙的成团性使星系从纯“哈勃流”偏移，引起弥散。

但是在最大的尺度上，没有足够强大的力来抗拒宇宙随时间膨胀的趋势。因此粗略地看，忽略所有这些相对局部的扰动，所有物质都是在远离其他物质，速度由哈勃定律给出。

探求H_o

本书到此已经集中讨论了哈勃定律的形式以及其理论解释。接下来将讨论哈勃定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常数H_o 的值。哈勃常数H_o 是宇宙学中一个最重要的参数，但同时也反映了大爆炸模型的一个缺陷。大爆炸理论不能预测这个重要的值的大小；而哈勃常数包含了理论无法解释的宇宙的最初状态的信息。通过观测获得H_o 的真实值是项非常复杂的任务。天文学家需要做两项测量。首先，用光谱观测获得星系的红移，给出它的速度，这一步相对直接。第二项测量是距离的测量，难度要大得多。

假设你在一个大的暗室中，屋中有一个灯泡放在距你未知远的地方。怎样确定距离呢？一种尝试是使用三角测量法。可以使用测量仪器如经纬仪，在屋中移动，从不同的位置测量到灯泡的角度，然后用三角法算出距离。另一种测量距离的方法是利用灯泡发出的光的性质。假设你知道灯泡的功率，比如说是100瓦。同时假设你有一个曝光表。用曝光表测量接收到的灯光的量，光强度随距离的平方递减，故可推出到灯泡的距离。但是如果预先不知道灯泡的功率，这种方法

就不适用了。另一方面如果有两个相同瓦数但不知具体值的灯泡放在屋子里，就可以非常容易地知道它们的相对距离。例如如果一个灯泡在曝光表上产生的读数是另一个灯泡的读数的1/4，则距第一个灯泡的距离是距第二个灯泡的两倍。但你却仍然不知道任何一个灯泡距离你的绝对值。

将以上想法用到天文学中，则使确定宇宙的距离尺度的问题更加突出。三角测量法是困难的，因为移动与待测距离相对数量级的距离是不可行的，除非特殊情况（见下）。利用恒星或其他光源测量绝对距离也是困难的，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方法获知它们本身的光度（或输出功率）。一个邻近的、光线微弱的恒星看上去与一个很远的非常亮的星相似，因为一般来说，功能最强的望远镜也无法分辨恒星的不同。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两个恒星（或其他天体）是相同的，测量相对距离则并不很困难。这些相对距离测量的校正是银河系外距离测量的中心任务。

客观地看待这些困难，我们应该想到在20世纪20年代前对宇宙尺度只有一个大概认识。在哈勃发现漩涡星云（当时的称谓）是在银河外面之前，普遍认为宇宙实际上相当的小。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星云是与银河系类似的漩涡星系，往往被认为代表了类似太阳系等结构形成的早期阶段。当哈勃宣布发现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定律时，他所得到的H_0的值大约是500公里/秒/百万秒差距（测量哈勃常数的常用单位）。这比现在估计的大出约8倍。哈勃在确认某类恒星为距离指示器时犯了个错误，当他的错误在20世纪50年代被巴德（Baade）改正后，哈勃常数值降到约250（单位与上面相同）。1958年桑德奇进一步将它修订为50和100之间，而且当前的观测估值仍在这个范围内。

现代的H_0测量使用一系列不同级别的距离指示器，级别逐级递增，从估测银河系内部恒星的距离为起点，直至测量最远距离的星系和星系团。但是基本思想仍然与哈勃和桑德奇提出的思想一致。

首先，我们利用局部运动学距离标准建立银河系的尺度。运动学方法不依赖一个天体的绝对光度的知识，类似于前面提到的三角测量方法。相对比较近的恒星的距离可以用恒星的三角视差来测量，即地

球在空间中的运动造成的一年中恒星在天空中位置的变化。距离的天文单位——秒差距（pc），就来源于这种方法：当地球从太阳的一面移动到另一面时，1秒差距远的恒星将产生1角秒的视差。作为参考，1秒差距大约等于3光年。重要的天体测量卫星依巴古能测量银河系中几千颗恒星的视差。

另一类重要的距离指示器是变星，其中最重要的是造父变星。这类天体的变化暗含着它们本身的光度信息。经典的造父变星亮度比较高，其光变周期P与绝对光度L之间显示出非常紧密的关系。对远距离的造父变星P值的测量能估计出L，也就得出距离。这些星非常亮，所以在银河系外其他星系中的造父变星也可以被观测到，它们将距离测量扩展到大约4Mpc（4,000,000pc）。造父变星距离测量的误差源于星际吸收、银河系旋转、尤其是对造父变星和另一类叫做室女座W型变星的混淆，这些误差是引起哈勃最初的测量值H_o 比较大的主要原因。其他的恒星距离指示器使得距离测量扩展到约10Mpc。以上这些方法总称第一级距离指示器。

第二级距离指示器包括HII区（炽热恒星周围的电离氢云区）和球状星团（由10万到千万数量的恒星组成的星团）。前者具有直径，后者具有绝对光度，这些天体平均值周围有较小的弥散。对这种相对指示器用第一级的方法进行校正，可将距离测量扩大到100Mpc。第三级距离指示器包括最亮的星系团和超新星。星系团可以包含多达约一千个星系。人们发现在一个富团中最亮的椭圆星系具有非常标准的总光度，可能是因为这类天体是以吞噬其他星系的特殊方式形成的。利用最亮的星系可以测量几百Mpc的距离。超新星是爆炸的恒星，可以产生大约相当于整个星系的光度。这些恒星因此很容易在遥远恒星中观测到。此外人们也探索了许多间接的距离估算方法，例如对星系的各种内禀性质之间关系的探讨。

测量H_o 的技术似乎已经具备了。但为什么对H_o 值仍知之甚少？问题是在距离测量的阶次中某一级的小误差也会以积累的方式影响高级别的测量。在每一级中会有许多修正：银河系的旋转效应、望远镜口径的不同、银河系中的吸收和视障，以及各种观测偏差。鉴于会有

大量不确定的改正，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得到精确的H_0 值也就不足为怪了。从哈勃时代开始围绕距离的测量一直有着争论。但是随着最新技术的发展，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结束这场争论的曙光。哈勃空间望远镜（HST）具有直接拍摄室女星系团各星系中恒星照片的能力，特别是能拍摄造父变星，这样就可以绕过在距离测量阶梯中传统测量方式的不确定性。HST在距离测量上的主要项目能够将哈勃常数的精确度定在10%左右。这个项目还未完成，但最新的H_0 值估计应该在60到70公里/秒/百万秒差距的范围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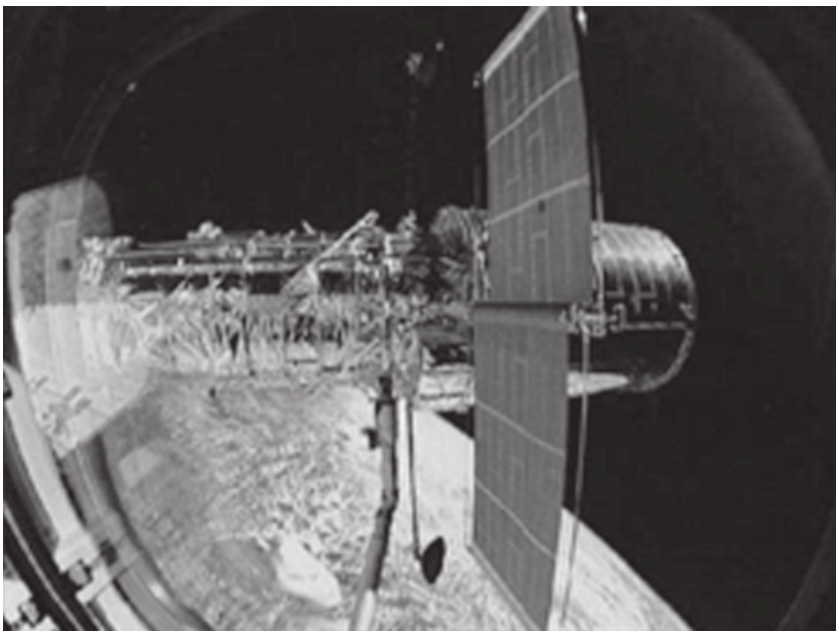

图10　哈勃空间望远镜。这张照片是1990年航天飞机进入轨道时拍摄的。这是哈勃空间望远镜承担的最重要的项目之一，通过测量距遥远新星系中恒星的距离来确定哈勃常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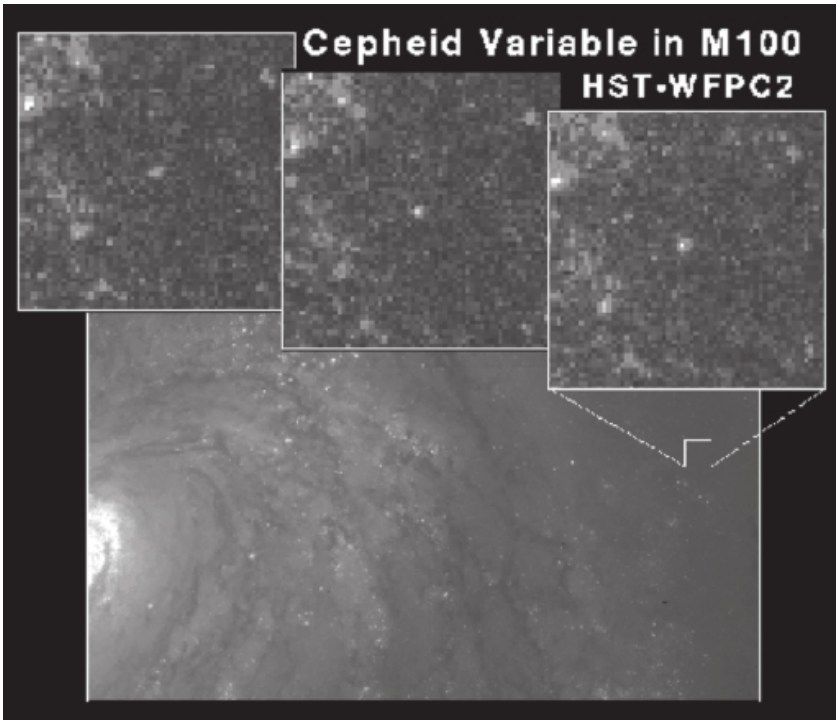

图11　M100中的造父变星。这张照片由哈勃空间望远镜拍摄。三幅图像显示的是变星，即现在已知的造父变星。哈勃望远镜能够直接测量距这个星系的距离，而不必使用在望远镜进入轨道工作前的间接方法进行测量。

宇宙年龄

如果宇宙膨胀的速率是固定的，则哈勃常数与宇宙年龄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简单。所有星系现在都在远离，而在宇宙形成之初，它们应该处于同一地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算出膨胀开始的时刻，那么宇宙的年龄也就是从膨胀开始到现在经过的时间。计算非常简单，宇宙的年龄就是哈勃常数的倒数。按照现在估计的H_0 的值，可算出的宇宙年龄大约是150亿年。

但是只有在一个内部完全是空的、没有物质使膨胀减缓的宇宙中，这样计算才是正确的。在弗里德曼的模型中膨胀减速量取决于宇

宙中物质的多少。我们并不能确切知道所需要的减速量的大小，但是很明显的是宇宙年龄要比我们的计算值小。如果膨胀正在减慢，那说明它过去膨胀得一定比现在快，那么宇宙只需要比实际更少的时间即可成为现在的状态。但是减速效应并不是很大。平坦宇宙的年龄应该约为100亿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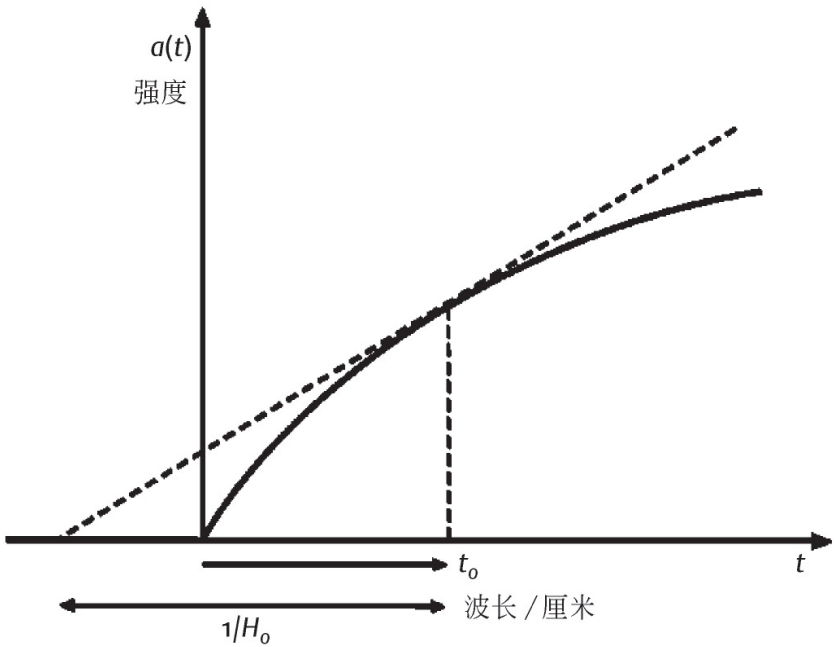

图12　宇宙的年龄。无论是开放的、平坦的还是封闭的宇宙，弗里德曼模型总是减速的。这意味着哈勃时间$1/H_o$ 超过了从大爆炸（t_o ）开始到现在所经历的真实时间。

另一种独立的估计宇宙年龄的方法是估算其内部物质的年龄。由于大爆炸代表物质和时 - 空的起源，显然宇宙内部不存在比宇宙更老的东西，但是确定天体年龄并不容易。我们可以用岩石中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来估计陆相岩的年龄，如铀235，其半衰期达几十亿年。这种方法十分易于理解，与放射性碳测年在考古中的应用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应用到宇宙学时需要使用比碳-14半衰期长很多的元素来得到非常大的时标。但是这种方法只限于给太阳系内的物质测年。月球

和陨石比地球上的物质年代久远，但它们在宇宙历史中最近才形成，因此对宇宙学来说并不适用。

测量宇宙年龄最有用的方法并不那么直接，最强的约束来自对球状星团的研究。这些星团中的恒星被认为是同时产生的，而这些恒星的质量非常轻，说明它们的年龄很老。由于它们都形成于相同时间，因此放到一起研究可以估计其演化过程。这将给出宇宙年龄的下限，因为我们首先必须给星团从大爆炸开始到它们形成留出一些时间。现在的研究显示这样的球状星团系统的年龄大约是140亿年，尽管最近些年对此一直有争议。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对于平坦宇宙模型构成直接的问题。球状星团中恒星的年龄相对于平坦宇宙较短的年龄显然是太长了。这种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支持了我们生活在开放的宇宙这样一个观点。最近，测定到老恒星的年龄似乎与其他证明宇宙可能加速而不是减速的证据非常吻合。本书将在第6章对此进一步讨论。

第五章

大爆炸

尽管弗里德曼模型的基本理论被认为是框架已存在多年，大爆炸理论出现的较晚，只是在最近才提出的，被认为是能够大致解释宇宙如何随时间演化的最可能的理论。许多年来，大多数宇宙学家喜欢另一种称为稳态的模型。事实上大爆炸理论也有多种版本。用“热大爆炸”可更加精确地描述这个现代理论，以将它与旧的理论（现已被抛弃）区别开，旧理论的初始状态是冷的。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将大爆炸称之为“理论”并不完全正确。理论和模型的区别是微妙的，但以如下方式定义其区别对我们会有帮助：理论一般是完全自恰的（它可以没有可调参数，且所有数学量都要预先定义）而模型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完整。由于大爆炸的初始状态的不确定性，很难做出确定的预测，因此也难以对它进行测试。稳态理论的赞同者在很多场合对此进行了抨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爆炸”这个术语最初是由这个模型的最著名反对者之一，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爵士为了贬损它在BBC广播节目中杜撰的。

稳态理论

由戈尔德（Gold）、霍伊尔（Hoyle）、邦迪（Bondi）、纳利卡（Narlikar）等人提出，在稳态理论中宇宙是膨胀的，但其属性一直不变。这个理论背后的原理被称为完美宇宙定则，它是宇宙学原理的广义化，指出宇宙在空间上是均匀和各向同性的，对于时间也具有同质性。

因为稳态宇宙的所有属性在时间上都必须是常量，这个模型的膨胀率也是常数。于是可以找到爱因斯坦方程对应此模型的一个解。这个解称作德西特解。但是如果宇宙膨胀，物质密度需随时间减小。稳态理论要求存在一个称为C场的场，以稳定的速率创造物质以抵消宇宙膨胀产生的稀释。这个称作“持续创造”的过程在实验室中从未被观测到，但是这种创造的速率非常低（就宇宙现在年龄而言每立方米只

产生一个氢原子），难以通过直接观测来判断它是否是可能的物理过程。

许多理论家更喜欢稳态理论，因为它比其他与之竞争的理论更容易检验。只要找到任何支持宇宙过去和现在不同的证据就可以推翻该理论模型。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观测者们试图寻找是否遥远星系（人们看到的是它们过去的样子）的属性和那些近邻星系存在什么不同。这样的观测是困难的，而且在怎样解释观测结果的问题上，稳定态理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个例子是当射电天文学家马丁·赖尔（Martin Ryle）宣称发现射电天体的属性的重大演化时，弗雷德·霍伊尔和他产生了严重分歧。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发现才为解决这个争论提供了重要依据。

确凿证据

20世纪60年代早期，两位物理学家阿尔诺·彭齐亚斯（Arno Penzias）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使用通讯卫星形状奇特的喇叭状微波天线，研究地球大气的辐射。这架望远镜是为研究对卫星通讯系统可能造成干扰的干扰源而设计的。彭齐亚斯和威尔逊非常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均匀的、一直存在的背景噪声。终于，在进行了许多检查并驱赶走在这架望远镜中筑巢的鸽子后，他们最终接受了背景噪音无法去除的事实。巧合的是在不远处的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包括狄克（Dicke）和皮伯斯（Peebles）在内的一组天文学家一直在试图设计一个侦测大爆炸产生辐射的实验。他们认识到有人在这一领域领先于他们。在1965年的《天体物理》杂志上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表了他们的结果，而同时刊登的狄克小组的文章则解释了这个发现的含义。彭齐亚斯和威尔逊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奖。

微波背景被发现后，即受到了大量的关注。我们今天对它的了解比1965年的时候要多得多。彭齐亚斯和威尔逊注意到这种背景噪声不随每天的时间变化，也就确定了它不是人们料想的大气现象。事实上

微波背景辐射的高度均匀性显示出它甚至与我们银河系内部的天体也不相关（银河系内部的天体在天空的分布也不均匀）。它显然是在银河外。更加重要的是，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辐射具有非常特殊的、被称为黑体的谱。黑体辐射出现时，辐射源既是辐射的完全吸收者也是辐射的完全发射者。黑体产生的辐射一般称作热辐射，因为完全吸收和发射使得辐射源保持热平衡。

这种背景辐射的黑体特征谱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它产生于原始火球最初的热平衡条件下。微波背景现在非常冷：不足绝对温度3度。但是作为宇宙膨胀的一种效应这种辐射逐渐变冷，因为辐射的光子产生红移。将时钟拨回到宇宙演化的早期，那时这些光子逐渐变热，能量也越来越高，最终辐射开始对物质产生强烈影响。普通的气体是由原子组成，原子包含围绕核运动的电子。但是在一个强辐射场，电子被剥离形成等离子体，在其中的物质被电离。这个过程大约发生在大爆炸后的300,000年，那时温度是几千度，宇宙比现在约小1000倍，密度高10亿倍。在这个时期整个宇宙的温度与太阳表面一样热（太阳的辐射也接近黑体的形式）。在完全电离的条件下，物质（特别是自由电子）和辐射经历了快速碰撞以保持热平衡，因此当宇宙被电离时它就不透光了。随着它的膨胀和冷却，电子和原子核重新复合成原子。复合发生时光子散射效率要低得多。宇宙经历复合过程后又变得透明，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微波背景是在复合时期电子散射的冷遗迹辐射。当辐射最终经散射过程释放，它在光谱的光学或紫外部分，但是那以后由于宇宙膨胀，它不断向红端移动，使得现在可以在红外或微波波段看见。

因为宇宙微波背景在整个天空有接近完美的各向同性，它提供了支持宇宙学原理的证据，同时也提供了星系和星系团起源的线索，但它对大爆炸理论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微波背景辐射的存在使得宇宙学家能够推演大爆炸早期的条件和状况，特别是有助于解决宇宙的化学组成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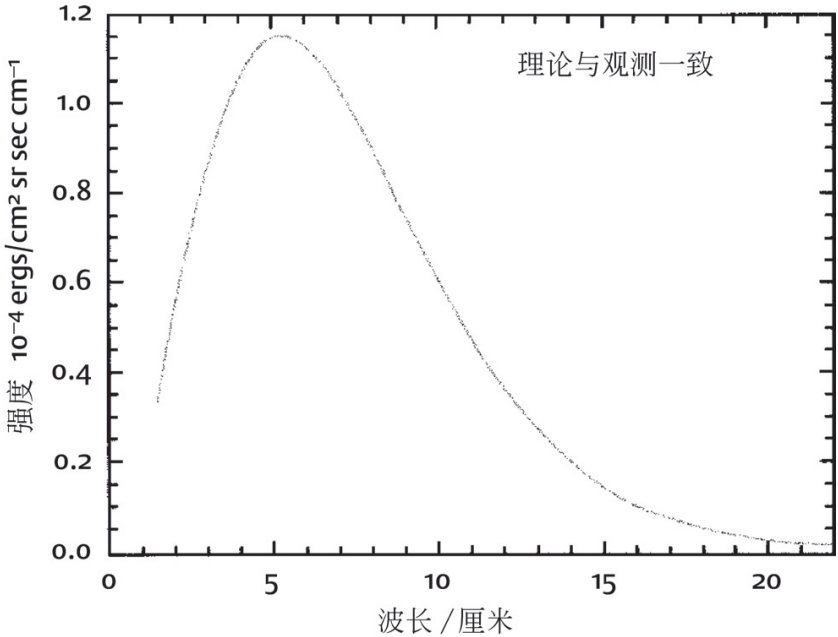

图13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谱。这幅图显示了宇宙微波背景强度的测量值是波长的函数。理论值和测量值都在图上绘出。两者非常相符，一条曲线完全覆盖在另一条上。这个完美的黑体特征是宇宙开始于一个热大爆炸的最强的证据。

核合成

宇宙的化学组成基本上是非常简单的。大多数已知的宇宙物质是以氢的形式存在的，氢是所有化学物质中最简单的结构，包含一个单质子原子核。宇宙中超过75%的物质是这种简单的形式。除了氢，宇宙中大约25%（以质量为衡量单位）的物质成分是氦-4，它是一种稳定的氦同位素，其原子核中有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另外有两种稀有的元素，所占比重大约为氦-4的大约十万分之一。其中一种是氘或常称的重氢，它的原子核由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组成。另一种是氦的轻同位素氦-3，与其重同位素相比，氦-3少了一个中子。最后是锂-7，它作为小的示踪元素其丰度仅占氢的百亿分之一。以上化学组成是怎

么来的呢？

从20世纪30年代起我们已经知道恒星燃烧氢作为其核燃料。在这个过程中，恒星也合成了氦和其他元素。但是我们知道仅靠恒星自身是无法产生上面提到的少量轻元素的。首先在恒星过程中，氘的破坏速度比其生成速度逐渐加快，因为恒星中的强辐射场将氘分解成质子和中子。在恒星内部比氦-4重的元素的形成相当容易，但是观测到的氦-4的比例太高，通常的恒星演化理论无法解释。

有趣的是阿尔弗（Alpher）、贝特（Bethe）和伽莫夫（Gamow）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认识到了单独用恒星过程解释氦丰度的困难，而正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模型认为核合成出现在宇宙演化早期。由于这个模型中的难题，特别是氦的超产，使得阿尔弗和赫曼在1948年想到，在核合成时期应该存在一个非常强的辐射背景。他们估计这个背景的温度现在大约是5K，与我们目前所知的差距不大，尽管它的提出比宇宙微波背景发现约早15年。

对原始火球中产生轻核的相对量的计算需要假设宇宙在相应的演化时期的一些属性。除了弗里德曼模型中的一般假设外，还需要假设早期宇宙经历温度超过10亿度的热平衡阶段。在大爆炸模型中这发生在非常早的阶段——最初的几秒钟内。除此以外，计算是很直接的，而且可以利用最初为模拟热核爆炸编制的计算机程序代码来实现。

在核合成开始前，质子和中子通过弱核相互作用进行持续地互相转换（核相互作用稍后将详细讨论）。只要质子和中子处于热平衡状态，质子和中子的相对数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当弱相互作用足够快以保持热平衡，质子和中子比率根据周围不断变冷的环境持续调整，但是在某些临界点上，弱核反应不足，比率不再能调整。这种时刻，质子和中子比率被“封冻”在一个特定的值（大约每6个质子1个中子）。这种比率是确定氦-4的最终丰度的基础。要将质子和中子加在一起制造氦，必须先制造氘。但是我已经提到氘很容易被辐射破坏。如果一个氘核被一个光子击中，它就被分解为质子和中子。当宇宙非常热时，氘在刚被制造后就会被破坏。这个困难被称作氘瓶颈。当这种核“堵车”存在，氦是不可能被制造的。另外，在此之前被封冻的中

子开始衰变，其寿命大约是10分钟。因此衰变的结果是，能够参与后续氦的制造的中子数量略有减少。

当辐射场的温度降到10亿度以下时，辐射的强度不足以分解氘，氘将保持足够长的时间等待进一步反应的出现。两个氘核可以合并，去掉一个中子就制造了氦-3。氦-3可以捕获一个氘核并去掉一个质子制造氦-4。这两个反应非常快，结果是所有中子在氦-4产生后被用尽，只剩了中间产物氘和氦-3的残留。氦-4的丰度自然就按照需要占了质量的25％左右。同时，算出的中间原子核的数量也和观测接近。所有这些反应都发生在原始火球的最初几分钟。

这似乎是该理论的巨大成功，的确也如此。但是来自大爆炸的核丰度的详细计算结果与观测到的元素丰度仅在某个关键参数的特定值一致，这个参数是宇宙的重子 - 光子比率。只有当这个数为百亿分之一时，整个模型才可以成立。也就是每百亿个光子有一个质子或中子。我们可以使用已知的微波背景温度来计算宇宙中有多少光子，这可以非常准确地计算出来。由于我们知道使核合成理论成立所需要的重子 - 光子率，我们可以用这个适当值来计算重子的数目。结果是重子物质的数量仅约占宇宙封闭所需物质数量的百分之几。

时间回溯

复合时期微波背景的产生和核火球时期的元素合成是大爆炸理论的主要成功之处。与详细计算结果相符的观测结果为这个模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这些成功的支持下，宇宙学家已利用大爆炸理论来研究高温、高密物质相关的其他一些现象和结果。在这些研究中大爆炸在极大和极小的物质间建立了联系。

让我们回溯宇宙的形成史，回溯越久远，宇宙就越小且越热。我们现在生活在大爆炸后的150亿年。微波背景产生于大爆炸后300,000年。核合成在最初几分钟。要理解宇宙更早期的情况，需要知道当物质处于能量水平高于核反应所需能量时的状态。探测这种能量水平的

实验耗资巨大。粒子加速器，如在日内瓦的CERN，可以重塑宇宙最初时的某些状态，但人们对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物质性质的知识还是零散的，还不能了解核合成之前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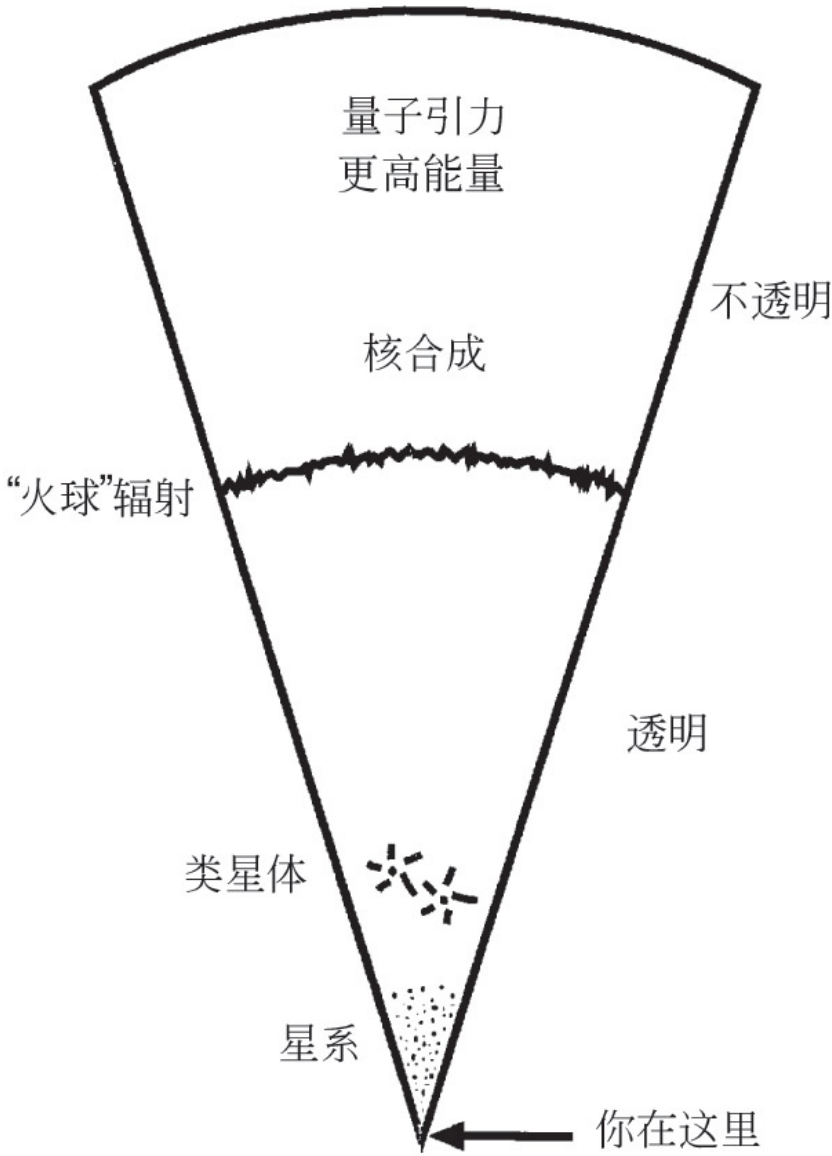

图14　回溯时间。当我们在空间望得越远，我们在时间上也回溯得越久远。我们

> 可以在相对较近的地方看到星系。再远些我们可看到高活动性的星系，也就是类星体。更远处有一个“黑暗时代”：通过回溯时间看到的星系形成前的宇宙。最终可看到遥远的宇宙，那时的宇宙十分炽热，是一个不透明火球，酷似恒星的中心部分。火球的辐射穿过膨胀的宇宙到达地球，成为微波背景。如果还能看得更远，就能看到类似恒星中发生的核反应。早期的能量非常高，只能借助想象来推测。最终我们到达宇宙的边缘……那时量子引力得十分重要，但我们对那时的情况一无所知。

早期的物理学家就认为可以在大爆炸模型中应用物理理论。当今，物理学的粒子理论在其他领域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检验，于是大爆炸模型就成了校验该理论的试验场。要弄清这个过程，需要了解粒子物理最近40年的发展。

自然界的四种力

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新理论的武装下，以及在依靠实验技术进步获得的新发现的推动下，本世纪〔1〕的物理学家试图将自然科学的范围扩展到自然界的方方面面。所有现象都可归于自然界四种力的作用。这四种基本的作用力使得组成所有物质的基本粒子相互作用。我已经介绍过其中的两种，电磁力和引力。另外两种是关于原子核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弱核力和强核力。四种力的强度不同（引力最弱，强核力最强），且参与相互作用的基本粒子也不同。

电磁力将电子束缚在围绕原子核的轨道上，也是将所有我们所熟悉的任何物质结合起来的力。然而，在20世纪早期人们认识到，为了将麦克斯韦理论具体地应用到原子，需要引入量子物理和相对论的思想。里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等人基于狄拉克工作基础上的努力使电磁力的完全量子理论得以发展起来，该理论称为量子电动力学（简称QED）。在这个理论中，光子形式的电磁辐射负责在电荷不同的粒子间传递电磁作用力。

在深入探讨作用力之前，有必要提及和这些力相关的基本粒子的性质。被称作费米子的粒子规定了物质的基本的属性。和它们相区别

的是力的载体 - 玻色子（如光子），玻色子和费米子具有不同的自旋。费米子分为两类，轻子和夸克，而每类又分成三代，每代包含两个粒子。因此总共有六个轻子（三对），六个夸克（三对）。每对轻子中的一个带电（如电子），而另一个不带电，叫做中微子。电子是稳定的，而另外两个带电的轻子（μ和τ）衰变非常快，非常难检测到。

夸克都是带电的，且三类都是成对的。第一对包括上夸克和下夸克；第二对是奇夸克和魅夸克；第三对是底夸克和顶夸克。但是没有发现自由夸克。它们总是被“禁闭”在称为强子的复合粒子中。强子包括重子，由三个夸克组成，最常见的强子是质子和中子。还有许多其他的强子态，但大多数不稳定。它们可能产生于加速器实验（或在大爆炸中），但无法在衰变前长久保持稳定。按我们当前的理解，似乎是在时间开始的一百万分之一秒内，夸克具有足够能量使其获得自由。在此时间内，熟悉的重子粒子溶解在夸克“汤”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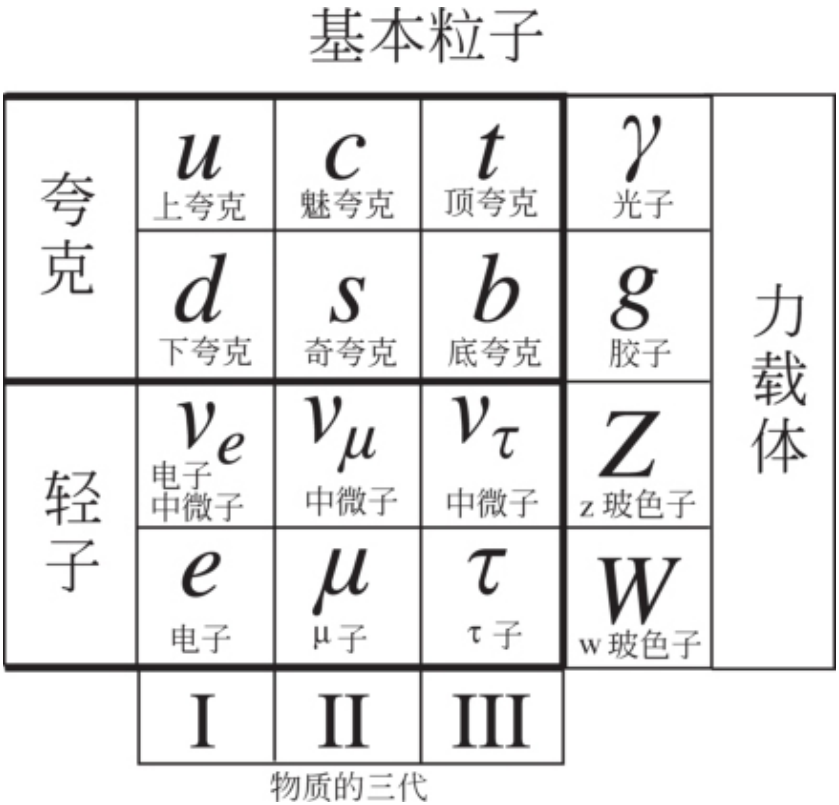

图15　物质的组成。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是由相对少量的基本粒子组成。三代夸克中每代有两个粒子。具有强作用的、较重的核子由夸克构成。没有强作用的轻子的分类与夸克相似。夸克和轻子都是费米子，它们之间的力是由玻色子传递的（图右侧）。这些玻色子包括光子、胶子以及弱W和Z。

每个费米子都有一个镜像叫做反粒子。电子的反粒子是正电子；也有反夸克和反中微子。

QED理论叙述了带电费米子之间的电磁相互作用。下一个要讨论的是弱核力，它是造成某些放射性物质衰变的力。所有费米子，包括中微子都参与弱相互作用。中微子不带电，不受电磁作用。如同电磁作用由光子传递，粒子间的弱作用力由非光子的其他粒子传递，这些大质量粒子叫做W和Z玻色子。因为这些粒子具有质量（与光子不同），所以弱核力作用范围小，且它的效应限制在原子核这样小的尺

度上。W和Z粒子扮演了与光子在QED中相同的角色：它们和光子都属已知的规范玻色子。

通过强相互作用将强子中的夸克结合在一起的理论叫做量子色动力学（或QCD），其理论基础与QED相似。在QCD中，有另外一套规范玻色子传递作用力。它们被称作胶子，共有8种胶子。另外QCD还有一个属性，称作“颜色”，它扮演了QED中的电荷的角色。

寻找统一理论的努力

是否可以效法19世纪麦克斯韦具有影响力的电磁统一理论，将所有QED、弱相互作用和QCD纳入一个包罗众多内容的单一理论？

1970年格拉肖（Glashow）、萨拉姆（Salaam）和温伯格（Weinberg）提出了将电磁力与弱核力统一起来的理论，称为弱电统一理论，这两种不同的力被视作单一力的低能表现形式。当粒子具有低能量且运动较慢时，弱力和电磁力的性质是不同的。物理学家说，在高能状态电磁力和弱相互作用力之间具有某种对称性：电磁力和弱力在低能状态的不同是因为这种对称性被破坏。想象一支铅笔竖着，从各个方向看都是相同的。瞬间的空气扰动或者汽车通过产生的震动会使它倒下。虽然它向各个方向倒的概率相等，但当它倒时，它只会在某个特定的方向倒下。同样，电磁力和弱核力之间的不同可以被看成是偶然的，是我们的宇宙中高能对称性被破坏的一个偶然结果。

弱电统一和强相互作用共存于一个基本作用理论中，这个理论叫做标准模型。这个模型非常成功，因为它所预测的所有主要粒子几乎都被发现，只有一个例外（一个特殊的叫做希格斯介子的玻色子，被用于解释标准模型中的质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发现。）但是这个模型不能像弱电统一理论统一两种力一样去统一三种力。物理学家希望最终将三种我们讨论过的力统一到一个单一的理论中，也就是所谓的大统一理论，或简称GUT。这个理论有许多版本，但尚不知道哪个正确（如果有正确的话）。

与统一理论相关的一个思想是超对称性。根据这个假设，费米子和玻色子之间存在着基本对称性，在标准模型中两者是分别处理的。在超对称理论中，每个费米子都有一个玻色子“伴侣”，反之亦然。夸克的玻色子伴侣是标量夸克，中微子的伴侣为标量中微子等等。光子作为一种玻色子，它的费米子伴侣叫做光微子。希格斯玻色子的伴侣是希格斯微子等。超对称性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在高能状态下显现的众多粒子中至少有一类可能是稳定的。可否是这些粒子中的一种组成了似乎遍布宇宙的暗物质？

重子相变

显而易见，对称性概念在粒子理论中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就电荷而言，描述电磁作用的方程是对称的。如果将所有正电荷变为负电荷，或者将负变为正，描述电磁力的麦克斯韦方程仍然正确。换句话说，将负电荷分配给电子，正电荷给质子的选择是任意的，可以反过来分配而理论上不会有什么差别。这种对称性被解释成电荷守恒定律：电荷既不能产生也不能消失。据此，我们的宇宙不应该带电：正电荷与负电荷同样多，所以净电荷为零。这看上去是符合事实的。

物理定律也似乎无法区分物质和反物质。但我们知道普通物质比反物质普遍。特别是我们知道重子（质子和中子）的数目超过反重子。重子带有特殊的“荷”，称作重子数B。宇宙有一定净重子数。像净电荷一样，我们应该认为重子数守恒。如果B现在不为零，我们自然会得出结论：过去它从来就不为零。产生这种非对称性的问题，即重子相变的问题，使研究大爆炸理论的科学家困惑了相当长的时间。

俄国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1967年首次计算出净重子非对称性的条件，指出重子数不必守恒。他解释说，物理定律是重子对称的，宇宙早期没有净重子数，但当它冷却后重子逐渐多于反重子的情况出现了。他的工作有令人惊异的预见性，因为所有这些工作都是远在任何统一的粒子物理理论建立之前即已完成的。

他提出一个模型：早期宇宙中每十亿个反重子有十亿零一个重子。当重子和反重子碰撞，它们消失在电磁辐射中。在萨哈罗夫的模型中，大多数重子都会遇到反重子，并在碰撞后消失，最终我们的宇宙中每存留一个重子就有数十亿个光子。在我们的宇宙中，情况也确实如此。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每含有一个重子就会有数十亿光子。这种解释是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交叉的很好例子，但其影响力还不够。在接下来的一章，我将讨论宇宙膨胀的思想，根据该思想，亚原子物理被认为影响整个宇宙几何。

注释

〔1〕 应为上世纪

第六章

宇宙发生了什么

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大爆炸中止于一场大坍缩吗？空间真的是弯曲的吗？宇宙中有多少物质？这些物质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我们肯定希望科学的宇宙学能够成功地给出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相关的答案依赖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参数Ω（欧米加）。天文学家们一直设法利用对我们周围宇宙的观测结果来获取Ω值，但并未获得明显进展。目前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使我们有可能在最近几年最终测定Ω的值。但是随之问题出现了。最近的观测表明，Ω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然而，Ω的问题并不完全是一个观测的问题，因为这个量的精确值可以为掌握大爆炸早期状态和宇宙大尺度结构提供重要线索。为什么Ω如此重要而它的值又如此难以获得？

对Ω的探索

要想理解Ω在宇宙学中的角色，首先需要考虑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时 - 空的几何性质（如曲率和膨胀）与物理性质（如密度和运动状态）之间的关系。如我在第三章中讲到的，由于引入宇宙学原理，广义相对论在宇宙学中的应用大大简化。整个宇宙的演化于是可以由一个相对简化的方程来描述，这个方程就是我们所知的弗里德曼方程。

弗里德曼方程被看作宇宙整体能量守恒定律的表达式。在宇宙中能量有多种形式，但这里只涉及两种相对简单的形式。一个运动的物体如子弹带有的能量叫做动能，它的大小与其质量和速度有关。由于宇宙在膨胀，所有星系都在迅速远离。因此宇宙中显然有大量的动能。能量的另一种形式是势能，这在理解上稍有困难。当一个物体在运动且受到某些力的作用，它可能获得或失去某些势能。例如，设想将一个砝码拴在一根摇摆的绳子一端，做成一个简单的钟摆。提起砝码要克服引力做功，因此砝码获得势能。如果松开砝码，钟摆就开始摆动。砝码下落时获得动能并失去势能。在这过程中，能量在两种形

式间进行了转换，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砝码沿着弧形路径摆动，当运动到弧的底部时，它没有势能而却仍继续运动。在开始另一次摆动前，它会回到弧的顶端短暂停留（瞬时地）。在顶端没有动能而只有最大势能。无论砝码的位置在何处，这个系统的能量是守恒的，这就是能量守恒定律。

在宇宙学中动能的大小依赖于膨胀速率，或换句话说依赖于哈勃常数H_0 。势能依赖于宇宙密度大小，即宇宙的单位体积内有多少物质。遗憾的是我们并不精确地知道这个量：它比哈勃常数的值更不肯定。如果我们知道物质的平均密度和H_0 的值，就可以计算出宇宙的总能量，它必须是不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常量，才能满足能量守恒定律（在宇宙学中则是弗里德曼方程）的要求。

我们将广义相对论涉及的方法上的难题暂时搁置，用高中物理中大家所熟悉的例子来探讨宇宙的演化。例如，飞船从地球发射升空，它的地球引力势能是由其质量决定的。飞船动能由其动力火箭的功率所决定。如果飞船安装了中等功率的火箭，这样发射时它不会运动太快，所以它的动能比较小不足以逃逸地球的吸引。结果是飞船上升一段距离后再次回落到地面。从能量的角度说，就是火箭在启动的时候用尽了“昂贵”的动能，以偿付它达到一定高度所具有的势能。如果使用功率大些的火箭，在它在回落地面之前将达到更高的高度。最终我们能找到功率足够大的火箭以支持飞船完全逃离地球引力场。这个临界启动速度一般被称作逃逸速度：高于它，火箭将永远运动下去；而低于它，火箭将会落回地面。

在宇宙学中情况类似，只是临界量不是火箭的速度（它至少在理论上可类比于哈勃常数），而是地球的质量（或在宇宙学中是物质密度），因此考虑临界物质密度比临界速度更有用。如果真实的物质密度超过临界密度，宇宙最终将会收缩：引力的能量足以使宇宙膨胀变慢、停止，进而收缩。如果密度低于这个临界值，宇宙将一直膨胀下去，临界密度会非常小。它也取决于H_0 值，但只是在每立方米一个氢原子的量级。大多数现代实验物理学家认为如此低密度非常接近于真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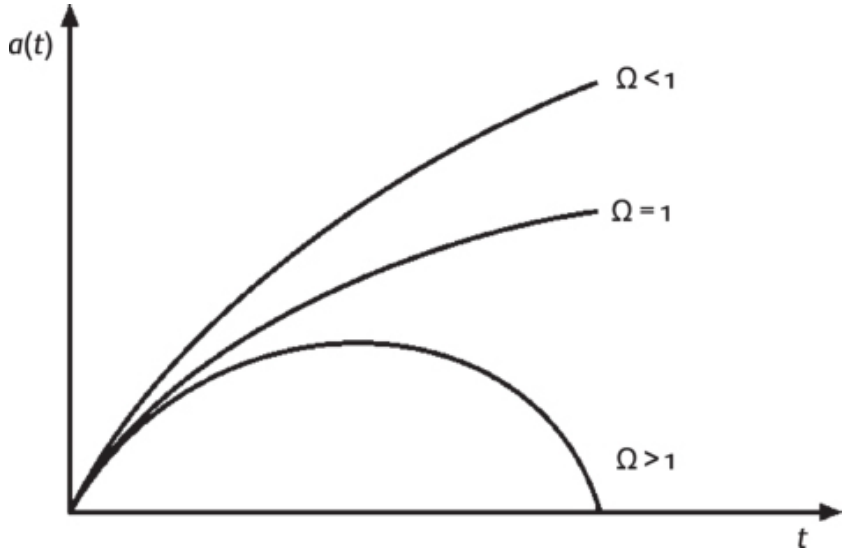

图16　弗里德曼模型。与弯曲的宇宙有多种形式一样，弗里德曼模型随时间演化也有多种形式。如果Ω大于1，膨胀最终终止，宇宙将收缩。如果小于1宇宙将永远膨胀。而两者之间Ω精确地等于1，就是处于平衡状态的平坦宇宙。

至此，我们可以引入Ω量：它是宇宙中实际物质密度与临界值的简单比值，而临界值是膨胀和最终收缩的分界线。Ω＝1代表这条分界线：Ω＜1表示了宇宙在膨胀，Ω＞1表明宇宙将来会收缩直到大坍缩。但是不管Ω的精确值是多少，物质的作用总会使宇宙膨胀的速度减慢，所以这些模型都预测了宇宙减速的趋势，我们稍后对此做进一步论述。

但是宇宙膨胀的长期变化不是一个只靠Ω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些基于牛顿物理学的简单能量观点的论据并不完整。如第三章所描述的，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物质的总能量密度决定了空间的曲率。一个负曲率的空间导出Ω小于1的模型。负曲率模型是开放的宇宙模型。如果Ω大于1则是正曲率模型（封闭的）。在两者之间，Ω精确地等于1，是经典的所谓“不列颠折衷”宇宙，它处在永远膨胀和最终收缩的中间状态。这种模型具有平坦几何，所有欧几里得理论都可以应用于其中。如果宇宙的形式是上述中最简单的，那我们将如释重

负。

Ω的量决定了宇宙学尺度上的空间几何以及宇宙的最终命运，但需强调的是Ω的值在标准的大爆炸模型中是无法预测的。这可能看似是一个相当无用的理论，连围绕Ω的基本问题也无法回答，但事实上这样说不公平。如我所解释过的，大爆炸是一个模型而不是一个理论。作为模型，它在数学上以及相对观测而言是自恰的，但它并不完整。这也就意味着Ω在某种意义上与哈勃常数H_0同样是一个“自由”参数。换言之，大爆炸理论的数学方程描述了宇宙的演化，但是为了进行一个特定运算，需要一系列初始条件作为起点。由于模型的数学基础在最开始时失效，在理论上我们无法确定初始条件。无论H_0和Ω为任何值，弗里德曼方程都成立，但我们的宇宙的构建是基于这些量的特定数值组合。因此我们可做的就是使用观测数据推出宇宙学参数之间的关系：至少在现有的知识下和大爆炸的标准框架内，还不能单靠理论推导。另一方面，当今宇宙学的观测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非常早期的宇宙的机会。

两个参数的探索

在宇宙学发展早期就已认识到确定宇宙学参数的重要性。事实上，杰出的天文学家阿兰·桑德奇，曾是哈勃的学生，写了一篇题为“宇宙学：两个参数的探索”的文章。20年后，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两个参数的值，为了搞清原因，我们必须了解那些能获知关于Ω信息的不同类型的观测，以及这些观测产生的结果。这些观测的类型很多，但可归为主要的四类。

第一类是传统的宇宙学测试。这种测试的思想是利用对非常遥远的天体进行观测来测量空间的曲率，或者宇宙膨胀的减速率。这些测试中最简单的方法是比较天体（特别是球状星团中的恒星）的年龄与宇宙学理论预测的年龄，我曾在第四章中讨论过。因为如果宇宙的膨胀不是减速的，预测年龄时对哈勃常数的依赖远大于对Ω的依赖，老

恒星的年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很确定，所以这种测试目前不是判断Ω值的有效工具。另一类传统的测试是利用非常遥远的源的物理性质来直接探测减速率或宇宙的空间几何。这类技术中某些是哈勃开创的，后由桑德奇发展完善。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的声望受损，因为当时不仅认为宇宙在迅速膨胀，也认为宇宙中的物质也在迅速演化。因为测量很小的空间弯曲的几何效应也需要探测很大的距离，我们就必然要观测那些遥远的天体，而这些天体发出的光到达地球之前已经经历了长途跋涉。从时间上看光可能是在非常久远之前发出的。宇宙学观测表明，宇宙演化过程中超过80%的阶段都没有特别之处。我们不能保证所观测的遥远天体的亮度和大小与近邻天体性质相同，因为这些性质可能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实际上，传统的宇宙学测试现在主要用在研究性质的演化，而不是测试宇宙的基本情况。但是最近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利用超新星爆发作为标准烛光，得出的结果似乎证明宇宙并不是减速的。对此在本章的后一部分将更多论述。

下一个类型是基于核合成理论的观点。如我在第五章中所解释的，支持大爆炸理论的主要证据之一是观测和计算的一致性，即观测得到的元素丰度和对早期宇宙核聚变基于计算的预测是一致的。但是这种一致性只有当物质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才出现。空间平坦所需的临界密度仅为百分之几。这一点已知多年，乍一看它似乎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都给出了非常简单的答案，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小附加命题。“百分之几”的限制只能应用到能参加核反应的物质上。宇宙可能充满惰性粒子构成的背景物质，这些惰性粒子不会影响轻元素的合成。这些背景物质构成物质的原子核，叫做重子物质，由质子和中子两种基本粒子组成。粒子物理学家认为除了中子外的其他类型的粒子可能产生于早期宇宙的沸腾炉中。其中至少有一些粒子一直存在了下来，可能组成了一部分的暗物质。至少宇宙的一些成分可能包含某些奇异的非重子粒子形式。构成生物的一般物质可能只是宇宙物质中的一小斑点，而宇宙物质的性质还没有被确定。这在哥白尼原理中增加了另一层面：我们不仅不在宇宙的中心，而且是由不同于宇宙中大多

数物质的物质所构成。

第三类证据是基于天体物理的观点。在这些观点和上述的宇宙学测量之间的差别在于，它们考虑的是单个的物体而不是物质之间的空间的属性。实际上，人们试图通过逐个测量组成元素的重量来有效地确定宇宙的密度。例如，尝试使用星系内部动力学推导出其质量，前提是假设银盘的旋转是靠引力来维持的，类似于太阳的引力维持着地球围绕太阳的运动。从地球在轨道上绕太阳运动的速度来计算太阳质量是可能的，相似的计算可以用到星系：星系中恒星的轨道速度决定于拉拽它们的星系总质量。这个原理也可以扩展到星系团，甚至比这个更大的系统。这些研究绝大多数都指出星系中存在更多的物质，而不是只有像我们的太阳一样的恒星。这就是著名的暗物质，虽然我们看不到，但通过它的引力效应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存在。

图17　后发星系团。这是富星系团的实例。除了单独恒星（如图中右边的一个），这张照片中的天体都是一个巨团中的星系。这样巨大的星系团相当少但质量极大，是太阳质量的100,000,000,000,000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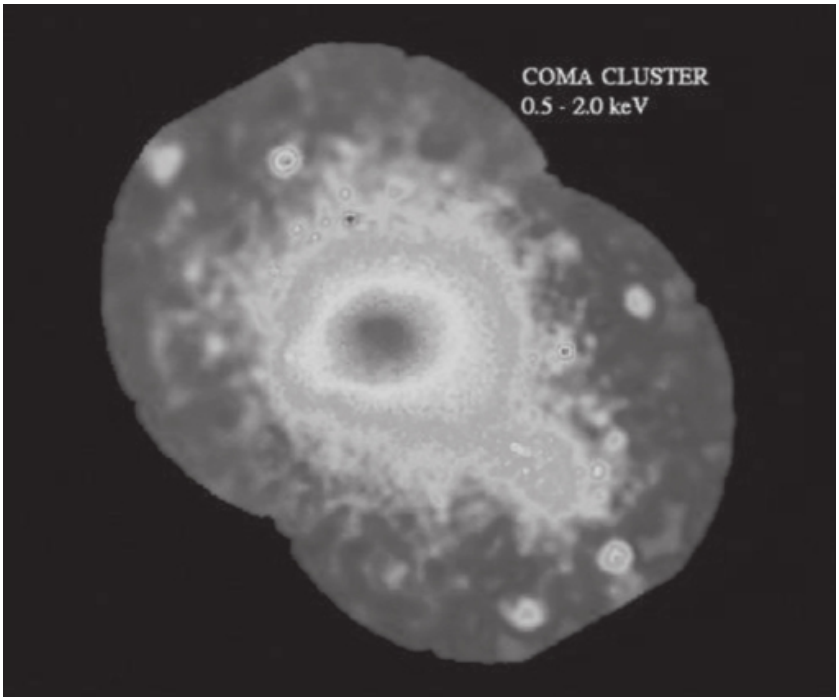

图18　X射线波段的后发星系团。除了前面照片中看到的几百个星系，类似后发团的星系团也包含非常热的气体，这可以从其X射线波段的辐射看出。这张照片是ROAST卫星拍摄的。

富星系团——巨大星系团块组成的尺度超过100万光年的系统——也包含着除内部星系外的其他物质。物质的确切数量是不清楚的，但是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在富星系团中有足够多的物质，说明了Ω肯定至少为0.1，而且可能甚至大于0.3。来自更大结构（尺度为几亿光年的超星系团）的动力学试验性证据表明星系团之间的空间中可能潜藏着更多暗物质。这些动力学证据最近也已经得到检验和证实，验证是通过对星系团产生的引力透镜效应的独立观测，以及对遍及星系团的炽热的X射线发射气体的性质的测量来完成的。如果存在物质的临界密度，星系团中的重子物质的比例相对于星系团的总质量而言，似乎远大于核合成的允许值。这种所谓的重子灾难意味着，总物质密度远比临界值低，或者某些未知过程将星系团中的重子物质集中起

来。

最后一类证据线索是基于对宇宙结构起源的尝试性探索：宇宙的成团性及不规则性是如何在宇宙学原理所要求的基本平滑的宇宙内发展形成的。解释它们在大爆炸模型中形成过程的思想在后一章中将详细论述。我相信理解基本原理相对容易，但是细节是难以置信地复杂且倾向于各种不确定性和偏向性。与Ω接近于1的现有数据似乎完全符合的模型能够且已经建立了起来。其他与Ω值远远小于1的数据符合的模型也建立了起来。其复杂程度听上去有点令人沮丧，但这种研究可能是最终成功地确定Ω的关键。如果能够对微波背景的特征进行更加仔细的测量，这些特征的属性将告诉我们物质密度是多少，同时也可确定哈勃常数，绕过了宇宙学距离测量的麻烦。我们只希望卫星能够在将来完成这项工作，MAP（美国航空航天局）和Planck Surveyor（欧空局）卫星将在最近几年内成功发射[1]。最近的气球试验已经证实了其可行性，这些将留到第七章中进一步讨论。

基于对这些证据分析总结，大多数宇宙学家可能认为Ω的值不可能小于0.2。尽管这个值如此之小，却要求宇宙中的大多数物质为暗物质。这也意味着，至少有一些物质不应该以质子和中子（重子）的形式存在，而重子构成了我们日常所熟悉的物质中的主要质量。换句话说，一定存在非重子的暗物质。许多宇宙学家倾向于Ω的值在0.3左右，看上去与大多数观测证据一致。有些人宣称有证据支持密度值接近临界值，所以Ω可以非常接近1。这部分上因为关于暗物质的天文证据越来越多，也因为在理论上认识到在大爆炸的非常高能态下可能产生非重子物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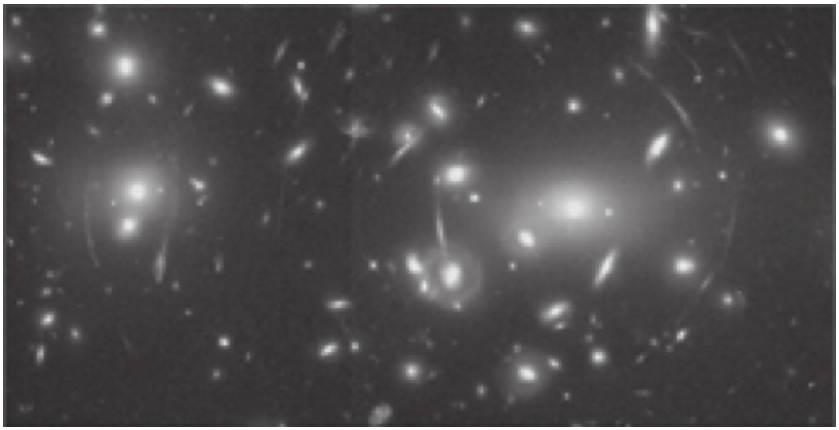

图19　引力透镜。富星系团的重量测量可以通过观测来自背景星系的光线穿过星系团时产生的扭曲来实现。在Abell　2218的例子中，光从背景源聚焦成一个复杂的弧形图案，星系团就像一个巨大的透镜。这些特征揭示了星系团内所含的质量。

宇宙的钢丝绳

由于很难评估观测证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这些证据有时有冲突），这造成的意见分歧又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围绕Ω的大争论。倾向于较高Ω值（接近于1）的最有力证据是基于理论而不是观测结果。于是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观点应被视为纯粹的偏见而不予考虑，但是它已经成为标准的大爆炸理论谜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得到了宇宙学家们非常认真的对待。

为了理解谜团的本质，可以设想正站在一个密封的屋子外面。屋子里藏着什么东西你并不知道，只看到一扇小门下遮挡的一个小窗。你被告知可以随时打开这扇门，但只能是很短暂地打开一次。你同时被告知房间是空的，除了有一根悬挂在两米高空中的钢丝绳，一个人在过去不确定的某个时间开始在钢丝绳上走。你也知道如果他从钢丝绳上掉下来，他会呆在地板上直到你打开门。如果他掉不下来，就一直会在钢丝绳上走，直到你朝里望的那一刻。

打开门的时候你期望会看到什么？不管是期望看到那个人仍在钢丝绳上还是期望他站在地上，这都取决于你所不知道的信息。如果他是个马戏团的演员，他很可能能够在钢绳上来回连续走几个小时而不会跌落。反之，如果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不是这个领域的行家，在钢丝绳上呆的时间就会相对很短。然而有一点很明显，如果他跌落下来，从钢丝绳掉到地面经历的时间会很短。我们很少能从窗口窥视到那个人从钢丝绳掉到地上的瞬间。在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当从窗口往屋里看时，期望看到那个人或者在绳上或者在地上是合理的，如果你看到他正在跌落的过程，就会认定怪异的事情正在发生。

这看上去似乎与Ω没有多大关系，但当意识到Ω不是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常数，它们的关系就明晰起来。在标准的弗里德曼模型中，Ω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变化着。在任意接近大爆炸的时刻，这些模型由Ω的值任意接近1来描述。换一种方式解释，我们来看图16。无论在以后的时间会怎样，三条曲线越在开始时越靠越近，特别是，它们都接近“平坦宇宙”的直线。随着时间推移，在早期Ω比1稍大的模型中，Ω的值越来越大，塌缩发生时Ω值已远远大于1。而初期Ω小于1的宇宙模型最终比平坦宇宙模型膨胀得快得多，Ω值逐渐接近于零。有更多证据表明Ω小于1，因此后一种情况更切题。在这种情况中，从Ω接近于1到Ω接近于零的变化是非常快的。

现在我们来看存在的问题。假设现在Ω的值等于0.3，在宇宙历史的早期，它是接近于1的，且仅比1稍小，事实上相差无几。例如在普朗克时间内（即大爆炸后10^{-43} 秒），Ω值仅比1小10^{-60} 数量级。随着时间的推移，Ω值一直处于临界状态附近，只是在不远的过去才开始快速远离临界值，在不久的将来将非常接近于零。这就好像我们捕捉到钢丝绳上的行者迅速跌落的瞬间是件非常令人吃惊的事。

这个矛盾就是众所周知的宇宙学平坦性问题，它是由标准大爆炸理论的不完整性引出的，如此大的问题使许多科学家相信需要一个大的解决方案。解决这个谜团的唯一方法似乎是，我们的宇宙必须是一个专业的杂技演员，这是最大可能地扩展这个比喻。很明显Ω不接近于零，因为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它的值的下限是在20%左右。这将人

站在地上的选项排除了。这说明Ω值一定非常接近于1，且宇宙初期必定发生的某些事情才导致了这个值如此精确。

暴胀和平坦性

上文提到的宇宙初期发生的变化称作宇宙学暴胀，这最初是由阿兰·古斯（Alan Guth）1981年提出的，描述了大爆炸模型的最早期状态。暴胀包括物质性质在极高能态下的一种奇怪变化，这种变化被称为相变。

我们已经讲了关于相变的一个例子。它出现在大爆炸的百万分之一秒的标准模型中，包含了夸克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低温时，夸克被限制在强子中，而在高温时，它们形成了夸克 - 胶子等离子体。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个相变。在许多统一理论中，在更高的温度下，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相变发生，标志着宇宙中物质和能量的性质和形式的变化。在特定的环境下，一个相变可能伴随着真空中能量的出现，这种能量叫真空能。如果出现了这个现象，宇宙的膨胀开始比标准弗里德曼模型中的膨胀更加迅速，这就是宇宙暴胀。

在过去的20年中，暴胀对宇宙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暴胀需着重提出的是，过分膨胀的相（存在非常短）实际上逆转了Ω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暴胀开始时，Ω被强烈地朝1拉动，而不是像上面描述的远离1。暴胀就像一个安全系带，将看上去要从钢丝绳上掉下来的行者拉回绳索上。利用Ω值和空间曲率之间已经建立的联系可以更容易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曾提到平坦的空间对应着临界密度，那么Ω值等于1。如果Ω不等于这个神奇的值，空间就可能弯曲了。如果某人拿一个曲度很大的气球，并将它吹到一个巨大的尺寸，大若地球的尺度，那么它的表面就显得很平坦。根据暴胀的宇宙学观点，气球最初远不足1厘米，最后可能膨胀到比整个可观测到的宇宙还大。如果暴胀理论正确，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非常平坦的宇宙中。另一方面，即使Ω非常接近于1，那也并不一定证明暴胀发生过。是与

量子引力现象可能相关的一些其他机制将我们的宇宙训练得可在钢丝绳上行走。

这些理论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们无法靠自身解决上述问题。最终，不管理论家愿意与否，我们不得不承认宇宙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我们可以站在理论的角度去推测Ω是否应该非常接近于1，但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实验结果。

问题焦点

所有问题的焦点是，如果Ω远远小于1，目前似乎是这样的，我们是否必须放弃暴胀？并不一定。首先在一些已经建立的暴胀模型中，宇宙是开放的、负弯曲的。许多宇宙学家不喜欢这类模型，因为看上去是相当人为的。更重要的是现在有许多证据表明，Ω和空间几何之间的联系，并不像以前想象的那么直接。沉寂多年后，我前面提到的传统的宇宙学测试再度兴起。两个国际天文学小组已经开始研究一种特定类型的爆发恒星，即Ia型超新星的性质。

一颗超新星的爆发标志着一个大质量恒星的生命终点。超新星是天文学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们比太阳亮10亿倍，且它们发出的光能够在几周的时间中照亮整个星系。超新星的观测贯穿了整个有记录的宇宙观测史，在1054年人们观测并记录了一颗超新星爆发，其产生的尘埃和碎块组成了蟹状星云，蟹状星云中有一个快速旋转的、被称之为脉冲星的恒星。伟大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在1572年观测了一颗超新星的爆发。在我们的银河系中观测到的最近一次超新星爆发是在1604年，这颗星被命名为开普勒星。按照古代的记录，尽管在银河系中大约平均每1 - 2个世纪超新星会爆发一次，可是最近400年中还没有观测到。但是1987年在大麦哲伦云星系中爆发了一颗超新星，我们裸眼可以看到。

有两种不同的超新星，标记为类型I和类型II，光谱测量揭示出在II型超新星中含有氢元素，但在I型中是没有的。II型超新星被认为是

大质量恒星爆炸后直接产生的，其中恒星的核塌缩成一种残骸，而外部的壳层抛射到空中。这种爆发的最后可能是形成一个中子星或者黑洞。II型超新星可能是不同质量恒星塌缩的结果，所以这些恒星的性质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I型超新星按照它们光谱形状的细节被进一步分成Ia，Ib，Ic。Ia型超新星最值得关注。它们具有非常统一的峰值光度，于是被认为是同类恒星爆发的结果。描述这种爆发的常用模型是，白矮星通过吸积一个伴星获得质量。当白矮星的质量超过一个临界质量——钱德拉塞卡质量（大约是太阳质量的1.4倍），它的外部爆发而中间部分塌缩。由于爆发中所涉及的质量非常接近于临界值，这种天体往往被认为释放等量的能量。它们的规则性意味着，Ia型超新星非常有希望用于测试时 - 空的曲率和宇宙的减速率。

新技术使天文学家能够在红移约为1的星系中搜索（并发现）Ia型超新星。也就是说当光从超新星到达我们时，宇宙膨胀为光线发出时的2倍。通过比较遥远和近邻超新星观测到的亮度可以估计出它们到底有多远，同时还可以了解光从发出到到达我们的这段时间内宇宙减慢了多少。问题是，如果宇宙变慢，这些超新星将会比它们应该具有的亮度要暗。这说明宇宙根本没有减速而是加速的。

这类观测给了基于弗里德曼方程的标准宇宙学描述致命一击。所有弗里德曼模型都是减速模型。即使是弗里德曼系列中的低Ω模型也不应该是加速的，虽然低密度使得它减速很不明显。暴胀理论所选择的临近密度模型也应该是大减速的。这到底出了什么错？

爱因斯坦的最大困惑

前面提到的对超新星的观测仍然是有争议的，但它们表明宇宙学理论似乎需要进行大的改变。而另一方面我们有修正这个错误的现成方法，这个方法正是爱因斯坦提出的。第三章中提到，爱因斯坦通过引入宇宙学常数来修改他最初的引力理论。这样做的理由是他想要建立一套描述静态（即不膨胀的）宇宙的理论，尽管后来他对这样做表

示了后悔。他的宇宙学常数改变了引力定律以阻止宇宙膨胀或收缩。在现代宇宙学理论中，可以引入宇宙常数使引力在大尺度上表现为排斥。如果这样做的话，引起加速膨胀的宇宙斥力将超过造成宇宙减速的物质间的引力。

这种解决方案首先要求人们承认宇宙学常数不是一个坏想法。现代理论也提供给我们一个新解释。在爱因斯坦的原创性理论中，宇宙学常数出现在描述了引力和时 - 空曲率的数学方程中。它是引力定律的修正。爱因斯坦可简捷地在方程的一侧加进宇宙常数这个项，由于这个方程是描写空时弯曲的几何性质（方程左侧）和物质能量动量分布（方程右侧）的关系，所以这个“声名不佳”的宇宙学常数具有真空能量密度的意义。真空具有能量听上去很奇怪，但是在本章前面我们已经涉及到了，它是引起暴胀所必需的。

在宇宙暴胀理论的早期版本中，原始相变释放的真空能在超爆结束后将消失。但是很可能现在仍存在少量的这种能量，正是这种能量使得引力是推而不是拉。这种真空能可能会引起宇宙加速的思想也可以使暴胀理论与Ω可能远小于1（如果空间平坦，Ω必为1）的证据一致起来。真空能使引力排斥而不是吸引，这虽然有悖常理，但是它至少能以与普通物质相同的方式来弯曲空间。如果我们的宇宙既有物质又有真空能，就拥有了一个平坦的空间而无需考虑弗里德曼模型要求的减速。

无论是否存在真空能，也无论Ω的值有多精确，我们仍然不能肯定地知道宇宙膨胀是否是加速的。但是这些思想最近几年已经在理论和实验方面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一代的测量出现了，如果成功，将能回答前面的所有问题。对此将在下一章进行讲述。

注释

〔1〕 MAP卫星已经发射、Planck Surveyor卫星2007年发射。

第七章

宇宙的结构

星系是宇宙的基本组成单元，但是它们不是我们能够看见的最大结构。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像人类一样组合在一起。用于描述星系在宇宙学距离上分布的术语叫做大尺度结构 。这种结构的起源是现代宇宙学的热点问题之一，但解释它为什么成为热点之前，首先需要描述该结构到底是什么。

空间的图案

大尺度上的物质分布一般是通过光谱巡天确定的，利用哈勃定律通过红移估计星系的距离。在那些红移巡天付诸实施的许多年以前，就已知结构的存在。天空中星系的分布是高度不均匀的，这可以在第一个大规模、系统的星系位置探测中看出，而这个探测的结果形成了Lick（里克）星系分布图。尽管这张图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没有人能够肯定所看到的结构是否是真正的物理结构或仅仅是偶然的投影效果。尽管我们可以辨识出星座，但是它们之间的物理联系还是无法获知。星座中的恒星距离太阳的远近大不相同。由于这个原因，宇宙结构探测主要依赖红移巡天。

图20　仙女座大星云。仙女座是距离银河系最近的大型漩涡星系的很好例子。并不是所有的星系都是漩涡状的；例如后发富团中所包含的主要是没有旋臂的椭圆星系。

这种方法的一个著名例子是哈佛 - 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CFA）的巡天，它的第一批结果发表于1986年。这是一个在很窄一条天区范围的1061个星系的红移调查，是从1961年发表的帕洛玛巡天中选择的源。这个巡天项目随后由同一小组扩展到更多的天区。上世纪90年代前红移巡天进展缓慢，且耗费人力，因为需要将望远镜轮流指向每个星系，拍摄一条光谱，计算红移，然后移到下一个星系。要获得几千个红移需要花费数月的望远镜观测时间，由于对资源的竞争，这一般要几年才能完成。最近发明的宽视场望远镜上的光纤设备已经让天文学家能在望远镜同一指向上捕获400条光谱。在最新一代红移巡天项目中有一个被称作2度视场巡天（2dF），由英国和澳大利亚使用英澳天文台的望远镜来执行。最终将确定250,000个星系的位置[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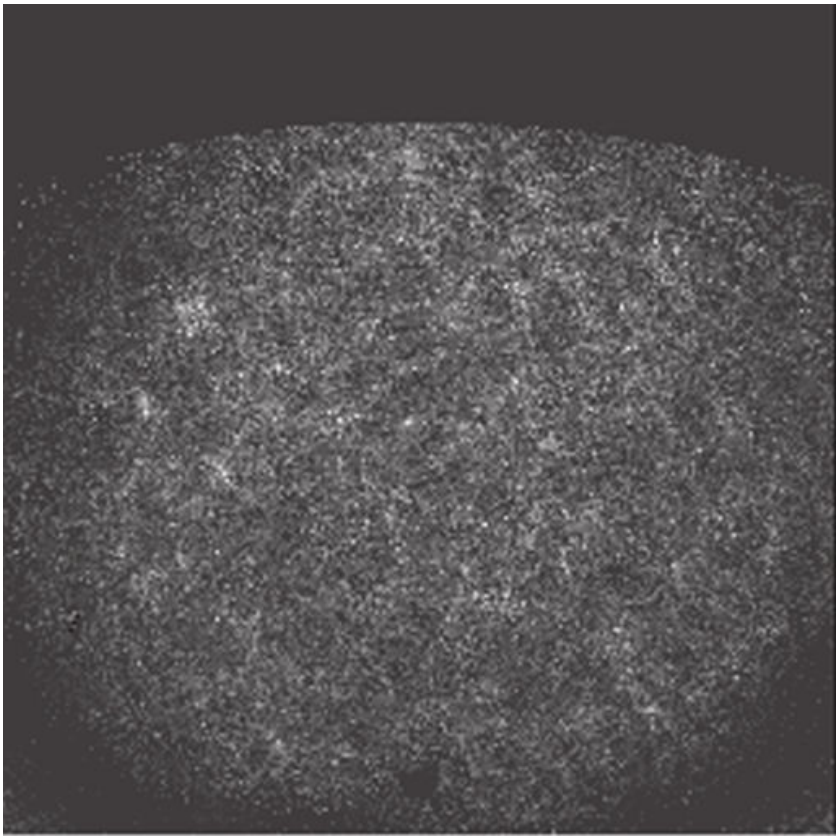

图21　Lick（里克）星系分布图。这幅图是通过肉眼非常仔细地在巡天底片上计数得到的，里克星系分布图显示了天空中大约100万个星系的分布。丝状的图案和团块是非常显著的；中心附近的稠密团块是后发星系团。

一般用来描述多个星系的物理聚集的术语是星系团 。星系团系统的尺度和成员星系的数目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我们的银河系是一个所谓本星系团 的成员星系，它是一个相当小的星系团，成员中最大的是仙女座星系（M31）。而另一个例子是所谓的富星系团 ，如所知的阿贝尔团 ，在一个仅仅几百万光年的范围内可能包含了几百甚至几千个星系：距我们较近的是著名的室女团和后发团。在这一大一小两极之间星系在密度各异的系统中呈无规则（或按等级）分布。最稠密的阿贝尔团是通过自身的引力平衡而聚集在一起的收缩的天体。欠

丰富的和空间较大的系统可能不是靠这种方式组合的，但可简单反映一种星系成团的一般统计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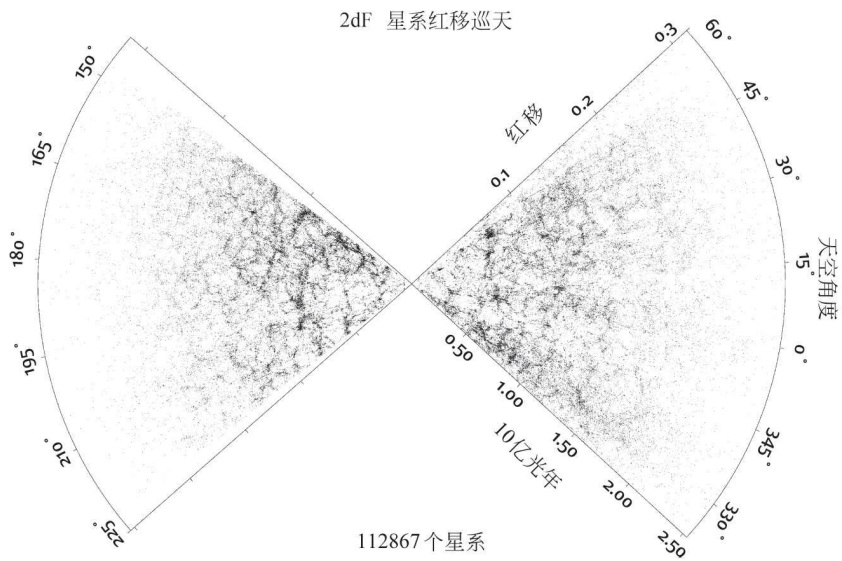

图22　2dF星系红移巡天。这个巡天仍在进行中，计划测量大约250,000个星系的红移。尽管部分巡天还未完成（译者注：目前已完成），造成图中缺一些区片，我们仍可以看到范围扩展到距离我们数十亿光年的复杂的天体结构网。

单个的星系团仍不是能看到的最大结构。尺度大于约3000万光年的星系分布也显示出相当的复杂性。最近的观测显示，星系并不是简单的，如阿贝尔团那样以类球形的“泡”分布的；有时也以扩展的类线形结构分布，这种称作丝状分布；或者以平坦的薄片状结构分布如“长城”。这是大致的二维星系聚集，1988年由哈佛 - 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的天文学家发现的“长城”的尺度至少是2亿光年乘6亿光年，但是厚度不足2000万光年。它包含数千星系且质量至少是10^{16} 个太阳质量。富团聚集成巨大松散的团块叫做超团。我们知道的许多超团都分别包含了10个到50多个富团。最著名的超团是沙普利超星系团　，而距离我们最近的是围绕上述室女团的本超星系团，即本星系群运动平面上的平坦结构。超团的尺度已知是3亿光年，包含了大概10^{17}　个太

阳质量的物质。

这些结构还伴有巨大的，几乎是空的区域，大多数大致呈球状。这些“空洞”包含的星系数目远小于平均值，或者其中干脆没有任何星系。在大尺度红移巡天中检测到不足平均密度10%，尺度达到2亿光年的空洞。若在非常大的尺度上存在星系团和超团，则存在这样大的空洞并不奇怪，因为有大于平均密度的区域就要有小于平均密度的区域。

当观看大尺度结构图时，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巨大的宇宙“网”，是交错的链和片的复杂网络。但这样的复杂性是怎样出现的呢？大爆炸模型是建立在宇宙是均匀平滑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要求宇宙遵循宇宙学原理。幸运的是，当尺度大于宇宙网时，复杂的结构逐渐消失。这点也被宇宙微波背景的观测结果所证实，微波背景来自宇宙早期，到达我们时大约已经旅行了150亿光年。宇宙微波背景在天空中几乎是均匀的，基本符合宇宙学原理，但并不完全符合。

结构的形成

1992年，COBE卫星配置了灵敏的探测器，目标是探测并绘出天空中微波背景的温度变化。1965年发现的微波背景在空中似乎是各向同性的。后来发现温度在整个空中大尺度上有千分之一的变化。现在知道这是由地球经过大爆炸遗留的辐射场时引起的多普勒效应。地球前进方向的天空看上去比地球离开的方向稍热一点。除了这种“偶极”变化，辐射在各个方向上是相等的。但是理论家们长期以来对微波背景中存在结构——冷斑点和热斑点的波纹图案表示怀疑。COBE发现的图案正是这样，成为了全球报纸的头条。

为什么微波背景不是完全平滑的呢？答案与大尺度结构的起源密切相连，又是引力在其中起了作用。

弗里德曼模型为我们了解宇宙的大量性质是怎样随时间变化的提供了途径。但这个模型又是不现实的，因为它描述的是一个理想的、

完全平滑而没有瑕疵的宇宙。这样的宇宙开始时就完美无瑕而且将永远保持完美。但在现实的情况下总有缺憾。有些区域的密度值比平均值稍高，而有些较稀薄。一个略呈团状的宇宙会怎样？答案离理想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密度高于平均值的宇宙区域对周围物质的引力拉拽强于平均拉拽，因此将吸入物质而耗尽周围的物质。在这个过程中，它相对于平均值密度越来越大，拉拽也更强。结果是一种团块的失控增长叫做“引力不稳定性”。最终形成了束缚强烈的团块并开始聚集成丝状和片状，就像在宇宙结构图中看到的那样。开始这个过程只需要非常小的波动，而引力就像一个功率放大器，将最初的微小的波纹转变成巨大的密度波动。利用星系巡天可以绘出最终结果；而在COBE图上可以看到最初的微小扰动。我们甚至可以对最初的扰动是怎样留下烙印的作出很好的理论解释，是宇宙暴胀产生了量子波动。

关于结构形成的基本理论已出现了多年，但是由于引力的复杂特性很难将这种理论转变成详细的预测计算。在第三章提到，如果没有简化的对称性，即使牛顿运动学定律方程也是非常难解的。在引力不稳定的后期，没有类似的简化。宇宙中的每个物体都对其他物体有引力拉拽；因此需要了解在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个物体上的所有作用力。所有的这些力之和是很难用纸笔来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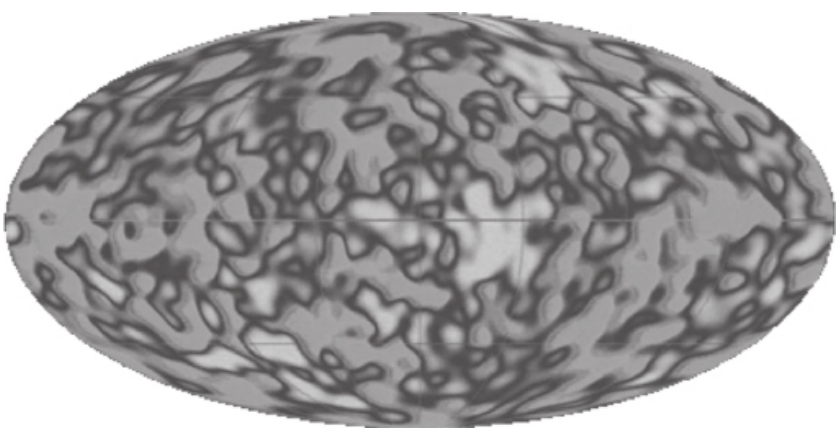

图23　COBE探测的宇宙背景波纹。1992年宇宙微波背景探测器（COBE）卫星测出天空中宇宙微波背景温度的十万分之一的微小波动。这些“波纹”被认为

是形成星系和大尺度结构的“种子”。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巨型计算机的出现，这一领域获得了加速发展。引力可以形成宇宙结构，这一点已非常明确，但需要宇宙中有足够的质量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个工作。因为基本核合成理论只允许相对少量的“普通”物质。理论家们假设宇宙是由某种奇怪的暗物质主宰的，它们没有参加核反应。模拟显示这种物质最好是“冷”的暗物质。如果暗物质是“热”的，则它们运动太快而无法形成合适尺度的团块。

计算机出现后的许多年后，一个自下而上的宇宙结构模型最终出现了。在这个模型中，首先是暗物质的小团块形成，这些作为基本单元的小团块结合成更大的单元，然后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最终星系尺度大小的物体形成了。而后气体（由重子物质构成）聚集，恒星形成，于是有了星系。星系继续通过链式和片式聚集形成更大尺度的结构。在这个模型中，结构随时间（或者说随红移）快速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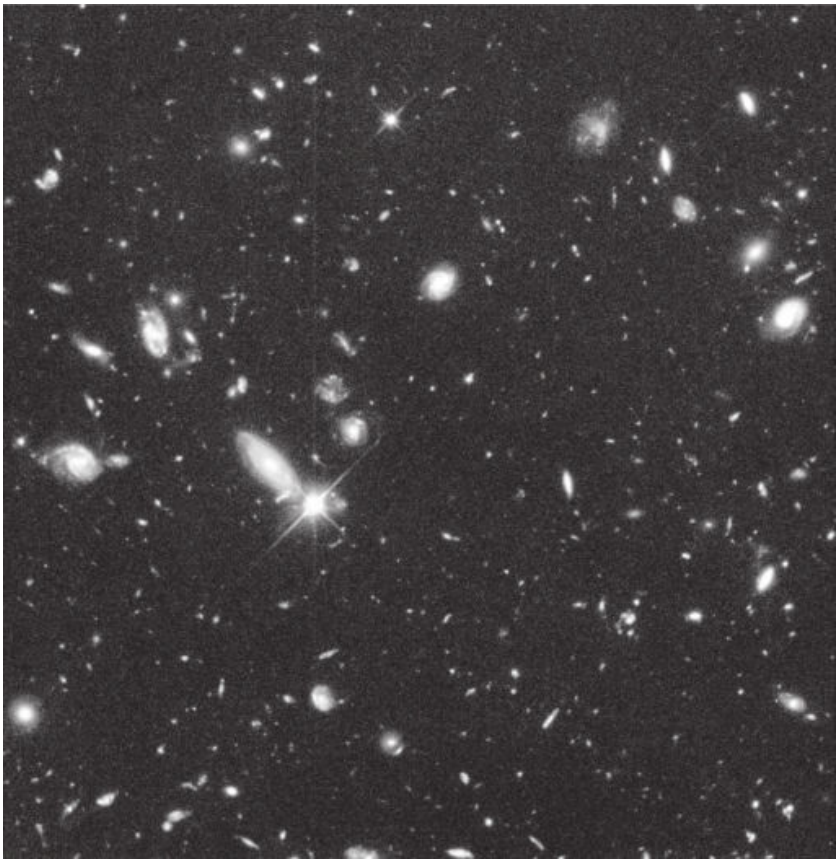

图24　哈勃深场。这是将哈勃空间望远镜指向一个空白的天区拍摄的，这幅图像显示了遥远的大量暗星系。其中一些天体的距离非常远，发出的光需要花超过90%的宇宙年龄那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我们。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看到星系的演化。

冷暗物质的观点已获得很大成功，但还远不完善。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暗物质，也不知道它们的形式。星系形成的细节问题也未解决，这是因为与气体运动和恒星形成有关的流体动力学和辐射过程比较复杂，但是这个领域的工作现在不只限于理论研究和模拟实验。观测技术的突破，如哈勃空间望远镜的研制成功，使我们现在能够看到高红移的星系，因而可精确地研究它们的性质和空间分布如何随时间变化。利用下一代大型红移巡天，我们将获得大量关于星系在空间移

动轨迹的细节信息，同时也可获得宇宙有多少暗物质以及星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等线索。但是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可能不是来自对引力不稳定性过程的最终产物的观测，而且来自对其最初状态的观测。

造物的声音

COBE卫星在结构形成方面是非常先进的，但是这个仪器还是有许多局限性。COBE最显著的缺点是缺少分辨微波背景中波纹的细微结构的能力。COBE的角分辨率只有10度左右，按照天文标准这是非常低的。作为比较，满月的直径约半度。宇宙学家希望在微波天空中的精细结构里找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的答案。

早期宇宙的波纹是由一种声波产生的。当宇宙还是非常热，温度在几千度的时候，声音在宇宙中回响。现在的太阳表面具有类似的温度且以相似的方式震动。由于COBE的比较低的分辨率，它只能探测到波长非常长的波纹。这些波纹代表了音调很低的声波，是造物的低音符。在这些声波中包含的信息非常重要但十分不详细；它们的声音相当沉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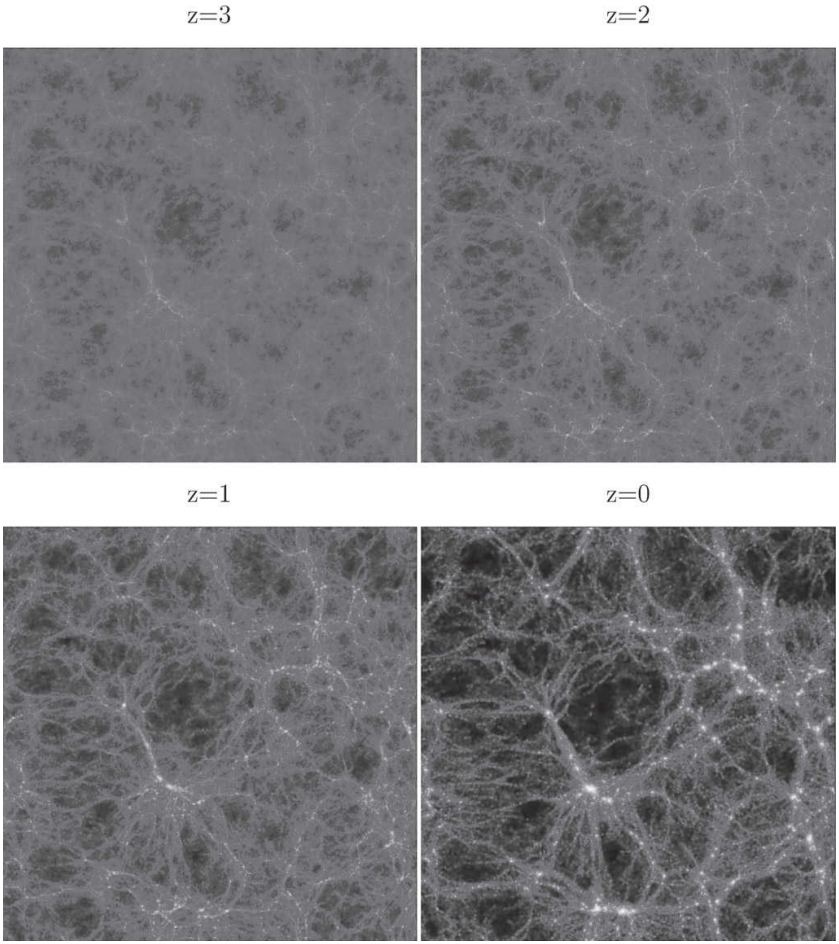

图25　结构形成的模拟。从几乎是平滑的初始环境开始，现代超级计算机可以模拟宇宙随时间向前演化。在室女座论坛中的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宇宙膨胀到原来的4倍时出现成团现象。在最后一帧图上稠密的节点是星系和星系团，而丝状结构让我们想到星系巡天的探测结果。

另一方面，宇宙也应产生更高音调的声音，而这更加有趣。声波是以特定的速度传播，例如在空气中大约是每秒300米。在早期的宇宙，声速应该快很多，接近光速。在微波背景产生的时代，宇宙的大约年龄为300,000岁。从大爆炸时声波首次被激发到宇宙微波背景产生的这段时间，声波只传播了约300,000光年。这个波长的震动产生

了特殊的“音符”，如同某个乐器的基调。并非巧合，星系超团大约也是这个尺度；它们正是产生于这个宇宙号角的回响中。

图26　BOOMERANG气球。这张照片显示了在南极施放的气球上做的实验。实验有效载荷位于右侧的车上。这个气球的飞行线路围绕着南极，利用循环风回到施放点附近。南极非常干燥，使其成为地球上微波背景实验的最佳地点，当然如果条件允许，在太空中实验则更理想。

早期宇宙的特征波长应该在微波天空的热点和冷点的图案中显现，但是因为波长相当短，它比COBE能分辨的尺度精细很多。事实上，这些声波产生的点的角尺度大约为一度。因此，从COBE开始，开始了研发探测仪器的竞赛，仪器不仅要能探测宇宙的基本音调也要能探测到更高的和声。通过对造物声音进行详细的分析，希望能回答当代宇宙学面临的许多主要问题。声谱所含的信息包括：宇宙含有多少质量，是否存在宇宙学常数，哈勃常数的值是多少，空间是否是弯曲的，以及是否发生过暴胀。

国际上有两项主要的相关实验，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MAP试

验飞船已于2001年发射而欧空局的“普朗克测量者”预计在几年后发射，它们会绘出极高分辨率的天空波纹的详细图案。如果对这些结构的解释是正确的，我们不久将会对上述问题有确定的答案，我们迫切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同时，相关线索也强有力地暗示了答案将如何揭晓。两项重要的气球试验，BOOMERANG和MAXIMA已经绘出了小片天空图，只比MAP和“普朗克测量者”的分辨率稍微低一点。这些实验还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是它们指出宇宙的几何是平坦的。这很容易论证。我们知道声音的特征波长具有可测量的特性。我们也知道这些被观测的声波有多远（大约150亿光年）。因此，如果宇宙是平坦的，我们能够推算出这个声波在天空中的角度。如果宇宙是开放的，这个角度会比平坦宇宙中的小；如果宇宙是封闭的，这个角度会大些。而实验结果暗示了宇宙的平坦性。实验的测量结果与前些章讲的加速膨胀都为宇宙学常数的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确定宇宙是平坦的并且在加速的唯一途径是弄清真空能是否存在。

宇宙结构研究揭示的画面似乎与前面讲过的其他线索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仍不知道宇宙如何演化成了现在的样子。解答这个深层次的难题依赖于更加深入地理解物质、空间和时间的性质。下一章将对这些性质进行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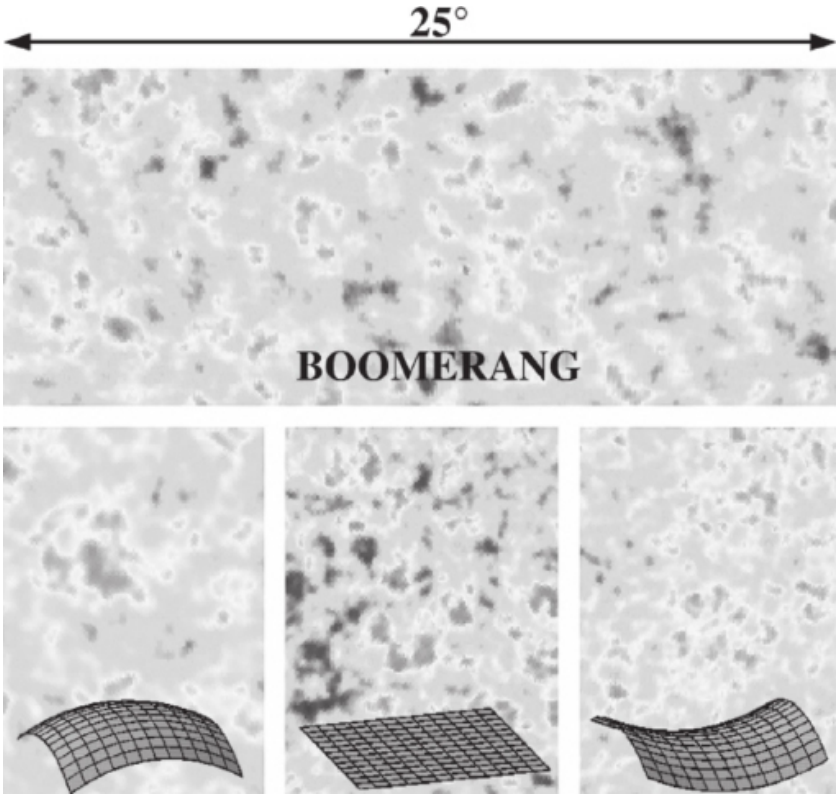

图27　平坦的空间。上方的图显示了BOOMERANG所测量的温度波动的精细尺度图形。下面的模拟图案显示了在封闭的、平坦的和开放的宇宙中所估计的这些波动的角度尺度。最匹配的是平坦宇宙（中图）。如此强烈的对比进一步推动未来的MAP和普朗克测量者以同样的分辨率绘制整个天空的图形。

注释

〔1〕 本文提到的能够同时得到400条光谱的望远镜是澳大利亚的英澳天文台的2dF巡天项目的望远镜，而中国自行开发的LAMOST望远镜可以同时观测到4,000条光谱，计划得到总计10,000,000个星系的光谱。

第八章
统一理论

现代物理学的纪元始于20世纪初发生的两场革命。一是相对论引发的革命，它在20世纪宇宙学的发展中起了主要作用；另一场巨变是量子力学的诞生。但相比而言，量子物理学对宇宙学的意义至今还不清楚。

量子的世界

在量子理论的世界里，每个实体都有双重性质。传统的物理学使用两个不同的概念来描述不同的自然现象，它们是波和粒子。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这两个概念在微观世界中并不是毫无联系。我们曾经认为是粒子的物质有时可能表现出波的性质，曾认为是波的现象可能有时表现出粒子的性质。光像是一种波。我们可以用棱镜和透镜产生干涉和衍射效应。麦克斯韦给出一个方程对光进行数学描述，这个方程被称为波动方程：光的波动性质可以通过这个理论来预测。另一方面，普朗克的热物体辐射研究显示，光也表现出被称作“量子”的类似离散包的特性。他犹豫地称这些量子可能为粒子。实际上是爱因斯坦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光电效应理论中，正式提出光其实是由粒子构成的。这些粒子后来被称为“光子”。但是物质怎么能既是波又是粒子呢？我们必须承认，这两个概念中的任意一个都无法对我们的现实世界进行确切的描述，它有时像波有时像粒子。

我们来打个比方，一个中世纪的修道士在完成第一次非洲之旅后回到修道院。在旅途中他遇到一只犀牛，他要把这件事讲给他那些心存疑惑的修士弟兄们听。由于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像犀牛这样的奇异动物，他必须用比喻来解释。他说犀牛在某些方面像一条龙而在另一些方面像独角兽。于是修士们就可想象出这种动物的相貌。但是龙或独角兽在自然界都不存在，而犀牛却是存在的。这与我们的量子世界相似：现实世界既不是由理想化的波也不是由理想化的粒子描述的，但是这些概念可以让我们了解物质的某些具体特征。

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于1913年成功地将能量是以离散包（即量子）形式存在的思想运用到描述所有原子中最简单的氢原子，以及原子物理和核物理的其他方面。原子和分子中离散能级的存在是光谱研究的基础，而光谱被应用到天体物理以及法医学等多个领域，它对哈勃发现星系退行起了关键作用。

不确定的宇宙

对能量（以及光）量子化特性的认知只是现代量子力学革命的开端。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薛定谔（Schrödinger）和海森堡（Heisenberg）的研究工作才最终阐明了光的波粒二相性。在这之前的那些年中，光子虽然被认为是存在的，但是无法将其与光的波动性协调起来。20世纪20年代建立在波动力学上的量子物理理论出现了。在薛定谔的量子理论中，所有系统的特性都用一个波函数（常称为ψ）来描述，ψ随着一个方程演化，这个方程被称为薛定谔方程。波函数ψ依赖于时间和空间。薛定谔方程描述了波在时间和空间的波动。

但光的粒子性又是怎样的呢？答案是量子波函数不能描述电磁波一类的波，这类波被认为是存在于空间某一点随时间波动的物理实体。量子波函数描述的是一种“概率波”。量子理论认为，在整个体系中唯一已知的是波函数：在特定的时刻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粒子的位置，而仅能推断其出现在某个位置的概率。

波粒二相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测不准原理。在物理学中有许多地方都会用到它，但是最简单的应用是关于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称我们不能知道彼此独立的某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位置知道得越清楚，对速度就越不了解，反之亦然。如果能确切地知道其位置，则其速度就完全不可知了。如果精确地知道它的速度，该粒子就无法定位。这个原理是定量的，不仅适用于位置和动量，也适用于能量和时间以及其他的共轭变量对。

真空可以产生短暂存在的粒子，这些粒子在不确定性原理控制的时标上时而存在，时而消失，这是能量 - 时间不确定性原理的重要结果。这就是粒子物理学家期望真空拥有能量的原因。换言之，应该有一个宇宙学常数。唯一的问题是不知道怎样计算它。目前对它的最好假设也太大，超过100阶的量级。但是宇宙不确定性的思想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功；它被认为是小的原始密度扰动存在的原因，这些扰动正是宇宙结构形成的开始。

根据牛顿物理学，宇宙的运动是确定的，如果在一个给定的时间，我们知道一个系统中所有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我们就能预测这些粒子在后续时间的表现。在量子力学中这一切都变了，因为粒子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原则是量子力学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所有的推导都需要借助于概率的计算。

对这种概率方法的解释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例如，在一个系统中一束粒子射向两个相邻的狭缝。因为“概率波”穿过两个狭缝，对应这种情况的波函数ψ显示了一个干涉图案。如果粒子束功率足够大，它所含的光子数目也很大。统计上讲，光子应该按照波函数规定的概率落在狭缝后面的屏幕上。由于狭缝造成了一个干涉图案，屏幕将显示出复杂的亮暗带，波的相位有时叠加，有时抵消。这是似乎是合理的，假设我们降低粒子束的功率，可以在任意时刻只让一个光子通过狭缝。每个光子的到达都可以在屏幕上检测到。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做这个实验，在屏幕上就得到一个图案。尽管每次只有一个光子穿过这套装置，屏幕仍会显示干涉条纹的图案。在某种意义上，每个光子必须在离开光源的时候变成波，穿过两个狭缝发生干涉，然后又变回光子，停留在屏幕上一个确定的位子。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很明显，每个光子都停在了屏幕的一个特定位置。此时我们知道光子的位置是确定的。这个粒子的波函数在此刻做了什么呢？按照所谓的哥本哈根解释，波函数收缩并集中到一个点。不管何时做这个实验，这种情况都会发生，而且可得到确定的结果。但是在结果出现之前性质是不确定的：光子确实不知道要通过哪个狭缝，它处于一个“混合”状态。测量活动改变了波函数，也因此改

变了现实。这使许多人开始揣测我们的意识和量子“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意识引起了波函数收缩吗？

“薛定谔的猫”佯谬对这个难题作了著名阐述。想象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有一只猫，房间里还有一瓶毒药。瓶子安在一个设备上，当量子事件出现时，如一堆放射性物质发射一个α粒子，该设备会将瓶子打碎而毒死猫。如果瓶子碎了，猫立即就会死去。大多数人会认为在一特定的时刻猫或者活着，或者死去。如果严格地按照哥本哈根的解释，猫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处在这两种状态：猫的波函数将两种状态重叠。只有当房间打开且猫的状态被“测量”，猫才“变成”活的或者死的。

另一种解释是，在测量进行的时候没有产生任何物理变化，只是观测者知识状态发生了改变。如果断言波函数ψ代表观测者的知识的而不是真实的现实，当已知粒子处在确定的状态时，改变波函数则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观点代表了量子力学的一种解释，在某级状态下事物是可以确定的，我们只是没有足够的知识去预测。

还有一种观点是多世界解释[1]。它认为在实验进行的每个时刻（即一个光子穿过狭缝装置的每个时刻）原来的世界变成两个：在一个宇宙中光子穿过左边的狭缝，而在另一宇宙中光子穿过右边的狭缝。如果每个光子都是这样，实验结束会有大量平行的宇宙。在整套实验中包含了所有可能实验产生的所有可能的结果。在讨论平行宇宙之前，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这个故事的线索。

缺失的联系

在第五章中讲了基本相互作用的标准模型。它包含的三种力都可以由量子理论来描述。第四种基本作用是引力，已经证明很难将它纳入一个统一的相互作用模型中。第一步是将量子物理并入引力理论合成量子引力理论。尽管人们在不断努力，还是无法做到。如果这步实现了，下一步就是用统一的粒子相互作用理论来统一量子引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创现代理论物理纪元的广义相对论成为了阻止进一步将自然界所有力纳入统一理论的羁绊。在许多情况下引力极其弱。大多数物体是通过原子间的电磁力组合在一起，这种电磁力比物体之间的引力强多个数量级。但尽管引力比较弱，它具有令人迷惑的特性，似乎抗拒着被纳入统一的量子理论中。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一个经典理论。同样，麦克斯韦的电磁学方程也是经典的。它们所涉及到的实体是均匀的而不是离散的，描述的是物质的确定性而不是概率。另一方面，量子物理学描述了基本的团块性质：物体由离散的块或量子组成。同样，如果掌握过去某时的足够信息，广义相对论方程使我们能够计算宇宙在未来特定时间的确切状态，因此它们是确定性的，而量子世界充满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体现的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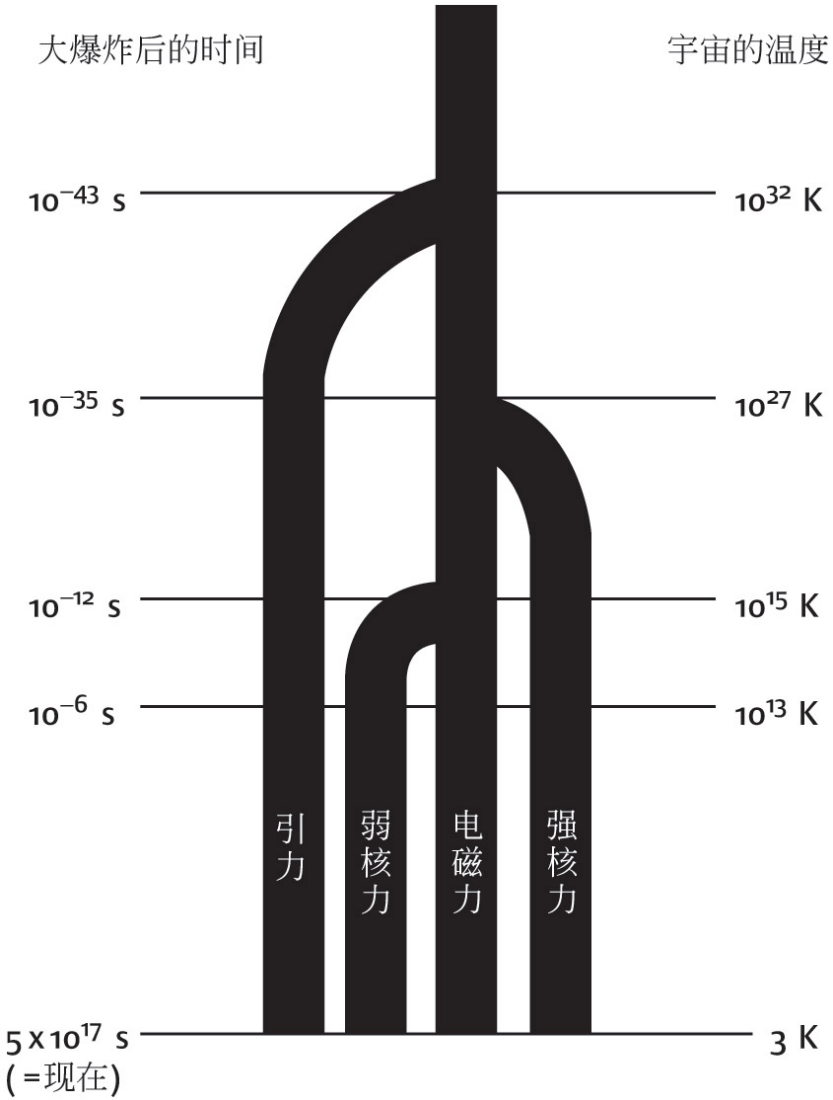

图28　统一理论。我们所知的低能世界的四种自然力被认为在高能时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将时钟拨回到大爆炸，我们首先会期望电磁力和弱相互作用统一成一种弱电力。在稍高一些的能态，弱电力与强核力统一于大一统理论中。在更高的能态，引力也将加入，形成一个万物统一理论。如果这样的理论存在，它将能够对大爆炸作出描述。

当然，传统的电磁理论在许多情况下是完全适用的，但是对于某

些情况，该理论就不适用了，如辐射场相当强的情况。为此，物理学家们寻找（并最终发现）电磁学的量子理论，或者叫量子电动力学（QED）。这套理论也与狭义相对论是一致的，但不包括广义相对论效应。

爱因斯坦的方程对大多数情况的描述是准确的，我们自然希望能建立引力的量子理论。爱因斯坦自己总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理论并不完整，而需要更加完整的理论取代它。以经典的电磁学的失效来比拟，人们认为当引力场非常强或者长度非常短的时候爱因斯坦方程也会失效。建立这种理论的努力至今还未成功。

虽然还不清楚引力的量子理论应该包含什么，但已经有了一些有趣的推测。例如，由于广义相对论基本上是一个时 - 空的理论，空间和时间自身在量子引力理论中应该量子化。这表明尽管空间和时间在我们看来是连续和平滑的，但在极小尺度的普朗克长度（大约10^{-33} 厘米）上，空间更多呈复杂的块状结构，可能是水泡样的泡沫结构，且由被称为虫洞的管道相连，这些虫洞在普朗克时间（10^{-43} 秒）内不断形成并关闭。我们有理由设想，量子化的引力波（或者称之为引力子）在其他基本的相互作用中可能扮演了规范玻色子的角色，例如量子电动力学中的光子。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这种思想的正确性。

量子引力中微小的长度和时间尺度表明了为什么量子引力是属于理论家而不是实验科学家的领域。还没有造出任何设备，能够迫使粒子进入普朗克数量级或更小的长度区域。揭示引力的量子特性这一任务需要巨大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理论家从粒子实验转向宇宙学的原因。大爆炸必须涉及普朗克尺度上的现象，所以从宇宙学中获得基础物理知识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时间的开始

宇宙形成之初奇点的存在对大爆炸模型来说是个坏消息。它类似

于黑洞奇点，是一个真实的奇点，温度和密度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大爆炸可以被认为是形成黑洞的引力塌缩的一种时间反演。许多物理学家认为，按照史瓦西解，宇宙学初始奇点可能是应用于大爆炸模型的爱因斯坦方程的特殊解的结果，但是现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霍金和彭罗斯总结了彭罗斯的原始黑洞理论，显示出奇点一直不变地存在于一个满足最普遍条件的膨胀的宇宙中，物理理论在大爆炸的时刻完全失效，而令人反感的“无限”此时出现了。

有可能避开这个奇点吗？如果可能，怎么做？宇宙学初始奇点可能只是经典广义相对论推演到该理论失效处的一个结果。这是第三章中讨论黑洞的时候引用爱因斯坦的一段话。量子引力是需要的，但是没有这样的理论，而且正因为没有，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否能解决宇宙的明显不合理的诞生之谜。

但还是有办法避开经典广义相对论中的初始奇点而不需要求助于量子效应。首先，可以通过提出一个不遵守霍金和彭罗斯所列条件的早期宇宙的物质状态方程来避开奇点。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对高能态物质的一个限制，称之为强能量条件 。这个条件可能被以多种方式违反，特别是在宇宙暴胀理论所预测的宇宙加速膨胀的过程中。在这个条件一开始即被违反的模型中，可以有一个“反弹”，而不是一个奇点。将时钟拨回，宇宙的尺度会缩为最小，然后再次膨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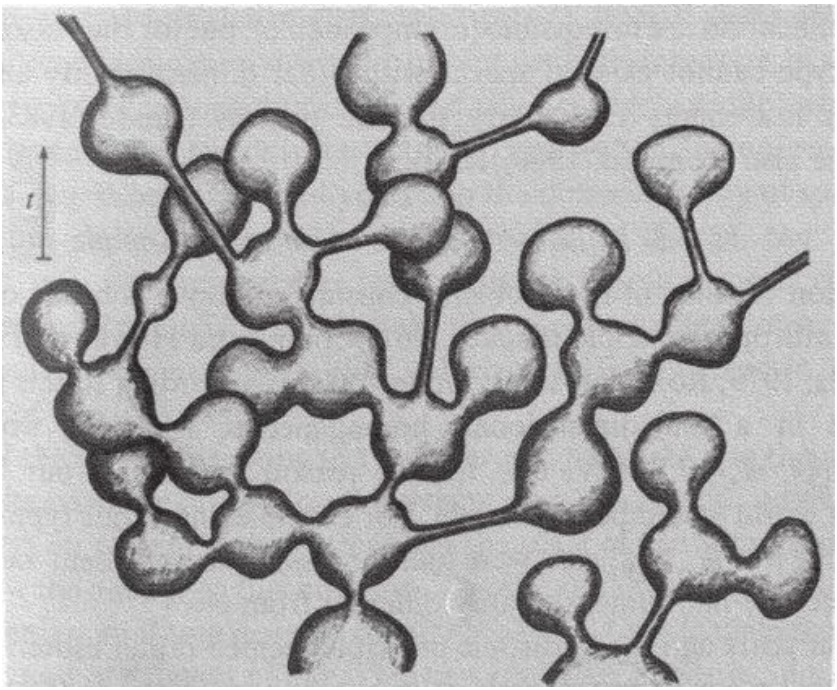

图29　时 - 空泡沫。与量子引力相关的思想之一，认为时 - 空自身会变成大量沸腾的泡沫和管道，在普朗克时标上出现和消失。

奇点是否可以避开仍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而且是否能够描述出普朗克时间之前大爆炸的最早的状态也仍不清楚，至少在完善的量子引力理论建立之前这些都无法解决。

时间之方向

宇宙形成之初奇点的存在使人们对造物时刻的空间、特别是时间的性质产生了疑问。此时给出对时间的清晰定义是有益的。每个人都熟悉时间是什么，以及事件是怎样按照先后顺序排列的，我们习惯于用因果关系来描述紧跟在某些事件后面的事件。但这些只是简单的概念，我们无法深入下去。那么对时间是什么的最佳论述则是：由钟表来测量的某种事物。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效地动摇了牛顿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概念基础。牛顿认为，空间是三维的，时间是一维的，它们是绝对的，不随粒子或实验者的运动而变化，相对论物理学把时空组合成一个四维的实体，叫做时 - 空。在许多情况下，这个理论中的时间和空间在数学上被认为是等价的：对相同的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同的观测者往往会测出不同的结果，但是四维的时 - 空间隔总是相等的。

但是爱因斯坦理论上的突破性成功往往会掩盖来自日常经验的这样一个事实：时间和空间本质上不同。我们可以去南方或北方，东方或西方旅行，但在时间上我们只能走向未来，不可能后退到过去。伦敦和纽约在同一时刻处于不同的空间位置，对此我们没有什么疑问。但没有人会说在5001年仍和现在的情况一样。我们也会说，现在我们做的会引发未来的一些事件，但是不会考虑同时发生于两个不同地点的事件间的因果关系。空间和时间真是非常不同。

在宇宙学中，大爆炸很显然具有特定的方向。但是描述它的方程在时间上是对称的。我们的宇宙正在膨胀，而不是收缩，但它可能收缩并用相同的定律描述。我们观察到的时间的方向性是否可能是因宇宙的大尺度膨胀而凸现出来的呢？霍金等人思考过，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宇宙，它最终停止膨胀而开始收缩，在收缩的过程中时间可以有效地后退。事实上，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就无法判断时间倒退的收缩宇宙和时间前进的膨胀宇宙的区别了。霍金曾一度确信情况只能如此，但后来改变了想法。

爱因斯坦的四维理论引出了一个更抽象的问题：描绘一个粒子在时 - 空中运动的整个历史的完整“世界线”[2]，可以通过理论计算得出。处于不同时刻的一个粒子与处于同一时刻、不同位置的两个粒子以同样方式存在。这与我们通常的想法是如此地不一致。难道我们未来已经存在了吗？所有事情都以这种方式注定了吗？

这些问题并不只限于相对论和宇宙学。许多物理理论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是对称的，如同它们在不同空间位置中的对称。时间明显的非对称性怎样与这些理论调和的问题是一个艰深的哲学难题。至少还有两类物理理论提出了这个有时被称为时间之方向 的问题。

一个理论是直接来自于一个看似全能的物理原理，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它规定了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熵是不会减少的。熵是对系统的无序的度量，所以这个定律意味着一个系统的无序程度趋向于增加。我已经通过对我的办公室进行周期性观察试验性地对该定律进行了多次验证。第二定律是一种宏观的描述；它涉及蒸汽引擎那样的大问题，但却来源于物理理论对原子和能量状态的细致的微观描述。规定这些微观状态的定律在时间上是完全可逆的。那时间之方向性是怎么出现的？

类似于经典的热力学定律，对黑洞和引力场特性进行一般描述的一套定律也已建立。尽管与引力场相关的熵是很难定义的，这些定律似乎指出，甚至在一个收缩的宇宙，时间都是有方向性的。正是这个原因使霍金放弃了他的时间反转思想。

另一个时间之方向问题来自量子力学，它也是时间对称的，但当一个实验进行时，奇怪的现象如波函数的收缩出现了。波函数似乎只在一个时间方向上收缩，而在另一个方向上不收缩，正如上面所暗示的，这可能是解释量子力学时的一个概念性难题。

无边界的假设

空间和时间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同，我们生活在远离大爆炸的低能世界里。但这意味着时间和空间一直是不同的吗？或者在引力量子理论中它们真的相同吗？在经典的相对论中，时 - 空是一个四维构造，三维的空间和一维的时间融合在一起。但是空间和时间不等价。由霍金和吉姆·哈特尔共同提出的一个与量子宇宙学相关的思想指出，当引力场非常强的时候，时间的这种独特性可以抹去。这个思想基于对虚数性质的巧妙运用（虚数是负1的平方根i的倍数）。这种对时间性质的修补是哈特尔和霍金的量子宇宙学无边界 假设的一部分，在他们的理论中，由于时间失去了区别于空间的特殊性，时间起点的概念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样的时 - 空是没有边界的。因为没有时间，也就没有

大爆炸，没有奇点，有的只是空间的另一个方向。

大爆炸的观点中并没有造物，因为“造物”这个词暗示了某种“前和后”。如果没有时间，宇宙就没有开始。对大爆炸之前发生过什么的提问，就像问哪里比北极更北一样毫无意义。

应该强调的是，无边界的猜想并不被所有量子宇宙学家接受：对于宇宙开始（或者没有开始）的另一种理解已经被提出了。俄罗斯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威令根提出了另外一套量子宇宙学，在其中有明确的造物的定义，宇宙通过量子隧道过程从无到有出现了。

统一理论

我已论述了粒子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努力将量子物理学和引力理论统一起来的几个领域。这些努力是朝向许多物理学家认为的科学最终目标迈出的一步。这个目标是总结出以一个方程描述所有自然界已知力的数学定律。如果你没有穿着品位的话，可能会把这个方程写在你的T恤上。

物理学的定律，有时也叫做自然定律，是物理科学的基本工具，它们由数学方程组成。这些数学方程根据前面讲过的各种基本相互作用来定义物质（以基本粒子的形式）和能量的特性。有时利用实验室获得的实验结果或对自然物理过程的观察结果来推导描述这些数据的数学规则。而有时首先在假设和物理原理的基础上建立理论，而后通过实验验证。随着我们认识的深化，表面上不同的物理定律会统一为一个有普适性的理论。前面给出的例子表明了在过去一百多年中这一思想的影响力。

但是这项研究活动的表面之下还隐含着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例如，若宇宙早期的物理定律是不同的将会怎样？我们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吗？我们的回答是，现代物理学理论实际上预测了物理定律的变化。例如，当我们回到大爆炸早期，电磁力和弱相互作用在高能态下变得难以分辨。但是定律中的这种变化本身由另一个定律来描述，即

所谓的弱电理论。在大统一理论优先的尺度上弱电理论自身或许也要修正，以回到宇宙的起点。

但不管是什么基本规则，物理学家必须假设它们在大爆炸开始后就一直适用。这些基本规则只在低能态下会随时间变化。按照这个假设，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宇宙热历史的完整一致图景，而这似乎不会与观测的结果有大的矛盾。这使得该假设合理，但并不能证明其正确。

另一组重要的问题围绕着物理理论中数学所扮演的角色。自然真是数学化的吗？我们制定的规则真的是一种简略的表达方式，能让我们用几页纸的文章来描述宇宙吗？物理定律是我们发现的还是创造的？物理仅是映象还是自成体系的知识领域？

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与描述宇宙初始时时空的物理定律有关。例如在某些版本的量子宇宙学中，物理定律需要先于它们要描述的物理宇宙存在。这使得许多理论家采用柏拉图式的哲学思考方式。柏拉图学派认为，真实的存在属于客观存在的理想化世界而不是我们意识的不完美世界。对于新柏拉图派宇宙学家来说，真正存在的是统一理论的数学方程（尽管这仍是未知的），而不是物质和能量的物理世界。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宇宙学家都对这种想法着迷。对那些较实际的宇宙学家而言，物理定律仅是对宇宙的简洁描述，其意义只在于它们的实用性。

为建立统一理论已做过许多尝试，包括奇异的超对称及弦理论（或甚至两者组合而成的超弦理论）。在超弦理论中，粒子不再被看成粒子，而看作在一维实体上的振动的弦。弦振动的不同模式对应着不同的粒子。弦本身存在于十或二十六维空间中。我们的时 - 空只有四维（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所以其他的维必须被隐藏。可能它们被包裹得非常小而不能观测到。这个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引起轰动后便销声匿迹，主要原因是处理这样复杂的多维物体所需技术的复杂性。随着将弦的概念推广为branes（膜）——名字来源于membrane（膜）的现实的多维物体，以及意识到事实上存在一种简单理论（称为“M-理论”）可以涵盖这种方法的各种尝试，最近这种思想开始复兴。这些想法令人兴奋但还相当不完善；弦理论至今还没有

作出任何能对宇宙学产生影响的清晰预测。是否这些方法热盼的“大于大统一”能够真正实现，我们仍将拭目以待。

寻找统一理论也带来哲学上的问题。包括霍金在内的一些物理学家，将构建统一理论看成某种对上帝思想的解读，至少是揭示物理世界内在秘密的努力。另一些人认为物理理论仅仅是现实世界的一种描述，类似于一张地图。一套理论可能对进行预测和理解观测或实验结果有用，但仅此而已。目前我们对引力使用不同于电磁学或弱相互作用的理论，这或许不便但却不是很糟糕。统一理论只是一张简单地图而不是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地图。这种哲学是注重实效的。我们使用理论与使用地图出于相同的原因：因为它们有用。著名的伦敦地铁图确实很实用，但它并不是特别准确地反映了物理现实，也无需如此。

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担心统一理论所提供解释的性质。例如怎么阐释为什么统一理论一定要是这样的理论？在我看来这是最大的问题。当量子理论本身具有非决定性时，基于量子力学的任何理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会是完整的吗？再有，数学逻辑的发展已经对理论完全自恰的能力提出了质疑。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证明了一个定理，说明任何数学理论都包含该理论不能证明的内容，该定理被称为不完备性定理。

人择原理

宇宙学一直是关于人类探索宇宙以及与其关系的学问。随着科学宇宙学的发展，人的作用削弱了。我们的存在看似偶然、无计划，是宇宙的伴生物。这种解释最近受到所谓人择原理的质疑，毕竟生命的存在和决定宇宙演化的基本物理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布兰登·卡特（Brandon Carter）首次提出将“人择”一词加进“宇宙学原理”以强调我们的宇宙是“特殊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智慧生命在其内部演化。

还有许多或许可行的宇宙学模型不能与人类观测者的观测一致。

例如，我们知道碳和氧这样的重元素对地球生物发展的复杂化学过程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也知道恒星要经过大约100亿年的演化，才能从存在于大爆炸模型早期的氢和氦合成大量的这些元素。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宇宙的年龄不止100亿岁。如果宇宙膨胀的话，那么其大小与年龄有关，而这个思路有助于解释宇宙为什么像现在这么大。它必须足够大，因为它的年龄必须大到给人类足够时间在其中演化。这种形式的推理一般称作“弱”人择原理，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宇宙由于我们的存在可能会具有的特性。

某些宇宙学家已经在更深层次寻找人择原理的扩展。弱人择原理可应用于我们宇宙的物理特性，如其年龄、密度或者温度，“强”人择原理涉及的则是这些性质演化遵循的物理定律。看来，这些基本定律要被非常精确地调整以适用于复杂的化学过程，进而允许生物的发展和最终人类的出现。如果电磁学和核物理的定律只作稍许变化，就会使化学和生物学变为不可能的。表面上，自然定律按照上述方式进行调整似乎是偶然的，因为在我们现有的基本物理的知识中，没有要求自然定律以这种方式促进生命发展的相关内容。因此这也正是我们寻求解释的东西。

某些版本的强人择原理中，推理基本上是来自设计学的论点：物理定律就应该是这样，因为它们必须适合生命的发展。这等价于要求生命存在本身即为一条自然定律，而更多我们熟悉的物理定律都从属于它。这种推理暗示宇宙是为提供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而特别设计的，这迎合了一些人的宗教思维模式，但在科学家中却相当有争议。

还有一种可能更科学一些的强人择原理版本，认为宇宙可能由一个个小宇宙组成，每个拥有不同的物理定律。这可能出自统一理论，高能对称在宇宙的不同部分以不同的方式被打破。显然人类只能在其中一个适合有机化学和生物学发展的小宇宙中演化，所以我们不应该奇怪其中基本的物理定律具有特殊属性。这多少能够解释上面提到的自然定律令人惊讶的性质。这种观点并非来自“设计”的理念，因为物理定律从一个小宇宙到另一个小宇宙会随意地发生变化。

这一版本的人择原理不可避免地受到争议，但它至少涉及了“怎

样”和“为什么”的区别。宇宙学是否能解释宇宙为什么要如此这般，仍需拭目以待，但是我们在理解宇宙发生了什么和怎样发生的问题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注释

〔1〕 多世界解释也叫平行世界理论。

〔2〕 由于一个粒子在任何时刻只能处于一个特定的位置，它的全部“历史”在这个四维空间中是一条连续的曲线，这就是所谓的“世界线”。

后记

宇宙学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法医学。不管是宇宙学家还是法医学家都不能在与先前略有不同的条件下进行重造过去事件的实验，而这种实验却是其他学科的科学家经常做的。只有一个宇宙，也只有一个犯罪现场。在这两个领域中的证据经常是间接的、难以搜集的，且存在多种解释。尽管有这些困难，在我看来，对大爆炸理论的支持毋庸置疑。

当然，重要的问题还未解决。我们仍然不知道宇宙中大多数物质的形式。我们不能肯定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我们不知道宇宙是怎样诞生的，或者是否发生过暴胀。不过，理论研究和实际观测取得的一致是如此之多，如此令人瞩目，似乎预示着一张拼合而成的关于宇宙的完整画面终将揭晓。这也是人们常说的著名的结束语。

宇宙大爆炸中发生了什么？星系从何而来？宇宙是加速的吗？“暗物质”是什么？是什么引起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扰动？本书将深奥的宇宙学展现得生气盎然、多姿多彩，引领读者在浩瀚的宇宙中感受时空的深邃，聆听宇宙玄妙跃动的音符。

百科通识文库

49

全球灾变与世界末日

比尔·麦圭尔 著

梁福明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全球灾变与世界末日

比尔·麦圭尔 著 梁福明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52**

Global Catastrophe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2.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2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Bill McGuire 2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灾变与世界末日 /（英）麦圭尔（McGuire, B.）著；梁福明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04-2

Ⅰ．①全…　Ⅱ．①麦…　②梁…　Ⅲ．①自然灾害 - 灾害防治 - 普及读物　Ⅳ．①X4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72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04-2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前言
第一章　地球简介
第二章　全球变暖——大量热空气？
第三章　冰期来临
第四章　地球内部的大敌——火山超级爆发、大海啸以及即将到来的大地震
第五章　来自太空的威胁——小行星和彗星撞击地球
后记
附录一　灾害时标
附录二　地球的地质时标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比尔·麦圭尔，伦敦大学学院地球灾害学教授，本菲尔德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英国“自然灾害工作组”成员，火山学家，曾出版《地球上的火山》、《启示录：全球灾难博览》、《幸免于难：地球临危之对策》等多部著作。

译者简介

梁福明，理学博士，现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科学系任教。主要从事非线性动力学和气候物理学研究。曾在《防火科学杂志》和《地球物理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图　目

图1　地球板块图上的近代灾害位置
图2　岩石圈
图3　印度洋海啸（2004）后严重受损的建筑物
图4　火山爆发后（1902）圣皮埃尔镇（马提尼克岛）的惨状
图5　过去1,000年温室气体浓度增加
图6　历史温度变化：
（a）过去1,000年
（b）过去140年
图7　现在到2100年的年平均温度变化图
图8　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引发的洪水淹没了新奥尔良的街道
图9　过去42万年温度变化
图10　米兰科维奇周期
图11　泰晤士河上的冰雪节（1739—1740）
图12　本次和上次间冰期温度比较
图13　多巴湖卫星图像
图14　多巴火山喷发引起阳光减弱
图15　拉帕尔马岛上的别哈火山崩塌引发海啸的模型
图16　1923年东京大地震造成的破坏
图17　舒梅克-列维彗星撞击木星
图18　已知的近地小行星轨道
1．水星　2．金星
3．地球　4．火星
图19　通古斯卡地区被击倒的森林
图20　不同小行星撞击伦敦可能形成的破坏范围

前言

不管怎样[1]
该怎样就怎样
未来不是我们能明了
不管怎样

杰伊·利文斯顿&雷·埃文斯

预测世界末日的一个问题是，即使预测正确，也不可能享受一丝荣耀。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大批的卡珊德拉[2]们预测地球或人类的灭亡，结果是他们直到逝去都没有见到地球或人类的灭亡，没有机会宣称“我早就和你们说过”。用伟大作家马克·吐温的话来说，人类的灭亡一直以来都被过分夸大了。但是，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

当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世界正走向末日：大约50亿年以后，太阳上的燃料将最终耗尽，它将膨胀成一个巨大的红色球体，把地球烧成灰烬。另一方面，宗教中狂热的末世论者无疑也支持这一观点，并且想象出各种方式，其中包括疾病、战争、自然灾害、外星人物理实验失败等等，千方百计地说明地球和人类将很快走到尽头。根据地球目前的状况，如果你深思熟虑后依然认为：人类也许终将面临“厄运不久降临”的命运，就像约翰·莱斯利（John Leslie）在其著作《世界末日》（*The End of the World*）中简洁表述的那样，而不是“厄运推迟到来”，你的这种看法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全球变暖加速、人口爆炸和超级军事大国兴起的背景下，我们的确更有理由推测，人类伟大的冒险旅程不会持续到遥远的未来，不会纵横于浩瀚的宇宙，而是行将结束。

让人有些担心的是，剑桥大学宇宙学家布兰登·卡特（Brandon Carter）提出的一个观点可能为上述看法提供佐证。他的“死亡日论证”是这样的：假定人类的成长和生存要延续几百万年甚至几十亿年时间，那么现存的这些人只是生活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只是占人类总人数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卡特认为，这种情况在统计上是极不可能的。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今天的人口要占据人类总人数的10%。换句话说，早在人类能大规模地进入太空之前，人类已经不复存在。

约翰·莱斯利举例说明了以上观点。假设抽奖箱中有签了你名字的彩票，但你不知道箱子中还有多少其他人的。而同时你有理由相信，箱子中总票数为1,000或10的概率均为50%。在抽奖时，你在前三次就被抽到了。这种情况下，可能绝大多数人会相信箱子中的彩票是10张，而不是1,000张。

如果死亡日论证成立——事实上它已经受住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的猛烈攻击，那么在人类或地球——甚至两者——都被某个复仇女神消灭之前，人类也只有几个世纪的时间。尽管“末日和灾难”的论调持续了近1/4个世纪，我还是不禁有一点乐观。一瞬间消灭65亿或更多的人口并不容易，许多所谓的“世界末日”的情景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最坏的情况可能只是导致人类数量的严重减少，并且/或者使我们的全球技术文明退化为某种更简单、更狭隘的文明，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是这样。因此，我个人认同史蒂芬·巴克斯特（Stephen Baxter）在其科幻小说《多重时间》（*Manifold Time*）中描述的所谓“卡特灾难”。毫无疑问，人类或其后代最终将消失，但那个时刻距离现在还极其遥远。

这里，我们先仔细看看如何理解“世界末日”和本书中如何使用这一概念。就我的理解，“世界末日”可以有四种解释：（1）人类将自己的全部期望寄托在地球上，当太阳在距今50亿年后演化成一颗新星时，地球和人类肯定会被完全摧毁；（2）地球遭受这样或那样的灾难，但至少还有一部分人能存活在地球上；（3）也许由于致命的和无可避免的疾病，导致人类灭绝，但是地球依然存在；（4）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末日”。本书将集中讨论最后一种情况，即一些全球性的地球物理事件，这些事件即使不是致命的，但也可能给人类和技术社会带来沉重的打击。有些自然灾害威力巨大，足以使我们熟悉的世界到达末日。在这里，我们不论来自高科技的威胁，例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科学的发展、遗传工程、纳米技术、以及逐渐强大的高能物理实验，也不论一些人提出的除全球变暖之外的减少人类数目的方法，如核战争和生化战争。本书将介绍自然界可能带给人类的一些严重威胁，其中一些由自然界本身产生，另外一些则是由人类催生的。

虽然大自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温和的，但它也可能变成可怕的敌人，而人类几乎在永无休止地与大自然的变化无常作斗争——包括大洪水、大风暴、灾难性的地震和火山喷发。2004年12月26日，亚洲爆发骇人的大海啸，40万间房屋被毁，40个国家的30万人丧生，其中有10万儿童，无家可归、失业和陷入贫困的人数高达800万。大海啸只是让人类见识了一下大自然最厉害的一面。尽管大海啸的范围、强度及其所造成的损失在当代是空前的，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幸运的，人类文明还是在相对平静的气候和地质背景下得以成长和发展。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下个世纪及以后的前景很不乐观。在未来几十年，温室气体引起的温度骤升、海平面猛涨以及持续的人口增长无疑将导致为数更多、破坏性更大的自然灾害。与我们的直觉相反，地球上的一些地方可能变得更冷，例如，一旦墨西哥湾洋流减弱，英国将在本世纪内与北冰洋一样寒冷。在预期的新冰期内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变暖使这一新冰期威胁消失了吗？还是冰川只是在伺机卷土重来？

虽然气候变化在地质学上是快变现象，但与人的平均寿命相比则变化较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测量和预报。而更突然、更难预报的是那些足以摧毁我们整个社会、目前还未曾经历的地质大事件。这些事件可大致分为地球以外和地球本身这两种情况。前者包括地球与彗星和小行星撞击所造成的威胁，这一点已广为人知。即使一个相对较小的、直径2公里的物体与地球碰撞，预计也将毁灭地球1/4的人口。

虽然地球本身可能给人类带来严重伤害的潜在能力还没有得到广泛证实，但我们脚下时刻运动着的地壳能够带来全球自然灾害这一威胁对我们来说则是真切而严重的。等待我们的有三个重大事件，它们在地球史前时代已经发生多次，但我们在有史时期尚未经历。大约在7.4万年前，一次灾难性的火山超级喷发　使地球陷入了寒冷的火山冬季　。大约10万多年以前，由夏威夷火山崩塌掀起的巨浪无情地袭击了整个太平洋沿岸。地震风暴　在耶稣诞生前仅1,000年曾发生过，后来在黑暗时代〔3〕再次发生，袭击了东欧大部分地区和中东，将辽阔

土地上的许多曾经宏伟的城市夷为平地。毫无疑问，这类地质构造上的 灾难未来将再次袭击我们，这一类灾难会对我们这个依赖技术的全球化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很难预测我们是否能有效应对，但确定无疑的是，对地球上的大多数居民来说，形势将更加严峻。

生活在太阳系中最具有活力的星体上，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人类的存在和繁荣完全是由于地质偶然事件。正如本书第四章将提到的，近来对人类DNA研究显示，在距今7.4万年前，曾发生过史无前例的超级火山喷发，人类险遭灭绝。如果我们在6,500万年前就已存在，当一颗直径为10公里大小的星体撞击地球时，人类就与恐龙一起灭绝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只要所有人类都还被拘于单一的太阳系中的单一星体上，人类长期生存的前景就是脆弱无力的。不论将来的技术如何强大，只要我们依然在地球摇篮中，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受自然界的猛烈袭击。即使我们不接受“厄运不久降临”的前景，但只要地球存在，而且我们还生活在地球上，全球自然灾害将不时发生，人类的进步将会受到它们的持续阻碍，甚至出现倒退。尽管其中一些事件会把我们带到已知的世界末日，但除非再一次出现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或彗星撞击地球的严重事件，总的来说，人类还是有存活和发展的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我们将开始离开地球，进入太空，首先迁徙到与地球属性相同的世界，然后再到其他星体。在目前内倾的政治环境下，我们不可能确定人类何时能正式迁入太空，但一定会的，届时人类将长舒一口气：终于不用再孤注一掷了。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人们尽可在想象的空间里自由翱翔。本书将从地球物理学角度说明，未来是什么样只能顺其自然。

比尔·麦圭尔

于英国汉普顿

2005年8月

注释

〔1〕 原文为西班牙语。——译注，下同

〔2〕 卡珊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不被重视的灾难预言者。

〔3〕 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欧洲历史上早于中世纪的一段时期，指公元5至10世纪。

第一章

地球简介

危险：大自然在行动

遭受地震袭击后城市的断垣残壁，从火山爆发中逃出的成千上万惊恐的难民，这些电视画面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由于距离感和缺乏真正的切肤之痛，我们对此不会感到吃惊或害怕。生活在繁荣的欧洲、北美洲或大洋洲的大多数人虽未完全免于灾难，但是他们已经非常幸运了。对他们而言，严重的自然灾害只是发生在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并且转瞬即逝。每天随意看看流行肥皂剧中的谋杀案，或者关注一下某个获胜的地方足球队，这些要比看5万人死于委内瑞拉泥石流更有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态度甚至流行于发达国家的一些地区，而这些地区都极易发生火山喷发或地震。如果你告诉生活在美国加州马默斯的居民区域火山爆发对他们生活的威胁，或者告诉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居民，大地震将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他们可能会耸耸肩告诉你：眼前有比这重要得多的事情。对此唯一的解释是他们拒绝相信这些事。他们很清楚未来某个时刻将发生可怕的灾难，只是不能接受这些事件发生在自己或后代的身上。

就全球范围的自然灾害而言，这种态度几乎无所不在，它渗透到了国家政府、国际机构、多边贸易集团、以及大部分科学团体中间。但让人欣慰的是，至少在一个领域，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小行星和彗星撞击地球的威胁已是常识，人类已经开始寻找所有正在逼近地球、有可能使人类发展突然止步的小行星。在英国和美国，由于电视节目的广泛宣传，更多观众开始了解到火山大喷发和大海啸的严重威胁，而不只局限于寥寥几个研究这些现象的科学家。特别是通过媒体对2004年12月的亚洲大海啸密集而全面的报道，人们对海啸及其巨大的破坏力和造成的生命损失有了广泛而深刻的领会。英国政府正在相应地推动成立一个国际科学小组，以便评估发生这种规模的自然灾害的威胁有多大，同时也顺利推行了印度洋和大西洋上的海啸预警系统计划。

事实上，地球是一个充满危险、非常脆弱的地方：它只是穿梭在太空中的一个小石块，地壳剧烈运动会造成毁坏，地球物理条件和地球运行轨道变化会引发剧烈的气候变化。冰期结束后仅1万年中，地球逐步变暖，温度接近于地球近代史上的最高温度。同时，人口过多以及对地球的过度开发利用使得当代社会更容易受到地震、海啸、洪水和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的冲击。本章介绍了地球和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威胁，后面将探讨即将来临的更大威胁。

地球是太阳系中最具活力的星球，这种活力为人类提供了保护性的地磁场、大气层、海洋，最终保护了我们的生命。正是这些地球物理特征使得地球生机盎然并持续发展，同时也使地球成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例如，那些壮观的火山喷发曾在地球历史早期促进了大气层和海洋的产生，而在最近的300多年内却造成了25万人死亡，伤者无数。同时，降水为河流提供了水源，也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饮用水，但是近年来由大量降水引发的洪水也大面积地破坏了地球表面。自1990年以来，汹涌的大洪水每年导致2万人死亡，几千万人受到影响。1998年，中国和孟加拉国主要河流发生洪灾，导致当地几亿人遭遇不幸。继续这样写下去，我尽可以描述那些为第一场雪而兴奋的生命如何在雪崩发生时被瞬间吞噬；或者描写推动着小船在浪尖前行的清风如何在转眼间变成了破坏力惊人的阴风怒号——但我想你们已经明白了。可以说，自然可以满足人类的一切需求，但我们必须警惕它的变幻莫测。

地球：袖珍小传

下面我们将谈及严重的、全球性的地球物理灾难。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普通自然现象的放大。为了方便理解，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地球和地球运动的知识。在这里，我们将快速穿越46亿年的地球历史，同时阐述那些使我们的世界如此危险、使我们的未来如此难以捉摸的地球特征。首先，只要想想地球漫长的历史，就能体会到我们以往未

曾经历过一些自然灾害并不代表它们从未发生过，也不代表它们以后不会发生。地球的历史极其漫长，自然界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还会重演。为了更形象地比较地球和人类的历史，我在此套用以前使用过的一个比喻。设想用一组正在进行1,500米（三圈半）赛跑的选手来代表地球的整个历史。在第一圈，地球是一片贫瘠的荒原，到处是小行星撞击和火山爆发。在第二圈，地球开始冷却，海洋逐渐形成，并出现了最简单的生命形态。铃声响了，运动员冲到了最后一圈的最后一条直道，这时进入了地质学中的寒武纪 （Cambrian），它标志着多样化的生命形态的爆发。运动员发起最后冲刺，恐龙出现了，随后又在领跑者距离终点25米时消失。那么，人类又在哪里呢？我们最古老的祖先出现在比赛的最后一刹那，也就是筋疲力尽的冠军撞线的那一刻。

自从几十亿年前第一个单细胞生物出现在毒气笼罩下的闷热的化学溶液中以来，生命就一直为了生存和进化同各种可能致命的地球物理现象进行不懈的斗争。直到今天，除了全球灾害发生频率可能有所变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变化，地球上的很多生物每天仍然面临生命、财产或生活的威胁，这些威胁来自火山、地震、洪水和风暴。过去，各种自然危害不断摧残着人类，构成了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威胁，这些灾害究其根源可上溯到40亿年前太阳系的诞生和地球（最初是一个环绕初期的太阳运行的圆形大石头）的形成。就像太阳系的其他行星一样，地球可被看作彩票中奖者，起初宇宙中有亿万个大石头，只有九个得以成长和演化，其中之一就是地球，而其他石头则在惊人的碰撞中粉身碎骨，或者被少数几个质量大一些的幸运者卷走，因为这些石头有着更强大的重力场。这种称之为吸积 的卷走过程涉及地球和其他行星，它们通过与质量小一些的石块碰撞而增加其质量，这一极端激烈的过程早在40亿年前就已基本完成，这对我们来说是幸运的。之后，太阳系趋于平静，只有极少量的碎片在穿梭，高速冲刺与行星撞击大幅减少。然而，地球与小行星 和彗星 的激烈碰撞则贯穿着地球的地质记录。小行星和彗星分别是岩石体和岩石冰体，它们在太阳系早期激烈的清洗过程中幸存下来。正如第五章要讨论到的，人们长

期以来一直认为这种碰撞是过去5亿年大量物种——也包括恐龙——灭绝的原因。而且，我们现在仍然面临着小行星和彗星撞击地球的巨大威胁。已经确认有超过718个具有潜在危险的小行星（Potentially Hazardous Asteroids: PHAs）可能会运行到距离地球很近的危险位置，其中就包括新近发现的“毁灭者”（Aphophis），它将在2029年4月13日从我们的通信卫星轨道内通过。

最初的地球应该很像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可怕的地狱，而不是今天这颗蔚蓝的星球。碰撞以及地球内部放射性元素的高度浓缩所产生的巨大热量使得整个地球被翻滚的岩浆海所覆盖，熔岩深度约为400公里。这个时期的地球温度接近5,000℃，与某些较冷星体的温度相当。当熔岩与寒冷的太空相遇，温度自然会骤降，从而使这片岩浆海的最外层固化为一个薄壳。虽然薄壳下不断翻滚的岩浆流一次又一次地将薄壳撕成碎片并再次滑入熔岩的大漩涡，但是大约27亿年前，一个更稳定持久的地壳终于形成并逐渐变厚。在地壳下面的高温熔岩中，熔岩热对流 继续翻动，将热量从地球深处的放射源传输到逐渐增厚的刚性外壳，从这里通过辐射进入太空。由于这些混乱的熔岩流动，地球的最外层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壳，而是由分离的、在缓慢的熔岩对流之上相互运动的岩石板块 组成。

在地球外壳形成的同时，地球深处也发生着重要变化。在这里，以铁和镍为主的重元素在重力的作用下慢慢向中心沉降，形成了地球的金属核心。在该核心的中心部位形成了一个以固态的铁和镍为主要元素的球，而核心的外层由于压力和温度条件则保持熔化状态。作为流体，它同地球一起旋转，并且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地球磁场。地球磁场屏蔽了来自太空的辐射，保护了地球表面的生命，也为人类提供了可靠的航海手段，如果没有这种航海手段，探险和回家之路对我们勇于开拓的先辈们来说将更加曲折。

在过去的几十亿年内，地球则非常安静，地球内部和表面的结构和地球物理过程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地球内部有三重结构：地壳由低密度岩石中的矿物质组成，主要成分是硅酸盐，这些矿物质由火山活动、沉积和掩埋而形成。地幔 的一部分是熔岩，由高密度的矿物质

构成，包括硅酸盐和以铁、镍为核心的、含有其他杂质的混合物。地球内部放射性元素的衰变会不断产生大量的热量，这些热量在释放过程中就形成了频繁侵袭人类社会的各种自然灾害，所以，自然灾害的发生源于地球自身的需要，如同在地球形成初期，热量通过地幔中熔岩的热对流被输送到地球表面。这些热对流促使巨大的岩石板块在地球表面运动，从而支持了板块构造学说 （plate tectonics），地球物理学家常依托此学说建立理论框架，从而解释地球本身的地质活动。

地球板块构成了地壳和地幔最上部的固体部分（通称为岩石圈），它们与地震和火山等重大地质灾害直接相关，这些灾害主要集中在地球板块的边缘，那里有可能存在多种相互作用。例如，两个板块可能由于急速的摩擦而聚积张力，并通过毁灭性的地震周期性地释放这种张力。容易发生地震的圣安德鲁斯断层就属于这种稳定性 板块边缘，它将加利福尼亚西部与美国其他地区分割开来；土耳其的北安纳托利亚断层是另外一例，其最近的一次运动引发了1999年的一次大地震。另一种情况是两个板块可能迎头相撞。如果两个板块都是由低密度花岗岩构成的大陆，如印度洋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那么，碰撞就会形成高海拔的山脉——喜玛拉雅山脉就是这样形成的，同时产生大地震，如2001年1月印度普杰地区遭受的毁灭性大地震。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由高密度玄武岩构成的海洋板块与一个低密度的大陆板块相撞，这时前者就会向下冲，插入到温度很高、呈对流运动的地幔中。当一个板块插入另一个板块的下面（此过程称为俯冲 ）时，就会引发世界上强度最大的地震。这类地震包括1960年的智利大地震、1964年的美国阿拉斯加大地震，最近一次则是2004年苏门答腊岛（印度尼西亚）的大地震，这三次大地震都引发了毁灭性的大海啸。整个太平洋板块四周一直持续着这种俯冲过程，使得阿拉斯加、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智利和其他环太平洋地区成为地震高发区。这种侵蚀性板块边缘也产生了大量的活火山——之所以称为侵蚀性是因为在两个板块的碰撞过程中其中一个会被毁灭。虽然这些地区的熔岩形成机制有时很复杂，但最终还是由俯冲过程产生。当俯冲板块被向下挤入温度很高的地幔中时，一部分俯冲板块将被熔化。由于其密度低于周围

的岩石，通过这种途径形成的新生熔岩将会上升，在火山处冲破地球表面。这种火山喷发通常是爆炸性的，并且危害较大。由好几百座活火山和休眠火山组成的火山带环绕在太平洋周围，组成了著名的火山环 ，其他火山则位于加勒比海和印度尼西亚的俯冲带上。几乎所有大规模的、致命的火山喷发都发生在这些地区，近期的火山灾难发生在皮纳图博（菲律宾，1991年）、拉包尔火山（巴布亚新几内亚，1994年）和蒙塞拉特岛（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从1995年到本书的写作时期）。

为了补偿一些板块的消耗，必须有新的岩石产生。新岩石产生于所谓的扩张性 板块边缘，新的熔岩将沿着这些板块边缘由地幔上升、固化，然后将两边的板块推开。这一过程发生在海洋深处的大洋中脊系统 ，即一条长为4万公里的线性隆起网状系统。在这里，新产生的次板块正好与侵蚀性板块边缘在地幔中的损耗相平衡。大洋中脊系统的一个主要部分穿过大西洋的中部，平分了冰岛，将东部的欧亚板块和非洲板块与西部的北美洲和南美洲板块分开。这里同样也有火山和地震发生，但火山爆发的规模往往相对适中，地震的震级也较小。受下面的地幔热对流的驱动，这些板块在地球表面以指甲生长般的速度永无休止地漂移，不断塑造着地球的外观，如果时间足够长，它们足以使地球上每个角落都出现地震和火山爆发。

危险的地球

如果说地震和火山喷发与地质活动相联系，其他地球物理灾害则更依赖于地球大气的运动。地球上的天气变化受到来自太阳的热量驱动，而不是地球内部的热量。从这方面来说，太阳这一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是与地球大气有关的自然灾害的始作俑者。借助于地球的自转以及能量和水分的持续转换而产生的热带气旋和洪水夺去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些致命自然现象的成因比较复杂，不容易加以分类。例如，被称为海啸 的海洋大浪（有时被误称

为“潮汐波浪”）有很多不同的形成途径；最常见的是水下地震，也可以是山体滑坡进入了大海，或是海洋沿岸和海岛上的火山喷发。与此类似，暴雨使本已脆弱的山坡更不稳定，在地质和气象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很多山体开始滑坡。关于自然灾害及其起因和特征，我们尚未谈到的还有很多，但是，我们目前的有关知识已经非常丰富，如果需要的话你完全可以咨询特定灾害方面的专家和权威。这里我只是抛砖引玉，带你们走马观花地了解一些重大自然灾害的主要特征，然后从某个角度来观察它们在目前和未来对我们社会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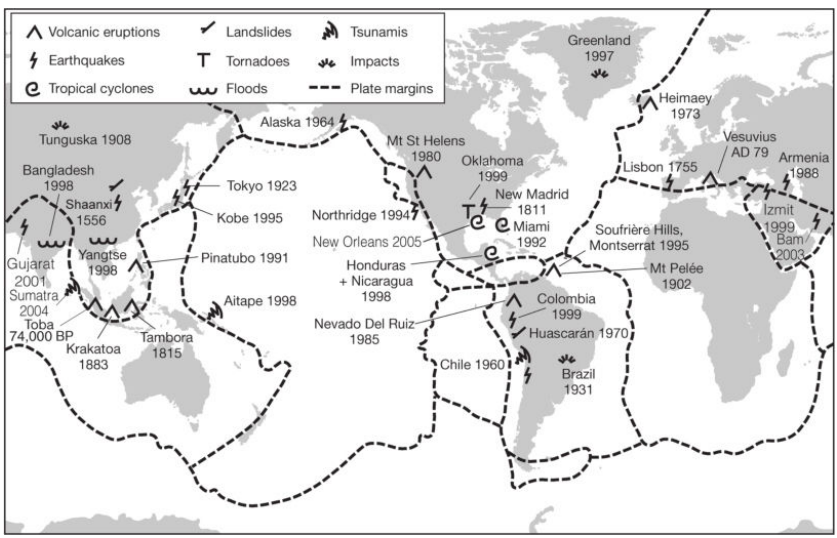

图1　地球板块图上的近代灾害位置：许多自然灾害的位置与板块边缘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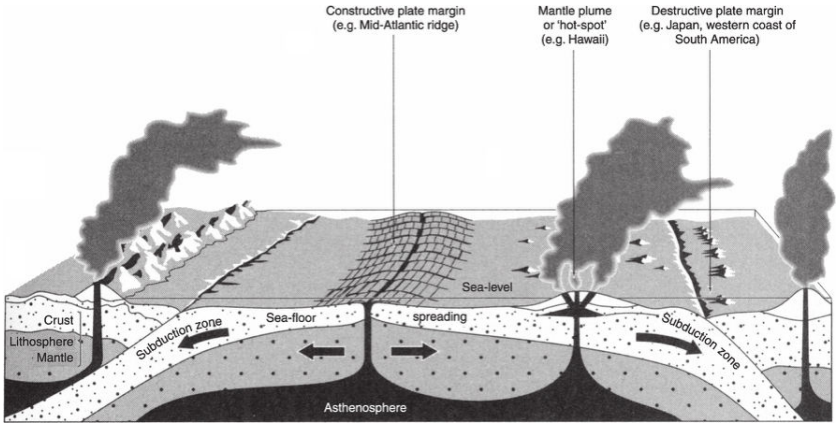

图2　岩石圈这一地球外部的刚性壳在大洋中脊带形成，在俯冲带被侵蚀

无论何时何地，地球及大气层给人的印象总是稳定而温和。然而，这完全是个错觉。地球上每天会发生1,400次地震，每星期就会有一次火山喷发。热带地区每年有40次飓风、台风和气旋肆虐，洪水和滑坡几乎随处可见，数不胜数。

每年至少有1亿人受到这些灾害的影响，而在所有自然灾害中，洪水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假如未来海平面上升，降水增多，这一情形将会持续。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洪灾，各大洲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近些年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只要降水异常猛烈或持续时间过长，用不了多长时间，江河堤坝就无法再容纳表面流量，河水开始漫过河滩甚至更远。事实上，降水的强度可能非常惊人，现有的世界记录是1960年拉丁美洲加勒比的法属瓜德罗普岛上发生的一次降雨，短短60秒　内降水量达到近4厘米。1952年3月，在印度洋的另一个法属岛屿留尼汪岛上，一个过境气旋在24小时内带来了近2米　的降水量。随着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在河滩地带定居，由河水暴涨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急剧增加。1993年春季，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决堤，淹没了美国中西部的9个州，毁坏了5万间房屋，损失总计200亿美元。2000年秋季，英国降下了300多年未见的大雨，很多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洪灾，而在2002年夏季，欧洲中部的广大地区被前所未有的大洪水淹没。在中国，河水泛滥引起的洪灾仍然是主要威胁，在过去150年

中有500万人因此而丧生。孟加拉国的情况更糟，由于洪水倾泻进入恒河水系，或者是孟加拉湾气旋风暴引起的海水倒灌淹没了农田，该国经常有2/3的土地被淹没。和其他自然灾害相比，由风暴引起的沿海洪水可能会夺取更多的生命。据估计，孟加拉国在1970年有30万人因此丧生，而印度东北部的奥里萨在1999年有1.5万人丧生。

风暴是最具破坏力的自然灾害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能引发洪水，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风速巨大。此外，由于风暴经常出现在世界上一些最富裕的地区，因此会造成一些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自然灾难。加勒比海、墨西哥湾、美国南部各州以及日本每年都会受到热带气旋的袭击，而英国和欧洲大陆则越来越频繁地受到强烈的、破坏力极大的冬季风暴的摧残。1992年，飓风“安德鲁”几乎把迈阿密南部夷为平地，财产损失达320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自然灾害之一。特大风暴使得城市风速高达300公里/小时，30万栋建筑被毁，15万人无家可归。在2004和2005年，大西洋飓风季节异常活跃，佛罗里达州在12个月内6次遭受飓风袭击。在2005年的飓风多发季出现了“卡特里娜”飓风，其破坏力远远超过了“安德鲁”飓风，使得数千人丧生，新奥尔良市的80％被高达7米的洪水淹没。不仅在热带会出现毁灭性的风暴，在中纬度地区的低压天气系统下也会出现飓风级的风暴。英格兰南部的很多居民都会记得发生在1987年10月的那场大风暴，数百万的大树被刮倒，平均风速据测仅次于飓风风速。在更近的1999年，当冬季风暴“洛塔”横扫法国北部时，法国经受了类似的严峻考验。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美国中西部地区每年都时刻准备着对付来势凶猛的龙卷风。龙卷风是风速很强的涡旋，当来自北方的干冷空气遇上来自热带的湿热空气时，它们的接触带上就会发生雷暴，从而形成龙卷风。龙卷风的平均风速高达500公里/小时，所到之处通常一片狼藉。一旦遭到它的直接袭击，没有任何人造建筑能抵挡得住。虽然不如飓风那样致命，但在1974年4月，短短几天内的约150场龙卷风袭击了肯塔基州、田纳西州、阿拉巴马州和附近各州，夺去了300多人的生命。

在地震、火山喷发和滑坡等地质灾害中，地震无疑是最具破坏力

的。每年大约有3,000次强度达到里氏6级的地震，这一强度足以导致严重的破坏和生命损失，特别是当地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建筑质量差、准备不足的人口中心时。如前所述，大多数地震发生在与板块边缘重合的地区。近年来，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安德烈亚斯断层的突然运动已经在旧金山（1989）和加利福尼亚州南部（1994）引发了大地震，后者造成的损失共计350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自然灾害。仅仅一年后，太平洋板块西部边缘的一次7.2级的震动严重摧毁了日本的港口城市神户，造成6,000人死亡，经济损失总额为1,500亿美元，是有史以来经济损失最惨重的自然灾害。神户大地震4年后，北安纳托利亚断层向伊斯坦布尔东部滑动，引发了严重的地震。伊兹米特城和临近的村落被夷为平地，1.7万人丧生。在2003年12月26日，一场中度地震（里氏6.6级）将伊朗南部的历史名城巴姆夷为平地，2.6万人丧生，而一年后的这一天，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西岸外海，一场里氏9.15级的大地震导致了举世震惊的亚洲大海啸。然而，大地震也可能发生在远离地球板块边缘的地方，北欧和美国东部等非地震高发区就曾发生过这种板块内 地震。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1年，它严重破坏了印度古吉拉特邦的普杰地区，彻底摧毁了40万栋建筑，夺去了10多万人的生命。地震工程学家常说一句话：致命的是建筑物 ，而非地震本身 。这毫无疑问是对的，如果合理的建筑法规得以贯彻执行，人们的生命财产损失将会大幅降低。然而，地震还可以造成地面摇动，从而引发滑坡并最终形成海啸，这种情况也是致命的。地震爆发使得海床突然大面积地向上移动，也许仅有1米左右，这就足以使上面溢出的海水形成汹涌的波浪向外猛冲，从而引发海啸。当这些波浪进入浅水区时，浪高就会增加——有时能达到30多米，随后以巨大的力量冲向海岸。1998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北部外海发生了地震，引发了17米高的海啸，在几分钟内就夷平了沿海的锡萨诺和临近村庄，3,000名当地居民被淹死或撞击致死。

对活火山数目的估计各有不同，但最少不会低于1,500座，也有可能超过3,000座。每年约有50座火山喷发，其中有些火山活动频繁，如夏威夷的基拉韦厄火山和意大利的斯特龙博利火山，其他的火

山可能会沉寂几个世纪，有时甚至上千年，但这些火山往往破坏力最强。最强烈的火山活动发生在侵蚀性板块边缘，即一个板块吞噬另一个板块之处。这一类火山爆发时，很少产生静静流淌的红色熔岩，更多的是向大气中喷射由火山灰和岩石碎屑形成的巨大烟柱，高度达20公里以上。大气风场携火山灰大范围蔓延，极具破坏性，使旅行更艰难，庄稼被毁，牲畜中毒，水源被污染。仅30厘米左右的湿火山灰就足以导致屋顶塌陷，而干火山灰中的细粉末可引起矽肺病等呼吸道疾病。正在喷发的火山周围堆积的火山灰厚度可达几米，足以掩埋单层建筑物。1994年新不列颠岛（巴布亚新几内亚）上的瓦尔肯火山和塔鲁鲁火山爆发时，岛上拉包尔镇的大部分地区就是这样的命运。1991年菲律宾的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后的多年间，每当热带气旋过境，大雨倾泻而下，厚厚的火山灰沉淀就会形成泥浆流。近10年后，从火山上倾泻而下的泥浆仍然在阻塞河道、淹没村庄和耕地、危害渔场和珊瑚礁。令人惊奇的是，泥浆流也是活火山附近最大的杀手之一。1985年，被冰雪覆盖的哥伦比亚鲁伊斯火山小规模喷发，引发了一场泥浆流，其规模之大和火山喷发规模远远不成比例。泥浆流倾泻而下进入河谷，导致阿尔梅罗镇和那里的2.3万名居民被埋葬。

图3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过后，泰国帕卡兰角只剩下一座受损严重的孤零零的房屋

岩浆流　也叫做“燃烧的雪崩　”。它比泥浆流更可怕，也更具破坏性。岩浆流是由燃烧的气体、熔岩碎片、石块、甚至是房子般大小的巨石组成的流体，它的威力如同飓风一般，足以摧毁沿途的一切。1902年，加勒比地区马提尼克岛上的培雷火山爆发，这是20世纪最严重的一场火山灾难，它所产生的岩浆流像原子弹一样瞬间毁灭了整个圣皮埃尔镇：在短短几分钟内，近2.9万人中只剩下4个幸存者，其余全部丧生。火山的威胁并未到此为止：从火山侧面崩塌的大量巨石可能引发大海啸，而有毒的烟云使当地数千人及其牲畜死亡。那些进入大气平流层并扩散到全球的火山灰和其他气体改变了气候，并在地球的另一面导致了气候恶化、庄稼绝收和健康问题。最大规模的火山超级喷发可能会使地球陷入寒冷的火山冬季　，并使全球范围内的农作物被毁，从而影响到整个人类。

图4　1902年火山爆发后，圣皮埃尔镇（马提尼克岛）受损严重：全镇只有4人存活

在所有的地质灾害中，滑坡最有可能被低估，也许因为它们常常由地震和洪水等其他灾害触发，因此，滑坡所导致的生命财产损失会被计入到原发事件。然而，不论是单独发生还是与其他灾害同时出现，滑坡都具有相当强的破坏力。1556年，中国陕西省发生大地震，地面剧烈摇动，无数窑洞坍塌，80多万人受难（根据朝廷的官方记载）。1970年，另外一次地震使得秘鲁境内安第斯山脉中的瓦斯卡兰山的整个山顶震落到山下的城镇，1.8万人在4分钟内死亡，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强降雨也极易引发滑坡。1998年，飓风“米其”给中美洲带来了强降水，36小时内降水多达60厘米，由此引发的滑坡仅在洪都拉斯境内就超过100万次，致使道路被堵塞，农田被掩埋，社区被毁坏。

对生命的终极威胁——可能也是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地球内部，而是地球外部。虽然空间碎石对地球的频繁撞击已经在数十亿年前结束，但是小行星和彗星的威胁仍然客观存在，并越来越受到重视。近期的估计发现，有1,000多颗直径为1公里以上环绕太阳运行的小行星的轨道与地球轨道接近或交叉，在未来某个时刻这些小行星可能会撞击地球。它们中间有很多直径2公里以上的物体，如此大的物

体撞击地球所产生的粉尘会进入大气平流层，屏蔽太阳辐射，从而引发宇宙冬季 （cosmic winter），最终可能造成全球大约1/4的人口死亡。人们会再次关注撞击威胁主要是因为过去10年中发生的两大科学事件：一是位于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希克苏鲁伯（Chicxulub）大型撞击坑被确认。这次撞击被普遍认为是导致白垩纪末期全球物种灭绝的根本原因。第二个事件是1994年舒梅克–列维彗星（Comet Shoemaker-Levy）碎片撞击木星，骇人的场面让人大开眼界。撞击后的图像被发送到世界各地，撞击产生的撞痕比地球还大，这令各界人士在极度不安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如果被撞击的是地球，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自然灾害和人类

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威胁有多大，那么我希望从现在起，你能够正确看待这些灾害的破坏力，这是许多和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居民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据慕尼黑再保险公司估计（很明显，保险公司对这类事情很感兴趣），在上个千年中，有1,500万人死于自然灾害，仅在上个世纪就有超过350万人因此死亡。在公元20世纪的末期，全球经济为此付出了空前的代价。1999年，欧洲、印度、东南亚发生风暴和洪灾，土耳其和中国台湾遭遇严重的地震，委内瑞拉发生山地滑坡，这些灾害共导致7.5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2004年的统计数字更加触目惊心，印度洋海啸、摩洛哥和日本的地震、美国和日本创纪录的风暴和肆虐亚洲的洪水，这些灾难共造成33万多人死亡，经济损失达1,450亿美元。

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每10年就有大约10亿人因自然灾害而饱受苦难。不幸的是，预报水平的提高和减灾工作似乎并不能减少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人类与自然界阴暗面的斗争也尚未见分晓。尽管我们对自然灾害及其驱动机制和严重后果有了更多了解，但由于地球上大部分人口越来越脆弱，这些知识为我们带来的一部分益处也

就被抹煞了。这主要是由于地球人口规模急剧膨胀，1960到2000年间，地球人口翻了一番。人口增长主要出现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很容易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冲击。此外，对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争夺使得越来越多的边沿地带被用作耕地和居住地，如陡峭山坡、滩头平原和沿海地区，而这些地带显然非常危险，极可能发生滑坡、洪涝、风暴大浪和海啸。

表1　世界人口最多的十大城市预测（2015年）

城市	人口（单位：百万）
东京（日本）	36.3
孟买（印度）	22.6
德里（印度）	20.9
墨西哥城（墨西哥）	20.6
圣保罗（巴西）	20.0
纽约（美国）	19.7
达卡（孟加拉国）	17.9
雅加达（印度尼西亚）	17.5
拉各斯（尼日利亚）	17.0
加尔各答（印度）	16.8

资料来源：联合国

脆弱性逐步增加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灾害多发地区的城市化运动。2007年，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很多人挤进了位置差、城市建设糟糕、人口超过800万的所谓大城市（megacity）。40年前，纽约和伦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分别

有1,200万和870万人。到2015年，孟买（印度）、达卡（孟加拉国）、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城（墨西哥）等城市将稳居榜单前10位（表1）：2,000万左右杂乱聚居的人口无序蔓延，在风暴、洪水和地震等自然灾害面前不堪一击。在所有因为自然灾害和环境恶化而导致的死亡中，96％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数字令人惊愕，但目前还没有降低的可能。情况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随着人们纷纷挤进这些破旧且极易受灾的城市（很多位于沿海地区，很可能发生地震、海啸、风暴和海岸洪水），死亡人数超过100万的真正大灾难 迟早会一次次地到来。

我所描绘的前景确实比较暗淡，但据现实可能会更糟。未来人口数量及其脆弱性将会增加，地球气候也将发生万年罕见的剧烈变化。在未来100年内气候将迅速变暖，这究竟会引发哪些自然灾害？虽然对这个问题还存在争议，但据最新的政府间气候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2001）预测，未来100年内，海平面可能上升超过80厘米。这必然会增加风暴大浪和海啸的频率和影响，并且加重某些地区的海岸侵蚀程度。到本世纪末，温度上升可能超过6℃，由此带来的影响包括：飓风、龙卷风和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多山地区的山体滑坡更频繁，最后是火山喷发次数增多（见下章）。

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即将走向末日。如果真是这样，它将怎样终结？一个世纪以后，人类是在一个越来越炎热的世界中渴望甘泉滋润，还是在几根燃烧的柴火边挤作一团，为抵御寒冷的宇宙冬季而挣扎？下一章将进一步探究这两者的可能性。

令人不安的事实

·在地球形成的最初，它的表面被熔岩海所覆盖，温度达5,000℃，与一些冷星体的表面温度相同。

·地球巨大的构造板块的移动速度接近于我们手指甲的生长速度。

·地球上每天大约发生1,400次地震。

·可能有3,000多座活火山或潜在的活火山，其中有50座每年都爆发。

·热带地区每年会受到40多次飓风、台风和龙卷风的袭击。

·1556年，中国陕西省的一次地震导致80万人死亡。

·上个千年中，自然灾害造成至少1,500万人死亡。

·由自然灾害和环境恶化导致的死亡中，96％出现在发展中国家。

第二章

全球变暖——大量热空气？

争论的问题

全球变暖涉及的问题绝不仅限于更加炎热的夏季、冬季洪涝、牛排放废气[1]等现象。毫无疑问，地球正在快速变暖，气候学家对此鲜有异议。他们争论的问题在于，人类眼下正在经历的地球变暖只是简单地反映了近来全球温度的自然变化趋势，还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的人为污染所致。这种争论至少在某些圈子中一直被描述为两大旗鼓相当的学术流派之间的论战，但事实绝非如此，这样描述也是极不负责任的。预测气候变化非常困难，这就是为什么预测未来温度上升和海平面变化的模型一直都在改进，但是，现有证据是无可辩驳的：人类活动正在 导致现阶段的地球变暖。

尽管少数标新立异的科学家、石油公司的辩护者、世界头号污染国家的首脑对此各持己见，但是，那些掌握大量事实依据者已经达成主流共识，如果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变暖的情况将更加严重。令人惊讶的是，还有人在故意贬低和掩盖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我看来，最近出现的一位就是自欺欺人的丹麦统计学家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在其著作《持疑的环保论者》中，隆伯格贬低了全球变暖问题及其对未来的影响，同时，通过片面引用科学研究结果，得出天下太平的结论。如果你恰好翻过他的书，被书中传达的和谐、无须作为的信息所迷惑，误以为天下太平，那么请允许我用一些相关事实将你带回现实。

过去70年中，地球比上个千年的任何时候都要热，而且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间，地球变暖在急剧加速。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听过长辈追忆过去——那时的夏天更热，天空更蓝。然而气象记录表明，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事实上，1980年以来曾出现过19个最热的年份，而90年代后期，全球各地都出现了温度最高的年份。与地球46亿年历史中的90%的年份相比，现在的地球更热，到21世纪末，地球温度将比过去15万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要高。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升温趋势不只是简单的气候变化，但也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太阳辐射变化所致，尽管我们不否认后者对气候变化的确有重大影响。升温趋势是两个世纪以来环境污染的结果，二氧化碳、甲烷、氮氧化物和其他温室气体像隔热毯一样将地球裹住。自18世纪后期，人类开始在地球上从事一项宏大的实验，最终结果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不幸的是，对我们人类而言，这个实验已经失控，由于其固有的惯性，我们不可能马上停止，只能减缓速度。即使我们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稳定在目前的水平，大气温度和海平面在未来好几百年内仍会持续升高。我们是下决心去解决问题，还是回避并最终接受惩罚，这是当今时代的大问题。还是让我们去实验室看看情况如何。

宏大的全球变暖实验

通过研究极地冰芯样品，我们得知在蒸汽的嘶嘶声和金属的碰撞声宣告了工业化的来临以前，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自上次冰期末冰川消退后一直保持同一水平。但是，自从前工业化时期以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上升了30%，与此同时，其他温室气体浓度也显著增加，特别是甲烷和氮氧化物。目前，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至少比过去42万年中的浓度高，也许过去2,000万年的历史中也没有出现过超过当前二氧化碳浓度的情况。二氧化碳的增长速度也是空前的，上个世纪的增长速度至少比过去两万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快。氯氟烃（CFC）和氢氟烃（HFC）[2] 等其他污染气体是20世纪的产物，在几个世纪前的大气中还没有出现。随着这些气体在地球大气中的积累，它们几乎就像温室气体一样，使得太阳辐射能够到达地球表面但无法再次返回外层空间。事实上，地球大气在过去几十亿年一直如此，通过温室效应调节地球温度的涨落，而人类活动引起的污染大大增强了温室效应，使得地球在上个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逐渐变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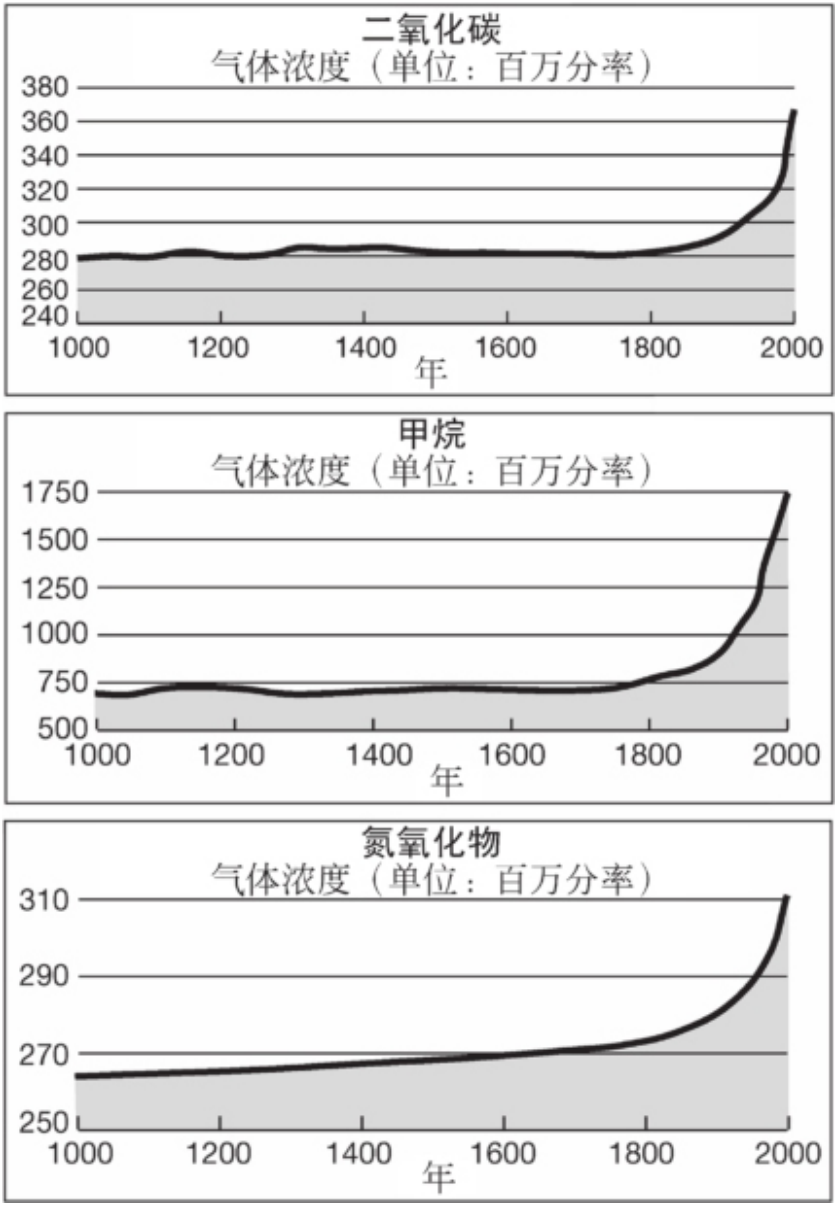

图5　自工业革命以来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

然而，气象机制非常复杂，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全球温度，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任何一种影响。太阳的出射辐射就是因素之一，它也会

随时间变化，在把升温趋势完全归因于人造温室气体的积累之前，也必须考虑这一因素。太阳的活动周期——太阳黑子周期——为11年，在此周期内，太阳出射辐射变化大约为0.1%。另外，太阳辐射还存在几百年到几万年的周期变化，这些长周期变化可能对调节地球大气温度起到重要作用，在最近几百年，它们降低或者掩盖了人类活动产生的气体所带来的影响。正如我在第四章中要谈到的，火山喷发对地球气候也有重要影响。详细情况可能有些复杂，但总体来说就是大型火山喷发将大量二氧化硫和其他硫化物气体注入大气平流层，使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减少，从而起到显著的冷却作用。1982年埃尔奇琼火山（墨西哥）爆发和1991年皮纳图博火山（菲律宾）爆发后，全球温度显著降低，虽然时间不长。有时候，火山爆发和太阳活动的共同作用会产生更长期的气候变化。例如，太阳辐射减弱和火山活动增强使中古时代地球温度骤减，气候学家称这一时期为小冰期 。小冰期大约从公元1450年持续到19世纪末，在这期间，伦敦泰晤士河曾经冻结，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也出现了严冬。

要确切地描述过去1,000年内全球温度变化是困难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距今几百年以前的记录不可靠。更复杂的原因在于：虽然世界某些地方在逐渐变暖，但其他地方可能逐渐变冷。那些反对人类活动引发全球变暖这一观点的人至今还在引用一个证据，即全球温度在1946年至1975年间显著变冷，因此，温室气体浓度的上升必定导致全球变暖的观点并不正确。然而，对这一时期资料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尽管北半球的多数地区明显变冷，南半球的情况却截然相反，在显著变暖。实际上，虽然这一时期的整体温度略有下降，但这只是硫化物气体造成的“遮蔽效应”[3] 掩盖了变暖趋势，这些硫化物气体源于火山喷发和没有清洁大气法约束时期的重工业。这种“遮蔽效应”，时下称为全球变暗 ，可能意味着温度将比预测值有更大的上升，情况十分不利。不管怎样，尽管存在全球变暗，仪器观测资料仍表明自1861年有记录以来，全球温度一直在不断攀升。资料还显示20世纪90年代是19世纪中期以来最热的10年，而1998年是这10年中最热的年份。2003年夏季，人们深刻体会到了全球变暖的真实性，欧洲大陆

破纪录的普遍高温使3.5万人死于酷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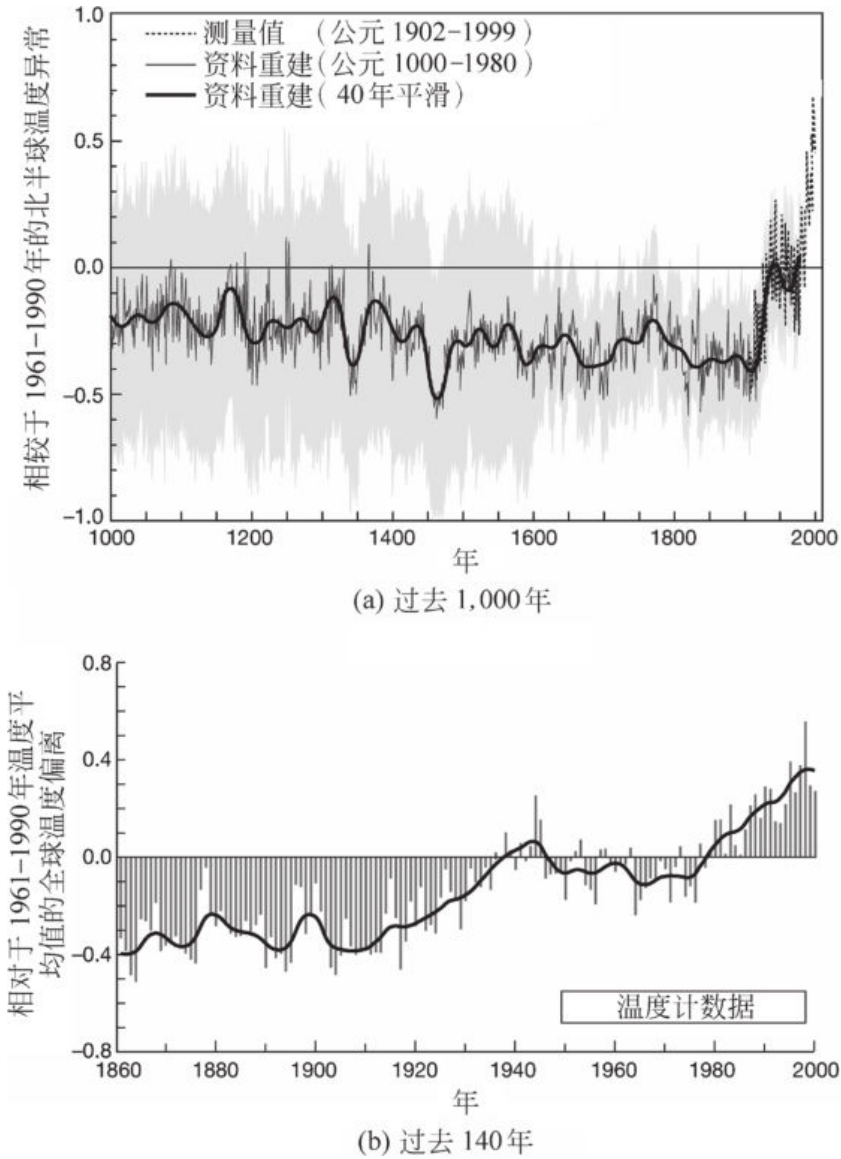

图6　历史温度变化：（a）过去1,000年（b）过去140年

如果说我们设计宏大的实验是为了使地球更热，那么目前看来，我们可以击掌相庆、高枕无忧了，实验会自动进行，温度会继续上

升，出人意料的结果会越来越多。然而，这显然不是我们的初衷。实际上，直到最近几十年，我们才开始从这些角度思考人类活动造成的污染对全球环境的影响。宏大实验正是人类贪图更多增长、更多物质、更多财富的副产品。很显然，我们一直在扰乱地球的自然运行，虽然我们不愿承认。既然如此，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结束实验。然而，由于政府行动拖拖拉拉、反对减缓全球变暖提案的既得利益集团将科学界搅成了一潭浑水，现在已经批准的《京都议定书》[4]（the Kyoto Protocol）远远没有实现它的目标，即在2008–2012年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2%（低于1990年排放水平）。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拒绝签署该议定书，或是连削减一点点排放量的要求都做不到。只有排放量削减60%，大气中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浓度才能真正减少。如此看来，要有效控制全球变暖的趋势，前景堪忧。

气候系统就像一艘超级油轮，在转向时其固有的惯性将继续发挥作用，即使我们已经醒悟，并在未来几年大幅减少排放量，温度和海平面高度仍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继续上升。因此，人类似乎注定要面对巨大的环境变化，有些可能变好，多数则可能恶化。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后代将会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地球。

温室地球

到公元2100年，地球气温不仅会更高，而且会出现许多极端天气现象，这些变化足以使至少数十亿人的生活更艰难。被许多人看作是由全球变暖引起的气候模式的变化，以及发展中国家脆弱性的加剧已经导致气象灾害大幅增加。国际红十字协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在《2004年世界灾害报告》中披露，每年由于风暴、洪水、山体滑坡和干旱引起的灾害次数已经从1996年前的约200次攀升至21世纪头几年的700多次。几乎人人都认为情况不会好转，只会越来越糟。

地势低洼的沿海地区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海平面上升和暴雨的袭

击，这意味着致命的洪水不再是偶发事件，而是成为了一种常态。与此相反，连年缺雨将会使越来越多的人被饿死，使非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区陷入干旱和由此引发的饥荒。2005年的夏季，创纪录的季风降雨引发了印度孟买的洪灾，导致1,000多人死亡，与此同时，长期的干旱使非洲西部国家尼日尔的400万人陷入饥荒，其中100万人为儿童。这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可能的一种天气模式。随着海温升高，特别是在热带引发更多更大的风暴，地球可能会变成一个狂风肆虐的地方。我会在以后的章节继续讨论全球变暖可能导致的多种灾害，这里先看看对未来100年内气温升高的最新预测，毕竟它是引发本世纪及未来巨大环境变化的关键因素。

2001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表了关于全球变暖的第三次评估报告，三卷共2,600页。IPCC于1988年成立，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建立，其任务是利用现有的最先进的专业知识，就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给出科学建议并达成共识。共识是这里的关键词。1,000多名科学家参与了报告的撰写或审查，排除了那些非理性的怀疑论者、永恒的乐观者、或者彻头彻尾的权谋论者，其有效性几乎没有任何疑问。IPCC的第三次评估报告可以汇总成几句话："第二次评估报告中谈到的情况将会恶化，而且事实绝不仅是这样。实际情况会更糟"。

我们看看该专门委员会如何看待气温上升。在上个世纪，全球气温上升了0.6℃。到2100年，按照IPCC的最坏预测，气温将比现在上升6℃，甚至平均预测结果也会上升4℃。如果还不够清楚，那么想想看，全冰期与当前气候的温差也就4℃到5℃。这两种气候之间的变迁涉及到地球环境的重大变化，既包括气候和天气，也包括动植物。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计，冰期过后的温度上升幅度将再次加倍，我们将经历同样剧烈的变化。然而，这一次有两个重要的区别：一、地球必须保障65亿人的衣食住行，而不是几百万人；二、虽然温度上升幅度相近，但这一次只用了100年，而不是几千年。如此剧烈的全球温度上升所产生的后果大多是明显的，但也会产生一些不太明显的后果。已经饱受煎熬的极地区域和长年冰封的山区还将继续为温度上

升付出惨重的代价。在过去100年中，全世界的山地冰川大幅后退，自20世纪50年代起，北极冰厚度开始大幅度变薄，致使2000年夏季北极没有结冰。更严重的是，春季和夏季的北极海冰范围比40年前减少了10%到15%，而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湖泊和河流的冰在春季就开始融化，比一个世纪前提早两个星期。北半球春季雪盖数量已经比1966到1986年间的平均值减少了10%，IPCC预测，到2100年，北半球的极地和山区温度将比现在高8℃。在2004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体积浓度是百万分之380（380ppm）。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即使我们努力使其浓度稳定在450ppm，到2300年以后，气温仍将缓慢上升。

冰雪融化急剧加速会导致海平面的上升：验潮站数据表明，全球海平面在20世纪内上升了10到20厘米，在未来100年内还会加速，预计将上升40厘米，到2100年甚至会超过80厘米。大多数最新预测到的海平面上升是由两种原因导致的：一是海洋温度上升引起的水体热膨胀，二是山地冰川快速融化而导致的水量增加。如果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未来格陵兰和南极洲冰原可能会出现灾难性融化，这将在沿海地区引发可怕的后果。根据IPCC的报告，最坏的情况是格陵兰冰原不久将会消失，到3000年，海平面将因此上升6米。更令人担心的是，尽管巨大的西部南极洲冰原（WAIS）目前还算稳定，但在未来几个世纪里，气候大幅变暖可能导致这些冰原的永久分解和消失。WAIS在未来200年内崩塌和融化的几率高达5%。一旦格陵兰冰原或WAIS完全融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沿海城市都将被淹没。即使上述的冰原融化没有发生，未来100年内的海平面上升也将使地势低洼的国家消失。例如，海平面上升1米，印度洋的马尔代夫将被淹没，而海平面上升和地面下沉的结合则预示着孟加拉国的海平面将在50年内上升1.8米，这意味着16%的耕地将会消失，而这些耕地养活了该国13%的人口。

海岸洪水也将因为暴风巨浪而更猛烈，到2080年，预计受灾人口将上升至2亿。由于海洋对变化的响应比较缓慢，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将长期存在。即使我们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目前的水平，在1,00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海平面仍将持续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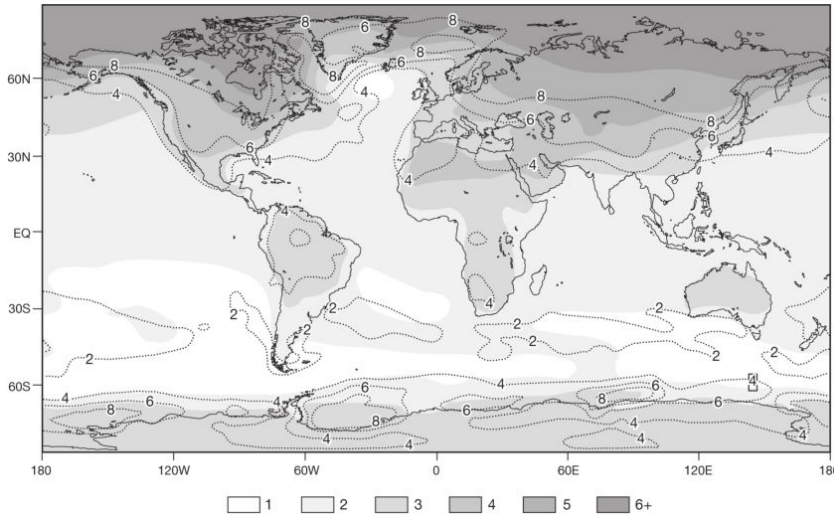

图7　从现在到2100年的年平均温度变化（单位：℃）

将任何与天气有关的自然灾害都归因为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虽然不能说某一场风暴或洪水是由于气候变暖所致，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极端天气出现的次数在持续增多。在20世纪后半叶，高纬度和中纬度地区极端降水事件增加的百分比高达4%，天气预报中出现了更多的暴雨、洪水和风暴。现有的气候特征可能将更加突出，湿润的地区将更加湿润，干燥地区将遭受长期持久的干旱。北欧和英国于是会遭遇更多的洪水，而北非沙漠将向南欧延伸，澳大利亚开始受到烈日的炙烤。大西洋“飓风带”在下半个世纪会更频繁地活动。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在过去30年中，热带气旋的破坏力增加了一倍，文章同时预测，在未来几年，与其他地区相比，加勒比海诸岛、美国东南部和墨西哥湾沿海、日本和中国香港将遭受更频繁的袭击。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人会冒险说这肯定是全球变暖的结果。但是，当海面温度（SST）上升被看作是这些更强大风暴的驱动机制时，我们似乎可以建立一个合理的联系，即全球变暖意味着海洋会变暖，而海洋变暖则会导致更多更大的风暴。在过去5年中，随着大西洋热带洋面的温度上升，飓风发生的频率增加了一倍。同时，风暴变得更强劲，持续风速超过175公里/小时的飓风增加了2.5倍。在

整个21世纪，海洋变暖的趋势将会持续，飓风带居民的前景堪忧。有风就会有浪，事实证明海浪的威力更加强大了。在英国西部和南部沿海，平均浪高大约3米，比30年前升高了1米多，而最大海浪的高度竟增加了3到10米。尽管现在还不能将这些变化直接归咎于全球变暖，但浪高的增加反映了北大西洋气候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持续变暖的全球气候系统的重整有关。海岸的进一步侵蚀已经危害到了英国许多裸露的海岸线，而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数目增加无疑将加重这种局势，形势会更加严峻。

图8　洪水中的新奥尔良：飓风“卡特里娜”造成的后果，是美国历史上经济损失最惨重的风暴

厄尔尼诺[5]（El Ni~no）事件的频发似乎也是由全球变暖所致，它是除了季节变化之外的第二大气候“信号”，它使西向信风减弱，并导致赤道暖洋流从西太平洋向东太平洋迁移，从而破坏当地的水产业，严重扰乱全球气候。这一潜在危害现象的出现频率从17世纪的每6年1次升至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每2.2年1次，全球变暖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地球持续变热，不只是海洋和大气变得越来越狂躁不安，地

壳也不例外。由于欧洲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等山区的温度增加，高海拔地区的永久冻土层开始融化，山体滑坡的次数更频繁、破坏力更大，严重威胁村庄、城镇和滑雪场的安全。由于冰雪融化导致山体稳定性减弱，瑞典出现了更多的岩崩、滑坡和泥石流事件，情况还有可能会恶化。几十亿吨岩石组成的整个山腰可能崩塌，将整个社区埋葬在瓦砾下。在过去的100到150年间，西欧诸多山脉顶峰的温度上升了1℃到2℃，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加速。例如，瑞士滑雪胜地圣莫里茨（St Moritz）所在的山区在过去15年间气温就上升了0.5℃。如果这种速度持续下去，地球上所有山脉的顶峰可能都会变得不稳定，从而使得高山地区居民的生活更困难、更危险。我的同事西蒙·戴（Simon Day）博士甚至提出，海洋火山岛上降水的持续增多可能引发大型山体滑坡，导致横扫太平洋或大西洋的大海啸。对此我们会在第四章进一步讨论。

很明显，全球变暖将使这个世界变得多灾多难，地球居民几乎无人能够幸免。实际上，情况已经开始迅速恶化，特别是在地势较低的沿海地区和岛屿。在20世纪90年代，暴雨和洪水导致了西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上超过40％的居民的伤亡。对于其他地势较低的西南太平洋岛国，如汤加和密克罗西尼亚，形势同样严峻。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受到自然灾害袭击的人口比例为1：12，美国为1：200，英国为1：2000。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新千年的第一年，以洪水、暴雨和干旱为主的各种自然灾害影响了2亿多人，占地球人口的1/30，这是个惊人的数字，而全球变暖效应还没有真正显现。毫无疑问，即使讨厌自然灾害，我们也只能把它看成未来几十年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而且，全球变暖的影响远不只是让地球更易受灾，其他重大而影响广泛的变化也开始显现，它们将同样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当农业、水资源、野生动物和人类健康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时，国民经济将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全球社会结构将开始瓦解。

少数国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适应这些变化，但是这种变化速度之快肯定会让亚洲、非洲和其他地区的一些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无法适应。在全球人口膨胀、收入减少和污染加剧的情况下，全球变暖的影

响无疑是非常可怕的。水资源的极度短缺就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即使在今天，仍有17亿人口生活的国家饮用水供给不足，占全球人口的1/3，而在短短25年内，这一数字将达到50亿，这将引起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对水资源的争夺。与此同时，热带、亚热带和许多中纬度地区的农作物产量预计将会减少，从而导致荒漠化、粮食短缺和饥荒的扩散。对食物和水资源的争夺会导致规模空前的经济迁徙，给世界很多地区带来动荡和冲突。

在今天的欧洲和亚洲，春季树木发芽的时间比20多年前提早了一个星期，而秋天的到来则推迟了10天。这些变化看似有益，但也会促使新虫害向温带迁移，而这些地区以前是没有这些虫害的。英国南部的某些地方现在温度很高，足以滋生传播疟疾的蚊子，白蚁也在这些地方安了家。在热带地区，受到虫媒传染病——特别是疟疾和登革热——影响的人数将大幅增加，而饮用水的缺乏将使得霍乱继续危害老人、幼童和体弱者。在城市地区，酷暑和日益严重的污染也将危害人们的健康，最严重的同样是在那些不可能有空调的贫困社区。由于全球各大洲的地面温度在本世纪末的上升幅度预计将高达8℃，现在帮助吸收温室气体的温带和热带森林届时将开始枯萎，成千上万不能适应新环境的动物物种也会随之消失。除森林外，草场、湿地、珊瑚礁、环礁、红树沼泽地、敏感的极地和高山生态系统也将为生存和适应而挣扎，但其中许多将会消亡。我们的休闲活动也会受到影响。过度干燥的欧洲南部不仅不再适合谷物生长，对喜欢阳光的人来说也变得太过炎热，至少夏天如此。随着大多数山地冰川在本世纪末消失，降雪大幅减少，冬季运动产业也前景暗淡。从生物多样性和旅游产业的角度看，近期最为糟糕的预测结果是：所有的大型珊瑚礁将在50年内消亡，一些壮丽的自然奇观也会随着海水变暖而消失，但我们当中仍有部分人能够继续炫耀地挥霍，或者努力追求这种生活。

目前为止，我所谈到的事都正在发生，或者已经被大型的气候模型所预测。这些模型的不断升级能够更好地预报全球变暖对我们的影响。然而，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这些事件包括我们从未想到过的情况，以及目前我们认为不大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我将在

下一章详细论述其中一种情况：一个寒冷的北大西洋小岛置身高温环境时的情景。在这里，我还想提出另一种可怕的情况，即全球变暖引起的大幅度海平面变化可能引发更多的火山爆发、地震和大滑坡。不可思议吗？以往的证据表明这是很有可能的。自从1万年前的上次冰期末以来，海平面快速升高，海水的压力对大陆边缘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火山喷发、活动断层移动以及大陆架区域大的滑坡和崩塌。在后冰期时代，海平面上升的平均速度大约是每年7毫米左右，如果格陵兰或者南极洲西部冰原最终因全球变暖而融化，由此引起的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也大致相同。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海平面需要上升多少或多快才能使这些情景重现。有趣的是，低气压天气系统过境时，仅几十厘米的海平面上升就导致了美国阿拉斯加的巴甫洛夫火山在冬季爆发。也许到那时，未来不只是变暖，而是变得灼热。我们还有其他的担心。有机碎片分解所产生的气体积累起来，在海底沉积物中形成所谓的天然气水合物（gas hydrates）。这些水合物是固态甲烷，看起来更像水冰，其物理状态极易受温度变化影响。温度仅上升1℃就可使其从固态快速离解成气态，从而增加对周围沉积物的压力，进而导致大面积沉积物质的不稳定和崩塌。有人提出，正是这一物理过程引发了斯图雷加滑坡（Storegga Slide），即8,000年前地球持续变暖时发生在挪威南部沿海外的两大海底滑坡。崩塌引起的巨大海啸横扫苏格兰东北部，在厚厚的泥煤层中留下了沙土沉积。如果在今后几百年中，全球持续变暖，那么情况可能着实会惊心动魄起来。

是好、是坏、还是疯狂？

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无法回避全球变暖的影响，对数十亿人而言，由此产生的环境恶化将使生活异常艰难。现在想要回到从前已经太晚了，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努力减轻全球变暖产生的最坏影响。问题在于：我们能够达成一个能有效解决问题的国际共识吗？1997年的

《京都议定书》曾给了我们希望，其目标是在2008到2012年前，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5.2%（低于1990年的排放水平）。尽管俄罗斯在2005年批准了该协议，美国政府却拒绝成为协议签约国，这意味着我们取得的进展远远不够。事实上，情况比这还糟。由于美国不批准协议，2008到2012年之前，所有工业国家的排放总量将上升大约12%，远远高于很多“一切照常”的预测结果。温室气体排放情况非但没有好转，而且日益恶化。美国是世界头号污染大国，其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25%，除非说服美国及其同伙澳大利亚与国际社会一起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否则很难出现转机。也许唯一能说服这些国家政府采取行动的方式就是：越来越强大的飓风不断袭击美国东部和墨西哥湾沿海城市，或者在澳大利亚出现为期10年的干旱。但是，美国也传出了一些好消息。截至2005年8月，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迈阿密等177个城市的市长已经签署了由西雅图市市长发起的《气候保护协议》，协议要求各签署城市要努力达到或超过《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目标。同月，包括纽约州、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在内的东北部的9个州达成协议，商定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限制在当前水平以下，目标是到2020年将排放量减少10%。这的确是一小步，但这一步却迈向了正确的方向。

随着全球变暖持续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来自“纯技术倾向”（technofix tendency）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这些旨在缓解全球变暖的提议既疯狂又荒诞——比如在太空放置巨大的反射镜来转移太阳辐射。还有更加荒谬且“天理难容”的：将一两个彗星转向，使其经过地球，利用它们的引力将地球摆动到一个距离太阳稍远的轨道上。其他的提议是经过非常认真的科学思考后提出的，如果未来局面失控，我们也许在某一时刻不得不采用。这些提议包括：把海洋当作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倾泻场，用物理的方法通过管道或箱子将二氧化碳排放到深海，或者将铁屑撒入海底，促进那些能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海洋微生物的生长。小规模的实验表明，两种方法都有效，但是要通过大规模的实验来改变现状，则需要巨大的财力和国际社会的一致努力。除非当前形势失控，否则这些都很难企及。除此之外，要说服大

众舆论接受这种想法——我们要祸害海洋以修复人类对地球大气的破坏——将是一场相当大的公关活动。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要扭转全球变暖的趋势，我们大家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告别过度挥霍的社会，转向高效节能型社会，鼓励对现有能源和资源的高效利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与广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紧密相连。全球变暖将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从而使我们熟悉的世界走到末日。要使环境不再持续恶化，我们必须有强烈的动机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发达国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削减燃料消耗，投资可再生能源，更大规模地循环利用，尽可能进行本地生产，而不是把水果蔬菜从地球的另一面空运过来。也许发展中国家政府会提出抗议，对此我非常理解，但他们不必重走欧洲和北美曾经走过的粗犷型的工业化路径，理由简单合理：如果发展中国家政府不这样做，国家和民众会是最大的受害者。发展中国家现在 就必须致力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循环使用，世界经济强国有义务支持他们朝这个方向开发。尽管《京都议定书》流产的阴影笼罩了一切，还有一个有待讨论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案，即在较长时间内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的稳定和减少。该方案称为缩减与收敛（Contraction & Convergence），或简称C&C，这个创造性的方案由伦敦全球公共资源研究所（GCI）于1995年提出，它基于两个原则：一、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减少；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方法必须对所有人都公平合理。因此，C&C方案提出了人均减排概念。通过国际协议决定每年的排放量必须缩减多少，然后再将排放许可量按照不同国家人口数分配到所有国家。排放许可是可以交易的，这样，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排放量超标的国家就可以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购买它们的剩余指标。这一极简单的方案日益受到关注，目前，它在联合国、欧洲、中国、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美国政客中都有强有力的支持者。随着气候温和时代的结束和温室地球时代的来临，我们及后代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漫长而艰苦的斗争，而C&C方案也许能使这一转变不至于那么令人绝望。

令人不安的事实

·到本世纪末，预计地球比过去15万年中的任何时期都热。

·到2100年，全球地面温度上升幅度将高达8℃以上，海平面上升幅度将高达88厘米。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可能高于过去2,000万年间的任何时期。

·在2000年，全球1/30的人口受到了自然灾害的影响。

·到2025年，50亿人口生活的国家将供水不足。

·在50年内，世界上所有大型珊瑚礁可能会因为海水升温而消失。

·冬季体育产业的现行形式到2100年将很可能消亡。

·西南极洲冰层在未来200年内融化的概率为5%。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全世界所有的沿海城市都将被淹没，其中包括纽约、伦敦和悉尼。

注释

〔1〕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的报告，全球10.5亿头牛排放的废气是导致全球变暖的最大元凶。这些废气中有大量甲烷，其暖化地球的速度比二氧化碳快20倍。

〔2〕 CFC也称为氟里昂，曾被用于冰箱、喷气机燃料和清洁溶剂等领域，这种化合物会破坏大气的臭氧层。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禁止向大气中排放该物质。HFC是CFC的替代物。

〔3〕 也称“阳伞效应”：大气中的气溶胶悬浮颗粒一方面能增加行星反照率，减少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另一方面能作为凝结核，促使云的形成，增加云的反照率，进而减少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两方面性质都有助于地面和底层大气的温度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温室效应。由于北半球工业化程度较高，空气污染较南半球严重，“遮蔽效应”在该地区表现最为明显。

〔4〕 《京都议定书》，全称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第三次会议制定。议定书规定工业化国家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减少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危险，发展中国家无此义务。美国曾于1998年11月签署该议定书，2001年3月又单方面退出。澳大利亚则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起正式生效。

〔5〕　在稳定的西向信风作用下，太平洋赤道海域出现由东向西的暖洋流，使太平洋西部海域为暖水区，东部则为冷水区。厄尔尼诺事件指赤道东太平洋的持续增温现象。厄尔尼诺海流特指沿秘鲁海岸向南流动的一支暖流。

第三章

冰期来临

火与冰

普通大众对科学越来越失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觉得科学家们总是争论不休、变化无常。实际上，正是通过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直到有足够证据表明一方获胜并得到认可，科学才得以进步。但是，对大众如此解释则是徒劳。人们希望科学家能够统一说法，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使他们的生活更轻松，烦恼更少。如果你所关注的事情是自己的职业或婚姻，你就不会考虑转基因作物是好是坏，也不会去想如何吃牛肉——是带着骨头吃还是切下来吃，甚至不用理会你的子孙后代是身在冰山还是火海。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科学界的共识似乎又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上一章我们看到，除了那些标新立异的气候学家，大多数气候学家现在都承认这一事实：地球正在快速变暖，原因是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环境污染。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气候学领域所关注的大问题是：下一次冰期何时出现？为什么会这样？是气候学界的观点发生了什么变化吗？实际上变化并不大。正如我随后要解释的，冰川会再次推进，地球有可能在未来1万年内陷入严寒。然而，变化体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当地球从目前所处的间冰期进入长达数万年的冰期时，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及其对气候的影响可能会在这种自然转变的关键时期起到一定作用。令人困惑的是学者们不能肯定这种作用是什么，尽管你本能地希望全球变暖能够推迟、甚至完全阻挡下一次冰期的来临，但一些科学家认为，持续的大幅升温实际上会加速下一次冰期的到来。即使情况并非如此，问题仍然存在。既然知道另一个新冰期即将出现，我们不是应该主动保持地球温度吗？不是应该张开双臂欢迎全球变暖吗？换句话说，我们目前面临着一个残酷的选择，以往关于全球变暖的大辩论中很少提及：我们希望眼前这个熟悉的世界由什么来终结——是火？还是冰？

如何冰封地球

在地球形成初期，它的表面是沸腾的熔岩海洋，到处都是火山爆发。尽管随着主要地质变化减缓，地表温度大幅下降，但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气候都很温暖。然而，一些非常偶然的事件宣告了巨大冰原的形成，从而使地球从温暖的天堂变为寒冷的地狱。艺术家的描述和电视纪录片让大多数人已经熟悉了最后一次大冰期，那时猛犸（已经灭绝的古代长毛象）漫步在冻土带上，满身长毛的人类祖先在冰冻的世界里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直到近期，对与冰有关的岩石形成过程的研究才向我们揭示了地球历史中一个更久远、更可怕的冰冻时期。那时的地球只不过是飞驰于太空的一个冰冻的雪球。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段地质时期——现在被越来越多地称作成冰纪[1]（Cryogenian，这一名称恰如其分；源于冷冻剂cryogen）——地球处在历史的临界点上。自地球形成35亿多年以来，其温度已经大幅度冷却，此时的问题是如何保持温度。大约在8亿至6亿年前，太阳辐射比现在弱，地球接收的辐射比现在少6%左右。而且，导致目前全球变暖的以二氧化碳和甲烷为主的温室气体的浓度在那时很低，不足以抵御太空的寒冷。巨大的冰原迅速形成，由两极向赤道推进，将整个或大部分地球（仍然是争论的焦点）裹在1公里厚的冰层中。由于雪白刺目的冰层把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反射回了太空，地表温度下降到了-50℃，永冻冰层出现的可能性极大。但是，可以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地球冲破了冰层，否则我今天不可能在这里告诉你这些。事实上，这种“雪球”状态可能出现了多达6次，每当气候回暖，这种“雪球”状态就会消失。

没有人能确定地球是如何成功地摆脱冰冻状态的。也许是火山爆发挽救了地球。在长达几百万年甚至几千万年的严寒之后，火山爆发排出的大量二氧化碳似乎产生了显著的温室效应，使得大气温度上升、冰层融化。地球上的生命顽强地走出了历史中的这个特别的创伤期，虽然倍受挫折和打击，但仍跃跃欲试。“雪球”地球最终变暖，紧随其后出现了生物多样性的“大爆炸”，它标志着5.65亿年前寒武纪时

期的开始。与成冰纪的酷寒相比，距离我们最近的第四纪冰期（Quaternary ice ages）就逊色不少。虽然第四纪冰期的影响范围较小，但这些距今最近的严寒却是决定性的，因为它们与人类远祖出现和进化的时期一致。不仅如此，它们还可能影响到人类的未来。

在地球的近代史时期，太阳辐射水平一直比成冰纪时期高很多，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含量也更高。但是，为什么在大约一千万年前的中新世（Miocene）末期，冰川又一次开始形成，并且推进到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在大约300万年前，向南挺进的冰层得以加强？在第四纪科学和环境变化领域，这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但本书不会对相关理论作详细的分析，在此只需指出，在过去200万年中，出现了20次左右严重影响地球的冰期，其原因包括：喜玛拉雅山脉隆起而导致的对地球大气环流的破坏，以及巴拿马地峡出现而引起的全球洋流系统的剧烈变化。

虽然以上两个惊人的地球物理事件——或者只是其中之一——可能促使地球日益寒冷，但当时冰层早已开始活动，我们需要从其他地方寻找冰期形成的根本原因。换言之，什么原因导致了冰期的出现？又是什么原因使它结束？二者同等重要。多年来，这个问题吸引了众多科学家。早在1864年，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克罗尔（James Croll）就首次给出了解释，在20世纪30年代又由塞尔维亚科学家米卢廷·米兰科维奇（Milutin Milankovitch）进一步扩充。克罗尔-米兰科维奇（Croll-Milankovitch）天文冰期理论（Astronomical theory of the ice ages）指出，地球公转与自转轨迹的长期变化是第四纪冰期盛衰的根本原因。根据天文学理论，冰期出现的前提是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夏季足够清凉，以保存冬季降雪。随着冰雪的逐年累积，地表反照率（albedo）增大，夏季日照的影响更小，冰盖和冰川加速成长。但是，怎样才能首先使北半球的夏季变凉呢？这正是天文学要解答的问题。只有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量减少，才能导致高纬度地区的清凉夏季，而前者取决于两个因素：地轴倾斜度的变化和 地球绕太阳公转轨道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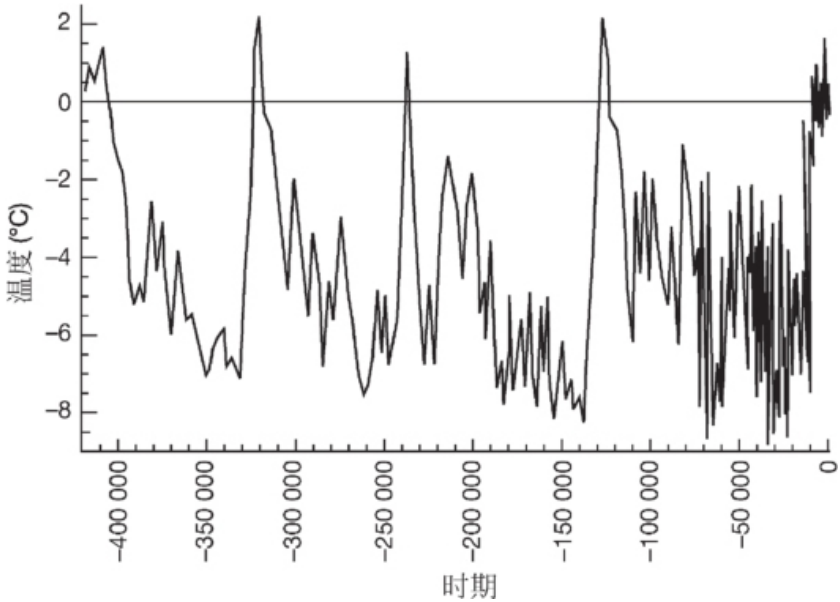

图9　过去42万年间的温度变化表明，在大多数时间内，地球温度比目前温度低许多

如果地轴没有倾斜，地球上就不会有四季变化。例如，北半球处于夏季时，北极朝太阳倾斜，更多的阳光直射到北半球表面，使其温度上升。与此相反，在冬季时，北极偏离了太阳，温暖的长夏被阴冷的北半球冬季所取代。此时，南半球受到了更多的太阳直射辐射，那里的人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而北半球的人则在阴暗的天空下瑟瑟发抖。虽然地轴的平均倾斜度为23.5°，但它并不是常数。地球像一个旋转的陀螺一样绕地轴进动（precesses），周期为2.3万至2.6万年。这种进动使地轴的倾斜度在22°到25°之间变化，周期为4.1万年。当倾斜度最小的时候，冬季实际上更温和，更重要的是，高纬度地区接收的太阳直射减少而变得更冷，这就使得冬季的降雪更不易消融，有利于冰盖增长。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有助于冰期出现的机制，即“天文驱动机制”（astronomical forcing mechanism）。像所有的行星一样，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并非圆形，而是椭圆形的，轨道形状的变化周期大约在10到40万年之间。现在地球离太阳的最近点出现在1月

份，这时北极偏离太阳，使得北半球的冬季偏冷。然而，就在1.1万年前，这一最近点——也叫近日点 ——出现在7月份，此时北半球夏季温度就会有所上升。

为了便于理解，我来画一些图示。如图10所示，在地球倾斜度和地球轨道的变化中可以确认出有规律、可预测的循环——米兰科维奇循环（Milankovitch Cycles），周期在几千年到几十万年之间，这些循环决定了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量，进而决定了地表温度。有时几个循环恰好重合，使高纬度地区的夏季温度下降，从而使冬季降雪得以累积。单靠这一点还不能产生在最近几百万年几乎一直覆盖北半球的巨大冰盖，但随着冰雪覆盖区域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太阳辐射被反射回太空，加速了冷却过程。冰期本质上就是这样出现的。与此相反，在其他时候，各种循环彼此抵消，导致地球变暖，冰盖就会退回到极地。

虽然米兰科维奇和后来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能够解释冰期的形成机制及其周期性，但是，冰期为什么出现在大约1,000万年前，而不是贯穿整个地球历史？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则不太理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水平在过去3亿年中平稳下降，从1,600ppm下降到工业革命前的279ppm。有人曾经提出，也许只有当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低于一个临界值——比如400ppm——“天文驱动”才足以启动冰期的冷热循环。我们不禁要问：一旦二氧化碳浓度在未来20多年后超过这一临界值，我们是否就会永远告别冰期？这个问题我们稍后讨论。

我们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再次面对冰期，基于这种可能，让我们看看上次冰期极盛时期的情况。随着温度在大约12万年前开始下降，地球上越来越多的水体被山地冰川和极地海冰所封锁，使得北半球陆地冰盖范围扩大，导致了海平面的大幅下降。这一时期，冰盖至少4次向南朝赤道扩展，在1.5到2万年前，冰盖达到顶峰。

那时的海平面比现在低大约120米，相当于40层楼，连接各大洲的新陆桥露了出来，极大地方便了各种动物和人类远祖的迁徙。其中一座陆桥横贯白令海峡，亚洲人可以穿过它进入北美洲，从那里开

始，他们最终开拓了一个新世界（New World）。就在人类的600代以前，地球北部牢牢地被冰川作用所控制，全部陆地的1/3被冰层覆盖，世界上5%的海洋被冻结。与今天相比，上次冰期在极盛时期的环境非常恶劣，全球平均温度比今天低4℃，而北部高纬度地区还要更低。在英国，温度降低了15℃到20℃，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块冻结的荒地，巨大的冰盖向南移动，抵达泰晤士河以远。北美洲也有一些极恶劣的环境，那里大部分地区的温度比今天低25℃，冰原厚度达到几公里，生命根本不可能存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当地球看似要回到成冰纪的“雪球”状态时，令人惊奇的变化发生了。地球开始迅速变暖，巨大的冰盖开始融化，其速度远比冰盖形成时要快很多。融化的雪水源源不断地流入冰原周围的巨大湖泊，随后注入海洋，使海平面上升，淹没了几千年前刚露出来的土地。到1.2万年前，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比对下个世纪最悲观的预测还要快很多，几个世纪内上升了约10米。气候持续变暖——几乎一直是这样。从冰期的极盛期到现在温暖的间冰期，这个过程充满了起伏，冰盖不止一次地试图占据中心舞台。例如在大约1.28万年前，冰盖停止了快速撤退，开始了一波为期1,000年的冷冻期，称为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与出现时间较早、不太寒冷的中仙女木期（Older Dryas）相区分。没有人能够肯定这次寒潮的起因，但有人提出主要原因是加拿大阿加西湖水的大量倾泻。早已消失的阿加西湖是北美洲众多由冰川融水形成的巨大湖泊之一。湖水突然灾难性地全部泻入圣劳伦斯河，由此汇入北大西洋，从而破坏了流向极地的暖洋流，使得高纬度地区的气候变冷，冰盖再次形成。新仙女木事件和类似的后冰期寒潮事件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当地球正在经历剧烈的气候变化时，我们更应该牢记这些教训。首先，冷暖之间的转换异常迅速——可能在10年内，其次，洋流的破坏会对气候变化有深远的影响。关于后者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稍后我会详细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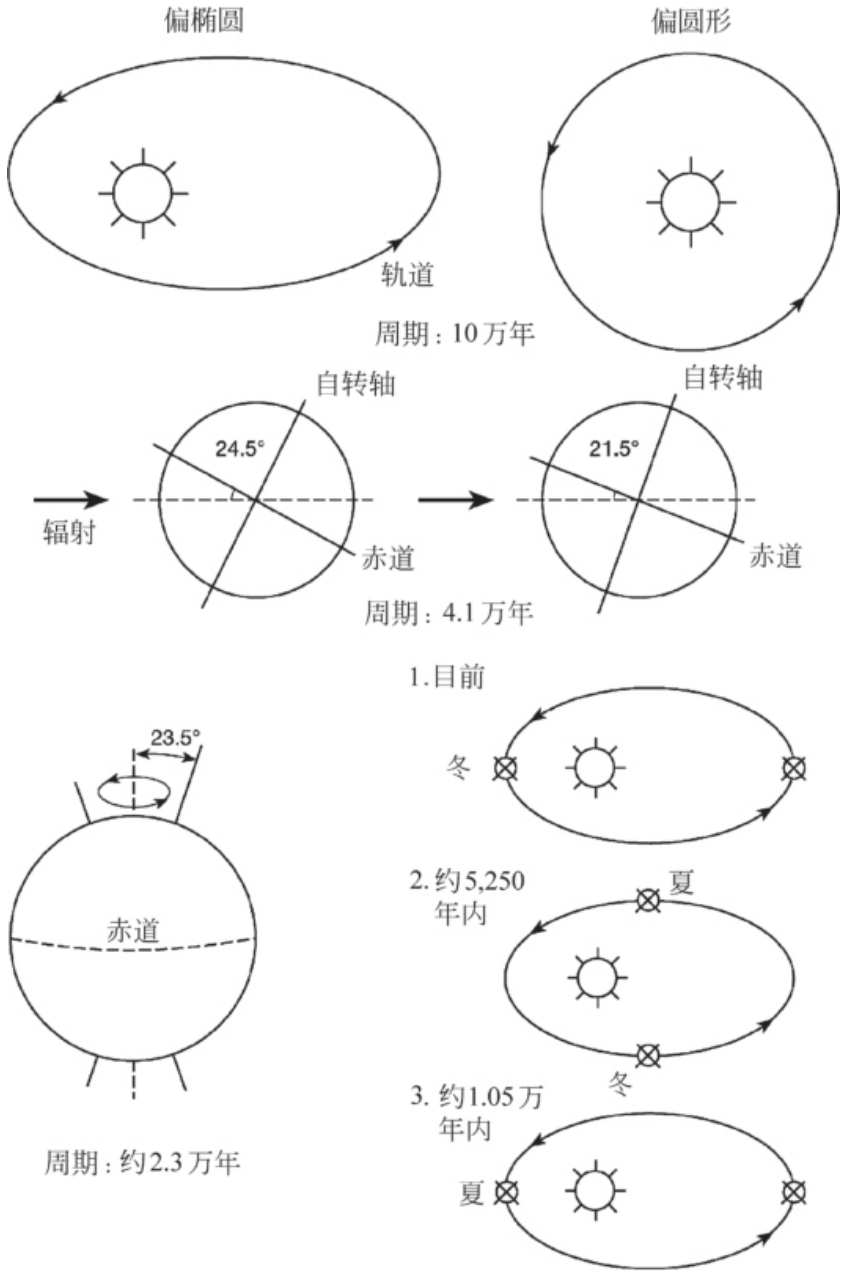

图10　米兰科维奇周期决定了冰期来临的时间；地球绕太阳公转轨道的变化（上图），地球自转轴倾斜度变化（中图），地球自转轴进动（下图）

狄更斯、白色圣诞、小冰期

读到这里，每一位读者似乎都已熟悉冰期 一词，但是大家对小冰期 （Little Ice Age）是否同样熟悉？气候学家用“小冰期”一词来表示从1450年起——也可能是1200年——一直持续到1850年和20世纪初的一段寒冷时期。在整个小冰期内，冰川快速推进，吞没了高山村落，而北大西洋海冰严重破坏了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养殖业。传说伊努伊特人曾远涉重洋，一路向南，最远曾抵达苏格兰，而在格陵兰强盛一时的北欧海盗则被冰川阻隔，从此销声匿迹。

在17世纪末，英格兰的年平均温度几乎比1920到1960年间低1℃，导致了冰天雪地的寒冬。“冰雪节”经常在冰冻的泰晤士河上举办，降雪也很常见。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许多著作中描写的白雪皑皑的冬天就是这个寒冷时期的真实写照，这样的冬天在很大程度上孕育了我们对传统的“白色圣诞节”经久不变的期望。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小冰期？这是一个尚在激烈争论中的问题。然而很明显，由于大多数寒潮都发生在工业革命前，人类活动对此肯定没有影响。尽管如此，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理解小冰期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如果我们不了解近代地球气候的自然变化，就不可能揭示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小冰期并不是历史上唯一一次有悖气候规律的情况——如果存在气候规律的话。就在这次寒潮（指小冰期）来临前一刻，至少是欧洲还沉浸在中世纪暖期 ，这一时期大约从公元1000年持续到公元1300年。在此期间，英格兰北部的葡萄长势就像今天一样，而生活在格陵兰的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则能够在一些近期才被冰雪掩埋的地方放牧。从小冰期到19世纪末正是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加速时期，这是引发目前对气候变暖原因的争论的重要因素。

正如上一章提到的，绝大多数科学家一致认为全球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但是，还有一些科学家坚持认为这只是纯粹的自然变化，将目前的气候变暖看作地球走出小冰期后进入另一个与中世纪暖期类似的时期。虽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全球变暖是人为导致而不是单纯的

自然变暖，但是毫无疑问，人类活动的影响附加于纯自然变化之上，而这种自然变化在近期导致了重大的气候转变。为什么纯自然变化也能引发重大的气候转变？太阳可能是一个主要因素，它的辐射量在100年到1万年内持续变化。例如，出现在小冰期的两个最冷时期就与如下两个太阳活动明显减弱的时期几近重合：公元1400到1510年间的史波尔极小期（Spörer Minimum）和公元1645到1715年间的蒙德尔极小期（Maunder Minimum）。在这两个极小时期，几乎看不到太阳黑子，极光几乎不存在，这表明地球接收的太阳辐射减少。据从事太阳研究的学者估计，太阳在蒙德尔极小期可能比今天暗0.25%，但这足以引发明显的降温。然而，其他因素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新近的一个理论认为当时的爆发性火山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至少加剧了小冰期的寒冷。1815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大爆发就是如此，大型火山爆发更能有效地使大量二氧化硫和其他硫化物气体进入平流层，即大约10公里以上的大气层。在这里，这些气体与大气中的水汽结合，它们所形成的细小的硫酸烟雾能够减少太阳入射辐射，从而导致对流层大气（10公里以下的低层大气）和地面的冷却。我们将在下一章进一步讨论。

图11　小冰期内的冬季往往非常寒冷，足以在泰晤士河上举办冰雪节（1739—1740）

不列颠冰期

对历史气候变化了解越多，就越能清楚地看到，剧烈的气候变化可能会突然发生。大约几十年内，地球气候就从日益变暖返回到了1.28万年前新仙女木期的严寒，这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从中世纪暖期到小冰期的快速转化也与此类似。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在特定条件下，气候可能突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正如当前从人为引发的气候变暖突然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样。这就回到了本章开始时的问题：全球变暖有可能使地球回到寒冷状态吗？这似乎与直觉相反，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至少在英国和欧洲西北部，也许还有整个北大西洋地区。热带棕榈树之所以能在爱尔兰西部和英格兰西南部生长茂盛，唯一的原因是墨西哥湾（暖）流（Gulf Stream）携加勒比海的暖水向北流。结果是英国和爱尔兰远比处于同一纬度的加拿大东部温暖，加拿大东部则不得不忍受副极地的寒冷。如果没有了来自南部的暖水，将发生什么情况呢？情况很可能是英国的气候会非常寒冷——也许还有欧洲西北部大部分地区——有人甚至认为其寒冷程度可以与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旧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相匹敌，这些冰雪覆盖的岛屿位于格陵兰东部，是北极熊的领地。在最近一项研究中，英国气象局模拟了墨西哥湾流停止后的情形。结果显示，在湾流停止后的10年内，整个北半球将变冷，北大西洋周围最明显。在英国，严冬将在湾流停止后的几年内来临，温度骤降到-10℃以下。

使墨西哥湾流减弱或停止的途径之一是向北大西洋倾注巨量的冷水，从而使湾流短路，这正是许多旨在研究本世纪及未来全球变暖影响的气候模型的预测结果。最新预测结果表明，最迟到2100年，温度会上升2℃到3℃，墨西哥湾流因此大幅减弱或者停止的概率为45%。仅在50年内，英国周围海水就会大幅度冷却，从而改变主要的天气模式，使该地区的气候更加寒冷。当全球其它地区酷热难当时，北大西洋地区却可能是一片冰天雪地，比小冰期还要严寒。这也许仅仅是个开始。北大西洋地区洋流变化的间接效应可能会扩散，从而颠覆目前

气候变暖的趋势，将冰雪带回北半球。最后，让我们看一看冰期回归的前景以及人类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出油锅　入冰窟

按照米兰科维奇循环理论，地球已经为本次间冰期的终结和全冰期的回归作好了准备。一些人认为，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诱因，即对气候系统的一次突然冲击，从而使其失去平衡并开始扰动，直至崩溃并陷入十分恶劣的局面。全球变暖能否提供这样一次强度适中的冲击仍然值得怀疑，但最新的研究表明，今天的气候变暖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气候变冷，这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北大西洋的洋流系统又成为了关键所在，它与以往的冷暖转换有密切关系。实际上，大多数人所熟悉的墨西哥湾流只是洋流系统的一部分，该洋流系统有很多名称，其中大西洋倒转环流（Atlantic Overturning Circulation）是最直观的一个。当墨西哥湾流的温盐海水向北流动时，海水逐渐冷却，导致密度增大。在到达北冰洋之前，海水下沉并形成一股向南流动的深层冷流，汇入一个更宽阔的、被称为全球输送带（Global Conveyor）的洋流系统。

看来只要寒冷控制了北半球，大西洋倒转环流的作用就会被严重破坏。例如，在新仙女木期，这一环流就曾被严重削弱，使得北欧的温度下降多达10℃。有关海洋温度和盐度的最新证据也表明，在大约两万年前上次冰期的极盛时期，墨西哥湾流非常弱。这些证据来自对有孔虫类（foraminifera）这种海洋微生物的壳体研究。那时，墨西哥湾流的强度只有现在的2/3，整个洋流系统大幅减弱。问题是此次减弱是导致上次冰期的原因之一吗？还是仅仅是一个结果？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总体来说湾流强度减弱将使北半球更为寒冷，而且这一减弱似乎与巨量冷水注入北大西洋有关。由于北冰洋海冰和格陵兰冰盖的融化，预计未来几百年内湾流强度即会减弱。

在1.28万年前的新仙女木期，从冰川湖排出的大量冷水仅产生了

一次1,000年左右的短期寒潮。但是，那时的地球正处在米兰科维奇循环中的温度上升期。现在，我们处在间冰期到下一个冰期的转换时期，如果没有人类活动造成的污染，温度将有望逐步降低。大量的冷水流入北冰洋不但可能引起欧洲西北部的短期寒冷，也可能触发影响整个北半球的新冰期。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也许我们不用等多久。在20世纪90年代，从事气候模拟研究的美国学者罗纳德·斯托佛（Ronald Stouffer）和亚历克斯·霍尔（Alex Hall）几乎连续10年运行了一个地球气候系统的计算机综合模型，以探讨未来几千年的气候状况。他们的发现着实令人担忧。据该模型预测，大约在3,000年内，格陵兰上空的强西风将促使大量北冰洋淡水注入北大西洋。由于密度较低，这些冰冷的淡水将停留在北大西洋表面，使其上空空气变冷并形成一个低气压天气系统，并通过正反馈机制使西风再次加强。预测结果表明，北大西洋将冷却3℃以上，大西洋倒转环流也会减弱，欧洲西北部的天气将更加寒冷。在该模型中，寒冷期仅仅持续了40年左右，但我们关心的是，如果全球变暖促使格陵兰冰盖大面积融化，则注入北大西洋的冷水量的增加可能把短暂的区域性变冷放大为大范围的持久性严寒。更加堪忧的是，人们可能已经探测到了即将到来的严寒的第一个征兆。最新观测显示，位于苏格兰和法罗群岛之间一支重要的南向洋流在过去50年内速度减慢了20%左右。这会是大西洋倒转环流崩溃和气候平稳地步入严寒的预兆吗？

要说明目前拿全球气候来做试验有多不合时宜，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比较本次间冰期和上次间冰期的温度廓线。从图12中可以看到，自然温度在过去的几千年内呈持续下降趋势。目前，人为导致的温度上升似乎扭转了这一趋势，如果没有温室气体排放，在大约8,000年内，地球的温度会降低3℃左右，地球将逐步走向下一次冰期。虽然全球变暖此时抵挡了严寒，但它对大西洋倒转环流的影响最终会加速下一次冰期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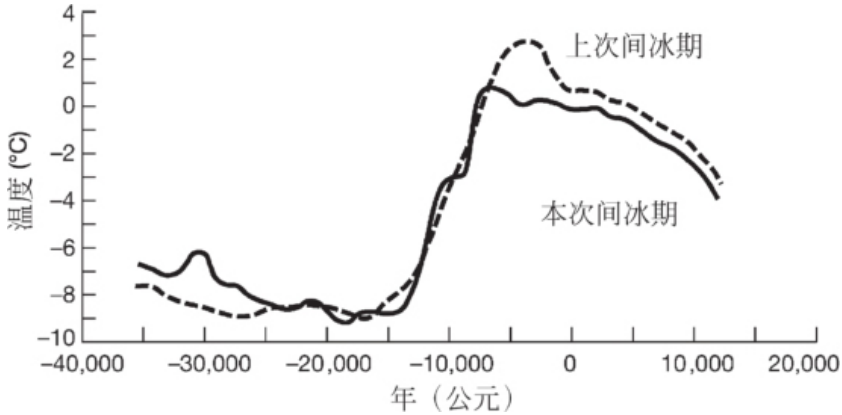

图12　本次和上次间冰期温度对比表明，我们已经在走向下一次冰期

到目前为止，我希望你已经相信当前的全球变暖有可能引发寒冷天气的出现，这可能是由于持续不减的温室气体排放所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醒悟过来，大幅度削减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那又会怎样呢？从图中可以看出，冰期终究会来临。这仅仅是我们愿意马上进入冰雪世界，还是希望先呆在桑拿室，然后再去冰雪世界的问题。不论选择哪种，一旦冰期回归，后人的生活必定会越来越艰苦。届时，在欧洲、北美洲、俄罗斯、亚洲中部和东部，人类将无法生存，进而导致人类大规模地向南迁徙，途中无疑会伴随着为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而发生的流血战争。在冰期地球（Ice Age Earth）的气候状况下，地球上不可能再维持80到100亿的人口，大范围的饥荒和内乱无疑将导致人口锐减。毫无疑问，就像上次冰期来临时一样，人类还会继续生存下去，但却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令人不安的事实

·在8亿年前至6亿年前这段时期，地球是一个冰冻的雪球，表面被1公里以上的冰层覆盖。

·自上次冰期末以来，人类只经历了600代。

·在上次冰期的极盛时期，英国的温度比现在低15℃到20℃，在

北美洲大部分地区，当时的温度比现在低25℃以上。

·自大约1.8万年前冰雪开始消退以来，海平面上升幅度超过了120米。

·温度上升仅2℃到3℃——这在2100年以前肯定会发生——就可能导致墨西哥湾流的大幅减速或停止，这一概率为45%。

·在过去50年内，位于苏格兰和法罗群岛之间的一支大西洋洋流减弱了20%。

·如果没有温室气体排放，在8,000年内温度可能会降低3℃。

注释

〔1〕 成冰纪（NP2）是地质年代中的一个纪，属于前寒武纪元古宙新元古代，期间出现全球雪球事件，是生物低潮期。

第四章

地球内部的大敌——火山超级爆发、大海啸以及即将到来的大地震

地球上的地狱

想象一下地狱中最恐怖的画面。黄绿色的硫化物气体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弥漫在漆黑的世界里，只能看到远方模糊的地平线上一缕昏暗的红光。从天而降的大量灰白色粉末如雪粒一般迅速塞满眼窝、鼻孔和耳朵，使人来不及清除。人们一边干咳一边连忙将手指伸入口中，千方百计地想要把吸入的灰泥抠出来，但没有任何效果。突然，一道刺目的闪电展现了托尔金（Tolkien）笔下的魔多城一般可怕的景象——以每小时0.5米的速度堆积的灰末将所有熟悉的地貌掩埋。一声炸雷预示了黑暗和《圣经》中的大洪水的重新到来。几秒钟内，成堆的灰末变成了湍急的泥浆流，几乎要把你的双脚冲走。雨滴和灰末混合而成的泥球不断地击打着你的身体，那些不断变厚的黏糊糊的火山灰泥浆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大地好像从未沐浴过温暖的阳光，但是天气没有一丝寒意。事实上，你的躯体正被闷热的空气慢慢烘烤着，每一个毛孔都流着汗，与全身的泥浆混在一起，把你的身体慢慢榨干。

全世界大约有5亿人生活在约500座历史上爆发过的活火山附近的危险地带，对其中一些人来说，上面的情景根本就不用想象。他们早已尝到了地狱的滋味。1991年，皮纳图博火山（菲律宾）爆发，1994年，位于拉包尔（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瓦尔肯和塔鲁鲁两个火山爆发。如果将上面所描绘的景象说给这些火山爆发中的幸存者，他们会点头说："我曾亲身经历过！"对于那些居住地远离火山的人来说，不论听起来多么可怕，上面的情景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但是，如果上面的景象出现在距离火山爆发1,500公里外的地区，情况又如何？可以说情况真的非同小可，因为它意味着地球正在遭受自然界超级杀手之一——超级火山爆发（super-eruption）的肆虐和蹂躏。这些巨大的爆炸甚至使近代最大的火山爆发相形见绌。1883年，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火山大爆发，造成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大约3.6万居民死亡。

但与惊天动地的超级火山爆发相比，这一灾难性火山爆发就显得苍白而微不足道，甚至连发生在耶稣诞生前1,500年、将希腊的锡拉岛（Thera）撕裂成碎片的大爆发，也只不过像是燃放了一场爆竹。

我们很幸运，因为超级火山爆发并不常见。据估计，在过去200万年的地球历史中，每10万年中可能有两次这样的大爆发。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65万年前新西兰的北岛，大爆炸震裂了岛上陶波（Taupo）这个地方的地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另一个2.4万年中高枕无忧。就像公交车一样，自然现象的发生时间极不规律，因此，下一次超级爆发可能发生在最近10年，也可能是10万年。而真正可怕的是，我们不可能像在“寻常”的火山灾难中那样避开超级火山爆发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我们中间那些生活在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国度的人们仍会发现：即使超级大爆发发生在遥远的地球另一端，我们安逸舒适的世界也会天翻地覆。这是因为超级大爆发会对气候产生严重的影响。爆发所排出的大量火山灰和气体进入高层大气，使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显著减少，从而导致全球范围的寒冷的火山冬天（volcanic winter）。

在考察下一次火山冬天所产生的可怕后果之前，我们先仔细研究一下超级火山爆发的规模，并与普通的火山爆发相比较。近年来，人们提出了许多描述火山爆发规模的物理量来比较火山事件的大小。VEI指数，即火山爆发指数（Volcanic Explosivity Index）便是最早、最常用的指数之一。它由火山学家克里斯·纽霍尔（Chris Newhall）和史蒂夫·塞尔夫（Steve Self）在1982年发明，主要用来估计和比较历史上火山爆发的大小和强度。火山爆发大小 指所喷发的物质总量，而爆发强度 指火山排出物质的速度。该指数是对数函数（就像众所周知的描述地震大小的里氏指数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两个火山爆发的VEI指数相差1，则两次爆发实际上相差10倍。因此，与VEI 4的火山爆发比较，VEI 5比它大10倍，VEI 6大100倍，VEI 7大1,000倍。在VEI指数比较小的时候，火山熔岩缓缓流出，这是夏威夷的基拉韦厄火山和冒纳罗亚火山多次爆发时的特征，这时VEI指数小得可怜，接近于VEI 0。而轻度爆发释放的火山灰可能使伦敦和纽

约笼罩在薄薄的尘雾中，这时的VEI指数记作VEI 1或VEI 2。然而，对火山学家来说，只有VEI指数较高时才是令人兴奋的时刻。VEI指数为3和4分别代表“中度”和“大”爆发，这种大爆发足以造成对当地的破坏，喷出的火山灰烟柱高达20公里，火山周围被埋葬在厚度达1米以上的火山岩屑和碎石堆下面。1994年，新不列颠岛上的拉包尔镇（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是被这种规模的火山爆发所摧毁的。几年后的1997年，加勒比海蒙塞拉特岛首府普利茅斯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VEI指数为5的火山爆发的特点是引起区域性的损害，如1980年受到电视媒体广泛报道的圣海伦斯火山（美国华盛顿州）爆发，而VEI指数为6的爆发可能造成区域性的毁灭和长久的影响。1991年菲律宾的皮纳图博火山爆发也许是20世纪最大的一次爆发，喷出的火山灰和碎石瓦砾足以将伦敦中心城区埋入1公里以下，使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以后的许多年，每当雨季来临，搀杂着火山灰的泥流经常从再次休眠的火山坡倾泻而下，堵塞河流，淹没农田、小镇和城市。而谈到VEI指数为7的爆发，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大约两个世纪前的1815年，也就是滑铁卢战役发生的那一年。正当惠灵顿和拿破仑各自的部队在欧洲各地设法抢占有利位置时，在遥远的印度尼西亚的松巴哇岛上，长期休眠的坦博拉火山发生了巨大的爆发，这可能是自1万年前上次冰期结束以来的最大一次爆发。据当时英国派驻爪哇岛的代理总督斯坦福德·拉弗尔斯（Stamford Raffles）爵士报告，爆炸发出了一连串的巨大声响，在距离1,600公里以外的苏门答腊岛也能听到。34天后，火山爆发结束，共造成1.2万人死亡。但是，在以后的几个月，当人们在被火山灰毁坏的土地上挣扎着寻找食物和未被污染的饮用水时，又有8万名印度尼西亚人因为饥荒和疾病而死亡。

毫无疑问，坦博拉火山爆发对印度尼西亚人来说完全是一次浩劫，尽管其直接影响仅限于东南亚一些地方，但就间接影响而言，全世界的许多地方必须承受这次大爆发的后续影响。坦博拉火山的大爆发不仅排放了50立方公里的火山灰，也将大约2亿吨富含硫的气体排入大气平流层，而高纬度的风场很快将它们扩散到全球。这些气体很容易与大气中的水汽混合，形成1.5亿吨的硫酸气溶胶 ，这些微小的

液体颗粒能有效地阻挡太阳辐射。几个月内，北半球的气候开始恶化，温度大幅度下降，以至于1816年变成了“无夏之年”。全球温度据估计下降了约0.7度，引起了夏季霜冻、降雪和暴雨，如果这一幅度再增加6倍就可能使地球进入全冰期。也许正是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触发了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丰富想象，促成了其最著名的作品《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问世，而据说景象壮观的火山灰和雾霭中的日落也激发了特纳[1]（J.M.W. Turner）的大多数作品问世。

在1816年，欧洲和北美洲的天气状况确实很恶劣，难道地球上一个遥远地方的一次火山爆发真的能够引起如此大的气候变化，导致社会崩溃和世界毁灭？以往证据表明，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据久远的地质资料记载，在大约4.5亿年前的奥陶纪（Ordovician），在今天的北美洲上发生过一次巨大的火山爆发，喷出了大量的火山灰和火山熔岩，将大约10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一切全部掩埋，受灾面积相当于埃及的大小或英国面积的4倍。另外，排入大气的气体和碎石的数量肯定是非常惊人的。在更近一些的200万年以前，怀俄明州的黄石火山爆发，威力十分强大，留下了一个80公里大小的巨大的火山口（或破火山口），火山灰覆盖了16个州。另一次巨大的黄石火山爆发大约在120万年前，还有一次是在64万年前。如果最后这次大灾难发生在今天，那将使美国及其经济遭受重创，全球气候将陷入极度恶劣的境地。

黄石火山爆发产生的强有力的岩浆爆炸和被称为火山碎屑流（pyroclastic flows）的炽热气体急速穿过了周围的乡村。如果将这些火山排放物扩散到整个美国，足以将美国覆盖8厘米深。火山灰沉降到了很远的地方，远至今天的埃尔帕索城（得克萨斯州）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甚至加勒比海床上的深海岩芯中也能找到此次爆发产生的火山灰。虽然黄石火山已经有7万年没有爆发，但那里的温泉、壮观的间歇性喷泉、冒水泡的泥塘都能证明熔岩就在地下不远处活动。该地区时常发生的地震和周期性的地面隆起和沉降也能证明这一点。没有人知道黄石火山何时——或是否会——再次发生毁灭性的

超级大爆发。最大的三次黄石火山爆发的时间间隔分别是66万年和80万年，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下一次爆发不久将会发生，或者还需要等待10多万年。另一种极大的可能是黄石火山再也不会发生另一次超级爆发，其巨大的火山系统很可能将逐步衰退，直到最终完全消亡。

你也许会轻松地说：这些骇人的事件是很久远的事情了。但它们真的不会在今天发生吗？沿着这个思路思考问题就大错特错了。在公元181年，新西兰的陶波湖上发生了巨大的火山爆发，所排放的火山碎屑流摧毁了北岛的大部分地区，而就在2.4万多年前发生的地球上最近一次超级爆发对该岛的破坏更为严重。7.4万年前——虽然这个时间相当古老，但仍然属于现代人类的时间范畴——在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多巴发生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火山爆发，撕裂的火山口约100公里大小。如今，这个巨大的火山口已经成为湖泊，吸引了众多游客，但有证据表明此次爆发还有更凶险的后续影响。多巴火山的爆发可能险些造成人类的灭绝。虽然对这次火山爆发规模的估计各有不同，但毫无疑问，它同美国黄石火山爆发一样，属于VEI　8的超级爆发。有人认为，此次超级火山爆发期间排放的碎石和岩屑总量大约为3,000立方公里，几乎可以将整个印度覆盖在1米厚的火山灰之中，但是来自深海岩芯的最新证据表明，火山爆发持续的时间可能比我们以前想象的更长，排放的碎石和岩屑量更大，可能高达6,000立方公里。这样整个美国都将被高达2/3米的排放物所覆盖，真是难以置信。

毫无疑问，那时生活在苏门答腊的所有人类祖先应该已经消失了。但是，能使整个人类面临灭绝之灾的火山爆发则一定是对整个地球造成了严重影响，而多巴火山爆发似乎就是这样。除了排放大量的火山灰，多巴火山还排出了大量的硫化物气体，足以在大气平流层产生多达50亿吨的硫酸气溶胶烟雾，使得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减少90%，导致全球范围内的黑暗和严寒。热带地区的温度可能骤降达15℃，敏感的热带植物会被摧毁，而整个地球的温度下降大约5℃到6℃，大致相当于短短数月内使地球完全进入冰期。格陵兰岛冰芯的温度记录显示，火山爆发引起的火山冬季至少会持续6年，紧跟其后

的是为期1,000年的“寒流”。之后不久，地球进入了最后一个冰期。有人据此推测，多巴超级火山爆发引发的冷却效应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将早已逐渐变冷的地球从间冰期（interglacial）推入冰川时期，而此次冰川期的全面出现距今只有大约1万年。

图13　7.4万年前多巴火山大爆发，产生了一个100公里长的火山口，使世界进入漫长的火山冬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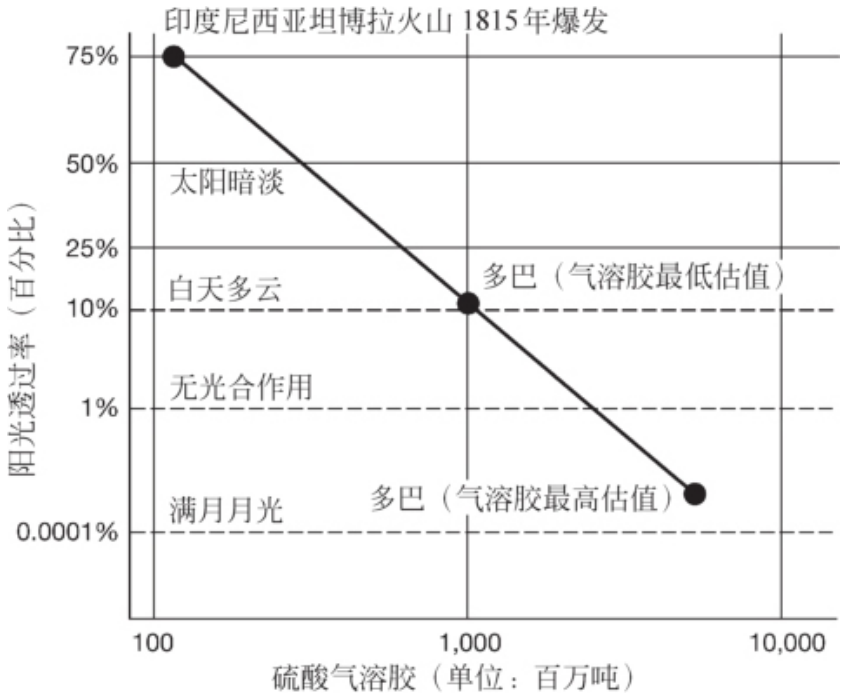

图14　多巴火山喷发引起阳光减弱：最严重的情况可能是，火山喷发产生的硫酸微粒可严重遮蔽阳光，使整个地球的白天就像满月的夜晚一样黑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那些不幸的祖先怎么样了呢？火山爆发引起的黑暗和寒冷真的使他们屈服了吗？确实有可能。对人类亚细胞结构线粒体中的DNA的研究显示，从基因的角度来讲，我们大家太过相似，不可能在数十万年的漫长岁月中不断进化而不受阻碍。这种极度的相似性只能借助于间歇性出现的人口瓶颈 现象来解释，在人口瓶颈时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人类的数量与基因库的规模都大幅减小。在瓶颈末端，人口迅速膨胀，每个个体都携有这个有限的基因库中的遗传特征，最终遍布全球。纽约大学的地质学家迈克·兰皮诺（Mike Rampino）和伊利诺伊大学的人口学家斯坦利·安布罗斯（Stanley Ambrose）共同提出，上一次人口瓶颈可能是多巴火山超级爆发造成的。他们认为，多巴超级爆发后的状况与摧毁一切的核战争的后果相类似，只是没有核辐射而已。就像核决战后城市和植被燃

烧所产生的烟能够导致核冬天 （nuclear winter）一样，多巴爆发后进入大气平流层的数十亿吨硫酸气溶胶烟雾将意味着永无止尽的黑暗和寒冷。光合作用几乎不存在，人类和动物赖以生存的食物源被破坏。当火山冬天临近时，人类祖先活活被饿死，只剩下越来越少的人，这些人也许因为地形和气候原因能够在一些地区得到庇护而幸免于难。有人提出，在大约2万年的时间里，整个地球上可能只有几千人，这个数字正好非常接近一个物种即将灭绝时发生反弹的数目，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祖先肯定像今天的白犀牛和大熊猫一样被列为濒危物种。这些残存的人类似乎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在多巴火山爆发和随之而来的冰期中挣扎着活了下来，使得今天的人口达到了65亿。

未来的某次超级火山爆发能够灭绝人类吗？任何规模的火山爆发都不可能使今天几十亿的人口彻底毁灭，但是，我们全球性的技术社会不可能毫发无损。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前，许多国家政府为可能爆发的、毁灭一切的核战争作了充足的准备工作。然而，随着这种威胁在今天大幅度减小，人们一直没有热情继续坚持执行针对全球性地球物理灾害的民防计划。缺少了这样的前瞻考虑，未来某次超级大爆发的影响很可能是惊人的。即使像美国、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他们的食品储备也只够各自的国民维持最多一到两个月，在没有补充的情况下，他们如何度过6年的漫长岁月？在一些饥荒不断的较贫穷的国家，情况要严重1,000倍，由此导致的大规模死亡将很快来临。从伦敦到拉各斯，当人类个体和家族为物质和生存而争斗时，丛林法则就会盛行。当云开雾散，微弱的阳光给冰冻的地球带来第一丝暖意时，也许现在人口的1/4已经死于饥荒、疾病和内乱。

虽然在未来一百年内出现另一次火山超级爆发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是不可能。超级爆发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很明显，经常隆起和抖动的不平静的 火山口是有可能发生的地方，黄石火山和多巴火山也在其中。大量的熔岩仍然驻扎在这些巨人的下面，在未来的大灾难中也许会释放出来。但是，大地震、地面严重隆起等预示着巨人苏醒的警示信号将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直到它们最终被释放。现在多巴和黄石火山都没有出现这些不祥的预兆，因此我们也不必为可能

出现的超级爆发而失眠。在全球约1,500个活火山中，目前只有很少的一些受到监控。而且，下一个超级爆发也许出现在目前不是火山的地点。也许就在此刻，在遥远的安第斯山脉南部，一直在地下积累的大量熔岩正在积聚力量，准备以后将地壳和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一起撕裂。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及的超级大爆发都是指灾难性的爆炸事件，但是还有一些很少见的情况。这种爆发几千万年才出现一次，它喷出的熔岩量更大，激烈程度却相对很弱。洪流玄武岩（Flood basalt）爆发时会排放出大量的低黏性的熔岩，熔岩会大面积地扩散。全世界都出现过这种壮观的爆发，包括印度、非洲南部、美国西北部和苏格兰西北部，但是最大的一次发生在2.5亿年前的西伯利亚北部，爆发时熔岩冲破了地表。虽然估计各有不同，但是这一史无前例的爆发所释放的熔岩大约覆盖了2,500万平方公里，面积是美国的3倍。

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中，类似的爆发曾出现过几次，它们都与大规模的物种灭绝有关。例如，在上面所提到的西伯利亚爆发以前，二叠纪时期的地球上生机勃勃。但在随后的三叠纪，随着大量熔岩流冷却并固化，至少有95%的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了。6,500万年前，大约在白垩纪末期发生的类似大规模物种灭绝就与印度西北部巨大的德干洪流玄武岩喷发有关。然而——我将在下一章谈到——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地球在这个时期曾被彗星或其他星体撞击，很多科学家认为这就是在白垩纪末期恐龙和大量其他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德干熔岩可能也起到了一些作用，它产生了巨量的二氧化碳，从而引发了严重的温室变暖效应，导致适应性较差的物种死亡。鉴于我们的污染型社会也在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为了人类、世界和地球生命的未来，我们应该以此为鉴。

充满水的坟墓

1980年华盛顿州（美国）的圣海伦斯火山大爆发虽然不是20世

纪最大的火山事件，但肯定是报道最多的。也许是因为它发生在世界上新闻媒体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火山冲天而起的爆炸几乎被照相机的咔咔声和记者手中铅笔的沙沙声所淹没。从科学的角度看，这次爆发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它使另外一种火山爆发形式受到了关注，而火山学家此前对这种形式丝毫不感兴趣。大多数火山爆发都是岩屑碎石从中心火山口垂直喷射，但是圣海伦斯火山大爆发却迥然不同。120年前发生的一次火山爆发所产生的熔岩和岩石碎屑堵塞了中心通道，使得喷出的新熔岩很难从那里流走，而是流到了火山北侧的山坡，像巨大的红宝石一样在山坡上隆起。到了5月中旬，这块巨大的宝石有2公里宽，100米高，很不稳定。5月18日早上刚过8:30，火山下面发生了中等程度的地震，使得火山甩掉了这个隆起的累赘，几秒钟内便破裂并冲下了圣海伦斯山，像发生了巨大的山崩。当这个庞然大物从地下的大量熔岩之上移走，熔岩内的气体便爆炸性地减压，呼啸着向北冲去，其强度之大足以将20公里以外已经长成的杉树林夷为平地，将总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的森林毁灭。山崩滑落体很快与河水和湖水混合，形成凶猛的泥石流，泻入火山的导流河谷，而火山碎屑流则顺着山坡流下，火山灰沉降到远在1,000公里外的蒙大拿州。

圣海伦斯火山爆发导致57人死亡，是一场区域性的灾难，但其科学重要性在于：它阐明了被称为火山侧面崩塌（Volcano lateral collapse）的机制。我们大多数人把火山看成是静态的，是强有力的、坚固的堡垒，不可动摇也不可移动。事实上，它们是经常移动和变化着的动态结构。火山非但不坚固，而且脆弱不堪，它们是火山灰和熔岩碎石形成的不稳定的堆积物，随时可能崩溃。圣海伦斯火山爆发后的许多研究表明，火山侧面崩塌及大规模滑坡的形成是许多火山生命周期中的一个正常环节，可能以100年6次左右的频率发生在地球上的某些地方。此外，研究显示，与已知的最大火山崩塌相比较，圣海伦斯火山的崩塌很小，它的滑坡量小于1立方公里，而在史前时期，夏威夷岛火山爆发时，有总量超过1,000立方公里的巨量石块落下。

这时你也许会问自己，即便如此，那又如何？从火山上滑落的巨

石不论有多大都不可能产生全球影响，不是吗？事实上如果巨石崩塌进入大海，那就有可能产生全球影响。1792年，一次相对较小的滑坡沿日本云仙岳火山侧面发生，滑坡体流入大海。被排出的海水形成了几十米高的海啸，袭击了周围的沿海地区，致使沿岸小渔村1.4万名居民死亡。一个多世纪以后的1888年，新不列颠岛（巴布亚新几内亚）上的里特岛部分火山体滑入大海，引起高达15米的海啸，海浪呼啸着冲进了临近海岸线上的村落，夺去了3,000人的性命。火山滑坡和大量海水的结合显然是致命的，但你一定在想，它如何能够影响那些居住地远离火山的绝大部分人类呢？答案是这要看最大的崩塌有多大，也要看由此引起的海啸规模有多大。

夏威夷群岛四周海床的水下影像表明，它们被几千万年前岛上火山排放的岩屑碎石所构成的巨大沙砾层所包围。在火山排放物形成的巨大杂货堆中，近70次规模庞大的滑坡事件已得到确认，有些体积超过了1,000立方公里。夏威夷群岛最近一次大型崩塌大约在12万年前，发生在比格艾兰岛上的冒纳罗亚火山上。巨量的石头进入太平洋引起了大海啸，400米高的巨浪冲上了旁边的科哈拉火山的山坡，高度超过了纽约的帝国大厦。7,000公里以外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南部海岸上，在海平面以上15米的地方发现了相近年代的沉积物，这可能与海啸有关。尽管对沉积物的本质和来源仍有争议，但海啸引起的巨浪大小似乎是真实的，用计算机模拟大型火山滑坡进入海洋也产生了规模相近的海啸。

发生在海岛火山上的多数崩塌似乎能在当地产生足足几百米高的海浪，当它们跨越半个海洋袭击大陆时，仍然维持着几十米的浪高。因此，夏威夷群岛的下一次火山崩塌可能引发一系列大海啸，严重破坏整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中国等许多国家的大城市。海啸在深水区的传播速度与大型喷气机的速度相当，因此，只需要12个小时，威力相当于无数颗原子弹爆炸的巨浪就会冲上北美洲和东亚的海岸。

问题不仅出现在太平洋。在大西洋东北部的加那利群岛周围的海上科学探测和岛上的详细地质调查揭示了一幅与夏威夷非常相似的画

面。海床上蔓延数百公里的乱石堆、岛上以悬崖峭壁为界限的巨大崩塌痕迹都证明了特内里费岛和埃尔耶罗岛上巨大的史前崩塌。目前最令人担心的是，在加那利群岛最西边的拉帕尔马岛上，一场新的大型崩塌似乎已经启动，随时准备爆发。在1949年的那次爆发中，岛上陡峭而快速膨胀的别哈火山西侧的大部分山坡朝北大西洋的方向下降了4米，然后停了下来。英国和美国的一些科学家相信，这块巨大的火山岩石现在已经脱离了火山主体，最终将完全 坠落冲入大海。据估计，它的体积有几百立方公里，大约是英国马恩岛的两倍。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它将在什么时间脱落。从地质学的角度判断，也许会很快，但是在明年还是在1万年内发生，我们则完全不知道。20世纪90年代末期，采用卫星全球定位系统进行的观测也没有给出明确结论，但观测指出，巨石可能仍然会缓慢地滑向大海，速度不超过每年1厘米。然而，即便如此，如果没有新的火山爆发作为诱因，这块巨大的火山岩石也不可能完全沉入北大西洋。

有一点很明确，拉帕尔马岛上的别哈火山的西侧一定 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崩塌，进而引发肆虐整个大西洋周边地区的海啸。在2001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史蒂文·沃德（Steven Ward）和伦敦大学学院本菲尔德灾害研究中心的西蒙·戴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科学论文，文章中模拟了别哈火山崩塌及其所造成的海啸在大西洋的传播。沃德和戴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体积为500立方公里的巨石崩塌而言，最糟糕的情况是：巨石在进入大海两分钟内将产生初始高度为900米的巨型水面隆起，随即很快降低。在接下来的45分钟内，一连串高达100米的巨浪将猛烈拍打加那利群岛的海滩，吞噬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带，然后冲上非洲大陆。随着海浪继续北移，它们将开始减弱，但西班牙和英国仍然会被浪高可达7米的海啸所摧残。同时，在拉帕尔马岛的西面，汹涌的巨浪将快速冲向美国。崩塌后仅6个小时，几十米高的巨浪就会淹没巴西的北部沿海地区，几个小时以后将横扫地势较低的加勒比海诸岛，冲击整个美国东部沿海。海湾、江河三角洲和港口的汇集效应可使浪高增加到50米以上，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华盛顿和迈阿密相当于承受着瓦尔肯火山和内普丘恩火山

同时爆发出来的冲击力。我们不能低估这些高如摩天大楼的巨浪的破坏力。风力驱动所产生的海浪每天都会冲上世界各地的海滩，波长（两个波峰之间的距离）大约几十米，而海啸则不同，其波长通常为几百公里　。这意味着一旦海啸像高耸而坚固的水墙一样撞击沿海地区，这种撞击将接连不断，可能延续10或1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直到用同样长的时间撤退。在如此可怕和残暴的打击下，除了那些最坚固的建筑，所有生命和其他一切都将被摧毁。

印度洋海啸给我们的教训是：如果没有充分的事先计划，在海浪前锋到达北美洲海岸的9小时内无法有效地完成大规模的撤退，死亡人数注定会达到数百万。而且，美国经济将因此接近终点，保险产业瞬间受到重创，全球经济将快速衰退。通过这种方式，遥远的大西洋火山上发生的相对较小的地质事件将影响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像火山超级爆发一样，尽管这些大海啸不常发生，但它们是正常的自然现象的组成部分。在未来某个时刻，人们肯定会碰到大西洋或太平洋盆地的大灾难，但在什么时候呢？对夏威夷火山崩塌频率的估计各不相同，介于2.5万到10万年之间，但是，如果把所有火山岛上的大型崩塌考虑在内，严重的崩塌事件大约每一万年发生一次。在地质时间尺度上，这确实非常频繁，我们必须认真关注。更令人担心的是，崩塌发生的频率不是常数，目前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变暖事实上可能使下一次崩塌提前。我的研究小组认为，以往越来越高的火山崩塌频率与海平面的变化有关，而其他人则认为更加温暖湿润的气候可能引发更多的大型火山崩塌。既然在可预见的未来海平面将持续上升，而以往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表明，地球变暖将在世界上许多最大的火山岛链上引发更大的雨，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向内地和高地迁移，或者至少应该买一件高质量的雨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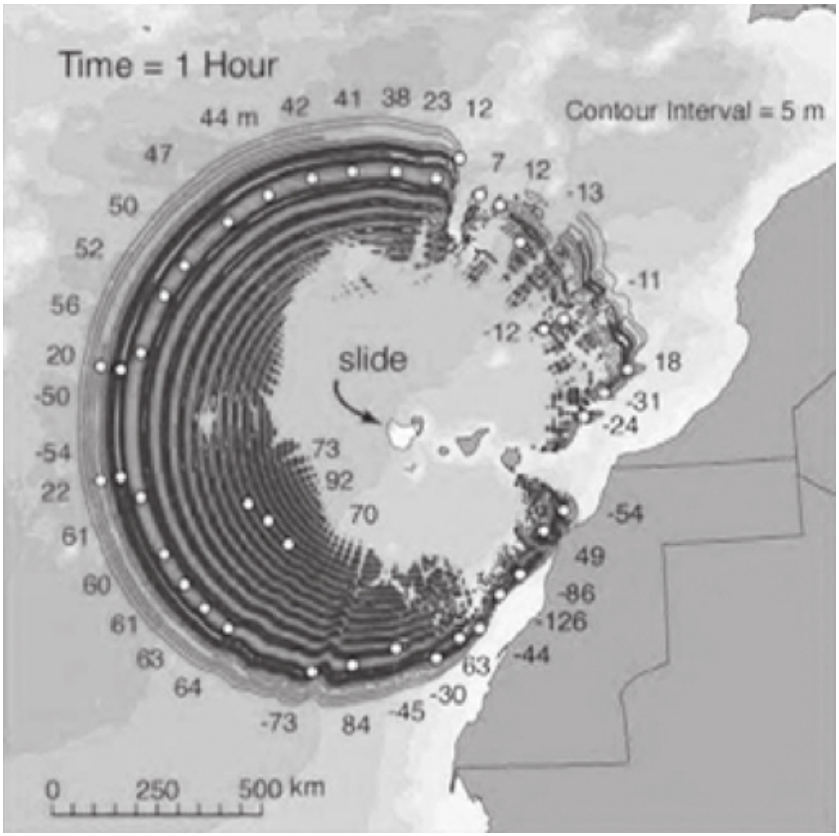

图15　拉帕尔马岛上的别哈火山崩塌引发的巨大海啸将冲击非洲、欧洲和美洲。图中正值表示波峰，负值表示波谷（高度单位均为米）。该图展示了火山崩塌1小时后海浪到达的位置

坐以待毙的城市

从来没有经历大地震的人很难理解身处其中、脑子一片空白时的恐惧。即使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人们不断地被告知地震发生时该怎么办，但是，当地面开始抖动时，连贯而理智的思维就停止了。1989年洛马普列塔地震袭击了北加州之后，美国地质调查机构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3%的圣克鲁斯人寻求即时保护，而接近70%的人要么呆住了，要么向外跑。这是地震中的老问题，不论人们

知道多少对策，当大地像未被驯服的野马一样猛然跃起，家具开始在室内横冲乱撞，盲目的本能就占据了上风，告诉人们“离开那个鬼地方”。不幸的是，这样做只能增加伤亡，当遭受惊吓的居民尖叫着冲向街头时，他们更容易被下落的建筑材料和其他各种从天而降的碎片击中。人们应该就近钻入结实的家具下面，或者就近在走廊的过梁下面躲藏。

地震的破坏力很强，主要因为很多地震多发地区的城市建筑物抗震能力较差，不足以抵抗大地震发生时地面的剧烈摇晃。加利福尼亚州的现代建筑方法严格遵循建筑规范，保证建筑物能抵抗对其他地方来说是毁灭性的地震，这项政策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在过去15年中，因大地震而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大幅降低。即便如此，1994年袭击南加州的北岭地震仍然造成了高达350亿美元的损失，其中大部分损失缘于地震对老旧建筑的破坏。其他地震多发国家也制定了建筑条例，以减少地面摇晃引起的破坏，但是这些条例常常得不到落实。1999年，一场里氏7.4级的地震袭击了土耳其的伊兹米特地区，15万间房屋倒塌，1.7万人丧生，政府和管理部门的失职所带来的恶果暴露无遗。地震中，许多住宅区完全被夷为平地 ，楼层的先后坍塌形成了成堆的混凝土板，从下面逃生的机会很小。在2001年1月份，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的普杰地区遭受了一场严重的地震，40万间房屋被夷为平地，大约10万人死亡。大部分死亡缘于当地古老的建筑方法：用泥土或水泥将巨大的石板稀松地粘在一起，构成了房子四周厚重的围墙，而屋顶也是很重的石块。当地面开始摇晃时，这些房子没有任何抗震能力，随时可能崩塌并砸中屋内的人。在更近的2003年，发生在伊朗南部巴姆城的一场中度地震夺取了巴姆古城的2.6万人的生命，原因是当地传统的土砖（泥砖）建筑物不能抵抗任何地面摇晃，而2005年在巴基斯坦的一场大地震中，死亡人数超过了8万。

在上一个千年中，因为地震而死亡的人数至少有800万。听起来很吓人，但是随着地震多发地区大城市的快速兴起，也许在几个世纪内这个数字就会被超越。一些地震学家已经发出了警告，在不久的将来，仅一场大地震就可能夺取300万人的生命。如果不幸的事发生在

卡拉奇或墨西哥城，尽管灾难将对地震国产生严重的影响，但对全球的影响很小，只是全球多数人的生活会受到一定冲击。如果地震中心是日本首都东京，情况就大不相同。2015年的规划表明，到那时，东京–横滨这一集合城市将是地球上城市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共有3,600多万人。集合城市就坐落在地球上的地震多发地带，在这里，东边的太平洋和菲律宾板块插入到了巨大的欧亚板块下面。近80年前，这里曾经被大地震摧毁，从此以后一直是不祥的宁静，而现在距离下一次大地震不会太久了，届时世界上的工业强国之一将会受到重创。灾难一旦发生，经济的冲击波将迅速横扫全球，迫使一个个国家屈服。为了让大家初步了解日本首都的命运，让我们回头看看20世纪发生的一场大灾难，即日本人称之为关东大地震的骇人事件。

图16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引发的烈火连续两天烧遍整个东京，只剩下遍地废墟

1923年9月1日，在东京和横滨，黎明像往常一样来临了，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天就是他们的末日。地震发生在近午时分，餐馆和啤酒馆里挤满了饥肠辘辘的工人，一家人坐在家里共进午餐。正在此

时，低沉的隆隆声突然变成了可怕的巨吼，相模湾底下的地质断层断裂，强烈的冲击波朝北直扑向这两个城市，首先冲入横滨，接着在短短40秒内冲进了首都东京的中心地区。这次大地震为里氏8.3级，剧烈的地面摇晃使人根本无法站立。成千上万的房屋倾刻间坍塌为一片废墟，里面的人瞬间被埋葬。这些倒塌的房屋多是由传统的木墙和很重的瓦顶建成。终于，石块撞击和房屋倒塌引发的巨响被火焰的劈啪声所取代，虽然略微安静了一些，但却同样可怕，上千个翻倒的炉子点燃了坍塌房屋中的木料，大火开始燃烧起来。轻风助火势，成百万处的小火很快汇聚成势不可挡的火海，吞噬了所有废墟。震惊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哆嗦着，身处开阔地却无处逃生，活活地葬身火海。在一处废墟上，4万人被大火夺去了生命，人们拥挤在一起，以致于他们炭化的尸体仍然站得笔直。大火持续燃烧了两天两夜，烧光了城市中一切可烧的东西，最后自行熄灭，只留下世界末日般的荒凉景象。死亡总数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有20多万人在地震和随后的大火中丧生。日本的经济损失惨重，换算成现在的价格大约有500亿美元。地震和6年后的“大衰退”共同导致了日本的经济崩溃和严重困难。有人曾经指出，就像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一样，这种情况助长了民族主义的气焰和军事力量的抬头，导致了侵略扩张和帝国主义，最终引发战争。

在新千年初期，东京和横滨这对双子城市又一次等待着它们的命运，不过，不论对日本还是全世界而言，这一次的命运将更加悲惨。目前，该地区的工业和商业力量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力已经辐射到了地球上许多遥远的角落，将全球经济连为一体，各国财富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一旦东京倒下，日本也将倒下，其他地方也将紧随其后。但这种情况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东京周边地下岩石中的张力已经积聚了78年，除了1992年的一次震级为5.9的小地震和2005年的另一次小地震，该地区的地下活动一直很平静。然而，政府和民众都知道这种平静不会持续很久，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设防震楼宇、改善教育和应急预案，甚至努力确定下一次大地震的确切时间。但到目前为止，准确预报地震已经证明是做不到的，在近

期取得突破的希望也很渺茫。除此之外，一大部分老旧建筑所用的材料仍然不坚固，预计有100万间木质房屋可能正好为下次地震后的大火提供燃料。就在10年前，东京以南400公里的神户发生地震，6,000人死亡。这次地震也许可以当作东京未来面临的大地震的缩影。神户受到了严重破坏，经济损失达1,500亿美元，而严重的火灾正是造成这些损失的重要原因。同时，应急效率也明显很低，远没有达到世界各国的期望，因为日本通常被认为是高效的典范。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地方政府没能应对地震后的混乱局面。因为没有预案来确保应急物资和设备运送到急需的地方，一旦道路被杂物堵塞或铁路无法使用，城市中数十万无家可归的人在地震发生后的几天内就几乎接受不到任何援助。公平地说，一些问题——至少是神户遭遇的问题——能够反映出日本社会的等级结构，这种结构压制了自由决断和自由行动，阻碍了突发情况下的快速反应。如果没有重大的改变，在这种根深蒂固的、严格的社会礼仪规范的束缚下，任何一个东京地区的地震突发预案都很难高效地发挥作用。

东京和横滨的地质条件复杂，地球上的三大地质构造板块在这里汇集。这些板块相对运动所产生的巨大张力通过局部断层的突然位移而周期性地释放，从而引发毁灭性的地震。事实上，该地区附近有很多活动断层，而大地震可能发生在4个不同的地方。地震学家认为，这些地区的地震早该发生了，或者至少已经在逼近。根据地震科学家的预测，在东京和横滨以南大约75公里——靠近小田原的地方——一场6.5到7级的地震随时可能发生。这场地震虽然会在当地造成严重的损害，并对东京和横滨产生中度破坏，但不可能像1923年地震那样对首都东京产生如此巨大的破坏。与此类似，另一个名为东海（Tokai）的地震即将到达骏河湾下西南方向150公里的地方。据科学家预测，这将是一场里氏8级的大地震，它无疑将摧毁沿海城市静冈市，但东京由于距离太远可能不会受到严重影响。更值得担心的是预测中的另外两场地震，它们会给东京地区造成更大的威胁，当地人们也在战战兢兢地等待着。地震学家预测，就在首都东京的正下方，一场震级为7的地震随时可能发生。这场当地人称为直下型（*chokka-*

gata）的地震将对首都造成严重的破坏，而横滨受到的冲击则较小。最糟糕的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在100年之内可能重演。这可能是一场震级为8的大地震，就像约80年前的情景一样，相模湾湾底南部的断层将会断裂，冲击波将快速向北，首先冲入横滨，然后在不到半分钟内进入东京。

日本政府仍然坚信他们的科学家能够提前探测到“大地震”即将发生时的警讯。如此相信科学，这既少见又令人感动，但是这种信心却用错了地方。回顾以前，人们已经注意到在有些地震来临前，井窖中的水位会下降，从岩石中散发的放射性气体氡的浓度会增大，但是这些现象并不总是能观测得到，而且，这些变化出现后并不一定会发生地震，因此将这些征兆用于地震预报就非常不可靠。希腊的一些科学家声称，地震前他们能在地壳上探测到电信号，但这种方法由于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而遭到了大多数地震学家的嘲笑。另一方面，动物、鸟类和鱼类往往在地震发生前行为怪异，这种说法看似有几分道理，而且日本人实际上正在认真研究，以期发现鲇鱼——在其他生物体中——能否帮助他们预报下一次大地震。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动物如何能在事前探测到地震，尽管有人提出岩石中的张力可以在动物的皮毛、甚至鱼鳞上产生电荷，引起小的电击，由此引起动物的躁动不安。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一头猪行为异常，又该 如何判断呢？

即使先知先觉的鲇鱼没有发出一丝预警信号，下一次大地震也有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袭击东京地区。那时，新近落成的建筑将依然挺立，许多老旧的房屋将会坍塌。尽管一些建筑中安装了燃气自动关闭装置，但爆炸的燃料罐、开裂的燃气管道、油料和化学品的溢出足以使大火吞噬上百万的木质房屋。就像在1923年，火灾的破坏力可能与地震本身的破坏力相当，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也相近——估计多达6万。虽然我们很难事先估算下一次大地震导致的经济损失，但是据一家针对保险行业的建模公司估计，损失将高达3.3万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是神户大地震的20倍，也是1994年美国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自然灾害——加利福尼亚州北岭地震的60倍。

人们普遍认为这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日本是一个高度密集的国家，东京地区不仅是国家政府所在地，也是证券市场和70%国内外大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占亚洲GDP的51%和全球GDP的13%，尽管目前经济低迷，在大地震最终爆发时，它仍有可能是一个经济强国。为了灾后重建和复兴，日本极有可能被迫从海外大规模撤资、抛售政府手中持有的欧洲和美国债券、出售海外资产、关闭海外工厂。当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发现自己在全力应付迅速崩溃的全球经济时，经济衰退将很快到来，这次衰退比1929年——那年华尔街股市暴跌，仅美国就有10万家企业关闭——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严重。届时，失业率会出奇地高，许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将开始解体。没有人知道东京大地震后的萧条将持续多久——也许几年，也许几十年——也不知道情况会有多糟糕。同样重要的是，这种推测的情景何时才能真正出现？也许只要几十年，也许要100年或更长时间，但如果这个大城市在下世纪初再次被摧毁，大家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尽管有时被媒体称为“乌鸦嘴”，但是我并不希望你们把我看作纯粹的厄运预言者，并且看到此就把书合上，感觉未来毫无希望。的确，从地质学上看，地球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我们研究得越深，地壳构造对人类文明的威胁似乎就越严重。另一方面，我们一直都在学习和收集资料，以便抵御或缓解下一次超级火山爆发或大海啸的冲击。最终，我们有可能较准确地进行地震预报，而且肯定地说，一个世纪之内，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出现火山不稳定或大量熔岩喷出地面之前，我们的卫星都能提前观测到。地球科学家几乎每天都在着手解决一些对人类社会构成严重威胁的事件，对它们了解也越来越多。最起码在地球下一次剧烈抖动时，我们不会像祖先面对多巴火山时那样满脸的困惑和恐惧，而是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令人不安的事实

·平均每10万年就有两次火山超级爆发。

·在7.4万年前的多巴火山超级爆发后，地球至少有6年处于火山冬天。

·在多巴火山超级爆发后，全球人口可能只剩下几千人。

·1949年拉帕尔马岛（加那利群岛）上的别哈火山西侧滑坡，一夜之间下降4米。

·如果别哈火山崩塌进入大海，美国东部沿海城市可能受到高达50米的海啸的袭击。

·预计下次东京大地震造成的损失将超过3.3万亿美元，并且可能引发全球经济崩溃。

注释

〔1〕 特纳，英国风景画家，1775—1851

第五章

来自太空的威胁——小行星和彗星撞击地球

本世纪的天文事件

人们曾经认为地球是一个安全舒适的避难所，能阻挡动荡的宇宙中的诸多纷扰，而1993年，美国已故天体科学家尤金·舒梅克（Eugene Shoemaker）的遗孀卡罗琳·舒梅克（Carolyn Shoemaker）和她的同事戴维·列维（David Levy）的一项发现永远改变了人类对地球的认识。舒梅克研究小组发现了21块巨石，它们曾是一个彗星的组成部分，木星巨大的引力场使它们分离开来——木星是一个主要由氢气和氦气组成的巨大星体，体积是地球的1,300倍。受木星的引力作用，这颗彗星并未像大多数彗星一样围绕太阳运行，它的岩石碎片现在围绕木星这个行星之王运行。由于木星已经有了一大批卫星，再多几个就会比较有趣。但不同寻常的是，这些新“卫星”的生命非常短暂，它们在第二年就会撞向木星结束生命，从而向地球科学家们展示了行星受到太空中大块碎石撞击的全景。

1994年7月16日，恰逢首次载人登月行动——阿波罗II号 发射——25周年纪念日，第一块舒梅克-列维彗星（Comet Shoemaker-Levy）碎片撞向了木星，喷出了由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巨大烟云和迅速向外扩散的冲击波。碎片接连不断地撞击木星，壮观的景象被地球轨道上的哈勃太空望远镜（Hubble Space Telescope）和前往木星途中的伽利略 探测器（Galileo probe）拍了下来。最初的撞击发生两天后，一块直径4公里、名字平淡无奇的碎片G岩石块以相当于100万亿吨TNT的力量撞向了木星，其能量约等于**80**亿 个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撞击产生了刺目的闪光，使许多追踪该事件的红外望远镜都暂时失灵。随后强光迅速减弱，呈现出一个比地球还大的黑色撞击区。每个目睹这一骇人景象的人都必然会产生同样的想法：如果碎片G撞击的不是木星而是地球，那将会怎样？

几乎一夜之间，地球变成了一个相当脆弱的地方，人类的命运也岌岌可危。科学家、普通民众、甚至连政治家都突然间开始认真思考

来自太空的威胁。两部好莱坞大片满足了公众对撞击事件日益增长的兴趣，它们以不同程度的科学严谨性表现了彗星或小行星撞向地球时人类可能面临的遭遇。

1996年，也就是木星撞击事件发生两年后，一个名为太空卫士基金会 （Spaceguard Foundation）的国际机构成立，目的是寻找有潜在危险的小行星和彗星，提高公众对撞击威胁的整体意识。在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和国防部已初步开始资助一些与保卫太空相关的项目，英国政府也成立了工作小组来考查小行星和彗星撞击地球的风险。忽然之间，每个人都想了解未来地球被撞击的可能性有多大 ，以及撞击对地球和人类会有什么影响。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可能性是百分之百。在漫长的历史中，地球一直在受到太空碎片的撞击，尽管次数比数十亿年前少得多，但未来地球仍难逃脱被撞击的命运。关键问题是：什么时候？至于撞击会给人类带来多大的灾难，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撞击我们的岩石块的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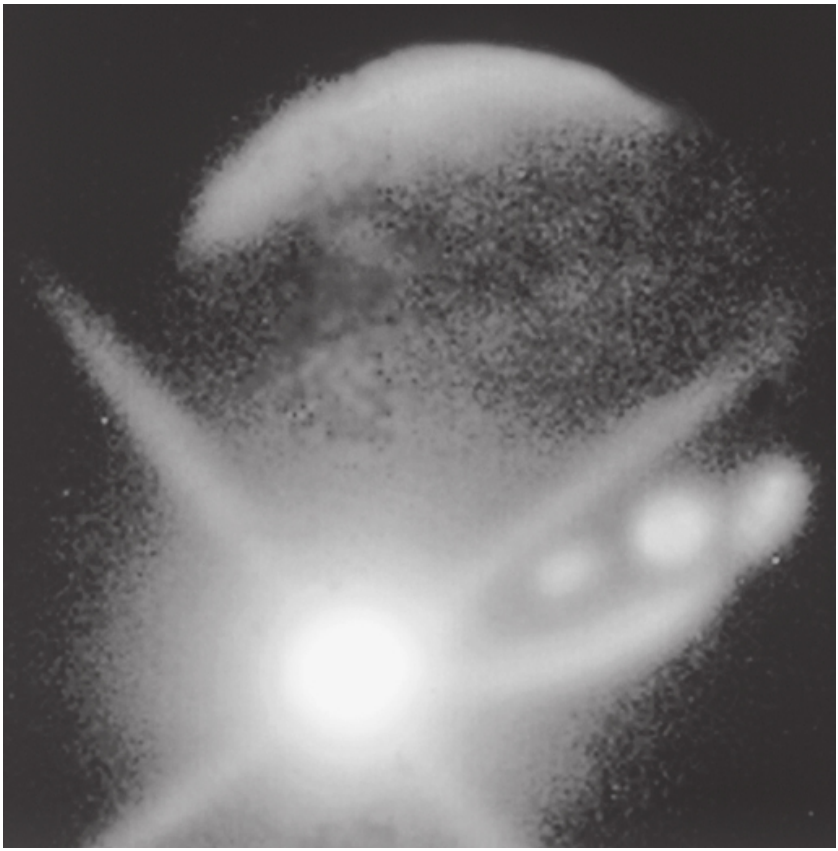

图17　1994年舒梅克 - 列维彗星碎片撞击木星的壮观景象

宇宙沙暴

为了更好地了解地球可能遭到撞击的频繁程度，我们需要知道究竟有多少岩石块在太阳系周围急驰，特别是那些因距离地球太近而造成威胁的碎石块。虽然大量岩石碎片已被早期太阳系中初步形成的行星所清除，但无数的岩石碎屑仍然存在，既包括几毫米的小微粒，也有小行星谷神星（Ceres）等直径超过1,000公里的巨石。实际上地球在太阳系中运行时经常遭受撞击，就好像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走时不断与沙暴搏斗。幸运的是，在数十亿的碰撞碎片中，大多数碎片都很

小，而且一旦进入地球大气层这个保护层，它们就会在瞬间消失。当然，地球也会不时地与较大的东西碰撞。

在大气层中，每5分钟就有一个豌豆大小的碎石块燃烧掉，每1个月就有一团足球大小的火光划过，用尽最后的力量将天空照亮。较大的物体可能穿过大气层到达地面，但这很少见，一年里只有几次。每隔几个世纪，地球就会与40到50米大小的石块相撞，如果这样大的物体直接撞击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被摧毁。最近一次有详实记录的这种规模的撞击就发生在1908年。

虽然整个太阳系充满了各种碎片，但仅从灾害性考虑，我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那些通过撞击地球而消失的碎石块。这种威胁地球的物体大多是岩石小行星（rocky asteroids），它们绕太阳运行的轨道或靠近地球轨道，或与地球轨道交叉。这种近地小行星（NEAs）的确切数目我们无法确定，但据目前估计，数量相当惊人。

多达2,000万个直径超过10米的岩石碎片在太空穿梭时可能穿过或靠近地球轨道。在这些岩石碎片中，直径超过100米的多达10万块，如果它们直接撞击地球，则足以毁灭伦敦和纽约；直径超过500米的可能有2万块，如果撞击地面，则足以毁灭一个小国家；如果撞入海洋，则足以引发破坏性很强的海啸。直径为1公里以上的碎石块数量更少，但破坏力更为巨大，它们如果撞击地球，则可以毁灭一个像英国那样大的国家；如果直径达到2公里以上，就会造成全球性的毁灭。尽管直径为2公里只相当于20个足球场那么大，但这种物体在碰撞中的动能十分巨大，它在撞击地面后会留下一个直径约40公里的陨石坑，并引起大量的岩石粉末状碎屑进入大气层，遮蔽阳光，使地球长年陷入寒冷的宇宙冬天（cosmic winter）。

对直径为1公里以上的近地小行星的数目有一系列统计结果，最新的结果是大约1,000颗。到2005年8月，其中的794颗已经得到确认，约为总数的3/4，它们的轨道可以及时被预报，以检察它们是否会对地球构成中期威胁。寻找其余近地小行星的工作还在继续，并且至少还需要几十年。一旦完成了这项工作，并且发现地球并非注定会成为袭击目标，我们也就有了一点安全感。不过遗憾的是，问题并没

有到此为止。让我们担心的还有慧星。

彗星 是大量岩石和冰块的聚集物，直径可达100公里以上。与小行星近似圆形的轨道不同，多数彗星沿着明显的椭圆形轨道运行，从寒冷的太阳系边缘地区或外太阳系运行到太阳附近，然后再次离去。在茫茫的太空深处，神秘莫测的彗星极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当它们进入太阳系内部，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受到太阳的炙烤，彗核（nucleus）中的气体和尘埃粒子被蒸发，形成了一条非常壮观、能延伸1亿公里以上的彗尾（tail）。长久以来，彗尾的时隐时现 常常被人们当作厄运和灾难的预兆，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彗星的运动速度通常为60到70公里/秒，比协和式飞机快100倍，约为常规近地小行星速度的3倍。正因如此，彗星和地球之间碰撞所产生的能量会更加巨大，破坏力也更加惊人。

另一个问题是，与小行星不同，人们对彗星轨道参数缺乏了解，因而很难预测它们是否会构成威胁。在所有的彗星中，哈雷彗星无疑是最著名的，它环绕太阳运行的周期为76年。人类在过去几千年中曾多次观测到它，对它的轨道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因此有可能计算出它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的运行轨道。计算结果表明，哈雷彗星至少在公元3000年以前不会威胁到地球。但是，对于其他沿抛物线 轨道（parabolic orbit）在太空中穿梭的彗星来说，它们的运行远远超出了太阳系。其中一些彗星可能在很久以前出现过一两次，其余的可能正首次飞向内太阳系。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依据历史记录预测它们的轨道，一旦我们发现其中的一颗正飞向地球，距离这一不可避免的灾难性撞击也就只有6个月了。此外，由于这些彗星一直在太空深处运行，它们个头非常巨大，直径可达100公里以上。这是因为它们没有遭受太阳风 （solar wind）的冲击。太阳风即太阳粒子风暴，当彗星穿过内太阳系时，太阳风使得彗星的一部分蒸发，产生特有的彗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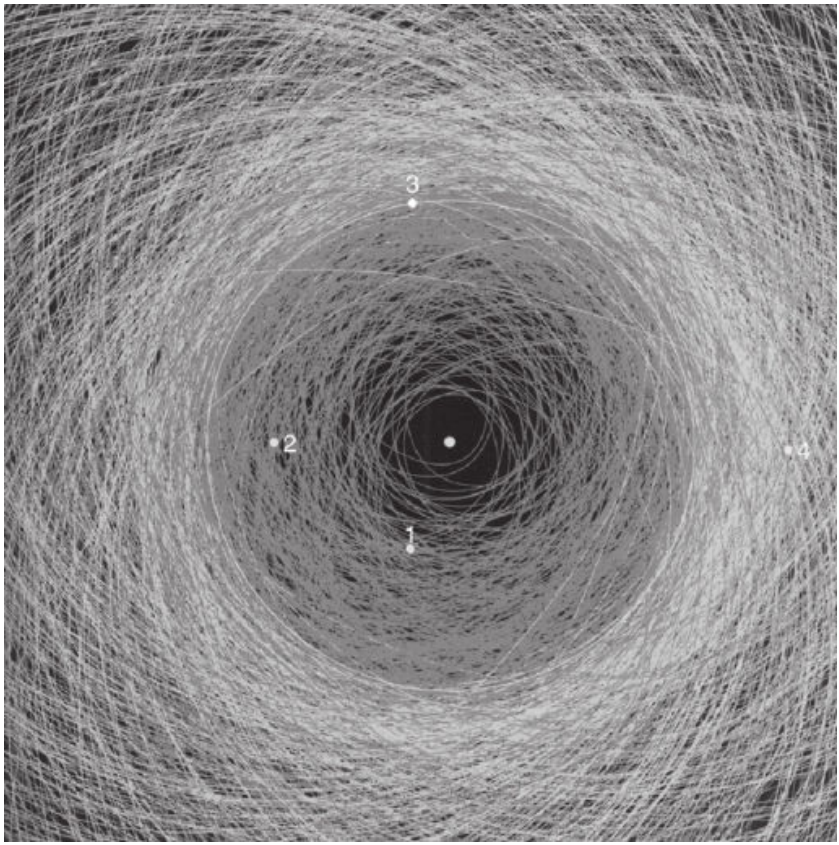

图18　已知的近地小行星轨道让我们看到，地球周围空间实在太拥挤了。图中也给出了下面4个行星的轨道：1．水星　2．金星　3．地球　4．火星

星球何时相撞

月球表面数百万密密麻麻的环形山不是火山爆发的结果，而是太空物体撞击的结果，该理论的倡导者一直在为了说服科学家和大众接受这一观点而不懈努力。早在19世纪早期，德国自然哲学家弗朗茨·冯保拉·格鲁伊图伊森男爵（Baron Franz von Paula Gruithuisen）就断言，月球表面的环形山是“远古时代宇宙撞击”的结果，但该说法遭到了“严肃”科学家的蔑视。（他还进一步声称，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月球

表面存在人类和动物。毫无疑问，这与前面的断言有关。）在19世纪末期，美国地质学家格罗夫·卡尔·吉尔伯特（Grove Karl Gilbert）采用向粉末或软泥投射物体的方法，尝试在实验室模拟月球表面环形山的形成。但是，吉尔伯特对观测到的结果感到困惑：只有垂直投射的物体才能够产生如同月球表面上的圆形环形山。据此，W.M.斯马特（W.M. Smart）于1927年宣称，月球表面的环形山不可能由碰撞引起，因为“陨石不会总是垂直下落”。直到看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数十亿吨炸弹爆炸的效果以后，地质学家才开始明白，如果爆炸足够剧烈，不论弹道的角度如何，都能形成圆形的弹坑。也就是说，物体撞击月球时所产生的剧烈爆炸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形成圆形陨石坑。值得一提的是，“月球表面环形山源于撞击”这一观点又历经了25年才赢得广泛认可，而且即使在今天，面对压倒性的反面证据，仍有个别特立独行的科学家坚持认为月球表面的环形山源于火山爆发。在科学界，要使任何新的理论得到认可无异于一场战争，地质学也不例外。正如板块构造学说的支持者最初不得不同反对力量进行艰苦斗争一样，主张地球和月球曾遭到撞击的科学家也曾同样步履维艰。

早在1905年，本杰明·蒂尔曼（Benjamin Tilghman）提出，亚利桑那州著名的巴林杰坑（Barringer Crater，现在称之为‘陨石坑’）是“前所未有的巨大陨石撞击”的结果。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说服力，因为蒂尔曼与他的同事工程师D.M.巴林杰（D.M. Barringer）经过25年的挖掘，并没有找到撞击物本身。现在大家明白了撞击物会被碰撞产生的巨大热量所蒸发，但当时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人们更相信那些提出其他形成机制的科学家。

直到二战结束，许多地球科学家的各种想法都被否定，月球环形山的撞击起源说才被接受，但是，这些科学家还是极力否定地球表面环形山结构的撞击起源说。由于地球具有更强大的引力场，被撞击的频率可能比月球高30倍，因而这种否定愈加显得离奇。然而，由于地球的动态性质，撞击坑极易被破坏，特别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所以这种否定也在意料之中。由于板块构造，尤其是板块俯冲过程——在此过程中玄武岩海洋板块在地球内部的高温下持续消耗，大约2/3的地

表在几亿年前才形成。最强烈的撞击发生在地球形成初期的几十亿年间，证明这一观点的证据只有在不受俯冲过程影响的古老的花岗岩大陆中心才能找到。因为花岗岩容易被腐蚀和风化，也许经过时间的洗礼，这些撞击坑很难再被发现。一些最古老的岩石上保留下来的撞击坑可能最多，它们分布在很偏远的地区，如西伯利亚、加拿大北部和澳大利亚。有些撞击坑非常大，只有在太空中才能看到它们的真正形状。今天，借助于人造卫星的帮助，全球已有超过172个撞击坑得到确认，而地球容易被太空物体撞击这一观点已经像板块构造学说那样深入人心。

然而，争论还远没有结束，辩论仍然在科学界继续，特别是关于撞击的频率和规律，以及——也许是门外汉最感兴趣的——下一次大撞击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撞击发生的频率还极不明确，不同观点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一方赞成撞击物的流量是常数，另一方则提倡所谓的集束撞击（impact clustering）。尽管地球在早期遭受了非常猛烈的撞击，但撞击匀变说（uniformitarianism）的追随者竭力证明撞击率是均匀的、不变的。相反，他们的对手则倡导另一种相干灾变说（coherent catastrophism）理论，认为由于某种原因，地球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小行星和彗星的周期性撞击。

如果我们要客观地评估未来撞击对人类文明的威胁，很明显，不论撞击次数维持在目前的水平，还是在将来会更严重，我们都应该尽快确定，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前者是正确的，那么一切照常，也就是说，大约几百年发生一次陨石直径为50米、可能摧毁一座城市的撞击，几万年发生一次陨石直径为半公里、可能消灭一个小国家的撞击，而陨石直径为1公里、影响波及全球的撞击事件每60万年发生一次。很幸运的是，巨大的毁灭级事件（Extinction Level Events: ELEs）——如6,500万年前终结了恐龙王国的、由10公里超大陨石引起的撞击——大约0.5至1亿年发生一次，因此，这种陨石在不久的将来撞击地球的可能性很小。基于以上撞击率，行星和彗星威胁论的支持者提出了引人深思的撞击死亡率问题。假如你能够建造一台时间机器，飞驰到1,000万年以后的世界，在那里找到一个“行星记录中

心”并向它咨询，你会得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百万年间，因空难（无疑包括太空空难）而死去的人数可能在10到15亿之间，而如果地球被两块1公里大小的物体撞击一两次，死亡总数可能为5到7.5亿以上，可见空难死亡人数是地球撞击事件中死亡人数的两倍。也就是说，在你有生之年，因行星或彗星撞击而死亡的概率是空难的一半。如果真这样想我们就能安心了。可是换个角度看，因小行星或彗星撞击地球而死亡的概率可能是你赢得英国彩票头奖概率的350多倍，你可能就会吓一跳。实际上，真实情况可能比这更可怕。如果相干灾变说成立，那么在某些时期内，地球乃至整个太阳系都会穿行于某个岩石碎片异常多的宇宙空间，从而使各种程度的撞击事件都显著增加。

一些理论认为，这种威胁地球的太空岩石碎片的周期性增加是由于奥特云（Oort Cloud）周期性干扰。奥特云是一个巨大的球形彗星群，在距离冥王星轨道很远的地方将整个太阳系包围。一般情况下，星云中彗星的运行轨道非常庞大，离最近的恒星也有1/4个轨道周长的距离，因此它们难得光临内太阳系，偶尔只有一两个。但是，如果一些星云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就会使成千上万的星云片的轨道被改变，它们会冲向太阳，从而极大增加了与包括地球在内的太阳系行星撞击的可能。关于奥特云如何受到周期性的干扰，学者提出了很多观点，包括因为**X**星（X planet）穿过星云，或者遥远的太阳暗伴星。人们曾极力寻找这颗虚构的X星，有些科学家认为，它的运行轨道离冰冻的冥王星和新近发现的小行星赛德娜（Sedna）的轨道很远。

另一个颇具吸引力的理论叫做西瓦假设（Shiva hypothesis），这个名字源于印度教的毁灭和重建之神。纽约大学的迈克·兰皮诺及其同事大力倡导该理论，他们认为地质资料中记载的大灭绝是大撞击事件的后果，这种撞击很有规律，每2,600万到3,000万年发生一次。兰皮诺及其同事把撞击与围绕银河系中心的太阳系轨道——包括地球轨道——联系起来。太阳系的轨道会上下波动，大约每3,000万年，这个轨道就会使太阳及其行星穿过光碟一般的银河系，这时，银河系中心质量巨大的恒星的引力就会发挥作用。兰皮诺学派认为，这足以使奥特云彗星群的轨道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并使一系列新彗星进入太

阳系的中心，从而大大增加地球遭受大撞击的频率。太阳系上一次与银河系相交距今只有几百万年，难道此刻正有一群彗星飞向我们吗？等到我们发现时，也许已经太晚了。

由于西瓦假设涉及到地质时间尺度上的周期性，因此，在讨论撞击事件的即时威胁时很少提及它。英国天文学家维克托·克莱贝（Victor Clube）和比尔·内皮尔（Bill Napier）的观点则与我们自己及后代的安全和生存问题有很大关系。他们认为，每隔几千 年，地球就会遭受物体团的撞击，上一次严重撞击发生在4,000年前的青铜器时代，时间之近让我们不得不担忧。为了弄清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次撞击，我们需要再次探索宇宙深处的奥特云。先不说太阳系在银河系中运动时可能产生的星云扰动，正常情况下，大约每两万年就有一个新彗星从奥特云落向内太阳系。这颗新彗星很快被太阳或木星强大的引力场“俘获”并彻底分解，形成一圈沿原彗星轨道散开的碎片，但这些碎片还是集中在原彗星位置的周围。通过这种分解途径，一颗较大的彗星能在内太阳系“播种”大约100万个直径为1公里的岩石块，使威胁地球的物体显著增多，大大提高了地球被撞击的可能性。克莱贝、内皮尔和相干灾变说流派中的其他学者提出，由于来自奥特云的大彗星在大约1万年前的上次冰期末进入了太阳系，彗星散开并形成了被称为金牛座复合体 （Taurid Complex）的大量碎片。每年12月，当地球穿过这一碎片流时，小岩石碎片和沙砾大小的石头就会在大气燃烧，有时就会产生金牛座流星雨的壮观场面。然而，这些无足轻重的小碎片仅仅是金牛座复合体的尾端，在复合体的中心则包含了一个直径5公里的穿过地球轨道的恩克 彗星（comet Encke），以及至少40个相伴随的小行星，一旦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撞击地球，都将带来全球性的大浩劫。

在金牛座复合体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上，碎片沿着轨道的分布情况很像万米赛道上的运动员：大多数人扎成一堆，其余则零散地分布在赛道上。根据相干灾变理论，地球轨道与金牛座复合体的轨道在一个几乎没有碎片的地方相交，出现了圣诞节前常有的壮观景象，但也仅此而已。大约每隔2,500到3,000年，在通过金牛座复合体轨道上类似

于运动员扎堆的地方时，地球就成了一连串直径约200到300米的石块的攻击目标。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本尼·派泽（Benny Peiser）认为，正是大约4,000年前的这次撞击导致了公元前第3个千年内很多早期人类文明的衰落。派泽等人用一系列地球撞击事件解释了同时期的历史资料，由于这些撞击物的体积太小，不会引发全球性的影响，但这些撞击却足以给古代社会带来严重破坏，产生毁灭性的空气冲击波、地震、海啸和大火灾。公元前2350年左右，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中心城市几乎同时倒塌，历史记录中充满了水灾、火灾、地震和大规模的混乱。当然，对这些记述可以另作解释，因为古人对这些事件的记述有时显得很荒诞，而且很难找到地球在这一时期遭到来自太空物体撞击的证据。即便如此，人们依然在澳大利亚、爱沙尼亚和阿根廷发现了7个撞击坑，它们的历史分别有4,000到5,000年，搜寻其它撞击坑的工作也在继续。有人提出，也许正是撞击次数的增多引发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和黑暗时期的出现，因为当时正是地球最近一次穿过金牛座复合体的密集区，时间是公元400到600年期间，但由于缺乏有力证据，这一观点很难得到肯定，而且，大型火山爆发也同样可以解释这一时期的地球气候恶化。近年来，在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历史学者中间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他们试图用某种自然灾害解释每一个历史事件，如小行星撞击、火山喷发或者地震，而这种解释大多都建立在很不充分的证据之上。本书旨在揭示自然灾害对大家的影响，因此我不会愚昧地认为历史文明并未多次遭到自然的破坏，但是，如果将一切历史事件——从英国内战和法国大革命到罗马帝国的衰落以及成吉思汗西进都归因为自然灾害，那就贬低了自然灾害潜在的毁灭性效果，低估了自然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

你愿意怎样死去

目前，金牛座复合体模型在撞击威胁论中尚处于弱势，如果我们

赞同这一模型，也许在大约1,000年以后，一连串刺目的闪电和刺耳的声震[1]就会出现，预示着下一批彗星碎片的到来。也许我们明天就会被毁灭，也许10多万年以后一座城市会被毁灭，也许100万年以后全球都将陷入岩石粉末笼罩下的宇宙冬季。下次大灾难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有赖于三件事情：（i）撞击物的大小，（ii）撞击物的运动速度，（iii）撞入海洋还是撞向陆地。若其他参数相同，撞击物越大，它的影响就越严重、越广泛。需要重申的是：一个50到100米大小的撞击物足以毁灭一个大城市，或者一个欧洲小国家，或者美国的一个州。撞击物体积越大，它的破坏力和破坏范围也将逐渐增加，当撞击物达到直径2公里这一临界尺寸后，除了引起区域或次大陆范围内的巨大破坏，还将造成一段时间内的温度骤降和植物生长减缓，从而影响整个地球。撞击物若大于2公里，地球生态系统就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直至引发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一个10公里大小的物体在墨西哥海岸外撞向地球，不仅导致了恐龙灭绝，而且致使当时所有物种的2/3也同时灭绝。更令人焦虑的是，有证据表明，在大约2.5亿年前二叠纪末期的一次大撞击后，只有不足10％的物种幸存下来。总的来说，地质记载中至少28％的物种灭绝与大撞击有关，正如我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有些学派低估了撞击事件对环境的严重影响，倾向于认为以往物种的大规模灭绝与玄武岩熔岩大喷发有关。

一块飞向地球的岩石的破坏力与它携带的动能直接相关，这不仅反映在物体大小上，也反映在撞击速度上。对所谓的长周期（long-period）彗星，它们的轨道能带它们进入遥远的星际空间，与近地小行星和在太阳系中心运行的彗星相比，这种长周期彗星的运行速度极快，破坏力也更大。破坏性质和破坏范围还取决于物体的撞击点是陆地还是海洋。地球表面的2/3被水体覆盖，从统计学角度来说，小行星和彗星的大部分撞击点是海洋。在这种情况下，与撞击陆地的情形相比，进入大气层的岩石粉末数量就会减少。但是，由于它所引发的大海啸能够严重破坏整个海洋盆地，这一小小的优点也被抹煞了。而且，随着巨量的水分和盐分进入大气层，气候可能受到严重影响，甚

至保护人类的臭氧层也将暂时被毁坏。撞击影响环境的证据主要来自于对一大一小两次撞击事件的研究。

在1908年，一个相对较小、直径约50米的小行星穿过了地球大气层，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卡地区不足10公里的上空爆炸。这次大爆炸释放的能量约等于800个广岛原子弹，其声音可以在相当于4个英国的范围内听到，爆炸击倒了2,000平方公里的茂密森林。数千公里外的地震仪记录了这次爆炸，自动气压记一次又一次地检测到了冲击波的信号，直到它绕地球3周后最终消失。爆炸产生的烟尘使得欧洲夜晚的天空异常明亮，据当时的报告记载，人们能借着光亮在午夜的伦敦玩板球。由于通古斯卡地区难以到达，第一支俄罗斯探险队在25年后才抵达那里，而令俄罗斯科学院矿物学家列昂尼德·古利克（Leonid Kulik）及其团队迷惑不解的是，他们没有找到预想中的大撞击坑。但是，他们发现一片被严重烧焦的树林，它们齐刷刷地倒下，形成了一个直径60公里的圆形区域。当撞击物进入大气层时，巨大的应力引起了岩石爆裂，该区域就是空中爆炸形成的。由于该区域人口稀少，撞击造成的伤亡很少，大约有数人死亡，20人受伤。如果晚4个小时，地球自转把圣彼得堡这个大城市带入小行星的降落范围，那将会带来一场大浩劫。

与6,500万年前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外海发生的大撞击相比，通古斯卡撞击事件就相形见绌了。一个10公里大小的小行星或彗星——不能准确判定其性质——撞进了尤卡坦半岛外海，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几毫秒内，一场超乎想象的大爆炸释放了几十亿个广岛原子弹同时爆炸的能量，同时形成温度高于太阳的巨大火球。火球使海洋蒸发，并在海底形成一个直径为180公里的撞击坑。直冲云霄的冲击波将空气撕裂，向空中喷出了超过100万亿吨的熔岩浆，随后散落到全球。爆炸引发的地震把比欧洲还大的一片区域瞬间夷为平地，所有的生命几乎消失殆尽。力量比最强飓风还要高5倍的超级飓风 咆哮着（hypercanes）撕开了大地，会同巨大的海啸不断击打着几千公里外的海岸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糟糕。被炸到空中的岩石像雨点般在全球各

地纷纷落下，重新进入大气层时产生的热量向地面辐射，如大烤箱一般将动物活活烤死，引发的大火使地球上的森林和草原成为荒地，将地球上1/4的生命化为灰烬。即使空气和海水平静下来，地壳停止震颤，从天而降的碎石块停止轰炸，灾难还远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空气中的烟尘遮蔽了阳光，使温度下降高达15℃。四周越来越暗淡，越来越寒冷，幸存的植物渐渐枯死，那些残存的食草恐龙也慢慢被饿死。海洋生物的命运也很悲惨，全球大火产生的有毒物质，以及撞击产生的大量硫磺进入大气后形成的酸雨注入了大海，毁灭了3/4的海洋生物。多年的严寒以后，希克苏鲁伯撞击（Chicxulub impact）带来的黑暗终于消散了，但此后火球撞击产生的氮氧化物发生了化学反应，将臭氧层撕成了碎片，毒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形成了强紫外线辐射的春季——紧随宇宙冬季，许多幸存下来的物种饱受煎熬，它们无望地挣扎着，艰难求活。地球的自然平衡遭到了巨大破坏，有人估计，地球大约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时间才从希克苏鲁伯撞击带来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当地球重归平静时，巨大的爬行动物的时代已经终结——只剩下早期哺乳动物，即人类的远祖——同时启动了一场进化试验，并最终随着人类的直立行走而宣告成功。但是，人类会有同样的经历吗？为了评估其可能性，让我们仔细看一下撞击事件的破坏力。

图19　1908年一颗小行星在通古斯卡（西伯利亚）上空爆炸，森林被夷为平地。

在通古斯卡撞击事件中，森林被破坏的部分原因是爆炸所产生的巨大热量，但主要原因还是爆炸所引起的冲击波。强大的冲击波生生地把树击倒，将森林夷为平地。冲击波的强度取决于峰值过压（peak overpressure），即冲击波的压强与环境压强之差。当峰值过压超过4磅/平方英寸 [2] 时，产生的风比常见飓风风力高两倍，此时才能造成严重破坏。虽然一个直径50米的物体在低空爆炸时的破坏范围远远小于伦敦陆地面积，但它产生的巨大过压的破坏力相当于一个大型核装置，足以摧毁伦敦外环路以内的一切事物，如果撞击物的体积增加，情况就会更严重。一个直径250米的小行星足以穿透大气层，形成直径为5公里的撞击坑，破坏范围可达1万平方公里左右——约等于英格兰肯特郡的面积。如果小行星的直径达到650米，破坏范围将增至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面积。

虽然听起来很吓人，但这种撞击并不足以造成全球性的破坏。要产生全球性影响，撞击物必须是一个直径不少于1.5公里且速度较快的彗星，或是速度较慢而直径达到2公里的小行星。二者中的任何一个撞击地球都将产生100亿吨TNT当量的爆炸，毁灭一个直径为500公

里的区域——相当于英格兰的面积，瞬间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当然这还取决于撞击点的位置。

等到爆炸产生的尘土开始遮蔽天空，阻挡到达地面的阳光时，世界其他地方面临的问题才开始真正显现。与巨大的希克苏鲁伯撞击相比，这一过程无疑会导致全球温度骤降，但至于后果有多严重，人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然而，这种规模的撞击可能导致极恶劣的气候和庄稼绝收，其严重性不亚于1815年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爆发后出现的“无夏之年”。正如上一章所提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充足粮食储备的发达国家尚且只能支撑一个月左右，全球范围内的粮食绝收无疑会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随着发达国家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全面崩溃，粮食定量供给有可能成为现实。在发展中国家，粮食收成往往只够人们自己糊口，这时大范围的歉收有可能迅速演变成《圣经》中描述的大饥荒。有些学者预言，两公里的物体撞击地球后，多达1/4的人口将死于恶劣的气候条件。更大的物体撞击地球后，植物的光合作用就会彻底停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是多少人会死亡的问题，而是人类是否能存在的问题了。有估计认为，一个直径4公里的物体撞击地球后会向空气中排入大量的灰尘和碎片，使光照水平无法满足光合作用的需要。

由于不知道远处有多少有威胁的物体，也不知道它们是否会突然撞向地球，我们几乎无从了解小行星或彗星何时会撞击地球，从而将我们带入世界末日。类似导致恐龙灭绝的希克苏鲁伯撞击事件几千万年才发生一次，因此，这种撞击在任何一年发生的可能性都很小。然而，看到下面的事实我们就乐观不起来了——如果西瓦假设成立，也就意味着下一批奥特云彗星可能正在奔向内太阳系。如果不成立，那么在金牛座复合体的密集部分回归，以及另一个小行星袭击地球以前，人类也就只有1,000年的时间了。即使撞击事件发生的时间没有内在联系，我们也无法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地球不会在明年遭到未发现的近地小行星或从未光临过内太阳系的长周期彗星的撞击。与通古斯卡规模类似的撞击带来的威胁很小，因为与地球表面相比，撞击物的破坏范围很小。如果其中一块撞击物撞向了城市，其他

大部分落到海里，那就很糟糕了。大块物体撞向了海洋，这听起来似乎是好事，但实际上是个恶耗。例如，一块500米的岩石落入太平洋底部将引发巨大的海啸，导致半个地球上的所有沿海城市在约20个小时内被大规模地毁坏。实际上这一情况发生的概率相当高——在接下来的100年中大约有1%的可能——而且死亡人口至少将会有几千万。

根据最新估计，直径为1公里的物体撞击地球的频率是60万年一次，但是，这一规模的物体所产生的撞击坑至少也有约100万年的历史。当然，自那以后可能还有几次大撞击，它们或是撞进大海，或是撞在了陆地上而尚未被发现。你也许会说，威胁肯定是有的，但真的迫在眉睫吗？答案是肯定的。大约有12个小行星（大部分都很小）可能在2100年之前与地球相撞。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撞击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一多一点，但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概率已经不小了，如果这是彩票中头奖的概率，我的彩票代理商会从我这里得到不少生意。最令人担心的是2004年末发现的直径为320米的近地小行星MN4，最近被命名为毁灭者（*Apophis*）——古埃及神阿佩普（*Apep*）的希腊名字。人们一度认为毁灭者于2029年4月13日撞击地球的概率高达1/37，让人欣慰的是，这一概率现在降低为1/8000。听起来很高，但和2001年夏季英格兰足球队以5:1击败德国队的概率相比，这些概率也只是它的80倍。几年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名为“都灵等级”[3]（Torino Scale）的指标，以便衡量撞击产生的威胁，而毁灭者是迄今为止第一个都灵等级持续大于零的物体。目前它的等级为1——被定义为“需要小心监测的事件”。随着我们对其轨道的进一步约束，这颗近地小行星成为了许多人关注的焦点，而且我们了解得越多，就会发现它的都灵等级完全有可能超过1，成为“值得关注的事件”。然而，这一等级再次升高的可能性很小，我们也期望很多年以后才会首次出现等级为10的撞击事件——定义为“确定的、具有全球影响的撞击”。如果预警充分，我们或许能够使小行星不挡道，保证地球正常运行，但如果一颗新的彗星向我们飞来，由于它体积大、速度快、来势迅猛，我们几乎无法招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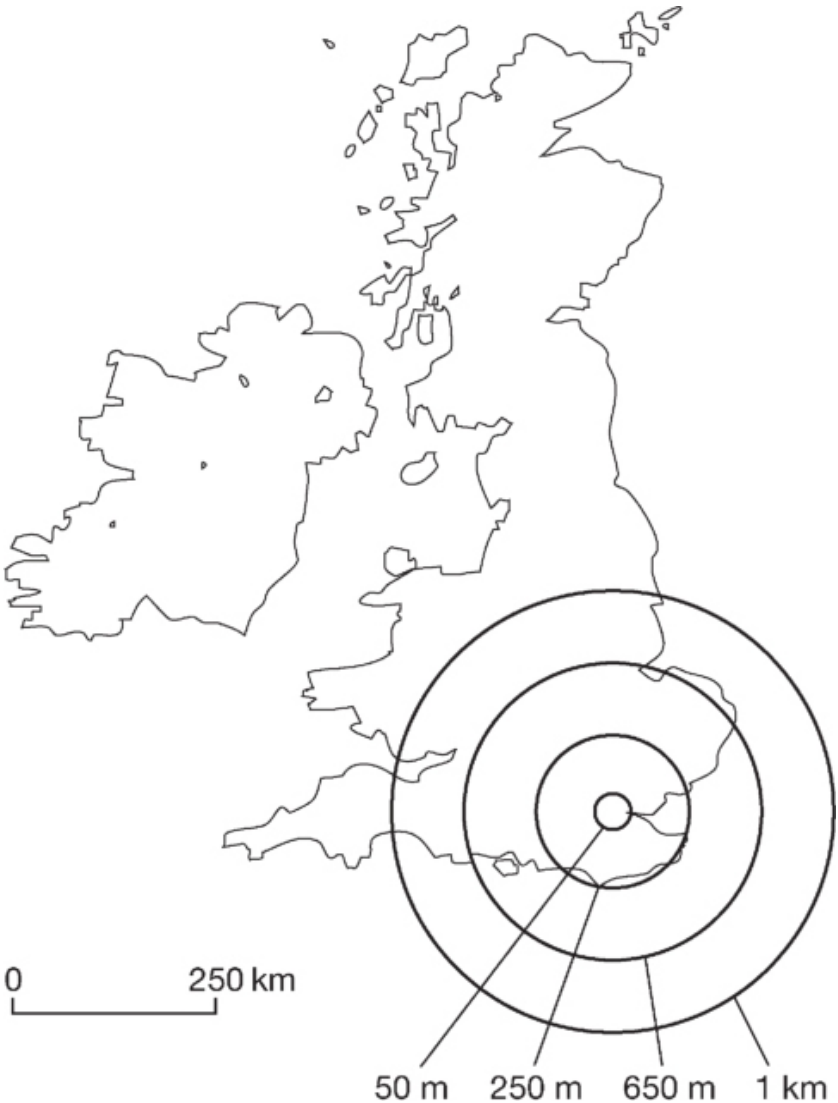

图20　不同小行星撞击伦敦可能形成的破坏带

令人不安的事实

·大约1,000多个颗直径不小于1公里的小行星经常接近或穿越地球轨道，其中约1/3将撞向地球从而结束其生命。

·直径2公里的物体撞击地球将导致全球1/4人口的死亡。

·在未来彗星撞击地球之前，我们只有6个月的预警期。

·每几百年就会发生一次足以毁灭伦敦、纽约或巴黎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

·古代撞击事件可能使地球上多达90%的生物灭绝。

·在未来100年内，一个直径500米的物体撞入太平洋的概率为1%。

·有人认为，也许再过1,000年左右，地球就会再次遭受太空物体撞击。

注释

〔1〕 声震：以超音速飞行的物体在到达地面时因为前部冲击波受阻而发出的爆裂音

〔2〕 约等于28,148帕

〔3〕 都灵等级，衡量小行星撞击地球所造成的灾难等级，由小到大可分为0–10，共11级

后记

哭泣一万年
流尽十亿泪
只缘当年未曾料
人类家国　锦绣河山
而今都已碎

——札格&埃文斯《在2525年》

单独考虑全球变暖、下次冰期临近、超级火山爆发、小行星撞击等事件的影响，我们可能只会感到一时的忧虑，但整体 考虑这些事件对地球和人类未来的威胁则足以使我们倍感沮丧。我们来总结一下人类目前的处境。我们正处于气候变暖的时代，这无疑将导致下个世纪地球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剧烈变化，给每个人带来不利的影响。与此同时，地球正面临着下次冰期的到来。也许因为全球变暖，下次冰期可能会提前出现，但即使没有人类的帮助，它也可能在未来1万年内降临。那些足以使1/4人口灭亡的小行星们继续穿过地球轨道而未被察觉，大型彗星何时向地球迎面飞来也无人知晓。印度洋大海啸使我们见识了大自然能够对这个日益拥挤的世界造成多么可怕的冲击，而且，由于目前地球上的人口数量非常庞大，下一次大海啸或超级火山爆发必定会导致数百万人的死亡，我们所谓的“进步的全球化社会”也将分崩离析。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紧密相连，甚至日本发生一次地震都可能引发全球经济灾难。在本世纪内，其他一些趋势也可能会催生我们所说的世界末日。虽然地球人口仍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在1968年就开始减慢，在2070年将达到90亿左右这一顶峰，比今天多一半，随即人口又开始回落，30年后达到84亿。这一趋势虽然可喜，但它会遗留下人口老龄化和所谓的“灰色”未来等问题。到本世纪末，日本和西欧1/2左右的人口将达到60岁以上，地球上1/3的人口将

超过这一年龄。有人认为，在一个老年人逐渐支配年轻人的世界里，代际冲突可能会成为最主要的政治问题。

我们后代的未来不仅更加灰暗，而且变得沉闷和贫乏。在有史以来最大的物种灭绝中，人类活动每年要消灭3,000至3万个物种，而总物种数量据估计也只有1,000万个。在祥和的新世纪钟声响起之前，大约有1/3的开花植物将成为濒危物种，整个动物物种的1/4到1/2将可能灭绝。由于越来越多的物种消失，它们的栖息地迅速被害虫、野草以及与人类形影不离的病菌所占据。我们的后代将不再与猩猩、熊猫、极乐鸟和珊瑚为伴，而是不得不与老鼠、螳螂、蓟属植物和荨麻打交道。此外，脆弱的生物多样性——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一旦遭到破坏，可能需要500万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与此同时，大约500万亿的人类后代还要生活在这个沉闷且——从物种的角度上讲——毫无生机的星球上。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实际上正在扮演着造物主的角色，决定着地球生物的进化及未来。人类毁灭了大量现存的物种，从而破坏了自然进化的来源，并严重限制了未来地球产生新物种的能力。对于整个地质年代中的数百万物种而言，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并且人类的活动正在使地球上的许多其他生命形式不久面临同样的命运。

未来在我的笔下似乎变得越来越糟。日益老化的人口失去了昔日的活力与创造力，却不得不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作斗争，努力摆脱随之而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剧烈动荡，千方百计地拯救——也许为时已晚——被他们的祖先（也就是我们）破坏了的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布兰登·卡特的“末日论”在一定程度上并非不着边际。其他人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形势将会非常严峻。例如，加州大学的安德斯·约翰森（Anders Johansen）和戴德尔·索奈特（Didier Sornette）近来根据人口、经济和财政指标的趋势预测，在大约50年内，未来会突然转变为某种新“情况”，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种新“情况”的性质，但它不可能是令人愉快的。

之前我们对世界末日作了简要介绍，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尽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但相信人类还将继续存在，至少是现在。先不说

是否有可能出现6,500万年前使恐龙灭绝的大彗星或小行星撞击地球的事件（这种撞击事件大约每1亿年发生一次），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大可能发生任何能够彻底毁灭全球65亿人的事件。即使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变成了火坑或冰窟，对于可能面对这些情况的子孙后代来说也没有多可怕。毕竟，人类有着超凡的适应能力，能够不慌不忙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以前确实终结过许多次，生长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英国时代和目睹过人类登月的百岁老人就能证明这一点。对我们的孩子及其后人来说，世界将充满了斗争和冲突，看不到进步的希望，也失去了前进的热情——与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对未来的看法一样，这样就危险了。设想在未来某一刻，当沿海大城市被海浪或冰层所湮没时，大众并不会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进步——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

在本书中，我根据目前的一些趋势和观点进行了推断，总结了地球和人类面临的几种不太乐观的前景，并逐一进行考查。但是，如果你指责我缺乏想象力，我想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毕竟，我无法目睹几万年以后的事情，而太阳在未来的50多亿年内仍将普照大地，滋养万物。在这段未知的时间内，现代人和由人类进化而成的新物种会做些什么呢？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没有人知道。人类及其后代也许会在短期内一次又一次地被迫倒退，但是，如果我们学会可持续发展而不是过度开发利用，那么，不论是在终将被太阳吞没的地球上，还是以后在太阳系、银河系甚至更遥远的地方，我们也许会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任何事、去进化成任何新的物种。或许我们现在该行动起来了。

附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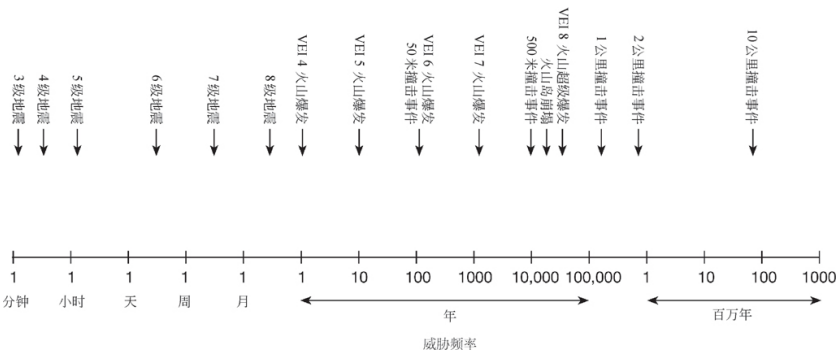

灾害时标：表示各种灾害现象的发生频率

附录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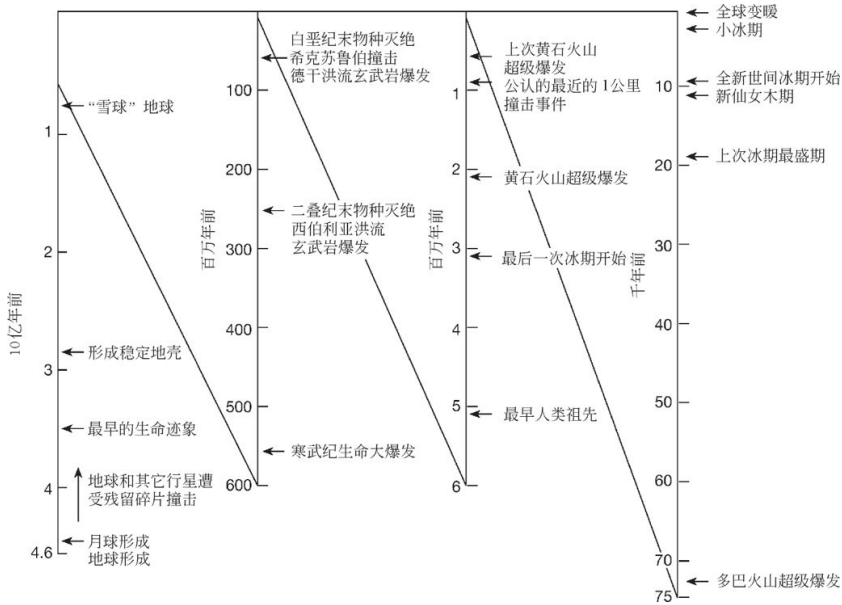

地球的地质时标：强调书中提到的重要事件

地球上的生命终将结束，这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我们不断面临各种各样的威胁，从全球变暖、大海啸到小行星撞击地球、超级火山爆发和下次冰期的到来……哪些迫在眉睫？哪些属于遥远的未来？人类能够幸免于难吗？本书为你揭示灾变背后的种种原因。

百科通识文库

49

释迦牟尼：从王子到佛陀

迈克尔·卡里瑟斯 著

高山杉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释迦牟尼：从王子到佛陀

迈克尔·卡里瑟斯 著

高山杉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69**

Buddh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1.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1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Michael Carrithers 20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释迦牟尼：从王子到佛陀／（英）卡里瑟斯（Carrithers, M.）著；高山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626-1

Ⅰ．①释… Ⅱ．①卡… ②高… Ⅲ．①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5）－传记 Ⅳ．①B949.9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8266号

地图审图号：GS（2007）第441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626-1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作者简介

迈克尔·卡里瑟斯，英国达勒姆大学人类学教授，曾在斯里兰卡研究南传佛教多年，著有《吉祥楞伽岛的阿兰若僧》（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我们为什么有文化——阐释人类学和社会多样性》（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等专著。

译者简介

高山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毕业，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和佛学史的研究。

目　录

插图目录
地图目录
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早年生活和厌俗出家
第三章　访道
第四章　开悟
第五章　弘法和圆寂
关于引文的注释
推荐书目
返回总目录

插图目录

图1　曼谷禅僧（亨利·威尔逊摄影）
图2　佛陀苦行像，犍陀罗雕塑，公元2世纪（拉合尔博物院藏品）
图3　佛陀涅槃像，阿旃陀石窟石雕，第26窟，约公元6世纪（汉斯·欣茨摄影）
图4　阿兰若僧戏大松鼠（本书作者摄影）
图5　斯里兰卡阿兰若僧对俗家众说法（本书作者摄影）
图6　比丘说法后接受俗家众供养（本书作者摄影）

地图目录

地图1　北印度和尼泊尔

译者序

《佛陀小传》是一位颇有哲学素养的西方学者撰写的关于释迦牟尼佛的学术传记。我国佛学家吕澂说过："释迦之传记不仅南北所传有异，同一所传之中或则为单纯素朴之记事，或则为绚烂庄丽之美文，又或广或略，而实录与譬说相杂则诸说无别；欲取捨所有材料以得的确史实，实非今日所能也。"[1] 由此可见，撰写一本佛陀传是如何之难。本书的撰写，依据的是南传巴利文三藏，择取了其中"单纯素朴之记事"，略述了佛陀一生的思想和行迹。作者在撰写中尤重于佛家哲学的疏通和整理，并阐明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思想诸因素与佛陀之间的互相影响。本书是否达到吕澂所说"取捨所有材料以得的确史实"的目标，实在难以评说，但是，至少就一个西方学人以哲学眼光审视佛陀来说，我认为还是值得一读的。

作者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是英国人，达勒姆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人类学教授，曾在斯里兰卡研究南传上座部佛教多年，著有《吉祥楞迦岛的阿兰若僧》（*The Forest Monks of Sri Lanka: An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tud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我们为什么有文化——阐释人类学和社会多样性》（*Why Humans Have Cultures: Explaining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Divers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2] 等专著。《佛陀小传》最早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作为"已逝大师丛书"（Past Masters）的一种出版（*The Buddh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此后又只字未动，与同一丛书里的另外三本（分别讲述耶稣、穆罕默德和孔子的生平事迹）合订出版（*Founders of Faith*.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再后来，《佛陀小传》被收进"学术小引丛书"（Very Short Introductions），除增加六张图片外，文字几乎没有变动。

本书是根据"学术小引丛书"版的《佛陀小传》翻译的。此前，已经有过两种汉译本：一是麦克尔·凯里泽：《佛陀——至善的觉悟者》，孟祥森译，"文化丛书"第76种，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8年4月1日第1版；二是迈克尔·卡瑞提斯：《佛陀》，孙

晶译，“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第1函第3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台湾版本只印了1500册，流通有限。也许正因为如此，大陆本翻译出版时，好像完全不知道台湾已有汉译，也就未能取来参考。原书学术性很强，文字简奥，翻译起来不是很容易。我在翻译时参考了上述两个译本，受到一定的启发。同时，我发现这两个译本在原文理解上有不少问题，而且大多是按照原文直译，没有还原到传统汉译佛典和新译南传佛典的用语上来。因此，我在翻译时尽自己所能做了一些改进，尽量使用传统汉译佛典和新译南传佛典的术语和译文。但因学术水平、文字功力和翻译经验有限，译文中错误和不完善的地方恐怕还有不少。另外，原著没有任何注释，译文中的脚注都是我在翻译过程中添加的。做这些注释时引用了一些权威学者的著作，以及近年台湾出版的一批关于南传佛教的著作和译作，并参阅了一些大陆上常见的佛教和宗教辞书，诸如丁福保编译《佛学大辞典》、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等等。希望这些注释能对读者阅读本书和了解佛陀有所帮助。

关于书名和书中所引佛典也需要解释一下。我之所以在书名和译文中使用“佛陀”，而没有使用大家都很熟悉的“释迦牟尼”，是因为“释迦牟尼”是北传佛教常用的对佛陀的称谓，而南传佛教中使用最多的称谓则是“佛陀”。本书完全按照南传佛教的资料撰写，甚至一次都没有提到“释迦牟尼”这个名字。本书所引佛典，主要是巴利文的《长部经典》、《中部经典》、《增支部经典》和《相应部经典》。它们略等于汉译佛典里的“四《阿含》”，也就是《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和《杂阿含经》。民国时期出版《普慧大藏经》时，曾经从日本刊行的《南传大藏经》（巴利文三藏的日文译本）中重译出一部分《长部经典》、《中部经典》、《增支部经典》和《相应部经典》，台湾后来还有重印本。我在翻译本书时，有选择地使用了这些译文。但由于这些译文使用的是文言，我按照编辑的要求对有些不好理解的文句作了白话翻译。

大约八年前，我曾撺掇老友李鹏从北京国家图书馆借出并复印了帝俄科学院院士、汉学名家王西礼的《佛教论》，帝俄科学院院士、

印度学家鄂登堡的《释尊小传》和《西域考古记》，还有莫斯科科学出版社的《鄂登堡纪念文集》。我们当时商定，他先把《释尊小传》从俄文翻译成中文，再由我做文字整理。这些年过去了，译事未能完成，部分译稿也不知所之。现在，译完《佛陀小传》，附记此事，以纪念我们的友谊，并感谢老友付出的辛劳。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责任编辑高耿松先生付出很多心血。他认真校阅，为译稿纠正不少文字和内容上的错误。在此，我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想申明，这个译本肯定还会有很多错误和不足，而责任均在译者。我真诚欢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进一步加工修改。

译者谨识

2008年5月18日

注释

〔1〕 吕澂（编译）《印度佛教史略》，台北市：广文书局有限公司，1971年9月重印本，第14页。

〔2〕 《我们为什么有文化——阐释人类学和社会多样性》，陈丰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

前言

直到上个世纪为止，佛陀也许算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整个印度次大陆，佛法盛行了1,500多年。在此期间，其变化流衍之广大，丝毫不逊于基督教在欧洲传布1,500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到公元13世纪时，佛教在印度本土虽然已经失其势力，但却早已远播东亚、中亚和斯里兰卡，并正在向东南亚传布。这几国的佛教史，其复杂程度也不亚于在印度本土的情况。

在这本小书里，我不打算阐释这样庞大的问题。我只略叙了佛陀生平，描述了佛法的起源和意义。可是，我尝试着通过自己的讲述，希望可以使读者诸君明白，为什么佛教可以如此容易地在诸大陆上传布，并且历经数世纪风雨，还能如此兴盛地延续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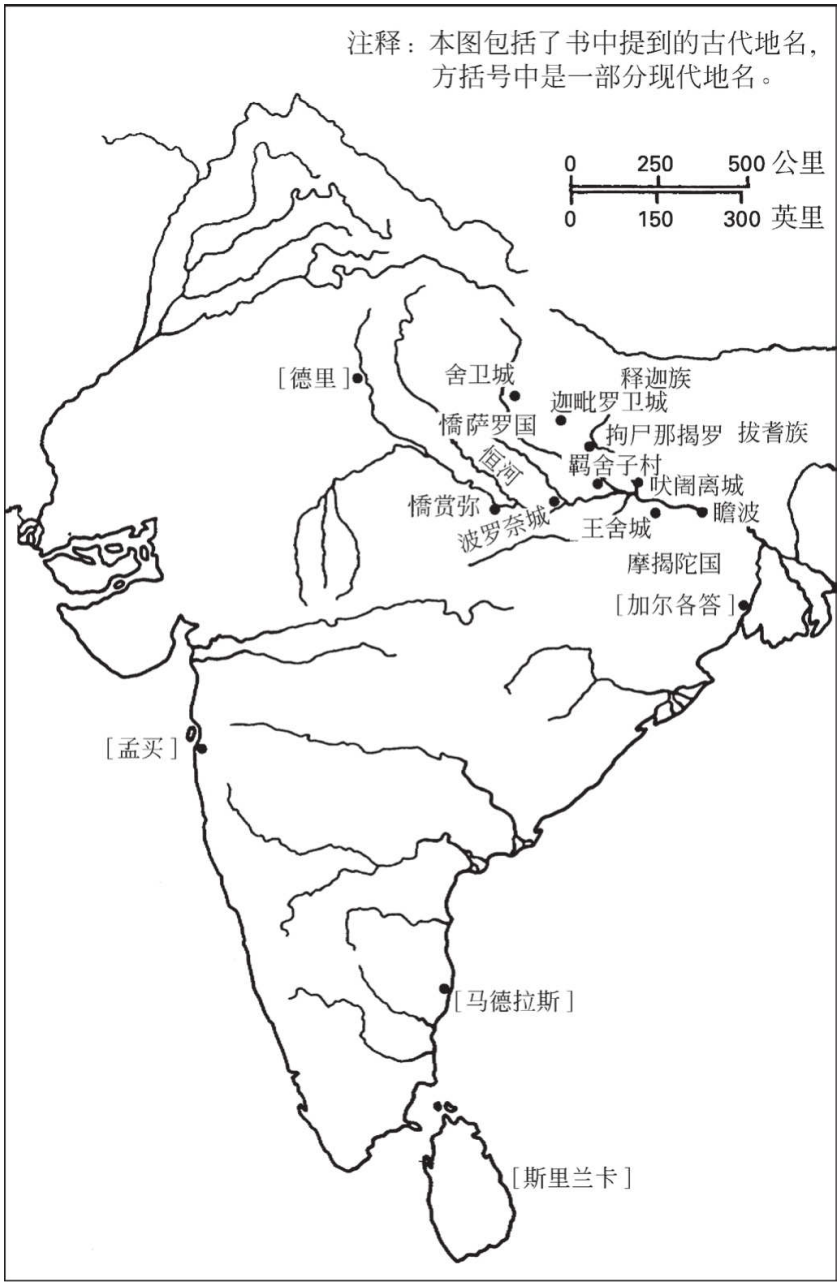
注释：本图包括了书中提到的古代地名，
方括号中是一部分现代地名。
0 250 500 公里
0 150 300 英里
[德里]
舍卫城
释迦族
迦毗罗卫城
憍萨罗国
拘尸那揭罗
拔耆族
恒河
羁舍子村
吠阇离城
憍赏弥
波罗奈城
王舍城
瞻波
摩揭陀国
[加尔各答]
[孟买]
[马德拉斯]
[斯里兰卡]

地图1　北印度和尼泊尔

第一章

绪论

在斯里兰卡古都阿耨逻陀补逻（Anuradhapura）[1] 的故址上，废弃着一尊石佛的坐像。这尊坐像比人身略显长大，孤零零地呆在荒草中冒出的一块残基上面。这尊佛像在这里坐了大约上千年了，它的造型是佛化亚洲（Buddhist Asia）各处所习见的那种样式。像中的佛陀双腿结跏趺坐 [2] ，双掌互叠置于膝上，入甚深禅定之中。佛教徒自古相传，2,500多年前，佛陀就是以这样一种姿势，在一棵树下获得开悟的。他对人间的实相，获得了决定见（decisive knowledge），对自己已得解脱，获得了不动信（the unshakeable certainty）。

阿耨逻陀补逻的这尊坐佛像，在其宝相庄严的刻画上，不落窠臼，与传统样式大异其趣。他的头背挺直，但双臂松弛，面部显出沉浸在寂灭当中的喜悦之情。佛像看上去睿智而安详，和坚硬无比的花岗岩结合得完美无缺。有一次站在佛像前，一位上了年纪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告诉我，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至少这尊佛像和它背后所代表的那种东西，是值得我们为之感到骄傲的。他还说，宗教这东西对他来说早就没有意义了，可是他冥冥之中总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自己一路走来，始终都是佛陀的弟子。

也许正是由这尊佛像启沃了如此强烈的个人沉思。可是，还有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就是这种想法是很多人心中都有的。就拿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 [3] 来说吧，他不是佛教徒，可是他说过这样的话：

> “我听过很多大师的教诲，读过很多哲学家的书，调查过很多种社会，可是我究竟从这里面学到了什么呢？西方人引以为豪的那种科学，到底教会了我什么呢？只给了我一两条残缺不全的教训，如果放在一起，连为一体，大体上也许可以等同于菩提树下圣者的沉思了。”[4]

这足以证明佛陀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有他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有没有充分的根据呢？身为一个东方的预言家，佛陀生于耶稣纪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和我们完全不同，他究

竟可以给这些想法如此现代的思想家提供些什么东西呢？这是我要尝试回答的首要问题。

我想通过写一册佛传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此乃明智之举，但绝非显而易见。（这是因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人物，他们的意义很少体现在个人生活中，只有在思想学说里，才能见出他们的真正意义。可是，在这一点上，佛陀是很特殊的，因为他的学说和生活紧密相连，根本无法分开。

传略

传统的佛传对佛教徒影响深远，而且早就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就让我来根据传统佛传的讲法来描述一下佛陀的生平。佛陀生为王子，在富贵安乐中长大，有朝一日还能继承王位，大权在握，这些福德都为世人所歆羡。可是等他长大成人后，却先后遇到了病人、老人和死人。以前他长在深宫之内，哪里见过这些，遂深受震动：原来，不管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权势，他也难逃生老病死之苦。与此同时，他也见到了一个游方的沙门（a wandering ascetic），这个沙门一心想做的事，就是从苦中获得解脱。佛陀细审所见，发现苦终不可免，就不顾家人之劝，抛妻弃子，舍弃尊位，也出家做了沙门，一心寻求解脱。在他的一生中，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出家后若干年间，佛陀先习禅定，后修苦行，发现都不能证得[5]解脱。于是，他不再自苦身心，反而坐下来静观人间，在静观中终获开悟，证得解脱。这是他一生中第二个重要的变化。他“所作已办”（had done what was to be done），参破了痛苦的谜题。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他得出一种哲学。此后45年间，他就传授这种哲学。人生在世的大多数问题，没有他的学说谈不到的。他建立了僧团，僧徒们仿效他的样子寻求解脱，还把他的法门传播到世界各地。他最后也是死于一般人的病痛，和其他人没有两样。但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的死是“大般涅槃”（utterly extinguished，巴利语*parinibbuto*

），死后不再投生转世，再受痛苦的煎熬。

上述所言是经过高度概括的，就算是这样，要想提出确实的理由来怀疑它，也并非不可能。不过，至少这些总是真的吧：出生、成人、出家、访道、开悟和解脱、弘法、涅槃。这部传记，还有两个关键的转变，即出家和开悟，为佛陀和他的弟子们提供了戏剧化的情节，可以借此来宣讲教法，也提供了心理学和哲学的型范，可以以此为根据来创立他们的思想。在戏剧性方面，情节集中在英雄般的个人奋斗所取得的精神转变上，而在哲学方面，则集中于佛陀身心内部所获得的发现。

因此，佛陀说："我今但以一寻之身，说于世界，世界集，世界灭，世界灭道迹。"（《相应部经典》，第1卷第62页）[6] 在此范围内，佛陀所遭受的，和一切凡夫没有什么不同。对一切凡夫来说，用佛陀的话讲就是，"生苦，老苦，病苦"。在他看来，这些无法避免的紧迫的事实，是任何人都能发现的，只要他们肯内省一下自己的经验。同样地，解脱的方法也是向每个人敞开的。比如说，佛陀所发展的禅定方法，也是根据简单而现成的现象，如每个人的出入息（breathing，即呼吸）。佛陀所拥护的道德规范，是建立在清晰而实际的原则上面，而这些原则都得自他自己的生活。佛陀拿自己当实验室[7]，概括出自己的发现，并推己及人，用之于施惠众生。

第二个问题是，佛陀是如何获得转变和发展的？因为从方方面面来说，这种发展正是他的哲学所要说明的主题。对佛教徒来说，这个问题最为紧要。佛陀自己也经常回答这个问题。有时候，他通过直接讲述自己的生平事迹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其他的场合，他会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比如他会说如果甲某做了某事，那么紧随其后的有害果报就会发生，如果甲某做了另一件事，那么他获得的果报就会是好的，而且有助于他的解脱。在这后面暗伏着一个假设，就是佛陀知道这些事，全是因为他自己亲眼见证过这些不同的选择。他要求他自己，就像要求他的僧徒一样，坚守一条有关证据的法则："汝等是言，依汝等所自知所自觉。"（《中部经典》，第1卷第265页）[8]

佛陀哲学的这种自传性格，并不意味着单单讲一讲他个人的生

平，就足以解释他哲学的起源。虽说佛陀喜欢独处，但毕竟是他所属的社会和这个社会所经历的历史的一部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在社会和知识方面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他有所继承，而对这些变化的进一步推进，他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思想是革命性的，只是这场革命早已酝酿了很长的时间。在我的心目中，这场革命是这样一种形象：一股变动的暗流，经过数世纪的汇集，越发强劲，浸润到古印度人生活的所有方面。佛陀被推到这个洪波的浪峰，对人间万象获得了深微而广博的识见。所以，根本的问题是如何估定佛陀的所见有多少来自他达到的这种高度，来自他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以及他的前辈和同代人的工作，又有多少是来自他本人敏锐的洞见。

资料来源

对于生活在2,500年前的一个人，要追述他的生平和环境，我们手里有什么资料可以依凭呢？关于佛陀的生平，我们几乎全得依据佛教的圣典。这些典籍有多种东方语言的版本传世，其中年代最久远，而且与佛陀关系最密切的部分，是《经藏》（*Suttapiṭaka*）和《律藏》（*Vinayapiṭaka*）。它们的各种版本，足足可以占满图书馆的好几个书架。而且，它们大多数被视为佛陀金口亲说，每一部都有自己特别的说法时处和说法因缘。佛陀弟子们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尽量要在历史背景下保存大师确实说过的每一句话。

他们的这种意图完成得究竟如何呢？让我们先看看佛典的构成。经律（canonical discourses）的构成，取多种样式：有时是佛陀与外道弟子的对谈；有时是佛陀对僧徒个别疑难的回答；有时则是佛陀面对僧众的无问自说法要；个别情况下还有对在家众（自己不行出家事，仅做出家者的外护）的说法。

佛法的对象主要是出家的僧众，所以住持大法的任务，主要也落在他们身上。一年大半时间，佛陀和僧众都要四处云游说法，仅在北

印度季风起时，才聚在各个僧舍中，度四个月的雨安居[9]。佛陀和僧众一边云游，一边弘扬教法，可是在雨安居中，他们只在僧团内部研讨和覆诵法义。当然，还有一小部分经律的内容，属于僧徒间的问答论议。在全部藏经之中，某些法义以略不相同的面目出现，这多半缘于佛陀在世时或入灭后僧徒所作的加工。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佛陀有时也会改变或修正他自己的教法，而僧徒后来散处各地，也使得同一种法义早期和晚期的不同版本，都随他们所在的不同地方，保存在他们的团体当中。

只是在佛陀入灭之后，圣典结集才真正开始。可能佛灭不久，僧团就举行了圣典结集的大会，佛灭百余年后，肯定还举行过一次。在这些会议上，僧团力图保存佛说，确立其真实性和权威性。他们还注意到应该系统地建立起若干规条，据此可以判定何者可以接受为佛说，何者为非佛所说，应该摈弃。而且，关于对佛法的住持，僧团还想出了很多办法。他们借鉴身边流行的文化，或者依靠自己的智慧，发展出一套记诵圣典的方法。他们使多数的经文保持一种叮咛反复、高度简括的形式，以便于记忆。他们还采用了诗偈，这类诗偈当时恐怕是可以唱诵的。佛陀在世之时可能就已经采用了诗偈。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将教典分门别类，化为内容重叠的若干部，而每人则负责记诵一部，代代相传下去。佛典是在佛灭后三四百年时才写成文字的。这些口传和会诵法确保了他们对佛说的保存要比我们这些习于印刷的人所认识到的要好得多。

这绝不是说，佛典里保存的材料都是信实可靠的。有些佛语早已失传，其他的则被曲解。有些变成了套语，在不相干的场合中反复出现。而且，僧众后来还自作主张加进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佛陀的形象越来越被夸大。不管佛陀本人说什么语言，现在用来记录佛典的语言，没有一种是佛陀自己使用过的语言。虽然这些语言中的巴利语可能非常接近佛陀使用的语言。有内部证据似乎可以证明，这些最古老的巴利语圣典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时间是在第二次圣典结集之时或者在那以后不久。所以，关于佛陀的形象，我们顶多能够看到他圆寂后第三代弟子所知道的那样。

单是得出这点儿结论，就害得许多西方学者埋头干了一个多世纪。第二次结集结束后不久，僧团内部就发生了部派分裂。随着每个部派的形成，原始经典固然被保存下来，但都经过了重新编纂。纵观整个佛教史，有一条通则是不变的，就是不管圣典如何编辑，绝不会丢弃其中任何一个部分。在旧的材料上面，不同的部派都增益了新的材料。现存各派所传圣典，代表了它们不同的侧重点和新的法义，被保存于若干有亲缘关系的北印度语言如巴利语、梵语或某一种俗语[10]当中。古时这些教法上的新发展，都发生在印度次大陆上。印度语言中关于这个阶段的文字记录，只有巴利语三藏保存完整，此外还有保存在其他语言中的一些断简残篇。

可是，还有其他不少材料靠译本流传下来。这是因为很久以后，在佛灭不到1,000年时，佛教先后传入了汉、藏两地。如今有很多材料在印度的各种语言中已经看不到了，却被翻译成汉藏文字，一直流传下来。在这些译本藏经中，充满了各种新说，佛陀当年说法的原样，反倒为其所掩。19世纪西方学术研究证明，佛教内部曾经异说纷起，派别林立，丝毫不亚于基督教教会内部的纷争。

初看上去，斯里兰卡、缅甸和泰国三地由上座部（School of the Elders）[11]传承的巴利语三藏，应该是最古老，最接近于佛说的。上座部僧众也是这么看的。从那时起，就有学者为验证此说的真伪，开始学习巴利语、梵语、藏语和汉语。同时，中亚一地又出土了大量古代经文。研究结果表明，在佛传的资料上，巴利语三藏虽然还是最有用的，但中亚残经以及汉藏译本的异文，在很多方面都足以补正巴利语三藏之不足。在复原原始材料的本来面目方面，汉藏文材料还是不可或缺的。本书的译文和术语主要依据巴利语三藏，同时也不忘援引学者们在其他语言材料方面的研究成果。

巴利语三藏优点虽多，但在有一点上稍显遗憾，即不能为“名人录”上有关佛陀的词条提供信实可靠的史料。最棘手的问题出现在佛陀的纪年上。佛陀享高龄，耄耋乃入灭，前后说法45年，这是经文中一般都会说到的。可是，确切日期为何，却为另一问题。依斯里兰卡旧传，兼参西方学者考证，佛灭时间是在公元前483年。汉传材料将

佛灭定于公元前368年。这个问题现在还在争论之中，恐怕以后也不会有结论，因为每家的论证都包含了一长串的推论，但这些推论都不够细致严密。这个问题倒是说明了所有古印度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纪年问题一点兴趣也没有，却热衷于哲学上的论难。所以，我们的处境很矛盾，我们现在比较了解佛陀的思想，却不太了解他生活的那个世纪。

佛陀在世时印度的社会生活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资料在历史内容方面就贫薄。佛陀是一个践行家，当他说法的时候，常从身边生活中就近取譬。这样一来就透露出了当时社会上的很多信息。僧众致力于保存真实背景下的佛说，所以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我们从而了解到当时的人们从事着何种职业，如何互相划分等级，当时有什么样的政治设施，流行什么样的宗教习俗。对佛陀时代的印度，我们可以画出色彩斑斓内容复杂的画卷，这幅画卷还可以借助佛教的对手耆那教徒的圣典来作修订和补充。可以这么说，自从有了佛陀，印度才算第一次走进了历史。这是因为，在任何的叙事文学中，只有从佛陀在世的时代开始，历史细节才变得清晰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有把握地描写某某国王治理着某某国家，某种经济制度如何如何，某某宗教教师在传授何种教法。

参照其他的材料，这幅相对静止的画卷就会变得鲜活起来。关于佛陀出世前的那个时期，我们手里有古婆罗门教（后来演变成印度教）的梵文圣典可以参考，我说的是《梵书》（*Brahmaṇas*）和《奥义书》（*Upanishads*）。这些圣典很少带有佛典里面那种益人心智的细节，这是因为它们本来先是关于某种祭仪的专门著作，后来又演变成关于某一类密法的秘籍。它们在几个世纪中陆续编成，从内容上说并没有反映出某一时代的生活。可是，它们却能证明，印度早期社会大大不同于佛陀生活的时代。这些差别已经从考古学的记录上面获得证明。佛陀出世前的几个世纪中，还没有我们所习见的城市和国家，

只有若干武士阶级组成的小邦国。佛陀在世时，城市和国家一下子都有了。在他圆寂后的一两个世纪当中，北印度迎来了孔雀帝国（the Mauryan empire），这是大英帝国取得统治之前印度次大陆上最大的国家。佛陀生活于印度文明的上升时代，正像苏格拉底生活于古希腊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上升时代一样。

在古代印度，同时发展出许多崭新而恒久的思想习惯。这些思想习惯在某些方面还很像我们的思想习惯，像得都辨认不出彼此了。我们可以拿它们和古希腊作个比较，相信会是大有裨益的。只有通过回顾我们历史上的同一时期，我们才会发现这些思想习惯确实是在当时形成的。我们现在惯于以一种语言和一种方式谈论各种社会，或者讨论某种普世的伦理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还习惯于认为，关于我们自身可以提出很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适用于不同环境中的不同人。而且，我们很轻易地就以为，关于这类事大家可以按照某些法则来讨论，这些法则与个人无关，却对所有人都有效。总而言之，我们已经习惯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是需要经过论证的，而不是靠超自然的力量来保证、常规的意象来说明，更不是靠传统的惯性来维护其神圣性的。

可是，一旦我们比较苏格拉底和他的希腊前辈，一旦我们拿佛陀和他的印度先人来对照，就会发现这些思想习惯原来是不久前刚刚获得的，显得如此之新鲜。这绝不是说，早期的希腊人和印度人不能去思考他们的自然或社会。他们当然思考过。可是，他们在这样思考的时候，却被牢牢地束缚在自己小圈子的狭窄眼界里面。他们只在为自己说，只对自己说，只有生活在他们这个社会里的人才能完全分享他们的思想成果。他们的思想是象征性的，这种象征性的思想只能激发或者表达（而非问难或解释）一个相对较小的团体所共享的经验和价值。只要这种经验是共享的，只要这个团体不含纳过多的分裂因素，就不会有任何理由和机会来让人质疑他们的价值观。

随着城市的兴起，以及一种复杂的世界性共同体的发展，经验不再是共有的，各种价值观也不再被当成是不可置疑的。传统的思想和生活之间的和谐一致不复存在。日常生活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这些变化又带来了这种新的可能性，即这些生活形式可被重新考虑，可被讨论，可被重新思考。人们可以对这些事进行哲学的思考。西塞罗说过，苏格拉底“头一次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让它在城市里安家落户，甚至引它走进千家万户，驱使它思考人生和道德以及善与恶”。西塞罗的这番话，也可以用在佛陀的身上。佛陀和苏格拉底都敬鬼神而远之，对怪力乱神不感兴趣，可是他们却热切关心人生的目标和指引。

注释

〔1〕 斯里兰卡的佛教圣地，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0世纪是古代锡兰（即斯里兰卡，又称楞迦岛，狮子国）的都城，今天是斯里兰卡中北省省会。那里佛教古迹甚多，设有斯里兰卡考古总局。

〔2〕 关于“结跏趺坐”，请参看本书第三章的“禅定”一节。

〔3〕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是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哲学家，本书作者的同行和前辈，主要著作有《苦闷的热带》、《结构人类学》、《野性的思维》、《神话学》等。

〔4〕 这段话的出处待考。

〔5〕 “证得”就是“证悟”、“悟出”、“领会”，是一种神秘的宗教体验，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知识的获得。

〔6〕 引自《杂阿含经》第45卷第1307经。这段话意为：在这个一寻长的、附随有心灵和各种意见的臭皮囊里，我（向你们）开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生起和灭坏，还有这个世界灭坏的道。

〔7〕 《四无量心》（性空法师讲，释见恺文字整理，“法悦丛书”第3种，台湾嘉义市：香光书乡，2004年．第22—23页）：“只有闻、思不算真正的了解，要用自己的身体去实践、验证才算真正的了解。解脱只能靠自己的身体，不能靠别人的身体解脱。自己的身体是我们的实验室，除了这个实验室外，没有其他的实验室可以检验佛陀所开示的法。解脱从自己的身心开始！第一阶段的修习很重要，了解第一阶段才能了解身体的各种情况。虽然身体臭臭的，给我们许多麻烦，但它是我们的实验室，所以要好好了解修行方法，运用智慧修行，以自己的身心做实验求证。不然，坐在这里做什么？对自己、他人无益。”

〔8〕 此处引巴利语《中部经典·爱尽大经》中语，参看江炼百、夏丏尊等据日译本重译的《南传大藏经》（台北市：佛教出版社，1981年），第548页。南传巴利语佛典分“经”“律”“论”三部分（三藏），“经藏”中最重要的有四部，即《长

部经典》、《中部经典》、《增支部经典》和《相应部经典》，都是若干部经文的汇编，略同于汉文大藏经里的《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和《杂阿含经》。

〔9〕 “雨安居”（rainy season retreat）是佛教术语，又译“安居”、“夏安居”、“夏坐”、“坐夏”等。在古印度雨期的三个月（公历约五月至八月共四个月）里，禁止僧尼外出，因为外出容易伤害草木小虫，所以应该在寺内坐禅修学，接受供养。

〔10〕 俗语（Prakrit）：俗语是相对于“雅语”（Sanskrit，即梵语）而言，指若干与梵语有渊源、流行于古代和中古印度民间的地方方言。巴利语也是一种“俗语”。

〔11〕 “上座部”（巴利语Theravada）是小乘佛教非常重要的一支。佛陀圆寂后，僧团因为对戒律方面的十个问题发生争议，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派。“上座”就是“长老”（Thera）的意思，“上座部”就是信奉“长老”（僧团中位置较高、比较保守的人物）所“说”（vada）的部派。上座部主要流行于今天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巴利语三藏就是上座部的圣典。Theravadins是英文化的巴利语词汇。Theravadin是巴利语“上座部信徒”的意思，Theravadins是这个词的复数形式。

第二章

早年生活和厌俗出家

关于佛陀早年生活得怎样，相貌又如何，后人都作了大量的渲染，但很少可以信从。在表现他独特的禅定之姿时，传统的造像大概是忠实的。可是，这些造像都是在他圆寂数世纪后才雕凿的，所以绝非是反映他真实面目的肖像。我们有理由相信，照他那个时代的审美标准来说，他的相貌是俊美的。在时代较古的《起世因本经》（*Aggañña Sutta*）[1]里，佛陀的俊美受到人们的赞叹，甚至盖过了邻国的胜军王[2]。在他的哲学之外，他的性格如何，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我们掌握的材料里，他的性格就是他的哲学。虽说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出，他年轻的时候一定热情洋溢而且性格叛逆，否则一个性格平和恭顺的人，敢不敢去成就他那番事业都不好说，更别说成功了。

有两件事实，我们还算比较有把握。第一件事实是，佛陀出生在释迦族，生地大约在释迦族的都城迦毗罗卫（Kapilavatthu）[3]，也就是今天尼泊尔低地台拉河谷（Terai）地方的蓝毗尼镇（Lumbini）[4]。第二件事实是，佛陀的家姓或族姓是乔达摩（巴利语Gotama，梵语Gautama；他被尊称为佛陀，也就是“觉者”，是在他获得开悟之后；本书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只用佛陀来称呼他）。关于他的童年或他所受的教育，这些事实虽然什么也没有揭示，但却使他置身于更为广大的恒河文明当中，显示了他所继承的环境中的某些东西。

释迦族是恒河盆地北缘多种散居的部族之一，处于当时正在发展中的北印度文明的边缘。佛陀出生时，这些部族的人民多少还是独立的，采用大体相似的各种政体。统治者或为寡头集团，或为元老会，或为二者的混一，所以最好可以称他们为部族共和国（tribal republics）。某些部族也许会选出首领来治理一段时间。严格些说，他们没有国王这类概念。所以，后世所传佛陀为王子一说，实在不可依信。可是，就更广阔的文明背景而言，释迦族人自认也有国王、贵族和武士的分别，却肯定不像别的部族一样承认高等祭祀阶级，也就是婆罗门在祭祀上的优越地位。释迦族人都自视为神明的贵胄。我们

难免都会有这种印象，就是当佛陀与外界交往时，他对自己高贵的出身极为自信。

有证据显示，释迦族极欲对当时的世界保持冷眼旁观的态度，可他们已经深陷其中，无法摆脱。佛陀的族姓“乔达摩”，也用在别的地方，也许最早还是一个婆罗门的姓。的确，释迦族人对他们高贵的出身自视极高，若不求其原因于域外，实在无法理解。他们实际上早已是南方某个国王[5]的臣属，在经济上也早已受制于南方的商业。不管是释迦族人，还是所有的部族共和国，都是受制于人，而非制人。他们将对印度文明贡献的只有他们伟大的族人佛陀，以及一部分保存在佛法中的部族价值观。

变化和权力的各大中心，主要集中在中央恒河盆地。数世纪以来，若干小的武士集团就沿着恒河扩张势力，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制邦国（centralized monarchical states）。印度古来素有十六“大国”之称，可是在佛陀年轻的时候，有数国已经吞并了周围的小国，并欲继续其征伐。其中的憍萨罗国已经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征服了释迦族。另一个大国摩揭陀国（Magadha）已经统治了西孟加拉，为未来孔雀帝国之核心，并且将于佛灭之后吞并拔耆族人若干部族共和国的联盟[6]。未来属于国王们，而非共和国。

在这些邦国中，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市镇中心，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在这些不断扩充的城市中，有国王们的宫廷，而宫廷和城市则引来了城市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商人、技师、士兵、工匠、纳贡的诸侯、他国的难民、异邦人、投机者。在人与人之间，劳动分工变得更为复杂，社会地位更为悬隔。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相异的各类人，如今聚居在一起，尽可能地和谐共处。国王的军队和官吏的武力征伐，远途贸易的微妙影响，人口的多次迁移，这些原因促使乡村也被拉进了宫廷和城市生活之中。考古记录显示，这些古印度的城市缺乏城市规划，完全是一盘散沙。可是，正是这一盘散沙，象征着这些新形成的复杂社团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各种创造性的机遇。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化，印度人是如何认识他们自身的？

四种姓

印度人开始调用一个非常古老的知识工具，这就是一种在社会中划分不同阶层的观念。这是往昔英武的武士社会的一大特质，令人想起欧洲中古时代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当时的欧洲社会，把人分为三等，即祈祷的人，打仗的人，还有劳役的人，也就是教会、贵族和农奴。在古代印度，则有四大种姓（梵语*varṇa*）。居最上者是婆罗门，主要指祭祀宗教的祭司和掌握知识的人。除其地位崇高外，婆罗门并不握有实权。实权乃在第二种姓，亦即刹帝利（巴利语*khattiya*，梵语*kṣatriya*）的手中。刹帝利的职责是打仗、治理国家以及供养婆罗门举行祭祀活动。释迦族人即以刹帝利自视。刹帝利一姓，包括了国王和贵族。第三种姓包括平民、工匠、农夫，统称吠舍（梵语*vaiśya*）。第四种姓是首陀罗（梵语*śudra*），即执役人（the Servants）之义。首陀罗不能分享宗教祭祀的权益，被迫屈居其他三大种姓之下，过着一种执役的生活。这种思想在各大种姓之间，划分出上下尊卑界限森严的社会等级。每一种姓对其他种姓都有若干的权利和责任，并对在上的种姓持恭顺的态度。种姓观多少也刻画 出印度社会的实际情况，就是刹帝利精英和他们的婆罗门祭司一起，统治着平民和地位更低的被征服的土著民[7]。

可是，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这种种姓观不仅是一种反映不同职业或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还是印度人观察人世的一种深入人心和普遍流行的方式。因为，它意在描述每一个种姓的人民所具有的先天根性。比方说，称一个人为刹帝利，不单单是把他说成一个持矛荷戟的人和国王，其中还包含了他一定富有、有权势、慷慨大方、英勇善战以及出身高贵的意思。身为一个婆罗门，不仅仅意味着他在职能上是一个祭司，还寓含着他生来就有智慧、有美德、学识渊博、身体清净、出身清白。叫一个人吠舍，不仅是指涉了他的工作，还点到了他的贫困、身体虚弱、人格卑下、出身微贱。在一个人身上应该被知道的每一种有意义的东西，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诸如宗教上的、心理学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以及社会上的，都会通过他属于哪个种

姓而为人所知。一个人的仪表，身心的秉赋，甚至他的本质，完全被他属于什么种姓决定了。不同种姓的人，好像属于不同物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般的人，只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好似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里面，只有黑人、白人和混血人一样。在古代武士社会的圣典《梵书》里面，这种种姓制度完全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它来源于定居恒河的印度人在感受城市化之前的经验，反映的自然也是那个社会的性质。如果在我们看来它显得不够公正的话，这种不公正早就以各种方式熔铸进他们的世界里了。

如今的世界以城市为中心，非复往昔英雄的世界，种姓论已失其与世界紧密而有机的联系。究其原因，约有如下数端：第一，种姓论已经不能涵盖在职业和社会地位上发生的新变化和复杂形势。比如在古代的典籍中，我们从未见到任何有关商人的记载。可是，在佛经和耆那教经书里，商人已经是当时生活舞台上十分显著和活跃的角色。在古代的教典中，只见有武士，而在佛经和耆那教经书里，还出现了雇佣兵和拿薪俸的官吏。这些新出现的专业化现象，缘自国家的兴起和货币的使用。国家和货币正是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出现于北印度的。这些新型职业者的出现给种姓论提出了巨大的难题。种姓论本来所面对的，只是一种简单的只有四种人居住的农牧世界。在什么地方安插这些新出现的人呢？他们属于哪一类呢？

但是，新环境所带来的最大挑战还不是这个。有一个更大的挑战，直捣种姓论的核心。它体现在一部佛经（《中部经典》，第2卷第84经）里提出的两种相关论点中。第一种论点是，若一个人犯了罪，不论其出身婆罗门还是首陀罗，刹帝利还是吠舍，在新兴的集权国家里，国王必须严格按照其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而断罪，而不是按照他属于何种种姓。这一点与古时所行的就完全不同。古时的刑罚，不论是赔款还是服苦役，均视犯罪者为何人，属何种姓而定。至于所犯罪行为何，不是唯一的标准。婆罗门和刹帝利犯罪，能和普通犯人一样接受同样的刑罚吗？不应该尊敬他们的种姓吗？ [8] 第二种论点是，在佛陀生活的城市化世界里，一个人很有可能出身于婆罗门或刹帝利这样的高级种姓，却被出身于首陀罗或吠舍这样低级种姓的人雇

为仆从。这种情况在旧秩序之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首陀罗只能服侍别人，而婆罗门和刹帝利只能役使别人。

在这部佛经里，这些评论意在显示世界的真实状况已经与奉持种姓论的婆罗门的空疏而虚骄的想法大为不同。如果我们取佛教之前的教典，与佛陀时代刚刚开始出现的另一种新的文献，也就是《达摩奢萨怛罗》（即《法论》；我这里指的是最早的《乔达摩法论》）相比对的话，就会了解到国王正在取得新的裁断和惩罚的权力。不论如何，他们就像在部族共和国里那样，可以免去旧的贵族，并且提升新的贵族。在佛典和法典里面，我们还读到新的财政制度——信贷、利息、土地市场——都出现了。这就带来了这样一种可能，一个有地位有财产的人因为想发大财而经营生意，最后却失掉了一切，而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人，却可以借助同样的方法而暴富攫升。

种姓论的难题在于，它描述了四种理想的人，每一种类型都有一套和谐相处的性格特征。比如说，刹帝利之为刹帝利，是靠他的出身，他的政治权力，还有——因为权力肯定是对人民和土地的权力，而财富只能来自人民和土地——他的财富。可是，现在这就大大地有悖于事实了。如今有了出身固然为刹帝利，却没有权力和财富的人。还有很多有钱的商人，他们既没有高贵的出身也没有权力。在新兴的邦国中，出现了有权力的人，可是他们按出身来讲却不是刹帝利。深处这些境地中的人就会发现，自己的实际处境和种姓论的规定完全不同。这种关于人性和人世的旧观点，完全没有反映出新的现实。

对于这个问题，出现了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来自婆罗门，也就是种姓论的制定者。佛陀灭后数世纪间，婆罗门编写了一系列的《法论》。在这些典籍里面，他们逐渐对种姓论作了修正。他们采用的策略是印度思想中经常出现的那种，保留旧的一切，再增益上新的内容。他们通过把新职业插进旧制度，从而保留了种姓的等级制。商人被划为吠舍，许多手工行业被放进首陀罗种姓。地方集团和部族被分散在后面三个种姓里。他们还发明了一个理论，把世袭的地方团体或职业团体——现在称为噶斯德〔9〕——的出现，解释成不同种姓间通婚的结果。在这件事情上，婆罗门干得很成功，今天的印度人还在按

照简单的种姓结构来理解复杂的噶斯德制度。

可是，我们更感兴趣的，还是另外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来自苦行者与哲学行脚者〔10〕，与婆罗门的反应正好针锋相对。佛陀后来要加入的，就是这些人的队伍。他们的回答可以在佛经和耆那教经籍中找到。这个回答是苦行者团体的思想之本，在佛陀登上历史舞台之时，至少已初具雏形了。

在和一个婆罗门的对话（《长部经典》，第1卷第4经）〔11〕中，佛陀以极为清晰的方式，把这个共同的观点表述了出来。在对话中，他问了婆罗门这样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汝婆罗门，成就几法，得名婆罗门？"这实际上相当于在问："靠什么能成就最好、最优越的人种？"因为，按照种姓论的逻辑，婆罗门就是人类中最好的和最优秀的人。婆罗门在回答中说，他和他同种姓的人，是因为同时成就了五法而获得如此优越的地位。他们同时拥有最高贵的血统，最深湛的学识，最端美的容颜，最聪明的头脑，以及最淳厚的美德。

这完全是正统的说法，也就是说这个婆罗门相信，一切美德都和谐地集中于他的一身。可是，佛陀通过探问细节来剖析这一主张的实质。不具备父母两边远溯七世血统纯粹这一点，是否依然可被称作婆罗门？看上去明显是可以的。不精通婆罗门诵经持咒之学，是否依然可以被称作婆罗门？也可以。容颜不端美的话，是否依然可以被称作婆罗门？当然可以。〔12〕但是，不具足智慧和美德，是否依然可以被称作婆罗门？不可以，婆罗门回答说，因为婆罗门立身之本，全在此智慧和美德之上，依此方能居最高之位，领导师之称。

看来智慧和美德是最重要的！有人会怀疑说，一个婆罗门真的会被迫作出这些有损于自己的让步吗？可是，事实是这种论点的确有人提出来过，这就说明当时知识界的风气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为，现在不仅婆罗门的观点遭到了挑战，而且智慧和美德这两种性质，也脱离了婆罗门教的各种传统解释。就拿美德来说，关于什么才构成善良的行为，如今有了一些普遍的观点，这些观点完全和"什么对于一个特殊的种姓是合宜的"脱离了关系。因为，佛陀的观点是这样的：美德是一种人人都能有的东西，它不是靠出身给你的，而是靠

努力赢得的。同样的，智慧也是后天获得的，并非先天赐予你的。所以，真正的婆罗门就是兼有智慧和美德的人，不管他出身如何。

这种论点，正是针对婆罗门的虚骄而发，表现了对苦行者德慧双修主张的赞同。但是，它的意涵还要广大得多。因为，它暗示出存在着某种可以增慧修德的基本人性，这种人性完全与一个人属于何种种姓、有何地位无关。不同等级和不同命运表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惊异的繁杂性，一下子就被抛到背景之中去了，在前台保留下来的只有一种简单的为人人所共有的禀赋。从原则上说，任何人都能变得聪明而善良。佛陀的许多同时代人，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作出了这个假设。他们的说法不仅是专门就这个情况或者那个情况而发的，也不是专门冲这个种姓或者那个种姓而来的，而是面对人类的境况本身。这是很具革命性的一步。因为，在迈出这一步之前，印度人还不能超越狭隘地方性的、束缚在印度社会旧制度之上的种姓观念来谈论人的生活。他们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可以对一个更加广大的世界说话。佛陀比他任何一个同时代人都更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

弃世出家

弃世出家这件事，也许在我们看来显得意义重大，可是事实上它只是佛陀弃世时从沙门团体那里继承来的一个更大计划的一小部分。沙门团体所关心的不再是人类社会，而是其边际：生死大事以及此生转瞬即逝的浮相背后的广大精神世界。他们好像从远方俯视恒河盆地的社会，深深地蔑视它。他们就是没有家室的行脚僧人（*paribbajakas*），有精神追求的人（spiritual strivers，巴利语*samaṇ as*[13]），离弃了世间及其一切利益的人。但是，他们可能也是印度唯一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是全世界的而非全世界某一部分的公民。

他们的世界主义通过这个事实表现出来：未来的佛陀那时还很年轻，他决心加入沙门团体之中，就是因为在他僻远的故乡就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沙门的事情。关于佛陀出家的最古的记载虽然十分简单，

可是它们却很充分地印证了沙门出家时的景象。佛陀出家时，“尚少年，黑发如漆，韶华之时”（《中部经典》第1卷第163页）[14]。这就不由得教人怀疑他当时有无妻子（按照佛教后来的传统，佛陀出家时已有妻儿）。可是，它的确显示出，弃世是一件需要一辈子来完成的使命。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出家动机：“时我作念，在家生活，拥挤脏乱，出家生活，广大清净。是故住家而修梵行，欲求一向具足清净，是事实难。”（《中部经典》，第1卷第241页）[15]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推想，佛陀时代的沙门生活有着富于冒险精神的崇高理想。沙门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这种理想远远高过日常经验的卑琐需求和意气之争。他们完全不追求自身的快乐，而是投身于一桩崇高的事业中。这桩事业有时给他们带来荣誉，有时也带来挣扎和艰困。做一个出家人，是每一个青年，每一个浪漫之人的雄心壮志。从这个观点来看，佛陀不过是当时无数受到沙门生活吸引而出家的青年之一。

可是，与这股热情相对的，是对这个终身的责任所持的清醒而极为严肃的观点。首先，美德和智慧的崇高理想反而会使这些沙门承受追寻完美的负担，但很少有人能圆满无缺地达到这种完美。其次，他们离开常人的生活，不仅因为这种生活有着无数的烦心事，还因为这种生活充满着危险。有一段经文简单叙述了佛出家前的反思，它这样描述佛的第一次心灵的巨变：

> “我为生、老、病、死、烦恼、杂染所困，何故复求为生、老、病、死、烦恼、杂染所困诸法？我既知为生、老、病、死、烦恼、杂染所困，见彼过患，何不求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无烦恼、无杂染、无上离系安稳涅槃？”[16]

这段叙述已经经过了佛陀后来思想的过滤，可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过滤器看到多种选择的严峻性。未曾经过检查和驾御的在家生活，只能引向不断重演的悲伤和失望。只有出家人的生活可以给人带来希望，这种希望使人能从知识和冷静的高度来俯视欲望和痛苦的泥沼。西方作家经常把这种观点算作没有止境的悲观论，可是他们却没有注

意到有望证得“不死境界”的乐观论。出家人的态度中混合着黑暗的苦难和光明的希望。

这种态度背后暗伏着一个更加宏大的理论，使它显得引人注目。这个理论解释并证明了出家人弃世的原因。根据这个观点，在家者平常的积极有为（activity）和出家者超常的清净无为（inactivity）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家者为了追求世俗的目标，比如性的快感、生儿育女、发财致富和支配他人，就必须造业（梵语*karman*）。这些业不包括不招果报的行为，比如说刷牙，而只包括招引果报或者带来结果的行为，这些行为会从实质上影响你自己或旁人的状况。另外，这些行为在完全可见的效果之外，还会带来精神上的结果，因为它们身上附带着给无助的在家者创造另一付身体和生命使他转世投生的力量（如果这听上去有些古怪的话，请记住比起那种认为我们的行为会使我们上天堂下地狱，或者给我们招来超自然惩罚的信仰来，它并不缺乏理性）。而当他转世投生以后，他注定要在另一个生命里继续受苦和欲求，就像他在这个生命里一样。所以，一世的受苦，不过就是一个人死后不断在欲苦交织的轮回（巴利语*saṃ sāra*）世界中一次又一次地转世投生，从而不可避免地要体验到的无始无终的受苦过程的一个特例而已。

与此相较，出家人生活于独住、安贫、无害、无欲之中，这虽然不能算是行善，却可以算作是无为而住，因为他完全不造任何业，这些业里包含着使他转世投生的可怕力量。缘此之故，成功的出家人可以完全越度生死的轮回。在家者因造善业可以投生善处（转生天界或投生婆罗门家），或因造恶业投生恶趣（陷于地狱或转为傍生[17]）。在家者掌控他的命运只能至此程度。这就是说，不管投生何处，就算是投生在最优越的地方，苦、死和转生都是无法避免的。只有完全离弃世间，弃绝一切有漏业（all flawed activity）[18]，人才能逃离这个可怕的樊笼，证入“无生、无老、无病、无死”的境界。

这种因果法则是无我的（impersonal），不被神支配，它是普遍的，适用于一切有情[19]，不论动物、人还是超自然的生物[20]，他们无不依其所造之业而转生各处。的确，大概是依靠这个观点的发

展，而非仅仅依靠对种姓论的批评，才引领着这些出家人发现了人性。主张任何人皆可成为持役者，或者任何人皆可按其行为被国王惩罚的佛经，也要诉诸这条普遍的因果法则。佛经中说，不管是婆罗门还是首陀罗，必然会在来世尝其业果，可是不管你是婆罗门还是首陀罗，也都可以通过出家行道从而完全摆脱轮回之苦。这些才是对种姓论最根本的驳斥，而从社会角度对种姓论进行的批评，倒显得不是主要的了。出家行道者所见的是一切有情的困境，而在一切有情中人的境况只是一个特例而已。

作为新的出家行道之人，佛陀对这一点大概只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未能细致而深入。但是不论如何，道德因果律的理论以及如何摆脱因果系缚的计划均已建立，尽管以世纪为标准来衡量，这个理论和计划多少还算是新的。在佛教之前较早的典籍〔21〕里，对此只有不多的暗示。在佛教之前较晚的典籍里，也就是在诸部《奥义书》里，它已略具雏形。而到了佛陀的时代，转世说已被大家共同接受，出家者实际上已经变成第五种姓，构成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出家者和他们的世界观如何发展，还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者还没有答案，或者根本无法回答。但是，不论如何，他们的修行和理论一定是一起发展出来的。只有一群以远离日常生活为其常例的人，方能站得远看得清。也只有这样一种广大兼备而涵盖一切的理论，方能证明过上这样一种艰苦的生活也自有其一番道理，或者才能激发遍居恒河盆地的人民把出家行道者当成托钵僧（mendicants）来尊敬和供养。

这些出家行道者是他们的世界造成的，可是他们身为教师、传道者和人群的典范也在塑造这个世界。他们的转世说常被当作是一种非理性的宗教观，也许它是各个武士团体征服北印度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一种古说。这么说也许有些道理，可是它却忽视了这个理论解释一个复杂世界的力量，同样也忽视了这个理论所具有的相对的诡辩性。不管一个人出身好坏，不管一个人是在宫廷里面飞黄腾达还是丧失了祖传的地产，不管一个人经商成功还是被国王的军队打败，这个理论都可以作出解释。今生的成功、美貌和权势，都是来自前世所造的善

业。穷人今生的微善，会为他积攒来世的善报，而今生在荣华富贵中犯下的恶行，都会在来世招致惩罚。而且，不仅生命里的事件，甚至生命的各个关口——生、老、死——都被安排在一个更加广大的结构中，在这中间它们都可以得到补救。在整个印度文明中，这个理论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接受，连婆罗门也不例外。这一点儿也不叫人感到惊讶。在将善恶的抽象道德范畴应用于一切行为，以及在设立无我的因果自然律上，这个理论是数代人或数世纪脑力劳动的产物。它将继续在佛陀和他同时代人的手中得到提炼和发展。

三种思想运动

在较早的婆罗门教经书中，导致后来这些发展的讨论和辩难的声音，却相对减弱，甚或销声匿迹了。可是，在反映出佛陀身边环境的佛经和耆那教经籍中，却回荡出各种各样争辩的声音，使人仿佛置身于各类哲学观点和禁欲法门的闹市上一样。当时就有公共的论议厅，各派沙门聚在里面辩论法义。公开的讲演或布道蔚然成风，它们不仅面向本宗的弟子，还面向潜在的俗家信众。（各派之间）有某些修行是大家共守的——比如乞食、云游、独身、自制——可是在这共同律则后，却点缀着五花八门的的意见和哲学，还有光怪陆离颇具创意的自苦法门。

这里面多少有点儿标新立异的成分。有些人像狗一样饮食，另一些人像鸡一样单腿站立〔22〕，还有许多人四处裸行〔23〕。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的标新立异表现在思想方面。佛陀后来破斥的那类“聪明黠慧，善于辩论，在论点中像虫一样宛转扭动的吹毛求疵之徒”〔24〕，正指此辈人物而言。可是，这类“吹毛求疵之徒”嘴里嚷嚷的那些骂人话，反而证明了当时论难的质量颇有提高，而且已经有若干的思想习惯传播开来，能够允许人们在两种论点之间作出抉择：“依汝之所设，结论固如是，然汝之结论，实含汝所设”；“汝之诸论点，试为阐明之”；“若汝有能力，试解汝之难”。当时还出现了多家的怀疑论者，

他们是这样一类哲学家，怀疑此事或彼事之中有效的知识能否成立。这些人的存在，也许可以充分证明当时学问界风气的热列和复杂。当时还有唯物论者，他们完全否认轮回转世这类无影无形的精神世界的存在。还有一些命定论者，他们虽然相信轮回转世，但却认为每一个有情在证得解脱前须先经历他所有可能的命运。〔25〕

然而，与佛陀关涉最深的，有三种思想运动。第一种思想运动可以在婆罗门教经籍中追溯它的痕迹。在最古老的祭祀文献中，献祭活动的举行，全是指向献祭者本人，他的肢体和官能，意在使他充满法力，可以成就俗世的一切益利和福寿功德。这在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对来世、死后生活的关心，并且同时演变成关于献祭者本人，也就是他的神我（Self）〔26〕的一种更为内在的概念。大约在佛陀出世之前不久编纂完成的诸部《奥义书》已经把神我这个内在的本质看成是从此生到彼世的轮回主体。〔27〕

第二种思想运动就是瑜伽。在几个相关方面，瑜伽思想和《奥义书》非常相似，我们有理由说存在着一系列的瑜伽/《奥义书》学说。透过佛经中对这些瑜伽/《奥义书》学派观点的攻击，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思辨的宝藏，以及许多辨析精微的学说，这些学说都对神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主张：有些人说神我是物质的，有些人说神我是一种精细的物质，或仅由心识构成，还有另外一些人主张每个个体都有若干由粗到细的神我。每一种观点都伴有一套稍微不同的对精神世界的建构，以及一整套的禅修法门。这些禅修法门意在有朝一日能够证得神我，从而使自己没入其中，摆脱世间与轮回的痛苦与纷扰。

第三种思想运动是所谓尼乾子外道（proto-Jains），我们现在多把它与耆那教联系在一起。〔28〕耆那教的祖师叫大雄（Mahavira），是佛陀的同时代人。有很多的材料证明，他的学说仅仅是在组织某些早已存在的影响很大的教义。这个学派持有一种特别严格的轮回论，严格到把对任何有自己灵魂的生物的伤害，都看成是对自己灵魂的伤害，认为使自己的灵魂附著上了尘垢，好像尘土使衣物蒙尘一般。若想涤除已经沾染的尘垢，必须自愿去做禁食一类的苦行。为了避免再染尘垢，必须禁止大小一切杀生之行。这就是不害论，或非暴力论

〔29〕，巴利语叫*ahiṃsa*。耆那教的苦行，一方面和当时对出家沙门普遍要求的自制合流，另一方面和若干极端的苦行派合流。同样地，不害论或者非暴力论，也是当时出家沙门共守的戒行，但实行最力的也许还要算耆那教徒和尼乾子外道了。当然，在其他学派中也可以见到。

佛陀与这些思想运动的关系十分复杂。首先，他对他们的主张有取也有舍。他立足于瑜伽/《奥义书》学派对观心内省的关注，发展了他们的禅法，但是却舍弃了瑜伽师们的神我论。他把不害论留为己用，却抛弃了苦行的学说。然而，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从别人那里借来合理的东西，或者被动地接受前人和同时代人影响的问题，因为凡是佛陀所接受的东西，都是经过了他自己的加工和改造，而他会抛弃哪些东西，也自有其一套很有独创性和创造性的理由。佛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充满了活力和竞争，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损人利己的强求，迫使他在思想上要完全保持忠诚，在生活上完全采用一种生活方式。佛法表现出来的那种相对的简单性，以及冷峻威严的口吻，多少掩盖了他为了在众人中奋力传达出自己声音所付出的艰苦努力。

注释

〔1〕即《长阿含经》第20卷的《起世因本经》。

〔2〕 胜军王（Pasenadi）一译波斯匿王，是中印度憍萨罗国（Kosala）国王，佛教的支持者，后被其子毗琉璃王篡位，在出逃的途中饿死。据说，胜军王与佛陀同年生同年死。

〔3〕 亦译“劫比罗伐窣堵”（梵语*Kapilavastu*），意译“妙德城”，是古印度国名，释迦族聚居之地，佛陀在世时被憍萨罗国的毗琉璃王（即胜军王之子）所灭。现为佛教圣地，在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

〔4〕 佛陀的诞生地，传说佛陀的母亲摩耶夫人在蓝毗尼的一棵树下生下了他。现为佛教圣地，属尼泊尔。

〔5〕指南方的憍萨罗国（Kosala）。

〔6〕关于拔耆族人，请参看本书第五章里“伽蓝经”一节。

〔7〕 王恩洋《佛教概论》（译者自己收藏的一个油印本）说佛教实行了“三种革命”，第二种就是对种姓制所实行的“阶级的革命”：“印度社会，阶级制度极

严，它共分四阶级：一、婆罗门，掌宗教，并赅括文化教育。二、刹帝利，掌政治军事。三、吠舍，操经济权，业工商。四、首陀罗，农奴，工奴，实际的劳动生产者。此外，还有贱民，不在四姓（即四阶级）之列。这种组织，好像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柏拉图以为是职能的分工，合理的统治，他是奴隶制度的拥护者，在佛即以为最不平等、最不合理的。因此，佛的教义力主平等，他说：四河入海，同为海水，四姓学佛，同为释迦。他的弟子四姓皆有，不分高下，高下只有由学龄与造诣来分。难陀是佛的兄弟，优波离是难陀的剃发工奴，优波离先出家证道，难陀后来出家，便要礼拜优波离。这种平等精神，在印度是违背制度的。婆罗门在印度专断教化大权，佛既成佛，即称世尊，立教施化，取婆罗门地位职权而代之，这便是阶级的革命了。”（第4—5页）

〔8〕 这和中国古代所谓的“刑不上大夫”很接近。

〔9〕 “噶斯德”（castes）制度，和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有联系也有区别，它主要是指按照财产、继承的地位和特权以及职业的不同，把人划分成若干阶层或者阶级。和它相比，古代的种姓论更加强调人种、血缘和婚姻的因素。

〔10〕 philosophical wanderers这个词不好译，这里参考了本书的台湾译本（第53页），勉强译作“哲学行脚者”。

〔11〕 即巴利语《种德经》（“种德”为发问的婆罗门的名字），参看《南传大藏经》，第66—73页。

〔12〕 以上一段婆罗门的回答，本书的台湾译本（第53—54页）把意思完全译反了。

〔13〕 指沙门。

〔14〕 此处引巴利语《圣求经》，参见《南传大藏经》，第467页。

〔15〕 《南传大藏经》，第527页（原文241页似有误，应为240页），译者作了部分改写。

〔16〕 此处引自巴利语《圣求经》，参见《南传大藏经》，第467页，译者作了不少改写。此文后面紧跟着就是上引“尚少年，黑发如漆”一节。作者引佛经，为节省篇幅，常据己意删节重组，此处即为一例。本节专讲佛陀出家，几乎全依巴利语《圣求经》。

〔17〕 “傍生”为佛教术语，指动物、畜牲。

〔18〕 “有漏”是佛教术语，意思是有烦恼。原文里的flawed可能就是用来翻译“有漏”一词的。

〔19〕 按佛教教义，“有情”（sentient beings）一词包含天、人、傍生、恶鬼等，实较“人”字为广。

〔20〕 “超自然的生物”（supernatural）指天神、阿修罗等。

〔21〕 这里提到的“佛教之前较早的典籍”，和后文提到的“佛教之前较晚的

典籍”，都是指古婆罗门教典籍说的。

〔22〕　此即汉译佛典中常见的“持鸡狗戒”的外道。水野弘元《原始佛教》（如实译，台中市：李炳南居士纪念文教基金会，2004年．第117—118页）：“又当时的苦行者之中，有只用某一定的食物与衣物者，有模仿狗而生活者，模仿牛者，模仿象而终生过此动物所过之生活者等，为数不少。他们认为依此能于死后生在幸福的世界……（注五）错误的沙门、婆罗门们以为模仿象、马、牛、鸡、乌鸦及鬼神，即是清净而可得解脱。立誓模仿象者，仿象的走法、坐法、卧法、大小便之法，以及其他一切象所做之事，过其一生。可知其他禁誓者，亦是同样的情形。”

〔23〕这是指耆那教徒。

〔24〕这段话出处不明。

〔25〕　王恩洋《佛教概论》：“佛教之兴，兴于婆罗门教衰、山林学派勃兴之际。那时印度人的思想极其自由，信仰绝无限制，人心踊跃，向上发展，有一种奇花怒放、蓬勃奋兴之象。由生机之勃发，有智慧之寻求，渴爱知识，尤重辩论。在个人则为学业之切磋，在教派则为教理之破立，而且质直诚谛，服从真理。在这样的时代，自然会有伟大崇高的佛教发展出来。”（第10—11页）

〔26〕本文凡遇大写的Self，都按旧译佛典的译名，统一翻译成“神我”。

〔27〕　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8—19页）：“所谓神我者，谓阿提茫（atman）。《奥义书》之大义，可以一言以蔽之，即梵即我是也。此为密意，昏昏者难知，而知之者，即可解脱。如《大毗婆沙论》卷200引明论说曰：‘有我士夫，其量广大，边际难测，光色如日，诸冥暗者，随住其前，而不能见。要知此我，方能越度生老病死，异此更无越度理趣。’”

〔28〕尼乾子是佛陀在世时“六师外道”之一，也就是耆那教的前身。

〔29〕　原文non-violence，译作“非暴力论”或“不抵抗主义”，指西方读者很熟悉的圣雄甘地的学说（参看止默［金克木先生年轻时的笔名］：《甘地论》，重庆：美学出版社，民国32年．第9—15页）。

第三章

访道

佛陀离家后，南行至散布在中央恒河盆地四周的人口中心区。他圆寂前，一直云游四方。其所游履之地，西起憍赏弥（Kosambi），东至瞻波（Campa），约250英里长，150英里宽。关于此一时期的事迹，后世留有一部编年史，但不甚可靠。不过，真正重要的，还是佛陀这种云游行脚的生活方式。很明显，他曾在深林里栖身，甚至暂居牛舍中以避风雨。和他打交道的，既有国王和妓女，也有商主和梵志[1]。他身为云游僧人，可以见识到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领略他所属文明的每一处风光。他享有云游僧的特权，不属于任何社会阶层，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因为从原则上说，云游僧对谁都不构成威胁。也许只有商主或者小贩——佛陀时代文明的典型人物——才能懂得世界之大，才会有这样一种世界公民的体验。

可是，尽管佛陀目睹了其所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他却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如芬陀利善开敷，处于水中得增长，终不为水之所著，清净香洁人所乐……我亦如是生世间，同于世法不染著。”（《增支部经典》第2卷，第38—39页）[2] 他有时候与其他外道的云游僧住在一起，有时候经常长期住在诸大城——王舍城、舍卫城、波罗奈城、吠舍离城、憍赏弥城——附近的林苑中。这些林苑是专门供各种云游僧挂单[3]的，后来也供不断壮大的佛教僧团使用。

关于佛陀的一生中这段思想成形的时期，以及他与其他外道僧徒的交往，我们所知道的仅限于一段既短少又贫乏的文字。如果删去重复的地方，以及不可信的细节，翻译出来仅能占到一两页的篇幅。这对写传记来说，用处不是很大。可是，这段叙述是用术语写成的，这些术语却可以借助其他谈论教理的佛经来作详细的引申和发挥。经过这样的引申和发挥，这段文字就比初看上去显得有用得多。在敏锐存疑的学者看来，这段文字没有一处不能被质疑。但是，整个故事和佛法其余的部分联系得非常之好，想来其中必有不少真实的成分。

据这段文字（《中部经典》，第1卷第163—166页）[4] 说，佛陀在沙门团体中最初遇到的是两位教授瑜伽禅定的教师，阿逻罗·迦罗摩（Ā̤ āra Kālāma）和邬陀迦·罗摩子（Uddaka Rāmaputta）。佛陀

先来到了阿逻罗·迦罗摩那里，仅就“口诵和复述而言”，佛陀“于未久之间”即习得其法。佛陀发现迦罗摩的教法——在这段佛经里却意味深长地没作任何交待——是以他所证得的禅定经验为根据的，于是就问阿逻罗·迦罗摩说：“尊者迦罗摩，以证得何种境界，汝乃敢宣说已经证得此法，以禅定所生之智亲证此法？”阿逻罗·迦罗摩回答说，以自己证得了“无所有处”（the Meditative Plane of Nothingness）[5]，才敢宣说已经证得此法。佛陀随即也证得了“无所有处”，当他向阿逻罗·迦罗摩描述自己的成就时，阿逻罗·迦罗摩大喜，邀请佛陀与他一起共领徒众。可是，佛陀心中却自念阿逻罗·迦罗摩之法“唯到无所有处为至极，不能趣入厌离，不能趣入离贪，不能趣入灭尽、寂静、从禅定生起的现观、开悟、解脱”，于是他便舍离阿逻罗·迦罗摩而去，往诣邬陀迦·罗摩子处修学。佛陀到了以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一遍，他发现邬陀迦·罗摩子的教法也不能引向开悟，仅能引向“非想非非想处”（the Meditative Plane of neither perception nor non-perception）[6]而已。于是，他复舍离邬陀迦·罗摩子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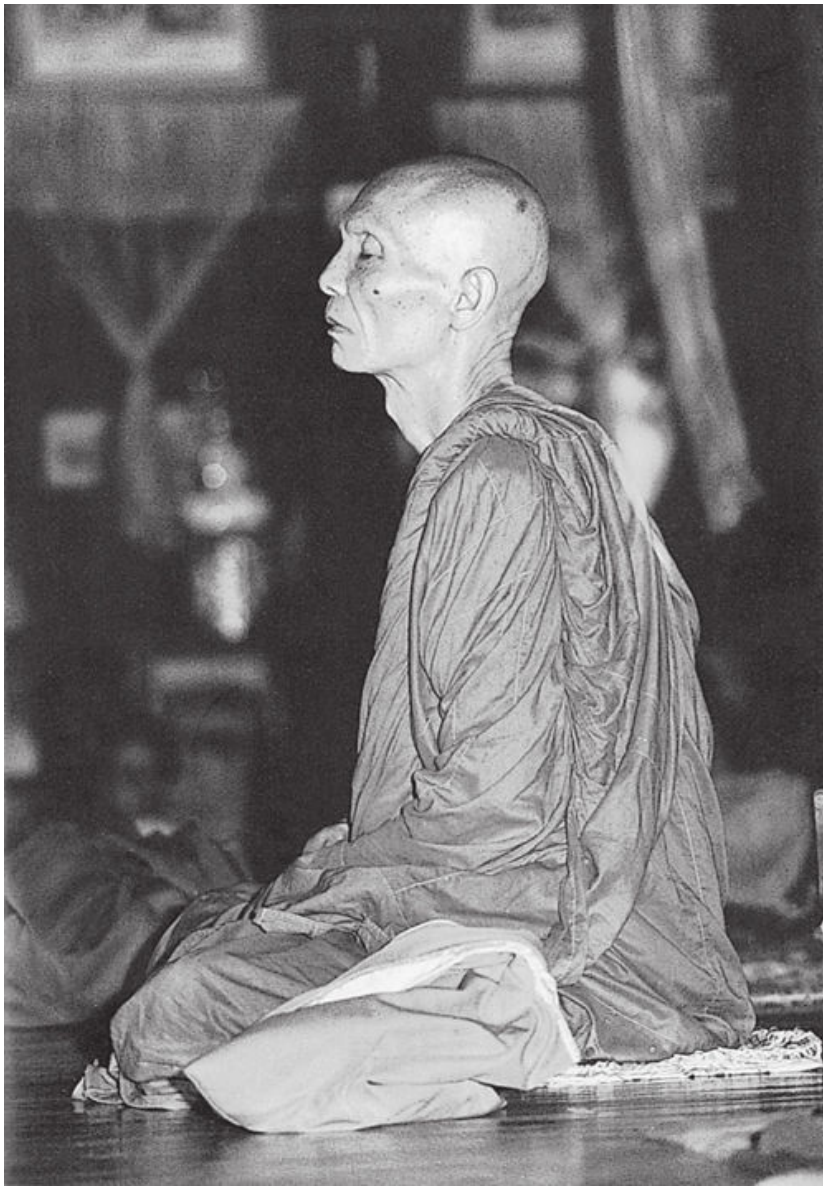

图1　一位泰国和尚按照佛陀根据自己的亲证所教授的方法在坐禅，他的这种坐姿很有利于他获得注意力的集中和心灵的警觉

在佛陀的求道生涯中，这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章。欲明其义，非弄清四禅不可。四禅是什么？为何佛陀会舍弃它们？

禅定

证得四禅的根本行法，在印土禅修诸派之间，不管你属于佛家，还是属于瑜伽/《奥义书》派，实在是大同小异。修行开始，当先觅一闲寂处，结跏趺坐〔7〕，腰背放直。腰背之直与跏趺之结，比较容易使人生起一定程度的警觉。这种警觉，若以比较安适的体式，比如卧倒一式，则不容易获得。〔8〕然后系心所缘，有说此物先为一个物理的对象，之后则换为心理的意象，一种单一的感觉，或者也可能是一个默念的声音。按一家《奥义书》之说，应当系念于心中所居的神我之上，这个神我“小于芥子，成真金色”（《唱赞奥义书》第3篇第14章）〔9〕。或按佛家的说法，可以系心于一种颜色之上，比如青色。或按佛家和瑜伽派的禅学，可以系心于自己的出入息之上。和这种心一境性（this concentration on one object）相对的，是不再注意其他的感觉，以及不再被任何妄想扰动。人由此全神贯注于禅定的所缘〔10〕之上——在某种程度上，对所有埋头做事的人来说，这种境界大概都曾经历过。

可是，由于在禅修者的心眼前，禅定的所缘历长时而不变，禅修者能获得若干极为神异的效果（神通）。研究这些作用的心理学家，不仅确定若干可以测量的物理变化会伴随这类禅定发生，而且还证实了——暂且不说我们对应该发生什么所抱持的信念——心理上面也会发生改变，比如禅修的所缘变得越来越历历分明，自己感觉到轻安（comfort）和喜悦（pleasure），远离周围的世界和自己的偏执之见（比起上一代来，西方人现在已经很熟悉这类境界了）。

在禅定成就的大小上，这些都只能算是微不足道的功效。还有其他更加神奇的功效，比如出现特殊的觉触，或者产生光明，甚或亲眼看到一整套复杂的幻象。在其他的教派中，这些功效也许就会成为禅定的所缘，代表了禅修的全部目的。

所有的禅定经验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主观的，所以好像很难找到一套语言，对它们作一种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叙述。不过，佛经里却有一系列对禅定境界的详细叙述，这些境界和某些瑜伽教典中描述的大

体相当。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佛家这种对禅定姿态和经验的描写，相比之下不带任何夸饰的成分，这是它的长处。这种描写，不拘哪种体系，都可以被很好地用来描写禅定。佛家的这套禅法，因其未受任何教条的污染，西方心理学家索性就直接拿它来描写一般的禅定现象。

这套禅法就是所谓“四禅”（*jhāna*）[11]。这是指一连串由粗变细的禅境。在初禅中，坐禅人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了觉知，但仍然有寻求和伺察[12]，专注于禅定所缘之中而不间断。在这个境界里，他感觉到身体的轻安，和在这种放松的定境中获得的更加精微的心灵的喜乐。住于这种心境的坐禅人，不会被没有实现的贪欲（unachieved desires）、嗔恚（anger）、昏沉睡眠（torpor）、疑（doubt）和掉悔（restlessness）[13]扰动。

在第二禅和第三禅中，坐禅人渐渐止息一切思虑，越来越只专注于禅定的所缘当中，以此增长的注意力和专一性，使他超越了身体的轻安和心灵的喜乐。他完全专注于禅定的所缘当中。最后，在第四禅中，坐禅人只知有禅定的所缘，心中常觉一种坚定的平静，超越了痛苦与快乐。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可以说是不断地在变成禅定的所缘，因为他除了凝定的心境（firm concentration）或“心一境性”（one-pointedness）这个简单的事实之外，几乎什么也意识不到了。在佛陀所开演的修行法门中，四禅将会发挥特殊的作用，它们表现了控御个人经验的特殊而有用的技巧。

在四禅之外，还有禅定成就的更高境界，这就是所谓的“四空处”（the Meditative Planes, 巴利文*āyatana*）[14]。在佛教文献中，对“四空处”有比较抽象而不带任何色彩的描述。“四空处”起源于各种瑜伽体系，很有可能它们在那里是被用来代表一些场所（places）或界域（spheres），也就是不可见的精神世界[15]的若干境界。证得这些境界，也许被当成是一种魂游（astral travel）。在诸部《奥义书》和瑜伽教典的精神宇宙学（spiritual cosmography）中，这些“空处”已经略显端倪，而佛经中通过对其他瑜伽体系的描述也透露出这些讯息。的确，在晚期佛教宇宙观里，这些境界都是有天神居住的精神层界。甚至早期佛教对它们的抽象讲述，也不能掩盖这一点：它们

和“四禅”一样，不是对禅定的一般描述，适合于所有特殊的禅定理论、禅定目标和禅定技巧。它们毋宁都是与某种关于不可见世界的地形学的特殊观点有关。这一点并不令人感觉奇怪，因为一旦坐禅人毅然不顾日常经验的世界，踏进一块新的领域，他很有可能要为自己提供一张这个领域的地图。

按照佛教对“四空处”的看法，这些境界的证得全靠止息“差别想”（perceptions of variety）。这个词的意思不是很清楚，但它似乎要表达的是，（在“四空处”中）禅定所缘上所见的种种差别相被超越了，坐禅人虽然还有意识，可是却不再了了分明地意识到心识的所缘。我们可以在第一“空处”，也就是“空无边处”（the Meditative Plane of undelimited space）中看到这种情况。在这个“空处”里，坐禅人只意识到空间的广延（extension），却在这种广延里面觉察不到任何的限度和属性。这个“空处”实际上是没有边际的。在第二“空处”，也就是“识无边处”（the Meditative Plane of undelimited consciousness）中，坐禅人只意识到心识，却意识不到心识的确定所缘。在第三“空处”中，坐禅人唯知“廓然无物”——按照晚期佛典详尽的说法，这就好像一人入室发现空无一人的那种感觉。不是意识到谁不在那儿，而是直接对无人在场的一种意识。〔16〕这就是“无所有处”（the Meditative Plane of nothingness）。唯一超过“无所有处”的，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在这个“空处”中，心识的活动极为微细，或者说心识的活动被完全抑制，乃至于坐禅人只能从这样一种状态中略微找回有这样一种境界存在的意识。

这样深的入定，我想大概可以解释今日在印度尚可见到的那些由瑜伽术引发的更加惊人的神通。（通过修习瑜伽术）呼吸几乎完全被抑制，心率明显减慢，其他生理表征也进一步发生变化。当然，这种现代西方生理学式的描述，未必符合瑜伽行者对这件事的看法，他们也不会以佛教描写禅定时所采取的那种不带任何色彩的抽象方式来看待此事。在他们眼中，这样的禅定经验，毕竟是他们精进修行的完成，一定是着落在某一个色彩缤纷的精神境界中。这种精神境界也许很像诸部《奥义书》里描绘的那样，仿佛在熟眠（也许可以被想成与

这类甚深的禅定相似）中一样与神我交通。这种禅定经验或者也可以像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所收的若干早期瑜伽教典中说到的那种“无相禅定”（meditation without qualities）。但是，不管怎么说，能修炼到这些境界，不能不说是证明了人有自我修炼和自我超越的能力。

佛陀舍弃禅定

可是，佛陀还是舍弃了这些禅定境界。或者，再精确些说，他舍弃了瑜伽教师认为禅定境界可以代表精神生活顶峰的主张。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第一个接近实情的答案，可以在巴利语《损损经》（*Sallekha Sutta*；《中部经典》，第1卷第40—46页）[17]中寻到。在这部佛经里，佛陀概说了“四禅”和“四空处”，称它们为“寂静住”（tranquil abidings）和“现法乐住”（comfortable abidings in the here and now[18]。可是，它们都非“损损”[19]，也就是从生死之苦中获得完全的解脱。要想求得这种解脱，唯有随顺佛陀觉悟后所开示的正道。从这个角度来看，“四禅”和“四空处”都非圆满究竟。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它们仅仅是暂时的状态，仅仅是“现法乐住”。这种批评，在别处（《中部经典》，第3卷第243—245页）[20]有更清晰的回应。在那里面，佛陀曾说善修禅定者可得长时住于禅定境界之中，但是这个禅定境界却是无常的，以后必然会归于消散。在另外一处（《中部经典》，第3卷第236—237页），某一修禅者深信自己凭借“四禅”和“四空处”已经获得最后的决定解脱，可是他实际做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事实上，他仅仅是徒劳地摇摆于“苦恼（平常的意识）”和“由于独处而发生的身体轻安”之间，或者顶多是摇摆于“非肉体性的禅悦”和“非苦非乐受”之间而已。换句话说，尽管这些禅定成就给人带来暂时的，甚至是较长时间的解脱感，它们还是不能对苦的问题作出决定性的一劳永逸的解决。修禅者出定以后，会发现自己毫无改变。

第二个原因，如同《损损经》所示，就是与佛陀开悟后的修行法门的圆融相比，这样的禅法显得单一而偏狭，完全没有触及到智性和德性方面的发展。我们可以拿登山为例，看看究竟为何会这样。尽管登山运动所锻炼出来的能力和心理素质，会有利于登山者个性更广的发展，可是这些能力和素质却未必一定如此。这是因为勇气和耐力这类品质，也可以被用来达到非常不道德而且带有破坏性的目标。所以，虽然佛陀掌握了禅法，可是光靠这些禅法是不足以把他从普通人的醒觉生活中解脱出来的。

关于佛陀舍弃了什么，重要的是获得一种持平的观点。一方面，他舍弃了瑜伽教师认为他们的特殊成就已经导向最后解脱的主张。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暗中接受了禅定是最高精神工具的主张。特别是“四禅”频频出现在佛经里，它们被认为有很大的功用。一个熟习“四禅”的坐禅人，会具有很强的集中精神的能力。对他来说，“其心平等，清净离垢，柔软调柔，具足光明”（《中部经典》，第3卷第243页），就像金子在被做成饰品之前，被金匠熔解和提纯一般。这种心境的专一平等——它当然不是佛教坐禅人所独有的——到时侯可以被用来达到最后的目标，也就是佛教所特有的开悟和解脱。

佛陀对“四空处”的最终看法，我们更难以判定。一方面，在三藏各处散落的经文中，它们频频被提及，被当成是很接近于最后解脱的大成就。若以同样类型的更多努力，把它们再往前推进一步，就可以达到“想受灭尽定”（complete cessation of what is perceived or felt）[21]。可是，总的来说，三藏中已经说得很明白，这种“灭尽”也还不是最后的解脱，因为在那之外还需要智性和情意上的转变，也就是要获得佛教的智慧。佛陀明显愿意接受许多种解脱道，甚至那些十分接近于他的瑜伽教师所授解脱道的道路。可是，最后目标的证得，还是得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步骤，一种思想和感情上的质变，而非一种禅修精进中的量变。

亲证的价值

佛陀与瑜伽师相遇的史话，其用途绝不止于此而已。这是因为，它还指明了佛陀所要选取的积极而有创造性的方向。这从他批评瑜伽师的用语中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佛陀在这里认为有缺陷的不是他们提出的理论——尽管对他们可能持有的理论在佛典中有很多地方作了抨击——而在他们的践行上面。他们的不足乃是源于不管以何种关于精神世界的观点来包装他们的禅定法门，这些法门本身就是不完备的。一方面，这显示出佛陀将要开创自己特有的禅定法门，和这些法门比起来，“四禅”这类禅法仅仅占有辅助的地位。另一方面，它还预示出一种永久态度的形成。这种态度不仅标示出佛陀的教法，也标示出他的人格，可以被称作是一种“经过严格规训的践行主义”（stubbornly disciplined pragmatism）。不管古印度货源充足的思想市场给佛陀提供了什么样的学说和行法，只有当它们表明可以在他自己的经验中发生效用时，他才会接受它们。

我们只要看看佛陀所处的社会环境，就能理解这种态度的意义。在数世纪之后，印度人之间逐渐达成一种共识，就是只承认几种权威或者有效知识的标准〔22〕，任何精神真理只有通过它们才能得到检证。这些标准在佛陀时代已经隐然存在。有一个标准干脆就是讲，一种学说之正确与否，全看它是否出现在婆罗门教典（包括诸部《奥义书》）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佛陀认为这种传统妄自尊大，它的标准也是外在的，他不会接受。第二种权威，是往世中一些令人敬畏的并且获得神启的教师以其超常的经验为根据而提出的证言〔23〕，佛陀也无意接受它。因为，在这一点上，佛陀是很自信的，甚至是很叛逆的，他确信假如苦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话，那么它一定带有只靠他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解决的性质。并且，不论如何，这些教师距离他还没有隔着几个世纪那么远，他们的知识对他而言不是一种无可反驳的超人的权威，因为他自己就曾亲眼见过他们，而且连这些教师都说任何人都可以体证他们的知识，以及这种知识所带来的解脱果（liberating fruit）。第三种权威，就是单单依凭推理或者推论，这对于佛陀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这可能和他已经形成的对禅定修行的信奉有关。所以，他只依凭第四个标准，也就是亲身的证知，亲自的

体验，“当下之亲证”（direct witnessing in the here and now）。就像佛陀所表达的，这个标准在我们看来不过是最最普通的常识，很难说是佛陀发明了它。可是，他坚持严格而一贯地使用这个标准，这是他最独特和独到的地方。

这种态度的结果，也表现在佛陀全部的成熟教法中。“不要轻信只凭听说的任何事物，不要轻信那些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传统，不要因为众人都这么说而相信它，不要因为经典上的记载而相信它，不要轻信权威、导师或长辈的教导，当你经过观察和分析后，认为事物与原则一致，并有助于个人及大家的善行和利益，才接受和实行。”（《增支部经典》，第1卷第189页）[24] 佛陀的僧徒不对未来和过去作玄想，也不会思考世界有无终始这类深奥的问题。他们把全副精力只放在一件事上，就是“这一寻臭皮囊”（this fathom-long carcass）中苦的生灭[25]。佛陀说，知识有多种可能的形式，只有那些和直接经验有关的知识，才和他追求解脱的弟子们有关。

在佛陀自己的求道过程中，这种把践行主义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的态度（this attitude of circumscribed pragmatism）[26]，绝非仅仅是盲目地投入禅定的修行。它还使得佛陀完全抛弃了伴随在他的瑜伽师[27]修行背后的那类理论。这并不奇怪，禅定修行得在某种关于修行目的何在、人体构造如何和精神环境如何的理论指导之下才是可能的。假如禅法无效的话，那么禅法背后的理论就会遭受质疑。我们当然不知道佛陀的老师[28]持有什么理论，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断言，这些理论一定是属于瑜伽/《奥义书》一派的思想。而且，从佛经中攻击它们的地方来看，在佛陀眼里它们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神我（梵语*ātman*）论，尽管在不同的体系之间，对这个内在的人格本原有很多种不同的称呼。

神我的知识[29]

争论的焦点是特殊的瑜伽知识观，因为这些体系弘扬的关于神我

的知识与其他类型的知识完全不同。从瑜伽的观点来看，知者（神我）即所知（神我），它们（指知者与所知）与知者的心境也是同一的。

为了能对这一点有所认识，我们先拿一个常识作例子来对照比较一下。这就是善巧金匠的譬喻[30]（佛陀自己经常使用这类譬喻，因为在这些譬喻身上，已经打上了佛陀那种特别崇尚践行的思想倾向的印记）。在这个譬喻里面，知者，也就是金匠，毫无疑问和他的所知本来就是不同的。身为匠人和认知的主体，他明显与自己关于金子、金子的属性和用途，以及锻金技巧的知识不同。尽管我们会承认，没有这种知识，他就不能算是金匠，可是按照常理，我们从来不会因此而说，金匠和他关于金子的知识是同一的。人是一回事，知识是另一回事。

我们也不会说金匠的心境和金匠本人是同一的。金匠可能会生气发怒，或者安静警觉，可他还是金匠。他的心境和他的知识，我们也不会混为一谈。不管他生气还是安静，他还是保有金匠的知识。在金匠身上，知者、所知和心境明显是不同的东西，尽管它们都共住于金匠一人身上。

可是，从观心内省获得的对神我的瑜伽知识却不同于此。首先，因为在这种瑜伽知识中，知者和所知是一样的：作为所知的大写的神我（Self），与作为知者的小写的神我（Self），完全是同一个东西。在宣扬这个主张的诸部《奥义书》[31]中，确实没有在“神我”的两种意义之间作出明显的区分。在这种瑜伽的意义上，“认识”自己，就是“证得”或者“变成”自己的神我。《奥义书》中所传达的洞见的力量，就表现在这个地方。因为，证见者，或者说知识的主体，达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中，它只证见到它自己。这是一种带有彻底单一化性质（radical simplification）的洞见，洞见了神我完满的自我同一。“在它（神我）之中没有差别”（《大林间奥义书》第4分第4婆罗门书第19节）[32]。要证得这个神我，瑜伽师只需向内反求诸己就可以了。

这种彻底的单一化还带来其他的结果。由于所觉和觉者不二，在

神我之中也就不存在任何可以觉知或者可以分析的属性（《大林间奥义书》第4分第4婆罗门书第13节）[33]。譬如说，假如在禅定中证得的是作为（禅定所生）喜（meditative Bliss）的神我——这是《奥义书》里常见的心诀（formulation）——那么，从禅定者本人的角度来看，神我和喜是同一的。这个喜不可能从神我当中分离或者区别出来。换句话说，假如被证得的神我是“无相神我”（Self without qualities[34]，也许近似于佛教徒的“空处”），那么就没有任何可以和神我分离开来的“无相的”心境。这是因为，在神我之中是没有“差别”的。从瑜伽师的角度，大家可以看出这一点的可信性。因为，在已经获得成就的禅定境界中，瑜伽师确实会感觉到自己正在变成禅定的所缘，自己的经验也变得彻底单一化起来。

再者，这样一种彻底单一化的感觉，也显示出神我的不动性（immutability）。这是因为，由于神我如此完美统一，所以决不能想象它会发生变化，会舍弃旧有的属性而取得新来的属性。的确，仅就其定义来说，“无相神我”就不可能被显示为会变化的。说它是不动的，也就是说它是恒常的。佛陀对此回答道，正因为这些禅境迟早哪一天就会终止，它们就不可能是恒常的。但是，对于一个深信其所求者是永恒的人来说，对禅定中所发生的稳固和彻底单一化的体验，正好能够证实他对永恒的信念。它还会证明这个信念，也就是这个恒常、不动、彻底单一的神我，超越了因果的世界，它不是被造的，它是“无生的”（《大林间奥义书》第4分第4婆罗门书第20节）[35]。它不能被分析，不能被分解为各个组成它的各个部分（《大林间奥义书》第4分卷第4婆罗门书第13节）。对他而言，它就是笼罩一切，没有差别的“宇宙的根基”（大梵）。

简单来说，神我就是一个永恒的、无缝的整体，自我同一，超越了从感官认识到的各种现象，不可分析，却可以通过修习瑜伽禅定来证得或者认识。这种从瑜伽中修得的洞见，是既有力量而又令人信服的。这也许是因为它能够穿透日常经验的差异性和潜在的纷乱，对根本实在一举提出一种简易直截的看法。这种看法的每一个组成部分——诸如甚深禅定的经验，在痛苦的现象世界彼岸存在什么的问题，

或者自我认识的本质——都会很容易地引出其他任何部分。所以，毫不奇怪，在印度教化的印度（Hindu India），尽管佛陀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挡不住这种观点继续流行传布。

可是，一旦这种观点的一部分松动了，其余的部分也就会随之瓦解。在《布吒婆楼经》里，佛陀曾经回答过沙门布吒婆楼（the ascetic Poṭṭhapāda）提出的一些问题（《长部经典》，第1卷第185页以下）[36]。根据佛陀的回答，我们可以重现他对禅定所坚持的践行主义推论是如何使他舍弃了各种神我论的。假设——还是从甚深禅定的经验谈起——坐禅人能够直接证见神我，从而获得对它的知识，那么就可以像布吒婆楼那样问：是先有甚深禅定的心境生起，随后才有相应于这种心境的关于神我的知识生起呢？还是先有关于神我的知识生起，随后才有禅定的心境生起，或者两者同时生起？[37] 这就是说，布吒婆楼是先证得一种禅定的境界，然后再想法去寻求神我呢，还是禅定境界的证得就会自动地带来神我的证得？

佛陀对此回答得头头是道："先有一种特殊的意识或者心境生起，然后才有伴随着那个意识的知识生起。"[38] 这是佛陀的禅定践行主义在现身说法了。因为修行道行很深的坐禅人，早已修得这种意识，故而知道"实由此缘故，于吾想生起"。[39] 坐禅人的修行技巧，在于控御身内的各种因缘，这些因缘成熟后会生起越来越微细的意识状态[40]。由于证得这种细微的意识状态，再加上对和它相伴的内省心理学的谙熟，就会最终证得关于神我的知识。

任何人都可看出，就算是瑜伽教师也得放弃这么多东西，因为在任何禅修体系里，总有很多的修行和技巧以及伴随它们的实用的忠告。可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整个瑜伽体系就开始动摇了。因为，从这种完全讲究践行的观点来看，既然禅境的生起是以瑜伽师的修行为因缘的，它就不可能同一于无因的、无生的、不可分析的神我。因为，禅境本身是完全可以分析的，而且肯定有其生起的因缘。

在随后的经文中，佛陀继续开演这种践行主义的各种蕴义。布吒婆楼问了另一个问题："世尊！想即我耶？抑想与我为异耶？"对此佛陀反问道："汝以何者为我耶？"这一反问的意义是因为以下事实，那

就是从佛陀的观点来看，各种神我论的基本形式虽然大体相同，但在理论上明显存在不少的变体。不同的理论会把它们不同的神我论置于十分不同的精神景观中，或者一个理论中会认为有多个神我存在，这些神我变得渐次微细一直通向最根本的神我。布吒婆楼先这样回答说："世尊！我信有粗我（a material Self，物质的神我），这个神我有特殊之形，四大〔41〕所成，段食〔42〕所养。"佛陀回答说："布吒婆楼！汝之粗我……设若真实，则心境与我，实非一物……就算承认有此粗我存在，但于此人，仍有各种心境生起，他种心境谢灭。"布吒婆楼变换策略，先提出一个非四大所成（made not of material），而为心识材料所成的（of mind-stuff）神我，再又提出一个意识所成的（of consciousness）神我。佛陀以不变应万变，重述了他的论点。如是所成的神我与意识或心境等并非一物。其理由是很清楚的，按照瑜伽派的界说，我不论是四大所成，非四大所成，还是意识所成，都是恒常不变，独立于世间的因缘的。而出于某些禅定者自己可以理解，或者在有限程度上可以控制的原因，意识的状态有其生起和谢灭，却是禅定经验的事实。所以，不管什么是恒常的，意识的状态不会是恒常的，所以它们和恒常的神我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个判断当中，有一个名词的使用对佛陀帮助不少。这个名词，被佛陀吸收进自己的词汇，成为他自己的财富。这个词（巴利语*saṃ khata*，有为法）的字根，有着"准备好"或者"聚合"的意思。可是，它的意思要远比"准备好"宽广得多。事实上，它有两个与此相关的意思，既是"愿意的"或"有意的"，也是"因生的"或"缘起的"。禅境都是有为法，它们都是靠修禅人的意志和愿望而修证的，这就意味着它们都是因缘所生法。它们的生起，都要归于前行诸因的牵引，以及同时诸缘的具足。这样一来，它们绝非"无生"的，亦非独立于诸种环境之外的。

大家也许会猜测，这可以远溯到佛陀与瑜伽教师〔43〕相遇，并研习其禅法和神我论之时。在其成熟教法里，佛陀对瑜伽教师的神我论进一步作过充分的解明，以至于实际上完全舍弃了神我论，而代之以典型的佛教无我论（doctrine of non-self，巴利语*anatta*）。无我论

说的是，不论在日常经验中，还是在禅定境界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都没有一个永恒、独存的神我〔44〕无我论很好地融入了佛陀关于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其他思想里。在他成熟的见解中，这个常住的神我实不可得而见，而神我论者就如同一个男子一样，欲求国中第一美人，却不能道其姓氏、家族及相貌（《长部经典》，第1卷第193页）〔45〕。

换言之，此常住之我，实为妄想所生，或者由于错解禅定经验而生，或者由于传闻而生。佛陀是愿意承认有一自我（self）存在的——此处用小写的self是最合适的——可是这个自我只是“世间共相，世间言语，世间名称，世间记述法”（《长部经典》第1卷第202页）〔46〕。大家可以有理由说“修炼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可是在这么说的时候，不见得会设想真有一个常住的实体。佛陀举牛乳为喻。牛乳变为酪，酪变为生酥，生酥变为熟酥，我们不能说有一种常住的实体（也许可以叫做“牛乳性”？）在历次的变化中持守自性不变：牛乳就是牛乳，生酥就是生酥。英国学者里斯·大卫〔47〕这样解释这个道理：

> “当（人格结构中的）变化达至某一点时，为方便考虑可以改换此人格的姓名称谓，人格就是按照这个姓名称谓被人知道的——就像乳制品的情况一样。可是，抽象名词只是一种方便的表达形式。任何时候，都没有作为独立实体的人格存在。”

于是，当我们说“我觉得今天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实际上是触及到了关于人性的一条重要真理。这个学说很难理解，也很有勇气，因为它导向了一片未经佛陀时代修禅者勘探过的水域。困难之一属于单纯理智理解上的。当佛陀想发展一套崭新的禅法时，这套禅法的重点就放在精细地分析修禅者的自我（小写的我）上面。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明白所谓我者事实上是“聚集而成”的，是由以前的诸因所造，靠同时的诸缘相续存在的。这个学说的细部极为复杂，可是它的基本原则却很简单。就像牛乳不断变化一样，我们所经验的自我也因若干可

以说明的原因而不断变化。

可是，真正的困难还不是在理智的理解上，而是在情意的可信性上。因为任谁都会惊骇地问道：明明知道有我，怎么能叫我接受我没有我这个怪论呢？理智上的答案可以是，人人都有一个自我，就是没有常住的神我。可是，重要的还是在于情意上的答案。任何一个企图证得或证见常住不变的神我的人，在佛陀看来注定都要失败，因为神我论是招致以后的苦恼的诱因："此（神我论）是彼等可敬沙门婆罗门的一种感觉，是他们在不适中的辗转反复。他们无知无识，被（对神我之）爱所缠缚"（《长部经典》，第1卷第40—41页）。〔48〕舍弃神我论，实乃根绝失败的潜在根源。无我论在情意上的调子，是一种平静而如释重负般的超脱。它是一种解脱，超越了神我论者遭到挫沮的努力。神我论者围着神我绕圈圈，"就像绑在桩子上的狗一样"（《中部经典》，第2卷第232—233页）。

苦行离系〔49〕

让我们暂时回到那个时刻，当时佛陀悟出那些禅定的瑜伽体系因其自身的局限，仅能引人至想的变灭无常的境界，而这个境界完全不同于他们鼓吹的目标，也就是恒常不变的神我。从这样一个结论中，随即会产生两种后果。一种后果是，根本没有常住的神我，这正是佛陀最后选取的道路。另一种后果是，神我还是有的，可是靠瑜伽不能证得它。也许还有另外一种修行法门，可以帮助我们证得神我。我们手边就有这样一种修行法门，这就是我们在耆那教那里已经熟悉的自我禁欲和极端苦行。按照这种观点，个体身上的永恒本原被称为"耆婆"（*jīva*），即"命"或"性灵"之义。因前世的罪恶业缘之力，"命"被系缚于这个苦恼世间之中。"命"受制于这种业缘之力，就如明镜易蒙尘垢一样。人可以通过不再造作恶业，从而免于这个苦恼世间的痛苦系缚。修持禁欲苦行和自愿惩罚，可以从"命"上烧尽前世因违犯善法而遗留下来的业垢，从而证得喜悦，永脱诸苦。〔50〕在耆那教中，既

无禅定修行之必要，亦无使用内省知识之必要。全靠圆满修持苦行，禁制人欲，正智[51]自得神奇地生起。

图2　佛行苦行，自饿其身，形销骨立，以求解脱，终觉无益

佛陀舍离邬陀迦·罗摩子后，转于苦行中求道。关于佛陀苦行的精勤，三藏诸经无丝毫疑义。他完全停止了出入息，以至于“有绝大风，骚扰我头……有绝大风，切破我腹，犹如巧技屠牛者……以锐利屠刀，切破其腹”（《中部经典》，第1卷第244页）。时有诸天神路

过，咸以为佛陀已经死去。佛陀于彼时每日禁食，以至于“我之脊柱凹凸，如纺锤之连锁；缘少食故，我之肋骨腐蚀破碎，如朽屋椽，我之眼窠瞳光，如穷井水光，向极深处，才可得见”（《中部经典》第1卷第245页）。因苦行之故，佛陀本来清净皎洁的形貌大为衰损，过路之人目睹其状，有把佛陀当成皮肤本黑色者。以此等难行苦行，佛陀得出这个结论：“诸有过去沙门，或婆罗门，虽受激烈痛楚苦受，若我今者，当为最极，更无驾越；诸有未来沙门，或婆罗门，虽受激烈痛楚苦受，若我今者，当为最极，更无驾越；诸有现在沙门，或婆罗门，虽受激烈痛楚苦受，若我今者，当为最极，更无驾越”（《中部经典》第1卷第246页）。[52]

可是，他同时还得出结论：“我虽以斯酷毒苦行，然尚未得过人法，逮达特殊最胜知见。”或者换句话说，他的苦行唯一可以示人的，不过是换来一付瘦骨嶙峋的模样而已。[53]“是则通达菩提，当有他道”。

中道

按旧传记载，这个结论把佛陀推到了开悟的门槛上。可是，在史料的诠释方面，它也给我们出了很大的难题。这是因为，一方面按照旧传所载，佛陀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解脱智（saving knowledge），知道了“我生已尽，梵行已成，应作已作”（《中部经典》，第1卷第249页）[54]。这里确实暗示出开悟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可是，佛陀在开悟前精进修行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这一点也很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通过修持各种法门，渐渐地改变了自己，对他自己和世界想出了一套可信的见解。在后来的佛经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来：“如海之渐倾，渐退，渐沉，未尝突落，于佛法中，亦复如是，修炼、践行、道路，是渐非顿，无有顿悟。”（《增支部经典》，第4卷第200—201页）

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矛盾呢？[55]首先，我们得承认，纯粹的传

记文字都是经过压缩的。它们都是故事，而故事的进度又相当快。构成故事的素材，不仅被当成是信史，还希望能对以后的教徒有所启发，于是就被嵌入一段较易处理的时间跨度里。这些故事带有戏剧性的张力。所以，就算我们承认开悟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当时佛陀心中一念信心（a moment of certainty）生起，相信自己已经走在正道之上，可是这种信心一定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要想把它的深义开显出来，还得花上更长的时间。

按旧传所载，佛陀认识到极端苦行的无益之后，就接受了一点施食，然后坐下来寻找另一条道路。实际上，他还是接受了一种仍然较有控制的苦行论，不过这种苦行论远离了纵欲和自苦这两种极端而已。这种比较有节有度的苦行论，他后来称作“中道”。〔56〕

佛陀忆起幼时曾坐在田畦畔阎浮树下看父亲犁地。〔57〕那一次，他第一回证入初禅，“有寻有伺，成就离生喜乐”〔58〕。他还发现，“唯斯当是通达菩提之道”（《中部经典》，第1卷第246页）。

这段叙述只是间接地涉及到佛陀开悟前已经获得的禅定成就。这些成就，一方面来自他自己养成的禅修践行主义（meditative pragmatism）的习惯，来自他关注在自身内能够靠自己而证见的东西，另一方面则来自他现在坚守不变的分析和批评的倾向。尽管他舍弃了瑜伽师的学说，却依然继续培养对身心状态的觉察，这种觉察只有靠瑜伽师的御心术（psychic technology）才能练成。假如在这些生灭变化的经验背后，找不到一个恒常不变的实体，一个大写的神我（Self），至少可以对这些转瞬即逝的身心过程的自性（nature）获得一种洞见。这里都是些可以直接验证和直接理解的东西，正是在这些身心过程上面，佛陀倾注了他全副的注意力和强烈的好奇心。这是因为，就算他找不到神我，至少可以寻得解脱。

这些努力所产生的，是一种极为殊胜的、大异于其他瑜伽师所行的禅法。〔59〕因为这种对直接经验的关注，不仅要求注意力集中的力量，还要求意识应该时时保持正念（mindfulness）和正知（self-possession），只有这样，佛陀事实上才能看到身心上面所发生的变化。〔60〕这些性质，也就是正念和正知（*satisampajañña*），在佛陀

成熟时期的讲道中都会谈到。它们要求当下可以了了分明地亲证自己内外诸法（以及他人身上类似经验）的能力。教授弟子这种修行法门的最重要的单部经典是《大念处经》（《长部经典》，第2卷第290页以下）[61]。这些念处（foundations），就是对坐禅人身（body）、受（feelings）、心（state of mind）、法（mental contents）的远离贪忧、亲切明了的觉知。这样警醒的觉知，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四禅的心一境性和行捨（equanimity），同时还需对最微细的觉知有明了的觉察。强调和开示醒觉的和热诚的观心内省，构成佛陀对禅法最独特的贡献。以此内观所得结论为缘，开悟就会随之而来。

如何才能客观对待并且分析自己的直接感受和态度呢？比如说，想努力而不掺杂欲望地来观察欲望，难道这不会破坏研究对象本身[62]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隐藏在修行的过程中。佛陀在求道之时都已经经受过这种修行过程，只是不甚系统而已。在求证禅定成就和严守苦行的过程中[63]，佛陀不断地修炼自己，使自己不去注意那些感觉和冲动，这些感觉和冲动通常都会产生作用或者反作用，从而阻碍他达到目的。他不顾禁食之时饥渴的呼求，同样也不顾因长时间坐枯禅所带来的身体上的疼痛和心神上的散乱。这样长时间修行的效果——如今日的坐禅人所证实的那样——不仅可以使人随意获得心神的安稳，而且可以打破各种根深蒂固的、机械的、无意识的习惯。通常一个人会停止禁食去吃饭，可是苦行者不会这样。通常一个人还可能因为一个姿势变得越来越难受而放弃它，可是坐禅人不会。想体会一下坐禅的感觉吗，试试这个实验吧：拿一把舒适的椅子，摆个最舒服的姿势坐上去，保持这个姿势不变，试着坐上一个小时。佛法能够预见到，几分钟内你就会想挠挠鼻子，转转手指，挪挪腿脚。如果一个人能够一心不动地观察这些欲念的升起和谢落，那又会怎么样呢？

可是，这绝非在说应和这些呼求的冲动消失了。它们没有消失，或者至少没有永远消失。在坐禅人身上，这些冲动只是不会再造成反作用。他是安稳的，其心调柔（malleable，巴利语*kammaññā*）。如果他愿意的话，就像在四禅中那样，可以暂时完全不理会这些冲动。

可是，他和这些冲动的长期关系却发生了改变，因为当他现在面对这些冲动时，他可以作出合理的而非机械的反应。

再者，因为这些感觉和冲动并未消失，他就可以随意使用在已经习惯的行捨中安然建立起来的正念去观察和分析它们。普通未曾修行过的人，可以在记忆平静，未受时间影响之时，很清楚地观察自己的苦受和乐受，以及相伴随行的冲动和感情。而当这些经验出现时，坐禅人则很快就能学会这么做。也许由于长时的修行，禅修苦行僧看待自己的苦乐和欲求，不像一般人那么强烈和紧迫。但是，这也不会改变苦乐和欲求的自性。不论如何，坐禅人可以使用记忆，以及对别人的观察，去证实他在自己身上对较好地受到控御的情绪所观察到的一切，应该也是在他人身上对较未受到控御的情绪所观察到的一切。

这种新式的禅观，叫做“止观”（“观”被称为“毗钵舍那”，巴利语 *vipassanā* ）〔64〕。它是佛陀的实验方法，搜集讯息的渠道。根据自己目前身心变化的讯息，佛陀可以建立起对人类境况的分析。

注释

〔1〕 “梵志”就是“婆罗门”的另一种译法，这里出于音律方面的考虑（“商主”是两个音节），选用“梵志”。

〔2〕 《别译杂阿含经》第15卷。意为“正如莲花生于水中，长于水中，出污泥而不染，我生于此世，长于此世，但超脱了这一世界，清净地生活”。

〔3〕 挂单：佛教名词，即云游行脚的僧人投寺院暂住之意。

〔4〕 即巴利语《圣求经》，《南传大藏经》，第467—470页。

〔5〕 “无所有处”是一种禅定的境界，后来被吸收进佛教的“四无色天”中，详见58页注释1。

〔6〕 “非想非非想处”也是一种禅定的境界，后来被吸收进佛教的“四无色天”中，详见58页注释1。

〔7〕 “结跏趺坐”（sitting cross-legged）是佛教术语，略称“跏趺”，指修禅定时双腿的坐法。分两种：一、“全跏坐”（俗称双盘），两足交叉置于左右股上，若先以右足押左股，后以左足押右股，称为“降魔坐”；若先以左足押右股，后以右足押左股，两足掌仰于二股之上，称为“吉祥坐”或“莲花坐”。二、单以右足押在左股上，或单以左足押于右股上，叫“半跏趺”（俗称单盘）。《大智度论》卷七：“诸坐法中，结跏趺坐最安稳，不疲极，此是坐禅人坐法。”

〔8〕 《印度哲学史略》（第99页）：“坐法之讲求，为瑜伽之必要条件。入三昧地，当先修坐法。在急走及睡眠之中，人心自不能加以修持。”

〔9〕 《五十奥义书》．徐梵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38页。

〔10〕 “所缘”就是“境界”、“对象”、“客体”的意思，和“能缘”（“心灵”、“精神”、“主体”）相对。

〔11〕 吕澂编译《印度佛教史略》释曰：“禅那梵云馱衍那，译言静虑，即定慧平等生起而寂静筹虑之义。此以粗细次第分为四段。初静虑，行者之心专注一境，寻求伺察而觉喜乐。寻求伺察者，为智粗细之用，喜与乐则情之内转外转分别也。第二静虑，心住一境，离于寻伺，仅觉喜乐。第三静虑，更近而离前之喜乐，别觉内门转之微细心悦。第四静虑，更进而离所有之寻伺喜乐，达于不起一切智情动摇之状态。”（第46页）

〔12〕 寻求和伺察（casual and concerted thought）分别指智慧对事理的粗和细的推求。

〔13〕 巴利语《有明大经》曰：“尊者！初禅有五支捨离，五支具足。尊者！若有到达初禅比丘，能捨贪欲，能拾瞋恚能捨昏沉睡眠，能捨掉悔，能捨疑，具足寻、伺、喜、乐及以一心。尊者！初禅有如是五支捨离，五支具足。”（《南传大藏经》，第571页）

〔14〕 “四空处”又名“四无色天”、“四空天”，是佛教所说修习“四无色定”者死后所得的果报（投生处），依次为是“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总称“无色界”（“三界”之一，另外二界是“欲界”和“色界”）。吕澂编译的《印度佛教史略》释曰：“四无色者，第一空无边处，加行时厌色而思维无边之空乃得此定。第二识无边处，加行时厌无边空思维无边识而得此定。第三无所有处，加行时厌无边形相粗动，于心所缘，舍诸所有，寂然而住乃得此定。第四非想非非想处，不如下之胜想名为非想，又非昧劣想名非非想。”（第46页）

〔15〕 原文the unseen spiritual cosmos（不可见的精神世界），应该是指“无色界”说的。

〔16〕 觉音尊者《清净道论》（叶均译，北京：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5年．第305页）：“譬如一人，看见了为些事情而集会于园堂等处的比丘众，便到别的地方去，在比丘们终结了集会之事离座而去之后，此人又来（园堂处），站在门口，再看那集会之处，只见空，只见（人已）离去，此时他并不这样想：‘那些比丘都已命终或去诸方了’，但见此处空、离去、及无有。”

〔17〕 《南传大藏经》，第355—360页。

〔18〕 原经以“四禅”为“现法乐住”，以“四空处”为“寂静住”，本书在叙述

时，顺序有所颠倒。

〔19〕 原文应译为“大损”（Complete Expunging），《南传大藏经》译为“损损”，是取《道德经》“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意思。

〔20〕 巴利语《舍弥村经》。

〔21〕 又称“灭尽定”，是佛教圣者所修的一种禅定。

〔22〕 即印度哲学中所说的“量”。下文依次讲了“圣言量”（包括宗教的圣典和宗教圣人说过的话）、“比量”（推理、推论）和“现量”（感觉、直接的认识），佛教最重视的是“现量”，不过各派之间对“现量”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23〕 水野弘元《原始佛教》（第131页）：“在《长部》十三《三明经》（《长阿含》二六《三明经》）中，有佛陀与婆罗门青年的问答，而使青年招认：当时的婆罗门，或其师们，甚至七代前之祖先们，皆无一人实际见过梵天者，亦无人听闻见过梵天者，并将祈拜这种实际上未曾见闻过的梵天之不合理，以恰如一个青年，热恋上不知住于何处，不知其姓名、家世，甚或容貌、身材的美人一样不合理等等的许多譬喻，加以述说。”

〔24〕 此处引自巴利语《伽蓝经》（参看第五章“《伽蓝经》”一节），译文采自台湾“原始佛法三摩地学会”印赠的巴利语、汉语合璧本《慈爱经·慈爱静坐法》（2005年4月修订4版，第28页，佛陀法语“羯腊摩经”），本书的文字是略引经文。

〔25〕 这句话来自《相应部经典》（略等于汉译《杂阿含经》），参看17页的，脚注1。如《四无量心》（第22页）所说：“在《杂阿含经》及在其他经中也可找到，佛陀说：这五尺的小小身体，是我们的世界，我教这个世界的生、灭、灭的道。”

〔26〕 pragmatism应当是指佛陀重视践行中的亲证，circumscribed应指不对未来和过去作玄想，把思考和亲证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27〕 指阿逻罗·迦罗摩和邬陀迦·罗摩子。

〔28〕 亦指阿逻罗·迦罗摩和邬陀迦·罗摩子。

〔29〕 本节提到的“知识”（knowledge），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文史哲、数理化的知识，而是一种神秘的宗教知识。在旧译的佛典里，一般都是用“智”来翻译，可是在现代汉语里，“智”字是不被用来翻译“knowledge”一词的。所以，为了不至于使得对照原文看译文的读者产生迷惑，本节一律用“知识”来翻译，请读者注意。

〔30〕 在本节后面引用的《大林间奥义书》第4分第4婆罗门书里，也有关于“金匠”的譬喻：“譬如金工，资（旧）像之金质，别铸为至新尽美之形，心灵蜕弃此身而祛除无明已，亦复如是，乃别制至新尽美之形……”（第4节，《五十奥

义书》，第612页）

〔31〕 本节以下主要引用《大林间奥义书》第4分第4婆罗门书中的偈颂。这些偈颂，据徐梵澄先生说，“皆诸《奥义书》智慧之菁华，因时代进步，思想皆已成熟，非复初期依约揣摩之言，皆锻铸而成颂制矣，亦无由确定谁本之谁，固传诵广远者也。”（《五十奥义书》，第618页，脚注3）

〔32〕 徐译为：“唯以意会彼，斯世无异多，若见其多似，得死如流梭。”（《五十奥义书》，第617—618页）

〔33〕 徐译为：“若人已求得，觉知此自我，于此聚集身，渊薮已深入；则为遍作者，宇宙之大化，世界属于彼，彼即此世界。”（《五十奥义书》，第615—616页）

〔34〕 也就是没有任何属性限制的神我自体，这在《奥义书》中被当作最高层次的神我。

〔35〕 徐译为：“唯悟彼为一，不变而贞恒，不垢超空间，性灵大无生。”（《五十奥义书》，第618页）

〔36〕 巴利语《布吒婆楼经》，《南传大藏经》，第98—111页。

〔37〕 这段经文的原文是：“世尊，先有想生，然后智生耶？先有智生，然后想生耶？抑智与想，非前非后而生耶？”，参看《南传大藏经》，第102页。经文里的“想”，相当于the frame of mind of deep meditation（甚深禅定的心境），而“智”则相当于the knowledge of the Self（神我的知识）。

〔38〕 原文是：“先有想生，然后智生，实由想起，而智生起。”（同上注）

〔39〕 原文是：“实由此缘故，于吾生智慧。”（同上注）“于吾生智慧”似误，因为“智慧”相当于本书的knowledge（“知识”），而这里出现的却是consciousness（相当于“想”、“意识”）。

〔40〕 即“想”（consciousness）。

〔41〕 “四大”（four elements）：指“地水火风”。

〔42〕 “段食”（solid food）：佛家有“四食”的术语，就是按由粗到细，由身体到心灵的顺序而划分的四种资益身心的“食物”，即“段食”，“触食”，“思食”，“食识”。“段食”的“段”即分段，断开之义，简单说就是可以咀嚼吞咽的食物和饮料，是最粗糙、最显眼的一种食物。

〔43〕 指阿逻罗·迦罗摩和邬陀迦·罗摩子。

〔44〕 王恩洋《佛教概观》：“佛法在整个宇宙推翻了万物的主宰‘神’，在每一个人身中推翻了主宰‘我’，在宗教上成了特出的平等睿智的教理。它说一切无主宰，佛不是神，他只做众生的善知识——善友——他不能勉强度众生，而说人人皆可成佛与他一样。这是佛教的民主精神，在一切宗教中特殊而独有的。”（第36页）

〔45〕《南传大藏经》，第106页。

〔46〕《南传大藏经》，第110页。这段话意为：一个大家共许的术语，语词的共同形式，一种世间的习惯法，一种实用的标志。

〔47〕里斯·大卫（Thomas Williams Rhys Davids, 1843—1922），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杰出的佛学家，巴黎圣典学会的创立者，其妻亦为同样有名之佛学大家。

〔48〕此处译文改写巴利语《梵网经》汉译本，参看《南传大藏经》，第30—31页。

〔49〕本章标题是Release from bondage through self-mortification，直译就是“通过对自己实行苦行（self-mortification）而从系缚（bondage）中获得解脱（release）”，主要内容是讲佛陀在获得开悟前修行苦行的事迹。“离系”是“解脱”的另一种说法。

〔50〕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常人正智为业所蔽，离系成道，业已烧尽（苦行原字之义为烧），得无余智，同时遍照，净寂长存，成阿罗汉。”（第45页）

〔51〕这里提到的“正智”，是指耆那教里获得解脱所必需的智慧。

〔52〕引自巴利语《萨遮迦大经》，参看《南传大藏经》，第534页。

〔53〕王恩洋《佛教概观》：“当时的宗派多修苦行，耆那教尤甚，它是宿命论者，以为人生之苦是由历劫多生的罪恶造成的，既成为罪恶，必应受苦果，苦既受尽，罪自涤除，因此说：人愈能提前受苦，合并受苦，积极地自觉自动地受苦，受苦已尽，自然解脱。佛初修行，便严守它的教条，而极端受苦，至于六年之久，而终不得道，后来悔悟，改换途径，才证菩提，因之排斥苦行。以为有情的罪恶，唯有更造善业，乃至无漏善业，乃能抵消，乃能拔除。决不是单独受苦所能消除的。比如有杀人罪者，不是自杀便成无罪，自杀并不能于人有益的，如果能做出救得十人百人的事业，那杀一人之罪，自然消了，而且还有功了。”（第7页）

〔54〕引自巴利语《萨遮迦大经》，参看《南传大藏经》，第536页。

〔55〕这个矛盾就是：“开悟”究竟是一个渐修的过程呢，还是瞬间的顿悟就够了？

〔56〕王恩洋《佛教概观》：“佛反对宿命，反对苦行，但也反对纵欲，他说纵欲为极乐行边，苦行为自苦行边，前者灭性，后者戕生，他便主张少欲知足的中道行，少欲不是绝欲，生活所需必得享受，知足便应适可而止，禁止贪求，不要因而损害身心，侵夺他人，扰乱社会。”（第7页）

〔57〕印度古代习俗，国王每年要亲自耕种田地，以祈求来年的丰收，类似中国皇帝每年开春在先农坛举行象征性的耕田仪式。佛陀的父亲净饭王曾经在佛

陀幼时举行过这个仪式。

〔58〕 这是“四禅”中“初禅”的特征，“有寻有伺”（accompanied with casual and applied thought）是说“初禅”还伴有“寻求”（casual thought）和“伺察”（applied thought）两种粗细不同的心理活动，“成就离生喜乐”（and with bodily happiness and the mental pleasure born of seclusion）是说住于“初禅”的人会感觉到因为“远离欲恶不善之法”（seclusion）而生起的（born）“身体上的幸福感”（喜）和“心理上的快乐感”（乐）。

〔59〕 这种禅法就是佛教独特的修行方法“四念处”（亦称“四念住”）。“念处”是以智观境的意思，指在精神专注的状态中按照教理认真思考“身”是“不净”，“受”是“苦”，“心”是“无常”，“法”是“无我”，以此破除那种以“不净”为“净”，以“苦”为“乐”，以“无常”为“常”，以“无我”为“我”的“四颠倒”的思想（请参看性空法师讲《念处之道：〈大念处经〉讲记》，“法悦丛书”第1种，台湾嘉义市：香光书乡，2006年）。

〔60〕 《念处之道》（第68页）：“修习四念处须具备四个条件——具备热诚、正知、正念三心，以及去除身心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如果修行者不热诚、不正知、失念，无法去除贪欲与忧恼，那么他的业处就无法成功，此四个条件是随观念处不可或缺的要素。”原文中的a power of concentration、mindfulness、self-possession，大约分别相当于热诚、正念和正知。

〔61〕 巴利语《大念处经》，参看《南传大藏经》，第282—293页。

〔62〕 指被观察的欲望。

〔63〕 “求证禅定成就”，指佛陀在阿逻罗·迦罗摩和邬陀迦·罗摩子二人门下学习“无所有处”和“非想非非想处”一事；“严守苦行”，指佛陀禁食自苦，以至形销骨立一事。

〔64〕 “毗钵舍那”是“观”（insight），“奢摩他”就是“止”（meditation），合称“止观”（insight meditation）。

第四章

开悟

在佛化诸国中，佛陀之开悟，一般被认作是在阴历毗舍遮月（Vesakha）——相当于四五月份——满月时的某夜，佛陀坐在一棵硕大的菩提树下（*ficus religiosus*）时发生的。佛陀圆证“三菩提”（*sambodhi*）[1]，先获得对人世本相的正智，此智可使人获得解脱；次乃获得正信，信己身已从人世烦恼中解脱。早期圣典将许多法门，当然都是那些最重要的法门，全部都看作是佛陀在开悟之夜所悟得的。这样一来，佛陀全部成熟教法都得归于开悟一事。就算此说并非句句真实，那天夜里所获得的正智和正信，一定是一切成熟教法的基础。

佛陀的开悟，生发于两个主要信念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张力。第一个信念就是：解脱答案的寻得，须求之于对止观中所亲证的所有经验细节作特别的关注（尽管那种禅法的明确形式也许还没有完全成形）。可是，假若佛陀所得的仅仅是这种信念，那么他大概只能成为瑜伽思想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贡献者。而他的另一个信念，则是深信轮回（transmigration）的真实。佛陀对轮回的看法，为其教法在人类生活中创造了活动的机会和感化力，使其远远超越了瑜伽一派狭窄眼界所能关注的东西。佛陀的原创性来自于他对个人经验的深细分析，而他的重要性则是来于他接受了这种为印度人所共同信奉的转世投生说。

在佛陀那里，对轮回转世的信仰，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深刻的道德严肃性问题。在其他教派的教法中，轮回转世说一般都伴有一套关于精神世界（the spiritual cosmos）的精致而复杂的学说。轮回就发生在这个世界之中。一个人升天入地，一时变成动物，一时变成天神，一时在做某层地狱里的居民（the denizen of some hell），一时又投生为刹帝利或婆罗门（a Warrior or Brahman）[2]，奴隶或国王（佛教后来对这类观点作了很多发挥[3]）。可是，对于佛陀来说，轮回的任何特殊细节，都不如轮回背后的原理来得重要。这个原理就是：人的任何作为都有其道德上的结果，这些结果谁也无法逃脱，不是在此生，就是在来世，必然要应验在他的身上。世间有一种根本的

道德秩序。一个人偷盗，口为妄语[4]，与别人的妻女私通，或者“行恒河岸，杀或使杀，截或使截，苦或使苦”（《长部经典》，第1卷第52页）[5]，而最后竟然不会招致恶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天地之间有一种不受人我控制和摆布的[6]道德因果律，所有人都要服从它。恶行在今生和来世必然会招致苦报。佛陀的教法好像只是注重个人私我的解脱，只面向那些有情识的存在者（sentient beings）[7]，只有这些存在者才能感受苦恼，才能从苦恼中获得解脱。可是，佛法也能触动作为道德主体（moral agents）的有情，身为这种主体的有情不但能影响到自己的福德，也能影响到别人的福德。佛法的某些部分，似乎只谈个人解脱（personal liberation），有些只谈天理人伦（morality）。可是，对佛陀来说，这两件事总是紧密而必然地联系在一起。

四谛

与开悟最密切相关的法门主要是和个人苦恼以及个人解脱有关。这就是四圣谛论（Four Noble Truths，巴利语*cattāri ariyasaccāni*）。在四谛法这张大伞下，可以说是概括了佛教的一切心要法门。四谛的表述是仿自医疗上的诊断：这是病症，这些是病因，这是关于病能否治愈的诊断，这是治病的方法。[8]病就是“苦”（suffering，巴利语*dukkha*）。苦是这样一种状态，它包括了英语里的suffering所包含的一切意义。但是，在此意义之外，苦还有更多的意思，这个较宽的义域，我们必须时刻记在心里。第一圣谛是说，谛实[9]有病，也就是说，谛实有苦。这就是苦圣谛（Noble Truth of Suffering）。第二圣谛是说，有诸苦因可得。这就叫苦集圣谛（Noble Truth of Arising of Suffering），它包含了对诸苦因的叙述。第三圣谛是说，谛实有苦灭，这就是苦灭圣谛（Noble Truth of Cessation of Suffering）。第四圣谛就是灭苦之方，也就是苦灭道圣谛（Noble Truth of Path Leading to Cessation of Suffering）。

我们来依据旧传看看第一谛，也就是指出有苦存在的圣谛。按照旧传的描述，佛陀在开悟后不久就开示了苦圣谛："苦圣谛者，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愁悲忧恼苦。"（《相应部经典》，第5卷第421页）[10] 在这里，把巴利语的*dukkha* 翻译成英语的suffering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苦是我们一般都能认识到的那种苦，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层面上，它伴随着人生的全体：只要我们有生，我们注定要经受生苦、病苦、老苦、失去所爱者的苦和死苦。这种从长远着眼的看法认为，生死相续的过程，不过就是任何人生命中都要遭遇的烦恼在一生又一生中的增广。我们所有的经验，甚至普普通通幸福的经验，都是被痛苦和烦恼包围着。因为从长远来说，我们终有一死，所以苦的问题是很迫切、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层面上，苦谛论很接近其他出家者所共持的观点，就是世俗生活只是痛苦的泥沼。可是，佛法并没有变成老套的悲观主义，这缘于它和一种精心构建的人类命运观的联系。当对苦谛继续作描述时，这种观点就逐步明晰起来："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11] 这是更短时间层面上的苦，因为它可能在一年、一天甚至一小时内就会出现。这种苦与佛陀对可直接观察之物的特别关注更为相关。它还是对苦所作的一种更加普遍的描述，不仅因为它伴随着人生中的历次危机，还因为它每天都会出现在日常的境遇中。这些日常的境遇，也许不会引起悲伤，但会使人刻骨铭心地意识到失败、挫折或者未能实现的愿望：诸如错失的机会，徒劳的努力，令人腻烦的按部就班的生活，生活中和别人难免的磕磕绊绊。在这里，*dukkha* 就不一定翻成suffering，而是某种虽然事情不大，但却常有的经历：比如不舒服、不满意或者不餍足。在佛典三藏中，这一点通过许多故事表现出来，比如求官者的凄惶不安，农人的焦虑，家庭生活中的摩擦和挫沮。这种学说把苦带进日常经验的轨道中来，因为它指出了生活本身无法避免的无常性（changing nature），这种无常性吞没了一切我们以为是安稳而坚固的东西。

可是，这样一种观点在佛陀的时代也为其他学派所共同信奉。所以，要想找出完全属于佛教独有的东西，我们还得看看描写第一圣谛

的最后一段："略说为五取蕴苦。"[12] 这条对苦的定义，可以说是引向了佛法中最具有独创性的东西，引向了佛陀对苦的看法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佛教圣典中有关人类困境的描述，这部分的描述经过了充分的论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根据这种描述，苦如细针密缕一般地织进了人生经验的每一条纤维中。这里的经验，是被放在最小的时间尺度上来考虑的，即在一秒一秒的刹那中，仿佛被放在显微镜下一样，接受观心内省的坐禅人客观而冷静的诊视。在显微镜的放大下，*dukkha* 带上了另一番意思，就是不完善（imperfection）、无常（impermanence）、变灭（evanescence）、不堪能（inadequacy）、不实在（insubstantiality）、不完全（incompleteness）、无法宰制（uncontrollability）。使人产生悲伤的大灾大难，使人发生不满的生气光火，只是内在于一切经验中的那种根本的"不完善性加无常性"——也就是"苦"——的比较明显的例子。就其迁流无常、变动不居、无法宰制、最终无法令人满足来说，经验本身就是苦。

要想看看这一切是怎么运作的，我们且拿"受"（feeling，巴利语 *vedanā*）来作范例。"受"是禅观中鼓励大家当作直接内省对象的所缘之一，它也是"五取蕴"之一。受可以分为身受和心受两种，也可以分为苦受（unpleasant feeling）、乐受（pleasant feeling）和不苦不乐受（neither pleasant nor unpleasant feeling），也就是捨受（neutral feeling）。这样一来，修禅观者思维观察身心上正在生起的经验时，随着生起的受的不同，会发现此为乐受，此为苦受，此为不苦不乐受。比方说吧，坐禅结跏趺坐时觉得膝盖疼，这就是苦受；因为能够长时坐禅，并获得少许禅定境界而愉快，这就是乐受；介于苦受和乐受之间的许多感受，比如对静静呼吸过程的感受，则为捨受。再比如说，禅室外面汽车喇叭的轰鸣，可以产生苦受；夜莺的鸣啭，可以引生乐受；下雨声也许既不产生乐受，也不引生苦受，它什么也不产生。尽管某些感受中的一部分如是如是生起，并引起人的注意，甚至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比如上边提到的膝盖疼，或者也许会不断重新回来，可是不需要我们用多深的禅观力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佛

陀把受看作是无常的。前受才灭，后受即来，就算是在大的禅定成就中，受也不可能保持永驻。佛陀所探索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最后应该以何为依？"按照这个诊断，肯定不能以受为依，因为就算是乐受也会因变坏而产生苦。这就是说，当时可能会觉得是乐，乐受中却载着不安稳的种子，或者说乐受自身内部解体的种子。通过观心内省发现的苦谛，是一种关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关于不断变化的过程的真谛。这种过程由于不能主宰自己，常在变化之中，从而造成不堪能和无法令人满足，所以不过就是苦而已。

进一步说，不堪能性浸满个人身心的一切经验。佛陀对人的身心提出过几种不同的分析性描述〔13〕，每一种描述都是为了适应不同的情况而提出来的。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描述都是描述一个过程，而非一个恒常不动的实体。在佛陀的眼中，个体更像是一团燃烧的火，或者一条湍急的瀑流，而不是用来盛装经验的坚硬器皿，或一块可以把知觉往上刻写的不动石板。我们的语言很容易掩盖这一点，因为我们习惯于想到相对稳定不变的身体和心灵，它们接纳着变动不居的经验，从而认为可以独立于经验之外来描述心灵和身体。可是，佛陀的语言却很特殊，在这种语言里，经验和身心复合体被放在一起，作为过程的一部分来描述。这里举一个这类描述的例子：

> "以眼为缘，于色而生眼识。三事和合（即眼根，色境，眼识）有触，缘触有受，而想所受，觉知所想，迷执所觉知。"（《中部经典》，第1卷第111—112页）〔14〕

按照这种说法，经验的对象，经验的器官（比如眼根），还有由此产生的经验意识，也就是"心识"，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三者之一，若缺其二，是不可想象的。用佛经里的比喻说，它们就好像束芦一样，相持不倒。〔15〕

进一步说，经验的这些特点，比如受、想、识，也可以被说成是在"心"里面，它们"是结合的，而非别异的，于此等法不得以分解知其差别"（《中部经典》，第1卷293页）〔16〕。如是从诸色尘（objects

of perception），经过诸色根（physical organs of perception），到受、想、行、识，只有一个变动不居、相依相持的复合体存在，这个复合体可以被称作“个体”或者“自我”，但其内里实无任何常住者可得。

五蕴

“五蕴”（five aggregates，巴利语*pañcakkhanda*）这个佛教术语，就是对这个过程所作的分析性描述之一。这个描述暗含了这个过程的无我、变化和相互依持的性质。第一蕴是色蕴（materiality），它包括四大（physical objects）、根（sense organs）、身（the body）[17]。另外四蕴是受、想、行、识。在这些“蕴”中，亦即在这个身心过程之中，包括了属于个体和他所经验的一切东西。受蕴只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而已，是禅观可以发现的一个方面。受蕴的变灭性和不堪能性，刻画了整个过程的特征。这就是所谓：“略说一切五取蕴苦”。或如佛陀在别处所说：“如五蕴生、坏、灭，比丘，汝之生、坏、死，亦复如是。”（《最胜义光》，第1卷第78页）

这看上去像是一种调子很阴郁的学说，大家出于本能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在这个世界上，肯定还有点儿幸福的东西吧？其实，佛法并未否认经验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满足感。禅观的修行已经假定，坐禅人了了分明地见识过这样的幸福感。苦就被当作苦，乐就被当作乐。但是，不能认为，这种幸福感会是牢靠的，并且能够延续下去。

可是，这还未能充分地答疑解难，因为这种怀疑的真正根据是在别的地方，也就是在质疑者的经验和佛陀的经验完全不同这一点上。苦的教义预设了佛陀身处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没有两样，同样易受病、死、天灾和人类压迫的侵扰伤害。在佛经里，苦正是以这些方式被宣讲着。但是，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人生的这种易受伤害的脆弱性被压制下去了，或者说通过繁荣、医疗进步以及那些负责隐瞒死亡的特殊机构，被弄得不那么引人注意了。没有对人生如朝露一样危

脆的觉知，人们就不会有理由把不满足这类小不如意与死亡、疾病、长期的挫败等大苦大难联系在一起。结果呢，大家可以忍受各种小的不适（佛教僧侣也在学着这么做）。可是，对那些在自己的经历中体验过这种危脆性——这种危脆性可能是来自心理、社会以及物质方面的——的人来说，小不如意和大苦大难之间的这种联系，就有很强的说服力。〔18〕

苦因

四圣谛的宣说，尽管实际上既简短又直白，它里面还是有很多戏剧性的张力。因为，假如苦真的是这样一种无所不在、永无了期的过程，它的起因会是什么呢？怎样才能进入这个轮回，看看是什么在推动它轮转不停？从这个视角来看，第二圣谛（有苦因可得）也就是苦集圣谛的发现就是开悟中最引人注意的内容。有些佛教徒把集谛的发现赞为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中，佛陀发现了所谓的“造屋者”（the 'house-builder'），也就是这个有缺陷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存在的原因。据说，佛陀在开悟时说过这样的诗偈：

多生轮回中
探寻造屋者
而未得见之
再生实是苦
造屋者已见
不再造新屋

（《法句经》，第153—154偈）〔19〕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佛陀会在哪些方向上寻找这个原因。有一个方向可以从佛陀那种践行主义的倾向上看出来。他不倾向于从纯粹抽象的角度看待这些原因，而是使用来自实际行动中的各种类比。比如说，坐禅人被比作冶工〔20〕，或者被比作调心如同调箭的矢工〔21〕。

佛经里有一处（《中部经典》，第1卷第240—243页）讲到佛陀开悟前的求道生涯，佛陀把他的努力比作一个人在钻木求火："譬如润湿活树，投诸水中，有人执持最上钻木来……不能钻使起火发焰……任何沙门婆罗门，亦复如是，身及诸欲，从莫之离……纵受激烈痛楚苦受，彼等不能逮达知见无上正等觉……譬如润湿活木，使离于水，置诸燥地，有人执持最上钻木来……不能钻使起火发焰……任何沙门婆罗门，亦复如是，身及诸欲，从莫之离……纵受激烈痛楚苦受，彼等不能逮达知见无上正等觉……譬如已离于水置诸燥地干燥枯木，有人执持最上钻木来……能钻使起火发焰……任何沙门婆罗门，亦复如是，身及诸欲，而能离着……纵受激烈痛楚苦受，然能逮达知见无上正等觉……。"〔22〕 这种思维方式很是微妙，因为它承认有辅助、增上（enabling）的因缘条件〔23〕，比如木棍的干燥性等等。可是它把最主要的原因放在施动者（agent）身上，也就是坐禅人或钻火人身上。这个主要的原因被当成施动者一般，就如同一个使事情产生结果的人。把苦因比喻描写成"造屋者"，正是出于这个意思。造"屋"的材料，必须准备停当，就差一个"建造者"，一个有目的性的和能动性的本原。因此，在寻找苦因的过程中，佛陀是在寻找某种能动而有目的性的东西。在此程度上，这个东西很像是一个施动者或一个人。

而且，这个本原在其他方面也得像一个施动者。首先，就像坐禅人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以使其禅法变得完善一样，这个本原必须可以回应改善的行为。就像一个人或一个施动者一样，它必须是可以改正的：对待"造屋者"必须能像对待自己一样，否则就不会有任何解脱的可能。其次，就像这个本原的行动效果在转生的过程中对他人和自己有道德性一样，他还得像一个道德的实行者，也就是一个行为有善恶的人。这些想法也许看上去太抽象了，与佛陀的那种践行主义并不一致，可是它们却指出了佛陀必须克服的行动上的障碍。对这一切最简单的解释，也许就是认为有目的性和能动性的本原就是一个施动者，一个神我、人格或者灵魂。可是，佛陀有很好的理由破斥这个观点。的确，在他的禅观中，他只发现了有一个无我的过程，也就是苦的过程。他必须得透过这一切发现一个本原，这个本原在许多方式

上很像一个施动者或者人格，可是它最终还是无我的，完全不是施动者和人格。

下面就是他发现的：

“诸比丘！苦集谛者，即：渴爱引导再生，伴随喜贪，随处欢喜之渴爱，谓：欲爱，有爱，无有爱。”（《相应部经典》，第5卷第421页）[24]

驱此一大苦聚向前的，是渴求或欲望。巴利语taṇhā一词，从字面上讲，就是“渴”的意思。正是这层意思，使得这个词显得活灵活现。然而，它在术语上则是意为“渴求”或“欲望”。在这层意思里，它是无法满足的渴求，“随处欢喜之渴爱”（which seeks fresh pleasure now here and now there），不论此生还是未来的无数世，缘此而有轮回转世。而且，因渴求“伴随喜贪”（bound up with impassioned appetite），火的譬喻自然不会不被佛陀注意到。在旧传以为是佛陀早期所说的《火喻经》（《相应部经典》，第4卷第19页）中，经验的每一层面都被描写成“被欲火洞烧”（aflame with desire）。

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多方面是诗意的，而非理智的，纯技术性的。佛陀成道前后所主要从事的，多半就是把这个观念的蕴义阐发出来。当然，渴求可以被说成是带有目的性的：渴求就是渴求某物，感到渴就是感到因　　何物而渴。“爱生于何处，止住何处耶？谓世有可爱喜者，则爱生于此处，止住此处。”（《长部经典》，第2卷第308页）[25]　　在大多数对渴求的描述中，常常都有突出这个积极欲望，也就是“渴求感官快乐”的倾向。这乃是出家人的清教主义在现身说法。的确，在出家人中，欲望的观念是很普通的：它是阻碍出家人证得自我或者清净灵魂的大障碍。但是，通过把它提升到一个自主原则的地位，佛陀扩大了欲望的定义。对他来说，渴求也包含着嫌恶。“无有爱”（thirst for non-existence）讲的恐怕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既可以渴求吸引他的东西，也可以渴求逃避和解脱叫他感到不愉快或不乐意的东西。我们渴求的东西很多。我们渴求所有的感官快乐——性欲的、味觉的、嗅觉的、触觉的或其他什么的快乐。我们内心深盼脱离

痛苦。我们渴望富贵和权势。我们甚至贪恋自己的身体，或者在来世想换一躯新的身体。甚至还有一种“见爱”（thirst for views），就是事事都想正确，事事都要知道内情，所有问题都要求得答案。

渴求可以被总说成是“有爱”（thirst for existence）。当然这就是所谓“引导再生的渴爱”（thirst which gives rise to repeated existence），可是也许我们最好把它想成是想变成和现在的经验所予的不一样的东西的那种渴求 。它打扮成不同的样子，骨子里还是同一股不息的追求，追求达到新的状态，成为新的存在，获得新的经验。同时，他还追求餍足和恒常，可又总是遭受挫折。“世人著有，变异不居，既被有覆，悦乐著有。有情所喜，是险所在，有情所怖，是苦所在。”[26]（《无问自说》，第3品第10种《世间经》，此处依据智髻比丘[27] 的读法）再生可以是经验前后刹那的再生，也可以是从此世到他世的转生。但是，不管这两种情况如何不同，却都是那种想变为他物 的欲念所生之果。

这就是在较大范围内渴求的有目的行为，因为它包括了一切有情识的生命。但是，就如佛陀其他教义中所见的那样，这个宏大的观点还得靠一点一滴的经验来证实。在这个观点下，渴求实际上已经被当作“行蕴”（impulses，巴利语*samkhara* ），写进“五蕴”这个对身心经验的总体描述之中了。我们回到前面的例子。一个人修禅观坐了很久，逐渐感到膝盖疼痛。就因为觉得这样有不快感，他很想换一个姿势，这一想就是一种想通过活动来获得安适和解乏的冲动。实际上，这个冲动正是那个不快感的能动而有目的性的一面：它随不快感而生起，和不快感无法分开。在一般的环境下，你可能就自动地改换了坐姿，连想都不带想的，甚至也许完全没有意识到它。同样的事也可以用来说乐受：在坐禅时，你可能感到昏昏欲睡，自己不知不觉地跟着这些感觉就动了。或者，你坐禅时饿了，在继续坐下去之前，很想自己吃一些点心。若不是去努力坐禅，许多这些冲动恐怕都不会被我们注意到，它们变得太快了，前后相续飘忽而过。在这种微观的观察下，经验中被发现有一个不停行动的基础，一个在短时间内会有有目的性冲动的基础。佛陀把这种行动看成是制造 经验。“彼‘心’‘意’‘识’，

日夜时刻，须臾转变，异生异灭，犹如猕猴，游林树间，须臾处处，攀捉枝条，放一取一。”（《相应部经典》，第2卷第95页）[28]

通过止观获得的这种对存在的驱动本原的洞见，影响着佛陀的思想，是引导他理解人世本相的根据。由于冲动是习惯性的和自动的，根本不假思索，而且也不履行决定的功能，没有理由像其他出家沙门一样，把它看成是某个人或者神我的工作。它只是一种习性，是生命根基上一种能动的倾向，这个生命有着特殊的和招致灾难的无限再造自身的能力。作为一种习性，佛陀把它称作“取”（clinging，巴利语 *upādāna*）。这种习性事实上已经写进了“苦圣谛”，因为它写全了就是：“略说一切五取蕴苦。”（《相应部经典》，第5卷第421页）这些不同的术语——取、爱渴、行、渴求——每一个都从不同方面说明了有情生命背后和内部的那种活动。它们都指向同一个东西，就是无我的能动的本原。发现了这个本原，就等于回答了佛陀的问题：“我是怎样陷进这个苦境中来的？”

可是，佛陀并不认为，单只爱渴就足够解释轮回了——他的缘起说绝不许这个问题只有单一的或者简单的解答。在痛苦的轮回受生的过程中，爱渴也许只是主要的动因，此外还有辅助、增上的因缘条件，没有这些条件，爱渴就会毫无用武之地。在这些原因里，有一个原因的地位尤其重要，就是“无明”（ignorance）或者叫“痴”（delusion）。在沙门和瑜伽师之间很流行一种观点，就是他们独享一种特殊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他人完全不知道的。可是，按照佛陀的习惯说法，他得到的知识绝不像关于神我的知识，是一种秘传的真理，而是一种对万法如实的（*things as they are*）洞解。相比之下，人们一般来说并非那样无知——比如对税务法规或者对神我无知——但确实被愚痴所困扰。[29] 人们总是认为，这个世界上会有恒常而稳固的满足，可是事实上世界却充满了痛苦。人们都错了，这样一来就得任由爱渴来摆布了。爱渴、无明和苦之间的关系，很像热、氧和火之间的关系。热是原动力，可是没有了氧，火是烧不起来的。“诸比丘，有爱生起，有别因缘，某物长养，若无助缘，即不能行。长养者谁，即为无明。”（《增支部经典》，第5卷第116页）。

爱渴的道德意义

到此为止所谈的教义，都是和道德无关的。它们是一个立场超然的专门家，一个出家人，对其他同样关心个人解脱的人所宣讲的。但是，佛陀也深信一切有情都服从于道德因果律的法则，他极为关心行为及其对他人影响的评价。因此，在佛陀的思想中，这些和道德无关的教义，就和其他部分的教义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其他部分的教义指向人世境况中根本的道德意义。

我们先从“行”（impulses）说起。就我目前所描写的来看，“行”几乎未带任何道德意义。可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们。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意图或选择（intentions or choices）来考虑，这两种意思都包含在关键术语“思 ”（*cetanā* ）中。有时候，把“思”翻成“选择”（choice），是最近于本义的。因为，“思”是一种心理活动，出现在言或行之前。可是，“思”还包含了意图这个意义。因为，佛陀认为没有表达出来的意图，它们本身也会有一种效果，如果没有表达于心外的话，至少是表达于心内的。佛陀主张在人世的事务中，具有根本意义的还是心理上的选择或者意图，这就是所谓“心为法本”（the world is led by mind）（《相应部经典》，第1部第39页）〔31〕。所以，比如在为佛教僧团发展出来的戒律中，只有有意的行动才被视为犯戒，而无意的行动——比如睡觉时、发疯时或受胁迫时的所作所为——是不应遭受责罚的。

这一观点包含着很多意义。它意味着，意图是不能忽视的，它们也会有果报。意图也会造业，它们本身就是业。这就是术语“羯摩”（karma）的意义。它最初只是“做”或“行”的意思，可是在佛教上还有“意业”这层意思（羯摩不像我们西方人现在习惯用法中所假想的那样是称呼行为的结果 ）：“因抉择故，思为羯摩——意业——以有思故，有身语意业。”（《增支部经典》，第3卷第415页）〔32〕每人有何种意图，每人就有何种世界。意图在造业，我们在苦中收获业

果。这些业果形成我们日后心灵生活的历史，就仿佛战争或者条约、瘟疫或者繁荣形成一个国家日后的历史一样。

谈论冲动和强烈愿望的时候，不一定非用带道德色彩的语言不可。可是，选择和行动却正是道德论述的材料。一个人可以作出或好或坏的选择，一个人的行动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而事实上，从佛陀的观点来看，无意识的 冲动实际上和有意识的 选择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在于，冲动产生时不知道它们自己在本性上也是选择。它们是在误以为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没有其他更好的行动方式时作出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渴求（渴望）这个相对中性的名词，可以被视为贪欲（greed），也就是某种在道德上应受谴责的东西，佛陀时常就是这么说的。贪欲也许从对世界本相的愚痴那里得到助缘，可是它自身也是不道德的，是一种应受谴责、亟待改进的习性。此外，贪欲在佛典中经常和嗔恚相伴。因此，从一种纯然道德的观点来看，是由于不善选择，为贪嗔所缚，我们才给自身带来在转世投生中遭遇的痛苦。我们对自己所犯的恶，以及对别人所犯的恶，是完全一样的，全都来自同样的根源。苦集谛可以这么说："贪欲所烧，嗔恨所焚，愚痴所误，为彼等所屈，煎迫于心，人自招苦，使他人苦，使自他苦，忧悲苦恼。"（《增支部经典》，第3卷第55页）[33]

或者，换句话说，贪、嗔、痴这三种习性，可以使我们造恶业伤害他人，同样地，它们也使我们命终投生受苦。使人轮回的道德原因，正是受苦的原因。但是，这就引起一个严重的问题来：到底这种原因是在如何起作用的？对于持有神我和灵魂的学说而言，这个问题就很好解答。神我自造业，自招果报，按其善恶，转世投生。就其自身来说，这个基本结构是可信的，因此细节方面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可是，如果没有神我的话，那该怎么办？

答案（如《长部经典》，第2卷第15经[34] 中所述）要从一个新的身心的出现，也就是一个崭新的心理生理实体的出现说起。怎么出现的呢？当心识投胎结生（the descent of consciousness into a mother's womb）时，它就出现了。[35] 乍看起来，这种思想很是原始，可以追溯到早期印度人关于儒童[36] 入胎的观念。可是，这种答

案纯属空想，超出了佛陀反复叮咛的只以自己所亲证者为真的主张。可是，晚期的佛教注疏家相信，心识的降世投胎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人失去了知觉时，就会说“黑暗降到他身上”一样。而且，这个结生相续的心识（the enlivening consciousness），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不是一个经过伪装的神我，而是由各种因缘和合而成的。

那么，依次还有些什么因缘呢？其中之一就是“生”（the act of physical generation），但是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行”。这里的“行”，应该理解成意图或者心理行动，它带有道德的性质，以此性质塑成了来生新的心理生理实体的性质。如果行是善的，那么新的身心就会秉赋好，际遇幸运。如果是恶的，就会禀赋不好，际遇不幸。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神秘的“行”是什么？事实上，它不过就是前生身心临命终前的一念。它绝不是神我，而是跳过此生与他生间隙的最后一点能量，就像佛教后期典籍中的一条材料所比喻的，仿佛火从这支灯芯传到另一支灯芯。它也无法摆脱前面的因缘，因为它是习惯性心理活动的产物，而这种习惯性心理活动又是在前世生活的无明和贪爱的覆从下形成的。这样一来，这个过程可以一直向前回溯，事实上可以追到无始之时。

在这个叙述中，没有根本的实体，只有事件的川流。这条事件的川流，有其自身的历史。荷载这部历史前进的，不是神我或者灵魂，而是被包括在爱渴和苦下面，由因缘果报形成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了解了这种相互作用，也就等于是了解了人世境况的本相和缘起。许多佛典都把这看作是开悟的基本内容，佛陀称其为“缘起”（dependent co-origination，巴利语*paṭ icca samuppāda*）。所谓“缘起”者，是指倚仗诸因诸缘之间必然的相互作用，就好像倚仗燃料、热量和氧气等的相互作用才能产生火一样。在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像神我或灵魂一样，可以最终独立于其他因缘。这样一来，缘起就有了两种功能。第一种功能是，它驳斥了恒常独存的灵魂观念；第二种功能是，它描述了苦的缘起。附随于缘起论的学说，包括了我在前两个圣谛名字下面谈到的所有内容，尽管用语略有不同。它通常（但不总是这

样）包括了十二个支分[37]这十二个支分里包括的，从那些描述心理生理实体的，比如色根（感觉器官）和受，到对苦的生起根源的各种描述，比如无明、爱、取、行，可以说应有尽有。当然，它也包含了苦[38]。尽管我们会猜想，作为一种学说，缘起论出现在四圣谛论之后，可是它实际上早就内涵于四圣谛论之中，内涵于佛陀对爱和苦的理解，以及内涵于佛陀对由爱生苦的相互作用的理解当中了。

医苦

第三圣谛就是苦灭谛，证实了苦的疾患实际上是可以治愈的。尽管没有恒常的造业受果的人格，无我的过程也是可以获得改造并且得到救治。这就是说，人可以获得解脱。在四圣谛中，灭谛的内容相对平淡，似乎是仅仅为了凑足医疗诊断的四句格式而设立的。可是，它还是针对着佛陀时代流行的一套主张而发。这套主张犹以邪命外道（Ājīvikas）[39]为其代表。邪命外道认为，转世投生是一个自动而机械的过程：每一个有情，不论其造了何种业，必须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转世投生一次，最终命定会证得解脱，所以任何特殊的努力都是不必要的。一个邪命外道很可能问过佛陀，他自己的诸法缘起说最后是不是也会得出和邪命派一样的结论。这些因缘不管多么复杂，难道最后不是也得像一座部件复杂、上满发条、嘀嘀嗒嗒走起来的闹钟一样，达到一个在机械上早已预先注定的结果吗？[40]佛陀回答这个问题说，尽管每个人的禀赋和能力都是由前世的环境所造成的，可是人仍有能力在今生有限的范围内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每个人可以按照四圣谛论所描述的，对世界作如实的观照，以求驱散心中的无明。人也可以遵照佛陀所宣讲的出家人中庸有节的修道生活来控制自己的贪欲。

第四圣谛是苦灭道圣谛。在这个圣谛里面，可以说是包含着（医苦的）药方，或者说医术。它通常被说成是八支正道（the Noble Eightfold Path）[41]，可是在经律当中，也已经被方便地划分

成“戒”（discipline or morality，巴利语*sīla*）、“定”（meditation，巴利语*samādhi*）、“慧”（wisdom，巴利语*paññā*）三学。所谓“戒”者[42]，就是一种闲寂（pacific）、诚实（truthful）、正直（upright）、彻底检束身心（thoroughly disciplined）的生活方式，不伤害自己和他人。对佛陀的僧徒来说，这就意味着要过一种乞食、甘于贫困（却非自苦）、独身不娶、温和端方的生活。尽管佛陀和他断欲出家的弟子们，制定了一整套与佛教原则相应的戒律，可是这套戒律从根本上说也许和佛陀开始求道时所守的戒律没有多大的差别，这套戒律受到了当时沙门出家者团体中流行的道德理想的启发。

八正道的第二部分是定学。一部分禅定和戒律相关，诸如努力制御六根，不做失德之事，培养善良、饶益、善巧的心境，并带着这种心境去做事。与此相对，就是不仅要避开恶行，而且要避开恶的心境，这种恶的心境不会使头脑清楚，只会使其愚痴。在这个背景之下，定学基本的技巧，就是使意识集中，再辅以平等的心境，而这种禅法的控御，就为止观打下基础。可是，止观的修行，不全是坐于闲寂之处。因为，它还要求有一个总的态度，就是自我忆念，意识明了，对周围的环境、内心的经验和自己的业果每天每夜每时每刻保持注意。[43]当佛陀的弟子被授以这套禅法时，它已经较为系统化了，可是佛陀在他的求道过程中，却是很不系统地修成了这套禅法。八正道的这前两个部分，可以被想象成一套技艺，特别是像画家所习的那些技艺，比如打草、填彩、绘景等等。就像这些技艺最后都要融汇成绘画活动这一更大的技艺一样，所有戒律和禅定的单独修炼，都会融汇成一种单一的醒觉而安静的生活方式。

可是，画师的各种能力必须和感受性，也就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相结合。并且，与此相似地，八正道的第三部分——慧学——也要求一种全新的观察经验的方式。这种新的观察的一个方面，很简单，就是对世界作如实的观照。对佛陀来说，就是通过四圣谛和缘起来观照：以如是如是的方式，经验生灭无常，没有恒常的自我，为缺憾所苦；以如是如是的方式，爱欲不断地产生苦恼。

智慧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养成一种从禅定的平等心境中产生的

新态度，心灵的一种新习惯。现在可以置身于经验之外，看出经验中的种种危险，然后转身离开。当转瞬即逝的快乐和渴望闪现在心灵的眼睛前面时，可以观察它们，而不再追求它们。对这种感受性最简要的陈述，大概要算这条普通的戒规了，这就是僧人“不应耽着于当下，不应取著各种境界，应该随意舍弃”。或者这一段：

“（比丘）于自心，不应妄构画，希求而创造，身心诸境界。亦不求造就，境界之毁灭。世间中万法，以不希求故，即不取著法，以不取著故，身心不焦虑，缘此是比丘，内心常寂静。”（《中部经典》，第3卷第244页）[44]

一个人既不要希求未来的经验，也不要黏着于现在的经验，而是要让它们很容易地从指缝间溜走。

佛陀对这一点有过详细的开示。在《蛇喻经》（《中部经典》，第1卷第22种）中，佛陀曾说“筏喻法”（the Simile of the Raft）。他举例说，有一个人被大水所阻，就用水边散置的木头扎了一个木筏，然后安全地漂到了彼岸。佛陀问道，如果此人到达彼岸后，将此木筏载于头上，带着它一起赶路，那么他这么做合理吗？答案当然是不合理了。佛陀接着说，执著于戒律和禅定所创造的有益的心境，同样也是不合理的，更不用说执著于无益的心境了。[45]（这当然就假设了通过习惯和修炼，有益的修行已经变成了僧人的第二天性。）这也同样适用于思想：沉溺于对过去或者未来、永恒、世界的命运等等问题的玄想和理论当中，就是使自己迷失在“邪见的稠林”（a tangle of views, a thicket of views）之中。相反，人应该凭借从止观中获得的洞见，以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观照世界。这种洞见就好像艺术家观察事物的方式一样，包含了良好的修养，却又是最直接的，完全不受反思的干扰。此时，人就逗留在一种敏锐的感受中，佛陀在他对解脱境界最有诗意的一篇描写中曾经描述过这种感受。其中提到的瀑流是指生死的苦流：“我住时沉，求时溺，我如是不住不求，以渡瀑流。”（《相应部经典》，第1卷第1页）

这就是涅槃，“吹灭”存在中的一切欲望和忧患。[46] 佛陀宣称，

思索开悟者和解脱者的心境，只会招致混乱和疯狂。可是，虽有这样有用的劝说，这一类的思辨还是在后来的佛教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在我们评价佛教是如何赢得我们的肯定的过程中，思索开悟者和解脱者的心境是必不可少的。佛典中对开悟的叙述，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一个人要么已经开悟要么未开悟，要么已经解脱要么没有解脱，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完全是在刹那之间完成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况且，导致佛教在佛陀灭后数代之间发生第一次部派分裂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已获解脱者〔47〕有无退转（至少暂时的）的问题。出于同样的原因，晚期学派对开悟到底是顿还是渐的问题，也发生过争论。

这些难题指向的，就是佛典中用来描写这类不可思议的事情时所用语言的问题：为了达到叙述上的一些目的，在讲述佛陀开悟 的史话时，就需要一种突然而带戏剧性的转变。如果说开悟只是一件获得确信，知道自己“所作已办”之事，那么这种突然而带戏剧性的转变也许是可能的。佛陀发现，他完成了解脱的一切要求，不再需要继续向前奋力苦斗了。可是，解脱 是一件不同的事，因为我们这里正在谈的，是人的性格上的一种翻天覆地的转变。这种转变，好像不可能像佛典中描述的那样，不需要在逐渐控御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的全部领域以后就发生。在这方面，开悟需要继续被证实，在此后的经验过程中，还得表现出实际的效果。我们可以承认，佛陀是在一个月圆之夜开悟的，可是他获得解脱却是一件漫长的，需要用他的一生来完成的大事。

图3　在这座渊寂的塑像里，佛陀刚刚入于般涅槃。佛灭之后归趣如何，如同世界有始无始一样，是佛陀说过的不能获得有意义回答的问题之一。涅槃之境，超过人的思议，超过生死轮回。

关于解脱的各种理论

佛陀关于解脱的概念究竟是否可信或者可行，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对于解脱结束了死和转生之苦这个主张，我们确实说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我们无法为这个主张作严密的论证，也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但是，这个主张却和——这带有典型的佛陀的风格——另一个更加具体的主张有关系。这个主张就是，解脱在今生就可以证得。关于这个问题，佛典还留下了不少可供讨论的根据。佛陀从未主张过，在入土之前解脱可以终止生理上的痛苦。这是因为，痛苦被认为属于身体的本性（而成就了“四禅”和“四空处”的人，却可以依靠禅定来暂时缓解自己的痛苦）。佛教修行所要一步一步消除的是心理上的痛苦，还有生存中外来的和不必要的忧悲苦恼。还有，关

于修行的效果，佛典给了我们一个相当清楚的观念：佛陀的僧徒“于过去无忧，未来不欣乐。现在随所得，颜色常鲜泽”（《相应部经典》，第1卷第5页）[48]。

精勤修行背后的原则，就是旨在“颜色常鲜泽”地活在当下。佛陀把这种原则称为“如理作意”（thorough reflection，巴利语为*yoniso manasikāra*）。“如理作意”者，乃是这样一种践行法门，就是对每一中道行会招致的果报作用心而又深细的思量。“诸比丘，以依正思维故，未生诸漏不生，已生诸漏捨离。”（《中部经典》，第1卷第7页）[49] 实际上就是讲，任何修行于带来长远的改变之外，必得带来当下的福报。这里面当然存在着一种张力。从一方面来说，僧侣的生活是艰苦的：他必须从事的修行，开始时都让人感到不舒服。可是在另一方面，所修诸行因为并没有被设作苦行，所以修行效果的出现不会被无限期地延迟，它们在一定时期内就会获得验证，而且还被认为有益于众生。应对繁难之事现在都成了僧侣们的第二天性，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次静观身心经验的本性和要求的难得机会，除此之外，这种静观确实还能带来一种心智上的快感。佛经中反复叮咛说，这样一种生活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一种神圣而英勇的职志。这种评价支持着僧侣们的修行，他们转而又受到身边同修的肯定，还从周围的社会获得对他们这种勇毅精神的赞赏。

而且，对修行法门中一门的掌握，不仅自身可以带来功德，而且也被认为可以自然而然地进一步引向纯熟。比如说，僧人如果戒律精严，做任何事就能无悔，远离悔心和焦虑。由于一个人于人于我皆能不害，他的良心清净，趋于寂静，以此为本，到时侯禅定必能成就。如是渐次纯熟，就被认为可以达到一个顶点，远离一切客尘烦恼。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重要之处，在于它是自然的。在像佛陀这样的计划中，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就是，一方面要把欲望当成敌人，而另一方面，解脱这一最终目标偏偏又是僧人不得不欲愿向往之事。怎样才能放下这种对解脱的热切欲望呢？按照佛陀所说，人当以当下修行的所缘——比如说持守戒律——为愿望的目标，结果自然就会成就。“修行精纯，严持戒律者，无需作意，‘让我离悔’。诸比丘

僧，但持戒律，自然离悔，法性如是。”（《增支部经典》，第5卷第2页）〔50〕 当一个人一边愿欲，一边放松身心进入修行的每一阶段时，第二个阶段就会水到渠成地准备好了。最后一个阶段的证得，完全不是靠一味地去愿欲，而是靠现在已经成为习惯的放松身心。

关于人的素质，佛陀的看法是，可以通过止观对它作有成效的研究，并且可以通过修行佛法来彻底改变它。这一观点的内在协和性是很难挑剔的，可是我们最终的评断必须建立在经验之上，建立在经验的证据之上。在今日的斯里兰卡，我曾对若干阿兰若僧〔51〕做过实地调查，只能提供一点自己的经验。（我发现）很多和尚明显都是身体健康，少欲知足，“颜色鲜泽”，“心无懊悔”，这一点本身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是，说得公正一些，这也许只是平静的生活带来的结果。我和这些僧人相处时间不长，而只有常年相处才能亲眼观察和理解修行佛法是如何慢慢地改变了他们的性格。

那些看上去直接从事佛法修行的僧人，一共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们对名为“功课”的事会很有兴趣，也可以说是很执著地投入进去。所谓“功课”，就是他们每小时每分钟都在做的一些日常工作——习经、用心饮食、卫生、坐禅、经行（exercise）〔52〕——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他们深思熟虑地完成着这些日常的任务，从中很明显地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第二个特点是，有些僧人也会在一些长期的工程（比如修建林中的禅舍）中投入很大的精力，花费掉他们生命中的大量时光。可是，（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他们却没有任何的焦虑感，对其努力工作所产出的结果，也都保持比较漠然的态度。他们都能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但对于成功却完全不感兴趣。这些扎根于内心深处的态度，距离常人的生活非常遥远，却和佛教那种生活于当下的理想极为接近。而这些态度的养成，我不难将其归因于出家修行。

图4　斯里兰卡的阿兰若僧与丛林中的野生动物和睦相处。他们深知一切有情〈比如这只大松鼠〉都不能逃于怖畏和困穷，所以都以慈忍对待他们。图中人物为阿兰若僧喜吉祥比丘，在拙著《吉祥楞迦岛的阿兰若僧》一书最后一章中，我讲述了他勤苦而有价值的一生。

只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僧人在面对林间野兽时表现出来的勇气，最能使我相信修行是有效的。有两回吧，我都是走在丛林中，忽然间和一只被惊吓的野兽迎面遭遇，它冲着我发威——一次是野猪，另一次是大象——挡在我和野兽中间的，只有一个僧人瘦小的身体，和他那种岿然不动的镇静神情。每一次，僧人都是态度坚决而不带攻击性地对着野兽平静地说话，野兽最后钻进了丛林深处。这种行为远远超出常人的期盼，它生动地证明了修习佛法可以怎样深刻地改变一个人。当然，这还不能证明佛法就是真理。可是，它却引得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佛陀的哲学，这种哲学针对人的素质的本质和能力，的确有些东西可以教给我们。

注释

〔1〕“三菩提”，巴利语“正觉”的意思。

〔2〕 原文Warrior大写，后面又跟着“婆罗门”，所以应该是指代表武士阶层的“刹帝利”种姓。

〔3〕 这是指佛教文献中十分庞大的《本生经》，它们都是通过讲述众生在前世善恶轮回的故事，以达到宣扬佛家学说的目的。

〔4〕“妄语”是佛教术语，就是说谎、撒谎的意思。

〔5〕此处引自巴利语《沙门果经》，参看《南传大藏经》，第37页。

〔6〕所谓“不受人我控制和摆布的”（impersonal），本书一般用它来翻译佛教术语“无我”。

〔7〕 sentient beings就是佛学术语“有情”，指有感觉或思想的存在者，以区别于没有感情或思想的存在者（比如山河大地、木石星辰）。

〔8〕 水野弘元《原始佛教》（第59页）：“此四谛，正如医生治疗病人的病时，首先要正确地诊断其病状以了解其所患者为何种病，其次要追究病因——其病由何种原因产生，这是很重要的。同样是下腹部疼痛，若不正确地诊断是腹膜炎，或是盲肠炎，就无法治疗。诸如应予冷敷却予以暖敷，应予温热却予以冰凉，如此错误之处置，或许会使病情更加恶化。故作为一个医生，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确地诊断病症，并正确地把握其病因。其次所必要的是，要知健康体为何种状态的正确标准，并要有使病者恢复健康体，对其病应施以何种治疗法、养生法、健康法的正确知识，而应依其知识，采取适切无误的方法。如此始可治愈病人的病，令其得以恢复健康体。如上述，正确地了解病状、病因、健康

状态、治疗方法之四诀，据此采取正确无误的措施（治疗），乃是医治肉体之病的医生，最为重要的事。与此同样的道理，对于医治精神上疾病——人们的苦恼——的宗教家而言，需要正确地了解苦的现状，苦的原因，无有苦的理想状态，脱离苦的修行方法，即苦集灭道之四谛，而依此采取正确无误的措施。由这一点，佛教之四谛，乃被比喻为医生之治病四诀。”

〔9〕“谛实”是汉译佛经常用语，就是“确实”和“的确”的意思，译者用它来翻译表示强调语气的“indeed”和“in fact”。

〔10〕此处引巴利语《转法轮经》。

〔11〕“怨憎会苦”就是“不喜欢见到的人，却偏偏遇上，甚至要朝夕相处”，实在令人痛苦；“爱别离苦”就是“亲爱的人却要分开，不管生离或死别”，最令人心痛；“求不得苦”的“求”，就是“在找寻什么，想要得到什么”，“‘求’是一种爱，当我们努力于某个目标却得不到时，就会有苦受”（《四圣谛与修行的关系——〈转法轮经〉讲记》，第48页）。

〔12〕意为：总之，身心中所有的体验……皆为痛苦。

〔13〕此处指佛教法相学中所谓“三科”，即五蕴、十二处和十八界。

〔14〕此处引自巴利语《蜜丸经》，参看《南传大藏经》，第421页。意为：依靠眼睛和可见的对象产生了视觉意识。这三者（眼睛、观察对象和视觉意识）的统一形成了接触。依靠这种接触有了感受，一个人知觉到所感受之物，并思考所有知觉之物，然后从思考过的事物中发展出各种相关的观念。

〔15〕汉译《杂阿含经》第12卷曰：“今当说譬，如智者因譬得解。譬如三芦立于空地，辗转相依，而得竖立，若去其一，二亦不立，若去其二，一亦不立，辗转相依，而得竖立，识缘名色，亦复如是，辗转相依，而得生长。”

〔16〕此处引自巴利语《有明大经》，参看《南传大藏经》，第570页。

〔17〕“根”指“眼耳鼻舌触”五种感觉器官，“身”指躯干和四肢。

〔18〕最近的例子，大家可以想一想功夫明星李连杰。他在印尼海啸中经历了生死大难（所谓人生的“危脆性”），对生命的意义有所觉悟，于是就开始他的“一基金”慈善计划。

〔19〕引自巴利语《法句经》第十一《老品》，参看法增比丘译《南传法句经新译》，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2005年，第22页。原文剩余的偈子说：“椽柱均断折，栋梁亦摧毁，我心证无为，一切爱欲灭。”（第23页）

〔20〕巴利语《法句经》第十八《垢秽品》第239颂：“刹那又刹那，一分又一分，智者渐除垢，如冶工锻银。”（第32页）

〔21〕巴利语《法句经》第十《刀杖品》第145颂：“治水者导水，矢工调弓箭，木匠绳其木，善行者御身。”（第21页）

〔22〕此处引自巴利语《萨遮迦大经》，参看《南传大藏经》，第529—

531页。本书英文未引原文，译者为了使意义更加醒豁生动，改为引用原文。

〔23〕 这就是佛教中很重要的“增上缘”。所谓“增上缘”就是各种有助于或者无碍于事物发生的条件。

〔24〕 此处引自巴利语《转法轮经》，参看《四圣谛与修行的关系——〈转法轮经〉讲记》，第62页。这段话意为：诸位比丘（指出家后受过具足戒的男性僧人）呀！苦集谛就是，“渴求”或“爱”引导我们走向再生，它和“欢喜”与“贪欲”一同生起，随处寻找新鲜的快乐，“渴求”分为三种，即“对感官快乐的渴求”、“对存在的渴求”和“对非存在的渴求”。

〔25〕 此处引自巴利语《大念处经》，参看《南传大藏经》，第289页。

〔26〕 《小部经》，台北市：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2007年8月，第112页

〔27〕 智髻比丘（Ñānamoli, 1905—1960）是英国人，牛津大学毕业，二战时担任英军情报部门审讯官，战后于1948年至斯里兰卡出家，圆寂后所留遗稿《清净道论》和《中部经典》英译本，以及佛学字书《南传字典》等，由菩提比丘（Bhikku Bodhi）整理出版。

〔28〕 《杂阿含经》第12卷，第289、290经。

〔29〕 这句是说，佛教的“无明”或“痴”，和科学或哲学上的“无知”不是一类东西。科学和哲学上的“无知”是没有“知”，佛教的“痴”是“知”有了毛病。

〔30〕 这一段汉译《南传大藏经》未收，是译者自己的翻译。意为：啊，诸比丘，对存在的欲求有一个特殊条件，它被某物滋养，没有它就不会生长，什么是滋养物？那就是“无明”。

〔31〕 《杂阿含经》第36卷，第18经。

〔32〕 这一段汉译《南传大藏经》未收，是译者自己的翻译。

〔33〕 这一段汉译《南传大藏经》未收，是译者自己的翻译。

〔34〕 即巴利语《大缘经》，参看《南传大藏经》第169—177页。

〔35〕 《大缘经》：“‘缘识有名色’，既言之矣。阿难，云何缘识有名色，当如是知。阿难，识不入母胎时，名色于母胎，犹得结成耶？（阿难答曰）是实不然，世尊。（佛复问）阿难，识入母胎后，若归于消灭，犹得现名色相耶？（阿难答曰）是实不然，世尊。”

〔36〕 “儒童”（homunculus）就是“侏儒”、“小人”的意思。

〔37〕 这里指十二支缘起论。十二支缘起论可以按顺逆次序不同，分为“流转缘起”和“还灭缘起”两种形式。“流转缘起”说的是生命生死轮回一面，即“缘无明有行，缘行有识，缘识有名色，缘名色有六处，缘六处有触，缘触有受，缘受有爱，缘爱有取，缘取有有，缘有有生，缘生有老死、忧悲苦愁恼种种苦生。”“还灭缘起”说的是生命修行解脱的一面，即“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识灭，识灭故名

色灭，名色灭故六处灭，六处灭故触灭，触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死、忧悲苦愁恼种种苦灭。”（参看水野弘元《原始佛教》，第34—54页）

〔38〕 按指流转缘起第十二支的“老死、忧悲苦愁恼种种苦？”。

〔39〕 “邪命外道”为拘舍罗·末迦黎子所创学派，是佛陀时代“六师外道”之一。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第46—47页）：“拘舍罗乃一坚持命运论者，如耆那教经谓拘舍罗曾曰：无人力，无作，无力，无精进，无人势，一切不变，均系前定。……我如是见——凡已完成未完成或将完成者，须经八百四十万大劫。于此期中，均须依次转生，七次为天上神，七次世间入无想胎，七次世间入有想胎，而终须七次再生于不同之身体，而于此轮回除尽五业三业半业之效用，各依十万六万六百之比例——如此乃达完成。”

〔40〕 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第47页）引佛经曰：“以如是斛量苦乐，于轮回中，不可变换，无可增减，无可多少，如掷缕丸，缕尽便住。”

〔41〕 “八支正道”又称“八正道”，为组成道谛的主要内容，依次为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参看水野弘元《原始佛教》，第64—71页）。但是，本书讲述道谛，并不依八正道，而是根据三学。

〔42〕 水野弘元《原始佛教》（第87页）：“戒学，是修行方法中，特别对情意性、习惯性的恶德，加以矫正而令趣向善德的方法。正如戒（*sla*）有习性、习惯之意，不论是善或恶，习惯性行为皆称为戒。然通常恶的方面称之为破戒或恶戒，单称戒时，即指善的习惯性行为。故以世俗的意义而言，戒亦可谓是道德的行为。因为*sla* 相当于英文的moral或ethic之故。”

〔43〕 水野弘元《原始佛教》（第71页）：“正定是正确的禅定，是精神经常统一之意。但这并不一定仅意味着坐禅时之特别的精神统一，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热衷于某事而达到三昧之意。……吾人不必特别训练正定，只要热衷于某事，埋头做时，自然可得正定的状态。”

〔44〕 此处引自巴利语《舍弥村经》，译文是译者根据本书作者的引文翻译的。

〔45〕 引自巴利语《蛇喻经》，参看《南传大藏经》第444页。原文是：“诸比丘，譬如有人，步行通衢，乃见大水，横流于道，此岸危险，而多恐怖，彼岸安稳，无有恐怖，然自此岸，达诸彼岸，既无渡舟，又无桥梁。彼乃思念：‘是大横流，此岸危险，而多恐怖，彼岸安稳，无有恐怖，然自此岸，达诸彼岸，既无渡舟，又无桥梁。然我唯有汇集草木枝叶，编制椑筏，依是渡筏，劳以手足，当得渡于安稳彼岸。’诸比丘，于是彼人，汇集草木枝叶，编制椑筏，依是椑筏，劳以手足，而得安全，得渡彼岸。达彼岸已，旋作是念：‘此筏益我良多，我依此筏，劳以手足，安全到岸。于戏，我将以此筏，或载于头，或荷于肩，如是而

行。’诸比丘，于意云何，彼人于彼筏，如是而行，为作所应作否？（诸比丘言“不也世尊”）诸比丘，彼人对于彼筏，应为如何。诸比丘，缘是已渡得达彼岸之彼人者，应作如是念：‘此筏益我良多，我依此筏，劳以手足，安全到岸。于戏，我将置此筏，或曳置岸上，或沉浸水中，然后始行。’诸比丘，彼人为如是故，是于彼筏，作所应作。诸比丘，我亦如是，为令度脱，令毋执著故，说筏喻法。诸比丘，由是汝等，实知筏喻故，法尚应捨，何况非法。”

〔46〕 水野弘元《原始佛教》（第17—18页）：“涅槃（梵语Nirvana，巴利语Nibbana）一语，是由‘吹灭’（Nir—va）之意而来，系指贪欲、嗔恚、愚痴等烦恼之火被吹灭的状态而言。”巴利语《法句经》第七《阿罗汉品》第90颂：“道尽（生死轮回尽）无忧患，解脱于一切（五蕴），漏尽无结缚，炽盛欲火灭。”（第15页）

〔47〕 即南传佛教最高果位“阿罗汉”。

〔48〕 《杂阿含经》第36卷，第995经。这段话意为：（佛教的僧侣）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忧愁和悔恨，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不存希望，他们只生活在当下之中，因此他们经常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49〕 此处引自巴利语《一切漏经》，参看《南传大藏经》，第330页。

〔50〕 这段话意为：对于一位修行有素、严格持守戒律的僧人来说，没有必要有意地去想，“让悔恨远离我吧”；诸比丘啊！持守戒律就可以远离悔恨，这是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

〔51〕 “阿兰若”就是“森林”的意思，是佛教或其他教派修行禅定或修行苦行的地方。

〔52〕 金克木在《天竺旧事》中写道（《梵竺庐集》乙《天竺诗文》．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19页）：“在鹿野苑的斯里兰卡（吉祥楞伽）的和尚过午不食，只饮一碗牛奶；到了傍晚，诵经声一停，便出来‘散步’。这大约是佛教经典（律）中往往提到的佛和弟子们的‘经行’。不过缅甸的和尚并不天天走，中国的和尚从不参加。那时住在鹿野苑的赏弥老居士也遵守同样的戒律习惯，到傍晚就拿起杖来上大路。我经常陪着他走。那不是中国古人的‘行散’，所以本不应当叫做‘散步’。那是一言不发飞快地走路，是印度式，不是中国式。”

第五章

弘法和圆寂

从长远来看，佛教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它变成了世界性的宗教，直到今天还盛行于全球人口最稠密的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大陆地区，而且现在还在往西方传布。可是，只要我们稍微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佛教的成功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是真理的胜利前进。佛陀在世时，以及此后的数世纪中，佛教在印度平等地与各个宗派相互竞争。直到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期，也就是佛陀圆寂十到十五世纪之后，佛教才在亚洲其余地区牢牢地站稳脚跟。然而此后不久，它却从印度本土渐渐消失。佛教史可以划分为若干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在起作用。对佛教来说，这些因素经常都是外在的。所以，就算我们都承认佛法充满洞见并且切实可行，可是仅仅这些优点本身还不足以被认为是佛教历次获得成功的原动力。

然则佛教的确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虽不至于积极地推动了佛教的远播，但至少使其传播变得可能了。这些特点的证据可以在以下事实中发现，就是凡在佛教传入的地区，它都能比较容易地与当地其他的宗教传统相融合。佛教在古印度和斯里兰卡与古印度教[1]共存，到了汉地和道教（Taoism）与儒教（Confucianism）并存，传至中国西藏和苯教（the Bon Religion）[2]并存，在日本和神道教（Shinto）共存。佛教如今又在东方适应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西方和自由的人道主义以及有自由倾向的基督教相融合。在所有这些环境中，佛教徒能够一方面为了达成若干世俗、宗教或民事的目的而坚守原住民的信仰，同时又可以保持佛教对心性和人类行动的最终目标所持有的根本主张。换句话说，佛教身上很少传教型宗教所特有的那种蛮横。佛教从根本上说是宽容的、四海一家的、随遇而安的。所以，当面对自己无法控制的某类环境所造成的机遇时，它可以很好地适应。

这种随遇而安性是基于佛法中三个互相联系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完全是诉诸人人共喻的人情，比如对苦与乐的感受能力，自利和利他的能力。当然，你也可以反对说，印度其他的教派，当然还有其他世界性的宗教，都体现了类似的诉诸人性的努力。第二个特点就

是，在佛陀身上，这种普世主义的纲领完全是抽象的，所以它才能真正做到普世主义。我们可以在好些地方看到这种发挥作用的抽象性，比如佛陀对四禅的描述。这种描述和许多禅修体系以及各种不同的禅修目的都是一致的。在同样一种精神下，佛陀对智慧福德的看法是既不反对也不宽恕印度那时刚形成的种姓制度，他只是抽象地谈论人的行为，其用语完全和种姓的存在与否无关。不论在种姓社会之内，还是在种姓社会之外，佛教都可以生存。第三个特点是，这种抽象性在佛法中还总与一种有意保持的节制性有关，这种节制性体现在应用佛法于个人经验结构之时。对于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佛陀完全拒绝发表任何意见。因此，一方面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当中，对世界持有完全不同观点的人，都能在佛法上达成一致意见，而另一方面，佛教徒也可以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佛陀的教法上面增益各种完全不同的法门，这些法门来自对当地传统和环境的适应。

佛教和在家众

可是，还有一个根本的难题未能澄清。我在前面对于佛法的描述，只限于对一小部分自愿并且能够全身心地从事出家修行的僧人而说的。可是，由于佛教是被整个整个的民族所接受的，所以这就意味着，接受佛教的还有不“舍家修出家行”的在家众。佛教是如何从一种少数人的教法发展成一种面对大众的教法呢？这种精英分子的启示，有什么可以传达给世俗大众的呢？这些问题的解答表现在佛陀成道后的生涯中。

对佛陀成道前和成道时的生活最可信赖的描述，见于若干字数稀少且内容简单的经文之中。这些经文好像是佛陀在谈论亲身的经历，无论在时间上相距多远，都可以远溯到佛陀对弟子亲口所说的教法中。接受这一点，相对还是很容易的。与此相比，叙述佛陀成道后生活的最古传说（我在这里和后边所谈的都是指《律藏·大品》的开头部分说的）都是以第三人称来叙述的，这些传说明显是在佛灭后若干世

纪中成形的，充满了带神话色彩的细节，因此不大可信。可是，它们至少还是传达出佛陀的个人解脱是如何演变成一种对世界民众的传教事业。

佛陀弘法事业的开端被披上一层特别神秘的外衣，包裹在传奇故事当中。当佛陀正在独享法乐（the consequences of his discoveries）的时侯，他认为世间众生被无明所覆，要对他们宣讲妙法，只会徒劳无功，不会有任何的利益。就在这时，梵天现身了。[3] 如佛教传说所特有的那样，此时现身的梵天仅仅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他可以起到支持人的自我转化这个中心情节的作用。[4] 他请佛陀看在还有“眼中尘垢较轻的有情”的份上出来说法度人，这些有情一定能够很好地回应佛陀的法音，并且知感佛恩。佛陀慷慨地答应了梵天的劝请，出于“愍念有情”（out of compassion for creatures），准备广传他医苦的良方。被佛教徒视作给世间冥暗带来光明的决心，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件事的真相已不可考，可是这个传奇性的小插曲却给人带来很大的启发。首先，它指出佛陀成熟教义的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佛法体现的主导价值不单单是解脱，还有作为第二个主导价值的慈悲，也就是对他人的关怀。在佛陀的道德严肃性中，在他倾向于使用道德词汇，并且倾向于依照心理活动对他人产生的影响来描述心识活动的习惯中，的确都寓含着慈悲。对佛陀来说，慈悲和解脱密切相关，是人性的目标和主要的情操。可是，在上述的传奇中，慈悲的意义与它和它的附随物在后来详细开演的教法里所具有的意义相比，还是比较狭隘的。在这里，慈悲只是佛陀身上所具有的个人特点，是他决定弘法的充分动机。而且，它之为慈悲，所针对的目标是特殊的，那就是传播佛陀出家修行的法门。

在佛陀传奇的这一部分里，很多内容都与这种慈悲的结果有关。这种慈悲的结果，就是成立了追随佛陀的僧团。佛陀（决定弘法后）不再独处，渐次云游至波罗奈城，住于仙人堕处（Isipatana）鹿野苑（the Deer Park）[5] 中。他在那里遇到了开悟前的五位同修。佛陀放弃苦行后，五人以为他违背修道的初志，乃弃之而他往。[6] 佛陀

对五人初次说法，此即后来的《转法轮经》，其中讲到了中道和四圣谛。五人接受了佛法，成为佛陀的弟子。从那时起，很多来自沙门和苦行者团体的人都皈依了佛陀。佛陀的很多次说法，都是面对这些沙门团体。这些团体在当时流动性很大，极易从一个师傅改投到另一个师傅的门下。从历史上说，这一点还是很有可能的。可是，现在最要紧的还是建立一个崭新而持久的团体，就是由追随佛陀的徒众组成的“僧伽”[7]。这时的确可以感到，以前普遍存在的流动团体，正在各处定形成独立的有自己法规的宗教社团。

可是，佛陀的听法众十分广大，不限于宗教的专门家（the religious virtuosi）。在五比丘之后皈依佛陀的弟子，是长者子（a rich young layman）耶舍（Yasa）。耶舍一天清晨醒来，看到身边醉卧着昨夜和他一起饮酒取乐的娼女，突然心生嫌厌。他闷闷不乐地游逛到鹿野苑，在那里正好碰见了佛陀。佛陀向他开示了四圣谛法，于是耶舍舍离世间，加入佛陀和他的小僧团。耶舍是商主之子，按照旧传所记，他的四个朋友也出家成为比丘，他们都来自“波罗奈城的商主家庭”。然后又有五十“乡村童子”出家。这些人成为新僧团的核心，开始把佛法四处宣扬。因为，在佛传传奇中，佛陀曾命这些比丘“为利益安乐诸有情，以对世间的慈悲，外出遍游世间……”。可是，他们不是创建俗人教会（a church of laymen）的抗议宗福音派教徒（Protestant evangelists），因为他们“所弘扬者，为无上圆满，至极清静，出家梵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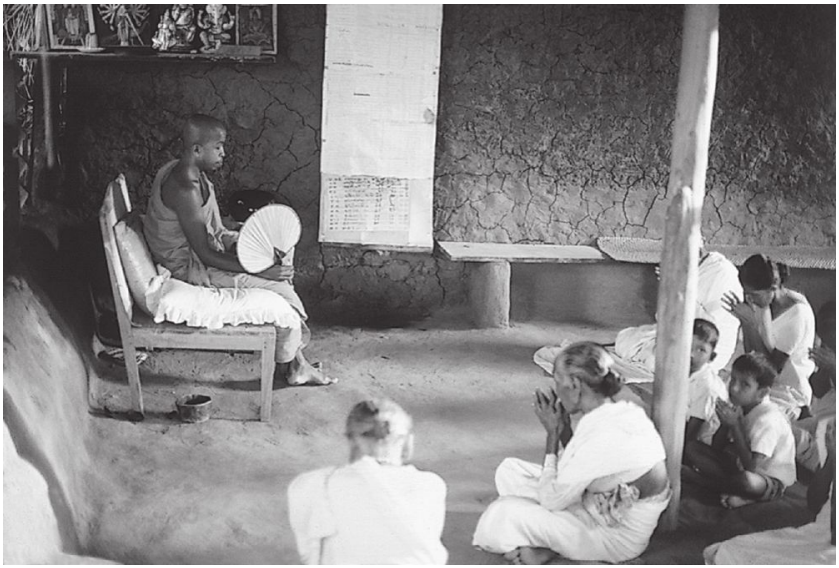

图5　一位斯里兰卡的阿兰若僧对居士众说法。和佛陀时代的求道沙门一样，佛陀的僧徒在佛灭后两千多年，还在向他们身边的人做“法施”[8]。

这个故事的某些内容听上去是可信的。在佛教和城镇商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择亲和势（elective affinity）[9]。商人属于复杂的文雅社会的主要建立者，这些人正是佛法的主要弘化对象。可是，佛法是一种普世的福音，除了商人之外，一定还有很多人——也许是那些“乡村童子”[10]——也加入了僧团。对独身生活的强调显得尤其可信，因为它传达了整个僧团的团体精神（*esprit de corps*），而且和很多经文传达的福音也相互一致。这个福音说的是，唯一真正合理的道路就是离弃世间。可是，就算这个不能妥协的目标是僧团的最初纲领，弘法活动还是在其自身内部保留着和在家众进行深入交往的可能性。因为，当化缘弘法的僧人横穿印度以及后来横贯亚洲沿着商道传法时，他们毕竟要靠在家众提供衣食才能免于饥寒。

在家众的确出现在佛传传奇中。耶舍出家后不久，他的父亲就来找他，正好碰见了佛陀，佛陀也对他说法。做父亲的也皈依了，对佛法“获得坚固信心”，“尽形寿皈依佛”。“皈依”二字今天正式代表了在家众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奉。很有可能，在这个传奇的编纂时代或

者更早的时候，皈依二字就有了类似的意义。耶舍的父亲当时就以饭食供养佛陀。在耶舍父亲家里，佛陀说动了耶舍的前妻和母亲也“皈依”了。在耶舍父亲家发生的这些事，向我们传达出佛教出家众和在家众之间关系的要旨。在家众向出家众布施食物，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出家众转而以智慧和其他的精神资粮回赠在家众。人类学家最喜欢发现基于长期礼品交换而形成的各种制度。在这种交换中，两个群体通过互赠礼品建立了一种关系，它们还通过礼品的不断交换使这种关系继续保持下去。〔11〕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家众一方，对出家众慷慨“财施”，这是受到鼓励的。而出家众一方，像佛经中不断说到的，以“法施”为“最上施”。两方所施的东西虽然种类不同，但是它们的施舍都不讲价钱，双方通过它们建立起永久的纽带。在这种互相交换的基础上，就形成了整个佛教的团体，也就是所谓的“四众”，包括了比丘众、比丘尼众（佛陀后来允许妇女出家）、居士众和居士女众。就是依靠这整个的团体，佛教才能获得永久的成功。

这样一来，佛法可以提供给在家众的，就是若干的精神资粮。可是，能够提供这些资粮的，不是只有佛教一家。资粮之一就是功德。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报酬，是在家众只要靠供养出家众并聆听其说法就可以获得的。功德可以积累，保证一个人来世可以投生善处。精神上的功德积累越多，投生之处就会越好。因此，像僧人把解脱当作其崇高的精神目标一样，在家众也有相宜于他们的较低的目标，这就是所谓善趣〔12〕（以及希望自己最后能够托生在可以出家为僧证得解脱的环境中）。这是一个资助佛教僧团的好理由。可事实上这也是资助其他教派比如耆那教教团的一个好理由，因为这些教派有一套内容极为接近的功德观。

另外一种给予在家众的精神资粮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学说。这种学说由若干戒条组成，诸如不许说谎、不许杀人和不许偷盗，不许以邪命自活，不得增长贪、嗔、痴等有害的态度。〔13〕僧人严持戒律，检束身心，是人类美德的完美代表。可是，这种完美的基本原则，也可以落实到较低的生活层面上，亦即落实到适合于在家众生活的凡事必讲妥协的环境里。在这种环境中，在家众必须过他们谋生和产子的世

俗生活。佛陀并没有独占这类教法，它们的新颖和流行，与当时社会生活中正在发展的各种城市化形式的相对新鲜性和广泛分布性有一定的联系。现在出现了商人，通过掌控金钱和贸易等物质工具，可以行有害他人之事。还出现了国家和军队，能够给人带来新的各种伤害。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以牺牲他人利益为能事的官职。而且，新兴城市中的生活要求原来没有自然的相互利益，以及相互之间没有共同传承的道德准则的各个集团，必须发明出具有最低互信度的共同生活方式。许多对新生活方式的适应，都是在和出家人无关的情况下产生的，可是却得由出家人赋予这种变化以形式，传达出它的呼声。他们体现了不害和安贫的美德（佛教僧侣甚至不能碰触金银）。他们不求任何官职。在弘法时，他们专门提倡那些美德，不管各家对其作何不同的理论解释，其实行定能使新的社会变得适于大家居住。

图6　出家人说法讫，接受在家众的供养。僧人做“法施”，在家众提供衣食，从佛教僧团在古印度出现以来，僧俗之间的这种关系就一直对僧团提供着支持。

功德观和居士戒，不仅可以解释佛陀的成功，也可以解释沙门团

体的成功。在古代印度，佛教也许很难说会显得比其他思想运动获得了更加明显的成功。单拿佛陀对在家众的教法来看，其实很多都可以在其他派别的学说里见到。可是，佛陀却综合利用了这些不同因素，使之发挥出全体大于部分总和的作用。这种综合来自佛陀倾向以践行的方式，亦即以巧匠譬喻的方式思考问题〔14〕，以及来自他对心理学解释的关注。

善巧

这种思维方式的关键，体现在一个他说法时常用的术语上面。这个术语就是“善巧”（*kusala*）。“善巧”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善于干什么”〔15〕，比如一个金匠善于锻造金饰品。这个词被佛陀借来，用它指禅定中的技巧。他还用它来泛指一切修持戒律和积累功德的技巧。在这个用法中，“善巧”也有道德上善的意思，就像我们说“他是个好人”，或者“那么做是对的”一样。的确，在很多种语境下面，“善巧”是恶的对立面，就像基督教中同样在善与恶之间作出界渭分明的区分一样。可是，对佛陀来说，“善巧/善良”只有一种践行上的，而非玄学上的或者绝对的意味。这个术语已作废的核心意思，可以通过一种对我们来说早已不存在的意义（在古希腊人中这个意义仍然存在）传递出来：就像一个人可以擅长或者善于某种手艺一样，他也可以很会做人，这样他就可以算是善良的。〔16〕

通过对业的果报，特别是对业背后的态度或者说心理活动的果报进行“如理作意”，可以使这个术语变得鲜活起来。对佛陀来说，善巧有两方面的作用：一种是它的结果对自己有利，另一种则是对自己和他人同样有利。比方说向比丘施食这件事，它可以使人获得功德；而从佛教特别重视心性的观点来看，这种功德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心理上的善德，一种对追求乐善好施这种善德很有助益的心境。可是，布施对于比丘来说也是善的，因为至少比丘可以借此机会得以果腹充饥。同理，修持戒律可以同时做到既能避免伤害别人，也能在自己身上培

养善良/善巧的心境。我们习惯于认为，行善就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可是，对佛陀来说，行善既是自利也是他利。对比丘来说，重点本是放在自利上面，也就是解脱上面的，可是证得解脱的方法——即可以为人师范的戒行——却意外地获得了利他的效果。可是，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就可以掉转过来用于在家众身上：他们通过善待别人，可以达到善待自己的目的。这种推论进一步获得了如下学说的支持，这就是对别人做到善意、柔顺、真诚和无害，事实上也就是希望别人也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对别人好，才能指望别人对你好。通过如理作意和戒行的磨砺，佛教徒不论僧俗都可以在“当下和来世”获得对他们善巧的果报。

所以，佛陀对在家众宣说的教法和他关于出家众修行的想法之间有着紧密而有机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还不是仅仅限于戒律的层面之上。对佛教僧侣来说，修持戒律有助于禅心的培养。可是，对僧俗二众来说，某些心理技巧和态度的培养也会辗转增进戒律的修持。就是在这个关节点上，慈悲，也就是对他人的关怀，再一次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一回，慈悲成了必须靠禅定来培养的一种态度，或者一种指向他人福祉的价值。人改变他自己，不仅仅是为了解脱，也可以是出于爱。在佛典中，慈悲被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悲心（compassion proper），可以被定义为同情他人之苦；第二种是随喜心（sympathetic joy），就是对别人的幸事，自己也替他感到快活；第三种是慈心（loving-kindness），这是佛教要培养的最重要的心境。佛教僧俗对慈心的培养，很好地表达在下引佛教古偈颂中：

“无论何众生，脆弱或坚强，含摄皆无余，长形或巨大，中形或矮小，细微或粗厚。可见或难见，远方或近处，已生或将生，愿一切众生，心中常喜乐。

无论在何方，彼此不欺瞒，互不相藐视，勿存嗔恚心，期使他人苦。

慈心对众生，发展无量心，上下普四方，尽皆无障碍，泯除憎恨心，亦无敌对意。”

（《经集》，第146—148偈，第150偈）[17]

这一段文字，将佛陀所定戒律所根据的态度浓缩成了一种情操，捕捉到了伴随在消极戒条背后的积极精神。不论是在比丘的修行中，还是在在家众所守的戒条中，慈心都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对佛教徒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心理的活动，也就是意图和态度，而不是所造的业本身。这种慈心是绝对不分人我的，从它里面透显出出家人那种奥林匹斯山神一般的超然态度。人应该平等对待一切，不论贵贱与亲疏。就在这种普遍的情操中，佛陀的道德推论才有其位置，因为在对慈心的规定中，修禅者应“认自己与一切同体”（《增支部经典》，第2卷第129页）。这就是说，正如我被困于苦乐之中一样，其他人也是被困于苦乐之中；正如我愿意自己好一样，我也应该愿意别人都好。在佛化的世界中，慈心再加上拔苦的悲心（compassion for suffering），将变成超越了家庭界限的社会情操的模范，变成一种独立不倚的价值。在后期佛教学术和思想中，这些情操变得极其重要，在价值上甚至超过了占据首位的解脱。

《伽蓝经》

佛陀对在家众所说的教法，可以从《伽蓝经》（《增支部经典》第1卷，第188—193页[18]）中看出其经过汇编后的全部结构。伽蓝族（Kālāmans）是在恒河文明北部边缘生活的一支部族。据《伽蓝经》说，佛陀和一群比丘云游穿过这片地区，一群伽蓝族人听说佛陀来了，就跑到羁舍子村（Kesaputta）问他一个问题：“有沙门和梵志来诣伽蓝，但自称叹己所知见，而呰毁他所知见，我等闻已，便生疑惑，此沙门梵志何者为实，何者为虚？”佛陀为他们解惑说法，这次说法常被后世引用以证明佛陀不崇尚教条主义，而是鼓励个人判断。他对伽蓝人这样说：“不要轻信传闻，不要轻信传统，不要轻信传说，不要轻信学问，不要只倚赖推论或推断或深思，不要倚赖对此一说或彼一说的考虑和赞同，不要因为它看上去适当而相信，不要因为出于对某个苦行者的尊敬而相信”。[19]

这不是向大家提倡随意的个人妄想，因为佛陀所推介的是他自己的道德推论，这种推论缘自其善巧和如理作意。佛陀深信，如果伽蓝人也能如此推论，他们每个人都会得出佛陀的道德学说：

> “若汝等能自觉，此法不善巧，彼法善巧，此法应呵责，彼法不应呵责，此法能引苦与恶，为智者之所诃毁，彼法能引福与乐，为智者之所称赞者……若汝等能自觉此，伽蓝人，汝等应断一道，而行另一道。”[20]

他们将要得出的道德学说很直截了当。那就是伽蓝人离杀，离不予取，不邪淫，不挑他人使陷灾难。这些戒规会十分自然地从伽蓝人的经验和他们对善巧的反思中产生。

首先，我们可以从这篇经文中，推断出某种时事性（topicality）。有理由相信，伽蓝族人和他们的邻居释迦族人，也就是佛陀的族人一样，曾经拥有一种独立的寡头共和政府，在记忆可及的过去，他们曾经也是一个相对自治的部族。可是，他们现在却受制于憍萨罗国国王，而释迦族人不久也要蹈其覆辙。在经济生活方面，伽蓝族人也可能隐隐感到了远方憍萨罗国首都的牵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这些力量，正在迫使伽蓝族人摆脱其相对简单而封闭的氏族社会，把他们带进恒河文明的复杂世界之中。这些混乱又被新的文化形式弄得更加复杂。这些新的文化形式，就体现在恒河文明的信使，也就是那些沙门苦行者相互冲突的意见当中。

当然，对杀人、妄语、偷盗等等所悬的禁戒，对伽蓝族人来说不可能是全新的。他们自己祖先的文化里，一定也有类似的禁戒。很难想象，一个社会可以不以某种形式奉行这些价值标准，至少是以打动社会成员的某种形式，还可以存活下来。然而，像古代伽蓝族人这种社会的典型特征是，这样一些价值标准不是推论出来的，而是靠传统和习俗来维系的，并且借助传说和仪式来使之变得惹人注目。在新的条件下，这些遗传下来的道德传统，却丧失了它们原来无可争议的主宰地位，这就为佛陀提出一种发源于人类生命最基本条件的新式道德推论提供了契机。佛陀所提倡的戒律，并非伽蓝族人所独有，而是源

自人们都处于社会之中、都过着一种共同生活、并且都能推想自己和他人的目的这样一些赤裸裸的现实。佛陀提出的这种戒律，旨在适用于所有的条件。

但是，佛陀所设想的，还不仅仅是为伽蓝人的戒律寻找新的根据。因为这些禁戒不仅是为伽蓝族人的社会而立，而是为伽蓝族人可能会接触到的所有人而立，不论其是否是伽蓝人。伽蓝人已经和其他许多民族有所牵涉。小型社会或者较大社会里的小团体的典型做法是只认自己的成员为道德团体的组成分子。可是，伽蓝人现在被邀加入一个更加广大的世界，把所有的生命，当然也包括恒河平原的人民，都纳入了自己的道德团体。佛陀倡导一种普世的道德，适应了伽蓝人被迫接受的这种更具开放性的生活。

到此程度，佛陀为在家众所说法，是建立在他的道德推论之上的。可是，在《伽蓝经》中，这种道德推论又是更深地建立在他的教法和经验之上，建立在他对人的素质的分析以及他追求自我转化的计划之上。当他对比丘众说法时，佛陀强调苦的根本——贪、嗔、痴三毒——能陷人于自害。但当他对在家众说同样的法时，他转而强调三毒不仅害己，尤其可以害人。

“若贪生起时，如何能不害？嗔痴生起时，如何能不害？若人心被染，贪嗔痴三毒，彼人杀盗欺，如何能免除？若人心不染，贪嗔痴三毒，杀盗欺等业，如何不免除？”〔21〕

在这段经文中，“害”既指害人，也指害己。如同“善巧”既能利己亦能利人一样，“害”既能害己也能害人。这一点是值得强调的，因为不仅西方人还有后期的佛教宗派，都因认定佛教不关心他人的利益，或者无视社会的存在，从而想弃绝佛法，或者想对佛法作出修正。〔22〕 不错，如果权衡一下的话，佛陀对剖析个体经验的关注确实胜过对剖析社会的关注。可是，佛法总是认定，做人就是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

而且，关于在家众如何改善自己，以使他的心“不被征服”，佛陀

的观点认为，不能单单仰赖如理作意。一方面，佛陀假设在家众身上存在理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如果得到正确的指导，就可以对道德问题作出善巧的解决。在家众能够合计出要做什么。另一方面，这种认为在家众具有理性能力的观点，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因为佛陀感到在家众也能够——在其身份所及的程度上——达到自我的转变。所以，在《伽蓝经》里，佛陀建议他们修持能够培养社会情操，特别是慈爱心的禅定。在家众通过修习这种禅定，可以把慈爱心施诸一切处所和一切有情，“与一切同体，无怨无嗔”。通过这种心理训练，迟早会使慈爱心成为一种经久不变的习惯和行为的动机。〔23〕

这里面包含了两种重要的意涵。第一，它意味着佛陀不仅向人推介为何 行为要善巧，还指出时常不听管束的人性如何 可以做到行为的善巧。佛陀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他相信人是可以做到善巧而合理行事的。他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也知道要做到合理行事，必须得在情感上获得蜕变。一个人可以明白某个行为是好而善巧的，却不能把它实现出来。对一切人身上都会有的这种弱点，佛陀是有他充分的考虑的。第二，这种自我转化的修行，从其在原则上可以被每个人做到这个意义上说，是十分简易可行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大部分的人类经验，尤其是超出佛教僧团这样与世隔绝的组织范围之外的那类经验，是无法控制它们使其为自己的目标服务的。伽蓝族人不但受制于自然界的变化，也日渐受制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是任何人都无法掌控的，甚至是任何人都无法完全了解的。可是，这里至少有一件事还可以有效地掌控：自己的各种习惯和动机。如果不能改变世界，一个人至少可以改变他自己。不错，对于在家众来说，修行一种法门，比如慈爱静坐法，其效果必须部分地依赖于他们先得成为认同这些价值的佛教团体的一员。但是，最终的努力，还是得靠个人自己，而且这个努力的核心也是自己。不论是远行到憍萨罗国首都，还是耕种祖先的土地，伽蓝人都一样可以很好地修持慈悲心。

《伽蓝经》在内容上也许时事性太强，可是正如佛陀所演说的，这部经像其他许多对在家众所说的教法一样，对于任何身处同样困境

的人来说都是同样适用的。在这里，佛陀表现得很有现代感。这是因为，如同伽蓝人被席卷进恒河文明中一样，欲在我们当今的世界之中找到一个不被拖进更加广大、更加复杂、更加迷离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的民族，实在是十分困难。佛陀因其教法的普世性，乃能诉诸对一个复杂社会的体验中所产生的种种不同的可能命数，而对这种复杂性的经历，在我们身上至少也是和古印度人相同的。从表面上看，现在的人和那时的人一样，听凭种种不同的需要和价值的摆布。可是，他们却具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都能感觉到苦也能感觉到乐，能够害人也能够利人。

文化相对论

这种现代性确实与我们自己某些来之不易的观点是相应的。佛陀的独创性还表现在他意识到周遭文化的种种差异性上。比方说，他在教典里还能建议不同的族群应该各守其祖先的伦理和宗教。佛陀还发现，各个民族的价值观都是相对于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而树立的。我们今天也发觉到，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存在着无法归约的差异性。我们把这种差异性称作文化相对论，它的意思是说其他的社会不能按照我们的社会来加以评判。可是，如同文化相对论不能被我们生硬地理解为人们愿意按照什么价值标准来生活都可以，或者就算没有任何价值标准也行一样，佛陀主张人们应该遵循祖先的典范（ancestral standards），只要这些典范与伦理的善巧（moral skilfulness）相一致就行。同样，佛陀还教导说，人类个体不应被视作是彼此孤立的存在，我们应该看到人类个体之间存在着生死攸关的联系。这又和另一种现代的观点相吻合，就是我们日渐发觉个体不应该被孤立地理解，而是应该把他理解成是深陷在社会环境之中的存在。

还有另一种现代性，是佛陀所未有的，这就是对人类事务的政治维度保持最大的关切。佛陀的说法主要划定了三个关注的领域，这些领域加起来，就构建出佛陀所认识的人世本相。这三个领域分别是：

一个个体对自己身心上所发生的事件的关注，对与他人面对面的人际关系的关注，以及对一切有情福祉的关注。对这三个领域，也就是心理上的，社会上规模较小的，以及一切众生的总体，佛陀想规定出诸法实相究竟如何以及应该如何。可是，他的这些描述和规定，对于人作为各种政治团体的成员应该如何做事、如何表现，以及政治团体应该如何组织却甚少谈及。当然，正是由于这种对政治上具体事务的相对淡漠，也许后来促成了佛法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得以顺利地传布。

但是，这绝不是说，佛法缺乏政治的兴趣，没有任何政治的意涵。佛陀自己的偏好，就我们所能推断的，应该是像他的释迦族人所奉行的那种带平等主义色彩的寡头政体或者共和政体。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一部记述佛陀涅槃前生活的传记性经文〔24〕里，他对僧团的组织订下了一套条规，这些条规是和拔耆族（他们实行与释迦族类似的政体）的族规一起对照列举出来的。僧团（或者说族人）处理他们的事务要完全一致——他们的决定要全体通过，他们要尊敬并且依从长老。可是，当长老的观点与经律（或者族中的传统）发生冲突时，应该依从经律。假如这些寡头集团发展起来的话，我们也许就会拥有古代印度关于民主和公民权的各种理论了，就像古希腊留给我们的那些理论一样。可是，寡头集团很可能从未成为当时印度政府的主要形式。佛陀在世时，这些集团正处于逐渐消亡的过程当中，不久以后就完全销声匿迹。佛陀大部分的经历是和各个王国打交道，没有哪个国王愿意听到任何激进的政治思想。

这样一来，佛陀如果还想谈论政治的话，他能谈的就只剩下国王了。有很多的经文流传下来，它们取得现在这样复杂的文学形式，应该是在佛陀圆寂之后，可是有些极有可能代表了佛陀本人的见解。在这些经文中，他对国王的职权有过讨论。其主要观点是，国王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也应遵守道德的秩序，还应考虑什么在伦理上和社会上是善巧的。当出现了信仰佛教的国王之后，这些谈话被按照字面的意思建构成一套佛教专有的圣王论。还有其他一些启示，比如有一处似在推荐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鼓励国王资助各种企

业，使人民生活兴旺富足。还有一处像是在推荐一种君权契约论（a contract theory of the monarchy），说的是国王之所以能被选出，是因为他最英武、最善良、最能治理人民。可是，这些启示却被置于高度讽刺、甚至幽默的场景下，通常是佛陀对着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比如一个叫利齿的婆罗门）讲一则虚无缥缈的故事，结果弄得佛陀远离了他似乎想要传达的启示。这种远离效果的造成，部分是因为佛陀是一个弃世者，他从解脱的角度俯视人间，所以就算是宏大的国家政务，在他眼中也会显得愚蠢而渺小。不过，佛陀的评论是很犀利的，暗示出他一定是一位目光锐利的政治舞台的观察家。

鉴于以往日之教行于当今之世每每令我们失望的经验，我们很有理由怀疑，任何一位往日的大师[25]，是否今天仍对我们保有其说服力和相关性。就佛陀来说，人们还可以继续驳斥说，他的佛法并非普世 的，因为它建立在某些宇宙观（比如轮回说）之上，而西方人是不会接受这些宇宙观的。可是，正如我在前面努力说明的，佛陀哲学关心的事已经足以使其对人人合用，已足以把他带进西方的历史之中，西方人唯一还要做的——非常适当地——就是，为了最终接纳佛陀，他们必须扩展对其自身历史的看法，超越狭隘的先入之见。佛陀最关心人的身心基础，以此为本人类才能达到自我的转变。这样的艺能（mastery），我们决不能错失。佛法适应了一个充满不同派别政治哲学和宗教的世界，可是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我们还想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话，就必须有一些基本价值观来指导人际关系。很难看出有什么理由说，佛法与我们无关。

佛陀圆寂的史话，在一卷很长的经文里（《长部经典》第2卷第16经[26]）有过描述。若剔除其中空想的成分，这卷经文可以说是描绘了一个老人最后的生命旅途。佛陀在病痛的折磨下[27]一路北上，走了几百英里。陪伴他的只有他的常随侍者阿难（Ānanda）。阿难这个人虽然对人友爱，可是就像经文里刻画的那样，他做事却笨手笨脚。最后，佛陀因食物中毒病倒，停歇在无名小村拘尸那揭罗。

阿难知道佛寿将尽，“入于住所，手把门闩，涕泣而立”[28]。佛陀唤阿难至前，作如是语曰：

“勿悲勿哭。我岂未曾为是言耶，凡恩爱者，必得分离……汝以身、语、意，慈心欢喜心，诚心利益心，久侍如来，无有保留。阿难，汝所为甚善，宜事精进，必速得解脱。”〔29〕

注释

〔1〕 这里作者用“古印度教”（archaic Hinduism），是指古代的婆罗门教，以和婆罗门教经过发展和改革后形成的“印度教”（Hindusim）相区别。

〔2〕 “苯教”又称“苯波教”，是佛教传入前在西藏流行的一种原始宗教，最初流行于后藏阿里一带，后来向西向东传布到西藏各地。苯教崇奉天地、山林、水泽的神鬼精灵和自然物，重祭祀、跳神、占卜、禳解等仪式。佛教传入后，苯教曾与佛教长期斗争。8世纪后，由于吐蕃王室兴佛抑苯，苯教势力渐衰。苯教后来吸收了佛教部分教理，改佛经为苯经，藏传佛教也吸收了苯教的若干教理和仪轨。

〔3〕 这里要讲的是梵天劝请佛陀说法的故事：“诸比丘，如是我起斯念：‘我所得斯法，甚深难见，启示甚难，以寂静、殊妙、绝虑、微妙故，唯智者之所能知。此诸众生，实深癖好于执，爱着于执，欢喜于执。然于癖好于执，爱着于执，欢喜于执此诸众生，而于斯事，渭即缘是缘生（法），欲见实难。若斯事者，谓是静止一切行，捨离一切依，灭渴爱，去贪欲，诸灭灭已，而成涅槃，斯事难见。我虽欲说法，然诸众生若莫能解，是徒使我疲劳，徒使我困惑耳。’……诸比丘，我心以如是思虑故，宁趣无为，勿趣说法。诸比丘，时有娑婆主梵天，以心知我心中所念，彼作是念：‘世界实将亡，如来……心趣无为，不趣说法故。’诸比丘，是娑婆主梵天，犹如壮士，伸其屈臂，屈其伸臂顷，从梵天界灭，现于我前……偏袒一肩，向我合掌，作是言曰：‘世尊！世尊当宣说法，……亦有尘垢轻者有情，不闻法故，则便衰退，彼等（若闻法）者，当了知法。’……时我知梵天恳切之愿，及愍念有情故……（同意说法）”（这里引自巴利语《圣求经》，参看《南传大藏经》第471—472页）

〔4〕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神并不是外在于佛陀的一种力量，而是体现了每个人心中固有的那种能够改变自己的潜在力量。水野弘元《原始佛教》（第55页）：“这可能是把起于佛陀心中的思想，以梵天恳请的形式表现出来。”

〔5〕 鹿野苑是佛教圣地，属于中印度波罗奈城，在今瓦腊纳西城西北约十公里处，传为佛陀成道后最初说法（《转法轮经》）和收徒（五比丘）的地方。

〔6〕 传说佛陀出家时，其父净饭王多方劝阻无效，就派五名亲信随侍。五人依次为阿若憍陈如、阿说示、跋提、十力迦叶和摩诃男拘利。

〔7〕 “僧伽”（sangha）是佛教名词，意译“众”、“和合众”、“和合僧”等，也就是僧团的意思，一般四个人以上就可以算作一个僧伽。

〔8〕 佛教视“施舍”为积累功德的方法，“施舍”分为两种，即“财施”和“法施”。“财施”是在家众向出家众施舍财物和饮食，而“法施”则是出家众向在家众说法。

〔9〕 化学用语，指有选择性的亲和力。关于佛教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请参看季羡林的长篇论文《商人与佛教》（《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416—538页）。

〔10〕 参看上文提到的“五十乡村童子”。

〔11〕 作者这里可能是在暗指法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1872—1950）写的研究赠礼的人类学名著《论赠礼》。

〔12〕 所谓“善趣”（better rebirth），比如生于国王家、生于大臣家、生于长者商人家、生于高贵种姓家等等。

〔13〕 这就是所谓的“居士戒”。

〔14〕 引出下一节对“善巧”的论述。

〔15〕 参看智髻比丘的《南传字典》（A Pali——English Glossary of Buddhist Technical Terms.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94），第39页。

〔16〕 在巴利语中，“善恶”的“善”（kusala）字，其最初的意思是“聪慧”（clever）、“善巧”（skilful）、“擅长”（expert），从这里衍生出“善良”（good）、“正确”（right）、“值得称赞的”（meritorious）等等意思。由于后面这种意思更多地被使用，反而使人们忘记了它最初的意思。我们中文里也有同样的问题，“善”这个词既有“善良”（比如“善心”），也有“善于”（“善战”）的意思。

〔17〕 此处引自巴利语《经集》（*Suttanipata*；即原文中缩写的“S”）中的《慈爱经》（*Mettasutta*）。译文采自台湾“原始佛法三摩地学会”印赠的巴利语、汉语合璧本《慈爱经·慈爱静坐法》（2005年4月修订4版，第7页、第9页和第11页）。

〔18〕 勘同汉译《中阿含经》里的《伽蓝经》。

〔19〕 此处引用巴利语《迦蓝经》，译文部分参考了上引巴利语、汉语合璧本《慈爱经·慈爱静坐法》一书末尾（第28页）所附佛陀法语“羯腊摩经”。上文第三章中“亲证的价值”一节也曾引用这段经文，文字有详略的不同。

〔20〕 译文参考了汉译《伽蓝经》。

〔21〕 这一段经文是译者自己翻译的，它的出处待考。

〔22〕 西方人想弃绝佛法，佛教晚期宗派（指大乘佛教）想修正佛法。

〔23〕 这就是所谓“慈爱静坐法”，是南传上座部僧俗二众最主要的修行法门之一，请参看巴利语、汉语合璧本《慈爱经·慈爱静坐法》（第25—27页）：“佛陀开示了一种静坐法，称为慈爱静坐。此方法可以增进我们内心的安详与快乐。即使到了今天，能依法修行的人也都有同样的经验，就是此法非常有效而且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慈爱，就像是一位好母亲，甘捨性命来保护她唯一的儿子一般。如果你也能培养这样的心，来对待所有的人（不分阶级、性别、种族、贫富、贵贱、亲疏等），这时你的慈爱心就培养出来了，心量就可以无限地扩伸。慈爱，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没有憎恨、嗔心及恶念，所以一个人如果培养慈爱，内心会变得更好，而且整个个性也会随着转变。一个心量大的人，才容易成就清净、平等、自在、解脱等的自然流露。……虔敬受持慈爱静坐法，会让你这一生不会伤害众生，而且会帮助别人。如果你修习慈爱静坐稍稍有一点点受用，你会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快乐，内心起了改变（贪、嗔、痴等习气显著减少了，面对顺、逆境缘，其心动念的幅度显著减小了），以及别人对你的改变。所以建议你能够耐心地、有规律地在每天清醒的时刻，至少静坐几分钟。并奉劝诸位大德发心，在有生之年，受持本经以慈爱心对待一切众生。你将因而体会到多么的快乐和喜悦。”

〔24〕 指巴利语《大般涅槃经》。

〔25〕 此书最初是作为牛津“Past Masters”丛书的一种出版，所以有这句话和原来丛书的名字相呼应。

〔26〕 巴利语《大般涅槃经》（汉译《游行经》）。

〔27〕 《游行经》：“于后夏安居中，佛身疾生，举躯皆痛。”

〔28〕 《南传大藏经》，第213页。

〔29〕 《南传大藏经》，第214页，译者对引文作了一定的改写。

关于引文的注释

简称

本书所引佛典，均来自巴利圣典学会校勘的上座部三藏。大写字母指来自何部经典，罗马数字指来自该部经典第几卷，阿拉伯数字指来自该卷第几页。所以，M II 91就是指，引自《中部经典》第2卷第91页。若我引用整部佛典，则会标出该经的号码，比如M I no.15，就是指《中部经典》第1卷第15种全经。我使用了以下的简称：

D *Dīgha Nikāya*（长部经典）

M *Majjhima Nikāya*（中部经典）

A *Aṅguttara Nikāya*（增支部经典）

S *Saṃ yutta Nikāya*（相应部经典）

此外，文句尚有引用《无问自说》（*Udāna*；简称U）和《最胜义光》（*Paramatthajotikā*；简称P）者，皆为巴利圣典学会本。还有《大林间奥义书》（*Bṛ hadāraṇyaka Upaniṣ ad*；简称B）和《唱赞奥义书》（*Chāndogya Upaniṣ ad*；简称C）均注出引自何分何书何节，这样不拘任何版本，大家一翻即得。

译文和术语

佛典译文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翻译的。想查证引文上下文的朋友，会发现巴利圣典学会英译本都按照巴利语原本编了号，这样大致可以翻捡到相应的段落。当然，如果能查巴利语原本，就更容易找到。只要稍做尝试，就能学会查找。

术语部分，除去我已经注出使用梵语的地方之外，均用巴利语。

巴利语发音法

为了免于在念巴利语时出现令人尴尬的错误，请谨记以下规则：c等于英文里的ch，因此*cetanā*（思）的发音，大致为chay-tuh-naa；复音后面的*h*，在发音上只表示多出一点气，如英语中的pi*th* ead，dog*h* ouse。若按巴利语正确发音，则Buddha一字里的两个*d*，都是要发音的。这种情况，类似于意大利语的双辅音。所以，Buddha大致应该念成Buddhuh，而非Booduh。

以拉丁字母转写梵语和巴利语，有些在字母上下加了特殊的发音符号，有这些符号的字母，其发音法略如下示：

ā ah

ś 介于s和sh之间

ñ 读如ny，如canyon。

ṭ ḷ ṇ 不像在英语中仅需让舌头碰到齿背，这里还需进一步朝上腭方向回收

ṣ 读如sh

ṃ 读如ng

推荐书目

关于佛教，英文出版物已经很多，有些专业性很强，有些又容易误人子弟，还有一些则甚佳。以下的建议，旨在使读者诸君对佛陀、佛法和佛教史获得比较广泛的了解。

在佛传方面，我推荐燃灯智比丘的《佛陀传》（佛教刊行会，康提城，1972年）。此书的切入点与拙著完全不同。该书可从斯里兰卡康提城佛教刊行会本部请购。作者完全依据其巴利原典的精确译文，来讲述佛陀的史话。此书无比细腻简洁，或为今日巴利佛典最佳导论。此外尚有迈克尔·派伊（Michael Pye）的《佛陀》（达科沃斯出版社，1979年）一书，着眼点与燃灯智比丘之书又复不同。他的佛传写得颇为生动，兼采史话与神话，告诉我们早期佛教僧团是如何看待佛陀的。以上两书，对拙著中描绘的佛陀，会提供有益的补充。

若欲了解佛法，最好的著作仍为罗祜罗长老（Walpola Rahula）的《什么是佛教》（格登·弗雷泽出版社，1967年）。此书乃由一修持佛法的比丘写出，写得既明白晓畅，又兼护教者的热情。尼耶也颇腻迦长老（Nyanaponika Thera）就禅观的修持，也写过一本同样明白晓畅的《佛法禅要》（利德尔出版社，1969年）。以上两书全依上座部传统写出。

欲知佛教哲学和佛教史的广大精微，较全面的导论书自以理查德·鲁宾逊（Richard Robinson）和威拉德·L. 约翰逊（Willard L. Johnson）的《佛教导读》（狄金生出版社，1982年）最为相宜。读此书后，大家可寻海因茨·贝狄特（Heinz Bechert）和理查德·贡布里希（Richard Gombrich）合编的一巨册《佛教世界》（泰晤士与赫德森出版社，1983年）来读。此书为一论文汇编，依次详述每一佛化国家中佛教和僧团。虽然所收文字都以一般读者为对象，但每篇文章均可代表相关学科领域最新之学术成果。[1]

精读上举诸种著作之外，若能辅以佛典原文的熟读，自然最佳。佛典原文可参亨利·C. 沃伦（Henry C. Warren）的《巴利佛典选读》（雅典娜神殿出版社，1963年重印本），或斯蒂芬·拜尔（Stephen Beyer）近期所出的《佛法经验谈：原典与释义》（狄金生出版社，

1974年）。

前述著作多附有有用的书目，使读者可以对自己所爱好的题目，依之作进一步的研究。鄙人的兴趣，乃在当今佛化国家中实际修持的佛法。关于这个问题，霍姆斯·韦尔奇（Holmes Welch）的《1900至1950年间中国佛教之修持》（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有透彻的研究。我对佛教的了解，乃基于我在斯里兰卡数年的田野考察，这个经历我已经写进了《吉祥楞伽岛的阿兰若僧》（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一书中。我的书主要是谈禅僧的，至于我所未能谈到的斯里兰卡民间佛教的种种信仰和仪轨，大家可以从理查理·贡布里希的《教诫与行持》（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一书中获得补充。

注释

〔1〕 此书第五章是有关斯里兰卡佛教的（"'They will be Lords upon the Island': Buddhism in Sri Lanka"），就由本书作者负责撰写。

佛陀生为王子，长在富贵，原可继承王位，享受荣华，然他却抛弃妻子，舍弃尊位。究竟何事让他离世弃俗，自苦身心？他又如何参破痛苦的谜题，获得最终的解脱？其佛法又缘何能历经风雨，千年不息？

本书抛开神话和传说，依据古印度原始佛经，如实地记述了佛陀一生的思想行迹及其与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思想诸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向读者展现出一个本真的佛陀和佛化世界。

一本佛传在手，一份超脱入心。

百科通识文库

49

《圣经》纵览

约翰·里奇斯 著

梁工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圣经》纵览

约翰·里奇斯 著
梁工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38**

The Bib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0.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0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John Riches 2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经》纵览 / （英）里奇斯（Riches, J.）著；梁工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625-4

Ⅰ．①圣… Ⅱ．①里… ②梁… Ⅲ．①《圣经》- 研究 Ⅳ．①B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8265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文雪琴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625-4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译者序
第一章　《圣经》在现代世界：经典文本抑或神圣文本？
第二章　《圣经》是如何写作的
第三章　《圣经》的成书过程
第四章　《圣经》与其信奉者
第五章　《圣经》与其评论家
第六章　《圣经》与后殖民世界
第七章　《圣经》与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
第八章　《圣经》与政治
第九章　结语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约翰·里奇斯，格拉斯哥大学神学与《圣经》批评学教授，已出版的专著有《耶稣的世界：危机中的1世纪犹太教》以及《一个世纪的〈新约〉研究》。

译者简介

梁工，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圣经》文学、比较文学。主要译著有《耶稣的一生》、《圣经中的犹太行迹——圣经文学概论》（合译）等。

图目

图1　楔形文字符号的演变
图2　手持《圣经》抄本的男子画像
图3　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英译本《圣经》的书名页
图4　《亚伯拉罕和以撒》
图5　伦勃朗的蚀刻版画
图6　路德像
图7　哥伦布在圣多明各登陆
图8　德斯蒙德·图图
图9　《战争安魂曲》
图10　西斯廷礼拜堂
图11　卡帕拉·斯科洛维尼教堂的乔托绘画
图12　伦勃朗的《安葬基督》
图13　《女仆的故事》

译者序

《圣经》是世界图书史上译本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也是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古往今来，诠释《圣经》的著述浩若烟海，令人叹为观止。面对如此深奥繁杂的一门大学问，现代读者如何找到一条便捷的通道，仅以少许精力即可进入《圣经》的学术境界，一览其胜景而领略其堂奥？可以说，约翰·里奇斯（John Riches）的《〈圣经〉纵览》便提供了一条这样的通道。

这本小书的篇幅不大，内容却精当而丰富。它论及《圣经》本身的多种内部知识，诸如其卷籍从口头流传到书写成文的漫长历史，及其被接纳为正典而获得权威性地位的复杂过程；还多角度地评述了相关的外部知识，涉及犹太教徒与基督徒理解《圣经》的不同维度，和宗教改革年代以降“批评性解读”的概貌——其中既有马丁·路德等新教思想家对天主教释经传统的反驳，也有赖马鲁斯、莱辛、威斯、施魏策尔等近代宗教学者对《圣经》的历史性和学术性辨思。此外，作者还立足于当代文化的制高点，深刻分析了《圣经》与后殖民世界的错综关联，描述了它在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中扮演的多重角色，并就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和地位发表不少精辟之见。这些内容应能有效地回应读者了解《圣经》的基本需求。

这本书的另一鲜明特色是具备较高的学术品位。在介绍《圣经》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知识之际，作者十分注意将西方学术界的重大研究成果体现在行文中，使人有可能一斑窥豹，览一书而略知《圣经》学术史。比如，论及《圣经》成书的历史过程时，作者评述了构成摩西五经的“四文献说”（主张摩西五经乃由J、E、D、P四种早期文献在大约600年间陆续汇编而成）；并述及学术界对“同观福音问题”[1]的探讨结论（主张《马可福音》首先成书，马太和路加都采纳了马可的资料，同时使用了一种被称为“Q文献”的耶稣言论集）。以这类由众多

前代学者呕心沥血得出的研究成果为依托，这本小书能给人带来事半功倍的读书效果。

本书的高品位还通过其客观公正的学术立场表现出来。作者既充分肯定《圣经》在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认同“其中的故事、意象、隐喻、道德和宗教概念已经塑造并将继续塑造世间万众的经验和理念”；对《圣经》又不作简单武断的褒贬评价，而主张其历史功能是多方面的：“《圣经》为人类思想、文学和艺术中某些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作品提供了灵感，同时也滋生了人类某些最恶劣的野蛮、无知、自私和偏狭”。就《圣经》与殖民及后殖民世界的关系而论，它既曾被殖民征服者用作道德和宗教的旗帜，借以向弱小民族滥施暴行；也被受压迫者用作反抗殖民统治的精神武器，从中求得慰藉、力量乃至民族和社会的解放。

至于同一部《圣经》何以能向多种最为歧异的阅读敞开大门，本书作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读者身份的歧异性和《圣经》内在要素的多样性——读者可能由于时间、地点、人种、族裔、教派、文化传统及现实条件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圣经》中的文化元素则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其素材来源和成书过程异常复杂，文体和手法变化多端，文本意义在不同层面的显示更是各有千秋。这些要素奇妙地组合起来，使人难以指望对《圣经》进行无可争议的单一阅读。纵贯全书，作者娴熟地运用现代阐释学理论对《圣经》知识作出灵活多样的释读，其间常有精妙之笔映入读者的眼帘，令人赞不绝口。

然而，约翰·里奇斯的这本小书并非枯燥乏味的思辨之论，而是有着很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为了阐明深层原理，书中穿插了不少典范的《圣经》引文，也提到《圣经》传播史上的许多轶闻趣事。作者以“阿克达”（祭献以撒）故事为例，形象地表明犹太人和基督徒对《圣经》的不同理解和运用；又借助于一批鲜活的案例，证实了《圣经》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广泛影响。而所有这些，无疑都能引领读者轻松愉快地走进《圣经》的世界。

梁　工

2008年3月31日

于古城开封铁塔湖畔

注释

〔1〕 “同观福音书”（Synoptic Gospels）又译为“对视福音书”、“符类福音书”，指《新约》卷首的三卷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它们的观念基本相同。记载耶稣事迹的顺序也大同小异，可以相互对照阅读。

第一章

《圣经》在现代世界：经典文本抑或神圣文本？

有时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较之世界上其他任何著作，有更多的《圣经》书册尚未被人阅读过。尽管这种说法难以证实，但它的确清楚地反映出民众对《圣经》越来越不了解，这引起了欧洲基督徒的广泛关注。但这一说法也忽略了一个或许可以说是更重要的事实，即《圣经》依然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读者群最广的著作之一。

如果举行一场比赛，以评选出当今“影响力最大的著作”和“读者数量最多的著作”——这两种著作决非同一回事——将会很有意思。马克思（Marx）的《资本论》也许迄今仍可参加“影响力最大的著作”的角逐，但它很难入围“读者数量最多的著作”；托马斯·潘恩[1]的《人的权利》和亚当·斯密[2]的《国富论》或许也有资格列入“影响力最大的著作”的决选名单。当然，还有一批自然科学著作（诸如达尔文[Darwin]的《物种起源》），以及哲学、文学和艺术著作也会在“影响力最大的著作”榜单中出现。然而，与世界上主要宗教信仰的那些伟大的核心文献相比，它们的情况又会如何呢？“影响力”并非十分精确的衡量尺度，而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既说明了获胜作品的价值，又反映了评委的个人见解。

就当今“读者数量最多的著作”这一奖项而言，其主要竞争者会包括某些文学经典和流行儿童读物，尽管它们的发行量也许还比不上娱乐性爱情小说和侦探小说。然而，这类图书固然极为流行，其吸引力却往往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文化。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世界主要宗教信仰的重要文献由于经常被用于公众礼拜仪式和个人祈祷活动，并对散布于各处的社群中的追随者和供职者的灵命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阅读。

这场假想的比赛并非是要断言任何特定文本在道德或美学上有某种优越性。如果这一论断可以证明，那也肯定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这场比赛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要揭示这类重要宗教文献所具有的某种非常独特的品质。它们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并为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都相差甚远的人们所阅读。它们何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尽管辨析《古兰经》和《圣经》这两种文献（或文献汇编）的共同之处将会非常有趣，但回答《古兰经》何以做到那一点并不是我的任务。这本小书的主要目的乃是对有关《圣经》的问题作出回答。这部古代文献汇编为何能对生活在当代的、后殖民及后工业化世界的人们持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首先我还是介绍一下今天的一些《圣经》读者，以展示对于不同教育、文化和信仰背景中的人们来说，《圣经》有着多么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同时也描述人们对《圣经》所作的解读的多样性。

全球最畅销图书

《圣经》：1815至1975年共发行25亿册，1998年发行20,751,515册。

《圣经》译本：在当今世界的6,500种语言中，《圣经》的部分经卷已被译成2,212种语言，《圣经》全书则被译成350多种语言。

最畅销图书：全球销量最大的版权图书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销量达8,000万册（1955—1997）。

最畅销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她的78部侦探小说的总销量达到了约20亿册。

最畅销小说：《飘》（1936）、《杀死一只知更鸟》（1960）和《娃娃谷》（1966），据说销量均超过3,000万册。

勒妮·祖卢（Renee Zulu）是索韦托一个著名妇女团体的成员，生活在约翰内斯堡的主要黑人聚居区。这个团体名为“扎马尼的索韦托姐妹”，因1976年索韦托起义造成的深重创伤而建，当时许多年轻人被南非警方杀害。这个妇女团体则活跃于社区教育和发展工作中，其成员成为教育领域的生力军，教妇女们读书写字，学习缝纫、制衣、

家政，甚至砌砖。她们会缝制漂亮的拼布床单，曾于1983年在格拉斯哥展出；还在智利难民的启发下制作小型拼帖画，在画中描绘她们在索韦托生活时的斗争、苦难和希望。

勒妮酷爱阅读《圣经》。她隶属于某个非洲独立教会，该教会起源于津巴布韦。每年有两周时间，她与教会的其他成员一同祷告、唱诗、研读《圣经》。《圣经》中丰富的叙事和诗歌给了她力量、慰藉和欢乐，否则，她的生活中就只有艰辛的重复性劳动，以及经济和政治上的斗争。

玛丽·约翰·玛南赞（Mary John Mananzan）是个来自菲律宾的女性本笃会成员，同时她也是菲律宾全国妇女组织联盟的主席。该联盟拥有4万名来自草根阶层的妇女成员。由于投身于维护妇女尊严和权力的斗争，她对一度流行的马利亚崇拜模式提出了质疑。这种崇拜模式鼓励菲律宾妇女顺从于她们的丈夫和长者，一如马利亚同意为上帝孕育儿子时所表现的对神圣意愿的顺服："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然而，玛丽·约翰却在被教会统称为"尊主颂"的《路加福音》所载的马利亚赞美诗中找到了抨击这种马利亚式虔诚的依据。马利亚对上帝唱出如下诗句：

>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
> 那狂傲的人正在心里妄想，
> 就被他赶散了。
> 他叫有权柄的失位，
> 叫卑贱的升高，
>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
>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
> 《路加福音》1：46—55 [3]

诗句中呈现出一个更积极也更具颠覆性的马利亚意象，她所奉拜的上帝支持穷苦人并剥夺富贵者的财富。玛丽·约翰让她班上的学生参加示威游行。"教授社会行动而非社会仪态"，这是《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对她的评价。

迪尼斯·辛古兰（Dinis Singulane）主教是莫桑比克的圣公会主教。在获得独立后的若干年间，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RENAMO）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之间持续不断的激烈内战使国民痛苦不堪。迪尼斯主教隶属于一个致力于推动和平进程的教会组织，在一次与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领导人会谈的重要会议上，他取出《圣经》，朗读了耶稣登山训众的两节（《马太福音》5：7，9）：

>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 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他恳请那位领导人以仁慈之心对待莫桑比克人民，停止交战；呼吁他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因为这样就能被“称为神的儿子”。“但你若不选择和平，”主教继续说，“我们就不知道你会是谁的儿子”。那位领导人请求迪尼斯主教留下《圣经》，他要用《圣经》来教导麾下的将领。

丹尼尔·鲍亚林（Daniel Boyarin）是个正统的犹太人，现在加利福尼亚讲授拉比研究课程。他曾在耶路撒冷的巴依兰大学任教过一段时间。他在《一个激进的犹太人：保罗与身份政治》一书中辩称，正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保罗才深刻地批判了传统中那些强调犹太人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倾向：“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8）。

然而，这种普世化倾向并非没有危险性。那些希望维护以往差别的人们又将如何？在这个美好的新世界中，他们的位置又在何处？随后的犹太教—基督教关系史表明了这种对犹太人已有特殊身份的拒认会造成何等可怕的后果。但与此同时，犹太人希望恢复并维持他们对以色列土地的特定依附，也为其自身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鲍亚林的观点是，较之重建锡安[4]的梦想，犹太人在大流散时代（即其在以色

列外部的犹太教社群中的生活时期）的经验为其处理社群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好的模式。人们必须聆听保罗对犹太主义的文化批评，正如这种批评同时也应受到他人的激进批评一样。

最后介绍的这个《圣经》读者就不那么心胸开阔了。马里斯·路特文（Malise Ruthven）著有一部引人入胜的游记《神圣超市》，其中描写了作者与神职人员提姆·拉·哈伊（Tim La Haye）的一次会晤，后者是所谓“阿米吉顿[5]神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相信《圣经》已揭示了世界末日的准确进程。它始于以色列国建立，包括圣殿的重建、大规模世界战争的爆发、犹太人的皈依，以及真正的信徒得进天堂（“教会被提”[6]）。

“《圣经》里说，‘无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拉·哈伊写道，“但我们却能知道那个时节……重要的迹象之一是，以色列和俄罗斯都是世界舞台上支配性的主角，正如先知们2,500年前对他们的预言。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俄罗斯始终无足轻重，而以色列几乎不存在。”接下来，他从《以西结书》中引用了一段关于以色列遭到来自北方的入侵的内容。他相信，上帝会采取超自然的干涉，于俄罗斯攻击以色列之际摧毁它。

我们还能继续举例。或许止笔于拉·哈伊这样的人物较为合适，以免这个多少有些随意且私人化的《圣经》读者名单显得过于谦卑或过于乐观了。我并不是想要呈现一种对《圣经》或温和或平淡的见解。我充分了解，正如《圣经》被用于争取正义和解放的事业一样，它也曾被用于在许多人看来异常邪恶的意图。例如，荷兰改革教会的许多成员支持种族隔离制度，而且他们真诚地相信这种政策符合《圣经》要义，因而在神学上也是正确无误的。与此同时我还知道，对于那些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来说，《圣经》是道德宗教指导的根源，同时也是启蒙的源泉。我们必须应对的事实是，双方都能从《圣经》中求得启迪和引导。犹太教社群和基督教社群处理《圣经》的方式全然不同，这不仅引人入胜，而且也令人困惑。

本书的目的之一在于考察《圣经》的成书形式，看这种方式能为理解《圣经》诠释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带来什么样的启发。第二

章考察经外传说和写作的过程，以便了解我们当今所知的《圣经》各卷的最终形式是如何形成的。第三章将考察不同卷籍被收入各种《圣经》的经历，目前，这些《圣经》在各种宗教社群中（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已获得权威性地位（被列为正典书目）。

这本书的其余章节将更多地聚焦于《圣经》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所得到的不同解读。在第四章中，我们会关注犹太教信徒和基督徒对《圣经》的某些解读。第五章则专注于批判性的解读，主要考察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情况，它们曾对如何理解《圣经》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接下来在第六章，本书将讨论《圣经》在非传统基督教地区被接受的方式。第七章考察《圣经》在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中扮演的角色。第八章探讨《圣经》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第九章则对全书进行总结。

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无疑是非常复杂的。是《圣经》本身的多样性造成如此多样化的读者群体吗？还是不同的读者按照自身的目标和意愿塑造了《圣经》——或从字面意义上，借助于确定哪些篇章应入选而哪些篇章不宜入选；或从比喻义上，借助于读者所采纳的不同解读策略？纵观全书，在考察《圣经》被阅读和践行的各种方式之际，这一问题将与我们相伴始终。

在此我应发表一项措词严正的不承担责任声明。我不可能代表《圣经》所有读者的观点，甚至不可能对涉及《圣经》的各种观点作出公正的筛选。首先，一如第三章所示，并不存在所谓的“唯一《圣经》”，因为有一系列《圣经》，它们收入的卷籍及其编排的顺序均不相同。其次，《圣经》属于全世界众多的宗教社群（以及宗教性并不强烈的社群）。我是欧洲白人，男性，出生于英国，是圣公会的基督徒，在苏格兰的一所大学讲授《新约》。大学，至少就其意向而言，是思想开放之地，在这里人们倡导某种国际性。我们很有幸，众多的海外学生和访客丰富了我们的学院生活。然而，尽管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人们增进对自身的认识，但我却无法假称它可以使我全然超越那种至少部分地塑造了我的人生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我属于某个特定的读者群。虽然它与其他这类群体有着种种关联，但是，我们只

能在自己所属的某个语境中阅读和思考，面对那些在我们看来特别紧迫的问题，反思我们各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和设想。当然，某些我个人会关注的问题也会是全球性的问题，会为世界诸多社群所关注。即便如此，我仍难免从自己的视角思考这类问题。对于这种倾向性我会尽量不抱偏见，但读者依然需要当心！

注释

〔1〕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英裔美国作家，革命领导人。1776年出版小册子《常识》，为美国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而辩护，1791至1792年出版了《人的权利》，捍卫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成果。——译注，下同

〔2〕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格兰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因发表《国富论》（1776）而成为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

〔3〕 原书引用的《圣经》是标准修订版（Revised Standard Version），但在新标准修订版（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中，实际引文应为《路加福音》1：51—53。本书中的《圣经》引文皆参阅汉语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南京。

〔4〕 锡安（Zion）：《旧约》时代耶路撒冷城内两座山中的东山，《圣经》作者以其指代耶路撒冷。后泛指犹太人的故土，转喻犹太民族回归故园的愿望。“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直译为“锡安主义”，即由此名引申而来。

〔5〕 阿米吉顿（Armageddon）：亦称哈米吉多顿（Harmagedon），《圣经》语词，源自《启示录》第16章第16节，在希伯来词源中指米吉多山。该山系著名古战场，后转喻“善恶势力在世界末日最后决战之地”。

〔6〕 教会被提（the rapture）：“基督末世论”中的基本词汇，意指上帝召唤忠实的基督徒上天堂之时。

第二章

《圣经》是如何写作的

在这本小书中，要以不长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题目，不可有太过乐观的期待。然而，对于《圣经》中的卷籍形成的过程，我们必须有所交待。它们是如何成为今日之模样的？本章将精选材料，仅举几个实例以展示《圣经》所蕴含的非常丰富的素材。

首先，有必要作几点一般性的说明，先谈文本写作的时间跨度。《旧约》中最早写成的部分（《士师记》第5章中的诗歌）据说成文于公元前10或前11世纪，而最晚的经卷（《但以理书》）则出自公元前2世纪的马加比时期。《新约》的时间跨度则比《旧约》短得多，最早的保罗书信大概写作于公元50年，其余卷籍的大部分也确定完成于公元1世纪前。对于所有的《新约》卷籍而言，学术界认真提出的最晚写作时间是《彼得后书》成书的公元2世纪中晚期，虽然该书也有可能形成于2世纪的最初二三十年。这有助于得出一种显而易见的观点：在《圣经》文献形成时期，作者们的生存状况——政治、文化、经济、生态方面的状况——彼此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圣经》中有反映游牧生活的文本，有出自君王或神殿崇拜者之手的文本，有被放逐者的作品，有在异族统治者的压迫下写成的作品，有宫廷风格的文本，有出于超凡的游方传教士的作品，也有受希腊写作风格影响的作者写出的高深作品。这个时间跨度覆盖了荷马（Homer）、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修昔底德（Thucydide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恺撒（Caesar）、西塞罗（Cicero）、卡图鲁斯（Catullus）的创作生涯。这一时期见证了亚述帝国（公元前12至前7世纪）和波斯帝国（公元前6至前4世纪）的兴衰、亚历山大的东征（公元前336—前326）、罗马的崛起及其对地中海世界的统治（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7年帝国设立元首政体）、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公元70年），以及罗马的统治扩张到苏格兰的部分地区（公元84年）。

口头表述和读写行为

虽然这批文献的成书时间相去甚远，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都产生于一种对写作行为评价甚高的文化中，即使其间的写作活动大体上依然被专职人员所控制。《圣经》中最早文本的形成时期明显对应于从使用楔形文字到字母系统的发展阶段。在楔形文字作品中，词语由符号表示，并用一种楔形工具镌刻在泥板上。在源于腓尼基人的最古老的字母表中，辅音字母用墨汁写在纸草或某种类似的适宜材料上——它更为柔韧，而且便于携带；最重要的是，这使得写作篇幅更长的文本成为可能。用新式字母系统写成的文稿能写在卷轴上，卷轴通常用皮革制成，可以承载《以赛亚书》的全部66章。后来手抄本书籍进一步发展起来（大致相当于现今图书的样式），使查询资料更为便捷，携带也更为方便。一部手抄本能把四福音书全部收录于同一个封套中，其篇幅大约是本书长度的两倍半[1]。从公元1世纪起，早期的基督徒最先用它抄写文学文本。约4世纪时，这种做法成为惯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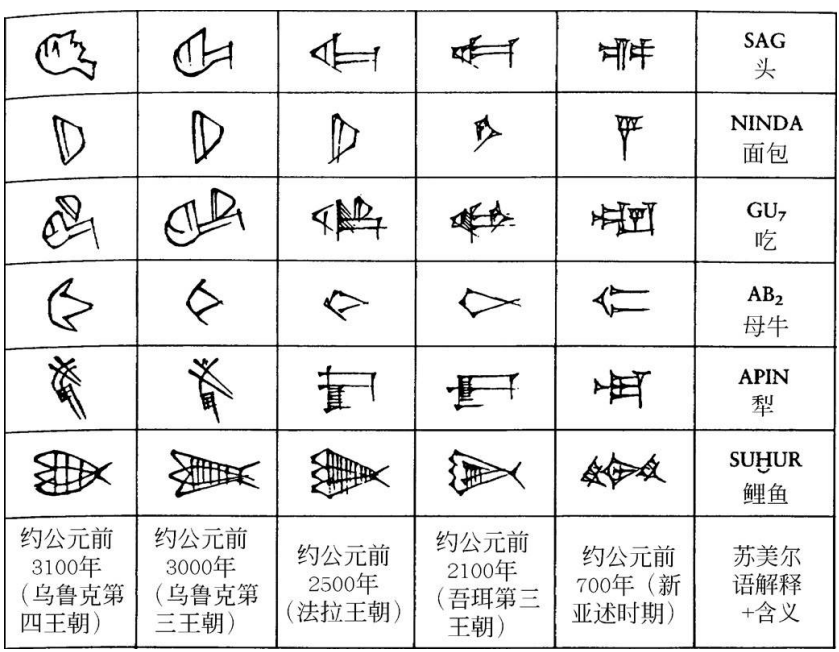

图1　两千余年间楔形文字符号演变图表

图2　手持打开的《圣经》抄本的青年男子画像，发现于3世纪的罗马地下墓窟中。基督徒喜欢用这种抄本指导其写作。

这个时代最显著的技术特征之一是语言记录新技巧的发展，其重要性可与16世纪印刷术的发展相媲美——印刷术使宗教改革观念的迅速传播成为可能。然而在更多情况下，《圣经》时代的文化依然是口头流传的，这意味着书写的文本往往借助于高声诵读才能流传，接受这种文本的大多数人是通过聆听而非阅读了解它们的。而且，我们目

前所知的大多数书写文本，无论是律法的、预言的、格言的、诗歌的还是叙事的，最初均为口传形式，后来才被笔录成文。于是，譬如预言式的讲论就是由先知口头作出的，它们被先知的门徒存在记忆中，后来才笔录下来。从最初的讲论、其后的笔录、将笔录片断与其他类似材料汇编，直到以某部先知书的形式最终出版，期间可能有数百年的时间悄然而逝，即如《以赛亚书》所经历过的情况。甚至在文本出自一人之手时，比如保罗的那些书信，它们也常常是向某个书记员口授的，虽然保罗偶尔也会添上他本人的问候语："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加拉太书》6：11）。

由此可见，纵贯《圣经》的创作过程，口头表达和读写行为是紧密交织的。这一点体现在如下事实中：各种文本的流畅洗练程度并不相同，有些出自于精通文本写作的行家里手，另一些则非常接近于对叙述和讲道的口头记诵。这一点在福音书里有着明显的例证：人们普遍认为《马可福音》在四福音书中成书最早，也最缺乏文学意味，这既表现在其希腊文风的粗糙上，亦表现在其内容近似于耶稣故事和言论的口头传说上。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路加相当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是像希腊史学家那样写作，通过精心筛选原材料写出一部信实可靠的文字记录（《路加福音》1：1—4）。他的文风显然富于文学意味，具有希伯来经典之希腊文译本的独特特征。

路加写作福音书时开篇就解释了他的著述目的和书写方式。当时有些人已试图记载耶稣生平所发生的事件，他则如同一位优秀的史学家，从别人的记载中精选材料，写就一部信实可靠的著作。

路加为其福音书撰写的序言

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

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福音》1：1—4）。

与此不同，马可则始于一句简单的论断：“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二者恰成对照的风格在译文中不易看清，但在下面两段话中能有所体现：

《马可福音》1：1—8[2]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中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路加福音》3：1—6[3]

凯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彼拉多作犹太巡抚，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聂作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那和该亚法作大祭司。那时，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路加擅长使用冗长的文学性语句写作，句中往往附加某些短语和从句（主从结构文体）。他把耶稣受洗的纪事置于其历史和政治的语境中。马可的希腊文则另有特色：句子由一系列主要的从句构成，它们简单地并置相连（并列结构文体），表现出一种讲故事的口语化特征。路加首先将约翰置于罗马的历史中，与此不同，马可将他的到来仅仅追溯到《圣经》的预言，于是他在收入那段先知言论时在句式处理上遇到了困难，只能将约翰出现于旷野中的从句直接跟在那段引语后面。

在这种读写行为和口头表述的大背景中，《圣经》文本的实际写作过程是怎样的？有必要牢记在心的是，《圣经》作者写作的方法与现代小说家大相径庭。小说家大体上都能自由控制素材，能凭借想象和经验创作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并能按其意愿运用各种文学典故和传说。相比之下，古代宗教文本的作者们则更多地受到昔日口头或书面流传的材料的限制。他们既是文本的创作者，也是文本的编订者。

要想体验我们进入了一个何等不同的文学世界，只需读一读《创世记》里的几个章节。我们从第1章得知上帝如何在六天中创造了世界，而在第七天休息。故事始于对混沌、黑暗的描写，然后从创造天体、陆地、大海、植物、动物，逐步发展到高潮，即创造出男人和女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记》1：27）。在开始描绘创造男人和女人之前，故事就已经强调了创造的美好，突出了它内在的和本身的价值。这并非否认第28节所表现的受造世界均为人类支配的强烈意味。但即便如此，人类的支配权仍受到限制。在《创世记》第1章，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都被限定以素食为生（只是在大洪水过后，按《创世记》第9章第3至4节记载，人类才获准吃肉）。在这篇故事的结尾，上帝完成其造物之后停工休息，他思索着所造的万物，“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至此，尚未出现什么显著标志能提醒我们已经踏进一个不同的文学天地。但在第2章第4节，创世故事却以一种相当不同的形式再度开始。首先，故事的结构迥然不同：第1章中按天创造的构思不见了。其次，事件发生的顺序也很不相同：在简要提及天和地的创造（与第1章对天地创造的强调迥然不同，在第1章，各种有生命的活物被造之前，四天已经悄然而逝）之后，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图画：地面没有任何植物，“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2：5）。上帝使雾气从地面升腾，滋润土地；继而，他的首次行动是造出人/亚当（在希伯来文中，“亚当”既指“人”，又是一个名字）。然而，尽管这是一个指称种类的术语，亚当却是男性，并且基本上是独

身一人。故事的其余内容都围绕着上帝为亚当提供生存条件而展开，先是为他建了一个园子，园中有各种花草树木，树上的果子能作食物（唯独那棵能分辨善恶的树结的果子不能吃）；继而造出各种飞禽走兽给亚当作伴。然而这些还不够，最后上帝又使亚当沉睡，用他的肋骨造出一个女人。至少在那时，亚当已经心满意足。故事结束于男人和女人快乐无比地生活在一起，全然不知他们是赤身露体的。

这两种描述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第二篇坦然地用写人的词语表现上帝，将人类置于创世的中心，且声称女人是用亚当的肋骨创造的，这是对女人在地位上从属于男人的生动象征。上帝就像一个雕塑家，用泥土塑成男人；他又像是个弗兰肯斯坦[4]，使男人沉睡，取其肋骨而造出一个女人。这与第1章表现上帝力量的崇高笔法相去何等遥远："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1：3）。而这是纵贯该章一再出现的基本主旨。再者，第2章显示，创造的全部目的都以男人（原文如此！）的需要为轴心。所有的一切都由于男人的需要而出现；倘若没有男人，其他任何事物都不会被创造出来。而在第1章中，人类固然是创造的顶峰，却依旧是整个创造过程的一部分。最后，第2章对造人的记叙无所顾忌地以男性为起点：男人的被造是第一步，后来的一切都依附于他；女人的被造适逢末尾，是创造的最后一步，且女人很快便严重堕落了。

最后还有一个差别，它在英语译文中不易显现，即在第1章中，上帝的名称用希伯来语艾洛希姆（*elohim*）表示，该词其实是复数形式。在第2章中，上帝又被称为YHWH（或许应读为亚卫［Yahweh］，但最初的词中没有元音字母）。

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个故事我们有两个版本，即便是对上帝这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也以不同的术语来指称，此外还有大量彼此矛盾之处，表现在创造的秩序上、男人、女人与创造的关系上，甚至男人与女人的相互关系问题上。

纵贯《圣经》前五部书，这种现象一再重复出现。例如，对于同一个故事说法彼此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出现于大洪水故事中（比较《创世记》7：2，3与6：19；7：8，9，15）、亚伯拉罕迁徙

故事中（《创世记》12：1—4a；12：4b—5）、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故事中（《创世记》15和17章）、旷野中的吗哪与鹌鹑故事中（《出埃及记》16：2—3，6—35a；《民数记》11：4—34）、“十诫”的条文中（《出埃及记》20：1—17；34：10—28；《申命记》5：6—18），以及禁食某些动物的饮食规章中（《利未记》11章与《申命记》14章）。除了叙事中的不同，用词方面的差异更多。在一些记载中，立约之山名为西奈（如《出埃及记》19：1；24：16）；在另一些记载中，又名为何烈（《申命记》4：10；5：2）。一些故事偏爱某些希伯来词语，如与“将亡的”、“灾祸”、“集会”等相关的词语，这些词在与其对应的故事中则极少出现，甚至踪迹全无。由此可见，某些故事存在着对应的版本，借助于辨析特定术语使用的连贯性，可望将对应版本区分开来。

希伯来《圣经》中的成对记载

《圣经》中的不少故事有两种说法。不同的口头传说被记录下来，而后收入经卷的最终版本中。有时，如亚伯拉罕徙居迦南之事所示，它们被简单地前后排列；在另外的情况下，如被带进方舟的动物之事所示，它们则被彼此交织起来，须由学者进行重构。

亚伯拉罕的迁徙

《创世记》**12：1—4a**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得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

十五岁。

《创世记》**12：4b—5**

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得，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

对挪亚有关动物的指示

《创世记》**7：2—3**

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

《创世记》**6：19；7：8—9,15**

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地，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地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

我们如何理解所有这些矛盾之处呢？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这批故事来自四种不同的书面文献，它们在时间的长河中被人们汇编起来，构成作为合成著作的《圣经》开头的五卷书。这四种原始文献分别被命名为“J”，即亚卫文献（Jahwist source，得自希伯来文YHWH的德文对应词）；“E”，即艾洛希文献（Elohist source）；“P”，即祭司派文献（Priestly source）；以及“D”，即申命派文献（Deuteronomist source）[5]。人们认为，最初J和E先被合并起来；晚些时候P被汇入“J＋E合编本”的叙事架构中；再后，或许与P的汇编同时，D被增补为第五卷书，但其内容有所改变，调整了约书亚被委以重任之事的位置。其中，最早的材料能上溯到公元前11世纪，

最后的编纂则始于公元前5世纪，也许包括了对P在总体面貌上进行的修订。就这样，五经（犹太人称之为托拉[Torah]）采集了人类历史上600年间的资料，将它们编在一起，展示出一幅世界的创造、上帝与其子民尤其与以色列人关系的宏伟画卷。

五经之五卷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的文献资料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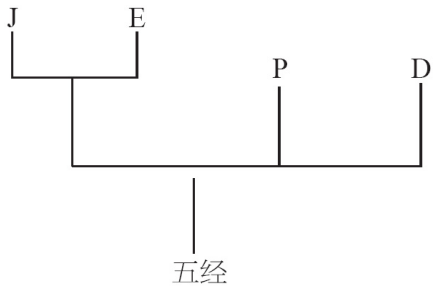

亚卫

纵观希伯来《圣经》，YHWH这个术语出现得非常频繁，但并非从来不发生变化。在能够读出语音的经文中，它其中所补入的元音得自一个指代“主”的希伯来语词“阿东乃”（*adonai*）[6]。加入元音字母后，由辅音构成的YHWH被拼读成JeHoVaH[7]。此名最初的发音形式可能是“亚卫”（Yahweh，有时写成Jahweh），但其真正的拼写样式并未流传下来。犹太人对上帝的名字满怀尊崇和敬畏之情，因此避免使用它，而宁愿代之以“主”。学者们则依据各书所采用的上帝名称的不同写法，来分辨构成五经的主要文学资源。

不仅《旧约》经卷源出于多种口头和书面文字传统，福音书也如

出一辙。福音书包含了对耶稣生平、受难、复活的四种讲述，尽管它们彼此之间也有大量的一致之处，但无论是观念还是细节上都存在种种有趣的差异。就前三卷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而言，一致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不但表现在诸多事件的编排顺序和对事件细节的多种描写方面，而且还在个别段落上表现为叙事的总体文学结构、语句结构、词汇选择，乃至文法形式等方面的一致性。这些语言上的一致之处是如此惊人，竟至使人得出结论，认为其间必有这样那样的文学借鉴关系；换言之，即有人复制了他人的作品。

下面三段呼召税吏的描写在遣词造句上存在着很明显的一致性，对此现象最容易作出的解释是，其中的两种复制了第三种叙述。三者之间的差别也值得注意，它们或许表现了不同作者在理解和强调上的差异。

《马太福音》**9：9—13**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马可福音》**2：13—17**

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就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

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路加福音》5：27—32

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

虽然并非没有争议，学者通常的看法却是马可最先写出福音书；马太和路加都使用了马可的资料以及另一种主要由格言警句构成的资料，后者被归于耶稣所作，称为Q文献 [8] 。这又致使早期基督教史学家得以借助于不同的福音书以及Q文献，重构各具特色的神学观念。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如何理解最早成书的《马可福音》？马可是从哪里得到了他的素材？在马可背后肯定存在着一些口头传说，它们被马可收集起来，按照某种顺序编为一体。与此相仿，被归入Q文献的材料（大致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共有的耶稣言论）可能也曾以口头而非书面的形式流传。

学者们曾试图重构福音书背后的口头传说的历史，但结果并不令人振奋。这段流传时期相当短暂：从耶稣受难到马可写作其福音书，其间还不足40年。这意味着几乎没有时间令口头传说获得固定的形式。当然，这并不排除如下可能性：有关耶稣最后日子的较长篇幅的口头叙事已经出现，或许被用于基督徒的崇拜活动中，并构成四福音书中描写耶稣遇难（即受难叙述）的基础。即便如此，仍难以得知

《马可福音》（或者假定的Q文献）中的哪些成分来自于传说，哪些又来自于马可本人。

不过，我们仍能多少有些信心地说，耶稣的故事和言论在被笔录成文之前，可能就以多种多样的口头形式流传着。一如希伯来《圣经》，福音书也植根于口传的文化。然而，虽然在这方面与希伯来《圣经》相仿，福音书中却也有朝读写方式迅速发展的动向，让人印象深刻。在大约40年间就写成四部关于耶稣生平、受难和复活的重要文学纪事，这是一项卓越成就。这清楚地表明，在公元1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社会各阶层中，文字作品的重要性日渐显著。同时这也证实，早期基督徒渴望成为那个社会的一员，尽管他们相信世界即将戏剧性地终结。

由此可见，《圣经》中的许多卷籍并非某个作家在短短几年中写成，而是一种汇编之作，反映了几百年间的社群传统。就《新约》而言，虽然学术界公认其中很多卷籍都是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但福音书在特定意义上依然是集体创作的产物，保留了早期基督徒的口头传说。

然而，虽然《圣经》中的作品深深植根于一种口头文化和传统中，但它们显然仍是文学著作。首先，它们运用了文学的形式和写作惯例。《圣经》中含有非常多样化的文学形式。希伯来《圣经》传统上分成三部分：托拉、先知书和诗文集。托拉（或五经）构成了《圣经》的前五部书，其中包括了一批叙事和律法文本。在某些部分叙事占支配地位（如《创世记》、《出埃及记》、《民数记》）；在另一些部分律法性材料又占主要篇幅（如《利未记》和《申命记》）。《申命记》被描述为摩西辞世之前给以色列人留下的遗嘱，随后以色列人就在约书亚的指挥下进入应许之地。先知书包含一批预言性著作，兼具叙事和预言讲演的双重特征。在此之前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等历史记录。这批著作不但含有诸多叙事杰作，而且以独特的神学观念建构了以色列人的历史。诗文集汇编了多种赞美诗和格言式作品，以及另一批史学著作。

除了这些文类，《新约》中还有另外一些文学形式：福音书——

与当时的传记或“人生记述”颇为类似；书信——篇幅不等，从相当简短的私人交往信件（《腓利门书》）到精心打造的16章专题论文（《保罗致罗马人书》）；人物行传——记载了著名人物的事迹，这在基督教文学中有很多范例；以及启示文学，即《启示录》，这是公元1世纪犹太教中广为流行的文体。由此可见，《圣经》的作者和编者们著书立说时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其中不少起源于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化。但在《圣经》的书写和汇编传统中，此类文学形式却颇具影响力，并限定了经卷的写作方式。甚至那部被归于马可的福音书，作为当年人物传记的一种特殊变体，其文体样式很快就被其他正典福音书的作者们所效仿，亦被不少其他作者竞相追随，只是他们的著作未被收入正典而已。所以，《圣经》既吸收了文学的传统和形式，又对此进行了创造。

《新约》卷籍之大致日期与同时代作家对照表

《新约》卷籍	同时代希腊和拉丁作家
公元49年《帖撒罗尼迦前书》	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公元前15—公元50），犹太人希腊主义哲学家
52—54《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	普卢塔克（Plutarch, 46—120），希腊史学家、哲学家、作家
55—56《哥林多后书》《罗马书》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 50—138），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
60—62《腓利门书》《腓立比书》	尤维纳利斯（Juvenal, 58—138），罗马讽刺作家 塞内加（Seneca），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65年被尼禄（Nero）勒令自杀
68—70《马可福音》	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罗

75—90《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传》 90年代《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犹大书》 95—96《启示录》（41—100） 100—130《彼得后书》 其余各书大致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最后30年间： 《歌罗西书》 《以弗所书》 《希伯来书》 《提摩太前书、后书》 《提多书》 《雅各书》	马讽刺小说家，66年自杀 马提雅尔（Martial, 40—104），罗马格言诗诗人

《圣经》内部的文学引用

《圣经》的作者们意识到他们是在某种文学传统的影响下写作的，这一点表现在他们对《圣经》早期卷籍内容的引用上。不言而喻，在记载本民族历史上伟大人物的生平时，作者们会进行种种比较。即便《申命记》中已有定论——“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行各样神迹奇事”（《申命记》34：10—11），这也不妨碍后来的作者至少作一些比较。于是，约书亚由摩西授权率领众人进入应许之地时，携带着约柜渡过约旦河，这明显引用了摩西过红海的典故。在两段故事中，众人都在水边宿营，清晨动身出发；大水都出现神奇的分离，在《出埃及记》中是“作了墙垣”（14：21—22），在《约书亚记》中

是“立起成垒”（3：13，16）。在所有这类描写中，约书亚都是按摩西的吩咐做的，而“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4：14）。《士师记》第6章的基甸应召和《出埃及记》第3章的摩西应召这两个故事之间也有类似的可比之处，《士师记》明确追溯到《出埃及记》第6章第7至10节及第13节。二者在语言上有相仿之处，都提到“我与你同在”（《士师记》6：16，比较《出埃及记》3：12）。进而两个故事在结构上也如出一辙：以色列人受压迫、呼求拯救者、异族诸神被毁灭、圣战爆发。这些可比之处在后来的改写本中也进一步展开。

然而，这种做法并未止步于《旧约》的写作，而是在《圣经》以外的希伯来文、希腊文典及《新约》对这些故事的重述中得到了延续。《马太福音》中屠杀婴儿的故事含有对摩西降生故事的引用和间接的影射。

《圣经》的作者在构思自己的叙述时，经常从较早的叙事和文学主题中取材。下面我们可以看出《出埃及记》第4章第19至21节与《马太福音》第2章第19至20节之间的紧密联系。

《出埃及记》**4：19—21**〔9〕

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

《马太福音》**2：19—20**〔10〕

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

这些简短例证所展示的是一种充满生气的宗教传统：其文本传统处于自我对话的状态之中。在某卷书中被确认为神圣启示的内容，将由后来的作品传承并诠释。这种文学内部相互作用的范围肯定比我们在这里所能勾勒的要宽泛得多。摩西形象贯穿于《圣经》的许多叙事中，塑造了故事的讲述方式，并被用作评判随后叙事中人物形象的一种准则。与此类似，以色列人出埃及、漂流旷野，以及圣地被掳掠之事也将由后人重述，成为律法、预言和礼拜仪式文献的素材。以往那些在神圣卷籍中记述过的伟大事件，势必影响到人们体验现实和梦想未来的方式。漂流旷野之后进入圣地的主题将会出现在以赛亚的预言中，以激励那些在流亡中盼望回归的人们，他们追寻着以色列荣耀的复兴，届时万民将聚集起来，向锡安表达敬意，并沐浴在圣殿和以色列国重建后的荣光之中（参见《以赛亚书》40：1—11；60：1—14）。

相同的梦想还塑造了基督降生年代犹太人的信念。死海古卷的作者库姆兰教派将遁入旷野看成对以色列最终复兴和圣殿重建的预备。马可以施洗者约翰宣告“主的道路”开始讲述这部福音书的故事。当然，约翰说的是自己的施洗，而其施洗是为耶稣预备道路。耶稣能力更大，将在约翰之后到来，用圣灵和火为众人施洗。

有意思的是，这些文本赖以形成的语境却相去甚远。以赛亚文本形成于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流亡的时期，它向那些到处漂泊的同胞作出回归圣地、重得往昔荣耀的应许。确实，他们将得到更大的荣耀：万民都会前来，认同其上帝的荣耀。相对而言，库姆兰教派则处于圣地内部的流亡之中，认定罗马统治势力和圣殿的祭司都被邪恶之灵所控制。他们的世界被异族的暴力再度颠覆，异族人侵犯了他们的独立，削弱了他们的宗教传统；但他们同时也失去了对本民族宗教领袖的信心。他们同样满怀先知的希望，要回到犹太历史上那些奠基的时刻；然而，他们并非寻求在地域上从流亡中回归，而是寻求推翻占领者的势力，恢复并重建圣殿及其祭司制度。

在《马可福音》中，这些古代预言的意义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马可在罗马城为遭受迫害的外邦基督徒社群写作，他关注的并不是以

色列和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或复兴。对他而言，始于旷野的“主的道路”将借助耶稣传教布道、治病救人、驱魔逐鬼的使命而通向耶路撒冷，在那里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继而其门徒被告知回到加利利，他们将从那里出发外出传道，把福音传给万民。马可的外邦基督徒社群所面临的问题是野蛮的公开刑罚和处死，它们已不再单单针对某个特定民族。既然如此，问题的解决也就不再取决于民族的复兴。对于马可来说，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耶稣对撒旦的捆绑，在于对众人追随他（3：14）并把福音传遍万国（13：10）的呼召。

1947年，库姆兰教派的作品死海古卷首次被发现于瓦迪·库姆兰附近的山洞里，这个发现颇令人惊奇。该派（可能）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初期，是从反对塞琉古最高统治者的抵抗党中分裂出来的一支。他们在死海岸边的基伯特·库姆兰过着严守教规的禁欲生活，并在那里建成了一个大型文库，收藏了多种《圣经》手抄本和释经读物，以及他们自己的律法、仪式和预言作品。他们期待着一场圣战，以便击败罗马人并复兴以色列。该社团在公元68年的犹太战争期间被摧毁。

充满生机的口头及书面传说

我在本章试图使大家对《圣经》卷籍的写作方式有所了解，特别强调了它们起源于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已经有文学兴起，但它们从许多方面来说依然是口头文化。这就使得《圣经》成为一种文献汇编，而那些文献深深植根于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口头传说之中。它们是逐渐书写成文的，这一过程本身应当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我们目前拥有的经卷也许是在其他文集和作品的基础上写成的；或者，它们实际上是对那些文集和作品的汇编。

口头传说一旦笔录成文，就会影响更多文学作品的创作，或者影响业已记录下来的新口头传说的编订。《圣经》中的早期作品对日后的写作产生了影响，同时它们也被日后的作品所订正，甚至被彻底更新。传说——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文字的——都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传说，有时还是引发争议的传说。它肯定不是用一种声音言说，而是不同声音言说着同一种语言。它们汇聚起各种短语和主题，共享着由公众积累起来的形象和意念，有时则以明显不同的方式重构这些形象和意念。这是一种充满活力且范围广阔的交流，涉及故事和史记、与律例法规相关的论辩、箴言和警句、书信和幻象。诸如此类的文本中有着丰富的词汇，处境互异、时代不同的人们试图借助这些词汇来与他们自己或康乐富足或忍辱负重的经历达成妥协。这些文本提供了律法、社会和政治智慧的充足资源，人们会通过它们寻求统筹其事务、强化其民族，并与自己的邻居和睦相处的策略。它们还是梦想的体现者。以往那些伟大的事件，即从奴役中的得救和漂流旷野时的勇敢坚韧，将来也许会被再度创造。辉映以往历史及其荣耀的新世界也许将以令人惊异不已的方式呈现出来。后面我们将看到，这种发生于《圣经》写作过程中的文本重组和再编，将会延续到后世犹太教和基督教社群接受《圣经》的历史过程之中。

注释

〔1〕 这里指本书英文版篇幅的两倍半。

〔2〕 在新标准修订版中，实际引文应为《马可福音》1：1—4。

〔3〕 在新标准修订版中，实际引文应为《马可福音》1：1—4。

〔4〕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著名电影怪物角色。初见于M.W.雪莱写的哥特式浪漫故事兼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1818）。在原书中弗兰肯斯坦是一个专攻秘术的瑞士学生，他造出一个怪物，最后却被那个怪物杀死。后来那个怪物被称为弗兰肯斯坦。当代西方多有电影以弗兰肯斯坦为主角。

〔5〕 亚卫文献、艾洛希文献、祭司派文献、申命派文献亦分别译为雅威典、厄罗亨典、申命记法典、司祭法典。

〔6〕 该词译法可参阅许鼎新：《旧约原文词义》，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2001，第2页。

〔7〕 汉语《圣经》将其译为“耶和华”（Jehovah），此乃上帝之名的误译。许鼎新及前辈《圣经》文学学者朱维之先生都将Yahweh翻译成“亚卫”。参阅许鼎新：《旧约原文词义》，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2001，第2页；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76—82页。

〔8〕 Q文献：福音书研究者推测曾经存在过的一部耶稣言论集。Q是德文Quelle的缩写，意为“原始资料”。

〔9〕 在新修订版中，实际引文为《出埃及记》4：19—20。

〔10〕 在新修订版中，实际引文为《马太福音》2：19—21。

第三章

《圣经》的成书过程

《圣经》的诸多名称

至此，我已相当随意地论及“圣经”（the Bible），但并没有探讨这个名称可能拥有的含义。该词本身源于希腊文*biblia*，后者其实只是*biblion*（即“书”）的复数形式。“圣经”一词的单数性质消弭了其词源本身带有的复数意义。《圣经》是一部文集：那么它包含了哪些卷籍，又为何收入这些卷籍呢？

一部辞书将“圣经”定义为：“基督教的《旧约》和《新约》经卷；《圣经》的一册；《圣经》的某个特定版本（‘主教版《圣经》’、‘马裤本《圣经》’、‘印刷者《圣经》’、‘醋《圣经》’、‘邪恶《圣经》’）；……有权威的书。”这无疑是该名称在英语中标准的传统含义，迄今在英格兰（及许多其他地方）如此使用，并清楚地反映出基督教对此种用法的影响。据此定义，《圣经》由《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构成；它显示这部文集被理解成某种权威资料。它还补充了一种新含义：这部文集有着不同的译本或版本。

然而，这并非对该文集性质的全部理解。至少在当今，“圣经”一词还会出现在诸如“希伯来圣经”、“犹太教圣经”和“基督教圣经”之类的表述中。显然，基督教《圣经》中收有许多犹太教的神圣卷籍，不论这些卷籍是否总被犹太教信徒认可为“圣经”。

拙劣的《圣经》版本

印刷错误和奇特的翻译致使一系列《圣经》译本有了绰号，下面是其中几个有名的例子：

马裤本《圣经》：1560年出版的《日内瓦圣经》将《创世记》第3章第7节的“裙子”译为“马裤”。这种译法也出现在《威克里夫圣经》中。

印刷者《圣经》：出版商将《诗篇》第119章第161节中

的“首领”（Princes）排印为“印刷者”（Printers），以致出现一个对出版商来说非常合适的句子：“印刷者无故地逼迫我。”

醋《圣经》：一个1717年的译本将《路加福音》第22章[1]中的栏外标题“葡萄园（vineyard）的比喻”印成“醋（vinegar）的比喻”。

邪恶《圣经》：一个1632年的译本将第七条诫命印成“你可以犯奸淫”。

在讨论这些虽然相互关联但却各不相同的经卷汇编之前，我们先简要考察《圣经》的得名过程。首先从犹太教经典开始。这部被犹太人视为圣物的经卷汇编曾经有多种名称，最常用的是“经卷”（scripture）、“诸经卷”（the scriptures）、“神圣经卷”（the sacred scriptures）、“诸书卷”（the books）、“二十四书”（the 24 books）、“律法书、先知书以及诗文集”（the Law，the Prophets and the Writings）、“塔纳赫”（Tanak，系一首字母缩拼词，得自表示《圣经》三个部分的希伯来语名称Torah[托拉]、Nebi'im［纳毕］、Ketubim［纪士宾］的首字母），以及“密可拉”（mikra，字面含义为“[高声]诵读的部分”）。其中后面两个名字是在中世纪出现的。而诸如“犹太教圣经”、“希伯来圣经”一类名称的使用日期则相当晚近，虽然很难确定它们的精确起源。最近它们在宗教研究院系成为许多人关注的课题；在多元文化或多元信仰的背景中，“《旧约》的重要地位”一类的题目已显得不合时宜。

基督教的用法也植根于这些犹太教名称中。我们从《新约》作品中能发现“经卷”、“诸经卷”的说法，前一个单数用法有时指称某些特定段落（时而也说“这经上”，如《马可福音》12：10），有时则指称整部《圣经》（如《罗马书》4：3）。后一种用法也许来自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翻译，以“七十子译本”闻名。在此译本中，类似于“耶和华之言”的希伯来式表述被译成“经卷中的上帝之言”（如《哥林多前书》15：15）。这种用法在后世的传统中得到保留，例如，在

中世纪天主教大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笔下，“神圣经卷”（*sacra scriptura*）便成为标准。在罗马天主教神学界，该词一直是大家偏爱的指称《圣经》的方式。

《新约》有时也用希腊文*biblion*指称律法书（《加拉太书》3：10；《希伯来书》9：19），在此，作者们再度采用了“七十子译本”的用法。然而，另一些用希腊文写作的公元1世纪的犹太作家，如著名的约瑟福斯（Josephus）和斐洛，却主要使用复数形式的*biblia*。而正是这种用法自4世纪晚期起成为后世教会的标准用法。只是在中世纪，从拉丁文中的借用语*biblia*才逐渐被视为一种单数表达，继而它又体现在一些欧洲语言用法中：*la bible, la biblia, die Bibel*，等等。

因此简要地说，作为一部神圣文本的汇集，“圣经”一词首先被用来指称不同版本的基督教经卷。只是后来，它才以一种意在将希伯来《圣经》从基督教经卷中区分开来的方式，被运用于犹太教经卷。这使“圣经”一词最新近的用法显得含混不清：既能指犹太教《圣经》，又能指基督教《圣经》，还能指它们的各种版本形式。现在，我们有必要思考这些文集是如何编成的，以求廓清不同的犹太教信徒和基督徒社群在汇编及确定《圣经》的过程中造成了哪些差异。

犹太教正典的形成：希伯来《圣经》及其希腊文译本

某个特定社群汇编、确定其经卷的过程通常被称为经卷的正典化。希腊语词“正典”（*kanon*）的意思是“竿”或“芦苇”，引申义为“规则”或“尺度”。创作神圣作品的正典就是确认一部文集，从某种意义上说，该文集将为编出它的社群提供行为规范。有必要牢记在心的一点是，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的经卷，它们很早就产生于不同语言的译本中，其汇编过程和翻译过程是密切关联的。但为方便起见，在此将分别考察希伯来《圣经》及其希腊文译本的形成。

希伯来《圣经》的形成

如前所述，那批共同构成基督教《旧约》、并在作出某些重要调整的情况下也共同构成希伯来《圣经》的作品，是在大约900年的漫长时期中陆续写成的。它们被汇编为社群的权威性著作，也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圣经》中那些较早出现的卷籍首先被确定为正典：即律法书和记载了以色列人进入圣地以及随后种种盛衰沉浮事件的历史书。接着是重要的先知著作，最后是被称为“诗文集”的赞美诗、歌词、格言警句以及一些较具冥想特质的作品（有时带有明显的怀疑主义意味）。人们一般认为，律法书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先知书于公元前200年左右分别被正典化。但最后一部分即诗文集的正典化时间却不甚明了。

一如前述，《新约》明确承认一批权威性经卷（*graphai*）的存在，并不时以较为具体的方式提到它们：“律法和先知的书”（《马太福音》7：12；22：40；《路加福音》16：16；《约翰福音》1：45a；《使徒行传》13：15等）。一些成书较晚的犹太教作品中也有某些线索暗示那批经卷的进一步分类，与后来分成律法书、先知书、诗文集的三分法相一致：参见《便西拉智训》[2]的前言、该书39章第1至2节，以及《马加比传下》第2章第13至14节。《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也在某种语境中提到三分法，明示它所指的就是整部《圣经》，这时，复活后的耶稣在以马忤斯显现于门徒面前，“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前两部分即律法书和先知书的构成相对稳定，至于第三部分，则显得难以把握——这一情形在死海古卷的《圣经》手抄本中得以证实。死海古卷中包含了公元1世纪时一个犹太教派文库的几乎全部内容（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只能看到破碎的残篇）。其中包括与当今定本几乎相同的希伯来《圣经》的全部卷籍，仅缺少《以斯帖记》。另一方面，这固然说明那时对构成《圣经》的24部书已达成基本共识，但死海古卷的另一些特征也揭示了当时经卷在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状

态。首先，出土于库姆兰的《诗篇》抄本中含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删节（共删35篇，还包括诗篇110），以及大量的增补。库姆兰最长的单册书卷被编号为11QPsa，其中有41首诗被收入当前公认的《诗篇》选本中，另有8首未见于先前的希伯来文作品。该文库中还有许多未被当今希伯来《圣经》收录的作品（那些与该社群本身生活之历史和规章制度直接相关的文件除外）。这类作品中的一部分可见于“七十子译本”。还有些始终游离于犹太教或基督教社群的正典之外（例如《禧年书》，书中重述了《创世记》的叙事，其神学观念与该教派原创作品的某些观念很接近）。但《禧年书》却被收入埃塞俄比亚教派的正典中。

至于希伯来《圣经》的最终成型时间，似乎是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陷落，继而作为犹太教权威之源泉的圣殿再度被毁以后的某个时候。这便引出涉及正典化过程的一些有趣的问题：谁拥有断言某些卷籍能否成为正典的权威性？是法利赛人的团体吗？按照传统说法，耶路撒冷陷落后他们便在詹尼亚（雅弗尼）聚集于约阿南·本·撒该（Johanan ben Zakkai）的身边。目前不少人质疑这个团体拥有某种能为遍及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犹太教社群所认可的权威性。认可的过程或许是逐步完成的，伴以那些社群逐渐认识到某些作品的价值和另一些作品的危害性。考虑到惨败于罗马人之手——不仅在犹太战争（66—73）中，而且在巴尔·科克巴起义（132—135）时——的痛苦经历，那些含有宇宙大决战和消灭犹太人之敌等激烈场景的作品或许会被慎重处理。见于库姆兰文库的《以诺书》就被排除了，而另一些（如《但以理书》）却被保留下来，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在那些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广泛流传。或许直到进入公元2世纪之前，一直没有被确切认可的正典出现。

事情至此并未结束。这时正典经卷的文本还是用无元音符的希伯来文写成的（且在不多几处还有亚兰语）。这意味着实际书写文本中只有辅音字母。这便留下很大空间，可能导致抄写错误、为辅音字母添加元音的不同形式，乃至由于对辅音字母的重组而造成大不相同的词语。只是后来得益于一套对辅音文本进行标注以代表所缺元音系统

的创立，这些含糊不清之处才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此乃马所拉学者们的成就，他们最早从公元6世纪才开始编出有这种标注的《圣经》文本。

希腊文翻译：七十子译本

从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起，亚历山大东征成功之后，在犹太人所居世界的许多地区，希腊语都成为首要的交流工具。那时，犹太教社群广泛散布于地中海沿岸和中东各地。许多犹太人在亚历山大之类讲希腊语的城市里长大，并在希腊语学校上学，不少人不再讲希伯来语。自公元前3世纪中期起，五经开始被译成希腊文；随后数百年间，另一些著作也被翻译。也就是说，希伯来经卷被译成希腊文与希伯来《圣经》的正典化是同时进行的。

《圣经》的这个希腊文译本一般被称为“七十子译本”（Septuagint），该词源于拉丁文*septuaginta*，意思是“七十”。据《亚里斯提亚书信》记载，72个长老按埃及托勒密国王的要求把五经译成希腊文。他们得到周全的照顾，勤勉地工作，在72天内完成了任务。这件事虽然被普遍视为民间传说，但“七十子译本”这个术语却沿用至今，甚至在学术界也是如此。通常，人们用缩略语LXX来指代该译本。

在这个翻译和正典化并行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引人关注的特征。首先，希伯来文卷籍与希腊文卷籍的文本之间存在一些实质性的差异，突出表现在《耶利米书》上，其希腊文译本比希伯来文本要短得多。（有趣的是，较之正典希伯来文本，发现于库姆兰的希伯来文《耶利米书》更接近于希腊文译本。）其次，所收录卷籍的数目也有实质性差异，这既表现在七十子译本的不同版本之间，也表现在七十子译本与希伯来《圣经》之间。一般说来，《以斯拉一书》、《所罗门智训》、《便西拉智训》、《犹滴传》、《多比传》、《巴录书》、《耶利米书信》、《马加比传上、下、三书、四书》和《所罗

门诗篇》未见于希伯来《圣经》，却被收进七十子译本。第三，编排顺序也有所不同，在七十子译本中，希伯来《圣经》的三分法被弃置不用。五经与其他历史著作之间似乎未作清楚区分。此后各书的顺序更加缺乏一致性：一些抄本将《诗篇》和智慧文学置于先知书之前（与某些新教《圣经》类似），另一些又与此顺序恰好相反。在一些版本中，《但以理书》被列于大先知书部分；在其他版本中，它又隶属于小先知书。

基督教的《旧约》

最初七十子译本是为大流散中的犹太人翻译的文献，它随后却为基督教社群所采纳，成为教会了解《旧约》（如其目前的称呼那样）的媒介。这意味着基督教《圣经》自始就比其对应的希伯来《圣经》含有更多的卷籍。七十子译本的语言影响了许多《新约》作者。直到4世纪末和5世纪初圣哲罗姆[3]将基督教《圣经》翻译成拉丁文，七十子译本的地位才遭到质疑。哲罗姆开始翻译时，已有不少《圣经》卷籍被译成拉丁文，而他所关注的却是回归希伯来经文——只要有相应的希伯来文本存在。他使用了当今希伯来文《圣经》的一种早期文本，并且不遗余力地学习希伯来文。这使他的基督教《旧约》的拉丁文译本具有很强的可靠性。该译本日后成为官方《圣经》，也即“拉丁文通俗译本”[4]。

然而，基督教《旧约》的历史无论如何也不会就此止步。《圣经》拉丁文译本的出现是西方讲拉丁语的基督教与东方基督教开始分道扬镳的标志，后者讲希腊语、古叙利亚语、科普特语、埃塞俄比亚语和其他一些语言。东方各教会的《圣经》篇目相去甚远：埃塞俄比亚正教的正典收入81本书，包括不少启示文献，诸如见于库姆兰文库但随后被犹太教正典排除在外的一些作品。作为一种基本规律，可以说，正教各派普遍遵循了七十子译本，在其《旧约》中收入了比犹太教正典更多的卷籍。

宗教改革时代以前的西方教会也存在相同的情况。但到了宗教改革时代，一场巨变发生了，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旧约》的希伯来文本重新产生了兴趣。《圣经》钦定译本（或詹姆士王译本）的译者们抨击先前的《旧约》拉丁文翻译，抱怨它们“并非出自希伯来文的源泉……而是出自希腊文的潮流；因为希腊文本已并非全然清澈，从中译出的拉丁文本必定更加浑浊不堪”，相比之下，圣哲罗姆的译文则“出自它们真正的源头”。

> 《圣经》的钦定译本或詹姆士王译本也许是所有英文译本中的最为知名者。它的确是对英语文学和语言影响最深的译本。在1604年的汉普顿宫会议上，国王詹姆士接受英国清教领袖约翰·雷诺兹（John Reynolds）的提议而授权展开这项译事。大约50位学者分成6组，分别在剑桥、牛津和威斯敏斯特投入工作，他们对已有的各种译本进行比较和修订，意在译出一个标准版本，供英格兰教会使用。该书第一版于1611年问世，之后又进行过一系列局部修订。在美国，它曾是销量最大的《圣经》版本。直到1988年，它才让位于新国际译本。

与此相关的是，尽管钦定译本的序言中未予明示，较之那些仅见于七十子译本中的卷籍，它对希伯来《圣经》中的卷籍表示出更多的敬意。前者被从《旧约》和《新约》中明确区分出来，而冠以“被称为次经之书”。“次经”（Apocrypha）是个源于希腊文形容词的复数名词，意思是“隐蔽的”或“暗昧不明的”，由德国宗教改革家卡尔施塔特（Carlstadt）于1520年引进。其建议是，这批卷籍仅为那些智者或熟悉内情者保留。宗教改革家对它们持质疑态度，因为《马加比传下》含有对死者的祷告（12：43—44），这是一种他们不予承认的天主教范例。这种普遍的质疑态度反映在英国圣公会《公祷书》的经文选段中，其中只有很少次经段落供公开诵读，它们主要选自《传道经》（《便西拉智训》）、《巴录书》或《所罗门智训》）。与此相对照

的是，罗马天主教重申这批卷籍的权威性，称之为“第二正典”，即第二位重要的正典。特伦托会议以后发行的拉丁文通俗译本将它们穿插于《旧约》经卷之中（一如七十子译本），但把《玛拿西祷言》、《以斯拉三书》、《以斯拉四书》降格为附录。此事后来再度发生转折，19世纪20年代以降，（新教）《圣经》公会印刷《圣经》时，普遍做法是完全删除次经。但一些较晚近的全球通用《圣经》译本（如大公版《圣经》）又重新收入了次经或第二正典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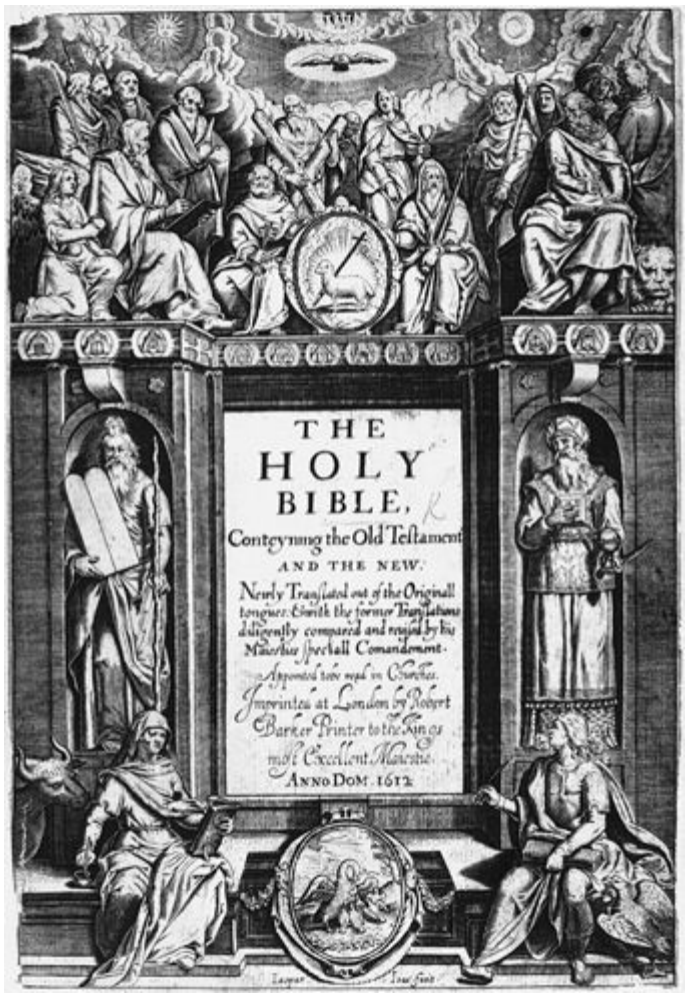

图3　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英译本《圣经》的书名页

特伦托会议（1545—1563）是教皇保罗三世（Pope Paul III）接受神圣罗马皇帝查尔斯五世（Charles V）的提议而召集的，意在解决宗教改革时期的争端，并消除天主教内部教务中的弊病。实际上它所起的作用是限定天主教教义对宗教改革家言论的反应，并解决此前悬而未决的教义问题。除了大量其他议题，它裁决了经卷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圣经》的神启性质问题，以及在诠释《圣经》方面天主教教权的权威地位（天主教会的教导职责）问题。它发布了《圣经》正典及第二正典卷籍的权威目录，并将拉丁文通俗译本确定为权威的拉丁文官方译本，供教会使用。

基督教的《新约》

基督教《新约》（特指起源于基督教的作品）的正典化过程与希伯来《圣经》正典化的过程并非完全不同。

基督教初建之时无疑没有出自基督徒的成文经卷。对早期基督徒来说，“圣经”是日后被他们逐渐称为《旧约》的经卷。最初基督徒的作品也不可能作为经卷来写作。然而，一旦基督徒的作品本身被视为经卷，就有必要把它们从较古老的作品中区分出来。“旧约”和“新约”之说是在2世纪末才出现的，它们起初分别用来指称上帝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之约，以及上帝通过耶稣与教会所立之约。其含义是，它们是隶属于旧圣约或新圣约的经卷，而非其本身就是上帝与人所立之约。当然，后来这两个词语也渐指那批经卷本身，如詹姆士王《圣经》的书名页上就有如下文字：“承载着《旧约》和《新约》的《圣经》”（参见图3）。

那些基督教创始人的作品是如何被确认为教会的权威之作的？那批卷籍的著述目的各不相同：保罗的书信不固定地写给地中海沿岸的教会（也有例外，写给一个名叫腓利门的人），发表他对信仰和实践

方面的特定问题的见解。它们在某些方面成为保罗本人在场的替代品，提出建议、劝诫、争辩、忠告或斥责。毫无疑问，它们被用来代表保罗行使某种权威，或许还被用在会众聚集的场合中诵读。在此意义上，它们自始就在其所针对的社群的宗教崇拜活动中发挥某种作用。另一些书信，尤其所谓的大公书信（《雅各书》、《彼得前书、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或许是为更广泛的读者群体所作；《启示录》亦如此，虽然严格来说这是一部启示著作（表现各种幻象和启示），而不是书信。

要搞清楚福音书写作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意图或哪些意图，难度会大得多。有人提出，这些福音书的目的与保罗书信相同，它们也是针对各自社群中的特定问题而写的。研究表明，马太的福音书写作于圣殿被毁后的时期，着眼于与犹太主流教派——法利赛传统的继承者——之间的关系，使基督徒犹太会众的地位合法化。由此耶稣被描写成一个前来“成全律法和先知”的老师（5：17），法利赛人则被抨击为“瞎眼领路的”（15：14）。另一方面，我们切不可忽略的明显事实是，福音书作者们主要记录了耶稣的生平、受难和复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子孙后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借此发表自己对这些与其信仰相关的种种事件的看法。他们不像是仅仅为了某个特定地区的小团体而负担起这样一项任务。那些著作必定很快就得到了广泛传播，其间，比我们当今从《新约》中所知的四福音书多得多的同类作品迅速流传开来。至于哪些篇目应列入基督教《圣经》的权威目录这个问题，早在此问题解决之前，那类作品肯定已经被视为经典。

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基督教作品在散布于地中海世界的教会中流行，不论其最初的著述意图和机缘如何，它们都在某种意义上被逐渐当成神圣经卷。那么，《新约》正典是如何趋于固定的？学者们对此问题众说纷纭，下面的见解只是其中之一。问题在于论述该过程的证据散布于各处，且往往是间接证据。学者们必须依赖有关2至5世纪神学家们对各种《新约》经卷运用情况的证据，并依赖教会对可能被包含在正典之中的特定经卷以及某些抄本实际内容的权威性或正统性的种种裁决。所有这一切，都有必要参照史学家们建构的初期教会

发展的总体图景来作出评价。

正典形成的第一步是收集基督徒的作品。保罗书信是最早被汇编起来的，时值2世纪初期。最早的汇编本包括10封信（《哥林多前书、后书》、《罗马书》、《以弗所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腓利门书》）。后来的版本补入了所谓的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最后，该书信集又补入《希伯来书》（它不同于其他书信，卷首没有保罗对收信人的问候语）。起初这部书信集并未被频频引用，但到2世纪末期时，它却赢得教会领袖们的普遍尊敬并得到广泛运用，尽管事实上它也是最早的“异端分子”之一马西昂派的主要教义来源。

《圣经》中使用假名的问题

在古代世界，作品通常被归在著名作者或人物的名下，虽然事实上是别人的手笔。在希腊文学中，一些作品被虚假地归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Socrates）名下。在《旧约》中，诗篇被归之于大卫，虽然它们肯定并不全是大卫所写。许多被归于摩西的律法条文实际上出自于后来的王室立法时期；智慧作品被归于所罗门；大量后出的预言性材料被增补至《以赛亚书》和《撒迦利亚书》中。从那个世纪之初开始形成了整整一类被称为伪经的作品，教会亦承认它们署了假名（比如《禧年书》，据说它是摩西的手笔，虽然它不过是复述了《创世记》的某些片断）。

《新约》在多大程度上含有使用假名之作是更有争议的问题。那些据信出自保罗的书信实际上都是他写的吗？《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中确实含有不同于《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语言和思想，但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教牧书信似乎是降低了保罗的思想境界；较之福音的精神力量，它们更关注教会的体

制和地位。许多学者质疑福音书由目击证人写成之说，它们的属性似乎显示：太多的证据表明这些作品是对口头传说的重组以及对其他福音书的直接借用，因而这种判断很难确立。

为何那些关注真理的人们故意为其著作署假名？其原因并不简单。在某些情况下，求助于古代权威能使得激进见解获得传统的力量，《以诺书》第1、2章的异象或许符合这种解释。在另一些情况下，某个特定教派的作者对其导师的观念也许特别推崇，以致继续以导师的名义写作。他们这样做时，可能偶尔也是希望针对随后的攻击而捍卫导师的声誉。这或许能解释《新约》中的某些书信何以被归之于保罗。

继之出现的是四福音书的汇编，这是更常引起争议的卷籍。1世纪末时，四部正典经卷可能都已完成，但这并不是福音书写作的终点。这种福音的过量产出不难理解，它表现了不同社群都热衷于表述他们对耶稣传说的理解，但同时这已引起普通读者的困惑，他们很容易由于其信仰的基本内容如此多样而迷惑不解。公元170年塔提安（Tatian）尝试找出解决之道，他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取材，同时补入一些口传材料，写成一部单独的叙事作品。此类尝试固然有调和作用，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到2世纪末，一种“四重福音”已被人接纳。它包括四部书，每部书都按照作者自己的独特眼光讲述“他所知的”福音。这种处理方法本身就与众不同，在基督教正典的核心处体现了某种政治折衷。它表明，无论哪个单独的竞争者、甚或多部书的混合体都不可能赢得压倒性的支持。人们或许能从这种折衷的背后得出某种更开明的见解：不论哪种叙述都不足以传达由四部书共同见证的唯一福音。这种理解体现在各福音书的标题上：“马太所记的福音”，等等。这些福音书都试图从其各不相同的立足点描述教会所得启示的奥秘。

福音书被接纳为正典的过程不易确定。在某个层面上，重要的是它们在主要教会的崇拜仪式上被公开诵读。有明确的证据表明，2世纪末时，四部正典福音书已获得稳固的地位，尽管第四福音（《约翰福音》）受到限制，因为它对（异端的）诺斯替教派颇具吸引力。另一批福音书——诸如《多马福音》（实为一部耶稣言论集）、《希伯来人福音》、《伊便尼派福音》、《埃及人福音》、《腓力福音》、《马提亚福音》、《彼得福音》等——皆与犹太裔基督教派或诺斯替教派有较密切的联系，那些教派处于主流教会外部的边缘位置，因此其福音书难以得到同等程度的接纳。

虽然这两批经卷于2世纪末被确定下来，但人们对《新约》正典中第三部分即大公书信之篇目的看法却存有较大分歧。那批书信据称是写给所有教会的，而非写给某个特定的会众。一般说来，虽然尚未获得普遍公认，《彼得前书》和《约翰一书》是在2至3世纪被接纳为正典的。另一些作品用了更长时间才被接纳，支持者也更少，它们是《雅各书》、《彼得后书》（系后期著作）、《约翰二书、三书》（两部颇受争议之作，尤其是它竟禁止信徒向那些被认为偏离其团体的人问安），以及《犹大书》。直到6世纪，一些东方的教会仍拒绝接纳《约翰二书、三书》。

可见，基督徒的作品被教会接纳，似乎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它与这些文集的形成紧密相关。到4世纪时，一系列正典经卷的目录被制定出来，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收入了当今正典中的许多篇目，亦收入了某些未见于如今正典的篇目。其中也有些重要变更，尤其是关系到《彼得后书》、《约翰二书、三书》、《犹大书》和《启示录》的内容。

这个接纳某些文献为正典的漫长过程最终被教会会议上的一系列决议所终结，虽然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是全体（普世）教会的会议。即便如此，依然有不同意见存在。老底嘉会议（363）从书目中删除了

《启示录》；希坡会议（393）和迦太基会议（397）则提出了现今27卷书的篇目。作为一条基本规则，被收入的篇目应出自某个使徒之手、针对的是所有教会（符合普遍适用的标准）、成书于早期，且被认定合乎正统教义。然而，这些标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是有弹性的：有人质疑《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否真为使徒；保罗书信缺乏严格的普遍意义；《犹大书》和《彼得后书》的使用时间还不够漫长。《启示录》亦遭到质疑，既因为它曾流行于一些异端教派（如孟他努派）中，又因为有人声称书中的应许将在基督统治的地上王国实现，这种见解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政治动荡和颠覆破坏。其作者的使徒身份亦遭到抨击，以致直到10或11世纪，它才被东部教会接纳。

早期教会的《新约》书目

圆括孤中是总卷数。这些书目表明，在最初几百年间，早期教会对某些卷籍的正典地位存在着相去甚远的看法。

穆拉托里经目[5]（**24**）
四福音书
《使徒行传》
13卷保罗书信（缺《希伯来书》）
《犹大书》
《约翰一书、二书》
《所罗门智训》
《启示录》
《彼得启示录》

克勒芒特抄本[7]（27）
四福音书
10卷保罗书信（缺《腓立比

优西比乌斯[6]
接纳之书（*21*或*22*）
四福音书
《使徒行传》
14卷保罗书信
《彼得前书》
《约翰一书》
？《启示录》
存疑之书（*9*或*10*）
《雅各书》
《犹大书》
《彼得后书》
《约翰二书、三书》

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	
	《保罗行传》
	《赫马牧人书》
《彼得前书、后书》	《彼得启示书》
《雅各书》	《十二使徒遗训》
《约翰一书、二书、三书》	？《启示录》
《犹大书》	拒认之书
《巴拿巴书信》	《彼得福音》、《多马福音》、《马提亚福音》等
《约翰启示录》	
《众使徒行传》	《安得烈行传》、《约翰行传》等
《保罗行传》	
《赫马牧人书》	
《彼得启示书》	

正典有何用途？

我们已经简要地考察了不同的信仰社群是如何汇编各种经卷并赋予它们神圣而正式的地位的。我们看到，不论在犹太教还是基督教社群中，这一过程的大部分是如何地不正式：各种类型的经卷汇编逐渐被人们认可具有神圣性、权威性，尤其是适用于崇拜活动。用后世基督教神学的话语来表示，就是对正典的接受过程先于对它的正式界定过程。而且，这一认可的过程常常充满了争议，绝非仅仅是某些文集日渐流行的问题。也有一些经卷虽已被编入某个文集，甚或被编入最终的权威性文集，但依然处于争议之中。人们在争议中不但想收入某些著作，而且想排除某些著作。在东方教会，《启示录》连同其中对

千禧年的热忱，就受到极大的怀疑。这类经卷是颠覆性的，只能以小心谨慎的态度和娴熟的诠释技巧去对待。

也就是说，经卷的正典化过程乃是某些卷籍被赋予权威性而另一些卷籍被拒绝赋予权威性的过程。神圣经卷承载着一种必须被慎重对待的指令，因为对于那些使用它们的社群而言，它们就是力量和生命的源泉，但它们也具有潜在的危险性。那些依赖其生存的社群也可能因它们而分裂。曾经在历史上维系了某个社群的同一批经卷，有可能突然被用来对抗这个社群，从而造成社群内部痛苦而巨大的裂痕。

赋予经卷的正典权威是一种什么权威？在耶路撒冷施教的犹太哲人摩西·哈贝尔特哈尔（Moshe Halberthal）对归之于经文的不同权威性进行过有效区分：一种是规范性的权威，另一种是生成性的权威。前者指的是，认定某些文献具有权威性，就等于宣布它们含有（或形成）规范那些接纳它们的社群之生活的行为准则。它们为社群提供了作出决定、化解矛盾、裁定信仰和行为等相关问题的方式。律法汇编或许是这类文本的最佳范例。从这种意义上说，宣称《圣经》具有权威性，就是宣告它完全能被理解为教会制定信仰和行为准则的源泉。由此，《圣经》中述及的做法就能被视为对特定行为方式的规定（或至少是认可），例如为死者祈祷（《马加比传下》12：43—44）[8]，或灭绝当地的民族（《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15章）。但是，《圣经》中固然包含律法规章，其中也含有大量其他文类：叙事、格言警句、诗歌、书信、耶稣传记等。

但这并不是正典文献在所处社群中发挥作用的唯一方式。在一些国家，构成教育课程基础的文学经典或许不具备规范性的法律力量，但它们在所处的社群中依然拥有非常强大的塑形功能。古希腊的古典文学、“《圣经》与莎士比亚（Shakespeare）”、歌德（Goethe）与席勒（Schiller），连同其他经典卷籍，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欧洲、北美的各种社群提供了共同的语言和思想，使之能够表达他们的经验并揭示其意义。由这样一组文献塑造的不同社群倾向于分享对世界的某些基本信念，以及在此世界上立身行事的适当方式，它们既能将人们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又能为有关其共同信念的激烈论辩提供工具。事实

上，《圣经》卷籍的确行使了这种塑形功能，所有片断都曾被引申为社群生活和信仰的规则及标准之源。它们为普通信徒——以及那些确实不具备特别强烈的信念的人们——提供了概念工具，使之从不同方面理解其人生的意义。对许多人来说，这样做是无可争议的；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为获取经验意义而对《圣经》语言及意象的不同运用已导致激烈的争论和冲突。库姆兰的犹太人信奉的《圣经》与同时代其他犹太人的经卷相同；他们与后者共享涉及圣殿、圣地、律法和契约的信念，但却强烈反对那些信徒对这些信念作出仔细的诠释。16世纪的基督教改革家与他们强烈反对的教皇及天主教士共有许多相同的信念，奉行那些由《圣经》支持的和“证实过”的信仰。但他们同时也用《圣经》提供强有力的论据，反驳中世纪教会的某些理念。当路德终于领会了他借以发动宗教改革的口号“上帝之正德”的意义时，他说，天国的大门似乎已经向他打开，一条全新的读经之路，故而也是理解世界和人类行为方式的道路，已经从这次突破中延伸开来。1世纪的犹太人、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和天主教徒皆求助于《圣经》的规范性，将其当作对此类争论的权威性裁决，但这只会加剧冲突的严重性。

瓦勒里安努斯·马格尼（Valerianus Magni）的著作《非天主教信仰准则论评》充分反映了人们求助于《圣经》的权威规范性来解决16世纪剧烈的宗教冲突的愿望。马格尼是嘉布遣会修士，宗教改革过后热心于转变新教徒的信仰，和耶稣会士发生了冲突。他在书中寻求建立一种读经准则，以便能在信仰方面达成完全统一的观点。倘若理解恰切，经卷必将以绝对的确定性决定正确的信仰：

“一条准则就像一件工具，有了它的辅助，人们所描画的线条自然是直的；相应地，那种只要追随就不至于在信仰中出差错的规范，被称为信仰的准则”（引自朔尔德［Scholder］，第14页）。

然而，在多数情形下，较之法典与律法裁决的关系，《圣经》正典经卷与人们从中所得意义之间的关系甚至更为复杂。这首先是因为，一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经文本身就是复杂多义的。它们产生于一个漫长的书写和汇编过程，因此并非总是清晰明确的。其中一些段落的含义不甚明了，另一些本来就含糊其词。而且，某些文本就其既定的隐喻或诗歌性质而言，乃是促使人们从其自身的角度对所处的世界进行再度想象，而非简单地指定观察世界的某种方式。在所有诸如此类的情况下，读者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对某些文本的内涵作出解析，他们还应在阅读时受到启发，从而拥有自身对世界的信念和经验。

把某篇文献收入某种经卷的正典，就在该社群中赋予了它权威性的地位。但它若与该社群的信念和期望明显有别，又应如何处理呢？《雅歌》是一篇优美的爱情诗，而这样一首诗作为神圣经卷时又有什么含义呢？《传道书》的观念带有深刻的怀疑论倾向，而这样一卷似乎公然否认善恶赏罚之间存在任何关联的书，又怎能被列入正典呢？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找到某些诠释策略，以减少不和谐的声音，调和并消除神圣作品中的杂音。而这些作品的含义，即如哈贝尔特哈尔以颇具挑战意味的口吻所言，也就由于它们被收入《圣经》正典而发生了改变。它们只要被置于《圣经》之中，就必然拥有适宜的意义。

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即它们入选正典可能会给经文带来问题。由于入选正典，该社群即声称对它们拥有了某些权力；同时该社群还会声称他们知道如何阅读并解释它们（不管在历史进程中这些阅读策略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倘若它们是某社群的正典文献，而该社群又持有某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话，那么这些文献大体上必定会通过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而被解读。但是，这种主张会遭到那些处于该信仰社群外部的人们的反对。他们可能追求对文献进行再诠释，以极其不同于该信仰社群的方式解读它们；或者，他们也许会先接受这样的诠释作为赋予经卷的意义，随后再寻求对其发动攻击。神圣文本的力量可能会在信徒和宗教的“高雅藐视者”——一如现代神学的奠基人之一施莱尔马赫[9]所言——之间引起持久而激烈的争论。

我们在这本书的其余章节要做的事就是考察人们解读《圣经》文

本的各种方式，既包括信奉者的解读，也包括处于以《圣经》为生的信仰社群之外的读者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这将是一项描述性的工作。我希望这些涉及《圣经》文本解读的绝对多样性能激起某种敬意。对一些人来说，其敬意会伴以温情，甚至于爱；对其他人来说，则更像是对一颗尚未引爆的炸弹的敬重。不难发现，这些不同的反应何以既是可能的，也是适宜的。

注释

〔1〕 在新标准修订版中应为《路加福音》第20章。

〔2〕 《便西拉智训》（Sirach），亦译《德训篇》或《次经传道书》或《耶稣智慧书》。

〔3〕 圣哲罗姆（St Jerome，?342—420）：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圣经》学者、翻译家。依据《圣经》的拉丁文旧译本，参照七十子希腊文译本和希伯来文原著，译成拉丁文通俗译本。该译本于16世纪中叶被确定为天主教的法定《圣经》版本。

〔4〕 拉丁文通俗译本，原文是the Vulgate，有时也音译为“武加大译本”。

〔5〕 穆拉托里经目（Muratorian Canon）：公元2世纪末罗马教会编订的《新约》正典目录。因其抄本由意大利考古学家穆拉托里（1672—1750）发现并公布，故名。

〔6〕 优西比乌斯（Eusebius，约260—340）：古代基督教神学家、教会史家、该撒利亚主教，著有《教会史》、《编年史》、《驳异端》、《福音的预备》等。

〔7〕 克勒芒特抄本（Codex Claromontanus）：公元6世纪的希腊文及拉丁文《新约》抄本，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亦译“青山抄本”。

〔8〕 在新标准修订版中，实际引文应为《马加比传下》12：43—45。

〔9〕 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768—1834）：德国新教神学家、宗教哲学家，著有《论宗教》、《基督教的信仰》、《独白》、《批判迄今为止的伦理学说》等。

第四章

《圣经》与其信奉者

文本一旦被正典化，就会发生变化，成为神圣的文献。在认可其新地位的社群中，信奉者对它们另眼相待，当作与众不同的特殊文献。出于这种原因，人们对这类文献的期待值与对其他文献的期待值相去甚远。正因为正典文献是神圣的，所以才无法想象它们会与信奉者本身最深层的神圣体验相抵触。社群经验与神圣文本世界之间任何严重的矛盾都须予以解决，要么使文本世界与社群经验一致，要么社群改变自己而与文本一致。一种有力的辩证法就此建立。信奉者依据自身的经验解读文本；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审视文本来求索自身经验的意义并塑造自己的经验。由此，我们会发现不同的信仰社群以迥然相异的方式解读同一部文本，从中我们既能看到他们不同的信念，又会看到他们不同的历史。

这与古典的、非神圣文献的际遇并不全然相异，但回应的激烈程度却有所不同。如果说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渐被视为体面的中产阶级社会的经典，有些人则会试图排除他们作品中某些令人厌恶或只是有失礼法的因素。歌德的选集中没有他那些较为随意的爱情诗；鲍德勒（Bowdler）则编出由他净化过的莎剧版本。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发生在文学著作或审美著作与体面的趣味和鉴赏力之间的此类冲突大多只会造成一时的流言蜚语，而很少导致社群中的持久分裂。它们也许会带来鉴赏能力的转变。人们都承认，作家和艺术家有助于使受众接受经验中的高峰和低谷，而文雅社会往往会忽略或抑制此类经验。我们将会看到，此类鉴赏能力的改变也会发生在宗教社群中。有时它们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因为社群往往极力维护他们那种已经被传统的《圣经》解读所神圣化的观察世界的方式。

无论这种或任何特定的诠释多么有说服力，米德拉希[1]始终恪守一种信念，即《圣经》不但是往昔的记录，而且是一种对将临之事的预言，一种预示和预告。倘若如此，文本和个人经验就不是两个独立的领域，相反，它们是相互启迪的。正如目前的事件有助于理解古老的神圣经文一样，反过来，经文也能揭示近

期事件或经验的根本意义。

犹大·戈尔丁（Judah Goldin，《最后审判》，第20页）

让我们考察一段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产生过深度共鸣的经文，并观察它如何塑造了这两个社群之间相去甚远的经验，又是如何被二者不同的经验所塑造。

阿克达 [2]

阿克达——即《创世记》第22章的亚伯拉罕捆绑以撒的故事深深触动了犹太教信徒和基督徒情感世界中的敏感神经。这个故事中交织着异乎寻常的暴力和慈爱。一个父亲按上帝的指令要把他的“独生子”献为燔祭，在最后时刻，由于天使的介入，亚伯拉罕和以撒才从迫在眉睫的恐怖事件中得救。故事以《圣经》叙事的最佳笔法写成，行文有力，文字简约，描写具体。亚伯拉罕和以撒把仆人留下，动身出发：“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创世记》22：6）。其中最后一句在两节之后再度出现。随后的简短对话强调了两个人的紧密关系；而亚伯拉罕对上帝的顺从驱使他们来到那座献祭之山，在那里他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就在这时天使介入了。而就在这场差点发生的灾难过去之后，天上传来祝福的声音，应许一个新的民族将从这对父子的后裔中出现。这篇简洁洗练的文学叙事所包含的情感和体验的范围是非常惊人的，这在后世丰富多彩的解读中体现出来。

《禧年书》的大半篇幅是对《创世记》和《出埃及记》前几章的再创作，其间作了删节、浓缩、诠注和增补。在该书序言中，上帝告诉摩西，以色列将会背弃信仰，但最终必定复兴。该书源于公元前2世纪，显示出作者对塞琉古王安条克·伊比法尼斯（Antiochus Epiphanes）根除犹太教的极端事件的反思。当时的

一篇原始文献述及一位母亲勉励自己的七个儿子宁死也不背叛信仰，随后她本人亦殉道而死（《马加比传下》第7章）。然而，犹太人却站立起来，终于建成一个新的犹太王朝，并在受罗马人统治之前享受了一个世纪的相对独立。

对阿克达故事的最早诠释之一见于《禧年书》。该书作者用了大半篇幅来表现一位在场的天使向摩西讲述，这使他为故事设置了一幅天堂的背景，而这是《圣经》叙事中所没有的。在这里，我们被告知上帝为何试探亚伯拉罕（《创世记》22：1）。亚伯拉罕信奉上帝、爱戴上帝的故事在天堂已经广为传诵，此事反过来又引起撒旦——他被命名为玛斯提玛王（Prince Mastema）——去质疑亚伯拉罕爱戴上帝的真实性，他断言亚伯拉罕更爱自己的儿子以撒。天使回答，上帝知道亚伯拉罕之爱是真诚的，因为他已经多次试探他，但上帝依然预备了对亚伯拉罕的最后一次考验。这种最后考验的主题将贯穿犹太人对故事讨论的始终。

亚伯拉罕被考验的题旨在《创世记》中已经出现过，但在《禧年书》里，该题旨却发生了微妙却很重要的重心转移。考验不再是上帝分辨亚伯拉罕是否爱他并恪守其指令的手段。在此，上帝（以及读者）自始就知道这一点；正因为知情，上帝才在关键时刻介入其中。而与此不同的是，在《创世记》中，直到亚伯拉罕伸手拿刀以后，上帝才借助天使之口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创世记》22：12）。在《禧年书》中，上帝的行为意在向玛斯提玛展示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实和爱，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他对亚伯拉罕的最后言谈中："我已经使一切人知道，在我吩咐你的所有事上，你对我都是信实的。"这成为传达给犹太人的一种信息，那时他们正经历着类似撒旦的试探。而亚伯拉罕被考验，引申而言，以色列人本身遭遇考验的目的，就是使他们对上帝的信实广为人知，以便通过他们，"万民都能祝福其自身"（《禧年书》18：16）。

除了上帝考验亚伯拉罕是否顺从的题旨，撒旦的引入为故事增添了另一种维度。现在，人们看到世上有一群黑暗势力，他们引导人偏离正道，甚至图谋让最正直的人成为其牺牲品。致使人类受苦的某些责任以一种隐晦曲折的方式落在撒旦身上，而上帝及其天使则被描写成其信奉者的支持者和守护者。在故事中，他们确保了以撒不会遭到伤害（至少是不会遭到肉体伤害）。然而，这种描写又如何符合犹太人数世纪被迫害、受苦难、无数人不幸死亡的民族经历呢？

从公元1世纪犹太作家亚历山大的斐洛笔下能看出他已经意识到这些难题的存在。那时斐洛所在的亚历山大社群正承受着歧视和迫害。他在《论亚伯拉罕》中首先回应了对亚伯拉罕故事的谴责，即较之那些为了保全其城邦或民众而甘愿祭献子孙的异教徒，亚伯拉罕的考验算不上什么伟大的事件。斐洛说，对亚伯拉罕而言，以人献祭是令人厌恶的，但祭献自己的儿子更是可怕的考验。对于异教君主来说，做这种事几乎就是他们的第二天性（《论亚伯拉罕》，第177—199页）。而斐洛的论述没有就此止步，他还试图通过揭示那个故事的寓言意义而对人类所受的苦难予以解释。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欢笑”。出于一种对上帝的责任感，亚伯拉罕祭献了欢笑，或者勿宁说是祭献了“理解的美好情感，那便是喜乐”。这就无可非议了，因为唯有上帝才享有只有欢喜快乐的生活。而上帝也允许那些诚信者在一定程度上分享这种喜乐，虽然即便如此，其中也会夹杂有哀伤（《论亚伯拉罕》，第200—207页）。这让人们想起那则犹太笑话：犹太人为何不酗酒？因为一旦酗酒，就会忘掉忧伤。

那么，又如何面对犹太人那些更大的苦难呢？根据安条克·伊比法尼斯时代（公元前175年）犹太人所遭遇的可怕迫害创作出了一批犹太人自身在极端痛苦的折磨中对上帝虔信不移的故事，其中之一（见于《马加比传下》第7章）讲述一位母亲在遇害之前目睹并勉励她的七个儿子殉道而死，其场景颇为恐怖。后来拉比[3]重述这个故事时，背景从最初的安条克·伊比法尼斯时代转换到了公元2世纪，那时犹太人正在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的统治下遭受迫害。故事中既充满那种受苦的伤痛，又富于为信仰殉难的豪情。“那位母亲流着

泪（对儿子们）说：孩子们，不要痛苦沮丧，你们就是为了这个终局被造的——在这个世上要让圣者的名字圣洁，那圣者是有福的。去告慰先父亚伯拉罕吧：你的心不可高傲自大！你筑了一座祭坛，而我筑了七座，已把我的七个儿子在上面祭献。进一步讲，你所经历的是考验，我所经历的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雅库特，《申命记》26，938）。

一篇对上述故事更为哀伤的回应出现于中世纪的重述中，当时正值犹太人受迫害的十字军东征时期。当时的犹太编年史记载了犹太人遭遇十字军进攻时如何宁愿把彼此当作祭品献给上帝，也不愿冒险在痛苦的折磨中被迫改教。他们检查尖刀，清除上面的污垢，以免使献祭失效；同时背诵着合适的祷告词。那时的犹太教会堂诗歌将这种献祭与以撒的阿克达相提并论：

主啊，居住在高处的全能者！
曾几何时，由于一次阿克达，
亚利伊勒[4]便在你面前哀声哭泣。
而今，多少人被屠宰、被焚化！
他们在众子们的血泊中
何以不再发出呼声？
就在那族长匆匆祭献其独子之前，
一个声音从天上传来：
不可伸手杀害他！
而今，犹大的多少儿女被宰杀——
但他却不急于救助遇难者，
不急于把他们从烈火中挽救出来。

（R.以利亚撒·巴·约珥·哈-勒维[R. Eliezer bar Joel ha-Levi]：《哀歌残篇》，斯比戈尔[Spiegel]编，第20—21页）

又如：

我们一旦能倚靠摩利山上那阿克达的美德，
就得到守护，得到代代相传的拯救——

而今，一个阿克达紧随着另一个，
他们的数目不胜枚举。

（R.大卫·巴·迈苏拉姆[R. David bar Meshullam]，《塞里哈特》，49，66b，斯比戈尔编，第21页）

这一时期对阿克达故事最为引人关注的处理乃是出自波恩的R.以法莲·本·雅各布（R. Ephraim ben Jacob）笔下。我们从中看到，亚伯拉罕对他儿子不仅施行了实际的仪式性杀戮，而且，当上帝使以撒即刻复活之后，他还想再次献祭：

他〔亚伯拉罕〕行动迅速，用膝盖紧紧压住他〔以撒〕；
他使自己的双臂强健有力，
按照祭典的规定用坚定的双手把他杀死，
那次杀戮全然正当。
复活的露珠滴落在他身上，他又活了过来。
（父亲）抓住他，（继而）要再度杀死他。
《圣经》乃是见证！此事证据确凿：
天上的主又一次呼唤了亚伯拉罕。

（斯比戈尔编，第148—149页）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声称《圣经》能证实他对亚伯拉罕试图第二次祭献其子的描述。在《创世记》的故事中，天使的确两次呼唤亚伯拉罕，一次阻止他献祭，另一次应许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国之父。R.以法莲对两次呼唤进行了迥然相异的描述：亚伯拉罕显然没有听到（或忽略了）第一次呼唤。斯比戈尔对这首诗作出意趣相投的诠释，并对“此事证据确凿”一语扼要评注：“即便未见于《圣经》，也定见于犹太人在中世纪的经历”（138页）。犹太人在中世纪受迫害的可怕经历必然要从他们的神圣经卷中得到回应。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基督徒对阿克达的诠释是在其自身对耶稣受难的基本叙述中折射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个故事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福音书的叙述中却几乎没有实际的对阿克达故

事的文学引用。从耶稣受难前夜在客西马尼园向上帝的祷告中，我们也许能听到对以撒故事的遥远回应：他向父亲提出了询问，以及后来甘愿接受父亲意图的传说。当然，福音书中的情节有所不同，其中没有作为上帝意图之中介者的人类父亲；天父方面不存在更加宽容的变化；也不仅仅是对受害者父亲的考验。相反，正是受害者本人必须挣扎着自愿接受天父那不可动摇的意志（这一主题确也出现在某些阿克达的版本中）。福音书述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时多次表现出上述要点，下面的方框中是其中几例。

圣子对天父意志的接受

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耶稣于最后的晚餐过后终于在客西马尼园接受了即将到来的死亡。在《约翰福音》中，这个场面出现得更早，发生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那时，耶稣之言在众人面前公开讲出，并为从天上传来的声音所认可。然而，约翰述及耶稣被捕时却采用了苦杯的主题。

《马可福音》**14：36**

“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马太福音》**26：39**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路加福音》**22：42**

“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约翰福音》**12：27**[5]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约翰福音》**18：11**

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

马太和路加以某种方式改写了马可的率直陈述“在你凡事都能”——一种对“全能”的传统表述。马太面对上帝杀死自己儿子的暴行，似乎提出一个问题：有没有某种更高的必然性能控制这种行为？路加显得更关注神圣意志的统一性或始终如一的问题：上帝之子怎能请求上帝改变其意念？约翰完全删除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之事，而代之以最后晚餐前一个可与之类比的痛苦场景（12：27）。他将其写成一个更为公开的场景，在场的不但有犹太人，还有希腊人。耶稣对其使命的接受必将荣耀神圣之名，恰如当时亚伯拉罕顺从上帝指示一样。这种接受在耶稣被捕时讲给彼得的话（18：11）中得到回应。至此，剩余的一切就是耶稣对其完全接受天父意志的确认：早些时候他不是说过“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约翰福音》4：34）吗？

在所有这些地方，天父的意志都是不可动摇的。只是在一处，这种对天父意志严酷无情的强调有所保留，那便是在福音书作者对一伙人类角色的生动描写中——那伙人阴谋策划将耶稣置于死地。马可对耶稣被捕的记叙是由耶稣自己的话引出的：“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近了”（《马可福音》14：41—42）。此句中对“卖”一词的使用语焉不详，它既能指“移交”，也能指“出卖”。它仅仅指犹大把他出卖给大祭

司派来的那伙人吗？是否也表示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此时已经倾服耶稣的神圣力量，正在把他移交到毁灭他的人手中呢？（《以赛亚书》53：6中有一个同类的希腊语词[6]：“主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移交］在他身上。”）这处语焉不详也许是故意的，但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正是那伙捉人者的暴行被强调了，四次用了动词“捉拿”，两次提到他们的“刀棒”。按照大祭司和文士除掉他的预谋，耶稣被拿获；一场敷衍塞责的审讯之后，他们把他“捆绑”起来，“移交”给彼拉多。

这段描写是对《创世记》中叙事题旨的颠倒，极易让人产生兴趣。在《创世记》中亚伯拉罕带走以撒，捆绑起来，顺从上帝之命把他祭献给上帝。而在此，是一伙罪人拿获耶稣，把他捆绑起来，移交给外国残暴的执政官去执行死刑。然而在两个故事中，一如客西马尼园场景所明示的那样，都是上帝操纵着这些事件的发生。在前一例中，亚伯拉罕接受考验乃是上帝与他之间这出戏的最后一幕，在其中亚伯拉罕的意志受到考验，按照上帝对他的应许，他被定为多国之父（《创世记》17：4）；还将成为伦理一神论、以及对上帝意志极端顺从的典范。亚伯拉罕成了所有忠诚的犹太人的典范，超越一切种族的界限，成为所有正义人士的典范。在另一例中，被称为上帝“爱子”（《马可福音》1：11）的耶稣被单独挑选出来，作为上帝在与人类邪恶的冲突中履行其意志的工具。祭献耶稣与其说是对顺从的考验（固然也涉及这一点），还不如说是上帝代理人和世上毁灭死亡势力的交战点，是从死亡世界向耶稣复活所预见的生命新时代的转折点。

随后基督教对耶稣受难故事的再创作重复了这种间接引用和改编的模式。在约翰对受难的叙述中，“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19：17），这一描写与同观福音故事中的兵丁让古利奈的西门把十字架背负到各各他的说法不同。在此，耶稣也像以撒那样，在路上背着处死他的刑具。有意思的是，这种说法亦出现在拉比对以撒故事的重述中：称以撒背负着木柴，恰如那背负自己十字架的人一样。后世基督教解经家接过这一主题，将其与基督徒承受苦难的经历联系起来。基督徒心甘情愿地承受苦难，这被视为延续了亚伯拉罕的信念：“我们也持守公义，拥有与亚伯拉罕同样的

信念，像以撒背负木柴那样追随他[7]”（爱任纽[Irenaeus]，《驳异端》，IV.5.4）。后世有虔诚诗人在《十字架十四处》中精心表现了这一主题，故事被描画在天主教堂的墙垣上，其中耶稣在十字架的重压下曾三次跌倒。

然而，基督教对以撒故事的诠释并不总与基督之死直接联系。在伦勃朗[8]的一幅蚀刻版画中（参见图5），天使不仅正在呼唤亚伯拉罕，而且还用双臂抱住他，极力阻止他的行动。这个故事已成为对神的守护的描绘，以守护天使的关爱为标志。这与中世纪拉比们的阅读心得相去甚远，后者是从他们惨遭迫害和种族屠杀的体验中解读这个故事的。

与此相对照的是，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再度赞扬亚伯拉罕为守信者。他称亚伯拉罕情愿祭献其子的行为是“伦理学的目的论悬置”。在宗教信仰中，当人们信奉某些至高无上的目标或目的时，他们会把常态的伦理法规和准则悬置起来。真正的“信仰骑士”会驰骋于超越伦理的境界，进入一个由神圣命令和应许支配的世界。亚伯拉罕的伟大之处在于，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依然一如既往地信任和仰慕上帝：不仅是涉及彼世的信仰，不仅是事务最终解决之途的信仰，而且是此时此地的信仰，认定上帝的应许能成就美善之事，甚至在撒拉（Sarah）显然不可能怀孕生子以后，在面对上帝命令向他献祭之时。克尔凯郭尔的论述是针对中产阶级将基督教常规化而进行的强烈且代价高昂的抗议的部分表现。他对“常规”伦理准则的悬置依然是危险的、让人心烦的，并且使原初故事带有某种奇特的色彩和有争议的本质，也使人们看到，这个故事见证了一种惊人的信仰。克尔凯郭尔说，倘若亚伯拉罕不曾信仰过，他可能会英雄般地献出自己而替代以撒。“他本应得到全世界的尊敬，他的名字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然而得到尊敬是一回事，成为救助痛苦心灵的北斗星则是另一回事”（克尔凯郭尔，第21页）。

图4　曼特尼亚（Mantegna）的画作《亚伯拉罕和以撒》（15世纪）

图5　伦勃朗的蚀刻版画《亚伯拉罕和以撒》（1655）。天使的手臂环抱着亚伯拉罕和以撒，他的翅膀在画面中占有重要位置。以撒未被捆绑，情愿奉献自身；亚伯拉罕似有困惑之情，几近绝望。

《圣经》文本丰富多彩的后来岁月

《圣经》文本的接受史为这批古代作品的生机活力提供了难以穷尽的证据。它们在相差甚远的环境中被极不相同的信仰社群所阅读

——既有引人关注的趋异式阅读，也有显而易见的趋同式阅读。解释这种《圣经》解读的丰富性并非易事。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文本阅读语境的多样性。毫不奇怪，遭遇士兵劫掠的人们阅读以撒被捆绑的故事，他们的感受与那些阅读同一个故事、生活在奉行天主教的奥地利山村里面对艰辛生活的人们的感受肯定有所不同。以撒的故事在分别被犹太教信徒和基督徒解读时，其文学语境也有重要差异。在基督徒方面，由于耶稣的十字架在《新约》作品中位于十分醒目的中心位置，阿克达的主题难免被归附于对受难故事的解读之中。以撒成为“那将要来临者的典范”（《巴拿巴书信》7.3），这个故事中的种种主题被发掘出来，有时通过对比的方式，运用到对耶稣受难之事的叙述和推论过程中。而对犹太教信徒来说，他们有更多的理由依据亚伯拉罕子孙的历史来反思以撒的故事的意义。

但阅读情景的多样性还不能解释一切：文本自身内容的丰富性和模糊性，也是它招致多样化诠释的原因。诸如亚伯拉罕伸出持刀之手、他把木柴放在儿子背上的意象，都曾拨动后世作家和阐释者的心弦。各种《圣经》作品（叙事、诗歌以及其他各种文体）中有着丰富的意象和隐喻，这一事实注定会使读者根据其经验任意引申出多样化的解读。形形色色的社群能够将这些故事和文本变为他们自己的故事和文本正是由于《圣经》作品具备使形象再现的性质。《圣经》作品并非封闭且结构严谨的文本，留下了种种间隙，带有一些含混不清之处，有待于填充和处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最为众说纷纭的文本正是那些含义最模糊的文本。

文本的正典地位不但要为解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负责，还须对叙事和对话再创作的方式作出说明。我们已从一个最惊人的例证中看到，中世纪对阿克达故事的复述实际上竟声称《圣经》故事已述及以撒之死。更为常见的是侧重点的问题，是有所选择的阅读：《圣经》作品中那些能引起特定社群在特定时期共鸣的成分，会被强调；其他成分则会被排除或忽略。结果就像对以撒故事的直接改写那样，会导致近乎戏剧性的差异。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驱动诠释过程的都是同

样的信念：这些文本是社群经验的标准和规范，所以，社群的经验必定会以某种方式反映在且被描述于文本之中。

注释

〔1〕 米德拉希（Midrash）：在希伯来文中意为“解释”或“阐述”，指一批收录于《塔木德》中的解经布道书，有时也指《塔木德》文献别具一格的解经方式。属于犹太教通俗典籍，除汇编于《塔木德》外也分册发行。自公元2世纪起就有雏形，6世纪前后陆续编订成书。

〔2〕 阿克达（Akedah）：希伯来文“捆绑”之意。在后世犹太文学中指代“捆绑（以撒）”，或“被捆绑者”（指以撒）。典出《创世记》第22章。

〔3〕 拉比（rabbi）：在希伯来文中意谓“长者”或“教师”，指犹太教精通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学者，以及口传律法大典《塔木德》的编纂者。

〔4〕 亚利伊勒（Ariels）：地名，在犹太文化中指代圣城耶路撒冷。

〔5〕 在新标准修订版中，实际引文应为《约翰福音》12：27—28。

〔6〕 指《以赛亚书》的七十子译本中有该语词。

〔7〕 “他”：指耶稣基督。

〔8〕 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文艺复兴时期荷兰著名画家，绘有《杜尔普博士的解剖学课》（1632）、《夜巡》（1642）等。

第五章

《圣经》与其评论家

本章与前一章会很不相同。我不会详细考察对《圣经》片断的诠释，而将聚焦于《圣经》批评中最重要的发展和变化。

从根本上讲，批评是人的判断力的运用。事实上，《圣经》的所有诠释者都运用其判断力来区分文本可能的内涵和意义。他们可能会赋予某些章节更重的分量，为那些似乎不太受关注或表面意义与人们的预期相矛盾的章节找出富有意义的诠释。这种明智而敏锐的解读一直是《圣经》诠释的特点，它构成当今（几乎）所有《圣经》学者都运用的文本批评、资料来源批评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学批评等标准化历史研究的基石。然而，当用于反对占支配地位的教会解经时，“《圣经》批评”这个术语也具有相当强烈的批判性。我将要简述的许多“《圣经》批评”的发展就属此类。事实上，现在许多通用的批评惯例最初正是由那些攻击当时正统解读的人制定的，我们将在下文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有必要了解这些发展的历史背景。时至中世纪末期，基督教的《圣经》诠释已或多或少地与教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合流。《圣经》收入了多种故事，涉及世界的创造、人类祖先的历史、以色列的被选、律法的赐予、随后以色列在圣地的历史，以及耶稣的故事、早期基督徒的传教成就和论争。教会以特定的方式解读这些故事，以便能提出一部内容全面且前后连贯的世界史，即从创世一直到最后审判的历史。教会施教道，《圣经》记载了上帝对亚当之罪的反应：拣选以色列、颁布律法，进而派遣其独生子降世，通过他的被钉十字架和复活为人类赎罪、最后以建立教会而告终。对《圣经》进行这样一番解读后，某些在《旧约》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元素，诸如赐予圣地、建成圣殿，以及律法和以色列在万民得救中的作用等都被淡化了。相应地，某些相对次要的主题却得到了强调，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始祖堕落和人类普遍腐化的观念。《旧约》被解读为《新约》的先兆，其主要人物和他们的事迹预表了实现在耶稣身上的一切（就像我们看到的教父对以撒和基督的比较所示）。

正是因为建构了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叙事结构，《圣经》成为所

有知识的源泉和尺度，既包括宇宙学、历史学，也包括法学和神学。在完成这一叙事的过程中，神学家确实受惠于其他学科的知识。公元1世纪的教父们自由地利用柏拉图派哲人的思想；中世纪经院学者也有争议地引用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至少在官方看来，《圣经》始终是真理的最终仲裁者。在《圣经》和中世纪基督徒生存的世界之间，似乎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和谐一致。然而在西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这种官方的共识发起了双重攻击。

教会遭遇攻击：来自内部的挑战

上述基督教故事并非唯一的版本。10世纪末叶教会内部出现的种种异议导致了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这种异议完全源于对基督教故事特定叙述的批评。在这类中世纪后期对基督教故事的批评中，值得关注的是对《圣经》基础的攻击。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一个《圣经》研究教授的成果。他以令人惊叹的技巧研读古代《圣经》文本，不但将《圣经》译成当地语言，使之得到更广泛的阅读，而且还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时期向公认的《圣经》世界观发起了挑战。

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对全局的某些方面作出的较为次要的改变，特别是涉及教会在拯救个人灵魂的作用方面。中世纪后期的教义规定，由于上帝是公正的法官，故男人和女人虽因基督的事功而得救，仍必须为他们在世间的罪孽遭受惩罚；然而，如果利用了教会的种种补赎圣事，他们甚至在死后也能避免或减轻本应受到的公正惩罚。《马加比传下》第12章第43至45节在经文上提供了为死人祷告的依据。对这类教义的普遍接受赋予了教会统治集团极大的权威性。

路德通过细察《圣经》，尤其是保罗书信中的原始记载，对此类关于上帝公正和宽恕的见解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关键经文见于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中："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17，引自《哈巴谷书》2：4）。但是，路德追问道，当圣保罗论

及福音书的上帝之义时，他到底指什么？是像经院神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指上帝施行正义，惩罚罪人、奖赏义人的公义本性吗？抑或指上帝赐予不义男女们的义？在希腊文的表述中，这两种理解都能成立。关键要看《罗马书》中的背景，分析保罗何以从《哈巴谷书》中引用那个短语。路德主张，保罗所说的上帝之义指的是上帝赐予信奉者和因信获生者的义（迪伦贝格尔［Dillenberger］，第11页）。

图6　《圣经》研究教授马丁·路德。他对保罗书信的阐释成为新教改革的催化剂。

这是宗教改革中的关键时刻，也的确是欧洲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对路德而言，《圣经》现在言说的是将人们从上帝律法和刑罚的威胁中解放出来，是上帝的仁慈和宽恕，其仁慈宽恕是施与所有聆听福音者的，而非只施与那些屈从于教会补赎规章的人。宗教改革正是以这种方式寻求将男女信徒从中世纪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在，他们可以在“世俗国度”中自由地响应神召了。

这种对保罗书信的全新解读，引发了人们的争论，为中世纪欧洲的权力结构和普遍精神特质的重大转型提供了基础。从本书的视角观

之，有趣之处在于这次转型赖以实现的方式。路德通过分析经卷的“文法意义”来驳斥占支配地位的经院神学诠释。也就是说，他运用了在人文主义语文学和文本研究中通常使用的方法来理解保罗书信中的暗昧不明之处。借此做法，对保罗书信合理的批评性研究发展起来，并被用来颠覆占主导地位的官方诠释文本的方式。

路德对主流释经传统的批判源于教会内部。他在新教中的突出地位表明，这种对批判理性的运用将成为新教神学的根本特征（倘若它未被永久施行的话）。批判性研究方法的范围逐渐扩大：历史批评、社会学批评、文学批评随之涌现。当然，这种批判理性的实践会导致更加多样化的阐释，也可能导致更大分歧的出现。但无论钳制新教思想的正统势力何等强大，批判的精神总是存在，随时准备颠覆和挣脱正统宗派的控制。

教会遭遇攻击：来自外部的挑战

对当时公认的《圣经》阐释的质疑并非全都来自教会内部。人类知识的迅速发展和新发现宣告了中世纪的终结，这本身也挑战了过去被宣称为是包罗万象的权威世界观。这首先是因为，新土地不断发现，一批旅行家的故事广泛传播，它们都揭示出《圣经》世界观在地理方面的局限性。人们发现了整个的新大陆，但在根据《圣经》对世界所作的种种描述中，人们做梦也想不到还会有这些大陆存在。即便强有力的传教活动能把这些土地纳入到基督教世界，但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理解那些新近皈依者的先辈们在上帝普世救赎计划中的位置？

而且，历史科学的发展也清楚地表明，《圣经》的历史观远不够全面。历史研究削弱了《圣经》年表的威信，揭示出不为《圣经》作者所知的更早文明存在的证据。再者，《圣经》中的历史纲要并没有包括之后的历史。《但以理书》第7章述及四个王国，这是宗教改革时代普遍接受的世界历史框架。这些王国被确认为迦勒底帝国、波斯

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和罗马帝国。问题在于，罗马帝国后来怎样了？德国皇帝号称自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样一来，又将法国国王置于何处——是德国皇帝的永久臣属吗？不难发现，对于那些寻求基督降世前最后一个（因此在人间是难以攻破的）帝国的政治安全的人来说，这个问题颇具吸引力。然而，如同所有试图使历史时钟停摆的企图一样，寻求这样一个帝国也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一个个的帝国盛衰更迭，《但以理书》所勾勒的历史纲要还不够复杂或者说是灵活，不能将这些帝国的历史纳入其中。

如果说《圣经》构建的历史观易受攻击，那它的宇宙观也是如此。哥白尼（Copernicus）指出，各个行星，当然包括地球在内，都围绕着太阳运行。在《约书亚记》第10章那个异乎寻常的追杀残敌的血腥故事中，当亚摩利人的五王联军被交付给约书亚时，他向上帝祷告道："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雅仑谷"（10：12）。祷告应验了：太阳、月亮果然停止运行一日，让约书亚的队伍杀死残敌。显然，故事中的宇宙观与哥白尼对行星运行的理解有冲突。甚至路德及其门徒梅兰希顿[1]也以《圣经》故事为依据来拒斥哥白尼的见解。一如朔尔德所言，在那个时代，除了拥有大量数学知识者，在所有人看来，哥白尼有关天体的革命性理论似乎只是当时流行的诸多推测之一。梅兰希顿从《圣经》中广征博引（其中就有《约书亚记》10：12—13），以毋庸置疑的口吻驳斥哥白尼道："我们由于这些神圣的证据而坚强。要固守真理，不允许自己被那盲目之见引入歧途。那种人把荣耀归之于心智，意在曲解自由的本能"（朔尔德，第49页）。神学家安得烈亚斯·奥西安德尔（Andreas Osiander）着手编辑哥白尼的著作，并于1543年在纽伦堡出版。但他对哥白尼挑战的重要性看得更清楚，并试图化解这种挑战。他辩称哥白尼的见解只是假设，有助于预测行星的位置，但并不能用来表述宇宙运行的实际状态。奥西安德尔认为，哥白尼的计算结果具有重要价值，但人类是不可能知悉天体运行的真正原因的。

随后在19世纪，达尔文主义者和创世论者的论争延续了相同的主题。达尔文主张，人类源自哺乳动物，经由类人猿进化而来。此说明

确提出一种与《创世记》全然不同的人类起源论。虽然《创世记》第1章和第2章的记载相去甚远，存在着种种内在矛盾，但许多基督徒仍然主张，《创世记》关于上帝直接创造人类的说法应被视为权威之论。另一些基督徒则逐渐将《创世记》故事视作创世神话，他们认为，这些故事与古代近东世界流行的其他同类神话或许有某些关联。这无疑会引出一些涉及这类神话与科学世界观关系的重要问题。

启蒙运动和历史批评的兴起

宗教改革时期教会的内部分裂终于导致了1618至1648年给欧洲带来巨大灾难的宗教战争。这一系列的战争反过来又引起人们对一切宗教形式的激烈反抗以及对摆脱宗教权威以获得解放的追求。从广义上讲，这一过程被称为启蒙运动。正是这个时期见证了各种经验科学、某些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所有这些科学和哲学都力图把人类知识和对人类事务的管理完全建立在人类理性之上。在欧洲那些追求从其专制状态——其权威性得自与不同教会的联盟——中获得政治解放的人们手里，这类哲学成了强有力的工具。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说，人类知识赖以建立的根基不应是传承下来的信念和权威，而应是“明晰确切的思想”；只有让所有的信念经受彻底的检验，我们才能认识这种“明晰确切的思想”。

在英格兰，这些发展趋势在一群彼此联系并不紧密的自然神论者[2]身上得到了特定的表现。他们在管理人类事务时，试图将宗教排除在外。他们说，上帝是一个遥远的角色，他创造世界之后就将其置于一旁，让它按自身的设计运行；这恰如一个钟表匠为钟表上足了发条，便让它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转。他们抨击《圣经》，部分是因为《圣经》中含有上帝干涉人世、影响宇宙物理（“自然”）规律的故事；部分是因为《圣经》试图把一套据称是由上帝创制，但却违背自然道德的律法体系强加于人。因此，他们嘲讽《圣经》的神迹故事，抨击其中重要人物的道德观念；他们还抨击一些教义，正是借助于这

些教义，正统基督徒将《圣经》的权威性定义为神启的至高媒介，称其没有任何错误。他们指出，《圣经》本身存在着种种混乱的记载和彼此矛盾的说法。他们最爱挑有关耶稣复活故事的毛病，许多著作都以此为题。在此类著作一些较为生动有趣的表现形式中，使徒们被想象为正在受审，接受盘问，看他们提出的辩护理由是否站得住脚。这类题材的上佳之作是托马斯·舍洛克（Thomas Sherlock）著于1729年的《见证人的受审》（斯蒂芬［Stephen］，第1卷，第203—204页）。

18世纪时，这类文献在不列颠可以比较自由地传播，并流传到了法国和德国，但在这两个国家，极其严格的审查程度却限制了文献的传播。在此背景之下，《圣经》批评史上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这就是所谓的“选篇之战”。在这场论争中，代表理性主义者一方的主要人物是当中学校长的德国学者赫尔曼·塞缪尔·赖马鲁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和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哲学–神学家戈特霍尔德·以法莲·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莱辛一度在汉堡管理剧院，在此他创作并上演了第一批真正的德国戏剧，后来在位于沃尔芬比特尔的不伦瑞克公爵那里谋到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他在这座图书馆的一项职责是整理编订尚未发表的手稿。早在汉堡时莱辛就是赖马鲁斯及其家人的朋友。赖马鲁斯交给莱辛一部手稿，其中运用并发展了《圣经》的自然神论批评，因为害怕遭到监禁和社会排斥，他不敢公开出版。莱辛决定从手稿中摘录一系列片断出版，假称它们发现于公爵的图书馆中，出自某位“不知名的作者”。第一次出版的两部分包含了从自然神论批评中引用的内容，体现了作者对自然神论批评的完全理解。赖马鲁斯抨击了对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一神迹的叙述，并不辞劳苦地计算出三百万以色列人及其所有辎重过海所需要的时间，最后得出结论：这个神迹与其说是分开海水，还不如说是让以色列人在被埃及人追上之前就及时过了海。然而，他揭露耶稣复活故事中矛盾之处的那部分内容却引起轩然大波，并导致一场影响巨大的公开论辩。之后，莱辛于1778年又出版了一个选篇，名为《论耶稣与其门徒的意图》。

前两段把耶稣刻画成一个纯自然宗教的布道家，并记述了他与当时犹太人的关系。后一段记述完全就是一种讽刺。赖马鲁斯说，像法利赛人一样，耶稣也教人以生命不朽的教义；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还训导人以公义，要人摆脱外在的遵法守命，不受伪善的约束。然而，这时赖马鲁斯却突然引入一个全然不同的议题："就在那时，可以确切无疑地说，耶稣在其教诲中把人们引向了宗教真正伟大的目的，即得到永远的赐福；由此，剩下的问题就只是追问，耶稣在他的教诲和行动中对其自身有何目的？"问题几乎是以事后想法的方式引入，好像此问题在赖马鲁斯的脑海中形成之际我们都在场。随后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段落，赖马鲁斯一口气列举了由此问题引出的一系列文学和历史难题。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它对比了"宗教真正伟大的目的"——传授一种纯正的对上帝和道德的理解——和耶稣"对其自身的目的"。后来的论述使问题逐渐明晰化，可知赖马鲁斯所追问的其实是耶稣对当时最紧要之事的关注：涉及犹太人摆脱罗马统治而获得独立的雄心，以及那时的政治势力及其控制和分布的状态。这是一个革命性的问题。在一些有关耶稣的早期描述中，他被刻画成一个天界的人物，来到世间启示天界的奥秘，并创建一种全新的宗教。这种启示的宗教超越了人类理性的范围，轻易就得到了当时独裁政治的支持。赖马鲁斯提出的问题显示出耶稣影响了1世纪民众的希望、恐惧和追求，这就把耶稣又带回了人类历史和政治的领域。这样的问题破坏了教会势力范围和国家势力范围完全分立的局面，在这种分立中，教会只对男女信徒一些超自然的目标负责；至于其他方面，则无条件地支持由世俗统治者来处理。那么，是否像赖马鲁斯提出的那样：当耶稣宣告上帝的王国将临之际，他指的是从政治上推翻统治势力即罗马人？考虑到已出版的选篇中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暗示，帝国检查官禁止莱辛再出版这种已经引发了一场重要公开争论的选篇就不足为奇了。

赖马鲁斯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历史方面的问题，要想回答它们，就必须使用历史学家能用到的所有工具和手段。赖马鲁斯已经详细地阐明了探究耶稣生平和思想需完成的一些工作。首先要仔细考察表现耶

稣生平的主要资料来源，即同观福音书，看看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被后人修订和篡改。此外，还必须细致地辨析某些词语和短句在当时的含义。耶稣对他同时代的人说，要期盼“上帝之国”的降临。但按耶稣听众的理解，这种主张究竟意味着什么？

赖马鲁斯著作的出版开创了一个各种研究论述层出不穷的新时期。对此，20世纪初期的阿尔贝特·施魏策尔（Albert Schweitzer）在其经典论著《探寻历史上的耶稣》一书中曾予以评述。这一探寻过程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最重要的就是将耶稣切实地置于1世纪宗教信仰及运动的情境中。事实上，在过去要进行这样一项历史考察需付出巨大的努力，现在依然如此。只需回顾一下1948年以来人们已经从事过的解读、翻译及编辑死海古卷的工作，就能明白这项历史考察涉及多少对大量相关文献进行学术编订的事务，而只有在此之后，对它们予以诠释，进而揭示耶稣与其关系的工作才能开始。由于所涉原始文献及其影响在地理范围上不断拓展，这项任务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大。一方面，《旧约》文本植根于辽阔的古代近东世界；另一方面，基督教又迅速扩展到罗马人所辖巴勒斯坦以外的希腊–罗马地中海世界。为了充分理解《圣经》在古代世界的宗教信仰与实践发展史上的地位，我们需要知道的知识确实多得惊人。如此一项事业只能由众人共同完成。

我只举几个例子。19世纪时，一系列现在被普遍视为表达了“启示”思想的文献逐渐为人所知。以往，这类文体只见于《圣经》的《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而如今，更多的同类文本已被发现。此类著作皆称基于某种上天的启示写成，故能揭示上帝意图的奥秘，例如借助于上帝的戏剧性干预，如今的“罪恶时代”如何会被“将临的时代”所取代，一个新天新地将会出现。诸如此类的文献能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宣告“上帝之国”将临的真正含义吗？一篇名为《摩西遗训》的此类文本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兴趣，其中提到推翻“撒旦之国”而代之以“上帝之国”。经过一连串的宇宙灾难和动乱，撒旦的统治将被推翻；恶人必遭惩罚而义人必享永久的至乐。我们确实能在福音书中找到和这一文本类似的地方。在耶稣于旷野遭试探的故事中，撒旦将世

间的万国呈现给耶稣，这肯定意味着，至少在那时，万国是撒旦的，能够由他赐予人。与此类似，在所谓“小启示录”的《马可福音》第13章，耶稣也预言了与《摩西遗训》中类似的突发性宇宙大动乱。

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类文本？约翰尼斯·威斯（Johannes Weiss，参见他的《耶稣对上帝之国的讲论》，1892）、阿尔贝特·施魏策尔等学者认为，它们与耶稣的思想非常接近，耶稣盼望历史上出现强有力的神圣干预行动，终结这个罪恶的时代，在人间建立起上帝的统治。在这方面（若非在别的方面）耶稣当然是被误解了。受此结论的影响，另一些学者认为，像《马可福音》第13章一类的段落是由后世教会写成的；还有人说，它们乃是基于耶路撒冷被毁灭的特定预言而作。然而不论对哪种说法，人们都可能提出：耶稣赋予“上帝之国”一词的含义与该词在启示文学中的用法其实相差甚远。一些学者认为，该词与拉比们对个人接受上帝意志的看法较为接近；其他学者提出，该词指的是上帝对历史的干预，这种干预尤与耶稣本人的治病和施教使命有关；另有学者甚至想在耶稣与1世纪那些争取解放的社群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后者追求以军事手段实现上帝的统治和以色列的独立（尽管这种观点在《新约》研究者中鲜有赞同者）。

这类讨论清楚地说明了《圣经》文本和其中的主要人物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特定的时代和文化，而这种时代和文化与我们自己的时代和文化常有很大差异，我们甚至完全不能理解。阿尔贝特·施魏策尔有一段名言，描述了我们对这种由历史研究揭示出的对耶稣的陌生感：

> “对耶稣生平的研究有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起初是为了追寻历史上的耶稣，相信一旦找到圣子，就能把这位作为导师和救主的他直接带进我们的时代。千百年来，他被各种束缚锁定在神学教义的坚硬磐石上，而对历史人物耶稣的探寻放松了这些束缚，人们高兴地看到生命和运动再次注入这个形象身上，历史上的耶稣也似乎前来迎接他。但那位圣子并未滞留，而是穿越我们的时代，又回到他自己的时代。”（施魏策尔，第397页）

批评与创造性阅读

我们已经看到，教会内外的批评家运用种种方法，试图使《圣经》摆脱教会1,500多年来对它作出的权威阐释。如果说教会的阐释成功地使《圣经》文本与信奉者的体验处于一种富于创造性且在表面上协调一致的关系中，那么这类批评的力量则主要来自一些声称自己的经验已不再能被教会的《圣经》故事所容纳的人。历史学、地理学、进化论都打破了教会阐释的限制。但是，如果说《圣经》摆脱了普遍接受的诠释，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再是社会和文化创造力的源泉。相反，这种对既定诠释的猛烈批评还为全新的、创造性的《圣经》解读扫清了障碍。无论是路德还是那些致力于探寻历史上的耶稣的人，都试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从《圣经》中读出自己的心得来。路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开创出一种新的新教读经法。历史批评家意在重构耶稣生平和教诲的工作——这无疑是艺术世界中最具生命力、最耗脑力的事业之一——反过来又促成了对福音书的多元解读。最后，这一历史探寻和重构的过程使我们更为强烈地感觉到，《圣经》文本及其随后的阐释都带有被特定文化所制约的性质。这就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力图把《圣经》含义等同于某种既定阐释的做法受到了质疑；另一方面，它使人们意识到《圣经》文本自身乃是古代传统与历代不同社群之间进行创造性对话的产物——这种意识或许能产生许多积极的成果。这对在当代语境中创造性、想象性地深入阅读《圣经》而言，也许是一种激励。

注释

〔1〕 梅兰希顿（Melanchthon，1497—1560）：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领袖之一，著有详细论述新教教义的《奥格斯堡信纲》（1521）。

〔2〕 自然神论（deism）：以理性为基础的神学理论，认为上帝创造世界之后便不再向自然现象施加影响力，也不再给出超凡的启示，故神学研究须以人的理性为指导。亦称“理性神论”。

第六章

《圣经》与后殖民世界

当今基督教发展最快的地区是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这些国家正逐渐从漫长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但现在仍在其他方面受到世界经济强国及其跨国机构的控制。在这些地区新兴教会和教会生活各种新形式的发展中，《圣经》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被运用于压迫体制下争取解放的斗争进程中，也为那些试图发展出更切合他们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督教形式的人们提供了灵感。随着《圣经》被译成当地语言，伴以主流教会的传教活动，各种新的信仰和行为模式得以发展成熟起来。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圣经》的运用远不是没有争议的。《圣经》已有一部被殖民者和传教士使用的历史，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对《圣经》的使用远远谈不上解放或尊重当地文化。本章试图展示一些迥然不同的《圣经》解读法，并确定是哪些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导致了这些不同解读法的产生。

图7　哥伦布在圣多明各登陆

《圣经》与拉丁美洲

对拉美的殖民史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哥伦布（Columbus）抵达那里之后的最初一百年间，数百万人死于战争、疾病和虐待，一些地区的人口锐减了80%。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建立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被教皇“赠予”了土地，并被鼓励去改变当地民众的信仰。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了今日的萨尔瓦多，他相信他的使命就是开创新世纪活动的一部分；当新世纪到来时整个世界都会在教皇的带领下统一于基督之中，在最后的审判到来之前共享最后的千年。他喜欢引用《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节的“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和《启示录》第21章第1节中与之相呼应的文字[1]。那新世纪将拥抱整个大地，锡安山将被基督教收复，所有人都将认同唯一真正的信仰。

此外，按照教皇发布的敕令，西班牙和葡萄牙君主受命发动圣战，以支持教会的传教活动。其间《约书亚记》和《士师记》所载征服迦南之事不但为征服战争提供了支持，而且为残酷屠杀拒不投降者提供了依据。正如当时评论家弗雷·托里比奥（Fray Toribio）谈到举目可见的死亡时说：

> 我不知道是不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罪恶和偶像崇拜造成了这种（死亡的）后果；但我看到，占据着应许之地、奉行偶像崇拜的七代人都被约书亚斩尽杀绝，随后以色列的子孙得到那地方为业。
>
> 引自普赖尔（Prior），第61页

所以毫不奇怪，有人把《圣经》完全视为一种压迫的工具。当现任教皇访问秘鲁时，他收到一封当地各社团给他的公开信，让他把《圣经》带回欧洲去。然而，正是在拉丁美洲，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把《圣经》从其在殖民背景下的误用中拯救出来。

> 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我们安第斯山脉的居民和

美洲印第安人决定利用您来访之机，把您的《圣经》归还给您，因为500年来它没有给我们带来爱、平安和正义。

请带回您的《圣经》吧，把它交还给我们的压迫者，因为他们比我们更需要其中的道德教诲。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之日至今，那种属于欧洲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价值观，都借助于武力，强加于拉丁美洲。

《圣经》是作为强制殖民化的一部分来到我们这里的，它是殖民主义者发动攻击的意识形态武器。昼夜不息的攻击和屠杀印第安人肉体的西班牙刀剑，业已成为打击印第安灵魂的十字架。

（理查德［Richard］，1990a）

甚至早在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入侵的时代，就有反对虐待印第安人的声音以不同的方式引用《圣经》。当然不必用《圣经》来证明对印第安人的处置有失公允、无比野蛮，但确实可以利用《圣经》的权威来支持反对压迫土著居民的做法。第一个在“新世界”接受圣职的神职人员巴托洛梅·德·拉·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是攻占古巴（1513）的西班牙军队的随军牧师，他曾是奴隶主，后来成了西班牙征服的坚决反对者。对《便西拉智训》第34章第21至26节的解读极大地增强了他反对西班牙征服的决心。这段经文的开头是：“食物对穷人来说就意味着生命，剥夺他们的食物便是谋杀。剥夺邻人的生计，或者克扣用人的工钱，都无异于图财害命。”他在1514年圣灵降临节的布道中断言（萨利纳斯［Salinas］，第102—103页），若没有公正的行为，献给上帝的祭品就会被穷人的鲜血玷污：“那种用穷人的财产向上帝奉献的人，无异于在父亲眼前杀死他的儿子。”因为反对者指摘他是异端分子，最后，卡萨斯被命令回到一所修道院，他的告解室也被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收回。他死后，西班牙皇帝腓力二世（Philip II）批准了查抄其著作的法令（普赖尔，第60页）。

强调从穷人的视角观察现实也见于当代拉美解放神学家们的著作

中。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如下的一些观点中看出：上帝站在穷人的一边，故教会必须奉行一种“对穷人优先的选择”；而且他们相信，穷人的灵性才智将是教会复兴极其重要的源泉。

1971年，秘鲁印第安裔神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errez）在《解放神学》中详细考察了近500年的殖民化和西方统治的历史，认为其最终结果是，绝大部分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土著居民大多被束缚在乡村或大城市的边缘地带。但在古铁雷斯看来，《圣经》谈到了解放：“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加拉太书》5：1），而这种自由必须包括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虽然历史已教导我们得到这样的自由是何等艰难，但圣保罗依然主张，基督受难和复活的复活节体验是“基督徒生活和所有人类生活”的关键所在。他的布道提醒我们“从旧人到新人、从罪孽到恩慈、从奴役到自由的过渡”。但当圣保罗说到自由时，他仅指“从一种自私自利、自我封闭的罪中解放出来……在一种不公平的结构背后，必有某种个体或群体的意志力应对此负责——一种拒绝上帝和邻舍的意愿。这同样表明，一种社会变革，不论有多激进，都无法自动消除所有的罪恶”（古铁雷斯，第35页）。

也就是说，解放神学试图拓宽神学的内涵，把人类存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也纳入考虑的范围，以此来反思构建一个公正、和平的世界所需变革的性质。这种变革当然是一种社会性的变革，一种有关社会结构和形式的变革。但这还不够：要想带来持久的和平与正义，还需个体和群体的心灵转变。

这种从私人和个体灵魂得救向公共和社会灵魂得救的神学转型是解放神学的标志性特点。这种转型基于对《圣经》叙事所揭示的上帝本性的思考，尤其是有关以色列出埃及、耶稣受难与复活叙事中揭示的上帝本性。《出埃及记》论及上帝对其子民在埃及痛哭时的回应，那时他们正受人奴役，备受煎熬；耶稣受难和复活的叙事则言及从整体上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希望。

选择《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从受埃及人奴役中解放出来以及随后进入“流着奶与蜜的土地”这些故事的目的无疑是显而易见的：塑造

一个“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上帝。这意味着“上帝的公正使他优先关爱孤儿寡妇。说来奇怪，但又合乎逻辑的是，在有压迫的地方一视同仁就意味着要优待某些人。”[2] 但是，如果说选《出埃及记》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但也还有令人困惑之处，尤其在拉丁美洲的后殖民处境中，因为这些叙事与征服迦南的故事密切相关，为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剥削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倘若有关解放的叙述不是以征服和种族屠杀结束，选择就要讲一定的原则。

毕克斯莱（Pixley）和古铁雷斯采用了不同的选择原则。毕克斯莱追随美国神学家诺曼·戈特瓦尔德（Norman Gottwald），重构了以色列的历史。这部重构的历史补充、澄清而非断然否定了《圣经》中的记载。依戈特瓦尔德之见，以色列是从一种部落联合体发展而来的，那些部落居住在“人烟稀少”的巴勒斯坦山区，他们在内地不断迁徙，以逃避沿海平原上欺压异族、战乱不断的王国。后来躲避埃及人统治的希伯来人汇入这些以色列部落，而这些不同的族群最后在亚卫（希伯来人的上帝）信仰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征服和摧毁迦南人的叙事被看成是后来的杜撰，因此被摒弃。叙事的神学核心则是对解放者亚卫的信仰。“他们在强大的埃及军队的追击下成功地逃脱被奴役的处境，这一事实表明，那位在埃及站在穷苦人一边的上帝乃是真正的上帝”（毕克斯莱，第236页）。

古铁雷斯更贴近《圣经》文本，但也是有所选择的。他的《上帝与生命》一书是对《圣经》深思冥想的成果，书中根本未提及《约书亚记》，而是把《出埃及记》的故事与耶稣的教诲，尤其是耶稣对《以赛亚书》的解读并列起来。后者体现在《路加福音》中耶稣最初的布道词里（4：18）：

> 主的灵在我身上，
> 因为他用膏膏我，
>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 差遣我报告：
> 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以这样的视角来解读，有关攻城掠地的叙述简直就销声匿迹了；或者换言之，耶稣布道本身强调了《旧约》传统，提供了一个有选择地解读整部《圣经》的（权威性）原则。这无疑与戈特瓦尔德尝试以历史重构法纠正或净化《圣经》叙事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圣经》与非洲

非洲的殖民主义一直延续到相当晚近的过去。多数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获得独立；一些殖民地晚至19世纪后半叶才建立。同样，在非洲《圣经》既可用作压迫的工具，也可用作解放的武器。南非于17世纪成为荷兰的殖民地，19世纪初被英国吞并。在新兴的南非白人〔3〕神学中，以色列人出埃及和进入应许之地的故事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英国接管了对好望角的管辖权，执行自己的立法和征税，南非白人开始离去，在纳塔尔省〔4〕、奥伦治自由邦〔5〕和德兰士瓦省〔6〕建起新的共和政体。不难看出，这些变迁能依据《旧约》作出解释：南非白人挣脱英国的束缚，向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进发。他们有诸多抱怨，其中之一就是抱怨英国人不允许他们继续蓄奴，但这并未使他们放弃像殖民者那样蓄奴。然而就算是这样，作为一种制度的蓄奴在《旧约》中并未遭到谴责。五经中有相对开明的法规，寻求规范而非废除蓄奴制度。

后来，南非白人神学把大迁徙〔7〕视为一次朝圣，被奴役的“上帝特选之民”遭到英国军队的追击，在无信仰的黑色“迦南人”的团团包围下，进入应许之地。于是，某种种族主义被引入对《圣经》文本的改写中。将黑人等同于迦南人，而将南非白人等同于上帝的特选子民，如其所愿，这种等同在两个民族之间设立了永久的壁垒。

这种神话据说是以南非白人在血河大战之前立下的誓言为主题，

通过全国性的追忆活动而得到了强化，并被秘密兄弟会积极传播。秘密兄弟会是一个组建于1918年的新教团体，意在推动南非白人民族主义的发展。在这里根据族群历史上发生的大事，《圣经》传说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再次被重新解读。

然而，对《圣经》的这种解读不可能不遇到挑战。虽然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批判大多基于世俗的或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无可否认的是，教会的一些领袖人物也对反种族隔离的斗争给予了支持。那时，称教会为“斗争的场所”已经习以为常，这就等于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教会、教会领导权及其核心象征都受到了质疑。虽然如此，德斯蒙德·图图[8]一类的教会领袖确实还能在一个特别敏感的领域与南非白人的首领们展开对话：这便是他们对《圣经》传统的运用。

在这方面，图图的文集《盼望与苦难》富有启发性。图图反对种族隔离的土地政策，尤其是把黑人从他们世代耕作的土地上驱赶出来，而安置到另一处所谓的家园中。既然白人神学把黑人视为“迦南人”，说他们因为违背了法律而被逐出家园，图图就把黑人描述为丹肯村的居民，称他们迫于威胁而不得不迁离，即如拿伯（Naboth）葡萄园的故事所示。在《列王纪上》第21章的故事中，在撒玛利亚做王的亚哈（Ahab）提出，购买或者交换其属民拿伯的葡萄园，拿伯不同意，因为它是“先人留下的产业”。亚哈的异族妻子耶洗别（Jezebel）插手此事，精心安排，使拿伯遭到伪造罪名的指控，并被乱石打死。亚哈去侵占那座葡萄园时遇到先知以利亚（Elijah），后者用恰当而又生动的言辞宣告了上帝对他的处罚：“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2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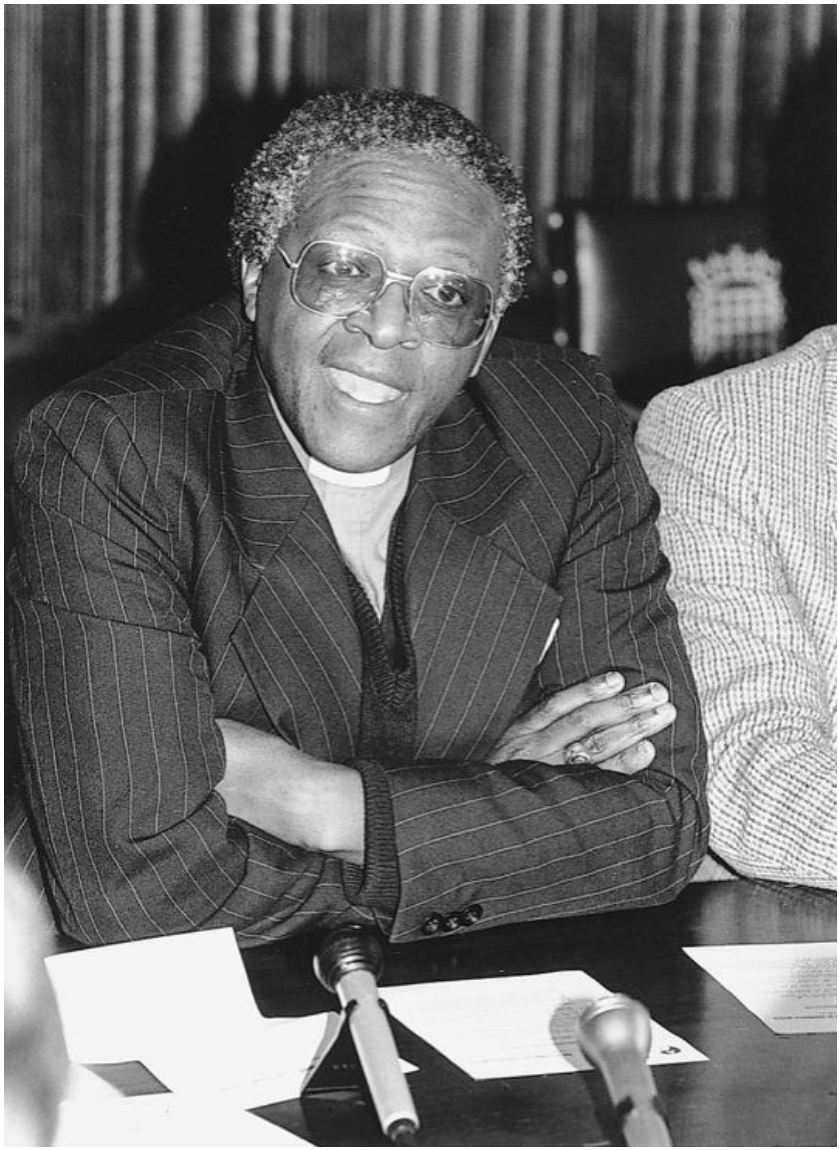

图8　德斯蒙德·图图

不难看出图图如何利用了这段经文，在拿伯和丹肯村居民之间，以及亚哈、耶洗别和南非当权政府之间找出了相似性。后者有权有势，自以为能把村民当成“无关紧要的人……在这个国家，在这片生养了你们的土地上，你们什么也不是”。但“上帝关注不公，关注压

迫，关注剥削……上帝也关注他们想让你们走投无路这一事实”。对于当权政府称为“隔离发展”的种族政策，图图毫不妥协地斥之为不公，是对黑人尊严的漠视。“南非的土地足够所有人生存，而事实恰恰是，一些人贪得无厌，同时又持有强权，以致能够为所欲为地满足其贪欲，给另一些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弱势者造成损失。但是，上帝支持的正是这个弱势群体。南非呀，请记住拿伯葡萄园的故事吧”（图图，第42页）。在这后面，是一部黑人因种族隔离制度而遭受虐待的血腥历史。未曾明言的拿伯故事的一些细节使图图的论述更具锋芒，几乎带有了几分威胁的意味。由此不难理解，南非白人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地反对图图。

所有这些见解都出自非洲黑人的视角，他们把非洲当作自己的土地，而其见解无疑会遭到白人的反对。图图在致时任首相约翰·沃斯特[9]的公开信中有力地论述了这一主题。这封信是

> 作为一个人写给另一个人的，我们荣耀地按照与圣子相同的模样被造（《罗马书》8：29）；圣子由于我们所有人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我们由于那同一的灵得洁净，他在我们所有的人里面工作，要把我们的石心变成肉心（《以西结书》36：26；《哥林多后书》3：3）……作为一个信徒写给另一个信徒的，由于共同的洗礼，我们都成为同一个身子的肢体，在我们尊贵的主和拯救者里面统一起来（《哥林多前书》12：13）。不论我们做过什么，这位耶稣基督都要拆除那所有隔断我们的无关紧要之物——诸如种族、性别、文化、地位等等（《以弗所书》2：14；《加拉太书》3：28）。在这位耶稣基督里，我们被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同一种得救赎的人类，黑人和白人密不可分。（图图，第29页）

这段表述中充满了《圣经》中的观念和隐喻，创造出一种解读《圣经》的经典框架。不同于以往引用的出埃及或占领圣地等单一主题，图图从《旧约》和《新约》中广征博引，以求提供一种共有的基本信念模式来引导维护传统和诠释历史的斗争。在后一种历史诠释中，无论黑人和白人喜欢与否，他们的命运都紧紧相连。非洲白人对征服圣地之事的种族主义解读被基督教普世主义取代；社会隔离被弃

之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基督里”的相同人性。

后独立时期的非洲解读

殖民枷锁被挣脱后有哪些情况发生？非洲教会是西方传教士创建并长期控制的，现在，其本土信徒是如何发展出一种在表达方式和社会形象方面都能真正体现非洲性的神学和灵性生活？《圣经》对这一事业能作出哪些贡献？这些问题显然已超越了本书的论述范围。然而，对所处社会文化方式的适应问题和基督教在非洲文化中的扎根问题得到了主流教会和那些分裂出去的非洲独立教会（AICs）的特别关注。

博茨瓦纳的穆沙·杜布（Musa Dube）提供了这种后独立时代解读《圣经》的一个有趣范例。她谈到博茨瓦纳国内的非洲独立教会妇女是如何解读《马太福音》第15章第21至28节所记载的耶稣遇到迦南妇人的事。那妇人来到耶稣面前，求他医治她的女儿，因为她被鬼附了身。门徒拒绝了那妇人，耶稣起初也想打发她走，说他“奉差遣，不过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还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而那妇人却回答：“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话博得耶稣对其信心的称赞，并满足了她的请求。

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妇女对这段故事的解读在好几个方面都很引人注目。首先，她们解读该故事的基本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莫雅”——即“灵”——的观念决定的。在她们看来，灵授人以力量，使之能“作预言、医病人、助人找工作、恢复家庭和睦、确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牲畜繁殖顺利，并驱赶人们生活中那些不期而至的邪恶力量”（杜布，第112页）。因此，她们说是灵引导耶稣遇到那妇人；是灵的作用使耶稣治病救人、施教布道。此外，对她们来说，那灵还有包罗万象的特征。非洲独立教会源自反对“对传教士教会带有歧视的领导权……莫雅向他们启示了福音的美和公正，揭示出福音反对殖民教会的歧视倾向，具有包容万物的特点”（杜布，第124页）。令人关

注的是，一位妇女以如下见解论述了迦南人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以色列人是从他们屈身为奴的埃及得救……而进入流着奶与蜜的迦南之地的，那位有伟大信念的迦南妇女向我们表明，她们的土地上确实流着奶与蜜。”一如杜布所论：“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后殖民阅读，它使宗主国以殖民地贫穷和缺乏信仰为由来证明其统治合理性的修辞策略不再有效”（杜布，第125页）。

这里的包容性与耶稣认可那位迦南妇人的信心有关，表现在了读者本身乐意借鉴基督教之外的传统，并将其变为自己的故事。作为上帝当下活动的莫雅概念盛行于非洲的一些宗教中，它“进入女人和男人心中，并赋予他们力量”。采用一个在两种宗教传统中都能找到的概念“既是一种抵抗策略，也是一种从宗主国所强加的文化重制下寻求疗救的方式，这种方式依靠减少差异和推行一些普世性的准则来实现”（杜布，第125页）。与此同时，这种对灵的强调还给人以极大的自由度，使教会成员无需其他授权——官方的或《圣经》的——就能在灵中言说，这对那些在非洲独立教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妇女们来说，不啻一种深刻的解放。

最后，杜布还注意到，强调疗救对非洲独立教会理解其信仰至关重要。多种类型的疗救活动是该教会生活的核心内容，面向所有人。这些疗救活动包含了人生的各个方面：“失业、关系破裂、庄稼歉收、母牛遗失、心灵蒙罪、身体病痛，以及遭遇不幸……通过断言上帝之灵已授权他们疗救那些社会病症，非洲独立教会与上帝携手，以持续不断的斗争反对体制性的压迫行为。他们作出了承诺，提出了解决方案。这种疗救空间成为他们正视社会弊端的政治表述，他们不再是被上帝忽略的孤立无助者，而是有能力控制并改变其社会状况的人”（杜布，第126—127页）。

在福音书对耶稣的描写中，治病救人是一个突出的主题，但在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西方诠释中，这一主题明显被淡化了。然而，非洲独立教会在接受这个故事时，却赋予疗救以核心地位。可见，他们对主流教会所宣扬的基本诠释模式进行了双重反驳，一方面，他们反对将被殖民者边缘化或排除在外的殖民主义阅读：人们认为《圣经》是

解放性的，并不是排他的，而是开放的，是赋予穷人以权利和妇女以权威的文本。另一方面，他们宣扬另一种宇宙论：信奉作为莫雅的上帝行动，把教会理解成向所有人实施疗救行动的团体。正如杜布所说，这种信奉和理解正是消除非洲独立教会信徒们所承受的肉体与经济痛苦的方式。他们提出一个诠释构架、一套基本信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可能对《圣经》文本有一个全新的理解。

运用与误用

《圣经》在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解读史为研究《圣经》的运用和误用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意义的课题。这部解读史清楚地表明，《圣经》文本极其丰富，可塑性也很强，可以从各种差异很大的角度来解读：同样的《圣经》文本既可能让一个民族生存，也可能使他们灭亡，这完全取决于如何来解读。这或许足以使有些人完全放弃《圣经》。而另一方面，一如莱辛200年前就深思过的，全然拒绝接受《圣经》文本就意味着冒无视生命源泉的危险。

诸如此类的讨论使我们直面一种令人尴尬的两难之境。能超然审视拉美征服史的人必然厌恶征服者利用《圣经》为他们对土著居民的暴行提供道德和宗教支持的做法。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征服者对《圣经》的运用完全斥责为武断和随心所欲，因为《圣经》中那些残杀迦南当地民众的故事本身就同样令人反感。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当时的确凿证据表明，《圣经》还能够给被压迫者以慰藉、力量和解放，就如我们将要在别处看到《圣经》是如何丰富犹太教信徒和基督徒文化的一样。倘若无视《圣经》，这样做不仅危险，而且我们会失去太多太多。

那么，如何运用它呢？首先要持批判的态度。我们必须意识到，《圣经》中有多种不同的声音，读者也可以有不同的强调点。我们有必要学会明辨那些不同的声音和解读方式，以便作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其次，应当怀着宽容的心态来阅读。我的意思是，应当允许《圣

经》中存在具有创造性、解放性和建设性的声音，以便形成我们自己对文本的理解。特别应像德斯蒙德·图图那样，将各种要素汇为一体，形成一种观察《圣经》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状况的视角。换言之，我们不应让自己的道德判断被《圣经》中的阴暗面支配。然而，一种批评式的、小心谨慎的《圣经》阅读方式能激发和增强我们的道德感，并提供一种能改造个体和社群的道德宗教视野。

注释

〔1〕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2〕 参见《申命记》第10章第16至18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硬着颈项。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无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

〔3〕 南非白人（Afrikaner）：具有欧洲血统且使用南非荷兰语的南非人，特指17世纪荷兰移民的后代。

〔4〕 纳塔尔省（Natal）：印度洋边非洲东南部的一个地区，1497年圣诞节时被达伽马发现，19世纪20、30年代属于英国，1836年被伯尔斯占据，1843年成为英国殖民地，1856年成为独立殖民地，1910年以后成为南非国家的基础省份。

〔5〕 奥伦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南非中东部省份，19世纪以后被殖民化，1848年被英国吞并，1910年成为南非国家的创始省份之一。

〔6〕 德兰士瓦省（Transvaal）：南非东北部地区，原住民为讲班图语的非洲黑人，19世纪50年代曾由布尔人建立独立国家，1877年被英国吞并，1900年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1910年以后是南非国家的一部分，境内盛产黄金。

〔7〕 大迁徙（the Great Trek）：1836至1845年间布尔农民因反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从南非开普殖民地出发的一次大迁移。

〔8〕 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1931—）：南非主教，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黑人领袖，拥护对南非的国际经济制裁，于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9〕 约翰·沃斯特（John Vorster，1915—1983）：南非政治领导人，1966至1978年任首相。

第七章

《圣经》与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

《圣经》是欧洲文化的主要源泉之一，这样说几乎肯定是低估了《圣经》的重要性。也许更恰当的说法是，《圣经》是欧洲文化最初的和主要的来源。借助于各种译本，《圣经》对所有重要的欧洲和北美文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和音乐的形成。它现在仍继续影响着电影、小说和音乐等通俗文化。《圣经》的语言、故事、隐喻、原型和人物构成一座巨大的文化资源库，以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的方式引用《圣经》。引用的范围极宽极广，从伟大小说和音乐对《圣经》叙事的精心重构，前者如托马斯·曼〔1〕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后者如巴赫〔2〕的《圣马太受难曲》，到伦勃朗对《圣经》场景和叙述的逼真描绘，再到诗歌和小说对《圣经》隐喻及主题的效仿中就可见一斑。对那些不了解这些作品是出自《圣经》的人们来说，弥尔顿〔3〕、布莱克〔4〕一类诗人的作品肯定难以理解。另一些作家更像是取材于某部“伟大的代码”，这部代码在文化遗产中占据了如此之多的份额，以致人们无论是否意识到它出自《圣经》，都几乎无法逃避它的影响。

> 在我们自己的想象传统中，《圣经》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我们对它相信多少，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圣经》不断地提出问题：为什么这部浩繁庞杂之书神秘莫测地置身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间，就像《彼尔·金特》〔5〕中的“无形的巨大障碍”或斯芬克斯，使我们企图避开它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6〕
>
> 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第18—19页

复述《圣经》：《圣经》与音乐

复述《圣经》叙事是《圣经》本身的一个特色。《列王纪》中的故事被《历代志》重复，福音书故事被重述了三遍。此外，如前所

述，从公元前2世纪起，这种复述的传统就出现在犹太教信徒及基督徒的写作中。亚伯拉罕捆绑以撒的故事被《禧年书》、约瑟福斯的《犹太古代史》、《米德拉希》及中世纪诗歌所复述。此种复述有助于聆听者理解其自身的经验，并将其经验写入他们的正典文本中。这样的互惠关系——运用《圣经》的文化语言理解新鲜但往往令人烦扰的经验，同时基于一种令人困惑且异于寻常的经验重塑或重读正典文本——将激励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在信仰群体之外传承《圣经》传统。

英语中一些常见的表述来自《圣经》钦定本中对希伯来成语的直译。

《约伯记》**19：20**

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在《圣经》的标准修订本中此语译为“我经由牙皮逃脱了”。）

《以赛亚书》**3：15**

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

《弥迦书》**7：17**

他们必舔土如蛇，又如土中腹行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战惧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

《民数记》**22：31**

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上。

这种在特定教会语境外复述《圣经》故事的过程必定是逐步发生

的。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剧很好地说明了对《圣经》故事的讲述是如何超出教会范围而展现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上的。上阿默高人〔7〕的耶稣受难剧中的故事源自他们对从瘟疫中获救的感恩。剧中的故事表明了这种对耶稣受难的通俗再现可能与某一社群历史上的特定事件有关。此类戏剧是中世纪仪式剧演出活动的扩展，后者以戏剧形式解读或吟唱了福音书中耶稣受难的故事——用不同的声音演绎福音书作者、各种角色以及人群。随着歌剧、清唱剧、康塔塔〔8〕以及与之相关的咏叹调、宣叙调〔9〕和众赞歌〔10〕的出现，这一音乐传统在17世纪发展起来。咏叹调和众赞歌的新文本被添加到福音书文本上，以使参与者的情感得到更好的表达。至18世纪初，这种倾向更加突出，以至于发展到不必拘泥于福音书文本来写耶稣受难的故事，而是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重述。巴赫现存的两部耶稣受难曲——即《圣约翰受难曲》和《圣马太受难曲》——依然保留着中世纪完整表现福音文本的做法，只是为了使作品更加生动有趣，他才在《圣约翰受难曲》中添加了取自《马太福音》的片断（耶稣受难后天明和地震时传福音者的评论）。总的说来，较早的《圣约翰受难曲》较为简约，福音的文本内容显得更为明晰。即便如此，这首曲子依然明确地突出了某些主题。首先，这部福音中的群众角色为巴赫展示其戏剧性技巧提供了机会。群众角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耶稣受审判和被钉十字架的场景中，在那里，合唱曲所演唱的各段之间有一种形式上的对称性。

1633年，上阿默高的巴伐利亚人村庄遭到瘟疫袭击。为了表达对灾难结束的感激，村民们起誓每10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所有演员都来自那个村庄，其中包括124个有台词的角色，另有数百位村民参演群众角色。剧情始于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终于基督复活。每场都由一个舞台造型引导，造型选自《旧约》的场面，预示着即将发生的情节。与基督在彼拉多面前的场景相匹配的是但以理在大利乌面前的场面。

在巴赫的作品中，第1、2句对应于第7、8句，同样的音乐出现在第3和第6句中；第4句和第5句则有音乐上的同一性，构成这个部分的中心。在这两句之间，巴赫插入一曲众赞歌：

上帝之子啊，由于你的被囚，
我们得以有自由。
你的牢房乃是恩慈的宝座，
是所有信奉者的得救之地。
倘若你未使自己受奴役，
我们就永远被奴役。

耶稣受审和受难场面中的群众角色

1．“不是这个人，是巴拉巴（Barabbas）！”
2．“恭喜了，犹太人的王啊！”
3．“钉死他，钉死他！”
4．“我们有律法，按照我们的律法他该死，因为他自称为上帝的儿子。”
5．“你如果释放了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朋友；无论谁，只要自命为王，就等于说反对凯撒。”
6．“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
7．“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
8．“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

这类群众的台词有双重效果：首先，不可否认，犹太人反对耶稣的方式和他们在处死耶稣中的作用得到了强调。这无疑是福音书文本所要强调的内容，但合唱团呼喊“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时的激情却凸显了群众的戏剧性参与，这些歌曲的音乐编排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但这还不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中间的那段众赞歌才是。在此，路德宗关于基督为人类的罪孽受难、而人性因其罪行的重负而衰落的观念才

是关键所在。耶稣受难曲的重点是人类为争取和平、摆脱罪负、赢得自由所进行的斗争，但表现犹太群众的音乐力量在后来的《圣马太受难曲》中得到了保留和强化，该曲还按路德宗的方向发展了咏叹调和众赞歌。

巴赫的耶稣受难曲最初是为18世纪上半叶莱比锡的路德宗圣周仪式谱写的，迄今依然是路德宗仪式的构成部分（尽管目前已很少在教会的礼拜活动中演唱），且毫不费力地走进了音乐厅。这种宗教礼拜仪式的作品能够转入广阔的世俗情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清楚地说明了伟大的宗教礼拜仪式性音乐作品是如何引导参与者从而使之应对人类经验的高贵和苦难（*grandeurs et misères*）。

一例类似的对礼拜仪式的扩展见于布里顿〔11〕的《战争安魂曲》，在这里作曲家将维尔弗雷德·欧文〔12〕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诗歌与追思弥撒并置起来。在奉献仪式上，面包和葡萄酒被呈现为弥撒的祭品，男童唱诗班祈祷着虔信者的灵魂摆脱地狱之苦而得救，米迦勒〔13〕引领他们进入圣光之中，“那古老的圣光啊，你应许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这最后一句引于一篇加长的赋格曲〔14〕，后者引入了欧文对阿克达叙事的再创作：

> 就这样，亚伯兰站起身，劈好柴，上了路，
> 随身带了火种，和一把尖刀。
> 正当他们一同逗留之际，
> 那独生的以撒开口问道，我父啊，
> 看哪，火和铁器都预备好了，
> 但献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
> 这时亚伯兰用皮带和绳子捆起这年轻人，
> 就地筑起祭坛，挖出深沟，
> 并拔出尖刀，要杀死他儿子。
> 就在那时，天使从天上呼喊他，
> 说，不可在这年轻人身上下手，
> 一点也不能伤害他！看哪，
> 一只公羊在树丛中被缠住了角；
> 用那只傲慢的公羊〔15〕代替孩子献祭。

但那位老人却未听命，而是杀死了儿子，
——并且一个个地杀死欧洲的半数子孙。

就在独奏者重复此诗的最后一句时，男童合唱曲再度响起，穿插着奉献仪式上的话和对亚伯拉罕及其后裔应许的暗示。

就像在拉比以法莲的诗中那样（参见本书此处），这个故事在诗人遭受的苦难的重压下中断了。但在这位拉比的诗中，虽然以撒死了，诗歌却以他的复活以及对亚伯拉罕信仰的辩护而告终。而欧文诗中的“父亲”却在深沟旁的祭坛上“一个个地”杀死欧洲的年轻人，拒不接纳傲慢的公羊为祭品。在布里顿的曲子中，士兵们的声音伴随着唱诗班对被杀者复活的恳求：“主啊，使他们超越死亡，活过来吧！你确曾应许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较之那位拉比的诗歌，这里的重述与原著之间的差异更大。故事的基础所在——亚伯拉罕相信上帝将保护他和他的祖先——因亚伯拉罕对儿子的行为而遭到质疑。男高音歌手重复儿子的疑问“我父啊……”一段，这使儿子天真的信任与随后无谓的杀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诗人没有回顾那传承而来的亚伯拉罕的原型信仰：只有路边被破坏的十字架意象和十字架上被信徒遗弃、被兵丁团团围住的受难者意象给人以希望：

在斑驳的岔路口，那人曾被悬挂起来。
在那场斗争中，他也丧失了肢翼。
而此刻，他的门徒都躲藏起来，
兵丁们则向他施加着压力。
在各各他附近，如此众多的祭司们奔走相告，
他们的脸上得意洋洋。
那本是兽性留在肉体上的标志，
高贵的基督乃是被他们拒绝。
高居于众人之上的文士们兴风作浪，
叫嚣着要效忠于国家。
而那些怀着更大爱心的人们
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都厌倦憎恨。

图9　本雅明·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首演前的排练场面，两位歌手分别是英国人彼得·皮尔斯（Peter　Pears）和德国人迪特里希·费舍尔–迪斯考（Dietrich Fischer-Dieskau）。

欧文的诗中点缀了拉丁文本《上帝羔羊》中的语句："哦，上帝的羔羊，你带走了世上的罪孽，使人们得享安息。"他重述亚伯拉罕的故事意在激励人们对古代传统进行重新评价：向祭司和文士们发起挑战，他们因民族骄傲和对国家的绝对顺从而腐败堕落。被宰的羔羊取代了傲慢的公羊。

艺术中的《圣经》形象

虽然《圣经》完全用文字写成，但却催生出整整一个门类的塑像和绘画艺术。这方面的创作最初也是在奉行《圣经》的社群中流行，特别是在基督徒中。相对来说，在犹太教徒中并不是很流行，因为他们对在犹太教会堂中使用《圣经》图像更为小心谨慎。这类艺术的一些最初形式体现为教堂的图像释经画、油漆画、镶嵌画、湿壁画、玻璃窗彩绘画等，同时兼具装饰和教诲的双重功能：它们是穷苦人的《圣经》。几位意大利艺术大师——诸如帕多瓦的斯科洛维尼教堂的

乔托[16]（约1305）、西斯廷礼拜堂的米开朗琪罗[17]（1508—1513）——都有构思宏伟的画作。乔托的湿壁画分为四组，画在教堂彼此相对的墙壁上，（从上至下地）描绘出马利亚的生平场景、基督的生平场景，以及有关善恶的寓言故事。通向圣所的凯旋拱顶上画着天使报佳音，西墙上画的是最后的审判。一如西斯廷礼拜堂，这里的画面不仅让会众想起《圣经》中的单篇故事，还向他们呈现出一整套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聚焦于通过道成肉身的救赎，并在贞女的生命中作了准备。这种世界观对个人的隐含之意清楚地展现在了描绘善恶的板面油画以及最后审判时的鲜明对比中。在文艺复兴后期的艺术中，这种构思得到进一步发展，《旧约》和《新约》中的场景被按照类别进行了比较和对照。

图10　米开朗琪罗在罗马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里描绘的《最后的审判》

图11　乔托在帕多瓦的卡帕拉·斯科洛维尼教堂里绘制的湿壁画之一

尽管乔托所描绘的《新约》人物显得亲切而富有人性，但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作品仍然是纲要式的，按照固定的形式呈现了教会的官方教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在描绘《圣经》场景时引入了一些更具个人主义色彩和更为私人化的内容。多那太罗〔18〕的杰作《大卫》青铜塑像（约1446—1460）表现的是少年之美和沉思的神情。马萨乔〔19〕在佛罗伦萨的布兰卡希教堂绘出的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景象（约1425），出色地揭示出人类的悲哀和失落状态。一百年后，格吕内瓦尔德〔20〕在《伊森海姆祭坛画》（约1513—1515）中不遗余力地描绘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遭受的肉体酷刑和极度苦难，与此同时，在祭坛的其他画幅中，背景是天国，有众天使盘旋，他们积极地为一片昏暗境界带去失丧了的神圣荣光。画面成功地表现出上帝之子竟是那位被上帝遗弃的遭受折磨者。

在格拉斯哥亨特林艺术画廊陈列的伦勃朗的油画《安葬基督》也

表达了类似的主题，只是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在画面上，基督的遗体正被放进一个在岩石上凿出的墓穴中，墓穴有通向左边的入口。一位老人扶住基督的双肩，一个年轻人拉住裹尸布，裹尸布里的遗体正被缓缓放下。年轻人身后还站着一人，靠在岩石上。右边有一个缠裹头巾的人跪着，在基督的脚踝处抓住裹尸布。这组人物左侧是一个举着火把的妇女，她用手遮掩着火把。她旁边还站着一位长有胡须的老者。在这些主要人物背后的右侧另有一组人物，其中为首的是个打着灯笼的身材高大者。这幅油画的突出特征在于对明暗色彩的运用：鉴赏者须习惯于画家在光线处理方面的微妙之处，如对于画面右侧的一些人物，他只允许其轮廓线条浮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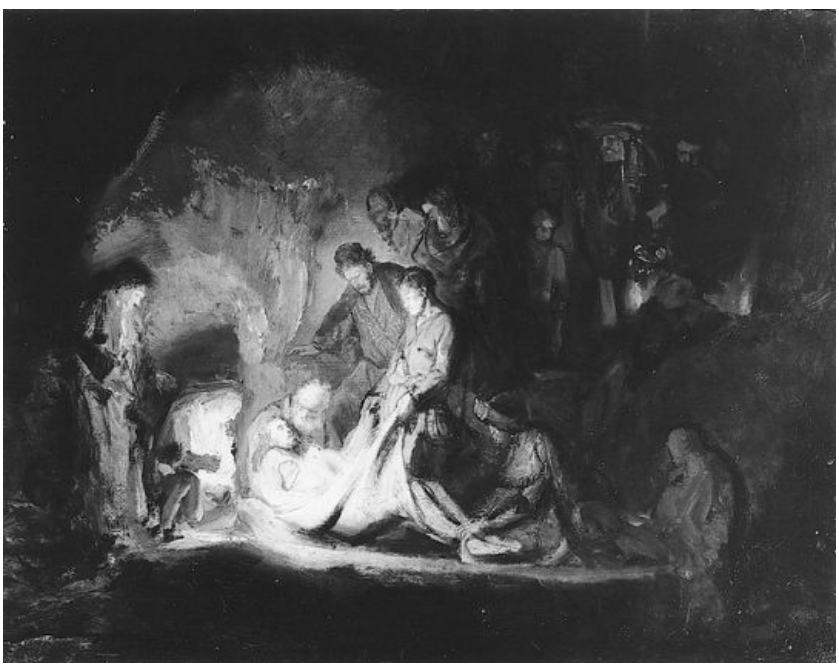

图12　伦勃朗的油画《安葬基督》，陈列于格拉斯哥大学的亨特林艺术画廊。

慕尼黑有一幅类似《安葬基督》的画，是伦勃朗在1536至1539年间创作的，时间上可能晚于格拉斯哥那幅画。慕尼黑的这幅作品是一组绘画中的一幅，那组画中还包括一幅《牧羊人崇拜图》。值得关

注的是，这幅慕尼黑的《牧羊人崇拜图》与格拉斯哥的《安葬基督》非常相似，在构图上几乎就是后者的翻版；在从婴儿基督身上照出的光线处理上，也完全一样。就这样，格拉斯哥的《安葬基督》里的人物巧妙地笼罩在哀伤、慈怜和尊崇的氛围中。有趣的是，伦勃朗渲染了一个呈跪姿俯伏在基督脚边的妇女形象；较之那个因痛苦而俯跪的人物，他好像更喜欢这个因崇拜而跪拜的形象。

伦勃朗绘画与福音书文本的关系颇为复杂。在马太对耶稣之死和下葬的描写中，他特别拿伴随耶稣之死的戏剧性事件——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大地震动、磐石崩裂、坟墓张开、“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同安放耶稣的遗体在坟墓里、用大石头封住墓门这些事进行对比（《马太福音》27：51—54）[21]。他提到，亚利马太的约瑟（Joseph of Arimathea）向彼拉多（Pilate）索取耶稣的遗体，彼拉多同意了他的要求，接着写道：

> 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马太福音》27：59—61）

在一系列绘画、版画和草图中，人们都能看到伦勃朗添加了一些未见于《圣经》文本的细节，如耶稣遗体从十字架上取下及其被置于墓穴中的方式，以及墓穴内的景象。在慕尼黑的画面上，鉴赏者的目光被引导着离开墓穴中的人物，穿过岩石上的洞口而看到外面的十字架。相反，在格拉斯哥的画面上，入口显得模糊不清，观者似乎正处于那座封闭的墓穴中。画面使人觉得被关入其间，而墓穴的封闭便是这种感觉的反映。但与此同时，伦勃朗也让观者看到是什么将要推开巨石：是存在于死去的基督中的新生命，被其仅存的几个朋友和家人悼念着、爱戴着、崇拜着。在此，伦勃朗无疑是其文本的诠释者。

《圣经》的象征意义：《圣经》与隐喻和概念

无论在文学、音乐、绘画艺术还是在电影对《圣经》故事的复述中，《圣经》都塑造了欧洲的文化遗产，并深深地渗入其中。在《甜蜜的生活》一片中，费里尼〔22〕频频引用《启示录》中的意象和主题，以强化对现代罗马社会衰败景象的描述。英格玛·伯格曼〔23〕将类似的主题用于他表现瘟疫的阴沉影片《第七封印》中。《圣经》的语言、隐喻和概念以无穷无尽的方式渗入我们的文化中：从为某个场面赋予一种新表现手法的措词，到利用重要的《圣经》隐喻和概念创作的整部作品——无论被如何接受或再创作（或是被拒绝），再到反思《圣经》自身作用的作品。

为了不让人以为这种影响仅见于以往数十年的作品中，让我们举一个当代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例子。阿特伍德在《女仆的故事》中虚构了一个位于北美洲的基列世界，这是一个后核武器发展时期的独裁专制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人们的生殖力以骇人的速度下降，“女仆”阶层应运而生。她们被分配给当权者中无子女的夫妇，负责完成生儿育女的特殊任务。她们被严密地控制，如果未能怀孕或者反叛，就会受到严罚，甚至被流放到殖民地或处以极刑。

在《圣经》中，“女仆”一词是对受奴役者合适的委婉称呼，其词根为希伯来文“阿玛”（*amah*），意为“女性仆人”或“女性奴隶”。这篇小说的关键含义是通过隐射作为奴仆的女孩辟拉（Bilhah）之事（参见《创世记》30：1—9）〔24〕体现出的：拉结（Rachel）嫉妒姐姐利亚（Leah）顺利地生了孩子，就把辟拉送给丈夫雅各（Jocab）。此即故事叙述者奥弗莱德（Offred）所言：“卑劣的老废物啊，拉结和利亚，我们已击打要害，使你们进入我们中间。”这篇小说也和亚伯拉罕、撒拉（Sarah）、夏甲（Hagar）的故事有关。夏甲是撒拉没有生育时送给亚伯拉罕的女仆，撒拉一怀上孕，就把夏甲和她儿子撵出门，使之流浪旷野（《创世记》21：8—21）。也许最重要的还是小说呼应了马利亚听到天使报佳音时说的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路加福音》1：38）。总之，与女仆一词相关的是受奴役、性剥削和恭顺服从。

然而，《圣经》对“女仆”一词的运用还与另一条更具颠覆性的叙事线索相关，其中包括像亚比该（Abigail，《撒母耳记上》25）这样的人物，她从丈夫拿八（Nabal）之处前去游说大卫，使家人免遭灭门的威胁。除此之外还包括一系列能劝谏犹太诸王的“聪明妇人”，最后还包括犹滴（Judith），她对亚述元帅荷罗孚尼（Holofernes）实施诡计，说她能为亚述人指点一条通向伯夙利亚城的秘密通道。她随身带去了食物而拒用荷罗孚尼提供的餐饮，以极具讽刺意味的言辞向他担保道：“阁下，你就放心吧，你的女仆有足够的食品，能吃到主用我手执行他既定计划的时候”（《犹滴传》12：4）[25]。最后她进入荷罗孚尼的帐篷，与他一同吃喝；当他烂醉如泥之际，用他本人的宝剑砍掉他的头（13：4）[26]。这个故事让人想起更早的杀死异族入侵者西西拉（Sisera）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希百（Heber）的妻子雅亿（Jael）把逃亡中的将军接进自己的帐篷，用钉帐篷的橛子钉穿他的太阳穴（《士师记》4：22）。

图13　《女仆的故事》中司令与奥弗莱德的危险相遇

在《女仆的故事》中也有与此相呼应的情节。奥弗莱德在中校的房间里和他接吻（这种事被严格禁止且易于败坏名声）后，盘算着从

卫生间的水箱里取出利器，继而“将那锋利的尖刀突然刺进他的肋骨之间。我想象着血从他体内涌出来，热乎乎地像精液，流到我手上”（阿特伍德，第150页）。这样，故事便采用了表现妇女反抗男性主宰的古老主题，并通过将这个主题置于某种未来世界的假设背景中，使古今连成一体。

在所有这类描写中，该书还直接论及《圣经》的作用。中校给家人读《圣经》，更确切地说，是读那些精挑细选且用书签标示出来的段落。

> 他走到为他预备的宽大皮椅的另一边，从口袋里取出钥匙，摸索着椅子旁边的桌子上那个装饰华丽的皮箱。他插进钥匙，打开箱子，取出《圣经》；那是一种常见的版本，封面是黑色的，页边刷成了金色。那《圣经》平常总锁着，所以仆人们无法偷走它。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设计，假如我们把手置于其上，有谁知道会导致何种结果？我们能听他阅读，但却不能阅读。我们把头都转向他，期待着，等来了我们的睡前故事……习以为常的故事，都是些平平常常的故事。上帝对亚当如何，上帝对挪亚如何。要结满果子，子孙众多，遍满全地。接着就走来那卑劣的老废物拉结和利亚。
>
> 阿特伍德，第97—99页

一如大卫·贾斯珀（David Jasper）所论，这个故事“利用了《圣经》正典的力量及其得到权威保护和被用作社会控制工具的方式。无疑，阿特伍德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揭示出不了解奠定我们文化根基的著作的危险性，这部著作迄今仍以多种隐晦的方式渗透于我们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秩序之中。基列共和国或许并非未来的国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我们自身社会梦魇似的幻象”（贾斯珀，第47—48页）。这个故事还指出，《圣经》就像“一种具有煽动性的装置：一旦弄到手，谁知道我们会怎么理解它？”它是一种潜在的颠覆性资源，需要被妥善地锁藏起来。总之，“女仆们”的经历让她们有了更多不同的故事，也为整部作品赋予一种非常不同的外观。

注释

〔1〕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小说家，192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有《威尼斯之死》（1912）、《魔山》（1924）、《约瑟和他的兄弟们》（1933）等。

〔2〕 巴赫（Bach，1685—1750）：巴洛克时代晚期德国作曲家和管风琴家，西方音乐史上最负盛名的作曲家之一，写出200多首大清唱剧（如《圣马太受难曲》，1729）、小调弥撒曲（1733—1738）、管弦乐作品（如6首《勃兰登堡协奏曲》），以及大量管风琴、拨弦古钢琴和其他独奏乐器作品。

〔3〕 弥尔顿（Milton，1608—1674）：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著名诗人，著有取材于圣经的《失乐园》（1667）、《复乐园》（1671）、《力士参孙》（1671）等。

〔4〕 布莱克（Blake，1757—1827）：英国诗人、版画家，多用神秘的象征手法表现基督教信仰，著有《天真之歌》（1789）、《耶路撒冷》（1820）等。

〔5〕《彼尔·金特》（1867）：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哲理诗剧。

〔6〕 这段引文选自《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10页。译文略有调整。

〔7〕 上阿默高（Oberammergau）：德国南部城镇，位于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慕尼黑西部偏南，因演出大型耶稣受难复活剧而闻名。

〔8〕 康塔塔（cantata）：意译为清唱剧，指用声音和器乐表现的乐段，通常由合唱、独唱和宣叙调构成。

〔9〕 宣叙调（recitative）：一种见于歌剧、清唱剧和大合唱中的音乐风格，特点是台词以有节奏的自然述说方式出现，旋律变化很小。

〔10〕 众赞歌（chorale）：路德宗独有的音乐形式，顾名思义，是在宗教仪式上由广大信徒一齐咏唱的音乐歌曲，又译为“圣咏合唱”。

〔11〕 布里顿（Britten，1913—1976）：英国作曲家，著有组歌《启迪》（1939）、歌剧《彼得·格里姆斯》（1945）和《威尼斯惨剧》（1973）等。

〔12〕 维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1893—1918）：英国诗人，其作品反映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

〔13〕 米勒迦（Michael）：《圣经》中的天使长。

〔14〕 赋格曲（fugue）：一种多韵律乐曲，由一个或多个旋律为相继进入的声部所模仿，在对位性的演奏中形成。

〔15〕 傲慢的公羊（Ram of Pride）：在这里欧文用《创世记》第22章第13节中代替以撒献祭的那只替罪羊转喻傲慢的犹太教祭司和文士们，把他们描写成致使羔羊（指耶稣）被杀的祸根。

〔16〕 乔托（Giotto，1267—1337）：意大利佛罗伦萨画家、建筑师和雕塑

家，其绘画从拜占庭的形式化风格转向对人类表情和动作之更自然的表现，代表作有教堂壁画《圣方济各》等。

〔17〕 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1475—1564）：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代表作有大理石雕像《大卫》（1501）、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画等。

〔18〕 多那太罗（Donatello，1386—1466）：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佛罗伦萨雕塑家，精通人体结构，代表作有《大卫》、《格达梅拉骑士像》等。

〔19〕 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意大利佛罗伦萨画家，精通直线透视法及对光和影的运用，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影响深远，代表作有《逐出乐园》、《纳税钱》等。

〔20〕 格吕内瓦尔德（Grünewald，？—1528）：德国画家，擅长运用鲜明的色彩和夸张的形象表现耶稣受难，代表作为《伊森海姆祭坛画》。

〔21〕 在新标准修订版中，实际引文应为《马太福音》27：51—52，60。

〔22〕 费里尼（Fellini，1920—1993）：意大利电影制片人，擅长借助幻想场面讽刺社会弊端，名片有《甜蜜的生活》（1960）、《阿马尔德》（1973）等。

〔23〕 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1918—2007）：瑞典导演，擅长运用慢节奏的情节、简洁的对话和象征手法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名片有《沉默》（1963）、《芬尼和亚历山大》（1983）等。

〔24〕 在新标准修订版中，实际出处应为《创世记》30：1—8。

〔25〕 此节转引自张久宣译《圣经后典》，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8页。译文有所改动。

〔26〕 在新标准修订版中，实际出处应为13：6—8。

第八章

《圣经》与政治

《旧约》即希伯来《圣经》的叙事、律法和先知预言至少使一件事清楚无误，这便是在它们的作者看来，上帝的意志及其对子民的教诲囊括了整个人生。在摩西、亚伦（Aaron）一类首领或后世历代诸王的治理下，民众的行为只能由上帝的律法来裁定。他们将自身的存在归功于上帝子民的身份：倘若持守律法，上帝就会守护并眷顾他们；一旦背弃律法，上帝则会给他们带来报应、放逐和奴役。《新约》则传递了一条不那么明确的信息，即其主要人物耶稣倡导一种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非世俗的或乌托邦式的伦理观：勿抗恶，爱仇敌，莫起誓。他的一些言论可以用来明确区分宗教领域和世俗领域："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马太福音》22：21）；"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保罗勉励他的罗马受信人顺从当权者（《罗马书》13：1）[1]，而他本人却与当时的民事权力机构发生了冲突。在《启示录》中罗马被形容为巴比伦的淫妇，预言家盼望着它的毁灭和上帝的统治将达于整个世界的那一刻（《启示录》17：1—6）[2]。有时，《新约》中勾勒的伦理观似乎仅仅适用于一种世界，这种世界只有在现在的世俗统治者被推翻、一个新天新地得以建立之时才会出现；在另一些地方，尽管仍聚焦于天国的事务，但《新约》似乎更关注使世俗世界在适当的范围内运作。

> "当人们主张不可将宗教和政治混为一谈时，我不明白他们正读的是哪部《圣经》。"
>
> 德斯蒙德·图图，基督救助会公告

考虑到《圣经》文本包含了如此复杂的信息，其中部分还自相矛盾，我们便可料到，《圣经》文本的运用和影响也存在着类似的多样性。在本书前面部分我们对此已有所了解。殖民者的解读能证明基督徒对拉丁美洲和非洲土地的占领、对土著居民的征服甚至灭绝皆属正

当。另一方面，同一部《圣经》又能成为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的有力工具。我们在本章将考察政治生活的另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圣经》影响到了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的形成，并进而考察由此产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圣经》与政治权威

芬兰学者海基·雷伊塞宁（Heikki Räisänen）曾声称，《罗马书》第13章第1节（“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是《圣经》中影响最大的单节经文。可能真是如此。诉诸这样一条经文，即使是最不公正、最冷酷无情的政权也能找到一把保护伞，获得神学上的尊贵地位和权威性，因而这类诉求也就屡见不鲜。对此主题的经典论述之一是路德的《世俗权威：它应被顺服的程度》。该书出版于宗教改革初期（1523），试图对君主的权威和职责作出界定。虽然该书为君主的权威提出了一些正面的理由，但其基调却是批判性的，强调了“他们（君主们）应放弃和不应为之的事”（迪伦伯格，第365页）。

路德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指出，君主确实由上帝授权去履行他们的职责，其职责包括追捕作恶者，并处之以极刑。“我们必须牢固地确立世俗法和判决权，无人怀疑此乃上帝在这个俗世上的意志和命令”（迪伦伯格，第366页）。他援引《罗马书》第13章第1至2节和《彼得前书》第2章第13至14节的内容，以证明世俗统治者拥有神授的权力；并引用一系列经文证明世俗统治者使用死刑的合理性，包括《创世记》第4章14至15节、第9章第6节；《出埃及记》第21章第14节以及第23至31节；《马太福音》第26章第52节；《路加福音》第3章第14节，以及《彼得前书》第2章第14节。

截至目前，一切尚可。但路德还意识到另有一些经文似乎与上述观点相抵触，如《出埃及记》第21章第23至25节称：“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耶稣登山训众时引用了这段话，却显然

予以了驳斥："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5：38—39）。如何协调这些彼此对立的论述？早期解经家区分了适用于一般基督徒的规则和仅适用于高级或完美基督徒的福音劝谕[3]，企图以此来协调《圣经》文本中的矛盾论述。路德不赞成这么做，因为这会破坏他理解的《马太福音》第5章第38至39节中的字面含义，他认为这是耶稣的训令。耶稣肯定要求人们勿抗恶，但勿抗恶的是哪些人？

路德试图区分两种"王国"，进而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把亚当的所有后代分成两类人，第一类属于上帝之国，第二类属于世俗之国"（迪伦伯格，第368页）。耶稣的训令是针对基督徒的，也将由他们逐字恪守：即使在可望得到法庭帮助时，基督徒也不应追求自己的权利。这样的人不需要"世俗律法和判决权"。另一方面，统治者有责任约束恶人，帮助那些被冤屈的人获得补偿。"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义的人设立的"（《提摩太前书》1：9）。这两种王国"必须被明确区分开来，二者都可以保持不变：一种是成就敬虔的，另一种将带来外在的和平并预防犯罪；任何一种离开了另一种，都不足以在世间存留"（迪伦伯格，第371页）。

这种教义（与奥古斯丁［Augustine］对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的对照不无相似之处）对现代欧洲的形成产生过巨大影响。它对教会和国家各自势力范围的明确划分有助于促成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这种和平共处通常表现为一种为双方都带来便利的结盟关系。教会为国家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而国家以其世俗权力巩固教会的权威性，双方互不干涉对方事务。在德国第三帝国[4]时期，这种"王位与圣坛"的结盟使许多路德宗信徒接受纳粹的统治，以致出现"德国基督徒"与纳粹主义的结盟。然而，对于那些拒不接受纳粹统治的信徒来说，这一教义则造成不易克服的困难。在何种程度上他们能够——确实也应该——不仅干涉国家的运作，而且同时还要为推翻某种暴君政权而积极工作？路德宗神学家迪特里希·朋谔斐尔（Dietrich Bonhoeffer）参与了用炸弹袭击希特勒的计划，并在计划失败后献出

了他的生命。

这种国家和教会的分立对路德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分立提供了一种明确的神学定位，能防止信仰性事务受到世俗的干涉。如果天主教当权者寻求向其同宗的福音派信徒强制推行以教皇为最高首脑的制度，路德就会谴责说这样做僭越了他们的世俗权力。但是，倘若统治者要求信徒在世俗领域里做一些错事，又该如何呢？

> “其民众难道一定要追随他吗？我回答，不，因为人的本分不是做错事；我们应当顺从热望公义的上帝，而不顺从人（《使徒行传》5：29）。当臣民不知君主对错时，应当怎么办呢？我说，既然他们无法知道，又不能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找出答案，或许就该听从他们的君主，这样做并不会危害到他们的灵魂”。
>
> 迪伦伯格，第399页

无需什么想象力就可以看出，这样一种陈述既能激发出勇敢的抵抗行为（就此而言路德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范例），又提供了妥协和思想控制的依据。那些不愿冒险对抗君主意志的人会援引完全无知的原则；统治者则会诉诸原罪教义并宣称，罪已严重蒙蔽了臣民的心，以致他们根本不可能辨明君主的对错。由莱辛出版的一个赖马鲁斯著作选篇（参见第五章）《来自神职人员的理性谴责》——部分以经书为依据，部分以理性为依据——严厉抨击了这种独裁专制和以神学诋毁理性的同流合污。但是18世纪中叶教会与国家结盟而形成的权力依然强大，赖马鲁斯不愿出版自己的手稿，而把它安全地收藏起来，以免他本人被拘禁，家庭遭羞辱。

对国家的忠诚：发誓言和服兵役

并非所有宗教改革者都乐意像路德那样在世俗王国和精神王国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再洗礼派信徒 [5] 及极端改教运动传统中的另一些成员相信，耶稣登山训众（《马太福音》5—7）中的诫命，尤其那些以耶稣格言反驳律法书格言的段落（《马太福音》5：21—48中

的“直接对比句”[6]），能被用作整个人类社会的指针。他们辩称旧的律法已被取代，耶稣已经前来宣告新的律法，那新律法将开创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他们非常直接地将此见解付诸实施，如回避炫人眼目的服饰和财富，拒绝在法庭上起誓，拒绝服兵役或自我保护[7]。瑞士圣加伦城的市民拆掉城门，宁愿相信上帝能守护他们免受攻击。倘若人们觉得其做法不可思议，令人费解，他们会回答：

> 凡是以为上帝之命难以履行的人，都是不爱上帝，不了解上帝，不知道他是何等良善……只是对于那些从未背负过的人，上帝之约及其圣子之轭才是沉重的……选民在上帝的葡萄园里工作得越多，劳累得越少；对上帝的选民来说，甚至那工作就是休息。
>
> 汉斯·登克（Hans Denck），引自卢兹（Luz），第55页

这种对上帝律法良善的完全信任和按律法字面意义付诸实践的意志，与一种传教激情合为一体。那些认为动用誓约和武力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必要手段的人从福音派伦理观的狂热拥护者身上看到一种对公民社会稳定性的可怕威胁，并以严厉的手段对付他们。然而，这几乎不可能消除他们的激情。

有人尝试在公民社会中实践耶稣登山训众的教义，这方面一个最有趣的例子就是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8]信徒。不同于路德，他们不同意“将亚当的子孙分成两类”，一类属于上帝之国，另一类属于世俗之国；而信奉“所有人都受到基督圣光的启迪”，就如乔治·福克斯[9]基于本人的宗教启示体验和《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10]所提出的教义那样。因此，至少在理论上存在两种律法是无可非议的，一种适用于基督徒，另一种适用于世俗之民。而且，和再洗礼派信徒一样，他们也是根据字面意义来解释登山训众中的诫命，因此，他们拒绝服兵役和发誓言。

福克斯对起誓的看法是很清楚的：“要留心向人们起誓，因为我们的主和老师基督说过：‘什么誓都不可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11]”。那将真理赐予

所有人并使他们为之作见证的是“照亮一切人的光”，而誓言不过是“闲言碎语”，人们到审判日才会应答。《旧约》对起誓的规定是专门针对犹太人的，不能用以反对耶稣和雅各之言，因为他们禁止所有起誓。1656年福克斯由于提倡这种观点而被送上了法庭，但到1689年，贵格会信徒获准“在全能的上帝面前”简要作证，但不准在刑事案件中作证，不准当陪审员，也不准担任公职。

1682年，在威廉·佩恩〔12〕的领导下建立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同年一条法律出台，规定人们作证时必须“庄重地承诺，所说属实，无一缺漏，全部属实”。但问题依然存在，首先，此地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上述规定有可能与英国的法律相抵触。其次，此地还吸引了一些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他们对不按传统做法起誓的证人和陪审团成员不放心。在历经诸多磨合之后，终于达成妥协，国王允准贵格会信徒在刑事案件中作证，可以担任无涉上帝的公职，但其他人员仍需起誓，誓词由相应的官员安排。这样做的后果是，贵格会信徒不能担任一些公职，最重要的是，不能担任地方行政官员和法官。

更严峻的考验是解决服兵役的问题，因为贵格会信徒都奉行和平主义。乔治·福克斯拒绝为联邦而战，不愿参加反查尔斯·斯图亚特（Charles Stuart）的战争，其立场是严格基于《圣经》文本的：

> “我们爱好和平，寻求和平、美德和所有人的福祉……因为基督说过，‘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所以他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13〕这是圣徒们的信念和耐心，去支撑和忍受所有的事，晓得报应在主，他必报复那些伤害其子民、毁谤无辜者的人；故此我们不能复仇，却要为了他名字的缘故而忍受。”
>
> 布尔斯廷（Boorstin），第48—49页

虽然在贵格会信徒们看来，他们似乎已逃离了英格兰，来到了一块能过自由安宁的生活、不再受英国国王的政治军事野心侵扰的土地，但殖民地的地位却使他们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于是，他们又卷入了一系列对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战争，但在南北殖民地的保护

下，他们大体上避免了这两个方向英王敌人的攻击。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受彼此势不两立的殖民者压榨的印地安人向宾夕法尼亚发动了战争攻势。1755年，西部边界的定居者备受印地安人和弗兰克林（Franklin）的折磨——后者当时是议会中折衷党的首领——这使他们发动舆论，支持组建必要的军队来保卫殖民地。1756年总督和管委会向特拉华和施瓦尼的印地安人宣战。宾夕法尼亚议会中的贵格会多数派全体辞职。

从这段历史汲取经验教训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以上论述我主要依据了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的资料，他痛惜贵格会信徒对自身动机和行为纯洁性的关注，并相信只要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愿意妥协，就能既保住权力，又能对随后美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这绝非不公之见，但真符合实情吗？我们很难知道一个始终忠实于自身原则的和平主义者能在何处妥协。这可能是英格兰贵格会伙伴们的言外之意，他们要求美国的贵格会信徒不要动摇。这是一群向往和平的人士，倘若他们拿起了武器，就会失去原有的身份，无法再做他们曾经能够作出的那种见证。毕竟，他们已着手建立一个把这种原则当作公共政策来遵守的社会。然而，他们的事务从没有完全操控在他们自己手中，就像在有关发誓的争论中所表现的。英帝国的野心卷入了宾夕法尼亚所发生的事务中；那些前往殖民地生活的其他人也许会对应当怎样对待那些掠夺他们定居点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简言之，贵格会信徒欲将其原则化为公众政策的企图忽视了平衡不同（有时难免是彼此冲突）原则的需要。结果他们成为一种边缘的、先知式的群体，愿意以其生命证实战争和强权的残暴。这种做法不可能引出像路德教义所催生的那种长治久安的国体。但在那种严格区分精神王国和世俗王国伦理观的努力被质疑了很久之后，贵格会信徒可能通过拒绝放弃上述原则应该影响公众生活的主张而作出持续不断的贡献。

性别政治

我们刚刚探讨过的历史都与将福音书中的训谕转化为世俗社会的指导原则方面的努力有关。无论路德还是再洗礼派信徒或贵格会信徒，其不足之处都在于他们相信，这种转化过程会相对直接和容易，就像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那样简单。但在16和17（或18）世纪，要将福音书和保罗书信中的格言警句落实到社会政治现实中显然还要做更多的事。它需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状况：就路德而言，需要注意到德国君主间的权力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利害冲突（路德确实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没有认识到这一情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经书的解读）；就贵格会信徒而论，则需要注意到英王的干涉及其帝国扩张的野心。

最后，我想讨论一个引起了更多争议的话题，涉及当代社会是否应该落实《圣经》训谕，即性别政治的问题。许多人都明确地意识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既需要我们对《圣经》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又需要在经卷和当代现实之间建立一种富于批判性和创造性的互动关系。

简言之，《圣经》中有许多明显属于父权制观念的内容，要求妇女顺从男人，将男性的地位置于女性之上。我们已注意到了前面两个有关创世的故事中所表现的对待女人的态度。《新约》的一些教诲要求妇女在教会中闭口不言（《哥林多前书》14：34[14]），妻子凡事皆须顺从丈夫（《以弗所书》5：21—33[15]）。千百年来，诸如此类的言论被教会采纳，并被融入到教会生活中；直到女性主义兴起，许多妇女才意识到主流教会中没有她们的任何位置。但另一些妇女依然相信，教会和《圣经》中蕴藏着解放性的资源，能引导教会和社会接纳较多平等主义、较少等级观念的组织形式。她们是怎样发展其理论的？

首先要提到的例子是美国《旧约》学者菲莉丝·特里布尔（Phyllis Trible）一类的评论家，她们怀着极大的热情著书立说，意在使人们意识到，很多《圣经》叙事中都含有压迫人的现象。特立布尔在《文本与恐怖》中披露，一些《圣经》叙事中妇女受到了可怕的虐待。在《士师记》第11章，耶弗他（Jephthah）向上帝起誓，倘若在即将到

来的战斗中得胜，就把自己遇到的从家门出来迎接他的第一个人祭献给上帝。事实上此人竟是他的女儿，但这并未能阻止他恪守誓言。这类故事还有不少，其中一些在前面评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女仆的故事》时已有所论述。

倘若我们要想利用《圣经》来寻找父权制的替代品，那唤起对《圣经》压迫性的意识就是必须的。但《圣经》提供了哪些可资利用的资源？对此问题，让我们考察两种相当不同但却有着互补性的研究途径。伊丽莎白·许塞勒–菲奥伦扎（Elisabeth Schüssler-Fiorenza）是任教于美国的《新约》学者，她在其著作中试图重写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以表明源于耶稣的平等主义传统在那部历史中占有重要位置。耶稣论及天国时宣称拯救即将到来，这种新型拯救其实已象征性地体现在他的餐宴之中："这是一种婚宴式的节日聚餐，而非'圣人'的禁欲苦行，耶稣及其传教运动的特征由此可见……耶稣的核心期望不是被选者的圣洁性，而是'所有人'的完整性"（许塞勒–菲奥伦扎，1983，第119、121页）。所有人中"有男人也有女人，有法利赛人也有妓女"。所以耶稣期望的是反对父权制，反对任何意在分裂统一群体、欲将一些人同另一些人对立起来的做法。在许塞勒–菲奥伦扎看来，一段关键经文是《加拉太书》第3章第28节："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同样重要的是那种废除父权制家族关系而支持"门徒皆有平等身份"的福音书传统："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马可福音》3：35）。因此，应摒弃所有的头衔和教内的等级差异："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马太福音》23：9—10）（许塞勒–菲奥伦扎，1993，第176—177页）。此外，这种平等主义特质还表现在早期基督徒传教的历史中，其间妇女发挥了和男人完全一样的作用。

就像《新约》作品本身所表明的那样，这种传统并不是没有受到质疑。人们从中能看出这么一种倾向，即隐瞒有关妇女在最早基督教社群中的作用和父权制化在第二代和第三代社群中不断增长的证据。

于是，从福音书中能看到确凿的证据，表明“使徒身份一律平等”，妇女在一些关键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一直留守在十字架跟前，成为耶稣复活的最初目击者（《约翰福音》20：11—18）。然而，通常被视为最同情妇女的《路加福音》却把妇女排除在目击者之外：唯有使徒看到了复活后的耶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至8节中列举出一个很长的名单，说他们都是可信的目击者，能证明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但即使此处也未明确提到妇女）；而路加却未描写耶稣复活后向任何妇女显现，相反他强调了向彼得的显现。许塞勒–菲奥伦扎相信，这种对彼得的强调必需置于“早期基督徒有关是彼得还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有资格成为第一个复活见证人的讨论这一背景下来考虑”（许塞勒–菲奥伦扎，1993，第164页）。

许塞勒–菲奥伦扎在《纪念她》中称其工作为“对基督教起源的女性主义神学重构”，旨在复原被《新约》的父权制倾向和教会后来的编史原则遮蔽的基督教起源史。“这种重构之所以是神学的，是因为它寻求耶稣和早期基督徒的核心神学见解；之所以是女性主义的，则是因为它对《新约》文本的批判性解读受“女性消除压迫、争取解放的斗争经验”的影响和推动（许塞勒–菲奥伦扎，1983，第32页）。这种重构没有把《新约》或者它所展示的教会面貌看成是教会生活理想形式的永恒范式，而仅将其看成一种原型，这种原型“有选择地接受自身转型的可能性”（第33页）。

另一些女性主义作家则把《圣经》及其故事、意象、隐喻，连同各种女性的写作，都当成重塑教会传统的想象性资源。英国天主教神学家玛丽·格蕾（Mary Grey）在《超越暗夜》中运用了一系列意象，意在创设一种出现于“暗夜”之中并最终穿越了“暗夜”的教会新形式。在一个论述旅行的章节中，她探讨了一种“逃离压迫、漂流旷野——同时历经上帝以某种方式的在场——而盼望抵达应许之地的浓缩式象征”（格蕾，第48页）。这种对象征和创造性想象的运用是“摆脱基督教生存疏离形式旅行中一种至关重要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放逐的意象或许比出走的意象更具有吸引力。玛丽·格蕾所倡导的不是从教会出走，而是将“出走”的象征转化成从“疏离关系”中出走的象征。

一种使大多数派别的信徒都不能上圣餐桌的圣餐生活有使人疏离圣餐的危险……一种使大多数人都成为性变态的性学神学是一种使人疏离的性学……把权力、神职和权威看成是使朝圣者失去权力、消极被动的理解均属于被疏离的理解。

格蕾，第50页

在此，《圣经》的意象被置于特定的情景之中：《圣经》的形象和象征被随意利用，在面临可能切断和破坏人类关系的教会和社群中的疏离力量时，寻求整全和包容。人们在求助《圣经》时，不是把它当作一套规范来运用，而是当作一种能为人们的生命体验赋予形式和结构的想象性资源，可以自由地、有选择地运用。

作为政治权威的《圣经》

无疑，这种对《圣经》在政治中应用的概述并不完全，本来还可以涵盖公众政策中的许多其他议题，如福利工作、蓄奴制、经济学、遗传学、医学等。考虑到在过去两千年中的大多数时候，《圣经》在欧洲史中都有重要的地位和权威，出现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惊奇。无视支撑或反对其意识形态基础的政治家就很难算是真正的政治家。

即使在这样一种概述中，互相冲突的运用《圣经》的方式也很容易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路德和主流教派的改革家们用《圣经》来证明使用武力的合理性，清楚区分支配世俗社会的法律和仅用于基督徒的耶稣登山训众的教义。另一方面，那些坚持认为耶稣的训诲应在国家生活中付诸实践的人又不得不面对实际操作的困难，这种困难表现为把一般的原则施用于特定社群的体制和立法中，而这些社群面临着各不相同的情况和危险。然而，无论对《圣经》所要传递的信息的本质有多么不同的见解，论辩双方都认为，《圣经》这部书给教会和社会传递的信息是前后连贯一致的。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圣经》中有大量无法为人接受的内容，真正

的任务在于发现那些能为寻求一个新教会和新社会提供资源的元素。发现的过程最终应由妇女斗争的经验来支配。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可以想出不同的策略，将那些更具创造性的资源从其他成分中提炼出来。对一些人来说，历史批评能使之辨明传统中那些几乎被后来的意识形态偏见弄模糊的成分；对另一些人来说，正是将《圣经》的形象和象征重新置于特定的语境中才有助于实现想象性飞越；借助于这种想象性飞跃，人生和社群的新形式才得以从《圣经》传统中浮现出来。回到前面的讨论，我们从中或许能发现，有两种相当不同的正典观在发挥着作用。第一种正典观认为正典是规范性的，只是这种规范性首先是通过历史洞察力发现文本中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因素来确定的。第二种正典观认为《圣经》正典的权威性首先且最重要在于其塑造性，它所提供的工具和意象既能奴役人，也能解放人。洞察力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检验的方式却是实践性的而非历史性的。

注释

〔1〕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2〕“……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3〕 福音劝谕（counsels of perfection）：意指基督于福音圣训中，除命令世人严格遵守十诫外，也奉劝世人更上一层楼，修炼贫穷、贞洁、服从三美德。

〔4〕 第三帝国（Third Reich）：从1933到1945年由希特勒执政的德国政权。

〔5〕 再洗礼派信徒（Anabaptist）：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激进派成员，信奉《圣经》的权威性，认为洗礼是信徒承诺个人内心信仰的外部证明，主张政教分离、信徒与非信徒分离。

〔6〕 “直接对比句”（antithesis）指在一个句子中，其前面和后面的语词或分句能形成直接的对比。例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43—45）。

〔7〕 “回避炫人眼目的服饰和财富”回应了耶稣之言“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马太福音》6：25，19）；“拒绝在法庭上起誓”回应了耶稣之言“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5：34）；“拒绝服兵役

或自我保护”回应了耶稣之言“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5：39，44）。

〔8〕 贵格会（Quakers）：亦称“公谊会”，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17世纪中叶由英国人福克斯创立。属于基督教属灵派别，强调信徒与上帝直接相通，领受圣灵的启示。

〔9〕 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英国基督教领袖，贵格会或公谊会的创建者（1647—1648）。

〔10〕 《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是“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11〕 本节引文出自《马太福音》第5章第34，37节。

〔12〕 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英国基督教贵格会信徒，北美殖民者。

〔13〕 引自《约翰福音》第18章第36节；《马太福音》第26章第52节。

〔14〕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她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

〔15〕“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第九章

结　语

我希望这部有关《圣经》及其应用的简短小书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人们解读和运用《圣经》的多种方式。《圣经》为人类思想、文学和艺术中某些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作品提供了灵感，同时也滋生了人类某些最恶劣的野蛮、自私和偏狭。《圣经》激发过世间男女的勇敢和奉献行为，鼓励他们为解放和人类的发展而奋斗；同时也为那种奴役同胞、使他们陷于卑贱和贫困的社会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圣经》是基督教实现伟大复兴的根基，最近的复兴体现在基督教在非洲和亚洲的迅速成长上。最重要的或许是，它提供了某种宗教和道德规范的来源，使不同的人群能实现联合，相互关照，彼此保护；而恰恰是这种强烈的归属感，又反过来激起民族的、种族的和国际性的紧张和冲突。

也就是说，《圣经》既是真善美的源泉，同时又曾引起假恶丑的现象。它未曾产出的是某种一成不变的阅读和阐释方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复杂：文本无力控制它被阅读的方式。罗伯特·摩根（Robert Morgan）说过："文本如同死者，没有任何权利"（摩根，第7页）。提出不同阅读方式的是读者或读者群。阅读方式的多样性和阅读群体的多样性是成正比的。

然而，这种多样性却不应仅仅归结为读者的多样性。《圣经》材料的丰富性，编撰过程的复杂性，隐喻、诗歌、叙事和论述的多样性，都使我们难以指望这部著作只有一种无可争议的阅读方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圣经》的诸多读者皆有大量可供选择的材料，也有足够多的机会去强调各不相同的方面。

《圣经》材料的多样性自然是宗教社群领袖所关注的对象，他们从其神圣作品中发现了宗教道德规范和启示性真理的源泉。正典化过程，即确立一批公认的具有权威性的篇目，排除那些不具权威性篇目的过程，其目的之一就是在社群内部限制信仰的多样性，防止偏离正统的立场。在基督教内部，《新约》卷籍第二正典的创作体现出进一步确定并限制阅读《圣经》方式的尝试：《旧约》须从《新约》的角度阅读，同样，因为与《旧约》相关，《新约》也将获得一系列特殊

的含义。

而且，一旦正典的边界确定下来，其中的篇目就再也不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阅读，至少在那些接受这些篇目为正典的社群中是如此。因为它们现在已成为一部权威性文集的组成部分，已被宣称为是上帝的话语，对其中可容忍的观点的多样性必须有所限制。文本一旦被正典化，信奉者的期待值就会高涨，读者对它们就须按一种“宽容原则”来阅读。这种原则要求我们在解读文本时，不仅要让文本有意义（即便其中的某些部分可能显得含义模糊且不可理解），而且还要能够解释文本中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重新阐释一些原本看似违背正典总体教义的段落。

但事实却是，就处理宗教中偏离常规的现象而言，将神圣作品正典化只是一种难以驾驭的工具。新教教会的多样性（它们都承认同一部正典）足以证明此点。倘若在一个既定社群内，要使诠释《圣经》有某种连贯性，使其在这同一团体内就有某种稳定性，就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策略。这一点或许能以不同的方式实现。首先，必须限制接触圣书的渠道，只有那些拥有必要的释经技巧和资格、能够确保诠释方式的统一性和连贯性的读者才能被允许解读《圣经》。在犹太教中这种角色落在学者或拉比身上；在基督教中则落在神职人员身上，他们在主教或其他教会领袖的权威领导下展开工作。

这些诠释者的任务，部分是制定诠释规则，部分是提出一种解读方式，使文本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又能与社群的规范达成一致。对于《圣经》所包含的那样一批复杂多样的神圣文本来说，完成这一任务不仅要想出一些策略来调和那些最明显的含义与社群核心信仰明显背离的段落，而且要突出重点——把某些经文放在显要的位置，同时使另一些经文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关键是要通过使用一些像寓意解经法之类的技巧，赋予某些字面意义上就缺乏教益或明显与社群信仰规范矛盾的文本以意义。《圣经》诠释史为那些寻找富于智慧和想象力的释经实例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在这些规则和诠释行为中仍保留了一定程度多样性阅读的空间，诠释者可以在文本与其读者的经验之间建立联系，而且如前所述，允

许这种经验影响他们对文本的重述。有商讨和争辩的空间，也有导致真正分裂的成分。中世纪教会通过高水准的综合性控制——神学和政治的控制——成功地容纳了阐释的多样性，并允许神学见解、生活模式和宗教修道会间存在差异。此外还有赖于无情压制那些被视为离经叛道的人，像犹太人、清洁派信徒[1]和胡斯[2]派信徒，或使之边缘化。当然，教会里肯定还会有离经叛道者，其中就有破坏了教会统一性的奥古斯丁派托钵修会修士[3]马丁·路德。

路德对教会的圣礼秩序及其神职人员完全控制上帝恩典分配权的抨击，皆属从教会内部发起的抨击。这种抨击基于路德对保罗书信有关因信称义的阐释，并有赖于对这些文本的严格文法阅读，而中世纪后期教会的阐释规则和实践完全允许这种做法。路德本人是一名合格的《圣经》教师，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反常的行为在教会内部就可以解决。但一系列因素使他的抨击具有了致命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印刷术的发明使他的见解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与此同时，他（及另一些人）将《圣经》译成本民族语言，为普通民众接近经文提供了多种渠道；而在此之前，读经的权利大半还被神职人员所把持。神职人员的垄断被打破了，此后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诠释者。

随后，出现了大量对《圣经》的新式解读以及表达宗教敬虔的新形式和新的人生模式，仅用“改革”来描述这些现象是不够的，宗教改革家可能用下面这些措词来形容它们：如同那些阅读并遵从《圣经》字面意义的人所得到的启示那样，回归教会本真的形式。事实上，已经发生之事更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风一旦吹出来，就无法把它收回去。古老的《圣经》解读模式依然有其地位，同时各种新的解读范式也比肩而立。新的宗教社群在欧洲各地相继涌现，又从那里扩展到全世界。这是一个伟大的再生年代，充满了勃勃生机，但相应地也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和反责。16世纪上半叶，欧洲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宗教战争的战火中。然而《圣经》竟能超越这种冲突，继续为人们提供生存的基础，并且一如前述，已扎根于世界各地的社群之中，甚至包括那些经受过以《圣经》为名的虐待的群体。看来解读的多样性将会一直存在。

一个16世纪的天主教学者以如下言辞嘲笑“每个人都可以是他或她自己的诠释者”的新教原则（与天主教“唯有教会会议确立的教会传统才是《圣经》的真正诠释者”的看法针锋相对）：[4]

“这位《圣经》专家是一个单独的人，而教会会议的教父们可以是任何数目的人。这位《圣经》专家是一只羊……而教会会议的教父们是牧师和主教。这位《圣经》专家自我祷告，而教会会议的教父们为出现在教会会议上的所有人祷告，其实是在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祷告……这位《圣经》专家可能是个未受教育的妇女，而他们……都是基督教世界最有学问的男子。”

瓦勒连努斯·玛格尼（Valerianus Magni）：《非天主教信仰准则评估》，引自施尔德，第18页

当然，迄今仍有人相信这样的发展是可以逆转的。还有人相信，他们的社群依然拥有正确释经的诀窍。这种诀窍要么是某种可靠的教诲性仪式[5]，要么是某种能检验真正文本解读的神学准则或信条，要么是某种能传递经文原初单一含义的历史方法。

运用这些神学诀窍的困难在于，它们要么过于具体，与某个特定的社群有过于密切的关系，以致在解决社群之间的争论时不易发挥作用；要么过于笼统宽泛，以致无法处理具体的差异。例如，倘若某个特定教会坚持宗教改革的某一信条为其“次要的信仰准则”[6]，这就使它能在解决内部有关《圣经》阐释适当性的争端时作出裁决，但却不能解决教派之间的分歧，因为正是那种不同信条之间的分歧有待解决。另一方面，倘若有人提出某种更具一般性的阐释原则，比如说所有阐释都应处于广义的三位一体视域之内，就只能生成一套相对缺乏说服力的规则，借助于它，只能裁决基督教内部的不同阐释。当然，这依旧是过于专门的基督教阐释，在解决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时仍起不了多大作用。

另一种办法就是尝试找出某种明显中立的诠释方法，无论各自的

文化立场如何，所有人都能使用。在许多人看来，历史批评方法似乎是最有希望的备选项。正如路德通过追问“使徒想干什么”来解决对《罗马书》中一段经文含义的争论一样，人们可以通过探询作者写作的最初含义，寻求对其他争议的解决途径。但这一提议也有不少问题。首先，作者意图是否真能解决要求处理的问题就值得怀疑。作者意图真有那么清楚明白吗？当T.S.艾略特〔7〕被问及对他诗歌的一段解释与其初衷是否一致时，他回答说：“我的初衷就是我所写的。”其次，或许更成问题的是，史学家难免受到自身观察视角的影响。这部分与他们在特定阅读传统中所处位置、传统的知识主体、文化信念和立场有关；部分与他们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趣味、偏好和成见有关。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史学家的判断，导致他们采用多种多样的解读。不明白这一点，作为史学家，对历史上的多样化解读（由一流学者提出的）就会茫然无知。这并不意味着求助于历史辨析就毫无用处，也不代表我们从这种文本探询中将一无所获，但这确实表明，借助于这种论证方法，我们几乎不大可能解决各种争论。

所以，《圣经》的读者也许必须正视如下事实：《圣经》拥有产生各种意义的巨大潜力。读者们或许不应将此事实视为《圣经》的缺点，而应把它看成是《圣经》力量之所在。这一点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它首先意味着《圣经》对任何社群的规范功能遭到了重大削弱。倘若《圣经》被认定本来就可能拥有多种含义，那它作为行为规范甚或信仰守则的用途就会受限。难道事实不总是如此吗？犹太教徒用《塔木德》〔8〕来裁决有关实践和信仰的事务，基督徒求助于某些信条或主教特别会议的教规来处理他们的事务，这些都足以表明：事实上，人们一直都承认《圣经》的内容要么过于丰富多样，要么过于晦涩不明，根本无法胜任拿破仑法典〔9〕所能承担的工作。

另一方面，认识到《圣经》具有产生不同意义的潜力并不意味着《圣经》对其他事物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力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被削弱。我们论证的全部要点就在于表明，《圣经》在很多社群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并非不存在危险。正如造就了一大批改革家、致力于解放运动的政治家和和平缔造者一样，《圣

经》也导致了某些深具压迫性的殖民者社群的形成。

这一事实的真正意味是，我们必须学会更具批判性地阅读《圣经》。我们必须更好地适应《圣经》文本中各种不同的声音。同样，我们还需要意识到使用《圣经》的不同方式，并学着鉴别这些不同的使用方式。

在这些任务中，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各种解读方法都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通过辨析文本中的不同倾向和影响，宗教史家能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圣经》的复杂性。许塞勒–菲奥伦扎对《路加福音》中的父权制倾向的分析使我们注意到了某些传统在《圣经》中——无疑也在随后的《圣经》解读中——是如何被边缘化的。她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听到我们可能忽略的声音。与此类似，玛丽·格蕾对旷野主题的想象性运用能鼓舞人们在教会摆脱父权制后的困境中生存下来，并发现更加人道、更加一体化的集体生存模式。

读者将再度被所属社群的规范和阐释惯例所引导。那些基督教社群中的信徒将深受基督教正典形式的影响。正如我们从德斯蒙德·图图对拿伯故事的解读中所看到的，它那《新约》与《旧约》相互贯通的背景创造了一种强有力的神学架构，使读者得以在此架构中解读文本。

即便如此，读者们也必须在这种解读方法产生的不同阐释之间作出自己的判断。就此而言，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将不得不依靠自身的道德资源。但这不仅仅是个人对《圣经》文本加以判断的过程，因为阅读的过程更为复杂。根本原因在于，阅读行为不可能孤立地发生，读者皆属于某个社群，这些社群受《圣经》文本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培养自身的道德意识。因此，善于思考的读者总是以《圣经》文本和自己的经验，一如我们在诸多事例中所看到的那样，来检验那些继承而得的道德感。这一过程将延伸还是被打断呢？从某种特定的视角进行的解读还可能有其他的意义吗？这种意义能让人走出僵局，为日益枯竭或（更糟地）正导致压迫和自我欺骗的传统带来新生吗？

另外，在此过程中读者不能仅仅依赖他们继承的价值观。随着学会辨析文本中的不同声音、不同的阅读方式和文本的不同架构，读者

的道德宗教想象力和判断力都会受到影响，变得更为敏锐。有慎思明辨和全神贯注的解读出现的地方，集体的传统就会得到支持和发展，并保持勃勃生机；在缺乏这种解读或这种解读被边缘化了的地方，传统也会衰落。但即使这样，也并非所有的传统都丧失殆尽，因为历史上总有道德楷模和先知式的人物出现，他们深深承载着《圣经》文本中的理念和意象，能够更新他们所继承的传统或创建他们自己的新社群。

《圣经》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我们很少注意到，即其年代的久远。其中最早的材料已有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大部分内容皆有两千年的历史，而《新约》的历史也只是稍微短些。那么，这批古老的经文对于在时间上距离它如此遥远的读者来说仍有意义吗？对此，人们一次次地投去怀疑的目光。毫无疑问，倘若这批文本仅有为其最初听众承载的意义（以及被期望承载的意义），我们便大可怀疑，在一个像现在这样迥然相异的时代里，它们还会有任何前途吗？然而《圣经》的历史表明，其中的故事、意象、隐喻、道德和宗教概念已经塑造并将继续塑造世间万众的经验和理念。非洲和亚洲近年来的历史证实，《圣经》的这种能量并未消减。目前所需要的是目光敏锐的读者，关注《圣经》赋予生命力的潜能，警惕《圣经》中较为灰暗的语调。

注释

〔1〕 清洁派信徒（Cathar）：一种基督教异端派别，兴盛于12至13世纪的西欧，主张放弃禁欲主义。

〔2〕 胡斯（Huss，1372—1415）：捷克斯洛伐克宗教改革者，曾因质疑天主教会的权威性而被开除教籍。

〔3〕 托钵修会修士（friar）：一种化缘布道的天主教信徒，活跃于中世纪前期。

〔4〕 有主教等教会官员讨论教义、教会管理等问题的会议。

〔5〕 教诲性仪式（teaching office）指用来教诲信徒以求强化其信仰的宗教仪式，一般具有固定的程序，通常伴以读经、唱诗、讲道等。

〔6〕 相对于“主要的信仰准则”，即基督教所有教派都必须遵守的信仰准则（如信奉耶稣为基督、不可崇拜偶像等），“次要的信仰准则”（subordinate

standard of faith）指仅为某些教派遵守的信仰准则（如天主教信奉马利亚为圣母，新教则无此信条）。

〔7〕 T.S.艾略特（T.S.Eliot，1888—1965）：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自称在宗教上是天主教徒，政治上是保皇派，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所著《荒原》（1922）被誉为西方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1948年因《四个四重奏》获诺贝尔文学奖。

〔8〕 《塔木德》（Talmud，复数形式Talmudim）：犹太教释经大典，陆续成书于2至6世纪。系古代拉比著作的汇编，由《密西拿》和《革马拉》组成，构成正统犹太教之宗教权威的基础。

〔9〕 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eon）：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1804—1814）于1804年颁布的民法，迄今仍不失为法国民法的基础。

《圣经》是一部内容深沉、年代久远的记录。它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部分内容被译为两千多种语言，是全球最畅销的书；它影响了西方文化方方面面的发展，塑造了无数人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圣经》如此巨大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

本书从多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包括《圣经》的写作过程、不同社群和文化对《圣经》的解读、《圣经》对当代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影响、《圣经》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等。书中穿插有不少典范的《圣经》引文及其传播史上的轶事，内容精当而丰富，引领读者轻松走进《圣经》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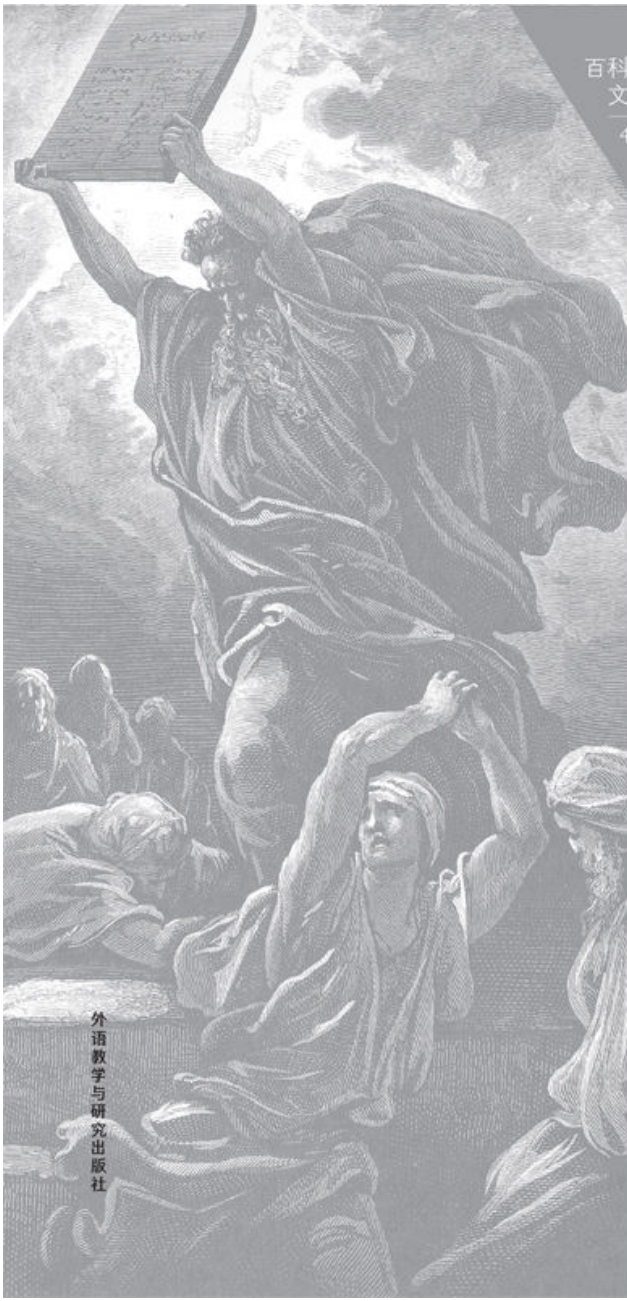

百科通识文库

49

《旧约》入门

迈克尔·库根 著

张贤勇 陆巍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旧约》入门

迈克尔·库根 著

张贤勇 陆巍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31**

The Old Testamen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8.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8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Michael Coogan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约》入门 /（英）库根（Coogan, M.）著；张贤勇，陆巍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86-1

I．①旧… II．①库… ②张… ③陆… III．①《圣经》- 研究 IV．①B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52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86-1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第一章　旧约是什么？
第二章　读经虽难，释义有道
第三章　旧约与历史
第四章　神话还是神的话？
第五章　出埃及考
第六章　“遵守我的诫命”——旧约律法
第七章　以色列——“礼仪”之邦
第八章　先知有话要说
第九章　希西家与西拿基立
第十章　诗歌体裁与神义问题
第十一章　“赞美名人”——旧约英雄儿女
第十二章　旧约的影响
大事年表
附录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迈克尔·库根，美国石山学院宗教学教授，哈佛大学闪族博物馆出版总监，美国圣经研究领军人物。著述等身，主编《新牛津注释版圣经》（第三版），同时也是《宗教百科全书》、《哈珀 - 柯林斯圣经辞典》等权威工具书的撰稿人。

译者简介

张贤勇，宗教学者，曾先后就读于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芝加哥路德神学院（LSTC）和瑞士巴塞尔大学。学成回国后就职于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现执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任哲学系副主任、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广泛，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复兴哲学、欧陆宗教神学、西学东渐等。著述颇丰，在国内为人所熟知的包括《罗马书释义》序言和《第一亚当和第二亚当》导言等等。

陆巍，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对圣经研究有浓厚的兴趣。

图目

图1　死海古卷中《以赛亚书》中的一列文字
图2　刻有祭祀文的护身符
图3　米吉多鸟瞰图
图4　站在海龙上的马尔杜克
图5　出埃及的地图
图6　刻有《汉谟拉比法典》的石柱的上端
图7　一位正在演奏手鼓的女性陶俑，公元前8世纪
图8　古代近东地图
图9　耶路撒冷地图，公元前8世纪晚期

第一章

旧约是什么？

参观过世界著名博物馆的朋友一定会注意到这样的鲜明对比：古埃及、古叙利亚、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展品往往都绚丽华美、琳琅满目，而古以色列的展品通常不起眼，常常踪迹难寻。至少在那些博物馆馆长看来，就艺术水准而言，古代以色列尚处蛮荒。埃及有陵墓神庙、巴比伦有册府芸台和金字庙塔〔1〕、波斯古都有琉璃砖瓦和宸居宫殿，而古代以色列则没有可以相提并论的事物。

然而，古代以色列却有一件作品流传至今，那就是虽然名称各异、但通常被称为《旧约》的结集文献。由于古代以色列有律法严禁造偶像，所以古代以色列人将其创造力倾注到了文学活动中。当然，在古代近东地区，文学绝非古代以色列人所独有，即便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也不例外，而且实际情形恰恰相反。但是，古以色列文学不单流传至今，更成为犹太教和基督教两教的权威经典，它带来的深刻影响和灵感启迪不仅广泽西方世界的虔信者、著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而且无远弗届。

在旧约中保存下来的古代以色列文学作品中，有无数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为后世传诵，《圣经》本身对此也有记载。透过旧约，我们也知晓了立约、戒律、选民、应许之地、君权神授等观念。许多世纪以来，这些观念对宗教信仰、社会价值和政治体制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人物和观念出现在创世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这一历史时期，那时神的种种活动得到了全盘叙述。

一些人将旧约视为古代以色列民族和早期犹太民族的文学作品选集，其范围与英国文学作品选集类似。像这些英国文学选集一样，旧约辑入的作品不仅在创作时间上早晚相差一千多年，而且同时入选的作品也诸体皆备——神话、历史叙事、先知预言〔2〕、小说、律法条例、礼仪规范、箴言谚语、赞美诗歌等，旧约中应有尽有。

这些体裁各异的作品都被整合进名为“书卷”（Books）〔3〕的更大的单元。相对来讲，这些书卷大都独立成章，但有时书卷间的分界较为模糊。例如，《士师记》的开头与《约书亚记》结尾处的叙事相连，中间并无间隔；《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

下》与《列王纪上》，以及其他一些书卷之间，也都有类似情形。此外，各书卷内部常常会出现混合文体。例如，《创世记》的历史叙事中既穿插着或长或短的诗歌，也包括律法规条和礼仪规训。现代学者还在《创世记》中发现了更多的文体，例如37–50章所载有关约瑟的传奇故事、1–11章中的神话、家谱、行程记事、各类清单、讲辞语录等等。由此可见，旧约中的许多书卷，尤其是篇幅较长者，都是各类体裁的合集。

现代学者已经公认，旧约书卷及其构成部分的成书年代并不等同于现在各书卷的编目顺序，因为它们的成书年代各异，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多年。因此，旧约与常规的文学作品选集有一处关键差别：旧约中头十多部书卷的编排顺序依据的不是这些书卷及其组成部分的成书年代，而是这些作品所叙之事的年代早晚。这就好比在编辑一本英国文学作品选集时，我们将《失乐园》放在卷首，因为尽管这部史诗是弥尔顿在17世纪创作的，但是诗中的事件却发生于世界初创之时（至少弥尔顿本人这样认为）。接下来其他作品的顺序也都以所述内容的时代背景为依据：先是古希腊，代表作如19世纪诗人丁尼生的《尤利西斯》；其次是古罗马，如16世纪晚期莎士比亚剧作《恺撒大帝》；再次为古代不列颠，如创作自不同时期的亚瑟王传说；之后为中世纪，以13世纪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为代表；以此类推。

从《创世记》到《列王纪下》，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犹太人被掳入巴比伦，旧约[4]的叙事年代顺序是一以贯之的。然而此后[5]，这种叙事年代顺序便基本废弃了，各部书卷及其构成部分时而沿用、时而跳出这个叙事框架，反复无常。一些旧约书卷的编排依据不是年代早晚，而是篇幅长短，长者在前，短者在后。其他一些宗教经籍也是如此，例如《新约》中的《保罗书信》以及《古兰经》中各章的编排都是前长后短。旧约书卷的排序有时显得随意，比如在晚古时期和中世纪的那些最古老的旧约完整抄本中，书卷的编排顺序往往五花八门。此外，不同的宗教团体排列这些书卷的顺序也不同。

更古老的书卷

旧约中偶尔会提到其他书卷。《民数记》21章14节中节选了一段被认定为出自《耶和华的战记》的诗句。《约书亚记》10章13节和《撒母耳记下》1章18节也引用过古代诗歌集《正义者之书》。《列王纪》和《历代志》各书中也随处可见类似王室官方史乘的文字，其中包括《所罗门记》、《犹大列王记》和《以色列诸王记》[6]。虽然这些古“书卷”一本都没能保存下来，但这些文字表明古以色列的文献远比旧约中选录的数量多。

人以群分，经随群定

旧约一词通常被解释为基督教圣经的第一部分。然而，在宗教研究中，实际情况往往比表象复杂得多，因此上述定义就略显含混，甚至是失当。

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时还只是犹太教中的若干支系之一，但很快就在信仰和实践上同犹太教渐行渐远，部分原因是由于后来很多非犹太人也成为了基督徒。但正如亲子关系一样，这种关联也不可能完全断裂。早期基督教作者将犹太教经籍奉为权威典籍，那时尚无“新”约，因为新约尚处在创作过程中。《提摩太后书》在提到“圣经”时，称它“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3:15–16）。此处“圣经”指犹太教的经籍，至少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它就包括了三个部分：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录。这三部分对应的希伯来文分别为*Torah*（托拉）、*Neviim*（众先知）和*Ketuvim*（作品集），这三个词的首字母拼在一起，就有了所谓的*Tanak*（“泰纳克”，亦作*Tanakh*）[7]。犹太人常用“泰纳克”来指代圣经。

托拉是第一部分。托拉一词不仅指“律法”，也指“教训”或“教导”。它包括圣经的头五卷书，起于《创世记》，结以《申命记》。

《创世记》开篇记载了创世和大洪水的经过，接着讲述古代以色列人列祖的故事，例如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利亚、拉结、悉帕、辟拉及其子女。其余的四卷书为《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它们紧接着《创世记》的叙事讲述了出埃及的故事，道出了雅各的后裔如何逃离埃及为奴之地并长途跋涉到应许之地东部边境的原委。与《创世记》中好几世代的历史相比，这四卷书记载的年代要短得多。这几卷书以主要人物摩西的生平为叙事框架：《出埃及记》第二章记载了摩西的出生，而《申命记》的结尾则描述了摩西的去世和安葬。圣经前五卷书中还穿插着数百条上帝颁布的律法，故托拉又被解释为“律法”。

犹太教圣经的第二部分是先知书，这部分又分为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前先知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这些书卷接着托拉的结尾继续叙述，讲述以色列人在迦南这一应许之地上的历史：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征服迦南，经过了混乱的以色列列王时期，最后，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以色列人的国土被巴比伦人占领。后先知书的书卷以各位先知的名字命名，其中包括三部“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之所以称为大先知书是因为这些书卷的篇幅较长；此外还有从《何西阿书》到《玛拉基书》的十二“小”先知书；又称篇幅较短的先知书。

犹太教圣经的第三部分是圣录。这部分集合了若干不同体裁的作品，相当于圣经这部大选集中的小选集。其中《诗篇》、《箴言》、《雅歌》和《耶利米哀歌》中载有不同类型的诗歌。《传道书》以及以诗歌为主体的《约伯记》中蕴含着许多对人类处境的思考。《路得记》、《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等书卷中则包含了历史小说。圣录中也有历史叙事：《历代志》上下两卷内容的年代跨度与托拉和前先知书相同，结尾记载了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之地的回归。《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讲述了之后犹太人在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

到公元1世纪末，托拉、先知书和圣录已成为古代犹太教的圣

经，它是“宗教经典”，来自于上帝的默示，因而具有特别权威。在今天的犹太人看来，这些才是圣经正宗。现代学者常用“希伯来文圣经”（Hebrew Bible）来指代这三部分经卷，一方面区别于包括新约在内的“基督教圣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公元2世纪晚期才出现的“旧约”一语似乎有贬义，暗示着犹太教经籍构成的“旧约”已然被之后的“新约”中的著述所取代。然而，“希伯来文圣经”一词本身也是误称，因为有些章节的经文并非希伯来文，而是与之相近的闪米特语系中的亚兰文[8]。

在公元1世纪晚期之前，众多犹太教团体对哪些经卷应列入圣经各持己见。当时托拉和先知书的内容已经确定，但圣录的内容仍有变动。在公元前一二世纪和公元1世纪——也就是旧约圣经时代结束之际，其他一些犹太宗教文本也已成书，而且对于某些群体来说，这些著作也都是经书。《便西拉智训》[9]就是其中之一。此书原用希伯来文撰写，于公元前200年左右成书，包含了许多箴言和诗歌。公元前2世纪晚期，便西拉之孙将其译成希腊文，并在前言中提到经文分为三部分：“律法、先知书和其他书卷”。虽然一些犹太教团体把《便西拉智训》奉为圣经，而且一直到中世纪都对其尊崇备至，但是大体而言，犹太人并未将《便西拉智训》归入“泰纳克”。

正典

正典是指列出权威书卷的正式书目，而确定圣经正典的内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到公元1世纪末，不同的犹太人团体在哪些书卷应定为圣经的问题上已经相当一致，只是对一些书卷的地位仍有争议。尽管缺乏明文记载，但我们可以从入选正典的若干标准窥见这一过程。标准之一是该书须以希伯来文（或亚兰文）撰写而成。许多被希腊世界中的犹太人视为圣经的书卷原本以希腊文撰写；或者原著为希伯来文，而广为流传的却是希腊文译本，例如《便西拉智训》。标准之二与成书年代相关：入选正典的书卷的写作年代不能迟于公元前5世纪

中叶，即以斯拉的时代，因为以斯拉是最后一位直接受上帝默示的个人。于是，犹太教的权威人士将《但以理书》等也收入正典书目，因为尽管现代学者推断此书写于公元前2世纪，但是根据书中的描述，主人公但以理，甚至还有某些章节的叙述者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其他一些被现代学者推断为以斯拉时期之后的书卷也是如此。例如《传道书》的写作年代可能不早于公元前4世纪，但它被认为是所罗门之作，而所罗门则是公元前10世纪以色列的国王；同样，《以斯帖记》很可能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但其叙事背景却是公元前5世纪初叶。而根据作者身份以及书卷内容来看，《便西拉智训》等书卷的成书年代则明显要晚得多。

虽说正典的确定还牵涉到许多其他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著作语言和年代。因此，《犹滴传》、《多比传》、《便西拉智训》、《所罗门智训》、《巴录书》、《马加比书》〔10〕以及《以斯帖补篇》和《但以理补篇》最终未能收入“泰纳克”正典中。

然而，在犹太教正典化完成之前，基督教就已经初具规模，很快，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和外邦人（Gentile）〔11〕就成为了基督徒的主体。早期的基督徒像同时代希腊化世界中的某些犹太教信徒一样，也将《便西拉智训》和《犹滴传》奉为圣经，直到欧洲宗教改革之前，这些书卷一直都保存在基督教的正典之中。那时，马丁·路德（1483–1546）及之后的改教家认定只有“希伯来真理”（Hebrew Truth）才应纳入基督教圣经，基督教正典的来源应仅限于“泰纳克”，也就是犹太教的希伯来文圣经中的书卷。早在公元5世纪，伟大的基督教圣经学者耶柔米（Jerome）〔12〕就曾暗示过这一结论。耶柔米称这些“泰纳克”中没有的书卷为“次经”（Apocrypha），字面意思为“隐藏的书卷”（尽管实际上并未隐藏），与正典书卷相对。即便如此，这些书卷仍被天主教徒和大多数东正教基督徒视为正典；因此又被称为“第二正典”（Deuterocanonical），这表明其地位尚有争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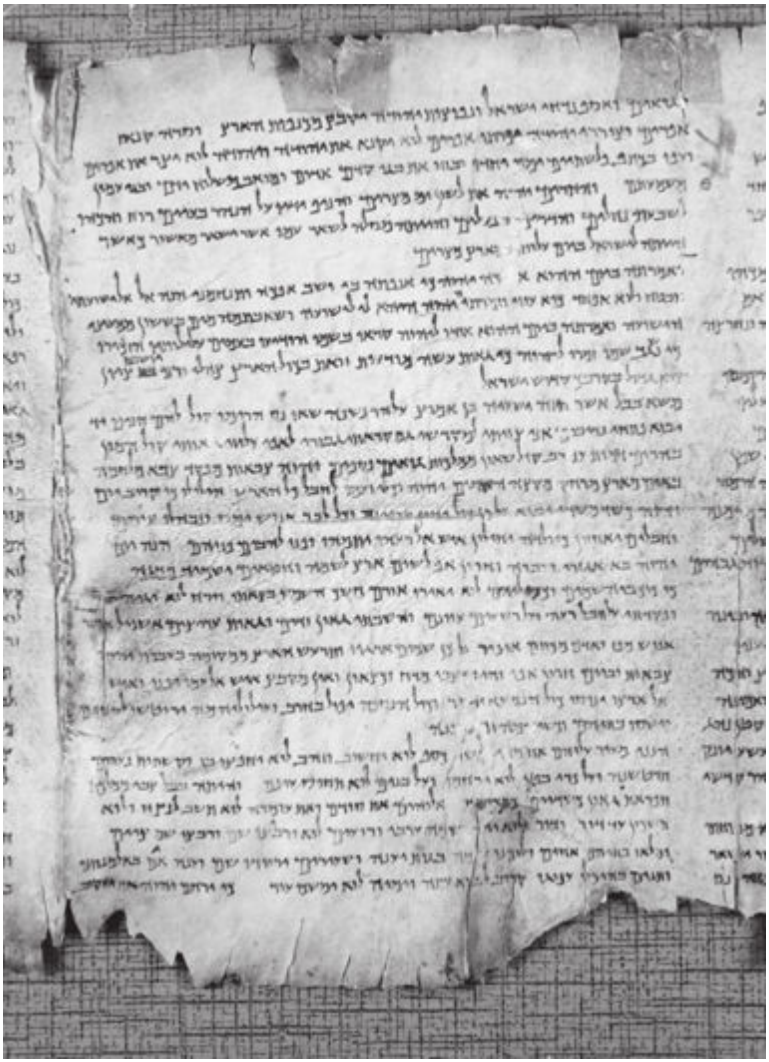

图1　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中《以赛亚书》的部分段落。此卷抄写于公元前2世纪，是圣经各卷中最古老的完整抄本。这一羊皮轴卷上共写有54列文字，图中这列包括了《以赛亚书》11章12节至14章1节的内容。每列高约10英寸，整部轴卷长约24英尺。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书卷的排列次序。与前先知书一样，托拉中的书卷也是按叙事年代排列的。然而，一直到中世纪，还有些希伯来文抄本将《路得记》归入前先知书，并置于《士师记》之后，因为《路

得记》与《士师记》的时代背景相同。最终，《路得记》被归入圣录。后先知书中各卷的排序也有所不同。每一部篇幅较长的书卷都被清楚地抄写在单独的轴卷上，并且被冠以先知之名，如《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其排序以各先知出现的年代为依据，偶尔也会变换不同的排序方式。从《何西阿书》到《玛拉基书》的这些书卷被称为小先知书，它们也合写在同一个轴卷上，而各卷的排序也千差万别。圣录中各书卷之间的排序差异就更大了。

早期基督徒认为，整个犹太教圣经讲述的就是一项受上帝启示的、关于弥赛亚降临的计划，这一计划在弥赛亚真正降临之前当然无法真相大白。这点在后先知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基督教圣经中，后先知书很早就被排在旧约的末尾，紧邻接下来的新约，因为新约被视为前面这些书卷的应验。现代基督教圣经通常会采用这种排序方法，尽管在不少研读版圣经中，先知书和新约之间还有次经。基督教圣经对犹太教圣经的重新排序体现了一种神学逻辑。首先是一段还算连贯的历史叙事，覆盖了从《创世记》至《以斯帖记》的内容（对有些基督徒来说是到《马加比书》）。之后的书卷也按照这一顺序讲述了关于现在的内容，例如与人类处境相关的《约伯记》、《箴言》、《传道书》（以及次经中的《便西拉智训》和《所罗门智训》）、《雅歌》、与祷告有关的赫赫有名的《诗篇》，以及和未来有关的那些先知书。《耶利米哀歌》之所以也被归入先知书，是因为其作者通常被认为是先知耶利米。同样，《但以理书》也被列入先知书，这很可能是因为《但以理书》7章为新约作者所采用[13]；而在犹太教正典中，《耶利米哀歌》和《但以理书》都属于圣录。

“圣经”一词的原义为“书卷”（book），但无论是希伯来文圣经还是基督教旧约，都不是一本书，而是多部书的合集，是从古代以色列和早期犹太人宗教著作中选辑出来的一部文集。宗教群体不同，其文集的版本也不同，名字也各异。犹太教和基督教新教的版本虽然排序不同，但内容完全相同。而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旧约中，还包括其他权威的犹太教典籍——次经或第二正典。如此一来，正典书目就变得错综复杂。（有关犹太教和基督教各派不同正典目录的对照表，请参见

附录）

正典的形成过程给我们以重要启示：和一些天真的看法刚好相反，圣经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由上帝传给人类的，而是千百年间不同宗教群体领袖在繁多的书卷中进行选择的结果，这些书卷也是千百年来许多作者创作的结晶。

注释

〔1〕 金字庙塔原文Ziggurat，指一种金字塔塔形的建筑。外部呈阶梯状。在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各个主要城市。在结构上，内部一般用泥砖搭砌，外部用烤砖遮盖。不设内室。底部多为50×50米的正方形或者40×50米的长方形。已知的金字庙塔约有25座，主要为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遗物。——译注，下同

〔2〕 实际上，先知不单单传讲预言，还包括警告、劝勉和安慰等内容。

〔3〕 在目前中国大陆使用最广泛的圣经中文和合译本中，这种“书卷”单元主要有两种译法：“记”（如《创世记》）和“书”（如《传道书》）；《列王纪》、《历代志》、《诗篇》、《箴言》和《雅歌》则为特例。

〔4〕 这里实际上是指旧约的律法书和历史书。

〔5〕 此处应指旧约的诗歌智慧书和大小先知书。

〔6〕 作者在此处将《犹太列王记》和《以色列诸王记》合为一本“The Book of the Kings of Judah and Israel”。请参王上11:41，14:19，14:29等处经文。

〔7〕 在英文中，*Tanak* 另有其他拼法。此外，本书中“托拉”（亦作“妥拉”）、“泰纳克”（亦作“塔纳赫”）等译名，如无特别说明，一般遵照周燮藩主编的《犹太教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8〕 亚兰文（Aramaic），又译阿拉米文。

〔9〕 英文原文为The Wisdom of Ben Sira，亦作Sirach and Ecclesiasticus，又译《德训篇》、《次经传道书》、《耶数智慧书》（或《耶稣智慧书》）等。

〔10〕 指《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又译《马加比传上》、《马加比传下》。

〔11〕 犹太人常以Gentile一词称呼非本民族的人。

〔12〕 耶柔米（Jerome），又译哲罗姆。

〔13〕 试比较《但以理书》7章9–10节和《马可福音》9章3节、《启示录》1章14节、5章11节等处。

第二章

读经虽难，释义有道

一直到17世纪，犹太人和基督徒对旧约的看法都很简单——旧约是上帝的话语，由文士和书记将上帝口述的话记录下来。尽管这有循环论证的嫌疑，但圣经本身的确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中，许多章节都记载了上帝直接向带领选民出埃及的民族领袖摩西说的话，而且先知的话通常有固定的开场白："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

然而，随着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的发展，曾经盛行一时的观点遭到无可挽回的冲击，曾经被奉为圭臬的传统教义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挑战。研究旧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托拉——前五部书卷——究竟是谁所写？

摩西和托拉

早期犹太教认为上帝将整部托拉的内容启示给了摩西，摩西将之记载下来。因此，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人类社会中的最高权威则是摩西。这种传统也为新约书卷的作者所接受，他们当中大多数也是犹太人。在引用托拉时，他们将其视为摩西所作。在他们看来，这也正是耶稣的旨意。

但是托拉果真是摩西所作吗？一些中世纪的学者指出了其中的问题。例如《申命记》的末尾有段关于摩西去世和安葬的记载，有人因此质疑这一部分并非摩西所写，但另有学者为此辩护：可能是上帝将这些情景事先启示给了先知摩西，也可能是摩西受命选立的接班人约书亚续写了最后几节。

到17世纪，现代哲学开始兴起，主流观点开始饱受质疑。托马斯·霍布斯、巴吕赫（贝内迪克特）·斯宾诺莎和理查德·西蒙等思想家开启了后来的"批判学"圣经研究。在西蒙看来，批判并不意味着否定（尽管圣经批判学常具否定的一面），而是要摒除来自教义的先入之见。

摆脱先入之见后，思想家们就能够像解读普通书籍那样来诠释托拉和整部圣经，并且通过文体和行文的一致性等因素来判断文本的真实作者。

他们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创世记》中上帝的不同名字和称谓。根据《创世记》4章26节，自亚当时代起，上帝就被称为耶和华（*Yahweh*）。而挪亚、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也知道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字。因此，上帝向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常自称为耶和华，而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称呼他。然而，在《出埃及记》6章3节中，当耶和华将自己的名字启示给摩西的时候，他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两种说法自相矛盾：到底亚伯拉罕知不知道上帝的圣名是耶和华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记载同一事件的经文在细节上有差异。《创世记》开篇就有两种关于创世和造人的记述，两种对洪水事件的不同描述，以及几个不同版本的十诫等等。上帝到底是像《创世记》1章24至26节所记的那样先造百兽而后造人，还是如2章7节及19节所述，造一个人之后才造百兽？在《创世记》6章19节，上帝晓谕挪亚将每种活物各取一对带入方舟，而同卷的7章3节的命令是洁净的活物取七对，不洁净的取一对；在《出埃及记》19章20节，上帝在西奈山上将十诫交付摩西，而根据《申命记》5章2节，这一事件却发生于何烈山上。难以相信这样前后矛盾的作品出自一个伟大的作者之手，无论他是人还是上帝。

还有其他明显的迹象表明圣经的前五部书卷并非摩西手笔。当这些书卷提及摩西的时候采用的是第三人称，也就是说这些文本讲述的是关于摩西的事件，而不是摩西的自述经历。文本中还常常提及摩西过世许久后的时代，如果摩西是作者，那么在时间上就有矛盾。有例为证：《申命记》开篇提到"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的另一侧……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既然摩西死于约旦河东岸，那么这段叙述性的导言就绝非出自摩西本人手笔，而是由摩西之后的某位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人所写。

以色列上帝的圣名

在全本旧约中，上帝被冠以多种不同的名号和称谓。目前，使用最频繁的是神圣的专有名词——耶和华，出现了近7,000次，在希伯来语中以yhwh标出。在圣经时代，该称谓是极其神圣的，人们极少直呼此名，而是代之以另一个词“主”（希伯来语为*adonay*）。自古以来的各个圣经译本无不遵从这一敬虔的替代称谓。在现代英语译本中，每当需要yhwh一词时，都会以小大写LORD一词标出。由于yhwh不发音，所以我们无从得知这个词的确切读法，但最有可能的是按照学界惯例读作“雅赫维（*Yahweh*）”。

底本假说

17世纪晚期至19世纪晚期的种种问题使学者们得出结论：托拉——或摩西五经（*pentateuch*，源自希腊语，意为“五卷书”）——是一部作品合集。学者们首先注意到《创世记》中上帝的不同名字和称谓，然后就可以在摩西五经中鉴别出各种不同材料来源，每一种都有各自独特的词汇和主题。这种来源分析方法后来得以充分发展，被称为底本假说。这是现代批判学最早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底本假说首先仅仅是一个假说，是对于数据的理论性阐释。它所解释的数据前后矛盾、内容重复、年代错误，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表明材料的作者绝非一个。典型的底本假说会这样解释上述现象：假设有时期不同、作者不同的底本或者来源，它们随后被整合到了一起。学术上把对于摩西五经来源的鉴别和分析称为文学批判（literary criticism），但这种分析与解读文学作品相去甚远，与其称其为文学批判，不如称之为来源批判（sources criticism）。学界在来源的数量、出处和时间等问题上多有歧见。底本假说中最普遍的说法是：在现存旧约摩西五经之中，有四种较早的材料来源，一般以字母来标

识。最早的来源是J（这一标注来自上帝圣名的德语拼法*Jahveh*，因为最早提倡该假说的学者多为德国人）。底本J成书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该底本开篇（始于创2:4）就将上帝称为耶和华（Jahweh）。在这一底本中，上帝常常亲自与人直接交流。第二个来源为E，这个字母源于希伯来语的“上帝”一词埃洛希姆（*Elohim*）。这一底本为片段式，日期上比J稍晚。在E来源中，上帝在《创世记》中被称为埃洛希姆，他常常通过梦，先知或者天使与人间接交流，而不是亲自显现。按照时间顺序，下一个来源是D，因为该底本绝大部分都只是出现在《申命记》（Deuteronomy）之中。这一部分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晚期至公元前7世纪。最后一个来源是P，对应Priestly一词，这部分成书于公元前500年之前的某一时期，主要关注宗教礼仪和仪式。在P来源和E来源中，《创世记》中的上帝都被称为埃洛希姆，直到《出埃及记》6章中上帝才将自己的名字耶和华启示给摩西。P来源在时间上最晚，同时也是摩西五经的最后编辑者，因此托拉的第一部分——《创世记》1章和结尾的大部分——《申命记》34章都是源自P。

底本假说被认为是对摩西作五经这一教义的背离，也就是对圣经权威的攻击，因此，这一理论屡遭责难，许多早期的支持者都受到谴责并被迫离开教职。然而，这一理论在19世纪末得到新教学者的广泛认同，到20世纪中叶，犹太和天主教学者也与新教学界达成一致。当然，保守派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仍排斥这一理论。

到20世纪晚期，原先的共识开始四分五裂。学者们开始质疑一些来源的形成时期和真实性，以及来源批判是否有助于理解现有文本。然而，尽管学者大多认为仅凭假说无法阐明摩西五经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但是对于阐释者来说，底本假说仍然是一个必要的起点。从20世纪初开始，其他分析方法也初见端倪。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就是其中一种，它考察各来源中的组成部分，通过对它们的鉴别和了解，探究来源形成之前的历史。随着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兴起，其他方法也应运而生。解读圣经的策略方法目前仍在发展，除了名目繁多的批判方法，还有圣经学者所采用的其他各种“主

义”——形式批判主义、修订批判主义、（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判主义、正典批判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令人目不暇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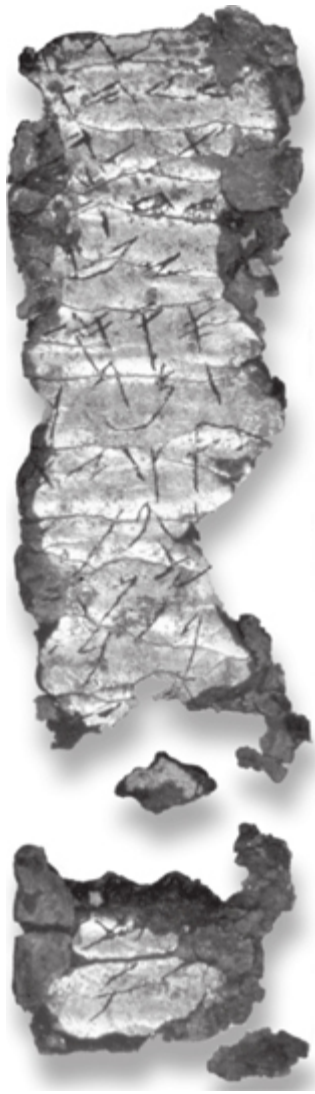

图2　一个展开的银质护身符，出土于耶路撒冷郊区的墓穴。其内容包括一段以古希伯来文书写而成的祭祀文，年代大约为公元前6世纪早期。这段话来自《民数记》6章24-26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

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这是现存最早的出现圣经经句的文本。

底本假说实例

四种来源通常以大段的形式并列出现。不过，这些材料有时也会彼此交织，比如对于埃及瘟疫的记载（出7-11），还有下文摘录的洪水事件（创6-9）。根据底本假说，这段文本只有两个来源。其中J文本（正体）使用“耶和华”（原文为the Lord，希伯来语为yhwh），P文本（斜体）则使用“神”（原文为God，希伯来语为elohim），当然这两个来源还有许多其他细节差异。

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地，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地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创7:6–16）

摩西是作者吗？

让我们回到批判学者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托拉的作者是摩西吗？圣经本身就在回答这个问题。《约书亚记》和《列王纪》中多次提到“摩西的律法书”（the book of *torah* of Moses）或“摩西的律法”（the *torah* of Moses）[1]，但根据《约书亚记》8章32节，约书亚能够将整部律法刻在石头上，因而此处的律法不可能是圣经前五

卷。然而同一节经文和其他多处都提到摩西本人就是律法书的作者。例如《出埃及记》24章4节提到“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但根据上下文，这命令必是指上帝在《出埃及记》20章到23章所发出的话语，而不是整部五经。《申命记》末尾同样反复提及摩西所写的“律法书”仅指《申命记》本身，不包括前面四卷《以斯拉记》7章6节。最早提出“摩西的律法”即圣经前五卷，该书卷的时间背景为公元前5世纪中叶，大大晚于摩西所生活的时期。

既然如此，为什么摩西会被认为是旧约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书卷的作者呢？原因之一是托拉后四卷书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摩西。此外，在古代世界，将自己的话挂在某位先贤权威名下并不足为奇。大卫、所罗门、苏格拉底和耶稣等古代圣贤，都曾被托名发言或著述。公元前五六世纪，犹太民族从巴比伦回归故里，当他们为信仰和实践问题苦苦挣扎时，摩西的权威赋予这前五卷书一种特殊的地位：它们就是律法，就是摩西本人的教导。

古代对于著作本身的理解也是一方面。在古代，一部著作未必出自作者一人之手，它更像是电脑中的“超文本”，由几个甚至是很多作者来扩展、编辑和修改，这与我们以往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一过程历经数代，在此期间，众多不同视角——也就是底本假说研究五经问题时提出的不同源本和传统——都被保存下来。同整部圣经的编者一样，对于五经最终的编者来说，保存不同来源的材料比维持细节上的统一更为重要。由此可见，在托拉成为神圣的经典之前，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已经获得了近似正典的地位。最终，这个过程被摩西赋予了权威，因为在人们心中，他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接近上帝的人。

其他的挑战

现代哲学的兴起，独立批判思想的盛行——例如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18世纪末呼吁“从教条的迷梦中醒来”，这些因素都推动了思想的突飞猛进。其中一项成就便是现代科学的崛起。17世纪，作为挑战

传统教条的先驱之一的哲学家斯宾诺莎提出质疑，认为摩西并非五经的作者；与他几乎同时代的伽利略·伽利雷则和约翰尼斯·开普勒继承并发展了先前哥白尼提出的太阳系理论。伽利略和开普勒通过科学观察证明了是地球沿轨道绕太阳运行，而不是太阳绕地球动行。这恰恰与圣经作者的观点背道而驰，甚至威胁到圣经记载的准确性。19世纪的地质学和进化生物学的影响也是如此。当自然科学的发展遇到底本假说的兴起，对于信徒来讲，圣经的传统权威就受到了双重挑战。

不过，人们又发现了一处与圣经密切相关的信息来源。19世纪中叶开始，近东的早期人类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一带）发现了数万份古代文献，它们大多写在黏土制成的石板上。埃及的文献也在19世纪初被成功破译。现如今，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以及其他近东古代民族的若干抄本文献都逐一被发现并很快破解。这些文献常常与圣经直接相关。许多文献中都有神话，例如有神话记载了大洪水，其中很多细节都与《创世记》6章到9章中挪亚的故事相似。此处也有历史性文献，记载了大量从前只存在于圣经中的人物和事件，这些当然不可能证明全部，但足以支持圣经中的一些历史细节。

注释

〔1〕 这两个短语直译为“摩西的托拉之书”和“摩西的托拉”，但和合本圣经中没有采用过托拉一词，而是用律法一词，此处遵照和合本的用法。

第三章

旧约与历史

旧约的前十几部书卷——取决于排序方法和书目——在叙述框架上是前后连贯的。首先是《创世记》，其开篇记载了天地之初创和人类之先史，其余部分则记述了以色列的四代先祖，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雅各的12个儿子，以色列12个支派即从这12子而出，到《创世记》的末尾，雅各及其大家族迁往埃及。《创世记》之后的四卷书分别为《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它们在叙述的时间跨度上相对较短，只讲述了以色列民如何在摩西的领导下逃出埃及，并跋涉至应许之地的东部边界，摩西亦在此地去世。之后便是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的一段连贯的历史：《约书亚记》描述以色列民如何在约书亚的带领下成功夺取此地；《士师记》讲述以色列民初到此地的岁月；在《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纪上》的1-11章中，以色列民在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三代君主的统治之下建立了联合王国。《列王纪上》的其余部分和《列王纪下》则回顾所罗门死后，联合王国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这段历史。北国的统治最终被亚述所终结，一个多世纪后，南国的政权也为巴比伦所灭。

在启蒙运动之前，上述叙事框架被认为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因为在人们看来，这些文字以圣经作者们生活的年代为顺序，他们在上帝的默示下准确地记录了几千年来真实发生过的一切。圣经的一字一句都是真实可信的。

在此背景下，17世纪爱尔兰阿马[1]的主教詹姆士·乌舍尔和其他一些学者利用圣经人物的年龄推测出一些结论：创世发生于公元前4004年；亚伯拉罕生活在公元前1996至公元前1821年等等。这些确切的日期并没有完全得到证实，因为无论是圣经本身还是众多抄本及古代译本，它们所给出的数字时有误差，而且推算年代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实际上，他们所使用的主要方法与古往今来大多数历史学家所采用的并无二致：在纷纭复杂的历史中选取一个已确知的事件的日期——比如亚历山大大帝死于公元前323年——然后以此为基准前推或回溯。但若缺乏佐证，圣经中的记载还会准确无误吗？

到19世纪晚期，随着天文学、地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各类古代近东文献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在很多细节和年代上往往不可靠，有时还错得离谱。如此一来，对创世日期的推算自然也站不住脚。此外，《创世记》和之后的若干书卷中对历代先人日期的推测也饱受质疑，这也许是因为书卷中许多人物的寿命都长得出奇，例如玛土撒拉活了969岁，亚伯拉罕175岁，摩西120岁，这显然是天方夜谭。因此，乌舍尔推算出来的年代也不可信。

圣经之外的文本的确可以作为古代以色列后期历史的证据，但是年代追溯得越早，材料就越少。对于《创世记》12章至《申命记》末尾记载的亚伯拉罕直到摩西这段时期，并没有可以提供佐证的材料。之后，从约书亚到扫罗、大卫和所罗门在任的整个联合王国时期，情况也如出一辙。直至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分裂以后这段时期，才有独立的材料能证明圣经的记载。第一个被同时期的非圣经材料证实的圣经人物是埃及法老示撒，《列王纪上》11章40节曾提及此人，同卷的14章25节也记载了他曾进攻南国犹大。示撒的埃及文为*Seshonq*，他的事迹已被埃及史料证实，其中包括公元前925年对犹大发动的战争。

有关公元前9世纪的史料则多了一些，进入公元前8世纪之后，史料数量激增。因此，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上半叶的年代确认相对比较可靠，不过也要除去非圣经材料与圣经记载之间、非圣经材料彼此之间的矛盾之处。

进入公元前6世纪之后，应许之地接连被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帝国所统治。这些帝国都有大量的官方文献，因此这一时期的证据尤为充分。当然，这些帝国所关注的事务远比犹大（后来被称为犹太）这一弹丸之地的事情重要。它们的史料也很少提及犹大地区的人和事。然而，由于圣经反复提到重要的异族统治者们，因此，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起，圣经记载的年代就较为可信了。

铭刻文本

在众多圣经之外的文献来源中，有许多来自以色列和犹大地区的古代铭刻。19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学家已发掘了数百片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上半叶的铭刻。近几十年来，古董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古代铭刻，许多都是现代仿品。真正被挖掘出土的铭刻大多是一些陶器碎片，所记载的内容也像这些碎片本身一样残缺不全。另外还有几块同时期的碑志，少量纸草文献和一些写在其他材料上的文本。大概是由于写在纸草等易腐有机材料上的缘故，未能保存下来的文本应该更多。这些铭刻对于理解古代希伯来世界意义重大，但由于对圣经人物和事件鲜有提及，导致其日期和内容都难以确定。以色列邻邦出土的铭刻也是如此。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上半叶的铭刻中，有许多来自亚兰（现在的叙利亚）、腓尼基（现在的黎巴嫩），以及约旦谷东部的亚扪、摩押和以东诸国。这些文本也极少谈及包括圣经在内的其他材料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但其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来自摩押的石碑——米沙石碑。

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历任君王

以色列（联合王国时期）
扫罗（1025-1005）
　　伊施巴力（1005-1003）
大卫（1005-965）
　　押沙龙（约975？）
所罗门（965-928）

南国犹大　北国以色列
罗波安（928-911）　耶罗波安一世（928-907）
亚比雅（Abijah）（911-908）
亚　撒（908-867）　拿　答（907-906）
　　巴　沙（906-883）

以　拉（883-882）
心　利（882）
暗　利（882-871）
约沙法（870-846）　亚　哈（871-852）
亚哈谢（852-851）
约　兰（Joram）（851-843）
约　兰（851-842）
亚哈谢（Jehoahaz）（843-842）
亚她利雅（842-836）
耶　户（842-814）
约阿施（Joash）（836-798）
约哈斯（817-800）
亚玛谢（798-769）　约阿施（Joash）（800-784）
乌西雅（Azariah）（785-733）　耶罗波安二世（788-747）
约　坦（759-743）　撒迦利雅（747）
沙　龙（747）
米拿现（747-737）
比加辖（737-735）
亚哈斯（Jehoahaz）（735-715）
比　加（735-732）
何细亚（732-722）
亚述征服北国
希西家（715-687）
玛拿西（687-642）
亚　们（641-640）
约西亚（640-609）
约哈斯（609）
约雅敬（608-598）
约雅斤（597）

西底家（597-586）

巴比伦征服南国

说明：所标注的年份是君王统治的大概期限，都是公元前。黑体为非圣经文献中提到的君王。日期重叠表明当时处于共治时期。

摩押王米沙和以色列

米沙石碑生动体现了圣经和非圣经两种材料来源的关系。该石碑是一块3.5英寸高的黑色玄武岩石板，1868年发现于约旦首都安曼以南35英里的小村庄狄本（Diban），现存于巴黎卢浮宫。石碑上的文字是古代摩押文，与希伯来文极为相似，详细记载了公元前9世纪中叶摩押的统治者米沙领导自己的民族战胜以色列的事迹。

这一独特的文本与《列王纪》有许多吻合之处。两者都提到摩押的国王米沙，以色列王暗利及其继承者——圣经中名为亚哈，米沙石碑中未被提及名氏。二者也都记载了摩押和以色列各自信奉的神——基抹和耶和华，都将战争的胜败归于神明的赐福和惩罚，也都提到了共同的习俗——屠城（the ban）[2]，即屠杀所有战败方的百姓，并将其作为祭品献给战胜方的神明。

米沙石碑讲述了在暗利王朝时期，以色列如何压迫摩押，而后摩押在米沙的统治下宣布独立，并且攻占了以色列的城池。《列王纪下》3章5节对此有明文记载："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反叛过程被详细记述下来，其历史背景是亚哈之子、王位继承者约兰在位时期。据圣经所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和摩押南部邻邦以东结盟，战胜了摩押。然而摩押似乎并未完全被击溃，因为米沙将其子献为燔祭，保住了最重要的一座城池。之后，"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3]大怒，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王下3:27），这句话颇令人费解。米沙石碑没有明确记载《列王纪下》3章中提到的这

次战役，而圣经也只字未提摩押之战中以色列的人员伤亡和领土沦陷。这也许是双方各自的偏袒之辞，描述的是摩押和以色列长期斗争中的不同片段。

由此看来，米沙石碑和圣经是两种独立的材料来源，在一些基本信息上可互为佐证，但内容不尽相同。这无疑缘于双方的政治和宗教立场不同，因此，两种来源都需要解释。

米沙石碑节选

我是狄本人米沙，基抹之子，摩押之王。父王统治摩押三十年，我接续他作王。我为基抹在卡霍（Qarhoh）建筑邱坛……因他曾将我从列王中拯救出来，让我在众敌面前立于不败。

暗利是以色列王，他压迫摩押许多时日，因为基抹的愤怒临到他的土地。当暗利的儿子接续了他的位，他依然说："我也将在我的时日里压迫摩押。"这是他所说的，但是我战胜了他和他的家，以色列已经被永远毁灭……

基抹的话临到我说，"去，从以色列那里抢夺尼波！"所以我晚上过去，与尼波争战，从破晓直到中午。我夺得了尼波，杀了全城的人，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作为祭献给亚斯他基抹。我从那里带走耶和华的子民，在基抹面前拖着他们。

考古学和圣经

除了各类铭刻，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其他类型的证据，例如断壁残垣、动物骨头、陶器、工具和其他历经了几千年的各类物品，这些证据被称为"物质文化"。在19世纪下半叶，考古学家发掘出数千处古代以色列遗址，经确认，有许多圣经中提到过的地方，例如耶路撒冷、米吉多、耶利哥、夏琐、拉吉等等。然而，正如米沙石碑一样，这些

出土遗址提供的信息很难与圣经记载相吻合，其原因有二：第一，圣经记载本身前后不一，内容有所取舍，观点失之偏颇，对于任何一处遗址，只有当其符合作者意图时才予以提及，而不会告之以来龙去脉；第二，考古证据有其自身特性，即物质文化的缄默性。能在圣经人物事件与一层灰烬或一座古城墙的残存地基之间建立起明确、直接的联系，这种情况屈指可数。遗迹上不会出现“约书亚、大卫或暗利到此一游”的字样，由于没有直接联系，专家只能推断这些出土物质文化的日期，因此时有争论。

以米吉多这一重要遗址为例。该城地处地中海沿岸至东部内陆丘陵的战略要道，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4世纪，几乎一直被占领。在20世纪，德国、美国和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约30层连续的城镇遗址，其中有大规模的防御工事、庙宇、宫殿、排水系统和其他遗迹。20世纪90年代以来，米吉多成为美国和以色列联合考察的重点区域。作为古代以色列最大的城市之一，米吉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在圣经中只出现过十几次，圣经之外的文献也只是零星提到。《约书亚记》记载以色列人战胜了米吉多王，但与此相反，《士师记》却记载以色列玛拿西支派没能把迦南居民从米吉多的领地上驱逐出去，还提到了士师底波拉率领以色列军队在米吉多附近与迦南人交战。此外，公元前7世纪末，埃及法老尼哥（Neco）和南国犹大王约西亚也在米吉多进行过一场大战（王下23:29）。

圣经中提及米吉多次数最多的章节是《列王纪上》9章15节，其中一段暗示所罗门王曾经在米吉多重建过城墙。一战后美国发掘者以此为依据，确定米吉多的一段城墙和城门建于所罗门时代（公元前10世纪），并把城墙内发现的大型建筑物鉴定为马厩，因为《列王纪上》后面的经文提到了战车之城，即军队中战车队驻扎的地方。米吉多的发掘似乎在某一点上证明了圣经的准确性。但是，后续发掘工作和更精细的年代鉴定技术却证明：城墙、城门以及被认为是马厩的大型建筑的建造时期很可能不是所罗门时代，而是一个多世纪后的以色列王亚哈时期。另一方面，尽管圣经和圣经之外的材料都提到亚哈王拥有庞大的战车部队，但尚未证明这些建筑就是战马的马厩。将文献

中的只言片语和大量考古发现联系起来的做法一直备受争议。事实上，几乎所有被发掘出来并得到考古确定的遗址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图3　向东北角眺望，可见米吉多残存遗址的土堆。它高出平原约100英尺，顶部面积约17英亩。

由此可见，考古学不能“证明”圣经的历史真实性。它只是圣经这出戏剧的舞台，为它提供更广阔的文化背景。

越追溯越迷离

虽然证据残缺不全，但当我们把近东文献、圣经、考古数据等各种证据放到一起时，又能拼出一幅概貌图。这就好比一大张游戏拼图，即使丢失了很多碎片，但仍然有足够的碎片可以恢复原图概貌。我们可以拼出第一个千年期间的年代、人物和事件的概况，也就是从公元前10世纪末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分裂到公元前2世纪的马加比时期。时间还可以再稍稍提前至大卫和所罗门时期，即公元前10世纪以色列第二任和第三任王的在位时期，在此之前的情况我们就无从知晓了。

但是更早的时期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从《创世记》到《撒母耳记下》，圣经中提到的所有人物或事件在同期的非圣经文本中毫无对证。摩西五经中只有巴兰曾在较古老的非圣经文献上出现过，据《民数记》22–24章记载，他是一位美索不达米亚的先知，受摩押王雇用去诅咒从埃及奔向应许之地的以色列民。在约旦谷戴尔阿拉（*Deir Alla*）出土的一块石膏上，有一段残缺不全的文本，其中的主要人物就是巴兰，他也是一位先见。然而，尽管这段晦涩的文本证明了巴兰的确声名远扬，但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年，与《民数记》叙述的内容不在同一时代。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圣经对于较早期的记载十分模糊。虽然埃及法老多次被提及与亚伯拉罕、约瑟和摩西等圣经人物有过往来，但在《创世记》和《出埃及记》中，圣经作者并未提到任何一个法老的名字。因此，即使有完备的古代埃及年表，他们的身份仍然无从确认。古埃及文献也未谈及圣经人物。亚伯拉罕是否真实存在？他生活在什么年代？如果确有其事，出埃及的故事发生在什么时期？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较早期的记载中就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是纷繁复杂的材料就如同一面面透镜，历史经过重重折射后已经难辨真伪。对于圣经中的叙述，我们越是向前追溯，就越远离历史，接近神话。

注释

〔1〕英国北爱尔兰阿马郡阿马区的城市，北爱尔兰五座城市之一。

〔2〕The ban在此意译为屠城，详情可参考米沙碑文英译的10–12行。

〔3〕此处英文圣经与和合本圣经相差较大。英文圣经中这句话直译为“极大的愤怒临到了以色列人，因此他们撤退了”，和合本中加的“耶和华的”在原文中本没有，和合本译者为了使意思更加明确而加入。

第四章

神话还是神的话？

从19世纪到20世纪，无数的古代近东文本重见天日，得以破解并被译出，这其中有数万份被鉴定为神话，而含有神话成分的则更多。简单来说，神话就是叙事。希腊语中*mythos* 一词的原意即为故事。叙事所采用的文体主要为散文或诗歌，其主角则是众神。虽然有些令人吃惊，但实际上旧约本身就充满了神话因素。

起源神话

所有的宗教都试图解释未知，而神话常常可以提供答案。世界如何形成？人类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这一类问题就是起源神话试图回答的。这类神话在古代近东十分常见，其中既有形形色色的神祇，也有对于起源问题的众多解释。一般来讲，一个民族、国家、城市或宗教的主神往往被描述为创世者。创世过程本身常常被描述成生殖行为的结果。例如，一位女神发生性行为后生出了幼发拉底河或大地；一位男性神祇自渎后吞下了自己的精液，之后怀孕并有了后代；另有版本为男性神祇吞下了父亲的睾丸而怀孕。或许盛行的以色列宗教中也有此类露骨的性描写，但圣经对于耶和华的记述中并没有。

古代近东有这样一则流传甚广的创世神话。太初浊水之神与风暴之神进行了一场大战，而后创造了天地。在美索不达米亚神话里，大战的双方是母神提阿玛特（Tiamat）和神祇马尔杜克[1]（Marduk）；在迦南神话中则是海神（Prince Sea）与巴力（Baal）。圣经中也充满了这些广为流传的神话元素。

对创世之前宇宙诸神之战最详尽的描写莫过于《埃努玛 - 埃利什》了。这部史诗又称《巴比伦创世史诗》，是古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首颂诗，赞美的是风神和巴比伦主神马尔杜克。

以下引文描述了马尔杜克与浊水之神提阿玛特之间的大战。

彻墨[2]继而与聪明神武之马独克，单独比斗，酣战不休。
至尊乃布网以掩彻墨，
魔风则尾随之，伺机扬击其面；
当彻墨张口意欲吞噬（马独克）之际，
彼乃鼓策魔风猛进，使其双唇难闭，
众风群起而吹袭其腹，
使其躯体膨胀而其口阔张，
彼即以箭射其腹，
洞穿五内，并裂其心。
彼即一战而胜之，遂了结（彻墨）之生命。

战罢，马尔杜克用提阿玛特的躯体造出天空（圣经用“空气”或“穹苍”等词），并在天上架设众星，月亮和星座。最后，在众神祇帮助下，他用提阿玛特的一位辅神的血液创造了人类，来服侍支持马尔杜克的众神。

《创世记》记载了圣经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创世故事，虽然其开篇暗示了一场创世之战正在酝酿——一边是黑暗，藏匿于巨大风暴之云中，停在深渊之上；一边是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之上（参见创1:1–2）[3]，但并未描写这场战斗。而关于创世之战的神话却常常在圣经其他地方出现。

以下两节引文摘自《诗篇》，可见圣经作者谙熟天地始于风暴之神与大海之战这一神话：

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
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他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
你曾分裂磐石，水便成了溪河，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
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
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

（诗74:13–17）

你管辖海的狂傲，
波浪翻腾，你就使他平静了。
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已杀的人；
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
天属你，地也属你。
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

（诗89:9–11）

在圣经中，原始的海有很多名字，例如深渊、海洋、大河、利维坦[4]、龙或者蛇等，这些名字在非圣经文本中也常用到。其他提法只出现在圣经中，如拉哈伯（Rahab）[5]。同样，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常被描绘为暴风之神，他“驾云而行”（诗68:4）[6]——其对手迦南宗教的主神巴力也是如此，以雷为声（诗29:3），在暴风密云中显现（鸿1:3，伯38:1）。

由此可见，以色列人会用古代近东神话中的词汇来形容他们的守护神。《创世记》6-9章中的洪水事件也彰显了这一点。

图4　图为公元前9世纪一根圆柱上所刻的巴比伦神明马尔杜克，他以胜利的姿态站在海蛇之上。圣经中称这条蛇为“鳄鱼”[7]，“……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赛27:1）

大洪水

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有各种各样关于神明发动洪水的神话。它们与圣经中挪亚和大洪水的故事大同小异，其情节无外乎主人公及其家人躲进按神明要求造的船中并得以获救，在洪水退却之后，主人公向神明献祭。以下引文摘自《吉尔伽美什》史诗，诗中描绘的洪水故事几乎与圣经中的别无二致。故事的叙述者即洪水故事的主角乌特那庇什提牟，他讲述了自己的船停靠在一座山上的情形：

到了第七天，
我解开鸽子放了出去。
鸽子飞去，又盘旋飞还。
它飞了回来，因为找不到栖息之处。
我解开燕子放了出去。
燕子飞去，又盘旋飞还，
它飞了回来，因为找不到栖息之处。
我解开了大乌鸦放了出去。
乌鸦飞去，看到水势已退。
他觅食，整理羽毛，翘起尾羽，不再回来。
我将一切都放出到四方[8]，献上祭物。
诸神嗅到了香气，
诸神嗅到他们喜爱的香气，
诸神便如苍蝇一般聚集在祭物的周围。

同样，在《创世记》之中，挪亚在洪水之后放出了一次乌鸦，三次鸽子，并向耶和华献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创8:21）。这些巧合证明，圣经和非圣经的神话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即使它们没有文字上的直接印证，至少也受到某种共同传统的影响。

神话和历史

许多历史文本都含有神话的成分，律法书和其他体裁的文本也是如此。例如，摩押王米沙为纪念公元前9世纪中叶战胜以色列修建了

一座纪念碑，碑文记载着守护神基抹如何启示并帮助他。于公元前586年摧毁耶路撒冷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宣称自己奉神祇马尔杜克之命来守护巴比伦，而一千多年前，他的先王汉谟拉比也曾在法典的序言中如是宣称。王权，这一在今人看来仅代表一种政治体制、一种统治形式的名词，当时却暗含了“君权神授”的神话色彩，即王权来源于上帝，国王由上帝来选择。

古代以色列也有类似观念。据称，以色列的几位君王是耶和华亲自拣选的，而拣选通常以先知为媒介。例如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撒下5:2）。因为耶和华最终被认为有能力荫蔽全世界，所以这类神话式语言也适用于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王古列，在谈到他时，耶和华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赛44:28）。

使用神话式语言来赋予王权合法性也许会招来微词，被认为是确保臣民忠于统治者的手段，因为民众不大可能背叛由神明拣选的统治者。然而，这同时也说明了在古代社会，神圣与世俗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样泾渭分明。

因此，神话与历史这两种体裁并非毫无交集。历史中有神话，神话中也有历史。这点在圣经前几卷就可见一斑。从《创世记》第一章对宇宙初创的描写，到《列王纪》中对耶路撒冷毁灭的叙述——也就是从《创世记》开篇的神话到以色列先祖的故事，再到以色列民逃出埃及，到达应许之地并在那里繁衍生息，整段笔墨一气呵成，年代连贯并且通常已经过校正。神话的基本要素是以神明为主角，至少在这一点上，这段以耶和华为主角的叙事具有神话的一面。

然而，除了神话成分和复杂的史前史，这些叙事中也有明显的历史成分。《列王纪》详细回顾了公元前10世纪末到公元前6世纪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诸王的历史，以及许多发生在埃及、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等更大背景下的事件。虽然和其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大多数圣经作者明白历史是由政治、军事、经济、自然及种种其他力量塑造的，但他们同时也会以更高的视角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是神明与人类的持续互动。对于圣经史学家和先知来说，以色列民的胜利或失败

就是上帝赐予的奖赏或惩罚，而惩罚往往更多。

上帝与诸神

圣经作者很清楚大多数民族拜的神并非耶和华，而是他们时常提到的其他神明，如埃及的阿蒙，巴比伦的马尔杜克（亦称巴尔或尼波）和匿甲，迦南谷物之神大衮、风暴之神巴力、瘟疫之神瑞示、死亡之神莫特和女神亚舍拉以及亚斯他录，摩押国之神基抹、亚扪的米勒公和亚兰的哈大。

圣经也经常提到以色列与其邻邦崇拜相同的神。在离开埃及之前，以色列人曾经侍奉过别神（书24:14，结20:5–8），在进入应许之地后依然如此。据称，所罗门王也曾敬奉过亚斯他录、米勒公和基抹（王上11:5–7）。圣经中历史的记录者和先知们反复谴责以色列人不单侍奉耶和华，还敬拜巴力和亚斯他录（士2:13）、美索不达米亚的死亡和复活之神搭模斯（结8:14）、太阳（结8:16，王下23:11）、天后（耶44:17），还有其他邪恶势力如阿撒泄勒（利16:8）和狸狸[9]（赛34:14）。古代以色列铭刻文本也有关于敬奉别神的记载，如许多人名中都含有对神的尊称“巴力”：耶鲁巴力（*Jerubaal*）、以实巴力（*Ishbaal*）、麦利巴力（*Meribaal*）、巴力亚达（*Baalyada*，*Beeliada*），等等。

信奉别神的不只是未蒙光照的外邦人和不忠心的以色列人。纵观整部旧约，耶和华与其他神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好比人间的君王或古代近东的其他神明，主宰着天上的王室，手下有大臣和随从。这一天庭的成员包括众多神祇，即耶和华的天军，或称“天上的万象”，耶和华则是“万象之神”。万象包括基路伯（类似于斯芬克斯的四不像），撒拉弗（可能类似于埃及宗教里带翅膀的毒蛇），后来被称为天使（Angel）[10]的信使，以及其他的天庭活物。天庭的众神统称为“神的众子”，他们就如同耶和华的幕僚，为之献计献策，向其高唱颂歌。可见，耶和华虽为“至高者”，但并非孤家寡人，他是众神集会

之首脑，众神皆是他的“圣者”。

众神一再被称为耶和华的侍者，这一点使我们对圣经作者们的观点产生了许多疑问。他们是否认为，即使贵为“至高者”，耶和华仍是诸神之一？抑或这种对神话的运用只是一种文学手法，正如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援引缪斯女神来代指古典时代的史诗那样？抑或是一种未经考证的废旧提法，就像我们总是说太阳东升西落，尽管我们了解的要更多？我们发现对耶和华和对古代近东其他神祇的描述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且圣经中多次提到以色列民崇拜其他诸神，由此可见，至少早期的那些圣经作者很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神论者，他们并不全然否定其他神明的存在，只是认为诸神在地位上次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出20:5）〔11〕，所以只有他可以被崇拜，正如第一诫所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20:3）。

到圣经时代晚期，严格的一神论业已形成。人们不再凭字面意义来理解有关别神的内容。然而，一神论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处理早期文本中的多神论？如何解释世界上存在罪恶和苦难？

《创世记》6章1–4节是圣经中最为典型的神话故事之一：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同很多古代神话一样，神灵娶了人类的女子为妻后生育了英雄的一代。这段短文并没有再给出其他细节，它很可能是一部完整的神话的片段或摘要。

注释

〔1〕和合本圣经译为米罗达，参见耶50:2。

〔2〕 译文引用自饶宗颐的《近东开辟史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文中把提阿玛特译为彻墨，把马尔杜克译为马独克。——编注

〔3〕 原文为“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希伯来文中“风”和“灵”是一个词*Ruha*。

〔4〕 意即海怪，和合本圣经译为鳄鱼。

〔5〕 Rahab一词在圣经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耶利哥城中的妓女喇合，一是指《诗篇》89章10节中的海怪拉哈伯。

〔6〕 和合本圣经译为“……坐车行过旷野的……”，与此处略有不同。

〔7〕 和合本圣经一般译为鳄鱼，实际上这个词是Leviathan，即利维坦。

〔8〕 在圣经中four wind常译为四方。参见和合本圣经：耶29:36、但7:2和亚2:6、6:5。

〔9〕 狸狸，和合本圣经译为“夜间的怪物”。

〔10〕 英文中的Angel一词源于希腊语*Angelos*，意即信使。

〔11〕 英文直译为“忌妒的神”，这里采用中文和合本译法。

第五章

出埃及考

典型的近东考古学遗址被称为圆丘。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在残垣上修建新城，层层叠加，逐渐形成隆起的土丘。当考古学家挖掘圆丘时，不可能将每一层都挖掘出来。为了解早期遗址的状况，他们会用探针或者声波穿透各层，直达圆丘最底部。在某种意义上，旧约就像一个圆丘，古代以色列的世世代代都在既有基础上为它添砖加瓦。本章也将深入考察其中的一段——《出埃及记》1–15章。

这15章是长篇叙事的一部分，讲述了“以色列的子孙”，即雅各的后代的故事。雅各一名在《创世记》32章28节中被改为以色列。迦南地闹饥荒后，雅各及其子孙迁至埃及，他们在那里饱受迫害，甚至险遭灭族之祸，此时，上帝拯救了他们，于是以色列民在摩西的带领下逃出了埃及。然而，这段叙述框架下的内容却杂乱无章，文体迥异，来源繁杂，漏洞百出。

来源分析

在《出埃及记》1–15章中，我们可以找到底本假说中四个主要来源中的三个：耶和华底本（J）、以罗欣底本（E）和祭司底本（P），与《创世记》和《民数记》的状况类似。每种来源都有其独特的词汇和主题。例如，耶和华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的地方是一座山，后来耶和华又在这座山上向摩西启示了十诫和其他的律法。在E底本（出3:1）和《申命记》中这座山叫做何烈山（Horeb），而在J底本和P底本（出19开篇）却被称为西奈山（Sinai）。在J底本中，摩西的岳父是流珥（Reuel），而在后面的章节中，E底本（出3:1）却称其为叶忒罗（Jethro）。J底本中的摩西是主角，E底本中的摩西和亚伦平分秋色，而在P底本中亚伦则成了头牌。有一些段落由多个来源的材料拼合而成，所以内容略有重复，对上帝的称呼也不同。《出埃及记》3章7–8节属于J底本，以耶和华来称呼上帝，而接下来的几节属于E底本，其内容相似，但对上帝的称呼却是神（*elohim*

）。根据E底本，在《出埃及记》3章15节中上帝向摩西启示了自己的名字，而在P底本中是到6章2节，之后该名字在所有来源的底本中得以通用。

也许因为《出埃及记》由多种原本独立的材料拼合而成，所以通篇叙事时有矛盾。法老下令杀尽男婴，如果摩西躲过此劫是例外，那么亚伦又是如何幸免于难的？又怎么会有60万男性离开埃及呢（出12:37）？如果真有60万男性，那么女性数量应大致相当，而两个接生婆（出1:15）又如何服务于如此庞大的人群？如果摩西由法老的女儿养大（出2:10），他又为何暗示自己在埃及宫廷中没有地位（出3:11）呢？是如E底本所说，耶和华在米甸时就将自己的名字启示给摩西（出3:1），还是如J底本所记载，是在他返回埃及之后（出6:1–2）？来源分析并不是对于矛盾出处的分析，而是要解释这些矛盾为什么 存在。

形式评注

材料来源的形式和体裁多种多样，包括行程计划、礼仪、律法、家谱、民间传说、诗歌和上帝的显现，它们虽然在长篇叙事中得到整合，但其原本独立的来源仍难以被掩盖。

以《出埃及记》4章24-26节的一段短篇为例：

>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西坡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阳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郎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坡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郎了。"

这一段令人费解的文字源于J底本，讲述了摩西肩负着告诉法老放走以色列民的使命前往埃及，途中遇到了想杀死摩西的上帝，情况危险难料。在《创世记》32章22–32节，这位上帝又以夜行恶魔的形象出现，正如何西阿所说的"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何13:7）。

如果要将这一段归类，我们可以称之为"溯源"，即用叙事手段来

追溯一个古人熟悉而今人陌生的词的源头，如上文所提到的“血郎”（bridegroom of blood）一词。通过之前的一段叙事，我们明白了“血郎”一词与割礼有关，这可能是因为割礼本应与婚姻或者生育相关，而不是如《创世记》17章所述在出生后施行。当然，摩西本人和他那个匿名的儿子并未受割礼，也许正因如此耶和华才要杀掉摩西。摩西的妻子西坡拉急中生智，使他们幸免于难。她为儿子行了割礼，然后用这块带血的皮肤碰触了摩西的生殖器（“脚”在圣经中是生殖器的委婉语），让耶和华误以为摩西也行了割礼。

“溯源”是摩西五经中的主要体裁之一。它的作用是通过追溯久远的历史来解释日常礼仪、习俗、名字、地貌、血统以及其他其受众所熟知的事物。例如，摩西一名常常被释为双关语：虽然摩西是埃及人名，如埃及有位法老叫做图特摩西（Thutmoses）[1]，但其读音却与一个不大常用的希伯来词很相近，该词意为“（从水里）拉出”（出2:10）。同样，逾越节起源被解释为当耶和华来到时，“越”过了以色列民的房子，使他们免受最后的灾难——杀灭头生之灾（出12:26–27）。以色列民在埃及以东的沙漠中首次停下脚步的地方之所以叫做玛拉（Marah），是因为那里的水味道苦（希伯来文中*mar*为“苦涩”之义，出15:23）。

其他分析

女权主义学者认为，西坡拉作为一个女性为儿子行割礼，这本身就非同一般。她的决断让人想起故事中其他女性的事迹，如接生婆施弗拉和普阿阻挠埃及王杀死新生男婴的法令；摩西的母亲和姐姐营救摩西；法老的女儿将摩西抚养成人等等。值得注意的还有米利暗——奇怪的是，她一直被视为亚伦的姐姐，只有极少数章节提到她也是摩西的姐姐（如《民数记》26章59节）。她也是一位先知，曾领导众妇女共唱胜利之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段唱词是一首长诗的开篇部分，早期被认为是摩西

和以色列民所作（出15:1）。会不会整首诗原本是米利暗的作品，而后归到了摩西名下？女权主义学者精当地指出，在圣经和对圣经的阐释中，父权主义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这些段落正是对于父权主义的有力反击。

另外一种分析法有时被称为正典分析或者情景分析，它针对的是圣经的最终形式，而不是圣经形成的过程。这种分析将上述割礼事件与《出埃及记》11–12章中的第十灾[2]联系在一起。在那场灾难中，耶和华再次变为在夜间杀人的神，而血的记号也再次使人免于死刑，但这一次用的是羔羊的血。推而广之，这种正典或情景分析法也可以把摩西和挪亚联系在一起。在希伯来语中，摩西的母亲为他造的船与《创世记》6–8章中的挪亚方舟是同一个词，圣经中提到该词的仅此两处。与挪亚方舟一样，摩西的船也涂了防水的材料（所涂的材料不同，参见创6:14和出2:3）。于是，叙述者将挪亚和摩西联系起来，前者在大洪水中拯救了人类，后者在大海中拯救了以色列民，他们的获救也预示了《出埃及记》14章中的红海事件。

故事和历史

《创世记》到《列王纪上》出现的所有人物和事件，在圣经之外的任何文本中都没有直接提及，《出埃及记》1–15章也是如此。在浩如烟海的古埃及文本中，从未提到过摩西和亚伦，对大灾难、头生的被杀和法老军队覆没红海等事件也只字未提。然而，正如卡尔·萨根所说，没有证据并不代表证据不存在，至少古埃及有可能像其他古代帝国一样，不把自己的失败记录在案。然而，我们的确无凭无据。

《出埃及记》本身的记载也是模糊不清，令人费解。开始迫害希伯来人（在这些章节中以色列人常被称为希伯来人）的法老是谁？他的继承者——摩西和亚伦所面对的法老——又是谁？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如果圣经作者给出一个法老的名号，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他们如何看待所述事件的发生时间。但是，由于没有名号，即使我们假定确

有其事，也无法确定其日期。

关于出埃及的日期，目前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出埃及发生的时间较早，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这一观点由来已久，它将出埃及和非埃及血统的喜克索斯（Hyksos）王朝被逐出埃及的事件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提法意味着埃及在这一时期直接控制着迦南地区，但《出埃及记》后面的《约书亚记》和《士师记》都未曾提到迦南地有埃及的政治力量。现代学者大都认同另一种观点，即出埃及发生于公元前13世纪中期，时值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II，公元前1279—前1213）的漫长统治。但这充其量只是一个有根据的猜测，所依据的不过是两类毫无关联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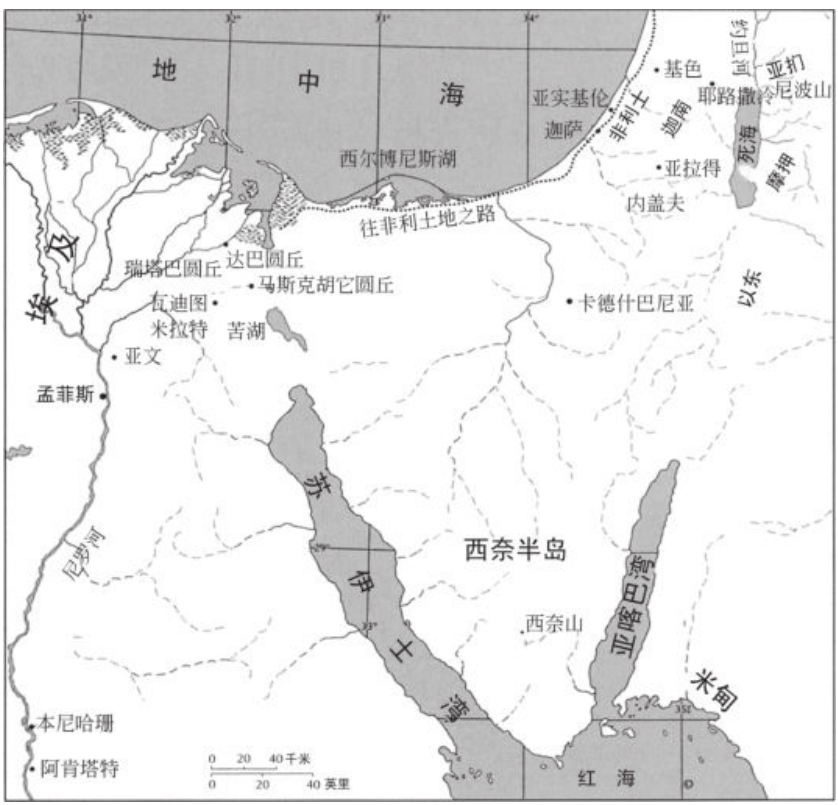

图5　出埃及的地图

地理问题也同样不甚清楚。《出埃及记》1–15章中所出现的众多地名得到确认的几率微乎其微。据说由希伯来奴隶建造的比东城（Pithom）和拉美西斯城[3]（Rameses）有可能就是如今的瑞塔巴圆丘（Tell er-Retabah）和达巴圆丘（Tell ed-Dab̀a），它们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东部，也就是《创世记》和《出埃及记》中所记载的希伯来民所在之地。那片以色列民平安穿过、而埃及人被淹没的水域通常译为“红海”。该词的希伯来语*yam suf*可以用来指红海的一个海湾，即亚喀巴湾或埃拉特湾（王上9:26）。然而，*yam suf*的字面意思是“芦苇海”，因此许多学者认为该词并非指红海，而是指尼罗河三角洲与西奈半岛北部之间众多小浅水湖或湿地之一。例证之一就是在“红海事件”中，埃及人乘坐双轮战车追赶徒步逃亡的奴隶时，战车深陷在了泥沼中（出14:24–25）。

故事与神话

学者们曾常常将出埃及前的诸如雹灾、蝗灾、畜疫之灾等归诸于自然现象。但是故事的意义就在于说明这些灾难并非自然现象，而是来自超自然的力量——耶和华。例如，在埃及人经受着冰雹、黑暗和牲群大批死去等灾难的时候，以色列人却毫发无损（出9:6, 25–27; 10:23）。换言之，这些事件属于神话。

《出埃及记》的神话因素不只表现在细节上，更体现在整体情节上，即耶和华通过直接干预来掌控一切。摩西（和亚伦）与法老（和他的术士）之间的角逐也是耶和华与埃及众神之间的竞赛，正如耶和华所预言的：“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出12:12）——这样看来，耶和华自己似乎（还）不是一神论者。有诗歌为证：“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出15:11），这首诗出现在逃出埃及之后，这句反问表明耶和华已证实他超越别神之上。

在讲述过芦苇海的故事时，作者借鉴了流传甚广的说法，即风暴之神战胜了太初海神。风暴之神耶和华从鼻孔中吹出大风（出15:8,

10），打败了他的敌人。但在《出埃及记》的版本中，神话中的敌人不是太初海神，而是法老及其军队，大海只是取得胜利的工具而已。此外，它还暗示着一个更早的神话：在创世之前的战斗中，上帝之风吹退了水，于是水分开，干地就显露出来（比较出14:21和创1:2, 9）。

圣经其他部分对出埃及事件的描述也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例如，总结这次事件的诗篇写道："以色列出了埃及……沧海看见就奔逃……因见主的面"（诗114:1, 3, 7），正如在古代神话中太初水神蜷缩在风暴之神的面前。《诗篇》77篇也采用了类似的语言：

> 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战抖。
> 　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
> 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战抖震动。
> 　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
> 你曾藉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
> （诗77:16–20）

后来，公元前6世纪的一位无名先知明确将太初之战与出埃及联系在了一起，从战胜海怪自然过渡到了出埃及：

> 从前砍碎拉哈伯、
> 　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
> 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
> 　使海的深处变为赎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
>
> （赛51:9–10）

圣经传统中的出埃及

由于历史证据的匮乏和神话语言的运用，我们难以确定事件的真相。出埃及到底发生过一次还是若干次？成功逃离的是一小群奴隶还是数百万人？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期还是

更晚？答案我们无从知晓。

出埃及是一次具有典范意义的事件。它在圣经传统中不断上演：以色列民在进入应许之地时穿越约旦河被认为与穿越芦苇海直接相关（书4:23）。之后的公元前6世纪，以色列人结束了巴比伦的流放并回归故土，这被视为是新一次的出埃及（赛43:15–21）。此外，逾越节作为以色列民族——因此也是犹太教——主要宗教节日之一，早期被认为是对出埃及的重现和纪念，虽然它原本也是一个农业节日。

既然出埃及是圣经的一个主题，就不太可能纯属虚构。除却文学和神话的修饰，我们能看到对真实历史事件的回忆。或许是一小群奴隶成功逃出，并将其视为神的救恩。这段历史在歌声中被颂赞，在仪式上被重演，在故事里口耳相传，同时也赋予了他们一种认同感——历经磨难才走到今天。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他们就是耶和华在万民中拣选的“属他的子民”（出19:5）。

由于出埃及的重要性，律法、礼仪、制度和以色列社会的其他方面都与它相关。举例来说，以色列民以遵行十诫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20:2）。

《出埃及记》1–15章向我们展示了圣经传统的复杂性。与现代作品的一气呵成不同，圣经文本几乎都是合成体，它们几经修改、变动、注解、剖析、扩展以及其他形式的补充和编辑，同时，后世的作者们也不断为其添砖加瓦。

与此同时，出埃及的故事也说明了历史与神话的彼此交织。对于圣经的作者来说，耶和华就是历史的主角，现代学者也曾用一个非圣经的词——“历史之主”来形容耶和华；一切发生的事最终都是耶和华的作为，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准确地推测他曾有何种作为，出于何种目的。用更学术的语言来总结就是：历史中有神话因素。

注释

〔1〕 图特摩西（Thutmoses），多译为“图特摩斯”。

〔2〕 耶和华在古埃及降临了十场灾祸，第十灾为杀头生之灾。

〔3〕 拉美西斯城（Rameses），和合本圣经译为“兰塞”。

第六章

“遵守我的诫命”——旧约律法

据《出埃及记》记载，以色列民逃出埃及后就直奔西奈山，历经两个月的艰苦跋涉后到达了目的地。耶和华在那里向他们显现，带着风暴之神的所有特征——“雷轰、闪电和密云”（出19:16）。耶和华与摩西进行对谈后向以色列民颁布了律法。代指摩西五经的“托拉”本身就有“律法”的含义，其主要内容是上帝所颁布的律法。根据早期犹太学者的看法，托拉中的律法共有613条。

这些律法大部分集中在三部主要的法集中。它们与古代近东其他几部已知的律法汇编一样，也常常被称为法典。但法典一语带有误导性，因为这些法集与《查士丁尼法典》或《拿破仑法典》等综合法典不同，也不会用于司法程序。此外，圣经文献集成中的一般性道德准则常收录于圣经的其他部分，例如先知书和箴言。因此，这些法集很可能反映了真实的律例。

图6　刻有《汉谟拉比法典》的石柱上端。《汉谟拉比法典》是圣经以外最为著名的古代法律汇编，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世纪，于1900年在现代伊朗的苏萨（Susa）被发现。右侧的太阳神沙玛士（Shamash）正在将象征王权的权杖交给汉谟拉比王。在浮雕下方的文本中，汉谟拉比讲述众神立自己为王的经过。“让公义遍满土地……让强者不再欺压弱者。”

这三部法集分别是《出埃及记》20:22–23:19的契约法典、《利未记》17–26的神圣法典，以及《申命记》12–24的申命法典。尽管契约法典和申命法典重叠很多，但二者仍然存在不少细节差异。基于这些异同，我们可以推定古代以色列具备统一的律法传统，但这一传统会因地区和年代而有所变化。

契约法典

律法是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组织原则、价值观和理想。让我们以契约法典为例来考察一下以色列的律法。契约法典可能是圣经诸种律法汇编中最为古老的，其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期。律法的内容涉及婚姻、财产、奴隶、偷窃、伤人、借贷、作伪证、各种形式的杀人和过失犯罪。穿插在这些民事和刑事条款中的还有宗教义务和禁忌。律法共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案例法，往往以条件句开头，例如“若……就……”、“当……的时候，就……”。另一种是像十诫这样的绝对法，它属于一般性的命令或禁令，常以“凡是……都……”、“你们当……”、“不可……”等句式开头。

案例法举例

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稼，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出22: 5–6）

邻舍的田地或者庄稼被损毁的方式还有很多，在案例法中可能没有提及；也可能案例法只涉及最典型案例，与此同时建立起总的原则：由于疏忽而造成他人损失的要予以赔偿。

这些律法所描绘的主要是乡村式的农业社会。居民生活在房屋中，聚居于村落或者小镇。他们种植的农作物有谷类、葡萄、橄榄，饲养的牲畜包括牛、驴、绵羊、山羊和狗。然而，对于在西奈半岛贫瘠荒野中宿营山脚的逃跑的奴隶来说，这种古今如一的典型的地中海经济却并不适宜。因此，这些律法必然源于以色列民安居在应许之地期间。而且与许多在叙事上联系于西奈山启示的材料一样，这些法集

打破了时间顺序，穿插在上下文之中。

契约法典所预设的社会中没有集权型政治组织，与此相对，申命法典中则涉及到了君王（申17:14–20）。尽管在契约法典的希伯来原文中没有明确提及真正的审判官，但司法程序很可能是在地方层级展开。申命法典对这一方面的记载就更为明确。虽然存在集权政府，但很多案件仍然是在地方上解决。《申命记》16章18节明确提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

然而，当一些案件无法得到解决时，例如出现矛盾证词且证据无法支持任何一方，此时则需要向地方的宗教权威提起上诉，宗教权威会用其他方式来裁定。

绝对法举例

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出21:15–17）

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出22:18）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23:19）

价值观

契约法典的律法反映了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之中，男性作为丈夫和父亲是一家之主，对于其家庭成员有绝对的权威。男性可以操控女性，尤其是女儿。女儿可以被卖为奴隶，而其价值取决于是否是处女。如果未婚的女儿被人引诱而发生关系，那么引诱者就必须给予其父亲一定的赔偿，所赔偿的实际上就是女孩因为失贞而损失的价值。

奴隶制在该社会中也是被认可的。律法对于如何处置奴隶有严格的规定，有些条款非常专横，例如，奴隶主如果殴打自己的奴隶致其

当场死亡的要受到惩罚，而殴打后一两天内才死亡的则免受惩罚（出21:20–21）。有些律法甚至十分残忍，比如奴隶在特定的为奴期间（为奴很可能是一种偿还债务的方式）的孩子在其为奴期满获得自由后仍须归奴隶主所有，如果奴隶不愿离开家人，可以自愿终身为奴（出21:2–6）。另一些规定在我们看来则相对文明，比方如果奴隶被主人虐待了，则主人需要释放这个奴隶（出21:26–27），当然前提是在奴隶制社会。

邻舍关系构成了该社会主要的横向关系（出21:14；22:7–8，10–14，26–27）。正如神圣法典所言："你要爱邻舍如爱自己"[1]（利19:18）。以色列法律中的邻舍意指以色列同胞，不一定是住在附近的人。与邻舍相区别的是陌生人或者（住在本地的）外族人，他们不是这个以色列族群中的正式成员，但仍然拥有一些权利，比如在安息日休息。关于异族人的（和其他法集中关于奴隶的）律法反复提到以色列民在埃及的经历："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作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出23:9）。这一规定其实就是在效法上帝：以色列民当纪念在埃及的经历，不单单要体谅那些处境相同的人，还要以上帝待以色列民的方式待他们。因此，神圣法典也命令道："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利19:34）。

先知书中还强调了对于弱势群体的义务。弱势群体包括居民中的外族人，穷人，还有缺少男性保护者的群体——寡妇和无父的。"无父的"常常被译为孤儿，但这种译法模糊了父权社会结构，因为圣经律法中孤儿的定义就是没有父亲的儿童。

《出埃及记》中有这样的律例："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2]（出21:15, 17）。"父母"并提突出了母亲的地位，对父权主导的社会或许能起到平衡作用。"打父亲的，必要把他治死"，如此表述在父权社会的环境下倒也在意料之中，但此处的确将母亲也包括了进去。有趣的是，《汉谟拉比法典》中也有类似律法，二者刚好形成对比："如果儿子打了父亲，应该砍去他的手。"这里只提到了父亲，对母亲只字未提，但惩罚较圣经律法却减

轻了许多。

在律法赐予以色列民之后，“约书”就正式生效了（出24:7——“契约法典”一名也由此而来），他们为此举行了一个仪式，以血立约。那么到底什么是“约”呢？

契约和十诫

契约是圣经传统中的核心主题之一。基督教圣经正典中的两个部分分别以“旧约”、“新约”[3]为名，足以证明契约的重要性。契约一词的希伯来语是*berit*，它在圣经中出现了约300次。该词本身为法律术语，意思是“合同”。事关国际关系、奴隶所有、婚配嫁娶的协议都要用到“合同”一词。圣经的作者用契约来形容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这种提法暗含着一层类比，即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君王，是以色列的宗主国，拜别神就意味着不忠或背叛。同样，上帝是以色列的主，以色列民族都是上帝之奴，理当听命于其主。此外，先知们还常常将上帝比为以色列的丈夫，二者如夫妻一般不容外人介入，拜别神就如同通奸。值得一提的是，古代近东有各种各样的合同，但以法律模型来描述神明与民族关系的，只有圣经律法而已。

圣经中有若干个人或群体与上帝订立了契约，其中包括挪亚一家及其后裔，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以及之后的大卫王及其王朝。最重要的契约则是上帝与以色列的西奈山之约。

在古代以色列法典或法集中，最著名的契约或合同要数十条诫命（Ten Commandments）了，但它的另一个名称十诫（Decalogue）更接近希伯来圣经中“十言”（ten words）的含义（申4:13）。十诫刻在两块石板[4]上，存放在约柜之中。

十条诫命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

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出20:2–17）

十诫的这一版本出自《出埃及记》20章。圣经中还有另外两个十诫版本。《申命记》5章中的是第二个版本。摩西临终之前，以色列民正准备进入应许之地，此时摩西创作了长篇训诲诗，回顾了以色列民出埃及后40年间的流离失所，并向以色列民重申上帝颁布的律法。然而，这些律法与早先《出埃及记》中的律法略有出入。《出埃及记》版和《申命记》版的十诫约有20处差异，这些差异大多无足轻重，但有一处至关重要，那就是守安息日的原因。在《申命记》中，守安息日是出于人道主义："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申5:14–15）。而在《出埃及记》中则是为了效法上帝："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20:11）。

《出埃及记》34章11–26节中也有十诫。根据圣经记载，摩西下了西奈山后，发现以色列民正围着一尊金牛犊欢喜雀跃，他气急败

坏，失手打碎了上帝亲手写下十诫的两块石板。于是，在惩罚完犯罪者之后，他返回山上，又求得两块石板。但这次拿到的“十言”与之前的相去甚远，其内容都是关于敬拜的合宜与否，因此学者们称这个版本为“礼仪十诫”。

古代以色列的十诫的内容随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各异。尽管有差异，但为了将各个版本都保留下来，圣经编纂者专为“礼仪十诫”设计了情节。这些不同版本也反映了不同的材料来源如何整合到圣经的最终版本之中。以《出埃及记》20章里的版本为例。这一版本有其独特的文字发展脉络：起初耶和华以第一人称说话，可能是由于后期文本内容的扩充，在两条诫命之后就转为了第三人称。

同契约法典一样，十诫源自一个父权至上的农业社会。它所面向的是成年男性，他们主宰着包括妻子、儿女、奴隶、牲畜和寄居的外族人在内的大家庭。对于女性，十诫仅是通过“父亲和母亲”的相提并论来暗示其地位并非很低（出20:12）。十诫现在被奉为永恒的道德法典，但这种看法忽略了它原初的背景，也掩盖了一些不当的价值观。十诫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规定了以色列民对上帝和对人的义务。第一部分开篇就要求唯独崇拜耶和华，但禁止拜别神并不等于严格的一神论。实际上，诫命承认其他神明的存在，只是禁止以色列民去崇拜。此外，以色列民的崇拜方式与其他民族也有所不同：不可作上帝的像，也不可作其他神明、人物、动物的形象；上帝的专名耶和华也不可用于任何的巫术、魔法和其他非法途径，因为耶和华是不可局限、不可操控的。最后，以色列人将每周的第七日尊为隆重的安息之日，这一习俗在古代近东独一无二，颇有些神秘色彩。

第二部分详细规定了以色列男性对同胞或“邻舍”应尽的义务：要尊重父母，即使他们已经年老；要充分尊重一个人的生命、婚姻、奴隶、法律地位和财产。如果以色列民谨守这些律例，那么他们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出20:12）。因此，这个契约是有条件的，以色列民能否在应许之地生生不息、繁荣兴旺，取决于他们能否遵行与上帝的约定。

圣经作者并没有区分对上帝的义务和对族群成员的义务。尽管我

们可以将宗教义务和刑法、民法、十诫，以及一般性律法区别开来，但这种做法不可取。既然律法为上帝亲授，而上帝又是所有律法的作者，也是宣誓效忠上帝的这个族群的创造者，那么触犯任何一条都是对上帝的冒犯。用神话语言来说就是："是神用指头写的石版"〔5〕（出31:18）。

因此，准确地说，上面所提到的各种法集不仅涉及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事务，也包括宗教义务，其中包括对各类宗教礼仪的详细规定，例如各祭祀和遵守圣日。透过法律和宗教律例的混合，我们看到了圣俗之间的彼此重叠，相互交织。

注释

〔1〕和合本译文为"却要爱人如己"。

〔2〕为了使中国读者更为明白，此处添加了圣经原文若干。

〔3〕原文中的Covenant与Testament同义，意为"约"。

〔4〕和合本译文为"石版"。

〔5〕和合本译文为"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版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版"。

第七章

以色列——“礼仪”之邦

一些立志要通读圣经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从开篇《创世记》到《出埃及记》前半部分读来并不费力，而《出埃及记》后半部分则充满了上帝所立的清规戒律，它们对圣物、圣日、祭司、祭祀以及洁净与不洁净作出规定，令不少读者囿于细节而不前，最终只得作罢。

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负责最后编订摩西五经的人是祭司。古代祭司将这些名目繁多的规定一丝不苟地分别记载下来，并且乐此不疲，这为后代留下了很多记录，其中既包括以色列不同时期的宗教礼仪，也有编者们眼中未来施行礼仪的理想方式。

不单《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对各种宗教仪式有着详细记录，纵观整部圣经，关于各类仪式和节日的记载随处可见。每个社会都有这种程式化的行为和仪式来纪念重要时刻。

有些宗教仪式与人生历程有关。圣经中有许多关于出生、成年、结婚以及死亡的礼仪。呱呱落地时有命名仪式，几年过后又有原本可能属于成人礼的割礼。此外还有屡次提到的婚礼，比如《诗篇》45篇就是皇家婚礼的颂歌。然而，圣经对真实的婚礼仪式却鲜有提及。圣经中还有对悼念仪式的记载，包括禁食、象征性的自残、哀悼和下葬。也许是因为此类仪式在家中举行，而编纂礼仪的祭司们对由自己主导的宗教仪式更感兴趣，所以圣经对此类古代以色列仪式只有零星记载。

祭司

圣经所描述的大部分仪式都由各个阶层的祭司主持。祭司阶层都是男性，代代世袭，多个世纪以来其结构一直在变，不变的是祭司只能由利未支派的人来担任，最终则由该支派的分支——亚伦的后代来担任。亚伦是摩西的胞兄，是《出埃及记》中的第一位大祭司。

人类学家将这些祭司称为礼仪专家。同先知、文士等人员一样，

祭司也都训练有素，恪尽职守。他们的职责范围甚广，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掌管以色列民每天、每季或不定期的献祭。许多祭品都将分给祭司，这也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圣经对这些祭品着墨甚多，并根据场合对其加以分类。

有些祭品是为了解决“不洁”的问题。这种“不洁”可能源于某种疾病，因此，祭司有时也是医务人员。祭司们还需要解决一些司法争端，或解读上帝的旨意，尤其是通过占卜来解读。

献祭仪式举例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作摇祭，摇一摇。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作举祭，奉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分。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作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分。’”（利7:28–34）

以色列的节期

古代以色列的三大宗教节日原本都是区域性的庆祝活动，参与者需要赶赴当地的祭坛来庆祝。这些节日对应的希伯来词字面意为“朝圣”（*hag*，该词与阿拉伯语的*hajj*一词有关，指穆斯林去麦加朝圣）。这些节日与农业生产也有关。例如，早春之际有除酵节，此时人们要收割前一年深秋种下的大麦。同一时期还有逾越节，此时则要献上初生的羔羊为祭。除酵节和逾越节分别源于种植和畜牧两种社会经济背景，但这两个节期很早就合二为一了。

逾越节后七周（50天）便是七七节（希伯来语为*Shavuot*），这是古代以色列的第二个节日，时逢冬小麦丰收。这一圣日名为“收割

节”（出23:16）或者“初熟之物”[1]（民28:26），后来又被称为“五旬节”，源于希腊语中的“五十”。

农业性节日过后就是“收藏节”（出23:16），时值初秋七月，正是葡萄、橄榄等各种水果收获的日子。这个节日又称“住棚节”（希伯来语为*Sukkot*），多半因为摘收果子的人——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是雇工，都要在田地里的临时建筑中过夜。圣经提到在七月还有“赎罪日”（希伯来语为*Yom Kippur*，利23:27–28，25:9）。在这个节期中会举行洁净仪式，使圣所、祭司和以色列民为秋收节而做好准备。这一圣日在后来的犹太教传统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图7　公元前8世纪的陶俑，高约8.5英寸，塑造的是一位正在演奏手鼓的女性，表现了古代以色列女性参与敬拜的方式。

了解上述背景后，我们来设想自己身处当地的祭坛，方圆数里的男丁或整个家族齐聚在此庆祝丰收的情景。崇拜者们走向祭坛，唱起

颂歌，歌声中还夹杂着待宰绵羊和山羊的咩咩声。众人将祭品交于身着彩色礼服的祭司。祭司燃起献祭的香，香气氤氲，足以掩盖之后宰杀祭牲的腥臭。整个仪式期间颂歌不断，并有各式乐器伴奏。空气中弥漫着欢快的气氛，随着仪式的展开，各种声影气味彼此交织，生动而又嘈杂。

以色列人的节期还有很多，每个节期都有自己的历史。他们有每日的献祭，每周的安息日献祭，还有每个新月出现时的献祭。随着犹太传统的发展，又出现了许多其他的圣日，如冬至时的献殿节（Hanukkah）[2]，该节日纪念的是马加比成功推翻希腊统治并于公元前2世纪再献圣殿。此外还有深冬时分的普珥节，它很可能源于一种巴比伦仪式，后来被吸收进犹太教，最终在圣经的《以斯帖记》中得到确立。

逾越节

纪念出埃及的逾越节是一个重要节日，它向我们展示了古代以色列礼仪的历史是何等复杂。在后圣经时期的犹太传统中，逾越节是在家中庆祝的，《出埃及记》12章3–8节中就有相关描述。然而，根据其他一些文本，逾越节同七七节和住棚节一样，都要在特定的地点集中庆祝，要么在当地的祭坛，要么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据说在公元前8世纪末希西家王和公元前7世纪约西亚王的统治时期，全以色列的朝圣者都会去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根据新约福音书和其他资料来源记载，公元1世纪时也是如此。

逾越节要在春季庆祝，为期一周，始于正月十四（出12:18；利23:5）。以色列人的民事历[3]将一月放在秋季，于是秋季新年也成为了犹太民族的一个圣日——罗施哈沙那（Rosh Hashanah，字面意为“一年的开始”）。由此看来，以色列民的新年有时在春季，有时在秋季。

这一春季圣日的名字颇有渊源。在两种古老的礼仪历法中，它被

称为“除酵节”（出23:15，34:18），与另外两个朝圣的节期相并列。三个节期均与农业生产有关，除酵节是为了庆祝早春大麦的丰收。因此，在这个务农者的节日里，人们把新收的一部分庄稼作为祭物带到当地的祭坛。在稍晚的文本中，除酵节与逾越节（希伯来语为*Pesah*）合二为一，《利未记》23章5–6节记载道：“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而在合并前，逾越节的主要仪式是宰杀羔羊，很可能是牧民的节日。

*Pesah*一词的核心含义可能是“保护”。春季宰羔羊献祭是为了请求上帝保护羊群及其所有者。然而，该词可能还有一层含义，这便是“逾越”。以色列民将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当耶和华穿过埃及地时就会“越过”他们的房子。

第二层含义也说明了合并的除酵节和逾越节是如何与出埃及联系起来的。然而，其联系方式因资料来源不同而各异。最早的礼仪历法仅仅提到日期——“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因为你是这亚笔月内出了埃及”（出34:18）。另一处文本不仅提到年代，还提出了吃无酵饼是因为以色列人在逃离埃及时非常匆忙，面团都来不及发酵（出12:39）。本来从饼中除酵是为了使其免受旧酵母的污染，旧酵母指的就是老面团。这种饼又称为“困苦饼”——“因为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申16:3）。同样，羔羊作为头生的替代品又与击杀埃及头生联系在了一起，作为祭品的以撒的故事（创22）和礼仪十诫中（出34:18–19）都有相关记载。

可见，除酵节和逾越节原本是两个独立的节期，在很早就合二为一，并且都与出埃及相联系。这种联系随着逾越节仪式的发展而得以在犹太传统中持续下去。例如，现代典型的逾越节晚宴上一定有甜酱（*haroset*）和青菜（*karpas*）。甜酱由多种水果、果仁和香料制成，代表以色列民为奴时用来砌砖的泥浆；青菜则是浸于盐水中的芹菜，用来纪念他们的苦役。

原本的不只有季节性节日与出埃及所发生的这种联系，也见于七

七节和住棚节这两个朝圣节日。在早期的圣经文本中，它们仅是农业性的节日，“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出34:22）。而在后圣经时代的犹太传统中，七七节却变成了纪念西奈山颁赐律法的节日。即便在圣经时代尚未完结之时，秋收时的收藏节，也就是住棚节，让人想起以色列民出埃及后在旷野流浪的40年间所住过的临时建筑（利23:42）。

根据《出埃及记》12章43–49节，只有受过割礼的以色列民才能参与逾越节。外邦人和奴隶如果要参加就必须先受割礼。然而逾越节原本是全家均可参与的，如此规定似乎有悖初衷，但后来它成为了全国性朝圣节日，且仅限男性参加，于是这一规定也就名正言顺了。不仅如此，《民数记》还加了一条，就是礼仪上的“洁净”，圣经律法中始终贯穿着这一概念。

洁净与不洁

《民数记》9章10–13节规定，不能在指定时间庆祝逾越节的人要在一个月之后补过。推迟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此人当时在旅行途中；二是此人接触了尸体。接触尸体将导致不洁，因此大祭司是不允许接触尸体的，即使去世的是他的家人。《利未记》和《民数记》中有许多区分洁净与不洁的条款[4]。人、动物、房屋、衣服和食物等也由此被分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只有洁净的方可在仪式上出现，否则就要被排除在外。

关于这种区分的起源并无定论。某些关于不洁的规定可能反映出人们对于传染病的警觉，如皮肤病或者非自然的身体分泌物都会使一个人不洁，此人也会因此被隔离。直到祭司证实其已变得洁净，并且已按要求献上祭品，隔离才会结束。其他关于不洁的规定则与一些原始禁忌有关，尤其是性和死亡。遗精、月经、生产都会使人不洁，其影响与接触死人或者死去的兽类是一样的。

食物也有洁净与不洁之分。饮食是一种文化的符号之一。也许正

因如此，一些文化会禁食某些食物，例如猪肉。其他的禁忌可能是为了维持秩序感，例如一块地不允许播种不同类的种子；亚麻和羊毛不能出现在同一件织物上。

如此一来，一个触及生活方方面面的系统就形成了。这个系统由祭司阶层来掌控，他们决定一个人是否已变洁净，作为报偿，他们会得到献祭中的部分祭品。

圣咏

圣经的叙事性书卷中穿插着十几首诗歌。米利暗和众妇女在逃出埃及后咏唱的〔5〕是胜利之歌；大卫在其密友死后吟诵的〔6〕是哀悼之歌；还有一些是祈求上帝谅解的祈祷等。

叙事书卷中的一些诗歌和《诗篇》中的相同。《诗篇》是圣经中最长的书卷，因此内容也最庞杂。它实际是古代以色列的诗歌总集，涵盖了源自不同祭坛、不同时期的诗歌，并于圣经时代晚期结集成册。其中诗歌的种类和体裁有十余种，每首可能都有配乐。个人哀歌最为常见，它所表达的是主人公怀着祷告必蒙垂听的信念向上帝求助，以及祷告得蒙垂听时的感激之情。个人哀歌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表达的内容有信任和感谢等，这些部分都可以独立成章。《诗篇》中还有集体哀歌和颂歌，它们赞颂了耶和华，创造主和以色列的救赎者。《诗篇》中大部分内容都不可考，这也增加了确定日期的难度。也正因如此，这些诗篇不断被各个时代的犹太人和基督徒用于敬拜上帝。

注释

〔1〕初熟之物的英文first fruits在和合本的《民数记》28章26节依然译为七七节，但是在《利未记》2章14节等处被译为初熟之物。

〔2〕献殿节（Hanukkah），又称为“光明节”（Festival of Light）。

〔3〕以色列人使用两种历法：一是宗教历，依天体运行而制定；二是民事历，依农业生产而制定。

〔4〕 洁净和不洁的英文分别是: purity（cleanness）和impurity（uncleanness）。原书作者认为cleanness和uncleanness为误译。

〔5〕 出自《出埃及记》15章21节。

〔6〕 出自《撒母耳记下》1章17节。

第八章

先知有话要说

圣经中，有许多被称为先知的人，还有约15部以先知名字命名的书卷。现代英语中的先知通常指可以预见未来的人。但这只是先知预言的一层含义，实际上，先知的首要角色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正因如此，尽管摩西不是可以预见未来的人，但他却是圣经中最伟大的先知。古代犹太教的旁支对先知的理解也大致相同：在基督教中，摩西和耶稣都是先知；在伊斯兰教中，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是先知。这些元老级先知的主要作用并非预言，而是向其门徒转述上帝的话。

下面这段关于先知的隐喻就体现了这层含义：

>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先知）。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出7:1–2）

在这个类比关系中，摩西就好比上帝，而亚伦则是他的代言人或先知，法老是听众。由此可见，先知起着中间人的作用。先知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传话的人，确切地讲是神明的代言者。

辨明神意

几乎所有前科学时代的人们——有些现代人也不例外，都认为许多事件是由宇宙的某种支配力量所引起的。因此，在他们看来，地震、饥荒和干旱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超自然现象，是由某位或某些神明发起的。梦境、天体运动，甚至云的形状、鸟群的队形等一些看似随机的现象也被认为与神明有关。对于解释这类现象的行为，我们有个很适当的名字——占卜。

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准备进攻耶路撒冷，《以西结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来描述这位巴比伦王：

> 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他摇签（原文作"箭"）

求问神像，察看牺牲的肝。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结21:21–22）

尼布甲尼撒似乎在想方设法求神明给予军事策略上的指导。以色列君王也会通过先知或其他方式求问上帝可否进行战斗。美索不达米亚曾出土数千个泥塑动物肝脏，上面铭刻着解释卜筮的方法。这些铭刻的文本名为预兆文本，它们的出现解释了上文中的“察看牺牲的肝”。圣经中尼布甲尼撒还用过其他的占卜方式。例如先知以利沙多次用箭来预测王的胜利（王下13:14–19）。圣经中还常常提到掷签，相当于现在的抽签和掷硬币，此外还有利用诸如以弗得和神像等神秘物品的占卜。任何占卜形式都有宗教层面。比如耶和华藉由“梦、乌陵（类似骰子的器具，配合以弗得来使用）和先知来回应众人”（撒上28:6）；掷签被用来解决争端（箴18:18）。

由于占卜过程和现象不易理解，因此绝大多数古代社会都有一些男女来对其进行解释，他们被同时代的人认为具有特殊的，甚至是神赐的洞察力，在许多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从手相师、算命师、巫师，到受神灵启示的预言者或先知，人们从事的占卜活动多种多样。

有关先知的记载尤其多，很多不同时期的古代近东文本都有涉及。这些文本有的来自幼发拉底河北部的马里[1]古城，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初期；有的源自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上半叶的亚述；有的则散布于勒万特（Levant）[2]地区，年代贯穿了公元前的两个千年。由此可见，预言现象在当时是极其普遍的。圣经作者还提到了邻邦的先知，如被摩押王雇来诅咒以色列民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先知巴兰（民22–24），以及迦南神明巴力及其妻子女神亚舍拉手下的众先知（王上18:19）。预言起初也许会被认为是圣经独有的现象，是独一真神给予其选民的启示。然而，圣经本身的记载却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

当然，圣经对这些先知的描述最为详尽，因为无论对于圣经作者还是圣经的受众，甚至是对于整个古代以色列社会，先知和预言都至关重要。旧约中被提及姓名的先知有几十位，其中有男有女，无名先知则更多。和在其他古代社会一样，先知的作用各不相同。“先见”[3]

或者“神人”可以帮助寻找丢失的东西。除先知外，圣经还提到了观兆、占卜、行邪术、施咒和交鬼。许多行为虽然被严禁，其中一些在公元前7世纪晚期约西亚王进行宗教改革后被禁止，但它们在圣经中的频繁出现说明这些行为在古代以色列是很普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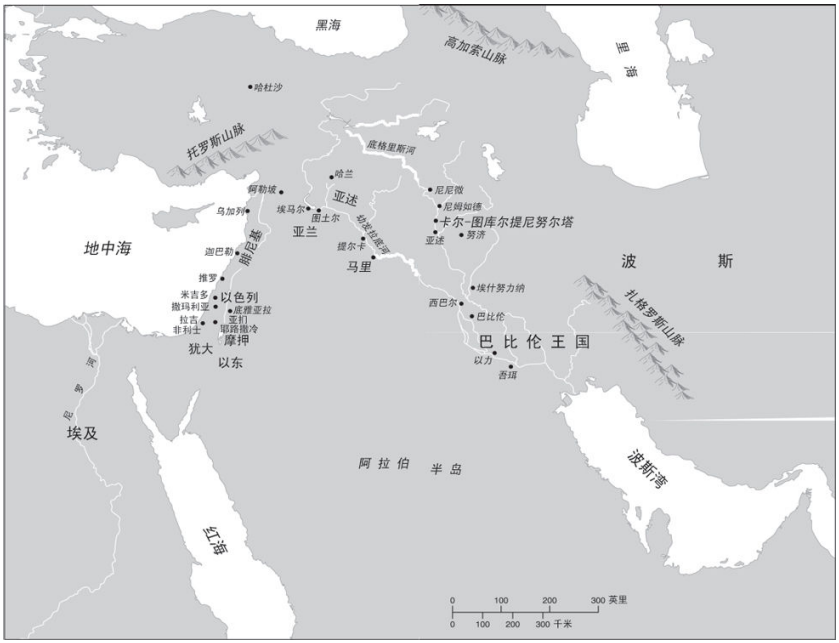

图8　古代近东的地图，用斜体标出的是先知所在的城市。

许多宗教中的圣徒、萨满巫师、神秘主义者等人物有时之所以处于社会边缘，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奇行怪语。圣经和非圣经来源中都有这样的例子：先知在宣讲信息之前会进入一种迷狂状态。刚刚受膏被立 [4] 的扫罗王在“受感说话”时就变成了“新人”（撒上10:6）。有时音乐也能使人达到这种迷狂状态（撒上10:5；王下3:15）。此时有人会赤身裸体（撒上19:24），有人会自伤自残（王上18:28；亚13:6），还有人会出现其他不正常行为，例如先知以西结曾长期侧卧，并且缄默不语。

一位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先知

下文节选自努尔辛（Nur-sin）的书信，此人是马里国王基姆利里姆（Zimri-Lim）的使节。马里是公元前18世纪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城市。

阿勒坡（Aleppo）之主、暴风之神阿达（Adad）的一位先知在阿布哈里姆（Abu-halim）面前对马里王说："我不是阿勒坡之主阿达吗？我不是将你举到我的膝上，将你祖先的王位还给你的人吗？我对你别无所求。当有含冤的人向你呼求，停下脚步为他们伸冤。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如果你按我所写给你的去行，留心我的话语，我就将太阳升起到太阳落下的土地赐给你，你的土地将大大加增。"这是阿勒坡之主阿达的先知在阿布哈里姆面前所说的。我主应该知道这些。

这个神谕向统治者保证了神明对他的支持。无独有偶，先知拿单也曾宣讲耶和华对大卫家世代为王的应许（撒下7:4-17）。

同其他文化一样，圣经中也有关于先知超凡能力的传说，其中以利亚和以利沙的能力显得尤为突出。据说他们曾令食物数量翻倍，使疾病痊愈、死人复活、毒物变无害，甚至令遗失约旦河底的斧头浮上水面。他们还借助神明的力量，唤火从天上降下，将熊召出树林撕裂无礼的少年。他们的力量甚至延续到死后。例如，以利沙的骸骨能使尸体复活。后来的先知也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迹，比如以赛亚能使太阳投射的影子倒转方向，此外他还有医病的异能。

并非所有先知都是社会边缘人物。圣经中详细记载了多位先知的生平，其中阿摩司出身农夫，耶利米和以西结原为祭司。纵观古代近东世界，包括以色列在内，许多先知都与统治者关系密切。因为许多古代近东文献都出于皇室精英的手笔，所以我们很难知道皇室委任的先知占多大比例。一些圣经先知担任着皇室官方或半官方顾问，如迦得、拿单、以赛亚和耶利米。许多先知据说还参与了君王的选立甚至

加冕，其中包括以利亚、拿单、亚希亚，很可能还有以赛亚。同时，由于先知的权威被视为上帝所赋予的，所以他们常常以上帝之名批评君王。

有些先知专司其职，他们要师从一位先知并接受一定时间的训练。老师就是学生们的“父”（见王下2:12，13:14），学生们则是“先知的儿子”[5]（王下4:38）。其他一些先知看上去则是业余的，例如先知阿摩司曾自述：

> 阿摩司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摩7:14–15）

阿摩司称自己虽然未受专业训练，却是一位真的先知，因为他受到了呼召。

启示的方式

先知及其同时代的人都相信，神明会直接与先知进行特殊的交流。这种交流通常表现为话语和异象，这要求先知既要听，又要看。例如，非以色列籍的先知巴兰形容自己“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民24:4）。同样，《阿摩司书》开篇提到“……阿摩司得默示论以色列……”（摩1:1）。先知受到启示的惯用表达为“耶和华的话临到”，而后先知以耶和华的名义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所传的信息被称为神谕，这一术语来自古典时代。

但是先知们究竟如何获得启示呢？渠道之一就是梦。为在梦中获得神明启示，他们要在特定的圣地过夜，这一过程名为“潜伏”（Incubation）[6]，许多资料证明了它的存在。那么先知口中的神明启示究竟是其深刻内心体验的外化还是他们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现代批判的观点否定了后者，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关键都在于内心的体验，以及先知及其听众所达成的共识，那就是这种体验来自神

明。

在关于启示的描述中，最常见的就是一些先知声称自己曾经见证甚至参与了众神议会的讨论。在古代以色列的宗教中，这种议会由耶和华主持。例如先知米该雅曾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王上22:19）。同样，先知耶利米也宣称只有他曾站在耶和华的会中，而不是那些假先知（耶23:22）。

以赛亚的异象

先知以赛亚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他参与神的会议，并在会上受命向上帝的子民发预言的情景。

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赛6:1–3，8–9）

经典先知书

先知在公元前8世纪之前的圣经叙事中频频登场。他们的故事往往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撒母耳记》和《列王纪》中，这些先知事迹被归入犹太传统的前先知书中。然而，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预言，至少是一种传达预言的新体裁。此时的先知被称为写作先知，或早期先知，他们的言论收录在后先知书的若干书卷中，包括长篇的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以及《何西阿书》和《玛拉基书》之间的12部较短的小先知书。

至少有两个因素推动了先知书的发展。随着文字能力在古代以色列的普及，先知的神谕可以由先知本人或其门徒写下并收集起来。二是以色列与近东强国——尤其是公元前七八世纪的亚述和公元前7世纪晚期至6世纪的巴比伦——之间的交锋日渐升级并最终被征服。分裂后的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虽然不敌亚述和巴比伦帝国等超级大国，但却遏制了它们向埃及等地的扩张。先知就是这些事件的重要发言人。

预言书大致包括两类材料，一种是预言性的神谕，即先知的话，常以诗体出现；另一种是散文叙事，内容为先知本人或他人叙述的先知事迹。这些材料的编排方式往往很难断定。一些书卷以精确的日期和年代排序，如《以西结书》和《哈该书》，但很多书卷并没有明确的编排原则。此外，大部分先知书都经过了整理、编辑和补充，有其各自的发展过程，篇幅较长者尤其如此。

预言性书卷较为复杂。以《阿摩司书》为例，这部书卷是经典先知书中最早的，且篇幅较短。同大多数先知书一样，《阿摩司书》开篇介绍先知本人的生平。之后是一篇较短的神谕，阿摩司藉此宣布耶和华的审判。《约珥书》中也有同样的神谕，这种内容的重复在先知书中并不罕见。《阿摩司书》中第一大部分是一连串相同模式的神谕，内容为耶和华先后宣布对以色列周边各国及以色列的审判；接下来的神谕和预言性质有关，且没有明显的编排原则；之后的一些神谕批评以色列及其民族内的某些阶层，尤其是居住在都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精英们；紧接其后的是片段式的诗歌、关于灾难的神谕、先知以第一人称描述的一连串异象（这些异象不可归为一类）、以第三人称介绍先知的一篇散文；最后又是一篇神谕，应许上帝将复兴大卫的王朝，而这个王朝现在已然衰亡。以上所有内容仅仅用了九章！

阿摩司活跃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那时勒万特地区的各个小国都相对自主且繁荣，如以色列、犹大、亚兰–大马士革、亚扪、摩押和推罗等。亚述帝国于公元前9世纪开始加紧扩张。由于亚述帝国被东部和南部边境问题困扰了几十年，勒万特西部各国迎来了短暂的安宁。但亚述不久还会卷土重来。阿摩司在其神谕中预见了亚述的再度

入侵及其后果。

亚述人对待沦陷区的政策广为人知：他们一般会推翻当地的统治家族，摧毁其首都和主要城市，把精英驱逐至帝国的其他地区，并使其他地区的移民迁入该地，最终使该地成为亚述的一个行省，由亚述王指派总督管理。这些正是由阿摩司宣布的。例如他对大马士革的预言就是都城和要塞被毁，统治者家族下台，人民被放逐（摩1:4–5）。以色列的其他邻邦也会面临相似的命运，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也是如此，那些居住在都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贵族将被放逐（摩6:1–7, 7:11）。

悲剧不幸被阿摩司言中。公元前732年，大马士革被亚述人攻陷并摧毁，公元前22年撒玛利亚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两地都沦为亚述的行省。犹大国在公元前734年成为了亚述的附庸国，亚述人得以喘息片刻。当发现犹大不甘臣服时，亚述军队又在公元前701年包围了耶路撒冷。因此，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讲，阿摩司的确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事，但亚述和巴比伦所采取的行动其实是不言自明的。对于《阿摩司书》1–2章之类的文本，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它的预测，而是它对于亚述进犯的解释。以现代历史学的视角来看，亚述的征服在所难免，因为一些小国妨碍了这个拥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大国的扩张。但是，对于阿摩司及之后的何西阿、以赛亚、弥迦和耶利米等先知来说，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阿摩司反复宣称亚述进犯是耶和华的旨意：

> 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摩5:27）
> 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摩6:8）
> 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啊，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摩6:14）

阿摩司和一般的先知书作者一样，强调上帝对于人类历史的掌控：君王的战败、城市的沦陷、国家的灭亡最终都归因于上帝。耶和华对其子民发怒，于是使用其他国家的力量来惩罚他们，因为他们不遵行与上帝订立的约。这就是先知们的洞见，是他们对所处时代事件的解读。

立约的使者

先知的言行与其时代密不可分，但无论是哪个时代，有一条信息始终不变，那就是过去、正在和将要发生的都是耶和华的作为。他是“全地之主”（诗97:5），不只主宰以色列，还包括整个世界。然而，他的主要关注点还是以色列，他的选民。

以色列人曾在西奈山与上帝立约，但他们却没有遵行。这一圣约的主要内容就是十诫，其诫命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要按照上帝规定的方式唯独敬拜他；二是要以色列人关爱自己的同胞。遵行这些诫命就可蒙得上帝恩典，否则就会招致惩罚。恩典是他们会在耶和华所赐的土地上世代繁荣，惩罚则有多种形式：干旱、饥荒，尤其是被敌人攻击、打败，而后被流放。

所以，无论是公元前8世纪中期的阿摩司，还是几十年之后的以赛亚，抑或是公元前6世纪初的耶利米，都打上了各自的时代烙印，他们以特有的神学视角来解释时代，即一切经历、悲伤、苦痛、受到的奖赏和惩罚统统来源于上帝。先知宣告上帝的审判，用《玛拉基书》（3章1节）中的话来说，他们是“立约的使者”。他们一致谴责以色列民敬拜别神，对人不公，屡次背弃所立的约。如同圣约一样，这些谴责有时也体现为法律诉讼的形式，由耶和华借先知之口控告以色列民破坏约定，并宣布惩罚即将来临：

> 以色列人哪，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 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
> 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
> 但起假誓、不践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
> 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何西阿书》4章1–3节）

在这一段中，公元前8世纪的先知何西阿援引十诫来敦促以色列民回归原初的道德原则，而耶利米在7世纪晚期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

规劝：

> 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耶利米书》7章5–11节）

耶利米强调，尽管大卫王朝的历代君王都豪言上帝会永远保护他们和都城耶路撒冷的圣殿，但这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西奈之约。先知以这一框架来解释过去、现在和不久的将来。他们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宣讲信息，对象则是同时代的人——有时是个人，尤其是君王；有时是族群中的某些阶层；有时则是外邦人——至少言语上是如此；然而，最多的还是对整个以色列民族。

但以色列民并未谨记先知的话。他们没有遵行唯独敬拜上帝和爱邻舍的诫命，结果自然是受到应得的惩罚。于是，审判如期而至。契约中的诅咒一一应验：他们的城市被摧毁，土地被掠夺，自己也被流放。北国以色列于公元前722年沦陷，而南国犹大也在公元前6世纪初战败亡国。

先知和未来

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86年被摧毁，民众也被流放到了巴比伦。国破家亡之后，先知们也再次话锋一转。他们越来越关注未来的复兴，盼望重现往日的荣耀，如同公元前10世纪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时期那样独立繁荣。在关于公元前6世纪事件的预言中有一些对未来繁荣景象的描写，其中以《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的40–66章最为详细。《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并非成书于以赛亚所在的公元前8世纪晚期，而是两个世纪之后。随着先知书在后来不断被修

订，其他先知书中也有了对未来的期盼。

但是，上帝应许的这些盼望并不会立即实现，而是许在遥远的未来——“末世”（end time）。届时，史前和历史时期的邪恶势力都将被耶和华及其天军击败。此类信息带动了启示文学的发展。在圣经中，《以西结书》40–48章和《撒迦利亚书》9–14章是早期的启示文学，到《但以理书》7–12章则发展得更为成熟，而新约的启示文学就是启示录。

早期的基督徒相信随着拿撒勒人耶稣的出现，末世已经来临，把旧约中的先知书视为对耶稣最终来临的预言，在正典中位于新约之前。然而这样的解读忽视了先知本身所处的时代。也许基督教读者并不知道，在希伯来圣经的原文中，弥赛亚 一词（英语为Messiah，希伯来原意为“受膏者”）意指过去和现今的领袖，而非未来的领袖。

未来的希望

恢复往昔荣耀，盼望未来繁荣，这一信念是后来才编入早期的预言书中的。以《阿摩司书》结尾的一段话为例：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
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
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
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
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
大山要滴下甜酒，
小山都必流奶。
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
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
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
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
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

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
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摩9:11–15）

注释

〔1〕 马里，1930年间发现的一座苏美尔古城，位于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西岸。

〔2〕 勒万特（Levant），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家和岛屿，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等在内的自希腊至埃及的地区。

〔3〕 “先见”，含义与先知相同，出现时期早于先知一词。参见《撒母耳记上》9章9节。

〔4〕 以色列社会中先知、祭司和君王在就职之前都要进行受膏仪式。所谓受膏就是将一种被称为香膏的昂贵的液体香料从受膏者的头上浇下。

〔5〕 和合本意译为“先知的门徒”。

〔6〕 该词的译法取自潜伏神谕（Incubation）词条，霍桑、马挺主编，杨长慧译，《21世纪保罗书信词典》，校园书房出版社，2009年5月。

第九章

希西家与西拿基立

公元前701年，亚述王西拿基立（Sennacherib）出兵南国犹大，包围了耶路撒冷。许多考古证据都可以证明这场灾难，《列王纪》、《以赛亚书》，以及西拿基立自己的史料中都有明确记载。它有助于我们研究先知及其所处时代的历史事件的关系，了解圣经和圣经之外的材料如何互为补充。

在公元前8世纪的后半叶，亚述帝国的国力达到了顶峰。它开始向埃及扩张，并于公元前671年征服埃及。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地中海沿岸的附庸小国阻挠了亚述的扩张之路。它们常常随风倒，甚至还发起叛乱。在这些小国中，大马士革于公元前732年被灭，北国以色列则于公元前722年亡国。以色列南边的邻国犹大则幸存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偏远，远离海上要道；另一方面是由于从公元前8世纪30年代开始，南国犹大就已甘心向亚述纳贡称臣了。

然而，公元前8世纪末，正当亚述忙于处理其本土周边的内务时，犹大王希西家（Hezekiah）与包括埃及法老在内的其他地区君主结盟，共同反抗亚述帝国的统治。刚刚在公元前705年登基的西拿基立对此反应十分迅速，立即采取了强硬手段。在公元前701年的一场大战中，西拿基立率军南下，横扫地中海沿岸，将叛变的统治者赶下台，扶植傀儡政权，并强令各国纳贡。这一次犹大未能逃脱厄运，主要城池都被攻破并摧毁，首都耶路撒冷也遭围城数日，直到希西家王投降并缴纳巨额贡品之后方才解围。

西拿基立讲述耶路撒冷之战

在下文中，西拿基立以第一人称讲述公元前701年他攻打犹大的那场战役：

至于犹大王希西家，他不肯屈服于我的轭，我出兵包围了他的64座城邑，所围困的小镇不计其数。步兵用攻城梯和撞城锤等攻城器械，最终将这些城邑全部攻破。我俘获男女老幼共200,150人，还夺取马匹、驴骡、骆驼

和牛羊无数。我将希西家封锁在他的王城耶路撒冷之中，如同笼中之鸟。我用土堆工事将这座城市围绕，他连城门都出不来。我从他土地上夺取的城池，都分别赐给了亚实突王米汀提、以革伦王巴底和迦萨王西里贝尔，他的土地因此减少。我要求他在保持以前的贡品之外，每年还要进献更多金银和礼物给我——他的宗主国！

希西家为我亚述国威所震慑，在我准备回到我的王城尼尼微的时候，他将最精锐的部队和最好的战士赠予了我，这些军人是他之前调入耶路撒冷的援军。他赠予我的还有：30他连得 [1] 金子、800他连得银子、上好的锑、大块的红宝石、镶嵌着象牙的床和扶椅、象皮、象牙、黑檀木、黄杨木、多彩滚边的衣服、亚麻衣、紫红色和蓝紫色的（染色）毛料、红铜、铁、青铜或锡制成的器皿、双轮战车、攻城盾、长矛、盔甲、腰间佩带的短剑、弓箭、无数的马饰和各类其他的战时用品，此外还有他的女儿、宫女和男女伶人。他还遣使臣来纳贡称臣。

圣经关于西拿基立入侵的一段记载

圣经作者的记录与西拿基立的记录基本一致，肯定了西拿基立自述中的基本内容：

希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希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希西家银子三百他连得，金子三十他连得。希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希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王下18:13–16）

关于这些事件，我们现在拥有诸多独立的材料来源。例如西拿基立本人所著的亚述文长篇叙事，其中有许多抄本留存至今；西拿基立王宫遗址的一个房间里保存的一系列浅浮雕石板，上面刻画着西拿基立攻破犹大南部城市拉吉的情景；还有大量考古学证据，证明了犹大

地区的毁灭以及希西家为抵御围城而进行的大规模备战。此外，圣经中的《列王纪》、《历代志》和《以赛亚书》对于这次事件也有记载。每种材料来源都需要在基于共同事实的情况下得到解释。

考古学证据

西拿基立的自述和《列王纪下》中都有这样的记载：作为其作战行动的一部分，西拿基立向犹大的主要设防城市发动进攻，以消灭反抗势力和首都耶路撒冷城外围的防御力量。犹大国的众多遗址上均有战争遗留下的层层灰烬和瓦砾，其中最著名的非拉吉古城莫属。亚述首都尼尼微的西拿基立王宫墙壁上的浮雕直观地描绘了拉吉沦陷的景象。考古学证据和浮雕的内容相吻合，共同见证了亚述帝国的穷兵黩武。

为应对耶路撒冷之围，希西家加固城防，将城墙扩建至米示尼（Mishneh），这是一个最近才发现的地区，又称第二区（Second Quarter）。这一部分城墙随着考古挖掘而重见天日，其建筑年代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

另一项考古学依据是一条长1,700英尺的地道，位于原耶城的中心地带大卫城地下。早在19世纪初，学者们就发现了这条地道，并认定它是犹大王希西家在公元前8世纪末所建：

> 他（希西家）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王下20:20）
> 这希西家也塞住基训的上源，引水直下，流在大卫城的西边。（代下32:30）

这条地道是一条输水道，其源头名为基训（意为“自涌泉”），位于耶路撒冷城防御工事的东面，是耶路撒冷城的主要水源。这条水道把水引入城内西侧的一个蓄水池——西罗亚池。

水道南侧尽头的墙壁上有一幅著名的“西罗亚水道石刻”，上面共有六行文字，内容并不完整，也许是因为在1880年被发掘后不久，有

些内容就被人凿下带走了。石刻描述了两队工人如何从水道两端开始施工，然后在接近水道中间时相遇。他们先“听到工人呼叫同伴的声音”，之后“凿子碰凿子”接上了头，这时“水流蔓延了1,200肘尺[2]，从源头流入了蓄水池”。尽管这段石刻由典雅的古希伯来文写成，但却不像官方所立的竣工纪念碑，因为上面并没有提到建造这条水道的国王的名号，也没有日期，而且它的位置也不是普通纪念碑文应当出现的位置。因此，这些文字也许是出自某个大工程师或工人们的手笔。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这段文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末，它回顾了犹大人为抵御亚述围攻所进行的准备，与圣经的几段简短记载也遥相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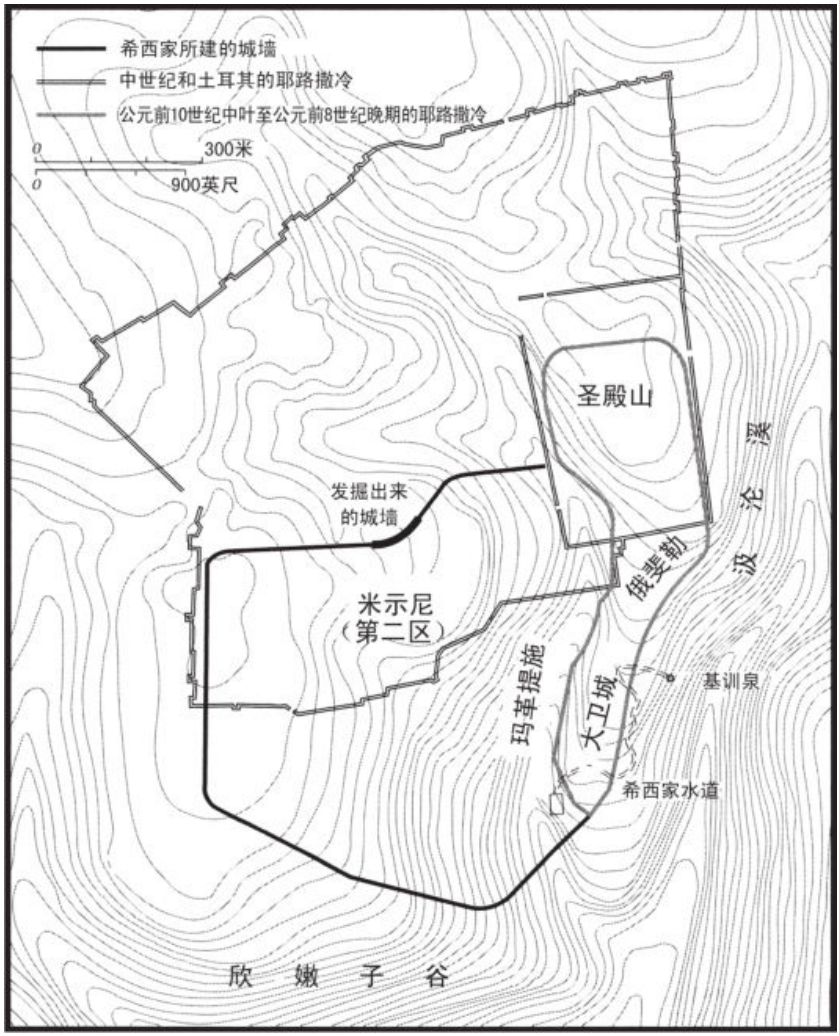

图9　公元前8世纪晚期的耶路撒冷

对战争的解释

在其他文本中，西拿基立用宗教语言叙述了自己的胜利，认为这是立他为王的守护神阿舒尔所赐予的。这一解释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无独有偶，圣经来源也认为公元前701年的事件是耶和华所为，

只是探讨的角度截然不同。前一种解释针对的是进攻本身：为什么耶和华允许亚述在犹大攻城掠地，大肆屠杀？答案是耶和华要利用亚述人惩罚悖逆的子民。耶和华通过先知以赛亚陈明自己的旨意：

> 亚述是我怒气的棍，
> 手中拿我恼恨的杖。
> 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
> 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
> 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
> 将他们践踏，
> 像街上的泥土一样！（赛10:5–6）

在这位先知的解释中，亚述是耶和华用来施行惩戒的工具。因为他的子民不去信靠耶和华，却“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赛30:2）。他们仰赖盟国胜于仰赖耶和华。此外，这些子民还违背了他们与上帝之间最重要的契约——西奈之约，若不能“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赛1:17），他们一切的宗教仪式都是徒劳。

由于以色列民是悖逆的儿女（赛1:2, 5），所以他们应受罚。亚述人会像其家乡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幼发拉底河畔的洪水一样席卷整个南国犹大：

> 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
> 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
> 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
> 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
> 仅存锡安城，
> 好像葡萄园的草棚，
> 瓜田的茅屋，
> 被围困的城邑。（赛1:7–8）

这一片凄惨萧条的景象正是西拿基立出兵犹大、围攻耶路撒冷时的生动写照。

然而耶路撒冷没有就此被摧毁，故事也并未完结。继王下18:13–16中的一番平铺直叙后，王下18:17–19:17叙述了希西家和西拿基立之间漫长的谈判，篇幅更长，也更具意识形态色彩。在双方谈判期间，先知以赛亚告诉希西家，耶和华将保护耶路撒冷，为了耶和华自己和他仆人大卫，也就是在希西家之前的犹大王。这段故事的结尾令人费解：

> 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王下19:35–36）

这里亚述退兵不是因为希西家的投降，而是因为上帝直接干预其中，这既是报偿希西家对于上帝的信靠，也表明耶和华定意要保护耶路撒冷，因为那里的圣殿是上帝的居所，而耶路撒冷也是他所拣选的王朝的都城。

西拿基立入侵南国犹大，攻占了多个主要城市，后又兵围耶路撒冷，而后希西家投降纳贡，这些虽然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对它们的解读却各异。有人提出耶路撒冷得以幸存是因为耶和华的作为，他施行神迹杀灭了亚述的军队，就如同当年杀灭出埃及时法老的追兵一样。公元前2世纪早期的作家西拉和公元1世纪晚期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却认为这样的解释有些夸大其词，实际上西拿基立的士兵只是死于瘟疫而已。但是对于《以赛亚书》和《列王纪》的作者而言，亚述的进犯和退兵都显明了耶和华全然掌控着历史。

通过考证，我们对于先知作为历史事件解释者的角色有了进一步了解。先知们认为耶和华是最有能力的神，甚至含蓄地表达了耶和华一神论的观点。此外，我们还示范了圣经、非圣经文本和考古学数据如何互为参照、共同作用，从而深化我们对事件的理解。

注释

〔1〕　他连得，古代近东的重量单位，根据圣经的说法相当于现在的45公斤。

〔2〕肘尺，古代希伯来人常用的长度单位，1肘尺约等于0.5米。

第十章
诗歌体裁与神义问题

本书中引用的许多圣经和非圣经文本都是以诗体的形式来排版，而且学界也认为旧约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诗体。为了节约莎草纸和羊皮纸等书写材料，古代的手抄本往往以同样的方式记录诗体和散文体，即句与句之间首尾相接，而不是一句一行。这是古代抄本中诗体难以辨认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圣经中的诗歌——甚至整个古代近东的诗歌，并不具备现代诗体的一些特征，例如它们很少押韵，一些类韵和头韵也只是偶尔才会出现。另外，圣经诗体的韵律至今仍未完全被破译。其原因也许是以色列民族及其邻邦所采用的韵律模式五花八门，而人们对于如何分析这些韵律仍然各执一词。

圣经诗体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平行体，即两行诗观点相同而措词各异。这就形成了一种思想的韵律。平行体可以是同义反复：

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
留心料理你的牛群；（箴27:23）

也可以是对比：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言语暴戾，触动怒气。（箴15:1）

还可以是递进：

门在枢纽转动，
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箴26:14）

平行体示例

平行体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诗歌表现手法。例如在古代迦南的神话中，暴风之神巴力被告知他将如何击败自己的对手海神：

让我告诉你，巴力王啊，
让我再重申，驾云者啊：
看哪，你的仇敌，巴力啊，
看哪，你将杀死你的仇敌，
看哪，你将荡平你的对手，
你的王位将千秋万代，
你的统治将直到永远。

在这些诗句中共有三对对偶句，每对由两行同义反复的平行体构成，对偶句之间又形成了递进和同义反复的平行体。

圣经的读者对这些诗句的格式和技巧并不陌生：

看哪，耶和华啊，你的仇敌，
看哪，你的仇敌都要灭亡，
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诗92:9）
你的国度直到永远，
你的统治存到万代。（诗145:13）[1]

本书所引用的其他诗作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就最后一句箴言本身来讲，它散文的味道更胜于诗。但既然它出现在以平行体写就的一连串箴言中，所以也就被视为诗。

上述几种平行体虽然有很多变体，但基本模式清晰，这种模式构成了圣经诗体和大多数圣经外诗体的重要形式特征。此外，基督教和犹太教一直在使用这本圣经，它的译本众多，而在翻译的过程中，诗体的韵脚很难保持，能留下的恐怕只有平行体了。

从《创世记》到《列王纪下》的这部分书卷构成了托拉和前先知书，其中的叙事性文体较多，诗体只是散见于叙事之中。在后先知书中，尤其是在《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中，诗体则多了不少。十二小先知书中的诗体也颇多。圣经中有两卷书全部以诗体写成。一是《诗篇》，即古代以色列赞美诗歌的总集；二是《雅歌》，又称所罗

门之歌（亦称歌中之歌），收录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诗。

智慧文学

古代以色列有一类文学常常以诗歌为表现形式，学者们称之为智慧文学（wisdom literature），这类文学在整个古代近东都很普遍。智慧文学一词的内容十分宽泛，其体裁可以是赞美、争论、寓言或是箴言。但不论何种体裁，智慧文学关注的始终是人类的处境，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个体，它的关注是普世性的。正是由于这种普世性，智慧文学为各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它不断为各种文化输送养分，也受到各种文化的浸润。

智慧文学中最典型的文体要算箴言了。箴言用词精巧凝练，常以诗体来表现人生经验的方方面面。一部分箴言散见于整部圣经，另一部分则结集成《箴言》。箴言往往始于民间智慧，由文士收集、拓展或者编辑为诗歌形式。《箴言》中的一些编者注暗示着这些文士通常由王室供养。例如："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希西家的人所誊录的。"（箴25:1）类似的开头在《箴言》中不止一处，这也表明《箴言》实际上是多部原本独立的箴言集汇编而成。

公元前11世纪的古埃及有一部《阿美尼莫普的教谕》（以下简称"教谕"），其内容与《箴言》22:17–24:22的"智慧人的言语"有很多相关之处。这恰好表现出智慧文学的普世性。两者都分为30个单元，现列举一些相似点如下：

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箴22:24）

不可与易怒的人结交，也不要上前与他搭话。（教谕11章13–14节）

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箴22:28）

不可挪动地里边界上的标记，也不可改变测量着的准绳。（教谕7章12–13节）

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

（箴22:29）

公务上有能力的文士，可以为廷臣。（教谕27章16–17节）

许多箴言讲授的是觐见王室的礼仪，比如与国王进餐时的礼仪，得体的说话方式等，这也反映了《箴言》的王室背景。有些箴言则针对高层次的道德问题，如诚信经商、善待穷人、孝敬父母等等。

古代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与宗教仪式紧密相连，因此，箴言的许多内容都与宗教相关，它强调成功的最终途径是“敬畏耶和华”，即遵守他所赐的命令。对先知而言，这一原则有群体的性质，因为耶和华会赏赐顺服的国家，惩罚悖逆的国家。这就是上帝之正义，也称为“神义”，它所传递的内容同样适用于个人。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箴3:9–10）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
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箴22:4）

这种情感的背后是一位大能的上帝，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他息息相关。这种观念最终催生了一神论，即以色列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从国际关系到日常生活，历史发展的各个层面都由这位上帝掌控着。

神义问题

在一神论中，只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全善，全能，全然公义，赏善罚恶。但经验告诉我们，现实并非总是如此，义人受苦、罪人发达的情况并不少见。圣经中有两卷书都以较长的篇幅探讨了这一深奥议题。《传道书》是其中之一，它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文体颇有哲学风骨。这位无名的作者像苏格拉底和第欧根尼一样，探寻着生活的

意义。与传统的智慧正相反，他看到有时义人虽无辜却遭灭亡，而罪人却享长寿——上帝似乎并不总是赏善罚恶。面临这样的矛盾，人又当何去何从？《传道书》给出的回答颇有存在主义的意味：吃吃喝喝，快快乐乐，享受生活。因为人皆有一死，死后一切都将终结。

圣经中的来世

由于圣经的各个组成部分写于不同世纪，所以圣经中的许多观点都无法一以贯之，它们有些处在变化发展之中，有些则根本无法取得一致。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古代以色列人对于死后世界的看法。

通灵术是一种向死去的人求问的行为，圣经常称之为“交鬼”。交鬼暗示着一些人认为存在一个死后的世界。尽管圣经律法严禁交鬼，但这种行为非常普遍。圣经中记载了一次成功施行的通灵术，以色列王扫罗曾请一个妇人施行通灵术，从阴间请出死去的先知撒母耳。古埃及人迷恋死后世界，因而对坟墓精雕细琢，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线索，相比之下，古代以色列人留下的信息少之又少。在以色列人的观念中，人死后生活在阴间（Sheol）[2]，一个黑暗、阴冷的地方，类似于希腊人的冥府，与埃及所描绘的西方乐土相去甚远。在阴间之中，人与上帝隔绝，平常的生活也一去不返。《传道书》这样描绘那里的境况：“死了的人毫无所知……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传9:5，10）。直到圣经时代晚期，为解决圣经中上帝在此世对人不公的问题，犹太人才发展了一系列详尽的关于未来的信仰。那时，为善者必得赏赐，而作恶者必受惩罚。我们所熟悉的天堂和地狱这两个概念也由此而来，这两个概念现在成了基督徒和穆斯林信仰的一部分。

《约伯记》

比起《传道书》，《约伯记》对神义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刻。《约伯记》是圣经中最艰深的书卷之一。不单因为其语言晦涩，结构散乱，更是因为它所探寻的问题很深奥，而且无答案可寻。

《约伯记》为散文结构，读起来如同改编过的古代民间传说。前两章为序言，介绍了约伯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伯1:1）的完人，上帝因他的敬虔赐福他，于是他有7个儿子和3个女儿，家道丰足，幸福和乐。一天，上帝在天上临朝，一个神秘的角色——撒但——与耶和华展开辩论，争论的焦点是：约伯的敬虔是否真实？他是否因为私利才敬畏上帝？若被夺去财富，他又将如何？于是，作为义人典范的约伯沦为了一场旷世赌局的筹码。

得到上帝的允许后，撒但开始兴风作浪。约伯的牛羊牲畜不是被抢，就是被杀，最可怕的是，他的10个子女也都命丧横祸。而约伯的回应则表现出他的敬虔是真实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1:21）。这个事迹后来被誉为“约伯的忍耐”（雅5:11）。待到又一次天庭会议，上帝又碰见了撒但。上帝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伯2:3）。撒但则反驳说要用约伯本人的身体来试验才能真正奏效。上帝再次首肯，于是撒但使约伯染上了一种皮肤病。约伯坐在炉灰中，用破瓦片刮自己的身体，却“并不以口犯罪”（伯2:10）。

至于撒但，他也是“神的众子”之一，是天庭会议的与会人员。他的头衔是控告者，用《约伯记》里常出现的法庭用语来说又叫做检举人。此人后来成为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中的大反派——魔鬼撒旦，但是在《约伯记》里还不是。他在《约伯记》中只是一个龙套，自第二章以后就彻底退场了。于是，无论约伯本人还是他的朋友都认为，苦难是来自上帝的惩罚。

序言部分为3–41章的神义问题大讨论作了铺垫。讨论由一系列的对话构成，前面是约伯与他的三个朋友之间的对话，最后是他与耶和华的对话。这些对话中存在着许多关键问题，而且凌乱不堪，24–28

章尤为明显。在32–37章之间，还突然冒出了约伯的第四个朋友，这说明《约伯记》也曾多次被修订，但对话的主题始终是对于约伯问题的思考。他的三个朋友坚守传统看法，即上帝是公义的，约伯受苦必然是因为他做了错事，子女死亡也是因为他们犯了罪。

约伯怒斥了这些陈词滥调，并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这一点读者都心知肚明，而且他一直坚守着以色列人的最高道德标准：

> 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
> 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
> 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
> 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
> 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
> （伯29:12–16）

最后，文中又出现了一个法律隐喻，约伯向上帝发出“传唤”：“看哪，在这里有我所划的押，愿全能者回答我”（伯31:35）。

在暴风雨中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确实作了回答。上帝用一连串的反问嘲讽着约伯所谓的智慧：

>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
> 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
> 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
> 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
>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
> 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
> 那时，晨星一同歌唱，
> 神的众子也都欢呼。（伯38:4–7）

整整三章都是这位造物主的训话（伯38–41）。他讲述了自己的大能——如何为大海的狂涛巨浪设限，使海中巨兽[3]成为自己的宠物，以及如何将天地万物分门别类。虽然这番话里包含了一些圣经中最华美的诗篇，但却完全没有顾及约伯的抱怨。

约伯对此也作出了回应。这一段的希伯来语较为难懂，所以下文以意译为主，斜体部分是引用上帝之前说过的话：

>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
> 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 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
> 我问你，求你指示我。
>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 因此我厌恶自己，
>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伯42:1–6）

约伯的结语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他见到上帝后突然醒悟，认识到人类智慧的局限性？若是的话，约伯应该心服口服了。但是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现代读者的解释是：约伯认识到自己已无力回天，所以只好随便说些什么，好让这位暴君停止咆哮。这也是为什么上文的最后一句还有一种更为随意的译法："我为这些凡世的尘土而悲伤颤抖。"

在散文式的后记中（伯42:7–17）又出现了一段古代民间故事。耶和华谴责约伯的朋友，因为他们没有像约伯一样诚实。于是，耶和华重新赐福于约伯，双倍补偿他失去的财产。圣经律法要求偷盗的人要进行惩罚性赔偿（出22:4–9），这是否暗示了上帝也会做错事？最终，约伯又有了7个儿子和3个女儿，代替之前那些死于非命的儿女。像古时的长老一样，约伯以高龄善终。这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转念一想，约伯那些死去的孩子呢？难道他们就为了证明上帝的正确而白白牺牲吗？

从智慧文学普世性的角度来讲，《约伯记》的角色设定具有深远的意义。约伯并不是以色列人，而是来自乌斯地（Uz），一个位于应许之地外围，名为以东（Edom）的地方。而《约伯记》的这位匿名

作者虽然是以色列人，他的作品中也随处可见其他圣经文本的影子，有些是直接引用，有些是间接提及，但在约伯和朋友的对话中却从未出现过耶和华一词，这个词只在旁白中出现。更特别的是，《约伯记》全卷都没有明确提及圣经的主要人物和事件，无论是亚伯拉罕、摩西、大卫，还是西奈山和耶路撒冷。向约伯启示自己的这位上帝似乎不是历史之主，而是自然之神。这些缺失告诉我们，深奥的《约伯记》也许可以这样来解读：无论是民族的历史还是个体的历史，我们都难以看到它的真相，因此也无法昭示一位赏善罚恶的上帝的所作所为。

当然，解读方式不只一种，也不是非此即彼。可能是由于曾与超凡的造物主有过对话，约伯同许多宗教中的神秘主义者一样，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对超越他的上帝的信仰，在上帝面前，他的一切忧虑都微不足道。也许约伯那句模棱两可的话和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有意而为，因为比起那些模式化的回答，问题本身更加重要。

《约伯记》中的神义论对圣经中主导的神义论构成了挑战，这也再次说明圣经并非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多种观点的集合，吸引甚至迫使读者们自己去探寻其中的奥妙。

注释

〔1〕 此处的诗篇并非引自和合本。为体现次数诗篇的平行体特征，同时可以与上一段引文比较，译者特别按照原作者所引用的英文版圣经的句式来翻译。

〔2〕 *Sheol* 是一个希伯来词。现在较为流行的英文版圣经中常用grave或者hell来替代（参见诗49:14）。

〔3〕 英文原文为Leviathen，即利维坦，圣经和合本及新译本中都翻译为鳄鱼。

第十一章

“赞美名人”——旧约英雄儿女

标题中的引文出自犹太人便西拉的一首长诗的首句。此诗写于公元前2世纪早期，主要讲述圣经中大大小小的英雄人物，并收录于以作者名字命名的《便西拉智训》（the Book of Sirach，亦作Ecclesiasticus，天主教译名为“德训篇”）中，该卷书在基督教的正典目录中属于次经。便西拉用六章的内容（从《便西拉智训》44章第1节开始）介绍了圣经中那些“名垂圣史”的人物，其中包括《创世记》中的以诺和挪亚，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主要的领袖和先知：摩西、亚伦、约书亚、撒母耳、大卫、所罗门、以利亚、以利沙、希西家以及其他一些圣经中的重要角色。透过其中三个角色，我们就能了解到圣经的重要性和一些解读圣经的问题。

亚伯拉罕

谈到亚伯拉罕，便西拉曾说他是“多国的父”（《便西拉智训》44章19节，援引《创世记》17章4节）。上帝曾与亚伯拉罕立约，要使他的子孙多如海砂，并赐他子孙以产业——应许之地。在《创世记》12–25章之间，亚伯拉罕是故事的主角，配角有他的妻子撒拉和夏甲、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还有侄子罗得。亚伯拉罕的故事开始得很是突兀，耶和华似乎毫无缘由地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家乡，赶往一片新的土地——迦南。在那里，上帝又多次向他显现并重申对他的应许。

亚伯拉罕的故事有其神话的一面。他常常直接同耶和华对话，甚至曾应邀与耶和华一起进餐。然而，是否真有亚伯拉罕其人？还是像罗马帝国的创建者罗穆卢斯一样，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我们无从知晓。可以想见，圣经以外并没有同时期的资料可以证明《创世记》中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创世记》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描绘成整日赶着羊群四处流浪的半游牧民，他们主要在当时的大城市外围地区活动，至多是那个时代舞台上的临时演员，不足以被官方史料所记载，更何况关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的迦南

地区的官方史料也不多。圣经的叙事复杂，有很多层来源，种种材料可能来自那位传说中的亚伯拉罕之后的任何一个时代。一些线索也暗示着在圣经作者所使用的来源中，确实有一些真实的历史记忆，但是这些线索也仅仅是暗示而已。

更合理的做法也许是将亚伯拉罕视为一位理想中的先祖，因为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15:6）。他总是顺服上帝的旨意，包括四处迁徙，接受割礼，甚至拿自己的儿子以撒献祭，难怪19世纪的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恰切地称他为“信心的骑士”。有时，亚伯拉罕也会质疑耶和华是否行为公正，为使上帝在惩罚索多玛城的罪人时不致累及无辜而与他争辩，这也正是《约伯记》所提出的问题。在这件事上，亚伯拉罕又成为了典范，一开与上帝争辩之先河，以致在他之后，摩西、约伯、耶利米等人也纷纷效仿。

亚伯拉罕的故事犹如接下来的圣经各书卷的引子。他是一国之父，上帝与该国立约，赐予了——至少是应许赐予——这个国家属于其自己的土地。该国与它的应许之地“圣地”（亚2:12）之间的关系是圣经的主题，在后来的犹太民族史中，这个主题也在反复出现，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是占有了这片土地，还是被掳掠至他处。

与此同时，作为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读者，我们自然会注意到亚伯拉罕并非完人——他也会欺骗他人。他的妻子撒拉美貌非凡，当进入埃及地的时候，他怕埃及人见色起念，杀夫夺妻，就让撒拉说自己是他的妹妹。撒拉如此照做，结果被法老召进了后宫，而亚伯拉罕则幸免一死。我们排斥这种自私的说谎行为并不是要不合时宜地谈女权问题，而是因为在《创世记》中这个故事有另一个变体，故事说到亚伯拉罕并没有完全说谎，撒拉确实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真是难以置信！另外，亚伯拉罕心甘情愿按上帝要求以儿子献祭，尽管这一“义举”赢得了千古传颂，但却令人十分不解：他为什么没有质疑上帝这个残忍的命令？既然他曾经为了索多玛城的无辜者勇敢地与上帝争辩，为什么这一次他不为以撒求情？文本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许多这类问题都有待读者来解答。

亚伯拉罕，信心之父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宗教”，因为这三个宗教与亚伯拉罕有着血统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传承。又因他的儿子以撒和孙子雅各，亚伯拉罕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也就是犹太人的祖先。

耶稣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他的血统可以直溯到亚伯拉罕。对于基督徒而言，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楷模，是一个属灵的先祖。

亚伯拉罕的长子是以实玛利，他也是很多民族的祖先。其中一支就是阿拉伯人，这族人中有一位先知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因此，与基督教类似，伊斯兰教在血统上也可以联系到亚伯拉罕，而且对于伊斯兰教而言，亚伯拉罕也是一个楷模，尤其是他对上帝的顺服（“伊斯兰”的意思就是顺服）。

从这三个宗教的典籍中也可以看出亚伯拉罕的重要性。在《创世记》的故事中，亚伯拉罕在25章就死了，但是在这之后，旧约中又有60余次提到他。在新约中也有60多次，《可兰经》中提到的次数则更多。

底波拉

虽然便西拉所列的名人里没有女性——看来他如果不是厌恶女性，就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但圣经里不仅有男人的故事，从《创世记》开始，我们也遇到了几位巾帼英雄：她们有的独立自主，有的强壮彪悍，有的则直接与上帝对话并领导她的民族。诚然，圣经中有一些女性没有名字，比如挪亚的妻子、法老的女儿和约伯的妻子，这可能是古代圣经的作者受到了父权主义的影响，将男性视为女性的保护者，而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然而，圣经中还有100多位有名字的女性，包括女性的族长：撒拉、夏甲、利百加、利亚、拉结、悉帕和

辟拉；女性先知：米利暗、户勒大和挪亚底；王后和王后的母亲：拔示巴、耶洗别和亚他利雅等。

圣经中有几位被提及姓名的女性，底波拉是其中之一，她可以被视为圣经中的女性的代表。底波拉是《士师记》中一个小片段的主角。《士师记》以一个过渡性的时期为背景，这一时期始于承摩西遗志，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的约书亚的去世，终于《撒母耳记上》中扫罗王朝的建立。《士师记》一名来源于其中所记载的12位“士师”。这个词指的是在古代以色列以及其他近东地区，集审判、军事和政治三职于一身的领袖。这12位士师中有11位是男性，唯一的例外就是底波拉，她同时也是一位先知。

关于底波拉的事迹，圣经中有两段重叠的记载。一是《士师记》4章的一段散文式的叙事；二是载于《士师记》5章的一段古老的诗歌，名为《底波拉之歌》。据《士师记》4章记载，由于迦南人压迫以色列民，当底波拉坐在棕树下行使审判职责时，她招来巴拉，指示他召集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的军队来与她一同进攻迦南人。在这场战役中，底波拉运筹帷幄，大败迦南人。大战之后，逃跑的迦南将军被另外一位女性雅亿所杀。

在这段散文式的叙事之后是一首诗歌，由底波拉和巴拉所唱的开头看来，这是一首胜利之歌。它是圣经中最为古老的诗歌之一，歌颂了耶和华如何与他的子民并肩作战。同之前的那段叙事一样，这首诗歌也提到了底波拉和巴拉率军作战取得胜利的故事，有人认为，前面的叙事可能源于这首诗。

底波拉与喇合、雅亿和大利拉等女性不同，她们虽然辅助盟友取得了胜利，但毕竟不是披挂上阵的战士，而底波拉却是运筹帷幄的女将领。在后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各种材料中，底波拉成为了女战士的原型。次经《犹滴传》中的犹滴以及圣女贞德就是以底波拉为原型。

我们对于底波拉本人所知并不多，《士师记》4章4节说她是“拉比多的妻”，由此看来她是一位已婚女性。但是这个短语又可以翻译成“火把似的女人”，刚好符合她极具煽动性的性格。无独有偶，巴拉

这个名字意思是“闪电”。底波拉被称为“以色列的母”（《士师记》5章7节），这个意思也颇为费解：她是否会是某个先知团体的领袖，或是某个权威人物，因为男性为“父”，所以女性自然为“母”？她是否真的已生儿育女，做了母亲？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首诗中可能会流露出对于底波拉超越了母亲和妻子身份的惊叹。

底波拉这个形象的出现使得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再次浮出了水面，这就是古代以色列女性的地位问题。她可以成为先知、士师和战士是否是个特例呢？毕竟圣经有明确记载，迦南将军西西拉被一位女性杀害是奇耻大辱，但是除此之外，圣经的作者并未对底波拉立下战功表示惊讶。所以，我们要警惕夸大圣经时代男尊女卑的情况。无论如何，我们很庆幸可以看到一位女中豪杰率领以色列民兵作战的故事。

大卫王

大卫是以色列的第二个王，他建立了一个长达四个多世纪的王朝。大卫在圣经传统中随处可见，他本人以及被归于他名下的诗作占了相当多的篇幅，仅次于摩西。然而，大卫和摩西的情况类似，并没有独立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但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圣经对大卫生平的大部分记载都符合史实。

大卫从一个牧童成长为以色列王，并在位多年。对他生平的大部分叙述集中在《撒母耳记上》16章到《列王纪上》2章。和圣经中其他长篇叙事一样，这段记载也混合了多种来源。由于来源众多、内容庞杂，所以圣经所塑造的大卫有非常多面的形象。正如最近一本关于大卫的著作的副标题所概括的：他是“弥赛亚、谋杀者、叛徒和君王”。

大卫的生平可以概述如下：他生在伯利恒，是七兄弟中最小的，也不可能继承丰厚的遗产，所以他就参加了以色列第一位王扫罗刚组建的军队。他在军队中屡立战功，还娶了扫罗的女儿米甲。然而，他

与扫罗最终决裂，于是大卫及效忠于他的手下转投以色列死敌门下，成为非利士人的雇佣兵。公元前11世纪末，扫罗在战场上死于非利士人刀下，大卫就势称王，首先是犹大支派的王，后又收服北方各支派，继而统治整个以色列王国，并指定耶路撒冷为新都城。据传，他的统治长达40年，这个数字可能是按套路凑的整数，但足以说明他在位的时间相当长。在这期间，他继续拓展疆域，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大国的国力在那个时期相对较弱。大卫晚年期间，众王子为夺取王位自相残杀，最后大卫临终前指定其子所罗门继承王位。

在大部分叙事中，大卫被描绘成一个天赋禀异，独具魅力的领袖，对其形象的刻画是多角度的。从大卫早年的英雄事迹和后来成就霸业的军事胜利来看，他是一个卓越的军事战略家；他很快在扫罗王庭中表现突出，虽曾为非利士人征战，却依然可以说服以色列南北众支派奉他为王，由此可见他是一位杰出的政客。大卫还是一个才华洋溢的诗人和音乐家。在《撒母耳记下》中有多首诗歌都被归于他的名下，其中有一首挽歌几乎可以确定出自其手笔。当他听闻扫罗及其子，同时也是大卫挚友的约拿单被非利士人杀害时，他悲痛不已，作此挽歌（撒下1:17–27）。正由于大卫写词谱曲的声名卓著，圣经中的众多诗作，包括《诗篇》中一半的作品都被归于他这位“以色列的美歌者”（撒下23:1）名下。

圣城耶路撒冷

《撒母耳记下》5章记载，当大卫即将开始他的统治时，他将都城从希伯崙迁至耶路撒冷。传统上认为希伯崙是亚伯拉罕和其家族的安葬之地，而耶路撒冷那时还不是以色列的城市，在大卫攻下之后成为大卫城。大卫为了给自己的统治提供一种宗教上的合法性，就将约柜运进了耶路撒冷城，因此大卫城也就成为了上帝的圣城。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将圣殿建在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就逐渐成为了古代以色列的宗教中心，也因此成为了犹太教地理上的中心。逾越节晚宴最后的祷告“明年到耶路撒冷”也说明了这个城市在宗教上的中心地位。圣经还提到所罗门建圣殿的位置就是当年亚伯拉罕用以撒献祭的地方（代下3:1），这更说明了耶路撒冷在宗教上的重要性。

耶稣作为一个遵守节期的犹太人，当然也要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福音书告诉我们他在耶路撒冷城被捕、受难、埋葬，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他还在那里复活。由于这些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耶路撒冷城，所以基督教也把这里视为圣地。

穆斯林出现得比基督徒晚，但是他们认为圣经基本上也是真主的启示。因为这座城与大卫、所罗门和耶稣有关，所以也是圣城。这座城市由于一些传说而在穆斯林心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据说穆罕默德曾被真主从麦加奇迹般地送到耶路撒冷，而且他还在那里被接到天上与真主交谈。

无论是对于犹太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耶路撒冷一直以来都是一座重要的城市。因此这里成为中东地区的冲突焦点。这一切的直接原因就是大卫王在三千多年前定都于耶路撒冷。

对于大卫的描绘是基于各种证据，这些证据多为宣传大卫的盛名，但不全是。圣经还详细地描述了大卫的另外一面，这就是他与拔示巴的丑事。圣经在记载这一事件的开篇写道：“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撒下11:1）。此时大卫的军队正带着约柜，穿越约旦河，围攻亚扪首都拉巴。叙述者的言外之意就是真正的君王应该御驾亲征，但是大卫却没有。他留在了耶路撒冷，因而窥见了将军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洗澡，并与她发生了关系，之后他还紧急召回正在前线奋战的乌利亚，这样拔示巴腹中的孩子就是她丈夫的了。乌利亚回来后也无心留恋温柔乡，于是大卫将他送回前线，一纸密令将乌利亚送入了战场上最危险的位置，使他孤立无

援，最终在激战中被杀。身为勇士、君王、诗人的大卫同时也是一位通奸者、一个借刀杀人的刽子手。大卫的恶行受到了先知拿单的强烈谴责。圣经的作者毫无隐讳地告诉我们这一切，并将大卫塑造成了一个劣迹斑斑的英雄。

在大部分叙事中，大卫是一个毁誉参半人物，然而，后续的文献却有些文过饰非。《列王纪》的作者把他作为君王的楷模和评价该王朝历任统治者的准绳，而这些评价往往都是负面的。成书于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历代志》也重述了大卫的故事。这个版本虽然以上下两部《撒母耳记》为主要材料，但对负面内容只字未提，例如拔示巴事件，大卫儿子押沙龙的反叛等等。最终，由于大卫王朝以和平繁荣而名垂后世，也是上帝所特别赐福的一个时代，所以后人心目中的明君都以这位“雅各神所膏的”（撒下23:1）大卫为原型。

一位匿名的早期基督徒也写了一份与便西拉作品类似的英雄谱，最后以“见证人，如同云彩”[1]，无法计数结笔。

> 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伏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来11:32–34）

无论是对于这位作者还是便西拉，这些人物都是英雄楷模，是信徒心中永远的英雄。许多英雄的文学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他们的故事令读者神往，也跨越了信仰的边界，成为了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们的灵感源泉。

注释

〔1〕引自《希伯来书》12章1节。

第十二章

旧约的影响

参观博物馆的人或许是游客，他们希望更广泛深入地了解文化。近两千年来，圣经成为了各种艺术家的灵感之源，其中包括雕塑家、画家、剧作家、小说家、音乐家、舞蹈家等等。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来选择并解读圣经中的人物事件。圣经对于艺术的影响深远，以圣经为蓝本的艺术作品数不胜数。以《约伯记》为例，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暗含了《约伯记》的主题，这些作家包括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萨缪尔·贝克特。仅是20世纪就有许多作家的数十部小说和戏剧以《约伯记》为蓝本，其中包括H.G.威尔斯、缪丽尔·斯巴克、尼尔·赛门、罗伯特·弗洛斯特、罗伯特·海因莱因和阿契博得·麦克列许。最近有人编撰了约伯相关作品的全集，其中列举了公元3世纪到20世纪的150部与《约伯记》相关的文艺作品。

圣经在流行文化中也不断放射异彩，电影、歌曲、音乐剧（这其中也有一部基于《约伯记》）中都有它的影子。日常话语中也随处可见圣经词汇，多是一些老套的用语，其来源也不可考，如《约伯记》19章20节的“牙皮”一说。此外，圣经对法律、医药、科学和政治等领域也有或好或坏的影响。

其实并不一定要熟悉或者笃信圣经才能欣赏这种种文化上的关联。就像在听以圣经为歌词的巴赫的康塔塔，我们既可以在音乐厅欣赏，也可以到教堂聆听。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甚至原本就是为了在音乐会上演奏，而不是用于葬礼，伯恩斯坦的《弥撒曲》也是为了舞台演出而作，所以艺术家无须去表达某种宗教意蕴，他们可以不断借用圣经来进行艺术创作。圣经的人物、故事和理念已然融入我们的文化，了解这些元素可以令我们更好地了解过去，进而了解我们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博物馆的观众也可能是朝圣者。同样一本书，无论是犹太人所说的希伯来圣经还是基督徒口中的旧约，虽然在内容和顺序上有些差异，却始终是一部神圣的典籍，有着特别权威。圣经的重要意义犹如公理一般不证自明。当众信徒在宗教仪式上聆听和诵读圣经时，就好像听到了蒙特威尔第的弥撒曲和巴赫的康塔塔。

虽然圣经内容很复杂，但自古以来的信徒和宗教团体都将它视为单独的一本书，作者只有一位上帝。然而，旧约之中混合着各种声音。因此对于阐释旧约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倾听这些不同的声音。我们是应该像现代批判学学者提倡的那样，抽丝剥茧，厘清每个声音所表达的内容呢，还是像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一些学者希望的那样，从整体的角度来聆听众多声音构成的复调式乐章？也许二者都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比如上帝有时施行惩罚会累及多代人，如十诫中明确提到：

>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20:5–6）

然而，上帝这种诛连后代的惩罚方式与其他地方的记载却明显相矛盾，如先知以西结所言：

> 惟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结18:20）

对于这位先知而言，上帝赏善罚恶也应当符合以色列的律法，律法规定“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申24:16）。在《以西结书》中，我们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即使是与前面完全矛盾的条文也可以被奉为戒律和上帝之言。

从上述例子看来，旧约中众多的声音常常不协调，这就需要读者来阐释。也正因如此，任何一种“旧约上说”的论调都不可取。这种论调之下，圣经就变得只有一种声音。正如莎士比亚所看到的，就连“魔鬼也会引证圣经来替自己辩护”（《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政客、学者、教皇都可以不顾原意和语境，将经文信手拈来，为己所用。也没有哪个信仰团体会认为圣经的每一条命令都要谨守遵行，因此所谓圣经是绝对的、永恒的权威这一说法，无论是在圣经里

还是在其后的宗教历史中都是站不住脚的。

一部权威经典和奉其为权威的团体之间其实有着复杂的关系。经典使得团体得以建立，成为团体的信条、价值观和实践准则。另一方面团体也实实在在地塑造着经典。除了在抽象层面，文本本身不具有权威性，它从特定的团体获得了权威。该团体——以圣经为例则是若干相关团体——随着自身的历史发展，圣经的权威也不断得到累积，对圣经进行的扩充、修订、阐释、再阐释、修改，甚至摒弃某些圣经传统的行为也被赋予了权威。这些过程还在持续，古代的文本被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环境，文本过去的意义和现在的意义相互交织。圣经中的多种声音来自不同的时代和环境，恰恰由于这些不同的声音，才有了上述各种编订的过程。因此，首先是圣经本身赋予了这些过程以权威。

由此可见，品读圣经之路颇为崎岖，却也获益良多。虽然旋律不同，但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称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一位不可捉摸却有血有肉的上帝，一位高高在上却俯就世人的上帝。

大事年表

时期*	事件与人物	圣经出处**
第二个千年早期或中期（？）	以色列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创世记》
13世纪（？）	出埃及：摩西	《出埃及记》–《申命记》
第二个千年晚期	以色列人出现于迦南地之上	《约书亚记》、《士师记》
11世纪晚期–10世纪晚期	建立王国：撒母耳、扫罗、大卫、所罗门	《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1–11章
10世纪晚期–8世纪中期	王国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大	《列王纪上》12章–《列王纪下》14章
9世纪中期–7世纪中期	亚述控制近东	《列王纪下》15–23章、《阿摩司书》、《何西阿书》
722年	亚述击败北国以色列，摧毁其首都撒玛利亚	《列王纪下》17章、《以赛亚书》1－12章、《弥迦书》

（续表）

时期*	事件与人物	圣经出处**
701年	亚述进攻南国犹大，包围了首都耶路撒冷，但并未攻下	《列王纪下》18–20章（=《以赛亚书》36–37章）、《以赛亚书》1章7–9节，10章5–11节
622年	犹大王约西亚改革	《列王纪下》22–23章
7世纪晚期–6世纪中期	巴比伦控制近东	
597年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一次包围耶路撒冷	《列王纪下》24章10–17节
586年	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所毁，百姓被掳巴比伦	《列王纪下》25章、**《耶利米书》**、**《以西结书》**
6世纪中期–4世纪晚期	波斯控制近东	
538年	部分被掳百姓回归犹大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
4世纪晚期–1世纪早期	希腊控制近东	**《但以理书》**、**《便西拉智训》**
168年	马加比革命	《马加比传上下》
63年	罗马将军庞贝攻占耶路撒冷	

* 所有的日期都是公元前；问号代表该日期仍有争议或者无充分证据支持。

**正常字体为该书卷所叙述的年代，黑体为该书形成的年代。

附录

《希伯来圣经》与基督教各宗派《旧约》篇目对照

犹太教	基督教		
《希伯来圣经》（泰纳克）	**《旧约》**		
	新教	天主教	东正教
妥拉	**摩西五经**		
创世记	创世记	创世记	创世记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利未记	利未记	利未记	利未记
民数记	民数记	民数记	民数记
申命记	申命记	申命记	申命记
先知书	**历史书**		
前先知书			
约书亚记	约书亚记	约书亚记	约书亚记
士师记	士师记	士师记	士师记
撒母耳记上下	路得记	路得记	路得记
列王纪上下	撒母耳记上下	撒母耳记上下	撒母耳记上下

（续表）

犹太教	基督教		
《希伯来圣经》（泰纳克）	**《旧约》**		
	新教	天主教	东正教
后先知书			
	列王纪上下	列王纪上下	列王纪上下
以赛亚书	历代志上下	历代志上下	历代志上下
耶利米书	以斯拉记	以斯拉记	以斯拉记
以西结书	尼希米记	尼希米记	以斯拉（续篇）上
十二小先知书			
	以斯帖记	多比记	以斯拉（续篇）下
何西阿书		犹滴传	尼希米记
约珥书		以斯帖记	多比传
阿摩司书		马加比传上	犹滴传
俄巴底亚书		马加比传下	以斯帖记
约拿书			马加比传上
弥迦书			马加比传下
那鸿书			马加比传三
哈巴谷书	**诗歌智慧书**		
西番雅书	约伯记	约伯记	约伯记
哈该书	诗篇	诗篇	诗篇
撒加利亚书			诗篇151
玛拉基书			玛拿西祷词
圣经	箴言	箴言	箴言
诗篇	传道书	传道书	传道书
箴言	雅歌	雅歌	雅歌
约伯记		智慧书	德训篇

（续表）

犹太教	基督教		
《希伯来圣经》（泰纳克）	**《旧约》**		
	新教	天主教	东正教
五卷	先知书		
路得记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
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
传道书	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哀歌
以斯帖记		巴录书	巴录书
但以理书			耶利米的书信
以斯拉记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
尼希米记	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
历代志上下		但以理补篇	但以理补篇
	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
	约珥书	约珥书	约珥书
	阿摩司书	阿摩司书	阿摩司书
	俄巴底亚书	俄巴底亚书	俄巴底亚书
	约拿书	约拿书	约拿书
	弥迦书	弥迦书	弥迦书
	那鸿书	那鸿书	那鸿书
	哈巴谷书	哈巴谷书	哈巴谷书
	西番雅书	西番雅书	西番雅书
	哈该书	哈该书	哈该书
	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
	玛拉基书	玛拉基书	玛拉基书
			（马加比传四）

译者注：正典译名以《圣经》和合本为准（两会，南京，2007），次经译名以张久宜的《圣经后典》为准（商务印书馆，1999）。

《旧约》究竟是什么？它和希伯来圣经有什么区别？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各自的圣经又有什么不同？古代近东文献的发现对解读圣经有何意义？《旧约》是如何将历史和神话结合在一起的？考古发现以及其他非圣经证据对解读《旧约》有何帮助？著名的圣经学者迈克尔·库根以广阔的视角深入探讨了《旧约》的方方面面，引领我们走进《旧约》——这一集史书、文学作品和圣经典籍于一身的经典之作。

百科通识文库

49

《新约》入门

卢克·提摩太·约翰逊 著

陆巍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新约》入门

卢克·提摩太·约翰逊 著

陆巍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15-5160**

The New Testamen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0.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10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2010 by Luke Timothy Johns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约》入门 /（美）约翰逊（Johnson, L.T.）著；陆巍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627-8

Ⅰ．①新… Ⅱ．①约… ②陆… Ⅲ．①《圣经》- 研究 Ⅳ．①B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8270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钱垂君
执行编辑 杨雅琼 张 帆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627-8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第一章　步入《新约》的世界
第二章　《新约》与历史
第三章　耶稣复活了？！
第四章　解释的过程
第五章　文学形式
第六章　同观福音
第七章　保罗及其书信
第八章　隐藏的珍宝：《希伯来书》和《雅各书》
第九章　约翰的手笔
第十章　《新约》正典的形成
第十一章　《新约》的影响
大事年表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卢克·提摩太·约翰逊，前本笃会僧侣，美国埃默里大学坎德勒神学院新约和基督教起源研究杰出教授。

译者简介

陆巍，宗教及神学深度爱好者、研究者，本科毕业于西安石油大学外语系，2007年9月开始就读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专攻基督教思想史方向，硕士二年级时曾修读古希伯来文，对《圣经》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翻译出版《〈旧约〉入门》，深受读者好评。曾就职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深圳《晶报》和招商银行，现游学于美国。

图目

图1　巴勒斯坦地图
图2　哥林多的神庙遗迹
图3　古斯塔夫·多雷，《以马忤斯之路》（1872）
图4　古斯塔夫·多雷，《耶稣在会堂中讲道》（1872）
图5　凯撒里亚的港口
图6　古斯塔夫·多雷，《保罗的皈依》（1872）
图7　保罗的行程路线图
图8　克里斯托夫·魏格尔，《耶路撒冷的雅各》（1695）
图9　马提亚·赛茨，《七碗、龙、骑在兽上的女人和巴比伦城的倾倒》（1672）
图10　公元4世纪包含《启示录》3:19—4:3的手稿

第一章

步入《新约》的世界

当耶稣（Jesus）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一个新的宗教运动在巴勒斯坦地区生根发芽，并在公元1世纪后期迅速传遍地中海世界。这个新兴宗教运动的领袖们写给信众团体的书信中有21封被保存下来。在公元1世纪的最后30年里，又出现了6份重要的文献，其中四卷为叙述耶稣生平的福音书，一卷为记载这场宗教运动最初发展的《使徒行传》，还有一卷为预言惊人异象的《启示录》。这27卷篇幅并不长的作品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新约》，都是以早期罗马帝国的通行希腊语“古希腊共同语”（Koine）写成。

这部《新约》并没有洋洋洒洒的篇幅，也不具备波澜壮阔的写作背景，更没有令罗马纸贵的文学价值。但是它在宗教和文化上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在2世纪中叶，基督教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之际，这27篇文本成为了官方的圣典集成（或称为“正典经卷”），与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共同构成基督教《圣经》。

自此，《新约》不再是人的手笔，也不再是历史文献。对于基督教的信徒而言，它是在上帝的启发下写出的文字，是源于神的启示，更是神学和道德规范的最权威源头。不过，亦有人对基督教嗤之以鼻，认为《新约》（尤其是“保罗书信”）代表了基督教的一种讨厌特质，即压抑思想和精神的倾向。通过帝国的扩张霸占，这种倾向开始成为欧洲占统治地位的一股文化力量，继而又随欧洲的殖民活动蔓延至全世界。

三类读者将从这本小书中获益。基督徒们将《新约》奉为圭臬，这次他们将会对它有一个新的认识。他们会惊诧于其复杂性，也会因发现其中的人性色彩而感到慰藉。

不屑于基督教的读者也会发现，《新约》中沉甸甸的神学意义和文化意义并不妨碍对本书的赏读。他们会惊觉《新约》中的观点何其多元，意蕴何等丰富。

而对那些已对《新约》抱有一定看法的读者来说，本书与其说是在介绍，不如说是在扭转他们的观念。但同时也有一定数量（且越来越多）的读者根本没翻过《新约》，也就未曾在生活中体会其文化力

量，更无从知晓其中的文字因何争议不断，又因何引人入胜。那么在本书中，他们将了解到《新约》为何具备如此魅力。

上述三类读者也需清楚，没有哪本书可以完全中立地介绍《新约》——这样的书可谓不可遇也不可求。不过为了让读者们看得明白，任何一本介绍性的书都要交代清楚它将从哪些角度切入其主题。本书将从四个维度来评说《新约》这部最早的基督教文献。

人类学维度

“人类学”一词本身就暗示了《新约》是出自人的手笔。《新约》文本自身也已经直接表明了这一点：四卷福音书的卷名即表明它们分别出自马太（Matthew）、马可（Mark）、路加（Luke）和约翰（John）之手；写信给各地会众最多的是使徒保罗（Paul the Apostle）。本书在论述上不涉及神的作为——无论是就基督教运动的产生还是《新约》文本的形成而言。但本书并非否定这一因素，只是不予讨论罢了。

正因为《新约》是由1世纪地中海地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写出的，所以这些文字同所有人类作品一样，始终被其作者对世界的认知、对社会形势的洞察，甚至是对上帝意志的理解所局限。因此，读者也就不难发现这些文字间有认知差异，甚至是相互矛盾。毕竟，一切人类的见证都是特定的、具体化的、有独特视角及局限性的。然而，如果说《新约》完全是人的作品而非在上帝干预之下写成，那么它也不仅仅是心理冲动和社会动态的产物。纵观《新约》各卷，所有细节和特性无不流露出人的创造力。

早期的信徒就颇具创造力，用自己文化中的种种象征符号来阐释他们的信仰体验。最早的基督教文献是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在极为独特的文化语境中诞生的。这些文献精彩地呈现了令自称文化人类学家的学者们最感兴趣的人类行为。基督徒群体是脆弱的、有一定目的性的。在这个群体的框架之下，基督的信徒们重新阐释了他们所继承

下来的那些象征符号，并通过这一过程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现实。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新约》，就是要明白这些文本是在人类自我阐释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个充满张力的过程依赖于起初开启这场信仰运动的宗教体验，这些宗教体验的汇积不过数十年的时间。

图1　巴勒斯坦地图。

历史学维度

有一些读者自然而然地将《新约》文本看做是永恒真理。在这里要特别提醒这样的读者，这些文本从历史中来，到历史中去，无不植根于1世纪希腊–罗马和犹太社会生活的语境。人类学认为这些文本是人作出的阐释，历史学则指出这一阐释以1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特殊社会现实作为背景。其中之一就是棘手的语言问题。《新约》以1世纪的希腊语写成，其措词、语法和句法都由不得读者随意解读。这些文本的表达被当时所采用的“古希腊共同语”所限定。因此，对《新约》真正可靠的解读只能在其特定历史背景下根据希腊语原文来进行。

历史学的维度包括对《新约》“符号体系”的研究。在《新约》所处的时代，第一批基督徒，无论是来自主流的“外邦”（希腊–罗马）文化，还是来自犹太文化，都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的结构、变迁和所使用符号的影响。我们将这诸多因素的复杂混合简称为“符号体系”。过去两个世纪的考古学发现令人们对《新约》历史背景的认识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也使得我们能够对这些古老的文本作出更为全面和准确的解读。

最后，《新约》对于一些问题的历史性重构有重要意义：耶稣如何传教？这场有关救世主的运动如何产生，又如何传播？《新约》各卷的历史背景和修辞目的又是什么？实际上，自19世纪中叶以来，对于这种历史性重构的探索一直是《新约》研究的一个主要动力。

就实际的历史知识而言，探索得出的结果是复杂的。一方面，《新约》是对其诞生时代的广阔历史、文化语境的绝佳见证。但另一方面，如果想从中获得基督教起源的完整历史记录，它又显得过于片面和偏颇。

文学维度

《新约》本是一部由各自独立的文学作品组成的文集。无论早期的基督徒对自己的信仰体验有过多少口头表述或阐释，今天我们所能

看到的只有精心创作的文字。

《新约》各卷的表述并非异口同声，视角也各异。因而每一卷都应当独立考察，而非试图调和它们之间的差异。各卷的区别常常被忽视：比如，当人们笼统地说“福音书”时，往往不在意每一卷福音书到底如何记载耶稣的事迹；提及保罗时，也不会留意这些署名保罗的书信彼此差异是何其之大。

文学维度也要求注重不同文体、风格在表意方面的差异。比如书信体和叙事体的表意就有很大不同。此外，因为《新约》的文体和修辞手法是1世纪地中海文化特有的，故文学方面的关注也要求具备历史意识。

宗教的维度

乐于从人类学、历史学、文学三个维度入手研读《新约》的读者常常会忽略宗教的维度，部分原因在于这一维度很容易被误解。“宗教”与“神学”不同。当然，《新约》古往今来一直为基督教神学所用，其中的一些篇章也可以说含有“神学”元素。

不过，对神学的最佳理解是将其视为对宗教语言和活动的有常思考，而《新约》中随处可见的正是这些语言和活动。

有三个概念需要澄清。所谓宗教体验是人类对于所感知到的终极力量的回应，涵括了思想、行为、意志和情感。这种回应是独特而强烈的，情不自禁的。而宗教是围绕着对终极力量的体验和信念构建起来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神话、仪式、教义和道德行为来寻求力量的调和，也常常试图以直接的神秘体验触及这种力量。宗教语言则是在宗教体验和宗教活动中所使用的一整套复杂的语言，包括神话、祈祷、劝诫和悔过的语言。

《新约》是一部宗教文献，最明显的原因是其作者和受众都是一场宗教运动的参与者，该运动在2世纪完全发展成了一门新的宗教。保罗不是以友人的身份写信给哥林多人，而是以“耶稣基督的使徒”的

身份，写信给“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新约》中其他各卷也无不如此。它们是这场有组织的宗教运动的“官方文献”。

《新约》的宗教性还在于其内容。对于终极力量的体验、与这种体验相关的信念，还有基于这些体验和信念而形成的生活方式，构成了《新约》的独特主题。《新约》所描述的世界热烈而充满张力，却有一种深刻的宗教特性贯穿始终。如果读者不能把握住这一点，那么就无法把握住《新约》的整体特性。

第二章

《新约》与历史

希伯来《圣经》（也就是基督徒所称的《旧约》）见证了近东地区千百年的历史变迁。其各卷成书时间跨度极大，因而也就成为以色列历史及周边地区古代文化的无价史料。它所记载的内容大多可为考古学所证实，尽管具体叙述不一定与史实相符。

然而《新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则截然不同。各卷成书时间跨度不过50年左右（1世纪的下半叶）；由于只关注耶稣的故事、初期基督教运动，以及散居各地的基督徒会众，因而所记载的事件也很有限。在2世纪之前，这些事件并不为外人所留意，而且基督徒在2世纪末之前也没有留下考古学上的证据。

众所周知，如果想重构历史上真实的耶稣形象，四福音书很难作为可靠的史料。从信仰出发的视角、表达上的相互依存以及彼此之间大大小小的不一致，使得四福音书不可能令人满意地记叙耶稣的生平事迹。恰当地总结耶稣的教义或宗旨则更难。福音书中虽然有对于耶稣其人的丰富见证和详尽阐释，但作为历史素材还是颇具局限性。

当然，有些历史性结论还是可以取信的：耶稣是生活在1世纪的犹太人，罗马当权者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一场运动以他的名义兴起——这些都具有极高的历史真实性。耶稣传教的一些细节也颇为可信：他医治病患、与社会边缘群体往来、用寓言的方式讲话、以先知的口吻切切地向人们宣扬神的诫命。有些特定的事件，比如他受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的洗礼也有可能是史实。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严重缺乏真实可靠的历史记录。

《使徒行传》记载了耶路撒冷最早的基督徒团体，以及彼得（Peter）和保罗宣教活动中的一些事件，但同样是片面且经过修饰的。由于《使徒行传》的记叙与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因而能够从中粗略勾画出保罗在约公元37年至公元64年间宣教事工的轨迹。在某些事件的记录上，《使徒行传》与保罗书信高度吻合。

尽管如此，13封署名保罗的书信中也只有5封可以追溯成文的确切时间，保罗的其余书信以及《新约》的其他各卷则无法确定。传统上判定的写作时间完全是学者根据文学关联性及所探讨的内容所作出

的猜测。

对于耶稣和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学术著作和畅销作品的看法并不一致，而是有着大量且常常很尖锐的争论，这正是因为它们几乎完全以缺乏历史确凿性的文学作品为依据。

对于《新约》的历史背景，人们则有着更为一致的看法。基督教及其最早作品所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是有充分历史证据的。因此，通过将这些文献放到1世纪的社会环境和符号意义之中，读者能够获得对它们的重要洞见。《新约》各卷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四种文化要素的混合：

第一种文化要素是地中海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模式，它们在罗马帝国产生前就已形成，帝国衰亡后依然存在。其中之一就是家长制家庭的重要性。在这种制度中，权力的施行自上而下，顺从则自下而上：男人比女人更有地位，父母比孩子更有地位。在家庭和帝国的最底层是奴隶，他们没有作为人的资格，而只是被当做财产。

占据了权力谱系正端的男人全都热爱荣誉、害怕耻辱，并醉心于为多此少彼而相互竞争。竞争的领域多种多样，包括战争、体育，甚至美德，但竞争的目标总是荣誉。

荣誉和羞耻特别符合当时社会的保护人制度：如果保护人为被保护者提供了各种实实在在的保护，那么被保护者就会为恩人献上赞美和荣誉。“友谊”这个概念则预设了人主体之间的平等，或者至少说是互惠，因此被用于润滑社会结构失衡造成的紧张关系。这样一来，被保护者可以被视为保护人的“朋友”。

保护人制度这一社会现象在地中海地区盛行的多神论宗教体系中找到了宗教上的表达。神圣力量被认为是散布在一个人格神的大家族之中，其中每一位神都能够成为人类的保护人，并反过来接受人类通过宗教奉献所给予的荣誉。

第二种文化要素是罗马的统治。自公元前3世纪晚期开始，罗马共和国的有力统治就扩展到了整个地中海世界。耶稣出生于奥古斯都（Augustus）统治时期，并于提比略（Tiberius）皇帝统治期间、被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广袤的行

省区域，罗马帝国的权力体现在其道路网和法律体系之中，体现在连年不断的赋税中，更体现在各要塞的驻军以及各罗马殖民地（比如哥林多与腓立比，保罗曾向这两地的教会写信）的退役士兵身上。难怪《使徒行传》将保罗到达罗马作为其宣教使命的顶峰，也难怪保罗会写信给都城罗马的信徒，告诉他们自己计划从他们那里出发前往西班牙宣教。

图2　哥林多的神庙遗迹。约建于公元前6世纪，与希腊罗马时期的阿波罗神有关。

不过，罗马统治的重要性有可能被夸大了。在其早期传播及《新约》成书时期，基督教很少引起帝国当权者的注意。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寄生物有一天会吞噬它的寄主。此外，在帝国的早期，希腊语和希腊文化（也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种文化要素）是毋庸置疑的文明标准，即便对在帝国中当家做主的罗马人来说亦是如此。

尽管罗马已经征服了希腊，但随着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东征而兴起的希腊化文明进程仍然在地中海世界占有主导地位。亚历山大设想了一个泛希腊化的世界，雅典古典

文化中的各种理念将在整个已知世界生根发芽。城邦及其各种文化体制构成了希腊文化的核心。共同的语言将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宗教融合则给不同的多神崇拜体系打下了希腊文化的烙印。

希腊文化渗透性强、影响力大。希腊的宗教思想、宗教习俗、修辞及哲学如何构成一种普遍文明秩序的基础，《新约》便是一个佐证。虽然早期基督徒反对所有这些“外邦人”的东西，但他们的作品中却处处可见希腊文化的印记。

基督徒反对希腊文化，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来自犹太教——《新约》中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要素。耶稣及其最早的追随者是犹太人：保罗是犹太人，而且目前我们所知的《新约》各卷作者也都是犹太人。他们也忠诚于犹太教，并首选犹太教的符号来解释他们信念中神在耶稣身上所成就之事。

然而，在1世纪，犹太教不只是存留于巴勒斯坦的“圣经宗教”。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的、并且不断发展的现象，遍及整个地中海世界。在外人看来，犹太人最显著的特征是团结且与外族隔绝。一些信念和习俗使他们区别于邻人。他们只信仰一位神，视自己为神的选民，与神立约并担负绝对的、相互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践行割礼，以及持守安息日。

这位神的作为，这个民族的故事，以及最重要的——那些指明以色列人应如何对待神及同胞的诫命，在被称为“托拉”（Torah）的符号系统中都有所体现。“托拉”一词首先指的是被称为“塔纳赫”（TaNak，由希伯来《圣经》中律法书［Torah］、先知书［Nebiim］、圣文集［Ketubim］三大部分的名称集合而成）的希伯来文本集纂，其次也指这些文本通过阐释不断扩充、为一代代人提供的指引和智慧。

尽管全都忠诚于托拉，1世纪的犹太民族内部仍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时甚至产生分裂。在数个世纪中，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起初是因为流亡，后来则是出于自己的选择。流散在外的犹太人需要遵循巴勒斯坦的特定社会习俗，在遵循上帝律法方面则相对自由。

例如，他们可以吸收希腊人的语言和文化而不违背自己的传统。早在公元前250年，《圣经》就被翻译成了希腊文（即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Septuagint，缩写为LXX］）。对于住在亚历山德里亚等地的犹太人来说，这个译本跟希伯来原文具有同等的权威性。事实上，亚历山德里亚的犹太作家和学者以七十子译本为基础构建了一整个著作体系。

跟所有的少数民族一样，希腊化时期流散在外的犹太人体会到一种张力，既想融入，又想保持隔绝（也就是保持“圣洁”）。但在一种相对的自由中，他们可以纾解这种张力。犹太教被视为一种合法的古老宗教，流散的犹太人甚至享有一些特权。

有些外邦人受犹太教吸引，成为改宗者（皈依者）或“敬畏神者”。他们赞同犹太教理念，但拒绝割礼，并且不完全遵守律法。另一些外邦人则因为犹太人与外族隔绝而痛恨他们。他们指责犹太人“憎恶世人”，并经常骚扰犹太人。对此，流散的犹太人以种种辩护式的作品加以回应，用外邦人能够理解的说法去阐释犹太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同样赋予了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教一种鲜明的特征。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经历了更大的冲突。公元前6世纪的巴比伦之囚让犹太人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只有远离异教的影响，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才能得到保证。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生活有着明确而具体的规则：托拉不单单是宗教诫命，更是这里的律法；这片土地应该保持神圣，远离异教的污染；圣殿是献洁净祭之地；犹太人的王要奉神之名统治子民。

面对影响力强大的希腊文化以及后来罗马人的军事征服，在如何最好地表现对神的忠诚这个问题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出现了分歧：是应当尽可能地顺应、改变，还是应当抵抗？若是抵抗，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1世纪，耶稣在加利利传道、在耶路撒冷被钉死，一场称他为“弥赛亚”（即“基督”、救世主）的运动兴起并蔓延开来。同一时期内，犹太人也在为“神的掌权”以及人该如何荣耀神争论不休。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描述了一个个彼此相争的团体或派别，他们在

宗教和政治立场上都有分歧。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艾赛尼人、奋锐党人：每个派别都有关于神的掌权的构想。

约瑟夫斯还描述了一系列民众反抗运动，它们导致了反抗罗马的战争（67—70），战争的高潮则是圣殿被毁（70）。在这样的环境下，耶稣及其追随者有关“神之国”的宣告，不能不说是煽动人心的。

虽然《新约》本身提供的史实很少，但它处处都体现出1世纪真实复杂的历史背景：地中海文化的种种模式，罗马统治的有力影响，希腊化文明的无处不在，以及托拉的符号世界——最早的基督徒正是在这个符号世界中寻求对自己信仰体验的阐释的。

第三章

耶稣复活了？！

信仰基督的这个宗教派别诞生在1世纪的犹太教历史语境中，这毋庸置疑。但是，它诞生的确切方式仍然晦而不明。对于它的突然出现（且不论它的戏剧性发展）存在很多解释，从神的干预到人的阴谋，不一而足。所有解释都必须在唯一可参考的材料——《新约》文本——中找到根据，还必须能够厘清耶稣的传教事迹与基督教运动之间的延续性与差异性。

福音书将耶稣描述成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位传教者和施行奇迹者。而成书早于福音书几十年的保罗书信，却将耶稣描述成一个遍布罗马帝国各城镇的宗教团体的核心。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变化的？从一位宣扬神之国的传道者到被高举为神，这到底是使徒们合谋包装出来的概念，还是保罗这样的宗教天才的杰作，抑或是接触希腊神秘宗教的结果？人们对这些理论进行论证，发现它们均存在缺陷。

最好的解释必须考虑所有证据，又能为这些证据的起源和框架提供最佳解释。因此，我们要寻找的原因需要符合如下两个毋庸置疑的结果：一场宗教运动奉耶稣之名产生并迅速扩展；在这场运动中以耶稣这个人物为中心诞生了许多作品。要确定这样一个（或多个）原因，最合理的方法是在考证历史可能性时探究这些作品本身的主张。

认为1世纪中期遍及罗马帝国各城镇的这场运动最初是在耶稣传教的过程中兴起的，这种解释福音书并不支持。耶稣的传教仅仅持续了一到三年，以他的突然离世而告终。他的教义不成体系，且往往不是直接的，也并没有为教会生活提供纲领。他召集门徒并且从中选出十二人，这表明他想要追随者，但是他选择的那些人事实上并不可靠：有一个背叛了他，还有一个不认他，其他人则在他耻辱地被钉死之前抛弃了他。

福音书（尤其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结尾）以及《使徒行传》的开篇均表明，从耶稣被钉十字架到人们开始奉他的名传道，这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后来的传道在性质上有别于耶稣本人的传道。

这些事情便是基督徒所说的耶稣死后复活，并通过他的灵将能力

赐予他的追随者。基督教运动的开端就是这次复活事件。

保罗书信对这次复活事件及其意义作出了最好的阐述，其他早期书信又有所补充。这些文献没有讲耶稣具体如何复活，也只有一次列出见证者的名单（《哥林多前书》15:3—8）。在最早的作品中，与其说这次复活是过去的事件，莫若说是当前的现实——一个既涉及耶稣也涉及其追随者的现实。追随者们都说这次复活使得耶稣升至神的地位，而他们自己也通过圣灵获得了能力（见《哥林多前书》12:1—11）。

这是个关键性的说法，而且很容易引发争议，必须小心将其解释清楚。《新约》以下各篇文本并没有否认耶稣的死；相反，它们强调了耶稣死亡这个事实。它们也没有把耶稣的“死后生命”等同于教会内部对其事迹、言语或理念的纪念。当然，这些形式的纪念一直持续着，但并不构成教会对于复活的理解。

最早的文献并没有把复活说成是从假死中苏醒，而是说耶稣进入了神的权能和生命，是被高举到神的“右边”（正如《诗篇》110:1所言），并由此为自己赢得了“耶稣是主”（《哥林多前书》12:3）的欢呼。耶稣的影响没有消逝，而是更加鲜活地存在着；事实上，用保罗的话说，他已经成为“叫人活的灵”（《哥林多前书》15:45）——他分享了上帝独有的权能，可以赐予其他人生命。

图3　古斯塔夫·多雷，《以马忤斯之路》（1872）。这幅画描绘了《路加福音》24:13—35的场景：两个门徒从耶稣撒冷回来的路上，复活的耶稣在他们面前神秘显现。

只有这样一种对于复活的深刻理解，才解释得通分散在帝国境内的这些小教会何以提出如此惊人的主张——跟它们在当时世界的实际地位完全不相称。从一开始，信徒们的主张就是放眼世界的：他们有一个世界范围的使命（《马太福音》28:19；《使徒行传》1:8）；他

们将审判世界（《哥林多前书》6:2）；世界属于他们（《哥林多前书》3:22—23）；他们的信心胜了世界（《约翰一书》5:4）。

相应地，这些放眼世界的主张也跟信徒们对当时自身处境的表述相关联。他们说自己已经被改变，从奴役、死亡和罪中解脱，获得了自由、生命和信心（例如《加拉太书》3—5）。用于描述这种转变的词语——拯救、赎回与和好——全都不是指向对未来的希望，而是指向当下的现实。信徒们现在的生存状态是平安、和好与喜乐。他们拥有了信、望、爱，并从行为上表现出来。

他们现在拥有了以前所没有的能力。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有些人能说方言，有些人能预言、行异能或者医病（《哥林多前书》12—14）。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全都可以放胆讲道，为他们所领受的从神而来的福音作见证（见《使徒行传》3—5）。

所有这些具体主张是基于一个总的主张：他们已经从神那里获得了权能，这位神使得所有其他事物成为可能（见《使徒行传》3:12—16）。这种权能不是经济或政治上的，而是属灵的——它作用于人并改变人的认知和意愿能力。称它为“属灵的”，并不是说它脱离了实体的存在；事实上，改变个人和社会实体，正是这种神圣力量最重要的表现之一。

这种力量的核心象征是“圣灵”：信徒们所体验到的力量来自上帝（即“圣”），他们被改变、被赋予自由（通过“灵”；见《哥林多前书》12:1—3，《罗马书》8:1—17）。

简言之，第一代基督徒宣称他们被神圣的力量所充满，且他们所体验到的力量来自巴勒斯坦那个在本丢·彼拉多手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们这种体验的表现就是圣灵；他们的信仰告白是“耶稣是主”。对这些追随者来说，耶稣确实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但“主”这个称呼要彻底得多、绝对得多（见《使徒行传》2:36）。耶稣不仅对犹太人有重大意义，对全人类都是如此。确实，因着耶稣被高举，这个世界被从根本上改变了。

如果说第一代信徒认为自己由于被神圣的力量所充满而成为“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5:17），是“新人”的一部分（《以弗所书》

2:15），那么，他们将这种新生命的来源归于耶稣这位“新的亚当”（《哥林多前书》15:45）。作为被高举的主，耶稣通过圣灵的力量存在于奉他名聚集的信徒中间，这是《新约》各卷的核心事件和信念。

为什么这场缘起于耶稣、却与耶稣生平并不同步的宗教运动可以如此迅速地崛起？为什么《新约》各卷坚定地认为不久前死在巴勒斯坦的耶稣此时仍存在于他的信徒中间，且带来了更大的能力？复活事件是最好的答案。

第四章

解释的过程

最初的信徒传讲上帝通过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所成就的事情，并称之为“好消息”（euangelion，即“福音”）。对于那些在生命中经历了圣灵力量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但正是这些关乎基督复活、被高举并通过圣灵临在的宗教体验和信念，给人的理解带来极大的困难。这使得最初的基督徒开始了一个解释的过程——于是便有了《新约》。

解释的必要性

信徒们心中有一种认知上的矛盾亟须解决。按社会学家的说法，认知上的矛盾是指两种观念之间的冲突，或者经验与观念之间的冲突。比如，我的观念是父母爱孩子，但实际经验是父母总打我。人们会感到这种观念和经验之间的矛盾无法忍受，要寻求一种化解的方法。

对于最初的信徒来说，他们自己身上有一个直接而明显的矛盾——他们对神圣力量的体验与自身现实处境之间的矛盾。如果已经获得了神圣力量，面对阻力时他们为什么仍然无能为力，为什么仍然软弱、受蔑视（《哥林多前书》1:26—31；《希伯来书》10:32—34）？如果借由受洗，他们经历了生命的复活（《罗马书》6:1—11），为什么他们中仍有人得病、仍有人死去（《哥林多前书》11:30；《帖撒罗尼迦前书》4:13）？如果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的圣洁，为什么他们中间仍然有罪的存在（《哥林多前书》5:1—13）？如果他们领受的圣灵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为什么得救恩的更多是外邦人，而不是犹太人（《使徒行传》28:25—29）？这些矛盾都迫切需要开解。

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新力量的来源本身也存在疑点。信徒们认耶稣为主，但同时也认他为弥赛亚（《使徒行传》2:36），而对犹太教徒来说，对这两个身份的认可都造成直接的认知矛盾。承认耶稣是主，似乎会造成“天上有两位掌权者”的局面，这就会威胁到犹太教严

格的一神论主张：如果只有创造天地的这一位主，那耶稣又怎么能成为“主”（见《哥林多前书》8:4—6）？

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即基督）则造成更多困惑，因为这跟托拉的符号世界相冲突。1世纪的犹太人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期，但所有被期盼的弥赛亚都是要让犹太人过得更好，要“使犹太民归回”。就此而言，耶稣没有做到；犹太人并没有因为耶稣而变得更好。

根据托拉的严格信条，耶稣也不能算是一位公义的弥赛亚：福音书中记载他违反安息日的禁条（《马可福音》2:23—3:6），无视有关洁净的条例（《马可福音》7:1—23），与“罪人”为友（《路加福音》7:34，15:1—3）。

最有问题的是耶稣死去的方式。保罗清楚地说明，“十字架的道理”被外邦人视为“愚拙”——这是奴隶的死法，而非贵族的死法；对犹太人而言则是“绊脚石”（《哥林多前书》1:18—25）。律法书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见《申命记》21:23；《加拉太书》3:13），就像是在说后来耶稣的死亡。

在这里，认知的矛盾达到了极点。耶稣是那位圣洁的上帝吗？是那位公义的、降下圣灵的主吗？还是说他因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到了神的咒诅，是个失败的假弥赛亚？对最初的信徒来说，在开始解释自己的经历之前，需要先解释清楚有关耶稣的一切。

解释的方式

通过仔细分析福音书以及第一代基督教会所处的社会背景，可以部分重建这个过程。分析表明，对耶稣的记忆在门徒群体中口口相传了约40年，而书写成文的福音书则是传统说法的文学结晶，经过了门徒们的选择和塑造。

对耶稣言行的记忆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习惯中。犹太基督徒偶尔在会堂中与他们的犹太同胞碰面，在那样的背景下很可能要为耶稣的弥赛亚身份捍卫一番（例如，见《使徒行传》13:13—

43）。但通常情况下，基督徒是在家中会面（见《哥林多前书》16:15—20）并进行日常聚会活动。

讲道无疑是传讲“福音”的手段，同时还可能用于证实耶稣的权能（他如何治愈众人），以及耶稣如何应验了律法书中的预言。敬拜的环境提供了回忆耶稣的时机——尤其是入会的洗礼（《哥林多前书》6:9—11）和圣餐礼（“主的晚餐”，见《哥林多前书》11:17—34）。说“方言”和用预言讲道（《哥林多前书》12—14）也提供了一种通过灵性语言“回忆”耶稣的手段。最后，集体的读经和讲道也会激发对耶稣言行的回忆，这既是将教会活动合理化，也是为信徒的行为提供引导。

这些集体的回忆很复杂，因为回忆的对象耶稣同时也被认为仍强有力地存在于他们中间。因此，在集体的圣餐礼（耶稣通过圣灵临在其中）上，基督徒们回忆起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所说的话（《哥林多前书》11:23）；先知被圣灵感动“以主的名义”所说的话，则可能让人想起耶稣生前的教导或升天的主带来的启示，或二者兼有（见《哥林多前书》7:10）。对研究传统的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复杂性是一个问题，但对那些在这个活生生的回忆中过着宗教生活的人来说，似乎不成问题。

大部分情况下，耶稣的事迹和教诲是通过相对独立的讲述或轶闻传播的，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一些惊人的相似性。例如，耶稣的赶鬼和医病就有既定的模式：疾病、医治行为、结果、反应。同样，他的许多教诲也可以分辨出某些模式，尤其是在他跟犹太权威辩论的故事中。就连耶稣高度精练、富有原创性的比喻，也能在犹太教师用于教诲的比喻中找到形式上的相似之处。

在叙述中，福音书把这些篇章分别放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背景下，并且用了不同的框架。将它们类比成一条线上串起来的珠子有些夸张，但有助于理解一个基本观点：福音书作者手中的耶稣故事是相对独立的一些单元，用不同的组合方式进行了整理。当然，并非福音书中的所有篇章都符合这样的固定模式。例如，耶稣受洗、显荣和洁净圣殿的故事就无法这样归类。

但通常来说，福音书中各个单独回忆部分的呈现符合如下假设：它们都在教会环境中通过口头方式传播，并且在教会的持续经历中被选择和塑造。例如，有关耶稣跟犹太长老的冲突，很可能反映了早期教会跟教诲人的犹太教师之间的冲突（见《马可福音》2:1—3:6）。信徒们希望按照托拉的符号体系来解释耶稣，这也影响了这些回忆的呈现：使饼增多（《马可福音》6:31—44）、在水面行走（《马可福音》6:45—50）等故事都明显让人想起《旧约》中的先例。

那些通过医病表现耶稣的能力，或者通过比喻和格言传递其智慧的故事，则完全符合早期教会对耶稣的认识——有权能、被高举的主。它们并没有造成认知上的矛盾，因而也不需要做大量的解释。

耶稣之死

然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确实需要认真解释。我们已经谈到，这一点被外邦人视为愚拙，对犹太人来说则是绊脚石（《哥林多前书》1:18—31）。由于第一代信徒也是犹太人或外邦人，因而耶稣死亡的方式对他们自己的理解也构成了一个挑战。这是耶稣生平中最需要解释的部分，而且所有迹象都表明，在对耶稣的回忆中，这也是最先形成固定叙述模式的部分。

四卷正典福音书中，从最后的晚餐到耶稣被埋葬的部分被称为“受难叙事”，它们存在着一些独特之处。福音书其他部分的叙述是片段式的，这部分则冗长得不成比例。其他部分并不关注时间、地点方面的细节，但这部分则在时间、地点上详尽而连贯。四卷福音书中，这些章节的一致程度最高。总起来说，这些特征表明，对耶稣之死的讲述是耶稣生平故事中首先被解释和塑造成固定模式的部分。

这一塑造过程仍可以从两个要素中看出来。第一是对十字架之辱的直白叙述：耶稣被其追随者背叛、弃绝（《马可福音》14:43—52，66—72）；他经历了强烈的恐惧（《马可福音》14:32—42）；他受到肉体上的虐待和嘲笑（《马可福音》14:65，15:16—20）；他

以当时世界上最耻辱的方式被处死（《马可福音》15:22—32）。钉十字架结合了拷打和窒息，是罗马人为奴隶和反叛者准备的死刑方式。

福音书的叙述并没有掩饰十字架之辱，但却改变了事件的意义。耶稣并不是作为罪人而死，而是完全遵从上帝的旨意（《马可福音》14:36），作为义人为他人献出自己的生命（《马可福音》14:22—26）。显然，这种改变是根据耶稣这位弥赛亚的特质，通过重新解读律法书文本而实现的。耶稣的死应验了经文（《马可福音》14:27）。

《以赛亚书》52—53章讲到一个无罪的仆人为了他人的缘故而受苦，虽然为义却要担当他人的罪孽。当时的犹太人不会把这段奇特的篇章理解为跟弥赛亚有关，但耶稣的追随者会。《诗篇》22章描述一位义人受到不义者的逼迫，痛苦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最后神证明了他的无辜。当时的犹太人也不会把这一章理解为与弥赛亚有关，但耶稣的追随者会。

通过这样重新解读经文，将耶稣视为被高举的主的那些人，也发现了如何将耶稣理解为基督，虽然耶稣的死法似乎跟救世主这个称呼并不匹配。这种重新解读的过程非常有效，因而到了1世纪50年代中期，保罗已经可以这样表述——"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哥林多前书》15:3）。

这整个过程的结果是对实际的叙事进行了文学塑造，目的不仅是要说明一切如何"为要应验经上的话"（《马可福音》14:49）而发生，而且是要在耶稣受难本身这一最大的耻辱上，用经文支撑起实际的说法（《马可福音》15:24＝《诗篇》22:18；《马可福音》15:29＝《诗篇》22:8—9；《马可福音》15:34＝《诗篇》22:2）。

在受难叙事中显而易见的东西，在今天已经不那么明显了，但这并不会减少有关耶稣回忆的真实性。信徒们忆起耶稣，仍然认为他因复活而存在于他们中间。他们对耶稣的回忆经过了教会持续经历的选择和加工。而且，他们对他的回忆也披上了律法书的外衣，确保了耶稣不仅被理解为被高举的主，而且还是弥赛亚。

第五章
文学形式

基督教运动从一开始也带有强烈的文学色彩。我们可以确定，在有关耶稣的回忆通过口头流传被选择、加工的同一时期内（40—65），也产生了最早的基督教文学作品，成为后来大量文学创作的开端。《新约》各卷不过是从这些最早的文学成果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它们见证着一个更广泛的创作活动。

虽然创作于宗教运动的背景下，但《新约》收录的这些作品起初并非作为传达永恒真理的神圣文本而写就。它们探讨的是特定读者的真实处境。它们使用廉价的纸莎草纸，而非律法书卷轴所用的羊皮纸或牛皮纸。在那之前不久出现的手抄本——书的前身——使这些作品得以廉价而方便地传播。

然而，这些文学作品的出现提醒我们要留意早期基督教的三个方面。首先，其领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并假定其读者的文化修养也较高。可以肯定的是，古代文学作品是大声诵读出来的，因而“诵读”是一种口头上的表现而非私底下的行为。其次，该运动拥有足够的物质资源支持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当时的交流网络和人们的殷勤好客则为作品的发布和接受提供了环境。第三，当时的基督徒表达其独特的宗教信仰，是通过1世纪地中海地区传统的修辞形式实现的。

书信交流

最早的文学表达采取书信的形式——那个年代的基督徒很自然地选择了这种常用沟通手段。发达的道路系统和邮政体系使人们得以通过书信快速沟通。政治家和哲学家都进行着大量的通信。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普通人之间沟通商业和个人事务的信件。这种交流形式非常流行，甚至有时连那些以论述为初衷的作品也会采用书信的形式。

《新约》作品有21卷可以打上书信的标签。其中13封书信被认定是保罗所写（《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歌罗西书》、《以弗所书》、《提摩太前

书》、《提摩太后书》及《提多书》）；七封书信来自其他教会领袖（《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犹大书》及《雅各书》）；还有一封书信（《希伯来书》）作者不详。

我们也可以算算其他两卷中的书信体部分：在《启示录》2:1—3:21中有写给亚细亚地方教会的七封书信；《使徒行传》15:23—29记录了耶路撒冷使徒会议致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的外邦信徒的一封信；现存的书信中还提到过一些没有保存下来的通信（例如，见《哥林多前书》5:9）。

保罗书信是现存最早的基督教文献，它们很可能是教会之间最早的书信往来，也是最早被归集起来的作品。这13封书信有一些很明显的文学特征。它们大体上符合古代书信写作的惯常形式：问候语、正文、告别辞。保罗书信的宗教特征则尤其体现在含有特定宗教语言的问候语，以及安插在正文前的独特感恩（或祝愿）段落上。感恩的内容也提挈着书信的主题。

保罗书信是应时而作的：这些真实的书信探讨的是目标读者的真实处境。保罗书信是正式的、官方的：他以耶稣基督使者（使徒）的身份，写信给由他自己或同伴建立的教会。保罗书信是多样化的：从赞扬的小短文（《腓利门书》）到长篇的神学论证（《罗马书》），从简单（《帖撒罗尼迦前书》）到复杂（《加拉太书》），不一而足。

保罗的书信在创作构成上是复杂的：他糅合了一些传统的元素（仪式、信条、赞美诗，甚至耶稣的少量话语）。同时，在书信成型的过程中还有其他很多人参与：一些书信是由他口述、秘书笔录；一些是与他人合写；在一些书信中，还可以找到由师生进行的希腊–罗马及犹太教研究活动的影子。书信中的“哲辩”（虚构的激烈论辩）和“米德拉西”（对《圣经》的深入阐释）元素，也很可能是保罗与同工们的共同智慧结晶。

保罗书信也具有明显的修辞特征。他书信中显露的“人格”并非个人感情的简单流露，而是利用古代传统修辞手段建构起来的“角色”。

这些信绝非随意写就，而是经过细心创作的，是劝导的工具。保罗在这些信中采用了喻理（*logos*）、喻情（*pathos*）、喻德（*ethos*）的古代论辩方式。它们体现出古代修辞术的拟人法（*prosopopoiia*）理念，即“人格化写作”：对信件进行的文学加工，以及通过这种加工展现出的“保罗”，是符合作者面对的社会环境和宗教形势的。

对保罗书信的历史分析聚焦于三个问题。首先是文学上的完整性：有些学者发现，在某些保罗书信中存在小小的窜改；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一些书信实际上是经过编辑、合成的作品，是一系列更短的信拼合而成的。

第二个问题是真实性：是否全部的保罗书信都是保罗自己写的？从19世纪早期开始，保罗的每封书信都受到过质疑。评价真实性的标准包括信中内容跟保罗的宣教活动是否一致，以及在风格、主题、教会组织程度等方面是否连贯。到19世纪晚期，达成了一个今天大部分学者都接受的共识：有七封书信被普遍认为是真实的，即《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及《腓利门书》。

关于《帖撒罗尼迦后书》、《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这三封书信，学界仍有争论。而相比之下，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即三封“教牧书信”）是伪作。他们认为，这些书信是一个以保罗之名撰文立说的“保罗学派”创作的。这些书信为什么会写出来？是为了把保罗的教导引向更保守的方向。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注意到，这些有争议的书信传达的态度更加具有抑制性，对女人的看法就是一例（见《提摩太前书》2:8—15）。

长久以来所持的共识似乎已被等同于事实，但实际上，关于保罗作品出自谁手的传统看法并不可靠，对这些书信修辞特点和社会成因的新研究尤其可以表明这一点。可以认为，所有归于保罗名下的书信确实都写于他在世时，并且经过他的授意。在他传教期间，已经有其学派参与到这些书信的写作中来。对作者身份的看法当然会影响对“保罗思想”的判断，但不应影响读者对全部保罗书信文学性或宗教性的鉴赏。

第三个问题是确定每封书信所面对的社会与历史情境。保罗书信有些包含着丰富的具体细节，因而其探讨的教会问题也相对清晰（见《哥林多前书》及《加拉太书》）。还有一些书信，将保罗传教活动中遇到的、促使他提笔撰文的情况交代得非常清楚（《罗马书》）。但其他书信所探讨的情况并没有这么清楚。

所有对情境的重建都是试探性的，因为这依赖于从保罗的论述中作出推论——读者看到的是保罗的看法，而非纯粹的“事实”。此外，复原当时的情境并不能穷尽作品的意义。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是为自己的西班牙之旅寻求支持，但《罗马书》的意义却远远超出募集资金这件事。

《新约》中的其他一些书信写作时的情境则更难探明。每一封信都有各自解释上的困难。其中几封（《以弗所书》、《雅各书》、《彼得前书》、《约翰一书》）很可能是通谕性的：它们面向更大的读者群，而不是某一特定教会的成员。有几封（《希伯来书》、《彼得前书》、《约翰一书》）也可能是面向会众的口头传道，后来以书信的形式寄送给其他人。

叙事教诲

《新约》中的另一种主要文学形式是叙事。有四卷叙事作品（《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追溯了耶稣开始传道到他复活显现的故事。其中两卷（《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还有对耶稣降生及孩童时代的简单记叙。

古代文学中的叙事主要与英雄人物（如亚历山大大帝）和重大历史事件（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关。但四卷福音书（写作时间跨度不超过30年）却前所未有地以一个默默无闻的外省传教人为叙述对象，主人公的活动最多只持续了三年，而且最终被当做罪犯以耻辱的方式处死。

公元70年前后的几起事件共同激发了福音书的创作。与罗马的战

争使犹太人中的弥赛亚主义者与非弥赛亚主义者关系恶化，让基督教愈发成为外邦人的宗教。这场战争也使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会瓦解。耶稣传道的亲眼见证者也都行将就木。从口头传播到书写的转变正是为了防止耶稣言行失去犹太教根基（并因此丧失其全部意义）。

跟其他写历史人物的古代叙事作品相比，福音书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们产生于轰轰烈烈的宗教运动，而非简单的文学冲动。信仰的视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复活的视角，贯穿于对耶稣其人的叙述中：作者与读者都认为这位过去的人物仍存在于他们中间。

同样，福音书对敬拜团体内口口相传的记忆进行搜集、组织和文学加工，这使得其叙事具有一种独特的厚度。每段文字中都包含三层认知：见证者的阐释，他们曾亲历耶稣时代发生的事件并讲述出来；这些事件在教会生活中的作用；四卷福音书作者各自的文学目的。

福音书中的三卷（《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可以放在一起平行研究，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异同关系。正因为可以放在一起去看，它们被冠以“同观”（Synoptic）的标签。毫无疑问，它们呈现出文学上的相互依赖关系。19世纪对福音书的研究大多旨在解决“同观福音问题”：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与《马可福音》的论述一致时，《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之间也相互一致；《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分别引用了共同的材料（学者称之为Q字原材料，Q即“来源”[Quelle] 的缩写）。

大多数学者现在都认为《马可福音》是最先创作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创作时借鉴了《马可福音》。少数人赞同古代教会的传统看法，认为《马太福音》是第一部写就的福音书，但这一观点不能很好地解释三个版本的实际情况。而《约翰福音》（也被称为“第四福音”）虽然与同观福音共享某些传统，但在文学上并不依赖于它们。

《新约》中的第五卷叙事作品——《使徒行传》实际上是《路加福音》的延续（作者也是路加）。它所讲的故事刚好接续《路加福音》，并显然与其同属一个文学课题，因此学者们把这两卷合起来称

为“路加–行传”。整体来看，这两卷作品在形式上很像那些希腊化的犹太人所创作的辩护型历史作品，所表现出的文学特征也与同时代的叙事作品最为相近。两卷均有正式的开场白，并采用文学转喻，这说明“路加–行传”的作者试图将基督教运动置于更大的希腊–罗马文化背景下。

最后一种文学形式——启示文学——则存在于《启示录》中：作者描述耶稣升入天堂，并揭示了他在那里目睹的异象。就这一体裁而言，《启示录》显得与众不同，原因在于被钉死后复活升天的基督扮演着核心角色，他的死和被高举重塑了所有传统的主题。但是，对异象、神秘数字、动物和宇宙象征主义的常规使用则明确标志着《启示录》属于启示作品。

《新约》中的书信、叙事和异象写作在很多方面都符合那个时代的文学和修辞传统。但它们也表明这些传统是如何被夸大并重塑，从而促使《新约》作者进行创作的。

第六章

同观福音〔1〕

关于《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我们对它们的作者一无所知。它们把耶稣其人放在1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背景下进行叙述，成为独特的见证。这三卷很可能写成于公元70—85年之间的福音书，赋予了“福音”一词新的意义：它不仅指上帝通过耶稣的死和复活所成就之事，也指耶稣在自己的言行中借助上帝的力量所行之事。

从文学角度讲，这三卷福音书的叙事紧密相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各自创作的时候，都借鉴了《马可福音》。每一卷福音书对耶稣的描述都包含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但也进行了不少加工：一方面根据所持信仰，一方面通过经文符号体系中对耶稣的诠释。一般读者认为同观福音书中描述的耶稣最接近历史上的耶稣，有血有肉；但实际上，其中的文学创作成分并不比第四福音少。

尽管有很多相似之处，同观福音的每一卷对耶稣其人的描摹仍是独特的。《马可福音》并不仅仅是其他两卷福音书的来源，也是大能的见证。同样，《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也不仅仅是《马可福音》的扩充和修改，对于所描写的人物，它们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视角。在相同的参考框架下，每卷福音书都有独特的表现方式——通过分别观察它们对耶稣及其门徒的描述，可以认识到这一点。

以耶稣为焦点的选择非常明显：耶稣现在作为被高举的主受到敬拜，他之前在世间的传教活动自然会受到关注。门徒的选择也很自然，因为早期教会中渴望成为弥赛亚“门徒”（*mathētai*）的人会和那些更早期的追随者产生共鸣。每卷福音书中耶稣及门徒的形象都有着一个叙事目的，即教导1世纪晚期基督教会中的那些读者。

《马可福音》：作为神国奥秘的耶稣

《马可福音》很可能是第一部写成的福音书。传统上认为其创作于大约公元67—70年，因为第13章所预言的圣殿被毁，还没有受到现实中犹太圣堂被罗马人破坏的影响。学者们一致认为，《马可福

音》运用了犹太启示文学的象征主义手法，该手法兴起于第二圣殿时期，是一种通过运用文学想象抵制外来影响的方式。

启示文学作品通常是托名的，即假托一位古代英雄向当下的读者说话。升入天国的可能性和种种异象，为受压迫的人提供了对于历史的另一种理解：上帝是历史的掌控者，并会毅然采取行动拯救其子民（尽管事实看上去并非如此）。启示作品会包含复杂的“密码”：它们用神秘数字、拟人化的动物以及宇宙力量作为象征，引导局内人了解其中的奥秘。

《马可福音》第13章是这类作品的一个小小例证：耶稣跟最亲近的三个门徒说到未来的事情：他描述了一场大灾难，随后“人子”驾云降临，施行神圣的拯救。不过，《马可福音》对启示意象的运用并不仅限于某一章节，而是散布在整个叙事中，因此，最好将《马可福音》作为一出以现实主义叙事形式呈现的启示戏剧来读。《马可福音》保留了这种文体中固有的局内人／局外人反讽：读者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和“神的儿子”（1：1），但叙事中的人物并不知道这点，虽然他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本是最应该拥有这种“局内人”知识的人。

《马可福音》对耶稣的描述完全是启示性的。这卷福音书没有记叙耶稣年幼时期的情况。耶稣一出场就是在另一个启示人物施洗约翰那里受洗。经过圣灵的洗礼、又在旷野受试探（1:9—12）之后，他又征服了压迫人类的宇宙力量（污鬼）（1:21—28），从而证明“神的国”正在通过他的言行临到人间（1:14—15）。

《马可福音》强调耶稣的行为甚于其话语。尽管每个人都叫耶稣“夫子”，尽管他对追随者也表现出教师的姿态，《马可福音》却只记述了他很少的言论：几处比喻（见4:1—32）、一些深刻的警句（见6:4，7:15）、先知的警告（13:5—23），以及最明显的，教导门徒忠于神国的代价（见8:34—38）。

耶稣的“新道理”（1:27）是有关权能的问题。耶稣医病（1:29—34）、赶鬼（5:1—20）、平息海上的风浪（4:35—40）、用几张饼喂饱很多人（6:34—44），还在水上行走（6:45—52）。无论其追随

者还是对手都在问：“这到底是谁？”（4:41）——这个问题的答案，《马可福音》的读者早已知道。

《马可福音》对耶稣的刻画很复杂，并非简单地将其描述成一个行神迹者。对于自己的弥赛亚身份，耶稣似乎希望保密（3:12，9:9）。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位大有能力的行神迹者，竟然注定要在其人类对手那里受苦、死亡。因而，《马可福音》刻画的关键之处，在于耶稣通过他正式的受难预言（8:31—32，9:31，10:33—34），教导门徒说自己的“人子”身份不仅要在荣耀的未来得到彰显（见13:26），而且尤其要在当下的受难中显明。人子“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10:45）。受难预言使门徒们——当然还有《马可福音》的所有读者——预备好去理解耶稣受辱而死的意义。

《马可福音》关于耶稣受难的说法是现存最早的，从中可以看出这件耻辱的事情如何被阐释所扭转：表面看来似乎是弥赛亚的失败，但实际却是神国在世界做工的最有力证明。作为人的耶稣的软弱，体现了神的权能。

因此，《马可福音》中的耶稣既不直白，也不简单。相反，他带着深刻的悖论：身为魔鬼的征服者却屈服于人类对手的残暴。通过耶稣的死，上帝开始了在人间的掌权。耶稣的复活——在有关受难的三次预言中已经有过暗示，并在耶稣显荣时有过短暂的表现——让耶稣故事成为一出喜剧而不是悲剧，也让《马可福音》对于耶稣的记叙成为一种教导，一种以软弱彰显权能的教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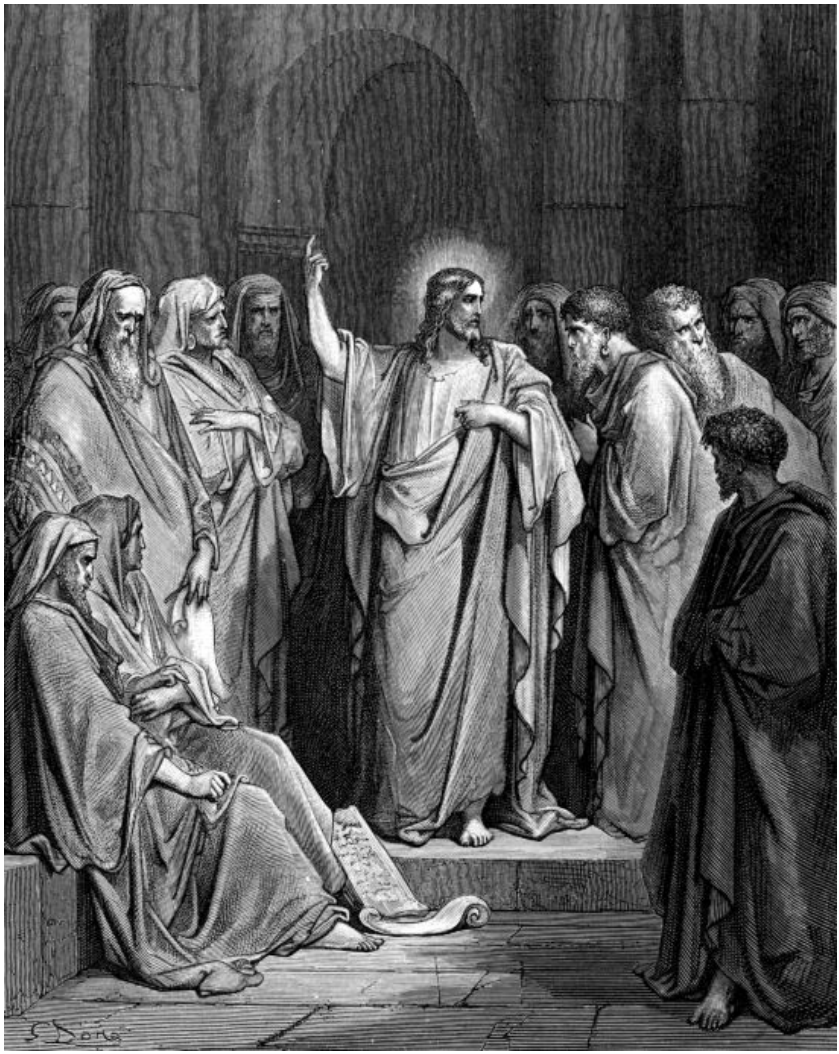

图4　古斯塔夫·多雷，《耶稣在会堂中讲道》（1872）。《路加福音》4:16—32描述了耶稣宣告自己作为先知的使命。

《马可福音》对耶稣门徒的负面描述一开始让人感到震惊。毕竟，彼得、雅各（James）、约翰等人物都是早期基督教运动中的领袖和英雄（例如，见《加拉太书》2:9—10），是值得敬仰和效仿的对象。然而，在《马可福音》的描述中，他们都不够好、都会犯错。

由于《马可福音》把焦点放在了门徒的戏剧性事件上，这种负面

描述就显得愈加强烈。耶稣的对手也很重要，因为他们代表着人间的宇宙力量——耶稣要与之斗争的力量（见3:20—30）。但是耶稣拣选门徒恰恰是为了扩展自己的活动，并在他遇到预言中的挣扎时“与他同在”（3:13—15）。

门徒们的不足，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愚笨。《马可福音》讥讽地扭曲了“局内人”的启示主题。他们理应领会耶稣的比喻，理解他的身份（4:10—12），但恰恰相反，连耶稣最清楚、最直白的说法，他们也一再误解（7:6—23，8:14—21）。在耶稣身份的问题上，他们也同样迟钝。彼得一度认识到耶稣的弥赛亚身份（8:27—29），但很快又误解了这一身份的含义（8:32—33）。当耶稣越来越直白地预言自己的命运时，彼得和约翰、雅各的回应却曲解了门徒的身份，将它与个人的权势和地位、而非谦卑的服侍联系在一起（9:34，38；10:13，35—37）。耶稣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对门徒的教导，与这些追随者的糊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9:39—50；10:14，42—45）。

门徒们缺乏理解，这还可以原谅。毕竟，《马可福音》中的耶稣确实充满矛盾，令人困惑。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缺乏忠心。耶稣拣选他们，是要他们“与他同在”，而且他的教导很清楚，做他的门徒就意味着效法他身为弥赛亚的独特方式——为他人受苦。当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荣入耶路撒冷（11:1—11），进入犹太和罗马敌人的地盘时，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一度令门徒们很激动，但他们很快又背离了这种态度。

耶稣在圣殿中的先知式姿态（11:15—19）招来了更多人的公然反对，他们开始谋划以法律名义处死他（11:18，14:1）。随着这一阴谋的展开，耶稣的一个门徒（犹大［Judas］）变节通敌（14:10—11）。在耶稣的信心出现危机时，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都睡着了，没有保持警醒（14:32—42）。彼得曾三次公开不认耶稣（14:66—72）。耶稣被捕时，门徒们全都逃跑了（14:50）。《马可福音》特别提到，一个少年人甚至赤身逃走，连裹身的麻布也不要了（14:51—52）。“夫子”遭到了所有学生的抛弃。

《马可福音》精心建构的叙事是为了刻画耶稣身上的矛盾和门徒

的不称职，以此来教导读者。这一教训在耶稣显荣那一幕表述得非常清楚：当时，彼得看到耶稣的荣耀，脱口说出了不该说的话（这是他的一个特点）（9:5），有声音从云彩里传来，教导门徒（及读者）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9:7）《马可福音》的读者便不会寄望模仿门徒，而是会留意效法耶稣。

虽然《马可福音》中没有明确描述复活之后耶稣的显现，但整卷叙述的视角都是将耶稣看作被高举的主。虽然马可福音的结尾相对较短（但毫无疑问具有独创性），且似乎仍以失败收场——那些女人都离开了，并且因为害怕而没有告诉任何人（16:8），但在该章靠前的部分可以发现希望的根据。在空坟墓中，信使告诉她们耶稣已经复活，要她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16:7）

虽然那些女人并没有传达这个信息，但读者却知道了，并且知道彼得和其他早期门徒已经跟复活的主恢复了关系。细心的读者会认出坟墓中的信使。《马可福音》将其描述为"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16:5）。马可希望读者明白，那个赤身逃离（14:51）的少年人已经归回，他是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凡人。《马可福音》的结尾不是绝望，而是希望。

《马太福音》：作为教会夫子的耶稣

《马太福音》的写作时间通常被认定在公元85年前后，这有两个原因。首先，《马可福音》的传播需要一些时间，《马太福音》的作者对它编辑加工也需要时间。其次，从马太的加工中可以看出，当时马太的教会与教诲性的犹太教派之间有着对话和冲突——这种情形最有可能出现在圣殿被毁（公元70年）之后。

马太精心加工了《马可福音》。他尊重《马可福音》的基本情节和侧重点，同时修正并精简了其相对冗长的叙事风格，还增添了大量新材料。他在叙事上的增补在开头和结尾最明显。马太增加了耶稣的

家谱，将其先祖追溯到亚伯拉罕（Abraham）（《马太福音》1:1—17），并增加了有关耶稣婴孩时期的描述，以此呼应《出埃及记》（2:1—23）。如此，马太明确地将耶稣与以色列人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在叙述的末尾，马太增添了耶稣复活后的一次显现——当是时，耶稣授意剩下的门徒去施洗，“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并许诺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28:19—20）。由此，马太又明确地将耶稣与教会生活联系在一起。

《马太福音》中最具实质性的增补是耶稣言论，它们要么来自与《路加福音》共享的原始材料（Q字原材料），要么出自另外的来源。马太把这些众多的言论融入分散的“训诲”中，因而这些训诲既有内在的条理，又按照主题分布。最著名的是《马太福音》5—7章的“登山宝训”：它不是耶稣本人直接的教导，而是福音书作者所造。需注意的是，《路加福音》中类似的那篇“训诲”在地点、长度和内容上都有所不同（见《路加福音》6:20—49）。

因而，《马太福音》不仅实际长度比《马可福音》长（前者有28章，后者只有16章），而且由于马太压缩了叙事并增加了这些训诲，它看起来甚至要更长。要跟上《马太福音》的故事情节并不容易，因为它的叙事经常被耶稣的教导所打断。虽然《马可福音》中也一直称呼耶稣为夫子，但《马太福音》所刻画的这位夫子不仅在行动上，也在言语上教导门徒。

在5—7章的训诲中，耶稣定义了进入神国的种种条件；在第10章，他指引门徒如何完成使命；在第13章，他用比喻解释了天国的奥秘；在第18章，他讲到了教会内部的生活；在第23章，他抨击了犹太教中的对手文士和法利赛人；在第24—25章，他细细教导门徒有关末日的事情。《马太福音》后来被视为“教会的福音”并非偶然，因为它精练且侧重教理，对传教和训导尤其有帮助。

耶稣在23:1—39跟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论辩，是马太福音中很有特色之处，它表明马太的教会将自己视为一个学派，与圣殿被毁后存留下来并形成古典犹太教的犹太教派别抗衡。这一犹太教传统发扬了法

利赛人的信仰。法利赛人认为，要在上帝面前过公义的生活，律法书的教导是必要而充分的标准，他们以文士为解经专家，将上帝的诫命灵活运用于不断变迁的环境中。

这一犹太教派别出现在公元70年之后，它与基督教都认为自己是以色列文化的正统传承。基督徒越在会堂里宣扬耶稣是弥赛亚、称他是“主”，那些非弥赛亚主义的犹太教徒就越难与他们共处。最终，犹太人编出了一段“咒诅异端”（*birkat ha minim*，字面意义为blessing against heretics）祷文，使得基督徒不可能再参与他们的会堂敬拜。

《马太福音》的成形表明它创作于这样一种对抗的环境中：一派尊耶稣为夫子、为主，另一派则遵守摩西律法和法利赛人的阐释。《马可福音》牢牢聚焦在门徒身上，《马太福音》则将门徒身份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下，放在教会通过与正统犹太教的对抗努力自我定位的过程中。

马太对耶稣的刻画符合这种背景。与《马可福音》中相同，耶稣是人子和神子。但对他的描述是依据律法书所做的文学加工。既然耶稣是不同宗教团体分离的原因，那么对这一分离出的团体来说，他也应当成为其组织自身象征符号时的关键点——这些符号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犹太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马太福音》首先证明，耶稣应验了律法。具体方法是以固定的模式引出某段经文，“这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例如，见《马太福音》1:22，2:5）这些插入的话明显带有解释性质，实质上是作者对故事的评注，意在引导读者把耶稣的降生、幼年时代、传道、受苦和死亡，甚至他的出卖者犹大的死亡（27:3—10），看成是先知明确预言的应验。耶稣一生的每个时刻，都带上了律法经文的依据。

《马太福音》还把耶稣描绘成律法书的弥赛亚式阐释者，“登山宝训”明确表明了这点。通过引用经文，《马太福音》把耶稣的幼年生活和受洗，解释成与摩西（Moses）带领犹太人走出奴役的大业遥相呼应（尤见1:15）[2]。耶稣与律法的关系也通过摩西揭示出来。耶稣坐在山上教导门徒时（5:1—2），阐明了这一关系：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他对门徒的公义要求不比律法少，而是

更多（5:17—20）。

在一系列反命题中——“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5:21—48）——《马太福音》展示了耶稣如何通过阐释律法产生“比文士和法利赛人”（反对他的犹太教师）更大的义。马太通过这样的叙事表明，耶稣最终揭示出了律法的真意。因此，当法利赛人批评耶稣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时，马太笔下的耶稣如此回答：“‘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9:13；见《何西阿书》6:6）

《马太福音》甚至暗示耶稣是律法的化身。要理解这点，有必要知道拉比（犹太教师）关于律法的经典表述。拉比们说律法是永恒的，在西奈山启示给人以前就已经存在于上帝心中，并且永远不会改变。律法是智慧，是对律法书命令的实现。研习律法与在圣殿献祭、持守安息日同样公义。要成为犹太教徒，就要背负律法的轭。神之永在（shekinah）显现在研习律法者身上。

相应地，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将自己与智慧联系起来（11:19），并称自己比殿还大（12:6）。耶稣呼唤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去负他的“轭”，这样他就会让他们得享“安息”（11:29—30）。复活之后的耶稣宣布，他会永远与门徒同在（28:20），告诉他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18:20）。在《马太福音》中，耶稣是神之永在的中保。《马太福音》中呈现的耶稣不像《马可福音》中那样带有讽刺色彩，而是一个有权柄、且善用比喻的人。

《马太福音》对门徒的描述，与其对耶稣的刻画相符合。他们是真正的局内人，知道“天国的奥秘”（13:11）。这个观点以一个很微妙的方式传递给读者，即马太修改了马可对“夫子”和“主”这两个称呼的用法。《马可福音》中所有人都称呼耶稣为“夫子”，而只有那些需要他医治的人才称呼他为“主”（《马可福音》6:28）。相反，马太将这两个称呼用作区分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方式。只有局外人——首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才称耶稣为“夫子”或“拉比”；对他们来说，耶稣不过是另一个凡人教师（见19:16，22:16）。

然而，局内人认为耶稣是被高举的，已经被赐予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28:19）[3]。在整个叙述中，马太笔下的局内人都称耶稣为“主”（见15:28，16:22），这个称呼表明了耶稣作为永远“与他们同在”的复活者的崇高地位（28:20）。例外情况也证明了这个规律。在最后的晚餐上，当耶稣预言有个门徒要出卖他时，其他门徒的回应都是问：“主，是我么？”（26:22），但背叛者犹大却问：“拉比，是我吗？”（26:25）犹大指引暴民逮捕耶稣的时候，他对着耶稣说了一句“请拉比安”（26:49）。

《马太福音》对耶稣门徒的描述也并非完全正面。他们的道德品格表明了他们同《马可福音》中的门徒一样有缺陷：马太笔下的耶稣多次称他们为“你们这小信的人”（6:30，8:26，14:31，16:8），因为他们心存怀疑。在《马太福音》中，犹大出卖耶稣，彼得不认主，其余门徒在危难时也抛弃了耶稣。事实上，彼得拒不认主看起来更加让人吃惊，因为在《马太福音》中，彼得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是其他门徒的代表：毕竟，耶稣正是把“天国的钥匙”（16:19）托付给了彼得。马太刻意引导读者注意，当彼得不认耶稣的时候，使用了起誓的方式（“我不认得那个人”，26:72），而在登山宝训中，耶稣曾明确驳斥这种说话方式（5:33—37）。

《马太福音》所刻画的门徒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更加聪明。在让耶稣解释撒种比喻时，马太清楚地表明，明白“天国的奥秘”（13:11）是听道后收获丰盛果实的关键（13:19，23）。在讲完一系列比喻之后，耶稣问他的门徒：“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13:51）这之后马太为耶稣安排了一句回答，揭示了这卷福音书的社会和象征背景：“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13:52）

耶稣的门徒扮演了文士在法利赛派犹太教中的角色。他们有智慧，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教导的责任，而要教导别人，他们自己首先必须明白。在福音书结尾，耶稣差遣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28:20）[4]

“路加-行传”：先知与民众

在《新约》全书中，《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好像是相互独立的作品，中间隔着《约翰福音》。但人们通常认为这两卷作品出自同一个作者。他有可能是保罗的同伴（《歌罗西书》4:14），但无法证实。而且，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大家普遍承认这两卷书是同一部作品的两个部分，被学者合称为“路加–行传”。两卷书开头都有题献给一个叫提阿非罗（Theophilus）的人的序言，他可能是个基督徒，资助了路加完成这部作品（《路加福音》1:1—4；《使徒行传》1:1—5）。

《路加福音》也具有同观福音的特点：与《马太福音》一样，它以《马可福音》作为原始材料，也从共同的素材（Q字原材料）中引用了耶稣言论，同时也有自身独有的资料来源。路加手头就有一本《马可福音》，他比马太更忠实地遵循了《马可福音》的情节主线。他对《马可福音》的改动，主要是使其更加准确、更加清楚。显然，出于同样的理由，路加删除了《马可福音》6—7章的大部分内容，因为有一部分包含了重复的内容（路加不喜欢重复），有些故事把耶稣说得更像一个术士，还有些论述有损门徒的形象。《路加福音》可以说是《马可福音》的扩展版和修正版。

相比马太，路加是以更加审慎的方式把Q字原材料中的耶稣言论插入到叙事之中。他没有直接插入大段的训诲，而是把耶稣的教导放到可信的情境中，比如在旅行和吃饭的时候。《路加福音》中独特的耶稣言论素材——尤其是一系列寓言，比如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和浪子的故事（10:29—37，15:11—32）——都来自认可度最高、最为人们所喜爱的耶稣故事。

路加通过“大量删节”《马可福音》中有问题的部分而腾出篇幅，但为了容纳大量的新材料，他需要创造出更多的篇幅。因而，他选用了《马可福音》中提到的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旅程（《马可福音》11:1），并将其拓展为长达10章的“旅途叙事”（9:51—19:44）。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走向牺牲的旅程中，依次向民众、对手及门徒作了

演说。

通过使用不同于《马太福音》的材料，《路加福音》把叙事与以色列历史和教会生活联系在了一起。《路加福音》中对耶稣幼年的叙述（《路加福音》1—2）比《马太福音》更完整。他不仅新增了一段耶稣12岁时的故事，而且使用了不同的材料。在基督教标准的“耶稣诞生故事”中，客店、马槽、牧羊人和天使的合唱出自《路加福音》，东方三博士和残忍的希律王则出自《马太福音》。更惹人注目的是，《马太福音》中约瑟（Joseph）是这段故事的主要角色，而路加则让马利亚（Mary）处于核心位置（见1:26—56）。

此外，《路加福音》不是把耶稣的家谱放在开篇，而是放在耶稣受洗（此时，耶稣被宣布为上帝之子）之后；也不止把耶稣的家世追溯到亚伯拉罕，而是一路追溯到《圣经》故事中的第一个人类亚当（Adam）（3:23—38）。如果说，《马太福音》将《马可福音》中的门徒大戏放到了对抗犹太教这一更大的社会背景下，融入了犹太人中弥赛亚主义者与非弥赛亚主义者的对立，那么路加则把这个故事搬上了更大的舞台，即整个地中海世界。

通过大量引入有关耶稣复活的叙述，路加在福音书结尾比马太更进一步扩展了叙事。路加记叙的有关空坟墓的故事与马太、马可一样，但更加曲折（24:1—12）。然后，在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神秘地向他们显现（24:13—35）。直到耶稣向他们讲解了律法书中预指他的那些话，并掰开饼分给他们，他们才认出他来。这个故事明显是要表明，那些奉耶稣的名聚会、敬拜的人可以经历到复活的耶稣。《路加福音》也提到，耶稣向聚集的十一位门徒显现（24:36—49），并且，在一个升天的场景中，耶稣离开他们、被带到了天上（24:50—53）。耶稣的升天也是路加第二部分叙述的起点，在这部分关于耶稣升天有更详细的描述《使徒行传》1:6—12）。

《路加福音》的叙事在作者的另一卷书中得到了最好的延伸。这卷书在短小的序言（《使徒行传》1:1—5）中表明，它是第一卷故事的延续，而且，要把这两卷书作为文学上的统一体来读，“路加–行

传”才最有意义。《使徒行传》并不仅仅是接着讲述《路加福音》中的故事，而且提供了对《路加福音》的权威解释。

路加对耶稣的书写，总是指向使徒后来奉耶稣之名的活动，而《使徒行传》中的人物所做的一切，都与耶稣在福音书中的行动相呼应。在这第二卷书中，路加受传统材料的束缚更少，能够更自由地凭着其文学和神学上的直觉去写作。因而，《使徒行传》是理解整部叙事的钥匙。

路加把耶稣的故事带出了巴勒斯坦，延伸到了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使徒行传》1:8），同时，他也把福音书的体裁扩展到了历史记叙。在《新约》作品中，“路加–行传”最有可能被完全视作希腊化时期的文学产物。它类似于希腊–罗马小说，尤其就其中的历险场景（比如12:1—19的逃离监狱）而言。它也很像希腊化时期的传记——耶稣及其追随者看上去就像是哲学家。但显而易见，它最适合归入希腊化时期的历史传记。路加讲述了耶稣及其追随者的故事如何与犹太和罗马历史上的统治者及事件发生交集，由此“拓宽”了福音故事（例如，见《路加福音》3:1—2；《使徒行传》18:1—2）。在《使徒行传》结尾，保罗被软禁在罗马城，等候面见恺撒，接受审判（《使徒行传》28:11—22）。

路加的写作手法是历史学家式的。他关注事件发生的年代次序和因果关系，希望以一定的顺序展现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原因。跟同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一样，他会借用总结和言论来补充有时候并不充分的材料。他在《使徒行传》中对早期教会生活的总结（2:41—47，4:32—37），使人感觉到当时的教会充满了内在活力。他为笔下人物安排的言论也经过了自己的修辞创造。他遵循了“角色写作”的理念，为的不是表达某个特定情境下说了什么，而是表达应该说了什么，以此向读者阐明叙事的真正意义（例如，见《使徒行传》2:14—41，7:2—53）。

古代历史是经过精心修辞加工的叙事，旨在通过故事进行论辩，达到说服的目的。在第一卷书的序言中，路加表明了他在历史方面下工夫的目的（《路加福音》1:1—4）。他表示自己使用了先前的文字

材料，还对亲历者做了详细考察（《路加福音》1:1—3）。

不过，与路加的确切目的最相关的是三个说法。首先，他写了几句话给他的资助者外邦人提阿非罗，提及“你所学之道”（1:4），这“道”与“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1:1）相关。因而，主题是上帝对所应许之事的信实，不仅仅是在耶稣身上，而且是“在我们中间”，即《路加福音》读者的那一代人。

其次，他力求向读者提供有关这些问题的“保证”或“确据”。1:4中的asphaleia这个词的意思是“确实”，而非“真理”。路加对于目的的表述说明，提阿非罗和那些跟他一起的人可能正心怀疑虑。第三，他一反前人惯例，提出要“按着次序”（1:3）来叙述，这表明所述事件的顺序可能会消除外邦读者心中的不确定。

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叙事的轮廓推断出这种不确定的原因。从开头到结尾，这两卷作品的一大主题是上帝希望让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听到福音（见《路加福音》2:32，3:6；《使徒行传》13:47）。保罗在最后一段监禁生活中宣称：“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使徒行传》28:28）

然而，外邦人的救赎故事有一个阴影，即犹太人对这个信息的拒绝（《使徒行传》13:46—47，18:6）。这种拒绝不仅对犹太人是一个问题，对外邦人也是如此，它同样在最后的场景中达到顶峰（《使徒行传》28:23—27）。上帝的应许是给犹太子民的。如果犹太人没有得到应许的祝福，上帝就失败了。这样的话，外邦人所信奉的这个神就是个易变的、不信实的神。

路加对叙事“按着次序”的建构，是要努力说明神的信实，用他的作品为上帝在历史上的行事方式进行辩护。这其中的关键元素是他对耶路撒冷最初的基督教会的描述。这一教会的兴起，是因为被高举的耶稣赐下了圣灵给他的犹太追随者（《使徒行传》2—6）。路加称这圣灵为父的“应许”（《使徒行传》2:39），把耶稣的追随者说成亚伯拉罕的子孙。最初的教会就是归回的以色列。

因此，外邦人的使命不是要取代失败的以色列，而是将一个忠诚的以色列扩张和延续下去。由于以色列被赐予了应许，也收到了应

许，因而上帝被证明是信实的，随后相信这位上帝的外邦人就可以“确信”自己的“所学之道”（《路加福音》1:4）。

在《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使徒保罗占据了主要位置。他在第9章时转变归主，他的传教之旅和监禁生活则在13—28章详细展开。然而，保罗的传教大业并不是路加整个写作计划的顶峰，而是其结局：当路加证明上帝的信实已传遍历史上的以色列、并为人们所接受时，情节上的根本困难便已经解决。

图5　凯撒里亚的港口，兴修并扩建于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在位期间。

路加在建构故事时使用的文学手段有两个尤其值得注意。第一个是地理位置的文学运用。《路加福音》中的耶稣故事，是在不断地朝向耶路撒冷前进。通过精心加工原始材料，路加一再强调这点（例如，见4:1—12；9:31，51—56）。相比之下，《使徒行传》的叙事则是要走出耶路撒冷（正如耶稣在《使徒行传》1:8的预言），前往犹太和撒玛利亚（《使徒行传》8），然后到世界的尽头（即罗马，13—28）。

这种强调使耶路撒冷成为焦点。路加精心地将故事的核心部分，即耶稣的受难和死亡、复活和升天，圣灵的降临和早期教会的兴旺，都集中在这座古代以色列中心城市的范围内。还有故事中困难情节的解决，也发生在耶路撒冷的这部分叙事中。

路加第二个文学上的关注点是预言。就像马可使用了启示的象征、马太使用了法利赛派犹太教的象征一样，路加也使用了跟预言有关的《圣经》意象。路加也像马太一样断言，弥撒亚传教期间以及教会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在“应验”古代先知的预言，只是没有那么机械而已。

预言也是《路加福音》叙事频频使用的文学手法。故事中的角色作出有关未来的宣告，这些宣言会在随后的叙事发展中得到“应验”。因此，复活的耶稣宣布，他的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他的见证（《使徒行传》1：8），而《使徒行传》的叙事“应验”了这个预言。由此，路加得以把故事的各个部分衔接起来——尤其是耶稣的预言在教会生活中应验的时候（例如，见《路加福音》10:11；《使徒行传》13:51），还得以将其故事中的许多主角刻画为先知。

《路加福音》特别使用了“像摩西的先知”（《申命记》18：15和34：10—12中的说法）这一意象。根据经文，上帝会在后来的世代中兴起“像摩西的先知”。摩西是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以色列先知。他传达神的话语，在民众中行神迹奇事。路加明确地把耶稣的复活与上帝将会“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的应许（《使徒行传》3:22）关联在一起。

司提反（Stephen）殉道前的演说中，这种关联体现得更加紧密。在《使徒行传》7:17—43，司提反分三个时期详述了摩西的故事：摩西首次被派遣去“看望”他的同胞，但由于卷入一场争吵并杀死了一个埃及人而不得不逃亡（7:23—29）；他的同胞“不明白”摩西是他们的救赎者（7:25）。不过，摩西在旷野逃亡的时候，遇到了上帝，并获得力量重新返回埃及（7:30—34）。在第二次奉差遣的时候，摩西以“奇事神迹”带领他的同胞走向自由（7:35—38）。但以色

列人转向了偶像崇拜，再次弃绝了摩西。结果，以色列人被流放旷野（7:39—43）。

这个两次差遣、两次弃绝的故事，正好暗合路加创作两卷书的模式。在福音书中，耶稣是上帝差遣去救赎犹太人的先知（见《路加福音》7:16）。但犹太人不明白（《路加福音》23:34），弃绝了他。然而，耶稣通过死亡、复活、升天而“离开”的时候，获得了圣灵的力量（《使徒行传》2:33）。第二卷书讲述的是先知耶稣第二次出发去救赎他的子民，这一次是借由他的使徒。这是明确无误的邀约，不可能误解，犹太人接受与否，决定了他们是否会被接纳为上帝的子民。

因此，彼得将降临在耶稣门徒身上的圣灵描述为先知的灵（《使徒行传》2:17—18），有奇事神迹为证（《使徒行传》2:19—20）。路加给彼得安排的这段话绝非偶然。《使徒行传》中对所有主角的描述都千篇一律地让人想起先知摩西和先知耶稣，这也并非偶然：摩西和耶稣都被圣灵充满，传达上帝话语，并在民众中间行大能的奇事神迹。上帝赐予犹太人的第二次救恩，是通过耶稣的门徒——先知职分的继承者来实现的。上帝以复活事件将耶稣高举，这对于犹太人而言比耶稣在人世的任何传教活动都更具说服力。

《使徒行传》的叙事所提供的线索，让读者能够更好地把握路加对耶稣及其门徒的独特描述。在福音书的部分，路加受限于他的主要材料来源（《马可福音》），也受限于从Q字原材料和其他材料中所能得到的素材。不过，他自己对耶稣传教活动的猜想仍然得到了清晰呈现。

在福音书中，耶稣首先是先知–弥赛亚。对幼年时期的记叙（《路加福音》1—2）表明，耶稣来自一个先知世家：他的叔叔撒迦利亚（Zechariah）、母亲马利亚，尤其是堂兄弟约翰，都是先知式的人物。他们都曾述说上帝应许的实现和人类普通价值观的倒转，以此宣扬弥赛亚的重要性（尤见马利亚的颂歌，《路加福音》1:46—55）。

在传道的开始阶段，耶稣作为先知–弥赛亚出现。《马可福音》6:1—6叙述了耶稣回家乡的故事，路加把这个故事原来的位置做了移

动，把它作为耶稣正式开始传道的时刻（《路加福音》4:16—29）。耶稣自己被圣灵充满（3:22；4:1，14），在家乡会堂诵读《以赛亚书》61:1—2及58:6的内容，并宣布这些经文应验在了自己身上（4:21）。主的灵在他身上，他是受膏者，要被差遣去向穷人传福音，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4:14—19）。那里的民众拒绝了他，预示着这位先知式的弥赛亚将要受到阻力（4:28—30）。他将成为矛盾的化身，正如当他还是个幼儿时西面（Simeon）所称，耶稣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2:34）。

作为先知，耶稣宣布“贫穷的人有福了”（6:20），这也意味着富足的人有祸了（6:24）。富足和贫穷这两个概念，前者指那些社会上有权力的人，他们“有权柄”（《路加福音》1:52），享受社会和宗教特权；后者则指所有那些贫弱、没有权势的人，他们被社会所排斥。

上帝反转了这种价值观，其体现便是耶稣把手伸向妇女和儿童，伸向所有那些受疾病和邪灵折磨的人。《路加福音》中，耶稣是身体疾病的医治者，但这医治代表着“子民的归回”，是对社会异化的修复。最重要的是，《路加福音》中的耶稣与“税吏和罪人”为友，这些人在宗教专家眼里是排除在上帝的义之外的。耶稣呼召的同伴却首先是这样的人（见15:1—3）。

在《路加福音》的叙事中，代表“富足的人”立场的是耶稣的反对者，尤其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路加福音》16:14）。他们反对耶稣的医治，反对他与罪人、税吏一同吃喝（15:1—3）。他们尤其反对耶稣用先知般的语言质问宗教精英：耶稣说，这些人在人面前受称赞，但在神面前却不受认可（18:9—14）。耶稣越坚持自己的先知计划，他的对手就越抵制它。最终，这些人“不知道”耶稣预言了神的惩罚这一关系耶路撒冷民众平安的事（见《路加福音》19:41—44），他们以煽惑百姓、使民众误入歧途的罪名精心安排、操纵了罗马当局对耶稣的逮捕和审判，（23:1—5，18—25）。路加呈现的耶稣，是一个公众和政治人物，是一个以神的眼光之名挑战现有秩序的先知。

相应地，《路加福音》对耶稣门徒的描述也是积极的。毕竟，在

《使徒行传》中他们将成为耶稣先知职分的继任者。他们是听从耶稣呼召的罪人（《路加福音》5:1—11）。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一切跟从耶稣（5:27—32，18:28—30），因此居身贫穷者之列。耶稣差遣他们出去时，他们将耶稣那作为神国象征的医治活动扩展开去（9:6，10—11）。耶稣与那些被遗弃的百姓同在的时候，门徒也跟他在一起（8:1—3）。

但路加也毫不犹豫地描述了门徒在理智和道德上的失败。他们背叛、否认并遗弃了耶稣。然而，他们在路加第二卷书中的角色如此关键，因而，对于耶稣所拣选的门徒的这些失败，福音书将之视为对先知的历练。

在耶稣的这场运动中，他们首先需要学习成为反主流文化的领袖。如同耶稣不考虑自己、而把自己全然献给他人一样，门徒们也要成为服侍别人的领袖。这个主题多次提到（见9:46—48，12:35—48），但都不如在“最后的晚餐”里那般发人深省。耶稣从自己即将为他人赴死这个角度，阐释了逾越节筵席中饼和酒的意义（22:14—20），而就在这之后，门徒们马上陷入了他们中间谁为大的争论（22:24）。耶稣对他们的训斥反转了世人对领袖的普通看法：他们不是掌权的恩主，而是服侍他人的仆人。耶稣干脆地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22:25—30），强调了这个观点。

在《使徒行传》的叙事中，门徒表现为耶稣先知职分的继任者，不过，他们能表现得如此有力量，完全是因为从耶稣而来的圣灵力量降临到他们身上（3:11—26）。跟耶稣一样，他们被圣灵充满，讲论神的道（4:23—31）。他们所行的“奇事神迹”，最重要的是医病，由此在世界上证明复活的权能（3:1—10，4:33，5:12—16）。除了耶稣所拣选的门徒之外，司提反、腓力（Philip）、巴拿巴（Barnabas）和保罗也都享有圣灵的力量，并为神在基督身上所成就的事情做了类似的见证（见3:6；6:5；8:5；11:24；9:17，28）。

《使徒行传》中的使徒还推进了耶稣有关公有式社会生活的构想，这可以说是更为激进的一种主张。他们放弃个人财产，共享所拥有的一切东西，救济穷人（2:41—47，4:32—37）。他们与罪人一同

吃饭，接纳外邦人进入信仰，与外邦人一起吃饭而并不要求其行割礼或遵行摩西律法，由此进一步发扬了耶稣的包容态度（15:1—35）。最后，他们践行了耶稣的领袖观，尤其是在饭食的服侍这件事上（6:1—7）。在路加对最早期基督教的看法中，不仅耶稣是先知式的，整个教会在世上也是先知式的呈现。

尽管各卷同观福音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每一卷对耶稣及其门徒的刻画都是独特的。每一卷都分别从不同方面重新诠释了律法，也分别提供了对1世纪基督徒社会处境的独特洞见。

注释

〔1〕 同观福音（The Synoptic Gospels），又称对观福音。其中Synoptic来源于希腊语σύν（syn，一起）＋ ὄψις（opsis，看），意为“对照着一起看”。——译注，下同

〔2〕 此处经文出处有误，似应为《马太福音》2:15。

〔3〕 此处经文出处有误，似应为《马太福音》28:18。

〔4〕 此处经文出处准确来说应为《马太福音》28:19—20。

第七章
保罗及其书信

使徒保罗是基督教运动中出现的最引人注目、最有原创性的人物（仅次于耶稣）。保罗具有突出重要性的原因很明显。他是小亚细亚和希腊两地所有教会的建立者。他通过亲自访问、委派代表和通信等方式在那些教会中行使教牧权威。基督教这个小小的犹太教派在外邦人中能够迅速扩张，保罗功不可没，这位犹太的法利赛人也因此获得了“外邦人的使徒”这一毁誉参半的称号（见《提摩太前书》2:7）。他是耶稣故事的第一个诠释者，也是无可争议的最有影响力的诠释者。在那些最终成为《新约》正典的作品中，保罗书信占据了核心位置。

然而，在这些不争的事实背后还有许多不易处理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很少被提到，但或许最相关：保罗是否像正典中所说的那样在历史上很重要？显然，他在《新约》正典中占据首要位置。除了13封书信外，保罗还在《使徒行传》第9—28章的叙事中，因作为基督的英勇见证者出现而占有突出地位。

保罗在正典中的重要性是否歪曲了历史真相？是否像如此多历史重构表明的那样，所有事情都围绕保罗展开？或者，基督教运动初期得以生存、得以成功，是否彼得才是真正“不可缺少的门徒”？不管历史事实如何，现在保罗在正典中的地位值得读者特别注意。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保罗在塑造早期基督教中的作用：他是否是个宗教天才，靠着个人体验创造出了一个与耶稣传道有别的基督崇拜？或者说，对于这个他起初迫害、后来加入的宗教运动，他是否是一个忠实的解释者？最合理的答案是，保罗并没有发明基督崇拜。他的书信表明，他了解并使用了前人的传统（仪式、信条、颂歌）。不过，保罗是个思想家，他赋予了这些传统以独特的印记。

今天的一些读者，有时会厌恶他们所读到的保罗的“人格”。确实，有些思想家（例如尼采［Nietzsche］）会将假想的保罗的神经症与假定的基督教的精神错乱直接联系起来。但是，读者在保罗书信中看到的更多是保罗的雄辩而非人格。保罗通过修辞建构自我，以最好地面对具体听众和环境。实际上，让许多读者感到不安的事实是，保罗是位真正的思想家，要求读者也思考。他的书信比福音书难懂。

二元论贯穿保罗思想的始终，这种二元论是道德上的，而不是宇宙论上的：例如，“灵”与“肉”之间的对比不是身体与灵魂的分裂，而是无私与自私的差别（《加拉太书》5:16—26）。他的书信中出现的其他二元对立包括：死与活（《罗马书》6:1—4）、幽暗与光明（《帖撒罗尼迦前书》5:5）、奴役与自由（《罗马书》6:15—23）、罪与恩典（《罗马书》5:15—21）、律法与信仰（《加拉太书》3:7—29）。保罗极少留下灰色地带，他要求读者在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以及旧造物与新造物之间做出选择。

保罗同样强烈地主张和解，但是这种主张没那么明显。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社会中导致了疏离，这些差别“在基督里”变得相对化，因而男人和女人、自由人和奴隶、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区别标记都失去了绝对性（《加拉太书》3:28），变成了人类促进彼此福祉的出发点（见《罗马书》14:1—21）。

最后一个问题关乎保罗生平和思想的来源。探讨保罗的生平，《使徒行传》和他的书信都必须用到，而且都要批判性地评价。如果这些材料之间出现分歧，比如保罗的说法与其他安提阿领袖的说法相冲突，那么，应当倾向于相信保罗书信。《使徒行传》的叙述充满了选择性和偏见，但即便存在不足，其中的叙述仍是研究保罗生平和传道活动所必需的材料。事实上，正是由于《使徒行传》16—20章与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哥林多和罗马教会的书信之间有着明显的交汇，历史学家们才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确定那几封（也只有那几封）书信的写作时间。

相反，对保罗思想的评价，只能使用他的书信。保罗在《使徒行传》中的演讲，是路加所做的修辞学建构，充其量只是保罗自己声音的回响。此外，保罗书信有6封作者存在争议，被认为是某个“学派”的托名之作，因而通常来说，要描述保罗的思想只能使用7封书信（即《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罗马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和《腓利门书》）。许多学者认为，剩下的6封书信要么违背了保罗真正的思想，要么只是粗糙的仿制。

保罗的生平

完整的保罗传记现已不存。不过，他生命中的一些重要事实足够清楚。他充分参与了1世纪地中海文化的三个方面。根据《使徒行传》21:28[1]，保罗继承了罗马公民身份。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保罗在基利家大数的犹太家庭享有一定的社会声望。保罗还通晓希腊化时期文化。他生长的环境是各类赛事频仍的城市（见《哥林多前书》9:24—27），而不是乡村。保罗说话和书写都使用希腊文，他用的《圣经》也是希腊文的（LXX，七十子译本）。他了解希腊–罗马修辞术和道德教导的基本内容。

不过，保罗的忠诚完全是犹太式的。他称自己是法利赛人，这个派别的成员解释律法很严格，但可以变通，因为他们认为遵行诫命是公义的表现（见《腓立比书》3:5）。保罗在好几个地方的辩论都使用了后来拉比所使用的解释原则——不过保罗使用的是希腊文本而不是希伯来文本（见《加拉太书》3—4；《罗马书》9—11）。显然，保罗既是最早自称为法利赛人者，又是耶稣复活的唯一直接见证者（见《哥林多前书》9:1）。

除了“热心”遵行律法（《加拉太书》1:14；《腓立比书》3:6），保罗在描述自己早年生活时，特别挑选出来让人注意的另一事实是他对教会的迫害（《腓立比书》3:6；《加拉太书》1:13；《哥林多前书》15:9）。他想要铲除耶稣之道追随者的原因并没有清楚表明，但可以从他在《加拉太书》3:13引用的《申命记》21:23推断出来：“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对保罗这个狂热的法利赛人来说，耶稣被罗马当局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表明耶稣并不像最初的信徒宣称的那样是上帝眼中的义人，而是被上帝所咒诅的人。

对于这个狂热的法利赛人来说，要么选择未来的基督，要么选择律法。保罗认为，称耶稣为弥赛亚和主的那些人是渎神者。他迫害他们是为了维护律法的神圣。

按照保罗自己的说法，在遇到了复活的主耶稣时，他的生命轨迹发生了转变（《加拉太书》1:11—12；《哥林多前书》9:1，

15:8）。按他自己的理解，这次相遇是一种先知式的呼召，呼召他去向万民传扬福音，即上帝借弥赛亚耶稣的钉十字架和复活所成就的事情（《加拉太书》1:15—16）。关于这段经历的叙述，《使徒行传》（见《使徒行传》9:1—9，22:6—11，26:12—18）和保罗自己的书信在细节上有出入，但二者都承认，保罗经历了复活的主耶稣，而且，他还把向外邦人传讲耶稣这场运动作为自己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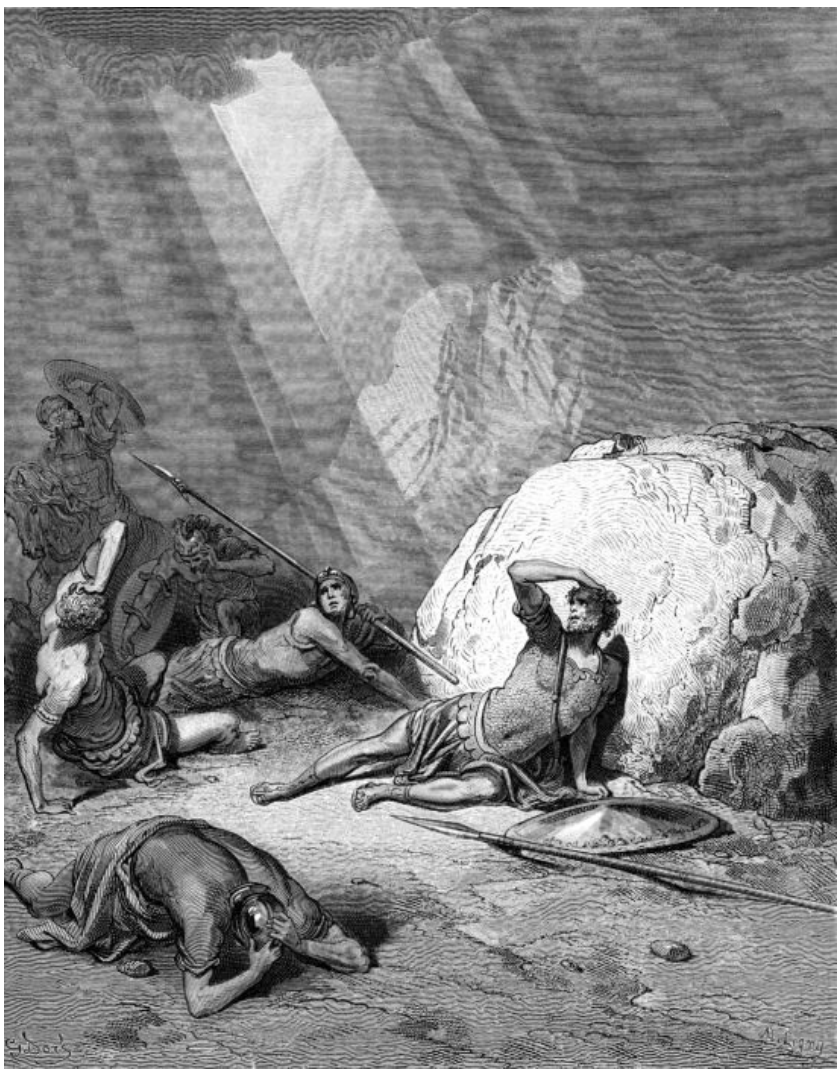

图6　古斯塔夫·多雷，《保罗的皈依》（1872），描述了《使徒行传》9:3—4的一幕：保罗遇到复活后的耶稣，被耶稣的光芒击倒在地。

保罗从一个迫害教会的法利赛人，转变为教会最有活力、最有热忱的使徒。他相信了圣灵的力量和被高举的主的降临就显现在这个教会中。他自己致力于建立教会，管理传教团队，并募集资金。最后他在罗马被监禁（《使徒行传》28:11—31），可能于64年到68年之间在尼禄皇帝（Nero）治下殉道。

从保罗书信的字里行间倾泻的能量有一部分源自他强烈的个人体验。在整个历史中，他是最伟大的“回转”者之一：他从一个拒绝跟外邦人一同吃饭的法利赛人，转变成为替主向外邦人传道的使徒，而他先前认为，这位主是被神所咒诅的。保罗的思想有着鲜明的“要么……要么……”的特征，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经历了“之前和之后”的人：他曾生活在一个时代，但突然间转身投入另一个时代；他曾生活在一种意义框架下，然后又投身另一种意义系统。

保罗思想中张力的另一个根源在于，最初的那些基督徒中，只有他如此强烈地经历了宗教体验与象征世界之间认知上的矛盾。法利赛人保罗以律法的名义拒绝基督。然而，一旦他归属基督，又该如何对待律法？他被驱策要去解决宗教信仰与神圣文本之间的冲突。他处理这一冲突的方式对基督教传统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于亲手建立和照管的教会，保罗会亲自前往，或者差遣所信任的代表（比如提摩太［Timothy］和提多［Titus］）前去，他们会带去保罗的书信，在教会中大声朗读，然后给予进一步的教导，由此，这些教会最直接地感受到了保罗。不过，虽然保罗喜欢亲自与教会联系，但不是每次都能成功（见《哥林多后书》2:1—11，13:1—9）。读者在保罗书信中发现的含糊性，这些教会显然也曾直接体验。保罗跟信众在一起时，并没有带给他们太多的影响（《哥林多后书》10:1—2）；而离开他们的时候，信众对他的行为会有所怀疑（《哥林多后书》1:17—22）。

现在，要接近这位历史上最传奇的人物，他的书信成了唯一的方

式。但是，如果要在这些书信中找出保罗思想的神韵，有一点很重要：这些偶然的信件，是在具体境况的激发下写出的，是保罗力图通过修辞对它们做出回应。因而，保罗的思想不是一名有体系的神学家的思想，而是一名努力让读者思考人生的牧师的想法。

由于保罗的书信多种多样，试图将他的思想综合起来的做法是错误的。要说保罗所有的看法都包含在归于他名下的那些书信中，这也不大可能。毋宁说，每封书信都是保罗在特定境况下的思绪的独特表达。要感受保罗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以及连贯性，有效的方法是更细心地阅读两封毫无争议属于他的书信，而不是试图去总结所有的书信。

《哥林多前书》

作为有关最早期基督教的信息来源，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两封信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在公元54年前后，保罗从小亚细亚写了一系列书信给罗马在亚该亚的殖民地，答复教会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信，尤其是如果没有《哥林多前书》，对于保罗归化和牧养的、追随钉十字架的弥赛亚的城市外邦信徒的实际行为和态度，我们的认识会大大减少。

这些书信显示，由于分歧和竞争，基督教会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冲突。它们表明，主张平等主义的教派置于具有深刻家庭传统的社会背景下，其原有的理想会如何做出让步。这些书信还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教会的例子，它所应对的问题困扰着有这种意向的所有教会：顺其自然与组织结构、自由与责任、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种种矛盾。最后，这些书信还说明了保罗如何以牧者的方式行事，尤其是他如何说服读者获得新力量之后以新的方式去思考生命。

这封书信[2]和《使徒行传》18:1—18证实，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但在大约18个月后离开。这一小群信徒——保罗称他们为“圣徒”——获得了属灵和口才的大大恩赐（《哥林多前书》1:4—9，12:1—14:40）。看起来，这个团体主要由外邦人组成（见6:9—

11），但它也可能包括一些转信的犹太人（见10:1—4）。他们的问题不是由于冷漠，而是由于过度的热情——这种情绪在外邦人的世界中被认为是对荣誉的热爱（*philotimia*），它表现为个体在灵性方面的竞争意识，就像他们在社会层面已经非常习惯了的那样。

《哥林多前书》提供了有关团体行为的信息，这些信息也暗示了触发保罗写信的事件和他写作时所面对的修辞挑战。保罗离开后不久，围绕着共同生活中“今生的事”，哥林多教会信徒之间的冲突加剧（6:3）。行为的差异集中在食物、淫乱等明显的问题上（《哥林多前书》5—10）。相信一位复活的主、相信拥有圣灵，并不能自然而然导致身体以某种方式生活。同样，关于敬拜中“属灵恩赐”的主次顺序和使用，也存在分歧（《哥林多前书》11—14）。

哥林多信徒有两种基本立场。第一种被保罗自己称为“强的”态度（8:7，10:22）：认为灵赐下了知识（8:1），知识产生了能力，能力带来自由（8:9）。由于解放发生在心智之中，而且牢不可破（10:12），因而身体的行为无关紧要。食物和性不过是物质的转换，不会触及有知识的灵。

另一种立场，保罗认为是“软弱”的态度（8:9，9:22）：它更小心、更保守，更多地意识到人类自由的脆弱，认识到肉体生活的复杂性，还看到了群体团结合一的脆弱性。这种立场认为，对食物和性的严格规定是使人“圣洁”，即与世人不同的必要条件。如果说这两种立场中的一方受到复活力量的过度束缚，另一方则倾向于低估它的转化潜力。

两方之间的辩论促使哥林多教会一些信徒写信给保罗，寻求他的指引。然而，正是保罗的建议让原本的辩论变成了分党，因为教会的一些成员宣布忠于保罗以外的其他领袖，纷纷宣称“我是属矶法（Cephas）的”或“我是属亚波罗（Apollos）的”（《哥林多前书》1:10[3]）。不过，信仍然写了出来（见《哥林多前书》7:1），并通过革来氏（Chloe）家族的人带给了身在以弗所的保罗（《哥林多前书》1:11）。

在这封信中，他们提到了新的流言：在教会中有人做淫乱的事情

——有人收了他的岳母[4]（《哥林多前书》5:1—5），还有人（可能）经常召妓（6:12—20），以此表明他们对自由的看法。派系之间的纷争如此严重，教会成员因此忽视了他们自己内部的审判而前往异教的法庭，寻求对“今生的事”做出裁判（6:1—8）。围绕谁的见解“正确”这个问题，教会迅速分裂。

保罗所面临的修辞上的挑战非常严峻。他不得不坚持自己的权威，以从道德上“像父亲一样”引导他建立的这个教会（4:15），由此才能不致落入彼此相争的陷阱中。而如果希望像老师一样训导他们，就必然落入这样的陷阱（3:4）。

从这个角度去阅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前四章的开篇论证让人印象深刻。即使面对哥林多各个教会复杂的具体环境，他也能灵巧地利用说服修辞的传统处理纷争，采取多种方式寻求群体关系的融洽。

保罗首先削弱了他们的自高自大（4:18）。他们是圣徒，但也需要变得圣洁（1:2）。教会不是他们的，也不是保罗的，而是神的（1：2）。此外，他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因为如果不是神借着基督赐予，他们就一无所有（4:7）。

接着，保罗详细叙述了“十字架的道理”（1:18）——即弥赛亚耶稣被钉十字架——带给他们的意义。他认为赐给他们的灵具有道德的意涵：他们要按照“基督的心”生活（2:6—16），即，在十字架的生活中，在对别人的服侍中，属灵的生活得到彰显。他们被授予能力不是为了去争荣誉，而是要在共同的事业中彼此合作。

保罗用自己和当时有信徒追随的另一位领袖亚波罗之间的关系来证明这点（3:5—4:6）。他们有不同的职责：保罗奠定根基，亚波罗在上面建造（3:10—17）。但他们都明白，他们建造的房屋属于神。他们彼此协作，共同劳动，而不是相互竞争。同样，哥林多教会的信众也应当共同劳作，“启发”（即“建设”）教会（3:10）。在开篇部分末尾，保罗提出了自己作为教会之父的特殊角色，说明教导他们道德的行为是自己的职责，而自己将会履行这项任务（4:14—21）。

接下来，保罗为论述教会内的道德主张做好了准备。他主张驱逐

犯奸淫的教会成员（5:1—13）。他指责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没能在内部提供充足的审判以解决问题，而是要向外面寻求审判（6:1—8）。他对自由会允许与妓女发生性关系等行为的主张提出了质疑（6:12—20）。

即使在这个初步回应中，保罗也表达了他的核心关切：自由需要受到责任的调和；和他人维持良好的关系，胜于通过审判决定谁是“对”的；个人身体的行为要受到限制，因为个人身体也是属于社会“身体”的，而这个身体里面的灵是复活的基督。

信徒在写给保罗的信中提到了食物和性的问题（7:1），保罗转而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例如，相比性关系的放荡，保罗更主张婚姻（7:1—2），而且维护了耶稣对离婚的禁令（7:10）。不过，保罗并没有把婚姻绝对化。如果是为了殷勤服侍主，单身（就像童身和守寡的人）也很宝贵（7:8—28，32—40）。他宣称“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7:31），唯一绝对的事情是回应神的呼召（7:17—24）。有关性的问题，只是如何把“各人领受神的恩赐”用于服侍别人的问题（7:7）。

在8—10章，保罗讨论了“奉献给偶像的食物”，细心兼顾了两派之间的不同看法。像哥林多这样的城市，肉市场是跟神庙相连的；跟祭肉有关的共同进餐，发生在多神崇拜的外邦人中。吃了这样的食物，保罗的读者是否与邪恶的多神论为伍了？保罗的读者中那些“软弱”的人，希望成为社会中不同的人，会强烈要求制定符合诫命的规定，约束所有人。而那些强调个人知识、能力和自由的“强”者，则希望获准按照能力放胆去吃。

乍一看，保罗似乎完全站在强者的一边（8:1）。他拒绝为整个教会制定统一的食物准则。确实，他承认，由于只有一位真正的神，偶像什么也代表不了，并且没有任何能力，因而献给偶像的食物并没有被玷污（8:4—6）。对于那些完全相信这一点的人来说，知晓此事确实给予了他们吃的自由。

但是，保罗接着对主张自由的读者的个人主义提出质疑。这些人的举止会影响其他人，可能会在事实上导致后者违背自己的良心行事

（8:7）。他说，强者的自由必须以照顾到软弱的人为条件（8:9—10）。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保罗援引了耶稣的故事。那些软弱的兄弟姐妹，“基督为他们而死”（8:11）。强者应当仿效基督，照顾弟兄的需要，而不是执着于自身的正确性（8:13）。保罗宣布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但“爱心能造就人”[5]。

保罗接着讲到了自己作为使徒的权利，以及他如何为了拯救他人而放弃这些权利（9:1—27），此时，他似乎偏离了主题。但实际上，这不是顾左右而言他，而是将自己呈现为道德楷模。他期望读者中的那些强者能够像他一样，献身于造就他人的工作。

他在第13章使用了同样的修辞手段，即著名的“爱的颂歌”。这篇颂歌充满诗意的平衡，极为优美，被广为传诵。而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作为呈现个人楷模的手段，保罗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拥有何种属灵恩赐并不重要，如果不能表现出对他人的爱，那些恩赐就全都无益（13:1—3，11—12）。这篇颂歌的背景是保罗处理（在第12—14章）教会中哪种“属灵恩赐”最为宝贵这个问题引起的分歧。

他的读者很乐意将那种相互竞争的欲望带入敬拜领域。但保罗再次希望转变想法，让他们的把关注点从个人地位转到群体利益。他们就像是由许多部分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的身体，要使整体兴盛，各部分必须相互依赖（12:12—21）。确实，在人的身体中，那些不那么起眼的部分往往是最必不可少的（12:22—24）。保罗把教会信徒称为“基督的身子”（12:27），因为他们都“饮于一位圣灵”（12:13）。

属灵恩赐的运用应当服务于造就整体的教会，而不是要吹捧起哪个个体。由此，保罗用第13章里爱（agape）的颂歌为使用恩赐提供一个准则。选择让自己受关注的说话方式，就是“心思像孩子，行为像孩子”（13:11）。保罗敦促他们要像成人一样思考，这意味着他们的思考应该着眼于他们所属的更大群体（14:20）。同样由于这点，保罗坚持认为，如果要对各种恩赐进行排序，那么，相比说“方言”这种狂喜的、非理性的、并且只能“造就自己”的说话方式，更应当推崇讲道这种理性的说话方式，因为它能造就教会（14:1—12）。

保罗在第15章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耶稣复活，为前文的14章给予

教会的所有道德指引提供了基础。他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已经因着福音得救，福音就是那位为他们而死、又被上帝复活的弥赛亚的信息（15:1—11）。这个福音的两个部分都至关重要。因为耶稣的复活，众信徒得以共享一灵（15:12—19）。但那灵的意义在于使人在道德上回转。上帝对罪和死亡的完全胜利，目前尚未实现（15:20—28）。迄今还没有这样的完全王国出现，使人可以在其中安闲地做君王，让自己放松（见4:8）。

哥林多信徒已经获得了赐下的灵，但他们自己尚未被复活，他们仍旧活在血肉之躯里。这样，他们就必须通过一种相互服侍的生活，在自己身上活出“为他们死”的那位的样式。保罗的读者们因为拥有属灵的恩赐，仅把眼光盯在上帝通过基督复活“已然”成就的工作上，但保罗提醒他们，还有“尚未完成”的与罪和死亡的斗争（15:50—57）。保罗要在他们身上唤起的正是那种在道德上从“肉”向“灵”的转变（15:30—34）。

花了大段时间去回答其读者的需要之后，保罗才在结尾转向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本身也是一个利他的行动。保罗希望哥林多信徒能筹到一大笔资金救助耶路撒冷的贫困群体（16:1—4）。在耶路撒冷的领袖们认识到保罗是奉神的差遣前往外邦人那里（《加拉太书》2:10）时，保罗已致力于这项工作并将传教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其中。在保罗看来，这项工作不仅是对那些有需要的人的物质支持，也是建立外邦教会与犹太信徒之间关系的标志（见《哥林多后书》8—9）。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众能够着眼长远，搁置内部的争论，以做出更大的和解行为。

这个努力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哥林多教会已经不再信任保罗，并且已经想选择其他领袖。他们拒绝了保罗的筹款要求，甚至指控他和他的代表骗取财物（《哥林多后书》12:11—18）。正如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现存）第二封信中所表明的那样，保罗发现必须寻求与一个疏远了自己的教会达成和解，而这疏远正是由于自己不断强调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和解而造成的（《哥林多后书》5:11—7:16）。在那封信中，就像第一封信一样，保罗继续展示出一种非凡

的能力，努力消除派系的纷争，把他的读者提升到“基督的心”这个高度，让他们不再汲汲于琐事纷争。

《罗马书》

公元57年冬天（《罗马书》16:23），保罗从哥林多城给罗马的基督徒写了一封现存最长的信。信里有个关乎保罗传教计划的现实的即期目标，但这个目标同样对后来的基督教神学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被视为保罗对“好消息”（福音）——即神通过耶稣钉十字架和复活所成就的事情——最重要的论述。《罗马书》被普遍认为是《新约》中两篇最长、最伟大的神学论证作品之一（另一篇是《希伯来书》）。

《罗马书》的开头和结尾提供了足够关于保罗活动和意向的信息，以重现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这座位于帝国都城的教会并非保罗所建，但保罗想要去拜访它（1:10—13）。他早有去拜访他们的愿望，但都由于自己在东方的工作而耽搁了（15:19）。保罗当时正处于向外邦人传教的关键时期，只想去那些没人传过福音的地方（15:20），而实际上，他在东方已经“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他的下一步计划是往西发展，具体说，是前往罗马帝国下属的西班牙行省（15:24）。他希望这次远行能够得到罗马教会的资金支持（15:24）。就像在东方传教时得到腓立比的资助一样（《腓立比书》4:15—20），保罗希望罗马教会为他在西方传教提供捐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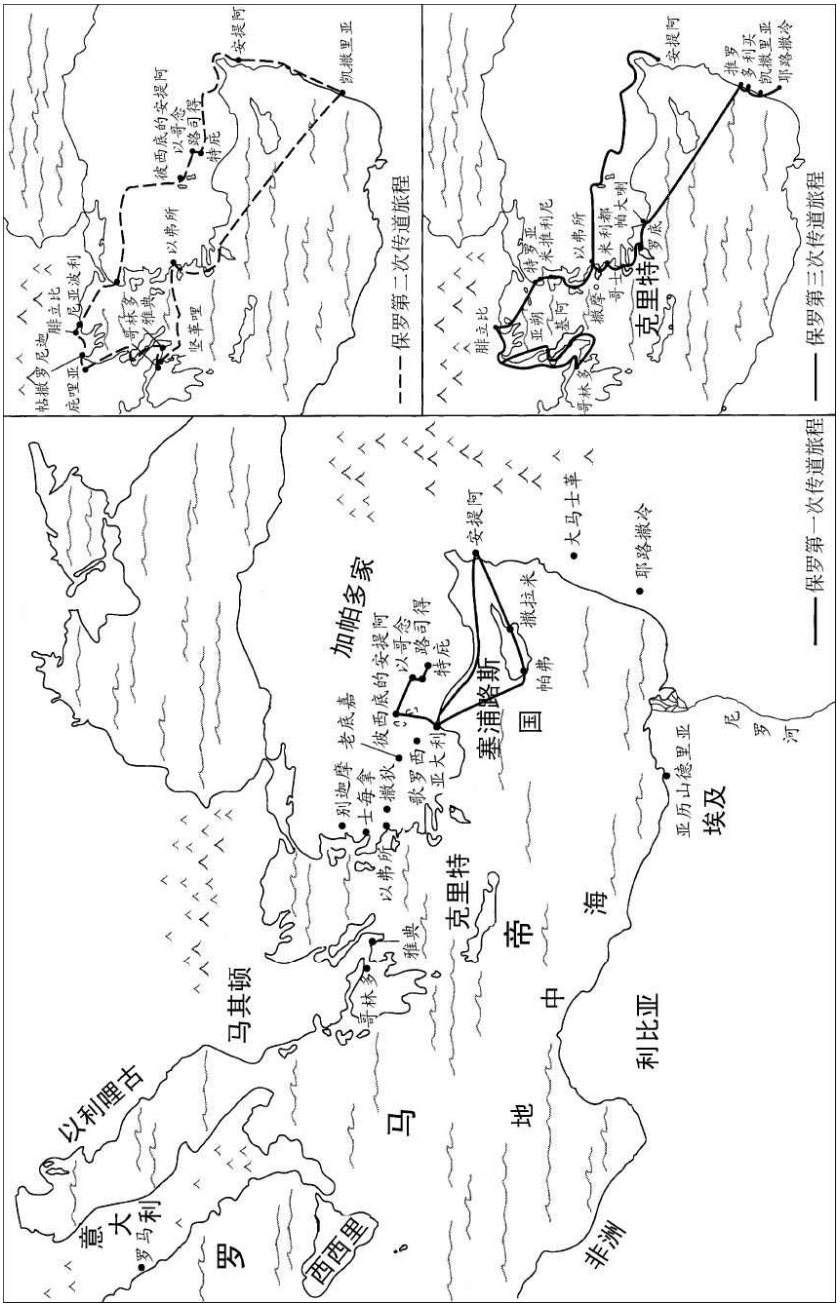
保罗第二次传道旅程
保罗第三次传道旅程
保罗第一次传道旅程
意大利
罗马
西西里
以利哩古
马其顿
马
地
中
海
帝
国
克里特
埃及
利比亚
非洲
尼罗河
加帕多家
塞浦路斯
罗马
别迦摩
士每拿
撒狄
以弗所
雅典
哥林多
歌罗西
亚大利
老底嘉
彼西底的安提阿
以哥念
路司得
特庇
撒拉米
帕弗
安提阿
大马士革
耶路撒冷
亚历山德里亚
拉撒罗尼迦
腓立比
厄亚波利
底哩亚
坚革哩
以弗所
安提阿
凯撒里亚
亚斯
基阿
撒密
米利都
帕大哩
罗底
雅罗
多利斯
凯撒里亚
耶路撒冷

图7　保罗的行程路线图。

保罗写这封信时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带着外邦人教会中募集而来的资金去供给耶路撒冷的圣徒（《罗马书》15:25）。这证明，马其顿和亚该亚（哥林多）的教会终究还是遵守了他们的许诺（15:26）。保罗完成这项任务之后，就要前往罗马，然后“往西班牙去”（15:28）。他现在派遣自己的资助人、哥林多教会的执事非比（Phoebe）为自己的代表前往罗马，希望罗马教会能够与她配合，为保罗的西方传教计划做好准备（16:1—4）。

事实上，罗马书的第16章是向罗马信徒举荐非比，还有一系列带给罗马信徒的祝福。保罗虽然并没有去过那里，却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向他们问安。这是早期基督教传教的普遍特征，也是其复杂性的象征（16:3—23）。

事情并没有按照保罗希望的那样发展。他在耶路撒冷被捕（《使徒行传》21:27—40），向恺撒申诉（《使徒行传》25:11）。他到达了罗马，不过是作为囚徒，而非活跃的传教者（《使徒行传》28:11—31）。不过，在写信的时候，他还抱着很高的期望。他把自己传讲有关耶稣的福音视为神拯救万民做工的手段。他邀请罗马教会加入这项工作。

如果《罗马书》主要是募集资金的书信，那么首章和末章已经充分表达了这个意图，但为什么保罗不满足？为什么还要写下这么冗长而复杂的论证，即被后来的基督徒极为珍视的部分？答案在于使徒身份的逻辑。使徒是受委托被差遣出去，代表差遣他的人。使者们带着举荐的书信前往接待他们的地方（《哥林多后书》3:1）。但保罗认为自己是受神差遣的使徒，他在其他地方强调自己不需要教会的举荐。他的教会就是他的举荐，而且这种举荐“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哥林多后书》3:2—3）。

但现在，他要向对他本人毫无了解的教会寻求资助。为支持他的传教活动，教会需要了解并接受他的信息。因此，保罗不仅要给罗马教会写信举荐他的代表非比，还需要一封信来举荐作为使徒的自己。因此，他创作了一篇很长的论证，说明上帝通过使徒传教所做的工。

《罗马书》不是保罗神学的系统表达，有些重大主题在这封信中

几乎没有出现。但在这段暂停工作的闲暇时间中，保罗得以深入思考某些思想，即他在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有关信仰和律法）、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有关在教会中为他人的生活）中锻造的想法，并且得以建构出一个出色的论证，来说明神如何通过基督让全人类与祂建立正确的关系。

保罗在《罗马书》中对救赎故事的讲述不是通过平铺直叙，而是以希腊式哲辩的方式构建出一种正式辩论。哲辩采取的形式是一个演说者与想象中的对话者之间的虚构对话，其中包含了很多鲜明的修辞成分：使用直接演说与质疑、提出反问、对问题给出唐突回答、使用论辩、列举恶行与美德、引用权威文本。

不过，哲辩不仅是一套文体上的特征。它给出论证，而后接以一连串可预知的修辞阶段。论题利用反题（对立面）来重新阐述，利用（逻辑上的、例证的和经验的）证据来扩展和证明，并通过回应反对观点来支撑。只有把《罗马书》作为这种论证来解读，才能最好地理解它。

保罗在1:16—17陈述了他的论题。就像所有的论题陈述一样，这个论题也有些适度的庞杂。保罗声称，通过自己传讲的福音，上帝的能力正在做工，目的是拯救所有相信的人，首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1:16）。福音还彰显（启示）了神的公义（1:17）——公义这个词模棱两可，既是神的品质，也是神带给人的某种东西。就像保罗把救赎与信仰关联在一起（“要救一切有信仰的”），他还强调了公义与信仰的关联。他用了“本于信以致于信”这个说法，使得这个品质成为达到正确关系的根源和目标。

然而，保罗心中的信仰，是对谁的信仰？显然，信仰是对人类的要求，是对上帝救赎行动（“要救一切相信的”）的回应。但是，谁的信仰才是公义的根源？最明显的可能答案是神对人的信实——这是律法书始终如一的主题。还有一种可能，保罗指的是耶稣作为人的信仰。他引用先知《哈巴谷书》2:4“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希望按照耶稣的复活来理解这句话。耶稣通过为信仰的死亡显明了自己的义。

真正的论证开始于提出的反题。保罗描述了除了福音之外人类所

经历的神的忿怒（1:18—3:20）。《罗马书》的这部分受到了出人意料的注意，因为它攻击了偶像崇拜和罪，其中最明显的是淫乱之罪。对宣扬地狱的传教者来说，这部分是可靠的训诫来源；而对于基督教的批评者来说，这是其宗教褊狭的证据。

不过，保罗的目标并非是要说明人类的脆弱这么简单，而是指向人类的背叛这一更危险的方面：罪不会在心灵或肉体的软弱中出现，而是会在意志的疾病中找到。罪是意志背叛那位作为万物根源的神，并以为自己就是一切（1:19—23）。因此，保罗谴责了那些论断人的有德者（2:1—11），并判定那些仗着特权地位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的犹太人有罪（3:17—29）。对保罗来说，罪是信的对立面（14:23），而不是恶行或破坏规则。罪是对自由的扭曲使用，它拒绝了神的秩序，并由此扭曲了所有的人类关系。

人类并不需要更多的规则去遵守，也不需要更多的榜样去效仿。他们需要一种力量来医治自己的心灵，让自己能够恰当地运用自由。保罗的论题——保罗在3:21—26中对它加以重述和扩展——是神所成就的福音恰恰实现了这种倒转，不是通过“律法和先知”（3:21），而是通过一个人，即耶稣的生命和死亡来实现。保罗强调，这是神的“恩赐”（或“恩典”）（3:24）。人类无法自行恢复与神或其他人的正确关系。是神以耶稣的死为祭，建立了这种正确关系。保罗用了律法书中的“赎罪”一词：耶稣的死就像古代以色列赎罪日的献祭，使人与神之间得以和解（3:24—25；见《利未记》16:12—15）。

不过，神的恩典有一个方面，即耶稣的死跟用动物献祭并不一样，而是人的自由行动，是出于信仰的行为，这点在大部分翻译中并没体现出来。耶稣的信心是他的死的一个根本要素，因此，借着这个行为，神让人类回到跟祂的正确关系中（3:22—24）。保罗说，以这个行为为基础，神显明了自己的义，并使得那些“分享耶稣信心的人”（3:26）——相比一般译成“信耶稣的人”，这个翻译更为准确——成为义。对保罗来说，耶稣回应神的样式，和相信神赐予耶稣里的恩典的人的样式一致。

神通过人类学的干预而非对经文的介入反转了人类历史。不过，

在4:1—25，保罗用了《创世记》中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说明，信仰的原则如何“有律法和先知为证”（3:21），信心的回应何以对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有效（4:1—16），以及为何总要将信心放在那位使死人复活的神身上（4:17—25）。

对保罗来说，与其说耶稣是一个新的摩西，带来新的教导，毋宁说他是新的亚当，展示了作为人的一种截然相反的样式。保罗在5:12—21展现了这种对比：如同第一个人开启了悖逆神的历史那样，新的亚当，也就是耶稣，开启了顺服神的全新历史。这种顺服正是保罗所称的“信”（见1:5，“顺服即是信”）。

但是，神的这种人类学干预如何到达其他人那里？保罗在5:1—11斩钉截铁地宣布，通过来自圣灵的力量，基督中神的恩典已经在事实上泽被其他人。耶稣的死是一种爱的行动，证明了神对人的爱（5:8）。这一爱的行动不是形式上的、遥不可及的，而是已经进入了人心这片人类自由所在之地：“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5:5）

在6:1保罗转向了对这个论题的可能反驳，此时我们发现，他用了不同的方式来维护这种爱的恩赐及其力量的真实性。基督徒之所以不可能继续处在罪中（即使这会使“恩典显多”！），是因为他们通过接受洗礼，开始了一种新的生命样式（6:1—11）。他们与基督同死，为的是过一种新的生活，不再受罪的奴役，而是活在真正的自由中（6:12—23）。

为什么律法无法使人完全成为义（第7章）？因为律法仅仅是文字上的，不能改变人心。那这是否意味着律法就是罪？不，但通过显明对神的悖逆，它彰显了罪。只要人的心仍然是扭曲的，律法的诫命就无力使他们成为义，这就好像医生的药方无法治愈疾病——如果没有真正吃下那药的话。对保罗而言，恩赐的灵就好像吃下的药：它真实地改变人。

第8章详细阐述了圣灵力量的真实性。现在，人可以去做那些“律法因肉体软弱”（8:3）所不能行的事情：持守神的诫命（8:4），分辨何事为善，并且去行（8:5—13）、去祈祷（8:26—27）、去忍受痛

苦（8:18—25）。他们知道，没有什么能让他们与“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神的爱”隔绝（8:39），因为通过基督，他们成了神的儿女（8:14—17）。

不过，这个获胜的宣告引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如果说是耶稣出于信的死亡成就了义，那么，那些不能接受耶稣的犹太人会怎样？他们是否会被神拒绝接纳为子民？如果被拒绝，这难道不意味着神对他们的应许是失败的吗？而如果神对其子民的应许失败，难道不是说明神本身就不信实吗？

在《罗马书》9—11章，保罗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忠诚的犹太人，这个问题让保罗感到“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9:1—5）。在传教活动中，保罗看到比犹太人更多的外邦人接受福音，据此，他努力寻求理解神在历史中的计划，并力图维护神对应许的信实。

这三章是保罗对经文最长的连续解释。他用法利赛人的方式去解释，但使用的前提明显不同。他重释经文的视角是：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而他周围的犹太人拒不承认这个消息。进一步的前提是，通过耶稣的复活赐给人的圣灵，完全是上帝应许的成就，那些获得圣灵的人由此成为神的儿女（见《加拉太书》3）。

保罗首先处理了这个最成问题的前提。保罗以《创世记》为依据，坚持认为以色列人的名分不是出于身体上的血统，而是出于应许，或拣选：根据应许，以撒（Isaac）而非以实玛利（Ishmael），雅各而非以扫（Esau），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也同样可以把应许扩展到新的群体那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之为我的子民”（9:25；见《何西阿书》2:23）。有人说如此决然地宣称神的主权并不公平，保罗的回答是：“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9:16）

当时，神的怜悯进入了“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中间，因为他们相信神借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复活的耶稣所启示的恩典（9:30）。而当时大部分犹太人在面对十字架的耻辱时都跌倒了，因而他们不能接受“神的义”（10:2—3）。根据《圣经》上的先例，拣选和驱逐、

扩展和收缩也正在发生。

最后，保罗转向神是否弃绝了祂的子民这个问题。保罗本能地回答说，“断乎没有”（11:1）。当时，保罗及其在基督中的追随者构成了以色列民的余数（11:2—6）。至于大部分“顽梗不化”（11:7）的犹太人，他们跌倒了，但并没有堕落（11:11）。确实，他们对弥赛亚耶稣的短暂拒绝，事实上对神的计划起到了关键作用，即帮助了外面的万邦都成为神的子民。

保罗争辩说，犹太人对耶稣的拒绝事实上开启了向外邦人传教的过程。说起来有些荒谬，通过使向外邦人传扬弥赛亚成为可能，犹太人服侍了外邦人。但保罗的愿望是，这些基于信仰和意志的子民不断增加，能够让他的犹太同胞变得热心，使他们最终接受福音，并被重新完全接纳为应许的子民、属灵的子民、信仰的子民：“于是全体以色列人都要得救。”（11:26）

在回答了对其论题的所有反驳之后，保罗在《罗马书》12—15章转而直接劝告他的读者如何按照他们所接受的恩赐去生活。他强调了一些跟《哥林多前书》同样的观点。他的读者要更新他们的心意（12:1—2），并“披戴”主耶稣基督（13:14）。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彰显弥赛亚的秉性。他们要谦卑，而不是高傲，要服务于群体的益处，而不是谋取私利（12:3—21，8—10）。他们要以一种相互包容的态度来解决观点和实践上的分歧（14:1—23）。强者要关心弱者，而不是专心自娱。每个人都应当努力造就教会（15:1—6）。在《罗马书》的结尾，保罗展示了神在他们中间做工的方式，以作为他们共同生活的典范：“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15:7）

保罗的每封书信都有自身的独特性，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和《罗马书》中表现的特点出现在了保罗所有的书信中。保罗在宗教上充满热情：即使是最平常的活动，也是按照神的临在和呼召来安排。他是位神学家：即使是生活中的最平凡一面，也要从罪与恩典的角度加以解读。他是位牧者：即使最高深的思想，也要回到共同生活的现实意义中。他是位作家：即便是在翻译中，也不可能不看

到他文章中的活力。他是位道德教师：即使是非常实际的计划，也是他进行道德教导的机遇。

注释

〔1〕 此处引文出处有误，应为《使徒行传》22:28。
〔2〕 指《哥林多前书》。
〔3〕 此处引文出处有误，应为《哥林多前书》1:12。
〔4〕 此处原文似有误，“岳母”应为“继母”。
〔5〕 此处经文出处有误，应为8:1。

第八章
隐藏的珍宝：《希伯来书》和《雅各书》

人们往往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登山宝训”等带有明显吸引力的篇章，或福音书和保罗书信等明显非常重要的作品，但认真的读者要注意，这样的选择意味着错失早期基督教中一些虽然不那么著名但强有力的见证。《新约》中某些珍品今天不那么受到重视，但在过去，它们对基督教意识的塑造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两篇匿名作品，即《希伯来书》和《雅各书》，应当受到这种注意。它们证明了《新约》作品的多样性，同时也是带有实质性内容的作品。

《希伯来书》：作为神学的传道

保罗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和《罗马书》都可以相对准确地定位到具体的历史年代，相比之下，匿名的《希伯来书》的写作背景等最基本的问题仍旧悬而未决。我们不知道作者身份、写作地点或写作对象。最精确的推测也只能确定它大约写于保罗那个时代，最多晚10年。《希伯来书》在《新约》中的出现很像其中对古代祭司麦基洗德（Melchizedek）的描述，“无父、无母、无族谱”（《希伯来书》7:3）。

通过作品的结构可以做出一些推断。它是用《新约》中所能看到的最好的希腊文写成的，修辞运用娴熟。这说明无论是其作者还是其读者都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而经文和典故的大量运用表明作者非常熟悉律法书的符号世界。作品中没有真正的书信要素，文末的祝福好像是后来添加的（13:23—25）。确实，《希伯来书》的风格完全是口语化的，很可能本来是一次讲道，后来被记录下来并传递给读者。

同样，作品也提供了一些关于其创作对象情况的线索。虽然标题“致希伯来人”是后来加上去的，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最初的听众从种族上来说是希腊化的犹太人。作者讲到了“新的契约”（8:13），但从没暗示说“亚伯拉罕的子孙”（3:16[1]）不属于这约。相反，作者提到，神借着先知晓谕“我们的列祖”，就像如今上帝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一样（1:1—2）。听众也是基督徒：听者已经

领受了洗礼，接受了“关于基督的基本道理”（6:1—4）。事实上，距离他们加入这场运动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他们最初的热情已经有所消退（10:32—35）。

教会成员正面临“离弃”真道或背教的危险（《希伯来书》6:4—8，10:35，12:12—13）。他们已经开始忽略教会（10:25）。他们的疲倦跟所遭受的苦难有关。他们不需要去殉道（12:4），但教会有些成员被关进监狱，还有一些人被剥夺了家产（10:34）。对于新参加宗教运动的成员来说，这样的经历让他们感到非常耻辱，使得他们开始重新思考是否继续保持忠诚（10:33）。还有一个事实：他们所敬拜的那位，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12:2），而这种死法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耻辱的。牵涉到这样带着耻辱的事实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那种起源于耻辱、并会导致耻辱的痛苦经历会让成员灰心，甚至背叛。

因而，演讲者面临的挑战是说服听众坚持信仰，并给出保持忠诚的理由。他的论证的基本形式在犹太人和希腊人中都很常见。由小而大的论证采用的是“如果……那么……”形式的类比论证：如果在较小的事情上是如此，那么（可以推断）在较大的事情上更会是这样。这种单一的论证形式贯穿了整部作品，使其在修辞上呈现连贯性。

在所有的类比中，总有某种因素保持不变。就《希伯来书》而言，这个不变的因素就是那位神，祂一直在晓谕祂的子民，在呼召他们。不同的因素在于神通过谁向祂的子民讲话。在过去，神通过“先知”讲话。《希伯来书》中所说的“先知”指的是神和以色列之间的所有中介，包括天使（1:5—2:2）、摩西（3:1—6）及由亚伦（Aaron）（摩西的兄弟）的后代担任的祭司（7:1—28）。而此时，神借着祂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晓谕民众。因而，《希伯来书》要论证的一个关键是证明耶稣比他之前出现的神的代理者更有优越性。

这一点基本上不是理论上的。神过去的应许——即神的子民会安然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会获得财产和荣耀——是基于对那位做出应许的唯一神的忠诚（见《申命记》28:1—30:20）。背叛的威胁同样真实：在旷野中濒临死亡，而不是到达应许之地；被流放到万国之中，而不是待在应许之地。

对《希伯来书》而言，无论应许还是威胁，只要是跟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的，都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神的儿子成了神的代理者，具有至高的权力。神的应许不是在地上生活，而是与神同在的生活（4:1—13）。因此，威胁同样可怕：从民众中被剪除，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6:5—8，12:25—29）。《希伯来书》的论证并不仅仅是神学上的（即不仅仅与基督的本性有关），还有着突出的实践性（关注听众的未来）。因此，在整个传道中，它在修辞上交替使用解释和劝告，并在11:1—40和12:1—29分别达到解释和劝告的顶峰。

《希伯来书》突出表现了地中海象征世界的两个方面，而这在《新约》的其他作品中并不那么显著。首先是柏拉图的观点。到公元1世纪的时候，从柏拉图那里产生的某些观念虽然还并不普遍流行，但也已经广泛传播，这种情形很像20世纪晚期，一些从未读过弗洛伊德的人交谈时会使用“弗洛伊德观点”。这种柏拉图的观点可以（过于）简单地描述为物质与理念二元论。它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本体论上的：形式（*noumenal*）的理念世界比短暂易朽的物质表象（*phenomenal*）领域更真实。第二个方面是认识论上的：真理与真实的事物（即精神领域）相关，而在身体领域，只可能存在意见。第三个方面是价值论上的：理念领域比表象领域更好。简单来说，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真实、更好。

在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等希腊化的犹太人中间，这种柏拉图式的观点支配了对于以色列（希腊文）经典的阅读，因而，“天”可以被解读为理念领域，而“地”则是短暂现象出现的场所。例如，对于逃离埃及、到达迦南的文学故事，寓意式解读可以将之理解为逃离恶行、实现美德，甚至可以解读为摆脱身体的束缚、实现纯粹的精神。这种把《圣经》式宇宙论与柏拉图概念相结合的做法在《希伯来书》中也能找到。当基督被高举到“神的右边”（《诗篇》110:1；《希伯来书》1:13）成为主的时候，《希伯来书》认为耶稣已经获得永生，不会再有任何改变。耶稣被高举是从现象世界向理念世界的运动，后者的世界比他在世上的情形更真实、更好。相应地，基督给那些追随他的人提供的应许是比任何地上居所更好的永恒“天

家”（11:10，16，13:14）。

相比其他《新约》作品，《希伯来书》也更热衷于使用古代仪式的象征，尤其是献祭仪式。其他作品可以把基督的死视为一种献祭（见《罗马书》3:21—26），但从不会把基督本人描述为一位祭司。在讲到基督被高举为主的那一篇诗篇中（《诗篇》110:1），《希伯来书》找到了大祭司的形象：“耶和华起了誓，决不后悔说：你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诗篇》110:4；见《希伯来书》7:21）借着被高举，耶稣同时成为永久统治的君王和永远献祭的大祭司。

《希伯来书》把这些因素组织起来，从本体论和道德上对基督进行论证。在本体论层面，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完美中介（9:15），因为他既是神又是人。《希伯来书》维护了基督完全的神性（1:2—2:9），但同样也明确强调基督拥有完全的人性（2:10—18）。不过，道德上的论证表明，基督的中介角色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作为人，他通过所遭受的痛苦学习顺服，从而朝着完全成为“神子”的方向不断前进（5:7—10）。死亡的那一刻，看似彻底的终结，实际上却是对神的临在的全然开放。基督把人性带到了神的临在中（10:11—21）。

《希伯来书》的核心部分（第5—10章）集中比较了古代以色列的献祭仪式与基督的祭司工作。跟终有一死的利未祭司不同，基督永远活着（7:23—25）。更重要的是，古代祭司只能实现外在的、仪式上的清洁，而基督则可以洁净人的内在、人的良心（9:8—14）。在与神的同在中，基督永远作为人的祭司，并因此始终坚守那个应许：让他的追随者分享类似的神圣生活。

《希伯来书》包含了很多对于背弃信仰的负面警告。不过，其中最有力的告诫却是正面的。作者呼吁读者，要“趁着还有‘今日’”（3:12—13）赶快回应神的呼召，要朝着耶稣已经到达的天家努力前进（4:1—11）。跟天家相比，世上的物质损失根本微不足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11:1—40，作者点出了所有《圣经》英雄的名字，这些人“因着信”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对神的忠心，他们知道真

正的家不在地上，而在天上（11:13—16）。现在，对于作者劝导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12:2）的那些人来说，这群人成为了“如同云彩的见证人”（12:1）；他们始终抱有到达耶稣所居之地的希望（12:22—24），因而能够借着受苦前进，借着受苦走向成熟（12:3—13）。

在《希伯来书》中，耶稣既是救赎的理由，又是信心顺服的榜样。他作为信心的典范，表现在下面这句简单的话中：“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12:2）作者期待读者也能够“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因为知道“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13:13—14）。

《雅各书》：强力的道德劝诫

这封短信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不同于《希伯来书》，然而在《新约》作品中，它代表了第一代基督徒另一种强有力的声音。这篇作品被认为是雅各所作，他可能就是保罗所称的那位“主的兄弟”（《加拉太书》1:19），即耶稣的兄弟（《马可福音》6:3），也是耶稣复活的见证者（《哥林多前书》15:7），在耶路撒冷教会享有权威（《使徒行传》15:13—21，21:18）。

这篇作品一开始可能是一篇讲道，但由于被传给“十二支派”（《雅各书》1:1），变成写给整个地中海世界犹太信徒的通函。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告诉我们，雅各在62年殉道（《犹太古史记》20:9），因而，如果历史上的雅各就是作者的话，这封信也大致写成于保罗所在的时代。

图8　克里斯托夫·魏格尔，《耶路撒冷的雅各》：雅各为第一代基督教团体的领袖，写有一封给犹太基督徒的通函。

事实上，对《雅各书》的诠释一直是歪曲的，因为人们总是参照保罗的《希伯来书》去解读它。保罗坚持认为人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遵行割礼等仪式），而且保罗用亚伯拉罕作为这种“信仰之义”的典范（《加拉太书》2:16；《罗马书》4:1—25）。这似乎跟雅各的看法直接矛盾——雅各认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雅各书》2:20），他用亚伯拉罕的例子说明“人称义是因为行为，不是

单因着信”（2:24）。但这种矛盾只是错觉。保罗对比了信心与遵行律法；雅各对比了口头宣言与行动（见《雅各书》2:14—19）。雅各与保罗之间的一致比分歧更多：他们都坚持信仰必须详细体现在行为中。

《雅各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始终注意门徒关系的道德维度。《雅各书》并没有用保罗和《希伯来书》那样的方式来讲论耶稣。这篇作品只提到了耶稣两次（1:1，2:1），且完全没有提及耶稣在世时的事情或他的死及复活。不过，耶稣表现在他的话语中：雅各经常用到耶稣的教导，不是直接引用，而是通过精巧的借用和暗示，使人联想到属于同一运动中的一名家族成员（例如，见2:5，5:12）。

说《雅各书》缺少严格意义上的神学（即关于神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神是创造者、立法者、拯救者、审判者（1:18，4:12，1:21）。神亲近人（4:8），并鼓舞他们（5:15）。神进入与人的关系之中（2:23，4:4）。雅各用他一系列有关神的丰富命题作为道德教导的根据。由于神超乎一切之上，是完美的“赐恩典者”（1:17，4:6），“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1:5），因而人也应当如此行，要做给予者，而不是拿取者。

《雅各书》利用了《圣经》的整个体系，包括犹太智慧文学的传统。《雅各书》让智慧成为主题，并对比了“从上头来的智慧”（从神而来，通向和平）和“从下头来的智慧”（从魔鬼而来，导致纷争）（3:13—18）。不过，雅各并不单单讨论智慧，他还更进一步，发掘这些古代智慧作品中的道德教导传统，例如，提供有关恰当说话（3:1—12）和如何看待贫富（1:9—11，4:13—17）的指引。

《雅各书》还继承了从律法书而来的先知传统。像先知一样，他严厉批评欺压穷人的那些人，这些人克扣穷人的工钱（5:1—6），并把穷人拉到公堂上（2:6）。他警告那些仗着家里有钱而自高自大的人，并提醒读者财富和生命本身都是短暂的（4:13—17）。他呼吁读者抛弃这种通过嫉妒和竞争表现出来的高傲，转向相互合作中表现出的谦卑（4:8—10）。他们必须二者择一：要么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神的朋友”（2:23），要么“与世俗为友”，像那些靠着“从下头来的

智慧”生活的人一样（4:4）。没有中间的道路可以选择。

最引人注目的是，雅各正面评价了律法。他提到了适用于其读者的、使人自由的完备律法（1:25）。他的意思不是受割礼或遵行仪式（保罗认为这些是“行律法”而加以反对），而是特指《利未记》19:18中被他称作“至尊的律法”（或许翻译成“天国的律法”更妥）的经文——“要爱人如己”。就像耶稣（《马可福音》12:31）和保罗（《加拉太书》5:14；《罗马书》13:9）一样，雅各在这个说法中找到了对道德性情的充分总结（2:8）。

通过在整篇作品中散布对邻舍之爱的表达，雅各详细阐述了这个命令。而这种表达的原初语境是《利未记》的19:11—18。爱要求不以貌取人（2:1—5），不诽谤弟兄姐妹（5:9），不评判他人（4:11），不欺压穷苦人（5:1—6），也不发假誓（5:12）。雅各有关律法的论断跟耶稣的教导联系在一起。因而，《利未记》19:12禁止以主的名义起假誓，而雅各却像耶稣一样，绝对禁止发誓（《雅各书》5:12；见《马太福音》5:33—37）。

雅各也以律法书为例，证明现实的“信心的行为”。雅各借用了一个流行的比喻，劝导读者以“使人自由的完备律法”（1:25）为镜，去发现如何遵行神灌输其中的话语（1:18）。然后，他展示了亚伯拉罕如何成为顺从信仰的典范：亚伯拉罕自愿献上儿子以撒为祭，被称为义，成为“神的朋友”（2:23）。喇合（Rahab）身上也表现了“信心的行为”，她接待以色列的探子进房间，因为她相信他们代表了“你们的神，一个上天下地的神”（《约书亚记》2:11；《雅各书》2:25）。约伯（Job）是信心忍耐的典范（5:10）。先知以利亚（Elijah）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在他身上表现出了义人祈祷的力量（5:17）。

在2:1—6，《雅各书》说明了那些宣称信主的人们是如何言行不一致的。他描写了这样一个聚会，穷人被晾到一边，而富人则备受优待。对那些“与世俗为友”（4:4）的人来说，这种行为完全正常，因为世界就是按照外貌和特权运行。但信仰的准则不同于世俗的准则。雅各在这里暗指耶稣提到的至福，“贫穷的人有福了”（《路加福音》

6:20）。由此他问道：“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仰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么？”（2:5）那些“心怀二意”的人已经将那些与他们对立的压抑性情内化了：“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2:6）

在5:12—20，雅各呈现了一个更正面的教会。它完全照事实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5:12），从不抱怨或说谎。他们中间有受苦的，就祷告；有喜乐的，就歌颂（5:13）。这个教会并不像之前提到的那个教会那样，遵循嫉妒和竞争的逻辑，而是相互协作，热心给予，符合他们对这样一位神的信仰：神慷慨地赐予所有人，从不吝惜。生病的人在这个教会中不会受到排斥，而是有权请教会的长老来为自己抹油、祷告（5:13—15）。教会的成员彼此认罪，互相代求（5:16）。他们相互指正，使罪人从迷路上转回（5:19—20）。

《雅各书》也是一种智慧文学，它不关注良好的举止，而只关注道德；不关心淫乱，却很注意财产；它不只处理事实，还要面对战争和暴力的根源（4:1—3）；它认识到了言语的力量和危险，并设想出一个相互协作的教会，以挑战一个相互竞争的世界。某些读者会问，对于社会伦理，《新约》作品中是否有任何有价值之处。对于这样的读者来说，《雅各书》是一个尤其有意义的见证。

注释

〔1〕这里的3:16，似应为《加拉太书》3:16。

第九章
约翰的手笔

《新约》中有五篇作品是归于约翰名下的：包括三封书信、第四福音，还有《启示录》。围绕这些作品产生了很多关键性的问题：它们是否为一个专门团体创作？如果是的话，这个团体位于何地？或者，这些作品是否是由地域分布不一的人按照基督教风格创作出来的？这个基督教派别得名于约翰这位“耶稣所爱的门徒”，也是《约翰福音》中的可靠见证者。他与这些类别上迥然不同的作品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第四福音呈现出多重特性是否因为它是一个“约翰学派”所作？作品之间真实的差异（当然还有显著的相同点），能否完全归结为历史环境的变迁，或者归结为三种不同体裁（书信、叙事、启示）造成的文学折射？这些基本的入门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第四福音有一份底稿，可以追溯到大约110年。《启示录》中反映的迫害可能发生在约96年罗马皇帝图密善（Domitian）的暴虐统治下。《启示录》的作者说自己在拔摩（Patmos）海岛上，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在亚细亚，有多种传统与约翰相关。因而，将这些作品追溯到1世纪晚期的亚细亚教会不无道理，因为这些教会的源头是耶稣的门徒约翰。

约翰著作的历史背景虽不确定，但特征却很明确。毫无疑问，这些作品产生于强烈的冲突中，并打上了冲突的深深印记。在第四福音的叙述中，这种冲突显露于外：那些所谓的“犹太人”强烈地抵制耶稣（《约翰福音》7:1），而耶稣告诫他的门徒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16:18）[1] 在三篇书信中，冲突是隐藏于内的，发生在相互敌对的领袖之间以及同一教会的不同派别之间。在《启示录》中，冲突既是内在的（在2—3章所说的亚细亚七个教会之间），又是外在的（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压迫）。

在所有这些作品中，这种冲突都表现在鲜明的二元象征上。它们对比光明与黑暗，真理与谬误，肉与灵，生命与死亡，真预言与假预言，上帝与撒旦。这种极端的对立，表达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冲突，把所有的正面品质都放到“我们”身上，而所有的负面属性都归

给“他们”。这种象征所表达的强烈的“内–外”的观点，可以被贴切地称为宗派的观点：要定义约翰的基督教，不仅要看其所肯定的东西，同样也要看其所反对的东西。

约翰作品的这种二元象征是围绕着耶稣这个人物组织起来的。在第四福音中，耶稣是世界的光（8:12），耶稣的对手因为拒斥他而处于黑暗（3:18—21）。信徒们正是由于宣告承认耶稣，而被逐出犹太会堂（9:22）。在三封书信中，对于耶稣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不同派别的产生：那些公义地宣告承认耶稣的人活在真理和光中；而那些不这么做的人，则是假先知和敌基督者（《约翰二书》7）。在《启示录》中，耶稣的见证者是先知的灵（《启示录》19:10），而做这种见证是圣徒受迫害的原因。

然而，这些关于社会背景、二元象征和宗派观点的论述都完全属实。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些作品拥有的既吸引人又让人反感的特殊力量。对于那些自认为在“局内”的人来说，约翰的作品提供了强烈的认同感，因为这些作品跟“局外人”清楚地划清了界限。然而，这些强烈的认同标志对于不那么有信心成为局内人的读者来说，也会加剧疏离感。

不过，社会变动并不能充分解释这些作品的文学力量。它们的希腊文文风简单。然而，每一位认真的读者都明白，这些作品是如何通过所建构的复杂象征关系来引人注意的。约翰笔下的耶稣启示了自身，但仍然神秘莫测、难以捉摸；《启示录》的异象变幻不定，壮丽雄伟。如果这些作品真的是哪一个学派写出的，那么这个学派至少会有一两位富有诗意想象力的成员。

分化的教会：书信

这三篇书信中有两篇（《约翰二书》、《约翰三书》）是由自称“长老”的人写的，并且用的是真实书信的格式；第三篇（《约翰一书》）没有书信的元素，很可能是一篇讲道或谈话。这三篇作品都得

以保存的原因可能是它们被放到同一个信包里，在同一时间寄往同一目的地。它们在文学上相互关联，从其中可以一窥分化的约翰派别。

《约翰三书》是一封推荐信，即教会领袖为了举荐从某个教会派遣到另一个教会的使者而写的信。此番，长老派遣了一位名叫低米丢（Demetrius）的使者去一个叫该犹（Gaius）的人那里。长老赞扬了该犹对自己所派遣之人的热情招待。这种热情表明该犹“按真理而行”（3）。要注意，这种热情对于持宗派态度的运动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成员“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7）。长老将这种热情视为参与真理做工的一种形式。因此，他很有信心，相信该犹也会接纳为所有人所称赞、“又有真理作见证”的使者低米丢（12）。

这封信反映了对教会内部分化的担忧，这种分化使传教和待客行为复杂化。长老抱怨了某个叫丢特腓（Di--otrephes）的人，说他“好为首”（9），散布恶言妄论长老，并拒绝接待长老的使者。的确，丢特腓做得太过分，甚至曾将接待长老使者的人赶出教会（10）。显然，在长老和丢特腓之间存在权力的争斗，他们都宣称对某个地区的教会拥有权威，并派出使者去确保这种权威。在这种争斗中，接待和驱逐成为权力运作的武器。

长老提到，他有许多事要写给该犹，但不愿用笔墨写在纸上，而是希望能够当面交谈（13，14）。不过，他也“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9）。毫无疑问，低米丢随身携带的就是这另一封信。

《约翰三书》完全是私人的——主语和动词都是单数，而不是复数。而《约翰二书》则似乎是写给当地教会的正规书信——毫无疑问，这个教会受该犹领导。信件开头问候语中所称的“蒙拣选的太太”（《约翰二书》1）代表着教会，其成员是“儿女”。跟《约翰三书》不同，《约翰二书》的主语和动词都是复数：它的读者对象是会众。这封短信随后成为在聚会时读给会众的另一篇更长论说文的框架，即《约翰一书》。

《约翰二书》充斥着这些教会正在经历的冲突，不仅是有关领袖间权力争夺的问题，还涉及对基督的某种理解。这封信以典型的宗派主义口吻谈到“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即离开了与长老结盟的

那些教会的人。分裂的原因是教义上的：那些脱教的人“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约翰二书》7）。由于他们没有恰当地理解基督而是选择离开，因而他们成了“敌基督”者，是危险的。

值得注意的是，长老继而建议这个教会继续做丢特腓所做的事情，尽管他曾对此颇有怨言。长老告诉它，不要接纳那些教导错误教义的人，因为欢迎这样的人意味着“在他的恶行上有份”（11）。

在从长老那里前往该犹家中参加聚会时，低米丢还带着第三篇作品在身上。这就是《约翰三书》9那里提到的写给教会的信。它被称为“约翰的第一封书信”，但它是为了给信众公开宣读而创作的。如果低米丢四处走访那些跟长老结盟的地方教会，他很可能会将这篇作品作为通告信息，在每个教会都读出来，而且他还会带着写给地方教会和领袖的短笺。

《约翰一书》揭示了早期基督教会的这种宗派纷争。它提到了那些“从我们中间出去”（2:19）、进入黑暗世界（1:11 [2] ）的人，他们卧在那恶者的权力之下（5:19）。他们是假先知（4:1），是敌基督的（2:18，22；4:3）。对于那些离开的人，《约翰一书》的说法非常尖锐：“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与我们同在。”（2:19）

分派的起因是对基督理解的争论。不幸的是，对于承认和否认内容的实际表述（2:22，3:23，4:2—3，5:1）让我们很难确切知道他们所争论的是基督的哪个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那些“出去”的人否认基督完全的人性。

《约翰一书》虽然声称是站在“局内人”的角度，但与其他宗派主义作品的区别很明显。例如，《约翰一书》中，作者没有攻击局外人，而是提醒局内人注意他们自己的罪（1:1—2:11）。在宗派主义的作品中出现这种自我批评的转向，让人始料未及。约翰的表述，在对“我们现在”的信心（我们在光中，在真理中，见1:1—4）和在罪的磨炼中的“我们应该”之间交替出现。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三个正面的神学强调。作者首先坚持神的超越性：没有人曾经看见神（4:12）；神大过人心（3:20）。这个主张削弱了教会中宣扬彻底了

解神的残余倾向。

作者也提醒读者，人对神的认识，首先是在爱中——事实上，“神就是爱”，因此“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4:7）。他讲到了在人身上分享和表现的神圣的自我奉献：“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4:11）这种爱不是出于人的本能，而是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其爱的教会中学习到的（4：7—16）。

最后，作者宣布，神的爱必须表现在对他人的爱中（4:20—21），并且，只有在关心他人的具体行为中，这个爱的诫命才能得以成就：“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3:17）

耶稣启示上帝：第四福音

约翰派别的最重要作品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对古典基督教有关上帝和基督的教义，尤其是有关道成肉身教义的形成有明显而重要的作用。这种教义认为，在耶稣基督身上，神真正进入人类历史之中。这卷福音书富有奥秘感，语言简单、使人感到亲切，却又无法完全理解，因而一直为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所钟爱。许多普通基督徒倾向于认为《约翰福音》表达了有关耶稣的全部真理。如果问：“耶稣做了什么？”他们可能会用同观福音中耶稣的教导和故事来回答。但如果问：“耶稣是谁？”他们就会用第四福音的说法来回答。

这卷福音书给人的直接印象是，它跟同观福音的差别太大了。有关耶稣传道的事实就很不同。《约翰福音》中，耶稣传道的时间扩展为三年，而不是一年。耶稣的活动集中在犹太而不是加利利。他在圣殿中摆出先知的姿态，是在传道活动开始时，而不是结束的时候（《约翰福音》2:13—21）。他跟门徒最后的晚餐不是逾越节晚餐，而且也没有按照他的死来解释饼和酒，而是为门徒洗脚（13:1—11）。他被钉十字架的时间也不同于同观福音中的记载，而是显然跟

宰杀羊羔准备逾越节筵席的时间有关（19:31）。尽管约翰也说到空坟墓的故事，但跟同观福音中出现的故事完全不同（20:1—10）。同样的情况还包括耶稣在复活后向门徒的显现（20:11—29，21:1—14）。

耶稣传道的特点也很不同。同观福音中最突出的耶稣行为，即为那些邪灵附体的人赶鬼，在约翰的叙述中并没有出现。耶稣所行的七件奇事被称为“神迹”，包括了在其他福音书中医病的不同版本：约翰提到瞎眼的人，在同观福音中没有提（9:1—7）；耶稣对瘫痪的人的医治，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5:1—9）。

《约翰福音》中耶稣的教导也不一样。在其他福音书中极力刻画的比喻在《约翰福音》中都没有出现。相比之下，耶稣在第四福音中仅用的几次“比喻”（10:6，16:25—28）并不突出。约翰没有使用本身以辩论为主题的故事，没有让耶稣与对手唇枪舌剑、并以尖锐的格言或声明告终。《约翰福音》中的辩论倾向于向外延伸，并转变成自我揭示的独白（如3:12—21，5:19—47，6:26—65）。

当然，有足够的关联点让人们可以认出《约翰福音》是基督教的福音书。对于耶稣，《约翰福音》使用了同样的称呼：他是弥赛亚（1:41）、人子（1:51）、神子（11:27）、先知（6:14）、君王（1:49）、救赎者（4:42）。耶稣行的某些神迹明显是一样的；尤其是增多饼（6:1—15）和在水面行走（6:16—21），在《约翰福音》和同观福音中都可以见到。

其他一些事件，比如进入耶路撒冷（12:12—19）、洁净圣殿（2:13—22）及伯大尼的香膏（12:1—10），可能被放在不同的位置，但显然都属于同一传统。同观福音中还有一些故事，在《约翰福音》中是作为“幕后故事”发生的，比如耶稣受洗（1:29—34）；或者不是作为单独的故事，而是混在其他故事中，比如耶稣受试探（见6:15）、耶稣在被捕之前的决断时刻（12:27—29）。尤其是约翰的受难叙述，虽然有独特因素，比如在彼拉多面前正式受审的场景（19:1—16），还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临终话语（19:26—30），但大体上仍跟同观福音中的说法一致。

如何最好地表达《约翰福音》与其他三部福音书的关系？显然，《约翰福音》跟其他三部福音书之间没有直接的文学关系，不像同观福音之间那样。然而，即使约翰的改造给人印象深刻，他显然还是借鉴了其他三部福音书共享的传统。有人认为，《约翰福音》是对同观福音在材料方面的补充：其中的传教活动更加广泛，还增加了同观福音中没有的一些事情。但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约翰对一切的深刻改造。还有一些人认为，《约翰福音》是“属灵的福音”，它提供了有关耶稣身份的核心，而不仅仅是实在事件。但这忽略了前三部福音的“属灵”维度，也忽略了约翰叙述的实在维度。

关于它们之间关系更好的看法是认为《约翰福音》把同观福音传统中含蓄的内容明确化了。同观福音将耶稣含蓄地描绘成神的启示者，但其依据是耶稣知道神国到来的时间，并呼吁人们通过悔改来回应神的呼召。约翰从一开始就明确地表达说，耶稣显明了父（1:18）。同观福音对耶稣增加饼的叙述表明他有创造的权柄。约翰则让耶稣证明自己就是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6:22—59）。同观福音暗示说人类回应耶稣的方式就是回应神的方式：“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路加福音》10:16 [3] ）约翰明确地表明，接受或拒绝耶稣，就是接受或拒绝神（12:44—50）。

《约翰福音》同样明确表明了自身的创作过程。其独创的结尾说明对耶稣的描述既是选择性的，也受到强化信徒信仰的目的所驱使（20:30—31）。虽然《约翰福音》宣称其所述来自一位亲眼所见者（见19:35），且其中有关1世纪巴勒斯坦的内容也支持了其源于那个背景的说法，然而它处处显示出多重的创作过程。最明显的例子是它增加了一个结尾（21:1—25），这个结尾使用了耶稣在加利利的复活显现，以此处理由于神所喜爱的门徒的意外死亡和彼得的殉道所带来的问题。

约翰的叙述明显包含了后来的经验所赋予的视角。在耶稣跟犹太人领袖尼哥底母（Nicodemus）谈话的时候，3:11节使用的动词突然由单数变成了复数，以揭示约翰信徒与犹太会堂成员之间正在进行的

辩论。在约翰的解读中，从会堂驱逐信徒是因为耶稣的传道活动（9:22）。耶稣告诉门徒说，在自己得荣耀（即升到父那里）之后，会给门徒赐下圣灵，圣灵会引导他们对耶稣言行有更深的理解（16:12—15）。

《约翰福音》坦率地承认复活和圣灵的恩赐所带来的更深刻洞见。因此，当耶稣洁净圣殿并说要三日重建被摧毁的圣殿（2:19）时，叙述者回应那些犹太的怀疑者说："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2:21—22）

第四福音风格简洁、结构直白、象征意义精妙。它的希腊文很少带来语言上的挑战。同样，作品的结构并不复杂。《约翰福音》开篇是一段序言（1:1—18），以诗体文写成（在1:6—8和1:15也有非诗体文字插入）。这段序言向读者介绍了《约翰福音》的象征体系（光明与黑暗，生与死），也介绍了贯穿整篇叙事的下降与上升模式（耶稣从神而来，并回到神那里，1:18；见13:1）。

序言之后紧跟着的是对耶稣公开传道的叙述，通常称为"神迹之书"，主要讲述了耶稣所行的七件奇事（"神迹"）。它们显露了神圣的临在（他的"荣耀"，1:14，2:11），在犹太对手中引发争议，并引出耶稣自我启示的独白。典型的例子是耶稣增加饼使众人吃饱（6:1—15），这使耶稣说出自己就是生命的粮（6:35），而当这引起争议的时候，耶稣宣告说，他所赐的粮就是自己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6:51）。

耶稣公开传道的那段时期引发了犹太领袖更大的敌意，最终耶稣离开了公众（12:36），并严肃地宣告说，犹太人拒绝他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胜过神的荣耀"（12:43）。

"荣耀之书"由两个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13:1—17:26），约翰把耶稣对门徒所有明确的教导都放到最后的晚餐这个语境中。耶稣直接向门徒说明自己是谁，将要去往哪里，并说明了自己和父之间的联结（他们共享的联结），以及门徒因追随自己而将要面对的世界的敌意。耶稣在结束时做了一个很长的祈祷，祈祷门徒能够"因真理成

圣”（17:19）。

荣耀之书的第二部分叙述了耶稣回到神那里的方式，还有他“荣耀”（即神的临在）的地位，也就是耶稣的受苦、死亡和复活（18:1—31）。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作品还有一段跋（21:1—25），预言了彼得和神所爱的门徒——基督教传统正是从他们而来——的命运。

《约翰福音》风格直白、结构清晰，象征体系却十分丰富，让人回味。这部福音书中，每个人、每件事都代表着其他某种东西，都超出自身指向更大的某件事情。有时，作者的笔法非常精妙。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约翰福音》序言的开头使人想起《创世记》1:1——“起初”，而且不知何故，叙述者接下来细数日子的流逝（1:29，35，43），然后明确指出正是在“第三天”，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变水为酒（2:1）。约翰暗示说，这个“新创造”行为（它本身也暗示着基督徒的受洗和圣餐）“显出了耶稣的荣耀”（2:11），应验了起初神历经七日的创造。此外，“第三天”还与复活日呼应。

约翰在叙述中对传统犹太筵席的采用很有特色。从最明显的层面上看，约翰是把逾越节（2:13，6:4，13:1）、住棚节（7:2—9:41）和修殿节（10:22）的筵席作为聚集民众见证耶稣言行的时机。但他也利用这些筵席以及安息日和耶路撒冷圣殿的象征意义来构建耶稣的形象。

犹太人的筵席成为约翰表明耶稣高于律法的主要手段。这个主题直白地出现在序言中：“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1:17）这个说法解释了前一节的晦涩宣称：“从他丰满的恩典（即，道成肉身）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1:16）简言之，摩西传给犹太人的律法，是神的恩典，但这个恩典得以完全表现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代表着“丰满的恩典”，代表着“恩典和真理”，而这正是以色列神的本质（见《出埃及记》34:6）。

最重要的是，约翰使用了逾越节筵席的象征意义。在第6章，耶稣把饼变多（6:1—15），接着在水面行走“过海”（6:16—21）。耶稣说自己就是生命之粮，约翰把他与神通过摩西赐给古代以色列人的

吗哪进行了明确对比：“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6:49—51）同样，约翰把耶稣的死放在逾越节宰杀羊羔的时刻，并用了经文的典故，明确把耶稣等同于“神的羔羊”——为了世人而被杀死（19:36，见1:29）。

约翰所有的象征都以基督为中心。耶稣所做的一系列“我是”的陈述，从直接的比喻，如光（8:12）、粮（6:35）、门（10:7）、牧者（10:14）、葡萄树（15:1），到宣称自己是通向神的唯一途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14:6），甚至用简简单单的一句“是我”（6:20，这让人想起《出埃及记》3:20神向摩西的显现），将自己等同于神。8:56—59的意义很明白。在跟犹太领袖争论自己的身份时，耶稣宣告：“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可以理解，他的对手反驳说：“你还不到五十岁，怎么能见到亚伯拉罕？”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耶稣是活生生的象征，因为他代表了神（1:18）。光进入黑暗的那个象征表达了《约翰福音》的信仰：神对万物的创造，以及人类对神的追随或拒绝（这是每时每地都在默默上演的戏码），通过神在基督中的自我启示以及人类接受或拒绝基督的方式，在耶稣身上得到显明（3:16—21）。

在《约翰福音》的叙事中，耶稣代表神，因此《约翰福音》不可避免地不像其他福音书那么写实。约翰坚持耶稣的人性，但由于他让耶稣代神说话，而且是道成肉身（1:14），所以在约翰的描述中，耶稣的人性被他神性的一面遮蔽了。

确实，这部福音书中的所有角色都是“代表性的”，因而，其叙事更像一部道德剧。如果耶稣代表神，那么门徒就代表相信神的世界，彼拉多则代表怀疑神的政治世界。而这一文学技巧的缺点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对犹太人——他们注定代表了拒绝神的世界——的刻画上。这种直愣愣刻画的后果，在贯穿基督教历史的强大反犹主义力量中得到了明显体现。

天开了：《启示录》

一些学者不相信《启示录》的作者就是创作了约翰书信和第四福音书的那个约翰学派，因为无论是作品风格还是乍看之下的见解都相差太大。但对这个由冲突形成的世界的看法，《启示录》显然跟约翰学派的其他著作是一致的；在《启示录》中，这看法是通过启示体裁的运用成型的。

那些不能理解启示作品的文学表达方式的读者，要么对书中意象感到憎恶，要么对其做出错误解释；总之，结果常令人遗憾。对于将《启示录》看作神对未来独特启示的人们，这卷书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它强大的诗学力量已经渗入很多私下或公开的妄想观点中。由于被解读为对末世的字面预言，这部作品继续在被称为“千禧年主义者”的基督徒中占有尤其重要的地位。他们之所以获得这个称号，是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将在尘世统治一千年（《启示录》20:4）。

对《启示录》这个作品来说，基于历史的文学判断，是做出恰当解释的关键。“启示”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apocalypse，表示从前隐藏的事实被揭示出来。《启示录》是《圣经》中启示文学的两个典型代表之一。只有领会这种文体的特征，才能最好地理解《启示录》。创作于大约公元前167年的《但以理书》首次充分展示了这种犹太文学形式。它通过描述当时希腊君主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Ⅳ）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迫害，展示了启示作品和启示历史观的全部特征。

对于亲身经历排斥或压迫的人来说，启示文学是一种反抗文学形式。在公元前167年到公元200年之间，对于反抗罗马统治和希腊文化的犹太人来说，启示文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创作形式。它是一种借古代英雄（亚当、以诺［Enoch］或但以理［Daniel］）之口说出的虚构预言，用于解释当下发生的事情，就好像古代人物已经预见到这些事情一样。启示文学的特色是升天的经历或者那些有关现在（在天上）和未来（在地上）异象的梦。先知用高度隐晦的语言表达这些异象，还会借用数字、传说中人格化的野兽和各种宇宙现象作为象征，只有局内人才能够懂得它们的意义。

对历史的启示式理解很简单，尽管其意象复杂：历史有其目标，而这个目标掌控在神的手中。虽然现实的证据似乎相反，好像压迫者获得了胜利，但实际上神在掌权，并且会带来戏剧性的改变。从这个世界到“将要到来的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义人受压迫转变为义人掌权。神的代理者，即“人子”或“弥赛亚”，会带来这种转变。他会拯救神的子民，并让他们管辖他们在人间的敌人。启示文学中的宗教信息同样很直白。它鼓励受压迫者怀着必有回报的信念继续忠于神。

显然，《启示录》属于这种启示文学的范畴。先知升到天上，凝视天上的圣廷，并看到了地上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些异象涉及富有象征含义的数字（4、7、12）、人格化的野兽（最著名的就是13:11—18中那个叫做666的野兽）以及形形色色的宇宙大灾难。有关历史的异象，是神与“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20:2）之间的冲突。表现在人类舞台上，就是圣徒受到邪恶帝国的压迫，这压迫最终通向神在地上的胜利（20:4—22:7）。由此带给读者的是传统的教导：“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13:10）

不过，《启示录》在其他方面打破了启示文学的模式。《启示录》不是托名于古代某个人物，而是一个同时代的人——拔摩海岛上“你们的弟兄约翰”（1:9）。最重要的是，弥赛亚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经历重新催化了启示文学的象征主义。在《启示录》开篇，向先知显现的“好像人子”的那位就是耶稣：“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1:17）〔4〕先知升到天上的神圣宝座，那位站在宝座右边的就是被宰杀的羔羊，他正受到活物与长老的颂赞：“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5:11—12）〔5〕

与那种认为当下挫败而未来必将胜利的历史理解相比，《启示录》认为神已经实现了对恶和死亡的根本胜利。这个胜利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耶稣的死与复活，复活之后的耶稣正施行神圣的统治。胜利不只是耶稣一个人的：先知还看到了耶稣数不清的见证者，他们被处死（“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现在“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

事奉他”（7:13—17）。

历史的顶峰已经实现；严格来说，地上仍在进行的挣扎是历史的结局。虽然在最后的异象中，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以及神与人住在一起被看作是未来的事情（21:1—8），但第一个异象已经表明，复活的耶稣显现在“七个灯台”之间，也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1:12—20）之间。因而，跟表面看上去不同，《启示录》其实怀着深刻的乐观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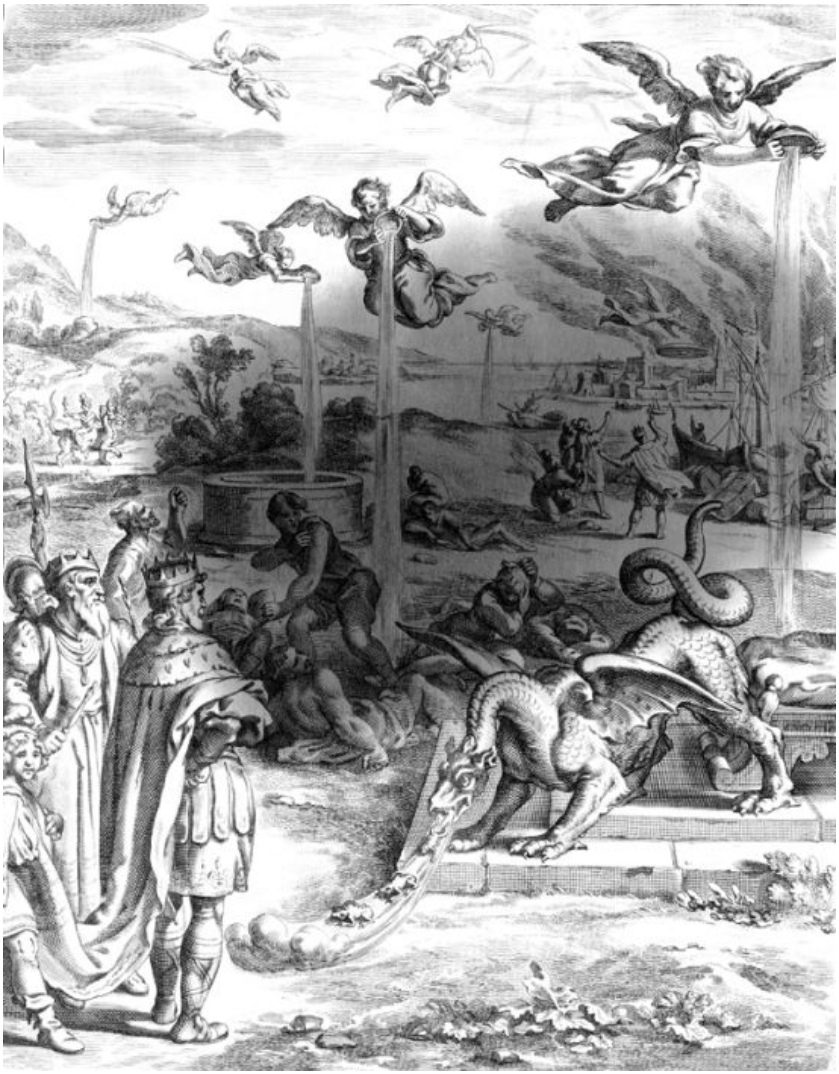

图9　马提亚·赛茨《七碗、龙、骑在兽上的女人和巴比伦城的倾倒》：《启示录》描述了圣徒与罗马帝国邪恶势力之间的争战。

《启示录》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包含了复活的耶稣给教会的信，分别写给以弗所（2:1）、士每拿（2:8）、推雅推喇（2:18）、撒狄（3:1）、非拉铁非（3:7）和老底嘉（3:14）[6]。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未来或天上的异象，而是对于当时罗马主要城市特定教

会情况的洞见。这些信中以忠心和背教、正直和腐败为衡量准则，讲到了教会的成功与失败。它们表明了《启示录》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合理地视为先知作品：不是因为它预见了未来，而是因为它从神的角度向人说明了这个世界。

同样的先知观点也被用在4:1开篇的异象中，并一直持续到《启示录》结尾。在这些异象中，冲突不是具体教会内与背教和腐败的斗争，而是神与撒旦的宇宙斗争（12:9）。这场宇宙斗争也牵涉到人间的使者。邪恶力量的代表者是帝国（17:1—18:24明确将之等同于罗马帝国），而代表上帝的是那些尚不需要殉道、但仍然要做基督见证的追随者。这些异象的意义不在于对未来的预测，而在于用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展现了人类为真理和正直而战背后的巨大利害关系。

《启示录》并不号召基督徒通过暴力反抗邪恶力量，而是通过拒绝承认它们的权威来抵制它们。基督徒并不认为君主至高无上。对他们来说，有且仅有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着他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17:14）。他们被想象中的上帝获胜的异象所激励，因而能够用生命去见证那位生来就要见证死亡者，继续他抵抗邪恶力量的未竟事业。

由此，他们拒不承认人类自高自大的伪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只“敬拜神”。在《启示录》结尾的异象中，神的子民在新耶路撒冷参加敬拜：“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22:3—5）这个结尾很恰当。

由于一些人拘泥于《启示录》中强大意象的字面意义、将其与现实分离，因而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但数个世纪以来，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启示录》就像在美国争取公民权的斗争那样，用“天开了”的异象带给他们身处更加宏大的世界的参与感，激励他们去抵制现实中根深蒂固的恶。

约翰的著作整体上仍吸引着读者，不是因为它超脱世俗，而是因为它们显然出自真实世界的冲突；它们持续令读者着迷，因为它们没有被原初的冲突语境禁锢住，而是利用想象的力量，以爱去超越宗派

分裂（约翰书信），以联结去克服分党（《约翰福音》），并通过真正的敬拜去抵制恶（《启示录》）。

注释

〔1〕此经文出处标注有误，应为《约翰福音》15:18。
〔2〕此经文出处标注有误，应为《约翰一书》2:11。
〔3〕此处原文引文出处标注有误，应为《马太福音》10:40。
〔4〕此处引文应为1:17—18。
〔5〕此处引文应为5:12。
〔6〕一共应有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原文遗漏了别迦摩教会（2:12）。

第十章
《新约》正典的形成

最早的基督教文献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神圣文本。它们的创作如果不是出自偶然，也是附带的结果；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情况，而不是着眼长远。它们出现于1世纪后半叶地中海地区情况各异的教会中，而这种差异也体现在文学形式和宗教观点中。这些作品成为《新约》，也就是现在称为《旧约》的犹太教《圣经》的长篇附录，经过了一个正典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几乎从这些作品刚一出现就已经开始，但是持续了一百多年，并且跟基督教的自我定位过程紧密相连。

许多分散的教会通过财产共享、个人关系网的培育以及共同的信仰和行为，变成一个统一的“基督教”或“基督教会”。然而，某些著作通过正典化成为《圣经》，是基督教在2世纪晚期成为一个一致、“大公”（在普世意义上）的宗教的关键因素。这种变化让基督教得以与异教和犹太教平等争取信徒。

正典化的过程

起初的几个阶段是自然的、逐步发展的，涉及文本与阅读群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到了最后的认可阶段，正典化才变成整个教会组织范围内的正式决定。

《新约》作品的创作牵涉到翻译成希腊文的犹太教《圣经》以及教会传统。例如，保罗就在《罗马书》9—11章有关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辩论中大范围引用了犹太教《圣经》。保罗也援引了他所参加的宗教运动中已有的传统：例如洗礼和圣餐礼等仪式、耶稣的教导以及信条原则。同样，福音书对耶稣故事的叙述也是建立在教会口口相传的传统之上，而对耶稣及其门徒的刻画，也借用了犹太教《圣经》的许多内容。

相应地，《新约》中各篇作品本意也是要用于聚会。受差遣送信的人会公开朗读那些书信。在敬拜聚会的时候，福音书的叙事也要大声念出。这一用途让这些作品成为公开的文件，并加速了它们被接受为基督教“圣经”的进程，因为它们在敬拜聚会的公开场合与犹太教

《圣经》一起使用。

正典化的基本步骤是基督教教会之间的文献交流。正如《歌罗西书》4:16所表明的那样，在保罗传道的时候，这种交流就已经出现。两组书信（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和《歌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说明，同时给几个教会写信加速了交流的进程。这个阶段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从特殊到一般、从局部到整体的转变：保罗之前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话，与后人在其他地方的教会所说的话密切相关。

在2世纪早期，教会通过这种交流已经收集了几小批作品。罗马的克雷芒（Clement of Rome）在大约95年写信给哥林多人，提到了耶稣的教导，以及《哥林多前书》、《希伯来书》和《雅各书》。同样，2世纪早期依纳爵（Ignatius）和波利卡普（Polycarp）的书信中，也显示出了对《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和保罗几封书信的了解。《新约》中的《彼得后书》很可能写于2世纪早期；它提到了“保罗的全部书信”，似乎这些书信存在于一个集子中，并暗示当时有解释这些书信的传统，“就如解别的经书一样”（《彼得后书》3:16）。

图10　POxy.1080 [1]，公元4世纪包含《启示录》3:19—4:3的手稿，最后一节描述了预言者的升天。

不过，此时这些教会的集子并不正式，提及《新约》作品也更多是通过暗指而不是直接引用。当时并不需要给出这些作品的正式清单，因为那些被接受的作品还没有受到增加或删减的挑战。

正典化和基督教自我定位的关键阶段在2世纪中期。那些在基督教运动中最早得到证实和接受的作品面临两个挑战。这两个挑战都牵

涉到作品内容和思想观念。首先，马西昂（Marcion）想要对这些作品进行删减。为了支持自己强烈的二元世界观，马西昂拒绝承认《旧约》中的神是恶的创造者，认为只有保罗对耶稣的理解是恰当的，即耶稣将灵魂从肉体中解救出来。因而，马西昂争辩说，神学上连贯一致的正典只有10封保罗书信（教牧书信不在其中）和《路加福音》，拒绝承认其他被接受的作品，理由是它们被“犹太化”了，即认为它们转向了犹太人的神。

另一个挑战来自扩张的力量，首要代表是史称诺斯替派的广有影响力的教导者所创作的大量启示文学作品。各种文学形式所反映出的主流思想又一次带上深刻的二元特征，推动了这一类型基督教的发展：相比教会这个团体，个体灵魂及其从肉体中的释放占据更优先的地位。这些文学和观念上的挑战联合起来，迫使教会从这些书卷中挑选一些作为规范文本。

我们对这些诺斯替派作品的了解部分源于2世纪晚期“正统”教师对它们的反驳，比如里昂的伊里奈乌（Irenaeus of Lyons）和迦太基的德尔图良（Tertullian of Carthage），部分源于对长期掩埋的科普特文献的发掘。两者都表明文学和观念上的挑战很严重。

在《驳异端》中，伊里奈乌（约公元180年）塑造了对这些挑战的标准回应，将正统基督教定义为公开的、体制化的和包容性的宗教。在反驳各种诺斯替观念时，伊里奈乌为教会的自我定位建构了一个尤其强有力的战略。借助于“信仰的准则”（或信条），伊里奈乌反对隐微教导的主张。所谓“信仰的准则”，是指对基督教总体信念的公开表达，用于为阅读基督教作品提供引导。

回应宣扬隐微启示的作品时，伊里奈乌借助了从诸位使徒得到的著作，即包括《旧约》、保罗的所有书信、四部（只有四部）福音书及其他“大公”作品在内的《圣经》正典。最后，他借助主教们公开的“使徒统绪”教义（主教职权是由使徒传承下来的）回应诺斯替派的隐微教导主张。伊里奈乌宣称，所有这些主教都承认这些信念，并只会读这些书卷。从伊里奈乌的时代开始，基督教信仰或行为上所受到的挑战都由主教集会讨论后做出回应，他们会以《圣经》正典为基

础，扩充或维护信条。

伊里奈乌和德尔图良的立场被很多其他主教和教师接受，包括亚历山大学派那些爱冒险的思想家，比如克雷芒和奥利金（Origen）等人。到了4世纪晚期，无论是主教个人——比如亚大纳西（Athanasius）（在其364年的复活节书信中），还是主教会议——比如迦太基会议（397年），都正式认可了主流传统辩护者们所采取的立场。

尽管在宗教改革期间正典问题不太受关注，但自2世纪晚期以来形成的《新约》正典文集依然稳固。随着1945年诺斯替文库在纳格–汉马迪发现，加上意识形态批判（尤其是女性主义）在学界发展起来，正典问题再次得到重视。但是，现在绝大多数的基督教传统不会再增加或删减两千年来塑造了基督徒生活和思想的《圣经》。

正典化的标准

这个历史概述很宽泛，但大体上是准确的。尽管流行的看法刚好相反，但包含在《新约》中的作品确实是基督教最早的证据。即使是认为某些诺斯替作品中（尤其是科普特的《多马福音》）有更原始成分的学者也承认，《多马福音》本身充其量只能是2世纪中期的作品。

不过，在1世纪末2世纪初还出现很多其他作品，因而，正典化所使用的标准这个问题仍然有效，尤其是鉴于还有证据显示，某些作品在地方教会中有很高的权威，比如《赫马牧人书》。

对今天的某些读者来说，有一个可能让人吃惊的事实，那就是神的默示即便曾作为标准，也只在极少数场合。《新约》作品被认为是应时而作，但这并不是它们独特性的标志。除了诺斯替派作品外，早期基督教还有各式各样的默示话语和异象启示。此外，《新约》作品并没有自称是神的默示，而是说犹太教《圣经》是神的默示（《提摩太后书》3:16）。

更常用的标准是使徒传统。《新约》作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使徒关联在一起。但这个标准并不总是行得通：毕竟，有许多诺斯替作品也宣称出自使徒之手，而且很难将《新约》作品与具体的使徒联系起来，比如，在福音书作者中，马可被认为是彼得的翻译，而路加则是保罗的同伴。

对使徒传统的主张实质上是历史优先性的表达：传统的作品集来自最早基督徒的见证，优先于那些2世纪创作的作品。因而，有这样的论点：使徒的明确继任者，即那些主教，阅读的只是这些书卷，承认的只是这些信仰，别无其他。

正典化最重要的标准可能是一种直觉，或“教会的感受”，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教会对这些特定作品合适与否的感知：这些作品从一开始就塑造了基督徒；这些作品反映了将之正典化的那些人所认为的教会的意义，即教会是致力于教会、世界和历史的公开、有组织的信徒聚会；而且，这些作品将能够把教会的异象传递给未来。

正典化的意涵

正典化的结果是27篇1世纪的作品被收入《新约》中，并由此成为基督教《圣经》的一部分。但正典不只是一个历史事实，它还是基督教的一种形式，仍然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要素得到认可。这种认可是今天的教会所做的宗教决定，而不是一个历史结论。

这个决定有很多意涵，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古老的作品对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的全体基督徒都至关重要。正典化是对于关联性的声明。确实，它认定《圣经》是先知式的，是神在一切时代向人所讲的话。从这个方面来说，经文的历史意义并非其唯一意义，甚至也不是其最重大的意义：保罗的书信和雅各的书信，以及福音书，仍在继续向今天的读者讲话，就像它们曾向最初的读者讲话那样。

正典化有两个悖论式的后果尤其重要。第一，基督徒将犹太教《圣经》称为“旧约”，并继续将它作为自己的《圣经》，因而不可避

免要与犹太人进行充满张力的对话，而犹太人则会继续从自己的视角去解读律法书。大多数时候，基督徒都是从一种自命优越的立场来制定对话的条件，他们仍然需要学习如何与犹太人开展平等对话。

第二个重要悖论是，正典化行为本意是要寻求实现统一，但实际上却让多样性成为常态。《新约》的27篇作品确实具有一种家族式的类似性，确实能够促使读者成为某种类型的基督徒，这种类似性是伪经作品所不具有的。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仍然保留了一开始就具有的风格、视角、甚至主张上的一切差异。由于这种不可化约的多样性，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得以在制度结构、神学、仪式、甚至道德方面形成复杂多样性；当然，他们都真诚地宣称，自己是以最庄重的心态对待《新约》。

注释

〔1〕《新约》抄本的编号。

第十一章
《新约》的影响

设想一下，莎士比亚的戏剧自写就之后，每周都在全世界各家剧院上演，以向这位伟大的诗人致敬，而且这些戏剧被翻译成几乎所有的人类语言。设想一下，它们的销售速度比其他任何书籍都要快，而且，每年有成千上万部以这些戏剧为分析对象的学术著作和更多的畅销书及文章出版。

设想一下，莎士比亚是世界各地数百所学校辩论得热火朝天的中心话题，而这些辩论正是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为基础的。设想一下，他的戏剧不仅是所有人类作品中被引用最多的文字，而且是世界各地数亿人孜孜不倦学习的内容，以作为生活不可或缺的指引。

如果我们能够想象到这些，就很容易证明莎士比亚戏剧跟今天密切相关。《新约》的情形也是这样。前文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一切假设，对《新约》而言都是实际情形：《新约》在世界范围内每周甚至每天都在用于敬拜；它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它销量极大，被广为研究，还拥有忠实的读者群。今天，数亿人宣称自己是以严肃的态度看待《新约》，这是不容置疑的。

回到上文的类比。要说莎士比亚戏剧无处不在而且影响深远，有人可能会提出三个反对意见。首先，对人类来说，把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艺术上是错误的。往好了说，它是繁重工作里的一点消遣；往坏了说，它会培育一种不健康的审美。

其次，大部分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演绎都很糟糕；这些戏剧被曲解，表演也很拙劣；那些最经常宣称喜爱莎士比亚的人，实际上背叛了他。

最后，莎士比亚满是对人产生负面影响的看法：他歧视女性、反犹、好战、笃信沙文主义，还表现出许多不符合当今社会价值的其他特征。

对于《新约》的影响，人们也会并且已经提出同样的反对意见。那些对宗教嗤之以鼻、尤其蔑视基督教的人发现，《新约》仍不可思议地持续深刻影响着现代人，令他们很是恼火。何以如此多的人会被这种古老的迷信所哄骗？尽管许多当代知识分子强烈抵制基督教，然

而，基督教仍不肯消亡。事实上，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基督教仍在发展和繁盛。

第二条反驳意见就好比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演绎得很糟糕或没有得到真正理解。谁会否认，绝大部分阅读《新约》的人按照《新约》的教导去做却没有充分理解它？谁会去辩解，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所过的生活，总在某个方面不符合《新约》的教导？然而，缺少理解乃至演绎上的失败，都无损于这个事实：对于绝大多数阅读者来说，《新约》文字仍然是生活的准则。确实，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演绎就算再糟糕，也至少保证了它们传播，让它们有可能得到更好的演绎；此外，神奇的是，糟糕的演绎并不会对文本自身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害。同样，基督徒的生活再不尽善尽美，至少也保证了《新约》作品的活力，让它有可能被人以更负责任的方式阅读从而促成更信实的生活。

最后一条反驳意见认为，《新约》的影响因为过于负面而更加不良。这种反驳广泛流行于当今形形色色的批评家中，他们指出《新约》通过多种方式造成了（或者至少说是促成了）基督徒冷酷和压抑的性情。他们抱怨说，《新约》剥夺了性爱的欢乐。他们准确地指出，基督教中的反犹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早期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刻薄态度。他们说，《新约》作品中对异端的不宽容给了教会可靠的依据来压制其内部出现的多元声音。他们指责说，《新约》的作者，尤其是保罗，对女性存在性别歧视，导致她们的声音被湮没了数个世纪。

所有这些指责都有合理的成分，甚至是相当程度的合理成分。另外还有一个指责：《新约》始终采取妖魔化外邦人宗教的方式，支撑了数个世纪以来基督徒对世界其他宗教的敌意。

对于提出这些指责的部分人而言，说《新约》除了负面因素之外至少还包含积极因素，并不足以回应这些指责。保罗并不是要贬低性，而是把性置于人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因而，从他的立场看，那些一心希望将性等闲视之的人来说是成问题的。又如，约翰确实宣称救赎来自犹太人，且保罗也确实祈祷全以色列得救。考虑到当时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公共活动的可能性极小，保罗告诫妇女在聚会时保持沉默，事实上在所有古代作家中已经算得上是最开明的。

这些回应也并不充分，因为事实上，有害成分仍然存在，而且会被那些自身秉性已经倾向于狭隘、敌意和充满怨恨的人解读，并付诸行动。这样的情况不仅历史上有记载，在当今的新闻报道中也不鲜见

对于这些批评的恰当回应与对莎士比亚戏剧批评的回应类似。没错，莎士比亚戏剧被曲解并被演绎得很糟糕；没错，它们包含着潜在的有害因素。但是，莎士比亚戏剧的读者和演员并没有遭受什么严重伤害！这形形色色的反驳丝毫不妨碍戏剧传达它的美、壮丽、深奥、智慧、幽默和完全的人性。那些华丽的诗句和不朽的诗行，它们仍然让没有防备的读者惊喜过望。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解读和演绎，提升了读者和演员的精神境界和人性魅力。

《新约》虽然有诸多明显的错误，但其同样保留了震撼人心、改变人类自由、激励人类献身人道事业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远远大过那些错误。如果说《新约》在恶者的手中会成为施行暴政的工具，那么，它同样也是致力于解放他人的圣徒们的伟大力量源泉。

耶稣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7），保罗的“爱的颂歌”（《哥林多前书》13），对最初基督徒共享财产的刻画（《使徒行传》4:32—37），耶稣提出的为神国、为穷人抛弃一切、舍掉所有的呼召（《路加福音》12:22—34，14:26—33）——这些话语没有任何恶的痕迹，没有任何自私的污点。历史上曾经以及今天仍在涌现的那些圣徒正是从这些话语中寻求动力，慷慨地给予，为了让世界更美好而努力生活。

大事年表

公元前

323	亚历山大大帝逝世
168	罗马征服地中海地区
	反抗安条克四世的马加比之战爆发
167	《但以理书》[1]
63	庞培征服巴勒斯坦
30	奥古斯都称帝
6	犹太地区被罗马吞并，成为其行省
4	耶稣降生（可能）

公元

28	施洗约翰传道
30	耶稣被钉十字架（可能）
34/37	保罗皈依（可能）
49—64	保罗传道及保罗书信
	其他书信（《雅各书》、《希伯来书》）
	教会的口授传统
64	尼禄焚烧罗马城并诬陷基督徒
66	犹太人反抗罗马的战争
68	保罗和彼得逝世（可能）
70	罗马人摧毁圣殿
	《马可福音》（可能）
85	犹太教“咒诅异端”的祷文

	《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使徒行传》（“路加–行传”）
90	《约翰福音》
95	克雷芒一世任教皇
96	图密善迫害基督徒
	《启示录》
107	安提阿的依纳爵殉道
122—135	犹太人对罗马的最后反抗
135	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
135/6	诺斯替派的瓦伦廷在罗马
155	波利卡普殉道
160	（异端）马西昂去世
165	查士丁殉道
156/70	孟他努传道（大约）
200	伊里奈乌逝世
313	米兰敕令（君士坦丁大帝）
325	尼西亚公会议
367	亚大纳西的复活节书信
397	迦太基会议

注释

〔1〕关于这卷书的写作时间颇有争议，有说法称其写于主前539年。

《新约》究竟是什么？它最初的用途是什么？它是如何演化成为基督教典籍的？又是如何将历史和神话结合在一起的？考古发现及其他非圣经证据对解读《新约》有什么帮助？

作者深入浅出，以平实易懂的文字把《新约》各个章节的大概内容、创作背景、写作风格、文本解读、历史渊源和流变、历史意义，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和异同呈现给读者。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走近《新约》，一窥它的真容和背后的故事。

百科通识文库

49

死海古卷概说

提摩太·J·林 著

傅有德 唐茂琴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死海古卷概说

提摩太·工林 著

傅有德 唐茂琴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36**

The Dead Sea Scroll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5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Timothy H. Lim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海古卷概说 / （英）提摩太（Lim, T.H.）著；傅有德，唐茂琴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13-4

I．①死… II．①提… ②傅… ③唐… III．①犹太教 - 教义 IV．①B9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42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13-4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译者序
第一章　作为文化标志的死海古卷
第二章　考古遗址与山洞
第三章　古卷与残片
第四章　理解《希伯来圣经》的新信息
第五章　谁之古卷？
第六章　来自库姆兰图书馆的文字作品
第七章　历史语境中的库姆兰 - 艾赛尼宗团
第八章　库姆兰宗团
第九章　库姆兰宗团的宗教信仰
第十章　古卷与早期基督教
第十一章　最伟大的抄本发现
附录　迄今未知的文本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提摩太·H.　林，爱丁堡大学《希伯来圣经》和第二圣殿犹太教教授。他是公认的死海古卷研究专家，古卷国际编辑团队成员，参与编辑制作了古卷文本的主要版本。他还编辑了《死海古卷电子参考图书馆》的第一卷，编辑和撰写了多部著作，其中包括《库姆兰注释与保罗书信中的圣经》（1997）、《历史语境中的死海古卷》（2000）和《排舍瑞姆》（2002）。

译者简介

傅有德，哲学博士，宗教学与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任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犹太哲学与宗教。主编《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犹太研究》和《犹太名人传》（思想家卷），出版《巴克莱哲学研究》、《现代犹太哲学》和《犹太哲学与宗教研究》等多部（篇）著作和论文。

唐茂琴，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是犹太教。曾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美国犹太文学。曾在《云南大学学报》和《犹太研究》等刊物发表数篇论文和译作。

图目

图1　《泰晤士报》1996年6月6日的新闻标题
图2　犹地亚沙漠
图3　以色列博物馆藏经祠
图4　《古卷、赝品与知识产权》的封面
图5　鸟瞰基伯特 - 库姆兰
图6　死海地区地图，基伯特 - 库姆兰、山洞和公墓的位置一览
图7　《哈巴谷书注释》
图8　《宗团规则》
图9　《列宁格勒抄本》
图10　《撒母耳记》抄本，保留了《撒母耳记上》10—11中遗漏的一段
图11　残片4QGen-Exod[a]，将摩利亚山称为“埃佬黑姆 - 以锐”
图12　战斗中的大卫和歌利亚
图13　库姆兰宗团“文书房”与“图书馆”复原图
图14　宗派文件
图15　7号洞所藏带有希腊字母的小残片
图16　4号洞所藏之所谓“遇害弥赛亚”的残片

译者序

不知为什么，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都带有异乎寻常的偶然性。

清末，官拜“祭酒”的王懿荣在对着处方查看中药时，突然发现一味中药“龙骨”上面刻有许多花纹，他认定那是一种文字。随后，他搜集了许多从河南、陕西、甘肃等地贩运来的“龙骨”，在悉心研究考察后，发现它们都源自河南安阳的小屯村，而这个地方正是殷（商）代的国都。于是，殷墟甲骨文发掘面世。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中国文字的历史，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历史。

无独有偶，1947年春，在巴勒斯坦死海西北岸、库姆兰南部的恩－斐施哈，3位放羊的男孩因为寻找走失的羊而闯入一个洞穴，发现了一些陶罐，其中装有手抄本的羊皮纸经卷。他们把经卷带到伯利恒廉价出售，后来引起美国、以色列学者的关注，接着开始了对古卷的探寻。到1952年，总共有11个洞穴被考古学家们先后打开，八九百部古卷抄本在隐藏了2,000年后重见天日，是为死海古卷。人们公认，死海古卷是20世纪全球最惊人、最激动人心的发现。

自发现之日起，死海古卷本身就成了一个传奇，一个难解的谜。死海古卷发现后不久，世界的眼球即被它吸引，学者们争吵不休，媒体们沸沸扬扬，人们亦津津乐道。学者们为争取一睹古卷真容而争吵不休，为争取平等研究古卷的权利而争吵不休，而这一吵就是40年。其间各种猜测、流言甚至人身攻击不绝于耳。整理欤？保护欤？研究欤？垄断欤？阴谋欤？1991年10月底，以色列文物局宣布实行新的使用权政策，终于打破了少数学者垄断多数死海古卷原始资料使用与研究权的坚冰。这对全世界的学者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然而，从此，新的争吵又开始了。这八九百部古卷并非卷卷完整，卷卷清楚。实际上，连一份完整的古卷抄本也没有。除了3卷抄本（《大以赛亚书卷》、《哈巴谷书注释》、《宗团规则》）几近完整外，其余大部分是残片，有25,000片之多。除了语言上的困难，这些残片如何拼凑？又如何解释？年代？版本？字迹？篇章？宛若天书一般。而学者们冥思苦想时的灵光一闪却也总会遭到持不同观点的同行的质疑。孰是孰非？文本如何说？历史文献如何说？考古证据又如何说？还有自

从死海古卷发现之初就萦绕人们心头、为之激动、为之不安的那些谜团是否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呢？诸如耶稣诞生、基督教产生之类的问题是否果如《新约》所说，是否果如传统宗教、历史书所说？那些经卷究竟为何人所记，又记载何人呢？早期基督徒？犹太人？哪一派？

死海古卷仿佛一团神秘的迷雾，若隐若现，扑朔迷离。无数的人在谈论它，但问题仿佛总是多于答案，或者答案总是不止一个。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我们仿佛迷失在其中，然而这种迷失本身却令人着迷，因为迷失中含着可能，含着真实，含着智慧。本书就是以这样引人入胜的方式述说、评论了自古卷发现之时直至近日（2005年）发生的形形色色令人着迷的事情。有趣的事件，有趣的论战，即便本应是枯燥的、纯学术的犹太历史与思想传统研究、基伯特 - 库姆兰考古研究、古文书学、文本考证、文献学、语言学和古代的圣经注解等等，作者也是那么饶有趣味地娓娓道来。无论对2,000多年前的历史重构还是围绕古卷发生的故事，人们总是有争议；各种理论的出现总是有可能，两个，三个，甚至多个，别人的，作者的。而这一切却不是新闻报道的耸人听闻或小说家的故弄玄虚，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有根有据，严谨致密，条理清楚，引人入胜而又不失学术风范。

对于中国人，即使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死海古卷依然是相对陌生的。我们或许多多少少听说过“死海古卷”，知道那似乎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也曾听说那部风靡一时的《达·芬奇密码》似乎与“死海古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死海古卷究竟讲的是什么？是怎么发现的？那是什么样的抄本？抄写者是谁？抄写于何时？为什么让它们沉默了2,000年？抄写它们的人哪里去了？它们和犹太教、基督教的关系如何？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就知者寥寥了。但是，我们相信，对于这样重大的发现，这样重要的文献，中国学者和学生们渴望知之更多，也应该知之更多。

如果想知道死海古卷的原貌，最好的办法是学习希伯来语，直接阅读、研究原文本；退而求其次，则可以阅读译本。死海古卷已经有了不少好的英文全译本（所谓全译本是指目前已有把握破译了的古卷

全译本，本书作者在附录中也作了推荐）。国内自50年代起也零零散散地有一些关于“死海古卷”的报道，上世纪90年代，山东的王神荫主教还翻译了西奥多·加斯特（Theodore H. Gaster）的英译本《死海古卷》。然而，对于一般的读者和研究者，若想短时间内兴致盎然地踏上轰动半个多世纪、至今依然风光无限的死海古卷之旅，那么，本书作者提摩太·H. 林绝对是个美妙至极的向导。你的好奇与乐趣正是他所期待的，也是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内心所体验到的。而这，也正是我们乐于翻译本书的主要原因。

译者之一傅有德曾经在英国牛津大学希伯来与犹太研究中心的研究生班学习，其时提摩太·H. 林曾经担任过他的辅导教师（Tutor）。林博士是加拿大华人，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当今死海古卷研究的著名专家，恐怕也是世界华人中绝无仅有者。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愿意翻译此书的另一个原因。

书中涉及很多《圣经》和圣经时代后期的人名、地名，以及专业术语，翻译起来格外繁难，误译之处，敬请方家指正。翻译过程中参考了王神荫主教译的《死海古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编辑周渝毅女士热情约稿，认真负责，促成了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傅有德　唐茂琴

2007年11月22日于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园

第一章

作为文化标志的死海古卷

很多人都曾听说过死海古卷，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什么，或者说它们对于我们理解《旧约》，即《希伯来圣经》、古代犹太教以及基督教的起源有什么意义。自1947年死海古卷被发现以来，特别是自从1991年所有未经编修的剩余卷册全部公之于众以来，出版热潮汹涌而至，从通俗读物到专业著作，应有尽有。除了业内人士，专业著作令大多数人望而却步；而通俗读物又良莠不齐，其中不乏耸人听闻的蹿红之作（常常涉及梵蒂冈的阴谋论），当然也有合理可靠的作品。

在这本对死海古卷的简介中，我将围绕它的发现、学术论战中的争议和毁谤、法律诉讼、政治和既得宗教利益展开论述。此外，我还将介绍公元前200年至公元70年期间对犹太历史与思想的传统专门研究、基伯特 - 库姆兰[1]（Khirbet Qumran，发现古卷的地方）的考古研究、古文书学（古字迹研究）、文本考证、文献学、语言学和古代的圣经注解。本书还将介绍最新的科技，而这一点往往为导论性教科书所忽略。为和这套丛书的目标保持一致，有必要对每个论题进行简洁而有选择性的处理，其目的是吊起你的胃口，引起你的兴趣，而不是对死海古卷作面面俱到的介绍。

2004年11月12日的《独立报》发表一文，其大字标题是《阿富汗想从英国要回“佛教的死海古卷”》。文章系尼克·麦欧（Nick Meo）所写，称阿富汗文化信息部部长萨伊德·拉尼（Sahyeed Rahneen）博士意欲使喀布尔博物馆流失的收藏品完璧归赵，将正式请求英国政府归还佉卢文经卷。喀布尔博物馆在驱逐塔利班政权的战争中曾经遭到洗劫，用古佉卢文写在桦树皮上的60件经卷残片的收藏品流落到了古玩市场，直到1994年在英国国家图书馆重见天日（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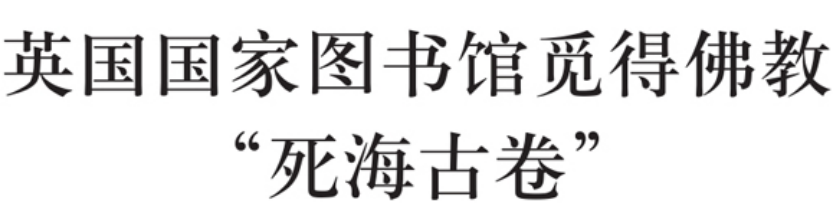

图1　《泰晤士报》1996年6月6日的大字标题使用“死海古卷”象征性地代表古代

的重大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报纸上的这一标题用“死海古卷”来指代发现的古代手抄本藏品。佉卢文文本是佛教经卷，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与犹太教毫无历史瓜葛。它们对于研究早期佛教的发展，探究作为历史人物的佛陀具有重要意义。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暗示，使用这一比方，是刻意强调它们年代的久远和重要价值。在一家全国性报纸上特别使用这一提法，表明死海古卷已经取得象征符号的地位。它们不再只是曾经生活在死海之滨的一个犹太教派的经卷，而是古代手抄本方面的所有重大发现的代表。

可以说，死海古卷超越了第二圣殿犹太教（公元前515年到公元70年）的历史背景，已成为一个文化标志。通俗小说，如丹·布朗（Dan Brown）写的畅销书《达·芬奇密码》，为增添故事的趣味性和神秘性而在叙事中不断提及它们。再如，在较早的一部小说《曼德堡大门》中，主人公的未婚夫就是发掘基伯特 - 库姆兰的考古学家。该小说发表于1965年，作者是著有《琼·布隆迪小姐的青春》的知名作家穆雷尔·斯帕克（Muriel Spark）。这些古卷何以变得如此受欢迎呢？

媒体与古卷

死海古卷受欢迎的原因不难找到。从1947年两名贝都因牧羊人最初发现它们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古卷争夺战”，媒体总是不断地向饶有兴趣的公众报道古卷的最新发现、相关的政治活动、人身攻击和学术争论。有些报道专门追求轰动效应，不管背后有没有学者的支持；有些则提供古卷研究最新进展的可靠信息；此外，在这两类报道之间是林林总总的其他类型的宣传报道。无论是何种情况，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的介入已经确保公众，特别是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公众，都读过或听说过死海古卷。

在我个人早期的学术生涯中，我亲身体会到了媒体在使古卷走向

大众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1991年，我刚刚在牛津大学取得古卷研究的博士学位并成为东方研究所的肯尼科特希伯来研究员。就在那时，人们要求拥有4号洞剩余的未经编修的古卷的使用权，此即所谓的“古卷争夺战”。从本质上说，这是一小群学者和其他学者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在库姆兰11个藏经洞中，4号洞藏经最多；前者占有从4号洞发现的未公开的资料，而后者则想使用并要求使用这些资料，以从事研究与学习。资料占有者和未占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几年来一直在不断升温，但在1991年夏秋之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91年10月29日，以色列文物局宣布实行一项新的使用权政策，于是，在双方交恶甚多之后，主张自由使用资料的一方胜出了。刊登在《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宣布了这一消息，其大字标题是《以色列开放死海古卷使用权》。

在新政策宣布数周之内，两位美国学者，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米歇尔·怀斯（Michael Wise）和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罗伯特·艾森曼（Robert Eisenman）向世人宣布，他们发现在当时尚未出版的古卷中有一小块碎片，其上的叙述证实有一位遇害或被钉死的弥赛亚。我和最重要的古卷研究专家之一格萨·韦尔迈什（Geza Vermes）在牛津大学组织了一次研讨会，研读了这个6行文本，并得出如下结论：恰恰相反，该残片讲的非但不是一位遇害的弥赛亚，而是一位受膏的公会首领，是他杀死了敌人[2]。在后面关于古卷和早期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一章中，我将详细讨论这些彼此相左的诠释。

一位名叫奥利弗·季黎（Oliver Gillie）的记者报道了这次研讨会。他的文章刊登在1991年12月27日《独立报》的头版和内文中。这次研讨会的特点之一是运用计算机技术和成像软件来加强辨认希伯来语手稿，这一点在随后的报道中得到了强调。位于亚尔顿的牛津大学希伯来与犹太研究中心有成像设备，是库姆兰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捐赠者资助，负责人是曾经任教于悉尼大学的阿兰·柯朗（Alan Crown）教授。当时我制作了一件4Q285（4代表4号洞，Q代表库姆兰，285指该卷的编号）第5号残片（现在重新编号为第7号）的放大且改进过的图像，后来发表在《犹太研究期

刊》上。在古卷研究中运用成像软件，这尚属首次，而经完善并放大后的第5号残片的发表把该期刊的读者惊得目瞪口呆。

关于这段插曲，有几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报纸上那篇文章的发表日期与圣诞节假期恰好一致。由于牛津研讨会是在12月20日召开的，所以这也是说得通的。然而，多年后我注意到，媒体在大幅报纸、收音机或电视上的报道与广播，几乎总是紧跟在圣诞节或复活节之后。当然，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古卷既然是宗教文献，所以在一年一度的节日期间就格外引人注目。但奇怪的是，它紧随的是基督教的圣日而非犹太教的圣日。复活节的日期每年随逾越节日期的变化而变化，但这一事实不影响一点，即媒体眼中只有基督教的宗教周期，而没有犹太教的宗教周期。既然几乎所有的学者都相信这些古卷是关于犹太教的而不是关于基督教的，那么为什么不在犹太新年或赎罪日期间发表相应的报道呢？

究其原因，正是与基督教的关联才使得这些古卷具有了轰动效应。比如说，如果能在死海古卷的某一卷中发现“一位遇害的弥赛亚”，那么，就会有人认为，它将对耶稣的独特性和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提出质疑。说句题外话，此类观点常常直言不讳地出现在媒体上，依据对耶稣和基督教信仰相当简单化的理解，以为一件考古文物的发现就会削弱基督教。在犹太教历史上，耶稣不是唯一被追随者们认为是弥赛亚、甚至是受苦受难的弥赛亚的人。不管怎样，可以说，古卷中有“一位遇害的弥赛亚”并不会质疑耶稣基督的独特性，但却会突出在大屠杀后〔3〕宗教间对话中不断被基督徒所接受的一个观点，即，耶稣是个犹太人而不是基督徒。

其次，将现代科技运用到古代手抄本的研究中自有其内在魅力——在异常古老的手抄本和最尖端的电子工具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随着过去15年中电脑应用程序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现在有了一些相当不错的网站，如，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设立的“俄里翁死海古卷及相关文献研究中心”。如果登录该中心的网站，“网上冲浪者”可虚拟参观基伯特 - 库姆兰、参加实时进行的小组讨论或搜索参考书目数据库。

计算机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古卷研究和信息传播。我于1997年编辑了《死海古卷电子参考图书馆》光盘数据库，可以让有个人研究需要的学者搜索、完善并打印出特定古卷的图片。后来，由杨百翰大学的“古代研究与摩门教研究基金会”制作的第2卷发行，其数据库由伊曼纽尔·托夫（Emanuel Tov）编辑，其中包含可搜索的所有非圣经古卷的副本和翻译。

在美国，其他引人注目的进展和项目包括完善了一份文本并弱化了其背景“噪音”[4]。该文本即格雷戈里·H. 贝尔曼（Gregory H. Bearman）所谓的“《创世记伪经》”。贝尔曼是帕萨迪纳市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科学家，精于分析卫星图像。他研发了一项名叫多光谱成像的技术，能使毁损严重、肉眼无法看见字迹的手抄本生成可读文本（如《挪亚书》）。普林斯顿大学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死海古卷研究项目”[5]的编辑中也运用了计算机完善技术，该项目由詹姆士·H. 查尔斯沃斯（James H. Charlesworth）主持。

是否开放4号洞古卷和对公认为记载着“遇害弥赛亚”的一块残片的解读是最近发生的两大争议性事件。在大事频频发生的过去的约半个世纪里，其他争议性事件也时有发生。比如，曼彻斯特大学的英国学者约翰·阿莱格罗（John Allegro）率领探险队进入犹地亚沙漠搜寻《铜古卷》中提到的宝藏（图2）。

图2　《铜古卷》逐一列出了犹地亚沙漠中的64处藏宝地点

发现于3号洞的这一份古卷在死海古卷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以铜为书写材料。其他所有的经卷都写在兽皮或蒲草纸上。它的正文蚀刻在铜板上，描述了犹地亚沙漠中的64处藏宝点，里面埋藏着金、银、圣殿祭品和该经卷的另一副本。这就是阿莱格罗决意寻找的宝藏。其他学者认为这些宝藏——多达65吨重的白银和25吨重的黄金——纯粹是文学上的虚构，并将《铜古卷》比作“玛塞海特 - 凯利姆”（massekhet　kelim，有关圣杯的短文）——一个中世纪文本，描述了所罗门圣殿〔6〕的宝藏如何被没收到巴格达的一座塔楼中，其埋藏地点如何记录在一块铜板上的故事。阿莱格罗没有找到任何宝藏，但是他的探险考察却被媒体广泛报道。

旅游业与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备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旅游业。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朝圣者来到以色列，参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其中，犹地亚沙漠中的基伯特 - 库姆兰考古遗址和以色列博物馆的藏经

祠在游览名胜排行榜中位居前列。在基伯特 - 库姆兰，他们由见多识广的向导带领着参观考古遗址并游览附近的山洞。即便是在动荡不安的岁月，游客的人数也相当可观。根据以色列旅游局统计的数据，去年有4.6万名游客游览过库姆兰遗址。感兴趣的游客现在还可以购买古卷的摹本和储藏过某些经卷的罐子的复制品，也可以购买包括“死海古卷”钢笔、T恤衫、领带、围巾和泥块在内的全套用品。

政治与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在以色列也被视为文化标志。1997年7月20日至25日，世界各地的学者被邀请到耶路撒冷参加死海古卷发现禧年（即50周年）庆典。在这次盛大的集会中发生了许多事，其中令人难忘的是这次活动的开幕式，主持者有时任以色列首相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耶路撒冷前市长特迪·考莱克（Teddy Kolleck）和伊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以及以色列博物馆馆长詹姆士·斯奈德（James Snyder）。坐在以色列博物馆外面的场地上，在耶路撒冷渐次朦胧的暮色里，我和来自以色列国内外的基督教、犹太教以及其他学者们聆听着人们阐述这些古卷对以色列国的重大政治意义。古卷发现的那一年，即1947年，恰好与犹太国在大约2,000年后重建的时间相吻合。我们被告知，这些古卷对犹太民族回归故里具有象征意义，而这一点在庆典安排中得到了重点强调。这是一次美妙绝伦的庆典，甚至还特意委托米歇尔·沃尔普（Michael Wolpe）为之谱曲，歌词即以古卷上的经文为基础。藏经祠是为展览死海古卷而特意建造的地下展览馆，地上部分乃模仿储藏一些古卷的古瓦罐盖子的形状而建。我们坐在博物馆的前面，背后是以色列议会大厦“科乃塞特”（Knesset）（图3）。

图3　以色列博物馆藏经祠，死海古卷在此陈列

我们并不是不明白以色列政治领袖想利用死海古卷捞取政治资本，但我们保持着我们高贵的沉默。只是当提到死海古卷对耶路撒冷至关重要时，听众当中才发出此起彼伏的不赞成的偷笑声。这对与会人员来说是可笑的，因为大多数专家相信死海古卷属于犹太教的一个虔敬群体艾赛尼人，而他们除了具有其他特征外还认为，耶路撒冷的祭司腐化堕落，故而他们离群索居，将自己放逐到了犹地亚沙漠！

当这些古卷最初于1947年在基伯特 - 库姆兰发现时，相关山洞和犹地亚沙漠在1929年签署的英国托管治权和文物法规的管辖之下。1948年后随着政局的变动，几乎所有的古卷都落到了以色列手中。大多数古卷保存在藏经祠和东耶路撒冷的洛克菲勒博物馆。《铜古卷》是个例外，依然在约旦首都安曼的文物部中安家落户。还有几块残片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家手中。加拿大甚至有一块邮票大小的残片，即所谓的“麦克 - 吉尔残片”。一般来说，文物的所有权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法律因素。沃伊斯艾赫·考瓦斯基（Wojciech　Kowalski）运用继承与国界交接的法律原理指出，“古卷目前由以色列保存的事实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准则完全一致”。并非每个人都赞成这一观点。暂且抛开法律上对所有权的考虑不说，这些古卷首先属于犹太民

族，然后才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

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格拉斯哥市的凯文葛罗夫艺术博物馆于1998年举办了“来自死海的古卷”展览会，其政治含义不言而喻。以色列文物局决定把允许在格拉斯哥举办死海古卷展览会作为对当地犹太社团的认可，并以此庆祝以色列建国50周年。禧年展览会是在不列颠举办的唯一一个此类展览会，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

梵蒂冈与死海古卷

梵蒂冈阴谋论早已与死海古卷的发表紧密相关。是谁最早提出的这一阴谋论并不清楚，但约翰·阿莱格罗无疑是最早揭露该阴谋的人之一。据他说，在50年代早期，最早可以接触所有古经卷的是由国际上跨教派的学者们组成的团队，那时，抄本的出版进展迅速。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约翰·阿莱格罗开始怀疑存在着天主教垄断，甚至天主教阴谋。给编辑团队中的某些成员分配的抄本越来越多；约塞夫·米利克（Josef Milik）、吉恩·斯达奇（Jean Starcky）和约翰·斯特拉格内尔（John Strugnell）得到的抄本份额最大，而他们全是天主教徒。阿莱格罗曾经对一个朋友说：“我深信，如果（古卷中）真出现什么影响罗马天主教教义的发现，那么这个世界永远看不到。”这一怀疑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他遭到了排挤，无法接触到剩余的尚未出版的古卷。尽管他是最早的编辑之一，但到了50年代后期，阿莱格罗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团队之外。1956年8月5日，在给另一位最早的编辑团队成员弗兰克·克罗斯（Frank Cross）的信中，阿莱格罗写道，“团队中的非天主教成员正以最快的速度被清除”。其二，他怀疑梵蒂冈可能封锁那些损害基督教信仰的信息。

最近，在《约翰·马可·阿莱格罗：死海古卷的独行者》一书中，阿莱格罗的女儿朱迪丝·安妮·布朗（Judith Anne Brown）详细阐述了父亲对死海古卷的延迟出版和限制接触剩余未出版材料的看法。尽管无法找到任何证据支持父亲的怀疑，但她利用私人信件和个人回忆录

的形式，描述了阿莱格罗如何将自己被排除在编辑团队之外归因于天主教的垄断和缄默阴谋。

正式出版物《犹地亚沙漠的发现》系列丛书的前任主编约翰·斯特拉格内尔和最早的编辑团队中说话最直率的批评家格萨·韦尔迈什对出版进程和限制接触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斯特拉格内尔和韦尔迈什分属于“古卷之争”的敌对阵营，但是他们都没有把出版延迟和限制接触问题归结为梵蒂冈阴谋。斯特拉格内尔为古卷的出版速度作了辩护，他认为，这样的速度和同类项目，如埃及的俄西林蒲草纸古卷的编辑速度大体相当；而韦尔迈什则谴责基伯特 - 库姆兰的发掘人、也是《犹地亚沙漠的发现》出版工程的首任主编罗兰·德·沃（Roland de Vaux），认为他任命的团队太小，无法应对编辑成千上万块残片的艰巨任务。

约翰·阿莱格罗关于天主教阴谋的观点是不可靠的，因为至少有一位最早的团队成员、哈佛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弗兰克·莫尔·克罗斯留在了编辑队伍里，而他不是天主教徒。还有更多世俗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延迟出版和限制接触古卷，这些原因包括学术抱负与嫉妒、个人恩怨与冲突、资金限制、追求完美、拖沓以及尚未出版的剩余古卷那支离破碎的保存状态等。

不管怎么说，梵蒂冈阴谋论继续在公众当中传播。事实与想象的界限常常变得模糊不清。想想丹尼尔·伊斯特曼（Daniel Easterman）的小说《犹大圣约》（1994）吧，书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虚构的阴谋，它试图封锁对基督教信仰有害的信息。主人公是某个叫杰克·古尔德（Jack Gould）的博士生，在都柏林三一学院研究《大马士革文件》[7] 中关于星与杖的预言。他特别热衷于研究那份显然来自于库姆兰某个山洞的耶稣蒲草纸卷[8] 的来龙去脉。当古尔德在别处沿着线索追寻时，在耶路撒冷古城一个虚构的天主教圣经研究机构中，一位名叫雷蒙德·贝菲尼斯特（Raymond Benveniste）的神父一边思索着手头的亚兰语残片的命运，一边和自己的良心作着激烈的斗争。我从中节选了几段以便让你领略一下一种虚构版的阴谋论。

雷蒙德·贝菲尼斯特神父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捂着嘴咳嗽了几下，又放了回去……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块16厘米宽21厘米长的蒲草纸残片。上面有30行亚兰语，这儿有个洞，那儿脏一块的，不过勉强可以辨认……残片本身不怎么重要，只是一封不知何许人写给圣堂执事的信……一般情况下，贝菲尼斯特会传下去进行深入研究并最终在该机构季刊的某一期上发表。但是只因一事让他心头不安。

这块残片包含一条资料，十分简短，涉及“耶稣的信徒”，一群似乎在某些方面依恋圣殿和“热衷摩西律法”的人。当然，对该节的解释有好几种可能。单凭它自己还不会生出多少枝节……

但是，在罗马，有人偏重谨慎，视谨慎高于一切。上次去罗马时，圣经委员会的德拉·盖拉尔代斯卡（Della Gherardesca）曾经开诚布公地跟他谈过。最近有大量书籍出版，暗示耶稣基督不过是一名哈西德派教徒，一位犹太圣哲，而他的父亲是一位学者，即“纳嘎赫”（*naggar*）——这是一个亚兰词，是“木匠”的比喻……

贝菲尼斯特又看了一眼这片蒲草纸残片。它算不上重要，但它却可能被视为证实这种毁谤性理论的另一条资料。假如落在坏人手上，它可能会被派上邪恶的用场。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作为一名学者，他为自己即将做的事感到羞耻。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已养成了顺从的习惯。在划亮火柴的时候，他的手甚至都没有抖一下。

《犹大圣约》讲了一个顺从的传教士毁掉了一块亚兰文残片的故事，因为该残片显然证实了耶稣热衷于摩西律法。梵蒂冈阴谋专事封锁那些偶然发现的、不经基督教官方渠道传播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以不同于《福音书》中的方式来描述耶稣。在小说中，那片蒲草纸残片说明，与《新约》的描述恰恰相反，耶稣没有废除“哈拉哈”[9]（*halakha*），即犹太律法。他是一个虔敬的人，一个坚持律法的狂热分子。该故事纯属虚构，但是伊斯特曼笔下的耶稣与韦尔迈什在《犹太人耶稣》（1973）一书中所作的著名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韦尔迈什认为，最好把拿撒勒人耶稣看作一名“哈西德”（希伯来语，即“虔敬者”）。不同的是，韦尔迈什笔下的耶稣是一个魅力非凡的圣人，不是一个犹太律法专家。甚至伊斯特曼对亚兰词“纳嘎赫”采用比喻式的理解，即不取“木匠”的字面意思而是取“学者”的意思，也是以

韦尔迈什的作品为基础，尽管后者自那以后就收回了自己的观点。

然而，早在几年前的1991年，米歇尔·贝金特（Michael Baigent）和理查德·利（Richard Leigh）出版的《死海古卷骗局》却不是虚构的小说。它宣称发现了隐藏在本世纪宗教流言背后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它把古卷出版延迟的矛头直指梵蒂冈。据推测，当时梵蒂冈控制着德·沃，而德·沃也是耶路撒冷圣经与考古学院多明我会的主任。该书声称，的确有一个阴谋：在若瑟·拉辛格枢机主教（Cardinal Joseph Ratzinger——新教宗本笃十六世）的领导下，以宗座圣经研究委员会和罗马教廷信理部这一现代宗教裁判的形式禁止可能“不利于基督教教义”的尚未出版的库姆兰古卷的发行。

阴谋论从本质上说取决于一些被神秘隐藏起来的已知资料。一些学者无法接触死海古卷似乎是阴谋论的最佳主题。然而，当《死海古卷骗局》面世时，在英国却没有取得预期的震撼效果。主要原因在于，该书出版后没几个月，允许接触古卷的新政策就宣布了。现在可以检验梵蒂冈阴谋论了。对大多数学者而言，用一个新流行的比喻词来说，显然没有发现“正在冒烟的枪”[10]。随后公布在媒体上的对该书作者的采访则暗示，梵蒂冈早已毁掉了任何有损教义的东西。在大多数英国人听来，这不免有点诡辩的味道。

该书被译成了德文，取名为《耶稣秘史：死海古卷和早期基督教真相》，书中各章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一家名为《德国明镜周刊》的全国性杂志上，此后它竟然成了一本畅销书。事实上，该书极受欢迎，销量超过了30万册，以致于德国学术界迫切感到不得不提笔批驳。

圣经考古学会与死海古卷

为非教界读者着想，一家杂志挺身而出为死海古卷作普及宣传。这家杂志就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圣经考古学会主办的《圣经考古评论》。该月刊由赫谢尔·尚克斯（Hershel Shanks）创立并编辑。他从

律师改行做出版商，孜孜以求，不知疲倦，该刊以高质量的文章而美名远扬。《圣经考古评论》（BAR）[11] 拥有30多万读者，常常因发表与圣经考古学和死海古卷有关的最新发现而引发争议。通过发表文章和举办公开的研讨会，圣经考古学会在传播古卷知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也是“解放古卷”的积极倡导者。

版权、知识产权和死海古卷

90年代早期，那场针对4号洞材料的争夺战至少包括两起在法律上和学术上的小规模附属冲突，该冲突与当时尚未出版的死海古卷的抄本和翻译产权有关。其中，擅自出版文本名为4QMMT（MMT代表希伯来语*miqsat ma'aseh ha-torah*，即“某些托拉律令”）的抄本引发的冲突更是搞得沸沸扬扬。为了把剩余的古卷从一小撮学者的学术控制中解放出来，1991年，圣经考古学会发表了题为《死海古卷摹本：备有导论与索引》的两卷相册，作者为罗伯特·H. 埃斯曼和詹姆士·M. 罗宾逊（James M. Robinson）。卷首是赫谢尔·尚克斯题写的《前言》，其中包含一个MMT合成本工作副本的抄本。

MMT是一个介于116行至135行（行数在编辑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之间的文本，是不明身份的个人和团体之间就20个左右的律法疑点展开的讨论，其不同身份只能通过“你（们）”（有单数和复数），“我们”和“他们”才能分清楚。人们相信，该文本指的是从犹太人主体中分裂出来的库姆兰宗团的早期阶段。这一合成本是通过对该古卷6份抄本进行编辑而形成的其假定原始文本的复原。编辑过程是伊丽莎·齐慕隆（Elisha Qimron）和约翰·斯特拉格内尔通力合作的过程。2001年8月7日，在巴塞尔会议上，以古卷复原术闻名的哥廷根大学教授哈特牧·斯特格曼（Hartmut Stegemann）也公开声称，在编辑过程中他出过一臂之力。但是他没有提出法律诉讼。齐慕隆，而非斯特拉格内尔，以侵犯版权的罪名把圣经考古学会、会长赫谢尔·尚克斯以及两个编辑埃斯曼和罗宾逊告上了法庭。该案在耶路撒冷开庭审

理。1993年3月30，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宣判，时任法官为达理阿·道耐尔（Dalia Dorner）。被告提出了上诉，而1998年3月17日，作为受理民事上诉的上诉法院——以色列最高法院，维持了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判决。

本案对著者的法律定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以复原和抄写的形式对2,000年前别人写成的一份手抄本所做的编辑工作而今也可以受到版权法的法律保护。MMT合成本的版权属于伊丽莎·齐慕隆。该案例是版权法的分水岭，《休斯顿法律评论》38.1（2001）将整整一期专门用于刊登大卫·尼莫尔（David Nimmer）对该案例的讨论，其篇幅相当于一本书了。尼莫尔是美国一流的版权律师，他质疑原判和随后的上诉判决。爱丁堡大学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知识产权和科技法中心主任赫克托·麦克奎恩（Hector MacQueen）则持不同观点。他赞成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判决，表示编辑作品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争论的焦点是在法律上对著作权人进行界定时衡量“原创性”的标准。一般来说，美国的版权法为“原创性”设置的门槛很高，它要求一定有“创造性火花”，然而以色列和英国的版权法则赋予“原创性”以“一种正当的技术和劳动”的含义。

麦克奎恩进一步论证道，赋予编辑文本以版权非但不会阻碍学术发展，反而会积极促进学术发展：有了版权保护的奖励，潜在的编辑们会有动力殚精竭虑；出版商们则会受经济利益驱使而保持出版编辑文本的兴趣。无论我们对齐慕隆 - 尚克斯一案持何观点，赋予编辑作品版权的先例已经确立起来。

毫无疑问，死海古卷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标志。它们得以普及的主要原因包括由媒体、旅游、文化和政治的体制化、针对古卷接触问题的争议、将梵蒂冈卷入其中的阴谋论、圣经考古学会的作用以及侵犯版权案等各方所产生的宣传效用。所有这些因素都促进了死海古卷的象征地位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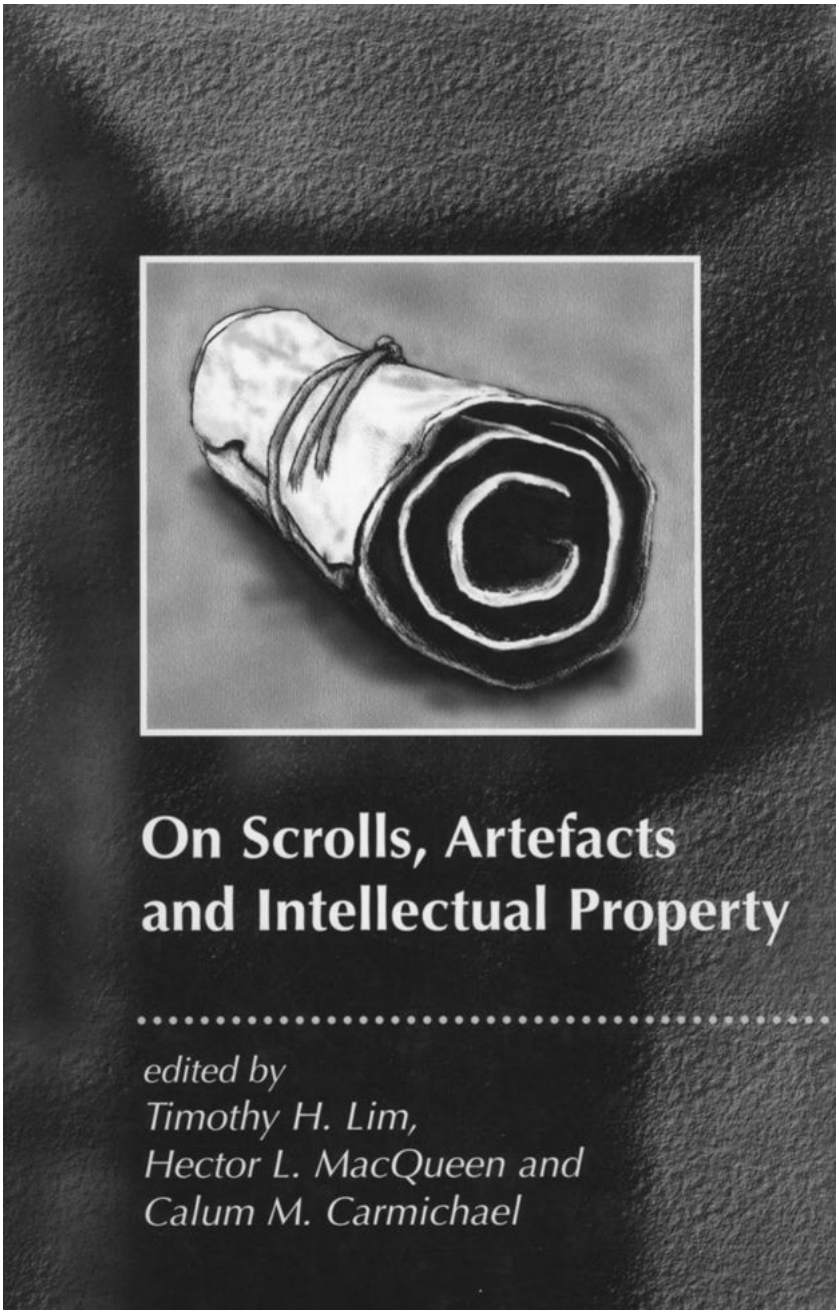

图4　一本书的封面，内容是关于一卷古经知识产权的那场法律之争。注意隐藏其中的版权符号

注释

〔1〕 又译库姆兰废墟。——译注，下同

〔2〕 这涉及基督教和犹太教中不同的弥赛亚思想，问题就出在希伯来语中“弥赛亚”（מָשִׁיחַ）的字面意思即“受膏者”（the anointed）。在古代以色列，“弥赛亚”指任何经过用油行过“膏礼”之后而升至某一特定高位的人，是犹太人的领袖人物，最初是大祭司，后来有国王和先知，在《以赛亚书》中预言有一位大卫王的后裔会拯救犹太人，做犹太人的王，那时全世界都将实现和平；到公元1世纪左右，犹太人在解释《先知书》时相信上帝会给他们带来一位弥赛亚，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简言之，在犹太教中，弥赛亚可以是多个；而基督教中则用它特指耶稣基督（基督在希腊语中是Χριστός，即Christos，在英语中翻译为Christ，字面意思是the anointed one），是救世主，是神，是独一的，故学者们在理解该词时有分歧。而且希伯来语中主语和宾语可以在语序上置换，是谁发出的动作关键看动词的语法构成，故同样是“杀死”，学者们也产生了不同的争议。在此，作者针对学者们对该文本基督教化的理解提出了反驳。

〔3〕 大屠杀（holocaust），指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而有计划地对犹太人实行的大屠杀。二战期间，大约有600多万犹太人惨遭纳粹杀戮。

〔4〕 背景“噪音”（background 'noise'）在这儿是一个比喻，指文本识别过程中文本上的干扰因素。

〔5〕 1985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普林斯顿神学院死海古卷研究项目”正式启动，由查尔斯沃斯和雷兹（H. W. L. Rietz）主持。自1992年，该项目连续出版了系列研究成果。

〔6〕 所罗门圣殿（Solomonic Temple），也被称之为“第一圣殿”，根据《圣经》，这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建立的一座圣殿。大卫王之子所罗门王继承王位后第四年（约公元前970年）开始建造圣殿，7年后落成，极其宏伟壮观，富丽堂皇。圣殿的内部，包括墙、天花板和地板，都是精金包裹；里面放置约柜和圣物，圣殿府库里还放着大卫王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细节描述可见《列王记上》5—8章。所罗门圣殿落成后曾多次遭到掠夺。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入侵耶路撒冷，一把大火将所罗门圣殿毁于一旦，而圣殿的所有珍宝都被运到了巴比伦，具体描述见《列王记上》14—15章，《列王记下》12—25章。

〔7〕 《大马士革文件》（The Damascus Document）是库姆兰古卷当中的一卷，因其中多次提到“大马士革”而得名。该卷最早发现于19世纪末（死海古卷发现于20世纪中期）埃及开罗古城的本 - 以斯拉会堂，参见附录的“宗派文本”。

《大马士革文件》通常用D表示，而发现于开罗的《大马士革文件》一般被称作《开罗大马士革文件》，一般用CD表示。

〔8〕 该小说虽为虚构，但显然利用了死海古卷以及学者和普通人对死海古卷的种种猜测。所谓“耶稣蒲草纸卷”并非专有名词，在小说中指记载着耶稣事迹的古卷残片，而在现实中，死海古卷并没有这样的残片，但小说应当受前面提到的那块备受争议的残片（是“一位遇害的弥赛亚”还是“受膏的公会首领”）的启发。

〔9〕 “哈拉哈”指拉比犹太文献中的律法性内容，与“阿嘎达”（非律法性的故事性叙述）相对。

〔10〕 该词与美国西部文化与电影有关，牛仔手中“正在冒烟的枪”证明他刚刚向别人开过枪，后泛指犯错误后留下的确凿证据。

〔11〕 《圣经考古评论》（*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的英文首字母缩写。

第二章

考古遗址与山洞

没有人能完全肯定古卷最早发现于何时，但是，1947年被指定为正式的发现年。关于古卷发现的故事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说法在细节上有些出入。一个版本是三个牧羊人正在库姆兰南部的恩 - 斐施哈看护他们的绵羊群和山羊群。在堂兄弟三个放羊的过程中，喜爱探索悬崖峭壁的朱玛·穆罕默德·克哈里尔（Jum'a Muhammed Khalil）向一个小小的洞穴扔了一块石头，随后听到了陶罐破碎的声音。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三个堂兄弟为了找一只走失的山羊而都向洞穴扔石头。无论当时是何种情况，那时天色已晚，已经无法看个究竟，而第二天还要专门给羊群饮水，于是三人一致同意两天后再回来。

但是，绰号为“伊尔迪伯”（“狼”）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埃尔 - 哈迈德（Muhammed Ahmed el-Hamed）——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觉得在那儿会找到金子，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悄悄溜了出去，从他们宿营的地方向上爬了100米，来到那片山崖的正面。一进入洞中，即后来被世人所知的1号洞，穆罕默德就看到大约有10个陶罐，有的有盖儿和柄，贴近洞壁排成一行。其中8个陶罐内有抄本，他拿了3卷，后来证实它们竟是《大以赛亚书卷》、《哈巴谷书注释》和《会规手册》（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宗团规则》[1]），然后回到了堂兄们身边。两位堂兄被埃尔 - 哈迈德的莽撞无礼激怒了，于是拿走了那3卷经书，又亲自返回那个洞里拿了两个陶罐，并把它们拿给伯利恒形形色色的古董商看。这些古卷和其他古卷究竟是怎样引起世人关注的呢？这里面有一个曲折复杂的故事，在诸多人中首先涉及一个名叫康都（Kando）的伯利恒补鞋匠、耶路撒冷叙利亚东正教首领都主教马尔·阿塔那修·撒母耳（Mar Athanasius Samuel）和鉴定这些古卷的希伯来大学教授埃利泽·苏肯尼科（Eliezer Sukenik）。在分割成块状的耶路撒冷城里出现了秘密会面，甚至在1954年6月1日的《华尔街报》上出现了一则出售《四卷死海古卷》的广告。

我们应当牢记在心的一点是，基伯特 - 库姆兰非同寻常，因为它的发掘乃是因为与古卷相关而非因为与《圣经》中提到的某个地点相

对应。在过去，与《圣经》有关的日程安排在巴勒斯坦考古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诸如耶利哥与美吉多等遗址皆因其在《圣经》叙事中的重要地位而被发掘。而今，出现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一方认为考古学应为《圣经》学术研究服务，另一方则力主巴勒斯坦考古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就基伯特 - 库姆兰而言，德·沃解释道，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找到了与1号洞中发现的一模一样的陶器是推动它发掘的动力。早在100多年前，学者们就对库姆兰耳熟能详了。最早的探险家们（路易斯 - 费利西安·凯尼亚尔·德·索西［Louis-Félicien Caignart de Saulcy］和亨利·B. 特拉斯特拉姆［Henry B. Tristram］）前去寻找蛾摩拉遗迹——一个因邪恶和放荡而被硫磺与火毁灭的人尽皆知的城市（《创世记》19）。当无法找到这个出现在《圣经》中的城市存在的证据时，他们对库姆兰遗迹的兴趣也随即消失了。查尔斯·克莱芒 - 加诺（Charles Clermont-Ganneau）曾于1874年发掘过库姆兰公墓的一座坟墓，他的评价是“这些废墟本身没有价值”。换句话说，若不是与古卷相关，基伯特 - 库姆兰作为考古遗址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居住年代

正如大多数使用了100多年的综合建筑群一样，基伯特 - 库姆兰的建成也非一日之功。根据遗址后来的使用状况可以分辨出遗址的不同阶段。考古学家使用一种叫地层学的方法来区分遗址的不同层次，即地层。从根本上说，这一方法依据的是沉淀层原理——地面土层层层相叠而形成沉淀层，即依年代顺序排列的居住史：上面的一层要比下面的一层年代新近，以此类推。

在每一层，即每一地层内，残余的陶器碎片和硬币有助于年代的确定。陶器有时可以根据它的样式、材料和烧制技术而确定分类，而这是显示年代更迭的一个重要指针。硬币也有助于确定年代顺序，因为它可以给出最早的可能日期或自此之后（*terminus post quem*）的

日期。因此，比如说，如果在某个地层中发现了大祭司约翰·许尔堪一世（John Hyrcanus I）时期铸造的一枚硬币，那么，撇开其他考虑因素不说，该土层的年代不可能早于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04年，即他统治的时期。从理论上说，没有最近的年代，因为即便是当代的古董收藏家也可能收藏有哈斯蒙尼（Hasmonaean）时代的硬币。然而，实际上只要考古沟渠一直没有遭到扰乱，土层中硬币的相关位置即可决定该地层的年代。

1959年，德·沃在英国皇家科学院发表了《施魏希讲稿》，此后，关于基伯特 - 库姆兰居住年代的一切描述都依赖于该讲稿对考古证据的权威论断。在《考古学与死海古卷》一书中——该书是有关这一话题的一切讨论的起点——德·沃将基伯特 - 库姆兰的居住年代划分为3个时期：

以色列时期	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
公社时期	
阶段Ia	公元前135—前100年
阶段Ib	公元前100—前31 年
遗址废弃	公元前31—前4年
阶段II	公元前4年—公元68年
阶段III	公元68—73年

第二次起义时期	公元132—135年

以色列时期

基伯特 - 库姆兰最早有人类居住的时期确定为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与以色列君主政体的最后阶段相对应。年代确定的依据是在灰土层中发现的陶器碎片、相对低矮的墙壁位置、盖有“拉麦克”（*lammelk*）即“国王所有”的印章的题字，以及与铁器时代第二阶段的其他以色列要塞所作的比较。在这一时期，库姆兰由一座长方形建筑构成，有大大的院子，一排房屋依东墙而建。那个圆形的蓄水池，也是该遗址上唯一的一个蓄水池，也确定建于该时期。

德·沃提出，这一居民区可能是《约书亚记》第15章61—62节提到的6个城市之一的“盐城”（*‘ir-hammelah*）。另外一些学者则更倾向于认为该遗址是另一个城市“西迦迦”。《约书亚记》的同一段落和3号洞出土的《铜古卷》都提及该城。以色列时期可能在公元前586年犹大国灭亡时被战火所毁，这可从灰土层得到证实，但这一年代的确定却几乎无从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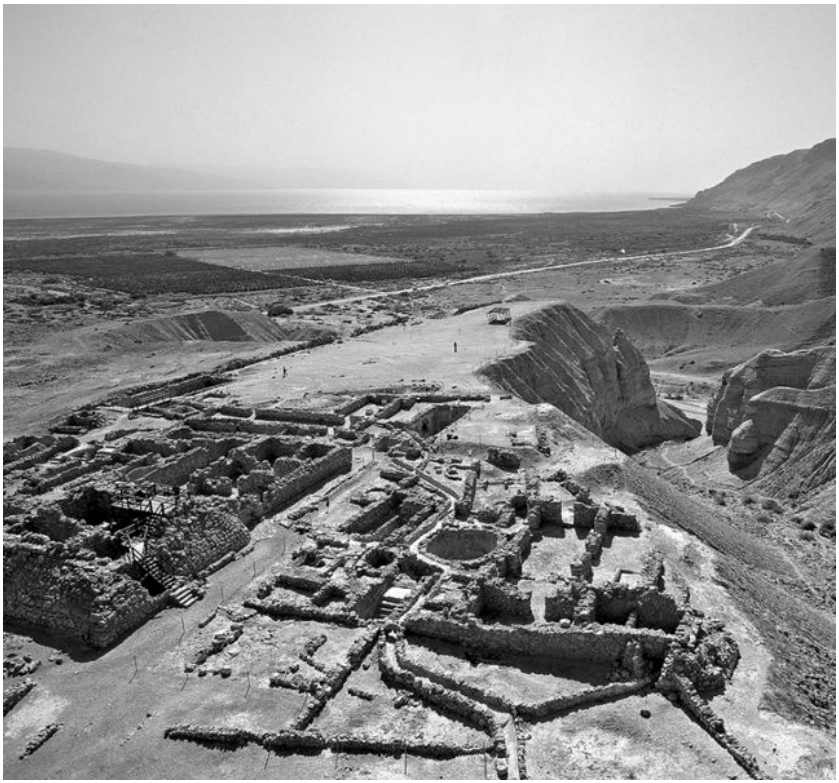

图5　基伯特 - 库姆兰考古遗址

公社时期

数百年后，另一个群体居住在了这片遗址上，德·沃确定他们是艾赛尼派。他把这段公社时期分为3个阶段。

阶段**Ia**（公元前**135—**前**100**年）

在这一阶段，人们对以色列时期的建筑略有改动，最显著的是增添了两个长方形蓄水池和几间房屋。由于没有发现硬币，德·沃难以确定这一阶段的年代。据他推测，这些建筑可能是在约翰·许尔堪一世统治期间，即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04年期间建造的，其依据仅仅是

在上一层的Ib阶段发现了亚历山大·詹尼亚斯（Alexander Jannaeus，公元前103—前78年）时期的硬币。因此，阶段Ia的年代肯定更早一些。约蒂·马格内斯（Jodi Magness）最近指出，阶段Ia根本不存在，因为该层没有发现硬币，而发现的陶器碎片不足以区分各个被毁层。她认为，被德·沃指定为属于阶段Ia的增补建筑实际上属于阶段Ib。

阶段**Ib**（公元前**100**—前**31**年）

根据德·沃的观点，在Ib阶段，库姆兰遗址已定型。以色列时期的建筑大大扩展了，增加了两层楼的综合建筑和房屋，包括一个塔楼、厨房、礼堂、诸多院子、食堂、餐厅、食品储藏室、厩棚和陶匠的窑房。请注意，德·沃使用的名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描述性词语。他使用的很多术语，诸如“礼堂”和“食品储藏室”等等，是对这些房间功能的解释。供水系统因蓄水池和倾析池的增加而得到了扩大。

这里也有一层灰土，还有一个大蓄水池，其石阶已有了裂缝。德·沃认为，这些特征是公元前31年的一场地震和随之而来的大火造成的后果的证据。换句话说，阶段Ib开始于公元前100年，直到公元前31年还一直有人居住。这场地震促使居民们离开该遗址大约30年，在公元前4年之后才重返定居，开始了阶段II。同样，马格内斯又提出了不同的历史分期。通过把窖藏的硬币由属于阶段II重新确定为属于阶段Ib，她指出该遗址并没有在地震后遭到长期遗弃。居民们很快重返该遗址居住，那些无法修复的建筑物就弃之一边，保留了被毁时的状态。在她看来，灰土层表明在公元前9年或8年时，库姆兰因遭到暴力破坏而在短时间内无人居住。

阶段**II**（公元前**4**年—公元**68**年）

根据在该层发现的窖藏的硬币所作的分析，德·沃提出，在公元前4年至公元6年希律·阿基劳斯（Herod Archelaus）统治期间，该遗址上又有人居住了。该遗址的大部分场地得到了清理和修复，瓦砾扔在了峡谷北面的斜坡上，然而有些房屋，例如塔楼的底层，还是保留了被毁坏时的样子。人们对建筑物作了小小的改动，例如，将院落改造

成有房顶的空间。供水系统也略作调整，听任现有的管道堵塞不管，新建了其他排水管。该时期的一个特色是工场的存在：陶匠的窑房继续使用；一个大火炉建在圆水池的正南方；还建了一个磨坊。然而，本层最有趣的发现却是涂有光滑灰泥的泥砖结构碎片。而今考古学家把它修复成三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一把是青铜椅，另一把是陶土椅。它们原本放在大礼堂上面的楼层，从上面摔到了底楼。德·沃提出，上面肯定有一个用作缮写的房间，类似于在中世纪修道院里发现的文书房（scriptorium）。这一解释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古代的文士[2]不在桌子上书写，而是将石板放在大腿和膝盖上书写；还有人指责德·沃用基督教术语描述犹太人居住区。该阶段终于战乱，有一层屋顶燃烧后留下的黑色粉末状物质和铁质箭头可为被毁的证明。该阶段离现代最近的硬币是犹太人的，于是德·沃推断说，它肯定毁于第一次犹太人起义，具体来说，很可能是起义的第三个年头（公元68或69年）。

阶段III（公元68—73年）

德·沃认为，基伯特 - 库姆兰公社时期随罗马人的一次侵袭而结束，而这次侵袭是罗马人征服犹地亚地区作战计划的一部分。在遗址上发现了凯撒利亚硬币和附近的道拉硬币[3]。公元67年和68年，罗马士兵曾分别在这两个城市驻扎过。在德·沃看来，这证明此后有过短暂的罗马时期，那时有少量卫戍部队驻扎在那儿巡逻海岸，直到公元73年马萨达要塞陷落。在这一时期，只有东边的综合建筑群有人居住。该遗址作了大幅整改以用于军事用途，例如塔楼的墙壁双倍加厚、加固北墙等。居住区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不再需要集会的场所，也不再需要使用工场。于是陶匠的窑房成了石灰储藏室。被毁坏的供水系统可能需要大量修理和维护，因此，罗马士兵只留用了综合建筑物外面的一个完好的大蓄水池。当马萨达要塞的最后一位奋锐党人[4]死于罗马的巴勒斯坦总督弗拉维乌斯·西尔瓦（Flavius Silva）的围攻时，这段居住期也随即结束了。

第二次起义时期

库姆兰建筑群被废弃59年之久，然而，在公元132年至135年间犹太人反抗罗马的第二次起义中，它们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暂时启用。德·沃将居住者描述为“暴乱分子”，但是从犹太人的角度看，他们是为独立和自由而战的斗士。无论属于何种情况，这一时期没有真正增添任何建筑。在塔楼底层一间屋子里发现的硬币属于那场战争最后的岁月。德·沃推断道，那时的居住者肯定是被罗马军队追杀的暴乱分子，他们被罗马军队穷追猛打，来到库姆兰避难，正如他们逃到犹地亚沙漠中的其他地方避难一样，如南部瓦迪·穆拉拜阿特附近的山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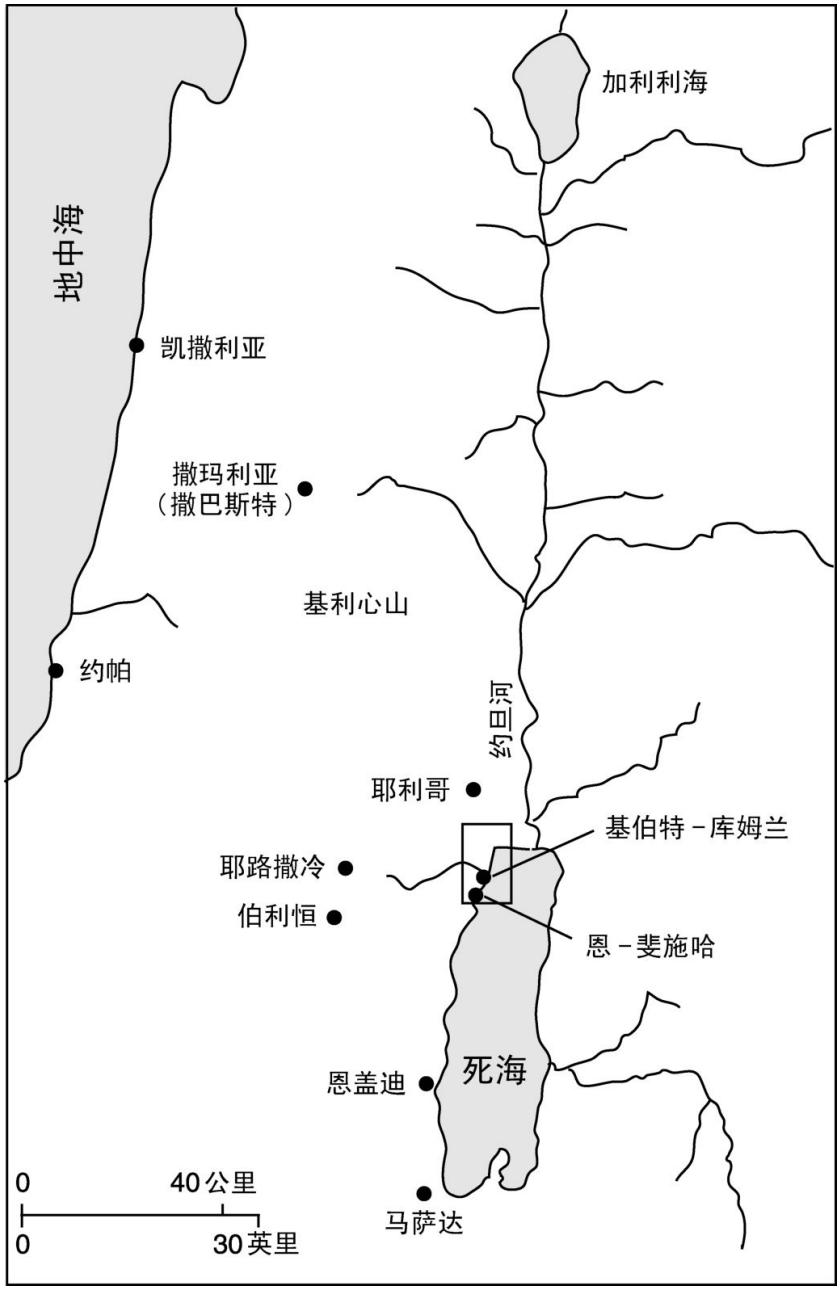
地中海
加利利海
凯撒利亚
撒玛利亚
（撒巴斯特）
基利心山
约帕
约旦河
耶利哥
基伯特－库姆兰
耶路撒冷
伯利恒
恩－斐施哈
死海
恩盖迪
马萨达
0
40公里
0
30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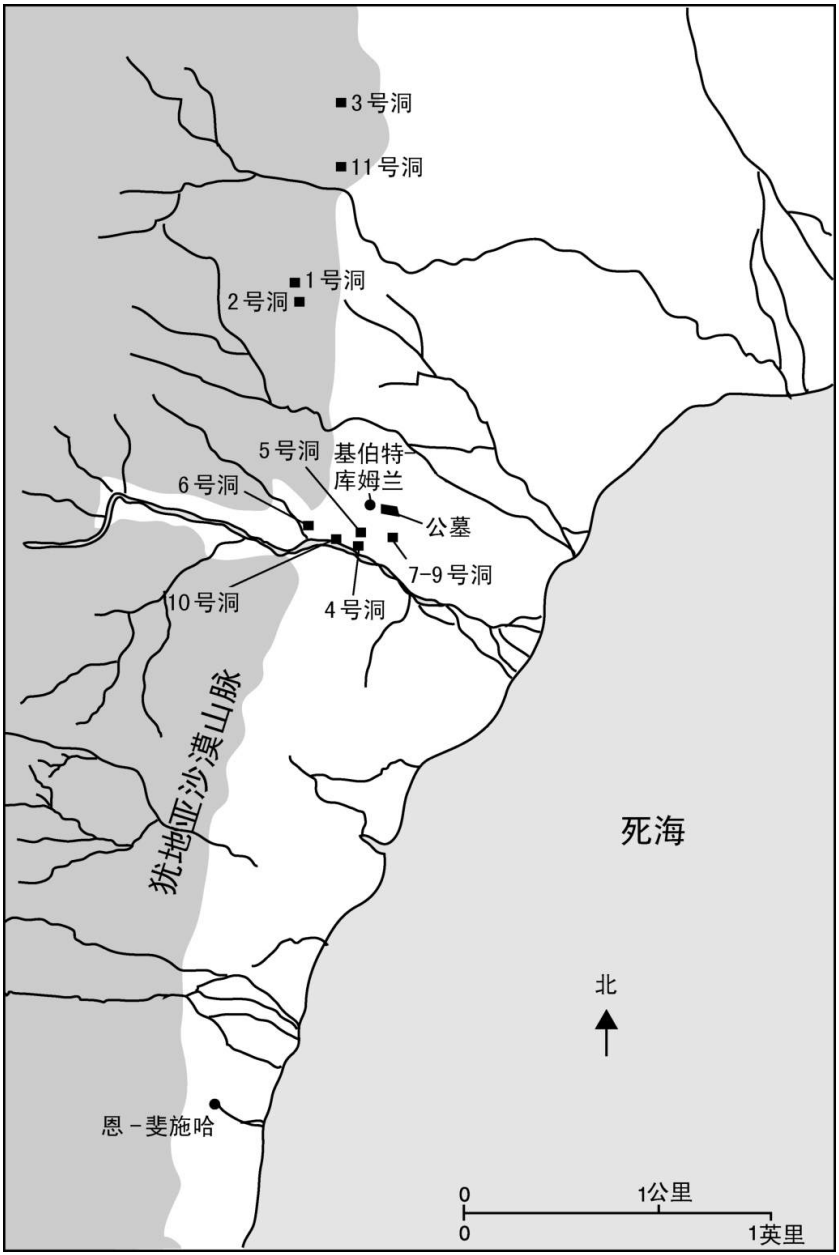

图6　死海地区地图，标出基伯特 - 库姆兰、山洞和公墓的位置

公墓

与基伯特 - 库姆兰的居住期相关联的是公墓。它位于这片废墟东部，有50米左右的空地将它与该遗址隔开。人们相信这是库姆兰宗团的公墓。这一大片公墓包含大约1,100个坟茔，被分成3个区域。每个坟墓上都有一堆石块，形成长方形坟墩。坟墓规划整齐，成行成排，南北方向分布。只有一个坟墓的朝向为东西向。德·沃和他的考古队在不同区域随机取样发掘了其中26个坟墓。每个墓室或墓穴都挖到1.2米至2米深。凡能从尸骨分辨出原尸体性别和年龄的均为男性，且都在40岁左右。在被德·沃描述为公墓扩展区的地方，挖掘检查显示，6具尸骨中4具为女性，一具为儿童。在两具女尸骨旁边发现了少量饰物、珠链和耳环。

1966年，斯特考勒（S. H. Steckoll）在主墓区发掘了一座坟墓，挖出了一具男性尸体，死时大约65岁。翌年，这位考古学家又发掘了8座坟墓，挖出了5具男尸骨、两具女尸骨，其中一具女尸旁埋着一个两岁大的婴儿，此外还有一具小女孩的尸骨。但是，这些发现从未发表过。

以色列和美国数家机构的成员最近对该公墓所作的调查已经纠正了德·沃报告中的几处错误。该遗址的不同区域有6处，而非3处：主墓区南、北部分；北部、中部和南部指状区（即扩展区）；北部山区。这支考古队使用了地表勘查计算和探地雷达，发现总共有1,138座坟墓，其中东西向的坟墓并非只有1座，而是54座。这后面54座坟墓埋葬的很可能是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不甚重要的贝都因人。

德·沃确认公墓西区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注意到，埋葬在那里的只有男人；他把它称为“主墓区”。女人和儿童只是埋葬在扩展区，即东区。然而，最近的坟墓调查结果表明，恰恰是东区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里发现了一具锌棺。锌，在古代是稀有金属，这说明那里埋藏的一定是一位重要人物。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么东区的中间指状部分就是主区，而非德·沃所说的次区。勘查该公墓的考古学家们复原了两处残垣断壁，以此作为原先方形建筑的一部分，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他

们的解释。根据他们的阐释，这个地方是库姆兰宗团的哀悼场所。就是在此地举行葬礼、为死者祈祷和让送葬的人群致悼词。最近的这次公墓调查间接地质疑了德·沃在说明而今已颇有问题的公墓“扩展区”时把女性和已婚艾赛尼派成员边缘化的做法。不仅仅是独身男性，已婚的艾赛尼派成员也是库姆兰宗团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介绍基伯特 - 库姆兰的居住情况和公墓时，德·沃将注意力集中在公社时期的阶段I和阶段II上。在他看来，以色列时期、罗马时期和第二次起义时期要么是该遗址历史的序曲，要么就是次要的插曲。他相信，就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一群人来到基伯特 - 库姆兰，并在那里安顿下来。这群人——我们随后会讨论到——就是艾赛尼派库姆兰宗团。然而，在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先看一下古卷本身。

注释

〔1〕 王神荫在译著《死海古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中将其翻译为《会众守则》。

〔2〕 在希伯来语中，专职抄写《希伯来圣经》的犹太学者、教师有一特定称呼：סופר（sofer），英语中译为scribe，汉语《和合本圣经》中译为“文士”。古卷是当时的犹太人所抄写，故在此将scribe译为“文士”。

〔3〕 凯撒利亚（Caesarea）和道拉（Dora）都是城市名。凯撒利亚位于地中海沿岸，海法与特拉维夫之间，是犹太统治者希律王自公元22年开始耗时12年建造起来的一座古城，当时为向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凯撒表示敬意而命名为“凯撒利亚”。道拉是迦南的一座沿海古城，位于凯撒利亚北部，二者相距仅8英里之遥，在历史上曾被诸多民族和国家统治过，在罗马统治时期是一自由城市。这两座城市的统治者不同，使用的货币也不同。

〔4〕 奋锐党人（Zealots，希伯来语为קנאי，פנטי），是公元1世纪前后下层犹太人中的一派，是犹太人的激进爱国组织。他们坚守摩西律法，痛恨一切与罗马讲和、勾结的犹太人，不断进行反抗罗马的起义。

第三章

古卷与残片

据估计，在山洞中发现的古卷抄本在800部至900部之间。数字浮动这么大并非由于我们这些负责编辑古卷的人不识数，而是由我们所编辑的这批资料的本质决定的。没有一份古卷是单独而完整的。《大以赛亚书卷》涵盖《以赛亚书》66章预言的全部，除了只有一小部分受损外，是最近乎完整的一部抄本。《哈巴谷书注释》（一部宗派圣经注释）和1号洞发现的《宗团规则》（一部规定公社规则的文本）遭到岁月侵蚀的程度也相对较小。

剩余的就是原始古卷的残片了。其中有些包括大量原先未遭破坏的文本（如《圣殿卷》），另一些却只有一两栏文字。损毁极其严重的是这样一些“古卷”，它们不过是小小的单块碎片或残片。有大约25,000块残片，而这一数字不可能更精确了，因为数字的统计取决于对残片的定义。对全部古卷进行编目分类的斯蒂芬·里德（Stephen Reed）极为准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何为一块“残片”？编者们最初记录时遇到的一块完整无缺的蒲草纸片或者羊皮纸就是残片吗？这些残片后来要是破了怎么办？那么，曾经完整无缺的一块残片而今就要算作两片或者几片吗？

还有一个影响古卷计数的更深刻的复杂因素，我们或可将其称作“拼图问题”。学者们常常把古卷的编辑比作拼图玩具的组合。实际上，“拼图问题”远比拼图游戏复杂：我们没有任何一盘拼图的所有构成部分；我们不知道最初有多少块拼图；就大多数残片而言，我们没有游戏包装盒上的拼图指南。

让我举例说明辨别和拼凑残片的艰难吧。假设你碰到了下面这两块小小的英语残片：

] very thing that creepeth up [

] s kind: and Go [

读者当中如果有人熟悉《钦定本》，即《詹姆士王钦定版圣经》的《旧约》，那么可能会认出这两句取自《创世记》，甚至知道来自第1章。认出它们的关键词很可能是creepeth。如果这两块残片取自于一个现代译本，译本中使用了不太明显的英语动词，如move along

the ground（《新国际版圣经》），那就更难辨别了。《钦定本》《创世记》第1章第25节的原文如下。我把保留在残片中的文字用斜体表示了出来：

And God made the beast of the earth after his kind, and the cattle after their kind and e*very thing that creepeth up* on the earth after hi*s kind: and Go* d saw that it was good.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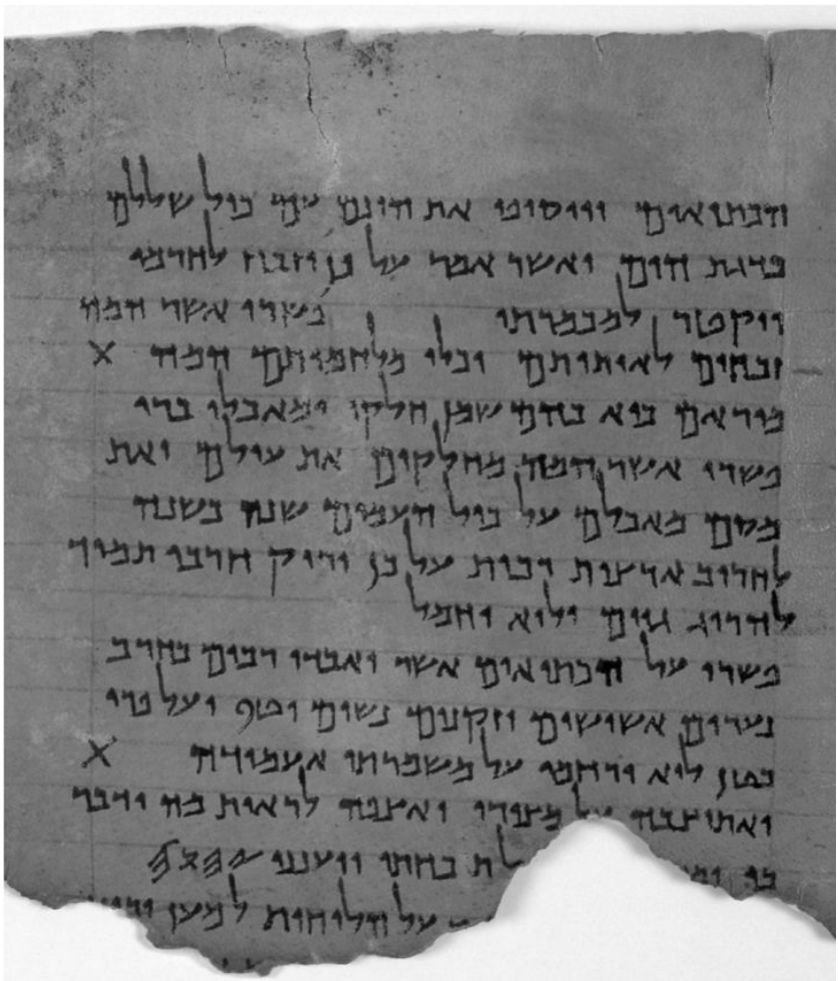

图7　注释《哈巴谷书》中圣经预言的重要古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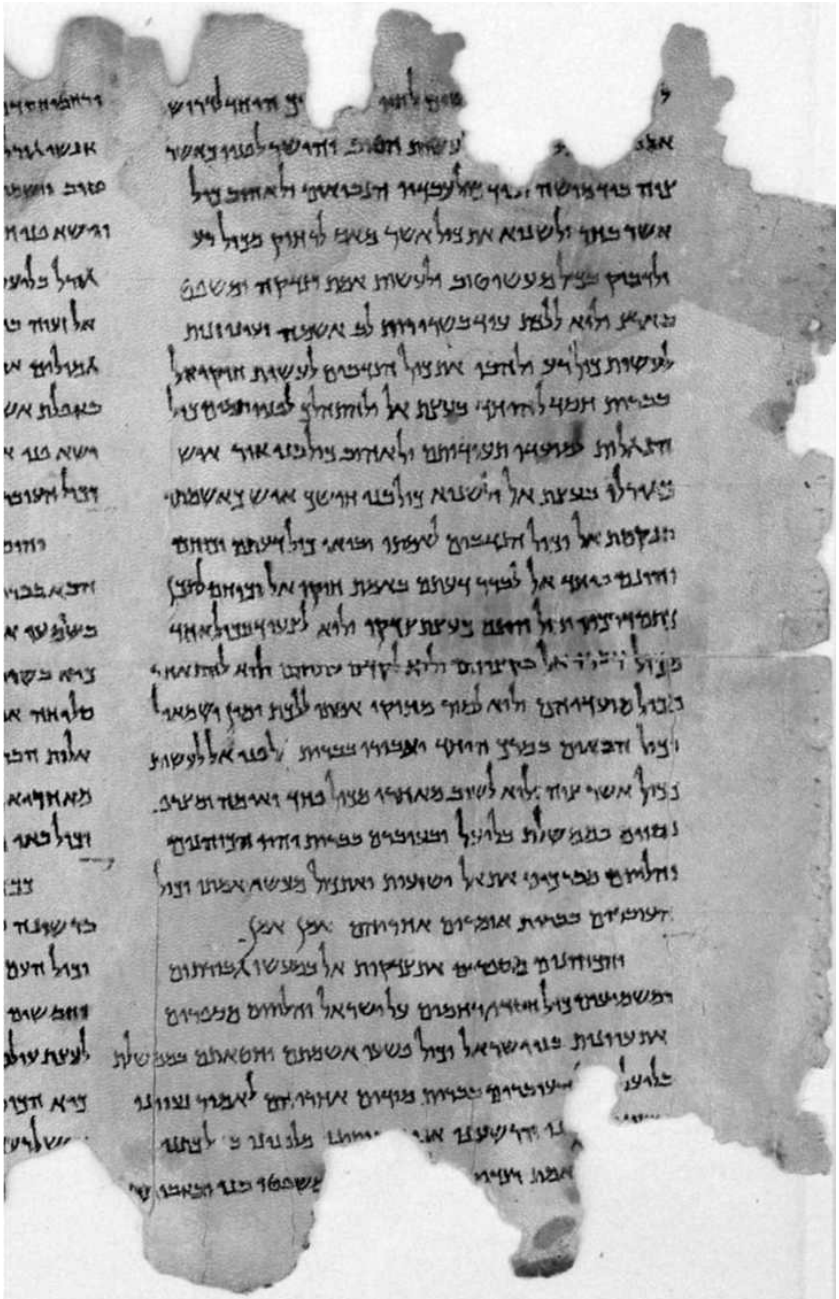

图8　描写宗团秩序与规则的古卷

这很容易，因为你有熟悉的《圣经》样本。如果你碰到其他3块残片又该怎么办呢？

] lows Christ [ ] of festival [ ] Jewish holy days [

这显然要难得多。你或许会猜测它来自《新约》，因为提到了“基督”（Christ），而且可能来自叙述在犹太节日逾越节期间耶稣受难的某一章节。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它们是本书第一章中几个句子的片断：

almost always fol*lows Christmas* or Easter. Of course, this should not be surprising, since the scrolls are religious documents and ar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during the annual cycle *of festivals,* but it is the Christian, and not *Jewish, holy days* that are followed. [2]

编辑这些小残片的实际情况甚至比第二个例子还要复杂，因为这些残片可能不止属于一种原文，而是两种或者三种不同的原文。一位编辑接到了编辑任务，精心研究之后却可能断定这些残片原本属于两个毫不相关的文本。如果残片一度属于文体类似但内容差别很大的两个文本，那将是更大的编辑难题。如此一来，这3块残片就分开了，要算作两份“古卷”。“古卷”这个词可以指字面意义上的卷起的一份抄本，也可以是“原始古卷残片”的简称。正是由于这个“拼图问题”才使得古卷的计数难以做到精确。

编辑古卷

面对这些困难，古卷编辑们根据语言、内容和笔迹将单块残片进行分组。所以，比如说，如果有15块残片，其中8块包含有出现在《申命记》中的希伯来语词汇，那么它们就要和其他7块可能包含亚兰语或希腊语文字的残片分开。此外，如果有两块残片在外形上吻合，即一块的边缘与另一块的边缘恰好吻合，那么这两块残片显然同属一部古卷。请注意，编目分类所处的阶段决定了它们被算作一块还是两块残片。同样，外形“吻合”的残片不受版权法保护；只有对非连

续性残片进行编排才能获得法律保护。无论怎样，这些残片都要集中到照相底片上，这些底片上还有其他残片，它们因笔迹和残留的外形相近而彼此关联。

然而，在收集的残片中可能有不止一份希伯来语《申命记》的抄本。在这种情况下，编辑们就会把那些出于同一文士手笔的希伯来语《申命记》残片收集到一处。像所有的古代抄本一样，古卷由手工抄成，同一文士的笔迹可以作为编辑非连续性残片的有效组织原则。然而，古代文士一生中不会只抄一卷经书，因此，辨认出笔迹相同的两块残片未必就意味着它们原先属于同一文本。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例如，抄写了《宗团规则》、《见证》和4号洞发现的第三份《撒母耳记》抄本的这位文士也校正了《大以赛亚书卷》的经文。反过来说，像《哈巴谷书注释》这样的长篇巨制不止由一位文士抄写而成，因此，辨认出残片上有两种不同笔迹未必就意味着它们原先属于两部不同的古卷。

另一个难题是抄经者学会了如何根据不同的宗派和抄经传统进行书写，于是几个文士的笔迹可能非常相似。《以赛亚书》、《何西阿书》和《诗篇》中所作的圣经注释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通过仔细研究个人风格可以检测出每个人笔迹的不同。

确定古卷年代

对古代笔迹的研究，即古文书学，还可从另一方面发挥作用。从一开始，人们就对古卷的真实性和古老性、在山洞的发现及其与基伯特 - 库姆兰的关系提出了无数问题。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古卷是伪造的，或者说是贝都因人暗地里埋藏在那里的；另一些学者则断言它们是犹太 - 基督宗教〔3〕文本。德·沃对此作出了回应，他指出：他那由考古学家和工人组成的团队，而不仅仅是贝都因人，在11个洞穴中都发现了古卷或写有文字的残片。它们是真正的发现，绝非弄虚作假或“暗地里埋藏”〔4〕。两位杰出的权威埃利泽·L. 苏肯尼科和W. F. 奥

尔布赖特（W. F. Albright）根据古文书学进行年代测定，确认它们是古代抄本，而不是犹太 - 基督宗教文本。

古卷里面并没有注明年代，于是，通过古文书学，即通过对古代笔迹的研究而进行年代鉴定的方法便发展起来。使用最广的是弗兰克·克罗斯的类型学方案。据此，古卷的年代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古代（公元前250—前150年）、哈斯蒙尼时代（公元前150—前30年）和希律王时代（公元前30年—公元70年）。通过将某个文士的个人笔迹沿类型与纪年的持续性顺序排列，古卷年代就确定下来，误差不超过25年。这种方法的可靠性取决于所使用的内外证据的质量。一些学者提出，要谨慎对待克罗斯的年代鉴定法，特别是在确定希律王时期的证据的绝对年代方面和该方法鉴定年代的精确程度方面要谨慎对待。毕竟，难道文士们的工作寿命就不会超过25年吗？不管怎样，克罗斯的古文书类型学继续被编辑和学者们广泛使用。

最近，古文书学年代鉴定法得到两次放射性碳 - 14检测的补充，它们分别在1990年和1991年进行。基本上说，该方法能够测定一切有机物的年代，例如皮革与蒲草纸，只要推测出含在有机物中的放射性碳同位素（碳 - 14）分解的半衰期就行。在过去，放射性碳检测需要大量样本，故不适于古卷的检测。随着该方法的完善，出现了一种名叫加速器质谱 [5] 的方法，于是才可能让古卷在遭到破坏最小的情况下接受放射性碳检测。那两次检测的结果肯定了古卷是有2,000年历史的抄本。

古卷的指称

单部古卷有3种指称方式：根据名字，如《创世记伪经》或《战争卷》；根据符号缩略法，如4Q285：4代表4号洞，Q代表库姆兰，285代表总编号；或者根据一个简短的描述性名字，如4QJer^{b}：Jer代表《耶利米书》，而上标b指该洞中发现的第二份圣经抄本。古卷也可标注成PAM（PAM指“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现已更名为“洛克菲

勒博物馆”）或SB（SB指“藏经祠”）加数字的形式，但这种用法仅限编者使用。几乎所有的古卷都有这3个分类指称，而《宗团规则》、《哈巴谷书注释》、《创世记伪经》和《大以赛亚书卷》则是有名的例外，它们没有总编号。

注释

〔1〕 本段汉译为“于是上帝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

〔2〕 本段摘自第一章“媒体与古卷”部分第5段的英文原文，汉语为“几乎总是紧跟在圣诞节或复活节之后。当然，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古卷既然是宗教文献，所以在一年一度的节日期间就格外引人注目。但奇怪的是，它紧随的是基督教的圣日而非犹太教的圣日。”

〔3〕 犹太-基督宗教（Judaeo-Christian），指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宗教思想价值观念体系，一般被认为是西方法律和道德价值观的基础。在这里，犹太-基督宗教文本（Judaeo-Christian Text）指基督教形成后与犹太教共享的《圣经》文本，即《希伯来圣经》，也就是基督教所说的《旧约》。

〔4〕 双关，指“欺诈”。

〔5〕 加速器质谱（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是以测量宇宙成因核素与其稳定同位素比值为主的现代核分析技术，具有灵敏度高、样品用量少和测量时间短的特点。这种技术的主要贡献是实现对碳-14半衰期的精确测试，从而实现精确断年。

第四章

理解《希伯来圣经》的新信息

古卷的全部文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反映某一宗派的观点，另一类总体上属于犹太教。在非宗派性的文本中，绝大多数属于《旧约》即《希伯来圣经》中的篇章。没有《新约》抄本，除非把7号洞发现的那些希腊语小残片看作《新约》各篇的残卷。这些古卷是抄本，而不是写作手稿或原始作品。

《旧约》是基督教对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的称呼。基督教新教《旧约》正典（字面意思是“法规”，指“权威指定的作品”）的书目和《希伯来圣经》的书目相同，但是它们的编序和计数皆不相同。犹太人的传统是把24篇分为3大范畴：《托拉》（Torah，5篇）、《先知书》（Nevi'im，8篇）和《圣著》（Kethuvim，11篇），而全集则叫《塔纳赫》，即以前3者的首字母缩写Tanak命名。新教正典总共包括39篇，篇数不同是由于把《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和《以斯拉 - 尼希米记》分开计算，而且把十二小先知书的每一篇都作为独立的一篇。此外，新教正典将这39篇分为4类：《摩西五经》、《历史书》或《前先知书》、《诗篇/智慧书》和《先知书》。

《旧约》或者说《希伯来圣经》的抄本约占全部古卷的四分之一，根据一次清点，有209部之多。除《以斯帖记》外，它们为新教和犹太教正典的每一篇都提供了证明。《尼希米记》同样未在古卷中得到证实，但是，由于在犹太传统中，《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被算作一篇，而且古卷中又有一小块《以斯拉记》的残片，所以有人认为，非但《以斯拉记》，而且《尼希米记》也都保留在古卷文献中了。

库姆兰圣经文本

库姆兰的《圣经》文本提供了新信息，揭示了公元前25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圣经》文本的传播情况。它们告

诉我们，在《圣经》文本定型前它是什么样子。耶稣或保罗和我们拥有同一本《旧约》吗？你有没有尝试过把《新约》中的一句引言和《旧约》中的出处相对照，结果发现它们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库姆兰经卷给我们提供了空前的机遇，让我们既能一睹《圣经》定型前的不稳定状态，也能见识一下对“正典”即权威经文的严格审查。

《旧约》或者说《塔纳赫》由希伯来语和亚兰语写成。这部诸多经卷的合集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也并非如同原教旨主义者认为的那样从天而降。这不是一本神奇的书，而是一部汇集了诸多权威文本的合集。这些文本显然源于神启而又历经人类著述与编辑的过程。每一卷或者一卷中的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创作历史和文本传播史。因此，举个例子来说，阿摩司之子的预言[1]被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时代来源、有名与无名的人们和文士的著述与编辑而分为《以赛亚书》（1—39）、《第二以赛亚书》（40—55）和《第三以赛亚书》（56—66）。

学者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形成的观点不同，圣经各卷的年代鉴定也就各不相同。保守一些的学者倾向于把年代确定得早一些，而自由派则晚一些。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不管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世俗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公元前第5和第4世纪的以斯拉（Ezra）时代至关重要。根据圣经传说，以斯拉是一位祭司，也是一名文士，他潜心研习律法（《以斯拉记》7.6，10）；他接到了波斯亚达薛西王二世门农（Mennon，公元前404—前359年）的一份文件，允许他带着流放的民众和献给圣殿的金银一同回到“耶胡达”即犹大省；他被委以重任，传授以色列上帝的律法（《以斯拉记》7.12—26）；他读摩西律法，他的助手们讲明意思，帮助人们“清清楚楚”地阅读（《尼希米记》8）。对以斯拉的刻画有传说的成分，但是，从广义上说，它的确表明律法学习在波斯时期复兴了。修正论者会认为这些经书的年代要晚于希腊化时代，但是，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波斯时期是大多数经文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以创作和编辑的时代。

在波斯时期，希伯来语日益变得陌生，亚兰语成为犹太人日常使用的语言，于是犹太人需要翻译来帮他们理解用神圣的语言（即希伯

来语）写成的摩西律法。亚兰语最初是由亚兰人讲的一种西北方的闪米特语，后来成为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好莱坞大片《耶稣受难记》里刻画的耶稣说着一种亚兰语（和拉丁文！）。《希伯来圣经》反映了这种语言上的变迁，部分章节用亚兰语（《耶利米书》10.11，《以斯拉记》4.8—6.18，7.12—26和《但以理书》2.4b—7.28）及希伯来语写成。

语言上的另一个重大发展是犹太人的日常语言进一步转化为希腊语。在希腊化时代，希腊文化和语言逐渐主导了近东地区，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把《摩西五经》以及剩下的《先知书》和《圣著》都翻译成了希腊文。有一个故事讲述了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公元前285—前246年）是如何要求把一本犹太人的《托拉》从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并收藏到他那位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大图书馆的。72名长老从耶路撒冷调来，在72天内完成了翻译任务。尽管《阿里斯提亚斯的信》中的这一叙述太过牵强，尽管到底有多少名译者、用了多少天在犹太人的资料中有不同的说法，但这次希腊语译本还是被叫作“七十子”、“LXX”或“七十士”。有时候学者们也用“老希腊本”指最早的、可识别的《七十士希腊译本》。

《七十士希腊译本》有自己的文本历史，它并非一次全部翻译而成。此外，有人对《七十士希腊译本》的源文本，或者说*Vorlage*（德语，意为“摆在［译者］面前的东西”）提出了质疑。《七十士希腊译本》的源文本肯定是希伯来语《圣经》文本，因为希腊语译本中的很多译文与《马梭列文本》（Masoretic Text）的文本类型一致，但是在某些经卷中，如耶利米预言，有人怀疑《马梭列文本》的源文本，因为希腊语译本比希伯来语本短14%，而且章节安排也不相同，例如“于外邦不利的神谕”。库姆兰圣经古卷4QJer[c] 和4QJer[b,d] 分别为《马梭列文本》和《七十士希腊译本》中的耶利米预言的文本类型提供了证据。在历史进程中，希腊语的犹太圣经被选定为《旧约》的权威版本；在东正教，至今仍然如此。

圣经文本的古老性

在库姆兰古卷发现之前，学者们只能满足于研究追溯至中世纪时期的希伯来语《圣经》抄本。尼斯蒲草纸卷可追溯至公元前一二世纪，是现存唯一的例外，尽管它并非真正的《圣经》文本，而只是一本引言出自《出埃及记》第20章和《申命记》第5章的礼拜仪式文选。那部中世纪的文本叫《马梭列文本》，是标准文本（*textus receptus*），现存的英语译本都是以《马梭列文本》为基础，而大多数现代英译本都是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图书馆的《列宁格勒抄本》（约公元1000年）翻译过来的（图9）。

图9　《列宁格勒抄本》，收藏于圣彼得堡图书馆的《希伯来圣经》的中世纪抄本

库姆兰圣经古卷证实了《圣经》经卷的古老性。它们大约比《马梭列文本》早1,000年，可上溯至公元前250年至公元100年之间。它们在时间上更接近《圣经》写作的年代。这1,000年的时间也是意义非凡，因为它回溯到了《圣经》文本尚未定型的时代。但是在公元100年左右，所有的《圣经》文本都统一成了“原马梭列文本”（proto-Masoretic Text），即“原拉比文本类型”[2]（proto-Rabbinic text-type），而文本之间的差异则仅局限于拼写上的不同。一些学者将这

一终点描述为《圣经》文本定型的时期；另一些学者则更愿意将此视为《马梭列文本》胜过其他文本类型而被选定为权威文本的时期。不管是哪种情况，在公元100年左右，不仅在库姆兰，而且在犹地亚沙漠的各个地方发现的《圣经》抄本，都是《马梭列文本》。

文本类型的多样性

“文本类型”是一个重要概念，指某部特定文件或文字作品的版本。让我们假设你正在笔记本电脑上写一篇报道或文章，你写一会儿后就在硬盘上保存下来，以便以后继续写。一个很好的做法是将文件的各个版本连续保存下来，以便万一发生死机或某个文件坏了的时候能将损失减到最小。因此，你先将文件保存为“样本.doc”，然后等又写了一些后再将它保存为另一个文件，起名为“样本2.doc”，依次类推。如果“样本2.doc”损坏了，那么你可以回到“样本.doc”，丢失了的仅仅是“样本2.doc”比“样本.doc”多的那部分。此外，有了这种电子文件线索，你可以返回去查看最初的构想和分析。所有这些文件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但又是略有差异的不同版本。如果有人问哪一个是“原”文，那么答案肯定取决于我们对“原”文的定义。你最初的写作思路会保存在“样本.doc”中。然而，如果你说的“原”文指的是你发送或提交的那份文件，那么它就是该文件的最后版本或者说正式版本。

在古代，“抄本”，顾名思义，是用手抄写下来的。文字作品的生产包括创作阶段和抄写阶段，而库姆兰古卷证实了后者。从我们亲身抄写作品的经验可知，在这一过程中，文本容易被扩展、缩减，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抄写错误。例如，我们的眼睛会从一行跳到另一行，或从一个词组跳到另一个相同或类似的词组。我们可能会写错字或别字。人类犯的所有这些错误都会导致不同文本类型的形成。其他一些改变则是出于意识形态与宗教方面的原因、或者习惯方面的原因而对文本进行的故意篡改，例如，套用老框框，或者一直将一个词刻意翻译成目标语中的另一个词。

在古卷发现之前，有3种曾经非常著名的《希伯来圣经》文本类型：《马梭列文本》、《撒玛利亚摩西五经》和《七十士希腊译本》。其中第二种指撒玛利亚宗团的《托拉》，他们自称是古代以色列北方王国的传人。撒玛利亚宗团的起源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些资料认为他们是外国人（《列王记下》17.24—34）、撒玛利亚的土著居民（《以斯拉记》4.4），或者在希腊化时期从犹太教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教派（约瑟夫斯［Josephus］：《犹太人古代史》[3]，11.340—345）。撒玛利亚人认为上帝的真正圣所位于基利心山，而不在耶路撒冷。他们现在依然居住在以色列的基利心圣山上坚守着自己的传统。他们那一版《托拉》以鲜明的扩张主义和带意识形态倾向的措词为特征。严格地讲，《撒玛利亚摩西五经》仅指《圣经》前五卷，但以此类推，此文本类型适用于其他所有的《希伯来圣经》。

在发现古卷后的几年里，弗兰克·克罗斯提出了地方文本理论，认为这3种文本类型与3处地域相对应。据此，《马梭列文本》是巴比伦的代表，《撒玛利亚摩西五经》是巴勒斯坦的代表，《七十士希腊译本》是埃及地区的代表。克罗斯根据3种文本类型中的一种将所有的库姆兰圣经古卷进行了分类。例如，4QSam[a] 被认为是一种非马梭列文本，更接近“老希腊本”的“源文本”。然而，4QSam[a] 和《马梭列文本》、所谓的原卢奇安文本（希腊译本的修订本）、《历代志》以及约瑟夫斯的《撒母耳记》也有密切关系。

显然，库姆兰圣经文本不能这样分类。伊曼纽尔·托夫提出了另一个与之相反的理论，即假设《圣经》文本类型的多样性。托夫更愿意称之为文本“群”，但更为常用的称呼是“文本类型”。文本类型不止有3种，至少有5种或者更多。下面是托夫提供的关于库姆兰圣经古卷文本特征的统计数据：35%为原马梭列文本；15%为前撒玛利亚文本；5%为《七十士希腊译本》；35%为不结盟文本[4]；20%按照库姆兰惯例写成。请注意，总数为110%是由于类别1、4、5中的某些文本被重复计数，而且类别4包含了所有不结盟文本和独立文本。此外，按照库姆兰宗团的抄写惯例划分出来的类别5颇有争议，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这是一个文本类型。

现在人们普遍意识到，库姆兰圣经古卷能证实的文本类型数量要比原先认为的多。《马梭列文本》肯定是一种重要的文本类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主导文本类型，但是还有其他几种类型不可忽视。一些学者，通常是那些立场比较保守的学者，依然坚持认为《马梭列文本》是《希伯来圣经》文本，其他所有的文本类型都是翻译、解释或者校订的衍生物，尽管它们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相关的文本特征。这种“马梭列文本基要主义”——人们这么称呼它——以毫无根据的信念对库姆兰古卷提供的新证据作了先入为主的臆断。

一些不同的措词

让我们简单看一下4个例子，看看库姆兰圣经文本是如何促成了《希伯来圣经》中某些特定段落的各种不同的措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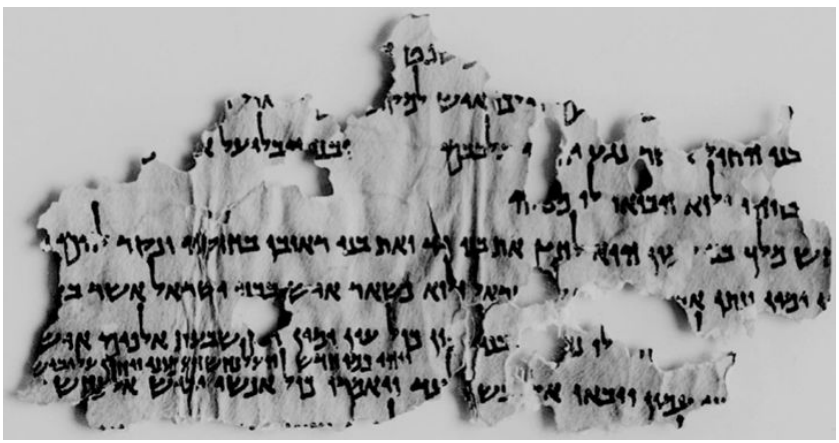

图10　《撒母耳记》的一份抄本，保留了《撒母耳记上》（10—11）中遗漏的段落

4QSamuel[a] 中的拿辖事件

这是在库姆兰古卷中出现的最有名的变体。《撒母耳记上》第11

章一开篇就叙述了亚扪人的王拿辖（Nahash）对着以色列城镇基列 - 雅比安营。在《撒母耳记》中，学者们辨别出两种文字线索，早期的资料认为君权神授，而后期的资料则反对君主政体。《修正标准版圣经》第10章结尾和第11章开头这样写道：

27 但是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11.1亚扪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 - 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2 亚扪人拿辖说：“你们若由我剜出你们各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3 雅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到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5]

这两章之间的过渡不自然。第10章描写了先知撒母耳不太情愿地同意了人们的请求，指定了扫罗（Saul）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19节）。在27节，显然并非人人都赞成对扫罗的提拔，因为它记载着一些被蔑称为“匪徒”的人藐视他。而在第11章第1节，笔锋突转，叙述起亚扪人的王拿辖在外约旦对着基列 - 雅比安营。我们并没有被告知拿辖是何许人，他为什么决定包围该城并切断它的供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条约的条款如此严酷。一些释经者认为，把右眼剜出来的这条要求是拿辖野蛮行径的证明。接着叙述道，拿辖又相当大度地允诺了长老们请求的7日宽限，让他们去找一位拯救者。扫罗，这位新受膏登基的王，对求援作出了回应，集结起一支武装力量，灭掉了亚扪人（11章11节），从而证实了自己是一位有能力的领袖。

4号洞中发现的《撒母耳记》的第一份抄本提供了《马梭列文本》中遗漏的一段（用斜体表示）。

27 但是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当时，亚扪的王拿辖残暴地迫害迦得人和流便人。他要剜出他们每个人的右眼，却不准以色列有一人救援。离开以色列人越约旦河而去的人中没有一个不被亚扪的王拿辖剜掉右眼的。但是，确有*7,000*人从亚扪人那里逃脱，躲到了基列 - 雅比。 NRS 11:1约1个月后，亚扪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 - 雅比安

营……

这段话说明，拿辖是亚扪人的王。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中，首次介绍一位外国的国王时，都会给出他的全名（例如，《撒母耳记上》15.8中的亚玛力王亚甲［Agag］；《列王记下》6.24中的亚兰王便哈达［Ben Hadad］）。本段为拿辖袭击基列 - 雅比的居民提供了依据，否则拿辖就是师出无名，也就是说基列 - 雅比的居民窝藏了来自迦得和流便两个部族的7,000名逃犯。拿辖规定了令肢体残缺的缔约条件，与对付自己主要敌人的可怕形式一模一样。剜眼和肢解让我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但在古代近东地区却是惩罚叛乱分子、敌人和违约者的普遍做法。

这几行很可能是抄写时眼睛跳到了也有“拿辖”的另一段而犯的笔误，于是它们就从《马梭列文本》中漏掉了。从《犹太人古代史》（6.68）对拿辖和基列 - 雅比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约瑟夫斯显然拥有包含这段遗漏段落的文本。一些学者非常肯定这一段原本就属于《圣经》文本，于是他们把这一段又重新插到《撒母耳记上》的英译本中。我在第11章第1节前标的上标字母NRS表示我把1990年出版发行的《新修正标准版圣经》中的这一段摘下来加了上去。

《创世记》22.14中的摩利亚山

上面那个例子中有整整一段被漏掉了，这实属罕见或异常。然而，即便一个单词出现变体也可能意义非常重大，这取决于它是个什么样的词。想想以撒（Isaac）差点被献祭的那座山的名字吧！根据《马梭列文本》，它叫“雅威 - 以锐”（Yahweh Yireh），雅威读作“阿道乃”（Adonai），常译作“主必预备或看顾”。

所谓的“阿凯达”（Aqedah），即“捆绑以撒”，是《希伯来圣经》中最动人的戏剧性描述之一。亚伯拉罕（Abraham）的妻子撒拉（Sarah）原本没有孩子，直到上帝为她打开了子宫才怀孕生了以撒

（《创世记》21）。在22章的开始，上帝不知何故要试验亚伯拉罕，命令他把独生爱子带到摩利亚地，在那儿以燔祭即完整火祭的形式献给他。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阐述了对现代人而言这样一条命令所引起的神学问题：

> 在某些情境下，人类可以确信他听到的不可能是上帝的声音；当这个声音命他做有违道德律法的事情时……可以以亚伯拉罕的献祭神话为例：亚伯拉罕，应上帝之命，要杀掉他的亲生儿子——这个可怜的孩子一无所知，甚至还扛着木柴。亚伯拉罕本应该对这个假定为神的声音说：我不会杀我的爱子，这非常确定；你向我显示为上帝，这我不确定，即便这个声音在空中咆哮如雷，我也绝不能确定。（选自《哲学与神学功能的论争》）

在《创世记》叙事中，亚伯拉罕捆绑了以撒——“阿凯达”，即捆绑之名，由此而来——正要动手杀他之时，上帝的天使在最后时刻阻止了他。悬挂在弗罗伦萨乌非兹博物馆的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阿凯达》油画描绘了以撒脸上极度恐惧的表情和亚伯拉罕眼中颇感矛盾的决心。在《圣经》故事中，亚伯拉罕因其虔诚而被称赞为“敬畏神的人（*elohim*：埃佬黑姆）”（第12节），一只公羊代他的儿子作了献祭。这件事的高潮是亚伯拉罕将那个地方起名为“雅威 - 以锐”，并附加了一个注解，即，至今“在雅威的山上必被看顾”（或RSV，“必有预备”）。《历代志下》第3章将该地解释为圣殿所在地，声称所罗门在上帝曾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建造了上帝的殿（第1节）。认为摩利亚山就是圣殿区的传统至今都保留着，而准备献祭以撒的那块磐石就在圆顶清真寺下。根据穆斯林传统，也就是从这块石头上，穆罕默德夜行登霄（《古兰经》，第17苏拉[6]）。

在4QGen-Exod[a]（4Q1）中，那地方的名字叫“埃佬黑姆 - 以锐”（Elohim Yireh）即“神必预备”（图11[7]），只可惜本节后半部分损毁了。这份材料使用了更为普通的名字“埃佬黑姆”，即“神”，而不是以色列神的特有名字“雅威”。一切主要证据都证实“雅威”是对的，这与第11节和15节中的“雅威的天使”相一致。也可能那地方原先

的名字是“埃佬黑姆 - 以锐”，这与第8节中的“神（*elohim*）必预备”和第12节中“你是敬畏神（*elohim*）的人”相一致；然而“J”源本，即雅威源本[8]（*Yahwist*）（《摩西五经》是以数种文献为源本编纂而成的）为反映自己的神学而改写了地名。

图11　有关《创世记》22章的4QGen-Exod[a]　残片，将摩利亚山称为“埃佬黑姆 - 以锐”

歌利亚（Goliath）的身高

根据《撒母耳记上》第17章记载，非利士人有一位讨战的人令扫罗王和以色列人极为恐惧。《马梭列文本》记载，他是一个6肘零一虎口即大约3米高（9英尺9英寸）的巨人（第4节）。然而，《七十士希腊译本》和4QSam[a]　中的主要证据表明，这个人虽然不矮，却称不上是巨人，只有4肘零一虎口即大约2米高（6英尺9英寸）（图12[9]）。很多职业篮球运动员都比歌利亚高！

图12　战斗中的大卫和歌利亚

“那等候主的”（《以赛亚》40.31）

《以赛亚》中备受喜爱的诗节之一是《第二以赛亚》的作者保证流放中的以色列人会重新获得力量。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影片《火战车》在重塑苏格兰传教士埃里克·利德尔（Eric Liddell）的生活时赞颂了这一节。橄榄球兼短跑明星利德尔（Liddell）坚持自己的宗教原则，在192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拒绝在安息日那天参赛。比赛前，他在教堂大声朗读了这一节。该译文在《钦定本》即《詹姆士王钦定版圣经》中最为著名，译文如下：

31 那等候主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10]

然而，假如利德尔读过出自1号洞的《大以赛亚书卷》，那么他把自己的赛跑与鹰展翅上腾作比就不会成立，因为1QIsa[a] 卷34栏的结尾是“他们行走却不飞翔 ”。

各种不同的古代资料

《圣经》文本的多样性也反映在库姆兰和其他地方的古代圣经注释中。这里有两个例子。

1QpHab

1QpHab是一份宗团圣经注释，以对《哈巴谷书》中的前两章预言以逐节注释为特征。注释遵循的一般模式是圣经引言、例行导读和评注。在第11栏9至15行中，圆梦者，即宗团释经者按照下面的方式解释了《哈巴谷书》2.16。

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也走起路来摇摇晃 晃！ 主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哈巴谷书》2.16）。解释（*pishro* ＝pesher［注释］＋后缀），这指的是那羞辱多于荣耀的祭司。因为他没有把心的包皮割 掉 ，继续追随沉湎暴食暴饮的酒鬼，以求解渴。上帝怒气的杯要使他落空，而真正增加的却是他的……和痛苦…… [11]

1QpHab这一部分所引用的《哈巴谷书》2.16中的句子和在《马梭列文本》中发现的同一节略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第二个动词。与上面的译文相比较而言，下面这个译文是对该词组更接近字面意思的译法：

1QpHab：你也喝吧，也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而

《马梭列文本》是：你也喝吧，显出你是未受割礼的〔12〕

这里出现了两种措词，一种关于醉酒、走路摇摇晃晃，而另一种则把醉酒和保留包皮古怪地联系在一起。最初的希伯来文本在所使用的动词上玩了文字游戏。当我们把圣经引言和宗团注释放在一起读时，会很清楚地看到，当释经者引用一种版本的《哈巴谷书》2.16时（这一现象在《七十士希腊译本》中也有反映），他对《马梭列文本》的另一种措词也了然于胸：他谴责“邪恶的祭司”没有把“心的包皮”割掉。

《彼得前书》

《新约》中的《彼得前书》是一封写给外邦基督徒的鼓励信，写于公元1世纪后半叶。它引用了《旧约》中的几段文字来支持自己的预言，其中一段文字是《以赛亚书》第40章6至8节，引用在了《彼得前书》的第1章第24至25节：

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13〕

《彼得前书》从更简短的《七十士希腊译本》中引用了《以赛亚书》第40章6至8节的内容。《马梭列文本》要长一些，第7节多出的部分写道：“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主的灵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14〕 两者的不同可以用段落抄写错误来解释，即眼睛从第7节的开头跳到了后面的第9节（两者都以“草必枯干”开头）。发现于1

号洞的《大以赛亚书卷》中，第一位文士抄写的是《以赛亚书》第40章6至8节的较短的版本；而第二位文士则纠正了这一段，在行间和下面的空白处插入了遗漏的第7节。

库姆兰宗团的正典

库姆兰古卷已经提供了新信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第二圣殿时期权威《圣经》的正典，尽管正典问题依然有待全面探索。正典问题与文本多样性问题既相关又有所区别。正典问题指什么样的篇章被视为权威之作；而文本多样性问题则指某一篇章的哪一版本被视为正典。因此，犹太教和新教正典都接受《马梭列文本》版的《耶利米书》为权威作品，而东正教则把《七十士希腊译本》版的定为权威，正如我们曾经提到的，《七十士希腊译本》不仅篇幅更短，而且章节安排也不同。库姆兰宗团似乎容许两种版本的《耶利米书》存在。如果他们的“图书馆”藏书可以造访的话，我们就能看到了。

我们不知道库姆兰宗团是否坚守一份权威《圣经》的固定篇目，也不知道如果他们真这么做的话，又有哪些篇目会入选。他们对《希伯来圣经》采取二分法还是三分法？最近有关正典的很多讨论集中在《4QMMT》的C部分第10行所涉及的一条参考资料上，“摩西书，先知书和在大卫那里”。显然，这一措词证明对《希伯来圣经》被三分成《托拉》、《先知书》和《诗篇》（或《圣著》）的认可。对我而言，理解这样一条参考资料必须对这些词语作补充考察，而不是假设我们知道它们的含义。库姆兰宗团是如何理解“摩西律法”、“先知书”和“在大卫那里”的呢？

我把这一措词放在宗团自身对权威《圣经》的理解这一背景下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摩西书”很可能指《托拉》或《摩西五经》；“先知书”指先知著述的松散的合集，而不是指从《约书亚记》到十二小先知书的8个篇目；而“在大卫那里”并非指《诗篇》或《圣著》，而是指“大卫的事迹”。当宗团指《诗篇》时，它用“大卫之

歌”为题目，或者用“诗篇书”，而不会用“在大卫那里”。在库姆兰古卷中没有“圣著”合集的证据。

古卷阐明了《圣经》文本定型为《马梭列文本》之前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大约公元100年之前，《圣经》文本的多样化要比以前意识到的更多。这种多样化不应被夸大。后来成为普遍接受的《马梭列文本》的文本类型在库姆兰圣经古卷中占很大比例，但它肯定不是该宗团和其他宗团在第二圣殿后期可见到的或者说可读到的唯一文本。

注释

〔1〕 阿摩司之子（son of Amoz），即以赛亚，他预言了以色列国、犹大国、圣城耶路撒冷以及其他国家、民族和城市的命运。

〔2〕 在此，“原……文本”指的是该文本类型的最早形态。

〔3〕 该书的英文名字为*The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4〕 不结盟文本（non-aligned text），如名所示，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不同的文本类型，而是包含了库姆兰圣经古卷中所有那些与任何既有的《圣经》文本类型有重大出入以及彼此之间也各不相同的部分。其不同点主要表现在正字法与字形上。

〔5〕 本段译文来自《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圣经》（即英文《新修正标准版圣经》的一个汉语译本）中的《撒母耳记上》10.27—11.3。

〔6〕 苏拉是阿拉伯语sura（或surah）的音译，即“章”，又音译作“苏赖”、“索勒”等。

〔7〕 原文为图22，疑误，因为本书只有16幅插图，只有插图11的意思符合文意。

〔8〕 Jahwist也被称作Jehovist和Yahwist，也简称为“J”，探讨《希伯来圣经》成书奥秘的“文献假说”中《托拉》的来源之一。在这一来源中，上帝的名字总是以希伯来语4个辅音字母的形式出现，英语中以YHWH（或YHVH, JHWH或JHVH）代表，学者们加上元音译作Yahweh, Yahwe, Yahveh, Yahve, Jahvey, Jahweh, Jehovah等，《钦定本》译作the LORD，《和合本圣经》直接译作“耶和华”（Jehovah）。

〔9〕 原文是图21，显然有误。

〔10〕 本段译文基本参照《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圣经·以赛亚书》40.31的翻译，只是参照本书英语原文，同时基于犹太人的宗教习惯（不将上帝的名字发

出声而是以ha-Shem［那名字］或Adonai［主］代之），将“耶和华”改为“主”（the Lord）。

〔11〕 本段译文参照《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圣经·哈巴谷书》2.16和王神荫翻译的《死海古卷》“哈巴谷书注释”2.16，pp.300—301，在此基础上根据本书原文在翻译时有所改动。西奥多·H. 加斯特（英译），《死海古卷》，王神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2〕 1QpHab这一节在王神荫翻译的《死海古卷》“哈巴谷书注释”2.16中没有，参照他在2.15中强迫邻人喝酒使其“走路摇摇晃晃”的翻译；下面的《马梭列文本》的翻译则来自《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圣经·哈巴谷书》2.16的译文。

〔13〕 本段译文来自《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圣经·彼得前书》1.24—25。

〔14〕 本段译文基本来自《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圣经·以赛亚书》40.6—7，只是根据该版本《圣经》的英文原文与本书的英文原文，将“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该版本《圣经》英文：the breath of the Lord blows upon it）改为“主的灵吹在其上”（本书英文：the spirit of the Lord breathes upon it）。

第五章
谁之古卷？

这些抄本一般被称作库姆兰古卷，因为人们相信它们属于居住在基伯特 - 库姆兰的艾赛尼宗团。这个尽人皆知的库姆兰 - 艾赛尼假说依然是解释死海古卷来源的理想模式，但它自身并非没有问题。岁月流逝，不同的观点被提了出来以质疑该理论的某个方面或更多方面。然而，库姆兰 - 艾赛尼假说依然是最为可信的。

库姆兰 - 艾赛尼理论

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有3组截然不同的证据是很重要的，它们是：从11个山洞中发现的古卷、基伯特 - 库姆兰的考古遗址以及古代历史资料中对艾赛尼宗团的描述。古卷的主人被认为是生活在库姆兰地区、后来的艾赛尼宗团成员，这是一个可被质疑的学术构想。

我们必须重新从罗兰·德·沃在《考古学与死海古卷》中所作的描述开始我们的讨论。根据他的理论，包含阶段Ia、Ib和阶段II在内的公社时期与艾赛尼派在这一处考古遗址居住的时期相一致。最初只有少数艾赛尼派成员住在那儿，但是到公元前100年时，随着新成员加入这个羽翼日渐丰满的群体，这个宗团已经得到壮大。在此后的200年间，该宗团差不多一直存在，当然不包括地震和火灾发生后存在的30年居住空白期。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探讨过德·沃对阶段Ia和离弃该遗址的时间划分中存在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他怎么知道艾赛尼派曾经居住在那里？

艾赛尼派：习俗与信仰

在古典时期的资料当中，特别是在斐洛（Philo，公元前25年—公元50年）、普林尼（Pliny，23—79）和约瑟夫斯（37—100）的著作中，有关于艾赛尼派的描述。尽管在古代文献中有种种前后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从著作使用的资料和

作者个人的观点中会发现，古代资料在对艾赛尼派的下列细节描述中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大约有4,000人，因为城市居民的道德败坏而远离城市，居住在犹地亚的许多城镇里。他们住在公社房屋中，个人财产和收入要交给公社负责人。想加入该宗团的人必须经过两年的考察期。他们过着禁欲者的生活，摒弃享乐和情欲，在衣食方面选择节俭和简朴。

他们遵循一些独特的习惯和习俗，这使得他们在古代犹太人中与众不同。他们刻意不涂油，而涂油在古代犹太教中是一项常见习俗。他们身穿白色衣衫，饭前便后在一个日常洁净浴池中沐浴。尽管他们作为仪式的洗浴表面上和基督徒的做法有相似之处，但是，它们所赋予的宗教含义与洗礼迥然不同。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洁净的原因，不是为了涤罪。艾赛尼派避免在安息日排便，在其他日子里他们则到远处用小斧头挖个坑后再方便。他们不允许将唾液吐在同伴中间或者右边。他们拒绝承担婚姻的责任，奉行独身，避免“妇女的淫荡”，尽管艾赛尼派的另一支为了传宗接代而允许婚姻和性行为。他们不养奴隶，但捍卫每一个好人的自由。他们拒绝宣誓，拒绝参加圣殿宗教仪式，反对在那里用动物祭祀。相反，他们自己进行祭祀，然后把祭品，可能是谷物和水果，送到圣殿。最后，他们餐前餐后都祈祷，而食物是由祭司们按照特殊的洁净规则准备的。

根据斐洛和约瑟夫斯的描述，艾赛尼派思想和习俗的特点是相信命运胜过相信自由意志。他们认为，一切生命都由神的计划决定。他们遵守祖先律法，其中包括严格遵守安息日规定，但是他们并非只知道恪守律法的犹太人，他们也涉猎秘传教义，研习只有本派成员才有的秘密书籍，其中包括召唤天使的名字 [1] 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修炼。他们也研究草药和植物，这是整体性治疗的一种古老形式。他们还继续运用预言的力量，包括对即将到来的事情进行预测。最后，他们相信人死之后灵魂在坟墓之外有自己的生活。

库姆兰的艾赛尼派

将艾赛尼派教徒的居住地锁定在基伯特 - 库姆兰或者至少在死海西北海岸的关键证据是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写的一段文字（见下框）。普林尼，罗马战士、作家，除了有其他作品问世外，还写了一部多达37卷的百科全书，题材多种多样，包括天文、地理、动物、树木、医药、农业技术以及各种矿物和金属。在第5卷中，他描述了非洲和西亚的地形，然后在介绍犹地亚之前概述了叙利亚地区。普林尼确定艾赛尼派居住在死海西岸的基伯特 - 库姆兰地区。

老普林尼的《自然史》5.17，4（73）

“在［死海］西岸的艾赛尼派的人们，直到现在都没有那些有害之物。他们孤寂独处，在世界上，他们是同类中最奇特的一群，令人惊叹，无人企及。那里没有女人，他们摒弃了一切性爱；他们没有钱，只与棕树林结伴为乐。日复一日，大批新会员源源不断地补充他们的数目。常有对人生厌倦，被命运浪潮抛掷出来的人被驱除到他们中间，被迫采取了这种生活方式。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自己不生养儿女，却千秋万代永世长存。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是因为人们对过去的生活有悔改之意。在他们（即艾赛尼派教徒）下边（below them），从前有座城邑叫做恩加达（Engada），今称恩盖迪（Engedi）（*infra hos Engada*），其原野之肥沃和棕榈之繁茂仅次于耶路撒冷（Jerusalem）（纠正：应为耶利哥［Jericho］），但如今已成为荒凉之地。从那儿，人们来到筑在岩石上的马萨达要塞，而它也离“沥青湖”（即死海）不远。犹地亚的边界到此为止。”[2]

这一段提到，在死海（沥青湖）西岸有一处单一性别的居住区，他们是男性艾赛尼派，过着没有女人、没有性爱、没有金钱的生活。他们只与棕树林为伴！厌倦了人生无常、思想相似的男人们源源而至使这个宗团的人数不断得到补充。普林尼将他们描写成“同类中最奇特的一群”（*gens sola*），而且“令人惊叹，无人企及”。这一段有夸张的成分（如“千秋万代永世长存”），也似乎有误（如说的是“耶路撒冷”，但很可能指“耶利哥”，因为耶利哥以原野肥沃和棕榈繁茂闻名）。该段的视角应该是公元70年以后，因为它提到耶路撒冷“已成

为荒凉之地”。普林尼是否去过犹地亚值得怀疑；他编写对该地区的描述时是使用的资料。《自然史》完成于公元77年，献给了罗马皇帝提图斯（Titus）。

艾赛尼派的居住地与位于基伯特 - 库姆兰正南方的恩盖迪的位置关系描写得非常详细。普林尼写道，“在他们（即艾赛尼派）下边，从前有座城邑叫做恩加达，今称恩盖迪”。但拉丁词*infra hos Engada*语义含混：是指“在他们下方是恩盖迪（down below them is Engedi）”呢还是“在他们南边是恩盖迪（south of them is Engedi）”？德·沃认为肯定是指后者，因为*infra* 用作“下游”解时，经常与山谷或河流相联系。况且，普林尼按照南北方位描述犹地亚的地形——始于约旦河源头向南直至死海。

最近，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家伊扎尔·赫希菲尔德（Yizhar Hirschfeld）认为，*infra* 在纬度上表示“下方”之意，因此，艾赛尼居住地应该在恩盖迪上方的西部山坡上。在恩盖迪上方，他发掘了一处地方，并确定那就是他认为的一处艾赛尼居住区。居住区有一条长约300米宽约25米的狭长坡道，在里面最初发现了28间小单人房，附近还有两个浴池，用作“米克瓦”（*mikvaot* ），即“浸礼池”。他注意到，遗迹分布的稀疏状态与古卷中宗团的禁欲特点完全对应，而且这样的居住区在犹地亚沙漠中还有另外几处。

赫希菲尔德对德·沃将*infra* 解释为“下游”提出了质疑，因为普林尼如果指“在南边”，他会用*a meridie* （字面意思是“在正午”，指“在南边”）。尽管*a meridie* 的确是一个表达“在南边”的词语，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德·沃对*infra* 的翻译是“不可信的”。普林尼表示“在南边”的意思时，这两种表达方式都用过。而且，德·沃主张的是表示“在南边”意义上的“下游”。

赫希菲尔德提出的另一个异议是：普林尼的这段描述并非沿“从北到南的直线路线”依次进行。关于犹地亚的这一段始于加利利海和死海，接着描述了加利利附近各种各样的居住区，之后又返回到死海。然后，在详细记载了死海东岸的几处地方——马卡鲁斯和加利劳——之后，行文又回到了西岸居住区。只有在此时，它才提到艾赛尼

派的地理位置恩盖迪和马萨达。在赫希菲尔德看来，普林尼“利用可供自己支配的文献资料，记叙了死海周围各种各样的地方和居住区”。

尽管赫希菲尔德针对德·沃观点的反驳或许是对的，普林尼的整篇文章并非始于约旦河源头而终于死海，但却不应从全篇语境中推测 *infra* 的意思。对死海的具体描述似乎是沿着从北到南的方向进行的。为了讨论方便，暂且不管艾赛尼派所处的位置，那么，相关段落是按照那个次序并从北到南的方向提到恩盖迪和马萨达的。拉丁语中副词 *inde* 表示方位：“从那儿”，即从恩盖迪，“人们来到……马萨达要塞”。普林尼以另一个表示方位的副词*hactenus* 结束本段，即犹地亚的边界“到此为止”。这两个副词都表示行文是自北而南。是该段的具体语境决定了*infra* 的意思是“下游”。那么，艾赛尼派的方位应为上游。故，根据普林尼的地形介绍，基伯特 - 库姆兰依然可能是艾赛尼派的居住地。

德·沃认为，普林尼写的这一段本身并不是确定库姆兰 - 艾赛尼身份的决定性证据。这段地形介绍融汇了古卷中描述的各宗团与艾赛尼派的相似之处，并在“这位古代史学家常常不无得意地流露出来的那种十足把握中达到高潮”。尽管德·沃没有这么说，但是他心里很可能明白普林尼记叙失真：例如，塔利奇城邑在第比里斯北面，但普林尼记叙的却是“在南面”（*a meridie* ）；还有，据普林尼记载，马卡鲁斯和加利劳在死海“南面”，但它们却都在死海东部。普林尼对犹地亚地区的描述是不可靠的，因而艾赛尼派的准确居住地不能由他的记载而一锤定音。人们最多可以这样说：根据该段介绍，艾赛尼派位于死海西北岸，因而基伯特 - 库姆兰依然有可能是一处居住地。德·沃真正做到的一点是：他强调在废墟中发现的古卷、陶片和碑刻上笔迹的相似性能够确立古卷、山洞和考古遗址之间的联系。

不同的理论

不赞成的声音在过去一直都有，现在依然存在。最近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假设，其中有的理论认为基伯特 - 库姆兰不是一个隐修中心，而是一个商贸中心、一处乡间别墅、一座要塞、一处乡村庄园或乡村修道院/艾赛尼中心。所有这些理论都一一遭到了藏经祠名誉馆长马根·布罗什（Magen Broshi）的批判。布罗什赞成库姆兰 - 艾赛尼假说，指出库姆兰不在主干道上，故不可能是商业中心；它没有马赛克铺成的地板，也没有内部装饰，故不是作为豪华别墅来修建的；它也不可能是要塞，因为库姆兰的墙壁太薄，出入口也没有守卫；它不可能是乡间农场，因为缺乏相应的农房设施；阶段I和阶段II期间持续有人居住，这表明艾赛尼派在此居住之前，它不可能是一处乡村修道院。尽管人们可以对库姆兰 - 艾赛尼理论提出异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错误的。实际上，大多数学者都在坚持该假设的某一种说法。下面，我将以库姆兰 - 艾赛尼理论为工作模型，既对它解释得通的资料进行评论，也把它无法解释的资料公之于众。

注释

〔1〕 犹太神秘主义者的修炼之一，其功能类似于巫术。

〔2〕 以王神荫译的《死海古卷》中“《死海古卷》简介”（pp.16—17）部分对该段的翻译为主，根据本书英文及需要在翻译时略有改动。

第六章

来自库姆兰图书馆的文字作品

几乎全部古卷都由文字作品构成。除了已提到的《铜古卷》可能是个例外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文献或非文字文本与阿莱格罗的探宝有关。还有两块损毁严重的陶片，即陶罐的碎片，上面详细记录着霍尼（Honi）将一位奴隶、财产和农产品赠送给埃拉扎尔（Elazar）。严格来讲，它们并不是古卷。它们是在基伯特 - 库姆兰的泥灰坡道上发现的。一块陶片上显然保留着“该宗团”（*yahad*）的关键词，不过这个文字的准确性遭到了质疑。

不管怎样，这一批古卷的文字特性会说明：它最初属于图书馆，而非储藏文献的档案馆。在40多年前，有一位博学的图书管理专家凯瑟琳·格林利夫·佩德利（Katharine Greenleaf Pedley）把古卷的特性和数量与基伯特 - 库姆兰联系在一起，她提出，它们表明那时的“兄弟会”肯定也是图书管理员！他们是一大批藏书的管理员，必须面对准备抄写用的皮革或蒲草纸、保存和收藏古卷这样的实际问题。凯瑟琳从图书馆历史的角度探讨了这些藏书后指出，考古遗址上肯定有一间阅览室、几间办公室、工作间和许多藏书架（图13）。她提出，在库姆兰宗团时代，书架被分割成“巢”（拉丁语为*nidus*）形，即“鸽子洞”形。以色列博物馆出版的由A. 罗伊特曼（A. Roitman）编写的《库姆兰的一天》采纳了这一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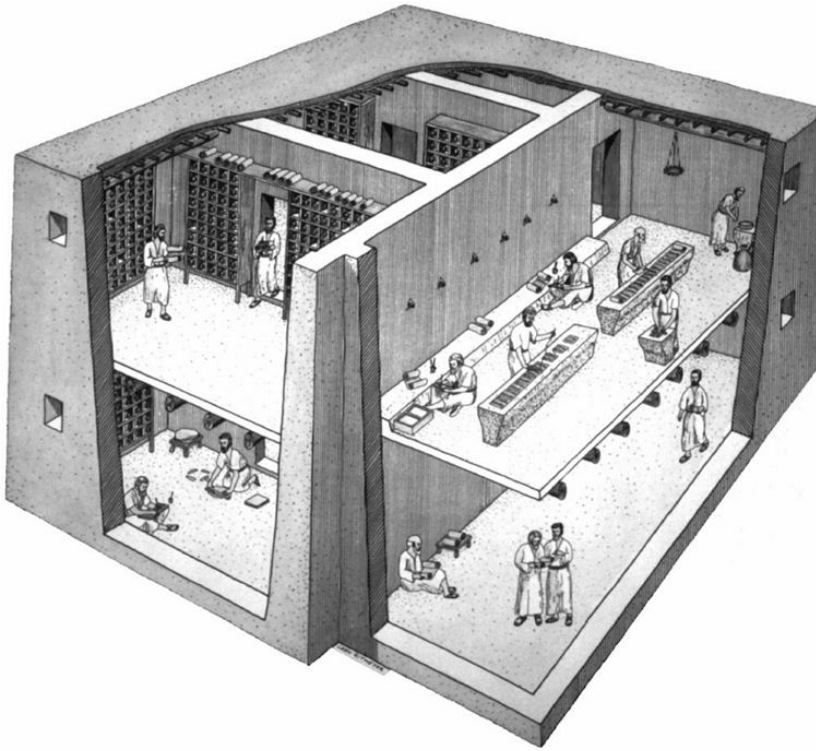

图13　库姆兰宗团“文书房”与“图书馆”复原图

新著文字文本

这座文字图书馆收藏了智训、赞美诗、诗篇、礼拜仪式、祈祷词和其他以《圣经》为基础的作品。在这些文字文本中，有一些是宗团特有的，如“排舍瑞姆”，即圣经注释，而其他文本，如圣经文本，则不是。而其他文本的特点，学者们还在争论不休。例如，《创世记伪经》（1QapGen, ap代表伪经，Gen代表《创世记》）保存相对完好，其宗团观点尚无定论。它在文体上属于“圣经重述”，即通过重新讲述《摩西五经》的部分内容而对经文作出解释。

《创世记伪经》

以有关亚伯兰（Abram）和撒莱（Sarai）在埃及的旅居的记叙为例。在《创世记》第12章10至20节，我们得知这对夫妇因为迦南地发生饥荒而去了埃及。他们踏上埃及领土前，亚伯兰警告撒莱说，埃及人会看到她的美貌，带走她，却会杀掉他，她的丈夫。这位先祖就建议他们伪装成兄妹，而不是夫妇，这样一来，亚伯兰的性命或许会被法老赦免。《圣经》中这短短的叙述留下了大量未讲清楚的问题，其中包括：亚伯兰是如何未卜先知的？撒莱花容月貌，但她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下面就是《创世记伪经》重新讲述的这一故事的部分内容。请注意，叙述者从圣经文本中的第三人称（“亚伯兰”）转换到了古卷中的第一人称（“我”）。

> 在我进入埃及的第一天夜里，我——亚伯兰，做了一个梦。［看那］，我在梦里看见一颗柏树，一棵棕树……突然有几个人走上来，要把柏树砍掉，把根拔除，让棕树单独（立）在那里。但是棕树大声哭喊道：“不要砍掉那柏树，砍［它］的人必受诅咒。”于是柏树因为棕树的缘故，得免于［被］砍掉（第19栏）。[1]

《创世记伪经》所做的就是填补圣经文本中的叙事“空白”。它解释说，亚伯兰因为“做了一个梦”知道了埃及人要做的事情，这是上帝向他启示该事的一种说明方式。柏树代表亚伯兰，因为棕树，即撒莱的缘故他免于一死。

关于撒莱的美貌，《创世记伪经》通过埃及大臣赫揆拿斯（Harkenosh）向法老的汇报而细致入微地进行了描绘。

> 她的脸多么俏丽！头发多么纤细！眼睛多么妩媚！鼻子多么迷人，整个面容多么光彩照人……她的双乳多么好看，白皙的皮肤多么俊美！她的臂膀多么赏心悦目，双手白璧无瑕，看上去多么［迷人］！你看看她的掌心多么可爱，双脚多么标致，腰身多么完美！没有一个被引入洞房的少女或者说新娘比她更娇美动

人，她的魅力任何别的女人都无法企及。千真万确，她的美丽让所有的女人黯然失色。可是，除了仪态万方之外，她还有丰盈的智慧，无论做什么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第20栏）。[2]

难怪法老想把她据为己有！《创世记伪经》用对女性美的传统描写填补了圣经文本中的叙事空白。这是将肉体之美与聪明智慧结合在一起对女性特征的描写。在《希伯来圣经》中，《雅歌》是一部类似的作品，里面歌咏的是“我的良人”和书拉密[3]之间充满情欲的率真的对话，尽管后来它被解释成一种灵性比喻，表达了雅威和他的百姓之间的忠诚。在《创世记伪经》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撒莱的美丽被理解成除了肉体特征描写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让人感到蹊跷的是，那些按道理应该是虔敬的成员，许多大概还是单身男性，他们为什么读这份材料呢？

塔古姆[4]《约伯记》

前面提到过，在《圣经》的全部正典文本中有几段用亚兰文写成。而这是圣经语言从希伯来语到其他语言发生变化的语言学证明。在圣经后时期，随着这一神圣语言的使用限制越来越严格，《希伯来圣经》的整部亚兰文译本产生了。在库姆兰古卷中发现了最早的塔古姆范本，即最早用希伯来语写成的《圣经》篇章的亚兰文译本：塔古姆《利未记》（4Q156）和塔古姆《约伯记》（4Q156和11Q10）。

有一句格言说得好，“翻译即诠释”。这正应验在库姆兰的塔古姆上。让我们想想塔古姆是怎样理解主要人物约伯（Job）的吧！在该篇《圣经》的开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他的生活被雅威向撒旦提出的古怪挑战毁掉了。当雅威允许撒旦为所欲为时，约伯失掉了家人、财产，备受疾病的折磨。在这卷道德疑难最重的经书的结尾，约伯意识到他必须为没有承认雅威的统治而忏悔（“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5]，《约伯记》42.6）。然而，在库姆兰的塔古姆《约伯记》中，这位义人受难者约伯直到最后都是一位无辜

的受害者。在这里，重点强调的不是这一卷《圣经》中所写的需要忏悔，而是尽管他作为一位完全人却仍然承受的苦难（“我被抛掷而出，摔得粉碎；我化成了尘土和灰烬。”[6]，11Q10 38.8—9）。

塔古姆《约伯记》出于宗教原因也对传统圣经文本作了大量改动。例如，为避免神人同性论，它会将诗歌语言变得朴实无华，或者置换上在神学上更易接受的属性。这可以从《约伯记》38章旋风中的话语这一部分看出来，其中，大量的反问句断言雅威是一切的主宰：“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第4节）；“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第8节）。在第6节和第7节，雅威问：

> 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
> 那时，晨星一同歌唱，
> 神的众子也都欢呼。[7]

这一场景的依据显然是常见于近东和圣经神话中的天庭描写。晨星被拟人化，放声歌唱，而神的众子也欢呼雀跃。

在库姆兰古卷中，塔古姆作者深为晨星一同歌唱的拟人化而苦恼。为了避免此类的神人同性论，他把该词组换成了晨星“瞬间光芒四射”。第7节中提到的“神的众子”也有问题，因为它可能导致多神论的误解。这位塔古姆作者把“神的众子”替换成了“众天使”，毫无疑问，他们从属于雅威。

拉比塔古姆[8]对此皆有反映，并反映了其他同样因神学原因而对圣经文本作出的改动。库姆兰古卷中的塔古姆所起的作用就是证实了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存在解经现象。

注释

[1] 本段翻译主要参照王神荫翻译的《死海古卷》（p.321），但根据本书英文原文有重大改动。

[2] 本段主要系译者自译，但参考了王神荫翻译的《死海古卷》

（p.322）。

〔3〕《圣经·雅歌》中赞美的新娘。

〔4〕 塔古姆（targum）指《希伯来圣经》的亚兰语译本，在第二圣殿时期到中世纪早期这段时间内由拉比们在巴勒斯坦或巴比伦翻译而成。

〔5〕译文来自《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圣经·约伯记》42.6。

〔6〕英语原文为I am poured out and fall to pieces, and I become dust and ashes。

〔7〕本段中涉及的《约伯记》38.4，6，7，8的汉语翻译皆来自《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圣经》。

〔8〕 塔古姆由拉比们翻译而成，反映了他们对《希伯来圣经》的理解和解释，故塔古姆常被称作拉比塔古姆。

第七章

历史语境中的库姆兰 - 艾赛尼宗团

在讨论库姆兰艾赛尼宗团的起源和历史之前，我们需要先后退几步，以将古卷融入第二圣殿犹太教史的语境中进行研究。

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

“第二圣殿犹太教”指的是由耶路撒冷的圣所所界定的犹太宗教、历史和文献。[1] 之所以是第二圣殿，是因为由所罗门国王（King Solomon）建立的第一圣殿早在公元前586年就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毁坏了。公元前539年，当波斯人战胜巴比伦人成为古代近东的一个帝国时，他们的国王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采取了政治和宗教宽容的总体政策，允许犹太人和其他民族返回故土和神圣的礼拜中心。这时，人们不再用“以色列人”（Israelite）而是用“犹太人”（Jew）这个词来指犹大国或犹地亚的遗民。犹太人回归了，圣殿重建也完工了，公元前515年又恢复了圣殿祭祀。

第二圣殿历时达585年之久，直到罗马人于公元70年将它毁于一旦。在这段时期，犹太人先后经历了波斯人（公元前539—前331年）、希腊人（公元前331—前170年）和罗马人（公元前63年—公元70年）的统治。其间，只有短暂的岁月，即公元前166年到公元前63年，犹太人在马加比和哈斯蒙尼王朝统治下有过某种形式的自治。正是在这个独立阶段，库姆兰公社时期开始了，而艾赛尼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也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希腊化时期

在上述犹太人独立阶段之前是希腊化时期，它是伴随着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对“全部已知世界”（*oikoumene*）的征服大业而开始的。公元前323年，年仅33岁的亚历山大大帝驾崩，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其麾下的将军们都渴望继承帝位。于是，他们之间

互相征伐约达20年之久，这就是后人所知的“继承人争夺战”。公元前301年，将军们终于同意举行“胜利者会议”，在会上瓜分了原有的帝国。原先是波斯行省的犹大或犹地亚被划给了塞琉古一世尼克特（Seleucus I Nicator），作为新建立的克利 - 叙利亚省的一部分。但是，在埃及和北非拥有王国的另一个将军托勒密·拉古斯（Ptolemy Lagus）占领了该部分领土，并宣称为自己所有。在公元前3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犹地亚成了托勒密王国的一部分。只是在两个敌对的希腊王国发生了帕尼亚斯战役之后，犹地亚才于公元前200年成为塞琉古王国的固有领土。

马加比起义

塞琉古统治犹地亚期间，犹太人发动了旨在打碎外来统治枷锁的战争，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马加比起义。一个名为玛他提亚（Mattathias）的虔敬犹太人和他的儿子们拒绝服从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埃皮法尼斯（Antiochus Epiphanes）的命令，不放弃他们祖先的宗教，不向偶像献祭。他们想按古代的圣约生活。和一些接受希腊文化的教友不同的是，他们把对希腊方式的强行文化适应看作一种侮辱和对犹太身份的威胁。他们领导了一场起义，并取得了胜利。及至公元前165年，犹地亚开始被玛他提亚的一个儿子统治，他就是军事领袖犹大（Judas），绰号马加比（Maccabaeus），即“锤子”。之所以有此绰号，或许是因为他的头部形状，也或许是因为他暴烈的性情。这个绰号也成为他的弟弟约拿单·马加比（Jonathan Maccabee，公元前161—前143年）和西缅·马加比（Simon Maccabee，公元前143—前135年）的名号，他们继他之后先后统治着独立的犹太国。犹大是犹太国的政治领导人，也可能是事实上的大祭司。

马加比起义的故事未见于《旧约》即《希伯来圣经》中，但却记载于《后典》[2]即天主教《圣经》的次经文本中。上下两卷的《马加比传》讲述了玛他提亚及其家族的故事，犹太人的节日哈努卡[3]

即基于此历史事件。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埃皮法尼斯于公元前169年亵渎了圣殿，而马加比起义胜利后洁净了圣殿，该节日就是为纪念洁净圣殿而设定的。公元1世纪的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也记载了马加比起义，他的论著，尤其是《犹太战记》和《犹太人古代史》，对于了解第二圣殿时期的整个历史是必不可少的。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流放归来[4]，犹太人就实行了双重领导制，除一个世俗领袖外，还有一个宗教领袖。在流放前，君王是以色列国的首脑，大祭司处于从属地位。在流放结束以及波斯人统治时期，领导权为两个独立的领导人所共享：所罗巴伯（Zerubbabel）是行政当权者，而约书亚（Joshua）则是大祭司[5]。这种双重领导模式持续了350多年，直到马加比时期才告结束，其时，玛他提亚的儿子们篡夺了大祭司的领导权，将行政领导权与宗教大权独揽于一人之手。

在哈西德或虔敬派犹太人眼里，马加比家族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因为他们不属于撒督 - 奥尼阿德（Zadokite-Oniad）祭司的遗脉，因而没有资格担任大祭司。撒督是君主时代大卫王朝的两位祭司之一。尽管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波斯统治时期大祭司一职是如何传承的，但显而易见，担任大祭司者须为撒督家族的后人。这究竟何以成为后流散时期大祭司任职的必要条件，至今仍然扑朔迷离。马加比家族虽然属于祭司家族，但不是撒督后裔，所以没有资格担任大祭司之职。约拿单和西缅都是非法夺取的大祭司职位。犹大也可能篡夺了这一职位，但不确定，因为在有关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3年间大祭司传承的历史记载中，有两处相互矛盾的地方。

某些学者认为，库姆兰 - 艾赛尼宗团就产生自这个反对马加比统治者的虔敬派群体。根据这一观点，这些人离开了犹太人主体和耶路撒冷的祭拜中心，定居在基伯特 - 库姆兰。在一组作品（排舍瑞姆，即宗派性圣经解释）中，他们把马加比家族的大祭司贬称为“邪恶的祭司”。

经历了约20年的统治后，犹太人认可了马加比领导人作为正当的大祭司的地位。在西缅·马加比统治时期，犹地亚的祭司们、民众、首

领和长老们举行大会，把马加比家族的大祭司职位合法化，宣布西缅·马加比是他们“永远的领袖和大祭司”（《马加比传上》14.41）。这就是哈斯蒙尼王朝的建立，该王朝是以他们的祖先哈斯蒙尼（Hasmonai）的名字命名的，持续了百余年的历史。

哈斯蒙尼王朝

按正式的说法，哈斯蒙尼王朝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7年，随着安条克统治的结束而寿终正寝。然而，在公元前63年，犹地亚就已经在罗马委派的长官和叙利亚总督的行政控制之下，其独立性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被罗马人征服之前，哈斯蒙尼王朝历经了5位统治者，其中4位集政治大权与宗教大权于一身。这5位统治者都有国王的徽号。其中，第五位国王亚历山大（公元前76—前67年）因为性别的缘故不能出任大祭司。在她遵照丈夫的遗旨接受王位之时，大祭司之职授给了她的长子约翰·许尔堪二世（John Hyrcanus II）。这4位男性国王分别是：约翰·许尔堪一世（公元前135—前104年）、阿里斯托布卢斯一世（Aristobulus I，公元前104—前103年）、亚历山大·詹尼亚斯（公元前103—前76年）、阿里斯托布卢斯二世（Aristobulus II，公元前76—前63年）。哈斯蒙尼王朝时期，犹地亚的疆土远远超出了原先作为波斯行省时的边界。并非所有哈斯蒙尼王朝的统治者都忠于马加比起义时的理想。有的国王吸纳了希腊人的价值观，其言行和其他希腊化的当权者没有什么区别，而这是其马加比先祖们强烈反对的。

安条克是哈斯蒙尼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他在帕提亚人的拥戴下于公元前40年加冕。这时，罗马人的主要敌人占领了犹地亚。他作为犹地亚的“国王和大祭司”只有短短3年时间。不过，安条克政权仰仗的是帕提亚人的力量，在罗马使节文提督斯（Ventidius）于公元前39年将帕提亚人赶出叙利亚时，他就失去了政治靠山。公元前37年，安条克最后被他的对手以督马亚人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废

黜，而此前，大希律王已经被屋大维（Octavian）加封为“犹地亚的王”。

罗马的统治

随着罗马人在近东的出现，犹太人的独立实际上结束了。罗马是一个殖民帝国。公元前63年，庞培（Pompey）将军征服了犹地亚，攻占了耶路撒冷、圣殿和至圣所。在击败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的国王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之后，庞培着手染指哈斯蒙尼女王亚历山大的两个儿子——阿里斯托布卢斯二世和许尔堪二世之间的王位争夺战争。庞培重组了这个地区，即现在叫做“东方居留地”的地区。犹地亚被允许继续保留其独立身份，但是，哈斯蒙尼王朝时大大扩展了的领土则被削减，减小到从前作为波斯行省犹大时的疆域。在奥卢斯·伽比纽斯（Aulus Gabinius，公元前57—前55年）任执政官时，在对叛乱地区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下，犹地亚被划分为5个行政区。

罗马帝国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第二圣殿时期的结束（公元70年），并远远超出了这一时期。事实上，犹地亚仍然由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管辖，这种局面直到639年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才告结束。公元前63年至公元70年这段时间，罗马人对犹地亚几乎保持着连续不断的统治。其间，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大权旁落，帕提亚人控制了犹地亚并拥立安条克为国王。

在罗马人拥有全部控制权时，他们允许由罗马的附属国，即依附于它的大希律王的王国，来统治犹地亚。有学者称，希律是“半个犹太人”，因为他来自以督马亚，其居民在大约100多年前被约翰·许尔堪一世强迫施行了割礼，并接受了犹太律法。他在位33年，即公元前37年至公元前4年，并以其建筑成就著称于世，其中最值得一书的是他重修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使之恢复了往昔的辉煌。第二圣殿是波斯时期修建的，不像第一圣殿那么富丽堂皇。希律王于公元前20年开始修

复工程，该工程持续了80年之久，在他死后多年才得以完成。

大希律王备受家庭烦恼的折磨。他娶了10房妻室，她们为分享遗产和继承权而明争暗斗。他立下了3份不同的遗嘱。公元前4年，在他去世后，各遗嘱持有人纷纷上诉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那里，由他亲自确定了希律最后遗嘱的所有要点。希律的王国被分给了他的3个儿子：玛塔斯（Malthace）所生的阿基劳斯成为犹地亚、撒玛利亚和以督马亚的统治者；希律·安提帕斯（Herod Antipas）被封为加利利和培拉阿的郡王；菲利普（Philip）也得到了郡王的封号，其领土包括巴塔那、查哈尼茨、高拉尼茨和帕尼阿斯。

阿基劳斯由于一起严重的诉讼案而于公元6年[6]被废黜。这桩诉讼案是由撒玛利亚的贵族伙同其罗马统治者提起的。人们对该诉讼案的内容至今都了解甚少，但它一定严重到了足以使他垮台的地步。阿基劳斯被流放到了高尔，而犹地亚则并入直接由罗马统治的叙利亚省。他的另外两块领地也最终为罗马人直接统治。公元44年以后，原来的希律王国全部变成了帝国的一个省，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66年爆发的第一次犹太起义。希律·安提帕斯在他哥哥遭流放约33年后也被流放到了高尔，因为阿哥利帕一世（Agrippa Ⅰ）对他提出了控告。菲利普在位37年，崩于公元33年。其领土先是分给了阿哥利帕一世，后来也直属罗马人统治。罗马人频繁任命、罢黜犹太大祭司，以致《新约》中《约翰福音》的作者认为该职位是每年任命一次。

第一次犹太起义

牛津大学犹太学教授马丁·古德曼（Martin Goodman）表明，犹太人起义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统治者的无能、罗马统治者的压迫、犹太人的宗教敏感、阶级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与外邦人的争斗和社会的分崩离析。公元66年4月，冲突爆发。当时，罗马地方财政官格修斯·弗劳鲁斯（Gessius Florus）掠夺圣殿珍宝的行为激怒了耶路撒冷人，他们公开嘲笑罗马总督，而总督则用十字架处死起义者作为回敬。对

罗马军队的袭击始于公元67年。当时，瓦斯帕西亚（Vespasian）指挥3个军团、23个预备队、6支骑兵队以及其他一些雇佣军，总共6万余人挺进加利利（包括第比利斯、基士拉和约塔帕塔）。公元68年与69年之交，加利利陷落，对耶路撒冷的围攻也展开了。德·沃认为，就在此时，基伯特 - 库姆兰阶段II因战乱而结束，其根据是灰土层和残存的箭头。

就在耶路撒冷城被围，甚至罗马军队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城内不同的犹太人派别正在闹内讧。奋锐党人组建了军事和政治力量，在耶路撒冷圣殿的纯洁性问题上群情激昂。他们把耶路撒冷划分为不同的控制区，分别由3个主战派领导人掌控，他们是西缅·巴奇拉（Simon bar-Giora）、其儿子以利亚撒（Eleazar）和基士拉的约翰（John of Gischala）。与此同时，瓦斯帕西亚因被宣布为皇帝而返回罗马，把围攻耶路撒冷的任务交给了儿子提图斯。犹太历阿布月（相当于公历7月或8月）9日，提图斯控制了耶路撒冷的上城[7]和圣殿山。男人、妇女和儿童惨遭杀戮，城市被夷为平地。圣殿也被焚毁，尽管提图斯本想放过它。耶路撒冷的毁灭至今仍为犹太人所纪念，他们在这一日实行全天斋戒，名曰“提沙 - 巴乌”（*tisha be'ab*，阿布月第9日）。

夺取耶路撒冷后，由鲁西琉斯·巴苏斯（Lucilius Bassus）指挥，旋又由弗拉维乌斯·西尔瓦统率的罗马军队，攻克了犹地亚沙漠中的诸多要塞。犹太人抵抗的最后一个据点是马萨达要塞。斯卡利人（The Sicarii），即一批以使用弯刀（拉丁文为sica）闻名的党徒，在残杀了那些屈从于罗马统治的犹太人后，继续在要塞抵抗，最后于公元74年集体自杀。据信，这也是基伯特 - 库姆兰第III阶段居住期的结束。

犹太人的宗派主义

第二圣殿时期的特征是犹太人内部宗派林立。其中，最重要的派别有艾赛尼派、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英语“宗派”（sect）和“宗派主

义”（sectarianism）二词带有贬义，因而是不合适的。哈佛大学教授沙耶·科恩（Shaye Cohen）为古代犹太人的宗派提出了一个颇为可取的定义：

> 宗派，是一个有组织的小集体，它从一个大的宗教团体中独立出来，并断言唯独它才体现了该团体的理想，因为唯独它才真正理解上帝的意志。

科恩进一步解释说，一个宗派必须足够小，这样才能够在一个较大的宗教团体内突显出来；它还必须是有组织的，有加入的程序和纪律；它还必须确立自己的边界，借以和更大的团体在规模、宗教、社会诸方面区别开来；唯独它才能够真正理解大团体的理想和上帝的意志。这个定义很适合艾赛尼派，对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则不适合。

E. P. 桑德斯（E. P. Sanders）是一位用威尔逊社会学方法研究《新约》的学者。他进一步提出，应该在“宗派”（sect）和“党派”（party）二词之间作出区分，区别的基础是他所说的“耶稣救赎的排他论”。一个宗派，例如艾赛尼派，是一个否认大团体内的所有人都可得救的小团体。它是内向型的，转向自身内部。与此不同，一个党派，如法利赛派，则是改革者，它直截了当地主张大团体中所有的人都应该和党纲保持一致。

这些定义有助于澄清公元前150年至公元70年间兴起的各类团体。艾赛尼派是内向分子，他们“因为城里人不敬神的习惯”（斐洛语）而逃离城市。当他们把祭品送到圣殿时，他们用“与众不同的习惯洁净法”（约瑟夫斯：《犹太人古代史》18.18—19）施行祭礼。

法利赛人是不离城隐居的改革者。他们是依据长老们的口传进行律法诠释的专家。他们关心食物的洁净、安息日的规则、什一税和历法。有的学者把法利赛人的起源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但这一观点有赖于特定的历史重构才可成立。就我们所知，约瑟夫斯提及约拿单·马加比时代（公元前161—前143年）的艾赛尼派和撒都该派时也提到了法利赛人。这表明，法利赛人的存在甚至早于这个时代。有些学者如斯德格曼（Hartmut Stegemann）则认为，法利赛人和艾赛尼

派都起源于马加比起义的哈西德，即虔敬分子。

不论起源如何，法利赛人都是一个大约在公元前150年到公元70年间存在的确定团体。他们活跃于约翰·许尔堪一世（公元前135—前104年）、亚历山大·雅纳乌斯（公元前103—前76年）以及沙龙·亚历山大（Salome Alexandra，公元前76—前67年）诸王统治的时期，其命运也随国王的更迭而变换。起初，法利赛人似乎是深受宠爱的。后来，一个名叫以利亚撒（Eleazar）的法利赛人举止粗鲁，在一次宴会上侮辱了许尔堪，致使这位哈斯蒙尼国王站到了法利赛派的对立面。他们领导过一次反亚历山大的暴动，但没有成功，反而招致了残酷的报复。此后，法利赛人的命运更加糟糕。最后，女王沙龙（亚历山大）赐予他们权力，他们这才享有了一段黄金时期。

法利赛人是拉比的前身。在拉比们著述的文献中，他们被称为“分离者”（*perushin*），尽管并非所有的分离者都是法利赛人。在库姆兰古卷中，他们被蔑称为“做事圆滑的人”（*dorshey ha-laqot*）。这个绰号含蓄地批评了他们在遵行律法时喜欢变通的爱好。在《那鸿书注释》中，他们被确定为被亚历山大·雅纳乌斯国王活活绞死的人。“暴怒的年轻狮子向那些做事圆滑的人复仇，并把它们活活绞死。”法利赛人相信人死后会复活，这条教义将他们和撒都该人区别开来。和艾赛尼派不同，法利赛人不认为命运是“万物的情妇”。[8] 在他们看来，有些事情是命运决定的，有些则在乎人为。

最后来看撒都该派。人们对这个派别知之甚少。他们很可能来自贵族圈，显然不相信命运和死者的复活。从其名称可以推测，他们大概和撒督人有关联。纽约大学的教授劳伦斯·H. 席弗曼（Lawrence H. Schiffman）论证道：根据《4QMMT》中有关哈拉哈问题的分析，库姆兰宗团与撒都该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同一个源头——撒督人，尽管约瑟夫·鲍姆加登（Joseph Baumgarten）已经指出，在哈拉哈问题上，库姆兰宗团与艾赛尼派更为相似，而与撒都该派相去较远。

第二圣殿犹太教，尤其是马加比起义和第一次犹太起义之间的那一段，是库姆兰 - 艾赛尼宗团所处的历史背景。马加比统治者集国王与大祭司双重权力于一身的做法对于一个版本的库姆兰 - 艾赛尼假说

极为重要。这一时期特别盛行的宗派主义也很重要，因为古卷涉及到了所有3个宗派——艾赛尼、法利赛和撒都该。最后，拥有强大政治军事力量的罗马人对古卷产生的威胁日渐增大。

图14　发现于开罗犹太圣堂储藏室的宗派文件

注释

〔1〕　指耶路撒冷圣殿第二次被毁之后，犹太人的宗教、历史和文献都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

〔2〕 又译《伪经》。

〔3〕 又译“光明节”或“献殿节”。

〔4〕 指犹太人于公元前539年结束巴比伦流散而回归以色列本土。

〔5〕 疑有误，因为《圣经·以斯拉记》记载为耶书亚（Yeshua）。

〔6〕 原文为公元前6年，而那时希律王在位，阿基劳斯尚未封为郡王。疑原文有误。

〔7〕 耶路撒冷分上城（upper city）和下城（lower city）。上城是祭司与王室贵族等居住的富庶城区，房屋高大精美。下城则相反。

〔8〕 命运是“万物的情妇”，即命运决定一切。

第八章

库姆兰宗团

在有关基伯特 - 库姆兰废墟考古学的开创性发言中，德·沃突然停下来，没有描述古卷中的宗团情况。虽然他认为宗团与艾赛尼派之间的相似性，连同考古学证据和普林尼的地理介绍，足以证明库姆兰 - 艾赛尼理论“是正确的”，但他还是把解释文本的工作留给了他人。他不无得意地指出了古卷的几个突出特点，认为“以此为基础，考古学可以对问题的解决有所作为”。

宗团的很多成员，他们以上千人、数百人、五十人、十人为单位组织起来（1QS 2.21—22, CD [1] 13.1），生活在基伯特 - 库姆兰和它周围人工挖就的洞穴里以及恩 - 斐施哈。这两处定居点的偏僻位置与一个隐修派恰好相符，他们自称“以色列遗民”、“真以色列人”、“新约”，退隐沙漠，过着一起工作、祈祷、学习神圣律法的平凡生活。不仅如此，选择库姆兰和恩 - 斐施哈这两个极为贫瘠的所在，也很适合古卷中提到的倡导禁欲的、宗教性的宗团。建筑物的集体性功能与为会众规定的组织和规则相一致。例如，那里有“议会厅”、会议室、食堂、供会议主持人站立的石灰面地板，甚至还有文书房。

德·沃确实涉及到的一个文本问题是“大马士革之地”的位置。根据《大马士革文件》，立约人“从犹大地离开，被流放到大马士革的土地上”（CD 6.5，19；8.21和19.33—34）。他指出：“大马士革”不应该照字面意思理解为叙利亚的那个城市，而是一个象征性的名字，借自《阿摩司书》（5:26—27），指代一个流放地，即库姆兰。同样，对于他们离开的“犹大地”，也必须作象征性的理解，指的是耶路撒冷的祭司及其助手，宗团就是从他们那里独立出来的。

德·沃承认，认为《宗团规则》提到的那些宗派分子就是《大马士革文件》中提及的那些人有个不小的障碍，这就是：前者是独身男子，后者则有妻子儿女。德·沃提出：“几个团体在库姆兰毗邻而居，他们在实质问题上观点一致，但是并没有相同的组织或生活方式。”纯粹由男性组成的宗团就住在库姆兰遗址上，而已婚的艾赛尼人则居住在悬崖脚下建起的洞穴、茅屋和帐篷（“营地”）里面。

最后，德·沃欣然支持所谓“邪恶的祭司”指的就是约拿单或西缅·马

加比的说法，尽管他也注意到，考古发现“把历史追溯到许尔堪一世统治之前，没有建议性意义。”在“公义导师”（the Teacher of Righteousness）的身份问题上，他则保持了缄默。

德·沃的观点有待纠正和限定。首先，说有那么多艾赛尼人住在库姆兰和恩 - 斐施哈是不可能的。“上千人、数百人、五十人、十人”的提法一定是象征性的，就像《圣经》中列举的以色列人数一样（《出埃及记》18.25）。从空间和水的实际需要估算出的人数要少得多，大概在150至200人左右。有人甚至认为，库姆兰只能容纳25至30人。其次，时下广泛认可的观点是这两个团体，一个独身的，另一个是已婚的，不可能在那里毗邻而居。有妻室的成员是城市居民，他们住在“营地”或“以色列城镇”里（CD 12.19, 23）。第三，对阶段Ia和阶段Ib年代的重新确定意味着基伯特 - 库姆兰的扩张肯定发生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即亚历山大·雅纳乌斯统治时期，而不是约拿单或西缅统治时期。

宗团的组织和日常生活

有3位学者值得注意，因为他们对古卷宗团的描述作出了贡献。他们是：格萨·韦尔迈什、J. T. 米利克和弗兰克·克罗斯。他们3位都是库姆兰 - 艾赛尼假说的支持者。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前两位学者认定宗团的敌对者是约拿单·马加比，而后者则把约拿单的继承人西缅看作是“邪恶的祭司”。

有关古卷宗团的描述，是通过把不同派别的文本结合起来实现的。韦尔迈什利用了“古卷争夺战”之后公开的4号洞内的《宗团规则》抄本，将各个文本结合起来，展示了一幅最新的宗团图画。他把宗团分为两个团体，一个是库姆兰的隐修兄弟会，一个是城市宗派。其结论是：这两个团体虽然互相区别且分地而居，但是“在教义和组织上却是统一的”，而且相互间有联系。

库姆兰隐修兄弟会

为了介绍这个隐修兄弟会，韦尔迈什研究了来自1号洞（1QS）和4号洞（4QS）的《宗团规则》（图8）。隐修兄弟会主要关注的是神圣、虔敬和静思的生活。《宗团规则》没有提及世俗事务和职业，但规定成员必须劳动，或为农夫，或为陶匠，或为抄本生产者。该宗团（*yahad*）根据严格的等级制划分社会等级，对此，从“会众大会”（1QS 6.8）开会时的座次即可见一斑。坐在第一位的是祭司，其后“按照品级”依次是众长老和其他民众。该等级制度的最上层是肩负教师、主持人和灵修执事责任的导师（*maskil*），或监督（*mebaqqer*），或被任命者（*paqid*）。他负责根据《宗团规则》（1QS 1.1, 5.1, 9.21）和两种灵魂的教义（1QS 3.16—4.26）教导成员、主持大会（1QS 6.11—13）、检验人们的灵性发展状况，并为他们确定品级（1QS 6.14, 21—22）。

韦尔迈什相信，尽管文本没有明确说明，但导师肯定是撒督人。显而易见，撒督祭司“逐渐占据了领袖地位”。韦尔迈什试图以此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在《宗团规则》的另外两个抄本（4QS^{b,d}）中没有提及撒督人。因此可以说，该宗团领导人最初只是一些祭司，后来则必须是撒督家族的人。至于撒督人血统何以变成了成为祭司领袖的必要条件，迄今不知其详。也许是因为，在所罗门王国，撒督家族成了唯一的祭司家族（《列王记上》4.2）。

韦尔迈什依据的一个观点是：《宗团规则》（*Serech ha-yahad*，简称S）是有历史变迁的，就是说，1号洞的《宗团规则》（1QS）是4号洞《宗团规则》两份抄本（4QS^{b,d}）后来的扩展，但是，这不是解释《宗团规则》（S）发生历史变迁的唯一方式。另一种解释认为1号洞抄本抄写在先，而4号洞的两份《宗团规则》（4QS^{b,d}）则抄写在后，是《宗团规则》的缩略版。菲利普·亚历山大（Philip Alexander）就持这样的观点。亚历山大没有把他认为《宗团规则》（S）发生变化的观点融合到库姆兰宗团历史的总体性描述中，而是猜度说，它可以看作是撒督家族对祭司领导权失去了控制。

然而，这种对撒督人掌权或失权没有多少根据的猜测，不过是对有关宗团历史重建——从《宗团规则》（S）着眼——的复杂问题所作的一种辩解罢了。4号洞《宗团规则》（S）抄本的公开，使得只根据1号洞《宗团规则》所作的库姆兰宗团描述问题多多。除1号洞《宗团规则》外，还有10个来自4号洞的《宗团规则》（S）抄本，1个5号洞的抄本（5Q11），以及其他4个密切相关的文本（4Q265, 4Q275, 4Q279和5Q13）。《宗团规则》（S）无疑是一份重要文献，因为它在多达200年的时间里不断地被抄写，最早的抄本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150年至公元前100年（4QpapS[a] [4Q255]），而最晚可上溯至公元1年至公元50年（4QS[h] [4Q262]）。根据编辑该文本的亚历山大和韦尔迈什的研究，《宗团规则》有4个版本：A（1QS）；B，而B又进一步划分为B1（4QS[b]）和B2（4QS[d]）；C（4QS[e]）和D（4QS[g]）（见《犹地亚沙漠的发现》36）。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4种版本的《宗团规则》重构一个宗团吗？用这种方式来调和这4个版本站得住脚吗？它们反映的是不同的宗团吗？德·沃在其书的结尾处暗示了一种方法，以此解释古典时期的文献中关于艾赛尼派的记述和从古卷中重建的宗团面貌之间的差别。他指出：艾赛尼派“经历了一场进化”，“其自身包含了几种不同的发展趋向”，因为该宗团的生活已经被考古学“追踪了大约两个世纪”。

现在回到韦尔迈什对该宗团的描述。韦尔迈什表示，该宗团有公会会计（Bursar），也被称为监督（mebaqqer），负责接收宗团新成员在加入时交来的财产和收入（1QS 6.19—20）。他可能和导师是同一个人。但是，就其被赋予管理不动产的具体职责而言，韦尔迈什猜测，导师很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新来的人把财产交给会计，由他登记入账并单独保管，因为他们尚未成为宗团的正式成员。

隐修兄弟会的主要机构是“宗团议会”（*‘atsat ha-yahad*），但是，《宗团规则》却没有明文规定其构成人员。据1QS 6.8—10记载：“所有人”都按品级就座，每个人都要把他的知识贡献给“宗团议会”。在这里，“宗团议会”就等于整个宗团（1QS 6.14—15；参考5.7—8）。然而，在第8栏中，宗团议会就不是指“所有人”，而是指选出

来的由12名男子和3名精通法律事务的祭司组成的团体（1—4行）。韦尔迈什对此模糊不清的说法存而不论，声称：“不论构成该派核心的是全体人员，还是代表12个支派和3个利未家族的该派领导人的最少法定人数，抑或是议会内个别的精英分子……都是可以质疑的”（第79页）。

从几项功能上看，该议会颇似现代的委员会、法院和录取办公室。议会开会的程序包括有关法律的辩论、当下事务的讨论、决定接受还是拒绝新加入者（1QS 6.13—23）、违规听证、犯法判决以及对每个成员一年一度的评估（1QS 5.23—24）。会议有严格的程序：一定要举止得体，讲话要按等级顺序（1QS 6.8—13）。违规行为要按严重程度受罚，惩罚和所犯罪责相当，包括驱逐、苦修、减少口粮等（1QS 6.24—7.25）。因此，例如，假如某人有意或无意地违反了摩西律法中的一句话，他就会遭到放逐（1QS 8.22）。较轻的犯规，如在开会时公然大笑，会受到较轻的惩罚——苦修30天（1QS 7.14）。

来自4号洞的《宗团规则》（S）抄本再次就这一刑法典的本质提出了诸多难解的问题（1QS 6.24—7.25）。例如，有人违反了暴露私处的禁令，有条文（1QS 6.13—14）规定判处30天苦修。关于该宗派成员是有意还是无意暴露私处的，学者们有争议。争议的核心是希伯来词*yad* 的含义。*yad* 的字面意思是“手”，但是，它也可被理解为“阴茎”的委婉说法。根据依丽莎·齐慕隆和詹姆士·查尔斯沃斯的说法，无论是故意“使其阴茎（*yado*）从衣服底下露出”还是允许“其裸体”（*ervah*）通过衣服上的洞被人看到，他都将被判30天苦修。这一解释中涉及两种猥亵行为，一是故意暴露阴茎，一是透过破烂的衣服让人看到其裸体。但是，亚历山大和韦尔迈什认为这是非故意违禁；当那人从有洞的衣服底下伸出手时，其裸体被无意地暴露了。这后一种解释更为可信，否则，“其裸体”就是同义反复了。

对我们的目的而言更为重要的是，1QS规定的处罚是“30天”，而4QS[e]（4Q259）则规定处罚“60天”。同一个宗团同时使用两部刑法典，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差别肯定反映了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宗团。但是，我们如何解释其发展呢？该宗派变得更宽容了呢，还是实

行了更为严格的习惯法典？《宗团规则》抄本的日期，即1QS抄于哈斯蒙尼时代（公元前100—前75年），而4QS[e] 则抄于哈斯蒙尼晚期或希律王初期（公元前50—前25年），对于确定法典写成的日期并非是可靠的依据。然而，约瑟夫斯提供了一条线索：

> 那些犯有严重过错的人被驱逐出团体。以这种方式被驱逐的个人常常无法逃脱最悲惨的命运——死亡，因为在誓言和习俗的约束下，他甚至不能分享别人的食物。他们有时也出于怜悯而带回来不少奄奄一息的人，断定濒于死亡的折磨足以抵偿他们的过错了。
>
> （《犹太战记》2. 144）

在这段话中，约瑟夫斯明确表示，艾赛尼人不得不出于怜悯的缘故而调整其惩罚。因为艾赛尼人遵守他们的誓言和习惯而不吃外人的食物，所以，被逐出宗团会导致性命攸关的后果。约瑟夫斯没有明说所犯的罪过，只说它们是造成驱逐的“严重过错”。驱逐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永久性的。但是，基于同情的原因，在被逐之人“奄奄一息”之际，许多人又被“带回来”了。诚然，这段话并非关于轻微的犯过，如不光彩的暴露私处，我们不知道基于同情的宽宥是不是宗团法纪尺度的放宽的一部分。但是，这件事确实表明，艾赛尼派可以调整其刑罚，实际上他们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是不是因为事后觉得对暴露私处的不体面行为惩罚得过于严厉，于是也将惩罚从60天减到30天呢？约瑟夫·鲍姆加登在注解刑法典时也这样说：在已婚宗派成员的宗团纪律方面，或许“有一个发展变化，不像早期那样严酷。”

要加入该宗团，须经历一个入会程序。韦尔迈什对考验期的长短不确定，说“起码两年，也许三年或更久。”显而易见，这是由于各个阶段——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完成期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然而，1QS 6.13—24明确了一个历时两年的过程：每一个自愿加入本宗团的人，都将接受监督对其见解和行为的检验；如果适合，监督就教之以“宗团律令”（*mishpatey ha-yahad*）；然后会就申请人的“言谈”征求“很多人”，甚至全体会众的意见；如果他注定要入会，他将被允许

光顾宗团议会，但是，直到“一周年”期满，他才可以接触公会的洁净食物。第二年，该申请人将把自己的财产上交会计，由他登记注册并单独保管，这是进一步融入宗团的必要步骤。但是，他仍然不允许使用公会的饮水，因为水是更高一级的洁净物。第二年过后，而且只有因为他命该入会后，他才会被完全吸收进宗团——登记到兄弟们的名单中，在律法、公义和洁净饭食方面确定其等级次序。其财产将并入公会财产，而对他的评判从此也归宗团所有。

约瑟夫斯在《犹太战记》（2.137—142）中假想了艾赛尼派的入会程序，他说的入会期是三年。申请人在宗团“外面等待”一年，以便学习艾赛尼的生活方式。他会得到一把短柄小斧、一块缠腰布和一身白色外衣。他可以参加洁净洗浴，但还不能进入私密处所。如果他证明自己适合入会，其品行将在未来两年中得到考验，然后才“被永远地接受为团体成员”。最后，在分享公共食物之前，他还必须发誓对上帝虔敬，对兄弟们忠诚。

在以上两种记叙中，有几处细节或是存在分歧，或是有的在一处表述中提到过，而另一处则没有提及。其中，主要分歧是入会期的年限是两年还是三年。一种答案是不算申请人在宗团“外面等待”的那一年，这样一来，每一种记述所说的就都成了两年，从而消除了两处记述的不同。另一个答案是：约瑟夫斯完全记错了艾赛尼派的习惯。无论如何，入会程序是艾赛尼派与古卷宗团之间的一个重要结合点。正如约翰·J. 柯林斯（John J. Collins）所说：

> 然而，两种程序之间的大致相似性仍然给人以深刻印象，尤其是因为，在实行古犹太教的其他地方，不存在与此类似的多年的入教程序。

城市的宗派成员

韦尔迈什认为，《大马士革文件》（D）、《圣殿古卷》、《弥赛亚规则》（1QSa）、《战争规则》和《MMT》（某些托拉律令）

描述了一个城市宗派团体，其生活方式与隐修兄弟会的成员大不相同。这些宗派成员居住在意思是“城镇”和“乡村”的“营地”（*mahanot*）里，遍及犹地亚。他们有妻室儿女，经商，因职业缘故他们和其他犹太人以及外邦人建立了联系。他们要求严格遵守律法以及和历法、节日相关的规定，但没有关于他们刻苦学习和解释《托拉》的记载。他们到圣殿献祭，这是他们在沙漠里的兄弟们不会去做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时不时地造访耶路撒冷。

根据《公会规则》[2]（1QSa 1.6—18），韦尔迈什重构了城市宗派生活的不同阶段。他承认，这一规则的本质是弥赛亚主义的（“本规则是面向世界末日时所有以色列会众的”，1QSa 1.1），但它仍然反映了宗团内的实际习俗。因此，宗派成员的结婚年龄为20岁；此后的5年中，男性成员要列席参加听证会和审判会；25岁时，他被准许从事服务于公会的工作；及至30岁，他被认为已然成熟，可以独立承担公会的工作；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衰老时，他的工作负担会相应减轻。

每个城市团体由10名或更多成员组成，由一名祭司（没有祭司时，利未人也可）负责教导他们。祭司精通《静思经》（*sepher he-hagu*），而该书名在其他犹太文献中没有提及（CD 13）。多数学者认为，《静思经》就是摩西律法，书名源自《约书亚记》（1:8）（“这律法书［*sepher ha-torah ha-zeh*］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hagita*］，好使你谨守遵行所写的一切话”）。“营地”的领袖是监督或者叫做“迈巴凯”，他就像“一个羊群中的牧羊人”（CD 13.9），为会众提供教诲和指导。他向他们传授上帝的伟大事迹，根据预备会员的精神考察他们，决定他们的命运。

按韦尔迈什的理解，所有营地的监督与库姆兰的监督是一样的。但他在城市宗派中的作用略有变化。他没有“宗团议会”的帮助，但他确实可以从“以色列团体”（*habur yisra'el*，CD 12.8）的建议中受益。以色列团体这一组织的成员构成没有详细说明。韦尔迈什确信，在“圣约之民”和邪恶的外人（他们被蔑称为“黎明之子”或“深渊之子”）之间不可能发生社会交往和没有理由的商业交易。

《宗团规则》里说的“宗团议会”这类组织，在《大马士革文件》中从未提及。相反，违规和调查之类的事由10位“公会法官”（*mishpatey ha-’edah*）实施，其中4名来自利未和亚伦支派，6位来自以色列，他们的年龄必须在25岁至60岁之间（CD 10.4—13）。如《大马士革文件》所列举的那样，城市宗派成员实行的种种律法和刑法，涵盖了有关起誓、作证、守安息日以及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种种交往等方面的规定。严厉的惩罚包括判处死刑，轻微的犯过则要遭受牢狱之苦。

他们从内部会员中吸收成员，以充实和更新团体。达到录用年龄的成年子女将立下“圣约誓言”（CD 15.6—6）。《弥赛亚规则》规定，凡在立约人家庭长大成人的青年，都将在年满20岁时被录用，并且会给他们分派一些自己家族和神圣公会的任务（1QSa 1.6—9）。韦尔迈什认为，新成员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外人，即那些为其腐化的生活方式忏悔的人（CD 15.5—14）。他推理说，“在他站到监督面前之前，任何人都不应把法规的内容告诉他”（CD 15.10—11）这句话几乎不可能用于一个在与宗团关系密切的群体中成长起来的人身上。

无论如何，城市宗团没有像沙漠宗团那样要求志愿者执行精心设计的入会程序。监督的确会考察外来人，而申请者也必须受誓言的约束，要回归摩西律法。一个人在发誓悔改其行事方式的那一天，必须按照《禧年与星期时令划分录》（CD 16.2—4）中测定的精确时间来过安息日、喜庆日和节日这些神圣的时刻。该书无疑是关于禧年节的书。事实上，《禧年书》（23:11）是被当作权威经文来引用的，目的是支持城市宗派的观点：即公会的法官不宜超过60岁，因为上帝早已规定“他们的理解力甚至会在其寿数终结前离去”（CD 10.7—10）！

隐修兄弟会和城市宗派之间的差别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一个位于城市，一个位于沙漠之中；一个以家庭的形式生活，一个则生活在宗团中；一个参加圣殿献祭仪式，一个在库姆兰献祭；城市的违法者被法官判处死刑或监禁，而监督和议会则把不端者逐出宗团或减少其食物供给；公饭桌对于隐修兄弟会很重要，而对于允许结婚的宗团

成员则不必要；加入沙漠宗团者需要数年的入会期，需要接受有关两种灵魂的教义，而这些在城市营地则无对应者；城市宗团有私人财产，而在沙漠则一切公有。由于这些差别，有的学者，如戴维斯（Philip Davies）断定他们是彼此不同的两个宗团：《宗团规则》的宗团和大马士革的宗团。

尽管存在以上差别，但韦尔迈什仍然认为，这两个宗团之间存在一种纽带：它们都声称代表以色列；都奉行撒督祭司权；监督即“迈巴凯”在两个团体中都是教师兼行政官；加入宗团需要先接受圣约；每一个成员都要接受年度考核；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都使用非正统的阳历，而不使用犹太人法定的阴历。

在我看来，由于缺乏更好的解释，韦尔迈什对隐修兄弟会和城市宗团的描述，仍然可以作为理解这两个宗团的模型。它既说明了这两个团体习俗上的不同，也谈到了其共同点。人们可以就其阐述的一些细节提出质疑，例如弄不清CD（25岁—60岁）和1QSa（30岁—60岁）所载的法官年龄。但是，韦尔迈什的分析的确解释了其中相互重叠和相互区别的特征。此外，约瑟夫斯的记载坚定了他对历史的重新建构。约瑟夫斯说：“另有一个艾赛尼支派存在，他们尽管在生活方式、习惯和风俗诸方面彼此一致，但在婚姻问题上则有区别”（《犹太战记》2.160）。城市宗团的已婚状态要求改变其生活方式。我们不知道隐修派和城市宗团成员是否有机会交往。有人提出，每年一度的圣约更新庆典或许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但这些也不过是猜测罢了，因为库姆兰公墓发现的几具妇女儿童的骸骨对于这种可能性只是无声的证据而已（即没有任何文字上的证据）。

在这一点上，库姆兰学中尚有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自1991年以来，以及未发表的4号洞古卷公开以来，学者们的主要任务是编辑残片和出版研究工具（考据性版本、影像和索引数据库）。现在这些基础工作已经告竣，学术研究的焦点已经转向新材料的评价和整合。然而，在我们能够完全根据古卷重构历史上的宗团之前，必须分析这些文本的性质及其文字上的发展。《宗团规则》和《大马士革文件》（D）这两种宗团文本，显然不是同一时代写成的，它们由几部分组

成。未来的研究将要求就所有相关文本作彻底的形式考证分析。

宗团的起源

或许可以说，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最大变化是关于库姆兰宗团之起源这一课题。多数学者仍然认为，《大马士革文件》的开篇警示以某种方式描述了该宗团的起源：

> “在上帝发怒的岁月，即在上帝把他们（犹太人）交付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之手后390年，他（上帝）造访了他们，使以色列和亚伦族内树根萌发，好让他们继承他的地，并使他地上善事昌隆。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罪孽，承认自己是罪人，在20年里，就像瞎子那样摸索着行路。上帝看到了他们的行为，他们一心追寻上帝，上帝从他们中间培养了“一位公义导师”（a Teacher of Righteousness），以指导他们在上帝之心的路上行走。”
>
> （CD 1.5—11）

我们可以从《圣经》文本里找到不少与这一开篇辞遥相呼应的文字，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以西结书》（4.5—10）中所说的390年上帝发怒的岁月。假如按字面上说的年数算，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流散算起，那么，那“树根”，即遗民的象征性指称，是于公元前196年萌发的。如果将“该公义导师”（the Teacher of Righteouness，前面引文中用不定冠词a属于诗歌风格）即该宗团重建者出现之前像瞎子一样“摸索着行路”的20年从这个数字中减去，那么，字面上的年代计算会把宗团重建的日期确定在公元前176年。

但是，这个年份远在约拿单或西缅·马加比时代之前，他们就是学者们所确认的“邪恶祭司”——“公义导师”的主要反对者。赞同马加比理论的人则指出，《以西结书》（4）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它指的是一个总的惩罚阶段。然而，这些学者也宣称，《大马士革文件》警示辞包含的历史信息把宗团起源指向了公元前2世纪中叶。他们是怎样知道这一点的？事实上，一旦抛开字面意义，CD1中就没有明确

的数字依据能把遗民存在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150年。

另一种马加比理论把宗团的出现确定在反对塞琉古王朝的起义时期，这是通过确定宗团的反对派的领袖身份来建立的。“邪恶祭司”（*ha-cohen ha-rasha*）是“排舍瑞姆”加诸宗团敌对者的一个贬义别号。这个理论说，虔敬者认为约拿单·马加比和西缅·马加比非法占据了大祭司职位，因为他们不是撒督家族的人。然而，至少一份《宗团规则》的古卷并没有提及任何撒督家族的人。还有，正如柯林斯所指出的：非法窃取职位并非古卷所关心的事情；《宗团规则》和《大马士革文件》也都不重视该事。所谓非法窃权的问题源于虔敬派，他们在诠释《马加比传上》（7.14ff）时拒绝犹大（马加比）而赞成阿尔希姆[3]（Alcimus）。

近年来，一种相反的理论引起了不少关注。根据弗洛伦蒂·加西亚－马丁内斯（Florentino Garcia-Martinez）和已故的亚当·范·德尔·武德（Adam van der Woude）的格罗尼根假说（这两位学者都曾工作于荷兰城市格罗尼根），库姆兰宗团的形成期可以上溯至由安条克·埃皮法尼斯于公元前175年突然引发的宗教危机之前。艾赛尼派的起源和库姆兰宗团的形成期不可区分。两者都地处巴勒斯坦，皆植根于流散后犹太教的启示运动，而这些从《以诺上》（90）得以证实，它描述道，在第III阶段末一个团体诞生了。

格罗尼根假说提出了艾赛尼派、库姆兰宗团以及以埃及北部为基地的另一个犹太宗派特拉拍塔之间的一种关系。据此，艾赛尼派属于母亲宗团，而库姆兰和特拉拍塔则是女儿宗派。这个说法很好地解释了三个团体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颇有用处的是，格罗尼根假说在“邪恶祭司”和“撒谎者”之间作了区分，认为他们不是同一个人，而是库姆兰宗团的两个不同的反对者：前者是名声不佳的大祭司，后者是与之对抗的一个律法教师。[4] 格罗尼根假说的一个不怎么有说服力的观点是，“邪恶祭司”不是一个人，而是连续6个大祭司的称谓。

注释

〔1〕 CD，即《开罗大马士革文件》，参见P153注释1。

〔2〕 即上一段提及的《弥赛亚规则》，是死海古卷中带有两页文字的残片，曾被看作是《宗团规则》的附录，其中勾画了未来弥赛亚时代以色列人的社会秩序和等级。

〔3〕 阿尔希姆是希腊化的犹太人，曾被任命为以色列的大祭司（公元前162—前159年），其间率军与马加比指挥的犹太军队作战，是犹太人的叛徒。

〔4〕 “邪恶祭司”和“撒谎者”是死海古卷评注中出现的蔑称，是古卷研究者们颇感费解的一个疑点。前者希伯来语为*ha-cohen ha-rasha*，指“公义导师”的对立面；后者希伯来语为*mattiph ha-cazab*，意思是“说谎的人”。对“撒谎者”的有些描写令人感觉他与“邪恶祭司”是同一个人，如撒谎者“用鲜血建立他的名利之城”（《哈巴谷书注释》10.10）。但有些学者将这二者分开，认为他们分别指不同的两个人，甚至是不同的两类人。

第九章

库姆兰宗团的宗教信仰

在描述库姆兰宗团的某些重要教义之前，我们须知，犹太教并不像基督教那样是一个教义性宗教，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犹太教不要求赞同一套信条和教义。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与犹太人的一套习俗和社会资格相吻合。直到中世纪的迈蒙尼德[1]（Maimonides）提出了13信条，传统犹太教才拥有一套共同的信仰声明。

犹太教也不成体系，它没有“系统神学”的传统，不以一以贯之的态度讨论诸如上帝的知识、复活、来世之类的话题。例如，规模庞大的拉比文献并无一章一节专门概括犹太教的信仰。正如乌尔巴赫（Ephraim Urbach）所说：

> 所有文献共有的一个事实是，它们都没有系统地处理信仰和概念的主题，在处理单个主题时，几乎不存在连续性的讨论。

但是，他们的确有共同的信仰，尽管宗教思想只能从律法的无数细节中梳理出来。

两种灵魂的教义

在库姆兰古卷中，许许多多教义同样散见于各处。但是，《宗团规则》中有一段话例外。它几乎可以说是对宗团的宗教思想的“系统”表述。在今天所谓的“两种灵魂的教义”中，导师教导所有的“光明之子”什么是人的品质、灵魂、行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奖赏或惩罚（1QS 3.13—4.25）。该文件开宗明义地说：

> “从上帝的知识产生出一切现在和将来的存在。在它们存在之前，上帝确立了有关它们的完整设计，当命令发出时，它们便变成为存在了。这符合上帝的伟大设计——存在物一成不变地完成其任务。”
>
> （15—16行）

这里表述的决定论在约瑟夫斯那里得到了确证，他报告说：撒都该派不承认命运，法利赛人则认为有的事情是预先命定的，有的则不是，而艾赛尼派则“使命运成为万物的情妇，且认为除非命该如此，任何事情都不会被看成是人。”（《犹太人古代史》13.171—172）

在两种灵魂的教义中，据说上帝根据他赐予人的灵魂的不同而把人类分为两部分。那些具有不义灵魂的人属于黑暗，由黑暗天使率领，而那些具有真理灵魂的人属于光明，由光明之君统辖。将所有人分为两大群体的做法，常常被说成是“伦理二元论”，是以生命的决定论为基础的。即使黑暗天使把某个公义之子引入歧途，这种变节行为的发生也是“和上帝的秘义协调一致的”（3.20—23）。

体现在两种灵魂教义中的这种二元论具有宇宙、人类和灵魂的维度：光明之君和黑暗天使对立；人类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涌现于光的源泉”，另一个“生于黑暗之源涌流的不义”；真理与不义这两种灵魂“在人的心里”挣扎。库姆兰宗团注定属于光明之子，而每一个成员的灵性价值都可以由他的身形外貌决定，对此，一个宗团相学文本有所阐述。

4Q186是一段引人入胜的文本，它用人的外貌来描述人的内在灵性特征。这个文本用密码写成，包含希伯来字母、希腊字母以及别的隐秘符号，以反序和镜中影像的方式书写而成。解码后发现，这些残片描述了3个不同外貌的人，说明了每人身上存在的灵性光明和黑暗的多寡。每个人的灵魂总值是9，这是一个随意挑选的奇数，避免了光明与黑暗在量上的均衡。第一个人是邪恶的：

> 他的头……［与脸颊］胖大，牙齿参差不齐，手指粗壮，大腿粗壮多毛，而且两条腿都这样，脚趾又粗又短。他的灵魂八（部分）来自黑暗之所，一部分来自光明之所……
>
> （残片1）

第二类型是善的：

他的眼睛乌黑，明亮……他的声音柔和，牙齿精致整齐。他的个头不高也不矮……他的手指修长，大腿光滑，［脚趾］排列整齐。他的灵魂八（部分）来自［光明之所的］第二根柱子，一部分［在黑暗之所中］。

（残片2）

最后，第三个人则介于以上两者之间：

他的大腿瘦长，脚趾也瘦长。他来自第二根柱子。他的灵魂六（部分）来自光明之所，三（部分）来自黑暗的深渊。

（残片1）

对于我们来说，把灵性的价值等同于可人心意的身体属性，初看起来，似乎有些怪诞，但事实上，它和我们根据第一印象来判断人没有多大差别。无论如何，库姆兰宗团采用的是这种方法来考查那些有意加入其行列的志愿者。

在最后的时代，真理将在世界上永远崛起，上帝将净化人的灵魂和行为，因为上帝“已经以永久性的圣约选择了他们，亚当的荣耀将属于他们”（4.22—23）。就是说，与真理的胜利相伴随的是“乐园的失而复得”。

人类灵性历史的这一顶峰暗指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概念，即神的拣选和圣约。就我们可想见的而言，所有的古代犹太人都认为他们属于上帝的选民，而这一拣选是由订立的诸多契约（或神圣的协议）所确认的，这样的契约贯穿于《圣经》的全部历史，是在雅威和以色列人个体或民族之间订立的：大洪水之后和挪亚订立了约（《创世记》9.1—17）、与多国之父亚伯拉罕订立了约（《创世记》17.1—4）、和作为上帝之民的以色列人订立了约（《出埃及记》19—24），和非尼哈（Phinehas，《民数记》25）立了约、和利未人立了约（《马拉基书》2.4—5）、与大卫王立了约（《撒母耳记下》7；《诗篇》78.67—72）。这种契约的关系可以是无条件的、永久的，或者说，它要求对神之诫命的服从，犯禁则惩罚不怠。

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以色列人常常迷失方向，这时先知就站

出来宣布忏悔之言。这个对库姆兰宗团特别重要的契约关系的一个发展是“遗民”或“真以色列人”的概念。遗民神学[2]假定了一个以色列人的核心，他们仍然忠于雅威。在圣经文本中，“遗民”的意思是毁灭后残留的幸存者，挪亚及其家人（《创世记》7.23）就是其典型。通过神学化这一概念，《先知书》赋予了“遗民”以对未来之期盼的信仰（《以赛亚书》10.20—21）。

新的圣约

《耶利米书》31章31—34节应该被单独挑选出来作为对库姆兰宗团至关重要的一篇圣经经文，因为它表达了雅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了新的圣约”这一观点（第31节）。这一圣约的新颖之处在于这样的信念：律法将被置于人们中间，写在人们的心里。通过宣布这一新的约定，该章显然是在倡导把《托拉》的教导置之一旁（第34节）。由此可知，保罗书信中的反律法主义倾向接受了这一观点，就不足为奇了。[3]

库姆兰古卷数次提及“新的圣约”，而且在《大马士革文件》（CD 8.20—21）中明确指称《耶利米书》为其来源（参考Ms B 19.33—35）。然而，这里所谓的“新的圣约”（*berit hadasha*）应该被理解为“接续的圣约”。塔尔门（Shemaryahu Talmon）洞察到，这里所说的圣约是古代祖先的圣约。《大马士革文件》一开始就这样说：

> 现在，你们所有懂得公义的人们请倾听且思考上帝的话语。上帝与所有的人发生了争论，他将谴责那些蔑视他的人。因为当人们对他不忠且背弃了他的时候，他在以色列人和圣所中掩起了面孔，并将他们抛向刀剑。但是，由于记得先祖的圣约，他使以色列留有遗民，没有让这个民族陷于灭绝。
>
> （CD 1.1—5）

换言之，当库姆兰宗团使用“新的圣约”这个说法时，他们对它的理解并不是像《新约》那样把它理解为一种展示神意过程中的新按排

或新阶段。更准确地说，“新”取的是“接续”的意思。

古典时期的资料并没有提及新的圣约或遗民与艾赛尼派有关。这一点不足为怪，因为约瑟夫斯和斐洛的读者群是希腊人，主要是非犹太人。举例来说，前者提到毕达哥拉斯派（Pythagoreans）（见《犹太人古代史》15.371）和大夏人（Dacian，同上书18.22）是为了把他们比作艾赛尼人。约瑟夫斯只记载说，艾赛尼人尊敬祖先的律法（《犹太战记》2.159），而斐洛则“借助于象征”记载他们对《圣经》的诠释[4]（《每个正直的人都是自由的》，82）。

由于有了库姆兰古卷，我们现在对于第二圣殿时期，尤其是公元前200年至公元70年之间的犹太宗教信仰的认识，比过去大大丰富了。古卷深刻地为我们揭示了宗团主义的兴盛，为我们提供了其中艾赛尼一派的实有文献。

注释

〔1〕 迈蒙尼德是中世纪最著名的犹太神学家和哲学家。他提出了犹太教的13则信条：1．信仰上帝的存在；2．信仰上帝的一体性；3．相信上帝是非物质的；4．相信上帝是永恒的；5．相信唯一的上帝才是崇拜的对象；6．相信预言；7．相信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8．相信《托拉》是神性的；9．相信《托拉》是不变的；10．相信上帝知道人的思想和行为；11．相信上帝奖善惩恶；12．信仰弥赛亚（救世主）的降临；13．相信死者的复活。这13信条后来被犹太教编入祈祷书，被传统犹太教视为权威的教条。

〔2〕 指关于劫后幸存者未来得救赎学说。

〔3〕 《托拉》即书写下来的摩西律法，而《耶利米书》（31）提到“新的圣约”指的不是已有的成文律法，而是将有写在以色列人心里的律法。这带有把摩西律法“放置一旁”的意思。《新约》保罗书信《哥林多后书》（3）也说：“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版上。”保罗的这些话表明他受到了《耶利米书》的影响。基督教认为，《新约》是上帝与耶稣基督所立的约，它取代或超越了摩西律法，即《旧约》，而犹太人认为，《耶利米书》提到的“新约”是接续摩西律法，而不是取而代之的。

〔4〕 亚力山大里亚的斐洛（公元前20年—公元50年），是第一位犹太哲学家。他用寓意解经法诠释《圣经》，认为《圣经》中的许多故事和事物都是比喻或象征，蕴含着深刻的隐秘意义。

第十章

古卷与早期基督教

如果说媒体的关注和炒作是可以逝去并忘怀的，那么，毫无疑问，古卷研究最敏感的方面关系到古卷与早期基督教教会起源之间的联系。正如在本书开篇第一章所提到的那样，即使稍有争议，特别是涉及梵蒂冈的争议，都会让记者们急急忙忙地前去调查。公众对于涉及死海古卷的各种阴谋依然兴趣盎然。秘密、幕后交易和添油加醋的篡改投合了人们的心理：渴求一睹隐藏在井然有序、组织得当的现有宗教大厦背后充斥着政治、宗教阴谋的隐秘世界。

无需远求即可找到此类耸人听闻的主张。以芭芭拉·蒂林（Barbara Thiering）的畅销书《耶稣其人》（1992）为例。该书旨在表明，耶稣并未死在十字架上，而是活了下来，并且娶了马利亚·抹大拉（Mary Magdalene）为妻，成了7个孩子的父亲。蒂林以“排舍”法解密福音故事，该书即以蒂林对此方法的理解为基础。除了在让人想起希伯来词语这方面一致外，她的方法与库姆兰宗团实际使用的“排舍”法并无多少相似之处。古代宗团成员理解旧有的先知文本，以便预言他们所处时代行将发生的事件。例如，《哈巴谷书》预言中所称的“迦勒底人”被看作他们那个时代的哥特人，即在公元前63年控制了古代近东的罗马人。相反，蒂林把“排舍”理解为一种解密《新约》文字以揭示隐含秘义的字面解字法，她运用此法随心所欲地重构了公元1世纪世界的另一部历史。

关乎基督教的古卷

蒂林的著作主要基于对库姆兰古卷的间接使用。她特意在宗团的圣经注解中找到一种方法，并利用它来解释《福音书》。另外有些学者更为直截了当：或者假设有的古卷事实上就是《新约》文献，或者说它们证实了一个像耶稣那样的弥赛亚式人物的存在。

《新约》古卷？

1992年，卡斯滕·彼得·提德（Carsten Peter Thiede）就古卷的两小块残片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宣称它们是《新约》文本。7号洞与众不同，因为其中保存的只有希腊语文献。提德重新提出了20世纪70年代由乔斯·欧 - 卡拉汉（Jose O'Callaghan）最先提出的一个观点：其中两块残片，即7Q5和7Q4，可以被分别鉴定为《马可福音》（6.52—53）和《提摩太前书》（3.16—4.3）。其中较大的残片7Q5保存了不超过20个完整或不完整的字母，只包含一个完整的单词*kai*，希腊语的意思是“和”（and）。尽管保存的信息如此之少，而且明显缺乏显著特征，提德仍然论证说，7Q5可以被复原为《福音书》中的段落，描写的是耶稣在加利利海或革尼撒勒湖的水面上奇迹般的行走，正如《马可福音》（6）最后所讲述的那样。提德把7Q5翻译为：

图15　7号洞所藏带有希腊字母的小残片

……明白那些面包，它们的心是僵硬的。当它们穿越过去后，就踏在革尼撒勒湖上，并且抛锚在那里。当它们得到……

要这样做，他必须假定一个未经证实的文本变体。和所有其他的证据相反，7Q5并没有写着*epi ten gen*（希腊文状语短语“踏在”的意思）以补充动词“抛锚”。还有，意为“它们穿越过去后”的原希腊语动词需要从字母delta到tau，即从*diaperassantes* 到*tiaperassantes* 的第一个声音发生变化。提德假设中最成问题的是，即使现有5行字的左右两边都没有保留空白，7Q5的篇幅也不过在20至23个字母之间。提德在计算字母数目时沿用了欧 - 卡拉汉的方法，把7Q5和7Q1（等于《出埃及记》28.4—7）及7Q2（等于《耶利米书》6.43—44）相比较，而这两处的篇幅在16至23个字母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可疑的做法。不能仅仅因为这3块残片都是在同一个洞里发现的，就认为这一假设，即它们具有相同的篇幅，是有道理的。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篇幅，即使那些抄写在同一卷轴上的文本也是如此。另有学者把以上残片确定为希腊文《以诺上》的文本。从如此少的证据读出如此多的意蕴，实在是应该慎之又慎。

“遇害弥赛亚”的文本

如在本书开篇提到的那样，在“古卷争夺战”余波中最引人注目的说法之一是发现了一份明显是在描写一位濒临死亡的弥赛亚式人物的文本（图16）。相关的文本是4Q285，残片5（现被重新编号为残片7）。这块损坏严重的残片包含6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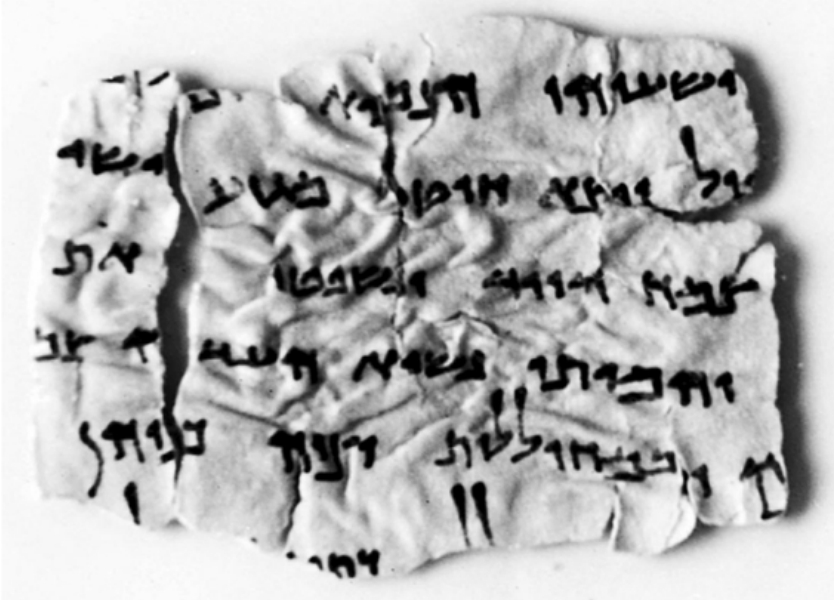

图16　4号洞所藏之所谓“遇害弥赛亚”的残片

1　[正如] 以赛亚先知 [在书中所写] ： [树林中的灌木] 将被 [斧头] 砍
[倒，黎巴嫩将因权威的人2 而陷] 落。将从耶西的树桩之间射出一支箭 [……]
3 大卫一支，他们将进入判决 [……] 4 公会首领， [大卫一支] 将 [用击打] 和
伤害将他致死 [……] 5 。一个 [有名的？] 祭司将号令6 [……这哥] 特人中的
被杀 [者] 。

米歇尔·怀斯和罗伯特·艾森曼曾经对媒体表示，这一残片描写的是一个濒临死亡或被杀害了的弥赛亚。就我所知，他们的意见从未发表在学术刊物上。正如我们现在所知，4Q285是一条战争规则，约由10块残片构成。上一段翻译反映了当今学术界公认的看法。1991年时，争论围绕着如何解读第4行展开。怀斯和艾森曼表示，它的意思是：“他们将杀死公会首领”，该首领也在古卷的其他地方被提到，而在本段中，他是与《以赛亚书》（10.34—11.1）中的弥赛亚宣言相联系的。然而，本书第1章提到的牛津大学的一个研讨会得出的结论是：应该这样读：“公会首领将把他杀死”。这就是说，弥赛亚式的首领将不会被处死，相反，他将杀死别人，一个不为人知的遇难者。

怎么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解释呢？要明白这些困难，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到，死海古卷中的希伯来语没有元音，无法读出声。这意味着它们只是由辅音写成的，尽管有被称为*matres lectionis* 的“阅读帮助”。阅读下面这段只用辅音和y写成的英语句子将有类似的体验：

My lvs lk rd rd rs thts nwly sprng n jn

英语原文是：

My luv'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1]

缺少发声法会导致意义模糊。拿辅音rd为例。它们可以读作red（红色的）、ride（骑、乘）、rode（系锚链）、rod（杆）、rood（耶稣受难像）、road（道路）、raid（袭击）、reed（芦苇），等等。希伯来语法还有另外一个英语所没有的特征，即不管是主格还是宾格，都可以直接在动词末尾添加后缀。

在上面提到的残片4Q285中，“处死”这个动词带有*hmytw* 这些辅音，它可以通过加上元音而成为*hemytu* ，把最后一个字母w变成第三人称复数形式的元音u；也可以写成*hemyto* ，这就把w变成宾语性的后缀o或“他”。前者可以构成句子“他们将杀死（或已杀死）公会首领”，后者可以构成句子“公会首领将杀死（或已杀死）他”。因为这个动词之前还有一个连词，所以，这句话应该译成过去时还是将来时就更加模棱两可。

从语法上看，两种解读都是可能的。认为一种比另一种更可取的主要理由是，在古卷提及公会首领的所有其他段落中，他都被描写成得胜的弥赛亚。事实上，在《以赛亚书》的注释4QpIsa[a] 和《祝词规则》1QSb中，公会首领都被描写成胜利者的形象，他实现的正是《以赛亚书》（10—11）所发出的那个圣经预言。[2]

共同的宗团母体

将古卷与基督教直接联系起来的这两种尝试都失败了。在过去的岁月里，其他几种尝试也被提出过，但一样没有说服力。在我看来，

有一个更好的模式，即把艾赛尼派、沙漠里的库姆兰宗团、城市宗团、耶路撒冷教会和保罗公会，统统看作共有一个宗团母体的不同团体。在他们之外，还存在别的团体。这个宗团母体包含的因素是：与主体分离、组成团体、宗教观念、以及选择最可意的护教经文以使宗派存在合法化。这些团体从《希伯来圣经》即《旧约》中吸取灵感。这样做后他们就与第二圣殿后期的其他犹太人共享这共同的遗产。但是，他们还是宗派分子——须知，耶稣的门徒最初也被视为“道”（the Way）的信徒——他们就是这样遵行一套既相似又有区别的信仰。他们关注某些经文段落，如《以赛亚书》（40）、《耶利米书》（31）以及《哈巴谷书》（2.4），但是，他们从中吸取不同的教益。

耶路撒冷教会 [3]

多年以来，耶路撒冷杜米仙修道院的副院长贝伊尔·匹克斯诺神父（Father Bargil Pixner）一直在试图求证耶路撒冷教会旧址旁边曾经有一个艾赛尼居民区，而且他还相信，“最后的晚餐”就发生在那里。他的立论根据是：在锡安山上的德国人墓地里已确认有一个“艾赛尼大门”（the Essene Gate）。约瑟夫斯在其《犹太战记》（5.144—145）中描述过罗马人围困圣城时的耶路撒冷第一城墙（共有三面城墙）的情形。他的描述始于西匹克斯塔，即现在的城堡所在地，逐渐向东而写到一个名为克斯图斯的地方，然后在圣殿西门处停笔。从西匹克斯塔开始，他的描述又沿墙向西、向南，穿过一个被称为百特扫的地方到达“艾赛尼大门”。然后，城墙继续向南延伸，经过西罗姆喷泉，描写继而沿墙向东，最后向北到达圣殿的东门。

开始于北面的西匹克斯塔，第一城墙又延伸到克斯图斯，继而进入议会堂，最后止于圣殿的西门廊。还是从西匹克斯塔开始，而朝另外一个方向，即向西，城墙顺势下降，通过百特扫而达于艾赛尼大门，进而在西罗姆喷泉上方转弯向南；由此，城墙又偏斜向东，朝向所罗门水池，在经过一个名叫奥弗拉斯的处所后，最后进入圣殿的东

门廊。

该门最先是被布利斯（F. J. Bliss）和迪基（A. C. Dickie）在1894年至1895年发掘出土，而后又在1977年至1988年间被贝伊尔·匹克斯诺，多伦·陈（Doron Chen）和什洛莫·毛尔高利特（Shlomo Margalit）重新发掘。该门由精心加工的石头砌成，宽2.66米（或9英尺）；石板、门栓、排水沟迄今仍然可见。匹克斯诺神父的论证是：百特扫就是《圣殿古卷》提到的公厕。这个论证是可能成立的，尽管库姆兰古卷并没有描写真实的圣殿，只描写了理想化的圣殿。旁边的名为“米克瓦”的圣礼浸浴池也和在库姆兰以及别处发现的浴池颇为相似。

马根·布罗什支持这个艾赛尼大门的说法，而且认为，1996年济苏（B. Zissu）对附近一个墓地的发掘将会进一步支持这个理论。显而易见，这个墓地的井墓与库姆兰发现的井墓相似，却和第二圣殿时期的普通墓地“迥然不同”。但是，墓地在4.5公里（3.8英里）以外的地方，位于艾赛尼大门的西南方。还有，库姆兰的丧葬习俗也可以在“恩 - 埃尔 - 古维尔”[4] 找到佐证。根据制陶业方面的证据，该地与库姆兰没有关系。库姆兰的埋葬习俗很可能不是独一无二的，甚至也不是与众不同的。

“艾赛尼大门”这一名称或可成为艾赛尼居住区或场所的进一步证据。耶路撒冷的其他大门都是以其朝向命名的，（例如，大马士革大门、雅法大门，等等），颇似现代高速公路两旁的路标；然而，艾赛尼大门却是以一个宗派的名字命名的。它告诉我们，艾赛尼派的住地就在附近，他们使用这个大门，也许还修建了这个大门。斐洛和约瑟夫斯都记载说，艾赛尼派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城镇和乡村。还有，在阿里斯托布卢斯一世时期，有一位艾赛尼派犹大，他常常在圣殿的院内给弟子上课。住在那里的很可能是艾赛尼派和/或城镇宗派的成员，而不是库姆兰隐修派的成员。

匹克斯诺和雷纳·里斯纳（Rainer Riesner）争辩说，《新约》之《使徒行传》（2.5—6）实际上提到了这些耶路撒冷的艾赛尼分子：“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

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再就是在《使徒行传》（6.7）之中，这两部分的作者路加（Luke）甚至说：“也有许多祭司信了这道。”在匹克斯诺和里斯纳看来，这些文句里的“虔诚”、“许多”和“祭司”等语词，指的就是耶路撒冷的艾赛尼成员。

然而，理查德·鲍克汉姆（Richard Bauckham）对匹克斯诺和里斯纳的观点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批评。他论证说：从《使徒行传》援引出来支持存在一个耶路撒冷艾赛尼团体的文本没有一处反映库姆兰术语：能够翻译希伯来语*hasid*（虔诚、神圣）的希腊词语是*hosios*（神圣），不是*eulabes*（虔诚）；希腊词语*plethos*（众多）在使用时，和库姆兰宗团的自我称呼*ha-rabbim*（希伯来语的“许多”）意义并不相同。再者，《使徒行传》（6.7）提到的“祭司”，可以是许多别的祭司，不一定是艾赛尼成员。

至于耶路撒冷教会的自指名称，鲍克汉姆考察了“道”、“神圣者/圣徒”、“上帝的教会”以及两个据说在意思上相当于“亚哈德”（*yahad*，即“宗团”）的术语。关于前两个术语，他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说是借用，库姆兰宗团和基督教宗团是从共同的《圣经》资料，尤其是《以赛亚书》和《但以理书》（7）获得其术语的。库姆兰古卷使用的*qahal*（集会）或*edah*（公会），更多的是现实反映，而没有耶路撒冷教会被赋予的“上帝的教会”的意思。最后，在耶路撒冷教会的用语中，不存在和库姆兰用语*yahad* 相当的词。

保罗教会 [5]

在库姆兰古卷和早期基督教教会的关系问题上，鲍克汉姆和我在观点上不谋而合。我认为，库姆兰古卷和保罗书信中各种平行的文句，最好是被解释成它们共享了同样的圣经资料和术语，尽管彼此有不同的理解。

以此前讨论过的核心概念——新的圣约为例。不论是库姆兰古卷还是保罗书信，都采纳了《耶利米书》（31.31—34）中相同的段

落，但却赋予它难以调和的含义。你应该还记得“新的圣约”，在库姆兰宗团那里指的是旧的圣约的接续。相反，在保罗书信中，“新的圣约”则是神意在展开过程中的新安排或新阶段，是与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相联系的（“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哥林多前书》11.25）。它涉及一种新的伦理道德行为，即遵循“基督的律法”，还包含一种对犹太教经文的重新解释（《哥林多后书》3）。

当我们把对《耶利米书》（31）的这两种解释放进古代犹太教的历史背景里，就会很容易看到，在只有宗派成员关注新的圣约这一概念的意义上，新的圣约是宗派性的。整个拉比文献都没有理会这个概念；唯一可能的例外是*berit milah*，即关于割礼的约，但是它与《耶利米书》几乎没有关系。即便是我们在不同宗团的文献里找到了引用的同一段关键性的圣经文字，但他们从中吸取的教益为什么不相同呢？对此，宗团母体的模型为我们作出了解释。

艾赛尼派，如果不包括城市宗团成员的话，很可能和1世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建立了联系。“艾赛尼大门”很可能就位于现今被称为锡安山上的艾赛尼居住区附近。但是，迄今尚无决定性的证据证明《新约》提到了耶路撒冷的艾赛尼派。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可能使用过一些术语，它们与库姆兰古卷里发现的术语相同，但是，一经更为仔细的考察便可知道，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可以说，共有的宗团母体概念能更好地解释不同文献中的宗教观念和圣经引文所具有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例如，库姆兰古卷和保罗书信经常暗指同一篇《圣经》文本，但它们的理解方式却大相径庭。库姆兰古卷不是基督教的古卷，但是，把它和《新约》作一比较有助于澄清其特殊性。

注释

〔1〕 英国诗人彭斯的诗：“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王佐良译）。

〔2〕 很可能指《以赛亚书》（11）所说的关于和平国度的预言：“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

〔3〕 耶稣殉难后由其门徒在耶路撒冷建立的最早的基督教教会。据信，彼

得是其发言人，耶稣的弟弟雅各（James）为住持。

〔4〕《新约》中地名“革尼撒勒”的现代称呼。

〔5〕指由使徒保罗创立的教会。在3次远途传教过程中，保罗创立了许多教会，其中哥林多教会和腓立比教会影响很大。

第十一章
最伟大的抄本发现

在基伯特－库姆兰附近山洞里发现古代抄本常常被誉为里程碑式的考古发现。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阐明了《死海古卷》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旧约》即《希伯来圣经》、第二圣殿犹太教以及早期的基督教。作为本书的尾声，我想简要地反思古卷的重要性：它们真的是20世纪最伟大的抄本发现吗？它们配得上这样的赞誉吗？

显而易见，在我看来，“最伟大的抄本发现”这样的宣称，对公众是一回事，对学者则是另一回事。从这样的赞誉中，公众希望看到某种具有“地震”效果的东西，它将颠覆我们对于基督教和犹太教起源的普遍认识；或至少造成某种范式的转换，就像在科学领域中人们接受宇宙的太阳中心说、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提出量子力学那样。这也是为什么古卷中那些和耶稣及其早期门徒其人其事相关的部分会造成轰动效应的部分原因。然而，这类宣称是没有根据的，或者说是严重的误导，公众的期望落空了。

对学者而言，这一赞誉则要具体得多。相对于古犹太史专家和圣经学专家以前在研究该时期时所拥有的证据而言，古卷无异于一种恩赐，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新信息，让我们能够深入研究仅仅一知半解的过去。古卷中也有其他发现，对于研究古代世界和中世纪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要理解古卷的学术意义，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一般来说，历史回溯得越久远，资料信息就越匮乏。在一个信息资料唾手可得的时代，这一点也许难以理解。我们只要点一下鼠标或按一下移动电话按键就可以找到想要了解的机场、宾馆、大学、教堂、圣堂、电影院或俱乐部的相关信息了。那么，为什么我们都会为这卷或那卷布满尘土的古卷或残片的发现而激动不已呢？

死海古卷之所以重要，首要的原因是，它告诉了我们大量有关第二圣殿犹太教和宗派的情况。它们让我们得以了解其内部人员对于与艾赛尼派相关的一个或多个犹太宗派的思想和信仰的看法，而这些宗派可与早期的基督教团体相比照。古卷的首要意义是历史性的，因为今天已经不存在艾赛尼派了，尽管某些当代“新时代”团体确实从艾赛

尼派的宗团思想中获得了启示。

人们一直在争论，说过去的学界有一个成问题的倾向，即用基督教的术语描述古卷中的犹太宗团。劳伦斯·H.　席弗曼主张，库姆兰学界对把古卷基督教化而负有责任。宗团成员并非由一位公义导师兼主教领导的修道士，他们行洗礼、在修道院食堂吃饭、在文书房抄写文献，而是一群遵守律法的犹太人，引领他们的是一位拉比兼公义导师，他们在“米克瓦”即仪式浴池里行洁净礼、吃公共餐、在图书馆里抄写文本。

不可否认的是，席弗曼在描写库姆兰宗团时通过改变其指称术语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于宗团成员的认识。他一直强调库姆兰宗团与拉比犹太教〔1〕之间的连续性，而拉比犹太教是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由拉比界定的一种犹太教。例如，他使用“哈拉哈”即犹太律法，来描述古卷里律法类的论述。但是，他这样做也可能因为解释错宗团的年代而受到质疑，因为“哈拉哈”应该属于库姆兰古卷之后的拉比犹太教。就此而言，他把该宗团“拉比化”，不也难逃其咎吗？

在我看来，无论我们怎样描述库姆兰宗团都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我们明白，我们不过是出于比较的目的而作一些类比。任何此类比较的动机都是以知之甚多者启迪知之甚少者。在这样的背景下，说成员皆由男性组成的宗团都像《宗团规则》中所描述的那样严守工作、学习纪律，从而表现出许多类似于基督教隐修派的特征，当是无可否认的。禁欲主义——只是指出最明显的特征——不是犹太教所奉行的习俗，但在基督教内却有着悠久固定的传统。

死海古卷对于《旧约》即《希伯来圣经》研究也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几乎包含所有《圣经》各篇章的最早的希伯来语和亚兰语抄本。古卷中的手抄本证实了圣经文本的古老性，证实了作为英译《圣经》底本的《马梭列文本》的可靠性，还让我们意外地认识了《圣经》标准化之前的文本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专业的《圣经》研究受益最大，但是，对某些人来说，这些发现对于如何把《圣经》作为上帝的话来理解具有宗教和神学意义。

最后，死海古卷对我们理解早期教会和《新约》具有重要意义。

古卷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或多个同时代团体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从而突出了在历史和神学意义上至关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基督教始于一个犹太宗派。古卷犹如一柄花剑，既显示了共同的《圣经》遗产，还表现了共有的宗派母体和基督教教义的独特性。

无疑，对于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研究和《圣经》研究，死海古卷是20世纪最伟大的抄本发现。古卷还成为了一种文化标志，象征着任何古老而又重要的事物，对此，最好的确证莫过于这样一个事实：你已经读完了本书，或至少读到了最后这一页！

注释

〔1〕 拉比犹太教是圣经犹太教之后以拉比为宗教领袖，以《塔木德》为经典的犹太教。自3世纪初至19世纪，拉比犹太教一直是散居各国的犹太人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指南。

附录

迄今未知的文本

古卷的发现使数百部从来不是为了子孙后代保留下来的文本重见天日。这些文本可以被分为各种各样的文体。这里我只介绍那些最重要的文体。有兴趣读所有非圣经类古卷的读者可以在已出版的各种选集中查找；格萨·韦尔迈什的《英译死海古卷全集》是标准版英译本。

宗派文本

英语的“宗派”（sect）和“宗派主义”（sectarianism）都带有异端邪说、宗教边缘化、政治不满和狂热盲从等负面含义。这些隐含之意大都不适用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00年间兴起的各宗派。那时各宗派更像是集思想和实践于一身的各个学派：他们有惩戒规则和入会程序，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教义，但也与他们从中分离出来的主体人群拥有共同的信仰和习俗。

学者们相信，古卷中有无数文本描绘了艾赛尼派的库姆兰宗团。这种观点取决于基伯特 - 库姆兰遗址与山洞中发现的古卷以及艾赛尼宗派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如果对这场讨论不抱任何偏见的话，在此或许会注意到古卷中有数卷彼此相关，都描述了一个或多个宗派的宗团，艾赛尼派的，或者其他派的。这些古卷被确定为宗派性古卷，其根据是它们记载的各宗团内容、世界观（常被描述为末世论观点）、自认为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以及他们使用的术语，如*parash*（分离）、*yahad*（宗团）、*ha-rabbim*（众多）、*pesher*（注释）、*moreh ha-tsedeq*（公义导师）、*ha-cohen ha-rasha*（邪恶祭司）、*mattiph ha-cazab*（撒谎者）或*kittim*（哥特人，等同于罗马人）。

有几个文本被称作规则，或者说*serakhim*（单数为*serekh*）。他们是共同生活的制度或规则，或者末世战争中行军作战的法令。《大马士革文件》就是这样的一份规则。

1910年，所罗门·谢希特（Solomon Schechter）发表了两篇题为《撒督作品残片》的文本，这是一个庞大的中世纪希伯来犹太著作残

片（共220,000片）集的一部分，这些残片发现于古埃及的福斯塔，即今开罗的本 - 以斯拉圣堂。这些文献是在一个书□（*genizah*）即旧书储藏室里发现的。现在名叫《大马士革文件》的这份作品，描写了一群虔敬的犹太人的起源和律法，他们脱离主体而独立生活，认为主体违犯了律法。在4至6号洞中发现了这份文件的抄本，共有10本，它们证实了古卷和拒绝接受拉比权威的一个犹太宗派卡拉派（Karaites）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宗团规则》（*serekh ha-yahad*，即1QS）描述了自视为光明之子的一个宗团的组织、习俗、信仰和起源。它也见于在1、4和5号洞发现的大量抄本之中。《宗团规则》有两个附加规则，《公会规则》和《祝词规则》。前者描述了末日降临时的宗团，后者则是一本礼拜文本汇编。

还有其他几项“规则”控制着该宗团的一些具体方面，例如入会程序、因不当行为而剥夺祭司资格、重续圣约的庆典、需保持的各种洁净以及对犹太律法的遵行。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规则，即《战争古卷》（*milhamah*）和其他文本，阐述了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在世界末日发生宇宙大战时的军事策略。

圣经注释

一组古卷（约25份）注释了《希伯来圣经》中的大大小小的章节，注释使用了专门术语“排舍”（*pesher*）。希伯来词“排舍”仅仅是“注释”的意思，但是，它的释经程序和解经观却独具特色。有两种排舍瑞姆（“排舍”的复数形式）：连续型和主题型。连续型排舍瑞姆通常采用圣经引言、开场白和评注的固定模式，对《圣经》中某一篇的章节和语句连续进行注释。他们注释了《以赛亚书》、少许《诗篇》、十二小先知书中的7篇。这些排舍瑞姆中最重要的是《哈巴谷书注释》（1QpHab，此处p＝*pesher*）。另一方面，主题型排舍瑞姆则围绕一个主题组织注释，例如神圣的拯救者麦基洗德

（Melchizedek，11QMelch）其人其事。“排舍”技巧也可能出现在个别章节（例如，CD[＝Cairo Damascus Document] 4.14，即《开罗大马士革文件》4.14）的单独解释中。排舍瑞姆将圣经文本解释为在他们那个时代已实现了的预言，即他们将圣经预言当代化或者现实化。

赞美诗

1号洞发现的《好达耀特》，即《感恩诗篇》，是一份长古卷，有18栏之多，是诉说者个人和会众向主表达感恩的诗篇。4号洞中另发现了《感恩诗篇》的6份抄本。本古卷中发现的赞美诗可以分为《导师赞美诗》和《会众赞美诗》。诉说者遭受迫害，向上帝寻求救赎。学者们已断定，这位诉说者就是《大马士革文件》和排舍瑞姆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公义导师”。《会众赞美诗》表达了一群期待在末日被公义者解救的虔敬之人的信仰和希望。尽管《好达耀特》的语言引经据典，尤其是引自《诗篇》，但是，它的确在言辞上与排舍瑞姆含有紧密关系。《好达耀特》与其他宗团古卷的联系也是通过《宗团规则》结尾的一首赞美诗而建立起来的。它还引用了以前不为人知的一篇名叫《4Q训导》的智训，即*musar le-mevin* 。

律法

《4QMMT》，即“某些托拉律令”，在前面谈到版权和知识产权时提到过。该文本由3部分构成：历法、律法目录和警示。其核心是对20个左右的法律问题的探讨（例如，一股液体的不洁净性）。这些讨论将仅仅表示为“我们”、“你/们”（有单复数之分）和“他们”的各个不同派别区分开来。编辑依丽莎·齐慕隆和约翰·斯特拉格内尔认为，该文本详细叙述了库姆兰 - 艾赛尼宗团在脱离其族中主体之前的历史，即便不是史前历史也是早期历史。

历法和祭司课程

古卷中有许多文本遵循的是一年364天的阳历。有些文本将这种阳历用于测算《创世记》中的洪水故事的纪年（4Q252）和给祭司们分配圣殿中的工作（4QMishmarot，即祭司课程）。也有一些文本将阳历和祭司课程与阴历所需的月亮盈缺并列对照。一年有354天的月运周期是圣殿的正规历法。像这样一年364天的阳历不是宗团性的，因为在《以诺上》和《禧年》中也有发现。然而，用它来测算《创世记》中洪水故事的纪年却使它具备了作为宗团文本的资格。

各种文字文本

最后，还有可以用过去已知的文体分类的无数其他文本，包括启示录、伪经、相学经（考察一个人的外貌以预示其灵性生活的文本）、智慧书、祈祷书、祝福和遗嘱。这些文本的宗团特征尚无定论。

作为20世纪全球最惊人、最激动人心的一大发现，死海古卷自发现之日起就成了一个传奇，一个难解的谜。但死海古卷究竟讲了些什么？是怎么发现的？它是什么样的抄本？抄写人是谁？抄写于何时？它对《圣经》的理解有什么影响？它和犹太教、基督教又是什么关系？

本书作者深入种种迷雾背后，以幽默风趣的语言，从考古研究、古文书学、文本考证、文献学、语言学和古代圣经注解等角度娓娓道来，解答了有关死海古卷的诸多问题，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有助于读者全面认识死海古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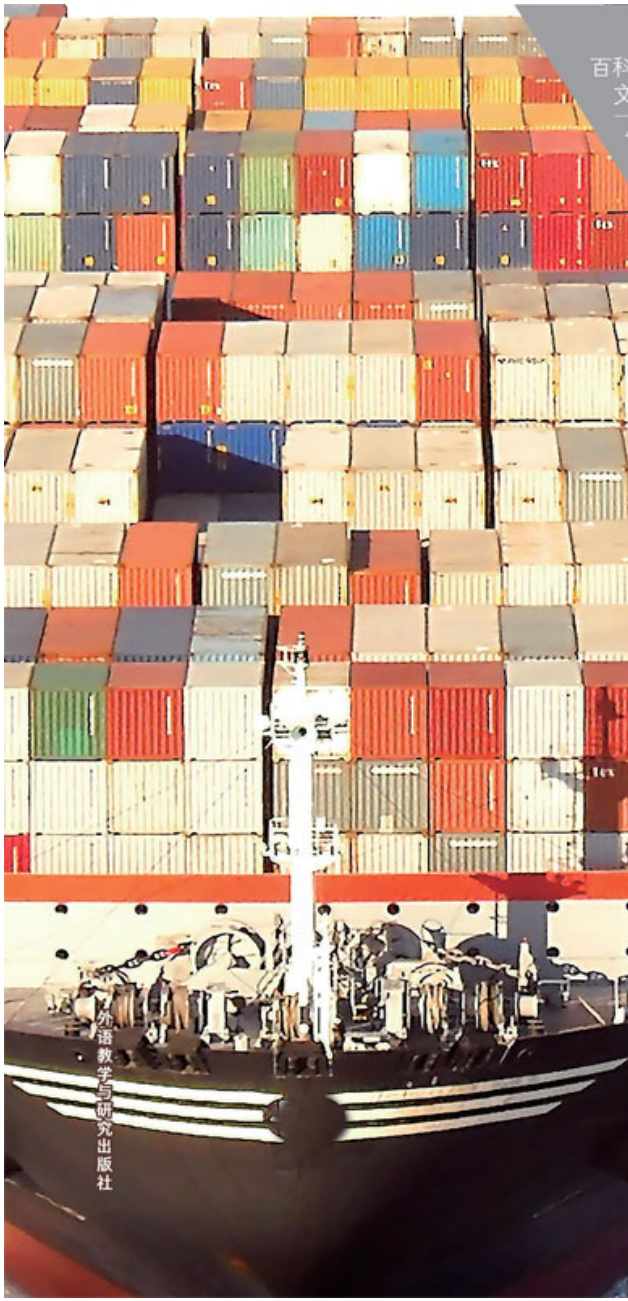

百科通识文库

49

世界贸易组织概览

阿姆里塔·纳利卡 著

陈泰锋 薛荣久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世界贸易组织概览

阿姆里塔·纳利卡 著
陈泰锋 薛荣久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27**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5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 Amrita Narlikar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贸易组织概览 /（英）纳利卡（Narlikar, A.）著；陈泰锋，薛荣久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88-5

I．①世…　II．①纳…②陈…③薛…　III．①世界贸易组织 - 概况　IV．①F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51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88-5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前言
略语表
插图目录
表格目录
第一章　谁需要一个国际性贸易组织？
第二章　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建
第三章　决策和谈判程序
第四章　不断扩张的管辖范围
第五章　争端解决
第六章　多哈发展议程
第七章　治理困境
返回总目录

| 作者简介 |

阿姆里塔·纳利卡，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讲师，教授国际关系学。目前主要研究世界经济中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已出版著作有《贸易与发展中国家：GATT和WTO中的协商联盟》。

| 译者简介 |

陈泰锋，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后，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WTO与中国经济。累计发表中英文学术研究论文70余篇（约60万字），参与或独立完成研究课题10余项，参编著作9部。独立出版专著2部：《中美贸易摩擦》、《WTO与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

薛荣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贸易学科带头人，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著有《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大经贸发展》、《中国加入WTO纵论》、《世界贸易组织概论》等。

前言

总部设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作为一个处理深奥的贸易事宜的机构，看似规模不大，但其引起大众关注、激发民众情绪的程度令人惊讶，极富戏剧性。2003年在坎昆召开的WTO最近一次高层会议上，非政府组织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WTO示威游行，有参加国威胁要退出本次会议，一个韩国农民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对WTO农业规则的不满。坎昆一幕并非不同寻常；该组织绝大多数部长级会议都伴随着群情激昂的抗议和愤怒的暴乱。

尽管对WTO协议从经济与法律角度进行详尽解释和解读的书籍和研究论文并不鲜见，也有民间社会活动家为政策宣传目的而著述颇多（其中有些研究缺乏审慎的态度），但针对WTO进行政治学分析的研究很少。本书旨在填补这一文献空白，并试图讲述WTO作为国际性组织的核心特点，以及推动其产生、运作和演变的政治原因。

本书有两大特点值得强调。第一，我主要是通过透视谈判进程来对WTO这一国际机构进行研究的。通过分析现有结构与潜在发展进程之间的持续相互作用，我不仅描述了催生WTO创立的最初商讨过程，而且还阐述了该组织成员构成、管辖范围及日常运作的变迁历程。偶然性、路径依赖和谈判程序经历了长期探索才最终确立了WTO今天的面目，而不仅仅是对该机构进行理性化的设计。第二，发展中国家构成本书内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注发展中国家并非我的初衷，但我所有的研究结果都导向一个被严重忽视的方向：权力非对称性与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我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权力上的差距在WTO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该机构本身也在许多不同方面影响着实力的差异。因此，权力、边际化、不满和发展是本书中反复提到的主题。

我还正面提到了对WTO的诸多公众争论。该组织表现为一个有趣

的矛盾混合体。到目前为止，它仍是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中规模最小和成立年限最短的（另外两个分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但它制定的规则却往往会侵入传统上属于国内管辖权限的领域，而且所有147个成员必须共同遵守。虽然WTO的许多事务确实是关于深奥而专业的贸易政策领域，但是，其规则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深远影响意味着它并不是一个只有经济学家才感兴趣的机构。理论上，WTO在三大经济组织中拥有最为民主的程序；而在实际操作中，WTO却因其近乎“英语俱乐部的氛围”和会议的排外性而饱受争议。严肃报纸和其他舆论对WTO既有对其“作为不足”的指责，同时也有对其“作为过度”的批评：有些人认为WTO应该涉足劳工、性别及发展等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对其扩张主义的倾向表示惊恐。对于其机构变革存在着诸多意见相左的提议。一些人对WTO推崇有加，也有许多人对其嗤之以鼻。通过叙述和阐明WTO的演变、目标和政治学运作机理，本书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驰骋于国际贸易政治学的迷雾世界。

略语表

AD 反倾销
AMS 综合支持量
ATC 纺织品与服装协议
CAP 欧洲共同农业政策
CVD 反补贴税
DDA 多哈发展议程
DSB 争端解决机构
DSM 争端解决机制
DSU 争端解决谅解
ECOSOC 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GATS 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T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HOD 代表团团长
ICITO 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PRs 知识产权
ITO 国际贸易组织
LDC 最不发达国家
LMG 志同道合集团
MFN 最惠国待遇
NAMA 非农产品市场准入
NGO 非政府组织
NTB 非关税壁垒
PSP 主要供给者原则
QRs 数量限制措施

S&D 特殊和差别待遇
SPS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TBT 技术性贸易壁垒
TNC 贸易谈判委员会
TPRM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TRIMs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TRIPs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TRQ 关税配额
UN 联合国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VERs 自愿出口限制
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插图目录

图1　1999年西雅图反WTO游行示威
图2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
图3　签署马拉喀什协定
图4　WTO办公大楼鸟瞰图
图5　WTO官方图标
图6　1995年5月，雷纳托·鲁杰罗出任WTO总干事
图7　WTO的组织结构
图8　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决策正在进行中
图9　TRIPs被纳入GATT，内容超出假冒产品问题范围
图10　西雅图之争，1999年
图11　2001年11月，贸易正义运动同盟在特拉法加广场示威游行
图12　抗议旗帜“民主与WTO的对抗”
图13　坎昆部长级会议失败后发达国家的即时反应

表格目录

表1　GATT的各回合贸易谈判
表2　WTO协议体系
表3　争端解决程序的各阶段

第一章

谁需要一个国际性贸易组织？

作为一个处理深奥的贸易事务且相对年轻的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已经激发了人们空前的狂怒和激情。关于WTO的诸多争议已进入公众视线，1999年在西雅图会议期间上演的大规模游行即是最形象的例证（参见图1）。

图1　1999年西雅图部长级会议期间公众对WTO的抱怨和不满集中爆发。

2003年坎昆会议期间，这些情绪并没有显露出丝毫缓和的迹象。鉴于WTO引发如此愤慨，我们在本章提出这样的疑问：究竟是谁需要一个国际性的贸易组织？

是否有必要设立一个国际性贸易组织？

要弄清楚是否有必要设立一个国际性贸易组织，我们需要确定这样一个机构在全球经济体制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为其成员规定了多项崇高的目标：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该协定进一步要求其成员为实现上述目标

而“达成互惠互利安排，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关系中的歧视待遇”。很明显WTO是一个致力于贸易自由化的机构。值得强调的是，这一宗旨并非其自身的目标，而是实现上述更广泛社会目标的一种手段。

抛开一些条件限制，经济学家认为贸易自由化是追求福利最大化的一种手段。18世纪中期以来的经济理论已经说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削减关税对绝大多数成员方都是有利的。贸易收益来自于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专业化分工。简而言之，如果每个国家都生产其最擅长生产的产品（相比于所有其他能够生产但生产效率比较低的产品），这些生产效率高的每种产品在各个国家都能获得较高的产量。然后，这些国家相互之间进行贸易，每个国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或服务，进口其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或服务。如此交换能够使所有参与国受益。实际上，根据古典学派贸易理论，不管其他国家是否降低贸易壁垒，任何一个国家都能从自身降低贸易壁垒中获取贸易收益，由此意味着一个理性的国家也许应该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确实，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言：“如果由经济学家来统治这个世界，就没有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必要了”。

对现实世界的简略回顾告诉我们，尽管自由贸易拥有美好的前景，但从历史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情愿削减贸易壁垒，反而总是迅速提高壁垒。关于这种政策倾向及其灾难性后果的一个经常被援引的例子就是美国及其他国家在“大萧条”时期的做法。继1929年股市崩盘后，美国国会于1930年颁布《斯默特—霍利关税法案》，将美国平均关税水平提高至接近60%。美国绝大多数主要贸易伙伴都通过提高类似关税壁垒和实施竞争性本币贬值等手段予以报复。价格持续下跌，关税壁垒不断增加，恶性竞争导致“大萧条”进一步恶化。20世纪30年代这种“以邻为壑”的损人利己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让战后的政策制订者铭记于心。人们逐渐认识到，如果没有国际机构的约束，即便各国明白不合作会使各方利益受损，国家间的合作也难以实现和维系。

有几个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各国为何采取损害其自身利益的行为。首先，尽管贸易自由化具备诸多优势，但有些国家依然

选择实行保护主义，其原因就存在于经济理论和“最优关税”概念之中。虽然毫无疑问实行自由贸易对小国是有利的，但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这对大国而言却并非如此。最优关税理论表明，大国在某个“最优”水平实施贸易管制可能会对自身有益，因为这样做能够使贸易条件朝着对其有利的方向发生改变。如果大国单方面调整其对外贸易关系，其获利的同时会牺牲其他国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这样的干预管制尽管对大国本身有利，但对整个世界来说会导致整体利益的损失。然而，正如美国斯默特—霍利关税一事那样，其他国家不可能被动地接受这样的调整，而会采取类似报复性的限制措施。结果是使所有卷进关税战国家的利益陷入恶性循环。经济学家伯纳德·霍克曼（Bernard Hoekman）和迈克尔·考斯泰基（Michel Kostecki）借助经典“囚徒困境”博弈对此问题作出了简明扼要的解释：“实施限制对每个国家都有利，但如此单方面合理的政策却是毫无成效的。”

大国之间的这种关税战对小国又将造成何种影响呢？非洲谚语“两象相争，草地受害”用在此处相当贴切。比如，美国与欧盟之间执行特定的高关税，初看起来，这意味着小国面临没有大国竞争的巨大市场，但是，争相进入这些大市场也会使小国自身卷入无法持续的价格削减战，并为之付出昂贵的代价。结果，大国之间的关税战最终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利益损失，从而对大国和小国都造成不良影响。

“囚徒困境”在国际贸易中为众人所熟知，各国政府也认识到如果他们单独实施贸易限制会有遭受报复的风险。然而，这并不能保证某个叛逆的大国不会采取这种个体理性但集体次优的贸易措施，从而引发所有其他国家报复性的连锁反应。一国（或多国）撤回其自由贸易承诺同样存在危险，结果会给其贸易伙伴造成无法预料的惨重损失。这些风险的客观存在往往对大多数致力于贸易自由化的国家构成一种威慑。防止两败俱伤情形出现的最好方法是确保各国在互惠基础上达成贸易自由化承诺。互惠的贸易自由化可通过进一步扩大贸易量来提高贸易收益。但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各国之间存在某种机制来约束彼此削减关税的承诺，那么报复性贸易战（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发生的风险就会降低。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逻辑正在于此。一个国

际性贸易组织设定在三个以上国家范围内普遍执行互惠原则，从而实现多边互惠。通过监督实施这些规则，多边贸易组织就能确保其成员国不再欺骗和背叛。事实上，绝大多数领域的国际组织存在的原因（*raison d'être*）也具有类似的逻辑。

除了有利于国际合作，在多边贸易组织监督和执行制度化的互惠规则还可以为其成员政府带来一些重要的政治好处。贸易自由化可以提高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但也会产生受损者和受益者，从而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的后果。政治经济学家早就指出贸易自由化最大的受损者是进口竞争型产业，而最大的受益者是消费者。有人可能认为，消费者从自由化中的获益与保护主义生产者的利益损失可以相互抵消，但如此分配存在的问题是，生产者利益往往比消费者利益更为集中、更有组织且呼声更高。多边自由化开放了数个外国市场，由此能确保国内企业通过寻求外国市场准入以弥补国内损失。贸易自由化进程不仅可以带来经济利益，而且从政治角度来说也是切实可行的。

遵守国际性贸易组织规则也成为各国政府解决本国问题而应该履行的重要职责，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抵制国内保护主义的要求。当面对国内压力，特别是经济进程面临困难，而各利益集团要求撤销自由政策之时，政府可以声明其受到国际组织行为规范的制约。一国将自由化进程置于多边贸易组织约束下，即意味着一旦违反承诺将会招致各种惩罚措施。根据该组织的特性及其执行机制，这些惩罚措施可以是国际谴责，也可以是为其违约造成的损失对所有成员给予补偿，乃至直接采取报复。的确，政府在采取着眼于长远利益（不仅仅在贸易方面）却并不受欢迎的措施时经常会声称受其所作国际承诺的约束，并以此为自己辩护。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济改革和重组计划，特别是那些涉及到棘手分配问题的改革措施，都要以国际经济组织为依托就不足为奇了。

设立国际性贸易组织的上述所有好处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其经济总量的大小和谈判能力的高低。但发展中国家对于这种组织的存在却要压上额外的赌注（参见加框文字）。1985年，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首次提出现已获得普遍认可的一种国际关系

理论，就是弱国倾向于寻求基于规则的权威国际体制。这些体制在国际关系中引入更加明确的界定，有利于减少大国对权力的滥用。这种明确性是发展中国家极富价值的资源，在游戏规则建立之后，拥有有限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利用多边贸易组织规范国际贸易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用以抵制大国蛮横施加压力的保障手段。与单边情形不同，发达国家在多边体制下不能轻易地违反承诺；他们一旦违反，就必须承受因违反国际规则而招致的惩罚。最后一点，多边贸易组织的存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环境，他们可以借此结成联盟，从而抬高整体谈判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制订更加明确的规则，并赋予规则监管机构更大的执行能力（当然，需要提醒的是，这取决于规则的性质及规则的执行者）。多边贸易组织能够制订最严格的法律规则。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尤其当一国规模不大或实力较弱时，如果没有国际性贸易组织，其国际经济进程将会是“凶险、惨烈而短暂的”。

定义发展中国家

多年来，学术界围绕发展中世界这一概念的争论从未停息。许多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日趋多元化使得这一概念已经变得过时。确实，与美国毗邻的加勒比海小型经济体的脆弱之处与非洲和太平洋地区更小型经济体面临的威胁相差甚远，更不用说与发展中世界的新兴国家如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差异了。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发展中国家都具有两大特征——边际化或称外围化，以及“第三世界分裂症”（Third World schizophrenia）。

边际化，或称外围化，指发展中国家无法对国际机构施加对自身有利的影响，或者无法在国际体制中以完全参与者的姿态出现。这些国家受殖民历史影响而致使本国实

力和国际影响力较弱，他们往往发现自己处于规则接受者而非议程制订者的地位。像巴西和印度之类的国家就是如此，虽然按照惯例他们被邀请参与议事，但却不断抱怨他们关注的问题并未得到重视，而一些更小的发展中国家同样感觉他们在关键决策会议上很难获得一席之地。

与边际化相关的另一现象被穆罕默德·阿尤布（Mohammed Ayoob）精辟地称为“第三世界分裂症”。当异己占主导的国家体系不利于其自身利益时，发展中国家尝试寻求体制变革。但由于自身能力不足，他们仍然会维持现有规则体系，借以保证其自身的合法地位与生存状况。

边际化和分裂症的共同特征严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和决心。这些特征不仅局限于最小最穷的发展中国家，即便是比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东南亚国家）和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比如巴西和印度），其谈判能力同样是有限的。具有这些共同特征的国家常被统称为南方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即北方国家）、第三世界或发展中世界。

判断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除了参考非成员国运用的客观标准之外，至少同样应该得到相关国家的自我认定，同时还有集团内部其他成员国的认可。据此，大多数国际组织都让各国自行申报确立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通常这由特定国家与将受该决定影响的诸国协商确定。例如，这一问题就是中国加入WTO谈判过程中争论的焦点。中国争取确立发展中国家地位，从而获准享受为发展中国家特设的待遇，如给予实施规程更长的过渡期。发达国家却为此设置了种种阻碍，在经过拖沓漫长的谈判之后才最终达成妥

协。

注意，在发展中世界里还有一小类国家被称为最不发达国家（LDCs）。与主观界定的“发展中国家”称谓不同，最不发达国家由联合国根据三个标准来判定：低收入（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750美元）、人力资源缺陷和经济脆弱程度。2003年，塞内加尔加入最不发达国家行列，使全球最不发达国家总数上升至50个。

谋划一个多边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尽管上文的论述已充分表明了建立一个多边贸易组织的必要性，但尚未能说明WTO的建立就是必要的。国际组织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且需要接受一套对国际权力和财富分配具有深远影响的规则的约束。在本部分，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国际谈判者曾谋划的两种模式的多边贸易组织：一种事实上从未实现，而另一种则真实存在过。

国际贸易组织

二战结束后，各国领导者纷纷渴望建立国际防卫制度和机构，以避免全世界再次发生类似的灾难事件。美国积极倡导这样的理念，即自由贸易能为实现世界和平提供一种重要的机制。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正是推行这一理念颇具影响力的杰出代表：

> 我从未犹豫过，也永远不会犹豫，在我的信念中，国家的持久和平与福利和国际贸易中的友好、公平、平等及最大程度地实现自由是密不可分的。
>
> 科德尔·赫尔，《实现和平的经济壁垒》
>
> （纽约：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1937，第14页）

二战同盟国，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已开始讨

论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建。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英两国签署的一项协议为战后经济发展描绘了蓝图。为维护全球经济合作，协议设想了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或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ITO）。在美英两国双边贸易谈判之后，数次多边会议于1946—1948年间相继举行。这一过程的成果就是《哈瓦那宪章》，56个与会国家中的53国签署了这份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协议草案。

尽管这一多边承诺让人充满期待，但ITO事实上并未真正建立过。上述协议在生效前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而没有国家愿意在美国加入前遵守ITO规则。尽管美国在ITO这一创意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但其国会能否批准却变得疑问重重。直至1948年，最初激发ITO这一创意产生的外部环境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美国国内，尽管《哈瓦那宪章》当时得到民主党总统的支持，但要想获得由共和党把持的国会批准，希望已经非常渺茫。此外，国际形势也对美国国会进一步施压，要求其更多地关注当务之急。1950年，杜鲁门（Truman）总统最终宣布不会将《哈瓦那宪章》提交国会批准。考虑到美国战后所拥有的经济优势，其他国家认为一个没有美国参加的ITO将会毫无意义。理查德·加德纳（Richard Gardner）这样描述ITO的“不光彩命运”：“它不曾有机会结束：它还未开始便已夭折。”这样一种结果在不了解《哈瓦那宪章》内容的情况下是无法理解的，事实上，它所设定的诸多管辖范围和组织机构早已为它自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图2　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华盛顿山宾馆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的与会代表，此次会议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创建。

《哈瓦那宪章》构想的ITO管辖范围很广，并拥有复杂的执行机构。广泛的管辖权在很大程度上是战后形势发展的产物。自由化的ITO承担着解决许多问题的任务，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属于各国的内政事务，但在当时的战后时期却让人们特别关注。因此，除了理所当然地涉及商业政策领域，ITO的106项条款还拓展至就业、经济发展、限制性商业惯例及商品协定等方面。它还认可了实现公平劳动标准的重要性，并加入了保障成员政府共同商讨发展和人道主义相关事宜的条款。

《哈瓦那宪章》为使ITO实现其宗旨目标设计了一个复杂的组织机构。ITO被明确定为联合国的一个特别机构。ITO决策程序在条款中有详细说明。条款还规定按照2/3多数原则投票选出由18个国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并为成员国中的“主要经济大国”预留8个席位。执行委员会继而任命工作委员会来履行具体职能并向执行委员会汇报。《哈瓦那宪章》还建立了一套明确的争端解决程序，以赋予ITO强制实施规则的权力。在争端解决案件中，涉案成员首先应自行相互协

商。然后，案件才能提交至执行委员会，并按照多数投票表决的方式予以解决。执行委员会也可以将案件移交至ITO全体成员会议仲裁，如果任何一个涉案成员对全体成员会议作出的决定不满意，还可将此案件进而移交至国际法院。

不幸的是，在反复权衡ITO所有潜在成员多样化且往往相互矛盾的需求之后，《哈瓦那宪章》的缔结者最后达成了各方均不满意的一揽子协议。虽然《哈瓦那宪章》的谈判进程起初遵循美国的理念，认为自由贸易是解决战后包括失业和经济动荡等诸多问题的良方。然而，为了满足饱受战争摧残的西欧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迫于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英国的压力，《哈瓦那宪章》还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具体列举了许多特例。英国的施压使《哈瓦那宪章》接受了帝国优惠制，并为国际收支出现困难的国家规定了例外条款。

美英之间的较量构成了《哈瓦那宪章》谈判进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直至1946年伦敦会议。然而，在伦敦，发展中国家（尤以巴西、智利和印度为首）打破了沉静的谈判气氛，他们要求《宪章》包括例外条款，允许其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采取特定的量化或其他限制措施。这些国家成功地将其多项要求纳入《宪章》的发展条款，包括专门设置一节将经济发展确定为ITO的核心目标。但是，由于在ITO构思创建之初发展中国家谈判者并未参与其中，这意味着他们的要求没有全部写入最后的宪章文本。这些要求构成了最后文件的重要补充，《宪章》中的例外条款由此得以不断扩充。

美国国内各集团也要求将例外条款加入自由贸易的广泛承诺。例如，农业部设法将数量限制和出口补贴作为例外，使得美国大多数农业政策不受ITO制约。由此产生的承诺混合体是矛盾、不稳固和无法维系的。在美国国内，用威廉·迪博尔德（William Diebold）的话来说，《宪章》受到“完美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的强烈指责。对完美主义者来说，《宪章》仅仅包含了种种例外，并未尽力取消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而保护主义者则指出大量廉价进口商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意思的是，关于ITO的争论使完美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之间结成了一个各怀鬼胎的联盟，这些传统上持反对意见的集团团结一致，

指责ITO赋予政府过度管制权，同时给外国经济体提供了太多的例外机制。面对如此非议，《哈瓦那宪章》获得国会同意批准的可能性已变得微乎其微。由此，ITO胎死腹中的结果就不足为奇了。

ITO谈判进程的失败意味深长。ITO毁于自己的雄心壮志。它让贸易谈判者及其政治领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多边贸易组织在当时可以实现的政治影响。这表明，如果无视相关国内利益集团或谈判桌上小国的利益，任何多边进程都会面临前功尽弃的风险。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还会看到，当WTO如今迫于多种诉求而将其规则延伸至劳工和环境等国内问题之时，ITO试验的教训甚至具有更大的启发意义。ITO的失败不仅有其延续至今的深远影响，更为直接的作用是它帮助谈判者发现了政治上的可行性。而这种政治上的可行性后来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得以实现。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早在1945年协商建立ITO时，美国就提议各参加国就多边关税减让的商业条约进行商讨。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美国当局认为，虽然ITO作为一个多边组织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是根据《1945年互惠贸易协定法》的授权，贸易协定则更容易协商和执行。在磋商《哈瓦那宪章》的同时，就多边关税减让条约进行的谈判也在1947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全面展开，其结果就是达成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根据原计划，GATT仅作为一项过渡协定，直至ITO开始实行，其内容涵盖《哈瓦那宪章》商业政策一章（即第四章）中提及的各项议题。1948年1月，23个国家签署了该项协定，其中11个为发展中国家，并以其作为多边合作的临时依据，直到ITO正式成立。然而，这一临时协定却成为国际贸易体制的基础长达47年。

相比于ITO的雄心勃勃，GATT的覆盖范围狭窄许多；事实上，它仅仅包含ITO商业政策一章的内容，并设置了一个薄弱的争端解决机制。最初的版本对就业、发展、限制性商业惯例或商品协定只字未

提，更不用说提及诸如劳工标准之类的问题。GATT仅适用于政府部门，而不像《哈瓦那宪章》那样通过规范企业垄断行为而触及到国民利益。GATT将管辖范围严格限定在国家内部事务之外，仅仅处理关税壁垒问题。该协定的第一部分确立了非歧视原则，要求所有缔约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MFN）（同时允许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如帝国优惠制和区域协定）。GATT还包含了关税减让的时间表。第三部分是有关成员加入、修正和退出等程序方面的规定。实体义务在第二部分有所陈述。然而，由于GATT议定时只是临时适用，因此，《临时适用议定书》对第二部分义务的履行补充了重要的例外条款。根据该议定书，签字国只要求在“与其现有法规不冲突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履行第二部分义务。这就意味着缔约各方可以对任何先前已经存在的法规申请“祖父权”，从而无需履行GATT的特定义务。

如果说GATT包含的内容与ITO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么也许更有趣的是其法律性质。GATT几乎相当于一个议事论坛，由缔约方全体（而非国际组织成员）签署的多边条约来维系。为了体现所有成员作为一个集体共同行事的特征，我们采用“缔约方全体”的称谓，以区别于“组织”或“成员”。GATT分析家吉尔伯特·温哈姆（Gilbert Winham）将其描绘成“正式缔约的、以规则为基的、非组织的国际事务合作形式。”正是由于GATT缺乏国际组织应有的法人地位，因而无权对单个国家采取集体行动。

GATT这种以条约为主而无组织形式的特征对其实际日常运作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影响。最初，缔约方全体每年会晤一两次，但到1951年，GATT又成立了闭会期间委员会，专门针对几种进口限制措施组织航空邮件和电报投票。1960年，这个委员会又被代表理事会取代。为强调其临时性，GATT秘书处被称为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ICITO）。GATT所有行动均由缔约各方合议完成，而在此过程中秘书处的作用非常小。GATT争端解决机制也很薄弱，裁决者由GATT早期成立的国家工作组最终发展成专家小组。但所有专家小组报告都必须由缔约各方全体采取协商一致方式予以通过，而败诉方可以（也确实会）阻拦或拖延这一通过程序。

至于实际决策程序，该协定赋予各缔约方一票表决权。第25条第5款进一步规定“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否则缔约方全体的决议应以所投票数的多数作出。”然而，GATT在实践中形成了共识决策法，即与会缔约方中无反对意见即可达成决议。这些决议通常是在所谓“绿屋会议”上达成的，而此类会议只能应邀参加。关税谈判大多依据“主要供给者原则”（Principal Supplier Principle）来进行：某种产品的关税减让首先由主要供应方和消费方进行谈判，然后再将减让结果推行至全体缔约方。

GATT没有实际组织结构的特点使得遵守并维持其规定的代价要小于ITO。由于参与成本低廉，对发达国家来说尤其如此，GATT能够长时间存在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该制度的缺陷也意味着它难以解决让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关系中深受其害的权力不对等问题。磋商和履行协议的责任在于缔约方自己，秘书处对此少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发现由于自身技术能力有限，无法有效地参与这种理论上“一国一票制”的协定。由于被排斥在“绿屋会议”的关键决策磋商过程之外（巴西和印度是例外，他们是GATT创始成员国，也是“绿屋会议”的常规受邀者），他们的自身利益进一步受损。重要的是，这些决策机制的缺陷致使GATT最弱缔约方滋生了边际化的感觉。然而，这些缺陷已经成为GATT的本质，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

“主要供给者原则”的谈判程序自动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议程安排过程之外，而发达国家则得以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制订议程。无可否认，根据“主要供给者原则”协商得出的减让结果会推行至所有其他缔约方，但这些减让往往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缺乏出口优势的产品。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出口产品都由于诸多例外条款而被排除在GATT管辖范围之外，其中以农产品和纺织品最为突出。GATT曾允许对农产品实行配额和出口补贴措施，后来又添加了使用非关税壁垒和数量限制措施的特殊豁免权，从而进一步削弱了这些农业减让规则。美国便于1955年第一次使用了这种豁免权。实际上，GATT农业制度已宽松到允许《欧洲共同农业政策》存在的地步。至于纺织品，随着1955年日本加入GATT，几个发达国家的国内产业都要求对日本廉价纺织品的

出口实施进口限制。多种技术手段被采用以实现这种保护主义，包括让出口国使用“自动出口限制”。这项保护主义制度最终演变成了1974年签署的《多种纤维协定》。

最后，《哈瓦那宪章》包含的发展问题在GATT的最初版本中并不存在。关于“贸易与发展”的第四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在GATT、联合国大会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上展开激烈的游说后才于1965年加进GATT的。第四部分还确认了非互惠原则，但措词平淡，几乎没有提及解决发展问题的具体措施。鉴于作为国际机构的GATT程序上存在诸多缺陷，发展中国家很快将其视为“富人俱乐部”而弃之一边，转而向联合国大会和UNCTAD表达他们的诉求。

尽管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对GATT表达不满或被GATT边际化，但GATT仍然维持了40多年。与其夭折的前身所经历的艰难历史相比，这算是相当长寿的了，部分原因就在于它能满足西方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的需求。它保护了发达国家的商业利益，却没有侵犯发达国家的内部主权。它在磋商程序、决策程序及争端解决机制上的体制性缺陷意味着发达国家不会反感这套宽松的约束。换言之，GATT的诸多缺陷成为保证主要贸易大国——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也被称为“四方集团”）——履行承诺和加入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并由此成就了一项比没有美国参与的ITO意义更为深远的协定。

GATT前四轮谈判主要处理货物关税问题。GATT薄弱的体制反而使其拥有足够灵活性进行创新，并多少适应一些全球变化。自肯尼迪回合（1964—1967）开始，GATT针对新型保护主义引入了一种诸边协定制度（即由一些国家而不是所有缔约方在自愿的基础上签署的协定），而后在东京回合（1973—1979）使其更加全面。诸边规则扩展至包括卫生与植物检疫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及其他形式的非关税壁垒。在这段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加入也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同时GATT的管辖范围和规模日益扩大。考虑到发达国家比较优势的改变，乌拉圭回合（1986—1994）将所谓新议题纳入GATT的管辖范围：服务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为了换得发展中国家对这些新增内容的认可，发达国家许诺在农业、纺织

业及工业品方面作出让步。

临时构建的GATT不仅存在了47年的时间，而且留下了辉煌的足迹。诚然，与ITO相比，GATT目光短浅许多，其组织机构的缺乏也滋生了尤其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许多问题。然而，正是GATT的诸多缺陷确保了其政治意义上的生存能力。有限的管辖范围意味着，GATT不会陷入复杂的矛盾，也不会像ITO那样面临根本不可能达成的政治妥协，另一方面，各国情愿履行协定承诺，而不愿被一个拥有强大争端解决机制、干预过度的组织束缚手脚。尽管发展中国家三番五次对GATT的例外机制提出抱怨，但他们仍前赴后继地加入该组织。这就是一个可行性多边贸易体制的范本——虽然它并不是一个组织。然而，1995年，旧的GATT被一个新的组织所取代：世界贸易组织。

表1　GATT的各回合贸易谈判

年份	谈判地点与回合名称	谈判议题	参加国数量
1947	日内瓦	关税	23
1949	阿纳西	关税	13
1951	托基	关税	38
1956	日内瓦	关税	26
1960—1961	日内瓦—狄龙回合	关税	26 62
1964—1967	日内瓦—肯尼迪回合	关税和反倾销措施	102
1973—1979	日内瓦—东京回合	关税、非关税措施、“框架”协定	123
1986—1994	日内瓦—乌拉圭回合	关税、非关税措施、规则、服务业、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纺织品、农业、建立 WTO 等	

资料来源：《了解WTO（第3版）》，2003年8月（WTO，日内瓦）

第二章

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建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尤其因为创建这样一个组织的尝试曾历经数次失败。在本章，我将分析这一新兴组织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政治历程，并重点阐述WTO与其前身之间的延续性及差异。

诠释WTO的成立

在战后将近50年的时间里，创建一个国际性贸易组织的梦想让各国贸易谈判者深感困惑。GATT被视为ITO流产后的临时替代品，而成立一个多边贸易组织的努力仍在继续。1955年，一些GATT缔约方提议以“贸易合作组织”的形式建立一个更为长久的机构。然而，这一提议犹如曾经的ITO一样也未获得成功。1963年，在经济和社会理事会（ECOSOC）上提出成立一个附属于联合国的国际性贸易组织的倡议同样化为泡影。然而，当1994年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终签订《马拉喀什协议》之时，长久以来苦苦追寻的多边贸易组织终于诞生。在法律上，WTO正式成立于1995年1月1日，最初有128个成员。

1995年WTO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体制发展变化的形势所需。但同时，其成立也是复杂谈判的产物，西尔维娅·奥斯特里（Sylvia Ostry）将谈判结果描述为“全盘交易”（Grand Bargain）。如果没有经过谨慎的妥协与权衡，WTO极有可能遭受与ITO相同的命运。在本部分，我们将基于上述两点来分析WTO的成立——形势变化和谈判过程。然而，有一点我们应该谨记，虽然作为国际组织WTO表面上与ITO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其谈判过程及由此产生的“全盘交易”却与GATT密切相关。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详细说明WTO在日常运作中延续GATT的做法对其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本质及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在乌拉圭回合启动时，创建一个多边贸易组织的计划并不在议程之列。但当时各方对GATT的不满情绪积蓄已久。20世纪70年代，非关税壁垒措施层出不穷。事实证明，东京回合试图通过自愿守则解决

非关税壁垒问题的做法大多并不见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比较优势上发生的变化意味着，如果希望主要贸易国继续受到GATT的约束，就必须将其范围扩大到服务业、知识产权及投资措施等新议题。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新形势。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低迷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考虑采用东亚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并试图通过扩大世界贸易的手段遏制日益增长的赤字。为实施这样的增长战略，为攫取单边自由化的利益，为保护自己以规避日益增加的非关税壁垒，也为确保新议题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纳入多边合作，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加入到谈判中来。为了满足各缔约方不断提出的种种新要求，GATT不可避免地要将其议程加以扩展，超越传统货物关税的议题范畴。乌拉圭回合理所当然地要担起此项重任，而GATT的旧体制不足以容纳这种扩展。

乌拉圭回合谈判者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保持东京回合最终达成的诸多协议的一致性和兼容性。国际贸易律师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指出，这些协议有些规则相互之间存在矛盾，而且对不同成员适用不同的争端解决协议。大家意识到，如果无法找寻到一套机制来协调错综复杂协议之间的矛盾，乌拉圭回合磋商的新协议仍将无法使整个体制长久维持下去。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杰克逊提议创建世界贸易组织。

一致性不仅是GATT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是其在处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管理的自由化项目中遇到的难题。人们需要建立一套机制以便实现GATT、世界银行和IMF之间更好的协调，从而保持国际经济体制的一致性。作为一种解决途径，一个也许能够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外部联系的贸易组织最终得以出现。

当创建一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想法提出之后，一些GATT缔约方便开始认识到它的优点。加拿大是积极的支持者，欧盟紧随其后。约翰·克鲁穆（John Croome）在追溯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历史时指出，建立这样一个组织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便是欧盟于1990年6月提出的。除了满足协调GATT规则之间一致性的需要外，欧盟的提议认为，在该组织内部单独建立一套争端解决制度是非常有益的。欧盟还指出，

GATT本质上的缺陷还使其无法承担许多重要使命，诸如对缔约各方进行贸易政策审议及与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对外磋商。随后，欧盟和加拿大共同对多边贸易组织的创建及运行提出了许多详细的建议。不过，这一想法尚有待得到众多国家的认可。

把创建WTO纳入“全盘交易”的做法打消了发展中国家对创建一个多边贸易组织想法的疑虑。作为接受新议题、“一揽子承诺”（the Single Undertaking）[1] 及创建拥有更强大争端解决机制的WTO新组织的回报，发达国家同意将农业和纺织品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并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允许其可在较长过渡期内执行部分新协议。在“一揽子承诺”沿用至《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之后，发展中国家要么选择接受全部协议（包括协议潜在的风险），要么放弃乌拉圭回合协议开启的所有新机遇。最终，他们接受了所有协议并成为该组织的成员。

美国在磋商中对该组织的抵制时间持续最长。根据副总干事瓦兰特·拉佛海（Warrant Lavorel）的描述，吉尔伯特·温哈姆指出美国一直摇摆不定，直至1993年才最终放弃自己的反对立场。据报道，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曾表示，如果乌拉圭回合中所有其他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以确保当局不会在国会招致某些利益集团的反对，美国政府愿意重新考虑其反对意见。等到欧盟同意在计算机芯片上作出让步，并在该组织从多边贸易组织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美国才最终撤回其反对意见。

图3　1994年4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签署最终协定，标志着乌拉圭回合正式结束。这份广泛的贸易协定包含29项协议，涵盖服务业、知识产权与投资措施三项新议题，及关于各国货物和服务承诺减让表的长达36,000页的补充内容。

图4　自1977年起作为GATT秘书处办公楼的威廉·拉培中心（Center William Rappard）继续成为WTO总部。这是首次专门为一个国际组织建造的办公大楼。在入驻威廉·拉培中心之前，GATT秘书处位于“博卡热”和“明窗”别墅（Villas Bocage and Fenêtre），与日内瓦的联合国大厦万国宫毗邻。

WTO的创建是为了解决GATT旧体制所无法应对的问题。但它的成立同样也将几个富有争议的领域有意识地排除在WTO管辖范围之外，而在另一些领域的协议又显得疲软无力。《农业协议》是将农业纳入WTO通行规则所迈开的重要一步。然而，正如第四章所显示的那样，该协议给主要贸易国为满足自身需求而继续实行保护主义留下了

广阔的自由空间。《服务贸易总协定》列举了第四种服务贸易形式，即包含自然人流动的服务贸易，但实际上几乎没有国家对此种服务贸易形式作出承诺。有别于ITO，但与GATT一脉相承的是，WTO并未将其范围延伸至劳工标准、商品协定或垄断性商业惯例。下一章将会详细论述，尽管WTO试图使其决策程序更加规范并合法，但WTO仍然沿用了GATT的许多做法。这些排除和缺陷在很多情况下导致WTO内部相互矛盾，这将会在本书后面予以讨论。但至少在WTO创建之初，这些局限可以确保它得到主要贸易国的支持，该组织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这种局限性。

WTO的原则

WTO协议有两个主要原则。两者都来源于GATT，表明了WTO与GATT之间的延续性。

非歧视理念是GATT和WTO多边主义的核心。在关于WTO的开创性著作中，伯纳德·霍克曼和迈克尔·考斯泰基认为非歧视原则由两部分组成：最惠国待遇（MFN）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源自GATT的第一条规定。霍克曼和考斯泰基将此项原则诠释为“要求在一成员国生产的某种产品所享受的待遇不得低于来自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换言之，WTO任一成员方对另一成员方作出的某种减让必须推广至所有其他成员方，从而实现多边化。最惠国待遇原则适用于WTO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议题。所允许的例外规定很少，且均已作出明确界定。它们包括区域贸易协定、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以及现有成员对新加入成员援引互不适用条款。

非歧视原则的第二个方面是国民待遇，它要求一旦外国产品符合某成员国实施的边境措施时，该成员国给予外国产品的待遇不得低于本国生产的同类产品。国民待遇原则源自GATT的第二部分规定。然而，正如本书第一章解释的那样，《临时适用议定书》允许缔约国通过申请获得祖父权利来规避国民待遇。但这一点伴随着WTO的创建而

发生了改变，在WTO所有的议题领域，国民待遇是一项普遍义务，唯一的例外是服务贸易。

所有WTO协议的第二个原则是互惠，GATT时期所有的关税减让也是以该原则为依据的。互惠原则是限制搭便车（free riding）的一项重要机制（否则，搭便车将会凭借非歧视原则而盛行）。它还有助于让国内政治势力欣然同意进行关税减让。然而，无论是GATT还是WTO，这同样的互惠原则都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中的痛处。印度代表在GATT早期就曾慷慨陈词："对等待遇只有在平等的主体间才能真正实现。弱者根本无法承受强者之重。"直到东京回合，GATT才通过"授权条款"的形式勉强接受对发展中国家实行非互惠性原则。这一规定为GATT采取并实施普惠制提供了法律依据。普惠制是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支持下确立的一种特殊和差别待遇（S&D）。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惠制附带有毕业原则，即要求发展中国家一旦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就要重新回归多边互惠。在WTO中，特殊和差别待遇被进一步弱化，多半局限于履行协议拥有更长的过渡期或提供履行协议的技术支持。

除上述两个总体原则外，WTO还继承了GATT的透明度、强制实施承诺及允许成员国政府在特定情况下限制贸易的"安全阀"机制。事实上，WTO的成立已提高了透明度的要求，并强化了有关强制实施协议的规定。各成员国不仅被要求公开其贸易法规并通报相关改动，而且其各项政策还须接受秘书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监督。如果一成员违背承诺，WTO更强大的争端解决机制将授权对其采取惩罚措施。WTO的这些特征将会在第五章予以详细讨论。

WTO与GATT到底有何区别？

上文已阐述了GATT和WTO之间的延续性。像GATT一样，WTO继续作为进行谈判的平台并且制订行为守则。然而，这些延续性却引出一个疑问，即WTO为何会激发公众空前的担心和忧虑。答案在于

WTO的法律本质使其与GATT相去甚远。尽管相似之处颇多，但两者却在六个重要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第一，从法律意义上来讲，GATT仅仅是缔约方之间的一个多边协定；而WTO则是拥有成员的国际组织。《建立WTO协定》第一条明确指出，所成立的是一个组织。WTO被赋予“为处理其成员间的贸易关系提供共同组织机构”（第二条）的重任。WTO协定确立了一个复杂的组织结构，以保证WTO的运作，并进一步确保WTO与其他负有相关使命的国际组织开展合作。WTO享有的法人地位是GATT所不具备的。

图5　当时的WTO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Renato Ruggiero）先生将WTO官方图标的采用描述为“在坚实而持久的基础上建立这一独特机构所迈出的又一步”。

第二，如上一章所阐述的那样，GATT仅建立在临时适用的基础之上。如果GATT条款与缔约方的现有法规发生抵触，《临时适用议定书》（“祖父条款”）允许缔约方免于适用这些重要的条款。与之相反，WTO是作为一个组织而创建的，而不是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因此，尽管美国设法保留住一项祖父权利，但祖父权利这一原则不再普遍存在。这意味着成员方不能再借助其现有的国内法规来规避遵守

WTO协议。他们将不得不严格执行WTO的规定，即便这涉及到修改国内法律，否则将面临遭受报复的风险。[2]

第三，有别于GATT，WTO所有协议都必须受到“一揽子承诺”的约束（包括《争端解决谅解》，以及货物协议、服务协议、投资措施协议和知识产权协议等实体协议）。“一揽子承诺”意味着WTO参加国不能有选择地适用WTO框架下的协议。它与GATT东京回合形成的那种方式截然相反。20世纪70年代末，GATT逐渐增加了缔约方可以自行选择遵守的诸多协议。结果，超过180个适用于不同成员方的协议因不同目的而纷纷订立，而这些协议时常与GATT规定相互矛盾。“一揽子承诺”旨在消除这些法律上的不一致和错综复杂的情形。鉴于乌拉圭回合谈判议题涉及广泛，“一揽子承诺”也成为促使各谈判方在不同议题上达成妥协的“催化剂”，从而有助于促成符合绝大多数成员方根本利益的全面多边协定。当乌拉圭回合结束时，“一揽子承诺”的概念进一步发展为所有《马拉喀什协定》签字方都自动成为WTO成员。WTO及其框架下的所有协议成为一个整体，成员方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不接受。

第四，WTO的干预管制范围大大了超过GATT。GATT对非关税壁垒（NTBs）的约束只能通过制订诸边守则来进行。这一做法在WTO通过采用“一揽子承诺”得以改变。而且，乌拉圭回合还将协议议题拓展至边境措施以外的范围。WTO不仅涉及GATT项下传统的货物贸易范畴，而且还包括关于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方面的诸多协定。即便是在货物贸易方面，WTO现在也将其规则范围拓展至卫生与植物检疫贸易壁垒（SPS）和技术性贸易壁垒（TBT）等议题。

第五，为了解决东京回合特定诸边守则的争端解决方式相互各异引发的问题，WTO建立了一个强大得多的争端解决机制（DSM），这将在第五章中予以详细讨论。此处需要强调的是，WTO争端解决机制采用“反向协商一致”原则。这意味着只有得到所有成员的一致反对，方可推翻专家组的结论（这与GATT的做法正好相反，GATT要求采用“协商一致”的方式来通过专家组的裁决，等于给予失败方提出抗辩

的权利）。而且，“一揽子承诺”允许在DSM中运用交叉报复（cross-issue retaliation），因此，成员方可以在使其受损最为严重的领域对协议违约方实施惩罚。

最后，鉴于WTO新的组织特征，正式成立的WTO秘书处取代了GATT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尽管时至今日，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总部而言，WTO秘书处尚显单薄，但是自GATT时期以来，其权力已大大扩张，包括通过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实施更为强大的监督职能（这将在第五章予以讨论）。

基于上述特征，WTO规则对其成员的约束力远胜过GATT。这些规则比GATT谈判达成的规则更具约束力，也更为正式，并且因之前体制所不具备的更强大的争端解决机制而变得更具强制性。其组织结构很好地说明，WTO延续了GATT的一些特性，但将它们加以正规化、合法化，这些前所未有的改进促使多边贸易体制发生了质的变化。

组织结构

《建立WTO协定》第4条对WTO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详细说明。对具体机构的扼要介绍有助于我们初步了解WTO作为国际组织所具有的民主、平等和效率。

WTO机构最重要的特征也许在于它是一个成员驱动型组织。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两者是职员驱动型组织。在国际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会员国政府与机构职员和执行委员会密切合作。而在WTO中，各成员国有责任磋商、履行以及实施协议。这种成员驱动的特征直接继承自GATT，GATT组织机构的缺乏使所有处理与协定有关事务的责任落到各缔约方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派驻秘书处或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根本不可能拥有很多权力。WTO延续了这一做法。如果存在这么一个国际组织，其机构能确保由其成员组成、服务于其成员，并由其成员驱动，那么这个组织就是

WTO。

图6　1995年5月，雷纳托·鲁杰罗接替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出任WTO新一届总干事。

然而另一方面，WTO上述特征导致其秘书处规模不大，且在向成员国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持方面作用有限。WTO秘书处是作为永久机构

设立的，因而与GATT的临时秘书处存在差异。WTO秘书处在提供技术支持和行使贸易政策审议职能方面的权力有所加强。但是，在许多其他方面，WTO与GATT的秘书处并无本质区别。与其他国际组织相比，WTO秘书处依然显得相形见绌；在此书撰稿时，秘书处仅有大约600名工作人员（与世界银行超过6,000人的庞大规模形成鲜明对比）。与拥有自己收入来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同，WTO预算很少，主要来源于成员国的会费。这些会费根据各成员国的贸易份额来确定。除会费之外，成员国也可以自愿提供专项资助，用于秘书处的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等。

WTO秘书处由总干事领导，总干事的“权力、责任、工作待遇及任职年限”由成员方在部长级会议上确定。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这是一个权力很大的职位，总干事在过去作为议程拟订者和协调者在谈判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各成员国都竭尽全力帮助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成为总干事，因而选举过程中竞争相当激烈。其中的仇怨逐渐累积，直至1999年西雅图部长级会议，即WTO第一任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即将任期届满之时。本应用于西雅图部长级会议议程的宝贵时间却由于选举新领导人的激烈斗争而白白浪费，许多人认为这也是导致西雅图部长级会议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最终，各方达成妥协，同意将总干事的整个任期由两位候选人共同分享，新西兰的迈克·穆尔（Mike Moore）接替鲁杰罗任前三年，泰国的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任后三年。为吸取这次痛苦经历的教训，谈判者制订了一套准则，意在指导今后的选举并减少可能发生的冲突。然而，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要使整个选举过程不受权力政治影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部长级会议是WTO最高决策机构，由此进一步体现了其成员驱动的特点。它由所有成员国政府主管贸易事务的部长组成。尽管部长级会议早在GATT时代就已经存在，但那时这些会议并不频繁，通常只有在发起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时才召开。《建立WTO协定》第4条第1款的规定使部长级会议成为一种制度：“设立由所有成员国代表组成的部长级会议，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尽管这一做法加强了WTO的

政治承诺和制度连续性，而且这是GATT从未实现的，但它依然招致诸多非议。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抱怨，部长级会议的频繁召开使其根本无法跟上WTO的谈判节奏。

如图7所示，WTO日常工作是由一个复杂的机构主持的。该机构设在日内瓦，由所有成员方代表组成。除大约22个成员国外，WTO所有其他成员国都向日内瓦派遣了常驻代表团，以更好地参与WTO事务。WTO在日内瓦的最高机构是总理事会，其主要职责是履行各项协议和部长级会议指派的任务。总理事会在日内瓦WTO总部定期召开会议，并对所有代表团开放。此外，总理事会也可以作为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和争端解决机构召开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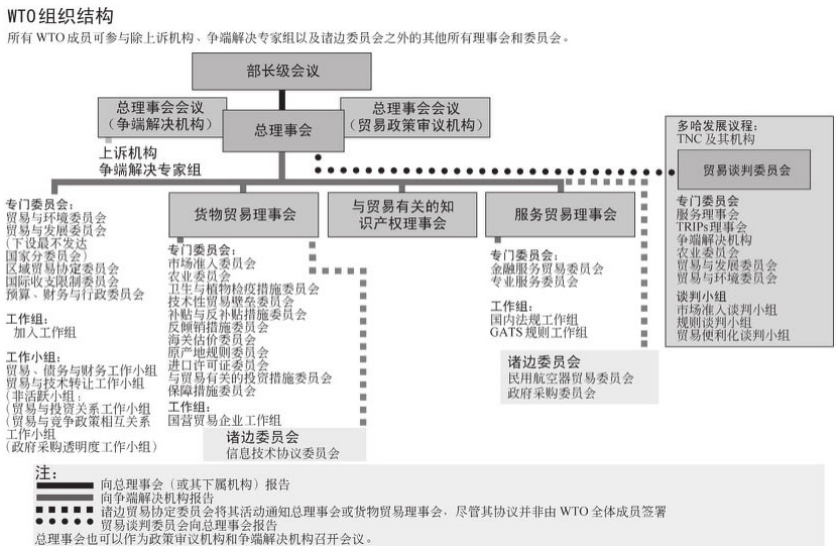

图7　WTO的组织结构

总理事会下设3个专门理事会：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与这3个理事会平级的是5个处理更具体事务的专业委员会，分别为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贸易与发展委员会（下设最不发达国家分委员会）、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国际收支限制委员会及预算、财务与行政委员会。此外，还有负责加入问题的工作组以及在贸易与投资、竞争政策及政府采购透明度领域开展探

索性研究的工作小组。各专门理事会、独立委员会、工作组及工作小组都要向总理事会汇报。处理仅由部分成员方签署的少量协议的诸边委员会也构成GATT组织结构的一部分。在多边谈判时，为推动谈判进程还可以建立新的委员会。例如，在2001年多哈部长级会议上，为磋商“多哈发展议程”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贸易谈判委员会”（第六章将予以讨论）。

再下一级的就是处理货物和服务具体事务的多个委员会，它们作为货物贸易理事会和服务贸易理事会的下属机构而存在。所有这些委员会都向WTO全体成员方开放，但诸边协议委员会、纺织品监督机构、争端解决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例外。

所有理事会、委员会、工作小组和工作组都根据成员方的既定议程及要求召开会议。不过，WTO议程的日益扩大导致原有组织结构不断膨胀，这表现为WTO召集的会议纷繁众多。除正式会议外，WTO召开的不同级别的非正式会议也日渐增多（下一章将详细讨论）。2001年，霍克曼和考斯泰基曾作过估计，WTO每年召开的所有正式和非正式会议大约有1,200场。随着2001年11月“多哈发展议程”发起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这些会议的场次还在进一步增加。

WTO所有组织结构均由成员国政府及其代表组成。非政府组织（NGOs）或其他利益集团无法直接进入WTO。《建立WTO协定》第5条第2款这样规定：“总理事会可适当安排与涉及WTO有关事宜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和合作。”尤其是在1999年西雅图部长级会议遭遇惨败之后，WTO的合法性因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而面临严峻挑战，因此，WTO开始尝试与非政府组织友善相处。非政府组织可以在经过WTO审核认可后参加一些部长级会议。上诉机构也开始允许非政府组织提供“法庭之友陈述”[3]（*amicus curiae*，第五章将进行讨论）。然而，WTO网站对此作出了如下解释：

> 当上诉机构收到“法庭之友”主动提供的陈述时，陈述方无权要求上诉机构考虑这一陈述。但上诉机构保有权力接受并考虑任何它认为与裁决有关的中肯建议，包括主动提交的“法庭之友”陈述。

总而言之，如果一个特定利益集团期望对WTO规则施加影响，它只能通过其所属的成员方政府来实现。当然，WTO官员及谈判者意识到他们的决定会影响到国内选民的利益。但鉴于WTO成员驱动的特点，处理WTO法规利益分配后果的责任还是落在成员方政府身上，而不是由作为国际组织的WTO来承担。

对WTO组织结构的分析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矛盾现象。从很多方面来说，WTO都是同时代最具有扩张性和渗透性的国际组织之一。WTO部长级会议及众多委员会制订的规则深入国家边境范围之内。成员方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否则将面临惩罚。但与此同时，遗传自GATT的许多特点却使WTO在其他很多方面成为一个非常软弱的组织。上至最高决策机构——部长级会议——都是由其成员自己组成的。各成员方无须将他们的任何决策权力移交给秘书处，或委派给其他执行机构。成员方必须执行的任何规则都是他们自己在理事会和委员会上制订的（理事会和委员会向所有成员方开放）。任何惩罚措施都由成员方而非集体机构来行使。即使是授权采取报复措施的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也和总理事会一样由成员方代表组成。既然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如此脆弱，那么也许有人会疑惑，WTO为何还会招致众多对其缺乏民主的指责。答案并不在于WTO表面上民主的组织结构，而在于这结构背后的谈判和决策程序。

注释

1 “一揽子承诺”是指任何谈判成果都属于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员只能选择一体接受或不接受谈判成果，而不能单独就某项议题表示接受，这样规定的本意是避免某些领域的自由贸易支持者在其他领域不作出让步。——译注，下同

2 祖父条款来自于GATT《临时适用议定书》中的一个特殊的标准化条款，该条款规定了GATT与各缔约方国内立法之间的关系。按照《临时适用议定书》的规定，GATT缔约方在不违背其本国立法的最大限度内临时适用GATT第二部分。这就意味着，对于GATT的第二部分，成员方的国内立法享有优先地位。其结果是，GATT的法律效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各缔约方的国内立法，这就必然限制

GATT作用的发挥。而WTO多边协议则不同。《建立WTO协定》第16条规定，如果本协议条款和多边贸易协定的任何条款之间发生冲突，则本协议条款应优先适用；每一成员应确保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程序与所附协定规定的其义务一致；各成员不得对本协议的任何规定提出保留，对多边贸易协定任何条款的保留，仅按有关协定本身的规定处理，对多方贸易协定条款的保留应受该协定管辖。由此可见，WTO多边协议已经在一般意义上废止了祖父条款。

3 “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 或friends of the court），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是指将自己对法院有疑问的事实或法律观点善意地提醒法院注意或向法院报告的人。据此可以理解，所谓的“法庭之友”，通常是对特定案件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具有专业特长或独到见解的专业人士，其向法院提供的报告将有助于法庭加深对特定案件的了解，从而形成公正合理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庭之友”对特定案件的解决是有积极意义的。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国内法律中也有“法庭之友”制度。具体到WTO争端解决机制而言，WTO设有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并由专家组和常设上诉机构具体负责贸易争端的解决，因此，“法庭之友”是指WTO争端解决机构以及争端当事方以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从WTO的实际运作来看，这主要包括环境组织、劳工组织、保护消费者权益组织等非政府组织。

第三章

决策和谈判程序

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重要特征是以法律为基础，这一点是有着临时性本质的GATT所不具备的。然而，我们在本章将看到，与WTO协定、机构及实施能力的法律强制性同时存在的是其临时（*ad hoc*）从GATT沿袭而来的非正式决策和谈判程序。这套程序对于GATT也许可行，因为GATT的法律地位、管辖范围及活跃成员的数量都是有限的，它几乎相当于一个高级俱乐部。而在更具有权威性的WTO中沿用相同的程序则显得问题重重。在WTO的内部存在着一个难以调和的严重矛盾：一方面，WTO表现为高度法治化，特别是可以通过其争端解决机制来强制实施规则，而另一方面，WTO事实上（*de facto*）在制订规则时却表现得过分随意。对于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所应具有（或其中所缺乏）的连贯性来说，这种不协调显得很重要，然而，它也会对WTO中所存在的权力分布的不对称性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本章，我将探讨这些过程的主要特征，并分析规则和程序产生影响的途径。我的中心观点是WTO标准运作程序既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失衡，同时又使这些不平衡进一步加剧。本章第一部分重点讨论WTO的决策程序，而第二部分集中讲述WTO的谈判规则及模式。

WTO的决策程序

就WTO日常运作而言，WTO继承了GATT体制演变而来的许多程序。WTO所有决策程序表现为三大核心特征：投票规则、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决策惯例、在所有明示规则下隐藏的非正式程序的重要性。

投票程序

首先，WTO是一个“一成员一票”的组织，此做法从GATT直接沿用而来，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采用的加权投票机制形

成鲜明对照。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各国的投票权力取决于其份额大小，而各自份额大小则相应体现了他们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然而，《建立WTO协定》明确规定，每位成员在会议上拥有一票投票权，并进一步保证，除去前面章节强调的一些例外，正式会议应对全体成员方开放。

就实际投票的计数而言，WTO绝大多数重要决定都采用简单多数的方式作出。这一规定的例外在《建立WTO协定》第9条和第10条及相关诸边协议中予以详细列明。WTO在此处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存在显著差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绝大多数决定需要85％多数的投票才能通过。这就等于赋予了美国实质性否决权，因为其掌控着约17.5％的票数。WTO要求采用简单多数作出决定的做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国家在WTO中的席位超过了2/3，因而拥有更大的投票权。然而有趣的是，与联合国大会往往被多数票操纵不同，发展中国家从未真正利用过其在成员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其原因可从WTO决策程序的第二个原则中找寻：协商一致惯例。

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决策

尽管存在详尽复杂的投票程序，但GATT的绝大多数决定事实上都是遵循协商一致的原则作出的。GATT的这一做法在《建立WTO协定》第9条第1款中有着明确规定。协商一致意味着“如果没有任何与会成员在作出决定时正式提出反对”才能通过该项决定。[1] 这一做法对权力产生的最直接影响是，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在GATT或WTO中利用其成员数量众多的优势。不仅如此，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决策程序还在其他几个方面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首先，协商一致规则要求没有任何一个出席会议的成员反对所讨论的决定，这使发展中国家处境颇为艰难。WTO大约有22个成员方未在日内瓦设置代表处，因而也无法对拟议决定表达其反对意见。即

便对于那些在日内瓦设有代表处的国家，当好几个平行会议发生冲突时，能否出席也是个问题。在笔者2001年所作的一项研究中，发展中国家代表团的平均规模甚至不到发达国家代表团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出席WTO各种纷繁的会议都已显得捉襟见肘，更不用说有所准备地积极参与了。尤其是WTO成员驱动的特征（已在前一章论述）使得成员方需承担起筹备和参与WTO会议的责任，这样发展中国家发现他们根本无法有效地参与协商一致的决策过程。其次，为了达成协商一致的目的，WTO经常采用从GATT沿袭而来的类似高级俱乐部的会议方式。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现他们经常被排除在这些会议之外，因此，至少有些国家把这种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决策方式视为强者排挤弱者的工具。然而，WTO中的小型集团会议并非只是协商一致规则的产物。确切地说，它们构成了WTO决策程序的第三大特征：一种同样沿袭于GATT、依托于非正式外交程序而不是正式协商规则的普遍做法。

图8　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决策正在进行中！

在WTO外交中非正式程序的重要性

WTO非正式程序至少部分来源于GATT采用的所谓“主要供给者原则”（PSP）。“主要供给者原则”通常要求在主要供给者和消费者之间首先发起谈判，而不是在全体成员方之间展开公开讨论。非正式程序也是WTO给予其成员平等代表权的产物，这意味着要达成协商一致除了全体会议之外还需要其他程序。贸易外交中非正式程序的重要性甚至在WTO官方网站上也得到了认可。一些非正式磋商，例如“代表团团长会议”（HODs），可由全体成员方参与。其他的则涉及更小规模的集团，例如由总干事召集发起的“绿屋会议”。这些非正式程序的存在使得成员方拥有一定的灵活性，这对于使陷入困境的贸易谈判最终达成妥协往往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当非正式性及规则的缺乏事实上成为一种制度的基础时，两大问题随之产生。

第一大问题是缺乏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他们对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所具有的可预见性寄予厚望，非正式性带来了一些重大问题。GATT和WTO中的“绿屋会议”直至今日依然饱受争议：旧式的“绿屋会议”只有受邀方才可参加，甚至受邀名单也被当成一种机密。尤其是在西雅图部长级会议遭遇失败之后，这种磋商的不透明性及排他性受到严厉指责。例如，1999年12月2日，在西雅图会议接近尾声时，非洲贸易部长发布如下声明：

> 会议进程没有任何透明度可言，非洲国家正日益被边际化，关乎我们的人民及其未来的重要议题都被普遍排斥在外。人们为达成一个部长宣言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包括牺牲旨在保证参与和协商一致的程序，我们对此深表忧虑。
>
> 我们反对现在采取的做法，必须指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无法参与为实现部长级会议目标所需的协商一致决策程序。

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发布了类似声明。面对如此尖

锐的批评，所有相关成员方有意识地尝试对这一程序作出改进。小型集团会议的议程及受邀成员名单如今开始公布；成员方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参加；一些会议纪要也开始公开发布；会议均为开放式，目的只在建立协商一致，而非进行决策。然而即便如此，一些问题依然存在。发展中国家往往发现他们在一些具有较强技术性的领域甚至无法认清自身的利益，因而也无法要求获得参加小型集团会议的权利。他们还发现，如果没有出席达成协商一致的小型集团会议，他们就无法在决策的最后阶段威胁施加阻挠。此外，非正式性使得WTO各级会议主席手中拥有相当大的决定权。这些关键人物可以自行确定会议的议程、召开频率及受邀成员名单，从而能够对协商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对会议主席职责范围及其履行方式缺乏明确的规定，因此，某些主席所扮演的角色不可避免地成为冲突的导火索。最后，非正式程序的重要性意味着，WTO从GATT那里延续了被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秘书长鲁本斯·里库佩罗（Rubens Ricupero）形容为“接近英语俱乐部的氛围”。这个机构的排斥氛围，再加上语言障碍，导致WTO中规模较小和年限较短成员方的有效参与变得异常艰难。因此，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或单独提出了很多体制改革建议，以使WTO的运行接受一套正式规则和程序的严格约束。

WTO缺乏具体管理规则导致的第二大问题是其日益倾向于以权力为基础的即席操作。由于应对困境时缺乏普遍认可的规则，一些匆忙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最终成为WTO惯用做法的一部分。以饱受争议的规则为基础作出的决策注定是缺乏合理性的。由于决策过于随意、规则制订过于草率而引发问题的实例在WTO短暂的历史上比比皆是。2003年9月在坎昆举行的最近一次部长级会议很好地说明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坎昆部长级会议的结果将在第六章详细讨论。此处，值得强调的是，坎昆会议最终陷入僵局，原因不仅在于谈判各方存在严重分歧，同时多少也是谈判程序受到重重质疑以及决策程序极不正规的必然结果。

所有WTO部长级会议都以文本草案作为磋商的立足点。一般来说，GATT和WTO起草部长级会议文本草案就是将“括号文本”汇总的

过程。所谓“括号文本”是指将不同成员方所有充满争议的提议用方括号括起来，再提交部长级会议以进行磋商的文本。然而，在坎昆会议筹备阶段，总理事会主席卡洛斯·佩雷斯·德尔卡斯蒂略（Carlos Perez del Castillo）大使在“由他个人负责”，并与总干事紧密合作的情况下为部长级会议发布了一份文本草案。卡斯蒂略草案“并未要求现阶段在哪项议题上达成协议”，同时宣称对各成员方代表团在任一议题上的立场都不存在偏见。即便如此，该文本在为坎昆会议拟订谈判议程方面，尤其是包含或排除哪些议题的选择上，还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例如，包含“新加坡议题”（1996年在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一些发达国家试图将WTO管辖范围拓展至贸易与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和贸易便利化，之后便有了这样的叫法）的谈判模式对一些发达国家是有利的。自1996年以来，发展中国家一直竭尽全力反对将这些议题包含在谈判议程之中，更别说同意采用磋商这些议题的谈判模式了。正如预料之中的那样，发展中国家对这一文本的反应非常激烈。他们不仅对它的内容予以抨击，而且还因其是总理事会主席“自作主张”的文本而非传统的“括号文本”而加以指责。然而，卡斯蒂略草案最终还是被用作坎昆部长级会议的讨论文本。

尽管遭遇激烈反对，卡斯蒂略草案依然得以发布，而后还能作为坎昆部长级会议的讨论文本，这一事件可以利用之前的哈宾森草案予以解释。在2001年多哈部长级会议筹备阶段，总理事会主席斯图尔特·哈宾森（Stuart Harbinson）也曾发布过一份类似文本。当时，发展中国家对主席发布这一文本的权力提出了质疑；一些国家甚至严厉指责这一文本忽视了他们的观点。然而即便如此，该文本依然被用作多哈部长级会议的文本草案；这为坎昆卡斯蒂略草案提供了先例。由于文本起草没有任何程序规则可以遵循，而总理事会主席职权范围没有明确界定，发展中国家对阻止这一做法几乎无能为力。事实证明，在WTO决策程序缺乏明确规则的情况下，强者总是能够将先例为其所用，弱者推翻这种先例的种种尝试通常都是徒劳的。

这种富有争议的规则随意性还表现在“明确一致”的理念上。由于印度在多哈部长级会议上的坚持，最后的文本同意在第五次坎昆部长

级会议上采用“明确一致”的决策方法对“新加坡议题”进行磋商。这一名词的采用被视为发展中国家赢得的一次重大胜利。然而，事实上，该名词并无法律依据，也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不可避免地为接下来的坎昆会议留下了争论的隐患。发展中国家的解释是，“明确一致”应适用于“新加坡议题”的一切磋商；发达国家却认为，关于谈判的发起早有协议，因此“明确一致”仅需要应用于磋商的模式。如果对此早有充分的界定和适当的规则，坎昆会议的这种争论大多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在坎昆会议上，发展中国家还对所谓“协调员”的任命程序及其履行相应职责的方式表示了不满。GATT和WTO都曾采用过这种选择“协调员”（也被称为“主席之友”）协助部长级会议主席就特定议题召集小集团磋商的做法。然而，对于“协调员”的选拔基础或标准却未作出明确规定，以致为此争议不断。当意识到“协调员”在议程设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后，发展中国家在坎昆会议上对“协调员”的选拔程序、履行职责的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纷纷提出质疑。许多发展中国家感觉到，由于“协调”不力，他们对最初文本中几个段落（尤其是农业和“新加坡议题”）的持续反对被公然忽视，直至会议闭幕日。

最后，WTO规则缺乏的严重程度还可以从仓促决定结束坎昆会议引发的争议中得到体现。根据惯例，各成员方认为，坎昆会议在9月14日既定日程结束后仍将继续进行。德贝斯（Derbez）部长按照既定结束日期宣布会议闭幕的决定激起了各种激烈反应。一些人指责德贝斯屈从于美国施加的压力；其他一些人批评他对GATT/WTO特有的策略技巧和边缘政策缺乏了解；还有一些人则称赞他通过6个段落的形式宣言设法挽救了会议。然而，所有这些争论都忽略了WTO这一国际组织的重要目标，即为其成员的多边合作提供一套值得信赖的规则指导。沿袭自GATT旧体制的惯例，及其“走廊外交”文化和不成文的合作议定书，使WTO根本无法实现这一伟大目标。

WTO的谈判程序

WTO议程的内容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决策程序。这当中有些本身就是谈判的产物。正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那样，关于决策程序规则谈判的协议非常少，并且事实上在规则的制订过程中经常引发争议。但是，一旦议程拟定完毕，正式或非正式的谈判程序将对最终谈判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没有适当的谈判协议，WTO存在的理由——为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提供谈判的平台——就会成为一纸空谈。当然，任何谈判都是由国家的利益倾向性、国内利益集团及各个独立的谈判方来推动的。不过，各个国家在WTO中承诺削减关税却是非常重要的：WTO制订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不会自动形成，如果没有这些规则，结果将非常不同。接下来，我将分析谈判程序的主要特征，并提供一些例证，说明有时谈判进程如何朝着有利于WTO中强国的方向发展。

首先，如前面章节所讲述的，WTO为其成员的所有贸易谈判提供了两大主要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MFN）和互惠原则。前者将两个成员方的谈判减让成果适用于其他所有成员方，从而扩大了谈判成果的利益分享范围，并有效防止可能出现的双边主义。然而，为了避免“搭便车”的发生，也为使国内政治势力欣然接受贸易自由化，第二个互惠原则也很关键。按照这两个原则谈判达成的减让还须接受一定的约束。如果国家超出限定水平，他们将遭到惩罚（特定情况除外）。这些原则在GATT时期就已存在，而WTO通过其更强大的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原则。当一成员方违反其承诺的义务时，WTO争端解决机制可以授权对此实施报复，而且这适用于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第四章中将予以详细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最惠国待遇和互惠待遇两大原则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WTO通过在谈判过程中将互惠条件纳入最惠国待遇原则来化解这一矛盾；一旦达成减让就必须实行多边化，而不能以对等优惠为条件。

第二，WTO采用的一些特定方法事实上拓展了最惠国待遇和互惠原则，以增加或排除某些特定的成员方和议程。例如，在GATT的前5轮谈判中，关税谈判主要应用“主要供给者原则”。依据该原则，最初谈判会在特定产品的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进行。霍克曼和考斯泰

基解释了这背后的基本原理：

> 对一个小供给者给予减让意味着丧失向主要供给者提供减让的机会，因为后者将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从减让中受益。主要供给者是从减让中获益最多的贸易国，并因此可能愿意提供或能够提供比小型供给者更加互惠的贸易自由化。

小国可能会在最后阶段参与到谈判中来，因为对主要供给者给予减让的国家可能要求以从同类产品的其他小供给者那里获取对等减让为条件。然而，正如第一章所讨论的那样，建立在如此原则基础上的谈判导致发展中国家及其议程在GATT中陷入边际化。而且，随着GATT议程中的产品及成员方数量不断增加，建立在“产品对产品”基础上的谈判变得极其错综复杂。

为了解决“主要供给者原则”存在的一些问题，肯尼迪回合采用了“全面关税减让谈判”方式，主要运用两种公式类型：线性减税公式和协调减税公式。前者要求所有成员方对所有产品按统一比例全盘削减关税。这使得覆盖面更广，但同时也意味着关税高的国家在与执行相同关税削减比例的其他成员方进行贸易往来时可以继续保持高关税。协调减税公式可以有很多种类，取决于所使用的特定公式，它可以让高关税国的关税降低幅度大大超过低关税国。因此，公式的选择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政治问题，尤其当不同公式对国家内部及之间产生的分配影响各异之时。为选择谈判公式展开的政治斗争之激烈程度在坎昆会议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谈判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成员方之间无法就多哈农业谈判的公式达成一致。虽然肯尼迪回合通过了“全面关税减让谈判”的方式，但实际上肯尼迪和东京回合运用了“混合搭配”方式。乌拉圭回合则采取“部门对部门”方式而不是公式方式。如今，根据谈判议题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式。例如，根据2004年夏天达成的“七月一揽子协议”（第六章将讨论），农业谈判采用分层削减公式，而服务业谈判将继续采用要求—回应的谈判模式。到目前为止，成员方之间的服务业谈判普遍令人失望，一些观察家将其归咎于要求—回应的谈判模式，并要求采用一种更为普及的方式来加以取

代。

第三，多边贸易谈判是否能够取得成功与议题关联性密切相关。A国同意在关乎B国利益的议题I上作出让步，而作为回报，B国需在符合A国特定利益的议题II上作出让步。换句话说，议题关联性有助于双方进行互惠的交换。这种交换还可以依据谈判各方的关税特惠而增加贸易自由化的潜在收益。如果缺少了这种关联性，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将会更加艰难，事实上，WTO也不可能成立。“一揽子承诺”概念正是这种议题关联性的集中体现。

尽管议题关联性有助于达成协议，但它也有负面影响。强国可以利用这种手段从弱国获取不成比例的让步。经常援引的一个例子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和纺织品议题上赢得了一些让步，但不得不以加入新议题的沉重代价来换取那些让步。关联性还可能超越贸易议题的范围。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们动辄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威逼利诱以获取发展中国家改变立场或同意让步。利诱的手段包括援助、低息贷款、市场准入配额及区域贸易安排，而同时又以撤销这些让步和特殊待遇来施加威胁。

议题关联性会导致权力失衡进一步加剧，尤其当它们被用来使弱国为换取同等让步付出好几倍于强国的代价的时候。事实上，被称为“志同道合集团”（LMG）的发展中国家联盟曾以此观点威胁阻止发起新一轮贸易谈判（即所谓的“多哈发展议程”）。LMG突出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执行乌拉圭回合协议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即指执行协议的代价，还包括发达国家未能善始善终地履行乌拉圭回合协议规定的义务，因此乌拉圭回合的成果并未让发展中国家受益。他们指出，如果同意发起新一轮谈判并获得减让，那么在新一轮谈判议程中必然会包括执行议题，那样他们将不得不在新议题上作出更多让步，以得到乌拉圭回合中没有兑现的承诺。正是由于议题关联性的负面影响，“一揽子承诺”方式也招致了某些团体的猛烈批评。

第四，任何一个国际组织运行机制背后隐藏的是其组织文化，这种文化会对其成员方采取的谈判和结盟策略产生重要影响。正如第一章提到的，GATT的谈判文化使发展中国家给它贴上了“富人俱乐

部”的标签。发展中国家并未将有限的资源耗费在一个与其利益相背离的组织，而是另辟蹊径，成功创建了一个主要关注自身发展的经济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展中国家对GATT的参与是非常有限的，其中还充满对抗。WTO议程的扩张及日益合法化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他们不能再处于多边贸易体制的边缘。然而，GATT和WTO的组织文化依然存在相似性，后者承袭了前者的决策程序，以及“绿屋会议”和“走廊外交”的非正式合作形式。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普遍坚持他们在GATT时代所采用的诸多谈判策略。

约翰·奥德尔（John Odell）曾用从价值索取型到价值创造型的一条线谱来描述谈判策略，他写道：

> 线谱的一极是纯粹的价值索取型或分配性策略，指当一方目标与其他谈判方发生冲突时为实现本方目标而采取的一组行动……相反的另一极是纯粹的整合性或价值创造型策略，指为实现并不存在根本冲突的目标时所采取的旨在扩大而不是分割共同利益的行动。

在这条线谱上，WTO中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采取严格的分配性策略。当然，这取决于几个要素，包括特定谈判者的角色、国内政治经济实力及该国的政治文化。此外，还有两个与WTO文化有关的因素进一步促使发展中国家采取强硬立场，在达成妥协时缺乏灵活性。首先，严格的分配性策略尤其在谈判各方的信任度较低时才会普遍采用，而这种情形在WTO中是客观存在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抱怨长期以来，无论是在GATT还是在WTO，发达国家总能轻而易举地迫使他们达成“协商一致”，并且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意见不断扩展WTO议题。其次，正如本章前面部分所讲述的，发展中国家发现他们无力顾及谈判中的一些技术问题，而整合性策略则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更高。谈判节奏已使发展中国家难以坚持积极主动的谈判立场，更不用说采取整合性策略必不可少的避退立场了。他们往往在谈判最后阶段屈服于压力，因而很难赢得让步。印度前任大使巴吉拉特·拉尔·达斯（B. L. Das）曾这样评论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轨迹：

从长期坚决的反对到最终顷刻间的默许，这一逆转剥夺了发展中国家从其谈判最后阶段的让步获得任何回报的机会。

这样，最终达成的协议进一步加剧了相互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并且危及政治上的可持续性。

最后，如果不提及加入程序，任何关于WTO谈判机制的讨论都将是不完整的。WTO最初有128个成员，截止2005年增加至148个，还有一些国家正在等待加入。然而，WTO的加入程序相当繁琐。它以双边谈判为开端，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可以要求与申请加入的成员方展开谈判，得到全体成员方的2/3多数的同意方可加入。申请加入的成员方虽只能在WTO协议现有范围内进行减让谈判，但他们有可能被正式成员方要求作出更多的减让。2003年柬埔寨——WTO自1995年成立以来加入的第一个最不发达国家（LDC）——加入WTO的过程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谈判的不对等性。英国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一则报道指出，柬埔寨在一揽子加入承诺中被要求放弃使用非专利药品，然而，WTO知识产权协定事实上已将最不发达国家在医药产品方面履行该义务的过渡期延长至2016年。而在农产品方面，欧盟和美国则保持了比柬埔寨签署的关税承诺高出好几倍的关税高峰[2]。难怪柬埔寨商务部长占蒲拉西（Cham Prasidh）说道："这是一份远远与柬埔寨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一揽子减让承诺"。

尽管存在如此严重不对等的加入程序，但各国还是愿意作出大量让步以加入WTO。因为成员方认为，加入WTO所获取的利益远远胜过为加入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令人质疑的决策程序和已被政治化色彩笼罩的谈判程序产生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确实，最近加入的绝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期望得到的利益包括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获得所有其他成员方的市场准入、对强国的违约行为采取保护措施以及援引可强制实施的争端解决机制为这种保护寻求支持。无论这些利益是否如期望的那么高，也许都可以通过审查协议的实体内容得到最好的衡量。

注释

1　协商一致规则是指当有关机构就提交的事项作出决定时，如果与会成员代表并未正式提出反对，则视为该机构已协商一致作出决定。但协商一致并不等于意见一致，或各成员方都对一项决定表示拥护、支持。不出席会议，或出席会议但保持沉默、弃权，或发言只属于一般性评论等等，都将不构成正式的反对意见，应视为决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协商一致原则是成员方尽各种努力不经投票达成的相互妥协及和解。这种方法的微妙之处在于，有些成员方在对某项决定并不十分赞同但又不想得罪某些国家时，可以很体面地“过关”；不利之处在于任何一成员方都有否决权。

2　关税高峰（Tariff Peak）是指大多数进口关税都较低，但对于少数敏感性产品（即希望保护国内生产者的产品）仍然设置高关税的情况。高关税的存在，往往导致外国竞争品的进入成为不可能（即实行禁止性关税）或市场准入量很小。因此，关税高峰现象会对外国竞争品的市场准入机会产生重要影响。WTO通常将关税高峰定义为超过15%的关税水平，但这种定义通常用来衡量制造品的进口。根据农产品的特点，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将农产品的关税高峰定义为关税税率等于或高于100%。

第四章

不断扩张的管辖范围

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已看到，WTO工作的结构和程序与GATT非常相似。然而，就其管辖范围来说，WTO规范和仲裁的范围远远超过了GATT的边境措施涉及的领域。如其名所示，GATT主要致力于关税措施及适用货物贸易的其他相关措施；而WTO协定管辖的范围不仅包括关税，还包括非关税贸易壁垒措施，甚至还延伸至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WTO的许多协议触及到了传统上属于国家内部主权的领域。在本章，我将通过介绍WTO协议的方式来分析WTO的管辖范围。这些领域的一些规则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因为全球化滋生的新问题要求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然而尽管其内容看似非常专业而深奥，WTO的规则制订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过程。把哪些议题纳入协议，把哪些排除在外，这些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强国利益的影响。同时，WTO协议的作用往往被事实证明是不均衡的，许诺给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很多至今仍未兑现。

协议体系

WTO协议是1994年马拉喀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产物。《建立WTO协定》主体部分由一系列长达550页的法律文本构成，其内容包罗万象。除此以外还有4个重要附件，对成员方必须遵守的实体规则和必须履行的义务作出了规定。附件1分别涵盖货物、服务和知识产权三部分，同时还包含由各成员方作出的长达30,000多页的承诺减让表。附件2和3分别为争端解决谅解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最后，附件4包括4个由部分成员签署的诸边协议。此外，自1994年以来，还新增了其他几项协议，如《加入议定书》、《信息技术协议》及《金融服务承诺谅解协议》。在本章，我们将集中讲述附件1的三大支柱协议，同时也会提及一些诸边协议。附件2和3将在下一章予以分析。

WTO协议与GATT协议唯一雷同之处是附件1a，即货物贸易协议。这一协议被称为GATT 1994，但不应与GATT1947混为一谈。GATT 1947涉及的多边规则范畴非常狭窄，它仅仅规范了与货物贸易

有关的关税壁垒措施。在肯尼迪和东京回合，GATT开始将非关税壁垒作为自愿性诸边守则纳入其管辖范围。WTO却将所有这些规则并入GATT 1994的多边规则，从而使它们成为“一揽子承诺”的一部分。因此，GATT 1994的管辖范围远远超过了GATT 1947，如技术性贸易壁垒、政府采购、反倾销、海关估价等。尽管GATT最初仅规范了货物贸易，但附件1b和附件1c——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却将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两项新议题成功纳入WTO的管辖范围。由于乌拉圭回合“新议题”主要所涉及的贸易壁垒已非边境措施，而是与国内法规相关联的非关税壁垒，将这些议题纳入WTO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各国国内主权领域。尽管WTO延续了GATT的许多结构和程序，但WTO协议却扩展到GATT从未进入过、也从未试图进入过的领域。

表2　WTO协议体系

总括	《建立 WTO 协定》		
	货物（附件 1a）	服务（附件 1b）	知识产权（附件 1c）
基本规则	GATT	GATS	TRIPs
附加细则	其他货物、协议及附件	服务附件	
市场准入承诺	国别承诺减让表	国别承诺减让表及最惠国待遇例外	
争端解决	争端解决附件 2		
透明度	贸易政策审议附件 3		
诸边协议	民用航空器贸易 政府采购 乳制品 牛肉		

WTO管辖范围在GATT模式基础上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生产模式和比较优势已从工业品的生产转向服务业和知识产权。任何旨在维系发达国家承诺的贸易组织势必要包含这些与发达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乌拉圭回合即是在发达国家这种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的驱动下发起的。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开创的“GATT自行车理论”经常被加以引用：如果GATT这辆自行车无法继续前进，它就会从此倾覆。WTO议题的不断增加由此也可视为适应成员方比较优势变化进程的一部分。

WTO管辖范围不断扩大的第二个原因在于GATT取得的辉煌业

绩，它成功地使工业品关税大幅削减。然而，随着关税壁垒被禁止，成员方纷纷开始寻求非关税保护措施。罗伯特·鲍德温（Robert Baldwin）曾经把贸易自由化形象地比喻为排干沼泽，这一比喻经常被人援引：排水的努力在成功使水位（关税）下降的同时也会让水面下的岩石、树桩和其他障碍物（非关税壁垒）重新浮现。为进一步扫除这些障碍，对成员方国内法规施加干预则成为一种必然。从这个角度来说，WTO议题的拓展只是代表了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步。然而，那种扩张趋势并未决定WTO规则的具体内容。下面，我将详细说明我的观点，即WTO规则制定的内容及制定者主要取决于WTO中权力的平衡，而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影响组织内部的不平衡及边际化。

多边货物贸易协议/GATT 1994

GATT 1994建立在GATT 1947基础之上，继续以削减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宗旨。它不仅包括适用于货物贸易的一般规则，还包括各成员方有关关税削减和约束的具体承诺减让表。一般规则涵盖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海关估价、取消数量限制及紧急限制进口措施。伯纳德·霍克曼和迈克尔·考斯泰基指出，GATT纷繁复杂的条款和协议下暗含着三大目标：建立非歧视原则、禁止数量限制措施（QRs），以及防止成员方规避非歧视原则和同意遵守的其他承诺。鉴于GATT 1947已顺利实现前两个目标，GATT 1994的许多条款和规定都旨在确保GATT在非关税壁垒上也取得同样的成功。

GATT 1994之所以能够达成颇为广泛的协议完全是乌拉圭回合谈判妥协的结果。GATT 1994及其关税约束、非关税壁垒和严格的透明度要求成为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所谓“全盘交易”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同意接受延伸至国内主权领域和超越传统货物贸易范畴之外新议题的更为严格的规则，下文将会对此作出阐述。反过来，他们也得到许诺，新体制将关注他们的切身利益。当然，签署协议时就已经有不少

质疑。而在马拉喀什协定签署10年后的今天，即便当初是该协定的积极拥护者也开始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受到了欺骗。接下来，我们将分析，是谁在“全盘交易”中放弃了什么，才使世界有了一个世界贸易组织。

关税与贸易

关税是经常使用的一种贸易保护措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关税是比配额更加理想的贸易限制措施。因为配额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它不仅切断了国内外市场价格之间的联系，而且还容易增加国内经济中的寻租和腐败行为。因此，GATT 1947和GATT 1994对该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GATT第11条要求全面取消数量限制措施，但关税是被允许的。伯纳德·霍克曼和迈克尔·考斯泰基指出了WTO关税措施运用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关税必须依据最惠国待遇条款按照非歧视原则加以实施，前面的章节已经对此有所论述。第二，成员方不得提高其在减让表中承诺的关税水平，也就是说，他们不得将其关税提高到“关税约束”水平以上。减让表采用了“肯定列表”的方法，这意味着关税约束仅适用于成员方在减让表中列明的那些特定产品。

乌拉圭回合取得的诸多成就之一就是增加了接受关税约束的产品数量，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承担关税约束的义务。在乌拉圭回合之前，前殖民地国家加入GATT并不需要进行关税谈判，并且特殊和差别待遇也可使其免于提交关税承诺减让表。WTO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这一做法，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提交关税承诺减让表。为了达成“全盘交易”，发展中国家最后接受了这一变化。同时，他们也被许诺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获得北方国家的关税减让。其中一个例子是农产品，过去农产品事实上被长期排除在GATT规则之外。然而，根据GATT 1994，成员方所有的农产品必须进行关税约束。同时，GATT 1994还承诺通过逐步废止《多种纤维协定》来取消纺织品和服装的例外规定。作为回报，发展中国家同意接受关税水平约束。据霍克曼和

考斯泰基的记录，乌拉圭回合之前，发展中国家只有22%的工业品接受关税约束，乌拉圭回合之后，这一数字上升至72%。而发达国家则进一步在其工业品上作出减让承诺，将接受关税约束的工业品比例从78%提高到99%。

然而，对关税约束的进一步分析揭示了一些问题。发展中国家承诺的关税约束比例增幅很大，但由于他们的关税约束水平比其实际适用税率高出许多，因此并未真正实现与其关税约束相称的自由化水平。结果，关税约束没有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唯一实质性好处仅在于设置了一个上限，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任何成员方都不能轻易将其关税提高到超过这一上限水平。发展中国家这种事实上有限的承诺自然激发了成员方、企业主及理论家的愤慨。鉴于发达国家工业品实际平均关税水平已经降低到3%以下，发展中国家继续对贸易加以限制则显得尤其令人无法接受。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急不可耐地辩称，发展中国家在要求发达国家作出更多减让之前必须致力于实现真正的自由化。然而，尽管其平均关税水平令人振奋，但发达国家的承诺减让表也远非完美。

降低工业品的平均关税掩盖了发达国家在某些特定产品上继续维持关税高峰的事实，而这些产品往往都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利益的关键所在，例如，皮革、橡胶和鞋类。一些发展中国家拥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和纺织品也由于例外措施和豁免权事实上被排除在GATT一般规则之外。乌拉圭回合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将这些议题纳入WTO框架。然而，即使《多种纤维协定》计划于2005年底前分步中止，但发达国家对纺织品征收的关税水平依然很高。例如，美国约52%的纺织和服装产品关税水平介于15%—35%之间。其他发展中国家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类似较高的市场准入壁垒，例如，热带产品和鱼类。换句话说，尽管货物贸易关税削减自GATT以来已有50年的历史，但WTO倡导下的多边关税减让进程对该国际体制中的弱者来说依然非常不公平。

发展中国家除了要与WTO默许的“关税高峰”作斗争外，还会面临“关税升级”[1]问题。“关税升级”是一种关税结构，其中原材料关税

税率比加工制成品要低。这种关税结构成为抑制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加工的重要因素。尽管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关税升级”有所减少，但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具有潜在优势的领域，问题依旧存在，这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样地，尽管GATT一直明令禁止设置配额，但各国还是设法寻找到使用配额的途径。GATT 1994第11条禁止使用配额限制措施，但关税配额的运用还是在农产品这一重要领域不断增加。由于关税高峰、关税升级以及关税配额被肆意滥用，发展中国家发现他们从乌拉圭回合得到的利益远远低于当初签署协议时的预期（例如，世界银行和GATT秘书处的分析所得）。乌拉圭回合并未兑现的承诺使发展中国家怨声载道，并成为1999年西雅图和2001年多哈部长级会议发展中国家联盟议程的重要内容。

农业和纺织业

承诺未兑现的情况突出体现在农业和纺织领域。将这两部分内容纳入GATT 1994是“全盘交易”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重要条件。然而，GATT 1994并未将这两项内容纳入其一般规则，而只是一般规则并不适用的具体协议。

《农业协议》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凯恩斯集团协调努力的产物，而且欧盟和美国在最后时刻也对此达成了妥协（见下框）。协议旨在解决对农业贸易政策的“三大支柱”：市场准入、国内支持机制和出口补贴。此外，WTO还就成员方可能采用随意性标准的非关税壁垒在《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后文将予以讨论）中作出了规范。乍一看，这些承诺似乎意义非常重大，尤其是考虑到将配额和其他保护措施实行“关税化”之后本应会带来的透明度。

凯恩斯集团（the Cairns Group）

将农业议题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凯恩斯集团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令人瞩目。由农产品出口国组成的凯恩斯集团成立于1986年，最初的成员有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斐济、匈牙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乌拉圭。与以往许多联盟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特定议题的联盟，且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组成。该集团诞生的重要背景是欧盟和美国之间爆发的农业补贴战，当时中等收入的农业出口国由于无法给予其农业生产者富有竞争力的补贴而削弱了自身的比较优势。

在成功将农业纳入新一轮谈判议题之后，凯恩斯集团便开始在代表着农业政策两个极端的国家即欧盟和美国之间充当协调者并展开斡旋。集团在积极充当协调者角色（区别于传统发展中国家的阻击联盟）的同时，也准备在必要时以阻击为威胁手段。当《农业协议》最后被并入《马拉喀什协定》时，许多观察家都将这一成果归功于凯恩斯集团的斡旋。从那之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凯恩斯集团都被视为联盟的典范，促使其他联盟纷纷效仿其“议题为基外交”的模式。

这种效仿凯恩斯集团基于议题建立联盟的试验结果不尽相同。这是因为凯恩斯集团本身就是在代价高昂的补贴战时代背景下一系列无法复制条件的产物，甚至美国和欧盟也都曾试图控制补贴战的发生。其次，在乌拉圭回合期间，凯恩斯集团与美国有着共同的长远目标。最后，对凯恩斯集团取得成功的绝大多数研究分析都忽视了在最后阶段凯恩斯集团被日益边际化的事实。美国和欧盟1992年在《布莱尔宫协定》中达成了最终的协议，期间凯恩斯集团被彻底排除在外。正是由于该协议是欧盟和美国最终协商

的产物，《农业协议》存在有损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款和规定就不足为奇了。

资料来源：阿姆里塔·纳利卡，《国际贸易与发展中国家：GATT和WTO中的协商联盟》（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3）

《农业协议》禁止实行新的出口补贴。为改善市场准入，所有农产品关税都必须接受约束。在某些特定产品方面，一些国家虽然可将关税约束在禁止性的高水平，但也必须通过维持关税配额量（TRQs）来保证最小限度的市场准入。尽管GATT禁止使用配额限制措施，但对农产品而言，当一国将其关税约束在禁止性水平时（例如，日本的大米关税政策），则必须强制性采取一定数量的进口配额，以允许按较低的关税税率进口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关于国内支持措施（旨在鼓励过量生产，并由此扰乱国际市场），主要谈判的是“综合支持量”[2]。“综合支持量”的计算以1986至1988为基期年份，用于评估成员方对农业部门的国内支持水平。它将补贴行为分成4种类型，有些类型是被允许的，但其他一些是被绝对禁止的。这是因为“综合支持量”并非针对所有农业政策改革，其主要目的仅仅在于规范那些造成贸易扭曲效应的政策措施。依此逻辑，“红箱”中的国内支持措施是被禁止的。“黄箱”措施则需要按照既定的比例予以削减。“绿箱”措施是被允许的国内支持措施，例如政府资助的研究、与生产不挂钩的直接给予农民的收入转移以及为粮食安全而给予的各类支持等。此外，美国和欧盟谈判达成的《布莱尔宫协定》中还有一项“蓝箱”措施，允许欧盟对限产计划下的农民给予补偿性支付，美国则实行差价补贴。《农业协议》还具体规定了出口补贴必须进行的削减，同时明令禁止出台新的出口补贴措施。考虑到乌拉圭回合谈判时粮食进口国的实际困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承担的义务要比发达国家轻很多。最终，发展中国家看上去似乎获得了一个不错的

谈判结果。

然而，进一步的审视使我们发现，自由化进程本身依旧非常缓慢。就制成品而言，关税被约束在比其实际关税还要高的水平，从而产生“约束悬空”现象。尽管每种产品的关税削减要满足最低15%的要求，但发达国家仍然可以集中于那些对发展中国家无关紧要的产品作出削减，即使这样，也能达到6年内所有产品平均关税水平削减36%的要求。同样，在《布莱尔宫协定》中作为对欧盟的妥协，“综合支持量”并没有具体针对特定产品。结果，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集中于那些对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质好处的产品来满足国内支持量的削减要求。农业在发达国家相对于制造业来说仍然是一个受到严格保护的产业。T.赫特尔（T. Hertel）和W.马丁（W. Martin）曾在2000年的一项研究中测算，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致使发展中国家每年损失达400亿美元。《农业协议》内置了一个计划于2000年发起谈判的“既定议程”，然而农业自由化至今仍然是一个充满荆棘的艰辛征程（第六章将进一步讨论）。

《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也没有实现预期利益。由于发达国家对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设限，使发展中国家每年遭受约100亿美元的损失。这种损失乍一看简直令人吃惊，尤其是《纺织品与服装协议》已经规定，《多种纤维协定》下的配额制度要在10年内分4个阶段逐步予以取消。然而，由于缺乏对实行自由化产品的确切规定，使得发达国家直到最后一个阶段（即2004年底）才对与发展中国家利益攸关的产品实行自由化。结果，WTO成立后前十年内预期应得到的利益并未能如期实现，而这种利益本该是作为对发展中国家同意将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和服务业纳入新议题中所付出代价的一种补偿。

原则、规定和非关税壁垒

尽管GATT 1994的利益并未实现，但采用一套更加严厉、渗透性更强的规则却使得执行协定的成本有所增加。有些规则与过去东京回

合谈判达成的内容雷同，旨在解决日益扩张的非关税壁垒问题。但与东京回合自愿守则不同，GATT 1994要求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些规则的约束。而且，这些强制性的规则通常与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要求相吻合。J. 迈克尔·芬格（J. Michael Finger）和菲利普·舒勒（Philip Schuler）在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诸如《海关估价协议》、《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协议的内容实际上相当于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发出命令："按我的方式来行事！"因此，这些规则往往被视为发达国家通过WTO强制实行的。即便从长远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可能会从这些协议所要求进行的基础设施改革中获益，但他们对执行协议过程中的成本大感不满。结果，这些规则的建立不仅使WTO的管辖范围比GATT大大拓宽，同时也加剧了WTO内部的南北对立。尽管这些协议赋予发展中国家更长的过渡期，但尤其在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之后，发展中国家宣称，过渡期赋予的喘息机会远不足以解决他们执行协议的成本。

GATT 1994下《海关估价协议》即是这种协议的代表。各成员方极有可能出于海关目的对进口产品任意适用标准，从而用非关税壁垒填补关税削减。为了预防这一风险，各成员方制定了海关估价守则，并将其纳入GATT 1994以取代GATT 1947含糊不清的海关估价要求。该协议要求各成员方的海关规则与既定的一套海关进口估价标准保持一致。由于发达国家的海关管理程序早已完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承受了更多的改革压力，且这些改革成本通常非常高昂。例如，据芬格和舒勒的保守估计，牙买加执行《海关估价协议》的成本将达840,000美元（包括120,000美元的培训成本、150,000美元的计算机设备和数据库成本，以及增加的600,000美元的人力成本）。

《实施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谈判时作为GATT 1994下《农业协议》的一部分——引发的问题与海关估价基本类似。制定该协议旨在"维护政府提供适当健康保护措施的自主权，但需要确保这些权力不至因保护目的而被滥用，从而形成不必要的国际贸易壁垒。"原则上来说，这不会造成标准的一致化。成员方可以维持他

们喜欢的标准和评估方法。但如果成员方在其边境对进口商品使用这些标准时，SPS协议则要求该成员方阐述其科学依据。由于现有国际通行标准都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证明本国标准同样有效的任务非常艰巨。即使发展中国家的原有制度有效可行，他们最终还是将大量款项用于更新自己的标准，以使其与发达国家的标准相符。例如，根据芬格和舒勒的记载，阿根廷花费了8,000多万美元用于提高动植物卫生检疫水平。在有些情况下，执行协议的成本甚至会超出最不发达国家（LDCs）的年度发展预算。《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也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同样的困难。

SPS和TBT等协议不仅执行成本高昂，而且这些规则还侵入到了各国国内管理体制、伦理、消费者选择和人们的文化习惯之中。美国和欧盟关于欧盟禁止含有激素牛肉进口的争端之所以如此激烈，就在于它对人们的饮食习惯和文化偏好产生了重要影响。WTO争端解决专家组和后来的上诉机构最终裁定这一禁令违法，理由是它不符合SPS要求本国标准具备科学依据的规定，同时也没有考虑有关国际组织制定的风险评估程序。当欧盟宣布无法接受这一裁决后，WTO仲裁庭授权美国及随后的加拿大对欧盟实施报复。这一事件可被视为WTO干预国内偏好和饮食习惯的典型案例。

乌拉圭回合之后，GATT侵入国内主权的另一个富有争议的领域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该协议中的各项政策可以被成员方政府用于要求外国投资者达到特定的业绩标准，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其中包括，当地含量要求（即外国投资者必须使用一定量本国制造的产品）、出口要求（即跨国公司必须将其产品的一定比例用于出口以改善东道国的国际收支），以及技术转移要求。发展中国家极力反对将这些议题纳入GATT，理由是它们已超出GATT最初的管辖范围。结果，TRIMs协议未能完全如美国设想的那样，而发展中国家也争取到了更长的执行过渡期。但它的确成为GATT 1994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协议不允许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和产品采取违反GATT国民待遇要求和数量限制禁令的措施。

与SPS、TBT及其他新议题类似，发起TRIMs谈判的动力主要来自

于发达国家。正如SPS、TBT协议采用北方标准那样，TRIMs协议意在保护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指北方国家）在东道国（主要指南方国家）的利益。如果“全盘交易”中有其他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协议或条款来平衡这种不对称性，那么这些WTO规则本来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例如，TRIMs协议虽然可以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却不能维护东道国的利益。因此，即使TRIMs协议成功引入了一套东道国用于对跨国公司进行管理的行为守则，但发展中国家曾期望制定的《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最终还是于1991年胎死腹中。

尽管GATT 1994的范围和目标都比GATT 1947更具扩张性和侵入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员方面对国际规则的冲击而无任何防范措施。实际上，GATT 1994中有很多临时性中止义务的例外规定，如反倾销（AD）、反补贴税（CVDs）、国际收支平衡、幼稚产业保护、紧急保障及农产品和纺织品特殊保障措施。其中有些在GATT 1947中就已存在，但很少被援用。这是因为成员方，尤其是大国发现，经双方磋商达成的所谓“自愿出口限制”（VERs）措施执行起来更加简便。WTO的贡献在于对VERs施加限制，并从法律意义上明确义务中止的条件；而且，可以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强制实施使得这些协定更具效力。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却发现很难防止成员方——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滥用这些例外规定，因而让那些历经艰辛谈判达成的减让承诺大打折扣。

中止最惠国待遇义务最通常援引（及滥用）的WTO规定是反倾销。倾销是指“一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低于其在本国市场的通常价格”。WTO成员方可以对这种倾销行为采取措施，但必须能够证明倾销对本国产业造成或可能造成“实质性损害”。《反倾销协议》相当深晦难懂，但成员方已经把超出经济和法律合理层面地随意援引反倾销措施当成一种习惯。尽管传统上发达国家是反倾销措施的主要使用者，但到1996年，发展中国家已取代发达国家成为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发起者。与之相比，其他绝大多数临时性中止义务的例外规定尚未得到真正使用，包括紧急保障和反补贴税。

WTO成员之所以频繁采用反倾销措施原因有二：第一，反倾销税

是对另一国实施打击的最简便的方式，尤其因为《反倾销协议》深晦难懂，并且计算倾销数量非常困难。与之相比，其他例外规定更加明确，因而更不容易被滥用。例如，紧急保障措施由于其实施标准严格而不易采用，此外，它还要求使用保障措施的国家作出补偿。相比而言，反倾销措施更容易采用。第二，援引例外机制以规避义务现象与日俱增也许和WTO规则管辖范围不断扩张及其强制实施性有关联。为了避免违约后遭受惩罚的风险，成员方很可能会采取某种方式以事先声明其无法履行承诺。反倾销税正好提供了这样一种途径，它使成员方可以声称贸易伙伴向其国内市场以低价“不公平地”倾销商品。在GATT管辖范围仅限于特定货物的关税时，寻求这种借口的动机并不强烈。但当GATT 1994及其附属协议对一些重要领域进行规范管理，而且报复性措施将招致损失时，这就提出了一个严峻问题：WTO管辖范围扩张的同时是否增加了规避规则的机会，从而可能损害WTO整套体制？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协定中WTO议题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张是显而易见的。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将服务贸易纳入GATT的想法最初是美国在1982年GATT部长级会议上提出的。发达国家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变化进一步加快了纳入进程。例如，截止1981年，服务业在发达国家GDP中约占66％的比重，并吸纳了67％的就业。显然，如果要继续使发达国家在GATT中作出承诺，GATT体制下的多边贸易自由化就必须拓展至发达国家拥有重要出口利益的领域。

然而，将服务业纳入GATT被证明是非常艰难的。对于一个完全致力于规范货物贸易的协定来说，服务业是一个全新的议题。事实上，服务业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不可交易”的。它包含了名目众多的活动，且要求采用与货物存在根本性差别的供给方法。例如，服务业中有些分行业要求供给者与消费者近距离接触（如美容美发、餐饮

和酒店业），有些则要求消费者流动（如旅游），或要求供给者在东道国建立商业形式（外商直接投资）。服务行业中有许多目的在于满足消费者的特定需求，因而并不存在如同商品供给那样通行的标准。服务贸易自由化并不能简单地通过关税削减来实现，而是要求修改那些影响货物、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国内法规。许多发展中国家担心关键服务领域的国际规则将会对其国内主权造成冲击，同时也担心将服务业纳入GATT会使影响他们利益的议题不再被关注，如自愿出口限制和非关税壁垒。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确定将服务业纳入GATT会产生何种影响，但他们最终都意识到服务业对其本国经济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如此重要的产业作出减让显然不能草率行事，因此美国试图将服务业纳入GATT议题的尝试立即激起发展中国家结成了超过61个成员的抵制联盟。

将服务业纳入GATT议题的过程至少在起初并不是令人振奋的。由于众多国家阻挠，1982年部长级会议达成了一项“妥协”：正式制订一份服务业工作计划，允许GATT及其缔约方为服务业谈判的技术基础作前期准备。在埃斯特角城会议上达成了另一项类似的“妥协”，尽管这曾经长期遭到G10集团（成员包括阿根廷、巴西、埃及、印度、南斯拉夫、古巴、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秘鲁）的反对。而支持美国计划的对立联盟又受到其他发达国家的支持，因此服务业被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议题。然而，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双轨体制避免作出跨议题减让（即服务贸易谈判与货物贸易谈判相互独立），但《服务贸易总协定》仍然成为WTO协定下“一揽子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将来服务业谈判对自己更为有利，发展中国家曾试图对商业存在这种服务供给形式加以限制，但并未成功。此外，他们为使发达国家承诺确保以自然人流动方式进口服务所作出的积极努力至今也收效甚微。回想起来，与发展中国家未从纺织和农业减让中获得多少实质性收益相比，他们在服务业上虽作出了更多的让步但最终甚至一无所获。

从理论上来说，WTO将服务业纳入GATS标志着其管辖范围扩张的一次巨大飞跃，尤其是考虑到服务贸易壁垒的取消只能通过修改国

内法规和制度来实现。例如，当一国允许从另一个拥有不同教育体制的国家引进医生和护士时，不可避免地要讨论引进的最低标准问题。然而，在实际操作中，GATS协定具有相当的限制性。就其结构而言，它与GATT 1994类似，不仅包括一套通用的原则和规定，也包括在成员方减让表中列明的适用于各亚行业的具体承诺，还有涉及特定行业的各种附件。第1条明确规定了GATS的适用范围及其对4种供给形式的适用方式：跨境交付（供给者和消费者无需流动）、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的临时流动。与GATT《农业协议》相似，GATS也为继续谈判设置了一个既定议程，它还与GATT一样将无差别作为首要原则。然而，由于欧盟及发展中国家要求协议减轻义务，因此GATS中规定的非歧视原则比GATT更具局限性。尽管最惠国待遇是普遍义务（第2条），但成员方可以列明最惠国待遇的诸多例外。国民待遇（第17条）是特定义务，而非普遍义务，这意味着它仅适用于在符合所列资格的前提下列入成员方减让表的服务行业。成员方政府可以自由地设定标准和资格要求，只要同一规定同等适用于国内外服务提供者即可。GATS还规定了市场准入的义务（第16条），原则上禁止采用6种形式的市场准入限制措施，除非成员方已在特定部门减让表中另有列明。与《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等其他国际协定不同，GATS中的绝大多数义务都是通过“肯定列表”生效的，这意味着GATS规则仅适用于各成员方具体列明的特定领域和范畴。

GATS有4个特别附属协议：自然人流动、金融服务、电信和空运服务。第一个协议激起了那些在自然人流动模式（即模式四）出口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极大不满。发达国家对通过自然人流动模式进口服务作出的承诺非常少；非关税壁垒仍然以“经济需求测试”形式存在；而《自然人流动附件》进一步明确规定，GATS仅仅适用于自然人的临时流动，而非移民。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了这一附件中的承诺不足，至少有些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问题已被提交至新一轮贸易谈判予以解决（第六章将讨论）。金融服务和电信服务被分别纳入GATS两个单独的附件。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其他国家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减让表示不满，这两个领域的谈判由此被推迟到马拉喀什

谈判的最终期限之后才宣告结束。此外，为这些重要领域分别订立附件还有助于实现它们之间的互惠减让。金融服务和电信服务谈判分别于1997年12月和1997年2月结束。

尽管将服务业纳入GATT议题在起始阶段充满争议，但如今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们作为服务出口国所具备的潜能。通讯中心从西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就是很好的例子；印度甚至还是全球主要的软件出口国之一。此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在GATS谈判议程设定过程中成功地扮演起重要角色。例如，“既定议程”第一阶段要求成员方在2001年之前为今后的谈判共同拟订一套指导方针和程序。为此目的，发展中国家于1999年组建了包括24个成员的联盟，成功制订了指导方针，并使之成为当前谈判的基础。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除GATS之外，TRIPs协定也是在马拉喀什谈判中签署的。将知识产权纳入GATT及随后发起的谈判甚至比服务业更具争议性，其原因不仅仅在于这一举措激发了人们前所未有的想象力，还在于TRIPs协定要求成员方修改其国内专利、版权及商标等法规，使其与新协定保持一致。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协定适用于药物等基本日常生活必需品，因而将对本国人民获取救生药品和技术的途径产生重要影响。尽管TRIPs协定签署已有10年，各成员方及其人民也开始了解TRIPs协定所要求的义务，但该协定引发的争论和愤怒却从未平息。

加强国际知识产权法规的想法早在乌拉圭回合之前就已存在。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对知识产权各种形式（想法、创造、发明）的规定都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即难以阻止未对发明创造作出贡献者从发明创造的成果中受益。搭便车的风险将阻碍许多重要的发明与创造。因此，成员方纷纷制订了一些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的国内制度。从全球来看，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正式成立，旨在管理为数众多的知识产权（IPRs）条约和协定。

尽管管理知识产权已经有一套方法安排，但美国和欧盟还是越来越担心他们作为知识产权出口国所拥有的比较优势会因廉价盗版商品而削弱。美国试图将TRIPs纳入GATT管辖范围的努力可追溯至东京回合。然而，发展中国家当时对这一想法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声称对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任何修改都应由专门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国际组织来完成，那就是WIPO。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发展中国家大多是知识产权的进口国，且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通常非常薄弱。发展中国家对把TRIPs纳入GATT提出质疑还有一些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理论支持。例如，安妮·卡普琳（Ann Capling）指出，许多国家（直至最近包括发达国家）只能对药品专利提供弱化保护，因为专利保护会抬高必需药品的价格。她还进一步指出“专利所有者可能会对使用新技术提出苛刻的条件，或者直接拒绝授权使用新技术以维护其垄断地位”，由此“新创意、基本知识及技术进步”的传播实际上是被阻碍，而非得到鼓励。尽管如此，TRIPs最终还是被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议题，继而成为WTO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有待解释。

除了发达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公司）的利益驱使GATT不断向新议题扩张之外，将TRIPs纳入WTO还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在20世纪80年代末乌拉圭回合谈判进行的同时，美国开始对违反本国专利法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单边贸易制裁。其中最令人生畏的是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案》中的“特殊301条款”，依据该条款，美国贸易代表可以将那些拥有不良知识产权制度的国家（如巴西和印度）列入“优先观察名单”，并威胁实施单边贸易制裁。面对这样的威胁，发展中国家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反对意见：将TRIPs纳入多边体制可能有助于制约美国的“侵略性单边主义”。第二，TRIPs协定构成了“全盘交易”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其他议题上获得了让步。第三，至少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者在后来接受采访时透露，他们在谈判过程中忽略了TRIPs的一些技术细节问题，他们本以为，TRIPs协定仅仅适用于假冒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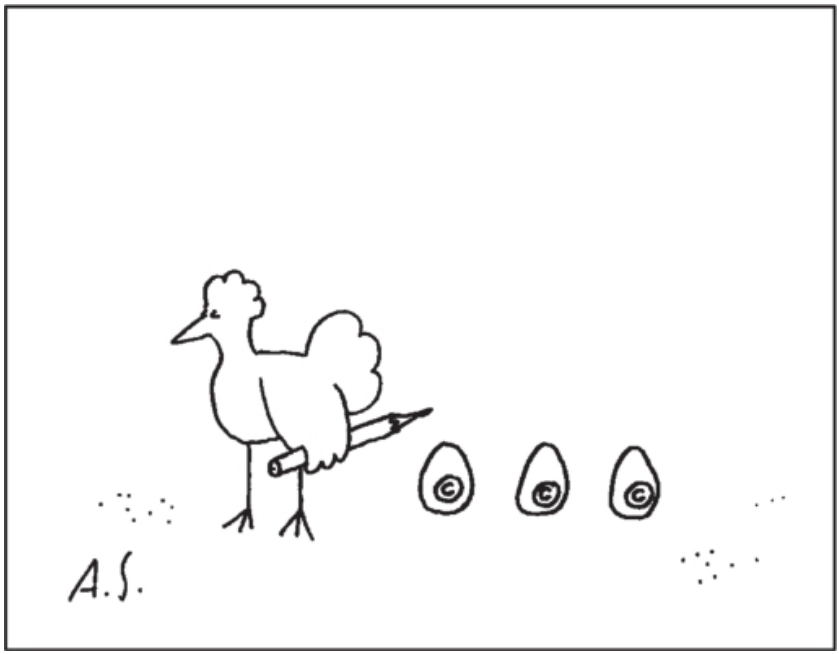

图9　将TRIPs纳入GATT是一个新发展。发展中国家并未预计到GATT主持下谈判达成的新协定将超出假冒产品问题的范围。

乌拉圭回合结束后实际达成的协定相当复杂，包含7大部分的73个条款，涉及版权、商标、地理标识、工业设计、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及包括商业秘密在内的未披露信息。协定依然以GATT的透明度和非歧视原则作为基本原则，但进一步确立了成员方在知识产权所有7个方面必须遵守的最低标准。与GATT类似，大多数标准都是基于发达国家利益而制定的。虽然发展中国家被特别给予了更长的履约过渡期，但事实证明，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执行协定的成本，这些优待是远远不够的。TRIPs协定还内置了一些保障条款，例如第8条规定，成员方出于保护公共健康的目的在必要时有权采取违反专利保护的措施。但在实际操作中，发展中国家发现他们很难运用这些保障机制。TRIPs协定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执行成本过高和有关专利的规定，被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作为重要议题提交给2001年多哈部长级会议（第六章将详细阐述）。

本章讨论的所有协议使我们对WTO复杂而广泛的规则体系有了全面了解。新议题一直不断地被纳入WTO。被称为“多哈发展议程”的新一轮贸易谈判如今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新一轮谈判不仅要解决现有协议中存在的问题，而且会不可避免地将WTO推向新的领域。

WTO管辖范围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张一直饱受争议。大多数协议是在经过艰难谈判之后达成的，为保证所有相关成员方都能接受，协议中不得不留有许多混沌和矛盾之处。协议中这些政治性的分歧经常被提交到争端解决机制以寻求合法的解决途径。在下一章，我将分析WTO作为国际组织所拥有的法律制度。

注释

1 关税升级（Tariff Escalation），是指对初级产品采取零关税或低关税，而随着加工程度的提高，对加工品的关税税率随之提高的关税管理办法。关税升级可以使加工品的增值部分（产品价值本身扣除产品投入价值）的被保护程度提高，即关税的有效保护水平高于其名义保护水平。各国为提高本国加工业和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设计关税体系时往往采取关税升级的模式。但是，也有些国家存在随着产品加工程度提高而关税水平下降的现象（称为关税降级，Tariff De-escalation），关税降级会使本国加工业和制造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2 根据《农业协议》，综合支持量（ASM）指“给基本农产品生产者生产某项特定农产品提供的，或者给农产品生产者全体生产非特定农产品提供的年度支持措施的货币价值”。综合支持量是从经合组织（OECD）常用的PSE（生产者补贴等值）演化出来的，两者基本相似。作为衡量国内支持的尺度或标准，两者均等于国内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的差额乘以生产量，再加上不按产量或价格提供的国内补贴的总和。

第五章

争端解决

许多谈判代表和学者都认为，乌拉圭回合谈判取得了许多成果，而所有这些成果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强大的争端解决谅解机制（DSU）。这一强大机制的出现将WTO的法制化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一项题为“法制化与国际政治学”的研究中，以朱迪思·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罗伯特·基奥恩（Robert Keohane）、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为首的多位学者从三个关键方面分析了法制化的概念：义务性、明确性与授权性。在这三方面，WTO都堪称典范。WTO成员有义务遵守WTO规则，否则将面临惩罚。WTO对成员方的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发生争端时，成员方可授权争端解决专家组、上诉机构，乃至争端解决机构解决这些争端。争端解决谅解机制使WTO真正富有效力，其规则能够被自动地强制执行，并产生与GATT截然不同的效果。这是整个体制的重大进步，使得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无法再以GATT效力和强制性不足为借口来采取单边或双边措施，同时加强了国际贸易体制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这是发展中国家尤为看重的。

在本章，我将通过集中讲述WTO的争端解决程序及一些重大案例来剖析其争端解决的效力。随着WTO法规的日益完善，WTO的法制化也在不断发展。不过，本章将重点突出WTO法制化进程中存在的两个根本性问题。第一，WTO规则法制化建设的新进展与实际上创造这些规则的临时性的非正式程序（第三章中已作讨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WTO规则的非正式制定程序与其执行时高度法制化之间的矛盾使WTO如今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如果这些矛盾无法得到正确的解决，WTO将面临解体的危险。第二，虽然发展中国家期望拥有一个以规则为基的更强大体制（DSU有助于建立这一体制），但他们在实践中却发现根本无法将这一体制为自己所用。鉴于这些困难，WTO体制以其目前状态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WTO中的争端解决

《建立WTO协定》第16条第1款规定，WTO应以GATT 1947遵循的“决定、程序和惯例”为指导。尽管这项规定旨在使WTO与GATT保持延续性，但WTO机构下的DSU依然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与GATT存在明显差异。

第一，DSU为WTO建立了独立统一的争端解决体系，这与东京回合守则中多种争端解决程序并存的情况截然相反。此项规定的例外也在附录2中明确列出。

第二，非常重要的是，WTO争端解决程序引入了一定程度的、GATT中并不存在的自动实施机制。这是因为GATT争端解决依据“协商一致”原则来运作，这意味着包括涉案方在内的任何成员先可以阻止专家小组的成立，后可以拒绝接受专家小组的报告。与之不同，WTO争端解决则依据“反向协商一致”原则[1]来运作。这意味着，一旦涉案方无法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专家小组就将成立，除非争端解决机构（DSB，总理事会的职责之一，由WTO全体成员方组成）一致否决成立专家小组（第4条），或一致同意拒绝执行专家小组的裁决（第17条第14款）。同样地，全体成员方一致否决才能拒绝执行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作出的裁决。从WTO成员方推荐的专家名单中选取出来3至5位资深政府和/或非政府个人（第8条）组成专家小组。DSU对专家小组的工作程序（*modus operandi*）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第三，DSU为WTO确立了GATT中并不存在的上诉程序。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将上诉程序的引入诠释为换取通过“反向协商一致”自动执行专家小组裁决的补偿品（*quid pro quo*）。上诉机构只负责司法解释等事务，它无权重新审核证据或解决新问题。上诉机构报告是终决性的，DSB必须执行，除非“反向协商一致”同意拒绝执行。

第四，DSU改进了对执行DSB裁决的监督机制，事实上这也是GATT所不具备的。如果被裁定违约的一方没有在“合理期限内”采取

改进措施，DSU第22条第2款要求争端各方就受损方的补偿问题进行协商。如果无法达成补偿协议，DSB可授权予以报复。除非DSB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否决这一授权。

最后，DSU的所有条款对每一阶段都有明确的时间限定（见表3）。在GATT中，案件有可能在涉案成员之间迟迟得不到解决，从而使受损方承受高昂的代价。发展中国家尤其对这些代价表示忧虑，因此，即使在他们认为最终裁决结果很有可能对自身有益时，他们对把争端提交至GATT裁决也会表现得相当谨慎。而在WTO中，不仅争端解决程序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时间限定，而且如果涉及到易腐产品或是发展中国家起诉发达国家的案件，争端解决程序还可以加快。

尽管WTO下的DSU比GATT争端解决程序强大许多，但这一手段还有赖于成员方自己来运用。这符合WTO成员驱动的本质特征，并与GATT一脉相承。成员国需要时刻关注其他成员方贸易政策对自身利益造成的影响，各国企业和消费者也需要时刻关注WTO规则，以免因违反规则而受到影响。WTO规则要求所有成员方公开其贸易法规，如有变更必须通知WTO，同时在其他成员方请求进一步获取有关信息时积极配合，这无疑为上述的保持关注提供了便利。此外，WTO还定期进行贸易政策审议。贸易政策审议机制（TPRM）的详细规定列在附件3中，并成为WTO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机制的最高机构是贸易政策审议机构（总理事会的职责之一），但具体审议工作由秘书处负责。

表3　争端解决程序的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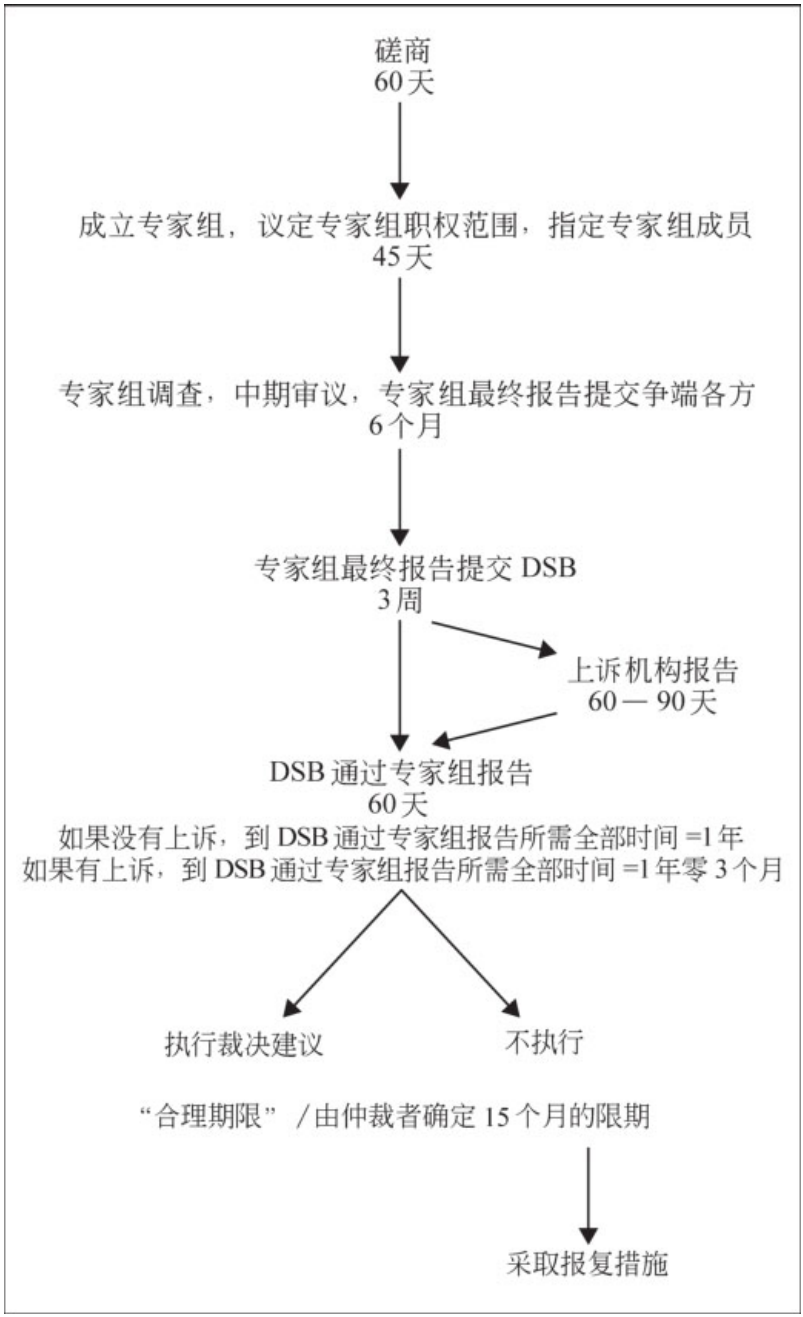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有三项目标。第一，通过定期监督确保成员方

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第二，提高公众和政府间讨论问题的质量；第三，促进对世界贸易体制的政策效应作出多边评估。每一项审议都包含两份文件，一份是被审议成员方政府准备的文件，另一份是由WTO贸易政策审议部门准备的文件。在全球贸易中占据最大份额的国家接受审议的次数最为频繁，例如，“四方集团”（加拿大、欧盟、日本和美国）的成员每两年审议一次。接下来的16个国家（就全球贸易份额而言）每4年审议一次。而最不发达国家审议的周期更长（有时超过6年）。然而，由秘书处公布的贸易政策审议若显示出成员方贸易政策存在违约行为，还不足以使争端解决机构采取行动。争端解决程序只有在成员方正式提出申诉之后才能启动。

成员方可以在三种情况下向DSM提出申诉，这在GATT 1994第23条中有明确规定，并在《争端解决附件》中有详细阐述。第一，当一成员方违反WTO规则，如有初步证据（*prima facie* ）显示受损方利益正在“丧失和减损”，则受损成员方可提请DSB注意。这种被指称违反WTO规则的案例数不胜数。伯纳德·霍克曼和迈克尔·考斯泰基指出，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因违背非歧视原则而被指违约。第二，成员方也可以提出“非违约之诉”，即如果成员方认为其根据WTO下某项协议获得的利益正在“由于其他成员实施某项措施（无论该措施是否违反该协议的规定）”而丧失或减损，都可以向WTO提出申诉。第三种申诉称为“情势”申诉。即便不符合前两种申诉的情况，只要成员方认为其根据WTO协定获得的利益正在由于“任何其他情况”而受到损害，就可以对冒犯方提起申诉。这些申诉条款表明该法律体系已远远超出对文本的狭隘解释，进而体现了WTO协议的本质精神。如果争端各方之间的磋商在60天内没有结果，任何以上三种情况下的申诉都会自动促成专家小组的成立，并进入下一阶段的审理。如果败诉方没有执行DSB裁决建议，则可授权对其采取报复措施。

报复措施包括对败诉方提高关税，具体方式取决于个案和涉案成员方的具体情况。例如，在欧盟香蕉争端案中（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和美国对欧盟有关向非洲、加勒比海及太平洋地区国家分配进口配额的方案提出申诉，专家小组最后作出了对申诉

方有利的裁决），美国获得授权采取“旋转报复措施”。据此，美国每隔6个月对欧盟不同系列的出口产品征收100%税率的报复性关税，从而给欧盟的多个不同部门造成了损失。此次争端成为首次授权实施交叉报复的里程碑式案例。胜诉之后，厄瓜多尔提出其从欧盟的进口量太小（总计2亿美元），不足以采取全面报复，因此转而通过暂时中止其他协议下（如TRIPs）减让义务的方式来实施交叉报复。值得注意的是，申诉解决机制通常不把补偿性支付包括在内，这种做法也是从GATT延续而来，除了1981年的一个案件外（新西兰对芬兰给予补偿），GATT从来没有采用过补偿性支付。WTO唯一一次采用补偿性支付是在2000年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发生争端之时，澳大利亚一项非法出口补贴的受益者被判对美国造成的损失作出补偿。

上述所有这些发展都表明WTO下的争端解决机制比GATT时代有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在日益法制化的同时，DSU依然保留了协定的政治基础。例如，争端解决专家小组成员由成员方从专家名单中推举，且成员构成必须经由争端各方同意。此外，虽然法律争端由指定的专家小组负责解决，但最终裁定机构仍然是由全体成员方组成的争端解决机构。无可否认，鉴于反向协商一致的要求，DSB在实际操作中几无可能否决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决定。不过，这种政治权力的保留，尽管表面看似并无实效，依然十分重要，它很好地反映出WTO在政治化和法制化之间寻求平衡而陷入的困境。我们将在下文讨论两者间的矛盾。

法制化过程中的政治影响因素

原则上来说，法制化是以规则为基贸易体制的精髓所在。然而，如果不考虑以下两个因素，法制化的实际效果是无法估量的：法制化实施的体制环境和赋予法制化内容和指导的政治程序。

尽管上文已经论述了WTO规则具有自动约束的特性，且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实施，但这种法制化与第三章所讨论的非正式规则制定

程序显得很不协调。DSU把武断性裁决程序达成的决定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并可予以强制实施。强大的法规体系与实际确立该体系过程中非制度化决策程序之间显然矛盾重重。发展中国家则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他们不得不接受一套规则体系的法制化约束，这套规则并非由他们来制定，但他们却必须遵守，否则将面临报复的风险。

法制化的代价还因WTO管辖范围的扩张而大大增加。在第四章，我们已经分析，WTO的管辖范围已侵入到国内法规以及国内主权领域。而法制化意味着成员方必须遵守这些富有争议的WTO规则，必要时甚至还需要对国内法律作出修改。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关于WTO管辖范围扩张引发的案例，即美国/欧盟激素牛肉争端。WTO作出了有利于美国的裁决，并裁定欧盟禁止进口含激素牛肉的做法违反了WTO有关规定，这一裁决在很多方面被认为是WTO法律干预了人们的文化传统和基本饮食习惯。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海虾—海龟争端，这是由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在1997年针对美国向DSB提出的申诉。在本案中，美国为了保护海龟（濒危物种）和出于国内捕捞产业反对非公平竞争的压力，禁止从那些在虾网上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装置的国家进口虾类产品。美国援引GATT第20条g款为自己的进口禁令辩护，该款允许出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目的而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专家小组裁定美国违反了第20条中“该项措施不得构成对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然而，上诉机构推翻了这一裁决，认为这一禁令符合第20条g款的规定，尽管上诉机构也同意专家小组关于这一禁令造成了不合理歧视的裁定（因为美国没有给予其对象国足够时间以满足其要求）。虽然裁决对美国提出了指责，但它依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被视为一些成员方可以将本国标准强加给其他成员方的又一案例。而且，该案件还被认为提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允许成员方适用那些并不影响产品物理特征的生产程序标准，这种做法远远超出了WTO规则的允许范畴。

先例问题以及WTO法律范围的扩张让我们看到DSU存在的第二大问题，即法制化本身的程序问题。国际贸易法专家约翰·杰克逊指出，在国际法中，遵循先例原则（*stare decisis* ）或判例法的普遍适用并不

可行。然而，在GATT争端解决的实际过程中，包括正式的争端解决专家小组的审理过程中，先前的判例经常被用作裁决的参考。WTO下的DSU依然如此，甚至包括制定决策在内的其他制度化程序也遵循了以前的先例。因而，裁决变成了协议下“惯例”（如果不存在正式的判例）的一部分，进而影响着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今后的裁决结果。格雷戈里·谢弗（Gregory Shaffer）这样写道：“WTO的个案并不仅仅包含其单个争端的裁决结果。WTO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也会对将来的案件产生深远影响。”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严峻问题。因为那些DSM的积极参与者能够有效地对WTO法规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却少参与，下文将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

除上述讨论之外，上诉机构在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解释、创建判例，以及形成法律体系过程中的角色倾向也显得问题重重。一些磋商困难的争议问题往往会被直接提交给DSB进行裁决。一旦DSB对该问题作出判决，那些从未达成一致、富有争议的规则就会隐秘而合法地进入WTO。鉴于WTO规则具有侵入性，对这些具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谨慎的磋商显得尤为重要，成员方应该对所签协议及其影响有充分了解。如果以DSB判决取代磋商，WTO将面临其协议合法性和长期稳定性被削弱的风险。

争端解决程序中的发展中国家

尽管存在上文提及的诸多问题，但争端解决机制从表面来看一直很成功。例如，霍克曼和考斯泰基指出，在1995年至2000年间，成员方向WTO提请的申诉超过160件，年均案例数是GATT时期的三倍多。发展中国家涉案数也在不断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超过30%的案件中成为申诉方或被诉方。而且，大多数案件都能够得到圆满解决，到目前为止，真正需要采取报复措施的案件只有两起。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功不仅体现在那些提交专家小组审理的案件上，还体现在通过磋商阶段就化解的案件上。可以说，“处于法律阴影下”的磋商会防止成员

方的争端升级到只有成立专家小组才能解决的地步。

然而，对案件数量的进一步分析也揭示了不太乐观的画面。在一项重大研究中，埃里克·莱因哈特（Eric Reinhardt）和马克·布施（Marc Busch）发现发展中国家“在WTO体制中对发达国家提出申诉的数量比在1989年后GATT体制下少了1/3”。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成为申诉对象国的可能性却提高了5倍。谢弗还指出，发展中国家还很少利用WTO允许作为第三方参与起诉的规定。截止到2002年8月，在WTO最初的273个案件中，只有巴西、印度和墨西哥作为第三方参与次数超过8次，而欧盟作为第三方参与41次，美国参与32次。这些数字表明，就积极参与争端解决程序而言，发展中国家已处于争端解决机制的边缘。这一边缘化代价高昂，而且影响深远：WTO规则仍然在不断发展，发达国家对这一进程施加了对其有利的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却只能站在一旁观看。

发展中国家被争端解决程序边缘化有多个原因：第一，援用争端解决机制的成本太高。鉴于每个案件复杂的技术问题及几年来积累的大卷法律文本，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是有效参与的前提。然而，发展中国家本土有关WTO问题的法律专家十分稀缺，且聘请私人律师成本极高。例如，据谢弗记录，仅就一个小案件来说，律师事务所代理发展中国家直至专家小组阶段结束所需的费用就高达200,000英镑。在一些大案中，如柯达诉日本富士胶卷案，律师向其每个客户索要的费用高达1,000多万美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的确很难筹措到如此巨额的资金。

第二，即便当发展中国家的确涉入某些对自身意义重大的案件，他们也是“一次性”而非“反复”参与其中。谢弗指出，这些“一次性”参与者往往受到企业或发达国家的资助，通常旨在化解特定的案件纠纷，而不是寻求保护其国家长远的整体利益。这就暗藏着一个恶性循环：缺乏持续的参与和对整体利益的关注使“一次性”参与的成本甚至更高，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将有关申诉提请DSB裁决的意愿。

第三，鉴于WTO成员驱动的特征，成员方自己有责任将某一案件

提交WTO审理。但这很难做到，并不仅仅是因为参与的成本很高，在作出裁决之前需对相关资源进行封锁，而且还在于实力强大的成员方有可能寻求WTO规则约束以外的单边惩罚措施对弱势的申诉方实施报复。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敢于冒这样的风险。

第四，即使有时发展中国家决定向WTO提出申诉并最终赢得胜利，WTO裁决的执行仍依赖于贸易报复措施，而不是补偿性支付。小型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小而几乎没有可供采取的贸易制裁手段。举例来说，假设小国A对“四方集团”中B国胜诉，并被授权对从B国进口的某些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但这样的关税措施对B国的经济很难造成影响，因为A国市场在B国出口中仅占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A国国内相关部门可能遭受巨大的损失，尤其当B国是A国某种特定产品主要供应者时。因此，即便胜算很大，意识到报复带来的损失还是会让A国不情愿就争端向WTO提出申诉。它反而会期望在WTO体制外寻找解决争端的途径。小国不愿提出申诉这一现象有事实依据：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最不发达国家作为申诉方或被诉方进入WTO争端解决机制。

鉴于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不平衡，特别是个案裁决结果有可能对WTO法律造成长远影响，人们为此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WTO法律咨询中心”，其主要职责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此外，人们还提出了几项改革建议。其中，重新审议争端解决程序的议题已被列入“多哈发展回合”谈判的议程——正在进行中的新一轮贸易谈判（第六章将详细讨论）。关于改革建议的分歧已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步显现。总体看来，发展中国家要求获得更长的执行期、在最不发达国家首都进行磋商以削减前往日内瓦的差旅费、进一步发挥“WTO法律咨询中心”的作用及要求授权集体报复和贸易补偿。然而，发达国家却要求进一步缩短执行期、扩大公众参与、加强监督机制和弱化报复程序。到目前为止，这些分歧还没有丝毫化解的迹象。部分原因是由于研究和政策界尚未就可促进成员遵循规则的因素达成一致。有些学者强调报复措施或至少是具有实效的报复威胁的重要性，其他一些学者则指出遵守国际体制下的任何标准

和规则是社会化、不断学习和遵守信誉的结果。与此同时，WTO议题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范围仍然还在很多新的方面不断向外扩张。

注释

1 争端解决规则采取了独特的“反向协商一致”的决策规则。它与“协商一致”同意通过拟议中的事项相反，争端解决机构是协商一致反对，否则该事项通过。换言之，在争端解决机构审议有关事项时，只要不是所有参加成员协商一致反对，则视为通过。“反向协商一致”决策规则，有利于专家小组的成立、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建议或裁决的通过、补偿或报复裁决的通过。因此，任何想阻止裁决获得通过的成员都必须说服其他所有成员，包括争端中的对手，从而排除败诉方单方面阻挠的可能。这些“反向协商一致”的决策规则有效地消除了1947年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程序中存在的阻止多边争端解决进程的可能性。再加上争端解决的结案时间表有严格规定，“反向协商一致”决策规则就可以保证整个争端解决程序进展得更快和更主动。

第六章

多哈发展议程

前面几章阐述了自WTO成立以来就存在的以及伴随WTO发展而衍生出来的种种争论。在一片争论声中，WTO发起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于2001年11月正式启动——称为“多哈发展议程”（DDA）。当前，虽然很难准确预测这轮谈判结果如何，但有两点确定无疑。第一，这轮谈判能否取得成功不仅关系到特定国家的利益，而且还关系到WTO作为国际组织的可信赖程度。在WTO成立的最初10年，成员方对GATT的种种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没有获得成功，WTO的五次部长级会议中的两次都无果而终。成员方普遍对WTO感到失望，纷纷转向寻求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从而对WTO存在的实际意义构成威胁，并使得弱者的地位进一步削弱。正如其名所示，多哈发展议程在试图拓展WTO协定管辖范围的同时，也旨在扭转发展中国家及其民族所面临的问题。鉴于WTO曾经令人失望和剥夺公权的惨痛历史，WTO这次再也无法承受失败。第二，DDA原定2005年1月的结束期限已被证明是过于乐观和不现实的；如今，所有的谈判者、政治家和分析家都认识到谈判比原先设想的要更加艰辛和复杂。在本章，我将探讨DDA发起的背景（包括简要介绍曾首次试图发起新一轮谈判却未成功的西雅图部长级会议），并将回顾DDA的议题内容和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洞察WTO谈判的最新动态。

新一轮谈判出师不利：1999年西雅图部长级会议

尽管DDA是2001年11月在多哈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正式发起的，但DDA的根源却在于1999年11月失败的西雅图部长级会议。谈判者曾希望在西雅图发起新一轮发展贸易谈判回合，但西雅图部长级会议本身却在非政府组织（NGOs）的游行示威中以溃败告终。成千上万的示威者（绝大多数是非暴力示威者，但也有一些是无政府主义者，估计有3万至6万人）出现在西雅图街道上举行抗议WTO的活动。公众的愤怒令国际组织官员和谈判者感到十分震惊，因为传统上

GATT/WTO贸易谈判深奥的技术性内容一向使其免受公众监督。WTO民主的缺乏是此次愤怒爆发的导火索。我将在下一章讨论WTO缺乏民主的根源。

图10　西雅图之争，1999年

尽管某些WTO成员方倾向于认为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的失败是非政府组织力量崛起的直接后果，然而，即使没有公众的不满，新一轮谈判能否成功发起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在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的筹备阶段，所有成员方都把精力集中于选举新一任总干事以接替雷纳托·鲁杰罗，这便浪费了准备西雅图会议所必需的时间和精力。成员方为发起“千年回合”谈判而争论不休、意见不一。发起新一轮谈判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他们认为只有扩充WTO既有协议的管辖范围才能获得新的收益。自1996年以来，欧盟就一直致力于增加“新加坡议题”（上文提过，“新加坡议题”包括竞争政策、投资措施、政府采购的透明度及贸易便利化）。美国和加拿大希望改进“争端解决机制”的透明度；由克林顿执政的美国在西雅图会议的最后一刻还提议WTO成立贸易与劳工工作组。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几乎所有建议都持抵制态度。劳工标准问题在1996年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就曾引发激烈争论，成员方最后一致认为，这一争议的相关事务属于国际劳工组织而非WTO的管辖范围。美国在西雅图会议上旧事重提被视为给发展中国家的沉重打击。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很鲜明：在所谓“执行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毫无必要发起新一轮谈判。“执行议题”是指乌拉圭回合中未能兑现的承诺以及发展中国家为执行协议所承担的始料未及的巨额成本。双方都在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拒绝作出任何妥协。

WTO运作程序的不透明性（第三章已讨论）让矛盾进一步恶化。西雅图会议主席发表的声明加深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而对加强WTO运作的民主基础却毫无益处。例如，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查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曾公开表示，如果谈判无法达成协商一致的文本协议，“我将保留一切权力采用更加独断的方式达成最后结果。毫无疑问，我作为会议主席有权这样做或者说需要这样做。”发展中国家对此愤怒不已；最终，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以失败而告终。

多哈发展议程：2001年多哈部长级会议

随着多哈部长级会议的临近，这些重点关注问题并没有多大改变。然而，2001年11月多哈部长级会议还是作出了发起“多哈发展议程”的决定。两年前还疑问重重的问题此时却能达成妥协，这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第一，鉴于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的溃败，尤其是9/11恐怖事件的发生，许多国家重新认识到需要采取重大举措以维护多边合作的最后一丝威信。第二，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结束后，成员方有意识地在多哈部长级会议筹备期间采取一些措施以改进决策程序，其中有些措施在第三章中已作讨论。WTO也开始提高其对外透明度，以使非政府组织更多地获得信息。第三，发展中国家的许多联盟在多哈会议最后阶段开始出现分化，因为其成员经不住各种双边协定的诱惑而

分崩离析。艾琳·科瓦（Aileen Kwa）对多哈部长级会议及其准备过程中用以打破发展中国家对立阵营的各种“胡萝卜加大棒”手段进行了非常有趣的描述。下框集中描述了“志同道合集团”是如何在多哈会议上被“打败”而达成“妥协”的。

发展中国家的“志同道合集团”（LMG）

LMG成立于1996年，最初包括古巴、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到多哈部长级会议开幕时，成员数量已经扩大至14个。LMG极力反对在解决执行议题前开展任何新的谈判，并出具了几个具体议题的详细技术性文献。该集团几乎没有对发达世界作出任何让步。

意识到屈服于LMG的要求需付出高昂代价，“四方集团”开始有针对性地对LMG中的特定成员国给予优惠性减让。有些对此作出了回应。非洲国家接受了欧盟委员会的TRIPs和公共健康宣言，以及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ACP）的WTO豁免权。作为回报，他们放弃了在工业品关税、环境以及“新加坡议题”上开展谈判的反对立场。对于这些最弱小的集团成员来说，帮助他们加强能力建设以及给予发展援助是很重要的。埃及人得到了一份援助计划，巴基斯坦人不仅得到了美国的援助计划，还得到了欧盟委员会增加纺织品配额的承诺。

与此同时，各种“大棒”也在挥舞。发展中国家被告知，ACP集团的豁免权以及TRIPs和公共健康宣言有可能被撤销。小国被警告，他们享受的优惠也有可能被取消。各国部长们被告知，要么召回持反对意见的大使，要么确保

大使软化他们的反对意见。据称多哈会议之后，LMG派驻的3位大使就因其强硬的反对立场而被宣布从日内瓦召回。

一旦分裂进程开始，就会滋生出多米诺效应。一位LMG成员国的大使解释道："一旦其他国家清楚意识到某些成员国的退缩，他们不得不从政治角度考虑其坚持反对立场的必要性。"2001年11月14日，当印度成为最后的反对者时，"多哈发展议程"正式发起。

资料来源：阿姆里塔·纳利卡、约翰·奥德尔，"协商联盟的严格分配战略：志同道合集团与世界贸易组织"，载于约翰·奥德尔主编，《谈判贸易：WTO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没有阻止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成功发起，但他们的积极参与也并非一无所获。也许最大的成果就是WTO给予发展问题足够的关注，并将新一轮谈判命名为"多哈发展议程"。《多哈部长宣言》主体部分第2段声明："WTO绝大多数成员方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努力将他们的需求和利益置于此次宣言工作计划的核心。"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Arvind Panagariya）注意到这份部长宣言的主体部分29次提及"最不发达国家"、24次提及"发展中国家"、19次提及"LDC"，同时还有许多附件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特别关注的重要议题。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多哈发展议程"仅仅是未来谈判的一个框架，至于谈判的实际内容以及最终的协议将会如何，仍需进一步的磋商。

在发展中国家取得的诸多胜利中，多哈部长级会议之后最经常被提到的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宣言》。《宣言》的背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更便捷地获得治疗HIV/AIDS所需的受专利保护的昂贵药物而进行的斗争（见下框）。在内容上，《宣言》大部分

遵循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议，特别是TRIPs联盟和公共健康联盟提出的要求。《宣言》声明："TRIPs协定不得也不应阻止成员方为保护公共健康而采取相关措施……为此，我们重申WTO成员方有权充分援引TRIPs协定中为达成此项目标而设计的灵活规定。"《宣言》的确是一个政治产物，但其重要性已远远超出象征意义。《宣言》使得成员方很难对另一成员方由于公共健康突发事件而采取的专利药品强制许可或平行进口行为提起申诉。成员方在决定是否构成全国性突发事件这一问题上还可保留诸多回旋余地。此外，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宣言》还将医药产品的过渡期又延长了10年，即延长至2016年。

艾滋病和TRIPs

在TRIPs缔结之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药品提供最低限度的专利保护，以保证公众获得廉价药品。然而，在TRIPs下，这一状况发生了改变。TRIPs不仅要求发展中国家提供专利保护，而且还严格限制了强制许可的条件（强制许可是指在没有得到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赋予另一方生产产品的权利，旨在生产更多可供使用的普通药物）。在国内出现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可实施强制许可，但所生产的普通药物只能用于国内市场，禁止用于出口。

面对艾滋病的威胁，南非于1997年12月颁布实施了一部《药品法》，实施强制许可生产普通HIV/AIDS药品。该部法律还允许平行进口，以便让南非能够进口最便宜的专利药品。

南非药品企业向比勒陀利亚高级法院提起上诉。他们声称，《药品法》授权未加补偿的强制许可违反了宪法要求保护产权的规定，也违背了TRIPs的相关条款。美国也对此表示支持，不仅将南非列入"301条款"下的"观察名单"，

而且还对从南非的进口取消了普惠制下所享受的免税待遇。巴西和泰国也承受过类似压力，他们也曾援引TRIPs下的突发紧急条款来授权强制许可以解决AIDS危机。

药品商和美国采取的这些严厉措施促使发展中国家联盟和非政府组织采取回应之策。发展中国家联盟认为，公司的贪欲与无以计数的本可预防的HIV/AIDS死亡事件直接相关。他们还进一步指出，美国竭力阻止其他成员方援引TRIPs旨在挽救生命的紧急例外条款。在“非洲集团”的带领下，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努力寻求通过部长宣言，以明确TRIPs关于公共健康的规定，并保障成员方将公共健康和福利置于专利保护之上的权利。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宣言》才最终在多哈部长级会议上一致通过。

资料来源：约翰·奥德尔、苏珊·塞尔（Susan Sell），“重塑议题，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联盟，2001”，载于约翰·奥德尔主编，《谈判贸易：WTO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

除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宣言》外，发展中国家还得到改进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的许诺。在农业方面，《多哈部长宣言》同意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特殊和差别待遇，以保证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包括食品安全和农村发展。与执行有关的议题在《宣言》的主体部分以及独立决议中均有提及。WTO还在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新成立了两个工作组，即“贸易、债务和财务工作组”和“贸易与技术转让工作组”。《宣言》还集中讨论了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问题，并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弱小经济体的需求给予了特别关注。《宣言》拟定澄清和改进反倾销、补贴和反补

贴措施的议程被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是美国作出的最大让步之一。与克林顿政府最后一刻企图将劳工标准提上西雅图会议谈判桌不同，这次的主体宣言仅仅重申了新加坡部长级会议达成的决定。其中第44段还确认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S&D）“构成了WTO协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诚然，发展中国家收获颇丰，但他们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作为获得上述收益的回报，发展中国家可能付出了高昂代价。尽管他们要求在发起新一轮回合谈判之前解决执行议题，但这一要求又不得不与新一轮的谈判进程相联系，并以此换取发达国家作出新的承诺。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为从乌拉圭回合中得到的收益付出双倍的代价——这恰恰是LMG集团试图努力避免的结果。通过最后一刻含糊不清的语言和精明的谈判，新加坡议题最终还是被纳入了“多哈发展议程”。新加坡议题被纳入谈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第三章已作讨论。含混不清的措词和饱受争议的谈判程序同样也成为2003年坎昆部长级会议面临的重大难题。在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如技术援助、技术转让以及为小型经济体拟定的新工作计划，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成果。由于对这些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活动的资金来源缺乏明确规定，这些条款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从很多方面来看，将新一轮回合命名为“多哈发展议程”表明所有成员方意图帮助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重拾信心。然而，“多哈发展议程”的谈判程序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信心依然只能是薄弱的。即使多哈部长级会议前期准备程序提高了内部透明度，并允许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私下接受笔者采访时却抱怨在多哈会议真正到来时，这些有助益的做法都被弃之于九霄云外。例如，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斯图尔特·哈宾森依据其职权发布的主席文本提出强烈抗议，但该文本最终还是被用作谈判的基础。对成员国政府施加双边压力的事例有很多。同样，谈判中还发生过许多令大使承受压力而处境“艰难”的轶事（例如，有位大使曾被责问道：“你是想被请教，还是想受凌辱？”）在如此情形下协商一致达成的DDA终究大大延缓了接下来坎昆部长级会议的谈判进程。

坎昆溃败

贸易谈判代表们2003年9月在坎昆相聚于两年一度的部长级会议，努力争取在2005年1月的最后期限之前结束DDA谈判。在根据《多哈宣言》设立的贸易谈判委员会（TNC）的组织下，成员方花了两年的时间筹备坎昆部长级会议。TNC下设7个谈判小组，就各个特定议题分别进行谈判——农业、非农业市场准入（NAMA）、服务业、规则、贸易与环境、葡萄酒和烈酒的地理标识以及争端解决谅解机制的改革。然而，谈判过程的组织和简化依然无法克服成员方在所讨论的各项议题之间的严重政治分歧，最终，坎昆会议以失败而告终。

2002年时谈判多次错过最后期限，且成果不多。该年最成功的当属TRIPs理事会就缺乏自主生产能力的成员方平行进口必需药品达成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发展中国家如今可以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通过强制许可生产的廉价普通药物。接下来的谈判进程则主要是围绕极其敏感的农业议题而展开，然而，议题之间的分歧依然存在。随着坎昆部长级会议召开日期的日益临近，总理事会主席——卡洛斯·佩雷斯·德尔卡斯蒂略大使——凭借职权发布一份折中的主席文本以期打破僵局。这份文本所激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反应在第三章已作讨论。欧盟和美国联合发布的农业文本（8月13日）丝毫没有减轻发展中国家的疑虑，他们担心两大巨头可能“将另一份《布莱尔宫协定》强加给我们”。（《布莱尔宫协定》为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奠定了基础。它由欧盟和美国联合达成，并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坎昆部长级会议就这样在发展中国家的怀疑声中开幕，这种在多哈部长级会议上就已被进一步加深的怀疑情绪很快发展成为南北之间的全面对立。

本书第三章已经讨论了坎昆会议磋商和决策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的影响。对三项议题的磋商也被证明是非常艰难的。坎昆会议在农业、新加坡议题和棉花这三方面陷入严重僵局。不过，在讨论之前，有一点需要明确：对这三项议题的集中关注并不表示其他议题已经解决或对将来解决这些议题会提

供捷径。坎昆会议上对诸如NAMA和S&D议题的分歧依然严重，而且这些分歧在将来的谈判过程中还会出现。农业被证明是2003年夏天最为棘手的难题，并成为坎昆会议最令人讨厌的议题。在欧盟和美国8月份拟定出联合草案之前，赞成全面农业自由化的凯恩斯集团一直希望美国能够支持他们的立场。同样，反对全面农业自由化的成员方则希望欧盟能够支持他们的观点。然而，当这两类发展中国家意识到美国和欧盟最终联合起来制订了一份令他们感到极为不满的文本时，他们在巴西和印度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就这样，一个近年来最有趣的发展中国家联盟——G20集团——诞生了，其核心成员由巴西、中国、印度、南非和阿根廷等新兴力量组成。

2003年9月2日，G20集团发布由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南非、泰国和委内瑞拉共同签署的文本草案。与欧美草案中的承诺相比，该集团建议对国内支持措施进行更加积极的削减，包括对“绿箱补贴”加以限制。在市场准入方面，草案克服了巴西等持积极态度的国家与印度等持消极态度的国家之间的分歧，要求发达国家作出更多承诺。例如，草案声明，“所有发达国家都应该对所有热带产品以及《农业协议》序言中提及的其他产品以及占发展中国家进口一定百分比的其他农产品提供免税待遇。”草案还一步声明，“发展中国家无须作出有关扩大关税配额量和削减配额税率的承诺。”为了与G33集团（见下框）保持一致，草案还要求赋予发展中国家“特殊保障机制”。在出口补贴方面，G20集团提议在指定日期之前取消与发展中国家利益有关的出口补贴，并要求发达国家进一步承诺在此后某一指定日期前削减剩余产品的出口补贴。此外，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的规定贯穿于文本草案的始终。

修改后的主席文本，即为德贝斯草案，于9月13日正式提交大会讨论，对G20集团关注的问题却丝毫未加考虑。在有些方面，该草案甚至被视为一种倒退。在所有对该草案的指责中，G20集团指出其对国内支持建议的削减量并不充分，在市场准入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作出的承诺也不平衡。有趣的是，与LMG在多哈会议后期的瓦解不同，G20集团并没有在坎昆会议期间实行的分裂策略中沦陷。双方成员在坎昆都各自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也没有任何一方作出让步。

坎昆联盟

有些坎昆联盟可追溯至多哈部长级会议或更早，而另一些联盟则是新型挑战形势的产物。除了G20集团外，坎昆会议期间还出现了其他3个主要集团。

发展中国家“核心集团”最初包括12个成员国：孟加拉国、古巴、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委内瑞拉、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为了回应欧盟认定坎昆会议后将进行“新加坡议题”谈判的草案文本，“核心集团”于7月份提交了一份联合声明，提出明示的协商一致是谈判的必要前提条件。该集团在坎昆部长级会议上继续发挥着作用，且其成员数量不断增加。

“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联盟”最初包括来自中美洲、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及非洲的20多个成员国。该集团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被允许指定某些产品为“战略产品”，对于这些产品，他们可免于承担新的义务，同时建立特殊保障机制以保护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免受进口激增造成的冲击。到2003年9月13日，该集团成员国已扩大至33个。

第三个有趣的坎昆联盟是G90集团。非洲集团、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及最不发达国家在会议闭幕

日聚集起来协调彼此立场，从而诞生了G90集团。尽管G90集团成立之初的紧迫任务是抵制将新加坡议题通过变相手段纳入谈判议程，但在坎昆会议结束后，G90集团也开始在特殊和差别待遇、滥用优惠措施以及NAMA快速自由化潜在的问题等议题上越来越多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各坎昆联盟具有强大的抗压能力，不仅在坎昆会议结束时依然能团结在一起，并在会议结束后长期存在。这些联盟在坎昆会议期间及结束后提交了许多经过深入调研后的详细建议。同时，他们还有意识地协调彼此立场。不同联盟的代表在部长级会议期间定期会晤以共同磋商并达成新的共识。由于认识到这种团结对他们加大集体谈判力量非常关键，特别是有以议题为基础的联盟尝试失败的前车之鉴，各坎昆联盟在会议结束后仍努力保持集团内部及集团之间的凝聚力。

资料来源：阿姆里塔·纳利卡、黛安娜·图西（Diana Tussie），“坎昆部长级会议中的G20集团：发展中国家及其联盟的发展”，《世界经济》，2004年7月；以及阿姆里塔·纳利卡，《国际贸易与发展中国家：GATT和WTO中的协商联盟》（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3）

“新加坡议题”是南北争端的另一焦点。通过借用《多哈部长宣言》中“明示协商一致”用词的模糊，欧盟认为，新加坡议题早已被纳入DDA议题，所有成员方在坎昆所需做的只是磋商其谈判模式。与之相反，以“核心集团”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坚持认为，“开始谈判的前提是就谈判模式达成明示协商一致，而不是就如何将新加坡议题的程序和结构进行区分归类达成协商一致。”这一解释上的分歧引发了成员

方对卡斯蒂略和德贝斯草案的强烈不满。后者名为一个折中文本，却激发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愤怒情绪，因为该草案不仅勾画了政府采购和贸易便利化的谈判模式，而且还明确表示，“我们决定在这两个议题领域启动谈判”。在投资议题方面也一样，文本虽然允许有一段异议澄清期，但却明确规定必须在特定日期前就谈判模式达成一致（有待于进一步讨论）。竞争政策领域是唯一措词不严格的，使得该议题基本停留在澄清异议阶段，且没有需要立即执行的承诺。然而，这并未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丝毫安慰，因为他们本来一开始就反对将新加坡议题纳入谈判议程，并且相信“明示协商一致”要求可以有效防止在最后一刻将新加坡议题强行加入谈判议程。尽管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也存在分歧（有些国家认为，新加坡议题可以“分类”谈判，并根据他们各自的利益点进行个别磋商；其他一些国家则认为，新加坡议题代表了一类不同的议题，应该作为整体加以对待），但他们还是团结一致反对德贝斯文本草案。

在坎昆会议的最后一天，德贝斯要求集中于新加坡议题开展谈判。笔者在随后对一些代表的采访中了解到，这一做法令众多本希望关注农业谈判的成员代表感到惊讶。其间还有一个阻碍达成一致的因素。博茨瓦纳在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发言时表示，只要协定包含任何一个新加坡议题，他们都无法接受。日本和韩国则回应道，任何协定都必须包括所有4个新加坡议题。新加坡议题的棘手最终导致德贝斯不得不承认失败。

尽管新加坡议题是坎昆会议失败的直接原因，但在棉花问题上的分歧也加深了WTO的信任危机。4个西非和中非国家建议发达国家分阶段取消棉花补贴，并在彻底取消之前给予他们资金补偿。然而，美国的态度是拒绝讨论棉花补贴问题，而是要讨论纺织品和服装这样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即便在素帕猜的领导下所有成员方都已同意讨论棉花问题，但德贝斯草案仍倾向于支持美国的立场，它建议磋商应该旨在“解决棉花、人造纤维、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中存在的产生扭曲影响问题，以确保全面考虑行业的整体性”。文本草案对资金补偿的新来源未作任何承诺，仅仅要求一些国际组织将现有的资源和项目直接

用于帮助那些棉花占GDP很大比重的国家以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非洲国家对这一建议感到十分失望和震惊，其他国家也表达了类似的不满。发达国家在占其经济和人口很小比重的领域作出的让步都显得如此吝啬，这足以说明发达国家即使对世界上穷国中最贫穷的国家都不愿作出任何减让。棉花议题从经济角度来说也许只是一个小问题，但它却加剧了WTO中的不信任和对立。

坎昆部长级会议在一片互相责骂声中闭幕。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指责坎昆会议上那些“不想作为”的国家，并宣称美国将不再等待这些国家改变想法，而是转向在WTO框架之外寻求双边协议。欧盟贸易委员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则再次重申WTO是一个“过时组织”。三次WTO部长级会议中的前两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并没有预示着WTO将有美好的未来。而在坎昆会议的会场和走廊外，非政府组织正在为全世界的穷人欢呼胜利。

坎昆部长级会议溃败后非政府组织
欢呼改唱甲克虫乐队歌曲

我的朋友，我们的世界并不是
为了让你们满意而出卖。
你说你将带给我们健康和财富，
我们知道你只是在撒谎，
我们并不在乎佐利克，
佐利克不能收买整个世界。
不能收买世界，听我们告诉你，
不能收买世界，不不不！
在坎昆没有新议题，
你知道这是错误的，
没有压力施加给谈判代表，

也没有整夜的“绿屋会议”，
我们不在乎威逼，
商业无法统治全世界。
无法统治世界，听我们告诉你，
无法统治世界，不不不！～！

谈判必将继续：后坎昆时代的DDA

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公开表达了凯旋论，也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的那样，“没交易也胜过这种交易”，但所有成员方依然意识到这种僵局对谁来说都不意味着胜利。经过短暂的停滞，谈判者最终于2004年7月31日达成了备受关注的“七月一揽子协定”（July Package）。从而打破了僵局。有两个因素促使谈判者克服了在坎昆会议上被证明是最难解决的困难。

第一，发达国家已经逐渐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参与方式的变化使游戏本质发生了改变。过去，发展中国家阵营虽然在谈判的绝大多数时候都采取拒不妥协的立场，但最终还是禁不住双边协定的诱惑而出现分化。这一历史让发达国家认为坎昆会议仍将会重演相同的一幕，因而发达国家并没有对G20、G33、ACP及LDCs等反对联盟的全部要求作出减让。然而，事实上，坎昆联盟面对发达国家的施压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从而使发达国家认识到他们将不得不作出一些减让，以避免多哈谈判的全盘崩溃。第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WTO已无力再次承受失败，否则，WTO的威信和存在必将遭受一次严重的打击。谈判达成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已在坎昆错过并更改至2004年7月底，这一次再也不能失败。

图11　2001年11月3日，贸易正义运动同盟在特拉法加广场示威游行。

“七月一揽子协定”——所有细节尚待进一步磋商的一个框架协议——将多哈回合谈判结束的期限推迟至一个不确定的日期，因而也是在事实上妨碍了多哈部长级会议目标的实现。作为妥协，欧盟同意取消除贸易便利化之外的其他所有新加坡议题。即使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框架协定规定，如果发展中国家缺乏必要的能力和基础设施，则无须执行最后的协定。棉花问题则被单独处理，而不是像坎昆会议上美国所做的那样试图把它置于更广泛领域内一带而过。此外，关于农业问题的附件则是框架协议又一锦上添花的成果。

关于农业问题的附件决定对农业实行“分层削减公式”，以逐步取消国内补贴。这意味着国内支持较多的国家必须作出较大幅度的削减，而发展中国家则获得更长的执行期，且削减幅度较小。附件还规定，任何直接和间接的出口补贴都将逐步取消，“分层削减公式”将确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同的市场准入承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指定需要作出较小关税削减的敏感性产品。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可以指定某些“特殊产品”，这些产品需要在食品安全、农村

发展等方面给予一系列非贸易性的考虑。“特殊保障机制”也包含在这一附件中。最不发达国家无须削减关税。发达国家还承诺通过第一年削减20％补贴的形式来预先表明自己的积极态度。然而，鉴于坎昆会议期间G20和G33集团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严重分歧，关于农业问题的附件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诸如预先表明态度这样的做法可能有助于恢复成员方对WTO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在坎昆曾达到很低的水平。

然而，仔细审视这些承诺就会揭示一些实际的或潜在的严重隐患。预先将补贴削减20％是参照约束水平而非实际水平来计算的。因为在实践中发达国家的补贴要远远低于约束水平，这可能致使实质性削减微不足道。市场准入的改善也有可能变得毫无意义，这将取决于发达国家到底将哪些产品列入敏感产品清单。即使发达国家已经同意逐步取消国内补贴，但“绿箱补贴”仍然是被允许的，并有可能通过重新分类和定义的手段加以控制。同样，国内补贴的取消更多地取决于“分层削减公式”的实际应用，以及谈判达成的最后取消期限。

“七月一揽子协定”最终也许只能实现有限的农业自由化，此外，非农产品市场准入也是迷雾重重，几乎没有取得丝毫进展。这其中大部分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坚持认为，只要农业问题的僵局持续存在，他们就拒绝磋商这一议题。显然，潜在的分歧是存在的，且许多分歧实际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例如，“七月一揽子协定”第一稿曾明确规定，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和非农业领域的削减承诺将会考虑到“他们在特定领域的发展水平”。然而，由于相对发展中国家中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来说，这一条款被认为赋予了小型经济体一些特权，因而被弱化。此外，“将会考虑”被改成“应该考虑”，而且按照这一原则最惠国待遇条款被援引，以用来防止特惠待遇。一旦“框架协议”下的实质性谈判正式启动，这些分歧极有可能会重新显现。

到“七月一揽子协定”达成时，虽有迹象表明诸如农业问题等一些老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一些新问题也随之出现。例如，伴随着《纺织品和服装协议》谈判的结束——这是发展中国家渴望已久的结果——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又开始担心由于来自中国具有高度竞争力的

纺织品出口而失去自己的市场。同样，随着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某些诸如ACP这样的国家集团开始担心他们在特定区域市场所拥有的优势地位会下降。而且，“七月一揽子协定”还滋生了几个与谈判程序有关的问题。“七月一揽子协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大利益方”达成的协定，即澳大利亚、巴西、欧盟、印度和美国。无可否认，巴西和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紧密相连，尤其是通过G20集团。但其他一些不属于G20集团的国家纷纷抱怨他们被这一程序边际化了。

上述所有问题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分歧有日益严重的趋势。随着谈判的进行，这种现象还将会继续存在，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在“让步和索取”的具体谈判中作出选择，而不是在大而化之的原则上表明态度。坎昆会议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联盟取得成功的一次典范，在这期间他们最终能够团结作战，并拒绝接受任何不理想的协议。然而，随着谈判的继续，坎昆联盟是否能够经受住内部分化趋势日益严重的压力以及外部施压的考验，尚需拭目以待。

最后，回到我们的大主题：对于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如何健康发展，西雅图和坎昆会议的失败以及多哈会议和“七月一揽子协定”的成功到底赋予了我们哪些启示？对WTO进行体制性的改革是否有助于实现体制平衡，从而避免谈判回合在成功与失败间摇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体制性改革的方向又在哪里？对此，我将在下一章同时也是最后一章探讨这些问题。

第七章

治理困境

在过去的5年，WTO一直危机不断。无可否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多边机制的发展会一帆风顺，尤其像WTO涉及如此众多成员方的国际组织。然而，WTO部长级会议失败的频率及陷入僵局的次数远远超过GATT时期，看起来还会继续增加。公众在西雅图部长级会议及随后一系列会议上举行的反WTO的抗议活动表明民众已意识到该组织剥夺了公权，这次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强度上都与20世纪90年代偶尔发生的反GATT示威游行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些危机的爆发使WTO深陷发展困境，而不只是新兴国际组织初创时期理应遭遇的困难，它们迫使WTO成员方及观察员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

最近对WTO作为国际组织本质的反思及相关体制改革的建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如何”的角度来回顾最近的问题：坚持沿用过时的决策方法是WTO深陷危机的原因，改革这些决策机制将会终止危机的发生，并使国际贸易体制的管理变得更加顺畅。其他一些人则认为问题远比此复杂，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即WTO面临的问题不是其如何履行职责，而是其实际上做了什么或者将要做什么。第三种质疑主要是关于“谁”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也与前面两个问题相关联：我们需要更加仔细地审视WTO实际上为谁负责。根据最后这种观点，造成WTO危机不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缺乏民主。下文将简要介绍这些不同的反思，以及这些想法在WTO是如何发展成如今的局面以及将来有何出路等方面给我们的启示。

改革一个“过时”组织

坎昆部长级会议失败后，欧盟贸易委员（即如今的WTO新一任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发表的关于这个“过时”组织亟需改革的声明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代表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实际上被剥夺了权力的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对WTO独断的决策程序提出抗议。随着发达国家转向体制改革的议题，谈判议程开始切入主流的讨论，很明显，争论的首要对象便是以协商一致为基础进行决策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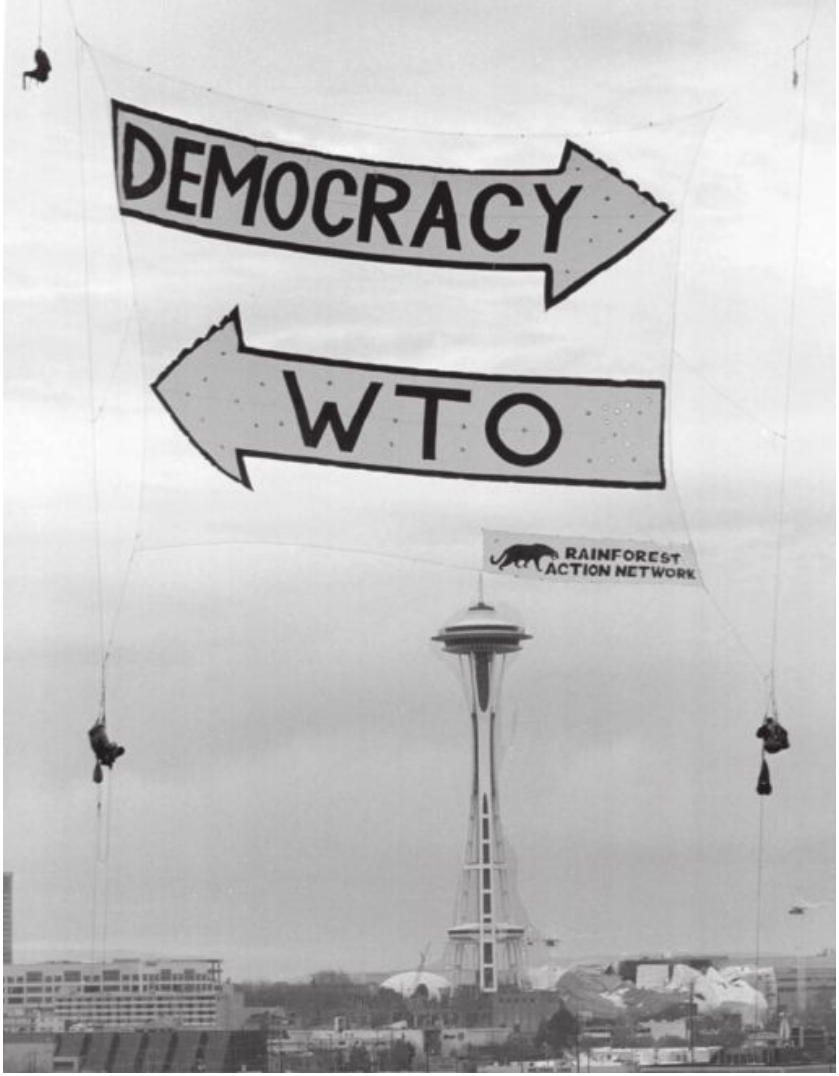

图12　WTO缺乏民主引发公众普遍讨论，这是GATT时代从未有过的。

赞成以及反对成立咨询委员会的提议

在评论西雅图和坎昆会议拖沓而缺乏效率的决策程序时，一些政府和个人认为，WTO要求所有决定都必须在148个成员方协商一致后

才能通过的做法注定了其走向失败的命运。以前，在GATT时代以及在WTO成立的头几年，只有少数成员方参与“绿屋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协商一致是有可能做到的。但是，自西雅图会议之后，“绿屋会议”透明度的增加使原先被排除在外的成员方得以参与决策。而当有148个成员方坐在谈判桌前时，就算有可能进行决策，效率也是非常低的。要克服WTO这一致命缺陷只能通过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或咨询委员会。

赞成成立咨询委员会的提议得到好几方的支持。在西雅图和坎昆会议失败后，欧盟一直主张设立咨询委员会。加拿大建议成立一个类似联合国安理会那样由来自不同地区代表构成的新委员会，且委员会的成员并不固定，而是采用“轮换制”。墨西哥则建议将“绿屋会议”改成“玻璃屋会议”，25%的WTO成员（在建议提出时有34个成员方）可以参与，其中，在世界贸易份额中占最大比例的15个成员方可以作为永久会员参会，剩下的19个与会成员方则按照区域标准进行选择，选举应由相关区域内的国家来实施。杰弗里·斯科特（Jeffrey Schott）和贾亚西里·沃特尔（Jayashree Watal）在2000年的一份研究论文中有类似提议，他们建议根据对外贸易总额与地理区划成立由20个成员方构成的非正式筹划指导委员会，且保证每一地区至少派出两名代表。2003年，理查德·布莱克赫斯特（Richard Blackhurst）和戴维·哈特里奇（David Hartridge）提议成立咨询委员会，大国在委员会中可以拥有永久席位，而其他国家可以分成若干小组，每一组拥有一个席位（由小组内的成员国轮流出任）。所有提议都强调委员会仅有咨询和促进协商的权力，而并不具备决策权。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很难获取参加小组讨论会议资格的国家）则坚决反对成立任何形式咨询委员会的提议。在他们看来，相比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及其采取的权重投票表决方式，WTO一直追求的就是其“一成员一票”的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决策机制。成立一个基于世界贸易份额来划定永久成员和非永久成员的咨询委员会将破坏WTO至少表面上的国际平等。

成立任何形式的咨询机构之所以会困难重重，有三方面的现实原

因。第一，鉴于WTO规则的约束性及潜在的渗透性，要让每个独立国家接受一个跨国协商机构的咨询建议，这几乎是不可能的。WTO绝大多数成员方都已从艰难的经历中认识到，谈判磋商的过程往往也是拟定会议议程的时候，因此进入最后决策阶段并不能替代参与最初的磋商。第二，鉴于区域内国家在特定议题上的巨大分歧，采取由区域内某一国家代表整个区域的非永久席位的做法根本不可行。第三，正如一个发展中国家集团指出的，“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将更加名正言顺地将绝大多数成员方排除在磋商程序之外。”

在效率和合法性之间取得平衡的一个可行途径是在“一成员一票”的以协商一致为基的决策机制与咨询机构这两种方法之间寻找到一种折中做法。“日内瓦发展中国家联合体”顾问维诺德·雷杰（Vinod Rege）提出的建议体现了这种折中做法。雷杰提议，每年年初，由总理事会主席在与其他三个分理事会主席磋商后推荐成立一个非正式筹划指导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应反映出WTO成员方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利益关注点，并取决于当年的会议议程安排和讨论的议题。委员会不是常设机构，但在有进行小组磋商的需要时可临时组建。雷杰的提议还包括创建一系列分委员会，其各自成员组成取决于特定国家对特定议题的兴趣，加入方式可以是接受分委员会主席的邀请，也可以是自由选择。然而，在执行这项建议过程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原则上反对成立咨询机构，因此不可能接受任何诸如此类的想法。第二，尽管雷杰经过改进后的想法允许咨询委员会可以在不同分委员会层面进行灵活的运作，但与目前的协商一致机制相比，成立这些委员会所要求的繁杂程序最终可能同样会使决策效率低下。

外交的灵活性VS规则的确定性

WTO体制改革引发巨大争议的另一个问题与其程序关联性不大，而与其整体上的运作方式紧密相关。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赞成设立咨询机构的国家通常也赞成沿用GATT谈判进程的随意性和外交的灵活

性以作为WTO的运作基础。相反，许多支持“一成员一票”协商一致决策机制的发展中国家则提议应继续加强谈判过程的规则约束。

“志同道合集团”（LMG）曾提出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建议支持协商一致决策机制。例如2002年，LMG宣称：“谈判程序的不确定性使许多成员方难以为会议作好充分准备。这一成员驱动的组织需要规定一些基本原则和程序，以确保部长级会议的筹备和谈判过程是透明、全面以及可预见的。”为此，LMG提议“所有拟采用的谈判程序都应该由成员方在正式会议上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予以批准。”该提议还强调“部长宣言草案应该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如确实无法通过，这样的分歧应该在部长宣言草案中得到充分而确切的体现”，以及“部长宣言草案在协商一致通过后才能由总理事会提交部长级会议讨论。”LMG的议案得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一个非洲国家集团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建议。一些非政府组织提议制定更为正式的规则。例如，10个主流的非政府组织（第三世界网络、国际乐施会、国际公共服务组织、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国际环境法中心、关注南半球、农业与贸易政策协会、非洲贸易网络、国际性别与贸易网络、贴巴国际土著人权中心）在2003年7月发布的一份备忘录中声明“所有会议都应该是正式的，且应备有会议纪要分发给成员进行修改或确认。”

第二种观点以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香港、韩国、墨西哥、新西兰、新加坡和瑞士于2002年联合提出的议案最具有代表性。该议案直接指向LMG的提议，并对LMG提议中的许多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与要求订立明确的规则和程序相比，该建议宣称，“为准备阶段设定详尽的程序是不恰当的，这并不会为坎昆会议上的协商一致创造最好的条件。”它强调了在一个成员驱动的国际组织中采取灵活性做法的重要性。与LMG建议对部长级层面的谈判程序持怀疑态度不同，该建议指出，“准备程序应该为部长级会议留出足够的空间，以处理那些需要在部长级层次解决的难题。”

上述两种观点很难调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各自基于相互对立的利益和能力。LMG的立场完全符合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的观点，即发展中国家总是寻求更具权威的体制。他们要

求建立更具确定性、规范性和严格性规则的动因在于他们相对有限的能力使其无法理解和掌握WTO管辖范围扩张后日益提高的技术要求。相反，在WTO中有明确可预见利益且有能力获得这些利益的国家则强调灵活性的优点，并高度重视传统意义上作为GATT和WTO谈判基础的外交手段。它们代表着对作为国际组织的WTO两种相互对立的设想。概言之，LMG的观点是主张建立一个管辖范围被严格限定的组织，同时接受一套明确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反之，发达国家的观点则主张建立一个横跨不同议题、管辖范围广泛的组织，且由政治力量而不是约束力和规则来驱动。同时，该组织还应在很大程度上倚赖于谈判程序的灵活性、WTO内部或外部举行的小型集团会议以及大量的政治干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设想对WTO到底采取何种方式对其成员方负责有一些重要的启发意义，这将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加以讨论。

质疑管辖范围

关于WTO的第二个争论集中于其管辖范围。对WTO管辖范围的质疑来自于成员方和非政府组织。

成员内部就WTO管辖范围的发展和演变产生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普遍地分裂为两种对立的观点。GATT/WTO规则向新议题的扩展绝大多数都是由发达国家引领的，例如，服务业、TRIPs、TRIMs，直至包括“新加坡议题”。然而，正如第三章所论述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现要跟上既定谈判议程和执行现有协定就已经很困难，当然就更不具备在新议题领域识别自身利益的能力了。鉴于这些现实困难，发展中国家对将任何新议题纳入WTO的一贯立场都是“说不”，并反复强调解决老问题的重要性。这些观点上的重大分歧使WTO陷入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两难困境。如果WTO放慢谈判的进程，它可能会导致发达国家拒绝作出新的承诺；然而，如果WTO继续其扩张步伐以迎合发达国家的谈判议程，它又可能致使占大多数的成员方被进一步边缘化，其决定的合法性将被进一步削弱。

为了同时满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一些学者和政策制订者建议分解“一揽子承诺”，并用“可变几何式”的多轨制加以取代。然而，这一想法仅停留在初始阶段，尚未引起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太多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东扩采取了一种类似的多轨机制，且运用得非常成功。如果这种机制真正应用于WTO的政策谈判，有两点忠告需要牢记。首先，“一揽子承诺”对促使WTO创立的“全盘交易”至关重要。如今，跨议题的交叉减让依然是达成最终协定的基础，多轨制将使这种减让难以实现。其次，为了避免在假设的“轨道2”议题上作出承诺，而仅仅承担“轨道1”的义务，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会将自己排除在“轨道2”的议题拟定和规则制订程序之外。现在许多新近申请加入WTO的国家都意识到，晚加入的成本可能会更高。在利益和观点出现严重分歧且实力极度不对等的情况下，保持警觉对于实现多边化是尤为重要的。

尽管发展中国家纷纷抱怨WTO谈判进程和议题扩张太快，许多非政府组织却以相反的理由对WTO表达了不满。他们认为，WTO的议程范围实际上过于狭隘，因而将贸易凌驾于所有其他价值问题之上。依据这一观点，通过宪政体制重新平衡WTO中利益关系是必要的，以便确保贸易与人权、环境、劳工标准、国家间性别和收入不平衡等议题之间保持平衡。虽然在这些关键领域扩充全球规则不无道理，但这些问题是否应由WTO来管辖，至少在四个方面非常值得怀疑。

第一，如第四章所述，WTO面临的问题似乎不是规则太少，而是规则太多，因而成员方越来越多地抱怨其制定国内政策的空间在不断缩小。全世界范围内人们都对不得不遵循WTO标准（例如关于转基因生物）表达了不满。将WTO规则继续扩充至非贸易议题将进一步压缩各国的国内政策空间，使成员方无权、也无力制订符合本国需要和利益的政策目标。因此，成员国并不可能轻易地允许WTO对其国内主权肆意侵蚀。

第二，如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述，WTO日常运作方式的更新并未与WTO议程的扩张要求相匹配。将WTO议题扩张至人权和环境等领域将要求WTO承担一个世界性的政府所应履行的全部职责。从组织结构

上来说，WTO无法有效地履行这些职责。即便WTO经过充分改革被赋予强大的权力和资金来管辖这些领域，它是否能够合法地履行职责也是令人怀疑的。正如下一部分将要说明的，WTO的官员责任制与民主政府的垂直责任制是截然不同的。WTO已经十分庞大，让其进一步扩充至并未意图涉入的新议题将会是无效且不明智的。

第三，尽管人们对将非贸易议程纳入WTO管辖范围是出于良好的意图，但在实践中很难保证这些标准不被用作非关税壁垒以抵制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丧失他们拥有的比较优势。人权、环境和劳工标准往往与各国国内文化和社会习俗紧密相联。在这些领域制订统一的标准长期以来一直备受争议。授权WTO通过贸易联系维护这些标准（这还有可能会被利用，成为施行保护主义的幌子），有可能进一步威胁到WTO决策的合法性。

第四，任何试图将WTO扩充至劳工标准和人权领域的请求都必须借鉴一下国际贸易组织宪章的历史教训。回想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论述的，虽然《哈瓦那宪章》的管辖范围比GATT和WTO都要广泛得多，但最终却不得不接受夭折的命运。通过不同的成员方相互赞成许多彼此对立的议题，国际贸易组织最终不堪其自身管辖范围的重负而失败。相比之下，GATT能取得成功就在于其只承载了有限的议程。尽管全球一体化进程愈演愈烈，但对于过去政治意义上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现在要重新去争取，至少应在政治上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

我对WTO进一步向非贸易问题扩张的质疑不应被理解成悲观的体现。通过改进全球管理体制的一致性，在全球范围内制定某种最低标准或规范是可行的。私人部门出现的类似机制已经形成，如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建立WTO协定》第5条也要求总理事会作出适当安排，“与其他职责上同WTO有关的国际组织进行有效合作”。对此，《多哈部长宣言》主体部分第5段再次声明：

> 我们意识到，成员方在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无法单纯通过在贸易领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我们应该继续与布雷顿森林机构进行协作，以增强全球经济政策制订的统一。

减少WTO的“民主赤字”

对WTO危机频发的第三种讨论关乎其根深蒂固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问题。这一赤字的产生是众多受WTO规则影响的民众无法对规则制订程序直接施加任何影响的必然结果。从这一观点来看，成员方之间问题重重的决策程序、WTO管辖范围不断向富有争议的议题拓展、以及薄弱的组织结构与强制约束力和膨胀的管辖范围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并非导致民主赤字的根源，而是进一步加剧了WTO中的民主赤字。

毋庸置疑，WTO的规则制订过程已经远远地将受其影响的民众排除在外。非政府组织或其他受影响的社会民众无权享有在WTO的代表权，WTO的所有事务都由成员方派驻的代表团负责处理。而这些代表团的组成成员则是各国官员（通常来自于商务部或外交部），而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代表。民众向代表团表达建议的唯一途径就是选举代表组成政府。然而，驻日内瓦代表团成员最终是由部长在听取相关部委官员的建议后指派的，这些被指派的官员才能参与WTO的决策过程。而这种长链式的代表团成员选拔机制意味着，即使是在最民主的国家，驻WTO代表团也是远离其本国民众的。正是有鉴于此，许多非政府组织才要求WTO提高其谈判的对外透明度，甚至要求即使无权参与决策，也应允许其作为观察员直接参与WTO谈判。同样，其他一些组织和民众也要求更大程度地参与作出最终决策的部长级会议和多国同盟会议，或者至少保证由他们选举出的代表参会，而不至于在日内瓦见到的全是陌生的官员。

图13　无可否认，如漫画所示，发达国家的即时反应是将坎昆部长级会议的失败归咎于发展中国家拒不妥协的态度。然而，幸运的是，这一本能反应后随之而来的是全体成员方更加积极地参与其中。

增加在部长级或同盟级会议的参与度能否真正让WTO对受其影响的民众更加负责，这无法确定。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提高民选官员的参与度可以缩短驻日内瓦代表团的选拔程序，并使国际贸易的治理与民众联系更加紧密。然而，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代表团（有些甚至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经常抱怨WTO谈判的高度技术性意味着他们的官员无法有效地参与谈判。他们缺少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研究支持和众多官员的协助。作为政治人物，他们比国内官员更易受到双边压力和非贸易议题的影响。提高民选代表的参与度还可以使代表更有效地承担政治义务，并加快WTO的决策进程。然而，这样的决策可能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准备不充分的部长们或其他国会议员施加更大压力而达成的。因此，尤其当部长们及其本国民众已开始逐渐认识到他们签署协议的后果时，希望通过这样的措施来改善WTO的民主赤字是根本不可能的。确实，乌拉圭回合协议中的执行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反复抱怨的承诺不对等都是这种民主赤字带来的后果。

相对于非政府组织要求更多地参与WTO谈判进程来说，私人部门的参与要求则更缺乏合理性。温迪·多布森（Wendy Dobson）和皮埃尔·雅凯（Pierre Jacquet）描述了商业联盟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例如，美国服务业联盟和英国无形贸易协会在GATS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拥有美国和欧盟企业的金融领袖团体在达成金融服务协议过程中也发挥了举重轻重的作用。类似的私人部门所施加的强大影响（如医药企业）在TRIPs协定的缔结过程中也有所体现。企业可以通过直接参与谈判来施加影响，尤其当他们被招入代表团就技术性议题进行谈判时，如电讯或会计。与之相比，来自民间的其他代表则很少能够施加同等的影响，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其他方法来体现他们的利益要求。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WTO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增加非政府组织对其事务的参与。从WTO官方网站上可以获得几乎所有的WTO文件。在贸易争端提交到上诉机构时，非政府组织可以呈交“法庭之友”简报。经过资格认证程序之后，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参加部长级会议（但他们不能在谈判桌上获得席位，除非他们作为某国代表团的成员）。尽管这些措施有效地增强了WTO的对外透明度，但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度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对这些客观事实的深入分析反而让人们开始怀疑，提高非政府组织或国会议员的参与度是否会对改善WTO的民主赤字产生积极的影响。

也许，敞开大门让非政府组织更多参与WTO事务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不清楚这些组织实际代表了谁的利益，以及它们将对谁负责。WTO，以其现有成员驱动的形式，至少可以保证每一成员有一票的投票权。在民主国家，这些谈判代表多少会对其民众的利益负责，不管在现实中他们如何脱离本国选民。与之相比，即使最好的非政府组织都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也不能在法律上对其所宣称代表的民众负责。对非政府组织活动的深入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发展中国家长期所担心的风险，即许多得以在国际舞台上赢取发言权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都来自于发达国家，或者由发达国家的一些组织给予资助。例如，在非政府组织相当活跃的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上，

738个经认证的非政府组织中大约有87%来自于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在WTO中直接参与程度的提高有可能使体制进一步偏离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非政府组织在处理与WTO有关的事务中没有作用。但是，就如他们想要与其达到平衡的私人部门，他们要参与到WTO事务中就需要通过其政府或施加跨国影响力。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对技术认知能力较低的国家或议题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此时，非政府组织能够提供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帮助成员方政府采取正确的谈判立场，以帮助特定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人群。当与政府政策发生分歧时，非政府组织可以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建立跨国联系以协调彼此立场。南北半球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与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对多哈部长级会议成功发布TRIPs和《公共健康宣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由发展中国家与特定非政府组织结成的联盟在未来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最后，我们暂且不去考虑WTO成员最终会采取怎样的改革策略，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WTO管辖范围的扩展已经与制订其法律规则的无序性和充满强权政治的机制不相同步。这一矛盾需要解决。无可否认，进行体制改革以允许发展中国家更加有效地发表意见将会导致谈判进程更加缓慢和艰难，但这一改革也有可能成为更具合法性的长远举措，从而可以降低WTO成员方之间出现分歧的风险。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改革措施，后果将会更加严重。如果WTO谈判进程继续像最近几年那样不断出现停滞，发达国家有可能彻底转向寻求双边或区域解决途径。这种后果对双方来说都是十分昂贵的代价。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他们将承受更高的交易成本（这种不便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甚至相互之间还有爆发双边贸易战的可能。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后果会是毁灭性的。因为他们已经花费很长时间来学习如何在GATT/WTO的多边舞台上运作，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凭借新组成的联盟力量来自信地参与GATT/WTO事务。如果不进行改革，他们将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来自于发达国家空前的双边压力，而且他们还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护措施来作出应对。WTO是发展中国家抵制一切不良势力的全部依

靠，确保并维护WTO的权威和存在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需求。

WTO的魅力何在，为什么能不断吸引发展中国家申请加入？WTO中又存在着怎样的争议，为何引起民众大规模的抗议游行？WTO只是一个贸易组织吗？它和你的生活有关系吗？

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建到发展，从谈判回合到决策过程，作者另辟蹊径，选取政治学的角度讲述WTO的核心特点，分析推动其产生、运作和演变的原因，展现了一个你并不了解的WTO。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欧盟概览

约翰·平德 著
戴炳然 译

百科通识文库

49

欧盟概览

约翰·平德 著

戴炳然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35**

The European Un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1.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1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John Pinder 20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盟概览 / （英）平德（Pinder, J.）著；戴炳然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08-0

Ⅰ．①欧…　Ⅱ．①平…　②戴…　Ⅲ．①欧洲国家联盟 - 介绍
Ⅳ．①D8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43号

地图审图号：GS（2007）第440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87-8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前言
缩略语
加框文字目录
图表目录
插图目录
地图目录
第一章　欧盟是干什么的？
第二章　欧盟是如何建成的？
第三章　欧盟是如何治理的？
第四章　单一市场、单一货币
第五章　农业、地区、预算：得失的冲突
第六章　社会政策、环境政策
第七章　“一个自由、安全与公正的区域”
第八章　一个民事大国：是耶，非耶？
第九章　欧盟与其他欧洲国家
第十章　欧盟与世界
第十一章　尚算圆满，但今后如何？
其他参考材料
年表（1946-2000年）
名词解释
译后记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约翰·平德，英国政策研究协会会长，欧洲学院荣誉教授，自1950年开始研究欧共体的发展，成果斐然，著作包括《英国与共同市场》、《欧洲经济学》、《欧共体与东欧》、《欧盟之架构》、《欧盟民主之基础》等。现任联邦信托基金机构主席，曾任国际欧洲运动副主席和欧洲联邦主义者联盟主席。

译者简介

戴炳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参与和主持多个欧洲研究项目。兼任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中国欧盟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2001年获欧盟委员会“让·莫内教授”称号，并获2008年“让·莫内奖”。

前言

有人说是萧伯纳为写了一封长信而道歉，原因是他没有时间写短信；有人说那是伏尔泰。他们俩很可能都这么做过。他们也许还为撰写了一本篇幅长的书而道过歉。当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谢利·考克斯邀我写此“非常简练的介绍”时，我就该想到这个故事。我写过不少关于欧盟的书，却从未受过“非常简练的介绍”的严格限制；我发现，尽可能简练地阐释一个复杂的实体，竟是一个难以应对的挑战。

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作最为精炼的阐述。自欧洲共同体——现称欧洲联盟——成立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关注它的发展，并积累了大量的事实与思索，可供本书从中选取看来最为切题的素材。我很快产生了一个想法，即最好是沿着联邦制的方向循序渐进地介绍，而且一直认为理应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连根拔起欧洲的古老国家，再将它们移植至一片处女地，而是建立一种可以使它们以有效和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共同问题的框架。我对观点的选取难免会受此想法的影响，但我关注的是为善于思索的人们——不管他们是倾向于联邦制还是政府间途径——提供事情的来龙去脉，借以评价欧盟的成效，并判断它在必须对其未来作出抉择的关键时刻应该朝哪个方向前进。为此，我力图实事求是。

我的知识涉猎可以说是博而不精。为了准确说明本书所涉及的欧盟事务，我得到了相关专业人士的鼎力相助。我要特别感谢莱恩·贝格、安德鲁·达夫、奈杰尔·黑格、克里斯托弗·约翰逊、约尔格·莫纳尔和西蒙·纳托尔。西蒙·厄舍伍德在加框文字、图表、年表、名词解释、地图等的制作上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帮助。谢利·考克斯及其同事们既保证了工作效率，又能理解作者的需求。一如既往，我还得到了波林·平德的睿智建议。如果本书不能令读者满意，那不是他们的过错。

《尼斯条约》

在本书付梓前不久，欧洲理事会于2000年12月10日缔结了《尼斯条约》。该条约将大大改变欧盟机构的运作方式。为使本书内容尽可能反映欧盟的最新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容我在时间与空间所许可的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作了一些适当的修改。有些变革将在2005年生效，其余则将在该条约得到所有成员国的批准后——最迟可能是2002年——生效。在此之前，现有条约中的各项条款仍然有效。

约翰·平德

2000年12月

缩略语

ACP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非加太国家）
AFSJ　自由、安全与公正的区域
Benelux　比荷卢经济联盟
CAP　共同农业政策
CE　强制性开支
CFC　全氯氟烃
CFSP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CIS　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CJHA　司法与民政事务合作
CO_2　二氧化碳
Comecon　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
Coreper　常驻代表委员会
EAGGF　欧洲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农业基金）
EC　欧洲共同体（欧共体）
ECB　欧洲中央银行（欧央行）
ECJ　欧洲法院（正式名称为“法院”）
Ecofin　经济财政部长理事会
Ecosoc　经济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
ECSC　欧洲煤钢共同体
ecu　欧洲货币单位（简称“埃居”，欧元的前身）
EDC　欧洲防务共同体
EDF　欧洲开发基金
EEA　欧洲经济区
EEC　欧洲经济共同体
Efta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EMS　欧洲货币体系
Emu　经济与货币联盟（经货联盟）
EPC　欧洲政治合作
ERDF　欧洲地区开发基金（地区基金）

ERM　汇率机制

ESCB　欧洲中央银行体系

ESF　欧洲社会基金（社会基金）

EU　欧洲联盟（欧盟）

eua　欧洲记账单位（埃居前身）

Euratom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euro　欧元（于2002年取代大多数成员国货币）

Gatt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NP　国民生产总值

GSP　一般特惠制（普惠制）

IGC　政府间会议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

NCE　非强制性开支

NTBs　非关税壁垒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OSCE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合组织）

PHARE　波兰与匈牙利：经济重建援助（后拓展至其他中东欧国家）

QMV　（理事会的）特定多数表决

SEA　《单一欧洲法令》（《单一法令》）

TACIS　对独联体国家的技术援助

TEC　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

TEU　《欧洲联盟条约》

UN　联合国

VAT　增值税

WEU　西欧联盟

WTO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

加框文字目录

条约
非关税壁垒
布朗5要点
《稳定与增长公约》
结构性基金与目标
各国的预算净支出或收益
社会政策
就业政策
欧盟与申请国的人均GDP
与欧盟签订协定的独联体国家
欧盟的《洛美协定》伙伴
第五个《洛美协定》（2000-2020年）
欧盟的“欧盟 - 地中海”伙伴
欧盟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协定与联系

图表目录

欧洲联盟及其支柱
共同体机构
各国欧洲议会议员人数
1999年选举后的议会党团
经社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中各国的代表人数
1986年与1996年一些欧盟国家对制造业的国家补贴
经济与货币政策机构
共同农业政策开支在预算中的份额（1970—2000年）
预算开支分配（2000年）
财政收入来源（2000年）
司法与民政事务机构
欧盟、美国、日本等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1997年）
负责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欧盟机构
欧盟的PHARE开支在各受益国的分配（1990—1998年），PHARE开支在各领域的分配（1990—1998年）
TACIS开支在各领域的分配（1991—1997年）
欧盟商品贸易的区域伙伴（1998年）
欧盟、美国、日本等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1997年），欧盟及其成员国发展援助的受益地区（1997年）

插图目录

图1　温斯顿·丘吉尔在海牙
图2　让·莫内与罗伯特·舒曼
图3　《舒曼宣言》
图4　夏尔·戴高乐对英国说“不”
图5　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单一货币说“不”
图6　爱德华·希思签署《加入条约》
图7　雅克·德洛尔
图8　阿尔蒂诺·斯皮内利举手赞同其拟定的《欧洲联盟条约草案》
图9　1979年的欧洲理事会
图10　部长理事会
图11　欧洲议会开会
图12　1999年新委员会的首次会议
图13　法院开庭
图14　欧元：纸币与硬币
图15　罗纳德·里根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图16　柏林墙倒塌
图17　比尔·克林顿与雅克·德洛尔

地图目录

地图1　欧盟的壮大（1952—2000年）
地图2　欧盟、欧洲自由贸易区、欧洲经济区
地图3　申请加入的国家
地图4　欧洲的构架

第一章

欧盟是干什么的？

今天的欧盟是由半个世纪以前创建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演变而成。当时煤炭业与钢铁业仍然是军事实力的两大工业基础；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在他发起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宣言中断言：这将使“法国与德国之间的任何战争”变得“不仅难以想象，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

持久的和平

在时隔多年的今天，人们恐怕很难理解这句话在当时的重大意义。1939—1945年的那场战争给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带来了严重灾难，而当时战争结束才仅仅5年。对于过去80年中曾3次兵戎相见的法国和德国而言，寻找持久和平共处的途径是首要的政治目标，而新的共同体正是为此而构建的。

对法国而言，以德国巨大的工业潜力，其完全独立的前景是令人担忧的。1914—1918年那场战争之后，法国就曾力图遏制德国，却一败涂地。用强有力的机构来约束德国，同时也约束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从而在更长时期内可以使德国接受，这一想法似乎更有希望。而这种希望已经得到了充分实现。法国人可以将欧共体（EC）和现在的欧盟（EU）视为他们创造性倡议的结果，他们的这些倡议曾是其欧洲政策的核心方案。与此同时，法国人还寻求扮演欧洲各国领导者的角色，而且相当成功。另一方面，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入这些欧洲机构，也给德国提供了一种架构，使其能在此架构下与日益增多的其他成员国发展和平与建设性关系。

对于德国人而言，12年的纳粹统治于1945年土崩瓦解之后，共同体给他们的民族以重新受世人尊敬的机会，因此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平等的共同体的想法是很有吸引力的。舒曼还宣称：新的共同体将是“欧洲联邦的第一座坚实基石，而此联邦系维护和平所必不可少”。尽管法国人对使共同体向联邦方向发展有些用心不专，但对联邦民主

主义十分着迷的德国政治阶层却不懈地支持这种发展。事实上，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于1992年通过了《基本法》的一项修正案，使其在加入恪守联邦制原则的欧洲联盟的道路上有据可依。

其他4个创始国——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与荷兰——也认为，新的共同体能将德国约束于强有力的欧洲机构内，不失为保障和平的手段。他们大多也像德国人那样，将欧共体视为联邦政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这么认为。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日渐淡出历史，成为一个更为遥远的过去，但作为创建共同体的基石，谋求和平与安全的动机仍然对共同体6个创始国的政府与政治家具有重大的影响。而半个世纪以来，这一体系为保持和平提供了一种架构，被看成是未来稳定的一种保证。决定实行单一货币来强化共同体便是最新的例证，这种单一货币被看成是将统一后潜力更为巨大的德国牢牢扼制住的途径。今后，随着欧盟东扩，其成员国将增至30个或更多，其中包括至少十余个新兴民主国家；因此，欧盟将不断面临强化其机构以保持稳定的压力。而在英国，政治家们普遍关注的是经济一体化，这便使他们的注意力转离了这一体系的根本动机，并阻碍其在此类发展上产生重大与建设性的作用。

经济实力与繁荣

尽管谋求持久和平是建立新共同体的深远的政治动机，但如果在其有权管理的经济领域中没有取得足够的成绩，这个共同体也不可能成功。而事实上，共同体不仅满足政治需求，也能促进经济发展。法国、德国、比利时与卢森堡诸国间的边界成为钢铁厂与冶炼钢铁所需煤矿之间的壁垒，阻碍着生产的合理化；消除这些障碍以及共同治理随之形成的共同市场，在经济上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以及成员国间实现和解的事实，促使这些国家——如同舒曼所指出的那样——将欧洲煤钢共同体视为经济乃至政治统一进程中的第一步。1954年，法国国

民议会拒绝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的一项条约使得第二步尝试踏空；之后，6个创始国再度迈上经济一体化的道路。在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成立之时，共同市场的构想已延伸至各国之间的所有贸易活动中，这合乎成员国间经济相互依存的逻辑，使它们走上了经济一体化的坦途。

由于法国的坚持，欧洲经济共同体实行统一的对外关税，从而能够以平等的地位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这说明了共同体的潜力：一旦拥有执行对外政策的共同手段，它就可以在国际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实现创建共同体的另一个动机的第一步：恢复欧洲在更大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已被两次自相残杀的大战消耗殆尽。

未曾遭受战败打击的英国人不赞同欧洲民族国家体制必须彻底改革，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与共同体保持着距离。他们认识不到推行这种改革的作用，但某些人除外，其中便包括温斯顿·丘吉尔。战争结束不到一年半，他便在苏黎世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现在必须建立一种欧洲合众国……第一步一定是法国与德国结成伙伴关系……法国和德国必须共同带头。"在英国，尽管只有少数人深刻理解要有一个新的共同体的道理，许多人却不愿在欧洲大陆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和被排斥在重大决策之外。因此在没能建立一个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他西欧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之后，接连几届英国政府都寻求加入共同体，并终于在1973年如愿以偿。然而，虽然在推动共同市场发展为一个更加完善的单一市场中英国人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们依然缺乏创始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那种推进其他形式的进一步一体化的政治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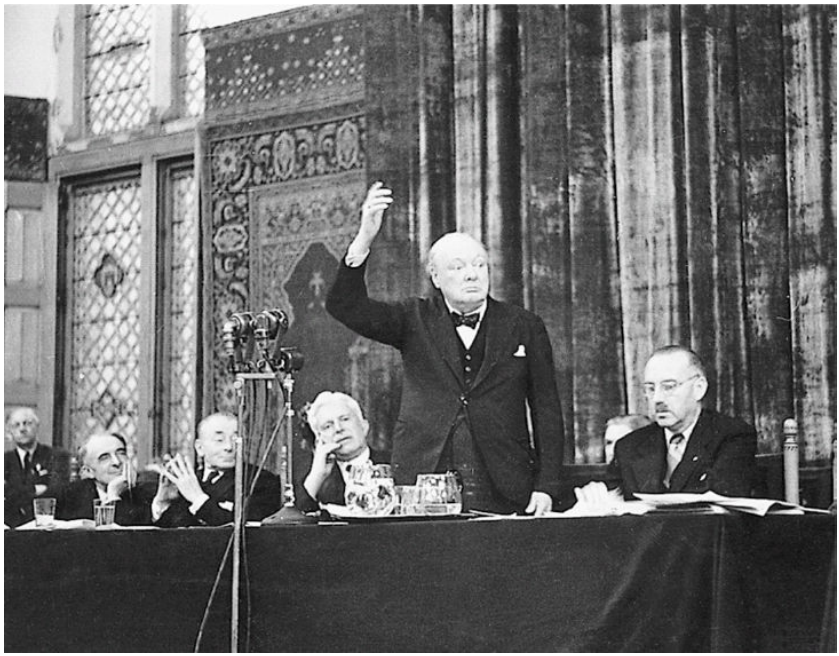

图1　丘吉尔在海牙：在号召建立“一种欧洲合众国”后，他发起了欧洲运动。

了解创始国与英国的动机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还在继续演变，仍然影响人们对欧盟的态度。这些年来，陆续加入进来的其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也怀有类似的动机；而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可望加入的十来个或更多的国家，将带着它们各自的不同动机，包括它们大多怀有的、受苏联长期控制后加入欧洲主流的强烈愿望。种种这些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动机构成了过去50年间许多戏剧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并造就了作为本书主题的欧洲联盟。

理论与解释

对于欧共体与欧盟现象，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强调成员国及其政府间关系的作用，另一种解释则更重视欧洲机构的影响力。

坚持第一种解释的人大多属于“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思想流

派，他们认为欧共体与欧盟并没有给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带来根本变化，因为这些成员国的政府依然追逐本国利益，并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在欧盟中寻求本身权力的最大化。这一流派的一种较新的变体被称为“自由政府间主义”，它通过分析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来解释政府在欧盟中的行为。因为缺乏更好的字眼，下文在讨论欧共体与欧盟如何运作时，持上述观点的流派将被称为“政府间主义者”。

我们不可低估政府在欧盟事务中所保持的作用：在代表成员国的理事会中，它们拥有决策权；它们还完全左右着最终是否诉诸武力。但其他流派，包括所谓的“新功能主义”和“联邦主义”，比“政府间主义者”更重视欧洲机构的作用。

“新功能主义者”将欧共体的发展看成是从最初的只限于两个工业领域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溢出”的过程。利益集团和政治党派被煤钢共同体在解决这两个领域问题上的成功所吸引，却对其无力处理其他领域的相关问题而沮丧，因此它们与欧盟委员会的领导层一起，成功推动共同体权限的不断扩张，直至它最终能为成员国的许多事务提供一种欧盟的治理方式。这至少部分解释了共同体发展的某些步骤，包括从单一市场向单一货币的发展。

“联邦主义”尽管也强调共同机构的重要性，但在两个主要方面超越了“新功能主义”。首先，它认为向欧盟移交权力与从现有权力向新权力的“溢出”无关，与之相关的是各成员国政府愈来愈无法有效处理跨国家的、从而是超越现有国家权限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涉及经济、环境、安全等领域，国家则只应对那些它们仍能有效处理的事务保持控制权。其次，“新功能主义”对决定欧洲机构发展的原则含糊其词，“联邦主义”则以自由民主主义——特别是建立在基本权利之上的法治，以及由民选代表立法和监督行政机构的代议制政府——作为其立足点。据此观点，共同行使的权力需要由政府机构处理，因为政府间方式既不够有效也不够民主，无法充分满足民主国家公民的需求。所以，要么机构中的联邦成分得到强化，直至欧盟成为一个有效的民主政体，要么它将无法获得民众的足够支持，从而无法发展，甚至可能无法存在下去。

接下来各章将试图说明欧共体与欧盟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不同的观点。同时，也提请读者注意：笔者认为，对有效的民主政府的需求已经使欧共体与欧盟沿着联邦的方向逐渐前行了很远，而且应该继续沿着此方向前进，尽管它绝不会必然地朝此方向前进。

第二章

欧盟是如何建成的？

“欧洲统一不会一蹴而就，或因循一个单一、普遍的模式。它将通过实实在在的成果来构建，首先是通过创建一种事实上的团结。”《舒曼宣言》以这些话准确地预示了昔日共同体演变成今日联盟的过程。因以往行动的成功而获得信心，共同体的机构与权力得以逐步发展，以处理看来最好由共同行动来运作的事务。

接下来的各章将更为详细地讨论共同体的各个机构与职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利益与重大事件是如何相互作用，从整体上造就了这种发展的。在前一章中已对一些基本利益与动机作了讨论：通过建立经济与政治关系——而不只是通过军事手段——来保障安全，实现企业与工会所特别关注的繁荣昌盛，推行绿党与志愿组织强烈要求的环境保护，保持在对外关系中的影响以促进在更大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利益等。

随着满足这些需求的共同体的建立，其他利益也掺和进来。那些担心受某些方面损害的国家，寻求通过再分配措施得以补偿：法国要求实行共同农业政策，以抗衡德国的工业优势；害怕因单一市场而利益受损的那些较弱经济体，要求设立结构性基金；英国及其他预算失衡国家[1]，要求调整预算分配。有些政府、议会、党派和志愿组织大力要求改革，以使机构更加有效和民主；而与此相对，有人抵制任何超越政府间决策的行动，但动机又各不相同：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上对民族国家的信奉，有的是出于认为一旦超越民族国家，民主就不可行，有的是出于对外国人的不信任，有的则只是出于想要维持现状。他们中包括戴高乐总统与撒切尔首相等重要历史人物，以及各色各样的机构与个人——这在英国与丹麦最为常见。在欧盟各机构中，部长理事会最倾向于这种观点。

让·莫内与雅克·德洛尔属于最具影响力的联邦主义者，致力于发展一种能有效处理各成员国及其公民的共同利益的欧洲政体。他们都发起了迈向联邦目标的重要步骤。阿尔蒂诺·斯皮内利则代表另一类型的联邦主义，构想着一举实现欧洲联邦宪法。德国、意大利、比利时与荷兰议会和政府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机构联邦主义者；欧盟委员会与

欧洲议会也是如此；在欧盟各条约能作此解释的范围内，欧盟法院也算是机构联邦主义者。尽管意大利人、比利时人和有些时候的欧洲议会支持宪法联邦主义，但总的来说其更倾向于莫内的循序渐进的方式。

50年代：创建条约

莫内负责起草了《舒曼宣言》，主持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谈判，并担任了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的首任主席。“高级机构”[2] 这个词反映了他对将一个强有力的执行机构置于共同体核心的坚持，而这种坚持源自他在担任两次大战间的国际联盟副秘书长时，深感政府间体制的软弱无能。但他也相信，对于信奉民主的成员国而言，这样的共同体应该具有一个议会和一个法院——联邦立法与司法的基础——以及一个由各成员国部长组成的理事会。

这一结构直至今日仍十分稳定，然而机构间的关系已有所变化：理事会成了最强势的机构；欧盟委员会仍然重要但已经失利；欧洲议会权力有所增强；法院已确立为诠释共同体权限的最高司法机构。虽然英国政府后来接受了这些机构，但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认为这些机构过于联邦化而不愿参加。

图2　创始人：莫内（左）与舒曼（右）。

但6个成员国决心朝此方向继续推进。由于受共产主义在欧洲与朝鲜扩张政策的影响，美国坚持主张德国进行重新武装，法国对此作出反应，提出建立一个拥有一支欧洲军队的欧洲防务共同体。6国政府签署了一项《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其中4国批准了该条约；但它在法国日益遭到抵制，国民议会1954年经投票决定将其搁置。或许这样也好，因为共同体机构即便得到同时制定的关于欧洲政治共同体的一项条约的强化，恐怕也不足以承担如此沉重的责任。其结果是，直到90年代，赋予共同体在防务领域某种权限的设想，依然是个禁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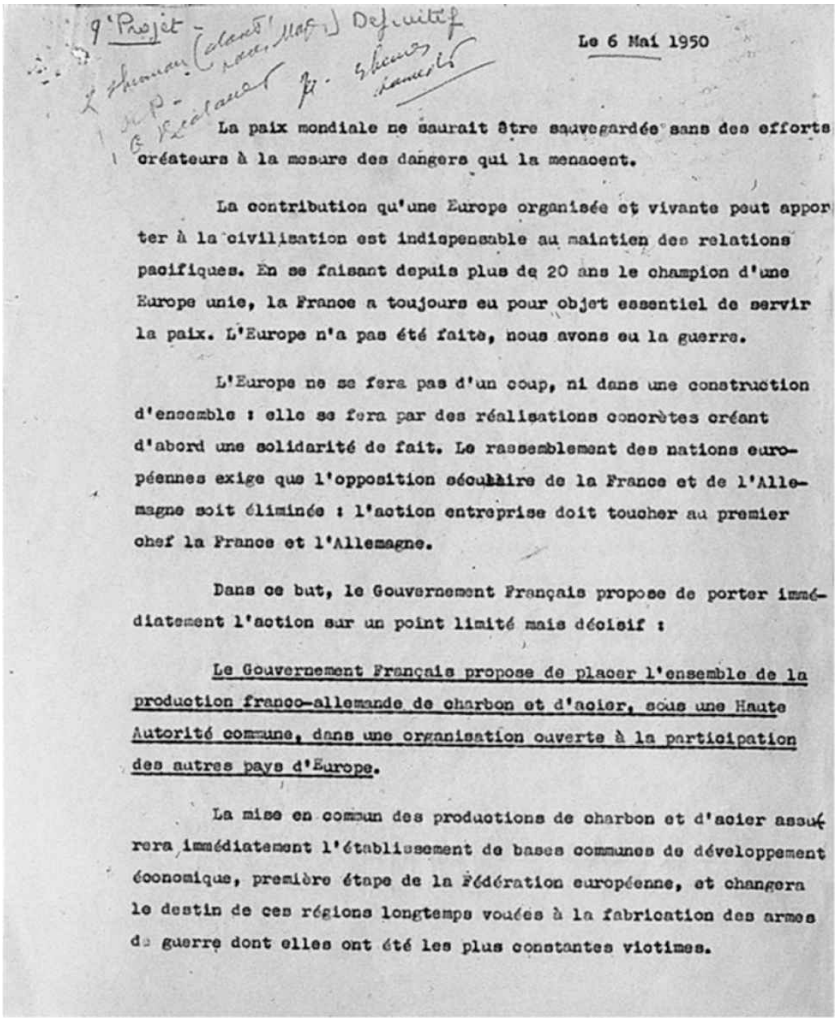

9 Projet - Schuman (clauses) Mai) Definitif

Le 6 Mai 1950

La paix mondiale ne saurait être sauvegardée sans des efforts créateurs à la mesure des dangers qui la menacent.

La contribution qu'une Europe organisée et vivante peut apporter à la civilisation est indispensable au maintien des relations pacifiques. En se faisant depuis plus de 20 ans le champion d'une Europe unie, la France a toujours eu pour objet essentiel de servir la paix. L'Europe n'a pas été faite, nous avons eu la guerre.

L'Europe ne se fera pas d'un coup, ni dans une construction d'ensemble : elle se fera par des réalisations concrètes créant d'abord une solidarité de fait. Le rassemblement des nations européennes exige que l'opposition séculaire de la France et de l'Allemagne soit éliminée : l'action entreprise doit toucher au premier chef la France et l'Allemagne.

Dans ce but,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propose de porter immédiatement l'action sur un point limité mais décisif :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propose de placer l'ensemble de la production franco-allemande de charbon et d'acier, sous une Haute Autorité commune, dans une organisation ouverte à la participation des autres pays d'Europe.

La mise en commun des productions de charbon et d'acier assurera immédiatement l'établissement de bases communes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première étape de la Fédération européenne, et changera le destin de ces régions longtemps vouées à la fabrication des armes de guerre dont elles ont été les plus constantes victimes.

图3　莫内送交舒曼的1950年5月9日《舒曼宣言》文本第1页。

尽管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失败是一个严重的挫折，但人们对共同体作为维持成员国间和平关系的架构的信任感增长了，由此形成了一股“重新启动”其发展的强大的政治推力。荷兰人急切地提出要建立一个全面共同市场，并很快得到了比利时和德国的支持。依然明显倾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国人疑虑重重，但他们坚持围绕法德伙伴关系构建欧洲一统的计划不变，因此接受了德国人所希望的共同市场，前提是

满足法国的其他利益：

条约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1958年生效的《罗马条约》是建成今日欧盟这一漫长和错综复杂的过程的重要基石。其他重要条约包括1952年生效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87年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9年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和2000年12月由欧洲理事会缔结的《尼斯条约》。

一个较小的复杂之处是，《罗马条约》包括两个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但前者比后者重要得多，所以通常被称为《罗马条约》。

一个较大的复杂之处是，欧洲联盟是由《马约》所建立的，除本身有其条约的欧洲共同体之外，欧洲联盟还包括外交政策与内部安全两个新“支柱”。《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被《马约》加强为《欧洲共同体条约》（TEC）；虽说欧共体是欧洲联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欧洲共同体条约》继续与《欧洲联盟条约》（TEU）并存。因此现在有两个条约（《欧洲共同体条约》与《欧洲联盟条约》），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拥有共同的机构，不过法院、委员会与欧洲议会在欧洲共同体中起到的作用，强于它们在另两个支柱中的作用。

注意：为避免不必要的复杂化，本书在提及欧共体与欧盟时，遵循两个原则：

- 涉及欧盟建立之前的所有事务，或特指欧盟建立之后，与欧共体单独相关的事务时使用欧洲共同体、共同体或欧共体；
- 欧洲联盟、联盟或欧盟被用在所有其他场合。

一个由法国起领导作用的原子能共同体、共同农业政策、与殖民地的优惠联系协定、共同体内男女同工同酬——若不如此，已有此法律规定的法国工业将在某些领域处于竞争劣势。6国中经济实力最弱的意大利，则使得欧洲投资银行在该国成立了分支机构，获得了社会基金，实现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所有这些都写进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的《罗马条约》[3]。这是“一揽子交易”——每个成员国都获得一些好处——的早期例子，自此之后的许多行动都具有此特点。

这两项新条约于1958年1月1日生效。但在该年年中成为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决心保持本国原子能领域的国有化，使之为法国军事实力服务，因此将原子能共同体排挤到权力中心之外。而欧洲经济共同体成为共同体日后发展的基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机构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相仿，不过其执行机构——被称为“委员会”而不是“高级机构”——不那么拥有实权。欧洲经济共同体被赋予了广泛的经济权限，包括：建立一个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和对外实行共同关税的关税同盟；在特定领域实行某些政策，尤其是农业政策；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

委员会的首任主席沃尔特·哈尔斯坦是一位出色的前法学教授和坚定的联邦主义者；作为阿登纳政府的资深成员，在商定《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的内容时他是莫内的主要谈判伙伴。他领导委员会迅速开展工作，加速了建立关税同盟的时间表；在此框架内，共同体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功，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左右，是英国和美国的两倍。但是莫内与哈尔斯坦所设想的新兴的联邦主义共同体，与戴高乐对民族国家的基要主义信仰发生了冲突，使得该10年成为共同体政治上险象环生的时期。

图4　戴高乐对英国说“不”。

图5　撒切尔对单一货币说“不”。

60年代：戴高乐抵制联邦主义者

1958年6月，《罗马条约》生效不到半年，戴高乐就任法国总统。他不喜欢共同体的联邦成分与志向，但也不愿直接挑战法国刚批准的条约，因此他转而寻求利用共同体提升法国的权力与领导地位。事例之一是他将原子能共同体排挤到权力中心之外，另一个例子是他行使否决权，使得旨在接纳英国、丹麦、爱尔兰和挪威为成员国的扩大共同体的首轮谈判于1963年结束。虽说英国政府对共同体概念的理解更接近于戴高乐而不是更热衷于联邦制的其他成员国，但它对本国农业与英联邦利益的保护使得谈判变得艰难而漫长，并令其他成员国感到厌烦。法国这种行使否决权的单边主义与民族主义做法引起其他成员国极度不满，并诱发了共同体内首次政治危机。接着在1965年，共同农业政策（CAP）的安排又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危机。

共同农业政策从一开始就承载着法国的关键利益，戴高乐决心尽快制定这一政策，避免其被不当延误。该政策建立在价格补贴之上，需要巨额公共费用。法国与委员会都认为费用应出自共同体而非各成员国的预算开支。但具有联邦取向的委员会和信守民主原则的荷兰议会，坚持预算开支必须由议会管理；而鉴于共同体预算不能由6个单独的议会管理，因此它必须由欧洲议会来管理。这一主张得到其他成员国政府的赞同，但对戴高乐来说是绝不可接受的。他决然挑起“空椅危机”，在1965年下半年禁止其部长出席理事会会议达半年之久，引起了其他起成员国对他可能准备毁灭共同体的担忧。

双方都不愿轻易让步，最后此事件在1966年1月以一项所谓的“卢森堡妥协”了结。法国政府坚持保有在“一个或多个成员国的至关重要的”利益面临危险时的否决权，而其他5个成员国则申明将信守条约在某些问题上以特定多数表决的规定——该规定原本定于是月在一系列事务上生效。对戴高乐来说，关键问题似乎可能是理事会中的否决权而不是议会的作用；而尽管其他国家政府声称坚持多数议决的原则，但事实上戴高乐的立场在此后的20年间占据了上风。因此，卢森堡“否决”应该是比“妥协”更为确切的表述。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中

期，在协商单一市场计划的过程中，多数表决开始施行，现已成为绝大多数立法决议的标准程序。

尽管政府间主义与联邦主义之间存在这些分歧，关税同盟还是于1968年7月在条约规定的日期之前建立。关税同盟的巨大影响不仅见于共同体内部，也反映在共同体的对外关系上。凭借共同对外关税这一手段，共同体正在成为在贸易领域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强国”。肯尼迪总统曾建议就大幅削减关税进行多边谈判。在委员会的巧妙领导下，共同体作出了积极的响应；结果是平均削减关税达三分之一，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共同体从此成为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力量。

共同体政治起起伏伏的同时，法院在确立法治上却稳步发展。基于其负有条约规定的保障“法律得到遵守”的义务，法院通过1963年和1964年的裁决，确立了共同体法优先与直接有效的原则，从而使之能始终如一地在所有成员国中得到贯彻。尽管缺乏对国家主体的严格意义上的强制手段，但建立在条约和共同体机构立法之上的对法律的尊重成为一种黏合剂，将共同体紧密地联结起来。

扩大与某种程度的深化：英国、丹麦与爱尔兰加入

1969年戴高乐总统辞职，由乔治·蓬皮杜接任。作为法国政策基础的民族基要主义，让位于务实的政府间主义。英国、丹麦、爱尔兰和挪威仍然寻求加入共同体，并得到法国的共同体伙伴的支持。而蓬皮杜没有像戴高乐那样否决扩大共同体而是予以同意，但前提是要同时符合法国利益，尤其是同意为共同农业政策出资，以及接受诸如货币联盟与外交政策协作之类的“深化”因素。这些条件除了要满足法国的农业利益，也是为了促进法国的欧洲计划：使德国更加坚定地融入共同体，以及防止共同体因扩大而弱化的危险。

法国的伙伴们支持共同体的扩大与深化。德国新总理、联邦主义者维利·勃兰特，在1969年12月海牙召开的6国政府首脑峰会上起到了

最重要的作用。他虽因其东方政策而闻名，缓和了与苏联集团尤其是与东德的紧张关系，但也推出了一项西方政策，增强了西欧的一体化。在海牙，他在推动扩大共同体的同时，提议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这一提议与法国提出的其他条件一道，原则上获得同意；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加入共同体谈判的同时，共同体内部也在着手推动上述计划的开展。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原则实际上并没有得以实现。法国偏向于联邦的政策手段而不愿实行机构改革，要求建立单一货币；德国则认为，单一货币必须与经济政策的协调、理事会内的多数表决和欧洲议会权力的增强齐头并进。但这些改革对于后戴高乐时代初期的法国而言还难以接受，因此成员国只达成一项汇率合作机制，且该机制脆弱得难以经受当时的国际货币动荡。由于法国坚持外交事务上的主权，为外交政策合作设计的机制[4]与共同体各不相干，且绝对是政府间的。此机制尽管相当有用，但其影响有限。倒是法国农业强硬的经济利益，在一项财政规则中获得了切实的效果；由于英国小而高效的农业与6个成员国的情况不同，该规则对英国大为不利。

共同农业政策的资金问题又一次引发了对欧洲议会的权力问题的讨论。荷兰坚持不懈地要求赋予议会以权力，并得到比利时、德国与意大利的支持。蓬皮杜的反应是原则上接受欧洲议会与理事会共享预算控制权，但尽可能地排斥其对开支的控制，尤其是对农业开支的控制。这一立场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被其他国家接受，写入了1970年的一项修正条约。当后戴高乐主义者吉斯卡尔·德斯坦继蓬皮杜担任总统后，1975年的另一项条约提升了议会的作用。这虽然只是走向议会预算权的第一步，但它将成为共同体体制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尽管农业及与英联邦国家的贸易依然是未决的难题，而且英国公众似乎也不认同，但希思首相与蓬皮杜总统建立了良好关系，并推动加入谈判圆满结束。英国、丹麦和爱尔兰一起于1973年1月加入共同体，但挪威全民公决反对加入。随着愈来愈反对共同体的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哈罗德·威尔逊于1974年取代爱德华·希思成为英国首相，并

决定在1975年就英国是否留在共同体内进行全民公决。经过一场有点装门面性质的“重新谈判”，威尔逊政府建议英国维持其成员国资格，1975年的公民投票也以二比一的多数票通过此建议。但工党的反共同体立场愈演愈烈，在1983年的大选中甚至主张英国退出。与此同时，因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9年出任首相。由于此时法国的后戴高乐主义政府正回归到支持早年的共同体主张，因此撒切尔为坚持政府间主义而不遗余力，与共同体的关系处于极度动荡的状态。她还如她所说的那样，通过抵制共同体的许多事务竭尽全力争取“拿回我们的钱”，直至1984年达成协议将英国对共同体预算的高额净贡献[5]降低。

图6　英国加入：希思签署《加入条约》。

欧洲理事会、议会直选、欧洲货币体系

1974年，蓬皮杜总统故世，吉斯卡尔·德斯坦接任法国总统。虽然德斯坦曾任戴高乐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却并非传统的戴高乐主义者，而且想通过一些措施使他的总统任期成为共同体的发展时期。尽管对联邦主义模棱两可，但他采取行动使共同体机构的政府间与联邦性因素都得以强化。他倡议将首脑会议定期化为国家与政府首脑的“欧洲理事会”，并发起了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

此时，莫内依然十分活跃，组织各成员国民主政党领袖和工会领导人成立“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并担任主席。经与莫内磋商，德斯坦建立欧洲理事会与实行议会直选的建议均被采纳。尽管他似乎是想让理事会采取政府首脑私下交谈的形式，欧洲理事会很快就在共同体决策中扮演了中心角色，调解部长理事会无法解决的冲突，确定重要的一揽子事务。20世纪50年代的条约就已经规定进行议会的直接选举，但需以取得各成员国政府的一致议决为前提；在戴高乐派当权的法国，一致议决迟迟未能达成。现在各国政府同意在1979年6月举行首次议会直选。朝着代议制民主迈出的这一步伐，将对共同体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首次议会直选的那年还见证了迈向货币联盟的重要一步。1977年，前工党政府重要成员罗伊·詹金斯成为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他并非明确的联邦主义者，却支持共同体向联邦方向迈进；在探索“推动欧洲前进”的途径后他得出结论，认为将建立货币联盟重新提上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想法得到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支持，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这能分散美元疲软和马克坚挺所导致的德美关系困难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深受莫内的影响。施密特与德斯坦在1974年接任总理与总统前，就在财长任上建立了密切关系，因此他们很快就对欧洲货币体系（EMS）建议达成一致，以形成一个有力的相互汇率稳定机制，以及一个能执行某些技术功能的欧洲货币单位——埃居（ecu）。[6] 此建议只有英国不予接受——其时工党政府对共同体的敌意正与日俱增。因此，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初创时，它并非共同体的一部分，而是与之平行的；除一个成员国外，其他国家都加入了——这是后来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形：一批成员国一起向前行进，而英

国，有时还有一两个其他国家，则站在一边观望——但通常最终决定参与进去。

单一市场、《欧洲联盟条约草案》、向南扩大

1985年1月，雅克·德洛尔成为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他访问了每个成员国，调查什么重大计划有可能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作为传统的莫内联邦主义者，他提出了3个计划：单一市场、单一货币和体制改革——都可看作是朝着联邦方向发展。但撒切尔的联邦主义观与戴高乐的相近，因此她反感德洛尔所构想的单一货币与体制改革。但同时，作为一名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她认为单一市场是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在艰难的70年代，欧洲经济失去了增长势头，所以所有国家政府都接受单一市场方案，将之看成打破所谓的“欧洲僵化症”的途径。此计划得到了那些更有活力的企业与主要行业协会的支持。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所构想的共同市场，事实上就是一个单一内部市场。条约明确规定了废除关税与配额的计划，并成功地完成任务，但对于消除非关税壁垒所要求的大多数立法，条约规定须在理事会中获得全体一致的表决。卢森堡“妥协”的影响是将这种否决权用另一种名义实施到其他方面，结果是在消除非关税壁垒上长期了无进展；而20世纪7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再度高涨，加上现代经济的日益复杂化，使此类壁垒成为贸易的严重障碍。

图7　德洛尔：单一市场、单一货币、单一思想的欧盟拥护者。

内部贸易关税的成功废除表明，制定带有时间表的计划很有必要。为此，委员会列出了一个约有300项措施的清单，要求在1992年底前付诸实施，以消除非关税壁垒，实现单一市场。负责此计划的委员会委员是撒切尔政府的前大臣科克菲尔德勋爵；计划及时地起草完毕，提交给了1985年6月在米兰召开的欧洲理事会会议。

与此同时，欧洲议会拟定了一项政治计划——在阿尔蒂诺·斯皮内利的推动下起草一项《欧洲联盟条约草案》。作为联邦主义者的领军人物，斯皮内利认为起草宪法是走向联邦的捷径。他从50年代起就不懈地坚持此主张，现在他认为经直接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议员（MEPs）——他是其中一员——有资格承担此任务。他说服欧洲议会其他议员支持此项计划，并领导了起草工作。最后，欧洲议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该草案。

《条约草案》旨在改革共同体机构，使它们具有一种联邦的特

征，并将共同体的权力范围扩大至将联邦通常具有的大多数权力包括在内，但防务这一关键领域除外。条约将在获得代表共同体三分之二以上人口的多数成员国的批准后生效，并规定将与未批准的所有成员国通过谈判达成适当的协议。此草案在大多数创始成员国中得到了普遍的支持，但德国政府却和一些国家一道，反对可能将英国排除在外的情况出现。密特朗总统虽然没有明说，但确实表示赞同草案。该草案的主要提议与委员会的单一市场计划一起被提交给在米兰召开的欧洲理事会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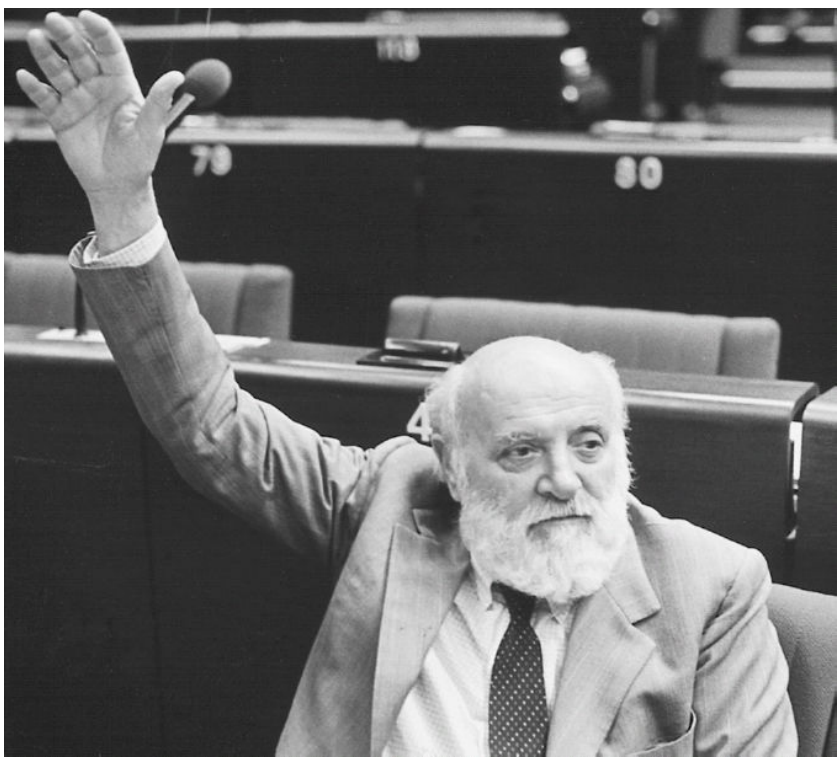

图8　斯皮内利举手赞同其拟定的《欧洲联盟条约草案》。

欧洲理事会不顾英国、丹麦和希腊的反对，首次以多数表决决定就条约修正案召开政府间会议（IGC）。这次政府间会议审议了涉及单一市场计划乃至议会《条约草案》中一些建议的修正案。会议结果

是达成了《单一欧洲法令》，规定在1992年前建成单一市场；赋予共同体在环境保护、技术研究与开发、与就业相关的社会政策、凝聚基金等领域内的权限；还将外交政策合作纳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被冠以《单一欧洲法令》之名，以区别于建议保持外交政策独立的另一项提议。《单一法令》还规定在一系列单一市场立法中实施特定多数表决，并通过一个“合作程序”增强了欧洲议会的权力，使之可以影响有关单一市场的这些立法；法令还引入另一个程序，规定签订联系协定与加入条约需取得议会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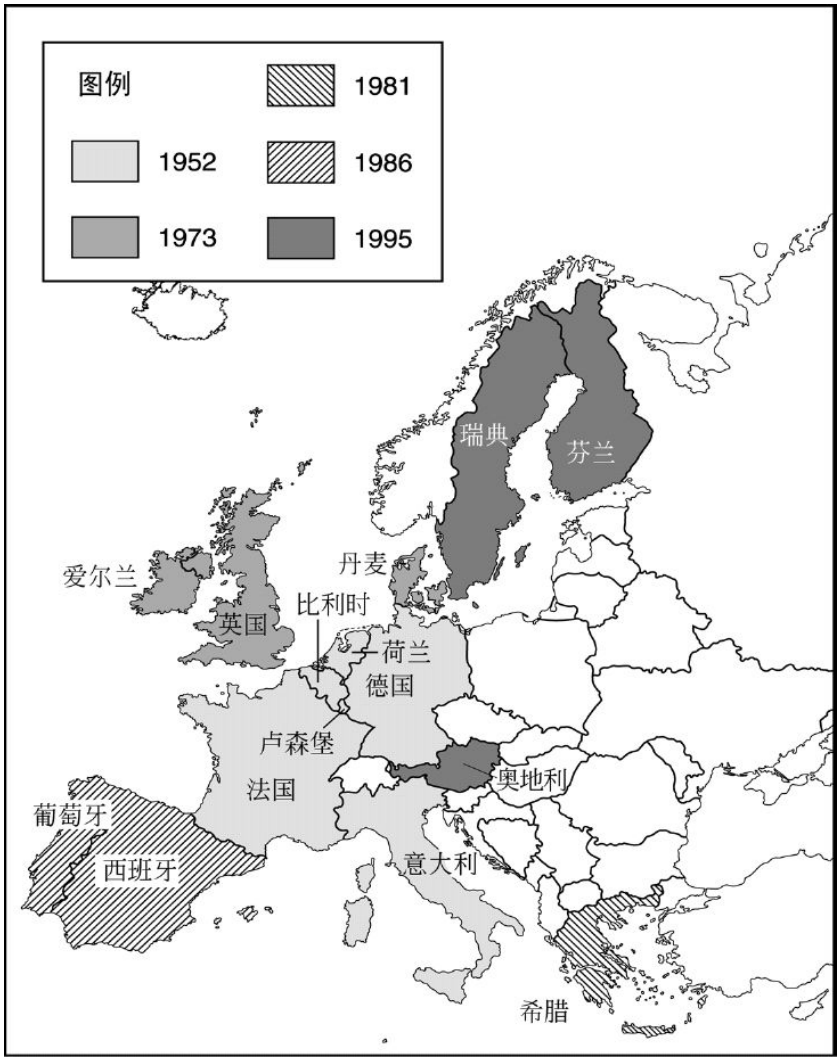

地图1　欧盟的壮大（1952—2000年）。

共同体在80年代再次扩大，于1981年接纳希腊加入，1986年接纳葡萄牙与西班牙加入。这3个国家都曾受独裁政权统治，将加入共同体视为其民主政体和经济现代化的支柱；共同体则希望它们成为自立的成员国，支持单一市场等共同体计划。为此，《单一法令》提出了一项凝聚政策，将结构性基金增加一倍，以支持经济实力较弱地区

的发展。

这样，在成员国政府、经济利益、社会关注、委员会、议会及多种联邦主义势力的共同影响下，《单一法令》强化了共同体的权力及其机构。此后又召开了两次政府间会议，缔结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阿姆斯特丹条约》，同样强化了共同体的权力及其机构，并对类似的各种压力作出了回应。如果不是《单一法令》的成功，这些都不会发生。现在，单一市场的前景有助于经济的复苏，而共同体机构则在处理大量立法方案的过程中增加了实力。

斯皮内利在《单一法令》签署数周后故世。他认为《单一法令》是失败的，用他的话来说，是“一只死耗子”[7]。事实上，《单一法令》促使共同体重新启航，其影响之深远可与《罗马条约》相比肩。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阿姆斯特丹条约》

随着单一市场的成功，德洛尔决心推行单一货币计划。对此，不仅撒切尔反对，为德国马克是共同体最坚挺的货币而自豪的大多数德国人，也显然不甚热情。单一货币是法国的主要目标，这不仅有其政治理由，也有其经济原因。而作为一贯的联邦主义者，科尔相信这是走向联邦欧洲的关键一步，但他在推动筹划单一货币计划的同时，却遇到了在德国取得必要支持的困难。

1989年，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苏联集团的解体使共同体向东扩张成为可能，德国也有望实现统一。但科尔需要密特朗的支持，不仅因为在形式上作为德国的占领国，法国有权否决德国的统一，还因为遵循勃兰特的政策，德国有必要保证新的东方关系不致损害欧洲共同体和法德关系。密特朗将单一货币视为将德国不可动摇地拴在共同体体系内的途径，从而将之作为同意德国统一的条件；而这也为科尔取得国内民众对单一货币计划的必要支持提供了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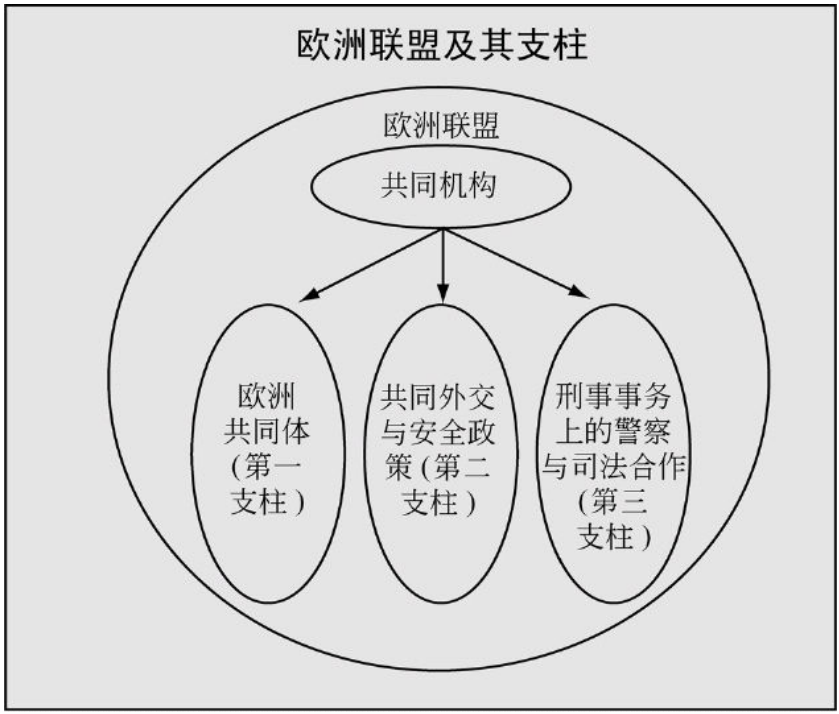

结果，《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得以缔结。该条约不仅对欧元和欧洲中央银行作了规定，也对共同体一系列其他权限及体制改革作了规定。共同体在教育、青年、文化与公共卫生等领域获得了一些权力；共同体机构也在一些方面得到了强化，包括理事会中更多的特定多数表决。欧洲议会的作用也因“共同决策程序”——在一些领域的立法上，必须同时取得欧洲议会与理事会的同意——的引入而得到加强；它还获得了对各届新委员会的任命批准权。《马约》还建立了两个与共同体平行的新“支柱”：一个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另一个涉及自由流动与内部安全，被称为“司法与民政事务合作”，后在《阿姆斯特丹条约》中改称为“刑事事务上的警察与司法合作”。这两个支柱的运作涉及到共同体机构，但其基础是政府间合作。这整个庞大而笨重的结构被称为“欧洲联盟”，包括作为其核心的共同体支柱和两个其他支柱。

尽管约翰·梅杰接任撒切尔夫人为英国首相，并公开宣称要进

入“欧洲的心脏”，但他坚持英国将不参加单一货币计划和事关就业的“社会宪章”。为了保证整个条约的通过，各国同意英国可以选择两者均不参加，丹麦则可不参加单一货币。

《马约》于1992年2月签署，但在1993年11月生效前几经波折：两次丹麦全民公决——第一次被否决，第二次在稍作修改后获得通过；以微弱多数通过的法国全民公决；英国下院令人焦躁的批准过程；德国宪法法院漫长的审议——最终驳回了认为《马约》与德国宪法不符的指控。这些插曲以及大多数成员国公民对欧盟认可度的下降，似乎令人惊恐，对于那些有联邦主义取向的人们而言尤其如此。

然而各国政府中更为激进的联邦主义者，觉得《马约》的力度还不尽如人意。新的货币决策权以及今后进一步的扩大——首先是面向一些为数不多的还未加入的西欧国家，然后是更多的中东欧国家——都要求欧盟更加有效和民主。因此，《马约》规定召开另一次政府间会议，会议成果则是1997年签订、1999年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条约》。

《阿约》重新审议了联盟的一系列权限，包括与两个政府间支柱相关的规定。《阿约》规定在《共同体条约》中加入有关就业的新一章，反映了人们对失业问题的关注：整个90年代，欧盟失业率一直在10%左右；人们担心，如果欧洲中央银行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失业还可能进一步恶化。

在所有的机构中，欧洲议会受益最多：共同议决程序的适用范围被扩大至大多数立法决策；它不仅获得了对整个委员会的任命批准权，还获得了在任命委员会之前对其主席的任命批准权。由于主席的任命一旦获得批准，他就有权同意或否决对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提名，因此议会对委员会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了。在1999年3月委员会辞职及新委员会任命的过程中，议会所起的作用表明了其对执行机构控制权的重要性。《阿约》还使委员会主席对其他委员拥有更大的权力。

在给共同体机构增添这些联邦成分的同时，《阿约》还反映了一种担心，即如果新的发展动辄被一致议决程序所阻断，欧盟将无法面对以后的挑战。这就使得一个新的“增强合作”程序产生，即同意一批

成员国在个别国家不想参加的情况下继续推行某计划——这实际上是将单一货币与社会宪章的情况普遍化了。然而，就在于阿姆斯特丹召开的欧洲理事会会议就《阿约》达成协议的6周前，托尼·布莱尔继工党大选获胜而成为首相。英国新政府接受了社会宪章，毫无异议地同意增加议会权力等改革，显示出对欧盟的更加积极的态度。但英国还是和丹麦、爱尔兰一起，对取消边境控制的规定选择不予施行；它也没有参与向共同体支柱部分移交和司法与民政事务合作相关的权力——但英国政府而后很积极地参与了此方面的合作。至于在外部安全方面，欧盟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的软弱无力，促使人们要求增强防务能力；英国政府不仅同意《阿约》在欧盟防务上的有关规定，还与法国一起在此方面发起行动。

向北和向东扩大；2000年政府间会议

奥地利、芬兰与瑞典于1995年1月加入欧盟。挪威政府经过谈判也达成了加入条约，但再次被全民投票否决。这次，瑞士政府也申请加入，但在1992年公民投票否决加入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一种松散得多的关系形式——之后，撤回了申请。

这一轮扩大几乎没有伴随任何特定的深化措施；这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加入没有产生经济问题。然而，由于不是所有成员国都支持机构的进一步强化，成员国数量的增加促使更具联邦主义取向的国家敦促通过《阿约》加强机构改革，而欧盟进一步扩大的前景加重了这种压力。

摆脱了苏联控制的10个中东欧国家取得了与欧盟的联系国地位，并进而寻求加入欧盟。它们面临着将其经济与政体从集权控制向成员国资格所要求的市场经济与多元民主政体转变的艰巨任务。到1997年，欧盟认为它们中有5个国家已经取得足够的进展，可以在次年开始进行加入谈判；与另5个国家的谈判则于2000年1月开始。第一批国家包括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以及也在申

请之列的塞浦路斯。第二批国家包括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以及马耳他。土耳其也获得了候选国资格，但由于其涉及的经济与政治问题太多，欧盟并没有定下开始谈判的日期。

面临如此大规模的扩大，欧盟深化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某些政策的改革势在必行，尤其是农业政策与结构性基金。委员会为此而提出的建议“2000年日程”被部分采纳，但可能需要有进一步的措施。至于机构改革，在2000年又召开了一次政府间会议。对于需要采取的措施，会上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应该坚持最小程度改革，即仅限于委员会成员名额、理事会投票的加权（为避免因大量较小国可能在今后几年加入而出现决策被小国所左右）、特定多数表决实施范围的扩大等方面；另一派则认为需要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革。这次政府间会议以2000年12月的欧洲理事会结束；我们可以看到，它所达成的《尼斯条约》更接近于最小程度而不是彻底的改革。

注释

【1】 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国家对共同体预算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从中得到的收益。——译注，下同

【2】 “高级机构”的英文原文为High Authority，authority这里意指具有权威的机构。

【3】 英文为复数，包括同时在罗马签订的《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即《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即《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单数的《罗马条约》则专指前者。

【4】 称为“欧洲政治合作”，目标是加强各国间外交政策协调，由外交部长会议操作。

【5】 共同体的预算收入除关税、农业税、增值税等自有财源外，还包括各成员国的“贡献”；这些收入的大部分又通过农业开支、结构性基金等再分配渠道返还各成员国，因此对每个成员国来说，其对共同体预算的贡献与得益是不平衡的。

【6】 詹金斯在其《欧洲日记1977—1981》（伦敦，1989年，第22—23页）中回顾了他选择“推动欧洲前进”这一主题的经过。

【7】 斯皮内利1986年1月16日在欧洲议会的发言中，称《单一法令》为“死耗子”。见皮埃尔·维吉里奥·达斯托里（编）：《阿尔蒂诺·斯皮内利在欧洲议

会的讲演》（博洛尼亚，1987年，第369页）。

第三章

欧盟是如何治理的？

欧盟拥有重要的经济与环境方面的权力，而且在外交政策、防务与内部安全上日趋积极。这种权力是如何行使与约束的？欧盟是如何治理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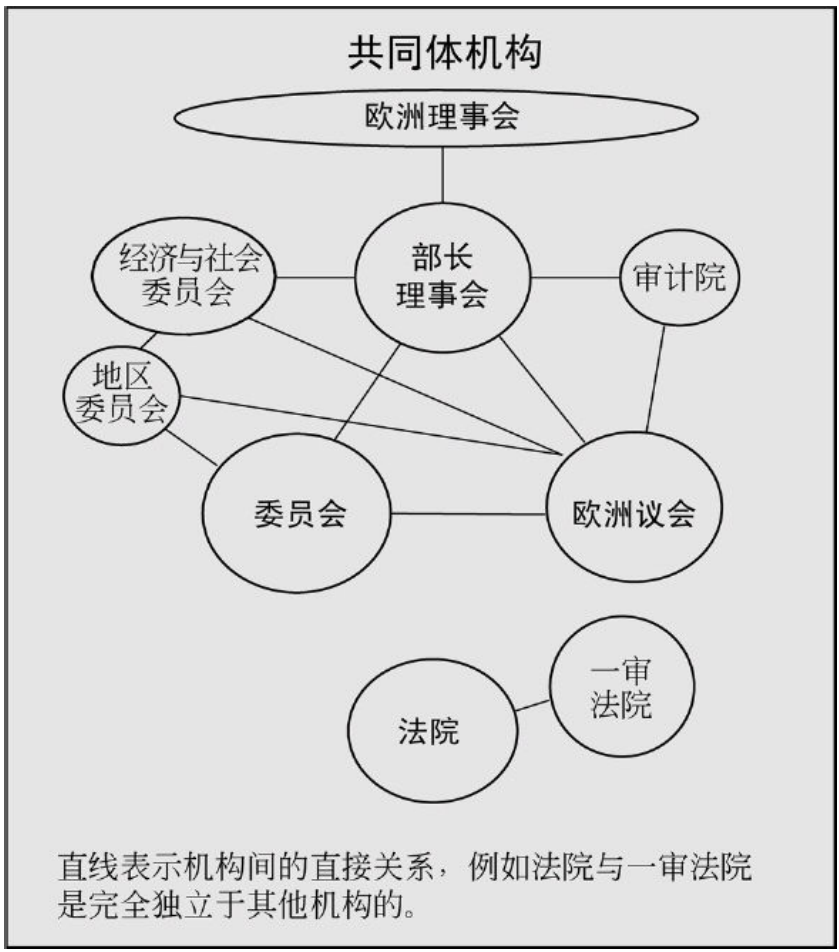

根据许多政府间主义者的观点，这是经由成员国政府间的合作来实现的：其他机构对代表各国政府的理事会起辅助作用，这一事实将不可改变。但联邦主义者认为，尽管理事会仍然是最强势的机构，议会、委员会和法院不仅充分独立于成员国，改变了它们间关系的性质，而且还是使欧盟可能和应该演变成一个联邦政体的过程中的重要

的行为体。

欧洲理事会与理事会

理事会由代表成员国的部长组成，其最高层是由国家或政府首脑与欧盟委员会主席组成的欧洲理事会。国家首脑被包括在内是因为法国与芬兰的总统行使着在其他国家由政府首脑执行的某些职能，所以他们与其总理一起参加欧洲理事会。

欧洲理事会一年会晤三或四次，以作出需要在这一政治级别来议决或推动的决定：有时候是因为部长们无法在理事会内就某些问题作出决议，有时候是因为必须制定涉及诸多问题的某个一揽子计划，例如《马约》或《阿约》。欧洲理事会还必须“确定总的政治指导方针”。无论是为有效处理当前事务，还是为启动新的计划，欧洲理事会的轮值主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图9　1979年的欧洲理事会：朝着不同的方向。

欧洲理事会会议本身的规模不大，只有两位总统（法国与芬兰总统）、1位主席（委员会主席），以及15位政府首脑[1]；陪同他们的有各国外长，有时还包括财长。他们身后跟着大批媒体记者，以截然不同的各种方式，将会议结果传递给各国民众。因此，如果英国报纸的读者认为，1999年12月的赫尔辛基欧洲理事会所讨论的主要是英国与法国间的牛肉争端，以及英国与其他成员国间可能影响到伦敦城金融利益的税务建议争端，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牛肉问题并未列入议程，税收问题也只是稍微讨论了一下。其他国家的许多记者，则大幅报道与另外6个国家开始进行加入谈判的决定，以及建立维和快速反应部队的问题。

每次会议之后都要发布“主席结论”，通常是一份冗长的文件，有时还有众多的附件。当然，国家与政府首脑本身只提出他们的一些决议，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对摆在他们面前的所有问题作透彻的讨论。他们确实发起一些重大计划，例如由英国与法国联合倡议的快速反应部队，但大多数细节以及“政治指导方针”则是由欧盟机构与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办公室提出。

部长理事会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机构。哪些部长参加哪一会议，取决于会议议题。理事会以二十几种方式会晤，包括经济与财政部长理事会（Ecofin）、农业理事会、司法与民政事务理事会，以及卫生、旅游、青年事务理事会等等。还有一个由外长组成的一般事务理事会，负责协调其他理事会的工作，但事实上它很难控制由强势政府部长组成的理事会。部长理事会这一结构的不协调性已引起欧洲理事会的注意，使之在1999年作了个根本算不上彻底改革的决定，即将理事会数目减少至15个以下。每个理事会均由任期半年的轮值主席国的代表主持。

图10　部长理事会：并不亲密的秘密会议。

与欧洲理事会不同，出席理事会会议的人数众多。每个国家都有几名官员陪同部长出席，相关的委员会委员也在场，还包括委员会官员和理事会秘书处成员——秘书处保证了轮值主席交替的连续性，因此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机构。另外不同的是，理事会的工作大部分是立法性的，但有些是执行性的。

理事会的会议程序更像是外交会议中的谈判，而不像一个正常民主立法机构中的辩论。大多数立法会议不对公众开放，但也远非滴水不漏；消息主要是通过各个部长会后向媒体吹风透露出去，因此有时说法迥然不同。

理事会会议与国际谈判的相似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更加明显。那时单一市场计划刚刚启动，特定多数表决（QMV）开始取代全体一致议决成为立法决策的通常程序。尽管条约规定只有委员会提出的立法文本可以成为立法，但一致议决程序给予每位部长以否决权，使之可以迫使委员会按其要求修改提案；而且虽然条约规定在一系列事务上实施特定多数表决，但“卢森堡妥协”所赋予的否决权事实上适用于几乎所有立法中。成员国的常驻代表委员会（Coreper）就委员

会提案预先寻求各国政府的共同立场；考虑到取得全体一致同意的困难性，确实得感谢许多这些官员的奉献，才使共同体得以运转。但被委员会确定为事关普遍利益并获得大多数支持的措施，却常被概括为“一般性事务”，在长期拖延后才得以通过。

这就是为什么单一市场长期进展甚微，直至《单一欧洲法令》改变表决程序。在此之前，单一市场措施的通过速度约是每月1项，只能勉强应付经济的新发展，更不用说在25年内完成整个计划了。但《单一法令》为绝大多数单一市场立法规定了实施特定多数表决，将通过速度提高到约每周1项，使大多数立法在1992年前到位。

在成员国为15国时，特定多数为总计87加权票中的62票。加权取决于国家大小：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各为10票，卢森堡为2票，其他国家在2票和10票之间。由于26票即可阻止一项决议，只要4个最大国中的任何3个反对，法律就无法通过。即将被接纳的十来个新成员国大多数是小国，这使大国担心这种均势将对它们不利。因此《尼斯条约》规定了新的加权数：从2005年1月1日起，加权票从4个最大国的每国29票到卢森堡的4票不等；特定多数为超过237票的70%，只要任何3个最大国反对仍可阻止决议。随着欧盟继续扩大，此情况将维持不变，不过英国、法国与意大利要阻止一项决议还必须取得至少一个小国的支持。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德国取得了一个额外的优势，即特定多数必须至少包括欧盟人口的62%。同时，为了保护较小国，特定多数还必须包括国家的简单多数。

虽然特定多数表决旨在保证大多数国家所希望的法律能被通过，理事会仍然尽力避免置处于少数的一国政府所认为重要的某件事情于不顾。这部分是因为在一个多元化的政体中——就像在瑞士联邦政体中那样——必须谨慎对待少数群体；而这种考虑在欧盟中更有其必要性，因为一个心怀不满的政府，可能会在其他仍需要全体一致议决的事务上采取报复而使工作陷于停顿。另外，这也反映了理事会中盛行的外交文化。这与“卢森堡否决”有所不同，因为前者还是常常付之表决的；但对于处于所谓的“表决阴影”下的议案，部长们更愿意达成妥协，以避免表决得出的结果对他们更为不利。主席在认为问题已获解

决后，常常会提议已达成共识；若无异议，理事会将不经正式投票而通过相关立法文本。

随着特定多数表决在单一市场立法中的实施，“卢森堡否决”开始淡出。特定多数表决成为更大范围事务决策的既定程序，《马约》、《阿约》和《尼斯条约》则将其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展至所有立法的五分之四左右。余下的约五分之一仍需要实行全体一致议决的立法，分属各种不同的情况。英国与一些国家，出于观念形态和辅从性原则的缘故，坚持要对与就业相关的一些社会政策事务实行全体一致议决。而那些反对对有关结构性基金的目标、任务与组织实行特定多数表决的国家，其动机是钱而不是观念。英国还坚持在税收协调上实行全体一致议决，这部分是出于主权考虑。提高欧盟税收收入上限 [2] 的条约修正案，以及加入条约，甚至联系 [3] 条约，都被认为与主权密切相关，必须经各个成员国批准。尽管《尼斯条约》规定在委员会主席与其他委员以及理事会秘书长的提名上，实行特定多数表决，各国依然对其他重要任命保持否决权，例如法院法官与欧洲中央银行执行理事必须由各国政府“共同协议”任命。在其他两个支柱中，如《尼斯条约》第七章与第八章所示，也主要实行全体一致议决。

成员国数量愈多，达成全体一致协议就愈困难。因此在可能继续扩大的背景下，尽管不是要求完全废止全体一致议决，但要求缩小其实施范围——正如《尼斯条约》所规定的那样——的呼声在增加，并成为倾向联邦主义者和反对联邦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之源。同样的争论也发生在理事会的执行功能上。

与大多数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不同，理事会还行使重要的执行功能。尽管按莫内的构想，委员会是共同体的主要执行机构，但条约许可理事会对委员会执行法律的方式方法“施加要求”，甚至规定可由理事会自己来负责执行。理事会安排了大量由成员国官员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来监督委员会的执法，并安排“工作组”来审议委员会的立法议案，整个体系则由常驻代表委员会管理。每个小组委员会专司共同体的某项事务，有时是委员会与各国政府间的有效联系渠道，因为共同体政策的执行事实上大部分是委托成员国政府来完成的。但理事会为

某些小组委员会规定的议事程序，使少数派国家的官员可以阻止委员会的行动，直至问题被提交给理事会讨论，而理事会则可能会批准停止行动。这致使人们抱怨说，这一被讥讽为“小组委员会制度”的体系破坏了共同体的效率。欧洲议会则在其有权进行共同立法之处，最大限度地减少小组委员会的阻力。为防止委员会在特定情况下采取某些行动，小组委员会或许很有必要存在。但总的说来，将执行各项共同体政策这样规模庞大和极其复杂的事务，实际上交由15个或更多政府的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负责，似乎很难令人信服。

欧洲议会

欧洲议会议员（MEPs）由欧盟公民于每5年的6月直接选举产生。现有626名议员，按比例在各成员国间分配，倾向于较小成员国，但倾向程度不及理事会的加权：从德国的99席，法国、意大利与英国的87席，到爱尔兰的15席和卢森堡的6席不等。同样，《尼斯条约》为即将到来的扩大规定了新的议席分配：从2004年6月的议员选举起，总席位不得超过732席[4]。

欧洲议会的政治文化与理事会的截然不同：会议向公众开放；通常以简单多数表决；议员一般按党派而不是按国家投票。1999年6月选出的议员中，四分之三属于主流党团：中间偏右的基督教民主党与保守党（欧洲人民党）占233席，中间偏左的欧洲社会党占180席，欧洲自由党、民主党与改革派党团占51席[5]；其余议员则相当平均地来自较小的左派党团——其中最重要的是绿党——和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右派党团——包括反对欧盟有关狩猎与捕鱼立法的法国“猎人与渔夫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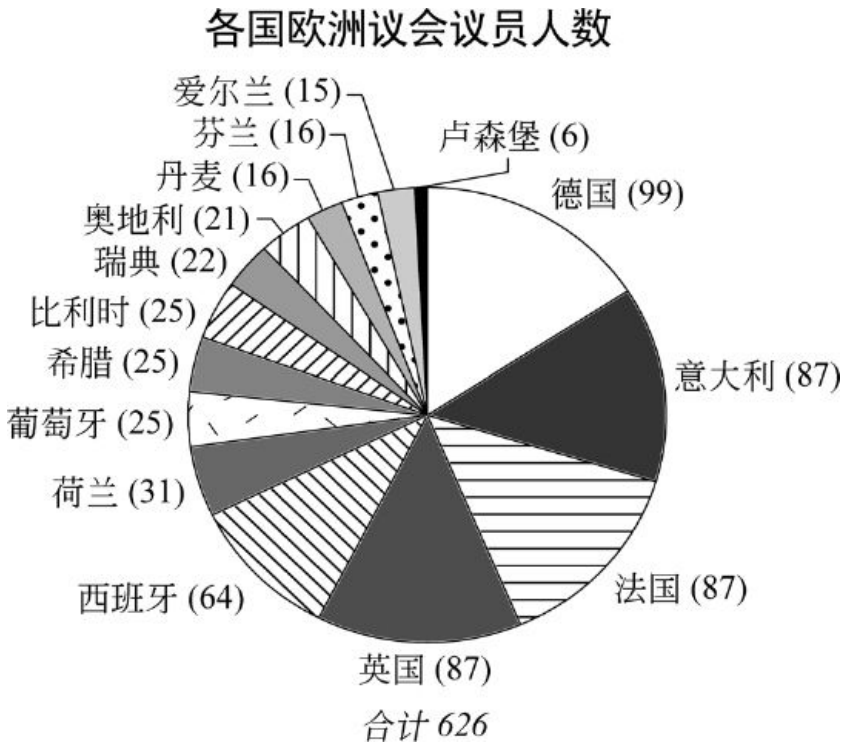

尽管现在还没有就一个统一的选举程序——或用《阿约》中更为客气的说法是“对全体成员国共同适用的原则”——达成协议，所有国家现在都采用比例代表制：有10个国家采用全国选区制，4个国家（比利时、爱尔兰、意大利与英国）以地区为单位，1个国家（德国）两者兼具。迄今，政党间均势的波动主要是英国的“得票最多者当选”制度引起的：由于这一选举制度，保守党的席位由1979年的60席减至1994年的17席，工党的席位则从17席增至62席。英国于1999年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后，波动有所缓和，保守党的席位恢复到36席，工党29席，自由民主党10席（1994年该党得票更多，但只获得2席）[6]。

1999年选举后的议会党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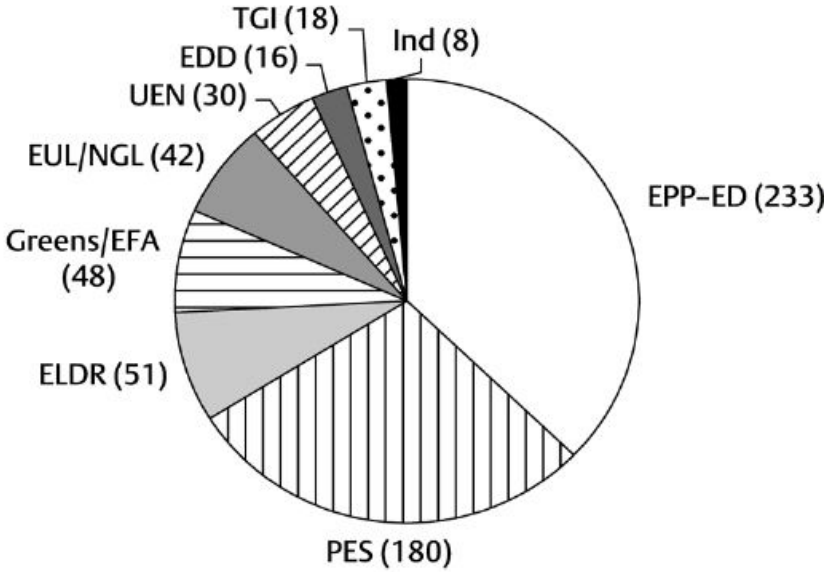

合计 626

EPP-ED:	欧洲人民和民主党党团
PES:	欧洲社会党党团
ELDR:	欧洲自由、民主与改革党党团
Greens/EFA:	绿党和欧洲自由联盟党党团
EUL/NGL:	欧洲左翼联盟和北欧左翼绿党党团
UEN:	民族欧洲联盟党团
EDD:	欧洲民主与多样性党团
TGI:	独立议员技术党团
Ind:	独立人士

因为其他所有国家都实行比例代表制，各主流党派间的均势相当稳定，中间偏右党派与中间偏左党派均不能占多数，因此必须有中间党派间的大联合来保证立法或预算表决上的多数；这对于在日益重要的共同决策程序下修改或否决委员会的措施尤为必要，因为该程序要求314票的绝对多数票。欧洲议会具有完备的小组委员会制度，各个小组委员会负责在相关的联盟活动领域中拟定议会的立场和对委员会成员进行质询；小组委员会也倾向于支持一致议决。但尽管如此，自

1999年选举以来，议员的左派与右派之分更加明显。

尽管议会在行使目前已相当大的立法权与预算权上有不俗的表现，参加投票的选民数量却在逐次下降，从1979年的63.0%减少到1999年的49.4%。这是因为：在成员国内参加投票的选民数量呈普遍下滑的趋势；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欧盟的支持率普遍下降。而另外也可能是因为欧洲议会一直格外受到媒体挑剔的和简直是恶意的（尤其是在英国）指责：主要也怪议员自己不争气，没能在他们的经费控制上建立完备的制度，以及因为各国政府未能达成一致的缘故，议会在布鲁塞尔与斯特拉斯堡各有一座耗资巨大的大厦，议员们在两地之间穿梭往返。而且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在缔结《马约》与《阿约》之后，议会权力有了多么大的增长。

凭借《单一法令》引入的合作程序到后来《马约》推出的共同决策程序，议会从最初纯粹的咨询作用发展出了立法功能，并通过《阿约》将其立法权扩大至覆盖一半以上的立法。早在1989年，议会就已经可以运用合作程序的影响，在更加严格控制小型汽车废气排放等事务上取得成效。有了共同决策程序，议会的权限进一步扩大，包括可以对理事会施加限制，阻止它利用由各国官员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来控制委员会执行共同体政策的趋势进一步扩大。议会还利用其对联系协定等的批准权，制裁土耳其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向共同体出口确保更为有利的条件。

按照公众很难理解的典型的欧盟术语，欧盟预算开支被区分为“强制性开支”与“非强制性开支”两类。前者被晦涩地定义为“由本条约或由根据本条约而通过的法令所必然产生的开支”，而事实上是为了规避议会对农业开支（被法国认为事关重大国家利益）的控制而专门制定的，议会实际上也竭力设法限制这部分预算开支的增长。虽然议会对强制性开支的权力有限，但它在非强制性开支上比理事会更具支配权；随着结构性基金的扩张，非强制性开支现在已占整个开支的一半以上。议会利用其权力的例子之一是在中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后，增加了欧盟对这些国家经济改革的援助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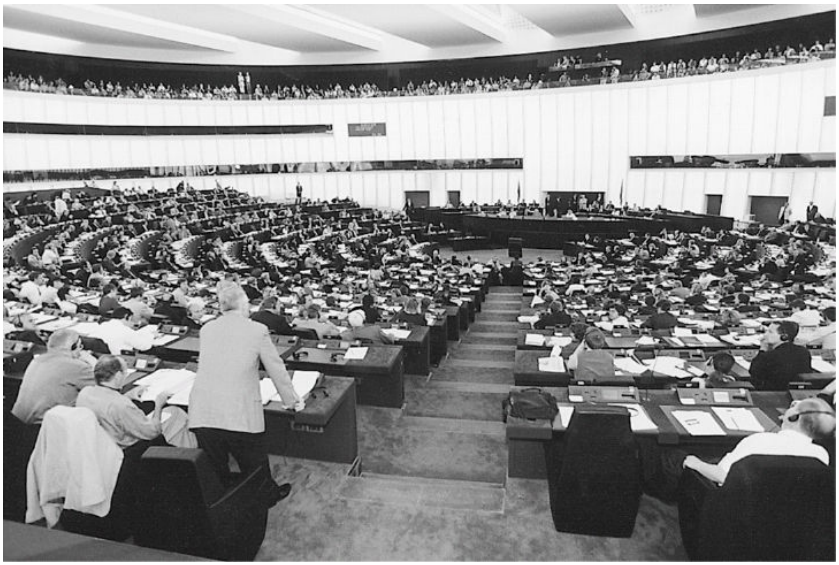

图11　当选议员正在工作：欧洲议会开会。

议会享有部分预算决定权是民主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它最大的作用是监督资金的使用。议会除了有权审查委员会的行政与财务活动外，还行使着“放行”权，即依据审计院报告通过或否决委员会对上一年度预算的执行情况。通常，议会如果不满意，它会不予放行，直至委员会承诺满足其要求。例如，它在1992年拖延放行1990年决算，直至委员会同意分派50名议会工作人员参加一个反欺诈小组。但在1998年，议会在拖延放行1996年决算后仍不满委员会的应答，便任命了一个高级专家小组作更详细的调查。专家们提交了一份有关委员会管理不善和某些腐败情况的令人震惊的报告；预见到议会会行使其解职权[7]，委员会在1999年3月集体辞职。

议会而后又行使了《马约》和《阿约》所赋予的新委员会任命权：它先是充分利用任命委员会主席的权力，在批准各国政府提名的罗马诺·普罗迪为委员会主席前和他进行面谈，以确保他不仅是主席一职的合适人选，而且会如议员们所希望的那样实行改革与制定政策；然后在批准任命整个委员会前，它又与其他委员人选逐一面谈。普罗迪与绝大多数委员会委员接受了议会的主流意见，使得新委员会与新

议会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成功的开端。

议会只在约一半的立法与预算事务上与理事会平分权力，但在限制委员会上它已证明自己要比理事会成功得多。因此可以说，议会是在接近于履行一个联邦众议院通常履行的立法与监督执行机构的功能。理事会则有些像一个参议院，只不过五分之一的立法仍需要全体一致议决，其立法会议不对公众开放，而且它还保留了与其立法功能不相称的执行功能。

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地区委员会

除议会与理事会外，共同体还有两个咨询机构：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cosoc）和地区委员会。在条约明确规定的某些事务上，委员会与理事会必须与之商议；在其他任何事务上，委员会、理事会或议会可以与之商议；它们还可以主动地发表“意见”。二者均有222名委员，由各国提名，由理事会任命。《尼斯条约》规定，当欧盟成员国扩大至27国时，委员可增加到最多344名。

经社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了广泛的经济与社会利益，而地区委员会的委员则是地区与地方机构的代表。二者公布的报告相当有价值，但并不总是那么有影响。但随着德国各州在共同体事务中已经发挥影响，以及地区代表在其他成员国的力量不断增长（苏格兰议会与威尔士议会是其典型），地区委员会很可能会在将来取得更大的影响。

欧盟委员会

尽管今天的委员会还不是莫内所构想的联邦执行机构，但因为拥有“立法动议”权以及执行共同体政策和作为“条约监察者”的功能，它已远远超越了一个国际组织的秘书处。

经社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中各国的代表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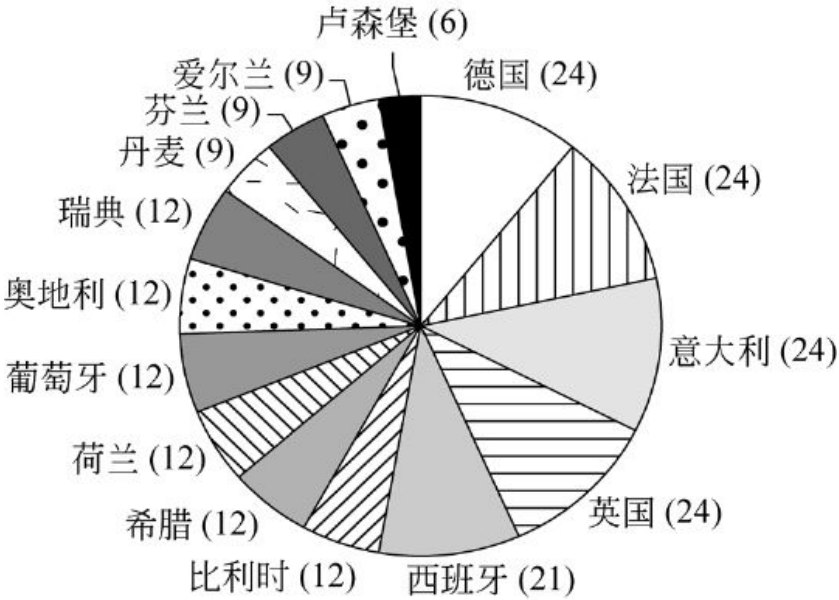

两个委员会各 222 名代表

《罗马条约》赋予委员会以立法动议专权，即向议会与理事会提交立法提案的专权。与由成员国政府来提出立法相比，这样更能保证法律以共同体及其公民的普遍利益为基础；同时这也保证了共同体立法方案更具连贯性，而这不是功能繁杂的成员国政府或理事会所能做到的。掌握了这一权力的委员会在早年常被称为“共同体的发动机”。委员会的权力在20世纪60年代受戴高乐的猛力打压而被削弱，权力的天平向理事会及1974年成立的欧洲理事会倾斜。但委员会依然有其关键性作用：既要提出具体措施供理事会与议会议决，又要提出综合性的一揽子政策建议并经由轮值主席使建议在欧洲理事会通过。后者的突出例子是欧洲理事会在1992年英国主席任期内通过的德洛尔一揽子预算改革计划，以及在1999年德国主席任期内通过的、为筹备东扩而对共同体政策进行改革的“2000年日程”。因此，委员会依然可以是欧盟发展的发动机。

委员会还被称为“监察者”，因为它必须保证共同体条约与法律得到施行，尤其是在成员国中得到施行。一旦掌握了成员国违背法规的证据，它就必须向有关国家提交“合理的意见”；如果后者未作应对，委员会可以将其诉诸法院。1999年，当法国政府拒绝接受共同体关于英国牛肉已可安全食用并应许可进口的决定时，委员会就这样做了。由于工作积压，法院可能要两年以后才能作出裁决；但一旦裁决法国存在过错，法院可以对它处以适当罚款。委员会还负责共同体法律与政策的施行，不过很大一部分是委托成员国政府或其他机构执行的。

为了保证委员会为共同体的普遍利益而工作，条约规定它必须“毋容置疑地”独立于任何外部利益；委员会委员在就任时必须就此作出“庄严承诺”。委员会现有20名委员，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英国各有2名，其他较小的国家各有1名。[8] 尽管条约规定委员会委员由各国政府“共同协议”任命，但以往一直是由各国政府自行任命并被其他国家接受。但现在，委员会集体任命在得到议会批准前，还需取得委员会新任主席的同意。这样，委员会委员的选择要经受新的影响。

和理事会与议会一样，即将到来的欧盟的扩大使得人们担心委员会规模愈大，工作效率愈低。为此，《尼斯条约》规定从2005年起每个成员国限提名1名委员。但进一步减少委员数量的提议受到较小国家（如爱尔兰）的坚决反对。它们的理由是：虽然委员会委员不是被委派来代表本国利益，而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的，但委员们如果对不同国家的国情与政治文化没有足够的了解，他们就无法为此利益服务。将对各国的了解运用于工作中和促进各国利益之间或许存在细微的差别，但改变委员会委员数量需要就修改条约取得一致同意，因此当时只就在相当遥远的未来欧盟扩大为27国时应该做的事达成了协议：《尼斯条约》规定届时将作出决定，将委员会委员的人数限制在27名之下。

将委员会委员的人数减到少于1国1名并非是保证效率的唯一途径。政府的最上层，如英国内阁，通常有20多名成员，有时甚至超过30名，但它还是能运转，因为首相有权指挥其他成员。《阿约》使委

员会朝着这个方向推进了一些，使其主席有权和各国政府共同参与其他委员的提名，并对其他委员行使“政治指导”以及分派与调整他们的职责；《尼斯条约》则不仅授权主席分派和调整其他委员的职责，还授权他任命副主席，以及“在取得委员会的集体同意后”将某位委员免职。

图12　1999年新委员会的首次会议：普罗迪主席畅怀一笑。

在条约术语中，“委员会”意指其20名委员 [9] ，但它平时还用来泛指委员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但不管是指20名委员还是指16,000名工作人员，一般不会令人混淆；而且尽管有些随意的说法称它为臃肿的官僚机构，但它所雇用的人员数量要少于许多地方政府。

鉴于特定多数表决现在适用于大部分立法，独有的立法动议权使委员会在立法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理事会可以修改委员会的提案文本，但必须取得全体一致同意；这对委员会有利而非不利：尽管委员会通常倾向于照顾各国政府的愿望，但它可以借此在它认为重要的事务上更好地抵制各国政府的压力。

委员会很好地行使了它的立法职能，但它的执行效能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很大一部分指责是不公平的，因为事实上执行权是委托给

成员国的。这本是一个不错的原则，在德国的联邦体制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由州政府负责执行联邦的绝大多数政策。但德国联邦政府有权保证州政府执行不怠，而成员国却倾向于抵制委员会的监督。问题的出路当然不是给布鲁塞尔以更多直接的执行权，但应该有足够的委员会工作人员来进行监督，而且委员会应该能更有力地保证共同体立法在各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委员会在执行竞争政策等方面有上佳的表现，在这些领域内它有权自行其是，而且尽管缺乏人手却干得不错。然而在缺乏称职人员的情况下被要求进行的开支计划管理中，或是由于其本身工作的失误，或是由于受雇的咨询人员的失误，出现了严重的缺陷，得出的结果有时很糟糕，有些甚至是虚假不实的。此类缺陷以及由于管理不当和缺乏财务责任感而引起的问题等，受到了导致委员会1999年辞职和要求新委员会进行彻底行政改革的那份报告的批评。

罗马诺·普罗迪和负责此项改革的委员会副主席尼尔·金诺克所面临的，是成立40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一个体制，这个体制一直受到各国政府要求任命其本国公民担任某些特定的高级职务的压力，以及雇用人员工会抵制变革的压力。普罗迪和金诺克提议的改革包括：改变聘用、培训、提升与惩戒程序；在委员会内新设一个审计小组，以保证资金的正当使用；成立一个“机构间小组委员会”来监督委员会、理事会与议会内的行为标准。

普罗迪显示了足够的勇气提出，委员会是一个欧洲政府。但“欧洲政府”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呢？在共同体的权限范围内，它的立法动议权使之像是一个政府，甚至因其独享此权利而超越了政府。但在特定多数表决而非简单多数表决适用的场合，尤其是在全体一致议决程序适用的场合，它对立法动议权的行使受到理事会的限制。然而，在这一方面，委员会与政府的差别与英国相比要大些，与那些实行联合政府协商一致的国家相比则要小些。委员会的执行功能则受到理事会与“小组委员会制度”的限制；除此之外，它在原则上与德国联邦政府差别不大，不过事实上德国政府在强制州政府恰如其分地执行政策上拥有更为有效的手段。实际上，委员会与政府的一个

关键性区别，在于前者并不掌握任何强制执行的具体手段。此外，它在整个外交政策中只扮演一种次要的角色，在防务上则几乎全无作用。不过，除了这些差别，委员会与政府也有重要的相似之处。

法院

法治是欧共体成功的一个关键。在其权限范围内，法律体制而非相对的权力日益制御着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制衡着欧盟公民。这确立了“法律的确定性”并被企业界人士所赞赏，因为它大大减少了交易的风险。政治上，它有助于创造一种使成员国之间的战争不可想象的全新的环境气氛。

共同体法制的最高层是法院，条约要求它保障由条约本身以及各机构依据条约而制定的立法所构成的“法律”“得到遵守”。

每个成员国各有1名法院法官，他们由成员国共同协议任命，任期6年，具有“毋庸置疑的”独立性。法院本身裁决那些诸如关系到共同体法令合法性的案件，以及委员会对一成员国或一成员国对另一成员国提起的、关于不履行条约义务的诉讼。但绝大多数涉及共同体法的案件是由个人或公司对其他法人或政府提起的诉讼；此类案件由成员国的法院审理，只有当成员国法院要求共同体法院就某个法律要点作出解释时，才提交到共同体法院。

图13　法治：法院开庭。

法院最重大的裁决是在20世纪60年代作出的。当时法院决心如条约所要求的那样，保证法律得到遵守。首先是根据共同体法的至高无上性，必须保证共同体法在所有成员国得到相同的执行；因为如果与共同体法相背的国家法律凌驾于共同体法之上，则共同体法将逐渐土崩瓦解。其次是根据共同体法的直接适用性，规定个人可以根据条约直接向成员国法院要求他们的权利。然后法院在1979年就第荣卡悉案的裁决，确立了在被认定为可接受的前题下“相互认可”成员国产品安全标准的原则，大大减少了在共同体一级制定具体规则的需要，从而为单一市场计划奠定了里程碑。1985年，法院要求理事会履行其条约义务，通过自1968年以来一直搁置的共同运输政策；理事会及时照做了。

迄今法院已作出5,000来项裁决，而送审案件之多使之很难不延期两年再作出裁决。为帮助解决此问题，建立了一个“一审法院”，审理几乎所有由个人或法人提出的、主要是和竞争政策相关以及和共同体机构与其雇员之间争端相关的案件。但这只是缓解了而并没有扭转待审案件不断增多的形势。

诉讼当事人可以就法律要点对一审法院的裁决向法院提起上诉（此即所谓“一审”），但对法院的裁决不能再上诉，因为法院是共同体权限内事务的最高司法当局。不过裁决的执行却有赖成员国的执法机构。由于绝大多数根据共同体法作出的裁决是由各国自己的法院作出的，这就形成了后者执行共同体法的习惯性做法。因此，即便有时成员国在服从与之不利的裁决上有诸多拖延，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拒绝执行法院本身所作裁决的情况。

法院的司法权几乎完全局限于共同体权限的范围之内，以及和警察与司法合作这一“支柱”相关的某些事务。然而在此范围内，除去几乎完全要依靠成员国来执法这一情况，共同体的司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联邦特征。

辅从性和灵活性

1988年在布鲁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撒切尔夫人引起了人们对“于布鲁塞尔推行新统治的欧洲超级国家”的强烈恐惧【10】；向“中央集权超级国家”的“滑坡”，成了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最喜欢引用的比喻。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对于将在德国联邦体制下属州政府主管的事务划归至欧盟权限范围的建议，德国各州政府也心存猜疑。事实上，许多联邦主义者觉得“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的条约目标过于抽象，他们大都支持以“辅从性”原则为指导，确定什么是欧盟该做的，什么是它不该做的。该原则同时具有加尔文主义和天主教的渊源，要求职能范围较大的机构只行使那些职能范围较小的机构所不能行使的职能。根据此原则，条约要求共同体“只有在并仅限于所拟行动的目标非成员国所能充分实现”，以及（目标）“因其规模或影响而由共同体实现为好”的场合，才采取行动。

《罗马条约》含蓄地认可了此原则。它区分了两类共同体法令：对所有成员国“具有完整约束力”的“条例”，以及只就“所要取得的结果”具有约束力、而将“方式与方法”留待各国自己选择的“指令”。但这

只是此原则很有限的应用，有时“指令”规定得十分具体，都没给各国留下多少余地。为此，《马约》对辅从性原则作了界定，《阿约》则制定了旨在保证此原则得到共同体机构贯彻的具体程序。有些联邦主义者觉得这还不足以防范过度的中央集权，建议条约应列出那些保留给成员国的权限。特别是由于德国的强烈要求，欧洲理事会在尼斯会议上决定于2004年召开另一次政府间会议，会议议程之一便是澄清欧盟与成员国间的权力分工问题。

对于究竟在哪些领域应该实施一体化，当然存在不同意见。这种分歧对《马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英国决定不参加社会宪章与单一货币计划，以及丹麦决定不参加单一货币计划与共同防务计划。鉴于条约只能经全体一致同意才能修改，如果要将那些条款写入条约，其他国家政府就不得不接受英国与丹麦的退出。这使得人们对“灵活性”观念越来越感兴趣：让那些希望在一特定领域加深一体化的国家，能在共同体机构内继续推行其计划，或者换句话说，让少数国家选择不参加。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规避英国或丹麦的否决权，因为此两国强烈抵制进一步一体化。虽说1997年工党大选胜利后英国的政策有所变化，其他国家依然担心，大多数其他国家所认为的为准备向东扩大而必需的改革，会遭到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反对；同时人们还担心有些新成员国会不愿意或不能继续进一步一体化，或甚至无法有效地应对现有的一体化。

灵活性的概念在《阿约》中以“增强合作”的名义出现。联邦主义者偏好这个概念，因为它暗示着一批国家间更深程度的一体化；而欧洲怀疑论者则将灵活性看成是削弱整个共同体间纽带的途径。《阿约》规定，包括任何需取得全体一致同意的场合，如果一系列的条件得到满足，便可在共同体内实行“增强合作”；而《尼斯条约》则规定如能取得特定多数同意，8个或8个以上的国家就可实行这种合作。

公民

《马约》首次提出了欧盟公民权利的概念，规定所有成员国的公民同时即欧盟的公民；《阿约》进一步提出，此两种公民形态是相辅相成的。《马约》规定了一些新的公民权利，例如：在符合某些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在整个欧盟内自由迁移和居住的权利；在其他成员国中参加地方和欧盟（不包括国家）选举和进行竞选的权利。这些是在条约已经保障的特定权利上新增加的；已经得到条约保障的权利包括：在共同体权限范围内，保护成员国公民不因国籍而受歧视；在有关就业等事务上，实行男女同等待遇。条约还要求欧盟机构如《欧洲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所保障的那样，尊重基本权利。

在《阿约》缔结之前，还没有任何条约规定要求在成员国本国之内尊重基本权利。然而尊重这些权利的国家的公民，如果认为欧盟某个机构中有来自不尊重这些权利的国家的代表，则很难接受该机构制定的法律。而几个新民主国家不久将入盟的前景，促使成员国政府采取行动以防止这种可能性。为此，《阿约》申明，欧盟“建立在自由、民主、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和法治等系成员国所共同尊重的原则之上”；它进而规定，一旦某成员国出现“严重和持续破坏”这些原则的情况，该国可以被剥夺条约规定的某些权利，包括表决权。

人们希望欧盟能采取更多措施以获得民众的支持。为此，在2000年政府间会议召开的同时，欧洲议会议员、成员国议会议员和政府代表召开了一个大会，起草了一份《基本权利宪章》。而一个主要问题是：声称这些权利受到侵犯的人们，是否可以诉诸法院？欧洲理事会尼斯会议对该宪章表示“欢迎”，但并没有将它纳入条约。

除了基本权利的问题，由于政府间因素与联邦因素间关系错综复杂，欧盟的管理体制使得决策困难，并使欧盟机构与公民间难以建立和谐的关系。然而，除非公民能在支持其本国政府的同时，也能对欧盟充分支持，各国选民可能会是一种导致欧盟瓦解的离心力。将来成员国扩大到20余国——可能最终有30余国——将使困难加剧。尽管2000年政府间会议达成的改革应该有所帮助，但除非有进一步的改革，否则，人们将对欧盟机构能否充分有效和民主地带领扩大的欧盟走向成功并获得公民的支持深表怀疑。

注释

【1】 这是在欧盟15国的情况下，扩大为27国后，数量相应增多。

【2】 欧盟预算收入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从各成员国增值税收入中提取的一定百分比，而这百分比的限额的改变需要以条约修正案的方式通过。

【3】 “联系”（association）在这里为一特定用语，指欧盟与非成员国通过协定或条约建立的一种特殊关系，在有些场合，它还是加入欧盟的过渡形式。

【4】 随着欧盟扩大为27国，欧洲议会议席已突破732席的限额，增加至785席，从德国的99席，法、意、英的78席，至爱沙尼亚、塞浦路斯、卢森堡的6席和马耳他的5席不等。

【5】 目前欧洲议会中，三大主流党团在785个议席中占的议席分别是278席、216席和104席。

【6】 按照英国的选举制度，议席分配到选区，实行得票最多的党的候选人当选的制度，因此就全国而论，各党的得票与席位并不成比例。

【7】 根据《欧共体条约》第201条，议会可以以超过议员人数半数以上的三分之二投票数，通过谴责案，迫使委员会集体辞职。

【8】 现为27名，即每个成员国1名。

【9】 现为27名。

【10】 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与欧洲：首相1988年9月20日在布鲁日的讲演》（伦敦：保守党政治中心，1988年，第4页）中谈到了“一个欧洲超级国家”。

第四章

单一市场、单一货币

尽管成员国间的和平共处仍然是共同体的核心目标，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5年开始，建立一个广阔的共同市场成为其行动的重心。美国经济的强大，就是这样一个市场成功的突出例子。德国人与荷兰人希望实现自由贸易；如果能同时建立有利于其出口的农业共同市场，法国人也愿意接受工业共同市场。

一个大的共同市场的理念在而后数十年中不断发展，因为它反映了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不断增长的现实。随着科学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规模经济的发展，愈来愈多各种规模的企业要求占有大而稳定的市场；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消费者的利益考虑，市场规模也必须大得足以为那些甚至是最大的企业提供竞争余地。因此，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废除关税为核心的最初的关税同盟计划，在80年代被单一市场计划所取代，并进而在90年代被单一货币计划所取代。

这3项计划各有其经济与政治动机：发挥经济合理性的好处，强化共同体制度以巩固成员国间的和平关系。这些计划的实施与结果也涉及经济与政治，这是因为，现代经济的一体化需要一个法律体制，从而需要共同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而且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领域，它们单方面的成功都不足以使共同体持续发展，两方面的成功都不可或缺，而关税同盟与单一市场在这两方面都做到了。经济与政治动机的结合也保证了单一货币的顺利启动，尽管目前还不是所有成员国都已参与进来。

单一市场

在20世纪50年代，关税与配额仍然是贸易的主要障碍。那时，在美国主导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推动下，开始了降低关税与配额的国际化进程。但共同体成员国希望更进一步，因此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税同盟，从而废除了相互贸易的关税与配额壁垒，并确立

了共同的对外关税。

关税同盟、竞争政策

成员国间的关税与贸易配额在1958至1968年间被逐步取消。产业界作出了积极的响应，跨国贸易迅速增长，在10年间翻了一番以上。

虽然关税与配额是贸易的主要障碍，但它们并非仅有的障碍。共同体还被授权禁止私营经济部门限制性的做法与滥用优势地位。条约将此任务交付委员会，规定它可不受成员国政府的干扰；1989年，委员会还被授权限制足以威胁到共同体内企业竞争的兼并与收购。拥有了这些权力，委员会采取了诸多行动来阻止反竞争的行为。1992年，委员会对大众汽车公司罚款1.02亿埃居 [1] （后来经上诉至一审法院，减至9,000万欧元），因为该公司不许其在意大利的经销商向外国人——绝大多数来自大众汽车价格高得多的德国与奥地利——出售其汽车。由于工作量太大，委员会最近在寻求将某些职责交还成员国的竞争管理当局。但企业团体力求阻止此举，因为它们觉得有委员会这个“综合服务站”更为方便。

1986年与1996年一些欧盟国家对制造业的国家补贴（*占GDP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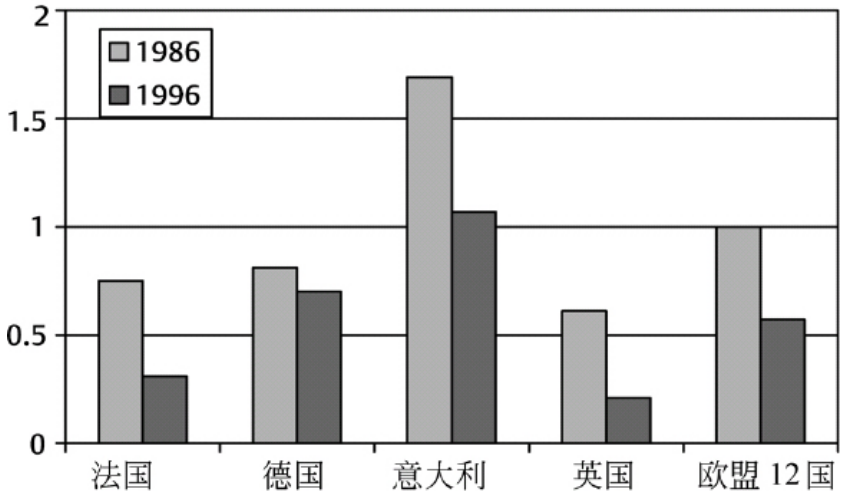

注： 1996年欧盟15国的数字为0.54%

不公平竞争的另一种形式是成员国政府向某个公司或某个行业发放补贴（按欧盟术语是“国家援助”），用以削弱主要竞争者的实力，动摇它们的优势地位。委员会被授权禁止此类补贴，然而限制政府比限制企业更为困难。委员会曾成功地对百般不愿的政府强制执行了某些困难的决定，但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其权力被戴高乐削弱和经历经济严重衰退后，委员会很难控制补贴发放愈演愈烈的势头。

除补贴以外，非关税壁垒也在那些年蔓延滋生，成为成员国间贸易的主要障碍。这一方面是因为科技进步造成各国规则复杂且不同，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那些饱受普遍“滞胀”之苦的国家大力要求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那时欧洲经济确实境况困难，“欧洲僵化症”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情境。人们希望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委员会与重要的企业团体使各国政府相信，需要推行一项计划，以建成共同体内部市场。

1992年前建成单一市场的计划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消除内部关税获得了成功，一些企业界领袖

与委员会委员就消除非关税壁垒计划作了构想。1985年，德洛尔成为委员会主席时，他认定单一市场计划将是所有成员国政府都愿意支持的唯一的重大新计划：大多数成员国政府是因为此计划的经济利益，以及在经历了20年停滞后“重新启动共同体”这一政治目标而支持单一市场，而撒切尔夫人看中的则只是经济的自由化。不过她帮了共同体一个大忙，提名曾在其内阁中任贸易大臣并以才干著称的科克菲尔德勋爵为委员会委员，与德洛尔一起筹备此计划。

1985年6月，德洛尔与科克菲尔德将此计划提交欧洲理事会。如果说60年代消除关税的计划可以在条约中以按百分比削减的方式来加以确定，那么消除非关税壁垒则必须有一项庞大的共同体立法规划。边界上的过境手续，以及因为标准与法令、因为公共采购和因为间接税中的不正常现象而造成的歧视，凡此种种都得予以解决。委员会发表了一份白皮书，明确规定需要制定约300项措施，并提出了在8年内完成此计划的时间表。计划得到了欧洲理事会的批准，并将在1992年底前完成此计划作为规定写入了《单一欧洲法令》。

《罗马条约》中禁止与进口配额“具有同等作用的一切措施”，其实已包含消除非关税壁垒的目标。因为全体一致议决的做法有碍立法进程，《单一法令》规定，对完成此计划所需的绝大多数措施，实行特定多数表决。委员会还通过发展相互认可原则——法院经由第荣卡悉案裁决确立的一个原则——以及将许多有关细节的决定权委托给已有的标准机构，减轻了立法负担。尽管如此，单一市场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使贸易自由化的立法计划之一。

此计划获得了非凡的成功；20世纪80年代后5年成为共同体的经济复兴时期。尽管人们无法肯定其中多少应归功于单一市场计划，但经济学研究认为它至少起了部分作用。通过使人们对企业预期树立信心和刺激贸易，加之由跨国合并浪潮诱发的结构改革，此计划肯定对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工业欠发达的国家，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当时的爱尔兰，担心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会给它们带来损害，经过努力将结构性基金翻了一番，以帮助它们进行调整；在结构

性基金与共同体经济扩张的支持下，这些国家从单一市场计划中也得益甚多。

非关税壁垒

在共同体建立时，主要的贸易壁垒是关税与配额。《罗马条约》规定要在成员国间贸易中将之废除。该条约还禁止“具有同等作用的措施”，即通常被称为“非关税壁垒”（NTBs）的其他障碍——它们可能并非专门用于限制贸易，但实际上会具有这种作用。这些壁垒包括不同国家对商品与服务的各不相同的标准或规定、对商品与人员的边境控制、一些歧视性间接税、公共采购当局与国营企业的民族偏好等。该条约还规定控制政府对企业或个别行业的补贴，以防止对其他国家更具竞争力的企业构成不公平竞争。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复杂化，非关税壁垒激增；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中，政府将这些壁垒和补贴作为贸易保护措施。这促成了通过大量的立法来解决非关税壁垒问题，从而建成单一市场的计划。虽然在有些行业非关税壁垒尚未完全消除，此计划的绝大部分已如期在1992年底前完成。

政治上，单一市场深得从联邦主义者到欧洲怀疑论者的各个派别的嘉许。正如条约中有关辅从性原则条款所说的那样，它堪称一个范例：其目标“因规模的缘故……由共同体来实现为好”。此计划的立法体制为厂商保障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并向消费者保证了厂商间合理的竞争。委员会、理事会和议会，也因其硕果——包括大量如术语所表述的“共同体法律”——巩固了它们的地位；法院的作用也因此而加强了。

单一市场计划已基本完成，但仍有一些重大的欠缺之处。大多数成员国在消除公共采购中的歧视上进展缓慢；在2000年，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领域，包括空运、电力、电讯与金融服务等，仍然存在某些歧

视性法规。但尽管法国依然不愿为完成空运和电力单一市场确定日程，欧洲理事会在2000年3月同意，分别在2001年年底前与2005年前完全开放电讯市场与金融服务业。而金融服务业在1992年计划进程中已实现了重要的自由化，包括走向单一货币的关键性环节——资本的自由流通。

单一货币

货币联盟要求各种货币可以在成员国间跨国界自由流通，并废除它们间的汇率变动。单一市场计划实现了第一个要求，而汇率机制则为第二个要求奠定了基础。

汇率机制与货币稳定

汇率机制（ERM）[2] 是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建立货币联盟的尝试失败后于1979年建立起来的，它要求各国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使它们的汇率波动保持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到80年代末，它通过以德国联邦银行为基础，在保持货币稳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国在开始时再次游离于外，却在1990年加入进去。但是由于英国汇率水平过高，而且缺乏上个10年的合作经验，1992年9月的货币大波动迫使英镑在被称为“黑色星期三”的那个日子退出汇率机制；货币一体化也因此而成为许多英国政客不堪回首的话题。

汇率机制对其他成员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尝到了汇率稳定的甜头，大多数政治家和商业机构都赞成单一货币，连工会亦大多如此。有了汇率机制，汇率兑换的成本将可省去，而这笔费用估计每年达130亿至190亿埃居，对个人与小企业是格外沉重的负担。不过汇率机制给经济带来的主要好处在于消除汇率波动的较长期风险：它将绝然地消除汇率风险，不仅是贸易方面的汇率风险，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跨国投资方面，以及那些有赖于能毫无风险地进入整个欧盟市场的企业的汇率风险；而这两方面对欧盟经济的活力有着愈来愈重要的作

用。

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支持单一货币计划，反映了它们对共同体的长期立场。法国对这一计划最为支持，因为法国不仅对汇率的稳定有着传统偏好，更渴望分享欧洲中央银行控制权，以部分收回事实上由德国联邦银行行使的货币自主权。另外，法国早就希望让欧洲有能力挑战美元的世界霸权。同时在1990年，单一货币已成为法国将德国控制在统一的欧洲的政治计划中的最重要一环，是法国对德国统一作出反应的迫切需要。除了丹麦与英国，其他成员国都认可单一货币的政治与经济需要。不过对德国人来说，尽管为取得法国认可其统一而接受单一货币的政治动机是决定性的，但对于用一种尚未得到验证的货币来取代已十分强硬和稳定的马克，他们仍有保留意见。

德国联邦银行在保障货币稳定上的成功显示了德国货币方案的优点，因此其他国家政府同意接受德国模式的货币联盟。而对放弃马克存有疑虑的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他们还仍然坚持认为单有货币联盟还不够，还需要有“经济联盟”来制定有益于货币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目标

《马约》在规定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Emu）的同时，还确立了欧洲中央银行（ECB）如同德国联邦银行那样是完全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与各国的中央银行一起，组成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欧央行的6位执行理事与其他央行行长，组成欧央行[3]的行长理事会。欧央行体系中的这些银行以及它们决策机构中的所有成员，均不得接受任何其他机构的指示。虽然欧央行体系的“首要目标”是“维持价格的稳定”，在服从此首要要求的情况下，它还应支持共同体的“总体经济政策”。欧央行拥有授权发行纸币和批准成员国造币厂铸币数量的全权。为满足德国的偏好，单一货币被命名为“欧元”，而非听来像法语的“埃居”。

为了确保只有那些达到货币稳定的国家才能加入欧元区，条约制定了5项“趋同标准”，涉及通胀率、利率、预算赤字上限、公共债务

总额上限，以及汇率稳定性。例如，预算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被限制在GDP的60%，除非它正在“充分下降”并“以令人满意的速度”接近60%的限度。只有达到这些标准的国家才被许可参加，而且也确定了阶段与时间表，以保证至少有最少数量的国家有时间来达到这些标准。未达标的国家获得“豁免”，直至达标；而英国与丹麦通过谈判获准可选择不参加，直到它们愿意参加为止。

在第一阶段，所有国家都得接受汇率机制——英国曾短暂地加入，但很快就被市场调节作用驱赶出来。在第二阶段，这些国家得在实现趋同标准上取得足够进展。第三阶段从1999年1月开始，将确定参加国货币的“最终固定汇率”，从而在2002年前实行单一货币。在毋需使用纸币或硬币之处，可使用欧元进行结算，并且欧元将在2002年完全取代参加国的货币。

参加国家与不参加国家

在制定趋同标准时，人们曾料想除英国与丹麦外的13个没有选择退出的成员国中，大约有六七个国家会在1999年前达标。结果，大多数国家参加欧元区的决心是如此之大，达标的竟有11个国家：不仅包括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意大利也在普罗迪总理的领导下达标。意大利是所有成员国中最赞同联邦主义的，担心被排斥在如此重要的一个发展之外促使从政者们都相应行动起来，以适应新情况。希腊是不得不接受“豁免”的唯一国家，但它也决心达标，并在2001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英国和瑞典政府仍然准备将参加与否的问题付之全民公决，而丹麦则在2000年9月的全民公决中以53%对47%拒绝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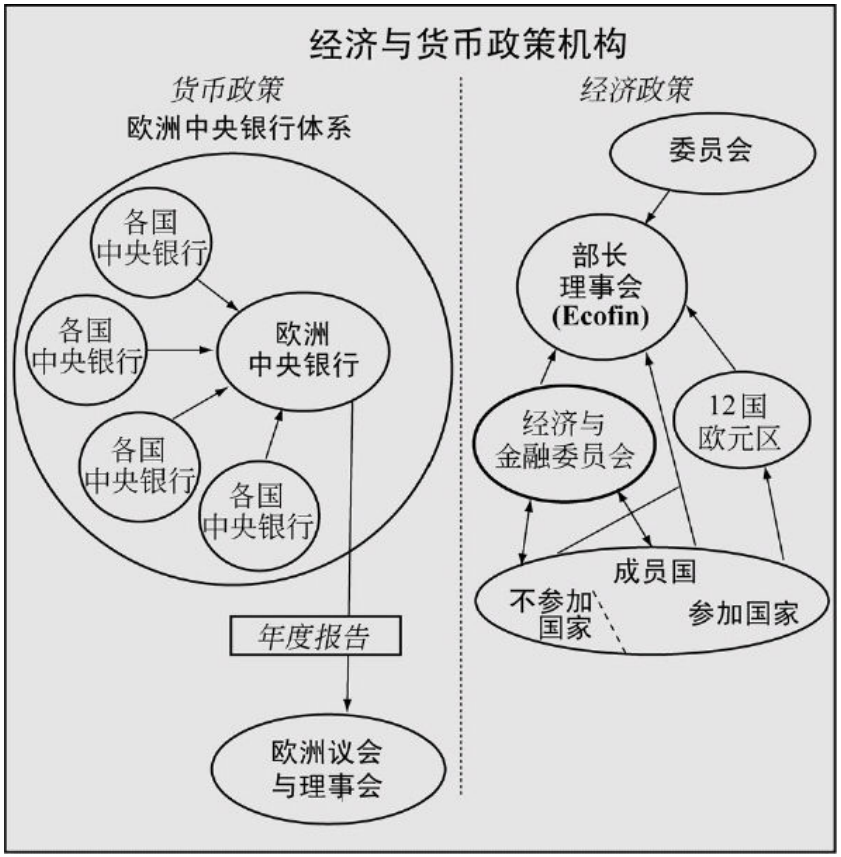
经济与货币政策机构
货币政策
欧洲中央银行体系
各国
中央银行
各国
中央银行
欧洲
中央银行
各国
中央银行
各国
中央银行
年度报告
欧洲议会
与理事会
经济政策
委员会
部长
理事会
(Ecofin)
经济与
金融委员会
12国
欧元区
成员国
不参加
国家
参加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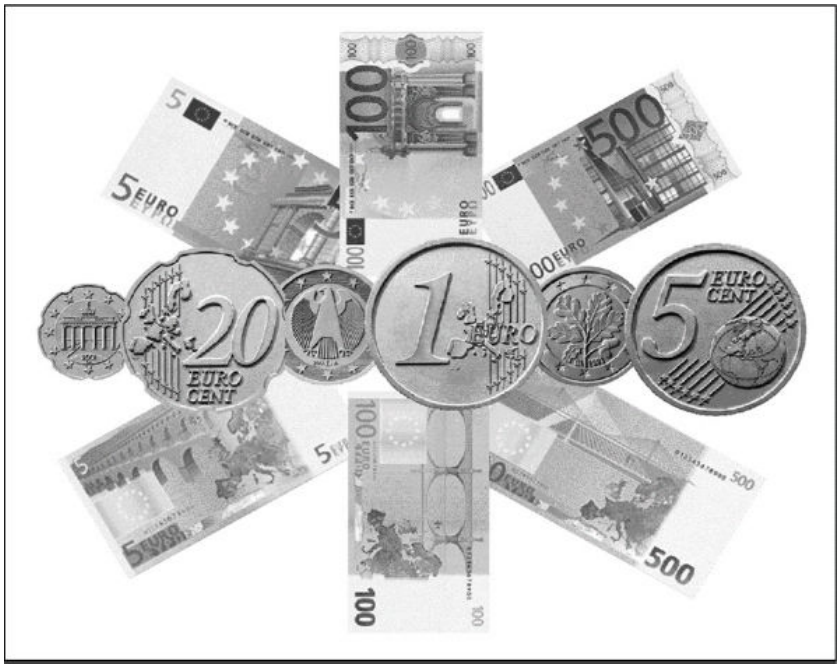

图14　欧元：纸币与硬币。

在英国，加入问题曾引起了激烈的政治冲突。撒切尔夫人在下议院大呼“不……不……不！”，充分表达了她的情感。她的继任者约翰·梅杰在马斯特里赫特通过谈判选择不参加，而3个主要政党都承诺，要以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申请加入欧元区。虽然一些最资深的保守党人决心“在经济条件成熟时”加入，保守党却愈来愈持反对态度；自1997年以来担任反对党领袖的威廉·黑格，更是推行在下届议会任期内（大选最迟将在2002年5月举行，但可能会提前至2001年举行）保守党政府将不会寻求加入欧元区的政策。

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欧元也有颇多怀疑。工党新政府在原则上赞同加入，但要满足它的5项条件。其中3项是对英国投资、对金融服务业与伦敦城，以及对经济增长、稳定与就业的预期影响。第四项是成员国经济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不用调节汇率即可作出必要的调整，从而使经济与货币联盟获得成功。第五项是英国经济周期与欧元区经济周期实现趋同。《金融时报》将前4项条件称为“论说题”，即

只要愿意，政府便可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周期趋同”更具实质意义：为了避免对英国经济造成冲击，英国的利率必须十分接近欧元区的利率；英镑则应以可接受的汇率兑换欧元。

布朗5要点

1999年1月欧元启动后的英国政府声明：

“《马约》许可英国选择是否和何时加入单一货币。本政府已确定，英国经济尚未作好在1999年1月1日加入的准备。但如果它符合国家经济利益，本政府支持加入单一货币的原则，但预计不会在本届议会任期内实现。然而，本政府正作出必要的准备，以期我们可以选择在下届议会任期（不迟于2002年春季开始）初期加入单一货币。如果政府决定英国加入，英国人民将在全民公决中拥有最终发言权。”

政府将如何决定呢？

英国没有在1999年1月1日加入经济与货币联盟。未来某个时候加入单一货币的任何政府决定，将基于国家的经济利益。政府将审视下述问题：

- 加入经济与货币联盟是否会为企业在英国投资的长期决策创造更好的条件？
- 采用单一货币会给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 商业周期与经济结构是否相容，使我们与欧洲其他国家可以在欧元利率固定化基础上和谐相处？
- 如果发生困难，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
- 加入经济与货币联盟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更高增长、稳定以及

就业的持续增长？

英国工业联合会与大多数较大型企业支持政府政策；英国工会联盟因担心被排除在欧元区外会对就业产生影响而希望尽快加入；大多数媒体则反对加入。不同主张的双方都发起了宣传运动。研究表明，由于将近60％的英国商品出口至其他成员国，有300万个以上的职位靠这部分贸易提供。因此亲欧元组织“英国在欧洲”有理由说，如果英国不采用欧元，这些职位的前景就不会那么好了，有些甚至会面临失去的危险。在英国的投资，特别是外国企业的“对内投资”将失去信心。英国在欧盟的影响会下降；反欧元的主张会使英国陷入退出欧盟的危险境地，给就业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反对加入欧元区的运动“企业支持英镑”，则宣称它支持单一市场，但不支持单一货币。它称欧元区“一个尺码适合全体”的货币政策，不适合英国并会带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理由是英国的经济结构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差别太大。许多反对者将1999年欧元对美元汇率的下跌，看成是欧元存在根本性缺陷的证据。他们还批评欧央行的独立性是不负责任，并认为经济与货币联盟是朝着“中央集权超级大国”迈出的一步。这些观点大多涉及经济与货币联盟对所有成员国造成的普遍问题的某些特定方面。

经济与货币联盟所引起的问题

欧元诞生后，有4个重大问题需要处理：对欧盟及一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影响、对外货币关系、欧央行所负之责、政治影响。

有关经济与货币联盟对欧元区的宏观经济影响的争论，涉及的是防止通货膨胀和防止通货紧缩之间的经典二分法。正如在确定趋同标准时那样，德国马克的强硬和声誉保证了将防止通货膨胀纳入整个体系中。除了确立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外，《马约》要求继续执行两个限制，即各国预算赤字不超过GDP的3％和公共债务不超过GDP的60％。这些规定的好处是公认的；尽管英国与丹麦选择不加入欧元区，它们也同意这些规定应在所有成员国中实施。用辅从性原则

来解释，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一个国家的通胀行为，会通过影响其他国家经济而对别国产生“外部影响”；另一方面，为填补赤字而过度举债有抬升整个欧盟利率之虞。

除了英国、荷兰与奥地利，各成员国失业率在10%左右居高不下已有多年，同时经济增长率一直缓慢。因此，要求平衡反通胀政策与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行动的呼声在高涨。这个呼声得到了在《阿约》最后谈判前上台的英国与法国的中间偏左政府的支持，因此《阿约》包含了有关就业的新章节，同时达成了一项《稳定与增长公约》。德国的中间偏右政府仍在主政，它坚持该《稳定与增长公约》应在反通胀上毫不动摇，规定在经济上扬时期预算赤字应该减少至零，对不能达到赤字与债务标准的政府可予以罚款。公约还对促进就业的行动作了规定，但主要是通过“规范”成员国措施的进展、而不是共同体本身的立法来行动。

不久，格哈德·施罗德取代赫尔穆特·科尔成为总理。在奥斯卡·拉方丹担任财政部长一小段时间后，德国新政府并没有终止其历来对价格稳定的热衷，但它开始倾向于更能刺激经济扩张的政策。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维姆·德伊森贝赫是个强硬的反通胀主义者，他被要求将欧央行利率下调至他认为合适的程度以下；不过他反过来与委员会一起，要求各国政府通过削减赤字从而降低对资本市场的货币需求，来取得预期结果。虽然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持有争论，但在拉方丹离职后并没有严重的分歧。

经济学家对有关可能出现的问题的讨论，许多涉及“不对称性冲击”的可能性，即单一货币对一些成员国可能产生各不相同的影响。较可取的应对方式是提供贷款，让这些国家有时间进行调整；为此，有人建议设立一个用于此目的的特别基金。就像在建立单一市场时那样，为了应对较强与较弱经济体间的较长期不对称性，共同体再次增加了结构性基金的预算，并设立了一项凝聚基金，用于支持跨欧洲运输基础设施与环境保护项目。

《稳定与增长公约》

欧洲理事会1997年阿姆斯特丹会议不仅就新条约达成一致，还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以加强成员国公共部门财政赤字政策的相互协调。其中期目标是：预算“接近平衡或有盈余”。对赤字超过3%的上限而没能纠正的国家，除非它是由自然灾害造成，或由于经济衰退而引起实际GDP下降超过0.75%，否则可以对之进行惩罚。其目的是避免一个或多个成员国由于财政管理不严，将通货膨胀与货币不稳定转嫁至整个欧盟。

如果理事会认定一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超过了3%的上限，并且不能以上述理由豁免，理事会可以建议该国最好应如何应对赤字。如果该国未能在1年内消除预算赤字，该公约“敦促”理事会要求它交付一笔无息储备金；如果两年后它仍未纠正过度赤字，该储备金将转为罚款。

同时，《阿约》还希望通过有关就业的新章节，缓解人们对失业问题的担忧（参见第288页加框文字）。

在英国，辩论则主要集中于成员国间在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灵活度上的不对称性，而这种灵活性被认为是在失去了汇率手段后的一种必需的调整手段。因此，成员国的这种充分的灵活性被列为英国政府决定是否参加欧元区的五条件之一，理由是成员国若不具备这种灵活性，欧元就不可能成功。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在80年代清除了这方面的许多顽疾。不过法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德国的出口业绩仍然可观，与其他成员国一样，它们也开始进行结构改革。它们的经济状况似乎不大可能坏到无法应付调整问题。

人们还关注欧元区内经济周期的差异。适合于平均水平的利率，对那些通胀压力高于或低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并不是最适合的；这一负面因素不利于保证所有成员国都从经济与货币联盟受益。不过认为英国经济周期应该紧跟美国、从而在结构上与欧元区平均水平保持差异的建议，并不符合下述事实：英国有将近60%的商品出口至欧盟，而

出口至美国的只有13%；同时，跨英吉利海峡的投资也一直在迅速增长。而且经济周期并非自然力量，以适度趋同为目标的政府政策是有可能对之施加影响的。

有人认为，1999—2000年欧元对美元走弱反映了欧洲经济的根本性结构弱点。但美元与欧洲货币间的这种汇率波动，在早先年也常有发生。市场形势将会改变，各国央行将会决定增加欧元持有量作为其储备货币，从而使欧元朝反方向运动。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创建一种如欧洲的汇率机制那样能够减少这种波动的国际机制？正如共同对外关税使共同体能够参与贸易自由化谈判，欧元的存在应使欧盟有机会在与美国平等的条件下，通过谈判建立这样的机制。不过，尽管在欧元内部管理上具有强有力的机构，执行对外货币政策的组织却比较薄弱。欧元使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可能，而如果欧盟支持者准备这样做的话，他们必须共同行动。

由于应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德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都是前所未有的经历，于是出现了欧央行所负之责的问题。条约要求欧央行每年向共同体机构提交年度报告，行长必须亲自向理事会和议会陈述该报告，行长与欧央行理事会其他成员必须出席议会的有关小组委员会会议。此制度与美国的类似，不同的是多年来美国国会的联合经济政策小组委员会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拥有巨额预算来为国会作出必要的经济分析和提供建议。欧洲议会的财政小组委员会显然也应该朝此方向发展。

这就带来了经济与货币联盟会对欧盟权限与机构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常有人说，意义深远的税收协调将必须跟进。但辅从性原则规定成员国可自行选择它们自己的税收制度，除非这种制度对其他成员国具有“外部影响”。为此，作为单一市场计划的组成部分，并得到当时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同意，对增值税与特种消费税 [4] 规定了最低税率，以防止因某国采取过低税率而引起不公平竞争。经济与货币联盟进一步对会影响资本市场竞争的税收作出类似规定。但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协调税收的必要。倒是有必要设立一项基金，用于对付偶尔发生的由严重不对称性引发的冲击；同时很有必要改革机构，以使欧盟

能执行有效的对外货币政策。但总的说来，欧盟已经拥有单一市场、单一货币，以及联邦体制下经济政策的主要手段——预算，它并不需要太多了。

另一个说法是经济与货币联盟将必然向联邦国家发展。但联邦国家必须拥有军权，而这并不会随欧元的采用而实现。防务一体化的理由不同，将在后面讨论。至于强化机构和使之更加民主化，则不管有没有单一货币，都是值得一做的；而且考虑到欧盟扩大的前景，为使欧盟能够满足其公民的要求和避免解体的危险，它们都将是必不可少的。欧元增强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但远非这种改革的主要理由；即将到来的欧盟扩大才是紧要得多的问题。

注释

【1】 埃居（欧洲货币单位）系欧元的前身，欧元的币值就是在埃居基础上确定的。埃居符号为€。——原注

【2】 汇率机制是1979年建立的欧洲货币体系（EMS）的组成部分。该体系以篮子货币“埃居”为核心，各成员国货币对之建立相对固定的汇率并确定可波动的范围，当其货币的市场汇率超出此范围时，该国中央银行有义务进行干预，使之回复到波动范围内，此即所谓的汇率机制。

【3】 应该是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行长理事会。

【4】 指对烟、酒、燃料等消费品征得税收。

第五章

农业、地区、预算：得失的冲突

单一市场是个增量博弈。由于它提高了经济生产率，不管是通过增加消费量的形式还是减少工作量的形式，对绝大多数人都有好处。不过在大多数人获益的同时，总有一部分人因为开放市场竞争而吃亏，或者至少他们害怕会吃亏，他们可能会要求得到补偿才肯同意参加新的计划。这种补偿通常会对共同体预算产生影响；即便补偿与竞争综合起来对双方均有利，但看来总像是个零和博弈，造成付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冲突。第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将农业纳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共同市场。

农业

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之时，开放工业品贸易共同体市场是项相对简单的事务，只涉及分阶段废除关税和配额的问题。但对于创建一个农业共同市场，取消关税与配额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以一些复杂的方式管理它们的农业，例如以补贴和价格支持来保障农民获得适当收入和保证食品供应的安全等。因此，要取代各成员国的农业市场，农业共同市场对共同体而言必然是复杂而难于管理的。如果只限于工业共同市场，事情会简单一些；但由于害怕德国工业的竞争前景，具有农业竞争优势的法国坚持共同体市场也必须对农业开放。

高价格与撒切尔的“把钱要回来”

后来制定了一项共同农业政策，通过对从共同体外进口的农产品征收可变税以及以支持价格收购和储存剩余农产品，将主要农产品价格维持在由农业部长理事会决定的支持价格上。农民的收入由消费者支付的高价来支持，而由高价造成的农产品剩余则由共同体纳税人来补贴。

由于共同体的6个创始国实行类似的制度，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高价习以为常。但从19世纪起就倡导自由贸易的英国人则习

惯于低价食品，他们从美国和英联邦国家大量进口农产品，并对英国农民支付补贴，以将其农产品价格维持在世界低水平。英国加入共同体后实施的共同农业政策（CAP）使其食品价格随之上涨；在使消费者不满的同时，高食品价格还是英国与共同体预算发生摩擦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共同体价格和英国从海外大量进口的食品的世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作为农产品进口税收纳入了共同体预算收入，而预算的大部分开支被用于补贴欧洲大陆国家的农民，分给规模不大的英国农业部门的只有相对很少的一部分。随着过渡期的结束，英国对共同体预算的净贡献预计将上升至其国民收入的0.75%左右。因此，英国在加入谈判时与其他成员国达成协议：一旦出现“不可接受的情况”，应寻求“公平的解决办法”来处理问题。

但1979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首相时，并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她艰苦奋战了将近5年，以抵制共同体许多其他事务的方式试图“把我们的钱要回来”。1984年，出头的日子终于到来：“黄油山”与“葡萄酒湖”等存货积累太多，其耗费之巨使共同体不得不提高从税收中提取收入的限额，而这需要所有成员国的全体一致同意。于是达成了交易，大家同意提高共同体从税收中提取预算收入的限额，并答应每年给英国相当于其对共同体预算净贡献三分之二左右的返回款。同时决定采取措施改革共同农业政策，不过那只是很有限的措施，因为人们关注的是给予英国的返回款和共同体的税收提取。

改革的阶段

共同农业政策继续蹒跚而行，囤聚着更多耗费巨大的剩余产品，直至1988年，预算再次告罄。这次，成员国的财政利益居先了。由于理事会各部门是按职能划分的，确定农产品价格的农业部长理事会决定了很大一部分共同体开支，对此财政部长理事会没有什么发言权。而由此造成的农业开支得由共同体的税收来支付，因此农业部长们事实上决定着公民向共同体缴纳的税率。建立财政控制已刻不容缓，欧洲理事会在1988年通过了德洛尔提出的一揽子措施，推出了一项“财政远景规划”，对1988至1992年这5年间共同体的主要开支项目作了

限制；其中，农业开支的增长不得超过整个开支增长的四分之三。

尽管这部分缓解了预算上的冲突，共同农业政策仍然需要进行重要改革。到1992年，负责农业的委员会委员是爱尔兰一位前部长雷·麦克谢里。他迎难而上并智胜反对派利益团体，将对牛肉的支持价格削减了15%，对谷物的支持价格削减了近三分之一。农业开支水平并没有下降，因为这些开支转而对农民提供了收入补贴，包括对休耕耕地予以补贴。但这些措施消除了共同农业政策的扩张动力，并为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共同农业政策开支在预算中的份额 (1970—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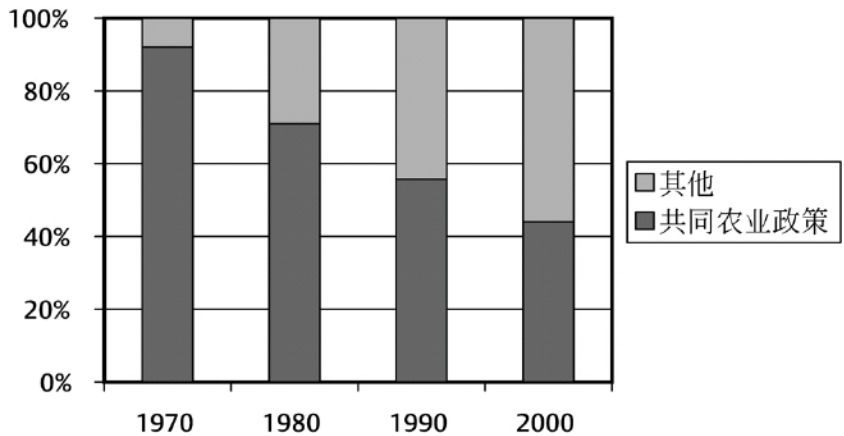

共同农业政策的费用仍然是共同体的一个沉重负担：一半的预算被用来补贴雇用劳动人口不到5%的一个行业，而且大部分是用来补贴少数较大和较富裕的农场主。另外，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东扩的临近，欧盟将面对的前景是：如果继续执行欧盟的现行价格，庞大的农业人口可能产生农产品的巨量过剩。同时，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首轮谈判将讨论限制农业出口补贴；如果欧盟要想在一个世界自由贸易体制中促进本身的利益，它必须也要遵守WTO的协议。为此，委员会的白皮书“2000年日程”中所列的为欧盟扩大作准备的措施中，就包括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的建议。然而1999年3月柏林欧洲理事会会议就“2000年日程”进行议决时，希拉克总统竭尽全力反对

某些农产品价格削减建议；而为了避免损害法德关系的风险，施罗德总理设法让大家同意了少削减一些。虽说将谷物价格削减15%和在3年内将牛肉价格削减20%的幅度已经相当大，耗费巨大的乳制品管理体制却并没有被重视。欧盟仍需要进行新一轮的价格削减。

共同农业政策改革长期不到位，曾引起成员国间就成本收益分配的激烈争吵，而且这种状况还得持续一些年份。英国最初的关切反映了消费者、纳税人和提供必要出口市场的国际贸易伙伴的利益，而现在也变成了欧盟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但是英国人尤其是撒切尔夫人，总是出于本国利益来表述其理由；如果他们早些更加努力地让他们的伙伴认识到英国人的利益也是大多数欧洲人的利益，这个过程也许不会是那么痛苦而漫长了。

凝聚和结构性基金

“凝聚政策”是共同体预算的另一项巨大开支，它的经历比共同农业政策愉快。由于一些经济较弱的成员国担心会在共同体内的自由竞争中受损，在关税同盟、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建立后，共同体决定提供资金来帮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它们能参与这些新事业并成为成功的伙伴：这就是“凝聚”的含义。

意大利与英国：社会基金与地区发展基金

这方面的最早的规定，是关于应意大利要求而写进《罗马条约》的社会基金。意大利经济是当时6个创始国中最弱的，意大利人担心会因贸易自由化而受损，希望设立一项基金来帮助其劳动力进行调整。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尽管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

建立欧洲地区开发基金（ERDF）的动机有些不同。1973年英国加入共同体时，它的经济状况已经落后于6个创始国，而且还可能因为共同农业政策而对共同体预算作巨额净贡献。英国存在地区发展问题并有较多的地区面临经济困难，而其他国家也有经济困难地区。通

过谈判使英国加入共同体的爱德华·希思政府有一个很好的主张，认为一项地区援助基金既可以照顾共同体的普遍利益，还对英国有着特殊作用：不仅可以援助其地区发展，还可以减少其对共同体预算的净贡献。尽管此基金在英国加入后不久就建立起来，但那时它还少得可怜，产生不了多大影响，这部分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困难时期，对于开销的协议更难达成一致；部分是因为德国作为共同体预算主要贡献者对进一步加大贡献越来越抵触；还有部分是因为大选选出的工党政府并不热衷于地区发展。

“结构性基金”这一称呼在于强调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资金的再分配，更是为了改善共同体经济较弱部分的经济状况。构成结构性基金第三部分的是欧洲农业保证与指导基金（EAGGF）的“指导部分”。该基金的保证部分用于向价格补贴提供资金，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旨在帮助农民进行结构改革的指导部分。这3个结构性基金尽管最初规模很小，但都得到稳定的增长，并足以满足20世纪80年代共同体一次重大发展——向南扩大——的要求。

向南扩大与结构性基金

当西班牙、葡萄牙与希腊加入共同体时，它们的平均收入远低于除爱尔兰外的其他成员国。爱尔兰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突飞猛进前，与该3国处于类似水平。由西班牙牵头的这4个国家，要求大幅增加结构性基金。它们的要求引起德洛尔的立时回应。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即将加入之际，他正设法让政府间会议（该会议产生了《单一欧洲法令》）通过其单一市场计划。他十分热衷于社会公正的思想；同时，尽管各国政府对此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很显然这4个心怀不满的国家可能会对单一市场立法的通过带来麻烦。为此，《单一欧洲法令》包含了一项关于“经济与社会凝聚”的条款；德洛尔建议在1988—1992年财政远景规划中将结构性基金的预算翻一番，欧洲理事会接受了此建议。

在决定开始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时，出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这4个国家要求将结构性基金作类似的增加。这次，德洛尔做到了在

1993—1999年的拨款中增加五分之二；同时，《马约》规定建立一项“凝聚基金”，以支持在环境保护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项目。到2000年，结构性基金的预算达到320亿欧元。

结构性基金与目标

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共同体围绕一组基金和目标来制定其地区政策，但在1999年进行了改革。

结构性基金目前包括：

- 欧洲地区开发基金（ERDF）——主要基金，最近的年度预算约为130亿欧元；
- 欧洲社会基金（ESF）——用于工人再培训，每年75亿欧元；
- 欧洲农业保证与指导基金（EAGGF）的指导部分——用于农村地区的结构改革，每年40亿欧元；
- 渔业指导财政手段（FIFG）；
- 凝聚基金——用于较贫困成员国，由《马约》所创立，用于发展环境保护与基础设施项目，每年约30亿欧元。

开支集中于**3**个关键目标：

- 人均GDP低于欧盟平均值75％的地区——三分之二的资金用于此目标，涉及欧盟人口的20％；
- 经历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地区，或面临结构性问题的地区（如煤矿地区或造船地区），约有欧盟人口的18％从中获益；
- 不限定专门地区，支持教育、培训与就业政策的改革与现代化。

旨在通过增加结构性基金予以援助的4个国家，大都表现不俗。葡萄牙的经济增长超过了欧盟的平均值，爱尔兰更是如此，西班牙也很成功，希腊在经过若干年的经济衰退后也在2000年达到了《马约》规定的趋同标准。尽管说不清楚这种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功于结构

性基金，但鉴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爱尔兰从中获得的援助相当于其GDP的3%左右，希腊与葡萄牙相当于4%，西班牙相当于2%，结构性基金的贡献不容忽视。

虽说结构性基金的目标主要是为了满足这4个国家的需要，集中于援助“滞后”地区的发展，但后来又增加了“衰退工业地区”，以取悦预算的主要出资国家——“北方”国家。随着乡间就业机会多样化成为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的组成部分，“农村地区”也增加了进来。后又包括了“就业与工业改革”，以缓解在全球技术进步时代人们对欧盟竞争地位的担心。结果，结构性基金的目标地区包括了欧盟一半以上的人口，而不再集中于少数最困难的地区。而委员会“2000年日程”的目的之一，便在于减少资源的分散利用，使其用于一些重点项目。

为东扩作准备

当务之急是帮助中东欧国家作好入盟准备。随着大多数成员国成为预算的重要净贡献国，同时在实行欧元后公共财政面临压力，委员会不得不将其从欧盟税收中的提取维持在欧盟GDP [1] 的1.27%之下。而以西班牙为首的结构性基金主要受惠国，坚决抵制其收益的任何削减。鉴于这种态势，1999年柏林欧洲理事会会议通过的财政远景规划将2006年前用于新成员国的资金增加到120亿欧元，即稍高于该年结构性基金总额的三分之一。这是否足够还很难说。第一批谈判加入的5个中东欧国家，其平均收入不足欧盟平均值的一半，而过去加入国家的平均收入均超过了此平均值的一半以上。第二批国家中，除斯洛伐克外，其余国家的平均收入都不足此平均值的三分之一。如果成员国间悬殊过大，欧盟将面临困难；结构性基金可能不得不分担至少部分压力。

然而，与共同农业政策不同，凝聚政策迄今还是比较和谐的。这无疑部分反映了渗透在成员国政治制度中的社会公平原则，部分则说明了有许多人从中获益。但就整个共同体预算史而言，和谐并非重要的特征。

预算

农业开支现在占欧盟开支的二分之一弱，凝聚基金约占三分之一强；这两项具有巨大再分配作用的开支加在一起，占整个开支的五分之四。欧盟机构的行政开支占总开支的5%不到，其余部分用于支持一系列的内部与外部政策。预算之外的一项重要的再分配项目是用于削减英国净贡献的返回款，这由其他成员国直接支付给英国；1999年的返回款为31亿英镑。

预算的整个开支在2000年为896亿欧元，相当于欧盟GDP的1.13%。除非得到所有成员国的批准，决定提高其限额，否则预算总额不得高于欧盟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27%。2000—2006年的财政远景规划将每年的预算开支保持在欧盟GNP的1.20%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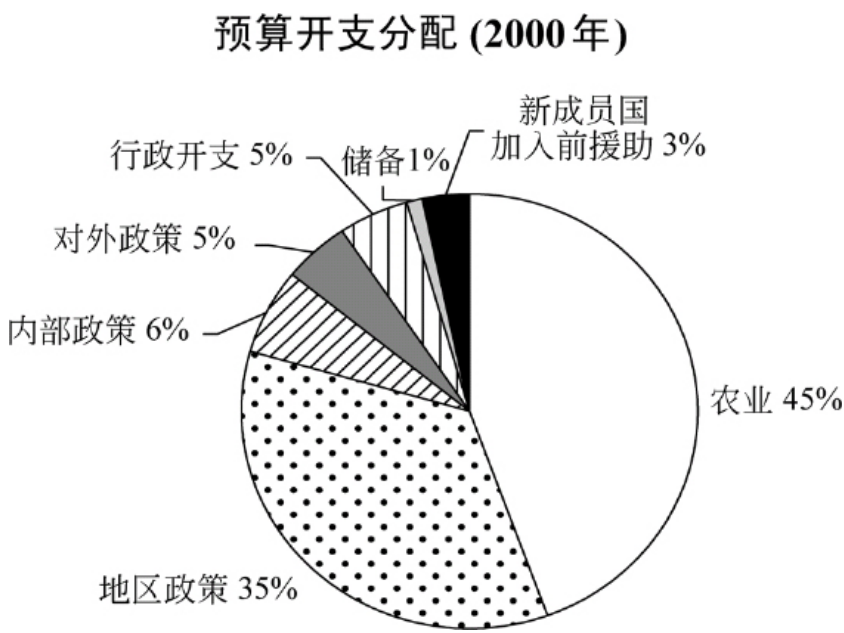

“自有财源”

与依赖成员国缴费的国际组织不同，欧盟从税收取得收入是条约的法律规定，并与其他条约义务一样，属于法院的权力范围。这是为

了防止个别国家通过不缴费而胁迫欧盟。联合国的财政状况说明了此类行为的后果：它多年来因为美国国会拒绝批准支付美国应付款项而被削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18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州未根据《13州邦联宪法》规定缴纳应付款项，成为支持美国联邦宪法的有力理由。同样的理由影响了欧共体的创始人，使之将向共同体支付税收收入确定为法定义务。倘若一成员国拒绝缴费，欧盟并没有具体的强制措施。但对于成员国而言，法治的重要性已足以令它们“遵纪守法”。

最初，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税收收入在条约中被称为“自有财源”，以强调它们属于共同体而不属于成员国。“自有财源”包括关税和农产品进口税。但它们并不足以支付共同农业政策的开支，因此，共同体还被拨给一部分增值税收入——对所有商品与服务征收的增值税的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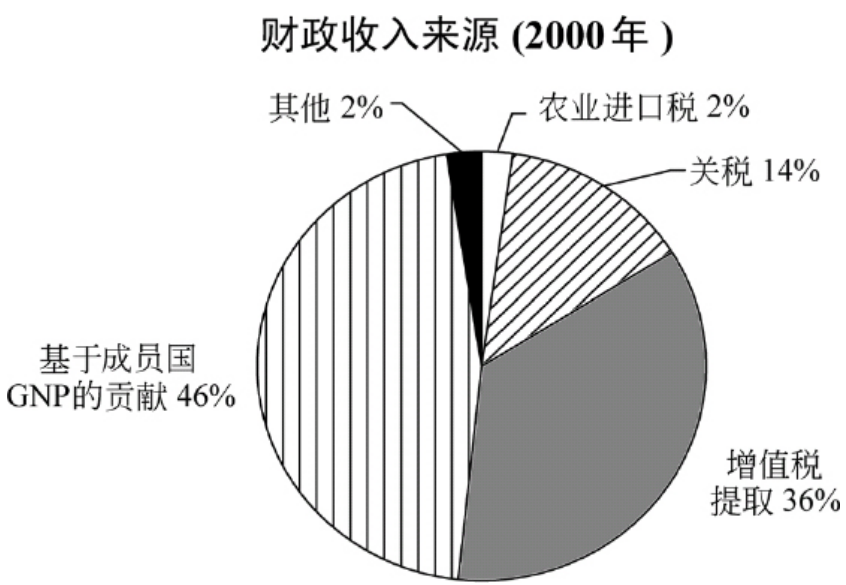

反对提取这些间接税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们给较贫困国家和公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之比富国和富人要支付其收入的更高比重。为此，在1988年推出了第四项财源——各成员国GNP的一个很小的百

分比。这个百分比与各国收入成正比；到1999年这部分收入约占欧盟收入的一半。然而，这种财政收入制度的整体结果仍然是倒挂的。

净贡献

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对欧盟收入的贡献远远不及它们从凝聚政策与农业政策中获得的收益。而英国的情况远非如此，尽管其人均收入也低于欧盟平均值。这是因为英国的农业规模小，从共同农业政策获得的收益相对较低，而它对农业进口税的贡献却超过其他国家。尽管英国获得一笔返回款来抵消这个特殊的不利因素，它对欧盟预算的净贡献在20世纪90年代仍保持在其GDP的0.3%上下。作为从共同体获益甚多的富有国家，德国多年来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作为最大净贡献国的角色。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是净收益国。但随着前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德国平均收入下降，本国的预算不堪重负，它也日益不愿承担这个负担。荷兰的净贡献率与德国的相似，超过了GDP的0.6%；在20世纪90年代，瑞典、奥地利与比利时和英国一样，净贡献率达到GDP的0.3%—0.5%；法国与意大利则在GDP的0.1%上下。因此抵制高净贡献率成了常态，而不再被看成是英国缺乏欧洲团结精神的个案。在英吉利海峡的这边，人们对这种变化或许会有些幸灾乐祸，但它是一种危险的发展。因为欧盟将需要保持团结，特别是它如果在即将到来的扩大后要继续保持其和平与繁荣的架构，它需要调拨资源来促进中东欧国家的一体化。预算的进一步改革肯定必不可少。

各国的预算净支出或收益

（占 GDP 百分比在 1992—1999年的平均值，
–表示净支出）

比利时	–0.31
丹麦	0.20
德国	–0.67
希腊	4.45
西班牙	1.07
法国	–0.12
爱尔兰	5.15
意大利	–0.12
荷兰	–0.60
奥地利 (1995—1997)	–0.34
葡萄牙	3.06
芬兰 (1995—1997)	–0.03
瑞典 (1995—1997)	–0.49
英国	–0.30

（资料来源：“欧盟财政”， 1998年10月，附录8，表5）

欧盟扩大之后，付给英国的返回款不可能按现在的方式继续下去。虽然英国政府曾明确宣布对此的任何改变将使其有理由行使否决权，但它必须注意到，净贡献给德国、荷兰、瑞典与奥地利造成的负担更为沉重。欧盟已经设想了一些分担负担的特别措施；欧洲理事会柏林会议决定将上述4国支付英国返回款的份额减少四分之三。但为了避免将来发生冲突，一种更加合理的制度不仅符合英国的利益，也符合普遍利益。在“2000年日程”中，委员会提议将返回款变成它所称为的“全面纠正制度”的一部分，将纠正反常现象的范围扩大。

这种改革不大容易成功。1988年，人均收入刚刚超过欧共体平均水平的意大利，即阻止了一项使富国比穷国支付更多的新财源的通过。1999年，在欧洲理事会决定2000—2006年财政远景规划时，法

国与西班牙成功地限制了农业与凝聚政策预算的某些变革，因为将资金用于即将到来的扩大势必削减它们享有的特殊利益；英国也拒绝接受削减其返回款，尽管其他国家的净贡献率已经超过了它。各国政府都得顾忌本国的公众舆论，因此自然不肯轻易放弃特权。但以往就重大一揽子预算方案作出的决定表明，改革不是不可能。

GNP的1.27%的最高限额给欧盟充分的余地去做它目前必须做的事情，但我们完全不能确定今后是否会继续如此。财政远景规划为21国组成的欧盟确定了1,035亿欧元的开支限额（2006年），或相当于欧盟扩大后预计的GNP的1.09%。这可能远远满足不了欧盟所有的需要，例如帮助中东欧国家在欧盟中正常运转，或者使欧盟能够尽到其日益重大的外交与安全责任。鉴于这些挑战，1.27%的最高限额也许是不够的，更不用说财政远景规划中的规定了。现在就考虑预算改革的意义，并不为时过早。

注释

【1】 似应该是“GNP”。

第六章

社会政策、环境政策

欧盟被赋予某些权力，例如建立单一市场，因为这个市场规模带来的优势是单个成员国所不能企及的。其他的一些权力则旨在防止成员国相互造成损害，为此目的授权欧盟在环保领域制定政策被普遍认为是可取的。另一个例子是社会政策，但人们对欧盟在何程度上应对此领域采取干预有强烈分歧。

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在欧盟中的含义较英国人所普遍认为的更窄，它并不包括福利国家所关注的医疗、住房与社会服务方面的政策。各国对于此类公共事业的运作模式各不相同，反映了各自的政治与社会文化；而且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差异的跨界影响并不足以证明需要欧盟干预。而在条约与欧盟术语中，社会政策所涉及的是与就业相关的事务，但在此方面各国间也有很大不同。然而由于就业状况更为紧密地关系到单一市场，欧盟被要求协调各成员国的就业政策，以防止较高标准国家的就业者因较低标准国家就业者的竞争而受到损害。

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是《罗马条约》中有关同工同酬的条款。在男女同工同酬的立法上，法国领先于其他创始国。为使那些大量雇用女性的部门保持竞争力，法国要求它的伙伴国也实行同工同酬。由于性别平等逐渐成为大趋势，同工同酬成为最出名的欧洲法律之一。到《阿约》缔结的时候，各国十分赞同将同工同酬原则扩展为在有关就业的所有事务上实行男女机会均等和待遇均等。

《单一欧洲法令》在两个方面扩大了社会政策的范围，即规定对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立法，和鼓励欧洲范围内的劳资代表对话。鉴于撒切尔夫人曾为削弱英国“社团主义”关系的势力而艰苦奋斗，她当然认为在欧洲范围内发展这种对话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反对降低健康与安全标准的规定被普遍接受。因此，虽然共同体社会政策是撒切尔厌恶的对象之一，但由于它们是单一市场计划的组成部分，她还是接

受了《单一法令》的这些规定。

德洛尔认为，对工人而言，提高社会福利立法标准是单一市场的必要补充，为此他在1989年提出制定《社会宪章》。该宪章在欧洲理事会中得到了除撒切尔之外的的一致同意。尽管撒切尔接受宪章中的一些规定，如工人的自由流动权以及参加（或不参加）工会的权利等，但她抵制其他规定，如工人有参与公司决策权以及最长工作时间限制——有关最长工作时间的规定后经特定多数表决通过，写入了条约有关工作健康与安全的条款，这令英国政府很是反感。梅杰同撒切尔一样，对《马约》有关社会政策的规定选择退出，使之只能以对其他所有成员国适用的议定书方式附录于条约。直到1997年工党大选胜利后，该议定书才得到全体一致同意，成为《阿约》有关社会政策的一章。同时写入《阿约》的还有旨在实现“高水平的就业与社会保障”的新一章。不过布莱尔还是继续推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社会政策

在欧盟术语中，社会政策意指有关劳资关系的政策。附于《马约》的一份议定书对社会政策作了相关规定；所有其他成员国都签署了这份议定书，唯独当时的英国政府因不愿接受而没有签署。但1997年5月当选的工党政府同意该议定书的内容，使之成为《阿约》中的一章。

欧盟的社会政策集中于几个方面：改善工作环境以保护工人的健康与安全；工作条件；为工人提供信息与咨询；男女工作平等；将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们纳入市场。这些目标主要是通过支持和协调各国的政策，以及通过由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在某些方面共同议决后通过的立法来实现的。委员会有责任在培训、社会保障、事故防范等事务上，鼓励成员国间合作。

《阿约》还授权理事会采取行动，反对“基于性别、种族、宗教或信仰、年龄及性取向之上的”歧视。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莱茵”模式

在对欧盟的方式上，布莱尔强调放松管制和灵活性，理由是这可提高欧洲经济的竞争力和促进就业。虽说劳动力市场并非他主张放松管制的唯一领域，但被看成是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英国的这种方式被称为盎格鲁 - 撒克逊模式，因为它与美国的经济哲学有相近之处。另一种方式是以德国为样板的莱茵模式。该模式在劳动力市场上强调团结与社会保障，而不是灵活性。实现此目标的管理方式大都通过劳动者和工会——在德国被称为社会伙伴——谈判达成。这反映了民权社会的一种共识文化，是对先前极权独裁方式的反抗，并以悠久的崇尚团结的传统为基础，例如私营部门承担高标准技术培训的责任。这使得战后数十年德国取得了瞩目的经济成就，并持续保持出口强势。不过，尽管东部各州加入德国给德国经济带来的负担是其20世纪90年代经济状况不那么乐观的原因之一，德国也因其未能根据全球经济的新发展在劳动力市场中引入更多灵活性，以及改革产业与金融组织和税收制度而受到批评。

就业政策

《阿约》推出了有关就业的新章节，以缓解欧盟公民对高失业率的关注；该章节的主要目的是鼓励成员国间在就业政策方面的合作。

成员国就其就业政策向理事会与委员会提交年度报告，由它们拟定成提交给欧洲理事会的报告。而后理事会会向各国发布指导方针，要求它们在就业政策中加以考虑；理事会也可以对各国政府提出建议。理事会可以与议会共同议决后决定从预算中出资，用于鼓励交流信息与最佳做法、提供比较分析与咨询、提倡使用新方法，以及资助试验项目。

这提高了欧盟成员国对就业政策的关注，但它对各国政府政策的作用还有待考察。

莱茵河还流经荷兰；荷兰人也具有被高度认同的经济与政治制度。20世纪80年代面临严重经济问题的荷兰人开始了被称为“圩田模式”（Polder model）[1] 的改革过程，将以市场为目的的改革引入依然基于认同的制度，并取得了低失业率、高效率及全面良好的经济成效。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推行的社会政策与此有许多相似之处。法国则在强调社会保障的同时，更多地依赖政府领导与管制；尽管它也被批评为改革进程缓慢，但就大多数政策而言，法国在20世纪90年代可谓表现不俗，只是失业率较高——整个10年期间一直保持在10%以上。

人们常常不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多年里，英国经济受到集体谈判和政府干预的双重高度管制。正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撒切尔时代的改革使英国决然转向盎格鲁 - 撒克逊模式。虽说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意在通过走一条中间道路来防止此类波动，他对经济灵活性的重视和其政府对企业的友好取向，很大一部分是继承其几位前任的改革政策以及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古老传统。

20世纪90年代英国经济状况的改善，就像爱尔兰经济的活力那样，增强了盎格鲁 - 撒克逊模式的可信度。但非常重要的事例是，美国的低失业率与高增长带来了该国经济上的持续成功；从中或许可以得出结论：灵活性适合于技术发展的新浪潮。虽然美国对社会政策自由放任的方式受到成员国抵制，某种共识或许正在欧盟中形成：就减少失业以及为创建有活力和有竞争力的经济的某些措施而论，设定基准和施加同辈压力之类的途径要比社会立法更合适。如果情况确是如此，那么英国与其他成员国有关社会政策的冲突期可以告一段落了。

环境政策

不能通过将污染的空气和水源从一个国家排出而去损害另一个国家来防止污染；因此有必要建立共同的标准，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单一市场中流通产品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如此。《单一欧洲法令》规定了一项共同体环境政策，以处理这些问题。该法令还申明，欧共体的目

标是“维持、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质量”。

由于民众对环境问题广泛关注，已有200多项环保措施通过了立法，涉及空气与水污染、废物处理、飞机与汽车噪音限制、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饮用水与浴室用水的质量标准等等。1988年通过了一项旨在减少酸雨发生的立法，规定在今后的15年内分阶段将二氧化硫和氧化氮的排放量削减58%。在环保意识强烈的瑞典加入欧盟后，危险化学品的保护标准也得到了提高。

尽管欧盟立法总是允许成员国在其他事务上自行确定更高的标准，但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要求下，在《阿约》中写入了一项条款，允许成员国对贸易商品也自行确定更高的标准，前提是它们能令委员会相信，这类标准并非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考虑到环保立法涉及的范围，对相关法律的抱怨已是极少。欧盟有项规定要求成员国在采取可能破坏环境的行动前先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此规定的确曾阻碍了一条绕过英格兰南部的温切斯特的公路的修筑计划，原因就在于它没有进行必要的环境影响评估。英国政府将此看成是干预地方事务，不过这类抱怨很少。环境政策出台于欧洲人正迅速变得愈来愈环保的年代，因此它就像过去的同工同酬政策那样，成了欧盟最得人心的政策之一。同性别平等政策一样，环境政策也在《阿约》中得到了强化；《阿约》规定，“环境保护的要求”必须纳入其他共同体政策，“以期促进可持续发展”。而后各国同意筹划将对环境保护的关注纳入欧盟的农业、能源、运输等行业政策；这些措施整合起来也许便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如同我们在第五章中了解的那样，有关税收的协议比立法协议似乎更难以达成。委员会曾提议征收一项碳与能源税，以减少二氧化碳（CO_2）的有害排放。但这遭到使用大量能源的工业部门的反对——它们认为，除非其他工业化国家也征收此税，否则会使它们失去竞争力。还有人以财政主权为由，反对税收协调。因此，这方面迄今毫无进展。但欧盟环境政策在国际上更为成功。

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上，欧盟施加了重大的影响。1986年，当人们意识到全氯氟烃（CFCs）会破坏臭氧层而危及地球上的生

命时，欧共体即成功地打破僵局，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形势的恶化。接着在1997年，欧盟在京都谈判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达成了旨在控制看来是导致全球气候极度变暖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尽管美国不愿接受任何适当的指标，也不愿响应第三世界国家对参加该国际协议提出的条件，即在必要的技术改革上给予援助，欧盟还是使京都谈判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欧盟自己恐怕也难以实现这个并不雄心勃勃的目标——在2010年前，将3种主要的气体排放削减8%。对成员国而言，唯一的法律义务是制定本国减少排放的方案；但即便是要做到这一点，欧盟也还是需要一种更加有力的制度。

欧盟还面临一个非常巨大的任务，那就是使在苏联统治时期被严重污染的中东欧的未来成员国达到欧盟环保标准。一个诱人的途径是在新入盟国家实施所有欧盟立法前设立一段很长的过渡期，同时保留某些贸易保护措施，以应对那些不承担代价高昂的义务的国家的不公平竞争。但提供适当的援助使它们达标，应该是更好的解决途径。

注释

【1】 Polder：荷兰筑圩造田的工程。

第七章

“一个自由、安全与公正的区域”

战后第一任工党政府的伟大的外交部长欧内斯特·贝文说，他的外交政策目标“实际上是……努力解决整个护照和签证问题”，这样他就可以“到维多利亚车站”（此站有火车开向欧洲大陆），“买一张火车票，去我想去的什么地方，而不需要护照或任何其他东西”。这位老工会会员保留着他海内皆兄弟的梦想，但作为外长他却发觉自己在努力捍卫国家主权，并拒绝了英国加入新近成立的共同体的主张——殊不知正是共同体最终使他的梦想成真。[1]

早在1958年，《罗马条约》就将“人员”与货物、劳务、资本一起纳入跨越成员国边界的四大自由流动之中。但“人员”的这种流动仅限于越境就业。25年之后，《单一欧洲法令》将内部市场定义为“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区域”。撒切尔夫人的政府认为这些言辞的含意没有变化，因为它们还受到“根据条约规定”的限定[2]。这个说法在相关方面仍然站得住脚，但更加奉行联邦主义的国家政府则倾向于从字面来理解：取消各成员国间相互边界上的控制，从而使跨越边界的流动对所有人员开放。

这种思想在1985年和1990年的《申根协定》中得到了法律表述。申根是卢森堡的一个小镇，具有象征意义地处于法国与德国边境，该三国与比利时、荷兰一起在此签订了上述协定。《申根协定》的签署国尔后陆续增加，直至所谓的申根国家包括了除英国与爱尔兰之外的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丹麦则与之维持了一种不明确的关系。

《申根协定》有两个主要目的。首先是关于边境控制：消除申根国家间的内部边境控制，建立外部边境控制，以及制定有关避难、移民和区内其他国家国民流动与居住的规定。其次是在打击犯罪上相互合作。

跨境犯罪活动增加与跨境经济活动增长的原因相似，即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进步。如果要使法治跟上形势的发展，那么就像在贸易上那样，跨境合作势在必行。随着成员国间关系因经济一体化而强化，它们更对这种合作有着特别的需求。这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始于1974年签订的有关交换恐怖主义情报的“特雷维”协定；有

关的部长与官员不久就发现，有必要将其他形式的犯罪也包括进来。这为《申根协定》的签订奠定了基础；而《申根协定》在那些愿意共同走得更远的国家的执法机构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合作；在第一项《申根协定》签订15年后，形成了一个包括3，000多页法律文件并对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有效的“既有结构”[3]。

《马约》与第三支柱

犯罪与人员的跨境流动，影响到所有成员国而不只是申根国家。为此各国同意，《马约》应该对这些领域的合作加以规定。除对外部边境控制、避难、移民和欧盟以外国家公民的跨内部边界流动作出规定之外，《马约》还列举了恐怖主义、贩卖毒品、欺诈以及“其他严重的犯罪形式”。成员国的司法、行政、警察与海关当局必须合作以对付此类行为。

有些国家，例如德国，希望这种合作在共同体机构内进行，让委员会、法院、议会以及理事会发挥它们的正常作用。英国等另一些国家则要捍卫它们的主权，希望将除理事会之外的机构尽可能地排除在外。结果是设立了与“第一支柱”共同体相平行的一个新的“第三支柱”——司法与民政事务上的合作（CJHA）。第三支柱的机制是政府间的：在理事会内实施全体一致议决程序，议会与委员会只具有咨询作用，法院则无权过问。其政策手段是由理事会决定的联合立场与行动，以及需所有成员国批准的公约。公约之一是旨在建立新的警察机构——欧洲警察署。

鉴于需要取得15国全体一致同意后才能作出决定，到进行《阿约》谈判时还没有取得多少成果也就不足为怪了。没有任何公约生效，其他方面的行动也进展缓慢。但是人们对跨境犯罪与非法移民的担忧在继续增长，预计将带来新问题的东扩则日益临近。因此大多数成员国要求一种更为有力的制度。

《阿约》与第一支柱

《阿约》申明要建立一个被堂皇地称为“自由、安全与公正的区域”（AFSJ）的宏愿。虽然总的说来，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区相比，欧盟堪称一个非常自由、安全和公正的区域，但《阿约》使用这三个词汇各有较为特定的含义：自由指跨内部边境的自由流动，安全指不受跨境犯罪的危害，而公正则主要指在民政与刑事事务上的司法合作。将具有如此广泛与崇高含义的词汇用于这些特定目的，这样做是否明智人们拭目以待，但答案也许取决于这些目的在多大程度上和能多快得以实现。

在自由流动方面，几乎所有和申根规定相关的事务都已被从第三支柱移交至第一支柱。这样，人员在申根国家的自由流动权得到了共同体机构的保障，但一些成员国曾不得不暂时恢复边境检查，以应对非欧盟公民持假签证从其他成员国涌入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外部边境控制还不令人满意。共同移民与避难政策也还不够完善。另外，由于英国、丹麦与爱尔兰仍实行边境控制，不能说整个欧盟已实现了没有边境检查的自由流动。

然而，在申根国家间取消边境控制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同样，将这些权限移交至共同体并让法院行使其正常职能——但内部安全和法治仍受成员国控制——也是一个重大成就。在条约生效后的5年间，即直至2004年5月，共同体机构主要是按政府间模式运作，即实施理事会内全体一致议决、咨询议会意见、委员会与成员国共享立法提案权。但这5年之后，如果申根国家（有些问题以特定多数，其他以全体一致通过）同意，将实施特定多数表决、议会与理事会共同议决、委员会拥有全部立法动议权。如果情况顺利，它们很可能会这样做，不顺利则另当别论。

英国决心保持其边境控制，选择不参加《阿约》关于人员自由流动的规定；与英国开放边境的爱尔兰，也不得不如此。但两个国家都可以选择参加某些特定措施，但需得到其他政府的全体一致同意。英国政府已表态，它有意加入除边境控制方面之外的整个《申根协

定》，但将视外部边境控制的情况和内部合作是否充分有效来决定。丹麦虽然签订了《申根协定》，但选择不将权力移交给共同体，因此结果还难以预料。[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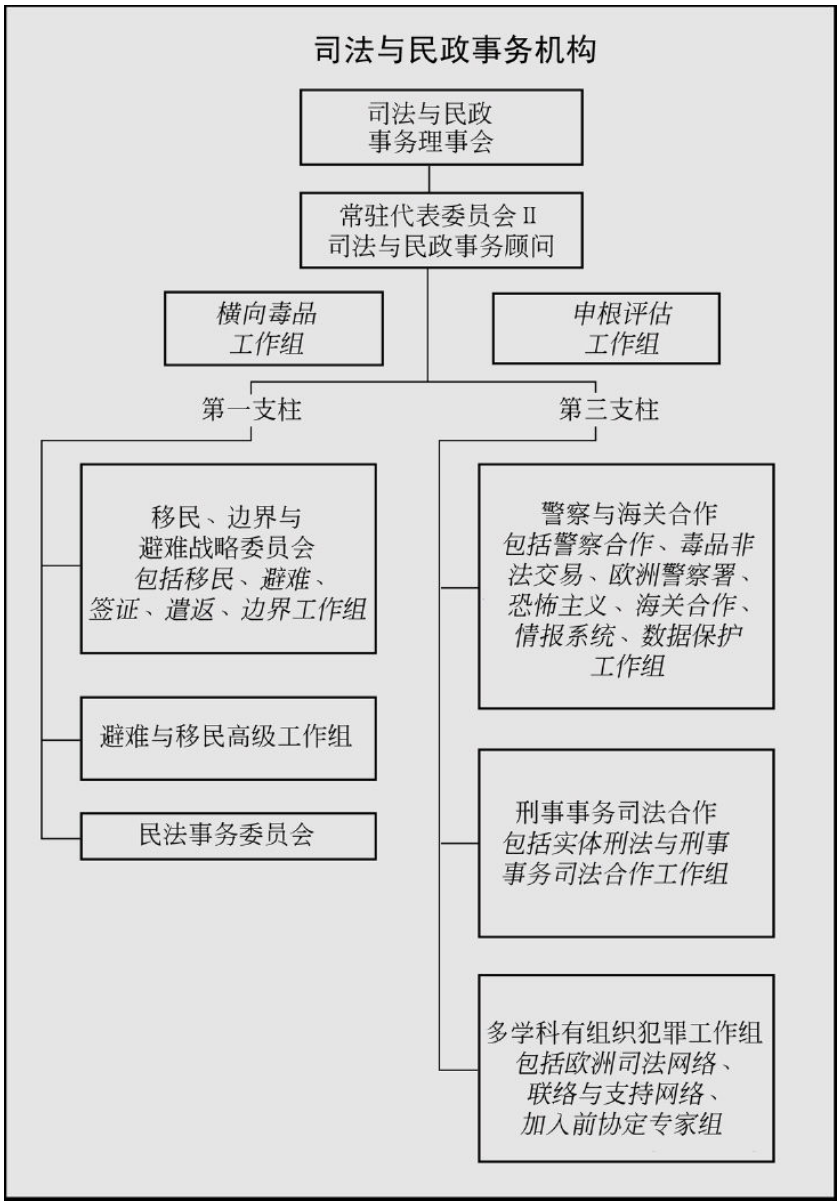

至于安全，打击跨境犯罪仍主要属于政府间第三支柱的职责。鉴于有关人员自由流动的权限已经移交至共同体，第三支柱的名称已经缩小至“刑事事务上的警察与司法合作”。针对人们对跨界犯罪的日益关注，《阿约》在犯罪形式的清单中增加了人口走私、伤害儿童和腐败，而后又增加了洗钱、制造假币与“网络犯罪”。

警察合作得到了重大的发展，且收效不小，例如缉获了大量向英国走私的毒品。尽管欧洲警察署要等到1999年7月有关公约经所有成员国批准后才能全面运转，在《马约》作出规定后的5年间，它还是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尽管第三支柱主要是按政府间模式运作，在理事会内普遍实施全体一致议决程序，但《阿约》明确规定，公约只需经过半数成员国批准，便可在那些国家生效。法院也起到了作用，它被授权对欧盟法律作出解释，以及裁决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委员会之间的争端。

为了提升人员自由流动与打击犯罪在欧盟政治中的重要性，1999年10月在芬兰任主席国期间，欧洲理事会就此主题在坦佩雷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一所高级欧洲警察学院，以及一个称为“欧洲司法”的机构，将成员国的检察官、法官和警官联合起来，以在刑事调查和诉讼上加强合作。会议还议决了其他事项。

“公正”狭义上是指司法合作，据此，已经采取了一些特定的措施，以使成员国在承认和执行司法裁决等跨国界问题上互相协助，不过在犯罪受害人权利问题上进展不大。不满于现状的法国提议建立一个“欧洲司法区”，以推进成员国间有关跨界诉讼和执行裁决的法律协调，以及建立公民诉诸法院的最低共同标准。英国则更赞同成员国间相互承认的主张，即仿效单一市场内相互承认规则的方式。这一立场被欧洲理事会坦佩雷会议所接受，但法律协调的建议不会轻易被放弃。

按“公正”一词较为宽泛的定义，分配公正一直是个问题，因为到德国寻求避难者远比其他国家多，它希望有分担费用的措施，但受到其他国家的抵制。1999年，英国受到的寻求避难者的压力差不多与德国的相当，它对德国的呼吁变得较为认同。在其他国家同样受到影响

的情况下，欧盟在1999年拨出少量款额，用作收容难民，算是朝着负担分担走出了一小步。

有批评认为欧盟强调限制移民与难民，是置对人的关怀于不顾；《阿约》根据公正的更为宽泛的含义作出了应对。面对公众的普遍反对，条约规定了保护移民与难民权利的措施，以及更为广泛地反对种族歧视与仇外情绪的行动。至于进展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名称的含义

在申根国家内，自由流动几乎已是既成事实。今天，如果贝文走进巴黎北站或里昂站，他可以买张车票，不需护照就可到申根国家内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去，但不幸的是，他不能到维多利亚站。

然而，现在还很难确定第三支柱下的警察与司法合作能否足以保证制止跨界犯罪。共同体支柱有权在此方面采取行动，但直至2004年，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受全体一致议决的制约；相关工作仍然主要依靠第三支柱来开展，但第三支柱普遍实行全体一致议决程序。跨界犯罪在继续滋生，令人怀疑的是目前的欧盟机构能否战而胜之？只要能继续下去，司法合作自然是可取的。但同样由于其机构上的弱点，司法合作并没有走多远。

我们也不该忘记，英国以及爱尔兰没有完全参加共同体支柱这个方面的事务，对欧盟是一种削弱，而且也可能是在给英国本身制造麻烦。为什么原本不应分割的事务，其责任要分归第一与第三支柱，使行动难以进行，并使公民本来就难以理解的事物变得更加难懂？英国选择不参加是主要原因。这是英国惯常做法的又一个例子：先拒绝参加一项共同体计划，但等到该项计划的大多数决定由其他国家作出后，它十有八九还是会迟早决定参加进去。

尽管有这些问题，我们期待“自由、安全与公正的区域”就其特定意义而言将是一个成功。但这个名称却未必恰当。因为从字面意思来看，它的含义要深远得多，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欧盟大有值得骄傲之

处。用此名称来表示一个狭隘的意思，这似乎是个缺憾，至少从中期来看，狭义上的“自由、安全与公正的区域”也未必能取得圆满成功。

注释

【1】 贝文与维多利亚车站的故事，可参见米歇尔·查尔顿：《胜利的代价》（伦敦，1983年，第43—44页）。

【2】 《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1997年简化版）第14条第2款有关单一市场（内部市场）的条文如下：“内部市场由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区域构成，在此区域内，货物、人员、劳务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得到本条约规定的保证”。

【3】 Acquis，意为已经达成的事物。源自aquis communautaire，意指欧盟的全部立法、管理、司法与技术构成。

【4】 事实上丹麦已经加入。鉴于北欧国家之间实行护照同盟，根据北欧理事会与欧盟的协议，包括非欧盟成员国挪威在内的北欧国家都已加入《申根协定》。

第八章

一个民事大国：是耶，非耶？

创建共同体的主要动机是维持法国、德国和其他成员国间的和平，以及使其公民生活富足。不过，尽管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尤为重要，它们与邻国、与距离更远的国家的关系也不容小觑。同时，辅从性原则——在共同体可以比成员国单独行动做得更好的一些事务上，它应该承担责任——不仅在内部事务上适用，也开始适用于对外事务。

与共同体的权力相应，它的对外关系起初集中于经济领域，但这种关系一开始就具有政治目的。对于德国，由于与苏联集团相邻且东德受苏联控制，它的首要目标是各国齐心协力抵御苏联压力。作为世界强国，法国对共同体有着更大企望；其中，与美国的关系是核心部分：莫内认为共同体与美国之间是伙伴关系；戴高乐则要反抗美国霸权。莫内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共同体逐渐被看成是潜在的“伟大民事强国”。

许多法国人则看得更远，构想着一个可以在防务领域挑战美国优势的欧洲，而其他国家一般不接受这种观点。外交政策上的合作逐渐发展至所谓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英国曾长期坚决反对欧盟在防务上的共同行动，但它却在1999年与法国一起，提出让欧盟拥有有限的防务能力。但这仍然只是欧盟对外关系中的次要部分。共同体的对外经济政策依然重要得多。

对外经济关系

《罗马条约》赋予共同体共同对外关税来作为贸易政策手段，并在术语上将之称为“共同贸易政策”。这并非预料中的必然结局，因为有些人曾希望让成员国保留已有关税税率——低于德国与比荷卢经济联盟的平均值，但高于法国与意大利的税率。但法国坚持要求实行共同关税，这部分是因为它担心廉价进口品从低关税国家渗透进来对法国构成竞争，部分却也是因为它希望共同体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具有发

挥重大影响的手段。

法国一直为此努力。共同关税是推动单一货币的动机之一，挑战着美元霸权；而后法国又继续推动建设欧洲防务能力，并创造了“欧洲强势”[1] 一词，以示与仅仅关注经济事务的“欧洲空间”相区别。但不管是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倾向的法国，还是当时批评共同关税为保护主义手段的英国，都没有料到它事实上引发了肯尼迪回合关税削减，使共同体朝着成为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最有力推动者迈出了第一步，并因此显示了对外政策共同手段的力量。

这种力量也显示在农业上，不过结果欠佳。进口税与出口补贴制度被用于高度贸易保护，有损共同体消费者和国际贸易关系，包括共同体本身的工业出口。但总的说来，共同体的对外贸易政策对其公民和国际贸易都是相当有益的。

另一个重要的对外经济政策手段——发展援助——也是如此。它也是在法国坚持下形成的，始于《罗马条约》的一项规定——为当时成员国的殖民地设立一项基金。而后此项基金迅速增长，供欧盟为第三世界所有国家提供援助。20世纪90年代，援助被用于另一个目的，即帮助中东欧国家从苏联式中央集权国家转型至市场经济与多元民主国家，其中也包括俄罗斯以及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欧盟、美国、日本等在国际
贸易中的份额 (199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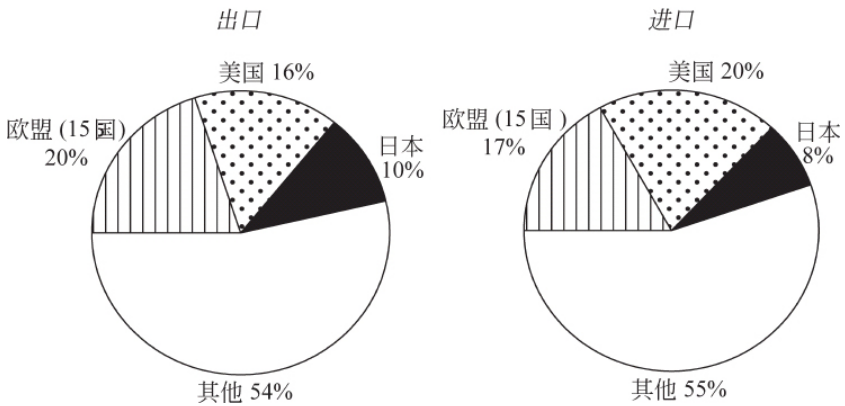

这样，欧盟及其成员国成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援助来源。在欧洲，对于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欧盟的贸易与援助政策手段，加上入盟的前景，成了帮助它们成功转型的主要外部影响。法国当初坚持赋予共同体执行对外政策的职能，确实值得庆幸。

共同体机构有效地处理着对外贸易关系。政策的决定和贸易协定的批准由理事会按特定多数表决程序作出；贸易谈判由委员会按照由此颁布的政策，在与理事会任命的一个特别委员会磋商后进行；在法律要点上，法院拥有裁决权。除了正式批准达成的结果，议会通常不大过问贸易谈判；事实上《罗马条约》甚至没有规定在有关贸易政策的事务上需要征询欧洲议会意见，尽管它有权同意或否决联系条约以及更为重要的加入条约。不过在诸如欧洲议会议员与签订了《欧洲协定》或《伙伴协定》的国家议会议员的联合委员会，以及在派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伙伴国的议会间代表团等对外关系中，议会确实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国家首脑，包括里根、哈韦尔、萨达特，以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都曾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它还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上受到咨询。

在草拟《罗马条约》时，商品贸易是最重要的，服务贸易则无足

轻重，在有关共同贸易政策的章节中并没有提及。但服务贸易现在已占到全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一左右。然而，尽管共同体常规制度可以成功运用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却仍然必须遵循政府间程序。商品贸易谈判的成功势头使共同体顺利完成了一系列贸易回合，但政府间程序仍然会削弱其就服务贸易进行谈判的效力。为此，除文化、视听服务、教育、医疗与社会服务以及某些交通服务外，《尼斯条约》规定对所有服务贸易实施特定多数表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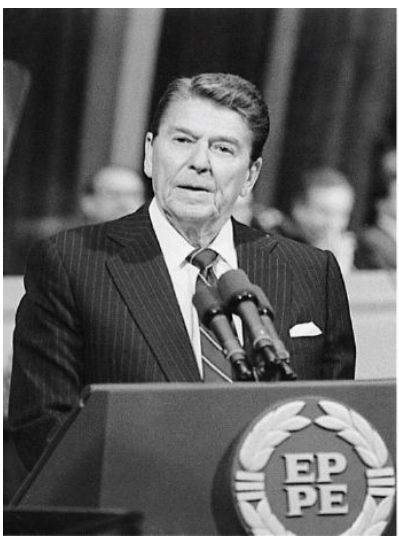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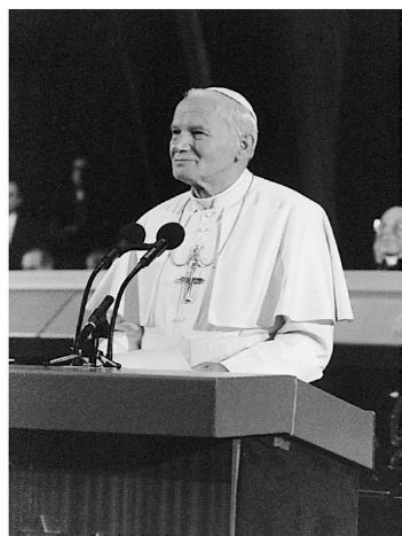

图15　世界世俗与精神强权人物在议会发表演说：罗纳德·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环境保护也已成为国际谈判的一个重要领域。虽然与贸易政策相比，共同体对外政策仍然主要实施政府间程序，欧盟还是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和破坏臭氧层的谈判中，施加了重要影响。

虽已采用欧元，但欧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尚无扮演重要角色的迹象。欧元尚处于初级阶段，而正如本书第十章所讨论的那样，执行对外货币政策的机构安排，目前还不够有力，不能使欧盟在此领域作出积极的贡献。

外交政策

成员国间的外交政策合作，是在1970年随着共同体扩大到包括英国、爱尔兰和丹麦而作为深化合作的因素推出的。这一活动被命名为“欧洲政治合作”（EPC）：外交部长们启用“政治”这个字眼，是为了将他们认为的“高级政治”与经济等显然属于低级政治的事务区别开来。不过共同体的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欧洲政治合作日后所能取得的任何成果，特别是在戴高乐之后的早些年中，法国坚持对欧洲政治合作实施政府间程序，而且将之与共同体完全割裂开来后，欧洲政治合作更是成果寥寥。

欧洲政治合作至少还是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早期成果：成员国将人权列入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日程。令人惊讶的是，苏联接受并最后通过了相关文本。尽管那时没人认为这有多大作用，但它却对最后促使苏联集团解体的政治动荡提供了支持。更具普遍意义的是，成员国的外交人员发展了多种合作方式，促成他们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和在联合国内，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了许多联合立场。到1985年，法国同意欧洲政治合作应与共同体有更紧密的关系，于是将之纳入了《单一欧洲法令》。

外交政策随后的正式发展是它与共同体一样被纳入《马约》，成为欧盟的“第二支柱”。德国统一的前景使法国人担心大一统的德国会弱化法德伙伴关系并奉行自主的东方政策。正如他们推出单一货币来将德国限定在共同体内那样，他们想要通过共同外交政策来限制德国与东方关系的自主性。德国不仅没有反对，还将此看成是按联邦方向构造统一欧洲的组成部分。为此，密特朗总统与科尔总理在1990年建议，在召开有关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政府间会议的同时，召开有关“政治联盟”的政府间会议。

当撒切尔夫人问他们所谓的政治联盟意味着什么时，她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原因之一是，尽管两人都接受共同外交政策的主张——这是政治联盟所意味的两个特定事务之一——却在机构改革这另一个特定事务上意见不一。法国希望强化政府间成分，尤其是欧洲理事

会，而德国希望通过加强议会的地位来发展一种联邦制度。为此他们很难用同一种声音说话。撒切尔夫人两者都不希望，因此尽管她接受已有的欧洲政治合作，却不希望共同体机构插手其间。德国很想让共同体具有制定外交政策的职能，但法国对此也表示反对；结果，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成了政府间的“第二支柱”。

与欧洲政治合作相比，“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这一名称更加堂皇，其机构也更加复杂。鉴于欧洲在海湾战争中不如人意的表现，条约提及了防务，但用词模棱两可，以顾及法国建立欧洲自主防务能力的愿望，同时又迎合英国反对建立这种能力的立场（英国担心这会削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以，使用“防务”的字眼并没有多少实际效果。同样，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也没有比先前的欧洲政治合作产生多少更好的效果。为此，1996年的政府间会议作了第二次尝试，以构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第二支柱。

条约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确定了非常宽泛的目标，从国际合作到支持民主、法治与人权都有涉及。为使欧盟更加决断，条约作出了实行特定多数表决的规定，但因成员国有权选择不参加和有权否决，这种规定受到了限制。虽然可以以特定多数表决共同立场与联合行动，但只能是“在共同战略的基础上”，而这种战略是要全体一致同意的，因此任一成员国可以要求对特定多数表决作出的决定加以限制。各国政府还可以将它们反对的决定提交欧洲理事会，那里它们又可以使用否决权；最后还有一招，即它们可以选择不参加。

这种复杂性反映了一个现实，即在行动所依赖的手段属于成员国而不属于欧盟的情况下，成员国的尽心尽力程度不尽相同，说得委婉些，行动的实施很可能得由着那些持严重异议的政府的心思。但如果根据多数表决作出的决定的实施手段属于欧盟，那这个决定便可以得到恰如其分的实施。这种手段可以是财政方面的，例如共同对外关税；可以是金融方面的，例如援助；可以是货币方面的，例如欧元——而欧盟确实动用这些手段。这种手段还可以是法律条令。但在对外关系上，联系协定等目前尚不适用特定多数表决。随着快速反应部队的建立，欧盟还将拥有决定防务行动的手段。但将士兵送到他们可

能被杀的地方去执行任务被认为是过于敏感的问题：欧盟不能置士兵所属国家的意愿不顾而擅自作出决定。这也就是为什么特定多数表决被排除在防务领域之外。如不考虑这些，并排除不太常见的选择不参加和全体一致同意，特定多数表决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实际价值，取决于欧盟在多大程度上拥有用以执行这些决定的共同手段。

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尝试实行更多的多数表决能否产生更加决断的共同行动，还得拭目以待。不过《阿约》推行的其他变革之一已开始产生影响，即任命一位同时兼任理事会秘书处秘书长的“高级代表”，“协助”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代表欧盟的理事会轮值主席。哈维尔·索拉纳已就任此职，而且兼任西欧联盟（WEU）秘书长。身兼三职，加上任北约秘书长期间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使他具有影响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政府间决策的有利条件。

不过控制对外经济政策手段的是共同体机构，在此方面，作为全面负责此领域事务的委员会委员，彭定康 [2] 扮演着中心角色；其他负责人还包括负责贸易政策的委员帕斯卡尔·拉米，负责大部分发展援助的委员波尔·尼尔森，以及负责加入谈判的委员冈特·费尔霍依根。条约规定，委员会在制定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发挥的作用只限于在理事会的要求下提交建议，这并不适应现实。

在理事会秘书处内，还成立了一个政策计划组，由秘书处本身、成员国、西欧联盟与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负责对可能产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问题做到未雨绸缪。由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开支被包括进议会与理事会共同控制的那部分预算之内 [3] ，议会也开始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但这不适用于军事或防务行动，也不适用于“理事会以全体一致议决另作决定的场合”。这些安排的缺陷在于，正如巴尔干危机所显示的那样，为实现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可能会急需大笔资金，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预算安排却不能适应形势，立即提供这笔资金。这是个严重的缺陷，因为在等待这些资金的时候，危机可能会失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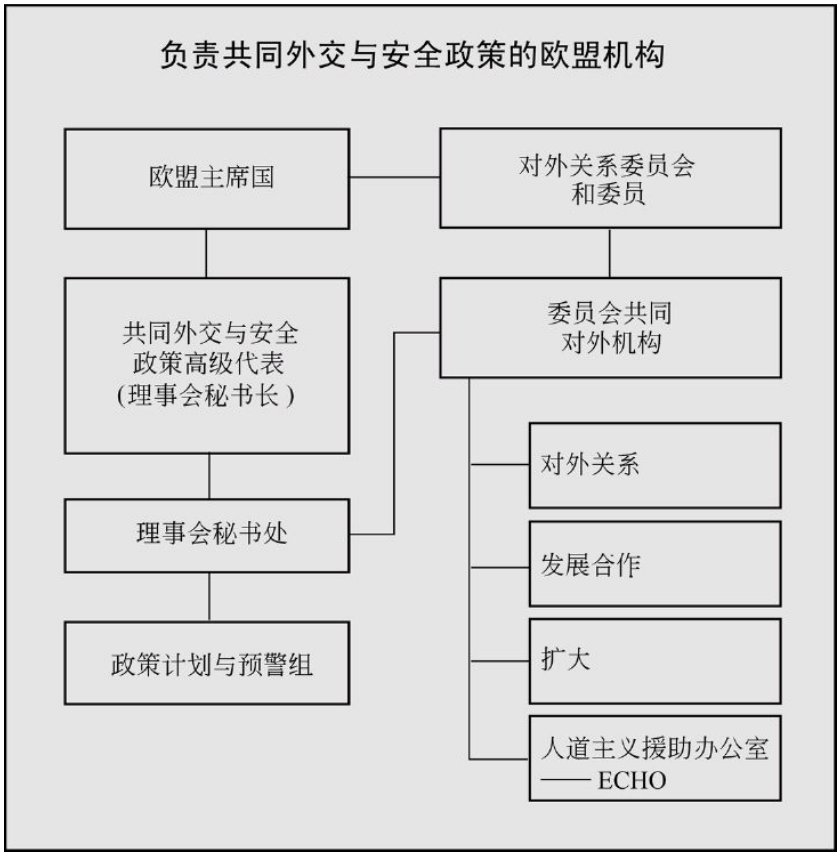

安全

欧盟应该为其对前南斯拉夫的共同政策提供更为有效的军事支持的想法，促使各国政府加强欧盟在防务领域的能力。所有国家都承认，它们有赖北约与美国来防御对其安全的任何重大威胁，但《阿约》使用了比《马约》更强势的语言，构想了“逐步制定可最终形成共同防务的共同防务政策”，其目的包括人道主义任务、维和，以及“包括调停在内的危机管理”。不过比条约表达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将愿望付之实施；对于将共同防务能力的愿望变成现实，条约没有将它交托给进展缓慢而艰难的政府间会议程序，而是授权给欧洲理事会以

全体一致表决来决定。

而后的科索沃战争显示，尽管欧盟国家的防务开支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但却只能提供十分之一的战斗力，而且它们对执行作战行动的影响也相应地有限。这使得参与战争的主要欧盟国家英国与法国一起提出了防务倡议。海湾与巴尔干战争的经验使法国人明白，如果他们要发挥有效的军事作用，必须与北约走得更近。英国人则认识到与法国人合作的好处；在拒绝成为欧元区的发起国之后，英国政府将防务看成是英国能在欧盟内起到核心作用的一个领域。

于是，1999年12月欧洲理事会赫尔辛基会议通过了建立一支“可达”5万至6万人的欧盟快速反应部队，并同意西欧联盟加入欧盟。欧盟可以利用西欧联盟的军事能力，并建立了自己的防务计划和参谋部结构，包括由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一起参加的理事会会议、代表成员国“防务长官”的军事委员会以及理事会秘书处的军事参谋部。快速反应部队将在2003年前建成，以“在北约并不整体参与的场合”，自主执行维和任务与危机管理；不过在此类行动中，通常可以要求北约——事实上是指美国——提供诸如空中运输、卫星情报侦察等设施，但也意味着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都需得到美国同意。这样，英国政府可以减少对削弱北约的担心；包括具有中立传统的奥地利、芬兰、爱尔兰与瑞典在内的所有成员国，也因有任何国家可以选择参与或不参与任何军事行动的规定而安心。

这显示了建立欧盟防务能力所面对的困难：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得到关键性多数成员国同意；需要北约支援从而需要美国同意的重大行动，美国可能不同意欧盟的计划，从而造成北约内部的紧张关系；在同时获得欧盟关键性多数成员国和美国同意的场合，政府间工作安排可能又过于无力而无法策划和运作成功的行动。尽管北约的体制也是政府间的，但美国的霸权领导使之可以运转；但欧盟成员国间不存在霸权，这在使欧盟可以发展成为可行的民主政体的同时，也会在防务领域造成一种难以运转的政府间体制。不过现时的安排，或许可以成为走向进一步改革的步骤，而这正是使此体制有效所必不可少的。

虽然这种改革很可能会在负责欧盟防务行动的体制结构中引入更多的联邦因素，它们不应与创建一个联邦国家混为一谈。因为后者将要求向欧盟移交整个武装力量的主要负责权，这与只具有有限影响的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欧盟真的发展起有效的防务能力，它将超越一个民事大国。但这种前景的不确定性，使它更有必要增强其在对外政策的经济与环境方面已被证明的能力。随着欧盟版图扩大至中东欧国家，其人口将增至5亿上下，那么不管有没有防务能力，它对外部世界的影响都将增强，但必要的条件是其机构，特别是处于核心的共同体支柱的机构，必须得到增强而不是削弱。如果扩大将削弱欧盟机构，它将成为一个毫无生气的庞然大物，成为世界稳定与繁荣的绊脚石——远算不上一个民事大国。而使欧盟增强的扩大进程，将使它能够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比迄今更大的影响力。

注释

【1】 原文puissance，尤指国王的权势。

【2】 Christopher Patten，时任负责对外关系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3】 欧盟预算中的的政策性开支分为强制性与非强制性两部分，前者受理事会控制，后者由理事会与议会共同控制。

第九章

欧盟与其他欧洲国家

创始人对欧洲共同体的命名表达了一个愿望而不是事实。位于西欧中部的6个国家，不管它们何等重要，也很难被称为欧洲。但是大多数联邦主义者所共有的愿望是：共同体将壮大直至名副其实。通过扩大——首先是包括几乎所有西欧国家，接着在随后几年中包括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此愿望正接近实现。与此同时，欧盟还需处理与那些准备加入但还没有加入的国家的关系，同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处理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

大多数申请加入的国家寻求的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对于希腊、葡萄牙与西班牙而言，巩固它们的民主制度也是动机之一。大多数受苏联长期控制后希望加入欧洲主流的中东欧国家也是如此，而且它们也希望增强安全。

成员国普遍认为东扩会使繁荣与安全地区的范围扩大，应该受到欢迎，并应被看成是欧盟的自然归宿。对德国来说，东部邻国的稳定与安全尤为必要。许多英国人，例如撒切尔夫人，期望东扩会造成更为“松散”、更具政府间特性的体制。相反，法国则很是担心扩大会弱化大欧洲计划。不过现在所有国家都接受扩大至接纳中东欧国家的原则，只是热衷的程度各不相同。同时条约申明，尊重“自由、民主的原则，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以及法治”的任何欧洲国家均可申请成员国资格。

扩大至包括几乎所有西欧国家

扩大需要走一套例行程序。在收到申请后，理事会征求委员会的“意见”；以此为基础，理事会可以以全体一致同意授权进行谈判。委员会在理事会监督下主持谈判，但最终的加入条约得由理事会全体一致通过，经议会同意，并得到所有成员国的批准。

加入前可先建立一种“联系”关系。最早的例子是1962年希腊与共同体之间签订的《联系条约》，条约规定通过一段过渡期消除贸易壁

垒，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并建立一个联系理事会。条约还预计希腊将最终加入共同体；经历各种变迁后，希腊在1981年终于成为了成员国。

很快，土耳其在1964年也签订了一个类似的条约，不同的是条约规定了一个22年的过渡期，而且没有明确的加入承诺，这反映了委员会对土耳其的怀疑态度。基于对该国人权、民主稳定性、低水平经济发展与高通货膨胀率等问题的担忧，这种怀疑一直持续至今；另外，土耳其人口达7,000万左右，且增长迅速，更使上述问题难以接受。土耳其在1987年便提出加入申请，但直到1999年欧盟才承认它的申请资格，不过仍然没有确定开始谈判的日期。

在20世纪60年代，葡萄牙与西班牙均不具备联系国资格，因为它们的政权与共同体相对立，而只有民主国家才是共同体合适的伙伴。但葡萄牙在1960年即成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的创始国之一。英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后积极倡导建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该联盟仅涉及贸易关系而不太关注成员国的政治局面。因此，20世纪70年代，民主政体取代独裁后，这两个伊比利亚国家都在没有经过联系国阶段的情况下，与共同体进行加入谈判。这就是为什么谈判拖得很长，直到1986年它们才加入的一个原因。而保护主义者的阻挠，特别是法国农民的反对，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地图2　欧盟、欧洲自由贸易区、欧洲经济区。

位置更北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的加入过程有所不同。英国、丹麦、挪威、瑞典与瑞士的共同体成员资格，没有受到政治的影响；奥地利则因其和平条约被排除在外。英国、丹麦、爱尔兰在1973年未经任何联系形式便加入。同时，共同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其他各成员国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当时冰岛还包括在内。后来还与

芬兰和列支敦士登分别在1986年和1991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1989年苏联的控制解除后，奥地利便立即申请加入欧共体。芬兰、挪威、瑞典与瑞士也不甘落后。德洛尔担心这会削弱共同体而想推迟扩大，提出了欧洲经济区（EEA）的建议，以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与欧共体国家包括进一个扩大的单一市场。但这5个国家不愿被排除在共同体决策之外，也申请加入；在现有自由贸易关系的推动下，经过一场短暂的谈判，奥地利、芬兰与瑞典于1995年加入。挪威的全民公决拒绝加入，瑞士则连欧洲经济区都拒绝加入。这样，瑞士继续维持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欧洲经济区只残留下一道痕迹，挪威、冰岛与列支敦士登则与欧盟建立了联系关系。欧盟囊括了几乎所有西欧国家，唯余塞浦路斯和马耳他，而这两国正在进行加入谈判[1]。

东扩

在整个冷战时期，欧盟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冷谈。苏联拒绝在法律上承认共同体，认为它强化了“资本主义阵营”。共同体则拒绝与受苏联控制的经济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进行谈判。1989年后，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中东欧国家转向共同体，将之看成为繁荣与民主的堡垒，并自然地向往加入。

情况最简单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受苏联控制的东德的自称。民主德国在1990年成了联邦德国的一部分，共同体迅速作出了必要的技术调整，以使扩大的德国能不加推延地承继德国的成员国资格。

至于中东欧其他新兴民主国家，共同体则与之签订了联系协定，并提供援助。援助通过旨在帮助中东欧国家转型的PHARE计划实施。该计划的重点是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的技术援助，例如教育与培训、农业以及一般的私营部门的结构改造。基础设施逐渐成为开支最大的单项援助，为单一市场作准备也得到了愈来愈多的重视。共同体预算对PHARE计划的投入达到了每年10亿欧元上下，另外还有来自成员国

与其他方面的捐助。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被建立，以促进对前苏联集团私营与公共部门的投资；此外，共同体的欧洲投资银行也一直在为该地区的项目提供资金。其他财政援助还包括将波兰共产党政权遗留下的440亿美元外债减免一半左右。

图16　柏林墙倒塌：柏林，1989年。

尽管有批评认为这些援助不及二战后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的援助那么慷慨，它们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被称为《欧洲协定》的联系条约。共同体在1990年即与开始向市场经济与多元民主转型的国家签订了协定，到1996年，与正在进行加入谈判的10个中东欧国家都缔结了此类协定。协定规定在长达10年的过渡期中，分阶段实现工业品自由贸易；削减某些农业保护；实现服务贸易、资本流通与开业自由化。贸易有了很大起色；在加入前景的刺激下，国外投资也在经济状况良好的国家得到很大的增长。协定还规定了广泛领域的“合作”，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PHARE计划的援助。各项协定都有机构来监督其执行，这些机构包括：由委员会、成员国政府

及联系国代表组成的联系理事会；由各方高级官员组成的联系委员会；由欧洲议会议员与联系国议会议员组成的联系国磋商委员会。这些机构还建立了一个论坛来进行政治对话。

联系协定的首批联系国希望协定将成员国资格作为最终目标确定下来，但各成员国的态度不一，法国尤其持怀疑态度。因此协定对此有些含糊其词。但法国后来也改变了主意，到1993年，那些达到了以下条件的国家获得了进行加入谈判的权利：稳定的民主制度、保护人权和少数族裔的权利、法治、竞争的市场经济，以及具有“承担成员国义务的能力，包括坚持政治、经济与货币联盟目标”。虽说政治联盟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意味，“成员国义务”的意义是足够清楚的——包括将将近10万页立法文件付诸实践的艰巨任务，其中大多数立法与单一市场有关。为缓解成员国对“扩大将导致弱化”的担忧，条件中还包括欧盟应该具有“在吸纳新成员的同时保持一体化势头的能力”。

匈牙利与波兰在次年提出了加入申请，到1996年另有8个中东欧国家提出了申请。到1998年，欧盟认为已有第一批5个国家取得了必要的进展，并于当年与它们开始谈判，这5个国家是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与斯洛文尼亚；开始谈判的还包括也已申请加入的塞浦路斯。2000年开始谈判的第二批国家包括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以及马耳他。考虑到完成谈判、批准与正式生效所需的时间，第一批国家预计将在2004年前后加入。

欧盟的 PHARE 开支在各受益国的分配 (1990—1998 年)

(*百万欧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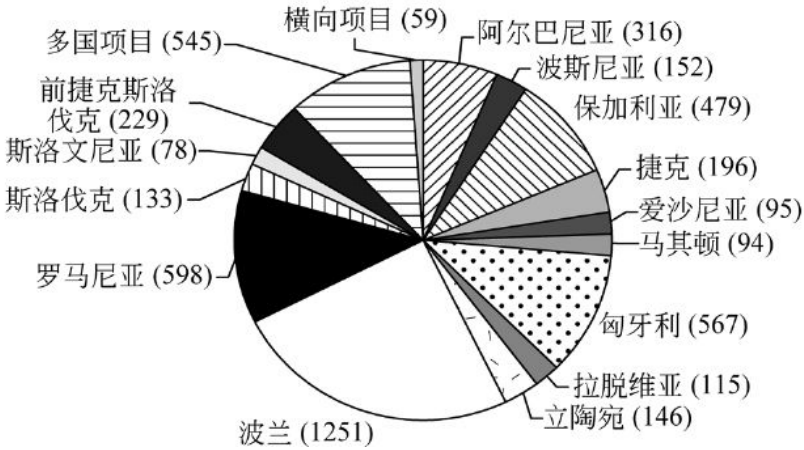

PHARE 开支在各领域的分配 (1990—1998 年)

（百万欧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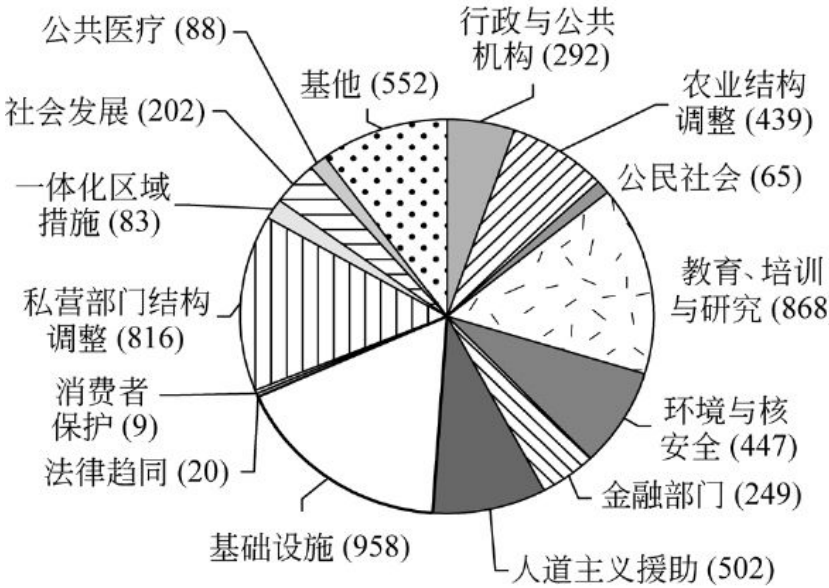

年均开支 6.21 亿欧元

与此同时，欧盟在自身“吸纳新成员的能力”上也在取得一些进展。共同农业政策需要改革，以应对东欧大量农民的加入；2000—2006年财政远景规划必须为更大的结构性基金提供资金。1999年3月，新当选德国总理的格哈德·施罗德成为轮值主席后，欧洲理事会柏林会议作出了一些必要的决定：增加结构性基金的预算，削减共同农业政策的支持价格——不过如第五章所述，这还不够，仍需另一轮削减。

将给新成员国的结构性基金拨款从2003年的58亿欧元增加到2006年的121亿欧元和将农业资助增至34亿欧元的同时，每年还有31亿欧元用于其他欧盟候选国的“加入前援助”。这些金额可能还不够。在第一批候选国中，波兰与爱沙尼亚的人均GDP尽管增长很快，但不及欧盟平均值的一半；而在第二批国家中，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

陶宛与罗马尼亚的人均GDP只相当于此平均值的四分之一。为保证这种悬殊不至于给欧盟带来过多压力，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但更为重要的是欧盟的机构改革。随着成员国数量超过20并增至30或更多，在那些政府间元素依然占主导地位和仍然存在否决权的领域中，及时和有效决策将变得愈来愈困难。2000年的政府间会议意在使机构为扩大作好准备。会议在限制委员会委员数量和增加大国在理事会表决中的加权票等事务上，确实达成了协议。但《尼斯条约》并没有将全体一致同意的实施范围缩小到能保证有效决策的地步，也没有使理事会与议会的共同议决成为与标准的民主程序相应的常规决策程序。然而，除非取得上述进展，否则当成员国数量随着下一轮扩大而增加，欧盟的前景——至少共同体支柱的前景——是堪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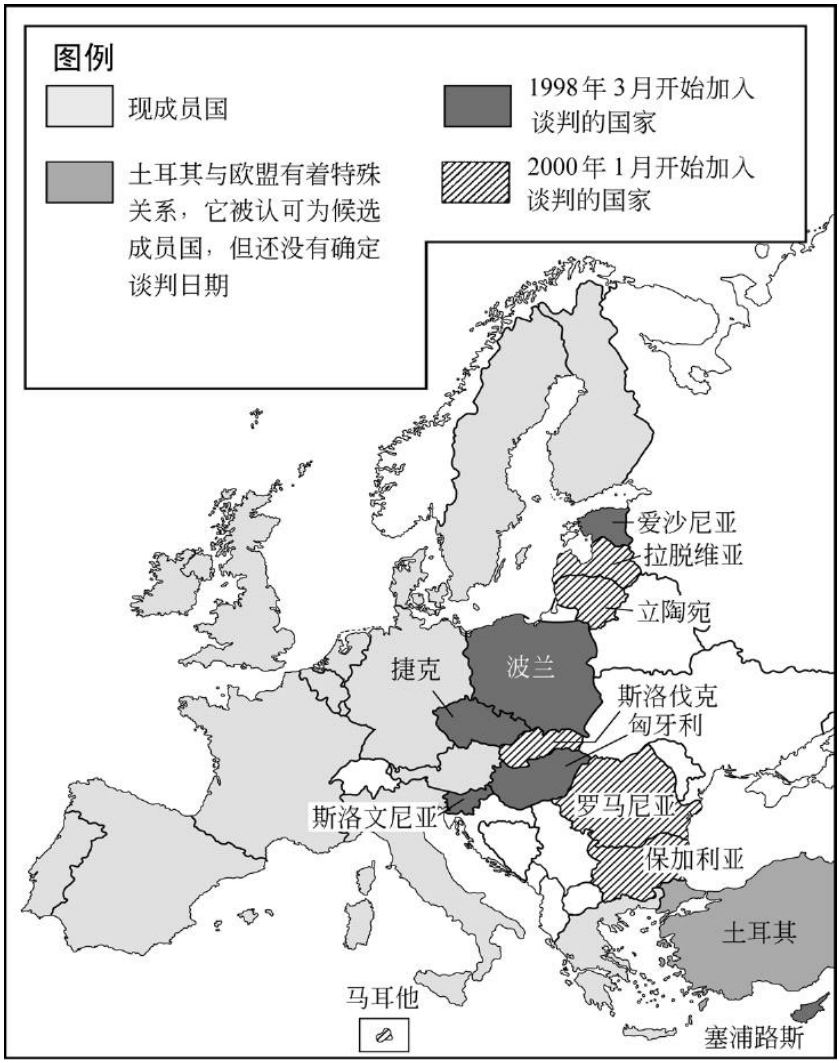
图例
现成员国
1998年3月开始加入谈判的国家
土耳其与欧盟有着特殊关系，它被认可为候选成员国，但还没有确定谈判日期
2000年1月开始加入谈判的国家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捷克
波兰
斯洛伐克
匈牙利
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
保加利亚
土耳其
马耳他
塞浦路斯

地图3　申请加入的国家。

欧盟与申请国的人均 GDP

（千美元，购买力平价， 1997 年）

卢森堡	30.2*	塞浦路斯	14.8
丹麦	23.6	马耳他	13.2
比利时	22.8	斯洛文尼亚	11.8
奥地利	22.1	捷克	10.5
法国	22.0	斯洛伐克	7.9
德国	21.3	匈牙利	7.5
荷兰	21.1	波兰	6.5
英国	20.7	土耳其	6.4
爱尔兰	20.7	爱沙尼亚	5.2
意大利	20.3	罗马尼亚	4.3
芬兰	20.2	立陶宛	4.2
瑞典	19.8	保加利亚	4.1
西班牙	15.9	拉脱维亚	3.9
葡萄牙	14.3		
希腊	12.5		

* 1996 年

（来源：世界银行）

西巴尔干国家

西巴尔干国家主要是指前南斯拉夫境内国家：克罗地亚、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马其顿，以及由黑山与塞尔维亚构成的现南斯拉夫[2] ——其中，科索沃在名义上仍然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阿尔巴尼亚也属此列；不过在最近有关欧盟政策的讨论中，曾是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之一的斯洛文尼亚没被列入，因为它已取得联系国与候选成员国资格[3]。

在解体之前，前南斯拉夫比其他任何中东欧国家都更接近共同体。接着便发生了它的解体与战争。美国最初想让欧洲来处理这些问

题。1991年上半年任欧盟部长理事会主席的卢森堡外长雅克·普斯，在出发去南斯拉夫前——当时冲突已经在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爆发——曾有句名言："这是欧洲的伟大时刻……。"由于斯洛文尼亚的塞尔维亚少数族裔只占人口极少数，斯洛文尼亚未经什么战争就取得了独立。但在有大量塞尔维亚少数民族聚居的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残酷的战争接连而起。而后的几年表明，尽管欧盟在经济上实力强大，它在动用武力上却无法有效地作出反应。普斯的名言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它不是美国的伟大时刻。"但他完全错了。[4] 即便英国与法国为去波斯尼亚的军队提供了人数最多的分队，20世纪90年代这个10年，却是美国人的天下，而肯定不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最初称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即CSCE）或联合国的天下。欧盟的经济与人道主义援助虽然很重要，但在受3场战争笼罩的这10年间，它却不免在北约特别是美国面前黯然失色。

欧洲政治合作在不那么困难的事务上还算有效，却没有能力处理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为独立国家这样的事务。尽管英国、法国和大多数其他成员国政府觉得过早承认有些危险，德国和一两个其他国家却倾向于支持它们独立。德国政府在1990年日益明确地表示，不管其他成员国希望如何，它将承认该两国，并在当年12月这样做了。随后，其他成员国决定跟进，以免显示欧洲政治合作的分歧；而这可能导致了动乱和尔后战争的爆发。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政治上的承认——如果还不是成员国的承认，那么至少欧盟的承认——应该成为欧盟的权限，并由特定多数表决来决定。

也有人觉得，如果及时地干预前南斯拉夫紧迫的经济问题，包括巨额债务，那么战争造成的耗费以及欧盟信誉受到的损害是可以被避免的。在此之后，欧盟一直是最大的援助提供者，每年出资约10亿欧元。它还帮助进行民事维和活动，例如监督选举、训练和部署警察、扫雷、反恐怖主义活动以及援助机构建设。彭定康为此而建议建立的欧盟"非军事快速反应设施"，与将在2003年前建立起来的军事快速反应部队一起，可以在欧盟现有力量的基础上，协助防止冲突。

彭定康与索拉纳还向2000年3月的欧洲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涉及面

更广的联合报告，总结了欧盟在西巴尔干国家的经验。他们批评决策缓慢、繁琐：在一项提议提交理事会前，得由成员国官员组成的两个委员会来审议；而理事会中的全体一致议决程序，使所能采取的行动只能是在“最一般化事务”的层面上。由于成员国的计划没有与欧盟的计划密切协调，因此事倍功半。最为危险的是，由于其预算程序（本书第八章作了概述），欧盟不能迅速和有效地兑现其承诺：成员国政府没有及时支付它们同意承担的费用；理事会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日常预算中开支这些费用（这些费用并未编入预算）的愿望，也难以按与紧急状态相符的快速反应来兑现。

经历了3次战争之后，欧盟现已启动了一项《东南欧稳定公约》，随后将与各个西巴尔干国家——包括现南斯拉夫，如果民主政体能稳定地在该国建立起来的话——缔结《稳定与联系协定》。支持此举的是一项对西巴尔干国家的援助计划，预计在2000—2006年间将耗资约55亿欧元，其中一半来自欧盟预算，一半来自成员国；援助款的五分之二将留给民主的塞尔维亚。1999—2000年成员国在科索沃战争与维和上的开支，估计不比2000—2006年援助计划的整个开支少多少；而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这个重要领域的进一步失败，将给欧盟声誉带来十分巨大的损伤，更不用说给西巴尔干人民造成的损失。月复一月的拖延使这种风险进一步加剧，然而目前调拨资金的决策依然极其缓慢。

不过，要是和平得到实现，《稳定与联系协定》加上援助计划应该能使这些国家继中东欧国家之后，最终取得欧盟成员国的资格。而这将为它们保证持久的和平与繁荣，前提则是欧盟本身能强化到足以接受30个以上成员国。

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

前苏联的3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苏联解体后拒绝加入俄罗斯组织的独联体，而是着手进行加入

欧盟的谈判。加入独联体的国家中，有6个可称为欧洲国家：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和俄罗斯本身。因此，如果满足了稳定的民主政体与竞争的市场经济的条件，这些国家可以申请加入欧盟。

拥有约1.5亿人口的俄罗斯是如此之大，甚至会颠覆整个欧盟的政治制度。因此它的加入，几乎不会比地域上不在欧洲但文化上属于欧洲的美国的加入更具可行性；换言之，那是不可能的。尽管其他5国可能最终成为候选成员国，但欧盟首先得面对吸收中东欧国家的艰巨任务，更不用说吸收土耳其了。独联体中的欧洲国家，经历了许多困难，曾经有70年的时间是作为苏联的一部分，它们面对着努力使自己转变为市场经济与多元民主国家的重大问题。因此至少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只能被认为是欧盟对外关系的伙伴，而不是潜在的成员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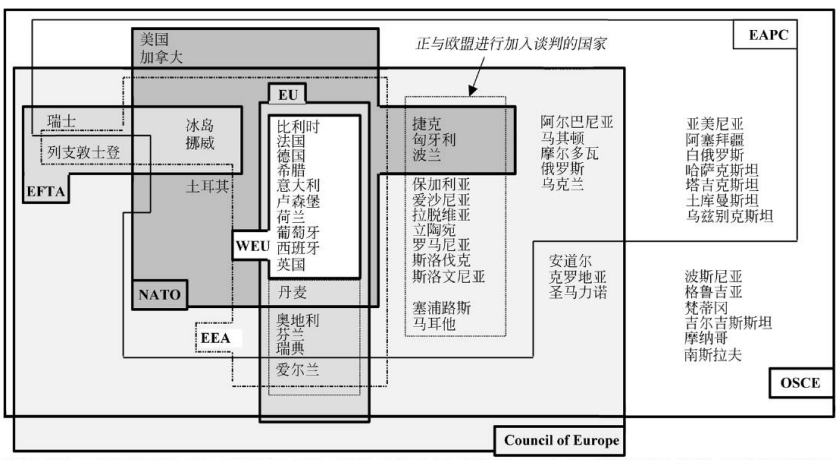

EAPC=欧洲-大西洋伙伴理事会；EEA=欧洲经济区；EFTA=欧洲自由贸易区；EU=欧洲联盟；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OSCE=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WEU=西欧联盟。

地图4　欧洲的构架。

乌克兰是具有约5,000万人口的一个大国，与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一样，它与扩大后的欧盟有着共同边界。欧盟应该尽力促进这些国家的稳定。但对欧盟对外关系构成重大挑战的是面临巨大困难、具有巨大潜力和拥有巨大核武器储备的俄罗斯。

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进行自由化改革后，作为回应，欧盟在1990年与俄罗斯缔结了一项贸易与合作协定，并同意对之提供经济援助。德国在而后的5年间提供了约400亿埃居的援助，包括一笔巨款作为对戈尔巴乔夫将俄罗斯军队撤出东德的回报。其他成员国与共同体一共提供了150亿埃居。共同体在1991年发起了一项援助计划，该计划在当年苏联解体后被称为对独联体国家的技术援助计划（TACIS）。TACIS预算约为每年5亿埃居，其中三分之一用于俄罗斯，十分之一用于乌克兰，四分之一强用于地区计划，其余用于其他11个独联体国家。该计划着重支持企业结构调整与发展、行政改革、社会服务、教育等，而最大的项目是占地区计划很大一部分的核安全。

对俄罗斯而言，进入欧盟市场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的出口产品主要是欧盟并不征收关税或规定配额的石油、天然气、木材、钻石与其他材料，唯有钢铁等产品曾被征收过反倾销税。为鼓励工业品出口，欧盟对独联体国家提供关税优惠。其后欧盟与独联体国家间还缔结了大范围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其内容与《欧洲协定》有些类似，但有重要的不同：要到独联体国家经济转型进一步取得进展后，自由贸易才可“最终”实施；鉴于协定中提及的合作主要靠比PHARE项目的规模小得多的TACIS项目进行，因此也就更为有限；协定中没有提及欧盟成员国资格；而由于不存在加入欧盟的前景，其联系机构虽说与《欧洲协定》的机构相仿，却没有那么多实质性问题可讨论。但因为欧盟 - 俄罗斯关系的重要性，与俄罗斯的联系关系应该是例外。

TACIS 开支在各领域的分配 (1991-1997 年)

（百万欧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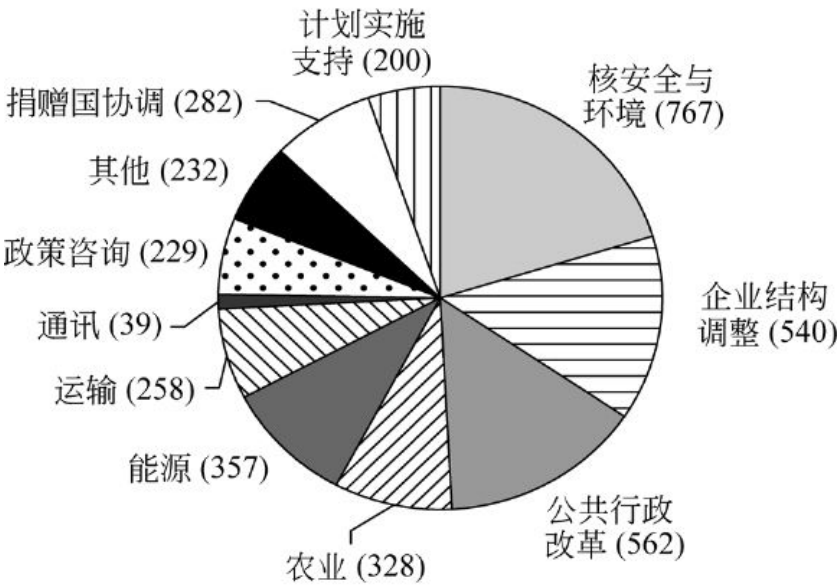

年均开支 5.42 亿欧元

与欧盟签订协定的独联体国家

欧盟与下述国家签订了《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

亚美尼亚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联邦
阿塞拜疆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克兰
白俄罗斯	摩尔多瓦	乌兹别克斯坦
格鲁吉亚		

由于俄罗斯政治的不稳定以及经济缺乏坚实的法律与行政体制，

欧盟与它的关系并不一帆风顺。北约扩大至接纳波兰、匈牙利与捷克已造成了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而波罗的海三国追随它们加入的可能性，更是潜在的紧张局势的来源。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使欧盟这一方感到不快。不过俄罗斯对欧盟及其扩大并无恶感，而与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也将使欧盟获益匪浅。弗拉基米尔·普京是比鲍里斯·叶利钦更加高效的一位总统；所有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能多远和多快地实现其必要的经济与政治进步。但要对此进展作出重大的贡献，是欧盟共同外交、安全政策，最重要的是对外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如果可以与俄罗斯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那将是欧盟欧洲政策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注释

【1】 该两国也已加入欧盟。

【2】 2006年6月3日，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塞、黑实现和平分手。

【3】 斯洛文尼亚已在2004年5月成为欧盟成员国。

【4】 普斯有关“欧洲时刻”的讲话，见《纽约时报》1991年6月29日第4版报道。

第十章
欧盟与世界

共同体显示了通过何种途径“联邦机构可以将高度发达的国家联合在一起”，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如何“构建一个更加繁荣与和平的世界”的榜样。这是让·莫内1954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向学生表达的希望。[1] 现在已很少有人心存如此崇高的目标。和其他国家一样，欧盟所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不过其中确实包括构建一个繁荣与和平的世界。那么撇开其榜样之说不谈，其行动又为此作了哪些贡献呢？

共同体作为贸易大国

从马歇尔计划到共同体的诞生与初期发展，美国为欧洲的联合提供了资助。莫内则报以一个日益平等的欧共体 - 美国伙伴关系的主张。在执行共同对外关税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后不久，美国作出了回应，发起了《关贸总协定》的肯尼迪回合贸易自由化谈判。在经历了5年的艰难谈判后，终于在1967年达成了双方平均削减关税三分之一的协定。

如果不是因为共同体有了共同关税这个对外政策手段而成为与美国地位平等的贸易伙伴，是不可能削减关税的。正如华盛顿的一位观察家所说的那样，欧共体“现在是《关贸总协定》中最重要的成员国”和进一步贸易自由化努力的关键。[2] 在而后的《关贸总协定》各个回合谈判中，随着战后时期美国创造冲力的减退，欧共体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在最近的“乌拉圭回合”（1986年于乌拉圭开始、1994年结束）谈判中，共同体扮演了主角。由于大多数工业品关税已经很低，因此谈判重点转向了非关税壁垒；而在这方面，单一市场计划使共同体在处理贸易自由化的技巧上，掌握了非凡的经验。在以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上，它的经验也发挥了作用。世贸组织拥有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更为宽泛的职能，并具有更大的解决争端的权力，也许是朝着验证一个说法迈出了一步，即欧共体作为“有效国际立法范例”或许可以在某个阶段“在世界层面上再现”。[3]

当然，共同体的贸易关系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远远不是如此。其间存在着通常的利益冲突，至少是参与者自认为属于它们的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农业总是争端的焦点。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农业政策，损害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与美国等贸易伙伴的利益。前3个国家原本在英联邦优惠制度下可以免税出口农产品到英国，因此它们受损尤甚；在英国加入共同体后，除了新西兰黄油配额等少数例外，它们的农产品面临着共同农业政策保护主义的沉重打击——要是英国在《罗马条约》谈判时就加入，这种打击原本可以避免。直至20世纪90年代共同体开始实施一些重要的改革，将对某些重要产品的保护水平削减了将近一半，这种损害才有所缓和。各国在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将在下个回合谈判中消除阻碍贸易的出口补贴。这对共同体将是一个严峻挑战。

共同体与美国在农业上趋于接近，但在环保、文化与消费者保护等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欧洲实行的标准限制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则认为那是贸易保护主义。转基因生物、经过激素处理的牛肉、高噪声飞机发动机、数据隐私、电影与电视节目等，都是争议所在。人们希望世贸组织将建立一种监管体制，使此类冲突不致失控。

与此相反，随着在《关贸总协定》框架下接连几个回合的关税削减，共同体特惠制所引起的摩擦得到了缓解。此制度涉及面很广，几乎包括了整个欧洲与第三世界，排除在外的只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南非与美国等少数国家。欧共体为一些特定国家提供的优惠，使美国大为光火。另一方面，特惠制使欧共体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关系；欧盟在重启世贸组织结构内的首个回合谈判上能作出何种贡献，将是对这种关系的价值的检验。1999年末在西雅图举行的世贸组织首次会议以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而告终，主要就在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包括美国与欧盟在内的一些国家想将环保与劳工标准纳入议程，而第三世界国家则不同意。

欧共体、《洛美协定》、欧洲-地中海进程

虽说与美国的关系对所有成员国都很重要，但各成员国与世界大多数其他地方的某些国家也建立了特殊的关系；许多此类关系已成为整个共同体所共有。

与许多其他事务一样，这种关系也是源自《罗马条约》。法国希望给其殖民地以优惠，并将此作为批准该条约的条件。为此，整个共同体同意来自这些地区的产品免税进口，并通过欧洲开发基金（EDF）对它们提供援助。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的领地也同样如此。据此建立的“联系关系”，就是现今《洛美协定》的雏形。迫于法国的压力，共同体还与摩洛哥和突尼斯签订了优惠协定；这些协定是目前与地中海国家所达成的意义深远的那些协议的先行者。

在前殖民地取得独立后，与之的联系关系变为一项具有联合机构的《洛美协定》，其中包括部长理事会、大使委员会与议员大会。随着英国的加入，非洲、加勒比海与太平洋沿岸的英联邦国家纷纷加入了《洛美协定》谈判。这使参加国家扩大到包括大多数非洲国家、加勒比海岛国以及一些太平洋岛国，并被统称为非加太国家。协定消除了殖民制度的某些残余，并将援助提高至20世纪90年代的每年30亿欧元的水平；协定还提供资金，以缓解联系国因出口收入下降而受到的冲击。

欧盟商品贸易的区域伙伴 **(1998** 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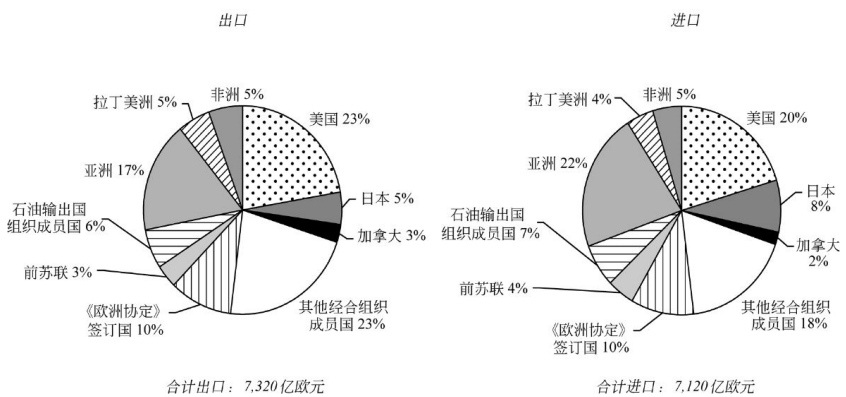

《洛美协定》的参加国为数众多，其联系国在本世纪之交达到了

71个，包括除南非和地中海国家之外的所有非洲国家。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非，在废除种族隔离后也有了建立正式关系的资格，而一项双边的贸易与合作协定被视为比《洛美协定》更加合适：它可促进南非经济的成功，这对非洲南部的未来以及对世界范围的种族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欧盟的外交政策机构过于无力，竟然无法将具有如此显而易见的迫切性的政治问题转化为必要的行动，致使此协定的谈判持续了5年之久。

2000年，《洛美协定》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第五次续签。由于《关贸总协定》接连几个回合的关税削减，联系国享有的优惠幅度被降低，它们有所不满；欧盟感到担忧的是，投入了巨额援助，但至少部分是因为治理不善，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情况还是很糟糕。然而，顺利续签第五个《洛美协定》，于双方都利益攸关：对于欧盟的联系国，这意味着援助计划将延续下去；对于欧盟成员国来说，协定将良好的治理作为分配援助的一个标准，而且联系国必须使它们的经济为在20年后与欧盟结成自由贸易区作好准备。此外，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欧盟在对外关系中愈来愈强调人权，《洛美协定》要求其参加国尊重这些权利。

欧盟的《洛美协定》伙伴

《洛美协定》将欧盟与 71 个非洲、加勒比海与太平洋 (ACP)国家联系起来，对它们出口至欧盟的产品予以免税或优惠，并援助它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安哥拉
安提瓜与巴布达
巴哈马
巴巴多斯
伯利兹
贝宁
博茨瓦纳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佛得角
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
乍得
科摩罗
刚果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科特迪瓦
古巴
吉布提
多米尼克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
赤道几内亚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斐济
加蓬
冈比亚
加纳
格林纳达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
海地
牙买加
肯尼亚
基里巴斯
莱索托
利比里亚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里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莫桑比克
纳米比亚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卢旺达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内加尔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
苏里南
斯威士兰
坦桑尼亚
多哥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图瓦卢
乌干达
瓦努阿图
西萨摩亚
赞比亚
津巴布韦

第五个《洛美协定》（2000-2020年）

欧盟与非加太国家（见本书334页方框文字）于2000年协议第五次续签《洛美协定》，协定有效期为20年。协定每5年可修订一次，援助议定书也以5年为期。非加太 - 欧盟部长理事会每年会晤以审查协定落实的情况。

· 贸易 为协定的核心。欧盟与各个非加太国家就“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将在2008年前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以期在2020年前建成欧盟 - 非加太自由贸易区。同时，对出口至欧盟市场的商品继续实行免关税或优惠政策。

· 援助： 除已经调拨但尚未使用的95亿欧元之外，最初7年的援助定为135亿欧元。将对妥善利用援助的国家予以奖赏。

· 减少贫困 应是发展战略中的优先目标。

· 鼓励非国家行为者 参与发展进程。

· 政治对话 表现了欧盟更为务实的态度：以良好的治理、尊重人权、民主原则与法治为援助政策标准，并采取行动防止腐败。

欧盟对前四个协定由于许多国家治理不善而成效不佳感到失望，这影响到了第五个《洛美协定》的签订。鉴于此，要发展欧盟 - 非加太自由贸易区将非常困难。

欧盟的“欧盟–地中海”伙伴

出席欧盟–地中海会议的包括欧盟与12个地中海国家，目标是在2005年前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

阿尔及利亚	约旦	巴勒斯坦
塞浦路斯 *	黎巴嫩	叙利亚
埃及	马耳他 *	突尼斯
以色列	摩洛哥	土耳其

利比亚具有观察员地位。

*已成为欧盟成员国。

到70年代末，共同体已形成了一个协定网络，对地中海周边的国家提供优惠和援助。这些协定的内容与《洛美协定》相近，但没有建立多边机构。此网络包括所有北非国家（除了拒绝参加的利比亚）、以色利、黎巴嫩，以及距地中海稍远的约旦与叙利亚。

到90年代，这些国家大多经济困难、政治动荡、人口迅速增长，向欧洲移民的压力因此而增加，引起了欧盟——特别是其南方成员国——的日益担忧。在欧盟决定接纳中东欧国家加入后，采取有力行动的机会来了。德国对扩大的关注似乎更甚于法国、西班牙与葡萄牙。为了增强与这些南方伙伴国在入盟政策上的合作，德国准备同意一项宏大的计划，来支持欧盟的南部邻国。其结果是1995年在巴塞罗那举行了一次欧盟及其地中海伙伴国的部长会议，会议发起了“欧洲 - 地中海进程”。

欧盟对此进程所作的贡献包括强化其给地中海伙伴国提供的优惠，以及推出一项每年约1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等；而伙伴国同意为在10年后与欧盟结成欧洲 - 地中海自由贸易区作好准备。此进程还构想了召开部长联合会议，但鉴于伙伴国家间的政治分歧，这已证明难以成行。对与此地区的关系，欧盟已注入了许多外交努力，希望能在不

过于分散其对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注意的同时，产生而且也必须产生某些效果。

亚洲、拉丁美洲与普惠制

在加入共同体时，英国为非洲、加勒比海与太平洋的英联邦国家争取到了令人满意的条件。但对于印度、巴基斯坦（当时还包括孟加拉）、斯里兰卡、马来西亚、香港[4]和新加坡这些亚洲英联邦成员——根据英联邦优惠，它们大多可以向英国免税出口——英国没有为之达成特别的协议。不过造成的损害有限，因为在1971年共同体率先采取了普惠制（GSP），对没有从《洛美协定》或地中海协定中获益的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产品，都提供了进口优惠。这减少了对大多数亚洲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区别对待。普惠制并不如听起来那么优惠，因为它对“敏感”（亦即竞争性）产品实施配额，将每种产品和每个成员国的优惠限制在预先确定的数量上。不过普惠制还是有助于加强共同体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

欧盟、美国、日本等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
(199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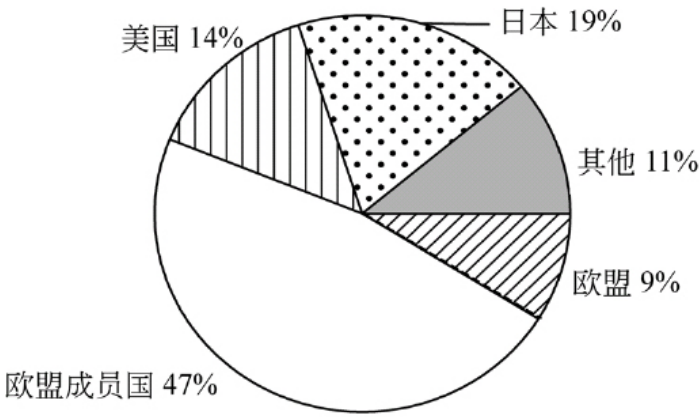

注：不包括人道主义援助

欧盟及其成员国发展援助的受益地区
(199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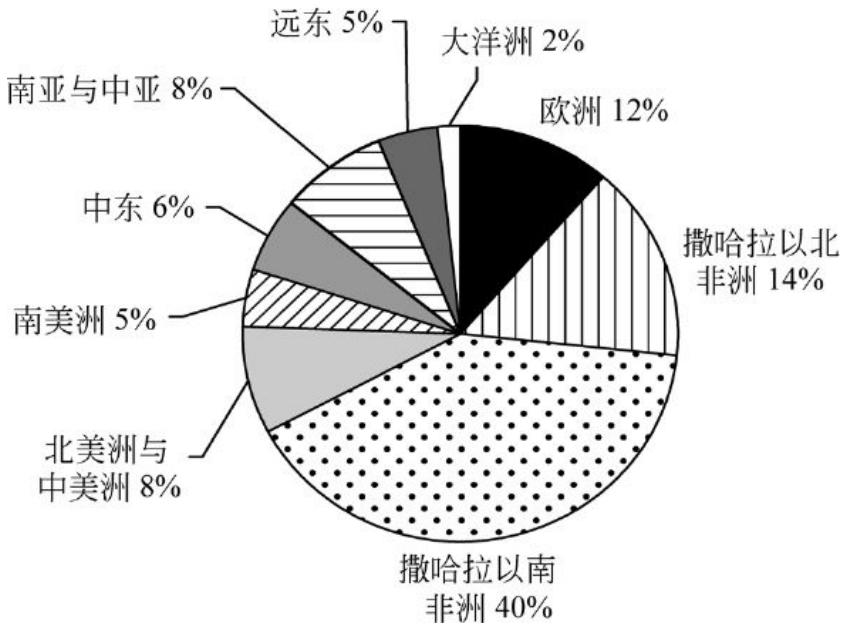

随着关税水平的普遍下降，普惠制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的优惠幅度降低了，但这些国家与欧盟的联系却由于援助计划而变得日益重要。到90年代后期，援助——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和对非加太国家与地中海国家的发展援助——达到了每年约60亿欧元。共同体还与包括印度、墨西哥与巴西的主要第三世界国家，缔结了双边贸易与合作协定，加强了与它们的联系。它还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区域集团签订了协定。1986年葡萄牙与西班牙加入以来，它们与拉美国家的特殊关系，也纳入了其他成员国与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关系网。

欧盟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协定与联系

欧盟与下述国家有《贸易与合作协定》：

阿根廷	墨西哥	韩国
巴西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智利	巴拉圭	乌拉圭
哥伦比亚	南非	越南
印度		

欧盟与下述地区集团有联系：

安第斯共同体（南美）	海湾合作理事会
南方共同市场（南美）	东南亚国家联盟
圣约瑟集团（中美）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欧盟的普惠制面向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

尽管这些协定、优惠和援助对经济的影响难以衡量，甚至可能成效并不太显著，但欧盟在政治上赢得了认可，这可能有助于其今后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发展。

货币、安全、环境

虽说共同关税使共同体成为可与美国匹敌的贸易伙伴，但在欧元出现之前，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并没有可与美元抗衡的货币手段。挑战美国霸权是法国长期以来支持单一货币的动机之一；美元汇率的波

动也使其他成员国不安。美元的疲软先是打乱了共同体在70年代初期创建单一货币的尝试，然后促使欧洲迈出了货币一体化的第一大步，在1979年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在80年代，美国旨在抑制通货膨胀的高利率政策，诱发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危机，延误它们的发展达10年之久。

当掌握着优势货币的人们，面临着或是应对本国问题或是考虑其选择对他国经济影响的抉择时，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本国的利益。欧洲在90年代也经历了这种时刻，那时德国为控制统一后带来的通货膨胀而采取了高利率，但在优势马克的影响下，其他国家的经济衰退加速了。这对促使人们支持单一货币以及一项满足参加国整体需要的货币政策，又加了把力。尽管这还不足以对付美元在世界体系中的统治地位，欧元的抗衡作用却可以提供一种次佳的解决途径。

因此欧元是有着不同经济周期的另一个货币来源，可以在美元走势对其他国家不利时抵消美元的影响。更为积极的是，虽说欧盟的货币政策最初是对内的，欧元却可以成为有利于国际货币稳定的汇率政策的基础。不过由于执行该政策的责任分属欧洲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长理事会，安排方式存在问题，欧元的作用因此而大打折扣。欧元也可以和美元与日元一起，发起一种稳定货币汇率的国际制度；但在这方面，它的体制缺陷更因为各国财长对此类决定拥有的否决权而雪上加霜。如果不进行适当的体制改革，欧盟将不可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担负起重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欧盟各成员国的表决权加起来将近美国的两倍；但如果它们不以一个声音提出共同政策，欧元也不可能在其中施加应有的影响。为此，欧盟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充分利用欧元提供的机会，像共同贸易政策很久以前便在贸易方面做到的那样，以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取代美国霸权。

然而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的防务霸权仍将不可撼动。欧盟不仅得对任何独立于美国战略力量的尝试承担巨额开支，由此而建立的军力还得由一个稳定的欧洲民主国家来控制，而这还需数年可靠决策的支持。因此欧盟仍然需要美国领导下的北约战略屏障，它在防务领域的努力将局限于能对维持和平——更为雄心勃勃的是，

对调解——作出贡献，尤其是在由联合国发起的行动中。为保卫欧盟的领土不受任何严重的威胁，欧盟将继续依赖美国的保护。

毋需军事力量的软安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欧盟有充分的能力通过民事手段对防止冲突和维持和平作出贡献。它在前南斯拉夫已经获得了有关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如彭定康所建议的非军事快速反应能力那样的设施，可以很快建立起来。通过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达成的此类共同立场，也能发挥作用。但除非欧盟有更好的方式为此提供资金，且取消相关决策中的否决权，否则它动用诸如非军事快速反应设施等共同手段的能力，将仍然存在严重缺陷。

环境也可以被看成是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的破坏是对世界人民的福祉乃至生命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如同我们在第六章所了解的那样，欧盟在处理此类问题的国际行动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控制破坏臭氧层的全氯氟烃上采取主动，并在限制使用引起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特别是因使用煤炭与石油而排放的二氧化碳）的京都谈判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京都协议》规定的温室气体排放削减量大约只相当于欧盟建议的一半，美国的反对是主要原因。美国还以第三世界国家也接受该协定作为其批准该协定的先决条件。但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拒绝接受该协定，除非对它们提供充分的援助，以帮助它们采用必要的环保技术来保持经济发展；美国则拒绝接受这个条件。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密切关系的欧盟，或许更能理解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和可持续发展援助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由于欧盟的决定在成员国中并不能以法律手段强制执行，它本身能否执行温室气体的削减还是个疑问；而且它的国际谈判方案也因为有关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决定可被否决而遭削弱。然而京都谈判显示了欧盟在这方面的潜力。在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带动下，欧盟成员国已位居最具环保意识的国家之列。假以适当的体制改革，欧盟也许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来达成国际协议，应对否则可能无法解决的问题。

欧盟对世界的作用

美国霸权过盛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是危险的。这种重担不是一个国家所能独力担负的，而只有欧盟，在经济、环境与软安全方面（但不包括防务），至少有潜力可作为其对等伙伴。欧盟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成就表明了强有力的机构运用共同手段能有何作为。

欧元奠定了欧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类似作用的基础，但这要求负责对外货币政策的机构必须进行适当改革。欧盟也大有能力在全球环境保护方面采取行动，尽管它在这方面的权力也需要加强。欧盟在包括非军事维和行动在内的软安全上能力正在增强，可以对美国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起到必要的平衡作用；而欧盟正在创建的军事手段，也使其有机会在军事上发挥补充作用。

图**17**　两位领导人会晤：克林顿与德洛尔。

其他大国将在21世纪出现，形成一个多极的世界。对一直高踞权力顶峰的那些国家，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权力关系的这种变迁总是很难的。如果美国已经适应了与欧盟在贸易上以及其他方面的平等伙伴关

系，那么它将更容易适应这种变迁。而欧盟与北半球和南半球国家都建立了关系网，将处在一个有利的地位，能推动建立一种可以顺应大国崛起这一新局面的稳定的世界体系。

欧盟自身在机构、政策与立场事务上的经验，帮助其成员国和平共处达半个世纪之久，再加上其在世界范围的关系网络，应该有能力影响其他国家朝着相似的方向前进。不过莫内所认为的此类机构可能有助于开创一个繁荣、和平的世界的想法，只能在相当苛刻的条件下实现。只有在愿意接受共同法治，并有能力建立共同立法机构进行立法和有能力形成一种政体以依法贯彻政策的多元民主国家，才有可能实现必要的主权共享。这些条件很大程度上在欧盟内已经具备，但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并不存在。尽管欧盟可以帮助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变得更为有效，但除非多元民主成为整个世界的常态，否则共同体类型的全球机构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但以此为目标的欧盟政策，符合其国家与公民的长期利益；因此即便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段，欧盟的经验表明，启动一个朝着这个方向的进程，可能已经开始改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注释

【1】 以共同体“为榜样”之说，见让·莫内：《建设中的欧洲合众国：1952—1954年讲演》（巴黎，1955年，第128页）。

【2】 欧共体作为“《关贸总协定》最重要的成员国”之说，见劳伦斯·克劳斯：《欧洲经济一体化与美国》（华盛顿，1968年，第225页）。

【3】 欧共体与“有效国际立法”之说，见托马索·帕多阿–希奥帕：《欧洲金融与货币一体化：1990、1992与以后》（伦敦与纽约，1990年，第28页）。

【4】 香港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自1842年起由英国租借，至1997年，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第十一章

尚算圆满，但今后如何？

自《舒曼宣言》启动建立欧盟的进程以来，欧盟在这半个世纪中已经取得巨大进展。欧盟成员国已经包括几乎整个西欧，不久还将包括中欧与东欧的大部分；它们之间的战争事实上已经不可想象。本书的前面章节告诉我们，在这50年中，机构、权力与政策已经确立，以处理单个国家的政府无法处理的事务。现在我们可以试着总结一下欧盟已经做了什么，并探索其未来又将如何。

权力及手段是否与目标相称？

欧盟在拥有行动的权力与手段的领域，便有能力实现其目标。这种权力和手段可以是法律的，例如单一市场机制；可以是财政的，例如预算和共同对外关税；可以是金融的，例如援助计划和当前的单一货币。建立在成员国权力和手段基础之上的合作也很有益，但如果没有共同权力与手段的核心，这种合作不会有多大作为。

尽管单一市场立法在一些领域并不完善，而且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以适应电子商务与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经济，但它为经济发展与繁荣提供了一种架构。单一货币则在货币领域中完善了单一市场，尽管目前它并不应用于所有成员国。

欧盟预算将资源注入到那些被认为需要支持的部门，最初是农业，但愈来愈多地是向欠发达地区与成员国。农业开支曾造成成员国间的冲突，援助较贫困地区的结构性基金则得到了更为普遍的赞同。即将向中东欧的扩大会带来增加结构性基金的压力，但可能并不一定需要大幅增加欧盟获取税收的权力。

因此，在经济领域，欧盟并不需要增加太多的权力。在环境方面也是如此——它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权力，而是使用现有的权力来制定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根据辅从性原则，体现于福利国家之中的社会政策属于成员国的权限范围。该原则许可欧盟在某些与就业有关的社会政策方面进行干

预，例如规定不得以通过降低劳动健康与安全标准来进行社会倾销。在包括社会安全在内的一些事务中，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那些希望建立欧盟统一标准者和那些认为扎根于不同社会文化的差异不容干涉者之间，存在着分歧。目前双方意见仍不一致，但后一种观点一直占据上风。

利益集团与联邦主义者推进着经济与环保目标及相关权力的实现，以及工人跨内部边界的自由流动。而推进所有人员在欧盟内自由流动的，却是除丹麦、爱尔兰与英国外所有成员国都接受的联邦观念。不过所有国家都参与了打击跨界犯罪的措施。在对外关系方面，欧盟的权力旨在保护和促进共同利益，包括国际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最有力的手段是接纳其他欧洲国家加入，从而使之整个参与欧盟的机构和分享权力。这应该能在若干年后使欧盟的稳定与繁荣区域扩大到包括欧洲的大部分。

在对外贸易上拥有的权力，加上共同对外关税这一手段，使欧盟有能力不仅在国际自由贸易中将美国霸权转变成欧盟 - 美国伙伴关系，而且还能促进自己的利益。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农业政策则背道而驰，损害了欧盟与某些贸易伙伴的关系；尽管纠正这种扭曲的改革来得十分迟缓，但它们正在逐步完成。欧盟将优惠政策与援助相结合，加强了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除了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发挥影响，欧盟还利用其在环保方面的力量，在保护臭氧层和控制全球变暖的国际谈判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欧元的诞生使欧盟拥有了一种潜在的可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施展的有力武器。但除非它在对外货币政策上作出必要的机构安排，否则在此领域中欧盟将美国霸权转化为伙伴关系的潜力，就不大可能实现。

在防务上，欧盟军事一体化的渐进途径，并非旨在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这一既成事实，但应该可以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服务于欧盟的利益。倒是在非军事层面，包括在民事维和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环保与政治领域对欧洲及世界的稳定作出的贡献上，欧盟可与美国的力量互补。欧盟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可以通过在除防务外的所

有领域建立平等的欧盟 - 美国伙伴关系，促成由美国在全球的霸权格局向今后必须发展的多极世界体系过渡。目前，欧盟并不需要太多新的权力来完成这一使命，它需要的是进一步改革机构，以便能有效地行使已有的权力。

机构：如何有效？如何民主？

欧洲怀疑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若不将向欧盟移交权力和改革欧盟机构加以区分，“更加紧密的一体化”是不可取的。然而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只有在欧盟可以更好地服务其公民而各成员国无法做到时，才有理由向其移交权力；而除了在防务上，欧盟已经具有辅从性原则所赋予的大多数权力。然而，权力一旦移交后，除非由强有力的民主的欧盟机构来行使，否则它们不可能服务于公民的利益。

政治机构需要一种法治的环境，在属于共同体权限的事务上，法院会确保法治的存在。

然而，在普遍实施全体一致议决的场合，理事会则不那么有效；单一市场立法在实施特定多数表决前的不足，证明了这点。鉴于特定多数表决现已适用于五分之四的立法和所有预算，理事会已变得更为有效。但在将特定多数表决进一步应用于所需领域上，《尼斯条约》只起了部分作用。在欧盟尚有赖于利用成员国的手段的场合，例如在防务上，全体一致议决和增强合作仍然是实际可行的程序。但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在诸如联系与加入条约、机构某些重要职务的任命以及汇率安排的国际协议等依然实施全体一致议决的事务上，人们对欧盟采取行动的能力必将有越来越多的质疑。

委员会在履行其作为共同体执行机构的职能方面拥有实权，但在确保成员国切实执行共同体委托它们执行的任务上有所不逮，而且理事会与小组委员会网络的干预也影响着委员会执行共同体决策的有效性。在1999年3月欧洲议会迫使委员会集体辞职之前，委员会自身的管理文化也成了它的一个严重缺陷。不过新委员会开始进行的改革，

应该会带来重大的改进。

议会在迫使前委员会辞职中起到的作用，显示了民主约束如何可以对有效性作出贡献。但议会在立法和预算上的影响依然受到条约的限制，而条约只是规定在大约半数的相关场合，由它与理事会平分权力。理事会对占预算一半的农业开支保留了控制权，但其作为很难说是杰出的。议会在它与理事会共同决定的另一半预算以及一半立法上，表现值得称道。

《尼斯条约》在扩大共同议决的实施范围方面几乎无所作为，这是个严重的疏漏。要是共同议决还是不能加以完善，欧盟将是在忽视争取公民支持的一种必要手段。除非公民能既忠于其国家又忠于欧盟，否则他们可能成为离心力。代议制民主系公民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它的辉煌历史是不明智的。要是公民觉得议会并没有与理事会处在平等地位，他们不可能将它看成是足够重要的代表途径。代表各国的理事会也是欧盟立法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即便它向公众开放其立法会议，理事会仍将由于其含混不清的半外交谈判制而备受关注。从长远来看，公民在一个强有力的议会中有其代表，是他们支持欧盟的必要条件。

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的有关规定取得了成功，这表明公民权如何可以唤起公民对欧盟的支持。条约不但要求各机构尊重《欧洲人权公约》，还规定了一些大多与劳动有关的其他权利。由欧洲议会议员、成员国议会议员以及各国政府代表起草的《基本权利宪章》，受到了欧洲理事会尼斯会议的欢迎；这对公民有好处，只是宪章的法律地位仍有待决定。但对所有公民而言，最重要的是欧盟在处理他们所需事务上的有效性。欧盟必须让人们看到，在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刻，包括即将到来的扩大，它将采取类似行动。

灵活性与联邦制

第二支柱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加入了灵活性，成员国可以自由

选择是否参加共同立场或行动。只要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仍要依靠成员国间的合作并利用成员国的政策手段，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灵活性使第二支柱比共同体支柱低效得多。不过，《阿约》提出了所谓的“增强合作”程序，对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共同体行动作了规定。

回顾共同体最初成立之时，6个发起国中的许多人将增强合作看作是让核心成员国再度前进的途径。犹豫不决的伙伴可而后再跟进。根据这种观点，英国与丹麦是主要问题所在；不过也有人担心中东欧国家可能会妨碍欧盟的发展，除非先行集团可以不必等待它们而继续前行。但《阿约》与《尼斯条约》所预见的增强合作，不可能产生先行集团，而只会造成不同国家集团的选择参加或不参加。对各个国家集团分别实施的立法愈来愈多，势必削弱共同体内的法治、单一市场的经济效率以及公民对欧盟的理解。如果共同体在其权限范围内已取得必要的权力，那么并不值得为不怎么重要的立法动议而冒此风险；而且共同体事实上确实拥有这些权力，但成员国可以选择不参加单一货币体系是一个重要的例外。

英国选择不参加是关键所在。人们对英国游离于欧元区之外一直颇有争议。对此，笔者的立场很明确：英国应该参加。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个重要成员国不参加一项主要的计划，同样会削弱欧盟并增加新成员国步其后尘的风险，一般来说会使欧盟分崩离析，除非欧元区的核心确实构成了一个一体化的先行集团。一个瓦解的欧盟必然造成一个不稳定的欧洲，一个英国逐步被边缘化的欧盟也必然使英国与伙伴格格不入；这两种前景都不符合英国的利益。与其如此，倒不如像挪威与瑞士那样，与欧盟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关系。

民意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英国人反对加入欧元区，但80%的人预计英国会在2010年前加入。这样的消极接受而不是积极参加，一直是英国对欧盟的典型反应；公民的态度正是政界人士推迟加入共同体和而后的某些发展计划所致，而这种消极接受损害的是英国、某些英联邦国家以及欧盟本身的利益。与此相反，英国参加单一市场计划是积极的，从而使英国和其他成员国都受益。因将自我排除在欧元区之外而造成的困境，将很可能被看成是由拖延而造成的损害的另一个例

子。[1]

自1997年以来，托尼·布莱尔政府表现出更为合作的迹象，试图打破这种勉强接受和选择不参加的模式：发起了英 - 法防务倡议，推动欧盟的新经济政策，总的来说对欧盟也更为拥护。但似乎依然令人不可理解的是，一旦接受了欧元之后，除了渐进的防务作用外，“更紧密的一体化”只很有限地涉及欧盟的权力，而主要是与完成使共同体机构更加有效和民主的进程有关；在此方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即欧洲议会需获得充分的共同议决权。

英国对机构改革进程的理解因为其对“联邦制”字眼的误解而模糊不堪。在其他国家，联邦制通常指其狭义，即包括两个或更多层次的民主政体，使各级政府更接近民众，并因循辅从性原则，担负起它们能有效行使的职能。

在英国，由于我们特殊的宪法发展史，“宪法”这一字眼听起来也有些吓人。其实宪法不过是一种手段，使游戏的原则与规则不仅让政客与律师明白，也能让其他公民理解，其实质是要使欧盟机构有效和民主。有关宪法的内容可以集中在条约的一个单独的部分——这决不会引起恐慌。2004年召开的政府间会议应有助于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分工，并澄清这些事关机构的问题。

倘若不进行改革使机构充分有效和民主，即便服务民众利益的能力逐渐下降，欧盟或许还可以存在很长时间，但却存在停滞不前和逐步解体的风险。倘若进行适当的改革，欧盟将有能力为欧洲的新经济与民主稳定提供架构，并有助于发展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促进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英国人民如选择积极参与而不是消极接受，他们就可以为上述目标的切实实现作出重要贡献。

注释

【1】 先前的例子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起建立共同体之时，英国拒绝6国的参加邀请；而在60年代初它申请加入后却屡遭戴高乐否决。

其他参考材料

有关欧盟的学术文献浩如烟海，但适合一般读者或刚入门的学生的读物不是太多。

我所建议的一般入门书籍中，包括拙作*The Build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Oxford，第3版，1998年，297页），希望大家不要见怪。该书比本书详尽，但相当易懂。Desmond Dinan的*Ever-Closer Union*（Basingstoke，第2版，1999年，596页）是一部信息量更大的学术入门书。有关欧盟发展道路的联邦主义观点，可参阅Michael Burgess的*Federalism and European Union; The Building of Europe, 1950—2000*（London，2000年，290页）。有关欧盟的主要政策，可参见Helen Wallace与William Wallace主编的*Policy-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Oxford，第4版，2000年，630页）的相关章节。Geoffrey Edwards与Georg Wiessala主编的*The European Union: Annual Review 1999/2000*（Oxford，2000年，219页）也涉及了广泛的内容。对于并不着意获得专门知识的读者，欧洲议会前议长Enrique Baron Crespo的*Europe at the Dawn of the New Millennium*（Basingstoke，1997年，229页）颇具启迪性与可读性。

Timothy Bainbridge的*The Penguin Compan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Harmondsworth，1999年，592页）是一本准确和方便的参考书。

那些欣赏传记类读物的人们，可以从Jean Monnet的Memoirs（London，1978年，544页）中，了解欧共体的主要创始人是怎样看待至20世纪70年代的欧共体历史的。有关1985至1994年德洛尔时期的特点与实质，可参见Charles Grant的*Inside the House that Jacques Built*（London，1994年，305页）。George Ross则在其Jacques *Delor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Cambridge，1995年）中，详细分析了德洛尔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策略。Martyn Bond、Julie Smith、William Wallace主编的*Eminent Europeans*（London，1996年，321页），生动地介绍了一系列在欧洲联合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Hugo Young在其*This Blessed Plot*（Basingstoke，1998年，558

页）中，评述了从丘吉尔到布莱尔的英国十来位支持或反对欧洲一体化的人物，对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远见卓识。

既通俗易懂又真实、公平地反映机构运作情况的读物不是太多。Neil Nugent的*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Basingstoke，第4版，1999年，592页）内容可靠且全面，但读起来不轻松。在拙作*The Build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中的“机构或宪法”一章，以及Helen Wallace与William Wallace主编的*Policy-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中由Helen Wallace执笔的“欧盟机构：经验与试验”一章，有关于欧盟机构的更为简短的解释。Dinan在*Ever-Closer Union* 的第八至第十章中，分别论述了委员会、欧洲理事会与部长理事会，以及欧洲议会。Julie Smith的*Europe's Elected Parliament*（Sheffield，1999年，198页）可读性强且信息量大。有关法院和一审法院的文献，大都是律师写给律师看的，但Dinan一书的第301至315页作了很好的概括。

在*The New European Economy Revisited: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Integration*（Oxford，1997年，306页）中，Loukas Tsoukalis对经济与经济政策领域作了启发性的概述。Christopher Johnson的*In with the Euro, out with the Pound*（Harmondsworth，1996年，256页）主张英国加入欧元区，John Redwood的*Our Currency, Our Country: The Dangers of Monetary Union*（Harmondsworth，1997年，214页）则反对加入。而Andrew Duff主编的*Understanding the Euro*（London，1998年，160页）中，十来位作者从诸多方面对欧元作了论述。对创建单一市场贡献最大的Cockfield勋爵在其*The European Union: Creating the Single Market*（Chichester，1994年，185页）中对单一市场作了清楚而有趣的描述。由Helen Wallace与Alasdair Young执笔的“单一市场”（Helen Wallace与William Wallace主编的*Policy-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中的一章），则介绍了单一市场最新的发展情况。Iain Begg和Nigel Grimwade在其*Paying for Europe*（Sheffield，1998年，200页）中，对预算作了很好的说明。C. Ritson和D. R. Harvey在其主编

的*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Wallingford，Oxon.，第2版，1997年，448页）中，对共同农业政策作了很好的阐述。地区政策在David Allen的“凝聚与结构性基金”（Helen Wallace与William Wallace主编的*Policy-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中的一章）中有所涉及。Ian Davidson在其*Jobs and the Rhineland Model*（London，1997年，80页）中，分析了有关盎格鲁 - 撒克逊模式与莱茵模式之争。

Nigel Haig主编的年刊*Manu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EU and Britain*（Oxford：Elsevier Science），以及驻布鲁塞尔的美国商会欧盟委员会主办的*Environment Guide*， 每年对欧盟的环境政策 作一次年度总结，内容非常有用。

尽管欧盟的对外经济政策仍然更为有效和重要，欧盟对外关系 方面的最新文献却大多与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有关。Simon Nuttall的*European Foreign Policy*（Oxford，2000年，280页）对此作了权威性的概述；而Martin Holland主编的*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he Record and Reforms*（London，1997年，210页）则从不同视角对此政策作了解读。Loukas Tsoukalis在其著作*The New European Economy Revisited* 的“欧洲或全球大国”一章中，论述了欧盟的对外经济政策，其中还包括有关即将开始的扩大的一节。有关欧盟扩大的信息量较大的著作还有Graham Avery与Fraser Cameron的*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Sheffield，1998年，198页）和Heather Grabbe与Kirsty Hughes的*Enlarging the EU Eastward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London，1998年，128页）；不过在这两本书完稿后，事态发展很快。

“自由、安全与公正的区域 ”也是一个发展很快的领域；截至2000年上半年这一方面的进展情况，可参阅Jrg Monar为Geoffrey Edwards与Georg Wiessala编的*The European Union: Annual Review 1999/2000* 撰写的“司法与民政事务”一章。

另外，欧盟的网站http://europa.eu.int能提供大量全面的信息。

年表（1946-2000年）

20世纪40年代

1946年9月19日：	丘吉尔号召建立“一种欧洲合众国”。
1947年6月5日：	宣布马歇尔计划。
1948年4月16日：	建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以协调援助西欧国家的马歇尔计划。
1949年4月4日：	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建立北约。
1949年5月5日：	欧洲理事会诞生。

20世纪50年代

1950年5月9日：	作为“欧洲联邦的第一步”，《舒曼宣言》发起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谈判。
1951年4月18日：	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6国签订《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
1952年5月27日：	6国签订《欧洲防务共同体（EDC）条约》。
1952年7月27日：	《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生效。
1954年8月30日：	法国国民议会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搁置。
1954年10月20日：	6国与英国建立西欧联盟。
1955年6月1—2日：	6国外长在墨西拿同意开始进行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谈判。

1957年3月25日：	签订《罗马条约》，从而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1958年1月1日：	《罗马条约》生效。

20世纪60年代

1960年5月3日：	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英国建立欧洲自由贸易区。
1960年12月14日：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更名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不仅包括西欧国家，还包括加拿大和美国。
1961年7月31日、8月10日：	爱尔兰、丹麦、英国申请加入共同体。1962年4月，挪威申请加入。
1962年1月14日：	6国达成共同农业政策。
1963年1月14日：	戴高乐总统终止加入谈判。
1964年5月4日：	《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合谈判开始，共同体起主要作用。
1965年7月1日：	法国中断就共同农业政策出资问题的谈判，并抵制理事会会议直至1966年1月。
1966年1月28—29日：	达成卢森堡“妥协”。法国重返理事会，但坚持在危及“至关重要的”利益时实行全体一致议决。
1967年5月11日：	英国再度提出加入申请，爱尔兰、丹麦、挪威随后也再度申请加入，但戴高乐依然表示反对。
1968年7月1日：	关税同盟提前18个月建立。
1969年12月1—2日：	共同体首脑会议就共同农业政策的

出资和恢复加入谈判达成一致。

20世纪70年代

1970年4月22日：	签订《修订条约》，将共同对外关税、农业进口税以及部分增值税作为共同体收入，赋予议会某些预算权。
1970年6月30日：	丹麦、爱尔兰、挪威、英国开始进行加入谈判。
1970年10月27日：	理事会建立旨在实现外交政策合作的欧洲政治合作程序。
1971年3月22日：	理事会通过计划，在1980年前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但不久就因国际货币市场动荡而受阻。
1972年1月22日：	与丹麦、爱尔兰、挪威、英国签订《加入条约》，但挪威在随后的公民投票中拒绝加入。
1973年1月1日：	丹麦、爱尔兰、英国加入共同体。
1974年12月9—10日：	巴黎首脑会议决定欧洲理事会每年会晤3次，并批准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
1975年2月28日：	共同体与46个非加太国家签订《洛美协定》。
1975年3月18日：	建立欧洲地区开发基金。
1975年6月12日：	希腊申请加入。
1975年7月22日：	签订《修订条约》，赋予欧洲议会更多预算权，设立审计院。
1975年12月1—2日：	欧洲理事会就议会直接选举作出正

	式决定。
1977年1月6日：	新委员会就职，詹金斯任主席。
1977年3月28日、7月28日：	葡萄牙、西班牙申请加入。
1978年4月7—8日：	欧洲理事会同意议会、理事会、委员会就基本权利发表的《联合宣言》。
1978年12月4—5日：	欧洲理事会创立欧洲货币体系，建立基于埃居的汇率机制。
1979年6月7日、10日：	欧洲议会首次直接选举。

20世纪80年代

1981年1月1日：	希腊成为共同体第10名成员。
1984年2月14日：	由斯皮内利发起的《欧洲联盟条约草案》，在欧洲议会以决大多数票通过。
1984年6月14日、17日：	欧洲议会第二次选举。
1984年6月25—26日：	欧洲理事会就旨在减少英国对共同体预算净贡献的返回款达成一致。
1985年1月7日：	新委员会就任，德洛尔任主席。
1985年6月14日：	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签署废除边界控制的《申根协定》。
1985年6月28—29日：	欧洲理事会批准委员会在1992年前完成单一市场的计划；审议了《欧洲联盟条约草案》；并决定召开政府间会议修订条约。
1986年1月1日：	西班牙、葡萄牙加入，成员国增至12个。

1986年2月17日、28日：	签署《单一欧洲法令》。
1987年7月1日：	《单一欧洲法令》生效。
1988年7月1日：	议会、理事会与委员会就预算纪律与程序达成的《机构间协议》生效。
1988年10月24日：	建立一审法院。
1989年6月15日、18日：	欧洲议会第三次选举。
1989年7月17日：	奥地利申请加入。
1989年11月9日：	柏林墙倒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开放边境。
1989年12月8—9日：	欧洲理事会发起政府间会议筹划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除英国外，所有成员国均通过了工人社会权利宪章。

20世纪90年代

1990年4月28日：	欧洲理事会就德国统一政策和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达成一致。
1990年5月29日：	签订建立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的协定。
1990年6月19日：	签订第二个《申根协定》。
1990年6月20日：	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自由贸易区开始就建立欧洲经济区（EEA）进行谈判。
1990年6月25—26日：	欧洲理事会决定与经济与货币联盟政府间会议同时，召开政治联盟政府间会议。
1990年7月4日、16日：	塞浦路斯、马耳他申请加入。

1990年10月3日：	德国统一。
1990年12月14—15日：	欧洲理事会开始召开经济与货币联盟政府间会议以及政治联盟政府间会议。
1991年7月1日：	瑞典申请加入。
1991年12月9—10日：	欧洲理事会就《欧洲联盟条约》（即《马约》）达成一致。
1991年12月16日：	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欧洲协定》，随后又相继与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签署该协定。
1992年2月7日：	签署《马约》。
1992年3月18日：	芬兰申请加入。
1992年5月2日：	签订《欧洲经济区协定》。
1992年5月20日：	瑞士申请加入。
1992年5月21日：	通过共同农业政策改革方案。
1992年6月2日：	丹麦全民投票拒绝接受《马约》。
1992年9月14日：	援助独联体国家的TACIS计划参加国首届部长会议召开。
1992年9月20日：	法国全民投票以微弱多数通过《马约》。
1992年11月25日：	挪威申请加入。
1992年12月6日：	瑞士全民投票拒绝加入欧洲经济区；加入欧盟的计划被搁置。
1992年12月11—12日：	欧洲理事会对丹麦作出特别安排，以推动该国通过《马约》；批准德洛尔的一揽子预算建议；同意就奥地利、挪威、瑞典、芬兰加入开始进行谈判。

1992年12月31日：	绝大部分单一市场立法按时完成。
1993年5月18日：	丹麦第二次全民投票通过《马约》。
1993年6月21—22日：	欧洲理事会宣布，中东欧联系国在满足政治与经济条件后可以加入。
1993年11月1日：	《马约》生效。
1993年12月5日：	委员会通过增长、竞争力与就业白皮书。
1994年3月9—10日：	《马约》建立的地区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
1994年3月31日、4月5日：	匈牙利、波兰申请加入。
1994年6月9日、12日：	欧洲议会第四次选举。
1994年7月15日：	欧洲理事会提名桑特接替德洛尔任委员会主席。
1994年11月28日：	挪威全民投票否决加入。
1995年1月1日：	奥地利、芬兰、瑞典加入，成员国增至15个。
1995年7月12日：	欧洲议会任命首任联盟调查官。
1995年7月26日：	成员国签订《欧洲警察署公约》。
1995年11月27—28日：	欧洲 - 地中海会议在巴塞罗那召开。
1995年12月31日：	欧共体 - 土耳其关税同盟生效。
1996年3月29日：	修订《马约》的政府间会议召开。
1997年7月16日：	委员会就10个中东欧国家的申请提交“意见”，同时提出旨在扩大而调整欧盟政策的“2000年日程”建议。
1997年10月2日：	签署《阿约》。
1998年3月12日：	开始与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进行加入谈判。

1998年5月3日：	理事会决定11个国家将在1999年1月1日采用欧元。
1998年6月1日：	欧洲中央银行成立。
1998年10月24—25日：	欧洲理事会同意防务合作措施。
1998年12月31日：	理事会确定欧元与参加国货币的固定汇率。
1999年1月1日：	欧元成为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法定货币。
1999年3月15日：	在独立委员会提交关于委员会管理不当与欺诈的报告后，委员会辞职。
1999年3月24日：	普罗迪被提名为新委员会主席。
1999年3月24—25日：	欧洲理事会通过“2000年日程”。
1999年5月1日：	《阿约》生效。
1999年6月10—13日：	欧洲议会第五次选举。
1999年12月10—11日：	欧洲理事会决定与另外6国开始加入谈判；接受土耳其为申请国；决定召开政府间会议修改条约。

2000年

2000年1月15日：	开始与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进行加入谈判。
2000年2月14日：	政府间会议召开。
2000年3月1日：	委员会通过其改革白皮书。
2000年5月3日：	委员会提议希腊成为欧元区第12名

	成员。
2000年5月9日：	欧盟机构庆祝《舒曼宣言》发表50周年。
2000年6月20日：	欧洲理事会通过旨在加强欧盟经济灵活性的措施。
2000年6月23日：	签订第五个《洛美协定》。
2000年12月7—10日：	欧洲理事会签署《尼斯条约》，并表示欢迎《基本权利宪章》。

名词解释

斜体词请参见其他词目。

Accession正式加入： 加入欧盟的过程。在经谈判达成加入条约后，所有成员国必须批准条约，欧洲议会必须表示同意。

Acquis Communautaire现有共同体： 欧盟全部立法、规则、司法与标准体系。

Agenda 2000 2000年日程： 为向中东欧扩大而改革共同农业政策与凝聚政策 的措施。

Amsterdam Treaty《阿姆斯特丹条约》： 参见*Treaty of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条约》。

Area of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AFSJ）自由、安全与公正的区域： 《阿约》将《申根协定》纳入欧共体， 规定废除边境控制、允许人员自由流动以及开展打击跨境犯罪的司法与警察合作。爱尔兰、英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丹麦，选择不参加废除边境控制以及涉及欧共体机构的一些方面的事务。

Asymmetric shocks不对称冲击： 以不同方式影响同一经济体内的不同地区。这是欧元区内的潜在问题。

Barriers to trade贸易壁垒： 成员国间已经废除了关税与配额。单一市场废除非关税壁垒的目标大部分已经完成，但仍存在某些非关税壁垒。

Budget of the *European Union* 欧盟预算： 来自自有财源的收入；三分之二的开支用于共同农业政策与凝聚政策。

Citizenship公民权利： 《欧洲联盟条约》提出了欧盟公民权利。欧盟公民不但享有作为本国公民的权利，还享有各条约赋予的权利。

Cohesion policy凝聚政策： 通过结构性基金实施的欧盟 地区发展政策，占欧盟预算开支的三分之一。

Comitology委员会制度： 由成员国官员组成、代表理事会 监督委员会 工作的小组委员会制度。

Commission，European Commission委员会、欧盟委员会：

欧盟 的主要执行机构，由20名委员组成，负责不同领域的政策。除具执行功能外，委员会还提出立法提案和监督守法情况。“委员会”亦常用作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约1.6万人）的总称。

Committee of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Coreper）常驻代表委员会： 参见*Council*理事会 。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地区委员会： 由地区和地方当局代表组成，对立法提出意见，并主动提交报告。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CAP）共同农业政策： 通过补贴和其他价格支持机制支持农业的政策，占欧盟 预算开支的将近一半。该政策已朝着直接补贴农民和降低价格支持的方向改革。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CFSP）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欧盟 的第二支柱，旨在开展政府间外交政策合作，以及利用西欧联盟 的能力开展防务合作。理事 会秘书长兼任“高级代表”，协助理事会轮值主席 对外代表欧盟。

Community共同体： 参见*European Community*欧洲共同体。

Compulsory Expenditure（CE）强制性开支： 主要用于共同农业政策 的预算开支。对此类开支，理事会 拥有的权力大于欧洲议会 。

Co-operation in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CJHA）司法与民政事务合作： 欧盟 以前的第三支柱 ，旨在开展人员跨境流动和打击跨境犯罪方面的合作。《阿约》 将司法与民政事务合作的大部分事务，转移至共同体 新建立的“自由、安全与公正的区域” 。由于爱尔兰与英国选择不参加“自由、安全与公正的区域”，目前存在的是一个缩小的第三支柱“刑事事务上的警察与司法合作 ”。

Council，Council of Ministers理事会、部长理事会： 由成员国部长级代表组成。理事会修订立法和对立法进行表决 ，监督共同体政策的执行，以及负责第二和第三支柱 的政策。它得到位于布鲁塞尔的理事会秘书处、常驻代表委员会和委员会制度（参见*comitology*委员会制度 ）的协助。理事会与首脑一级的欧洲理事会 ，是欧盟 最强势的政治机构。

Court of First Instance一审法院： 负责审理涉及竞争法等领域的案件和机构与其雇员间的争端等。

Court of Justice法院： 在共同体 法方面的最高司法当局，由每个成员国的1名法官组成，共15名法官，院址在卢森堡。法院发展了涉及面很广的案例法（参见*European legal order*欧盟法制 ）。它保证了共同体内的法治。

Direct effect直接有效： 参见*European legal order*欧盟法制。

Directive指令： 共同体 的一种法令，它“在其要求取得的结果上具有约束力”，但将“形式与方式的选择权”留给成员国当局。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Emu）经济与货币联盟： 达到了财政状况良好的“趋同标准”，并最终确定本国货币与欧元的汇率后，12个成员国将参加经济与货币联盟。欧元从2002年初取代它们各国的货币。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 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负责 。还建立了经济政策协调制度。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Ecosoc）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由雇主、工人和社会团体代表组成。对欧共体 立法提出意见，并主动提交报告。

Electoral systems选举制度： 所有国家目前在欧洲议会 选举中均采用比例代表制，英国在1999年选举中开始采用该制度。

Enhanced co-operation增强合作： 允许那些希望在特定领域实施更加紧密一体化的国家，在欧盟 的框架内开展这种合作。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Euratom）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与欧洲经济共同体 同时于1957年建立，旨在促进原子能领域合作以及开展民事目的核能研究与开发。

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欧洲中央银行： 负责欧元区货币政策。总部设在法兰克福的欧央行由执行理事会管理；执行理事会与欧元区各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欧央行的管理委员会。欧央行与各国央行组成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其主要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所有上述机构成员均不得接受任何其他机构的指示。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ECSC）欧洲煤钢共同

体（欧洲煤钢联营）： 由1950年5月9日《舒曼宣言》发起，将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6国的煤钢部门由一共同制度管理。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均建立在煤钢共同体体制结构之上。

European Commission欧盟委员会： 参见*Commission*委员会。

European Community（EC）欧洲共同体（欧共体）： 欧共体为欧盟 的核心支柱。它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煤钢共同体 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含有欧盟 机构的联邦成分，并负责欧盟大部分事务。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欧洲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 欧洲理事会1950年通过的跨欧洲保护人权的机制。欧盟 所有成员国都签署了该公约，它是欧盟尊重人权的基础。

European Council欧洲理事会： 由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或国家首脑（如芬兰和法国总统，他们具有某些行政职能）和委员会 主席组成，对需要此级别领导解决或推动的事务作出决定，并确定欧盟 的政治指导方针。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欧洲法院： 参见*Court of Justice*法院 。

European Defence Community（EDC）欧洲防务共同体： 20世纪50年代初期将欧洲煤钢共同体 国家军队整合起来的一次大胆尝试，但被法国国民议会搁置。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EEC）欧洲经济共同体： 根据《罗马条约 》于1958年建立，其权限包括在6个成员国间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和开展大范围的经济政策合作。它的主要机构包括委员会、理事会、欧洲议会、法院 。它是今天欧共体 的基础。

European legal order欧盟法制： 法院建立了共同体法律的主要原则。其一是“直接有效”，使个人可以如同享有成员国法赋予的权利那样，享有共同体法赋予的权利。其二是共同体法“优先”，确保共同体法在整个共同体内按同一标准得以实施。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EMS）欧洲货币体系： 经济与货币联盟 的前身，主要包括限制汇率波动的汇率机制。

European Parliament（EP）欧洲议会： 欧盟 直接选举产生的机构，其议员 （MEPs）在立法、预算、委员会 上拥有重大权力。

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EPC）欧洲政治合作： 政府间的外交政策合作，1970年开始实行，1993年由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取代。

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ESCB）欧洲中央银行体系： 参见*European Central Bank*欧洲中央银行 。

European Union（EU）欧洲联盟（欧盟）： 除共同体 这一核心支柱之外，《欧洲联盟条约》 另创建了两个新支柱 ，即外交政策合作和司法与民政事务合作。三个支柱共有相同的机构，但两个新支柱主要是政府间的。

Federation联邦： 联邦政体中，政府职能由两级或多级民主机构分工行使。权力通常依据辅从性 原则分配，成员国或组成部分拥有它们能够有效行使的那些权力。

Free movement自由流动： 条约规定人员、商品、资本和劳务在欧盟 内自由流动，称为“四大自由”。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IGC）政府间会议： 欧盟 修订条约的主要途径。成员国代表在政府间会议上起草一项修订条约，它在生效前必须得到各国的批准。

Legislative procedures立法程序： 大多数欧共体 法律是按共同议决程序制定的，赋予欧洲议会 与理事会 同意、修订或拒绝法案的权力。合作程序赋予欧洲议会的权力较少，已不那么重要；但只是将理事会计划告知欧洲议会的咨询程序，适用范围仍然相当广泛。批准程序赋予欧洲议会批准加入条约、联系协定以及某些立法事务的权力。

Maastricht Treaty《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参见*Treaty on European Union*《欧洲联盟条约》 。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MEPs）欧洲议会议

员： 目前有625名[1] 经各成员国选举进入欧洲议会 的议员。欧洲议会议员代表其选民，在议会小组委员会中审议立法，表决法律与预算，监督委员会，讨论欧盟 事务。

Nice Treaty 《尼斯条约》： 参见*Treaty of Nice*《尼斯条约》。

Non-compulsory expenditure（NCE）非强制性开支： 欧洲议会 比理事会 拥有更多控制权的那部分开支，目前约占整个预算 的一半。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 1949年成立的西欧安全保护伞，它将美国与欧洲安全体系联系起来。

Own resources自有财源： 欧盟预算 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为按成员国GNP与增值税基数提取的一定百分比，次要来源为关税与农产品进口税。

Permanent representations常驻代表处： 每个成员国在布鲁塞尔均设有常驻代表处，为该国与欧盟 沟通合作的中心。代表处的负责人为该国在常驻代表委员会的代表（参见*Council*理事会 ）。

PHARE波兰与匈牙利： 经济重建援助：为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提供援助的计划。

Pillars支柱：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马约》） 使用一种支柱 系统来建立欧盟。各支柱相对独立，但由一套共同规定联系起来。核心支柱为欧洲共同体 ，其余两个支柱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和司法与民政事务合作 ，但后者已重新命名为刑事事务上的警察与司法合作。

Police and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刑事事务上的警察与司法合作： 参见*Co-operation in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司法与民政事务合作。

Presidency轮值主席（国）： 理事会 与欧洲理事会 由成员国的代表轮流担任主席，每届主席任期6个月。当任主席同时根据共同外交 与安全政策 代表欧盟 ，并协助确定在其任期内欧盟的目标。

Primacy优先： 参见*European legal order*欧盟法制 。

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QMV）特定多数表决： 参见*voting*表决 。

Regulation条例： 欧共体法令 的一种，它在所有成员国中“具有完整的约束力和直接适用”。

Schengen Agreements《申根协定》： 最初于1985年在欧盟 框架外签订；申根国家现包括除爱尔兰、英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丹麦以外的所有其他成员国。该协定已被纳入欧共体 （参见*Area of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自由、安全与公正的区域）。

Secondary legislation次级（二级）立法： 欧盟机构在条约赋予的权力范围之内制定的法律。

Single European Act（SEA）《单一欧洲法令》： 1986年签订的、首个对《罗马条约》作出重大修改的法令。该法令对完成单一市场的1992年计划作了规定，增加了一些新的权限，拓展了特定多数表决 的适用范围，加强了欧洲议会 的作用。

Structural funds结构性基金： 包括凝聚基金、欧洲农业保证与指导基金的指导部分、地区发展基金、社会基金（参见*cohesion policy*凝聚政策）。

Subsidiarity辅从性： 该原则要求，只有当某项行动在欧盟 一级进行比由成员国分别进行更加有效时，才在欧盟一级进行。

TACIS（Technical Assistance to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对独联体国家的技术援助： 对独联体国家的转型过程提供援助的计划。

Treaties of Rome《罗马条约》： 参见*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欧洲经济共同体 与*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常被称为《罗马条约》。

Treaty of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条约》（《阿约》）： 1997年签订的一项条约，拓展了共同议决的适用范围，改革了共同外交政策以及司法与民政事务两个支柱 。

Treaty of Nice《尼斯条约》： 由欧洲理事会 在2000年12月缔结，旨在为即将的扩大作好机构上的准备。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拓展

了特定多数表决 的适用范围，促进了增强合作 。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TEU）《欧洲联盟条约》： 1991年签署于马斯特里赫特（因此简称《马约》）。该条约建立了欧盟 ，制定了创建经济与货币联盟 的程序，赋予欧洲议会 以重要的新权力，提出了欧洲公民 权利，建立了共同外交 与安全政策 和司法与民政事务合作 两个新支柱 。

Union联盟： 参见*European Union*欧洲联盟 。

Voting表决： 理事会 决定大多由特定多数表决（QMV）作出，给每个国家的表决权数依人口多少而定，但加权偏向小国。全部票数为87票，62票构成特定多数。从2005年起将实施新的加权方案，以为欧盟的扩大作好准备。全体一致同意程序在共同体 立法中已不那么适用，但在另两个支柱 中仍是主要程序。简单多数表决只限于程序性事务。

Western European Union（WEU）西欧联盟： 英国与欧共体成员国在1954年建立的组织。在长时间停顿后，《马约》 与《阿约》 对欧盟 与西欧联盟之间的关系作了规定，将后者纳入欧盟，并作为北约 的欧洲“臂膀”予以发展。大多数欧盟成员为西欧联盟成员。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WTO）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 从1995年起取代《关贸总协定》来规制世界贸易，目标是减少国际贸易壁垒，并具有争端解决机制。

注释

【1】 现为785名。

译后记

当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让我翻译《欧盟概览》的时候，我欣然从命是出于两个考虑。

其一，我从事欧盟与欧洲一体化研究30年，见证了它在我国的发展，但一直以缺乏一本适合我国大众读者的普及读本为憾。本书是牛津VSI系列丛书之一，又系英国著名学者约翰·平德所写，兼有深入浅出和权威性的优点，可谓填补了这个空白。唯一的缺憾是该书成书于2001年，没能反映之后欧盟的一些重大发展。我曾试图联系作者，请他写序或作些补充，可惜未果。不得已之余，只能以添加译注续貂；其中如有谬误，应由我负责，并欢迎读者指正。

第二，外研社是我开始学外语时就已心仪的出版机构，与之合作是乐事。果不然，该社杨柳编辑在校阅译稿时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从来认为翻译是比写作更难的再创造，在如今初通外语都可以从事翻译、各类译著未免滥觞之时，责任编辑实是译文质量的最后把关者。我和杨柳编辑还无幸谋面，我甚至不知其年龄、性别，但她/他在我们十数次电子邮件往来中，不仅捉出了我译文中的疏漏、错误之处，还提出了不少改进译文质量的建议。在此，我想对外研社及杨柳编辑的敬业，表示特别的感谢和敬意。

得悉《欧盟概览》即将付印，有感而识。

戴炳然

2008年12月19日

欧盟是如何以及为何由最初的6国发展至现在的28国，从而成为欧洲国家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代言人的？欧盟的主要机构是如何运作的？欧盟在国际事务中有何影响？欧盟的明天又将如何？作者用平实的语言剖析了这些复杂的问题，带领读者走进欧盟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百科通识文库

49

女权主义简史

玛格丽特·沃特斯 著

朱刚 麻晓蓉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女权主义简史

玛格丽特·沃特斯 著

朱刚 麻晓蓉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54**

Feminism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5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Margaret Walters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权主义简史 / （英）沃特斯（Walters, M.）著；朱刚，麻晓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06-6

I．①女… II．①沃… ②朱… ③麻… III．①女权运动 - 历史 IV．①D4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60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车云峰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06-6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绪论
第一章　女权主义的宗教根源
第二章　世俗女权主义的开端
第三章　18世纪：执笔的亚马孙女战士
第四章　19世纪早期：变革中的女性
第五章　19世纪后期：运动中的女性
第六章　为投票权而战：妇女选举权运动者
第七章　为投票权而战：妇女选举权女斗士
第八章　20世纪早期的女权主义
第九章　女权主义第二浪潮：20世纪后期
第十章　世界各国的女权主义者
后记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玛格丽特·沃特斯，曾在雷丁大学担任英语讲师达20年之久，目前是自由撰稿人和评论家。她为《星期日泰晤士报》撰写评论，还曾定期为女权主义权威期刊《多余的肋骨》撰稿。她此前曾有论文收录于《只谈家庭》、《谁害怕女权主义？》（朱丽叶·米切尔、安·欧克利主编），还曾为《女人的权利和委屈》（朱丽叶·米切尔、安·欧克利主编）撰写标题文章。

译者简介

朱刚，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西方文论。主要成果有《詹明信》（1995）、《萨伊德》（1997）、*Text, Reader, and the Nature of Literary Reading*（1998）、*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2001）、《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文化批评理论》（2002）、《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二卷，2002）和《二十世纪西方文论》（2006）。

麻晓蓉，南京大学博士生、四川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主要成果有《埃米莉与祥林嫂：文学形象比较研究》（2002）、《浅谈加强英语专业学生母语教育的重要性》（2003）和译著《企业行为管理——实用战略手册》（2004）。

图　目

图1　17世纪贵格会妇女布道
图2　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
图3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图4　弗洛伦丝·南丁格尔
图5　《妇女进行曲》歌片儿，1911年
图6　潘克赫斯特家族领导游行，1911年
图7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在白金汉宫外被捕，1914年
图8　埃米莉·戴维森扑到国王的赛马下，1913年
图9　反映妇女选举权女斗士被强制进食的招贴画，1910年
图10　玛格丽特·桑格
图11　西蒙娜·德·波伏瓦
图12　贝蒂·弗里丹
图13　反对“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的示威活动，大西洋城，1969年
图14　妇女解放团体在伦敦游行，1971年
图15　妇女解放团体集会，纽约，1970年
图16　反对女性割礼的招贴画，苏丹
图17　南非妇女抗议对阿米娜·拉瓦尔的死刑判决，2003年
图18　苏丹穆斯林女孩展示染有墨迹的手指，证明她已经投过了票
图19　女权团体的抗议活动，雅加达，2000年

绪论

“我本人始终就没能弄明白女权主义究竟是什么，”作家丽贝卡·韦斯特 [1] 1913年语带讥讽地说，“我只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表达出和逆来顺受的可怜虫或妓女不同的观点，人们就说我是女权主义者。”在她写作的年代，“女权主义”还是个比较新的字眼，19世纪90年代才由法语进入英语。有趣的是，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该词最早的例证含有贬义。1895年，《雅典娜神殿》 [2] 鄙夷地谈到一部描写某个女性的作品，极尽调侃地说她“同女权主义说教调情”。“在德国，女权主义就是公开鼓吹社会主义，”《每日新闻》1908年战战兢兢地说道，随后对“妇女选举权运动者、妇女选举权女斗士以及女权主义发展中的所有其他阶段”予以全盘否定。

在那些年代，一些作家使用另一个词——“妇女主义”来替代它，但同样也充满敌意。有一位被人遗忘已久的作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忆及了与一位身居巴黎的女知识分子（尽管他对她有偏见，但她似乎相当活泼有趣）会面时的情景，愤怒地揶揄说这位女性的写作反映了“19世纪顽固的妇女主义”。

令人奇怪的是，对“女权主义”这个字眼最尖刻的批评竟来自弗吉尼娅·吴尔夫 [3] 。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曾为女性发出过呼吁，影响很大，甚为恳切。在1938年创作于法西斯主义和日渐迫近的战争的阴影之下的《三几尼》中，吴尔夫也许对任何“主义”都感到不安，所以坚决抵制这个字眼。她坚称，任何词汇都无法准确概括这股“19世纪反抗父权”的力量。她接着写道：

> 事实上，那些19世纪的妇女是你们这场运动的先锋。她们当时反抗父权制国家的暴政，正如你们时下反抗法西斯国家的暴政一样。

吴尔夫宣称，她们被人称为女权主义者（她犯了年代错误——这个词在19世纪并不为人所知），这令她们非常反感。她继续强调说，我们应该

废除一个陈旧、邪恶而腐朽的词汇，一个在它的时代为害不浅的词汇。“女权主义”便是这个词汇。根据字典，这个词的意思是“捍卫女性权利的人”。既然唯一的权利，即谋生权已经获得，这个词便不再具有意义了。没有意义的词是死词、腐朽的词。

然而，虽然弗吉尼娅·吴尔夫所谓的“谋生权”曾经是、并且目前仍然是女权主义的中心内容，但是在她写下这些话之后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获得谋生权显然并没能解决女性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女性的工作——虽然某些商界女强人的收入被媒体大肆宣扬——酬劳依然很低；而在家务活儿方面，女性根本就得不到酬劳。女性面临着特殊问题：生育和抚养孩子，还承受着既要干家务和/或照顾孩子又要外出工作的巨大压力。吴尔夫在20世纪20年代写作时，女权主义者几乎尚未提出这些问题，更不用说解决这些问题了。

数百年来，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女性都曾为自己的性别呼吁，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需求以及希望。由于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我只集中谈一个国家——英格兰——的女权主义，尝试着探讨它的历史沿革。尽管其他国家的女性有不同的经历和定义，但是在英格兰，至少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者”通常都是个贬义词。无论如何热心地为女性权利而战，鲜有女性愿意自称为“女权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女性再次组织起来时，这场运动自称为“妇女解放运动”（这个字眼源自黑人运动、第三世界运动和学生运动）。它也经常被简称为“妇解”（women's lib），这么称呼有时候是出于亲昵，有时候则是出于贬损。但也就是在这些年间，“女权主义”这个词日渐为大众所接受，其含义也得到了扩展。虽然有人认为民事平等和法律平等还没有完全实现，而且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这场新的运动往往重点关注的是女性特有的问题，即女性在生育和扮演社会角色中所遇到的问题。同样是在这些年间，英国的女权主义者至少尝试过跨越国界，去寻找她们和海外女权主义者之间的相同或不同之处。

然而，我们又是多么频繁地听到女性们急切地声明“我不是女权

主义者，而是……”。而她们发表看法时依据的便是女权主义，缺之不可。美国女权主义者埃丝特尔·弗里德曼（Estelle Freedman）认为，女权主义这个词自出现之初就带有负面含义，并且指出，没有几个涉足政坛的女性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么做的女性少得令人吃惊。20世纪90年代，英美的一些女权主义者发现出现了诋毁女权主义的“回潮”，而且某些目标显然已经得逞，于是对这种回潮发出了警告。例如，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和安·欧克利（Ann Oakley）把她们的第三本论文集取名为《谁害怕女权主义？》，书的原版封皮上印有一只卡通的大灰狼。她们认为：“对女权主义的攻击往往演变为更为广泛的厌女症”；“女权主义者”现在成了那些不受欢迎或备受鄙视的女性的代名词，和20世纪60年代之前使用的“恨男婆”、“母夜叉”、“老妖婆”、“巫婆”等称呼如出一辙。她们还说，女性也必须揭露并消除女权主义自身所固有的厌女症传统。

同样麻烦的是，一提到“女权主义”这个字眼，许多年轻一些的女性似乎也警觉起来，其中不少人似乎羞于提及这个概念。一份英国小报最近刊登了一篇横跨两版的文章，名为《女权主义死了吗？》。文章竭力巧妙地保持不偏不倚，给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以相同的篇幅：一方认为女权主义这个词依然非常适用；另一方则确信这个词已经过时，甚至令人尴尬，应该被淘汰。这篇文章配发了一张“激进妇解分子”在抗议“世界小姐”选美比赛现场维持秩序的照片。（事实上，照片上每个人都在笑。）让我略感尴尬的是，我在照片上看到了很久以前的自己，长发长裙，紧握着一块毫无新意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女人也是人”。我几乎已经忘记了“世界小姐”选美比赛那时依然存在（在那些糟糕的年月里，这种比赛总是被安排在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直到2002年，这一赛事才意外地引起公众关注。首先是尼日利亚激进分子暴力示威反对他们所谓的“裸体游行”，认为那会助长淫乱之风，导致艾滋病蔓延。随后是数名选手拒绝参赛，因为一名尼日利亚青年妇女婚外怀孕，依据伊斯兰教教法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但只是延缓到孩子断奶后再执行。选美皇后们的姿态既展现了勇气，又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然而有趣的是，她们中的一位略显不安地坚称她之所以采

取这种姿态，绝对不是因为她是女权主义者，甚至也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她是个人。

我近来问过一些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是否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或是否确实对女权主义感兴趣，她们大部分人都断然地予以否认。这些年轻女性中有一部分受过大学教育，其他的都有工作，而她们所有人显然都是先前女权运动的受益者。一位女性说，女权主义这个词本身听起来就挺陈腐过时。她觉得，一方面，女权主义已经变成极端分子——她称之为“原教旨主义者”——的游乐场，这些人对于像她这样的女性说不出什么有用的话。另一方面，她认为女权主义已经被“制度化”了，她把它比作共产主义：它不仅要求忠实于某些思想，还要信奉一套笼统的思想体系。此外，她补充说，女权主义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学术话题。人们可以获得“性别研究”的学位，她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致命之处：如果需要证据的话，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女权主义已经不是非常适用了。也许10年左右之后，当这些年轻女性发现自己在家庭、家务和工作之间顾此失彼时，她们会有不同的感受。也许她们会发觉需要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定义女权主义。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倒希望她们不必如此。

注释

〔1〕 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原名塞西莉·伊莎贝尔·费尔菲尔德（Cecily Isabel Fairfield），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著名记者。——译注，下同

〔2〕 《雅典娜神殿》：英国伦敦出版的文学杂志（1828—1921），撰稿者多为知名作家。

〔3〕 弗吉尼娅·吴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5）：英国女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为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先锋，以“意识流”创作手法著称。

第一章

女权主义的宗教根源

“在最早为自身及自身性别发出呐喊的欧洲女性中，有一些是在宗教的框架下进行的，而且使用了宗教术语。在当下世俗化的社会里，我们或许很难想象她们当年所做的一切：很难充分认识到她们的勇气，很难理解她们当时挑战社会现状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或这种挑战达到了何种程度。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各地总会有些家庭将“可有可无”或者无法婚嫁的女儿往女隐修院一关了事。对于一些人来说，这肯定不啻终身监禁；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宁静的女隐修院生活似乎促进了真正的自我实现：它培养了一些女性的组织才能，使一些女性识文断字，能够独立思考，从而发现她们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宾根的希尔德加德[1]生于11世纪末，她先是在莱因兰的一所小隐修院做了修女，后来当上了这所隐修院的院长。长久以来，人们公认她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近年来，她非凡的音乐才华被世人重新发现，备受赞誉。但她有时深为人们对自己“非女性化”行为的种种怀疑所苦。于是，她写信给当时的一位教会领袖明谷的伯尔纳[2]，询问她——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是否应该继续写作和作曲。伯尔纳给予了她鼓励。数年后，她享誉整个欧洲。虽然当时只有司铎才有权传教，但是她60岁开始周游整个日耳曼帝国，进行她的传教活动。

和其他中世纪妇女一样，希尔德加德试图想象几乎无法想象的事物、讲述自己对神之爱的理解时，她借助于女性经验，尤其是母性经验，从而写到神的“母性”。“神再次向我展现出他的恩慈，”她写道，“正如……母亲给她哭泣的孩子哺乳一样。”一些虔诚的妇女怀着母性的柔情想象襁褓中的耶稣。一位佛兰芒贝居安女修会[3]修女这样冥想神之母的感受：

> 一连三天，也许更久，（她）紧紧抱着他，他像婴儿一样安憩在她双乳之间……有时她亲吻他，仿佛他是一个小孩子；有时她把他抱在大腿上，仿佛他是一只柔弱的羔羊。

“仅仅因为我是女人，我就得相信我无法告诉你神的美德……？”15世纪初期英格兰妇女诺里奇的朱利安[4]这样问道。她很诧异“她的创造者竟然选择降生于那个被创造物”。进而，她认为：

> 我们的救世主是我们的真母，我们永恒诞生于他，永远受他庇佑……我们得救于母性的慈悲和恩德……母爱的本质就是慈爱、智慧、知识；这种母性就是美德，因为虽然和我们灵魂的出处相比，我们的肉体诞生于低贱、贫寒和卑微，然而这个肉体诞生于他的创造，由女性来加以完成，体现为众生。

虽然其他女性对这个类比只是一带而过，但诺里奇的朱利安却非常直接地进一步阐述了这个类比。基督正如

> 仁厚慈爱的母亲那样深知自己孩子的需要，并密切关注着这种需要。母亲给予孩子吮吸的乳汁，而我们亲爱的耶稣母亲却用他自己来喂养我们，他是如此慷慨、如此温柔……

玛格丽·肯普[5]和朱利安同时代，她从自己家乡埃塞克斯一路跋涉去拜访朱利安。玛格丽记下了自己的生平——也许是自己口述、他人记录，这被称为第一部英语自传。她的生平再清晰不过地说明，为什么她对自身不幸的沉湎和夸张的表述激怒了那么多和她接触过的人。但是她的故事也出人意料地感人至深；而更重要的是，她的传记之所以了不起，只是因为她坚持认真对待自己和自己的经历。玛格丽遭遇到的母性经验中痛苦而可怕的一面曾经启示了因信仰而终身未婚的朱利安。玛格丽第一次怀孕期间一直病得很重。经过漫长而异常痛苦的分娩后，她精疲力竭，沮丧万分：“由于生产的煎熬以及之前的病痛，她对生活感到绝望。”有时，她几乎要自杀。她回忆道，是耶稣显圣抚慰了她。耶稣以一位英俊的年轻人的形象显现，坐到她的床边。他告诉她：“在床上，你可以大胆地把我当作你的夫君。”但是直到多年后，经历了14次怀孕的玛格丽才终于和她欲望无度的凡夫达成协议：只要他不再执意要求鱼水之欢，她愿意替他偿还债务，并且取消自己所恪守的星期五斋戒，同他一起吃喝。他同意了，不过带着一

丝讽刺，这讽刺数百年来不断被人重复，令人生厌：“愿你的身体像以前对我那样随时供神享用。”

凭着非凡的精力和毅力，玛格丽踏上了跨越欧洲的朝圣之旅。一路上她哭哭啼啼，激怒了随行的同伴，他们中途舍她而去。但是她的勇气——以及永不言弃的决心——使她到达了耶路撒冷，并最终踏足君士坦丁堡。

到了16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谈论自身，观点愈加一致、愈加富有攻击性，只是仍然未能摆脱宗教的框架。宗教改革〔6〕使更多的女性得以接受教育。1589年，在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英格兰最早的女权主义檄文”中，简·安杰〔7〕挺身而出，强调夏娃优于亚当：夏娃是第二个成形之人，因此也更加完善。亚当由“废物和肮脏的泥土”塑造而成，神又从亚当的肉中造出夏娃，故而“她定比他纯净”，这“显然说明我们女人比男人要优秀不少……有了女人，才有男人的救赎。女人是第一个信神的，同样也是第一个悔罪的”。接着，安杰又世俗地谈到了日常的家庭生活，言谈间透着义愤和诙谐。她提醒我们，保证男人衣食无忧、干净整洁的是女人：“没有我们的照顾，他们会像正在产崽的狗一样躺在床上，像脏鲐鱼一样在夏天的热浪里游来荡去。”

但是任何女人想要捍卫自己的性别，都不得不有力地处理《圣经》中女性的负面形象：大利拉〔8〕背叛，耶洗别〔9〕杀人，而夏娃则对人类的堕落负有直接责任：“女人诱惑他，他吃了。”女人一旦大胆讲话，或就教会对女性的态度提出难以应付的问题，经常就会有人拿圣保罗的话来进行压制。“让你们的女人在会中闭口不言，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圣保罗向哥林多人训示道。他在给提摩太的书信中还说道：“她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

渐渐地，一些女性找到了反抗这些《圣经》禁锢的信心。一些女性对《创世记》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认为归根到底，亚当对于人类的堕落和夏娃负有同等的责任。于是，1611年埃米利亚·兰耶〔10〕提醒自己的读者，基督

由女人怀上，由女人诞下，由女人哺育，对女人顺从……他治愈女人，宽恕女人，安抚女人……他复活后，首先显身给一个女人。

1617年，雷切尔·斯佩特〔11〕嘲讽道：

倘若当初亚当不赞成夏娃的所作所为，不愿意步她的后尘，那么他作为她的主人，本应申斥她，订出点儿戒律，以免有失主人的身份。

其他人则坚持认为，神把夏娃的后裔玛利亚创造为基督之母，这本身就已经昭示了他的宽恕。

在动荡不安的17世纪，尤其是在抵制国教、尊崇简化宗教仪式的教派和众多不同的小团体中，女性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至少有些女性感受到了神启，开始传教或进行预言。现代历史学家指出，在伊丽莎白时代后期为逃避迫害而移民到美洲或荷兰的英格兰宗教异见者及其传教活动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那些设法留在英格兰从事地下活动的异见小团体中，女性也相当活跃。直到内战时期和空位期〔12〕，她们才大举转回地上，畅所欲言。基思·托马斯〔13〕罗列了一些这类独立教会：布朗派〔14〕、独立会〔15〕、浸礼宗〔16〕、千禧年会〔17〕、家庭会〔18〕、贵格会〔19〕、寻求派〔20〕以及狂言派〔21〕。无论它们在神学上有什么不同，它们都认为每个 个体必须获得精神上的再生。体验贵格会所谓的“内心之光”比外在仪式更为重要，而这光并不讲究性别差异。正如当时一位作家所说：“一个虔诚的男人，还有，或女人，能和世上所有的牧师一样，在天堂和地上真正而有力地进行捆绑、释放。”

在一段时间里，各种独立教会允许女性就教会事务进行公开辩论和投票。到了17世纪40年代，一些教会，尤其是贵格会，则更进了一步。1659年，贵格会教徒福克斯〔22〕认为：“基督在男人中，也在女人中，他解救那些世俗律法之下的人……男女中的基督，在神的灵中，不在世俗律法之下。”

“基督的灵由神而来，既存在于男人中也存在于女人中，难道基督的灵……不能说话？”凯瑟琳·埃文斯和萨拉·谢弗斯〔23〕问道。女性越来越频繁地感到触动，受到神启，在集会甚至礼拜时发言，不过她们经常遭到激烈的反对。她们被斥责为“被骄傲冲昏了头脑”、“虚荣自大”，甚至是“篡夺男人的权威”。譬如，1646年约翰·维卡斯〔24〕满腹怨气地牢骚道：“胆大妄为的家庭主妇们……没有一点儿女性的谦卑，高谈阔论，全然不顾使徒的禁忌。”

约翰·班扬〔25〕坚决反对女性的积极参与。他认为，撒旦无论如何都会诱惑更为软弱的夏娃，而不是亚当：“男人是礼拜的头领，是神的园子的守护者。”他把女性称为“头脑简单、意志薄弱的性别”。他引用《哥林多前书》〔26〕的观点，认为女人“不像男人那般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她们被置于男人之下”。他反对女性单独集会，认为这只会纵容“败坏体统”。他坚称：“我认为她们（女人）在祈祷时不应在整个教堂前面担任神的牧师。”进而，他语带讥讽地补充道：“要是那样，我就成了狂言派或贵格会教徒了。”在任何公开集会上，“她要做的就是闭紧嘴巴，安静地洗耳恭听”。

即便是到了17世纪70年代，勇敢的贵格会教徒玛格丽特·费尔〔27〕依然觉得有必要捍卫女性的良心独立和积极参与礼拜的权力。在一本名为《论女人说话之正当性》的小册子中，她强烈申辩道：“那些仅仅因为性别而否认……耶和华的灵通过女人说话的人……反对基督和他的教会，他们是蛇的后代。”

图1　这个场景看上去带有一丝讽刺意味——尽管不知这种讽刺针对的是那位热情洋溢的发言者，还是那些心不在焉的听众？一位听众竟然睡着了，其他听众则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样子。

有时她们引用先知约珥（Joel）来回应圣保罗的禁忌，称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

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

对许多人来说，约珥所见的令人心醉神迷的幻象，在由内战和空位期所引发的种种社会巨变中显得特别重要；当时人们普遍觉得世界末日真的即将来临。比如，一个自称“第五君主国派”的教派认为，世界上四大世俗帝国——即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已经一去不复返，第五君主国——基督的王国和圣徒的统治——即将到来。在这种狂热而动荡的大气候下，涌现出了大量的先知，他们中许多人具有革命思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领域，女性被认为应有的被动性和对外界影响的接受性，倒可以说是优势了：她可能会更容易、更乐于成为神的传声筒。在英格兰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比利时先知安东尼娅·布里格（Antonia Bourigue），作了一番令人不安的双刃剑式的论证：“他们应该容许神通过女人说话，只要他乐意如此，因为他先前曾经通过野兽对先知说话。”

但是在先知灵感和疯癫之间，在受神引导和被魔鬼操控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在17世纪的英格兰，女性依然因巫术而受到审判。更甚的是，女性先知很容易被人斥为疯癫而不予理会。例如，埃莉诺·戴维斯夫人（Lady Eleanor Davis）多年一直声称受到神启。1625年的某个清晨，她听到“一个来自天堂的声音，犹如号角般说出这番话：离最终审判日还有19年零6个月”。她接着出版了一些被视为预言的小册子，其中包括查理一世之死。她的丈夫烧掉了她的书；她常常被当作笑柄。由她的名字编成的字母换位游戏——埃莉诺·戴维斯夫人：没见过这么疯的女人〔28〕——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是她对异象的狂热使她陷入了极大的危险，甚至连她的社会地位也无法让她免于叛国罪的指控。1633年，她因被控“（全然不顾自己的性别）竟不自量力地……不仅解释《圣经》……还要当女预言家”而在高等宗教事务法院受审，被处以罚金并被关入精神病院。但是到了空位期，她的许多预言似乎都应验了，于是她又恢复了正常生活。从1641年到11年后她去

世时为止，她又至少出版了37本小册子。

另一位女预言家安娜·特拉普内尔（Anna Trapnel）在伦敦的一座浸礼会教堂体验到了某种神启。1652年时，她已经加入了第五君主国派。1654年，她陪同一位男性传教士到白厅去，结果在那里陷入昏睡，一连12天才醒。民众聚集到那里聆听她的预言——以及她对奥利弗·克伦威尔[29]及其政府的尖锐批评，这件事被收录在《白厅奇闻轶事》和《石头的呐喊》中。她坚持说——以诗体的形式——神的旨意既传给男人，也传给女人：

约翰不会被触怒
任凭这里的女仆歌唱，
任凭她们参与宣布
吾王的事务……

当局把她定为疯子，但是依然要她出庭受审。她说："这份报告说，等到对簿公堂时我会哑口无言，会认识到自己是个女巫。"但是她的伶牙俐齿战胜了法庭，毫不动摇地继续她的预言。克伦威尔政府无疑将这类预言当真了；好几次，他和他的国务会议都因先知的预言而中断，停下来认真聆听，其中几位先知是女性。

指望借神启来实现妇女解放可能作用有限。后来的女权主义不再那么强调女性的精神平等，而是更多地转向争取自然权利，否认男女在智力上有任何差异。

但是这种宗教狂热的爆发却蕴含着政治意义。16世纪，再浸礼派[30]已经承认女人和男人平等，允许她们在集会上祈祷和发言。有一个教派自称"平均派"[31]，其女性成员尤为活跃，施展才华的舞台也更大，她们在政治上表现得相当睿智。该教派信奉"以神形而造者"人人平等，鼓励女性参加活动。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许多平均派妇女的丈夫都被关在牢里，她们屡次三番聚集在威斯敏斯特——其做法十分类似今天的"示威"，要求释放她们的丈夫，同时也痛诉自己因此所遭受的艰辛。她们往往受到粗暴的对待，被斥责对自己

不明白的事情指手画脚。1642至1643年间，妇女们举行请愿，要求和平，结果遭到遣散，还被鄙夷地称为“婊子，妓女，牡蛎妇人，厨房丫头”。300名妇女再次向上议院呈递请愿书时，遭到伦诺克斯公爵[32]的断然拒绝。他嚷道：“让这些女人走开！”随后又嘲弄地补充说：“我们最好有一个女人议会。”1649年5月，妇女们又组织了一次请愿，要求释放平均派囚犯。但请愿被驳回，还遭到嘲笑：“请愿不是女人的事，她们应该呆在家里洗盘子。”对此，妇女们满不在乎地反击道：“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盘子可洗了。”

同年晚些时候，她们再次尝试请愿。多达1万名妇女又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

> 在你们的眼里，我们竟显得如此可鄙，都不配用请愿来向尊贵的议会表达我们的委屈。对此，我们只能感到既奇怪又悲伤。难道我们不是和这个国家的男人一样同等享受《权利请愿书》以及这个国家其他法令中所涵盖的自由和安全吗？难道我们不像男人一样只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才能把我们的生命、肢体、自由或财产从我们这儿拿走……

1,000名胸前佩戴着海绿色丝带的妇女把这份请愿书呈交给议会。她们又一次被不屑地遣散了。

不过，女性找到了培养自己行政能力的机会，这在贵格会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17世纪50年代，女性例会与男性例会同时召开。虽然一开始女性似乎偏重传统的女性事务，比如福利和道德问题，但是她们有机会建立起自己的、十分高效的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实际上掌控着相当多的资金。然而，历史学家们认为她们关注的范围在逐渐缩小。到了17世纪80年代，她们将自己局限于“女人的”问题。在此后的岁月里，她们专注于“适合我们的事情，比如说穷人，尤其是我们中那些贫困潦倒的人”。这其中包括帮助年轻男子找到学徒场所或工作，指导年轻女子从事“所有有益的事情”——包括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始终保持行为举止“谨慎、贞洁、端庄”。

注释

〔1〕 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1098—1179）：德意志女隐修院院长和神秘主义者，自称多次见到诡秘的异象。

〔2〕 明谷的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法国天主教西多会修士和神秘主义者，创立了明谷隐修院。

〔3〕 贝居安女修会：中世纪起出现在北欧城市中的一批女修士，她们不参加经正式批准的教会而过着虔修生活。12世纪末最早出现于列日，13世纪时正式以贝居安为名。她们大多自食其力，潜心于沉思默想，发愿身在会中时守贞不嫁，但可以随时还俗嫁人。

〔4〕 诺里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1342—1416以后）：英国神秘主义者，所著《神恩的启示》（*Revelations of Divine Love*，约1393）被普遍认为是阐明中世纪宗教修养体验的重要文献。

〔5〕 玛格丽·肯普（Margery Kempe，约1373—约1440）：英国神秘主义者。

〔6〕 宗教改革：16世纪西方基督教会中所发生的宗教革命，其主要领导人是路德和加尔文，由此产生基督教三大分支之一的基督教新教。

〔7〕 简·安杰（Jane Anger）：16世纪后期英国女作家，生平不详。她唯一的存世作品为《简·安杰论保护女性》（*Jane Anger: Her Protection for Women*，1589）这本小册子，批评了当时的大男子主义。

〔8〕 大利拉（Delilah）：《圣经·旧约》所载以色列人领袖参孙的最后一位情人，曾哄骗参孙说出力大无穷的秘密在于长发，然后出卖了他，并因此成为不忠的性感女人的代名词。

〔9〕 耶洗别（Jezebel）：《圣经·旧约》所载以色列国王亚哈之妻，阻挠希伯来人信仰神，迫害并杀害先知，挑拨希伯来人互相残杀，后被处死，尸首被群狗分吃。

〔10〕 埃米利亚·兰耶（Aemilia Lanyer，1569—1645）：据认为是英国第一位职业女诗人。

〔11〕 雷切尔·斯佩特（Rachel Speght，1597—?）：英国女诗人，据认为是第一位公开争论性别问题的女性。

〔12〕 内战：指1642—1651年间英国议会派与保王党之间的战争。空位期：指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至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之间的这段时期。

〔13〕 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1933— ）：英国历史学家。

〔14〕 布朗派：由英格兰基督教清教派公理会领导人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约1550—1633）创立，抵制圣公会，主张政教分离的自由教会运动。

〔15〕 独立会：又称分离派，要求脱离圣公会，主张由真正信奉基督的人组成独立的地方教会，后通称公理宗。

〔16〕 浸礼宗：基督教新教派别，认为只有信道之人才可受洗，而洗礼必须全身浸在水中（即浸礼）。

〔17〕 千禧年会：基督教派别，认为现实世界污秽不堪，会被复活的基督彻底涤荡，随后基督会治理世界1,000年。

〔18〕 家庭会：又称爱的家庭，16世纪由荷兰商人尼克莱斯（Hendrik Niclaes）创立，号召所有“热爱真理的人”不分民族和宗教，一律团结起来，不再争执教义，融于基督的身体之中。

〔19〕 贵格会：基督教公谊会的别称，强调圣灵的指引，废除外在礼仪和神职人员，积极维护和平、反对战争。

〔20〕 寻求派：17世纪许多英格兰清教徒脱离圣公会，组成小团体，寻求并等待神派来创立真正教会的新先知，这批信徒通称寻求派，为公谊会的前身。

〔21〕 狂言派：17世纪英格兰激进教派，提倡泛神论，认为神无处不在，强调对基督的内在体认，反对《圣经》权威。

〔22〕 福克斯（Fox，1624—1691）：即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英国脱离国教者，创立了基督教公谊会，即贵格会。

〔23〕 凯瑟琳·埃文斯（Katherine Evans，?—1692）和萨拉·谢弗斯（Sarah Chevers，?—1662）：贵格会女教徒。

〔24〕 约翰·维卡斯（John Vicars，1580—1652）：英国诗人和编年史家。

〔25〕 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英国清教牧师。

〔26〕 《哥林多前书》：《圣经·新约》中使徒保罗的书信体教义。

〔27〕 玛格丽特·费尔（Margaret Fell，1614—1702）：英国贵格会创始人之一，被称为“贵格会之母”。

〔28〕 字母换位游戏：即字母换位后构成新的单词或短语，这里指把Dame Eleanor Davis换成Never so mad a ladie。

〔29〕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国将军和政治家，为英国内战中议会派的主要将领，曾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1653—1658）。

〔30〕 再浸礼派：16世纪英国激进教派，认为洗礼应该在成年人自行选择宗教后再进行，故经常为婴儿时受过洗礼的成年人重新施洗礼。

〔31〕 平均派：17世纪中期英国激进政治派别，认为在政府事务上人人都有发言权。

〔32〕 伦诺克斯公爵（第四）（4th Duke of Lennox，1612—1655）：即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里奇蒙公爵（第一）（1st Duke of

Richmond），苏格兰贵族，1624年承袭父亲的爵位。

第二章

世俗女权主义的开端

在世俗层面上，女性的自主也许难免会发展得更加缓慢。由于受到神启而作出“非女性化”的举动是一回事，而出于个人抱负作出离经叛道的举动就没那么容易了。为了耶和华神，公开演讲或提笔写作都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还可以被称为神启的产物：“我乃无才无德的一个弱女子……若没有圣人之手的引导，我所能做的和铅笔或钢笔没有什么两样，”17世纪一位女性作家声称。此外，许多女性，无论是贵格会的还是其他教派的，都明显因为属于具有共同信仰和价值观的支持性团体而获得了信心。

但是，世俗的抱负则另当别论。当然，在许多世人的记忆中都还留存着一位杰出的英格兰女王，她知识渊博，博览群书。在罗杰·阿谢姆[1]的指导下，伊丽莎白能讲流利的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阿谢姆这样称赞女王：“她的头脑没有女性的软弱，她的毅力与男性并驾齐驱。”虽然她十分独断专行，但几乎从不支持其他女性。她对蒂尔伯里[2]驻军的那篇著名讲话（1588）体现出自己在女性和君王双重角色之间强烈的反差：“我知道我拥有女人软弱无力的身体，但是我却有着国王的心胸和勇气，而且是英格兰的国王。”不过，对于一些英格兰妇女来说，女王的存在至少算是一种鼓励，使她们相信自己的才华，接受自身“非女子气”的志向。确实有一些保王派[3]妇女——在内战中丈夫不在身边时——勇敢地奋起保卫自己的家人和家园。安妮·布雷兹特里特[4]（诗人，生于英格兰，后移居美洲）在女王逝世40年后写道：

> 让那些说我们这个性别缺少理性的人
> 明白现在这样讲只是诽谤罪，过去却是叛国罪。

一部名为《女人的严厉复仇》（1640）的匿名作品颇具煽动性地申辩道，把女人排斥在知识殿堂之外是“男人们精心策划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自己的主宰地位得以延续”。巴斯阿·梅金[5]曾担任查理一世的一个女儿的家庭教师，她后来创立了一所女子学校，并负责学校的

管理工作。她在《论复兴淑女在宗教、礼仪、艺术和语言诸方面的古典教育》一文中，强调了女性接受良好教育的重要性。“让女人变成傻子，”她说，“你们就好把她们当作奴隶。”她的书也许是，至少部分是，在为自己的学校和课程作广告，目标是家境殷实的女性。有趣的是，虽然她给女性提供了（当时依然难得的）学习经典的机会，但是为了使读者安心，她明确表示不会“妨碍女人成为贤妻良母，也不会让女人因读书而疏怠必要的家务”。而且，她透着一丝不安说道：“我无意谋求男女平等，更无意让她们凌驾于男人之上。她们是性别的弱者。”

但是巴斯阿·梅金热情地歌颂了保王派女性在内战期间的表现：她们“像战士一样保卫自己的家园，像男人一样深谋远虑，勇敢顽强”。她对学识渊博的同时代女性，包括安妮·布雷兹特里特和纽卡斯尔公爵夫人[6]，不吝赞美之词。夏娃食禁果而使世界陷入罪恶这个圣经故事经常被用来批评女性，但在梅金看来，这不过是说明必须接受良好教育的一个最早例证。

许多早期世俗作家似乎都经历过一段艰难时期。1621年，玛丽·罗思夫人（Lady Mary Wroth，诗人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的侄女）开始写作十四行组诗，但她最终并未完成，而且直到20世纪方才付梓。组诗出版后，女性文学批评家们对她为这种通常极为男性化的诗体所带来的有趣而清新的视角进行了分析。但当年罗思夫人勇敢地发表 散文体传奇《蒙哥马利伯爵夫人的乌拉尼亚[7]》后，却遭到恶意攻击，结果该书因被指诽谤同时代人而遭禁售。她的社会地位也庇护不了自己。“工作吧，夫人，工作吧，”丹尼勋爵（Lord Denny）居高临下地向罗思夫人建议道：“但是唯独不要写书／因为比你聪明的女人从来不写作。”

任何胆敢发表作品的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其实就是公开的嘲讽——在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的遭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她家世显赫，出身保王派的东英吉利亚领主之家，年轻时入宫，后陪伴亨丽埃塔·玛丽亚王后[8]流亡巴黎，在那里与当时的纽卡斯尔侯爵、即后来的纽卡斯尔公爵结识并成婚。她的特权——地位和财富

——的确庇护了她；但是这些特权也连同她那张扬怪异的个人风格，尤其是毫不掩饰的文学抱负，一起使她很容易成为闲言碎语恶意污蔑诋毁的对象。她的婚姻是幸运的；年长她很多的公爵鼓励她写作。她的作品屡次遭到批评。针对其中的一次批评，公爵评论道："一个女性写作，这就是罪过；如此侵犯男性特权，绝对不可赦免。"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生于14世纪的意大利，长于法国，据说是第一位以写作为生的西方妇女。她从父亲那里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丈夫过世后，25岁开始写作，收入足以养活3个孩子、1个侄女和她自己的母亲。她在自己最著名的作品《贵妇之城》（1404）中批评学术书籍散布"众多针对妇女及其行为的恶毒中伤"；三位寓言式的女性——理智、正直和正义——讨论了厌女症的根源。她认为，"内在品德更高的男人或女人更为高尚"；"一个人的贵贱不在于性别，而在于品行"。

1558年，纳瓦拉的玛格丽特[9]发表了《七日谈》，针对厌女症者的攻击为妇女辩护。玛丽·德古尔奈[10]在《论男人和女人的平等》（1622）中断言女人和男人在智力上是平等的："亲爱的读者，如果你不属于这个一切美好事物都被禁止享有的性别，你是多么幸福啊。"1640年，安妮·玛丽·范斯许尔曼[11]在《论女性心智的学习能力》中坚持认为："凡是能使人类头脑充满奇异而真切的愉悦的事物，同样适合人类中的女人。"

虽然从许多方面来看，卡文迪什的处境和大多数其他女性都不相同，但是她却非常感人地写出了女性共同的忧虑和烦恼，尤其是因子女而生的忧虑和烦恼："为他们幸福而操心，为他们作恶而忧虑，为他们生病而烦恼，为他们夭折而悲痛欲绝。"无论地位如何，女性无不为之所苦。

卡文迪什和夫君回到伦敦后，开始创作哲学诗。正如一位现代传记作家所说，她在“（女性和基督教）谦卑的美德”和自己的抱负之间左右为难。她理所当然地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作品，但是又经常被迫通过退守和自我贬低来为自己辩护。她抱歉地表示，写作是有闲妇女“无害的消遣”，总比无所事事地说邻居们的闲话要好得多。写作是一种“合乎体统和操守”的活动。她声辩道，不赞成这点的男人，只能希望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可以把时间花在不比诚实、天真而无害的幻想更糟的事情上”。

然而，卡文迪什的确从未将自己的作品当作无害的幻想。虽然她对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拒女性于千里之外的傲慢姿态持批评态度，但她还是勇敢地将两本书题赠给它们。1653年，她出版《诗歌与幻想》时宣称，她之所以写作是因为“在这个时代，所有的英勇行为、公职、强大政府和雄辩的辩护都对我们这个性别关起大门……”言下之意是，写作本身可能是一种英勇行为；而对她那一代的任何女性来说，也许确实如此。此外，她在1655年发表的《哲学和物理学观点》中抱怨道：

> 我们被当作笼中之鸟，在自己的房子里上蹦下跳，不得翱翔于外面的天空……我们被拒于所有的权力和权威之外，由于我们从未得到过文职或军职，我们的意见遭到鄙视和嘲笑，我们最出色的成就在耻笑声中被践踏，因为男人们对自己过于自负，对我们则不屑一顾。

但事实上，她在写于初返伦敦之时而发表于1655年的《世界杂集》的序言中指出，“如果让我们上学，开发智力，增长知识，我们会和男人一样拥有清晰的理解力。”

但是尽管她满怀雄心壮志，不懈追求，却未抱什么幻想。甚至有时候，或许是在所难免，她会丧失勇气。她对读者看过自己的自传《真实关系》后的反应曾作过悲观的预言：“既然没人关心她过去是谁的女儿，现在是谁的妻子，她有怎样的成长经历、命运或生活，那这位夫人为什么还要写自己的生活呢？”

果不其然，读者往往都是很刻薄的。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12]怀着强烈而居心叵测的猎奇心理，于1667年在伦敦跟踪了她好几个星期，接着又读了她关于自己丈夫的描述，最后谴责她是“一个疯狂、自负而荒唐的女人”。虽然卡文迪什曾满怀希望地特地将两篇序言奉献给女性读者，鼓励她们将时间花在“任何能为我们这个性别带来荣光的事业上，因为这个性别是些从不奢求名望的可怜而沮丧的灵魂”，不过她承认，传统限制了女性的天赋，使她们之间充满妒意，挑剔彼此的成就，所以她也许会“遭到同性别同胞的非难”。她的确经常有此遭遇。与她同时代的多萝西·奥斯本[13]对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的《诗歌与幻想》一书的反应，可悲地暴露出女性——甚至是知识女性——自己对女性写作不以为然的偏见严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多萝西听说公爵夫人的书后，感到既震惊又可笑，于是给她的未婚夫威廉·坦普尔爵士[14]去信称：

> 你要是见到这本书，务必给我寄一本；他们说这本书比她的衣着要过分十倍。当然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是有点儿精神错乱了，否则她怎么也不会荒唐到要冒昧写书，还要用诗歌体来写。我半个月睡不着觉，也不会沦落到这一步。

不久，她又写信给坦普尔，告诉他不用费心了，因为她已经弄到了这本书，也已经读过了，“……而且确信疯人院里还有很多比较清醒的人”。但是，既有讽刺意味又令人感到相当可悲的是，奥斯本本人写给未婚夫的书信却展现了一位生气勃勃、感觉敏锐、能言善辩的女性形象。正如弗吉尼娅·吴尔夫所说：“那位没有受过教育、惯于独处的女孩子在遣词造句和描绘场景方面竟有如此的天赋。”吴尔夫暗示，若换一个时代，奥斯本本可以成为一位小说家。

有趣的是，在王政复辟时期，伦敦这样一个道德沦丧、自私自利的世界竟为女性提供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她们可以做演员，虽然这并不是社会所尊重的职业；事实上，女演员常常被当作妓女看待。但是此外还有一些女性成了剧作家：凯瑟琳·特罗特（Catherine Trotter）、玛丽·曼利（Mary Manley）以及玛丽·皮克斯（Mary

Pix），她们都有剧作问世——而且又都在1696年上演的《W. M.》中受到无情的嘲弄。玛丽·曼利在她首部剧作的开场白中预见到了她们都将会面对的困难：

图2　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是一位睿智的作家，遇到凡是对被视为直言不讳或雄心勃勃的女性不友善的言行，她都予以有力的驳斥。

大幕现在由一位女士之手拉起，
你们会叫喊：这名字预示着软弱 ，
流苏 和香茶 才是她们全部心思的归宿。

在这些勇于开辟新天地、毫不畏惧这种讥讽的女性中，阿芙拉·贝恩〔15〕是最著名的一个。弗吉尼娅·吴尔夫窥见了些许贝恩的重要性，形容她为

> 一位中产阶级女性，拥有所有的平民美德：幽默、活力和勇气；一位由于丧夫且自己又遭某种不幸而被迫靠个人智慧谋生的女性，她不得不和男人在同样条件下工作。通过辛勤工作，她挣到了足以养活自己的钱。这一事实的意义要远胜于她实际所写下的任何东西。

距今更近一些的读者对待贝恩“实际所写下”的东西要认真得多——她是一位技艺纯熟且常常富有挑战性的剧作家，同时一些评论家发现她的生活几乎和她的剧作同样有趣。在成为作家之前，她游历甚广——或许曾到过南美洲的苏里南；作为政府间谍，她肯定到过低地国家〔16〕。虽然她作为剧作家的声名最为显赫，但是她还创作了故事《一位贵族和他妻妹之间的情书》。一位近代传记作家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个被忽略的故事实际上是一部伟大的色情小说，它同时也是对浪漫幻想所具有的潜能和危险的一次深刻挖掘。

她经常被人指责淫秽下流——而男性剧作家却免受指责。亚历山大·蒲柏〔17〕是那些嘲笑她伤风败俗的人中最著名的一个：“舞台上阿斯脱利亚〔18〕步履风情万种／曼妙地把所有角色都搞上了床。”贝恩为此作了有力的自我辩护：

> 如果我写的剧作署上任何一个男人的名字，而且没人知道是我所写，我向所有不带偏见的人请求评判，他们一定会说，这人写的都是好喜剧，和时下任何男人写得一样好。但该死的是，女人毁掉了诗人……我珍视名誉，有如我生为英雄那般。

事实上，像《浪荡子》这样一部戏是一个冷静透彻的分析，展现了女人在和男人打交道时如何使用心计、讨价还价——以及不可避免地作出妥协，而男人则几乎千篇一律地被塑造成冷酷无情的剥削者。

贝恩笔下的女主角海伦娜——靠集于一身的幸运、机智、精于算计和装扮技巧——在和损人利己的威尔莫尔的婚姻中获得了尊重（不过几乎可以肯定不会获得幸福）。但是有迹象表明，贝恩可能最同情的，也许甚至是最认同的，不是（多少有点）贞洁的海伦娜，而是妓女安杰莉卡·比安卡。正如现代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女主人公和她的创造者拥有共同的初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杰莉卡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孤苦无依地处于一群自私自利、工于心计的人中间。她相信引诱她的人所说的甜言蜜语，而在剧尾她遭到抛弃，留给她的只有苦涩和幻灭。贝恩的这种结局使我们心绪不宁，很不是滋味，满怀疑问，因为贝恩以及我们所同情的，毫无疑问都是不幸的安杰莉卡。在剧本附言中，她反驳了对她抄袭的指控（女性的才能特别容易受到冷嘲热讽，被一笔抹杀）。贝恩承认，虽然她可能从托马斯·基利格鲁〔19〕先前的一部作品中“窃取了一些线索”，但是“情节和动作（不是自夸）都是我自己的”。她接着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似乎佐证了她个人对那个不幸角色抱有某种认同：“不怕各位笑话，我挂出安杰莉卡的招牌（唯一被窃取的东西 ）来提醒 各位妙趣之所在。”〔20〕

注释

〔1〕 罗杰·阿谢姆（Roger Ascham，约1515—1568）：英国人文主义学者和散文家，1548—1550年间奉诏担任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老师，对女王影响很大。

〔2〕 蒂尔伯里：英格兰埃塞克斯郡瑟罗克区港口。

〔3〕 保王派：英国内战期间拥护英王查理一世的政治团体。

〔4〕 安妮·布雷兹特里特（Anne Bradstreet，约1612—1672）：首位在美洲殖民地写出有价值的英文诗歌的女诗人。

〔5〕 巴斯阿·梅金（Bathsua Makin，约1600—1675）：英国早期女权主义者，被誉为17世纪“英格兰最博学的女性”。

〔6〕 纽卡斯尔公爵夫人（Duchess of Newcastle，1623—1673）：即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英国贵族、诗人、哲学家、剧作家和散文家。

〔7〕 乌拉尼亚：希腊神话中司掌天文的缪斯女神。

〔8〕 亨丽埃塔·玛丽亚王后（Queen Henrietta Maria，1609—1669）：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之女，1625年与英王查理一世结婚，为英王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之母。

〔9〕 纳瓦拉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de Navarre，1492—1549）：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女作家，纳瓦拉国王亨利二世的王后。《七日谈》是她效仿《十日谈》创作的故事集。

〔10〕 玛丽·德古尔奈（Marie de Gournay，1565—1645）：法国女作家，蒙田的养女。

〔11〕 安妮·玛丽·范斯许尔曼（Anne Marie van Schurmann，1607—1678）：荷兰女诗人和文学家，被誉为17世纪最有才华的女子。

〔12〕 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英国海军军官，以所记日记闻名。

〔13〕 多萝西·奥斯本（Dorothy Osborne，1627—1695）：英国贵妇，以婚前写给未婚夫坦普尔的书信闻名。

〔14〕 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

〔15〕 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1640—1689）：英国戏剧家、小说家和诗人，是英国第一位职业女作家。

〔16〕 低地国家：指欧洲西北部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

〔17〕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国评论家和伟大诗人。

〔18〕 阿斯脱利亚（Astraea）：希腊神话中司掌正义的女神。

〔19〕 托马斯·基利格鲁（Thomas Killigrew，1612—1683）：英国剧作家和剧院经理。

〔20〕 在《浪荡子》一剧中，高级妓女安杰莉卡挂出3幅自己的画像作为拉客的招牌，其中1幅被浪荡子威尔莫尔窃取。原文where a great part of the Wit dwelt为双关语，既可理解为“（本剧）妙趣之所在”，亦可理解为“一位伟大智者的居所”。

第三章

18世纪：执笔的亚马孙女战士〔1〕

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是最早的真正女权主义者之一，或许也是第一个探究并维护关于女性的思想的英国作家。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认同这些思想，与之产生共鸣。在她一生中，她和其他女性打成一片，推心置腹，谈论她们遇到的共同问题。虽然她笃信宗教，但是她和17世纪教派里那些喜好争辩的前辈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2]。她非常保守，终身追随保王党和高教会派；只有当她洞察到女性的生活受传统所限、思维没有得到开发训练时，才会变得激进起来。

阿斯特尔生于1666年，父亲是纽卡斯尔煤炭商，在她12岁时去世。青少年时期，阿斯特尔曾陷入极度抑郁。她写诗倾诉自己的孤苦和无情的现实——尽管她才思敏捷、满怀自信，却也无法想象自己会有什么像样的未来。21岁时，她写过一首诗，诉说自己的挫败感（其他许多女孩也一定有过相似的经历），并忧郁地承认，她想象不出会有什么生活能够让自己施展才华或实现梦想。

自然不允许我像寻常那样，
以入朝或报国，去博取
那宝贵的少许名声

她那时也许倾向于做传教士：

为土耳其人和异教徒
我或许能把福音传递
不遗余力地使他们悉数皈依
但是，唉，怎奈我的性别令我无能为力……

不过，几个月后，她仅带着一点儿盘缠和几位亲友的住址，离家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伦敦之行，这一举动的确显示出了非凡的勇气。起初，她似乎曾在切尔西落过脚，并希望在那里度过余生。她有些远房亲戚住在那里，但是他们并不十分乐意帮忙。不久她便陷入了沮丧，看不到出路究竟在何方。1688年，她因“无法谋生”而感到绝望，

便给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William Sancroft）写信求助：

> 既然神 赋予了男人 和女人 同样智慧的灵魂 ，怎么能够禁止他们改善这些灵魂呢？既然他没有拒绝赋予我们思考 的能力，为什么我们不能（至少为表感激之情）将我们的思考 奉献于他这个最尊贵的对象 之上，而不是把它们用在琐事 、作 乐 和世俗事务 之上呢？

桑克罗夫特大主教显然被她的聪慧和虔诚打动了，他送了些钱给她。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联系。不久以后，玛丽·阿斯特尔便开始接触到一个知识女性的圈子，她们成了她的终生好友，同情并支持她的想法。1694年，她完成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对女士们的严肃提议》。她在书中敦促妇女们认真看待自己：她们必须学会独立思考，下工夫开发自己的智力、提高自己的技能，而不是一味地听从男人们的判断。她有一本书取名为《对教育的思考》，该书具有开拓性和真正的前瞻性——至今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因为她强调了女性接受良好教育的紧迫性。她认为，女孩子必须学会独立思考，清晰而理性地作出判断，而不是把时间都浪费在掌握优雅的社交技巧和才艺上。

>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功劳都置于他们［男人］的名下 ，认为自己所能够做的无非是可怜地去征服 某个一无是处的人 儿 ，而无力做一些更为崇高的事情 ，那我们也未免太抬举他们而过于贬低自己了。

阿斯特尔的文笔总是那么清楚、犀利，常常流露出睿智：“镜子所能为你做的，还不及你用自己的头脑认真自省时的一半。”

阿斯特尔的分析确实非常及时。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宗教改革，尤其是许多女隐修院的关闭，客观上导致英国妇女更难受到任何形式的教育。阿斯特尔认为，女人和男人一样能干；她们所缺少的只是“培养、提高自身”的严格训练。她慷慨地支持其他女性，例如热情地赞扬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3] 出版的书信集兼游记——《土耳其

信札》：

至少让她的同性 来公正地评判 她吧……正如我发自灵魂 深处的那样，让我们尽情地享有卓越天才 的无上荣光 ，为一个女人 的成功而欢乐，并且自豪地追随她的步伐。

但是，“可怜的女人 除了找个丈夫之外，可曾有人教她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她在1700年出版的《对婚姻的一些沉思》一书中这样问道。她十分不情愿地承认，婚姻对于人类繁衍是必要的，不过她坚持认为妻子往往只是被简单地当作“男人的高级仆人 ”。她警告道，任何女人“不表现出绝对服从 ，就决不会被丈夫 这样至高无上的君主所容纳”。她在自己的第一本书里描述了自己的理想：建立一座世俗女隐修院，女人能在那里共同生活，遁出尘世，保持快乐和好学的纯真，“这样一个你们母亲夏娃 所失去的伊甸园”。这个伊甸园里没有亚当的位置。在《对婚姻的一些沉思》中，她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想法，使其更加具体可行。她认为，无论女子未来命运如何，都需要建立女子大学，使她们接受全面的教育。也许在她看来更重要的是，这些大学还要帮助未婚女性；事实上，它们可以为某些女性提供人生选择，使她们过上不必依赖男性的生活。

随着名气渐长，阿斯特尔经常成为嘲讽和恶毒挖苦的对象。她最终停止了写作，但是她能够非常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1709年，她说服自己在切尔西的一些比较富有的熟人赞助开办了一所慈善学校。她的计划非常及时：在1699年5月至1704年之间，伦敦和威斯敏斯特地区已建立学校54所；到了1729年，该地区共有学校132所，许多女性积极参与到学校的规划和管理中来，并且逐渐加入了教学行列。

阿斯特尔对男性以及婚姻固执而严厉的否定态度无疑降低了她对许多女性读者的吸引力。但是她对于女权主义的伟大贡献在于，她以自己的方式敦促妇女正视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断，通过开发自己的天赋和自学，在生活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她坚持认为，自己的成就一点

儿也不突出；她“没有任何理由 觉得自己的理解 比她的同性们 更出色”。如果有什么区别，只是由于“她的专注 、她对真理公正无私、毫无偏见 的爱 以及对真理矢志不渝的追寻，不畏重重阻力。这是每个女人 都力所能及 的”。

直到18世纪末，其他女性才能够像她那样清晰有力地发表看法，或者提出一个类似的、同样有力的女权主义纲领。但是在整个18世纪，女性的境况不断改变，而且并不总是越变越好。在一个日益资产主义化的社会，在家庭作坊或家族生意中和丈夫一起打拼的妇女越来越少。对女性来说，独立生活、养活自己或许更难了；而且，有看法认为，没有嫁妆找丈夫难度陡增。同时，接受教育的女性人数大增，她们至少学会了读写。在整个18世纪，“礼仪”书籍都是直接针对女性写的，虽然这些书大多教导的都是温顺、孝顺、贤淑等“妇道”美德，而且所有的书都极力强调端庄，这个品质也常被委婉地用作贞洁的同义语。但是，更多的女性自身也在写作和发表作品，而且体裁多种多样；她们为数众多，终于惹恼了那位了不起的约翰逊博士 [4] ，他花了不少时间嘲讽这些“执笔的亚马孙女战士”。

在这群具有女权意识的“亚马孙女战士”中，最出色的要数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5] 。她的《为女权辩护》出版于1792年，直到今天依然对我们有直接的借鉴作用。然而她决不是孤军奋战。例如，凯瑟琳·麦考利 [6] 和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是一名激进分子，对法国革命作出过深思熟虑的回应。1790年，麦考利写了《教育信札》，之前她已经出版了多卷本的《英格兰历史》。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稍晚些的说法一样，她在《教育信札》中声称，女性表面的软弱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教育误导所致。麦考利还抨击了性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坚称一次性经验并不会把一个处女变成荡妇。她坚决反对那种把女性当作“仅仅是男人财产”而无权支配自身的观念。

当然，她引起了一些读者的不安；正如一名男子不以为然地跟一位女性朋友所评论的那样：“我曾经希望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个这样的女性出现，以此证明天赋并不受性别的限制……但是……你得原谅我，我们只需要一个麦考利夫人。”甚至像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约翰·

亚当斯（John Adams）这样一位同情她的读者，也话里有话地称赞她是“一位拥有男性般高明理解力的女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知道麦考利的作品，她寄给麦考利一本自己写的《为人权辩护》，并附上一封信，信中说“你是唯一一位与我不谋而合的女性作者，我们都尊重我们这个性别所应该努力争取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沃斯通克拉夫特写道：“我不认为她的理解是男性化的，因为我不同意对理性作出如此傲慢的假设；不过我认为她的理解很明智，而且她的判断……证明，女人可以完完全全地作出判断。”她继续写道，她推崇麦考利是因为她“追求的是桂冠”，而大多数女人“追逐的只是花朵”。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年出生于一个后来并不太成功的中产阶级家庭。她早年的生活令人寒心地意识到那个时代提供给女孩的教育少得是多么可怜。大部分女孩都是在家受点教育——这种教育很少令人十分满意，教她们的要么是母亲，要么是缺乏训练的家庭女教师。在18世纪后半叶，为中产阶级女孩开设的私立学校蓬勃发展，但是许多这样的学校只注重教学生如何做到优雅、彬彬有礼，为日后的“美满”婚姻做好准备。沃斯通克拉夫特曾经在约克郡上过短期的走读学校，不过她主要靠自学。一位做牧师的邻居曾经借书给她看，她似乎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不让自己接触任何“仅供消遣的东西，甚至连诗歌也不行”，而是“专注于需要理解力的著作”。

和她那个时代缺乏足够教育的许多女孩一样，她发现谋生艰难。19岁那年，她在巴斯谋得一份差事，给一位老妇人做伴，后来回家照顾濒死的母亲。此后，她靠做针线活儿勉强维持生计。她和妹妹们以及密友范妮·布拉德（Fanny Blood）一起在纽因顿格林开办了一所学校，但是很快就失败了（鉴于她们既无经验，又缺乏训练，失败也就毫不奇怪了），不过她至少在那个地区的新教知识分子中间结识了一些朋友。范妮不久之后结婚，陪伴丈夫去了葡萄牙。1785年，范妮即将临产时，沃斯通克拉夫特去了里斯本，但是她的朋友却死于难产，令她伤心欲绝。1786年，她短暂地受雇于爱尔兰贵族金斯勃罗家族，担任家庭女教师（依然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她厌恶雇主，看不惯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满心怨愤，郁郁寡欢。后来她回到家里照顾产后

精神崩溃的妹妹。

她三十出头时，激进的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让她为自己新创刊的《分析评论》工作，将她从麻痹性抑郁中拯救了出来。她开始定期为他写写评论，做做翻译。显然，她通过阅读与写作进行了自学。此外，这份工作，以及她与通过约翰逊认识的那些激进知识分子之间的友情，增强了她写作的自信。1787年，约翰逊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论女儿的教育》。本书论述有力，呼吁给予女孩机会，让她们发展神赋予她们的才智。不过，本书的真正力量在于其中所蕴含的一股个人情感，一种显然源于她自己在获得教育过程中的种种艰辛的尖刻和紧迫感，以及她对众多时髦妇女轻薄言行的蔑视。此后不久，她又出版了《玛丽，一个故事》。本书虽然文笔显得粗糙，却讲述了一个女孩在一个没有给她提供多少支持和机会的社会里如何成长的有趣故事。（她的两部小说的标题，即《玛丽，一个故事》和后一部没有完成的《玛丽亚；或女人之委屈》，都清楚地暗示这些故事直接取材于她本人的经历。）玛丽聪明且富有“情感”，为了在一个没有给她多少机会的社会里获得成功而奋斗。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出——并且开始探讨——一些有趣的情感悖论。她的女主人公一方面强烈地反抗男性主宰和男性暴力，但另一方面却依然梦想着父爱般的呵护；她既同情自己终成牺牲品的母亲，又对她充满怨恨。那位年长的妇人被刻画为懒懒散散，把时间耗费在阅读情感小说上，满脑子都是恋爱场景。最终，在经历了一系列失败后，玛丽决定为他人而活，做一个本分的“有女人味”的女人。可悲的是，她的人生就是她母亲的翻版。沃斯通克拉夫特可能缺乏充分的技巧来展开笔下的人物，这本书并未引起广泛的评论，但是它依然令人着迷、发人深省，探讨了她自己所面临的一些两难困境。

到了1790年，沃斯通克拉夫特觉得自己已经具备足够的自信去谈论政治问题。《为人权辩护》向埃德蒙·伯克[7]立场保守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发起了猛烈的抨击，有时甚至是刻薄的人身攻击。她指责伯克多愁善感，简直有一种腻歪的女人气；她把他比作“名媛”，挖空心思招人爱怜；他是个幻想家，而不是严肃的思想家。继而，她

伟大的女权主义论著《为女权辩护》于1792年出版。她挺身而出，“为我这个性别而非为我个人”大声疾呼，不过她也承认“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大部分斗争都是由我这个性别所处的受压迫状态引起的”。她将法国革命中所主张的人 的权利扩展到了女人 ，这一步看似简单，却甚为关键。

如果男人的各种抽象权利经得起讨论和解释，由此类推，女人的权利也不会畏惧同样的检验……如果女人和男人拥有同样的理性禀赋，那么是谁让男人来做独一无二的裁判的？

沃斯通克拉夫特承认，在她所处的时代女人的确 低人一等。她们从出生起就遭受压迫，得不到教育，被与现实世界隔绝开来，因此大部分女性难免会变得无知而懒惰。

她们从孩提时代起就被教导美貌是女人的权杖，大脑也要和肉体保持一致，在它那镀金的笼子里漫步，一心想着膜拜自己的牢笼。

男性的殷勤和奉承都被看作只是企图给女人画地为牢，最“有女人味”的女人是最能满足男性幻想的女人。她指出，女子气通常只是一种人为的构建，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不过就是对教养——或者说所向往的教养——的一种急切的展示。女孩子们还是幼儿时就开始学习 如何做女人。随着年龄增长，由于别无选择，她们便利用起这种女子气。她认为，这无异于间接承认女性低人一等。但是，女性并非“天生”低人一等，正如穷人并非“天生”愚昧无知一样。此外，她还说自己所认识的做事有理性或展现出任何才智的女性，无不恰巧都在孩提时代被放任自流。她不仅有力地为改进女孩教育而争辩，也为至少普及 9岁前教育而呼吁，这在她的时代是绝无仅有的。

奥兰普·德古热 [8]

1791年，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奥兰普·德古热发表了《妇女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清晰有力地宣布：女人生来自由，而且和男人平等。在德古热的描述中，过去一个美丽可爱的女人可以获得数不清的财富，但是她比奴隶好不了多少。现在，至少在理论上，她享有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以及反抗压迫的权利，因此也应该能够自由地走上讲坛发表演说——正如有时候她不得不走上断头台。和男人一样，她也受到法律的约束，也会依法遭到起诉和审判。但是，这就意味着女人也应该在公共生活中、在法律和税收决策中承担同等的责任，并且有权要求男人承认他自己的子女。过去，无论已婚妇女还是未婚妇女都处于劣势地位，靠姿色过活。德古热坚定地认为，在未来，妇女必将自由地参与男人的所有活动。在更为实际的方面，她勾勒出一份详尽的“社会契约”，凡选择过共同生活的女性——和男性——均受这份契约保护。

沃斯通克拉夫特指出，任何女人想要表现得像人，都要冒被贴上“男性化”标签的风险，而且她承认在自己这个性别里，害怕别人说自己没有女人味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但是如果“男性化”意味着做事有理性、有节操，她建议我们都应该“越来越男性化”。虽然她为女性的潜在 力量——她们从事所有智力活动的能力——而辩护，她却严厉批评同时代很多女性的现实 表现。“从婴孩时代就受到母亲的言传身教”，要她们必须找一个男人来养活自己，于是她们学会了如何施展魅力、装扮外表，直至找到一个愿意养活她们的男人。她们很少思考——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情感。不过，沃斯通克拉夫特同时也承认，虽然改进教育对女性至关重要，但是它并不能改变一切：“男人和女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须接受自身所处社会的观点和行为方式的教育”；如果没有激进的社会变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女性行为革命”。她觉得在现状下这么多妇女无知、懒惰、缺乏责任感并不令人惊讶。

有趣但也相当可悲的是，其他女性——甚至是一些相当有学识的

女性——也对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例如，汉娜·莫尔[9]甚至拒绝阅读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书，因为书的标题就“荒谬无比”；而汉娜·考利[10]则忸忸怩怩地抗议道：“政治不是女人的事。”

时至今日，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乍一看似乎已经过时。但是她是一位有力的作家；她的文章朴实无华、文笔生动，往往一针见血。本书仍然非常值得一读，而且它依然是当代女权主义的一部奠基之作。她的论述中颇多循环论证，而且由于探索性强，经常涉及新的领域，所以有时候似乎有些令人费解。她敏锐地、有时甚至是苦涩地意识到了女性在她所处的社会里所遭遇的种种个人困境。例如，她认为对童年的理解是任何自知的关键所在。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幼稚对成熟来说至关重要：“在我能够对我的整体存在形成一点认识之前，我一定会心满意足地像个孩子一样又哭又跳——渴望得到玩具，而一旦得到又会很快厌倦。”几个月后，她给哲学家、小说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写信，难过地说：“我的想象总是背叛我，让我陷入新的痛苦，而且我想我到这一章终结时都还是一个孩子。”

正如上文所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小说《玛丽，一个故事》部分基于她自己的童年以及她与父母之间紧张的关系，是探索女性成长过程的一个有趣尝试。（它偶尔还对女主人公的情感 不吝溢美之词，正是这种真实感受的能力使她与众不同。）沃斯通克拉夫特痛苦地认识到，童年迷茫的情感往往会主导、甚至扭曲成年的各种关系，书中对此作了描述；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重新上演那些植根于过去的一出出戏剧。她在《为女权辩护》中说，女人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鼓励去成为真正的成年人；她们“在还是孩子时就被制造成女人，而在她们可以永远离开学步车时却被带回童年”。但是任何女孩，“只要她的精神还没有被懒散所压抑，她的天真还没有被虚假的羞耻所泯灭，她就永远是一个顽童，洋娃娃永远也无法让她兴奋，除非把她限制得别无选择”。

在《关于教育的思考》中，她坚称婚姻的基础应该是友谊和尊重，而不是爱情；在《为女权辩护》中，她不屑一顾地声称，大部分

女性为爱神魂颠倒，梦想着与某个真正爱自己的理想男人相爱而得到幸福，这不过是因为她们的生活极度空虚而已。不过沃斯通克拉夫特自己并未做到言行如一，她默认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正是部分因为如此，她才成为魅力持久的作家。她悲哀地承认，即使是最有理性的人也可能会成为“狂热而持续的激情”的牺牲品；正如她付出了代价后所发现的那样。1793年，她去巴黎时遇到并爱上了美国冒险家吉尔伯特·伊姆利（Gilbert Imlay）。在经历了最初的一段甜蜜之后，她在信件中开始抱怨他明显对自己不闻不问，流露出越来越多的绝望。她怀了伊姆利的孩子，心情万分沮丧，但依然努力地写作《法国革命起源与进程历史综览》。她对法国革命中女革命者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比较暧昧，考虑到她的个人情况，也许是受到了焦虑情绪的影响，急于以此显示自己的高贵。1789年10月，巴黎的女商贩们游行到凡尔赛宫，冲进宫殿向国王提出抗议，沃斯通克拉夫特却毫无同情之心。她对此无比恐惧，说她们是“市民中最低贱的垃圾，一群抛开一种性别的德行而只会吸取另一种性别的恶习的女人”。

图3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最早为妇女权利——以及她们经常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奋笔疾书的英国女性之一。她文风雄辩有力，语气有时义愤填膺。她的作品长盛不衰，许多现代女性依然如饥似渴地阅读她的作品，并大加赞赏。

孩子范妮出生后，她为了伊姆利的生意（带着孩子和保姆）去了瑞典。她此行的《信札》于1796年出版，（和她从巴黎写的信件不

同，）既有洞察力又引人入胜。但是当她回到伦敦时，却发现伊姆利和另一个女人同居了。她跳泰晤士河自杀未遂，最终嫁给了威廉·戈德温。

她于1797年去世，身后尚未完成的第二部小说《玛丽亚；或女人之委屈》是一部纯粹的情节剧[11]；但是也许只有 情节剧的夸张才有助于她抒发对于女性处境所一直怀有的愤怒和挫败感。她的女主人公玛丽亚被歹毒而奸诈的丈夫送进了疯人院，因为他觊觎她的财产。“难道这世界不就是一个大监狱，女人们天生就是奴隶吗？”她问道。

或许这本书最有趣的部分是玛丽亚和她的看守（一个叫杰迈玛的女人）成了朋友。玛丽亚发现杰迈玛遭遇之悲惨绝对不亚于自己。杰迈玛童年饱受典型的恶毒继母摧残，之后被赶去当学徒，结果惨遭师傅强奸而怀孕。孩子流掉后，杰迈玛成了小偷，遭人诱奸后又被抛弃，于是开始在“名声不好的院子”[12]里工作。她逃到一家济贫院寻求庇护，后来被疯人院老板雇用，最终发现疯人院的老板竟也盘剥压榨疯人院里的病人。这部小说里尽管有各种哥特式的夸张，但是却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观点：在男性主宰的世界里，中产阶级女性和工人阶级女性都可能会发现自己遭到掠夺而无可奈何。

沃斯通克拉夫特最后一部小说遭到一位男性友人的批评，她为此愤怒地辩护道：

> 您居然认为玛丽亚的遭遇无足轻重，我对此感到既气愤又惊讶；我只有想到您是男性，才能解释您这种——恕我直言——缺乏怜悯之心的表现。

她的这个意见非常严肃，这也是她留给后世的遗产：女人必须大胆说话，讲述她们自己的生活经历，表达她们的切身感受，说出她们自己的希望和被欺骗、被不公正对待的感觉。

沃斯通克拉夫特留下的笔记勾勒出了笔下女主人公极为惨淡的未来：“丈夫强迫离婚——情人背叛——怀孕——流产——自杀。”沃斯通克拉夫特很可能从未想过要为她安排一个令人信服的圆满结局。她

本人虽然十分短暂地在威廉·戈德温那里获得了安宁和满足，却在结婚几个月后死于生产。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也取名玛丽，长大后将会嫁给诗人珀西·雪莱[13]，写出那部非同寻常而又令人不安的小说——《弗兰肯斯泰因》。

小说

在整个18世纪，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阅读散文体小说，因为其中反映或评论了她们自身所怀有的希望和遭遇的困难。但是她们自己也在写小说，所探讨的往往都是自己生活中的机遇和问题。她们中有些人专注于描写日常家居生活；她们中的佼佼者——范妮·伯尼（Fanny Burney），有时当然也包括简·奥斯汀（Jane Austen）——则会就女孩所面临的选择提出严肃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婚姻及其后果的问题。

“哥特式”小说通过离奇的情节来表现同样的问题，极受读者追捧。在许多故事中，纯真无邪的女主人公发现自己身陷一个噩梦般的世界，不得不奋力反抗企图夺走自己贞操乃至生命的恶汉。塞缪尔·理查森[14]笔下的女主人公——帕美勒（1741）最终赢得了自己的男人，而克拉丽莎（1748）则充满了悲剧色彩——的“情感”这个特点被表现到了极致。安·拉德克利夫[15]的《尤道弗的神秘事件》（1794）和《意大利人》（1797）比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人之委屈》稍晚一些，是后者的翻版，不过要更为老练一些。简·奥斯汀在《诺桑觉寺》（1818）中情有独钟地戏仿了哥特式的夸张离奇。然而，虽然她笔下天真的女主人公在幻想上要略逊一筹，却要面对更为糟糕的东西：十足的自私和残忍。哥特式小说的过分铺陈为女性读者及作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使其得以发掘自己的情感，直面自己关于男人、婚姻以及个人生活中各种选择的阴暗幻想和恐惧。

注释

〔1〕 亚马孙女战士：希腊神话中的野蛮部落女战士。Amazon意为“没有乳房的”，据说亚马孙人会割掉女孩的右乳以便其拉弓射箭。

〔2〕 这里暗指16世纪的宗教改革及其在宗教界所引发的大争论。

〔3〕 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1689—1762）：英国贵妇，以书信闻名，尤其是与女权活动家阿斯特尔和安妮·蒙塔古夫人（Lady Anne Montagu）之间的书信。

〔4〕 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著名诗人、散文家、评论家以及辞书编纂者，其警言佳句流传甚广，仅次于莎士比亚。辞书代表作为《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755）。

〔5〕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英国女作家和历史学家，被尊为女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

〔6〕 凯瑟琳·麦考利（Catherine Macaulay，1731—1791）：英国女历史学家和激进政治作家。

〔7〕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英国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

〔8〕 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1748—1793）：法国女权主义剧作家和记者。

〔9〕 汉娜·莫尔（Hannah More，1745—1833）：英国宗教女作家和慈善家。

〔10〕 汉娜·考利（Hannah Cowley，1743—1809）：英国剧作家和诗人，被称为18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

〔11〕 情节剧：西方感伤戏剧的一种，追求耸人听闻的奇异情节和壮丽场面，大多表现善恶斗争，结局通常惩恶扬善，皆大欢喜。

〔12〕“名声不好的院子”：即妓院。

〔13〕 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1792—1822）：英国浪漫派诗人，一生追求个人解放与社会正义，是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英国传奇和哥特式小说家。

〔14〕 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英国小说家和出版商，其小说《帕美勒》常被称为英国第一部小说。

〔15〕 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1764—1823）：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哥特式小说女作家，擅长在恐怖描写中加入浪漫气氛。

第四章

19世纪早期：变革中的女性

19世纪，女性的诉求得到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清晰的表达——或许这是对当时出现的真正“女子气质”形象作出的反应，随着世纪时光的流逝，这种“女子气质”似乎变得愈加狭隘：成了一种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的有关教养和优雅的理想。但是，虽然许多女性（以及男性）雄辩地宣讲自己的观点并且身体力行，不过直到这个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出现有组织的运动——尤其是争取改进女性教育、外出工作机会、修改涉及已婚妇女的法律以及选举权的运动。

1843年，已婚妇女玛丽恩·里德（Marion Reid）在爱丁堡出版了《为女性申辩》，被誉为继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之后女性所作的最彻底、最有效的申述，这个评价毫不为过。里德涉及了改革者们在这个世纪余下的时间里所专注的大部分领域，然而本书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当时，本书读者众多，数次再版，不过它似乎在美国比在英格兰更受欢迎。）同时代的人——她承认这些人大多是女性——自信十足地谈论“女人的领域”，把女人味和自我牺牲画上等号，里德对此作了冷静而大逆不道的分析。“有女人味”的举止实际上就是“关心体贴丈夫，保持子女干净整洁，用心料理家务”。但是里德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坚定地认为，这种貌似崇高伟大的“自我牺牲”实际上通常包含着“极其可耻的自我泯灭”。

大部分女孩所受的教育只会“束缚和限制”她们。她声称：“任何独立思考的表现都会马上受到压制……大部分女孩都被驯服成了机器人。”许多女性为了“能够接受良好扎实的教育”，所面临的几乎是无法逾越的困难，里德对此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大部分女孩被抚养得“机械地履行职责……而她们自己的头脑却始终陷于贫瘠和荒芜之中”。这个教育问题在整个19世纪都一直显得举足轻重；自玛丽·阿斯特尔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时代以来，看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女孩教育——无论在家受教于往往本身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培训的女家庭教师，还是在难如人意的学校学习——始终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虽然里德认为大部分女性都是以“一种冷漠、生硬、机械、没有爱、无精打采的方式”对待家务，她还是谨慎地承认女性有责任做家

务。她承认，现实生活中，家务活儿一定会占据女性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或许是主要部分”。但是她认为女人没有理由一定要被限制在家务劳动中。她略带迟疑地承认，她可以部分地“委身”“于男人”。但是，她问道：“如果女人的权利和男人的不一样，那么她们的权利是什么？”她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女人是为男人而生，但是从另外一种更高层次的意义上说，女人也是为自己而生”。在她看来，无知并不等于美德。

但是，生活在“枷锁之下”的已婚妇女无权处置自己的财产；甚至连自己的劳动成果也要听凭丈夫的处置。只要丈夫愿意，他可以将其据为己有，“肆意挥霍浪费”。更有甚者，“她的孩子，和她的财富一样，也是她丈夫的财产”。

对于那个时代来说，里德最激进的言论是她坚称“女子气质”和参政投票一点儿也不矛盾。毕竟，女人和男人一样，是“有理性、有道德、负责任的动物”。她小心翼翼地声明，她并不特别希望看到女议员的出现；很可能没有几个女性会“同意被选中”，也没有几个投票人会选择她们。但是如果真的有女性“有能力或者愿意跨越自然的阻碍”，她认为没有理由不让她们参加竞选。

19世纪最著名的两篇女权辩护出自男性之手，不过两位作者——威廉·汤普森〔1〕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2〕——都承认受到了自己妻子的影响和启发。有趣的是，这两位女性都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口齿伶俐，却都不愿意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这是由于害怕打破习俗用自己之口说话而感到紧张呢，还是仅仅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认为男人的辩护会更受重视呢？

1825年，出生于爱尔兰的威廉·汤普森出版了他的《人类的一半女人对人类的另一半男人得以维护政治奴隶制以至公民和家庭奴隶制的权力的控诉》。他形容这本书“至少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对“人类一半成年人受欺压的抗议”。这本书是献给孀居的安娜·惠勒（Anna Wheeler）的，感谢她所给予的灵感。安娜·惠勒15岁时就被嫁人，和丈夫育有6个孩子。但是安娜发现丈夫是个酒鬼后，鼓起勇气离开了他。1818年，她在法国呆了些时间，在那里接触到了空想社会主义

者。两年后，丈夫去世，她回到伦敦，因热衷改革运动而出名。她遭到了像本杰明·迪斯累里[3]这样的人物的攻击。迪斯累里讽刺安娜“界于杰里米·边沁[4]和梅格·梅里利斯[5]之间，非常聪明但革命得可怕”。

汤普森赞成并表达了安娜·惠勒的激进观点。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听说您愤然拒绝了和男人这种东西彼此平等的恩惠，我愿和您一道平等地促进两性进步。”本书集中关注的是已婚妇女的境况，当时已婚妇女已经沦为“一份会移动的财产、一个永远听凭男人使唤的仆人”。对于已婚妇女而言，家变成了“牢房”。房子本身，连同房子里的一切，都属于丈夫，“而且在他所有的附属物里，最低贱的要数他的生育机器——妻子”。事实上，已婚妇女就是奴隶，她们的境况比“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好不了多少。母亲们被剥夺了对子女和财产的权利，大部分都被当作“上等佣人”使唤。

本书部分是为了回应詹姆斯·穆勒[6]的《论政府》一书。该书当时非常有名，认为女人不需要政治权利，因为她们的父亲或丈夫足以代表她们。“那些既没有父亲也没有丈夫的女人怎么办呢？”汤普森问道。接着，他不遗余力地严词抨击了认为夫妻权益始终如一的愚蠢想法，痛斥这种不公正的情形。他还盼望有一天，所有阶级的孩子，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将获得平等的待遇，接受平等的教育。

安娜·惠勒后来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女权作家和演说家。可悲的是，她自己的女儿强烈反对她的激进思想，声称她

> 不幸深受法国革命恶毒谬论的影响，那时这种谬论几乎已经传染了整个欧洲，而且……她还深受沃斯通克拉夫特夫人的书所毒害。

有趣的是，威廉·汤普森也批评过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但批评的理由却正好相反：他批评她“眼界狭窄”，“结论中透着胆怯和无能”。（或许这暴露出他本人缺乏历史意识。）不过他号召女性对教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提出自己的要求。他感到，从长远来看，这也会使男性受益：

既然奴役你们使男人戴上了无知和专制的枷锁，解放你们会使他们获得知识、自由和幸福。

1869年，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出版了《论女性的从属地位》，书中也认为奴役女人是错误的，是“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詹姆斯·穆勒的儿子，而詹姆斯·穆勒对于女性的保守观点则使威廉·汤普森义愤填膺。）1830年，穆勒结识了哈丽雅特·泰勒（Harriet Taylor）并深受她的影响。哈丽雅特当时已经结了婚，有两个年幼的儿子。两人保持了近20年的亲密友谊，最终在1851年哈丽雅特丈夫去世两年之后得以结婚。1851年，哈丽雅特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妇女选举权”的短文。她还写过一些文章抨击婚姻法，宣称女人对她自己所生的孩子拥有权利和义务。不过有趣的是，这些文章都没有发表。当她最终和穆勒结婚后，他说他感到有责任发出“一个针对现行婚姻法的正式抗议”，理由是现行婚姻法赋予男性“合法控制婚姻另一方的人身、财产和行动自由的权利，丝毫不考虑女性自己的意愿和意志”。穆勒承认

这个观点之前在我心里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论女性的从属地位》这本书针对女性能力受限的大量实际遭遇所表述的看法，主要都是来自她（哈丽雅特）的教诲。

穆勒在《论女性的从属地位》中的论述基于他的信仰，他认为当时存在的——而且显然是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决非自然的结果。“有主导权的人会认为这种主导权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他问道，并举例说美国奴隶贸易的获益者一直到那时都在为奴隶贸易辩护。我们现在称之为女子气质的东西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是朝着某些方向强制性压迫、朝着其他方向不自然激励的结果”。他似乎是逐渐才认识到这一点的，很可能是受了哈丽雅特的影响。1832年，他们相识后不久他还曾写信跟她说：“女性伟大的职责应该是美化 生活……把

美、精致、优雅四处播撒。”

19世纪美国女权主义

在19世纪的美国，女权主义兴起于废奴运动。女性在废奴运动中表现得非常活跃。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废奴团体数量激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废奴团体只接纳白人。在1840年伦敦召开的世界废奴大会上，与会的美国代表中便有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但是大会禁止妇女参加辩论，这促使斯坦顿和柳克丽霞·莫特（Lucretia Mott）成为女权主义者。1848年，她们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组织了一次妇女大会，并为妇女、也为黑人争取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各项权利而奔走呐喊。萨拉·格里姆凯（Sarah Grimke）和安吉利娜·格里姆凯（Angelina Grimke）姐妹出身于南方蓄奴家庭，却皈依了贵格会，成为热情而卓有成效的废奴运动者。1836年，安吉利娜发表了《致南方诸州基督教妇女的呼吁书》，两年后又发表了《两性平等信札》。她愤怒地反驳了批评她有违妇道的言论。奴隶出身的索杰纳·特鲁思[7]嘲笑了那些固执地认为女人需要男人保护的教士们。她在南北战争和奴隶解放之后慷慨陈词，抨击虽然给予先前的奴隶选举权——却仅限于男性。1920年，妇女获得了选举权。然而直到1970年，选举权才赋予全体黑人。

但是在《论女性的从属地位》中他否认

任何人都知道，或者是能够知道，两性的本质，只要观察角度不超越彼此间的现存关系。所有道德准则和当世舆情都告诉他们，女性的职责和天性就是为他人而生。

他认为，鉴于女性所受教育之匮乏，生活圈子之狭窄，女性尚未提出什么“真知灼见”并不令人惊讶。他还宣称她们尚未创作出“她们自

己的文学”，这种说法倒更加令人怀疑了。安·拉德克利夫、范妮·伯尼、简·奥斯汀、苏珊·费里尔[8]以及勃朗特姐妹[9]：她们似乎都未进入他的法眼。

穆勒相信，在理想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会彼此类似：男人会更加无私，而女人也会从社会认为她们应该具有的“夸张的自我克制”中解脱出来。穆勒从未论及离婚问题。但是他坚持认为，不立刻给予女性和男性同等条件的选举权是不公正的。他表示，事实上她们中有许多人都比现在的某些投票人更值得拥有选举权。1866年，穆勒将女性的第一份选举权请愿书递交议会，而且提议对1867年通过的《改革法案》作出有利于女性的修正。

一些现代女权主义者批评穆勒，说他关注的几乎都是已婚妇女，而忽视了诸如女儿或单身女性的处境。但是已婚妇女——正如里德和汤普森早先曾经认识到的那样——至少从法律上说，确实是特别脆弱无助的。妻子所可能面临的问题在臭名昭著的卡罗琳·诺顿（Caroline Norton）一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卡罗琳·诺顿生于1808年，是剧作家理查德·谢里丹（Richard Sheridan）的孙女，天生丽质，活泼开朗，受过良好教育。她原先肯定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女权斗士。事实上，她曾经断言自己“永远不会妄求疯狂而荒唐的平等说教”。她曾经承认，她之所以结婚，部分是因为她“特别害怕”以后会“活了一辈子到死还是个老姑娘”。但是1826年，她婚后不久便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根本谈不上情投意合的丈夫。夫妻关系逐渐恶化，终在大打出手中破裂。最后，诺顿不仅拒绝妻子支配她自己的财产（她继承的全部遗产以及她后来的所有收入），还禁止她和三个孩子有任何接触。他出于报复，将她推到公众苛责的风口浪尖，（很可能是莫须有地）指控她和时任首相的梅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通奸，使她成为丑闻的焦点。虽然这个案件最后法庭并未受理，但不难想象卡罗琳·诺顿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和背叛，她的声誉也因此永远地蒙上了污点。

诺顿无法诉诸法律来捍卫或保护自己，或者要求探视孩子的权利，因为她发现，已婚妇女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她抱怨道：“事实上 我可以像一个拥有正当职业的聪明男人那样养活我自己，但在法律

上我却感到如此的孤苦无助、仰人鼻息，这真让人难以接受。”1838年，她支持通过一项旨在改革《儿童监护权法》的法案。此前，该法仅允许母亲对7岁以下子女拥有有限的一点权利。1854年和1855年，她根据自己的遭遇制作了两本小册子：《对〈儿童监护权法〉导致母子隔离的思考》和《19世纪为女性制定的英国法律》，均赢得了广大读者。她写道：“我一点一点地了解了关于已婚妇女的法律，但是它在保护措施上的每个漏洞都让我吃尽了苦头。”1855年，在《致女王陛下的信》中，她支持一项改革婚姻和离婚的提案。她写道：“窃以为，我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说明应该改革一部相关法律。”1857年，一部《离婚改革法》获得通过，但是女性可以提出离婚的法定情形依然非常有限。

诺顿的人生凸显了已婚妇女地位上的一些残酷的畸瘤，不过她的人生决非独立的个案，甚至也谈不上非同寻常。譬如，夏洛蒂·勃朗特在去世前不久结婚，结果却发现丈夫拥有自己小说的版权，还将自己的全部收入据为己有。但是卡罗琳·诺顿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其他女性开始集会讨论女性问题并很快继承了她的案例所宣扬的事业时，却对她们敬而远之。事实上，一个由“兰厄姆广场女士”[10] 这个团体建立的“已婚妇女财产委员会”，很可能是英格兰第一个有组织的女权主义团体。但是卡罗琳·诺顿也许是觉得自己已经过度地暴露在公众的视线里，也许是急于至少挽回些许声誉，她和这个团体保持了距离。

弗洛伦丝·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是另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断然拒绝参加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不过从长远来看，她的所作所为相当鼓舞人心，比她实际所说的话要有效得多。她的名言是“我对我这个性别的是非曲直毫不关心”，而且她坚持认为之所以有女性失业，“是因为她们不愿意工作”。她曾经说过，她愿意高薪聘请一位女性担任自己的秘书，结果却找不到一位有能力或者有意愿做这份工作的女性。但是，她本人强烈反对社会划分性别界限和限制女性生活的做法。南丁格尔身为大家闺秀，她抱怨说自己是矫揉造作的有闲女子气质的牺牲品。她语带讥讽地问道，为什么“男人做精纺活儿、每天坐着马车出门就比女人这么做更加荒唐可笑呢？”“为什么我

们看到一群男人早上围着桌子坐在客厅里就要发笑，而女人这么做时就觉得很正常呢？”

南丁格尔承担了一些典型的女性职责——照顾祖母和年迈的保姆——之后，似乎对护理萌生了兴趣。但是随着她对这项工作的兴趣日益浓厚，终于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母亲和姐姐芭斯诺普（Parthenope）不断地要求她花时间陪伴她们。1844年，家人断然拒绝让她去索尔兹伯里医院做事。南丁格尔曾经愤愤不平地说：“没有什么能和一个优裕英国家庭的暴政相媲美。”她声称大部分女性“除了家庭之外，既没有上帝，也没有国家，对它们也不承担丝毫责任”。然而在1849年，她想方设法去了一次德国的凯撒斯韦特——一家由信义会〔11〕女执事们开办的孤儿院及医院。虽然她批评那里的护理和卫生条件差，但是她也承认“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兴趣盎然，在这里我感到身心愉悦”。但是，她37岁时在一部自己称为《卡桑德拉》的小说片段中，依然愤愤不平地问道：“为什么女人拥有同情心、智慧、德行——这三样东西——但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却一样也用不上？”

1853年，她的生活发生了改变。父亲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决定每年给弗洛伦丝500英镑生活费。她终于摆脱了家庭暴政。同年8月，她当上了哈利街患病妇女护理会的常驻监督。她已经下定决心，要竭尽所能学习一切和护理有关的知识。她常常黎明即起，研读政府蓝皮书〔12〕。不过她仍然不时感到担心，不知一个女人献身于“医院及其他地方的慈善工作”是否“合适妥当”。1854年，在一场霍乱爆发中，她在伦敦的米德尔塞克斯郡医院工作。

在克里米亚战争〔13〕期间，南丁格尔已经声名鹊起，她受邀率领一群护士前往斯库塔里〔14〕。不久，她便成了民族英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她被热情地誉为一位真正具有“女子气质”的女性——一位实实在在的护理天使，一位放弃奢华的上流社会生活而给克里米亚的伤兵带来慰藉的女性。“提灯女士”这个形象广为流传，成为赞誉她慈悲胸怀、良好教养、温文尔雅和高雅风度的标志。南丁格尔确实对病人非常关心，对普通士兵满怀同情。但是她最大的贡献也许在于，她是一位效率卓著、头脑清晰的管理者。“我现在负责英国军队的穿

衣问题，”当时她写道，“我实际上就是厨子、管家、清洁工……洗衣妇、日用杂货商、仓库管理员。”毫无疑问，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及之后的几年是她一生中最惬意、各方面都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图4　弗洛伦丝·南丁格尔是一位民族英雄——“提灯女士”——正如本图所示，她之所以广受赞誉，往往是因为她对克里米亚的伤兵所表现出的同情和女性柔情，而不是因为她异常杰出的管理和组织才能。

这么说是因为战争结束后她不愿就此停下工作，而是雄心勃勃地开始对英国军队进行健康调查。她后来卧床休息了很长时间——一个对流行的“女性”脆弱进行戏仿的习惯——只是为了有时间更加有效地工作，不受母亲和姐姐各种要求的干扰。她始终是一个有趣的悖论：表面上，她是“女性”自我牺牲和甘于奉献精神的典范，这一名声已被广为传颂；而事实上，她是坚毅果敢、乃至英勇无畏地坚持己见的榜样，为女性打开了希望之门。她的事迹无疑促使人们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女性接受某种专门的职业培训之后，可以走出家门或家庭作坊从事工作。

同样，哈丽雅特·马蒂诺[15]也坚持认为自己为妇女所进行的辩护是理性的，不带任何个人感情色彩。马蒂诺自视一名教育者，她不屑

一顾地认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事实上危害了妇女事业。她的第一本书——《政治经济学的解说》——于1832年面世。她时年30岁，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下人。这本书反响很好，她成了专门普及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的一名记者，读者甚众。马蒂诺曾在美国游历，期间和那里的废奴主义者一起工作过，她将他们关于奴隶的论辩应用在了妇女身上：

拒绝给予公平正义的最好理由莫过于强者治人、弱者治于人。在两种情况下，受压迫者中多数人的默认和少数人的强烈不满均一方面表明这个阶级遭受着压迫，一方面又证明这个阶级应该享有人权。

与此同时，她始终拒绝支持“妇女事业”，认为“女人和男人一样，必须获得适合自身的东西”，这或许暴露了她缺乏远见。《美国社会》出版后，几十位妇女写信给她，诉说英格兰的“法律和习俗”是如何压制了她们，寻求帮助以改变现状。其他一些妇女则表示，只要她愿意出谋划策，自己愿意拿出“资金、精力和忍受指责谩骂的勇气”。

但是自始至终，马蒂诺显得惴惴不安，避免公开表露自己的情感。她对卡罗琳·诺顿这样的女性没有丝毫同情之心。马蒂诺觉得，卡罗琳为改变婚姻法而将个人问题抖搂出来的做法简直是“颜面扫地”。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她存世的写给母亲的一些书信里却流露出她对自己选择独立生活的真切焦虑，读来相当感人。

我完全可以想象您和我有时都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尽到一个女儿的义务，不过我们都应该提醒自己，我现在和您任何一个有职业的儿子 一样，也是一位世界公民。我独自工作和外出访问的时候，就很难照顾您了。

她从未完全处理好个人抱负和当时女性行为规范之间的矛盾，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35岁那年，马蒂诺得到一个工作机会，出任一份新创刊的经济学期刊的主编，这原本意味着名利双收，意味着个人抱负得以实现，也意味着她对妇女的期望如愿以偿。她犹豫不决。后

来，弟弟詹姆斯来信表示反对，于是——显然有些如释重负——她婉拒了这个工作机会。不久，她写了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迪尔布鲁克》。这部小说以间接的方式，不仅探讨了她自己的恐惧、希望和犹疑，还探讨了当时依然困扰着同时代女性的那些疑惑和问题。马蒂诺于1876年辞世。

到了19世纪中叶，已经有一大批妇女在为实现具体的变革、为其他妇女开辟新天地而默默奋斗着，令人刮目相看。例如，弗朗西丝·鲍尔·科布[16]回忆起自己在布赖顿上过的那所昂贵的寄宿学校时满腹怨言。她说，那里简直糟糕透顶：学生们挤在一间屋子里，围坐在桌边，“咣咣当当叫人烦得要命”；楼上丁零咚隆地敲着钢琴，楼下一屋子女孩对着女老师朗读背诵课文。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经历非常普遍。女孩教育亟待改进。她猜想，祖母时代的学校很可能比自己这个时代的学校还要好一些。尽管科布的早期教育不如人意，但是她坚持写作，文笔生动，思想深邃，所谈问题不仅局限于教育，还包括单身及已婚妇女所面临的其他困难。

例如，她曾头头是道地谈论过陷于不幸婚姻的妇女的遭遇。她写道，“我们习惯于听人们讲醉醺醺的恶棍跌跌撞撞地走出酒馆摸回家”，殴打可怜的妻子。但是“谁能想到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且拥有体面职业的男人竟也会犯下同样的暴行？”她有时会陷入多愁善感的俗套：

> 我们想要（女人的）爱律意识来完善男人的公义律意识；我们想要她的影响力通过内心温柔的劝慰激发德行，以此来完善男人的外在道德立法……我们想要她细心的天赋、她对长者和受苦受难者的温情、她对孩子需求的理解……

但是作为一名享有盛誉的记者，她支持女性接受大学教育，并且默默地推动《已婚妇女财产法》的出台。然而，她始终坚称自己的女权主义不带任何个人感情色彩，不过她对此的过分强调倒显得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我在成熟之年成了一名‘女权妇女’，这并不是因为在我个人身上有人让我感受到了女人的冤屈。”

小说中的婚姻

婚姻一直是19世纪小说家笔下十分重要、同时也十分令人着迷的主题，但是夫妻关系却鲜有令人特别满意的表现。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1847）中，女主人公和罗切斯特先生的爱情是一场更为精妙、更加令人难忘的哥特式传奇剧，不过她获得了一个相对幸福的结局——发生在罗切斯特落得身体残疾、无依无靠之后。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想要获得一些传统习俗所未能赋予她们的东西，无论这种想法表现得有多么隐晦。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有趣的是，她的笔名叫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中探讨了往往难处的兄妹关系。在《米德尔马奇》（1871—1872）中，聪明但有些理想主义的多罗西娅，渴望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某件值得去做的事——或者某个值得去爱的人——却很快陷入了不幸的婚姻。虽然她最终与另外一个男人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幸福，但是她还是觉得自己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的《利己主义者》（1879）令人心寒地审视了一桩婚姻，其中女人只是地位的象征。他的《克劳斯威的黛安娜》（1885）用令人不安的小说形式表现了卡罗琳·诺顿的灾难性婚姻。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的《落单女人》（1893）则饱含同情地叙述了一群未婚女人抚养一个孤儿的故事，她们希望这个孤儿长大之后能够成为“一个勇敢的女人”。

注释

〔1〕 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1775—1833）：爱尔兰政治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对劳工的剥削和对女性的压迫。

〔2〕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

家、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家。

〔3〕 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两度出任首相（1868，1874—1880），为现代保守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4〕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理论家，功利主义最早的和主要的阐释者。

〔5〕 梅格·梅里利斯（Meg Merrilees）：一个半疯癫的吉卜赛女人，为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1771—1832）的《盖·曼纳令》（*Guy Mannering*，1815）一书中的重要角色。

〔6〕 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为哲学激进主义的重要代表。

〔7〕 索杰纳·特鲁思（Sojourner Truth，1797—1883）：美国黑人女传教士、废奴运动者和女权运动者。

〔8〕 苏珊·费里尔（Susan Ferrier，1782—1854）：英国小说家。

〔9〕 勃朗特姐妹（the Brontë sisters）：英国作家，即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1816—1855），代表作为《简·爱》（*Jane Eyre*，1847）；爱米丽·勃朗特（Emily Brontë，1818—1848），代表作为《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1847）；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ë，1820—1849），代表作为《艾格尼丝·格雷》（*Agnes Grey*，1847）。

〔10〕 兰厄姆广场女士：参见第五章。

〔11〕 信义会：基督教新教重要派别，源自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信奉“唯独《圣经》”、“唯独因信称义”，认为耶稣之死已为世人赎了原罪，人因信心蒙恩才得以称义。

〔12〕 蓝皮书：英国政府文件，又名《英国议会文书》，始于15世纪英国议会出版物，因封面为蓝色而得名。

〔13〕 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爆发于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之间的一场战争，1854年英国、法国加入奥斯曼土耳其一方对俄作战，1856年俄国战败。由于指挥失当，加之瘟疫流行，双方均伤亡惨重。

〔14〕 斯库塔里：当时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区，因同名湖泊而得名。

〔15〕 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1802—1876）：英国散文家、小说家、经济和历史著作作家。

〔16〕 弗朗西丝·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1822—1904）：爱尔兰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理论家。

第五章

19世纪后期：运动中的女性

直到19世纪后半叶，英格兰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的妇女“运动”。这场运动主要由芭芭拉·莉·史密斯[1]和一群人称“兰厄姆广场女士”——因她们早期的一个集会地点而得名——的志同道合者共同发起。该团体围绕业已明确的问题——妇女迫切需要更好的教育、更多的工作机会以及提高已婚妇女的法律地位——发起了更多有组织的活动。

这些妇女之所以走到一起，部分是为了应对“女子气质”日益狭隘的定义和对适宜“妇女领域”日趋传统、越来越富于局限性的界定。在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的头等美德似乎经常被神经兮兮地等同于温婉顺从。一个不得不自谋生计的中产阶级妇女可能会十分幸运地获得一个当家庭教师的低薪职位，虽然很可能她本身所受的教育就很有限。她没有多少别的职业可以选择。而且，如果一个女人发现自己身陷不幸婚姻，她仍然无路可逃。

可悲的是，就连那些本身取得了可观成就的女性、那些怀着深切同情极有见地地描写妇女生活及抗争的女性，有时似乎也对正在兴起的女权主义躲躲闪闪。玛丽·安·埃文斯——乔治·艾略特——尽管在《米德尔马奇》（1871—1872）中显示出对妇女的聪明才智找不到足够的施展空间有着深刻体会，尽管自己已经成为芭芭拉·莉·史密斯的密友和支持者，但她仍然在1853年宣称：“男人所给予女人的际遇，已经是女人的莫大福气了。”而且她赞美这样一种方式：一种“十足的温柔、慈爱、潜在母性”使“女人的生命”充盈着“绵绵爱意”。1856年，著有《露丝》（1853）和《北与南》（1855）的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对妇女接受培训成为医生这种想法本身就嗤之以鼻：

> 如果能求得男人的判断，我连一只老鼠都不会交给女人去医治。女人没有判断力。她们乖巧、敏感、天资聪颖，有着无数美好可爱的特质，但是在需要受过认真的长期医学教育才能从事的事情上，她们顶多也不过是长着天使面孔的呆鹅。

1857年，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2]在《奥罗拉·利》中认为：

> 女人……必须证明自己能做什么
> 然后再去做，反复念叨妇女的权利、
> 妇女的使命、妇女的作用，直到
> （也在自己一边念叨的）男人们高喊
> 女人的作用就是……空谈。

芭芭拉·莉·史密斯（她婚后冲破传统的藩篱，只把夫姓“博迪雄”加在自己姓氏之后）出生于一个富有却不同寻常的家庭：她的父母并未结婚。父亲一直鼓励她读书，并且给了她一笔相当可观的零用钱，使她能够四处游历。她曾在欧洲大陆和贝茜·雷纳·帕克斯[3]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帕克斯后来写了《论女孩教育》，她还坚持认为单身女性对所有女性命运的改善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帕克斯和莉·史密斯刚刚出版小册子《妇女和工作》不久，当时一篇评论便嘲讽道：“要命的是，女人缺乏进行严密的连续思维的能力。”）

1857年，莉·史密斯病后在阿尔及利亚疗养期间，认识了后来成为自己丈夫的欧仁·博迪雄（Eugene Bodichon）医生。他们婚后在美国住了一年。期间，她在波士顿、纽约和新奥尔良结识了一些热衷教育的女性以及其他一些受过从医培训的女性。在塞尼卡福尔斯，她和柳克丽霞·莫特多次促膝长谈。柳克丽霞·莫特在废奴运动和正在兴起的女权运动中都是活跃分子。莉·史密斯打算继续致力于当时显得最为紧迫的领域：已婚妇女的法律问题、妇女对提高教育和培训水平的迫切需要以及拓展妇女有限的工作机会的需要。

1854年，芭芭拉·莉·史密斯制作了一本小册子，取名为《英格兰最重要的妇女相关法律简编》。她开门见山地审视了限制单身女性的矛盾规定：她们可以在行政堂区投票，但即便她们是纳税的财产所有人也不能在议会选举中投票。她接着探讨了已婚妇女更加不利的境遇：“在法律上，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是一个人。妻子丧失了她单身时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她的存在完全被她丈夫的存在吞噬了。”她讨

论了婚姻财产协议以及父母离异后孩子的监护权问题。她甚至还揭示了一个奇特而麻烦的法律规定：一对男女一旦正式订婚，女方在未告知未婚夫并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处置自己的财产。她的宣言售价几个便士，读者甚众，前后有3个印次。次年12月，她和一群志趣相投的妇女——包括贝茜·帕克斯和安娜·詹姆森[4]——成立了已婚妇女财产委员会（英格兰第一个有组织的女权主义团体），在全国范围内散发呼吁进行法律改革的请愿书，并很快征集到了大约2,400个签名。委员会的干预使一系列修正案得以通过，缓解了已婚妇女的经济困境，但是这些变化仍旧没有从根本上重新明确她们的权利。

莉·史密斯还写了一篇文章，最初于1858年发表在新创刊的《英国妇女杂志》上。当时有种观点认为，由于中产阶级妇女理所应当要结婚，所以她们不必再考虑别的事情了。莉·史密斯在文中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观点。很多女性很可能终身不嫁，那就得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她认为，即便是那些结了婚的女性，也应该做好准备来教育自己的子女，而且必要的话，还要外出工作。此外，她还强调了工作本身的价值。

> 生养12个子女本身并不是什么高贵的职业……做一个高贵的女人要胜过做一个高贵的男人的母亲。

她甚至还搬出维多利亚女王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毕竟，女王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有工作的君主。同时，莉·史密斯要求对女性业已从事的实际工作——操持家务，养育子女——的价值给予更大的认可。在行动上，莉·史密斯在伦敦开办了一所私立学校，一直办了近10年时间。在学校，男孩和女孩同班上课；她自己的侄女、朋友们的孩子与附近工人的孩子一起学习。

《英国妇女杂志》起初主要由莉·史密斯提供赞助，它似乎赢得了相当广泛的读者，而且常常激发读者采取行动。就连最初疑心重重的乔治·艾略特也在1859年末写信给自己的朋友，一再表示这份杂志“肯定 做得相当好……它激发妇女去从事有用的工作，唤起普通民众给予

女性需求一定的考虑”。但是莉·史密斯和贝茜·帕克斯很快就直接遭遇了女性就业问题。她们杂志的读者热切渴望得到工作，于是便开始到她们的杂志社登门拜访。此时，她们的杂志社已经从兰厄姆广场迁到了卡文迪什广场。她们决定作一个就业登记——结果却发现实际上妇女的就业机会寥寥无几。许多男性对女性有可能进入他们的行业极其反感。他们说，女人会拉低所有人的工资，而且她们的出现很可能会迫使男人丢掉饭碗。

就业机会也引起了其他女性的关注。当年早些时候，哈丽雅特·马蒂诺——她熟知兰厄姆广场小组的工作，很可能还受到了它的影响，不过她始终都没有加入其中——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女性行业》的文章，对女性实际能够获得的为数不多的就业机会作了冷静而实际的分析。她清楚地看到，女性的处境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女性除了外出工作之外别无选择。她认为，“自食其力”对男性和女性来说都是相当新的一种观念。

>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工商业经济体中，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规划并没有任何相应的改变。我们谈起话来仿佛还停留在过去：每个女人都是，抑或应该是，由父亲、兄弟或者丈夫养着。

贫苦妇女可能在田里或工厂里劳作。除此之外，马蒂诺能看到的只有两种就业机会——针线活儿和教书，其报酬都很低。和芭芭拉·莉·史密斯一样，她也强调必须拓展并改进女性教育，应该为她们施展自己的“能力和精力”辟出一片“公平的天地”。

她很赞赏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5]。布莱克韦尔在美国接受教育成为医生，当时她正身在英格兰。（芭芭拉·莉·史密斯和贝茜·帕克斯协助整理了布莱克韦尔在伦敦及其他郡首府所作的讲话。）但是，布莱克韦尔和这些早期女权主义者中的许多人都不一样，她坚信女性只应提出适度而理性的要求，故而对日渐高涨的选举权呼声没有什么热情。

如上章所述，弗朗西丝·鲍尔·科布是《已婚妇女财产法》及女性

教育运动的倡导者。她后来的确还为了妇女选举权而奔走呐喊，认为女人不必依赖男人来保护自己及自己的权益。她在这方面的言论有时暴露出一丝阶级傲慢：她愤怒地指出，“我们这些上层妇女——从宪法上讲，我们拥有财产，所以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请允许我再补充一句，从人之常情上讲，我们在教育和智慧上至少都不低于‘文盲’选民，因而也有资格参加选举），却依然没有选举权。”她始终极端保守，不过她并不赞同保守党中的激进派，并因此于1867年退出了正在兴起的选举权运动。

同样，埃米莉·戴维斯〔6〕几乎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一名坚定的保守分子，只是有一点例外：她认识到女性命运要得到改善，教育始终都是关键。年轻的戴维斯写道：“什么也没学过的人找不到事情做并不奇怪。”她不得不去阿尔及尔照顾生病的弟弟时，非常幸运地遇到了芭芭拉·莉·史密斯。芭芭拉·莉·史密斯鼓励她，宽慰她说许多其他妇女有着和她一样的渴望和不满。回到英格兰后，戴维斯（和她的朋友伊丽莎白·加勒特〔7〕一起）造访了兰厄姆广场。此时，兰厄姆广场已经成为《英国妇女杂志》和妇女就业促进协会的总部。她深受鼓舞。回到北部的家乡后，她组建了妇女就业促进协会诺森伯兰和达勒姆分会，还写了一系列信件给当地报纸，论述增加妇女就业机会的重要性。她为自己这样的女孩所享有的智力培养之匮乏感到愤愤不平：“她们上学吗？不上。她们有家庭女教师吗？没有。她们上一些课，能学多少学多少。”她带着强烈的个人感情描述了

> 深深的灰心失望之情，这种灰心失望源于自己所受的告诫：作为女人，没人对她们有多少期望……无论她们做什么都千万不要介入男人的职业，顶多是肤浅地间接介入，因为在这些职业中她们所能期望的永远只能是失败。

女人知道这种态度是多么地“令人窒息和寒心；要勇敢地挺过去又有多么地不易”。

然而，在兰厄姆广场小组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教育为第一要务”，这也鼓舞了戴维斯。在伦敦，当时新成立不久的女王学院和贝

德福德学院给（一些）中产阶级女孩开设了差强人意的课程。1862年，戴维斯筹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推动女生参加创立于1858年的大学地区考试。经过大量缓慢而精心的组织工作和谈判努力，剑桥终于在1865年同意，作为实验，女生可以尝试和男生参加同样的考试。虽然戴维斯一直是个现实主义者，但她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女孩必须获得和男孩一模一样的教育，在中小学校如此，在大学亦是如此。1866年，她的《女性高等教育》一书面世。她在书中谨小慎微，避免过于强烈地表达自己的主张。戴维斯承认，女人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做到和男人一样好……但是在我看来，她们并不能因此而不竭尽全力，不自主选择自己想要尝试的事情”。她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芭芭拉·莉·史密斯慷慨解囊）创建了一所女子高等教育学院，校址选在赫特福德郡的希钦市，最初只有5名学生。1873年，学院迁至剑桥，改名为格顿学院。1879年，牛津如法炮制，成立了玛格丽特夫人学院[8]。但是，尽管埃米莉·戴维斯的观点如此激进——她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女生应该和男生参加同样的考试，但她绝对不希望女生享有和男生同样的自由。她期望自己的学生始终表现得娴静端庄，循规蹈矩。她认为，有背传统和“非女性化”的行为可能会危及整个项目。

埃米莉·戴维斯所作的开创性工作至关重要。不过，也许是在所难免，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女性才在高等教育领域朝着真正意义的平等迈进。在伦敦，女王学院和贝德福德学院于1878年开始向女性颁发学位。但是牛津女生直到1919年才成为大学的正式学生。令人费解的是，虽然剑桥于1921年开始给女生颁发“名义”学位，但直到1948年才承认她们是学校的正式学生。

伊丽莎白·加勒特（婚后改称加勒特·安德森）也得到了兰厄姆广场小组的支持。她冲破在今天看来极为强大的阻力，长期坚持不懈地想通过学习成为一名医生。她常常成为粗鄙笑话捉弄的对象。一些男生声明反对“在学习那些迄今仍被视为敏感科目时……男女有失体统地混在一起”。《柳叶刀》杂志则索性把她一心学医斥为“病态”。然而，什么也无法动摇加勒特的决心。一则她相信女医生“对许多患病妇女”来说会是一个福音；二则她对这项工作怀有浓厚兴趣，她知道

自己会成为一名好医生。

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的经历鼓舞了加勒特。1849年，布莱克韦尔顺利毕业于纽约州一所小学院的医科专业，她在纽约为贫民窟中的妇女和儿童开了一家诊所。但是在造访伦敦期间，布莱克韦尔有时也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一位专栏作家评论道："双手沾满血污的女人不可能拥有普通女人那样的天性和感情。"伊丽莎白·加勒特不得不竭力说服自己的母亲，让她相信自己从医的坚定决心既没有错，也非病态，而是"健康而活跃的精力使然"。幸运的是，她的父亲比较支持她，而且加勒特本人也默默地执著追求。她在苏格兰学习了助产术，然后在巴黎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就连向来反对女性从医的《英国医学杂志》也承认，"每个人都必须钦佩加勒特小姐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毅力和勇气"。1870年，她被说服参选伦敦校务委员会[9]。此时，她显然已经成为一位德高望重、广受欢迎的公众人物了，结果她所获得的选票比其他任何候选人都多。

19世纪下半叶最重要、意义最为深远的一场运动也最为出人意料：反对《传染病法》的运动，该法极大地暴露出双重性别标准的残酷和虚伪。首部《传染病法》于1864年获得通过，规定在特定港口和设防城镇，警察有权逮捕任何仅仅被怀疑 是妓女的女性，强制——有时以野蛮手段——其接受内检，一经发现有性病的任何迹象，可以强行把她关进医院。《传染病法》分别于1866年和1869年作了两次增修。妇女们不久便开始了抗议。伊丽莎白·加勒特、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和哈丽雅特·马蒂诺亦置身其中，她们认为"这套监管体制所制造的恐怖要大于它所旨在消除的恐怖"。

1869年，废除《传染病法》全国女士协会成立，这是由一些德高望重的女性组成的第一个真正且有力的压力集团。起初，她们将矛头指向粗暴对待妓女或疑似妓女的具体法律。但是她们很快超越这些细枝末节，开始大张旗鼓地渲染起双重性别标准的种种劣行及其对整个社会男女两性所产生的灾难性影响。不久，约瑟芬·巴特勒[10]成为该协会的领袖。她出身于自由党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美丽、热诚而德高望显——这使她成为一位极为杰出的宣传家，虽然她所宣传支持的

是为许多人所不齿的行当。痛失独生女后，她和丈夫搬到了利物浦，此时她已经开始关注起妓女的命运。她说："我为一种无法抑制的欲望所缠绕，想要找到某种比我自身所经受的更为深重的痛苦。"她把一些不幸的"堕落"女孩带到自己家里，筹钱建立了一个很小的"休憩之家"，照顾那些"濒死的抹大拉〔11〕"。

巴特勒已经对妇女所面临的问题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1868年，她出版了一本名为《女性教育与就业》的小册子。她在小册子中除了重申当时已广为人知的改善妇女教育这个主张之外，还认为——鉴于英格兰未婚女性为数众多——应该为她们提供适当的培训，以使其能够自食其力。1869年，巴特勒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妇女组建了全国女士协会。她成为该协会极为杰出的标志性人物和领袖。她的讲话和文章有效地融合了冷静清晰的论证和炽热如火的情感。在1871年写的一本小册子中，巴特勒基于自己和妓女交往的经历，认为《传染病法》等同于中止《人身保护法》〔12〕。《传染病法》"简直无异于引入某种隶农制或奴隶制。我这么说并不是感情用事，而是依据其最严格的法律意义"。这个问题和她的抗议燃起了举国上下妇女的想象力和情感。全国女士协会的一位成员在1870年致首相的一封信中强调道：

> 你们所骄傲地珍爱着的母亲、妻子、姐妹或女儿，没有一个敢保证，倘使她出生在同样没有庇护、没有安全的境地，处于同样贫穷和邪恶的魔爪之下……她，同样在她那青涩而天真无邪的少女时代，能够避免像那些人一样滑入那个长久以来全社会一直竭力确保无人能够逃脱的可怕深渊。

约瑟芬·巴特勒及其迅速壮大的声名显赫的追随者队伍，很快便成为一个极为有效的压力集团。她们的活动让长期以来因受习俗束缚而几乎不为人知的无情的双重性别标准触目惊心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而至关重要的是，她们认为这种双重标准不仅压迫妓女，也压迫大多数女性，这种压迫以形形色色难以察觉的方式贯穿于她们日常家庭及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来，巴特勒在议会特别委员会作证时指出，《传染病法》不仅对女性而且对男性也有着灾难性的间接后果。她从

查塔姆〔13〕归来时称，“我在那里看到了刚入伍的年轻士兵堕落的证据……有些男孩看上去还不到13岁……那里和地狱一样阴森。”在她看来，真正的混蛋，真正的剥削者，是那些皮条客，是那些通过“建起一所房子把女人卖给男人”来牟利的人。

19世纪80年代，安妮·贝赞特〔14〕勇敢地揭露了另一种或许更加迫切需要关注的剥削方式。她发现伦敦东区布赖恩特 - 梅火柴厂女工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就给该厂众多恰好也是神职人员的股东们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真挚有力的信：

> 请想象一下别人家女儿那苍白憔悴的面孔……当她摘下破旧的帽子，露出因长年搬运箱子而磨光了头发的头颅，头发磨光了，你们的分红增加了，牧师大人……我要让你们得到报应，声名扫地……

她的控诉流传甚广，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关注。火柴厂的女工们在伦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最终获准成立她们自己的工会。

至此，女性所面临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在不断取得进展。但是女性——以及一些像汤普森和穆勒这样的男性斗士——整个世纪都在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奔走呼号。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这个要求会变得更为迫切，妇女选举权运动者——以及后来的激进派妇女选举权女斗士——将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主角。

注释

〔1〕芭芭拉·莉·史密斯（Barbara Leigh Smith，1827—1891）：英国教育家、艺术家和妇女运动领袖。

〔2〕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1861）：英国女诗人，《奥罗拉·利》（*Aurora Leigh*，1857）为其无韵长诗。

〔3〕贝茜·雷纳·帕克斯（Bessie Rayner Parkes，1829—1925）：英国诗人、散文家和女权主义活动家，与莉·史密斯共同创办了《英国妇女杂志》（1858），致力于为女性争取教育改革和合法权利。

〔4〕安娜·詹姆森（Anna Jameson，1794—1860）：英国作家和女权主义者。

〔5〕 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Elizabeth Blackwell，1821—1910）：美国第一位女医生和第一位女医学博士。

〔6〕 埃米莉·戴维斯（Emily Davies，1830—1921）：英国女权主义者，为争取妇女高等教育权的先驱。

〔7〕 伊丽莎白·加勒特（Elizabeth Garrett，1836—1917）：英国医生和女权主义运动先驱，为英国第一位获得医师资格的女性。

〔8〕 玛格丽特夫人学院：牛津大学学院之一，1878年由伊丽莎白·华兹华斯（Elizabeth Wordsworth，1840—1932，著名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的曾侄女）建立，校名取自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之母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Lady Margaret Beaufort，1443—1509），后者以学识渊博著称。

〔9〕 伦敦校务委员会：依据1870年通过的《初级教育法案》设立的政府机构，主管整个伦敦地区基础教育的建设和管理，其成员由普选产生。

〔10〕 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1828—1906）：英国社会改革家，为改善妇女教育和医疗条件作出过重要贡献。

〔11〕 抹大拉：《圣经·新约》中一位被称为“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妓女。这里用来代指从良的妓女。

〔12〕 《人身保护法》：拉丁语habeas corpus意为 [We command] that you have the body，即他人不得无端羁押自己的身体。自13世纪起，英国法院即发布各种关于刑事诉讼的令状，包括审查逮捕理由的令状。17世纪中叶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曾迫害新教徒和反王权派。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辉格党援引旧例，通过议会制定了本法，于1679年颁布，迫使英王查理二世签署。

〔13〕 查塔姆：英格兰肯特郡港口，曾拥有作为皇家海军根据地的船坞。

〔14〕 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1847—1933）：英国社会改革家和妇女运动活动家。

第六章

为投票权而战：妇女选举权运动者

19世纪，选举权逐渐成为女权主义者诉求的中心内容。无论从象征意义上（作为对妇女完整公民权的认可）还是从实践意义上（作为深化改革和实实在在改变妇女生活的必要方式）来说，它都意义重大。但事实证明，获得选举权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历时数十年。女性在为选举权呐喊时所展现的决心和执著，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令人振奋。在她们的诉求遭到同样坚决的拒绝，有时还含有相当的恶意时，尤为如此。而且，拒绝她们的除了男性之外，往往还有女性。

早期有过一些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诉求：威廉·汤普森受安娜·惠勒的影响，早在1825年就为妇女代表权问题发出过雄辩的呐喊。1843年，玛丽恩·里德撰文驳斥了当时有关女性适宜“领域”的陈词滥调以及女人对男人所谓的影响使自身有求必应这种论调。她接着强调，不仅选举权很重要，而且在议会哪怕仅仅拥有象征性存在也同样意义重大。或许“议员的选民构成中有几个妇女”能促使议会“给予妇女权益一点点关注”。1847年，年迈的贵格会教徒安妮·奈特[1]发表了一本小册子，为妇女代表权发出呐喊。1851年，已经成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妻子的哈丽雅特·泰勒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发文呼吁“给予妇女选举权”。1869年，穆勒本人在《论女性的从属地位》一书中雄辩而比较详细地作出了同样的申辩。他承认，妇女不太可能和同一阶级的男人有什么意见分歧，但是“如果问题以某种方式牵涉到了妇女权益”，那么她们就“需要选举权，以确保自己的权益得到公正平等的考虑”。

当然，这一时期男人还没有全部获得选举权。即便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也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成年男子有权参加投票。虽然《1884年改革法》提高了这一比例，但依然只有大约63%至68%的男人获得了投票权。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32年改革法》出台后，妇女的法律地位反而下降了。该法用male person（男人）来取代含义更广的泛指词man（人；男人；人类），明确将女性排除在外，因为有人可能会认为man这个词可以理解为“人”。同年，一名人称“雄辩家”亨特[2]的激进分子受人之托向议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

（起草人为约克郡一位富有的老姑娘，名叫玛丽·史密斯［Mary Smith］），认为“每个拥有必要经济能力的未婚女性”均应获准参加投票。亨特指出，该请愿者像所有男人一样照章纳税；而且，既然女性在法律上可以受到制裁，那么她们也应该有权对制定法律发表意见，也应有权参加陪审团。

但是，争取投票权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而且始终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人主张所有成年人都应拥有选举权，有些人则只为妇女奔走呐喊，于是分歧出现了。在后者中间，对哪些妇女应该拥有选举权也存在不同意见。许多早期对妇女选举权的要求都集中在老姑娘身上，例如弗朗西丝·鲍尔·科布就曾替女性财产拥有人和纳税人呼吁过此事。这些要求之所以比较有限，部分是出于策略考虑（如果一些妇女获得选举权，便至少是创下了先例，以后就比较容易扩大范围了），但往往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轻蔑的看法：妻子的权益和她丈夫的完全一致，给她选举权就等于给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第二张选票。一些妇女认为，已婚妇女财产法的通过会比选举权更能立竿见影地带给她们好处。另一方面，汉弗莱·沃德夫人（Mrs Humphrey Ward）表达了她的忧虑：如果允许老姑娘投票，也就意味着“大量过着不道德生活的女人将获得选举权，而通常要比未婚妇女有着更为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的已婚妇女却被排除在外”。一位议员讽刺道，给予老姑娘选举权，无异于褒奖“异性中一部分由于某种原因而未尽妇道的人”。其他反对女性拥有选举权的人认为，只有男人才会被征召去保家卫国，这赋予了“他在处理国家事务中发表意见的权利”。

从这场辩论中，我们可以瞥见某些人对女性奇怪而发人深省的态度。譬如，1871年政治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说道：

> 一个女人的真正宿命……就是嫁给一个她能够爱并尊重的男人，然后在他的保护下以自己所有的智慧、优雅和英雄品质平静地过此后的生活。

同样，许多女性也接受了女人和男人生而不同的观点，认为这是

神的旨意。神要她们为人妻、为人母。如果她们离开自己的适宜领域，就会导致种族“羸弱、衰落、呈现病态”。

斗争进展非常缓慢，这或许无法避免。事实上，非常多的知名女性都不屑地认为选举权相对来说并不重要，有时候还有些人虚伪地坚称，从个人来说，她们从未因为没有选举权而遭遇过什么不便。1867年，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宣称：“我在政府机构里工作的这些年里，从来没有觉得需要投票权。”虽然后来她承认选举权的确重要，但她始终觉得还有其他更加紧迫的问题困扰着女性。身为一名成功的作家和记者，哈丽雅特·马蒂诺坚持认为“这项事业最好的朋友是幸福的主妇和忙碌快活的单身妇女……无论一个女人自己实际上能做什么，看到她这么去做了，社会都会很欣慰”。

比阿特丽克斯·波特[3]将她本人的“反女权主义”态度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可能因为我这个性别而导致的不便”。自由党人维奥莉特·马卡姆[4]提出一个悖论作为托词：许多女人显然“比男人高贵，所以我不愿看到她们要与男人平起平坐”。1889年，畅销小说家兼记者汉弗莱·沃德夫人宣称“妇女解放进程现在已经达到女性生理构造所决定的极限了”。有时妇女选举权运动者会抬出维多利亚女王，以证明女性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例如，芭芭拉·莉·史密斯指出：“我们仁慈的女王既能履行神授的艰巨职责，也能成功地抚育众多的子女。”但是这位维多利亚女王却出于恐惧，极不光彩地高声声讨“疯狂而邪恶的女权蠢行”。

以芭芭拉·莉·史密斯为核心的兰厄姆广场小组在争取选举权的长期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其他许多运动中亦是如此。1866年初，她们组织了一场妇女选举权请愿活动，共有1,499人在请愿书上签字，主张应该用person来替代man，而且所有房主，不论性别，均应享有选举权。在推动妇女教育方面卓有成效的埃米莉·戴维斯，正式将这份请愿书递交给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适逢穆勒的《论女性的从属地位》一书刚刚出版。1866年6月，穆勒将这份请愿书呈递给了议会。不出他们所料，这份请愿书以194票对73票遭到否决。但即便如此，这也被欣喜地视为一个鼓舞人心的开端。此事招致大量批评，或

许反而证明了其成效。例如，《旁观者》杂志揶揄称，全国具备政治能力的妇女不超过20人，一般妇女只会使政治讨论变得“离题万里、华而不实”。

1866年10月，莉·史密斯和一群朋友在伦敦伊丽莎白·加勒特的家中成立了一个妇女选举权运动委员会。次年，该委员会发展成为伦敦妇女选举权协会。她们组织了多场请愿活动，获得的签名总数超过了3,000个。莉·史密斯还制作了一本小册子，列数“赋予妇女选举权的理由”。数家知名报纸，包括《康希尔》和《双周评论》，都拒绝刊载支持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文章。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名叫莉迪娅·贝克尔（Lydia Becker）的妇女在曼彻斯特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协会。她在听了莉·史密斯的一篇演讲之后，便被吸引到这项事业中来。她成立了一个地方性的妇女选举权委员会，并于1870年创办了《妇女选举权报》。不久，爱丁堡、布里斯托尔和伯明翰也相继成立了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团体。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这些团体保持这项事业生机勃勃，持续不断地向议会施加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组织了公开集会，尤其是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参与曼彻斯特协会工作的理查德·潘克赫斯特[5]，于1866年创办了《英国妇女评论》，这对宣传妇女选举权事业颇有裨益。

妇女选举权运动者有时候也会深受意见分歧之害，尤其是在采取何种策略方面，不过这也许在所难免。芭芭拉·莉·史密斯不久便退出了伦敦委员会的一切正式活动——她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哈丽雅特·泰勒意见不和，后二者坚持认为男性加入委员会有好处——虽然她后来担任了该委员会的名誉书记。穆勒虽然在早期给予了大力支持，但面对后来的发展和更加激进的策略，他感到惴惴不安，便退缩了。他尤其不赞成曼彻斯特一些女性的“共同的粗俗动机和策略”。而这场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比早期支持者们所预计的要更加艰难，耗费的时日也要久得多。整个19世纪70年代，议会年复一年地辩论（并否决）这个议题。1871年，一位托利党人[6]说女人天性敏感，容易情绪化，所以应该受到保护，以免“被迫卷入政党政治的漩涡”。女人适宜的天地是家庭，其职责——及内心最大的愉悦——是做一个贤妻、好姐姐

或好妹妹、乖女儿。再者，一旦女人在议会成了气候，将会导致“与居心叵测的邻邦草率结盟，阶级鼓噪越发高涨，肆意立法，内部混乱，动辄鸣冤叫屈”。妇女选举权支持率最高的一次投票是在1873年，当时有157位男性议员投了赞成票。

海外妇女选举权运动

与此同时，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者（及其反对者）密切关注着海外的新情况。一位妇女曾说：“对于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那些现身说法的妇女更有好处的了。”事实上，南半球的例子似乎尤其鼓舞人心。在新西兰，妇女于1893年获得选举权。在澳大利亚，19世纪90年代一个接一个的州赋予妇女选举权，至1902年妇女终于获得了参加联邦选举投票的权利。一位保守的（男性）教授于1904年阴郁地声称：“我认为澳大利亚完蛋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土著，无论男女，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获得选举权。）在美国，各州先后赋予白人妇女选举权。至1914年，有11个州的妇女可以投票，不过她们不得不等到1919年才能参加全国选举。丹麦于1915年赋予妇女选举权，而荷兰则是1919年。

数十年间，妇女选举权运动者仅仅取得了一些微小而平凡的胜利，但是考虑到当时社会对女性角色的看法，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从长远来看，这些成果为后来赢得民意支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排斥和嘲笑，她们坚定执著。与此同时，很多女性开始在地方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中扮演起越来越积极的角色，从中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心。她们在地方教育委员会和《济贫法》[7]委员会任职。她们还学习发表公开演讲。正如妇女选举权运动者安伯利夫人[8]有一次所说的那样，“人们看到一个女人可以演讲而同时依然表现得像一位贵妇人后，都对我表示惊讶。”此外，具有各种不同政治

信仰的妇女都开始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来，像弗朗西丝·鲍尔·科布和埃米莉·戴维斯这样的保守党人对这项事业的赤诚丝毫不亚于自由党和激进派妇女。

19世纪9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男人获得了选举权，妇女越发感到待遇悬殊，社会不公。她们指出，连那些几乎目不识丁的贫穷男人都获得了投票权，而受过良好教育、缴纳着地方税和国家税的妇女却仍然无缘获得完整的公民权。有观点认为，1897年见证了一场真正的突破：一项有利于妇女的法案在下院获得了71票的多数，而且这种情况在随后几年中反复出现。虽然这些法案没有一项转化为实际的改革，但妇女选举权运动者还是深受鼓舞。

注释

〔1〕 安妮·奈特（Anne Knight，1786—1862）：英国社会改革家和女权主义运动先驱。

〔2〕 “雄辩家”亨特（“Orator” Hunt，1773—1835）：本名亨利·亨特（Henry Hunt），英国政治家，宣传激进思想，主张议会改革，因好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而被政敌戏称为“雄辩家”。

〔3〕 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1866—1943）：英国作家、插图画家和植物学家。

〔4〕 维奥莉特·马卡姆（Violet Markham，1872—1959）：英国作家和社会改革家。

〔5〕 理查德·潘克赫斯特（Richard Pankhurst，1834—1898）：英国律师和社会活动家。

〔6〕 托利党：英国政党，产生于17世纪，后于19世纪中叶演变为英国保守党。

〔7〕 《济贫法》：英国对贫困者进行救济的法令。16世纪开始实施，经过数次改革，一直持续到1948年。

〔8〕 安伯利夫人（Lady Amberley，1842—1874）：即凯特·安伯利（Kate Amberley），英国女权主义者，出身贵族，为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之母。

第七章

为投票权而战：妇女选举权女斗士

suffragette（妇女选举权女斗士）这个词是1906年《每日邮报》创造的，最初是一个污蔑性的称谓，后来被不断壮大的激进运动纳为己用，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慢慢地，至少有一些妇女选举权运动者意识到通过和平手段取得的成果微乎其微。但是早在1868年，莉迪娅·贝克尔就曾不无夸张却又带有一定远见地说过，“它需要 流血或暴力行动”来“唤醒政府去实现公平正义”。

19世纪70年代初期，少数妇女把“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观点直接付诸行动，拒绝纳税。然而直到1903年潘克赫斯特家族创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时，鲜有什么真正的改变。她们已经在自己的根据地曼彻斯特积极行动起来，抗议当局禁止独立工党集会的做法。潘克赫斯特博士于1870年起草了第一部《取消妇女限制法案》，后来由雅各布·布赖特〔1〕提交给议会。（该法案二读通过，但是被威廉·格莱斯顿〔2〕宣布无效。）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3〕曾经担任《济贫法》监督官，她作过这样的评价：“我虽然参加过妇女选举权运动，但是我现在才开始认识到，妇女手握选票不仅仅是一项权利，还是一种极其迫切的需要。”她的女儿克丽丝特布尔（Christabel Pankhurst）很可能受到了多重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来自她的父母，还因为她聆听过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者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的讲话，撰写过她的传略——安东尼曾于1902年造访曼彻斯特。克丽丝特布尔写道：“想到又一代女性在为争取选举权而浪费生命，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从本质上说，妇女社会政治联盟依然是一个家族式组织，虽然1906年弗雷德·佩西克·劳伦斯和埃米琳·佩西克·劳伦斯〔4〕同意资助这项事业，并将其总部设在伦敦克莱门特这个小客栈里。（诚然，妇女社会政治联盟是最著名、同时或许也是最富成效的争取妇女选举权团体，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组织——妇女自由联盟、全国妇女选举权社团联盟、女演员选举权联盟等——这些组织虽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却都取得了进展。）从一开始，克丽丝特布尔·潘克赫斯特就主导了妇女

社会政治联盟，并很快在自己身边聚集起一批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当过磨坊女工的安妮·肯尼（Annie Kenney），她很快成为她们中最富成效的演讲者；工人阶级出身的已婚妇女苏格兰人弗洛拉·德拉蒙德（Flora Drummond）；以及信仰社会主义的教师特雷莎·比林顿（Teresa Billing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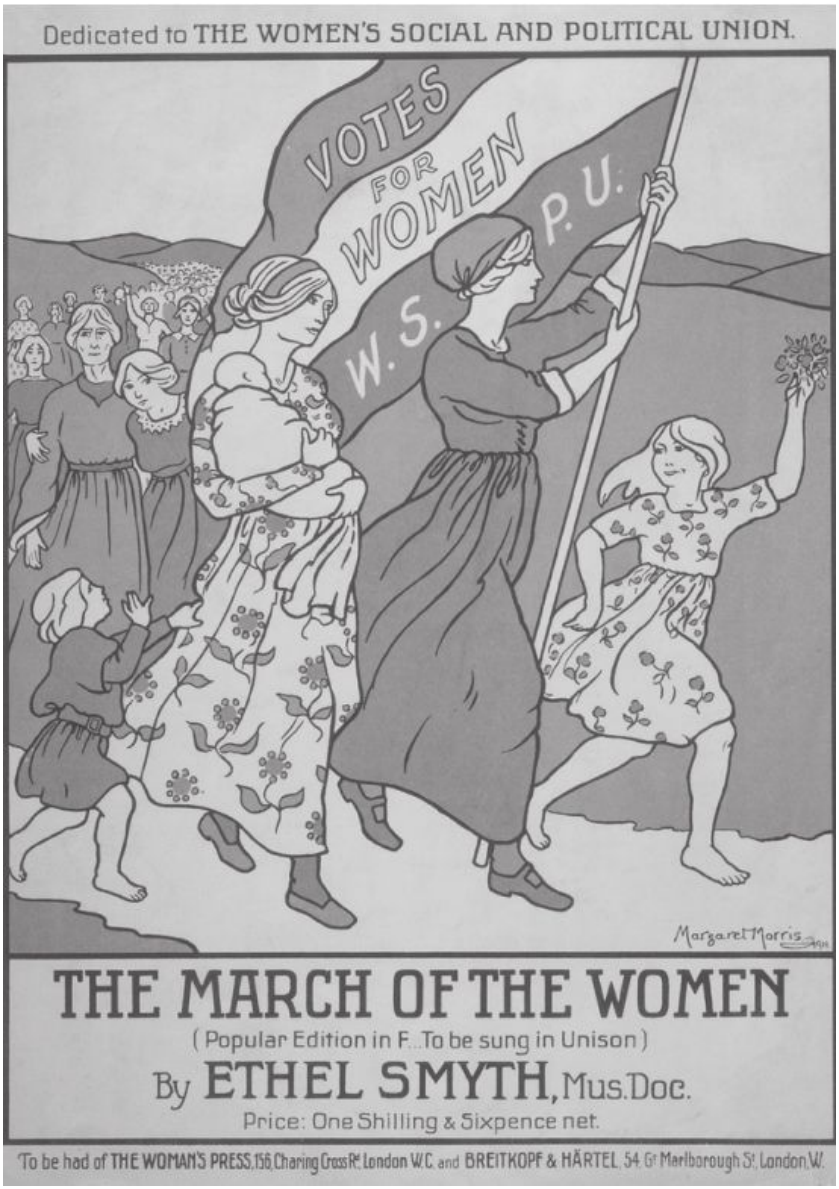

图5　埃塞尔·史密斯（Ethel Smyth）1911年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所创歌片儿《妇女进行曲》的封面，宣告为了选举权“妇女们奋勇前进”。她使用了妇女选举权女斗士们的代表色——绿色、紫色和白色，但这既是一场示威，也是一场庆典，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成立不到一年，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就发展到约58个支部。同时，其内部也第一次出现了分裂和对克丽丝特布尔的不满，这种分裂和不满到后来数不胜数。她毫无疑问极具领袖魅力，令众多追随者唯其马首是瞻，不过这种忠诚有时并不健康。然而，她也时常表现得专横跋扈，冷酷无情。她的母亲埃米琳也是如此，只是程度或许稍轻些。特雷莎·比林顿后来曾表示克丽丝特布尔利用了自己的追随者，“她利用了她们的长处和短处，强迫她们参加毫无准备的行动，不肯宽恕软弱表现，吹嘘拔高新手，说其成熟老练，丝毫听不进成熟的意见。”

1935年，一位妇女回首往事时，形容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前辈——一个权威不容置疑的领袖，一个不会犯错的领袖”。由于愤怒，她的话有些言过其实，但很可能也有一定的真实性。这个评价用来形容克丽丝特布尔很可能还要更准确一些。特雷莎·比林顿称，克丽丝特布尔是“一个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一个手腕高明的政客，一个自我奉献的世界改造者，一个铁石心肠的独裁者”。于是，妇女社会政治联盟最忠诚、最能干的两位组织者弗雷德·佩西克·劳伦斯和埃米琳·佩西克·劳伦斯在1914年被排挤出局，连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5]也在1913年被扫地出门。西尔维娅也许是这个家族里最有趣、肯定也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一位：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艺术家，也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她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东伦敦联盟（ELF），旨在帮助已经组建家庭的工人阶级妇女。她曾与工党政治家基尔·哈迪[6]有过一段恋情，哈迪甘愿冒断送个人政治生涯的风险来支持妇女选举权事业。

向激进行动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初，妇女选举权女斗士们在公开集会上诘难政治家。进而，她们组织了自己的大规模集会和游行。从一开始，她们便在场面效果上展现了惊人的宣传天赋。很快，她们熟练地掌握了如何使自己的观点显得直观醒目。她们在海德公园艾伯特音乐厅外的街道上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爱德华统治时期的伦敦出现这些妇女公开集会，本身就已经非常令人惊讶了。

妇女选举权女斗士们选择的颜色非常醒目：妇女们身穿配以绿色

和紫色饰带的白色长裙，举着色彩鲜艳的条幅，上面绣着或镶着标语口号。艺术家妇女选举权联合会创作的招贴画和明信片收效显著，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分上下两层：上层标注着“女人可以做到的，却还没有选举权”，绘有护士、母亲、医生和工厂工人的形象；下层标注的是“男人可能做过的，却并未丧失选举权”，绘有罪犯、疯子、白人奴隶主、酒鬼以及被形容成“不宜服役”的残疾人的形象（这倒有失公允）。她们的一些宣传过于追求轰动效应，以致未能真正发挥作用：譬如，一张反对“猫鼠法案”（源自把监狱里的绝食抗议者先释放再重新逮捕的做法）的招贴画上画了一只凶恶的姜黄色大猫，牙齿咬着一个女人柔弱的身体，这个女人一袭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标志性装束。而且，至少有些妇女选举权女斗士似乎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当时还比较新颖的摄影这种形式所蕴含的政治机遇，并且充分地加以利用。事实上，或许正是她们留下来的那些影像资料，才使妇女选举权女斗士们看起来依然令人兴趣十足。那些记录了游行示威的黑白老照片使那个时代立刻生动起来——这也包括那些反映人们眼中警察进行迫害的影像。在一张著名的照片上，看上去精心打扮、装束正式、矮小柔弱的潘克赫斯特夫人，正在被两个愤怒的粗暴男人挟持着带走。

图6　由潘克赫斯特家族领导的妇女选举权女斗士游行，1911年。

渐渐地，妇女选举权女斗士们才开始诉诸直接行动。她们开始时采取的是看似温和的对抗行动：猛撞政治家的门，或者聚集在唐宁街抗议。随着挫败感的加剧，她们开始采取零星的暴力和纵火行动：焚烧邮箱，砸碎商店橱窗。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曾经这样说道：“破碎的玻璃窗是现代政治中最有价值的论争。”（有趣的是，伦敦西区一些被砸了橱窗的商店依然在妇女选举权女斗士们的刊物上做广告；一些商店出售妇女社会政治联盟标志色的衣服，甚至有一家还出售白、紫、绿三色的内衣。）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说过“三座苏格兰城堡一夜之间毁于大火”，她对此举明显表示认可。1914年初，卡内基图书馆、两座古老的教堂以及许多庞大的空宅被付之一炬。玛丽·理查森〔7〕划坏了国立美术馆收藏的委拉斯开兹〔8〕的油画《梳妆中的维纳斯》，宣称“我要毁掉神话史上最美丽的女人的画像，因为政府正在毁掉潘克赫斯特夫人——她是现代史上最美丽的人物”。一些激进分子则更为过火：她们火烧了一位敌视妇女选举权事业的大臣的官邸；两名妇女竟然企图烧掉都柏林一个坐满观众的剧院。一位名叫埃米莉·怀尔丁·戴维森〔9〕的妇女为争取选举权而献身，之前她曾宣称这项事业“需要一个悲剧”。在1913年德比马赛〔10〕上，她在比赛中冲入赛道——无疑是冒死，甚至是寻死——绊倒了国王的赛马。几天后她伤重不治而死。然而，虽然最初激进分子乃至像戴维森这样的狂热分子曾经激起过大众的真正同情，但她们的举动同时也疏远了许多支持者。

并非每个人都赞同这种不断升级的斗争新策略，即便是在这场运动内部也不例外，因为这意味着坐牢的女性会越来越多。曾经和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密切合作过的特雷莎·比林顿就公开谴责使用暴力，认为暴力手段将“迫使大量女性作出自我牺牲，有时甚至是自杀，而且无一例外地会受到可怕的伤害，很有可能还会遭到虐待”。她因此认为，激进行动“由革命堕落成了政治把戏”。她公开谴责摆“烈士姿态”，反对妇女选举权女斗士们摆出一副自己“不是反叛者，而是无辜

的受害者”的样子。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辞去了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职务，连阿德拉·潘克赫斯特[11]也反对极端的激进行动。因此，这场运动内部的分裂加大了。

图7　1914年5月，埃米琳·潘克赫斯特试图向国王递交请愿书，结果在白金汉宫外被捕。图片左侧的男子怒气冲冲，凶相毕露；身穿制服的警察也许只是在例

行公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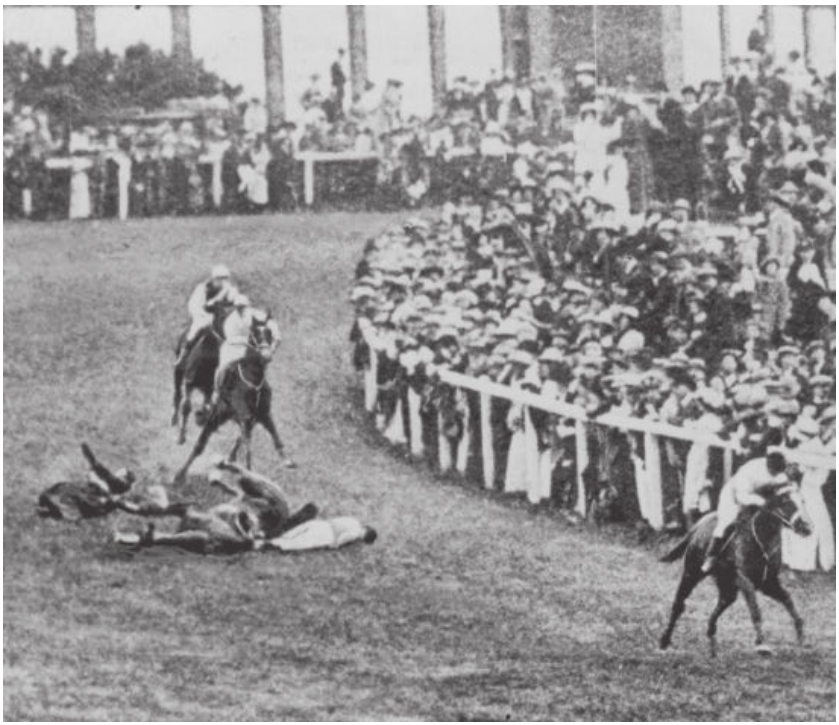

图8　在1913年德比马赛上，埃米莉·戴维森扑到国王的赛马下，为妇女选举权事业而献身。

早在1908年，那些因为采取某种直接或暴力行动而入狱的妇女选举权女斗士们就开始通过绝食来反抗当局。最初的几位妇女成功获释。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绝食抗议，当局开始强制她们进食。许多妇女自视为烈士，其他很多人也这么看待她们。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数次入狱，佩西克·劳伦斯夫妇也是如此。康斯坦丝·利顿小姐[12] 1909年第一次被捕入狱，但当局弄清她的社会地位后对她格外开恩。获释后，她采用化名进行活动，结果再次获刑，被强制喂食8次，使她的健康受到了永久性的损害。《罪犯保释法案》（俗称“猫鼠法案”）通过后，引起了巨大争议：妇女暂时获释出狱，恢复健康后再次被捕。她们激起了广泛而真诚的同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对她们这场运动的批评之声开始高涨，有些批评者甚至是曾经的支持者。譬如，特雷莎·比林顿就坚信：“我认为感情用事、个人独断和狂热盲从并非妇女解放的光明大道。”

到这个阶段，克丽丝特布尔·潘克赫斯特已经退出这场斗争多时了。她旅居巴黎，过着安逸乃至奢华的生活，逃避了国内妇女选举权女斗士们所面临的不断加剧的纷扰。她于1910年宣称：“女士们！休战听起来很好，但是激进行动不可替代。我们在这场斗争中感到无比自豪，因为我们感到斗争使我们变得有多么强大。”忠心耿耿的安妮·肯尼每个周末都去拜访她，然后带回这位流亡领袖的指示。其他较为明眼的妇女则批评她临阵脱逃，可谓理所当然。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情形发生了彻底的改变。1914年8月，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明智地宣布暂停妇女选举权运动。克丽丝特布尔——法国的旅居生活看来损害了她清晰思考的能力——极为夸张地评价道：“男人所创造的文明，在和平时期丑陋至极且残酷无情，现在将要被毁灭了。”这场战争，她继续说道，是“神对那些将女性置于屈从地位的人的报复”。西尔维娅想得总是要深刻得多，她在《妇女选举权女斗士运动》中说：

> 男人和女人已经被战争的苦难和牺牲拉得更近了。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在由于战争而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的巨大的经济问题面前，参加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女性变得敬畏和谦卑了，知道社会变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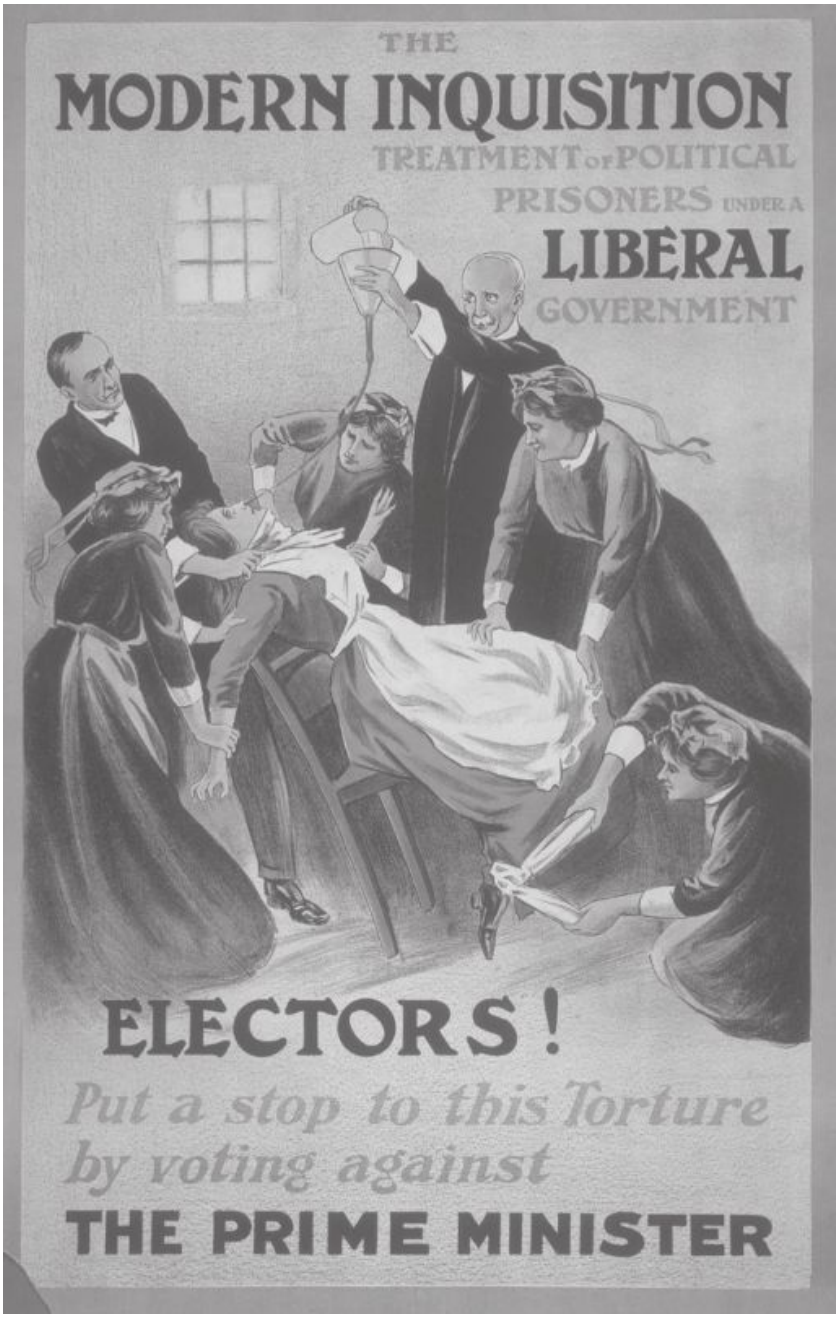

图9　戏剧化反映妇女选举权女斗士在狱中被强制进食的招贴画，1910年。（画面上方文字：现代宗教裁判所：自由党政府统治下政治犯的遭遇；画面下方

文字：选民们！投首相的反对票，制止这样的折磨。）

1918年，30岁以上的妇女获得了选举权。1928年3月，在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她们终于在选举权上和男人实现了平等。

注释

〔1〕 雅各布·布赖特（Jacob Bright，1821—1899）：英国激进的自由党人和女权主义者。

〔2〕 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以自由党人身份担任4届英国首相。

〔3〕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Mrs 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奠基人之一。

〔4〕 弗雷德·佩西克·劳伦斯（Fred Pethick Lawrence，1871—1961）和埃米琳·佩西克·劳伦斯（Emmeline Pethick Lawrence，1867—1954）：英国贵族夫妇，英国女权运动领袖。

〔5〕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1882—1960）：英国左翼妇女选举权运动者，埃米琳·潘克赫斯特之女。

〔6〕 基尔·哈迪（Keir Hardie，1856—1915）：苏格兰社会主义者、工人领袖和英国工党创始人。

〔7〕 玛丽·理查森（Mary Richardson，1889—1961）：加拿大妇女选举权运动积极分子，在英国女权运动中表现活跃。

〔8〕 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1599—1660）：西班牙绘画大师。《梳妆中的维纳斯》作于1647—1651年间，为其存世的唯一裸体油画，也是17世纪西班牙两幅裸体油画之一。

〔9〕 埃米莉·怀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1872—1913）：英国激进女权主义者。

〔10〕 德比马赛：1780年以来每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在萨里郡埃普瑟姆唐斯举行的传统赛马活动。

〔11〕 阿德拉·潘克赫斯特（Adela Pankhurst，1885—1961）：英国女权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加入过共产党。

〔12〕 康斯坦丝·利顿小姐（Lady Constance Lytton，1869—1923）：英国贵族妇女，妇女选举权运动者。

第八章

20世纪早期的女权主义

20世纪早期，英国妇女获得了法律平等和公民平等，虽然在实践中并不尽如人意，但至少在理论上是平等了。1918年起，30岁以上的妇女获准参加投票。随之她们内部便产生了争论——是该将工作重心放在大力争取和男性同等条件的投票权呢，还是该集中精力解决女性的其他需要和问题。一些女性和一些男性都感到，成立女性政党应该能够帮助她们扩大既有成果，但是她们让这个机会溜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过于纷繁复杂，难以简单概括。它给一些妇女提供了外出工作的机会。在战争年代，外出工作的妇女人数增加了100多万。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兵工厂和机械厂工作，另一些人在医院工作。很多妇女要求提高薪酬，有时也坚持要求和男人拿同样的薪水。她们组建了一支妇女志愿预备队以及一些女警巡逻队。战时，无论她们是在家里操持家务，还是在外辛勤工作，几乎可以肯定其贡献对她们于1918年获得部分选举权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战争使许多女性或成了寡妇，或一直独身，战时报刊还曾诋毁过“招摇的随意女郎”[1]。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挖苦道：“杞人忧天的道德贩子们编造出洪水猛兽般的女孩和妇女形象……（她们）放荡不羁，给国家平添大堆大堆的私生子。”一家女权主义报纸评述说，军方并未意识到“他们在保护军队不受妇女干扰的同时，没能保护妇女不受军队的骚扰”。

早在1918年，下院议员们就赞同妇女可以名正言顺地在议会拥有一席之地，不过妇女真正当选议员却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过程。1918年，克丽丝特布尔·潘克赫斯特参选斯梅西克[2]议员，但是以700票之差落选。1919年和1920年，两位女性——保守党人阿斯特夫人（Lady Astor）和自由党人玛格丽特·温特林厄姆（Margaret Wintringham）——先后接替了自己丈夫在议会的席位。阿斯特从未热心参与过争取妇女选举权的长期斗争，而温特林厄姆则是全国平等民权社团联盟[3]（NUSEC）的成员，同时也是妇女研究所[4]的一员。温特林厄姆后来还公开宣称，料理家务是一个“十分荣幸、需要技术、事关国家命运的职业”。

工党党员埃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一位拥有工会背景的未婚女性，于1924年当选议员，她直言不讳地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令人钦佩。她十分关注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认为妇女应当获得持家津贴；她支持工会的权利；国际和平与自由联盟[5]调查英军士兵在爱尔兰的暴行时，她是调查团成员之一。她写道："男人们半夜闯进家里，把女人们赶下床，女人们身上只裹着一件外套。她们半夜被赶出家门，家园被付之一炬。"

1929年，阿斯特夫人提议女议员们组建一个妇女政党，但是由于工党妇女党员不太支持这个想法，这个提议终告流产。（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惜被白白错过了。）一直到了1940年联合政府成立时，只有12位女议员。热衷政治的妇女似乎更加青睐地方政府。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妇女积极参与地方教育委员会及其他地方机构的事务，一战后有更多的妇女加入进来。

全国平等民权社团联盟有着更远大的目标，即"实现其他所有必须的改革：经济改革、法律改革和社会改革，以确保男女之间在自由、地位和机会方面的真正平等"。例如，其成员曾奔走呼号，希望能向妇女开放各种专门职业，主张她们应享有和男性同工同酬的权利。1919年，《（消除）性别歧视法》至少在理论上向妇女从事各种专门职业和担任公务员敞开了大门。据弗吉尼娅·吴尔夫称，该法比选举权对妇女的作用更大，但是现代历史学家对此表示怀疑，至少对其短期效用表示怀疑。1923年，《婚姻诉讼法》为男女离婚奠定了平等的基础。

但是，全国平等民权社团联盟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平等，还有差异，其成员努力解决女性的特殊问题和需求。埃莉诺·拉思伯恩[6]出任该联盟主席后提出，妇女不应该要求和男人平等，而应该要求"实现自己天性中的各种潜能、适应各自生活环境所需之物"。她们的要求包括改革离婚、儿童监护以及卖淫等方面的法律。1921年，六点团[7]成立，其成员中有一些曾经是激进派，包括记者和小说家丽贝卡·韦斯特，但是其诉求内容以及所采取的方式基本都称不上激进。她们也着力解决妇女的特殊问题，呼吁改善未婚妇女和孤儿寡母的境遇，

改革涉及侵犯儿童行为的法律。她们希望已婚男女享有同等的子女监护权，男女教师获得同等薪酬，她们还反对政府机构中对女性的歧视。她们发布了一份黑名单，上面列有敌视妇女权益的议员的姓名，督促妇女们无论自己持何种政治立场，都不要投票给他们。

20世纪20年代，新出现了几家面向女性的杂志，不过它们的名字——《妇女和家庭》、《好管家》——清晰地表现出对其读者没有寄予太高的期望。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在妇女地位这个问题上表现得要激进一些。1920年创刊的《时代与潮流》拥有一些著名的撰稿人，包括弗吉尼娅·吴尔夫、丽贝卡·韦斯特和罗丝·麦考利[8]。这家杂志认为妇女应该行动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向所有 政党施加压力，要它们解决妇女的种种关切。它还提出了众多妇女问题，包括未婚母亲及寡妇的地位、子女监护权等。1925年，韦斯特一如既往斗志昂扬地写道：

> 我是一名老派的女权主义者……我们队伍中有些人有意降低了嗓门，冷静地告诉我们性别对立的时代已经终结，因此我们只能和男人携手并进。我不相信这一套。

韦斯特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一名妇女选举权运动者和一位富有成效的宣传家，她始终斗志旺盛——她认为妇女还有很多东西需要通过斗争去争取。

但是，她的写作主题十分广泛，思想深邃，经常妙语含讽。她嘲笑男性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我们想让每个女人都变成圣母，我们必须让她们有足够的食物。”不过她对无所事事的上层妇女也同样尖刻，说她们整天“在房子里晃荡，迟钝的头脑里一心想着聚会”。

在此后的岁月里，丽贝卡·韦斯特还就审判纳粹战犯发表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后期，她写了一部有关南斯拉夫的书，篇幅很长，十分有趣。另一方面，她的小说也流露出一种对男女关系的多愁善感，这种多愁善感令人意想不到，往往还有些腻人。也许这源

自她似乎并不幸福的个人生活：她和H. G. 威尔斯[9]有一个私生子，虽然他们一起生活了几年，不过儿子安东尼基本上是她独自抚养大的。安东尼后来对母亲十分恶劣，显然没有想过母亲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岁月。

在这段时期，大众媒体，无论是出于紧张不安还是尖酸刻薄，自始至终都倾向于把女权主义者描绘成失意的老姑娘或母夜叉。一名记者评论道，因为战争，许多年轻女性都“已经没有了女性特征，变得十分男性化，事实上，这种中性状态在她们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以至于这些个体都被（不厚道地）称为‘它’，而非‘她’了”。女教师和女公务员一样，有时不得不奋起反抗性别歧视。20世纪20年代，经济开始陷入萧条，女性和以往很多时候一样首当其冲，面临着失业。

不过，的确有更多的女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不仅是中小学教育，还包括大学程度的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埃米莉·戴维斯（见第五章）。然而，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弗吉尼娅·吴尔夫以她特有的拐弯抹角的方式，揭示了女性在剑桥大学沦为二等公民的情形：她描述自己如何被禁止进入一座著名的图书馆，描述自己和女子学院的一位同窗好友如何不能像男生那样吃鳎目鱼和山鹑，而只能喝肉汤、吃牛肉。1935年，另一位名叫多萝西·L.塞耶斯[10]的作家根据自己在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的学习经历，创作了小说《俗丽之夜》，以宽广的胸怀深情地褒扬了一批牛津大学女教师所表现出来的正直诚实、聪明才智和对他人无微不至的关怀（虽然她不得不安排一位男侦探来帮助她们解开一桩罪案的谜团）。她笔下的一位女教师不无欣慰地说，她们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就——这都是靠“锱铢必较”取得的。

为法律平等、公民平等和教育平等而奋斗过去一直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依然是——女权主义的核心内容。但是，这场运动也凸显了两性差异，要求重新更加深刻地理解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特殊需求。20世纪早期最有意思——从长期来看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便是避孕。这个话题当时很少被公开讨论过，而且时至今日仍然能激起强烈的反对。早在1877年，支持节育的组织马尔萨斯联盟

[11] 就开展了避孕方法的宣传活动。该组织的两位重要成员——安妮·贝赞特和查尔斯·布雷德洛 [12] ——因为出版了与此相关的《人口规律》这本美国人写的小册子而遭到审判。（同样是这位安妮·贝赞特，在19世纪80年代强烈支持抗议布赖恩特 - 梅火柴厂恶劣工作条件的女工罢工。）

《人口规律》的作者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曾在纽约贫民窟里做过护士，为那里的妇女服务过。她还创办了月刊《妇女反叛者》，不仅号召革命，而且——显然更加危险的是——还介绍避孕知识。在一本名为《计划生育》的小册子中，她认为避孕能够让“普通妇女”拥有“两情相悦的满意性行为……其魅力在于能够促进健康，而且还有美容提神之功效”。1873年通过的《康斯托克法》规定，邮递“淫秽、下流或猥亵”材料属违法行为。桑格在出庭受审的前一天离开了美国，于1914年到达格拉斯哥，后于1915年7月抵达伦敦，在那里结识了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

虽然二人志趣相投，但是她们的关系却根本谈不上融洽。斯托普斯是个令人困惑、难以相处的女人。在少女时代，她既聪明伶俐又胸怀大志，在父亲的鼓励下，一直读到大学，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但是——大概和那个时代其他许多家教良好的女孩一样——她对于性几乎一无所知。即便如此，她在十分漫长的时间里依然保持着性无知，还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和一个名叫藤井健次郎 [13] 的日本男人保持了一段热烈但无性的长期恋情后，她嫁给了一个名叫雷金纳德·盖茨 [14] 的男人。他们在这段婚姻中始终没有同过房，但是斯托普斯直到大约3年后才意识到缺了点什么。她后来再婚嫁给了汉弗莱·罗 [15] ，但是第二次婚姻远不如她所期望的那样幸福美满，不过罗在她后来开办节育诊所时给予了她宝贵的支持。但是斯托普斯至少找到了有效的方法来克服自己的无知，进而帮助那些几乎和自己当年一样无知的妇女。她后来写了《婚后之爱》（1916），半个月内售出2,000本，年底时已经达到了6个印次。接着，她又写了《明智的父母之道》（1918）和《做个快乐母亲》（1920）。她的文风——嗯，有些华丽：

图10　玛格丽特·桑格，为纽约贫民窟妇女服务的护士，让避孕知识惠及千家万户——此举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她不得不为此逃离祖国，躲避法律的追究。

在那永恒的时刻，在那狂喜的巅峰，令人几近昏厥的涌动压倒了精神，将男人和女人的全部精华一举卷入它那迸发的高潮之中。

这种（毫无可信度的）极乐和另一副阴郁但同样奇异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挥霍无度者繁殖得如此之快，容易生下由于身心畸形孱弱而柔弱残疾的孩

子，同时却要求健全而节俭者来养活。

不过，玛丽·斯托普斯以实际行动表明她是玛格丽特·桑格忠实的朋友。当桑格回到美国再次面临指控时，斯托普斯挺身而出给予她以支持。她不仅为桑格组织了一次请愿活动，还以她特有的华丽文风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

> 对一个女人来说，她的每一根纤维、每一块肌肉和每一根毛细血管都被一种神秘而日益加剧的恐惧所悄然毒害，这恐惧来自一个意外在她心脏之下慢慢成形的胚胎，比任何噩梦都彻骨、漫长。先生，您可曾想象过作为这样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

玛丽·斯托普斯的书——至少就其实用性而言，明显满足了一个迫切需求——实际上延续了十分畅销的势头。她坚持认为“正常男人的性需求”并不比“正常女人的更强烈”，这显然触动了许多女性的心弦。她后来和雷金纳德·盖茨在伦敦北部的霍洛韦区开办了一家节育诊所，为贫苦妇女提供免费避孕咨询。诊所的宣传手册上声称，他们为那些身体内部受到损害的“奴隶母亲”带来健康和卫生，这些母亲每年都生下“孱弱的婴儿”，但是“中产阶级和医学界却冷漠地任其生活在胁迫之下的无知中”。但是玛丽·斯托普斯也树敌不少，这些人与她有着共同的兴趣，本来也许会和她精诚合作的。1928年，一个潜在的同路人抱怨她患有“偏执狂和夸大狂”。

1936年，一群妇女成立了堕胎法律改革协会，着力应对一个更具争议性的问题。她们称每年大约有500名妇女死于堕胎，而这都是非常无谓的。她们中的一位活动家、出生于加拿大的斯特拉·布朗〔16〕勇敢地公开承认：“如果堕胎会致命或造成受伤，那么我就不会站在你们面前了。”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及之后）仍争议不断，但已经有数个妇女组织开始敦促将堕胎合法化。1956年，一项报纸民意调查发现，在200个受访者中，51.9%的人赞成自主堕胎，23.4%的人赞成由于健康原因进行堕胎。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复

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堕胎依然是一个频频引发争议的主要问题。

一些当代女权主义者不屑地认为弗吉尼娅·吴尔夫与女权主义毫不相干。例如，希拉·罗博特姆[17]评价说，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吴尔夫要求拥有500镑年金和一个自己的空间，这针对的仅仅是少数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此话不假，但是她依然拥有读者，而且其中还有那些对大部分女权主义作品不屑一顾的女人（和男人）。的确，吴尔夫对于“女权主义”这个字眼怀有矛盾情绪。该书最初出版时，她承认自己很担心会“被视为女权主义者而受到攻击”。在《三几尼》——后来一部要阴暗许多的作品，写于战争迫近和法西斯主义膨胀的阴霾之下——中，吴尔夫直接抨击了“女权主义”这个说法，认为这是“一个陈旧的字眼，一个恶毒、邪恶的字眼，盛行之时已为害不浅，现在则已经过时了”。她向“受过教育的男人的女儿”——而非仅限于受过教育的女性——发出的呼吁现在听起来相当缺乏策略，而且即便是在20世纪30年代想必也已经相当过时了。（她解释说，“受过教育的男人”指的是那些上过牛津或剑桥的男人。）但是她有力而尖锐地指出，“亚瑟教育基金”几十年来，乃至几百年来，使男孩而非其姐妹受到了应有的教育。她讽刺道，直到1919年，婚姻都是“唯一向女性敞开大门的伟大职业”。而且，她又补充说，她们由于缺乏教育竟连从事这项职业都不够格。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弗吉尼娅·吴尔夫为当时刚刚遭到一个男人批评的丽贝卡·韦斯特进行了辩护。这个男人称，韦斯特是“彻头彻尾的女权主义者！她说男人都是势利眼！”吴尔夫担心，妇女选举权运动“极可能已经激起了男人独断专行的超强欲望”。她说，毕竟“这几百年来女人一直扮演着镜子的角色，这镜子有着一种奇妙的魔力，能映照出两倍于实际块头的男人形象”。她坚信，大部分女性事实上都不知道男人到底有多么憎恨她们。“男人反对妇女解放的历史，”她冷冷地说道，“也许比妇女解放这个过程本身更有意思。据此可以写出一本有趣的书来。”不过作者，她补充道，“得戴上厚厚的手套，躲到护栏后面，以免被坚硬的金子所伤。”不管怎么说，现在看起来滑稽可笑的事情，“曾不得不极度认真地予以对待……你们的祖母和曾

祖母中，许多人曾哭干了眼泪。”

在匆匆翻阅小说家“玛丽·卡迈克尔”〔18〕写的一部现代小说时，吴尔夫碰到了“克洛艾喜欢奥利维娅”这样的表述，“接着，它使我猛然意识到这中间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克洛艾喜欢奥利维娅，这在文学中也许还是头一遭。”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小说中女性几乎总是因为和男性有关系才出现的。接着往下读，吴尔夫了解到这两个女人共用一个实验室，“实验室本身会使她们的友谊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持久，因为其中个人因素要少一些。”于是她惊呼，玛丽·卡迈克尔也许在从未有人涉足之地点燃了一支火炬，探索着这样一个地方：“妇女独立存在，不需要异性用变幻莫测的彩灯去照耀。”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最令人难忘的部分，吴尔夫总结了自己对妇女才华过去曾经——现在依然时常——如何遭到压制和浪费的论述。她审视了历史上一些才华横溢的女性，从纽卡斯尔公爵夫人、乔治·艾略特到夏洛蒂·勃朗特——她们被剥夺了“体验、交流和旅行”的机会，因此从未像她们原本能够做到的那样写出铿锵有力、磅礴大气的东西来。吴尔夫还创造了莎士比亚之妹朱迪丝（Judith）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有力形象。她和哥哥一样天资聪慧，却不可避免地对男人感到失望，遭到他们的嘲笑和利用。和哥哥一样，她满怀希望地来到伦敦的一家家剧院，但是很快“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于是——当诗人的心被禁锢羁绊在一个女人的体内时，谁能了解它的热度和强劲搏动呢？——她在一个冬夜自杀了，埋在某个十字路口，就是今天公共汽车在大象堡外停靠的位置”。但是“她就活在你我身上，活在许多今晚不在这里的女人身上，因为她们要洗碗，要哄孩子上床”。

注释

〔1〕 随意女郎：指20世纪20年代的新潮年轻女性，时人普遍认为其有伤风化。

〔2〕 斯梅西克：英国英格兰西米德兰兹郡工业城镇。

〔3〕 全国平等民权社团联盟：成立于1918年，前身为全国妇女选举权社团联盟（NUWSS），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

〔4〕 妇女研究所：成立于1915年，最初旨在活跃农村社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鼓励妇女投入粮食生产，现为英国最大的妇女组织。

〔5〕 国际和平与自由联盟：成立于1915年，全称“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宗旨是反对战争。

〔6〕 埃莉诺·拉思伯恩（Eleanor Rathbone，1872—1946）：英国社会改革家。

〔7〕 六点团：由朗达夫人（Lady Rhondda）建立的妇女组织，因提出男女平等的六点主张而得名。

〔8〕 罗丝·麦考利（Rose Macaulay，1881—1958）：英国女诗人和小说家。

〔9〕 H. G. 威尔斯（H. G. Wells，1866—1946）：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

〔10〕 多萝西·L.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1893—1957）：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

〔11〕 马尔萨斯联盟：英国第一个致力于宣传避孕知识的组织（1877—1927）。

〔12〕 查尔斯·布雷德洛（Charles Bradlaugh，1833—1891）：英国社会活动家和著名无神论者。

〔13〕 藤井健次郎（Kenjiro Fujii，1866—1952）：日本植物学家和细胞学家。

〔14〕 雷金纳德·盖茨（Reginald Gates，1882—1962）：加拿大植物学家和遗传学家。

〔15〕 汉弗莱·罗（Humphrey Roe，1877—1958）：英国飞机设计家、制造商，第一个用自行设计的飞机飞行的英国人。

〔16〕 斯特拉·布朗（Stella Browne，1880—1955）：加拿大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性别激进分子，支持女性节育。

〔17〕 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1943—）：英国社会历史学家、女权主义作家及理论家，信仰社会主义。

〔18〕 玛丽·卡迈克尔（Mary Carmichael）：吴尔夫虚构的小说家，以其独特的句式颇受好评。

第九章

女权主义第二浪潮：20世纪后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几个国家出现了有时被称为女权主义“第二浪潮”的妇女运动。1946年，联合国设立了妇女地位委员会，并于两年后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规定成年男女“在缔结婚姻、结婚期间和解除婚约时，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时还承认妇女作为母亲时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1975年到1985年之间，联合国分别在墨西哥城、哥本哈根和内罗毕召开了3次国际大会，讨论妇女问题。这几次大会承认女权主义

> 是来自不同地区、阶层、国家和民族背景的妇女对自身关切和权益作出的政治表达……女权主义具有多样性，而且必须具有多样性，这反映了不同女性的不同需求和关切，并由她们自行对其进行界定。

非洲妇女作了有益的提醒：

> 妇女也是统治他人的阶层和国家的一分子……和“姐妹情谊”的良苦用心相悖，并非所有妇女都有相同的权益。

许许多多西方女性纷纷拿起了笔。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便是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1]，而且至今仍然如此。她的作品——包括四卷本自传和几部小说——总体构成了对一个女人个人体验的深度探索。其他许多国家的女性纷纷响应，称波伏瓦的《第二性》（1949）帮助她们看到了在女性所处的大环境下自己个人的种种挫折。波伏瓦认为，从古至今，妇女被剥夺了享有完整人性的权利，被剥夺了创造、发明以及超越单纯的生存在不断拓宽的事业领域中寻找生命意义的人权。男人“改造地球的面貌，创造新的仪器，进行发明创新，铸造未来”；而另一方面，女人却始终是一个原始的“他者”意象。她被男人观看，也是为了供男人观看，永远都是客体而非主体。

在分别探讨女童、妻子、母亲、妓女、自恋者、女同性恋者和恋爱中的女人的各个章节中，波伏瓦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她的中心论点：正是男性 活动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使存在本身具有了价值；这种活动

压倒了各种纷繁复杂的生命力；“它征服了自然和女性。”她认为，女性代表自然、神秘、非人类；她所代表 的比她的实际存在 ——即她的个体经验——更重要。

但是波伏瓦坚持认为“女人并非天生，而是后天造就的”；女人能够改变她的处境。大部分女性都错误地在爱情中寻求救赎。但是，波伏瓦自己的选择或许也太过简单了：她构想出一个“独立女性”的形象，这个女性

想要积极主动，成为主导者，拒绝接受男性意在强加于她的被动地位。现代女性接受男性的价值观；她为自己能以和男性相同的方式进行思考、采取行动、开展工作、从事创造而自豪。

这个形象若是我们的未来，肯定没有多少吸引力。但是她正确地指出，有太多女性念念不忘女子气质所带来的种种优待；同时又有太多男性乐于见到女子气质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种种限制。今天，女性徘徊在过去和可能的未来之间，这个未来充满艰难，尚不为人知。

波伏瓦一向反对任何极力主张妇女具有特殊品德或特殊价值观的女权主义，坚定地摒弃任何将特别“女性化”的特质理想化的举动。她认为，支持那种女权主义只会暗示自己赞同

男人为将女性束缚在被压迫状态之下而编造的鬼话。对女性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要强调自己是女人的问题，而是一个要成为完完全全的人的问题。

不过，虽然波伏瓦曾经并且一直对某些形式的传统女权主义持批评态度，但是她对日渐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MLF）赞叹不已。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中，她承认自己意识到

在我们梦想的社会主义到来之前，为妇女的实际地位而斗争是必要的……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平等也尚未实现，因此，妇女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71年，波伏瓦和其他妇女一起在《新观察家》[2] 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宣言。宣言由当时一个正在推动堕胎合法化的妇女解放运动团体起草，343名妇女在上面署了名，宣称“我曾经堕过胎，现在我要求所有妇女都享有这项权利”。然而，她始终坚持说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妇女的“冤屈”，自己逃脱了在《第二性》中作过精彩分析的那种压迫。（这种说法并不怎么令人信服。）

> 我非但没有因为我的女性身份而受苦，相反，20岁以来，我已经集两种性别的优势于一身……我身边的人既把我当成作家、他们男性世界的伙伴，又把我当作女人……恰恰是这种有利的位置，鼓励我撰写了《第二性》。这个身份使我能够畅所欲言。

但是波伏瓦的4卷自传——《孝女回忆录》、《年富力强》、《势所必然》和《归根到底》——以及1964年那本令人啼笑皆非地取名为《十分安详的辞世》的关于她母亲的书，以独一无二的详尽、非同寻常的坦率以及时常感人至深的笔触带领我们作了一次穿越她个人经历的体验之旅。她从未说过自己是别人的楷模，但是她以自己的人生为其他人树立了成功的榜样，展示了一个女孩如何逃脱“客体、他者”的女性角色。她内心对自己专注于妇女问题几乎怀着愧疚之情，因为“我们中有一些人从未因我们的女性身份而感到有什么不便或阻碍”。但是她承认，一个拿起笔的女人不可避免地提供了

图11　西蒙娜·德·波伏瓦也许是整个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西方女权主义者，她的自传、小说以及伟大的女权主义理论著作《第二性》使其依然声名显赫。

一根供人打击的棍棒……如果你是年轻女人，他们会纵容你，乐呵呵地冲你挤眉弄眼。如果你上了年纪，他们会恭恭敬敬地向你鞠躬施礼。但是在青春逝去之后，倘若你胆敢在获得长者的威仪之前发言：整群人都会对你穷追猛打。

她的自传以及小说更加感人，当然也更加直接地面向女性读者，

因为或许有悖于波伏瓦的初衷，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唤起了她本人的挫败感和不安全感，且不论其根源是她和让-保罗·萨特[3]的长期关系中萨特的不忠，还是她自己和美国作家纳尔逊·阿尔格伦（Nelson Algren）以及克洛德·兰兹曼[4]之间的感情纠葛，抑或是她自己膝下没有一男半女。

但是自始至终，波伏瓦都对新鲜体验持开放态度。1955年，她和萨特访问中国后，写了《长征》，宣称它“颠覆了我对我们这个星球的所有认识”，因为她开始认识到“我们西方的安逸生活仅仅是一种有限的特权”。她在自己最后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暮年》（1970）中，面对最终不可避免的失败，仍然竭力保持冷静的头脑，这或许是她最为感人的作品。

贝蒂·弗里丹[5]在1963年出版的《女性奥秘》一书中，戳穿了美国富裕白人郊区快乐的家庭主妇这个神话。她写道：“这个尚不具名的问题像个疖子一样从快乐的美国神话中爆裂出来。”创作本书的想法源于她参加完一次同学聚会后为一家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在那次聚会上，她询问在场的其他妇女：“如果能重头来过，你希望自己当初的选择有何不同？”她们的回答使弗里丹意识到了一种不可名状但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有人批评她思想狭隘，只顾中产阶级；她的言论过于简单化，只会督促郊区妇女进行自己的人生规划，跳出家庭杂务的羁绊，到外面的世界去工作，同时却无视众多没有那么幸运的妇女已经在家务劳动和外面薪酬通常都十分微薄的工作之间疲于奔命了。这个批评不无道理。黑人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为比较贫困的美国人争辩道：

> 解放意味着一个母亲终于获得了辞职的自由——呆在家里，过着有钱人那样的日子……能够工作和不得不工作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但是，弗里丹的著作论证严谨，文风犀利，甚至还慷慨激昂地控诉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便 是富裕的中产阶级妇女也过着受限制的生活，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垂头丧气地接受这种限制。她坚持认为，

每个妇女都至少应该问一 问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她或许才能真正意识到“无论是丈夫、孩子、房中之物、性还是活得和其他妇女一样，都不能给她一个自我”。

弗里丹本人一直具有激进的政治背景，她的早期作品尤为明显地表现出她对社会不平等的敏锐察觉。而且，她和一群其他妇女——其中一些来自汽车工人联合会——后来成了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OW）的创始人。全国妇女组织的宗旨是：“使妇女完全融入当下美国社会的主流，享有由与男性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所带来的所有权利与责任。”和女权运动中一些年长的妇女一样，弗里丹担心女权主义的新论调“僵化地反抗过去，在同样的老问题上老调重弹”，而不是向前迈进。在《第二阶段》（1981）一书中，她一方面承认妇女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又表示变化少之又少。虽然长期以来人们为了让《平等权利修正案》[6] 获得通过已经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仍有一些州拒绝批准这项修正案。弗里丹和新一代女权主义者之间的隔阂也许不可避免地愈来愈深了，但指责她与“男权回潮”同流合污也未免有失公允。她深有同感地援引了多伦多一位记者的话：

> 我今天不想被人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正如（20世纪）50年代我不想被人当作“头脑简单的金发女郎”一样。妇女解放论者这个标签限制并蒙蔽了那些被贴上这个标签的人。不无讽刺的是，这个标签居然源自一种原本旨在消除给女性贴标签这种做法的想法。

她的批评也许不够公允，但却也不能充耳不闻。

在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不久后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内部，至少最初存在着千差万别，充斥着一种能量，这种能量部分来自于对被排斥在当时左翼团体之外的愤怒，部分来自于蓬勃兴起的运动本身内部不无裨益的观点分歧。许多年轻一些的妇女——在学生运动中，在反越战示威者和新左派分子中——感到她们的男性战友把她们边缘化了。1965年，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7] 中的女性成

员宣称，学会了“从根本上思考过去社会角色从未受到过质疑的人的个人价值和能力”之后，这场运动中的许多女性“已经开始尝试将这些经验教训运用到她们与男性的关系中去”。两年后，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女性强调说她们的“兄弟们……认识到他们必须解决自身的大男子主义问题”。一些女性发行了一份名为《妇女解放运动之声》的小报。同时发行的还有自觉被男性战友边缘化了的新左派分子的一份宣言，她们对斯托克利·卡迈克尔[8]那番臭名昭著的言论大为光火：“女人在运动中的位置就是俯卧。”

图12　贝蒂·弗里丹在纽约，1970年。

贝尔·胡克斯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一书

中，尖锐地批评了整个女权运动，认为那些“受性别压迫最为深重……无力改变自身生活现状”的女性从未得到为自己说话的机会。她坚持认为，当下的女权主义具有种族歧视色彩，造成许多女性幻想破灭，痛苦不堪。参加运动的女性一直无视种族和阶级这两个紧密交织的问题。事实上，强调对女性的普遍“压迫”严重忽视了美国社会内部真正的不平等。胡克斯认为，白人女性表现得好像这场运动是属于她们的似的，她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妇女内部也因各种各样的偏见而四分五裂，这些偏见包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级特权”等。胡克斯回忆起自己在女权主义团体中的亲身经历时说：“我发现白人妇女对我和其他非白人成员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黑人女权主义者不无道理地指出：“白人女权主义者提出的每个问题都对黑人产生着异常严重的冲击。”

在美国，女权主义的表达形式多种多样，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9〕1970年创办的通俗易懂、印刷精美的《女士》〔10〕杂志，一直到黑人单身母亲姊妹会，不一而足。凯特·米利特〔11〕在《性政治》（1970）一书中，着力分析了“作为政治制度的父权制”。她强调说，政治指所有“存在权力结构的关系”，两性之间的关系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仔细探究。她认为，女性一方面被偶像化了，同时另一方面又被施以恩惠。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她犀利地分析了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一些作家的父权制态度：弗洛伊德〔12〕、D. H. 劳伦斯〔13〕、亨利·米勒〔14〕、诺曼·梅勒〔15〕和让·热内〔16〕。她几乎看不到女性眼下有什么出路。她的结论是：“也许我们……能够把性别从严酷的政治现实中剥离出来，但是这要等到我们从现在所居住的沙漠里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忍受的世界时才能实现。”其他的政治表述还有美国舒拉密斯·费尔斯通〔17〕的《性别辩证法》（1970），他认为社会中的基本对立、最深重的压迫不是阶级，而是性别。她希望有一场真正的“女权主义革命”，但是又认为这场革命要求

对性别战争的力量对比作出全面的分析，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经济革命

而对阶级对立所作的分析那样。而且还要更加全面，因为我们所应对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所涉及的压迫可以一直追溯到史前的动物王国。

在英格兰，澳大利亚出生的杰曼·格里尔[18]写了既生动又颇具挑衅意味的《女太监》（1970）一书，对“自卑感或天生依赖性”提出了质疑。此前，女性往往顺从地接受这种说法，听任其扭曲损害自己的生活。书中部分章节谈到了中产阶级的爱情和婚姻神话，论及为什么成为“男性幻想对象”事实上阉割了女性以及“煮饭、穿衣、美容和持家”又如何成为令人焦躁的强迫性活动。

女同性恋女权主义

20世纪60年代后期，许多女同性恋者感到自身在妇女运动和正在兴起的男同性恋解放组织中被边缘化了。美国全国妇女组织主席贝蒂·弗里丹曾因把宣传女同性恋问题的妇女形容为“紫色威胁”而引起轩然大波。她的诋毁遭到了一篇名为《认同女人的女人》的简短宣言的愤怒驳斥。1973年，美国著名记者吉尔·约翰斯顿（Jill Johnston）发表了《女同性恋者的国度——女权主义的出路》，其中对异性恋作了妙语讽刺：“开始时你沉浸在他双臂的环抱里，最终你的双臂沉浸在他的洗碗槽里。”

一些女同性恋者坚持认为她们是妇女解放的关键所在，因为她们的存在本身威胁到了男子至上主义的软肋。有时女同性恋被认为是妇女在政治上最正确的选择，甚至是唯一政治正确的选择。丽塔·梅·布朗[19]认为，异性恋和同性恋妇女之间的差别就是“改良和革命之间的差别”。在《没有回头路：20世纪80年代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解放运动》一书中，男性和女性作者一致批判了认为每个家庭都应该是异性恋家庭的俗见，同时还批判了流传甚广的“男强/女弱角色模式中女性天生低人一等的观念”。

希拉·罗博特姆的《解放与新政治》（1970）和朱丽叶·米切尔的

《妇女等级》（1971）都是为了响应英格兰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不过米切尔认为，这场运动“从它所获得的认同和共同目标”来看是国际性的，而且大部分都“自称是革命的，只是革命的形式千差万别”。她在书中简述了欧洲（荷兰、瑞典和法国）和美国的妇女运动。她认为，各地妇女都是“最根本的受压迫者，因此可能也最具有革命性”。她接着探讨了4个必须予以变革的生活领域：生产、生育、性和子女社会化。

这些著述源自这场新兴但发展迅猛的妇女运动，同时也受到了它的鼓舞。这场运动波及国家众多，有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但同时或许至关重要的是还包括美洲国家。民权运动〔20〕、黑人运动〔21〕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女性抱怨道，有太多时候她们被当成“打字员、茶水招待员和性对象”。

1968年11月和1969年，大西洋城“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现场发生了数场抗议活动。女权主义者给一只绵羊戴上后冠，嘲弄选美比赛，使这场新兴的妇女运动备受瞩目。抗议者认为，选美比赛象征着女性总体遭到客体化、矮化，对她们的评判标准首要是相貌。一位女权主义者厌烦地评论道：“女人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一场活生生的‘世界小姐’选美比赛。”

在伦敦，1969年以来妇女们一直在举行小规模集会：有些妇女抗议越南战争，帮助开小差的美国士兵；其他妇女则来自传统的左翼团体、学生运动或激进的实验性反大学〔22〕。哈克尼〔23〕妇女开始制作一份名为《悍妇》的小报，后来的几期由伦敦的其他团体出版。1971年底，《悍妇》接纳了56家团体——还有1家男性团体。1970年2月，原本定于在牛津召开一次大会，但有大批妇女儿童（以及少数男性）到会，会场只好从鲁斯金学院〔24〕换到了牛津辩论会〔25〕。最重要的是，这些集会为女性提供了发言的机会：抒发心中的孤独寂寞，谈论工作中的平等权利、子女抚养、家务劳动、男性、革命等。这场不断壮大的运动——或许有些过于乐观地——明确了自己的诉求：同工同酬、教育平等、机会均等、24小时托儿所、自由避孕以及自主堕胎。妇女们在伦敦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她们打着横幅，上

书："我们不漂亮，我们不难看，我们很愤怒。"

这场运动依旧主要是一场中产阶级运动，虽然她们多次尝试联合工人阶级妇女：女权主义者曾经支持了夜间清洁工要求提高薪酬、改善工作条件的活动，支持了达格纳姆福特汽车厂女技师举行的一次罢工。

也许这场新运动最显著的特色在于其组织方式：妇女集会以小团体的形式进行，有些是地区性团体，其他的——后来——则抑或讨论特定的问题，抑或为了特定的事业而奋斗。但是大部分团体都参与某种形式的"提高觉悟"活动。这个字眼是美国妇女凯茜·萨拉蔡尔德〔26〕杜撰的：妇女们定期集会，从亲身经历出发进行交流。这不是闲话家长里短；团体意在探究妇女有哪些共同点，又有哪些不同点。其宗旨是开始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理解个人的恐惧和不满，并通过"分享、认识、述说"来发现这些恐惧和不满中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正如朱丽叶·米切尔所说的那样："妇女们怀着各自生活中难以名状的挫败感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发现自以为是个人困境的东西其实是一个社会困境。"

图13　所有女人都美丽：反对"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的示威活动，大西洋城，1969

年。

身体问题

女权主义第二浪潮最迫切关注的问题之一便是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权利。西方女权主义者经常探讨与美貌和加诸女性外貌之上的价值相关的问题——这乍看起来可能很肤浅，但细细想来并非如此。我们周围充斥着撩人心弦、光彩照人的媒体形象，部分由于这个原因，某些女性急切地想通过追求最新时尚来寻求逃避，而其代价之高往往令人不堪忍受。另一些女性则可能会诉诸更加不顾一切、更具自我摧残色彩的举措：抑或节食节到了患厌食症的程度（其间可能还会伴有强迫性进食症和贪食症），抑或迫不及待地寻求自残，亦即整容手术。

苏茜·奥巴赫 [27] 的《肥胖是女权主义问题》（1978）和娜奥米·沃尔夫 [28] 的《美貌神话》（1990）均探讨了困扰着许多当代女性的生理上自我厌恶和对年龄增长的恐惧——她们为此感到困扰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是在富裕的西方，妇女也不得不为了得到更好的医疗保健权利而作艰苦斗争：为了在分娩方面得到充分的妇科指导和护理；为了获得节育及必要时实施流产的权利；为了提高人们对乳腺癌、子宫癌等妇科癌症的关注力度。

米切尔表示，提高觉悟是“言所未言：事实上，和‘一起闲聊’正好相反”。不能应付自己生活中所遭遇的特定压迫形式的妇女，“开口谈论折磨着其他妇女的压迫形式时，就会遭到别人的极度不信任……如果我们不能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那就无权声称能解决别人的问题”。男人是不可以参加的，主要不是出于敌意，而是由于意识到女性至少在公共场合，“在思想上和／或在调情中”，有听从男性的习惯。

提高觉悟从来都不是仅仅意在——像诋毁者有时声称的那样——

进行什么“集体治疗”。在会上，妇女们轮流发言，讲述自己的问题和不满。这并不是要简单地发泄一下个人怨气，而是希望进一步认识到这些问题和不满可能并不仅仅是她们个人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她们会发现作为女人 她们有哪些共同之处，且不论她们在阶级、种族或个人经历上有着什么不同。（她们大多——虽非全部——都是比较年轻的女性，因此很少涉及年龄差异。）

正如一位美国女权主义者所说：“提高觉悟是对我们能够信赖的信息加以政治分析的一种方式。这种信息就是我们的经历。”另一位美国人舒拉密斯·费尔斯通认为：“如果觉悟事先没有得到必要的提高，无法充分地利用特定的自由，那么去宣传争取这些自由便毫无价值。”其他妇女对此倒没这么肯定。有些妇女抱怨说，提高觉悟特别适合中上阶层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而且她们伶牙俐齿，精于此道，在组织中能够获得主导地位。事实上，当时大多数妇女都没有多少群体动力学〔29〕方面的知识。由于内部情绪有时变幻莫测，甚至会突然爆发，因此组织内一两个成员可能很容易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当了替罪羊，甚至是受到了排挤。一些集会的结果出人意料，不仅毫无裨益，反而徒增烦恼。姐妹团结可能力量很大，但有时人们忘记了姐妹之间的关系有时也很令人头疼，难免会有分歧和不和。在英格兰，早年的一次会议最终不欢而散，竟然是因为——现在听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和毛派女权主义〔30〕者之间的一场激烈争吵。还有一次周末会议在居住着一大群煤矿工人的宿舍楼里举行，一些与会妇女显然对如何应付工人阶级男性以及如何回应他们的粗野玩笑毫无头绪，开始大叫“姐妹们遭到了矿工的欺负”。

但是（真正的）男性暴力的确是一个迫切需要提出的问题。一些女权主义者，尤其是美国女权主义者，由于推动《平等权利修正案》而未获通过，要求福利和堕胎权又遭到威胁，失望之余便抓住男性暴力这个问题不放，认为这是女性二等公民地位和脆弱无助的象征。1975年，美国妇女苏珊·布朗米勒〔31〕出版了论述强奸的长篇专著《违背我们的意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书解构了数百年来男性“强奸英雄这个神话”，提出了一个很快被其他女权主义者接纳的口

号：“色情作品是理论，强奸是其实践。”（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便是这样一位女权主义者。针对人们普遍轻描淡写地为色情作品开脱，声称色情作品对男女来说都是一种“解放”，格里芬进行了有力的声讨。在《色情与沉默》（1981）一书中，她认为色情作品根本不像其辩护者所声称的那样是在解放性能量，它所表达的其实是“对人体知识的恐惧和压抑情欲的欲望”。）布朗米勒继而指出，强奸恰恰正是所有 男人刻意用来恐吓所有 女人的做法。她谈论女性时并不感情用事。她后来的著作《女子气质》颠覆性地巧妙解构了女孩们几乎从摇篮时代起就在学习的把戏：勾引男人、与其他女人争宠的花招和技巧。正如我们所知，女子气质是浪漫的胡编乱造，是经过精心谋划刻意保持下来的东西。它是“强加限制这个怀旧传统”的产物。但是在《违背我们的意愿》中，她辛辣而有力地嘲讽了经常利用一些粗俗的陈词滥调对伤害女性的暴力犯罪一笑置之的做法：“哪有女人会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被强奸”；“是她自己要求的”；“要被强奸时，还不如放松下来好好享受一下”。布朗米勒有力地引用了德高望重的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小说《兔子归来》中一个（女性）人物的话，书中人物不以为然地说：“你知道强奸通常是怎么回事吗？就是女人事后改变了主意。”

图14　妇女解放团体在伦敦游行，1971年。

不幸的是，从法律上强调强奸的确是一种严重暴力犯罪的这种迫切需要，被一些后来的女权主义者曲解了。对另一位美国妇女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cKinnon）来说，女人，事实上几乎就其定义而言，始终都是受害者。她坚称："随时会被强奸在女性一生中是家常便饭。"

> 你成人时，你父亲按住你，捂住你的嘴，这样另一个男人就能在你两腿之间制造出可怕的剧痛。年纪再大些时，你丈夫将你绑在床上，将滚烫的蜡油滴在你的乳头上，找来别的男人观看，还让你吮吸他的阴茎……在这千年的沉默之后，照相机被发明出来，于是当这一切发生时你便被拍进了照片里……

她的朋友安德烈娅·德沃金[32]认为"色情就是女人的法律"，而且不讲任何条件就直截了当地把强奸和性交画上了等号。事实上，麦金农也持这种看法，她在《只有语言》（1995）一书的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她眼中女性经验的可怕范式：最初的父辈强奸将我们冻结在永远的恐惧状态之中。她不断地塑造一个因曾受到侵害而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的形象。她认为，这个孩子形象存在于大部分女人身上，即使是那些宣称享受两情相悦下性爱的女人也不例外："侵犯者勃起；受害者尖叫，挣扎，流血，冒着血泡，变回5岁。"这是女权主义旗号下的传奇剧。

图15　正如这个标语所示，美国的早期女权运动和英国一样，很快便学会了如何将观点表达得引人注目，诙谐风趣。（标语文字：终结人类牺牲！不要结婚！洗尿布不是成就。）

注释

〔1〕 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小说家、哲学家和当代最负盛名的女权主义者。

〔2〕 《新观察家》：法国巴黎的一份新闻周刊。

〔3〕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作家和哲学家，为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4〕 克洛德·兰兹曼（Claude Lanzmann，1925—）：法国著名纪录片制片人。

〔5〕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921—2006）：美国女权主义者和作家，被誉为“女权主义第二浪潮之母”。

〔6〕 《平等权利修正案》：美国宪法修正案，旨在废除许多州和联邦政府歧视女性的法律，该议案已获通过，但尚未获得批准。

〔7〕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美国新左派激进学生组织，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认为大学是战争和种族主义的帮凶，采用激进方式要求进行大学改革，试图将大学校园改造为革命阵地。

〔8〕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1941—1998）：原名夸梅·

图雷（Kwame Ture），生于特立尼达，11岁随父母移民美国，为黑人运动、美国民权运动和泛非运动活动家。

〔9〕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1934—）：美国女权主义领袖、记者和著名女权主义报人。

〔10〕《女士》：美国女权主义杂志，为20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女权主义刊物。

〔11〕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34—）：美国著名女权主义作家。

〔1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科及神经科医生、心理学家，为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13〕 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1885—1930）：英国小说家和诗人，其作品曾因露骨的性描写而遭查禁。

〔14〕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891—1980）：美国“垮掉派”作家和画家，其作品曾因露骨的性描写而遭查禁。

〔15〕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美国小说家，其作品反应现实，也渲染变态心理和变态情欲。

〔16〕 让·热内（Jean Genet，1910—1986）：法国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

〔17〕 舒拉密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1945—2012）：美国女权主义者。

〔18〕 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1939—）：英国作家、记者和女权主义批评家。

〔19〕 丽塔·梅·布朗（Rita Mae Brown，1944—）：美国作家，著有描写女同性恋体验的作品。

〔20〕 民权运动：20世纪50至60年代非洲裔美国人要求平等权利的运动，其主要领袖为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1968）。

〔21〕 黑人运动：又名黑人权力运动，20世纪60年代中期非洲裔美国人要求平等权利的运动。

〔22〕 实验性反大学：新左派认为传统大学教育不能满足其需要而在两年制社区大学中进行的试点改革。

〔23〕 哈克尼：英国伦敦东区一自治市镇。

〔24〕 鲁斯金学院：牛津大学下属独立学院。

〔25〕 牛津辩论会：牛津大学1823年成立的会员制辩论社团，经常邀请名人政要进行辩论。

〔26〕 凯茜·萨拉蔡尔德（Kathie Sarachild，1943—）：美国激进女权主义者。

〔27〕 苏茜·奥巴赫（Susie Orbach，1946—）：英国学者、心理治疗师和女权主义者。

〔28〕 娜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1962—）：美国所谓的第三代女权主义作家。

〔29〕 群体动力学：研究群体中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的学问。

〔30〕 毛派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的一个分支，认为男权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主张采取激进手段进行反抗。

〔31〕 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1935—）：美国激进女权主义者，其观点有很强的先锋性。

〔32〕 安德烈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1946—2005）：美国激进女权主义者，以抨击色情产业而著称。

第十章

世界各国的女权主义者

“姐妹团结力量大”曾经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流行的女权主义口号之一。但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这句话都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有时候还备受争议。正如美国黑人诗人奥德里·洛德（Audre Lorde）1983年所说的那样，这句口号掩饰了

> 种族、性别、阶级和年龄的差异……一味宣扬容忍女性之间差异的做法是最蹩脚的改良主义。它完全否认了我们生活中差异所具有的创新功能。

1995年，她的忧虑引起了澳大利亚华裔洪美恩（Ien Ang）的共鸣。洪美恩认为女权主义者之间有时难免会出现沟通失败，这

> 应该被当作一种更为朴素的女权主义的起点，这种女权主义正是由姐妹团结这种观点本身的根本局限性 所决定的……我们不应急于打着理想化的团结一致这个名义去破除“沟通障碍”，而应承认并面对这种障碍的顽固性，这样做会大有裨益。

两位作者都认为，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似乎常常是在强行推广一种专注于性别歧视的女权主义，往往会忽视一些使性别观念复杂化的因素，例如阶级差别和种族歧视。巴西妇女认为，女权主义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没有只言片语谈到她们该如何应对本地的紧迫问题：种族暴力、健康问题以及黑人妇女求职时所可能遭遇的种种困难。事实上，一些拉丁美洲妇女居然抵制“女权主义”这个字眼。

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相对于西方女权主义者与性别歧视、社会及政治不平等进行抗争，“第三世界”妇女还不得不面对更多、甚至更棘手的问题。她们经常不得不与根深蒂固的本地信仰和风俗习惯这种形式的性别歧视作斗争，不得不应对各种阶级、种姓、宗教以及民族偏见。在一些国家，她们与这些问题的斗争与建立民主政府和争取最基本自由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有时还因此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但是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部分地区和中东地区，妇女们的生

活还受到了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深刻影响。“第一世界”国家——最初是17世纪的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19世纪以来美国步其后尘——把世界广大地区纳入自己的直接掌控之下，在政治和经济上奴役当地人民。到了21世纪初，美国凭借其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在世界很多地方推行“话语殖民”。

“第三世界”这种说法在当代女权主义和后殖民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但是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1]从地域上定义它：“拉丁美洲的民族国家、加勒比海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南亚及东南亚、中国、南非和大洋洲。”她还将黑人、亚洲人、拉丁美洲人和生活在“西方”的原住民纳入其中。然而，这种说法有时被看成是贬义的称呼。西方人使用这个字眼时，言下之意是“欠发达”或“不民主”。有时说“第三世界妇女”，实际上是对“有色人种妇女”的“委婉”称呼，暗含着一个和西方女权主义“标准”相对的本地“他者”，因此有时人们觉得目前说“后殖民女权主义”更为“正确”。但是，两种说法无不清楚地提醒西方人我们对这些妇女的生活现状有多么孤陋寡闻：她们可能深陷根深蒂固的本地信仰以及源于阶级差别、种姓、宗教、民族等因素的风俗习惯的重围，同时还遭受着殖民主义遗毒的毒害。

以拉丁美洲为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占领——以及奴役——留下了十分严重的民族和阶级不平等问题。当地女权主义者也许不得不与天主教会顽固的父权制作斗争，此外还要直面被称为“大男子气概”的当地特有的男性性别歧视。（同样具有破坏作用的女性对应词“女子本分”——即女性对男性主导地位的绝对服从——可能进一步困扰她们的生活。）

尽管如此，女权主义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还是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以墨西哥为例，女权主义“第一浪潮”诞生于反抗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总统人所共愤的独裁统治的革命中，这场艰苦的斗争从1910年一直持续到1918年。妇女们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女兵们 建立营地，寻找食物，烧火做饭，照看伤员，但是也有女战士拿起武器奋勇作战。一些妇女穿着裙子、戴着自己最好的珠宝首饰，跟随

男人参加战斗。其他妇女则被指责“无论内在还是外表”都变得男性化了，不过人们也承认一个女人能够“在战斗中用手中的武器证明她不再是女兵 ，而是一名战士”。

女知识分子们也支持革命。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埃米拉·加林多·德托佩特（Hermila Galindo de Topete），她创办了《现代妇女》杂志并担任主编，为学校性教育、妇女选举权及离婚权而斗争。她认为，天主教会是墨西哥女权主义前进的主要障碍。明知无望当选，但是为了宣传妇女想要得到并且需要选举权，她成为第一个参选众议院议员的女性。经过漫长的选举权斗争，墨西哥妇女于1927年获得了平等公民权。然而，直到1952年她们才最终获得选举权。20世纪70年代，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墨西哥也兴起了妇女解放运动，其成员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有：合法堕胎的需要、对强奸犯施以更为严厉的刑罚以及援助受虐妇女。她们还就包括性在内的诸多问题开展了坦诚而蕴含着极大争议性的讨论，质疑阴道性高潮“暴政”。

在1898年被美国入侵并占领的波多黎各，妇女运动在数十年间致力于提高教育水平，将其作为通往其他改革的第一步。1936年，普选权终于得以实现。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于20世纪50年代给予妇女选举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正如西方妇女之前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它并没有立竿见影地转化为妇女地位和处境的显著变化。拉丁美洲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仍然有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妇女运动要求给予女性全面、平等的法律和政治权利，不过她们也同样关注广泛存在的妇女文盲问题，尤其关注千百万棚户区和贫民窟妇女的悲惨境遇。许多农村妇女迁移到城市，成为“亚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有的做着收入低下的用人（女仆、洗衣工、厨子）这样的临时工作，有的靠做街头小贩艰难度日。但是住在棚户区的妇女往往会组织起来，改善她们眼前的处境：建立居民协会、公共厨房以及消费者组织和人权团体。贫困、恶劣的医疗条件和拙劣的堕胎手术使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据估计，在玻利维亚，每10万例分娩就有390名产妇死亡；在秘鲁，这个数字是265。）一些拉美国家禁止堕胎，哪怕是出于挽救孕妇生命的需要也不例外。但是，秘鲁虽然是一个专制政府，却设立

了妇女部[2]，还为妇女专设了公设辩护律师，通过了制裁家庭暴力的法律。

以圣保罗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妇女对健康问题有了新的关注。妇女们学习如何给水消毒、如何判断及预防儿童常见疾病。她们可以得到避孕咨询；她们成立妇女组织，互相帮助，开展社区内合作计划；她们为改善住房条件而奔走呐喊。20世纪80年代，在巴西东北部塞尔唐这个半干旱的贫困内陆地区，妇女们发起了农村女工运动。她们是农业工人，却只能领取男人一半的报酬，她们为被纳入抗旱项目而斗争。她们还设法筹集资金，参加了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大会。

1988年巴西宪法从条文上看十分不错，其中保障男女同工同酬，给予妇女宽松的产假，设定了最低工资。但是——由于大部分妇女对于如何获得自身的权利知之甚少——一个名为“忒弥斯”[3]的组织应运而生，来教育广大妇女。她们接着与一个女警察局合作创办了一个试点项目，只处理强奸和暴力案件。很快，其他类似中心也纷纷成立。同时，1975年以来，全国街头儿童运动以及“永生”这样的妇女组织也一直在努力帮助千百万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儿童，为他们提供医疗、教育和法律援助。这些儿童很容易遭受性侵害，往往还会受到警察的虐待。此外，巴西黑人妇女在对自身压迫尤为深重的问题上变得更加直言不讳——这些问题包括各种各样的种族暴力、公共医疗政策以及就业市场歧视。

1975年，联合国在墨西哥城召开了国际妇女年大会，全球女权主义者齐聚一堂。1981年以来，来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各地的妇女每3年聚会一次，旨在“加强团结、谋划创新性的政治实践以及进一步发展挑战性别压迫和性压迫的话语”。会议每次都在不同的国家召开：哥伦比亚、秘鲁、巴西、墨西哥、阿根廷、萨尔瓦多和智利。一些妇女感到，左派倾向于把女权主义斥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和帝国主义的舶来品；而右派和教会则将其视为对基督教家庭价值观的威胁而极力抵制。会上辩论常常十分激烈。和其他拉丁美洲女权主义者一样，与会者都很关注平等权利和经济再分配问题。但是，她们也讨论一些

她们觉得一般不为人所注意的争议性问题：家庭暴力、性骚扰以及婚内强奸。事实上，有些拉丁美洲女权主义者认为，她们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促使国家通过了制裁针对妇女的暴力犯罪的法律。例如在巴西，妇女团体向政府施压要求资助妇女辩护委员会，该委员会说服最高法院推翻了男性陪审团对一名杀妻男子的无罪判决，其理由是："在此类犯罪中，受到维护的不是荣誉，而是自我奉承、狂妄自负和男人把妻子当成私有财产的傲慢自大。"

多年来，会议组织者大力吸纳基层团体和尽可能多的妇女（条件是：任何妇女，只要她自认为是女权主义者，那么她就是　女权主义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她们建立了海外联系。在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整个拉丁美洲的女权主义者都积极致力于将妇女组织起来进行辩论和讨论。和其他国家的女权主义者一样，拉丁美洲的组织者们也不得不解决接纳谁和排斥谁的问题，不得不承认阶级、种族和性取向的不平等是任何女权主义分析的中心内容——也使这种分析变得错综复杂。来自16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黑人妇女齐聚一堂，为北京世界妇女大会起草了一份文件。

20世纪末，年轻一代的妇女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这场运动中来，而且常常对她们的前辈提出批评，这或许是自然的。她们中有些人曾经是学生活动家，另一些则参加过高校的女权主义项目。她们抨击先前那种标新立异地承认、甚至歌颂"多样性"的观点。她们认为，那只是一种粗略的多元论，往往意味着接受不平等，不允许真正"对他人及其经验予以认可或使之合法化"。

然而，国际会议既能彰显相互联系，也能凸现分歧和怨恨。在1980年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些妇女抱怨说讨论佩戴面纱和女性割礼时从来没有征求过那些最相关妇女的意见。在1994年在开罗举行的另一次关于人口与发展的会议上，第三世界妇女抱怨会议日程被只对避孕和堕胎感兴趣的欧美妇女把持着。而且，当欧美妇女真正论及"第三世界"议题时，她们言谈间也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和种族主义情绪。即使是在1995年的北京大会上，也有人抱怨说西方人喋喋不休地谈论生育权和性取向问题，令欠发达国家妇女所迫切关注的

问题遭到了忽视。正如一位妇女所说，把西方女权主义应用到诸如南美妇女所关注的问题上去，“不啻用治头痛的药来治严重的胃痛”。

图16　反对女性割礼的招贴画，苏丹。

非洲

非洲问题特别复杂。阿米娜·马马[4]认为："非洲妇女始终明确自己的斗争，把斗争不断进行下去……[这]可以追溯到我们集体久远的过去。"不同的妇女所遭受的压迫也不同：女权主义必须承认"种族、阶级和文化上的差异"。非洲女权主义是异性恋的，是鼓励生育的，其所关注的是"面包、黄油和权力"的问题。女性割礼是阻止女性发生不正当性行为的一种方式，目前依然存在于一些非洲国家。它并非穆斯林所固有的习俗，却已经成为某些原教旨主义者压迫女性的一种姿态。

2000年，30岁的尼日利亚穆斯林妇女阿米娜·拉瓦尔（Amina Lawal）非婚生子，被一个伊斯兰教教法法庭判处石刑[5]——很显然，她是被强奸的。这个案件得到了世界媒体的广泛报道，因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世界小姐"选美比赛即将在尼日利亚举行。许多参赛选手都提出了抗议：一些选手索性拒绝参加比赛；另一些选手则声称她们至少要公开谴责这项判决。一位时尚作家评论说，先知穆罕默德也很可能会从参赛选手中选一个出来做他的妻子，这番话引发了骚乱。伊斯兰激进组织将选美比赛形容为"裸体游行"，称其会助长淫乱之风，导致艾滋病蔓延。但是许多当地妇女勇敢地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表达自己的义愤。

跨文化误解是一个顽疾。1915年，英国女权运动者格雷丝·埃利森（Grace Ellison）造访了土耳其，写下了一本名叫《土耳其哈来姆中的英国女人》的书。她在书中描述了改革如何影响着妇女的生活，如何连男人也似乎青睐某种程度的女性解放，显示自己真正理解了这一切。她对于当时关于穿着传统服饰的辩论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和她那个时代以来的许多女权主义理论家一样，她倾向于将传统习俗和面纱浪漫化，对越来越多的妇女穿西式服装——至少在家里如

此——深感遗憾。但是当埃利森的土耳其朋友——一位名叫泽格雷布·哈穆（Zegreb Hamun）的妇女——到英国拜访她时，情况就刚好戏剧性地颠倒了过来，轮到她受到误解了。哈穆也出版了一本自己和埃利森的书信集，取名《土耳其女人之欧洲印象》。她不屑地认为伦敦的一家女士俱乐部冷漠乏味，缺乏哈来姆的“神秘和魅力”。但是参观了议会大厦后，她批评的调门儿陡然高了起来：

> 但是我亲爱的，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女士旁听席[6]是一个哈来姆？一个有着格子窗的哈来姆！政府的哈来姆！……你们把自己的女人派到世界各地，不给她们任何保护，反而在这个你们制定法律的作坊里，给她们罩上保护的标志！

近代西方学术界一些女权主义者无休止地从理论上大谈面纱和哈来姆，这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她们似乎是在解构，从而美化并沉湎于自己奇特的“东方化”幻想版本中。在一些穆斯林社会，佩戴面纱的确曾经是——而且现在依然是——一个偶尔会触发争议的重要话题。1923年，一位著名埃及政治家的妻子胡都·沙拉维（Hudu Sha'rawi）从海外旅行归来，曾在大庭广众之下摘下面纱，虽然她还包着头巾，但在当时仍然引起一片哗然。不过比这件事重要得多的是，她此后组建了多个妇女团体，为获得更好的教育、选举权与竞选公职的权利以及实现有关家庭问题的改革而斗争。和之后无论是埃及还是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妇女一样，她一直试图创立一种具有伊斯兰特色的女权主义。

图17　妇女们抗议对尼日利亚妇女阿米娜·拉瓦尔的死刑判决，2003年。

5年后，一位名叫纳克希拉·扎因·阿斯丁（Naxira Zain as Din）的黎巴嫩妇女出版了一本书，认为“面纱是对男人和女人的一种侮辱”，而且还认为诉诸伊斯兰教教义并不能证明压迫妇女的正当性。（宗教学者们煽动了示威活动来抵制这本书。）另一方面，许多妇女认为面纱有时具有解放性：面纱使她们可以去进行观察，而不是成为观察的对象，这不仅将她们从怪里怪气的时尚中解放出来，而且还有助于她们避免性骚扰。当然，不可能将所有的伊斯兰国家混为一谈。而且，在大部分伊斯兰国家（当代埃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仅阶级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巨大差异，居住在乡下与居住在开罗和亚历山大这样的大城市里的妇女之间亦不例外。许多穆斯林妇女，尤其是大城市妇女，都乐于摘下面纱。而另一方面，以一些土耳其妇女为例，她们认为事实上正是面纱才使她们得以进入公共生活，给了她们自由，可以自信地从事教师、医生这类职业。西方穆斯林社区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争论。在法国，女学生在被禁止戴头巾时进行了强烈的抗议。在英国，一名穆斯林女学生因为不仅坚持要戴头巾、穿宽松长裤还要穿拖地长袍而上了报纸。但是这似乎只是个别现象；任何一个清晨，在伦

敦街头都能看到几个这样装束的女孩去上学。

图18　一名苏丹穆斯林女孩展示她染有墨迹的手指，证明她已经投过了票。苏丹

妇女于1964年获得选举权。

在穆斯林神权国家，问题更加尖锐。沙特阿拉伯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妇女被强制佩戴厚重的面纱，在没有男性亲属陪同时甚至都无法上街走路，旅行和工作都需要征得男性的许可。另一方面，伊朗妇女却有着独立从事政治活动的悠久历史。即使是在19世纪，也有一些妇女奋笔疾书，为她们笔下许多伊朗妇女的可怜处境而呐喊。当时一位女作家发行了一本小册子，名为《男人的缺点》。20世纪初，妇女和男人一样要求拥有宪法权利和性别权利。1906年，到英国大使馆寻求避难的罢工者中也有女性。但是她们的积极行动并未受到理睬。1906年颁布的新宪法规定她们不得从政，而且明确“妇女所受的教育和培训应限制在抚养子女、家政和保持家族荣誉的范围之内”。但是，女校纷纷成立，妇女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911年，埃及妇女活动家卡西姆·阿明（Ghassem Amin）的《妇女解放》一书被翻译成波斯语——遭到了宗教当局的猛烈抨击。1931年，妇女获得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出离婚的权利。在此后的10年间，一个同时面向男童和女童的国家教育体系建立起来。1936年，第一批女大学生进入德黑兰大学。1978年，妇女占到了劳动力的33%。1962年，妇女终于争取到了选举权和角逐公职的权利。在科威特，妇女最终于2005年获得了选举权和角逐公职的权利。

伊朗妇女在1978年的伊斯兰革命中表现活跃，组建了形形色色的妇女组织。但是此后，官方对妇女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197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7]坚持要求为政府工作的伊朗妇女佩戴面纱，同时解雇了女性法官，废除了一部家庭保护法，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妇女的离婚权，禁止避孕和堕胎。妇女如拒绝遵守严格的着装规范，会被处以鞭刑和罚金。已婚妇女必须征得丈夫的同意后才能从事工作。数部监护权法律获得通过，否认母亲对子女享有权利。但是，即便是在这段黑暗的岁月里，妇女所受的教育和男性并无多大差别。妇女依然可以投票、当选议员、担任政治职位以及外出工作。1998年，伊朗大学生中有52%为女性。

同时，许多妇女发现伊斯兰革命后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了。妇女更难提出离婚或得到子女的监护权；女孩结婚的最低年龄先是降到了13岁，后来又进一步降到了10岁。妇女必须征得父亲或丈夫的书面许可才能获得护照。佩戴面纱成了强制性的，不过仍有一些妇女对面纱持欢迎态度，将其视为摈弃世俗化西方生活方式的象征。

一些世俗女权主义者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一些则在1979年国际妇女节当天举行示威抗议新法令，还有一些坚决抵制强加给她们的严格的着装规范。不满之声此起彼伏，影响甚广，因为其传播渠道往往都是非正式的：复印的传单和小册子、墙报、街头辩论以及妇女杂志。虽然女权主义被迫转入地下，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上层妇女至少再次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果敢自信了。

近年来，女权活动家对一些社会现实进行了猛烈批评：妇女如要离婚，仍然异常艰难；儿子年满2岁、女儿年满7岁之后，父亲享有法定监护权。而且在伊朗，石刑依然是一种合法的刑罚。妇女们认为，这种刑罚所惩罚的对象往往都是女性，而非男性。2000年，一名妇女被控通奸并伙同情夫谋杀丈夫，被判石刑处决。还有一个妇女被控出演色情电影和发生婚外性关系，在德黑兰的一座监狱里被执行石刑。有报道称，女犯人经常遭到强奸，甚至身受酷刑折磨。

图19　雅加达女权团体的抗议活动，2000年11月。（标语文字：对一夫多妻制说不）

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在伊朗这个神权国家，当前两性关系事实上完全是“非伊斯兰教的”。她们认为，伊斯兰教传统上尊重女性，赋予她们尊严。许多穆斯林妇女坚信《古兰经》不仅始终承认妇女的个人尊严，还赋予她们重要的经济权利。只是后来《古兰经》往往被人故意曲解，从而对男性有利。沙里亚，即安拉用来规范人类行为的律法，本质上对妇女也没有敌意。一些穆斯林女权主义者还搬出先知之妻赫蒂彻[8]作为例证。据传说，赫蒂彻比丈夫年长，是一个独立而精明强干的人物，她先是雇用先知作为自己的贸易代表，然后又执意要跟他成婚。

其他女权主义者则主张政教分离。但是，该地区的许多妇女团体不是像大多数西方女权主义者那样去诉诸人 权，而是努力去开创一种具有伊斯兰特色的女权主义。她们认为，这种女权主义植根于当地一向尊重女性的文化和传统。她们面临的阻力相当大，或许还在不断增大，但她们始终立场坚定。

俄罗斯和东欧的妇女对西方女权主义往往不屑一顾，自然坚持认

为她们自己的妇女运动史和西方没有多少或者全然没有关系。以俄罗斯为例，妇女有着悠久而独特的运动史。在19世纪70年代，一个由自称为“柴可夫斯基派”[9]的社会主义学生和工人组成的团体接纳了许多女性成员，他们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剥削终结之时，妇女才能最终摆脱家务劳动和工厂工作的“双重压迫”。一些妇女加入了一个反抗沙皇压迫的恐怖组织——“民意党”[10]，并在其中表现活跃。许多妇女因积极参与1875年莫斯科的一系列罢工而遭逮捕，对她们的审判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一位记者略带感伤地写道：

> 满脸错愕的公众看着那些年轻妇女容光焕发的脸庞，她们面带孩子般的甜蜜微笑走上不归路，前面看不到任何希望……人们自言自语道：“我们又回到了早期基督徒的时代。”[11]

1905年革命后，许多妇女参加了争取杜马[12]选举投票权的斗争。不过历史学家认为，这场妇女群众运动不久便分成了两派：一派主要关注阶级斗争；另一派，亦即所谓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则对“性别压迫”更感兴趣。1907年，劳动妇女互助协会成立（男性也可加入），努力将影响深入到工人阶级妇女中去，鼓励她们加入工会和社会民主党。

1907年，在斯图加特召开的一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上，克拉拉·蔡特金[13]提出一项决议，敦促社会主义者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她将其视为向结束阶级斗争迈出的一步。她说，对于劳动妇女来说，选举权是

> 战斗的武器，为了使人类摆脱剥削和阶级统治，她们必须进行战斗。它使妇女能够更多地参与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推翻资本主义秩序、建立社会主义秩序的斗争中去，唯此才能大刀阔斧地解决妇女问题。

活动家们组织会议，积极鼓励工人阶级妇女参与会议和行动。1911年3月19日，第一个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在德国举行，成千上万

的妇女参加了集会和游行。1913年，俄国也庆祝了这一节日。

有人称是1917年在圣彼得堡的妇女节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面包与和平”——引发了十月革命。但是一些俄国女权主义者认为，这场布尔什维克革命对妇女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帮助；有很多男人及一部分妇女坚称妇女的利益和男人的利益完全一致，二者不能割裂开来。革命后，妇女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机会，并且被要求从事全职工作。虽然城市里开办了自助餐厅、洗衣房和托儿所，妇女似乎依然不得不肩负着沉重的双重负担。20世纪20年代，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崭露头角，成为妇女问题上思想深邃、文采飞扬且影响深远的作家之一。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

1909年，俄国妇女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出版了《妇女问题的社会基础》，认为女权主义不仅仅是政治权利或教育权利和同工同酬权利的问题，其真正问题在于家庭的组成方式和人们设想家庭的方式。1920年，她出版了《俄国劳动妇女运动史浅析》，强调妇女必须两线作战：她们应该抵制越来越多的西化中产阶级妇女组织，这些组织要么一心关注法律平等和选举权问题，要么将女权主义等同于“自由性爱”；同样，她们也必须反对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二者都忽视了妇女所遭遇的特殊问题和特殊压迫，不屑地认为女权主义只在天生便毫无正义可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促进妇女权益，因而天生便是“资产阶级的”。

柯伦泰首先是位理论家，但有时面对个体遭遇也会真情流露，比如有一回面对一位对丈夫极度不满的妇女时便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这位妇女的丈夫酗酒，还禁止她外出工作。在一篇极其感人的乌托邦式空想文章中，她设想了20世纪70年代可能存在的生活：届时，原来的圣诞节成了另外一个节日，这天一个公社共同庆祝自己设法共同创造出的圆满生活。

1991年苏联解体后，至少有一部分妇女很高兴重新回归家庭。虽然妇女可能在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成为了输家，但是一些妇女还是乐得有机会做一个全职的母亲和家庭主妇。

女权主义者近年来开始意识到那些从世界上贫穷及欠发达地区到西方富裕国家工作的妇女所面临的问题，并且已经着手研究这些问题。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妇女前往美国；俄罗斯和东欧妇女到西欧和英国寻找工作。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妇女去法国；还有一些妇女则来自斯里兰卡。东南亚女孩往往跑到中东国家——巴林、阿曼、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寻找工作。她们中有些是合法移民，而那些非法移民则非常容易受到伤害。许多妇女做互裨〔14〕、女佣、保姆、清洁工，在老年人家里和医院里干些不需要什么技术的活儿，或在餐厅里做工资微薄的工作。但是还有很多妇女不可避免地沦为妓女或身陷妓院。菲律宾妇女经常被招募为“邮购”新娘，新郎则大多是美国或日本男人。

曾经为了妇女外出工作权、为了把自己从繁重家务中“解放”出来而积极斗争过的一些西方妇女，现在寻找起廉价的家务帮手来。对一些外国妇女来说——那些幸运儿——移民是改善自身生活的一种方式。但是更多的情况是，移民工人——往往资质不高，有时几乎不会说自己新家的语言——收入微薄，工作没有保障，使她们在各方面都孤立无援，得不到任何保护。她们往往连自己有哪些权利都不知道——要么即使知道也不清楚该如何主张这些权利。她们几乎没有任何支持网络。不过在美国，一些活动团体已经挺身而出，维护她们的权益。她们的存在本身对西方女权主义者构成了一个痛苦的悖论；她们促使我们更加仔细地审视自身，也许我们正纵容着对其他妇女的压迫。

注释

〔1〕 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1955—）：美国印度裔后殖民和跨国女权主义理论家。

〔2〕 此处“专制政府”指藤森政府。藤森政府于1996年颁布国家法令，宣布

成立秘鲁促进妇女和人类发展部，简称妇女部。

〔3〕 忒弥斯：希腊神话中司掌司法和正义的女神。

〔4〕 阿米娜·马马（Amina Mama，1958—）：尼日利亚学者和女权主义作家。

〔5〕 石刑：伊斯兰教教法对通奸罪的处决方式，为把男性腰部以下、女性胸部以下埋入沙土中，行刑者朝其反复投掷石块。

〔6〕 女士旁听席：1945年之前英国议会辩论时为供女士列席而单独划分出的座位区，在演讲者对面。

〔7〕 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1900—1989）：伊朗已故最高宗教领袖。

〔8〕 赫蒂彻（Khadija，约555—619）：原为贵族富孀，40岁时嫁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为妻，比先知年长15岁，被称为“信士之母”。

〔9〕 柴可夫斯基派：原为激进学生团体，1871年俄国早期民粹派领袖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柴可夫斯基（Nikolay Vasilyevich Tchaikowsky，1850—1926）成为其领导人后称为“柴可夫斯基派”。柴可夫斯基派常年在西欧从事政治活动，十月革命后从事反苏活动。

〔10〕 民意党：俄国19世纪革命组织，成立于1879年，主张对国家政权实行政治斗争和以恐怖手段进行改革及颠覆活动。

〔11〕 早期基督徒：早期基督徒为坚持信仰经常遭受迫害而殉道。

〔12〕 杜马：全称“国家杜马”，俄国经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成立于1905年，至1917年二月革命时为止共存在4届。1993年，俄罗斯建立新的联邦议会，恢复“国家杜马”的称呼，议会上院称“联邦委员会”，下院即“国家杜马”。

〔13〕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1933）：德国社会主义政治家和女权运动领袖，被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14〕 互裨：一种住在别人家里以照顾孩童等家务劳动换取食宿的工作学习方式。

后记

那么，女权主义的前途是什么？或者说女权主义有 前途吗？至少在富裕的西方，女权主义还有存在的必要吗？1992年，美国妇女苏珊·法吕迪 [1] 用令人心寒的具体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女权主义者一段时期以来一直经历着她所称的“回潮”。那些无疑从女权主义运动中得到好处的妇女——还有那些或许也同样受益却很少承认这一点的男人——现在都迫不及待地说女权主义搞得过头了。正如朱丽叶·米切尔和安·欧克利在她们的第三本文集《谁害怕女权主义？看清回潮》中所说，女权主义之所以让很多人不舒服，部分原因在于“女人是谁、她们想要什么这整个主题对我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构成了挑战”。

20世纪，“第一浪潮”中的女权主义者要求公民平等和政治平等。在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第二浪潮”关注并着力强调妇女的性权利和家庭权利。现在，恰恰是这些诉求成为了众矢之的。“个人的即政治的”是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口号，而当代一些女权主义者似乎想要反其道而行之。政治的被降低到纯粹 个人的层面，只涉及性和家庭生活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可能产生政治影响，亟待加以思考。

在《新女权主义》（1998）一书中，娜塔莎·沃尔特 [2] 在承认妇女“在经济状况和权力上仍然不如男人”的同时，认为当代女权主义的任务是“打击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物质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但是在谈到这种打击究竟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时，她还是语焉不详。在一次访谈中，她仿佛一反几十年来一直盛行的观点，萌生了一个新观点，即“我们想要和男人齐心协力地改变社会，而不是反对他们”：“毕竟，尤其是在改变家庭领域的现状方面，意味着男人要承担相应份额的家务劳动，而妇女则要越来越多地走出家门。”也就是再次表明：“我们必须彼此携手，和男人携手，共创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但是沃尔特一会儿批评先前的运动过于个人化，没过几页之后又说先前的运动过于政治化——甚至更糟的是，运动成员“要么毫无幽默感，要么邋里邋遢，要么立誓不婚”。（我记得情况并非如此。）

她接着又把玛格丽特·撒切尔[3]奉为“英国女权主义默默无闻的巾帼英雄”，称她使女性的成功变得正常起来。但是撒切尔对妇女的关切没有丝毫兴趣，而且她不支持其他女政治家也是人所共知的。

杰曼·格里尔之所以写作《完整的女人》（1999）一书，部分是为了表示对娜塔莎·沃尔特的书及其“愚昧的沾沾自喜”的愤怒并予以有力的反击。格里尔认为，沃尔特凭空臆断女权主义关心的只是“金钱、性和时尚”。不过，她又补充道：

> 直到我这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开始貌似严肃地断言女权主义搞得过火了的时候，我胸中才升腾起一团怒火。当生活方式女权主义者恰到好处地为自己赢得了“拥有一切”——即金钱——的权利之时，保持沉默是不可容忍的。

毫无疑问，人们对个人变化这个威胁 和对变化本身一样感到惊恐不安。于是有些人产生了怀旧情绪，紧紧抓住一个性别身份一成不变的虚幻的黄金时代，固守着男女之间关系无论如何不平等却始终可以轻松预知的美梦。另一方面，其他人则——用娜奥米·沃尔夫生动的措词——坚持认为发生了一场“性别地震”，使身居要职的妇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沃尔夫在《火攻》（1983）一书中认为，妇女必须放弃她所称的“受害者”女权主义，停止抱怨，欣然投身“权力”女权主义。但是，正如琳恩·西格尔[4]在她1999年出版的《为什么要女权主义？》一书末尾动人地说道，这场运动最激进的目标尚未实现：

> 一个不仅是某些女人、而是所有女人都能更好地生活的世界。按照我依然称之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构想，这对男孩和男人来说也同样是一个美好百倍的世界。

人们很容易遗忘女权主义漫长、有时伴随着激进创新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后期女权主义“第二浪潮”兴起的时候，至少在当时，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令人吃惊、让人兴奋。此后这些年间，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西方妇女越来越广泛地意识到其他女权主义运动——不

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望挑战我们心中的各种观点和确信之事，打消我们可能已经滋生的任何自满情绪。

这种更广泛的意识源自于诸多因素。技术进步肯定很重要：例如，不同国家的女权主义者现在能够通过因特网快捷高效地进行交流，和许多人分享经验和信息。学术女权主义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大学，当然大部分在西方国家，目前都开设了妇女研究课程，尤其是女权主义课程。学术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其他时代和其他文化中妇女生活的极其宝贵的视角，促使我们既要思考共同的事业，也要思考彼此的差异。学术论文、研究文章、教材以及学术会议都为女权主义重要信息在全世界的传播发挥了作用。

但是或许其中也有损失，这个损失往往得不到解决，甚至不被承认。我时常深有感触地回想起我在本书开头所引用的丽贝卡·韦斯特的话：

> 我本人始终就没能弄明白女权主义究竟是什么。我只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表达出和逆来顺受的可怜虫或妓女不同的观点，人们就说我是女权主义者。

前文所述的种种女权主义都透着一丝兴奋，抑或是因为触犯禁忌，抑或是因为其本身所蕴含的风险：有时是敢为天下先的兴奋，有时是局外人挑战传统习俗的兴奋。或许，近来还有一种重新发现我们的过去的兴奋，以及——由此产生的——重新进行发明创造 的兴奋。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确　令人兴奋。我们感到自己在“使其焕然一新”，感到自己在探索过去和现在，全身心投身于一种激进而充满危险的崭新事物。但是，最近跟我一起聊过的女孩子从未有过任何相似的体验。她们似乎对女权主义没有什么兴趣，部分原因是她们仅仅把它看作一个学术科目——某种灌输给她们的东西，不需要自己去发现——因此既令人仰视，又相当枯燥。（当然，那些有志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志向远大者不在此列。）女权主义犹如一勺勺地喂给年轻一代的女性，因此，她们或许自然、甚至还很健康地暗自怀着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渴望。至少，抵制学术女权主义似

乎是向前迈进的一条道路。从长远来看，事实可能会表明依据她们自身经验来重新开创女权主义是向前迈进的另一条道路。

但是另一个难题——在我看来是关键的难题——在于，学术女权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话语，只有圈内人才能理解。有太多妇女觉得被这种话语拒之门外，受到疏远。当然，这并非女权主义的独有现象。今早我在写作本书时，顺手翻开报纸，发现了记者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大快人心的批评文章。他抨击了那种经常被学术界普遍使用的语言，斥之“荒谬”甚至“为害不浅”。这种语言，或许在那些探讨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的学者中间尤为盛行。“大学教师……非常善于构筑小圈子，但对如何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人——包括为他们收集垃圾的人、送取洗烫衣服的人和端上土豆煎饼的人——进行沟通却一筹莫展。”他在文章结尾开玩笑地引用了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名言：“这是我所无法容忍的英语。”要如法炮制来具体反对学术女权主义，真是太容易不过了。

忽视菲斯克的观点是危险的。女权主义要保持勃勃生机并不断向前发展，就必须开始从根本上重新进行发明创造——在此不仅仅指发现新问题，还指发现一种新话语。无论怎样，我仍然相信女权主义一定会 再次令我们惊讶，相信它一定会不断自我创新——其方式也许是我们所无法预见的，其领域也许是我们鲜有虑及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会来自学术圈外，而且很可能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以我们目前尚无法窥见的方式给我们带来挑战。

注释

〔1〕 苏珊·法吕迪（Susan Faludi，1959—）：美国作家。

〔2〕 娜塔莎·沃尔特（Natasha Walter，1967—）：英国女权主义专栏作家和记者。

〔3〕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1925—2013）：人称“铁娘子”，英国首位女首相（1979—1990）。

〔4〕 琳恩·西格尔（Lynne Segal，1944—）：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心理学与性别研究教授、著名女权主义学者。

谁是最早的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思潮到底真正改变了多少女性的生活？这种思潮在当今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何差异？

在这本简史中，玛格丽特·沃特斯着眼女权主义的发展历程，追根溯源，探究妇女选举权、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女权主义思想在今天是否依然有其价值等重大问题。她从欧洲讲到美国，再讲到第三世界，通过分析全球妇女的现状，向我们展示了女权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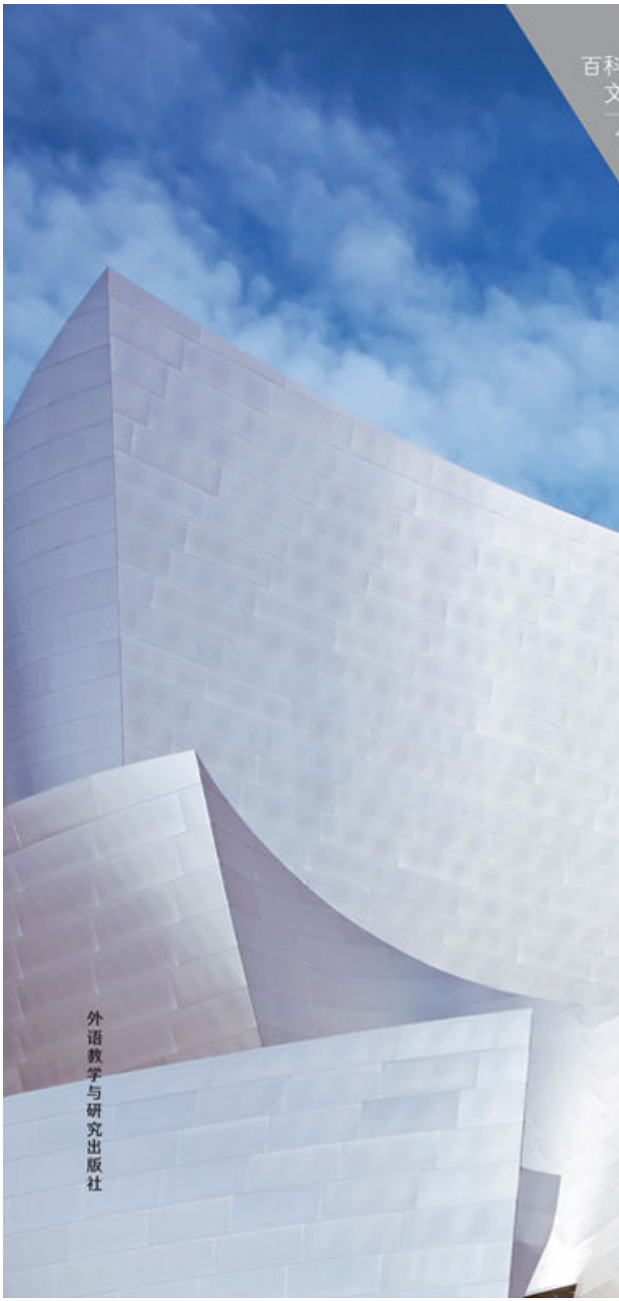

百科通识文库

49

解读后现代主义

克里斯托弗·巴特勒 著

朱刚 秦海花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解读后现代主义

克里斯托弗·巴特勒 著

朱刚 秦海花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44**

Postmodernism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2.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2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Christopher Butler 2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后现代主义 / （英）巴特勒（Butler, C.）著；朱刚，秦海花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87-8

Ⅰ．①解…　Ⅱ．①巴…　②朱…　③秦…　Ⅲ．①后现代主义 - 研究　Ⅳ．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56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车云峰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87-8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作者简介
译者简介
第一章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第二章　看待世界的新方式
第三章　政治与身份
第四章　后现代主义文化
第五章　“后现代状况”
返回总目录

图目

图1　波特曼设计的威斯汀·波拿冯契饭店内部："后现代主义超空间"
图2　摘自雷·费德曼：《要就要，不要拉倒：一部小说》（1976）
带有喜剧色彩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也最能体现对理论的嘲弄。
图3、图4　辛迪·舍曼：《无题电影剧照》（1977）
希区柯克和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中辛迪·舍曼可能会以这样的形象出现；但事实上她没有出演过这些电影。
图5　贾斯珀·约翰斯：《愚人之家》（1962）
语言、理论、对象和艺术。这是一支画笔吗？
图6　杰夫·孔斯：《新胡佛四件套》（1981–1986）
博物馆展览的精致艺术也被运用到日常消费品中。
图7　马尔科姆·莫利：《鹿特丹前的"阿姆斯特丹"号汽轮》（1966）
这仅仅是一艘大船，还是关于艺术本质的一个声明？
图8　理查德·埃斯蒂斯：《荷兰旅馆》
一栋危险的形式精美的建筑，难道是一种现代主义倒退？
图9　安东尼·卡罗：《一天清晨》（1962）
作品形式精美足以引起观众的思索和愉悦。这里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图10　迈克尔·克雷格–马丁：《一棵橡树》（1973）
有时候一支雪茄就是一支雪茄（引自弗洛伊德）。
图11　杰夫·沃尔：《女性照片》（1979）
谁在看谁？从哪个角度？为什么？
图12　文图里、斯科特·布朗及合伙人事务所设计：伦敦英国国家美术馆塞恩斯伯里翼廊（1991）一幢新的建筑，却是以往风格的拼贴。是否很有讽刺意味？
图13　里卡多·博菲尔设计：巴黎阿卜拉克萨斯剧院

在这幢凡尔赛宫的后现代主义翻版建筑中，你同样会觉得很渺小。

是为国王设计的吗？

图14　朱迪·芝加哥：《晚宴》（1979）

女权主义研讨会：但是与会者的身份难道就没有被“代表”她们的意象所限制吗？

图15　卡罗利·施内曼：《内部卷轴》（1975）

我们用身体写作，但在何种意义上女性写作能同样发自身体本身？

图16　辛迪·舍曼：《无题，第228号》（1990）

演示阉割的威胁：犹滴的故事是否也同样是舍曼的故事？

图17　芭芭拉·克鲁格：《无题》（你的凝视击中我的脸颊）（1981）

传递信息的艺术：男性的凝视有多粗暴？

图18　伊丽莎白·默里：《她的故事》（1984）

后现代主义身份主题可以和现代主义表现模式相结合吗？

图19　罗伯特·科莱斯科特：《祖母和法国人》（身份危机）（1990）

表现个人身份需要硬行插入叙事模式、使用现实主义模式吗？

图20　迪士尼设计者的《美国大街》（1955），阿纳海姆，加利福尼亚州

这是你生活的大街吗？

图21　罗伯特·劳申伯格：《女奴》（1955–1958）

“图像导致相对主义导致怀疑。”那么那只鸡在顶上干吗呢？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巴特勒现为牛津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教授，著述颇丰，其中包括《早期现代主义》、《阐释、解构和意识形态》等。

译者简介

朱刚，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西方文论，主要成果有《詹明信》（1995）、《萨伊德》（1997）、*Text, Reader, and the Nature of Literary Reading*（1998）、*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2001）、《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文化批评理论》（2002）、《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二卷，2002）和《二十世纪西方文论》（2006）。

秦海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西方文论，主要成果有“*Using role-plays to develop cultural awareness in communication*”（2003）、《离经叛道的美国戏剧家托尼·库什纳及其政治剧》（2006）等。

第一章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1976年卡尔·安德烈[1]在伦敦泰特美术馆展出的《对应物之八》（1966），是个用砖块垒成的长方体，展出时激怒了很多人。这是一件典型的后现代作品，现在移至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作为珍品收藏。它与经典的现代主义雕刻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形式上过于简单，缺乏表现力，不足以吸引观赏者的目光——确切地说，看上几眼就会让人厌倦。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模仿。由于作品乏善可陈，几乎没有人会对作品本身产生兴趣（也许毕达哥拉斯[2]教团的数字神秘主义者会有些兴趣）。这就促使我们对它产生的背景（而不是其内容）进行思索："这件作品有什么意义？"或者"博物馆为什么会展出这样的东西？"无法激发人们的兴趣，就用某种理论来填补，这也是一种颇为典型的后现代方式。也有人因此会问："这真的是艺术，还是一堆砖块假充艺术？"但是这样的问题在后现代时期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在后现代时期，大家似乎普遍认为，一件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其决定性因素不是别的，正是美术馆这一机构 本身。不管是毕加索也好，还是被切割的牛[3]也好，视觉艺术品就是博物馆馆长们给我们看的东西，而我们所要做的则是只管跟上与这些作品相关的观念。

许多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当然还有他们的同盟者，那些博物馆馆长）想要我们接受与这种"简约派"艺术相关的观念。一堆砖头确实简单，但这种简单是有意而为之，目的是为了对抗、否定先前（现代主义）具有的艺术表露情感的特点。如同杜尚著名的《小便器》和他那安放在凳子顶部的自行车轮一样，这堆砖头同样考验我们的理解力，检验我们对美术馆公开展出作品的容忍度。它也表明了一些根本上具有批判性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总而言之就是艺术对其自身进行的一些否定性假设。安德烈认为："我要寻找的，就是一系列微粒以及将它们以最简单的方式结合起来的规则。"他声称他创作的"对应物"具备"共产主义性质，因为其形式为所有人共享。"

无论对这件雕塑作出多少政治正确的阐释[4]，它都远不及罗丹的《吻》或安东尼·卡罗等其他雕塑家更为复杂的抽象作品那样令人赏心悦目 。安德烈的先锋派理论对人们的理解力是一种考验，似乎在质

疑先前的艺术带给人们的那种愉悦。像砖块这样的作品把清教思想、“质疑”以及让观众感到内疚和不安等因素紧密联系起来。这些是许多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典型态度，通常都有其政治意蕴。马丁·克里德[5] 荣获2001年度特纳奖的作品就延续了这一传统：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面的电灯时亮时灭。

我在下文中涉及到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知识权威、学院派评论家、哲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们，就像是一个组织松散、喜好争辩的政治党派的成员。总的来说这是个国际性的、“进步”的政治派别，在思想上左倾而非右倾，喜欢把所有的事物都当成政治行为，无论是抽象绘画还是私人关系。这个组织没有统一的纲领，即使那些对其宣言作出过很重要的理论贡献的人有时都义正词严地否认自己属于这个团体。然而，这个后现代主义党派倾向认为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它清楚自身的不确定性，经常宣称已经看穿了别人赖以生存的幻想，从而掌握了我们周围文化和政治机构的“真正”本质。于是，后现代主义者通常追随马克思。他们声称，他们特别清楚实际已被禁锢在他们所谓的“后现代状态”下的当代社会的独特情况。

因此，后现代主义者支持的并不仅仅是某些审美“流派”，或者是诸如简约主义或概念主义（安德烈的砖块等作品就源于此）等先锋派思潮。他们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他们所运用的一套哲学思想不仅支持一种审美观，而且对“后现代性”这个“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状况进行分析。这种状况据说影响我们每一个人。这种影响并不仅仅来自先锋派艺术，在更根本的层面上，它源于电子技术带来的传媒的快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6] 称之为“电子村”。然而矛盾的是，在我们这个新的“信息社会”，大多数信息显然不值得信赖，因为这些信息与其说在推进知识，倒不如说被有权阶层操纵用来塑造形象。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态度是一种怀疑的态度，有时甚至近似无端臆想的多疑症（这从托马斯·平钦[7] 和唐·德里罗[8] 的阴谋论小说和奥利弗·斯通[9] 的电影中可见一斑）。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10] 是对后现代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位重要批评家。他认为约翰·波特曼[11] 设计的位于洛杉矶的威斯汀·

波拿冯契饭店完全体现出后现代状况的征候。这幢建筑入口十分复杂，建筑本身试图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缩微的城市”，饭店里的电梯上上下下永不停歇。所有这一切使身在其中的人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尽管他们可以标识周围环境，却失去了定位自身的能力，从而使这幢建筑成为“后现代主义超空间”的变体。詹明信认为，这种“极度的混乱”展示的是一种困境，一种“象征和比拟”，表现了“我们思维的一种无法企及……当我们发现自己作为个体陷入了一个全球化、多国度、没有中心的交际网络时，我们的思维无法对这个巨大的网络进行标识。”我们很多人到伦敦的巴比干中心（Barbican Centre）时也有过类似的感觉。

图1　波特曼设计的威斯汀·波拿冯契饭店内部："后现代主义超空间"

这种把我们的现状比作"迷失在大饭店"的观点表明，后现代主义是关于大都市的学说，主要针对大都市中出现的新思潮以及随之产生

的新感受。然而，人们对这些观点和态度向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而我也将在下文中用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来质疑后现代主义怀疑论。确切地说，虽然后现代主义者可以自信满满地宣称在新的“后现代主义”时代，后现代主义哲学、政治观点和艺术形式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我认为事实却并非如此。

不过，有一点现在已经很明显，那就是即使只考虑1945年以后盛行于先锋派艺术中的观念，我们也可以察觉到这些观念是和现代主义观念的决裂。詹姆斯·乔伊斯和阿雷恩·罗布–格里耶【12】的作品完全不同。同样，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和卡尔海因兹·施托克豪森【13】、亨利·马蒂斯和罗伯特·劳申伯格【14】、让·雷诺阿和让–吕克·戈达尔【15】、雅格布·爱泼斯坦【16】和卡尔·安德烈、密斯·凡德罗和罗伯特·文图里【17】的作品也都是风格迥异。人们如何看待艺术领域中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接受的价值观，在这点上没有统一的线索可循。

这些差异中有许多源自艺术家们对思潮变化的感悟。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包括苏姗·桑塔格【18】和伊哈布·哈桑【19】在内的一些评论家已经开始指出，在欧美存在着一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他们认为与先前的艺术相比，后现代主义艺术家有意使自己的作品缺乏统一性、“权威性”，更加具有调侃和混乱的意味。后现代主义艺术家注重的不是从艺术完整性和整体性之中获得愉悦，而是人们的理解过程。此外，他们不像之前的艺术那样追求叙述的完整、统一，而是更加坚决地反对某一固定的阐释。我们会在下文中举出一些例子。

理论的兴起

在上文提到的艺术家们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后不久，后现代主义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知识界和学术界中出现了“理论的兴起”。各个领域的人们都产生了一种极具批判性的自我意识。现代主义艺术家（和

他们那些据称是“天真的”具有自由人文主义气质的读者、观众及听众）相信艺术品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吸引所有的人，因此可以避免在政治上产生歧义。而后现代主义者对此大加批判。

战后涌现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伟大艺术家，如施托克豪森、布莱兹【20】、罗布–格里耶、贝克特、库弗、劳申伯格、博伊斯【21】等。之后，一些法国知识分子继承（也有许多人认为是补充和解释）了这些艺术家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备受关注的有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路易·阿尔图塞【22】、文化评论家罗兰·巴尔特【23】、哲学家雅克·德里达【24】、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25】等。事实上所有这些人创作之初考虑的都是现代主义的内蕴，而和当时先锋派几乎没有什么广泛的联系。阿尔图塞关注的是布莱希特，巴尔特研究的是福楼拜和普鲁斯特，德里达感兴趣的是尼采、海德格尔和马拉梅，而福柯则研究尼采和巴塔耶【26】。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们已经很难说清楚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什么最重要：是在艺术领域内创造一种特定的（令人不安的）体验呢，还是艺术在哲学或政治方面所提供的新的阐释契机。当然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坚定的后现代主义者向来（并且是灾难性地）更加“看重”后现代主义的阐释意义，而不是许多人在现代主义艺术中学会欣赏到的令人愉悦的艺术表现和复杂的艺术形式。

这种令人吃惊的新思想体系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从法国传入英国、德国和美国。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间，有着浓厚伦理和个人主义色彩的存在主义十分具有代表性，其中最为人们熟悉的倡导者是萨特和加缪。但到了1968年的学生动乱时，当时最先进的哲学思想已经背离了这种存在主义，而转向更具怀疑倾向的反人本主义态度。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它们体现的正是这些新的主张，我们随后会对此加以讨论。法国“新小说家”也对忧惧、荒诞这些具有哲学意义或情感化的状态失去了兴趣。萨特的《恶心》以及加缪的《鼠疫》、《局外人》等小说采用传统的叙事方式，认为小说通过模仿现实生活而产生作用；但“新小说家”不再信奉这一原则，而倾向于采用罗布–格里耶、菲利普·索勒斯【27】及其他作家在作品中所

采用的一种更加冷峻、充满矛盾的反叙事手法。他们关注的不再是单个人物的刻画，也不是通过前后连贯的叙述而产生悬念和趣味，而是他们自己在创作时所采用的语言游戏。

尽管这些新的理念给某些文学创作带来了启示，并在学院派的文学阐释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其产生的根源却跟艺术无关。巴尔特主要对如何运用语言学模型阐释文本感兴趣，德里达最初的哲学著作是对语言学的批判，而福柯的研究则以社会科学和历史为基础。大多数促使后现代主义理论产生影响的法国知识分子都在宽泛的意义上遵循马克思主义学说。

因此，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大量汲取了哲学、政治和社会学思想，这些思想以“理论”的形式渗透进先锋派艺术（尤其是视觉艺术），并散播到欧美各所大学的人文系科。后现代主义时期是一个罕见的由学院派主导艺术家的时期。

然而，这种“理论”不属科学哲学中的理论（科学哲学中的理论可以通过检验甄别正误），也不是欧美宽泛的经验哲学里讲的那种理论。这是一种更加关注自身、持怀疑态度的话语，将传统哲学中产生的普遍概念运用到文学、社会学或其他材料中去，并由此使这些材料带上后现代主义色彩。

迷失在翻译中？

因此在英国和美国学术界，许多支持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欧陆思潮的译介上。其结果就是对一些文化思考进行了很有意思的移植，并且导致同以往传统的明显断裂。比如说，后现代主义理论承续了结构主义对语言功能的关注，但当雅克·德里达将注意力转向指涉问题时（即语言对外部非语言现实的指意）时，他回头关注语言学家费尔迪南·索绪尔[28]。在德里达试图批驳索绪尔的理论时（见《论书写》），他显然并不知道，在哲学界（包括法国哲学界）看来，许多他所关心的问题以及他自己得出的（让人难以把握

的）结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29]早就谈到过，而且表述得更加清楚，研究得更加缜密。当然，这种无知对德里达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德里达在早期作品中并未提及维特根斯坦。许多研究德里达的文论家们也因此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历史一无所知，不知道英美哲学传统对这些哲学问题早就提出过一些规范性的解答。这就导致许多大学院系在学术上产生分歧，无法相互理解，形成不同的派别，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依旧存在。

后现代主义者理所当然地积极支持那些能“解放思想”的伦理和政治学说。与此同时，他们也极度依赖这些新学术权威的声望。这些新学术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杜撰新术语来维持自己的影响，而这些新术语使他们的研究读来艰涩、深奥，给译者带来很大的困难。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30]说过：

> 米歇尔·福柯有一次曾跟我谈起德里达的写作风格，说他的特点就是“令人恐怖的艰涩”。文本写得十分艰涩，让人难以确定论点是什么（故而说它‘艰涩’）。当别人对这一点提出批评时，作者会辩解道：“你们对我的理解是错误的，你们这些白痴”（因此称之为‘恐怖’）。
>
> 《纽约书评》，1983年10月27日

有时候这些知识分子故意采用这种常常很晦涩（更不用说令人困惑）的讲话和写作方式来挑战“笛卡尔式”的清晰阐述。他们认为清晰的阐述依赖于“资产阶级”明确的社会等级秩序观念，并且对这种依赖表示怀疑。罗兰·巴尔特在讨论17世纪法国文学时曾说过：

> 毫无疑问，当时的法国文学创作有一定的普遍性，能够面向欧洲有着同样特权生活方式的精英分子，但是法语所拥有的这种备受推崇的感染力和沟通性只是水平传播的。它向来不会垂直传播，从来没有深入到大众之中。
>
> 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全集》第1卷（1942–1965）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不喜欢单调乏味、政治上可疑的逻辑，而喜欢带暗示的一语双关的文字游戏，因而建立的理论更加具有文学性而

非哲学性。同时由于这些理论过于深奥，让人很难弄明白，因此很少能由此得出清晰的或者可以验证的结论。这就给理论大师的追随者们一个让他们满意的重任——在翻译这些理论时对其阐述，为其辩护。虽然论证清晰一向是法国的传统，但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们却一反这一传统，断然采用一种先锋派写作风格。他们的作品佶屈晦涩，衍生出数千种对其的仿效和改编，也自然而然产生出许多曲解。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支持者们通常具有的混乱、自负的集体心理。

下面我要举的例子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句子，曾在学术杂志《哲学和文学》年度“最差写作比赛”中荣获二等奖。读完本书后读者们也许会明白这个句子的意思，也许仍不能明白。它出自霍米·巴巴[31]的一本经常被提及的著作——《文化的所在》（1994）。

> 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欲望的计策可以测算以用于惩戒，那么很快反复的负疚、辩解、伪科学理论、迷信、虚假的权威和分类就可以看作是孤注一掷的努力，试图使原本分裂的话语产生的袭扰“正常化”，这种袭扰违反了其阐述属性所声称的理性和开明。

因此在这段时期内，源自法国知识分子的后现代主义和主流英美人文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和矛盾。后者采用后奥威尔[32]方式，对政治术语、宏大综合体和从马克思主义衍生而来的“意识形态”都持怀疑态度。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它坚持不同的方法，尤其坚持认为哲学应该使用大家都能理解的“普通语言”进行阐述，即使涉及专业技术层面，也应该尽可能清晰明了。从吉尔伯特·赖尔[33]的《精神的概念》（1949）到约翰·罗尔斯[34]的《正义论》（1971），英语中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都采用这些方法，主张谋求一种基本上是协同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主张整个哲学界可以对哲学著述作进一步的阐释和逐一的修正（而原作者则完全可以对这些阐释和修正作出回应，就像罗尔斯后来在他1993年出版的著作《政治自由主义》中所做的那样）。这种方式既受到苏格拉底哲学方法的影

响，也同样受到科学合作模式的影响。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联系，并具有其政治目的，但是它却从不打算加入这种大家都能接受的、合作式的框架体系。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一框架只会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翻版，目的是为了得到普遍的接受，但这种普遍接受是后现代主义者无法认可的。在某种意义上，法国后现代主义是超现实主义思潮忠实的继承者，因为它们都试图瓦解所谓的认识事物的“正常”方式。

对于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用文学修辞方式表述理论、哲学论点，其危险在于文本会有多种阐释可能，但这也正是其意义所在。我们会认识到，在后现代主义的本质中有一种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对来自启蒙运动的理性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完全失去了信心。这在20世纪后期逐渐形成的其他思想理论（如认知科学对语言学的影响、用达尔文模式解释心理发展等）中是绝无仅有的。出版商在推销后现代著作时，宣传的不是这些作品中富有挑战性的假设和论点，而是宣传它们如何善于“运用理论”、如何具有“洞察力”、如何“干预”，以及如何“应对”（而非“解决”）问题。

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伦理学、美学和政治社会学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构成了我下面要讨论的内容。对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这三个领域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术语本身就让人注意到它是历史时期和意识形态的混合体。因此，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评论家在使用某一艺术品、某一思想家或社会实践来说明后现代主义学说的典型性，或来准确界定“后现代性的社会状况”时，所依据的正是这些我们大家各自认可的不同的评判标准。不过，我仍然希望能在本书中把握住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

本书将介绍众多后现代主义观点中最重要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之间的论战很有意思，但由于篇幅有限，我不可能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这些论战上面。本书将集中介绍在我看来最持久、最有生命力的后现代主义观点，尤其是那些可以帮助我们概括、理解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创新艺术和文化实践的观点。

我们应该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的很多观念很有意思，也很具影响

力，是理解一些优秀的实验艺术的关键所在，但这些观念往好里说似乎有些含混，往坏里说则根本不正确。其实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许多重要文化时期最基本、最主要的观念都会受到类似的批评。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人们会对这类观念中的一些进行重新解释（如浪漫主义关于想象的理论），而对另一些则予以摒弃（如医学上的麦斯麦疗法【35】）。历史上所有激进的思潮都有这一特点，而后现代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想象力的作用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现在也没有人会完全赞同浪漫主义关于想象的观点。18世纪的麦斯麦疗法和20世纪的催眠术也大不相同。20世纪兴起的激进思想（诚如激进政党）通常都会遭遇理想破灭，随之而来的是修正与改进，而这似乎已经是后现代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命运轨迹的写照。但不管怎么说，至少后现代主义的寿命已经可比战前现代主义鼎盛期的寿命。对于支持者来说，后现代主义替代了战前处于鼎盛期的现代主义，在政治上更加进步；而对于反对者来说，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日渐衰落的现代主义最后的苟延残喘罢了。

注释

【1】 安德烈（Carl Andre, 1935–）：美国雕刻家，崇尚简约风格。1966年他在纽约蒂伯德纳基美术馆（Tibor de Nagy Gallery）把在标准生产线上生产的120块普通砖头垒成一个长方体进行展出（该作品1976年被伦敦泰特美术馆购入）。此举曾引起轩然大波。——译注，下同

【2】 毕达哥拉斯（约前570–约前490）：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教团创始人。该组织虽系宗教性组织，但提出的原则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产生过影响，并促进了数学和西方哲学的发展。其成员将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对数字的理解融合在一起，故有此称谓。

【3】 被切割的牛：指的是英国当代艺术家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 1965–）的作品《母子分离》，将一头母牛和它的小牛剖开放在玻璃容器中，陈列在伦敦萨奇美术馆（Saatchi Gallery）。赫斯特是青年英国艺术家（YBA）的主要代表人物，引导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艺术的发展，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1995年，他获得英国当代艺术大奖特纳奖。

【4】 政治正确：即所谓的“political correctness”（缩写“PC”），指的是

在种族、性别、文化、性取向等方面不得使用带有歧视性的语言或表现出带有侮辱性的举止。虽然该短语在18世纪末美国政府文件中就已经出现，但是上述意义则是欧美左翼运动的产物，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有直接联系，20世纪60年代之后风光了30年，在政府法律（《平等权利法案》）的推动下，已经形成了一种大众意识，曾一度非常时髦。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保守势力的反扑越来越受到质疑。

【5】 克里德（Martin Creed, 1968–）：英国先锋派艺术家。

【6】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加拿大文学家、哲学家、传媒理论家，尤以其“地球村”概念著名。

【7】 平钦（Thomas Pynchon, 1937–）：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把黑色幽默和幻想相结合，描写现代社会的混乱和人的异化，代表作有《V.》、《第49号拍卖》、《万有引力之虹》等。

【8】 德里罗（Don DeLillo, 1936–）：美国当代小说家，作品主要关注美国社会对技术和媒体过分依赖和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对当代人的自我进行剖析，代表作有《白色噪音》、《天秤座》、《毛II》等。

【9】 斯通（Oliver Stone, 1946–）：美国当代著名导演，代表作有《天与地》、《尼克松》、《生逢七月四日》等。

【10】 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 1934–）：当代美国文化批评家，著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等。

【11】 波特曼（John Portman, 1924–）：美国建筑师，设计带中庭的饭店，以创造新型的现代城市空间著称，他设计的建筑有波拿冯契饭店（位于洛杉矶）、底特律复兴中心等。

【12】 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以其在《尤利西斯》（1922）、《为芬尼根守灵》（1939）等巨著中的语言实验和对新的文学方式的探索而著称。罗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 1922–2008）：20世纪50年代法国“反小说”（即“新小说”）的代表作家和主要理论家，“左岸派”导演、电影剧本作家，著有论文《争取新的小说》（1963）、小说《窥视者》（1955）、《幽会的房子》（1966）、《神灵》（1981）等。

【13】 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 1882–1971）：美国作曲家，出生于俄国，代表作有《春之祭》、《俄狄浦斯王》、《诗篇交响曲》等。其作品对一战前后的音乐思想和鉴赏产生过巨大的冲击，被作为现代主义音乐的试金石。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 1928–2007）：德国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电子音乐和序列音乐的重要创始者和理论家，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的先锋派作曲家影响很大。

【14】 马蒂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法国画家、雕刻家、版画

家，野兽派绘画运动的领袖，作品以线条流畅、色彩明亮、不讲究明暗与透视法为特点，代表作有油画《戴帽子的女人》等。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 1925–2008）：美国画家和版画家，波普艺术先驱。

【15】 雷诺阿（Jean Renoir, 1894–1979）：法国电影导演、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人物。戈达尔（Jean-Luc Godard, 1930–）：法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浪潮”的重要导演。

【16】 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 1880–1959）：英国艺术家，20世纪重要的肖像雕刻家，参与创建伦敦小组，旨在促进英国的现代艺术。代表作有《岩钻》、《创世记》等。

【17】 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1886–1969）：德国建筑师，提出“少即多”的原则，是20世纪中期世界上最著名的四位现代建筑大师之一。文图里（Robert Venturi, 1925–）：美国建筑师，在20世纪美国建筑设计的功能主义主流之外独树一帜，奠定了建筑设计上的后现代主义基础。他提出“少就是乏味”的原则，向“少即多”的现代主义提出挑战。

【18】 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美国学者、作家、批评家，以论述现代文化的随笔闻名。

【19】 哈桑（Ihab Hassan, 1925–）：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最早的阐释者之一，代表性论著有《俄耳甫斯的肢解：走向后现代文学》、《后现代转向：后现代理论和文化论集》等。

【20】 布莱兹（Pierre Boulez, 1925–）：当代法国杰出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

【21】 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爱尔兰戏剧家和小说家，荒诞派戏剧的主要代表，代表作为《等待戈多》，196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库弗（Robert Coover, 1932–）：美国作家，擅长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和元小说，代表作为《公众的怒火》。博伊斯（Joseph Beuys, 1921–1986）：德国先锋派雕刻家和行为艺术家，其作品以非正统的素材和仪式性的行动为特色，引起许多争议。

【22】 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代表作有《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列宁与哲学》等。

【23】 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法国符号学家、文学批评家，后现代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神话学》、《符号学原理》、《结构分析与〈圣经〉考释》等。

【24】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创始人，对西方哲学的批评涵盖文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代表作有《论书写》、《语言与现象》、《写作与差异》、《播撒》。

【25】 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思想史家，代表作有《疯狂与理性缺乏：古代疯狂现象史》、《规训与惩罚：监狱之起源》、《事物之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性史》等。

【26】 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法国作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其论著、小说和诗歌关注色情、神秘以及乖戾，视放纵行为为争取个人“主权”的手段。

【27】 索勒斯（Philippe Sollers, 1936–）：法国文学家、批评家，1960年在巴黎创办先锋派理论刊物《泰凯尔》（*Tel Quel*，或译《如此即彼》）。

【28】 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 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奠基人。

【29】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奥地利哲学家，20世纪语言哲学的主要人物，代表作有《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等。

【30】 塞尔（John Searle, 1932–）：美国哲学家，当代英美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的重要人物之一，代表作有《表达和意义》、《思想、大脑和科学》、《社会现实的建构》等。

【31】 巴巴（Homi Bhabha, 1949–）：美国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以文风晦涩而闻名，作品有《民族和叙事》（1990）等。

【32】 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英国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其代表作《一九八四年》体现了对极权主义的批判。

【33】 赖尔（Gilbert Ryle, 1900–1976）：英国哲学家、“牛津哲学”（即“普通语言”思潮）的领导人物，致力于消除由语言误用而引起的混乱。

【34】 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20世纪美国乃至西方思想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作品《正义论》（1971）常常被视为政治哲学复兴的开端。

【35】 麦斯麦疗法是由德国医生麦斯麦（Franz Anton Mesmer, 1734–1815）创立的治疗体系，通过装神弄鬼、呼风唤雨等方法使病人“入定”，建立“危象”，后该方法被指控为行骗。催眠术就是在麦斯麦疗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章

看待世界的新方式

抵制各种宏大叙事

很多后现代主义理论依靠的是坚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在这方面，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1] 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后现代状态》一书（法文版，1979；英文版，1984）中，他提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曾被接受和认可的“权威叙事”已陷入危机，并在逐步衰败。一些主要的哲学流派，如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等，都包含或蕴藏着这样一些权威叙事，认为历史是进步的，知识可以解放人类，所有的知识之间存在着隐含的统一性。而利奥塔所批判的是两种主要叙事：一种是人类进步解放论——从基督教救赎到乌托邦；另一种是科学胜利论。利奥塔认为自二战以来这些学说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可信性”：“如果让我以极端简单化的方式给后现代下个定义，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

从传统上说，这些元叙事给文化实践带来某种合理性和权威性。（弗洛伊德理论之所以能够取得权威地位，正是因为他们宣称以科学原理或科学元叙事为基础，当然现在赞同他们这一观点的人并不多。）另一个相关的例子则是教科书上关于美国开国元勋们起草宪法及后来立法的历史。这一宏大的历史叙事及其宪法中规定的“立国原则”，在美国当今关于言论自由的限度、堕胎权利及美国公民私人携带武器的权利等争论中仍备受关注。1945年后许多前殖民地地区建立的政府都提出过表述民族斗争历史的叙事，而这些叙事后来也同样成为权威政治叙事。这类叙事难以避免，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有这类叙事。

诚然，自由主义者有很好的理由反对这类“宏大叙事”（理由是这类宏大叙事不允许人们在价值观方面提出异议，并常常导致极权迫害），不过，利奥塔关于20世纪后期元叙事衰退这一论断之所以听起来有道理，最终原因还在于它针对的是少数知识分子所处的文化环境。但声称我们这个年代宏大叙事正在衰退这种社会学 上的泛泛而谈

仍然缺乏说服力，因为正是由于大规模、全民性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信仰才导致如此多的压迫，比如在北爱尔兰、塞尔维亚、中东以及其他地方的暴力和战争（后现代主义者一般故意回避今日发生在科学和宗教领域的种种事件）。阅读报纸的人都很清楚，现在的人们或多或少仍然愿意每日借宏大叙事的名义互相残杀——对萨尔曼·拉什迪的追杀令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2]。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学院派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毫不客气地对他们周围的欧美社会进行剖析却还能安然无恙，原因恐怕就在于当时这些社会还没有因为对立意识形态的存在而分崩离析。当然，如果考虑到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之间的争执，我们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利奥塔所提倡的对权威叙事的质疑，得到德里达和其他众多后现代主义者的回应，对在西方民主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一代有着很强的感召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存在主义将他们从宗教信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968年发生的反抗资本主义及其军事工业体系的运动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美国的“帝国主义”意图令他们怀疑，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想要逃离冷战期间那种令他们感到窒息的像摩尼教[3]一样的意识形态上的陈词滥调。

这一切导致怀疑论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最基本的态度，他们怀疑任何试图涵盖一切的整体性解释。利奥塔认为即便是“共识”也已经成为一种“过时、可疑的价值体系”，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抵制”这种“共识”。利奥塔并非是唯一持这一观点的人。后现代主义者对这种观点作出了响应，部分原因是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支持那些与宏大故事“格格不入的”人——那些受压制、被边缘化的群体——来反抗传播权威叙事的有权阶层。因此许多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先锋派、勇敢的异见者。这宣告了一个多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多元化时代里，即便是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也仅被当作准叙事而已，必须和其他叙事竞争以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他们的表述对世界并不具备独特、可靠的意义，与现实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他们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虚构而已。

当然，抵制这类权威叙事（尤其是整体性、极权性叙事）完全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因此，许多重要的后现代主义著作

表达这种怀疑论归根结底是为了达到自由主义目的。爱德华·赛义德[4]的作品就是个例子。在《东方主义》（1978）一书中，赛义德试图揭示西方帝国主义宏大叙事对所呈现的东方社会的扭曲。帝国主义者认为自己代表着理性、秩序、和平、守法等行为准则，而把东方定义为这一切的对立面（比如福斯特[5]在《印度之行》中所看到的“混乱状态”），并坚信对“他者”的表征的描述——其“东方主义”叙事——终将占据上风。这种关于进步发展的帝国主义宏大叙事被强加到一个本土的——甚至是“异常”的——东方习俗之中。在这些论述中，赛义德采用了福柯的观点，并继承了古希腊及尼采的神话即历史论[6]，认为这类气势雄伟的政治宏大叙事充其量不过是混淆视听之举，试图让某些社会群体享有权力，而把另一些社会群体排除在权力之外。正如赛义德指出，福楼拜与埃及交际花库楚克·哈内姆[7]过夜之后曾写信给路易·科雷[8]，信中谈到“东方女人不过是部机器，不同的男人对她而言没有任何区别”。他在这番话（以及他随后写的其他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广为流传、颇具影响的东方女人的模式”。然而，在这一影响深远的叙事中，“她（哈内姆）从来没谈过自己，没有流露过她的情感，没有表达过她的存在，没有讲述过她的历史。”我们可以想象她自己的讲述可能会有多么不同，但是福楼拜和哈内姆各自的叙事方式在文化上是没有可比性的；由此，我们得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结论，即普遍真理不可求，相对性才是必然的结果。

解构主义

敢于肯定地作出上述论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雅克·德里达哲学的影响。在德里达卷帙浩繁的著述中有着对这种“解构主义”态度最为详尽的描述。

解构主义的核心论点在于相对论——我这里所说的相对论意思是真理本身总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判断主体的不同立场及带有倾向性的思维框架。因此，我们很难认为解构主义者会坚定地信仰任何像哲学

命题那么明确的东西。事实上，给解构主义下定义这一做法本身就违背了它的另一主要原则——即我们不可能对任何事物作出最终的、精确的定义，因为即使是看起来最可信的定义也总可通过语言“游戏”对其进一步定义。对于解构主义者而言，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既定的，甚至是不可靠的，因为所有的语言体系在本质上都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是不可靠的。

不过，德里达和他的追随者们倒是似乎态度鲜明地支持这样一个相当明确的历史主张：西方传统的哲学和文学长期以来错误地认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有着坚实的基础，是可靠的（某些宗教甚至认为是上帝确保了这种关系）。这种“逻各斯中心论”错误地相信语言是自然的镜子，虚幻地认为文字的意义起源于现实世界本身的结构，因此通过文字可以将关于这一结构的真相直接呈现到人的思维中去，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谬误的“在场形而上学”。这就是德里达自己的宏大元叙事。他似乎错误地认为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从来没有质疑过语言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但其实唯名论 [9] 和本质主义之间的论战由来已久。（事实上，众所周知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1922）一书中曾力图在语言和现实世界之间建立一个绝对稳定、可靠的对应关系，可在他1953年发表的《哲学研究》一书中（当时他已经去世），他又完全否定了这一立场，转而支持语言游戏相对论。）

然而，德里达的怀疑论毫不通融地指出社会文化越来越离不开科学及无坚不摧的资本主义技术的“契合”，而事实上技术本身就来自科学，并且用来证明科学的合理性。德里达对社会文化进行的这番描述具有相当的政治吸引力。许多人都相信哲学、科学和小说确实准确地描述世界，历史叙事可能具有真实性，而德里达的怀疑论则使他的追随者们可以对持上述观点的人进行批判。

德里达理论的支持者们特意将矛头指向文人，谴责他们过于天真地信任所谓的“古典现实主义文本”（这一名称颇具嘲讽意味）。这些人显然对语言的本质认识不清，并因此产生了错误的信心。

比方说，在读乔治·艾略特 [10] 的《米德尔马契》（1882）时，我们也许会有一种错觉（事实上艾略特本人并没有这种错觉），认为

她的作品完全是对现实敞开的一扇窗户，她的话语足以准确地描述真相。如果我们信任艾略特的叙事声音和语言，尤其是她所作的推论，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自己处于一种支配地位，甚至有点像上帝一样。我们会以为自己了解多萝西亚·布鲁克的真实情况，但事实上我们所确切知道的不过是艾略特对她的描述而已，这就像我们读到一个比喻时的情形——难道这些描述和比喻也是“真实的”吗？比如，丈夫卡索朋的不称职使多萝西亚困惑、痛苦，她认为自己的生活“似乎变成了假面剧，有着谜一般的服装”。除了这一比喻本身的阐释问题之外，它也只在那些能以某种方式理解假面剧及其功能的文化中才有意义。因此对于多萝西亚的这一描述是相对的，只有在特定人群的特定话语（即能理解假面剧的话语）中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就这样，后现代解构主义者想要揭示，人们原先所信任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比如上述语言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出错的。“得了吧，”我们会说，“这不过是个关于假面剧的比喻而已，作者有计划、有步骤地用它来误导读者。”但是从逻辑上来讲，很显然你在证明语言总是如何“出错”时，心里肯定同时 还隐藏着一种对它充满矛盾的信任。因为如果我们对事实没有相当的信心，又怎能证明在具体运用语言时“出错”或陷入矛盾呢？这对于那些反对解构主义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而那些运用解构主义理念的人则能从中获取力量。

那么，为什么解构主义者想要质疑人们对艾略特这样的作家以及先前很多哲学传统所抱的信任呢？

作为体系的符号

德里达理论的支持者们坚持认为，解释任何单词都必须考虑这些单词与它们所参与的各种体系之间的关系。由此他们认为，我们充其量不过是陷于（不可相互比较的）概念体系之中的相对论者而已。我们只能在它们 所允许的范围内“了解”现实。不管我们说什么，我们都

被局限在一个语言体系之中，而这个语言体系并不以我们所期望的方式与外在现实相联系，因为任何体系之中的任何名称都暗指或依赖于该体系中不在场的其他名称的存在（德里达称之为“轨迹”）。比如，英语中有一系列表示不同程度“愤怒”（anger）的单词——从“恼火”（irritated）到“暴怒”（furious）。法语也自有一套不同的词语来描述我们的这种情感经历。对于所有以这两种语言为母语的人来说，所有名称都必须依靠各自体系中的其他名称才能对“愤怒”这种情绪中进行描述。然而，尽管英语和法语明显不同，但他们都无权声称自己对世界上所有愤怒的真实状态都进行了编码。同样，艾略特也无权宣称自己对多萝西亚幻灭的真相进行了最终编码。因此德里达主义者认为，语言看似能表明概念之间的明显不同，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事实上它只是在体系中暂时拖延，或者说推开它的同伴们而已。因此对德里达主义者来说，我们的概念不仅仅标志着差异，还意味着“延异”，即意义的延缓（“延异”这个法语新词正是取了两者的双关谐音）。因为意义总是在语言链中永不停息地从一个词向另一个词滑行。

德里达从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概念相对论出发，进一步提出种种可以对所有的概念框架由此进行批判的方法。这是他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最重要的贡献，与他的哲学立场正确与否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认为所有的概念体系往往都会形成伪造或歪曲的等级体系 。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并不如我们所愿意相信的那样直接，它充满比喻，与我们概念体系的范围完全相关。不仅如此，我们还一向过于相信这些体系的核心范畴在组织我们经历时所采用的方式。比如我刚才所提到的篇章中，很显然乔治·艾略特依靠的是“表面”和“事实”之间的清晰界限，以及人们“真实地展示自我”和“表演”（就像在假面剧中或身着伪装时）之间的区别。

在我们组织话语时，倾向于“优先选择”并依赖德里达所谓的“超验能指”，如“上帝”、“现实”、“人的理念”等。我们喜欢运用一组组对立的概念，如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灵魂与肉体、本义与喻义、自然与文化，以及男性与女性等来组织我们的话语，而这些相对概念的运用

使我们误解了许多基本关系，或者至少说使我们过于死板地固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喜欢将这些成对的概念中的一个置于另一个之上，例如认为“女性”比“男性”低劣（“东方”比“西方”低劣）。但是，如果 采用一种更有相对主义特点的概念图式，我们会发现它们的定义“事实上”互为依存。德里达主义者坚持认为表面上相互对立的东西事实上相互需要，并总是相互隐含，这种观点颇有弗洛伊德理论的色彩。如果你被当作是一个狡猾、诡计多端、糊涂的东方人（就像福斯特笔下的阿齐兹），那么我就只可能把自己看成是充满理性、寻求正义的帝国主义者（就像福斯特书中的罗尼·菲尔丁）[11] 。这种对对立概念的解构颇有创新之处，起着解放思想的作用，其过程是这样的：某一特定的体系宣称自己可以正确地描述世界，但当我们对这一体系进行评判时，我们会发现这一体系“优先选择”一些概念，或使它们居于中心地位，并把这些概念纳入等级体系之中，但是这些概念以及等级体系反映的并不一定是“正确”的秩序，它们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所认识到的更加相互依赖。

事实上，对于德里达主义者来说，揭示这些对立关系之间隐藏的相互依存性就等于“解构”了它们。这些关系可以被取消，甚至被颠倒，往往产生一种自相矛盾的效果，因而真相“实际上”是一种虚构，阅读始终是一种误 读，而最根本的是，理解只可能是一种误 解，因为理解从来就不是直接的，永远是一种片面阐释，经常使用比喻，却还自以为忠实于本义。这种解构颠覆了我们对逻辑、伦理及政治常规的信念，而后现代主义中最富有革命性——也最典型的——的正是这种对解构主义的核心运用。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相对论观点认为，我们一旦以这种方式看待我们的概念体系，就会认识到世界、世界上的社会体系乃至人类身份等都不是既定事实 ，也并非由和现实对应的语言以某种方式加以保障。恰恰相反，这些都是由我们 在语言中建构 出来的，而我们也根本无法断言我们在建构这些概念时所采用的方式就是事情存在的“真实规律”。我们并非生活在现实中，而是生活在我们对现实的表征之中。（众所周知，德里达私下里曾说过：“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只有

更多 的文本，我们就用这些更多的文本来试图描述和分析原先文本所指的内容。）

所有这一切可以让我们满怀信心地与所有“既定”体系断绝关系，相信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能够、也应该加以改变。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及带有后启蒙运动、康德主义、普世化、帝国主义色彩的语言宣称自己可以描述事物的真实状况，而解构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则可以结成某种联盟，抵制这种观点。

文本的游戏

解构主义（尤其是文学批评家们所运用的解构主义）对文化产生的最大影响在于它拒绝遵循通常的观念等级体系，特别是上文所提到的等级体系，来进行思维活动，创作文学文本，以及阐释文本。在进行这些活动时，解构主义打乱文本的结构，认为文本不过是对意义所进行的“随心所欲的”描述，这是因为“延异”，亦即同一类概念之间半隐蔽的相互依赖性，是无穷无尽的。通过一个单词所开启的路线，我们可以穿越整部词典。语言是个无限的领域，充满活力地相互联系在一起，这一观念使解构主义理论和许多先锋派、后现代派作家的实验思想联系起来。法国的“新小说家”和一些美国实验派作家，如沃尔特·阿比什【12】、唐纳德·巴特尔梅【13】、罗伯特·库弗和雷·费德曼，就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语言和文本（以及绘画、音乐）的传统手法成为游戏 的对象——它们的目标不再是明确地界定论点或叙事。它们只不过是意义的播撒者 而已。

我知道你们这些家伙接下来会想出什么主意，那关于表征问题呢？是啊，它怎么说？对于现实的准确、严格的表征！文字忠实于事物！意思忠实于文字！（能指／所指），精确地使用书写 （咕咕），以区分口头表达与书面文字、叫喊与嘟哝。

是的，我知道你们对于书面文字的看法，对你们这些家伙来说，这是个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但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讨论过了，而对我来说，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如果照你们的意思从逻辑意义 上来说）我才不管什么事物的秩序 呢，因为我，我才不想为了建立一个秩序而去讲述，去记叙，或者去背诵，决不！

与此相反，我所做的都和读、听有关。而不是写作　。我激发人们的各种感觉，而决不想要传达什么意义。我对胡说八道感兴趣，我对超小说　感兴趣！或者你也可以说我是在走向不可读、随心阅读、谵妄阅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喜欢用公然打破平静的方式阅读，对此着迷：在犯罪时被当场抓住　！我才不干蠢事呢！

不过，呃，我要制止这些讨厌的东西（什么单倍行距、双倍行距、三倍行距）以及所有通过排版获得自我满足的做法。说实话，我和你们一样对此感到恶心。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谈论（甚至写）这些东西。就为了正确地给问题定位。

是的，但语言怎么了，你可能会问？

意义怎么了？

问得好！

图2　摘自雷·费德曼[14]：《要就要，不要拉倒：一部小说》（1976）

带有喜剧色彩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也最能体现对理论的嘲弄。

作者之死

最为重要的是，读者／听众／观众在表述和阐释这种语言游戏的过程中必须独立行动，不为作者的意图所左右。把注意力放在作者身上其实是选错了重点，因为如果把他／她当作是创造、界定文本意义的权威，这种做法很显然（遵循逻各斯中心论）赋予某些特定的意义以优先权。为什么读者就不能和作者一样创造意义呢？作者（或历史）的意图和现实主义一样不可靠。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认为文本是“语言中符号的自由嬉戏”。宣称“作者之死”的主要有巴尔特和福柯。这一论断在政治上同样占据有利地位，因为它废除了作者，把他／她看成是占有和经营自己意图的资产阶级和资本家。

正如巴尔特所言：

我们现在知道文本并非是发布唯一“神谕”（即“作者–上帝的旨意”）的一串词语，而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各种不同的写作融合和碰撞，没有哪一种写作是初始的……文学……拒绝为文本（以及作为文本的现实世界）指定一个“秘密”、一个终极意义，通过这种方式，文学释放出一种可称之为反神学的活动，这是一种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活动，因为拒绝框定意义归根到底就意味着否定上帝及其本质——理性、科学和法律。

罗兰·巴尔特：“作者之死”，录自《意象–音乐–文本》（1977）

就这样，虽然文本确实由作者建构，但它已经被从作者的专制下解放了出来，可以供想象力自由驰骋。阐释者拥有意义，可以用解构主义手法对意义进行自由发挥。为文本或任何符号体系指定特定的终极意义从哲学角度看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一种退步。所有的文本都获得了解放，可以和它们的语言、文学或文类上的伙伴们一起自由地遨游在互文 的海洋里，它们之间原先被认定的界限已经不再重要。这些文本合在一起被当作艺术语言，带有嬉戏的特点和播撒性的形式（这一点和德里达自己的讲座颇有相似之处，均是随心所欲、毫无条理、缺乏重点、拖沓冗长的独白）。在阐释中追求文字的确定性，如同现有的政治秩序所炮制出的统一思想一样，都被认为带有反动的含义。

隐喻

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文本，不管其出发点是多么想实事求是，都是（可以被解构的）修辞游戏的形式。而上述观点的可信度又得到另外一种论点的支持，该论点与尼采和柏拉图哲学一脉相承，认为整个语言中（包括乔治·艾略特作品中最“现实主义”的部分）凡表面上可以取其字面意义的，事实上都带有喻义 。现在人们可以把哲学和历史（两者都曾被奉为纪实性的、实事求是的话语，并因而曾受到另眼相看）当作文学一样阅读，反之亦然。我们不再需要迷信字面意义（认为它是一种毫不含混地指向现实的语言），因为所有那些被认为在表

达字面意义的文本，一旦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事实上它们都是隐喻的表达。

总体来讲，很多语言学家已经在逐步认可关于语言的这一观点，其中主要的领军人物就是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15]（当然这种说法也颇受争议），他们承认受到德里达的影响，认为所有日常语言都由隐喻构成。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倾向于认为哲学上的客观主义世界观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语言学研究试图证明，我们事实上每天都借助于相互关联的概念体系进行思考，而这些概念体系是建立在隐喻基础上的，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将这些概念体系简化为更加“直白”的语言，从而使它们完全、系统地相互协调一致起来。

一般说来，后现代主义者感兴趣的正是这种分析在政治、伦理上所带来的结果。解构主义者曾经坚持认为，所有的思想体系一旦被看成具有隐喻特点，便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矛盾、悖论、困境，或者用德里达自己的话来说，成为“不可解结”（aporia）（这是一个修辞术语，意思是让人困惑的问题）。对于德里达的追随者来说，语言体系带有隐喻特征就意味着语言事实上不可能把握（或掌控）它意欲解释的对象。

这些论点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吸引了一大批文艺批评家，时至今日也还有吸引力。这一类解构主义是一种策略，带有先锋主义和怀疑论性质，旨在揭示矛盾能够逐步削弱、颠覆、揭露、“撤销”并僭越任何文本。更何况，它同时还具备振奋人心的政治含义，因为它表明文本对自己所编织的矛盾事物具有不自觉的盲目性，而解构主义者的洞察力无疑要比这种盲目性更胜一筹。解构一首诗、一个文本或一种话语就等于揭示它们（事实上）是如何逐步削弱它们（看似）维护的哲学，瓦解它们表面上所依赖的等级对立关系。当所揭示的矛盾有着重大的道德或政治意义时，这种解构就显得尤其有力。

下面我从丁尼生[16]早年作的一首诗中节选了一部分作为例子，来粗略地说明解构主义所采用的手法。丁尼生在诗中写道：

可敬的伊莎贝尔，头戴着花冠，

代表女性坚韧的圣洁的花朵，
预示着完美的为妻之道，带着纯洁的谦卑。

二
聪明、决断的才智
凭着直觉区分
错误和罪恶；审慎的自我控制；
婚姻的律法像金字一样
烙刻在她那苍白的心上；
仍在燃烧的爱情发出足够的光
去阅读那些律法；受到奉承时
非常低调，在悲伤时
却用她银铃般的声音善解人意地给予劝告，
如此合情合理，在不知不觉中，
用她无尽的温柔
攻克怀疑和骄傲的堡垒；
有着忍受和遵从的勇气；
有着对飞短流长和动摇不定的厌恶，
戴着花冠的伊莎贝尔，在她平静的一生中，
是婚姻的女王，完美的妻子。【17】

这首诗意在用恭维、虔诚的话语进行赞美，但在我们今天的历史环境下来看，诗人为了加强这些策略而选择的主题却会让人颇有微词。解构主义者可以认为这些主题不符合我们对现实（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有悖于政治正确）的理解，因为它们事实上以幻想为基础，建立在诗中所表现的字面意义和喻义之间尴尬的关系之上。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些主题利用喻义和字面意义之间的种种差别，但同时所揭示的却又正是自身对这些差别的不安。就这样，这首诗解体了。

诗中将男性支配女性这一非常令人不快的话题改头换面（使它变得让人容易接受，至少对男性而言），假装女性确实可以“驾驭”男性——但只能通过道德伦理所认同的方式。她们拥有美德，而我们拥有

权力。但是美德，尤其是丁尼生在诗中所颂扬的那种反常的自我克制型美德，可绝对不是什么权力。它只能出现在象征性（而非真实的婚姻）语境下，女性在这种语境下毫无权力可言：因此便产生了“完美的为妻之道，带着纯洁的谦卑”这种不幸的组合。此外，伊莎贝尔只有在区分错误和罪行时才能本能地 运用她的智慧（这又印证了一组根深蒂固的对立关系，即女性凭的是直觉，而男性靠的是理智）。为了防止她的直觉让她失望，她会随身携带法典式的“婚姻的律法”来帮助她记忆，这又在她纯洁、无痕的“苍白的心”上留下印记。就连她的心都是苍白的，没有血色的，不存一物的：她倒真的是供男性填充幻想的一张白纸 。就连她所感受到的爱所能起的作用也只是给予她“光／去阅读那些律法”而已。她“悲伤”时唯一的武器是温柔和因顺从而被大大阻遏的勇气。她不想“主宰和驾驭”，但她又如同上帝，因为这种不直接质疑性别差异的膜拜无伤大雅。丁尼生的诗在极力抬高、颂扬伊莎贝尔的同时又使她臣服，诗中充满悖论，导致了对自身的解构。

解构主义者认为语言会通过这种方式将我们引入歧途，人们绝不可能完全、令人信服地把握“现实”，因此解构主义认为其所批判的文本中绝不可能有任何经得住推敲的现实主义 。对现实主义的这一批判在各种后现代主义活动中都占据绝对核心的地位。但是，由于后现代主义拒绝加入任何现有体系，在阐述任何体系时都无一例外地采用调侃、含糊其词的态度，这也使它不可能在不违背自己论点的前提下提出一个自己的体系。因而人们常常谴责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怀疑论者而已，无力献身于有意义的道德或政治信仰。而解构主义者为了恪守自己的论点，常常不断倒退，陷入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件中。许多解构主义批评（比如杰弗里·哈特曼【18】的《丧钟》以及保罗·德曼和希利斯·米勒 【19】 的许多批评）现在看来相当自我陶醉、自我专注，最终对重要的事情都不置可否。

事实上，那些解构主义阐释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正是恣意捕捉了这种嬉闹性的倒退，为的是支持一个没有，至少还没有直接受到批判的论点。极端的解构主义者被认为充其量不过是对我们的信仰进行一种实用主义批判，而归根到底还是落入以往哲学的窠臼，与其说是指

出如果你质疑自己等于什么都没说（对他们来说，这一观点过于受到文学的、传统的、讲究事实的逻辑的限制），倒不如说是指出如果你质疑自己就等于开辟了各种有意思的探索途径。毕竟，按照他们的观点，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会这样做，而唯一可能的反应就是在游戏中再走一步，而不是鲁莽地将其中的一些步骤看作是非法步骤而将其剔除。因此，传统的解构主义与其说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理论，还不如说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项目”。

怀疑论和意识形态

尽管总体上来说解构主义埋头象牙塔，只关注自我，但它也很赞成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相对论倾向，这使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科学中的实证或经验验证不是很感兴趣。他们常常认为科学实证已经变得不再纯粹，因为科学中的实证与军事–工业综合体联系在一起，而严谨的技术理性被用于社会统治，诸如此类。这同样也意味着利奥塔和德里达的支持者们喜欢相信的是“故事”，而不是可以被验证的理论。在法国思潮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者不再相信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哲学、历史和科学，而愈发成为（难以把握的）文化 活动的理论家，而这也就是我在谈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应用时所举的例子大多来自艺术领域的原因。

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文化包含一系列不断相互竞争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之所以有效，不是依赖诉诸独立的评判标准，而是靠去吸引传播这些故事的社会群体——就像北爱尔兰流传的谣言那样。正如塞拉·本哈比[20]指出，对于利奥塔理论的支持者们来说，

> 真实的超验确定性消亡了。在语言游戏的痛苦挣扎之中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关于真实，世上没有超越局部话语的统一标准，而只有局部话语之间为获得合法性而进行的永无休止的争斗。
>
> 塞拉·本哈比：《给自我定位》（1992）

因此，后现代主义涉及一种极具批判性的认识论，对任何支配一切的哲学、政治原理都持敌对的态度，强烈反对那些有助于维持现状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然而，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将德里达式的批判和一种更加具有建设意义的颠覆性意识形态结合了起来。他们认识到，指出某人或某种理论在无意之中支持了一个对立的立场（比如丁尼生的例子），很类似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论辩方法。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处于一种“错误的意识”状态：他们赞同资产阶级的说法，认为自己是以自主个体的身份自愿地为市场提供劳动力，但事实上他们却无法挣脱阶级对立结构，而这种结构是由经济决定的。这也就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确认的“真实的权力关系”（一种全然非德里达式的表述）。同样，弗洛伊德理论的支持者们也会认为（与社会认可的观念相一致的）超我和无意识的秘密或受压抑的欲望（比如性表露的欲望）之间的冲突会无可避免地导致内心矛盾，而这些内心矛盾则可以用德里达理论来释读。因此便产生了一种悖论：为了强调内在矛盾这一观念，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恰恰与19世纪两种无疑具有整合性的思想体系结为了同盟。

当然，在指出这些内部矛盾可以瓦解意识形态的同时，并不一定需要提出另外一种可以全面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正如上面我们讨论过的，所有的语言体系从根本上来说都带有隐喻性质，因此其中必定会包含某些矛盾。只要提倡这一论点，就可以对矛盾加以分析从而表明社会对立状态，而没有必要直接提供一个广泛适用的马克思主义式或弗洛伊德式的解决方案。后现代主义的这一特点对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如此一来，这些批评家研究的对象就不必仅仅局限于文本（尤其是诗歌），或某一历史时期（比如浪漫主义时期）——这些对象的矛盾性显然有待发掘——而是可以致力于研究任何材料。哲学的解构主义方法被轻而易举地借鉴到文学理论中，成为寻求悖论、消除隐喻的手法，被批评家们赋予虚张声势的意义。德曼、希利斯·米勒和德里达在耶鲁的其他门徒的著述都将注意力积极投向文学作品以及其他对象中不攻自破的论辩手法 ，尤其是对上面所列举的那类内在隐喻进行分析。他们认

为比喻修辞有着互相矛盾的含义，而这不可避免地损害了艺术，就这样，他们割断了艺术与历史之间任何可靠的联系，拒绝承认艺术可以反映客观真实经验，而这正是关键所在。解构主义背后的哲学通过这种方式使人们对文学理论的兴趣日益高涨，它所关注的问题也逐渐在各个文学批评流派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不管是研究哲学、建立理论还是创造艺术，要使自己免受上述批判，表明自己跟得上最新的理论时尚，了解这种批判，最好的办法是十分注意自己所持立场的公众反应，并对这种立场予以恰当的限定。这种十分重视公众反应的自反性 的外部征兆就是时常求助于元语言，有些人把这种自反性看作是后现代状况下哲学的标志。因此，在大量后现代主义作品中，带有自反性的自我批判或回归已经写入了“文本”。这一点在戈达尔的影片中有所体现。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明信的观点，戈达尔的影片

> 绝对是后现代主义电影，因为这些影片把自己仅仅看作文本，是一种制造毫无真实内容的表征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表面的、肤浅的。正是这一信念，说明了为什么戈达尔的影片具有自反性，它为什么会决定运用表征来反对自己，以摧毁表征那具有约束力的绝对地位。
>
>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引自汉斯·贝尔滕斯[21]：《后现代观念》（1994）

后现代主义意识把作品（哪怕是电影、绘画或时装秀）当作文本，把任何有意义的文化产品看作是其他所有自然语言运用的延续。这一做法避免了现代派所犯的一个典型错误，即赋予个别艺术品及其隶属的组织以“美学”上的优先权。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者声称，任何作品与其他所有文本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延续性。就这样，后现代解构在哲学话语（一种具有高度技术性、不断地回归到同样问题、探求基本矛盾的学科）和艺术话语，乃至社会所有话语之间强行建立了另一种平行的关系。

后现代解构主义认为达成一致、统一论点的可能性十分有限，并怀疑任何作品或文本都或多或少受先前作品的影响，因此人们逐渐认

为所有文本，无论是哲学还是报纸，都涉及一种近乎痴迷的重复，即互文性 。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就一直在费劲地解决同样的老问题。同样，小说也无可避免地复制或再次呈现先前的假设、以往的思想、传统的描述方式，等等。并非只有乔伊斯那部有意让人难以把握的现代主义作品《尤利西斯》能做到这一点。就像一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翁贝托·埃科【22】在他一部极受欢迎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玫瑰的名字》中谈到的那样："书里谈论的总是其他的书，每一个故事讲述的都是已经被讲述过的故事。"这一观点到头来成了一种文本唯心主义，因为据此观点，所有的文本永远指向其他文本，而不是指向任何外部现实 。没有文本能够就自身之外的现实世界构建任何东西。文本永不止息，但是，用德里达的话来说，文本所做的只不过是"播撒"以往建立的概念或观点的变体而已。

重写历史

正如我前面所言，所有这一切活动都使各种形式的现实主义受到批判。尝试任何形式的现实主义就等于陷入哲学错误，因此如果采用当时还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视角来撰写历史，注定会失败。后现代主义思想把所有的对象都当作文本和修辞进行分析，由此将当时依旧具有自主性的知识学科向文学的方向又推进了一步——历史不过是另一种叙事，它的范式结构只不过是一种虚构，受缚于它自己（通常无意识运用的）没有实现的神话、隐喻和陈式。不管原始史料表面看来多么客观、多么有事实依据，最终不过是一系列相互关联、可以进行多种阐释的文本，甚至连历史的因果解释也可以归结为源自众所周知的虚构情节，因而也是对这些虚构情节的重复。

关于历史撰写的这一观点是后现代主义理论最根本的准则，因为它影响着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在后现代主义的审视之下，连历史的撰写都难以满足以往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或"实证主义"标准，那作为与历史更为不同的文学当然也不可能提出任何站得住脚的

现实主义论断。在这里，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根据事实进行客观性 重构这一说法只是个神话而已。历史学家实在无法告诉我们当时或现在的事实真相，用阿伦·芒斯洛【23】的话来说，所有的“意义产生于社会编码或社会构建的话语实践，而话语实践对现实起着巨大的倡导作用，以至于有效地断绝了与现实的直接接触”。因此，从根本上来看，历史只不过是另一种多少能被社会所接受的叙事，力图获得我们的关注和认同；历史不过是另一种表达事物的方式，也许会在讨论和争辩过程中幸存下来，也许不会。此外，历史周详的因果构建和解释本质上和叙事虚构如出一辙。正如海登·怀特【24】写道：

> 历史叙事……是文字上的虚构，内容虚实参半，形式上更接近于文学作品而非科学论著。
>
>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艺术品的历史文本》，收录于他的《话语回归线》（1978）

所有的历史书都在讲述故事，而故事中最基本的证据或事实，比如“拿破仑个子不高”或者“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很美，增一分嫌长”，都可能产生无穷的、引起争议的阐释，同时这些故事也会作出事实性的论断，如“……因此拿破仑好斗以弥补身高缺陷，克娄巴特拉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为这些判断会随之契合到更为广阔、典型的叙事中去：比如，拿破仑的四处征战主要可以看作是性格的体现，而不是由当时的经济条件所决定，又如莎士比亚似乎接受普卢塔克【25】的观点，认为安东尼之所以逃离亚克兴角战役【26】是因为受到克娄巴特拉惊人美色的诱惑。在这里讲故事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是莎士比亚都无关紧要，因为他们都会借鉴当时的传统为他们要讲述的故事确定一个叙事种类或体裁。一些历史叙述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如西蒙·夏玛【27】的《公民：法国革命编年史》（1989）和奥兰多·费吉斯【28】的《一个民族的悲剧：俄国革命1891–1921》（1996）就凸显了这一叙事功能。我们阅读的是故事，但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可以断言这个故事是唯一的，即使他们的目标就是如此。撇开其他因素，“被创造

的”、“被建构的”与“被发现的”、“作为证据的”之间的关系始终会引起争议，并因阐释不同而无从定论。我们极感兴趣的复杂问题更是如此：那些非常简单的陈述可以证明事实和故事之间的关系至少在某些时候是“无可辩驳”的，但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因此而很好地理解撰写世界上人类重要历史这一文化实践，比如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历史撰写和人们对冷战的看法或左翼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党之间的关系，以及罗森堡夫妇【29】是否有罪，肯尼迪是如何在得克萨斯州被枪杀的，等等。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已经充分地证明（从这个视角看）大部分历史陈述都具有文化选择性。

此外，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会使用一种充满转义和隐喻的语言，而这些转义和隐喻又向我们表明历史所关注的远远不止事实的表面意义。这里有待解决的并不只是历史情节的因果关系，而是我们所继承的语言中的一切道路，其中有些符合传统，有些则不那么符合传统。

而根据后现代主义观点，历史的其他特点很可能会随之而来。很显然，如果否定了现实主义历史的可能性，如果认为事实总是只与构建事实的理论假设和对事实的阐释相关，如果认为证据总是随其背景的建构不同而改变，那么所有处理历史证据以及“原始资料”的方法都难以完全摈弃叙事偏见，即便是那些极枯燥无味、看似非叙事性的方法也不例外。历史实质上具有了神话的形式，以虚构的手法明确地展现自我，为历史提供基本的概念结构。如果人们认为使用这种基本的阐释性结构不可避免，那么后现代主义相对论就会成为准则，因为这些相互冲突、从神话演变而来的结构显然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如果我们不能直接接触过去，那么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只可能是相互冲突的故事而已。这些故事由他们的史学叙事者用不同的方式连贯起来，所谓的过去不过是历史学家试图讲述的东西而已，而我们出于种种文化原因对历史学家颇为依赖。不仅如此，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学家们所偏爱的叙事结构总是不可避免且可能会令人不快地带着哲学或意识形态的含义——比如我们在上面例子中提到，历史学家们更看重个人的能动作用，而忽视基础经济结构的作用，这一观念带着过多的

小说色彩和资产阶级特性。

但是，我们在阅读历史时会觉得历史是真实、可靠的，或者觉得它有可能是真实的，这一点又该如何看待呢？就连那些有意识的后现代重构主义者也在想方设法让我们更好地 相信那些他们认为真正发生过的事情。确实也存在着这么一种叙事，多少能够准确进行描述。语言和现实之间确实可能存在着大量的对应关系。几乎没有人会赞同抹杀大家所普遍接受的事实。有些人拒绝承认二战期间犹太人曾遭到屠杀，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证明人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历史学家没有凭空捏造的权利。如果是这样，现实主义小说家也同样没有权利去凭空捏造。他们不仅必须相当了解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东西，更要了解历史学家不知道的东西。后现代主义相对论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 ，也并不认为纪实小说、虚构小说和历史没什么区别。事实上它真正想要传达的意思是，所有的历史学家，不管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经验主义者、解构主义者还是后现代“新历史主义者”，都有一套理论假设来支撑他们所撰写的叙事，而我们必须更加清楚这些理论假设的存在，对其持怀疑态度和相对观点，并且更加重视它们，不能掉以轻心。

这一点对于传统的历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都适用。理查德·埃文在《捍卫历史》一书中曾举过下面这个例子（详见参考书目）。黛安娜·普尔基斯就基斯·托马斯对女巫的描写进行了批判，因为托马斯笔下的女巫通常都是无力、老迈的女乞丐。普尔基斯认为托马斯只不过是在重复着一个“权力授予的神话”，即男性的“历史身份建立在女性的无权和失语基础之上”。而理查德·埃文却认同托马斯的观点，对普尔基斯回应道：“贫穷、单身的老女人经常被指控进行巫术，因为她们根本不是失语，而恰恰相反，她们诅咒那些拒绝施舍的男人。”普尔基斯认为历史叙事应该用来支持赋予女性权力这一当代观念，而托马斯的经验主义论断似乎与她的这一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叙事不可能与“过去”完全对应。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相同的”事件，而我们始终只能间接地获得证据，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透明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不在场、缺失和偏见等因素。尽管

如此，叙事多少还是可以充当（阐释得出的）证据，而且新的证据仍旧可能推翻叙事。此外，并不是叙事的所有文学形式都同样适用于各种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正如芒斯洛所指出的，如果采用传奇文学、滑稽戏、悲剧等形式，就不可能恰当地叙述1944年的华沙贫民区暴动[30]，因而也不可能充分地对之进行阐释。我们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就过去事件的本质和意义进行一番辩论，而后现代主义者（以及其他许多人）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保持这场辩论的开放性和严谨性。如果对此缺乏警惕，就会导致某种“官方版本”跳出来为我们展示一种真实的、最终的过去。一旦社会接受了这一“官方版本”，它很可能会随之登堂入室，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种意识形态显然是失真的，因而让人无法接受。这似乎就是冷战期间交战双方所经历的情况。从这点来看，解构主义历史学家和其他人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喜欢在著述中大声表达自己对这一工作难度的担忧。

抨击科学

后现代主义者在抨击科学的客观性论断时表露了他们最激进的政治观点（同时这也是他们所遇到的最显而易见的困难）。因为科学家们显然认为自己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统一的理论和“宏大叙事”，功不可没，同时他们认为自己正在竭尽全力完整地描绘“那里”客观存在的现象（尽管这一构想背后显然也有带欺骗性的隐喻模式）。我们果真能够对黑洞或n + 四维空间[31]进行“描绘”吗？

科学的论断不能不受到质疑。然而除了那些相信创世论[32]这类让人更加难以信服的权威叙事的人以外，有谁能严正地抵制进化论这一“宏大叙事”呢？又有谁会想要否认物理学基本原理？答案就是：“某些后现代主义者”，他们主要的政治依据就是认为科学思想的等级分类逻辑本身是一种令人反感的压制行为。譬如布鲁诺·拉图尔[33]（荒谬地）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授权社会学（sociology of delegation）作出了贡献”，因为它涉及这篇科学论文的作者爱因斯坦

在想象中授权观察员对事件定时进行测量，随后又通过理论来表明这些事件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拉图尔似乎认为社会概念能够解释基础科学。

我们许多人都认为科学家是具有真知的人：他们揭示自然的本质；他们对于因果规律的了解使我们得以研制出像集成电路板这样意义重大的发明；他们关于证据、证明和普遍共识的标准最终控制着他们的研究所遵循的范式或概念框架。这些标准是（或者理应成为）我们所知的最佳标准（这远优于现代经济学家中所盛行的标准）。这就是诺贝尔奖的意义所在。

但是后现代主义者并不喜欢这一描述。他们对以往科学家所作的基本论断进行了抨击：

论断一：科学家可以客观、真实地描述和分析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因此他们的描述和分析带有普遍适用性；

论断二：他们的科学探索是对现实真相的客观探求，因此同样具有普适性，因为它们无论在哪里都是真理，不受局部文化限制的影响，尤其不受任何潜在的道德或意识形态诱因的影响，虽然很可能正是这些诱因激发了科学家的探索和发现。

后现代主义者是高明的相对论者。他们认为科学家不可能享有这类特权，因为科学家所倡导的不过是“许多故事中的一个”而已，他们的自命不凡是没有道理的。他们与其说是“发现”，倒不如说是“建构”了现实的本质，因此他们的成果也同样会受到种种潜在的偏见和隐喻的影响。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后现代主义分析揭示了这些偏见和隐喻存在于哲学和普通语言中。因此，关于科学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它言过其实地（逻各斯中心主义地）自称掌握了真理，还在于科学的制度化地位和运用受到有权精英阶层意识形态的影响，产生了政治问题。这是我们所遭遇的相对论中最极端的版本，因为对科学的抨击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现实世界的哲学建构问题（在这一点上始终都存在争议）；更重要的是它抨击了对世界的实证分析（不仅包括航空技术以及炸弹制造，也同样包括医药和计算机研发等领域），而这些实证分析一向都被认为在追求“真实”方面最为成功。

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在考虑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这一攻讦时，有必要将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这两个问题尽可能分开讨论。当然，后现代解构主义者及其支持者想要表明的是，从他们的立场来看，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这两个问题密不可分。但是我拒绝简单地接受他们的观点。因为科学发现的动机 和后续影响容易在伦理和政治上受到批判，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并不新鲜。许多原子弹研制者，尤其是罗伯特·奥本海默[34]，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同样不可否认，量子力学、基因工程以及关于全球气候的科学研究与资助和追求西方政治、军事目标之间确实存在着种种耐人寻味的非常关系。但是，接受这些背景判断并非一定意味着科学家所进行的核心活动没有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成功地找到最为可靠的分析自然的方法。科学家寻找因果规律或统一的理论，质疑原子是否真的遵守量子力学原理。如果认为他们的这些活动从某种角度来说本质上固有“资产阶级”、“欧洲中心论”、“男权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特性，这种想法是极为荒谬的。

这至少部分是因为科学真理与政治和宗教真理不同，科学真理在所有科学家面前都同样令人信服，无论是社会主义科学家、非洲裔科学家、女权主义科学家，还是和平主义科学家（尽管上述几类科学家中有人否认这一点）。经验主义科学家只承认带有这种普遍适用性的真理。阿司匹林在哪儿都有效，这是他们不愿用（政治或文化）相对论看待的事物之一。每个科学家都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政治压力下的科学研究（比如前苏联官方对李森科遗传学说[35]的看法）是有害的，当然也有一些可望带来益处（如艾滋病研究）。尽管如此，此类研究结果只有经得起常规的测试，不受任何政治背景的影响，才可能在科学家这个群体内长久有效。

正如艾伦·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36]这两位物理学教授令人震惊地指出，那些批判科学的后现代主义评论家通常不懂科学的经验主义论断，也不了解科学理论关键术语是如何使用的。因此他们在政治领域中运用科学思维模式时，通常会故意用隐喻来加以代替，而这些隐喻既有很强的倾向性又模棱两可，容易引起歧义。这样做的结果用索卡尔和布里克蒙的话来说就是“神秘化，故意使用晦涩的语言，思路

混乱，误用科学概念”。比方说，让·博德里亚[37]声称，海湾战争中，“事件的空间成了有着多重折射的超空间，并且战争的空间最终成为非欧几里得空间[38]”。索卡尔和布里克蒙对此评论道，这里说到的“超空间”这个概念“在数学和物理学中根本就不存在”，而探求欧几里得战争空间是个什么样子也毫无意义，更别说是去对博德里亚因误解、误用科学术语而刚刚“发明”的空间进行假设了。

因此，科学家可以对后现代主义者作出一种回应，即认为虽然后者对科学社会学或科学政治学的兴趣或许很有价值，但是他们并没有透彻地理解科学真正的运作规律，也不了解科学想要确立的真理的本质。这种针锋相对的反击和英美传统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指责如出一辙，因为这些哲学家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也同样对逻各斯中心论哲学的运作规律和成就不甚了解，而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那些最负盛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除了相互之间的交流之外，似乎没有兴趣与其他任何人进行建设性对话。他们急切地拥抱看似“政治正确”的观点，而这种做法导致他们在描述、评论科学家的工作时显得极为离奇怪诞、孤陋寡闻，更不消说还带着政治偏见。这便是索卡尔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著作的主要任务（1994年后尤其如此。当年索卡尔发表了一篇文章，以戏谑的口吻对科学活动进行了描述，里面充斥着可笑的基本科学错误和不合逻辑的推论，却发表在后现代主义刊物《社会文本》上[39]。）

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很多批判试图证明西方经验主义科学活动带有内在政治特征，而这些批判不仅仅显得孤陋寡闻，更具有匹克威克式特点[40]，因为它们喜欢将隐喻和类比直接运用到科学发现中，如果采用上述解构主义方法进行分析，科学似乎隐含着某种政治声明或政治立场，但事实上这和它们试图确立的真理毫不相干。

譬如，人类学家埃米莉·马丁[41]写过一篇题为《卵子和精子》的文章，曾被大量引用。该文认为，“不管是科普类还是专业类的生殖生物学，在描述卵子和精子时都采用了一些陈式化思维，这些陈式化思维对于我们的文化如何定义男性和女性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些陈式化思维不仅认为女性生物过程不如男性生物进程重

要，而且认为女性不如男性有价值。”这类文献往往声称，我们拥有的是一个“被动的”、“腼腆少女般”的女性卵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主动的”、“具有男性气概的、强健的”男性精子，而且确实有一些教科书似乎也采用了这种带有强烈倾向性的形象描述。但是问题还不止这些。后现代主义评论家认为，那些信奉父权制的科学家的假设带有主观色彩，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因而在精子和卵子的关系问题上出错是不可避免的。而今的观点认为（女性的）卵子主动地“抓住（男性的）精子”（在此之前精子经历了长途跋涉）。但是当初真的是宣扬男性优越性和侵略性的男性意识形态偏见阻隔了这一新的观点吗？在描述科学活动时提出这些偏见或许导致了上述阻隔是否合理？（当然，男性偏见确实阻隔了对女性生理学的充分研究，这一点我无意否认。）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各种关于卵子和精子的描述与关于性别的陈式化思维之间存在的隐喻共鸣——比如，斯科特·吉尔伯特[42]在此基础上（粗俗地）写道“受精就像是一场粗暴的轮奸”——“卵子就是一个妓女，磁铁一样地吸引士兵”，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共鸣其实是夸大其词，因为事实上严肃的科学著述在讨论这一论题时从未真正使用过类似的表述。尽管这些隐喻性阐释是后现代主义者关注的典型话题，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阐释相比较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也是愚蠢的，不可能深入下去，因为如果有人希望概括任何一方关于精子和卵子间关系的观点，并将其引申来证明或解释更大范围的男女间关系时，必定会表达一种可笑的本质主义——“从精子和卵子开始，就一直是这种状况。”这种做法恰恰忽视了一点，即在男性–女性关系中还存在着调整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它还对科学作了另外一种更具破坏性的暗示，即科学并不客观，而“新的”发现纠正了科学工作中的男权主义偏见。但是，正如保罗·格罗斯[43]指出，宣称男性科学家一向忽视女性卵子的积极作用，直到在女权主义者的敦促之下才予以承认，这是相当错误的。早在1919年贾斯特[44]（引用一篇1878年发表的论文）就已指出卵子将精子“拉进去”或者“吞没”。格罗斯称1920年之后这种观点在教科书上就颇为常见了。

所有这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论点现在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美文化对自然科学的看法，对自然科学的怀疑日益加深，且观点越来越政治化。

当然，我也在此画蛇添足地补充一点：在后现代理论盛行的时期，“现实主义”历史和小说写作、电影制作、科学研究以及新闻报道也仍然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行进。它们得到普遍认可，因此许多被后现代主义艺术和理论所吸引的人们一定已发觉自己生活在两个相互对立的认识论世界中。

后现代主义者和其他哲学、理论、历史和科学等领域的学者之间的这场论战，其根本矛盾在于统一的论调与矛盾主义的言论间的对立、合作建构与个人主义解构之间的对立。但是每一方都离不开对方。后现代主义者采用自由主义立场，反对所有整体论解释（尽管他们有时倡导的观点又与弗洛伊德理论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一致，从而暗中让整体论从后门进入），而他们进行的后现代主义批判具有对抗、否定的特性，在很多方面都能够极大地解放思想，至少对女性、少数族裔以及许多先锋艺术来说确实如此，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将会谈到。也许可以将某些艺术家的观点看作“嬉戏”，但不能这样看待历史学家及科学家的观点，更不用说律师的观点。律师很难将后现代主义怀疑论运用到法律证据中，也不会怀疑，设立法庭的目的就是以某种方式对所发生事情的两种不同陈述进行检核，以确定这两种陈述各自的真实性和可能性。

相比较而言，后现代主义批评手法在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中的运用要成功得多，比如对父权制“宏大宣叙”的“消解”以及帮助妇女反抗父权制统治等。现在我就将讨论的话题转向这些伦理及政治问题。

注释

【1】 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法国当代哲学家，后现代哲学与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力图解构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整体性观念，倡导思想的异质性，代表作有《话语、形象》、《力比多经济学》、《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公正游戏》、《漫游：律令、形式、事件》、《非

人：对时间的反思》等。

【2】 拉什迪（Salman Rushdie, 1947–）：印度裔英国小说家。1988年他出版小说《撒旦诗篇》，其中一些情节涉及先知穆罕默德，激起各地穆斯林社团的愤怒。1989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公开谴责此书，并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将其作者“处死”。

【3】 摩尼教（Manicheanism）：3世纪由摩尼（Mani）创立于波斯的二元宗教，宣扬善恶二元论，这里指的是西方仇恨共产主义的冷战思维。

【4】 赛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巴勒斯坦裔美国文论家、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代表作有《开端：意图和方法》、《东方主义》、《文学和社会》、《世界、文本、批评家》、《文化和帝国主义》等。

【5】 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英国小说家和散文家，“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主要作品有小说《霍华德别业》、《印度之行》等，反映了20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

【6】 神话即历史论（Euhemerism）：亦译为欧伊迈罗斯主义，是古希腊神话作家欧伊迈罗斯（Euhemerus）所持的理论，认为神话中的角色和事件均系历史上人物与事件的纪实，神由英雄人物或征服者演化而成。

【7】 哈内姆（Kuchuk Hanem）：19世纪埃及著名美女和舞女，曾出现在法国作家福楼拜和美国探险家科蒂斯的游记中。哈内姆在福楼拜关于东方的描述中是一个关键人物，几乎成为东方的象征。

【8】 科雷（Louise Colet, 1810–1876）：法国女诗人，一度成为法国作家福楼拜的情妇。

【9】 唯名论（Nominalism）：认为人们用来表示事物的形式和词所指的事物之间并无内在联系，人们用词是习惯和惯例任意选择的结果。

【10】 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英国女作家，本名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开创了现代小说心理分析的创作方法，注重人物性格和环境的描写，代表作有《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米德尔马契》等。

【11】 这里提到的阿齐兹和菲尔丁都是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中的人物。

【12】 阿比什（Walter Abish, 1931–）：美国实验派小说家，著有《决斗现场》、《按字母排列的非洲》、《有多么德国？》、《日蚀热》等。

【13】 巴特尔梅（Donald Barthelme, 1931–1989）：美国后现代派代表作家之一，认为“拼贴画的原则是20世纪一切艺术的中心原则”，著有多篇短篇小说以及《白雪公主》、《亡父》、《天堂》、《国王》等长篇小说。

【14】 费德曼（Ray Federman，全名Raymond Federman, 1928–2009）：美国作家，出生于法国，对小说、散文、诗歌、文论等都有涉猎，以实

验风格著称，著有《双倍或零》、《要就要，不要拉倒：一部小说》、《超小说：当今和未来的小说》、《批评小说：后现代主义散文》等。部分黑体字喻指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著作的书名，分别是德勒兹的《意义之逻辑》、福柯的《词与物》（即《事物的秩序》）、德里达的《论书写》和《写作与差异》。

【15】 乔治·莱考夫（George P. Lakoff, 1941–）：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教授，主张隐喻在人类思维、政治行为和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马克·约翰逊（Mark L. Johnson, 1949–）：美国俄勒冈大学哲学教授。二人于1980年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突出了人类思维的隐喻性，被称为认知科学的经典。在这本著作中，他们将西方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主要观点归结为客观主义。

【16】 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英国诗人，其诗作形式完美，音律和谐，辞藻华丽，被封为桂冠诗人（1850），主要诗作有《夏洛蒂小姐》、《尤利西斯》以及组诗《悼念》、《国王叙事诗》等。

【17】 节选自丁尼生的诗作《伊莎贝尔》。

【18】 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 1929–）：德裔美国文论家，解构主义文论的领军人物之一，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有时被认为是耶鲁学派成员，但以独立的风格著称，著有《挽救文本：文学、德里达、哲学》、《文化的重要问题》、《丧钟》、《精神的伤痕》等。

【19】 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理论家，耶鲁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盲目和洞见》、《抵制理论》等。米勒（Hillis Miller, 1928–）：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耶鲁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英文与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文学中的话语行为》、《论文学》等。

【20】 本哈比（Seyla Benhabib, 1950–）：生于伊斯坦布尔，现为耶鲁大学政治学和哲学教授，擅长将批评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结合起来，著有《他者的权利》、《文化的权利》、《批评、规范、乌托邦》等。

【21】 贝尔滕斯（Hans Bertens, 1945–）：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化研究，著有《文学理论基础》、《后现代观念》等。

【22】 埃科（Umberto Eco, 1935–）：意大利中古史学家、符号学家、哲学家、小说家，著有小说《玫瑰的名字》以及大量散文。

【23】 芒斯洛（Alun Munslow, 1947–）：威尔士史学家、教育家，现为英国齐切斯特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解构历史》、《话语与文化》、《新历史》、《叙事与历史》等。

【24】 怀特（Hayden White, 1928–）：加州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兼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知名史学家，著有《元历史》、《形式的内容》、《形象现

实主义》等。

【25】 普卢塔克（Plutarch，约46–约120）：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一生著有大量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26】 亚克兴角战役（the Battle of Actium）：公元前31年，古罗马屋大维和安东尼为争夺国家最高权力而在希腊的亚克兴海角进行的海战，屋大维获胜，后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因此该战役标志着罗马共和国的结束及罗马帝国的开始。

【27】 夏玛（Simon Schama, 1945–）：美国历史学家，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和艺术史教授，著有《地貌和记忆》、《绝对肯定》，英国广播公司系列节目《英国史》的撰稿和主持人，曾是《纽约客》的艺术和文化批评家。

【28】 费吉斯（Orlando Figes, 1959–）：英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俄国现代史，现为伦敦大学教授，常为《卫报》和《伦敦书评》撰写书评。

【29】 罗森堡夫妇（Julius Rosenberg, 1918–1953; Ethel Greenglass Rosenberg, 1915–1953）：美国共产党人，被指控向前苏联提供核武器情报而被送上电椅。此事当时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争议。

【30】 华沙贫民区暴动：二战期间，波兰有300万犹太人，华沙的犹太区最大，有40万居民。1942年9月纳粹开始把犹太区居民赶往集中营，此后两个月间有30万人在毒气室遭到杀害，于是剩下的居民开始武装反抗，最大规模的起义发生于1943年4月10日至5月16日（原文日期恐有误），遭到德军镇压，1.3万人在战斗中死亡，剩下的5万余人后来大部分死于毒气室。

【31】 n + 四维空间：爱因斯坦提出四维空间，后来的物理学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多维空间”（n + 四）的观点，即在爱因斯坦四维空间之上进一步提出五维、六维等多维空间。

【32】 创世论：认为宇宙起源、生命起源、人类出现等都由超自然的神所创造。这种理论由来已久，但进化论出现后成为与之相对立的一种理论，如近来美国的“智能设计运动”（Intelligent Design Movement），鼓吹把上帝造人论带入课堂。

【33】 拉图尔（Bruno Latour, 1947–）：法国当代科学社会学、科学人类学学者，著有《行动中的科学：如何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了解社会》、《我们从未经历过现代时期》、《自然的政治：如何在民主中引进科学》等。

【34】 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 1904–1967）：美国物理学家，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35】 李森科遗传学说（Lysenkoism）：前苏联农学家李森科（1898–1976）创始的遗传理论，攻击孟德尔学说，在20世纪30–60年代曾主导前苏联生物界。

【36】 索卡尔（Alan Sokal, 1955–）：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反对人文学科中的“主观主义倾向”。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 1952–）：比利时理论物理学家，天主教鲁汶大学物理学教授，和索卡尔合著过《时髦的胡言乱语》一书。

【37】 博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法国文化理论家、哲学家、政治评论家、摄影家，他的作品常涉及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著有《物体体系》、《象征交换与死亡》、《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波斯湾战争没有发生》等。

【38】 非欧几里得空间（non-Euclidean space）：在一个平面上，欧几里得（古希腊数学家）空间通过已知线以外的给定点可以引出一条与它平行的线；但在非欧几里得空间，引出的则不是平行线，而是椭圆几何线（两线必然相交）和双曲线几何线（两线渐行渐远）。后现代艺术把这种抽象空间理念用到艺术创作中，后现代文学也有模仿，但是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科学概念的“借用”是在曲解自然科学，故弄玄虚。

【39】 即1996年的“索卡尔事件”（原文时间疑有误）。索卡尔在观点荒谬却极为雄辩的长文《超越疆界：对量子论和万有引力理论的变革性阐释》中，吹捧后现代相对主义，旁征博引波尔、海森伯格、量子力学、模糊数学等当代科学新理论，批判“男人、白人、资本主义”世界观，肯定女权主义等进步理论。此文在后现代重要学术杂志《社会文本》刊出后，索卡尔随后又在学术杂志《通用语》（*Lingua Franca*）上撰文，逐点披驳前文的逻辑混乱和文理不通，造成轰动，令后现代主义阵营颇感尴尬。这一事件引发了90年代后现代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展开科学理论本质是什么的论战。

【40】 匹克威克是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人公，生性宽厚憨直。

【41】 马丁（Emily Martin, 1944–）：美国人类学家，现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著有《身体里的女性》等书。

【42】 吉尔伯特（Scott Gilbert）：美国生物学家，现为斯沃斯默学院生物学教授。

【43】 格罗斯（Paul Gross）：美国生物学家，现为弗吉尼亚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

【44】 贾斯特（Ernest Everett Just, 1883–1941）：美国生物学家。

第三章

政治与身份

是的，我本可以成为一名法官，但是我未能掌握拉丁语，未能掌握审判时要用到的拉丁语。我就是拉丁语学得不够好，通不过严格的法官资格考试。这些考试以严格著称。人们晕头转向地走出考场，说道："我的天哪，考试太难了！"——于是我成了一名矿工。

彼得·库克[1]：《边缘之外》（1961）

后现代主义在伦理方面最重要的论点涉及话语和权力的关系问题。这里的"话语"指的是一套长期演变而来的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陈述，用来定义和描述某一主题。大致说来，话语是主要知识学科的语言，如法律、医学、审美判断等领域中的"话语实践"。律师、医生以及其他人使用的这些话语并不仅仅是默认某种占支配地位的理论，接受其指引（比如，表现为从事正统科学研究者所使用的范式）。这些话语还涉及引起政治争议的活动，不仅因为它们在对人群进行描述和界定时所持的那种肯定语气——如谁是"移民"、"寻求政治避难者"、"罪犯"、"疯子"或"恐怖分子"——同时也因为这些话语还表明了其使用者所拥有的政治权威。

囚犯：上帝是我的法官，我的主啊，我没有罪。
法官：他不是。我是。你有罪。六个月监禁。

语言的力量

凡是比较系统地使用语言的行为都可以视为具有赋权的功用。你相信年轻医生说的话，同意让他对你施行麻醉、切开你的身体、帮助你康复。在某一社会群体中，那些被赋予权力而使用话语的人包括医院、法庭、考试委员会以及像我这样著书立说的教授，他们所拥有的权威通过话语的语言游戏得以表达和实施。同时话语的语言游戏也可以用来对那些游离在这一话语圈子之外的人——如女巫、麦斯麦疗法催眠师、信仰疗法实施者、同性恋者、共产主义同情者、无政府主义

异见分子等——进行压制、排斥或者边缘化。上文我们讨论过后现代主义和哲学主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就是其中之一。

米歇尔·福柯在研究法律、刑罚和医药等行业史时，对话语和权力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极具影响的分析。很显然，这些权力话语的目的就是要排斥和控制一些人，比如被诊断为疯子和病人的犯罪行为实施人。福柯认为这些排斥行为以如下方式产生：

> 虽然普遍的法律形式确保一种原则上平等的权利体系，但是这一法律形式却得不到那些精细的日常物质机制的支持，得不到那些微观权力体系的支持，因为这些微观权力体系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也是不对称的，我们称之为“规训体系”，如考试、医院、监狱、工场的规章制度、学校及军队等。
>
>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7）

福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自下而上分析权力，而不是仅仅将权力看作上层阶级利益自上而下的强行实施。他试图表明，行使权力的愿望总是能够击败人道平等主义，并暗示虽然启蒙运动以普遍原则和理性为基础，但却也始终有着极权制的苗头，因为追求永远正确的理性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控制机制，把那些它认为非理性的东西边缘化，并加以排斥。福柯认为，这些预设的非理性包括欲望、感情、性、女性气质和艺术。

福柯极为反对改良主义——他是个反对辉格党的历史学家，记载了“无自由”的兴起。在此过程中，他寻求他自己称之为“认知素”的东西，即对隐含在特定社会历史状况背后的知识秩序所作的假定，而这些假定多半是无意识的。这些都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因果”状况，“限定了某个知识领域的全部经历”，对这一领域中物体的存在模式进行定义，并“为人类的日常感知提供理论力量”。同时，它们还界定了在哪些状况下话语具有“真实性”。我们需要在历史中对此进行发掘，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认知“考古学”。这些状况潜藏在感知之下，并不总是一目了然，因此认知素是一个时代的某种认知潜意识。

福柯从左派的视角对所有这些材料进行了批判，以揭示其排斥了

什么事物，排斥了什么人，采用的又是何种方式。从根本上说，权力和知识相互作用，比如受过医学专业训练的“理智”的人们把自己与那些“没有理智”的人区别开来，并在作出判断之后将后者关进疯人院。性别歧视者、种族歧视者以及帝国主义分子都采用相似的手法——他们先让自己的 “正常化”话语占上风，并通过这种方式创造、分化出“异常者”，也就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他者 。而事实上，那些被排斥在这一话语之外的人的隶属身份正是由“正常”话语协助创造 出来的。

福柯通常列举同性恋者、女性、有罪的疯子、有色人种以及囚犯作为“他者”的典型例子。这种敌视和反感在学校、军队以及帝国统治过程中确实十分明显，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潮激发起大量针对“后殖民主体”本质的研究。在这里，后现代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语言学分析为基础——这一点我们在讨论德里达和巴尔特时已经有所涉及。人成了符号，成了语言游戏的一部分——因此就有了劳拉·马尔维 [2] 那篇一再被引用、多次再版的文章“视觉快感和叙事影院”，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太过于自信的推论：

> 因此，在男权文化中，女性作为男性他者的能指而存在，受象征秩序的束缚。在象征秩序中，女性只能保持沉默，安分守己地承受意义，而不能创造意义。而男性则可以在这一秩序中通过语言将自己的幻想和癖好强加到沉默的女性身上，借此来体验这些幻想和癖好。
>
> 《荧屏》，1975年秋季第16卷第3期

就这样，我们通过语言创造出了人（就像我们通过语言创造出大学和欧元一样），但是后现代主义者从这一点出发，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更具普遍意义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话语”就像是德里达理论中的语言——它并不属于那些拥有话语控制权的个体，而是超越了这些个体。它也不仅仅存在于像法庭这样的正式语境中，而是遍布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法官的判决书到科学刊物、电视广告、流行歌曲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大幅广告。一种话语越是在某一群体或社会中占支

配地位，它看上去就越“自然”，也就越会使用自然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自然”总体而言似乎在宣告某位神灵的权力秩序或科学家们发现的潜在秩序；“自然”似乎在遏制“白种人以外的人种”、女性、疯子，认为这些人生来 （亦即自然地）就比“我们”更具有兽性，更缺乏理性，等等。正如德里达和福柯指出，这些压制性规范通常是我们语言中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而我们内化了这些规范，往往意识不到它们的来龙去脉：我们在无意中接受了这些规范，误以为它们就是关于自然的事实，但实际上它们不过是我们关于自然的讨论而已，带有心理上和政治上的主观因素。

比如，在福柯的笔下，精神病院受医生话语所操控，反映出它周围资产阶级社会的专制体制。精神病院是一个家庭、越界和疯狂关系的微观世界。另一方面（确切来说是从左的方面），福柯赞同“愚昧”，反对资产阶级理性。尽管他的精神病院史研究并没有理应具有的实证基础，但是他关于权威和权力的政治观点却击中要害。如同20世纪60年代的很多人（如分析家R. D. 莱恩[3]在他的著作《分裂的自我》以及肯·凯西[4]在他的小说《飞越疯人院》中所描绘的），福柯也将疯子看作社会的受害者，强调社会没有认识到疯子也同样是极为不幸的个体。他对监狱也作了类似的分析（和同样过于宽泛的总结），认为监狱揭示了周围社会的“监狱性”这一根本属性。福柯对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年》进行了卡夫卡式的改写，在那里，社会深受“普遍全景敞视手法”[5]之害。我们所有人都处于秘密的审视和控制之下。但这等于把社会常用的控制形式，如按常规工作、接受监督等和坐牢当成一回事。然而，“社会”和“监狱”并不是一回事。

我在上文已经列举了一些滥用权力的常见例子。这些事例违背了启蒙运动关于普遍公正和个体自主权的理念。但是福柯没有从伦理 的角度对权力进行整体描述，这是他的诸多不足之一。福柯要的是“斗争”，而不是臣服，但他没有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对他来说，“权力”就像是一种电力，像重力一样必然伴随着人类的一切活动。尽管福柯的思想以左翼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为先决条件，但是他回避作明确的政治评论，避免涉及道德理论。因此，尽管他是

个标准的“抵抗者”，但他所做的不过就是和利奥塔一样，提倡小范围的局部改革。正如特里·伊格尔顿[6]所言：

> 福柯之所以反对某些权力当局，不是出于道德原因……，而仅仅是因为它们握有权力，因此从某种模糊的自由论立场来看带有压迫性。
>
>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幻象》（1996）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福柯在讨论话语的功能时，没有考虑到话语事实上需要通过个体发挥作用，因此他低估了个体能动性和个体责任的重要性。在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中，当安杰洛对伊莎贝拉说“判你哥哥有罪的不是我，是法律”时，我们都知道不应该相信他的话。福柯理论的追随者认为，做出可怕事情的与其说是某一个体，倒不如说是浸染他／她的权力话语。就这样，福柯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提供了一个复杂的、以语言为基础的版本——他把个体的阶级身份和职业身份看作“话语”，认为这些身份本身就带着罪恶，与他／她的个体行为是否道德无关。

本书的读者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政客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了，甚至也不愿意为下属承担责任。此外，他们还经常表达带着极度偏见的观点，并借口说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很多”，而这很多人指的或许是新移民、寻求政治避难者或另一族裔的邻居们。这些政客以这种方式表明他们只是在传达那些有重要政治意义的观点而已。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他们只是话语的载体。当他们的行为遭到质疑时，他们不是简单地说“我没做”或“我做了”，而是声称他们的行为不过是传达观点，而关于这一行为的话语足以为他们所做的开脱责任。在此程度上，他们的确证明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存在着福柯式的认知素，并显示出用固有的政治化而不是道德观点看待个体责任会带来的种种弊端。

自我和身份

分析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由它产生出一种关于自我本质 的独特观点，挑战了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信奉的个人理性主义以及他们所强调的个人自主性。确实，后现代主义者在描述个体时喜欢用的术语不是“自我”，而是“主体”，因为后者不动声色地让你注意到人们“被臣服”[7] 的状况，不管人们是否了解这一点，那些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权力话语在他们生活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而他们被这些权力话语所“控制”（如果你政治上偏左）或“构建”（如果你立场中立）。

福柯以及那些和他有着同样思想的人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们在对权力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之后，紧接着又作出了一个更具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论断——他们认为这些话语会使受其影响者对某一特定身份 产生需要，或者要求他们采用这一特定身份，甚至会把这一身份强加到他们身上（这么多的可能性体现了这一说法的重要性）。用后现代术语来表达，就是话语“建构了主体 ”。当然，机构及其话语要求人们成为某种特定的人，“融入”进去，人们对这一事实并非全然不知。凡是受过学校教育、参加过运动队、加入过军事机构或者在医院生过孩子的人都或多或少对此有所了解，更别说是读过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机构人”[8] 社会学的那些人了。但是后现代主义论点尤其微妙。当我们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时，我们不仅仅扮演角色 ，我们的身份，即我们对自我的观念，也成了有争议的问题。当然，这其中不仅包括那些（在宗教中或者从弗洛伊德理论到心理呓语[9] 疗法中）直接与身份相关的问题，也同样包括一些貌似与身份没有直接联系的问题，比如女性观众在观看一部以男性为主的好莱坞影片时对片中女主角扮演角色的回应，抑或她们在男性主导的博物馆中观赏裸体绘画时的感觉，抑或青少年在电视机前的反应。所有的话语让你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还是照我一贯的做法，引用一些日常发生的只需凭直觉就可以理解的事例，而不是众多后现代主义学术著作中常见的那些极为深奥的理论化例子。）

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们又进一步就“主体”的本质作出了一些政治论断。其中之一认为，事实上是那些存在于个体之间及个体内部的相互

矛盾的权力语言建构了自我。根据这一观点，主体不可能像约翰·罗尔斯和托马斯·内格尔【10】等信奉英美康德主义传统的道德哲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可以“脱离”社会实际现状，以一种理性、自主的观点对社会现状加以判断。比如，男性个体的思想和语言措词被认为是受到毒害的父权话语模式的一部分，这些话语总是相互矛盾，而这一男性个体只不过是这些话语的附属品而已。这种观点背弃了康德关于统一自我的理念，而赞同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弗洛伊德模式的更新和发展，认为人们经历着系统间的内部矛盾。用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教授塞拉·本哈比的话说（而她在表达这一观点时同时采用了德里达和福柯关于语言的术语）：

> 主体被一个由结构、对立和差异构成的体系所置换，而要想理解这些结构、对立和差异，就不要把它们看作是现有主体性的产物。你和我仅仅是这些相互矛盾的权力语言存在的“场所”，而“自我”也不过是语言中的又一个位置而已。
>
> 塞拉·本哈比：《给自我定位》（1992）

这一关于个体本质的观点所带来的后果可以在很多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中非常清晰地看到，而在这个方面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与同时期一些作家，如安格斯·威尔逊、艾丽斯·默多克、约翰·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思以及索尔·贝娄【11】等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小说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对于琳达·哈钦【12】这样的文学批评家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来说，像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这类小说挑战了“人文主义关于统一自我和完整意识的假设”。后现代主义小说

> 质疑了整套相互联系的观念：自主、超验、确定性、权威、统一性、整体化、体系、普遍性、中心、延续、目的论完整性、等级制、同质性、独特性、起源等，而这些观念已经和我们便利地称之为自由人文主义的东西联系起来了。
>
> 琳达·哈钦：《后现代主义诗学》（1988）

因此，在许多近期发表的美国小说中

关注的中心不再是人物的心理（不可缩减的本质、一些“人性”的东西），而是转移到人物这个概念的不足之处，认识到主体性是多重交叉话语的痕迹，是非统一、相互矛盾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痕迹，是关系体系的产物，而关系体系归根到底是话语本身的产物。

彼得·柯里：《古怪的自我》，收录于布雷德伯里[13]和帕尔默主编的《当代美国小说》（1987）

一个颇有影响的经典例子是约翰·巴思[14]的短篇小说集《迷失在游乐宫》（1968）一书中的同名短篇小说。故事的叙述者安布罗斯描述自己在写题为《迷失在游乐宫》的故事时遇到的困难，该故事中的人物就叫安布罗斯，在游乐宫里迷了路。按照叙述者安布罗斯的构思，故事人物安布罗斯和他的家人一起在游览大洋城，时间是上一次战争期间，其中一项活动是去游乐宫。但是对他进行描述的作者始终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而且他在讲这个故事时遵循了文学传统。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真正的对话，基本没有知觉细节，也没有任何主题。”安布罗斯只不过是其作者故事中的一个功能而已，因此“一个可能的结局就是让安布罗斯在黑暗中遇到另外一个迷路的人”。我们自始至终都不会为假象所蒙蔽，认为安布罗斯具有任何自主性，相反，我们乐于（相当真实地）看到他是正在描写他的作者创造出来的。这个作者的所作所为也像一个模式化的作者，似乎企图将他在写作班上学到的正确叙述原则运用到写作中去（这一点在故事中有所体现，如作者就斜体字的作用所发表的看法，以及就自己的故事缺乏情节高潮而发出的感慨）。

小说人物如此，作者同样也是如此：作者既用语言表述，也被自己使用的语言所表述（比如写作学校的语言）。而这也同样适用于读者，因为读者的处境并不比作者好到哪里去，他们同样“散布在语言的间隙之中，陷入并最终迷失在无穷无尽的意义传递之中”。根据这一观点，一个“人”

不是一个统一体，没有自主性，而是一个过程，自始至终处于构建之中，始终充满矛盾，随时会产生变化。

凯瑟琳·贝尔西[15]：《批评实践》（1980）

后现代主义认为人的身份本质上和小说一样是建构出来的，这一观念在视觉艺术中也有所体现，比如辛迪·舍曼[16]的系列照片《无题电影剧照》（1977–1980）及其后续作品。在这些照片中，舍曼或多或少改变了自己的形象，装扮成不同的女演员，在不同的场景中穿着不同的服装，而这些手法在电影艺术中都非常典型甚至已经陈式化了。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她借用了电影艺术话语，在剧照拍摄中扮演各种不同的人物，但是关于女性气质的所有版本（往往带着讽刺或戏仿意味）在一种大众媒体的多种话语中同时得到体现。当然，这只是另一种表演而已，但这些照片并非以某一特定影片为基础，把它们放到一起便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舍曼如何能或又如何不能在扮演这些不同角色的同时还保持一个根本的身份？与此同时，它们还对“真实的”舍曼这一观念提出了质疑。哪些照片能让我们确信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舍曼？是开放的那张，还是真诚的那张？是动情的那张乃至全裸的那张？但是所有这些形象只不过是另一种惯例、另一种话语产生的结果而已。

图3、图4　辛迪·舍曼：《无题电影剧照》（1977）
希区柯克和安东尼奥尼 [17] 的影片中辛迪·舍曼可能会以这样的形象出现；但事实上她没有出演过这些电影。

罗兰·巴尔特认为，理想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品之所以接受这些策略以及对人类身份和话语的调侃式限制，正是因为这种调侃和分裂有着它们想要取得的道德意义。康德认为人具有统一性，这一观念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和正统的道德规范，而后现代主义艺术恰恰摈弃了这种观念。

文本的愉悦并不偏爱某种意识形态，反对其他的意识形态。但是，这种不予取舍的做法不是出于自由主义，而是出于悖论：文本和文本的阅读是相互分裂的，而被克服、被分裂的正是社会要求每一个人类产品必须具备的道德统一性。

罗兰·巴尔特：《文本的愉悦》（1975）

巴尔特本人极为含糊的理论在其“自传体”作品中得到了例证，尤其是他在《恋人絮语》（1977）中对自己带有虚构成分的刻画。小说

中法文原文的语法（就像奥登[18] 爱情诗中所用的语言一样）十分巧妙地模糊了主人公的性取向。他的自传《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1975）开篇就在引言中宣布“必须把所有这一切都看作出自小说人物之口”。因此这部书中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巴尔特“自己的”（亦即作者的）声音，这是我们可以推断出的，而另一个是虚构人物巴尔特的声音。此外，巴尔特还在书中评论他自己的书：这次是以评论者的形象出现。

对主体道德统一性所进行的这种解构完全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因为传统自由主义的目的是帮助自我逃避所遇到的压迫性意识形态划定的界限。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想要逃避或者重新划定这些界限（如那些规定性别身份的界限），是因为我们已然 认为一旦取消这些限制性的界限，我们可以获得新的道德统一、完善和自主性。德里达通过分析揭示出所谓一种身份劣于另一种身份的意识形态陷阱。我们如能避免落入这一陷阱，并努力认识到同性恋和异性恋（或者男性和女性）都有虽然互不相同但却同样完整的身份，以上论述便会一目了然。后现代理论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都建构于一系列多种多样的主体之中，并在其间或轻松或吃力地移动、变换，因此我们都是阶级、人种、族裔、地区、年代、性别等因素的结合体。

众多后现代主义者上述这些较悲观的分析是希望借此将我们从主体道德统一性中解放出来。一旦意识到矛盾话语对我们产生的可怕影响，我们应该能够找到某种出路。

差异政治

在自我本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者或许不能像关注责任的道德哲学那样作出令人信服的表述，但是他们确实成功地借用了福柯的论点来揭示在所有社会中权力话语是如何运用而使下层群体边缘化 的。因为这些权力话语并不仅仅对自我进行去中心化和解构；它们同时还起着将未参与其中者边缘化的作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出现过许多这

类举止古怪的边缘人物，如多克托罗[19]的《拉格泰姆》中的科尔豪斯·沃克、安杰拉·卡特[20]的《马戏团之夜》中的菲佛斯、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中的萨利姆·西奈等。萨利姆在社会上无足轻重，但他的身份危机（以及他和同他一样在印度独立时出生的其他人之间神奇的心灵感应）可以被看作象征着整个国家的危机。小说中他的确告诉我们："不管从本义还是喻义来说，我都既主动又被动地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小说对印度的政治史进行了解构，表明边缘的可以看作中心的，事实上西奈（就像是阅读文本的读者一样）出现于周围各种碎片式叙事之中。小说并无意（像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弄懂个人生活的情感逻辑，而是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揭示自我是由历史事件的矛盾和冲突所组成的。小说甚至运用了荒诞夸张的手法，比如萨利姆说："尼赫鲁[21]的死……也都是我的错。"甚至他的脸就是"印度全国地图"。然而，在小说结尾时，他不过就是个"头重脚轻的大头侏儒"（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京特·格拉斯[22]《铁皮鼓》的影响）。

通过抨击中心观念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思想促进了差异政治影响的扩大。在后现代状况下，界限分明的阶级政治让位于更为散播、多元化的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通常有意识地彰显边缘化身份，对抗占统治地位的话语。

身份政治的一个例子便是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关系，这无疑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最为核心的政治问题。这里的观点就是认为女性被排斥在父权制象征秩序之外，即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之外。也正因如此，女性被认为是低劣的，遭到"他者化"。她们受德里达所说的"错误等级制度"的压迫，被赋予弱势价值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男性气质被赋予的强势价值观。这从上文对卵子和精子的争论中可见一斑。

因此，女权主义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女权主义批判男性使用元话语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以维护男性对权力的控制；女权主义试图把权力赋予女性个体，以此进行对抗。然而，我赞同本哈比等批评家的观点，即我们不应该认为采取这种行动的女

性“仅仅”是占据了“语言的另一立场”而已。“社会建构”这一后现代主义观点忽视了个体是如何通过维护一个全新的、独特的关于他／她自身的叙事 而建构自我的。这是理解个人创造性的关键所在。它证明个体通过社会化过程而成长这一事实通常被那些持自我是“社会建构”之观点的理论家所忽视。当然，我们可以在任何人的自传中辨别出传统规范以及对社会建构话语的认同——但是就我们自己的自传而言，我们（就像罗兰·巴尔特那样）既是作者，又是书中人物。也正因如此，尽管我们由异律代码组成，但我们仍然可以寻求古典自由主义式的自主性。本哈比认为女性尤其需要这种自主意识，其结论是由福柯和德里达理论发展而来的强硬的建构主义观点实际会“削弱……女性对自己的解放意愿的理论表述”。通过削弱女性对自身能动性及对自我的意识，他们拒绝让女性重新塑造自己的历史，也就否定了开展激进的社会批评的可能性。然而，后现代主义态度与信奉任何既已确立的哲学理念如此格格不入（一旦有了任何确立的理念，醉心于德里达思想的理论家会随之对其进行解构），这对女权主义来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确实，或许更明智的选择不是遵循后现代主义路线，因为其结局往往是激进的分裂主义，而是采用一种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的平等主义方式，在循序渐进中获得解放。因为尽管后现代主义观点帮助过很多人，使他们明确 了自己与多数派，或者说“当权派”之所以不同的根源所在，但是意识到自己的异见者身份，这不过是第一步而已，要开展有效的政治行动，所需要的远远不止这一点。

自由论者和后现代论者一样，认识到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能力，去质疑那些划分我们社会角色的界线 ，质疑这些界线所预设的概念框架的有效性和主导性；而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在以这种方式抵制限制性意识形态方面尤其有效。他们经常试图用越界–解构的手法，在性别、人种、性取向及种族等方面松开概念对我们思维的束缚，要求我们采用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的立场，认识差异，接受社群中的“他者”。在这样一个多元的（话语）世界里，不可能有哪一个概念框架能获得一致的认可。既然没有哪一种认知论可以占据主导地位，各种概念框架之间的竞争便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成为权力争夺的一部分。

因此，后现代主义自我 与处于自由人文主义思想中心的自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被看作自主的、理性的、核心的，出于某种原因而不具备任何特定 文化、种族或性别特征。后现代主义分析则摈弃了这种乐观的、普适性的康德式概念，认为自我由语言体系构建，尽管从表面来看这些语言体系明显支配的是无产阶级、女性、黑人和被殖民者，但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处在这些语言体系的控制之中。从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我决定论到受马克思主义启发而强调的他者决定论，这一总体变化的意义非同小可。它对正统的英美后启蒙哲学观点进行了尖锐的质疑，强调个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身份差别。正如罗伯特·休斯[23]在他的《牢骚文化》中所称的那样（当然这一点显然很有争议性）：它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促使很多人视自己为受害者 。我们会在下一章深入讨论这一文化。

结果就是，尽管我们可以认为大量后现代主义思想、写作和视觉艺术在抨击陈式化分类，维护差异，等等，但是当这些群体在理论中并借助理论从多数派的主导分类中解放出来后，他们就会要求别人承认他们是“真实的”但相互独立的群体。这类分析的受益者既是鼓吹脱离者（他们从正统中异化出来并憎恨正统），但同时又带着点集体主义的特点（因为他们同其他异见者站在一起）。那么，这些用差异来界定的群体，这些消除既定分类后出现的产物，又如何与现存的政治中心进行交流呢？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因为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任何整体化社会理论和社会图景都一贯持近乎无政府主义的敌意。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受左翼思想激发而对权威所产生的不信任感（如利奥塔理论）使差异得以被接受，但是那些极力赞成让这些依据差异而界定的群体各自为政、相互竞争、通过斗争解决争端的，却是那些右翼人士，他们信仰个人自由，希望政府的管制越少越好。因此，批判性后现代主义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一旦作出批判之后，如何能够明确其理想群体，同时又能避开宏大叙事，避免“退回”到康德主义或“本质化”的启蒙运动思想呢？没有现成的社群模式可供参考，这一点对于乌托邦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那些想得不那么长远、目标就定在现世的思想家来说却至关重要。因

此，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对立性维持了下来，但却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一旦这些差异和不同的身份得以确立，它们就和一切和谐的中心意识形态切断了联系。因而后现代主义者像是在呼唤一种无法归约的多元主义 ，与任何统一信仰准则断绝关系，从而可能无法产生共同政治行动，并始终对他人的主导地位持怀疑态度。就这样，他们背弃了启蒙运动理念，而大多数西方民主社会的法律体制正是以启蒙运动理念为基础的，目的在于建立普遍的 平等和公正。的确，后现代主义者普遍认为，源自启蒙运动的理性声称将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理念推及到所有人，但“事实上”它却是一种压迫性体制，即福柯所谓的控制，而理性本身，尤其是当理性和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时，就是极权政治的早期萌芽。

后现代主义者对理性发起的攻击表达了韦伯式【24】的怀疑论，质疑技术至上的消费社会和“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手段–目的理性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后现代主义怀疑论却也同样针对理性交流本身所使用的手段。尤根·哈伯马斯【25】是最为雄辩的左翼批评家之一。他指出，这种后现代主义转向、放弃沟通甚或共识理性的理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他看来沟通和共识理性是抵制滥用政治权力的最好手段，而他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批评家。他主张我们应该努力创造一个“理想的谈话环境”，一种尽可能不受福柯式权力效应所扭曲的交际方式；同时我们也应该致力于唤起一种共识性和社会团结意识，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对这种共识和团结意识极度不信任。

对很多人来说，后现代主义理论让人无所适从——后现代主义者不过是一些认识多元论者，没有坚定的普遍立场，因此，他们作为批评家不管思想如何激进，他们外在始终缺少业已稳固的观点，而这意味着就现实生活中进行的政治而言，他们事实上是一群被动的保守主义者。

注释

【1】 库克（Peter Cook, 1937–1995）：英国讽刺作家和喜剧演员，被认

为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讽刺文学的领军人物。

【2】 马尔维（Laura Mulvey, 1941–）：英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现为伦敦大学电影和传媒研究系教授。

【3】 莱恩（R. D. Laing, 1927–1989）：苏格兰精神病学家，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对精神病的起因和治疗提出了新的观点，著有《分裂的自我》、《理性和暴行》、《自我和他人》等。

【4】 凯西（Ken Kesey，全名Kenneth Elton Kesey, 1935–2001）：美国作家，著有《飞越疯人院》、《魔鬼盒子》、《水手之歌》等。

【5】 全景敞视手法（panopticism）是福柯使用的一个词汇。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他以实用主义者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为例，解释现代社会权力机制的运作方式。全景敞视监狱通过独特的设计，身处其中央监视塔上所有囚室一览无余，而犯人却无法知晓自己时刻处于这种监视之下。

【6】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43–）：英国文学批评家、哲学家，现为曼彻斯特大学文化理论教授，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评》、《批评的功能》、《后现代主义幻象》、《理论之后》等。

【7】 作者使用的是“subject-ed”，兼含“主体”与“臣服”两种意义。

【8】 机构人（organization man）：该词出自怀特（William H. Whyte, 1917–1999）1956年出版的书《机构人》（*The Organization Man*）。该书探讨了现代生活机构化、日益增多的官僚机构以及从众心理给个体带来的损害。怀特是美国在城市、人与开敞空间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和最受尊敬的评论家之一。

【9】 心理呓语（psycho-babble）：指肤浅地滥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概念和术语的言语或写作，在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中间尤为流行。

【10】 内格尔（Thomas Nagel, 1937–）：美国哲学家，主要研究精神哲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代表作有《论利他主义的可能性》、《致命的问题》、《平等与偏爱》等。

【11】 威尔逊（Angus Wilson, 1913–1991）：英国小说家，以讽刺风格著称，代表作有《盎格鲁–撒克逊态度》、《并非笑料》、《让世界燃烧》等。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英国女作家、哲学家，代表作有《大海啊，大海》等。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2009）：美国作家，代表作有包括《兔子，快跑》、《兔子归来》等在内的“兔子”五步曲、《人马》、《夫妇们》等。罗思（Philip Roth, 1933–）：美国新一代犹太小说代表作家，代表作有《再见，哥伦布》、《波特努瓦的抱怨》等。贝娄（Saul Bellow, 1915–2005）：美国小说家，其作品主要探讨现代人的孤独感和精神困境，代表作有《奥吉·玛琪历险记》、《赫索格》、《雨王汉德森》、《洪堡的礼物》等，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2】 哈钦（Linda Hutcheon, 1947–）：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多伦多大学英语系和比较文学中心教授，代表作有《后现代主义诗学》、《后现代主义政治》、《分裂的形象》等。此外，她首创了“历史元小说”这一概念。

【13】 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 1932–2000）：英国作家、学者，代表作有《现代英国小说》、《现代美国小说》以及小说《历史人》等。

【14】 巴思（John Barth, 1930–）：美国实验主义小说家，以后现代主义小说和元小说著称，代表作有《大路尽头》、《漂浮的歌剧》、《迷失在游乐宫》等。

【15】 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英国加的夫大学批评与文化理论中心主任、教授，著有《批评实践》、《莎士比亚及伊甸园的失去》等。

【16】 舍曼（Cindy Sherman, 1954–）：美国摄影家，其作品通过解构文化中常见的形象揭示女性气质的社会建构性，代表作有《无题电影剧照》、《时尚图片》、《历史肖像》等。

【17】 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 1899–1980）：英国著名导演，以悬疑片和惊悚片著称，代表作有《后窗》、《火车上的陌生人》、《爱德华大夫》、《三十九级台阶》等。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 1912–2007）：意大利现代派电影导演，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的先驱，代表作有《城市爱情故事》、《女朋友》、《迷情》、《春光乍泄》、《中国》等。

【18】 奥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美国著名现代派诗人，生于英国，著有《战地行》、《看吧，陌生人！》、《忧虑的时代》等诗集。

【19】 多克托罗（Edgar Lawrence Doctorow, 1931–2015）：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代表作有《比利·巴思盖特》、《但以理书》、《上帝之城》、《拉格泰姆》等。

【20】 卡特（Angela Carter, 1940–1992）：英国小说家、记者，以其后女性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和科幻小说著称，代表作有《魔幻玩具铺》、《马戏团之夜》、《明智的孩子》等。

【21】 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印度政治家，印度独立运动的主要人物，曾任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

【22】 格拉斯（Günter Grass, 1927–2015）：德国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著有《铁皮鼓》、《猫与鼠》等，其中《铁皮鼓》是欧洲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作品。他于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3】 休斯（Robert Hughes, 1938–2012）：澳大利亚艺术评论家、作家、电视纪录片制片人，著有《美国视野：美国艺术史诗》、《牢骚文化》、《澳大利亚艺术》等。

【24】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对社会学理论有很大影响，著有《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

【25】 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以其“公共领域”概念著称，著有《沟通与社会进化》、《现代性的地平线》、《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等。

第四章

后现代主义文化

前面各章所大致介绍的思想背景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很多（但不是所有）自认为属于创新型或先锋派的艺术家都被后现代主义论题所提出的新的批评主张所吸引，这不足为奇。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不见得需要从哲学或学术角度深入了解这些东西。他们从谈话和报刊中同样可以获得“新的思想”，因为谈话和报刊常常传播这些新思想，但他们有时会搞错，有时只是一知半解，有时又夸大其词。但也正是通过这种途径，重要的思想得以像病毒一样在社会上传播。

相反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和批评家常常想要笼络先锋派艺术，将其作为典范来证明自己思想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现代主义元叙事被用来使某些东西合法化，而利奥塔则认为当代艺术家的职责就是要质疑现代主义元叙事所起的这种作用，他持这种观点也在意料之中。他要求艺术家们

图5　贾斯珀·约翰斯[1]：《愚人之家》（1962）

语言、理论、对象和艺术。这是一支画笔吗？

质疑那些从前辈那里学到的绘画和叙事原则。很快他们就会发现这些原则是欺骗、诱惑和令人消除疑虑的手段，而这也注定了这些原则不可能是“真的”。

利奥塔：《解释给孩子们听的后现代主义：1982–1985书信集》（1992）

确实，很多后现代主义评论家（如安德烈亚斯·许森[2]）的典型观点就是认为先锋派“真正的”功能在于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批判——它理应抨击资产阶级艺术机制，并因此朝向（更加光明的？）未来迈进。当然，并非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先锋运动都是如此，先前的先锋运动也非如此。这是一种政治性要求，不可能代表诸如查尔斯·詹克斯[3]和他的同僚们眼里的后现代主义（他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与我们在这里勾勒的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他们捍卫的是绘画和建筑艺术中对戏仿性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一种保守回归。

因此，后现代主义艺术以不同的方式间接呼应了上述诸家理论。它抵制现代主义权威叙事以及现代主义本身从过去所继承的高雅艺术的权威地位，同时也在担心自己的语言问题。后现代主义艺术通常一概不考虑先前所谓“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之间的关系，比如菲利普·格拉斯根据大卫·鲍伊和布赖恩·伊诺[4]的作品所改编的交响曲《低限交响曲》（1992）和《英雄》（1997）就表明了这一点。后现代主义艺术常常显得非常琐细、通俗、趣味低下。与大众文化为伍的事物通常都被视作是反精英、反等级、持异议的。它瓦解叙事——例如，在埃里克·菲施尔和大卫·萨尔[5]的具象画中可以看到的——因为连贯的叙事很容易依附于某一宏大叙事。（安塞尔姆·基弗[6]等一些画家因致力于创作与历史和神话有“深层”联系的宏伟作品，而明显地游离于后现代主义主流之外，原因也在于此。）大量后现代主义艺术关注各种迄今被边缘化的特征和行为。这其中包括玛丽·凯莉严肃的女权主义作品：她在《产后纪实》（1973–1979）中记录了她和幼子之间的关系（这里用的“纪实”一词揭示了作品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文本，而不是形式结构上循规蹈矩为引起视觉愉悦的图像和画面）；这些艺术中也包括麦当娜的舞台表演和她的书作《性》（1992），表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愉悦关系，她以受男性性侵害的“受害者”角色出现，“戏剧化地”屈从于施虐受虐行为，这一点震惊了很多女权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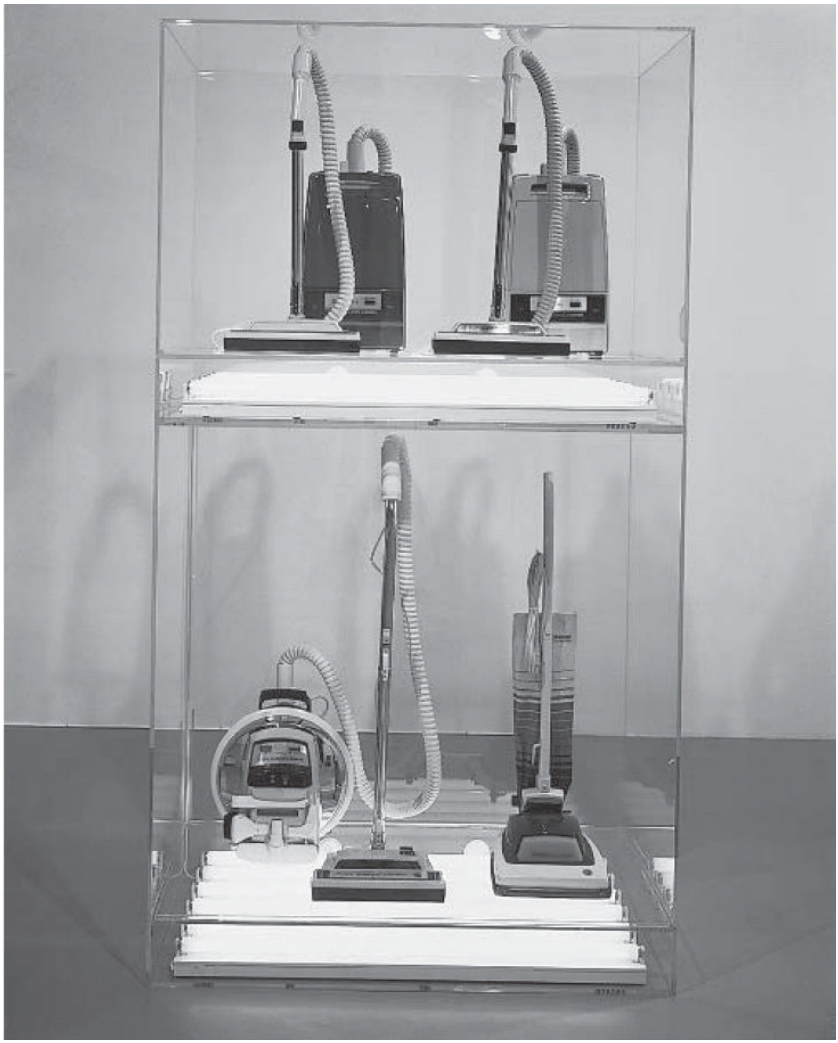

图6　杰夫·孔斯：《新胡佛四件套》（1981–1986）
博物馆展览的精致艺术也被运用到日常消费品中。

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批判的态度通常通过拼凑、戏仿和讽刺表现出来。于是便产生了像杰夫·孔斯[7]的《新型胡佛折叠吸尘器》（1980）这样的庸俗艺术品，事实上只是将市场上买得到的吸尘器悬挂在一个有机玻璃箱里，箱底安放了数盏荧光灯。这件作品是对杜尚选用“现成品”创作的手法的戏仿，因为它确实是一件“能引起购买欲望

的”消费品（而不仅仅是个小便器或自行车轮）。然而，既然它不再是装在纸板箱里让人带回家的商品，而成为博物馆展柜里的“艺术品”，那么它所引起的经济欲望就多少和它所激发的审美伪欲望混淆起来，或者遭到后者的嘲讽。他的《新胡佛四件套》就是将这件作品复制成四份。

从事先锋派艺术的很多人的目标通常还是传统的现代主义目标，即进行陌生化处理，只不过现在受到了更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引导。20世纪70年代，德里达、福柯和巴尔特的思想以各种杂乱无章的形式蜂拥而至，影响着艺术家们的观点。在此之后，他们的目标就是不让作为主体的消费者感到轻松“自在”，因为那只会导致人们对这个世界采取保守实用的迁就态度。

接受一个熟悉的世界，这对人们来说颇具诱惑，而沃尔特·阿比什的作品，尤其是他经典的后现代主义叙事《有多么德国？》（1980），主旨就是要瓦解这种诱惑，而不是直接面对巴尔特世界里令人不安的特征。阿比什塑造的叙事者和他讲述的文本都有着极度的不确定性——如不确定的情节、因果关系、主题，等等——以一种惊讶、怀疑的语气毫不留情地传递给读者。比如，下面这段话摘自他的短篇小说《英国式花园》（《有多么德国？》就是由这部短篇小说发展而来的），里面巧妙地充满了我们所讨论过的认识论困境。书中这样写道：

> 如果一个人身在德国，但又碰巧不是德国人，他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断定他所遇到的每一样东西的相关性，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如何判断它们是否真切。他会不断地问自己：这东西有多么德国？这确实是德国的真实色彩吗？看着天空，人们几乎愿意相信这还是那同一片天空，那片德国人在1923年、1933年和1943年急切注视过的天空，当时他们的注意力还没有被其他东西的颜色所吸引。也许那东西更加让人分神。现在天是蓝的。德语里用“Blau”表示。但是蓝色分许多深浅层次……对每个孩子而言都有许多不同的选择……法语里用“bleu”，而在英语中我们用“blue”。
>
> 沃尔特·阿比什：《未来完美》（1977）

被问及每一样东西“是否真切”会令人感到奇怪而又不安。人们是否期望他们所经历的陌生国度整体上 更像是艺术而不是生活，因而这种经历是不真切、不真实的？还是说我们没有把这种经历当作艺术，而是通过较邪恶的政治眼光来看待它？阿比什提出的问题通常都如此拐弯抹角，例如“这确实是德国的真实色彩吗？”便是一个奇怪的例子，色彩可以是真实的吗？在所有的图画、照片和涂色簿（这些都是阿比什所关注的东西）里，颜色或许可以逼真或者乱真，但这只能在某一具体摹本或复制品中才会发生。当然最为矛盾的是，颜色是文学文本所不能传达的一种东西。我们对颜色的描述远远不足以表现它。

通过这种手法，阿比什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用自己的偏见（或过失）来填补文本中的空白。例如，他提到德国人或许曾被“其他东西的颜色所吸引”。但这东西是什么呢？是灰色或棕色的制服吗？通过把“清白的”1923年与1933年、1943年并置对照，文本意在影响我们，而且这一段的结尾很清楚地表明，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说英语的人。

我认为在这一段以及《有多么德国？》中关于吉塞拉和埃贡那精彩的一章中，阿比什巧妙地运用了巴尔特和其他人常用的论点，企图诱导我们将我们 的陈式化印象加到吉塞拉和埃贡身上，把他们当作典型的“新德国人”。该文本采用杂志上一篇极度渲染的文章，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吉塞拉和埃贡的模样，由此令人发笑地呈现了一种形象（陈式化印象）：

> 在构成成分中可以发现意义，那些有着细微差别、不同层次的多种意义：无处不在的华达呢西装，佩斯利涡旋纹披巾，夹克衫胸袋里露出白色真丝手帕，垂涎的鬈狗，黑色皮裤，高跟靴，吉塞拉的金发梳向脑后，突出她优美的线条和性感的身姿，凸显她苍白而轮廓精致的脸庞，锃亮的车，红色皮坐椅，最后，还有一楼半开的落地窗，可让人从缝隙中瞥见屋内的生活。所有这些都详尽地表露出德国年轻一代的能力和一种满足感、圆满感。一切都在其中……德国上层及中上层阶级固有的本能：将本质上“完美”的东西和具有“威胁性”的东西结合起来。
>
> 沃尔特·阿比什：《有多么德国？》（1980）

就这样，阿比什诱导读者对文本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文本故作严肃地呈现并不十分陈式化的东西，而我们又对此颇有抵触，文本的幽默之处在于我们所感受到的两者之间的这种不协调。他创作了巴尔特所谓的“狂欢的文本”——

> 一个把迷失状态强加给读者的文本；一个让人感到不安（甚至于厌倦）的文本；动摇读者的历史、文化及心理假设，扰乱他／她的品位、价值观和记忆的稳定性，使他／她和语言的关系陷入危机。
>
> 罗兰·巴尔特：《文本的愉悦》（1975）

后现代主义小说

我举阿比什的例子旨在说明，在欧洲和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和艺术文化之间最为重要的联系引发了怀疑主义相对论，持续不断地对艺术领域里的模仿论和现实主义进行批判。后现代主义哲学不相信语言能够真实地描述世界，而这种怀疑促成了一种特定的艺术，从法国“新小说”到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靠的是在事实和虚构之间制造各种富于刺激的混乱。因此，布赖恩·麦克黑尔 [8] 认为“占支配地位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模式涉及本体论不确定性，针对的是由文本所投射的世界的矛盾本质。他用贝克特、罗布–格里耶、富恩特斯、纳博科夫、库弗以及平钦的作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具有不稳定性，很难找到可靠的途径来了解这个世界，这一点在很多后现代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从罗布–格里耶作品中单纯的逻辑矛盾，平钦作品中的妄想症，巴特尔梅作品中的喜剧狂想，到保罗·奥斯特 [9] 侦探故事套侦探故事的作品，一切都会成为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障碍。在这些作品中，有关小说世界的简单事实被颠倒，意识也许没有可靠的中心，而作品的叙述者，如平钦《第49号拍卖》（1967）中的厄迪帕·马斯，都以思维混乱或者疯狂著称，也就是说，这些叙述者都处于一种难以

归类的精神状态，而有相当一部分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主人公都受到这种精神状态影响。

在后现代小说中，历史人物或其他小说中的人物会信步走入文本之中，这种后现代主义手法更加强化了本体的不确定性，因而在库弗的《公众的怒火》（1977）中，尼克松总统在埃塞尔·罗森堡受刑的前夜试图引诱她；在多克托罗的《拉格泰姆》（1975）中，弗洛伊德和荣格在美国的一个游乐园一起穿越“爱之隧道”；而在盖伊·达文波特的《牧歌》（1981）一书中收录的短篇小说《亨利皇家划艇赛【10】上布道的基督》中，伯蒂·伍斯特【11】、马拉梅【12】和拉乌尔·杜飞【13】（他来画素描，差点被一辆捷豹XKE撞倒），当然还有斯坦利·斯潘塞【14】，这些人则并排站在河岸上。

现代主义小说，哪怕是福克纳或乔伊斯最复杂的作品，在涉及文本和（历史上）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时，也几乎总是“按规则行事”，因而“有知识的读者”【15】几乎总能够重新建构出谜题的答案，理清因果关系，整理出前后一致的事件年表。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作品与现代主义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为这些正是后现代主义小说所要解构的要素。通过展现文本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世界之间所存在的对立，后现代主义令人不安地摧毁了我们的现实感以及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使我们对之产生怀疑。其结果便是产生出一系列属于“历史学元小说”这一特殊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体裁的艺术作品。这一体裁把历史素材和虚构素材相结合，因而或含蓄或直接地对现实主义关于小说和历史关系的理论进行了后现代主义批判，正如前面提到的海登·怀特以及其他一些人所做的那样。

后现代主义小说巧妙地运用历史作为叙事这一观念以及与之相伴的回顾性讽喻，而其中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就是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1969）。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发生在信奉达尔文主义的年轻人查尔斯、他尊崇传统的未婚妻埃内斯蒂娜以及让人捉摸不透的年轻女人萨拉·伍德拉夫之间。小说不仅包含“作者”对书中所述事件所作的讽刺性评论（作者对达尔文有所了解，而书中的男主人公才刚刚开始接触进化论；作者知道他的女主人公是个原始的存在

主义者——但她自己当然不清楚这一点，因为她最终逃脱了福尔斯的情节，在罗塞蒂兄妹们【16】的居住地切尔西寻求容身之地）。除此之外，小说作者还对维多利亚时期进行了后现代主义评判，比方说那个时代对性的态度等。小说本身的情节对维多利亚小说，尤其是哈代的作品进行了类比或戏仿，而作者对此也有所评论。所有这些都旨在披露作者的操纵。

> 我正在讲述的故事纯属想象。我所创造的这些人物只存在于我自己的头脑中。如果说到现在为止我还假装了解我所创造的人物的思想和他们最隐秘的念头，那是因为我采用的是我所讲述的故事发生时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来写作（我也采用了该传统中的一些词汇和“声音”）：小说家的地位仅次于上帝。他或许并不了解一切，但是他装出无所不知的样子。但是我生活在阿兰·罗布–格里耶和罗兰·巴尔特的时代；如果这是一部小说，它不可能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
>
> 因此，或许我在写一部变了样的自传；也许我现在正住在我小说中提到的一幢房子里；也许查尔斯就是经过伪装的我。也许这只是一场游戏。像萨拉这样的现代女性存在，而我从未理解过她们。也许我只是在企图用一本伪装的散文集冒充小说给你们看。
>
> 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1969）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各种严肃的悖论：小说人物以为自己是自由的，而我们在事后认识到他们其实是由他们所处时代的视角（当然还有话语）所决定的。所有后现代主义者想要的自我意识、反思性、相对论和怀疑论在这里应有尽有。我们既可以深入人物的内心与他们感同身受（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风格），同时我们又可以置身其外对他们进行评判（采用的是一种不大妥当的当代视角，颇有讽刺意味）。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在列车车厢里看了他的男主人公一眼后，给读者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结局。

朱利安·巴恩斯在小说《分成10½章的世界历史》（1989）的开篇借木蠹之口讲述挪亚方舟的故事，而这只木蠹似乎对近代历史非常了解。对它来说，挪亚方舟更像是一艘囚船，而《圣经》里关于挪亚方舟的故事不过是个神话。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对故事本身进行戏

仿和质疑的故事：“我们对政治背景一无所知。上帝对他自己的创造物心怀愤怒，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新闻。我们只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而已。”人们会想，这样的情况太多见了。这本书采用的手法就是使十个半故事相互交织，让我们不停地从近代历史中寻找与这些故事相类似（这些类似颇具讽刺意味）的事件。（在很多片断中，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总是在船上遭遇海难或受到袭击。）这倒并非是说木蠹赞同任何官方版本——事实上它就认为《创世记》对蛇抱有歧视。但不管怎么说，它所采用的模式更加倾向于达尔文主义。上帝为挪亚方舟招募成员的计划一点都不完善——比如他没有考虑到有些动物行动比较缓慢：

> 比方说，有一只行动尤其迟缓的树懒——我可以亲自担保它是一只可爱的生灵——才刚刚从树上往下爬到树根，就被上帝报复的大浪给卷走了。你把这称作什么——自然选择？我倾向于称之为不称职。

在这部非常有新意的作品中，木蠹是劳动者，代表受压迫者的声音，批评的对象包括老板和他们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挪亚和他的家人吃光了这个“漂浮的咖啡馆”（或者“宇宙飞船地球”）上那些不合群的多余物种。很快挪亚方舟就变得像一个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里闪[17]“有个关于物种纯洁的念头”。《圣经》、神话、历史、科学以及很多其他东西以无序、讽刺、戏仿的方式平行出现，这一切似乎对作为意识形态阐释依据的《圣经》、神话和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后的章节也同样复杂，提出了不同寻常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纲要，不过当然（和阿比什一样）不带任何一本正经的“理论”色彩。

这类作品

> 不仅表明撰写历史是一种虚构行为，运用语言从概念上对事件进行分类，形成一种世界模式，同时这类作品还认为历史本身就和小说一样，充满各种相互关联的情节，这些情节看上去不为人类意志所左右地相互作用着。
>
> 帕特里夏·沃[18]：《元小说》（1984）

在以上这些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的是小说叙事，遵循上面勾勒出的哲学怀疑论，其观点就是历史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叙事，受我们的欲望和陈式化偏见所影响，无一例外都是由巴恩斯笔下的木蠹或福尔斯笔下的维多利亚绅士作者那样的叙事者根据当时社会流行的模式化小说情节来进行组织和叙述，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有所了解。

小说在后现代主义化方面担负着过于沉重的责任，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迄今小说所常用的“话语”——如作者和文本的关系、带有鲜明的自由主义或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特色的整体性人物建构、小说和史实的关系等——在众多方面都使它容易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现代主义擅长写作技巧和形式操控，崇尚自主性和个人主义，以阐释历史为己任，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乔伊斯对都柏林的描写或福克纳对美国南方的描写之中。然而，我们现在逐渐远离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小说，人物的描写更加玩世不恭，具散播性，充满自我意识，难以捉摸，而且通常蓄意歪曲，这些人物可以同时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平面，因而完全缺乏可信的心理完整性。后现代主义小说无意创造一个稳定的现实主义幻象：它所呈现出的自己容易受成见和叙事操纵等虚幻技巧的影响，而它的种种对立和矛盾也会导致多种阐释，这些都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核心。在内部进行理论化，乐意向读者展示自己形式上的运作方式，这也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做法，不仅仅表现在小说中，而且也体现在电影中，比如戈达尔借用布莱希特【19】的手法，在电影中插入指示牌和文本。另外，这一时代通常是“有关自身”的视觉艺术也是如此。

后现代主义音乐？

本书在音乐方面论述不多：部分原因在于早在我们的讨论所涉及的年代之前，许多作曲家就已经舍弃了后现代主义所抨击的传统背景——比如，他们拒绝接受传统的音调叙事规律。他们也普遍倾向于拒

绝以往（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家的影响，这些思想家以作品的整体结构为目标，比如从勋伯格[20]的十二音体系到布莱兹[21]及其他人在20世纪60年代所倡导的整体结构系列思想。这些现代主义形式观已经不是人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了。事实上，早年的很多作曲家会依据界定好作品的理论标准来支配他们的音乐创作。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很多作曲家都不再奢望按照理论上的严格标准来排列声音，而是采用一整套新的策略，即便这些策略并不一定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多元论的启发，至少两者也是一致的。

然而，也有一些音乐作品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艺术类似，或受其影响。比如说，卢恰诺·贝里奥[22]的《交响曲》（1968）第二乐章采纳了马勒[23]《第二交响曲》中的谐谑曲元叙事主旋律，这一主旋律或多或少控制了节奏发展，但是随着乐曲的展开，它又对谐谑曲元叙事主旋律进行了分解和解构。除此之外，贝里奥还将不同音乐作品的片段——如巴赫、勋伯格、德彪西（《大海》）、拉威尔（《圆舞曲》）等音乐家作品的片段——用戏仿互文拼贴手法组合在一起，另外作品中还夹杂着贝克特的《难以命名者》文本片段的表演、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事件”的口号、莱维–施特劳斯和马丁·路德·金的名言，等等。（他后来在作品中增加了第五乐章，旨在对前面各乐章作出典型的富有自我意识的后现代主义元评论。）我们可以说他的《背诵——我》（1972）洞察作品主人公女背诵者的意识流——满是她那断断续续的曲目碎片，以表明她的主体性部分是由社会建构的，或者由她头脑中的音乐文本所“构成”。

这些不同来源的片断之间没有逻辑联系，把它们用互文性拼贴组合起来的做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后现代主义绘画（就像萨尔和施纳贝尔的作品），而这种手法在艾尔弗雷德·施尼特凯、武满彻（比如他的德彪西风格的作品《梦的引语》）和其他很多人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施尼特凯运用将不同风格拼贴起来的手法，随心所欲地采用“高雅”音乐和“通俗”音乐的片断，因此正如他在《第一号大协奏曲》（1977）前言所说，这部作品包括“巴罗克音乐的准则和形式，随意的半音体系和微音程；平常的流行音乐也似乎带着破坏性的效果从外

部闯入”。

但是就这一时期的大多数音乐来看，其中有一些作品与过去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或直接与之竞争，或对不同的风格组合采用多元化手段，但这些作品仍然给人以传统协奏曲为主的印象——比如利盖蒂[24]精彩的《小提琴协奏曲》（1990/1992）。当代作曲家在设计新音乐语言方面是了不起的创新者（比如，利盖蒂运用十分复杂的聚合韵体节奏模进，利用自然乐音学中的不和谐音等）。这类真正具有实验性的音乐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隔阂，主要原因在于音乐中没有词语，很难和文本一样运转，也难以传递那些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随处可见的具有批判性和对抗性的概念派观点。当然，这一原则也有特例，如凯奇[25]声名狼藉的无声钢琴曲《4分33秒》（1952），但这些特例不过是从另一面证明了这一原则，而且不管怎样，这些作品在音乐厅上演时间很短，并且已经被美术馆的表演艺术所取代。单凭音乐很难表达政治观点，必须借助于听众的寓意联想，而后者本身又是一种极为不确定的辩证逻辑，肖斯塔科维奇具有反斯大林主义讽喻意味的交响曲所引发的无谓争议就说明了这一点。

只有在歌剧和声乐中我们才能指望找到一些类似后现代主义的信念，但即使是这类音乐作品似乎也忠实于一个连贯的、本体上相对稳定的世界——比方说特内齐的《希腊》（1988）、伯特威斯尔的《俄耳甫斯的面具》（1973–1983）、阿代的《在她脸上搽粉》（1994–1995）以及亚当斯的《尼克松在中国》（1987）等。这些作品和前文讨论的小说叙事差异很大。当然也有例外，就是菲利普·格拉斯的《爱因斯坦在海滩》（1976），由格拉斯和简约派艺术家罗伯特·威尔逊合作，作品中没有连贯的叙事可循。这一时期音乐创作的政治主张和左翼后现代主义相一致，如诺诺和亨策的作品，但总体上来说似乎没有哪个重要的作曲家需要非常明确地表明后现代主义理论立场。我们顶多只能说，作曲家和后现代主义者一样着迷于语言的本质和功能——语言的无条理性、音调–无音调冲突的利用、隐含在语言中但又完全受传统支配的结构以及如何运用语言来解构早先的形式和惯例。

然而，这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所理解的解构主义之间只不过是一种非常松散的联系。你同样可以说（确实也有很多人这么说过）立体主义“解构”了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但是这一说法只不过是一种类比，没有把握毕加索和布拉克[26]的历史意图。在这一时期，很少有作曲家会浪费时间为前辈们的“内部矛盾”而幸灾乐祸。甚至连原先热衷于批判过去的皮埃尔·布莱兹（他曾说过“勋伯格死了”），现在也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指挥布鲁克纳的作品。最起码自1970年以来，由于新一代作曲家们十分乐意将不同的风格混合起来，因而使很多乐曲避免了过去曾发生过的辩正论战——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过的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理论序列主义和机遇主义音乐之间的论战。在这一点上，作曲受益于后现代主义所创造的思想氛围。

艺术和理论

我一直试图证明，后现代主义影响最明显的症候之一就是艺术和理论之间的联盟。在这一方面，它进一步发展了原本就已经很强势的（关于“科学”、艺术原则或“法则”的）理论路线，而这些在现代主义鼎盛时期的一些作品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如包豪斯建筑学派、十二音体系音乐、科比西埃[27]的建筑设计，甚至以一种不那么严谨、科学的方式出现在超现实主义中。后现代主义理论造成了艺术作品的泛滥，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和批评家对它们和语言之间的普遍关系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尤其在意它们和先前约定俗成的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随着学院派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20世纪60年代政治态度影响的不断扩大（这两者都是在战后实验先锋派确立了许多新的艺术手法之后出现的现象），很多艺术家对自己的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格外敏感。他们要求读者和观众具备后现代主义元语言意识。对后现代主义艺术来说，这种意识通常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可以补充、完成那些古怪而且令人厌倦的艺术品，比如本书开头提到的砖块，同时还可以像皇帝的新装一样自欺欺人地用评论来粉饰这些艺术品。

图7　马尔科姆·莫利：《鹿特丹前的“阿姆斯特丹”号汽轮》（1966）
这仅仅是一艘大船，还是关于艺术本质的一个声明？

很多现代主义作品的目标在于一种自我解释的自主性（“要理解”《四重奏》这首特定的曲子，“你只需要”不断地欣赏它的内在含义……以及尽可能广博的“生活”知识，如神学和历史知识）——然而，如果没有了批评讨论的包围，后现代主义作品却是不完整的。这种概念论内省性 通常就是后现代主义来源的标志。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创作意味着在批评方面要富有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在程度上远远超越了现代主义（尽管现代主义是使艺术和学院派精英思想可悲地结合起来的始作俑者）。艺术家和批评家合谋，要求在作品和思想之间建立“正确的”关系，创作者将这种关系隐含在作品之中，由观众对之作出回应。

概念主义

让我们借助一个例子——保罗·克劳瑟 [28] 对马尔科姆·莫利关于《鹿特丹前的“阿姆斯特丹”号汽轮》明信片的巨幅油画（1966）所作

的经典后现代主义评论——来了解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

莫利取一张明信片，将它翻过来，投射到屏幕上，用格网将投射的影像覆盖，随后把它颠倒过来以很大的比例复制，甚至连明信片的白边也复制进来。克劳瑟认为这种“超级现实主义”是一种批判性行为，凸显、质疑、挫败我们把艺术作为“高雅文化”活动的期望。（它的确挫败了人们对高雅文化复杂性的期望。）它“针对的……是合法化话语，通过这种话语，艺术成为提升和改进的载体，具有了合法地位”。也就是说，它进行了一些福柯式的质疑，尽管这种所谓“针对”的举动到底有何意义还不是很明确——后现代主义对这一术语的运用大多都是这样。显然在这种背景下指望艺术可以起“提升和改进”作用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但这依旧是个遗憾。不可能有人会认为莫利的船能起提升和改进的作用。克劳瑟接着说道：“在莫利一例中，批评的维面可以说已经被绘入图像之中了。”然而“可以说”这一含糊的推诿之词掩盖了一种不可能性：很明显，真正提供“批评”的是批评家的评论 而非绘画本身。他后来又谈到“我们所拥有的不是一种外在的‘反艺术’，而是一种意在内化和展示自身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状况问题素【29】 的艺术”。克劳瑟补充说，奥德丽·弗拉克、查克·克洛斯、杜安·汉森的作品也有同样的特色，但是约翰·索尔特、理查德·埃斯蒂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与此类似的照相写实主义作品只不过是“精湛的表演”和“在美学上炫目的构图”而已。他大概是想说后者用过于传统的方式创作出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术作品（它们确实令人赏心悦目，形式精湛，这是它们的优势所在）。

图8　理查德·埃斯蒂斯：《荷兰旅馆》
一栋危险的形式精美的建筑，难道是一种现代主义倒退？

克劳瑟认为索尔特和埃斯蒂斯等人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特性上，令人遗憾地使“莫利和其他创新者的作品……被合法化话语所挪用”，因为正是这些合法化话语包裹着他们的上述价值观。他不赞同他们“华而不实的逼真”、他们“势不可当的市场吸引力”以及他们迎合“传统偏见”的做法。所以埃斯蒂斯那些看上去像照片的作品只不过“满足了现代主义所培养的对时髦新玩意儿和新奇事物的需求”。欣赏“审美”或“精湛技巧”等特性会被看作是政治上的退步，因为它允许我们捍卫一种形式结构上的现代主义式审美快感 ，而克劳瑟显然不赞同这一点。确实，当艺术家们表现出这些现代主义特性时，克劳瑟和其他很多后现代主义者一样会对他们进行抨击，认为这些现代主义特性不是“进步的”，没有对“合法化话语”（其中包括各种现代主义话语）进行批判。但是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克劳瑟自己的“合法化话语”呢？——我们可不可以认为埃斯蒂斯的作品是在对克劳瑟的“合法化话语”进行进步性批评呢？然而，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是不会真的浪费时间去直接地或含蓄地批判别的艺术的。

图9　安东尼·卡罗：《一天清晨》（1962）
作品形式精美足以引起观众的思索和愉悦。这里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因此，克劳瑟认为“要想理解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过渡”，莫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艺术家”。他（以及基弗，克劳瑟把基弗也包括在内，这倒让人有点意想不到）有着反现代主义的美德，致力于设计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体现对高雅艺术可能性的怀疑态度”，目的就是让“批判　超级现实主义内化这种怀疑论并使之成为艺术实践的主题，从而……赋予艺术以解构　特性”。因此，它具有“明确的”后现代性，而作出这一论断的关键就在于它那“质疑”的特点。

人们通常轻易地就把那些创作概念艺术的艺术家解读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真正卫士。但是按一般的理性标准来看，他们的思想通常都过于凌乱，而“理论”往往会遏制艺术家的想象力和比喻联想的能力。你可以很快就看懂其中的含义，但是你不可能（很快）逃避理论的不良影响，而批评家们正是借助理论的影响赋予艺术品以“意义”。这件作品和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激发了后现代主义式的思考，因为它是艺术理论自我意识的产物。重要的不是艺术品本身，而是它背后的概念表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置身于艺术机构

的常规活动之外，包括出售艺术品在内——比如罗伯特·巴里1969年在阿姆斯特丹的艺术项目美术馆举办展览时就没有任何作品可售，因此他在美术馆入口处贴了一张布告，上面写着“展览期间美术馆闭馆”。

这一概念主义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对艺术的复杂性失去感觉——传统模仿论规范的丰富内涵和现代主义艺术那引人入胜的形式联系常常被弃之不用。这一反现代主义转向很可能会导致出现蓄意的浅薄，不管是绘画、很多简约派艺术还是音乐，都是如此。

图10　迈克尔·克雷格–马丁：《一棵橡树》（1973）
有时候一支雪茄就是一支雪茄（引自弗洛伊德）。

迈克尔·弗里德【30】认为，一件完完全全的简约派作品只有被戏剧化地放置于展览空间中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这使它在与现代主义作品相比较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现代主义模式使观众关注作品的复杂性和形式构造。一种模式要求交流互动，而另一种模式则是对内在联系的思考。对弗里德来说，简约主义者不过是些彻底的写实主义者，依赖于我们这些艺术品观众的自我意识，而相比之下，按照现代主义

内在性传统，艺术品会使我们全神贯注而达到忘我的境界；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戏剧性”与现代主义是相互抵触的。说得直白一些，我们欣赏安东尼·卡罗的雕刻作品时从探索其蕴含的内在联系中获得乐趣；但是罗伯特·莫里斯的毛毡垛却未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而是在“提出问题”。

莫里斯和安德烈等早期艺术家的概念主义后来促成了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诸多发展，通常将概念主义和简约主义结合在一起，通过十分简单的艺术品“提出问题”。一个例子就是迈克尔·克雷格–马丁【31】1973年展出的作品：墙上一个普通的浴室玻璃支架，离地9英尺，上面放了一玻璃杯水，他称之为《一棵橡树》。这是整间展室里唯一的物品。参观者会拿到一份不记名的书面问卷，内容包括：

问：你难道没有直接将这杯水称为一棵橡树吗？

答：绝对没有。它不再是一杯水。我已经改变了它的实际物质构成。称它为一杯水已经不再准确。人们想叫它什么就可以叫它什么，但这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它就是一棵橡树……

即使你只理解了本书所讨论的理论中的一小部分，你也可能会对命名的任意性、美术馆的功能以及架子高度的玩笑等略知一二，或许甚至会因天主教神学的圣餐仪式【32】而感到一丝心灵的悸动。这一切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有着准智力性、浅薄，只注重表面，也具有“质疑”的特性。但仅此而已。归根到底，从过去2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视角来看，它只不过是个玻璃杯而已。按照弗里德的观点，它之所以成为艺术品，就是因为它被戏剧化地放置在美术馆这一机构中，有我这样的艺术史家愿意提及它，哪怕是在这样的书中把它作为糟糕透顶的例子。如此而已。但它远非个案，而且它确实以极为愚蠢的方式证明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普遍倾向，即认为对于一件真正的简约主义艺术品来说，只要涉及“理论”，再带点“质疑”的特性就足矣。我所引用的问卷来自戈弗雷【33】，他认为它是一件“干净利落、简单雅致的装置”。但是以阿尔西品科【34】、布兰库希【35】、大卫·史密斯以及其他任何现代主义雕塑风格来看，它根本谈不上干净利落、简单雅致。但话又说回来（回到弗里德所说的戏剧化特征）——确切地

说，它并不是件雕塑作品，尽管它可能看起来像件雕塑。它只是个“装置”。跟任何人自己动手做的浴室架子没什么两样。

音乐中也出现了简约主义潮流，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反拨（不过所产生的艺术品要强得多）。这当中的简单化手法和视觉艺术中的手法相类似，是对复杂形式的反抗，宣称（十二音体系、立体主义）沉湎于发展艺术语言就会陷入过去的精英思想，会疏离后现代主义者想要面对的那些观众。赖利、赖克、格拉斯、尼曼、费特金的简约主义音乐作品以及后来由约翰·亚当斯和迈克尔·托克对这一风格的进一步发展，使高雅音乐和通俗音乐之间的区别变得毫无意义。这种音乐很典型的手法就是依靠重复的节奏程序，不涉及复杂的语言与和声展开，而复杂的语言与和声展开都与布莱兹、亨策、施托克豪森这些20世纪50年代作曲家创作的现代主义后期音乐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音乐界很多人认为简约主义音乐过于乏味、简单，不值得认真对待。一些早期的简约主义音乐作品很大程度上靠重复起催眠作用，或者引起听者的沉思（赖克的作品深受禅宗影响，尤为如此），其主题元素通常是最基本的，没有什么创新（仅仅具有互文性而已）；它的和声很死板，尽管节奏上十分复杂，但听起来毫无个性。

但是赖克的《击鼓》（1971）和《献给18个音乐家的音乐》（1974–1976）、亚当斯的歌剧《尼克松在中国》（1987）和管弦乐《和谐教案》（1985）等作品改变了这一点。《和谐教案》出色地将简约主义手法和后现代主义“向后”风格结合起来。题为“安福塔斯【36】伤口”的第二乐章对瓦格纳手法的运用明显体现了这一点。这使作品中不仅有半音抒情风格，能让人联想起勋伯格，同时也有着巨大的情感力量（亚当斯在简约主义风格中增添了许多东西，而这就是其中之一）。确实，亚当斯的作品以十分简单的前提为基础，逐步形成极为复杂、令人满意的结构，利用传统的修辞，尤其是加快结尾段和高潮，来调动听众的情绪。这一点在他的《华丽自动钢琴曲》（1981–1982）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品将后现代主义折中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以无自我意识、不俯就的方式将高雅音乐和通俗音乐合为一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亚当斯在这部作品中引入“主旋律”时，平淡的

旋律逐渐变得激昂，成为一个个越来越有悖常情、雄壮的高潮。与此同时，我们听到互不相干的音乐老调子、“嘭嘭作响的行军声、贝多芬式的雄壮的钢琴琶音和弦、心醉神迷的福音和声——所有这些都和欣喜若狂的三部重唱混杂在一起”。我上文所引用的是罗伯特·施瓦茨的评论，他在书中又继续引用了亚当斯本人的话：

> 在我创作这一曲子时，相互厮杀的钢琴声、低柔的迷人女声、瓦尔哈拉铜管乐器声、咚咚锵锵的铜鼓声、福音三和弦以及倾泻而出的降半音键盘声都学会了和睦共处。【37】
>
> K. 罗伯特·施瓦茨：《简约主义者》（1996）

这和本书中所提到的其他作品一样有趣。

承接——然后是枯竭？

因此，很多后现代主义艺术创新手法都借助于艺术家和批评机构，要求人们运用一些重要理论观念，如反思等，对其进行阐释，而反思这样的理论观念源自艺术家的自我意识，涉及艺术方法和意识形态，包括把作品当作一种手段，对先前的一般性限制进行批判，因此在很多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看来，它们同样也在对原先的政治限制进行批判。后现代主义意识到与现代主义之间有着一种“后”的关系，体现这一意识的一个上佳例子就是杰夫·沃尔1979年创作的作品《女性照片》，该作品巧妙地呼应了马奈在《酒吧女》中使用的间接视角手法。沃尔一手摁着相机的快门钮，眼睛盯着镜子里的女孩，而那个女孩则摆出马奈作品中酒吧女招待的姿势。这不仅构成了两个人物之间让人充满遐想的复杂关系，同时也是这一时期女权主义批评家所分析的“男性注视”间接性的一种巧妙的变体。

这种极度的自我意识也产生了一种观点，认为鉴于以往历史所承担的责任（更不用提历史现在所担负的怀疑性模仿及道德和政治义务），以及上文所讨论的有关互文性的新理论，后现代主义视觉艺术

家确实是继现代主义“之后”出现的。他／她的作品和写作者的著作一样，只能沦为一种重复（或“重新题写”或“引用”）。它必然是一种互文性组织，对过去进行引用和改编，指涉的是其他作品，而不是任何外部现实。因而创造力和独创性这些原先受到青睐、极具个人主义特点的典型的先锋主义观念受到攻击。很多后现代主义视觉艺术显然容易模仿，它们是关于表面的艺术，蓄意地平面化，不求深度，只要我们和詹明信一样将安迪·沃霍尔 [38] 的《钻石尘鞋》和凡·高笔下农夫的靴子作一下比较，就可以很容易认识到这一点。凡·高所画的靴子（在海德格尔看来）对农夫的世界进行了深入的揭示。而在很多人看来，后现代主义作品只可能是一种杂糅，风格混杂，和以往作品之间的相似性是其立足之本。

图11　杰夫·沃尔：《女性照片》（1979）
谁在看谁？从哪个角度？为什么？

公开承认自己缺少创新能力便是对上述观点的一种回应。时至1980年，道格拉斯·克林普已经在辛迪·舍曼、谢莉·莱文和理查德·普林斯等人作品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后现代主义摄影观。他对这些摄影师

赞誉有加，因为他们

揭示了摄影始终是一种再 现，摄影所表现的总是大家已经看到的东西。他们所拍摄的形象是偷来的，是充公、侵吞、剽窃 而来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原创的东西无法得到安置，始终被延宕；即使可能作出创新的自我本身也只不过是个摹本而已。

道格拉斯·克林普：《后现代主义摄影活动》，载于《十月》1980年第15期

就这样，谢莉·莱文通过照片复制这种方式对爱德华·韦斯顿等男性前辈的摄影名作进行“挪用”，而所要达到的目的，用琳达·哈琴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质疑原创性膜拜”。“正典”下的“男性视角”在女性话语中被复 写，或者说“被重新构造”，并因此而“受到质疑”。罗莎琳德·克劳斯认为莱文“侵犯版权”，通过“剽窃”沃克·埃文斯【39】 所拍摄的佃农的照片以及爱德华·韦斯顿所拍摄的他儿子尼尔的照片（克劳斯认为不管怎么说，按照互文性理论，这些照片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青年大理石雕像），“强烈地”质疑了“起源以及与此相关的创新性这两个概念”。莱文的作品因此“明确地解构了起源这个概念”，“正在（其时为1981年）采取行动废除现代主义的基本论点，通过揭露这些论点的虚构状况对其进行清理”。克劳斯认为，莱文所采取的废除和清理“行动”必须被“放置”在典型的后现代“摹本话语”之中。但是这又成了另外一种神秘化，容易让人误入歧途——这些图像只有通过拙劣的冒充才具有“创新性”。在那些不抱任何理论偏见的人看来，它们不过是对那些更为出色的作品的低劣模仿而已。能让人感到些许不安。艺术家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否道德？人们不禁会对此感到疑惑。然而，克劳斯赞同罗兰·巴尔特的观点，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一种模仿，将上述疑惑断然置之一边。因为巴尔特曾告诉我们，即便是煞费苦心的现实主义者，也不过是在复制摹本而已：

刻画……不是为了用语言指涉某一实际对象，而是用一种编码指涉另一种编码。因此构成现实主义的不是对真实的复制，而是对（被刻画的）摹本进行复制……（现实主义）通过二次模仿，对本身就已经是摹本的东西进行复制。

罗兰·巴尔特：《S/Z》（1974）

在下面的这段陈述中，这一观点的政治意图得到了进一步凸显：

>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莱文的作品不仅对男权社会将作者身份等同于维护妄自尊大的男性气质这一做法提出了批判，而且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所有权和产权观念进行了抨击。
>
> 史蒂文·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1989）

但是有什么能够证明“从根本上”这一说法的合理性呢？也许用“寓言式”、“伪哲学”或“假深沉”这些词会更恰当些。

质疑原创性，认为艺术是一种形式，通过话语的再循环对已有事物进行再现，这样的观点加深了一些人对后现代主义所持的怀疑态度，认为后现代主义艺术过于摆出一副“后一切”的架势。后现代主义互文性难道就不可能是文化枯竭的症候吗？在实验性现代主义的伟大时代之后，先锋派难以为继，无法在创新上有所建树，而后现代主义互文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吗？抑或它就是道德上或政治上无法参与到社会现实中的表现呢？

后现代建筑

或许从后现代主义建筑和之前的英雄现代主义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将所有这些杂乱无章的变化看得最为清楚。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一个典型特点便是引经据典时所表现出来的杂糅性。这种特点异常典型，以至于在罗伯特·文图里、他的妻子丹尼丝·斯科特·布朗和史蒂文·艾泽努尔合著的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向拉斯韦加斯学习》（1972）一书中，拉斯韦加斯的建筑和拉斯韦加斯长街【40】因其不同的层次、对流行建材的使用以及对和谐性的漠视而受到赞美。文图里所考虑的是开车走马观花地欣赏拉斯韦加斯长街时的感受，因此“移动的身体带着移动的目光必须能够分辨并阐释各种不停变化且被并置参照的秩

序”。詹克斯在其同样重要的著作《后现代主义建筑语言》（1977）一书中也认为，应该允许建筑的“代码”之间形成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双重编码”冲突（詹克斯用了符号学术语），犹如上文所讨论过的约翰·亚当斯的音乐作品那样。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理念在布朗和文图里1991年为伦敦英国国家美术馆设计的塞恩斯伯里翼廊中付诸实践了。建筑设计师们呼应了主楼的科林斯式 [41] 壁柱列，先将它们归在一起，随后又将它们分散开去，因而

尽管古典元素占据主导，但它们以决然的方式打破了古典结构的原则，比如对壁柱列所作的风格处理，或者在抬高的平台上开辟完全非古典主义的车库门式开口作为入口、窗户以及装货场，既削弱了古典主义印象，又挑战了原本所重点表现的构造逻辑。每一处古典主义风格的细节或过于繁复的元素都与另一处削弱或违背古典主义原则的细节形成对比。对文图里和斯科特·布朗来说，当代文化和社会多样性所需要的是内涵丰富、有多重意义的建筑，而不是一目了然、单纯的建筑。

黛安娜·吉拉尔多：《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1996）

文图里等建筑设计师认为，现代主义所注重的功能决定形式这一建筑语言过于拘谨，应该考虑到不和谐及矛盾可以产生活力，并且毫无疑问会发人深思。于是这样的作品正好乐得对自身进行解构。

但是，这种双重编码并不一定都能像英国国家美术馆和斯特林所设计的斯图加特德国国家美术馆新馆一样，集不同风格于一身而取得令人振奋、满意的效果，它也可能沦为一种粗糙、简单的庸俗流行物。而这恰恰是我在里卡多·博菲尔所设计的位于法国马恩拉瓦雷的阿卜拉克萨斯住宅区（1978–1982）中所看到的，该剧院被称为“大众的凡尔赛宫”，是对古典主义的拼贴。

整幢建筑怪诞、夸张。近乎超现实的外观、巨大的柱子将有着过多巴罗克式混凝土装饰的现代公寓楼遮掩起来。这是一种用拼帖手法设计的法西斯式高大建筑。博菲尔的作品对法国当地政府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实在让人意外（或许也并不让人意外）。这里的后现代主

义／现代主义二元对立相当明显，但是该建筑设计中对人的尺度、人的尊严以及便利等因素几乎不予考虑，这和与之对立的另一极，如科比西埃那令人望而生畏的现代主义作品，没什么两样。

图12　文图里、斯科特·布朗及合伙人事务所设计：伦敦英国国家美术馆塞恩斯伯里翼廊（1991）一幢新的建筑，却是以往风格的拼贴。是否很有讽刺意味？

话语和权力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后现代主义先锋派日益政治化。多数艺术家对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关系的理论有所了解，这通常表现在他们能够意识到艺术品所传递的“信息”或者所代表的符号是如何适应或者背离那些旨在推广它们的机构的。这种情况招致了批判，认为艺术过于依赖“博物馆–美术馆联合体”（听起来像“军工联合体”一样）。言下之意，博物馆就像是世俗的神庙，通过美术馆馆长和依附于他们的批评家–评论家这些伪神职人员的话语使作品“合法化”。但是真正

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们挑选艺术家和编写目录的方式，而他们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允许内部存在不同的批评声音，主要考虑的还是学院派理论这一知识保护屏障。

图13　里卡多·博菲尔设计：巴黎阿卜拉克萨斯剧院
在这幢凡尔赛宫的后现代主义翻版建筑中，你同样会觉得很渺小。是为国王设计的吗？

就这样，艺术品被看作一种机构批评并加以运用，尽管它随后很快失去了活力，带上了对皈依者布道的腔调。其中最实事求是的“批判”是由迈克尔·阿舍作出的。1973年，他对米兰的托塞利美术馆的一面墙进行了喷砂处理，消除了“作品”和“美术馆”之间的界限，使两者不分你我，“从而既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共谋关系，又揭示出美术馆虽然很少为人注意，但却是一个主要的（并起着支配作用的）文化机构，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但人们通常认识不到这种影响力”——大概一旦将托塞利美术馆的墙炸通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墙后面的行政办公室了。

或许汉斯·哈克关于博物馆–美术馆联合体的一些作品更为精巧一点。哈克的专长之一就是记录艺术品的经济命运。他于1975年创作的一部作品由修拉【42】的《摆姿势的模特儿》的摹本以及14幅按时间顺

序排列的油画板组成，每幅油画板上都尽可能印上这幅画相继拥有者的照片以及他们简短的生平介绍。

这就要求观看者越过美术馆围墙去观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去思考——艺术品所处的社会环境，正如鼓励研习文学的学生超越实践性批评或“新”批评那种封闭的审美实践，而放眼于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一样。以下是有关这一点的经典、正统的看法：

> 在当时激进的大气候下，构成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主要矛盾当然逐渐激发出批判艺术的生产，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
> 保罗·伍德等：《备受争议的现代主义》（1993）

这些“主要矛盾”当然并不仅仅是逻辑上的矛盾，随时可以被解构——它们还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矛盾，主要是社会中被抑制、被隐藏的矛盾。因而，“新摄影”展览会激发参观者提出下面的问题：

> 为什么某某图片会有意义？它是怎样传达意义的呢？为什么一个社会在某一特定时期需要某些特定的图像？为什么在摄影中会出现不同的类别？如何断定某些特定的图像具有美学价值？原因又何在？摄影家们为何要超越他们的技术才能和创新能力去拍摄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呢？摄影有什么政治意义？当今社会是谁在操控摄影这一领域呢？
>
> 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政治》（1989）

所有的艺术——如小说、诗歌和音乐作品——同样都面临着这些尖锐的问题。以往的艺术缺乏（它们自己的）政治洞察力，批评家们对此感到不满，这促使用各种艺术媒介进行创作的人们制造出一大批神经质的、“政治正确”的艺术，要么明确地、要么含蓄地在理论上支持那些立场正确的政治议题。他们不仅抨击艺术理应为“资产阶级”富人所拥有、是供其消遣享受的奢侈品这一思想（比如，为达到这一批判目的，他们生产简单、廉价、粗陋的“蔑视市场”的概念主义作品），同时他们所制造的艺术也契合先前介绍的伦理标准，支持女权主义和边缘人群，支持建立在性别、性取向、族裔等基础之上的各种

身份。

现代主义时期很多政治倾向明显的艺术以及极权政权下产生的艺术都千篇一律地遵从现实主义传统，过于明显地屈从于统一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艺术则不然，尽管它热衷于“延异”、“质疑”等诸如此类的观念，但倒是确确实实的先锋派，象征着不同意见，而不是强求群体一致。就这样，后现代主义将承认“他者”自主地位这一道德呼吁改头换面，成了就边缘和差异所发表的支离破碎的宣言，对占统治地位的态度进行“解构”，对陈式化论断进行批判，等等。他们通常用戏仿的手段对这些陈式化印象进行公开抨击——比如琳达·本利斯那些引起诸多争议的裸照，其中一张照片（摄于1974年）中她装扮成一个招贴画女郎，戴着一副墨镜，手握一个巨型双头假阴茎。或许这张照片旨在戏仿，对媒体中的模式化形象进行嘲弄性模仿，但是和其他许多类似艺术作品一样，它也利用了那些模式化形象。这是一张性感的照片，对男性很有吸引力。这种双重效果也同样出现在文学戏仿中，比如半真半假的色情写作就是在利用这种模式化形象，这在罗布–格里耶的《碰头的房子》（1965）、罗伯特·库弗的《杰拉尔德的派对》（1986）等一些实验小说中都出现过。

在下面的论述中我将重点例举女权主义作品进行讨论，因为女权主义作品通常潜心于后现代主义理论，这是它的优势。同时，它还有着相当清晰的伦理目标，而这又构成了它（与上述优势完全相反）的另一优势。在这一时代早期，很多女权主义艺术是纯粹的政治宣言。比如在费丝·怀尔丁的《等待》（1972）这一表演派艺术作品中，怀尔丁坐在椅子上，一件件地背诵妇女们所等待的事情。又如玛莎·罗斯勒的《厨房符号学》（1975）是一段录像，在录像中她背诵着字母表，演示用厨房用具来解释每一个字母，但到最后她拿起刀在空中一阵胡乱挥舞。

图14　朱迪·芝加哥：《晚宴》（1979）
女权主义研讨会：但是与会者的身份难道就没有被“代表”她们的意象所限制吗？

20世纪70年代早期，很多女权主义作品采用“本质主义”方法，对两性之间的差异作出很多假设，而忽视了身份的不稳定性和社会建构性这个后现代主义一再强调的看法，这些作品后来受到了批判。朱迪·芝加哥和他人合作的《晚宴》（1973–1979）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是一张摆成三角形状的桌子，三角形的中间是一块空地，桌上摆着39套餐具。每套餐具由一个精致的陶瓷盘子、手工缝制的长条餐巾、陶瓷酒杯及一套刀、叉、汤匙组成。每一套餐具象征着一个神话传说中或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女性。盘子的形状是（蝴蝶状的）女性生殖器。室内的地板有2,300块瓷砖，上面有着另外999个名字。400位女性参与了这件作品的制作，它也成为女权主义艺术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作品。它清楚地象征了女权主义想要恢复历史的愿望，也提供了另一种方式与男性主宰的万神庙进行抗争。然而，也有人认为这件作品庸俗的制作和低下的风格削弱了它严肃的目标；此外，用女性生殖器这一意象来代表女性，这种做法本身不就涉及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本质主义”吗？

当然，也有人为此进行辩护，认为使用女性生殖器这个意象是对一种普遍观念的回应。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一般观念认为女性“缺乏”阴茎以及阴茎所代表的权力（这一观念似乎是弗洛伊德从叔本华及其他人的理论发展而来的，本身就是一种极度歪曲、具有厌女特性的假设，认为女性的性反应在本质上无足轻重），而这件作品正是对这一观念的回应。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一作品过分地将女性归结到她们的生物特性。很显然，对该作品作出何种评判完全取决于你认为你在为什么而战，与可当作万神庙的《晚宴》这件作品本身是否具有价值毫无关系。

卡罗利·施内曼的表演派作品是女权主义艺术采用本质主义方法的又一个例子。下文中大卫·霍普金斯准确地描述了她所表演的《内部卷轴》（1975）：

图15　卡罗利·施内曼：《内部卷轴》（1975）

我们用身体写作，但在何种意义上女性写作能同样发自身体本身？

图16　辛迪·舍曼：《无题，第228号》（1990）
演示阉割的威胁：犹滴的故事是否也同样是舍曼的故事？

她站在观众面前，一丝不挂，慢慢地将一个卷轴从她的阴道抽出展开。她照

着卷轴的内容给观众朗读一段滑稽故事，讲的是她与“一个结构主义电影制片人”的会晤，这个电影制片人曾批评过她电影中的“个人嘈杂声”和“情感存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施内曼的表演针对的是批评的内化问题，但它也同样可以和女权主义“本质主义”对女性写作的关注划到一起。这是法国女权主义理论的一种形式，受到埃莱娜·西克苏等作家的推崇，设想女性得以使用一种前俄狄浦斯（因而本身具有反父权制的特性）“语言”；一种身体颤动的语言。

大卫·霍普金斯：《现代艺术之后：1945–2000》（2000）

同样得益于通俗艺术的影响，但表达的重点更为含蓄，这就是辛迪·舍曼的后期作品，比如她的摄影作品《第228号》（1990）是一幅《圣经》人物犹滴的庸俗巨幅摄影图片——风格非常大众化，甚至带有电影艺术的特点。它对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以同一人物为主题的大幅油画进行了戏仿，而所有这些油画（除了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那宏大华丽的油画之外）都很典型地表现了男性“高雅文化”，同时也毫无疑问地表达了他们的某种阉割焦虑。舍曼曾说过，她希望创作一些东西让“普通人也能够欣赏……我想模仿文化中的某些东西，也想在模仿的过程中拿文化开个玩笑”。在后现代女权主义者看来，这样的作品用伍德的话来说能够“提出问题”，比如有关“假面舞会和女性身份、视觉表征中的模式化女性形象、带着性别眼光的观赏者、女性身体与拜物教、男性视角的历史和女性视角的历史【43】，等等”。（但对于其他人来说，由于缺少能作出这种阐释的理论，这类作品的意义要小得多。）

相比较而言，芭芭拉·克鲁格的摄影作品更加复杂，理论性更明显。她从杂志上获取照片，把它们放大，进行修剪和分割，然后与文本结合起来，所采用的方式显然来自她做杂志设计师时的经验。随后她把这些经过剪辑的照片整体拍摄下来，并且把这些照片放进（罗琴科式的）红色镜框中，这是她的典型做法。正如克鲁格对《纽约时报》所作的解释：这些作品都是戏仿广告，目的是为了引发一种批判，批判的对象是“文化对人们生活的设计方式和商业设计之间存在的关联”。通过女权主义对表征的批评，它们能帮助我们了解图像在社会中的运作方式，因为这些都是由男性支配的媒体所建构出来的女

性形象，而这些形象又决定了女性看待自我的方式。这类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些陈式化意象，它们维系着男女两性之间普遍存在的权力平衡。在此过程中，它挑战占主动地位的“男性凝视”，并使迄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的女性凝视强大起来。这一点在克鲁格的另一幅图片《无题》（1981）中得到了体现，图片上是一个古典女性侧面半身像，图片上还有一句口号：“你的凝视击中我的脸颊。”这幅图片蓄意设计了一种模棱两可。是谁的凝视？任何男性的凝视吗？为什么说是“击中”？击中的是什么——是雕像中所表现的男性对女性的经典正统观点吗？其中蕴含的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其他图片上的文字，如“买我吧，我会改变你的生活”（1984）或“我购故我在”（1987），也同样通过直接“呈现其中的矛盾”来对消费主义观念进行解构。

图17　芭芭拉·克鲁格：《无题》（你的凝视击中我的脸颊）（1981）
传递信息的艺术：男性的凝视有多粗暴？

然而，也有人指出（从一些女权主义观点来看）克鲁格的照片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因为这些照片和它们所戏仿的商业广告一样具有诱惑性，从而缺乏足够的政治功效，并因此而受到批评。它们究竟是对消费主义现象的一种批判，还是其中的一分子？此外，克鲁格的

照片还遵循了过时的现代主义原则，有着非同一般的形式效果，因此克鲁格也曾因为其作品的“构图美”而受到批判，更何况她是在一家商业性美术馆里展出这件作品的。

在这点上存在着我前文所提到的两种选择：要么深入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并试图从内部对其进行改造；要么接受并公开宣称自己的边缘化地位，并试图使边缘挤入中心。

作为政治的艺术

我所提到的艺术品几乎无一例外都具备我所强调的批判性和对抗特征。但是为了能够立足，它们似乎都需要并且也确实去寻求过批评家所提供的体制上的支持。本杰明·布赫洛【44】和其他很多人都告诉我们：

> 处于霸权市场和体制视线之外的艺术家们目前正在发展进行反对和抗争的艺术实践，而当前批评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支持和推广这些艺术实践。
>
> 布赫洛：《简约主义和波普艺术之后的艺术理论》，收录于H. 福斯特（主编）的《当代文化探讨》（1987）

但这也并非完全行得通。艺术品本身，不管是挂在墙上的艺术品，还是在美术馆里展出的艺术品，即便是某处的“大地艺术”【45】或者“现场艺术”，都不足以成为政治论战中的优秀辩手（因而对批评家来说也不是理想的同盟）。这是因为，论战与舆论宣传不同，论战需要的是双方而不是一方；论战双方都必须能够清楚地陈述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通过协商解决冲突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而不仅仅是靠呼喊概念性的口号。因而，我们可以说克鲁格和资产阶级规范之间仍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她所要求的不过是赋予个人权力而已；就像哈克的作品一样，克鲁格这件政治正确的作品虽然表面上看来“针对”的是一些更为广泛的问题，诸如经济控制、社会公正等，但事实上它至多不过是在提醒我们世上有好人也有坏人，有些坏人是男人、

艺术品经销商、房地产开发商、大公司总裁、军火商，等等，仅此而已。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你认为政治论战和政治行动最有效的中心在哪里。一些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和理论家（以及那些持“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一观点的女权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无处不在”。但是视觉艺术家们很少通过发表政治“声明”的方式来向人们传达政治（尽管他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通常都是对已经转向自己一方的人说或者暗示一些简单的东西。从这一方面来看，他们的作品所具备的复杂性甚至不及最通俗的大众政治艺术品，后者，如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之所以更加复杂、深刻，在于可以真正进行对话。如果政治行动需要依赖修辞进行劝导，那么后现代主义视觉艺术显然没有能力提供这样的劝导——除非偶尔借助一下陈腐的舆论宣传，用最为基本的模仿手段将信息硬塞给我们，有时甚至还得用讽刺手法来增加点刺激。正如那些批判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一直不倦地告诉我们的那样，最有效、最进步的艺术形式仍然是针对现实、表达特定批评立场的现实主义艺术，而这恰恰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既能告知，又可以劝导。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与这一时期后现代主义关于表征政治的评判标准并不契合。

或者干脆像罗伯特·休斯那样更加坚定地说：“真正改变政治观点的是事件、辩论、媒体照片以及电视。”艺术家或许是“针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艾滋病等问题有感而发……但是

> 一个艺术家的价值并不等同于他或她在性别、意识形态、性取向、肤色或者健康状况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讨论一个问题不一定要面向一群公众……在我们美国，政治性艺术就是对已经皈依的信徒进行长期说教的一种仪式。
>
> 罗伯特·休斯：《牢骚文化》（1993）

休斯同样准确地指出，很多这类政治性艺术的问题在于这些作品所蕴涵的思想未见得有多深刻——这些思想通常平庸而天真，不能激

发人们对一些不同寻常或者复杂的问题作出思考。比如，“在杰茜卡·戴蒙德的一件作品中，一个等号被叉叉掉，下面以柔弱的笔迹写着：‘完全不平等。’如果有人见到这一有着哀伤意味的图案在博物馆的墙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便认为它让我们对美国特权现象有了新的理解，那他简直就是在痴人说梦。”这类艺术充其量不过是“借用一个显而易见且又极为普通的观点——‘种族歧视是不对的’……——然后拐弯抹角地对它进行编码，当观赏者把它解读出来之后便会满怀喜悦，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了我们称之为艺术世界的‘话语’之中”。（罗伯特·休斯，出处同上）

艺术品当然可以对社会及各种社会制度进行批判，但它最终还是得在那个社会展览，经艺术经销商之手出售，且通常要通过中产阶级艺术机构的评估来获得合法地位。它并不妨碍吉尔伯特·西尔弗曼出价90,000美元来购买哈克的作品《社会润滑油》，尽管这件作品在一块单独的金属饰板上引用商界和政界主要人物的话来对他们进行嘲笑，以宣扬艺术是一种“社会润滑剂”。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自相矛盾。开明社会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来吸纳对社会存有敌意的艺术。虽然有一些臭名昭著的特例，但一般来说这样的社会不会对艺术家进行压制和审查，而是会保护他们表达思想的权利。（尽管开明社会里偶尔也会有不开明成员试图颠覆这一共识，比如在马普尔索普[46]风波中，联邦政府资助展览他的一些表现同性恋施虐受虐的照片，此举便招致非难。）

然而，我这里所讨论的社会中最基本的法律和社会结构绝对是开明的。尽管率先获得合法地位的是艺术机构，而不是艺术作品，但在这之后，真正重要的是具体艺术作品对观众产生的长期影响，其价值远远超过任何展览所作的“声明”。几十年来，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概念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噱头更加令人厌烦、更加过时了。后现代主义作品由于过分明显地进行说教，所以通常看起来学究气有余，让人无所适从。此外，说教性后现代主义和那类能够长期促进知识、才智的当代艺术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而其差异之大还没有被多数后现代主义批评家所充分认识到。当然，艺术作品理应“质疑”——从《安提戈涅》

到《赫达·加布勒》【47】的悲剧传统所做的不就是这个吗？但是，它们在质疑的同时需要采用一种比近期后现代主义艺术更为复杂、影响更为持久的形式。

众多先锋派所青睐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一种哲学理论，有其政治和历史观点，这一点我在前面章节里已经简单介绍过。特权以及它那套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术语后来都受到了批判和颠覆，其中包括和现代主义紧密相关的形式主义。有条理的叙事、中心以及先验价值术语等都遭到质疑。西方文化的首要地位（以及任何参照西方文化所获得的特权秩序）也必须受到质疑。这样做的目的通常在道义上让人钦佩：把目光投向边缘，投向那些被压迫、被排斥在外的人群，争取颠覆或扭转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这确实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意愿，但它实施起来却缺乏稳定的理论支持。比如，尽管有德里达的最新思想，但是他那些真正的解构主义作品是否能够 形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政治立场，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此外，视觉艺术还采纳了充满悖论的观点，认为一切　都可能成为“文本”。把世界看成文本，这一典型的德里达和巴尔特式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认为所有的思维活动都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才得以实施。这一观点忽略了我们对先前艺术所产生的很多非语言反应——比如仅仅从绘画的质地、色彩或形式联系中我们便可以获得乐趣，要么把这种非语言反应斥为颓废的形式主义现代派残留下来的享乐思想而不予考虑，要么认为这种非语言反应需要被赋予某种合适的概念–语言理论联系而获得解救。有的一切，从家具、服饰到建筑，都必须被看作是“语言”的一部分，而我们则可以对语言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揭示这种结构可以被瓦解或颠倒，从而脱离“资产阶级”社会赋予它的可疑的等级秩序。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是语言的一部分，如果语言只是起着撒播作用，如果艺术话语确实和医学、法学、刑罚学等话语一样超越个体，那么就连作者、创造性、原创性等都成了可疑的观念，不可能“拥有特权”。

这种明显的民主化冲动认为读者、学生和伟大的小说家一样，畅游在同一片语言海洋之中，因而可以通过阐释对文本拥有同等的支配

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传播这一思想的却是一些极有权威、性格古怪、报酬优厚的文化批评家。根据个人气质、创作经历或者作品所试图记录的现实来阐释艺术品的方法被废黜了。

于是便有了诸如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对“新表现主义”绘画的批判。这一冲突值得分析，因为它表明当时还活跃着一些想要同后现代主义一争高下的其他流派。一些主要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在批判这些流派时毫不含糊地使用了政治术语。他们认为来自德国和美国的新表现主义绘画不仅“讲究绘画艺术”，“过分”具有表现力，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并且还“将特权赋予”绘画自身所带的过时的等级化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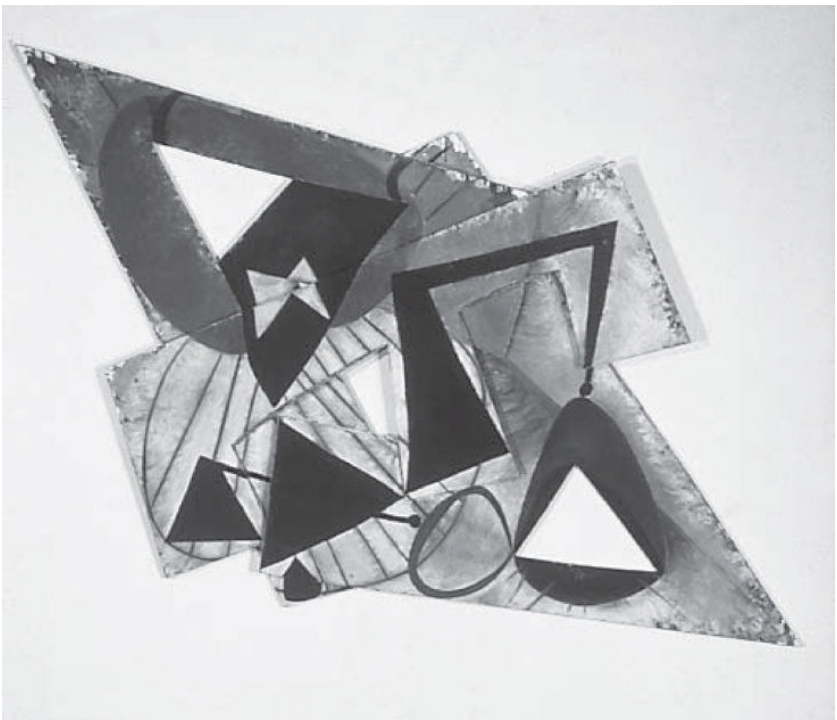

图18　伊丽莎白·默里：《她的故事》（1984）
后现代主义身份主题可以和现代主义表现模式相结合吗？

很明显，朱利安·施纳贝尔、大卫·萨尔、埃里克·菲施尔等美国新表现主义画家和山德罗·基亚、弗朗西斯科·克莱门特、格奥尔格·巴泽

利茨、约尔格·伊门多夫、安塞尔姆·基弗、P. A. R. 彭克等欧洲艺术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而这些欧洲艺术家的创作又显然可以追溯至德国现代主义表现主义传统。此外，他们推进了表现主义，而不是对其进行颠覆、戏仿或“批判”。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后现代主义清教思想所摈弃的感官性和情感主义又重新带回到艺术之中。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与后现代主义毫不相干的心理学将菲施尔阐释为一个表现主义具象画家，尽管其画中人物心理扭曲，异化明显，显然也受到后现代主义大环境下叙事理论的影响。我们同样可以认为珍妮弗·巴特利特、罗伯特·科莱斯科特、尼古拉斯·阿弗里卡诺、伊丽莎白·默里等画家不是颠覆、而是复兴了既往的现代主义绘画传统。他们甘冒风险与过去直接竞争，对过去进行发展——比如巴特利特就可以看作是莫奈的后继者。

图19　罗伯特·科莱斯科特：《祖母和法国人》（身份危机）（1990）
表现个人身份需要硬行插入叙事模式、使用现实主义模式吗？

新表现主义画家和由批评家芭芭拉·罗丝为之辩护的抽象派画家受到了后现代十月派 [48] 的攻击，十月派在道格拉斯·克林普（1981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宣布了“绘画的终结”。克林普认为罗丝呼吁延续（现代主义）传统，是一种“保守主义”行为。这种行为

和六七十年代的艺术截然相反……六七十年代的艺术力求与高雅艺术这一神话争夺阵地，宣称艺术与其他各种形式的活动一样，都由真实的历史世界决定。

克林普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批判了“人类的神话以及这种神话所支持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因为这些观念都“维护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它们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标志”。正因如此，新表现主义绘画由于其政治上的保守而受到批判，因为艺术家不应该在艺术中构造出另类的愉悦世界；相反，他们应该拷问一下世界以及世界上的各种话语是如何对他们进行构建的，而且最好他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将他们构建为受害者。后现代主义批评家比艺术和艺术家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在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机构或政治层面上行事，尽管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会一目了然地看到，只要受过像样的教育，具备一定的修辞技巧和劝说能力，这些后现代主义批评家所运用的学究式手法事实上都是相当基础的，很容易掌握和运用。这远远比不上以往创造任何伟大艺术所需要的才能。但是，最主要的任务是在时下理论的支持下从批评上进行抵抗。很多后现代主义批评可以被看作是学院派对一向占据中心地位的艺术传统和艺术愉悦所进行的报复，也正因为这样，我下面会指出，在一个有着极为多样化视觉、音乐和文学艺术的时代里，后现代主义批评所全力维护的只是其中一个非常狭隘的传统。现在我要转而讨论的正是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

注释

【1】 约翰斯（Jasper Johns, 1930–）：美国艺术家，波普艺术的先驱。这里的《愚人之家》有很强的互文呼应，可以伸延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批讽刺作品，如被誉为“人文王子”的荷兰思想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的《愚人颂》、法国作家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约1494–1553）的《巨人传》乃至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的《堂吉诃德》。

【2】 许森（Andreas Huyssen, 1942–）：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语与比较文学教授，主要研究德国文学和文化、法兰克福学派文论、后现代主义等，著有《大分裂之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现代性与文本》等。

【3】 詹克斯（Charles Jencks, 1939–）：美国建筑师、风景园林师、建筑理论家，以其对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评论著称，著有《抽象的表征》、《后现代主

义，艺术和建筑中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学新范式》等。

【4】 鲍伊（David Bowie, 1947–）：英国著名摇滚歌手、词作者。伊诺（Brian Eno, 1948–）：英国电子音乐家、音乐理论家、唱片制作人，为氛围音乐（Ambient Music）的创始人。

【5】 菲施尔（Eric Fischl, 1948–）：美国新表现主义画家。萨尔（David Salle, 1952–）：美国新表现主义画家。

【6】 基弗（Anselm Kiefer, 1945–）：德国新象征主义画家、雕刻家，是二战以来德国最著名、也最受争议的画家之一。

【7】 孔斯（Jeff Koons, 1955–）：美国当代艺术家、雕刻家，波普艺术领军人物之一，擅长以实物为基础进行艺术创作。

【8】 麦克黑尔（Brian McHale, 1952–）：美国文论家，现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今日诗学》杂志主编之一，著有《后现代主义小说》、《建构后现代主义》等。

【9】 奥斯特（Paul Auster, 1947–）：美国作家，著有《纽约三部曲》等。

【10】 亨利皇家划艇赛（Henley Royal Regatta）：英国夏季传统的一项社会活动，自1839年以来（除了二战期间）每年七月第一周举行，为期五天，类似于我国的端午龙舟赛，据说其比赛方式和规则曾影响到现代奥运会的设置。

【11】 伍斯特（Bertie Wooster，全名为Bertram Wilberforce "Bertie" Wooster）：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 1881–1975）的作品《吉夫斯》中的人物和叙述者，富有，心肠好，但经常犯迷糊。

【12】 马拉梅（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追求在诗中表现“绝对世界”，对法国现代诗有深远影响，主要作品有诗篇《牧神午后》、诗剧片断《埃罗提亚德》等。

【13】 杜飞（Raoul Dufy, 1887–1953）：法国画家，由印象派转为野兽派，笔触有力，色彩鲜明，所绘物体夸张变形，以求装饰效果，代表作有《三把伞》、风景画《尼斯》等。

【14】 斯潘塞（Stanley Spencer, 1891–1959）：英国画家，以“复活”为主题作过许多宗教画，代表作有大型绘画《复活》、幽默画《保育室》等。

【15】 “有知识的读者”（informed reader）：美国读者批评家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 1938–）曾使用过这个概念，指具备语言能力、语义能力、文学能力的理想读者。

【16】 罗塞蒂兄妹：指英国画家、诗人但丁·罗塞蒂（Dante Rossetti, 1828–1882）、他的妹妹、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 1830–1894）和他的弟弟、批评家威廉·罗塞蒂（William Rossetti, 1829–1919）。

【17】 闪（Shem）：《圣经》中挪亚的长子，被认为是闪米特人的祖先。

【18】 沃（Patricia Waugh）：英国文论家，现为英国杜伦大学英语系教授，著有《六十年代的收获：英国文学及其背景1960–1990》、《元小说》、《女性小说》等。

【19】 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德国戏剧家、诗人，提出“史诗戏剧”理论和“间离效果”的演出方法，强调作品的理性分析和教育作用，著有论著《戏剧小工具篇》、剧作《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等。

【20】 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 1874–1951）：美籍奥地利裔作曲家、音乐理论家，追求无调性创作手法，创立十二音体系，作品有弦乐六重奏《升华之夜》、交响诗《佩利亚斯和梅丽桑德》、论著《和声学教程》等。

【21】 布莱兹（Pierre Boulez, 1925–）：法国作曲家、指挥家，致力于倡导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音乐。

【22】 贝里奥（Luciano Berio, 1925–2003）：意大利作曲家，以实验主义风格及电子音乐著称。

【23】 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被认为是20世纪作曲技法的先驱，主要作品有《降E大调第八交响曲》（即《千人交响曲》）及采用德译中国诗人李白、王维等古诗作歌词的《大地之歌》等。

【24】 利盖蒂（György Ligeti, 1923–2006）：匈牙利作曲家，20世纪西方现代作曲家中的领袖人物之一。

【25】 凯奇（John Cage, 1912–1992）：美国实验主义作曲家，早期创作机遇主义音乐，是电子音乐的先驱之一，最为出名的作品是1952年所作的《4分33秒》，该作品“为任何乐器所作”，没有任何音符，在4分33秒的时间内，演奏者虽然面对着乐器，但不作任何演奏。

【26】 布拉克（Georges Braque, 1882–1963）：法国画家，立体主义画派代表之一，曾参加野兽派绘画运动，后又创作“拼贴画”，代表作有《弹吉他的男人》、《圆桌》等。

【27】 科比西埃（Le Corbusier, 1887–1965）：瑞士建筑师、城市规划师、画家、作家，按功能主义原则设计现代建筑，重要的建筑作品有马赛公寓、郎香的圣母院等。

【28】 克劳瑟（Paul Crowther）：英国哲学家、视觉艺术评论家，著有《界定艺术、创立正典：怀疑时代的艺术价值》、《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哲学》、《20世纪艺术的语言：观念史》等。

【29】 问题素（problematics）：后现代主义使用的一个术语，路易·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把它解释为“内部无法进一步细

分的一个思维整体。问题素使得对有些问题可以进行思考，对有些问题却无法进行思考”。换言之，“问题素”引出了一些问题，它可以进行处理；但这些问题却同时蕴含有它所料不及的另一些问题，它本身对此没有明说，甚至意识不到，更无法解答和处理，这是问题素自身的空白和盲点，暴露出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性”。詹明信等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对此多有发展。

【30】 弗里德（Michael Fried, 1939–）：美国现代主义艺术评论家、艺术史家，现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人文和艺术史教授，著有《马奈的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写作和缺陷》等。

【31】 克雷格–马丁（Michael Craig-Martin, 1941–）：爱尔兰艺术家，主要创作概念主义和简约主义作品，书中提到的《一棵橡树》现收藏于英国泰特美术馆。

【32】 圣餐仪式（the Eucharist）：纪念耶稣被害前最后一餐的仪式。在某些基督教教会，这种仪式也被称作与上帝灵交（Communion或者Holy Communion）。

【33】 戈弗雷（Richard Timothy Godfrey, 1945–2003）：英国艺术史家。

【34】 阿尔西品科（Alexander Porfirievich Archipenko, 1887–1964）：美籍俄裔抽象派雕塑家、画家。

【35】 布兰库希（Constantin Brancusi, 1876–1957）：罗马尼亚雕塑家，常以同一题材用不同材料创作出多种变体雕塑，强调抽象的几何形体和线条的运用，主要作品有《沉睡的缪斯》、《无尽之柱》等。

【36】 安福塔斯（Amfortas）：中世纪传奇中圣杯骑士的首领。

【37】 瓦尔哈拉（Valhalla）：瓦尔哈拉殿堂，北欧神话中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

【38】 沃霍尔（Andy Warhol, 1928–1987）：美国艺术家、先锋派电影制片人、作家，美国20世纪50年代波普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39】 埃文斯（Walker Evans, 1903–1975）：美国摄影家，曾为美国农场安全管理局拍摄纪录片，记录大萧条带来的后果，被誉为美国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社会景观摄影师。

【40】 拉斯韦加斯长街（the Las Vegas Strip）：拉斯韦加斯城一条长6.7公里的大道，两侧云集了世界著名的赌城、宾馆及其他娱乐场所。

【41】 科林斯式建筑：科林斯式建筑风格华丽，过分雕琢。

【42】 修拉（Georges Seurat, 1859–1891）：法国画家，新印象主义创始人，其作品《大碗岛上星期日的下午》是19世纪顶级艺术品之一。

【43】 男性视角的历史和女性视角的历史：这是作者的文字游戏：“his-

story”–“her-story”–“history”。

【44】 布赫洛（Benjamin Buchloh, 1941–）：美国艺术评论家，哈佛大学现代艺术教授，著有《新先锋艺术与文化产业》等，2007年获得第52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艺术评论金狮奖。

【45】 大地艺术（earth art）：按照艺术家构思改变自然景物的视觉艺术形式，又称地景艺术。

【46】 马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 1946–1989）：美国摄影师，以大幅黑白肖像、男子裸体照片等著称，其描绘同性恋行为和性虐待的摄影作品曾在美国引发激烈的艺术论战。

【47】 《安提戈涅》（*Antigone*）：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前496–前406）的著名悲剧。《赫达·加布勒》（*Hedda Gabler*）：挪威戏剧家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的剧作。

【48】 十月派（October group）：十月派这一称呼由杂志《十月》（*October*）而来，其代表人物之一、后现代主义艺术评论家克林普于1977–1990年期间担任该杂志编辑，并于1981年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绘画的终结》（“The End of Painting”）。

第五章

“后现代状况”

信赖真相

或许我们可以用“现实主义的丧失”来概括前面所讨论的一个中心主题，随之丧失的还有对以往历史的信任感。事实上，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指出，界定后现代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文化中“历史感的消失”，普遍缺乏深度，只有“永恒的现在”，传统记忆则消失殆尽。很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正是社会状况中的某种因素导致了这种结果。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后现代主义分析是对权威和可靠性的批判——体现在哲学领域、叙事以及艺术和真实的关系之中。所有这一切怀疑行为不仅与学术研究者及艺术家们的态度有关，更和西方民主社会中更普遍的信心失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左翼人士对“当今资本主义”所隐藏的操纵性怀有敌意，就连最乐观的开明人士都普遍认为真实的新闻往往受到图像的操纵，基本信息的传播总是因商业集团利益而受到歪曲，即使是像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这些与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给人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的可怕事件，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戏剧化的媒体事件”，由摄像机剪辑、合成一些片断，“发生在电视上”，为政治目的服务——狙击手肩上扛着摄像机，演讲者在白宫前的草坪上发表演说希望事态好转，等等。不管是巴尔特之类的批评家的作品，还是米兰·昆德拉和拉什迪的小说，都传达了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我们所接触到的政治和历史事件其实都已经被虚构化了，是一种叙事，已经被政治和经济目的这双幕后之手篡改过了。

不难看出电视是如何出色地充当这类虚构化了的信息的主要传播者的。信息如此之多，如此相互矛盾，如此明显地受到（拥有霸权的）经济利益的驱动，如此商业化，如此不值得信赖。电视显然是一个应被批判的对象，因为电视这一媒体依赖的是现实主义“明白无误的”再现，而这在我们的观念中是与摄影紧密相关的，也正是这一点遭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质疑。

不真实的图像

大众传媒用图像取代事实，这一认识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无一例外都是资产阶级话语所产生的错误意识的受害者，而自由主义则质疑商业集团对自由言论实行的限制。问题是，自从现代主义开始反对19世纪现实主义到现在，对于追求真实的现实主义的抨击已经历时这么长的时间，以至于对于很多人来说，对虚构的怀疑也使他们失去了对真相的信赖，而这一点我们从有关书写历史的争论中已经有所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很欣赏这样一个观点：现在普遍存在一种“表征危机”。他认为，随着后现代性的到来，符号不再承担指涉现实的功能，“这导致现代主义所推崇的自主空间轰然倒塌，而资本权力不断扩张，侵入了符号、文化和表征的领地”。留给我们的

是能指那纯粹、任意的嬉戏，我们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它不再生产现代主义式的不朽作品，而是不停地将以前文本的碎片、原先的文化和社会生产基础材料进行重组，并在这些现有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原著作攫取其他著作的内容，原文本采用其他文本的片段拼合而成。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后现代主义和视频文本》引自德里克·阿特里奇等编著的《写作语言学》（1987）

对于很多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图像的社会，它最关心的只是“幻象”的生产和消费。现在，信息不过是我们出钱购买的东西而已。（或许在一个由知识支配、为技术驱动的社会中，这也是我们所购买的最主要的东西。）我们始终都在试图掌握某种新的软件。对于政治现实以及电视和报纸这类共同的社会生活机构的怀疑和失望，强化了我们对艺术的促进和调解作用的怀疑和失望。根据尼采的理论，无论是白宫的正式声明，还是日常肥皂剧的插科打诨，所有这些现象多多少少都在秘密地维护着某些人的经济权力或其他权力，而不是服务于任何真理，而这种尼采式的假设无处不在。这就导

致了一种极为偏执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不仅存在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和艺术中，也同样体现在那些讲述真实或虚构阴谋故事的通俗电影之中。在奥利弗·斯通的电影《刺杀肯尼迪》里，军界的一些人串通起来，策划了刺杀肯尼迪的阴谋，目的是为了让美国继续在越南作战，而影片所表现的是一个来自新奥尔良的律师大无畏地与这些阴谋分子进行抗争。有多少人相信这部电影的情节不是虚构出来的（而实质上该片确属虚构），而是事实？

图20　迪士尼设计者[1]的《美国大街》（1955），阿纳海姆，加利福尼亚州这是你生活的大街吗？

在那些认为我们周围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不真实的观点中，最为著名、最骇人听闻的当数让·博德里亚的断言了。他响应福柯的理论，认为

迪士尼乐园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这个“真实的”国家、“真实的”美国的一切，本身就是个迪士尼乐园（就像监狱的存在是为了掩盖这样的事

实：无所不在的社会本身合起来就是座监狱）。

他接着又指出，（有着海盗、西部边疆和未来世界奇妙场景的）迪士尼乐园

> 被呈现为想象和虚构的地方，目的是让我们相信世界其余的部分都是真实的。而事实上，围绕着迪士尼乐园的整个洛杉矶乃至整个美国都不再是真实的，而是超现实的、仿真的了。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对现实（或意识形态）的错误表征问题，而是在掩盖真实不再真实这一事实，因而现在的问题是要挽救真实原则。
>
> 想象的迪士尼乐园本身不存在真实与虚假的问题；它是一个威慑机器，目的是为了逆向恢复真实的虚构性。
>
> 让·博德里亚：《仿真》（1983）

我们完全被困在一个由媒体主宰的符号世界里，资本主义不怀好意地创造出这些符号以合成我们的欲望，而这些符号不过是在一个难以逃脱的概念怪圈里相互指涉而已。它们只是幻象，在一个博德里亚称之为“超现实化”的过程中替代了真实的事物和它们真正的关系（只有左翼人士才了解这些，因为他们能够看透假象）。因此，无论如何我们永远得不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但与此相反，我们可以说我们确实得到了我们花钱购买的东西，不管广告是怎样宣传它们的——尽管广告不计其数，麦当劳的汉堡就是麦当劳的汉堡，而且很多人认为它的味道确实不错。如果你身上散发着迪奥的沙丘（Dune）香水味，你身上散发的就是沙丘香水味。不管广告如何千方百计地诱导我们，所有这一切并不仅仅 是符号游戏。但是就连没有读过任何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人也不会完全被蒙蔽，也不会真的相信其他人会上当、上大当。看一下世界各地就政治家进行的民意调查，这一点就清楚了。哪怕是关于广告效果的市场调研也行。但是听了博德里亚和其他人的论调，你会觉得我们每天吃的、喝的都是能指，晚上睡的、盖的也都是能指。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这种论点结合了过去自由主义对广告的抨击（认为广告合成出一些我们并不“真正”拥有的需求）和一点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理论——客体的符号总是具有欺骗性，人们绝不可

能通过这些符号追溯到他们“真正”想要的客体。法国拉斯科洞穴的仿制品取代了真正的拉斯科洞穴——它使我们相信这没什么两样。其实，要想让参观拉斯科洞穴的游客学会如何区分真假，明白让游客参观仿制的洞穴是出于保护古迹的目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本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哪怕是游客中那些天真透顶的人都很容易明白，更别提艺术史家们了。

总的说来，后现代主义者都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所激发、产生的信仰和艺术通常也都是否定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大众的富裕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当人们满足了基本的需求之后，广告和市场营销就会趁虚而入，合成和界定我们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而那些真正有需求的人反倒更加容易被遗忘。于是便造成了市场营销优先于生产。我们会有一种印象，觉得哪怕是司法也是或者可以成为媒体事件——比如电视上播放的辛普森一案【2】的审判如此明显地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辩护者的夸张和装腔作势、戏剧性场面中相关人员精心的着装以及律师和电视记者们带着政治倾向和陈式化偏见的片断总结。整个事件看起来虚假得令人作呕，因为所有的参与者都通过媒体虚伪地模仿他们认为能被大家接受的榜样或虚构的典范，借此来操纵人们的观点。我们完全可以问：公正的司法怎么能在这样的舞台上得到落实呢？归根到底，法官和陪审员毕竟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真的会被这种毫无羞耻之心的角色扮演所蒙蔽吗？还是说我们可以相信法庭上的司法程序会比这个更可靠？我们所有人都会对此抱有疑问，而后现代主义者（事实上还有写了大量庭审悬疑小说的作家们）所坚持和强调的正是这种质疑。

但是他们在描述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叙述冲突及其解决方法的时候也常常带有误导性的悲观主义色彩。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遵循的都是由来已久的后尼采传统，对理性丧失信心。他们准确地认识到所有话语都与权力体系有内在联系，而权力体系或许支撑着这些话语——认识到话语所表述的是权力——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的文化不过是一些对立力量在错综复杂地相互影响罢了。他们怀疑真相，因而不在乎理由陈述和理性协商这样的举措，也

不会对程序的公正性给予应有的关注。弗洛伊德的潜在影响通常意味着我们所说的一切传递着种族、阶级、阶层和性权力游戏的权威和威胁。可是这一切几乎没有考虑到民主社会中法律契约和法律约束所起的作用，以及道德因素对促进人权保护（这里的人权指的是普遍的人权，不因文化而异，也不是某一群体的专有物）的作用。此外，它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坐到谈判桌上不是为了传达威胁之意（抑或如果我们认为历史著作、神学著作和小说并非只是在用虚构的叙事欺骗读者），那么我们必须设法理智、坦诚地用确凿的证据支持我们的观点。可否想象会有人认为任何国家（美国、以色列、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家的任何言论都是一种帝国主义、宗教或“流氓国家”的霸道行为，仅仅因为这些言论暗示了譬如说那个国家政治机构和武装力量的权力。

当然，这些政治家所作的很多声明确实反映了自己国家政治机构和武装力量的强势，令人极为反感，但是在发生冲突时，弄清楚那些最理性的人所持的意见——比如那些能对冲突造成的过错和产生的责任以最无偏见的态度进行裁决的人——就显得更加重要。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们充其量只能说后现代主义者是出色的批评解构者，但却是糟糕的建构者。他们通常把建构的任务留给了社会中那些耐心的自由主义者。这些自由主义者仍然愿意设法至少弄清真实和幻想之间存有的一些区别，而后现代主义者却认为阶级冲突和心理冲突不可避免，并在这种悲观论断的卷裹下模糊了真实和幻想的界限。

从另一方面来说，后现代主义者显然已经认真思考过1945年以来文化是如何逐步演变成他们所说的“后现代状况”的，这种转变的本质又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这样的后现代状况中，人们不再认为全球社会现状由传统的经济或政治框架决定，而是一种文化状态。这种对文化分析（目前这种文化分析因蓬勃发展的“文化研究”思潮而备受关注，而后者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的依赖是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社会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当下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社会活动显然方兴未艾，目前（至少自1989年以来）

还没有什么能取代它们。由于普遍存在着一种预测，认为社会的富裕状况会持续下去（尽管这种预测可能带有虚幻的色彩），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些活动主要生产信息，而不是生产实物，因而需要从文化角度来分析它们。

因此，在讨论哪些社会变化对当今社会影响最大时，后现代主义观点强调的是新型媒体对时间和空间的高度压缩（这里我主要采用大卫·哈维[3]的观点）。（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电视和因特网同步接触到世界几乎每个角落的事件及信息。）时下的因特网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现象——它（目前）是一个没有等级、真正未经组织的大杂烩。与因特网同时发生的是从重视商品生产到重视信息服务生产的转变。（现在的情况是，每天都有交易者赚大钱或大亏本，但不是通过买卖商品，而是坐在电视屏幕前，通过计算机获得数量空前的信息，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操作。）有些人认为这是不断变化的新闻图像或（“掌控市场者”的）观点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症状，令人愤慨，但这同样是“后现代状况”中的典型现象。我们很多人都在一个高度紧张、充满信息的环境中工作（那些不身处其中的人通常要么正在挨饿，要么是文盲，要么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要么就是精神不正常）。所有的一切都过剩。我们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图片：杂志上，广告中，电视上，以及城市的大街小巷，这给我们的感官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也是现代主义者曾抱怨过的）。商品的销售完全取决于口味的变化，结果时尚取代了文化，而通过媒体引导人们形成新观念成为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手段。

后现代主义者在作出上述诊断时很容易受到指责，他们似乎过于相信他们的同胞会轻易上当。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很多道德非难不过是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喋喋不休，根本不值得用理论来对其进行改头换面，骗取人们的敬仰。对有些人而言，这样的状态还说得过去。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后麦克卢汉地球村，起维系作用的是电子交往，而不是真正的人际社会关系，因此符号理所当然比商品更加重要。

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得问这样一个问题：后现代主义“怀疑主义阐释学”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呢？分析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极为

严重的核心矛盾——如果有人说所有的一切“真的”是由具有欺骗性的图像而非现实构成，那么他／她又是如何知道 的呢？他们事先假设出一种差异，然后对其进行质疑。这些批评家充其量不过是在居高临下地对他人的 （自我）欺骗进行乏味的评论，或者是以广为人们接受的自由主义道德立场为借口，因广告行业和电视成功地敦促人们进行消费，使人们相信一些他们（那些批评家）不赞成的东西而对其大加指责。这其实就像在两个政治家的观点中作出选择一样，并非什么独特见解，而且也不能作为强有力的证据去证明后现代主义对当今社会的崭新状况有所创见。

更加根本的问题在于一群有影响力的少数派对以往流行的正统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认同无疑正在消退。后现代主义怀疑论者注意到，在一个极为宽容的多元社会里，关于现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版本，而他们也乐意采纳一点相对论，完全可以倾向于选择像理查德·罗蒂 [4] 那样的后现代主义反讽手法 。这些反讽主义者对任何“终极词汇”的真实性都持怀疑态度，并且认识到别人有着不同的词汇；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词汇比他人的词汇“更加接近现实”。他们只是担心自己或许在玩一种错误的语言游戏，并因此而成为不合时宜的人。这样的人

> 并不想为自己或其他反讽主义者提供一种方法、一个平台或一种基本原理。他只是在做所有反讽主义者都做的事情——试图获得自主地位。他设法从继承的偶然性中挣脱出来以确立自己的偶然性，从原先的终极词汇中脱离出来以设计自己的词汇。反讽主义者这一类群的普遍特征是他们不希望靠自身以外的东西来消解他们对于终极词汇的怀疑。这意味着对他们来说，解决疑惑、达到个体完美境界的标准是自主性，而不是依附于自身之外的某种权力。
>
> 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1989）

这里所表达的观点就是：认识到所有事物都缺乏基础、都带有偶然性，这是件好事。人们的思想会因此而更加开放，因为在讨论问题的可能性时受到的限制会更少；同时，人们还会认识到，自己在这类讨论中的观点是相对的，因为对方的观点很可能也有着坚实的依据。

在罗蒂看来，这是一种存在主义反讽。反讽主义者对于自己所用的词汇心存疑虑；而别人的词汇似乎也不错。没有什么“最终的答案”或基本立场可以消除这些疑虑；你可能会始终担心别人所看到的现实可能比你（用你自己的词汇）看到的更多一些。或者我们可以说，在艺术领域而非哲学、政治或道德领域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种创造艺术的方式，没有哪一种阐释艺术的方式更应该享有优先权。事实上，哲学还远远没有认识到自己与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之间的相似程度。因此，这种反讽真正的意义在于我们永远不能完全认真地对待我们自己、我们所用的词汇、理论及艺术体裁。（在后现代语境下）我们不再能够依赖于那些超越一切、压倒一切的宏大的道理或论点；我们只能相互依靠，依靠我们小范围对话得来的结果（其中包括艺术创作）来相互证明。我们会采用完全实用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成功与否。纵观历史，词汇及其竞争者一起一个接一个地轮番登场。前一阵子流行“新几何绘画”[5]，现在则是英国青年画家和“感觉”[6]风靡一时。在这方面，政治运动比艺术思潮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说从撒切尔主义到新工党的转变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罗蒂式的词汇转变，其中包括每一届政府为塑造形象而做的自我宣传，而非制定和发布理据充分的政治新观点和原则。

如果人们能够接受这种后现代主义观点，那么我们就会真正拥有一种后启蒙式的自由主义。或许这一理想在美国尤其有吸引力，因为从总体来看美国致力于多元文化，相信权利和自我提高，在一个总体世俗化的国家里有着很多基督教的信奉者。同时，这一理想还具备一种内在的治疗效果，而不是纯哲学观点——它提倡：“让我们就这一点详细地谈一谈。”当然，即使是这一建议也不过是条建议而已——如果真正按照后现代主义方式采纳这种（反讽）形式的自由主义，它也只不过是生活的很多形式之一而已。

很难相信这种罗蒂式的后现代主义在英国、法国或德国会有市场，更别提那些后苏维埃国家了，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参与对话者的观点即便不是那些假设上毋庸质疑的（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或民族主义的）传统观点，也都无法展开商榷。但话又说回来，那些持怀疑

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指出，问题恰恰在于一些人毫无根据地相信确定性。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当我们要求在北爱尔兰进行“建设性对话”时，我们其实也是在要求主要的对立各方采用一点反讽相对论——而他们显然认为这种要求难以接受。

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往往信奉多元文化主义倡导的多元论和相对论。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可以十分轻松或天真地接受既定事实，即我们西方人如今大多数相信，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看，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是分裂的。尽管我们或许会相信诚信守约这一逻辑，但是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实用政治[7]之后，我们还能像康德和休谟那样相信这个逻辑吗？这些传统原则以及可供替代的其他原则在今天看来似乎都缺乏坚实的基础。正如约翰·格雷[8]所言：

> 后现代状况有着多元、瞬时的多种视角，缺乏任何理性、超验的基础或统一的世界观，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作为一种历史命运给予了我们，假装情况不是这样只能是徒劳。
>
> 约翰·格雷：《启蒙运动的后续》（1995）

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必须抵制这种状况，不能用它作为借口来为一种嘲讽的无动于衷态度开脱。要想拥有卓越的解构主义洞察力，需要依靠真理的概念。自我是社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但这一观念并不足以抵消下列观念：即人作为个体构成自己独特的生活叙事，在政治语境下捍卫个体的法律权利必须遵循普遍原则或理想，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那些规定将“犯通奸罪”的妇女当众用石块砸死的教义，我们不能满不在乎地称之为“他们那里的做事方式”，仅仅将其当作和我们“这里”不同的一种行为方式。看来不管是否带有反讽意味，后现代主义相对论事实上是对多元宽容的呼吁，只不过是经过了改头换面而已。在后现代主义时期，千差万别的个人立场、性别立场和种族立场变得尤为突出——至少在富裕社会如此——后现代主义相对论恰恰适应了这样的现实。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指出并捍卫这里所涉及的身份差异方面作了很多努力。然而，在实际过程中

它们仍然会导致激烈的冲突，而要解决这些冲突则需要比后现代主义原则更为完善的东西。对有些人来说，同性恋违背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对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来说，同性恋不过是个人喜好而已，本身不会引起什么道德上的后果，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事关文化或生活方式的参与问题，理应整体上加以捍卫，但只有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才能称它是一种权利。鉴于此，很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仍须了解其没有言明的伦理底线。而在我看来，这一伦理底线不应是无动于衷的相对论，而是尽可能宽容地接受下面的现实，即不同艺术品所涉及的价值观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无法相互通融，而且常常相互矛盾，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宽容的态度，即各种后现代主义论断所表现出来的宽容态度，绝对不能视为事实上的相对主义（尽管两者常常被混为一谈）。宽容是指为了某一更加重要的理想——如探索的自由或者他人在建构自己的叙事或身份时所享有的自主地位——而有原则地容忍他人表达和追求那些你明知不对的信念。不过在我看来这也还有个前提，就是他们在此过程中不应损害他人。但是宽容和后现代主义怀疑论无论到什么程度都不能违背像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尽管其中的一些条款值得商榷）或《日内瓦公约》中所陈述的原则。

我一直试图指出，后现代主义有点像一个党派的宣言——从根本上来看它只是一些信条，事实上并没有被所有人接受，也不可能反映当代社会男性和女性的普遍状况。如果我们先前未曾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并接受过弗洛伊德的理论，就不可能认为后现代主义信条是对我们生存状况的“真实”判断。（如果我们确实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就是接受了一种更为宏大的意识形态，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想要抵制的东西。）正如汉斯·贝尔滕斯雄辩地指出的那样：

尽管无所不在的后现代性及其提倡者会给人一种错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下面的这些观点：语言构成了现实，而不是再现现实；自主、稳定的现代主义主体已经被后现代主义个体代理所置换，而这个后现代个体代理的身份普遍具有他定性，并始终处于一个动态过程之中；意义已经社会化，瞬息万变；只有在既

定的论述结构、既定的权力结构中，知识才能成为知识。

汉斯·贝尔滕斯：《后现代观念》（1994）

可供替代的其他选择

后现代主义批评作为道德规劝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要说它对我们现在的状况具有独特的洞察力或者对社会进行了准确、完整的描述，却难以让人信服。因此，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把后现代主义思想和它所取得的成就放到更大的背景中，从它与其他信仰传统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中去认识它。在我们所讨论过的哲学、伦理学、艺术活动等所有领域中，除了后现代主义者倡导的传统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非常具有活力的知识传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英美自由主义传统。在我脑海中涌现的作者有约翰·罗尔斯、约瑟夫·拉兹、迈克尔·桑德尔、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埃米·格特曼、玛莎·努斯鲍姆、威尔·基姆利奇卡、约翰·格雷、罗纳德·德沃金、布赖恩·巴里和迈克尔·沃尔泽等。但大多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知道的英美哲学家似乎只有理查德·罗蒂。

因此，后现代主义所取得的不朽成就很可能不是在哲学或政治领域，甚至也不是在伦理思想方面，而是在艺术文化领域。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政治曾经风靡一时，随着时过境迁，后现代主义政治也会自谋出路。但是如果说某种历史感和传统感能得以保留的话，那这一时代所能留下的就是把后现代主义看作一种文化现象，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通过一些重要作品对我们产生了影响，尤其是一些重要的作家，像阿比什、巴特尔梅、库弗、德里罗等，按字母顺序还可以继续往下列举。当然，很多用其他艺术形式创作的人也同样是（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典范——其中包括约瑟夫·博伊斯、克里斯蒂安·博尔坦斯基、弗兰克·盖瑞、菲利普·格拉斯、让–吕克·戈达尔、罗伯特·劳申伯格、理查德·罗杰斯、辛迪·舍曼、弗兰克·斯特拉、詹姆斯·斯特林、卡尔海因兹·施托克豪森和维姆·文德斯等。

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艺术领域中还有其他的传统也坚持了下来——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因为现代主义传统还在继续，另外很多艺术家从后现代主义中汲取了养料，但并没有成为它忠实的追随者。一些现代主义思潮——如达达派和杜尚式采用“现成”物体的构成主义【9】（影响到简约主义或大色域绘画【10】）以及（激发了劳申伯格等画家在作品中对无理性联系的图像进行后现代主义拼贴的）超现实主义——似乎被后现代主义直接挪用了。这种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之间的相似和延续比比皆是（世上无新事），偏离现代主义而形成后现代主义只是因为所涉及的价值观不同而已。（比如，后现代的超现实主义并没有弗洛伊德的整体理论来支持它。）后现代主义十分在意政治差异，同时也坚持认为艺术具有政治意义，这使它不可避免地对现代主义者的观点进行批判，因为现代主义者愈来愈普遍认为艺术品的外观或形式特点能给人带来愉悦（即使只是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式愉悦）。然而，正如我前面曾指出，不管是明显还是完全地拥护，只要赞同后现代主义学说，新表现主义绘画就可以延续现代主义特点，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而抽象主义乃至现实主义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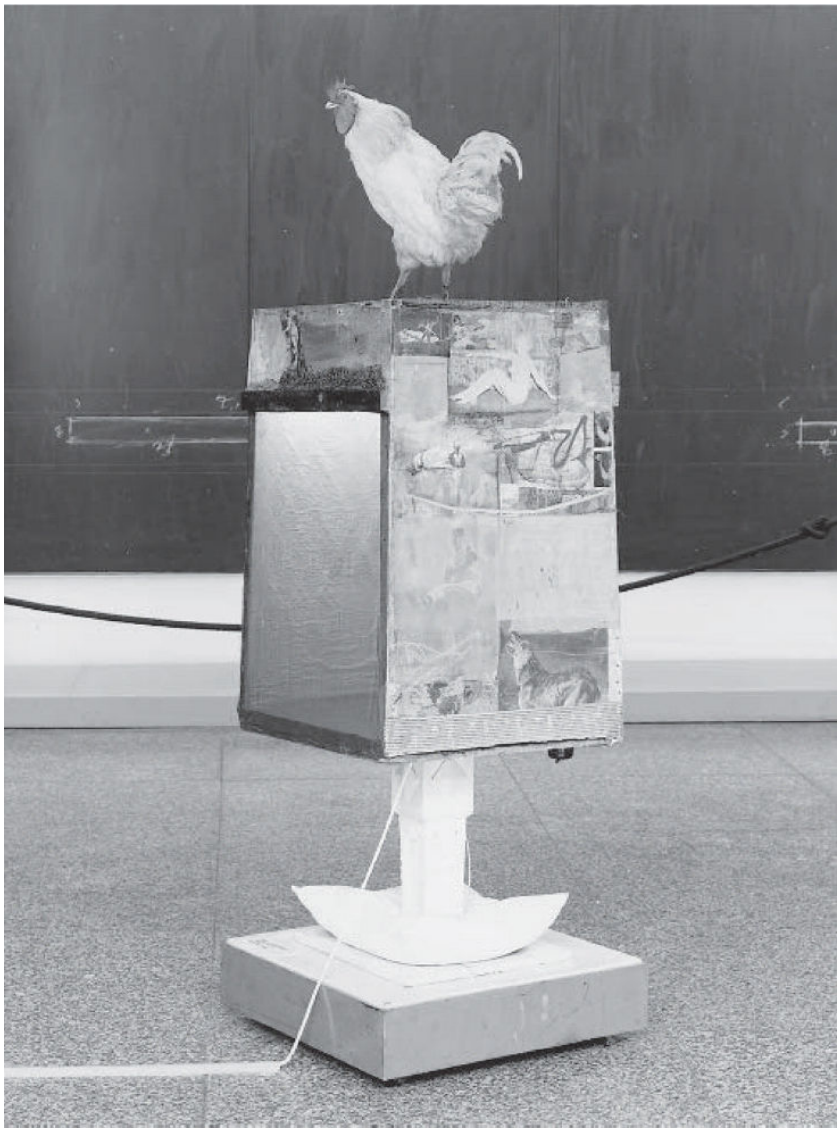

图21　罗伯特·劳申伯格：《女奴》（1955–1958）
“图像导致相对主义导致怀疑。”那么那只鸡在顶上干吗呢？

事实上，自1945年以来（为便于我们分析，尤其是1970年以来），很多重要的艺术活动都设法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之间采取折中的手段。（当然，正如很难给“后现代主义”本身下定义一

样，要想给与“后现代主义”截然不同的“现代主义”下定义也同样很困难，就这一点而言，有些艺术家就很难归类。）比方说，许多很重要的作家，如米兰·昆德拉、伊塔洛·卡尔维诺、萨尔曼·拉什迪、约翰·巴思、朱利安·巴恩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及翁贝托·埃科等都把这个时代所关心的话题写进了他们的作品之中，但他们都不是不折不扣的后现代主义者。而像珍妮弗·巴特利特、安东尼·克拉格、理查德·迪本科恩、埃里克·菲施尔、霍华德·霍奇金、大卫·霍克尼、比尔·杰克林以及R. B. 基陶伊这些画家们也是同样如此。像约翰·亚当斯、哈里森·伯特威斯尔、捷尔吉·利盖蒂以及维托尔德·卢托斯瓦夫斯基等许多著名作曲家也是这种情况。

因此，像翁贝托·埃科（他自己就是个重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小说就介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他的小说《玫瑰的名字》（1983）作为一部侦探小说，似乎依靠的是现代主义对确定性的寻求，但是小说却完全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就像埃科在后记中声称的那样：“几乎什么都没有被发现，侦探被击败了。”在小说中，巴斯克维尔的威廉说他找出罪犯乔治完全是“误打误撞”的结果。他本以为证据中有着某种预示性的规律，但事实上其中毫无规律可言。他解决了很多次要的疑点，却是通过（颇具嘲讽意义的）误解才解开整个情节的疑团。但是，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由肖恩·康纳里扮演的威廉看起来很成功，因为商业影片无疑不敢冒险将过多后现代主义式的失落情绪带给观众。

很多像埃科这样的杰出作家都带着些非常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性，但他们同样也带着很多更持久的保守主义特征，正是这些保守主义特征使他们更能接近文化的中心，而这或许也是文化本身希望能保留下来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之外还有很多了不起的艺术

很多人的艺术经历主要还是在自由现实主义形式范畴内，与后现

代主义相比，他们更有信心获取真理，获取一个不仅与政治因素相关、更与人道主义关怀相关的真理。约翰·厄普代克、伯纳德·马拉默德、诺曼·梅勒、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思、海因里希·伯尔、伊恩·麦克尤恩这些传统的自由主义小说家所创作的许多作品到现在依旧起着重要作用，可以帮助许多人理解当代生活，正如约翰·阿什伯里、弗朗西斯·培根、英马尔·伯格曼、卢西安·弗洛伊德、京特·格拉斯、哈罗德·品特、弗朗索瓦·特吕弗以及其他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做的一样。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认可这样的名单，但是这些名单可以提醒我们，在理论乃至明显的政治动机之外，是我们每个个体共同写就了正典，以记录和保存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在这样的活动中，后现代主义艺术一直是个很有影响的组成部分，但并不占明显优势。

然而，在怀疑论和信仰观、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意识形态的压制策略和自主身份的保留策略之间重新进行论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正是这些方面肩负着对“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进行说明和批判的重大责任。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或许并没有牢牢把握职业政客们的日常活动，而我猜想对他们所能施加的影响就更小，尽管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巨大影响下，人们开始对性别和种族这些“身份”政治采取日益开明的态度。作为文化批评家，他们倾向于将政治、伦理动机看作一种争论，一种关于某些以图像为主的表征性 活动是否合法的争论。他们这样做确有其道理。

在本书中，我试着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解释和评论，因为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最有影响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该轮到后现代主义的创始人去面对新生一代的质疑了。正因为如此，我将注意力尽量集中在那些我认为最有生命力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上。由于“理论的兴起”，围绕后现代主义的论战（与围绕现代主义的论战不同）有着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这些论战提出了一些反复出现的哲学问题。正是这种根本性、深层次的辩证对话——理性和怀疑、现实和图像、政治权力的接纳和排除之间的辩证对话——才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核心所在，而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我们还会将这一辩证对话继续进行下去。

注释

【1】 迪士尼设计者：英文为“imagineer”，由“image”和“engineer”构成，指迪士尼公司为建设主题公园而专门聘来从事“模拟工程”（imagineering）的设计人员，包括艺术家、作家、建筑学家、园林专家、模型专家等。

【2】 辛普森一案：1994年美国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O. J. Simpson, 1947–）被控谋杀前妻及其男友。1995年，在经过漫长的举国瞩目的审判（被称为“世纪审判”）之后，辛普森被刑事法庭宣判无罪。1997年，民事法庭认为辛普森对两人之死负有责任，判其作出3,350万美元赔偿，但他一直拒绝支付赔偿金。2006年，辛普森写了一部名为《如果我做了》的小说，以第一人称描写了那起谋杀案，但在出版前夕被出版商撤回。

【3】 哈维（David Harvey, 1935–）：美国社会理论家，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教授，著有《后现代性状况》、《希望的空间》、《新自由主义简史》等。

【4】 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美国后现代哲学家，著有《哲学与自然之镜》、《偶然、反讽与团结》等。

【5】 新几何绘画（Neo-Geo）：一种后现代绘画艺术，试图用拓扑学的视觉原理进行创作。

【6】 感觉（Sensation）：一种绘画艺术思潮，源自英国传媒大亨、伦敦萨奇画廊老板、先锋艺术的支持者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 1943–）。1999年，萨奇把他网罗的一批艺术作品集中起来，在德国柏林的汉堡火车站博物馆举行展览，命名为“感觉”（Sensation）。次年，“感觉”展进军美国，在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展出，在一幅题为“圣母马利亚”的画作上因画家（英籍尼日利亚黑人艺术家查里斯·奥菲利）在圣母马利亚身上涂大象粪便，引发宗教抗议，逼迫纽约市长勒令展览关闭，结果引起后现代艺术家全球范围的抗议，萨奇也成了甲壳虫乐队灵魂人物列侬之后又一位英国文化英雄。

【7】 realpolitik：德语词汇，指从实用而不是从道义或意识形态考虑出发的现实政治、实用政治。

【8】 格雷（John Gray, 1948–）：英国政治哲学家、作家，现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著有《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后续》等。

【9】 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现代西方艺术流派之一，多用玻璃、塑料、木块、电线等构成巨大的抽象立体艺术品。

【10】 大色域绘画（colour-field painting）：指强调色彩而不太重视形式和画面的绘画风格。

在过去的十年间，后现代主义一直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时髦术语。但是如何来定义后现代主义呢？在本书中，克里斯托弗·巴特勒质疑、探求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核心思想，以及他们在理论、文学、视觉艺术、电影、建筑、音乐等方面的表现。他认为艺术家、知识分子、批评家以及社会科学家们“就像是一个组织松散、喜好争辩的政治党派的成员”——这个政治党派的成员包括辛迪·舍曼、萨尔曼·拉什迪、雅克·德里达、沃尔特·阿比什、理查德·罗蒂等。该书搭建起一个极为有趣的框架，以揭开“后现代状况”的种种奥秘，所涉内容从博物馆文化的政治化，一直谈到崇尚政治正确的方方面面。

百科通识文库

49

解读苏格拉底

克里斯托弗·泰勒 著

欧阳谦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解读苏格拉底

克里斯托弗·泰勒 著

欧阳谦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40**

Socrate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8.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1998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C. C. W. Taylor 19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苏格拉底 / （英）泰勒（Taylor, C.C.W.）著；欧阳谦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94-6

Ⅰ．①解… Ⅱ．①泰… ②欧… Ⅲ．①苏格拉底（前469～前399）- 哲学思想 - 研究 Ⅳ．①B50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26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94-6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略语表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生平
第三章　苏格拉底文献和苏格拉底问题
第四章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
第五章　苏格拉底对后世哲学的影响
第六章　结论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泰勒，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研究员、哲学讲师。著有《古希腊人论享乐》、《原子论者：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等书，译有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合译）。

译者简介

欧阳谦，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20世纪西方人学思想导论》、《西方哲学问题研究》（合著）、《西方哲学智慧》（合著）等书，译有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

图目

图1　苏格拉底半身像——雕刻于苏格拉底死后不久。这个半身像是罗马时代的复制品。
图2　苏格拉底与他的“两个妻子”——这是17世纪荷兰画家C.B. 埃弗丁恩（1606-1678）带有喜剧风格的画作。
图3　半圆形公共会场——雅典公民大会的会场。这是从天文台上看到的远景。
图4　国王拱廊或者叫巴斯勒奥斯拱廊的废墟——这是负责宗教事务的执政官阿耳康国王的处所。
图5　被认为是装有用于处决犯人的毒药的小罐。
图6　苏格拉底之死——《克力同为已经死去的苏格拉底合上眼睛》，意大利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的作品（创作于1787至1792年间）。
图7　苏格拉底训斥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场景（意大利画派作品，约1780年）
图8　拉斐尔壁画《雅典学院》（创作于1508至1511年）的局部——该壁画描绘了古希腊那些最著名的思想家。
图9　圣奥尔本斯的修士马修·帕里斯（卒于1259年）为一本名为《先师苏格拉底的预言》的算命书所画的扉页插图。

略语表

DL	Diogenes Laertius 第欧根尼·拉尔修
Pl.	Plato 柏拉图
Apol.	《申辩篇》（《苏格拉底的自辩》）
Charm.	《卡尔米德篇》
Euthyd.	《欧谛德谟篇》
Euthyph.	《游叙弗伦篇》
Gorg.	《高尔吉亚篇》
Hipp.Ma.	《大希比阿篇》
Lach.	《拉凯篇》
Ph.	《斐多篇》
Prot.	《普罗泰戈拉篇》
Rep.	《理想国》
Symp.	《会饮篇》
Tht.	《泰阿泰德篇》
Xen.	色诺芬
Apol.	《申辩篇》
Mem.	《回忆苏格拉底》
Oec.	《经济学篇》
Symp.	《会饮篇》

第一章
绪　论

苏格拉底在哲学史上的位置独一无二。他是最具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同时又是最神秘、最难了解的哲学家之一，而且，他的历史影响还与他的这种神秘性有关。首先，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的人格对他同时代的人，尤其是对柏拉图，都产生了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苏格拉底的言传身教，尤其是如果没有苏格拉底之死对柏拉图的影响，柏拉图大概就会成为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这样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就会完全变样。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楷模，一个将道德与知识完全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楷模，一个面对唾弃和死刑表现出英雄般坚定的楷模，苏格拉底的形象一直影响着我们。为了回应时代的哲学变革，每个时代都要不断地强调苏格拉底作为哲学第一殉道者和守护神的形象。然而，苏格拉底的这个形象其实并不是由他本人创造的，而是由那些以他为写作题材的人创造的，尤其是柏拉图。柏拉图将苏格拉底描绘成理想化的哲学家，这个形象从古至今一直吸引和激励着世人。如果我们想试图透过柏拉图的生花妙笔来寻找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我们会发现，这就如同19世纪的《新约》研究企图寻找历史上的耶稣一样，最后其形象还是模糊不清。

苏格拉底的神秘性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与耶稣的情形十分相似）：首先是苏格拉底本人没有写下任何东西，其次是他死后很快就成了“苏格拉底对话”这种文学体裁的写作主题。他的那些亲朋好友，门生故旧依据各自的兴趣，发挥各自的想象力来呈现他的对话，以此来表现苏格拉底个性和对话的不同方面。柏拉图的对话录和色诺芬（Xenophon）的回忆录是这类体裁中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作品，另外还有一些比较零碎的回忆录，特别是埃斯基涅斯（Aeschines）的那些回忆录，因为被后人引用而得以留存。我们下面将会详细讨论这些作品。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柏拉图、色诺芬和其他作家都是出于不同的目的来描绘他们心目中的苏格拉底，因此苏格拉底就有了不同的形象。可以说这些作家歪曲了苏格拉底的形象，他们往往创造出一个多变的苏格拉底形象，如理想化的哲学家或者是模范公民。“苏格拉底”只不过是用来称呼这个多变形象的一个代称罢了。柏拉图极力将

苏格拉底描绘成一个理想化的哲学家。在我看来，柏拉图通过这种描绘把他自己不同阶段的哲学理论算在苏格拉底名下，其实他知道这些理论并不是苏格拉底的，而是他在他老师苏格拉底死后才提出来的。但是在柏拉图看来，苏格拉底就是理想化的哲学家的最好典范，因为他相信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苏格拉底经历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如果按照“小说”和“传记”的类别来划分，那么这些“苏格拉底对话”既不是小说作品，也不是传记作品。这些作品只是表达了作者们对于苏格拉底独特人格及其生活事件的不同反应和理解。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我们必须进一步厘清有关苏格拉底生平性格的事实，至少是其中那些可信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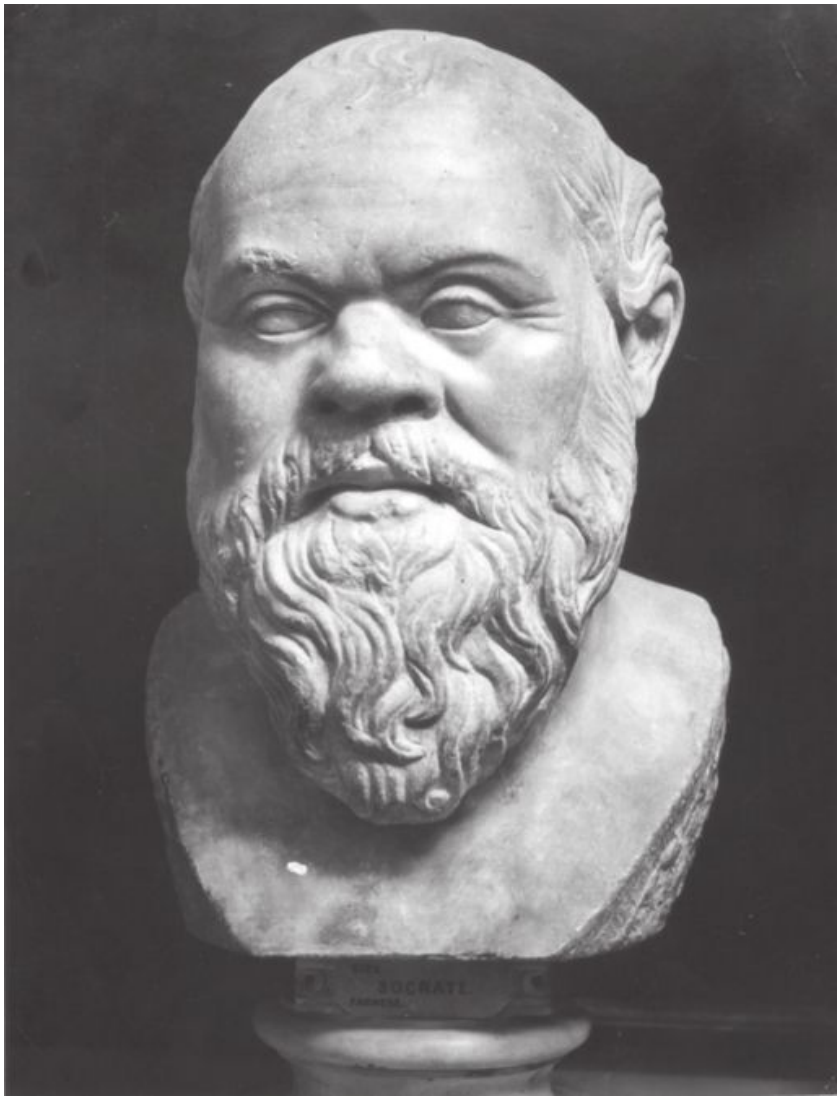

图1　苏格拉底半身像——雕刻于苏格拉底死后不久。这个半身像是罗马时代的复制品。

第二章

生　平

苏格拉底去世的时间是能够确定的，因为有明文记载，他在公元前399年初春（雅典官历为400年或399年）被处以死刑，而关于他的确切出生日期还存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争议。公元前2世纪的编年史家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公元3世纪的传记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曾经引用过他的著作）很肯定地指出，苏格拉底出生在公元前468年的5月初（接近雅典官历的469年或468年），但在柏拉图的书中，苏格拉底有两次说到他被判死刑的时候正好是70岁[1]。要么是苏格拉底当时只有69岁，而柏拉图故意把他说成就快70岁了，要么是阿波罗多罗斯确定的出生日期（从400年或399年往回推70年算出来的）晚了一年或者两年（大多数学者也这样认为）。根据官方起诉书的记载（第欧根尼·拉尔修曾引用过），苏格拉底的父亲叫索福洛尼克斯（Sophroniscus），住在阿洛佩克（在雅典城的南面）。在《泰阿泰德篇》中（149a），柏拉图提到，苏格拉底的母亲叫菲娜丽特（Phainarete），是个身材魁梧的接生婆。他母亲的名字（字面意思是“有启迪的品性”）和职业正好符合苏格拉底自愿承担的角色，即充当他人思想的助产士[2]。不过，这可能只是柏拉图的文学杜撰。据说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石匠，苏格拉底自己也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石匠。他还在重甲步兵团服过役，在那儿服役需要自带武器和盔甲，这说明苏格拉底的家境还不错。他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更多的是他哲学观点的体现，而不是说他真的很穷。他的妻子叫臧蒂普（Xanthippe），色诺芬和其他人（柏拉图不在其中）都将他的妻子说成是个泼妇。他们有3个儿子，其中两个在苏格拉底死时都还很小。就算他妻子的脾气很坏，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长久的婚姻关系。有一个不太可信的说法（而且还不合情理地说是来自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还娶了第二个妻子，名字叫米尔托（Myrto）。至于苏格拉底与米尔托的婚姻关系，有人说是在他与臧蒂普结婚之前，也有人说是在这之后，还有人说苏格拉底犯有重婚罪，因为他同时与这两个女人保持了婚姻关系。

人们对苏格拉底的前半生所知甚少。据说他当过雅典人阿基劳斯

（Archelaus）的学生，而阿基劳斯又是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的学生。阿基劳斯的兴趣在自然哲学和伦理学（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阿基劳斯提出热和冷是万物存在的两个根本原因，动物源自黏土似的物质，公正和不义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由习俗造成的，2.16）。在柏拉图所写的《斐多篇》（96a ff.）里，苏格拉底说他最初关注的是自然哲学，这可能反映了他当阿基劳斯学生的这段经历。如果是这样，他很快又将兴趣转向了其他领域，这也说明了阿基劳斯在伦理学方面并未对他产生任何影响。

公元前432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时候，苏格拉底已经三十好几了，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柏拉图几次提到苏格拉底从军的生平事迹[3]，如在开战初期，苏格拉底参加了北爱琴海的波提达依围攻战。在这些段落的最后，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详细描述了苏格拉底在战斗中是如何地勇敢，如何在赤脚单衫的情况下顽强地经受住了严冬的考验。阿尔西比亚德斯对于苏格拉底的描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为柏拉图所塑造的苏格拉底和公元前5世纪喜剧作品里所描绘的苏格拉底提供了非常可信的证据。“第欧根尼·拉尔修曾援引过喜剧作家阿美庇亚斯的一些戏剧台词（按照绝大多数学者的看法，这些台词出自阿美庇亚斯已经失传的剧作《Connus》。在公元前423年举办的戏剧比赛中，这部剧作获得的名次是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云》之上的），描述了苏格拉底强壮的身体，以及他引人注目的俭朴衣着和让鞋匠感到不快的赤脚习惯。在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云》中，有两次提到赤脚是苏格拉底的典型特征。另一位喜剧诗人欧波利斯（Eupolis）谈到苏格拉底时，说他是一个像乞丐一样的话匣子，往往下顿饭在哪里吃都不知道，还说他是一个小偷，这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也有讽刺性的描写[4]。到公元前420年，苏格拉底已经很出名了，因为他古怪而简单的生活方式，也因为他的巧言善辩，他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他的个性特征成为了当时喜剧作品乐于采用的故事素材。但在喜剧作家眼里，苏格拉底的个性也代表了社会生活中一些重要但不受欢迎的倾向，所以他仅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的戏剧形象得以流传。

图2　苏格拉底与他的“两个妻子”——这是17世纪荷兰画家C.B.　　埃弗丁恩（Everdingen,　1606-1678）带有喜剧风格的画作。在苏格拉底靠着的石头上刻有“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在古希腊，这句箴言被当作是苏格拉底的一个口号，被铭刻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上。

格思里（W. K. C. Guthrie）对苏格拉底的戏剧形象做了一个很好的概括：

我们从喜剧《云》中能够看到苏格拉底是3种不同类型的人，这些类型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不可能完美地结合起来：首先，他是一个智者，讲授使人精明的技艺；其次，他是一个不敬神的自然哲学家，就像阿那克萨戈拉那样；再次，他是一个苦行僧式的道德教师，因无心俗务而衣衫褴褛，食不果腹。

在这部喜剧中，苏格拉底开办了一个学校，学生交了学费就可以向他学习赖掉欠债的诡辩术。这种诡辩术就叫做“用强词夺理来取胜”。智者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提出过这个口号，意思是在两种对立观点的论战中，有理的传统道德观念（也就是代表着真理的一方）最后要输给无理的谬论（代表着歪理的一方）。喜剧《云》中的苏格拉底除了是传授这种诡辩术的老师，还是一个特别喜欢研究天体的自然哲学家。他拒绝了传统宗教及其对天体的神化，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各种新神：如“空气神”、“以太神”、“星云神”、“混沌神”、“舌头神”以及取代宙斯而成为宇宙最高力量的“天界旋涡”。这种新“宗教”为智者派的非道德主义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因为与原有的诸神不同（就像苏格拉底所说，这些神不是“现在通用的钱币”，247-8），新神无意惩罚那些作恶者。在该剧的结尾，苏格拉底的教学场所被烧毁，这是对发生于此的许多亵渎神灵的行为的惩罚，因为“弄清月亮的位置（观察月亮的轨道）”就是“冒犯诸神”（1506-9）。

到了公元前423年，苏格拉底已经很有名气。他被讽刺为是新学的代表人物。对于那些保守、有思想的雅典人来说，苏格拉底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危险分子，老是喜欢用科学思考和论辩训练去挑战传统的道德和宗教。当然，这种嘲讽并不意味着喜剧作家以及观众很了解苏格拉底或其他学者的生平和学说（虽然喜剧《云》中所嘲弄的学说和阿波罗尼亚的自然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 of Apollonia］的学说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给一些评论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喜剧作家和观众还是掌握了一些关于苏格拉底的真实情况（虽然有许多的夸张、简化、歪曲），对像普罗泰戈拉和第欧根尼这类“知识分子”的目的也有所了解。我们必须要追问，苏格拉底在公元前423年之前究竟做了些什么，人们会对他有如此的讽刺和嘲弄。

按照阿里斯托芬的描写，苏格拉底创建了一所寄宿学校，向学生传授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和运用论辩技巧，他甚至还通过传授这些知识来获取报酬。其实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柏拉图和色诺芬都反复强调，苏格拉底从没有声称自己懂专业的科学技术知识，或是为了钱才去教书〔5〕。在柏拉图眼里，职业智者只知积攒钱财，他们就像是“兜售灵

魂的小贩”[6]，而苏格拉底则完全不同于智者，他为世人的幸福无私地献出自己的时间，结果自己却深陷贫困之中[7]。很难相信，如果柏拉图真的认为苏格拉底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知识贩子，他还会为苏格拉底作面面俱到的辩护，但我们却不难相信苏格拉底其实并不是喜剧作家丑化的那么一个人。所有关于苏格拉底的描绘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苏格拉底好质问他人，好与人辩论。他时常挑战那些自以为有所专长的人，并揭露他们思想中前后矛盾的地方。当然智者也做这样的事情，至少为了挣钱也在向人们传授辩论的技巧。苏格拉底却与众不同，他任何时候都穿着他那很显眼的破外套[8]，赤脚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9]，难怪人们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古怪的家伙，跟每一个人辩论，找出别人的漏洞。他属于智者派中的一个成员，这些智者用十足的诡辩向世人证明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神灵，只有空气和旋涡，太阳也不过是一块烧红的石头，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言论”。众人对苏格拉底的描绘中充斥着许多传闻，比如说苏格拉底早年对自然哲学有兴趣跟他的老师阿基劳斯有关，说苏格拉底不遵从当时的宗教观念。这些传闻都被喜剧天才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423年搬上了戏剧舞台。

图3　半圆形公共会场——雅典公民大会的会场。这是从天文台上看到的远景。

柏拉图提到苏格拉底的两次从军经历，一次是公元前424年参加发生在彼奥提亚的德里留战事〔10〕，另一次是参加公元前422年发生在北爱琴海沿岸的安菲波里之战〔11〕。在从德里留战场的撤退过程中，苏格拉底因为表现英勇而成为传奇式人物，后来的一些作家传说他在撤退时还救了色诺芬的命。因为当时色诺芬才只有6岁，这个传说显然是不真实的，无疑是由阿尔西比亚德斯对苏格拉底在波提达依战役中英勇行为的描述转化过来的，当时阿尔西比亚德斯受了伤，是苏格拉底救了他的命。在人们对苏格拉底的描绘中，几乎都肯定了苏格拉底十分勇敢，根本不在乎艰难困苦，而且酒量惊人〔12〕，有些描述还提到他的性情很暴躁，但是他能够用理智来控制自己的愤怒、节制自己的性欲〔13〕。色诺芬在他的《会饮篇》里给我们描绘了中年苏格拉底的外貌：鼻子扁平，鼻孔宽大，双目突出，嘴唇肥厚，大腹便便，这与阿尔西比亚德斯所描绘的苏格拉底形象很吻合。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阿尔西比亚德斯将苏格拉底看作好色的男人或者像森林之神赛利纳斯（Silenus）一样〔14〕。在喜剧《云》中有两处附注

146和223（即原稿上的旁注，大概写于古代晚期）说苏格拉底是秃顶，但这个说法并没有确实的根据。或许这源于人们常把苏格拉底看作是好色之徒，而好色之徒在他们看来都是光头秃顶。

苏格拉底从军中退役后的生活我们就一无所知了。直到公元前406年，因苏格拉底参与了一桩雅典公务，我们才又对他的生平有所了解。这桩公务是苏格拉底受审前涉足的唯一一次公务。那年雅典获得了一次海战的胜利，但由于指挥官们没有出手援救生还者，雅典公民大会投票认定这些指挥官应该受到集体的审判而不是按照法律只审判个别人。当时雅典的绝大多数官职的授与都是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根据抽签结果，苏格拉底当选为元老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为公民大会准备议事日程并主持会议。这次苏格拉底是委员会中唯一一个反对这个违法提案的人〔15〕，然而色诺芬在他的《回忆苏格拉底》中有不同的说法，且提到了两次，他说苏格拉底当时主持了公民大会的关键性辩论，并“不允许他们通过这个动议”（事实上这个动议最后公民大会通过了，我们只能这样理解：苏格拉底“试图反对通过，但他的反对没有起作用”）。

公元前404年，雅典民主政体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三十僭主。他们下令重新修订法律，很快便开始了恐怖统治，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或是流放。这样的统治持续了8个月，直到三十僭主的暴政被武装抵抗运动所推翻，民主政体又得以复辟。苏格拉底在民主派和寡头派中都有朋友。三十僭主中最有名的卡尔米德（Charmides）和克里底亚（Critias）都是他的朋友（他们都是柏拉图的亲戚）。在推翻寡头政体的战斗中，他们都遭到了杀害。他在民主阵营的朋友包括演说家吕西亚斯（Lysias）和卡厄里芬（Chaerephon），都曾遭流放，但一直积极参加反对寡头统治的斗争。在民主派的统治之下，苏格拉底对政治一向是不闻不问。他一直住在雅典。三十僭主当政时，曾想把苏格拉底也拖下水，让他也参与到逮捕一个叫利昂（Leon）的萨拉米斯人的行动，但苏格拉底拒绝与他们合作，“回家去了”〔16〕。当然，他在政治上并不反对三十僭主的统治，也不赞同民主派那种不合法和不道德的做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在审判海军指挥官的问题上坚

持自己的立场。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说明苏格拉底当时参与了推翻僭主统治的活动。柏拉图对此保持沉默，更重要的是色诺芬对此事也三缄其口，这表明了苏格拉底确实没有参与这些活动。

审判与死亡

大约在公元前400年或者399年初，一个名叫麦勒图斯（Meletus）的默默无闻的年轻人[17]对苏格拉底提出了如下控告：

图4　国王拱廊或者叫巴斯勒奥斯拱廊的废墟——这是负责宗教事务的执政官阿耳康国王（King Archon）的处所，苏格拉底就是在这里被控有不敬神之罪。

此控告由皮托斯区的麦勒图斯的儿子麦勒图斯提出，并发誓保证所控属实：阿洛佩克区的索福洛尼克斯的儿子苏格拉底是一个坏人，因为他拒绝承认雅典城邦所公认的诸神，并且引入了其他的新神。他还是一个腐化青年的罪人。对他的刑罚应该是死刑。

另外还有两位控告人：不出名的吕柯（Lycon）和在复辟的民主政府中赫赫有名的政治家阿利图斯（Anytus）。在由负责宗教事务的

执政官（大家都称他为“国王”）主持完预审之后（在柏拉图《游叙弗伦篇》的开头有提及），这个案子就在公元前399年的初春交由500人组成的陪审团来进行最后的裁决。

关于这场审判的过程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在苏格拉底死后，有不少作者声称记录下了控方的控词和苏格拉底的辩词。由柏拉图和色诺芬所写的两篇苏格拉底的辩护词最后留存了下来，而控方的控词则已佚失。在控辩双方出示证据，作完陈述之后，由陪审团投票来裁定苏格拉底究竟是否有罪。根据柏拉图的《申辩篇》（36a），投票的结果是，认为有罪的是280票，认为无罪的是220票，前者比后者多了60票。一旦陪审团作出了有罪裁定之后，就要由控方和辩方分别提出他们所希望的刑罚，然后再由陪审团在两种刑罚中间作出选择。控方要求处以苏格拉底死刑，（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苏格拉底开始拒绝提出对他应该使用什么刑罚[18]，最后，在众人的劝说下，他提出一笔罚款，数额为半个塔兰特（古希腊货币单位），相当于一个熟练手工艺人8年的收入（38b）。陪审团投票的结果是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按照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最后主张死刑的人比开始主张有罪的人又多了80人，即有360人主张死刑，只有140人不主张死刑。显然，苏格拉底拒绝接受刑罚使原来认为他无罪的一些陪审团成员对他产生了反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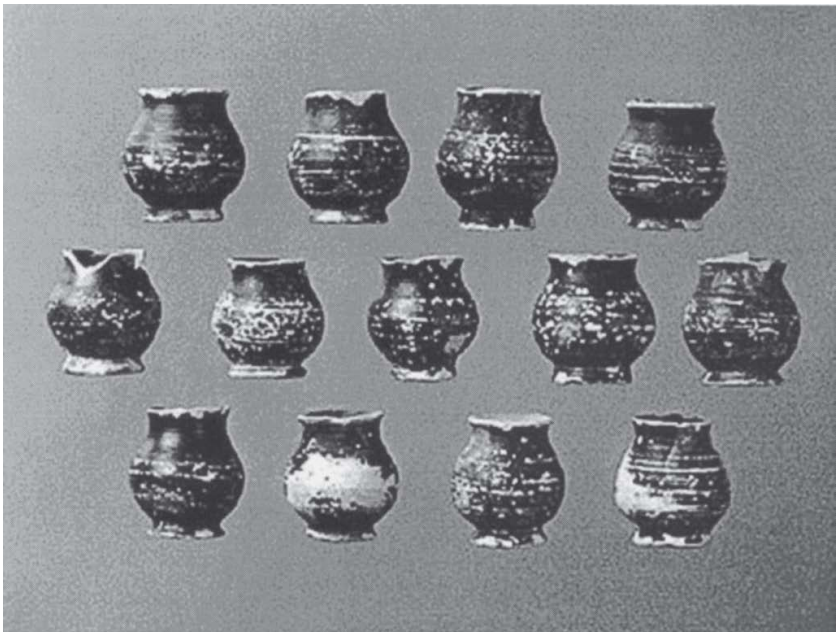

图5　被认为是装有用于处决犯人的毒药的小罐，发现于雅典监狱的水池里。

通常宣判之后马上就要执行判决。可是这次审判时正好赶上要派人去神圣的德洛斯岛举行每年的祭祀活动，为了保证仪式的纯洁性，规定在这个时间不能处决犯人〔19〕。因此在宣判和执行之间还有一个月的间隔。苏格拉底在这个期间被关在监狱里面，他的朋友可以来探监〔20〕。柏拉图在《克力同篇》表示，苏格拉底有机会越狱逃脱，大概城邦当局也默许，因为处死这样一个著名人物会让他们很难堪（45e，52c）。虽然有越狱的机会，但苏格拉底还是拒绝逃跑，决定坦然赴死。柏拉图在《斐多篇》里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描写，使苏格拉底之死名垂千古。执行死刑的方式是让犯人自己喝下从毒芹属植物提炼出来的毒酒，尽管这种刑罚没有通常的酷刑那么可怕，但是医学上证明，这种毒酒喝下去之后还是很令人痛苦的，苏格拉底不可能像柏拉图描写的那样，死得很平静，很有尊严。依照柏拉图的描写，苏格拉底最后说的话是“克力同，我们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一只鸡，记住要还清这笔债务”〔21〕。阿斯克勒庇俄斯是药神，有病

的人只要向他献上一只公鸡作为感恩的供品，身体就能得到康复。如果这确是他的临终遗言，那么有趣的是他最后关心的还是与宗教仪式有关的事情。（这个情形让18和19世纪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崇拜者们有点尴尬。）柏拉图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因而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对苏格拉底遗言的描写更多的是出于戏剧夸张而非历史真实的考虑。假定这个遗言最终表现了苏格拉底的虔诚，那么色诺芬的描写应该比柏拉图的更符合实情一些。近来有一个很巧妙的观点认为，根据《斐多篇》陈述的一些细节可以判断（59b），苏格拉底喝下毒酒的时候，柏拉图因为生病并没有在场。向药神献上公鸡，是因为柏拉图身体康复而要表示感谢，同时也标志着他是苏格拉底哲学的继承人。这种自我吹捧似乎不太可信。以前还有一种观点（如尼采的观点）认为，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献祭，表达了苏格拉底本人对摆脱生命疾苦的感激之情（参见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台词“在生命的阵阵兴奋之后，他终于睡着了”），这种看法似乎更有道理。

由于这次审判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我们无法准确地再现控方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上面提到的那些信誓旦旦的指控非常含混，可以将许多行为都列入其中，而依照雅典的法律诉讼程序，准许控方提出一些与指控书内容完全无关的材料，这些材料有可能直接影响到陪审团对于被告是否有罪的最后裁决。一种古老的观点认为，苏格拉底被定罪的真实原因是政治方面的，因为据说受他影响的朋友都是一些以反雅典城邦和反民主政体而知名的人物，尤其是阿尔西比亚德斯和克里底亚。演说家埃斯基涅斯（Aeschines）直截了当地宣称“你们这些雅典人杀害了智者苏格拉底，不就是因为你们认为他曾经教过克里底亚，而克里底亚又是推翻了民主政体的三十僭主之一”[22]。考虑到阿尔西比亚德斯、克里底亚、卡尔米德这些人都声名狼藉，再加上苏格拉底其他两个知名的朋友费德鲁斯（Phaedrus）和厄里西马楚斯（Eryximachus）（还有苏格拉底圈子里的其他人）又曾卷入公元前415年发生的一起广为人知的诋毁宗教的事件，这就难怪有人要利用上述人等的种种劣行来控告苏格拉底腐化青年。公元前403年曾经通过一个大赦令，使人们可以免于因过去所犯的罪行受到指控，但是并

不排除可以用这些犯罪前科来说明被告的品行。至少从指控苏格拉底腐化青年来看，肯定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宗教上的指控只是为了掩盖纯粹政治上的指控，或者说所谓的腐化青年与宗教和政治问题都不相干。我们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420s）中看到，苏格拉底被描写成一个传统宗教的颠覆者，他用自己的“新神”，如“空气神”和“旋涡神”来代替传统的诸神。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传统道德和正统教育的破坏者。在《申辩篇》中，柏拉图认为，某些对苏格拉底的污蔑之词到公元前399年还在四处流传。我相信柏拉图所言属实。尽管公元前5世纪对普罗泰戈拉和欧里庇得斯〔23〕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指控完全是不可信的，但是阿那克萨戈拉还是被迫离开了雅典，因为他害怕会因为自己曾大不敬地宣称太阳不过是一块烧红的石头而受到指控。柏拉图在《申辩篇》中（27d-e）很注意将苏格拉底和阿那克萨戈拉区别开来，这表明他知道，苏格拉底也可能遭受类似的指控。

图6　苏格拉底之死。《克力同为已经死去的苏格拉底合上眼睛》，意大利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Antonio Canova）的作品（创作于1787至1792年间）。

当然也有证据表明，在当时的人看来，苏格拉底个人的宗教行为和宗教态度均很古怪。他公开宣称他听从一种隐秘的神示，这是一种内心的声音，这种声音会警告他不要去做有害于自己的事情，比如去从事政治。苏格拉底在《申辩篇》里说，麦勒图斯在控告中歪曲了他的主张。苏格拉底的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明显违法或是不敬神的地方，但是联系到他那些不守成规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相信游叙弗伦（Euthyphro）在对话中所言不差，苏格拉底没有依照通常的途径与神沟通〔24〕。事实上，雅典城邦从公元前4世纪就能够接受外来的新神，比如狩猎女神本狄斯神（Bendis）和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被正式

地供奉起来，但个人迷信还是被视为危险的举动，而且要以死刑加以惩处。当苏格拉底被看作是个人迷信的带头人时，人们的这种偏见就会给他带来伤害，这在一些文献中有所暗示。在喜剧《云》中，在描写苏格拉底引荐斯特里普斯亚德斯（Strepsiades）到他的“思想学校”时，阿里斯托芬模仿了一种神秘宗教的入教仪式，这明显是对苏格拉底的一种嘲讽（250-74）。而在阿里斯托芬的另一部喜剧《鸟》（创作于公元前414年）的一段合唱中提到，苏格拉底在一个神秘的湖畔招魂唤鬼，而他的朋友卡厄里芬（在喜剧《云》中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之一）“这只蝙蝠”就是他招唤出来的鬼魂之一（1553-64）。人们还认为，苏格拉底还带领一帮人，搞神秘学研究，有一次在波提达依，他陷入迷狂的状态，纹丝不动地站在一个地方，冥思苦想了一整天[25]，这些都是指摘他行为怪异的依据。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既是一个不敬神的自然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装神弄鬼的苦行者，他的这两种形象似乎彼此不太吻合。但这种形象上的矛盾在公元前5世纪还不是很明显。无论如何，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当时的思想风气，而不是那些听上去振振有词的罪状。我认为，在古希腊人看来，苏格拉底是宗教的离经叛道者和传统道德的颠覆者，他密友一些骇人听闻的罪行已经充分地显示了他对年轻人的负面影响。

关于控告苏格拉底的理由就说到这里。至于苏格拉底的辩词，一直有人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苏格拉底并没有提供什么证据来反驳控方，但许多事实表明，苏格拉底确实进行了申辩，只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太与众不同，以至于人们认为他事先根本就没有打算要进行申辩，或者说他不是当真希望可以使陪审团相信他是无罪的[26]。（西塞罗[Cicero，《演说集》，1.231] 还有其他人都曾描述说吕西亚斯为苏格拉底写了一份申辩词，但没有料到，苏格拉底拒绝在法庭上宣读。这个故事很可能只说明苏格拉底的申辩词只是吕西亚斯写的许多篇演说稿中的一篇。见普卢塔克[Plutarch][27]写的《吕西亚斯传》，863b。）我们自然要问，由柏拉图和色诺芬写的两个不同版本的《申辩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苏格拉底申辩词的基本内容。这两部作品在性质上迥然不同。柏拉图的《申辩篇》要比

色诺芬的版本长4倍，声称是一字不差地记录了苏格拉底发表的3篇申辩词，第一篇是对他控罪所作的辩护，第二篇是他被定罪之后对刑罚问题所作的申诉，第三篇是在陪审团投票判他死刑之后，他对陪审团发表的演说。色诺芬的《申辩篇》是一部叙事性的作品，它首先解释了苏格拉底为什么事先没有打算进行申辩，接着从苏格拉底的主要申辩发言及其向陪审团所作的最后陈述中摘录了一些内容（用直接引语叙述），最后对苏格拉底在审判之后讲的一些话进行了记录和汇编。这两部作品在内容上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尽管它们都反映了苏格拉底对他3条罪状所作的申辩，但是在申辩的内容上有很大的出入。色诺芬描写的苏格拉底驳斥了对他不信城邦诸神的指控，他认为自己一直积极参加城邦公共的敬神活动；至于指控他引入了新神，苏格拉底认为，这仅仅是因为他得到了神示。在他看来，传统宗教也经常依赖于神示和神谕。他还驳斥了说他腐化青年的指控。他强调，对于传统美德，他一向是身体力行，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他还声称，人们真正不满的其实是他对青年的教育，但他认为，这种教育对青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苏格拉底说话的口气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至于读者可能都会觉得奇怪，人们为什么会告他。

相反，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一开始就表示，现在对他的指控是对他长期误解的结果。这种误解最早要追溯到阿里斯托芬对他的讽刺挖苦，其中有许多不实之词，最主要是两条：一是说他自称是自然哲学的权威，另一个说他是为了钱才去教书的（在反驳第二个谎言的过程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否认他教过任何人，这与色诺芬笔下的不同）。苏格拉底认为，人们之所以对他的行为有所曲解，是因为他声称具有某种智慧。正是对这种智慧的解释使得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远在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之上，因为前者的解释相当于是一篇自辩词，他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作是一种神圣的使命，和世俗成规迥然有别。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个使命的渊源起于苏格拉底的朋友卡厄里芬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去求神谕。卡厄里芬问神灵还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的人，神谕上说没有了。因为苏格拉底知道他并不具有

什么专长，他对神谕的内容感到有些迷惑，就在那些公认的权威中间去寻找比他更有智慧的人（他首先找了政治家，随后又找了诗人和手艺人）。通过对他们专业知识的询问，苏格拉底发现这些权威实际上不具有他们自己宣称的那种智慧，反而是他自己更有智慧，因为他至少知道自己的无知。于是，他明白了，神谕之所以说他有智慧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所以他的神圣使命就是告诉其他人，他们所谓的智慧只是徒有虚名而已。正是履行了这种质问他人的使命（通常就是指“苏格拉底的反诘法”，“反诘”这个词的希腊原文*elenchos*，就是“审视”、“质问”的意思）使得他不受欢迎，旁人对他也产生了误解。他在申辩中强调这种使命会给城邦带来最大的利益，他有义务严格按神的旨意执行这种使命，即使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

这段叙述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最明显的就是神谕的真实性。这段叙述有依据吗？或者按一些学者的观点，这仅仅是柏拉图的杜撰？没有关于德尔斐神谕的正式记载来帮助我们确证这段叙述的真实性。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有关神谕上的回答都出自文学作品，其真实性都有待一一考证。事实上，色诺芬也提到了这个神谕，但这也不算是一条独立证据，因为他在写作时就已知道柏拉图对此事的记载，因此他对这个神谕的叙述多半来自柏拉图。我们很难去考证这个神谕的真实性，但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可。如果它是假的，那为什么柏拉图要点明是卡厄里芬去求神谕而不是说是“某个人”去求神谕？为什么他还要补充一个旁证说，尽管卡里芬在苏格拉底受审时已经去世，但他的兄弟还健在，可以证明这段叙述的真实性？这段叙述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起了不同的作用，这比其历史真实性更为重要。按照色诺芬的说法，神谕上说的是，再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具有自由的精神，更公正，更有自制力，后又引用了一些事例来证明上述这些美德，而对于他的智慧就提得很少。按照柏拉图的记述，神谕上说的是再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了，而苏格拉底的智慧就是自我认识。色诺芬意在利用这段叙述凸显苏格拉底身上的传统美德，而柏拉图则是要说明，苏格拉底的反诘是在履行一项神圣的使命，是一种最虔诚的行为。

柏拉图关于神谕的叙述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在他笔下，苏格

拉底不再追寻神谕的意义，转而通过不断盘问雅典公民来关切他们的灵魂，以此作为他终生的志业。《申辩篇》23a有一段对神谕意义的阐释："事实上神（只有神）才是智慧的，人的智慧不重要，甚至毫无价值……人哪，苏格拉底才是你们中间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知道事实上他并没有什么智慧"。这个发现并没有让苏格拉底停止探求，反而使他继续追问："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遵照神的旨意四处奔波去寻找我认为是有智慧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雅典公民还是外邦人；当我发现他并没有什么智慧的时候，我就要代神向他指出，他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为什么苏格拉底要"代神"向人们指出，他们自夸的智慧是毫无根据的呢？神要求他去告知人们，只有神才拥有真正的智慧，人没有真正的智慧，这是为什么呢？传统的观点认为，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承认自己比不上神；对于那些试图要僭越此一神人差距的人，都要受到神严厉的惩罚，比如阿波罗神曾经痛斥好色之徒玛息阿（Marsyas），因其要与他在音乐上比个高低。然而，人们从苏格拉底的质问所得到的益处并不是那种表面上的东西。苏格拉底的质问是要人们"关注智识、真理和灵魂的最佳状态"（29e），因为"正是因为德性，财富和其他东西才可能在公私两方面都对人有益"（30b）。自我认识和灵魂向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自我认识就等同于灵魂向善，是灵魂向善的必要或充分条件，或者就是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说苏格拉底为神效劳能够给城邦带来最大的好处。

自我认识和灵魂向善之间的具体关系在《申辩篇》里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清楚的是，柏拉图把知识和德性的关系作为许多苏格拉底对话的主题。按《申辩篇》里的描述，这也是苏格拉底用来反驳说他不敬城邦诸神的要点所在。与色诺芬不同，柏拉图并没有提及苏格拉底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是否遵行了传统的宗教礼仪。他是把苏格拉底的哲学生活方式视作更加高级的宗教实践，即服从一位要我们完善自己灵魂的神。色诺芬和柏拉图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编排苏格拉底对指控的回答，色诺芬强调苏格拉底身上十分传统的虔诚和德性，柏拉图则将苏格拉底描绘成履行哲学生活方式的楷模。

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对指控的回答显示出苏格拉底质问的力量。当麦勒图斯指控苏格拉底引入新神，苏格拉底就通过盘问使麦勒图斯承认自己的立场是前后矛盾的，因为麦勒图斯既坚持说苏格拉底引入了新神，同时又说苏格拉底不承认神的存在。至于指控他腐化青年，苏格拉底就反驳说，如果他腐化了他们，那他也不是存心的，因为他要是腐化了青年，他们便会加害于他，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这么做过。苏格拉底的后一个论点对他在柏拉图其他几段对话中提出的伦理命题至关重要。我们看到，柏拉图所设计的苏格拉底对指控的反驳，不仅依赖于苏格拉底的辩论技巧，而且还借助于苏格拉底的伦理学说。在柏拉图看来，对苏格拉底的指控并不是一种人身攻击，更重要的是一种对苏格拉底哲学实践的攻击，要对这种攻击进行反驳，就要指出苏格拉底其实是在为神效劳，而且还要充分利用苏格拉底的论辩技巧及其思想学说。与柏拉图不同，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的反驳就没有什么哲学内容。

要想通过把色诺芬和柏拉图的描写结合起来，做到真实地重现苏格拉底受审时的自我辩护，其结果必然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们二人都是按自己的思路来编写苏格拉底的申辩内容。我认为，不可能弄清苏格拉底是否真的作过按柏拉图或色诺芬记述的那些陈述或申辩。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我认为，与色诺芬的记述相比，柏拉图的记述更能抓住当时审判的气氛，更能体现苏格拉底申辩的真实内容。原因有二。首先，与色诺芬的记述比较，柏拉图强调了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嘲讽及其影响（色诺芬完全没有提到这个方面），这就把对苏格拉底的指控置于相关的历史背景之下，也使对苏格拉底不敬城邦诸神和引入新神的指控听起来更可信。其次，苏格拉底的申辩与众不同，色诺芬对此的描述却枯燥乏味；而柏拉图却生动有趣地记述了苏格拉底视其反诘为敬神利邦之举的事情。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作家都指责苏格拉底傲慢自大，柏拉图本想替苏格拉底辩解，但在他笔下，苏格拉底在宣称其反诘是敬神利邦之举时比在反驳对他的指控时表现得更为傲慢自大。

注释

〔1〕 见《申辩篇》17d和《克力同篇》52e。

〔2〕 见《泰阿泰德篇》149-51。

〔3〕 见《申辩篇》28e，《卡尔米德篇》153a和《会饮篇》219e ff.。

〔4〕 见《云》177-9。

〔5〕 见《申辩篇》19d-20c, 31b-c, 《回忆苏格拉底》1.2.60,1.6.5和1.6.13。

〔6〕 见《美诺篇》91d和《大希比阿篇》282d-e。

〔7〕 见《申辩篇》31b-c。

〔8〕 见《普罗泰戈拉篇》335d, 《回忆苏格拉底》1.6.2和第欧根尼·拉尔修2.28。

〔9〕 见《云》362, 柏拉图《会饮篇》221b。

〔10〕 见《申辩篇》28e, 《拉凯篇》181a和《会饮篇》221a-b。

〔11〕 见《申辩篇》28e。

〔12〕 见《会饮篇》214a, 220a, 223c-d。

〔13〕 见西塞罗《图库兰谈话录》4.37.80，比较柏拉图《卡尔米德篇》155c-e和《会饮篇》216d。相反的说法也有，如他的死对头阿里斯托依努斯（Aristoxenus）所描述的那样。

〔14〕 215b, 216d；比较色诺芬《会饮篇》4.19。关于扁平的鼻子和突出的眼睛的描绘也见《泰阿泰德篇》143e。

〔15〕 有关的事件描述请见《申辩篇》32b-c和色诺芬的《希腊史》1.7.14-15。

〔16〕 见《申辩篇》32d，比较《回忆苏格拉底》4.4.3。

〔17〕 见《游叙弗伦篇》2b。

〔18〕 见《申辩篇》36d-e，他建议的刑罚是宣布他是公众的恩人，因此他今后可在市政厅免费享受一日三餐。

〔19〕 见《斐多篇》58a-c。

〔20〕 见《克力同篇》43a。

〔21〕 见《斐多篇》118a。

〔22〕 《反对提玛科斯》，发表于公元前345年；也可比较《回忆苏格拉底》1.2.12-16。

〔23〕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约公元前485—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相传创作了90余部悲剧作品，现存《特洛亚妇女》、《希波吕托斯》和《美狄亚》等9部。——译注

〔24〕 见《游叙弗伦篇》3b，比较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1.1.2。

〔25〕 见《会饮篇》220c-d。

〔26〕 色诺芬《申辩篇》1-8。

〔27〕 普卢塔克（Plutarch，大约生活在公元46—120），古希腊传记作家和散文家，创作了大约200多部作品，比较有名的是《希腊罗马名人传》以及《道德论丛》。——译注

第三章

苏格拉底文献和苏格拉底问题

上一章对苏格拉底的生平及其死亡原因的介绍，已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所谓的“苏格拉底问题”，即如何通过文献去了解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的生平和性格。上一章的每一论断，或明或暗地都包含了一些对其所依据文献的性质和可靠性的假设。上一章还特别强调，柏拉图和色诺芬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来构想苏格拉底的申辩；最后结尾时说道，除了勉强能确定个别攻击苏格拉底的词句外，我们手头的文献只能让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申辩过程的大概，对其详情，我们仍一无所知。本章的任务是概述那些流传至今的、涉及苏格拉底的各种古代文献及其所属体裁，希望以此来弄清造成这一结果的来龙去脉。

柏拉图之外的其他描述者

对于第一类苏格拉底文献，主要是公元前5世纪出现的那些描写苏格拉底的喜剧，此处我并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些喜剧是唯一在苏格拉底去世前就已完成的苏格拉底文献，所以这部分文献不可能受到柏拉图的影响。这类喜剧表现了时人对苏格拉底的讽刺和挖苦，并且将他与当时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方面联系起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讽刺挖苦导致了人们对苏格拉底的怀疑和敌视，并最终造成了他的死亡。

亚里士多德在《诗论》的开头就提到，“苏格拉底对话”与公元前5世纪西西里的两位剧作家索夫龙（Sophron）和克塞那库斯（Xenarchus）的滑稽剧属于同一表现体裁（他们显然是一对父子），但他还没有找到一个名字来给这种体裁命名。“滑稽剧”是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戏剧化摹仿（有些剧作的名字就叫“岳母”或是“金枪鱼与渔夫”），这些“滑稽剧”都是虚构的，从表面上看，还都带有喜剧色彩，剧中的男女人物都代表着某类人。并没有证据表明，剧中描绘的人物就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虽然亚里士多德把这类滑稽剧与苏格拉底的对话视为同一种艺术体裁，而且据说柏拉图曾经还把这类滑稽剧介绍给雅典人，他的人物描写也受其影响，但我们不能夸大两者的相似

之处，因为这种相似仅在于都是用散文体的对话来（粗略地）描写时下的生活。我们也不能贸然地下结论说，因为滑稽剧完全是虚构的，而苏格拉底的对话跟滑稽剧属于同一艺术体裁，所以苏格拉底的对话也完全是虚构的。至少有一点不是完全虚构的，这就是对话所描写的人物都来自现实生活。至于说到人物描写的虚构程度，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至于说是谁率先用“苏格拉底对话”这一体裁写作，不同的古代文献看法不同，没有证据显示，这类作品是苏格拉底生前就创作出来的，但完全有理由认为，其作者都有着同样的意图（色诺芬对此直言不讳），那就是为了纪念苏格拉底，为了替苏格拉底辩护，以此来批驳对苏格拉底的指控和审判，反驳那些诽谤苏格拉底的传闻（比如大约在公元前394年之后的某个时候，就有一个叫波吕克拉特斯［Polycrates］的演说家写了一本名为《苏格拉底罪名》的小册子来诽谤苏格拉底，这本小册子现已失传）。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苏格拉底的一些朋友记录了他的对话，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拉尔修，但正像我们不要认定“苏格拉底对话”完全是虚构的一样，我们也必须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这些朋友的作品就是苏格拉底对话的真实记录。这种记录的作用不是为以后的公开出版提供一字不差的信息，而是保留一些有关苏格拉底的真实材料，为描写苏格拉底提供更为丰富的想象空间。

图7　苏格拉底训斥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场景（意大利画派作品，约1780年）

除了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作品之外，大多文献都已失传。对于其他大多数作家我们最多只知道一些书名和文字片断。从一些书名上看，它们之间在主题上是互相关联的，其中也包括了与柏拉图对话的关联。据说，克力同曾经写过一本《普罗泰戈拉》和一篇苏格拉底的申

辩词；埃斯基涅斯，安提西尼（Antisthenes），欧克莱德斯（Eucleides）以及斐多（Phaedo）都写过名为《阿尔西比亚德斯》的著作；埃斯基涅斯和安提西尼各自都写过名为《阿斯帕希娅》的书（阿斯帕希娅［Aspasia］是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的情妇，也是柏拉图写作《美诺篇》的灵感来源）；安提西尼也写过《梅内克塞诺篇》。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份保留在莎草纸上的匿名古代残篇（现收藏在德国科隆），其中记录了苏格拉底在被判处死刑之后与一个未披露姓名者在牢房里的对话（这使我们想起柏拉图的《克力同篇》），这个人问苏格拉底为什么他在受审时不为自己辩护。像在《普罗泰戈拉篇》中一样，苏格拉底回答说，快乐是生命的最高目标，这个观点为苏格拉底的朋友、昔兰尼学派的创始人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s）所采纳（他也写过一个苏格拉底的对话）。有可能这篇匿名作品的作者也属于昔兰尼学派成员。另一个与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有关联的文献是埃斯基涅斯所写的《卡里亚斯》（卡里亚斯［Callias］的家正是柏拉图对话和色诺芬《会饮篇》中故事发生的背景）。除了《阿尔西比亚德斯》外，麦加拉的欧克莱德斯（Eucleides of Megara）还写有《埃斯基涅斯》，《克力同》和《爱欲篇》（爱欲是典型的苏格拉底对话的主题，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和《会饮篇》以及埃斯基涅斯的《阿尔西比亚得斯》中也有论述）。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名字在这些文献中频繁出现，这绝非偶然。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正因为苏格拉底与阿尔西比亚德斯过从甚密，人们才控告苏格拉底腐化青年，而且在他死后，人们还以此事来诋毁他的名声；按照色诺芬的说法[1]，“控告人（也许是波吕克拉特斯）说，克里底亚和阿尔西比亚德斯是苏格拉底的朋友，他们二人给城邦带来了最严重的危害。克里底亚是寡头统治集团中最贪婪和最残暴的人，而阿尔西比亚德斯则是民主派中最不负责任和最不讲道德的人”。苏格拉底文献的主旨之一就是要向世人说明，苏格拉底并没有鼓励阿尔西比亚德斯去胡作非为，相反，苏格拉底一直在试图约束他。阿尔西比亚德斯之所以犯罪（包括渎圣罪和叛国罪），正是因为他没有听从苏格拉底的劝告，没有身体力行苏格拉底的教导。色诺芬

在《回忆苏格拉底》1.2中（像克里底亚一样）很平淡地提到，只要阿尔西比亚德斯在苏格拉底身边，他就会去行善，但是只要他离开了苏格拉底，他就有可能去作恶，但不管怎样说，他最初跟随苏格拉底是为了追求政治权力，而不是出于对苏格拉底的仰慕之情。（这是一个靠不住的理由，他为什么会因为渴望权力而追随苏格拉底，除非他相信苏格拉底能够帮助他获取权力？）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把阿尔西比亚德斯当作一个戏剧性人物，以他作为第一人称，描述他与苏格拉底的关系。柏拉图的目的也是想要说明阿尔西比亚德斯的胡作非为与苏格拉底并无关系。苏格拉底的勇气和自制（不同于阿尔西比亚德斯无法抵制性欲的诱惑）让阿尔西比亚德斯感到羞愧，他承认他应该照苏格拉底的教导去做，但只要一离开苏格拉底，他就会受到众人的恭维，所以他很乐意看到苏格拉底死去（216b-c）。冒充柏拉图之名写的《第一个阿尔西比亚德斯》一书也记述了同样的内容。阿尔西比亚德斯自信他的能力超过任何一个公认的政治领袖，因此他打算涉足政界，而苏格拉底的任务是要让他相信，他不具备从政的条件，因为他缺少必要的知识，不知道什么是至善。在对话的最后，阿尔西比亚德斯承诺要听从苏格拉底的劝告。苏格拉底的回答谈到了他们各自的命运，他担心城邦的力量对他们两人来说都过于强大。

来自斯菲特斯的埃斯基涅斯（Aeschines of Sphettus）写的《阿尔西比亚德斯》同样讨论了野心、羞愧、知识这样的主题，我们现在保有这部著作中的一些重要章节。苏格拉底向一个不知其名的同伴述说了他与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对话，一开始他就说注意到阿尔西比亚德斯的政治野心是如何受到塞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的影响，后者在公元前480年领导雅典人抗击波斯人，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接着苏格拉底指出，尽管塞米斯托克利斯的政治功绩是建立在他的知识和才智之上，但这些知识和才智最后也没有使他逃脱遭贬谪和被流放的结局。苏格拉底说这些的目的是想让阿尔西比亚德斯明白，他在才智方面远逊于塞米斯托克利斯，他完全不可能在功绩上与其一争高下。苏格拉底的策略很有效，他使得阿尔西比亚德斯突然大哭起来，将头靠在苏格拉底的膝盖上，乞求苏格拉底给他以教诲。苏格拉底向

他的同伴总结说，他之所以能够打动阿尔西比亚德斯不是因为他自身的任何技巧，而是因为有天赐的秉赋，这秉赋便是他对阿尔西比亚德斯的爱："尽管我知道我教给别人的任何技巧方法对阿尔西比亚德斯来说都是无益的，但我可以常伴他左右，我相信爱的力量可以使他聪明起来"。这个情节将柏拉图在描述苏格拉底时强调的两个问题结合了起来：否认知识和自己教书育人的能力，强调爱在增进友谊、教育爱人方面的作用[2]。

另一部流传至今、包含有苏格拉底对话重要片断的作品（除了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对话之外）是埃斯基涅斯写的《阿斯帕希娅》。这部作品也涉及到其他苏格拉底文献里的主题。它记述了苏格拉底与卡里亚斯（Callias）之间的一次对话。对话的开场让我们想起了柏拉图《申辩篇》的20a-c一节。在这节中苏格拉底说到，卡里亚斯聘请了来自帕罗斯的名叫尤努斯（Euenus）的智者做他儿子的家庭教师，但是埃斯基涅斯对话中的情形与此刚好相反，说是卡里亚斯请求苏格拉底给他推荐一个家庭教师，令人吃惊的是苏格拉底向他推荐了有名的交际花阿斯帕希娅。苏格拉底举出阿斯帕希娅的两个特殊专长作为推荐理由：修辞方面，阿斯帕希娅教过著名的伯里克利和另一个杰出政治家吕西克勒斯（Lysicles）修辞学；再就是她在婚姻方面的指导。关于前者，在这个对话和柏拉图的《梅内克塞诺篇》里都有涉及。在《梅内克塞诺篇》里，苏格拉底发表了一个葬礼演说，他说这个演说词是由阿斯帕希娅写的，还说阿斯帕希娅还教会了许多人使用修辞术，其中包括伯里克利。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他《历史》的第二卷也提到阿斯帕希娅写过的那篇有名的葬礼演说词。至于在婚姻方面的指导则与色诺芬有关。按照苏格拉底对话中的描述，接受阿斯帕希娅英明指导的正是色诺芬本人和他的妻子。（这种指导具有典型的苏格拉底的特征。阿斯帕希娅开始举出许多事物让他们挑选。结果丈夫和妻子什么东西都想要最好的，比如最好的衣服和最好的马匹等。然后她总结说，在配偶方面，他们也想要最好的，她由此推断他们应该使自己的伴侣更加完美。）这就难怪色诺芬为什么会两次提到阿斯帕希娅擅长做媒和培训已婚妇女[3]。当然，我们不好断定说色诺芬

本人确实像埃斯基涅斯说的那样，曾受惠于阿斯帕希娅在婚姻方面的指导。但这是苏格拉底文人圈子里的一个共同话题，后来无论谁谈及这个话题（这似乎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大概都要考虑到以前的一些说法。现在我们仍很难说，柏拉图的《梅内克塞诺篇》、埃斯基涅斯和安提西尼的《阿斯帕希娅》以及各种版本的《阿尔西比亚德斯》究竟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总的说来，除了色诺芬明确提到的柏拉图的那些著作之外，我们似乎还没有什么根据来断定这些苏格拉底对话著作之间的优劣。

色诺芬的著作和柏拉图的对话录是所有苏格拉底文献中仅有的保存完整的作品。除了对苏格拉底的申辩进行描述之外，色诺芬还有4卷本的《回忆苏格拉底》，用直接引语记录了苏格拉底的对话；再就是《会饮篇》，生动地叙述了苏格拉底受邀参加一个晚宴的情形，与柏拉图《会饮篇》里的记述比较接近，无疑是参考了柏拉图的这部作品；《经济学篇》以苏格拉底对话形式论述了地产管理方面的问题，充满了道德说教。《回忆苏格拉底》的开篇说得很清楚，它的主旨就是为苏格拉底辩护。色诺芬首先列出了对苏格拉底的指控，然后引入苏格拉底的对话，详尽阐述《申辩篇》前两章的主题，即，苏格拉底非常虔诚，作为一个道德的楷模，他对自己的青年朋友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遗憾的是有些青年朋友不听他的劝告而变得道德败坏。在《回忆苏格拉底》的其余篇章里，这些主题在一系列的对话中进行了详尽地阐发。对话通常是在苏格拉底和另一人之间展开，有时据说还有其他人在场；参加对话者大多是苏格拉底的熟人，如亚里斯提卜、克力同和他的儿子克里托布鲁斯（Critobulus）以及色诺芬本人，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人物，如伯里克利的一个儿子，智者安梯丰（Antiphon）和希比阿（Hippias），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狄奥多特（Theodote）的高级男妓。最后一章又回到了色诺芬的《申辩篇》一开始的主题，色诺芬说苏格拉底不打算为自己辩护，因为有神的预兆指示他说，与其让自己慢慢老去，还不如坦然赴死。他最后称颂苏格拉底是最优秀和最幸福的人，苏格拉底不仅自己在道德操守上出类拔萃，还鼓励其他人施德行善。

色诺芬的这部作品是一部更详细、更全面的《申辩篇》。为了使全书风格保持一致，该书中对话内容更多地是提倡虔诚和道德修养，并给予一些实用的建议。例如，苏格拉底曾用神意对世界的安排来开导一个名叫阿里斯托德穆斯（Aristodemus）的不敬神的朋友。他讲到眼睫毛是怎样被神设计来为眼睛挡风的（1.4.）。除此之外，他还讲了一个智者普洛狄库斯（Prodicus）的故事。这个故事说赫拉克勒斯施德行善，乐而不淫，拒绝了各种邪恶放荡的诱惑（2.1）。苏格拉底想用这个故事来劝告享乐主义者亚里斯提卜要有自制力。苏格拉底还与许多对话者一起讨论了一般原则的作用问题（3.1-5），劝一个经济拮据的朋友要让家里的女人学会做衣服（2.7），并向人们指出身体健康的重要性（3.12），提醒他们注意就餐礼仪（3.14）。这些记述并不表明这部作品就没有什么哲学内容。我们发现，苏格拉底使用了柏拉图对话中常见的论辩方法，如从各行各业的实践经验中，选取类似的事例，运用归纳论证，得出结论（2.3）。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苏格拉底盘诘他人以证明对方缺乏相关知识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3.6和4.2节，他盘诘了声称有政治领导才能的柏拉图的兄长格老孔［Glaucon］和一位名叫欧谛德谟［Euthydemus］的青年朋友。这使我们想起了埃斯基涅斯的《阿尔西比亚德斯》和假托柏拉图之名写的《第一个阿尔西比亚德斯》中对阿尔西比亚德斯类似的盘诘）。还有两章（3.9和4.6）专门探讨了柏拉图对话中常见的哲学话题；前一章先讨论勇气是一种自然天赋还是一种教育结果（《美诺篇》的开篇就有一个类似的问题，这在《普罗泰戈拉篇》里也有明显的记述）。接着色诺芬在这一章里（见第4节和第5节）说到，苏格拉底首先将智慧与自我克制等同起来，然后又将智慧与正义和其他德性等同起来。这一点同样与《美诺篇》和《普罗泰戈拉篇》有关，因为在这两部作品中苏格拉底都极力捍卫德性就是知识的主张。后面一章（4.6）涉及定义的问题。在柏拉图的一些对话中，苏格拉底将“某某是什么”（如“正义是什么”）这类下定义的问题看作是哲学的首要问题，并且用虔诚（在《游叙弗伦篇》里有论述）和勇气（在《拉凯篇》里有论述）作为例子来阐述其基本观点。色诺芬在这一章的第6节指出了

常见于柏拉图的《美诺篇》、《高尔吉亚篇》和《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的悖论”，即没有一个人是自觉地去做错事。在第11节色诺芬也提出了相关的论断，即那些知道应怎样应对危险的人是英勇的，而那些犯错误的人则是怯懦的。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篇》（359-60）中就论证了这个命题。

概括地说，有关哲学的内容在《回忆苏格拉底》中不及虔诚、德性、实践忠告重要，但是它所包含的哲学内容与其他的苏格拉底文献中包含的哲学思想基本相同，尤其是柏拉图的对话。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是相信色诺芬有关苏格拉底哲学思想及其方法的文献资料完全来源于他自己的收集，还原了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还是相信他的资料来源于其他的苏格拉底文献，尤其是柏拉图的著作。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确实有些内容说明色诺芬的著作是以柏拉图的著作为基础。色诺芬的《会饮篇》（8.32）记述的波桑尼亚斯（Pausanias）和斐德罗（Phaedrus）的演讲，很明显地参照了柏拉图的《会饮篇》。色诺芬在《申辩篇》第一章中提到了许多早期有关苏格拉底审判的文献，很可能其中就包括了柏拉图的《申辩篇》。但《回忆苏格拉底》中没有明显引用柏拉图著作的内容，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说，只要色诺芬讨论的主题与柏拉图一样，就一定是色诺芬用了柏拉图的资料，而不是柏拉图受色诺芬的影响，或者说他们都依赖于一个共同的资料来源，包括对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回忆。（我们还不能肯定柏拉图和色诺芬完成这些著作的确切时间。）从另一方面看，色诺芬是在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两年前就离开了雅典，在三十多年后才重回到雅典。他绝大多数记述苏格拉底的著作都是在流放期间完成的，而他在这段时期失去了与雅典人的联系，因此他必定借助了包括柏拉图在内的其他人写的有关苏格拉底的著作，以此来帮助自己回忆并加深对苏格拉底的认识。既然前面提到可以用柏拉图的影响来解释为什么色诺芬在哲学方面与柏拉图有许多相似之处，既然我们能够断定色诺芬在离开雅典期间参阅了柏拉图的著作，那么最慎重的办法就是承认，《回忆苏格拉底》里的哲学内容不能当作一个独立的资料来源来证明历史上苏格拉底真实的哲学观点。同样，我们无法断定色诺

芬对苏格拉底个性和对话的描写就一定比其他作者的描写更符合历史实情。色诺芬确实作为对话者在对话中出现过（1.3.8-15），他有时声称他也在对话的现场（1.4, 2.4-5, 4.3），但他说，大多数的对话他都没有参加。不管怎样，说他在场只是一种文学虚构。色诺芬称自己出席了《会饮篇》[4] 里记述的晚宴，这个戏剧性的日子是在公元前422年，而当时他大概只有8岁。另外还有一些对话，比如与一些智者的辩论（1.6, 2.1, 4.4），对一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的反诘（3.1-6, 4.2-3），这在当时的苏格拉底文献中很流行。《回忆苏格拉底》中有关苏格拉底对话的一些描述，可能确实出自色诺芬本人或是其他人对苏格拉底对话的真实回忆，但我们没有办法确认这部作品究竟有多少内容是来自真实的回忆。这些回忆确为《回忆苏格拉底》提供了素材，但对这些素材的处理定会受为苏格拉底辩护这一目的的影响，同时还必须遵循创作苏格拉底对话的一般文学原则。

在本节的最后，我要谈及另一位作者，尽管他并未写过苏格拉底对话作品，但人们一直认为，他的作品为了解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提供了独立的资料来源。此人便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写过一些现已失传的对话作品，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作品是对苏格拉底对话的描写。）与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其他作者不同，亚里士多德没有亲自结识过苏格拉底，在他出生前15年苏格拉底就已去世。公元前367年他作为一个17岁的学生进入柏拉图的学园，他在这里一呆就是20年，直到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可以肯定，他在这段时间里与柏拉图有着私人的交往。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地方提到苏格拉底。他经常在上下文中提到的苏格拉底显然来自于柏拉图的描述，例如在《政治学》（1261a, 5-8）中，他就提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并说道“苏格拉底提议妻子、孩子以及财产应该公有”。然而，有时他的论述又表明他试图谈论的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就他著作中的这些论述而言，我们必须考虑，他对苏格拉底的描写是否有未受柏拉图影响的地方。

在《形而上学》（1078b, 27-32）的一段重要文字中，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柏拉图理念论的来源时说道：

有两件事情可以归之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推理和普遍定义，因为它们都与知识的出发点相关；然而，苏格拉底并没有把普遍和定义当作分离存在的东西，可是他们（即柏拉图和他的后继者们）把普遍或者定义当作是分离存在的东西，并把它们叫做理念。[5]

按照柏拉图的描述，苏格拉底在几次对话中都始终坚持理念是分别存在的理论，最明显的是在《斐多篇》和《理想国》中，所有参与讨论的人都熟悉这个理论[6]。事实上，认为苏格拉底没有将普遍和事例分离的主张不可能来自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著作的解读，柏拉图在学园中的口述才是这个主张最初的来源。我们不一定要假定亚里士多德与年长他40岁的柏拉图的私交很好，（据说他是一个很得柏拉图欢心的学生，而且还写过一首诗来赞美柏拉图），或者说回忆苏格拉底是学园里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需要假定的是，学园里面的人都清楚苏格拉底通过柏拉图所起的作用。要不是这样就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了。现代的一些学者对此表示怀疑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除了说苏格拉底没有把理念分离开来之外，学园的口传究竟还包含了其他多少内容，我们无法说清。但我认为，除了上述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否定性结论之外，这个口传完全有可能还包含了相关的两个肯定性论断，即苏格拉底一直寻求普遍定义和运用归纳推理。

柏拉图

除了被普遍看作是柏拉图最后著作的《法律篇》之外，苏格拉底出现在了柏拉图的所有对话中。更严格地说，除了《法律篇》、《申辩篇》（它本身不是一部对话著作）和《书信集》（其真实性尚有争议）之外，柏拉图的所有著作都是在描述苏格拉底的对话。然而，在这一系列的著作中，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描述还是有着相当的变化。一般认为，《智者篇》和《政治家篇》从文体风格上看，应该是柏拉图的后期著作，苏格拉底只出现在这两部对话的开头，他仅仅在这两个对话之间和这两个对话与《泰阿泰德篇》之间起承上启下的连接作

用。在柏拉图的大多数对话作品中都是由苏格拉底来充当对话主角，但在这两篇对话中，主角却是一个来自埃利亚的客人（巴门尼德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后来的《蒂迈欧篇》及其未完成的续篇《克里底亚篇》中。在这两部对话中，苏格拉底仅在对话的开头短暂出现，对话的主角是另外两个人，对话的篇名就是这两个人的名字。在《巴门尼德篇》中，苏格拉底唯一一次以一个青年男子的面目出现，他的主要作用是接受老巴门尼德在哲学方法方面的教诲。即使是在一些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对话里面，对他的描写也是有一些变化的。有些对话突出了苏格拉底的生平，如著名的《会饮篇》和以苏格拉底审判及其死刑为主题的对话（如《游叙弗伦篇》、《申辩篇》、《克力同篇》和《斐多篇》），以及（在一个较次要的程度）《卡尔米德篇》。有些对话著作，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些著作，生动地描述了苏格拉底的个性，表现了苏格拉底与其他人，特别是与智者及其朋友之间的谈锋。除了上面提到的著作外，属于这个主题范围内的著作还有《普罗泰戈拉篇》、《高尔吉亚篇》、《欧谛德谟篇》、《美诺篇》、《理想国》、《大比希阿篇》、《小比希阿篇》、《伊安篇》、《拉凯篇》和《吕西斯篇》。在另外一些对话中，苏格拉底依旧是主角，引导着对话的展开，但却没什么个性，仅代表着一个哲学权威的形象，虽然影响着对话的发展，但其作用并非不可由他人替代，比如来自埃利亚的客人（或许就是柏拉图）。我认为（虽然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在《理想国》（除第一卷之外）、《斐德罗篇》、《克拉底鲁篇》、《泰阿泰德篇》和《斐莱布篇》里面，苏格拉底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我们该怎样去解释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的多变性？这种多变性对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和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呢？

19世纪的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柏拉图对话著作的文体特征，将6部对话著作单独划归为一组：这些著作是《智者篇》、《政治家篇》、《斐莱布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和《法律篇》，它们都属于柏拉图的晚期著作，因为它们在文体特征方面与经古代学者考证、被证明是柏拉图临终前仍未写完的《法律篇》有许多相似之处。

19世纪的研究还进一步确定了另一组对话著作：即《巴门尼德篇》、《斐德罗篇》、《理想国》和《泰阿泰德篇》。这些著作在风格上与其他对话著作相比更接近柏拉图晚期的著作，以此可以假定它们属于柏拉图中期的一组著作，写作时间晚于其早期著作，但早于其晚期著作。随后的韵文类型研究虽然进一步证实了这3组划分的正确性，但最后没有能够确定每一组内各篇对话的写作顺序。不管怎样，本书认可这些研究成果。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柏拉图晚期著作的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苏格拉底在这些对话中消失了。苏格拉底在《法律篇》中没有出现，在除了《斐莱布篇》以外的其他所有对话中也没有出现。苏格拉底在《斐莱布篇》中的作用与其在中期对话中的作用很相似，但这不包括《巴门尼德篇》。在《巴门尼德篇》中，苏格拉底起到的作用就是与巴门尼德进行对话。尽管在《斐莱布篇》、《斐德罗篇》、《理想国》和《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底还是扮演引导者的角色，但他只是一种哲学理论的代言人，一个论辩技巧的讲解者，而不是与其他人进行争论的一个人。当然这些差别不仅是判断的问题，同时也是程度的问题。我们并不是说苏格拉底在中期的对话著作中就没有他个人的特点，或者否认中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与早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之间的联系。比如，在《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就赤脚行走（229a），听到了神的声音，警告他不要过早地打断讨论（242b-c）。而且，即使在早期的对话著作中，苏格拉底也充当着哲学家代言人的角色。显然在柏拉图的写作生涯中，他对苏格拉底作为哲学理想化身的关注在变化。他最开始把苏格拉底的个性看得极其重要，后来逐渐降低了其个性的重要性，以至于使苏格拉底不以个人形象出现，转而成为柏拉图哲学的代言人，在《法律篇》中甚至公开用完全没有个性特征的人物，比如用埃利亚来客和雅典人来代替苏格拉底。下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柏拉图在其早期对话著作中对苏格拉底的描述。

这里必须再次强调，柏拉图的描述属于“苏格拉底对话”体裁的作品，我们前面警告过，不要轻信色诺芬以及其他描写苏格拉底作者的对话作品的历史真实性。这种警告也同样适用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

描述。与色诺芬不同，柏拉图从来没有声称，他经历过他所描述的任何一次对话。但他申明，在苏格拉底受审的时候，他是在场的[7]，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是可信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写的《申辩篇》就是对苏格拉底申辩词的实录。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例中，他明确说过他当时不在场；在《斐多篇》一开始，斐多就告诉了埃切克拉底（Echecrates）苏格拉底临终那天在场者的名字，他说到“我想柏拉图那天是生病了”（59b）。这段记述使柏拉图和此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目击者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他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斐多，因此目击者的说法只能看成是戏剧场景中的一部分。例如，根据《斐多篇》的叙述，苏格拉底从他的理念论和回忆说中得出了灵魂不灭的主张，这显然是柏拉图的戏剧虚构。我倾向于认为，柏拉图说苏格拉底临终时他不在场，就如同色诺芬说他在场一样，都是一种惯用的文学技巧，其实，柏拉图多半在场。

有些对话（如《卡尔德米篇》和《普罗泰戈拉篇》）发生在柏拉图出生以前，其他一些对话（如《游叙弗伦篇》、《克力同篇》和《会饮篇》）从故事背景来看，柏拉图并未出场。通常情况下，柏拉图不会说他的著作是苏格拉底对话的实录，即使他在个别情况下这么说了，如《会饮篇》中（172a-174a），那也只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虚构，其中的叙述者解释了他如何能够描写出一个他本人并不在场的对话过程。对话的主旨不在历史的真实性，而在替苏格拉底辩护，并阐明其哲学观点，例如，描写苏格拉底与智者对话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凸显苏格拉底真正哲学化的生活与智者们以哲学为幌子行骗之间的巨大差别，这样就能够证明宣称他勾结智者纯属污蔑，对他处以死刑实在不公。明白了这个目的，那苏格拉底是否真的见过普罗泰戈拉或色拉西马科斯（Thrasymachus），或者说他们真的见过面，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否就像《普罗泰戈拉篇》和《理想国》中描述的那样，都无关紧要了。同色诺芬一样，柏拉图也许采用了一些真实的回忆。至于这些真实的回忆用在了什么地方，我们并不清楚，也不认为这有多重要。

按照韵文类型研究的判断标准，我们上面提到的这组对话著作应

该早于柏拉图的那些“中期对话著作”：如《巴门尼德篇》、《斐德罗篇》、《理想国》和《泰阿泰德篇》。如果还要对早期著作进行细分，我们就必须求助于非韵文类型的研究。这里亚里士多德的证据非常关键。如果我们接受亚里士多德说的苏格拉底没有将理念分离开来的这一观点，我们就能确定，那些按文体划分属于早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并不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在这些对话中，比如《斐多篇》、《会饮篇》和《克拉底鲁篇》，都坚持一种理念分离存在的理论。现在学者们对柏拉图哲学发展进程的某些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猜测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我们有理由说，当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提出理念论，他就是在逐渐把苏格拉底变成一个替他本人发言的哲学权威，而不再是他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的形象。这些对话中的其他一些特征也能证实这一点。《会饮篇》有许多地方在突出苏格拉底的个人特点。一开始描写他为了参加晚宴而穿得衣冠楚楚（174a），但因为停下来在路上思考一个问题而姗姗来迟，最后在阿尔西比亚德斯的称颂中，对话达到了高潮。这种写法和苏格拉底的“阿尔西比亚德斯对话”的传统完全符合。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还有另一个角色，那就是代表一个名叫狄欧蒂玛（Diotima）的聪明女子发言。他说是狄欧蒂玛论述了爱在教育中的作用，最后甚至还说是狄欧蒂玛洞见了美的理念（201d-212c）。所以严格地讲，苏格拉底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理论，而是作为他人理论的代言人。我认为，柏拉图采用的这种手法标志着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和一种传统写作体裁中的苏格拉底（它们之间也难有明确的区分）转向了我们所说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作为狄欧蒂玛代言人的苏格拉底还处于转型的时期，这里的苏格拉底还不同于《斐多篇》和《理想国》中把理念论据融为己有的苏格拉底。我们看到，《斐多篇》里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描写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情形，柏拉图暗示，他的叙述并不是苏格拉底发言的实录。另一个转向的标志是在谈及有关死后灵魂命运的神话时，苏格拉底以他自己的死谈到了“死后的情形”（107d）。《克拉底鲁篇》的主题，特别是它对语言意义和赫拉克利特变化理论的关注，显然与《泰阿泰德篇》和《智者篇》有着联

系，可以勉强地把这种联系看作是一种变化的前奏。

除了理念论之外，还有两个学说应该是柏拉图提出的。一个是灵魂三分说。这个学说出现的时间不会早于中期著作《理想国》和《斐德罗篇》。另一个是回忆说，这个学说应该受到过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影响，因为柏拉图公元前387年第一次出访西西里时，接触过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回忆说与理念论的联系十分紧密，这在《斐多篇》和《斐德罗篇》里显而易见，在《美诺篇》也有所暗示。回忆说也与轮回论紧密相关。轮回论出现在《斐多篇》和《理想国》的结尾处，是有关死后神话的中心话题，这个理论在《高尔吉亚篇》里谈得不多，但在《斐德罗篇》中有许多描述，另外在《美诺篇》和《斐多篇》的一些辩论中这个理论也不时出现。在我看来，坚信这些学说的苏格拉底不过是逐渐在成为柏拉图理论的传声筒。

于是我们看到，在这组文体风格相似的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并没有坚持任何笔者认为是属于柏拉图的学说：如理念论、灵魂三分说、回忆说以及轮回论。除了大概是伪造的两部《阿尔西比亚德斯篇》，还有基本上不是苏格拉底对话而是对苏格拉底葬礼演讲滑稽模仿的《梅内克塞诺篇》之外，属于这组对话著作的大体上有：《申辩篇》、《游叙弗伦篇》、《克力同篇》、《卡尔米德篇》、《拉凯篇》、《吕西斯篇》、《伊安篇》、《欧谛德谟篇》、《普罗泰戈拉篇》、《大希比阿篇》（其真实性还有争议）和《小希比阿篇》。除此之外，还可以加上《高尔吉亚篇》和《美诺篇》，它们大概属于过渡性的著作，它们在柏拉图早期和中期的对话之间起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这里并不是说，在这些对话著作中的苏格拉底就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同其他苏格拉底对话的写作者一样，柏拉图从一开始就不关心历史的真实问题，他真正关心的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和作为哲学典范的苏格拉底论辩。但是这些对话所描写的苏格拉底的形象，在精神上和理论上（在一定程度上，尽管并非全面）却是一致的。这些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更加接近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首先这里呈现的辩论比《泰阿泰德篇》中表现的纯技术的论辩大概更加接近实际的苏格拉底对话，其次苏格拉底在这些对话中还没有完全变成柏拉图学说的代

言人。

就柏拉图描写的苏格拉底而言，在“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清晰的界限。“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仅仅是柏拉图在自己的著作中所描写的苏格拉底。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描写经历了一个清晰可辨的发展过程。他开始把苏格拉底描写成一个非常个性化的、投身于典型的哲学活动中的人，后来这个名字叫“苏格拉底”的人就成了一个传达他主张的傀儡式人物。在这个发展的最初阶段，即使柏拉图的描写十分接近历史的真实，但他也决不是简单的复制，从这个阶段过渡到更加“柏拉图”的阶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突然的转向。

下一章我们要考察柏拉图早年笔下的苏格拉底。这个考察有两个预先的假定需要说明。第一，对别人的观点进行反驳质问是苏格拉底探求知识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揭示对话人思想的前后矛盾，有时至少也是为苏格拉底提出的某些论点寻求论据的支持。第二，苏格拉底的诸多对话不能孤立地理解。有些现代学者复兴了格罗特（Grote）在19世纪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从学说的一致性或者追求共同主题方面来看，柏拉图的对话著作与索福克勒斯〔8〕那样的剧作家的作品相比，并没有显示出更多的优势。我认为恰恰相反，柏拉图始终把苏格拉底描写成一个追求真理和理解的哲学家，因此他的那些描写苏格拉底整个哲学活动的对话著作是连贯一致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柏拉图描写的苏格拉底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思想，也不否认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的改变也正好反映了他自己哲学观点的转变（下一章要讨论其中的一些转变）。总之，我认为，一方面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哲学充满了变化和发展，但另一方面，柏拉图还是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寻求前后一致立场的苏格拉底形象。

注释

〔1〕见《回忆苏格拉底》1.2.12。

〔2〕特别见《会饮篇》和《斐德罗篇》。

〔3〕见《回忆苏格拉底》2.6.36和《经济学篇》3.14。

〔4〕 见《会饮篇》1.1。

〔5〕 译文参考了苗力田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97页。

〔6〕 见《斐多篇》76d，《理想国》507a-b。

〔7〕 见《申辩篇》34a, 38b。

〔8〕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公元前496—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据说写下了123部作品，现存《俄底浦斯王》、《安提戈涅》和《埃阿斯》等7部。——译注

第四章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

正如上一章结尾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将考察在12篇对话以及《申辩篇》中，柏拉图是如何表现苏格拉底的学说及其论辩方法的。这些对话几乎都具备了以下的特征：

i．对苏格拉底性格的塑造 。苏格拉底主要被塑造成是一个好问者而不是一个老师。他不承认自己有智慧。他通过反诘法，也就是认真审查对方观念的方法，向对话者寻求难题的解答，但最后往往都徒劳无功。在有些对话中，尤其是在《普罗泰戈拉篇》和《高尔吉亚篇》中，质疑的姿态往往会变成一种权威的语气。

ii．下定义。 许多对话都试图为德性或是其他重要的伦理概念下定义。《游叙弗伦篇》中问道“什么是虔诚？”，《卡尔米德篇》中问道“什么是节制？”，《拉凯篇》中问道“什么是勇敢？”，《大希比阿篇》中问道“什么是好，或什么是美？”，《美诺篇》和《普罗泰戈拉篇》中或明或暗地都问到一个普遍的问题“什么是德性？”。在所有的这些对话中，关于定义的讨论总是没有结果，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主要问题的答案。但在有些情况下，原文的字里行间似乎暗示了正确答案。

iii．伦理学。 所有这些对话都涉及广义的伦理学问题，即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除了那些专门探讨定义的对话外，《克力同篇》讨论的是一个现实的伦理问题：苏格拉底在被判刑之后该不该越狱；《高尔吉亚篇》和《欧谛德谟篇》讨论了人生目的。从表面上看，《伊安篇》是唯一的例外，因为这部作品考察了一个职业诵诗者声称他拥有智慧的断言。但即便如此，《伊安篇》里的讨论与其他对话中普遍的伦理追求仍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揭穿了伊安拥有智慧的谎言就意味着，诗人和诵诗者其实都不受智慧的引导，而是受制于非理性的灵感，因此诗歌并不像希腊传统所强调的那样，对教育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这部简短的对话著作可以看作是柏拉图

早期讨论教育目的和教育者必备条件的文章，这个话题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占有很重的分量。

iv．智者派。 在有些对话中，如两篇“希比阿”的对话，还有《普罗泰戈拉篇》、《高尔吉亚篇》、《欧谛德谟篇》和《美诺篇》里的对话，其主题就是以描绘苏格拉底和许多智者以及学生朋友之间的交锋而展开的。这些对话深化了在《申辩篇》中阐明的为苏格拉底辩护的主题。

下面我们将对这些话题进行详细的考察。

苏格拉底否认有智慧

苏格拉底说他自己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的无知。这成了古时的一句名言。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表述，显然是对柏拉图的误读。虽然苏格拉底经常说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辩论所涉及的问题，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他什么都不知道。事实上，他有几次强调过，他有一定的知识，这在《申辩篇》里最为明显。在这篇对话中他有两次声明，他知道放弃自己神圣的使命是错误和可耻的行为（29b，37b）。他所要否认的是他拥有智慧[1]，继而否认他在教导民众。显然他明白，教育就是授人以智慧和学识（19d-20c）。考虑到他在《申辩篇》里宣称，只有神才拥有真正的智慧，人的智慧与这种真正的智慧相比（23a-b）根本不值一提，那么他否认有智慧可以理解为是对人的局限性的承认。拥有一种能够洞察万物的智慧，那是神所独有的特权。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奢望有这种智慧，苏格拉底否认自己有这种智慧，其实是在坚决抵制人类普遍存在的那种亵渎神灵的傲慢。

尽管对人类智慧的贬低确实是《申辩篇》中的一个基调，但苏格拉底之所以否认自己拥有智慧，否认他在教导民众，不是为了让自己与神的智慧一较高下，而是为了凸显他与典型的人类智慧的差别。这种典型的人类智慧是通过泥瓦匠、鞋匠等手艺人体现出来的。他认为

（22d-e），就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能手这一事实来说，手艺人确实拥有智慧，但他们若以为其专门技艺可以运用到手艺之外的事情，那便是大错特错。这种专门技艺是一整套条理化的知识，是通过系统的学习和相互的讨教获得的，拥有这种知识的专家能够解决其手艺所涉及的实际问题，并且能够说清楚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的理由。智者派声称他们掌握了“政治技艺”[2]，这种技艺可以运用到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帮助人们获得成功，并且可以传授给别人。虽然苏格拉底否定了智者的这种断言，但并不是因为人类无法掌握这种知识，而是因为智者实践的这种技艺还不满足对真正的专门技艺的要求，比如，他们的技艺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和传授[3]。苏格拉底否认自己具备这种专门技艺[4]，但并没有说他或者其他任何人就不能掌握这种技艺。

我们没有理由假设说苏格拉底否认有知识就是所谓的一种“苏格拉底讽刺”的表现，即为了论辩的目的而假装自己一无所知。确实，苏格拉底经常在对话中称赞他的对话者比他更有智慧[5]，但读者无论如何都不应被苏格拉底欺骗。实际上苏格拉底说的都是反话，他的这些称赞都是为了突出对话者所说知识的可疑性，或是质疑对话者的权威性。然而，从《申辩篇》的上下文来看，苏格拉底不可能是为了辩论需要才说自己一无所知的。苏格拉底并没有假装遵从一个表面上博学多闻、但实际上徒有虚名的知识权威。他是非常真诚地用自己的知识状态与一种相应的知识范式进行比较，以发现这种范式的欠缺。

如果说苏格拉底否认有知识事实上就是否认有智慧或者懂专门技艺，那么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否认与苏格拉底对知识的独特主张是一致的。普通人能够理解一些特定的东西，但不是按照专家的那种认知方式来理解，尤其是普通人不能像专家那样，把一些个别知识纳入到一个全面的知识网络之中，通过这个网络将个别的知识与其他知识或者与一个知识结构整体联系起来，从而提出他们对这些知识的解释。但是普通人又是如何知道一些零散的知识的呢？这通常是直接或间接由专家传授的。然而，在道德问题上苏格拉底不承认有任何专家，至少不承认人类在此问题上有任何专家。那么，他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不

能够放弃自己哲学使命的想法又是从何而来？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他听到了神的声音，因为神才是道德问题的专家。抛开苏格拉底是如何知道神是道德专家（《游叙弗伦篇》提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谈，事实上在《申辩篇》和其他对话著作中都没有提到或是暗示过，是神让苏格拉底坚持他的哲学使命。

只要我们联想到苏格拉底并没有声称他拥有道德方面的知识而只是表示了他的看法，问题或许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说过，他拥有道德方面的知识，我们为什么要断定柏拉图并不能代表苏格拉底的真实想法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苏格拉底的确承认有一种他自己无法达到的理想的知识范式，但他说过自己懂得某些特殊的知识。这相当于是说，只有满足这种范式才能称作知识，而苏格拉底自己的知识状态不能满足这种范式的要术，因此只能称作意见。只要把专家的知识称作完整的知识，把普通人的知识称作零散的知识，我们就可以区分满足范式要求的知识和不满足范式要求的知识，这样也就用不着否认后者也可以冠以知识的头衔（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把专家的知识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知识，把普通人的知识称为“日常用途”或“宽泛的，大众意义上”的知识。尽管柏拉图没有用这种说法，但这种区分还是存在的）。然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苏格拉底承认他不是一个道德专家，他又是如何知道他所宣称的那些个别的道德真理呢？

说来或许会让人失望，直接的答案就是苏格拉底没有说过他是如何知道那些道德真理的。考察他的辩论活动，或许能帮我们找到一些线索。他经常与人辩论似乎就是为了揭穿辩论者的知识不过是些前后矛盾的信念而已，从而动摇他们的知识信念，就像他在《申辩篇》里面所描述的那样。但有时他至少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对话者坚持自己信以为真的信念，对于那些信念的认真审查就不仅要揭示出它们的前后矛盾，而且还要显示出有些信念的虚妄性。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波卢斯（Polus）和卡里克勒斯（Callicles）在《高尔吉亚篇》里断言，宁可冤枉他人也不能受他人冤枉。苏格拉底声称（479e），他批驳了上述说法，最后让波卢斯接受了相反的观点，即，宁可受人冤

枉，也不能冤枉他人。他还在与卡里克勒斯辩论结束时说（508e-509a），他的结论是由“严实牢固的论据”（即不可抗拒的力量）得出来的。然而，论断固然坚决，但同时他仍认为自己并未拥有知识：“我的立场始终未变，那就是我不知道这些事物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而我至今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包括现在遇到的这些人，也都不知道，如果他们说知道，那就会让他们显得很可笑”。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对比，一边是苏格拉底否认的专家的知识，另一边是苏格拉底赞许的由反诘法产生的一种知识态度。不断的验证表明，有些命题不能否认，否认了就会使自己自相矛盾。然而，从理论上来说，持守这些命题只是暂时的，因为总是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某个人可以提出一个崭新的论据来反驳那个“严实牢固的论据”，正如苏格拉底自己所承认的那样（509a2-4）。但在现实中，苏格拉底完全确信这些论据是建立在颠扑不破的原则基础之上，非常牢固，不可能被任何人驳倒。苏格拉底以普通人身份认识的真理就是他通过反诘法获得的真理吗？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只是我们没有在文本中找到明确的证据。据说在《克力同篇》（49a）中，苏格拉底和克力同都赞同人决不能行不义之事这一观点，这种共识使他们不得不一起思考苏格拉底越狱的正当性。显然，这里明确地暗示了他们的共识是基于一些充分的理由，否则苏格拉底和克力同为何不改变他们的想法？但是没有证据说这些理由是通过对苏格拉底和克力同意见的反诘得来的。

我们的结论是，尽管苏格拉底有时把诘问对话者的信念当作揭示真理的方法，尽管这种方法为获得知识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模式，但我们也不能证明苏格拉底宣称过，所有普通人的道德知识都是由反诘法取得的。他有过一些暗示，说他的道德真理是建立在充分论证之上，但他并没有阐明获得这些普通人的道德知识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高尔吉亚篇》里的对话提供了最为明显的例证，其中反诘法被看作是发现真理的主要方法。在这篇对话中，我们发现，苏格拉底不再充作一个普通的发问者，而是声称自己拥有专门的知识。这篇对话的主题之一就是讨论修辞学 [6] 在教育中的作用，也就是在提升道德

生活中的作用。苏格拉底为各类真正关乎人的灵魂良善、身体健康的技艺和与此相对应的各类有名无实的技艺分门别类（463a-465a）。真正关乎灵魂良善的技艺通称为“政治学”，也就是指生活的技艺。按规定，政治学还可以再细分为以促进灵魂健康为宗旨的“立法”（好比促进身体健康的体操技艺）和以维护灵魂向善为目的的“司法”（好比保护身体健康的医学）。与政治学对应的一种有名无实的技艺就是修辞学，因为演说家的目的不是使人们向善，而是通过说服的手段来迎合人们的愿望，帮助他们获取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说，修辞学提升的不是真正向善的生活，而只是给人一种向善的假象，就像美容术这种技艺不是使人们真正地健康，而只是让人们看起来健康而已（465c）。因此，政治学才是一门真正的生活技艺。与他在《申辩篇》中的立场刚好相反，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篇》中不仅宣称他在实践这种技艺，而且断言，除了他没有别人在做这件事情，因为只有他才关心他同胞的福祉。

苏格拉底这种作为政治学唯一真正实践者的思想在《美诺篇》的结尾（99e-100a）处有一个生动的再现。他在辩论结束时总结说，德性不是教育出来的，“除非存在着一个能够向别人传授政治技艺的政治家”（即除非有某个人能够将自己专门的生活技艺传授给另外一个人，然而普通的政治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否则德性就只能是一种神赐的天赋。他接着说，这样一个人很像荷马所描述的在地府中的提瑞西阿斯（Tiresias）[7]：“他是地府中唯一能够现形的，其他人只是像幽灵一样地游荡”。这里提到《奥德赛》第十一卷所描述的奥德修斯（Odysseus）的地府之行，使我们想起了《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与智者会面的情景。苏格拉底向智者引用了奥德修斯的话（315b-c），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生命的人，而把智者看作是一些幽灵（即鬼魂）。于是，“与那些幽灵相比”[8]，他就是一个真正懂得生活技艺的专家，真正懂得德性的本质[9]，而且他有一种全新的方法向世人传授德性的本质[10]。这个方法就是他的回忆法。他认为永恒的真理都植根于灵魂之中，但在灵魂转世的过程中这些真理往往被人们遗忘，只有通过批判性的反思才能够被重新记忆起来。

这样一个带有权威特征的苏格拉底形象是早期“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向中期柏拉图式对话过渡阶段的一个特点。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苏格拉底逐渐变为柏拉图代言人的一个例证。

定义

苏格拉底对于下定义的兴趣源于他对专门知识的探求。专家都了解他们各自的研究主题。在苏格拉底看来，关于任何一个研究主题的基本知识就是关于这个主题究竟是什么的知识。关于专门知识，在《大希比阿篇》（286c-d）里有明确的论述。苏格拉底告诉希比阿，当他称赞某些行为是高尚的，谴责另一些行为是可耻的时候，有人向他发难道：“你是怎样知道一些行为是高尚的而另一些行为是可耻的呢？告诉我，你所说的高尚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苏格拉底就向希比阿请教，因为他博学多闻，关于什么是“高尚”的知识只不过是他广泛知识中“很小、很不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希比阿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他拥有的知识既没有价值，也不够专业（286e）。

柏拉图的很多对话作品都强调了“某某是什么？”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通常的辩论方式是以一个主题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然后就这个主题提出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就德性这个主题而言，一个人该如何去努力获得德性？如果连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德性概念都没有，就很难讨论如何获得德性。因此，尽管从心理上讲，是具体问题优先，但从认识论讲，是“X是什么？”这样一个抽象问题优先，因为你不先知道“X是什么”，就没办法回答关于“X”的具体问题，这个顺序不能颠倒过来。柏拉图的对话讨论了很多类似的、有争议性的问题。《拉凯篇》（189d-190d）里讨论了如何灌输勇敢这样一种具体的德性；《美诺篇》（70a-71b）和《普罗泰戈拉篇》（329a-d，360e-361a）讨论了德性的普遍原则问题；《理想国》第一卷（354b-c）讨论了正义是否对正义者有利的问题；《游叙弗伦篇》（4b-5d）讨论了一个更为

具体的问题，即游叙弗伦检举他父亲杀人的行为是否算得上是虔诚和神圣。同样，在《卡尔米德篇》（158c-59a）里，就卡尔米德是否有自制力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议，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弄清楚什么是自制力。

如上面最后两个例证所示，如果不先回答“E这一性质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就不能确定“某物或某人是否具有E这一性质？”，这就导致了人们指责苏格拉底犯有所谓的“苏格拉底谬误推理”的毛病，即他主张，除非你知道一种性质的定义，否则你就不可能知道某物是否具有这一性质。坚持这个观点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很困难，这不仅因为它容易遇到无数的反例（如即使我们不知道货币的定义，我们也能够知道一张5镑的纸币就是货币的一种），而且还因为苏格拉底所推崇的定义方法就是要先从属于同一类或拥有同一种性质的具体事物说起〔11〕。显然，如果不在下定义之前先说清楚属于同一类的或是拥有同一种性质的具体事物是哪些，那苏格拉底推崇的这种方法就行不通。这样说来，我们也不能通过举反例来反驳一个定义。因为，既然事先对某性质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就不能判断某物是否具有这一性质，同样，如果事先对某性质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也就说不清楚某物是不是就一定没有这种性质。但是，因为提出反例是苏格拉底反诘法中惯用的一种方式，所以谬误推理破坏了苏格拉底的辩论方法。

事实上，苏格拉底并没有颠覆自己的方法论。苏格拉底在《游叙弗伦篇》和《卡尔米德篇》里讨论得最多的就是，如果不事先回答“E这种性质是什么？”，就不能确定“某物是不是有E这种性质？”。苏格拉底并不认为这类问题都有争议。他主张寻求事物的一种性质，这种性质可以在所有毫无争议地都有E这一性质的事物中找到，而在所有毫无争议地没有这一性质的事物中找不到，然后看是否能将这种性质应用到对是否有E这一性质仍存有争议的事物中，以此来确定它们是否有E这种性质。（事实上，这种辩论方式不可能最终消除争议，因为最初关于性质的争议现在变成了另外一种争议，即将性质的外延从无争议的事物扩大到有争议的事物是不是恰当的问题。然而这又是另

外一个问题）。但在《大希比阿篇》中，苏格拉底的强硬挑战者断言，在搞清“高尚”的定义之前不可能回答某一件具体的事情是不是高尚这个问题。当苏格拉底和希比阿都无法解释什么是高尚的时候，苏格拉底想象自己再次面对这个强硬挑战者的追问，“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高尚，你又怎么知道有些言辞或者行为就是高尚的呢？如果你就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你认为，你活着真的比你死了要好吗？”（304d-e）。我们不能草率地说这是某个其他人的观点而不是苏格拉底自己的观点，因为苏格拉底表明，那个强硬的挑战者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他的“第二自我”：“他恰好同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而且就跟我住在同一间房子里面”（304d）。然而，苏格拉底并不是简单地赞同挑战者的观点，因为他最后总结说（304e），他知道那句格言“高尚的事情很难言说”说得不错，但就挑战者来说，他并不了解这一点。所以挑战者的观点与苏格拉底的观点并不是完全相同，但却密切相关（确实是这样因而很容易混淆），而且确实还构成一种挑战，如果接受，甚至有可能推翻苏格拉底整个的一套辩论方法。因此，这个挑战为我们把上述那个挑战者的观点与苏格拉底实际上比较谦和的观点区分开来了，即承认如果不能给一个性质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确实无法说清有些事物是否有这种性质，但并不是所有事物都是如此。但作为一个领域里的专家就是要能够言之有据，对于有无争议的事物都能够说清楚它是否有所讨论的那种性质或属于那种类别，在苏格拉底看来，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专家还要能够说清楚这种性质或类别究竟是什么。

在《拉凯篇》、《美诺篇》、《普罗泰戈拉篇》和《理想国》第一卷中讨论的例子展示了另一种讨论的模式；这里引发探寻某性质定义的问题不再是一个给定的、有争议的事物是否具有这一性质的问题，而是说这种性质本身是否还有其他性质的问题，具体说就是正义是否有益于正义者，勇敢和德性（包括所有的德性如勇敢、节制、正义、智慧等）是否可教授。在《美诺篇》（71b）里，苏格拉底用了一个类比来说明定义的先后顺序，不过他说的也只是些先前我们已知道的内容。比如，如果我根本不知道美诺是谁，我就不可能知道他有什么特征，例如，他是富有还是英俊。同样，如果我完全不知道德性

是什么，我就不可能知道哪些事情是符合德性的，而且也不知道怎样去拥有德性。

按照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理解，这种辩论确实没什么新意。如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美诺这个人，我对“美诺长得是不是英俊？”的回答只能是“很抱歉，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同样，如果我不知道善是什么，我对“善是否可教？”的回答也只能是“很抱歉，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表述一个主题的先决条件是了解这个主题，然而这个先决条件并没有满足。清晰表述的先决条件并不要求对主题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拿人来说，比如美诺这个人，我用不着说清楚美诺不同于他人的独特品质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人，我可以就把他看成是“站在那边的男人”，或是“我去年在酒吧遇到的一个人”。讨论一般的概念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比如，当我们在使用“德性”这个词的时候，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在谈论的东西是什么。但是，使用这个词并不一定以掌握这个词的普遍意义（即定义）为先决条件。回到我们前面的那个例子，我在使用“货币”这个词的时候，即使我不能够给出有关货币的定义，我也知道我正在谈论的是什么，只要我能够认识具体的货币，这就已经足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诺显然一开始就知道他谈论的是什么，不然他就不会提出“德性是否可教授？”的问题。由此可见，要清晰表述一个主题就要先确定这个主题是什么，这道理已经说了千万遍，但这并没有证明一定要先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既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也可以知道自己在谈论的是什么，那么苏格拉底为什么还要坚持定义的优先性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到，引发对于具体德性和一般德性定义探讨的其实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即《拉凯篇》、《美诺篇》、《普罗泰戈拉篇》里面提出的如何养成那些好品质的问题。这个实际的问题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关于品质的定义呢？显然，一个人仅仅知道自己正在谈论什么是不够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能提出这个实际问题就说明其实他已经知道谈论的是什么。因此我们还需要能够阐明所讨论品质的词典含义是什么。就我已经解释过的作为分

散的“德性”和作为集合的“德性”的希腊原文而言，其比较准确的含义说明可能包括：

1．人的一种品质，一系列使人获得美满生活的品质之一。这一系列品质中的任何一种都是获得美满生活的必要条件，但只有其总和才是充分条件。

2．上述各种品质之和。

解决有关德性的实际问题又为什么一定要人具备一种给出德性的词典定义的能力呢？这种能力确实推进了问题的探讨，明确了要去寻求那些有助于美满生活的品质，但是它没有说明那些品质包括什么，更重要的是它没有说明怎样去培养那些品质。人们可能会同意有关德性的定义，但是在解答实际问题时又会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例如有些人认为带来美满生活的那些品质完全是自然的馈赠，就如同人的智力和贵族血统一样，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能够通过实践来养成良好的品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解决关于德性的实际问题就需要有一种不同的定义；它要求对品质的含义作出实质性的说明。这种实质性的说明包括把品质的集合体分解为品质的组成部分（如德性是由正义和节制等品质组成），包括进一步解释那些品质的含义（如节制就是用理性来控制所有的欲望）。这就是说它提供了一种德性理论，通过它来解释德性的构成和目标，进而指出养成德性的恰当方法。

寻求这种实质性的定义也是对专家的要求。德性方面的专家应该能够解释清楚什么是德性，其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地指导人们如何养成和保持德性，正如健康专家应该能够解释清楚什么是健康，其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地指导人们如何获得和保持健康。上面提到的对话文本也多少证实了苏格拉底寻求的正是这种实质性的定义，但是要说这些对话已经清晰地把实质性定义与上面讨论的那些品质的词典定义区分开来，这个结论又过于简单化。

在这些对话中，苏格拉底有时明确、有时暗示地将知识或某种认知状态与德性等同起来，这说明他寻求的是实质性的而不是纯概念性或“分析性的”定义。在《美诺篇》里，对此有着最为详尽的讨论（上面讲过，这个对话是处于从“苏格拉底的”对话转向“柏拉图的”对话的

过渡性作品）。75到76段的对话中，苏格拉底试图向美诺解释，他要寻求的不是一连串像勇敢、自制这样的具体德性，而是对那些具体德性共有的东西进行说明，他列举了两个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这种共性，一个是形状，另一个是颜色。他对形状作出了概念上的解释，即形状是一种固体的限度；对颜色进行了“科学的”描述（以公元前5世纪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理论为基础），即颜色是从可感觉的物体中流出来的粒子流，它以合适的尺寸和形状通过眼睛里的管道而达到人的内在感觉器官。苏格拉底并没有明确说这是两种不同的定义；他说他更喜欢用形状来说明问题，但他没有说原因，他只是以“过于精细”来形容颜色，这也许是说颜色不如形状，因为颜色要涉及到过于复杂的技术性词汇。尽管这个表明了相比实质性的定义，苏格拉底更喜欢概念性的解释，但他还是对德性提出了实质性的描述，即德性是知识。虽然这确是基于德性是有益于有德之人这样一个概念性的命题，但它并没有说清楚德性这个概念，（在希腊语中，德性与有益是相通的，87e），它只是确认了知识是人生取得成功的必要或充要条件。这一结论不是单纯地依靠词义的解释，而是通过引证一个有关如何获得美满生活的高度概括性的命题得来的。这一命题指出，既然每一种可欲求的品质，如力量或无畏等，都可能导致灾难，那么只有那种绝对有益的东西才可以指导人们的行为，这种东西就是可等同于知识的智慧（87d-89c）。这个定义使得苏格拉底似乎放弃了他原先的主张，转而修正了他的观点，认为通过考察那些可疑的经验事实而断定，德性不是知识，德性只是合理的信念（89c-97c），而且也没有什么德性专家，除非德性是某种知识才可能有德性专家（这是另一个概念性命题）。在苏格拉底的辩论中，概念性的命题和有关人性的经验性主张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最实用的德性理论，这种理论能说清楚各种具体德性共有的东西是什么。

在《美诺篇》里面，如何养成德性的这个实际问题导致了苏格拉底把德性当作一种认知状态，作了一番实质性的描述。这不是一种巧合，另外两个对话也从讨论德性问题开始，一个讨论了一般的德性问题（《普罗泰戈拉篇》），另一个讨论了具体的德性问题（《拉凯

篇》里的勇敢），两篇对话显示了相似的论辩发展模式。在《普罗泰戈拉篇》里面，苏格拉底的年轻朋友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假设，可以通过普罗泰戈拉的教授来养成德性，但是他拒绝智者把德性看作是一组偶然联系在一起的品质的观点，而赞同《美诺篇》里所提出的德性即知识的理论。在《拉凯篇》里，在拒绝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之后，关于如何培养勇敢这种品质的问题引出了勇敢就是认识什么是危险和什么是安全这一定义（194e-195a）。这个定义最终被否定了，因为关于什么是危险和什么是安全的知识与关于什么是坏和什么是好的知识完全一样，这样勇敢也就成了有关什么是坏和什么是好的知识。但这种知识正是相当于作为整体的德性，那么勇敢不是像原来假定的那样，仅仅是德性的一部分（198a-199e），而是德性的整体。因此对话结束的时候，参与对话的人都承认，他们没有弄清勇敢究竟是什么。要不要接受这个毫无结果的辩论，评论者们意见不一，如果不接受这个结果，引出此结果的假定就应该被放弃。这里的关键在于德性的实际问题不仅引出了一种对于品质问题的实质性描述，而且还引出了《美诺篇》和《普罗泰戈拉篇》所提出的同样的论述。

我这里并不是说，在写作这些对话的时候，柏拉图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纯概念性的定义和以知识理论为例证的实质性定义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就是在《美诺篇》这个我认为是成书时间最晚的一篇对话里面，即使对德性定义进行了最为详细的讨论，柏拉图也只是列举了其中的一种典型定义方式而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区分，这就表明他还没有达到从理论上来区别这两种定义方式的程度。我觉得，柏拉图的惯常做法表明，他比较倾向于实质性的定义方式而不是概念式的定义方式，讨论的实践导向也证实了这一点。

有时候对话的过程交代得不是很清楚。在《游叙弗伦篇》，开始提出的问题是“哪一些事情的品质（特别是指人的行为）是虔诚的？”当游叙弗伦提出（6e-7a），神灵赞成的就是虔诚的时候（它非常接近希腊人通常对hosion的解释），苏格拉底从他的说法推出了一个观点，即他之所以认为神灵赞成的事情就是虔诚的是因为“事情本身就是虔诚的”（10d）。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虔诚之所以为虔诚是因为

得神之赞许，这样使得剩下的讨论完全在寻求那些本身是虔诚因而得神赞许的行为。我们也可以说苏格拉底在这里探讨了虔诚的实质性定义，并且用人性以及人与神的关系的理论来加以回答，但是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没有给这个理论提供更多的内容。《卡尔米德篇》里的讨论更不好把握，部分原因在于它所讨论的德性，即sophrosune（通常译为“节制”，但有时译为“心灵的健康”更好一些）是非常模糊的，它既是一种行为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指导人们行为的精神和心态。因此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对于它的讨论究竟属于概念式的解释，还是实质性的说明，确实比《拉凯篇》、《美诺篇》和《普罗泰戈拉篇》里的定义更难进行归类。

伦理学

寻求定义就是寻求专业知识。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往往有一套与其专业相关的理论，明白其基本规律，可以解决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在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那些对话中，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是在寻求一种可以应用于人类德性的理论，他在有些对话中试图寻求一种有关某种具体德性的理论（如《游叙弗伦篇》里讨论的怜悯，《拉凯篇》里讨论的勇敢，《卡尔米德篇》里讨论的自制力），在另外一些对话中，则试图探求一种宏观的德性论。在所有的这些对话里面，苏格拉底的这种寻求至少在表面上是不成功的，因为在每一对话结束的时候，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都会承认他们并没有解释清楚德性或某种具体德性究竟是什么。但可以看出，这些对话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在3个涉及某种具体德性的对话中，有关德性的讨论更多的是试探性的，苏格拉底并没有打算提出任何肯定的观点，他似乎很愿意接受最后所面对的思想死结。然而，在《美诺篇》和《普罗泰戈拉篇》里，苏格拉底明确地提出了德性即知识的论点。从表面上来，讨论虽然又走进了死胡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苏格拉底就放弃了上述论点。我认为，在柏拉图的这些对话里面，苏格拉底虽然还没有提出一种完全成

熟的德性理论（建立这种德性理论一直是他思想的目标所在），但他至少提出了这个理论的大体轮廓。于是在这些寻求定义的对话里面，苏格拉底的形象已经从一个只会批判的探询者变成了某种理论的支持者（虽然他不是一个充分意义上的专家）。这样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种形象的转变究竟是柏拉图认为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确实有此一变，还是柏拉图只是想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来更多地表达他自己的观点。

苏格拉底德性理论的基本原理在于，它把德性看成是一种可以确保生活美满的观念与要想获得成功就要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最好的这一实质性论点结合了起来。这个理论又是基于一种更加全面的有关人类行为动机的理论。这种理论说明，行为者要为自己谋幸福的思想（即促进最大幸福，达到生活美满）能够推动他朝着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向努力。这种动机包括了欲望和信念两方面的因素；苏格拉底认为[12]每个人都追求美好的东西。从上下文来看，苏格拉底的这个主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坚定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对美好事物的渴望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动机，它要求每个人都清楚他所追求的美好是什么，并集中精力朝着某个方向去努力。因为有了追求的目标，人的欲望就会被锁定在经由思考确定出的目标上，避免受到与之相冲突的欲望的干扰。因此，正确的行为必须要有正确的目标，而要有正确的目标则要求行为者对什么是美好的事物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按照这种理论，人的行为动机完全是单一和自利的；每个行为者永远都朝着他或她认为是最美好的事情去努力，失败往往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什么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也就是说失败是因为认知上的缺陷，而不应归结为是动机有问题。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点，他认为行为者的全部追求可以用享乐主义来解释，人就是想过一种最大限度地享受快乐、逃避痛苦的生活。

按照这个假定，做错事情与追求快乐或者满足欲望并没有关系；人之所以会做错事是因为人在评价什么是最大的快乐的时候犯了错。正如苏格拉底所说（358d）“按照人的本性，人不会去做众人都认为不好的事，而会去做众人都认为好的事”。苏格拉底本人究竟是接受了享乐主义的主张，还是仅仅为了攻击普罗泰戈拉，说他没什么思

想，他所说的不过是些常识？评论家们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有重大分歧。但是毫无疑问，不管怎样，苏格拉底自己确实主张人的德性观念是他行为动机的唯一根据（在《美诺篇》里也有论述）。德性即知识的观点直接来源于苏格拉底的主张，这个主张在古代是众所周知的，它否定了行为者可能去做违背自己明智判断的事（即否定了意志的软弱）。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描述〔13〕，苏格拉底曾经断言“除非因为失误，否则没有人会认为他正在做的是有悖于他认为是最好的事”，简单说来就是“无人故意犯错”〔14〕。

就前面的论述来看，苏格拉底的德性理论是把德性等同于某种可以确保生活美满的品质，然后又基于上面提到的那种动机理论，将这种品质等同于行为者掌握的什么对自身最好的知识。但是，这个理论缺乏道德的内容，它没有指出或者是暗示出，对于行为者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过上一种合乎道德的正当生活。如同传统德性实践所规定的那样，过一种正义的和有节制的生活。“正义的”意味着要尊重和关心他人，“节制的”意味着要放弃自我欲望的满足。但是，如果要说苏格拉底有些独特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一直坚持道德的优先性。我们可以在《申辩篇》里看到，他说过他知道，不管怎样他都不能做错的事情，他要服从神灵的旨意去从事哲学的思考。《克力同篇》的基本论点就是一个人决不能做坏事（或者是“做违法的事情”）。这个道德原则使得他放弃了越狱的打算（49a-b）。苏格拉底认为，对于行为者来说，最好的生活就是按照道德规范去生活，这样就与上面提到的动机理论联系起来了。根据这个论点，无人故意犯错的口号就有了一种道德的向度，“没有人愿意做坏事”（或者是做不义之事）〔15〕，所有做错事的人都不是出自本意（或者说是“无意”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苏格拉底悖论”在道德论上的表述。

有道德的生活对于我们人来说就是最好的生活。这个论点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将苏格拉底道德优先的直觉认识与他的利己动机论连接起来。正是基于这一动机理论，他才把德性等同于知识。这个论点也是苏格拉底整个思想的主旨所在。它极其重要，但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苏格拉底的对话并没有提供什么论据来支持这个论点。在

《克力同篇》的47e处，正义和非正义被分别比喻为灵魂的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因此，正如肉体生病腐化让人活得没有价值一样，灵魂的腐化堕落也让人活得没有意义。但是这不能成为一个论据。我们承认健康本身就是值得期望的一种状态，疾病是令人厌恶的一种状态，但对于正义就是灵魂的健康而不义就是灵魂的疾病这样的关键论断，需要的是论证而不仅仅是提出观点而已。

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里面作了一些论证，但还不够充分。在这篇对话中，为了反驳波卢斯，苏格拉底提出，那些成功的暴君就是公认的最为不仁不义之徒，他们并没有像波卢斯断言的那样得到对他们最好的生活。相反他们永远也得不到真正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想要的就是对其最好的东西，但不义只会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之所以这么说是源于波卢斯承认，只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不义行为是可耻的行为。苏格拉底同意波卢斯的观点，并由此引申出了这样一个原则：不义的行为之所以可耻是因为它要么令人不快，要么给人带来危害。显然，不义的行为不会使人不快；因此按照上面的假定，不义的行为就必然给人带来危害。那么，不义的举动对于行为者来说便是有害而无益。这个论点有许多站不住脚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它忽视了这些道德概念的相对性。为了使人可以接受，第一个假定应该解读为“对某人来说，任何可耻的行为要么使某人感到不快，要么给某人带来伤害”。从这个假定显然不能推论说，因为不义不会让不义之人感到不快，所以它就必定会给不义之人带来伤害；它也可能是给别人带来伤害，这就是不义对不义之人来说也是可耻的理由。（我们之所以认为不义对作恶者来说也是可耻的，就是因为它会给别人带来伤害）。在后面的对话中（503e-504d），苏格拉底为了反驳卡里克勒斯而提出，既然任何一种事物的德性（比如一艘船或者一栋房子）取决于它合适的组成比例及其排列形式，那么身体和灵魂的德性也必须依赖于它们组成的恰当比例和排列顺序。对于身体来说就是健康，对于灵魂来说就是正义和自制。《克力同篇》曾经对健康和德性的并行论有过简单的说明，在这里已经上升到了一般原则，即德性取决于事物的组成形式，但是这个原则还不足以建立起健康和德性的并行论。

因为事物具有的恰当组成形式是由该事物特定功能决定的。比如说一艘船的功能就是在水上安全省力地运载乘客和货物，我们要由此种功能来判断这艘船的构造是否良好。所以为了知道怎样才能使我们心理的组成部分，如思维能力和身体欲望，达到最佳的组合状态，我们首先需要知道我们的人生目标应该是什么。有些人生目标可通过传统道德来确立最佳的组合形式，但有些人的人生目标就要求一种完全不同的组合形式。比如，传奇人物唐璜（Don Juan）或者印象派画家高更（Gauguin）可能会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表达的组合形式才是最佳的组合形式。

德性即知识的学说是理解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篇》中强调的整体德性论的关键所在。在这篇对话中，普罗泰戈拉采纳了一种非常传统的德性概念。他认为德性就是由一组彼此不同的品质组成的，就像我们的身体是由不同的感官组成的一样。人的行为要恰当，就必须协调好这些不同的品质。但一个人可能具有某些品质而同时又缺乏其他一些品质。比如，最容易看到的是，一个人可能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是在其他品质方面又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329d-e）。与此相反，苏格拉底提出，如勇敢、自制等这些具体德性指的其实都是“同一事物，只不过名称不同罢了”（329c-d）。他后来在对话中又对如何理解整体的德性进行了说明。他强调，他一直“努力地表明，所有的品质，如正义、节制、勇敢等，都是知识”。说每一种德性都是知识的意思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动机理论，知道什么对行为者自身最好就足以保证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正确行事。我们不应该把具体的德性看作是一种一般的德性知识中的不同种类。比如，把怜悯看作是宗教方面的知识，把勇敢看作是应对危险事情的知识，它们两个的性质完全不同，就像算术知识和几何知识都是数学知识，但却各不相同。因此，一个人可以只懂算术知识而不管几何知识。苏格拉底构想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综合性知识，这便是知道什么对行为者自身最好的知识，这种知识可以运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它有不同的名称。比如勇敢就是使人在险境中临危不惧的一种德性，怜悯是使人在神面前举止得当的一种德性。上述各种不同的德性说的又

都是同一个东西，那就是行为者对他或她自身福祉的领会。

有人反对说，苏格拉底的这种整体德性论与他的具体德性说是前后矛盾的，因为在《拉凯篇》和《美诺篇》里，他把具体德性看作是整体德性的组成部分。确实，在《拉凯篇》里面，苏格拉底把勇敢定义为对可怕之事的知识（194e-195a），但这种定义被否定了。因为如果这种定义说得通的话，勇敢也可以被定义成是对什么是好和什么是坏的知识。但是这样勇敢就与作为整体的德性等同起来了，而开始的假设是勇敢不是德性的全部而只是德性的一部分（198a-199e）。考虑到这篇对话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我们弄不清楚柏拉图当时在写这篇对话的时候，他自己是否认为勇敢作为整体德性的定义和勇敢作为德性一个组成部分的定义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说他已经看到了这个矛盾，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清楚应该舍弃哪种定义。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柏拉图自己并不认为它们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在他看来，读者也应该看到，用不着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定义。在柏拉图看来，只要对部分德性论稍作解释他便可以和整体德性论统一起来。简单地说，整体的德性遍布生活的全部领域，而作为具体德性的“勇敢”和“怜悯”等并不是德性的全面应用，而只是德性在一个特定领域中的应用。比如近海航行学与远洋航行学并不是两种学科，它们都属于航行学，只是应用的范围有所不同。它们是航行学的组成部分，必须同时掌握它们才能胜任航行的工作。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德性即知识的理论在其核心论点上存在着漏洞。德性始终是对行为者有利的这个核心论点竟然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并没有给予任何的证明，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个论点的前后有矛盾。当我们问“德性是关于什么的知识？”的时候，这个论点的矛盾就会呈现出来。在《美诺篇》和《普罗泰戈拉篇》里面，苏格拉底回答说，德性是关于行为者幸福的知识，按照追求幸福是人固有动机的假定，如果一个人坚持追求自己的幸福，他就必须具备有关幸福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可以保证他生活美满。然而，行为者自身的幸福与保证他最终获得幸福的知识是有区别的。“德性是有关行为者幸福的知识”就好比说“医学是有关健康的知识”。以这个类比来说，德性作

为保证人们获得幸福的知识，其价值就纯粹是工具性的，这如同医学的价值也是纯工具性的一样，它只是从保证获得幸福这一内在价值中派生出来的。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将德性视为本身就有价值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有工具性的价值，他并没有将德性比作医学，而把德性看成是健康本身。因此，德性不是为了达至我们指明的、并称之为幸福的生活状态而采用的手段；其实德性就是这种幸福的组成部分（有关苏格拉底伦理学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弄清楚，苏格拉底是否还承认有其他的组成部分）。所以说德性是值得追求的，并不是因为它是为了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即过上一种幸福生活）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恰恰相反，生活之所以值得过，那完全或者主要是因为那是一种富有德性的生活。

显然，德性理论的前后矛盾在于，苏格拉底既主张德性是有关什么是行为者幸福的知识又强调德性就是幸福本身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观点。当然，我们可以说德性是有关什么是行为者幸福的知识，而行为者的幸福就是知识。但是，假如这样的话，作为行为者幸福的知识就必须与有关什么是行为者幸福的知识区分开来。否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有了什么是幸福的知识就等于有了幸福，幸福就是对什么是幸福的认识，反过来说，这种认识（即什么是幸福的认识）就是幸福，而幸福就是关于什么是幸福的知识，如此这般推下去以至于无穷。所以，如果苏格拉底想要坚持德性即知识的论断，他就要么指明，这种知识并不是有关个人幸福的知识，要么放弃德性就是个人幸福的观点。

按照柏拉图在《欧谛德谟篇》里的描写，苏格拉底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这篇对话表现了两种哲学思想的交锋，一种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另一种以智者欧谛德谟和狄奥尼索多罗（Dionysodorus）两兄弟为代表。两个智者凭借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诡辩技巧来阐述他们的思想，这种诡辩技巧使得他们特别地“好辩论，而且还能够驳倒任何人的观点，无论这种观点是对还是错”（272a-b）。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他试图论证智慧在实现幸福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在他辩论的第一部分（278e-281e），他认为德性即知识，这个论点与《美诺篇》

（87d-89a）里面所提出的论点完全一样；只有知识或智慧（它们是可以互换的）是无条件地好，因为其他所有的好东西如物质财富或者人格魅力，只有运用得当才会给行为者带来好处，而将这些好东西运用得当又要全凭智慧的指导。就这个部分的辩论而言，苏格拉底还是在重复《美诺篇》里面的论点，但是他在第二部分的辩论（288d-292e）超越了以前的论点。他在这里指出，以前的辩论表明，那种可以为行为者带来最大幸福的技艺是能够协调和运用所有从属利益的技艺，而且还包括了所有其他技艺的成果。这种技艺显然就是一种起着指导或者支配作用的技艺，可以称之为是政治的或者君主式的技艺。但现在的问题是，君主式技艺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这种技艺不是给民众直接提供诸如财富或者自由之类的好处，因为以前的辩论已经表明，这些东西只有受智慧指导才谈得上是幸福的。这样君主式技艺的目标只能是使民众有智慧。但这是什么样的智慧呢？当然不是做鞋子或者建房子的那种智慧（这等于是技能），因为这些也必须接受某种最高技能的指导。所以君主式技艺的目标不是别的，正是使民众也具备一种君主式的技艺。但正如苏格拉底所承认的（292d-e）那样，这个认识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对什么是君主式的技艺还缺乏一个明确的概念。

苏格拉底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未解的难题。柏拉图也没有看出苏格拉底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来。这篇对话表明，柏拉图已经意识到了苏格拉底伦理学体系中两个重要原则的矛盾，即德性即知识（关于人的幸福的知识）和德性即幸福之间的矛盾。如果人的幸福可以等同于知识和德性的话，那知识的对象就不是这种知识本身。柏拉图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提出（在《理想国》里面），人的幸福是一种人格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的非理性冲动受到理智的支配，而理智又是由知识训练出来的，这种知识不是关于人的幸福的知识，而是关于善本身的知识，它是一种普遍的理性原则。柏拉图的这个思想包含以下3方面的内容：（1）人的幸福是德性；（2）德性不等同于知识，而是受到知识的指导；（3）这里所说的知识是关于普遍的善的知识。我们在《欧谛德谟篇》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苏格拉底在

《美诺篇》里面明确提出的观点逐渐发展到柏拉图自己的观点。

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里也在试图解开这个难题，因为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提出了一种幸福理论，其中心论点是：（1）德性是关于人的幸福的知识[16]；（2）人的幸福是一种最快乐的生活。这个理论的意义不在于苏格拉底自己是否接受了，或是仅仅为了普通民众和普罗泰戈拉能够接受而提出了它。它的意义在于打破了阻碍苏格拉底理论发展的僵局，虽然柏拉图自己不一定会接受这种理论。在尝试了这种坚持德性与知识的同一性而放弃德性与幸福的同一性的理论后，柏拉图选择了《欧谛德谟》的立场，即坚持德性与人的幸福的同一性，而不是与知识的同一性。

苏格拉底和智者

在柏拉图的辩护计划中，苏格拉底与智者的交锋显得尤为重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苏格拉底与智者在当时被视为是一路货色，所以柏拉图的辩护就是要表明，苏格拉底和智者的行为有着天壤之别。柏拉图把苏格拉底描写成哲学家的典范，因此，从抽象地意义上看，苏格拉底与智者的交锋代表了一种真哲学与假哲学之间的交锋。

柏拉图在其篇幅最长、最富戏剧性的《高尔吉亚篇》、《普罗泰戈拉篇》和《欧谛德谟篇》等3篇对话中描述了苏格拉底与智者及其弟子的思想交锋。我将连同《理想国》第一卷的内容对上述3篇对话一起进行考察。从作品本身看，《理想国》第一卷或许曾经是一篇单独的对话；即便不是这样，它也可以使我们看到柏拉图早期对话作品中那种质疑和反诘的辩论风格，其实《高尔吉亚篇》里的卡里克勒斯和《理想国》里的色拉西马科斯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除了这些主要的戏剧性对话作品之外，苏格拉底在两部“希比阿篇”的对话中也与智者展开了一对一的辩论。

智者在古希腊语中叫作“*sophistes*”（源自形容词*sophos*，是“有智慧”和“有学问”的意思），原来是指“专家”或者“圣贤”。著名的希

腊“七贤”[17] 也被称为“七智者”。在公元前5世纪，智者是指那些像在苏格拉底对话中的普罗泰戈拉和希比阿那样四处讲学的知识分子。我们在前面看到，智者在某些地方被看作是危险的破坏分子，他们通过自然科学和诡辩技巧来颠覆传统的宗教和道德。与其他人不同，柏拉图对智者的描写更加细致精确。在智者的思想中确实有颠覆传统的内容，如卡里克勒斯和色拉西马科斯就猛烈地攻击传统道德。在诡辩中，欧谛德谟和狄奥尼索多罗厚颜无耻地蓄意哄骗对手。但是，柏拉图并没有把智者这个阶层描写成为道德的颠覆者或是假冒的辩论者，更不用说把这两个恶名都加在智者头上。《普罗泰戈拉篇》中的智者向人们传授生活的技艺，但这种生活技艺并不否定传统的社会道德，反而是在延续传统社会的道德，因为他是在为传统的教育内容拾遗补缺。他通过一个故事说明，社会道德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就必须要与社会合作，必须要一种道德。他以此来为传统道德辩护，并说明基本社会道德的重要性，特别是正义和自制的重要性。他对自己观点的论证是比较合理的，在某些地方还很有说服力。有趣的是，柏拉图根本没有提到智者以弱胜强的诡辩术，以及他们关于神灵的存在论和本质的不可知论。智者普罗狄库斯也出现在《普罗泰戈拉篇》里面，他在柏拉图的其他对话中也经常被提到。据说，他对宗教的起源做出了自然主义的解释，所以被某些古代学者视为无神论者。柏拉图在这个对话中没有提到这些，只是取笑了他咬文嚼字的怪癖。在《普罗泰戈拉篇》和《大（小）希比阿篇》的对话中，希比阿被描写成为一个博学者，他的兴趣广泛，科学、天文学、历史学、文学批评和记忆术无所不包。在《大希比阿篇》中，他并没有表现出有什么辩才，柏拉图也没有提到他有什么激进的观点。高尔吉亚一出场就提出，作为他专长的修辞术（也译为雄辩术）是一门无涉价值观的学科（455a），但是在苏格拉底的诱导下，他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必须知道什么是正义和不义。如果他的学生们还不知道这一点，他可以再教他们（460a）。当然，他在对话中并没有对正义和非正义作出实质性的说明；而且这个对话也没有提到，卡里克勒斯是从高尔吉亚那儿学到非道德主义的。

如果说高尔吉亚对卡里克勒斯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他在表达自己那些惊世骇俗的观点时所充分体现出来的雄辩力量，这可能更符合高尔吉亚的实际情况。在柏拉图看来，这种影响和强行灌输一样危险。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就像他对智者学说的描述一样，柏拉图对智者品性的描写也很细致。至少他没有总怀着敌意来刻画智者的形象。色拉西马科斯确实令人生厌：高傲、粗鲁、放肆（他甚至告诉苏格拉底，他让照料他生活的人为他擦鼻涕）（343a）。希比阿是一个博学又自负的笨蛋，但柏拉图对其他智者的描写要更加温和一些。比如，《欧谛德谟篇》中的那两兄弟的骗术如此明显，一眼就能被人识破，以至于他俩儿看上去都有点讨人喜欢了。而普洛狄库斯则是个有点滑稽的人物。普罗泰戈拉是一个受到更多关注的人物，他确实有些自命不凡和骄傲自满，当他被苏格拉底问住的时候，他会变得非常恼怒，但很快就会平静下来，爽快地承认自己的无知，即使是有那么一点屈尊俯就的样子，他还是对苏格拉底表示了自己的敬意。更重要的是，柏拉图把他看作是一个必须从思想上认真对待的人物。他为捍卫社会道德和他的教育者身份所作的发言，都是柏拉图的严肃之作。在同苏格拉底辩论的时候，他始终能坚持己见。当我们再看看《泰阿泰德篇》里面对他学说的长篇批判（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其他智者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柏拉图确实很重视他。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智者非正统的宗教观并不感兴趣（后来在《法律篇》第十卷里面，柏拉图提出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无神论会导致不道德的行为，他建议用国家的手段来禁止无神论的传播——包括动用死刑来惩处那些信奉无神论的人——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不会持这种态度的）。他面临的严峻挑战来自智者色拉西马科斯和高尔吉亚的伙伴卡里克勒斯所代表的智者派的道德思维方式。卡里克勒斯比较明确而色拉西马科斯比较含蓄地表达了他们的一种思想，其基本内容就是将自然的东西和习俗的东西区别开来。他们断定，人性都是自私的，同其他动物一样，人也有寻求最大自我满足的自然冲动。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就是能够无限制地满足自己的自然冲动。在他们的眼里，法律和道德都是为了限制人们的自

然冲动而采取的一些社会措施，其目的是为了增进一些人的幸福，其作用就是强迫人们牺牲自己的幸福来保证其他一些人的幸福。但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将他们自己的幸福置于他人的幸福之上，所以每个人理性的选择就是使自己摆脱法律和道德的束缚。（卡里克勒斯还进一步强调，这不仅仅是理性的行为，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正确或正义的行为，因为只要个人有力量使他人为自己服务，他就有权利这么做，法律或道德的错误就在于试图阻止人们这么做。）

前一章勾勒的苏格拉底的道德理论是对智者挑战的一种回应，尽管这种回应还缺少应有的说服力，因为苏格拉底还没有将道德和行为者的幸福有效地联系起来。但是除了这种彻底挑战传统道德的观点之外，智者派的思想里面也有维护传统道德的声音，从而能够回应他们自己提出的这一挑战。如普罗泰戈拉在对话中（见《普罗泰戈拉篇》）就提出了道德的社会起源论。这种理论反对那种把自然和习俗截然对立起来的主张。相反，它强调以社会道德形式出现的习俗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因为这些行为准则是自然而然地产生，是人类为了生存去适应外界环境的结果（社会就是由此而形成的）。其实习俗并没有妨碍人性的发展，相反，只有通过习俗的作用，人性才能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得以延续和发展。

因为普罗泰戈拉赞成传统道德，尤其是正义和自制的道德，这样他就加入到了反对卡里克勒斯和色拉西马科斯的阵营中。尽管这样，苏格拉底还是找出了他理论上的漏洞。虽然苏格拉底没有明确说出来，但还是暗示了，普罗泰戈拉把正义和自制仅仅看作是有工具性的价值而不是有内在的价值；在他看来，正义和自制的价值仅仅在于它们是为公共生活谋福利的必要前提，并不是要求人们时时处处都遵守这些道德规范，只要人们大体上能遵守就行了。因此在特定的情况下，只要既不危及社会秩序又不用受罚，那偶尔做点坏事也未尝不可。（这是一个“搭便车”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理想国》第二卷里面有过相关的讨论。在《普罗泰戈拉篇》里面，苏格拉底批评普罗泰戈拉把具体德性与整体德性割裂开来（见前面的相关论述），其实是没有抓住德性的实质，所以他称自己是德性问题的专家（换言之，他

可以教授政治的技艺，319a）是骗人的。像希波克拉底等人都去请教他德性方面的知识，这不仅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和金钱，而且还可能会得到错误的德性观和人生价值观（312b-314b）。

智者是一些危险人物，但不是像大众讽刺挖苦的那样。他们是一种威胁，但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宣扬无神论或不道德的行为（即使有些智者确实在传播无神论或是反道德的观点），而是因为他们把自己装扮成是专家，能够回答“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的知识。这是一个在苏格拉底与智者交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普罗泰戈拉声称，他可以教会人们如何去获得德性，但事实证明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德性。欧谛德谟和狄奥尼索多罗也断言可以教授德性（275a），但实际上他们教授的只是修辞技巧。（按照柏拉图的描写，普罗泰戈拉对他自己的主张坚信不疑，但对话中的兄弟二人就很难说了。智者是否相信他所说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主张没有什么事实根据）。希比阿自称他什么都懂，包括作为德性组成部分的美和高尚的本质，但事实证明，他和其他的智者一样，都只是徒有其名罢了。相反，苏格拉底一般不自称是专家。他所要表达的是对哲学任务的真正把握，是寻求真正的生活技艺；要获得这种技艺就要真正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正确的人生目标。

在《高尔吉亚篇》里面，通过与修辞术进行对比，苏格拉底强调了自己的这种哲学主张。生活的技艺旨在寻求德性，需要知道德性是什么，而修辞术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这些人并不知道欲望满足的结果是好是坏。因此生活技艺的真正专家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这篇对话中出人意料地声称，他拥有生活技艺的专业知识。如果人们的生活没有哲学的指导，而只受修辞术左右，那么结果就是用对快乐的追求代替对德性的追求，接着就可能出现卡里克勒斯那样的道德混乱。在卡里克勒斯看来，德性就是毫无顾忌地追欢逐乐。同其他智者不同，高尔吉亚似乎没有断言他能够传授德性。这样苏格拉底在这篇对话中批评的不是智者对专业知识的占有，而是一种错误的做法。这种做法主张通过说服技巧而不是通过哲学探究来

确立基本的价值观（在柏拉图看来，最典型的就是雅典的民主政治）。

注释

〔1〕 见《申辩篇》21b。

〔2〕 见《普罗泰戈拉篇》319a和《申辩篇》19d-20c。

〔3〕 见《普罗泰戈拉篇》319d-320b和《美诺篇》89c-94e。

〔4〕 见《申辩篇》20c。

〔5〕 见《游叙弗伦篇》52a-b，他说他应该向游叙弗伦学习怎样反驳麦勒图斯对他的指控。

〔6〕 rhetoric，也可称为修辞术或雄辩术。——译者

〔7〕 见《奥德赛》。

〔8〕 见《美诺篇》100a。

〔9〕 见《美诺篇》和《普罗泰戈拉篇》。

〔10〕 见《美诺篇》。

〔11〕 见《美诺篇》72a-c。

〔12〕 见《美诺篇》77c, 78b。

〔13〕 见《尼各马可伦理学》1145b, 26-7。

〔14〕 见《普罗泰戈拉篇》345e。

〔15〕 见《高尔吉亚篇》509e。

〔16〕 也见《美诺篇》。

〔17〕 根据不同记载，被称为希腊“七贤”的共有22人之多，但提到比较多的是泰勒斯（Thales）、梭伦（Solon）、比亚斯（Bias）、庇塔库斯（Pittacus）和基伦（Chilon）等人。——译注

第五章

苏格拉底对后世哲学的影响

古代哲学

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苏格拉底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就是他对柏拉图的影响。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苏格拉底死后，他的许多亲朋好友都曾撰文著书纪念他，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受到苏格拉底的影响，而柏拉图只是其中之一。在这个部分，我将简要地追述一下，后代人是如何通过与柏拉图的私交或是柏拉图本人和他人的著作而受到苏格拉底的影响。

我们首先从与苏格拉底有过个人接触的两个人说起，他们是安提西尼和亚里斯提卜。据说，安提西尼原是高尔吉亚的学生，他后来转而拥戴苏格拉底。他看起来像是一个传统的智者，写过大量不同主题的作品，其中许多主题与只关注伦理学的苏格拉底的兴趣相距甚远。他感兴趣的是语言的本质以及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他尤其否认矛盾存在的可能性，这就很像反对苏格拉底的两位智者，普罗狄库斯和普罗泰戈拉的观点。据说这两位智者也否认矛盾存在的可能。安提西尼似乎是一个在思想上兼收并蓄的人物，苏格拉底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坚持苏格拉底的一些伦理主张，并且将其运用到他的苦行生活之中。安提西尼认为德性不仅可传授，而且还能够给人以幸福。除此之外，他还补充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我们需要的正是苏格拉底的力量”[1]。苏格拉底否认可能存在那种违背自己理智判断的行为。人仅仅拥有德性知识还不足以保证他去追求德性，他还必须获得足够的力量来遵守他或她的理智判断，这就是意味着，光有理智判断还不够，还需要克服欲望带来的干扰。（柏拉图在《理想国》429c也做了类似的修改，他将勇敢定义为“能够在各种快乐、欲望、恐惧的影响下，坚持由法律和教育所灌输的信念，能够分清什么是最坏的和什么是最好的”。）苏格拉底的力量要由一种苦行的生活方式来发扬，这种生活方式要求回避所有的快乐，当然除了那些对苦行生活有益的快乐。显然，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也同他的学说一样，对安提西尼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后来，极端的苦行生活就成为了犬儒学派的标志，这个学派拒绝接受通常的社会生活习惯，以此来表达他们的核心信条，即善的生活就是顺应自然的生活。据说安提西尼后来成为了犬儒学派的创始人。没有证据表明苏格拉底在思想或组织形式方面影响了安提西尼，但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却为后人所继承。正如第欧根尼·拉尔修明确记述的那样（6.2）：安提西尼“继承他的（即苏格拉底）忍耐力，学习他不受情绪影响，由此成了犬儒主义的创始人”[2]。

图8　拉斐尔壁画《雅典学院》（创作于1508至1511年）的局部。该壁画描绘了古希腊那些最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站在中间。苏格拉底站在他们的左边，正在向一群旁观者发表演说。

亚里斯提卜的家乡在北非的昔兰尼加，他因为仰慕苏格拉底而来到雅典。他也写过题材众多的作品，其中有伦理学、语言理论和历史。据说，他是苏格拉底弟子中第一个学智者向学生收学费的人。他被看作是昔兰尼学派的创始人，这个学派在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比较有影响。但由于我们无法确定这个学派创立的年代，所以我们没有可

靠的证据来确定这个学派的哪些学说是由亚里斯提卜本人提出来的。在伦理思想方面，该学派主张，当下的感官快乐才是至善；在认识论方面主张，我们只能认识当下的感官印象。这后一种主张明显带有怀疑论倾向。正是这一倾向使昔兰尼学派在伦理学和认识论方面的主张统一起来。根据怀疑论的观点，过去和将来都是无法理解的，因此只有面对当下的经验才是理性的选择；所有生物都趋乐避苦，所以及时行乐才是合理的主张。在古希腊哲学家中间，唯有这个学派从这种怀疑论的角度否认幸福是至善；因为要得到幸福就要把生活看成是一个整体，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当下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所以，聪明人的生活目标就不是什么幸福而是及时行乐。

从这些思想中间，我们看不到什么苏格拉底的影响。这个及时行乐才是至善的主张，更接近卡里克勒斯的观点，而不是苏格拉底的观点。虽然后来有一些怀疑论者宣称苏格拉底是他们的鼻祖，但这并不是因为苏格拉底说过，唯有当下的感官印象才是可以认识的。这个观点其实是由普罗泰戈拉提出的，在《泰阿泰德篇》里面曾遭到过苏格拉底的批评。另一方面，从欧西比乌斯（Eusebius）记录的一些亚里斯提卜的观点来看，亚里斯提卜的有些思想还是比较接近苏格拉底的。比如说，他认为快乐是值得追求的，但不是无条件的，也不能没有节制。这种节制来自教育，来自自我认识，来自学习，来自一种忍耐力（忍耐力是安提西尼苦行主义道德的一个关键词。）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学派在亚里斯提卜死后，在一个怀疑主义盛行的时代发展了他的观点，提出了及时行乐是至善的主张。

绝大多数的古代文献都表明，亚里斯提卜喜欢奢华的生活，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里面就有相关的记载。色诺芬写道，苏格拉底曾用普罗狄库斯关于“赫拉克勒斯的选择”这一寓言[3]来告诫亚里斯提卜（2.1）。这个寓言的寓意完全是安提西尼式的观点，即认为简单和辛劳的生活从长远来看比奢华的生活更能够带来快乐。这个观点强调的是长远的考虑，亚里斯提卜似乎没有在理论上拒绝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安提西尼和亚里斯提卜之间的差别不是体现在思想上的截然对立，而是表现为一种性情上的大相径庭。安提西尼受到

苏格拉底苦行生活方式的影响，他将这种苦行生活方式上升到道德理想的高度，而亚里斯提卜则认为，苏格拉底提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节制的思想与一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是相通的。亚里斯提卜对苏格拉底的理解让我们想到了苏格拉底确有不那么刻板的一面。例如，他特别喜欢美食和豪饮[4]，以及他出了名的好色。有些人认为，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篇》里面表现出来的享乐主义倾向代表了他真实的观点。上面提到的古代文献就有记载说，苏格拉底也主张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及时行乐。最引人注目的是苏格拉底的形象如此复杂多变，以至于像安提西尼和亚里斯提卜代表的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在某种程度被看作是苏格拉底式的（奥古斯丁[5]在《上帝之城》中对此有过评论，见8.3节）。

由于安提西尼的关系，苏格拉底与犬儒学派有了一定的联系，以后又被认为是斯多葛学派[6]的思想前辈，因为斯多葛学派自认为是犬儒学派和苏格拉底思想的继承人。按照希腊历史学家的描述（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作品中是依照生活年代的顺序进行记录的），这两个学派领袖的传承关系是这样的：经过斯洛普的第欧根尼[7]和来自底比斯的克拉特斯[8]的发扬光大，犬儒学派领袖的位置由安提西尼传到了来自西提乌姆的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Zeno）手中。据说芝诺在去拜访雅典的途中，读了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之后便决定投身哲学。他四处打听在哪里能够找到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最后有人建议他去认识克拉特斯。作为犬儒学派的后继者，斯多葛学派继承了顺其自然的生活就是人类最大幸福这一主要观点。然而，斯多葛学派是借助苏格拉底而不是犬儒学派来阐述其自然主义幸福观的。对于斯多葛学派来说，顺其自然的生活适合于所有生物，因为这种生活遵循了整个自然界的完美秩序。人是理性的动物，对于人来说，顺其自然的生活也是符合理性要求的生活。在人的灵魂中，并不存在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划分，也不存在道德和理性的划分。事实上，斯多葛学派完全接受了苏格拉底伦理学的基本主张，他们也同样认为德性即知识，德性是实现幸福的充分条件。在《美诺篇》和《欧谛德谟篇》里面，苏格拉底提出德性（等于知识）是唯一的无条件的善，这

个主张被斯多葛学派解释成德性是唯一的善，其他所有的东西，不管好或是坏，都是无关紧要的。阿里斯托（Aristo）是芝诺的一个追随者，他坚持苏格拉底的德性统一论思想，并解释说，不同的德性有不同的名称是为了描述有关善恶的不同知识，不同德性的划分只是为了应对不同的现实情况。

我们看到，斯多葛学派所坚持的德性即（善的）知识和德性是唯一善的两个主张都曾使苏格拉底在伦理学上走进了死胡同。批评者们毫不迟疑地断言，斯多葛学派也走进了同样的死胡同：普卢塔克[9]断言，当被问到什么是善的时候，斯多葛派肯定回答“善就是智慧”，当被问到什么是智慧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回答“智慧就是善”。他们的回答直接引证了《欧谛德谟篇》中的相关段落（292e）。苏格拉底在理论上陷入困境，最先就是在这些段落里反映出来的。但是斯多葛学派找到了走出这个困境的办法，这就是他们有关人的德性与自然的完美秩序相一致的学说。人类的德性确实是有关德性的知识，但这种知识并不仅仅是有关人类德性的知识，即不是有关人类德性本身的知识。它是有关宇宙德性的知识，可以使心灵完全听从理性的召唤，从而达到与宇宙理性合一的境界。但是看起来，斯多葛学派似乎并没有彻底摆脱这个困境，因为理性的行为就是作出正确的选择，就是去选择好的东西而放弃坏的东西，如果不存在好与坏的区别而只有德性和背德的区别，那么我们最终还是无法认识清楚什么是德性。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斯多葛学派，于是这个学派中的有些成员就试图找到一种解决办法，即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中间把健康这种“可取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和疾病这种“不可取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区别开来。无论是哪一种无关紧要的事情都不比另一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更好或是更坏，然而自然会促使我们去寻求可取的事情和避开不可取的事情，德性就在于遵循这些自然的推动力而去作出正确的选择。批评家们，如普卢塔克[10]，就认为斯多葛学派玩的这个花招，其实是想鱼与熊掌都可兼得，因为他们不得不承认对于无关紧要事情的选择既是一件最值得关心的事情，同时又是一件最不值得关心的事情。斯多葛学派的矛盾引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这里无法再继续讨论了。

斯多葛学派认为，德性从属于宇宙的理性秩序，他们有这个思想就很难再声称自己师从于苏格拉底了。因为这个思想强调有关自然的知识优先于有关伦理的知识，但谁都知道，苏格拉底对自然哲学不感兴趣，他只对伦理学有兴趣〔11〕。可是他们能够从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找到证据来说明，苏格拉底正是从思考自然的普遍问题中得出他的道德思想的。在这本书的1.4节，苏格拉底试图劝说无神论者阿里斯托德莫改变他的思想，提出从人体的精巧构造就可以证明神的存在以及神对人类的关照。在这个讨论中，苏格拉底提出人的智慧只是遍布世界的许多智慧中的一种，如同组成人体的自然成分只是整个自然组成成分中的一部分；接着他又说宇宙的智慧将一切都安排得合情合理、无可挑剔，神可以看到一切，听到一切，他无处不在，关照着一切的存在。苏格拉底的这个观点似乎预示了斯多葛学派后来的宇宙观，这就是把宇宙看成是一个有神意的、有灵性的和有序的存在。西塞罗〔12〕和塞克斯都〔13〕都明确提到了色诺芬的这段记述，并将其作为斯多葛学派宇宙理性观的一个思想来源。（还有一个同样的论点出现在《回忆苏格拉底》4.3节处，苏格拉底特别提到人类具有的理性和语言就证明了神对人类的关照。）《回忆苏格拉底》中的另一段记述（4.4）明显地预示了斯多葛学派后来的理论主张，因为在这段记述中，苏格拉底和希比阿都认为确实存在着一些普遍的和不成文的道德法则，例如一个人应该崇拜神，应该尊敬父母，这些道德法则并不像某些社会的法律那样，只是人类习惯的产物，而是由神为人类所制定的，一旦违反就要受到惩罚。西塞罗的《论共和国》（3.33）有类似的主张，并有详细的论述（西塞罗的论述与斯多葛派观点如此类似以至于人们怀疑西赛罗是不是在照搬他人思想）。

公元前1世纪伊壁鸠鲁学说的信奉者菲罗德穆（Philodemus）认为，斯多葛学派很希望被别人称为是苏格拉底的信徒，苏格拉底在这个学派的历史上一直是被当作一个圣贤的典范。他坦然赴死的态度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在面对死亡时应该持有的态度。斯多葛派的自杀者，如有名的塞涅卡〔14〕，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坦然赴死的。根据公元1世纪到2世纪的作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观点，苏格拉底是

最杰出的圣贤，他将苏格拉底的影响概括为，“虽然他已去世，但他在世时的言行同样会使世人受益，甚至带给人们更多的教诲”。[15]

古代的哲学怀疑主义有两个主要的思想传统，这就是皮浪派的怀疑主义和学园派的怀疑主义。皮浪学派的开山始祖要追溯到公元4世纪来自埃利斯的皮浪（Pyrrho of Elis），他像苏格拉底一样，没有写下任何东西，也是一个神秘人物。没有确定的证据表明，这个学派的信徒把苏格拉底也看作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著作是我们了解皮浪学派怀疑主义的主要原始资料。在他的作品中，苏格拉底一直被列入到教条主义者的名单中。教条主义者就是那些坚持某些绝对的信条，反对怀疑主义者对于所有问题不作判断的立场。他仅仅有一次提到[16]苏格拉底没有作任何判断。这就是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230a）以讽刺的口吻说到，他非但没有一种自我认识，就连自己到底是人还是群氓都完全弄不清楚。对于学园派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学园派是柏拉图自己创立的学派，在阿尔凯西劳（Arcesilaus）的领导下，该学派在其创立1个世纪之后就信奉了怀疑主义，并作为一个怀疑主义学派延续了两百多年。直到在阿斯卡隆的安条克（Antiochus of Ascalon）的领导下，该学派才改信教条主义。阿尔凯西劳声称，他信奉怀疑主义，但仍然忠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精神，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位先辈的哲学实践本就是怀疑主义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

西塞罗的作品也是我们主要的资料来源。他在其著作中指出，阿尔凯西劳把苏格拉底的辩论活动看作是仅仅为了批驳他人、攻击他人的活动；苏格拉底并没有自己的信条，他只是去质问和反驳别人的思想。在对话中，我们确实发现，苏格拉底在许多地方通过揭示对话者思想的前后矛盾而使他们陷入困境。阿尔凯西劳解释说，这个结果正好说明了苏格拉底持有怀疑主义的基本立场，即他认为感觉或思想都不能把握住任何确定的东西[17]。阿尔凯西劳认为苏格拉底的论点存在着悖论，因为苏格拉底说，他除了知道自己无知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18]。他批评苏格拉底不应该断言，自己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我们前面的论述已清楚地表明，阿尔凯西劳的阐释确实抓住了苏

格拉底对话活动中的一些要点，只是这种阐释过于片面。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无知，否认拥有智慧或专业知识，但他同时也声称：他从普通人的角度可以知道一些事情；有些人从专家角度也可以知道一些事情，这与他承认自己无知其实并不矛盾。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一无所知的，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他质问他人，但通常都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出一个普遍性的论点说，感觉或思想都不能把握住任何确定的东西。相反，苏格拉底认为知识与德性是同一的。质问的否定性结果可以刺激人们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当然，知识探索中的这种怀疑态度与怀疑主义是可以完全相容的。一个怀疑论者当然是一个探求者，在其不懈的知识探求中，他的怀疑论态度会使他不断地推翻自己的结论。但是，尽管怀疑论者强调要不断地去探求知识，但他们最终对人类的认识能力还是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按照阿尔凯西劳的说法，“用思想或是感觉都不能抓住任何确定的东西”。怀疑主义者之所以有这种观点，并不仅仅因为，到目前为止，任何对知识的探求都没有得到确定的结果，还因为怀疑论者事先就相信，任何时候都会是这样的结果，而且还运用那些矛盾的事例或论据来证明他们的主张。但在柏拉图的描述中，苏格拉底身上就没有一点悲观主义的色彩。

当然后来的哲学家并不都认同苏格拉底的观点。一些亚里士多德的后继者就对苏格拉底持反对态度，特别出名的是阿里斯托依努斯，他就是说苏格拉底犯有重婚罪的始作俑者。这个说法当然遭到了斯多葛学派成员帕奈提乌（Panaetius）的反驳。对苏格拉底的攻击最不遗余力的要算是伊壁鸠鲁派的人。对于那些不属于自己学派的哲学家们恶言谩骂，是伊壁鸠鲁学派的一贯传统，对苏格拉底也不例外。连续几代伊壁鸠鲁派信徒都对苏格拉底出言不逊。他们中间最有代表性的是普卢塔克引证过的克罗特斯（Colotes）的评论。这位伊壁鸠鲁主义者把卡厄里芬去求神谕的故事看作是一个“智者派蹩脚的谎言”〔19〕，他认为苏格拉底的辩论完全就是自吹自擂或者就是江湖骗术，因为他的言行从来都不一致〔20〕。伊壁鸠鲁学派将斯多葛学派和怀疑主义的学园派看作是职业上的竞争对手，他们之所以对苏格拉底怀有敌意似

乎有部分原因在于这两个学派都很看重他。

其实不只是异教哲学家喜欢把苏格拉底看作是他们的思想先驱。公元2世纪基督教教义辩护文作者查斯丁[21]也以苏格拉底为例，来反驳有些人提出的基督徒有无神论思想的指控。他指出，像基督徒一样，苏格拉底也被指控有无神论倾向，因为苏格拉底拒绝承认奥林匹亚众神祇的神话而竭力主张崇拜一个唯一的真神。其实，苏格拉底已经对基督的启示有了一定的领会，因为尽管哲学家们掌握的真理有限，他们的思想有许多谬误矛盾之处，但“他们思想中的合理之处都属我们基督教徒所有”。

中世纪和近代哲学

尽管查斯丁如此明确地将苏格拉底基督教化，但他并不是将苏格拉底基督教化这一传统的始作俑者。虽然奥古斯丁受柏拉图的影响很大，他甚至认为柏拉图可能知道《旧约》，但他并不像查斯丁那样断定苏格拉底是赞同基督教的。有些基督教作家称赞苏格拉底是一个虔诚之人却受到不公正的死刑判决，而绝大多数的基督教作家提到苏格拉底时，却会指责他的“偶像崇拜”，并且举出他所讲的神示（按照德尔图良[22]等人的解释，这种神示是由一个精灵来传递的），以及他向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献祭和他“对狗发誓”的那些誓言等。柏拉图哲学传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早期，这一时期的人们主要关注柏拉图的晚期作品，特别是他的《蒂迈欧篇》。在这些晚期对话作品中，苏格拉底性格已无关紧要。从12世纪开始，柏拉图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日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亚里士多德。中世纪主要的哲学家对苏格拉底都没有什么兴趣，一直到15世纪后期，随着柏拉图主义的复兴，人们才重新对苏格拉底产生了兴趣。作为新柏拉图主义者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柏拉图主义被解释成一种用寓言来表达的基督教真理。我们看到佛罗伦萨人马尔西利奥·菲奇洛（Marsilio Ficino）对苏格拉底和耶稣所遭受的审判和死刑作了一个详细比较，发现两者有许

多相似之处。这一比较传统为伊拉斯谟（Erasmus，在他所写的人物对话中就有“圣哲苏格拉底，请为我们祈祷吧”这样的表白）所延续，他将接受死刑于监狱中的苏格拉底比作蒙难于格斯马尼花园的耶稣。（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比较始终没有中断，如18世纪的狄德罗［Diderot］和卢梭[Rousseau，当然还有其他人]以及19世纪的许多作家，他们所作的比较显然是为了配合他们自己特有的宗教信仰。）如同在古代世界一样，在近现代，苏格拉底的形象也被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所利用。在16世纪的法国人蒙田（Montaigne）看来，苏格拉底不是一个耶稣式的人物，而是一个遵循自然德性和智慧的典范；对于古代人描述的苏格拉底的超自然力量，特别是他所说的神示，其实都可以用自然主义的术语来加以解释；神示或许就是一种直觉的、非理性的判断力，而这种判断力得自于他固有的智慧和德性。在17和18世纪，理性主义的宗教观发展起来，它拒绝神示的内容，反对因其解释的争议而引发的宗教狂热，因而那时的人把苏格拉底看作是死在宗教狂热者手中的理性宗教的殉难者。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伏尔泰（Voltaire）创作了一部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戏剧，自然神论者〔23〕（或称理神论者）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为一个“苏格拉底兄弟会”制定了一套敬神的礼拜仪式，其中包括一篇祈祷文，他也采用伊拉斯谟的做法来祈求苏格拉底的保佑。

图9　圣奥尔本斯的修士马修·帕里斯（卒于1259年）为一本名为《先师苏格拉底的预言》的算命书所画的扉页插图。两眼圆睁的“柏拉图”在口述他的思想，而“苏格拉底”在记录这些思想，这显然是把他们的名字弄颠倒了。这幅插图被印在德里达的著作《名信片》上。

如同在古代世界一样，近现代也有反对苏格拉底的声音。有些作者批评苏格拉底的道德品行，说他有同性恋倾向，置自己的妻儿于不顾。包括伏尔泰在内的一些批评家都认为，苏格拉底的神示就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迷信行为。18世纪还出现了一批著作，自近代以来，第一次重申了古代的一个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苏格拉底受到指控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之所以被判死刑是因为他反对雅典的民主政体以及他与克里底亚和阿尔西比亚德斯之间的朋友关系。（这种解释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例如斯东［I. F. Stone］那本很受欢迎的《苏格拉底的审判》就是这样解释的。）有些正统的基督教作家拒绝承认苏格拉底和耶稣之间的相似性，除了已经提到的指责苏格拉底迷信和不道德之外，他们还宣称，苏格拉底其实是因自杀而身亡的。

苏格拉底在异族文化中充满矛盾的遭遇也体现在了中世纪阿拉伯的文献中。除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外，苏格拉底是阿拉伯学者提得最多的哲学家，不仅仅是阿拉伯的哲学家对苏格拉底感兴趣，就是阿拉伯的诗人、神学家、神秘主义者以及其他学者对苏格拉底也很感兴趣。当然阿拉伯学者的这种兴趣并不是建立在对于古希腊相关文献的广泛了解的基础上。尽管他们都非常熟悉有关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那些对话作品，特别是柏拉图的《斐多篇》和《克力同篇》，但是对柏拉图其他的对话作品却不甚了解，对其他相关的苏格拉底文献就更是闻所未闻。然而阿拉伯学者普遍对记录有苏格拉底言论的那些轶事录感兴趣，就像第欧根尼·拉尔修和其他传记和说教作家所记录下来的那些有关苏格拉底的趣闻轶事。这种记录往往将苏格拉底描述成一个圣人，“七根智慧的栋梁”之一（即“七贤”之一），他是道德的楷模，美德的化身，智慧的源泉，通晓人世、时间和上帝。他一直被看作是维护一神教神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英雄，他之所以被判处死刑，正是因为他反对偶像崇拜，坚信唯一真神。这样他就被当作是伊斯兰教圣贤的先行者（正如在西方世界他被看作是第一个基督徒一样），他被描写成一个在伊斯兰教国家能像亚伯拉罕（Abraham）、耶稣，甚至穆罕默德（the Prophet）那样受到尊敬的人物。有些作品将他描写成一个苦行者，有时甚至说那个住在木桶里，让亚历山大大帝走开不要

挡着他晒太阳的人就是苏格拉底。这明显将他与犬儒学派的信徒弄混淆了，尤其是第欧根尼。另外一些作品将他视为炼金术之父，或是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的开创者。然而，如同在西方世界一样，有些正统的宗教信仰者出于宗教的理由对苏格拉底受到的这种普遍赞誉提出了质疑（例如生活在11和12世纪的伊斯兰教神学家加扎利［al-Ghazali］），他们认为苏格拉底是各种异端学说的始作俑者，是伊斯兰教的一大威胁，有人甚至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利用苏格拉底来迎合自己的先入之见，这一传统源远流长，经久不断。黑格尔（Hegel）、克尔凯戈尔（Kierkegaard）和尼采（Nietzsche）3位19世纪重要的哲学家，也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先入之见来理解苏格拉底的。在首次发表于1805至1806年间的《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认为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是因两种合理的道德观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一种悲剧性的结果，是世界精神辩证地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必要阶段。在苏格拉底出现以前，雅典人都是自发地、不加思考地服从客观道德的要求。通过批判地考察人们的道德观念，苏格拉底将道德变成了某种个人的和值得反思的东西。这种新道德观要求每个人对其道德原则进行批判性的审视。然而由于苏格拉底未能对德性作出任何肯定的论述，使得这种批判性审视的后果仅仅破坏了客观道德的权威性。苏格拉底的批判性审视表明，客观道德所宣称的普遍道德法则往往会遇到特殊的情形，由于缺乏相应的标准，使得个人在一些特定情形下无法判断对错，而只好诉诸于自己的良知或内心启示。苏格拉底的内心启示就是他所谓的“神示”。

苏格拉底诉诸于他的内心启示，他事实上是在诉诸于一个高于集体道德感的权威，人们是不会接受他的诉求的：

> 雅典人民的精神本身、它的法则、它的整个生活，是建立在伦理上面，建立在宗教上面，建立在一种自在自为的、固定的、坚固的东西上面。苏格拉底现在把真理放在内在意识的决定里面；因此他与雅典人民所认为的公正和真理发生对立。因此他是有理由被控告的。〔24〕

这样，个人的良知与雅典国家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因为两者

都强调自己才是最高的道德权威。同时两者的冲突又是悲剧性的，因为两者都自有其道理：

> 真正的悲剧是两种公正的道德力量之间所发生的必然冲突；这就是苏格拉底个人遭遇到的命运。一种力量是自然道德的神圣公正性，其法律就是那种体现为本质的自由和崇高的意志；我们可以称它是一种抽象的客观的自由。相反，另一种力量是意识的或者主观自由的神圣公正性：这是由善恶知识之树，也就是自行建立的理性结出的果实；它是所有相连时代的普遍原则。正是这两种力量在苏格拉底的生活和哲学中产生了冲突。〔25〕

这种情况之所以是悲剧性的是因为，雅典人民的集体道德和个人良知都对苏格拉底提出了合理、强制、但却是相互冲突的要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等待人类发展到两者的要求趋于一致的这样一个阶段。像苏格拉底这样不遵守集体道德规范的人必将遭受挫折，但是这种挫折将导致“虚假个体性”所代表的世界精神的干预性活动的胜利：

> 个体性的虚假形式被剥去了，而且用的是强制的方式，是用刑罚来进行的。这个原则以后上升到了它的世界精神的形式。这个原则的真正方式是一种普遍的方式，正如它以后所采取的那样；其中的错误之处在于这个原则仅仅作为一个个人的所有物而出现。〔26〕

显然苏格拉底的审判起因于集体的合法要求（客观道德）和个人道德行为（主观道德）之间的冲突，它反过来也反映了人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集体和个人是分离的，因而会发生相互的冲突。这个阶段将要被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所超越，那时个人和集体以某种方式成为一体，但不是使一方屈从于另一方，也不是将个人完全融入到集体中，而是发展出一个更高形式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可以在集体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克尔凯戈尔在其早期作品《反讽的概念——关于苏格拉底的系列评论》中，详尽地讨论了苏格拉底的生平学说。这部作品是他于1841年提交给哥本哈根大学的硕士论文。在这之前，他刚刚与雷吉娜·奥尔森（Regine Olsen）解除了婚约，经历了一场人生的危机，（他的论文评阅人报告至今还保留在哥本哈根大学，这份报告有趣地描述了学

院派人士与一个狂傲天才之间的对峙）。克尔凯戈尔对苏格拉底的理解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同黑格尔一样，他认为苏格拉底正处在世界精神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一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要实现突破，个体就必须作出牺牲。“一个人可以被世界历史证明是对的，但他仍然得不到他那个时代的认可。因为他得不到认可，他就只能成为一个牺牲品；又因为他后来可以得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认可，所以他又一定会获胜，也就是说他必须通过成为一个牺牲品来取胜”。〔27〕同黑格尔的主张一样，克尔凯戈尔也认为苏格拉底的作用就是将希腊人的道德观念引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他独创的引导方式就是用反讽这个手段来推动这种道德观念的转变。传统的希腊精神已经失去了活力，它需要一种新的原则来清除过时的道德观念的所有偏见。这就是苏格拉底的作用，他使用的武器就是反讽：

> 反讽是一把剑，一把双刃剑，苏格拉底就像是一个复仇的天使向希腊人挥舞着他手中的剑……反讽完全是主观性的煽动，在苏格拉底身上反讽就是一种真正的有世界历史意识的激情。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一个旧过程结束了，一个新过程又开始了。他是最后一位古典时代的代表人物，但是他要服从于神灵的召唤去毁灭他身上的纯正性和完美性，以此来摧毁古典主义。〔28〕

克尔凯戈尔并不认为反讽是假装的无知，或者是假装对别人的遵从。严格按照字面意义来解释的话，“反讽”就是一种“无限的和绝对的否定性”，这里是借用了黑格尔的观点。这等于说在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中，低级阶段的消失是为了迎接高级阶段的到来。克尔凯戈尔列举了犹太教被基督教所取代的事例，在这个过程中，施洗者约翰（John the Baptist）也发挥了同苏格拉底一样的“反讽”作用：“他（即约翰）让犹太教继续存在，同时又在其中播下了使其毁灭的种子”。〔29〕但是在苏格拉底与施洗者约翰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因为后者缺乏对他反讽行为的自觉意识：

> 因为反讽的形成需要不断地完善，它需要实施反讽的主体有反讽的意识，当他评判既定的现实存在的时候，他能够感到一种否定的自由，并且享受着这种否定的自由。〔30〕

苏格拉底感受到了否定的自由，他第一个将反讽展现为“一种主观性的特征”：

> 如果反讽是主观性的特征，它必须首先展现自身，让主观性出现在世界历史中。也就是说反讽是最初级的和最抽象的主观性特征。正是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主观性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历史中，这就是我们在苏格拉底身上所看到的情形。〔31〕

苏格拉底对道德观念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于他能够有意识地拒绝以往所有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同时又能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原有道德规范所谓的客观权威性被个人的道德主观性取代。这样，反讽导致的不是道德的虚无主义，而是道德的主观主义。通常来讲，反讽的含义有两种：首先按照克尔凯戈尔的观点，反讽就是苏格拉底的假装无知。这是苏格拉底使用的一种策略，旨在对传统道德观念进行彻底的批判；其次，爱用反语挖苦的苏格拉底不再对传统道德顶礼膜拜。他之所以无视传统道德，那是因为他破除了这种道德的客观性。但是，他之所以轻视他自行接受的道德观念，那是因为他认为，这种接受就如同任意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一样，有点像是一个人因为喜欢而养成的一种癖好〔32〕。为什么苏格拉底没有简单地将传统道德和主观道德一并放弃？克尔凯戈尔对这一问题也没有给出任何答案。根据他的观点，苏格拉底已经提出了“真善美的观念，以此作为实现可能的理想世界的界限”〔33〕，这里似乎暗示着存在一个更高的阶段，道德的主观主义将被超越。在这本书中〔34〕，克尔凯戈尔还就苏格拉底对他朋友产生的神奇作用和耶稣向他信徒传授圣灵进行了一番比较，这个比较指向了克尔凯戈尔在其后期著作中提出的作为更高发展阶段的信仰飞跃，当然这种信仰飞跃在本书中还仅仅有所暗示而已。

在《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1846）一书中，克尔凯戈尔将这个暗示进一步明晰化，苏格拉底作为基督教思想先驱的传统形象带有了明显的个人色彩。基督教的本质在书中被看作是主观性的。从思辨哲学的客观立场来看，基督教是一种荒谬的信念，因为信奉基督教仅仅依赖于那种个人无法判定的信仰飞跃，而且这种信仰飞跃是不能为抽象的概念体系所接受的，因为它是一种个人献身的生活方式而已。

这种个人的献身超越了客观的知识，在克尔凯戈尔看来，这就通向了一种真理的独特形式：

一种客观的不确定性就固着在充满了激情的精神变化 过程中，这就是真理，这就是一个生存个体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真理……上面这个真理的定义也就是信仰的定义。没有经历过冒险，就不会有信仰。信仰正好就是个体精神的无限激情与客观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如果我能够客观地去理解上帝，我就不会去相信上帝的存在，正是因为我不能够客观地去理解上帝，所以我必须相信上帝的存在。如果我希望一直保持信仰，我就必须不断地抓住这种客观的不确定性，以致使自己深入到7万英寻的水底来保持自己的信仰。〔35〕

在对道德的个人坚守中，苏格拉底接近了这个真理，以致他差不多被看作是一个异教徒：

真理的本质就是主观性和精神性，这也就是苏格拉底的智慧，它的永久价值就是使我们认识到存在的基本意义，其实认识者就是一个生存个体。苏格拉底因为他的无知而显示了这个真理，就其最主要的意义来讲，这属于异教徒的信仰。〔36〕

克尔凯戈尔是想把苏格拉底不仅当作是道德的个人献身者，而且还把他看作是上帝的个人信仰者。这种信仰确实预示了后来的基督教的信仰，只是还缺乏深刻的悖论性：

当苏格拉底相信有上帝存在的时候，他全部的思想激情都指向客观的不确定性，信仰正是植根于这种矛盾和冒险之中的。现在不同的是，确定性取代了客观的不确定性。客观地讲，确定性也是荒谬的；这种荒谬由思想激情所坚守，便成为了信仰。与面对荒谬的那种严肃相比较，苏格拉底的无知就像是一种诙谐的嘲笑；与信仰的那种严肃紧张相比较，苏格拉底式的存在主义精神就像是古希腊人轻浮的思想。〔37〕

苏格拉底将上帝存在的主观信仰与事物的客观真理结合起来之后还是摇摆不定。在某种程度上他还处于思想的困惑之中，这也就是基督教徒内心的精神痛苦，他要为之献身的那些客观真理也是没有什么理性可言的。

在尼采看来，他对苏格拉底的感情充满了难以解开的矛盾，就像

他对耶稣和瓦格纳〔38〕的感情一样，正如他自己所说："苏格拉底与我是如此的亲近，使得我要永远与他搏斗"。尼采的这种矛盾感情是用不同的口气表达出来的，有时是在不同的作品中，有时又是在同一部作品的不同地方。在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悲剧的诞生》（1872）里面，尼采表达了他对苏格拉底的这种矛盾感情。这部作品的中心论点是希腊悲剧产生于古希腊两种对立的创造性力量的相互作用之中，尼采认为阿波罗神和狄奥尼索斯神〔39〕正是这两种力量的代表。荷马在他的作品中充分地描述了阿波罗神性格的倾向，按照荷马的描述，这种倾向与梦境难分难解，它展现的似乎就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就像是荷马的那个充满理智而又令人愉快的众神世界一样。狄奥尼索斯性格的倾向类似于酒醉的狂喜，它要表现的是那些强烈的和无法控制的冲动，尤其是性欲和暴力的冲动。这些冲动在传统宗教节日的场合可以得到表达。古希腊人的独创就是发展了戏剧节的形式，将阿波罗神的幻想与狄奥尼索斯的狂喜结合到一个独特的综合体中而创立了悲剧这种艺术形式。在阿提卡式的悲剧中，阿波罗神的部分与几个对话情节完全联系起来，狄奥尼索斯神的部分则与合唱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种综合是一种简单的并列。恰恰相反（虽然尼采作品的晦涩带来了解释上的风险），尼采认为悲剧的世界既是黑暗可怕的，就像狄奥尼索斯代表的力量一样，同时又是理智快乐的，带着一些神秘，就像阳光普照的荷马的神灵世界一样。"史诗—阿波罗神的力量是如此地令人惊奇，它在我们眼前用表面的快乐将最可怕的东西化为幻境，并通过幻境而得到解脱"。〔40〕

这种综合在埃斯库罗斯〔41〕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作品里达到了高潮，但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里却消失了。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是一种退化的悲剧形式，其显著特征就是对人物的现实主义刻画，使它更接近新喜剧的世界而不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那种可怕而又充满理想的世界。尼采针对欧里庇得斯的变化有一个评价，他认为是欧里庇得斯：

> 将观众带到了舞台上面……因为欧里庇得斯的缘故，凡夫俗子们从观众席上

挤到了舞台上面；以前只是表现伟大勇敢品质的镜子，现在却显示出令人烦恼的真实，而且还故意展现自然的混乱样子[42]。

这样苏格拉底就登场了。尼采以他个人的方式重提当时的传说，强调苏格拉底与欧里庇得斯的密切联系[43]，认为苏格拉底对悲剧的衰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他看来，正是欧里庇得斯使悲剧的衰退成为了现实。

当然，这种影响的确切方式在尼采的散文作品中是不容易被发现的。他认为欧里庇得斯仅仅是一个面具，借他之口说话的是一种通达神意的超凡力量，这个神力既不是狄奥尼索斯也不是阿波罗，而是苏格拉底[44]。尼采似乎在暗示，欧里庇得斯的现实主义是建立在心理自然主义基础之上的。他的戏剧人物在舞台上所遵循的行为心理原则，同我们用来解释日常生活中人们实际行为的心理原则是一样的。尼采将其称之为“审美的苏格拉底主义”，它的最高原则大体可以解释为“美的就是可理解的”，这正好与苏格拉底的格言“知识即德性”[45]互为补充。“苏格拉底主义”似乎就是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理性精神的代名词，它试图采用解释和批评的方法来驯服那些在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悲剧中得到称颂的可怕力量。

苏格拉底主义谴责当时流行的艺术和道德。苏格拉底主义以其挑剔的眼光发现它们缺少真知和充斥着幻想；由于缺少真知也就意味着要出现那些十分荒唐和堕落的事情。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苏格拉底相信他有责任去纠正人生：他独自一人，孤芳自赏，作为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艺术和道德的先驱者，他走进了一个世界，其触及到的那些问题将会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幸福[46]。

“审美的苏格拉底主义”似乎将理智主义扩展到了艺术领域，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试图将其运用到日常行为上面。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看来，德性就是知识，德性足以保证我们得到幸福；可以说正确的人生是依靠理智来实现的，而错误的人生是因为缺乏理智造成的。正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否定了人身上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神秘的力量和理性不能捕捉的东西在苏格拉底式的艺术那里也没有一席之地。但是，悲剧自身的力量和深邃正是来自于它与理论的对

抗。悲剧所探究的力量超出了心理理解的范围，它所展现出来的人生困境是道德理论的力量也不可能解决的。因此，苏格拉底主义代表了一种精神的极度贫乏，尼采借用了“颓废”一词来称呼这种精神的贫乏（这里他用了法文词décadence）。

对“颓废”一词的使用反映了尼采对苏格拉底的矛盾态度。《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弥漫着尼采的一种感受，他把苏格拉底看作是具有超人品质的独特个体，“是一个能够用知识和理性来摆脱死亡恐惧的人”[47]，也是一个体现了探索精神的超越性力量的人。“苏格拉底自省的快乐”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于整个世界的态度：

>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看来就是一个在传授一种全新的“希腊人的快乐”和确认幸福生活的导师，他力求在日常行为中对优秀青年实施他的思想助产术和教育的熏陶，指望从中培养出一个天才来[48]。
>
>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把苏格拉底看作是所谓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旋风中心了[49]。

苏格拉底成为了科学精神的化身，这种精神导致了近代科学的最高成就，而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这些科学成就。但是与此同时，尼采认为这种苏格拉底式的乐观主义，这种以为知识的力量可以解决一切人类和自然问题的信念，不仅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谬见，而且还是一种精神衰退的症状。在《悲剧的诞生》的后面部分，尼采的这个观点得到了激烈的表达：

> 对于这种本质已经退化的音乐[即新阿提卡颂歌，这是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出现的一种音乐形式]，真正的音乐天才只有厌恶和拒绝，就像他们厌恶苏格拉底毁灭艺术的倾向一样。阿里斯托芬准确的直觉完全是有道理的，他对苏格拉底本人、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和新颂歌诗人的音乐抱着同样的拒斥态度，他在这所有的3种现象中看到了一种文化衰退的征兆[50]。
>
> 一个人只要被苏格拉底式的求知欲束缚住，他就会妄想用知识来治愈永恒的生存创伤[51]。

在这个部分的后面，尼采接着谈到现代世界被亚历山大派（即缺乏创造的和学究式的）文化所困扰，这种文化把为科学效力的理论家当作它的代表人物，其原型就是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式文化的成果就是那种“妄想拥有无限力量的乐观主义”。在《悲剧的诞生》发表14年后又出了第二版，尼采借此附加了“作为一个自我批评的尝试”的章节，这里他又回到了同样的主题：“正是由于道德上的苏格拉底主义，由于辩证法，由于理论家的简朴和快乐而导致了悲剧的消亡……这种苏格拉底主义难道不是没落、萎靡、腐化的标志吗？难道不是本能失调而走向衰微的标志吗？”〔52〕

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尤其是在他最后精神崩溃之前的1888年所写的那些作品中，尼采的口气更加尖刻。他在这些作品中就把自己等同于狄奥尼索斯的力量，在他看来，苏格拉底拒绝狄奥尼索斯的力量，实际上就是对人性的一种拒绝，他对此有着十分激烈的反应。在《瞧！这个人》一书论及《悲剧的诞生》的章节部分，尼采说到他的这本书有两个创新之处。首先是他认识到狄奥尼索斯现象是“整个希腊艺术的唯一基础”；其次是他“对于苏格拉底主义的认识：是他第一次发现苏格拉底要为希腊的衰落负责，并把苏格拉底看作是一个颓废者的典型”。他接着说，“我是第一个看到”：

> 一种真正的对立——一方是以隐蔽的复仇欲望来面对生命的那种堕落本能，另一方是产生于旺盛生命力而毫无保留的接受痛苦甚至罪恶的最高的生命肯定……这种最根本的、最快乐的、最自由的、最纵情的生命肯定，不仅是最高的洞见，而且也是最为深刻的洞见，这种洞见得到了真理和知识的最严格的证实和肯定……承认现实和肯定现实，对于强者来说是绝对需要的，就像弱者因懦弱变得胆小而需要逃避现实一样——逃避是弱者的“理想”……他们不会自由地去认识：颓废者需要的是谎言——这是他们的一个生存手段——对于一个不仅理解“狄奥尼索斯”的词义，而且还按照这个词义来理解自己的人来说，他根本不需要去反驳柏拉图、基督教、叔本华——因为他能够闻出他们所散发出来的腐败气味。〔53〕

尼采的《偶像的黄昏》写于1888年初，他在这本书论及苏格拉底的文章里使用了“疾病”和“腐败”这样的词语。尼采就苏格拉底的遗言首先进行攻击。按照他的解释，苏格拉底的遗言表达了对从生命的疾

苦中得到解脱的感激之情。这个遗言所表达出来的厌世倾向，正是苏格拉底以及那些将道德和价值理论化的所谓圣人们患有的疾病。

> 不管怎么说他们肯定是患上了某种疾病——这就是我们的答复：一个人应该走近去观察他们，这是一些历史上最聪明的人！……是不是出现在地球上的智慧就如同一只渡鸦，需要闻到腐肉的味道才会兴奋呢？〔54〕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衰退的征兆……是希腊走向崩溃的代表……是伪希腊人……是反希腊人的代表”，在他们的理论中包含着一种否定生命的态度。这种态度与狄奥尼索斯对生命的胜利似的肯定态度是对立的，而尼采恰恰把狄奥尼索斯与自己划上了等号。

尼采并没有止于把苏格拉底描绘成一个典型的（也许是原型的）颓废者；在其中令人惊讶的5个分节中（3-7），尼采还就苏格拉底的个人品质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的措词甚至带有反犹主义的那种令人讨厌的自命不凡的口气。在他看来，苏格拉底属于社会的最低阶层：他是一个下等人。他的丑陋就是一种无耻放荡的性格的标志。他甚至怀疑苏格拉底到底是不是一个希腊人。辩证法是一种恶毒的发明，它使得下等人能够打败比他们优秀的人，即打败那些趣味优雅和行为得体的人。辩证法是那些没有其他防卫力量的人手中最后的武器。（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都是辩证论者的缘故。）苏格拉底装得一本正经的样子，但其实不过是个滑稽的小丑罢了。

在知道尼采写作此书时已经临近精神崩溃的情况下来读这些评论，我们可以把这些评论看作是病态的胡言乱语而不用去理会。然而，即使这些评论是如此的猛烈和病态，但还是表现了尼采内心深处对于苏格拉底的矛盾态度。在该书的第8节中，尼采说道，他前面所写的东西表明，苏格拉底有时十分令人厌恶，这样就更需要解释他为何还对苏格拉底如此着迷。在3-7节中，尼采对苏格拉底完全持敌对的态度，但我们不清楚尼采是不是真的这么讨厌苏格拉底。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是的。在这几节中满是尼采对苏格拉底的冷嘲热讽，但不能因此就说他否定了苏格拉底。他对苏格拉底的美化抵消了那些丑化的评论，他把苏格拉底看作是这样一个人，尽管受到错误思

想的引导，但却是心怀善意，态度认真。他想通过理性来控制危险的狄奥尼索斯冲动，以此使时代的疾弊得到纠正。尼采决不会收回他对苏格拉底的否定性评价。在他看来，苏格拉底“似乎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拯救者”，但他不惜任何代价地信奉理性却是错误的和自欺的：“苏格拉底是一种曲解：全部的道德改进，包括基督教徒，都是一种曲解 ”。然而尼采说话口气的改变是明显的，他在最后部分谈到苏格拉底之死的时候，带有一种十分忧伤的语气：

> 这个所有自欺者中间最为精明的人，他自己抓住（只要生命是有活力的，幸福和本能就是不分的）真理了吗？他最后不是对自己说智慧就是面对死亡的勇气吗？……苏格拉底自己想去死——不是雅典人要他死，是他自己端着那个盛有毒酒的杯子，是他要求雅典人递给他这个杯子……他轻声地对自己说：“苏格拉底不是医生，只有死亡才是真正的医生……苏格拉底自己一直就是一个病人”〔55〕。

恰恰是因为他感到自己与苏格拉底如此亲近，所以一直到死，尼采都在批判苏格拉底。

注释

〔1〕 第欧根尼·拉尔修6.10-11。

〔2〕 犬儒主义（Cynics，也称犬儒学派），是流行于公元前4世纪到基督教时期的一个古代哲学派别，以愤世嫉俗和悲观怀疑而著称。其创始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西尼，第欧根尼则是这个学派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用自己的行为挑战社会常规道德，倡导一种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平时睡在露天的巨大陶管里，声称要像狗那样生活。这个学派与其他古代哲学派别相比较，它的社会影响主要在于它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它的思想体系。——译注

〔3〕 赫拉克勒斯（Heracles或Herculean），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和英雄，是天神宙斯和凡人女子阿尔克墨涅所生的儿子。他力大无比，但受到宙斯妻子赫拉的报复和迫害，作为欧律斯特斯的奴仆去完成12件苦役而名闻天下。——译注

〔4〕 见柏拉图《会饮篇》220a。

〔5〕 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公认的古代基督教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将基督教信仰与柏拉图的哲学结合起来，代表作有《忏悔录》和《上帝之城》。——译注

〔6〕 斯多葛学派（Stoics），古希腊罗马时期一个重要的哲学派别，它公认的创始人是西提乌姆的芝诺。它强调知觉是真知的基础，相信德性是世界的内在规定，主张哲学探究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一种以心灵平静为原则的生活方式。——译注

〔7〕 他被形容为是一个“发了疯的苏格拉底”，见第欧根尼·拉尔修6.54。

〔8〕 克拉特斯（Crates），来自底比斯，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是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的学生。他放弃财产而追求矫正世上罪恶的事业。他以写作哲学戏剧和哲学书信而为人称道，其历史的重要性在于他对斯多葛派创始人芝诺的影响。——译注

〔9〕 见《道德论丛》1072b。

〔10〕 见《斯多葛学派的矛盾》1047-8。

〔11〕 见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1.116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987b, 1-2。

〔12〕 见《论精神的本质》2.6.18。

〔13〕 见《反杂学家》9.92-104。

〔14〕 塞涅卡（Seneca，大约公元前4—前65），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雄辩家和悲剧作家。公元65年，由于受到政敌指控参与政治阴谋而被勒令自尽。——译注

〔15〕 《谈话录》4.1.169。

〔16〕 见《反杂学家》7.264。

〔17〕 见《论演说术》3.67和《论目的》2.2, 5.10。

〔18〕 见《学园派》1.45, 2.74。

〔19〕 见《反克罗特斯》116e-f。

〔20〕 见1117d，这里克罗特斯大概想到了苏格拉底有时带着讽刺的口气在那里夸奖他的对话者。

〔21〕 查斯丁（Justin，约公元100—165），基督教早期教父。他率先将基督教教义与希腊哲学结合起来，代表作有《第一护教文》和《与犹太人特里风谈话录》。——译注

〔22〕 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公元160—220），基督教神学家。用拉丁语写作，使得拉丁语成为基督教会的基本语言和传播工具，代表作有《护教篇》等。——译注

〔23〕 自然神论者（Deist），一种非正统的宗教信仰者，强调宗教知识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来获得，主张容忍不同宗教的教义和仪式，注重人生的道德修养。——译注

〔24〕 译文引用和参考了贺麟和王太庆译的《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

馆，1960年，第二卷，90页。

〔25〕 见《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二卷，106页。

〔26〕 同上书，104页。

〔27〕 此处及以下引文都是根据原书的英译本译出。见克尔凯戈尔：《反讽的概念——关于苏格拉底的系列评论》（普林斯顿，1989），260页。

〔28〕 克尔凯戈尔：《反讽的概念——关于苏格拉底的系列评论》（普林斯顿，1989年），211页。

〔29〕 同上书，268页。

〔30〕 同上书，212页。

〔31〕 同上书，281页。

〔32〕 同上书，235页。

〔33〕 同上书，197页。

〔34〕 同上书，29页。

〔35〕 克尔凯戈尔：《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普林斯顿，1941年），182页。

〔36〕 同上书，183页。

〔37〕 克尔凯戈尔：《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188页。

〔38〕 瓦格纳（W. R. Wagner, 1813—1883），德国作曲家，“乐剧”的创始人，毕生创作了大量的歌剧作品，著名的有《尼伯龙根的指环》、《漂泊的荷兰人》、《纽伦堡名歌手》等。——译注

〔39〕 阿波罗（Apollo），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所称的太阳神，他是阳光、智慧、预言、音乐、诗歌、医药、男性美等的保护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希腊神话中的酒神。——译注

〔40〕 根据尼采原书的英译本译出。见尼采：《悲剧的诞生》（纽约，1967），12页。

〔41〕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约公元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据说创作了80余个剧本，现存《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阿伽门农》等。——译注

〔42〕 此处译文参考了周国平译的《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45页。

〔43〕 见第欧根尼·拉尔修2.18。

〔44〕 此处及以下译文均根据尼采著作的英译本译出。见尼采：《悲剧的诞生》（纽约，1967），12页。

〔45〕 同上书，11页。

〔46〕同上书，13页。
〔47〕同上书，15页。
〔48〕同上书，15页。
〔49〕同上书，15页。
〔50〕同上书，17页。
〔51〕同上书，18页。
〔52〕同上书，1页。
〔53〕尼采：《瞧！这个人》（哈莫斯沃，1990），80页。
〔54〕尼采：《偶像的黄昏》（哈莫斯沃，1990），39页。
〔55〕同上书，44页。

第六章

结　论

每个时代都要为自己重塑苏格拉底的形象。在我们今天这个后基督教和后唯心主义的时代，苏格拉底既不被当作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先驱，也不被看作是世界精神发展到更高意识阶段的一个代表，那么苏格拉底对我们还有意义吗？答案是要历史地评价苏格拉底的重要性。因为正是他开创了系统化的伦理学思想，是他深刻地影响了柏拉图，是他成为了苏格拉底文献的核心人物。毫无疑问，即使对于我们这个世俗化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时代来说，苏格拉底的历史重要性仍然是存在的。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苏格拉底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典型的意义，他是一个挑战者，一个鼓动者，一个启示者。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苏格拉底用自己的哲学思考和系统化的质疑方法，也就是通过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去挑战那些传统的哲学思想。尽管现在对古代经典作品的研究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文化优越性，许多人还是会发现苏格拉底的那些没有专业术语、生动有趣的对话可以鼓励学生自己与文本对话，可以作为最好的哲学入门读物。这对于教师来说更有实际的作用。他们可以采用一些类似苏格拉底反诘法的方法刺激学生去审视自己的观念，根据说理来修正自己的观念，最后通过对已有知识的批判反思而得出自己的答案。当然，苏格拉底的反诘法不仅仅是作为教学方法来使用，在现实生活中如同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一样，它也是一种自我批评的方法。苏格拉底的口号“未经审视的人生没有价值”〔1〕，表达了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诚实所构成的人类核心价值观，这就是一个人乐意重新审视自己的想法，从而放弃自己身上固有的教条主义。走向极端的自我审视也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无所作为，但苏格拉底确实代表了一种生活的典范，不管怎样，他始终坚持那些经受住了自我批评的理想，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又是一个英雄。只要思想和道德的诚实还是人类的理想，苏格拉底就会是追求这一理想的最佳典范。

注释

〔1〕见柏拉图《申辩篇》38a。

苏格拉底是西方历史上最著名、最神秘的哲学家。两千多年过去了，围绕其生平学说仍有许多疑团悬而未解。谁要置苏格拉底于死地？谁对苏格拉底的记述最真？谁受苏格拉底的影响最深？

本书在博采百家之长的基础上，再现了苏格拉底的生平行迹，考察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和各家笔下的苏格拉底之间的复杂关系，剖析了苏格拉底对后世哲学的深远影响。

百科通识文库

49

解读柏拉图

朱莉娅·安娜斯 著

高峰枫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解读柏拉图

朱莉娅·安娜斯 著

高峰枫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45**

Plato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3.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3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Julias Annas 2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柏拉图 /（英）安娜斯（Annas, J.）著；高峰枫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99-1

Ⅰ．①解… Ⅱ．①安… ②高… Ⅲ．①柏拉图（前427～前347）- 哲学思想 Ⅳ．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14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99-1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译者序
第一章　知识与意见
第二章　生平与师承
第三章　柏拉图解读法
第四章　爱欲与哲学
第五章　德行：个人与社会
第六章　灵魂与自我
第七章　万物本性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朱莉娅·安娜斯，亚利桑那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她曾在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已出版11部著作，内容涉及古代哲学诸多方面，尤其是认识论、心灵哲学和伦理学。

译者简介

高峰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古典文学和早期基督教方面的研究。

图　目

图1　柏拉图头像
图2　古埃及艺术一例
图3　古希腊艺术一例
图4　苏格拉底半身像
图5　大西岛，小说《海底两万里》的插图
图6　带有古怪黑色人像的杯子，上面有一成年男子追求男童的图案
图7　让·德尔维尔的画作《柏拉图学派》
图8　古代雅典公共广场上的抽签机
图9　多那太罗画作《青年男子半身像》的局部图
图10　中世纪手稿中的一幅圣父创世图
图11　拉斐尔画作中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图12　拉斐尔画作《圣体辩论》中的查士丁

译者序

这部正文不足百页的小书是英国古典学者朱莉娅·安娜斯（Julia Annas）为一般读者撰写的柏拉图导读。安娜斯是牛津出身，在牛津执教多年，现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讲座教授。她专治古代哲学，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古代怀疑派均有专门研究。我曾读过她《理想国导读》一书和其他论柏拉图的单篇论文，感觉安娜斯虽称不上是开宗立派的思想巨擘，但确是一位淳谨笃实的优秀学者。这本小书以凝缩的方式、简明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了柏拉图思想的方方面面，不尚新奇，却又吸收了西方柏拉图研究的一些新成果，作为一本入门书，可算是一时之选。目前国内研究柏拉图的风气渐浓，但有些学者过分倚重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而且对施特劳斯的理解简单机械，食而不化，以致于谈玄说妙，光怪陆离，几堕魔障。希望此书能有助于普通读者更全面了解柏拉图思想，特别是传统研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至于矫正目前凌空蹈虚的研究风气，则非译者所敢想。

在译书过程中，我对各章的题目和个别小标题作了较大改动，力求醒目。另外，原书无脚注，考虑到读者的需要，我加了60余条注释。这些注释中，有一类涉及文史知识，尤其是较偏僻的作家，我尽量简单予以解释。主要参考了《牛津古典辞书》（*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2nd edition. Edited by N. G. L. Hammond and H. H. Sculla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另一类是柏拉图著作的引证。除作者随文注出的对话出处之外，作者没有注出的，我尽量找出标准页码，这样读者若有兴趣查证，自可按图索骥。但受学力所限，我注出较多的是本人熟悉的一些对话，还有一些段落仓促之间未能查询到准确出处，望读者体谅。

书中柏拉图著作的中译文，我尽量引用老一代学者，主要是严群和王太庆两家的翻译。一来，两位先生都是从希腊文原文翻译，二来

也借此表达对前辈学人的敬意。译文中与现今语言习惯不合的词句，一般不作改动。《理想国》我用的是上世纪20年代吴献书的译本，主要因为这一译本现在大家谈论较少，故特意表而出之。以上三家没有翻译的对话，我大多据作者书中自己的英译文来翻译，偶有不明之处，便查对洛布古典丛书的译文。

在编写注释过程中，社科院哲学所高山杉先生帮我查对了很多材料，并通读了译稿，指出语言上的一些疏漏。第七章有两个日文问题，我请教了北京大学日语系的彭广陆教授，在此一并致谢。最后要感谢外研社的编辑高耿松先生，是他促成了本书的翻译。

译文中凡有不当之处，望读者指出。在此先行谢过。

译者谨识

2007年5月

第一章

知识与意见〔1〕

陪审团的问题

假如你是陪审团成员，正在听张三讲述他被袭和遭抢的经过。他讲得细节生动，没有破绽，你完全相信他的说法，你相信罪行严重，而张三深受其害。这便是真实的意见。张三的确遭受了袭击。

可是你真的知道他被袭击吗？这种担心乍一听上去非常奇怪，因为你已掌握最有力的证据。但你不妨再细想一下：此间是法庭，张三正提出指控，被指袭击他的人准备提出反驳。你能否确信，你之所以深信不疑，是因为张三说了实话，还是因为他描述这桩案子的方式说服了你？如果是由于后者，那你可要当心了。因为即使张三没有说实话，你还是可能照样相信他。另外，就算他说了实话，他的证据足以证明他被人袭击了吗？也许这都是精心设计好的圈套，毕竟你本人没在现场，没有亲自目睹事件的经过。因此我们自然也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你其实并不知道张三被人打了，你只是有一种真实的意见，而没有确定的理由怀疑其真实性。

《泰阿泰德篇》

《泰阿泰德篇》是柏拉图引人入胜的一篇对话，也是颇令人费解的一篇。苏格拉底称自己像他母亲一样是一名接生婆：他把思想从人们心中接引出来，随后检验这些思想是否经得起理性的推敲。关于什么是知识，他不愿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可以看出他熟谙其他哲人的著作），他只是逐一批驳了年轻的泰阿泰德所提出的关于什么是知识的各种论断。泰阿泰德认为如果你真正“知道”某事，便不会出错，因此他提出“知”乃是“觉察”，后又提出真知乃是真见，后又补充，有真见而且能够证明或“给个说法”。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对话结束之时，我们一片茫然，唯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并无能力充分定义“知”。苏格拉底执意破除他人

的妄见，而从不自己立说，因此这篇对话成为柏拉图传统中一篇关键作品。柏拉图给后人的启示在于，寻求真理的方法在于质疑那些自认为掌握真理者（这是苏格拉底在对话中的一贯做法），而不用自己下哲学论断。其他人注意到，在其他对话中柏拉图对“知”的本性有明确、大胆的论断，因此他们便认为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清除掉的，只是那些错误的知识论。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是其他人思想的接生婆，没有自己的“孩子”，这与其他对话中（比如《理想国》）信心十足、放言高论的苏格拉底十分不同。读者对此必须有自己的判断（第三章中我们会讨论古人和今人对此问题的解答）。

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提出上述问题。年轻的泰阿泰德问道：若不是真见，那么知识究竟为何物？无论如何，若你有真见，你便不会出错。但泰阿泰德在和苏格拉底谈话（关于苏格拉底第二章还会谈到），年长的苏格拉底如往常一样，发现了问题。在公开场合劝说别人是可以通过娴熟的技巧来完成的。他指的是律师需具备的技巧，只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中还没有职业律师。受害者必须要作陈词，而许多人往往花钱雇专职的讼师，因为他们要说服的不是12人的陪审团，而是由501人组成的陪审团。

如何引证柏拉图著作

1578年，出版商亨利·艾蒂安（Henri Etienne，他的姓氏拉丁文拼写方式为Stephanus）在巴黎首次印刷出版了柏拉图著作集。新兴的印刷术使更多人得以阅读柏拉图，而且人们第一次可以准确地引证对话录中的具体段落，因为大家用的是有相同页码标记的本子。我们至今仍然用这一本的页码来引用柏拉图（比如说，200就代表Stephanus本上面的第200页），再加上从a到e的5个字母将同一页从上到下划分成5个部分。在大多数柏拉图原文和

译本上，页边空白处都印有“Stephanus页码”。不管读者看到的本子是怎样编排的页码，一提到“200e”，大家就能很方便找到原文中相应的段落。

苏格拉底继续说：

苏格拉底：他们不以其术教导，以其术驰辩而说服，使人依其意旨而成见。你想有如此高明的教师，在几个滴漏的时间，能把被劫财物或遭其他横暴者的真相，充分指教当时不在现场目睹的人？

泰阿泰德：我想他们断不能教导，只能驰辩以说服。

苏格拉底：你想，说服人是否使人持某种意见？

泰阿泰德：可不是？

苏格拉底：关于非目睹不能知的事实，审判官信服公正的诉说、采纳真实的意见、凭耳目而判决，判决虽确，毕竟非凭知识，乃由于被正确地说服；是不是？

泰阿泰德：完全是的。

苏格拉底：朋友，在法庭上，真实的意见若与知识为同物，第一流的审判官决不能缺知识而有真实意见以作正确判断；今则二者显得各异。

（《泰阿泰德篇》201a-c）[2]

这点听上去令人信服，也许显得再明显不过了。但是，就像陪审团一样，我们也可以问一问：我们是否应该确信无疑？为什么陪审团不能知道张三遭到抢劫？

知识的必备条件

柏拉图称陪审团尚不具备知识，理由之一在于，他们被某人说动，而此人的目的就是要使陪审团相信自己的话。就这个案子而言，他已说服他们相信了事实真相，但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即使他讲了不实之词，他同样有能力使陪审团相信他的话。乍一看去，这种担心实属杞人忧天：如果你已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了真实的意见，为什么还要担心别人会以同样方式劝说你接受虚假的意见呢？没有发生之事如何

能让你怀疑已经发生之事呢？其实，对劝诱有所怀疑，不无道理。因为遭怀疑的是获得意见的途径。如果沿着这条途径，我既能获取正确意见，又能获取错误意见，那么它便不能保证我只能获得正确意见。大多数人会怀疑，通过这一途径所获的意见是否就是知识。

这段话中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陪审团被说服而认可的事实（就是指张三遭抢），若你不在现场，没有目击全过程，你便不可能有确定的知识。就算我们相信张三说了实话，我们现有的只是间接叙述，与张三自己获知的途径完全不同。他亲历、目睹了抢劫过程；我们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就算讲得天花乱坠，也不过是如说书一般。只有在场目击者才能有确定的知识。这点听上去有点牵强。如果知识仅仅限于直接经验到的第一手材料，那么我们能知道的便极其有限，因为我们间接读到、听到的便不能算作真正的知识。但这里涉及一非常重要的思想：他人绝不能替你或为你获得事物的知识。所谓知识，一定是你个人获得相关的意见。至于到底什么是自家获得意见，这要视意见的性质而定，但就张三被抢一事来说，若要自己获得见解、不假他求，那唯一的途径便是在现场亲眼目睹。

留给我们的问题

柏拉图给了我们两个理由，来证明陪审团的真实意见不能等同于知识。这两个理由都很有道理，但二者有何联系？劝诱他人带来一个问题：这一途径不能保证我们从别人那里获取的意见为真。若这一问题成立，则意味着一定会找到同样的途径能够确保我们获得真知。苏格拉底抱怨说，受害者要说服陪审团，但发言的时间太短，而且法庭上感情因素太多，不能使陪审员所获的意见接近真知。这样的抱怨并非无的放矢，它说明我们能找到某种获得意见的方式来克服上述不利因素，比如没有时间限制，比如每一位陪审员都能没有任何顾虑、充分盘问证人和受害者。如此说来，我们似乎可以假定，存在一种传达意见的方式等同于真知，只是这决不是劝诱。

第二点说明：任何传达意见的方式，不管多么小心多么审慎，都不能等同于知识，因为任何得自他人的意见都是间接的，都是你不曾真正知道的，因为那不是你自己亲身获得的真知。依赖他人的见证，不管这见证多么真实，永远也不同于自己亲身体验。

问题在于：第二点反对意见似乎与第一点矛盾。第二点认为，知识不能被传达，必须由每个人独立获得。但第一点虽质疑劝诱这种方式，却似乎暗示：有可能存在一种从他人处获得意见的方式，可以等同于知识，因此知识便是可以传达的。

读者参与

到此地步，读者必须仔细想想这段话，她 [3] 必须想想柏拉图的用意所在。最简单化的回答是：柏拉图让苏格拉底表述了相互矛盾的知识论，因为柏拉图本人也是稀里糊涂，没有意识到他要求知识既可以传达、又不可传达。读者若不体察柏拉图的用心，便无须再深究了。

但我们还需深思。别忘了，苏格拉底在这篇对话中反复强调，他并没有发表一己之见解，而只是驳斥他人的谬说。泰阿泰德提出，真实的意见可以等同于知识，而苏格拉底对此提出两点反驳，有力地批驳了泰阿泰德的看法。难道我们会认为，作者柏拉图竟然丝毫未察觉到这两点反驳之间相互抵牾么？我们不应作如是观。（我们也可以认为作者早已看出这其间的矛盾，而且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此矛盾也了然于胸。当然这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读者不必同意我的看法。）《泰阿泰德篇》中的论辩深奥而微妙，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柏拉图自己深明这两条反驳之间的关联如何。

为何柏拉图并未觉得有何不妥呢？此处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苏格拉底的话，因为他在对话中强调他仅限于驳斥他人的观点。这并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主张，而是说对话的重点不在提出这些见解。苏格拉底认为泰阿泰德的观点站不住脚，他提出两点反驳，即使这两点反驳本

身相互矛盾，也不能动摇苏格拉底的结论。关键在于，当我们或者柏拉图提出确定的知识论之时，需要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

在另一部对话《美诺篇》（87b-c）中，我们又发现“知识可以传授”这一论点，这一点被当作定论来接受。但还是在《美诺篇》中，我们发现柏拉图的另一个著名论点——“知识乃是回忆”。苏格拉底和一个男童[4]展开对话，这个男童不懂几何，但苏格拉底带领他完成了一个几何学论证。论证本身很简单，但其中一步让这个男童觉得与直觉相冲突。苏格拉底带领他完成论证之后，说（85c）这个男童现已掌握有关这个题目的真实意见，但“如果有人频繁地以多种方式向他问起这样的事，你知道他最后就会确切地认识到这些东西，如同现在这样明白”[5]。苏格拉底传授的办法是，将证据交给他，最后这个男童能够自行获得正确的知识。这个男童直到自己行动起来，努力理解证据，他才真的获得了知识。这个男童必须自己领会证据，因唯有他自己才能领会。苏格拉底不能替他领会。但苏格拉底可以传授知识，就是说，他可以将证明传达给男童，最终使男童能自己尽力。这样我们就明白，一方面知识可以传授，另一方面知识必须由每个人自己获取。进一步讲，柏拉图称此为“回忆”，因为当男童逐步领会了证明时，柏拉图认为他的灵魂已然回想起在投生之前所拥有的知识，也就是在男童出生之前就已获得的知识。当然，从这样的讨论不一定非要得出回忆说的结论，这不过是柏拉图以惊世骇俗的方式来解释论辩的结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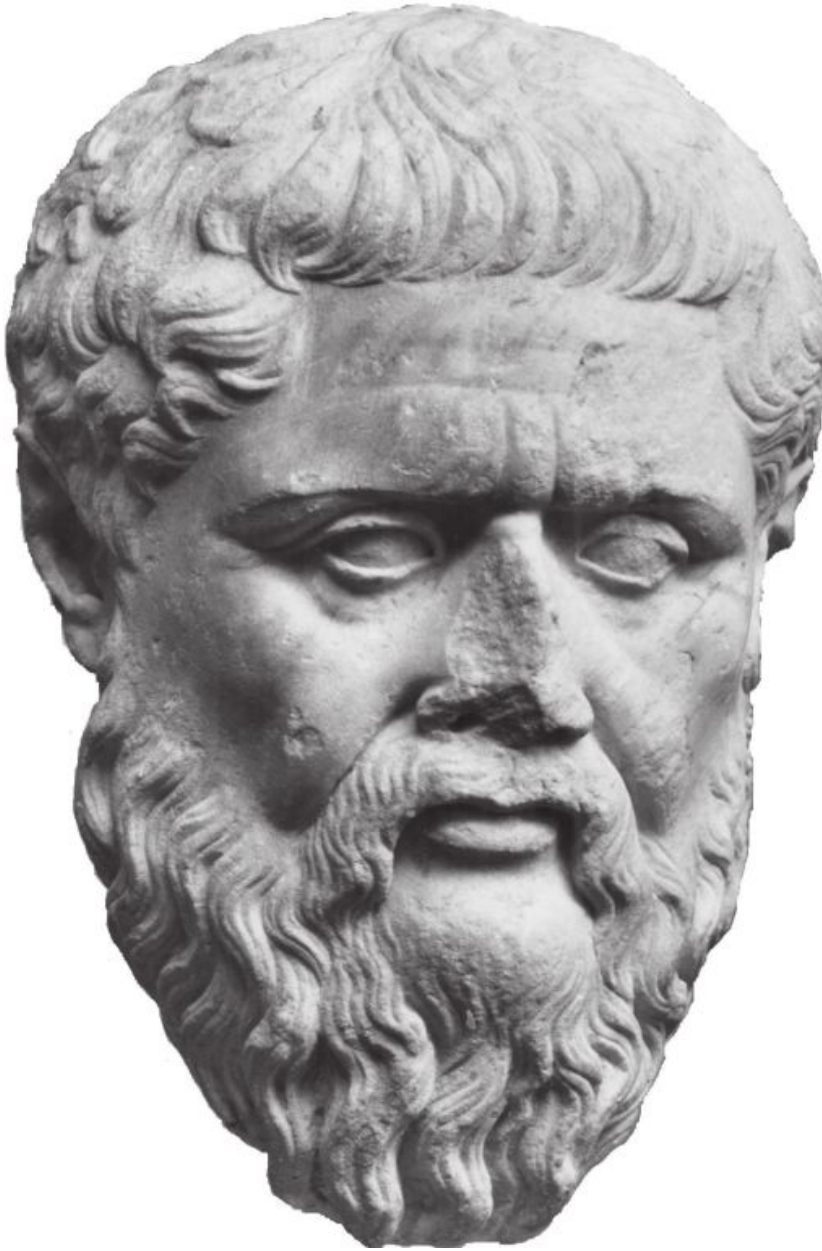

图1　柏拉图头像

与柏拉图争辩

从很多方面来说，《泰阿泰德篇》中关于陪审团一段能让我们很好地初步了解柏拉图的写作方式。我们立刻发现，必须要注意柏拉图是如何写作对话的，特别要注意在支持自己观点或批驳他人观点时，辩论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还发现读者自己也被带进了辩论中，即使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轻松取胜，她也需要质疑柏拉图的论点。我刚才简单地谈到《美诺篇》中的辩论，这也可以让我们了解柏拉图写作的另一特征。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既主张知识可以传授，又提出知识要求个人的直接经验。如果我们用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比如陪审团判案），我们便会发现问题。在《美诺篇》中，我们仍然找到两个观点，但是彼此并无冲突。但是《美诺篇》中的辩论围绕一个几何学论证，这一论证中所涉及的知识与陪审团断案大相径庭。几何学证明乃是明晰、抽象的，远离日常经验，其中自有重要的道理要我们去领会和传授。无怪乎当柏拉图思考“知识”这一概念时，他心目中的“知识”是非常狭义的概念，绝非我们随随便便说的那些寻常知识。如果我们细想断案和几何证明这两例的区别，我们便明白他这样做的用心。在断案的例子中，知识就是指目击犯罪，而《美诺篇》中“理智”这一概念的范围则要窄得多。

柏拉图最知名的理论大概是“理念说”，也就是他关于什么是“真”、我们能知道些什么的那一番宏论。“理念”在《美诺篇》和《泰阿泰德篇》中均没有提及（我们稍后还会讨论），但在这几部作品中我们能找到一些思路，有助于我们理解柏拉图关于理念的论述。

柏拉图的写作方式激发我们与他争论。他还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哲学论断，思想之惊世骇俗、表达之新奇壮丽，古往今来，少有人及。（“知识乃是回忆”即是著名一例。）对柏拉图的解读经常过度强调一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有时人们以为他最为关注如何激发读者的兴趣，而对表达明确的思想不以为意。而还有一些时候，人们把他当作大胆、独断、我行我素的理论家，对于辩论毫无兴趣。实际上，柏拉图既钟情于论辩，又爱发奇谈怪论，往往采用微妙精深的方式，让人难

以把捉。若能牢记此点，读柏拉图当有所收获。这篇柏拉图导读无意讨论柏拉图思想的方方面面，也不想提供解读柏拉图的秘方，而是想让读者与柏拉图多多亲近，而且若有可能，希望读者日后能对柏拉图自行钻研。

注释

〔1〕 作者在这一章讨论柏拉图的认识论，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是“知识”（knowledge）和“意见”（belief，也有译作opinion）。为使读者先明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特摘录严群先生对此所作的辨析（载严群编著的《柏拉图》一书，世界书局，民国23年，页34 - 35）：

（一）意见有真有假，有对有不对；理性知却没有真假、对不对的含糊[案：“理性知”就是“知识”]；

（二）意见对于任何事物，都不能有洞察明辨之功，纵使所见偶尔不差，毕竟缺少必然性，而信之不笃、守之不坚；理性知却不然，它所见的的确是真理，有必然性，而且信之笃、守之坚；

（三）至于来源，则意见尽可被人游说、劝诱而如此这般地主张，易出易入，相信得快，动摇得也快；理性知却只能受人开导、指点，难出难入，不易相信，也不至动摇；

（四）再论对象：理性知的对象是纯粹的“有”（pure being）；意见的对象则介于“有”与“非有”（non-being）之间，参杂感觉成分、变幻无常的东西，所以意见是介乎知与无知（knowledge and ignorance）之间的一种状态；

（五）就范围说，随便什么人都能有意见，理性知却限于少数人。

〔2〕 中译文用严群的译文，见《泰阿泰德·智术之师》（商务印书馆，1963年），页103-104。译文略加改动，以与全文呼应。

〔3〕 本书作者为女性，因此书中凡用单数第三人称作为泛指的时候，作者一律用“她”（she）。译者尊重作者的女权主义立场，故译文中一概用“她”字。

〔4〕 这名男童是美诺家的一名随从，王太庆译为“小厮”。

〔5〕 译文见王太庆所译《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页182。

第二章

生平与师承

名字还是绰号？

柏拉图不一定真叫柏拉图。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难道这事还有争议吗？柏拉图流传下来的著作无不冠以“柏拉图”的名字，但在古代传记文献中，却有一派认为“柏拉图”只是广为流传的绰号，而这位哲人的本名应该是阿里斯托克里斯（Aristocles）。这种说法也有一些凭证。柏拉图的祖父名叫阿里斯托克里斯，而依古人惯例，长子可以与祖父同名。只是我们缺少其他旁证，来证明柏拉图确是家中长子。而且“柏拉图”听上去也不大像一个绰号，在当时这是一个颇常见的名字。另外，相关的解释也难以令人信服。比如说，plato（柏拉图）这个字和*platus*　很相像，后面这个字意思是“宽”，因此有人认为柏拉图曾是一名肩宽背厚的摔跤手，或者因为他笔法多变、文风很“宽”的缘故。这些不过是臆测而已，我们决不至于断言柏拉图曾改名，或者听任别人给他安上另一个名字。但如何解释关于阿里斯托克里斯的说法呢？我们不知道，也无从断定。这自然令人沮丧。一个人改名字可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可是这件事我们却无缘确认。

我们掌握的事关柏拉图的古代文献材料经常让我们陷入这种困境。关于柏拉图的古代传记中有大量故事，如果这些故事都信实可靠，我们自然能获知有关柏拉图个人很多有趣的信息。只是这些故事往往不堪一击。

事实与传闻

柏拉图于公元前427年生于雅典，卒于公元前347年。有关他的家世，我们了解得相当清楚。

柏拉图的家世

柏拉图的父亲阿里斯通（Ariston）和母亲佩里克提奥妮（Perictione）均出自雅典名门世家。柏拉图在其对话《克里底亚篇》中，将其祖先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政治家梭伦（Solon）。梭伦在执政期间实施改革，将雅典引向后来的民主制。柏拉图有两个嫡亲兄弟，一个叫格老孔（Glaucon），一个叫阿德曼图（Adeimantus），都曾出现在其对话《理想国》中。阿里斯通去世后，柏拉图的母亲嫁给了派里兰皮斯（Pyrilampes），此人已有一子，名叫迪默斯（Demos，在柏拉图对话《高尔吉亚篇》中被提及）。柏拉图母亲佩里克提奥妮再婚之后，又生一子，名叫安提封（Antiphon）。柏拉图这位同母异父的弟弟一开始也研习哲学，但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在《巴门尼德篇》中，正是由安提封来叙述整场对话。柏拉图的继父派里兰皮斯有强烈的民主倾向（他儿子的名字迪默斯在希腊文中就是“人民”的意思）。公元前404年，雅典在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以惨败告终，一群仇视民主制的人士发动了一场政变，建立了三十人政府（史称“三十僭主”）。这三十人当中就有柏拉图母亲佩里克提奥妮的兄弟克里底亚（Critias），及她的侄子卡尔米德（Charmides），二人都在《卡尔米德篇》中现身。一场内战使柏拉图的家人反目成仇。我们不知道柏拉图自己持何种政治观点，人们一直对此大加猜测。由于苏格拉底是被恢复的民主制政府判处死刑，很有可能柏拉图对民主制怀有敌意。

从很早开始，柏拉图就被视为杰出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关于他自然有种种传闻。但是直到几代人之后，才出现记述柏拉图生平、可以被称为传记的作品。在柏拉图生前，无人留意此点。柏拉图的生平行事，有案可查的已然所剩无几，但是人们已开始关注对话后面的作者本人（如今我们许多人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找到一些柏拉图生平的记述，其中人们往往借助他的生平行迹来解释某篇对话中的某段为何这样写，特别是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段落。比如，有人说柏拉图曾

去过埃及求法。这种说法并非完全是天方夜谭。实际上，许多古代哲学家据说都去过埃及，特别是在古代晚期[1]曾流行一种学说，认为希腊的智慧实际上来源于更古老的东方诸国。《法律篇》中有一段话也许能说明柏拉图亲眼见过古埃及风格化的艺术（他认为远胜过古希腊标榜创新的艺术），但据此我们还不能贸然下结论。这到底是有助于理解《法律篇》的一条史料，还是从对话这一段中衍生出来的传闻，我们也不得而知。

图2　古埃及艺术一例。雕塑家乌色维尔（Userwer）的石柱，第十二王朝。

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可靠的材料来源，所以不能像了解后代哲学家那样了解柏拉图的性格特征。在他的对话中，他从不以自己的声音发话。无论我们对此作何解释，都不能通过稽考其生平来绕过这一问题。我们对他生平的看法无可避免地要受制于他创作的对话。

柏拉图论希腊与埃及艺术

《法律篇》中主要的发言者是一个雅典人，他宣称如今希腊人疯狂地追求创新和新风格。欲救此弊，希腊人必须学习埃及人如何

将艺术风格定于一尊，如何不要偏离传统。
雅典人：很早以前，埃及人就认识到我们现在所论的原则，就是说，城邦中年轻人平日所歌所舞应合于规范。埃及人将符合要求的歌曲和动作开列出来，展示于宗庙之中。明令禁止画家和其他工匠革新和创造任何不合传统的东西。即使现在，这项禁令对于画家、工匠、以及一般艺术都依然有效。如果你留意的话，会发现一万年前（我丝毫也不夸张）的绘画或雕塑与现在的艺术品相比，并无二致，而且技法也相同。
克莱尼阿斯（Cleinias）：真是不可思议。
雅典人：其实不过是立法者与政治家别具匠心的创制而已。

（《法律篇》656d-657a）[2]

这段话中有些地方显示柏拉图曾见过埃及艺术，有些地方则显示他不曾见到过。但不管怎样，都不会影响他的观点：在艺术领域，固定的程式化风格优于对传统的发展和创新。

不同的解释

几乎与柏拉图同时代，关于他的身世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他的外甥斯佩乌希普斯[3]，柏拉图一派哲学的继任者，就认为柏拉图真正的父亲不是阿里斯通，而是日神阿波罗。随即便有一整套传说流传开来：柏拉图生于阿波罗的诞辰日；一群蜜蜂飞来，停在婴儿的嘴唇上；苏格拉底在遇到柏拉图之前梦见一只天鹅，而天鹅正是阿波罗的神鸟。把柏拉图看成是个半人半神的人物，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荒诞离奇、不足为信的，而古人对此则习以为常，很多古代的名门大户都自称是诸神的后裔。翻译成现代语言，这等于说柏拉图是一个天才，一个出类拔萃、才智超群的人，完全超越他所生活的历史环境。关于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后来也有类似的传说。人们

认为柏拉图超凡脱俗，是因为其哲学体大思精。若以这种方式看待他，那么最重要的莫过于那些宏大的论断，而他求道过程中的具体论辩和思想，倒反在其次了。尤其在古代晚期，柏拉图被视为超拔于凡人之上的思想巨人，一位有超人智慧的圣哲。在柏拉图著作中（特别是《蒂迈欧篇》）不难找到相关的段落，刺激了类似传说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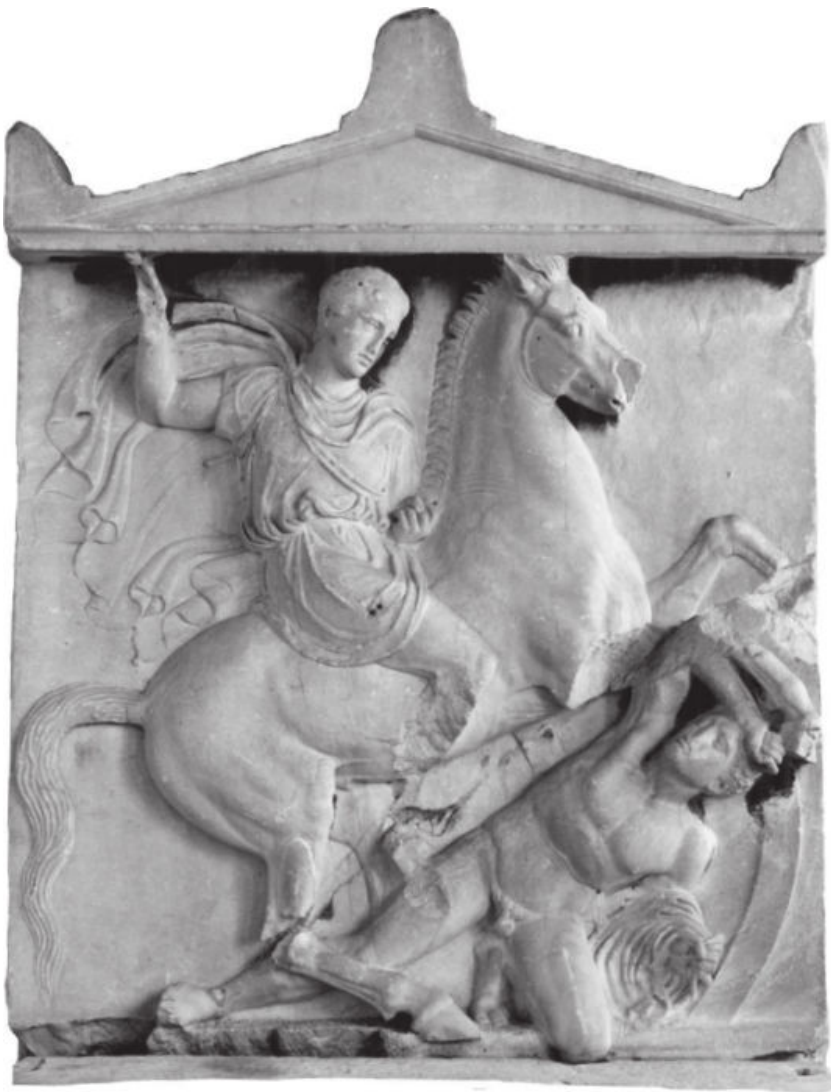

图3　古希腊艺术一例。刻有戴克西琉斯（Dexileos）像的纪功碑，公元前4世

纪。

与上述“阿波罗之子”传说迥然不同的是另一派的说法，主要在所谓的“第七书”中。在柏拉图流传下来的著作当中，有十三篇据称是他写给多人的书简。这十三篇中，绝大部分都是晚出的作品，但第七和第八篇当中没有明显与时代不合的细节。“第七书”当中包括一部分所谓的柏拉图自传，叙述其早年政治上的幻灭，以及后来几次秘密造访位于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城邦，力图游说城邦僭主狄奥尼西奥斯二世（Dionysius II）采纳更合理的政治制度。古人大都将这封信视为真作，以此阐明柏拉图何以对政治哲学采取如此理想化的处理。在19世纪和20世纪，更有人根据此信断定柏拉图哲学真正的原动力乃是政治。但是此说能否成立，还要视这封书信的真伪而定。无论如何，若认为柏拉图在这封信中袒露心扉，披露了个人经历，这都是错误的见解。这其实是一篇文辞丰赡的文学作品，旨在为柏拉图和狄奥尼西奥斯的对手狄翁（Dion）辩护。我们手上的只是一面之词。

对现代学者而言，这种“政治化”的解释自然要比“阿波罗之子”的解释显得更可信，也更具吸引力，而且这种解释已流行了多年。前者认为柏拉图哲学自有其政治用心，后者则认为柏拉图哲学是超凡天才（甚至是一位神）的产物，两相对照，前者更贴近于我们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不可遽然断定这第七封书信向我们揭示了对话后面的、“真实的”柏拉图，而他自己的外甥却大错特错。对柏拉图的解释一向有争议，很有可能在他去世之前争议便已兴起。

苏格拉底与学园派

研究柏拉图，有两点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一点是雅典人苏格拉底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点是他建立了“学园派”，西方第一个哲学学派。

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在追寻真理，但他追寻真理的方法却是全新的。他拒绝建立玄远的学说，不写哲学论文，也不写任何有关哲学的

著作，他追寻真理的方式只是和一个又一个人谈话，迫使他们意识到首要的工作是真正理解所谈的话题。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只有先充分理解我们未经深思便接受的那些观念—比如勇气、正义、其他美德、何谓高尚的生活、何谓真正的理解等等，哲学方能实现更高远的目标。这一点对柏拉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格拉底将哲学生活看作持续不断的探究和思索，而探究的对象无外乎他人和自己所持的信念。苏格拉底力主不断的探究胜过僵死的信条，寻求理解胜过耸人听闻的论断，这对柏拉图触动极深。苏格拉底还认为，哲学生活当是严肃的生活，在生死攸关之际，宁可一死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礼敬有加，自己所作哲学对话中，苏格拉底是大部分对话的主角，唯有《法律篇》中苏格拉底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柏拉图从不自己发话，而总是描写苏格拉底，将他视作一位不断找寻真理的哲人。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约生于公元前468年，卒于前399年。其父为石匠，其母为接生婆。他的妻子臧蒂普（Xanthippe）[4] 出于贵族之家。苏格拉底一度有财力作为重甲步兵 [5] 在军中服役，但晚年非常穷困。在《申辩篇》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说，正是因为他全心奉献给哲学，无心留意俗务，才变得穷困潦倒。他有三个儿子。在后来的记载中，人们说他还有另外一个妻子，名叫米尔托（Myrto）。

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受审，后被处死，当时正值民主制刚刚恢复。人们常常怀疑他之所以遭人嫉恨，是因他与推翻民主制的人互有往还，但是实际的历史情形已不可考。他被判有罪，罪名是引入新神和诱惑年轻人，这两项罪名听上去多少有些隐约其词。第一项指控很可能与苏格拉底的“神灵” [6] 有关，此种神灵经常阻止他做想做的事情。

苏格拉底很快便成为哲人的象征和代表，终生献身于哲学探究，甘心为哲学赴死。许多不同哲学学派也假托苏格拉底为本派开山鼻祖。苏格拉底未留下任何著述，而每一派都在他身上发现了符合自己的思想或方法。他饱受争议，有人奉之若神明，也有人疾之若寇仇。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曾作一剧讽刺苏格拉底，题名为《云》。即使在死后，苏格拉底也不断遭受攻击。许多友人写下为苏格拉底辩护的作品。我们目前还保存他的两位追随者埃斯基涅斯 [7] 和安提西尼斯的著作片断，这两个人与另一位追随者阿里斯提普斯后来均开创了不同的哲学流派。但是关于苏格拉底其人，我们主要的文献来源是色诺芬（Xenophon）和柏拉图。二人当中究竟谁对苏格拉底的描述更真实，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其实这种争论徒劳无益。从最开始，苏格拉底的形象便极具包容性，截然不同的思想都可以投射到他身上，因此色诺芬笔下自有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笔下也有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其间的差异只体现色诺芬和柏拉图二人思想的不同而已。在柏拉图对话中，柏拉图本人从不在对话中现身。苏格拉底通常是主角，而对话本身有时是直接对话，有时是由别人或苏格拉底转述。在不同对话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是大相径庭。他有时锲而不舍地质问他人的论点，有时信心十足地给出最终结论，有时则只是一名旁观者。柏拉图深受苏格拉底启发，并将其视为哲人之典范，但是哲学的使命与方法究竟如何，柏拉图自己的看法也经常改变，因此苏格拉底在不同对话中的形象也是千差万别。在苏格拉底发话较少的对话中，柏拉图已经不再拘泥于苏格拉底本人所代表的哲学观点。而在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对话中，我们不妨认为柏拉图展现了他所领悟的苏格拉底的不同侧面，而不必追问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忠实于所谓“真实”的苏格拉底，还是背离了历史原型。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具体年代，但我们知道，柏拉图在生命的某个

阶段作了两个重大的抉择。他放弃了家庭和结婚生子的公民义务。（柏拉图没有结婚，现代读者不会觉得惊讶，因为他的著作带有明显的同性恋倾向。但在古代雅典，结婚是使家庭和城邦得以延续而必须要尽的一项义务，与个人的性取向没有关系。柏拉图选择独身，便是放弃繁衍子嗣，这在当时社会看来是重大的个人损失。）他还创建了第一个哲学学派，称之为“学园派”，因聚徒讲学的运动场[8]而得名。

我们对学园的组织结构所知甚少，每一代学人都认为学园具有一些他们各自的大学制度的结构特征。亚里士多德在学园中盘桓了20年，据说在里面教过书，但我们最好把他看作是一名高年级研究生或者年轻教员。但我们别忘了，学园一直是一座公共运动场，因此柏拉图的学校不可能具备现代大学的许多体制特征。柏拉图不收学费，但只有衣食无忧、愿意花时间研究哲学的富家子弟才有能力长期在此就学。有一次柏拉图登坛开讲，讲授“善”，但讲课效果很不好。听众以为讲授的是良善的生活，而柏拉图却大谈数学。还有一部讽刺作品，讽刺学园的学生给一种蔬菜下精确的定义。但总体来说，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学园是集中讨论的场所，这意味着学生并非去那里学习柏拉图派理论。也许“学生”一词是个误称，因为这第一所高等学府不授学位，不打分数，不颁证书，也不给教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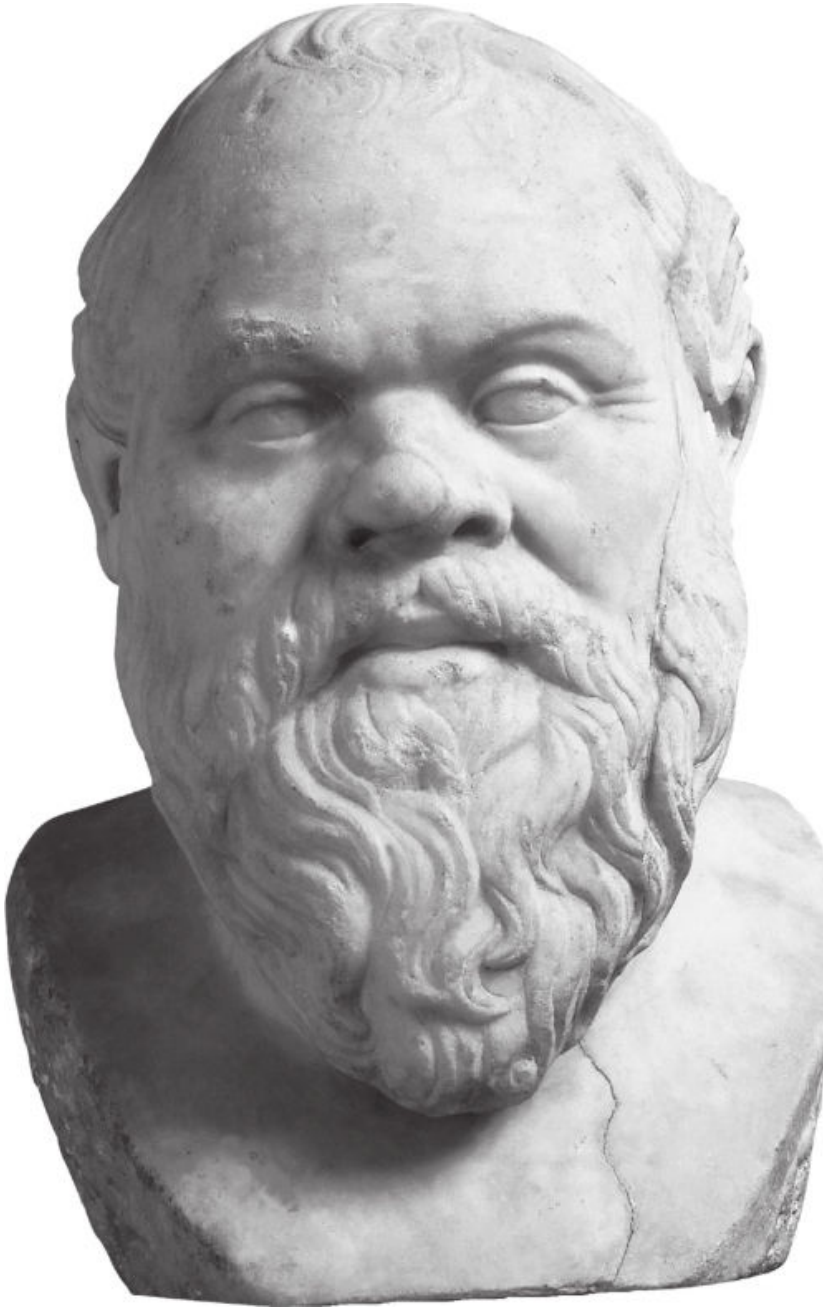

图4　苏格拉底半身像

在哲学上开宗立派与柏拉图所笃信的苏格拉底精神是有冲突的。苏格拉底拒斥所有带有学院气的哲学。但是我们将看到，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虽以探究的方式寻求真理，却不完全排斥个人确定的见解。来学园求学的人也不必附和柏拉图的意见。柏拉图最好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以及学园后来的两位掌门都与柏拉图的见解大相径庭。因此学园是一所学习如何进行哲学思考的学校，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延续了苏格拉底的传统。

但是在有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柏拉图不复遵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对同时代盛行的宇宙本源论没有兴趣，转而关注如何生活的伦理问题。柏拉图在古代被当作第一位系统的哲学家，他最先将哲学视为研究后世称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这些学问的独特途径。如果我们将对话作整体的考察，我们的确可以发现柏拉图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而且很有系统。所谓有系统是指柏拉图持续不断地关注一系列问题，而不仅仅提出一套周密的教条。古代和后代都有人将柏拉图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建立一套理论体系，也就是一般所称的“柏拉图主义”，但柏拉图本人从未这样做过。他留给我们的只是这些对话，至于从中抽取其思想、构建一个体系，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

哲学是一门与众不同的学问，自有一套单独的研究方法，与修辞学和诗歌等其他学问判然分明。柏拉图是第一位持这种观点的思想家。有时人们会说柏拉图创造了哲学，这是因为他坚持哲学与其他思想形式截然不同，而且他似乎最先使用“哲学”一词来定义他心目中的哲学，这个词的本意是“热爱智慧”。他肯定是哲学这门学科的创始人，他认为哲学是思索一系列广泛问题的独特方式。今天在学校里老师所教、学生所学的仍然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

注释

〔1〕 所谓“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指从所谓“古典时代”（Classical Antiquity）向中世纪过渡的历史阶段，具体起止年代并无统一标准，比较宽泛的说法是上起公元2世纪，下至7世纪（见著名学者Peter Brown的概述，*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1971；Norton

Paperback，1989]一书前言）。

〔2〕 根据作者英译文译出。

〔3〕 斯佩乌希普斯（Speusippus，约公元前407—前339），柏拉图的外甥，继柏拉图之后执掌雅典的学园。据后人记述，他的著作卷帙浩繁，今只存一些残篇。

〔4〕 这是严群的译法，王太庆译作克桑替贝，还有人译作桑提婆。

〔5〕 所谓“重甲步兵”（hoplites）指希腊城邦的公民，虽无财力养马，不能充任骑兵，但其财产足以购置全副盔甲，便可在军中作为重甲步兵服役。所需全套装备包括头盔、胸甲、胫甲、铜制盾牌、铁制短剑，以及用于进攻的长矛。

〔6〕 苏格拉底称有“神灵”（*daimonion*）降临于其心中，尤见《申辩篇》31d（严群中译本，页68）：“你们听我随时随地说过，有神灵降临于我心……从幼年起，就有一种声音降临，每临必阻止我所想做的事，总是退我，从不进我。他反对我从事政治。……”又见《游叙弗伦》3b（严群中译本，页13）：“我了解了，苏格拉底，因为你说神时常降临告诫于你……”。

〔7〕 埃斯基涅斯（Aeschines），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苏格拉底忠实的追随者，在苏格拉底受审和临刑时均在场。曾作多部苏格拉底对话录（今轶），据说忠实再现了苏格拉底的性情和谈锋。安提西尼斯（Antisthenes，约公元前445—前360），也是苏格拉底的忠实弟子（可见色诺芬《会饮篇》8.4及《回忆录》3.11.17）。一般被认为是犬儒学派的创立者，对最著名的犬儒哲学家第欧根尼，以及对后来的斯多葛学派均有影响。曾作多部对话录，也曾解说荷马史诗。阿里斯提普斯（Aristippus，生卒年月不详，比柏拉图稍长），苏格拉底的朋友。据说建立昔兰尼学派（Cyrenaicism），提倡享乐主义伦理原则。也有一说，认为该派是由其同名的外孙所创。

〔8〕 希腊文*gymnasium*一词指通常位于城墙之外的运动场，对所有公民开放。因希腊青年裸身在其中锻炼体魄，因此旅美学者刘皓明先生将其译为“裸斗场”。Academy本是雅典郊外的一处运动场，因希腊英雄阿卡德谟斯（Academus）得名。柏拉图在此建立自己的学校，直到公元529年这座学园才被迫关闭。

第三章

柏拉图解读法

理论与实践

柏拉图多次特意强调，哲学乃是以辩论求真理。哲学的最佳方法他常常称之为“辩证法”[1]，在不同时期他对此有不同认识，但有一点他从未让步：哲学自有与众不同的更高目的，有更严格的方法，胜过其他与之争竞的文化活动。在《理想国》结尾处，他说哲学与诗歌之间一直存在冲突（这里的“诗歌”指公开表演的戏剧和史诗，非指个人关起门来阅读的短诗）。在《高尔吉亚篇》和《费德罗篇》中，他以不同方式表现了哲学与修辞术之间的激烈对抗。哲学之鹄的唯在真理，而一味说服他人、不顾真伪，这绝非哲学，在意图和方法上都令人生疑。（请回想一下第一章中断案的例子。）并不是说在哲学和其他思想活动之间原已存在尽人皆知的区别，然后柏拉图加以说明。相反，恰恰是柏拉图明确了这其间的区别，他率先提出哲学自有其目标与方法，哲学有明确的、与众不同的研究题目，我们应当将哲学与其他思想形式划分清楚。很少有哲人像柏拉图一样区分什么是严格的哲学方法，什么是以劝诱方式左右他人的伎俩。同时，柏拉图又是最具“文学色彩”的哲人，最易于为普通读者接受，因为他的作品（至少有一部分对话）引人入胜，可读性很强。有一些著作与其说是哲学名著，还不如说是文学经典。即使是不那么文采飞扬的作品，里面也充满了隐喻、笑料和其他引人注目之处。

柏拉图著作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在于它们都以戏剧形式写成，要么是两人或多人之间的对话，要么便是独白，而独白经常是转述他人的对话。很多作品刻画对话者的性格栩栩如生，布局谋篇别具匠心，非常巧妙地吸引读者的注意。若与大多数哲人艰深晦涩、学究气十足的著作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不过，柏拉图一向反对凭借口舌之利劝诱他人，原因在于这些人引诱读者接受其结论，从不依靠辩论和思辨的力量。可柏拉图这些“文学”技巧岂不也在他的批评之列？这样一位文学巨匠怎么可能反对文学呢？这岂不等于太阿倒持吗？

苏格拉底的“伪装”

苏格拉底正在和埃里斯的希比阿（Hippias）谈话，后者是四处云游的“智术之师”，他标榜为职业的“智者”，收费授徒，讲授修辞术，还亲自负责公众事务。苏格拉底问希比阿：何以以往的智者都不是显达之士？

希比阿：你怎么想呢，苏格拉底？还不是因为他们无能，不会把他们的智慧运用于个人和国家？所以在这两方面他们均无建树。

苏格拉底：对呀，其他的技艺都有进步，与现代工匠相比，古人简直一钱不值。我们能否这样说：你这门技艺，你的诡辩术，也同样进步？与你相比，那些以智慧为业的古人也是一钱不值呢？

希比阿：是的，你说的没错！……

苏格拉底：……早先的思想家以为，在所有人面前公开展露自己的智慧，然后收取费用，这样做是错误的。他们的头脑真是简单，他们居然不知道钱是多么重要。但你提到的现代人［指高尔吉亚（Gorgias）和普罗迪库斯（Prodicus）］，每个人靠自己的智慧挣了大钱，超过任何一个工匠。在他们之前，还有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早就这样做了。

希比阿：苏格拉底，你根本不知道这样有多棒。如果你知道我已经挣了多少钱，你肯定要吓坏了！……我敢肯定，你随便举两个智术师，我一个人挣的钱绝对超过他们的总和！

苏格拉底：希比阿，你说的真好！这恰恰体现了你的智慧，也显示出今人和古人的不同。

（《大希比阿篇》281d-283b）[2]

希比阿以为苏格拉底在夸他。可是读者却看出苏格拉底认为智术应当求真理，蔑视以智术牟利的做法，故而对希比阿可以说是嗤之以鼻。这就是所谓苏格拉底的“伪装”，在他的谈话对手听起来是一个意思，而读者却明白这不是苏格拉底的真意。这种方法并

不永远奏效，但却使柏拉图著作中很多段落生动、引人发笑。

柏拉图著作

古代哲人的著作很难保存，但我们可以很放心地说：柏拉图所有“发表”的著作我们都有，包括一部未完稿（《克里底亚篇》）和几部在柏拉图谢世之后才归入他名下的短著。这几篇短著的文风和词藻均带有后代特征，我们用*来表示。而有可能出自柏拉图之手、但仍存疑的作品，我们用＋表示。

由于没有外证，我们无法确定柏拉图写作对话的顺序（只有《法律篇》似乎在他去世时尚未完成）。古人也没有一种权威的意见，来规定应按何种顺序传授这些对话，或者应按何种顺序从对话中归纳出“柏拉图哲学”来。一切都依靠读者的兴趣、聪明才智以及思想深度。

下列对话录顺序是由特雷西鲁斯 [3] 制定的，他是柏拉图派的哲学家，也是提比略皇帝（the Emperor Tiberius）的星象师。他将对话每4篇分为1组，理由如何，并不十分清楚。柏拉图著作很多版本都采纳他的顺序，包括哈克特（Hackett）版的柏拉图英译本全集。

《游叙弗伦》、《申辩篇》、《克力同篇》、《斐多篇》、《克拉底鲁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政治家篇》、《巴门尼德篇》、《费雷波篇》、《会饮篇》、《费德罗篇》、《阿希比亚德上》、《阿希比亚德下》*、《希帕库斯篇》、《恋人篇》＋、《泰阿格斯篇》＋、《卡尔米德篇》、《拉凯篇》、《吕锡篇》、《欧谛德谟篇》、《普罗泰戈拉篇》、《高尔吉亚篇》、《美诺篇》、《大希比阿篇》、《小希比阿篇》、《伊安篇》、《梅内克塞诺篇》、《克里脱芬篇》、《理想国》、《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米诺篇》*、《法律篇》、《艾皮诺米篇》*、《书信》＋、《定义》*、《论正义》

、《论德》、《德谟多克篇》*、《西叙弗斯篇》*、《埃利希亚篇》*、《阿希欧克篇》*、《格言集》＋[4]

超然与权威

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上面的问题：柏拉图的确在瓦解自己的哲学活动，系统地批判他所使用的文学形式。也许他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正用劝诱之术来攻击劝诱活动。也许柏拉图自有一套复杂的思想，旨在颠覆读者的期待。但还有一种解释更简单、也不那么极端，而且与柏拉图的知识论更吻合。

以对话体写作（不管是直接对话还是转述的对话），柏拉图可以将自己的哲学见解与对话角色的见解分开。作者当然隐匿于对话人物之中，因为所有角色都是柏拉图一手创造的。读者读到的是两人或多人之间展开的辩论，她读到的是一场争论，但如何解释此种争论，则要视她的能力而定。作者并不把结论直接交到她手上，也不借重自己的权威来迫使她接受。

这一点有时被人忽略，因为有人从对话中直接抽出柏拉图的思想，仿佛这些观点原本是用论说方式表达的。而另一些人则夸大了对话体带来的问题，他们甚至认为柏拉图本人不持任何明确的意见。既然我们认识到，柏拉图借戏剧化写作方法在所有作品中都与角色所持的观点保持距离，我们就应当分析一下哪些结论不能从这一前提推导出来。

我们不能认为柏拉图就像一个剧作家那样超然。他并没有构建出一个戏剧世界，在其中各个角色你来我往，供我们娱乐。柏拉图的著作提出严肃的问题供读者思考，这些问题旨在吸引读者进行认真的哲学思辨，而不是单纯来欣赏戏剧。因此，柏拉图刻画人物时有轻有重，并不是每个角色都需要我们仔细研究。有些角色面目可憎，有些滑稽可笑，还有一些则暗淡无光。许多对话的主角是苏格拉底，很多

时候他被理想化，被描绘成哲学活动的最高体现，与其他生活方式形成对照（当然不同的对话有不同的侧重）。

柏拉图一方面使用对话体，另一方面对论题持有自己的见解（有时将自己的见解通过苏格拉底之口道出），这两方面其实并无冲突。在一些对话中，苏格拉底与另一人争论，此人往往有一技之长，但苏格拉底总能让他明白他对于自己的专长其实一无所知。但苏格拉底并不表达明确的观点，甚至还宣称自己其实也一无所知。但这绝不等于柏拉图自己没有任何主张。柏拉图灵活地处理苏格拉底这个角色，并不是单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

柏拉图为何不直抒胸臆？如果他确有自己的见解，如果读者心知肚明，对话中唯有苏格拉底才代表柏拉图的观点，那么以戏剧化形式写作的目的何在？柏拉图为什么不直接站出来，告诉我们他的观点？

柏拉图极不愿意直接陈述自己的见解，不愿意以个人权威迫使读者接受这些观点。他当然知道有很多哲人写下权威性的论著，指点读者当如何思考很多重大问题。柏拉图本人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明确实在、不易动摇的见解，因此他在西方哲学史上才能独树一帜。但他也视自己为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别忘了，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只是考察其他人的观点，力图让他们自己去领悟。柏拉图也同样想要读者自行领悟道理。我们在第一章讨论断案的例子时已略及此点，在后面考察柏拉图关于知识和理解的理论时，我们还会看得更清楚，读者必须自悟，以领会柏拉图所言何意。柏拉图自信甚深，但他不愿意让读者仅仅因为这些道理出自柏拉图之口就不加思考地接受。

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在一些著名对话中，柏拉图让苏格拉底详述了一些确定的观点，而且信心十足，而他谈话的对象只是附和几句“对，没错”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以为在这些段落中，柏拉图在直抒胸臆，苏格拉底所说就是柏拉图所想。但是柏拉图不能替你思考，你必须身体力行，自己来理解其中的道理。有时读者会得到一些帮助，比如发现苏格拉底的话引起争议，或是被人攻击，或者一段、乃至一整篇对话的意思都晦涩不明。另外，即使对话本身的戏剧效果并不强烈，但柏拉图在形式上与苏格拉底（有时对话的主角是从埃利

亚来的访客）所说的话拉开距离，也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你弄明白了柏拉图的思想，也不能算大功告成。只有你自己想得清清楚楚，这思想才真正变成你的思想，而不是柏拉图的思想。千万不要因为柏拉图说过如此这般的话，便被动地接受。只有这时你所理解的才完全归你所有。

在一段著名对话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产婆，自己并不生养“孩子”，只为别人接生思想、检验思想。这个比喻并不说明苏格拉底缺少自己的思想，而是表示他将两种活动分开：一种是表达他个人的观点，另一种则是帮助读者自行了悟。柏拉图之所以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写作，是因为他也想将两件事情区分开来：展示他自己的思想和让读者自行理解这些思想。论到表达观点之慷慨激昂，没有哪位哲人能与柏拉图争锋。但柏拉图向来认为这与将个人观点强加于读者判然有别。在形式上，读者从未直接接触柏拉图自己的想法。读者看到的只是柏拉图借他人之口、以超然的方式表达的思想。

产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母亲非纳莱特（Phaenarete）是一名接生婆，苏格拉底自称自己也擅长接生术。

这方面我与产婆无异：如她们不生子，我是智慧上不生育的；众人责备我尽发问题，自己却因智慧贫乏，向无答案提出，——责备得对啊。原因在此：神督责我接生，禁止我生育。因此，自己绝不是有智慧的人，并无创获可称心灵的子息；然而，凡与我盘桓者，或其初毫无所知，与我相处日久，个个蒙神的启示，有惊人的进步，自己与他人都觉得。显然，他们不曾从我学到什么，自己内心发现许多好东西，生育许多好子息。神与我只为他们负责接生。

（《泰阿泰德篇》150c-d）[5]

根据类似内容的段落，有人以为柏拉图是怀疑派，不持任何意

见。

（《泰阿泰德篇》的某古代注家语）

神为何在《泰阿泰德篇》中让苏格拉底成为别人的产婆，而他自己却不生育？……假如一切都无法为人类所理解，那么神自然要禁止苏格拉底生育错误、无根据的伪说，而要逼他检验他人的意见。危害最大者莫过于欺骗和狂妄，若能帮助你摒弃愚妄，这样的辩论便是功德无量。……

这便是苏格拉底的医术，他治疗的不是身体，而是腐烂堕落的灵魂。但假如存在洞达真理的知识，而且亦有真理存在，那么不仅仅发现真理者能拥有真理，从发现者那里学习的人也能拥有真理。但如果你深信还没有得到真理，你倒更有可能得到，然后你便会拥有最好的，就如同你可以领养一个聪颖的孩子而不必自己生养一样。

（普卢塔克[6]《柏拉图解疑之一》）

两种传统

如何阅读柏拉图，古代就有两种解释传统，也就是两种研究柏拉图哲学的方法。最先兴起的一派我们目前已不太熟悉。柏拉图死后，学园的继承者便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理论。稍后，大约公元前268年左右，当时入主学园的是阿凯西劳斯[7]，他主张回到柏拉图对话中所昭示的论辩方法，因为在对话中苏格拉底总在与人争论，从不陈说或者捍卫自己明确的观点。苏格拉底总是就对方的观点进行论辩，然后指出对方的意见难以成立，而阿凯西劳斯将此方法视为以柏拉图的方式从事哲学思考的关键。柏拉图对于对话中谈论的观点保持一中立的立场，这一点最受阿凯西劳斯推崇，他认为柏拉图著作中那些明确的论断不过是供讨论的观点而已。无论如何，他将柏拉图学派推向古代怀疑主义的方向，就是说，我们应探究、质疑他人观

点的论据，而不可只信奉自己一家学说。这种“新学园派”或“怀疑论的学园派”延续了柏拉图学派，教导人们反驳流行的理论教条。直到公元前1世纪这一派才消失。

另一支传统称为“柏拉图主义”，与富有探究精神的学园派相对立，直到柏拉图自己的学校关闭才开始出现。这一派学者认为柏拉图在著作中系统阐发了一整套理论，可名之为“柏拉图主义”。这一派感兴趣的是柏拉图那些明确的论断，至于柏拉图坚信可以通过辩论来破除他人的见解，使每个人自行理解他人观点，该派则不以为然。从公元前1世纪到古典时代末期，都有哲学家为柏拉图理论作注疏，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对话的语言、细节和论点。他们也撰写了“柏拉图纲要”一类著作，将柏拉图思想组织成一个哲学体系。这一体系还以古代晚期常用的方式被划分为三种科目：逻辑学（以及认识论）、格致学（以及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及政治学）。一旦柏拉图思想以这种方式处理，人们便将其对话当作资料库，来确立他关于各种问题的立场。

这第二支传统又被现代学者分为“中期柏拉图主义者”和“新柏拉图主义者”。前者所作大多为中规中矩、学究气十足、枯燥乏味的作品，而后者始于公元3世纪，当时普罗提诺[8]对柏拉图作了全新的阐释，以独特、新颖的方式发展了柏拉图思想。但区分“中期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只是现代人的做法。在古代，根本的区别在于学园派和柏拉图主义的对立。学园派主“怀疑论”，好穷究不舍，从柏拉图那里继承了依对方观点进行辩论的传统，不偏听，不盲从，不随便将柏拉图理论当作颠扑不破的真理。另一支则是柏拉图主义传统，尊奉既定的教条，固执己说，不容争辩，这一派以为真正重要的是柏拉图关于灵魂、宇宙、德性和幸福的具体学说。对后一支的哲人而言，哲学活动就等于忠实地钻研柏拉图的著作，与时迁徒，发展他的理论，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我们最熟悉的其实是“教条化”的柏拉图主义传统。柏拉图著作有各种版本和译本，有各种注释本，还有解释他思想的学术专著或普及性读物（本书即为一例），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但我们也知道，决

不能指望现代哲学家能对柏拉图所讨论过的题目有任何发展。但我们忘了还有另一支传统。柏拉图也许不愿意我们过度关注他的思想本身，他更希望我们认真思考从事哲学的独特方式。这种传统在20世纪虽偶尔出现，但因经常采用怪异、不近人情的方式，所以少有人认真对待。在最近几年中，研究古代哲学的学者对古代辩论方式更为关注，所以这后一支传统又开始引人注意。

这两种传统是否注定是水火难容？有时如此。但它们也有可能共存，相互借鉴。即使你认为柏拉图的魅力在于其灵魂说、理念说、或完美生活的思想，你仍然可以从柏拉图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不要固执己见、比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即使你认为柏拉图最吸引人的是他对苏格拉底的刻画（苏格拉底永远在追问，从不自诩已然获得知识），找出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发表的明确观点也不失为一桩趣事。

柏拉图是不是怀疑论者？

柏拉图是不是古代所谓的“怀疑论者”？他心目中的哲学活动是否只限于质疑他人观点，而从不提出已证实的结论？
西塞罗（Cicero）回答“是”。

怀疑论的学园派也称“新学园派”，但我以为也可称作“旧学园派”，将柏拉图归入新派和旧派均无不可。在他著作中找不到确定不变的观点，能找到的是就同一个问题正反两方面的辩论。一切都要被探究，没有确定的结论。

塞克斯都·恩披里克是另一种类型的怀疑论者，他的回答是“否”。

有人说柏拉图是独断论者，也有人说他是怀疑论者，还有人说他二者兼而有之（在运动场中，苏格拉底出场时，要不就在与人游

戏，要不就在与智者派的人争论。人们说柏拉图以“质疑”而著称。但是当他通过苏格拉底、蒂迈欧或其他人郑重其事地提出论断时，他又是个独断论者……）。我们以为……当柏拉图论到理念、天道、或者德行胜过邪恶的时候，就算他认可这些事果真如此，他所持的也只是意见。如果他坚持认为这些事可能性极大时，他便已然放弃了怀疑论最显著的特征……[9]

多重声音？

“柏拉图有多重声音，而不是众多理论。”这是阿里乌斯·狄迪莫斯[10]的观点。他是擅长笺注的一位古代哲学家，他发现我们读柏拉图对话时会越来越感到困惑，不知道当如何把它们联系起来。即使我们认为在某些对话中，柏拉图可能暂时认同苏格拉底或埃利亚来客所持的观点，我们仍然会发现侧重点和角度不同，因而很难判断某一主题到底有多重要。我们还发现对同一主题往往有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而且不同对话中的观点彼此冲突，几乎不可调和。

历史上对这一问题有很多解答。有一种说法认为，柏拉图写作对话的本意在于，每一部作品都自成一体，若要将所有对话放在一起，营造一个理论体系，这便大错特错了。我们很难反驳这个观点，但也很难贯彻这种想法。比如我们读《申辩篇》、《克力同篇》和《高尔吉亚篇》，就不可能认为其中论述“善”和“幸福”的部分毫无关联。而当我们读到《普罗泰戈拉篇》中论幸福的段落，发现与《高尔吉亚篇》中的论述明显矛盾，若仅仅归结为每一篇对话都对同一问题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就很难让人满意。有一些思想线索始终贯穿于柏拉图很多对话中，我们自然跃跃欲试，想把这些思想整合在一起。

但是，在这些思想中我们能发现何种统一性？有些解释者发现柏拉图思想高度一致，但是对于不同对话中的不同讨论方式，他们或避而不谈或有意贬低。古代柏拉图主义者便代表这种倾向。这一派最极

端的做法是将所谓“柏拉图主义”看作一成不变、铁板一块的一套思想，先已存在于柏拉图心中，至于这些思想在对话中是如何表达和呈现的、柏拉图的论辩是如何展开的，这些因素都对这些思想毫无影响。坚持这种意见的人损害了柏拉图的名声，好像柏拉图只醉心于教条而不管辩论。到了20世纪，大家越发关注对话中论辩的细节，逐渐接受这样的看法：柏拉图不止一次返回到同一个思想，每次处理方式均有不同。直到不久以前，学术界还普遍接受一种进化的模式，认为柏拉图的著作体现了他思想的“发展”。具体说来，早期对话里苏格拉底只辩论不给出结论，到了所谓“中期”和“晚期”对话，柏拉图便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观点的前提颇为可疑，比如柏拉图的生平、著作的准确年代不易确定，而苏格拉底是否仅仅是柏拉图的传声筒，也未可知。这种方法如今已遭到怀疑。虽然用这种方法可以解释一些问题，比如为何有明显矛盾的段落等等，但实际上还有其他解决办法。

柏拉图的思想也许是或松或紧地连缀在一起，也可以说是或多或少以独断的方式提出的。许多强调教条的柏拉图主义者不明了柏拉图何以拒绝直接表明个人态度，他们也损害了柏拉图的声誉，好像柏拉图只是在利用苏格拉底或者埃利亚来客，把他们当作自己发号施令的传声筒。柏拉图拒绝提出武断的学说，这一点我们应该予以尊重，但这不影响我们对他思想产生兴趣。很多人觉得，在通读对话过程中，他们一点一滴地积累，慢慢感觉到一整套清晰的思想。他们还认识到，柏拉图每一次陈述这些想法，都不是最终的定论。

虚构、神话、哲学

哲人以求真理为要务，故不会需要那些我们称之为虚构的东西，因为我们明知故事为假，却还要以此为娱乐。柏拉图更进一步，他对当时盛行的虚构故事，主要指公开上演的戏剧和诵诗，深恶痛绝，这是尽人皆知的。他了解这些叙事作品影响巨大，能决定我们对自我和社会的认识。他强烈反对人们不假思索就用这些强有力的叙事形式来

传播传统思想，这会贻害无穷。尤其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传统教育给人们灌输的是诸多妄见，包括对神的信念、以及如何过正当的生活。[11] 荷马史诗和古代戏剧故事（相当于现代社会中的大众娱乐）美化了武士社会的价值观，根本不适用于公民社会中的人，因为公民社会中的人必须与他人协同合作。

我们称之为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东西，如果轻率地用于微不足道或有害的事业，这是柏拉图所深恶痛绝的。但我们已经说过，他自己却是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家，而且自己深明这一点。他致力于哲学研究，探索真理，这从两方面改变了他对自己文学才能的态度。

首先，他认为这些才能的作用非常有限。他的一些对话加入了哲学以外的东西，但他并不希望我们就此裹足不前。即便在那些容易理解、引人入胜的对话里，柏拉图也总是明确告诉我们：哲学要不断地争论、审视、检验不同的意见，至于我们的想象力是否能得到满足，则无关紧要。

另外，柏拉图认为，想象力和创造性没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他只是利用它们来追求他心目中的正确观点。他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看法，深受历代清教徒喜爱，那就是他认为并不存在完全无害的娱乐。对于柏拉图来说，一个好故事的价值在于能鼓励我们想到、并能深思崇高的价值。反之，如果听任我们接受本文化中那些未经怀疑的价值观，这便是于人有害的故事。

因此，柏拉图在其作品中大量运用传统形式，比如故事、生动的形象、还有神话，也就是那些涉及超自然的故事。但是故事的内容已被彻底改造，尤其在神话方面，当时人们普遍接受多神论，认为诸神干预人事，但相互之间漠不关心或彼此仇视。柏拉图抛弃了这种观念，代之以一神论的思想，并认为神只产生善。在《高尔吉亚篇》、《斐多篇》、《理想国》、《费德罗篇》和《政治家篇》等对话中，柏拉图都使用了复杂的神话，他把神话当作文学素材，强化了对话中辩论的观点。

柏拉图著作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是大西岛[12] 的故事，这不免让人莞尔。这篇未写完的故事载于其《蒂迈欧篇》的开篇和《克

里底亚篇》的残稿中。他先描写了古代雅典的理想政体，面临大西岛的入侵。大西岛位于希腊世界西边，是一个富庶的国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该岛原本也是一完美的政体，但因自身缺陷，导致其向外谋求武力扩张。单单这个故事的开头就已开启了乌托邦文学的先河，也影响了传奇、动作片，以及描写神秘外来者威胁地球文明的科幻电影。（这些作品与柏拉图的著作相比，要显得粗糙许多，因为柏拉图并没有让读者轻易地将自己视为“好人”，也没有皆大欢喜的结局。）

最有趣的是，柏拉图让叙述者在讲故事之前加了一个长长的引子，称此故事得自古埃及的祭司，因这些祭司保存的记录比希腊人远为古老。叙述者称，希腊文明屡遭毁灭，又屡次振兴，因此希腊人已不知本国历史。这一说法吸引了很多人决意发掘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有人业已在很多地方“发现”了“真实”的大西岛，比如在地中海、塞拉岛[13]和特洛伊遗址，在地中海以西，在史前的不列颠，在爱尔兰、丹麦、南美洲、尤卡坦[14]、巴哈马群岛、北美洲，或者是已经沉入大西洋的一片大陆。人们前仆后继，不断寻找大西岛，这显示了阅读柏拉图的危险，因为他明显使用了典型的虚构手法：先强调某一事件确有其事，再称此乃无名的权威人士所发现，实际用以说明后面的记述不过是文学虚构而已。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借这个故事来思考我们现今关于政府和权力的观念。如果我们不去深思这些问题，而去从事海底探险，那便大错特错了。人们不断将柏拉图错当成历史学家，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到他不信任文学写作，或许自有其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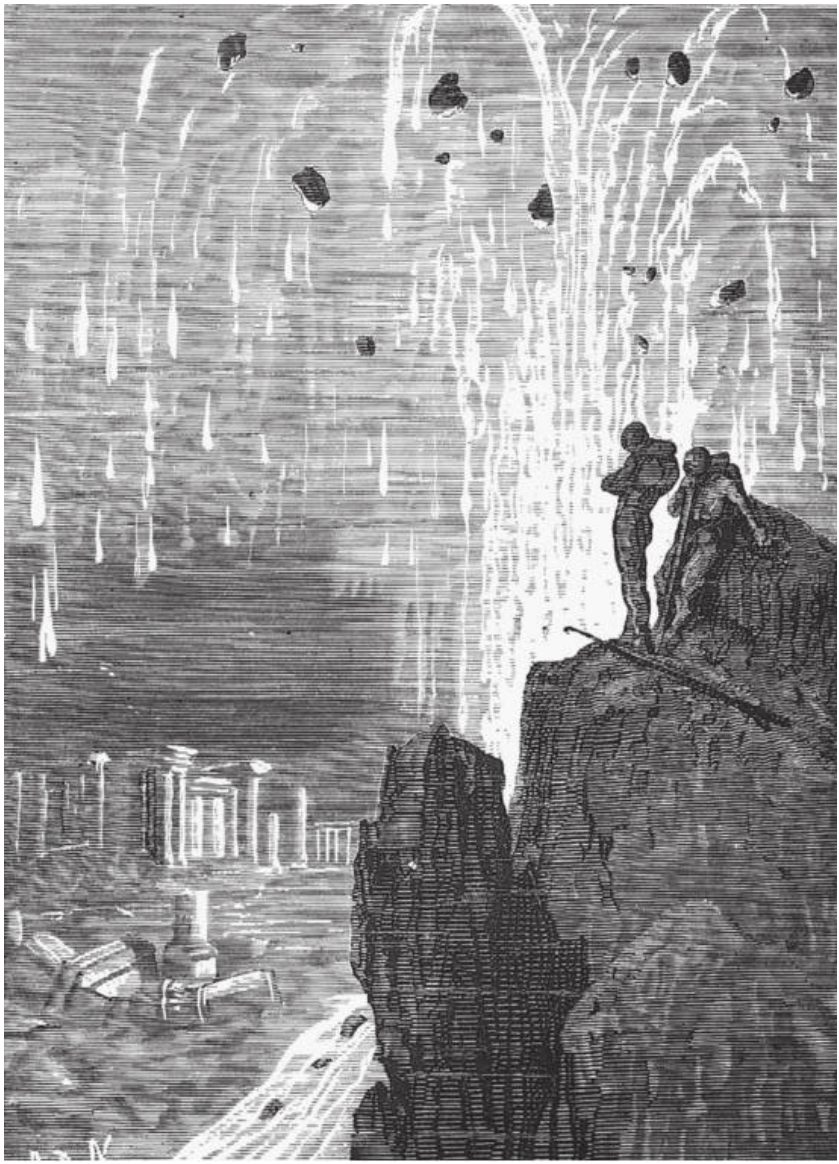

图5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于1870年出版的《海底两万里》中，尼默船长（Captain　Nemo）潜艇上的旅行者发现大西岛海底遗址被海底火山照亮。大西岛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科幻小说和电影（包括一部迪斯尼动画片）中，被描绘为一座海底城市，有时还有居民居住。来自现代文明的勇敢的探险家们重新发现了这座古城。

注释

〔1〕 这是对dialectic一词常用的译法，指通过问答方式讨论哲学问题。

〔2〕 据作者英译文译出。

〔3〕 特雷西鲁斯（Thrasyllus），生年不详，卒于公元36年，以精研星象学闻名于当世。

〔4〕 柏拉图著作题目的中译主要采纳《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的译法，有几篇或依通行译法（如《理想国》），或沿用严群的译法（如《游叙弗伦》、《克力同》等）。

〔5〕 严群译，《泰阿泰德·智术文师》（商务印书馆，1963年），页35-36。为读起来更顺畅，个别文字稍有改动。另，我将严群译文中的“上帝”一律改作“神”，因为中文“上帝”一词几乎已为基督教所垄断。

〔6〕 普卢塔克（Plutarch）生于公元50年之前，卒于120年之后。他是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和传记作家，以《希腊罗马名人传》流传最广。

〔7〕 阿凯西劳斯（Arcesilaus），大约生于公元前316或315年，卒于公元前242或241年。曾执掌雅典学园，否认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持有任何确定不变的学说，力主从正反两方面就任何论题作辩论，主张“搁置判断”。

〔8〕 普罗提诺（Plotinus），生于公元205年，卒于269或270年，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著有《九章集》（*Enneads*）。

〔9〕 西塞罗一段话出自《学园派》（*Academica*）卷二，46节。恩披里克一段话出自《怀疑论纲要》卷一，221-223节。（以上是作者在书后所列参考书中注出的。）但查西塞罗文本，此段实出自卷一第46节，作者引证时恐一时失察。塞克斯都·恩披里克（Sextus Empiricus），公元2世纪的怀疑派哲学家，具体生卒年月不详，曾广泛批驳了当时其他学派的观点。以上两段引文据作者英译文译出。

〔10〕 阿里乌斯·狄迪莫斯（Arius Didymus）是公元前1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哲学家。

〔11〕 主要见《理想国》卷二和卷三，376e-398b。

〔12〕 大西岛（Atlantis），或音译为“亚特兰提斯”。

〔13〕 塞拉岛（Thera）是古希腊岛屿城市，位于爱琴海中，今名Thira，传说即为亚特兰提斯。

〔14〕 尤卡坦半岛（the Yucatan），位于中美洲北部、墨西哥东南部的半岛，是古玛雅文化的摇篮之一。

第四章

爱欲与哲学

片面理解柏拉图

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曾说过，柏拉图在古代异教哲人中最接近基督教。[1] 奥古斯丁与其他早期教会神学家急于借重柏拉图的权威来发展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但他们忽视了柏拉图思想当中为犹太教和基督教极力谴责的成分。从此以后，人们总是片面理解柏拉图，有时甚至有意曲解，这未尝不令人心痛。

在柏拉图写作对话的时代，人们普遍认可并接受男人之间的情欲和性爱。尤其在青年男子和成年男性之间，年长的“爱者”往往充当年轻的“被爱者”的精神导师，指点他进入成人社会。这种关系被涂上浪漫色彩，而且人们认为同性间的感情不会危及婚姻这种乏味的社会关系。

图6　柏拉图所处社会的爱者与被爱者

在《会饮篇》和《费德罗篇》中，柏拉图将爱情当作哲学的背景，或者哲学的一部分。在其他对话的场景中，爱情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在本章和后面几章中，我将探讨柏拉图的观点。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对话这种写作形式使作者与对话人物拉开距离，我后面就不用再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点了。

柏拉图不仅仅接受同性恋为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持一种浪漫的观点，并在两方面走得更远。他强调同性恋关系中教育的因素，将这种关系升华为理想的师生关系，从而完全超出肉体上的吸引，使之变成老师对学生灵魂（指心理和心灵生活）的关切。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柏拉图式的恋爱”，它指的是一种浪漫的爱情，但由于关注的是灵魂而非肉体，因而此种爱情的实质被彻底改变。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总是在竞技场中与年轻人消磨时光，但他关心的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有时，苏格拉底也自称是爱情专家（指充满性欲的浪漫爱情）。

这一点肯定会遭人误解。在竞技场中晃荡的年长者感兴趣的是年轻人的身体，而非灵魂。《会饮篇》中有一段（215a-222b）正是要表明苏格拉底的爱到底意味着什么。阿西比亚德（Alcibiades）是一位英俊、聪慧、富有的雅典少年，身边不乏年长的追求者，但苏格拉底毫不为他的美色所动，这一点深深地吸引了这位年轻人。阿西比亚德发现唯有苏格拉底能让自己因虚度时光而感到羞愧，唯有苏格拉底才能使自己向往更好的生活。他想让苏格拉底成为他的良师，于是决意以色相引诱苏格拉底。从打情骂俏到与苏格拉底同床共枕，他一切手段用尽，但仍没有奏效。苏格拉底只是说，如果他真能使阿西比亚德浪子回头，这便是真正的奖励，远胜过单纯的性爱。[2]

尽管这一段雄辩动人，但仍然未能阻止其他人的误解。后来的讽刺作家琉善[3]讽刺了一位柏拉图派哲人。他准备做一位少年的老师，但少年的父亲非常担忧，于是这位哲人安慰道：吸引他的是灵魂，而非肉体，即使他的学生与他同榻而眠，他们也毫无怨言！[4]

爱与性

诚然，有一些段落，尤其是《费德罗篇》，显示出一旦二人的关系从师生提升为更平等的道友关系，性欲并非完全被排除在哲学关系之外（但不是那种最高尚的哲学关系）。对柏拉图而言，性欲并不构成问题。问题在于，一方面要全心奉献给哲学探究，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忽视日常需求，这其间的分寸如何把握，这才是关键。

另外，柏拉图使用充满激情的同性恋语言，有时别有深意。最明显的地方在《会饮篇》，他将对哲学探究的冲动描写为对性欲的改变。在论“爱的阶梯”一段，苏格拉底描绘了性欲冲动如何能得以升华和净化，最终引导人超越感官的满足，从对美的物体的占有转为对普遍真理的深思和领悟，真正的快乐无过于此。[5] 人们经常拿柏拉图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对比，但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理解的冲动可以回溯到人人皆有的原始本能，此种本能保持其能量和紧张，可以转化为具有复杂思想结构的东西。两相对比，柏拉图的观点没有那么简单化。

柏拉图为何偏要将哲学思考的冲动回溯到爱欲？也许他喜爱这种解释，因为这种解释有可能将两类截然不同的事物归结到同一个原因。哲学冲动归根结底来自人的内心深处，而且真实无伪。柏拉图真切地感觉到这与爱欲极相似，因为此种冲动来自内心，决不可有意为之，而且正如爱欲一样，此冲动驱使你竭尽全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不管目标多么难以企及，你仍然感到这是你全部生命的意义所在。但哲学也不是孤独的活动，没有人像柏拉图那样强调互相切磋和辩论的重要。若要在哲学方面有所进益，必须借助两人或多人之间的谈话，仅凭一个人苦思冥想是不够的。有时柏拉图强调，爱情能产生一对伴侣，他们有共同的关切，超越了每个人单独从爱情中能得到的收获。哲学同样需要往复辩驳，需要相互砥砺和相互扶持。因此哲学与爱欲相似之处甚多，这一点的确出人意料。爱欲如何能阐明哲学，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柏拉图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来讨论，这的确是伟大的创见。

性别问题

对男性来说，这种观点也许很有启发。但女性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却遇到很大的问题。因为柏拉图对话中完全以男性同性恋的语言讨论性爱，丝毫没有考虑女性，或者将女性视为低等、当被放弃的选择。柏拉图谈到男性之间的爱能生出思想的“后代”，远胜过男女结合所生的有血有肉的后代。此处柏拉图沿袭了当时歧视女性的偏见，他认为男性之间的爱情无论在精神还是在其他方面都优于异性恋。当然，在表达这种偏见时他可能有夸张之处，对同性恋的作用也有所夸大。（女性间的爱情他不感兴趣，可能他对此所知甚少。）但柏拉图对女性的态度却非常复杂。在他著作中他显然不考虑女性读者的感受，但在《会饮篇》中，当论到“爱的阶梯”时，这一番宏论却出自一位女性，一位名叫迪奥提马（Diotima）的女巫。尽管柏拉图厌恶女性，但他也体察到女性所遭遇的问题，这个问题哲学家直到最近才开始理解。

妇女的潜能与家庭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在《法律篇》中也有所涉及）：在理想的社会里，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小家庭将被废除、或者被严格限制。柏拉图深感家庭的弊端，因为人们学会自私自利，对家庭之外的人争强好胜、充满敌意，这阻碍了人们对更大群体的关心。他以为，只有当家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受到钳制，城邦中的公民才能真正热爱自己的城邦以及城邦所奉行的理念。这个想法若能实现，还有助于妇女释放自身的潜能，她们有可能摆脱相夫教子的封闭生活，而和男子一样，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施展自己身心各方面的能力。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以非常理想化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成为武士和哲人。[6] 在《法律篇》中，

柏拉图更加务实一些，他认为女人可以突破传统的束缚，从事更多的社会活动，但小家庭不必废除。这样的想法，即使表述得不那么绝对，在柏拉图时代也可说是振聋发聩，为此也招致了很多嘲笑和误解。

这些问题在近代已经被充分、系统地讨论过，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所提方案的种种缺陷。这种理论不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而是从有关人性的抽象论述中以先验方式推导出来的，因此无法应用于现实社会。这种理论虽然冲决传统思想的束缚，但不切实际，在历史上没有造成实际的影响。此外，柏拉图虽然在理论上认同男女平等，但实际上仍坚持认为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表现均不及男性。[7] 原因在于，他认为若改变妇女的命运，必须要求她们做与男人相同的事，扮演男人所扮演的角色。他没有看到在女性身上、在她们的社会活动中有任何值得尊重、值得保留、需要男性和女性共同承担的东西。因此他不断贬低、歧视女性。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人们对柏拉图有不同的定位。有人视柏拉图为女权主义的先驱，因为他觉得不应该将女性排除在男性活动之外。也有人认为他从骨子里反对女权主义，因为他认为我们可以关注女性，但目的仅在于将女性按照男性理想来重新塑造。考虑到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且女权主义阵营内部也有分歧，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活动和女性特质究竟应该抛弃还是应该珍视，意见并不统一。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柏拉图的观点会引起不同的回应。我们既可以批判他缺乏对女性的理解和同情，也可以赞扬他能够注意到妇女社会地位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他哲学家无人思考过这个问题，这说明柏拉图思想的独创性。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他对流行的思想少有怀疑。妇女操持家务、没有政治权利、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亚里士多德颇能代表过去哲学家的基本态度。

有一个故事，说柏拉图的学园里还有两个女学生，一个叫拉斯特妮娅（Lastheneia），另一个叫阿西欧提娅（Axiothea），她们俩都是在读完《理想国》之后，女扮男装混进学园的。这个故事可能是有人读了《理想国》之后杜撰出来的，但无论是真是假，都说明在人们

看来，柏拉图认为性别与思想发展毫无关系。

性与性别

虽然柏拉图一向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地位显赫，但20世纪之前，出于各种原因，他关于性、爱情和性别的观点一直被视为哲学讨论的禁区，人们故意漠视他对话中相关的内容。这种虚伪的态度虽不始于19世纪，但在19世纪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当时柏拉图著作在大学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维多利亚时代对柏拉图著作中同性恋因素的刻意回避

汤姆·斯多帕的剧作《爱之创造》捕捉到维多利亚时代牛津大学中对柏拉图的矛盾态度。[8] 剧中提到两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一个是沃尔特·佩特，他本人是同性恋，他著有《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一书，书中柏拉图对男性美的爱恋几乎坦露无遗。[9] 另一个人物是本杰明·周伊特，他是牛津贝里奥学院的院长，翻译柏拉图的大家，是牛津柏拉图研究（特别是《理想国》）的开山者。[10] 在斯多帕的剧中，周伊特指责佩特给贝里奥学院的一位学生写了很不得体的情书。

佩特：……你竟然反对柏拉图式的激情，这实在让我震惊。

周伊特：就柏拉图而言，柏拉图式的激情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若不防患于未然，那么校园会变得空无一人，监狱则会人满为患。在翻译《费德罗篇》时，我绞尽脑汁，把他对恋童癖的描写改写成英国绅士淑女之间的脉脉温情。如果柏拉图有幸在贝里奥学院执教，他自己一定会做类似的改动。

佩特：院长大人，我们一向尊奉希腊文化为人类文化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无论其道德风貌还是思想深度，同时代其他文明根本无法望其项背。但是，不管您有多少聪明才智，都无法清除男童

恋，因为此乃希腊社会最鲜明的标志。
周伊特：多谢你提醒，但一个本科生实不足以构成鲜明的标志，我已致函学生家长，请这位学生离校……腐蚀希腊文明的瘟疫决不容在贝里奥学院肆虐！

同性恋在当时根本无法公开谈论，要读柏拉图，只能靠经过删改、引人误解的译本。同时，人们也隐隐约约感到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大概不是为社会认可的异性恋。让·德尔维尔（Jean Delville）的象征派绘画《柏拉图学校》正表露此种态度。柏拉图被刻画成与基督相仿的精神领袖，身边是12弟子，这些弟子赤身裸体，不辨男女，意在表现他们是没有性欲的灵魂。但看上去，毫无疑问是女性化的俊美少年，围绕在一位年长的精神导师周围。难于启齿之事通过强烈的暗示得以传达，但隐讳的表现方式一定会让柏拉图大惑不解。对柏拉图来说，同性恋并不需要遮掩，也无需感到羞愧。

柏拉图认为女性也应有与男人一样的社会地位，这一看法虽不能说大逆不道，但也一直沦为笑谈。直到19世纪的妇女运动，这一看法方被当作严肃的政治议题。150年来，人们一直带着这个问题谈论《理想国》。单纯就这一点而论，研究柏拉图对现代女权主义的讨论并无帮助。柏拉图的出发点以及很多假定距离我们太过遥远，他已无法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

但是柏拉图对女性的态度，显示出他最激烈、最具开创性的一面。他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并非天经地义，女性能胜任男性所有的工作，仅此一点已然是发前人所未发。尽管他关于爱欲与哲学的思想非常独到，但若我们平心而论，他对同性间爱情的思考并没有太多独创性。只是由于后来很多读者为同性恋问题搅得不得安宁，这才夸大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图7　19世纪末期风格的柏拉图

注释

〔1〕 见《上帝之城》卷八，第五章。

〔2〕 可参见刘小枫的译本，见《柏拉图的〈会饮〉》（华夏出版社，2003年），页101-116。

〔3〕 琉善（Lucian），生于公元120年前后，卒于180年之后，讽刺作家，以希腊语写作多种对话。周作人将其名字译作“卢奇安”，后按读音译作“路吉阿诺斯”。周作人晚年煞费心力，翻译了他的重要对话，见两卷本《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

〔4〕 这实际上是琉善所作对话《柏卖学派》中苏格拉底的话。该篇对话描写宙斯命人将当时流行的哲学学派摆在市场上进行拍卖，欲购买苏格拉底的买主正需要为自己的孩子请一位老师，于是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说：“但是和美少年交际，有谁比我更是适当呢？因为我所爱的不是身体，这乃是灵魂我所认为美丽的。实在是，就是他们和我在一件大衣底下睡觉，他们可以告诉你，我决不会亏待了他们”（周作人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下卷，页697）。

〔5〕 关于“爱的阶梯”，见刘小枫译本，页89-94。

〔6〕 见《理想国》卷五456a-b。

〔7〕 比如《理想国》卷五451a-e，455d-e等处。

〔8〕 汤姆·斯多帕（Tom Stoppard，1937—），英国当代著名戏剧作家。《爱之创造》（*The Invention of Love*）一剧发表于1997年，描写英国古典学者和诗人豪斯曼（A. E. Housman，1859—1936）死后回忆年轻时代牛津的人物和风貌。当时，维多利亚时代刻板的道德观念受到冲击，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和同性恋风气开始抬头。

〔9〕 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英国19世纪的“唯美主

义”代表作家。1873年出版《文艺复兴》一书，一举成名。佩特对王尔德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0〕 本杰明·周伊特（Benjamin Jowett，1817—1893），英国19世纪著名的古典学者，从1855年起即成为牛津希腊文教授，并长期担任牛津贝里奥学院院长（Master of Balliol College）。1871年出版4卷柏拉图英译本，长期以来一直是英语世界最流行的柏拉图译本，影响至为深远。很多研究柏拉图的现代学者对其译笔颇多指摘，认为不能紧扣字面义，增饰过多，但平心而论，周伊特对柏拉图研究的贡献不可磨灭。此外，周伊特还著有多种神学著作，在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宗教界也是关键人物。

第五章

德行：个人与社会

如何获得幸福

在许多对话中，柏拉图力图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过完美的生活。他的出发点是当时社会普遍持有的观点，那就是，我们都在追求幸福。伦理学就是指我们不仅关心如何生活，更要关心如何才能有高尚的生活，使人生活得更有意义。人人追求幸福，这里的幸福是指高尚的生活（这与现代人关于幸福的观点截然不同，因现代人将幸福等同于快乐，而对于所有古代哲人，幸福意味着成就一种高贵、人人羡慕的生活）。柏拉图从未怀疑这便是一切伦理思考的起点。但究竟什么是高贵的、人人羡慕的生活，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柏拉图给出的答案与常人迥异，也与其他哲人不同。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许多人都想当然地以为幸福生活意味着有所成就，所以成功人士，尤其是有钱人，日子过得安稳的人便可称幸福。如果有人说，被社会排挤的失败者的生活是幸福的、令人钦佩的，而且是值得我们效仿的，那么这种观点一定会被视为怪论和谬说。但柏拉图受苏格拉底影响甚深，而苏格拉底放弃世俗功名，一心致力于哲学，最终受审、被处死。但在柏拉图看来，苏格拉底的生活才真正值得赞美。这样看来，大多数人关于幸福生活的观点是大错特错了。

但错在何处？他们认为如果拥有一般人珍视的东西，比如健康、财富、美貌等等，这样的生活就很美满，他们就很幸福。可是问题在于，这些东西真有价值吗？真会有益于你吗？柏拉图认为你就像拿着工具和材料的工匠一样，只有当你使用这些外在之物，用它们来完成某种工作的时候，它们才对你有益。另外，你必须用这些外在之物做正确的事，将它们合理、明智地使用，否则它们对你无益，甚至对你有害。比如说，赢了彩票的人可能不会因为赢钱而更加幸福。如果赢来的钱她使用不当，这笔钱便对她毫无益处，甚至还会毁了她的生活。幸福不仅仅是你所拥有的那些东西，你还必须将这些东西用于正

当的途径，就像工匠对待她手上的原材料一样，然后这些外物才会对你真正有所裨益，使你的生活更加完善。

因此我们看到，那些让我们合理使用物质条件的美德，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称其为“神界之善”，与此相对的是单纯由外物本身构成的“人世之利”。没有前者，后者对我们毫无裨益。因此，健康和财富的真正价值在于我们是否拥有勇敢、正义这些美德。而如果这些美德对于我们人生有所帮助，必须以理性的推断作为基础和指导。因此，在《欧谛德谟篇》中，使人生更有意义的那种美德被称做智慧，指的就是指导德行的具体知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胆的见解。何以见得？柏拉图是不是说：健康和财富本身还不足以使人生更完满，还必须依靠智慧将其施之于正途，我们方真正拥有完美的生活？如果真是这样，他便认为健康和财富只在一定条件下、只有在完美的生活中才是有益之物。有无可能柏拉图持更加严厉的观点，认为诸如健康和财富从本质上说根本无益，唯有当人明智地使用健康、财富以及其他有利条件之时，我的生活才变得完美？

柏拉图似乎没有辨析上述两种观点的不同，因为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证据支持这两种不同观点。后来的伦理学理论于此作了更细致的区分，而斯多葛学派认同后面这种更严厉的观点，并宣称柏拉图开启了这一思想。原因在于，这种更严厉的观点认为美德本身就足以带来幸福，而这种立场柏拉图在其他地方也有所表述。

关键所在

在《申辩篇》（苏格拉底的法庭自辩）、《克力同篇》和《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明确表达了一种毫不妥协的立场。苏格拉底称，判断人幸福与否，唯一要问的就是人是否有德行。若我们知道这是一件错事，我们便不当去做，至于后果如何、得失如何，都不能丝毫影响我们的判断。即使有杀身之祸，也不当为求生而牺牲自己的主张。

为什么苏格拉底坚持认为美德无论如何都不应当放弃，一切关于金钱和个人安危的念头都应置之度外？我们已然看到，美德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一种利，一种可以和其他诸如财富或安危放在一起来衡量的利。美德乃授之于天，是所谓“神界之善”，它或者是唯一的无条件的至善，或者是唯一有资格被称作“善”的东西。它之所以能凌驾于诸善之上，是因为唯有美德方能使我们将其他俗世的便利施于正途，唯有美德方能决定健康和财富究竟对我们有益还是有害。因此美德经常被当成一种技艺或专门技能，一种实际知识，用来将外物转化为一完整、统一之物。

不背德

在《克力同篇》中（48c-d），苏格拉底一边等待处决，一边思考是否应该越狱的问题。[1]

苏格拉底：那么，根据我们所同意的，必须研究，未经雅典人释放，企图离开此地（指监狱）是否正当。正当，我们尽管去做，否则只好罢论。你所提关于花钱、毁誉、儿子无依等等，确实只是大众的想法……至于我们，在理性的约束下，除方才所同意的结论之外，不得虑及其它。请问：赂人带领离开此地，或行贿得人之助以自逃，此举是否正当，或者做这些事确实是背理枉法。行这些事若是不正当，我们就不得计较留在此地静候死期以及其他任何悲惨境遇，应当念念在于免行不义。[2]

这个见解引人深思。在我开始思考如何过完美生活之时，我已先有自己的生活，我有一整套信念和社会关系，比如我的家庭和职业，我的人生目标，我的抱负和梦想。我也希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勇敢而不懦弱，公正而不卑鄙，等等。柏拉图坚定地认为，美德自有其特殊的位置和价值。成为有德之人不是说在拥有财富和健康的基础上，再加上美德。相反，美德乃是指导、规范人生最重要的因素，其他方

面不过是美德得以施展的物质条件。美德产生完整有序的人生，而如果美德不能实施其影响，结果便是一团糟。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能理解为什么柏拉图认为美德如此至关重要。只不过柏拉图表述这一理论并不精确，而后来的哲学家则通过思考，完善了这一美德至上的理论。

以神为榜样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说法未免强人所难。我们大都认同亚里士多德比较平易的观点，他承认美德是生活中的基本要素，但也强调像健康和财富这些世俗之利也自有其不可缺少的价值。若拥有它们，你的生活会更好，而一旦失去它们，你的生活会被破坏，你也不再幸福。

即便是古人也认为柏拉图的观点难以实现（前面已经说过，这种观点一般被当作斯多葛派比较严厉的意见）。如果他的主张是对的，那么我的生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就会放弃追求财富或者权力，而会尽我所能让美德来统领和规范我的生活。对大多人来说，这意味巨大的改变。

但有时柏拉图似乎又认为，让美德指导人生选择、彻底改变生活，还远远不够。你应当意识到，我们日常的担心和忧虑统统是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你应该努力相信，人们汲汲以求的东西都毫无价值。就是说，美德要求你远离日常所思所想之事，远离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善恶交杂。因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纯粹的美德和真正的完善。“因此，我们必须尽速逃此世而趋彼世。欲逃此世则须力求肖神，肖神则在于正直、清净、而加之以智慧。”（《泰阿泰德篇》176a-b）[3]

效仿神的思想会让柏拉图的读者感到震惊。诸神乃是与人类完全不同的存在，就像其他动物与人的区别一样。传统观点认为，人若极力仿效神灵，这乃是要遭天谴的大罪。柏拉图的思想当然不能从这个

意义上理解，他要表达的是关乎神之本质的精妙哲学思想。与传统的希腊诸神不同，柏拉图的神是纯善，完全没有罪恶，因此效仿神就是尽人力之所能，努力趋近完美。

认为美德就是效仿神，这与古代伦理思想的主流完全不合。古人多视美德为人之本性与潜质的实现，而不是超越人世理想，离世弃俗，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变成高于常人的另一种存在。这种出世的思想在被搁置数百年之后，在古代晚期又迸发出新的活力，尤其可见于“新柏拉图主义”对柏拉图思想的解释以及该派对基督教思想发展的影响。

教化之功

柏拉图虽深受这一思想吸引，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仍以美德为一种躬行实践的知识，必要运用于人生中，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已经看到，人人均以追求幸福为人生之鹄的，而柏拉图认为成就德行乃是获取幸福的头等大事。可是人如何能够成为有德君子？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需以身边的有德之士为榜样，进而效仿、超越、批评他们的思想。如果行之有效，我们终将获得更丰富、更深刻、更合一的美德。但我们必须始于身边社会的价值标准。柏拉图的见解却截然不同。他对渴望追求美德的人有很多惟妙惟肖的刻画，但这些人总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扞格不入，找不到任何同情和支持。柏拉图在一处写道，一个人越是才华横溢、生性敏感，便越容易受各方社会压力的钳制。

柏拉图意识到，这些压力不完全是道德或政治方面的压力。社会文化在多方面影响到个人。特别要提出，柏拉图强调艺术在塑造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方面有重要作用，柏拉图是提出这个问题的第一人。现代社会中电影、电视和书籍的功能，就相当于柏拉图时代雅典的戏剧表演、节庆、以及诵习史诗（特别是两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和抒情诗。柏拉图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些艺术形式，认为

它们决不仅仅是无害的娱乐形式。

《理想国》和《法律篇》是柏拉图两部篇幅最长的对话。在《法律篇》中，他为理想的新城邦草创了一部法典，他特意强调对城邦的文化活动要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方能有益于公民心灵的健康发展。传统文化，特别是诗歌当中的主题内容应当彻底地改写，凡助长自私自利、破坏协作精神的段落都应予以清除。而且柏拉图对戏剧表演深感忧虑。就像后来很多国家的清教徒一样，他认为扮演戏剧角色，会使演员的自我变得脆弱易变。他还对戏剧之于观众的影响非常担忧，因为戏剧会诱使观众轻视高尚的情感，削弱观众的情感自制力。在《法律篇》所勾勒的改进的城邦里，构成希腊流行文化的戏剧（就是我们现有的“希腊悲剧”）根本没有立足之地。这样做势必会造成人们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枯竭，但柏拉图丝毫不以为意。他最关心的是民众的精神发展，本可用于艺术方面的心理能量在柏拉图的理想城邦中必须严格限定在这一领域。

不容异见

在《理想国》（492a-c）下面这一段中中，柏拉图对流行文化的影响深表怀疑，因为它压制个人的思想。这一段生动地表现了他的观点。

苏格拉底：哲学家之为善与不善亦由于此。亦如植物之一遇适当之培养，适当之天时土地，则无不勃然而兴，至完全畅茂成熟而后止。设其所遇不当，则苟无天佑，必成为最不良最有害之野草。抑汝亦知众人所谓无数青年，为诡辩家所败坏，而复有无数之诡辩家，随时随地，诱惑青年，使之为所不当为乎？以余观之，为此言者，非诡辩家之最大者欤？盖论调若此，实于无形中授青年以种种不良之教育，非适导之使为彼辈一流之人物耶？

哀地孟德：彼等于何时教育之？

苏格拉底：每于公众集会之时，若法庭、若剧场，或其他公共之

所。多人所视为不善，则大唾骂，而合意则欢呼鼓掌之声，震动屋宇。无论为彼等所是非好恶，无不言过其实。而当其唾骂或称颂之际，其气焰之盛，令人战栗。当此时，年少之人，其孰不见之而惕厉，不论其所已受者为何种之教育，尚能至此而不为大众之潮流所卷，而屹然不动乎？势必至众所以为是者，彼亦以为是。众所以为非者，彼亦以为非，而实无一己之意见可言也。[4]

个人与国家

迄今为止我一直讨论的是社会团体，而非国家，而对柏拉图来说，在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并无明确的分界。在他关于治国的理论当中，政治制度已不容人民尽最大程度追求个人目标。柏拉图政治理念的核心是，你争我夺的个人主义是应解决的主要政治问题。民众总追求一己之私欲，而不愿意为公共利益而相互协作。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明确说自己勾勒的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理想城邦，而在《法律篇》中，他具体描述了应当如何治理一个理想化的希腊城邦。柏拉图重新营建了政治和教育制度，以期培养出热心公益、与城邦其他成员同甘共苦的理想公民。即便在《法律篇》中，柏拉图还是认为妇女应当视自己为城邦一员，应当投身公务，而不要完全陷于单调乏味的家务事中。在《理想国》的玄想中，柏拉图将这些思想推到极致，竟主张取消家庭，而在《法律篇》中，他却强化家庭的作用，将其视为培养急公好义的公民的根基。

提出如此激烈的观点，为培养有公德心的民众而不惜对政治制度作天翻地覆的改革，柏拉图的理由何在？他认为这是治理社会唯一的理性办法，唯有依靠此法，社会才能形成一整体，而不是一群彼此倾轧的乌合之众。这些理论每次被论及，总被当作专门之家深思熟虑之后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并经常比作职业领航员或者医生的权威意见。相反，当时雅典所认可的民主制却被表现为一群你争我吵的乌合之

众，人人都在为自己那一点蝇头小利而吵吵嚷嚷，对于整个社会的需要却没有任何深入了解。

民主与官僚

在柏拉图看来，民主以官僚机制压制了个人才华。在《政治家篇》这一段中（298c-299d），他挖苦道，如果航海和医术也由雅典民主制来管理，不知会如何。他后来也承认，民主管理在现实世界中可用来防范对权力的滥用。

埃利亚来客：假设我们下令，禁止任何人，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再受航海术或医术的约束，假设我们自己组织一个代表大会……我们容许普通人和其他行业的工匠发表有关航海和疾病的意见，比如如何对患者用药、在何处下刀，甚至容许他们自行驾船航行……而这些意见可以著于书版、勒于金石……今后，凡航行和治病，都须以此意见行事。

青年苏格拉底：你所说的，真有些古怪。

埃利亚来客：我们每年从民众中选拔官员……用抓阄来决定。执政者当依照写下的条例来驾船和治病。

青年苏格拉底：这更让人难以接受。

埃利亚来客：再看看还会发生什么。一年后，执政者任期届满，将会有专门的法庭来调查审问他们的所作所为。任何人如果愿意，都可以指控他人在那一年中没有依条例驾船……或没有依条例治病。法庭必须决定违法者当如何受刑或受罚。青年苏格拉底：在这种情况下，若有人还心甘情愿担任一官半职，这个人就活该要受刑或受罚。[5]

柏拉图认为民主制是一种危害，因为它认为无需专门知识也可以治理国家，如此一来便不能鼓励人民更多地为公益着想。在民主制中，有才之士被迫向平庸之辈看齐。另一方面，在现实社会中，一些

自诩为治国良才者往往自行其是，无法无天，而民主制所推重的官僚体制和权力分割的确可以防止对权力的滥用。在《理想国》的幻想世界中，最高权力被交给完美无瑕的人。但在其他著作中，当柏拉图思考现实问题时，拥有专门知识的治国者仍然是最理想的选择。他虽不喜民主制，但也承认民主制乃是现实中可推行的最佳方案。在《法律篇》中，柏拉图便以雅典的民主制为基础设计政治改革方案，将民主制引向天下为公的方向，而任何其他政治制度都没有被当作改革的起点。在柏拉图看来，民主制虽不尽人意，但仍然胜过其他的选择。但只有在理想国度里，我们才会生活得更好，我们才不会彼此漠不相关，而是怀抱共同的理想凝聚在一起。我们已然看到，柏拉图认为不管现实世界如何，个人必须以美德为人生的准则，在这方面他毫不妥协。但他也多多少少保有一线希望，希望现实世界能有一些改善，以弘扬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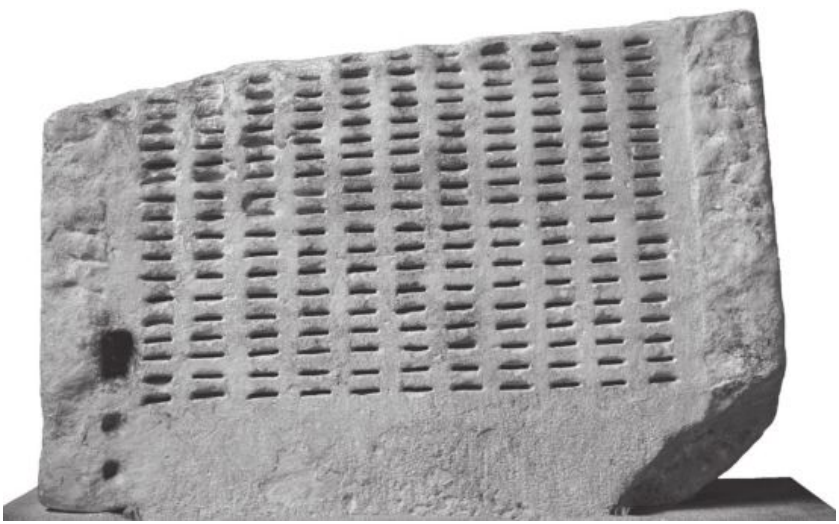

图8　这是“抽签机”的残片，用于分派公职或任命陪审团成员，从公共广场（雅典主要的公民集会场所）的遗址中出土。雅典民主制广泛使用拈阄制度，来确定谁担任公职。雅典人认为任何公民都有能力处理公共事物。选举被认为是一种精英政治，不过像十将军组成的委员会这样重要的机构还是要靠选举。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描写的理想化的城邦中，加强了选举的作用，削弱了

拈阄制的功能。

注释

〔1〕 克力同（Crito）是苏格拉底忠实的朋友，在苏格拉底受审和受刑时都在场。在苏格拉底受刑前，他几次劝说苏格拉底从监牢中逃走，并许诺自己可以出钱出力。在这篇对话的开始，克力同提出以下3点理由：“（一）苏氏含冤死去，旁人要笑克力同重财轻友，舍不得花钱救友的命。（二）克力同为苏氏解决疑难问题：（甲）不必顾虑累朋友破财与冒险，钱有的是，冒险是应该的；（乙）不必愁无处可去，啬他利亚等地都有克力同的朋友，能招待他。（三）死去就是抛弃儿子，有亏父职。”（引自严群译本的“译后话”，见严群译本页115）随后，苏格拉底便开始论证逃走这一行为是否正当。

〔2〕 严群译本，《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商务印书馆，1983），页104-105。

〔3〕 严群译本，《泰阿泰德·智术之师》，页67。严译所谓“肖神”就是模仿、仿效、效法神的意思。

〔4〕 《理想国》，吴献书译（1929年；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印），第三册，页82-83。

〔5〕 据作者英译文译出。

第六章

灵魂与自我

灵魂问题

在希腊思想中，灵魂是使生命体受生之物。这便带来与灵魂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的身体被赋予生命，但使躯体受生之物究竟是一种物质形式还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存在？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当如何理解它的本质？灵魂与躯体是不可分割的吗？当躯体死亡、失去活力时，灵魂也一道消亡吗？还是灵魂在躯体死亡之后仍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人究竟为何物？到底是有生命的躯体，还是独立存在的灵魂？如果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灵魂，是不是说当躯体不复有生命之时，人依然不死？

在柏拉图时代，对这些问题早已有各式各样的回答。柏拉图在著作中给出了多种解答，有些说法相互矛盾。但有两点他深信不疑。他认为灵魂是与身体迥然不同的存在，这是他一个根本的理论前提。的确，人们一向以为柏拉图是二元论的代表，所谓二元论就是指灵魂和身体（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心灵和身体）判然有别。另外，柏拉图从未怀疑过，当我追问我的本质究竟为何物时，答案应该是：我就是我的灵魂，而不是受生的身体。因此，苏格拉底在临终前半开玩笑地提醒他的朋友，他们将要埋葬的不是他本人，而只是他的身体。

苏格拉底临终遗言

在《斐多篇》（115c-116a）里，苏格拉底正准备服毒：

克力同说："可是我们怎样埋葬你呢？"

苏格拉底说："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把我抓牢不让跑掉就行。"然后温和地笑着，瞧着我们说："我无法使克力同相信，那个谈天说地、体察入微的苏格拉底就是我。朋友们，他认为我就是将要死掉的人，问起怎么埋我！虽然我长篇大论地说过，我服毒之后就不再跟大家在一起，要去享受你们所知道的快乐和幸

福，可是他似乎认为这只是鼓励大家、鼓励我自己的空话。……你们一定要鼓足勇气说，你们埋葬我的身体，这样做你们认为最好、最合适。”[1]

但进一步讨论灵魂问题时，柏拉图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有时相互矛盾。他时而认为灵魂乃纯一之物，而在其他地方又说灵魂可以分成不同部分，这些部分象征性地体现为人和动物。有时他认为灵魂的本质在于思考和思辨能力，有时他又以为灵魂的本质在于自我驱动的力量。一般来说，柏拉图持灵魂不朽说，因此灵魂与身体的关系仅仅是暂时性的，但我们也能找到与之矛盾的说法。有时灵魂是身体的主宰和引导，有时灵魂是深陷身体牢狱的囚徒。

柏拉图关于灵魂的说法很难组成一个连贯、一致的理论。有些学者认为这可以证明柏拉图思想有不同发展阶段，但我们很难发现一以贯之的主线。比较合乎情理的看法是，柏拉图以不同思路探究相同的问题，我们自然不能强求这些探索都趋向同一个方向。

纯一物或复合体？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有一段著名论述，将灵魂分为三“部分”或三方面。[2] 我的身体既已被激活，我便作为一统一体行事，但我身内交织着不同的欲望和冲动，相互冲突。柏拉图设想一个口渴的人却不去喝水，因为喝水可能会对他不利。（柏拉图没有详论不喝水的原因，但我们不难找到许多理由来说明喝水可能对他不利。）这不同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例子，这种冲突实际上是内心两种绝然不同的驱动力之间的较量。我的本能要求我此时此刻的欲求立即得到满足，不去衡量后果如何；而我之所以能暂时克制自己的欲求，乃是由于我衡量了什么事从长远来看对我最有利。这便是理智，理智使我对人生整体作全盘的了解和规划，驱使我追求这一更高的目标。我必须克制自己的欲念，因为如果随意满足自己的欲望，便会妨碍实现更高

的目标。

对于一个身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中的人来说，理智不仅仅是为你作整体规划的思维官能。它无需借助欲望，也能为你提供行动的动力。欲望驱使你在当下立即获得欲望的对象，而当欲望的满足并不符合你最大利益之时，理智便会帮助你加以抵制。

短期欲望与经过理智思考的长期驱动力之间存在鲜明的对立，但柏拉图觉得这还不足以解释我们所有行为。我们身上还有*thumos* ，这个词可以翻译成“精神”、“情感”等概念。它与理智有别，因为它无法用语言表达（比如在孩童和动物身上），它也可以和欲望发生冲突。柏拉图有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有时我们可以压制特定的欲望，但又说不清道理何在。有时主导我们的是一种完整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能服从与特定欲望相冲突的理念和热望，但又无法推导出根据是什么。（柏拉图举的一个例子是，士兵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这就是灵魂中主感情的那一部分，比单纯的欲望更复杂，更富有认知方面的判断，但又缺乏理智所具备的反思能力。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灵魂分作三部分，此说意在揭示在高尚的生活中，理智主宰灵魂的全部，而灵魂每一部分都可在各自范围内发挥各自的作用。理性之所以为主宰，乃是因为它明了人最高的福祉，而其他部分仅明白一己之利。若听任这些部分控制人之全部，必然导致灵魂功能的丧失。

在《费德罗篇》中，我们能找到同样的理论。在这篇对话中，人被比作双驾战车，御车者便是理智。而驾车的两匹马，一匹代表情感，颇为驯服，而另一匹则代表欲望，它桀骜不驯，总力图将战车带入歧途。而理智则竭其所能，驾驭这两匹马。[3]

图9　《费德罗篇》中将灵魂比作插上翅膀的双驾战车。这奇特的比喻吸引了历代艺术家。此图为多那太罗（Donatello，1386-1466）所绘的一幅半身像中人物身上所佩戴的徽章。这说明画中人物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思想的复兴运动颇感兴趣。（当时柏拉图思想的复兴深受古代晚期新柏拉图学派的影响。）

虽然情感和欲望被比作与理智交战的动物，我们也发现它们用语言交流。柏拉图将它们描写成会说话的马（其中一匹耳朵是聋的！）。他认为灵魂各部分既是实力不等、相互厮杀的力量，又是人身上与理智在不同程度上相互配合的部分。情感与欲望自有理性的成分，可以进行交流，但理性的程度不高，因此不足以被描绘成人形。在《蒂迈欧篇》中，灵魂的组成部分分别被安置在身体不同部位，理智居头部，因其统领其他成分，而情感居身体上部，欲望居身体下部。[4]

但在《斐多篇》以及《理想国》全书结尾处，我们发现柏拉图的另一种理论。[5] 他认为灵魂乃是纯一的整体。这两种理论都认为灵魂不朽，而如果灵魂之本体由多种成分混合而成，则灵魂不朽说便难以成立。这其中的根本道理在于，任何物事若由可分辨的部分相混而成，都可能消散，分解成原来的各部分。若一物于未来将消散分解，

则此物如何能不朽？（当然这一论点并不完全站得住脚。）这一观点与灵魂三分说有何关联？这两种观点均见于《理想国》，人们希望将二者调和，便在“灵魂本体”一语上大做文章。灵魂看上去明显可分为不同部分，主要在于它与身体相联。正因为灵魂在身体中“投胎”（这一说法其实不无问题），才会出现我们身上会有相冲突的驱动力。灵魂分为不同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我们以受生的躯体形式存在，而灵魂之本体则不受分毫影响。

若灵魂的本性不受身体影响，那么苏格拉底死后依然存在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肯定不会是在他生前曾赋予他身体活力的东西，而应仅仅是不受身体丝毫影响的那些部分。苏格拉底有理由断定那不死的部分真是他本人吗？

心灵或驱动者？

柏拉图倾向于将灵魂与身体直接对立起来。在描述我们的心理世界和求知过程时，他总将灵魂与身体视为相互争竞的力量，总是贬抑身体。因此，早期教会主张苦行禁欲的教父非常喜欢他的思想，他们将圣经中灵与肉的对立解释成柏拉图所主张的灵魂和身体的冲突，这一点对西方基督教关于身体的看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但我们已看到，灵魂与身体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当灵魂赋予身体活力之际，灵魂的一部分已受到身体的影响，并与身体交织在一处。因此，柏拉图有时只简单地提及身体与灵魂一般意义上的差别，在其他一些地方，他想到的是被赋予生命的、为灵魂所灌注的身体与未受身体影响的灵魂之间的差别。在讨论知识的一些段落中，这种差别主要表现为感官与灵魂之间的差别。感官赋予我们信息，但灵魂一旦被刺激，就不仅仅单纯要接受和处理这信息，还要反思、乃至超越这信息。在《理想国》（523a-525b）中，灵魂发现感官对外部世界的呈现相互矛盾，灵魂被激发，开始思考如何能准确理解外部世界。在《泰阿泰德篇》（184c-186e）中，苏格拉底帮助年轻的泰阿

泰德自己看清，我们不仅仅接收感官经验，还要解释、超越感官经验。而这一点，感官凭借自身根本意识不到。

感觉、身体与心灵

苏格拉底：知觉物之为热、为坚、为甘，知觉此等物性，所通过的器官，你是否认为并属于身体？……通过其一官能所知觉者不得通过其他官能，如通过听官者不得通过视官、通过视官者不得通过听官。
泰阿泰德：我如何能够不承认呢？
苏格拉底：分别通过视官听官而知觉、然后一并加以思考，不能一并通过其一器官而知觉之。
泰阿泰德：不能。
苏格拉底：关于声与色，不是一并加以思惟，首先，认为二者存在吗？
泰阿泰德：是的。
苏格拉底：其次，认为二者其一异于其他，而各同于己。
泰阿泰德：当然。
苏格拉底：再次，二者共为二、各为一？
泰阿泰德：亦然。
苏格拉底：也能察其相似与否？
泰阿泰德：也能。
苏格拉底：凡关于二者之如此类似，通过什么器官而后加以思惟？二者之共同处，不能通过视或听而后统摄之。……通过什么器官而后施会通之能、而后晓声色及一切物之共性，如所谓“存在”、“不存在”与方才关于声色所云种种？你能否指出，有什么器官适应于此种种共性，通过什么器官而后一一知觉之？
泰阿泰德：你指“存在”与“不存在”、“似”与“不似”、“同”与“异”、物之为一与为他数，显然也指“奇”“偶”及其相

联的其他概念；问通过身体上的什么器官，以心灵知觉此种种共性。……苏格拉底，我说不出；似乎绝无特别器官专作会通事物的桥梁，如感官之各有所司；我想灵魂自具机杼、以潜观默察一切事物的共性。

苏格拉底：泰阿泰德，……你使我免于辞费，如果你已明白：若干事物，心灵自具机杼以潜观默察；若干事物，心灵通过身体上的官能而后知觉之。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希望你也同意。

（《泰阿泰德篇》184e-185e[6]）

柏拉图认为我们的感官判断中到底有哪些归于身体、哪些归于在身体中起作用的灵魂，我们很难归纳出一整套一以贯之的理论。但有一点很清楚：柏拉图所谓的灵魂对应于我们所称的心灵或者知性。我们的心理机制不仅包括接收感官经验的能力，还包括整合、解释感官经验的认知能力。此外，知性并不局限于解释感官，它通过反思来超越感官的界限，从而发现无需感官也能把握的东西。心灵这种独立的运作经常与我们的感官经验产生鲜明的对立，它们争夺心理空间和能量。单纯依赖感官经常被贬低为被动的昏睡状态，而若要唤醒某人，意味着她必须摆脱感官经验的束缚、必须开始用心灵来思考。柏拉图很多生动的段落贬低身体，贬低依赖身体来探求知识，这种状态常被称为做梦，与之相对的则是从梦中醒来。

柏拉图经常强调，这些纯粹思考的对象是稳定、不变动的。它们是数学研究的对象，柏拉图称之为“理念”，这一概念我们下一章将论及。在《斐多篇》（78b-84b）其中一段，苏格拉底甚至强调灵魂与不变的理念十分相像，也就是那些不受感官经验的变动任何影响的纯思的对象。因为灵魂与纯思和知性的对象，那些不变、稳定、纯一之物极其相像，因此可以推断灵魂本身亦为不朽。

但是在《费德罗篇》（245c-246a）中，我们看到灵魂之所以不朽，乃是因为它总在运动（或变动）中。它的运动从不停止，因为灵魂可以驱动自身，而所有他物均受其驱动。这里谈论的是所谓“所有

的灵魂”[7]，这不免带来理解上的困难：我们不清楚这一概念是指所有灵魂个体，还是指灵魂的总称——就像“雪”或“金”一样，指代的不是个体，而是某物的总量或总数。当然，我们在《蒂迈欧篇》和《法律篇》（893b-899d）中也能找到相关的思想：整个世界拥有一个灵魂，而我们的灵魂只是单独的部分。因此柏拉图至少将其理论重心从单独的、被赋予灵魂的个人身上移开。

将灵魂界定为自我运动，这是一个既深刻又有趣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后来对此作了发挥。对于生命体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生命体运动和变化的根源来源于自身，这与无生命体不同。另外，既然其他的运动都需要一个自我运动者成为其动因，柏拉图自然引出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不动之驱动者”[8]的学说。柏拉图从自我运动的角度论证灵魂不朽，而不是从灵魂与永恒不变之物的相像来论证，事实上他关注的是灵魂的另一个侧面。柏拉图认为与永恒不变之物相似的当然是我们的理智，而不是总处于运动当中的灵魂。进而言之，这不仅仅是我托生在身体内的个体灵魂的不同方面。柏拉图表述了关于灵魂与身体根本区别的两种不同思想。我的灵魂使我有能力追求超出感官经验范围的真正知识，但我的灵魂也是宇宙间生生不息、变动不居那种力量的一部分。后来的柏拉图主义者都从学理上找到一些方法，将这两种理论勉强调和在一起，但柏拉图在其对话中却从未这样做过。

主宰还是囚徒？

灵魂与身体的关系常被说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灵魂高于身体，是统领身体的原则。统领者需要有臣属，柏拉图认为反之亦然。这看起来像是一种稳定、但不平等的关系。但我们也发现，尤其在《斐多篇》中，我们需要从身体中“净化”自己，而哲学当被理解为应对死亡的训练，这里的死亡指灵魂最终逃离身体的监牢。身体本身是一种罪恶，它向下拉扯灵魂，用自己的需求纠缠灵魂。死亡则是灵魂摆脱身体侵蚀的解脱。

这里的矛盾并非本质上的矛盾，而主要因为强调的重点不同、所用的语言表达不同。柏拉图一向认为，灵魂和身体是绝对不同的两物，他总以不同方式将此种差别生动地揭示出来。一种方式是以身体为灵魂的羁绊，另一方式则是强调灵魂是身体的引导。这是以不同方式强调所谓“柏拉图二元论”。之所以称为二元论是有道理的，因为灵魂和身体迥然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充满疑问，难以准确理解。但柏拉图给我们，也给他自己留下一道不必要的难题，因为他没有划定灵魂与身体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我们已然看到，灵魂与身体的区别有时在于一方被激活，而另一方主动赋予活力；有时区别在于一方是被激活的身体，另一方或为思考功能或为自我运动的能力，但只属灵魂所有，与身体无涉。由于这些界限模糊不清，也由于他对灵魂本性的看法经常改变，因此我们才有关于灵魂与身体关系的不同说法。

转世的神话

在柏拉图对话中，最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但我们也看到，灵魂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尤其当柏拉图强调要摈弃身体之时，很难明白那不会消亡的何以就是个体灵魂（比如说，苏格拉底自己的灵魂），因为与苏格拉底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相关的一切都将被抛弃。

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周旋，但并没有解决。在有些对话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死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经常有人说，这些善报和恶报对灵魂将要授生的生命有影响。有时柏拉图会给我们完整的灵魂转世说，今生是前世的结果，也包含来生的凭借。此说的前提是，个体灵魂历经千百劫数，仍能保持同一。灵魂因前生所为，或上升、或沉沦，只不过当灵魂再次投生时，不复意识到前世的生活。

柏拉图的灵魂转世说常引来争议。有人颇赞赏这些“神话”故事，认为柏拉图以诗性语言表达了超越哲学论辩的玄妙见解。还有人认为柏拉图将哲学辩论难以讨论清楚的思想以神话方式直接引入。这些故

事的基调和作用不尽相同，有些不无讽刺（比如人可以转世投胎，变成动物），而有些故事却非常严肃。

我们应当记住，柏拉图避免用论说体将其思想表现为死板的教条，他总是使用多种迂回曲折、旁敲侧击的方式。比如人死后要为今生的所作所为接受审判，又比如今生乃是由前生所作所为而决定的，这都是他认为很重要的思想。阐发这些思想的神话故事，当如何解释？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以生动的方式来强调此世生活的伦理意义，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故事虽没有哲学思辨，但表达了关于灵魂和自我的一套超验的学说。

或者，二者兼备。柏拉图的写作方式让我们自己从不同对话中提取观点，然后归纳整理为他关于某个问题的见解。我们会觉得力不从心，尤其涉及到他的灵魂说。如果我们设想他不断地思考灵魂本性问题，每一次都形成不同的答案，这样我们多少会感到一些宽慰。他坚信，灵魂和身体天差地别，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易辨明。他也确信灵魂不朽，确信我之真我并不囿于身体和人世生活。柏拉图对灵魂本性的探索并不沿着某一固定的方向，这是因为他一方面坚持某些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不愿沿用前人的成说，而力图尝试多种途径，以期了悟灵魂的真谛。

注释

〔1〕 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页284。与苏格拉底对话者，王本译作“格黎东”，现改为“克力同”。

〔2〕《理想国》卷四439-440。

〔3〕见《费德罗篇》246a-247c。

〔4〕见《蒂迈欧篇》69d-71b。

〔5〕见《斐多篇》78b-80c，《理想国》卷十608d-611a。

〔6〕 严群译本，页78-80。作者为简练起见，引原文时有所裁剪。省略号代表略去的内容。此处译文对严译的个别词句稍作改动，如心灵变为灵魂。

〔7〕这一概念希腊文作*psuchē pasa* ，英文译作all soul。

〔8〕 亚里士多德关于“不动之驱动者”的论述，见其《形而上学》卷四第八章最后一句话，1012b30-31。

第七章

万物本性

混沌与秩序

自然界虽偶有失衡，却展现出惊人的秩序和规则。对柏拉图来说，理解自然界最好的方式是将其想象为由工匠制成的造物。这位工匠尽其所能，将秩序加在无序的物质材料之上。

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认为世界的创始出自一位神匠，他按照一个既定模式完成创世工作。这个模式是一套理性原则，体现于物质材料中，制造出一完整的结果。因世界展现出理性结构，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理性的创造。另一方面，因世界在物质材料中得以实现，而物质材料钳制理性，阻止理性发挥作用，我们必须考虑柏拉图称之为“必然性”的因素。必然性指万物必然要遵从的道理，不管理由如何。

柏拉图的论述在细节上有些荒诞不经，而且经常晦涩难懂，但他提出了一系列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位神工巧匠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原因何在？在《蒂迈欧篇》关于世界结构的论述中，数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柏拉图的宇宙观和他关于此世界的知识论当中，数学扮演了什么角色？最后，《蒂迈欧篇》突出体现了柏拉图的一个著名观点：真实世界决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身边的大千世界，不是感官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个世界。只有当我们运用头脑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当我们的思考能使我们接近“理念”的时候，我们在观念中把握的才是真实的世界。

《蒂迈欧篇》一直被当作柏拉图形而上学思想的核心。到了19世纪，由于人们强烈关注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理想国》渐渐取代了《蒂迈欧篇》的核心地位，但《蒂迈欧篇》仍被广泛阅读。这两部对话都很重要，因为它们揭示出柏拉图思想的不同侧面，这些侧面既对立又统一。

神与善

这位创世的神匠创造出可能造出的最完美的世界，因为他本身为善（《蒂迈欧篇》29d-30c），故而希望他的造物尽可能尽善尽美。因其本身为善，故没有嫉妒心，他希望造出的世界尽可能完美，而且尽可能像他自身那样完美。

由于受两千年来一神论影响（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我们习惯认为神是善，因其自身为善，故其造物亦为善，当我们接触到柏拉图这种理论时，不会觉得惊诧。我们有两点要记住。第一，柏拉图在他的文化中公开提出这样的思想，有一定的风险。第二，尽管如此，柏拉图的立场仍不及我们所熟悉的一神论思想来得极端。

古代民众宗教——各式各样的泛神论——并不宣称神、或者众神本性为善。这看上去有些天真、不切实际。他们认为居于外界和内心的超自然神力乃是善恶相混。民众宗教中的希腊诸神可以做出卑鄙无耻、危害甚深的事情。而且，他们对人类还非常嫉妒。柏拉图认为神全然为善，而且只产生善，这使他与民众宗教分道扬镳。他从未摈弃当时宗教的外在形式和活动，但他的神学思想与大多数人对宗教的理解格格不入。在《理想国》中，他坚持认为诸神只产生善，[1] 健全的社会必须对大部分有关神的故事进行严格的审查。[2]（前面已经说过，在文学艺术方面，即使需要压制人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柏拉图也在所不惜。此处对神而言，他亦是如此。）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走得更远。虽然公共宗教依然维持普通希腊城邦的宗教形式，但柏拉图提出强制措施，在基督教兴起之前的古代社会里可谓闻所未闻。公民不得拥有私人的祭坛和私人的敬神活动，他们必须参加整齐划一的公共宗教仪式，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重要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外部行为，还有他们的内心信仰。所有公民必须相信神的确存在，而且这些神灵眷顾人类，决不会接受贿赂从而无视人间的罪恶。公民若否定这些信条，将被教育改造，若仍执迷不悟，将被处决。[3] 在古代哲人当中，柏拉图算得上是独一无二，因为他认为人人都应持有正确的宗教信仰，不仅要相信神（或诸神）

的存在，还要相信神只会产生善，从不为恶。

图10　基督教的上帝如同柏拉图的神匠。《蒂迈欧篇》对中世纪影响深远。这是13世纪上半叶的一幅插图，上帝正用圆规规划世界（圆规在当时建筑业中已被使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创世故事在这里以柏拉图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位神匠将数学规则加之于混乱的物质材料上，创造出我们的世界。

古代哲人从未如此激烈地排斥民众宗教，无怪乎古代基督教思想家在异教哲人中独钟情于柏拉图，总引柏拉图为同道。他关心普通民众的宗教信仰，特别是他坚持神之本性为善、而非恶，这些思想对基督教思想家都非常重要。

尽管后来有很多犹太人和基督徒借鉴了他的思想，并花费无数心力试图将《蒂迈欧篇》的思想融入《创世记》之中，但柏拉图与这些思想家之间仍有隔阂。

柏拉图的神是一位工匠，他尽其所能改造他必须使用的原材料。他从混沌中创造出秩序，但他并没有从虚无中创生出原初的质料。（希腊哲学传统一直认为，从“无”中创造出“有”这一想法是前后矛盾的。）因此，柏拉图避免了一直困扰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恶的起源”问题。如果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何以他会创造出“恶”，并使“恶”成为世界的一部分？[4] 柏拉图的神乃是像工匠一样的创造者，他制造出完美的制品，但“必然性”的作用、物质原料中不可避免的欠缺，这些都与他无关。

数学与知识

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着重强调天体运行（即便是不规律的运动）是可以通过数学计算的。柏拉图还持当时流行的四元素说，但他加上一点，认为四元素的相互转换乃是因为它们内在结构中不同的几何图形。[5] 在柏拉图看来，我们的世界是有规律的世界，数学是其中的关键。

在很多对话中，数学是柏拉图理解知识的重要模式。在一些短小的对话中，柏拉图描写苏格拉底仔细审视各种德行，是否拥有知识经常被比作是否拥有一项技能或专长，这里所涉及的是实践知识。但是柏拉图在判断知识的时候，自有一些特定的条件（如第一章中所论及的）。知识可以被表达出来，拥有知识的人可以“给个说法”，也就是解释、论证她所知道的东西。知识还要求你用头脑来独立思考，不应

该未经反思便贸然接受他人的意见。与之相反，即使是正确的意见也至少在两方面低于知识。意见可由“劝诱”得来，而劝诱指的是跳过解释和证明便使人相信的技巧，结果造成人虽持有某观点，但实际并未理解。而有真知的人明白他〔6〕所知道的，还能“给个说法”。在一些著作中，柏拉图将“给个说法”比作一个有专长者能清楚地解释她所擅长的技能。

但是当柏拉图将重点放在知识其他两个特征时，他往往以数学为理想的模式。这另外两个特征是：知识是有结构的，它不是一团杂多的信息，而是组织完善的系统，包括根本的道理和其他推导出的知识。柏拉图认为，几何学最能体现系统化思想，使理解过程有条不紊，这是他所熟悉的发展最充分的数学分支。在几何学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前提、结论、以及推导过程的精确描述。这一知识的理想形式见于《美诺篇》和《斐多篇》，在《理想国》关键的几卷书中运用得最为充分。在《蒂迈欧篇》和《斐力布篇》中，柏拉图强调唯有数学能够带来我们知识当中任何系统和可靠的部分。

数学第二个鲜明的特征在于其研究对象。一旦我们掌握毕达格拉斯定理，〔7〕我们便在头脑中领悟了一个道理，不管我们画什么样的图来展示，都不影响这个定理本身的正确性。我们的展示图不管多么拙劣，都无关乎数学上的真理。这一定理虽不能在经验世界中看到，但它却是颠扑不破的。一经证明，我们便知它为真。数学这一特性对柏拉图触动极深，因为我们不仅能确定所证明的结论，还认识到唯有运用某种抽象思考我们才能理解这些结论。我们明白，感官经验的证据与我们在思考中所证明的结论无关，甚至后者还会与前者抵触。柏拉图认为这便是哲学智慧之开始，这便是思考万物的正确途径。虽然他的知识论前后有出入，他有时会认为我们可以认识通过经验得来的东西（参看第一章），但柏拉图更愿意认为：当我们意识到经验世界并不带来真知，当我们明白抽象思考才能产生理解，这才是迈向知识的第一步。而数学就是这一步的完美体现，它的这一特点对柏拉图影响甚深。

但是，在思考对象和思考方式两方面，数学还是不及哲人所进行

的思考，数学仅仅是哲学思考的准备工作而已。

理念

柏拉图以为，哲人运用一种称为“辩证法”的思考方式。在不同作品中他对此方法的论述显著不同，但有一点不可动摇：此方法以讨论的方式展开。哲学总是包含与他人的辩驳与讨论，你必须针对他人的意见，维护自己的观点。我们不太清楚最适用于哲人的方法是什么，关于此点有多种不同意见，但柏拉图总是确信哲学思考胜过所有其他类型的思考。即使数学家也不能彻底领会他们得出的结论，而唯有哲学家能考察并运用他人的结论，将这些结论辨析清楚，给出能确保结论得以成立的理由。这种哲学至上论听上去有些盛气凌人，却是很多哲学家追求的目标，即使在有些时代，哲学必须与科学发现或神学结论保持一致，也不例外。

柏拉图对哲学的看法，最著名的是他的理念论。他宣称哲学思考能够把握“理念”[8]（他没有专门的术语，常用希腊文一个习语，相当于“某物自身”，但译成英文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有时他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理念是哲学的顶点和核心，这当然是对理念的称颂，因为柏拉图坚持用对话体写作，并没有提出关于理念的系统“理论”。理念出现在对话录各处，好像苏格拉底以及其他人已经很熟悉这个思想，但柏拉图没有明确介绍这个概念，似乎认为这是人人皆知的。但《巴门尼德篇》第一部分提出了六种反对意见，结论是：这个想法不坏，但还需要加工，方能成立。

虽然“理念”一说柏拉图并没有详细解说，而且出现次数也不多，但根据为数不多的几段讨论，读者仍极力建构一套“理念论”，力求将这一理论与柏拉图自己的批评相参照。这可能就是柏拉图的用意所在，但毕竟柏拉图在表述这一思想时故意含糊其词，因此若要从中得出明确的结论，我们还需谨慎从事。

在《蒂迈欧篇》中，在论及知识与真实见解之区别时，柏拉图

对“理念”有一番总论，以为理念隐含于知识与真实见解的区别中。（应该注意到，柏拉图没有考虑到我们对知识的看法可能不对应任何事物。他认为我们渴求的知识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获得的。）但这并没有解决理念究竟为何物的问题，而且柏拉图的讨论很难综合在一起。

在《蒂迈欧篇》中，理念是造物的大神所依据的模式。世间万物（包括种和属，还有四元素）都托身于物质中，安置于空间内（柏拉图于此处语焉不详，后遭亚里士多德批评）。最重要的是，万物乃是“生成”的，而理念则“不生不灭”。这便是理念与我们身边万物在形而上学方面的重要区别，万物不过是“分得”理念之内蕴，或者是理念之“肖像”或“模仿”。在《理想国》、《斐多篇》和《会饮篇》一些著名段落中，柏拉图又着重强调了这一区别。但是，世间万物的“生成”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物事“分得”理念，柏拉图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尽相同。

理念

蒂迈欧：让我们来仔细讨论、探究这些区别。世上是否有不依他物、独立存在的“火”？以此类推，是否有不依他物、独立存在的其他物？还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我们通过感官感知到的一切是唯一真实的事物？是不是说，除感官感知的事物之外，别无他物？我们说，每一物均有能为理智所把握的理念，这种说法是不是无稽之谈？

我们不应该仅仅说一句“事情本来如此”，不加考察和评判，便随便把这问题打发掉。我们已然讨论了许久，也不应该于正题之外再加一篇冗长的说辞。但若能简要标举出一些根本的分别，那便再好不过了。

下面便是我赞成的观点。如果理智与真实意见有所不同，那么必定有“独立存在”之物，也就是我们感觉不到、但理智可以把握的

理念。但如果有人以为，真实意见与理智没有分别，那我们必须要将感官所感知的一切视为最稳定。但我们必须说明，二者的确有区别，因它们不是在一起生成，而且彼此相异。理智来自传授，而真实意见则由劝诱得来。理智总伴随明确的解释，而真实意见则没有。理智不为劝诱所动，而真实意见则为劝诱左右。我们不得不说，每个人都有一部分真实意见，但唯有神和一小部分人才拥有理智。

（《蒂迈欧篇》51b-e）[9]

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认为我们指称具体事物的每一个名词都对应一个理念，因此每一总称都有一个理念（这等于将理念变成后来所称的共相）。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它起源于对《理想国》596a一段的误译，这段实际的意思是：凡有理念存在之处，只能有一个理念。每一总称都对应一理念的说法完全不着边际。若果真如此，我们就不能理解理念为何是理智的对象、为何理念是我们必须用头脑去努力把握的事物。此外，这也与柏拉图的语言观相违背，因为他坚持认为我们的语言体现的是常规和成见，语言自身绝对不能引向哲学真理（见《克拉底鲁篇》，《政治家篇》262-3）。

“分得理念者”“生成”，而理念“不生不灭”。“生成”的一个意思是变化，一物在某时拥有某种性质，后来则有另一性质，甚至后来获得的性质排斥或对抗原有之性质。当然，柏拉图有时强调我们所经验到的世界处于流转变迁之中，这与理念之永恒不变完全不同。这一点与理智相关。如果我们不必随一物的变化而改变对它的认识，我们自然会更好把握一物的本性。（数学的一个特性便是其真理不随时间改变。）但若单纯以事物变化为理由，强调发生改变的事物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低于不变的事物，这理由未免站不住脚。所幸柏拉图还提出其他理由。

更有趣的是所谓“对立论证法”，在《斐多篇》、《理想国》和《大希比阿篇》中，这是讨论理念所用的最显著的方法。其要点在

于，我们可以作一个真实判断，说在我们经验世界中存在某物、具有某属性，但从其他角度考察，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某物的对立面。比如，长度相等的棍子宽度却不相等；一个美貌女子胜过她的同伴，但与女神相比则相形见绌；一个行动可以为对，因兑现了许诺，但也可以为错，因为轻率、危险，等等。有时我们发现若一味寻找对立性质，这样的观察角度未免失之牵强，但重要的是，我们总能找到类似的视角。因此，经验世界中没有一物可以完全排除其对立面，没有一物可以宣称自己拥有绝对的某属性。但我们的确可以领会某物具有某属性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我们明白某属性为何，便可明白这个意思。因此我们发现：理智所把握的对象不是经验世界中的物事，因后者既可以具有某属性也可以有对立的属性。理智所把握的是物之本体，是我们在头脑中领会的一物的理念。

这种说法可以让我们明白，为何柏拉图要将存在与生成的区别紧密联系于知识和意见的区别。这也说明他为什么要强调变化，因为一物从这方面来看具有某属性，从另一方面看则具有对立的属性，这正显示一物的变化。问题在于，这种说法认为，只有含有对立面的词语方具备理念。柏拉图有时好像意识到此点（而且将其作为立论的基础），但在其他地方，他不加论证便扩大了理念的“范围”。

虽然我们试图将柏拉图论述理念的全部观点综合在一处，但这个问题就像柏拉图自己提出的六种反对意见一样，没有得到解决。柏拉图自已也没有宣称有最后定论。在《巴门尼德篇》中，他让一位年高德劭的哲人对苏格拉底说，理论需在往复辩论中加以粹炼，这也正是柏拉图对我们的劝告。

柏拉图画像

柏拉图最著名、也是流传最广的画像出自拉斐尔的壁画《雅典学院》。这幅壁画是为教皇尤里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的图书馆所画。这幅描绘古代哲学的壁画深受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

复兴思潮的影响，壁画的中心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一手握《蒂迈欧篇》，一手指天，而亚里士多德一手拿《伦理学》，注视柏拉图高举的手，另一手向前伸出。二人手势不同，显示出亚里士多德更关注以哲学原则理解人世，而柏拉图则执意思索抽象的理论原则自身。在壁画中，特别强调了《蒂迈欧篇》中对世界内在结构的数学思考。柏拉图站在毕达哥拉斯和欧几里得（Euclid）中间，他的面容不像古代半身雕像，倒更像同时代的数学家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也是影响基督教的重要哲学家。在对面墙壁上，拉斐尔对三位一体的刻画深受当时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影响。查士丁本是公元2世纪柏拉图派哲学家，皈依基督教之后殉教。他在图中也和柏拉图一样，一手指天，不过他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在教皇尤里乌斯的思想框架中，异教哲学的最高成就以微缩的形式重现于基督教核心思想的表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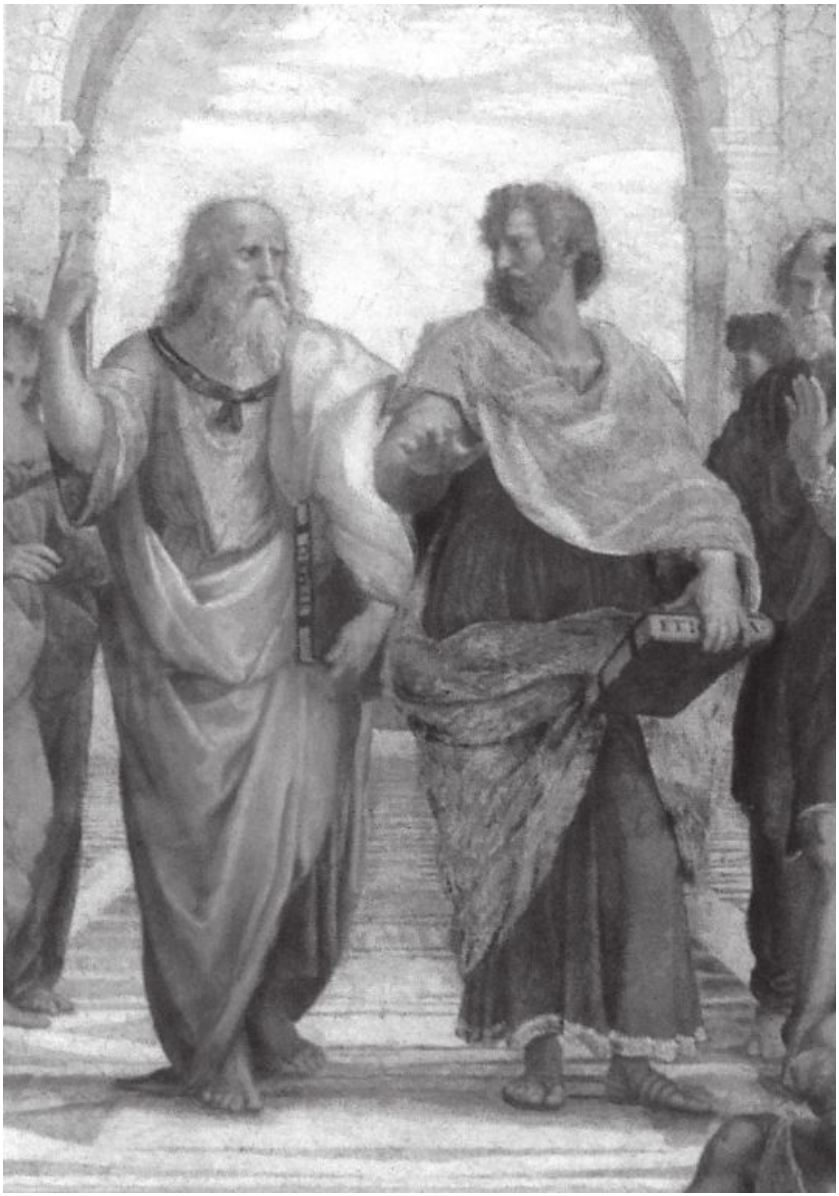

图11　拉斐尔在《雅典学院》中所绘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图12　拉斐尔在《圣体辩论》中所绘殉道者查士丁 [10]

结论：哲学

研究柏拉图的日本学者纳富信留指出，西方哲学在19世纪引入日

本时，日本人曾造“哲学”一词来加指称。〔11〕虽然我们所称的哲学各门（比如宇宙论、逻辑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在东方思想传统中早已非常发达，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被纳入“哲学”领域。即使在西方传统里，这些研究也没有被整合成一门根本的学问。纳富信留和许多人一道，发现柏拉图首次将哲学当作一整体的知识体系，他是将哲学界定为寻找理智和智慧、优于其他门类知识的第一人。柏拉图也是将哲学体制化的第一人（“学院”一词便得自柏拉图），他认为哲学需要以系统方式追求真理，并完全依靠与他人和自我的辩论。难怪后世的教条主义和怀疑派都宣称继承了他的衣钵，他的对话录两千年来也被解释得千奇百怪。归根结底，他最深刻的道理并不是我们应当相信理念的存在，或美德之重要，而是说，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应当与他深入对话，与我们同时代人深入探讨。

注释

〔1〕 见《理想国》卷二379a-c。柏拉图在卷二380c和卷三391e都重申此点。

〔2〕 见《理想国》卷三386a-388e。

〔3〕 这些严厉措施见《法律篇》卷十结尾处909d-910d。

〔4〕 比如奥古斯丁早年受摩尼教吸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摩尼教回答了“恶从何而来”（*unde malum*）这一问题。后来，奥古斯丁受新柏拉图思想影响，将“恶”不再理解为一种实体，而当作对“善”的褫夺（*privatio boni*）。见《忏悔录》卷三，7，12，以及卷七，5，7和12，18。

〔5〕 这一段讨论见《蒂迈欧篇》48b以下，尤其53d-55d。

〔6〕 此处作者无意中又使用he作为泛指的第三人称代词，不符她在第一章所宣扬的女权主义立场（见本书第一章112页的注释第1条）。这一段前后都用she，这里恐是笔误。由此可见在细微处全面贯彻女权主义立场之难。

〔7〕 指勾股定理。

〔8〕 “理念”（*eidos*，idea）一词英文或译作idea或译作form。本书作者即用form，很多现代柏拉图研究者也倾向使用这种译法，因为英文idea一词（思想、想法、观念）带有主观色彩，易引起误解。我们都知道，柏拉图的“理念”当然不是指人脑中的观念。希腊文*eidos* 一词可以指看到的样子、形状、形式等等。

〔9〕 作者的译文有时不易理解，我参考了Loeb古典丛书的英译文，译者为

R. G. Bury。

〔10〕 殉道者查士丁（Saint Justin Martyr，约公元100-165），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以所作两篇《护教论》最知名。查士丁致力于将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思想打通，后于165年在罗马殉教。

〔11〕 纳富信留（Noburu Notomi）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与早稻田大学齐名的私立大学）的准教授（相当于我们的副教授）。有英文著作*The Unity of Plato's Sophist: Between the Sophist and the Philosoph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北京大学日语系彭广陆教授帮助查找到该作者的相关信息，特此感谢。tetsu-gaku就是“哲学”一词的日语读音以罗马字母拼写出的形式。

没有一位哲人像柏拉图那样关注严格的哲学思考，也没有一位哲人能以更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吸引读者加入哲学对话。柏拉图其人其书两千多年来被人们不断解读，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书以广博的视野、权威的眼光、平实的语言介绍了柏拉图的复杂思想和多方面的天才创见，展示了柏拉图研究的最新成果，凸显了柏拉图哲学的现代关怀。

百科通识文库

49

读懂莎士比亚

杰曼·格里尔 著 毛亮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读懂莎士比亚

杰曼·格里尔 著

毛亮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41**

Shakespear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6.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1986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Germaine Greer 19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懂莎士比亚 /（英）格里尔（Greer, G.）著；毛亮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95-3

Ⅰ．①读… Ⅱ．①格… ②毛… Ⅲ．①莎士比亚，W.（1564～1616）- 戏剧文学 - 文学研究 Ⅳ．①I561.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19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95-3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第一章　莎士比亚的生平
第二章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诗学
第三章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伦理学
第四章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政治学
第五章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目的论
第六章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社会学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杰曼·格里尔，沃里克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写过三本相当畅销的书：《女宦》、《性与命运》以及《完整的女人》。

译者简介

毛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英语系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图　目

图1　莎士比亚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市亨利街的出生地
图2　斯特拉特福市的受洗记录
图3　《托马斯·莫尔爵士之书》，据推测是莎士比亚的手迹
图4　《鲁克丽斯受辱记》的献词（1594年）
图5　伦敦塔里的南安普敦伯爵（1603年），老约翰·德·克里茨绘
图6　莎士比亚盾形纹章的草图（1596年10月20日）
图7　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庇护人亨利·卡里（1591年）
图8　第一对开本的扉页
图9　伦敦的远景（1647年），文策斯劳斯·霍拉绘
图10　伊丽莎白时期的喜剧演员理查德·塔尔顿
图11　天鹅剧院，约翰尼斯·德·威特绘（1596年）
图12　汇集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滑稽短剧的场景（1662年）
图13　猎驯鹿的伊丽莎白女王（1575年）
图14　布朗和霍根伯格绘制的伦敦地图（约1574年）
图15　克拉斯·凡·菲舍尔绘制的伦敦全景图（1616年）
图16　狄奇雷的伊丽莎白女王像，小马克斯·海拉特茨绘（1592年）
图17　詹德斯的莎士比亚像，约翰·泰勒绘（约1610年）
图18　《玫瑰花丛中的年轻人》，尼古拉斯·希利亚德绘（约1588年）
图19　表现一个印刷店的版画，简·凡·德·施特雷作于1580年
图20　莎士比亚的纪念碑，海拉特·雅森作

第一章

莎士比亚的生平

有关英国最伟大诗人的生平和活动的记录不仅稀少难觅，而且隐晦难懂。如果说它们的含义曾经明白无误，现在却已非如此。所有试图破解莎士比亚生平活动密码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就我们所知的而言，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及其不同的形式在16世纪英国的沃里克郡很普通。诗人莎士比亚可能是农夫理查德·莎士比亚（Richard Shakespeare）的孙子，而这个农夫住在位于斯特拉特福市以北4英里的一个叫斯尼特菲尔德的小村子里。一个被称为“斯尼特菲尔德的农夫约翰·莎士比亚”（Johannem Shakesper de Snytterfyld...agricolam）的男子在1561年被指定为他父亲财产的管理人。而我们推测他与1552年因为在亨利街的住屋前堆了一个粪堆而被处以罚款的约翰·莎士比亚（John Shakespeare）是同一个人（亨利街的屋子今天仍然被崇拜者认定是诗人的诞生地）；此人在1556年的一场官司里以手套商身份出现。

当理查德·阿登（Richard Arden，理查德·莎士比亚在斯尼特菲尔德的地主）在1556年制定遗嘱时，他最小的女儿玛丽（Mary）还没有结婚。而1558年，玛丽和约翰·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孩子已在斯特拉特福市的圣三一教堂受洗；1564年4月26日，她的第三个孩子也在此教堂受洗，并赐名“约翰·莎士比亚之子威廉”。从那以后18年的时间里，我们对这个孩子的情况一无所知。

约翰·莎士比亚的生活日益富裕。尽管目不识丁，他还是在1565年被任命为首席市议员，后又担任司库和高级市政官的职务，最后在1568年荣任乡长。我们从莎剧中的一些暗示可以推知，莎士比亚一定受过至少是文法学校 [1] 的教育，而作为高级市政官的儿子，他可以享受免费的教育。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莎士比亚上过斯特拉特福市的文法学校；可是，那个时期的学校档案都已遗失。1578年以后，约翰·莎士比亚的生意开始每况愈下；在1586年，已经10年没有参加市政会议的约翰·莎士比亚的名字从高级市政官的名单上被删去了。

图1　莎士比亚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市亨利街的出生地

在1582年11月27日，一个职员在伍斯特教区的登记簿里记录了一份由威廉·莎士比亚和安娜·惠特利·德·坦伯尔·格拉夫顿提出的特别结婚申请（Willelmum Shaxpere et Annam Whateley de Temple Grafton）。第二天的婚前公告则清楚地写明新郎的姓名是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gspere），而新娘是斯特拉特福市的安妮·哈瑟威（Anne Hathwey of Stratford）。即使是如此简单明了的一件事，莎士比亚还是让后世的学者们在迷惑中到处找寻是否还有“另一个女人”；今天我们相信这里名称上的不一致不过是书写的错误。根据安妮·哈瑟威墓上的铜牌，我们得知她在1623年去世时是67岁，那么在1582年，她的年纪应该是26岁左右。他们需要提出特别结婚申请的理由有很多：新郎尚未成年；婚礼的5天之后就是不能举行结婚仪式的基督降临节，在此期间人们要向神忏悔认罪；安娜的父亲已经去世而且她自己已有身孕。这些情况中最不同寻常的是威廉·莎士比亚的年纪：他当时还未满19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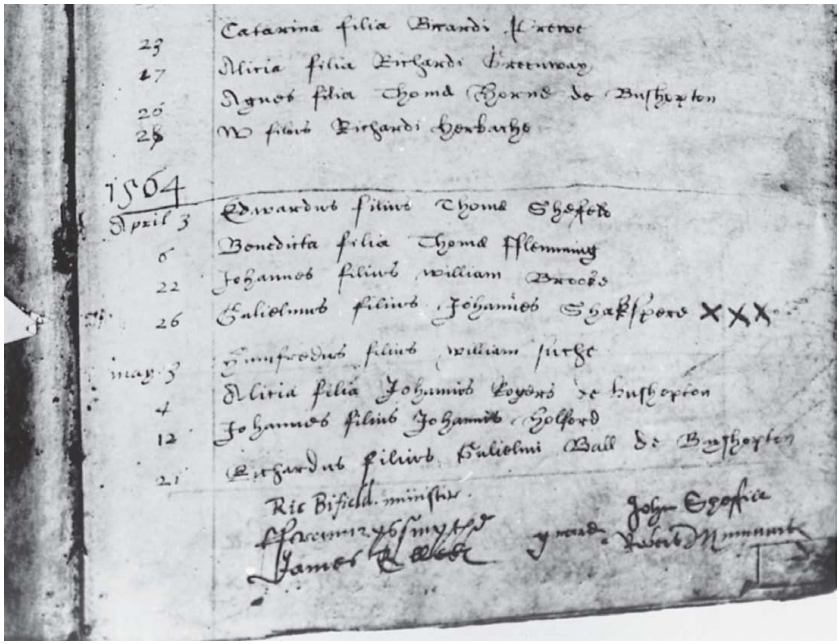

图2　斯特拉特福市的受洗记录

6个月之后的1583年5月26日，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孩子苏珊娜（Susanna）受洗。1585年2月2日，她的双胞胎兄妹哈姆尼特（Hamnet）和朱迪丝（Judith）也同时受洗。11年之后，教区登记本上记录了诗人莎士比亚的独子哈姆尼特被安葬的情况。

从他孩子们的出生到他开始在伦敦的戏剧舞台上脱颖而出的这一段时间被称为莎士比亚生命中“行踪不明的年代”。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莎士比亚可能在学校教书；可能在学习法律；可能在当兵；可能作为某个大人物的随从在欧洲四处游历；或是他因为盗鹿而被逮捕，并因此远走伦敦。我们再一次发现有关莎士比亚的明确记录也有些令人不快。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一个过气的大学才子派[2]戏剧家，因为生活的放荡、污秽和穷困而行将就木。他临终前躺在一张借来的床上，写了他生平最后一本小册子《千悔得一智》（1592年）。其中，他呼吁和他同样有大学背景的文人戏剧家马洛（Marlowe）、纳什（Nashe）和皮尔（Peele）注意“一个暴发户式

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点自己，以演员之皮包藏虎狼之心，以为他可以像你们一样写出流淌的诗句；他是一个十足的三角猫，虽然自命不凡，其实不过是乡下货色的噱头和轰动场面”。

从格林对于《亨利六世》第三部一行台词的借用，我们知道这部戏剧当时一定已经上演，而且还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格林指的显然是莎士比亚；可是我们无从得知莎士比亚究竟怎样冒犯了格林。如果作为一个演员在台上诵读这些大学才子派的诗行，莎士比亚是不应该遭到这样的恶毒攻击。如果格林在这里所用“乌鸦”的比喻源于贺拉斯（Horace）著名的第三封书信[3]——这封信应该为格林和他那些大学才子派文人所熟知——那么他是在指责莎士比亚将别人的作品冒称为他自己所作。

在人们还没有弄清楚他那本小册子的确切含义前，格林就已撒手人寰。而纳什则决定和这本“尖刻、无聊、谎话连篇的小册子”划清界线。莎士比亚显然还就此事特意与为出版商整理格林著作的亨利·切特尔（Henry Chettle）交涉过；切特尔还特地在自己几个月后出版的《良心之梦》一书的前言中大方地向莎士比亚道歉——“我十分遗憾；格林的这个错误仿佛就是我自己的，因为我知道莎士比亚先生的行为举止彬彬有礼，就如他在戏剧事业中的表现一样出众。另外，不同的崇拜者都证实莎士比亚先生为人正直，这说明了他的诚实；而他的写作带有幽默和戏谑的美感，又说明了他的艺术才华”。显然，切特尔明白格林是在指责莎士比亚抄袭；可是，切特尔对此的反驳似乎还有一些保留之处。我们知道莎士比亚举止优雅，才华出众，而且还有不少上层社会的朋友支持他。20世纪商业剧院的戏剧大都没有照搬原著，通常都会对原著进行了改编才上演，我们没有理由认定16世纪的商业剧院就不如20世纪的商业剧院富于变化，善于改编剧本；作为一名成功的演员，莎士比亚当然很可能为了增加剧本的内容而借助那些大学才子派文人，而且自然而然地会改编他们的作品为己所用。当时，抄写全本的戏剧是一件费力的工作；通常，每个演员的台词都被单独地写出来，并附有提示，而舞台监督则通过一块写有台词和进出场标志的提示板来指挥调度舞台表演。出版商很少会得到一部完整的

戏剧；另外，剧团也将这些戏剧脚本视为他们的重要资产。许多的戏剧作品根本没有出版，还有许多则是匿名出版。很少的戏剧会写明是某一个作家所作，除非这些作家非常有名；而且就算署了名这些戏剧也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托马斯·海伍德[4]就宣称自己写过至少220部戏剧，许多“都在多次的转手和剧团的变迁过程中被不小心遗失了”。亨利·切特尔自己写过13部戏剧，其中只有1部被保存下来；他还与人合作过36部戏剧，其中有4部被保存下来。如果在1590年前后，莎士比亚曾与海伍德、德克尔[5]、芒迪[6]及切特尔合写过《托马斯·莫尔爵士之书》，我们不难想象所有这4人，甚至可能还有其他今天已经不为人所知的作家，都为莎士比亚提供过写作素材。最有可能和莎士比亚合作过的当属约翰·弗莱彻[7]；我们从《亨利八世》文字的风格中可以发现他的身影。1643年四开本版《两个高贵的亲戚》的封面上弗莱彻被列为合著者；而在1653年的版权登记簿上也写明弗莱彻是莎士比亚一部现在已经佚失的戏剧《卡登尼奥》的合作者。我们的证据还缺乏说服力，但是即使有确凿的证据说明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与人合写，这也不会动摇他作为最伟大的英语戏剧家的地位。当然，这会让那些认为莎士比亚独具天才原创性的崇拜者们感到惊恐。莎士比亚的才华要归结于他的时代和环境。虽然莎士比亚使他所能接触到的作品产生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且此种变化的伟大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同代人的文化给他提供的丰富资源也不容忽视。经过几个世纪的筛选，我们仍不能认定哪一部戏或一部戏的任何一部分是莎士比亚的个人原创。也许，只有《托马斯·莫尔爵士之书》的增补部分可以说是诗人亲笔所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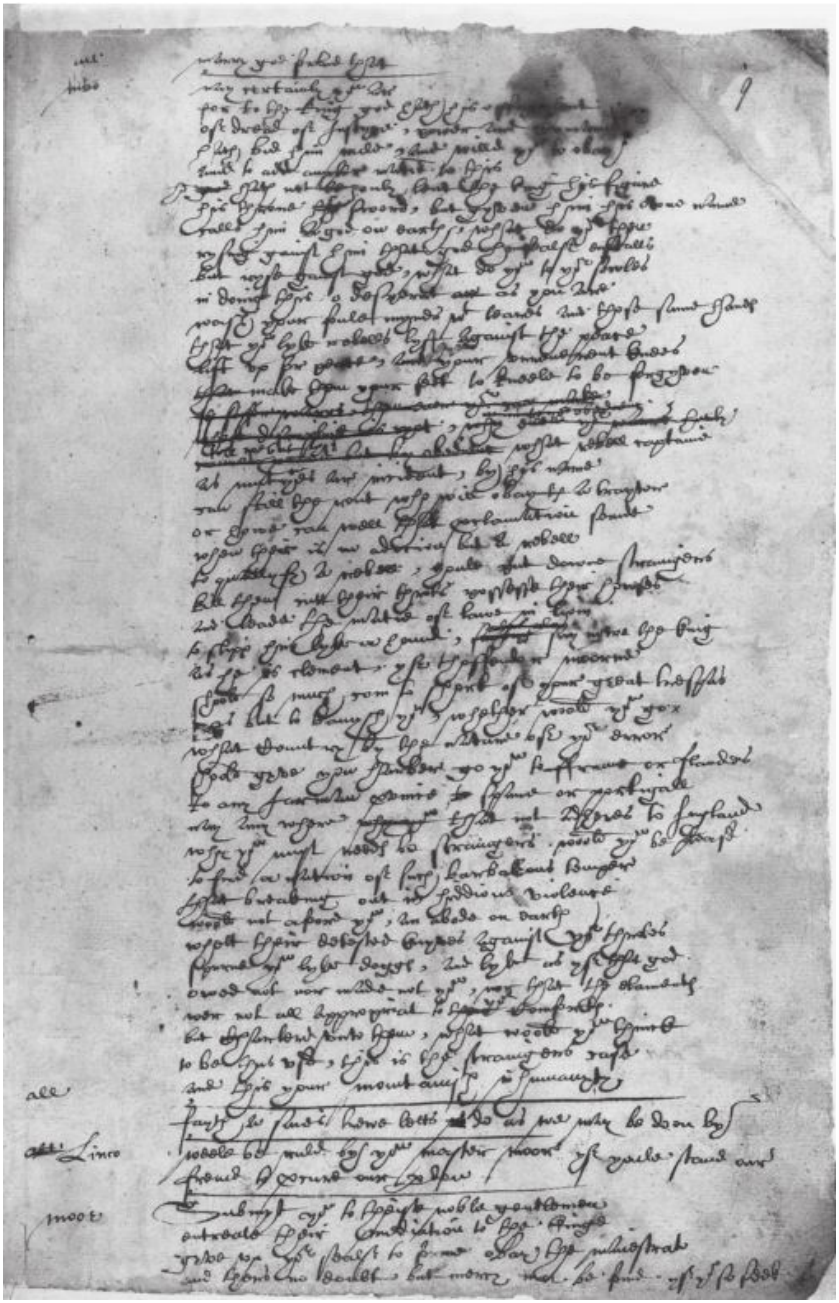

图3　《托马斯·莫尔爵士之书》，据推测是莎士比亚的手迹

其实，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中一个根本的特点就是他没有任何自我中心的意识。除了精心准备和出版的《维纳斯与阿都尼》及《鲁克丽斯受辱记》这两首长诗外，莎士比亚很长时间默默无闻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任何自我推销的兴趣。为了寻找到莎士比亚的踪迹，那些次要人物的生平、他家庭中不起眼的成员的生活、与他一起工作的演员以及他认识或可能认识的政治人物及宫廷成员的历史都已经被我们仔仔细细地研究过，可是我们能得到的结论却没有任何改变。

1591至1594年间，英国经常有瘟疫发生。1592年夏天的疫情最为严重。为了防止伦敦“因人群的聚集而增加瘟疫的传染”，8月24日的巴塞洛缪节〔8〕被迫取消，剧院也都关门停业。莎士比亚这时开始从事一些文学性更强的工作。1593年4月，《维纳斯与阿都尼》被版权登记簿记录在案；随后，一个叫理查德·菲尔德（Richard Field）的斯特拉特福市人出版了此剧。诗人的全名出现在了给年轻的南安普敦伯爵（Earl of Southampton）的献词下方。一年之后，《鲁克丽斯受辱记》也出版了，同样附有给南安普敦伯爵的献词信。信的内容显示了两人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我所写出的作品属于您，我将要写作的作品也同样属于您，凡我所有的，也都必定属于您，您忠诚的莎士比亚”。这两部诗集都大受欢迎。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看一下再版次数即可。在莎士比亚去世前，《维纳斯与阿都尼》就再版8次；而在英国历史上的王政更替时期〔9〕前，一共再版了14次。这样的记录已经超过了锡德尼〔10〕的《阿卡迪亚》和马洛的《希罗与勒安得耳》。另一部戏剧《鲁克丽斯受辱记》也再版了8次之多。从这些历史中，我们可以知道莎士比亚当时已经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而作为戏剧家，他是否也同样出名则是另一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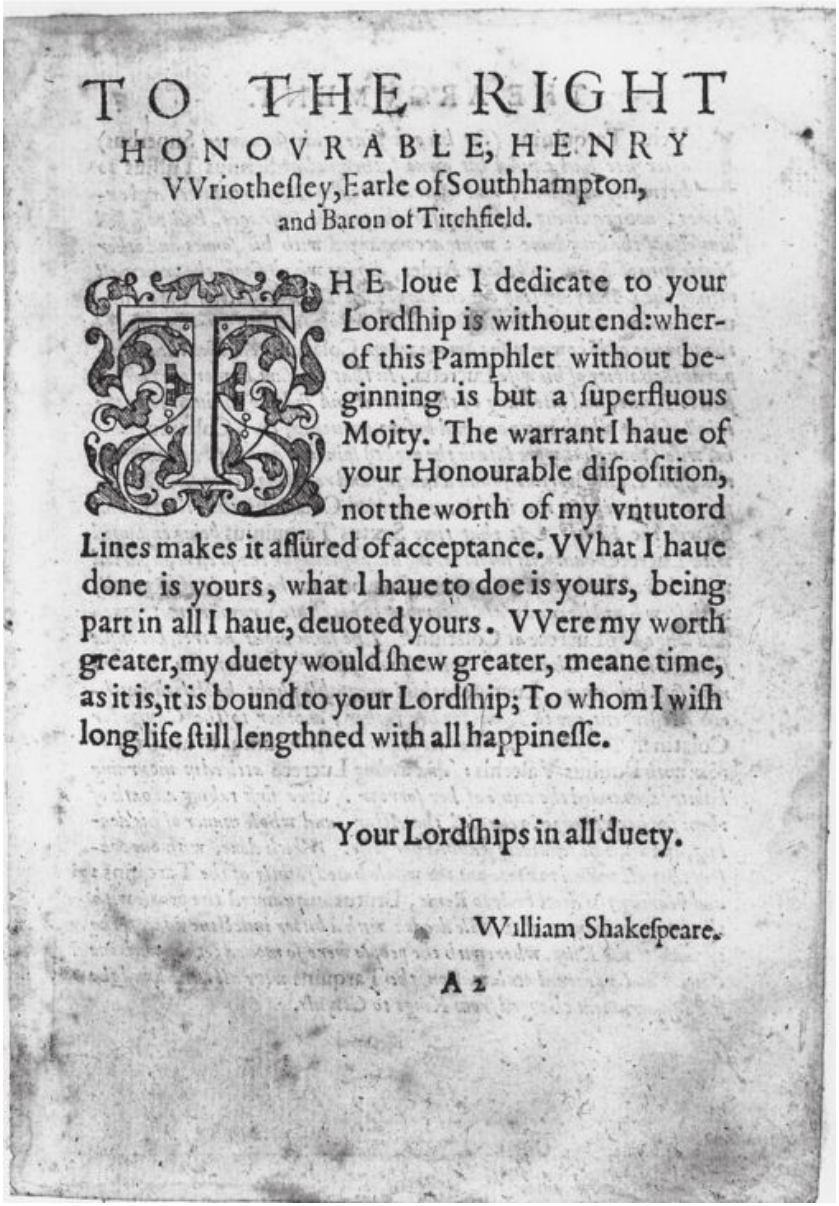

TO THE RIGHT
HONOVRABLE, HENRY
VVriothesley, Earle of Southhampton,
and Baron of Titchfield.

THE loue I dedicate to your Lordſhip is without end: wherof this Pamphlet without beginning is but a ſuperfluous Moity. The warrant I haue of your Honourable diſpoſition, not the worth of my vntutord Lines makes it aſſured of acceptance. VVhat I haue done is yours, what I haue to doe is yours, being part in all I haue, deuoted yours. VVere my worth greater, my duety would ſhew greater, meane time, as it is, it is bound to your Lordſhip; To whom I wiſh long life ſtill lengthned with all happineſſe.

Your Lordſhips in all duety.

William Shakeſpeare.

A 2

图4　《鲁克丽斯受辱记》的献词（1594年）

我们无从得知莎士比亚有没有为成为南安普敦伯爵门客这一机会动过心，或者，他是否真的有过这样的机会。如果以莎士比亚的十四

行诗作为依据，那么我们可以推测莎士比亚可能被另一个显得更有才华、更讨人喜欢的人所取代，并且此人一定不反感南安普敦伯爵性格中令人厌恶的一面。无论历史真相如何，我们可以确知莎士比亚几乎是从无间断地为剧团写戏。在1593年夏天彭布罗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的剧团被迫解散之前，他们就一直在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1594年四开本版《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的扉页上就写明彭布罗克剧团以及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和斯特兰奇勋爵（Lord Strange）的仆人（他们又被称为“海军大臣剧团”）都上演过此剧；而且“海军大臣剧团”的戏单上还列出了平时演出的莎剧剧目。《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的扉页还显示萨塞克斯伯爵（Earl of Sussex）的仆人也演过此剧；显然，他们一定是从彭布罗克剧团那里获得了剧本，并在1593年12月和1594年2月间上演此剧。但在他们的剧目中我们并没有找到作者莎士比亚的名字。这并非唯一的情况：当四开本《亨利六世》第二部以《约克与兰开斯特两个著名王室争斗史之第一部》之名在1594年出版时及这部剧的第三部分以《约克公爵理查德的悲剧》之名在1595年出版时，都没有提到作者莎士比亚的名字。在当时盛行改编旧作和合写剧本的情形下，戏剧界的作者意识一般来说是比较淡薄的。可是在1598年，《理查三世》的第二个四开本版面世时，扉页上却署上了作者莎士比亚的全名。为了取代现在已经遗失且并不规范的第一版《爱的徒劳》而出版第二个四开本时，扉页上也清楚地写明此剧“为威廉·莎士比亚最新的改定增补版”。《理查二世》的第二个四开本也印上了莎士比亚的全名。我们可以推断，在1598年时，莎士比亚的大名已经成为了出版商的一个卖点。即使情况真是如此，《亨利四世》第一部却没有署上莎士比亚的大名，直到它的第三版在1599年问世时，莎士比亚的名字才出现在书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二个四开本在第一版出版两年后的1599年问世时，并没有印出莎士比亚的名字。《亨利四世》第二部、《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无事生非》等几部戏的四开本在1600年出版时，又印出了莎士比亚的名字；可是，《亨利五世》在同年出版时，却又没有出现作者的姓名。这种毫无规律的情况在当时其实丝毫不会令人惊讶；如果上演此

剧的剧团可以成为出版商更大的卖点，那么作者的姓名也就自然被隐去了。

在成为有名的戏剧家之前，作为演员的莎士比亚就已经颇有名气。我们发现他与理查德·伯比奇（Richard Burbage）都是一个被称为“张伯伦剧团”的新剧团的领头人；这个剧团为圣诞节的娱乐活动收取费用的事情被记在了1595年3月15日的王室记录中。1596年，大概是应他功成名就的儿子的请求，约翰·莎士比亚获颁一枚盾徽。1597年，威廉·莎士比亚购买了一处名为“新宅”的房产，该房产是由1491年曾担任过伦敦市市长的斯特拉特福人休·克洛普顿爵士（Sir Hugh Clopton）建造的。后来，莎士比亚一家就定居于此；而莎士比亚本人，作为当地一个拥有大量贵重物品和广泛投资于土地房屋的富裕市民，其大名就常常出现在斯特拉特福市的各种文档记录之中。可是当时所有的市政档案都没有提及他作为诗人和戏剧家的活动。

1598年，在张伯伦剧团于“帷幕剧院”上演的本·琼生[11]的《人各有癖》的演员名单中，莎士比亚是领衔主演。当时该剧团正在寻找新址，打算用先前一个剧院遗留的木材来建造一个名叫“环球剧院”的新剧院。他们租赁了由托马斯·布伦德爵士（Sir Thomas Brend）之子提供的河畔区的一处土地；布伦德死后的文件显示莎士比亚是主要的租赁人。根据1599年2月21日的租赁合同，莎士比亚拥有一半权益中百分之二十的股权，而伯比奇兄弟则拥有另一半的权益。在威尔·肯普（Will Kempe）为了把他的歌舞节目带到诺维奇郡而离开剧团之后，莎士比亚的股权增加到了七分之一。当时的记录表明莎士比亚住在毕晓普格特区靠近肖尔迪奇剧院附近的单身汉公寓里；在1596年的时候，他住在泰晤士河南岸区；而在1599年，他在临近环球剧院一处叫“监牢街”的地方安身。尽管其他的演员往往在伦敦安家落户，莎士比亚却选择在他的家乡投资一处大宅。在伦敦，他习惯在毗邻工作地点的地方暂居。这说明莎士比亚和他妻子安妮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疏远。夫妇两人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在乡下经营一份大产业。除了房子需要大量的翻新，伊丽莎白时期大宅院里的日常生活还包括烘烤、酿酒、蒸馏以及其他的生产活动。莎士比亚的住宅还附有两个谷

仓和两个花园，至少一个花园里种着葡萄。数年后，莎士比亚又在他的宅地里建造了一处小屋和一个花园，增加了107英亩的土地并交由佃农耕种。这一切成功的经营肯定离不开他妻子的智慧和通力合作。

图5　伦敦塔里的南安普敦伯爵

在1598年，作为诗人、演员和戏剧家的莎士比亚的声望达到了顶峰。理查德·巴恩菲尔德[12]在他的诗集《情绪各异的诗歌》中称赞莎士比亚有着“流淌蜂蜜的诗才”。同年，弗朗西斯·米尔斯[13]在其《智

慧女神的女管家》中的“希腊、拉丁及意大利诗人与我们现代诗人之比较”一文里赋予莎士比亚一个大学才子派文人所能给予的最高评价：

“奥维德[14]迷人而又睿智的灵魂在充满韵律和口吐莲花的莎士比亚身上得到延续；看看他的《维纳斯和阿都尼》、《鲁克丽斯受辱记》和在他的朋友中流传的蜜糖般的十四行诗吧。普劳图斯[15]和塞内加[16]被认为是拉丁诗人中最优秀的喜剧和悲剧家；而莎士比亚在我们英国人中是同时擅长这两者的诗人。论喜剧，我们可以举出《维洛那二绅士》、《错误的喜剧》、《爱的徒劳》、《爱的获得》、《仲夏夜之梦》和《威尼斯商人》；论悲剧，让我们看看《理查二世》、《理查三世》、《亨利四世》、《约翰王》、《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图6　莎士比亚盾形纹章的草图（1596年10月20日），由嘉德勋章院[17]第一主管威廉·德西克爵士作

如果我们觉得这样的赞扬有过誉之嫌，那我们应该记住，其实米尔斯对于莎士比亚的同乡，也来自沃里克郡的迈克尔·德雷顿[18]的评价更高。米尔斯评论的特殊价值还在于它给出了12部莎剧（其中有一部现已无从考证）和一些在当时只以手稿形式流传的十四行诗的名录。1599年，急于从莎士比亚的声望中获益的威廉·贾格德[19]将一部分搜集来的诗歌编为《激情的朝圣者：莎士比亚诗集》出版，但书中的20首诗中只有5首是莎士比亚所作。5首中两首是第138和144首十四

行诗的一种版本；另外3首则来自于《爱的徒劳》中年轻贵族们的诗歌游戏。这部诗集存在两个不同扉页的事实说明也许是莎士比亚个人，也许是巴恩菲尔德、巴塞洛缪·格里芬（Bartholomew Griffin）或其他被盗用的作家干预了此事，并要求编者采用别的扉页以及删去任何有关莎士比亚的字眼。1612年，当贾格德肆无忌惮地再次玩弄这样的把戏时，他加入了一些从托马斯·海伍德的作品《特洛伊英雄》中胡乱截取下来的诗行；海伍德则在《为演员辩护》一书中给印刷商的信里表示他自己的诗歌不能匹配莎士比亚的大名，而莎士比亚根本不认识的贾格德擅自盗用他的名字则是冒犯了这位更伟大的诗人。

现代的研究显示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后期，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速度明显放慢。他每年只写一部戏剧，如1600年的《哈姆雷特》、1601年的《第十二夜》、1602年的《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以及1604年的《李尔王》。当然1598至1600年间出版业的热潮也在消退。《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五世》和一直热销的《理查三世》的四开本在1602年出版；而《哈姆雷特》则是在1603年和1604年再版两次。在这之后，除了偶有旧戏的新版面世，如《理查三世》（1605，1612年）、《爱的徒劳》（1607年）、《理查二世》（1608，1615年）、《罗密欧与朱丽叶》（1609年）、《哈姆雷特》（1611年），莎士比亚只有4部新戏上演：《李尔王》（1608年）、《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1609年）、《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1609年）和《奥瑟罗》（1622年）。在莎士比亚给国王剧团所写的13部戏剧中，只有《李尔王》和《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在他去世前出版（1609年）。另一方面，莎士比亚的名字其间却出现在一些并非由他创作的戏剧作品的四开本的扉页上，例如《伦敦浪子》（1605年）和《约克郡悲剧》（1608年）。这两部戏据说都由国王剧团上演。这样的异常情况部分是因为张伯伦剧团和国王剧团都在努力使他们手中的剧本不被印刷流传。这些后期的四开本多半是根据错谬百出的演出剧本偷偷出版的，或者是由剧团正式授权出版以打击市场上的盗版书籍。如果这样的情况属实，那么我们可以认定国王剧团为了保护他们最为重要的资产的努力最终还是成功了，因为在1623年

对开本莎剧出版时，36部戏剧中有一半从未出版过。盗用莎士比亚姓名以及《维纳斯与阿都尼》和《鲁克丽斯受辱记》持续再版的情况足以表明莎士比亚的名字仍然是出版商的一大卖点。

图7　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庇护人亨利·卡里，第一代亨斯顿勋爵

1601年间，莎士比亚为一部名为《殉情者，或罗莎琳娜的抱怨》的诗集写了一首诗；这部谜一般的诗集大概是献给伉俪已久的约翰·索

尔兹伯里爵士（Sir John Salisbury）夫妇的，或是为了庆贺一桩婚事，或是间接地哀悼埃塞克斯伯爵[20]的败落（以及他的副手，莎士比亚的庇护人南安普敦伯爵）。诗集中最重要的一首诗由是罗伯特·切斯特（Robert Chester）所写；在这之前是一组名为《根据一个旧题——乌龟与凤凰——而作的诗歌》，其中两首出自本·琼生之手，而马斯顿[21]，查普曼[22]和莎士比亚则是各写了一首。

《凤凰与乌龟》是英国诗歌中柏拉图式爱情理想最为经典的表达形式。可是，一个在伦敦中殿律师学院[23]的学生中广为流传的故事却塑造了一个对于爱情态度完全不同的莎士比亚。这个著名的故事是由爱德华·柯尔（Edward Curle）讲述，并由约翰·曼宁厄姆（John Manningham）记载在1601年3月13日的日记里：

> 以前，伯比奇饰演的理查三世一角曾让一位女士大为着迷，以至于她在离开前，邀请伯比奇晚上以理查三世之名到她的住处与她幽会。莎士比亚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于是晚上提前去了那位女士那儿；结果，在伯比奇到达的时候，莎士比亚和这位女士已经在男欢女悦之中。当仆人来报理查三世就在门外时，莎士比亚叫仆人回话说“征服者威廉”当然要早于理查三世[24]啦。

我们无从得知此事的真伪；但是，热衷于逛戏院的律师学院的学生显然认为这件事是可信的。可能，莎士比亚留给他们的印象就是如此；而且，莎剧中反复出现的，让脸皮较薄的学者们尴尬不安的淫词秽语也可为此佐证。当然，即使真是如此，莎士比亚浪荡的一面也并非与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完全不能相容。

要确定莎士比亚在1598年（米尔斯的莎剧单出现的日期）至1604年（莎士比亚的新剧和重排的老剧开始出现在宴乐账目[25]上）之间所写戏剧的具体年份并非易事，我们只能依赖一些偶然的巧合，比如加布里埃尔·哈维（Gabriel Harvey）在他的《乔叟诗集》的页边上曾留下了一段赞美莎士比亚的话语——“年轻人非常喜欢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都尼》；可是他的《鲁克丽斯受辱记》和《哈姆雷特》却有着可以吸引更加睿智观众的内涵”。《哈姆雷特》这部戏吸

引的似乎不仅仅是“更加睿智”的观众。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一个蹩脚诗人安东尼·斯克洛克（Antony Scoloker）艳羡的评语——“讨人喜欢的莎士比亚的悲剧，当悲剧演员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之时，喜剧演员也可以在其中任意驰骋，难怪像《哈姆雷特》这出戏会让所有的人都喜爱无比”。1603年出现的《哈姆雷特》盗版证明这出戏剧获得了成功。某个盗版的版本甚至成为停泊在塞拉利昂的一艘大货船上的船员们业余演出时的脚本。

1603年5月19日，当莎士比亚的剧团同意接纳国王的同胞劳伦斯·弗莱彻〔26〕之后，英国的新国王詹姆斯（James I）一世给予了莎士比亚和他的演员同僚们盖有英国国玺的特许执照。这份执照允许他们“自由地演出他们已经熟悉和未来将习演的喜剧、悲剧、历史剧、短剧、道德剧、田园诗剧、舞台剧及其他种类的戏剧”。莎士比亚所属的张伯伦剧团此后成为国王剧团。莎士比亚的名字出现在演员名单的第一位；这些演员获得王室赠予的红色布匹以制作新的制服，以便以国王大殿的王室侍从官身份参加国王加冕仪式的游行。1604至1605年间的宴乐账目中记载了6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其中3部戏（《一报还一报》、《错误的喜剧》和《威尼斯商人》）的作者被错写为“莎士比德（Shaxberd），而另外3部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爱的徒劳》和《亨利五世》）就像其他许多被列出的戏剧一样，根本没有写明作者是谁。

1609年5月20日，一个叫托马斯·索普（Thomas Thorpe）的人获得许可出版一本诗集；当诗集出版时，书名被简单地定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索普出版的书的开头部分有一个令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献词——“献给W. H. 先生，并祝愿您永远幸福和不朽，这些诗行是为您而作”。其中的一些诗在1598年之前就已经在一个小圈子中流传，但是我们无法得知索普从何处得到这些诗稿。当所有的猜想现在都已烟消云散之后，我们只能承认我们无法知道这些诗是何时所作，为谁而作，书里的献词又有何含意；我们也无法确定任何一个诗中提到的人物的身份。我们甚至无法确认我们是应该把这些诗解读为莎士比亚个人性格和私人生活的反映，还是应该把它们看成对已有的哲学及文

学思想和传统的再现。如果沃尔特·拉雷爵士[27]可以为一个把他投入大狱、头秃牙坏、残酷无比并且年迈衰朽的女王写作一首英语诗歌史中最富激情的诗篇，而且在其中使用爱情与忧郁的语汇来表达自己的忠诚，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莎士比亚的世故圆滑丝毫不亚于拉雷爵士。

国王剧团在1608年的时候重新获得了黑僧剧院的租赁权。这个剧院是伯比奇的父亲詹姆斯（James）1596年的时候买下了原来的僧院之后改造而成的。演员们原来就曾在里面演出；在詹姆斯的手中，它被建成为一个室内剧院。但不幸的是，附近居民的抗议使得剧团一直没能真正使用这个剧院。作为剧团冬季的驻地，这个剧院非常理想；但作为一个服务相对少数和更注重品位的私人剧院，它需要一种不同风格的戏剧作品，类似于王室喜爱的有面具和盛装表演的戏剧。《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显然就是为这个新剧院所写的作品。1611年11月，国王观看了《暴风雨》和《冬天的故事》这两部戏的演出；由于很喜欢它们，国王还决定让剧团在1613年庆祝巴拉丁选侯（Elector Palatine）与伊丽莎白·斯图亚特（Elizabeth Stuart）的婚礼仪式上再次上演这两部戏。届时，剧团还会同时演出国王在1604年11月就已经在白厅宴会厅观看过的《奥瑟罗》、《约翰·福斯塔夫爵士》、《裘力斯·凯撒》和《无事生非》。

当时的莎士比亚刚好48岁，正处于生命和事业的顶峰；可是就在国王剧团非常成功但也一定是让人筋疲力尽的演出季结束之后几个月，莎士比亚作为斯特拉特福市的市民被传召到伦敦为一桩民事纠纷案作证。这桩案子的双方是斯蒂芬·贝洛特（Stephen Belott）和贝洛特的岳父克里斯托弗·芒乔伊（Christopher Mountjoy）；莎士比亚被传召的原因与他自1604年起就是芒乔伊的房客这一情况有关。1613年，莎士比亚为卢特兰伯爵（Earl of Rutland）设计了他参加国王登基庆典中的长矛格斗表演时所穿服装上的徽记和格言，并因此获得了44先令的工钱。作为投资，莎士比亚还购下了黑僧门房，并交由他指定的3人来管理。这3人分别是：他的同事约翰·海明斯（John Heminges）、威廉·约翰逊（William Johnson）和约翰·杰克逊

（John Jackson）。

1613年6月29日，环球剧院在演出《亨利八世》时屋顶着火，不到一个小时，整个剧院全被焚毁。莎士比亚并未参与剧院的重建，在他的遗嘱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剧院的股份。我们不知道是有剧团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剧本，还是剧本本来就被放在别处保存。

我们也无从知晓莎士比亚第一份遗嘱制定的日期是在1615年还是1616年；在遗嘱上，他按照常规写下“立嘱人身体健康，头脑清楚”的文字。1616年3月25日，他请律师修改了第一份遗嘱，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第二份遗嘱，因为他的二女儿朱迪丝一个月前刚与托马斯·奎内（Thomas Quiney）结婚。这份遗嘱非常简单，无法让人知道更多的情况。妻子安妮·莎士比亚的名字只是在后记中的字行间出现了一次——“我决定给予我妻子我们第二好的床以及全部的家具”。作为遗孀，安妮·莎士比亚会自然地拥有她丈夫三分之一的财产；而莎士比亚在此处写下的简短条款大概是因为他要特地明确在分割财产时，安妮将会得到他们共同使用过的大床。遗嘱中也提到了他的同事伯比奇、海明斯和康德尔（Condell），但是莎士比亚只留给他们每个人26先令8便士用于购买葬礼时佩戴的指环。就像当时所有谨慎负责的商人，莎士比亚遗嘱的大多数条款涉及财产分割的细节，以保证他的女性继承人的权益。

莎士比亚什么时候去世以及去世的详情我们今天都已无法得知。他的葬礼在1616年4月25日星期四举行。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说法，说莎士比亚的生日和卒日都是4月23日，正好是圣乔治日[28]。

7年过去之后，海明斯和康德尔编辑出版了包含36部莎剧的第一对开本，这是莎士比亚留给后人的不朽杰作。他们的动机也许是“为了怀念这个可贵的人和朋友”，也可能是因为贾格德又在打算从莎士比亚的巨大声誉中牟利——在1619年，贾格德又在忙于出版一系列使用虚假名字和日期的盗版四开本。

1623年的对开本前言部分只有4首赞美莎士比亚的诗歌。其中著名的一首由本·琼生所作，他说到自己对于莎士比亚的“热爱”并且“以一种近乎于崇拜的方式怀念他”。其他几首平庸的诗歌是由几位不知

名的诗人所作。琼生自己作品的对开本前面的献诗数量是莎士比亚的3倍；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朋友和同事查普曼和卜蒙[29]的诗。琼生死后6个月，就出版了一本纪念他的哀歌集《回忆琼生》，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琼生都被看成是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作家。但是，从琼生自己的提醒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莎士比亚有着属于自己的一群追随者，他们把莎士比亚看成是一位天才。一方面，我们看到琼生始终在批评莎士比亚随意的、几乎是不加修饰的文学风格；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琼生在提醒莎士比亚的崇拜者，就像所有其他的诗人一样，莎士比亚也需要挥洒汗水“在缪斯神的铁砧上反复锤炼他的诗篇”。

在第一对开本伦纳德·迪格斯[30]的诵诗中，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纪念碑1623年就已经立在斯特拉特福市的圣三一教堂内。（而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莎士比亚的长相就依赖于海拉特·雅森［Gheerart Janssen］制作的这个纪念碑和第一对开本扉页上马丁·德罗肖特［Martin Droeshout］创作的版画上的莎士比亚）。与其他关于莎士比亚生平的证据相比，这些画像不仅画得不好而且相互矛盾。我们不知道斯特拉特福市莎士比亚的纪念碑是根据什么人的作品制作的；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安妮·莎士比亚这个不为人所知的女人在1623年8月去世，并与她的丈夫合葬在圣三一教堂的高坛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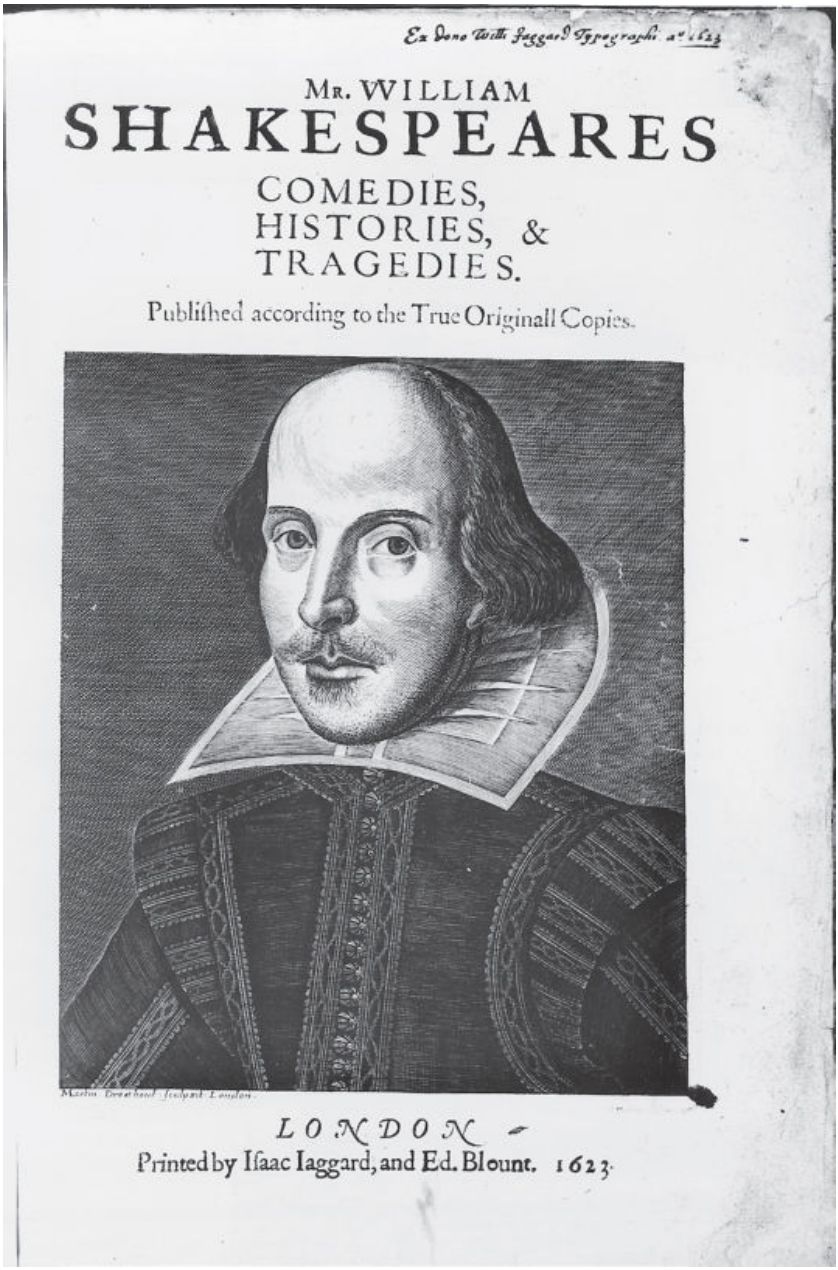

Ex Dono Willi Jaggard Typographi an° 1623

MR. WILLIAM
SHAKESPEARES
COMEDIES,
HISTORIES, &
TRAGEDIES.

Pu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True Originall Copies.

Martin Droeshout sculpsit London.

LONDON
Printed by Isaac Iaggard, and Ed. Blount. 1623.

图8　第一对开本的扉页，上面是马丁·德罗肖特所作的莎士比亚版画像

叙述这些平实但又令人迷惑的莎士比亚生平的情况是为了在讨论

莎士比亚思想的时候能够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为此，我也剔除了那些许多学者们经年累月关注的猜测和假想。历史上，莎士比亚的作品被反复地仔细检看，以寻找各式各样的证据来说明他是否从属于天主教、清教、埃塞克斯派政治团体、柏拉图主义、女权主义、反女权主义等等；关于莎士比亚何时、何处、认识何人等种种的猜想彼此不同而且还相互矛盾。此类的猜想在本书中不会被涉及，因为我对于莎士比亚思想的讨论将会完全依照莎士比亚留给后人的文学作品。

因为莎士比亚很少站在私人的立场言说和表达，所以在讨论莎士比亚思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莎士比亚本人并未在其作品中现身的因素考虑在内，并把它看成是莎士比亚才智的一种表现。我所要做的与许多莎士比亚的赞美者不同。我不打算称颂莎士比亚“拥有所有思想和感情的灵感”——尽管莎士比亚可能会同意泰伦提乌斯〔31〕的看法，会认为作为一个人，一切与人有关的东西对于他而言都不是陌生的。哈兹里特〔32〕在赞扬莎士比亚的时候可能是多了些溢美之词；他认为莎士比亚具有领会所有观点和感情的能力，并且“用一种直觉的和有预见性的方式深入到这些思想和情感的各种发展方向，深入到命运的改变、激情的冲突和思想的转变中去”。的确，莎士比亚的感受力比那些受到严格思维训练的人更博大更具综合性，但是这并非是某种直觉的产物——莎士比亚不是神圣灵感用来显示自身的工具。与此相反，莎士比亚对于思想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解和兴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把这些思想观点简单化、格式化，或者试图调和或者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他选择的是将它们戏剧化，以此让人们意识到思想之外的维度，意识到日常生活中充满想象力的维度。

讨论莎士比亚思想的最大危险就在于人们通常假设莎剧中的某个戏剧人物就等同于莎士比亚个人。莎士比亚不是一个宣传家；他也没有把戏剧当作传达自己思想的简单工具。莎士比亚创造了一个充满了辩证冲突的戏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不同的思想观点针锋相对，而对于思想本身更为深刻的理解就在这些思想的交锋和冲突中得以浮现出来。莎剧所要达到的效果并不是要否定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冲突，而是要通过戏剧艺术创造出一种各种观念之间的静态平衡。而我们在

称赞这样的艺术效果的同时，也会同时意识到它的难度和脆弱性。

注释

〔1〕 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英国教育制度中提供中等教育和大学预科教育的学校，相当于我国的中学。——译注，下同

〔2〕 大学才子派（university wits）：活跃在16世纪末期的一批英国戏剧家，他们的戏剧创作革新了传统和单调的戏剧形式。他们被称为“大学才子派”的原因主要是他们的大学教育背景（主要是剑桥大学）。重要的代表就有罗伯特·格林和下文提到的克里斯托弗·马洛和托马斯·纳什（均为剑桥毕业）；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写作无韵诗的马洛。“大学才子派”的戏剧被认为是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铺平了道路。

〔3〕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著名的关于诗学的一封书信，后人将它单独编为《诗学》（*Ars Poetica*）；此书对于西方文学批评思想影响颇大。在英国，受贺拉斯影响的诗人包括蒲柏、琼生等。

〔4〕 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约1574-1641），英国剧作家，演员。代表作有悲剧《死于仁慈的女人》。

〔5〕 托马斯·德克尔（Thomas Dekker，约1572-1632），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喜剧《鞋匠的节日》和《从良的妓女》。

〔6〕 安东尼·芒迪（Anthony Munday，约1560-1633），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历史剧《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和《托马斯·莫尔爵士》。

〔7〕 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1579-1625），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忠实的牧羊人》。

〔8〕 巴塞洛缪节：英国16世纪时每年的圣巴塞洛缪日（8月24日）都要在伦敦史密斯菲尔德集市举行的娱乐活动，多有戏剧演出，市民不分阶级地位均会参加。

〔9〕 王政更替时期（Interregnum）：旧王统治结束新王尚未登基的王位空位期。在英国历史上共有两次王政更替时期。这里是指第一次（1649-1660）。查理一世在1649年被处死，查理二世在1660年才登基，其间英国处于无王的共和国时期。

〔10〕 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英国诗人。代表作有诗集《爱星者与星》和评论集《为诗辩护》。

〔11〕 本·琼生（Ben Jonson，1572-1637），英国诗人，剧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有《狐狸》、《炼金术士》、《人各有癖》和《巴托罗缪市集》等。

〔12〕 理查德·巴恩菲尔德（Richard Barnfield，1574-1627），英国诗人。

〔13〕 弗朗西斯·米尔斯（Francis Meres，1565-1647），英国作家。编撰的《智慧女神的女管家》一书对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和诗歌影响甚大。

〔14〕 奥维德（Ovid，前43-18），古罗马诗人。代表作有《爱的艺术》和《变形记》。

〔15〕 普劳图斯（Plautus，约前254-前184），一共写有130部喜剧，流传下来的有20部，著名的有《孪生兄弟》、《一坛黄金》和《撒谎者》。

〔16〕 塞内加（Seneca，约前4-65），古罗马悲剧作家，其作品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时期的悲剧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作有《特洛伊妇女》、《腓尼基少女》、《美狄亚》和《阿伽门农》等。

〔17〕 嘉德勋章是授予英国骑士的一种勋章，它起源于中世纪，是今天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骑士勋章和英国荣誉制度最高的一级。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获得这枚勋章，其中包括英国国君和最多25名在世的佩戴者。

〔18〕 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1563-1631），英国诗人。代表作有诗集《理想》。

〔19〕 威廉·贾格德（William Jaggard，1568-1623），英国出版商。莎士比亚作品第一对开本的出版和他密切相关。

〔20〕 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1567-1601），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对西班牙和法国天主教徒作战有功，但败于爱尔兰，因失宠企图叛乱，失败后被处决。

〔21〕 约翰·马斯顿（John Marston，1575-1634），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喜剧《愤世者》和《荷兰妓女》。

〔22〕 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约1599-约1634），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喜剧《全是傻瓜》。

〔23〕 中殿律师学院（Middle Temple）：14世纪以后英国形成了著名的四大律师学院，中殿律师学院为其中之一。其他三所分别是林肯学院、格雷学院、内殿学院。

〔24〕 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约1028-1087），本是诺曼底公爵，后于1066年征服英国，成为英国国王，史称威廉一世。理查三世（Richard the Third，1452-1485），约克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1483至1485年在位。

〔25〕 宴乐账目（Revels Accounts），英国王室记录庆典活动的账目。

〔26〕 劳伦斯·弗莱彻（Lawrence Fletcher，？-1608），演员，1594年跟随一个喜剧团在苏格兰演出，与当时统治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结下了私人交情，后因为詹姆斯登基为英格兰国王而沾光不少。虽然不算是一名出色的演员，但是在1603年发给国王剧团的特许状上，他的名字却赫然列在首位。

〔27〕 沃尔特·拉雷爵士（Sir Walter Ralegh，1554-1618），一度为伊丽莎

白女王宠臣，后被捕下狱。创作有几首脍炙人口的小诗和一本未完成的《世界史》。

〔28〕 圣乔治日（St George's Day），即4月23日，是一个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纪念日，主要在一些将圣乔治（Saint George）作为主保圣人的国家和地区间举行，包括英国、格鲁吉亚、保加利亚、葡萄牙以及加泰罗尼亚。在英国，圣乔治日同时也是全国的国庆日。公元303年的这一天，圣乔治因试图阻止罗马皇帝对基督徒的迫害而被杀害。

〔29〕 弗兰西斯·卜蒙（Francis Beaumont，1584-1616），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喜剧《厌恶妇女者》和《燃杵骑士》。

〔30〕 伦纳德·迪格斯（Leonard Digges，1588-1635），英国诗人，翻译家。

〔31〕 泰伦提乌斯（Terence，约公元前190 - 前159），古罗马喜剧作家。泰伦提乌斯共写有6部剧本，全部保存下来。它们是：《安德罗斯女子》、《自责者》、《阉奴》、《福尔弥昂》、《两兄弟》和《婆母》。

〔32〕 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英国散文家，评论家，画家。代表作有《莎士比亚戏中人物》、《圆桌对话》和《时代精神》等。

第二章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诗学

莎士比亚工作的剧院建筑结构本身就具有象征性。它被称为“环球剧场”，而铭刻其上颇具深意的一句格言是“世界是一个舞台”。当饰演哈姆雷特（Hamlet）的演员引领剧中的罗珊克兰兹（Rosencrantz）和吉尔丹斯坦（Guildenstern）环顾上下左右的观众，并且说到“这大好的土地，在我看来，也只像一块荒凉的海角；这顶优美的天空的华盖，你看，这璀璨高悬的昊空，这镶嵌金光之雄浑的天幕，——唉，在我看来仅是一团混浊的毒气”[1]（第二幕，第二场，298-303行）时，他一定会沉浸在自己精彩的双重讽喻中。

剧院当时是很不卫生的场所；这也是为什么瘟疫来临时，它们会首先被关闭。但是，它们同时也是伦敦唯一能够汇集所有居民的地方；从最低贱的小偷到最高贵的官员都可以聚集于此，并体会到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经验。即使是教堂也不可能提供如此壮观的景象，因为在教堂里，站在下面的人群面对的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讲坛。而在剧场里，观众可将自己看成是一片由不同人物的脸庞编织而成的图景，他们贴着木质的墙壁从剧场最底下的座位一排排地延伸而上；而演员则站在一个如“海角”般突出的舞台上，与观众相比，处于弱势。

戏剧家们为戏剧艺术的辩护

正如世俗与宗教权威所意识到的那样，戏剧舞台具有很大的宣传功用。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早期，戏剧演员被无形中鼓励在节目中表现反天主教的情绪，有时候甚至是出于造谣和诽谤的目的；只有在宣传清教的好处要大于煽动反天主教情绪带来的好处时，王室才开始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在莎士比亚活动的时期，演员已经被禁止在戏剧中表现宗教问题。王室要员对演员的庇护不仅是为了保护他们不被当作恶棍和骗子而绳之以法，也是为了将这个有力的宣传机器置于王室的控制之下。因为被剥夺了通过戏剧这个公共平台来表达自己观点

的机会，难怪宗教改革运动的成员会对戏剧发起严厉的批判。剧场往往是毫无秩序的地方，其中妓女可以四处拉客，然后带着嫖客前往位于剧院附近的烟花场所。学生与学徒工，还有其他一些带着武器的暴民更是拉帮结派，常常在剧院里大打出手。伦敦的清教市政府被迫同时为瘟疫和骚乱带来的损失负责，而且还得反复劝导那些涌向剧院的市民把星期天的时间花在虔诚的宗教活动上，但这样的劝导往往都徒劳无功。

图9　伦敦的远景（1647年），文策斯劳斯·霍拉绘

清教徒对戏剧界的攻击对剧团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广告宣传，但是同时戏剧家也敏感地意识到这些批评的意义所在。他们中没有任何人会否认戏剧对于公众的责任，即戏剧应该在愉悦大众的同时促进公益的进步。当然，对于戏剧家而言，这并非通过虔诚的劝谕来实现，而是通过娱乐节目，以生动、形象和令人难以忘怀的方式来进行道德教化。所有伊丽莎白时期的剧作家都熟谙贺拉斯的格言：

“当你将有益的东西与甜蜜的言辞融合起来，做到寓教于乐时，你的表达才可谓尽善尽美。”

当哈姆雷特把演员称为“时代客观和简洁的记述者”时，他是在部分地回应清教徒的攻击并与其争辩。和那些评论公共戏剧的大学才子派作家一样，莎士比亚也不满当时上演剧目的庸俗无聊，特别是像在黑僧剧院演出而且票价高出环球剧院6倍之多的教堂童伶剧团演出的那些剧目。哈姆雷特对于戏剧的观点并不具有什么新意，也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议论；这些观点很可能源于莎士比亚自己对从16世纪开始流行的亚里士多德的拉丁版作品的阅读，也可能源自人们对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中提出的诸问题的讨论——当时的人常将这些问题与贺拉斯的《诗学》以及关于西塞罗〔2〕的批评作品相互比照理解。菲利普·锡德尼的《为诗辩护》一书是在他死后的1595年才得以出版，但早在这之前，它就已经被人广为引用。该书汇集了上述作品中的各种观点，也许正是这些观点使哈姆雷特能够在剧中用自己的方式说明什么是“诗歌真正的目的”这一锡德尼所关心的问题，并且表达对于戏剧中“荒唐的过度表现”的蔑视：

“动作对于语言，语言对于动作，都要恰到好处，要特别留神这一点，可不要超越人性的中和之道；因为做得太过火便失去了演戏的本旨，从古至今，演戏的目的不过是好像把一面镜子举起来映照人性；使得美德显示它的本相，丑态露出它的原形，时代的形形色色一齐呈现在我们眼前。”

（第三幕，第二场，17-24行）

莎士比亚在学校读过的泰伦提乌斯戏剧集的版本一定已经充满了对戏剧作品道德化的解释，它们把戏剧作品解读得就像是《圣经》中的寓言一般。事实上，莎士比亚时代的知识界普遍习惯于将文学作品解读为基督教意义上的道德寓言；即使是古典作家最无涉道德和最玩世不恭的作品也被当成是对生命意义和灵魂本质充满焦虑的探索。莎士比亚自己一定也是从公元4世纪的语言学者多纳图斯（Donatus）那里最

初获得喜剧的概念——虽然多纳图斯告诉我们他的定义取自西塞罗，可西塞罗的现存作品中并没有相关的文字。多纳图斯把喜剧说成是“对于生活的模仿，反映习俗的镜子和表现真理的意象”。而基督教思想对于这种观念的理解自然会涉及如何表现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表现高尚的和令人厌恶的行为方式以及如何体现重要的伦理问题。

当时在欧洲大陆，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呈现出两种形态，并且吸引两类不同的观众。一种可说是博学型的戏剧，有着高度形式化的情节和基于古典诗歌的韵脚，主要是在私人剧院中为上层观众和学者演出，而且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枯燥无味和故作姿态。另一种是大众型的戏剧，主要依据传统的戏剧情节和人物创作，有着精心准备的套路和歌舞表演以充分展示商业剧团演员的才艺。现在这种戏剧有着更大的吸引力；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对于字面意思为“艺术喜剧”（*commedia dell'arte*）这一称呼的误解——其实，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职业剧团”。1570年前后，意大利的喜剧团访问了英国，可是他们的表演并未获得成功——以通奸情节为主的戏剧无法吸引一个当时深陷宗教纷争的国度，特别是这样的情节涉及到了相当敏感的婚姻地位问题。

伊丽莎白时期大众戏剧的独特性在于戏剧家非常强调对戏剧的全面掌控。约翰尼斯·雷纳努斯[3]在他以诗歌体翻译的托马斯·汤姆基斯[4]的道德剧《语言》（1610年）的引言中，描述了这样的掌控是如何被运用的：

> “就戏剧演员而言，在英国，他们每天都要被反复地教导，就像是在学校中一样；即使是最著名的演员也要服从于戏剧家仔细的教导。这样的安排使一部优秀的戏剧更添活力和光彩，所以我们丝毫也不奇怪为什么英国的戏剧演员（我当然是指那些才华出众的）比其他地方的演员要更加出色。”

哈姆雷特在剧中对演员们说的话如实地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哈姆雷特本人至少是部分地创作了即将上演的戏剧节目，而且他还对演员表演的风格给出了详细的指令，要求他们台步要轻快，不要用夸张的表情

或动作来模糊戏剧的主题——“演丑角的人除了脚本规定的之外不要再多说任何话”（第三幕，第二场，38-9行）。

当时，女王身边的宫廷弄臣、女王剧团中的明星演员理查德·塔尔顿（Richard Tarleton）因为能够根据观众提出的主题即兴创作诗歌并且能够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而著称于世。在他1588年去世之后，伦敦最滑稽的人成了威廉·肯普（William Kempe）；他是斯特兰奇勋爵剧团的领衔主演，当时莎士比亚正在为这个剧团写剧本。威廉·肯普可能出演过莎剧中的一些角色。

戏剧家对于戏剧舞台的主导地位并非一个公认的和不言而喻的原则；相反，戏剧家们必须充满决心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因为观众自然而然地会被著名喜剧演员有时候由着性子的表演逗乐。如果戏剧演出只是为了娱乐观众或者赢利，那么大可不必坚持这样严格的艺术规范。戏剧家对于规定戏剧表演本身的严肃态度可以从哈姆雷特决定要首先控制小丑们的表演这一情况中窥得一斑——“他们有的只顾自寻开心，引得一大部分愚蠢的观众发笑，而那时候剧中正有些严肃的问题必须考虑”（第三幕，第二场，40-3行）。

图10　伊丽莎白时期的喜剧演员理查德·塔尔顿

莎士比亚“真诚的戏谑”

英国清教徒对于戏剧表演的指责是基于两个理由：一方面演出时对人类言语和行为的模仿会鼓励人们说谎并且教授人们如何伪装自己；另一方面，演出时的男扮女装本身就是一种邪恶。莎士比亚以不同的方式讽刺了这一伦理上的指责。在《爱的徒劳》和《仲夏夜之梦》中，莎士比亚在剧情表演之外特别地展示了戏剧表演的形式和技巧，并有意地将演员简单的风格与观众丰富的经验相互对照。为提西

阿斯（Theseus）安排娱乐活动的仆人特地提醒这些贵族，他们不会喜欢“关于年轻的皮拉摩斯（Pyramus）和他的情人提斯璧（Thisbe）之间爱情的那场其实简短但是显得拖沓的戏”：

> “请不要听吧，对您怕不大合适，我曾听过，不成话，太不成话，除非您能欣赏他们这一番诚意，他们为了伺候您实在费了大劲，吃了好大的苦才把台词背诵下来。”
>
> （第五幕，第一场，77-81行）

在提西阿斯的描述中，观众的积极参与对于创造和维持戏剧表演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点也是莎士比亚戏剧美学的基本信条。在其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坚持这一原则，不顾许多傲慢诗人的嘲讽，就如戏中所说——“这类东西，最好的也不过是些影子而已，最坏的也不会比影子更坏，如果能用想象力加以补充”（第五幕，第一场，208-9行）。

根据这样的理解，演员们大可不必紧张地提醒观众不要害怕由剧中的细工木匠斯纳格（Snug）假扮的狮子；这样做其实十分荒唐，因为首先演员不可能逼真到能够完全欺骗观众，其次观众本来就知道舞台上出现的一切无非是表演而已。的确，这样的表演本身就源于古典神话；这类内容有文化的观众或者早就在学校的拉丁文课上读过，或者已经通过格尔丁（Golding）翻译的奥维德的《变形记》了解了它们。

在《爱的徒劳》这出戏里，莎士比亚安排了一群各自不同的角色，他们包括一个想入非非的西班牙吹牛大王（可能来源于意大利戏剧中卡皮塔诺［Capitano］这个角色）、一个源于意大利波洛尼亚某个医生形象的学究、一个俏皮的侍童、一个助理牧师、一个警吏和一个乡巴佬。如果说这些角色的原型都来自于当时欧洲的大众戏剧，可是莎士比亚让他们来演出一部严肃老式的有关中世纪“九大伟人”的露天历史剧实在是具有反讽的意味——像这类英雄伟人题材的舞台剧在今天英国的乡村仍能看到。演员的身份与他们演出的戏剧人物之间的

强烈对比一定是莎士比亚有意为之。正如剧中助理牧师所问，“我们从何处能找到合适的人来表现他们？”牧师知道自己不合适大概就是为什么他的表演十分蹩脚的原因，而此时剧中的小丑则被迫为他辩护——“诸位要见谅，一位愚笨而良善的人，是个老实人，很容易泄气！他是很能和人相处的一个人，而且是个公正的好人；但是扮演亚历山大（Alisander），——唉，你们都看见了——是有一点不能胜任”（第五幕，第二场，575-9行）。

小丑考斯达（Costard）此处的辩护不仅揭穿了这出“九大伟人”的历史剧所营造的假象；他的话也同时深化了剧中有关纳瓦尔世界的戏剧气氛。此时那几个被揭穿的演员变成了和观众一样的普通人物，而剧中纳瓦尔的绅士们和其他法国女贵族则变成在台上冷眼旁观的观众。可是，当来使通报法国国王的死讯时，纳瓦尔绅士们也走开了。这些贵族根本搞不清楚轻薄的玩笑与认真的求爱之间的差别；于是随着戏剧的继续，女贵族们开始置身局外，成了台上的观众和批评者。首先是公主要让纳瓦尔的费迪南德（Ferdinand）尝试一下在现实世界里他应该做的事情——忍受“寒霜和斋戒，简陋的居室和单薄的衣服”，之后罗莎琳（Rosaline）又告诉她的追求者应该如何施展创作才能：

> “罗莎琳：　你这一年中须要天天访问沉默不语的病人，永远和那些呻吟的苦人打交道；你的工作便是，运用你的所有聪明才力，逼使那些受苦难折磨的人破颜一笑。
>
> 伯龙（**Berowne**）：　让垂死的人放声大笑？这可办不到，这是不可能的，欢笑无法打动苦难的心灵。
>
> 罗莎琳：　唉，这乃是使那些爱嘲弄的人闭口无言的好办法，他之所以能信口雌黄正因为浅薄爱笑的观众对于小丑滥加赏识。一句笑话能否成功，要由听者决定，不由说者决定，所以，如果被自己的呻吟震耳欲聋的病者肯听你那无聊的笑话，那么你就说下去吧……”
>
> （第五幕，第二场，842-57行）

当演员们朗诵这些对白的时候，剧场的观众知道英国当时正值瘟

疫蔓延。几周之后，伦敦的市政府就关闭了所有的剧场，以控制传染病的流行。特别当我们了解到那些贫穷的戏剧观众并不能像富人那样去乡间避难时，罗莎琳对幽默与笑话作用的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她没有说出来的观点其实就是，在充满艰辛与痛苦的生活中，快乐和欢笑本身有着伦理上的意义。

莎士比亚与他那些受过更高教育的竞争者不同，他从不挥舞言辞的大棒或动辄就给观众开出道德的药方。他完全知道有些戏剧对着观众词费滔滔或是故作呻吟，而无知的观众根本就无法理解这些宏大的主题或优雅的戏文；他从来没有模仿过学究气十足的讽刺语调（《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一剧除外）。在《仲夏夜之梦》这部戏里，提西阿斯对于“九位文艺女神哀悼一位学人在最近贫穷乞讨中之死”这样的题目毫无兴趣，他说道：

> “这是一番尖刻的讽刺，与结婚喜庆太不调和。”
>
> （第五幕，第二场，842-57行）

在《对愚蠢的鞭笞》一书中（1621年），赫尔福德的约翰·戴维斯[5]给予了莎士比亚他早已应得的荣誉：

> “给我们英国的泰伦提乌斯，威廉·莎士比亚先生
> 一些人提到了不起的威廉，我也在诗文的游戏中歌颂你，
> 你自己不也是在诗文的游戏中扮演了国王般荣光的角色。
> 你曾是一位国王的同伴：
> 可是在平民之中，你就像一位伟大的国王。
> 一些人习惯胡言乱语，由着他们自己的性子胡来，
> 可你却从不如此，你是一位具有统治力的智者。
> 　而你播种的诚实态度，观众们却总能收获，
> 　如果他们能保持好你的馈赠，他们在精神上就更为富足。”

这段文字巧妙地赞扬了莎士比亚；它显示在戏剧演出时，莎士比亚往往出演国王的角色。对于戴维斯双关妙语所指的莎士比亚国王般

的风采我们不必执著于其字面的含义。重要的是戴维斯在讽刺与真诚的戏谑之间所作的区分；莎士比亚的戏剧不是那种追求观众“哈哈大笑”的喜剧；他的作品能够让人发出的是“理解之后的微笑”。

> “只有以诚实的方式所展现的戏谑
> 才是对于人而言最有益处的娱乐。”

《暴风雨》：戏剧诗学的具体实践

《暴风雨》这部戏剧大概是系统地揭示莎士比亚诗学思想最好的例子。这部戏在海明斯与康德尔编辑的第一对开本中排在首位。戏剧的文本清晰并且经过仔细的整理。戏剧的情节安排别具新意，明显是经过了一番仔细的推敲。即使是最迟钝的观众也能意识到戏剧所具有的形而上学关怀。现在我们都同意这部戏涉及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引起人们热烈讨论的一个辩论主题，即“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们往往忽略的是在莎士比亚那里，自然与艺术之间具有着一种连续性。《暴风雨》讨论了什么是好的和坏的、什么是有益的和有害的艺术；而莎士比亚在剧中所持的立场显然与经院派学者针锋相对。

这部戏的开场便有着一些夸张的效果，“一颗子弹也能发出雷鸣之声”而且“鼓声反复如暴风雨般鸣响”；这些正是本·琼生批评的舞台把戏。复杂的舞台指示特地标明要制造“暴风雨中电闪雷鸣的声音”，可是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一切不过是普罗斯帕罗（Prospero）的魔法所作：

> “米兰达（**Miranda**）：　我最亲爱的父亲，假如您是用了您的法术使得这狂涛怒吼，请把骇浪平静下去吧”
>
> （第一幕，第二场，1-2行）

这里对于观众参与的诱导非常微妙：一方面，他们被要求认可舞台上

那些机械发出的声音是真实的；另一方面，他们也被提示这样的效果是台上的人物用了超现实的方法制造的。因为米兰达是个无知的孩子，普罗斯帕罗安慰并告诉她这一切不会有任何的损害，而这一点剧场中的观众都已经知晓。之后，他脱掉了他的法衣，就像戏剧中的合唱团一样，叙述戏剧开始之前已经发生事情的大概脉络。他曾是一个世俗的统治者，可是因为他执迷于在“隐逸的环境休养心灵”以至他的国家被人篡夺。他虽然自认无过，可是他在几个地方说的话却让我们怀疑他是否真的没有过错。首先，他的“图书馆便是他足够大的国土”，而在岛上，他除了拥有“丰富的外衣、衬衫及其他必需的东西”，还有“许多他认为比他国土更可贵的书籍”。显然，这个岛屿，就像是戏剧的舞台，有的只是道具服装和书写的文本。

当普罗斯帕罗需要召唤他的手下爱丽尔（Ariel，在剧中被称为“空中的精灵”）时，他就让作为旁观者的米兰达睡着。这个场景可以与奥伯伦（Oberon）指挥帕克（Puck）的情形相互比较，但有一个很关键的差别我们必须注意。帕克是一个自愿被驱使的工具，可是爱丽尔却很不情愿，他还在盼望着得到解放。也许，我们不应该把爱丽尔看成是普罗斯帕罗头脑或灵魂的一面，因为这样做会忽略在普罗斯帕罗来岛之前爱丽尔的复杂经历，特别是他被卡力班（Caliban）的巫婆母亲困锁在一棵松树上的事情；更好的解读方式是把他看成观众被戏剧家的文字影响而产生出的集体想象力。这样的拟人化直接来自于文学中“带着翅膀的思想”这一意象，而这个意象在《亨利五世》剧中合唱团的唱词中就被使用了：

> “藉想象的翅膀，我们迅速地换景，动作的速度不比思想来得快。”
>
> （第三幕，合唱团，1-3行）

如果说在某个层面上，普罗斯帕罗的小岛就是一个戏剧舞台，那么这个舞台轮流被不同的统治者统治；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会想到去运用诗剧本身所具有的巨大象征力和想象力。并且我们注意到这种想象力只能在剧场里施展；当普罗斯帕罗离开了小岛，他就失

去了爱丽尔，也失去了米兰达。尽管这些观点看起来似乎相当复杂，可是对于当时从小就熟悉各种意象和象征，习惯于使用拟人化思维的观众来说，其实一点也不晦涩难懂。对于《暴风雨》这样一个复杂的寓言来说，我们不能给出一个确定的和唯一的解读方式；因为莎士比亚自己也被他创造出来的一系列两极对立的意象所吸引，并且在这两者之间置入了许多的联系与呼应。爱丽尔象征空气，卡力班象征土地；爱丽尔象征灵魂，卡力班象征身体；爱丽尔象征智识，卡力班象征欲望；爱丽尔象征思想，卡力班象征感觉等等。普罗斯帕罗当然是鄙视卡力班而钟爱爱丽尔——他称呼爱丽尔的方式甚至比称呼他女儿的还要亲密。可是，普罗斯帕罗的悲剧在于他如此喜爱爱丽尔，但他最终又要失去他；他万分鄙视卡力班，可在结尾的时候，却又不得不承认卡力班这个代表着黑暗的东西也是他自己的一部分。

莎士比亚对卡力班这个形象的创造很可能来自于他当时阅读的有关欧洲人环球航行探险的记录，特别是关于百慕大探险的小册子——卡力班（Caliban）的名字似乎是“加勒比”（Caribbean）的某种误写。但是另一种同样可能的来源是莎士比亚读过的法国作家蒙田（Montaigne）的散文作品，特别是佛罗里奥（Florio）译的那篇《食人生番》，因为卡力班的名字（Caliban）与“食人生番”（cannibal）有很大的相似处。同蒙田一样，莎士比亚可能在内心中对所谓的“野蛮人”抱有同情；我们应该特别地注意到剧中卡力班虽是一个野蛮人，但是普罗斯帕罗对待他的方式也同样的野蛮——他用各种刑罚，包括“痉挛”、“肋痛”和“骨痛”等来让卡力班为他做苦力。普罗斯帕罗的做法与当时欧洲殖民者用棍棒奴役巴西的印第安人如出一辙。而当时伦敦的贫苦工人的境况与卡力班也不无相似之处：他们每天被苦役、疾病、工伤和寄生虫所折磨，无知而又堕落。戏剧家的责任就在于让他的阳春白雪能够为这些“野蛮”的观众所领受；若不如此，观众们自然可以随时打断他们不能理解的戏剧表演。

莎士比亚创作《暴风雨》的时候（1611年），只能在夏季演出的露天戏剧表演已经开始衰落；有灯光照明的室内剧场开始兴起，它们可以在较小的剧场演出，票价可以更高，而且一年四季都能演出。室

内剧场的流行也已开始影响露天剧场。利用戏剧进行道德训诫的热情渐渐消退，想象力的作用也变得不像以前那样重要；在王室的引领下，观众开始喜欢各种大排场的舞台表演。戏剧变得不那么严肃，更加追求轰动效应；国人关注的重要问题让位于对于家庭内部勾心斗角的表现。至少在戏剧营造的意象上，原来的野花和紫罗兰被代表上层生活的麝香和灵猫香所取代。

当喧闹的底层民众主宰着露天剧场的时候，小圈子主导的室内剧场已经发现自己需要去迎合那些有权势的庇护人的虚荣心；这些贵人们开始决定上演的剧目、演出的时间和什么样的主题在新作品中能够得到表现以及如何表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76首的主人公用反讽的语气表达了自己是如何无法与时俱变：

> “我的诗何以这样缺乏新鲜花样
> 这样缺乏变化或敏捷的才思？
> 我对时髦作风何不加以模仿，
> 使用新奇笔调或诡异的复合名词？
> 我为什么写法总是穿着陈旧衣裳，
> 每个字几乎都可以宣示我的名字，
> 露出身份以及来自何方？”

正如这首诗在结尾处的语气变化所显示的，这种反讽式的哀叹其实是对于真实与不变的赞扬。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莎士比亚更是用讽刺的笔法描写了一个为了取悦庇护人而大量创作诗歌的诗人。这是一个奇怪善变的人物；莎士比亚对于这个人物的做作以及自私无聊的讥讽与《哈姆雷特》中他对于小圈子式戏剧演出的蔑视与批评如出一辙。在《哈姆雷特》中，这种表演被比作“一窝雏鹰般的小孩子，尖声锐叫，最受热狂的欢迎”。我们上面引用的十四行诗中的主人公正话反说，将他作为一个宫廷诗人的失败视为一件值得荣耀的事情。可是实际上，投身大众戏剧之后的莎士比亚后来成为了国王剧团的首席剧作家，或者说，他自己最后也成为了一个宫廷诗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莎士比亚本人更喜欢用他动人的神话传说来服务那些目

不识丁、整日为生计烦恼但又容易被打动的底层观众，而对仔细揣摩那些受过教育的贵族们的趣味和想法感到十分厌烦。在《辛白林》剧中，真正的英国贵族是在远离堕落宫廷的环境中长大的。白雷利阿斯（Belarius）在剧中的颂扬山洞之词可看作是针对白日的露天剧场而发，而批评王宫之语可视作针对夜晚的室内剧场所作：

> “弯腰，孩子们，这个洞门教你们如何礼拜上天，教你们低头作晨祷；帝王的宫门拱得很高，巨人可以裹着大不敬的头巾大踏步地走出走进，无需对着太阳道早安。”
>
> （第三幕，第三场，2-7行）

可以肯定的是，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里，莎士比亚基本上都是和白日的露天剧院同呼吸、共命运；但是，他也无法确定他的工作是否促进了观众的道德进步。到了1611年的时候，公共道德水平的下降、社会紧张和各种派别斗争的加剧足以引起大多数观察者的注意。对于莎士比亚而言，1590年时的观众群已经解体而不复存在。《暴风雨》也许是莎士比亚以其特有的曲折笔法向底层的戏剧观众致意——在剧中，我们发现没有一个角色比卡力班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普罗斯帕罗和爱丽尔为这小岛所创造的一切：

> “这岛上净是声音，音乐，很好听的，不伤害人。有时候有千种的乐器在我的耳畔铮铮地响；有时候，我恰从长睡中醒来，有些声音能使我又瞌睡起来；随后，在梦中，我觉得天上的云彩裂开了，露出了富丽的东西，就要落在我的身上；以至于，我醒了以后，哭着愿意再回到梦中。”
>
> （第三幕，第二场，133-41行）

莎士比亚经常将他的戏剧创作比作梦境的创造，最明显的是在《仲夏夜之梦》一剧中。在全剧的尾声，普克将贯穿全剧的梦境意象作了一番总结：

> “如果我们小仙有什么冒犯，

只想到这一点，便毫无遗憾，
这些幻景出现的时光
你们只是在此睡了一场。
这浅薄无聊的剧情，
其结果不过是个梦……”

（第五幕，第一场，409-14行）

和《暴风雨》一样，《仲夏夜之梦》也有灵魂内部的斗争和冲突；它主要的角色都被错觉所折磨，梦中套梦，而痛苦的根源无非是想象和梦幻；莎士比亚在这部戏中关注的主题是诗歌与想象之间的互动。而在《暴风雨》中，我们关心的远远不止幻象的制造、行动的伪装或作为梦幻制造者的艺术家形象。《仲夏夜之梦》的结尾，尽管充满了敬畏和假装的谦卑，但仍然表达出乐观的情绪，因为最终真实的仪式驯服了恋人和诗人不羁的想象：

“……说了这一整夜的故事，他们的心灵竟能同时发生同样的变化，便可证明不仅是幻想中的景象，有些变成了真实的东西……”

（第五幕，第一场，23-6行）

在《暴风雨》中，卡力班也在梦想着他自己获得救赎，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结果；这一点被一些平常的意象所表现出来：他耐心累积的财宝，或是一生劳作后可以获得的恩典。卡力班的想法显示了他所拥有的想象力——它来自于普洛斯帕罗法术的刺激却又不为普洛斯帕罗所知道；而凭借这样的想象力，卡力班能够最终超越他低人一等的境地。除了他所代表的一切，卡力班还象征着底层民众，他们为了享受一下闲暇时的娱乐，获得一些“快乐的戏谑”，希望在娱乐和暂时的自由自在中忘却痛苦和劳作而涌入剧场。同时，正是只有通过他，戏剧家的艺术才能变得有血有肉。剧中的卡力班与米兰达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米兰达也是一个全然无知的角色，完全受他人摆布；如果说她被普洛斯帕罗揭示的景象和引入的人物所侵害，那么对于她的结局，普罗斯帕罗实在应该负上全部的责任。

戏剧家对于普罗斯帕罗这个人物的态度并非都是同情。对于他安排费迪南德和米兰达见面场景的处理中就有剧作家对他的一些蔑视情绪。因为他只是把米兰达当成了自己一件宝贵的财产，只能像对待卡力班一样地对待费迪南德，他不停地编造谎言伪装自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同时又在旁白中洋洋自夸，不断地提醒观众谁才是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剧中的老刚则娄（Gonzalo）说普罗斯帕罗的小岛宛如一个世外桃源其实是一番别具意味的讽刺，他所指的是普罗斯帕罗如何肆无忌惮地使用恐怖、迷幻和肉体折磨来建立他的独裁统治。我们看到正是普罗斯帕罗本人让这些那不勒斯人陷入昏睡以便使西巴思善（Sebastian）和安图尼奥（Antonio）谋害那不勒斯国王阿隆佐（Alonso）的性命，而他则可以在此时让爱丽尔去破坏他们的计谋。更让人奇怪的是这两个人是如何能在普罗斯帕罗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来到了岛上。

包括凯瑟琳·M.莉（Catharine M. Lea）在内的许多批评家都指出剧中小丑斯蒂番诺（Stephano）和特林枯娄（Trinculo）的闹剧表演来自于意大利职业戏剧中固定的喜剧套路；可是被批评家忽视的是这里的闹剧和全剧其他部分之间的对比关系。这两个角色当然十分可笑，特别是当他们按照意大利喜剧套路的要求将他们滑稽的对白和夸张的身体与面部表情结合起来的时候；可是这两个小丑的表演也间接地暗示了我们目睹的舞台上的景象其实是如何的无聊和愚蠢，无论这些景象多么吸引观众的眼球。斯蒂番诺在剧中说道人们“不愿意出一文钱救济一个跛脚的乞丐，他们却愿意出十文钱看一个死了的印第安人”；他们随后让卡力班喝酒以便能够控制他，而卡力班却觉得这酒的魔力要远大于普罗斯帕罗法术所创造出的梦境，甚至真的相信这两个奴隶贩子要给予他自由。这里的剧情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主题：普罗斯帕罗必须与这两个不速之客争夺对卡力班的控制权。戏剧原来篡国夺权的主题先是在西巴思善和安图尼奥谋害国王的情节中重复了一次，此处又被拿来与这两个小丑如何征服卡力班的情节相互映照；唯一不同的是此时正专注于导演女儿订婚一幕的普罗斯帕罗对于他奴隶的反叛一无所知。当他重新想起这一切的时候，面对于这样的幻象以

及原本被他控制的那些刈者和女神，普罗斯帕罗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控制力——剧中“于奇异之沉重紊乱声中，它们都怆然而逝”。普罗斯帕罗此时也只能表达遗憾之意：

> “我们的游戏现在完了。我们这些演员，我已说过，原是一些精灵，现在化成空气，稀薄的空气：顶着云霄的高楼，富丽堂皇的宫殿，庄严的庙宇，甚至是这地球本身，对了，还有地球上的一切，将来也会像这毫无根基的幻象一般地消逝，并且也会和这刚幻灭的空虚的戏景一样不留下一点烟痕。我们的本质原来也和梦的一般，我们短促的一生是被完成在睡眠里面。”
>
> （第四幕，第一场，148-58行）

在伊丽莎白时期那些把戏剧舞台与被创造出的宇宙天地相提并论的文学言辞中，这一番高论实在是最为动人的。将人的一生与这稍纵即逝的戏剧表演等同起来的观点对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大概是一个无比真实的比喻，无论他们是柏拉图主义者、斯多葛派、怀疑论者还是基督徒——伊丽莎白时期的人往往是一人身兼四角。

在他彻底放下一切之前，普罗斯帕罗还是要与诱惑了卡力班的人较量一番。此时观众对于卡力班的看法已经超出了剧中普罗斯帕罗对他的估量，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卡力班是可以在普罗斯帕罗不知道的情况下独自行动。当看到他如何向一个喝醉的小丑表示臣服，观众们会发现卡力班也有纯真的一面；他对于自由的热切盼望可以让人理解，可是观众会同时意识到他永远也不会真正找到自由。在剧中，普罗斯帕罗制造了一个有华丽衣装的幻象来吸引包括卡力班在内的一群附庸风雅者的注意；可是他并没有能看到卡力班最终彻底的醒悟，也不知道卡力班对他的蔑视。卡力班最终显然超出了这些世俗之人，而普罗斯帕罗还是要放出他的猎狗来对付他。此时，剧中唯有那个对于凡人情感无动于衷的爱丽尔给了普罗斯帕罗他应得的训诫——“克己比报复更加难得”。普罗斯帕罗终于意识到他的法术魔力并非合理和无私。

普罗斯帕罗的全套法术中有一些我们在剧中并没有看到：

“……坟墓曾受我的命令惊醒了里面睡眠的人，张开口，借了我的伟大的法术放他们出来。”

（第五幕，第一场，48-50行）

这句话似乎对莎士比亚比对普罗斯帕罗更加适用；这些需要被弃用的“可怕的法术”大概也是指那些被本·琼生讽刺的戏剧技巧——引入大跨度的时空场景和耸人听闻的重大事件，使用粗糙的声效和观众的想象力来弥补语言图景的不足。事实上，文学史的发展是站在琼生一边的——17世纪的英国戏剧就退回到了一个更为狭窄的范围里，严格遵守戏剧的三一律[6]，并且屏弃了早前戏剧包容一切的特性。作为一名卓越的批评家，德莱顿了解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如他所说的那样“自然的一切意象都在莎士比亚的眼前，他轻松而又成功地运用它们；当莎士比亚描述一件事情时，你不仅能看到，更能真正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可是，德莱顿仍然服膺琼生的理论，并在其中找到应该被仿效的正确规则和正统观念。他丝毫不敢任想象力自由驰骋，任它纵横海洋，将人一生的历史压缩到短短的一两个小时之中，或是让戏剧人物与神鬼交谈。莎士比亚的语言已经渗入了英语之中，而莎士比亚的戏剧思想却对英国的戏剧界缺乏影响力，这部分地是因为伊丽莎白时期的那些如饥似渴、能与戏剧表演相互呼应而且丝毫没有个人中心观念的观众群体已经同他们年迈的女王一同在历史中消逝了。

《暴风雨》尾声中的诗歌曾被人讥讽为打油诗；它同时也被人解读为莎士比亚对戏剧舞台的告别词；也有人说这段话根本就是他人所作。它是用英语诗歌中最无艺术难度的四步韵写成；因此与普罗斯帕罗在剧中那些庄重威严的素体诗无法相比：

“现在我的魔术已经毁去，
我有的力量是我自己的，
那是很薄弱：现在，老实说，
诸位可以在此地监禁我，
或是送我回那不勒斯去，

我既然恢复了我的土地，
并且也把骗我的饶恕了，
请别教我再住这个荒岛；
请诸位开恩把我释放，
只消诸位帮忙鼓鼓掌。
必要诸位夸奖，吹饱我的帆，
否则我失败，没得诸位的喜欢。
现在我没有精灵魔术，
我的结局将是很悲苦，
除非是诸位肯替我祷祝，
上天慈悲原谅我的错处，
诸位有罪必愿受人原谅，
请诸位大量也把我释放。

普罗斯帕罗此时已经衰弱到无法自己走下舞台。四步韵诗歌的要点在于它制造出的戛然而止的效果能将句式与修辞上明显的停顿感压缩到短促的诗行内，而诗行的结尾则因为押韵的韵脚而显得铿锵有力。这样的诗歌形式有力地表现了衰弱的普罗斯帕罗。在这里，不管是普罗斯帕罗还是莎士比亚都不是在告别戏剧舞台，而是在乞求观众能够宽待并且原谅他们在剧中所做的错事。在剧尾表现出如此彻底的谦卑态度对观众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如果说《暴风雨》的剧情中始终充满着对许多事情的焦虑感——包括法术的残酷、童真的脆弱、幻象制造者所拥有的神祇般的魔力、人类不可抗拒地走向堕落而不是寻求提升的倾向和智识本身具有的盲目性与自我放纵等等——那么最后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是一个被剥去了法衣的魔法祭司，他在苦苦哀求我们的干预以便拯救他自己的灵魂。

莎士比亚和戏剧的世界

《暴风雨》包含的当然不仅仅是对于美学和戏剧艺术的探讨，我简短的讨论也无法涵盖莎士比亚诗学的全部内容。如他同时代的人一

样，莎士比亚深刻地意识到戏剧中不同体裁与种类的区分，也同时意识到他的戏剧往往是这些不同体裁和种类的混合物。他剧中的人物常常对他们身处其中的戏剧发表评论，例如在《爱的徒劳》中，伯龙说道：

> “我们的求婚未能像旧戏那样结束；才子没有配上佳人；姑娘们若是客气，大可以使我们的节目成为一出喜剧。”
>
> （第五幕，第二场，866-8行）

莎士比亚知道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眼中，他对于时空同一律的违背是一个缺陷；可是他却坚持创造宏大的戏剧行动，安排壮丽的场景；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巴洛克戏剧中只限于室内的布景和通向街道的窄门。在他戏剧的多样性背后有一个统一的目的；这个目的使莎士比亚得以抗拒同时代人要求他遵守拟古典戏剧理论的种种压力。他对于五幕剧结构的使用显示出他其实熟悉城市戏剧以及塞内加风格的悲剧后面的基本原则。《错误的喜剧》就运用了普劳图斯喜剧中的舞台安排，包括3个通向街头的房门；整个戏剧情节被限制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场景之中”，而且时间跨度仅为一天。《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是一出无可挑剔的希腊喜剧风格的范例；而《裘力斯·凯撒》则可以说是英国戏剧中结构最为清晰对称的古典悲剧。可是，对莎士比亚来说，戏剧在语气上的统一以及它的和谐紧凑从来就不是目的本身；他更关注的是如何使用现有的材料和理论开辟出新的可能性，而不是把它们禁锢在某个固定僵化的表现形式之内。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到许多伊丽莎白时期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但我们无法知晓莎士比亚对于国王、贵族和平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战争或宗教派别之类的问题抱有什么样的看法。当时的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而内战的阴影正在逐渐笼罩着英国。莎士比亚自己代表着新教传统中最好的理想，因为他竭尽所能地批评一切空洞和虚伪的言辞。在他的戏剧教化中，他从不试图去依附某一个现存的观点和立场，他总是努力使观众了解任何问题背后涉及到的方方面面。

莎士比亚的戏剧从不试图夸张或是抹杀属于个人的情感，而是试图启发并使之产生出新的同情与洞见。莎士比亚用于启迪观众的工具就是他的语言，尤其是在戏剧表演中使用的语言。

莎士比亚戏剧的目的与其使用的媒介在许多方面相互融合。现在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戏剧在伊丽莎白时期人们的世界观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我们要知道一个大多不识字的人群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表演来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而在戏剧中，一切社会生活的内容——所有的身份，所有的职业，所有的行业——都被分门别类地表现出来，并且按照当时人们对于它们的期望与认识被刻画出来。在宝座上或是在蒂尔堡骑马的女王、在绞架上的异教徒和反叛者、在讲坛前的牧师、叫卖的商贩都知道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他们各自的表演水平，不管这种成功是打动了人们的心灵，改变了固有的成见，还是卖出了手中的活螃蟹。莎士比亚能够直面这么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并且将其中的所有形式融为一体，其结果是所有人的心灵——演员的、诗人自己的和来自不同背景的观众的——都同时得到了“脱胎换骨般的转变”。他的作品印证的是比个人的意见更加持久的东西，并且由此演化成为“一种具有永恒性的内容”。

“梦也许是错误的、荒唐的和芜杂的，但是同时它又是绝对正确的。如果莎士比亚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之处只有通过他全部的戏剧作品才能被表现出来，因为它们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和世界。换言之，莎士比亚是完完全全非现实的（就好比一个梦）。”

读罢维特根斯坦 [7] 这一段话，和他同时代的人们也许会说他根本不懂得莎士比亚；可是今天我们开始用维特根斯坦的思考角度去探讨莎士比亚的思想，因为莎士比亚思想中内在的活力要比它任何表面上的观点都更有意义和相关性。的确，我们也许可以说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拒绝给我们一个显白的结论；他把这个工作交给了戏剧里的演员和剧场中的观众，让他们去说完自己的未尽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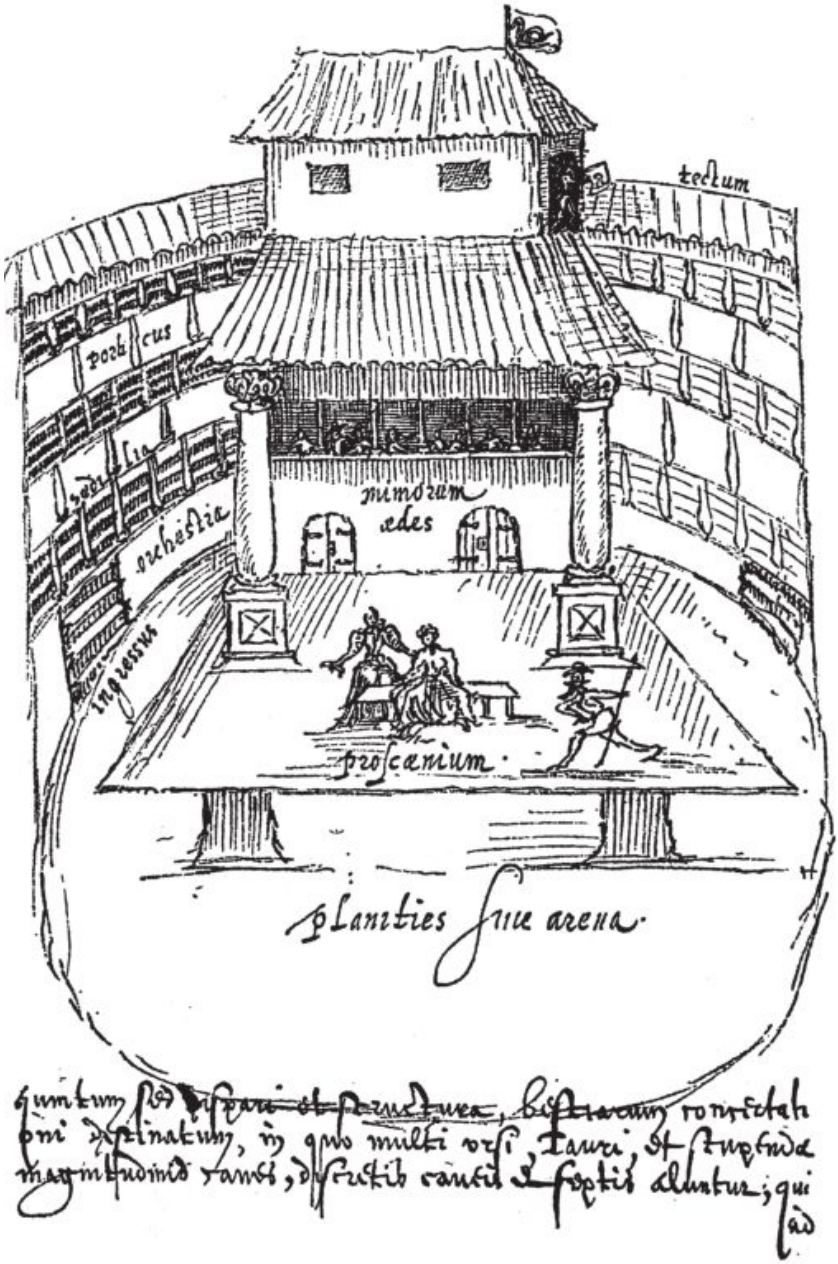

图11　天鹅剧院，约翰尼斯·德·威特绘（约1596年），此图是阿尔农特·凡·比谢尔所作的复制品。

注释

〔1〕 此书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十四行诗均用梁实秋先生的译文（《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5年），但是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熟悉程度，所有莎剧的剧名仍使用朱生豪先生的译法。

〔2〕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

〔3〕 约翰尼斯·雷纳努斯（Johannes Rhenanus），当时德国马堡的一名医生、化学家和炼金术士，多才多艺，与王室交往密切，长期任王室的私人医生，并随王室成员在1611年前后访问过英国，其间购得了菲利普·锡德尼的诗集。

〔4〕 托马斯·汤姆基斯（Thomas Tomkis）：当时英国剑桥大学出身的戏剧作家。

〔5〕 赫尔福德的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 of Hereford，约1565-1618），英国诗人，讽刺作家。

〔6〕 三一律（unities），一种关于戏剧结构的规则。又称三整一律，意指一出戏只能表现单一的行动，情节只能在一天之内和一个地点展开。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指明，悲剧“所模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同时指出一出戏的演出时间应“以太阳的一周为限”。在16世纪，意大利理论家基拉尔底·钦提奥把“太阳运行一周”解释为剧情的时间限度，卡斯特尔维特罗又进一步规定一出戏“必须真正限定一个单一的地点”。在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家布瓦洛把三一律总括为“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并以此作为不能违背的结构法规。

〔7〕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最伟大、最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之一。

第三章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伦理学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格概念

“什么是我们的一生？不过是一出激情的戏剧。
我们的欢乐是幕间的音乐；
母亲的子宫只是演员们的休息室，
在此我们为了这出生活的喜剧而穿上戏装；
上苍是敏锐审慎的观众
观看演出并指出演员的过错；
坟墓让我们从此躲避阳光的刺探
仿佛演出终结而幕布落下。
我们就如此上演自己的戏剧直至最后谢幕——
可是对于死亡我们却又十分认真，这实在不是戏谑之事。”

沃尔特·拉雷爵士

我们不必诉诸柏拉图就可以明白人最真实的东西并不是他的形貌和服饰，也非行为与言谈，而是他内心中永恒不灭的灵魂。但灵魂并非像一张无形的身份证那样，是个静止的实体，是活力之源，是上帝注入人体内的灵耀之火。正如一个演员可以在同一出戏的不同场景，或是在不同戏的不同时间里赋予穿着不同服饰的角色以生命和活力，灵魂可以赋予人类多变的肉身以生命和活力。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而言，灵魂仿佛是一个人的基因构成，是遗传给予他在未来发展中的一切潜在可能；而现实中的我们只是部分地实现了这种无限可能性。在伊丽莎白时期人们的眼中，那些扼杀人发展潜力的现象——儿童的夭折、严重的疾病、智力发展的种种限制、连年的战争、瘟疫和饥荒——显得格外地真实和残酷；对于他们来说，坚信现实的生活只不过是永恒灵魂可悲可叹的表象，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需要。这样的信仰使他们得以承担那些无法承担的苦难，就像《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Antonio）说的那样：

“我不过是把人生当作人生罢了，格拉西亚诺（Gratiano）；世界不过是人人

必须扮一角色的舞台，我的角色是个悲惨的罢了。”

（第一幕，第一场，77-9行）

在我们引用的拉雷爵士的诗中，人在他扮演的角色完结之后仍然存在，就像演员在台上3个小时的喧闹之后并未消失。可是，对于麦克白（Macbeth）这个试图毁灭自己灵魂的人来说，他离开舞台的瞬间也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人生不过是个人行动的阴影，在台上高谈阔步的演员，以后便听不见他了……”

（第五幕，第五场，24-6行）

莎士比亚对人物性格的理解就是基于相比于永恒而言仿佛是幻象一般的现实生活的深刻体悟。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的人格并非因为他们的行动而获得意义；而他们的自我也不是主宰他们行为的内在结构。莎士比亚的人物不是在寻找自我，而是在寻找超越现实自我的方式；这是因为现实的自我转瞬即逝，而只有他们的灵魂才具有与上帝的相似性，才是永恒不变的本体。一种解脱的方式就是让艺术创造出的自我来取代我们具体的肉身自我，因为艺术才可以更为忠实地表现我们内在的灵魂。诗歌所刻画的形象可以直接地再现我们灵魂所体验到的一切。

因此，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家不是刻意地通过特殊甚至是古怪的特性来表现一个独特的人物，他们更关注的是要提供给观众可信的人物类型。当然，只是贴上类型的标签就将戏剧人物推上舞台——如很多当时的戏剧家所为——是远远不够的。戏剧家必须能够对于这样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形成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只有这样，观众才会感觉到是上帝的力量造就了这样的人物，而就其德行而言，他们也可以望其项背。在《为诗辩护》一书中，菲利普·锡德尼写道：

“看，尤利西斯（Ulysses）和狄奥米德斯（Diomedes）的智慧和节制，阿喀琉斯（Achilles）的英勇，尼索斯（Nisus）和欧律阿罗斯（Euryalus）的友情，

是否对于无知识的人也带有鲜明的光彩，而俄狄浦斯（Oedipus）的良心的谴责，阿伽门农（Agamemnon）的很快懊悔的骄傲，其父阿特柔斯（Atreus）[1] 的吞灭自身的残酷，忒拜两兄弟的疯狂野心，美狄亚的复仇的悲酸和痛快，再如，在低一些的水平上，泰伦提乌斯的格那托（Gnatho）和我们乔叟的潘达（Pandar），也是表达得如此精妙，以至于我们现在还用他们的名字来代表他们的行当；总之，一切美德、罪恶和情欲是在他们的自然状态中揭示了出来，以致我们似乎不是在听人叙述而是自己亲身看清了这一切……”[2]

为了实现“戏剧自古及今的目的”，即“在自然面前竖立一面镜子，照出美德的真实轮廓而拒斥它自己表现的形象”；一个剧团不仅得有“扮演国王”的演员，还得有一个游侠、一个恋人、一个笑星、一个小丑和一位淑女——六个演员才能够组成巡游剧团的班底。他们得演出剧本里所有的人物，如果必要，有时一人还得身兼两三个角色；这样的情况间接地揭示了自我本身具有的多变性。杰克斯（Jaques）在《皆大欢喜》一剧中就一个演员一生中饰演的多个角色发表了一番评论：

> “整个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罢了；他们有上场，有下场；一个人一生扮演好几种角色，他一生的情节共分七个时期。”
>
> （第二幕，第七场，139-43行）

在他随后对于这七个时期的描述中，杰克斯给出了一系列的性格速写图，其中每一个性格都具有自身的完整性，而且与之前的性格没有任何的关系。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这样经历一个又一个的不同阶段：他们从学校毕业，成为了爱情诗人，21岁时便可以作骑士，当士兵，然后结婚从商，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成家，最后慢慢老死。在每一个时期，他们都尽心地扮演类型化的角色：作为恋人，他们会呻吟哀叹，写作诗篇；作为士兵，他们在马上纵横驰骋；作为法官，他们又会危坐高言。

杰克斯把其中的一个角色称为“穿花衣的傻子”；这个角色来自于“艺术喜剧”中的人物。其他一些角色可能也来自于同一剧目，像戴

面具穿紧身花裤的小丑、船长、破坏年轻人爱情的学究和老头这样的人物。我们在16世纪意大利的高雅戏剧和它的源头古罗马喜剧中也能看到同样的角色种类。“剧场”这个词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不仅是指人们观看戏剧表演的场所，甚至也不是用来指称一个特定的行动区域（例如像现代英语中的“手术室”和“战区”中的意思），而是指一种涵盖所有方面的戏剧表演。换言之，剧场不是为了展现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而是表现社会生活的整体图景。当时人们将1576年在索尔迪奇建成的剧院冠名为“大剧场”的原因就在于此。渐渐地这个词背后的普遍性含义消失了，被窄化和限制为仅仅指称那个有照明灯光和粉墨油彩的戏剧舞台。远在莎士比亚辞世之前，戏剧家似乎就已经失去了为大众提供一个生活全景的艺术自信。

在讨论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对于一切真理的探寻方式还限于大学内举行的公共论辩，而不是在实验室内进行的科学实验。客观的和基于实际经验的方法在人们眼中往往和炼金术没什么两样。对于那些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比如是否存在别的世界），经院学者仍然试图通过公众的辩论和修辞的技巧来加以证明。因此，当哈姆雷特提到“这部戏中一些不可避免的辩论命题”时，我们大可不必惊讶。作为一个经院出身的学者，哈姆雷特会把任何一部戏剧看成公共辩论中的一个命题，需要我们通过对对白、剧情和人物的仔细分析来得到最终的意义。哈姆雷特给国王演出的戏剧实际上是一则最简单的寓言，一部被戏剧化的真人真事小说。当时，观众能看到戏剧剧情是怎样凸现出日常生活中未经艺术处理的一切现实。需要反复强调的是，莎士比亚戏剧所表现的不是具有鲜明个性的戏剧人物，因为这样做会否定他戏剧作品所具有的类型化和示范性的作用，从而人为地把戏剧人物和观众阻隔开来。可是在现在莎剧演出中，我们仍然经常依照电影和现代小说中人物刻画的模式来表现人物的鲜明个性。

恶的本质：《奥瑟罗》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总是存在着对人灵魂内部冲突和斗争的刻画。这种内在的冲突斗争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外化。最为简单的形式来源于莎士比亚对道德剧的模仿，即用一个具体的恶人来表现恶，并用他来影响戏剧的主人公。这个作为恶的代表人物直接继承了古典喜剧中存在的“充满诡计的仆人”这一形象；有时，这个人物也可能是一个不那么工于心计，来自于英国本土文化中的角色。去追问恶人的行为动机完全是枉费心机，因为恶的本质就是荒诞、矛盾、无动机可言的。依阿高（Iago），这个让一代又一代的批评家徒劳地进行着心理解析的人物，就是这样一个恶人。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毁掉奥瑟罗（Othello），可是他没有任何理由。从他那奇怪而病态的黑色幽默，混乱而又有些歇斯底里的动机，以及他对于奥瑟罗的依附关系中，伊丽莎白时期的观众会立刻认出这个恶人，即使在剧中他否认勃拉班修（Brabantio）对他的称呼：

> “勃拉班修： 你是一个下流的东西。
> 依阿高： 你是——一个元老。”
>
> （第一幕，第一场，118行）

当然莎士比亚对于依阿高的刻画，相比于《麦克白》中的巫婆形象，要蕴含着更多的内容。因为在这里，莎士比亚试图表现一种实际上并不复杂的邪恶是如何展现其自身的。以防我们忘了依阿高是一个诱惑者，莎士比亚在剧中还特地提醒我们。除此之外，他还告诉我们，依阿高像仇恨“地狱中的酷刑”一般仇恨奥瑟罗，而且依阿高预言道“时间的胎里包藏着不少的事端，将来是要产生出来的”（第一幕，第三场，369-70行），而最终“地狱和昏夜要把这怪胎送到世上来”（第一幕，第三场，401-2行）。

依阿高在剧情中无处不在的情形显得有些不合情理；他周旋于各个角色之间，并且安排了最后毁灭奥瑟罗的陷阱。他在诱惑并毁掉洛德里高（Rodrigo）和卡希欧（Cassio）的过程中显示出近乎疯狂的智谋也似乎超乎自然之力。在引诱卡希欧时，他扮起了道德剧中益友的

角色，突然地为卡希欧唱起了祝酒歌。当卡希欧以为美酒是他生活中魔鬼的化身时，依阿高却有着另一套说辞：“别这样，别这样，好酒原是有用的东西”（第二幕，第三场，300行）。

因为自己的鬼话而得意洋洋的依阿高随后又作了一番长篇的解释：

“谁说我是小人？我的劝告不是很忠实正直，近情近理吗……”

（第二幕，第三场，327-8行）

“恶魔的哲理呦！魔鬼若要怂恿人做一件罪大恶极的事件，一定要摆出一副神圣的样子来诱惑人，如我现在这样……”

（第二幕，第三场，341-4行）

随着奥瑟罗逐渐落入了依阿高凭机智而不是凭巫术设下的圈套，剧中的反讽意味越来越浓：

“爱米利娅（**Emilia**）： 我敢以性命打赌，这一定有什么阴险小人，挑拨好事的流氓，招摇撞骗的奴才，为要谋一官半职，所以捏造这段谰言；一定是这样一回事。

依阿高： 呸！没有这样的人，绝不可能！”

（第四幕，第二场，132-6行）

当演依阿高的演员念出这段台词时，他一定会向台下的观众会意地挤眉弄眼，尤其是因为恶人形象当时通常是一个喜剧性的角色。

由于除了依阿高之外只有观众才知晓他的一切机谋，他们之间便渐渐地发展出一种共谋的关系。如果他们发现在毁灭奥瑟罗这个外乡人的过程中，观众与依阿高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那么抱怨依阿高只是邪恶的简单图示化的批评家们也许能多少平心静气一些。在大部分的剧情中，观众知道舞台上的一切都在暗地里进行。除了依阿高，所有的人物都被蒙在鼓里，而只有依阿高，仿佛爱德蒙顿的黑色猎犬，在他们之间周旋，驱使他们犯下谋杀的恶行。当奥瑟罗

知道了依阿高的所作所为之后，他的理解是很恰当的：

> “我看看他的脚，那只是一种传说；如其你真是一个魔鬼，我便杀不死你。”
> （第五幕，第二场，287-8行）

这时依阿高用言辞回击了奥瑟罗：“我流血了，长官，但是没有死”（第五幕，第二场，289行）。奥瑟罗随后追问依阿高为什么要如此地陷害他的“灵魂和身体”。可是，依阿高的恶行已毕，作为邪恶化身的他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于是便回答道：“什么也别问我：你所知道的，你都知道了；从此以后，我一字不说”。（第五幕，第二场，304-5行）

正因为依阿高的行为不能用人物的个性来解释，更恰当的理解是他象征着一种力量的存在——“比痛苦，饥饿，和海洋还要残酷”（第五幕，第二场，363行）——《奥瑟罗》的剧情从一开始就有意让观众参与，让他们去理解善恶的冲突。他们观看完戏剧之后并不会祈求自己别遇见一个依阿高似的人，而会体悟到恶的本质以及看上去光明的现实如何会迅速地陷入混乱和无序之中。在伦理上把恶理解为一种缺陷、荒诞和矛盾可见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用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来体现恶的这些特质并且把它表现为一种活跃的力量则来自于基督教的传统。我们不再像伊丽莎白时期的观众那样感到魔鬼的无所不在，但是，依阿高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意义，他是种族主义者那些肆意攻击行为的客观对照物——依阿高似的人物仍然活在我们身边，他们踢毁外来移民的信箱，并在其中倾倒粪便。

人格的发展和变化：《亨利五世》

如果诗人捍卫自己艺术的前提是戏剧舞台可以成为引导人民驱恶扬善的一种方式，那么显然他们相信人性的改造和拯救是可能的。从我们上面引述杰克斯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伊丽莎白时期的人并不把人

格看成是一种固定的和有限的存在。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要求人物在个性上前后一致，因为若不如此，人物本身就会变得面目模糊，而故事情节的发展也会显得混乱。但是戏剧则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富于变化和发展的人性，因为每个人物都已经先被赋予了一个固定的地位和称呼，都由固定的演员来扮演、固定的服饰来表现。今天的观众和批评家在熟悉了小说的形式特点之后再来观看戏剧，往往不能认识到自己对人物刻画一致性的要求其实是无的放矢，完全没有必要为莎剧人物在剧中发生的突然变化而大惊小怪。戏剧家当然能够意识到这种变化的突然和随意，他们也能体会到戏剧制造的喜剧结局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冲突；但正是通过人物的突变和以喜剧收场的方式，他们才能通过比拟来彰显上帝的恩典。

对于莎评家而言，最难解释的无过于《亨利五世》中似乎不可救药的哈尔王储（Prince Hal）如何转变成为莎士比亚史诗剧中英雄式的国王亨利五世（King Henry V）。其实，在对他临死的父亲和观众说的话中，亨利五世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很难解释的人格变化：

> “如果我作伪，啊！让我就在目前的放荡的生活中死去吧，不必活下去把我计议中的改邪归正的情形做给多疑的世人看了。”
>
> （第四幕，第五场，151-4行）

哈尔王储把王位称为“一袭新的灿烂的衣裳”，此时观众第一次意识到哈尔王储改变了的身份；他们将观察这袭新衣是否适合他。王位本身是传承不断的——“国王已死，国王万岁！”——而亨利五世在登基之后以如下的言辞表达了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此时仿佛他已经变成了他的父亲：

> “我诚心地愿意你的声誉日隆，直到有一天看到我的儿子开罪于你，而且服从了你。这样我便可以重述我父亲说过的话……”
>
> （第五幕，第二场，104-7行）

为了强调这一点，亨利五世采取了奇异的悖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的父亲狂放地进了他的坟墓，因为我的狂放性格也葬在他的坟墓里面了，我要以他的那种性格严肃地生活下去，打击世人对我的预料，粉碎预言，消灭那些只根据我的外表而遽下判断的恶意诽谤……”

（第五幕，第二场，123-9行）

观众——或是亨利五世言中的“世人”——必须要以他展现或表演出来的一切来作出判断，因为“戏剧中可以被理解的东西”说到底不过是表演的行为和熟记的台词。为了创造出一种氛围以使观众能感到亨利五世性格中发生的剧变，莎士比亚特地安排了一场福斯塔夫（Falstaff）与亨利五世的正面冲突——这可以被称为“剧情发展中的一次政变”。莎士比亚先是让我们和福斯塔夫一样相信，随着他“驯顺的羊羔”和“乖巧的男孩”成为国王，他和他的那些同伴会时运大转；而实际上，观众就像福斯塔夫一样先为亨利五世身上的变化感到惊讶万分，而后又完全信服：

“不要以为我是从前的那个人，上帝晓得，世人也必须看出，我已经撇掉了从前的我，我也同样的撇掉了从前陪伴我的人，有一天你听说我恢复了故态，仍就来找我，你可以和从前一样……”

（第五幕，第五场，56-61行）

英国国王的加冕礼一直都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包含着一系列圣意的符号来象征继位人在精神人格上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与基督教中的受洗礼、坚信礼、授圣职礼（就是涂油礼）有关。亨利五世此后不能再随意地取笑国家，因为加冕之后的他已经变成了国家的化身；所有个人的欲望从此必须服从于教职。去指责亨利五世没有始终如一的自我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剧情的要点就在于他过去的自我已经消亡。在理解莎剧时，我们应该努力相信这种奇迹般的变化，尽管这样的情况与我们现代人的情感体验格格不入。其实这样的转变并不是

特别地偶然或令人惊讶，因为奋兴布道家宣称他们每天都能目睹这种变化。

相信人的灵魂能够自新的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乐观的，同时也是反加尔文宗教义的。和当时大多数的基督徒——无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一样，在莎士比亚的头脑中，人的一切力量为上帝的恩典所限。无论恶的力量如何诱惑人性中的弱点，上帝的干预总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愿意虔诚地祈祷。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命运是预先设定的。基督徒的“视域”或者说“他们眼中人生的舞台”从原初的意义上讲，是会有一个好结局的，因为无论一个人最终获得了胜利还是被打下地狱，上帝的公平和正义都得到了实现。正是因为基督教设定的世界图景，伊丽莎白时期的悲剧不可能提供一个预先命定的戏剧结构。学者们往往感到莎士比亚戏剧中因缺乏这样命定论的情节结构而弱化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力量，所以他们试图从《哈姆雷特》剧中哈姆雷特的一段台词里找到证据，来说明莎士比亚戏剧中存在着这种命定论的思想，因为这里哈姆雷特作为一个悲剧英雄的毁灭似乎可以被看成是他性格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局：

> “譬如个人，也是如此，由于某种脾气天生的畸形发展，常常冲破理性的藩篱，——这是生成如此的，当然不能怪罪他本人，——或是由于某种太不合普通情形的习惯，都能使得他的性情有点什么缺憾；这样的人，身上带来一种缺憾的标记，这缺憾也许是天生的或是命中注定的，那么他的德行无论是如何神圣般的纯洁，无论是如何穷极人为的优美，但在一般批评起来，仍是要受你那某一项缺憾的连累祸害；一点点的瑕疵，可以使全部的美质都受到耻辱。”
>
> （第一幕，第四场，23-38行）

关于《哈姆雷特》这出悲剧最普通的现代解释便是将它归结为哈姆雷特性格中致命的弱点——犹豫不决；就像我们将《麦克白》的悲剧归结为麦克白的野心或者将《奥瑟罗》的悲剧归结为奥瑟罗的嫉妒——这些特点在现代人的理解中都被认为是人物性格中不可改变的东西，就像解剖学或种族主义中的决定论观念。可是，实际上，哈姆雷特在这段话中所指的其实是性格中的一个明显缺陷会如何影响我们在

他人眼中的形象，或者说他人会如何把一个瑕疵放大成一个人的全部性格而无视他具有的美德。当然，现在我们发现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在舞台上会故意显得迟疑不决，跌跌撞撞，与他所谓的个性作着无形的斗争，换言之，现在这个角色的表演采用了电影中那种内向性的人物刻画模式。我们看现代哈姆雷特的表演就仿佛在看一个残疾人努力地攀登纽约帝国大厦，而这样看其实无法穷尽这部戏剧所能带给我们的东西。观看莎士比亚悲剧的观众并非被恐惧和怜悯这样的情感完全地控制，被动地期待从中获得心理上的净化和升华；相反，他们是在积极地理解、解读，并对剧情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们对哈姆雷特时而同情，时而批评，时而认同，时而拒绝。

为了理解这部戏剧的关键问题（借用一句哈姆雷特自己的话），观众必须要进入戏剧人物通过独白表现出的情感中去；但同时也不要忘记自己旁观者的身份。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总是被精心地置于一个独立的时空之中，开头和结尾都有合唱团的旁白使之与观众隔离开来。莎士比亚在剧中使用了几乎所有可以产生陌生化效果的技巧：人物对于剧情本身高度自觉的描述，特别安排的歌曲演唱，关于剧情的概括总结，哑剧表演，戴面具的人物，喜剧性的幕间表演，有意为之的时间错误，关于戏剧主题的评论以及对于抽象观念图示化和象征性的再现。当然，观众们自己的价值观始终是起作用的，他们并不完全相信戏剧讲述的内容。对学者来说，这是莎士比亚戏剧艺术中最难理解和最难把握的一方面，同时也是莎士比亚思想中极其重要的地方，它必须要在戏剧的对白中展现出来。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莎士比亚思想的戏剧化表现从始至终都涉及到戏剧人物和观众的反应与解读两个方面。

《哈姆雷特》和英雄式的怀疑

观众与戏剧人物之间这种充满活力的关系最为彻底的表现无过于《哈姆雷特》；这种情况与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一书中的描述颇为

一致：

“悲剧揭开那最大的创伤，显示那为肌肉所覆盖的脓疮；它使得帝王不敢当暴君，使暴君不敢暴露他们的暴虐心情；它凭激动、惊惧和怜悯阐明世事的无常和金光闪闪的屋顶建筑在何等脆弱的基础之上……”[3]

《哈姆雷特》这部戏带我们进入的正是一个充斥着谎言的世界；它的基础不停地滑落坍塌；它使我们怀疑的不仅是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而且也包括我们自身的判断力和行为力。剧中的气氛与蒙田的随笔《为雷蒙德·塞邦德辩护》颇有类似之处，而且剧中的文字与佛罗里奥翻译的蒙田随笔也有相互呼应的地方。虽然莎士比亚的思想与蒙田的思想有着明确的联系，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人生存状态中的悖论性对于所有伊丽莎白时期的思想家而言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约翰·戴维斯爵士[4]的诗歌《认识你自己》：

“我知道我的肉体如何脆弱，
　　外部的力量，内部的发烧都能毁掉它；
　　我知道我头脑与神的无二，
　　可是无论是它的智识还是意志都已被败坏；
我知道我的灵魂有能力知道一切，
　　可是它既盲目又无知；
　　我知道我是君临自然的王者之一，
　　可是却被最低下和罪恶的东西束缚；

我知道我的生活痛苦而且短暂，
　　所有的存在物都在作弄我的知觉；
　　总而言之，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人，
　　一个骄傲却又处境悲惨的东西。”

在这首诗里，约翰·戴维斯爵士表明他能确信的只有他的无知——诗里表现出的反讽是基督教怀疑论者自然而然的立场。正是这样的思想才开启了宗教宽容与多元主义的先河，可是持怀疑论的立场绝非一

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持怀疑主义的立场是一件对于精神与智识都要求极高的活动。在哈姆雷特那里，这样的立场带有英雄般的色彩。哈姆雷特精神上的英雄主义在剧中与福廷布拉斯（Fortinbras）凭借蛮力和勇气的英雄主义形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对比。福廷布拉斯盲目地寻求复仇而从不质疑自己行为的道德性；哈姆雷特也许要为不能以大开杀戒的方式来恢复家族的荣誉而无尽地折磨自己，可是他所选择的方式，尽管痛苦而且危险，但却是正义的。就像哈姆雷特在大战之前的反思中所想到的那样：

> “看看这两万人为了一点虚幻的骗人的名誉，竟视坟如床，效命拼死，所争的那块地方还不够双方的用武之地，还不够作阵亡将士的埋葬之所，我能不惭愧吗？”
>
> （第四幕，第四场，59-65行）

当我们读到这段独白的时候，哈姆雷特已经带着观众熟悉了埃尔辛诺那个外表光鲜但却内里污秽的世界。哈姆雷特与观众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其实在他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进入克劳迪乌（Claudius）华丽盛大的王庭时就已经确立了，因为在他与其他的戏剧人物对话之前，哈姆雷特就已经在与观众们对话了。就在回答他母亲对他哀悼亡父的行为表示的质疑时，哈姆雷特表达了一个观众无法拒绝的观点：

> “不仅是我这一袭墨色的长袍，照例的一套黑色的丧服，用力的长吁短叹，面上沮丧的样子，以及一切悲哀的表示——不仅这些不能真正的表示我的内心悲哀；这些才是真正的可以说是‘好像’，因为这是人人可以假扮出来的举动，但是我心里有非外表所能宣泄的悲哀……”
>
> （第一幕，第二场，77-85行）

哈姆雷特以这样的方式将自己置于观众和充满了虚假表演的埃尔辛诺之间；观众们能够意识到并且认可哈姆雷特存在于另一层面上的真实之中，他会为他们揭示以多种形式显现出来的虚假和伪装。但在这样

做的过程中，甚至人自己的头脑都已经无法被完全地信任，哈姆雷特由此陷入了昏聩和混乱的危险之中。

在他的第一段独白之后，哈姆雷特成为了戏剧的主角，而同时观众也获得了一个他们在剧中的代理人：何瑞修（Horatio）。何瑞修将会忠实地告诉哈姆雷特观众们已经知道的一切。观众与戏剧主角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哈姆雷特对何瑞修这个无声的旁观者所表现出的关爱而得到了加强——在剧终的时候，快要死去的哈姆雷特把他经过了一番痛苦之后才参悟到的道理告诉了何瑞修：

> “啊——上帝！——何瑞修，事情就是这样的暧昧不明，我死后要留下一个何等罪过的名声！如其你真的爱我，且别去享天堂的极乐，在这严酷的尘世隐忍些时，把我的故事宣扬一下。”
>
> （第一幕，第二场，77-85行）

在《哈姆雷特》的第三幕中，在埃尔辛诺的世界里，我们看到赖尔蒂斯（Laertes）侮蔑哈姆雷特，而普娄尼阿斯（Polonius）则将充斥着狡猾和机谋的经验传授给他的儿子，随后又把类似的心机算计教给他的女儿。通常的戏剧形式要求我们相信台上的人物关于一个不在场的人物所说的话，除非所说的一切当场就被明确地否定。可是这里奥菲莉娅（Ophelia）的神智不清（“父亲，我不晓得我该怎么想。”）和普娄尼阿斯的世故奸猾使我们开始怀疑这些言辞的真实性。哈姆雷特随即登场后的一番对于人总是以最坏的想法揣度别人的批评使我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观众通过他们的代理人何瑞修也彻底相信了哈姆雷特，无论他的行为将会变得如何古怪，观众也会对他深信不疑。这幕有哈姆雷特的戏后紧接着又是一幕没有他出场的戏。在后一幕戏里，观众发觉了普娄尼阿斯那些高调的道德言辞后面的隐含之意。我们发现他居然雇人去监视他自己的儿子，其手段之卑劣让受雇的探子都表示抗议。奥菲莉娅也算是一个间谍，她赶来报告哈姆雷特第一次出现的古怪行为。普娄尼阿斯认定这是为爱情所折磨；但是观众此时已经不再相信他的任何判断。哈姆雷特不过是没有在奥菲莉

娅的表情中找到他试图寻觅的事实真相，而这样的真相，我们知道，他在埃尔辛诺是不可能找到的。

埃尔辛诺居民对哈姆雷特的看法与观众们对他的看法之间存在的差异在剧中一直被莎士比亚有意地保留；因为观众们必须要自己学会去怀疑埃尔辛诺的一切。他们要渐渐地学会哈姆雷特在一封情书里所表示的“真理就是一个骗子”这样的怀疑态度。而哈姆雷特则成为了一个探索者的角色，寻找着埃尔辛诺被败坏的根源。如果我们怀疑或否认哈姆雷特作为丹麦一切乱象的鞭挞者和疗伤者的身份，整出戏就会陷入混乱；可是如果我们忘记了哈姆雷特因此可能陷入唯我论〔5〕的困境——当我们只依赖自己理性的时候，这种危险就始终存在——我们就不能把握住这部戏的全部意义。我们知道新教思想最为激动人心的地方就是个人完全依靠自己的良心时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

哈姆雷特使用的第一个计谋是安排一出戏：戏中戏与戏剧本身之间的巧妙对应是打动伊丽莎白时期有学识的观众的惯用技巧。哈姆雷特安排上演的戏中戏具有高度的形式化特点：复杂的哑剧表演，前奏和押韵的对句。在这个形式化的戏剧结构里包含的正是造成丹麦病象的那个“隐秘的事实”。在哈姆雷特的周围，埃尔辛诺的一切都是伪装的东西，都是谎言的体现。奥菲莉娅假装读书，以引诱哈姆雷特和她“上演”一出普娄尼阿斯安排好的戏给藏于暗处的国王克劳迪乌和王后格特鲁德（Gertrude）看。而王后则带着哈姆雷特到她的内室去“上演”一出让暗藏的普娄尼阿斯观看的戏剧。观众每一次都能明了这样的陷阱，而每次哈姆雷特都作出了准确的猜测。

伊丽莎白的观众非常熟悉复仇剧的基本形式，就像今天的我们非常熟悉间谍小说一样。当哈姆雷特正确地怀疑克劳迪乌就是凶手的时候，他也面临着致命的危险：他不仅有可能被暴君除掉，还可能因此而毁灭自我。剧情的发展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哈姆雷特这个上帝派来的鞭挞者最后被自己毁灭了。如果谁忘记了这一点，哈姆雷特在克劳迪乌祈祷时决定不刺死他的场景一定会提醒我们。当哈姆雷特拒绝刺死克劳迪乌时，他便放弃了复仇的逻辑，而立刻从一个追杀仇人者变成了一个被追杀的人。当罗珊克兰兹和吉尔丹斯坦紧紧跟随哈姆雷特

时，他说道“躲藏起来吧，狐狸，所有人都在追捕你”。观众们清楚地知道哈姆雷特的意思，可是舞台上的人物却丝毫没有感觉；只有和观众一样知道内情的克劳迪乌才能明白哈姆雷特的意思。克劳迪乌小心翼翼地避免正面冲突而选择自我伪装和刺探的伎俩，仿佛是他而不是哈姆雷特才是寻仇者。我们开始意识到如果哈姆雷特真的能够拯救丹麦，他必须要为此而献身。“上帝之鞭”[6] 必须要被“基督之道”所代替。哈姆雷特将他的行为比作外科手术——“我要立刻就能探到他的痛处”（第二幕，第二场，593行；比较第三幕，第二场，296-7行）；克劳迪乌用一种反讽的方式使用了同样的比喻，他把毒药和赖尔蒂斯的剑比作治病的手术刀和碘酒。剧情的发展此时指向它不可遏制的结局，而新的危险就在眼前。剧中的哈姆雷特也有可能变成丹麦病象的牺牲品，变得和其他的丹麦人一样，在道德上冷漠无知。

剧中，丹麦真正的病症并非源自什么大阴谋，而是求知欲的缺乏和对于隐秘之事的漠不关心。埃尔辛诺的人们只是满足于获得权贵的眷顾，维持表面的秩序，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这种无知使他们容忍一个邪恶之人篡夺王位。当哈姆雷特折磨他母亲的内心时，他试图做的正是要唤醒她的道德意识。哈姆雷特的真正敌人并非是克劳迪乌的罪行，而是人们那种让篡位者横行的精神上的盲目无知。消除这种盲目（同时也唤醒观众的道德感），光靠以命抵命的复仇是远远不够的。奥斯力克（Osric）——这个代表着日常生活中的邪恶的角色——的出现，手持着用于最后的致命手术的武器，而他的手术将带来灾难和灭亡；这代表着我们对于虚假的探索和表现此时达到了顶点。

> “他吮乳的时候就会先向奶头行礼了。他这个人，以及末世浇风所推重的这一类的许许多多人，只学会了一套油腔滑调，缛礼繁文，不过是一层浮沫，却能使他们雅俗共赏地与世浮沉，可是一按实际，水泡禁不得一吹便破。”
>
> （第五幕，第二场，184-91行）

哈姆雷特以一种平和谦卑的基督精神赴死；他拒绝何瑞修提出的解决办法时使用的语言使人想到《马太福音》10章29节和24章44节

的话——“一只雀死，也是天命。命中注定在现在，便不能在将来；如不在将来，必在现在；如不在现在，将来总要来；最好听天由命。”（第五幕，第二场，215-18行）

哈姆雷特最终向谋杀他的人企求宽恕，就像是一个基督徒在死前忏悔他生前所有的过错。观众第一次在剧情中看到了哈姆雷特无法知道和无法猜到的结局——哈姆雷特将会像一只羔羊一样走向他的屠杀者。在他能够治愈克劳迪乌的邪恶前，他已是垂死之人；只有这时他才能让克劳迪乌尝到自己所下毒药的毒性，而他的“手术”在此时才告完成。躺在何瑞修臂弯里的哈姆雷特最终向观众告别：

> “他们诸位吓得脸白发抖与此惨变无关的旁观者们，假如我能苟延几时……啊，我可以告诉你们——但是不必说了——何瑞修，我死了；你还活着，把我报仇的缘由宣布令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知道。”
>
> （第五幕，第二场，339-45行）

观众们此时已经经历了剧情的漫长旅程。他们开始时以为这是一个传统的复仇剧，可是他们对于剧情的理解最终跨越了哈姆雷特对于这个世界的清醒认识与赖尔蒂斯盲目愤怒之间的鸿沟。就他们理解戏剧的过程而言，复仇剧的结构和形式是不可或缺的起点，可是在剧情的发展过程中，观众却开始反思复仇剧本身的形式和主题；而剧中的赖尔蒂斯和福廷布拉斯就是传统复仇剧的代表形象。观众们体验到的不仅是一个怀疑论者的形象，而是怀疑的思想和面对现实的过程本身对于个人产生的痛苦经验。与我们不同，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习惯于激烈的辩论、传道和其他形式的言辞争辩；可是即使我们不再习惯聆听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风格写就的长篇大论，我们仍然被《哈姆雷特》深深地吸引——只要它带有形而上学含意的戏剧情节由演员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麦克白》：罪和上帝的恩典

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成就并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新颖的观念或是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哲学体系，而在于他将伊丽莎白时期普通的思想观点活生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他所发现的是一套混杂而不成系统的观念；他所做的是给予它们具体和真实的形象——“一个实实在在的表现和名称”。莎士比亚的根本目的，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完全地调动他的观众”。所有其他的考虑，比如时间、空间和体裁的统一性，不管是什么“悲剧，喜剧，历史剧，牧歌剧，牧歌的喜剧，历史的牧歌剧，悲剧的历史剧，悲剧的喜剧的历史的牧歌剧，不分场面的戏，或不分地点的戏剧”（《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392-6行）都无关紧要。

鉴于何瑞修（以及观众）都确信他们的英雄会在“一群天使”的歌声中得到安息，所以《哈姆雷特》算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就成了问题，但这同样无关紧要。如果一出戏的结局是主人公得到拯救的话，人们通常称之为喜剧。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诸如《一切为财》、《普通的世情》、《时不我待》、《活得越久便越愚蠢》、《知足常乐》、《放荡和浪子作风》之类的戏，其主人公无不以毁灭收场，但它们都被称为喜剧。它们的作者是像托马斯·勒普顿（Thomas Lupton）在《一切为财》中的开场白里说的那样来表现剧中主人公命运的：

> “祈求上帝吧，所有的观众，期盼你们能够被感动，
> 能够改变自己的错误，并且感到悲伤。”

这些描写“令人难过和不同寻常”事件的“快乐而简洁的喜剧”就是《麦克白》这部戏的先驱。《麦克白》的剧情结构非常简单。主人公的超凡之处一开始就确立了。他受到了诱惑，并且堕落，最后被毁灭。麦克白的诱惑来自于外部，但不是以恶人而是以巫婆的形象出现。剧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观众在麦克白知情之前就见到这几个巫婆，而且知道她们具有堕落天使才有的不受时空限制的力量。她们以幽默的四音步对句体（一种嘲弄性模仿诗格）发话，人们都认为她们是大

众戏剧中魔鬼撒旦身边小妖们的后代。

重罪的前提是事态严重，犯罪人要对所犯罪行的后果完全知晓且从始至终想法都不变。在《麦克白》中，莎士比亚就创造出一个兼具这3个条件的人物形象（与浮士德的形象不同）：麦克白犯下了罪行，他很清楚自己罪行的严重，而且在犯罪之后，他丝毫没有悔改之意。戏剧中的反讽意味是非常尖锐的：麦克白被毁灭是因为他是一个英雄；可是他的毁灭并非不可避免。因为麦克白在剧中比别人在精神意识上更为自觉，他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天意的存在和上帝恩典的力量。诱惑者明白他们自己的局限：只有上帝才拥有决定生死的权力，只有人自己才能毁灭他自己。就像那些巫婆谈论剧中的水手（间接地也是在说麦克白）一样——“他的船虽然不至于覆没，但是要遭遇风暴的颠簸”（第一幕，第三场，24-5行）。

麦克白之所以容易受巫婆们的影响并不是因为他过度的迷信，而是因为他自己邪恶的欲望诱使他迈出了错误的一步。他错误地理解了巫婆们的两个预言得到应验的事情；而这样的自我欺骗其实是他有意为之。作为国王邓肯（Duncan）的主将，麦克白事业的成功来自于他的忠诚；当他决定自己主宰一切时，他就已经误入歧途。邓肯的头号敌人麦克白如果不将刀剑施加于邓肯之上，他是不可能想象自己会黄袍加身的。虽然麦克白暗暗地告诉自己“如其机缘要我作国王，哼，机缘自然会给我王冕，用不着我去张罗”（第一幕，第三场，144-5行），但他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罪行。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犯罪感，作为下一个诱惑者的麦克白之妻就不可能影响他。

麦克白的妻子嘲笑麦克白的心志不坚，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正是以此来说服麦克白。因为她认为，既然麦克白在心中已经垂涎王位而且想象着谋杀国王的计划，那么唯一的障碍不过是麦克白自己的怯懦，而怯懦本身就是可耻的。此时，麦克白再次被荒谬的推理所迷惑；而观众像上苍一样是“睿智明了的旁观者”。他们看着麦克白的妻子召唤邪恶的力量：

“来哟，你们那随伴着杀心的精灵！请取去我的女性，使我自顶至踵的充满了

最刻毒的残忍，把我的血弄得混浊，把怜悯心的路途塞起，好让我的狠心不至于因良心发现而生动摇，或是犹豫不决！你们司杀的天使哟，你们若要无影无踪地执行宇宙间的肃杀之气的时候，请到我的怀里来吸取我的变了胆汁的乳吧！来罢，昏夜，围上地狱中最黑暗的烟雾，好让我的快刀别看见它造出的创伤，也别让上天从黑幔中间偷看见一眼因而高呼‘停止，停止！’”

（第一幕，第五场，40-54行）

就像一切邪恶的语言，这段台词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理论上，我们无法让本是自然一部分的邪恶力量来推翻自然的秩序，就像我们无法在上苍面前隐瞒自己的行为一样。现场的观众就像上苍一样能够看穿舞台黑暗的幕幔，看到片刻的良心发现使麦克白的妻子无法实施她的计划。上帝的恩典对于罪大恶极者也是毫无保留的，麦克白清楚地意识到了对抗他恶行的力量。邓肯的美德，如剧中所言：

“将大声疾呼像天使一般来抗议这穷凶极恶的毒手；并且恻隐心，有如一个跨风而行的裸体的新生的婴孩，又如天上的御风而行的天使，将要把这段惨事吹到人人的眼里，以至于泪雨淹溺了狂风。”

（第一幕，第七场，19-25行）

麦克白可以像班珂（Banquo）一样祈求掌权天使（九级天使中的第六级）来保护他，使他不受这些邪念引诱，可是，他却徒劳地祈祷自己的行为不会被人发现：

“你这坚牢的大地啊，你别听出我的脚步向哪方走，怕的是地上的石头都要纷纷谈论我的踪迹。”

（第二幕，第一场，56-8行）

麦克白这里提到的大地大概也是指剧场中那个突出的木质舞台，它的周围有成百上千个观众注视着，有人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喊道“停止！停止！”。忏悔的可能性就在眼前，但麦克白却拒绝了。而他行为的可怕之处在于即使他说了真话，其结果也和谎言没有两样：

“如其在这意外事前我先死一个钟头，我便是幸福一生；因为，从此以后，人世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一切都是琐细无聊；名誉与美德是死了，人生的醇酿已经吸干，窖里只剩下一些渣滓可以自豪。”

（第二幕，第三场，91-6行）

我们注意到，这一段话是麦克白伪装出来哀悼邓肯之死的：虽然全是违心之言，可是句句在理。批评家一直对剧情中随后出现的颇为粗俗的闹剧表演（这种闹剧由侍从表演，他对有关欲望和行为的诡辩观点进行了有意的模仿和戏弄）和对前面巫婆出场时的哑剧式拙劣模仿感到很难理解，但如果我们考虑到麦克白此时的生活已经成了一个悲剧性的闹剧，那么上述两个场景都可以被看成是表现麦克白荒诞性的方式。麦克白试图杀死他的灵魂，而他的灵魂却拒绝就此毁灭。负罪感和上帝的恩典同时在劝他忏悔，可是他却再次拒绝了。与此同时，他也因绝望而心力交瘁，无所作为，既无法与他的妻子合作，也无法统治他篡夺来的国家。他终于明白了邪恶的力量是不能依赖的，他只能等待看善意的力量能否发挥作用。麦克白的妻子，迷信邪恶的力量和她自己的本领，最终在胡言乱语中死去。在他自己黑暗而又无意义的世界里，麦克白努力使巫婆的预言能够符合他自己的意志，但他并未尽全力。失败之后，他能做的只是诅咒这些巫婆：

她们经过的空气都要沾染毒雾；相信他们的人都该倒霉；
他就以这样的方式盼望着自己的毁灭！

（第四幕，第一场，138-9行）

剧中没有任何的线索可以让我们相信有什么力量能够治疗麦克白心中的邪恶。在谋杀发生之后，我们第一次听到天真无邪的人声是由麦克杜夫（Macduff）的小孩发出的，可是他立刻就被麦克白的侍从杀死。在下一个场景中，玛尔孔（Malcolm）质问麦克杜夫为什么不能保护他的家人，仿佛他，也包括所有的观众，都在怀疑是否有任何人能够对抗和消灭麦克白。麦克杜夫此时叹息道：

“流血吧，流血吧，可怜的国家！伟大的暴虐，你立下安稳的基础吧，因为善良不能拦阻你！”

（第四幕，第三场，31-3行）

随后是一段莎士比亚作品中最为令人费解的对白。玛尔孔先说道：

“天使是光明的，虽然最光明的是堕落了；纵然一切卑鄙的东西都貌似忠良，忠良的一定依然不改常态。”

（第四幕，第三场，22-4行）

紧接着他就开始自己诽谤自己：说自己无羁放荡，有一种“不顾廉耻的贪婪”，彻底地堕落；这些言辞使得麦克杜夫退却犹豫，因为他无法效忠和侍从一个自称会“把一片宁静投入地狱，破坏宇宙的和平，摧毁人间的和谐”（第四幕，第三场，98-100行）的人。

玛尔孔在提醒了我们作为国王必需的美德有“公正，真实，节制，稳重，慷慨，坚忍，仁爱，谦逊，虔诚，忍耐，勇敢，刚毅”之后，我们就用不着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为什么玛尔孔会谤诽他自己，而颂扬英国国王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的圣德和他天赋的治疗瘤症的超凡本领：

“除了这奇技之外，他还有天赋的预言的本领，还有各种的福泽环拱着他的王位，表示着他充分享有上帝的恩典。”

（第四幕，第三场，156-9行）

戏剧就这样通过玛尔孔之口提出了拯救与恩典以及它们如何能够施行于尘世的主题。麦克杜夫立即理解了这一主题，他认识到，他的罪不是由他而是由他的妻子和孩子来赎的：

“上天竟袖手旁观而不肯臂助他们吗？罪孽的麦克杜夫！他们都为了你而被害

了。”

（第四幕，第三场，223-5行）

最后正是麦克杜夫对于上帝意志的臣服和对他罪行的忏悔使他能够举兵反抗麦克白——“上天已经鼓动了挞伐”（第四幕，第三场，238-9行）。而上帝用来挞伐麦克白的工具就是玛尔孔和麦克杜夫。

此时在麦克白的驻地丹新南堡，唯我论的幻想和危险依旧横行。麦克白的妻子在她的梦魇之中仍然在欺骗自己；她认为犯下的罪行无法更改，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惩罚罪恶——“明知没有人能向我们问罪，我们何必害怕”（第五幕，第一场，35-7行）。让麦克白心惊欲狂的正是他想到他妻子的话有可能是对的；生活可能真的就是如此毫无意义，既不能让人觉得痛心，也不能让人感到恐惧——“惊悸，可怕的事和我凶残的心已经厮熟了，不再使我惊惶”（第五幕，第五场，14-15行）。他妻子的死也无法让他流下一滴眼泪；她的死只不过是生命这个百无聊赖的故事中的又一个插曲——“一个傻子说的故事，充满喧嚣和愤怒，却毫无意义”（第五幕，第五场，27-8行）。

巫婆们在麦克白身上开的可怕玩笑还没有到最后点题的时候麦克白就已经开始大笑。他知道他成了他人的笑柄，像是一只掉进陷阱的狗熊；巫婆们曾告诉麦克白没有一个女人生的男人能够杀死他，而麦克白则想象巫婆们的意思是指没有一个尘世中的男人能够杀死他。麦克杜夫明白地说这是巫婆们开的一个玩笑——“别指望你的护符吧，让你崇奉的天使告诉你吧，麦克杜夫是在落生之前由他娘的子宫里剖出来的”（第五幕，第八场，13-16行）。此时，麦克白终于明白了邪恶的力量对人来说，并无裨益。

正是由于莎士比亚能够让麦克白悲剧性人生中的各个阶段都生动鲜活地表现出来，他才能成为变态英雄的典型。麦克白性格中的不同方面被逐步地表现出来，推动他命运的发展。当读到戏中那些生动、丰富和寓意深刻的无韵诗时，我们总是想去建立某种能够解释麦克白整个性格的理论。可是，《麦克白》比《哈姆雷特》更为坚决地抵制这样的理论。麦克白的形象始终坚持其具有的普遍意义，它就像戏剧

舞台一样不属于任何个别的人，或像是宇宙力量交织而成的海洋中的一个孤岛，一个除非有“上帝的恩典”、否则我们一定会迷失于其中的世界。

现代的观众通常认为《奥瑟罗》、《哈姆雷特》和《麦克白》3部戏中都有着精彩的人物刻画，并且可以提供我们动人心魄的戏剧表演机会。这3个人物通常都是由多才多艺、演技精湛的演员出演；这让普通观众更加容易意识到这些人物与他们的巨大差异而非相同之处。可是如果我们看到莎士比亚戏剧艺术中教化的一面以及他对于观众理解力的要求，我们就会想到这3个英雄人物其实代表着人类试图获得拯救的斗争。像他同时代的人一样，莎士比亚为人性本身的多样性所吸引；他能够取材于语言与行为中的不同寻常之处来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怪异人物。可是这样的人物，无论如何夸张和繁复，从根本上讲都并非戏剧目的本身，而只是点缀或者深化戏剧中心问题的工具而已。现代人通常把奥瑟罗、哈姆雷特和麦克白看成是复杂有个性的人物；而现代的文学批评如果不借助复杂的心理分析似乎无法对这些年年上演的莎剧说出什么更多的东西。但是，戏剧舞台从本质上讲不同于学校教室和新闻专栏；舞台上的一切仍然能够给予我们一些直接和淳朴的经验。我们当然能就什么样的性格缺陷会对人物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进行一番审慎的分析，但是能够打动观众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能够感染观众的是人物身处其间的道德世界崇高性的逐步展现。因为我们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主人公享有共同的语言，我们能够与他们一起穿越戏剧语言的深沟险壑和悬崖峭壁。

莎士比亚并没有为我们勾勒出一套系统的伦理思想体系；试图从他的作品中推导出一套伦理法则根本就是徒劳的工作。因为与他同时代的人一样，莎士比亚有着一种既深刻又敏锐的道德感；而且这种道德感总是必需的和充满活力的，它的全貌无法被任何一个个人所把握。戏剧家的任务不是喋喋不休地解释道德伦理问题，而是要用令人铭记和生动活泼的形式表现出道德问题本身具有的真实性。

图12　汇集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滑稽短剧的场景（1662年）

我们可以再次用维特根斯坦一段朴实无华的话来作为本章的结尾，因为它为我们指引了一条进入莎士比亚思想世界的捷径：

“我们可以说，莎士比亚展现了人类激情的舞蹈。因此他必须要做到客观，如其不然，莎士比亚就不是在展现而是在谈论人类激情。但是他是以一种舞蹈的方式而不是以一种写实主义的方式在展现。”

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洞见及其内涵，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莎士比亚的私人意见对于解读他的戏剧无关紧要，而他从不会用作品来表现他的个体自我这一事实却至关重要。

注释

〔1〕 尤利西斯、狄奥米德斯、俄狄浦斯、阿迦门农、阿特柔斯等均是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古希腊史诗和戏剧中的英雄人物。

〔2〕 引自《为诗辩护》，菲利普·锡德尼著，钱学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页。

〔3〕 引自《为诗辩护》，钱学熙译，第34页。

〔4〕 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es，1569 - 1626）英国诗人，政治家。

〔5〕 唯我论（solipsism），认为世界的一切事物及他人均为“我”的表象或“我”的创造物的哲学观点。它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逻辑结论。

〔6〕 上帝之鞭（*flagellum dei*），喻指某种事件是上帝对于人类堕落和恶行的惩罚。

第四章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政治学

历史剧：莎士比亚的史诗剧场

现在看起来，莎士比亚可能是依靠他的历史剧而获得最初的声誉。请看托马斯·纳什的一段评论：

“勇敢的塔尔伯特（Talbot，所有法国人心中的恐惧）将何等欣喜地发现在他沉寂墓中两百年之后，他会在戏剧舞台上再次重温那辉煌的胜利；至少上万名观众的泪水（如此的情形不止一次地出现）如贵重的香料重新涂抹在他的骸骨之上。在悲剧家的剧中，这些观众仿佛亲见他在战场上流洒热血。”

托马斯·纳什在这里所指的很可能是《亨利六世》第一部；而格林对莎士比亚又妒又羡的评论与纳什的话出自同一个时期。格林引用的是《亨利六世》三部曲中的另一部分；显然，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读者们对这部戏是十分熟悉的。我们要想知道莎士比亚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完全不必仅仅依靠格林言辞里对莎士比亚的怨恨之情去推测和猜想，只要把纳什评论中提供的数字与1592年时伦敦的总人口数作一个比较就能一目了然。

在今天，这样的成功只有电影大片才能获得；也许，正是电影大片——而非今天的戏剧舞台——才是莎士比亚规模宏大的历史剧的合适参照物。正如电影界大亨在二战期间把电影变成了爱国主义的宣传工具，当时伦敦的剧作家们因为面临清教主导的市政府的仇恨而必须依赖王室的保护；于是，他们争着为以文盲居多的观众写作史诗剧体裁的戏剧作品。这促使他们将未经综合的史实与猜测融入到一个短暂但极其重要的戏剧逻辑中。关于此点，我们可以参考莎士比亚的反历史剧《特洛伊洛斯与克瑞西达》的开场白（26—9）：

“……我们这出戏
不是从战争开始时演起，
而是从中间演起；从那个地方开始，

直到一出戏所能容纳为止。”

在《亨利五世》中，每一幕的开始都有合唱团的演唱，目的在于呼吁观众充分运用他们的想象力来配合剧作家和演员：

“……诸位，请原谅那些庸俗之辈胆敢在这简陋的台上扮演如此伟大的戏剧：这个斗鸡场能容纳法兰西之广大的战场么？就是当年使得阿金谷的空气受了惊吓的那些战盔，我们能把它们塞在这个木造的圆圈儿里么？啊，请原谅！圆圆的一个‘零’字，地位虽然渺小，可能成为百万的居数；所以对于这个伟大的故事我们固然也是微渺不足道，且让我们来激发你们的想象力罢。”

（开场白，8-18行）

对观众参与的指导以一连串命令性的动词出现在合唱团的唱词中：“试想……在想象中驰骋……就可以看见……听见……只要设想……跟了去，跟了去！……把你们的心勾挂在舰队的后尾上……离去……用力的，用力的想……务请多多原谅，用你们的想象弥补我们表演不足的地方。”（第三幕，合唱团，34-5行）

这些句子存在着语气上的不一致：一方面是居高临下的教化，另一方面则是有意地对进行教化的戏剧家和演员的贬抑——这种奇怪的结合可以被理解为是莎士比亚的自辩，或是为史诗剧作的辩护。《亨利五世》是莎士比亚系列历史剧的最后一部，也是这个系列的核心；而这个系列中所有的戏剧都围绕着英国最典型的英雄人物国王哈里的出场而展开。同时，我们知道在莎士比亚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都在对抗因从掠夺“新世界”中尝到甜头从而不断加剧其对外扩张的西班牙。伊丽莎白女王如此热衷于劫掠西班牙船只上的财宝不仅是贪婪所致，也是形势所迫。一连串的战争使英国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女王只能加征各种不得人心的苛捐杂税来维持各项开支；英国的人民则长期生活在无休止的征兵恐惧中。莎士比亚描写的福斯塔夫就是一个腐败的征兵官员；今天的人们大多把他看作一个简单的喜剧人物，可是莎士比亚对他的刻画有更深的含意。福斯塔夫自己承认他“滥用了国王的征兵令”，用“一百五十名士兵换回了三百多英镑的收益”。那

些“也许宁可听到魔鬼的声音，也不愿听到征兵的鼓声”的听众们也许会对福斯塔夫的话哈哈大笑；可是当他们听见福斯塔夫说“我已经领着我的一群叫花子被人宰割了，一百五十个里面没有三个活的，他们只好到郊外终身行乞去”（第五幕，第三场，36-8行）的时候，他们大概就不会笑得那么无忧无虑了。

因为福斯塔夫形象具有的娱乐性，学者们倾向为他的行为找各式各样的借口；他们也许忘了代表恶行的角色始终是一个讨人欢心、性格活泼而且有趣的形象。福斯塔夫这个角色来源于道德剧中“好玩伴”的原型，他永远使人失望，永远无法帮助主人公在往天堂的道路上前进一步。也许，通过用讽刺的笔触描绘这么一个人们熟悉的、鱼肉乡里的寄生虫形象，莎士比亚实际上是在表达许多沉默的老百姓对于政府的怨恨之情。16世纪90年代的时候，政府官员的腐败盛行；福斯塔夫可能引起的不只是观众们的笑声，一定还有奚落声和嘘声。

当然，历史剧作家的中心任务不是去表现民众的怨愤，而是去创造一个史诗剧的舞台，运用所有的技巧——诗歌、音乐和宏大场景——去表现历史本身的连续性以及观众在历史中的位置。就像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历史剧作家塞缪尔·丹尼尔〔1〕在反驳托马斯·坎皮恩〔2〕对韵体诗的攻击时所说的那样，“所有的诗歌无非是用韵律组织起来的言辞，与大白话不同，因为它能够更好地表达人们的想法，同时可以使人愉悦和记住历史”。莎士比亚历史剧中那些充满爱国之情的大段台词所享有的盛名有力地证明了这个事实，即莎士比亚创造出的那些动人心魄的戏剧语言能够在国家动荡不安的时刻使人民的心志保持坚定。我们应该把战争时期的莎剧表演也写入莎剧表演史。在二战时期马耳他被围困的最黑暗的日子里（1941-1943年），为了激起厌战者的斗志，一些士兵们会利用电台播送《亨利五世》的业余演出。今天，使用心理刺激使人承担凡人所无法承担的任务的手段已经被包装得带有些许邪恶的味道。相比而言，莎士比亚唤醒观众心中爱国主义的方式要显得温和和巧妙得多。

图13　猎驯鹿的伊丽莎白女王，出自乔治·特伯维尔《高雅的狩猎术》一书的扉页（1575年）

对于那些确信宣传不是艺术，或宣传那些他们不愿认同的事业——对王室或某个宗教派别的忠诚，为国献身的勇气——也不可能是高雅艺术的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就会成为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将它们看成是自足的诗歌作品或是对于个别国王或贵族的心理描述只能部分地解决这个难题；因为这样的解读方式一方面必然要忽略掉许多由剧中人物作出的评论，像那些不知姓名的、具代表性的或为了一段

重要的台词只出现一次的人物，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解释剧中的那些鬼神形象和他们的预言、警告以及诅咒。被这样的解读方式忽略掉的还有剧中那些以历史影射现实的言辞，比如在《约翰王》中，有许多的因素与历史没有太多的关系，反而与政治宣传紧密相关，像剧中反教皇（第三幕，第一场）、反西班牙的言辞（第二幕，第一场，23行，26行；第三幕，第三场，2行；第五幕，第一场，65行；第五幕，第二场，151行，154行；第五幕，第七场，117行）以及有意把约翰王与伊丽莎白女王相互比照来宣扬鼓吹女王的剧情等等。当然，这样的比照并非以一种粗糙和简单化的方式完成，莎士比亚从未削弱政治问题本身蕴含的复杂性，相反，他通过时间的选择和对观众情绪的引导将这样的复杂性突出地表现出来。当观众完全被冲突中的各种矛盾和心理力量吸引住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同时意识到简单的教条和派系不是合适的解决办法，因为它们总会让人误入歧途。

在莎士比亚写作《亨利五世》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英国统一的幻象已无法再维持下去。戏剧家的力量已经不能引起所有人——知识阶层和目不识丁的大众，有权有势的人和下层民众——的关注。室内剧院的兴起使戏剧有了更多的布景可能，这些剧院对充满公共意识和普遍性的事件不感兴趣，它们只对一些骇人听闻和淫秽色情的戏剧题材感兴趣，这样一来室内剧院便分走了环球剧院的一部分观众群。与此同时，其他的各种娱乐活动也都在争取每个观众那半个便士的门票钱。新近有才华的作者开始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写作戏剧作品，他们的观念虽然更高尚，但局限性也甚大。

图14　布朗和霍根伯格绘制的伦敦地图（约1574年）

1598年，本·琼生的一部戏剧被张伯伦勋爵剧团接受并在帷幕剧院上演。在1597年，琼生因参与写作一部名为《狗岛》的戏剧而被囚禁起来；这部戏的上演曾导致全伦敦的剧院在该年7到10月间被勒令关闭。不到一年之后，由于在决斗中杀死了亨斯罗剧团的一名演员，琼生被判有罪，最后只因有教士特权才逃过一死。但是琼生的拇指仍被打上带有罪犯标记的烙印，个人的全部财产也被王室没收；他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剧院敢雇佣的作者。但后来因为莎士比亚的剧团上演了他的《人各有癖》，琼生得以时来运转。可是让人觉得颇不厚道的是，琼生在修改《人各有癖》的时候，特地在剧前加了一段可能是针对莎士比亚的、带有责备意味的开场白：

“尽管生计造就了许多的诗人，而他们中的一些人
无论自然还是艺术都没有使其有点长进；
可是我们的诗人因为生计摆弄文艺，却不是真正地热
爱戏剧，
他们迎合时代中不良的习俗，

或者用了他们自己都会鄙夷的手段
来使诸位感到愉悦。
或是让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在一瞬间就变成了男人，
一生的时光似乎转瞬即逝；
或是拿着三把锈剑，
吟着几句押韵和不押韵的诗句，
为了约克和兰开斯特的宿怨而拼杀，
然后在伤兵医院内疗养他们的疮疤。”

琼生对整个的史诗剧形式不屑一顾，包括“会把人的魂儿勾到海外”的合唱团、从云端突降的天神[3]、焰火围绕着的地狱魔鬼以及用击鼓声和通过摇筛子里的金属屑来模仿的暴风雨声。琼生关心的是所谓“写实主义”的风格或者说是“生活的真实”；可是莎士比亚却有意地避开了这种他认为是更加有害的“真实”的幻象，他知道其实最真实的诗歌也是虚构得最好的诗歌。他在《亨利五世》中为史诗剧所作的辩护其实是在变相地夸耀他自己的诗才；他吹嘘说，这样的才能使他能够将观众带到一个更有利的位置来观察和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而且还能使他们乐于被置于这样一个位置：

“我们的地点要立刻移到战场上去；哎呀，好可怜，我们对不起阿金谷这个地名，只有四五支破剑胡乱耍动一番。但是诸位请坐下来看戏；戏是假的，事情却是真的。”

（第四幕，合唱团，48-53行）

图15　克拉斯·凡·菲舍尔绘制的伦敦全景图（1616年）

当时，相比于学者们的鄙视，史诗剧的作者畏惧的事情要严重得多。如果被认为干涉了宗教和政治问题，任何一部戏剧也不能通过审查。当《托马斯·莫尔爵士之书》被庆典主管检查的时候，他就命令剧中描写朗巴德人叛乱的情节必须被删去。《理查二世》中国王逊位的部分被禁止演出，在1597年出版的四开本中也被删去。《亨利四世》第二部1600年的四开本作出了大幅的修改。如果我们比较《亨利四世》第二部的四开本和后来的第一对开本，我们会发现所有涉及爱尔兰问题、伊丽莎白女王的合法性、武装叛乱以及关于特定贵族的细节在某个时候全被删去了。

审查和发照机关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发现有关宗教和政治的影射。年迈的女王自己的确是一个戏剧爱好者。在象征性表现女王的舞台剧中，她被表现为一个具神圣色彩的人物；女王越是老迈，这样的舞台剧的排场和规模就越宏大。可是，当她滥用国王的特权为与西班牙的战争不断搜刮民脂民膏时，议会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就不断提

高，而英国人民却饱受一系列的天灾人祸之苦——瘟疫蔓延、农业减收、新一轮的圈地运动以及经济衰退。对于民众反叛的恐惧最后导致了1595年禁止集会法案的通过。历史剧作者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不打算用历史剧来凝聚民心，使人民效忠于上帝和国王，那么他们最好去干别的营生。为了使历史剧写作免于授人以柄，简单地记住不要触犯女王是远远不够的，历史剧作家必须学会在处理繁复的历史事件时，明了他要传达的信息，而且还得随时准备删改、歪曲甚至是编造历史故事来体现他想要传达的历史教训。

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素材主要来源于两本著作：拉菲尔·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和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的《两个伟大和荣耀的家族兰开斯特与约克的联合》。但在他的历史剧中，莎士比亚并没有照搬这两本历史著作的内容。他删去了与剧情无关的事件，改换了历史事件的顺序，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安排了重要的角色，还将许多人物一生的经历压缩到一个戏剧场景中。批评家和学者曾经以为莎士比亚在其作品中添油加醋地使用了霍林斯赫德的编年史；可是通过对于都铎王朝历史的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莎士比亚其实参考了当时所存的一切史料，包括手稿、未翻译成英语的法语和拉丁语材料以及一些只是口头相传的历史资料。莎士比亚使用这些材料的方法不是通过细致的评估来确定史实并且前后一贯地运用它；相反，他会从相互矛盾的历史记载中选取最适合戏剧化地体现他宏大主题——都铎王朝的建立和玫瑰战争的乱象——的历史记录。

在莎士比亚消化和改变他得到的书面及口头的历史史料之后，最后的成果不仅带着他个性的印记，而且还要服从于戏剧表演的需要。像布莱希特[4]的历史剧《伽利略传》一样，我们看到莎士比亚历史剧的高潮部分通常都附有相关的评论。布莱希特会使用歌唱和在幕布上投射文字的方式来附上评论，而莎士比亚通常会通过合唱团中昙花一现人物的长篇诗体独白来发表评论。在《亨利五世》中，莎士比亚将历史评论安排成一个合唱团的表演；其效果与布莱希特似的戏剧效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合唱团的言辞不断地指向历史的真

实，而戏剧所表现的与之相比不过是一个渺小的幻影而已。对于布莱希特而言，戏剧人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和剧情所要表现的历史辩证法；这一点对于莎士比亚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莎士比亚的历史观念。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首先要做的是去营造一个史诗般的氛围；为此他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不仅包括鼓声、喇叭声、旗帜、担任前导的人物、宏大的言辞，而且还包括观众的想象力。戏剧的主人公就是英国，她不仅体现于代表国体的贵族和受洗的国王，她还体现在普通观众身上。莎士比亚以不同的方式反复申明：他要强调的是国王与臣民的相互依赖，每一个个人就是一个微观的国家，而国家也像一个人的灵魂一样需要得到救赎。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狂热的宗教激情甚至已使兄弟反目，而戏剧则试图去重新团结人民，提高公众士气。莎士比亚成功地运用了一些往往容易引起争议的历史题材。看过莎剧的观众激动之余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他们暂时不必为伊丽莎白时期日益恶化的政治局面和不断加剧的社会动荡而担忧。同时，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既不空洞无趣，也不宣扬好战精神。莎士比亚以他自己的方式阐明了不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人必将重蹈历史覆辙这样一个显白的道理；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通过剧中各种符征、预言和先兆，使将来之事得以预示，过去的缘由与当下的行为紧密相联——在涵盖了从珀西〔5〕叛乱到亨利七世〔6〕登基的200年历史的8部莎士比亚历史剧中，这一点被反复地表现出来。对于观众来说，8部戏中没有一部是容易和轻松的：他们必须非常注意战争的进程，因为在戏剧表演时，这一进程只能通过几个士兵和一些旗帜、战鼓、喇叭和木剑来象征性地表现一下；他们还必须密切关注那些以不同形式反复呈现的微妙主题以及它们自身不间断的变化。将各种宏伟的主题——善与不善的统治，居于神圣地位的王位和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纯政治意义上的王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承担的义务——融为一体，并放置在如此宏大的历史图景之内，这样的事情我们只能通过戏剧的舞台和诗剧的形式才能做到。

让莎士比亚的成就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他其实是从创作生涯的中期才开始写作他的历史剧系列的：第一批作品是1590年完成的《亨利六

世》的第一和第二部；而下一部完成的《理查三世》中的主人公理查三世则是这一系列历史剧所涉及的君王中在历史上出现得最晚的君王——他的出现宣告了都铎王朝的建立和英国黄金时代的来临。《理查三世》也许是对一个已故国王的无端攻击；但莎士比亚在这部作品中出色地运用了各种诗歌和戏剧手段，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比历史上的理查三世更有趣、更引人入胜、更深刻复杂的戏剧人物。剧中的理查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人物不如说是各种文学人物的混合体：他是“恶人”、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者、塞内加式的独裁者和马洛笔下的英雄形象；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墨枯修（Mercutio）和哈姆雷特一样，他也敢于对世间的矫揉造作和虚伪阴险作直言不讳的批判。理查三世的英格兰与哈姆雷特的丹麦一样腐败：《理查三世》剧情的道德模式也涉及了对于一个魔鬼般人物所代表的邪恶的惩罚；这在英国的戏剧舞台上司空见惯。不同的是这部戏里的理查三世机智多变，其权谋的本领实在令人叫绝；他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变得栩栩如生，以至于观众们一定会在看完戏后突然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会被一种肆无忌惮的邪恶力量所深深吸引。

王位的意义：《理查二世》

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在当时并不是唯一描写这位英国国王的戏剧作品——他的一个匿名竞争者也写了一部题材相同的戏剧《伍德斯托克》。当时还有一些没有署名的描写约翰王和理查三世的戏剧。1595年，塞缪尔·丹尼尔创作了历史史诗剧《兰开斯特与约克家族的内战史》。这些事实表明英国当时存在着要创造一个民族文学传统的自我意识。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在精神内涵上与塞缪尔·丹尼尔的作品很相近，而且从中受益颇多（虽然对莎士比亚产生影响的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尽管莎士比亚参考了很多历史资料，但他在《理查二世》中对史料的处理却得心应手，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当时的观众需要努力地配合戏剧本身的表演才能够理解从篡位到其引发的可

怕后果的全部剧情发展。要看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仔细地考察这出历史剧的各个部分。

在第一个场景中，理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王，他以一个仲裁者的形象出现来调解两个贵族之间的争端。在下一个场景中，刚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其性格形象与历史事实颇为不同）揭露出，害死约克公爵的元凶不是鲍灵布鲁克（Bolingbroke）控告的毛伯雷（Mowbray），而是理查本人：

> “这争端该由上帝来解决，因为置他于死地的人乃是上帝的代表，在上帝面前接受涂油礼的上帝代理人；如果他死得冤枉，让上天来复仇吧，因为我绝不能举起一只愤怒的胳膊来对抗执行上帝意旨的人。”
>
> （第一幕，第二场，37-41行）

我们不能因为理查受了涂油礼就把他认定为象征着一种必须被服从的绝对王权。虽然理查是世俗范围内耶稣的象征，但是他必须遵循上帝和道德的法则。如果他为了王位的稳固而允许使用谋杀的手段，那么他自己的合法性就不复存在。当刚特的约翰说国王的罪过并不意味着臣下就可以犯上作乱，他只是在重复着一种政治的教条。如果说决斗就是让上帝来作决定的一种方式，那么理查在下一个场景中取消了决斗的提议就显得非同寻常，虽然我们和观众都能看到，如果国王真的有罪，他肯定不会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当他用了流放的惩罚来将此事搪塞过去，事情就变得更加严重了。鲍灵布鲁克要6年之后才能回到英国，而毛伯雷则永远不能返乡。鲍灵布鲁克哀痛的言辞表达了兰开斯特家族热爱英国这一主题。在第四幕中，理查本人告诉我们，人民对于兰开斯特的爱国之情也多有呼应和同情，而他自己则将国家看成是满足私欲的工具，为此他可以随意地盘剥贵族和平民。

第二幕开始的时候，刚特的约翰在临终之时仍在病榻上指责理查纵容自己的私欲；而他的兄弟约克公爵（Duke of York）则指出国王只关心对他的“歌功颂德……和无聊邪恶的歌谣”以及“从时髦的意大利传来的种种报道”。理查对异国物事的眷恋与约翰的爱国之情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这一点在约翰关于“第二个伊甸园”的言辞中显露无疑，约翰的话语最后对理查作了一次最为严厉的批判：

> “这块拥有这样可爱的人物的国土，这一块可爱的可爱的国土，为了闻名世界而倍觉可爱的国土，现在要出租了，——我说这句话难过的要死，——像是房地出赁或小小的农场放租一般……那一向征服他国的英格兰，已经很可耻地自动地征服了它自己。”
>
> （第二幕，第一场，57-60行，65-6行）

国王是国家的首脑，他与国家一体的关系如同夫妻间的关系。当理查剥削英国的财富来满足他对外国物品的奢侈欲望时，他实际上是在剥削他自己。作为国王叔父的约翰乘机向理查直言进谏，称他是英国的地主而不是英国的国王；而理查则回答说，若约翰不是自己祖父的儿子，他定会因这样悖逆的言论而被处死。约翰最后还指责理查谋害了他的另一个叔父格罗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结果，理查不顾约克公爵的抗议，没收了约翰所有理应属于鲍灵布鲁克的财产，然后就若无其事地前往爱尔兰去了。脑赞伯兰伯爵（Northumberland）、威劳贝爵士（Willoughby）和洛斯爵士（Ross）3人合唱般的对白概括了英国在理查统治下的苦难，接着脑赞伯兰伯爵就宣布鲍灵布鲁克公爵即将回到英国，并将领导反对理查的起义；在下一个场景中，不同的目击者向王后描绘了起义的成功。在这个被他劫掠的国家里，理查二世没有赢得一个盟友的支持；他过于迷信天赋的继承权，并很快因此陷入了一无所有的境地。相反，鲍灵布鲁克则广为国民所爱戴——威劳贝爵士说到“好些位居下层的人因为他的馈赠而变得富有”（第二幕，第三场，138行）。威劳贝的言语引入了文艺复兴时期关于出身高贵和品行高贵孰优孰劣的辩论。这一问题的提出很快让我们发现也许理查失去王位之后可能会变成一个品质高贵的人，而他获得王位则会败坏鲍灵布鲁克的道德这一带有讽刺意味的可能性。鲍灵布鲁克庄严地宣誓他绝非为了篡位而来，他只是要拿回本应属于他的财产和爵位。在这一幕的结尾，合唱团宣布，

保王军士气低落，并且最终被击败。

在第三幕，理查的宠臣受到了应有惩罚，而此时理查从爱尔兰的征战中返回，抚摸着英国的土地，得意于自己神圣的王位，与先前一样不愿听到任何的诤言。他把自己比拟为柏拉图书中的太阳，只要一出现就会扫除黑暗的统治：

“狂暴的大海里所有的水也不能冲洗掉国王身上所涂的油；凡人的议论不能废黜上帝所选定的代表。”

（第三幕，第二场，54-7行）

此刻骚兹伯（Salisbury）和斯克鲁珀（Scroope）带来了最新的消息，理查终于意识到，也许涂在国王身上的圣油不能被冲洗掉，可是太多的圣油却也能淹覆国王的王位。被现代戏剧（尤其是后易卜生时代作品）熏陶的观众很自然地会把理查此时自相矛盾的言辞理解为他个人性格的表现。可就文艺复兴戏剧理论而言，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些言辞集中体现出的这部戏剧的中心思想。理查先是吹嘘上帝会派天使来保护他在世间的代理人，可是突然发现除了想象中的天使外，他没有任何的支持者。理查的问题——“国王的名义不就可以抵得过两万人吗？”——得到的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否定回答。理查咒骂他的仆从卜希（Bushy）、白格特（Bagot）和格林（Greene）的话与《马太福音》23章33节非常相似，他把自己比作是被犹大出卖的耶稣。可是后来他却发现他的随从并没有出卖他，反而为他效忠战死。在那篇言辞华丽的开场白中，当理查说到“我们谈论坟墓、蛆虫和墓碑吧”，他其实是通过描绘一幅超现实的图景来说明国王的脆弱之处：

“……一位国王之血肉做成的头颅上面箍着一顶空洞的王冠，就在那王冠之中死神设立他的朝廷，那个怪模怪样的小丑就坐在那里，对着他的威仪嘲弄，对着他的排场狞笑，准许他一个短暂的期间，一个小小的场面，让他称孤道寡，受人畏惧，以脸色杀人……”

（第三幕，第二场，160-5行）

理查终于明白了失败的原因，可是为时已晚，虽然他试图努力保住他的王位，可是当约克公爵背弃他以后，他失去了最后的一线希望。这个时候，剧情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法理上的国王理查与被人拥戴而成为国王的鲍灵布鲁克终于相见。鲍灵布鲁克仍然忠于他的国王——莎士比亚在此精心地把他塑造成一个不情愿的篡位者——因为王位政治之谜是整个戏剧的中心所在。可是观众们几个世纪以来都在猜测鲍灵布鲁克的话语是否是伪善的表现。这样的猜测固然是仔细阅读戏剧文本的结果，但这并非是对戏剧现场表演的反应。更具反讽意味的是，理查和鲍灵布鲁克都预言了英国的土地上即将出现的血雨腥风——在这个瞬间，似乎两人在政治上并无歧异。然而，当理查被迫取消对鲍灵布鲁克的流放令并归还他的土地时，理查意识到他被迫向一个更大的权威臣服，而国王的王位变成了一个可悲的笑话——“现在国王该怎么办呢？他必须投降吗？”（第三幕，第三场，143行）。理查有意痛苦地重复了“必须”这个词，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作为人质，他必须跟随鲍灵布鲁克前往伦敦。

在这幕高潮结束之后，我们当然会期待某种对这个场景的评论。王后此时就担任了这样的角色——她预告即将来临的痛苦，并为约克公爵园丁的到来做着准备。王后用一种气势宏大的无韵诗解释了理查根本性的错误——理查并非错在盘剥国家财富以满足私欲，因为国王有这个特权。理查是错在允许一个强敌羽翼渐丰以至于最后威胁到了他的王位。莎士比亚在国家和花园之间建立的呼应可能来自于许多不同的历史和文学传统，然而王后在这里所表明的观点却十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首要的责任是确保王位的稳固。在回答王后关于她丈夫命运的问题时，园丁们使用的一个意象明显地指向这部戏剧的基本结构：

“他们两个的命运放在天平上了：在您的夫君一方面除了他本人之外一无所有，有几个无聊的亲信只能使得他的分量更轻；但是在鲍灵布鲁克那一方面，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有所有的英国贵族，因为占了这一点便宜，他就把国王理查压倒了。”

（第三幕，第四场，84-9行）

第四幕的第一个场景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后期被强令删除。女王自己曾向年迈的兰巴德[7]抱怨说《理查二世》“已经在公开的场合上演了四十次之多”。女王在她的抱怨中可能把之前所有的演出都算上了，并且为她允许这部戏的上演而后悔。女王曾经说“你知道吗，我也是理查王”。当然，我们可以劝说她如果王位是永恒和连续的，她也可以认为自己是亨利四世，但是在埃塞克斯不成功的叛乱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这样的话对于她一定不会有什么说服力。就在埃塞克斯叛乱发生前，一些埃塞克斯的支持者曾联系莎士比亚的剧团，希望他们特别安排一场《理查二世》的演出。演员们反对说，这部戏已经过时，演出一定会赔钱。但该戏的上演还是为他们赢得了一笔为数不小的资助（大约40先令）。

剧中，卡赖尔主教（Bishop of Carlisle）要求必须要有一个正式的退位仪式，因为没有任何臣民有权力审判“上帝权威的象征、他的将领、事务员和选定的代理人”；他的话被珀西这个剧中唯一胸怀叛逆之志的人打断。此时，理查其实已经让位于他的表弟鲍灵布鲁克，但是他仍然被要求出席正式的退位仪式；他也用了“拨动天平”（第四幕，第一场，184-9行）这个意象来形容整个退位仪式。剧中的理查站在舞台的中央主导了退位的仪式，而鲍灵布鲁克虽然在整部戏中都是以英雄的形象示人，此时却被置于一个类似于圣经中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彼拉多（Pilate）的位置上。天平又开始了新的倾斜：鲍灵布鲁克的形象在观众心中有所下降，而理查因为表现了他自己的激情和死亡而迅速上升。第一个令人痛苦的场景是理查向他妻子告别的时候，他表现出自己终于明白了他和英国之间应该有怎样的关系：

“双倍的分离啊！坏人啊，你们破坏了双重的结合；王冠与我的结合，然后，我与我妻之间的结合。”

（第五幕，第一场，71-3行）

当叛乱四起、而新国王亨利四世将四处征战之时（这是莎士比亚下一部戏的主题），理查却在等待他自己的死亡。这是亨利四世为了稳固自己统治必须采取的措施之一。理查最后以一种英雄式的方式死去，而这部戏中曾经的英雄却因为权谋而陷于彷徨和怯懦。剧情的发展已经为两年后完成的《亨利四世》做好了铺垫。因为我们在《理查二世》中已经知道了年轻的亨利五世的放荡言行，看到了珀西的肆无忌惮，听到了那些一再重复的、说英国将会再次陷入内战和苦难境地的预言。

“反面接受力”

莎士比亚对于历史的理解并没有什么新意。在他为戏剧作品收集整理的材料之上，莎士比亚并未强加任何的意识形态或哲学理念。相反，他只是从各种各样的材料中——时人对于《圣经》的解释、布道词、编年史、歌谣小曲、大众戏剧和传统以及各种史料中汇集的智慧之语——撷取出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观念；并使之成为一种格外生动和令人激动的戏剧作品。莎士比亚以这样的方式使他的作品能够经得起各种不同的分析，能够提供各种不同的解读可能。相互冲突的观念在莎士比亚的想象力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发挥，英国诗人济慈（Keats）将这样的才能形容为莎士比亚具有的“反面接受力”。

莎士比亚包容一切的智识是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所共有的特点。当时编撰警句格言的人并不在意他们从古代贤人那里获取的观点、看法是否相互冲突，是否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可行的生活规范。如果这些格言彼此之间相互矛盾，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学校的学生被要求将普遍性的格言运用到具体的情景中去，通过具体的例子来看这些格言是否真实有效，从而使枯燥的格言变得生动有趣。他们并不被要求选定前提，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哲学体系；他们需要考虑的是蕴含在这些格言和道理中的意义。今天熟悉逻辑形式的学生会将这种汇集式的思维方式称为“模糊逻辑”。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带有任何价值

判断的色彩：它真正表明的是任何定义都具有多变性，任何一个定义内涵的周围都有一个模糊区域，就好像蛋黄周围的蛋清一样。现代逻辑相信“一切定义的形式都是否定”；可是在莎士比亚那里，概念就像人的生命一样具有活力，它能生长、变化、繁殖和消亡。数学的最新发展否定了绝对的确定性，这使今天的逻辑学家感到震惊不已，他们变得谦虚起来，并慢慢开始学习使用“近似的一致性”这样的概念了。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们，如皮埃尔·德·拉勒米[8]，甚至是培根（Bacon）和蒙田都已经在提醒人们注意我们头脑中的观念本身具有的多变性与不确定性，提醒我们不要为了发展体系的需要将思维置于一个机械的模式之中。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是现代哲学中体现这种反绝对确定性的代表作品。

图16　狄奇雷的伊丽莎白女王像，小马克斯·海拉特茨绘（1592年）

对于不是学逻辑学的人来说，莎士比亚思想的多变性和丰富性有着更为显而易见的价值。莎士比亚的时代也许在逻辑学史上不值一提，但其思想的创造性在历史上却是不可比拟的：在它那充满各种冲突和疑惑的混乱状态中诞生了所有的现代科学。莎士比亚用一种思想的舞蹈将相互不协调的观念融合到一个赫拉克利特式的有机整体之中，正是这样的思维模式使多元化倾向和宽容精神成为可能，并在经历一段痛苦的磨合期后成为英国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的特点。正是对不容置疑的确定性的反抗才催生了社会的共识和妥协的艺术。像蒙田一样，莎士比亚了解人类理性本身并不完美。在人们还没有给“理性化”命名之前，他已明了其运作机制。有些评论家试图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到表现他政治思想的纲领性言辞，他们最终在《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中尤利西斯的台词里找到了：

“阶级不明，最低级的人也公然放肆横行。各层的天，星辰，地球都有条不紊地谨守阶级，顺序，地位……”

（第一幕，第三场，83-6行）

其实任何一个莎士比亚的观众都不会相信戏剧中所有的辩论最终要达到一个像一篇小孩子的命题作文“如果阶级动摇，一切事业都将崩溃”一样的结论。相反，正如我们在前面简单讨论的莎士比亚的第一部历史系列剧一样，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对抗和冲突，莎士比亚的思考方式不是僵化教条式的，而是赫拉克利特式的，充满了变化和发展；在莎士比亚的思想舞蹈中不仅是舞者在舞蹈，舞蹈本身也在变动和发展：

“舞蹈使女士光彩四射，

此时也播撒了开启世界的种子。
火，空气，土地和水——相互和谐，
因为爱——自然界伟大的君王——给予了劝导
使它们不再相互无序地争斗。

在舞蹈中它们严格地遵循着韵律
就如它们的运动将维持着整个世界。

从何时起，它们仍然在旋转舞蹈，
并且不断变化，彼此相互换位：
然而它们既不混乱也不夹杂，
每一个元素都保持着自己的固定空间
由着舞蹈的指挥，转动或跟随：
爱创造了如此的奇迹，
因为舞蹈是爱情最适合的练习。”

注释

〔1〕 塞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约1562-1619），英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史诗剧《兰开斯特和约克家族的内战史》。

〔2〕 托马斯·坎皮恩（Thomas Campion，1567-1620），英国诗人，音乐家。

〔3〕 突降的天神（*deux ex machina*），原意指在古希腊、罗马戏剧中用舞台机关送出来的解围之神。后引申为往小说和戏剧情节中牵强扯入以左右结局的解围之人。

〔4〕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6-1956），德国戏剧家和诗人，提出“史诗戏剧”理论和“间离效果”的演出方法。“史诗戏剧”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突破了“三一律”编剧法，采用自由舒展的戏剧结构形式，多侧面地展现生活宽广多彩的内容。“间离效果”的演出方法，又称“陌生化方法”，是他提出的一个新的美学概念，又是一种新的演剧理论和方法。它的基本含义是利用艺术方法把平常的事物变得不平常，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暴露事物的矛盾性质，使人们认识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布莱希特的代表作品有《伽利略传》、《四川好人》和《大胆的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等。

〔5〕 亨利·珀西（Sir Henry Percy，1364-1403），英国叛乱者，领导反对亨利四世的暴动，在战斗中被亨利杀死。

〔6〕 亨利七世（Henry VII，1457-1509），都铎王朝第一代英格兰国王。

〔7〕 威廉·兰巴德（William Lambarde，1536-1601），英国法学家。曾为英国国会议员，为伊丽莎白女王所赏识。

〔8〕 皮埃尔·德·拉勒米（Pierre de la Ramée，1515-1572），法国哲学家，逻辑学家，人文主义者。主要著作有《逻辑范畴》和《逻辑学两卷集》。

第五章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目的论

关于衰乱[1]的洞见：《李尔王》

在完成了历史剧系列的最后一部《亨利五世》之后，莎士比亚就不再触及英国历史的题材，直到1603年和1606年间写作的《李尔王》。这个故事的来源很多，至少包括以前一部类似的戏剧作品、霍林斯赫德的编年史、一本题为《官员镜鉴》的书以及斯宾塞[2]的长诗《仙后》。这一次莎士比亚并未精心编选史实来为政治和历史问题做一次清晰的戏剧化表现。他也没有依照编年史家留下的材料来塑造人物。这一次他是将戏剧人物的行动推到了一个超越人类历史的范围。剧中，莎士比亚否定了人对于生活意义提出自己理解或是希望生活的安排可以给予人真正满足的权利。

学者们带着一种令人奇怪的犹豫而不愿承认《李尔王》是一部描写年老昏庸的戏剧。也许，承认李尔王昏聩糊涂会削弱他在剧中的英雄形象。但是这部戏剧的要点就在于此：一个人无论如何英雄盖世，如果不幸长寿，最后必然会走向李尔王式的年迈昏庸。在这部戏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条线索：一条是乐观主义的理念，相信从一只麻雀的死亡到任何伟人败落的背后都有着上帝的旨意；另一条则是一种看到光明远去时的悲观愤怒之情。莎士比亚可能并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3]，但他明白，在地球上没有什么人类建立的城邦会永恒不灭：

> “婴儿，一旦跃入‘光海’里面，
> 爬到成年，把那荣冠戴起，
> 邪恶的蚀影便对他的光荣作战，
> ‘时间’竟摧毁他自己的赠予。
> ‘时间’真能毁坏青春的美貌，
> 给美人的额上钻刻了沟纹，
> 把自然的杰作中的珍品吞掉，
> 镰刀过处，一切都荡然无存。”

（第60首十四行诗）

“时间如窃贼般悄无声息地流逝”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一个中心主题；在诗中，莎士比亚对于及时行乐主题的描写却又超出了哀叹青春流逝、红颜渐老的传统文学模式。莎士比亚并不因能以基督教鄙视尘世幸福的传统视角来瞻望不朽天堂中的福乐而拒绝“广阔的世界和其中消逝的甜蜜”。他始终将关注点放在受造的世界之中，得到了一种有关一切能量终将陷入衰乱的熵变理论的洞见。在《李尔王》的世界里，并不是失去的东西都可以用他物来替代。国王是完美之人的象征，是造物的顶点，他有着“智识和理性”以及“君权的标志”。可是当他失去了世俗的权力之后，他的人性中也就失去了君权的标志。其实这些标志是否真的存在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任何人都可能误判自己在造物秩序中的重要性。

至少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的观点与蒙田的看法有相似之处，而且也与后达尔文时代的有些思想不谋而合。莎士比亚的读者们，比如像19世纪的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意识到对于一种“超越尘世的希望”的需要。而就在读者们觉得这种希望越来越不可信的时候，他们对它的渴求反而越来越强烈。现代社会中，人性中包含神性的可能性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渐渐淡去。

《李尔王》的开头部分饱受指责，因为人们认为这部分写得过于庄重严肃，动机交待不清，而且颇为荒唐。这样的指责大多来自于那些把莎士比亚看成是一个写实主义作家的批评家们；还有一些人的批评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李尔王自己造成了他后来的苦难，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其实莎士比亚在这里要说的道理和蒙田在《为雷蒙德·塞邦德的辩护》中提出的观点是一样的，即我们并非自己灵魂的主宰，因为我们用以主宰自我的能力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扭曲。李尔王的确头脑混乱，随心所欲并且有妄想偏执狂的迹象；他的行为看上去像是一个典型的脑动脉硬化病患者，一个年迈但并不睿智的人。放弃权力便意味着他向必然性屈服，然而，以为将他的王国一分为三之后，他还能掌控国家则是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幻想。其实这样的幻想在生活中不是随处可见吗？许多被迫要依赖孩子的老人不也是处心积

虑地运用各种手段来分配权力，但到头来都枉费心机，他们最终的下场不也和被流放到荒原之上的李尔王有着相似之处吗？莎剧中，从人生的第六个时期到最后的第七个时期[4]——从一个“瘦弱的穿拖鞋的老朽”到“再次回到童年，忘记一切，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味觉，没有一切”（《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165-6行）的风烛残年——是一个漫长而又可怕的过程。

在大多数的作品中，莎士比亚用一种戏剧式的眼光观察老年人，比如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写道，老人们“脸是皱的，眼里流出浓液的琥珀和桃树的胶汁，智慧是非常的缺乏，两腿是非常软弱”（第二幕，第二场，197-200行）。喜剧永远是年轻的，永远是从外部去观察瘫痪的老人；而悲剧通常不会去表现头脑昏庸这样平凡庸俗与不可避免的主题。刚乃绮（Goneril）与瑞干（Regan）对她们父亲李尔王的态度一方面的确是恶劣的，但另一方面却又是可以让人理解的。而另一个女儿考的利亚（Cordelia）提醒她的父亲，儿女的责任总是有限度的。虽然她的说法确是对的，但同时也是残酷的。哈姆雷特会因有人一直奉承他而大发雷霆；可是李尔王却要求这样的奉承并且给那些拒绝这样做的人以不公正的处罚。他丝毫不念父女之情，将他的女儿考的利亚放逐，而后又哀叹他的两个大女儿皆是忘恩负义之徒。坎特伯爵（Kent）不停地向他进谏，甚至称他为“疯狂”和“老迈”的人，称他的决定是“愚蠢”的表现。坎特伯爵一生为国操劳，结果自己最后也被李尔王流放他乡。非理性的愤怒就这样折磨一个仿佛患脑硬化症的国王；李尔王过分诅咒自己的女儿考的利亚，明显有违常理。刚乃绮和瑞干，和观众们一样，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原因——“这是他年老糊涂的地方”，“那与年纪同来的暴躁的脾气”。

直到第三幕的开始，李尔王几乎从不诉诸我们的同情心；相反，他以嘲讽回敬别人的嘲讽，不停地诅咒，并且祈求上天也来相助他的复仇计划。被她父亲否认，被她父亲以极其不近人情的方式对待的考的利亚，却因为在台上倾述了她对父亲的爱而获得了观众们的同情。国王的弄人小丑不断地嘲弄其主人李尔王，不断地试图使李尔王看到自己的愚蠢之处，但是李尔王却一次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李尔王： 你叫我作傻子吗？

弄人： 别的头衔你都已放弃了，只剩这个是你生来有的。”

（第一幕，第四场，154-6行）

李尔王弄人的一番攻击把《李尔王》置于了伊拉斯谟（Erasmus）在《愚人颂》中开创的伟大传统之中。伊拉斯谟描写的信仰上帝的愚人就是一个孩童，而我们只有变成了这样的孩童才能够进入天堂。人不应该在上帝面前夸耀自己智识的伟大和他取得的世俗财富和权力，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人的智慧与力量根本无法与上帝的智慧和权力相比。伊拉斯谟笔下的愚人都机智过人，无忧无虑，从不矫揉造作，从不放纵自己的欲望。愚人因为自知其愚蠢而免于受上天的惩罚，并且变得比常人更加明智，不像李尔王那样拒绝承认自己的愚蠢和无助。一个愚人是“自然的”，或者说是“简单而淳朴“的，仍然处于天真的状态中。我们刚出生时也是天真纯朴的；如果我们一直以这种状态生活下去的话，我们死时仍能保有童真。一个天生的白痴可以避免所有因智识发展而带来的诱惑和罪恶，所以人们认为天生的白痴永远都天真无邪，或带有上帝的印记和恩典。英语中“愚蠢”（silly）就来源于古英语中“被上帝恩宠”这个词（blessed）；这层意思在今天仍然存在于“快乐的白痴”这样的短语中。“愚蠢”一词中这样的引申义一直保留到现代英语中，这揭示了莎士比亚描写愚人时所暗指的思想传统。这样的传统既是怀疑论的，但同时也充满了基督教的精神。

埃德蒙也处于“自然的”（natural）而非社会的状态中，这里“自然的”意思是说他是格罗斯特的“私生”子[5]。埃德蒙自我形象与弄人自我形象之间的对比部分反映了这部戏剧中对相互矛盾的“自然”观念的调侃。虽然《李尔王》中每个人物都经常使用“自然”这个概念，可是没有一次他们所指的意思是相同的。当埃德蒙走上台的时候，他不是在与观众对话，而是在向“自然”述说，称其为是自己的女神。评论家认为当时的观众一定会惊讶于这样的偶像崇拜；埃德蒙却觉得因为

他的私生子身份，他被特意挑选出来作自然的侍者，并且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力量。作为一个在沃里克郡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莎士比亚也许知道杂交品种能够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帕地塔（Perdita）在《冬天的故事》中就拒绝接受杂交的康乃馨——“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的杂种”。埃德蒙对于自然的认识多少带有类似自然选择过程的意味。我们被告知，这种自然选择更偏爱强暴和杂交的后代。而李尔王的弄人除了有着自然的态度，他还是个自然哲学家，为我们讲述了他精心挑选的一系列自然状态中的动物行为习惯的事例。因为没有一个戏剧人物会认真听取他的意见，所以没有人能够明了他例子中说明的优胜劣汰的道理。

“自然”这个词在反复使用中逐渐开始带有一种悖论的意味。当人们用“自然”这个词泛指一系列他们所喜欢的特征，而把他们所不喜欢的称为“不自然”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召唤一种根本不关心他们的力量——“自然”。李尔王自己是剧中第一个把自然拟人化的人物。当他称考的利亚为“一个可恶的东西，连自然都会羞于承认她是自己的造物”时，他以一种愚蠢的自负来表明自己能够读懂自然的意旨。那些为埃德蒙的自然崇拜感到震惊的观众没有看到，其实李尔王在这一点上与埃德蒙并无二致：

> “听我说，自然！亲爱的女神，听我说！如其你是要这东西生育的，请你改变主意吧！”
>
> （第一幕，第四场，284-6行）

李尔王如此对自然女神发号施令，似乎她是他的知交，是可以供他驱使的精灵；但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要求惩罚刚乃绮的命令——“给她一个非自然的惩罚，一个不知感恩的孩子”——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格罗斯特头脑中的自然则是完全中立的，而且他确信自然的存在有利于人类福祉——“最近的日食月食不是我们的吉兆，虽然理性可以如此这般的解释，但随后发生的事却总使人遭殃”（第一幕，第二场，100-3行）。然而，他的观点不仅被不相信有任何神圣力量

的小儿子埃德蒙所嘲笑，而且还被他的长子爱德加（Edgar）所讽刺。他的两个儿子都相信自然超越了人类中心观，它不关心任何一个物种的命运，更别说是单个的人。

李尔王祈求自然女神的仁慈庇护，但却一无所得；然而，他坚持要求自然的力量按照其自身的意志行动，不管他是否命令它这样做。他仍然在欺骗自己，以为他还是造物之主。李尔王没有意识到，就像光阴一年的轮回，他已经经历了人生大半的周期：春天般的活力，夏天般的盛年，秋天般的衰老，现在已进入了最后严酷的冬天。他的搏斗，他在“拼命的要在他的小小的胸襟之中鄙夷着那交相驰骤的狂风暴雨”的努力是如此的荒唐可笑。

当莎士比亚的戏剧人物放弃自己的家园，来到荒野之中寻求庇护时，他们遇到的不是田园风光中那些精心修剪的绿草地，而是伊丽莎白统治下荒芜凋敝的英国农村；饥荒在她统治的晚期在英格兰的大地上肆虐横行。无论剧中雅典郊外的树林（其实在他的描写中是典型的英伦景物），还是温莎的公园或阿登的森林，“沙漠”般的荒野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永远是一个考验人类意志的地方。在《皆大欢喜》中，公爵被篡位的弟弟放逐，在野外他感受到“朔风的冰冷的毒牙和酷烈的针砭”，此时他终于体悟到这样的道理：

> “这不是谄媚，这是忠臣，竭诚的劝我做现在这样的人。”
>
> （第二幕，第一场，10-11行）

公爵所指的“这样的人”显然无关于他的地位和家世，而是指根本的人性。当李尔王不再认为自己是造物的主宰，而意识到他不过是一普通的受造物时，他也将发现他自己真正的人性所在。

在《李尔王》的核心一幕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尔王的彻底转变。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当他以往坚信的众神也离他而去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同类已经变成了一群脏兮兮的流浪乞丐。也许莎士比亚认为李尔王变为一个愚人的过程过于容易，所以他让观众们在这里还看到另一个愚人。此人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惯于将自己古怪的想象强加

给容易上当的农民。爱德加这时也装扮成这群疯疯癫癫的乞丐中的一员：

“他们有狂吼的嗓音，用针钉木刺及迷迭香的叶子戳在他们麻木的臂上；他们就用这种可怕的景象，去向贫乏的村庄、小村、羊槛、磨坊强求一点捐助，有时用疯狂的咒骂，有时用善言哀恳。”

（第二幕，第三场，14-20行）

爱德加假扮的这个疯癫的汤姆是伊拉斯谟笔下愚人的反面，因为他的所谓宗教乃是荒诞的迷信，加上臆想中魔鬼的迫害，这一切都被强加在单纯的村民头上以图牟利。这个狂热分子的诡辩发展成为一种完全非理性的体系，成为人类的疯狂和傲慢的终极表现。

一个基督教的怀疑论者也许会质疑人类的理性是否有能力理解上帝的意图，但他不会就此放弃理性，陷入到自我欺骗的泥沼之中。疯子汤姆向李尔王和他的弄人坦白了自己过去罪恶的生活——他“懒得像猪，阴险得像狐狸，贪婪得像狼，凶得像狮子”，可是偏偏李尔王不注意他这番貌似自夸、实则是自损的发言。李尔王相信的是他亲眼所见的，而非亲耳所闻的——“人不过是如此吗？……你没有取用蚕的丝、兽的皮、羊的毛、麝猫的香……你才是本来面目；赤条条的人也不过是像你这样的一个可怜的裸体的两脚动物罢了”（第三幕，第四场，105-11行）。

李尔王开始认识到人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而已，而人类生活的价值不在国家或“君权、智识和理性的符号”之中，而在于人类最低限度的共同之处，在最卑微的人群之中，甚至在那些被“上苍置于边缘的”人们中——那些衰弱的、贫穷的、愚蠢的人们之中。在前面的剧情中，李尔王责备瑞干削减掉他的随从时说道：

“如其你不准人在自然的需要之外再多享受一点，人的生命是和畜类的一般贱了。”

（第二幕，第四场，268-9行）

在后面的剧情中，李尔王愤怒的责骂也包含着对整个人类的诅咒。他徒劳地让自然的力量来服从他的调遣：

“你，震撼一切的迅雷，殛平了这怀孕的圆形大地罢！敲碎了自然界的铸型，把那要变成忘恩负义的人们的种子全泼翻了吧！”

（第三幕，第二场，6-9行）

李尔王台词中“种子”或“幼芽”的概念最远要追溯到圣奥古斯丁[6]关于“种子理性”的说法[7]，即被创造出的宇宙万物中蕴含的元素与创造宇宙并仍在创造一切存在物的上帝心中的原型是相互对应的。现在我们习惯于用基因或遗传特性这样的观念来理解这种说法。作为一个一无所有、衰老虚弱和被人漠视的老人，而且其王位也早已被自己的孩子占有，李尔王与这个“伟大的创造着万物的自然”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就像叶芝在《驶向拜占庭》一诗中所说的：

“一个衰颓的老人只是个废物，
是件破外衣支在一根木棍上，
除非灵魂拍手作歌，为了它的
皮囊的每个裂绽唱得更响亮。”

在《李尔王》的第三幕，我们目睹了李尔王灵魂的出现和不断的升华，这一幕中的许多场景在结构上类似于以伟大的小丑为主角的低俗喜剧。在现代的戏剧舞台上，这些场景相当于是喜剧演员在台上表演的滑稽快板。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就是以此场景为原型创作的。在《李尔王》中，当弄人通过颠倒现实来作出讽刺性的预言时，剧情进入一个与现实和历史相背谬的想象空间：

“扒贼不在人众里流连……

那时节，英格兰的国家，
就要弄得大乱如麻……”

（第三幕，第二场，88行，91-92行）

寄生和虚伪，如李尔王的弄人所说，乃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这样的预言梅林 [8] 一定会说的，我是生在他之前”（第三幕，第二场，95行）——弄人的话打破了以为剧情是置于遥远的异教背景之中的错觉，使观众意识到此剧情节就发生在他们眼前。

这部不同寻常的戏剧中最为不同寻常的方面就是莎士比亚能够充分展现李尔王的灵魂，即使他的心智已经日渐衰朽。开始的时候，李尔王为困惑所折磨，而他以极大的耐心和动人心魄的焦虑承受着这样的折磨；渐渐地，他不再扮演自然的主人，而是学着用一种平等和谦卑的态度对待他周围的人，并生平第一次感觉到了人性的连续性：

“豪华的人，吃点药吧，你来尝受贫民所尝受的，你就会把你的过度的供养分给他们一些，表示上天是公道的。”

（第三幕，第四场，33-6行）

李尔王在这一刻所表现出的对社会公正的理解与《暴风雨》中刚则娄对于“黄金时代”的憧憬极为相似。年迈的李尔王与同样年迈的老臣刚则娄都成了上帝眼中的愚人，因为所有基于人类智识的自傲都已经被苦难所除去。所有赤身裸体的避难者聚在一起，徒劳无功地想弄明白他们未来的命运——这是剧中少有的平静的一幕，但却转瞬即逝。很快地，他们又被抛回到“文明”的状态之中，此时他们看到的是格罗斯特被弄瞎的双眼。剧情中的反讽意味变得更加强烈，令人难以忍受：爱德加在安慰他自己，他相信人的运命是有起有落的——“最坏的事情也会变成欢乐”；可是他最终却发现，人类的苦难可以是永无休止的，就像诗人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说过的那样，“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最坏的，并因此能够否极泰来的境地”。当爱德加看着他眼盲的父亲时，他说到：

“……谁能说‘我现在是最倒霉的’？我现在只是比以前更倒霉了。”

（第四幕，第一场，27-8行）

失明的格罗斯特所能看到的却要比他失明以前看到的更多，他获得的洞见与李尔王的没有不同。他拿出自己的钱袋给汤姆，并且告诉他“分配平均便可打破过度的财富，每个人都可给足了吧”（第四幕，第一场，70-1行）。这个关于社会公正的观念并不会因为它在弄人的眼中超越了人性的可能而影响它对人们的震撼力，因为弄人所谓的人性不过是格罗斯特和李尔王在头脑清醒、身体健康、享有特权时才乐于接受的东西。而且，像所有的社会生物学家知道的那样，自然的本性并非全是自私自利；任何物种的延续也要依赖于种群内部的利他主义行为，或是父母为了孩子，或是个体为了群体。阿班尼（Albany）不愿服从他妻子那种野蛮的思维方式，并预见了她自身的毁灭和不受遏制的自利带来的整个宇宙的毁灭：

“人类必将互相吞噬，就如海怪一般。”

（第四幕，第二场，48-9行）

如果我们把阿班尼的洞见翻译成现代的语言，那就是“一个成功的物种，在毁灭和控制了其他的种类之后，唯一的敌人就是他们自己”，在我们看来，这个道理不言自明。在这部社会生物学寓言中，李尔王的女儿们会为了自我繁殖的机会而自相残杀就丝毫不令人奇怪了。

《李尔王》中最令人不解的部分是格罗斯特似乎是自杀式的死亡。爱德加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戏剧人物，他总是以一连串的假面具示人。在这一幕里，他又选择了一个新的、意义不确定的面具，并且用以宗教救赎为主题的讽刺剧来演绎这个场景。这可以说是一种关于人性的盖棺论定：也许人类天生就有这样的倾向，他们以自己的形象制造出自己可以理解的神祇。如果这部戏是出喜剧，或是一部悲喜剧的话，那么爱德加对埃德蒙的胜利应该使苦难转化成了欢乐。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争斗不过是被简略地一笔带过，而且无关宏旨。虽

然倍受欺骗和打击，格罗斯特最后仍坚持自己的信仰，并欣然赴死。爱德加无法延长他父亲的生命，但他的谎言，就像柏拉图的神话一样，使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成为了可能。这个情节有悖于贯穿全剧的衰乱主题。当格罗斯特听到李尔王的胡言乱语时，他大喊：

“啊，残毁了的自然杰作！这伟大的世界就要这样消沉尽了。”

（第四幕，第四场，136-7行）

李尔王明白我们是哭喊着来到这个世界——这个“群丑的台上”——而此时爱德加的话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个结论式的补充：

“一死犹如一生，均不可强求，随时准备即是。”

（第五幕，第二场，9-11行）

在《皆大欢喜》一剧中，小丑试金石（Touchstone）在阿登森林里告诉杰克斯“我们每刻都在成熟，我们每刻也都在腐朽”。这当然不是故事的全部，但却是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艺术也许可以为光阴的消逝提供某种安慰，但是这样的慰藉比起爱德加的谎话与他击败埃德蒙的结果也好不了多少。《李尔王》以一连串徒劳无用的戏剧行动而结束。阿班尼让李尔王重登王位，可是李尔王似乎对此已经毫无知觉。考的利亚天真无邪，是她道出了一切真相。她的死让李尔王痛心不已，心神大乱，以至于错把弄人当成是考的利亚。但此时的弄人早已从舞台上消失。最后，当李尔王意识到他自己不过是“命运的弄人”时，他也无需看到自负的弄人败倒在他面前。

《李尔王》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扭转这“衰朽”的过程，阿班尼不会看到冤情得以洗清、正义得以伸张的结局。全剧以一个似乎合乎剧情的两行诗句收尾，其实这是莎士比亚在巧妙地点出戏剧中衰乱的主题：

“年最老最能忍，我们年轻力壮；将见不到这样多，活不到这样长。”

（第五幕，第三场，325-6行）

我们不应该把李尔王对于上帝徒劳的祈求看成是莎士比亚本人有无神论立场的证据。就像蒙田一样，莎士比亚否定了我们试图审视上帝意旨的权利和以为上帝的意志与人的意志总能相互一致的幻想。这种基督教意义上的怀疑论主张既非悲观绝望，也非玩世不恭；因为它接受了人类永远处于愚昧无知中的现实。它的结论自然是拒绝任何完人或任何有关人的可达到完美性的理念，反对任何以牺牲个人来成就集体的政治制度。如果我们把这一系列观点向前推展，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更为激进的结论：藐视任何形式的独裁主义，深信所有人之间的平等地位。一切的地位和权势，就如同智慧与美貌，都不过是我们暂时借用的东西，最后我们会连本带利地一道物归原主：

“……自然之神，善于理财，从不假人以丝毫的才智，而不讨还债主的权益，感激与利润二者均不得或缺。”

（《一报还一报》，第一幕，第一场，36-40行）

莎剧中的国王只有在不奴役国家、谦卑地服务民众时，他们才是英雄的化身，就像亨利五世在哀金谷之战前夜亲自慰问他的部卒。理查二世只有在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性、不为自己而为他不能再为国效力而哭泣时，他才是一个英雄。其他历史剧中的国王压根就没有成为英雄人物。而对于李尔王，只有他在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在舞台上踉踉跄跄，说起话来像《等待戈多》中的伏拉迪米尔（Vladimir）与埃斯特拉冈（Estragon）一样毫无头绪时，才呈现出英雄的一面。在李尔王身上，两个不同的主题——国家和个人的独立自主权以及普通人的尊严——交汇在了一起，虽然李尔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主宰，甚至连他自己的主宰都不是。李尔王是文学中一系列无名小卒的代表人物，这些小人物终日为生计奔忙，而莎士比亚却让这样的人物有机会来评论那些有权有势之辈的所作所为。

“自然天真之人”与“黄金时代”的神话

在这样一本小书中，我们之所以花如此长的篇幅来讨论《李尔王》是因为在这部戏中，莎士比亚向我们朴实无华地坦露了他的心扉，没有任何装饰；剧情没有任何复杂的叙述和形式上讲究的对称结构。在莎士比亚的创作生涯中，他习惯使用梦幻般的戏剧情节结构，可是在《李尔王》中，一切却是如此朴素，没有修饰，也没有任何的解释。普通观众们在观看和感受这出悲剧时不会觉得有丝毫的困难，因为认识剧情的关键点在于理解和接受一个不被美貌、健康或智慧装点修饰的人性。可是学者们往往会觉得莎士比亚的做法有些不合常理。其实《李尔王》是莎剧中一个主题的最佳表现。这个主题贯穿了莎士比亚作品的全部，但是却从未被人重视。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在于莎剧中代表下层民众的角色始终在研究中被认为是次要的（在戏剧表演和伊丽莎白时期戏剧传统中，情况并非如此）。

从他开始写作戏剧的时候起，莎士比亚就会让下层民众成为道德上的批评者。在《维洛那二绅士》中，一个代表着贵族友谊的人物试图强暴他朋友的情妇，而这位朋友却打算把她作为礼物献给这个贵族。这样的剧情因蠢仆朗斯（Launce）和他爱犬无心的评论而讽刺性地让观众觉得有一种疏离之感。朗斯无法把他的狗送人，因为它总是要回到主人身边，而它的主人正因为“偷盗布丁而受枷刑”。戏剧的主要情节是意大利式的，可是剧中的评论却是实实在在的英国风格。《错误的喜剧》里的德娄密欧（Dromios）也有类似的特点，而下一个重要的“自然天真之人”则是《仲夏夜之梦》中“可爱的好家伙波顿”（Sweet Bully Bottom）。所有这些角色都是话篓子，急着要说明事情的原委，不会虚伪掩饰，而且对他们给别人的印象也毫不在意。

在《爱的徒劳》中，衡量和批评贵族们的装腔作势、西班牙人的幻想和学究们的故作姿态的戏剧人物是小丑考斯达和一个天真的孩子毛兹（Moth）。考斯达的名字代表一种苹果，这层意思还可引申为一种带嘲讽味的意思，即收税时需要清点的人头。伯龙称他为“英国国民的一分子”时就用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参加了贵人们的奢华游戏，

他用自己自然的本性来取笑他们假装的贞节和智慧。毛兹则是用他继承来的“父亲的机智”和“母亲的伶牙俐齿”来嘲笑阿马都（Don Armado）的傲慢，搅乱贵族们的情场把戏。当贵族们的求爱计划被现实打得粉碎时，这个农民和这个孩子则主导了戏剧的舞台；他们和剧中的教师以及助理牧师一道成功地演出了一场乡村风格的冬天与春天的对唱作为剧情的结束。

《驯悍记》中醉醺醺的补锅匠克里斯脱弗·斯赖（Christopher Sly）是另一个代表人类共性的小人物。在剧情开始的时候，他被贵族老爷的随从们唤醒；为了出他的洋相，这些恶作剧者告诉斯赖他也是一个贵族老爷，可是他们失望地发现（与《第十二夜》中的马尔瓦里奥［Malvolio］不同）斯赖根本不上当。无论他们如何欺骗这个补锅匠，斯赖始终保持自我不变。

莎剧中第一个专门的小丑形象是《皆大欢喜》中的试金石。与农村里的小丑不同，试金石没有什么同情心；他是一个城市出身的小丑，机智但是浅薄，常装出一副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样子去蒙骗和盘剥乡下人。他的名字不无深意，可是他那涂了油似的机智言辞，并未证明阿登森林是个虚假的世界，反而证明了它的真实存在。在莎士比亚版本的乡村与宫廷的永恒对立中，小丑试金石不断骚扰老牧羊人考林（Corin）。考林说起牧羊之事总是津津乐道，对牧歌传统中充斥的陈词滥调却不愿多谈。但他纯朴的话语正是全剧的关键所在——“我是一个诚实的工人，我挣我的吃食，我挣我的衣裳，不恨人家，不嫉妒人家的幸福，看别人好我也喜欢，我自己不好我也满意，我最得意的事就是看着我的母羊吃草，小羊吸乳”（第三幕，第二场，71-5行）。

《皆大欢喜》在很多方面都堪称《李尔王》的先驱：剧中的阿登森林也是一个艰苦的地方，在那里的人们必须为生存努力。和《李尔王》中的荒原一样，森林是一个无政府的地方，人们按照平等合作的方式行事。流放中的公爵高兴地说，在这个地方他与别人没有差别。这样的描述后面有一个始终为英国人民所喜爱的神话，那就是在贵族制和国王没有进入之前，英国是一个只有古老的百家村和百人长制度

的国家。“快乐的英格兰的观念”就是有关“黄金时代”神话的英国版本。伴随这一观念的是莎士比亚的另一看法——“自然已经被败坏，而人的血管里流着乞丐的血液”。后来，回到一种根本上是英国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深入到17世纪英国平等派和掘土派成员[9]的心中。他们和莎士比亚一样也使用想象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在《亨利六世》第二部中的杰克·凯德（Jack Cade）就是代表这种思想的一个人物。他的一个叛军部下说道“自从有了贵族，世界就不再是快乐的了”；可是这些叛军追随的头领凯德就是个自欺欺人、以为自己有着贵族血统的骗子。凯德幻想如果他要是成为国王，“那就不会再有货币”——这明显带有无政府式的乌托邦主义色彩。虽然凯德率领的一群文盲与那些文化人之间的斗争在莎士比亚的笔下被写成了一出可笑的闹剧，但是莎士比亚仍然让这些叛乱的文盲们有大声疾呼和发泄怨气的机会——“你曾派任许多地方行政法官，传讯穷苦人民，问他们所不能回答的事情。并且，你曾把他们关在监牢里；只因他们不识字，你就把他们绞杀了”（第四幕，第七场，39-43行）。我们看到《爱的徒劳》中的考斯达时，他正是被传讯去应对一件他无法回答的事情；可是，那些有教养的贵族只要能够背诵一段拉丁文诗歌便可逃过一死的事实一定会让人觉得这是对于“贵族的责任”[10]这一法律的极大扭曲。

对于一个可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快乐英国”的怀旧情绪明显带有沙文主义的色彩，但对世外田园的向往却是欧洲文学中一个恒久的主题。这样的向往与时间无关，它是人们心中某种永恒不变的向往，只是这种向往经常被社会表层的变迁所遮蔽和歪曲。在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认为自己属于老派的戏剧传统，不谙劝诱和恭维，只为心中的真情实感所动。直言不讳或沉默寡言的诚实也是修辞的手段，但莎士比亚却特别地依赖它们，这表现在剧中的弄人——诗人、笨头笨脑的农夫和妙语连珠的孩童之中。在他最阴暗悲观的戏剧作品中，这样的直言不讳和诚实无法得到体现，而人性中的良善也无法成为人类命运的立脚点。自然女神此时是一个无道德感的异教徒的化身，她的律令残酷且无可逃避。相反，只有那天真自然、未被扭曲的人性才是我们最好的依靠，最好的改变人世的残酷和不公的利器。

莎士比亚和大众的智慧

在通俗文学中，凡是出现了宫廷和乡村的纷争，得胜的一方一定是乡村，因为只有乡村才是爱和忠诚、诚实和慷慨、勤劳和合作的家园。终其一生，莎士比亚都表现出对英国本土文学传统的深深依恋之情，特别是菲利普·锡德尼代表的传统。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写道“我必须承认我自己的野蛮，我一听到那关于珀西和道格拉斯的老歌曲，总发现自己比听到了军号还要激动，虽然它只是由一个声音沙哑，风格粗野的盲琴师所唱”[11]。《第十二夜》中颇有教养的敖辛诺（Orsino）也有着同锡德尼一样的对古老歌谣的喜爱，而且他还试图以此来影响瑰欧拉（Viola）：

> “我们昨晚听的那个古老的歌，我觉得这歌很能舒畅我的感情，比起现在那些激越嘈杂的歌儿的淫声艳辞要好得多了。”
>
> （第二幕，第四场，3-6行）

> “你细听，西撒利欧（Cesario），很古，很简单，在阳光下纺织的女人，以及用骨针编造花边的活泼的姑娘，都常唱这歌，是非常的质朴，对于天真的爱情加以调笑，像在古时那样。”
>
> （第二幕，第四场，43-8行）

在莎士比亚的文学生涯中，他运用了属于他自己简朴的歌谣来批评那自以为才高一等之人的矫揉造作；在莎士比亚眼中，这些人才陷入了愚蠢之中。《第十二夜》中的小丑在全剧的最后以一首“简拙的歌谣”结束了发言，歌谣的开头唱的是“当我是个小小孩的时候”。小丑费斯特（Feste）在《李尔王》中的同类唱了一首类似的歌谣。歌中唱到，人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这样的分类来自于伊拉斯谟《愚人颂》中对愚笨在人的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四个阶段所起的不同作用的描写。《爱的徒劳》结尾时冬天与春天的歌谣体对唱与戏剧的情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虽然此处的歌谣比那时同类歌谣的歌词都写得更为干净连贯，可是它的风格仍然非常质朴，屏弃了一切的文饰，与流行

的歌谣如此相似以至于有的学者怀疑它只是已有歌谣的改编版。《奥瑟罗》的悲剧气氛被德斯底蒙娜（Desdemona）所唱的一首关于被遗弃的爱情的歌谣所加重，歌词的结尾和传统的重复韵脚“唱啊，青柳，青柳，青柳”处都带有一些反讽的意味。在《辛白林》中，被流放的王子为伊慕贞（Imogen）唱的哀歌也让许多研究者大伤脑筋，虽然这首歌谣远不像《第十二夜》中的那首那样简拙。

莎士比亚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就是他的戏剧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乡村娱乐、传统节日和大众文化。他同时代的文化人都不愿屈尊记录农村的娱乐形式和娱乐节期，而这样的娱乐内容一定是多种多样和相当发达的。关注大众娱乐活动中的象征形式和反复出现的主题的现代民俗学在当时还未出现。《冬天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它给予我们一个理想化的剪羊毛的场景，可是这个仪式的象征意义对于整个剧情的重要性我们可能并未完全意识到：牧羊人在这里与剧中的西西里亚王利昂蒂斯（Leontes）一样也失去了他的妻子：

> “我的老婆活着的时候，到这一天她又是柜上，又是茶房，又是厨师，又是主妇，又是仆人；欢迎大家，伺候大家，又要唱歌，又要跳舞；时而在这桌子的上首，时而又在中间；一下子靠在他的肩头，一下子又靠在他的肩头；为了劳累消乏的酒，脸上已经火红，但是她还是要向每一位客人敬一点酒。”
>
> （第四幕，第四场，55-62行）

利昂蒂斯失去他的妻子是因为他误解了她对客人们的欢迎。而牧羊人此处对于剧情所作的评论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剪羊毛的仪式在剧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而且剧情的主要冲突就来自于流氓欧陶利科斯（Autolycus）对于轻信的牧羊人的攻击。

当乔治·奥威尔[12]为了维护莎士比亚而反击托尔斯泰（Tolstoy）对于《李尔王》的批评时，他被迫承认莎士比亚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一个使用语言的音乐家，用“连接音节的才能”来吸引他的观众。奥威尔这样说已经是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但他下的结论却不可思议：

“当莎士比亚让某个人物说出带有颠覆性和质疑性言辞的同时，他却从不认同于这个人物。他的戏剧中有很多尖锐的社会批判者，他们不被社会上流行的错误观念所欺骗；可是这些人物却总是小丑、恶棍、疯子或是装疯的人，要不就是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人物。《李尔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剧中的确有许多暗藏的对社会的批判——托尔斯泰忽略了这一点——但是这些批判都出自一个弄人之口，或是装疯的爱德加，或是处于疯狂之中的李尔王。在他清醒的时候，李尔王几乎没有说过一句睿智之语。”

奥威尔关于莎士比亚会认同什么样人物的观点十分牵强。在他的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就与那些小丑们和沉默的人站在一边，就像《爱的徒劳》中助理牧师那个角色。在诗歌中，莎士比亚说出了作为一个为公众娱乐服务的作家的失落和遗憾，特别是在他表现必然性的艺术在权力面前被迫缄默之时。十四行诗中的诗人形容自己是一个“在舞台上不完美的演员／在恐惧中不知如何是好”；他承认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花衣小丑”，而且“伤了自尊，廉售了最贵重的东西”（110首）；他祈求宽恕，并希望他的爱人代他谴责命运如此的安排（111首）：

“啊！你要为我骂那命运女神，
是她使得我做下了丑事多端，
她没有为我准备较佳的福分，
我只得牺牲色相讨大众的喜欢，
于是烙印打在我的姓名之上，
我的本性几乎被感染了
工作环境的色彩，像染工的手一样。”

托尔斯泰所批评的对诗人偶像崇拜的结果就是使我们有意地低估了莎士比亚的农村生活背景而在他的头上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可是，莎士比亚在生活中的默默无闻也许就是因为他低下的社会地位；和他同时代的人很可能轻蔑地忽略莎士比亚的存在，就像女伯爵罗素（Countess Russell）说的那样——他不过是“那个平民莎士比亚”。

正如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韦德金德（Wedekind）的戏剧《璐璐》中的那个女贵族所说，只有一个怪物才能看明白社会中的怪现象。作为一个娱乐大众的人，莎士比亚只有靠一些大人物的庇护才能躲过被当作恶棍和骗子而被惩处的命运，因此他自然很可能认同和被人当作是那些被奥威尔蔑视的小人物。而奥威尔作的那些区分——什么是疯狂，什么是清醒；什么是歇斯底里，什么是假装的疯癫——正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所要拒绝的东西。奥威尔以为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难以看出莎士比亚有任何的宗教信仰，可是借孩童之口说出真理的做法正表现了基督教对所有人生活的尊重。正是这同一种深刻的情感才激发了我们今天大声抗议医疗机构拒绝用透析器继续维持脑残疾病人生命的做法；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病人的生活没有任何的质量和价值，但是这样的看法明显违背了耶稣基督山上布道词中的精神（《马太福音》5章22节）。这一信念的最终结果便是反抗一切形式的虚伪假装和基于其上的社会不公。就像《一报还一报》中伊莎白拉（Isabel）警告安哲娄（Angelo）时说的那样：不要有任何高人一等的观念，以为自己在道德上胜人一筹不过是愚蠢的表现：

> “……人，骄傲的人，一朝有权在手，便立刻不顾他自己知道的脆弱的本质，像是发怒的猴子一般，当着上天扮演出离奇的把戏，使得天使都要流泪……”
>
> （第二幕，第二场，118-23行）

莎士比亚常用戏剧舞台的意象来比喻受造的宇宙万物，这里的戏剧舞台的意象又添一番新意：在舞台上背诵台词的演员对于整个戏剧的理解与一个在机械模仿人的行为的动物相比也未必强得了多少。

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不乏乐意为人解说世界万物意义的人物，可是我们就此推断某一个人物就能代表莎士比亚本人某些确定的思想就恰恰忽略了戏剧这个文学模式的基本要素。哈姆雷特说“世上本无好坏，都是人们的思想使然”，其实这正是维特根斯坦所要强调的：一个场景的意义并非由这个场景的参与者的发言决定，而在于观众能够理解多少——莎士比亚创造出的戏剧世界以及观众的参与使其意义的

可能性延伸到无限远的地方。莎士比亚设想中人的智识活动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学习过程；每个戏剧都以自己的方式表现了人在置疑一切思想时所必须经历的探索历程。如果托尔斯泰和奥威尔不约而同地否定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地位，这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以非系统化的方式表现出的思想。虽然维特根斯坦并不喜欢莎士比亚的思维方式，但是他并不怀疑它的存在，以及它那与众不同的表现形式。莎士比亚的思想并非是通过引证基督教教条确立的。他的思想建立在那些能把我们引向一个公正社会的价值观之上，无关乎基督教教条的存在与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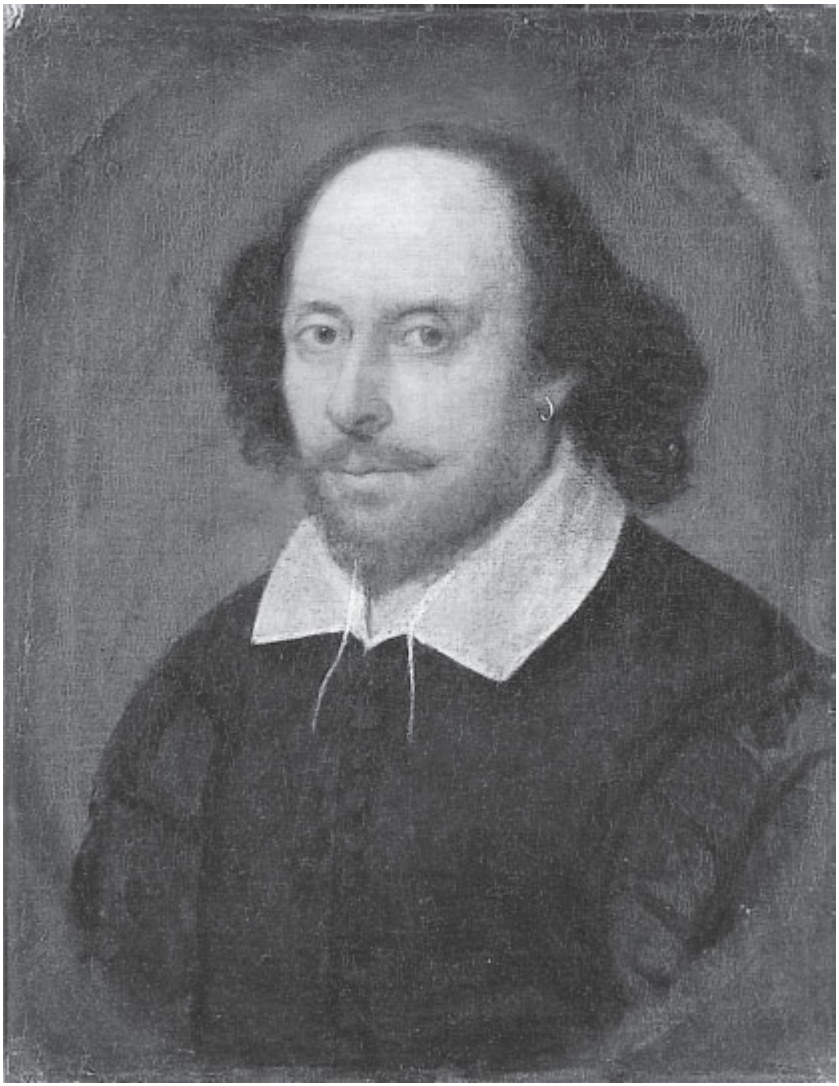

图17　詹德斯的莎士比亚像（约1610年）

注释

〔1〕　熵（entropy），物质微观热运动时，混乱程度的标志。此处为使意思更明了，译为“衰乱”。

〔2〕　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约1552-1599），英国诗人，长诗《仙后》是其代表作。

〔3〕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热力学的基本定律之一。它是关于在有限空间和时间内，一切和热运动有关的物理化学过程具有不可逆性的经验总结。其意义在于指出了自然过程总是从有序向无序方向演变。

〔4〕 第六、第七个时期：按照基督教思想史有关理论，世界历史共分为七个时期，第一期为亚当夏娃的时代，第六期为耶稣基督到来的时代，第七期为末日审判后人类走向永生，历史走向终结的时期。

〔5〕 Natural一词在英语中有“自然的”和“私生的”两层意思。

〔6〕 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重要代表。著有《忏悔录》等。

〔7〕 种子理性（*rationes seminales*），也可译为种质、种源理性。源于希腊语*logoi spermatikoi*，本意是说植物的生长无非是种子潜能的实现。斯多亚学派最初借用它来解释事物的生成、发展。圣奥古斯丁则用它来解释上帝对万物的创造和事物自身的不断生长发展。

〔8〕 梅林（Merlin），亚瑟王故事中的术士和预言家，晚于传说中的李尔王许多年，这是弄人故意说的笑话。

〔9〕 平等派（Levellers），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主张社会改良和建立共和国的政治派别。掘土派（Diggers），1649-1650年间主张土地公有的英国清教徒中的激进派。

〔10〕“贵族的责任”（*noblesse oblige*），意指拥有权力，财富和名望的贵族阶层需承担的社会责任。

〔11〕引自《为诗辩护》，钱学熙译，第35页。

〔12〕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作家。代表作有政治讽刺小说《1984》和《动物农场》。

第六章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社会学

忠实的品质

大多数莎剧的思想主题不像《李尔王》中的那样宏大抽象，但是它们与这部伟大悲剧所勾勒出的价值体系并无不一致之处。在他的喜剧中，莎士比亚几乎没有创造任何人物来作他思想观点的传声筒就成功地诠释了一整套实用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来源于他的家乡沃里克郡的文化，与当时城市和王室生活所奉行的观念多有不同。在莎士比亚思想中，婚姻是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结构的关键所在；对他而言，婚姻绝非一种喜剧性的社会习俗，而是一个关键而又复杂的社会理想。莎士比亚拒绝接受那种把妇女表现为一种消极木然、没有欲望的陈规老套；他同时也反对社会上敌视妇女，把妇女看成是娼妇的观念。他创造了一系列充满激情和心地纯洁的妇女形象，她们全心全意地照料、服侍她们所爱的男人，无论出现何种不和与纷争，都能始终如一。女性对于爱情的忠诚与她们的主动态度密切相关；莎剧中真正变心的女性形象只有《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克瑞西达（Cressida），一个消极操纵男性欲望和善于伪装自身情感欲望的女人。

在当时的农村家庭中，婚姻中的双方是伙伴的关系，妻子需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除此之外，夫妻双方还必须在农村家庭需要面对的一系列艰难困苦中学会彼此忍让和体谅。

“北风正在怒号，
　　牧师的老生常谈陷入一阵咳嗽声，
鸟儿在雪中缩头缩脑，
　　玛丽安（Marian）的鼻尖冻得通红，
烤山楂放在酒杯里咝咝的响，
于是瞪大眼的鸱枭在夜里唱，
　　突胡
　　突胡，突胡——很好听的一声歌调，

肥胖的琼姑娘正把锅来搅。”

在《爱的徒劳》中，年青的贵族咏唱的那些充满雕琢和轻浮的爱情歌曲与这首舞台上演唱的农村歌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剧中的无名评论者说这首歌谣取代了阿波罗之歌，代表了命运反复无常的神祇墨丘利的尖刻之语（第五幕，第二场，904-21行）。歌谣的含义十分明确：当田野开满鲜花，姑娘们身着洗净的新衣裳，带着阵阵芬芳的时候，男女之间要卿卿我我是很容易的；但婚礼仪式举行之时，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的猫头鹰从黑暗的田野处发出忧郁的号叫，所有人都偎坐在烟火之旁。自然的冬天象征着人生的冬天——爱情已经成熟，变成一种友谊和容忍的德性，尽管此时玛丽安的脸庞已不再娇美如花，琼姑娘（Joan）的头发也因劳作而变得凌乱如麻。

在《驯悍记》中，醉醺醺的补锅匠斯赖开场时成了贵族的仆从，并因此而得到了一个妻子，他必须以合乎他新身份的礼仪对待他的妻子。可是斯赖此时却格外地固执。当一个侍从假扮他妻子来到他面前时，这个侍从刻意放低身段。欺赖说道：

“你是我的妻吗，何以不喊我丈夫？我的仆人们才称我为老爷：我是你的汉子。”

（序幕，第二场，105-6行）

当被告知应该称他妻子为“夫人”时，斯赖却坚持直呼其名——“夫人爱丽丝或夫人琼安”。结果他最后还是被要求“干脆称夫人便是，老爷们都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太太”，可是斯赖却只愿叫她“老婆夫人”，然后让他妻子坐在身边，“别去理会什么世事沧桑”。《驯悍记》绝非一出关于虐待妻子的时髦闹剧，而是巧妙地改编了乡村风格的主题来表现作为地位平等之人相互结合的婚姻故事。皮图秋（Petruchio）并不想谈恋爱，他只想找个妻子。他的选择是为了他自己好，因为他知道自己需要一个稍有财产的女人来协助他管理刚刚继承的庄园。他选择凯特（Kates）就像选择一匹良驹一样，因为凯特有的是精力和勇

气；而他则需要拿出如同驯马的智慧和精力让她相信自己并且接受婚姻所带来的一切。其实这个意象我们可以在许多古典作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苏格拉底（Socrates），色诺芬[1]，普鲁塔克[2]和加图[3]——的作品中找到。但莎士比亚在这里对于这个意象的运用却出自《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虚构场景，在这个和《驯悍记》类似的场景中，莎士比亚塑造了许多忠诚和直率的妻子形象。

今天我们都认为比阿特丽斯与班尼迪克[4]配对的婚姻才是完美的婚姻，可是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夫妻双方都平等的婚姻观念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特别是在社会中那些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在莎士比亚的早期喜剧中，他会用不同寻常的篇幅来诠释一种婚姻关系的范例，并基于这样的观念设计出一个合适喜剧的结局。在《错误的喜剧》中，莎士比亚从3个不同的角度来表现婚姻的主题：剧中对伊济安（Egeon）与义米利亚（Emilia）关系的概述；西拉鸠斯的安提孚勒斯（Antipholus of Syracuse）与露西安娜（Luciana）的恋爱；阿德利爱娜（Adriana）对于婚姻的失望与哀菲索斯的安提孚勒斯（Antipholus of Ephesus）与她之间的隔阂和疏远。

《错误的喜剧》是根据普劳图斯的戏剧《孪生子》的内容写成的。这出戏的戏剧行动被置于总体情节之内，它主要描述了伊济安和他的妻子在一次海难中因为船只触礁解体而失散的过程。剧中，除非伊济安能够找到足够的钱来赎生，否则他就会在当天结束时死去。对于那些熟悉泰伦提乌斯喜剧风格的观众，这意味着伊济安在剧情发展的时间内必须想办法找到并和他失散的家庭重新团聚。在《冬天的故事》和《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里是以找到失散的孩子为救赎的标志。这两部戏都写于莎士比亚职业生涯的晚期，而《错误的喜剧》创作于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关于失散夫妻的团聚成为喜剧情节主干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举出《皆大欢喜》、《辛白林》和《冬天的故事》这3部晚出的戏剧。这些晚出作品显得更加浪漫，作品中伦理实践的目的性不那么明显，但是所有这些作品都能够说明婚姻本身就是一种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生活方式，而婚姻中亲密关系所带来的快乐并非最本质的东西。

在《错误的喜剧》中，重新出现的妻子是一个女修道院长，她揭开了两个孪生兄弟的谜团并且搭救了她的丈夫，她的话语明显带有宗教赦罪的色彩：

> “不管是谁绑的，我要解开他；他恢复了自由，我也就获得了一个丈夫。”
>
> （第五幕，第一场，339-40行）

与《错误的喜剧》中放弃世俗生活、成为女修道院长的妻子一样，《冬天的故事》里的赫迈欧尼（Hermione）以她的死亡（后又奇迹般地复活）洗刷了她丈夫由于妒忌而犯下的罪过。有的批评家提出莎士比亚笔下模式化的、以拯救者出现的女性形象往往是消极被动的人物，莎士比亚对待女性有一种道德上的双重标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要更加复杂和更加有趣得多。《错误的喜剧》里的女修道院长并非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人物；在艾非西斯，她是权力的象征。赫迈欧尼在《冬天的故事》中也不是被她的丈夫遗弃。当得知神谕和由神谕预示的他爱子之死时，他丈夫幡然悔悟。而赫迈欧尼则拒绝在一个已经被玷污的婚姻中与他生活在一起，并决定将自己活埋整整16年的时间。赫莲娜（Helena）在《皆大欢喜》中勇敢地决定追随她自己选择的丈夫，而且为了强迫他完婚，她假扮营妓，在违背她丈夫意愿的情况下，以通奸的名义怀上了他的孩子。

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莎士比亚把美德理解为一种行动而非对于生命意义的沉思，他关于救赎的观念则完全是基督教的。耶稣基督，作为世人的楷模，通过忍受苦难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世人。基督教意义上的被动式的英雄主义非常看重坚忍的品质；在莎士比亚的伦理观中，这种品质与坚贞和诚实为同源一体（见十四行诗第116和119首）。虽然莎士比亚会提及当时的女人都像他第20首十四行诗中写的那样三心二意，也会让伊莎白拉和瑰欧拉在剧中就女人的善变无常大发一番议论；可是在全部的莎剧中，只有《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一剧真正表现了女性的背叛。在莎士比亚笔下，女性对婚姻的背叛往往是男性凭空臆想出来的，是令他们难以释怀的先入之见——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弗兰克·福德（Frank Ford），《无事生非》中的克劳蒂奥（Claudio），《辛白林》中的波斯丘默斯（Posthumus）以及《冬天的故事》中的利昂蒂斯都是因为不信任他们的妻子而铸成大错。相反，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人物则往往是刹那间就坠入爱河，自愿将自己托付给她心爱的男人，而且即使要因此冒生命危险也决不变心；与她们相比，莎士比亚的男性角色——《维洛那二绅士》中的普罗图斯（Proteus）和瓦伦坦（Valentine），《第十二夜》中的敖辛诺，罗密欧以及《一报还一报》中的安哲娄——经常很快地就背弃诺言，移情别恋。莎士比亚应该不会反对《仲夏夜之梦》中赫密亚（Hermia）的话——“男人们违背誓言，在数目上超过女人们所立的一切誓言”（第一幕，第一场，175-6行）。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男人的变心似乎不会引起什么大的波澜，可是当女性失掉坚贞和诚实，就像在《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特洛伊洛斯与克瑞西达》以及《李尔王》里那样，世界就会倾覆而回到野蛮的状态。

莎士比亚并不认为忠贞是一种类似于受虐症似的性心理上的问题，在他眼中，忠贞是超越性别的圣爱在世间的体现。《凤凰与斑鸠》中的斑鸠既是男性也是忠贞的象征。十四行诗中的主人公永远无法摆脱对于爱情的忠诚，无论是爱人的背叛、与爱人的分离、流言蜚语、被世人羞辱、或是爱人的放荡与冷漠都不会改变这样的情感。虽然十四行诗中的主人公有时也会冷嘲热讽，恶言相向，然而这也不会改变诗歌本身试图体现的对于爱情金石般的、不顾生死荣辱和背叛的忠贞。诗人在下面这首诗中表达的对爱人的顺从超过了莎剧中的所有贤妻：

“使我生而为你奴仆的那个神
不准我在思想中限制你的享受，
也不准我要求你计算时辰，
我是你的奴仆，只会耐心等候，
啊！我既听你呼唤，我只能够
任你放荡自由，让我忍受孤苦，
忍受惯了就会随时的逆来顺受

而不怨恨你对我的欺侮！
随心所欲的去吧，你有权利
任意支配你的时间，
时间完全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才可原谅你自作自受的罪愆。
等待固然难熬，我还是要等待，
不敢怪你享乐，无论那是好是坏。”

（第58首十四行诗）

求爱：理想与现实

《错误的喜剧》中的女修道院长为了等待她的丈夫在分离中独自坚贞地守候了33年。莎士比亚十分看重贞操，但是并不像当时许多人一样，认为具有美德的女性就没有欲望。他笔下那些机智的女士们与她们的女伴或男伴常用一些语带双关的言语相互调笑，但这并不有损于她们自己的贞节。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原本满足于以彼得拉克情诗描写的方式来作一个为了罗珊琳而憔悴的恋人，可是当他被人送往教堂并且躺在了孩子般的、不会虚假伪装的朱丽叶的身旁，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墨枯修此时赞美了得到回报的爱情给予罗密欧的活力：

“这不比为了恋爱而长吁短叹要好些吗？你现在有说有笑的了，你现在是罗密欧了；你现在是你的本来面目了，无论是天性如此还是有意做作：因为一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情人，实在是像一个大傻瓜，伸着舌头东窜西窜的想把他的那根棍子藏在一个洞里。”

（第二幕，第四场，88-93行）

图18　《玫瑰花丛中的年轻人》，尼古拉斯·希利亚德绘（约1588年）

墨枯修在这里暗示，那种夸张做作的贵族式求爱实际上有意隐藏了人心中简单的要与所爱之人融为一体的欲望。在《维洛那二绅士》中，对西尔维亚（Sylvia）的赞美也是充斥着夸张和虚假的彼得拉克情诗般的求爱方式：

“西尔维亚是谁？她是什么人？
我们的情郎这样地赞美她？
她是贞节，美丽，而又聪明，
上天把这些优点送给她，
　　好让她受人崇敬”

（第四幕，第二场，38-42行）

瓦伦坦将西尔维亚“卖给”了普罗图斯，同时又坚持说她是“天堂般的圣洁”，还要求普罗图斯用“神圣”来称呼她：

“……纵然不算神圣，总要承认她是一位高级的天使，君临世间一切生灵。”

（第二幕，第四场，146-8行）

而且“她的优点又使得其他优秀的人们显得不足道，她是独一无二的”（第二幕，第四场，161-2行）。

这样的话语称得上是最高的柏拉图式的赞美，它把所爱的对象当作是“理念”最终且最完美的体现，是“理念之源”，包含和统驭一切。难怪此时普罗图斯会将家乡的恋人渐渐遗忘：

“当初我是爱慕一颗灿烂的星，现在我是膜拜天上的太阳……”

（第二幕，第六场，9-10行）

作为世界主宰之光的太阳本身就是一种神性的象征。我们在彼得拉克的《诗选》中可以找到上百个类似的意象；但丁（Dante）也用了同样的比喻来形容他的恋人比亚绮丝（Beatrice）。然而无论普罗图斯在剧中第四幕第四场中表现出如何赞美和崇拜西尔维亚，他很快

便将这番诗意的情趣变成了不体面的企图强暴西尔维亚的行为。

在《错误的喜剧》里，西拉鸠斯的安提孚勒斯对于露西安娜表现出同样夸张的崇拜，在一段带有奥维德诗歌色彩和伪柏拉图主义主题的韵体诗中，他说道：

> “教导我，好人儿，该怎样想怎样说，
> 打开我的茅塞一般的心窍……
> 难以领略你言谈中的奥妙……
> 你是神吗？你要把我重新创造？
> 那么改造我吧，我服从你。”
>
> （第三幕，第二场，33-4行，36行，39-40行）

这里莎士比亚有意地使用奥维德《变形记》中的意象作为反讽来讥刺那些为了获得性快感而迷失了理性思考的男人们，他们就像神带有了野兽的特征。同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在《驯悍记》中找到。鲁禅西奥（Lucentio）将毕安卡（Bianca）比作神话中的女子欧罗巴（Europa），将他自己比喻成一个长着“犄角”的野兽。

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并不将追求性爱看成是男性独有的特点。《皆大欢喜》中的杰克斯就说当一个男人从孩童变成学生时，他就会充当恋人的角色——“像风箱般叹息，为他的情妇的眉毛作一首缠绵的情诗”。这样的模式化描写在一出戏剧《世界和孩子》的幕间表演中也可以看到；这里十几岁的毛孩子被形容为充满“欲望和爱恋”，直到21岁他能够成为骑士的时候，他才能拥有“威猛的男子汉气概”。我们发现，在经院派学者的作品中一直存在批评讽刺恋爱愁绪的传统，但他们自己却经常受到此类指控。伊拉斯谟就反对“爱情带来的痛苦和激情”，因为它们比其他任何情感都会“侵占和俘虏一个人的内心，并使他完全陷入无所事事的无聊状态中”。《驯悍记》中的鲁禅西奥在帕都瓦的大学里学习亚里士多德哲学时就陷入了这样的情感困境之中：

> “……我站在这里悠闲地旁听，可受了爱情的影响而无所事事……”

（第一幕，第一场，150-1行）

结果，他开始了对于毕安卡的求爱与征服，他伪装成自己的仆人，还故意假造了一个父亲，几乎要不认自己真正的父亲，最后通过皮图秋才知道自己根本对付不了他的妻子。

1590年前后的英格兰社会生活中，用诗歌来求爱似乎已成为一时之风。年轻人用了“华丽的辞藻和精心的语汇”来勾引那些愚蠢的女人，破坏了谦谦君子们循规蹈矩的求爱方式。伊丽莎白女王曾两次下旨要求惩处那些用《仲夏夜之梦》中义济阿斯谴责过的伎俩来引诱上层妇女的人：

“你，赖桑德，你投情诗给她，你和我的孩子交换定情的信物；你乘月色到她的窗下，用虚伪的声调，唱些虚情假意的歌儿；你偷偷摸摸的在她的心上留下了印象，因为你送给她用你头发编的手钏、戒指、小玩意儿、装饰品、小巧的东西、不值钱的物事、花球、糖果，这对于没变老成的少女都是很有力量的手段；你是用欺诈偷去了我女儿的心……”

（第一幕，第一场，28-36行）

《爱的徒劳》中聪明的侍童毛兹也以一番激烈的言辞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恋爱方式：

“只是从舌端进出一支歌词，用你的两脚随声信步起舞，不时地翻白眼，一声唱夹着一声叹息，有时候声音从鼻孔里出来，好像是你在寻嗅爱情时要把爱情吸进去一般；把你的帽檐一拉，斜搭凉棚一般遮住你的眼睛；两臂交叉在你的紧身内衣之上，像是一只穿在烤叉上的兔子；再不就把两手插在袋里，像古画里的一个人；别唱一支歌儿太久，唱几句就换一首。这就是功夫，这就是派头。这就可以诱惑娇羞的少女，其实没有这一套她们也会被诱惑的；而且可以使他们成为风头人物，——你们注意到没有？——如果他们最喜欢这一套。”

（第三幕，第一场，9-23行）

毛兹指出这种恋人的装腔作势只会对那些轻浮，或用伊丽莎白时期的话来说是“水性扬花”的女人起作用。剧中的阿马都得以诱惑杰克

奈塔（Jaquenetta）不过是因为她是个无知的乡下姑娘。可是当剧中年轻的贵族们用同样的手段来和法国的贵妇们搭讪时，就算他们把这些手段运用得更熟练老到，贵妇们也只把这一切看成是一出蹩脚的自恋症把戏，完全用错了地方。莎士比亚喜剧中没有一个女主人公被这样的手段征服。西尔维亚，波西亚（Portia）和奥莉维亚主动地将芳心相许，从而自然避免了这一番无聊的求爱言辞。《皆大欢喜》中，罗珊琳假扮成男孩贾尼曼德（Ganymede），瑰欧拉假扮成男孩西萨里奥，她们通过隐藏自己的女性身份而获得爱情，因此也无需这样的求爱过程。在隐瞒她们真实性别的情况下（但并不是没有性爱的意味），她们能用自己的方式重复毛兹对当时流行恋爱方式的批评。作为假扮的男孩贾尼曼德，罗珊琳可以叫停奥兰多满是陈词滥调的追求，不让他用蹩脚的诗句去糟蹋树木；她不单能够取笑多愁善感之爱的俗套，而且还能在求爱开始之前就履行了婚姻的仪式。

罗珊琳带着怨气的话语指出“男人求婚时是四月，结婚时像十二月；女人在处女时是五月，她们作妻时，天就变了”（《皆大欢喜》，第四幕，第一场，139-41行）。罗珊琳说的这种情况就表现在《错误的喜剧》中的安提孚勒斯兄弟上；实际上，莎士比亚在《错误的喜剧》中反复使用了“水滴”（第一幕，第二场，35-40行）和“倒退的时光”（第四幕，第二场，53-62行）这样的意象来说明这两兄弟本质上是一类货色。他们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在爱情的年历上，一个比另一个要走得快些而已：哀菲索斯的安提孚勒斯已经不在爱情的五月天，而是在十二月的时候；不像他那温良的兄弟那样心中充满了“欲望和恋爱”，他此时已是“很快很容易就和妻子争吵”。这两兄弟谁也无法通过对方看清自己；西拉鸠斯的安提孚勒斯无法理解他兄弟面临的问题，也不能认识到这样的问题他自己也无法幸免。剧情主要展现一种完美的婚姻状态中的精神价值，但同时莎士比亚也在剧中给出了一个与理想分裂的现实图景：从五月的恋爱游戏开始一直到夫妻彼此感到失望，终日生活在压力和紧张状态之中。

我们不应该认为写作《凤凰与斑鸠》的莎士比亚拒绝了柏拉图式的爱情观。他只是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个许多同时代的人没有认识到的

真理：理想毕竟是理想，它不是满足世俗欲望的工具，不管这种欲望是对变童还是对妻妾之间的爱情关系。相爱的人之间的钟情不是每天发生的故事，而是两人之间精神上的融合。就像阿德利爱娜在《错误的喜剧》里不能真正拥有与丈夫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能真正地与他在此世的生活中融为一体。一个柏拉图式的恋人能与其爱人融为一体，但不是通过肉体上的亲密，而是通过他的奉献。年轻人的性爱与两个灵魂之间的结合没有什么关系；莎士比亚反复讽刺的是人们如何盗用灵魂结合的理念来形容一种当下短暂具体的快感。

婚姻的成就

虽然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人们经常用婚姻来结束一个戏剧情节，但对莎士比亚来说，婚姻并非一个用来构成大团圆结局的陈腐主题；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从恋人们多变的幻想中如何能够成就婚姻这样一个恒久的社会习俗？在《仲夏夜之梦》中，恋人们的纠纷先是被复杂化了，然后用了仙术才被调和；最后它变成了一种仪式，因为只有合适的仪式才能使代表贞洁和生育的女神狄安娜（Diana）与代表性吸引力的女神维纳斯（Venus）彼此和谐——我们不应忘记在剧中这两位女神总是处于一种不分胜负的对抗之中。

《罗密欧与朱丽叶》为同样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悲剧的版本。在维洛那病态的社会秩序中，原本是天造地设的两个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最后演变成了一出悲剧。在维洛那人们往往会因为“一句口头的空言”就产生毫无道理的相互仇杀。但维洛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莎士比亚用了25行诗句来说明朱丽叶的年纪，而且先后重复了3遍。她的母亲告诉我们，她生朱丽叶的时候和朱丽叶现在一般大，换言之，朱丽叶的母亲生她时是28岁〔5〕。后来，我们又知道朱丽叶的父亲自从朱丽叶的母亲出生之后就没有参加过舞会。这件事被如此反复强调，不是因为当时的观众对此不会感到惊讶，而是恰恰相反。朱丽叶还是一妙龄女子，但当时社会变态的道德习俗惯于将年轻的女子嫁给老男人，这

才是造成这出悲剧的真正原因。在爱上罗密欧的时候，朱丽叶就已经迈出了悲剧性的一步；她必须教会罗密欧什么是爱情的真谛。这就是为什么在阳台上，每当罗密欧打算朗诵准备好的、蛮可以适用在罗珊琳身上的求爱辞藻时，她就会阻止他继续说下去。劳伦斯修士（Friar Lawrence）在剧中责备罗密欧的三心二意，而且认为罗珊琳对他冷漠是对的：

> “因为她知道，你的爱只是背诵不知所云的滥调。”
>
> （第二幕，第三场，83-4行）

朱丽叶的爱情饱含着纯真的全部力量；而劳伦斯修士在两个相互敌对的家族之间秘密安排一桩婚姻的做法使朱丽叶成为维洛那腐败社会的牺牲品。朱丽叶父亲的态度——“你是我的，而我将把你给予我的朋友”——明显是错的。

在英格兰宗教改革运动的过程中，人们在婚姻生活的地位、恋人的权利和父母在子女婚配的利益问题上耗费了无数的笔墨。最后达成的共识是父母的确在孩子的归宿问题上有一定的决定权，但是父母不能违背孩子的意愿，强迫使之完婚，也不能拒绝一桩合适体面的婚姻。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孩子可以向宗教机构讨个公道。当时的普通人被王室之间由贵族安排的婚姻所震惊，如一些宗教辩论家所言，这些贵族安排他们子女婚姻的方式就像是在处理牛羊之类的牲口，特别是与王室结合的婚姻的结局往往不是通奸就是家庭暴力。用一种严肃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的莎士比亚实际上是在表述新教的婚姻观念。我们可以在《基督教婚姻之书》（1542年）中找到一段动人的描述：

> “让别人去赞美独身的生活吧……我永远会赞美一个道德的婚姻，它不会拒绝一切的苦难和烦恼而会给基督国度的公共幸福带来所有的好处……我认可那种依照仁慈的原则建立的生活，在其中婚姻的一方将会承担另一方的负担如同承担自己的负担，会为另一方寻求生活的安宁如同寻求自己的安宁。”

新教改革者真诚地相信，夫妻之间应该相互帮助共同走向天堂，而一桩不般配的婚姻让人每天都在犯重罪。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绅士樊顿（Master Fenton）认为他与安·佩哲（Ann Page）私奔的理由就在于她父母这样的罪过：

“你们要她嫁给她所不爱的人，那将是最不幸的婚姻，事实上，她和我早已订有婚约，现在更有把握什么也不能使我们分离……她的这一举动可以避免强迫婚姻将给她带来的无数的罪孽的日子。”

（第五幕，第五场，218-21行，225-7行）

福德（Ford）与佩哲（Page）的婚姻表现了婚姻中爱情能够带来的一切幸福，他们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福德甚至还有颇为严重的臆想症），但是两人之间的承诺却始终如一。因为丈夫给予她们的充分信任使英国的妻子们有着足以让欧洲大陆妇女艳羡的好福气；《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她们羞辱淫亵的福斯塔夫的行动证明了她们完全配得上如此的信任。

新教的婚姻理想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秘密婚姻。婚姻的神圣仪式在新教教义中只需要结合的双方参与，理论上除了上帝之外不需要任何别的见证人，而牧师在婚礼中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见证人而已。在伊丽莎白时期，婚姻的证言足以在上帝面前将两个人永远结合在一起；后来的婚礼，无论多么盛大地举行，都可能因为之前的婚约而被宣布无效。在《皆大欢喜》中，小丑试金石追求乡女奥德莱（Audrey）的方式与阿马都追求杰克奈塔的方式如出一辙；他找了个邻村的蹩脚牧师来给他们证婚。当牧师抱怨没有人来充当送走新娘的角色时，杰克斯自告奋勇，但是他并没有充当牧师指派给他的角色，而是去骂试金石：

“以你那样身份的人，你就像一个乞丐似的在一颗树底下就结婚？到教堂去，找一位能告诉你结婚是怎么一回事的好牧师：这个人只是把你们俩结合起来，像拼合两块壁板一样，以后你们两个必有一个将像是湿板似的干缩起来，越来越弯。”

（第三幕，第三场，74-80行）

试金石此时的旁白证明了杰克斯观点的正确性——“我本想就请这个人给我们证婚，不想再请别个：因为他不会把我们的婚姻弄好的，如弄不好，则以后我要抛弃我的妻便有很好的借口了”（第三幕，第三场，81-5行）。

与这次失败的婚姻相呼应的是女扮男装的罗珊琳与奥兰多玩笑式的婚礼，此时西利亚扮演了蹩脚牧师的角色。罗珊琳甚至必须在一个关键的地方提醒对方——如果婚礼证言的时态错误，婚礼就不是婚礼，而成订婚仪式了。

“罗： 你得先这样说——‘你愿意吗，奥兰多’——
西： 来吧。——奥兰多，你愿意要这个罗珊琳为妻吗？
奥 ：我愿意。
罗： 是，但是什么时候娶呢？
奥 ：就是现在呀，她给我们行完礼后立刻就算娶你了。
罗： 那么你就应该这样说，‘罗珊琳，我娶你为妻。’
奥 ：罗珊琳，我娶你为妻。
罗： 你娶我，我本可以向你要传票看看的；但是，奥兰多，我也要你做我的丈夫。”

（第四幕，第一场，122-31行）

对于理解《皆大欢喜》这部戏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记住人们耳闻目睹了奥兰多娶男孩装扮的罗珊琳的全过程，虽然按照教会法规，如果结婚的一方乔装改扮的话，这个婚姻的契约就是无效的。

在婚姻中，双方的性吸引（在奥兰多与这个漂亮“男孩”的关系中也未必不存在，《第十二夜》中的敖辛诺与假扮男童的瑰欧拉的关系也是如此）没有双方的友谊和融洽来得重要。一个丈夫不仅仅是他妻子的爱人，他还像伊丽莎白时期最有名的一首名为“新娘的明天”的歌谣中唱道的那样：

“……一个朋友保护你
不受悲伤，烦恼，和痛苦折磨。
无论健康还是在病中，日日夜夜都是为你的舒适
他被正式地允诺，来到你的身旁，
他的关爱始终如一，确定无疑；
所以你也应如此爱他。

没有什么珍宝堪与
一个忠实的朋友相比。
黄金易腐，尘世的财富很快消亡
散入风中：
但是爱情，一旦植入纯洁和完美的头脑
将永存，无论幸福还是苦厄；
命运皱起了眉头，可是它们并非那么不善，
因为它们也无法推翻这样的力量。”

我们今天已经如此习惯将婚姻视作严肃文学的重要主题，以至于很难去体会莎士比亚婚姻观的原创性。这种原创性体现在他将婚姻理解成为一种夫妻之间相依相伴的关系，并且他把这样的关系树立为社会生活结构的基础和支柱。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认为婚姻不是人生活的最佳状态，它比不上童贞和独身生活。兄弟会式的组织自然要贬低异性之间的承诺和亲密，而男性的主导权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形式。莎士比亚写作的时代经过了数代人的宗教纷争，而在此过程中，等级森严的基督教会必须面对来自于更为大众化的宗教运动对它的冲击；这些大众式的基督教运动从《圣经》中得出了与教会完全不同的教训，要求人们以个人良心的律令行事。

不管这些改革者在宗教问题上的歧异，他们所有人都坚决维护婚姻，认为这是一种使人光荣的习俗。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对于波西亚这个人物的塑造就运用了这个现成的主题；而他创造出的摩洛哥亲王必须从金、银和铅制的3个箱子中作出选择的情节以一种极其巧妙的方式涉及了父亲的权利和女儿的弱势地位这个社会问题。这个情节的设计以一种极新颖的方式让我们经历了一场婚姻的全过程

——今天的读者们认为这种方式极其平常的原因其实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力。

当时印刷业的发展刺激并满足了人们读书识字的愿望。当识字的能力逐渐从社会的上层扩展至下层时，社会理想从社会的下层进入了文学的话语。作为一个兼跨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作家，莎士比亚与改革者站在了一边，为其奋争；他给予了改革者们有时过于严肃的观念以特别的活力和吸引力。在他笔下的婚爱故事中，他成功地诠释了一夫一妻制异性婚姻的理想；直到今天，仍然启发着我们思想中夫妻之间应该相互平等合作的观念。当时，学院派的喜剧不关心妇女，更不要说恋爱的问题；剧情复杂的欧洲大陆喜剧主要描述通奸的情节，或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被一些偶然事件破坏的婚姻关系。像《无事生非》中的比阿特丽斯和班尼迪克的原型很可能来自于那些诉诸文字的普通人的乡土文学之中，而莎士比亚对于这个文学传统的吸收，相比起那些学院派和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学作品，也许要更积极有效得多。莎士比亚对文学语言的使用没有设置任何专门的标准，也没有为了使语言高雅纯粹而设置任何的禁忌；而我们知道这样的禁忌曾阻碍欧洲戏剧发展长达几个世纪之久。一切的方言和行话都是莎士比亚文学磨坊现成的材料，它们为莎士比亚留给我们的无与伦比的语言财富奠定了基础。莎士比亚对于语言的态度表现出卓越的实用主义立场：他从现实生活的语言中汲取他的材料，从不考虑这些素材是否应该存在的问题。因为他从不把任何机械的体系强加在既有的无比丰富多样的经验之上，他总是把他的语言置于戏剧表现的语境中而使之被理解，所以他的戏剧作品有着如此长久的生命力——是他的观众们赋予了它们生命的原动力。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赞同奥威尔的观点，即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没有思想，而是要说明这种现实的实用主义立场本身就是它们思想内容的一部分；每一次戏剧表演都是一次实验。戏剧人物和他们的语言都被放进一个熔炉，熔炉中最后形成的化合物就是观众在看了戏剧表演之后获得的体会和感受。也许，我们无法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抽象出一个思想观念或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思想命题；部分的原因在于莎士比亚知道一个我们似乎已经遗忘的道理：情感与思想

具有同样的智识性。莎士比亚的思想，就像艾略特〔6〕曾说过的，是一种完整而又充满联系的情感。莎士比亚的观念与其观念的表现形式是密不可分的。

图19　表现一个印刷店的版画，选自简·凡·德·施特雷的一本名为《新发明》的版画集（1580年）

图20　莎士比亚的纪念碑，海拉特·雅森作，现藏于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市圣三一教堂

只要莎士比亚仍然在英国的文化生活中占有一个中心的位置，那么这个文化就会保留和延续那些使它具有独特性的价值：宽容、多元、达成妥协的能力和对于人类历史上最奢侈的社会制度——民主——的深刻认同。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这个文化如此地缺乏系统性以至于它显得混乱无形、全无组织，甚至是虚伪做作；可是当你从内部去观察它，你会看到它所具有的包容一切的特质其实与生活本身是一致的。它留给我们的困惑是如何能够在一种无序的表面现象中发现一个内在的组织原则。我们的努力无法成功的原因可能是我们总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这样的原则。在剧场中，观众是唯一的媒介。莎士比亚提出的所有命题和论断中真正缺少的是我们观众的回应；没有观众的回应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命题和论断。

注释

〔1〕 色诺芬（Xenophon，前427-前355），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著有《远征记》、《希腊史》以及《回忆苏格拉底》等。

〔2〕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0年），古罗马传记作家，哲学家。代表作有《希腊罗马名人传》和《道德论集》。

〔3〕 加图（Cato，前234-前149），罗马共和国时期有名的政治家，演说家，罗马史上第一位拉丁散文作家。

〔4〕 比阿特丽斯（Beatrice）和班尼迪克（Benedick）是《无事生非》中的男女主角。班尼迪克曾以豪言壮语宣称抱独身主义，后与唇枪舌战的对手比阿特丽斯结婚。

〔5〕 朱丽叶当时年龄应为14岁左右，此处疑为原作者笔误。

〔6〕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美国出生的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代表作是长诗《荒原》。

为什么称莎士比亚是思想家？作为思想家的莎士比亚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印证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物理学的熵变理论和当代数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本书通过对多部莎剧的精妙解读，依次从当代诗学、伦理学、政治学、目的论和社会学等多个角度，揭示出莎士比亚在四百多年前的诸多创见与当代各学科前沿理论的密切联系，为我们展示了作为思想家的莎士比亚所取得的独特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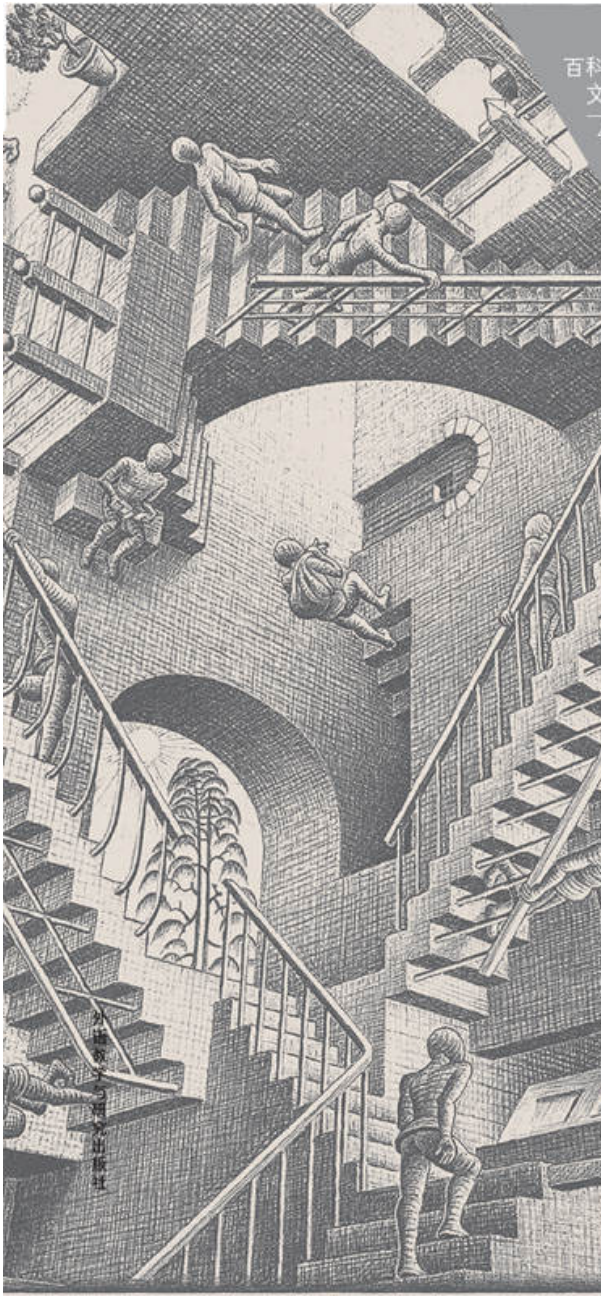

百科通识文库

49

存在主义简论

托马斯·R·弗林 著

莫伟民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存在主义简论

托马斯·R弗林 著

莫伟民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55**

Existentialism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6.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6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Thomas Flynn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存在主义简论 / （英）弗林（Flynn, T.R.）著；莫伟民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07-3

I．①存… II．①弗… ②莫… III．①存在主义 - 概论 IV．①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66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07-3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
第二章　成为一个个体
第三章　人道主义：赞成与反对
第四章　本真性
第五章　一种经受磨炼的个体主义？存在主义与社会思想
第六章　21世纪的存在主义
术语表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托马斯·R.弗林，埃默里大学哲学系教授。代表作有《萨特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集体责任的试验案例》（芝加哥，1986）和《萨特、福柯与历史理性》两卷本（芝加哥，1997、2005）。

译者简介

莫伟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法国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主持多个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出版过五部著作和译著，发表过五十余篇学术论文，曾获得五项省部级科研奖励，2004年入选首届“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并先后三次以学者和教授身份在法国巴黎高师哲学系从事研究工作。

图目

图1　在服从城邦死刑判决将要喝下毒药时，苏格拉底还在谈论个人的不朽
图2　萨特在1968年学生暴动时发表演讲
图3　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运动的奠基者
图4　时年41岁的索伦·克尔凯郭尔，他去世的前1年
图5　亚伯拉罕正要献祭他的儿子以撒
图6　尼采热切的凝视
图7　唯一的希望就是知道没有（终极的）希望
图8　海德格尔、花园和远处的森林
图9　马塞尔，希望哲学家，看上去很慈祥
图10　卡尔·雅斯贝尔斯和他的世界
图11　阿尔贝·加缪、报纸和城市
图12　应对战争中的暴行负责的弗朗兹（法兰西）（在萨特的戏剧《阿尔托纳的死囚》中）
图13　莫里斯·梅洛-庞蒂正在阅读他的笔记
图14　西蒙·德·波伏娃总是在工作
图15　运用“原始”理性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

译者序

存在主义，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不仅对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哲学、文学、艺术、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二战前后那几代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存在主义反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近代思辨理性主义，强调哲学应该研究具体个体的生活、经验以及历史境遇，关注个体内部非理性的主观情绪体验（恶心、荒谬、焦虑、恐惧、死亡的体验），阐发了有关个体行为、自由、选择及其责任的哲学学说。

存在主义的产生不仅有经济危机、一战、二战、社会变革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而且也有其重要的哲学思想渊源。虽然“存在主义”一词是由马塞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引入的，但“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却肇始于克尔凯郭尔的个体哲学和尼采的唯意志论，海德格尔和萨特又运用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对存在主义作了存在论解释、阐发和提升，存在主义最终遭到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巴尔特、福柯等结构主义者和思想家的批评而逐渐走向衰落。

本书作者托马斯·R.弗林教授，是美国著名的萨特研究专家，博士论文题为“让-保罗·萨特与集体责任问题”。他出版了多部研究存在主义的著作，在国际哲学界有较大影响。主要著作有《萨特与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1986）、《辩证法与叙事》（1993）、《萨特、福柯与历史理性》（两卷本）（1997、2005）、《历史伦理学》（2004）等。

与众多研究存在主义的书籍相比，本书的最大亮点在于作者不仅把存在主义当作一种哲学，还别具匠心地把存在主义定位为一种生活方式，从而很自然地把理论与实践、通俗性与思想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本书虽然简短，但内涵丰富，思想性强。作者不仅梳理了存在主义缘起、发展、式微的演变历程，而且还澄清了通常招致人们误解的一些论题，挖掘了存在主义思想的深刻哲学洞见，重申存在主义运动在21世纪的哲学舞台上仍将扮演重要角色。作者在书后对本书专业词汇所作的解释非常有助于读者对该书的理解。

由于篇幅和体例所限，作者基本上都没有注明引文的出处，也没

有系统阐释某些专业词汇的意义在哲学史上的演变过程。虽然译者尽可能对某些词汇和句子作了译注，但难免有遗漏和不妥之处。读者如果有兴趣深入了解存在主义，可阅读相关书籍、查阅相关资料。然而，无论如何，本书作为对存在主义的简短概述，仍明显体现出作者具有的精深研究功力和独到的见解。

译者谨识

2008年2月

前言

存在主义通常与巴黎左岸[1]咖啡馆以及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德·波伏娃的“学派”联系在一起。二战结束巴黎刚解放那会儿，萨特和波伏娃那帮哲学家经常光顾这些咖啡馆。人们可以想象，这些离经叛道、思想前卫的知识分子们，嘴里叼着香烟，一边欣赏着爵士乐，一边热烈地争论着他们新获得的政治和艺术自由的意义。他们充满热情和创新精神，经受着极大的痛苦来进行自我剖析。他们向往自由——永远都是自由。

尽管这反映了那时的媒体所塑造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形象，也确实捕捉到了时代精神，但却掩盖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哲学意义，把存在主义思想装扮成了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这也许就是决意以具体而非抽象和永恒的方式从事哲学研究所要付出的代价。存在主义者主张，哲学要与当代现实密切相联，这激发了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奉献精神。但这种强烈要求也把他们与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使以后一代又一代的人认为，存在主义者只是昨日新闻的头版头条。

这就是我希望在这本小书中予以纠正的对存在主义思想的误读。假如存在主义表面上带有其战后的时代印记，那么，作为一种从事哲学思考的方式，作为一种处理那些关涉到人们生活问题的方式，存在主义至少就与哲学本身一样古老。同时它又与它所审视的人类状况一样现实。为了一开始就确保这个要点不被忽略，我在第一章中就讨论了不是作为学说或思想体系的哲学，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第一章的标题取自于古典学者皮埃尔·阿多[2]对回归斯多葛派所作的研究，他把这种向斯多葛派的回归看作是“古代”哲学如何能为当今人们生活提供意义的范例。尽管阿多偏爱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但他在克尔凯郭尔、尼采这些所谓的19世纪存在主义运动的“先驱”及其20世纪继承者的著作中发现了类似的关怀。

存在主义被公认为是一种关于具体个体的哲学。这既是其荣耀，又是其耻辱。在大破坏和大众传播盛行的年代，存在主义捍卫了其主要倡导者萨特所说的“自由的有机个体”，即有血有肉的行动者的内在

固有价值。这值得我们称赞。由于现代社会中存在着难以抑制的趋同力，所以，我们将要提到的“生存的个体性”就是一种成就，但不是一种永恒的成就。我们生下来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物，但我们必须通过承担我们行动的责任来成为生存的个体。这就实现了尼采所说的“成为你自己所是”。许多人并不承认这种责任，逃避他们生存的个体性，躲进了无个性人群的舒适安逸中。为了能以一个实例来说明如何成为个体，在第二章中，我将先回顾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生存的“阶段”或“人生道路的阶段”，最后就尼采如何看待成为生存个体这一设想作一些评论。

二战后不久，萨特发表了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的公开演讲，这个演讲震惊了巴黎知识界，并充当了存在主义运动的准宣言书。从此，存在主义就与赋予人类和人的价值以崇高地位的某种人道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与人道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这些不同的人道主义流派在当时曾被广泛接受。在第三章中，我讨论了这个有争议的演讲的诸种内涵（萨特唯一遗憾发表的就是这个演讲），还讨论了萨特的同代人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致人道主义的信》中对萨特演讲所作的“答复”。

虽然存在主义思想的最高价值被公认为是自由，但存在主义倡导的首要品德却是本真性。第四章致力于探讨本真性这个话题，同时也讨论了作为其对立面的自欺或不诚的本质和各种表现形式。我把本真性与生存的个体性联系起来，并考虑建立一种基于生存责任之上的本真性伦理学的可能性。

二战一结束就有人批评存在主义，说它仅仅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另一种形式，丧失了集体意识，漠视探讨当时社会问题的需要。为了反驳这种广为流传的批评，我在第五章中将专门讨论一种“经受磨炼的个人主义”这一问题，像存在主义者们设法以增进而非损害个体自由和责任的方式去设想社会团结一样，这种个体自由和责任仍然是绝对的，没有商量的余地。

在最后一章，我将利用前面讨论过的和其他的存在主义思想来思考存在主义哲学和我们当代的持续相关性。有必要把存在主义运动的

哲学意义、强有力的洞见以及对具体事物的关注与其左岸成型期时引人注目、但现已过时的一些口号标语区分开来。在多个合适的备选项中，我选取了四个现在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对这些话题，存在主义者自有一番哲学评说。

即使这只是一本简论，但这本小书的两个特征也许还是会使读者感到它有些局限性：一方面，没有提到许多被公认为是“存在主义者”的名字，而另一方面，可能全书又过多地提及萨特。关于第一个方面，尽管我本可以提及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或卡夫卡、贾科梅蒂或毕加索、埃奥内斯科或贝克特之类的人物，他们都在艺术中有力地表现了存在主义的主旨，但我关注的是把存在主义看作一场具有艺术蕴意的哲学运动，而不（只）是一场具有哲学抱负的文学运动——虽然这是一种误解，但却广为流传。我并不在此讨论值得提及的布伯或伯戴弗、奥特加·伊·加塞特或乌纳穆诺和许多其他哲学家，其原因就在于这毕竟是一本“非常”简短的小书。那些有兴趣研究本书中讨论的话题的人们将在书末找到一些有用的文献资料提示。

之所以花大量篇幅讨论萨特，是因为他和波伏娃是这个阵营中唯一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的两位哲学家。就存在主义是20世纪的一场运动而言，它肯定集中反映在萨特的工作中。没有人比萨特更好地体现了哲学与文学、概念与想象、批判与忠诚、作为反思的哲学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之间的那种统一与张力，这种统一与张力体现了从事哲学思考的存在主义模式。

注释

〔1〕 巴黎以塞纳河为界分为两部分，大体说来，虽然卢浮宫在塞纳河右岸，但右岸主要分布着巴黎的商业机构和行政中心，而左岸，尤其是拉丁区，则是巴黎的文化、艺术和教育中心，海明威、凡·高、毕加索、萨特等文化名流经常光顾此地。——译注，下同

〔2〕 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国当代哲学家、史学家、语文学家和希腊罗马思想史研究专家。

第一章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

假如我不用言辞来阐明我对正义的看法，那我就用我的行动来做到这一点。

苏格拉底致色诺芬

尽管号称独树一帜和史无前例，但存在主义实际上代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历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这是一种作为“关注你自身”的哲学实践。其关注焦点在于一种恰当的行为方式，而非一系列抽象的理论真理。由此，雅典将军拉凯在柏拉图的一部同名对话中承认，苏格拉底给他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的学说，而是其学说和其生活之间的和谐一致。苏格拉底本人在面临死亡判决时警告雅典法庭，他们将再也不容易找到像他那样教导他们把关注自身看作高于一切的人。

这种哲学观在希腊化时期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和伊壁鸠鲁派哲学家中间盛行。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研究伦理问题、找出个人生活的恰当方式上。正如一位古典学者所说，“从本质上说，哲学在古希腊人那里与其说是增进知识，还不如说是培育心智”。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家就是灵魂的医生，开出药方——指定适当的人生态度和实践——来增进人们的健康和幸福。

当然，作为一种对人性和宇宙基本真理探究的哲学也在古希腊人中广为流传，并且也是关注你自身的哲学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个更具理论性的研究路径导致了科学的兴起，并在中世纪和近现代哲学学说中占据了首要位置。确实，就像“政治理论”和“文学理论”这些表述所体现的含义，当今的“理论”通常被看作是“哲学”的同义词，以至于说“理论哲学”几乎是多此一举。

在两类哲学形式的区分中存在争议的就是“真理”的两种不同用途：科学的用途和道德的用途。前者主要是用于认识事物和从事理论研究，而后者则主要用于实践和培育自我，比如实现“对你自己忠实”。前者并不要求一个人为了认识真理而必须成为某类人（对17世纪的哲学家笛卡儿来说，罪人可像圣人那样全面地把握数学公式），而要达至后一种真理则要求个人要有某种自我约束和一套针对自身的

实践，如注重饮食，言辞谨慎，经常沉思默想。这后一种真理其实是关于做人的问题，就像苏格拉底以他特殊的生活方式所体现的那样，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达到论证或洞见的清晰性的问题。在哲学史上，对自身的关注逐渐边缘化，被交付给了精神指导、政治组织和心理咨询这样一些领域。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例如，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397）、帕斯卡尔的《思想录》（1669），19世纪早期德国浪漫派的著作也没有把“道德”真理从学园中驱逐出去，它们都鼓励人们把哲学理解成是对自身的关注。

存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运动可以在这个更大的哲学传统中找到它的位置。存在主义者可被视为复兴了这种较为个人化的“真理”观。这是一种被体验的真理，不同于、并且常常对立于这个术语较为超然的和科学的用法。

毫不奇怪，19世纪的“存在主义之父”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和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对苏格拉底哲学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苏格拉底被看作是某种理性的捍卫者，这种理性超越了纯粹约定俗成的和主观的价值，而趋向普遍的道德规范，对此，克尔凯郭尔赞扬他，而尼采则责备他。但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敬重苏格拉底个体化地“跨越”了证明个人不朽和选择接受雅典法庭死刑判决之间的理性上的鸿沟。（苏格拉底被控渎神和利用其学说腐蚀青年，他因此而受审，并被判有罪。）换言之，每个哲学家都认识到生命并不遵循逻辑论证的连续性，一个人通常不得不冒险超越理性的界限以便最圆满地过自己的生活。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许多人都提供了灵魂不朽的证据，但苏格拉底在假设灵魂可能不朽之后，就凭着这种心中假设的可能性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他遵照雅典法庭的命令喝下了毒药，与此同时还不断地与其追随者争论着他来世的可能性。克尔凯郭尔把这称作“作为主体性的真理”的范例。克尔凯郭尔指的是一种个人的确信，基于这种确信，一个人愿意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在他的《日记》中，克尔凯郭尔沉思道：“重要的就是要去发现一个对我来说是真实的真理，去发现我能为之生和为之死的观念”（1835年8月1日）。

图1　在服从城邦死刑判决将要喝下毒药时，苏格拉底还在谈论个人的不朽

清晰性是不够的

伽利略写道，大自然之书是以数学符号写就的。现代科学后来的发展似乎证实了伽利略的说法。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似乎只有能被度量（量化）的才能给予我们可靠的知识，而不能度量的就只能归于纯粹意见之类。这个观点被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实证主义哲学奉为圭臬。这种实证主义的思维习惯坚持认为，“客观的”就等同于可度量的和“与价值无涉的”。其目标就是要从实验中抽出主体，以获得一种纯粹非个人的、“并不来自于任何地方的观点”[1]。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发现，但它存在的前后不一致的问题也很快显现出来。把可知局限于可度量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量化的价值观。也就是说，选择这种做法本身就近似一种“跳跃”，表现了对某套本身并不可度量的价值观的信奉。

而且，把不可度量之物不算作知识不仅使我们某些最重要的问题悬而未决，而且变得不可解答。我们的伦理规则和价值观仅仅表述了我们的主观偏好吗？把数学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很难说他是一位

存在主义者）的话换个说法就是：人们反感无端地伤害他人，但有谁相信，这种反感仅仅表示了人们碰巧不喜欢这种行为呢？伦理学理论中的“情感主义者”的学说就认为，这种反感仅表现了人们的一种情绪。这个学说有时被称作道德判断的“呸/呜啦”理论[2]。情感主义者因接受了实证主义者把知识局限于可度量之物事的主张而把不能度量的情感排除在知识之外，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他们的理论。但是，我们真能获得那种像实证主义者要求于科学的并不掺杂个人情感的知识吗？也许，认识主体能被重新引入这些讨论之中而不损害这些讨论的客观性。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修正“客观性”的定义，能否发现“真实”这个词除了实证主义者所说的“与感觉经验相一致”之外的其他用法。许多哲学家回应了这一挑战，存在主义者便是其中之一。

让-保罗·萨特（1905—1980）举例回应了这一挑战。他指出当今唯一有效的知识论便是基于微观物理学真理之上的知识论：实验者就是实验体系的一部分。萨特想到的是来自于原子物理学中所谓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这个原理，至少就其通俗的解释来说就是，使我们能观察轨道电子动量和位置的仪器影响了轨道电子的活动，以至于我们能分别、但不能同时确定电子的动量或位置。类似地，人们可以反对说，涉入“原始”部落生活这种行为本身就妨碍了人种学家去研究处于原始状态中的人。这些想法削弱了实证主义者把知识等同于可度量性的观念，也搅乱了理性主义者对实在的看法。后者原本以为非此即彼的逻辑就能穷尽实在，不存在既是此又是彼的情况。再举一例：光既有波的性质又有表明它是粒子的性质。这两个特征似乎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标准逻辑解决不了“光是波还是粒子”这个问题。光，似乎两者都是，而不仅仅只是其中一个。似乎需要另一种逻辑来理解这个现象。上世纪初物理学和数学的其他许多发现都对实证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关于知识和世界的论断提出了反例。

生活体验

存在主义者所涉入的正是这个有限的世界，任何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评估都只能是相对的。他们渴望把我们生活中最不具个性的现象加以“个性化”。例如，什么能比时间和空间更不具个性和更客观呢？即便是相对论为我们提供的成熟的时空观也依赖于一个绝对的或恒常的参照点，即光速。我们用分秒来测算时间，用米或码来绘制空间。这似乎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量化的、因而也是客观的方法。然而，存在主义者所说的“绽出的”时间性这个观念却为时间意识现象增添了性质的和个性的维度。对存在主义者来说，生活时间的每个时间维度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我们的态度和选择的一个功能条件。例如，某些人总是急于承担职责，而其他人则对于如何度过他们的时间茫然无知。当你高兴时，时间飞驰而过；当你痛苦时，又感觉度日如年。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即使用数字表示的安排我们时间的建议也是对生活抉择进行检验和评估的建议，这些生活抉择首先确定了我们在时间上需要优先考虑的事。假如“时间具有本质”[3]（存在主义者会坚持这么认为），那么，我们现在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体验自己生存的“已然”和“未然”的方式，我们如何处理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专注使得这种生存方式具体化了。

存在主义者通常以戏剧化的手法描述这样的“生活时间”。阿尔贝·加缪在其关于纳粹占领巴黎的讽喻剧《鼠疫》中，描述了深受鼠疫肆虐之苦、被强行隔离的城市居民：“仇视过去，厌烦现在，欺骗未来，我们更像那些出于正义或仇恨而被迫生活在监狱铁栅后面的人。”把“监禁”看成是“服刑”，这显然是存在主义的观念。在对情感意识作富有洞见的分析时，萨特谈到，当某人真正在“欢呼雀跃”时，他其实是在以肢体变化的方式（来像变魔术一般）想象“立即”拥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境遇的可能性，而无需等待其必须的、时间上的展开。尽管萨特是在20世纪30年代陈述这个论点的，但人们立即可以想到在德国占领巴黎期间希特勒在凯旋门下迈着轻快舞步的照片。如米歇尔·福柯所说，时间有它自己的黏滞性。绽出的时间性包含了其涌流。

但存在主义的空间也被个性化了。萨特提出，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的“路径”空间（生活空间）[4] 这个观念在性质上与我们日常

生存的生活时间相同。故事讲述了两个参加鸡尾酒会的人，其中一人想要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尽可能地靠近，而另一人则生性冷淡，想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在酒会的一个房间里，这两人一边你推我搡、一边又想继续交谈。生活空间是个人化的：它是我平常上班走的路线，是教室里很快能找到自己位置的座位安排，或是我课桌上物品的排放顺序。这便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我的“舒适区域”，也是我生活筹划的一部分。我如何处理对我有意义的“空间”取决于我如何安排我的生活。

当然，这些是心理学要思考的问题。但存在主义思想和方法的一个明确特征就是它们也具有一种存在论〔5〕意义。它们表述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并帮助我们通达我们生活的意义和方向（对法语词“*sens*”的两种不同译法）。诚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尽管许多哲学家都设法贬低甚至批评我们的感觉和情感的哲学意义，但存在主义者却极其重视像“畏”〔6〕这样的情感（克尔凯郭尔称之为我们对我们自由的意识）和“恶心”这样的感觉（萨特把它描述为我们对生存偶然性的体验和一种“存在的现象”）。这立即就使存在主义者可与独具创造力的艺术家进行对话，这些艺术家善于利用我们的情感和富有想象力的生活。实际上，存在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一直如此紧密以至于其批评者通常只把存在主义当作一种文学运动而不予考虑。确实，存在主义思想的戏剧性，还有它对情感意识的揭示性力量的尊重以及对“间接沟通”的运用（这一点稍后会简要讨论），都会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但存在主义者探讨的问题、对概念作出的仔细区分、严密的论述、尤其是他们明显与其他哲学传统中人的对话等，都使我们可以明确地把存在主义者主要划在哲学范畴之内，即使在他们强调概念与想象、哲学与文学之间区分的模糊性时也是如此。

“为之而死的真理”

假如非个人的空间和时间能被个人化，并被带入我们的选择和责任的领域中去，那么“客观”真理也能如此。如同一开始所提及的，克

尔凯郭尔区分了“客观”反思与“主观”反思、“客观”真理和“主观”真理。他考虑到了客观反思在发展科学方面的普遍运用，并作了如下描述：

“客观反思的方法使主体成为偶然，并因此使生存变成无关情感、逐渐消逝的文物。远离主体，客观反思方法导向客观真理，而主体及其主体性变得无关情感，真理也就变得无关情感，正是这种无关情感性成就了其客观有效性；因为所有的旨趣，就像所有的决断一样，都植根于主体性。客观反思的方法导向抽象思想、数学和不同种类的历史知识；这种方法始终远离主体，主体的生存或非生存恰恰因为这样而变得无限地冷漠无情”。

存在主义的五个论题

存在主义者以各自的方式运用五个论题。这些论题并不构成对“存在主义者”的严格定义，它们更多的是描绘了这些哲学家同属一个学派，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论题的交叉和重叠）。

1．存在先于本质 。我们根本上是受时间束缚的存在。生活时间不同于可度量的“钟表”时间，它关乎本质：“尚未”、“已经”和“目前”在意义和价值上各不相同。

2．时间具有本质 。存在主义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哲学。尽管存在主义并不反对科学，但存在主义的关注点却集中在人类个体在大众社会普遍要求浅薄和服从的社会经济压力下对身份和意义的追求。

3．人道主义 。你之所是（本质）就是你所选择（你的存在）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本质并不是命运。你就是你自己所造就的人。

4．自由/责任 。存在主义是一种自由哲学。它的根本原则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能与我们的生活保持距离并反思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此意义上，我们总是“超过”我们自身。但是如同我们是自由的一样，我们也是负有责任的。

5．伦理考量至高无上 。虽然每个存在主义者都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来理解伦理，但其根本关注点却是要我们去检验我们个人生活的本真性和我们社会的本真性。

存在主义者并不否认逻辑和科学推理的有效性。在此意义上，他们并非非理性主义者。他们仅仅怀疑这种推理能否触及内心深处引领我们生活的个人信仰。如同克尔凯郭尔在谈及黑格尔的辩证理性主义时所说：“设法凭借这种抽象哲学来生活就像想凭借一张丹麦在上面只有针尖大小的地图来找到丹麦各地一样。”

与忽视个体生存的客观反思相反，克尔凯郭尔把主观反思及其与之相应的真理看成是主体性：

> “当主体性是真理时，主体性的定义就必须包含一个与客观性相对立的表述，一个岔路口的标志，并且这个表述也必须传达思想深处的张力（自身与自身的关系）。这样说来真理便是：客观的不确定性，紧陷于感情最为强烈的思想深处的一个占用过程之中，这就是真理，是一个现存的人所能获得的最高真理”。[7]

这也关乎人生“岔路口”上方向的转变。这使得对主观反思的选择成了一个“存在主义的”选择。如果这种选择仅仅是一个有关自然事实或法则的非个人论断，那么我们就会处理“客观确定性”，而个人选择的赌注就会无关紧要。人们就会完全依指令行事。如果苏格拉底对个人不朽的信仰只是一种论证的结论，那么他就会这么做。但在此，“真理”更具有一种“道德”本性。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一个人用来计算某个可能结局的概率的方式，或在沿着通向目的地道路上看距离标记的方式是一个（“使某个客观事态成为一个人自己的”）“占用”问题，而不是“接近”某个客观事态的问题。就像克尔凯郭尔在别处指出的那样，对作为主体性的真理来说，重点在我们信仰的“方式”，而非信仰的“内容”。这导致了某些人的误解，认为克尔凯郭尔是在宣称你们信什么无关紧要，只要你们信就行。尽管克尔凯郭尔作为非常坚定的基督徒并不倡导宗教相对主义，但他更加关注的却是反对不温不火

或纯粹是有名无实的宗教信仰，而不是为基督教教义作辩护。

如果人们把一个世俗化的存在主义真理转译成有关生活意义的语言，那就意味着没有“客观上”正确的道路可供选择。对存在主义者来说，在弄清楚选择和可能的结果之后，人们就会坚持践行自己的选择，并使之成为正确的选择。对存在主义者来说，这样的真理与其说是在发现，还不如说是在抉择。当然人们并不是盲目和毫无标准地作出这些选择（与通常的误解完全相反）。但正如一些人反对的那样，选择的本质是构建标准，而非无标准。人们可能会把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称为“转意归主”，在这种经验中，决定性的一步并不仅仅是理智，它也是意志和情感（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激情”）的事情。所谓的信仰的“盲目跃迁”就是这样，如同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这种信仰的“盲目跃迁”把人投进了生存的宗教领域，但同样也可运用于个人一生中其他许多重要的“转捩点”，包括个人政治信念的根本转变、陷入爱河等。

这只是存在主义、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许多相同之处中的一点。例如，伟大的美国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信仰意志》中作出了类似的断言。他说，我们的激情本性不仅可能，而且必定会在命题之间作出选择，凡是真正的选择，从本质上说，就不可能完全凭理智作出。但某些这样的选择就是英国伦理学家R.M.黑尔所说的“原则的决定”。这些决定本身并没有原则，因为它们是用来确立原则的，我们生活中日后作出的选择正是依据这样的原则。这些原则类似于“游戏规则”，人们决定参与时选择了这些规则，但这些规则事先并不适用。在你决定参加游戏之前你并不遵从这些规则；你决定了参加就意味着你遵从这些规则。这些就是我所说的“构建标准的”选择。诚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类似于萨特所说的赋予个人生活以方向和统一性的初始的或“基本的选择 ”。我们通过反思我们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向而发现了这个选择。萨特宣称，这其实是一个我们发现自己早已悄悄作出的“选择 ”。

介入的哲学与文学 [8]

克尔凯郭尔的作为主体性的“真理”观是20世纪萨特所说的“介入”这一概念的先兆。似乎是为了贬低客观真理这个概念，或至少是为了表示认同现代科学定义下的“客观性”的新意义，萨特指出：“只存在介入的知识”。另一方面，萨特又赞同由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提出的较为经典的“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和真理观以及他的现象学描述方法（参见下文）。调和这两种观点的一个方法就是像克尔凯郭尔那样宣称，每一种观点都参照了“真理”这个术语的不同用法。在萨特那里，这是一个把现象学描述融入到一个更为实用主义的辩证真理观念中的问题；即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把不同的观点调和起来的问题。这更符合像马丁·海德格尔在20世纪20年代引入的解释学的或诠释学的现象学（参见第六章）。尼采曾强调，所有知识都是诠释，并不存在“原初的”、不可诠释的文本。换言之，被算作知识的其实是“完全的”解释。于是，不管是完全赞同尼采，还是部分认同克尔凯郭尔，真理都已被存在主义者“个人化”了。“我的真理”不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表述。

在发表于1948年的著名论文集《什么是文学？》中，萨特详述了“介入文学”这个概念。萨特的基本前提是，写作是一种我们必须加以负责的行动形式，我们不仅要对写作的形式负责，还要对写作的一切内容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赋予萨特一种社会责任感，但在他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1943）中却缺乏这种社会责任感，或至少是没有能详尽阐发。实际上，人们经常批评存在主义者过分强调个人主义，明显缺乏社会责任感。萨特早已凭借几部广泛被人们接受的剧本和感人的小说《恶心》而闻名于世，现在又探讨起了散文艺术家的道德责任。萨特承认，“尽管文学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但我们可以在审美律令的核心处发现道德律令”，即相信两者都是自由的。萨特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看成是“赐予-企助”的关系 [9] ，萨特的这一观念成了他美学思想的关键，不久便被当作消除异化社会关系的普遍模式。这个关系模式并不把人当作纯粹的物体或工具，而

是当作自在的价值。当萨特进行以下总结时，似乎一种自由尊重另一种自由的纯粹形式条件获得了一个根本性特征：

> “作者从独一无二的观点出发来向那些他想要获得其认同的自由描绘世界，这样的唯一观点总是关于充满着自由的世界的观点。很难想象由作家激发的宽宏大量的释放能被用来认可非正义，以及读者在阅读一部赞同或接受或仅仅放弃谴责人对人的征服的作品时能享受自己的自由。”

换言之，诚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存在主义详细阐述一种社会良心和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至少美术和文学应该介入社会和政治。

在二战后初期写成的这篇重要文章中，有一个萨特后来感到后悔的评论。在这一评论中，萨特在诗歌和散文之间作了一个著名的区分。根据这一区分，诗歌代表任何非工具主义的语言形式或是像音乐、视觉艺术和造型艺术这样的艺术形式。这些形式本质上是为了艺术而追求艺术，它们不能在违背其艺术本性的痛苦之下介入社会变革。而另一方面，散文由于其工具性的本质，能够、并且现在应该通过其写作题材和写作手法来培育个体的和集体的自由。尽管萨特随后在一篇论述非洲黑人法语诗歌的革命特征的文章中将修正这个区分，但其基本论点并没有改变：在他看来，我们目前正处在社会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中，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应该介入现实，减轻我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萨特写道，仅仅谴责这些实践是不够的，还需要积极的反抗。在第五章中我们将探讨各种各样的存在主义作家们的社会责任观。但目前只需提几个此类作家的作品中具有的这种社会和政治“介入”特征就行了。

让-保罗·萨特（1905—1980）

巴黎人，可能是20世纪最负盛誉的哲学家，经常与其终身伴侣西蒙·德·波伏娃一起周游世界。他的名字成了存在主义运动的同义词。他撰写了大量剧本、小说和哲学著作，最著名的是《存在与

虚无》（1943）。曾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拒绝这个荣誉。他公共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深深地介入到政治左派中。在他去世时，有几千人自发地涌上街头加入出殡队伍。诚如报刊标题所言："法兰西失去了她的良心。"

图2　萨特在1968年学生暴动时发表演讲

存在主义与美术：间接沟通

由于存在主义的存在观颇具戏剧性，而且在论证中普遍使用生动的意象，在与人的交流沟通中诉诸个人感观反应，因此，存在主义总是与美术密切相关。实际上，加缪与萨特都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萨特拒绝了这个奖）。在某种程度上，克尔凯郭尔是个诗人，因为他经常使用笔名、寓言和其他形式的"间接沟通"来促使个人介入眼下发生的事情。尼采是伟大的德语散文艺术家之一，他关于宗教先知的

寓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类似于萨特的小说《恶心》，是哲学的戏剧化表述的典范。西蒙·德·波伏娃（1908—1986）的小说也表述了她的哲学洞见。加布里埃尔·马塞尔（1889—1973）以沉思默想的方式撰写哲学，他曾说他的哲学也许更好地表现在了他已出版的30部剧本之中。在我们所讨论的哲学家中，只有海德格尔、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和莫里斯·梅洛-庞蒂（1908—1961）不太符合这一范畴。不过，除了雅斯贝尔斯，他们甚至撰写美学方面的重要研究作品，并且三人都使用了通过具体事例赋予论证价值的现象学方法。他们都坚持认为，艺术家，尤其是海德格尔笔下的诗人和梅洛-庞蒂的造型艺术家，都预示了，并且通常更充分地表达了哲学家试图加以概念化的一切。存在主义观念对美术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将看到某些人偏向于把存在主义描述为一场文学运动。确实，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像贝克特和埃奥内斯科这样的剧作家，像贾科梅蒂和毕加索这样的艺术家，都代表了存在主义思想的许多显著特征。

介入社会和道德改革是所有这些作家的特点。这一观念最为恰当地体现在他们用“间接沟通”来传递他们观点的做法中。“间接沟通”这一术语意指一种修辞行为，这一行为隐藏了哲学家的作者身份，以便通过悬置读者的怀疑来使读者认同作品中的人物。因此，克尔凯郭尔能用不同的笔名来写作，每一个声音都传达了某种与这个笔名使用者有关、但又不完全与哲学家本人相同的观点。尼采能模仿嘲弄圣经先知，即使当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贬低宗教信仰时也是如此。尼采的格言虽然是以他的本名写出，但也有巨大的修辞力量，尽管有人有时会担忧他格言的出处，即有哪种“论证”证实了他的格言。同样，德·波伏娃、萨特、加缪和马塞尔可以写小说和剧本，以具体的方式传递他们的思想给读者，而读者至少在当时悬置了其决定性的距离。当萨特被问及为何在巴黎的资产阶级街区而不是在工人阶级街区上演自己的剧本时，他回答说，看了他戏的资产阶级观众没有不怀有“反叛他所在阶级的”思想。这就是艺术表现一种哲学生活方式的力量。

胡塞尔与现象学方法

尽管由埃德蒙德·胡塞尔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现象学方法以不同的方式被同时期的存在主义者所采用，许多（也许绝大多数）现象学家却并非存在主义者。但所有存在主义者都接受现象学研究方法中最著名和最重要的一点，即任何意识都是对一个并非意识者的意识。换言之，意识的本质就是指向他者。甚至在反思中意识指向自身时，它也像是指向一个“他者”。这被称作意向性原则。在这个情境中，“意向的”与“故意的”无关。意向是关于我们精神行为独特性的术语：这些行为超越自身而指向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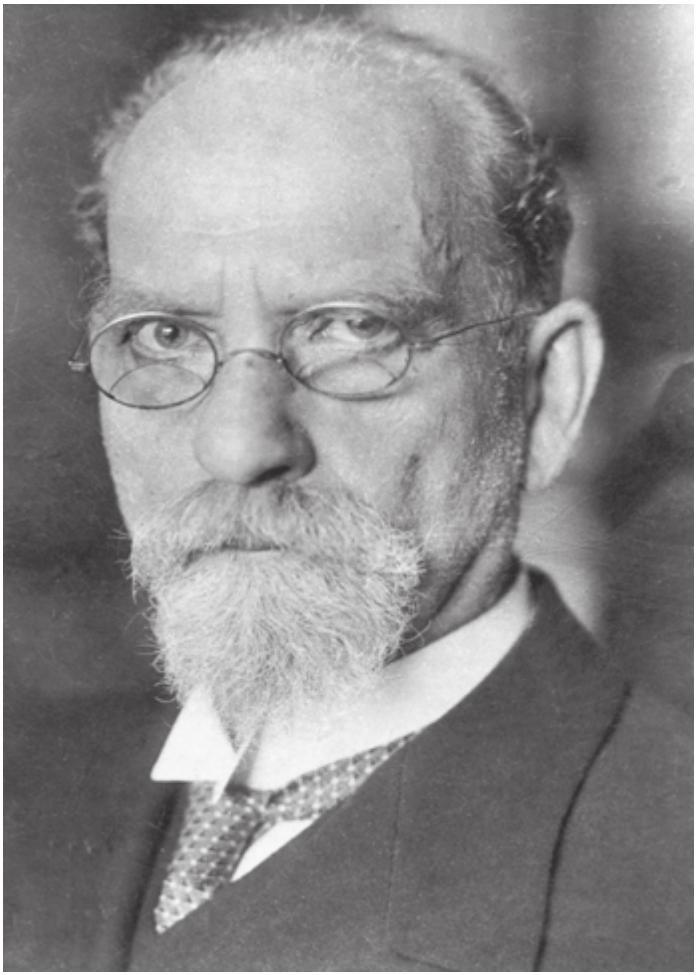

图3　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运动的奠基者

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

出生于捷克共和国的普罗斯尼兹，在转向哲学之前获得过数学博士学位。他于1901年至1916年执教于德国哥廷根，从1916年起直至1928年退休一直执教于弗莱堡。作为现象学的奠基者，胡塞尔在20世纪的欧洲哲学中起着开创者的作用。马丁·海德格尔是他最著名的弟子，后来接替了他在弗莱堡大学的职位。胡塞尔是犹

太人后裔，晚年因纳粹主义兴起而受到迫害。当他在弗莱堡去世后，其比利时牧师朋友就把他的遗孀和手稿带到了鲁汶大学，从而使其手稿免遭纳粹毁坏。

这个原则有两方面的意义。它克服了头脑“中”的“观念”和这些观念所代表的外部世界之间的“沟通”问题。我们没有“第三只眼睛”来对头脑中的一切与外部世界的一切作比较，以此来确认，我们确实知道外部世界。这个问题是近代哲学之父勒内·笛卡儿（1596—1650）及其追随者的遗产。在力求摆脱怀疑、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笛卡儿得出结论说，他只能确信一件事，即他是一个思者，因为怀疑是一种思维形式。这似乎证明了他凭直觉所作的断言：“我思故我在”。但为这来之不易的确定性付出的代价却过大，因为它使笛卡儿陷入自我思想中而不能自拔，面临着“沟通”内部实在和外部实在之间鸿沟的问题。他如何能把这个确定性拓展到“外部”世界呢？

根据意向性原则，这就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对意识来说不存在内部/外部。每一个意识行为都“意向”（意向性地相关于）一个早已在世界中的对象。例如，随着我们知觉、设想、想象或回忆这些对象，或和这些对象有情感上的关联，我们“意向”这些对象的方式将有所不同。但在每一种情形中，有意识都是一种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

例如，想一想我们头脑中的意象。如同萨特在其早期研究中指出的那样，意象并不是“头脑中”将被投射到外部世界的缩影。这就再次提出了内部与外部之间对应符合的问题。意象意识是一种使得我们的知觉世界“变得不真实”的方法，这种方法向仔细谨慎的现象学描述表明了它的明确特征。例如，如果我们想象一个先前知觉到的苹果，经验的仔细描述就会揭示出，想象一个苹果如何不同于知觉同一个苹果。首先，不同于被知觉的苹果，被想象的苹果只具有那些我们选择后给出的特征。这样的想象并没有教给我们什么。我们其他的意识行为也是如此。每一种意识行为都向现象学描述揭示了其独特的特征。

但由于意识以这样不同的方式去“意向”其对象，所以我们可以使

用“本质还原”或“范例的自由想象变换”[10] 这样的现象学方法来勾勒这些各种各样的意识经验的轮廓，理解其本质。以各种“给予性”的模式而对“被给予”意识的一切作严密描述的这种想象性任务就是存在主义者在展开他们的具体论证时所采用的。如同胡塞尔曾指出的，现象学方法的要点并不是（通过发现原因）去说明而是（通过描述本质或可理解的轮廓）让我们去审视。

考虑下面几个例子。法医艺术家会勾勒出罪犯的画像好让证人去鉴别。随着她添加或删除画像的某些方面，证人会觉得画得像，也可能会觉得不像，直至她最后改得恰到好处，证人就会说“对，是他；他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本质还原描述的一个极其平常的类比，它使用了范例的自由想象变换来达至一种洞见，立时抓住意向对象。

让我们把取自于萨特《存在与虚无》中著名的现象学“论证”当作第二个本质还原的例子，这个论证本身没有什么技术性。一个偷窥者透过钥匙孔在偷看一对夫妇时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在同一个行为中，他体验到他的身体被另一个意识“对象化”。他愈发显得尴尬，脸发红。他的这两种表现等同于一种双重论证，既表明了他人的存在（一个古老的哲学谜语），又表明了他的身体易于以一种他所不能加以控制的方式被对象化。即使偷窥者弄错了（声音在开着的窗子前面，由风吹窗帘发出的），这种经验也仍然远为直接地、并且比任何来自于类推更加肯定地证明了我们对他人思想的信念，这是标准的经验论者的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本质还原”的力量所在。它捕捉到了作为主体、而并非简单地作为对象的另一个主体的经验的本质或可理解的轮廓。

这些来自于现象学描述或范例的自由想象变换的论证的有力之处和潜在的弱点，在于这些论证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一直所说的“可理解的轮廓”上。这直接抓住了胡塞尔所说的“事物本身”。它类似于数学或逻辑证明结束时的“兴奋”体验（胡塞尔是数学博士）。假定是，如果描述愈来愈严密，探究者就将自行审视。当然，潜在的弱点是，在回应“我看不明白”这样的宣称时，现象学家只能回答，“那看得更仔细

些吧”。但实际上，我们通常能抓住要点；我们成功地通过大量变换而看到不变的“本质”。这样通过举例的论证，不仅向存在主义者提供了他正在探寻的具体推理方法，而且还几乎希望将这种方法表现在富于想象力的文学作品、电影和剧本之中。

我在前面提到，许多现象学家并非存在主义者，反之亦然：虽然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接受了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因为这个概念为他们的描述方法打开了一个较为宽广的领域，但他们拒斥胡塞尔后来思想的另一个特征，因为它与存在主义所关注的一切相冲突，即胡塞尔的“悬置”生存的设想。胡塞尔谈论自然态度，这种态度是前哲学的态度和素朴的态度，因为它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日常经验的真实世界。在努力使现象学成为一门与哲学本身相同义的严密科学时，胡塞尔坚持认为，人们应该悬置自然态度的素朴实在论，抛弃或者悬置现象学描述对象的生存或存在问题。胡塞尔把这称作“现象学还原”或悬置，并认为它能避免自然态度易于导致的怀疑性异议。胡塞尔承认，人们可以在自然态度中实施一种“本质还原”，并达到一种“本质”心理学。但胡塞尔后来又论证说，这会使得“你描述的一切在现实世界中有效吗”这个怀疑性问题得不到解决。胡塞尔的要点是，假如你产生了这个额外的还原，并悬置了你探究对象的“存在问题”（撇开了它们是“在现实中”还是仅仅“在头脑中”存在的这个问题），你就消除了怀疑论者对你能凭你的描述达至“实在”的怀疑。现象学还原的要点是使一切都对现象学家有利，除了 “被还原”对象的存在（现在被称作“现象”的存在）。当你悬置了存在问题，你就保留了先前所有的经验及其各自的对象（知觉、意象、记忆和其他东西），但现在你是作为意识相对物（即现象）来保留。在某种意义上，你具有与在自然态度中相同的音调，但主音不同。预防了怀疑论的质疑——自古希腊以来，这种质疑曾是一种推动哲学发展的否定性力量——你现在就能对任何现象进行严格的描述分析了。种种描述本身能区分出一个被知觉的苹果与一个仅被想象出的苹果之间的差异。这似乎是把哲学怀疑论者加以边缘化，并确保我们对世界有一种确定知识的巧妙方法。这就是胡塞尔的梦想。

存在主义者提出两个理由来反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首先，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使我们与世界的基本关系具有理论性，而非实践性，似乎我们天生就是理论家，后来才学习实践。胡塞尔的学生马丁·海德格尔与此相反，他强调，我们通过我们的实践关切而原初地“在世”，并且哲学应该分析这种“前理论的”意识以便达至存在。同样，如同我们所看到的，萨特坚持认为所有知识都是“介入的”。梅洛-庞蒂谈到我们身体的某种“操作性的意向性”〔11〕，这种身体先于我们反思性的概念化而与世界发生相互作用。甚至胡塞尔晚年也似乎通过引入作为我们理论反思的前理论基础的“生活世界”这个概念而认同这些论断。

但是，主要的存在主义异议是认为存在本身并不是一个可以还原的“本质”，并且如同梅洛-庞蒂著名的论断所说，“一个完全的（现象学）还原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能“还原掉”现存的“还原者”。现存的个体不止是人们希望在理论概念中加以把握的对他们的“定义”。像萨特所说，存在着“存在现象”，诸如我们的恶心体验，揭示了我们所是和我们所无须所是（我们的“偶然性”）。但是，这样一种体验并非是认知的。这种体验应该是感觉或情感意识的事情——引人入胜的描述和小说的素材。

注释

〔1〕指这种观点的源头并非个人，也非神明，而是“客观的”。

〔2〕伦理学的情感理论认为伦理判断既不陈述非伦理的科学事实，也不表达非科学的伦理事实，而只是对情感作非真非假的表达，类似于“呸”或“呜啦”这样的表达。由此，伦理学的情感理论也被称作“呸/呜啦”理论。

〔3〕许多哲学家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并不清楚是谁最早提出了这个观点；具体含义是指“时间”不是指物理学意义上的可度量的客观时间，而是指具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维度的个性化时间。

〔4〕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890—1947），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受格式塔心理学影响，提出了人类行为“场论”和群体力学，创立了“拓扑心理学”。他认为个体的生命空间包括他的将来、他的现在和他的过去。每个人任何一刻的行动、情感和精神状态，都取决于他总体的时间维度。

〔5〕 ontology一般译为“本体论”，但本书一律译为“存在论”。因为这一概念关注“存在”本身的本质特征。但自17世纪以来，它往往等同于整个形而上学。然而，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存在论应该区别于形而上学，应该追问“存在”的意义，而形而上学遗忘了存在的意义。

〔6〕 畏（anguish, *Angst, l'angoisse*）：意识到一个人的自由是彻底的可能性。这不同于“怕”，“怕”有特定的对象，而“畏”则没有专门的对象。也译为“焦虑”。

〔7〕 克尔凯郭尔明确反对真理符合论（即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而倡导真理主体论，即认为真理就是主体对客观事实的“占有”、“占用”、“拥有”。这个“占用”过程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也就是真理最终归结为主观自身与自身的关系。

〔8〕 在萨特那里，“介入”（committed）指的是作家、哲学家、艺术家等对20世纪社会、政治问题的公开表态和干预。萨特可谓是“介入哲学”和“介入文学”的身体力行者。

〔9〕 这种关系强调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目的与工具的关系，艺术家有道德责任把读者看作具有道德价值的自由主体。

〔10〕 范例的自由想象变换（free imaginative variation of examples）是胡塞尔现象学本质直观的方法，对意识中各种状态所作的本质直观，既要纯粹地非感性地审视某一时间点的现象，又要通过自由想象、变换各种例子来反省直观到的现象，从中找出贯穿于各种情况的不变本质。

〔11〕 操作性的意向性（operative intentionality）。如果说在胡塞尔那里，意向性是指意识的意向性，即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那么，在梅洛-庞蒂那里，意向性是指身体的意向性，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我们的身体与其他人、与周围世界发生关联的，并生存于其他人、周围世界之中的。身体的意向性，强调了既非物质也非意识的知觉的首要性，从而成了“操作性的意向性”。

第二章

成为一个个体〔1〕

“任何两个人、任何两种境遇都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彼此衡量。”

“意识到这个事实，就是经历一场危机。”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

存在主义被视为一种“个体主义的”哲学。在第五章中考察存在主义的社会维度时，我们将修正这个观点。但一开始我们应该注意到，对存在主义者来说，成为大众社会中一个有独特个性的个体就是一项成就，而非仅仅是一个出发点。再者，每个存在主义者都会以各自的方式来探讨这个主题。但他们的基本观点就是，现代社会使人远离个体主义而趋向墨守成规。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群众”、尼采直言的“民众”、海德格尔谈论的“常人”、萨特论及的“有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每人的思考、行动、穿着、言谈等都模仿“他人”所为。在列奥·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中，叙述者是墨守成规、钻营功名之人，他一直渴望进入上流社会，经常提到要举止“得体”。说这话时，他甚至要用上流社会爱用的法语表达法“*comme il faut* ”。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个体是我们必须承担并坚持、但也许永远也不能实现的使命。诚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指出的，人类状况受制于时间性，这就要求作为一个个体生存必须始终是动态的和在进行中的，决不应该是静态的和已完成的。作为一个个体生存要依靠外部环境，因而包含着相当的危险。

尼采滔滔不绝地谈论过超乎民众之上的个体的孤独。他力求像苏格拉底那样让自己的个人生活符合自己的学说，但和存在主义者通常的情形一样，尼采的个人生活悲剧性地见证了他追求这种标新立异所要付出的代价。他曾经周游欧洲多年，在一个地方逗留的时间从未超过几个月。他常住在租来的房间里或者寄居在别人家里，身患严重的偏头疼和胃病，通常还不得不自己花钱出版自己的著作，而这些著作在其有生之年并没有很多读者。尼采把自己比作17世纪犹太裔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后者因其离经叛道的观点而被逐出犹太教会。他有一句格言是：“亚里士多德说过，独自生活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

但他忽略了第三类人：哲学家，他必须既是野兽又是神。”尼采坚持认为，哲学家必须违反时下流行的常识，并指出：

> “今日……当只有畜群被尊重时……‘伟大’这个概念就包含了高贵、想要坚持自我、能与众不同、卓尔不群、并且必须独立生活的意思；当哲学家假定‘只要他成为最孤独、最隐匿、最叛离、超越善恶之人，他便会是最伟大之人’时，哲学家就将表露他自己的理想。”

依据这些标准，索伦·克尔凯郭尔可算是尼采式哲学家的典范，尽管后者似乎对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只有粗略的了解。克尔凯郭尔撰写随笔和短文，以个体的名义攻击当时哥本哈根墨守成规的三种最强大的力量，即大众媒介、国家教会和居于统治地位的哲学——黑格尔（1770—1831）哲学。在他看来，大众媒介代替人们思考，教会代替人们信仰，而黑格尔主义则代替人们作出选择，即黑格尔主义在所谓的“辩证”过程中的某个较高级的、具有包容性的观点中“调和了”那些本是个体化的选择。换言之，黑格尔的哲学把具有挑战性的“非此即彼”问题转换成了让人舒服的“两者都是”的问题。虽然是以成为个体的名义，但这些令人不快的观点却使克尔凯郭尔孤立于他的社会，并引起有关当局的强烈反对。确实，据说他喜欢把“单个的人”这个简单的短语当作他的墓志铭。此外，众所周知，克尔凯郭尔还解除了与雷吉娜·奥尔森的婚约，他这一行为看似无情，但实则是因为他不想把他不凡的使命和他随后的单身生活强加给雷吉娜。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那种被尼采颂扬为真正哲人的孤独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如同我们将看到的，克尔凯郭尔理想的信仰骑士也是“超越善恶”的，尽管这和尼采在使用这个著名表述时所要表达的含义有所不同。

克尔凯郭尔的人生阶段理论

对成为个体这个设想所作的最全面的分析出现在两处——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和《人生道路的各阶段》两部书。这两部书都是

他间接沟通法的例证。在每一部书中，使用不同笔名的作者各自讲述了一个故事（实际上是几个故事），旨在使我们明白和检验这些故事在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寓意。这两部书的叙事论证提供了对三个生存领域的完整描述。克尔凯郭尔构想这三个领域是为了追述成为一个个体的历程。虽然一旦这个过程被设想出来，我们就必须进行修改和细致地描绘，但有三个领域（或称阶段）却是明白无误的（审美的、伦理的和宗教的）。每个阶段都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故事作为其典范：唐璜是审美领域的典范，苏格拉底是伦理领域的典范，亚伯拉罕是宗教领域的典范。这些人物给克尔凯郭尔展开来的“论证”增加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情感力量。类似于美术馆的讲解员，克尔凯郭尔经常提到典范，因为他想让我们看到典范如何用具体事例说明讨论中的人物品质。因此，让我们沿着此路而行，在走向个体性的过程中与其文学和历史人物相遇。如同人们对存在主义分析中所预计的那样，每个阶段或领域都将揭示出与时间性的关系，正是这种时间性把这一阶段与其他阶段区分开来。这再次说明，时间具有本质。

在一封致《人生道路的各阶段》读者的信中，其中一个角色“塔西唐兄弟”对人生阶段（或领域）作下述概括时说，也许最好的开始方式就是趋向终结：

> “存在着三个生存领域：审美的、伦理的和宗教的……伦理领域只是一个过渡领域，因而伦理领域的最高表述就是作为否定性活动的忏悔。审美领域是直接性领域，伦理领域是要求性领域（并且这种要求是无限的，以至个体总是无能为力），宗教领域是满足性的领域，但请注意，这并不像一个人填满施舍箱或袋子那样的满足，因为忏悔专门创造了一个无限的空间，并由此而造成了一种宗教矛盾：在水下七万英寻的深处筋疲力尽的同时仍要感到愉悦。”[2]

塔西唐兄弟的分析显然是从“宗教的”角度出发，它低估了伦理领域的稳定性和永久性，似乎我们将要见证的伦理领域的局限性使它不足以应对人生最紧迫的问题，例如，在好人遭遇不幸这种使人愤慨的事情中。萨特从相反的视角宣告，加缪在其小说《鼠疫》中以戏剧化

的手法表现了“恶不能被救赎”。至少这是无神论存在主义者的观点。总之，很清楚，以“存在主义”这个名义探讨的都是具体的、令人困惑的境况下的特定个体。因此，让我们紧紧遵循人生的这三个阶段。

图4　时年41岁的索伦·克尔凯郭尔，他去世的前1年

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

有神论存在主义的先驱，生于哥本哈根，并在此度过了他的一

生。在当地的大学学习神学和黑格尔哲学，与国家教会、大众媒体和黑格尔哲学的捍卫者进行针锋相对的论战。也许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个人职业看作是痛苦而孤独的，他与出身于当地显赫家庭的雷吉娜·奥尔森解除了婚约，后来也一直单身。他出版了大量哲学和神学著作，其中许多是匿名出版的，这些著作以其敏锐的理解力和心理学洞见而闻名于世。

审美阶段

从时间上讲，这是直接性 的领域。可以看到，这个领域涉及的范围极广，从明显的文化平庸直至最高的文化修养都包括在内。生活在这个阶段并且能毕生生活在这个阶段的人都只关注现在，漠视作为忏悔的过去或作为义务的未来。除非是考虑到有益于现在，他们是不会关心过去和未来的，如同我们将在诱惑者约翰 [3] 身上所看到的。克尔凯郭尔被歌剧《唐璜》吸引，这部歌剧讲述了永不悔改的玩弄女性的“唐璜”的故事，莫扎特曾在其最伟大的一部歌剧中为这个不知疲倦的诱惑者的故事配上了音乐。被克尔凯郭尔当作审美领域主要典范的唐璜，只为了当下的感官满足而生活。《人生道路的各阶段》和《非此即彼》中都有他的身影。

《人生道路的各阶段》开头讲的是一个有关“审美”聚会的故事，这次聚会被命名为“*In Vino Veritas*”（这是一个古时的格言，可译为“酒醉吐真言”）。这个名字还是聚会的入会口令。故事滑稽地模仿了柏拉图著名的《会饮篇》（这篇对话讲述了一次讨论爱的宴会的故事）。这两部作品把重点放在宴饮和大醉的赴宴者发表的称颂爱的讲话上。柏拉图笔下的聚会最终关注的焦点在真实持久、有益于灵魂的爱欲，这与感官美带来的短暂的吸引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次名为“酒醉吐真言”的聚会则正是颂扬瞬间即逝的感官美。事实上，无论是聚会最后时刻发出的邀请，还是准备拆除聚会场所的工作人员在聚

会结束时的立即出现，都在强调事件的直接性和偶然性。如同其中一个参与者所说：“要成为好事，就必须立刻办，因为‘立刻’是所有范畴中最神圣的……。”回想一下萨特对那些真正在“欢呼雀跃”的人的分析，这些人徒劳地想把令人愉快的经验浓缩在一个瞬间。

狂欢者们在莫扎特歌剧曲调的伴奏下进入了盛宴大厅。他们的各种发言论及了情爱或男女之间的日常关系。诱惑者约翰作了最后的发言。这个人物是克尔凯郭尔在其早期作品《非此即彼》中引入的。由于他集中体现了审美领域，所以，让我们借助于他在这前一册书中的引言来详细解说这一领域。

克尔凯郭尔审美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人生故事之一“诱惑者日记”详细记述了“诱惑者约翰”的阴谋诡计，他的策略就是模仿嘲弄唐璜的放荡生活。事实上，取自于歌剧的台词充当了故事开头的警句。约翰被16岁的年轻女孩科迪莉亚吸引，他在大街上注意到她的姑母（也是她的监护人）陪伴着她。他后来碰到一个显然也同样为这个女孩着迷的青年男子。约翰以帮他求婚为借口而接近他。在作为这个青年男子的朋友进入女孩家门后，约翰就设法讨女孩姑母的欢心，即使在他迷住这个女孩时也是如此。青年男子不久就不能与约翰一起进出女孩家门了，他现在与其说是约翰的帮手，还不如说是他的累赘。他们之间一系列的信件往来透露了约翰引诱后又抛弃年轻的科迪莉亚的故事。约翰似乎一点也不在乎他给别人造成的痛苦，他只关心“最大的享乐”，在这之后，他诱使科迪莉亚与他解除婚约，这样就可以由她来承担分手的责任。如同约翰所说：“对婚约的诅咒总是在其伦理方面。伦理无论在哲学中还是在人生中都一样令人厌倦……我肯定会安排这件事，使她成为解约者。”无疑，约翰不如唐璜直率，但其目标是一样的：毫无愧疚地始乱终弃。当约翰提出以下规劝时，他就捕捉到了“审美”这个术语以及这个生存领域的巨大模糊性：“以诗化自己来赢得少女的芳心是一门艺术；以诗化自己来让少女忘记自己却是一件杰作。”在某种程度上，审美者也是一个诗人。

伦理阶段

克尔凯郭尔认识到约翰并非道德败坏；他根本不遵守伦理游戏规则。对错的规则并不适用于他的生存领域。每一个考量都旨在当下，即使这个“当下”在于未来，就像诱惑者约翰对科迪莉亚的算计那样。伦理领域的两个明确特征，即作为忏悔的过去和作为义务的未来，在此都无一席之地。存在主义的“承诺”概念也不见于其话语中。忏悔、义务、承诺都属伦理范畴，这些范畴在经历了“跃迁”或“皈依”之后才起作用。这种“跃迁”或“皈依”就是自由选择，因而也是个体化的行为。在我们不久将要详细阐明的步骤中，这个“跃迁”并不是前一阶段自然发展的结果，更不是其必然结果，这和黑格尔式的解读不太一样。克尔凯郭尔似乎相信大多数人毕生都生活在审美领域之中。总之，克尔凯郭尔论证说，唯美主义者不能作出能使他或她成为自我的选择。如同克尔凯郭尔的另一个角色威廉法官 [4] 警告曾在《非此即彼》中强调人生是一场假面舞会的年轻的唯美主义者那样：

> “你难道不知道午夜将至，那时每个人都会摘下面具？……我已看到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一直欺骗别人，以至于最终他们的真正本性不能表现出来……你的本性最终被消解为复多，你真的会成为许多，就像那些不幸的着魔者那样，会成为众多，你因此将会失去人身上最内在和最神圣的东西——人格的统摄力量。你能想到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吗？……[这样一个人]也许会不可思议地卷入远远超越他自身的人生关系中，以至于他几乎不能表现他自身。但是，不能表现自身的人也不能去爱，而不能去爱的人也是最不幸的人。”

这位法官讲清楚了存在主义的主旨，即选择起到了解放和建构自身的作用。在克尔凯郭尔看来，黑格尔哲学强调诸多选择之间的“调和”，并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更综合的阶段或立场，而存在主义思想则强调选择，强调包含着危险、承诺和个体化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位法官用一个非常巧妙的类比提出：

> “设想船长在船必须转向的瞬间。他也许可以说‘我要么这么做，要么那么

做’；但假使他不是一位杰出的航海家，他就会以为船一直像往常一样前行，因此，在这一瞬间他做什么都无关紧要。对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他忘了考虑前行，最终的瞬间就不会再有非此即彼的问题，这并不是因为他已作出了选择，而是因为他忽视了选择，这等于说，别人已替他作了选择，因为他已失去了自我。”

这是存在主义给我们上的一课，它让我们认识到整个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没有选择本身也是一种选择，我们同样要对此负责。萨特直言不讳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对人类现实（即人类）来说，生存就是选择，不再选择就是不再生存。当他补充说，对人类而言，生存就是选择一个人自身时，他其实就呼应了克尔凯郭尔关于选择与构建自身关系的论述。

法官向年轻的唯美主义者提供的基本“选择”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构建标准的选择。就像他说明的那样：“我面对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首先并不是指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而是指人们据以选择善恶或排除善恶这样的选择。”换言之，它构成了“参与游戏”的决定，道德上的善和恶这些范畴都在这种游戏中运作。对克尔凯郭尔来说，道德的明确特征就是道德规则的普遍性和非例外性。克尔凯郭尔所倡导的、源于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伦理观认为，不道德的本质在于你要其他每个人都遵守规则，而唯独把你当作一个例外。正如康德指出的那样，我们会撒谎、骗人或偷盗的唯一理由就是其他人不会这么做。这话的意思并不单单是说，这样一种选择于社会有害（功利主义者就这么认为。他们坚持，如果行为对大多数人有利，那就是正确的），而是把这种行为推而广之（即希望每个人都撒谎、骗人或偷盗）在实际上完全不可能。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撒谎，那就无人可信，因而撒谎也就不可能了。这也暗示，这种行为将使规则遵守者沦为规则破坏者实现其目的的工具。这明显违背每个个体的内在固有的价值——典型的存在主义观点。我们正在探讨像十诫或“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样一组规则，但这些规则是用非宗教术语表述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像苏格拉底和罗马执政官布鲁图斯（其子因犯叛国罪而被判处

死刑，布鲁图斯并没有赦免他的儿子，尽管他完全有权这么做）那样公正和正直，而不知这其实是《圣经》的律令。实际上，甚至在判决不公时苏格拉底仍遵守雅典人的法律，这就使他成为伦理领域的典范：苏格拉底并不认为自己在一般规则之上，尽管这样会对他造成伤害。克尔凯郭尔把这些个体称作“悲剧英雄”，但又补充说，不同于亚伯拉罕，“悲剧英雄仍处在伦理领域之内”。

宗教阶段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信仰的“跃迁”是进入宗教领域的前提，同时也是个体化的最高形式。在此，操作性的范畴既不是审美领域中的苦乐，也不是伦理领域中的善恶，而是罪和恩，其代表人物是亚伯拉罕。在《创世记》的故事中，他准备献出自己唯一的儿子，以服从上帝的命令，尽管上帝允诺这位老人是“许多部落”的先祖。这一奇事的时间维度就是这一“无限”运动开始的“瞬间”。在回应只向亚伯拉罕一人发出的圣令时，伦理范畴就被悬置了。在此意义上，宗教阶段行为的动机不能被总结为是伦理阶段的要求。换言之，宗教个体是“超越善恶的”（用尼采的话来说），并因此被看作是在不道德地行事。用伦理领域的话说，亚伯拉罕无法用语言来向妻子解释他的古怪行为。他既不能依靠一般原则的确定性，也不能指望普遍理性的帮助。他孤身一人面对上帝——完美无缺的个体。亚伯拉罕以最极端的方式拒绝这种无名的慰藉（他“生存”）。随着他迈出超越伦理领域的这一步，他体验到了对自由的“畏”，他甚至也知道这一命令既背离一般的道德原则，而且还可能不是出自上帝的旨意。宗教个体高于普遍概念。从宗教观点看，“诱惑”逆转了这个关系，它使伦理的/普遍的成为绝对的，并要求去做“道德”的事情，违背上帝的律令。这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跃迁”。

有人提出，克尔凯郭尔对这个圣经故事的解释无意中导致了与尼采式的和萨特式的存在主义有关的“境遇伦理学”[5]的产生。除了以

经验法则作出判断外，这种道德抉择把每一种伦理情形都看作是独一无二和不可比拟的。由此，萨特讨论一个面临两难选择的年轻人，他或者与母亲一起呆在被纳粹占领的法国（他的父亲被怀疑与纳粹私通合作，他的哥哥在1940年德国进攻时阵亡），或者离开法国与自由法国阵线并肩作战。如果他从当事人那里寻求有利于这个或那个决定的建议，那么，他实际上早已作出了他的选择。但萨特敢说："你是自由的，因此选择吧——即创造吧。"像他所解释的那样："没有任何普遍的道德规则能向你表明你应该做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迹被允诺。天主教徒会答复说，'不，确有神迹！'很好，但每次仍必须由我自身来解释神迹。""道德创造性"的危险和成就是存在主义著述的一个基本论题，这在尼采、萨特和德·波伏娃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毫无疑问，克尔凯郭尔并不认为一个人应该拒斥伦理。他确实把亚伯拉罕的行为看作是"对伦理的目的论悬置"，而非抛弃。暂时搁置伦理领域是为了更高的目的，即忠实于上帝的指令。随着亚伯拉罕从他献出自己儿子以撒的山上下来（天使凝视着他的手，指出亚伯拉罕已通过了无条件信仰上帝的考验），他就回到了伦理领域，但他已有所改变。他现在知道这并不是没有例外的，他对戒律和规则的遵行是基于一种更高的忠诚之上。总之，像克尔凯郭尔总结的，个体高于全体。标准的道德规则不再绝对，不再要求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则。

这就产生了这些领域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生统一性的问题。在谈论人生审美领域中的"消散"（即人生的支离破碎和骄奢淫侈）这一问题时，这位法官劝告年轻的唯美主义者："[在你目前的状态中]你不能爱，因为爱意味着献出自我，而你并无自我可以献出。"这位法官在谈及这些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似乎暗示，人生的意义取决于对这三个领域的整合："如果你做不到把审美、伦理和宗教看作三大盟友，如果你并不知道如何去保持不同事物在这些不同领域中的不同表面现象的统一性，那么，人生就缺乏意义，人就必须承认你正确地坚持了你所珍爱的、并能用来说明一切事物的理论，'做或是不做——你都将后悔'。"至少在唯美主义者那里，除了这样一种综合之外似乎还

有另一个选择，即怀疑主义或虚无主义，或两者都是。

图5　亚伯拉罕正要献祭他的儿子以撒

克尔凯郭尔有关这些阶段或领域的论述并不完全一致。一方面，他强调使一个人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个体化选择显然是每个步骤的核心。在跃迁发生之后，似乎就不能完全回到先前的领域。一个人一旦选择参与伦理活动，就不能重新考虑并毫无保留地返回到纯粹的审美领域。你失去了你的纯真，只能作为不道德的人来继续享乐。以此类推，已实现宗教信仰跃迁的孤独个体一旦退回到纯粹的审美甚或伦理领域（似乎没有体验到各领域的界域）就必定招致“罪孽”的惩罚。虽然克尔凯郭尔有时把“罪孽”和道德败坏混为一谈，但它还是属于宗教范畴。可是，如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把这些领域看作“三大盟友”这样的观点或者意味着黑格尔式的“综合”（被压抑的复归），或者意味着“重叠”，这个重叠与领域的景象而非阶段的景象相呼应。无论在哪种情形中，个体化“选择”的主导性论

题都被严重破坏。诚然，像克尔凯郭尔使用笔名（或尼采使用讽喻，甚或柏拉图使用对话）这样的间接交往的优点之一，就是人们不用在表述中寻求前后的连贯性。诚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存在主义者珍视模糊性。但再次重申，存在主义者并不是非理性主义者。只要在这个充满偶然性的世界上有可以被理解的意义，他们就总是试图从这样一个世界中理解这些意义。

有自由但并非一切人的自由：尼采

即使这些思想家对自由这个基本术语的确切意义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存在主义确是一种自由哲学。尼采就是其中之一，人们都知道尼采否认自由意志观及其所行使的道德选择。他设想把人类带回到现实中，远离那些有关超验和永恒的幻想。这一设想使尼采转向人类生存的生物学维度、生存的非理性本能和冲动：虽然他对形而上学采取敌对态度，但他所说的“强力意志”（尽管人们常将它与选择和支配联系在一起）确是回答了“最终有什么？”这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就其宇宙学意义而言，强力意志是推动宇宙的力量；从生物学上来理解，强力意志就是驱动生物领域内不可抗拒的生命推动力；从心理学上讲，强力意志就是支配和控制的驱动力。强力意志的“最高”表现就是由自由精神行使的自制力。在尼采看来，自由精神的道德要“优于”民众的宗教伦理。如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哈尔所注意到的，“作为整体的大自然就是强力意志”，它体现在生存的每一个维度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保罗·利科尔把尼采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起列入“怀疑大师”的行列中的原因。每位思想家都怀疑我们对自己行为所作的表面说明。他们宣称，我们行为的真正原因在于别处。就尼采而言，那个最终来源就是强力意志。如同福柯后来以尼采的方式所说，像19世纪早期看似最高尚的致力于刑事改革方面的努力其实最终表达的是更有效地控制人口这样的欲望。

那么，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创造性自由在这样的宇宙中居于何处？

我们在我们自身身上感觉到的以及归之于他人的责任有何基础？这是自由相对于决定论的永恒问题，不过在存在主义这里，这一问题更具戏剧性。在宇宙那里，每一事件都有原因，每个原因都是必然产生的结果（这两个观点有待商榷）。通常理解的存在主义自由宣称有“绝对开端”，但这一“绝对开端”现在似乎没有一席之地。每一事件都有其前件（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前件，这取决于一个人所提出的决定论种类），并且每一个原因都必然产生结果。实际上，根据这一论述，无人能做不同于他们以前所做之事。

尼采坚持认为，自由意志的“谬误”在于相信选择（而非生理学和文化力量）是我们作出赞同和否认的道德判断的基础。尼采表现出一种对心理学的而非存在论解释的偏好。他指出：“我们最为愤慨的邪恶行为基于这样的错误观念之上，即做了伤害我们之事的人拥有自由意志，换句话说，他本来能选择不对我们造成伤害”。假使尼采是对的，那么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容忍。因为，用前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小说家斯塔尔夫人的话说，“理解一切就可以宽恕一切”。虽然这可能是斯宾诺莎及其德国崇拜者的智慧，但这几乎不是民众的常识。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生于德国东部吕采恩镇附近的勒肯村。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以前就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语文学教授，这一直被公认为是他才华出众的表现。由于他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受病痛折磨，他在10年后辞去了教授职位。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在欧洲各地游历，撰写了以尖刻妙语和对生命的执着而著称的散文随笔。作为“审美”存在主义的先驱，他最著名的宣言就是“上帝死了”，意思就是近现代科学已使得对上帝的信仰变得毫无意义。他为自己设定的使命就是要与由这个事件引起的虚无主义进行战斗。在生命的最后10年，他一直备受精神失常之苦。

图6　尼采热切的凝视

但尼采在其有关宗教先知的寓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出了一种“高级”伦理的可能性，这种伦理是基于一种创造价值观的自由和能力。在某种意义上，随着“上帝之死”，即随着犹太-基督教上帝观念的淡漠，“自由人”（尼采的真实个体）夺得原本为上帝所有的特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造肯定生命的道德观和增强生命力的审美价

值观。尼采宣称，“人是一种能评估价值的动物”，高尚的道德价值观和审美价值观在把人的生命变成艺术品的规划中融为一体。高尚与美的这种融合能把我们从我们自身中解救出来，就像古希腊人那样；也就是把我们从因认识到宇宙并不关注我们而感到的绝望中解救出来。对尼采来说，艺术要取代宗教。对萨特哲理小说《恶心》中主角安东·罗克丁来说，艺术就预示着一种像宗教一样的救赎。因此，那些“自由人”似乎可以获得一种自由伦理，他们用耳朵去倾听，有勇气去肯定他们所听到的一切。那些自由人能做别样的事情吗？尼采似乎把这一问题视作是对自由意志的错误信仰而导致的假问题，因此不屑一顾。实际上，如果他们真的是自由人，他们不会做别样的事情，因为这源于他们拥有高贵的出身或恰以这种方式行事的本性。

尼采认为我们当前的犹太-基督教伦理产生于“奴隶”权力意志的发挥。“奴隶们”颠倒或“重估”了“主人”的道德观。在尼采寓言般的论述中，最初的异教领袖赞同一种肯定生命的有关高贵和卑贱的道德观。这些价值观与我们所知的犹太-基督教道德截然相反。尼采假设，因为“怨恨”主人毫无遮掩地运用肯定生命的强力意志，奴隶的牧师们通过隐蔽地运用强力意志，颠覆了主人的价值观，并纳入到他们自己的、今天被我们称之为道德领域内的“善恶”范畴。由此，主人的好与坏（高贵与卑贱）就分别被转化为奴隶的恶与善。主人看作好的，奴隶就谴责为恶，而主人视为卑贱的一切则成了奴隶的谦卑、怜悯之类的“德性”。尼采向“自由精神”灌输一种高级道德，这种道德颠覆了奴隶的价值观，使自私从一种奴隶般的邪恶转变成主人般的美德，等等。这种新（或旧）道德由此超越了犹太-基督教伦理中的善恶，但同时表现了对主人道德中的“好坏”的认同。在主人对强力意志的运用是相对开放和放纵的地方，奴隶对强力意志的运用就是隐蔽的，充满着否定生命的怨恨 。尼采对自由精神宣扬的颠覆行为从根本上再一次肯定了生命。但这只是对少数人而言的。

尼采向那些能接受颠覆行为的人提出一种宿命论学说。对存在主义精神来说，这种宿命论要比刚刚讨论过的决定论更具挑战性。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注定要做我们所做的。尼采把这称作“永恒轮回” [6]

的论题。他认为这个论题得自于我们的选择是有限的而时间是无限的这样一个事实。因此，正像他所理解的那样，凡能发生的定会无数次地再度发生。如果决定论是回溯性的，那么宿命论就是展望性的；它涉及写入生命之书中的一切，而这生命之书的书页尚待翻开。在这种情况下，尼采的建议就是不要被动地放弃，而要像古代斯多葛主义宣扬的那样，要去积极地“爱命运”。我们稍后将讨论加缪版本的这一理论。但是，无论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个理论，还是更加貌似合理地把它看成是要求人们有勇气地谨慎行事的道德律令，像查拉图斯特拉所要求的，“通过一种坚决的意志行为来弥补过去”，都再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自由地”遵循或拒斥尼采的忠告。这是克尔凯郭尔提出的值得重视的一个悖论。

有趣的是，克尔凯郭尔笔下的威廉法官通过诉诸一种心理-社会制约，使他笔下那个不幸的年轻唯美主义者面对某种类似的挑战：

> “对我来说，选择的瞬间非常严肃……因为……存在着危险：在下一个瞬间我可能不再会有同样的力量去选择，早已经历的一些事必定还会经历。认为人可以在某个瞬间使自己一片空白，或严格地说，使个人生命的进程突然中断或完全停止，这样的想法完全是一种错觉。在一个人作出选择之前，人格早已热衷于选择；当选择被推迟时，人格其实在无意识地进行选择，或者选择由包含在人格中的隐秘力量作出。因此，当最终作出选择，人们就发现（除非如同我在前面所说的，人格已被完全挥发掉了），有些事必须反复做，有些必须取消，而这通常是非常困难的。”

在克尔凯郭尔那里，选择是与“自身”相互补偿的，这个“自身”既是由选择构建，又是由选择表现。在此，“人格”更类似于尼采的基础性“本能”，这种“本能”使人作出抉择并充当其缺失的模式。或者也许这样说更恰当，“人格”就像一种习惯那样起作用，这个习惯就是先前那些选择的积淀，存在主义选择的自律可以在这种情形中得到保全。

萨特曾经写过一篇题为“笛卡儿的自由”的文章，萨特在文中发挥了尼采的观点。他说在缺乏对上帝的信仰时，我们应当享有笛卡儿归之于上帝的绝对自由。用现象学的术语说，这意味着整个“世界”（我

们意义的境域）就是我们完全要负起责任的创造。萨特强调，“我们没有借口”。诚如我们所看到的，和尼采一样，萨特主要关注道德价值的创造。但不同于前人尼采，萨特宣称，这些价值都是我们创造性“选择”的结果。相反，尼采似乎认为，受遗传影响，“那些能倾听的人”（即自由人）就能被他的论证力量所触动，而民众却不能理解这种论证力量，或是感觉受到了威胁。如果是这样，尼采就是在赞同一种心理-生物学的决定论（我们必须遵循我们认为是最强有力的论证，并且只有自由精神才能理解肯定生命的动机）。这确实把尼采与萨特和德·波伏娃区分开来了，但诚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并没有把尼采与克尔凯郭尔区分开来。

“考虑到例外的哲学思考”

第一位倡导生存哲学的是德国精神病学家、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尽管他有关尼采的著述颇多，对克尔凯郭尔却所言甚少，但后者可能对他的影响更大。雅斯贝尔斯是第一个把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并列起来的重要思想家。尽管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对上帝的看法相互矛盾，但雅斯贝尔斯仍把他们看作是黑格尔之后19世纪主要的思想家，并且认为，他们的著作更加有效地为20世纪的欧洲思想奠定了基础。1935年随着纳粹政权加紧控制德国的社会和文化，雅斯贝尔斯这位勇敢的反纳粹人士在公开讲演中作了如下发言：“考虑到哲学思考和现实生活的境遇，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阐明了即将发生的灾难，当时无人意识到这个灾难（除非作为瞬间的很快被遗忘的预感），但对他们来说这个灾难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灾难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为了科学知识的纯粹形式而贬低生存 。因并未陷入非理性主义，并且凭着对强力应有的尊重以及对指导我们生活的理性界限的尊重，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批评各种“系统”的论述，像黑格尔对我们神秘、混沌的生存状态所作的论述那样。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向个体言说，向那些有一种能理解和接受他们学说精神的人言说。正是在此意义上，克尔凯郭

尔引证了18世纪德国科学家、讽刺作家乔治·克里斯托弗·利希滕贝格尔的警句："这样的作品是镜子；假如猴子偷偷朝里一看，那么，任何使徒都不能偷偷朝外张望了"。[7]

在雅斯贝尔斯眼中，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这两人都在他们生理和心理的承受力之上追寻诚实、承诺和"本真真理"这样一些价值。他们真的是例外，值得我们钦佩，但不能仿效。雅斯贝尔斯似乎说，没有人必须殉道。像苏格拉底一样，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践行他们学说的本真性、并忍受着由此带来的痛苦。他们的生活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毁灭"。作为一种警示，他们的生活过于离经叛道，我们不应仿效，但他们却是我们应该仿效的德行的典范。这使雅斯贝尔斯从他们的生活中汲取了灵感："从事哲学思考要考虑到例外，但不要成为例外"。

注释

〔1〕 "individual"，源自拉丁文"individuus"，有"不可分的"、"单个"、"个别"、"个体"、"个人"之意。"个体"、"个人"较为中性，而"个人主义"则更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蕴意，译文采用"个体"。

〔2〕 这个比喻是指宗教阶段的满足就好比在水下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所感受到的愉悦，有罪的个体只有依据宗教信仰和宗教意义上的悔意才能得到拯救。

〔3〕 诱惑者约翰（Johannes the Seducer）是处于审美感官阶段的典型代表，他在享受已诱惑到的女性的同时（甚至之前）就在盘算如何抛弃她。享乐主义者只是一堆相互矛盾的情绪、支离破碎的感官自我逃避选择的责任和重负。

〔4〕 威廉法官（Judge William）是《非此即彼》中的人物，克尔凯郭尔借他之口道出存在主义的一般论点：个体的可能性选择是建构自身和解放自身的，个体生活包含着危险、承诺和"非此即彼"的选择。

〔5〕 境遇伦理学（situation ethics）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强调要在具体生存境遇中来探讨善与恶、权利与义务、选择与责任、自由与必然等道德问题，这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伦理学。

〔6〕 "永恒轮回"（eternal recurrence）。尼采认为世界是循环的，每个已经发生的事物都会在一个无限延伸的过程中不断地重现。这是由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到简单的循环过程。尼采弘扬悲剧精神，既反对决定论，也反对宿命论和

目的论。

〔7〕 这是德国讽刺作家利希登堡的著名格言，强调个体的阅读和理解能力。

第三章

人道主义：赞成与反对

我想，英勇和神圣并不真正吸引我。

我所感兴趣的是成为一个人。

阿尔贝·加缪：《鼠疫》

如果当今有人道主义，那它本身就摆脱了幻想，瓦莱里在谈论始终作为我们先决条件的那个人的内心深处存在的微不足道的人时极妙地指明了这个幻想。

莫里斯·梅洛-庞蒂

1945年10月29日，萨特发表了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的公开演讲，该讲演不久就成了存在主义运动的宣言。无论如何，这都是知识界的一件大事。它确实点燃了存在主义运动的火焰，这个运动从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和巴黎歌舞剧场传播到欧洲乃至全世界类似的场所。萨特向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发表的这篇演讲简明扼要地概述了萨特存在主义的显著特征：“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考虑到萨特观点被假定为无神论，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该由个体去创造他们自己的价值，因为宇宙中并不存在他们可据以指导其行为的道德秩序；这种自由本身就是一个人可以追求的终极价值（如萨特所说，“无论选择什么，我首先选择的就是自由”）。阅读过萨特两年前出版的杰作《存在与虚无》的人都能理解这一点。但这本晦涩难懂的长篇巨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畅销书，它就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样，更多的是被引用，而非被阅读。

之所以有必要发表这篇讲演不仅是因为它能使存在主义鸿篇巨著的许多基本观点更容易为普通大众所知，而且它还能回应共产主义者和天主教徒对萨特的批评。萨特的这些主要批评者认为，存在主义这种新哲学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对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社会所感受到的对社会正义的要求完全麻木不仁。换言之，这位存在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言人必须要回应这样一些看法：他的思想是一种精神鸦片，使人陷入自恋，转移了年轻人要担负从法西斯悲剧的废墟中重建一个正义社会这一使命的注意力。假使存在主义未能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和目标明确的社会哲学，那么，它就会丧失大多数公众对它的信

任。

这样一个使命几乎不可能在一个晚上的讲演中完成。这一简短发言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于它试图这样去做。萨特说，除非每个人都自由，否则没有人能真正自由（而不仅仅是《存在与虚无》中所说的个体的抽象自由），萨特诉诸的是康德的普遍原则伦理学（克尔凯郭尔的亚伯拉罕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而把这些普遍原则悬置了起来）。萨特强调，“我在选择时，我是在为一切人选择”。萨特用明显带有康德语气的言辞要求，每个行为者都应该对他自己说：“难道我有权这样行为，使人类都按照我的行为来约束自身吗？”这似乎表达了一种对他人，甚至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这不同于他先前的观点。当萨特断言在每个道德选择中我们都形成了我们想要成为的那类人的形象，并且确实是任何有德之人都应该成为的那类人的形象时，他就引入了另一种伦理原则：“因为实际上，在创造我们想要成为的人时，我们的行为同时也在创造我们认为一个人应该 成为的那类人的形象 ”。不管这些原则对构建一个社会伦理来说多有用，但它们似乎都无法从萨特那时已出版的著述中推导出来。从他随后关于社会存在论（参见第五章）的著作来看，这些评论都具有预见性。但这些旨在使个人主义者免受马克思主义者和宗教批评家批评的评论与整个演讲内容完全不匹配。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萨特的自言自语，“天马行空般地”进行哲学思考。这篇讲演的内容前后不一致，虽说它有助于我们追溯其思想发展历程，但对他本人来说，却是一大累赘。实际上，他曾经公开表示，这是他唯一后悔出版的著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家阅读的似乎正是这篇哲学著述。

在论证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哲学时，萨特认为存在主义把人置于其关注的中心和价值等级的顶点。虽然萨特在这篇讲演中提到了有神论存在主义者，并引雅斯贝尔斯和马塞尔为证，但他们却难以在讲演的主干部分拥有一席之地。相反，萨特坚持认为，终极价值和我们努力的目标应该是增进个人自由，即增进个人具体的选择的可能性。他暗示，不应为了任何“更高的”价值而牺牲创造性自由，无论这种价值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还是宗教信仰者的“上帝”。这和尼

采在《人性，太人性》一书中所说的“自由人”形象相呼应。当萨特强调一个人必须“选择，这便是创造”时，他并不是说要“随意而为”。恰好相反，萨特指的是一种负责任的赞同或反对自由的决定。

加缪赞同萨特和尼采的观点，即不管我们的世界有什么样的意义，它要么是由个人单独创造，要么是由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创造。他认为，这正是我们“畏”的源头：我们渴求由关爱我们的宇宙所赋予的意义，结果却发现宇宙只是一个空洞的天空。面对他所说的这种“荒谬”境遇，我们要做什么？加缪在解释希腊的西西弗斯神话时给了大家一种存在主义的安慰。西西弗斯是一个凡夫俗子，诸神罚他把巨石推上山顶，但巨石又滚落下来，循环往复，永无休止。可是，加缪宣称，当西西弗斯在山脚下重拾巨石时，他却是幸福的。为何说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呢？这是因为西西弗斯超越了他的命运，这不是因为消极的放弃，而是仰仗谨慎的选择 。他由此表明他自身优于没有生命的巨石。用尼采的话说，他已把“已然如此”（他的过去，他境遇的已知事实）转变成了“如我所愿”。

面对这个有关生命终无意义的寓言，加缪劝告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承认并不存在最终的希望。像古代的斯多葛主义者一样，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终有一死，因此必须要限制我们的期望。

人道主义与无意识

萨特人道主义的符咒，为加缪和德·波伏娃所仿效，其含义就是人总能从已经所是的一切中创造新的东西。这样，几乎众所周知的存在主义者的“悲观主义”就包含了一个深切的（即使有限的）希望。这就是加缪《西西弗斯神话》的寓意，尼采的拥抱命运 [1] 也是一样。萨特拒斥弗洛伊德无意识观的主要人道主义后果就是，这样的驱力和力量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和责任。

图7　唯一的希望就是知道没有（终极的）希望

并非所有的存在主义者都如此怀疑无意识。我们发现克尔凯郭尔笔下的威廉法官谈到了无意识的选择和隐秘的力量。鉴于尼采的论断涉及到非理性的本能和驱力，人们可以理解弗洛伊德为什么承认，尼采在几个方面的预见都先于他作出。如果海德格尔被认为漠视精神分析，那么，他仍然在好几个场合应他的好友、瑞士精神分析学家梅纳德·博斯之邀向一组精神分析从业者发表演说。实际上，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发展出一种基于海德格尔概念之上的有影响的精神分析法。梅洛-庞蒂对待无意识的态度似乎模糊不清。确实，他认为对弗洛伊德本人来说，无意识并不是一个论述充分的观念。他相信弗洛伊德的术语接近于其他思想家们所说的“模糊的知觉”或“非反省的知觉”（这样命

名更为恰当），萨特也赞同这个观点。总之，梅洛-庞蒂毕生都尊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即使萨特众所周知的反对意见也受到了质疑。正如他以前的学生和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让-伯特兰·蓬塔利所说，萨特与精神分析相交长达30年，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琢磨不透：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但终有一天他们之间的关系会被重新改写，萨特的著作也会从这种关系的视角被重新阐释。卡尔·雅斯贝尔斯是一位精神病学家，萨特在20世纪20年代帮他把其主要著作《普通心理病理学》翻译成了法文。雅斯贝尔斯讨论了“人类意识无法接近的基础”。

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却引起了他们的愤怒。雅斯贝尔斯像萨特一样批评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即“人是其无意识的傀儡，但当人理解了无意识后，人就会成为他自己的主人”。与此相对照，雅斯贝尔斯反驳道：

> “在基督教长期盛行之后，一个真诚的思想家的自我反省，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那里达到了顶峰，但这种自我反省在精神分析中却退化为对性渴望和典型的儿童经验的发现；这种精神分析通过在众所周知的必然性领域中发现我们熟知的类型，而掩盖了真正的但危险的自我反省。在这种必然性领域中人类生活的低级层面被认为具有一种绝对有效性。”

于是，在这个群体中，只有梅洛-庞蒂表现出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及其由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1901—1981）提出的法国结构主义版本的无意识的强烈兴趣。为了避免人们得出结论说，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的接受与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格格不入，人们就应该注意到尼采式的“自我克制”的可能性。精神分析设法实现这种可能性，而雅斯贝尔斯却质疑这种可能性。对人们期望一个具体的和处于某种社会境遇的行动者能拥有怎样的一种自由这一问题一直就存在着争议。存在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各执己见。

是另一种人道主义吗？

我尚未详细讨论马丁·海德格尔的思想。他的许多追随者甚至坚决主张，这位重要的欧洲哲学家根本不是一位存在主义者。必须承认，海德格尔确实说过，他的兴趣在于存在的意义，而非克尔凯郭尔和萨特所关注的伦理或心理问题。他在其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1927）中设问："存在意味着什么？"他后来的著作极富诗意（虽不能说神秘），致力于消除那些我们文化和个人生活中影响他所说的存在-事件得以发生的障碍。换言之，贯穿其学术生涯，海德格尔都在批评那些专注于本质与生存、原因与结果、主体与客体这些形而上学问题和人性理论的人，他们使我们无法接近存在本身。

在他著名的《致人道主义的信》（1947）中（该信明显是为了答复刚才提到的萨特的讲演），海德格尔批评了传统人道主义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或"被赋予了语言的动物"。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样的想法低估了人，并易于导向某种技术社会。这种技术社会依据生产性来定义人，并依据个人的或社会的功利来评估一切价值。海德格尔认为萨特并没有摆脱这种传统的形而上学及由此而产生的哲学人类学的窠臼。"人"的荣耀（或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意味着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他向存在敞开。人应该能在世上为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发生保留一席之地。在海德格尔后期作品的一个著名表述中，他把人/此在称作"存在的护卫者"。保持敞开、倾听"感召"、关注不为日常琐事困扰的"神圣"的一面都是人的荣耀。海德格尔建议，我们应当"诗意地栖居"，而不是纯粹以实用主义方式行事。如果人们接受这个忠告，那么，后期海德格尔可被看作是在宣扬"真正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强调人最深层的可能性。这就是他在《致人道主义的信》中的观点。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

海德格尔在德国西南山区长大，他从未失去对大自然的热爱或对简单生活的尊重。他受教于布赖斯高的弗莱堡大学，后担任埃德

蒙德·胡塞尔的助手，他的第一部著作《存在与时间》（1927）被他的同事们看作是天才之作。该书引入了一种解释学现象学，这种现象学不同于正统的胡塞尔现象学。在胡塞尔的推荐下，海德格尔接替他担任了弗莱堡大学的哲学教职。人们对海德格尔之后卷入民族社会主义（纳粹）政党的事仍颇有争议，但他作为主要哲学家的名望却不可动摇。

但我们应该补充说，海德格尔的这些看法似乎和存在主义论题以及我们迄今正在讨论的话题并不相关。实际上，早期的海德格尔（即写作《存在与时间》时的作者）用了许多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概念来说明我们如何接近我们早已略知一二的“存在”。他使用了“诠释学的”（或曰解释学的）方法来厘清我们对这个基本概念的模糊认识。海德格尔对这种“前理解”意义的解释凸显出他和存在主义者的关联。尽管我们在最后一章将详细探讨这个话题，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像“畏”（即存在主义的焦虑）和前面讨论过的绽出的时间性这样的概念主要出现在他的早期思想中。我们必死的时间性（即我们的向死而在）这个观念也是如此。认识到和积极接受这一观念可以使我们面对我们不再存在的这一可能性，从而使我们的有限性具体化，使我们向存在的意义敞开。

图8　海德格尔、花园和远处的森林

在《赫尔索格》一书中，小说家索尔·贝洛〔2〕通过摩西·赫尔索格这个人物的反思捕捉到了海德格尔的洞见：

“但这一代人的哲学是什么呢？不是上帝死了，这一论点很久前已经过去了。也许应该说死亡是上帝。这一代人认为——这就是它对思想的思想——忠诚的、

敏感的、脆弱的都不能长久或具有真正的力量。死亡等待这些东西，好比水泥地板在等待落下的电灯泡。易碎的玻璃灯泡随着爆裂就失去了它细小的真空，这就是一切。这就是我们如何彼此讲授形而上学。”

但真正使海德格尔感兴趣的是存在论（对存在的探究）而非形而上学（对用来整理我们思想的终极范畴 [3] 的研究）。我们个人的必死性具有把我们分散在日常关切中的忙碌汇聚起来的力量，具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意义。萨特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主义者把注意力放在了我们必死性的道德和心理层面，而不是它揭示存在意义的力量，这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总之，不管如何描述海德格尔整个的哲学构想，人们都很难否认下面这两点：他对存在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早期著作经得起“存在主义”富有创造性的解读。

创造性自由与创造性忠诚：有神论人道主义

我们看到萨特在他的讲演中简明扼要地提及了有神论存在主义，继而用似乎排除或至少低估上帝信仰的言辞讨论了存在主义。但并非所有的人道主义者都是无神论的。实际上，有神论者以一种类似于海德格尔的方式提出，由于无神论把人仅仅归结为是自然的产物而无内在的价值或终极的希望，因而低估了人的真正价值。再有，最为人关注的还是以后的存在主义者赋予个体的那种自由或自主。无神论者宣称，这种自由是绝对的。他们强调，不管人把上帝看得有多完美，这都是以牺牲人的完美为代价的，神学只是颠倒了的人类学。尼采关于上帝之死的论题导致他提出一种伟大的无神论，人凭着这种无神论不顾宇宙的冷漠，像西西弗斯那样坚定前行。

相反，有神论者则坚持认为，人类的明显特征就是他们并不仅仅是向海德格尔的存在敞开（尽管有人会以含糊的有神论方式来解释海德格尔），也向进行理解和表现关切的上帝敞开。对有神论者来说，自由是真实的，但却是受造之物。他们把世界和我们的生存看作是一

种恩典，鼓励我们充满爱心地回应。我们相应的态度应是马塞尔所说的对这一恩典的“创造性忠诚”。和海德格尔一样，马塞尔拒斥对技术世界的崇拜以及培育了这种技术世界的数学式思维。（海德格尔论证说，技术在当代社会中取得统治地位，大自然和人类被简化为纯粹的“资源”，这些都是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遗忘“存在”和我们控制欲发展的逻辑结果，这一点在尼采的强力意志学说中臻于顶峰。）与加缪拒斥任何终极希望形成鲜明对比。马塞尔关注的焦点恰恰汇聚在人类希望的细微差别上，这个希望与对他者允诺的信任和信仰有关，而与某种非人格力量的可靠保障无关。似乎专为反对加缪的立场，马塞尔强调，从形而上学上讲，唯一真正的希望并不在我们自身，这种希望源于谦逊而非骄傲。

图9　马塞尔，希望哲学家，看上去很慈祥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1889—1973）

巴黎人，终其一生都住在巴黎，他首先把“存在主义者”这个术语用于萨特。因反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论哲学[4]，他想成为一位实在论哲学家。除了享有盛誉的吉福德讲座（该讲座内容以《存在的神秘》〈1950〉为名出版），他的大多数哲学著作，从《形而上学日记》（1927）开始，都具有沉思默想的风格。作为皈依天主教的信徒，他保持了一种很深的宗教情怀。他展现出哲学与想象文学之间的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统一，他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或许最好地体现在他已出版的30多部戏剧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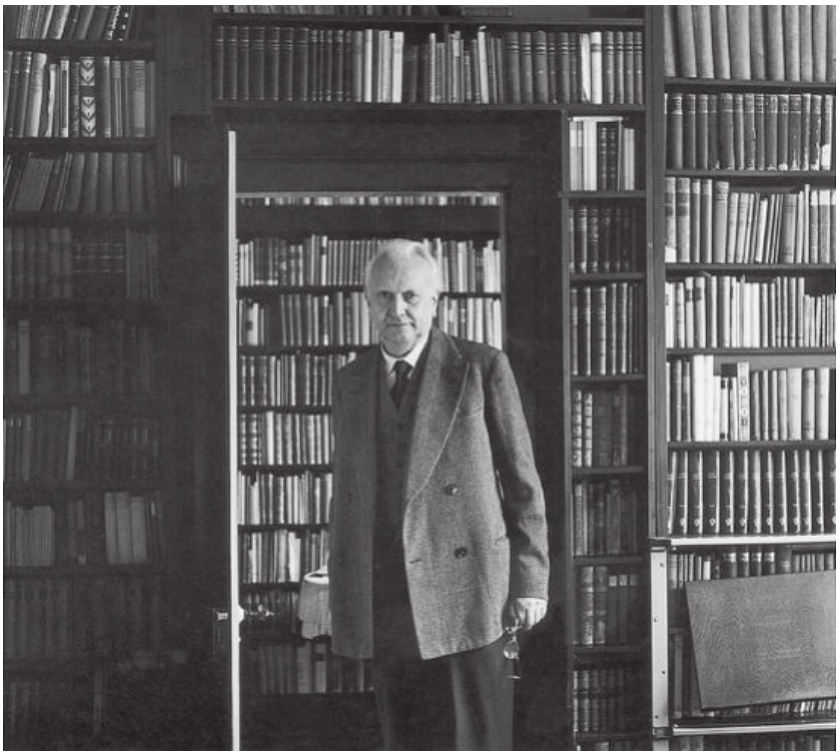

图10　卡尔·雅斯贝尔斯和他的世界

卡尔·雅斯贝尔斯详细阐明了一个名为“哲学信仰”的概念。他说这种信仰既不同于启示宗教的信仰，也不同于无神论。这种信仰包含了一种把“超越性”看作是我们自身生存最深的潜力所在的态度，同时它还表达了我们在“界限境遇”[5]中的有限性体验，这些体验包括痛苦、内疚和死亡。雅斯贝尔斯的作为一种界限境遇的死亡概念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它促使我们去关注一个我们无法概念化的生存维度。以此方式，而不是通过标准的理性论证，我们就间接地接近了超越性。对雅斯贝尔斯来说，超越性就是奠定我们生存基础的绝对他者。像马塞尔一样，雅斯贝尔斯把生存看作是他称之为超越性的不可对象化的存在的赐予；像海德格尔一样，他强调，超越性只向生存展现它自身（生存像海德格尔的“此在”那样起作用，即意指人类存在方式）。只有人类才会思考他们为何生存。这就提出了我们的偶然存在这个典型的存在主义问题。

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

出生于德国奥登堡的富裕家庭，早年学医，他的第一部主要出版物是《普通心理病理学》（1913）。不久后他的兴趣转向哲学，出版了《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并在1921年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职。他第一个把他的探讨称作“生存哲学”。这是一种有神论存在主义，关注像痛苦、内疚和死亡这样的界限境遇。体验这些界限境遇，既能感受我们的有限性，又能体会到他所说的“超越性”或是对我们生存基础的暗示。纳粹认为他“在政治上靠不住”，所以在1937年革去了他的教授一职。

偶然性的体验

为萨特赢得早期名声的著作就是他的哲理小说《恶心》。在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段落中，他笔下的人物安东·罗克丁坐在公园长椅上注视着一株栗树根：

“（这个领悟）它使我透不过气来。我是最近几天才懂得‘生存’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在那儿，我们一群人，笨拙，被我们自己的生存弄得尴尬不已，没有理由在这儿而不在那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茫然地焦躁不安，彼此感到多余。多余是我能在这些树、这些树篱、这些通道之间确立起来的唯一关系。我徒劳地努力数着栗树的数目，或者计算着它们与韦勒达间的距离，或者比较它们与水榆树的高度；它们中的每一个都逃脱了我为它规定的样式，溢出了这个样式或从这个样式中退缩了。而我也身处在这些树中，卑微地、懒洋洋地、令人讨厌地、反复思考着我的想法，我也是多余的。[我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一个人。]幸运的是，我并未感觉到这一点，我只是理解这一点，但我感到不适，因为我害怕感觉到它……我模糊地想到要杀死我自己，至少杀死某个多余的生存物。但我的死亡——我的身体，我的鲜血倾泻在这片沙砾上，在这些植物中间，在这个欢快的公园中——也将是多余的。我永生永世都是多余的。”

同索尔·贝洛对“落下的电灯泡”的描述一样，这段想象性的描述在好几个方面都构成了一种存在主义的“论证”，同时也展现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想象性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段描述既没有证明也没有解释什么，但它使我们通过他人的感受间接地去体验，去审视（像胡塞尔说的那样）；这就是说它阐明了一种我们得以共鸣的经验：“是的，它就是如此”。在目前的情形中，这个体验是关于我们自身偶然性的体验，关于我们所是以及我们不必如是的这样一个纯事实性的体验。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事实并不是指，如果我们的父母不曾相遇，“我们”就不会在这儿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相反，各种类型的存在主义者诉诸这个在哲学上反复出现的洞见，这种洞见确定了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是“那样”之间的区别，并强调了我们对非必然性的体验。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呢？

正是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维度才使存在主义者认真应对我们纯粹这样存在的事实。正是对“我们为何生存？”、“为何存在着什么而不是

什么都不存在？”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才把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区分开来。罗素等哲学家否认了这是个有意义的问题。和这些哲学家不同，存在主义者，无论是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都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加缪要求我们充分利用荒谬的境遇。萨特会同意罗克丁的说法，我们的生存仅是一个无情的事实，我们都是多余的。他们两人都赞同萨特剧本《密室》中西西弗斯的最后台词，“好吧，让我们继续下去吧”。[6] 我们并不因为不存在终极希望就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西西弗斯的智慧就在于他并没有把石头放那儿原地不动，而是推动石头！这就是鼓励去追寻有限的但可及的善——就像古代的斯多葛主义者那样。

对超出我们力所能及之事的希望就是在质疑我们的基本价值或限制我们的可能性吗？有神论者专注于使人在希望和梦想中超越自身局限的内在动力。在谈论萨特小说的这个段落时，马塞尔说道：

>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体验是真实无疑的；对这一点所作的说明必须先于对萨特人类学所作的任何分析，我会毫不迟疑地说，这一点就其本身而言似乎是我所无法辩驳的。我们的问题——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是要把什么价值归于它。”

我们的生存仅是一个我们必须应对的无情事实，还是一份我们应怀着感恩的心而接受的馈赠呢？马塞尔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萨特体验到的树根以及他自身生存的有形性“不是存在的过剩，而是一种基本的和荒谬的存在”。相反，马塞尔体验到的却是存在的一种奇妙的丰盈，一个有趣的古代柏拉图原则的例证。这一原则认为，善就像爱，渴望被传播，就像美的体验，要求被分享。

人道主义与自由（梅洛-庞蒂）

萨特的讲演影响甚大，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在这场争论中，萨特的朋友、志同道合的哲学家梅洛-庞蒂发表了一篇名为“对存在主义

的战斗”的文章，这篇文章为这场争论奠定了人道主义的基调。他认为，问题“是要知道自由起了什么作用，我们能否赋予它一些东西，同时又不把一切东西都赋予它”。这个冷静的评论清楚地总结了争论的问题：人类在物质和文化世界中的适当位置是什么？存在主义反对唯物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存在主义坚持认为，人类不只是物理、心理和社会力量的总和。这个“不只”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凭借意识就能评估和回应这些力量。但存在主义者也反对“唯灵论者”，认为他们是宗教左派。就像我们今天常说的，存在主义者强调我们的处境性，这种处境性始于我们的具体化[7]，而这种具体化赋予了我们一种视角，并挫败了任何想把我们的生存挥发为在世上盘旋的自由飘浮的精神的企图。如同梅洛-庞蒂强调的（马塞尔也赞同）那样，我并不拥有身体，我就是我的身体。存在主义者设法在这些极端之间理解人的生存。梅洛-庞蒂解释道：

> “这个新哲学的优点恰恰是设法在生存这个观念中寻找一个思考我们境况的方式。就‘生存’一词的现代意义来说，它是这样一种运动，人通过这种运动而处于世上，并使自身涉入一个物质的和社会的境遇之中，这种境遇随后成为人观察世界的视角。”

像笛卡儿哲学那样的古典哲学主要是通过知识来把我们与世界关联起来。我们看到存在主义者如何拒斥胡塞尔在其现象学方法中对这个笛卡儿偏见的延续。存在主义宣称，我们通过一种存在关系而处于世上，在这个关系中，具有悖论意味的是，通过某种交流，主体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境遇。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处于世上，最初是通过其实际关切，而不是通过理论来认知。梅洛-庞蒂通过强调我们身体的首要地位来解释这一点。

虽然梅洛-庞蒂在晚年会超越存在主义，但这一超越因他在53岁时的突然离世而被迫中断。他对存在主义思想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仔细分析了我们身体的存在和社会生存的“世界间性”[8]，萨特早年虽说没完全忽视这个概念，但似乎是低估了它。梅洛-庞蒂在实验心理学上

的早期工作使他不同于大多数存在主义者。除雅斯贝尔斯外，多数存在主义者似乎都对经验科学不感兴趣。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那样，因从当时新近出现的结构语言学那里得到灵感，梅洛-庞蒂逐渐把语言当作他思考的焦点。如果说这种转变并没有取代他过时的现象学描述，那至少也丰富了它。

注释

〔1〕 拥抱命运（amor fati），也译为“爱命运”，这是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尼采把“命运之爱”看作个体最内在的本性，人类所具有的伟大之处。

〔2〕 索尔·贝洛（Saul Bellow），美国当代犹太作家，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多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赫尔索格是他的小说《赫尔索格》中的一名犹太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命运的关系，阐发了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异化的成因和心灵回归的路径。

〔3〕 终极范畴（ultimate categories），或译“最高范畴”，这些范畴主要涉及超越感官知觉的内在实在，不同哲学家对内在实在有不同理解。

〔4〕 观念论哲学（idealist philosophy），或译为“唯心论哲学”。这是一种极其重视抽象观念的研究，强调抽象观念是知识的真实对象，主张观念先于物体，观念是事物存在的依据。

〔5〕 鉴于“痛苦”、“内疚”和“死亡”这些都不是正常的境遇，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界限境遇”或“极限境遇”。

〔6〕 这是萨特剧本《密室》中的最后一句台词，出自加尔散之口。在萨特看来，“他人即地狱”，冲突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永远是这样无谓地维持下去的。此前两句的台词是，剧中人物艾丝黛尔大笑着说：“永远在一起，我的上帝，这多么滑稽！永远在一起！”加尔散看着艾丝黛尔和伊内丝也笑着说：“永远在一起！”加尔散最后一句台词就是继续相互冲突下去的意思。

〔7〕 具体化（embodiedness），强调个体所处境遇的存在主义，同时也就高度重视具体、有形，重视意识的知觉和形体问题。

〔8〕 世界间性（interworld），也可译为“世界之间”，强调的是不同世界的共同特征、交互作用和沟通意向。

第四章

本真性

本真性的选择似乎是一个道德 抉择。

让-保罗·萨特

对存在主义者来说，伦理方面的考量至关重要。萨特在加缪去世之际写道，加缪继承了有漫长历史传统的道德家的遗产，这些道德家的著作也许构成了法国文学中最具创造性的一切。当萨特这么评价加缪时，可能也是在说他自己。在萨特看来，加缪坚定的人道主义再次肯定了道德事实的存在，以此来反对他那个时代奉行机会主义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和缺乏道德感的“现实主义者”。

无论我们考察克尔凯郭尔还是尼采，海德格尔还是雅斯贝尔斯，萨特还是德·波伏娃，马塞尔还是加缪，他们每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关注“道德事实”。这一事实就是，我们肩负众多义务，拥有很多价值观，这些义务和价值观并不是一系列有关世界客观事实的逻辑结论。用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先前引入的另一个有关义务的论断（至少不言明地被引入），那么任何有关事实的论断都不能用来证明一个有关义务的论断。例如，如果你的结论是某人不应杀人，你提出的禁止杀人的理由中至少有一个必定是谋杀属于不应为之之事。人们可能会推断说，谋杀是有预谋地、不正当地谋害他人性命，是人们不应做出的不正当行为。即使将不应杀人的理由列出长长的清单，但单子上的某处必定是一条命令或禁令，这就把这张纯粹描述事实的单子变成了一张契约。如同那个已被人说了千百遍的观点所总结的：“应该有怎样”的道德价值或道德义务不能仅仅通过勾连非道德词项、描述事实“是怎样”得来。[1] 对于尼采的问题“为何要有道德？”（克尔凯郭尔的唯美主义者也提出过这个问题），人们不能给出像“它会使你幸福”这样与道德无涉的回答。当宣称道德自身就是其目的时，这样一种回答会使道德变成他物的工具，在上述情形中，道德就是幸福的工具。克尔凯郭尔的“悲剧英雄”不会幸福，罗马执政官布鲁图斯在判处有罪的儿子死刑时大概也不会感到幸福。这通常被称作道德王国的“自律”。存在主义者继承的就是康德

遗产的一部分——当然，他们各自的继承方式有所不同。

就萨特而言，故事的道德寓意就是，每一故事始终有其道德寓意。我们回想一下，萨特曾经坦诚地说道，他的使命就是要让资产阶级感到内疚自责。这并不是因为萨特是一个爱指手画脚的说教者。相反，萨特坚持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承认我们现在全心投入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克尔凯郭尔笔下的船长在船按照当时航向继续航行时，对是否要转向一直犹豫不决。和这个船长一样，我们也被要求要勇于承认我们作出的定义自身的选择；要使这些选择成为我们自己的选择，并通过承认我们的所是[2]而成为我们自己。这是尼采的“成为你所是的人”这个要求的一种形式。这是一件体验有关我们自身、有关我们作为人类所处状况真相的事情。在萨特看来，非本真的人活在谎言之中。

有关我们境况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如何体验这个真相？诚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尽管明显包含事实的成分在里面，但本真的人所要体验的这个真相却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的方式。在这方面，它类似于克尔凯郭尔的主观真理，作为占用的真理，作为“使之成为自己的”这样的真理，其重点在“如何”上，而不在“什么”上。但不同于那种有关客观不确定性的主观真理，萨特的本真性基于人类状况的一个事实性真理之上，即便这种本真性包含了个人打算以自己的方式实践未来不确定性的意愿。

但提到本真性的事实基础，这又让我们回到了人道主义的基本问题：人类是什么？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把我们与自然中的其他一切区分开来？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传统的回答不同，在他看来，传统的回答低估了我们人类。不过，正是海德格尔给出了“本真性”（德语的*Eigentlich*，也译为“真实的”，从词源上讲应译为“自己的”或“本己的”）一词的专门用法，不久后这就被看成是存在主义的主要贡献。萨特承认他从海德格尔那里借用了这个词。尽管海德格尔强调，“本真性”这个词及其反义词“非本真性”并不具有道德意义，但萨特并不这样认为。另一方面，“真诚”及其反面“不诚”这些相关的表述都是萨特的标志性语言，虽然海德格尔断言它们明显具有道

德意义，萨特却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他们两人都错了，或确切地说，他们二人都不愿承认，不管创造者各自的本意如何，这些术语都能轻易地用于道德领域。

境遇中的存在

既然我们弄清楚了关于我们境遇的存在真相及其伦理意义，我们就从“人类在境遇中生存”这个存在主义的洞见开始讨论。这一洞见不仅意味着我们不是飘荡在物质世界之上的游魂，就像展翅飞跃水面的鸟群那样；在境遇中生存还强调，我们是这个宇宙及包容这个宇宙的文化世界的组成部分。我们虽不及天使，但又胜过机器。境遇是萨特所说的“真实性”[3]和“超越性”的一种模糊混合。“真实性”指的是我们境遇中的已知事实，像我们的种族和国籍、我们的才能和局限、我们要与之打交道的他人以及我们先前的选择。“超越性”（或说是我们意识对已知事实的超越）指的是对我们境遇的接受方式，即我们如何勇敢地面对这个真实性。如果我们从动态的意义上来理解，那么，超越性就有点像意识的“意向性”那样起作用。某些天生身体残疾的人会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应对挑战，而其他人则会被这种伤残压垮。萨特承认，“境遇”这个表述从下述意义上来说是模糊不清的，即人们无法确定境遇中被给予的和发生的一切的确切作用。例如，我未能成为一位外科医生，这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我缺乏知识和身体技巧或我贫困的社会经济条件（真实性），在多大程度又归因于我精神上的懒散和缺乏自律（超越性）？但是，如同西蒙·德·波伏娃所指出的，从一开始，存在主义就把它自身定义为一种模糊性哲学。这些主观的和客观的因素不能被精确地测量和评估。实际上，已知的事实和对这些事实的接受方式的这种模糊性渗入了我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如同亚里士多德警告我们的，去探寻一个比研究主题所能允许的更大的清晰度，那就是一个错误。你在道德问题上不能去追求一种数学的精确性。存在主义者把这一点应用于生命本身。检验生活，以便消除一

切模糊性，这会类似于剪影制作者对一幅印象画的处理方法。梅洛-庞蒂是关于模糊性的杰出哲学家。没有人比他更坚决地强调人类境遇的根本模糊性。

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淹没”在日常世界中必定包含了这两个方面。想到人类生存的根本时间性维度，人们就能把真实性和超越性这种二元区别分别描述为我们绽出的过去和未来。海德格尔是第一个对我们绽出的时间性作出三项区分的，1）作为真实性或“沉沦”的过去（我们不是白板一块地来到世上，而是早已有一个过去）；2）作为“凸显”或“绽出”的未来（我们生活在“未成”和“可能”之中）；3）淹没在我们日常关怀中的现在。

在这三个绽出的维度中，作为可能的未来这个维度最为重要。我们都是“可能”的创造物。正在戒酒的嗜酒者想“过一天算一天”，但即便这样，他们也不能避开未来的幽灵。正如萨特所说，改过自新的赌徒每当接近赌室时，必定会重申其承诺。存在主义的“畏”是我们对作为我们自由之焦点的可能性的体验。过去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人从一座高楼坠下。当他快速经过30层楼时，有人大声喊叫“你在干什么？”，他乐观的答复是“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既富悲剧性又令人好笑的是，这个人忽视了对他的境遇来说至关重要的可能性维度。这种可能性以重力加速度逐步减小。

如同我一开始所说，存在主义者把时间和空间都个人化了。科学的空间和时间，如亚里士多德把时间看作运动的尺度或者爱因斯坦的时空连续体，都是从生存的空间和时间的生活体验中归纳出来的。假如我们没有关于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浩瀚这种原初的未量化的体验，那么，我们就不能从任何东西中归纳出这些科学概念。这些科学概念就不会对我们的生活发生长远的影响。但鉴于海德格尔运用这些体验揭示出存在在其中发生的时间镜域（对海德格尔来说，存在并非是永恒的），而萨特则更直接地想要强调我们对生活中必然充满模糊性的境遇的责任。无论我们的境遇是什么，都总是包含着超越的可能性。如同我们前面所说，萨特人道主义的符咒是，你总是能从你已是的状态中成就某事，因为你始终超越你的真实性。

双焦意识

萨特认为意识是由前反省和反省两个方面组成，这对于他的境遇观念以及因这个观念而成为可能的自欺观念来说很关键。从根本上说，意识指向对象（意向性的），并无掩饰。它不含盲点。当你阅读这些语词时，你就意识到它们的意义在于你正试图理解的一连串论证之中。你前反省地意识到了这个论证。如果某人以“你在干啥？”这样的问题打断了你的阅读，你可以反省地回答说“我正在阅读”。尽管你的意识最初指向你正在理解的论证，但你的反省意识现在却指向主体（“我”）和一个客观事件“在阅读”。萨特的意思是，原初的、前反省的意识只是隐含地（即非位置性地）有自我意识；但却明确地（位置性地）意识到了书中的论证。但主体仍然出现在对客体的明确意识中，尽管似乎是在幕后，否则人们不可能（反省地）回答说“‘我’正在阅读。”[4]

人们在手术前通常都要被全身麻醉，阻塞前反省意识，从而使反省意识得以空置。换言之，对“在手术期间你感觉到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应该是“没有感觉”。并没有有意识的、前反省的“经验”可供病人去反思。正如萨特所说：“对一个对象的位置性意识同时就是对自身的一种非位置性意识。”通过诉诸自我对自身的一种直接的非认知性关系（非位置性的自我意识），萨特断言，我们在每一个意识行为中都始终隐含有“自我”意识，并且这种隐含的自我意识有时会通过随后的反省而凸显出来。这就是我们对先前两个问题答复之间的差异：当我有意识地阅读此书时，我隐含有自我意识；但当我无意识地躺在手术台上时，我甚至连隐含的自我意识都没有。

这一论述既有道德意义，又有认知意义。首先，无需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来强调或遮掩我们有意识的行为，损害我们的责任感。其次，为把握自身的意识，我们能避免无休止的、徒劳无益的对反省的反省。每一个意识行为就其本性来说都具有自我意识，尽管只是一种隐含（即非位置性地）的自我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强调了我们的责任。如同萨特强调的，“我们没有借口”。

如果我们用“知识”来指反省意识，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意识到的要比我们知道的多。就像意志薄弱的节食者，即使（反省地）对自身表示抗议，我们还是前反省地意识到我们想拿第二份食物的意向：“我不该这样做”。萨特后来把这个前反省意识称作“领悟”，并坚持认为我们领悟的要多于我们知道的。这便使他能把一些心理分析术语引入他对人类状况的分析，而不用诉诸无意识。诚如上面所提及的，萨特认为无意识剥夺了我们存在的自由。正是这同一个意识的双焦本性才使得自欺无须借助于无意识而成为可能。

从本质上说，由于我们处于境遇之中，又由于这个境遇就像时间和意识那样流逝和模糊，所以，人类也没有稳定的、永恒的身份。无论我们拥有何种身份，它都要么是由外部强加的（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会使得不诚的一种形式成为可能），要么是由我们不断定义自我的、对存在的筹划和根本的“选择”所维持。这种与我们自我的不协调成为了我们自由的基础，同时也使我们的自欺成为可能。从根本上说，我们是一部创作中的作品，一个撰写中的故事。否认这个事实，就是不诚。

不诚

在萨特的存在主义中，没有一个存在范畴比“不诚”更著名。在日常用语中，“不诚”确实比“诚实”用得更多。这大概是因为，作为一种自欺，“不诚”的适用性更广。海德格尔论证说，我们很大程度上都淹没在日常生活中，忽视了向存在敞开，只是“随波逐流”，即像“常人”那样非本真地生活。海德格尔把这个淹没称作“沉沦”，这明显是暗指《圣经》的原罪观。萨特似乎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我们通常倾向于否认对我们境遇的责任，即生活于不诚之中。这在盛行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尤其如此。萨特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他宣称，《存在与虚无》是对处于异化社会中的个体所作的现象学研究。这些异化社会助长了自欺，这种自欺使我们对由我们实践支持的结构性不

公视而不见。在这些情形中，即使我们坚决声明处于诚意之中，这也是在不诚之中作出的宣称，因为它假定我们可以以石头就是石头这样的方式处于诚意之中，即完全等同于我们自身，并免除责任，而我们始终不只是我们自身，因而没有借口。换言之，我们关于我们所是的一切时间化意识[5]总是超过我们的所是，这使萨特能宣称，无论我们可能是什么，我们都处于“尚未成为”的方式之中。正是由时间化意识引入我们生活之中的这个鸿沟促成了我们的自由，并为我们的责任奠定了基础。也是那个著名的存在主义的“畏”的渊源，把我们对自由的不言明的意识看作纯粹可能性的可能性。

受克尔凯郭尔的启发，存在主义者把畏和怕区分开来。鉴于怕有一个明确的对象，例如，有人害怕从悬崖坠下，而畏则是人意识到他可能会从岩架坠下。这种意识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权作出任何选择，即使我们的选择并不一定能成功。可是，尽管存在主义通常使用抽象语言，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它却旨在成为一种具体的哲学。存在主义所援引的可能性（即便没有特殊对象的可能性）——对自由的纯粹意识——都表示对我境遇中的自由和可能性的意识。诚如萨特所说，“在战争之初主动尽职的新兵也能在某些场合怕死，但通常他是‘对害怕感到害怕’。这就是说面对自身，他心怀着畏。”

不诚的“诚”

在转向讨论不诚的两种基本形式之前，让我们先来关注萨特所说的不诚之“诚”，因为不诚之“诚”既揭示了萨特对“明证性”[6]的极高标准，又是解释不诚的关键，这种不诚就是满足于“非劝说性[7]的”明证性。简言之，萨特采纳了一种大致可说是现象学式的明证性知识观，这种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对象意识面前的直接呈现。如同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意识的意向性把我们直接置于世上，而我们无须假定，我们心中的观念一定要与“外部”世界中的一切相符。他在“肯定的”与“可能的”之间作出了区分，区分的标准取决于这个对象

是否在一个直接的“自明的”直观中被反省地把握到，比如人们理解数学证明要点的方式或是当场发现自己的配偶和别人私通，或是相反，取决于追寻的对象是否仅由他物来表明存在，就像人们设法证实科学假设或是注意到丈夫衬衫领子上的口红那样。在前一个情形中，我们的对象本身完全在场；在后一个情形中，我们拥有对象的线索或明证性，但对象本身尚不明显，即尚未被证实。萨特的论点是，一般来说，信念是基于后一种明证性之上的态度，而知识则要求对事物本身作直接的把握——确实，这对知识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如果把范围限定在可靠的明证性之内，那么从认知意义上说，这种信念就是“善的”，但如果事先以不充分的明证性为依据，那就是“不诚”的信念。他宣称，不诚就是一个人自发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选定非劝说性的明证性。例如，一旦某人“已爱上”某个特定的人，此人就会搜集明证性来支持他的“决定”，并且（尽管是前反省地）有意向性地忽视相反的明证性，即使他的朋友们会质疑那个人身上吸引他的地方。如同萨特所作的描述：“在人去睡觉时，人就把自身置于不诚的境地，人在做梦时就处于不诚之中。”但由于前反省意识直视的眼睛[8]，人们就意识到已确定了这个非劝说性的证据。人们对仍处于不诚之中负有责任。

不诚的两种形式

我们对自由有一种“畏”，正是出于对这种“畏”的逃离才激发了我们的不诚。正是人类既具真实性又具超越性的二元性才使不诚成为可能。不诚就是设法否认其中的一极，来逃避两极之间的张力。因此，萨特证明了不诚有两种形式。最常见的形式就是设法把我们的超越性（我们的可能性）瓦解为我们的真实性（我们的先在状况）。实际上，有人通过宣称“我就这样”来逃避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各种决定论就是不诚的这种基本形式的不同理论版本。这些理论否认我们在创造性和存在主义的意义上是自由的，从而

把我们从对自由的“畏”中解救出来。这种类型的不诚就使人甘愿过一种事先被安排好的、没有控制权、因而也无须负责的生活方式。这类不诚有悖于加缪笔下西西弗斯的创造性“选择”和迪伦·托马斯〔9〕给他临终的父亲的建议，后者的建议是：

> 别安然走进那良宵。
> 狂烧，狂烧在光之将逝。

小说家和诗人都强化了行动者的意识和责任。再则，本真性的这些例子都是尼采版本的“已然如此”转化为“如我所愿”。另一方面，不诚的决定论形式提倡麻木地顺从命运。如同我们早些时候所注意到的，这是萨特否认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基础。诚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诉诸我们对自身行为的“前理论的”领悟（这种领悟先于我们明确的、反省的意识），萨特仍然保留了许多“弗洛伊德的”洞见。自欺发生在这个具有张力的意识的“统一性”之中。因为自相矛盾的是，假如人们不在某种基础意义上被分裂，那么，人们就不能对自己“撒谎”；可假如人们完全不是被欺之人，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自欺，而只有萨特所说的“愤世嫉俗的谎言”。不诚就像意识本身那样自相矛盾。用萨特的话说，不诚是“无知的知，是知的无知”。这发生在同一个隐蔽自我意识的统一性之中。

超越性（可能性）瓦解的另一种情况就是让另一主体来决定我们力图遵循的“身份”的不诚态度。这种情况植根于我们的人际关系中，用萨特的话说就是“为他人而在”。萨特笔下的完美侍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人行动敏捷，举止做作。他急于要客人点菜。上菜时，盘子没端稳，但却装出一副保持好了平衡的样子。萨特注意到，他正刻意在咖啡馆里扮演侍从的角色。他成了一种他人强加给他的形象的奴隶。现在他已将这一形象据为己有。当行动者把其他行动都当作不可想象的而不再考虑，那么，不诚就发生了。他及其整个存在都只“是”侍从，就像石头就只能是石头一样。但他的意识却使这种完全的侍从身份变得不可能。前反省地，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游戏，但反省

地，他仅注意到以这种特殊方式完成工作而选择忽视其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认识到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能解下围裙，放弃这一职业，从而选择承受因不断反思这一设想而产生的畏，这就是诚意的一种形式。但人们通常都避免拥有这样的自由及其包含的畏。

不诚的第二种、不太常见的形式就是急切地想要贬低我们的过去，似乎我们是毫无现实性的纯粹可能性，完全生活在未来之中，没有任何对过去的牵挂。这是梦想家的不诚，詹姆斯·瑟伯笔下的“沃尔特·米蒂”〔10〕就是这样一种人。沃尔特是一个无法与现实世界保持联系、老爱白日做梦的人。任何事情都能使他去幻想他想要成为的英雄，但实际上，他的生活平淡无奇，枯燥乏味。这样说来，那位学生也是在不诚地行动，因为她坚持要当一位脑外科医生，但又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按掉闹钟的按钮，而不起床去上她的化学课。又像前面提到的那位船长一样，这个学生选择了不作选择，这就是说她已（前反省地）选择不当外科医生，但却不（反省地）承认这个事实。她是在自己骗自己。她生活在不诚之中。

不诚的这两种形式都依附于有关人类状况的虚假性，都强调人类状况要么是超越性，要么是真实性。但实际上，真实的人类状况是两者兼而有之，只是含混地结合在一起，那些经受不住在模糊性中生活的人就会发现这个结合使他们紧张不安。但那些接受挑战，生活在这个关于他们状况真相之中的人，就是萨特所说的“本真的”人。

本真地生存

我们谈论了存在主义者成为个体的设想。本真性是存在主义个体的特征。实际上，生存的个体性与本真性似乎是相互蕴含的。人天生就是个体的（在存在主义意义上）和本真的。一个人要真正成为本真的，就要认识到一个人的个体性，反之亦然。生存的“个体性”和“本真性”都是表示有所成就的词语。回避选择的人，甘愿成为人群中的一张脸或者官僚机器中一个齿轮的，就不能成为本真的人。因此，我们

现在可以说按“他人”要求和期望生活的人就是非本真的人。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中，主人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过着非本真的生活。当他最终开始主动接受逼近的死亡而不是顺从地任其发生时，他就成了本真的人。从认识到他人的死亡到承认我的死亡，这样的进步就是迈向本真性的一步。对海德格尔来说，作为可能性的未来的时间维度先于作为真实性的过去的维度，尽管在评估“此在”的本真性时哪个维度都不能被忽视。海德格尔认为，我的向死而在，我必死的时间性，是我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为它是我其他可能性的终结，并且对海德格尔来说，可能性在绽出的时间性的三个维度中最为重要。根据这个观点，非本真性在于通过把我们必死性简化为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一个事件来逃避它。如同伊凡·伊里奇所声明的：

> “他从基斯维特的逻辑学中学到了三段论：‘凯厄斯是一个人，凡人总有一死，所以，凯厄斯也有一死，’对他来说，这种三段论用在凯厄斯身上总是对的，但用在他身上就肯定错了。凯厄斯——抽象的人——会有一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不是凯厄斯，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创造物，不同于其他人……凯厄斯确有一死，他死得其所；但对我而言，小范亚，伊凡·伊里奇，凭着我的全部思想和情感，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绝不应该死。那太可怕了。”

对海德格尔来说，果敢地接受一个人的向死而在，这就把我们散乱的心思集中在存在实现的意义上。这是体验我们偶然性的另一种方式。一旦我们认识到，在时间的某点上我们将不再存在，我们就洞察到了生存所意味着的一切。正如马塞尔所认识到的，即使我们相信个人的不朽，进入那“良宵”也并未免除危险。并且如同摩西·赫尔索格所说，“这就是我们如何彼此讲授形而上学”。

萨特不同于海德格尔之处在于，他把“我的死亡”看作是我体验之外的事情。是的，我可以看到另一个人的死去，并想象我自身在那样的状况之中，但仅此而已。我的死亡是萨特所说的“不可实现之事”，因为它恰好超越了我体验的界限。萨特无疑是从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前270）那里知道这个学说的。但萨特也把本真性与生活的统一性联系在一起。然而，在萨特那里，正是定义自我的选择（或说设想）才把我们的各种关怀融为一体，使我们真诚地接受。

无论我们反省地认识到与否，萨特都认为，根本选择（fundamental Choice，我把选择这个单词大写是为了把它与其他那些被称之为“普通选择”的决定和挑选区分开来，我们是在这个引导生命的大写的选择的指导下作出其他选择的）统领我们生活的意义和方向（法语“*sens* ”一词包含了这两层意思）。在此根本意义上，大写的选择是前反省的。它指的是我们是什么，而不仅仅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具有反省意识，这种意识早已作出了这个大写的选择。它的具体表述就是阐明了这个主题的许多小写的选择（choices）。

萨特强调，我们根本的选择就是对自我同一性的徒劳追求。我们已看到，对同一性的追求与我们并不具有同一性的意识相冲突。不过，我们大多数人行为处事时，似乎表明我们能获得事物的协同性和同一性；我们可以是有意识的事物。他声明，这是神圣但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我们对这种理想的追寻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畏”的非本真的逃离。我们的自由是关于非4同一性的自由。无论我们是什么，是侍从、士兵，还是约会中的女人（举三个他提到的例子），我们都以“异于”它的方式拥有每一种性质；即以一个有意识的主体的方式。如果这些特征中的每一个都在我们自己的眼里或他人的眼里描绘了我们，那么，我们就以超越它们的某种方式维持了这些特征；我们对用来维持这些特征的方式负责。用萨特剧本中的话来说，“我们是被判为自由的”。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人们追求一种安全感，按自己生活中的角色或他人的期望生活（即使他们对被压抑的自由表现出来的畏不能被完全消除），每个人就以符合其境遇真实性的特殊方式阐明各自生存的根本选择。萨特相信，“人类实在”是一个整体，而非松散的集合。再有，我们都是创作之中的故事，而不是仅仅并置在一起的、相互分离的一组事件。正是这个定义生活的根本选择或“设想”才把我们的体验与基于这种选择的其他多种选择统一起来。

那么，通过检视到目前为止表明他们生活的单个的普通选择（英文小写的选择）人们应该能发现与自身保持一致的特殊方法。萨特把这种通过解释普通选择来揭示出根本的方法称作“存在主义的心理分析”。这样的心理分析并不诉诸毁灭自由的无意识，但萨特承认，这种心理分析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弗洛伊德。虽然萨特承认一种“彻底转变”的可能性，人们凭借这个转变就不会去追求自我同一性，而会“选择”实践一种拥有本真自由的痛苦生存，但在人生方向上很少发生这样的根本变化。

无论是否有例外，像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的脚注中所指望的一种本真性伦理学仍然是有可能的。从萨特的视角来探寻这种伦理学细节的人最好还是阅读他死后出版的《伦理摘记》。在该书中能发现萨特敢于为一种他从未作为整体加以阐述的道德哲学提出假说，表明洞见，指出要点。这与《存在与虚无》中坐于咖啡茶几旁的存在主义者大相径庭。这标志着彻底的转向吗？并非如此。相反，这种道德哲学让我们得以一窥存在主义伦理学积极的一面。在早期著作中从现象学角度加以描述的“异化社会”一旦被摧毁，这一面就会表现出来。

存在主义认为，人充满了偶然性，如同罗克丁在《恶心》中所体验到的。这一看法通常用戏剧手法以想象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萨特看来，类似于面对个人必死性的海德格尔主义者或是尼采式的勇敢地欢迎过去的永恒轮回的“自由人”，本真的个体会接受这种偶然性，并充分体验这种偶然性。

一种关于本真性的伦理学

本真性通常被看作一种伦理学的陀螺仪，用来帮助个人在尼采的道德自由下落状态中确定自己的方位。如果本真的人在伦理上“具有创造性”，并且敢于超越伦理安全性的最后灯塔；如果像克尔凯郭尔的亚伯拉罕或者尼采的自由人一样，行动者暂不遵行传统伦理规则（这种伦理规则诉诸一种基于“每个人都这样做那又如何？”[11] 箴言

之上的普遍性），而选择了独一无二的、没有先例的、境遇性的一切，那么，他凭什么说自己参与了伦理活动，并遵守了活动规则呢？似乎这个所谓的道德创造性是虚无主义的借口，或至少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的面具。不过，我们已说过，存在主义者把伦理考量看得至高无上。他们可能提出什么样的伦理学呢？

有人已经提出，从长远来看，存在主义者向我们提出的，与其说是道德内容，不如说是伦理风格 。存在主义者会指导我们如何生活，但诚如德·波伏娃所强调的，他们并不为我们开出道德处方。这一说法有它的道理。尼采确实强调，风格比实体更重要。他把实体当作陈腐的形而上学而摈弃。尼采劝告说，那些能够采纳这一建议的人应使他们的生活成为艺术品。萨特认为，无论艺术还是道德选择都不受制于严格的规则。在此意义上，他把进行道德选择比作构思艺术品。但是，萨特不同于尼采而更接近于克尔凯郭尔，他承认道德判断具有一种“普遍”特征。德·波伏娃指出，“一种模糊的伦理学不会先验地否认分离的存在者能同时相互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个体自由能创制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法律”。实际上，她接着又强调“那个普遍的、绝对目的的重要性，这个目的就是自由本身”。

自由构成了存在主义者的终极价值，恰如本真性构成了他们的首要德行。但如同德·波伏娃所指出的，这并不是一种对一切都无所谓的、空洞的自由（在那里“一切都行”），也不是受规则束缚的“严肃之人”的自由，这种人把他的自由淹没在了社会的专制之下。像尼采一样，波伏娃发现虚无主义源于这样一种严肃精神的失败。随着人们开始拒斥宗教和哲学传统各种严谨的道德范畴，人们最终也拒斥了任何终极价值，这是一个被称为“虚无主义”的立场。但是相反，她提出，那些感受到生存的愉悦并获得其赏赐的人（即那些欣然接受其偶然性的人），会安然度过由尼采“上帝之死”所引发的虚无主义风暴。换言之，存在主义选择的“内容”就是自由本身。通过接受其彻底的偶然性和统一性的缺失，这种自由就会变得具体。再次，无论我现在是什么，我都以尚未成为的方式而存在；即并不局限于我现在是什么，而是有意识地超越自己。

但这难道没有沦为一种纯粹的生活风格吗？凡人们所接受的就是自由地“接受”，这重要吗？如果欣然地接受人的偶然性就意味着一种“本真性”，那么，一个人不也可以成为一个本真的反犹主义者或纳粹分子吗？德·波伏娃认为，个体自由真正要求的是，通过他人自由来拓展自身，以此来追寻一种她所说的“开放的未来”。换言之，当我着手拓展他人自由时，我的自由也会加强，而非减弱。我在第三章中曾提及，萨特认为，个人具体自由的要求就是，个人在选择时要选择他人的自由。波伏娃的观点其实就是对萨特观点的一种发挥。这个具体意义上的“自由”意味着追寻一种他人的“开放的未来”，即实现他人的可能性以及自我可能性的最大化。在这方面，使他人受奴役或受压制，都将是“非本真的”行为，而奴役他人就更是如此，因为如同德·波伏娃所说，自由只有通过他人自由的无限运动才能本真地实现自身。

这样，虽然生存的本真性确实具有一定的内容，即既渴求自身的自由又渴求他人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意义仍须分析。当存在主义者面对具体的有关自由和社会伦理的问题时，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去分析自由。

注释

〔1〕 道德判断说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应该怎样”（ought to be），而事实判断则陈述一个人的行为“是怎样”（is）。

〔2〕 “我们的所是”（what we are），或者“我们所是的样子”；系动词“to be”，本意即为“是”，也译为“存在”。

〔3〕 在萨特那里，“真实性”（facticity）是关涉到一个人或被给予一个人身份的一组自然和社会事实，体现了人类生存的有限性，属于萨特所说的“自在存在”。但这种有限性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自由和筹划，反而是个体作出自由选择的依据。

〔4〕 为克服近现代哲学的主客二分，萨特在《自我的超越》和《存在与虚无》中区分了前反省意识（对对象的直接意识，这是一种非位置性的关系）和反省意识（对意识的意识，这是一种位置性的关系），强调意识是无我的，反对先验自我介入到纯粹意识之中，从而在意识之内超越主客二分。

〔5〕 “时间化意识”（temporalizing consciousness）指的是“在时间关系中

得到确定的意识，凸显的是时间的未来向度”。

〔6〕 “明证性”或“证据”（evidence），作为重要的哲学术语，一般译为“明证性”，原为“明显地看”、“显而易见”的意思，被用来支持或反对某种主张。

〔7〕 萨特把明证性分为“劝说性”（persuasive）和“非劝说性”（non-persuasive）两种，前者指个人从情感上能劝说别人信服的明证性，后者则指不能劝说别人相信的明证性。

〔8〕 因为“前反省的意识”是“关于对象的直接意识，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中介和反省”，所以此处把unblinking eye译为“直视的眼睛”。

〔9〕 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威尔士诗人和作家，出版的诗集有《诗18首》、《诗25首》、《爱情的地图》、《死亡与出路》和《诗集》等。

〔10〕 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1884—1961）在短篇小说《沃尔特·米蒂的隐秘生活》中，成功塑造了整天幻想的人物沃尔特·米蒂（Walter Mitty），他是一位抱有英雄式幻想、严重脱离现实的人。

〔11〕 这是传统伦理学宣称的普遍道德规则，而本真的人拒绝信奉这样的道德箴言，转而诉诸道德境遇中的特殊性。

第五章

一种经受磨炼的个体主义？存在主义与社会思想

在历史中，存在也先于本质。

让-保罗·萨特

独自幸福也许是可耻的。

阿尔贝·加缪，《鼠疫》

当萨特在1945年10月的那个夜晚进入演讲大厅时，他所要面对的是当时广为流传的一种观念，即他新近受到公众关注的哲学只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又一种翻版，这种哲学对打败了欧洲大陆的法西斯主义的同志情谊完全无动于衷。他前一年首版的剧本《密室》的倒数第二行“他人即地狱”常常被引用，这证实了人们的这种质疑。在巴黎解放后，萨特的创作灵感突然爆发，似乎对其本真性伦理学更是孤芳自赏，对不诚的批评更加严厉，但无论是他的本真性伦理学，还是他对不诚的批评，都不探讨紧要的社会问题。这无疑是共产主义和天主教的批评家们对他的看法，在那次讲演中尽显无遗。这些批评家们都明确支持有关社会正义的理论以及实施这些理论的计划（这些理论和计划可能相互矛盾）。不过，我们所说的存在主义传统，尽管强调要成为一个个体，但一直都批评资产阶级社会因循守旧、贪图物质安逸、追求安全、厌恶风险以及缺乏想象力的保守主义。但这就意味着存在主义变成了一种认识到了剥削和压迫，并倡导要终结这些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理论吗？我将通过回顾主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来给出答案。

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论资产阶级文化

我早些时候指出，克尔凯郭尔以抗衡当时丹麦社会正在形成的三种机制（黑格尔哲学、官方教会和大众传媒）而闻名。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用生命来换取概念。他赞同当时丹麦的主流思想，认为应“历史地”理解生命，即在事件发生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能揭示出

这些事件的必然性。但他坚持认为，这样的思辨在现实生活的偶然性面前软弱无力。

如哲学家们所说，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生命，这完全正确。但他们忘了另一个命题，即生命必须面向未来。

（《形而上学日记》，1843）

观念可以被系统化，而生命则不能。克尔凯郭尔嘲笑说，试图依靠抽象的黑格尔哲学来生活就好比把你要洗的衣物送到一家宣称“搞定洗衣”的洗衣店，结果却发现只有洗衣店的招牌待售！

但官方的路德教会也好不到哪儿去。因赞同把圣经的“基督教世界”重新引入到“基督教王国”的设想，克尔凯郭尔把后者等同于一种文化基督教，这种基督教使人自满贪婪，并装出一副关心穷苦者的样子，同时又通过认同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权贵而得益。克尔凯郭尔注意到，国家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官员（神职人员），这些人表面上宣扬基督教，但实际上只关心他们的腰包，还设法阻止人们理解基督教的真意。尽管他的兄弟是牧师，并且克尔凯郭尔本人也曾打算当牧师，但他与众不同的宗教虔诚使他与官方教会格格不入。

接着就是大众传媒。克尔凯郭尔把大众传媒看作是一种使人道德腐化的机制。大众传媒损害了探求真相的勇气，并迎合了公众舆论的形成和那些不想冒险被排除于主流之外的人的观点。克尔凯郭尔为这样的观点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尤其是《海盗》周刊对他的冷嘲热讽。这本周刊的讽刺文章和漫画使克尔凯郭尔成了哥本哈根的笑柄，以至于他都不愿继续在哥本哈根城周围散步，而这原本是他钟爱的运动。

克尔凯郭尔写道，至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对他们来说，道德最重要，甚至比智力都重要；但他们从未感受到那种对伟人和天才的热情，即使这些伟人和天才并非名副其实。他们的道德 规范就是警察张贴的各种布告内容的简要概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成为国家的有用之人，在晚间的俱乐部里高谈阔论；他们从未感受到那种对未知之事、悠远之事的留恋，从未感受到虚无的深度（《形而上学日记》，

1837年7月14日）

尼采也可能发表这些评论。他和克尔凯郭尔两人都称颂毫无保留的真诚，对胆怯和虚伪都极其敏感。他们都提倡苏格拉底那种为求真理甘受迫害的精神。他们的作品也都充满了智慧和激情。

诚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上述大多数的论述都是为了保护“个体”而发表的，这说明了为什么克尔凯郭尔会以精英主义者和不关心政治者而出名。显而易见，他不相信革命和发动革命的暴民。假如他富有幽默感的嘲讽并没有宽容君主制或贵族制，那么，这不应该被看作他有平等主义的倾向。相反，克尔凯郭尔坚持一种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常常掩饰了他的怀疑态度。在此意义上，他的“个体主义”代表了我们设法在存在主义传统中追寻社会良心轨迹的出发点。

但在转而讨论存在主义开始阶段的另一个人物尼采之前，我们应注意到，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精神显然关注穷人和受压迫者的困境，他是从基督教精神这个理想出发来攻击“基督教王国”的。他对教会政治和教会官员所作的批评基于“福音价值观”之上。无论对错，他的批评集中于国家教会在口头上宣扬福音价值观，但在实践中却损害了这些价值观上。但在欧洲革命盛行的那一年（1848年，包括当他在修改下一部书的校样时发生在他书房外的一切革命）克尔凯郭尔似乎更关注内在生活；对倡导对贫困者的仁慈态度的关注要甚于对引发革命行为的社会不公的关注。他认为，从本质上讲，革命年代充满激情，而当代却是“一个理智的、反省的年代，缺乏激情，虽有热血沸腾之时，但却肤浅轻薄，转瞬即逝，万事都谨小慎微，松弛懈怠”。他对这两种时代的对比可算作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批评。他评论道：“与注重行动的革命年代相比，当下的年代是一个追求名声的年代，充斥着各式宣言的年代：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很快就有公众关注。”如果说像这样犀利的言辞把他推向了论战前沿，那他身上的怀疑和机智又把他拉了回来。由此，他强调，他的《爱情作品》中关于“仁慈”的那一章是专门针对共产主义而写。改变心境和个人信仰而非发动社会动乱和政治革命似乎才是他所偏爱的解决措施。

尼采同样不相信“民众”。尼采对政治民主的鄙视与克尔凯郭尔的

并无二致。尼采的态度几乎并不会因为诉诸福音价值观而有所缓和，或者如他所说，发生了转变。他在好几个场合都系统地颠覆了这些福音价值观。例如，尼采认为，与克尔凯郭尔的“仁慈”密切相关的“怜悯”贬低了客体，并因与其主体不相称而被摈弃。实际上，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一样，他们关注的是个体的态度或精神，而不是个体工作的社会经济状况。虽然尼采的“高级类型”是希腊人或像歌德那样代表高雅文化的人物，而克尔凯郭尔的英雄则主要受圣经的启发，但除了顺便提及之外，他们两人都不详细探讨社会责任问题或政治哲学的其他主要话题。像克尔凯郭尔一样，尼采对个体形成的关注要甚于对社会转型的关注。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传统仍须面对19世纪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面对迅速成长的无产阶级，该如何平等分配工业社会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服务。

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共在和民族社会主义的诱惑

尼采目睹了在认识到“上帝之死”时笼罩欧洲社会的虚无主义。如果说尼采是为这种虚无主义的阴霾所困扰，那么，海德格尔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德国知识分子则更关注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起及其领导下的大众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尽管影射更为巧妙，但同样具有威胁的是庸俗的唯物论和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至上论。作为古希腊文化的继承者（这一观点是由18世纪和19世纪德国杰出的古典语文学家和考古学家提出的），德国文化至少在两个层面受到两个方向的攻击。海德格尔在一次讲演中说到，德国文化犹如“在大钳子中被挤压，一边是俄国，另一边是美国”。

尽管个体化力量果断地接受个人的向死而在，但海德格尔把我们的共在看成是此在的一种基本结构。人类在本质上是社会的。我们最初就生（在绽出的时间性的语言中，海德格尔说“被抛入”）在一个文化世界中。在这个文化世界中，我们的共在须和他人的所为一致。我们发展出了一种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自我”和海德格尔所说的一个非

本真的“常人”自身[1]，就像伊凡·伊里奇一样，受制于公众舆论。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个文化世界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传统”，从词源学上讲，这个文化世界是被“传承”下来的，作为我们共同遗产的一部分而被接受。这个传统有助于我们形成一个民族。海德格尔有时在此情况下提到“命运”，并不是指难以理解的命运，而是指客观限制和从我们共同的历史中涌现出的可能性。在存在主义意义上，这些可能性可以被当作本真的或非本真的选择机会。

但在有的历史瞬间会产生一种本真的共在，海德格尔把民族社会主义（纳粹）革命（误）认为是这些历史瞬间中的一个。如同一位我认为公正的传记作者对此争议作出的总结中说到的：

> “时至今日，人们对海德格尔卷入政治之事仍耿耿于怀。出于哲学上的原因，他一度是民族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但他的哲学也使他摆脱了政治舞台。他从他所做的事中吸取了教训，后来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精神易受强力意志诱惑这一问题上。”

尽管存在主义者倾向于不墨守成规，并且如同我们所看到的，海德格尔也强调坚决地实现“我的”向死而在的个体化力量，但“本真的”共在　这个观念却被证明是既诱人又危险的。海德格尔似乎受到了纳粹运动的绝对权力和他可能在教育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会的诱惑。在这方面，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1929—）对海德格尔的看法通常也适用于萨特：通过使个体成为他们哲学关注的焦点，他们忽视了人类生活的主体间性[2]和社会性。尽管这是对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并不准确的评论，但这样的批评仍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证明存在主义也有一套社会哲学的责任落到了倡导本真的个体的人头上。

如果说二战的结束使海德格尔蒙羞，那它却使卡尔·雅斯贝尔斯站在了道德的至高点上。尽管雅斯贝尔斯也相信德国的文化使命是为世界提供在“俄国的鞭子与英美的约定”之外的第三种选择，但他是在一战后发表这个看法的，并且不同于海德格尔，他并没有在纳粹得势时说这话。他以他的大学教授职位为代价抵抗了纳粹的接管，并在二战

结束时发表了一系列演讲，这些演讲稿后来以《德国犯罪问题》为名出版（1947）。他在书中区分了犯罪的形式和责任，以便澄清德国人在这场灾难之后应该如何厘清他们目前的处境。他区分了犯罪的四个范畴：刑事犯罪（违背明确的法律），政治犯罪（面对纳粹政权行动的政治绥靖程度），道德犯罪（在与一个人的伦理共同体进行对话时形成的个人良心的问题），形而上学犯罪（基于人类团结并导致的共同责任，特别是对人们都意识到但并未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抵抗非正义的共同责任）。集体责任的这个意义对存在主义思想来说是全新的，但萨特不久后在与各种剥削性和压迫性的团体和社会进行论战时就探讨了这个问题。几年以后，萨特受这些演讲的启发而撰写了剧本《阿尔托纳的死囚》（1959），这个剧本虽然表面上描绘了德国人对二战的责任，但实际上是一则有关当时在镇压阿尔及利亚革命时法国所犯罪行的寓言。

和萨特一样，二战经历及其后果对雅斯贝尔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存在主义思想持久的伦理关怀表现在雅斯贝尔斯把伦理诉求当作是一种对政治的制约。雅斯贝尔斯与马基雅弗利的“现实主义”无关，这种无涉道德的现实主义宣称，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如果说雅斯贝尔斯曾经对自己的观点还有所怀疑的话，那他与纳粹的交往经历使他确信，伦理确实是政治的制约因素。但原子弹的出现极大地增加了风险成本。虽然雅斯贝尔斯也感觉到有变革制度的需要，但他的观点听上去还是更像克尔凯郭尔。他说，发现新制度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改变我们自身、我们的特性、我们道德政治的意愿。曾经长期以来出现在个人之中的一切，在小群体中有效、但在整个社会中软弱无力的一切，现在都变成了人类继续生存的条件。

在此几年之前，当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发现，我们史无前例地处在一个全人类的自杀已成为可能的境遇之中。有鉴于此，他表达了和雅斯贝尔斯相同的担忧。他强调，如果我们不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根本的选择，并且凭其所思、所做、所是的一切而有助于增加或减轻这样的大规模的自杀，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这种境遇。但他相信，只有在哲学层面上这个选择的存在本性才能被

澄清，这就是他着手去做的。存在主义要求一种社会良心。但存在主义要求的特殊紧迫性回应了他所认为的世界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事实：我们具备了从总体上摧毁已知文明的能力。

尽管雅斯贝尔斯承认，一种普遍性的形式保持不变（即无条件的道德义务），但他并不是以存在主义方式提出另一种伦理规则的。他强调，这个义务的内涵，即我尤其应该做的“什么”，不能从无条件地做某事的义务中推演出来。当然必须行善避恶；我“应该”去尽我的职责。但此时此地我的职责是什么呢？在这个境遇中我应该追寻的善是什么？正如雅斯贝尔斯从实践中认识到的那样，这样的发现和创造既需要伦理行为者有一种勇于献身的精神气质，又需要一种甚于智慧的理性形式。雅斯贝尔斯警告我们，当精神气质在禁令和义务中耗尽自身时，它就成了道德。在此，他的有神论承诺开始起作用：他使我们确信，“隐藏在伦理中的并不仅仅是伦理的”。它是“超越的”，甚至是“神圣的”，但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宗教的，即指启示宗教和制度权威。就像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以各自的方式做到的那样，雅斯贝尔斯也让我们面对道德创造性的风险，但我们是在超越镜域中或者他所说的“无所不包”中面对这种风险的，这种“无所不包”要求我们以对其他人的自由尽到最大责任的方式去实现我们的自由。

大众社会的挑战：马塞尔

尽管雅斯贝尔斯把他的思想称作“生存哲学”，但似乎是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发明了“存在主义者”这个词，并把它用在萨特身上。他喜欢把自己的著作称作“新苏格拉底的”。和苏格拉底一样，马塞尔对他所处的社会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面对强力意志勇敢地捍卫真理，或者说，面对求真意志勇敢地捍卫真理。尼采反对求真意志，认为它是强力意志未被认可的一个形式。

在出版于1951年的《反对大众社会的人》一书中（该书书名集中体现了存在主义的社会批判），马塞尔超越了通常与存在主义者联系

在一起的、对工业社会及其技术产物的新浪漫主义式的蔑视，而探讨了自由、人的特殊性、价值观危机以及伦理本真性这样一些典型的存在主义论题。但在马塞尔手中，每一个论题都明显具有了一种社会性，一方面体现在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中，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唯物主义的批判中。这一批判的基本论点就是要坚决反对他所说的“抽象精神”。例如，这种精神必定体现在我们的宣战和实战中。无论这是攻击敌人（敌人通常被妖魔化，并被冠以侮辱性的称谓），还是发射导弹（人们看不到这给人类带来的影响），人们都无法体验到由自身行动所造成的现实给人带来的痛苦。提倡和平主义的电影《西线无战事》以其修辞力量阐明了这一点，影片的刻画对比了攻击敌人的抽象过程和一战期间堑壕战的具体现实。马塞尔对抽象精神的批判是对追寻一种具体哲学的延续，这种具体哲学吸引了许多哲学家，并在20世纪30年代把萨特引向了现象学。

从政治上讲，马塞尔发现抽象精神在他所说的“大众”狂热中起作用。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当下的政治境遇使大多数人处于受贬抑和被异化的状态中。他们缺乏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感到陌生。这样的结果就是大众不可避免地容易变得狂热：政治宣传对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有一种电击般的强大效果。他宣称，哲学家必须努力构筑一种能把尽可能多的人从这样一个状况中解放出来的社会秩序。

马塞尔继续对“狂热”意识作了一番现象学描述。对马塞尔而言，尼采的“民众”就是大众社会。它的成员可以被训练，但不能被教育。不过，不同于尼采，马塞尔极力主张，可以采取社会和政治步骤来把这些人从他们受贬抑和被异化的状态中“抽离”出来。他的解决措施，用今天的话说，更像是“共产主义的”，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就是说，它支持像古代同业行会体系中的中间群体去调解和控制国家的专制主义倾向。他用的术语是“交心”，这个术语在他的词汇中指享有共同旨趣和关怀的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尊重。“交心”与萨特大致在相同时间所说的“博爱”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解放的基础就是从抽象思维转移到具体思维。从根本上说，

人类处于某种境遇之中，但抽象的人道主义忽视了这一点。萨特在他的人道主义讲演中所说的就是这一点：他坚持认为，假如我们将在具体之中追寻自由而不是在抽象之中梦想自由，那么，我们就必须探讨他人的异化境遇。我们不可能自由，除非他人也得到解放。这就是萨特的讲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所论证的。但正如萨特针对反犹者所言，我们不能直接影响他人的自由；我们必须探讨他们的状况；我们必须改变他们选择的“基础和结构”。马塞尔会赞同萨特，认为这样的基础和结构并不简单是经济的和机械唯物论的。但他会站在雅斯贝尔斯一边，强调人类真正的价值在于他们能够超越现状而向超越敞开。增加这样一种善于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的能力有助于控制现代国家的集权倾向，并开启伦理体系的教条主义。

萨特与加缪论阿尔及利亚战争

萨特宣称自己在二战中应征当兵的经历使他跳出个体主义的局限，并引导他发现了社会。梅洛-庞蒂回忆说，萨特在战前远离政治和历史，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只是在法国解放后的初期萨特才卷入政治。首先，他站在左派的非共产党政治一边，但随着冷战的发展，萨特与以前批评他的法国共产党有了共同的政治和社会关怀。尽管萨特从未加入法共，但他一直与法共保持着爱恨交织的关系，到匈牙利革命（1956）时期，这种关系才开始减弱，至苏联占领布拉格（1962）时，这种积极的关系完全结束了。

萨特认为所有的关系都应该是自愿和平等的。由此说来，萨特本质上是一位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法国人所说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把当权者描述为“我们中的他者”，并对其每一种权力形式都表示怀疑。但他也是一位道德家，这就是说，他的政治介入始终包含一个道德维度。梅洛-庞蒂曾经说过，如果你把压迫行为与剥削的非个人结构区分开来，那么，萨特则始终关注于行为，而不是眼下问题的结构维度。道德责任就体现在行为上。这并不是说萨特忽视了哲

学家路易·阿尔都塞所说的“结构因果性”[3]。萨特并未忽视它。但萨特坚持认为，这些社会结构是先前行为的积淀，并由当下的行为来维系。因此，当他把殖民主义描述成一个“体系”，并说“卑劣行为在体系中”时，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是一种需要压迫行为、并由此而得以维系的剥削结构。换言之，“卑劣行为”并不完全在体系之中。原则上，一个人应该能发现责任方，并说出他们的名字。这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

针对法国介入镇压阿尔及利亚革命这件事，萨特说出了责任方的名字，这使他和他的朋友阿尔贝·加缪发生了冲突。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西班牙人，他在纳粹占领时期的抵抗运动中很活跃。作为抵抗运动秘密报纸《战斗报》的编辑，加缪曾被盖世太保追捕。加缪在哲学上接受的教育不多，他的主要身份是记者和演员。萨特对加缪早期小说《局外人》热情洋溢的评论使他们得以会面，并最终成为了朋友。事实上，萨特想请加缪出演《密室》中的男一号，加缪经考虑后拒绝了这个角色，因为在纳粹占领下的法国需要保持低调。

阿尔贝·加缪（1913—1960）

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父亲是阿尔萨斯人，母亲是西班牙人。他的父亲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寡母在贫困中将他养大成人。在1940年移居巴黎前，他在阿尔及利亚戏剧界和新闻界很活跃。去巴黎后不久就投身于抵抗运动，编辑了秘密报纸《战斗报》。第一部小说《局外人》和文章《西西弗斯的神话》都出版于1942年，这两部作品使他一举成名，并引起让-保罗·萨特的关注。他不久便与存在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死于车祸。

尽管加缪已撰文声援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但他认为，阿拉伯

人不应该被剥夺像教育制度这样的法国公民才享有的福利，因为这一体制能使像他这样的穷青年也摆脱贫困，而这正是他移居宗主国法国的原因之一。他也把革命看作是一种由埃及领导的泛阿拉伯扩张主义的表达方式。在保持现状与彻底革命这两个极端之间，加缪建议双方形成某种结盟。换言之，《反叛》这部作品的作者建议走中间道路。萨特很少表现出温和或妥协，尤其在政治上。他如此强烈地要求支持革命以至于反对他的人群两度在他的寓所投放炸弹。随着萨特进入他后来所说的一个“无涉道德的现实主义”时期，支持他认为有必要的、任何地方的革命，加缪却愈来愈关注政治和社会动乱的伦理层面，反对死刑，并倡导一种和平主义，直至其47岁意外死亡。

图11　阿尔贝·加缪、报纸和城市

萨特密友在萨特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加缪的《反叛》一书，这事终结了加缪与萨特之间的友谊。但决裂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如同我们将在梅洛-庞蒂的情形中所看到的一样，萨特对待政治要

比对待友谊更加严肃。随着政治观点逐渐左倾，萨特疏远了那些政治上逐渐右倾的旧友们。直至1968年学生反抗，萨特一直与法国所谓的“毛主义者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毛主义者与中国很少有关系，而与有“直接民主”理想的典型无政府主义有很大关系。萨特现在能发表题为“共产主义者们害怕革命”这样的文章了。这标志着萨特政治存在主义的极端性。

最近的讨论对加缪在这件事情上的形象有所粉饰。这使他和萨特相比显得更加稳重平和，更少主动与人争论。但在这件事上，他们二人都没有表现出公正或宽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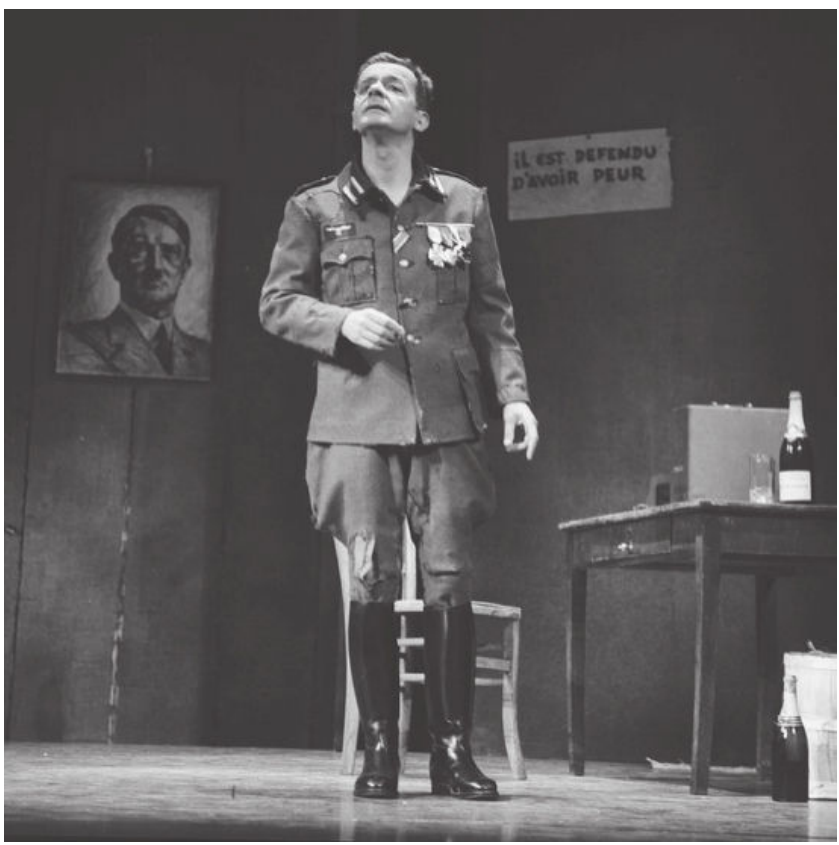

图12　应对战争中的暴行负责的弗朗兹（法兰西）（在萨特的戏剧《阿尔托纳的死囚》中）

萨特和梅洛-庞蒂论共产党

二战刚一结束，莫里斯·梅洛-庞蒂与萨特、西蒙·德·波伏娃和其他人一起创办了一本左倾的批评杂志，取名为《现代》（该刊名取自于萨特非常喜欢的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该杂志不久成了法国存在主义的喉舌，至今仍广为流传。它的第一期（1945年秋）发表了萨特撰写的引言，这一引言成了战后存在主义运动的宣言，并预示了萨特对公共生活的政治介入的哲学原则。这篇引言特别强调了存在主义对个体自主的责任、对个体权利的捍卫以及在追求这些目标时所需要的团结。“完全介入和完全自由，正是自由人必须通过扩展其选择的可能性而获得自由。”萨特在解释该杂志的规划时说：“总之，我们旨在对我们周围的社会做出某些改变。”追寻这些目标所必需的“团结”的本质却是一个问题。

萨特与法共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讨论过。梅洛-庞蒂与法共的关系恰恰相反。虽然从未加入法共，但梅洛-庞蒂对马克思主义表示同情，并著有《人道主义与恐惧》（1947）一书。他在该书中写道，为建立和维护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使用暴力来对付那些欲将其置于死地的敌人是理所应当的。令人好奇的是，这些论证也是萨特后来为了达到相同目的所运用的。那时，梅洛-庞蒂已与萨特决裂，并从积极的政治介入中隐退。但在《现代》创刊的前几年中，他们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同一页上。梅洛-庞蒂在1947年的《现代》杂志上写道：“就其本质来说，政治行动并不单纯，因为它是一个人针对另一个人的行动，是一种集体行动。”翌年，萨特创作了一部名为《脏手》的剧本，提出的也是这一观点。

他们之间闹翻的起因是朝鲜战争。梅洛-庞蒂把中苏对这场战争的干涉看成是典型的苏联帝国主义行为，这与萨特对苏俄干涉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看法如出一辙。他们两人都反对这种干涉，只是在时间上差了16年。尽管梅洛-庞蒂是负责杂志政治版的编辑，但萨特在他不在场而且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美国卷入朝鲜冲突。梅洛-庞蒂辞去了总编职务，并在《辩证法的冒险》

（1955）一书中继续拒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该书以“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主义”为题辛辣地批评了萨特的政治观。西蒙·德·波伏娃同年又在一篇题为“梅洛-庞蒂与伪萨特主义”的文章中以同样方式作了回击，此事才算有了了结。又一次决裂就此完成，文章的标题说明了一切。人们可能把他们之间的决裂看成是一场家庭纷争而不屑一顾（萨特的门生通常被看作是“一家人”），但实际上它却生动表现了法国文坛上发生的一场冷战。这些人物都是舆论的制造者，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媒体上广为传播。就社会良知而言，存在主义已经成熟，它成长的痛苦正表现在小说、剧本和媒体中。

图13　莫里斯·梅洛-庞蒂正在阅读他的笔记

莫里斯·梅洛-庞蒂（1908—1961）

与加缪和萨特一样，他也是幼年丧父，由寡母养大成人。在巴黎高师，他是西蒙·德·波伏娃的同班同学，比萨特晚两届。他早期研习经验心理学，尤其是格式塔心理学。主要著作《知觉现象学》出版于1945年。曾去比利时鲁汶大学研究胡塞尔未出版的手稿，这些手稿在他的思想中很重要，就像随后海德格尔的著作那样。他与萨特、西蒙·德·波伏娃和其他人一起创立了先锋杂志《现代》。53岁时猝死于书桌前。

西蒙·德·波伏娃与存在主义的女权主义

在出版其开创性著作《第二性》（1949）时，西蒙·德·波伏娃就已出名。在这之前她撰写了包括“模糊性伦理学”在内的一些文章，几部小说和一个剧本，同时她还是《现代》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但这部两卷本的《第二性》才是她的主要成就。在随后人们所说的“女权主义”运动中，这部著作也许仍是唯一最重要的哲学文本。

图14　西蒙·德·波伏娃总是在工作

西蒙·德·波伏娃（1908—1986）

和萨特一样，她也是生于巴黎、死于巴黎。也曾和萨特一样在享有盛誉的巴黎高师念书，法国大多数重要的知识分子都毕业于此。她在法国的中学教过书，但却从未在大学执教。作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女性之一，她也是最著名的公众人物之一。在她诸多剧本、小说、哲学论文和多卷本回忆录中，巩固了她的国际声誉并成为女权主义运动奠基文本的著作就是《第二性》（1949）。虽然她与萨特从未结婚，但在成年岁月里却一直彼此相伴。

这部著作的哲学前提就是存在主义的论点，即认为人类是“在境遇中”生存，这个境遇从根本上说是模糊不定的。但我们已看到，她先于萨特详细阐明了我们境遇的社会维度。《第二性》通过强调性别及其社会构造所起的作用，详细阐述了“境遇”这个概念。在书中她写的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而成的”。实际上，性并不是性别。性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而性别则是一种社会建构。她的大部分研究都在探讨“妇女”在历史上如何被建构以及“父权”社会中女性被分派的次要角色。她的基本问题是：“妇女如何变成为人类中的‘他者’？妇女的性如何变成了‘第二’性？”

“永远不变的女性”，这是被她戳穿的神话之一。众所周知，歌德在其《浮士德》中叙述了这一神话，但实际上，永远不变的女性本质这个古老的概念历来是逆来顺受和无比纯洁的典范，这与不言而喻的积极主动的男性本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德·波伏娃强调，这个神话使妇女按一种不切实际的标准行事，忽视了每一个妇女境遇的特殊性。在存在主义意义上，这个神话是假的，因为它不够具体。这个神话和每个妇女的现实生活体验并不相符。波伏娃曾在“模糊性伦理学”一文中表示赞同萨特的观点，认为并不存在人性的看法。她现在强调，也并不存在女性的本质，理由是一样的：存在先于本质，而不是后于本质。她认为，这就要求我们从存在论走向社会学和政治学。

但是，“永远不变的女性”这个神话因为它的矛盾性也使妇女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它把妇女看作母亲和养育者，我们的生命都归因于她，她值得我们充满深情地感激，但它也把妇女看作我们必死性的根源（《圣经》伊甸园中的夏娃），因此也受我们憎恨和咒骂。“妇女的本性被概括为母亲、妻子和理念；这些角色时而融合，时而冲突，每一形式都有其两面性。”德·波伏娃的观点是，由社会构建的一切都能由社会（和政治）拆解，它所导致的对妇女的压迫也能由此得到解除。

我们现在所说的存在主义传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个体解放始终是可能的。但在存在主义运动的社会意识维度中，人们认识到我们不能直接对压迫者或被压迫者的自由采取行动。相反，我们必须着

眼于努力改变我们观察到的、萨特称之为“选择的基础和结构”。这就是德·波伏娃号召采取行动的文本意义所在。它不仅把我们的意识提升到社会问题上，而且还描述了压迫的手段，并以此方式提出了开始纠正这些结构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她的著作攻击了“父权制”的权力结构，并号召人们摧毁这些权力结构。

但正如萨特后来说殖民主义的那样，虽然卑下存在于体制中，但我们不能因为个体只是“像其他人那样”行动而开脱其罪责。一旦人们认识到了人类“境遇”本质上的模糊性（即它是由一种对制约性结构的自由超越所组成这样一个事实），看似具有悖论性的（如果说不仅仅是矛盾的）一切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再有，我们面临着每个人是摧毁还是延续父权制的问题。尤其是，德·波伏娃在《情势的力量》一书中所说的“情势的力量”是一种虽非具有决定性、但却是真实的影响，这就使得诉诸个体的努力成了问题，对许多存在主义者来说也是一样。例如，我们今天会问：“人们如何获得中性的语言？”“一时一词”会是典型的存在主义的答案。不过，这个“唯名论的”探讨方式忽视了情势的力量，即像公共舆论和风俗习惯这样的社会原因的力量在语言形成中起的作用。一旦萨特和德·波伏娃发现了社会，他们就不得不屈服于社会因果性——这种社会因果性是一种丰富了个体行动、但没有把它消解在某种非人性化的集体中的影响力。人们可以生动地把这描述为“存在主义遇到马克思主义，并设法使它人道化”。德·波伏娃尝试在妇女解放事业中做到这一点。当萨特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时，他试图从一个更为广博的视野来解决这个问题。

德·波伏娃通过描绘一幅消除了异化和压迫的社会图景来结束她历时多年的研究，她希望通过必要的社会经济变革来促进这样的社会早日到来，但她同时也说，这还要求自由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合作：

> “该由人在既定的世界中建立起自由王国。为获得最后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必须凭借和经由各自的自然区分，明确地肯定他们的手足之情。”

这个观点非常像萨特在《伦理摘记》中提出的自由行动者之间的

积极交互性 的理想。《伦理摘记》写于同一时期，但直至萨特去世后才出版。他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把这种交互性称作“博爱”。

处于关系中的个体：社会存在主义

很难说存在主义者是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这一点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在萨特谈论“介入”之前很久，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就力图解决他们时代的社会弊病，并且至少在克尔凯郭尔的情形中，这些社会弊病能在局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被发现。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社会大动荡，所谓的“最优秀的”存在主义者遵从查拉图斯特拉的建议，把必然的卷入转变成了一种生存的选择。正如萨特富有争议性地说到的那样，“每个人都有值得参加的战争”，“我们从未像在占领时期那样自由”。他们的“选择”覆盖了这样一个范围：从海德格尔的不幸陷于政治世界到加缪冒死参与抵抗运动。

但如果存在主义运动认可并考虑到了“情势的力量”，那么，它是以为个体自由和责任在社会领域中保留一席之地这样的方式做到这点的。在其《探寻方法》中，萨特提出了存在论的基本观点：只存在个体及个体之间的真实关系。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将继续阐明他对下述问题的理解，即社会团体和制度如何能优于其个体成员的本质而不消解后者的自由和责任。这种自由和责任，在群体活动中被加强，在制度惰性中却被破坏，但从未被完全摧毁。

当梅洛-庞蒂把萨特的人道主义符咒拓展到社会领域时，就已经捕捉到在社会领域中存在主义立场的现实乐观性：

> 人类世界是一个开放的或说是未完成的体系，以矛盾威胁人类世界的彻底偶然性也同样能把人类世界从无序的不可避免性中解救出来，并使我们不对它感到绝望，只要人们记得人类世界的各种机构实际上都是人，它们总是设法维护和拓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注释

〔1〕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的存在就是“在世中存在”，既可以是本真地在世，也可以是非本真地在世，而“常人”就是非本真地在世，即人与他人共在，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个性，没有创造性，缺乏主见，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消极沉沦。

〔2〕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指不同主体和心灵之间具有互动、沟通和传播信息的共同特征。

〔3〕 阿尔都塞认为，因果性只存在于整体内部，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整体结构决定部分结构，但部分结构对整体结构又具有相对自主性。

第六章

21世纪的存在主义

保持向体验的历险敞开。

莫里斯·梅洛-庞蒂

尽管“存在主义”仍是一个常常被提到的术语，萨特也可能是20世纪最被广泛认可的哲学家，但人们还是经常听到存在主义运动终结了这样的说法；存在主义已被相继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和七八十年代的后结构主义思潮所取代。在这之后，随着一批存在主义哲学名流的相继逝世，这场哲学运动终于烟消云散。诚然，作为西方通俗文化的一个现象，存在主义在二战刚结束时就已达到了顶峰。这是巴黎左岸咖啡馆里的“阿帕希”（冒险家）舞、爵士乐的时代。荒诞剧的时代，完全自由的时代。用其法语的表述，这是解放的产物。那时的热情很难维持下去。但它的精神却仍然停留在西方社会的深处，在以后几十年的各种反墨守成规的运动中涌现出来，也许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达到了高潮。

在1968年的学生造反期间，巴黎墙上涂写的标语宣称“想象万能”。这体现了这场学生暴动的自发性、乌托邦希望和最终的徒劳无功。这场运动有时被描述为“萨特革命”。这个表述集中体现了存在主义的主旨，即作为境遇中的存在，我们是可能性的产物，是萨特所说的超越性的产物，或者从时间上讲，是未来的产物。我已经指出，对萨特来说，“超越性”主要指我们想象意识的活动，我们凭借这种意识超越了我们实际所体察到的一切而达至能够或可能被体察到的一切。没有人看到过独角兽，但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这样一种生物存在于自然界中，人们看到的会是什么样子。如同萨特在研究小说家、剧作家让·热内时写道的：“这同一种不足能使人形成意象，使人无法创造存在。”意识，作为存在的缺失或不足（如同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所说的“虚无”），取决于存在，就像我们对独角兽的想象取决于我们感知到的马、角之类的存在。意识不能创造这些东西，但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我们创造性的想象体现了我们人类的特征——自由。

但是，萨特的意识却是介入性的；它并不只是虚无缥缈的幻想。

随着它所追求的自由变得越来越具体，这种介入也变得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如同它所表达的“想象”一样。在萨特理想的“目的之城”中，所有的关系都是平等的（水平面的）和非对象化的，它构成了引导我们进行社会交换的模式。萨特把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赐予-企助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体在交往的同时尊重相互的自由；现在这种关系被看作是本真的社会互动的标准模式。这并不是说萨特陷入了唯美主义（用美来取代善，用艺术来取代道德）。实际上，他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伦理摘记》中用类似的语言论述了本真的爱和友谊——这个观点会使周末聚会的存在主义者感到困惑，因为他们习惯了《存在与虚无》中从施虐狂/受虐狂这样的角度来分析（非本真的）爱。

于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主义可能已经过了它的全盛时期。不过在一种文化意义上，存在主义却在各种在它之后的亚文化中，在我们话语中的畏、不诚、介入、本真性这样一些词汇中留下了踪迹。但在这方面，存在主义仍只能被看作是具有过去时代特征的物事。

但作为一场哲学运动（在它曾经是的程度上），各种形式的存在主义五十多年来在大陆哲学中起着主要作用，并且现在已进入永久的哲学对话之中，它在这种对话中表达了对人类状况持续的道德关怀。换言之，存在主义在我们当下如此盛行的各种形式的决定论、墨守成规、自欺和技术主义中间，继续捍卫着个体自由、责任和本真性。存在主义通常是以一种想象的模式做到这一点的，即使用艺术和事例，用具体的方式来使人理解抽象的原则。这些抽象原则原本可能会被当作不相干的学究之物而摈弃，或是被当作有趣的智性关注之物而敬而远之。存在主义是一种具体哲学，用德·波伏娃的话说，它使萨特去“研究情感”[1]，如同他们昔日的好友雷蒙德·阿隆（1905—1983）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巴黎咖啡馆里向他们提出的对他们面前的鸡尾酒杯作一番现象学描述的可能性。

让我通过举例来讨论目前哲学争论的四个领域。这四个领域是我从其他几个可能的候选领域中选出来的。存在主义者已经或已准备对

这四个领域作出重要贡献。虽然只作了提示性的、并不全面的阐释，但我下面提到的话题却表明，本书所论及的作者和设法以一种真正符合人性的方式来引导生活的当代人密切相关。所谓存在主义“传统”就是把哲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而非纯粹崇尚空谈的游戏。下面我们将看到这个传统如何在不否认英美哲学积极洞见的情况下推动英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回归经验；如何捍卫人类行动来反对抽象结构分析的主宰，同时尊重结构在我们社会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如何阐明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阐释的丰富性，以补充科学和日常生活的因果性解释；如何发展一种能和我们具体的道德体验产生共鸣的责任哲学。

经验与语言

英美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偏离经验、理念和思想体系，而转向分析概念和日常语言，这通常被看作是把所谓的“分析”哲学家与他们的“大陆”同僚们区分开来的变化。事实上，存在主义哲学有它自己的语言学转向，在法国方面，这种转向受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51）去世后出版的著作的启发要大于伯特兰·罗素（1872—1970）或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在德国方面，这种向语言的转向甚至更为明显。

以后期的海德格尔为例。虽然对索绪尔的语言学一无所知，但海德格尔在提到语言时，把它看作是存在之家，并使用“语文学”论证来打破我们语言的日常用法，以揭示出直至那时还被遮蔽的存在。这也是他在早期的“存在主义”著述中的做法。他把“生存”这个词（德语的*Existenz*）分解为拉丁文的ex（意味着“出口”中的“出去”）和动词sistere（站立），使得“生存”（to exist）能被看成是从人群中、从日常状态中、甚至从我们自身（按照萨特的解释）中“凸显”。想想萨特的论断：我们“不只”是我们自身，我们的意识总是超越目前和当下而趋向未来和可能。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从时间上来看，“生存”指尚未完成和作为可能性的未来。按此分析，这个术语让我们注意到时间镜

域，这是传统上永恒的存在得以被理解的基础。海德格尔对古典希腊语所作的某些“语法分析”通常牵强附会，有悖于古典语文学家通常的解读。但这些语法分析却在他设法重新找出对存在的一种原初意识的情境中非常有意义，在他看来，这种存在已被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遮掩和遗忘。提及海德格尔这种研究方式的目的就是要强调海德格尔极其看重的语言，这种语言要比英语世界中的哲学家们的语言更加重要。不过，他并不想把存在之家与其栖居者混淆，无论这两者之间可能有多相关。语言也许是存在之家，我们也许是它的守护者，但不是它的囚徒。

在梅洛-庞蒂那里，也是如此，尤其在他早期对语言所作的现象学探讨中。他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表达、一种姿势形式。他把胡塞尔归之于意识的意向性归之于我们体验的身体。体验这个概念变得更为复杂，包含了我们肉体生存的视角。他强调，语言本身最终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但随着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现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他对语言的理解就发生了变化。

在考察这个变化之前，让我们先来反思一下结构主义语言观的本质以及为什么这种对语言的理解方式与存在主义的理解方式截然相反。有争议的是自由的、负责任的个体的作用，这种个体是存在主义思想的标志。简言之，结构主义并不太重视这种个体。顾名思义，语言学“结构主义”研究的是语言的形式或结构，而不是语言的内容。类似于站在人体前的X光技师，结构主义者设法揭示出语言的基本构造，而不是语言“有血有肉”的实际用途。结构主义者把语言看作符号的系统排列，这些符号既使交流成为可能，同时又限制了交流，很像人体骨骼，既使我们的行动成为可能，又限制了我们的行动方式。但不同于X光线下的骨骼，语言学符号以一种“差异”方式运作，即它们的“意义”取决于它们在相同系统或语言中与其他符号的差异。真正说来，人们并不学习语词，而是学习语言。如果不暗示属于某种自然语言，像英语或斯瓦希里语“语词”甚至不被看作是一个词，而纯粹是一种声音。

对结构主义者来说，语言符号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语词那样

给客观事物“命名”，而是在一组符号的成员之间作出区分。对结构主义者来说，论证的要点是，意义是纯粹的语言学符号，而不是如同现象学家和普通公众所认为的那样，是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就使人们能以科学的方式把关注点集中在沟通的结构和密码上，而不陷入个体有意识的言谈行为的日常模糊性之中。但这种对抽象性和科学性的追求却放弃了生存的、能赋予意义的个体。事实上，结构主义者贬低了构成存在主义哲学和现象学方法核心的意识的作用。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梅洛-庞蒂修正了他早期把语言看作表达这样一种基于意识的理解方式，而赞同一种结构主义所采用的更为形式主义的和有差别的理解方式。他现在宣称，语言“是差别体系，个体通过这个体系来阐明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换言之，语言不再像胡塞尔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被本质还原所直观把握到的意义表达。相反，语言纯粹是基于一个“语言”系统中符号之间的相对差异的语言学现象。

但梅洛-庞蒂仍坚决支持个体自由和责任这些存在主义的价值观，拒绝完全接受结构主义论点：是语言在“讲”我们，而不是我们在讲语言。他区分了由社会经济因素决定 的存在（这是他所否定的）和由社会经济因素引起的存在（这是他所愿意承认的）。这种区分使存在主义价值观能在结构性力量下得以保全。他的观点类似于英美哲学中所谓的“言语行为理论家们”的观点，这些理论家区分了行为和行动，前者是被引起的，是不自由的，而后者有其原因并且适合于讨论其自由和责任。和萨特一样，梅洛-庞蒂对用来解释和引导我们生活意义的社会历史维度越来越敏感，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则倾向于忽视生存和历史，而强调非历史的结构。梅洛-庞蒂把这个特征看作是“知识的历史性”。萨特后来也同意，我们必须学会相对灵活地对现象进行组织和分类。梅洛-庞蒂早已把现象学“意义”解读成被置于历史情境中的意义。如果说这个观点没有向胡塞尔试图避免的相对主义屈服，那也表示了一种对实用主义和历史的认同，这种历史把结构与实践、语言与言语行为置于创造性张力之中。

支撑这个张力的就是梅洛-庞蒂所说的“制度”：

“我们把制度这个概念理解成那些赋予经验以持久性维度的事件，其他经验的整个系列都与这个经验相关而获得其意义，从而形成一个可理解的系列或一段历史，或者那些在我身上积淀了某种意义的事件，并不仅仅作为残留和剩余，而是作为后续的要求，未来的必然性。”

换言之，制度是一组事件，这组事件“构造”了我的经验，而经验又转而修正和改造了这组事件。梅洛-庞蒂认为，索绪尔的“语言”或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的亲属结构是一组封闭的所有可能的组合，但制度并非如此，作为结构的制度是“多样的、复杂的概然性”的图表，“总是与局部情势相关”，并由此向“经验的历险”敞开。这就是存在主义对结构主义论述的改写和贡献。

萨特承认，自己并未发展出一种语言哲学，但他强调，语言哲学的某些要素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对萨特来说，语言是表述的一个现象，超越语词而拓展到非语言表达的符号和姿势。和梅洛-庞蒂一样，萨特认为，语言问题恰恰与身体问题一样：我既不能听见我自己讲话，也不能看见我自己微笑。

从存在论上讲，在《存在与虚无》中，语言属于“为他人而在”的范畴，而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语言则属于“实践-惰性”[2]的领域。但在这两种情形中，萨特都把从一般语言向法语、德语这样的自然语言，接着向方言和俚语，最终向个体言语的转变看作是从抽象到日益具体的转变。处于境遇中的个体的言语行为是最具体的语言现象。在这方面，语言是用来占用世界的一项基本技术，而不是像后结构主义者们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构造世界的手段。这表现了萨特的观点，即“自由是语言法则唯一可能的基础”。结构主义者们会断然否认这种看法。换言之，我们的自由和责任拓展到我们对语词的选择，并进而延伸到我们凭借这些选择加以维持的每一个语言系统（例如，种族主义和主张性别歧视的称谓）。这种理解对我们的表达和沟通这样的具体行为所具有的不言明的道德意义特别敏感，从这点上来说，这是典型的存在主义对语言的理解。但存在主义大大限制了语言所具

有的创造意义的力量，妨碍了所谓的“语言学唯心论”的论断，即否认有外在于和独立于语言的现实，我们对语词的使用被假定为基于这种语言之上。

但这种抽象-具体关系却在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58）中被历史化了。现在，实践（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人类活动）已取代了自为的存在或意识，而实践-惰性（积淀的先前的实践，它既限制又促进了当下的实践，就像自然语言既限制又促进了言语行为那样）已发挥了《存在与虚无》中所说的自在的存在或非意识的功能。不同于自在的存在，实践-惰性是反终结性的场所，是我们实际的决定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例如，砍伐树木以增加耕地的做法可能会因引发洪水而产生相反的效果。萨特以此为例来说明实践-惰性的一种功能，即我们先前的实践反过来损害我们当下的筹划。和以前一样，语言与特殊言谈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抽象对具体的关系。但作为实践-惰性的语言的客观可能性和反终结性却大大明确了在萨特早期立场中有关抽象/具体的相当模糊的对比。就语言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实施了结构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所说的一种“结构因果性”而言，语言的力量就愈加显得重要。实际上，凭借其实践-惰性这个概念，萨特认识到了梅洛-庞蒂所解释的索绪尔语言学的有效性，而同时继续强调在理解语言学现象时个体实践所具有的存在主义首要性。

简要考察存在主义对语言的探讨方式就是要表明，在多大程度上生活经验（德语的*Erlebnis*）或萨特所说的生活体验，而非语言，才构成了他们讨论的基础。语言是重要的，这一点主要是就语言在一种交互的但通常受束缚的关系中去表达或形成经验而言。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的囿于“语言牢笼”这样的威胁对欧洲大陆和英语世界的许多语言唯心论者们来说是一大问题。对存在主义者来说几乎不成问题，这是因为，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意识总是早已“在世中”了。甚至在存在主义者的注意力从意识扩展到生活体验时，正是语言的体验和体验的语言，而非语言本身，才是他们所真正感兴趣的。尽管他们早期对语言的理解主要是工具主义式的，如同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书中，依据各自的介入能力而在诗歌与散文

之间作出的不恰当区分所表示的那样，但梅洛-庞蒂的著作显示，在他去世之际他已超越了某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而趋向一种结构主义的语言观。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也修正了自己的早期论点，把语言学结构和其他结构纳入实践-惰性这个概念之中。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我曾提到，存在主义“运动”因前后相继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流派而显得黯然失色，我们在今天仍能感受到这两股思潮的存在。无论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文学批评家罗兰·巴尔特本人是否认同，人们都普遍把他们看作是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当然，诚如我们在前面部分所看到的，还有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索绪尔在语言学方面的工作为这个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再则，顾名思义，结构主义是对社会现象所作的某种柏拉图式的探讨，以此来探寻那些无意识地指导和限制我们推理过程和实践的客观必然的结构。由此观之，“原始人”的推理过程同现代人的推理过程都具有逻辑性。这个方法区分了以下两者：一是对像一个部落的语言形成规则或亲族规则这样的文化实践进行的非时间性考察，一是文化实践发展的和历史的方面，如这些规则在实践中被运用的具体方式。结构主义者追寻那些能赋予他们各自研究以普遍和科学地位的一般规则时，更为关注现象的非时间性维度。例如，他们的研究表明，“原始”社会中的亲族关系主要是遵循一种（包容和排斥的）二元关系的无意识“逻辑”，这种逻辑事先决定了谁获准与谁结婚，谁又被禁止与谁结婚。再如，在大多数西方司法体系中，堂（表）兄弟姐妹的子女或近亲被禁止通婚。但诚如列维-斯特劳斯所阐明的，在所谓的“原始”社会中，被准允或被禁止的婚姻体系遵循着比禁止近亲婚姻复杂得多的规则。在理想的情况下，这样一些样式或结构能依据结构主义学者所能识别的某些“符码”而得到标绘。以类似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同

样的无意识逻辑在文学作品（巴尔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阿尔都塞）和拉康著名的论断（即无意识“像语言那样被构造”）中起作用。萨特发现拉康的这个表述非常有吸引力，甚至在他继续拒斥无意识这一概念时也是如此。

结构主义者赋予这些社会结构一种客观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并宣称他们的方法是客观和科学的，这也使得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的研究方法完全对立。这也标志着所谓的“去主体中心”的开端。“去主体中心”日后将成为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明确论题。但使得这个方法与存在主义现象学直接针锋相对并引发如此多争论的，就是它公开表示的“反人道主义”。诚如米歇尔·福柯在其一般被认为是结构主义杰作的《词与物》的结尾中所说，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成功表明，一个认识事件在不远的将来会发生，它将突然改变我们目前所说的“知识”的根本结构。他认为，这种突然性类似于把我们现代的以人为中心的理解方式置于显要地位这样的突然性。他推测，如果这一剧变发生的话，那么，“人们肯定可以打赌，人会像画在大海边沙地上的脸那样被抹去”。因为这些结构与柏拉图的普遍理念或形式一样，都不是个体行为者的产物。相反，个体是这些结构的体现者，而非发明者，就好比个体是自己所讲语言的语法规则的体现者，而非发明者一样。存在主义者所关注的负责任的个体在他或她一无所知的非人格结构中沦为了“占位者”。

当然，这引出了行为者和责任在结构主义世界中的意义这个棘手的问题。一个人如何对把他塑造成这类人的社会熏陶负责任？人们在此发现的是在协调个体自由和社会科学过程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就科学法则和原因是必然的而言，它们并没有为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自由留有一席之地。但结构主义者们宣称遵循的恰恰是对社会现象所作的这样一种科学“探讨”，这种探讨即使不是植根于语言本身的“逻辑”之上，也是以这种“逻辑”为模型的。

图15　运用“原始”理性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

我们已看到，梅洛-庞蒂一直在试图协调存在主义的自由和责任这样的价值观和结构语言学的科学方法之间的矛盾，潜在地，也在调和这些价值观和以结构主义方式把这种科学方法应用于法国人所说的人文科学中的矛盾。在作为《辩证理性批判》导言的“探寻方法”一文中，萨特强调，存在主义的使命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再来征服人”。他一心想要去除党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论”（即经济决定论）；但他的批评被证明同样也适用于阿尔都塞和其门徒的较为成熟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风行一时。恰如刚提到的那样，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为“实践-惰性”领域中的结构、结构主义研究以及它所支撑的分析推理留有一个存在论的地位。再则，阿尔都塞的“结构原因”可以置于实践-惰性领域之中，就像列维-斯特劳斯的亲族家谱可以置于其中一样。这是通常被忽视的实践-惰性这个概念的一个主要功能。但正如我们早些时候所说的，即使是和最无情的“必然”的社会结构有关，实践-惰性这个概念也坚决捍卫个体的自由和责任。例如，萨特提出了列维-斯特劳斯的这些亲族结构如何在由于战争或自然灾害而造成人口稀少之时起作用这样的问题。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这些结构并不起作用，不是我们服务于结构，而是结构服务于我们。梅洛-庞蒂把结构解释为“可能之事”，而非“必然之事”，这也保留了生存自由。这再次表现了人道主义的箴言：“你总是能从你所已成为的一切出发来造就某事。”

哲学中所说的“后结构主义”或者文学、艺术和建筑中所说的“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可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这些范畴在他那里是重叠的）所说的“意义的分裂”来表示。恰如原子裂变（分裂或爆裂）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文学的体裁和叙述、形式和风格、有机关系和等级秩序以及物质和自我这些标准的统一体的破裂已产生了多样性和散布性。同样，揭示出了社会和文化关系“逻辑”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被像福柯这样的后结构主义者拆解成了多重合理性。虽然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因为他们的多重真理观及其各自对意愿力量和强力意志的强调而被重新确立为反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但萨特的存在主义却因明言依靠笛卡儿的我思作为哲学推理的出发点而被当作无可救药的现代主义的思想，并遭到抛弃。福柯拒斥萨特时措词异常严厉：“《辩证理性批判》是19世纪的人想要思考20世纪的问题而作出的伟大而又可悲的尝试。我想说，在这个意义上，萨特是最后的黑格尔主义者，也是最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福柯说这话时，我们可把他看作是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换言之，在福柯看来，萨特的存在主义对当代人什么都没有说。

尽管福柯的批评异常激烈、毫不留情，但我们不可能把萨特局限于他所象征的19世纪，这至少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如同我所指出的，萨特的主体不是自我，而是向自身的在场。我们已看到，它不具自我同一性，这就能与讨论作者之“死”和自身的“遮掩”的巴尔特和福柯这样的后现代主义和/或后结构主义作者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尽管一种根本的二元论渗透于萨特的思想之中，但它并不是笛卡儿那种身与心、思维与广延实体这种通常被拒斥的二元论，而是自发性与惰性的二元论，一种可与后结构主义思想相容的功能性的而非实体性的二元性。

其次，尽管萨特并不赞同多重合理性，但他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却清楚地区分了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辩证理性是动态的和历史的，而分析理性既不是动态的，也不是历史的。这就产生了除这两种以外的其他推理方式的可能性。而且，在迈向福柯的（和尼采的）知识与权力的统一性时，萨特还把这两种理性中的每一种与一个政治和

社会阶级（分别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知识与权力的统一性是后现代主义论点。事实上，“所有知识都是介入的”，萨特的这个论断不仅表达了他的生命定向选择这个概念，而且在福柯再次凸显这个关系之前就以尼采的方式引入了权力-知识问题。如果萨特因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威胁了个体自由而对这一概念有所怀疑的话，那么，他同样也批评怀疑论的透视主义和多重合理性，他认为这种透视主义和合理性妨碍了彻底的社会变革，并因此维护了社会经济现状。早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萨特就是这样批评他昔日的朋友雷蒙德·阿隆历史理解的方式的。

加上德·波伏娃持续不断地（有时是受争议地）出现在女权主义运动中，人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她与萨特并未成为发展中的后现代主义者，但他们与第一代存在主义者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一起在21世纪同样能推进哲学对话的这个方面。

解释学

哲学解释学在20世纪日益增强的重要性也为存在主义思想进入21世纪提供了契机。作为解释文本的方法，解释学最初关注的是《圣经》文本，接着是法律文本，最终是文学和艺术文本，它在大陆思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文本”这个观念的内涵逐渐扩大，包含了任何意向活动的表现（从制度的确立到拳击手的刺拳和虚击都被包括在内），解释学解释的范围也相应地得到了扩展。从威廉·狄尔泰（1833—1911）和马克斯·韦伯（1864—1920）开始，运用“理解”就成了人文科学的标志性方法，尤其是历史和人文主义社会学的明确方法，以此来区别于自然科学。在海德格尔，尤其是他的弟子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1900—2002）那里，“理解”和解释成了我们在世中存在的根本方式。

和现象学一样，解释学主要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形而上学理论或存在论。解释学假定所有知识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之中（如萨特所

说，都“处于境遇之中”），认知者带着对当下问题的“前见”或前理解来探讨问题。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智者派早就提出，学习是不可能的，因为要么你早已知晓，因而无需再学，要么你对所学的一无所知，即使你遇到，也不会认可。解释学强调，学习确实是可能的，因为不管我们学什么，我们都是既知道一些东西又不知道一些东西。关键是要说明这个悖论式宣称在何种意义上有效。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解释学循环”。伽达默尔，我们当今最著名的解释学的实践者，把解释学定义为“让被书面语词的字母疏远或被文化和历史探究分隔的存在的特性所隔离的一切再次说话”。换言之，解释学是一种方法，用来发现陌生文本的意义，而不管这种陌生性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就像古代铭文那样，还是仅仅因为来自另一个领域，就像来自于另一种文化甚或来自另一个行业或学术专长的人的陈述一样。解释学是由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1768—1834）引入现代哲学，并由狄尔泰和韦伯拓展至人文科学的。从广义来说，解释学是“理解”另一个人的活动，而不是从因果关系角度来“说明”另一个人的活动（这会危害一个人的自由）；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解释学，那么，存在主义者就以各自的方式广泛地使用了解释学。简要地考察一下我们的五个人物，就能揭示出他们对解释学的运用以及“存在主义的”解释学如何与当前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继续相关。

第一个人物是尼采。他不是施莱尔马赫的崇拜者；他坚持认为，所有知识都是解释，否认存在任何根本“文本”，人们在这个根本文本之外不再能设法确切地理解它。知识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或无可置疑的；知识始终都是对解释的解释。这似乎导向一种尼采和后现代主义者们都支持的对于真理和知识所作的实用主义式探讨。这样说来，知识就像踩水，真理就是我们踩水成功。这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截然不同，胡塞尔的现象学旨在反击这种“相对主义”及其所助长的“唯意志论”（在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强调意志对于理智的重要性）。

解释学方法的反笛卡儿性在马丁·海德格尔那里显露出来。我们现在正处于刚刚提到的解释学循环之中。海德格尔论证说，在实际探寻之前人们对正在研究的主题已略知一二（即他所谓的“前理解”），否

则人们就根本不会对它感兴趣。正是海德格尔把现象学变成了解释学的现象学。事实上，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旨在阐明我们关于存在的前理解，这种前理解使我们自己的生存成了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海德格尔的导师胡塞尔拒绝承认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是真正的现象学的原因。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继续这条探究路径，他在该书中诉诸“前存在论理解”来理解存在、非存在、真理的标准和一个人的根本筹划这样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现象学描述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不言明的意识引入到反思意识之中。这样的理解是直接的和前认知的。它为我们随后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指导，这些随后的研究被反思所调和，并在概念中得到阐明。

卡尔·雅斯贝尔斯采纳了狄尔泰和韦伯那种把解释学应用于人文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历史学的方法。由狄尔泰阐明、并被韦伯使用的理解这个概念，由雷蒙德·阿隆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引入法国。事实上，正是阿隆的工作才触发了萨特对历史哲学的兴趣。雅斯贝尔斯和其他人分享了狄尔泰的文本解释学的理想，这种解释学能使我们“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他自身”。作为雅斯贝尔斯心理病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如同后来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心理分析中一样，解释学通过使我们接近人文科学的“内在生活”而使人文科学“人性化”；也就是解释学使我们接近促使行动者行动的意向和目的，这些意向和目的明显不同于说明行动者行为的自然“原因”。

但是，当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的结尾处把解释学用作为“存在主义心理分析”的方法时，他就引入了一种特殊的对解释学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的用法。这个设想的目标是要把一个个体的基本“选择”或定义生命的设想提升到反思意识。如同我们在第四章中所注意到的，它假定生命是一个总体化现象，类似于叙事的渐进化，这个总体化现象的统一性取决于对一组价值和标准的前反省的和持久的采纳，这组价值和标准为生命提供了意义和方向。由于前意识是完全半透明的，并且隐含有自我意识，因此，存在主义分析师（他或她自己可能也是主体）的使命，就是要把这种理解提升为完全的知识。借助于一种解

释学或对基本选择的经验符号所作的解释，就能完成这样的提升。像沿着沙滩行走的人一样，人们可以通过向后看自己的足迹来“读”出自己的方向。存在主义的心理分析设法揭示出的，并不是我们在不诚中假装要成为的或错误地想要成为的人，而是我们先前的行动揭示出我们已选择（Chosen，大写的选择）要成为的人。尽管萨特并未使用由解释学家伽达默尔所阐明的表述，但萨特似乎要求在分析师与被分析者之间存在一种解释视界的“融合”来实现这一点。在日常的社会经验中，如同在撰写像古斯塔夫·福楼拜的传记这样的生存传记中，萨特确实谈论我们“对于另一个人的理解所作的理解”。这似乎是在成功的解释活动中视界融合的功能上的等同。

而且，解释学方法假定，语言学表达或任何文化对象都嵌入在传统之中。但这个传统是妨碍还是促进沟通，取决于所使用的适当的解释学方法。尽管狄尔泰把解释学捍卫为人文科学的适当方法，以区别于自然科学所使用的功能关系和因果说明的方法，但海德格尔把“理解”描述为人在世中存在的根本方式。由此说来，理解这一方法并不简单地是自然科学的补充，就像狄尔泰似乎加以暗指和韦伯所坚持的那样，理解是一般人类认知的基础。萨特似乎会同意海德格尔，即认为在《存在与虚无》中我们的前反省意识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被阐发为“理解”，在这后一本著作中，“理解”被描述为是对实践自身的半透明性[3]。所以，解释学会是一种普遍方法，适合于所有形式的人类理解。不过，萨特把解释学与辩证理性和实践联系起来，想要为像在自然科学中被使用的“分析”理性保留一席之地。在此程度上，萨特是同意狄尔泰和韦伯的。但当萨特把“意识形态”或虚假意识这样的观念引入交往时，他就遮掩了这种半透明性。除了警告我们萨特意识的直视眼睛比先前意识到的更易患上视觉并发症，我们无需关注这一点。即使说掩饰意识的半透明性限定了人类自由和责任的范围，它也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个范围。

一种责任伦理

在后现代主义世界中，继承而来的统一原则和绝对价值的崩溃构成了对可辨认意义上的伦理理论和道德实践的特殊挑战。一开始，伦理身份这个观念似乎假定了狄尔泰所说的“生命的连贯性”。从古代起，道德家们坚持把融贯性看作道德生活中的一个本质要素。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本真生存必须防止我们的努力在纯粹的忙碌和懒散的好奇中“耗尽”。海德格尔和萨特都指望以一个果断的和支撑性的筹划或“选择”来达到这个统一性，而不是躲避在某种形式的实体性身份之中。每个哲学家都把人类看作一个负责的个体。虽然海德格尔在充分探讨关于存在意义的存在论问题之前不太情愿冒险提出一种伦理学（这从未发生过），但萨特通过唤起对不时渗入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诚（诸如否认责任）的关注，极其想“让资产阶级有内疚感”。对萨特来说，责任就像自由一样无处不在。

法国伦理学家艾曼努埃·莱维纳斯（1905—1995）在后现代伦理学中的流行开启了存在主义概念和价值的复兴，尽管他通常并不被看作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吸引许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关注莱维纳斯立场的，是它否定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并转向一种责任伦理，以取代一种关于普遍原则或抽象价值的伦理学。假如莱维纳斯不曾存在，那么后现代主义者们也必定会创造这么一个人物。

不过，即使是后现代主义者也承认需要像“正义”这样的基本伦理原则，众所周知，雅克·德里达也宣称这个原则“也许是不可解构的”。德里达这样说是指它也许不易经受他通常使用的（解构）方法，即通过分析概念从先在的形而上学假定中获得的“混乱”或“痕迹”来拆散概念的统一性。更为简单地说，正义也许是相对主义世界中的一个绝对。

莱维纳斯同样赋予正义某种相对的根本性。对莱维纳斯来说，正义派生于第三方的降临，即使它奠基于面对面的原初责任，面对面是他根本的伦理范畴[4]。在此意义上，正义类似于萨特这样一个概念，即我们的“为他人的存在”随着第三人的出现而在我们中间高涨。像他们之前的功利主义者一样，后现代主义者也已发现正义概念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正义概念似乎拥有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必须加以满足的

不容商量的特征。任何的“游戏”（如同利奥塔所说的，他把正义看作一个特别严肃的游戏）或隐喻手法也不能成功逃脱它的严格要求。不过，如同在克尔凯郭尔的悲剧英雄那里，非人格的正义，漠视“日益微弱的情势”，能给人造成重大伤害。

存在主义的“在境遇中的存在”在这方面能提供帮助。这又是一个关注具体思维的例子。这与其说是在引入新观念还不如说是在召唤我们回到传统洞见，即使传统洞见的概念情境并不是传统的。我们想到了这样两度诉诸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具体”思维，即他在正义与公平（平等）之间作出区分，以及他的审慎之人的概念。在前一种情形中，人们可以通过考察情形的特殊性来避免法则脱离上下文应用的不公平性。在法律的字面意义与精神之间作出的区分是这种对具体表现出来的相同关注的另一种表现。

在某种意义上，境遇伦理学这个概念并不新奇。它至少与亚里士多德的审慎之人这个概念一样古老，这个概念是我们的第二个例子。审慎之人知道在恰当的情势、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如同伦理学家约瑟夫·皮珀所说，审慎可以被理解为“境遇意识”。对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审慎”判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具体性。“审慎”判断是某种并非恶性循环的成果：正义之人是作出正义判断之人，但人们必须通过作出这样的正义判断来学着成为正义之人。并不存在绝对的出发点。人们总是处在事物中间。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处在解释学循环的伦理视角之中。

类似于审慎之人，存在主义者“在境遇中”进行判断。但审慎之人在哪里发现 了什么是要去做的正确的事情，存在主义者就决定 要去做这样的事。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在哪里是调查研究性的，他或她在那里就是“创造性的”。“本真的”个体在充分认可他的或她的可错性时是在作决定。但在考虑到最容易获得的证据，考虑到对自由的推进而不是武断地作出选择时，本真的人，诚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贯彻到底会使它成为正确的选择。

存在主义者正是在进入这个伦理的自由下落领域〔5〕时满足了后现代主义者对一种伦理实践的要求，这种伦理实践并没有形而上学承

诺或者不可侵犯的法则和原则。一种价值占有的伦理学表达和支撑了一个人一生的自由；诚如我们所提出的，萨特关于这种伦理学的看法开始能满足后现代主义世界中的这些后现代主义要求。如果说现代主义伦理观就是伦理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坚持理性动物的自律与理性处置的他律之间（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冲突在原则上可以得到解决（尽管尚未得到解决），而后现代主义却乐于认同这种不可解决性，并赞成由此而来的选择的多样性，那么，存在主义就像梅洛 - 庞蒂和德·波伏娃所说，它既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伦理理想的力量（例如，在萨特的目的之城中的本真生存），又提供了与必然的模糊性共存的现实意愿。这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并无太大差异。亚里士多德警告人们不要在道德王国中探寻比所能允许的更大的精确性，尤其是，不要为道德问题寻求数量上的解决方法。如果满足了后现代主义的非形而上学要求，并因此成为非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那么，存在主义的选择仍然是“现代主义的”，因为它仍然信奉人道主义，只是这种人道主义是由它自己创造的。

注释

〔1〕 研究情感（blanche with emotion），译者曾就此短语专门请教过巴黎高师哲学系Claude Imbert教授，她也觉得此短语没有交待德·波伏娃著作的出处，但仅从本段落的表述看可以把它转译为“研究情感”。

〔2〕 在萨特看来，惰性意味着消极，实践-惰性（practico—inert）就是消极的实践，就是主体的客体化使得实践变得消极、颓惰；相反，客体的主体化却使得实践变得积极。在此意义上，个人实践由于个体充满主动性而具有最少的惰性，而包括语言在内的社会实践却因自身的客观性而具有最多的惰性。

〔3〕 在哲学史上，意识哲学家一般都主张意识对自身是透明的或半透明的，有不证自明、自己赋予自己意义的意思，这里把实践比作了意识。

〔4〕 鉴于马丁·布伯赞赏“我-你”的对话和交互关系，莱维纳斯则注重“我-他者”的非对称关系，我对他者负有绝对的责任，但我并不指望他者以对等的方式回报我。莱维纳斯把这种非对称关系称作“面对面的关系”。

〔5〕 指的是伦理学从关注高高在上的抽象原则转而关注个体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境遇。

术语表

畏（anguish, *Angst* , *l'angoisse* ）：对个人自由作为一种极端可能性的意识。这不同于“怕”，因为“怕”有特定的对象。因此，一个人可能“怕”从悬崖上跌落，但面对跳崖的可能，他却感到“畏”。

本真性（authenticity）：承认自己独特个体性的状态。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绝对包含了一个人的向死而在；对萨特来说，这是一个人拥有自己的彻底自由和责任。每一个存在主义者对这一“德性”都有他或她的见解。

间接沟通（communication, indirect）：获得读者交感关注的间接方式，以便传递那些可能会被理智化或被简单地、不假思索地拒斥的价值观和情感。美术在这种形式的“具体”思维中特别有效。

“此在”（Dasein）：海德格尔用以特指人类存在方式的术语。通过使用这个术语，而不是“人”，海德格尔就抛弃了传统的人道主义。传统的人道主义通过聚焦于人是“理性动物”这样一个论断而不知不觉地限制了人的特殊性。

生存（existence）：从词源学上讲，“生存”意味着“凸显”、“站出来”。我们可以说人生存，而事物则简单地存在。存在主义者把生存与绽出的时间性联系起来，尤其是与作为可能性的未来联系起来。克尔凯郭尔的明喻抓住了生存的含义：“生存意味着什么？生存就是排在长队中，但排到窗口时又不买票。不是这样，生存就是在骏马奔越平原时，拼命抓住马的鬃毛。不是这样，生存就类似于骑在一匹行动迟缓的矮种马背上时，你可能体验到的最为匆忙的状态。”（参见“间接沟通”）。

不诚（faith, bad）：萨特的术语，指自欺。因为人类境遇的真实性和超越性的二价构成，每个人都有自欺的倾向。本真的生存在一个创造性张力中维持了这种二元性。而不诚则试图通过把超越性瓦解为真实性或者把真实性挥发为超越性来逃避这个张力（及其“畏”）。这两种做法都否认了我们的存在论构造，因此徒劳无功。

解释学（hermeneutics）：对“文本”的意义进行解释或理解的方法，广义的“文本”包括梦、象征符号以及其他行动者的意向，还包括

一个人自身。

人本主义（humanism）：把人置于宇宙中心的哲学理论。它的各种形式——例如，无神论的、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等等——都取决于它们把什么当作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大完善。

意向性（intentionality）：对胡塞尔来说，这是意识的标志性特征，意识凭意向性指向（意向）世界中的对象。这就使现象学家摆脱了由勒内·笛卡儿（1596—1650）的“内部/外部”认识论遗留给近代哲学的沟通思想和外部实在“纽带”问题的困扰。

虚无主义（nihilism）：指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没有客观价值，真理纯粹是主观的，人类生存毫无意义。尼采相信“民众”在失去对上帝的信仰后，会屈从于某种虚无主义，而“自由人”则会通过接受这个境遇并创造自己的真理和价值观躲过了这一劫。

现象学（phenomenology）：20世纪主要的哲学运动之一，由埃德蒙德·胡塞尔创立。作为一种严格描述意识对象的方法，现象学被像海德格尔和萨特这样的存在主义者所采用。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现代主义的继承者，还不如说是现代主义的批判替代者。它拒斥强调作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特征的主体和意识。尽管被使用得如此宽泛，以至于实际上毫无意义了，但在其主要倡导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1924—1998）的言语中，后现代主义拒斥像马克思主义作为阶级斗争的历史理论这样的“元叙述”，并宣称意义的“分裂”，即统一的意义形成在当代社会中无可挽回地分崩离析。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经常与后现代主义相混淆。从性质上说，后现代主义更具文学色彩和审美特性，而后结构主义更具哲学性和社会科学性。后结构主义也超越了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支持合理性的多样性，批判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提出的能赋予意义的主体。后结构主义运动将包括米歇尔·福柯（1926—1984）以及像雅克·拉康（1901—1981）和罗兰·巴尔特（1915—1980）这样一些前结构主义者。

境遇（situation）：人“在境遇中”生存，意味着人淹没在像出身、国籍、性别、社会身份、先前的选择这样的意识生活的已知事实中。这就是人们的“真实性”。但人们也以和他们真实性相关的方式“超越”了这些已知事实；例如，羞耻或骄傲，顺从或拒绝，抱有希望或感到失望。人类境遇内在地是如下两种成分的模糊混合物，即真实性与超越性、给予与索取（参见“不诚”）。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顾名思义，这种理论认为我们社会的相互作用，从我们的语言（费尔迪南·索绪尔）开始，一直延伸到“原始”社会的逻辑（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我们的意识形态（路易·阿尔都塞），我们的文学尝试（罗兰·巴尔特），甚至我们的无意识（雅克·拉康），都基本受制于无意识的规则和译码。这些规则和译码都先于我们的意识活动，并引导我们的意识活动。由于结构主义强调形式结构对于内容的重要性（抽象和普遍对于具体和特殊的重要性），也由于它相对贬低个体的创造性，所以结构主义被认为是与一般的人道主义相对立，与特定的存在主义相对立。

绽出的时间性（temporality，ekstatic）：这一术语由海德格尔阐述，为萨特和其他人所采纳，但早已被克尔凯郭尔所预见。它指的是生活时间的三个维度，即作为“被抛”或真实性的过去，作为“投射”或绽出的未来，作为“沉沦”或淹没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在，这与量化的“钟表”时间完全不同。这种时间观阐明了一种存在主义的观点，即我们从根本上讲是受时间束缚的，但这种存在主义观点强调作为可能性的未来维度，尤其是我们最本己的可能性，我们的向死而在。

与众多研究存在主义的著作相比，本书作者别具匠心地把存在主义定位为一种生活方式，力图全面展现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人间情怀，深入诠释存在主义思想与我们日常生活的血肉联系。全书不仅梳理了存在主义的缘起、发展和式微的演变历程，还细述了存在主义思想对当代艺术、文学和政治生活的影响，重申了存在主义运动将继续在21世纪的哲学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百科通识文库

49

解读欧陆哲学

西蒙·克里奇利 著

江怡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解读欧陆哲学

西蒙·克里奇利 著

江怡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68**

Continental Philosoph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1.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1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Simon Critchley 20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欧陆哲学 / （美）克里奇利（Critchley, S.）著；江怡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17-2

I．①解… II．①克… ②江… III．①哲学史 - 研究 - 欧洲 IV．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788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17-2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前言
第一章　知识与智慧的鸿沟
第二章　欧陆哲学的起源：如何从康德走向德国唯心论
第三章　视物的眼镜和眼睛：哲学中的两种文化
第四章　哲学可以改变世界吗？批判、实践、解放
第五章　怎么办？如何回应虚无主义
第六章　有关误解的案例研究：海德格尔与卡纳普
第七章　科学主义与蒙昧主义的对立：避免传统的哲学困境
第八章　运用你自己的理性：理论的枯竭和哲学的前景
附录
译后记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西蒙·克里奇利，现任纽约新学院大学哲学教授，著有《解构的伦理学》（1992）、《很少……几乎没有》（1997）、《伦理学、政治学、主体性》（1998）等。他还主持编辑了大量文集，包括《布莱克威尔欧陆哲学指南》（1998）。

译者简介

江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当代美国哲学、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比较研究等。主要著作有《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主编）、《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主编）等。主要译著包括《弗雷格》、《理性主义者》和《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

图目

图1　贾钦托·布兰迪，《哲学的寓言》
图2　弗雷德里克·祖卡里，《智慧》
图3　伊曼纽尔·康德版画
图4　约翰·乔治·哈曼画像
图5　弗雷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画像
图6　埃米尔·多斯蒂灵：康德及同桌就餐者
图7　弗雷德里希·哈格曼，康德准备芥末的画像
图8　彼得·保罗·鲁本斯，《四位哲学家》
图9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漫画形象
图10　G. W. F. 黑格尔画像
图11　《体系—纲领》的摹写本
图12　欧仁·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图13　埃德蒙·胡塞尔画像
图14　卢梭之墓
图15　多梅尼科·费蒂，《忧郁》
图16　弗里德里希·尼采画像
图17　鲁道夫·卡纳普和他的妻子伊娜
图18　马丁·海德格尔
图19　雅克·卡洛，《傻老头》
图20　奥托·穆尔，《噢！感觉》
图21　乔治·德·希里科，《孩子的大脑》

前　言

有一个时期，英国的学院派哲学大多都只是讨论逻辑和知识论，倾向于把哲学限定在这一范围，而将其传统上与一般道德体系和思想体系之间的联系看作是一种错误。这种趋势很强，但是地域性很明显。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键词》

1999年10月5日，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被要求就欧洲联盟的前景发表她当时的观点时说："我有生之年的所有问题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办法都来自英语世界。"尽管这种说法显然有误，它却表达了这样一个深刻的真理：就是说，对英语世界的许多人，甚至是对英语世界之外的某些人而言，他们的世界与欧洲大陆的社会、语言、政治制度、传统和地理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分歧。英国政治，尤其是（但绝不仅限于）保守派，以"惧怕欧洲派"和"热爱欧洲派"之间的区别进行界定，他们的对手将其分别称为"亲欧者"和"恐欧者"。这就是说，有一种文化差异，某些人会说是分歧——或许甚至是一个深渊——存在于"欧洲大陆"与其对立者之间，而这个对立者，撒切尔夫人有意用使人回想起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口吻把它称作"英语世界"。欧陆哲学就是这种文化分歧的表现之一。这本小书的目的就是要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为什么这个事实很是重要，以及它对现在和未来的哲学活动可能意味着什么。

欧陆哲学是否是一个界定明确的哲学领域，这还颇有争议。即便人们承认它确实是一个哲学领域，"欧陆哲学"这个词是否是最为恰当的名称，也还存在争论（比如，"现代欧洲哲学"这一名称也经常使用）。我们暂且说"欧陆哲学"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牢记这一点，本书就有了三重目的：

1．梳理"欧陆哲学"一词的历史渊源和含义，以及如何区别于其所谓的对立面，也就是分析哲学或英美哲学，并又如何为其对立面所表现此领域。

2．表明欧陆哲学的概念如何能够很好地加以界定，并构成一个截然不同的哲学传统和实践体系，包括了一系列通常为英美传统所忽略或抛弃的引人注目的问题。
3．除此之外，表明我们将来如何能够更好地讨论哲学本身，而非只是局限于谁或者什么属于欧陆哲学亦或分析哲学的专业口角。

我首先会采取略为不同的策略，勾画出当代哲学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智慧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哲学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鸿沟，一方面是关于人们如何知道所知的一切这样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一种善的或充实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更为实际的或者说是存在论的问题。大多主流哲学都已经放弃了把知识和智慧整合为一个单一的概括性看法的努力。我会试着展示，欧陆哲学的吸引力在多大程度上在于试图连接知识与智慧（或者说是理论与实践），或者缩小这两者之间的鸿沟，从而多少回应了古代把哲学定义为对智慧的热爱的说法。但我们会看到，在一个越来越多地以自然科学的程式塑造的世界中，这样一个观点自身也不是毫无问题的。

接下来的几章可以按照另一种经典的哲学区分方式加以划分：即历史的和系统的。第二章勾画了导致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形成差异的不同历史发展轨迹。我将把欧陆哲学回溯到18世纪晚期人们对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思想的接受。康德在许多方面都是欧陆传统和分析传统共同拥赞的最后一个伟大人物，他同时也宣告了这两种传统的分道扬镳。我会比较对待康德的不同方式，以考察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我还会比较详细地考察18世纪80到90年代康德思想所引发的争论，然后表明，这些争论如何确立了费希特（J. G. Fichte）和黑格尔（G. W. F. Hegel）著作中的德国唯心论的关键问题。大致地说，这个问题就是：康德的理性批判的结果是否与其所表明的意图相反，事实上损害了道德和宗教信念的基础？也就是说，对理性的批判，必定也是对所有信念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正是以彻底的怀疑论和虚无主义的噩梦而告终吗？我们会进一步探究19至20世纪欧

陆哲学中这种思想的重要意义。

第三章首先考虑的是与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差异相关的某些问题，接下来会考察文献中对这一差异的某些模式化的、颇引人发笑的表述。随后，我要讨论欧陆哲学的两重含义：哲学家们使用的、专业的自我描述，以及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内的更多人所使用的带有具体历史的文化特征。我认为，分析哲学家们对欧陆哲学所怀有的大多数敌视和误解，都是由于把这两重含义无益地纠缠在一起，都是由于专业的自我描述常常以有害的方式凌驾于文化特征之上。接下来我会考察欧陆哲学在英语世界中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语境，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哲学传统之间的冲突只有从斯诺（C. P. Snow）提出的著名的“两种文化”模式的角度来看，才能很好理解。就是说，英语世界的文化生活分为如下两部分：一方面是科学，另一方面是文学或人文精神。这就是说，欧陆哲学并不是发生在“另一个地方”的异域的东西，而只是表达了对以某种“英语方式”为核心的反抗。在这方面，我会重点讨论具有启发意义的历史实例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集中关注他对于区分为经验主义与思辨哲学思想方式的英语文化的重要反思，这些分歧也是导致了萨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浪漫主义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之间对立的原因。最后会讨论一些有关这两种文化之间冲突的更为新近的说法。

在第四章，我会尝试以更为系统的方式勾画出欧陆哲学中明显的、令人信服的东西。我会对人们如何去解释哲学家们的不同实践活动给出一些评论，之后，我会集中讨论传统和历史的概念，表明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两位哲学家是如何有趣地理解这些概念的。我提出了用于描述欧陆传统哲学实践的一种模式，以三个关键词把它们组织起来：批判、实践 和解放 。这旨在表明，大多数欧陆哲学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关心对现代世界的社会实践提出批判，这种批判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个人的和社会的解放。

我接下来会转向虚无主义这一关键概念：最高价值（比如对上帝

或灵魂不朽的信仰）的瓦解或贬值，这在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著作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我勾画出了帮助尼采理解虚无主义的饶有意味的俄国背景。然后，我试图表明，那种导致了尼采作出虚无主义判断的文化和思想病态，在他之后如何发展为反动的现代主义和进步的现代主义这样两极，这又如何导致了欧陆传统中对哲学与非哲学之间关系的特定理解。

第六章处理一个具体案例研究。如果有一个争论典型地表现出了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的误解，那么这就是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海德格尔与鲁道夫·卡纳普（Rudolf Carnap）之间的争论。实际上，这是一个由卡纳普和维也纳学派提倡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海德格尔主张的存在的或所谓“阐释学的”世界体验之间的争论。欧陆哲学家与分析哲学家之间新近的大多数误解，都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与卡纳普之间的这种令人奇怪的僵持，所以，值得考察一下究竟什么出了问题。

在第七章，我提出了科学主义 与蒙昧主义 的问题，进一步讨论科学的世界观与阐释学的世界观之间的关系。欧洲大陆的许多哲学都可以说是对现代世界中的危机感作出的回应，是怀着解放的目的尝试建立对现实的批判意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欧陆哲学与大部分分析哲学之间最为突出的巨大差别，即其反科学主义 。它批判科学主义是基于它相信，自然科学的模式无法而且不应当为哲学方法提供模式，自然科学并没有为人类提供通往世界的首要的、更有意义的途径。我们会看到，一系列欧洲大陆的思想家，比如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均表达了这一信念。对科学主义的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在最近几十年里，它也招致了被与反科学的态度相提并论的危险。这就是蒙昧主义 的危险。在我看来，科学主义和蒙昧主义是哲学中应当避免的两个极端，它们反映出了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中有害的倾向，卡纳普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争论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与存在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和蒙昧主义这两个极端不同，我提出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在全书的最后，我思考的是一些我不断预见到的哲学的前景。哲

学研究中目前的这些区分是某些不恰当的、狭隘的专业自我描述的结果（你是分析主义的或是后分析主义的，抑或是欧陆哲学家，还是现代欧洲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都是狭隘的自我描述，这是学科专业化的结果，在我看来，这种专业化导致了哲学批判功能的削弱，使得哲学在文化生活中不断地被边缘化。我认为，哲学应当是对这种生活的重要表达。

在开始之前我要作几点说明并表达感谢。我的目的一直是，将参考资料控制在最少，尽可能简单地集中表达关键性的观念。这就是说，我在许多地方都挪用或借用了其他哲学家的论证和观点，事实上有些时候是我在其他地方发表过的观点。对此我不会表示歉意，因为本书针对的是具有好奇心但肯定不是专业的读者。本书后面的参考书目和进一步阅读书目是为了说明我的材料来源，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他们可以进一步学习的途径。

你可能在本书中看不到对构成我们所认为的欧陆哲学的所有思想家、传统以及运动的概述或总结。这些是我整个工作的重要缺失。这种概述已经有了，有些还做得非常不错，我的目的并不是打算增加一篇这样的概述。相反，本书更想对欧陆传统中哲学的本质作出反思，所以本书的风格是一篇论说文，而不是教科书。换句话说，下文表达的是一种带有个人风格的观点。

本书最初起草于2000年3月到5月间，当时我有幸在悉尼大学哲学系担任客座讲师，全书根据我的讲课笔记整理而成。我提到这些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偶然事件：2000年3月1日我抵达悉尼的那天，悉尼大学的“普通”哲学系和“传统与现代”哲学系在经过了27年的分离之后重新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哲学系。现在，尽管这种分离（这不无它所表现出的讥讽，这种讥讽，应当说，并没有完全消失）最初源于政治分歧，主要的导火索是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初参加了越南战争，但分离也是由于学术思想上的差异，最为显著的是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与政治的关系。虽然并不能说哲学系的分离可以用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分野来解释，但这种分野的确以各种多少有些超乎想象的方式影响到了这种分离。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们，特

别是要感谢我在悉尼大学的学生们，他们帮助我重新思考这种分离。最后，本书并非来自于我的创意，而应归功于牛津大学出版社出色的编辑谢利·考克斯。我感谢她有如此好的创意。

第一章

知识与智慧的鸿沟

哲学就是爱智慧。如果你认为自己爱上了智慧，那么，哲学大概就是你要研究的对象。但是，哲学传授的智慧是什么呢？在苏格拉底（Socrates）以及他之后的几乎所有古代哲学家看来，哲学所传授的智慧是关于享受一种美好的人类生活。美好的人类生活也应该是幸福的生活，这被许多古代哲学家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看法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表述，后来诸如斯多葛学派这样的希腊化时期哲学家也这样认为；根据这种看法，哲学应容许获得最大的幸福，也就是一种无利害因素的静思生活。所以，哲学是一种反思性生活，一种经过审视的生活，其假定是，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哲学应当塑造人类，而不仅仅是让人类获取知识。

但不应忘记，尽管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失去了生命的生活则是不值得审视的；在古人看来，哲学并不是对日常社会生活实际的背离，相反，哲学是以真理的名义考察何为真理的反思性实践，它正是发生于古希腊人所说的“城邦”（*polis*）之中，这是政治生活的公共领域。哲学最初就是一种实践 活动，明显不同于17世纪之后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探索。

在古时，哲学教导我们热爱的智慧，就是追求美好的生活，一种进行反思冥想的生活；按照释义来看，这将会是一种幸福的生活。现在，或许有些奇怪的是，哲学之外（就是说在作为学术研究的哲学之外）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哲学之内 的大多数人都陷入这种研究，无法摆脱。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他们很自然地断定，哲学的核心问题必定是生活的意义。有了这个想法，我们再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专业哲学家在一个聚会上碰见一个陌生人，她回答了“你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而这个陌生人则立即大着胆子问道（此外此人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时候，哲学家略微紧张地咯咯一笑，急切地想要尽快转换话题，或者是尴尬地一笑，解释说哲学的学术研究实际上并不讨论这种问题。这样，这种社交场面很是尴尬，但我认为，这个陌生人的假设很有道理。也就是说，如果哲学并不讨论（不必要回答，但至少要处理）生活意义的问题，那么，我们

无法说哲学家们的工作做得妥当。

图1　贾钦托·布兰迪（1621—1691），《哲学的寓言》

在我看来，这里的问题与其说是哲学之外的人的问题，不如说是哲学之内的人，即我们的专业哲学家们的问题。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认为哲学应当关心生活意义的问题，或者是关乎如何获得美好幸福的生活，这种看法多少是一种玩笑，而且还是一种没什么品位的玩笑。这种问题被降格归于通常称作“大众心理学”的领域。就大部分而

言，专业哲学已经很高兴地把这个领域让给了大量而且仍潮涌般不断增长的关于“心灵、身体和精神”的书籍，那些在繁华商业街书店里尴尬地摆在逐渐缩水的哲学书架旁边的成排的色彩鲜艳的“新时代”书籍。专业哲学几乎完全放弃了这场战斗，早早地引退了。

如果哲学并不关注智慧，那么对大多数专业哲学家来说，哲学究竟在关注什么呢？我们说，哲学关注的是知识 。关于什么的知识？在广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关注的是事物如何成为它现在这个样子的知识。这里，“知识”一词的拉丁文*scientia* 是富有启发性的。知识的问题，也就是知道事物如何成为它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正是科学，也就是近代自然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事物如何成为它现在这个样子的最好的、最为可靠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自然科学可以为其假设提供实践经验的证明，可以证实它的说法。如果我说“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拯救者”，但没有提供任何经验证明，那么，我是否接受这个说法就完全是一个信仰问题。但如果我说，水这种物质可以描绘为在任何时候都具有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的东西，那么，我就可以用实验去证明这个结果。

我们都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说法提供实践经验的证明，或者恰当地驳斥那些说法。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早期的英国和法国，它支配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支配着我们期望 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们期望多少能像剧场里的观众那样，从理论角度审视事物——“剧场观众”在希腊文里就是*theoros* 。事物是以感觉或表象的形式通过经验直接呈现的。科学赋予我们关于这种事物本质的知识。这些事物因此就被称作“事实”。

在科学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我们的专业哲学家赋予哲学什么样的角色呢？回顾一下“知识”的希腊文*episteme*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哲学变成了认识论（*epistemology* ），即关于知识的理论。就是说，它主要关注的是逻辑的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比如，有关我们如何 知道我们所知的东西，这种知识凭什么是有效的。哲学成为一种理论探究，探究科学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根据科学的世界

观，哲学的角色就不再是柏拉图所认为的各门学科的女王，这里，理论知识和实践智慧成为了一体。用约翰·洛克（John Locke）1689年在《人类悟性论》开篇所说的话，它变成了科学的清道夫，其工作就是清除存在于知识和科学进程中的垃圾。哲学家就成了各门学科“水晶宫”的守门人。

守门人的工作足以令人尊敬，但有关智慧的问题呢？这里的问题在于，科学很是奇妙：它向我们更为真实并且更好地描述了事物存在的方式，当代哲学家喜欢把这称作“自然主义的本体论”。而且，通过科学的合作者（即技术）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的转变和提高是古人难以想象的，甚至我们的祖辈也是难以想象的。因此，科学不仅很奇妙，而且很有效。但尽管如此（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智慧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仍然纠缠着我们，就像是我们自认为已不再需要的阑尾一样。

问题是：科学的世界观彻底排除了寻求生命意义问题答案的需求了吗？知识躯体需要切除智慧这个阑尾吗？依据某种极端的观点，这的确如此；某些哲学家可能认为，所有的问题或者一定是可以通过经验探究得到回答的，或者是被作为荒谬的东西加以抛弃的。这样，也许可以这样认为，生命意义的问题可以通过达尔文进化论从因果上或经验上作出回答。根据这种看法，生命就可以基于某些因果假设而得到解释，譬如自然选择，就是说，人类的认识是进化发展的结果。甚至有一门哲学分支就叫“进化认识论”，它首先试图把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还原为认识论问题，然后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只能按照进化的倾向得到回答。

在知识与智慧、或者说是科学的探究与我们也许可以叫做人文的探究之间的关系上，我采取一种不太极端的观点。我认为，生命意义的问题不可能还原为经验研究。这完全不是一个因果问题。我认为，在知识与智慧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不是一道解释上的鸿沟，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更为全面的理论弥合它；它更是一种感觉上的 鸿沟。如果所有认识论上的问题都可以由科学探究在实践中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可能会觉得，即使所有这些问题在一觉醒来都得到了解决，

这仍然与智慧的问题毫无瓜葛，与美好的人类生活究竟包含着什么这个问题无关。

这正是日常经验中的巨大悖论（也是我们在第二章将会遇到的虚无主义悖论）：科学的世界观非但没有弥合知识与智慧之间的鸿沟，反而使我们更为明显地感觉到这个鸿沟。我甚至敢打赌，这个悖论在科学与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最为明显。正是在先进的西方社会中，知识与智慧的鸿沟似乎扩大成了深渊。在这种意义上，有关生命意义的思辨性问题就是奢侈和富裕的结果。或许情况就是这样——只有生活中基本的迫切要求得到了满足，哲学才会出现。正像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说，“食物在先，伦理在后。”这说得没错。但人类的奇怪之处在于，当你给了他们食物，甚至比他们所能吃的还要多，当你给了他们各种尘世的赐福，那么，他们就会为自己编造出新的苦难，新的神经病和变态，甚至创造一种新的“学科”以医治这些新的神经病和变态：精神分析、心理治疗、芳香疗法、反射疗法，或者其他什么名字。正是由于在存在上开始感觉到了这种悖论的力量，被忽略了的生命意义问题才更强烈地被重新提了出来：“我似乎拥有了我所想要的一切，但我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这种不寻常但又完全是司空见惯的情况正是填补“意义鸿沟”和回答生活意义问题这种在我看来不合理的企图的合理根源。做到这一点可以有许多方式：通过回归传统宗教，或者通过发明新的宗教；通过政治极权主义，这通常会和回归传统宗教结合，成为令人迷醉的鸡尾酒（例如，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或者是通过57种填补意义鸿沟的方式，它们流行于神秘主义的市场：占星术、瑜伽、手持水晶静坐于金字塔下、发现自己内在的童真等等。我们在这本小书的最后将会看到，这些都是蒙昧主义 的变种。就是说，如果许多当代哲学所犯的错误就是被科学冲昏了头脑，导致了科学主义，那么，同样错误地抛弃科学则导致了蒙昧主义。我最后的一个说法就会是，某些当代欧陆哲学中就存在着蒙昧主义的危险。所以，如果当代哲学的危险是科学主义，那么与它相对应的就是蒙昧主义。用穆勒的话说，“人们谴责一个理论使人变成了野兽，而另一个则使人变成了疯子。”

概而言之，古代哲学首先被描述为知识与智慧的同一，或至少是试图整合这两者：就是说，关于事物如何成为它现在这个样子的知识，会带来人生行为上的智慧。这种把知识与智慧联系起来的假定认为，这样一种宇宙表达了人类的目的，因而关于自然的知识就构成了之所以为人的意义的主要部分。这就是所谓的“目的论的宇宙观”，根据这种宇宙观，每个自然之物都可以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终极因加以解释，正是因为这个目的，事物才成为它现在这个样子。这种观点带来了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智慧、因果解释与存在理解或意义之间的巧妙统一，例如，大自然就可以被看作是由上帝之手书写的一部活生生的著作。

在当今世界，经过各门学科由17世纪至今的突飞猛进，这种统一已经分崩离析。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在1641年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已经这样写道：“通常对终极因的寻求在物理学中毫无用处。”宇宙并不会表达人类的意图，它完全是受物理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我们可以竭力去获知，但它们对人类的努力却毫不在意。宇宙是巨大的、冷酷的、机械的、无人性的。所以，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17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这种世界观变革的时候这样写道：“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充满了敬畏之心。”这就是说，有关哥白尼（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无限的、开放的宇宙（一个没有意义、没有终极目的的宇宙）的知识，在人们转向智慧问题的时候就会使人产生真正的焦虑。这就是被称为启蒙运动 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体验的一种表达：给我们留下的是知识与智慧、真理与意义、理论与实践、因果解释与存在理解这些不同领域之间的经验的鸿沟。正如马科斯·韦伯（Max Weber）在大约两个半世纪之后所说，科学革命以其无法否定的真理引发了对自然的去魅（disenchantment of nature）。自然界不再是人类同样参与其中的某个“世界灵魂”的可见表达。相反，自然界是完全不具人格的客观的“材料”，它是受规律支配的，具有清晰的因果关系，完全脱离了人类的意图。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代人的问题就很清楚了：面对科学革命带来的对自然的去魅，我们体验到了知识与智慧之间的鸿沟，这

个鸿沟结果会迫使我们放弃有意义的生活。问题在于：自然，或实际上是人类自身能够通过弥补或消除这个意义鸿沟并产生某个关于美好生活的可信观念而复魅（re-enchanted）吗？这个悖反似乎难以解决：一方面，科学真理的哲学代价似乎是科学主义，这样我们就成了野兽。另一方面，以对宇宙的一种新的人文关怀而拒斥唯科学主义，似乎又导致了蒙昧主义，这样我们就成了疯子。这两种选择都不是非常具有吸引力。在本书的最后，我会试图提出一种中间道路。

但你可能会问，这与欧陆哲学有什么关系？我的观点是，哲学当下应当思索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悖反：一方面是有可能把我们变成野兽，另一方面则是有可能把我们变成疯子。这就是说，智慧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生命意义问题，至少应当更为接近哲学活动的核心，而不是不痛不痒地、令人尴尬地、甚至是有些轻蔑地加以对待。在我看来，可归于欧陆哲学名目下的大部分问题，其吸引力在于试图统一或至少更为紧密地结合知识与智慧、哲学真理与存在意义的问题。这里有大量的例子，比如，黑格尔将有关认知的生死之争看作是升华为绝对认知的重要部分；尼采论述上帝之死和对价值重估的需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论述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和对于追求解放和公正的社会变革的需求；弗洛伊德（Freud）论述在梦境、玩笑、口误中表现的无意识压抑以及它所揭示出的精神生活核心的非理性；海德格尔论焦虑、非真实社会生活中的麻木冷漠以及对真实存在的需要；萨特（Sartre）论述自欺、憎恶以及渴望人类自由的无用但却必需的激情；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论述在上帝之死造成的荒谬宇宙中的自杀问题；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论述我们对他人的无限责任的创伤。这个名单还可以增加。

图2　弗雷德里克·祖卡里（1540—1609），《智慧》

这就是说，欧陆哲学的吸引力就是，它似乎更为接近人类存在的细微之处。它似乎更忠实于生活的戏剧、人类的希望和恐惧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当然，这并不是说，英美哲学或分析哲学的主流中完全没有涉及这些问题。虽然，在我看来，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后者的大部分都是由知识问题占主导地位，以科学的或自然主义的方式对其进行思考，而以牺牲智慧问题作为代价，但这并不能解释诸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这样的人物，可以

说，作为思想家，他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是基于把哲学的真理与某些关于存在意义的看法，事实上也就是关于某种生活方式的看法结合了起来。这就是说，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富于激励性的愿望可以说是治疗性的。所以，我们说，试图弥补知识与智慧的鸿沟并不是区分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充分条件。这并不是问题所在。我的基本看法是，试图弥补这个鸿沟应当是一切哲学思考的必要条件。

第二章

欧陆哲学的起源：如何从康德走向德国唯心论

下面几章的任务是要界定欧陆哲学，然后阐明欧陆哲学的独特之处和令人信服之处。我想用双重方式来完成这些任务：即历史的方式和系统的方式。第二章和第三章会考虑历史的发展，而第四章则会对欧陆哲学进行更有争议的、更为系统的阐述。抱着一种系统的、论证式的意图写作哲学史，这种观念自黑格尔1870年的巨著《精神现象学》以来就一直是欧陆传统中惯常的方式，《精神现象学》把这两种方法统一了起来。我们也可以在更为当代的著作中看到同样的手法，比如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知识与人类旨趣》（1968）、福柯（Foucault）的《疯癫与文明》（1961）和德里达（Derrida）的《论文字学》（1967），而这在英美哲学中则少见得多。

胡塞尔还是康德：开辟欧陆哲学的两种方式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区分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两种方式。我们可以想象一本关于欧陆哲学的著作开始了对这一主题进行探索的历史，这就是1900年前后出版的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海德格尔将其称为开创了现象学传统的“突破性”著作。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可以提醒读者，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当代分野（或更准确地说，鸿沟）主要在于这样两种传统之间的分野，即受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关于逻辑和语言的革命性哲学启发的传统（包括了早期维特根斯坦、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和英美的语言哲学），以及来自于通常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产生激烈对抗的传统，比如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有过重要的联系，1894年，弗雷格针对胡塞尔的处女作《算术哲学》（1891）发表了一篇深刻评论，结果显著地改变了胡塞尔关于逻辑与心理学关系的观点，即：逻辑并不像胡塞尔早期认为的那样，可以还原为心理学。

什么是欧陆哲学？

欧陆哲学这个名称在哲学史上有200年的历史，它始于康德18世纪80年代批判哲学著作的出版。它引发了下面一些重要运动：

1 德国唯心论和浪漫主义及其后继（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施莱艾尔马赫、叔本华）
2 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悬疑大师”（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
3 德国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胡塞尔、马克斯·谢勒、卡尔·雅斯贝斯、海德格尔）
4 法国的现象学、黑格尔主义和反黑格尔主义（科耶夫、萨特、梅洛–庞蒂、列维纳斯、巴塔耶、德·波伏瓦）
5 阐释学（狄尔泰、伽达默尔、里克尔）
6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卢卡奇、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
7 法国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拉康、阿尔都塞）、后结构主义（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后现代主义（利奥塔、鲍德里亚）和女性主义（伊利格瑞、克里斯蒂娃）

当然，看似有所分歧的分析哲学传统和现象学传统中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中欧先祖，这就是主要在布拉格活动的哲学家伯纳德·波尔查诺（Bernard Bolzano）和弗朗茨·布伦坦诺（Franz Brentano）二人的思想，后者是维也纳大学的教授，年轻的弗洛伊德曾是他的学生。简而言之，弗雷格和胡塞尔从波尔查诺那里得到的是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思想不是主观的心理经验，而是具有能够加以分析的客观内容。而他们从布伦坦诺那里得到的则是意向性论题：即每个思想都指向世界中的对象，而不是封闭在某种意识的封闭空间里。这两个观念促进了抛弃怀疑论、相对主义和所谓的“心理主义”（这是在19世纪初的德国盛行的观点，认为逻辑问题和哲学问题

都可以还原为心理机制）。胡塞尔最初就坚持对逻辑和算术进行心理主义说明，直至弗雷格劝说他放弃了这个观点。正是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以及明确拒绝把哲学还原为实证科学的一切企图，使得弗雷格的语言哲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结合在一起。所以，根据这种解释，分析哲学的起源与欧陆哲学的起源具有相同的历史时期、相似的中欧德语世界的地理来源以及共同的哲学敌人。哲学家之间重新建立交流的唯一方式，就是回到这些传统出现分野的历史起点和概念起点。这正是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在他有影响的《分析哲学的起源》（1993）一书中采取的策略。达米特叙述了自弗雷格以来的分析哲学史，满怀希望地认为，更为清晰地理解哲学的过去，会是当代哲学家之间达到某种相互理解的先决条件。达米特用恰如其分的严厉话语这样来描述当代的情况：

> 我并不想假装认为这两个传统中的哲学基本上是一样的；显然，那会很荒谬。我们只有回到它们的分野之处才能重新建立交流。现在隔着深壑叫喊毫无用处。显然，哲学家们决不可能达成一致。然而，他们不再能够相互交谈或相互理解是令人遗憾的事。要得到这样的理解也很困难，因为如果你认为人们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你可能就不会有与他们交谈或者自找麻烦批评他们观点的强烈愿望。但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好像正在不同的学科内工作。

这样，当代哲学的背景就与20世纪初的情况形成强烈的反差。达米特写道：

> 弗雷格是分析哲学的先祖，而胡塞尔则是现象学的奠基者，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哲学运动。比如说，在1903年，对熟悉他们两人思想的德国哲学系学生来说，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当然不会被看作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思想家，而是两个思想取向上非常接近、但是兴趣上有些分别的思想家。

达米特继续饶有兴趣地把弗雷格和胡塞尔比作莱茵河和多瑙河，“它们的源头离得很近，一段时间有着大致平行的河道，后来却分而流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注入不同的海域。”虽然，至少在达米特

看来，弗雷格的莱茵河显然是思想的正道（而胡塞尔的多瑙河则流入了欧陆传统的唯心论黑海），但这仍然是很有启发的建设性的意象，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的区别。

达米特的策略很有吸引力，我会在第六章讨论科学的世界观和阐释学的世界观之间冲突的时候含蓄地使用这个策略：就是说，要得到冲突双方相互理解的一种方式就是回到其哲学源头，即海德格尔和卡纳普之间的僵持局面。然而——这也是区分两个传统的第二种方式——如果我们要理解欧陆传统中的哲学本质，我认为必须从康德开始，正如我在之前所说的，他是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最后一位共同的伟大人物，他宣告了它们的分道扬镳。首先，我们从康德（而不是胡塞尔）开始是出于两条简单的理由：其一，如果不提19世纪的先驱者，特别是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那么20世纪欧陆哲学的发展基本上就是无法理解的。这对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法国哲学尤其如此，这个时期的法国哲学完全可以描绘为对黑格尔（科耶夫［Kojève］的著作和萨特早期的著作）、尼采（福柯和德勒兹［Deleuze］的著作），或是马克思（阿尔都塞［Althusser］的著作）的一系列的回归。其二，19世纪非英语世界的哲学史，至少在英国，不幸很少被收入到本科生的教学大纲中，即使没有读过多少从康德到弗雷格的用德语写作的哲学著作，学生们也仍旧有可能获得哲学学位。因此仍然有必要努力弥补这个鸿沟。

阅读康德的两种方式

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大部分差别，都可以简单地回到如何阅读康德以及阅读了多少 康德这些问题上。这就是说，人们是否仅仅想到的是第一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1781）中的认识论问题，或者是想到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1790）中更大的系统化抱负。我想更深入地探讨一下这个思想。

如果我们关注的是第一批判，那么我们通常关心的是先验演绎论

证的成功：康德在这里试图表明，为了体验对象，我们就必须预设他所谓的“知性范畴”的运作，由此才有对之加以理解的人类主体，即后者把大量的、杂乱无章的感觉经验统一到概念之下。因此，正如康德所说，“对象符合概念，而不是概念符合对象。”对康德的这种阅读将会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引导：他是否成功地为经验知识提供了有效的基础或者说根据，是否成功地回应了休谟怀疑论的挑战。康德说，休谟以如下方式把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休谟表明，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怀疑论的挑战，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确定，我们基于流动的感觉和印象的概念是否充分符合对象本身并产生知识。康德的回应是把这整个问题翻转了过来：他承认，尽管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物自体，但我们表象的对象却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对物自体的概念相一致的。这种翻转就是康德所谓的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经验世界对我们而言的确是真实的，但为了解释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我们就必须在逻辑上（或用康德的说法是“先验地”）预设一个把直觉统一到概念之下的主体或意识。这就是“先验唯心论”这个论题的大致观念。康德认为，这个论题与经验实在论相一致。从这种角度解读，康德的主要哲学贡献就是认识论，隐含的也就是科学哲学。的确，这正是新康德主义学派对他的主要解读方式，这个学派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德国和法国的学院派哲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是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和其他人的著作中对康德的这种认识论的解读，直到晚近的时期仍然主导着英美哲学对康德的接受。

然而，第三批判的抱负则有所不同。康德试图通过批判判断力沟通知性能力（关注自然知识的认识论领域）和理性（关注自由的伦理学领域）。判断应该是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的中介，应该把批判哲学的各种要素整合为一个体系。如果我们采取了这条路线，那么康德哲学的迫切问题就变成了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自然与自由之间关系的可信性问题，或者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我们下面将会看到，这正是费希特、谢林（F. W. J. Schelling）、黑格尔的德国唯心论以及弗雷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和诺瓦利斯（Novalis）的早期德国浪漫主义所遵循的路线。可以说，这正是欧陆哲学至今一

直遵循的路线。

图3　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版画

康德与哈曼
——纯粹理性批判和对这种纯粹性元批判的需求

让我来重新构建后康德哲学的某些背景，以期更为详细地解释我们如何从康德走向德国唯心论。德国启蒙运动（the *Aufklärung*）的整个计划建基于理性的最高权威，但却遭遇了一种内部的瓦解。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描述为：理性的最高权威在于主张，理性可以批判我们的所有信念。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写道：

>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我们所有的信念都必须接受批判。神圣的宗教和威严的国家都无法免除这种审判而不引起对它们自身的怀疑。

但是，如果这是真的，就是说，如果理性可以批判一切事物，那么，它也一定可以批判自身。因此，如果这种批判的确有效，这里就一定有一种对批判的元批判 。这正是康德的早期批评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也是康德在哥尼斯贝格的同胞，约翰·乔治·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的观点，他发明了“元批判”（*Metakritik*）这个概念，至今仍然是德国哲学中的常用词。如果康德代表了并试图捍卫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那么，哈曼则代表了与启蒙运动相反的声音，这种观点将在名为“狂飚突进”（*Sturm und Drang*）的美学和文化运动以及早期的德国启蒙运动之中蓬勃发展。哈曼在1758年一次失败的伦敦商务之旅期间经历了某种有趣的同性恋体验，之后戏剧性地转向了宗教。康德受雇于哈曼在里加的先前雇主，把这位重生的宗教迷带回理性之路，关于哈曼与康德之后这段关系的描述，则是历史小说的最佳素材。

图4　约翰·乔治·哈曼（1730—1788）画像

但这里我跑题了。哈曼在1784年的《理性纯粹主义的元批判》中批评了康德的形式主义，即他对知识的形式特征的过高评价，以及相信理性可以与经验相分离，先验的东西可以与后验的东西相分离。哈曼的批评预示了他的朋友，也是他长期的邻居弗雷德里希·海因里希·

雅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以及黑格尔的批评，并形成了下面这一观点：即认为康德的批判哲学可分解为一系列恶的二元论（形式与内容、感觉与知性、理性与经验、自然与自由、纯粹之物与实践之物等等），而实践理性的首要性完全是抽象责任的空洞的形式主义。在哈曼看来，理性与经验，或者说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分离是不可能的，因为思想依赖于语言，它当然是两者的混合；这是对之后哲学发展，即向语言学方面的转向的另一个不可思议的预言。你如何能够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区分概念和直觉呢？他写道："不仅是整个思维能力依赖于语言……而且语言也是处于对于其自身理性的误解之中。"

所以，如果理性一定要批判一切事物，也就一定有一种对理性的元批判。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什么东西可以防止这种元批判变成一种激进彻底的怀疑论呢？正如弗雷德里克·贝瑟尔（Frederick Beiser）所说，"噩梦出现了：对理性的自我批判以虚无主义——即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告终。这种恐惧就是启蒙运动的危机的主要内容。"我下面将尝试阐明，正是虚无主义概念使得人们可以区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这个问题就是18世纪末德国的两个重要冲突——泛神论的冲突和无神论的冲突——的核心，而雅可比则处于两者的中心。

泛神论和无神论的冲突——雅可比的意义

泛神论的冲突始于1785年雅可比的《论斯宾诺莎学说书信集》的出版，这是他与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通信，讨论的是莱辛（G. E. Lessing）晚期对斯宾诺莎主义的令人震惊的认同。当时大多数优秀的思想家都参与了这场冲突，包括门德尔松、康德、约翰·赫尔德（Johann Herder）、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和哈曼。巴吕赫·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在这场冲突之前是被荒谬地丑化为某种理性主义的泛神论

者，或者更糟糕地，是一个邪恶的无神论者。这场冲突附带的一个结果就是结束了这种丑化，以诺瓦利斯将其描绘为“醉神之人”（*Gott vertrunkene Mensch*）告终，但这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雅可比利用了莱辛对斯宾诺莎主义的认同，提出了对启蒙运动的发自内心的批评。雅可比的观点是，首先，斯宾诺莎的哲学就是理性主义的范式，而且，理性主义，只要一直坚持下去，就会走向无神论。所以，与启蒙者（*Aufklärer*）康德相反，理性导致了宗教信念或道德生活的基础的瓦解。如果是这样的话，雅可比补充说，那么我们就要作出清楚而且更为明确的选择：或者是欢迎启蒙运动的理性的无神论，或者是通过信念的非理性跳跃而抛弃无神论。雅可比在阅读帕斯卡时获得了这一灵感，在帕斯卡看来，“没有什么会像否定理性那样如此与理性相一致。”这就是说，理性的正确运用使得我们必须承认超越它的东西：信念的领域。雅可比对帕斯卡赌注的看法也对另一位后来的世俗理性主义宗教批评者至关重要，此人就是索伦·克尔恺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理性和合理性地位与人类存在的诸多非理性之间的这一冲突，迄今为止一直处于欧陆传统分歧的核心，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贝瑟尔恰当地指出，“毫不夸张地说，这场争论提出了整个欧陆传统的界定问题，即理性权威的问题。这样，所谓的‘后现代困境’实际上开始于1786年。”

决定欧陆哲学道路的另一个问题是无神论的冲突，这场冲突始于1798年，1799年导致费希特因信奉无神论的指控而被免去耶拿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的职位。这场冲突缘起于1798年出版的各种匿名的攻击性小册子，随后就是费希特以及现在已鲜为人知的弗雷德里希·C. 费尔伯格（Friedrich C. Forberg）在杂志上发表的论宗教和道德地位的文章。费希特被免职是一件相当令人不快和惋惜的事情，与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本人1940年在纽约遭遇的无神论冲突有相似之处，当时他由于宣传无神论和开明的性道德观点招致针对他的人格诋毁运动，因此被阻止担任纽约城市大学的教职。金凯太太领导了这场反对罗素的运动，她的律师约瑟夫·戈尔茨坦把罗素描绘为“淫荡好

色、贪婪纵欲、色情狂、傲慢狭隘、不诚实、道德沦丧”的人。真是荣耀之至！从苏格拉底的时代以来，哲学家们一直都背负着腐蚀了青年人的道德这一骂名。虽然18世纪90年代的耶拿和20世纪40年代的曼哈顿不尽相同，但我们应当牢记的是，耶拿正是这个时代德国思想生活的哲学中心，是当时许多伟大思想家的家园（费希特、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谢林），也是炼就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或称耶拿浪漫主义的熔炉。

图5　弗雷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1743—1819）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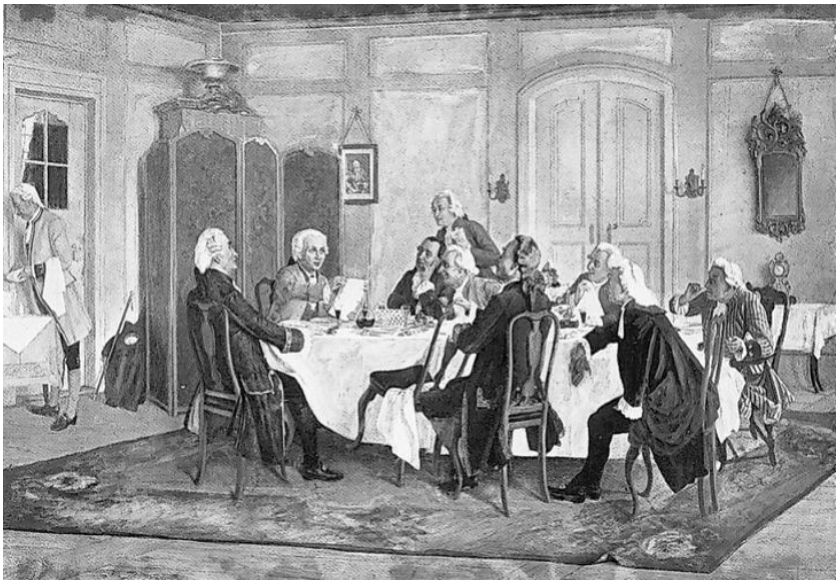

图6　埃米尔·多斯蒂灵，虚构的康德家的晚餐，在座者有哈曼、雅可比等（1801）

虽然历史上这场争议的细节很是有趣，也多少有些使人感到压抑，但它却随着雅可比1799年发表了举足轻重的《致费希特的信》而在哲学上变得重要起来。在这封信中，我们看到虚无主义 这个概念第一次用于哲学上。简单地说，在雅可比看来，费希特的立场，即我们所称的费希特唯心论，就是虚无主义。要理解他这种说法的含义，就必须联系上述康德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的泄气效果，它不仅否定了人类可以认识到古典形而上学的思辨对象（上帝、灵魂），而且消除了认识自在之物和康德所描述的自我之“本体”（noumenal）基础，即没有现象呈现的可能性。雅可比的基本观点是，费希特重建康德的先验唯心论，导致了一种贫瘠的自我主义 ，即没有任何关于客体或主体自身的知识。这是一种虚无主义，因为它允许自我之外或离开了自我就无物存在，而自我本身则仅仅是“自由的想象力”的产物。雅可比在一段非同寻常的文字中申辩道：

如果我可以反思到的，也就是我可以沉思到的最高之物，就是我纯粹空洞、

十足赤裸的自我，它自身是自由自主的：那么，理性的自我沉思以及合理性，在我看来就是一种诅咒——我哀叹我的存在。

针对他所认为的费希特唯心主义的一元论，雅可比提出了一种哲学的二元论，认为在对真理（*die Wahrheit*）的哲学专注之外还有真事物（*das Wahre*）的领域，只有信仰和心灵才能触知这个领域。又一次，雅可比对费希特的批判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帕斯卡对笛卡尔的批判，即，虚无主义是基督教世界观给世俗化的理性主义扣上的罪名。因此，我们面临的存在选择，既无法得到理性证明但又必须下注的选择，就是在费希特的唯心论与雅可比的二元论之间二者择一，前者是一种虚无主义，因为它未提供任何超出自我投射之外的知识，而后者则被雅可比自我嘲弄地描述为“幻想主义”，因为它声称上帝就是理性的本质，但却不能合理地证明这一点。雅可比得出结论：

> 但人类拥有这样的选择，这个唯一的选择：空无或者一个上帝。选择了空无，他就使自己变成了一个上帝；就是说，他使一个幽灵变成了上帝，因为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人类以及周围的万物就不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幽灵。我再重复一遍：上帝是一个在我之外的活的存在，自身就存在着，或者我就是上帝。没有第三者。

否定了上帝，我们就面临着把人类变成上帝的风险。这就是说，康德和费希特的唯心论中存在着一种普罗米修斯似的诱惑，即人类变成了上帝的某种复制品，由空无中创造而生（值得回想一下，雪莱夫人［Mary Shelley］的小说《弗兰肯斯坦》（1819）副标题就是“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某种怪物给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性主义投下阴影）。

为了表明这种思想在欧陆传统中的意义，让我再举几个例子。如果虚无主义是对哲学的自我主义的指责，其中前康德世界观中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那么，我们就会在马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的不寻常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4）的自我主义中找到对雅可比的批判的怪异的证明，这本书在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克·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中遭到了大篇幅摧枯拉朽的批判。被雅可比贬低为虚无主义的东西，施蒂纳却以无政府主义姿态将其推崇为个人的自由。施蒂纳认为，如果我是无，那么，“我不是在空洞意义上的无，而是创造性的无，我由此作为创造者创造了万物。”施蒂纳试图表明，黑格尔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对宗教的批判仍然无可救药地落入了宗教思维方式的羁绊，而他这种尝试导致的反常结果则是，他在回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把自我转换为了上帝的复制品。人类成了自我造成的原因，类似中世纪神学的目的因（the *causa sui*）。施蒂纳在一个世纪后的萨特存在主义那里得到了奇怪的共鸣，人类在没有上帝的、虚无主义的世界中拥有了情绪激昂的自由，变得如上帝般神圣。这就是为什么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的结尾会说，“人是无用的激情。”

我们还可以看到，雅可比关于帕斯卡赌注的说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小说《群魔》（1871）对虚无主义者基里洛夫的刻画中得到了回应。

> 每个渴望最大自由的人，一定都敢于自杀。而敢于自杀的人就已经获知了欺骗的秘密。除此之外就没有自由；这就是全部，除此之外就一无所有。敢于自杀的人就是一个神。现在，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以使得没有上帝，有的是空无。但是迄今还没有人这样做。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立场称为“逻辑的自杀”。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一旦人类把自己提升到了牲畜之上的程度，那么，关于人类存在的“基本的”、“最高的”和最为“崇高的”观念就变成了绝对是完全必要的：相信灵魂的不朽。一旦这个信念坍塌了，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60年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的虚无主义或麻木不仁中看到的那样，自杀就成为了唯一的逻辑结果。这样，不再相信灵魂不朽的基里洛夫曾想写一本书，探究为什么人们不去自杀。

因此，人们会说，欧陆传统中有一条从哈曼和雅可比对康德的批

判走向克尔恺郭尔、施蒂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的，而实际上是非宗教的反理性主义，再走向萨特和加缪的战后法国存在主义的道路。

统一康德的二元论

18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批判康德哲学的附带的效果是，启蒙主义对于理性的信念似乎比以往更为可疑了。正如贝瑟尔所说，“康德并不是在阻挠而是在煽动理性的自我毁灭，走向深渊。”对康德的这种看法在哲学上是否可以得到证明，这显然是另一个问题。关键在于，围绕着如何界定欧陆哲学传统的一系列争论都离开了这个观点，而我的观点则是，欧陆哲学只能基于这一点加以理解。

图7　弗雷德里希·哈格曼，康德准备芥末的画像（1801）

让我最后回到前面的论证，即康德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需要统一的二元论。这是由被康德视为他的最好批判者的哲学家提出的反对意见之一，他就是萨洛蒙·迈蒙（Salomon Maimon）。迈蒙的批评发表在1790年的《论先验哲学》中。他的核心论点是，康德处于先验唯心论核心的知性与感性之间的二元论很是极端和深刻，它阻止了先验概念与经验直觉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这就是说，先验演绎的论证正是由于康德为了实行这种演绎提出的二元论而变得无效了。这就是某些欧陆哲学家喜欢说的“施为性的自我矛盾”。

这里重要的是要看到，迈蒙的批评是如何为后康德主义哲学确定了基调，我们如何克服康德体系中致命的二元论呢？我们需要的是某个更高的统一原则，它可以免于这些批评。费希特和德国唯心论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费希特把这个统一原则确定在主体活动之中。理论与实践的二元论被统一到主体的自我反思，即自由意识之中。这就是费希特在著名的《知识学理论》（1794）中探讨的观点。与之相反，对年轻的谢林来说，这个统一原则是力或生命的概念，这在他早期的自然哲学中得到了表述。在黑格尔看来，它就是精神概念，在叔本华那里，它就是意志概念，对尼采来说就是权力，对马克思来说就是实践，对弗洛伊德来说就是无意识，对海德格尔来说就是存在。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补充。这里的关键是，欧陆哲学的主要问题都出自对康德的批评，因此也必须在这个背景中加以理解。

第三章

视物的眼镜和眼睛：哲学中的两种文化

看出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这种区分存在重大问题，并不需要有多聪明。欧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兼收并蓄、互不关联的思想潮流，很难把它们说成是一个统一的传统。这样，欧陆哲学是一种发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英美学派在欧陆的投射，欧洲大陆并不承认这个称呼的合法性——这有点像在巴黎要一份欧陆式早餐。

然而，如果把欧陆哲学这个概念依其表面看作是一个地理范畴，那么，又会引起其他问题。有些哲学家来自欧洲大陆，比如弗雷格和卡纳普，但他们并不被认为是欧陆哲学家，而有些哲学家在欧洲大陆之外，但却被看作欧陆哲学家。而且，从地理上说，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达米特曾正确地指出，“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具有同样明显的地名准确性问题）这个名称弊大于利，因为它将分析哲学剥离了其德语世界的起源。达米特有些恶作剧般但却很准确地提出了一个替换名称“英奥哲学”。

对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区分的一个意义更为深远的反对意见是由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提出来的，他认为，这个区别混淆了地理上的术语和方法论上的术语，就像是我们把汽车分作前轮驱动的汽车和日本车一样。虽然分析哲学通常是与某些地方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牛津或普林斯顿，但它涵盖了某种哲学论证的方法、某些论证以及清晰性和严格性的标准，而欧陆哲学则是指某个地方，不考虑什么方法论。因此，在威廉斯看来，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区别基于混淆了方法论范畴和地理范畴的比较。

然而，即使严格地按照地理上的范畴（比如“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或者按照方法论范畴（比如“分析哲学”与“现象学”）重新表述这两对术语，仍然无法纠正这种混淆。如果从地理上重新表述这种对立，那么就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这就会错误地暗示，英国、北美和大洋洲的哲学从界定上来说属于非欧陆的哲学，而分析哲学的奠基者（弗雷格）和最重要代表（维特根斯坦）无疑就是欧陆哲学家。如果是从方法论上重新表述这种对立，那么这就几乎根本无法解释，在这个界限的一边，很少有哲学家能被说成是在从事传统形式的哲学分

析（且不提对最近几年的“后分析”哲学的所有讨论），而在另一边，则完全不存在任何范畴可以涵盖在方法论和主题上相对的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如黑格尔和克尔恺郭尔、弗洛伊德和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海德格尔和阿多诺（Adorno）或者是拉康（Lacan）和德勒兹。

威廉斯对在哲学学派和学说之间进行这种区分提出了理由充分的质疑，因为它掩盖了就哲学本身的特性而论更为深刻、更有意义的可能的辩论，并使其无法进行。尽管不得不批评威廉斯的是，基于对哲学与自然科学程序之间颇有疑问的类比，哲学的特性在他看来以分析哲学为最好的代表，因为它具有“精巧的真实性”这种更体现人的特点的长处，但他在这里显然有一定道理，我在本书的结论部分将会回到这个论题。要把某人归属为所谓的哲学分野的任何一方，最后都会有些狭隘，在思想上也是怯懦的，因为这阻止了可能的思想挑战，这种挑战是超越我们专业固守范围的对话的结果。

一些残留的陈规

然而，在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区分放到一边之前，至少应尝试一下去诊断和祛除某些残留的文化陈规。哲学的专业固守范围会继续存在，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通过探讨一些选择的例子，找到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以讽刺挖苦的口吻熟练地概括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区别的模式化的表达：“精确性、概念的清晰和系统上的严谨，这些就是分析哲学的特性，而欧陆哲学家则沉溺于思辨的形而上学或文化阐释学，或者是依赖于人们的同情，沉溺于胡思乱想、平庸乏味。”我担心，这种成见会因为新闻界的争论和某些糊涂的专业哲学家的评论而进一步加深。作为后一种情况的例子，人们只需想想1992年剑桥的德里达事件就够了，剑桥大学某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反对授予德里达名誉博士学位。在反对派输掉了投票表决的

第二天，一份有分量的英国报纸刊出了大标题“认知的虚无主义袭击了英国城市”。

1960年在法国举行的一个关于分析哲学的研讨会上，在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的论文发言之后进行的过激而臭名昭著的讨论中，分隔分析传统与欧陆传统的鸿沟得到了最为清楚的表述。当时，梅洛–庞蒂申辩说：“我们的纲领不是一样吗？”对此赖尔回应道：“我希望不是。”正是这个“我希望不是”，这个面对欧陆明显异国情调的坚定的“不是”，恰好揭示了一种在哲学中应当没有地位的意识形态偏见。这就是撒切尔夫人在拒绝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的欧盟计划时说的“不！不！不！”而这成为她1990年政治生涯衰落的起因。这里的悖论是，年轻的赖尔是作为现象学的提倡者开始他的哲学生涯的，他1930年发表在《心智》杂志上的处女作就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引人注目的全面评论，而他30年代在牛津的讲座对波尔查诺、布伦坦诺、弗雷格、迈农（Meinong）和胡塞尔进行了广泛论述。达米特低调地说：“极其遗憾的是，他关于那些作者的了解几乎都没有以文字形式保留下来，同样，在我看来，他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在他后来的思想中也几乎没有保留下来。”

还是有关梅洛–庞蒂，艾耶尔（A. J. Ayer）在他的自传中用以下回忆雄辩地证明了分隔分析哲学家与欧陆哲学家的这个鸿沟：

> 人们或许会希望，梅洛–庞蒂和我应当找到共同的讨论基础。我们的确在一些场合中尝试过，但这种努力没有进行多久我们便开始就某些双方均不愿让步的原则问题争吵起来。由于这些争论往往会变得尖刻，我们心照不宣地把它们搁置一下，只进行单纯意义上的社交，这仍然会使我们有足够的话题进行谈论。

这听上去有点像是达米特说过的那种隔着鸿沟喊叫。另一个也涉及到艾耶尔的例子更为有趣，甚至多少有些不大可能。这涉及到艾耶尔与最为极端的欧陆思想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之间的会面，巴塔耶是一位反哲学家、不可知论者、反神学者、色情主义者。他们于1951年在巴黎一个酒吧相会，在场的还有梅洛–庞蒂。显

然，这场讨论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而讨论的主题则非常简单：在人类存在之前太阳存在吗？艾耶尔认为没有理由去怀疑这一点，而巴塔耶则认为这整个命题毫无意义。对于一个接受科学世界观的哲学家来说，比如像艾耶尔，说类似太阳这样的物理对象先于人类的进化存在，这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对现象学更为通晓的巴塔耶而言，物理对象一定是从人类主体的立场得到感知才能说是存在的。假如在这个命题所假定的时间没有人类存在，那么说太阳先于人类存在就是没有意义的。巴塔耶得出结论说：

> 我应当说，昨天的对话产生了令人震惊的结果。法国哲学家与英国哲学家之间存在着一种深渊，这是我们在法国哲学家与德国哲学家之间没有看到的。

作为揭示了欧陆哲学仍旧面对的这种挥之不去的成见的例子，我们可以作为个案研究探讨一下安东尼·奎因顿爵士（Lord Anthony Quinton）晚至1995年发表在《牛津哲学指南》上关于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两篇文章。奎因顿关于分析哲学的文章很好地概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虽然它过于简单而无法用于说明这个领域战后的发展情况。他在结论中提到了分析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他们秉承分析的精神思考和写作，尊重科学，将其看作合理信念的典范，符合分析精神的严谨论证、清晰性和坚定的客观性。”然而，同样是这种坚定的客观性并没有出现在奎因顿关于欧陆哲学的相应文章中。文章一开始，十分合情合理地，奎因顿适时指出，在英国，欧陆哲学的流行含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新附加上的。他还对作为拉丁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显著特征的哲学研究的统一作了有价值的评论。那是英国哲学家与欧陆哲学家之间一场令人欣赏的、毫无争议的对话，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时期，当时，洛克阅读的是笛卡尔、伽桑狄（Gassendi）和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的著作，休谟读的是培尔（Bayle），并对卢梭有所了解，穆勒研究的是孔德（Comte），如此等等。到此为止，没有发生什么分歧。然而，奎因顿接着说，“实际上在这两个哲学世

界之间并没有可以觉察到的融合，”而且，好像是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当然是无意的），他对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都给出了相当令人震惊的概括：第一个遭到了摒弃，（但却没有恰当地涉及现象学），因为它依赖于“戏剧性的、甚至有些夸张的说法，而不是持续的理性论证”；第二个被说成是“到福柯时推到了高潮，而在德里达那里超越了自身，在外围思想空间中得到了呼应”；第三个则是以下面的话令人困惑地匆匆了结：“批判理论家们明显的政治意图打消了号称保持中立的分析哲学家们一方的任何兴趣。”如果这些评论可以说是展现了对中立的坚持，更不用提以上所说的严格性、清晰性和坚定的客观性这些优点，那么，完全可以认为奎因顿的信念是有道理的，即在这两个哲学世界之间并没有任何可能的融合。毋庸赘言，这种评论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我认为，在思想上也是狭隘的，其作用只会使这种有害的文化成见永远继续下去。

欧陆哲学——专业的自我描述和文化特征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以及两派哲学家之间的这个鸿沟呢？至少在英国的读者看来，“欧陆”这个形容词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这个形容词的其他用法，比如“欧陆式早餐”，或者是我母亲那时候常用的说法“欧陆式盖被”。这就是说，正是这个地理词，或者说是地名 ，指存在于特定地方（即欧洲大陆）的某个东西。这个形容词引出了欧陆的和非欧陆的区分，而从英国人的角度看，这个区分常常有恶化成英国人与欧陆人之间的对立之虞，欧陆人被界定为外来的、异国情调的、陌生的，而英国人则被看作亲切的、本土的、熟悉的。这样，“欧陆”这个概念就暗指了看起来难以对付、老实说让人十分讨厌的政治地理学问题，这就是，究竟是英国脱离了欧陆还是欧陆脱离了英国（回想一下那个臭名昭著的报纸标题：“浓雾笼罩海峡。大陆遭到阻隔”）。

现在，我想就欧陆哲学的历史意义说两点。首先，这本质上是一

种专业的自我描述 ：就是说，这是哲学家们和哲学系组织研究和教学的一种方式，表明了他们的思想联盟。从这种意义来说，欧陆哲学是哲学专业化的一个特征。在这种严格意义上，“欧陆哲学”这个概念是新近才创造的。虽然人们对于欧陆哲学的概念被视为专业描述的起源并不存在什么共识，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欧陆哲学并未成为哲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名称。显然，它在美国出现的时间早于英国，而在英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在埃塞克斯大学和华威大学开设了关于欧陆哲学的研究生课程。在美国，以及较小程度上在英国，“欧陆哲学”一词代替了以前所说的“现象学”或者“现象学与存在哲学”。这些术语还保留在英语世界中与欧陆哲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专业学会的名称中，比如1962年建立的“现象学与存在哲学学会”和1967年建立的“英国现象学学会”。这样看来，在战后时期，欧陆哲学在广义上就等于现象学（通常带有存在哲学的外表），这也反映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一些介绍性著作的名称中：《现象学导引》（1965）和《现象学在美国》（1967）。1983年出版的《欧陆哲学在美国》正是模仿和变换了后一本书的名称，这一点似乎具有暗示性。“现象学”为什么被替换成了“欧陆哲学”，其原因并不十分明了，但这似乎是要引导人们去考虑各种所谓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运动，它们逐渐远离了现象学，并常常对现象学采取敌视的态度：这种倾向较弱的是拉康、德里达和利奥塔（Lyotard）的思想，较强的则是德勒兹和福柯的思想。

图8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四位哲学家》

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这种实际上的区分，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哲学的随附现象中看到，比如要求求职者是“欧陆主义者”，以及在出版社的分类目录中，其中专门有几页就是关于欧陆哲学的，通常放在目录的后部。约翰·塞尔（John Searle）就洋洋得意地断言，分析哲学在英语世界有一种近乎垄断的专业霸权地位，而各种类型的非分析哲学（比如现象学）就感觉需要界定自己与这种霸权关系的地位。然而，虽然有这种毫无争议的霸权，在英国、爱尔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仍然有一些大学以欧陆哲学为专门研究领域，在美国就更多，大多

是一些天主教大学，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在那些分析哲学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系里，常常有一些课程或文章是关于“近代欧洲哲学”、“后康德哲学”或“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这些课程的开设有时是为了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这在这个领域中通常很重要。而且，欧陆哲学的影响力在英语世界，特别是它最近的法语版形式，被认为在哲学系之外比在哲学系之内更为强大，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许多理论创新：文艺理论、艺术史和理论、社会和政治理论、文化研究、历史编撰学、宗教研究和人类学，更不用说在美术、建筑、女性主义和心理分析领域的争论。特别发人深省和重要的是，英语世界对欧陆思想的接受大部分都发生在哲学系之外。

然而，假如这就是事情的完结，那么，对欧陆哲学的讨论，就会像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其他专业分歧一样，没有什么普遍意义。要想解释反映在奎因顿的轻蔑和巴塔耶的震惊中围绕欧陆哲学的争端的这种持续不断的烦躁不安，我们就得作出第二个说明。这就是说，欧陆哲学概念作为一个专业的自我描述，更有争议，更具破坏性，因为它涵盖了一层更为古老的文化 意义，回到了关于英国和英语世界与欧洲大陆之间关系的争论上，比如，这些争论在当代英国政治中就大量存在。在这种意义上，有关哲学传统的认同问题就完全陷入了政治地理学的意识形态偏见之中，表达为这样一些错误模糊的概念，比如“英国的经验主义”、“法国的理性主义”、“德国的形而上学”等等。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有趣案例

英国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关系的思想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追溯到出现了用本国语言（比如法语和英语）而不是用拉丁语书写哲学的时候。这里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蒙田（Montaigne）1580年用法语出版了《散文集》，培根1605年用英文出版了《学术的推进》。但可以解释我们所界定的“欧陆哲学”出现的关键因素，我相信则是开始于很晚以后，即在法国革命之后，英国接

受了康德、德国唯心论和浪漫主义的那些年。这里的关键人物是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以及他对德国唯心论和浪漫主义深有影响的、可以算作是具有个人特色且不合常规的理解。在这方面最有吸引力的是穆勒于1832年和1840年发表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关于边沁的两篇长文。在论及德国对柯尔律治的影响时，穆勒谈到“欧陆哲学家”和“欧陆哲学”。他也谈到“德国的柯尔律治理论”和“法国哲学”。早在论柯尔律治的文章中，穆勒就写道：

> 谁能掌握这些前提并把这两个人［柯尔律治和边沁］的方法结合起来，谁就掌握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整个英国哲学。柯尔律治曾说过，每个人都生为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每个英国人都是潜在的边沁主义者或者是柯尔律治主义者；他们对人类事务的观点，是只有根据边沁的原则或者柯尔律治的原则才能证明为真的观点。

这里的有趣思想是，边沁和柯尔律治的结合就使人们看到了这个时代英国哲学的全貌。而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倾向因此就被赋予了两个问题：穆勒认为，边沁对古代的理论或众所周知的看法都是质疑：“它是真的吗？”而柯尔律治询问的是，“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欧陆哲学”关心的是意义，而与之相反的边沁主义则关心真理。用我开篇的概要模式来说，如果边沁关心的是知识问题，那么，柯尔律治关心的就是智慧。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对穆勒在这里所说的话作一番心理分析，因为在1826至1827年的冬天，他经历了一场严峻的“心理危机”。穆勒像许多年轻人那样自问道，如果他一生中的所有目标都得以实现，他是否会感到幸福；他不得不回答说，他不会幸福。穆勒出色的实利主义教育给他带来的是知识，但智慧，或者确切地说是幸福，却并不够用。穆勒通过阅读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诗歌，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己的沮丧情绪，他写道，“从它们［诗歌］那里，我似乎学到了什么是幸福的永恒源泉。”用穆勒的话说，他知道了“我不是一根木头或一块石头”，他最后不同意边沁的这个判断，即“诗歌不过就是一

个微不足道的东西”。穆勒确信它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并沉浸于阅读柯尔律治主义者及其德国前辈的著作，比如被穆勒推崇为“多面手”的歌德以及人文主义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询问穆勒，他是否完全改变了对一切事情的看法，穆勒回答道，“我相信眼镜，”暗指他一直被教导所要遵循的逻辑，但又补充说，“但我认为眼睛也是必要的。”

回到穆勒的两篇文章，边沁是伟大的“颠覆者”，或者“用欧陆哲学家的语言说，是他那个时代和他的国家的伟大的批判思想家”。这种颠覆性的批判所使用的是逻辑分析和经验感觉的方法，寻求的是“实践事务”的真理。在穆勒看来，边沁是休谟的怀疑论在实践方面的延伸，特别是在法律和政府领域的运用。凭借他的聪明才智，边沁以社会改良主义的精神运用了这些批判才能，推进了公众福祉。另一方面，柯尔律治并不关心寻求关于万物的真理，而是关心寻求它们的意义。这样，他的方法就不是去解构已经认可的学说和传统，而是提出对这些学说和传统的意义进行阐释学重建。用现代术语来说，考虑到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富有影响力的思想，我们会把这叫做一种处理问题的“语境主义”方法。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某个实践活动、事件或者是文本的意义，那么，我们就要重构它在历史上的出现，把它放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复杂脉络之中。在这种意义上，或许令人惊奇的是，“柯尔律治式的欧陆哲学”正是传统上的保守主义，是社会变革的最大敌人，而边沁则是对传统进行解构，因而是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朋友。人们通常以相反的方式来理解对传统或趋势的区分，即分析哲学被看作是保守的，是在那种有着皮质镶边椅的上层休息室里的乏味闲聊，而欧陆哲学则与之相反，是时髦独特的、有着街头智慧的、身着皮上衣的。有趣的是，我们会有机会看到卡纳普与海德格尔冲突中类似的政治分野，前一位是进步的改良主义者，而后一位，在最极端的时候，则是保守的反动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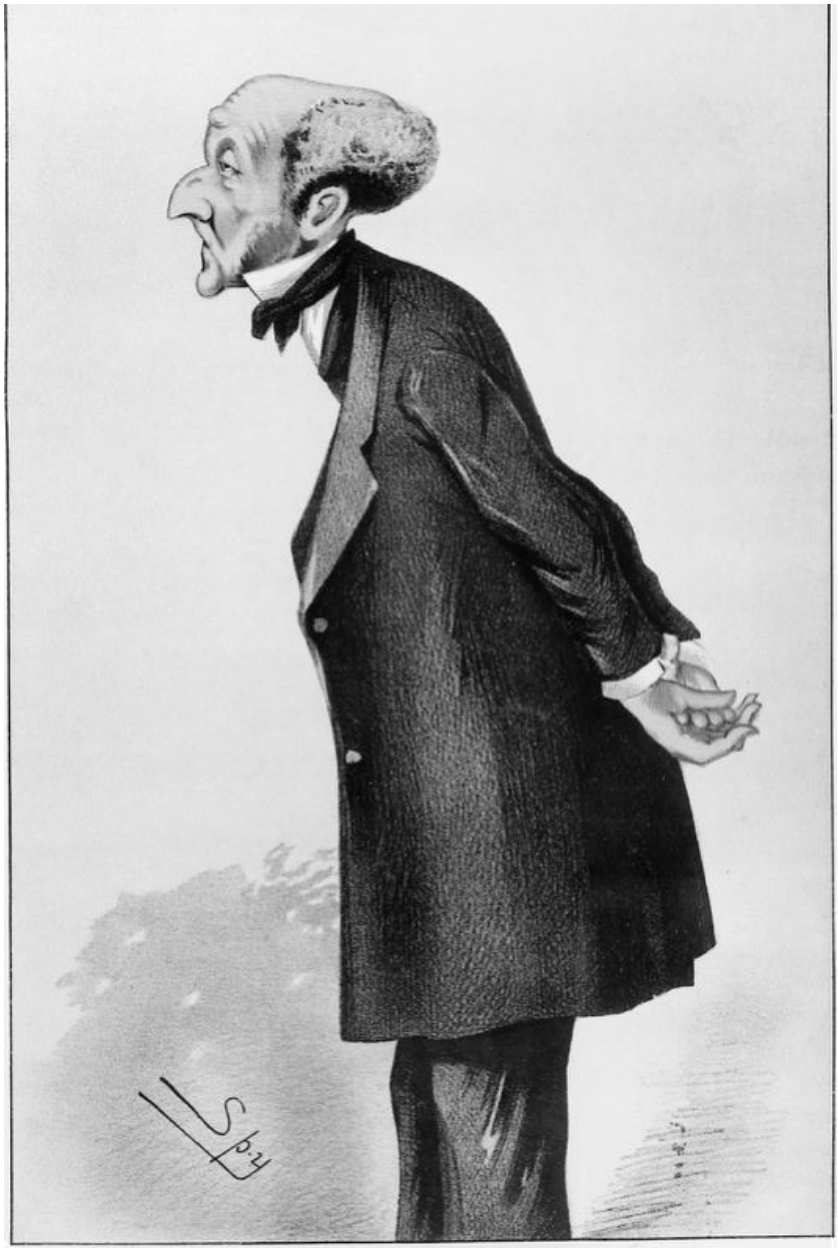

图9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的漫画形象

我们可以从穆勒的论述中概括出其中一些对立：

边沁	柯尔律治
真理	意义
批判性解构	阐释性重构
社会变革和改良	社会保守主义
进步	传统
（分析的）	（欧陆的）

这样看来，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差别就不是不同地方的地理上的差别，比如英国与欧陆的差别，而是一种所谓的“英国人的哲学心灵”内在的差异。换句话说，这是某一种文化天生具有的差异，这种文化由此就内在地进行了分割，被完全宗派化了。穆勒比较了哲学的冲突与宗教的偏狭，意味深长地指出了这一点。

英国的哲学精神如同宗教精神一样，从根源上仍然是宗派的。保守的思想家与自由主义者，先验论者与霍布斯（Hobbes）、洛克的追随者，互相把对方看作超出了哲学讨论的界限，把对方的思考看作受到了原罪的污染，这使得他们的所有研究，除了出于攻击的目的之外，即便并非是恶意的，也都是毫无用处的。

虽然这写于150多年前，但却很好地描述了许多哲学家看待处在把他们分割开来的海峡——或者院系走廊——对面的专业对手的方式。专业的哲学冒险，就像宗教冲突一样，具有了派性，人们只是为了准备攻击敌人才去研究对方。但我们还是不要过分纠缠于这种令人厌恶的细节。

那么，应当做什么呢？穆勒提出了以下有趣的建议。

因为，在那些长期为欧陆哲学家所认可、但却几乎没有英国人得到过的真理之中，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抗性的思维方式，虽然目前的表现方式是不尽完善的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对思考的双方都是必要的，就像是政治制度中的相互监督权力。的确，对这种必要性的清晰看法是哲学宽容的唯一理性的或持久的基础……

穆勒继续补充道，哲学事务中的最大危险，

与其说是在真理中包含了错误，倒不如说是把部分真理当成了全部。可以有理由认为，在社会哲学的几乎每个主要争论中，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争论双方对于他们肯定的东西都是有道理的，然而对于他们所否定的东西却多有偏颇；如果任何一方都能够在自己的观点之外考虑一下对方的观点，那么也就不会再需要什么去使自己的观点保持正确了。

可以说，这段话给了我们不少启示。首先，“欧陆哲学”所共同遵循的一个真理就是对抗性思维方式的必要。就是说，真理并不在于整体中的某个部分，而是要通过反思这样一个整体才能获得。尽管穆勒并没有提及黑格尔，但这正是黑格尔的思想，接近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黑格尔写道，“真理是整体”，这就是说，如果人们要获得哲学事务中的真正智慧和知识（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的知”），那么就必须将构成哲学的历史和现实的浩瀚无边的命题和观点，视为每一个都表达了一粒真理。从一堆稻谷中拿起一粟，就意味着可能失去了人们原本可以从整堆谷粒中烤制出的那个味道浓郁的面包。

穆勒比较了对这种对抗论或辩证法与监督和制衡的需求，后者是自由民主的政府制度的精华所在。一种存在竞争党派的政治制度，其合理性就在于，反对党的责任就是要不断地考察执政党的政策和立法，如果角色掉转也是如此，它们必须这样做。那么，根据穆勒的乐观看法，哲学上的错误就是将部分真理当成了整体，或者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担心出错压过了对真理的渴望。在这种意义上，这并不是要决定边沁和柯尔律治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把这两种哲学倾向看作共同表达了更大的真理，就是说，人类关注的是真理与智慧这两个问题，他们既需要赖以观察的眼镜，也需要看待事物的眼睛。哲学既需要批判的和逻辑的解构，也需要耐心的阐释学重建。这样，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就是更大的文化整体的两个部分，哲学事务的真理并不是通过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得到的，而是像穆勒所说的那样，“在自己的观点之外考虑一下对方的观点。”

哲学中的两种文化

综上所述，我对欧陆哲学作出了两种历史断言：它是一种专业的自我描述，也是一种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自我描述，欧陆哲学是这门学科专业化中必要的（但或许是过渡性的）灾难。作为一种文化特征，欧陆哲学至少要追溯到穆勒的时代，他教导我们的是，哲学传统的分野表达的是内在于“英国性”的冲突（而且甚至是一种宗派的冲突），而不是英语世界与欧洲大陆之间地理上的对立。这样，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鸿沟表达的是分庭抗礼的思维习惯之间的分野，我们可以把它们叫做“边沁式的”思维习惯和“柯尔律治式的”思维习惯，或者经验的–科学的思维习惯和阐释的–浪漫的思维习惯。穆勒更深一层的看法在于，要发现哲学和文化上的真理（无论它们是什么），并不是通过选择立场，由此把某一方面错认为是整体。相反，用黑格尔的话说，真理就是整体，而整体只有在系统的运动和历史的发展中才能得到理解。本书就是希望能够对这种理解有所贡献。

我相信，分析哲学家们对欧陆哲学表现出的大多数敌意和怀疑，都是由于对这样两种说法（专业的和文化的）的毫无助益的混淆以及对立场的选择。但这种敌意并非总是单方向的。除了某些分析哲学家具有的边沁式的粗鲁之外，这种敌意也来自某些欧陆哲学家的柯尔律治式的疯狂，他们未能把握其文化定位的条件，而是说着他们部落式的语言。例如，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是伟大的哲学家，但绝对没有必要用英语像他们那样写作。这种情况的结果往好了说是令人尴尬地缺乏独创性，而最糟的情况则是，无法理解。于是，欧陆哲学家必须要理解的是欧陆哲学的“英国性质”。虽然我在这里无法对此展开论述，但我认为，同样也可以这样去说欧陆哲学在英语世界中的“美国性质”、“澳大利亚性质”、“加拿大性质”，如此种种。

换句话说，哲学中存在两种文化，除非这种情况得到了恰当的反思，否则在哲学中，实际上是在文化中，不会有任何改变。在穆勒论柯尔律治的文章发表了将近120年之后，1959年5月7日，斯诺在剑桥大学的参议厅作了著名的瑞德讲座。在讲座中，他断定了一种共同文

化的缺失和两种不同文化的出现：一方面是由科学家代表的文化，另一方面则是斯诺所谓的“文人知识分子”代表的文化。如果前者赞成通过科学、技术和工业推进社会改革和进步，那么，知识分子则是斯诺所谓的“自然的卢德派分子”，他们理解和同情先进的工业社会。用穆勒的话说，这种分野就是边沁主义者与柯尔律治主义者之间的区分。《再论两种文化》（1963）写于1959年讲演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多年之后，斯诺在其中以无懈可击的简洁散文体表达了他论证的以下要点：

> 在我们这个社会（即先进的西方社会）中，我们甚至失去了对一种共同文化的伪装。我们所知的饱学之士在他们主要思想关注的层面上不再能够相互交流。这对我们这些具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的，首先是日常的，生活都是很严重的。这正引导着我们错误地解释过去，错误地判断现在，否定了我们对未来的希望。这正在使我们很难或根本毫无可能采取正确的行动。
>
> 我用两组人作为这种缺乏交流的最为极端的例子，他们代表了我所命名的“两种文化”。一组人包括了科学家，他们的分量、成就和影响无需强调。另一组则包括了文人知识分子。我并不是说文人知识分子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决策者。我是指，文人知识分子说出了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和预示了非科学文化的氛围：他们没有作出决策，但他们的话语渗入到了那些决策者的心灵。在这两组人（科学家和文人知识分子）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他们不是相互尊重，而是有些互相敌视。
>
> 这旨在对我们的存在状态进行一种描述，或者是一种非常粗略的大致描述。这就是我在情感上最为厌恶的状态，我认为这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这里显然是穆勒评论的回声，特别是这两种文化的不同代表相互感受到的敌意。正如在穆勒那里一样，这里不禁要对斯诺的努力作一番心理分析。他于1927年获得了化学一级优等学位，1928年起开始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在卢瑟福爵士领导下的世界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他之后成为了一名杰出的研发专家，1964年成为威尔逊政府新成立的科技部的副部长。然而，他对文学始终充满了热情，1932年还出版了一本侦探小说《船帆下的死亡》，紧随其后的是非常流行的《陌生人与兄弟》系列的11部小说。所以，在许多方面，他对这两

种文化危机的表达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呼喊。然而，也如在穆勒那里一样，这也正是更为普遍的文化反常的一部分。

斯诺受到了当时最杰出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利维斯（F. R. Leavis）严厉的人身攻击。他抱怨“斯诺一整套虚假的说法”，缺乏对文学的理解。这种精英式的短见斯诺完全不予理睬，但显然，在斯诺与利维斯争论中所表现出的也正是这里所说的边沁与柯尔律治、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类似冲突。的确，这是英国文化史中的常见冲突。最后举一个例子，历史上在穆勒与斯诺之间，有赫胥黎（T. H. Huxley）与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之争。简言之，赫胥黎于1880年在当时英国的工业中心伯明翰所作的讲演中，赞同科学教育，反对在大学占主导地位的普遍流行的古典标准。阿诺德1882年在剑桥的里德讲座“文学与科学”中回应道，文学和科学两者都可以被整合为一种更为普遍的、更为德国式的理解，即把科学理解为人文科学（*Wissenschaft*），理解为更为广义的知识。虽然这种回应富有启发，但对此的检验却是阿诺德对修正大学标准的古典主义表示坚定的反对。所以，这个历史还会继续，无疑还会增加其他更多当代的例子。

因此，我的看法是，我们可以用两种文化的模式更好地理解目前哲学上的分野，这种对抗的两极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我们所认为的文化。如此看来，这样两极中的任何一极或两者都绝对不可能消失。正如穆勒所说，对抗中有一个真理，这是为“欧陆哲学家们”已经了解了一段时间的。最可期待的是，对抗各方至少达成这样一个看法，即另一方的存在是合法的，一定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讨论的，而且最好是可以相互学习。

斯诺对这种哲学和文化分野的回答非常简单，可以概括为一个词，即教育 。在我看来，他仍然是对的。斯诺指出的文化反常现象，或多或少地直接融入到了1963年关于高等教育的《罗宾斯报告》以及一些“新大学”的建设之中，如苏塞克斯大学、华威大学、约克大学、基尔大学、肯特大学、东安吉利亚大学以及我所在的埃塞克斯大学。这些大学并未明言的要旨就是强调了两种文化问题，坚持学生要接受

广泛的教育，自然科学家应当研究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话题，反之亦然。令人沮丧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撒切尔政府发起了对大学的攻击，这一使命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些机构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交叉学科”这个意义模糊的法宝。

最后，我们来考虑一下斯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在《世界都市》中的论证。他大胆地提出，存在两种文化是因为现代性存在两种开端，一个是人文主义的，另一个是理性主义的。如果说笛卡尔的名字被习惯性地与后者联系在一起，那么，图尔明的意思就是说，开始于17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科学的现代性就遮掩甚至是歪曲了人文主义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可以追溯到出版于1580年的蒙田《思想集》中具有实践主义思想的人文主义怀疑论。在图尔明看来，（人文的和科学的）现代性始终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双重轨迹，这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真理与意义、知识与智慧这些整体的崩溃或分离。图尔明乐观地认为（在我看来过于乐观了，但却值得赞赏），我们需要把现代性加以人性化，这样，我们就需要实践哲学的重生。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重新激发了蒙田的人文主义怀疑论，恢复了从事哲学的实践动力。图尔明写道：

> 如果说这两种文化仍然疏远，那么它并非是出于20世纪的英国就的地域特殊性：它是在提醒我们，现代性具有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基于古典文学的人文的出发点，以及根植于17世纪自然哲学的科学的出发点。
>
> 还需要加以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两种传统从一开始就没有被看作是互补的，而是相互对立的。无论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Newton）涉足自然哲学得到了什么，抛弃了伊拉斯谟（Erasmus）和拉伯雷（Rabelais）、莎士比亚和蒙田，也会失去某些东西。

第四章

哲学可以改变世界吗？批判、实践、解放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古典的解放理想更不那么过时了。

——雅克·德里达

有了前两章对欧陆哲学的这种历史描述，接下来我将尝试更系统地说明它与分析哲学的区别。这就会进一步引出传统、历史以及所谓的“历史性”的核心作用。我在本章的最后将提出哲学实践的一种具体模式，这基于三个词：批判、实践 和解放 。这一系列概念有望开始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欧陆传统的哲学都注重对近代世界的社会实践提出哲学批判，而这种批判激发了一种个体或社会解放的概念。换句话说，大多数欧陆哲学都要求我们批判地观察这个世界，意图确认某种转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在我看来，正是这套背景假定，把诸如黑格尔和尼采这些古典哲学家与哈贝马斯、福柯和德里达这样的当代后继者联系起来。

专名还是问题？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是少数几个这样用英文写作的哲学家之一，他们英勇无畏，坚持致力于消除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差别，做法就是涉足于这两个阵营当中。最后，他毫无疑问受到了来自双方的攻击，都说他错了。罗蒂试图把分析传统和欧陆传统都根植于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美国实用主义。罗蒂认为，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差别关键在于，分析哲学讨论的是问题，而欧陆哲学讨论的是专名。现在看来，这可能或多或少是对的，因为欧陆哲学通常表现为是由我这样的人提出的开始于康德的大致依编年顺序的一系列专名，而不是人们通常与分析哲学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以问题为主导的方法。但我们这里必须小心，因为罗蒂用于区分这两个传统的标准可以被说成是某个以偏概全的论断，它肯定了这样一种荒谬的模式化概念，即欧陆传统多少不太关心问题及其论证。

但罗蒂的评论的确抓住了某些有趣的东西，就是说，当代欧陆哲学的著作、文章和讨论，无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语世界，都倾向

于关注某个具体的经典哲学家的文本，或者是对两个或更多的哲学家的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因此，人们不会去写《论真理概念》这样的文章，而是写《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不会去写《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而是写《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对当代政治理论的意义》；不会去写《论伦理学的限度》，而是写《尼采对道德的系谱学批判的永恒轮回》；不会去写《人格同一性问题》，而是写《从康德到德里达的主体概念》，如此等等。

如果说这种实践时常迷惑并且激怒受过分析传统训练的哲学家丝毫不为过，他们认为，欧陆哲学家只是在做注疏，而没有原创性的思想：这纯粹是法国式的文本解释（*explication de texte*），而不是严格的哲学论证。的确可以认为，英语世界的当代欧陆哲学有对注疏的严重倾向，会有损于原创。但这种批评意见（以及罗蒂的标准）中所缺少的是对一种截然不同的哲学实践的认识，即对于翻译、注疏、解释、传统以及历史对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有着极为不同的感觉。这并不是说欧陆传统的哲学消解了问题，恰恰相反，这是说，问题通常是在文本上 和在语境中 加以处理的，因此这就要求一种不同的处理模式，一种看似 更为间接的处理模式。

文本和语境

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是另一位这样的重要的美国哲学家，他坚持不懈地反对他人将自己的思想归结为分析的或欧陆的思想方式。然而，与罗蒂不同的是，卡维尔将这两个传统归根于在哲学上被忽略了的美国先验论传统，这种传统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思想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卡维尔在他的杰作《理性的主张》（1979）开篇写道：“我一直希望不是把哲学理解为一组问题，而是一组文本。”然而，我认为这过分强调了这一点。我宁愿认为，构成当代欧陆哲学的各种思想传统，组成了一种确定的但不断重

新配置的文本整合（constellation of texts），一种文本的星团（a sort of star-cluster of texts），某些会时而明亮耀眼，时而暗淡无光，这时我们的注意力又会为其他的星光所吸引。某些文本会膨胀壮大，如同红巨星一样吸入了该领域中的其他一切事物，而其他的文本则像黑洞一样萎缩，无法放射出一点光芒。众所周知，夜空呈现的方式是由我们在地球上的位置决定的，而某些文本发光的强度则取决于观察它们的语境以及其他偶然因素，比如整个社会的思想堕落程度。

若用一种更为平淡的意象来表述，欧陆传统的文本构成了一种哲学问题的记录档案，这与它们的语境以及我们自己的语境都有着明显的关联，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我们会在不同的时间利用这个档案中的不同资源，这取决于我们所面临的和想要考虑的问题的性质。但这个档案中许多文本的特征则是——比如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的著作——具有强烈的历史自我意识，这就使得它们无法完全脱离它们的语境或我们的语境而得到解读。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采取的正是这种历史的方法，我寻求的是重新建构那个时代德语世界的文本历史和语境历史，以及在英语世界得到接受的条件，以确立后康德时代的哲学问题意识。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相当成功地使哲学史得到很好的解读，人们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相关的东西，而且还意味着，系统的哲学论证无法完全脱离它在历史中出现的文本条件和语境条件。

让我就此给出四个最近的例子：

1 20世纪80年代对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兴趣，特别是关于崇高的概念的讨论，既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争论所引发问题的原因，也是这场争论的结果。这样，关于现代性究竟是结束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立场）还是尚未完成（哈贝马斯的立场），这种常常近于尖刻的讨论，最后表明就是如何解读康德的问题，以及在某人的解读中强调什么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这场争论已经烟消云散，而讨论则还在继续。

2 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还在念哲学本科的时候，谢林这个名字我们要么没听说过，要么只是在黑格尔早期批判他的著作中听到。而最近对谢林的兴趣日趋增长，则来自于英美哲学

家对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接受中所意识到的哲学问题。显然，诸如德里达这样的思想家的论证形式与谢林的论证形式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假如情况果然如此，那么，“解构”就不再像先前所想象的那样是非常先锋的了。

3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如今普遍被看作是20世纪最伟大的法国哲学家之一。但是，他的思想在80年代中期之前的法国完全遭到了忽视。目前关于列维纳斯的大量研究似乎是1986—1987年冬天“海德格尔事件”的直接后果，当时，海德格尔蒙羞卷入纳粹的事件已经得以揭露。所以，由于海德格尔思想缺乏伦理的和政治的远见以及认为是由海德格尔启发了的思想，最为著名的是德里达的解构，因此正是在这种语境中产生了对列维纳斯的兴趣。

4 除了查尔斯·泰勒所做的显著的开创性工作之外，黑格尔在英美哲学的标准中一直是个相当模糊的人物，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目前对黑格尔思想的兴趣复苏，是源于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等人关于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的局限性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争论，以及寻找调和自然与自由或理性的方式的需求。

还可以给出一些此类的其他例子，欧陆传统充当了大型的文本档案，储存了特定语境下的哲学问题。一个真正的当代哲学问题就会使我们回想来自这个档案中的一个文本和一系列概念。我们在哲学上前进的方法就是以新的方式回溯过去。

换言之，就欧陆传统而言，哲学问题并不是从天空中凭空坠落，不能被看作是某个非历史的永恒哲学 幻想中的要素。对这个传统中的某个古典哲学文本的解读，并不会太多地采取学院派对话的形式，就像是与一个来自遥远地方的陌生人见面一样，这个陌生人的语言我们才刚刚开始费劲地理解。我记得，非常尴尬的是，在我的学术生涯刚刚开始后不久，我曾提交了一篇论文给一个英国主流大学的哲学家

们。在饭桌上，我竭力长长地阐述了主题概念从亚里士多德直到笛卡尔以及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意义变化，席间有人问我，“我为什么不能像是和笛卡尔在一起吃饭一样去解读笛卡尔呢，就像是我正在和你吃饭一样？”我回答道，笛卡尔在350年前就去世了，他亲眼目睹了30年战争带来的彻底骚乱，用拉丁文和法文写作，并且运用了特殊的文学风格，比如自传体论文（《方法论》）和精神上的修炼（《第一哲学沉思》）。因而，我推论说，我们无法只是通过解读这些因素就简单地决定他的论证究竟是否有效。不用说，我并没有使我的对话者和饭桌上的其他客人感到信服，但这一场景的确是很有意思的，表明了哲学方法上的差异。

这就是说，哲学问题在文本上和语境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同时也被拉开了距离 。正是这种具体体现与距离感的结合，或许就解释了为什么表面上并不重要的翻译、语言、阅读、文本接受、解释和对历史的阐释等问题在欧陆传统中具有了重要的核心意义。当然，这也常常使人面对令人困惑的指责，说我们是在做“文学”，而不是在做“哲学”。仿佛哲学家的命题与经验之间有一种直接透明的关系，一种效仿塞拉斯称之为“给与物的神话”的愿望，也就是说，认为哲学知识是直截了当地、不证自明地依赖于我们直接感知的对象，或者是“心灵直接得到的”对象。

传统与历史

因此，尽管这并不足以作为一个标准，但用专名与问题之间的表面差异去确定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差异，就导致了更为深层的传统与历史的问题，以及历史在欧陆传统中的核心性的问题。或许，标志着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差异的最为简易的方法，就是看每一方如何理解自己的传统构成以及哪些哲学家构成了那个传统。这就是说，这里重要的是，哲学家感觉 自己属于哪一种传统，知道谁能够算作（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知道谁不能算作——有时并不知道为什么）该传统的

前辈或权威。因此，分析哲学家会把弗雷格、罗素和摩尔（G. E. Moore）作为前辈权威，而欧陆哲学家则会认为是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这种意义上，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都可以通过它们的前辈谱系得到确定，就像是家族老照片和画像，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那些前辈的面孔与当代传人之间的相似。

但以这种方式进行区分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因为从欧陆哲学的观点看，分析哲学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直到最近，它始终对自己的传统完全缺乏自我意识。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有所变化，对分析哲学的起源已经做了一些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是联系到弗雷格那里的德国思想根源，正如我们在达米特那里已经看到的一样，或者是联系到罗素对英国唯心论的批评。分析哲学在20世纪头几十年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与在诗歌、绘画和建筑中的更为广泛的现代主义运动并行发展的。记住这一点，或许就不会奇怪，维特根斯坦不仅写作了《逻辑哲学论》，而且在维也纳以最为简洁的现代主义风格为他姐姐设计和建造了一座房子。

最近出现的对分析哲学的“历史化”的另一个重要的征兆是开始把传记看作合法的哲学兴趣和重要的文化猎奇领域。这里的例子还是维特根斯坦，即雷·蒙克所写的奇妙著作《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天才的责任》（1990），以及德里克·贾曼的并不太好看的电影《维特根斯坦》（1993）。这种向传记的转向在蒙克1996年的《罗素传》以及最近关于柏林和艾耶尔的成功传记中得到了强化。在欧陆哲学这一方面，吕迪格·萨弗兰斯基关于海德格尔的思想传记值得关注。传记的魅力在于，哲学家的思想创造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具体的存在态度的表达。这样——而且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特殊魅力——哲学可以被看作是体现在一种生活方式中。因此，要支持或悍卫某个哲学家的观点，就会带来一定的模仿或者说是试图仿效那种生活。我们在专业方面始终可以看到这一点，即某个令人着迷的著名哲学家的学生们不仅会捍卫他／她的理论，而且会模仿他们的手势、停顿、用词习惯，甚至是他们吸烟、喝酒和性爱的习惯。门徒这个词用于这里所描述的情况丝毫不为过。但这并非是全新的观念，因为在远古的时候传记就在哲学

教导中用作核心工具，显然苏格拉底就是个例子，而且在希腊化晚期的各种学派中也比比皆是，比如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在传记中，一种哲学与一种生活方式融合在了一起。

历史性与解放

继续有关历史的问题，我想说，大多数欧陆传统的哲学家都会拒绝承认大多数分析传统中使用的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区分是有效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关注后康德的传统对欧陆哲学如此重要，因为，除了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这个显著的例外以及后来的卢梭，历史问题正是在这里变成了哈曼、赫尔德的思想以及黑格尔的大部分思想中的哲学核心。我们可以说，欧陆传统的成果就是，它让我们关注到作为一种实践的哲学的根本历史性质，以及从事该实践的哲学家的根本历史性质。这就是对通常所谓的“历史性”的洞见。

这种对历史性的洞见的结果是，关于人类生活意义和价值的深层哲学问题不再能够合法地与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话题——即上帝、自由和不朽——相关联，这些话题在康德看来尽管在道德上合乎情理，却毫无认知意义。相反，认识到哲学（和哲学家）的根本历史性质，就意味着两件事情：

1. 人类主体的彻底有限性，即没有什么在人类经验之外的类似上帝的立场或参照点，我们的经验可以由此得到描绘和判断；或者说，即便有的话，我们对此也会一无所知。
2. 人类经验的完全偶然的（或被创造出来的）特征。这就是说，人类的经验完全是人类的，是由我们塑造和再塑造的，而这种创造的环境确定无疑地是偶然的。

一旦人类已然被定位为一种有限的主体，存在于一种完全偶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网络中，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理解欧陆传统中许多哲学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即要求事情是另外的样子。如果人类的经验是偶然的创造物，那么它就可以重新创造成其他的样子。这就要

求对于能够应对、批评并最终弥补现实的哲学、艺术、诗歌或思想进行转变。这一需求贯穿了许多欧陆思想，并继续启发着像哈贝马斯和德里达这样的哲学家，这个需求就是，人类从自身目前的境况中解放自己，这种境况经不起自由的检验。正如卢梭所言——这曾经是18世纪末年轻的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者的战斗宣言——“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批判和解放就是这同一条线索的两个终端。

我所知道的对批判与解放之间联系的最富戏剧性的表述，以一种奇妙的原始形式存在于一段简短的文本中，它写在一张单页纸的两面，日期大概是1796年的夏天：即所谓的“德国唯心论最古老的体系–纲领”（参见附录 ）。文献学研究表明，这一文本，虽然其中所表达的观点更为接近青年谢林，在一定程度上也接近于伟大的德国诗人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雷德里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Hölderlin）。的确，早些年间，这三位曾在德国南部的蒂宾根神学研讨班上共同学习过。谢林接下来将会于1798年在23岁的豆蔻年华受聘为耶拿的教授。“体系–纲领”有一段奇特的故事。虽然它的存在为黑格尔未刊著作的编辑福斯特和伯曼所知，但它并未被收进1834—1835年出版的黑格尔著作杂集之中，这或许是因为这个文本与成熟黑格尔更为保守的观点并不协调。“体系–纲领”是1913年柏林拍卖会上出示的黑格尔文本中的最后一份，当时由普鲁士国立图书馆购买收藏。这份文本的首次出版和注释是在1917年，它吸引了伟大的德国犹太裔哲学家弗朗兹·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的注意，他给该文本起了这个如今非常著名的名称，并发起了哲学界对它的广泛讨论，这使得“体系–纲领”得以扬名。

图10　G.　W.　F.　黑格尔正在撰写《精神现象学》，对窗外耶拿的争斗毫不理会（1806年10月14日）

图11　《体系–纲领》首页的摹写本

这段文本简洁地明确了后康德思想的一些主题。这里是它提出的

8个关键的讨论点，此外还有其他的讨论点。

1 （我们已经在第二章中讨论过）认为康德之后哲学上需要的东西是批判体系的二元论的调和，伴之以浪漫主义观点，认为艺术作品正是这种调和的工具。艺术作品提供了关于自由的赏心悦目的形象，把自然领域和理性领域带入了和谐之中。

2 认为为了创造这件艺术作品，哲学家必须成为诗人，拥有相同的审美能力。自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之后就分开的哲学与诗歌必须成为一体。

3 哲学与诗歌在艺术作品中的统一是出于对理性神话 的需求，这会使诗人变得理性，而使哲学家变得感性。这样，“永恒的统一就会降临到我们之间”。这里的观点是，为了在社会上变得有效，理性的观念就需要变得具体。因此，避免把康德的理性观念变成形式主义的方式，就是用神话的形式把理性具体化。这在该文本中也被称为“一种感性的宗教”。

4 于是，理性的神话就具有了我们可以称作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意识形态既是批判的也是解放的。

5 它是批判的，因为要获得自由，我们就必须破坏通往自由道路上的障碍，在该文本中这种障碍指的是国家机器，它把自由人当作机器对待。因此，按照启示录的说法，“它必须予以终结。”对国家的破坏也意味着消除国家宗教，这种宗教的特点是“轻蔑的眼神”，而自由人则“在智者和牧师面前”颤抖。

6 它是解放的，因为理性神话的目标是获得基于自由和平等的新的社会组织：“只有在那时我们才可以期望一切 力量的相同发展。”

图12　欧仁·德拉克洛瓦（1798—1863），《自由引导人民》（1830年7月28日）

7　所以，正是通过理性神话形式的艺术创造力，我们才能够展示政治上得到改变的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揭示了我们可以称作的早期德国唯心论和浪漫主义中的“卢梭主义”，它试图确立新的道德社会模式，这包括自由以及所有男女之间的平等。特别是对英国以及德国的浪漫主义者来说，在这就意味着一种基于友谊的社会，一切朋友都将是自由平等的。

8　所以，在这个曾一度被遗忘的、奇妙的纯真乌托邦式片断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形而上学批判的灵感，这与1789年法国革命的解放精神不谋而合，变成了一个美学宣言，即“真和善只有在美中才是兄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乔治·卢卡奇曾谈到耶拿的浪漫主义：“它是在奔腾的火山上跳舞，它是绚丽多彩而不切实际的梦想。”的确，它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但它依然是绚丽多彩的。

诉求并非传统的传统

这样，欧陆哲学与其传统的关系密不可分。的确，这种想法我们已经碰到过，就是在穆勒以进步和传统的差异对边沁和柯尔律治进行的归类中。但穆勒把传统与保守联系起来时显得太过仓促。与传统的关系的确可以在社会上是保守的，正如成熟时期的柯尔律治或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古典政治保守主义。然而，对传统的诉求并不一定是传统的，因为传统这个概念所要揭示的正是某些在当代生活中缺失的、被遗忘的或受到压抑的东西。如此看来，对传统的诉求并不需要面对过去默认某种保守的观点，而是可以在面对哲学史和诸如此类的历史时采取批判的 形式。这样一种对于传统的批判理解就是海德格尔称作的解构（*Destruktion*，解除结构）或者拆散（*Abbau*，去掉）形而上学的历史，年轻的德里达尝试把这些词翻译成法语就是解构（*déconstruction*）。这个有争议的解构概念应当毫无争议地加以对待，并且被视作是试图批判地解构传统，使用的是在这个传统中熟视无睹但仍然会被这个传统所思考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就可以谈论对传统的全新的 体验。我将以两种著名的对传统的全新思维方式，即胡塞尔的和他最杰出的学生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把这一点说得更为具体一些。

我们可以说传统有两种含义。

1 毋庸置疑地继承或传递下来的东西。这是穆勒在涉及柯尔律治时使用的保守的传统观。
2 通过批判地研究第一种含义的传统而制作或产生出来的东西，这就是诉求于并非传统的传统，一种全新的传统。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共同具有的正是这第二种含义的传统，虽然两个人并非没有本质的区别，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在其去世后出版的《欧洲科学的危机》（1954）中，晚年胡塞尔认为，传统的这两种含义对应于对传统的积淀 体验与复活 体验的区别。把地理学术语“积淀”看作是沉降或巩固的过程，这很有帮助。对胡塞尔来说，积淀就

在于遗忘事态的起源。让我举一个胡塞尔的著名的几何学例子，出现在1936年作为《欧洲科学的危机》的附录发表的论文《几何学的起源》中。不应当忘记的是，该文也是德里达第一本书的主题，这本书正是对胡塞尔文章的翻译和注释。简单地说，胡塞尔的核心论证是，如果人们遗忘了几何学的起源，那么也就是遗忘了这些学科的历史本质。但这为什么如此重要？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几何学以其最为纯粹的形式表达了胡塞尔所谓的“理论态度”，这是自然科学对其对象所采取的立场。胡塞尔的观点是，要复活关于几何学起源的知识，就要回溯自然科学的理论态度归属于确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的方式，胡塞尔给了它一个著名的名字叫做“生活世界”（*Lebenswelt*）。胡塞尔的雄辩观点是，自伽利略以来，科学活动的结果是带来了他称作的“自然的数学化”，这忽略了科学对于生活世界日常实践的必然依赖。知识与智慧、科学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一道鸿沟。这正是胡塞尔称作的“危机”情况，它出现在自然科学的理论态度最终决定了看待一切实体的方式的时候。用胡塞尔的世界观（即现象学）来说，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传统的起源进行批判性的、历史的反思，这允许对传统的一种积极的复活性的体验，以反对我们目前关于过去的形象的有害的天真想法。

图13　埃德蒙·胡塞尔（1859—1938）学生时代画像

早期海德格尔的解构（*Destruktion*）概念与此大同小异，即对本体论历史的解构，但准确地说并不是破坏过去的方式，而是寻求这个传统的积极趋向以及反对海德格尔所列的“恶意的偏见”。解构 就是在制造一个传统，这是通过重复或回溯过程制造成形的东西，海德格尔称之为重复（*Wiederholung*）。这里的想法是，与传统的真正关系是通过回溯或重复得到的，这就是要通过批判性、历史性的反思的行为，重新追回事态的原初意义。海德格尔的核心例子是“是其所是”（即存在的意义）与时间的联系方式，他声称，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这种联系一直受到了遮蔽。所以，我们必须摧毁对于过去的一致认可的陈腐的感觉，以便体验隐藏的令人吃惊的历史威力。在《存在与时间》时期（20世纪20年代后期），海德格尔把一致认可的传统与遭到摧毁的传统之间的区别清楚描绘为传统（*Tradition*）与遗产（*überlieferung*）之间的区别。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与某种遗产产业结合起来：相反，海德格尔是在玩弄德文词 *überliefern*（递交或送达）的含义，认为与过去的真正关系在于其隐藏的潜能得以送达和揭示。这样，在海德格尔看来，真实的存在就需要一个全新的而不是已认可的对过去的体验作为它的前提。

重要的是要指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反思传统的目标并不是这样的过去，而是现在，确切地说是现代的危机；黑格尔对精神史的反思以及（我们现在就要看到的）尼采的虚无主义概念也是如此。欧洲自然科学的真正危机，或者说是海德格尔口中的“西方的危难”恰恰就在于感觉没有危难：“危机？什么危机？”真正的危机就是没有危机，真正的危难就是没有危难。在这种缺乏思考的健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嘲弄道，我们沉溺于做一只快乐的羔羊。因此，一种得到恢复的或遭到摧毁的传统感——一种全新的传统——就会使我们产生对现在的批判意识。

作为制造危机的哲学

人们会说，欧陆传统中的哲学点金石就是实践问题：这就是指，我们在由我们自己塑造的世界中作为有限自我的植根于历史与文化中的生活。正是这种实践的点金石，引导哲学走向对现实境况的批判，把它们看作对自由于事无补；引导哲学走向解放的要求，即事情可以是另一种样子，就是哲学、艺术、思想或政治的转变的要求。或许，这个事实开始解释欧陆传统中的哲学具有的一个可能是令人困惑的特征，也就是危机 的主题，它以不同的形式如同地下暗流般贯穿于德国唯心论、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心理分析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传统中。而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更具有自我意识的分析传统领域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危机。例如，这明显地表现在维也纳学派1929年蛊惑人心的宣言中，这份宣言我会在第六章中讨论。其作者捍卫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以及对于形而上学的克服，以此作为社会的全新的社会民主转型中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对欧陆传统中的大多数哲学家来说，哲学是一种批判　现实的手段，是为了推进对处于危机中的现实的反思意识，无论这是被表达为低俗的平庸世界中的信仰危机（克尔恺郭尔），还是欧洲自然科学的危机（胡塞尔），或者是人文科学的危机（海德格尔）、虚无主义的危机（尼采）、遗忘存在的危机（海德格尔）、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马克思）、工具理性霸权和对自然的支配的危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危机。哲学作为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敏锐反思，带来的是批判意识的觉醒，胡塞尔称之为已积淀的传统的复活。更进一步说，哲学家——用胡塞尔的话说，就是“人性的公仆”——的责任是制造 危机，就是说，以复活历史批判的名义扰乱逐渐死亡的传统积淀的缓慢积累，而这种历史批判的视野应当是得到解放的生活世界。欧陆传统的哲学就有了解放的含义。对哲学家来说，真正的危机就是没有认识到危机的情况。在这样一个世界，哲学就会毫无目的，不外乎是一种历史的猎奇，一种思想错乱，或者是一种使人的常识更为敏锐的技术手段。

为了多少使事情具有固定的体系，我围绕着构成本章副标题的术语，尝试对欧陆传统中的哲学提出以下的简单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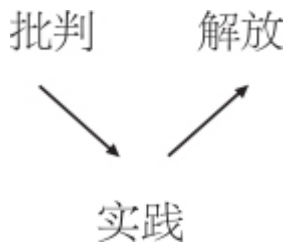

这就是说，批判是对现存实践的批判，因为它被看作是不公平的、不自由的、不真实的，或其他什么。而且，这种批判旨在从那种不公平实践中解放出来，转向另一种个人的或集体的实践，是一种对人类生活的不同构想，无论是尼采式的高贵的独处生活、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德勒兹和瓜塔里（Guattari）描述的多元变化，还是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图14　位于巴黎先贤祠的卢梭（1712—1778）之墓

第五章

怎么办？如何回应虚无主义

我们在第二章看到，康德给他欧陆传统中的唯心论、浪漫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遗留下了一个问题，这是他在《判断力批判》中竭力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雅可比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也许可以这样来表述：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如果是合理的，就会获得这样一个显著的功绩，既表明了思辨独断的形而上学传统主张在认识上 是无意义的，同时也确立了实践理性（即自由概念）至上的、具调控作用的道德 必要性。这就提出了以下的问题：如果自然界是由因果关系支配的，在机制上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那么，自由在自然界中是如何得到体现，或者说，是如何取得效果的？自然界的“因果关系”如何能够与康德所谓的“自由的因果关系”协调一致？借用爱默生所用的康德第三批判中的语言，天赋是如何被转换为实践能力的？康德难道不是将人类置于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可能称作的两栖 立场，它既自由地归属于道德法则，又是由剥离了一切价值、把人类视作异化世界的客观自然世界决定的？面对每个人都能够——以一定的代价——作为商品获得的冷漠的对象世界，个人的自由难道不是被还原为一种抽象概念？

图15　多梅尼科·费蒂（1589—1624），《忧郁》

这正是尼采在19世纪80年代诊断出的问题，他用了虚无主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对整个20世纪的欧陆思想家来说都绝对是至关重要的：海德格尔、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迪奥多·阿多诺、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汉娜·阿伦特、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就是

说，与承认主体的自由相伴随的就是道德确定性在世界中的瓦解。在第二章里，从雅可比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到施蒂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特，我们追溯了这个概念的形成。我现在要回到虚无主义这个主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俄国的虚无主义

尼采对虚无主义的理解必须置于俄国的语境之中，与我们在第二章中间接提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他称之为“彼得堡的虚无主义”。尼采从俄国小说家伊万·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那里拾起了虚无主义的概念，他读的是普罗斯珀·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的法文译本。顺便插一句，梅里美1845年的小说《卡门》也为比才（Bizet）1875年的同名歌剧提供了脚本，这正是尼采的最爱——在我看来，这是个极有争议的选择，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正是在尼采的手中，虚无主义得到了完整的哲学陈述和明确的表达。

俄国语境和德国语境的区别之处在于，在德国的语境中，虚无主义主要是形而上学的或认识论的问题，而在俄国的语境中，它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政治特性。这个过程大概是开始于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i）试图“虚无化”传统的审美价值，认为艺术并不是表达了某个绝对的美的观念，而是代表了一定历史阶段中的一定阶级的利益。因此，在俄国的语境中，虚无主义的问题是与激进的社会主义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在车尔尼雪夫斯基1863年极有影响的小说《怎么办？》中有明确的表达。俄国虚无主义政治的完整历史必须包括米歇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对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批判。并非巧合的是，列宁在1902年所写的描述其政党政治主张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书，题目也是《怎么办？》。

在这种意义上，俄国的虚无主义表达了一种彻底怀疑论的、反审美的、功利主义的、科学主义的世界观。这种观点在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1862）中通过对虚无主义人物巴扎罗夫命运的描述受到

了温和但却是毁灭性的自由主义批判。这里主要的戏剧性冲突在于两种对立的世界观：父亲们（尼古拉和巴威尔）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和对欧洲的热爱，与儿子们（阿尔卡狄和巴扎罗夫）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激进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穆勒关于浪漫主义与功利主义、边沁与柯尔律治之间冲突的俄国版本。在这部小说的中心一幕，面对作为暴力反抗力量的虚无主义的模糊暗示，巴扎罗夫冷笑道：

> “我们的行为都建立在我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基础上……现在，我们能做的最有用的事情就是抛弃——所以我们抛弃了。”“一切吗？”
>
> “一切。”
>
> “什么？不单是艺术、诗歌……还有……我担心说出它来……”
>
> “一切。”巴扎罗夫以难以名状的沉着重复道。

自由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的戏剧性冲突被屠格涅夫以古典式的——虽然并非令人信服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强烈地、非理性地、单相思地爱上了奥金佐娃夫人之后（她既是一个贵族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巴扎罗夫返回家乡，像父亲一样当了一名乡村医生。在相当于一种（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是符合逻辑的）自杀行为中，巴扎罗夫从一个受感染的农夫尸体那里传染了伤寒，在病榻上向奥金佐娃夫人表白了他的爱情。这样，虚无主义就通过爱的力量而得到了克服，而小说的结尾则是一种基督徒的观点，即“永久的和谐与无止境的生命”。

尼采式的虚无主义

尼采对虚无主义观点最为简洁的表达出现在他死后出版的杂文集《权力意志》的第一卷中。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是指

> 至高的价值贬低了自身 。其目的是欠缺的；“为什么”是没有答案的。

这里应当强调的是反身动词的使用，即“贬低了自身 ”（devalue *themselves* ）。尼采并不是在说，至高的价值通过批判而遭到了贬低，那是雅可比和屠格涅夫的观点。相反，它们贬低自身 正是它们的发展所固有的。这种说法可以与尼采最为著名的评论相提并论，这就是涂写在前柏林墙上以及在世界各地的厕所墙上的名言“上帝死了”。这并不是指，上帝设法摆脱了枷锁，从宇宙的后门悄悄地溜走，而没有告诉任何人，或者是另一个上帝取代了他的位置。相反，这是指“我们杀死了他”。正是我们人类将上帝置于死地。虚无主义就是意义次序的崩溃，一切在前康德形而上学中被作为价值超验来源的东西都变成了空无，不存在使生命的意义得以依附的认识挂钩（cognitive skyhooks）。关于生命意义的一切超验的说法都已经被还原为纯粹的价值——在康德那里，上帝和灵魂不朽被还原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公理的状态——而那些价值也变得无法令人相信，需要尼采所谓的“重新评估”或者说是“价值重估”。

除了来自俄国和德国语境的影响之外，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尼采的虚无主义观念完全是大胆原创的。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的根源不能从社会、政治、认识论，甚至是生物学角度（就是说，关于物种减少的故事）得到解释；相反，它根植于对世界的某种阐释，即基督教。在尼采看来，“基督教 - 道德”对世界的阐释具有解救虚无主义的明显优势，它承认世界具有意义，承认人类拥有价值，防止产生绝望。然而，在尼采看来——这也是至关重要的——虚无主义中存在一个悖论或者说是悖反，即基督教 - 道德对世界的阐释是受到求真意志的驱使，但正是这种求真意志最终却与对世界的基督教阐释相左，因为求真意志发现这种阐释是不真的。这就是说，基督教的形而上学激发了对真实世界的信念，这个世界与我们生养于斯的变化的虚假世界相对。然而，由于意识到上帝死了，这个真实的世界就被揭示为是虚构的了。因此，这里的悖论就是，对世界作出道德解释或评估的意愿，现在表现为对非真实世界的意愿。基督教就像尼采早期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描述的古代悲剧一样，并非完全是自杀式的死亡。但是，问

题也就在这里，对真实世界的信念的需求 正是为了生活，因为我们无法忍受这个变化的世界。尼采写道：

> 一旦人类明白了那个世界是如何仅仅从心理需要中虚构出来的，他又是如何对这个世界绝对没有任何权利，那么虚无主义的最后形式就会出现：它包括了不信任任何形而上学的世界，禁止自己相信真实的 世界。站在这种立场上，人们就会把变化的实在看作是唯一的 实在，禁止自己有任何暗中接触到来世或虚假的神性的机会——但却无法忍受这个世界，尽管人们并不想否认它 。

这就解释了对尼采来说虚无主义的核心悖反，即我们“并不 尊重我们所知，我们并不被允许 尊重我们应当告诉自己的谎言”。这就是说，我们无法相信超越了这个变化的世界之外的真实世界，而且我们无法忍受这个变化的世界。或者引用雅可比批评费希特的话说，“凡是利己的东西，最终都会让我们作呕（虽然我们也意识到要做到不利己是不可能的）：必然的东西结果让我们作呕。”这种邪恶的悖反带来的结果就是尼采称作的“消解过程”，即当我们意识到了我们道德价值的可鄙起源以及基督教 - 道德对世界的阐释是如何受到追求非真意志的驱动，我们的回应 就是宣称存在是无意义的。尼采定义为虚无主义的正是这种宣称无意义，他发现其存在于三种处于萌芽状态的形式：

图16　身着军装的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1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称之为“消极的虚无主义”，或者更为刺耳地说，“欧洲的佛教”。这就是说，如果我先前的形而上学信念的核心有空虚感，那么，我也会肯定这种空虚感，去做瑜伽、折纸或其他什么。

2 我们在屠格涅夫那里看到的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或“积极的虚无主义”，尼采把它看作完全是“生理衰落的表现”。这就是说，如果我先前的形而上学信念的核心有空虚感，那么，我就会继续用野蛮的创造性的恐怖主义行为去破坏我周围的一切。（这是虚无主义的一种倾向，我们可以在各种极端政治运动中，诸如20世纪60年代巴黎的法国境遇主义者，察觉到这种倾向，境遇主义者宣称，由于社会不过是一种景观，一种空洞外观的虚假骗局，政治的任务就是要用五花八门的、通常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政治行为去宣布这个事实。境遇主义的一个著名口号是，“砖石之下，就是沙滩”，这意味着，人们应当把那些砖石扔向警察，暴露出下面的沙滩。）

3 厌倦、冷漠、精疲力竭、疲惫不堪的一种普遍的文化氛围，尼采把它概括为一个难忘的公式：“现代社会……不再有力量排泄　了。”这就是说，如果我的形而上学信念的核心有空虚感，那么，我就会只是耸耸肩咕哝道：“哦，是吗，我猜它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会把这看作是“空想虚无主义”，经典地表达为《维尼小熊》中的小驴依唷这个角色。

但认真地说，这里要抓住的关键之点是，虚无主义并非是对基督教 - 道德对世界的阐释的简单否定，而是这种阐释的后果 。在尼采看来，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得以出现，是由于我们意识到，我们试图用于为宇宙赋予意义的范畴是无意义的。这根本不是指宇宙是无意义的，而是，可能借用了康德的说法以及雅可比微弱的记忆印痕，“相信理性的范畴就是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因此，从尼采的观点看，虚无主义是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的一种没有预见到的结果。这就是说，虚无主义是道德价值评估的后果。我的价值在世界上不再

有位置——这是一种现代斯多葛学派的自我异化，黑格尔把它嘲讽为“关于世界的道德观”。

现在，这种立场可能 导致放弃消极的虚无主义或对于积极的虚无主义的热切幻想。但它也可能带来对价值重新评估的需求，希望情况完全不同的一种变革的、解放的需求。在尼采的思想中，对虚无主义的诊断也就伴随着对克服虚无主义的要求，这对20世纪所有欧陆思想家来说都具有代表性。尼采的思想可以定义为对虚无主义的抵抗。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断地坚持，我们需要新的范畴和新的价值，以便使我们能够忍受这个变化的世界，而不会使我们陷入绝望之中，也不会让我们去发明一个新的上帝，在它面前屈膝膜拜。

在我看来，这就是尼采著作中看似不可思议的永恒轮回 主张的作用，即“实存如其所是，没有意义或目的，而最终得到重现，没有虚无的结尾”。尼采强调指出，永恒轮回的概念试图表明的恰恰是泛神论的对立面。就是说，如果泛神论是指上帝呈现在万物之中，那么永恒轮回则是试图考虑始终没有上帝的宇宙。在尼采看来，无神论不单单是对事实的陈述：它也是用很大的力气把人类从他们习惯于卑躬屈膝的偶像中解放出来的结果。

或许其他人不会赞同，但我把尼采的永恒轮回概念理解为一种超越康德的思想试验。就是说，康德的伦理学是基于纯粹崇高的责任概念，而这个概念无法基于经验利益，无法被看作是达到幸福之类的目的的手段。美德只能是用其自身来奖赏。但是，康德的伦理学仍然保留了上帝和灵魂不朽，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预设。所以，人们的道德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仍然可以与幸福的远景联系起来，即美德则会得到回报。尼采使得这种最初属于康德的思想变得比康德更为康德化。在他看来，没有上帝，而关于灵魂不朽的想法则是一个糟糕的笑话。然而，尼采用永恒轮回的思想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则是，想象一下我们存在于一个没有神学意义或形而上学保证的宇宙之中，它无休止地重复自己，永恒地重现。这样，如果我们都有了那个 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知道并且仍然肯定 这种图景，那么，我们就完全能够说，我们最终克服了隐含在基督教 - 道德对世界的阐释中的虚无主义。

启蒙运动的辩证法

概述一下：诊断为虚无主义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就在于认识到这样一个双重失败：

1 现代性或启蒙运动的价值并没有关联道德和社会关系结构以及日常生活的内容。这就是说，它们并没有带来一种新的整体神话和理性，而“体系–纲领”（参见此处 ）的作者们则把这看作理性神话学 的需要。换言之，康德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系列并不一致的二元论。启蒙运动的道德价值（这是哈曼和黑格尔批判康德的核心，并由青年马克思所继承——启蒙运动的价值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价值）缺乏有效性以及与社会实践的联系。

2 然而，启蒙运动的道德价值不仅没有关联道德和社会关系的结构，而且，更糟的是，它们还通过一些进程带来了那些关系的持续恶化，这些进程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性化，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化，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称之为工具理性，海德格尔称之为对存在的遗忘。这正是启蒙运动致命的、具有悖论性质的辩证法。在我看来，这是雅可比最重要的领悟，通过我一直在讲述的历史，我们已经看到它逐渐揭开面纱。

因此，概括起来说，目前所见的哲学现代性问题就是，当我们看到了启蒙运动的价值不仅没有把握日常生活，而且导致了逐渐的分解之后，如何面对虚无主义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欧陆哲学家们一再回归的问题，他们或者试图找到回应这个问题的新方法，如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或者是拒绝造成这个问题的历史和哲学术语，比如罗蒂。

哲学和非哲学

当然，这里的另一个难题是，如果正像尼采、海德格尔和阿多诺

这样一些截然不同的思想家所赞同的那样，哲学已经与产生了虚无主义的那些力量同流合污，那么与虚无主义的这种冲突就不可能仅仅发生在哲学中。在尼采看来，哲学就是虚无主义的；它充斥着基督教-道德阐释世界的禁欲主义和无名怨忿（*ressentiment*）。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对海德格尔来说，传统哲学想要知道充足合理原则核心中的无物之无物。在阿多诺看来，哲学的危险在于对抽象化的意识形态论述，这种抽象化与对物化的、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同流合污。

那么，我们如何回应虚无主义呢？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正如其他哲学家一样，对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我到此为止一直寻求确立的就是，对虚无主义的回应是康德之后的欧陆哲学的实质问题，如同阿里阿德涅的丝线穿过以往若干世纪的思想迷宫。这使得大多数欧陆哲学都寻求可以回应现代危机的非哲学的论述和实践。尼采在古希腊的悲剧思想中寻找根源，海德格尔在诗歌创作的冥思苦想中寻找出路，阿多诺在高雅的现代主义艺术的自由意志中发现踪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寻找答案，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实践的诊察台上发现秘密。这里的要点是，虚无主义问题开始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多的欧陆哲学关注与非哲学的关系，无论是艺术、诗歌、心理分析、政治学、还是经济学。

进步的现代主义和反动的现代主义

尼采之后，对虚无主义的这种关注分裂成了两种不同的反思现代世界危机的传统，可以表述为进步的 现代主义和反动的 现代主义。一方面，紧随黑格尔的激进继承者（诸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之后，对现代性的哲学批判是与更为进步的德国社会学家对现代性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这在诸如韦伯和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等思想家的著作中都有明确表达。这个传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中继续蓬勃发

展。这种对待现代性的方法在当代最为杰出的代表是哈贝马斯，他意味深远地担当了法兰克福的哲学和 社会学的领袖。这个传统在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的后继者阿克塞尔·霍奈特（Axel Honnett）的思想中继承下来，直至今日。在方法论上，这个传统的特征在于相信哲学与社会学的共存共荣。这就是说，哲学的范畴如果要获得效果，就需要社会学的中介；而社会学的研究则需要有哲学的批判性和反思性，以防滑入实证主义。在政治上，这个进步的现代主义传统则一直与各种左派思潮关系密切，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对现代性的更为保守的批判，这可以在诸如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卡尔·施米特和恩斯特·荣格等思想家那里看到。根据施本格勒的论述，西方世界是一种“老朽的文化”，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衰退，如同古罗马晚期的衰落一样。以衰退和崩溃这样的叙述方式表达的社会批判传统在哲学上的继续，可以在海德格尔那里看到，特别是在他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开始的对技术的反思中。但同样，或许是出人意料地，我们也可以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看到这种悲观主义文化批判的传统，他在《文化与价值》中表明，他受到了施本格勒的强烈影响。进步的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是基于哲学与社会学的相互依存，而对反动的现代主义者来说，社会学则被谴责为表现了现代民主的衰落。于是，哲学的范畴就被直接运用到了社会分析中，由此就会产生多变的悲观主义的文化诊断。海德格尔在这里再一次提供了一个经典例子，他只是把他关于作为存在之遗忘的形而上学历史的论题，扩展为一种文化批判，在这里，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是由一个技术世界图景所控制的，而这个世界图景正是同一种遗忘的社会表现——海德格尔叹息道：“废墟在扩大。”反动的现代主义的政治后果就是著名的海德格尔加入纳粹的事件，在其中，他和其他人，例如施米特和荣格，虽然是很短暂地，看到了抛弃虚无主义实际上是可能的。毋庸赘言，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特别适合回应本章标题中所提出问题的方式。

我的观点是，虽然在政治立场上截然对立，在方法论上也是南辕北辙，但反动的现代主义和进步的现代主义是对虚无主义问题的两种

回应。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相信，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从事我所称的制造危机。这就是说，哲学是对现存的社会实践的批判，把它们看作是各种不自由的或不公正的实践，由此渴望达到个人的或集体的解放的目的。这些传统的不同，而且是彻头彻尾的不同，在于它们认为这种解放可能存在于何物之中。

第六章

有关误解的案例研究：海德格尔与卡纳普

说出一个词而没有用它意指任何东西，则是哲学家的失职。

——贝克莱（Berkeley）

我在第三章中主张，理解对立的哲学传统之间误解 的最好方法是用“两种文化”的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可以看作是表达了两种对立的、的确也是相互对抗的思想习惯：边沁式的经验主义 - 功利主义与柯尔律治式的阐释学 - 浪漫主义，这构成了某种文化在哲学上的自我理解。我们在穆勒和斯诺那里看到，如何可以用这种对抗关系去理解诸如“英国性”这样的东西，的确，这可以证明是一种富有成果的对抗，前提是冲突的双方至少同意相互对话。

我现在想进一步探究这条思想路线，审视这两个传统之间误解的一个具体案例研究：海德格尔与卡纳普的案例。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卡纳普和维也纳学派提倡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海德格尔提倡的存在性的或“阐释性的”世界体验之间的争端。这个争端对后来的哲学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卡纳普关于海德格尔的观点，为艾耶尔在英国语境中对形而上学进行的尝试性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消除提供了背景，并且，卡纳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分析哲学在美国的专业发展具有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通过他最为得意的学生奎因（W. V. O. Quine）而产生的。例如，在介绍20世纪哲学的一部不太有什么帮助的小书中，艾耶尔基于对1929年讲座的粗略阅读，谴责海德格尔“完全可以被描述为江湖术士”。在卡纳普1970年去世后的祷文中，奎因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哲学描绘为“后卡纳普的”，而不是“后维特根斯坦的”，这后一种说法则具有争议地被用来描述相同时期的英国哲学。在欧陆哲学一边，海德格尔无疑是他德国学生们（诸如汉斯–乔治·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和汉娜·阿伦特）的思想背后的主要启发，对两代法国思想家（例如萨特、拉康、福柯和德里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最近分析哲学家与欧陆哲学家之间的许多误解，都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与卡纳普之间这种难以理解的僵持局面，因此这值得更为深入地进行探究。

图17　鲁道夫·卡纳普（1891—1970）和妻子伊娜，1933年在布拉格

图18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惊讶的表情

无来自于无（Nothing comes of nothing）

1929年7月24日，海德格尔在布赖斯高的弗赖堡大学作了哲学教

授就职演讲。他当时39岁，正值智识能力的巅峰。在马尔堡经历了富有成效的几年之后他重返母校，接替他的老师，即埃德蒙·胡塞尔的教席（但他最终还是与老师分道扬镳）。这对海德格尔来说显然是个人胜利的时刻。讲座的题目简单得令人容易产生误解，“什么是形而上学？”，但内容却绝非简单。据说（但无疑是不足为信的），在经历了——对那些并不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人来说——一定是艰巨的思想体验之后，有一段时间的沉默，然后终于提出了一个问题：“海德格尔先生，什么是形而上学呢？”对此，海德格尔回答，“很好的问题！”

但什么是形而上学？尼采把形而上学界定为将世界一分为二的说法非常著名。这就是说，像柏拉图那样，对世界的神话的、前哲学的体验的完整整体，被分割为存在的领域与表象的领域、实在与表象、超感觉的东西与可感觉的东西。这并没有错，但海德格尔显然想回到对形而上学的更为亚里士多德式的理解上。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使用“形而上学”这个词，它来自公元2世纪罗得的安德罗尼卡（Andronicus of Rhodes）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里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所作的分类。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分类时，他的著作被排列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按其内容分为诗歌、雅典法规、政治著作、道德著作、逻辑和修辞著作等等。然后，有几册物理学——之后还有一系列由亚里士多德签名的著作——讨论的问题则是在当时已有的体系中无法分类的东西。这些著作就被称作“物理学之后”，希腊文是*ta meta ta physika*。

但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后来的也就是先在的，其意是指这些著作讨论的内容正是其他探究领域中所隐含的第一原则。亚里士多德对这个基础的哲学领域所使用的词不是形而上学，而是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ote*）。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一门科学或知识领域（*episteme*），讨论的就是存在如其所是。这就是说，它并不关心具体事物领域的存在，比如生命体（生物学）或人类社会（政治学），而是关心就其普遍性和一般性的存在如其所是。海德格尔的思想自始至终迷恋不已的正是存在问题，这是由形而上学探究带来的问题。海德格尔关心的是先于涉及到任何具体存在物或事物领域的存在如其所

是。保持存在如其所是与某种具体的存在物领域之间的鸿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本体论差异”。

那么，海德格尔是形而上学主义者吗？既是，也不是。在卡纳普和维也纳学派看来，他的确像是一个形而上学主义者，就这个判断而言，他们既是对的又是错的。海德格尔相信，哲学问题——在他看来，存在问题就是唯一的 哲学问题——无法简化为科学的探究。因而，形而上学无法用逻辑分析加以解释：海德格尔可以被看作是挽回了古希腊哲学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即存在问题。然而，海德格尔并不是 形而上学主义者，因为他相信，从柏拉图至今的每个哲学体系在寻求确定存在如其所是的意义时，都忽略了存在这个问题 的彻底性以及这个问题 所拥有的与时间主题的内在联系；所以，他的巨著的书名就是《存在与时间》。在海德格尔看来，“质疑是思想的虔诚。”形而上学先前的历史一直在试图以各种方式回答存在问题：在柏拉图看来，它可以通过“形式”概念加以回答，即关于事物的知识就是关于事物形式的知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它可以表达为“本体”概念；在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看来，它可以用“自有之因”，即上帝，来回答；在黑格尔看来，它就是“精神”；在尼采看来，它就是“权力意志”；如此等等。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存在的历史”，就是对从柏拉图一直延伸到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颠覆的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一系列答案。因此，彻底地提出存在问题就是要质疑形而上学，最终要“克服”它。然而，虽然海德格尔和卡纳普都使用了“克服形而上学”，他们的意思却截然不同。

维也纳学派的基本倾向可以表达为其主要成员奥托·诺伊拉特（Otto Neurath）的说法：“摆脱了形而上学的科学”。哲学是一种从属于科学的工作，它唯一关注的是对命题的逻辑澄清和经验科学的方法。的确，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从推进哲学命题的角度来说，维也纳学派完全没有实际研究哲学，他们只是致力于澄清经验科学命题、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主张的逻辑分析。诺伊拉特写道，“哲学并不是与同一种经验科学的不同领域并行或在其之上的一种基本的或普遍的科学。”这里提到的“一种经验科学”，暗指的是确定一种科学世界观的明

确目标，诺伊拉特称之为“统一科学”。这让我们回想起尼采对形而上学的定义，即科学的世界观将会恢复神话的世界观中所得到的统一体验。诺伊拉特推测：

> 这种科学世界观的代表人物代表的是简单的人类经验。他们自信地从事着清除形而上学和神学碎片的工作。或者，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在形而上学的间歇之后，又回到关于这个世界的统一图景，在一定意义上，这始终是人类最初时代不依赖于神学的神奇信念的基础。

与这种科学的世界观相关，形而上学的命题之所以为假，并不仅仅是由于它们没有意义：它们没有认识内容。这样，它们是合法情感的表达，但这些情感的合宜表达方式应当是艺术、音乐或诗歌，而不是哲学。因此，卡纳普给出了一个尖刻的说法：“形而上学主义者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

这样，在与这种哲学观的截然对立中，海德格尔就要捍卫形而上学，反对科学。海德格尔在讲座中提出的问题简单而有力：“当科学已经成为我们的爱好，基于我们存在的理由，我们正在遭遇的究竟是什么？”他对此的回应是，当科学成为我们的爱好，那么，各种知识领域就会有分化和专业化的过程，这些会导致科学活动的形而上学基础的衰落。海德格尔在讲座的结尾明确而丝毫不为夸张地说道：

> 只有当科学基于形而上学而存在，它才能够以常新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根本任务，这不是积累和整理一些知识，而是以常新的形式揭示真理在自然和历史中的全部显现。

科学必须基于形而上学——这非常明确。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呢？噢，这就是无 。但无来自于无，所以，这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海德格尔沉思的争论要点，即关于无 的问题，卡纳普正是由此挑起了事端。我还是从海德格尔巴洛克式的复杂说法中清理出其中的核心思想吧！在讲座的第一部分，海德格尔一开始就毫无争议地主张，具体学科应对的是万物各自的领域，除此之外，它们关

注的是无[1]。所以，科学想要知道的是关于万物的一切，除此之外就是无（besides that nothing）。于是，海德格尔就反常地问道，“这个无是怎样的（what about this nothing）？”他主张，科学对于这个无丝毫不感兴趣，而正确理解下的形而上学则可以证明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个无。我们几乎可以想象，卡纳普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在讲座礼堂的后排窃笑，他反对海德格尔的主要批评要点是，“这个无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无法用逻辑上一致的语言构造出来，因为它把一个否定词用作某种荒谬的名词。可以形成这样一个问题本身就表明，形而上学正是利用了日常语言固有的某些模糊性，这些模糊性是可以并应当通过逻辑重组而得以消除的。对语言的这种逻辑重组就是维也纳学派早期的纲领。

海德格尔的下一步是审视这个无的问题如何在传统逻辑中得到理解。逻辑的基本法则是非矛盾原则，即说一个事物可以同时既存在又不存在就是矛盾的。为了符合这个原则，逻辑就把“无”看成是存在之物，或者说是存在物的否定词：非x就是对x的否定。这样，形而上学关于无的问题就变成了一种否定。海德格尔不是用大量的论证，而是指出“无的更原初意义就是‘没有’和否定”。卡纳普会反对这一点，但海德格尔这里的意思好像是，在逻辑上把“无”理解为否定，这是知识分子从理论上看待的否定。而海德格尔在讲座中的观点（他在《存在与时间》中作了更详细的阐述）是，除了知识分子角度之外还存在很多看待万物的方式。他认为，先于从理论上揭示万物，有一种感性的或情感的揭示，这是以海德格尔所谓的“情绪”的方式发生的——这是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激情”（*pathos*）的翻译。因此，人总是处于某种情绪之中，无论是压抑的、高兴的、或者就纯粹是漠不关心的，他／她看待万物的方式就是由这种情绪决定的。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情绪不能被理解为纯粹的感情，也就是在我们理性上单一的心理活动中的某种心理色彩。情绪确定了人类经历他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方式。

于是，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有一种情绪揭示了无吗？海德格尔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这就是焦虑的作用，德文是*Angst*。但的

确，人们总是对这样或那样的东西感到焦虑：考试、心理上对蜘蛛、老鼠或其他什么的恐惧。不，海德格尔坚信，这种具体的焦虑最好叫做担心 。当原因（蜘蛛、老鼠、考试）不存在了，担心就消失了。海德格尔对于焦虑的观点是，它始终存在，并先于一切担心而存在，就像人的存在中的某个难以捉摸的背景噪音。因此，焦虑并不是对这样或那样东西的焦虑，而是对某个人的存在的整体的焦虑。焦虑中所出现的（海德格尔这里的话语使用了很棒的描述性语气）是，具体万物从人们的掌控中滑落了，只留下了人们自己，感觉很是陌生，难以捉摸。在这种难以捉摸的感觉中，在它所带来的宁静甚至是沉着之中，人们感觉到了万物的虚无，开始提出形而上学的问题，这首先是由莱布尼兹提出的："为什么会存在万物，为什么不是虚无？"

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在焦虑的体验中开始的无，就引导我们把这个 形而上学问题设定为关于存在的意义。虽然它听起来很奇怪，但无的问题直接引导海德格尔进入形而上学的核心，这样一种探究就无法简化为维也纳学派提出的科学的世界观。哲学在根本上是形而上学的，"哲学决不能用科学观念的标准加以衡量"。海德格尔的结论是，"人类的此在（Dasein，实存）只有在它使自己进入了无，才可以使自己的行为像个存在者。超越就出现在此在的本质之中。但这种超越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科学必须基于形而上学。

黄色小册子

1929年是哲学上的繁忙之年。1929年9月15日至17日，在海德格尔讲座之后不到两个月，恩斯特·马赫学会在布拉格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决定呈献给莫里茨·施利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一份礼物，他是将要以这份礼物接受洗礼的维也纳学派的幕后掌权者。施利克在斯坦福大学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客座教授，刚刚拒绝了波恩大学提供的教席。礼物是一篇短文，本质上是一篇宣言，题为《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文章的正文没有作者署名，前言则是由维也纳

学派的三个成员署名的：汉斯·哈恩（Hans Hahn）、奥托·诺伊拉特和鲁道夫·卡纳普，但其内容之激进、语气之雄辩反映了逻辑实证主义者中最为热衷政治的诺伊拉特的观点。这篇短文随后被新加入者称为“黄色小册子”。

鉴于之后宣称为由维也纳学派激发的分析哲学大部分的保守性，最为显著的是这篇文章咄咄逼人的激进政治特征。科学的世界观与哲学和政治上反动的形而上学和神学倾向相冲突。在黄色小册子的作者们看来，维也纳学派“面对现时代”，抛弃形而上学，拥抱经验科学。这种发展使人想起马克思，它是与现代生产过程中的潜在解放内在关联的。维也纳学派与群众打成一片，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态度往往会导致务实的经验主义观点”。黄色小册子讲述了一个短小但令人信服的故事，它把维也纳学派的观点追溯到自然科学的进展，致力于与反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倾向进行论战。它在最后写道：“科学的世界观服务于生活，而生活则接纳了它 。”这种教诲性的陈述清楚地表明了诸如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家对维也纳学派来说是危险人物。艾耶尔在1933年从维也纳寄给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中简洁地评论道：“所有的当代德国哲学家都是懒汉或蠢人。甚至是想到海德格尔都会使他们犯病。”在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者看来，海德格尔的思想就是对反动的、反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回归，这与政治上的泛德国抱负是一丘之貉。接下来十年的历史就悲剧性地证明了卡纳普的怀疑，维也纳学派的所有主要成员，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在1936年纳粹德国合并奥地利（*Anschluss* ）的前后时期离开了奥地利。罗素写道：“这些人都经过了严格的逻辑训练，显然，这使得他们不会受狂热教条的影响……”海德格尔于1933年陷入了对纳粹主义的政治热情之中，随后他及其追随者又被无为主义所深深困扰，与此相反，卡纳普则毕生都一直坚持左派的观点，而且的确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卡纳普与海德格尔冲突的争斗似乎不仅仅是对上述分析的边沁与柯尔律治争端的回应。

逻辑、经验主义、好的诗歌和坏的诗歌

记住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就来更为仔细地看一下卡纳普1932年的文章《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他在其中选择了海德格尔1929年的讲座作为形而上学无意义的主要案例。卡纳普反对形而上学的理由，并不是说这样的陈述是假的，而是说它们完全没有意义。对卡纳普这样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意义根植于证实原则，就是说，一个词或句子，只有当它原则上是可以得到证实的，才是有意义的。但什么是证实的条件呢？它们是双重的：逻辑的和经验的。

在维也纳学派看来，自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以来，逻辑 就是一个自我指涉的系统，它允许把所有的命题都还原为重言式或矛盾式。借用这个经典的例子："所有的单身汉都是没有结婚的男人"这个命题就是一个重言式，因为它的谓词（"没有结婚的男人"）是可以与主词（"单身汉"）相互替换的，或者说是包含在主词之中的。这样的陈述就是哲学家们称作的"分析判断"。这种判断仅仅凭借它们的形式就是真的，但它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存在之物，也就是关于事实的任何东西。重言式的对立面就是矛盾式，比如"所有的单身汉都是已婚的男人"，这从定义上看就是假的；它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所以，所有的逻辑命题都可以还原为重言式或矛盾式，它们或者必然为真，或者必然为假，但所有这些命题都是可以得到证实的，因而都是有意义的。另外唯一一个有意义的语词或句子的领域是关于经验真理的领域。早期维特根斯坦相信，一切经验呈现或复杂的事态都可以还原为反映了事实或"给予物"的简单命题。如果这些简单或者说是基本命题反映了事实，那么它们就是可以相对于事实加以证实的。我的命题"这是一棵兰花树"可以得到检验，只需要看一眼我面前的这棵美丽的巨大绿色植物就可以了。经验命题可以得到证实，因而是有意义的。

卡纳普1932年的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形而上学陈述在逻辑上和经验上都是无法得到证实的。例如，如果我说"焦虑揭示了作为人类的存在"，那么逻辑实证主义者就会问，这个命题在逻辑上是可以得到

证实的吗？不能，因为它既不是重言式，也不是矛盾式。那么，它在经验上是可以得到证实的吗？不能，因为“存在”并不是像兰花树一样特定的事实。因此，这个命题是无意义的。适用于这个命题的说法也适合所有的形而上学命题：如果它们得不到证实，那么它们就是无意义的，只能通过逻辑分析得到克服。

但是，人们会问，如果形而上学得到了克服，如果我们像休谟一样把包含了无法证实的陈述的所有著作都付之一炬，那么哲学还剩下什么作用呢？卡纳普坚信，剩下的是逻辑分析的方法，他在1934年的论辩文章中说，“维也纳学派并不实践哲学”。但是，如果卡纳普是对的（这是一个很有可能的“如果”），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哲学家和非哲学家已经被形而上学的问题困惑了几千年？那么多的人都如此愚蠢了这么长的时间吗？在他文章最后蛊惑人心的几页中，卡纳普引用狄尔泰（Dilthey）的观点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形而上学表达了一种对生活的感觉，生命感觉（*Lebensgefühl*）。在这方面，形而上学就像是艺术，它同样表达了对生活的感觉或态度。然而——这里就是关键所在——形而上学不如艺术，因为诗人或音乐家并不认为他们的语词或意象具有理论上的或认识上的内容。因此，形而上学是糟糕的艺术，而形而上学主义者则是没有诗歌才能的诗人，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在卡纳普看来，最为奇怪的是，真正理解了这个问题的思想家只有尼采，他的思想或者有一些经验内容，比如他对道德史的分析，或者并没有选择用理论形式去表达它们（比如海德格尔），而是用诗歌的形式。卡纳普显然想到的是尼采的《扎拉图士特拉如是说》，这本书试图回答哲学上的虚无主义问题，但采用的是一种非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的、甚至是有些魔幻的方式。

依然隐藏着的哲学冲突的核心

阿恩·奈斯（Arne Naess）诙谐地说道，“认为卡纳普是以恶魔解读《圣经》的方式读了许多海德格尔的东西，这并非完全没有道

理。”这无疑是真的，但正如我始终试图表明的那样，卡纳普和维也纳学派对海德格尔的猛烈抨击有可以理解的理由。科学的世界观与卡纳普所认为的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歧，而且表达了深深铭刻于上个世纪社会和政治上的冲突。就我所知，卡纳普在他的晚期著作中再也没有谈起与海德格尔的冲突。但海德格尔都说了些什么呢？

海德格尔惯于以傲慢轻蔑的态度对待他的批评者，完全不与他们进行正面交锋，在我看来，这并不能算作他的优点。因此，在海德格尔已出版的著作中只有一个附带的注释中提到了卡纳普。然而，在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中都贯穿着与卡纳普所代表的那种哲学挑战的间接交锋。海德格尔更愿意把这称作“逻辑斯蒂”（logistics），而不是逻辑分析（logical analysis）或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在我看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海德格尔在其著作的字里行间与卡纳普展开的争论，这场争论可以提出以下四点：

1 逻辑分析是客观化的语言体验最为极端的表现。这就是说，日常语言活生生的、有生命的特质遭到了剥夺，变成了一套形式化的技术程序。对语言进行的这种尝试性逻辑改革，有把语言变成语言使用者无法识别之物的危险。在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论述语言的著作中，海德格尔就鼓励我们经历“一种语言体验”，这是任何形式的元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卡纳普式的逻辑的元语言与那种体验的距离非常遥远。

2 逻辑分析语言的形式化把语言变成了一种技术工具。卡纳普式的逻辑分析所采纳的这种语言观，在20世纪50年代被海德格尔称作“元语言学”，他把这种观点与他对于技术的观念联系起来。就是说，卡纳普式的逻辑分析属于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即哲学被还原为技术性思考。海德格尔以令人难忘的话语补充道，“元语言和苏联的人造卫星、元语言学和火箭是一样的。”逻辑分析就是一种权力意志，就是一种对自然的支配，它界定了这个技术时代。

3 卡纳普试图仅仅通过消除诸如“存在”和“无”这样的词汇去克

服形而上学，从海德格尔的观点看，这正表达了一种未经反思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如上所见，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存在被遗忘的历史。相信“存在”一词应当完全从意义语域中删除掉，这属于这种遗忘最为极端的表现。因而，卡纳普对形而上学的克服，正如所寻求克服的形而上学一样，是形而上学的。

4 在这种意义上，卡纳普对尼采的赞扬就是相当发人深省的了，因为海德格尔的追随者会认为，逻辑分析在形而上学史上属于次于尼采的时期。这也许可以使人想起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这样写道：“赫拉克利特在这一点上总是对的，即存在就是一个空洞的虚构。”虽然尼采或许会把逻辑实证主义看作他自己颠覆柏拉图主义的一个序曲。

至少，这就是我们可以想象 的海德格尔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回应方式。但让我们回到海德格尔在其已出版的著作中唯一一处提到卡纳普的地方，因为他实际上所说的话相当令人惊讶。它出现在1964年的一封信中，这封信是作为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篇文章的前言出版的。海德格尔在竭力克制自己的情况下谈到，

> 那些努力尝试所依然隐藏的核心，这些尝试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从其最为极端的对立立场［卡纳普→海德格尔］，所趋向的。我们如今把这些立场称作：技术–科学的语言观和思辨–阐释的语言体验。

现在，我想把这段话理解为海德格尔对哲学中两种文化问题的表述。就是说，当代哲学一致认可，语言是思想得以发生的领域，但如何才能最佳地理解和描述这个领域，则存在完全相悖的意见。在卡纳普看来，这就是要改变日常语言的模糊性和不一致，以便对可以和不可以说的东西有清楚的看法。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经历一种语言体验，它反映着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一切。

卡纳普的教条

一时间还不能想象卡纳普和维也纳学派的观点为分析哲学家们所普遍接受。情况远非如此。在1982年与布赖恩·麦基（Brian Magee）讨论逻辑实证主义的是非曲直时，艾耶尔苦笑道，“噢！我认为最为重要的缺陷是，它几乎全部都是假的。”在这方面，可以简略地指出三个问题领域：

1 卡纳普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标准就是他的证实主义的意义理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意义概念作为判定这种区分的标准过于狭窄，因为许多科学理论都具有很强的思辨性。他给出了爱因斯坦的例子作为一个证据：相对论就是一种思辨性猜想，无法把它完全还原为一套经验观察陈述。的确，这也同样适合于解释牛顿力学，它被接受为一种理论，并非因为它在经验上可以得到证实，而是因为它是一种具有最大解释力的假说。如果牛顿的或爱因斯坦的观点后来通过观察得到了确证，那么情况就会更好一些。如果没有得到这样的确证，它们就有可能遭到反驳。一种猜想的真实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经受住反驳。因此，波普尔自己对于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标准是可反驳性。如果一个理论是可以反驳的，它就是科学的；如果它无法反驳，它就是形而上学的。

2 第二类问题出自于证实原则。首先，面对批评性的攻击，卡纳普弱化了他的观点，从完全的经验证实变为“可确证性原则”。根据这种观点，句子和语词，如果它们在原则上 可以由可想象的 观察得到确证，就是有意义的。这，尽管比先前的那个略为宽松一些，仍然是一种经验的意义标准。然而，这里的真正问题是证实原则本身的地位：如果一切命题都必须由证实原则得到证实，那么，这个原则本身如何得到证实呢？就是说，什么是对证实的证实？回想一下，根据证实原则，当且仅当语词和句子可以被还原为重言式，或者在经验

上是可观察的，它们才是有意义的。证实原则不可能是一个经验陈述，因为正是由于它，经验陈述才获得了意义：这个原则本身是观察不到的。但它也不可能是一个重言式，因为虽然它本身不是一个事实，但它与事实具有一种关系，因为它正是这些事实得以判断的标准。逻辑重言式仅凭定义就无法与事实具有任何关系。因此，如果它既不是重言式，也不是事实陈述，那么，我们如何可以证实这个证实原则呢？唯一的选择是，它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证实的，这就意味着，它可以作出关于自己的陈述，提出自己的论证。这就开始听上去像是卡纳普和维也纳学派希望克服的老派的形而上学了。可以这样更为形象地表达这里的问题：证实原则是现代版的奥卡姆剃刀，它从经验事实的领域剔除了多余的形而上学实体。问题是：这个剃刀如何能够剔除自己？如果这个剃刀无法剔除自己，那么，我们就愈加无法证实这个证实。证实原则在实践上是自相矛盾的。

3 但是对卡纳普最为棘手的反对意见是他的学生奎因在他著名的论文《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1951）中提出的。经验主义的第一个教条就在于逻辑重言式和经验观察陈述之间的区分——从严格意义上讲被称作分析与综合的区分——的可行性。第二个教条是奎因所谓的“彻底的还原论”，就是说，每个经验陈述都可以被还原为关于事实或给予物的陈述。奎因认为，第二个教条无法得到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个教条也就落空了。由此，卡纳普有关意义的整个图景就崩溃了。用威尔弗雷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话说，诱惑卡纳普和维也纳学派的是“所予的神话”，这种观点认为，语词和句子与当下可得的实在具有直接的关系。奎因勾勒出了关于信念与经验之关系的另一个图景，把我们的全部知识比作“只是在边缘上对经验有影响的人造结构”。这种观点的结果是关于信念与经验或概念与直觉之关系的更为全景式的说明，奎因称之为“彻底的实用主义”。虽然奎因在晚年的著作

中以更为强烈的自然主义措辞说明他早期的观点，但正是这种对经验主义的实用主义批评，使得理查德·罗蒂建立了与欧陆哲学传统的诱人联系。

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理解海德格尔之意

正如我们所见，这场思想的碰撞大多都集中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卡纳普谴责海德格尔是一个形而上学者，而海德格尔则暗示卡纳普的科学世界观预设了一种未经审视的形而上学。因而，他们都指责对方犯了相同的形而上学错误。这种明显的无礼行为在哲学史上并不新鲜。为了调和这两种对立的立场，让我转向维特根斯坦的一小段话，这也是写于1929年，作为对海德格尔讲座的回应。他写道：

> 的确，我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和焦虑所指何意。人有碰撞语言界限的冲动。例如，想想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带给人的惊奇。这种惊奇无法用问题的形式来表达，也没有什么答案。我们可以说的任何东西都先验地属于毫无意义的。不过，我们的确在碰撞语言的界限。

把维特根斯坦看作调解海德格尔与卡纳普冲突的第三方在这里或许有所帮助。虽然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纲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启发，但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却从未顺畅自如，维特根斯坦于1929年突然莫名其妙地与卡纳普断绝了关系。而且，在维特根斯坦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重返哲学后，他的观点经历了急剧的变化，这使他更加远离了维也纳学派。在奎因之前，维特根斯坦就把《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看作是教条。因此，如果前期维特根斯坦是被可以还原为逻辑的语言图画所支配，这种情况下的语言可以使人说出能够说的一切而对剩下的缄默不语，那么，后期维特根斯坦就是寻求通过分析日常语言用法而摆脱这幅图画。正如他在《哲学研究》中所言，“不要寻求意义，而要寻求用法。”这就是说，哲学的核心问题变成了在语言的日常使用中对语言的理解。我们

并不需要发明一种新的语言，因为我们拥有的语言完全足够了。

维特根斯坦曾叙述了他与摩尔在剑桥对话的轶闻，他们的对话关注的是下面的问题：我们必须掌握逻辑分析以便理解我们用日常语言的命题所指的东西吗？维特根斯坦用这句话来回应摩尔：“多么该死的看法！”在这种意义上，想到海德格尔，我们就会把后期维特根斯坦看作在寻求摆脱形式的元语言，而走向这样的语言体验。所以，如果卡纳普克服形而上学的尝试是基于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那么后期维特根斯坦就代表了所谓的“对克服的克服”，在这里，我们就把逻辑分析的教条抛至一边，回到日常语言以及用这种语言表达的杂乱多样但丰富多彩的日常的人类社会生活。

图19　雅克·卡洛（1592—1635），《傻老头》

然而，我们不应把维特根斯坦想象成某种快乐的海德格尔追随者。绝不是这样一回事。显然，他的评论包含了对海德格尔的重要批评。这就是说，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知道海德格尔所称的存在和焦虑所指何意，但却暗示，这种东西是无法说出来的，否则就变成了无意义的东西。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海德格尔在1929年的讲座中想做的事情就是要碰撞语言的界限，以说出不可说的东西。现在，在维特

根斯坦看来，无意义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它检验着人类的深层欲望，他把这描绘为伦理层面的欲望。尽管如此，海德格尔所说的就是无意义的东西，这也正是卡纳普的观点。“什么是形而上学？”这个问题就是语言处于休息中的典型例子。所以，维特根斯坦知道海德格尔用存在和焦虑所指的东西，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话所指的正是海德格尔认为它们所意味的东西。

在我看来，海德格尔与卡纳普冲突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决定谁对谁错，而是在于把这个冲突看作明确地表达了哲学问题和文化反常，这些对我们来说仍然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陷入一种毫无结果的哲学僵局，就是说处于一方面是科学主义另一方面是蒙昧主义的僵持局面。下一章的题目就是要试图在这个僵局中找到出路，进入海德格尔所说的依然隐藏着的哲学核心。

注释

〔1〕 ...besides that they are concerned with nothing. 就是说，它们什么都不关心。——译注

第七章

科学主义与蒙昧主义的对立：避免传统的哲学困境

真正的哲学在于重新学习看待世界。

——梅洛-庞蒂

正如我在第四章所言，欧陆传统中的大多数哲学都可以说是对现代世界中一种危机感的反应，并尝试以解放的信念提出对现时代的批判意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它与大多数分析哲学之间最为显著的和戏剧性的差别，即它的反科学主义 。从欧陆的观点看，在哲学中采纳科学主义，并未能抓住哲学的批判和解放功能：这就是说，它没有理解科学的世界观与尼采所谓的虚无主义之间可能的共谋关系。它根本就没有理解科学和技术在人类异化出世界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种异化的出现可以有各种方式，或者是通过把这个世界转变为在因果上确定的与孤立的人类主体相对的对象领域，或者是通过把这些对象转变为可以毫不在意地进行检查或交易的无聊商品。

对科学主义的批评在于相信，自然科学的模式无法而且也不应当为哲学方法提供模式，自然科学并没有为人类提供他们通往世界的主要的和最为重要的通道。我们看到一系列欧陆思想家均表达出这种信念，比如伯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20世纪30年代之后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的哲学家。在这方面，哈贝马斯的著作《知识与人类旨趣》（1968）值得大力推荐。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主义意味着科学对自身的信念：这就是说，“确信我们不再能够把科学理解为一种 知识形式，而是必须把知识等同于科学。”《知识与人类旨趣》是对科学主义的系统批判，这种科学主义按照历史脉络前进，从19世纪中叶恩斯特·马赫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著作中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接受重建了实证主义的出现。从根本上说，哈贝马斯叙述了维也纳学派科学世界观的萌芽时期，但他的意图既是批判的也是解放的。他认为，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就在于拒绝任何批判反思的概念，这种反思体现在康德的著作以及那种批判性纲领在德国唯心论的发展中，这种纲领为马克思、韦伯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解放的社会理论提供了基础。哈贝马斯这样说的意思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如我们在

第二章中所见）就是对一个认识主体、说话主体以及行为主体的可能性条件的反思。康德由此就是在寻求确立理论科学知识的基础，但他的先验探究具有解放的意义，就是说，它寻求的是捍卫人类自由的概念。哈贝马斯这样说，“‘改变人生’的自我反思的行为就是一场解放运动。”黑格尔由此就把批判纲领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考虑了康德哲学必定预设了一整套与语境相关的假设，这些假设根植于实际存在的生活世界和社会生活的结构和历史之中。这就是说，康德的知识 图景必定预设了一整套没有得到恰当反思的旨趣——这就是黑格尔主张的基础，即康德的伦理学虽然具有值得称道的意图，但仍然是一种脱离语境的、抽象的形式主义。哈贝马斯的论点是，在黑格尔之后，这种对于知识与旨趣关系的批判性反思的概念是由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以例证的方式重新提起的，虽然弗洛伊德令人遗憾地倾向于科学主义，而这正是哈贝马斯竭力想要去除的。这就是说，心理分析是一种批判的反思的实践，它寻求的是把人类从各种幻觉中解放出来，这些幻觉人类很容易沉溺其中，而且“理解了这些幻觉，主体就从自身中解放了自己”。

做现象学

然而，有一种危险在于，对于科学主义的合理担忧会发展成反科学的态度。这就是蒙昧主义 的危险。在我看来，在哲学上应当避免的两个极端就是科学主义和蒙昧主义，它们反映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内部都存在的致命的倾向，正如卡纳普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冲突表明的那样。在海德格尔唯一提及卡纳普的地方，他谈到的是当代哲学中相互对立的立场之间“仍然隐藏着的思想核心”。我现在想试着思考一下这个核心，捍卫现象学的这样一个观念，其目的是在不陷入蒙昧主义的前提下摧毁科学主义。

梅洛–庞蒂用一句很好的措辞描述了现象学的任务，即“揭示人类经验的前理论层面”，而科学世界观的理论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人类

经验。我在这里要捍卫的正是类似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观念。就我的理解，这就是做现象学的问题，旨在力图揭示人和万物的经验的前理论层面，并为这种自身极其严谨并具有其可靠标准的层面找到一种恰当的描述方式。正是前理论体验的这种冷酷的但又是最难以把握的方面，使得现象学有了阐明的任务，这是一种对熟悉之物的神秘，梅洛–庞蒂试图用“知觉信念”这个概念对其加以说明。这就是说，当我睁开眼睛环视周围的世界，我就完全相信，它是存在的，富有意义的。问题是，当我开始反思这一点，并询问自己，“好吧，我如何能够确信，如果我的感觉证据并不总是完全可靠，那么外部世界是否对我依然存在？”这个信念就破灭了。如果人们已经得到了这种反思的立场，他们又如何重新获得这种朴素的知觉信念？梅洛–庞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用了他所谓的“过度反思”（hyper-reflection）这个概念：这就是说，现象学就是对先于反思的东西的反思，即对经验的前理论基础的反思。这里的关键在于，接触人类经验的前理论水平的方法，对我们这些掌握了各门学科理论态度的人类来说并非必定是直接的。因此，现象学就意味着要重新学习看待以可感觉的和实践的方式呈现出的世界。

图20　奥托·穆尔，《噢！感觉》（1925）

前科学

那么，现象学如何才能避免科学主义和蒙昧主义呢？让我们从科学主义开始。在我看来，科学主义 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主张，即认为看待万物的理论方式或自然科学方法提供了使我们了解自我和世界

的主要的和最为重要的方式，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则提供了解释一切现象的最好形式。现象学表明，在诸如卡纳普和诺伊拉特那里的，科学的世界观，完全依赖于一种以近便的、就事论事的方式把世界看作前反思存在的先验的实践观点。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所谓的环境（德文词是*Umwelt*），它在我们的周围，与我们最为密切、最为熟悉，也是对我们最有意义。这种周遭世界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客观的科学世界，而是已经由我们的认识、伦理和审美价值赋予色彩的世界。这就是说，科学主义，或胡塞尔口中的客观主义，就是忽略了作为科学实践条件的生活世界 这个现象。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中，胡塞尔将生活世界描述为下面的样子：

> 这属于理所当然的，先于一切科学思想和一切哲学质疑，即世界是——并总是——在先的，对观点的每一次修正（无论是经验上的观点还是其他的观点）都预设了这个已然存在的世界，即对于给定情况中毫无疑问地存在着的事物的一种视野……同样，客观的科学也是在通过前科学的生活而在先的世界存在的基础上提出问题。

在现象学的范围内批判科学主义，并不是要抛弃或否定以对于人与自然之统一的某种神秘的领悟或其他什么的名义得到的科学研究的结果。相反，它只是认为，科学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获得关于自我以及世界的认识的主要的或最为重要的方式。反科学主义完全不是指一种反科学的态度，也不是指“科学并不思考”，这是晚年海德格尔的一个说法，它带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在我看来，这里需要的是青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基本上被忽略了的但极有启发的说法，即“存在性的科学观 ”。这就表明了自然科学的实践如何来自于生活世界的实践，而生活世界的实践不能简单地还原为自然科学的解释。

让我来用海德格尔所谓的“前科学”概念（德文是*Vor-wissenschaft*）对这一观点稍加详述。海德格尔于1924年所作的清晰透彻的讲座包含了《存在与时间》中许多论证的雏形，他在这个讲座中把他的反思

描绘为属于一种前科学，这就是对科学研究可能性条件的解释性阐述。海德格尔这里所指的是，前科学描述了生活世界实践中的科学理论态度的社会起源。在这里我可以大胆地认定，海德格尔尝试着将其思想换成轻松一些的说法，就是说，他把这种前科学描述为科学进程中的警察，临时搜查一下古人的房屋，检查科学研究是否真的接近事物本身，因而也就是现象学意义的，或者科学是否研究的是传统的或流传下来的关于事物的知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现象学的警察部队大批逮捕和拘留了所有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在海德格尔的其他著作中，这种现象学意义的监督被称作构成逻辑（productive logic）。就是说，这是对生活世界的一种前科学的揭示，它呈现在科学之前，为科学奠定了基础。海德格尔这里要说的似乎是，与经验主义者或洛克式的把哲学家看作服务于科学的观念（如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不同，构成逻辑呈现在科学之前，表明了科学的基础在于一种关于个人、万物和世界的现象学，即前理论的经验层面。

我所谓的“现象学的前科学”或“存在性的科学观”并不挑战或否定科学的成果。它表明了科学的理论态度在我们的各种生活世界实践中找到了其可能性的条件——用哈贝马斯的话说，理论知识根植于实践旨趣。而且，下面将更为清楚的是，它表明了这种实践需要解释性的阐明或一种阐释学，而不是关于自然科学的因果假设或对伪科学的类似因果的解释。现象学所提供的是对个人、万物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进行澄清的重新描述。这样，现象学就不会带来任何伟大的发现，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提醒，即提醒我们所熟知的但当我们主张自然科学的理论态度时就被遮蔽起来了的事物。现象学给我们提供的是我们所谓的“日常回忆”，即回想起构成了日常生活错综复杂的精细网络的背景实践和线索。

《X档案》情结

现在让我转向蒙昧主义。重要的是要指出，这种现象学的反科学

主义可能 导致一种反科学的蒙昧主义 ，这在许多方面是被颠倒的或被歪曲的与科学主义对立的概念，但只要我们足够小心地加入一点思想纠察，就并不一定 会是这样。这里的蒙昧主义可以定义为反对自然科学提出的因果解释，而提出另一种因果解释，这是一种或多或少更高层次的、但在根本上却是玄妙的解释。这就是说，蒙昧主义以反科学的、神秘的但依然是因果的解释取代了被认为是科学主义的科学解释形式——地震不是由地壳的板块运动引起的，而是上帝对我们罪恶的愤怒。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种东西在《X档案》的每一集中都可以看到，即提出了两种因果假设，一种是科学的，另一种是超自然的，而前者总被证明是错的，后者则是对的，但在某个方面我们仍然存有疑惑。就是说，这种超自然的现象可以得到解释，但其原因则仍然是个谜——这是一种神秘之物。作为一种文化消遣，这可以被看作无伤大雅，但《X档案》情结的影响在其他地方则会更为有害。蒙昧主义的类似解释不外乎，上帝的意志、外来生物的无处不在、星座对人类行为的作用等等。不太明显的但却同样具有潜在危害的例子是弗洛伊德的本能的内驱力、荣格的原型、拉康的真实、福柯的权力、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 ）、列维纳斯的上帝痕迹，或者，确切地说，后期海德格尔中的存在于历史中以及作为历史本身的划时代的隐退。这个名单还可以增加。

在我看来，我们仍然可以从现象学中学到的是，当它成为我们通往个人和万物的首要的和最为重要的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我们关于整个社会的全部隐含的知识背景储备），我们并不要求对莫名奇妙的原因给出有关因果的科学解释或伪科学的假说，而是需要我倾向于（考虑到维特根斯坦）称作的阐明性评论 。例如，“事物对我们而言最为重要的方面由于简单和熟悉而隐藏起来。（人们无法注意到某个东西——因为它总是在人们的眼前。）”阐明性评论清楚地刻画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特征，它们被隐藏起来但却是不言而喻的，它们之所以隐藏正是因为它们是不言而喻的。它们使得这些现象变得更为清晰，改变了看待它们的角度，给予事物一种新的、令人吃惊的概述。在这

种意义上，现象学就是对不言而喻已知的但却未被关注的东西的重新安排；它使得我们可以重新学习如何看待世界。当然，用这种方式去看海德格尔的思想，并不像谈论存在的隐退或其他什么中划时代的贡献那样令人激动，但或许，这份激动正是我们最好应当克服的东西。

我以上所说应当可以清楚地表明，我是在试图对当代哲学图景给出一个小小的病理诊断，也就是要评论一番（也可以说是减弱一些）欧洲哲学和分析哲学最为放肆的地方。一方面，在某些欧陆哲学中存在一种蒙昧主义的危险，在这种哲学中，阐明社会现象就要涉及到范围广阔而含糊的力量、实体和范畴，就像是解释了一切又什么都没有解释一样。例如，类似互联网（或者是手机、甚至是移动房屋）这样的现象，可以被看作是进一步证明了支持海德格尔所谓的构架（*Gestell*）论题，这是普遍存在于技术世界的大致态度，因而从属于对存在的遗忘。这样，对日常现象的恰当解释就要涉及到类似因果的因素，它们的作用就像古代神话中的诸神一样。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任何方面都可以看作是证明了力量的惩戒基质、“大他者”（Big Other）的分解和真实之物的创伤、无器官身体的多样变化，如此等等。凡是存在这种蒙昧主义倾向的地方，其治疗方法就是要解除神秘或解除神话。就是说，一定存在这样一种批评，它探讨和研究了我们最初为什么会卷入其中。

但在我的小小病理诊断的另一面，在分析哲学的某些领域存在一种顽固的科学主义的危险。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篇哲学论文题目是“感受性和唯物主义：弥合解释鸿沟”，那么，为什么不会是这样的论文题目“大爆炸和我：弥合解释鸿沟”或者“自然选择和我：弥合解释鸿沟”？这种科学主义方法的假定是认为，存在一个通过更好的经验解释就能得到弥合的鸿沟。而我在这整本书中的观点就是，这里有一个无法通过经验探究而得到弥合的感觉鸿沟（即知识与智慧之间的鸿沟）。这就是说，生命意义的问题无法还原为经验的探究。知识与智慧之间的感觉鸿沟正是批判性反思的真正空间。在哲学中，但更为普遍地说是在文化生活中，我们需要剪掉科学主义和蒙昧主义这两翼，由此避免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中最为糟糕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需

要避免错误地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因果的或类似因果的解释来解决需要现象学阐明的东西。当然，说的容易做起来难，但至少我们可以开个头。

当然，科学主义和蒙昧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不像我指出的那样简单。首先，蒙昧主义并非单一的东西。的确有一种基于信奉某种超自然神秘之物的蒙昧主义，比如信奉宙斯、耶和华或死神——我们可以称之为“神秘的蒙昧主义”。但还有其他的蒙昧主义，它们是可以通过科学证明的：“医生，难道你不明白我的失眠和好斗是由于我去年夏天宿营的时候被外星人劫持了吗？”或者是“只需要再有一年的研究，我就会最终证明物质是神性显现的结果”。当然，也有一些科学主义是基于信仰，因此也就等同于蒙昧主义。例如，我也许会相信一切心理状态都能够还原为进化的安排，而并不知道如何还原或者为什么要还原。我们只是这样觉得。我们可以称之为“神秘的科学主义”或其他什么。我们只是说，有一种迫切的需求，是对科学主义与蒙昧主义的区别建立更为详尽的分类系统。

来一点思想纠察

如果我们想要能够探究本书描绘的两种哲学文化之间依然隐藏着的核心，那么我认为，我们就需要加入一点思想纠察。就是说，我们需要回到最初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解释与澄清之间、因果的或类似因果的假设与对阐述、解释或其他什么的要求之间的经典区分。简而言之，韦伯认为，自然现象需要因果解释，但社会现象则需要澄清，即对事物为何是如此这般给出理由或提出可能的动机。哲学的任务之一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迫切需要作出这种区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我们看到的海德格尔与卡纳普之间的尴尬局面，就会有落入科学主义、蒙昧主义，或者是《X档案》情结的诱人黄昏带的危险。本章中我的观点始终是，确保我们作出这种区分的最好方法，是通过一种虽非令人激动但却令人信服的现象学观点，但毫

无疑问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的观点希拉里·普特南已经进行了很好的表述，他是来自分析传统的哲学家，他对哲学中科学主义的批判逐渐响亮起来：

>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完全正确：伦理学关注的是我们如何生活以及人类的幸福，他同样十分正确地认为，这种知识（“实践知识”）不同于理论知识。承认知识的领域比“科学”的领域更为广阔，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得到一种关于我们自己以及关于科学的健全的人性的观点的话，这种知识观似乎是一种文化的必然。

我们的生活伴有知识与智慧的鸿沟，而且我们涉身其中。现在哲学家以及我们每个人应该开始思考这道鸿沟了。利害攸关的可能不仅是我们个人的心灵安宁。

第八章

运用你自己的理性：理论的枯竭和哲学的前景

可以想象，在未来，令人厌倦的“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分裂”得到回顾时被视为暂时性的不幸的交往失败——在未来，塞拉斯与哈贝马斯、戴维森与伽达默尔、普特南与德里达、罗尔斯（Rawls）与福柯，被看作相同旅途中的结伴者……

——理查德·罗蒂

我认为至少可以说，哲学目前的状态有趣地显露出整个理论模式的枯竭。正如我在上面所说，分析哲学已经有幸得到了某种历史的自我意识，变得对自己的传统有了兴趣，并且意识到在康德与弗雷格之间的德国哲学的确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可以讲述。但我们感到不解的是，这是否来得有些晚了，而且这种对分析哲学的起源、历史或者是黑格尔的前历史的兴趣以及目前对后分析哲学的热潮，是否只是在亡羊补牢。

在德国，哈贝马斯退休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其目前日程和未来方向很不确定，通常很难看到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与英美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等更为广泛的主流运动区别开来。当然，战后的大多数德国哲学都隐含着这样一点：即纳粹主义灾难之后的正常化。更为宽泛地说，德国在哲学上多少得到了平静，战后伟大的一代如哈贝马斯、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恩斯特·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米歇尔·特尼森（Michael Theunissen）、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和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等人大多都已经亡故或退休，而他们的后继者则还没有达到他们的思想高度。

我们正视现实吧，巴黎已今非昔比。法国20世纪30年代新康德主义的崩溃和法国人所谓的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兴起，带来了思想璀璨的两代人。在第一代人中，我们会想到列维纳斯、萨特、德·波伏瓦（De Beauvoir）、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拉康、巴塔耶和布朗肖特。在第二代人中，我们会想到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和克里斯蒂娃。虽然德里达依然有强大的影响力，仍然有大量有趣的哲学工作正在继续（特别是

法国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复兴），以及现象学极有影响的复兴，但我们的印象却是，其中没有一个能够使世界变得一片光明。

当然，这里提出的问题针对的是通常概念的欧陆哲学。曾得到证明的专业内部的理由是，有一种哲学传统贯穿了德国唯心论和浪漫主义，直到现象学和阐释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这完全被占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所遗忘、压制或者就是被忽略掉了。在这种意义上，以可以追溯到穆勒和阿诺德的十足英国式的姿态，这是个通过水路引进外国王子（公主），用一点欧陆的甜美和光明照亮了阴暗的功利主义的问题。但我所理解和试图加以解释的欧陆哲学本身，却面临着两个根本问题：首先，如前所示，在海峡两岸正在进行的是一件并非那么 有趣的工作；其次，被忽略了的这个传统的大部分内容，现在则得到受过分析哲学训练的哲学家们饶有兴味的解读和使用，他们目前的工作正是基于泰勒、卡维尔和罗蒂这样的哲学家所建立的基础。

对于沉浸于千禧年氛围中的人而言，并不十分清楚的是，究竟什么是哲学上的未来，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未来的话。但从光明的一面看，我想在本书的结尾提出一些针对目前状况的可能的补救方法。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起点，即康德。康德用一句话概括了启蒙主义的纲领："运用你自己的理性！"（*Sapere aude* ）这句话可以得到不同的理解：敢于为自己而着想 。这就是说，欧陆哲学家们无法，在我看来则是不应当，期望从水路引进新的王子（公主）。我们无法期望从法兰克福、巴黎或其他什么地方引进新的伟大的欧陆模式。

我们必须从哲学上为自己考虑，当然，这完全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我认为这种工作刚刚开始，而且我要说，在英国，以及英语世界的其他地方，重新出现了一种真正非宗派的对由这两个主要传统提供养分的深层哲学问题的兴趣，也就是说，这些问题必须满足当地的情况，学会讲这个地区的方言和部落的语言。其中部分问题就在于，欧陆哲学一直以来被简化为一套专名，它们带有各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我们在某个或一系列入门课程中，或者是通过阅读类似本书一样的著作，就可以带有热情、迷惑或者冷漠地大致了解他们。在我看来，这不再是崇拜一系列专名的问题，而是对它们遗留下来的东西做

些事情 ；做具有创造性、发明性主题的工作，而不是将自己局限于翻译和注释。哲学必定是与一定思想传统具有批判关系的论证清楚的概念创造，而不是令人伤感地哀悼失去的机会或只是强化人的常识的技术。

正如我一直试图表明的，哲学研究中目前的分野是某种多少有些不充分的专业自我描述的结果。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宗派性的自我描述，这是学科专业化的结果，这个过程导致了哲学批判功能及其解放的目的的削弱，以及它在文化生活中逐渐的边缘化。这样，借用罗蒂的说法，这种区分就变得令人厌烦了。

我在本书中一直尝试讲述的是怎样能够把这个区分放置于更为有趣的历史图景中，即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都可以被看作是对“两种文化”问题的至关重要的表达：科学说明与人文阐释的对立、经验–科学主义–边沁–卡纳普与阐释学–浪漫主义–柯尔律治–海德格尔的对立。我的观点始终是，当这种文化状况没有得到恰当的理解，那么我们就冒险陷入了一种毫无结果的而且有害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是科学主义，另一方面是蒙昧主义。要正确地理解哲学中两种文化的问题，我们就要理解哲学自康德以后的道路分殊以及界定了哲学的不同问题。我一直关注康德之后的理性危机这一主题，描述了由此引发的虚无主义问题，以求勾勒出欧陆哲学这一面。我希望，一旦这个过程更为清楚了，我们学会了克服久治不愈的宗派主义，那么，我们就会开始推进哲学，并且勇敢地面对深层面更具持久思想旨趣的问题，譬如那些关于知识与智慧之间鸿沟的问题。

最后，这正是我想提出的哲学的前景，这是一种有望实现的前景：哲学可能会构成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成为一种文化与其自己以及其他文化交流时必不可少的部分。哲学是在专门语境中进行批评性反思的时刻，人类由此得以有机会分析他们找寻到自我的世界，质疑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被看作常识的东西，在这个社会中他们提出最为概括性的问题，诸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爱？”，“什么是生命的意义？”。更为泛泛地说，这个希望就是，这种问题所提出的各种考虑可以通过探究和论证而具有教育意义和解放的

效果。正如斯坦利·卡维尔所言，哲学是一种成人教育。但这应当很难算作新闻，因为对哲学的这种描述，是连苏格拉底都不会感到惊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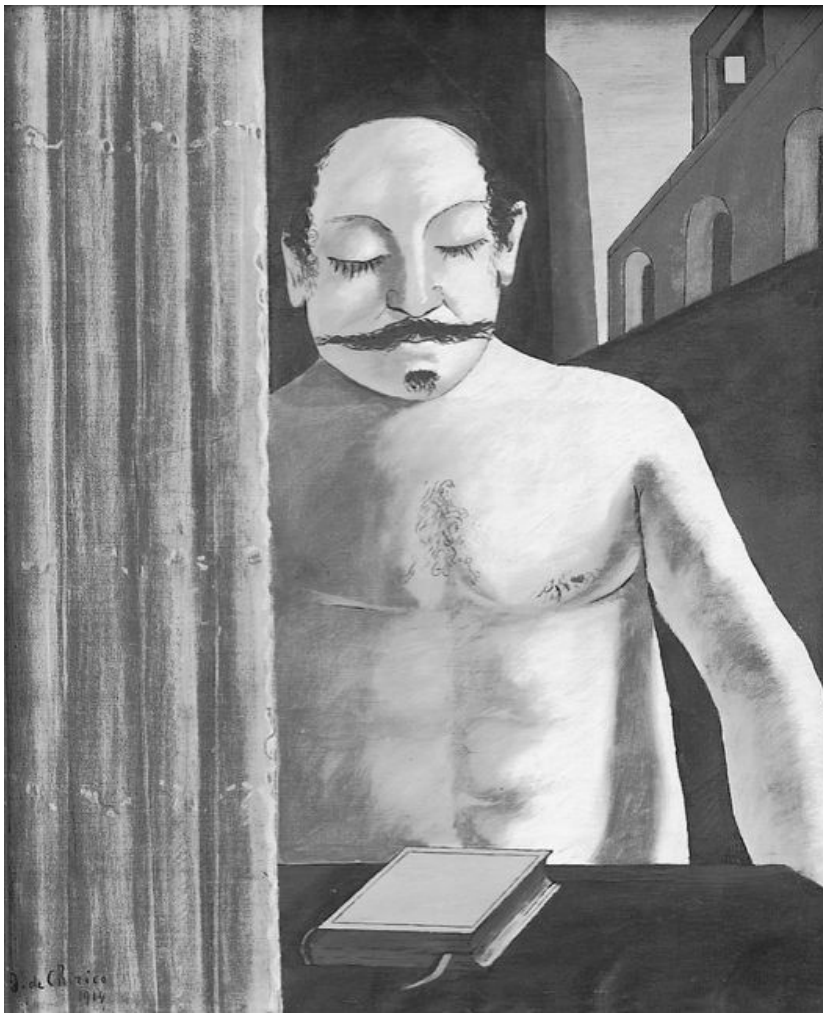

图21　乔治·德·希里科（1888—1979），《孩子的大脑》

附　录

所谓的“德国唯心论最古老的体系-纲领”（1796）

该页正面

一种伦理学 。由于整个形而上学在未来都将归属于道德 ——康德只是用两个实践公设和穷尽一切的 无作为例子 ，这种伦理学将只不过是所有观念的，或者说是一切实践公设的，完整体系。第一个观念自然就是作为绝对自由存在物的我自己 。以这种自由的自我意识存在［*Wesen* ］，整个世界 就同时出现了——出自无——唯一真实的和可以想象的无中生有 ——我在这里会返回到物理学的领域；这里的问题是：一个世界如何必定为一个道德存在物而存在？我会再次使我们的物理学得到提升，我们的物理学正在经由实验途径缓慢而费力地前进。

因此——如果哲学赋予了观念和经验以材料，我们最终就可以获得我期望从上个时代得到的大物理学。这并不是说我们目前的物理学可以满足类似我们的或我们应当成为的创造性的精神。

我从自然界转到了人类活动 ［*Menschenwerk* ］。把人性观念放在第一位——我想表明没有国家 的观念存在，因为国家是机制性的东西，正如很少有机器 的观念一样。

只有自由 之物才能称作观念 。于是，我们也必须超越国家！——因为每个国家都必会将自由人看作机器的一部分；但它不应当这样做；这必须得到终结 。

你们可以亲眼看到，这里的所有观念，永恒和平的观念等，都只是从属于 更高观念的观念。同时，我在这里想确立的是人类历史 的原则，想完全揭示国家、宪法、政府、立法这一整套人类的悲惨创造物。最后涉及的观念是关于道德世界、神圣性、不朽——所有迷信、对教士职位的追求的复苏，这一直是最近由理性本身捏造的理由——所有灵魂的绝对自由，这些灵魂本身就承载着可理解的［intellektuelle］世界，可能并不寻求它们身外 的上帝或者不朽。

最后要谈的是将所有的观念统一在一起的观念，这就是美 的观念，这个词取自更高的柏拉图的含义。我现在相信，包含了所有观念的最高的理性行为，就是审美行为，而真和善只有在美中才 是兄弟——哲学家必须和诗人［Dichter］拥有同样的审美能力。

该页反面

没有审美感的是我们的迂腐哲学家［*Buchstaben-Philosophen* ］。精神哲学就是美的哲学。一旦无法成为精神上的［geistreich］东西，我们甚至无法在精神上对历史作出推理——没有审美感。无法理解任何观念的人缺乏的到底是什么，在这里就显而易见了——可以如实承认的是，只要脱离了图表和登记，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神秘之物。

诗歌由此就得到了更高的尊严，最终它再次成为它在开始时的样子——（历史）人类的教师 ；因为不存在哲学，也就不再有历史，诗歌单独就可以超越一切留下的科学和艺术而存在。

同时，我们常常听到，大众应当有一种感性的宗教 。不仅是大众而且是哲学家也需要关于心的理性的一神论，关于想象［*Einbildungskraft* ］和艺术的多神论，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首先我在这里会谈到一个观念，据我所知，这个观念还不为人所知——我们必须有一种新的神话，但这种神话必须服务于观念，它必须成为关于理性 的神话。

在我们把观念变成审美的——也就是神话的——之前，它们对人们 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在神话成为理性的之前，哲学家一定对它感到羞愧。因此，开化的和未开化的人们最后一定会握手致意，神话一定会成为哲学的，而人们也会成为有理性的，哲学一定会成为神话的，以便使哲学家们变得感性。那时，永恒的统一就会降临我们之间。绝不会有轻蔑的眼神，人们在智者和牧师面前绝不会有盲目的颤抖。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期望所有 能力，个人的能力以及所有个人的能力，得到相同 发展。任何权力都不会受到压制，于是精神的普遍自由和平等就会降临！——来自天堂的更高生灵一定会在我们之间建立这个新宗教，它将是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作品。

引自安德鲁·鲍伊《美学与主体性：从康德到尼采》
（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0年）
安德鲁·鲍伊译

译后记

这是一本关于欧陆哲学的入门指南，但绝不是可以不假思索就一气读完的消遣读物。作者在书中对欧洲大陆哲学的历史演变、主要特征及其与分析哲学之间关系的来龙去脉的精到阐述，使每位读者在获得相关历史知识的同时，更体验到了思想的厚重与深沉。这就是作者给我们展现的宏大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历史背景。在这个背景中，我们看到了西方哲学家们如何以思想的锋芒挑战和反思人类社会以及思想者本身。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书中揭示的欧陆哲学的秘密，即批判、实践和解放，正是哲学在当下应当履行的重要社会功能。

我在繁忙的写作之中接受这本小书的翻译工作，主要是因为书中的主题正是我近些年来一直关注的话题，即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对立与融合。我始终认为，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的对立更多地是建立在相互误解的基础之上，而只有追寻它们共同的思想根源，我们才能清楚地理解它们的思想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分歧所在。克里奇利的这本小书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我的这个看法。但更有意义的是，我从这本书中也获取了很多对欧陆哲学本身的深刻理解，这些对我更好地认识分析哲学的性质以及未来发展都具有很大的启发。

该书作者克里奇利曾在英国的埃塞克斯大学工作多年，主要教授欧洲大陆哲学，这在以分析传统为主导哲学的英国很是不易。后来，他移居美国，现在担任纽约新学院大学的哲学教授。这所大学在美国以及英语世界以研究和宣传欧陆哲学而著名，曾是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大本营，过去有马尔库塞这样的哲学大家，现在则有伯恩斯坦这样的美国新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我与克里奇利于2006年在杭州相识，当时我们共同参加由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主办的纪念列维纳斯百年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共同讨论了列维纳斯这位当代法国哲学的重要人物，当然也谈到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关系的目前状况。他本人长期致力于对欧陆哲学的研究，虽然没有像罗蒂那样试图在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但他对欧陆哲学本身的研究成果也的确为我们重新认识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关系提供了很大启发。这本小书正是他多年来研究欧陆哲学的重要成果之一。

最后，我要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盛情邀请，感谢高耿松编辑和刘佳编辑的信任和支持。本书的翻译工作是在举国上下准备奥运会的历史时刻完成的。奥运会是以体育盛会消解一切对立的重要形式，我希望，这本小书也能为我们消除对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关系的偏见作出一点贡献。

江怡

2008年2月14日于北京

“哲学，就是爱智慧，这种智慧会使我们的人生富有价值。”这本小书的核心即是希望将哲学置于文化生活的核心，进而复苏对哲学最古老的定义——对智慧的热爱。

本书从两百年前的康德谈起，对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大家一一道来，系统阐述了欧陆哲学的历史演变、主要特征及其与分析哲学之间关系的来龙去脉，解答了大家心中的问题：欧陆哲学到底是什么。

百科通识文库

49

动物权利

戴维·德格拉齐亚 著

杨通进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百科通识文库

49

动物权利

戴维·德格拉齐亚 著

杨通进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72**

Animal Right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2.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2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David DeGrazia 2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物权利 / （美）德格拉齐亚（DeGrazia, D.）著；杨通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21-9

Ⅰ．①动… Ⅱ．①德… ②杨… Ⅲ．①动物 - 普及读物 Ⅳ．①Q9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41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徐 宁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21-9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前言与致谢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动物的道德地位
第三章　动物是什么
第四章　痛苦、拘禁与死亡的伤害
第五章　吃荤
第六章　收养宠物和动物园的动物
第七章　动物研究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戴维·德格拉齐亚，乔治·华盛顿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生物医学伦理学》杂志副主编。著有《认真对待动物：精神生活与道德地位》，并在哲学和伦理学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

译者简介

杨通进，贵州剑河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著有《环境伦理：全球话语，中国视野》、《走向深层的环保》等，译有《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等，发表论文30多篇。

图　目

图1　一名正在拍摄养鸡场内部的动物权利积极分子
图2　正用嘴接住一条鱼的北极熊
图3　一只被捕兽夹困住的狐狸
图4　一只正在“钓”白蚁的黑猩猩
图5　路边动物展览园中的一只老虎
图6　一间饲养肉鸡的鸡舍
图7　咬着栅栏的一头猪
图8　一只待售的长臂猿幼崽
图9　一只正在绳索上行走的猩猩
图10　一头犀牛
图11　一只被关在笼中、植入电极的猴子
图12　一只正在接受五成致死剂量测试的老鼠

前言与致谢

在撰写这本关于动物权利的小书时，我很自然地在其中融入了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基于这一理由，我不能声称自己将以完全中立的态度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不仅主张有感知能力的动物拥有道德地位，而且认为它们应获得同等的考虑（第二章将阐述这一术语的特定意义）。同时，由于我认为另一种观点——“差别对待模式”——也几乎是同样令人信服的，因此，我在本书中将同时考察关于动物道德地位的这两种观点的意涵。然而，由于我发现，那种认为有感知能力的动物完全没有道德地位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在尝试驳斥这种观点以后，我基本上就不再讨论它了。

在撰写本书的几年以前，我写过一本篇幅更长、学术性更强的书，即《认真对待动物：精神生活与道德地位》（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如果说那本书所面对的读者群主要是学者的话，那么，本书则是为那些想了解与动物权利有关的伦理和哲学问题的、勤于思考的人所写的。因此，在避免过于简单化的前提下，我尽力把《动物权利》写得通俗易懂；我还在每一章加入了一幅或多幅插图，给每一章都开列了关于参考文献、资料和（在某些情况下）推荐读物的清单，而不是添加正式的脚注。对于那些已经阅读过《认真对待动物》的读者来说，本书所包含的下述内容或许是有趣的：对人们对待动物的态度的简要历史回顾、关于“动物权利”一词的不同含义的讨论，以及对动物实验问题的详细考察——本书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超越了前一本书的论阈。

在本书杀青之际，我想对几位一直给我帮助的人士表达感激之情。牛津大学出版社大众图书编辑部主任乔治·米勒邀请我提交了本书的写作提案，并协助了最初的讨论使提案得以完善；后来，丽贝卡·奥康纳和凯瑟琳·汉弗莱斯在文字编辑方面又给了我诸多帮助。作为本书的外请审阅者，罗伯特·加纳给了我诸多鼓励，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与伯纳德·罗林就动物的精神生活、与保尔·夏皮罗就动物保护行动主义，以及与彼得·辛格就与动物有关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所进行的讨论都使我获益良多。最后，我要感谢我所有的家人，特别是

凯瑟琳和佐薇的爱和帮助。

戴维·德格拉齐亚

华盛顿，2001年7月

第一章

绪论

2001年4月，根据一条匿名消息提供的线索，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一个动物权利组织——“爱心战胜杀戮”（Compassion Over Killing，略作COK）开始着手调查一个大型养鸡场，该养鸡场属于美国马里兰州塞西尔顿的ISEAmerica农业公司。在ISE的管理者拒绝了他们的探访请求后，COK的积极分子于夜晚携带摄像机秘密潜入了这个养鸡场。COK的代表随后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披露的录像使许多观看者大为震惊。现场的观众看到，数千只母鸡拥挤在由铁丝制成的层架式小笼子里，其中许多已经羽毛脱落并奄奄一息。有些鸡被粪便所覆盖，一些被卡在铁网间动弹不得。还有少数鸡已经死亡并开始腐烂。这些积极分子解救了8只被当地兽医诊断为健康状况很差的小鸡；在我撰写本书时，他们正开始发动一场全国性的禁止层架式铁笼养鸡的运动。因此，他们的目标不只是专门针对ISE公司（尽管该公司的铁笼设备很有代表性），而是针对整个蛋类生产行业。

图1　一名正在拍摄养鸡场内部的动物权利积极分子

由动物保护积极分子所发动的这类运动有时是很成功的。面对来自积极分子的压力，欧盟决定在2012年前逐步淘汰层架式铁笼养鸡

法。并且，在2000年夏天，麦当劳宣布，它的餐馆只从那些给母鸡提供了72平方英寸铁笼空间的产蛋厂家购买鸡蛋——这比美国的行业标准几乎高了50%。

这类事件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即当代动物权利运动的兴起；该运动对关于非人类动物的道德地位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大多数人都反对虐待动物，并认为动物是有道德意义的。但同时，允许人们几乎不受限制地利用动物的传统观念又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信念和日常行为。面对这类相互冲突的信念，我们能够体验到道德和理智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则会促使我们努力去解决此类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动物与人相比所具有的道德地位呢？传统主义者和动物权利的拥护者都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我们如何理解动物本身密切相关：动物是什么样的生物？特别是，它们的精神生活如何？

在讨论这些以及相关的问题时，从历史的角度勾勒关于动物的传统看法和新近兴起的动物权利运动将对我们有所帮助。下面的概述得益于贝考夫（Bekoff）、埃根森（Egonsson）、雷根（Regan）和辛格（Singer），特别是泰勒（Taylor）（参见References，sources，and further reading）；这个概述非常简洁，因此在关于传统和当前对待动物的态度的主要资料上必然是有所选择的。

历史概述

纵览整个世界，关于动物道德地位的传统思想主要来自于宗教和哲学，它们与科学相互影响，共同构造了关于动物究竟是何种生物的概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把哲学和宗教区分开来的趋向主要存在于西方思想中，而把哲学与科学区分开来也只是相对现代的事情。在西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下述观点影响颇深：动物有感觉但缺乏理性 ；它们在自然等级体系中低人一等，因而是实现人类目的之恰当资源。他认为，由于动物缺乏理性灵魂，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就不存在公正与否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还认为，由于依其所述男人的推

理能力比女人强，因而男人天生就比女人优越；而且，有些人——他们在体格（而非心智）方面更强——天生就适合做奴隶。在古希腊时期，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包括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前者认为动物可能是由人类转世而成，后者则认为动物具有一定的推理能力。但是绝大多数随后的西方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观点都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一致：动物是为人类的使用而存在的，只有人类具有理性。

《圣经》声称，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而我们人类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随意使用自然资源——包括动物；这一观点极大地强化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关于动物的观点。另一方面，通过宣称所有的 人类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圣经》为人人平等的观念提供了合法证明，而这与希腊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赞成贵族统治的倾向是背道而驰的。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如奥古斯丁（Augustine）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等都强化了这一主张，即动物之缺乏理性证明了它们被人统治的合理性——自那时以来，大多数基督徒都接受这种理论。更古老的犹太教传统虽然赞成动物从属于人类的观念，但它比基督教更强调尽可能减少给动物带来痛苦的重要性。基于所有的上帝创造物都值得同情这一信念，犹太教的这种关怀既体现在犹太教关于屠宰和食用动物的教义中，也体现在对那些为娱乐而追猎、斗牛和斗狗的谴责中。伊斯兰教——第三个亚伯拉罕宗教传统——虽然赞成人类是最为重要的，且动物是为人类的便利而存在的，但是，《古兰经》仍禁止虐待动物，而且它或许也认为（取决于读者的理解）动物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性；更重要的是，据说先知穆罕默德说过："谁善待真主的造物，谁就是善待自己。"

虽然现代西方哲学之代表人物的观点显示出有趣的差异，但现代西方哲学（这个时期开始于17世纪的笛卡尔［Descartes］，延续到19世纪后期）基本上坚持人类至上的观点，这反映了这段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影响。现代科学完全用机械论术语来描述自然，取代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这一自然观：自然是有目的的，而且有点类似于一个生命体。在这种背景下，勒内·笛卡尔认为，把动

物（自然界的一部分）看作有机的机器是很自然的，它们不仅完全缺乏理性并且完全缺乏情感 。他认为，人的身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的本质——以独一无二的语言能力和创造性的行为为代表——只存在于人的心灵、精神或灵魂（只有这些部分才拥有意识）中。但是，笛卡尔认为动物甚至感觉不到痛苦的观点使大多数哲学家感到震惊，因为这有悖于常识。所以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其他人都认为动物具有感觉和情感，但他们都否定动物拥有某些要获得重要的道德地位所必需的特性，例如理性或理解一般概念的能力。在康德的有巨大影响的道德哲学中，自主性 ，或从自然的因果决定论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是证明人类使用动物的正当性的决定性因素。

尽管关于人类优越性的断言明显地支配着现代哲学，但其他不同的观点也同样存在。大卫·休谟（David Hume）就是这种观点的一个代表。休谟把同情看作道德的基础，而且同情可以延伸至人以外的有感知能力的动物。不过，在休谟看来，公平概念关涉的是那些力量大致相等的人之间的契约，因而与我们对待动物的行为无关。更激进的是功利主义的先驱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观点。边沁认为，正确的行为给受该行为影响者带来的快乐应该最大限度地超过给其带来的痛苦。边沁在一个脚注中对这个标准的意涵作了说明，他宣称，功利原则必须把有感知能力的动物考虑进去，因为它们能够感受到的快乐和痛苦并不比人类少。因此，边沁把人类给动物施加痛苦的司空见惯的行为批评为“暴君行为”。后继的功利主义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功利概念，其中，人类的典型快乐——例如智力、美学和道德方面的快乐——在计算功利量时比通常的感性快乐更具分量。然而，这种向人类优越论的理论倒退却使密尔认识到了日常的动物使用行为与考虑动物权益的无偏私的道德立场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与此同时，相对异端的阿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反对把理性、自主性、自我意识和权力看作道德地位的首要决定因素。受印度教和佛教的影响，叔本华认为，道德生活要求对所有能够感受到痛苦的生物表示同情。不过，在他看

来，人类更发达的智力增加了他们感受痛苦的能力，因而给人类遭受的痛苦以更多的道德关怀是合理的。

在现代科学的舞台上，对我们理解动物作出最大贡献的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19世纪所做的工作，他证明了人类是从其他动物物种进化而来的。他还有力地指出，动物与人类的能力差异主要是程度上的而非性质上的，尽管这一观点的影响要小得多。基于仔细的观察，达尔文坚信，许多动物也有一般的概念、某些推理能力、初级的道德情感和复杂的情绪。一直以来，科学家们基本上都忽视了达尔文的这些观点，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但是，进化论——特别是与遗传学相结合时——还是证明了，那种认为人与动物之间在认知方面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的历史概述到目前为止只限于西方传统。在转到19、20世纪的动物权利运动之前，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非西方传统的主要观点；在某些方面，这些非西方传统与西方思想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虽然一个西方人和一个东方人可能都会说生命是神圣的，但只有东方人在心里想到的是所有的 生命。印度的耆那教、印度教和佛教传统，都以某种方式接纳不杀生（*ahimsa* ）的信条，即提倡不伤害所有有生命的事物，并且对所有的生命都保持敬畏。这些传统都有着转世再生的信仰。耆那教徒和佛教徒都强调有生命之物的互通性，提倡素食，并反对传统的用动物献祭的行为。印度教实际上是由一些不同的宗教组成的，它在近几个世纪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部分地是源于佛教徒和耆那教徒的影响。不杀生已成为印度教的核心信条，同时动物献祭也变得越来越少见。今天，许多印度教徒都认为，残害生命将会使行为者在今后遭受痛苦，这种观点从自利的角度为动物保护伦理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在远东，古老但仍生生不息的儒学传统强调万物一体，并认为人类与动物的能力仅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相应地，孔子的追随者们尽管承认人类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却努力培育万物一体的情感，并同情所有遭受痛苦的生物。

在美洲大陆，当地的土著人（他们可能来自亚洲，横跨现在的俄罗斯到达阿拉斯加）倾向于认为，精神赋予了自然以生命——这与笛

卡尔的机械自然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与他们认为动物生命具有某种精神性的看法保持一致，美洲的土著人一般都接受了尊重动物的原则，虽然他们也准许（恭敬地）杀死和食用动物。

总而言之，西方传统大体上持这样一种观点：由于只有人类才是具有自主性的、理性的、有自我意识的、或能够理解正义的，因而只有人类才拥有、或至少拥有更高的道德地位。动物普遍被看作是为人类所用而存在的。非西方传统既本身呈现出重大的差异，也与西方传统迥然有别。从总体上看，我们通常发现两个朝不同方向发展的观点：一个慎重地承诺保护动物的利益和尊重动物的生命——不论是认为它们的生命具有内在价值还是仅仅作为人类自我救赎和繁荣的工具，另一个则确信人类比其他动物更重要。

虽然西方传统比非西方传统在对待动物上普遍地更缺乏尊重，但当代关于动物权利的思想和政治见解却兴起于西方。第一次重大的动物权利运动开始于19世纪的英格兰，这场运动的起因是反对把未经麻醉的动物用于科学研究。这场运动引发了保护动物的抗议活动，促进了英国的立法改革，也催生了大量动物保护组织，特别是在讲英语的国家。然而，反对用动物做研究的呼声在20世纪初开始衰落；尽管一些早期的保护动物的仁爱组织依然存在，但这场运动丧失了动力并逐渐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

在20世纪60、70年代，英国、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和学术氛围对一场新的仁爱运动持接纳的态度。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民权运动为反对其他形式的歧视打开了方便之门。对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关注为强调对动物个体的关怀创造了逻辑和文化的空间，因为动物明显受到环境状况的影响。在科学上，一度占统治地位的行为主义理论逐渐衰落；行为主义禁止讨论动物（或人）的“内心状态”，这使得很难为同情动物找到科学上的依据。1976年，唐纳德·格里芬（Donald Griffin）出版了《动物的意识问题》一书，催生了一场影响日隆的科学运动——认知生态学；认知生态学在进化论的背景下研究动物行为，并把“内心状态”确定为信念、欲望和情感。1975年，彼得·辛格出版了《动物解放》，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事件；该书把有说服

力的哲学推理用易理解的文字表述出来。这本书促成了大量关于动物道德地位的严肃的哲学著作的产生——一个20世纪哲学家普遍忽视的话题，同时，该书还激发了许多人成为动物保护的积极分子。

正是在这种包容性的文化空间里，近年来的动物权利运动得以兴起。这个运动的重要进展包括1963年“英国抵制打猎协会”的成立、1971年“绿色和平组织”的建立以及1980年“善待动物协会”的成立。今天，动物权利运动有数百个组织和数百万成员，在立法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突破，这里仅列举少数几个例子，如非常超前的《瑞典动物福利法》（1988）、《英国禁用板条牛圈关押小牛法》（1990）和《国际海豚保护法》（1992）。在科学界，寻找动物研究替代品的做法在一些领域里被广泛推崇。个人基于伦理的原因放弃吃荤在20或30年前还显得反常而古怪，但现在，符合道德的素食主义已进入主流社会并发展迅速。

西方文化已发生了改变，变得越来越接受动物权利的观念，越来越认真地探究与动物的道德地位和精神生活有关的问题。我们在新闻中看到动物保护积极分子已不再感到诧异。今天，许多人都努力解决善待动物的相关问题，他们都希望进一步理解并弄清与动物权利有关的问题。

本书计划

本书将探讨与动物权利有关的一些关键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涉及到与人类相对应的动物的道德地位。动物拥有道德地位或道德权利吗？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如果动物拥有道德地位或权利，那么，在某种与道德相关的意义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们看成是和人类一样平等的？在此有必要把平等对待（equal treatment）与平等考虑（equal consideration）区别开来，并简述在这些问题上的各种不同观点。同样，我们还必须确认讨论的范围。在谈论“动物”时我们心中所指的究竟是哪些动物——是字面意义上的包括变形虫在内的所有动

物呢，还是仅指有感知能力的动物（即具有情感的动物），或某些其他范畴的动物？我们将在第二章讨论这些问题。

对动物道德地位的探究通常有一个常识性的假设，即许多动物有感知能力。但是，对任何有关动物伦理问题的详实的、细致的考察，都要求我们知道更多关于动物（特别是它们的精神）究竟是什么的知识。例如，如果有人认为虾缺乏感知能力，没有任何（意识）感觉，那么，这种信念将会减弱人们对此类生物的道德关怀。因此，第三章的基本问题是：基于可获得的经验证据，大致上哪类动物有情感 ——诸如疼痛的感觉和害怕的情绪——以及它们拥有的是何种情感。

在清晰理解动物的精神生活之后，我将在第四章讨论动物拥有哪类利益 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将说明动物可能会受到伤害 的主要方式。显然，不愉快的情感，如痛苦和沮丧，就是伤害的一种方式。动物还会因拘禁 而受到伤害；拘禁是对动物行为自由的限制，这种限制严重损害了动物过好生活的能力。但是，免受拘禁之利益是否仅仅是避免痛苦感觉之利益的一个例证？如果一只被拘禁的动物已经习惯于被拘禁的状态，并未感受到痛苦，那么，我们剥夺它行使其物种特有功能的机会，是否是对该动物的伤害？使动物提前死亡 （有别于痛苦的死亡过程）是对动物的伤害吗？毫无痛苦地杀死一条在熟睡中的正常而健康的狗的行为伤害到了这条狗吗？一旦我们开始探索动物利益的性质和动物可能会受伤害的一般方式，我们就会遇到真正有争议的问题。第四章将讨论关于这些问题的不同观点，并对某些问题作出回答。

通过提供理解动物的道德地位、精神生活和利益的框架，第二到第四章为后面几章更具实践性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五章分析了吃荤的伦理问题，主要关注的是工厂化农场的肉产品的消费问题，同时也考察食用家庭农场生产的肉产品问题以及海产品的问题。在第六章，我们考察的是收养宠物和动物园的动物的伦理问题。除了考虑人们通常施加于这些动物的伤害之外，该章还将探讨是否有合理的理由——基于对动物的尊重 ——反对在家中或动物园里限制动物自由的问题。最后，第七章将探讨异常复杂的动物研究问题。该章将直面这样

一些问题：生物医学的进步能否证明伤害研究对象（它们对该研究既不知情也不同意）的合理性；如果能够证明，那么对动物受试者的伤害是否存在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继续研究就是不道德的；拟进行的实验要取得怎样的成功才能获得伦理的辩护；研究团体应如何积极地寻找动物实验的替代品。

如果本书的探讨是成功的，那么它将可以帮助读者思考当代动物权利讨论中的一些最核心的问题。

第二章
动物的道德地位

从1934到1998年每年的劳动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小镇希金斯都会举行一个射杀活动物的节日，直到后来该活动被禁止。参与者曾经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在一年一度的活动中，有5,000只鸽子被从笼子中一只一只地放出来，仅仅是为了成为活动参与者的靶子。据动物基金会的调查者估计，被射中的大多数鸽子（超过3/4）都只是受伤而不会立即死亡。当竞赛者结束了他或她的一轮射击之后，一些鸽子掉落在射击场上，另一些逃至附近森林的则因受伤而慢慢死去。在每一轮射击完成之后，年幼的孩子们就会收集受伤的鸽子并用各种方式弄死它们：使劲用脚跺、扯下它们的头、把它们往桶上砸，或者将它们掷入装有其他奄奄一息或已死的鸽子的桶内，使它们窒息而死。射击者和孩子们并不是秘密地进行这类活动。数千观众购票入场，坐在露天看台上观看，一边吃东西、喝啤酒，一边对射击者和孩子们大声叫好。

人们可能偶尔会听到这样的观点：人类使用动物的行为不会产生任何伦理问题。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那么，刚刚描述的那类行为——为娱乐而射击活鸽子、踩死它们、扯下它们的脑袋，等等——在道德上就是没有问题的。同样，鼓励孩子们参与对动物的虐待，鼓励成人和孩子通过购票入场加入这种虐待者的行列，也是不存在道德问题的。

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荒谬的道德立场。很难想象任何一个在道德上严谨的人——即任何一个认为行事应明辨是非的人——不会谴责如刚才所描述的给鸽子造成巨大的、不必要伤害的至少其中一些行为。虽然完全否认动物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的态度在过去的世纪中可能很普遍（见第一章），但是这种态度正变得越来越罕见，这是道德进步的一种表现。然而，正如射杀鸽子所表明的那样，许多人还是乐于对动物施暴。

很明显，在一年一度的猎杀活动中，人们对待鸽子的至少某些方式是错误的。如果有人认为，为娱乐而射击 鸽子的行为并不是明显错误的，因为如果鸽子幸运地被击中就会立刻死亡（这种观点无视了这

样一个事实：许多被射中的鸽子并不是那么幸运），那么，对于那些希望证明把受伤的鸽子掷入桶内，使它们与其他鸽子一起闷死的做法也是合理的人来说，这种辩护不会有任何帮助。如此对待鸽子和其他有感知能力的动物是错误的。但为什么 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对动物是否拥有道德地位 和权利 的问题有何启示？本章余下部分将讨论关于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的答案。

道德地位

越来越多的人宣称动物具有道德地位、道德权利，或兼而有之。在判断他们的这种主张是否正确之前，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术语的含义。我们先从道德地位开始。

例如，说一条狗有道德地位 ，就是说这条狗因其自身的缘故、而非与人有关联的缘故而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更准确地说，这意味着，这条狗的利益或福利很重要，必须给予认真考虑——这种考虑不依赖于狗的福利对人的利益的影响。简单地说，我们必须因狗自身的利益 而对它好。让我们来看一些事例。

有理性的人知道，为取乐而残暴地踢狗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假设本和格雷格有不同的理由来认可这种判断。本认为踢狗是错误的，因为这侵害了某个宠物所有者的财产——这即意味着宠物所有者的利益 是相关的因素。当然，许多狗不属于任何人的财产。本可能回击说，踢狗取乐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这是残酷的行为，而残酷是一种我们不应养成的恶习，因为从长远来看，这种恶习很容易使人去虐待人类 。简言之，虐待动物的人更容易成为虐待人类的那种人。在这里，人类的利益是本反对残酷对待动物的最终依据。依此观点，动物的利益不具有独立的 道德上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动物没有道德地位。

格雷格则持不同的看法，他判定动物确实拥有道德地位。他认为为取乐而踢狗是错误的，因为没有充分的理由去如此伤害它们。（在

另一种情境中，若伤害狗是为了避免一个小孩被狗伤害，这或许就是伤害狗的一个充分理由。）从格雷格的立场看，狗的福利因其自身的缘故而受到重视；它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与狗的福利的改善如何有助于人类的利益无关。因此，即使你能使格雷格相信，虐待狗并没有对人类产生任何消极影响，他还是会认为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在他看来，狗拥有道德地位。（至于狗拥有的道德地位与包括人在内的其他在道德上重要的生物所拥有的道德地位是否相同，则是另一个问题。）

那么，如何理解道德权利的含义？说动物拥有这类权利意味着什么？这一概念的内涵相当复杂，因为“道德权利”一词有着多种不同的用法。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特定的语境来弄清这个术语的含义，这样，人们在谈论动物（或人）是否拥有道德权利时，就不会因这个词的不同用法而相互误解。

区分三种意义上的“权利”将对我们有所帮助。（在我们的整个讨论中，除非另有说明，我们所说的道德权利是与法律权利相对的。）在较宽泛的意义上，说一个存在物拥有权利就是指该存在物拥有道德地位。我们把这称为道德地位意义上的“权利”。在这种意义上，人们认为狗拥有道德地位——但狗拥有的道德地位比人的低——然而我们仍然认可狗的权利；任何程度的道德地位均可成为拥有权利的充分理由。例如，人们可能断言，狗拥有不遭受痛苦和不被杀死的权利；这意味着，狗的这些权利就其本身来说在道德上就是重要的，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能践踏之——当宽泛地解释“充分的理由”时，可以把公司为获得利润而在动物身上测试新化妆品毒性成分纳入“充分的理由”之列。因此，在拥有道德地位的意义上说动物拥有权利一点也不激进。

第二种更严格意义上的“权利”可称为平等考虑意义上的权利：说某人拥有权利就是说她应获得同等考虑。这意味着她的利益与任何其他人的类似利益具有同等的分量。因此，说狗应当获得与人同等的考虑，就是宣称，狗避免遭受痛苦的利益和人避免遭受痛苦的利益在道德上是同等重要的；动物的痛苦与人的痛苦具有同等的分量。如果格

雷格认为狗有道德地位但不应获得平等考虑，那么他所相信的就是，狗拥有道德地位意义上的权利，但不拥有更为激进的平等考虑意义上的权利。（本章后面将进一步对平等考虑加以说明。）

第三种同样严格意义上的“权利”可称为超越功利意义上的 权利：说某人有权利去做某事意味着，至少一般来说，其根本利益必须受到保护，即使保护它可能会对社会总体不利。（汤姆·雷根和伊夫琳·普卢哈尔［Evelyn Pluhar］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捍卫动物权利的；我们可把类似的观点称为强式动物权利论 。）例如，人们在道德和法律上拥有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这样一个理念意味着，陷害一个无辜的人是不对的，即使当局没有抓住确定的嫌疑犯，即使满足社区成员愿望的判决能够带来巨大的社会功利。虽然这种强式意义上的权利的拥护者可能会承认，在某些 案例中，人们可能为了共同利益而无视某些人的个人利益，但是，她会坚持认为此类案例是例外，而且，对公共利益的诉求不足以成为践踏个人权利的理由。

与之相比，我们来考虑一个功利主义者 苏的立场；她认为正确的行动是那些能够产生最大功利——即利益减去伤害后的余额最大——的行为，同时要把受影响的所有个体（包括动物）的利益都考虑进来。苏相信，动物和人应获得同等考虑，不同个体的类似利益具有同等的分量，但是，如果牺牲某些个体的利益能够使功利最大化，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做。所以，她认为，动物和人是在平等考虑的意义上而不是在超越功利的意义上享有权利。超越功利意义上的权利将为个体的根本利益提供绝对或接近绝对的保护。然而，甚至人类是否拥有这种意义上的权利都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彼得·辛格和雷·弗雷（Ray Frey）这样的功利主义者就否认人类拥有这样的权利。

我们已经理清了三种意义上的“权利”。那么实际上动物是否拥有其中任何一种意义上的权利呢？先看看第一种宽泛的道德地位意义上的权利。很明显，在每年一度射杀鸽子的活动中，我们对待鸽子的至少某些方式是错误的，踢狗取乐也是错误的。然而，这些判断以及那些更为一般的判断（即无端伤害动物是错误的）都不包含这样的意涵：动物具有道德地位。为什么不包含呢？

根据间接义务论 ，我们的道德责任或义务仅仅直接指向人类其他成员；与动物有关的义务（如不要给它们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完全是基于人类的利益，例如，不养成残暴品格对人类是有益的。照此看法，如果没有充分理由来说明对动物施暴是对人类不利的，那么，就没有道德理由来谴责对动物的暴行。这就是本和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立场（见第一章）。

我认为间接义务论是错误的，因为它无法解释我们对动物负有的义务。第一，我认为，谴责虐待动物的关键在于，施虐者毫无必要地伤害了动物 ；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此类行动是错误的。第二，虽然我们确信，虐待动物是错误的——甚至本和康德对此也深信不疑——但我们不能十分地确信，虐待动物会给人类带来恶果。认为虐待动物会给人类带来恶果的假设依赖于经验的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认为虐待动物是错误的人能够列举出像这一道德判断本身那样令人信服和确定的证据。而且，现实中可能存在着相反的证据。例如，允许牧羊人踢他身边的羊或许能使他发泄出一些怒气，从而使他殴打老婆孩子的可能性更小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假定的情形中（比如，地球上只剩最后一个人），当虐待动物的行为不可能 给人类带来有害的后果时，虐待动物应该也是错误的。

这些思考表明，与间接义务论相反，动物拥有道德地位，因而至少拥有一种意义上的权利。但是，这一结论并未解决这一问题：与人类相比，动物应该获得多少道德关怀，以及它们是否拥有更严格意义上的权利。

图2　正用嘴接住一条鱼的北极熊

动物享有的一种平等？

动物的某些保护者宣称“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他们的反对者通常反击说，这明显是荒谬的。但是，这一观点是否荒谬，部分地取决于个人所理解的平等是哪种道德上的平等以及哪些动物的平等。

如果一个人所指的确实是所有的　动物，包括蜈蚣、蛞蝓和变形虫，那么，关于动物在道德上是平等的观点肯定是不可信的。因为，说此类动物有感知能力 是极其可疑的。感知能力不仅仅是对刺激的反应能力；它至少应包括某些情感 。情感包括痛苦——这里的“痛苦”是指一些知觉　而不仅仅是神经系统对有害刺激的察觉——之类（有意识）的感觉和害怕之类的情绪。我们不知道在种系发生阶梯或进化树的哪一确切的点上感知能力消失了，被更原始的、无意识的神经中枢系统取而代之。但是，我们将在第三章看到，有确切证据表明，至少脊椎动物有感知能力；而几乎没有证据证明最原始的无脊椎动物有感

知能力。强调感知能力的原因是：无感知能力的动物——由于缺乏任何感觉、思考或具有其他任何精神状态的能力——甚至无法在意它们被如何对待。因此，它们能否在任何道德意义上受到伤害或得到好处很值得怀疑。

因此，说所有的 动物都享有某一形式的道德平等是与常识相悖的。那么，我们能不能说，所有有感知能力的动物都是平等的？现在我们必须问，它们在什么意义上是平等的？很明显，平等对待 所有有感知能力的动物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动物有不同的特性，而这些特性是构成不同利益的基础。猫关心的是得到人道对待和行动自由，而普通人则关心学会如何阅读以及发展自己的生活规划等问题；把猫当作潜在的读者或生活的规划者来对待，并不会促进猫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尊重自主性的原则适用于人类（在他们足够成熟时），但不适用于动物（即便有，也是极端罕见的例外）。这一原则可以解释为什么主人把自己的猫带去看兽医（即使猫强烈地反抗）的行为不会遭到质疑，而强迫一个有自主能力的成年人去看医生的行为在道德上则是成问题的。这些理由削弱了那种主张必须给予有感知能力的动物以同等待遇的观点。

另一方面，有感知能力的动物应得到同等考虑 的主张则是合乎情理的。这种主张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和一只动物拥有类似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只动物的利益和这个人的利益看作在道德上是同等重要的。要应用这一理论，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在人类与动物之间是否有一些类似的利益：人类与动物确实拥有某些大致相同的重要利益吗？让我们来看看避免遭受痛苦的利益。痛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遭受痛苦之主体的角度看，它是非常不愉快的、令人厌恶的或“消极的”。当一个人遭受痛苦时，他所体验到的福利或生活的质量就会降低。因此，所有能够感受到痛苦的动物都有类似的避免遭受痛苦的利益，这看起来就很合理。如果有感知能力的动物应获得平等的考虑，那么，母牛免受痛苦的利益与人类免受痛苦的利益在道德上是同等重要的 ——虽然不同的平等考虑理论对此解释略有不同，例如功利主义和强式动物权利论。如果平等考虑不延伸至有感知能力的动

物，那么，母牛所遭受的痛苦就没有人遭受的痛苦重要。（除非有特别的说明，本书后面的“动物”一词专指有感知能力的动物。）

如果人们逐渐接受给予动物平等考虑的观点，并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人与动物间的互动关系就会大为不同。在畜牧业、动物研究、斗牛和牛仔竞技表演中，在大多数马戏团的动物表演和动物园展览中，在几乎所有的狩猎行为中，以及在使用动物的其他行为和机构中，我们并没有像平等考虑原则所要求的那样平等地考虑动物的利益。因此，接受这一原则将是比较激进的。不论激进与否，从伦理学的立场来看，问题在于给予动物平等考虑是否正确。在我看来，平等考虑是正确的。

意义逐步增强的三种“动物权利”

道德地位意义上

动物至少有一些道德地位。动物不是仅为供人类使用而存在的，因此，它们必须因它们自身的 缘故而被善待。

平等考虑意义上

我们必须对动物与人类的相似利益给予道德上平等的考虑。例如，动物遭受的痛苦与人类遭受的痛苦一样重要。

超越功利意义上

和人一样，动物拥有某些我们不得损害的根本利益（即使存在个别可以损害的情形，那也是例外），哪怕是为了使社会的功利最大化。例如，动物有自由的权利，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以有害的方式拘禁它们，即使这样做可能带来较多的好处和较低的成本。

平等考虑的问题

和人类一样，动物拥有利益，能够受益或受害。事实上，如已经证明的那样，动物拥有道德地位。所以，平等考虑原则不仅仅能够有意义地适用于人类，而且能够 有意义地适用于动物。那么，我们应当把该原则应用于动物吗？是的，从逻辑上讲，给予每个人的相似利益以平等道德考虑这个原则应该适用于所有拥有利益的存在物，除非所讨论的存在物之间存在着可证明不平等考虑之合理性的相关差异 。这样，在思考平等考虑是否应该延伸到动物时，我们可以首先假定平等考虑是合理的，然后再进一步探讨，是否存在任何论证（通过列举人与动物之间的相关差异）可以推翻那个假定。

如果赞成平等考虑之假定的适当性是不明显的，那么可以考虑另一选择：首先假定动物应获得低于平等的考虑。根据这种方案，尽管我们承认动物有道德地位，我们可能首先 假定，把动物在行动自由、不受伤害等方面的利益看得没有我们的类似利益重要的做法是正确的，而无需为轻视它们利益的这种方式提供任何证明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公平和错误的。

两种平等考虑理论

功利主义

正确的行动或政策是那些能够使利益最大限度地超过损害的行动或政策，这种行动或政策给予受影响各方——包括人和动物——的利益以一视同仁的考虑。

强式动物权利论

和人一样，动物拥有超越功利意义上的权利（见此处 的方框表，“意义逐步增强的三种‘动物权利’”）。

当我们考虑人类对动物之态度的历史，以及持续存在的偏爱人类、反对动物的偏见时，这种方法是特别值得怀疑的。如第一章所示，历史显示出了一种利用动物和贬低动物道德地位的明显倾向。人们倾向于认为（不管是正确地或错误地），他们的利益与动物的利益常常是冲突的——例如，在吃荤、动物研究和害虫防治的情形中——因此，认真对待动物的利益对人类来说是不利的。所以，我们绝不能忽视自利和偏爱人类的偏见。更重要的是，动物在很多方面与我们不同，而且，动物（除了某些例外）不是我们社会群体的成员。我们从经验中得知，人们通常歧视地对待那些他们认为与自己不同、而且不是“我们中的一员”的个体，特别是当那些外人容易被支配时。因此，反对动物的偏见是可能的。这类偏见的历史，以及这类偏见持续存在的可能性，使得不平等考虑的假设很容易导致道德上的错误。

这种逻辑上的和实用主义的综合分析，都赞成给予动物平等考虑的假定。这意味着，不平等主义者 ，即赞成给动物以不平等考虑的人需要承担举证的责任：举出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相关区别以证明给予动物不平等考虑的合理性。我怀疑不平等主义者能否承担这种责任。在本章余下的部分，我们将探讨平等考虑面临的五个主要挑战以及对这些挑战的回应。

诉诸物种

不平等主义者可能会为人与动物的不平等考虑作如下辩护：人与动物是不同的，仅仅因为人就是人，也就是说，人是智人（*Homo sapiens* ）物种的成员。根据定义，物种的这种差异决定了所有的人而且只有人才拥有的特征，而且，这种差异在道德上是重要的。构成人类独一无二之道德地位基础的并不是与智人物种之一般成员相关的那些特质（诸如理性或道德能力），而仅仅因为他是人。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它是不证自明的。

反驳不证自明的主张是很困难的，因为这种主张倾向于中断进一

步的论证："那就是这样，是一个基本的道德事实，所以我不能给你更多的证明。"不过，仍然有一些方法能够挑战诉诸物种的观点。

第一，认为物种在道德上的重要性是不证自明的主张，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对动物的道德地位已经认真思考了很久的人，并不认为这一主张是不证自明的。不平等主义者可能会以道德上的无知来回击："如果你看不到显而易见的真理，那我也无能为力。"但这听起来是独断的。一般而言，如果有理性的人不同意某些主张是不证自明的，那么，就需要对该主张作出明确的证明。但是，对目前的这种观点没有 更进一步的证明。

更糟糕的是，当我们思考一些生物学事实时，认为物种在生物学方面的差异有着道德上的重要性的观点也是很难得到证明的。我们与黑猩猩的两个物种——普通的黑猩猩和矮小的黑猩猩（倭黑猩猩）——有着密切的联系；人和这两者任一之间在DNA方面的差异（大约1.6%）只略高于这两种黑猩猩之间差异（0.7%）的两倍。此外，还有与智人不同的原始人，例如直立人（*Homo erectus*）、能人（*Homo habilis*）和粗壮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与黑猩猩、类人猿、大猩猩和猩猩相比，这些原始人与我们的关系更为接近。当各种各样的其他物种与我们是如此相似时，认为只有智人物种的成员才拥有特殊的道德地位，这是难以让人信服的。事实上，在我们与我们由之进化而来的原始人种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生物学上的界线；更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突变把"我们"从"它们"之中分离出来。那么，为什么仅仅是我们这一物种拥有特殊的道德地位呢？

现在，不平等主义者可能会改变其论点，声称相关意义上的"人类"就包括原始人，而原始人就拥有特殊的道德地位。但是，只要想想，最原始的原始人与最接近原始人的灵长目动物之间在生物学上的差异是多么的细小，那么，不平等主义者这种转移论点的做法就会不攻自破。此外，今天获得语言训练的类人猿很可能比最原始的原始人在智力上更发达，因此，认为所有且只有 人科拥有特殊道德地位的观点就更让人怀疑了。而且，即使我们坚持认为，生物学上的差异在道德上是重要的，那么，为什么假定人类／非人类的区分是关键性的？

为什么没有考虑把所有的原始人和类人猿归在一个圈子里？这个圈子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灵长目动物或哺乳动物？为什么我们是这个圈子的成员，而其他脊椎动物不是？由于物种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种群分类的唯一根据，因此，很清楚，我们必须抛弃不证自明的主张，转向赞成或反对平等考虑的论据。

这些讨论要求我们超越诉诸物种的观点，这一点还可以通过设想某种未来可能出现的场景来得到证明，比如我们可能遭遇外星人，而它们比我们更聪明、更敏感和更有教养。如果有人宣称，这些外星人不是人类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证明忽视它们的利益是合理的，那么，这种观点就将被指责为某种类似于种族歧视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的偏见。事实上，诉诸物种的最大困境之一就是，与独断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区分道德世界的不同方式类似，它并没有为把“我们”从“它们”中分离出来提供更多的证明。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诉诸物种并没有提供任何可靠的论据来证明给动物以不平等考虑是合理的。

契约论

为不平等考虑辩护的另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诉诸于我们所知的传统伦理学理论——契约论 。根据契约论，人们的道德权利和义务是从假想的订约者所达成的协议中产生的；这些订约者们讨价还价，试图找到对双方都有利的原则和规则，并用这些原则和规则来治理他们的社会和建构基本的制度。在契约论看来，由于动物不是能够参与契约设计的理性主体，因而动物没有道德地位——这导致它们得不到平等考虑。

证明不平等考虑的这种尝试有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它没有充分地解释我们对动物的义务。事实上，契约论关于动物没有道德地位的意涵表明，契约方法从一开始就是不可信的；因为在前文我们已经看到，虐待动物的错误只有通过接受动物拥有道德地位的观点才能得

到恰当的解释。

彼得·卡拉瑟斯（Peter Carruthers）注意到，认为动物拥有道德地位的论点在直觉上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他试图用间接义务论来说明我们有不虐待动物的责任。他指出，虐待动物会使行为者成为一个邪恶的人，从长远看，他很有可能会虐待人类。在前文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形式的论证是不甚合理的，其原因至少在于，这种论点试图把一个如此确定的道德判断——虐待动物是错误的——建立在猜测性的经验假设之上，即虐待动物会产生对人类不利的副产品。但是，我们还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批评，因为间接义务论不能够解释，为什么 虐待动物是一种恶行，而同情动物是一种美德。根据间接义务论，动物缺乏道德地位，因而人们不可能直接对它们做错任何事情。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与撕一张报纸取乐的行为相比，把母牛粉身碎骨的行为更能体现有缺陷的道德品质呢？要说明为什么虐待行为是一种恶德，唯一合理的方法就是承认虐待行为之受害者的道德地位。

契约论还要面对另一个重要问题：认为只有理性行为者才拥有道德地位的理论对不具有理性能力的人来说包含着某些不安的意涵。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那些不具有理解社会契约条款所必需的理性的人，也就不拥有道德地位。很明显，婴儿不具备这种理性，但他们被认为是拥有道德地位的。如果契约论者回答道，婴儿有发展成有理性的行为者的潜力 ，那么，胎儿也具有这种潜力。这样一来，诉诸人的潜力也就意味着，甚至早期胚胎也拥有道德地位并应获得平等考虑。一些契约论者将会认可这种含义，但很多人却不会。

让我们不再追问婴儿和胚胎的道德地位问题，而考虑那些甚至缺乏可成为道德主体潜力的人——例如，严重智障者。以眼前的观点来看，他们显然缺乏道德地位，可以相应地当作缺乏道德地位的对象来对待。然而，卡拉瑟斯试图以两种方式来消除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含义。

他首先提出了滑坡论 ：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严重智障者当成如有权利一样 的人来对待（这里他所指的权利把道德地位和平等考虑综合在了一起），那么，我们将会为虐待那些刚刚满足理性标准且应享有权

利的人的行为提供方便之门。由于我们不能精确地界定那些构成理性行为的能力，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必然无法准确地划出一条恰当的界线来判定，谁满足了以及谁没有满足理性的标准。为了避免从这种精细划分的区别对待的斜坡中下滑到虐待权利所有者，我们应该避免轻易断言哪些人是有理性的。

这种论证有几个困难。第一，我们无法界定理性的假定只是一种推测（虽然不是毫无道理）。这个假定肯定比它想要支持的那种道德判断——即把那些没有理性的人当作没有道德地位者来对待（例如，强迫他们做有害的实验，为获得他们可移植的器官而杀死他们）是错误的——更不确定。第二，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假设我们能够准确地界定理性。即使这样，我们把无理性的人当作缺乏道德地位者来对待不仍然是错误的吗？这些人的确具有道德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把他们当作好像没有道德地位的人来对待是错误的。

卡拉瑟斯还提出了一个诉诸社会稳定 的论证。他认为，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事实，即如果我们否定无理性之人的权利，许多人会非常抑郁，并且不可能照这种政策去做，不管其正当性如何。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政策可能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我们必须赋予 无理性的人以权利。然而，这种论证也会遇到与前面的论证所面临的类似问题。第一，它的假设（把无理性的人当作缺乏道德地位的人来对待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只是一种推测，而且，这种假设比这种人不应该被以这种方式对待这一道德信念的确定性更为薄弱。第二，这种假定无法解释人们的这种道德直觉：在一种假设的情境中，即使人们不会因为把无理性的人当作缺乏权利的人来对待而感到不安，以这种方式对待他们仍然是错误的。

总之，这种契约论方法错误地否定动物拥有道德地位，也不能够充分说明无理性之人的道德地位问题。因此它无法推翻赞成对动物平等考虑的假设。

诉诸道德能力

不再诉诸契约论（它进而依赖于理性主体的概念），不平等主义者可能直接诉诸理性能力 或道德能力 （rational agency或moral agency，这两个术语我是互换使用的）。在这种理论看来，要拥有完全的道德地位并获得平等考虑，一个人就必须是道德主体。但是，如何证明这种主张的合理性？一些不平等主义者宣称可以从直觉上 得到证明。另一些则诉诸某种互惠原则 ：只有当人们履行了道德义务时，才能拥有道德权利或获得平等考虑，而只有道德主体才能履行义务。如果权利的某些拥有者没有履行道德义务，那他们就是获取了道德保护的好处而没有承担道德责任（义务）；在互惠理论看来，这对那些承担道德责任重负的道德主体来说是不公平的。不管不平等主义者是怎样证明道德能力是获得权利的基础这种主张的，他们仍然断言，人类是道德主体，而动物或至少它们中的大多数不是。

然而，这个断言会直接引出这样的问题：一些人甚至缺乏成为道德主体的潜力；而且，在处理异常人的道德地位方面，诉诸道德能力的方法也并不比契约论更好。此外，和契约论一样，它也面临着要说明动物道德地位的问题。而且，认为道德能力是拥有特殊道德地位的基础的断言也是很成问题的。从两种支持这种主张的方式来看，互惠原则被常识判断所质疑，例如，婴儿拥有不被虐待等权利，尽管他不是道德主体，并且一些婴儿永远无法成为道德主体。同时，道德能力和权利之间具有联系是直观可信的这种断言并不是结论性的。虽然许多人认为这种断言在直觉上是合理的，但许多其他的人，包括我自己，则不这样看。对后一组人来说，虽然道德能力与一个人应该如何被对待相关——因为一个道德主体必须被看成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但是从道德的角度看，这与一个人的利益究竟有多重要的问题没有相关性。

如果与可疑的互惠原则分离开来，诉诸道德能力的方法很可能最有力，因为互惠原则断言，缺乏道德能力的存在物不拥有任何道德地位。另一方面，不是建立在互惠原则基础上的诉诸道德能力的方法可能会断言，只有道德主体才拥有特殊的 （而非排他的 ）道德地位，并且承认有感知能力的非道德主体也拥有一定程度的道德地位。这种

观点所存在的问题比其他宣称动物没有道德地位的观点要少。尽管如此，如果这种观点只能用直觉来支持，那么人们在直觉上的差异则会使这种观点显得可疑。而且，这种观点也有着这样一层有问题的含义，即一些人的道德地位比另一些人要低。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说：诉诸道德能力并不能推翻平等考虑的假定。

诉诸社会纽带

玛莉·米奇利（Mary Midgley）发展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即把道德地位理解为基于关系 而非个体的特征，并且强调社会纽带 的道德重要性。这种方法的出发点是：在与其他人交往时，我们认识到，我们与某个人的社会联系的程度影响着我们对那人的责任的强度。因此，我们对我们的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有很大的责任，而对我们各种各样团体的其他成员（例如，邻里、学校和宗教团体）则只有较少的责任；对那些与我们（除了都是人类社会的成员这一点）没有关联的完全陌生的人，我们只有最弱的责任。不过，我们感觉到，与人类其他成员的情感和社会纽带仍然是重要的，这使我们对他人比对动物具有更强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和动物形成任何特殊的团体。（这里存在着例外，比如当动物是人类的伙伴时，我们对动物的责任也是很大的。）因此，这种主张断定，我们一般可以给予动物非平等的考虑。

这种主张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我们确实对那些与我们有特别密切关系的人有更多的义务。例如，我有义务供养我的孩子，但没有同等的义务供养其他的孩子。但是，这种看法对平等考虑的意涵是有争议的。毕竟，我对其他孩子的消极 义务也具有同等的道德力量：我不能绑架、虐待或杀害他们，不管他们与我的社会关系多么疏远。而且，虽然我有特别的积极 义务供养我自己的孩子，但我承认，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拥有和我的孩子同样的基本权利。事实上，我会把某些积极权利（例如获得足够营养、衣物和庇护的权利等）纳入到基本权利

中来，而且，我也不会认为只有我自己所在国家或社会的孩子才拥有这些权利。以这种方式，我就把平等考虑扩展到了其他所有的孩子——以及所有的人身上了。

此外，正如对所有人都平等考虑与对不同个体负有不同的特殊责任是相容的，对所有有感知能力的动物的平等考虑与对它们负有不同的特殊责任也是相容的。因此，这个通常的信念——即我们帮助处于危难的人的责任强于帮助处于危难的动物的责任——与平等考虑并不一定就是冲突的。毕竟，在一个求助的呼声不绝于耳的世界中，我们只能有选择地帮助某些求助者；在这个意义上，积极义务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自己酌情处理的 。我选择帮助受饥荒威胁的埃塞俄比亚人而不是萨尔瓦多的难民，但这绝不意味着我认为萨尔瓦多的难民应获得更少的考虑。类似地，我给予人类事业的帮助比给予动物的更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动物应得到更少的考虑。

此外，用诉诸社会纽带来为不平等考虑辩护的做法是危险的。因为，这种导致不平等主义者断定动物不应获得平等考虑的推论，在某些情况下或许会为像种族歧视主义这类令人生厌的歧视提供合理性证明。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X种族的成员感觉到彼此之间有很强的社会联系，但与Y种族的成员十分疏远。把社会纽带看成拥有道德地位的基础就意味着，X族群的成员可以正当地忽视Y族群成员的利益，而这在道德上是应受谴责的。

总之，诉诸社会纽带的方法在伦理学上包含有令人不快的含义，把它当作道德地位的基础是成问题的，但是，就它能支持伦理学上正确的结论而言，它与平等考虑可能又是相容的。通过两点改进，这种方法作为对平等考虑的挑战或许能够变得令人信服。第一，如果我们把社会纽带解释为仅仅是决定道德地位的一个因素 ，而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那么，我们就能够避免支持对某些人的不公平的歧视。第二，我们对其他人的积极义务强于我们对动物的积极义务的观点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果所有人都拥有某些积极权利，包括得到饮食和庇护的权利，那么，即使个体 在选择帮助的对象上有自由选择权，一些更大的集体 （可能是富裕国家的政府或联合国）也有义务尽力满

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这种主张进而指出，这些义务是基于人类共同体的观念。动物对食物或住所（哪怕动物生存之地的气候状况危及其生命）没有类似的积极权利；人类，不论个体还是集体，都没有义务为动物提供这些利益。对平等考虑的下一个挑战依据的就是这一论点。

诉诸关于帮助与杀害之道德差异的常识

对于平等考虑最有力的挑战来自于两个被广泛接受的、关于我们对人类的责任与我们对动物的责任之间的差异。第一个所谓的差异是，所有人都拥有某些积极权利，并伴随着相应的援助义务，而动物缺乏此类积极权利。第二个所谓的差异是，一般来说，杀害一个人比杀死一只动物在道德上更糟糕。毫无必要地杀死一只鸟是错误的，无缘无故地杀死一只狗甚至是更糟糕的；但是没有特别的正当理由（如自卫）就杀死一个人则是最糟糕的，这实际上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坏的事情了。甚至那些拥护动物权利的人也普遍同意，杀人与杀死动物的错误程度是不同的。依据这个推理线路，就援助的义务和杀戮的错误性而言，在人与动物之间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异与对动物的平等考虑是不相容的。

关于回应这一挑战的可能策略，我这里只能提出几个论证思路而无法深入展开。关于援助义务的差异，人们也许可作出如下回应。该论点的假设是：（1）人类有积极权利，这种权利使我们有义务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2）我们（如果有的话）只有非常有限的义务来援助需要帮助的动物。从反驳的角度来说，这些差异与平等考虑是相容的。假设动物与人一样拥有积极的权利，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与这一权利原则相应的义务："作出合理的努力去提供援助，当援助可能是真正有用的时候　。"但我们可以进而反驳说，人类在援助需要帮助的动物时，他们的干预行为既有可能对动物有利，也可能会伤害它们。生态系统是很微妙和复杂的，很容易被不适当的干预所破坏。

例如，如果我们通过提供食物把狼从饥饿状态中解救出来，这可能导致狼的数量过多和新一轮的饥饿危机，还会导致狼过多地消耗它们所捕食的动物。因此，我们对野生动物所做的正确的事情通常就是不干扰它们。有可能对动物有所帮助的干预通常是这样一些干预，即干涉那些剥削动物的人类活动，例如限制以打猎为乐的人和捕鲸者的行为。认为人们有时应当以这种方式进行干预的观点是可信的。所以，这种观点试图把平等考虑和这样的判断（即在实践中我们不应该过度地干预需要帮助的动物）结合起来。

关于杀人与杀死动物之间的所谓差别，可以有两个主要的反驳策略（我已在别处仔细分析过）。更普遍的策略是主张，平等考虑并不意味着反对杀人与反对杀动物的道德理由是同等强硬的。平等考虑只是意味着，在动物与人拥有类似的利益（如避免遭受痛苦的利益）时，我们必须给予这些利益以同等的道德分量。尽管我们用同样的词汇，即“杀死”，来表明对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的剥夺，但是，这两种存在物的利益并不是真正类似的。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继续生存的利益对他的福利来说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人类通常都拥有生活规划、人生理想和较深的私人关系，所有这些都可能由于过早死亡而被摧毁。相反，假设持续生存是一条狗的利益（第四章支持的一个观点），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断言，持续生存对狗的福利的影响，没有 持续生存对人的福利的影响那么重要。狗至多只有非常短的生活规划；即使狗之间有各种关系，这些关系的深度和广度通常也无法与人际关系的深度和广度相比。因此，这种主张进而指出，一般来说，死亡对狗的伤害要比对人的伤害小。如果我们拿人与处于进化树中较低位置的动物（例如鱼）相比，那么，死亡对人伤害更大的信念就变得几乎不容置疑了。

虽然这些比较性的观点在直觉上似乎是可信的，但是，我们很难为它们提供一个详细而有说服力的支持理论。然而，没有这样一种理论，人们可能就会想，这种观点在直觉上的吸引力是不是仅仅来自于偏爱人类的偏见。史蒂夫·萨庞提斯（Steve Sapontzis）进行辩护的一个替代方法就是，否定这种观点——即杀害有感知能力的非人类动物

的道德错误小于杀害人的道德错误——的合理性。两种策略都试图证明，平等对待动物既不荒谬，也并非不合理。

结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动物是否应获得平等考虑，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已经为一种赞成平等考虑的道德假定作了辩护。很明显，诉诸物种不能推翻这个假定。几乎可以确定，契约论也不能推翻这个假定。不过，虽然诉诸道德能力和社会纽带的公开讨论至今未能承担不平等主义者的举证责任，但是，这些讨论尚不足以排除人们也许能够更成功地阐述相关论据的可能性。在对平等考虑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中，诉诸关于援助与杀害的道德差异之常识的策略，似乎是最成功的。把这种方法与适当发展了的诉诸道德能力和社会纽带中的一个或两个结合起来，也许能给平等考虑提出最难以应付的挑战。但是，我们关于援助与杀戮的直觉很可能是由偏爱人类、反对动物的偏见决定的；这种可能性证明了继续赞成平等考虑之假定的合理性。只有那种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比目前已提出的观点都更具说服力的挑战，才可能推翻那个假定。

一种可选择的观点：区别对待模型

假设赞成对动物平等考虑的假定被成功推翻了，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动物的道德地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动物没有道德地位的观点是不可信的；我们已经详细考察了这种观点的论据。但是，有一种介于极端的观点与平等考虑之间的观点在直觉上是可靠的，并且被许多人毫不怀疑地默默接受。

为了弄明白这种观点，人们需要设想两种特定的标尺，然后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第一种是种系发生的标尺，或者至少是解释种系发生的某种方式。这是一种关于动物物种演化阶梯的标尺，即越接近进化的顶端，在生物学和认知上就越复杂。因此，根据这个标尺，人（目

前！）位于这个标尺的最顶端，类人猿和海豚略低一点（除智人外的原始人位于其间，如果我们把灭绝的物种包括进去的话）。例如大象、长臂猿和猴子等位于这个标尺中略微更低一点的位置，犬科动物和猫科动物的位置又更低一点，兔子和啮齿类动物的位置还要更低。沿着这个标尺更快速地移动，我们就会看到，哺乳动物的位置一般都比鸟类高，鸟类的位置比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普遍高一点，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又比鱼类普遍高一点。在很大的程度上，脊椎动物——包括以上所提及的所有类目——的位置会比非脊椎动物高一些。当然，非脊椎动物包含多种多样的生命形式，它们并非都有感知能力，即使我们不能确定划分有感知能力和无感知能力的动物的界线究竟在哪里。很粗略地讲，这就是第一种标尺。

第二种标尺是道德地位的等级结构。处在最顶端的存在物享有最高的道德地位并应获得完全的考虑。处于略低一点位置的存在物应获得认真的考虑，但这种考虑要比最顶端的生物少一点。当一个存在物的位置从这个道德地位或道德考虑的标尺下滑时，它所享有的考虑的量就相应地减少。当一个存在物的位置下降到某一点时，它就只应获得极少的考虑。它们的利益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但并不是很重要，所以，当它们的利益与那些道德地位更高的存在物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它们的利益通常被牺牲掉。我们可以在脑海里在刚刚描述过的存在物之下划一条线。所有低于这条线的存在物都没有 道德地位。如果存在着好的理由来有节制地对待它们，那只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那些拥有道德地位的存在物的利益。所以，这是道德地位的一个标尺，不平等考虑的区别对待标尺。

要掌握这种与平等考虑不同的观点，我们就要把种系发生的标尺与不平等考虑的区别对待标尺结合起来。在由此产生的图景中，只有人类享有完全的平等考虑。在现存的物种中，类人猿和海豚应获得略少的考虑，大象、长臂猿和猴子又更少一点，如此等等，不一而论。处于获得最少量考虑者与没有道德地位者之间的，是那些最原始且感知最简单的生物——更多的是无脊椎动物。从常识的角度，我们可能会认为，无感知能力的存在物没有利益，并把道德地位的界线划在它

们之上。这种观点既可以避免那种认为动物缺乏道德地位的理论所产生的问题，同时又很容易接纳这种普遍信念：杀死一个人一般地说比杀死一条狗更糟糕，而杀死一只狗比杀死一只鸟更糟糕，等等。这种观点还与我们对人比对其他动物具有更强的义务的信念完全吻合。因为，在这种观点看来，我们对于所有的人都有更强的义务。

理解动物道德地位的两个框架

平等考虑的框架

动物应获得平等考虑（见此处 的方框：“意义逐步增强的三种‘动物权利’”）。

区别对待模型

人类应获得完全的平等考虑。其他动物应获得的考虑与它们在认知、情感和社会性等方面的复杂性成正比。例如，猴子的痛苦没有人的痛苦重要，但比老鼠的痛苦重要，而老鼠的痛苦则比鸡的痛苦更重要。

抵制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是对平等考虑这一假定的青睐。不管这种区别对待模型在直觉上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只有在其对给予动物较少考虑的做法作出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证明之后，我们才能负责任地接受它。没有这样的证明，忽视（例如）狗所遭受的痛苦的重要性的做法（仅仅因为遭受痛苦的主体是一只狗），就是十分武断的。如果忽视或贬低所有动物的利益的做法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得拿出一些理由来证明为什么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理由，那么最好先找到它。然而，我非常怀疑能否找到这样的理由，这就是我接受平等考虑之主张的原因。

结论

本章介绍了道德地位、道德权利和平等考虑的概念，以及赞成和反对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动物的主要论据。回到本章开始提到的案例，我们现在可以对这一最初的判断——在一年一度的射杀节上残酷对待鸽子的行为是错误的——作出说明。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它在没有任何可信理由的前提下给动物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但是，为什么毫无理由地伤害鸽子或其他有感知能力的动物是错误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上述主要概念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鸽子和其他有感知能力的动物都拥有道德地位 。也就是说，它们的利益——或者说它们的整体福利——具有独立的道德重要性。换言之，我们对动物负有义务，而且，这些义务不是基于人类自身的利益。动物本身能够被错误对待。我们应该为了动物本身 而善待动物。这是否意味着鸽子以及其他动物都享有道德权利 ？是的，至少在这个词的三种含义中最宽泛的意义上；根据这种最宽泛的含义，拥有道德权利就是拥有道德地位。

现在让我们考虑更严格的平等考虑意义上的“权利”。鸽子能够被错误对待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应该获得平等考虑。根据区别对待理论（它赋予动物以道德地位而不是平等考虑），毫无必要地严重伤害鸽子也是错误的。如果鸽子和其他有感知能力的动物应获得平等考虑，那么它们就拥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权利。平等考虑不仅反对猎杀鸽子，而且还反对（例如）畜牧业，如果人们不需要靠肉食来维持生命的话（见第五章）。另一方面，假设区别对待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虽然射杀鸽子取乐、把它们的头敲碎以及把它们闷死的行为都是错误的，但是，给家庭农场的鸡提供相当舒适的生活、并且只为了吃肉而杀死它们的做法就是正确的——尽管我们不是真的需要食用这些肉，而且不能以这种方式对待人类。

鸽子和其他动物是否拥有最严格的、超越功利意义上的权利？在这种意义上，只有当他人不能剥夺一个人所拥有的某种事物（即使这种剥夺能够带来最大的功利）时，这个人对此种事物（例如活动的自

由）才拥有权利。从实践的角度看，确认动物是否拥有这种超越功利意义的权利并不重要（动物研究的情况可能是一个例外，见第七章）。道德地位和平等考虑的问题在实践中是更为基础和更有深远意义的问题。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伦理学家都同意，人类拥有超越功利意义上的权利。基于这些原因，我没有探讨关于这种意义上的动物权利的争论，而是把这个争论留给专业的哲学家们。

第三章

动物是什么

一只哆嗦的浣熊在车库里被逼得走投无路，只能缓缓后退，眼睛紧盯着手握扫帚正逐渐迫近的男人。这个人想把浣熊从车库里赶走，而这只动物的行为在他看来是流露出畏惧的。一只狐狸的腿被钢制的捕兽夹困住，夹子深深地扎入了它的皮肤里，它挣扎了几个小时试图逃脱，但毫无用处，它慢慢地咬断自己的腿以便使自己与捕兽夹分开。一个路过的人看到了这种情景，他能够想象到，这只狐狸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一条狗由于其人类朋友举家外出旅行，第一次被寄养在宠物寄养站；它有些神经兮兮，心情狂躁，还在地板上大小便。寄养站的工作人员相信，这条狗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有些焦躁不安。

人们以为浣熊会感到畏惧、狐狸会感到痛苦和折磨、狗会感到焦虑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看法有充分的根据吗？有可靠的证据支持对动物行为的这种解释吗？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动物有哪些形式的精神生活？虽然这个问题很容易显示出科学上和哲学上巨大的复杂性，但是，本章对动物的精神生活只提供一个初步的和一般性的讨论——动物属于什么样的存在物？它们是怎么样的？本章的主要论点是，有相当多的动物，包括大多数或全部的脊椎动物，或许还有一些无脊椎动物，都拥有丰富多彩的情感。不过，在探寻证据之前，我们需要理清某些关键术语。

图3　一只被捕兽夹困住的狐狸

一些基本概念

一个存在物要拥有精神状态或精神生活，它就必须拥有某些知觉或意识 。但什么是知觉？我们将通过参照其他类似术语和列举事例的方法来阐明这个术语。

如果一个人或一只动物在某个特定时刻拥有某些主观的体验，那么他或她在那时是有知觉的。这些体验包括我们清醒时的所有意识状态，甚至包括我们做梦时所体验到的那些杂乱的思维和情感状态。与知觉关系密切的概念是感知 ，即拥有情感 的能力。反过来，情感既包括感官的感觉 ，例如疼痛和恶心，也包括情感状态 ，如畏惧和喜悦。所有有感知能力的存在物都有知觉的状态。例如，所有有感知能力的动物大概至少都能感受到痛苦或愉悦。

把知觉与伤害感受 区别开来是重要的。伤害感受是疼痛过程中的

第一个事件，它是对潜在的伤害或组织损坏的察觉，因特定神经中枢器官（伤害感知神经元）受刺激而产生；伤害感知神经元在轴突周围激起脉冲（神经元起着脉冲传递通道的作用）。这类刺激包括割、压、刺、热、冷、组织的发炎和肌肉痉挛。伤害感受本身不是知觉或意识的状态，但它通常与这类状态同时发生，通常表现为疼痛。和伯纳德·罗林（Bernard Rollin）一样，人们可能会把伤害感受理解成“疼痛的机器或导管”；尽管如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仍可能存在没有疼痛的伤害感受，例如，严重的脊椎损伤可以使截瘫患者仍保留神经反射系统，但是没有疼痛的感觉；被实施了全身麻醉的动物也是如此。

虽然对“知觉”这一术语没有完美的定义，但经验和常识足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基本概念。当我们醒着或在睡梦中时，我们都会体验到主观的状态；并且，我们知道，在一些睡眠和全身麻醉状态中，我们没有这类主观的状态。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经验证据有力地支持着这样的常识判断：许多动物也有知觉的状态，即使它们的意识与人的典型意识相比更简单，有着更少沉思的色彩，并且更少依赖于语言。

动物的疼痛和其他感觉的证据

虽然大多数人都相信，许多动物能体验到疼痛，但是，对动物之精神状态的负责任的讨论必须要考虑，是否有证据来支持关于动物具有这种或其他属性的看法。不过在这里，如同对动物的其他精神状态的讨论一样，我们需要一个操作性的定义来说明我们要讨论的对象。我们自己对疼痛的体验（关于疼痛的现象学）以及对疼痛现象的科学研究都大体支持这种理解：疼痛是一种不愉悦的或令人厌恶的感觉经验，通常与实际存在的或可能出现的组织损伤联系在一起 。（这个定义并不包括“情感的痛苦”，情感痛苦是对最基本的“疼痛”的一种象征性的延伸；“遭受折磨”通常是对“情感痛苦”的贴切而严密的表达。）

现在，当我们追问某类动物是否体验到了某种特定的精神状态

时，有四种证据与之相关。首先，人类现象学有助于我们了解精神状态的分类，并使我们知道这些状态是怎样的。这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操作性的定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提供其他三个方面的信息来证明非人类动物拥有某种特定的精神状态：特定情景中动物的行为、动物生理学和功能进化理论。其中功能进化理论探讨的是生活在特定小环境中的某种动物之精神状态的变化过程。

让我们把这类证据与疼痛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无疑，动物的举动通常表明，它们似乎正处于疼痛之中。下述三种行为中的任何一种都能表明某种程度的疼痛：（1）避免或逃脱一种有害的刺激（例如，把爪子从利器上缩回）；（2）伤害事件之后的求助（例如，哭喊）；（3）尽量不使用身体的某个过度劳累或受伤的部位以使它们得到休息和恢复（例如，不活动受伤的肌肉部位而活动其他部位）。大多数动物，包括昆虫，都表现出行为（1），虽然某些动物的这类行为也许是基于无痛苦的伤害感受或对刺激的某些类似的无意识反应。脊椎动物和一些非脊椎动物也表现出行为（3）。行为（2）可能仅仅与社会性相对较强的动物有关，在哺乳动物和鸟类中较为普遍。动物学习并适应新环境的证据加强了这样一种信念：上述三类行为中的任何一类都表明动物能感受疼痛，因此动物具有感知能力。这类证据在脊椎动物和至少一些非脊椎动物（如章鱼和鱿鱼）中都能发现。

现在来看看关于动物疼痛的生理学方面的证据。各类脊椎动物都普遍拥有感受疼痛所需的生理机制。疼痛是与一定的生理变化相联系的，包括在特定神经通道中的大量神经脉冲，以及大脑特殊部位的新陈代谢和电波活动。依次地，这些活动还会引发其他的生理反应，例如，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变化。不仅神经生理学和神经解剖学上的疼痛在这些动物身上很相似，而且这些动物还有相同的调节疼痛的生理机制，如内源性阿片。此外，在所有的脊椎动物和一些非脊椎动物中，麻醉和止痛剂能够控制明显的疼痛。事实上，如果动物在感受疼痛和其他负面的精神状态方面与人没有重要的相似性，那么，用动物作为模型来研究人类的此类状态就将变得毫无意义。

依据进化论对疼痛之功能进行的研究也为动物疼痛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证明。疼痛的生物学功能明显有：（1）为可能发生、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组织损坏提供机体方面的信息；（2）激发机体作出有可能避免伤害或使伤害最小化的反应，例如使肢体迅速地从有害刺激源中移开或为了恢复而不活动肌肉。疼痛的不愉悦性为适应性的、保存生命的反应提供了动力。

然而，人们可能再次回应说，伤害感受或类似的反应——没有疼痛或任何意识的知觉——也许同样能够发挥使动物远离伤害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功能进化论的论据可能并不能支持动物的疼痛这一事实。然而，进化倾向于保存有效的生物系统。进化不是自发地（没有“设计限制”地）产生能很好地适应特定小生态环境的新的生物，而是在遗传禀赋和从进化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机体系统的范围内促使生物发生变化。我们现在知道，人类感觉疼痛的能力对于机能和生存来说是重要的。如果人感觉疼痛的能力严重受损或完全丧失，例如感觉缺失的麻风病人，在没有得到特别照顾的情况下，其生命将处于危险之中。使我们产生意识的类似神经结构，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疼痛行为，也能在脊椎动物中发现，这一事实表明，疼痛对它们来说有一种类似的功能，并且，至少从脊椎动物进化的整个过程来看，自然选择保存了感受疼痛的能力。

然而，除了如章鱼、鱿鱼等最“高级”的非脊椎动物外，在其他的非脊椎动物中，关于疼痛或者更一般意义上的感知却非常不确定。例如，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些昆虫的复杂举动，如蚂蚁和蜜蜂，似乎表明它们有感知能力；人们可能把在所有昆虫中明显的疼痛举动——避免或逃脱有害的刺激——当作这些生物能感受痛苦的强有力的证据。然而，一些昆虫的行为——如在受伤或失去身体部位之后仍继续进行往常的活动，或者不减轻受伤肢体的负担——又有力地表明，它们缺乏感知能力。此外，与脊椎动物相比，昆虫有非常原始的神经系统。最后，昆虫的生命周期很短，学习能力也很低，因此它们能从意识状态（如疼痛）中得到的好处很有限。惊吓反射可能足以使它们从大多数危险情况下逃脱。因此，目前可获得的证据太不确定，无法确切地在

有感知能力与无感知能力的动物之间划清界线，虽然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一些非脊椎动物（如变形虫）没有感知能力。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关于非脊椎动物有感知能力的可能性是很不确定的，然而大量证据表明，很多动物能够感觉到疼痛，这显然包括所有的脊椎动物。但是，那些能感受疼痛的动物也能感受快乐——至少是以愉悦感 的形式——却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动物也能体验快乐情感 的观点还需进一步论证。）我们还可以肯定，能感受疼痛的动物也能感受到身体的不适 ，即一种与疼痛不同的不愉悦的感觉。不过，我们无法在此对这些精神状态作出精确的定义或给出具体的证据。

悲伤、恐惧、焦虑和痛苦的证据

疼痛是感官性的，因此与身体的特定部位有联系；而悲伤、恐惧、焦虑和痛苦是情感性的，因此与体验到这些情感的整个主体相关联。在为动物身上出现的这类状态提供详细证明之前，让我们先弄清这些概念本身的含义。

我们从痛苦开始，它与其他几种情感都有联系。注意，痛苦与疼痛是不同的，因为没有其中一种，另一种也可以发生。比如我捏自己的手，会觉得疼痛但没有痛苦；反之，某人因恐慌而痛苦却没有疼痛。痛苦与悲伤也不一样。如果你仅因某事的最后期限将至而略感苦恼，那你就没有痛苦。痛苦是一种高度不愉悦的情感状态，总是与一定程度的疼痛或悲伤联系在一起 。因为痛苦是根据疼痛和悲伤来定义的，痛苦的证据同样也是疼痛或悲伤的证据（痛苦是更严重的疼痛或悲伤）。我们在前面已讨论过疼痛。

悲伤是一种典型的不愉悦的情感，是对环境挑战或打破内在平衡的刺激的反应。它可能由迥然不同的现象引起：如瞥见掠食者的逼近、将要失败的信念、腹泻等。悲伤会以多种多样更具体的精神状态表现出来，例如恐惧、焦虑、失望和无聊。彻底地探讨悲伤需要考察

所有这些精神状态，在此我们将仅仅考察恐惧和焦虑。

恐惧促使我们对察觉到的危险作出专注的反应，并为未来的反应作准备。虽然轻微的恐惧可能是愉快的，如滑雪时的感觉，但恐惧一般是不愉快的。恐惧是一种典型的对可察觉到的危险作出的不愉快的情感反应（通常是在紧急情况下），一种集中注意力以采取保护措施的反应 。与之相比，焦虑伴随着一种更一般的（而不是集中的）对环境的警觉和注意的状态。它通常会限制我们的精神资源和阻碍我们的行动，从而使我们关注所处的环境，直到我们决定如何对任何可能产生的挑战作出反应。尽管恐惧和焦虑是紧密相关的，但焦虑特别易产生于不熟悉的环境中，这解释了为什么焦虑比恐惧更不易集中注意力。此外，至少对人来说，焦虑的对象常常是对自我形象可能的损害。焦虑是一种典型的对可觉察到的、影响自己的身体或心理健康的威胁作出的不愉快的情感反应，这种反应一般都对行为加以抑制，并导致对环境的高度警觉和注意 。从常识上看，恐惧与焦虑在互补性的环境中都有类似的保护性功能。例如，一只猫在兽医的候诊室这一新环境下可能会焦躁不安。在它第二次造访此地时，它可能会感觉到恐惧，因为它回忆起了上次造访时所接受的疼痛不堪的注射。但现在让我们超越常识意义上的主张而转到更严密的证明上来。

现在来看看焦虑的证据，它在我们所讨论的这几种精神状态中最有可能引起怀疑。首先，人类焦虑的典型行为和生理特征，在处于可能使其产生焦虑的情景中的许多动物身上也可发现。这些特征（如果有的话）是：（1）自主神经亢奋，如心悸、出汗、脉搏频率加快和呼吸急促等；（2）运动肌肉紧张，例如在易受惊吓的状态下；（3）在新环境中抑制惯常的举动；并且（4）过度专心，例如在视觉扫描时。这些特征与焦虑的定义相符，它们进一步从行为和生理两个方面为动物的焦虑提供了证据。此外，我们已经看到焦虑的适应性价值或进化功能：它使动物抑制某些行为，并小心地观察环境，为保护行为作准备。

其次，人类的焦虑和动物的某些精神状态（这里我们推断为焦虑）都可以通过类似的方法用某些药物来调节，这些药物会产生类似

的神经生理和神经化学方面的变化。例如，在一种测试中，随意地处罚口渴的老鼠会导致老鼠减少饮水量——对正常行为的一种抑制。但给老鼠服一种抗焦虑的药物会使它恢复正常的饮水量。另一种测试是把动物放置在新环境中（例如灯光明亮的空地上）。之前服用了抗焦虑药物的动物显然比没有服这类药物的动物焦虑更少。此外，当把能引发人的焦虑的药物给动物服用时，动物就会表现出与焦虑相关的行为和生理反应。

由于上述与焦虑有关的大多数研究的实验对象都是哺乳动物，所以下面的研究成果就显得特别重要。科学家很早就知道，在人体中是几乎所有抗焦虑因子酶作用物的苯二氮卓受体，在哺乳动物身上也有。最近的研究表明，五种接受测试的无脊椎动物没有一个有这种受体，并且没有一种软骨鱼（一种处于脊椎动物和非脊椎动物分界处的动物）有这种受体。但是，所有其他被检测的物种——包括三种鸟、一种蜥蜴、青蛙、龟和三种多骨鱼——都有这种受体，这为下述结论提供了又一证据：至少大多数脊椎动物能够体验到焦虑。

虽然把可获得的证据加在一起可以得出这种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除了共同的不愉快以及高度的警觉和注意力外，人类的焦虑与动物的焦虑在性质上是相似的。毫无疑问，依赖于语言的人类思想的复杂性使人所体验到的焦虑与动物所体验的焦虑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这里提出的观点是，许多物种的动物都具有感受本书所定义的“焦虑”概念的能力。

考虑到焦虑和恐惧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正如上面已解释的），我们就可以断言，能够感受焦虑的动物也能够感到害怕。支持这一常识判断的是这一事实：所有的脊椎动物都有自主神经和大脑边缘系统，而它们包含着恐惧和焦虑的基质。当然，这类动物的行为常常好像是处于恐惧之中；从进化论的立场看，这是一种具有适应价值的状态。

如果某些动物能够体验恐惧和焦虑（亦即悲伤的两种形式），那么，它们能否体验到悲伤就不再是个问题。但是，它们能体验到痛苦吗？很明显，痛苦是一种高度不愉快的、与一定程度的疼痛或悲伤联系在一起的情感状态。我们已经证明，脊椎动物能够体验疼痛和悲

伤。但是，如果一些动物只能体验到最低限度 （而并非很强烈）的此类状态，那就意味着，它们不能体验痛苦。尚不清楚的是，哪些证据才能支持某些动物仅能体验到最低限度的疼痛和悲伤这一判断。该判断与下面这个一般性的推测是不同的：有最原始的感知能力的动物拥有微弱的精神生活。总之，由于所有的脊椎动物和至少一些非脊椎动物显然是有感知能力的，因而我赞成这种暂时性的假定：至少大多数脊椎动物能体验到痛苦。

对某些怀疑论的回应

我们已考察过的证据支持这种论点：大部分动物，包括大多数或全部脊椎动物，或许还有某些非脊椎动物，有多种多样的情感。然而，我们在这里不太可能讨论那些支持更复杂的精神现象的证据：动物与人类可能共享、也可能不共享这些更复杂的精神现象，如思考或推理、语言、自主决策。（这些我已经在别处探讨过。）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确认并反驳某些怀疑动物之精神生活的所谓理由。

一个通常的论点是：动物缺乏知觉或意识，因为它们缺乏不朽的灵魂 ，而灵魂是非物质性的。但是，这是一种非常不可靠的论证。它忽视了所有的关于动物意识的经验证据，却建立在这样一个没有证据的假设之上：只有人类拥有不朽的灵魂，任何其他动物都没有。人们不禁会想，在从原始人进化而来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拥有了灵魂！事实上，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使得断言人类有不朽的灵魂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神经学和心理学对于灵魂并没有提供有价值的解释；而肯定它的存在会遇到严重的、关于非物质存在和物质存在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即使相信灵魂是个人信仰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信念并不是对动物精神生活的负责任的探究。

有些哲学家认为，因为语言 对于知觉来说是必需的，所以动物肯定没有知觉。即使我们假定，目前存在的动物没有语言——尽管少数

受过严格训练的类人猿和海豚例外——这个论点仍然是没有根据的。虽然语言对于表达一种知觉状态来说确实是必需的，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语言对于享有 这种状态始终是、甚至通常是必需的。如果这是确实的，那么婴儿在掌握语言之前就应该体验不到痛苦、快乐和恐惧——这种观念的不真实性在今天几乎人人都承认。对某些特别情感的表达（例如对自己终有一死 的恐惧），涉及到抽象的思维能力，可能需要语言上的能力去形成与之相关的思想（如必死性）。但这绝不表明，没有语言的动物就没有情感。

人们有时也听到这样的观点：高度的理性能力 对知觉状态（包括情感）来说是必需的。但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来使人接受这种观点。当然，因为回应某些情感需要复杂推理，高度的理性能力是必需的，例如，一个人为了改善自身健康而设计周详的计划，以便降低由于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和悲伤。但是，对于体验痛苦、悲痛以及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其他情感来说，并不需要复杂的推理。

怀疑论者可能还会通过论证动物没有自我意识 来挑战动物有知觉这一论点。但这种论点不是未能把知觉与自我意识区别开来，就是假定前者依赖于后者。但请注意，从概念上说，自我意识比基本的知觉更具体更复杂，它涉及到自我的概念。而且，事实上没有一个清晰的理由能证明，为什么所有的知觉都必须包括自我意识。要观察一棵树需要知觉——假定我们所使用的“观察”一词涉及到有意识的体验——但是，这种视觉体验并不需要意识到谁正在观察。因此，我们一般都认为，甚至很幼小的婴儿，在他们获得某些重要的自我意识形式之前，都能够拥有某些情感，例如痛苦或愉悦的感觉。

然而，人们可能争辩说，即使动物有一些精神状态，它们缺乏自我意识就足以表明，它们缺乏某些特定的精神状态，如痛苦。也许先前所陈述的“痛苦”的定义是不完整的；依据埃里克·卡斯尔（Eric Cassell）的观点，痛苦涉及到对自我持续存在的意识，并且在痛苦的过程中，人们感觉到自我的完整性受到威胁。虽然这些怀疑论者通常都没有清楚地说明“自我的完整性”这类概念的含义，但是，让我们假定这一假设是正确的：痛苦涉及到对自我持续存在的意识，即短暂的

自我意识。

关于动物的痛苦，怀疑论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很多动物拥有短暂的自我意识。例如，考虑一下我们的主张（可能很少会有人否定它）：脊椎动物能体验到恐惧。而我认为，除非主体拥有某些能延续到未来的知觉，恐惧是不可能的。毕竟，人们是对某些在（可能很近的）未来可能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事情感到恐惧。当然，人们可能会坚持认为动物没有恐惧的能力，以此来保持对动物的短暂自我意识和痛苦的怀疑态度。但是，我们已经为动物的恐惧提供了证据，却并没有看到支持动物缺乏短暂的自我意识的主张的证据或论证。

进一步的思考，包括下面的两点，为许多动物拥有短暂自我意识的论点提供了支持。第一，认知行为学的发展——该学科以进化生物学为背景研究动物的行为——倾向于支持那种认为许多动物拥有信念、欲望和有意识的行动的观点。认知行为学的主要观点是，就我们所了解的关于动物的所有行为来说，对其行为的最好解释 就是，动物具有这些属性。如果一条叫鲁弗斯的狗想要（期望）到户外埋一块骨头，而且是有意这样做的，那么，这就意味着，鲁弗斯拥有自我持续存在的某些知觉；欲望通常与本人在未来的福利状况有关，而意图也是在一段时间后才能实现。第二，有大量独立的证据表明，脊椎动物既拥有记忆又拥有对未来的期望。例如，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许多鸟对于它们所隐藏的食物有全面的记忆。这样来说，如果动物的任何记忆或期望包括了动物自我 的某些再现（如对一次受伤的记忆），而这似乎是可能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动物拥有某种短暂的自我意识。总之，如果说痛苦以及其他某些感情（包括恐惧）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短暂自我意识，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至少大多数脊椎动物都拥有这类自我意识。

图4　一只正在“钓”白蚁的黑猩猩

让我们作一个总结。本章从三名人类观察者开始，他们分别认为浣熊感到了恐惧、狐狸感到了强烈疼痛和痛苦、狗感到了焦虑。现在我们可以说，现有证据表明，他们所认为的动物的这些感受都是真实的。

第四章

痛苦、拘禁与死亡的伤害

雷切尔刚搬进她的新家，在壁橱里发现了一只老鼠。考虑到动物的福利，她想尽可能无伤害地把老鼠赶走，并考虑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放置一个装有奶酪的致命的捕鼠器，这种产品有一个能够击碎脊骨的金属制撞击装置，能使老鼠立即死亡。雷切尔认为这种选择实际上能让老鼠无疼痛死亡。另一选择是，她可以用一个“人道的”捕鼠器，它里面装有奶酪，能引诱老鼠进入一个容器内，当奶酪被触动时容器就会关上。之后，她可以把容器中的老鼠带到野地里放走。雷切尔想知道，无疼痛死亡是否会伤害一个有感知能力的动物。如果不会，那么无疼痛地杀死一只老鼠不会导致伤害。但她又想到，为什么她会认为“人道的”捕鼠器是值得考虑的？毕竟，当房主人外出工作或晚上睡觉时，一只被逮获的老鼠可能要在捕鼠器内呆数小时。在那段时间里，或在它被带到野地的过程中，这只老鼠毫无疑问会体验到不愉快的情感，如恐惧、焦虑和受挫感。当在野地里被放走时，老鼠可能也会因为被迫离开了家或其他社会组织成员而感到沮丧——如果沮丧属于老鼠的情感之一的话。因为这种“人道的”捕捉方法会导致某些体验上的伤害，很明显，这种方法比捕获并立即杀死它的方法更恶劣，除非死亡对老鼠也造成了伤害。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人道的”捕捉方法因避免了老鼠的死亡才显现出其优势。

一只袋鼠已经在动物园舒适的拘禁状态下生活了数年。自被拘禁以来，它与心爱的伙伴们离别的悲伤感觉已经渐渐地逝去了。它不再希望逃离动物园。总的说来，受挫的期望转换成了很容易得到满足的温和的欲望——对食物、舒适、偶尔的刺激等的欲望。如果返回野外，这只袋鼠会有更大的自由，但同时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例如，变化的天气、疾病的威胁（却没有兽医照顾），还有捕食者。它的处境激起了人们对动物自由的价值的思考。对自由的限制（特别是严重限制自由的行为），经常会因给动物——以及人类——带来悲伤 和痛苦 而伤害到他们。但对这只袋鼠的这种拘禁，在目前看来似乎还不是伤害。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如果袋鼠返回野外，它体验到的舒适度或生活质量将会下降，寿命也许会更短。即使这样，它在野外会更好

吗？在野外，它将再次获得更全面地运用其自然能力 （如感知能力、体力和“智慧”）的机会。袋鼠将重新行使更高程度的物种特有功能 ，它将过一种更富生机的属于袋鼠的独特生活。抛开对其体验到的幸福的影响，对袋鼠来说，这种生活是否更有价值呢？

总之，是什么使动物受到伤害或受益？动物的主要利益是什么？相应地，动物福利的性质是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研究动物的精神状态以便了解动物拥有哪类体验（这我们已经在前一章讨论了），因为幸福体验 是动物福利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在，在转到涉及动物的特殊伦理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行为是如何影响它们的福利的。

痛苦的伤害

在其余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动物或人类能体验到更高程度的幸福，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更好。愉悦的、有趣的或有吸引力的体验容易使个体感觉到幸福。这类体验主要是因其本质 或其自身的缘故而被珍视；这些体验感觉很好，我们也喜欢此类体验。但这些体验也有工具性的 价值，因为感觉良好的个体通常能更好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感觉不好的个体通常心烦意乱，痛苦、恐惧、沮丧等情绪会使他们远离自己所追求的日常目标；有时这些令人厌恶的状态是如此分人心神，以致个体只想着尽早结束这样的状态。（当然，强烈的 愉悦也会让人分心。也许正因为这样，快乐的短暂性有其进化论的基础。）

因此，令人厌恶的精神状态是有害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能牺牲一点精确性而把这类状态——疼痛、悲伤、焦虑、痛苦等——统称为痛苦状态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一个词来指认一种类型的伤害。痛苦是一种伤害，给一个人带来痛苦就是对那个人的一种伤害。人类伤害动物的最明显而常见的方式，就是给动物带来痛苦。

正如愉快的精神状态本质上是有益的那样，痛苦本质上是有害

的。这一点并不会因为遭受痛苦有时可能会使一个人受益而自相矛盾。一些犯下恐怖罪行的人可能需要受些苦才能真正悔悟并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又踢又哄地带一只猫去兽医站做手术以便恢复它的腿的正常功能，这种做法能使猫受益，即使整个过程使它承受了一些痛苦。此外，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讨论的，每一种具体的痛苦形式（如恐惧和焦虑）都有生物学上的功能以及适应性的价值。因此，痛苦虽然并不总是带来伤害，但是，总的来看 ，痛苦在本质上总是有害的；没有人会仅因受苦而感到幸福。而且，痛苦在工具性的意义上也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了对目标、目的和计划的追求。人们通常都有精心策划的生活目标，这些目标的成功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动物拥有的是较为简单的目标。不过，我们仍然有理由认为，动物，即便是鱼，也拥有某些欲望——如对食物的欲望——而痛苦会妨碍这些欲望的实现。

痛苦是一种伤害，这不是真正引起人们争论的问题。事实上许多人，包括很多动物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哲学家，都认为我们能够伤害动物的唯一 方式就是使动物遭受痛苦。因此，人们通常认为，无疼痛地杀死一只用于研究的动物，在道德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不会导致对它们的伤害。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假定是幼稚的。

拘禁的伤害

与植物不一样，动物可以活动和做一些事情。自由的行动至少使它们能够确保生存的手段。有感知能力的 动物在活动的时候能够体验到情感，例如快乐和痛苦。假定有感知能力的动物有欲望（正如我在本书其他地方所论证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们期盼 自由活动并做某些事情。此外，如果它们能做它们想做的事情，它们通常就能体验到快乐或满足；如果它们不能做它们想做的事情，它们体验到的通常就是失望或其他不快的情感。因此，自由——即其活动没有受到外在限制——对有感知能力的动物来说总体 上是有益的，这能使它们

追求它们所缺乏或需要的东西。自然地，对自由的某些限制符合受限者自身的利益——如有围栏的儿童床——而其他一些对自由的限制则至少与人们的利益不矛盾，如你邻居的篱笆对你的自由的轻微限制。

相反，思考一下我们所说的拘禁 。从狭义上看，拘禁指的是对行动的外部限制，这种限制严重妨碍了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 。由定义可知，在这种意义上的拘禁是有害的。由于监狱严重地妨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坐牢是惩罚的一种方式。拘禁的另一个例子是，强迫一只猴子单独生活在狭小而单调的笼子里。毕竟，猴子喜欢四处闲逛、寻找食物、玩耍，喜欢和其他猴子在一起嬉戏。对活动的严重限制不仅常常会导致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不适——如果生活条件是非自然的，并妨碍了动物的正常活动——而且几乎总是给动物带来悲伤和其他不愉快的情感体验。总之，这种外部限制通常引起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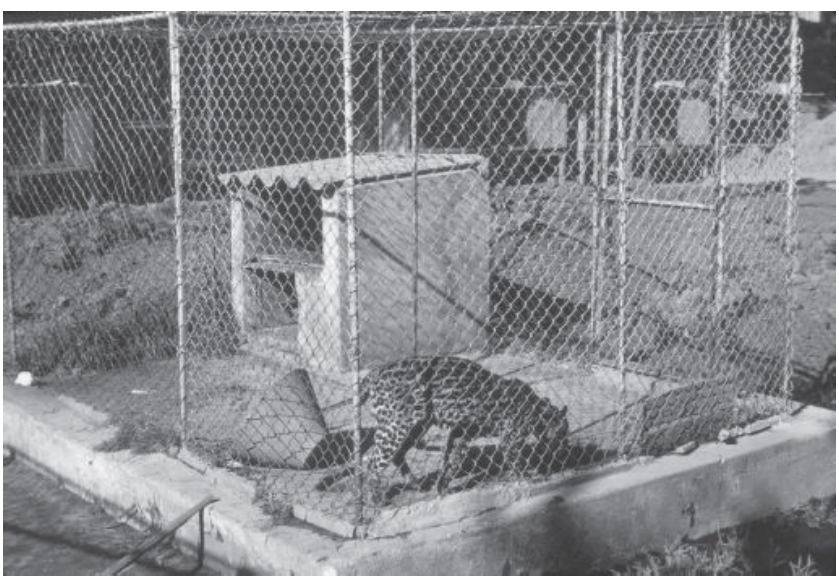

图5　路边动物展览园中的一只老虎

但如果没有导致痛苦，外部限制还是有害的吗？回顾一下我们动物园里的袋鼠，它在那里生活得很舒适；而在野外生活的话，它的幸

福体验事实上会降低。拘禁是否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它？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一个未解决的理论问题的回答：行使它们的自然能力或物种特有功能在本质上是否有价值（即是否会产生某些独立于幸福体验的福利）。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前面提到的那只舒服的袋鼠就因呆在动物园中而遭受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因为动物园限制了它行使其自然本领的能力。总的来说，回到野外对它可能更好，尽管要遭受更多的痛苦。另一方面，如果自由的价值仅仅在于它能提高幸福体验的程度，那么，那只袋鼠在舒适的拘禁环境中的生活会更好。在没有解决自由的价值问题之前，我们就不能完整地理解动物的福利，但是，对大多数与拘禁有关的现实情境的讨论并不需要等待那个理论问题的解决。严重妨碍动物行使其自然能力的那些拘禁，通常都给动物带来了痛苦，并导致了对动物的明显伤害。

死亡是一种伤害吗？

死亡与垂死是有区别的。垂死的个体仍然活着，但通常包含着痛苦，特别是当垂死的过程被延长时。在垂死过程中可能遭受的痛苦是我们对死亡感到恐惧的一个原因。但是，死亡本身却排除了痛苦以及所有其他体验。死亡对主体的幸福体验没有影响，只是终结了这种体验。死亡是一种伤害吗？

我们的常识判断认为，死亡对人来说通常是一种伤害（至少对于出生之后的人，胎儿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死亡或许没有伤害那些已经足足活了95年的人。死亡肯定也不会伤害那些遭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而且没有任何希望提升其生活质量的人。但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死亡伤害了死者；这就是为什么谋杀是一种残忍的罪行的原因。那么，为什么 死亡对人是一种伤害？这一问题的答案对动物来说意味着什么？

一些哲学家坚信，死亡是一种伤害，因为它妨碍了一个重要的欲望 ：即继续生存的欲望。在正常情况下，他们认为，人们至少在工具

性的意义上 珍惜他们自己的生命——作为成功地追求更多独特目的和计划的必要手段 ，例如抚养孩子或完成一本著作。许多人还从内在的意义上 珍惜他们的生命。无论在哪种意义上，他们都想或渴望继续生存。

因此，在这种观点看来，死亡仅仅会伤害那些渴望继续活下去的个人。这种主张对于动物来说意味深长，因为可能只有非常少的动物（甚至）拥有活着的这种概念 ，更不用说渴望活下去了。假设一幢房子着火了，一只狗还在屋内。它非常害怕；毫无疑问，它会意识到自己可能很快严重受伤或受害。虽然它努力逃跑的行为可能会避免其死亡，但是，要说它拥有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概念以及求生的欲望，则是可疑的。因此，在这种观点看来，这只狗会因为烧伤而体验到伤害，但不会因为死亡本身而受到伤害。

一个赞成诉诸欲望这一分析途径的人可能认为，一些缺乏继续活下去的欲望的个体仍然会受到伤害，如果死亡威胁到他们切实拥有的重要欲望。让我们设想，一匹狼渴望在它的群体中获得统治地位。它已经发展了一些重要的盟友，并及时与那些地位更高但比其虚弱的狼展开了几场搏斗，逐渐接近狼群的最高地位。如果它在达到这一目标之前就死了，人们可能会认为死亡伤害了它，因为这阻碍了它在狼群中占统治地位的欲望，即使它缺乏死亡的概念。对诉诸欲望之观点的这种创新将极大地扩大受死亡伤害之动物的范围。但是，它仅仅适用于这样一些动物：或者（1）它们拥有生命的概念和继续生存的欲望，或者（2）它们拥有面向未来的规划。

下面这个例子对所有诉诸欲望来解释死亡之伤害的观点构成了挑战。一个健康的新生婴儿，有着愿意全身心照料她且十分爱她的父母。在出生一周时，她已经毫无疑问地拥有了感知能力，并具有发展出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高级认知能力的潜能。但就目前来说，她还没有计划或规划，更不用说生命的概念了。假设由于某个离奇的事故，这个婴儿在睡眠中无痛苦地死亡了。诉诸欲望的解释肯定会认为，她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伤害。可是，当我们听到这类故事时，许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悲剧，不仅仅是对于她家里那些极度悲伤的成员而

言，也是对于这个婴儿本身而言。死亡伤害了婴儿，这一论断要求我们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死亡的伤害。

这种不同的理论（汤姆·雷根、史蒂夫·萨庞提斯以及我都为之辩护的理论）认为，就其摧毁了延续的生命所能够提供的有价值的机会而言，死亡是一种工具性意义上的伤害 。有感知能力的动物能够拥有有价值的体验，包括那些能提升幸福感的体验，如快乐和满足，也许还有那些与行使自己的自然能力有关的体验——取决于人们关于幸福的理论。而死亡会剥夺猫或新生儿本应用来体验幸福的生活机会，即使它或她没有任何关于这种机会的意识 。因此，根据这种观点，某种动物不需要拥有复杂的概念能力或面向未来的规划才会受到死亡的伤害。感知能力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拥有有价值的体验，而死亡会中断这种体验。（至于仅仅具备感知能力的潜力 是否足以证明死亡是一种危害，这还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充满争议的问题，它对关于堕胎的讨论很重要。）另一方面，如果一只动物既没有求生的欲望也没有面向未来的规划，而且它在未来能够体验到的主要是消极的、充满痛苦的体验，那么，目前这种理论就会否认死亡会伤害这只动物。

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雷切尔的例子，她在其新住所发现了一只老鼠。在了解了关于死亡的上述两种观点后，她进行了如下推论：“诉诸欲望的观点认为，无痛苦的死亡不会伤害到老鼠。而诉诸机会的观点则持相反的看法：如果把它放到荒野，这只老鼠可以获得老鼠的生活中存在的各类机会。而死亡会毁灭这些机会。”诉诸机会的观点使得雷切尔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人道的捕鼠器虽然可能使它遭受一些痛苦但却保存了它的生命，因此是一种很值得考虑 的方法。那么，最后她是否会使用人道的捕鼠器，将取决于下面这个也许更具争议的判断：与捕鼠器的使用给它带来的痛苦——一些恐惧、挫败和可能的悲伤——相比，老鼠的夭折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伤害。但是，雷切尔十分肯定，死亡构成了一种伤害。

她进一步想，假设一辆车撞伤了她的小狗，并轧断了它的腿。雷切尔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让她的狗在麻醉中无痛苦地死去，要么给狗的腿打上石膏，这样还有完全康复的机会。第二种选择方案意味着

狗要经受很多疼痛、挫折、或许还有恐惧，因为它的腿要打上大概一个月的石膏。但是，雷切尔凭直觉认为，如果这条狗被无痛苦地杀死了，那么，不仅她，还有她的狗都会失去某些东西。她推论说，如果我们假设死亡带来的伤害就是它毁灭了未来的机会，那么这种以及类似的判断就显得更为合理。

物种间的伤害是否有可比性？

和人类一样，动物也会受到伤害。它们明显地会由于痛苦而受到伤害。它们也会被拘禁所伤害——对其自由的限制大大妨碍了它们正常生活的能力。严重干扰物种基本功能发挥的对自由的限制是否应该被视为这种意义上的拘禁，因而是有害的（即使没有导致痛苦的结果），这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哪类动物会被死亡所伤害也是有争议的：仅仅包括那些有求生欲望的动物，还是包括有未来规划的动物，抑或所有有感知能力的动物？前文的讨论支持更具包容性的观点，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无论是哪种观点，就我们已经思考过的关于伤害的主要形式来说，一个问题都会出现。如果一个人和一只动物受到一种特定形式的伤害，我们应该认为他／它们各自的伤害在重要性 上是类似的（大致相同）还是大不相同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理解我们对动物的道德责任是重要的。

由于痛苦从根本上说是体验性的伤害，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一个人和一只动物体验到了大致相等的痛苦——尽管在特定情况下很难衡量——那么他们受到的伤害就是类似的。当然，痛苦在工具性的意义上也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了个体对目标的追求。而且，由于毁灭了对目标的追求，痛苦还会产生更进一步的伤害——这一点在人和动物身上都同样适用。更重要的是，如果物种的特有功能具有独立于幸福体验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对所有的动物来说，痛苦都会限制这些功能的发挥。总的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一定量的痛苦应该算作一种可比较的伤害，不论受伤害的是哪类动物。

拘禁带来的伤害在物种间是可比较的吗？如果我们是从这种拘禁所带来的痛苦的角度来理解伤害，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已经发现，痛苦带来的伤害是可比较的。但是，如果对自由的限制妨碍了物种特有功能的发挥——即使它没有导致痛苦——那么拘禁就包含了一种独特的伤害形式。虽然这一点适用于所有有感知能力的动物，但是，认为拘禁对动物的伤害程度是不同的这一观点却是可以得到证明的，不过这种复杂性在讨论死亡的伤害时得到了最好的解释（我们将马上转向这一问题）。

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一些人认为继续生存具有其内在的价值，所以把死亡看作是一种内在的伤害。这些论证是否正确还有很大争议。然而，一般说来，所有人都同意，对人来说死亡在工具性的意义上 是有害的。因此，让我们重点关注死亡在工具性意义上的伤害。这种伤害在物种间是可比较的吗？

许多哲学家，包括动物权利的一些主要捍卫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些赞成从诉诸欲望的角度来理解死亡带来的伤害的人认为，由于大多数有感知能力的动物没有对生命的欲望——或者如改进过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没有面向未来的生活规划——因而死亡根本 不会伤害到这些动物。所以，很明显，死亡对它们的伤害较之于对正常人和任何符合相关标准的动物的伤害都要小。那些赞成诉诸机会的观点的人则认为，虽然死亡剥夺了所有有感知能力的存在物可获得的机会，但是与那些生活较为简单的动物（包括大多数或所有的动物）相比，可获得的机会对人更有价值。（为了支持这一论点，一些哲学家诉诸人类所谓的在获取愉悦感和满足感方面的优越能力；其他人则诉诸人类所谓的更有价值的行为特征和功能类型。）类似地，猴子可获得的机会较之于猫而言更丰富，而猫可获得的机会较之于海鸥而言又更多，等等。这种比较是基于物种在认知、情感和社会复杂性等方面的不同。总之，对于个体的生活而言 ，生存的价值因物种不同而有差异，所以死亡所带来的伤害的严重程度也相应地各不相同。

图6　一间饲养肉鸡的鸡舍

要对这些有关比较价值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将要求我们系统地研究那些尚未得到解决的理论难题（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分析过）。在这些问题上，人们尚未达成任何重要的共识。然而，几乎所有的评论家，包括我自己，可能都会接受这样一种谨慎的主张：一般说来，与大量有感知能力的动物（至少包括那些比哺乳动物“更低级”的动物）相比，死亡对人的伤害是更大的。同样，人们可以认为，拘禁妨碍了具有更大价值的活动和功能，或者剥夺了具有更大价值的愉悦和满足，而与某些动物相比，拘禁更容易剥夺人的这类愉悦和满足，因此，拘禁对人的伤害比对动物要大。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对自由的严重剥夺几乎总会导致痛苦——一种对所有物种都类似的伤害。（从理论上讲，如果仅从工具性的角度来考虑 痛苦，人们也会得出类似的观点：痛苦所威胁到的功能的形式或满足感的来源，因物种不同而有差异。但是，我将忽略这一点，因为痛苦主要是一种体验性的伤害。）

结论

我们的讨论得出了一些结论。第一，一定量的痛苦是一种可比较的伤害，不管谁是受害者。第二，如果在人和某些动物——至少是那些比哺乳动物“低级”的动物——之间进行比较，那么，死亡不是一种可比较的伤害。正常情况下，死亡对人的伤害更大。第三，就其会导致一定量的痛苦而言，拘禁在不同物种间是一种可比较的伤害；但是在人和某些动物之间，就其妨碍有价值的活动或获取满足感的可能性而言，拘禁所带来的伤害又是不可比较的。现在让我们重新审视第二章所概括的伦理框架，简要地讨论一下潜在的伦理分歧。

如果一个人赞同平等考虑的框架，他会认为，对于人类和动物的类似 利益，我们必须给予同等的道德考虑。这样，平等考虑意味着，就像给人带来痛苦的行为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一样，给动物带来痛苦的行为在道德上也是有问题的。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见到的那样，许多使用动物的机构明显地不符合这个标准。另一方面，下述观点与平等考虑是不矛盾的：反对杀害人的道德假定比反对杀害动物的道德假定要坚实一些。（这一论点得到了其他观点的进一步支持，包括这一观点：如果人们热爱的某个人死了，那么，他们所体验到的情感伤害通常都更大。）并且，就这些动物而言，反对拘禁它们的道德假定在某种程度上 也比反对拘禁人的道德假定要薄弱一些。

与平等考虑不同，不平等主义者对可比较和不可比较的伤害这一微妙话题所给予的关注较少。不平等主义者断言，总体上 人类的利益较之动物的利益在道德上更重要。而且，一般说来，动物在认知、情感和社会性方面越复杂，其利益在道德上就越重要；这证明了物种间不平等考虑的等级模型或区别对待的合理性。认为（比如说）死亡带来的伤害在物种间不可比较的观点使得不平等主义者断定：就许多动物来说，几乎不存在可以用来反对无痛苦地杀死它们（比方说，在生物医学的研究中）的理由。也许更重要的是，不平等主义者否认，给青蛙、画眉鸟、老鼠和人带来痛苦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同样有问题的——即使我们永远也不应随便给它／他们带来痛苦。

我们已经探讨了动物的道德地位、它们的精神生活以及它们可能会受到伤害的主要方式，现在让我们转到有关人类使用动物的实践伦理问题上来。

第五章

吃荤

母鸡X在一个拥挤不堪的孵卵器中开始了它的生活。随后它被关入一个全部由铁丝制成的“层架式”鸡笼中，这与符合母鸡本性的户外环境非常不同，而它将在这里度过它的一生。（由于没有商业价值，雄性小鸡都被毒死、碾碎或闷死。）母鸡X的笼子极其狭窄，以致它无法舒展羽翼。虽然它的嘴对于进食、探寻和修整羽毛来说非常重要，但却被切掉了一部分（并且是穿过敏感组织），目的是为了防止它啄笼中其他的伙伴而导致的危害（鸡笼中的鸡互啄对方的行为源于过分拥挤）。产蛋前数小时内，母鸡X都在鸡群中焦虑地踱步，本能地搜寻着一个它无法找到的小巢。产蛋时，它只能站在倾斜的、不舒适的铁丝笼底，这是为了防止其本能的行为，如啄食、沙浴和啄破鸡蛋。缺乏锻炼、不自然的环境以及要求极高的生产率（它一年要产250个蛋）导致它骨头脆弱。（与许多母鸡不同，母鸡X没有经历强制换羽期；在强制换羽期，母鸡会在一至三天里没有水喝，而且近两个星期得不到食物，以此来延长产蛋周期。）在两岁时它的功能已耗尽，于是被塞入一个板条箱，装上卡车——没有食物、水或对恶劣天气的防护——运往屠宰场。这种粗暴的装运方式导致母鸡的一些脆弱骨头开始折断。到达指定地点后，母鸡X被倒挂在一个传送带上等待一把自动刀片割断它的喉管。因为美国的《人道屠宰法》并不适用于家禽，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它完全有知觉。它的身体在存活时期已被严重损害，因而在死后只适合于做鸡肉馅饼、鸡肉汤等等。

公猪Y四周大时断奶，被关在一个非常拥挤的、多层的饲养栏中。由于通风设备简陋，它呼吸的空气中有着浓烈的屎尿味。在体重达到50磅后，它被关进一个狭小的“催肥”畜圈中。这个畜圈是用板条做的，混凝土的地面并没有铺垫任何草垫，也没有任何娱乐物件。尽管猪是有着较高级智力和社会性的物种，但猪Y与其他的猪被铁制的栅栏隔离开，除了起身、躺下、吃和睡之外别无他事。它有时咬邻近板条箱中其他猪的尾巴来娱乐自己——直到所有猪的尾巴被“截短”（切断）。这些程序和阉割都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实施的。当它被决定屠宰时，猪Y被粗暴地赶入一辆卡车，与其他30头猪挤在一

起。两天的旅行对猪Y来说并不愉快，它与其他猪相互争斗，无法进食、饮水、休息，也没有避暑的措施。在屠宰场，猪Y闻到了血腥味并抗拒装卸者的刺戳。但他们用一根钢管从后面反复地驱赶和敲打它，直到它被困在传送带上并送到击昏器前。猪Y是很幸运的，因为它被电流击昏的过程很成功，在它的身体被浇上沸水和分割肢解之前它已经被杀死。（尽管《人道屠宰法》要求，除家禽外的动物在它们被钩住、倒挂吊起和切割之前，要对它们实施电击，使其失去知觉，但许多屠宰场的雇员说，违反这些规定是常有的事。由于担心高压电可能导致它们体内“热血飞溅”，许多屠宰场的监察人员明显鼓励使用低得多的电压，以致无法保证它们没有知觉。此外，在许多屠宰场，电击人员每隔几秒钟就要用电流击昏动物，他们面临极大的压力，无法确保电流能击昏生产线上的每一只动物。）

尽管母牛和它们的小牛相依为命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母牛Z在出生之后不久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那时它还是小牛），开始了它作为奶牛的生涯。母牛Z从没喝过初乳——它母亲的乳汁（母乳有助于小牛抵抗疾病）。它生活在一个非常拥挤的、没有青草的“家畜围场”中，它的尾巴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被切除。为了产出多于正常状况20倍的牛奶，它被迫吃很多的谷物——而不是有利于母牛消化的富含纤维质的粗饲料——这使得它的新陈代谢紊乱并导致痛苦的跛足残疾。和许多母牛一样，尽管在非哺乳期服用了抗生素，但它还是经常患乳腺炎，这是一种痛苦不堪的乳腺发炎。为了保证持续的牛奶产量，母牛Z被迫每年产一头小牛。为了加速它的生长和生产力，它每天被注射牛生长激素。它的自然寿命是20年或更长，但在4岁时它已不再能维持产奶水平，它的能量已被“耗尽”。在运输和装卸的过程中，母牛Z是幸运的：虽然被剥夺了食物、水和超过两天的休息，还伴随着被刺戳的恐惧，但它没有被毒打；在屠宰场，它的本能（不同于猪）使它能够在由单根木条做成的斜槽上轻松行走。不幸的是，那个缺乏训练的电击师傅不太会操作气动击昏枪。虽然他电击了母牛Z4次，它还是一次次站立起来并不停地咆哮。然而，这个过程并没有就此结束，它被倒挂起来递送到“屠夫”面前，他切断它的喉管并把血放

尽。它在流血及被肢解和剥皮的部分过程中还保留着知觉。（联邦监察员所站的地方使他看不到所发生的事情；另外，他应接不暇地检查眼前飞驰而过的动物尸体，只想发现某些明显的污染痕迹。）母牛Z的身体将被用于牛肉加工食品或牛肉汉堡。

图7　咬着栅栏的一头猪

工厂化农场的设立

上面描述的动物生活是动物在现代工厂化农场中的典型生活。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这些工厂为我们提供了大多数的肉制品和乳制品。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厂化农场——它们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饲养尽可能多的动物，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迫使美国300万家庭农场破产；与此同时，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农业部门也见证了类似的转变。科学的发展刺激了工厂化农场的兴起；这类科学发展包括：动物所需的维生素D的人为供应（否则动物自身合成维生素D需要阳光）、减少某些疾病蔓延的抗生素的成功发明，

以及提高产品品质的先进的基因选择方法。由于创立这种机构的动力是经济效率，所以工厂化农场仅仅把动物作为实现经济效率这一目的的手段来对待，即当作没有独立的道德重要性或任何道德地位的纯粹物体来对待。

就受伤害动物的数量及其受伤害的程度而言，工厂化农场对动物的伤害较人类的任何其他机构或活动都大 。仅在美国，这种机构每年就杀死1亿多只哺乳动物和50多亿只家禽。美国农场的动物实际上没有得到合法的保护。最重要的联邦法就是《人道屠宰法》，但它并没有覆盖到家禽——我们所消费的动物中的大多数——而且也不涉及动物的生活环境、运输或装卸过程。更重要的是，正如盖尔·艾斯尼茨（Gail Eisnitz）和其他人已经广泛引证过的，这项法案很少被实施。很显然，美国农业部支持农业企业的主要目标：没有障碍地实现利润的绝对最大化。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农业部的大多数高级官员要么本人担任过农业企业的领导，要么与这一产业有着政治上和财政上的紧密联系。

相反，一些欧洲国家对类似美国工厂化农场中的那类极端做法加以了限制。例如，英国禁止使用板条小牛栏，并规定，在运输过程中，不给动物提供食物和水的时间不得超过15小时。欧共体和欧洲委员会制定了农场动物的福利标准，并在不同的成员国中把这些标准转化成了法律。与美国农场动物的状况相比，这些标准通常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更大的自由，以确保符合动物本性的行为得到实现，同时提供的还有更人道的生活环境。尽管如此，欧洲的大多数畜牧业仍然是高度集约化的，足以冠以“工厂化农场”这一名称。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主要是通过三个例子描述了工厂化农场的基本状况。有人可能会反对说，母鸡X、猪Y和母牛Z的处境并不代表所有工厂化农场的普遍特征。这种反对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三种动物所遭受的痛苦是普遍存在的，至少在美国是如此。虽然在此全面地描述工厂化农场是不可能的，但增加对其他种类的农场动物的一些说明，也许是有帮助的。下面的概括意在描述美国的状况，但有些概括实际上也描述了其他许多国家动物的遭遇。

作为肉牛饲养的牛的处境通常都比这里描述的其他动物的处境要好。许多牛有机会在圈外自由活动大约6个月。之后，它们被长途运送到饲养场，在那里它们被喂养谷物而不是草。使它们遭受痛苦或悲伤的主要因素是：持续不断的风吹雨打、用烙铁打烙印、去角、未经麻醉的阉割、为身份鉴别而割耳，以及枯燥的、一成不变的生活环境。当然，我们还可以加上被运送到屠宰场的过程中以及在屠宰场里所遭受的伤害。

肉鸡在封闭的鸡圈中度过一生；由于数十万只鸡以超常规的速度生长，鸡圈变得越来越拥挤。除了极度拥挤之外，它们遭受的主要伤害还包括：同类相残、因恐慌而相互踩踏所导致的窒息、切除嘴尖，以及因堆积的粪便和简陋的通风设备而导致的非常不健康的呼吸环境。

食用牛犊被剥夺的生活福利在许多方面与猪相似。那些用配方食物喂养的食用牛犊尤其如此；它们单独生活在用木条板做成的牛圈中，这种牛圈非常狭窄，以致牛犊无法转身或以自然的姿势睡觉。牛犊得不到水和固体食物，而是饮用一种缺铁的代乳品——以便给美食家们提供尽可能白嫩的牛肉；这使小牛患了贫血症。这种饮食和单独拘禁极大地损害了小牛的健康，导致了小牛的神经质行为。

现在让我们来概览一下全景：工厂化农场通常给动物造成痛苦、拘禁和死亡这类严重的伤害 。就痛苦——或一般的体验性伤害——而言，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工厂化农场的动物在它们的一生中明显地体验到了大量的痛苦、不适、无聊、恐惧、焦虑和其他可能的不愉快情感。（见第三章关于动物的精神生活的讨论。）此外，工厂化农场的性质决定了，它对动物的拘禁 完全符合我们对这一术语约定俗成的理解，也就是说，工厂化农场给动物的行为自由施加了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的外在限制。（只有那些作为肉牛特殊喂养的牛不是在这种意义上被拘禁的，至少在它们生命中的部分时间里是如此。）而且，工厂化农场最终会杀死这些作为肉食饲养的动物，从而给它们增添了死亡的伤害（假设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论证的，死亡伤害了母牛、猪和小鸡这类动物）。当然，只有当我们认为这些动物的生命本来可以 得到人

道的对待时，死亡才能被视为一种伤害。考虑到它们目前所获得的对待方式，死亡似乎还可被看作是一件幸福的事（肉牛或许除外）。总之，工厂化农场给动物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一基本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道德评价

在对工厂化农场的道德评价方面，如果第一个重要的洞见是它们导致了对动物的严重伤害，那么第二个重要的洞见就是：消费者不需要工厂化农场的产品 。我们无法合理地认为，给这类动物带来的所有伤害都是必要的 。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况外——例如，人们面临饥饿且别无选择——我们一般都不是必须靠吃肉食才能生存甚或保持健康。吃荤的主要好处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愉悦 ，因为许多人特别喜欢肉的味道，以及方便 ，因为要调整到接受或保持素食食谱需要一些努力。把上述两个重要的洞见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工厂化农场给动物带来了不必要的严重伤害 。因为导致大量不必要的伤害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错误，所以得出下一论断似乎是必然的：工厂化农场是一种无法得到合理辩护的机构。

注意，对工厂化农场的这种谴责并不是依赖于动物应获得平等考虑这一有争议的假定。即使人们只接受关于道德地位的区别对待模型（它证明给动物较少的考虑是合理的），也无法为给动物带来不必要的严重伤害的做法进行辩护。这表明，如果一个人非常认真地对待动物，把它们看作是至少拥有某种道德地位的存在物，那么他就会认为工厂化农场是无法得到辩护的。

那么，消费者是否有错呢？消费者并没有伤害动物，而只是食用了工厂化农场的产品。那好，让我们想象一下，某个人这样说：“我自己并没有把狗踢死，我只是花钱请人把它踢死了。”我们会认为这个人做了错误的事情，因为他鼓励和怂恿了残酷的行为。类似地，吃荤的人可能通常都感到，肉制品的生产离自己很遥远，或许他们甚至

从未想过工厂化农场和屠宰场发生的事情；尽管如此，因为他们购买了工厂化农场生产的肉制品，这就直接鼓励了相关的残忍行为并使得这类行为成为可能。所以消费者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总之，下面的道德原则（虽然有些模糊）是站得住脚的：尽最大的努力，不给那些使动物遭受严重的不必要伤害的机构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

我认为，购买工厂化农场肉制品的行为从经济上支持了大量不必要的伤害，违反了这个原则，因而在道德上是无法获得辩护的。有趣的是，我们得出这个重要结论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伦理学理论（如功利主义或强式动物权利论）。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是基于动物福利的考虑而反对工厂化农场并抵制其产品，但是，我们的论证还可通过对人类福利的考虑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如何证明呢？

第一，动物产品具有高脂肪、高蛋白并包含胆固醇，与心脏病、肥胖、中风病、骨质疏松症、糖尿病和某些癌症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医学专家现在都建议，与（例如）大多数美国人的饮食相比，人们应少吃肉而多吃谷物、水果和蔬菜。第二，自二战以来，美国工厂化农场已经导致300万个家庭农场破产，因为每年享有数十亿美元政府补贴的大型农业综合企业越来越占统治地位。虽然美国消费者经常听说，工厂化农场的肉制品的销售价格更低，但是，很少有人向他们提起幕后的税收补贴代价。在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占有类似统治地位、使许多更小的农场破产的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则相对较少。第三，工厂化农场正破坏着环境。它过度地消耗能源、土地和水，导致表层土壤的侵蚀、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和森林的滥砍滥伐；它对肥料、农药和其他化学制品的使用还导致了水污染。第四，工厂化农场对人类食品的分配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例如，它需要消耗含8磅蛋白质的猪饲料才能生产出1磅供人食用的猪肉，需要消耗含21磅蛋白质的牛饲料才能生产出1磅牛肉。结果，（例如）美国生产的大多数谷物都被拿去饲养家畜。不幸的是，富裕国家对肉制品的需求，使得植物蛋白的价格对最贫穷国家的普通大众来说过于昂贵。贫穷国家常常放弃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实践，去生产能出口套现的农产品和肉制品，但这

种以大量土壤受侵蚀为代价换来的利润是短暂的，结果会导致这些国家的贫困和营养不良。事实上，如果合理使用的话，人类很容易获得足够的植物蛋白质来养育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第五，也许特别是在美国，工厂化农场对它的雇员来说是残忍的。它要求他们承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例如，一个工人每分钟要切剁90只鸡，他因担心错过流水线上的鸡而站在流水线旁小便。它还使农场工人遭受美国工人所遭受的一些最严重的健康危害（例如皮肤病、呼吸问题、手臂致残、胳膊受伤，以及被发狂的、未得到恰当电击的动物弄伤），而这一切所换来的只是很低的报酬。第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放松对肉制品工业的管制，生产流水线也变得更加快速；这两种因素使得保证肉制品的安全几乎不可能。正如亨利·斯皮拉（Henry Spira）（见辛格书中谈及斯皮拉的部分）指出的那样，据估计，被污染的鸡肉每年导致2,000美国人死亡。

所以，由于能够获得基于人类福利之考虑的进一步支持，抵制工厂化农场产品的理由是非常有力的。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下面这个重要的反对意见。人们可能认为，继续保持工厂化农场从经济上讲是必要的。假如通过成功抵制，这个行业破了产，这不仅对农业企业的所有者来说明显是一个灾难，而且也会减少许多工作岗位，并有可能损害地方经济。这种观点进而指出，此种结果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正如工厂化农场是必要的那样，给动物造成严重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与我指责严重不必要 伤害的观点正好相反。

在回应上述反对意见时，我们或许可以同意假设的可能后果为事实，但同时批驳废除工厂化农场是不可接受的这一主张。首先，正如彼得·辛格所指出的，终止工厂化农场的负面代价只需要我们承担一次，而永远保持这种机构则使动物永无止境地承担这种代价。其次，考虑到工厂化农场的雇员如此糟糕的待遇，很难相信，他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工作能算得上是什么严重的伤害，正如无数“被耗尽”的雇员所做的那样。再次，如果这个行业被取消（假设不是简单地被更少集约化的畜牧业所取代，因为更少集约化的畜牧业还会使一些问题存留下来），由工厂化农场所引发的对人类福利的多种威胁——健康的危

险、环境的破坏、低效率以及不合理的谷物蛋白质分配，等等——通常都可以得到避免。避免这些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无止境的危险和伤害，似乎可以弥补任何短期的经济损害。最后，我提出，在追求利润或就业时，我们对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存在着道德底线，而在追求这些目标时使有感知能力的生物遭受严重伤害的行为则越过了这些底线 。（强制卖淫、逼迫他人进入色情行业或奴隶制度都是违反此类底线的生动例证。）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那么就不能认为工厂化农场是必要的了。总之，我认为把这些反驳结合在一起，就能削弱从经济必要性角度对工厂化农场所进行的辩护。

传统家庭农场

本章前面关注的是工厂化农场，因为这是我们消费的大多数动物产品的来源。但是，人们也食用通过其他方式饲养的动物，包括传统家庭农场。

由于家庭农场采用的是集约化程度较低的饲养方式，所以，它们给动物造成的伤害较之工厂化农场要少得多。家庭农场可能并不拘禁动物，即限制它们的活动，从而严重干扰它们的生活状况。但是，如果诉诸机会的论点对死亡之伤害的解释是正确的（见第四章），那么，家庭农场的动物也无法完全不受伤害，因为它们最终还是会被杀死，这意味着要承受死亡的伤害。

家庭农场与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工厂化农场相比，有着更有力的辩词，因为它对动物产生的伤害要少得多，而且，至少避免了工厂化农场对人类福利的一些威胁，例如，水污染、极度恶劣的工作条件等。不过，我们还是有很强的道德理由来反对家庭农场并且抵制其产品。一方面，这种机构确实通过某些方式给动物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痛苦：给牛打烙印、去角；阉割牛和猪；把幼崽与其母亲分开（这种分离甚至会给家禽带来悲伤）；以及在运输、装卸和屠宰过程中粗暴地对待动物等。此外，所有的动物都会被杀死。由于吃荤是不必要的（异常

情况除外），因而这些伤害也是不必要的。给动物带来不必要伤害的这种日常行为很难获得辩护。

然而，一些可能的反对意见或许会进一步支持某些形式的家庭农场。例如，鸡和火鸡可能不会遭受刚才描述的大多数伤害。如果一只鸡或火鸡能够过一种愉快的生活（比方说，拥有完整的家庭，从来没有被虐待过），那么，唯一相关的伤害就是死亡。然而，赞成用诉诸欲望的观点来解释死亡之伤害（尽管我在第四章批驳过这种观点）的人可能会否认家禽会遭受这种伤害；这意味着，生活在舒适环境中的家禽根本没有受到伤害。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不同于笔者）接受道德地位的区别对待模型，那么，他就会依据不同动物在认知、情感和社会性方面的复杂程度，给予它们的利益——包括避免痛苦的利益——以不同的道德考虑。这种伦理模型的拥护者可能会为这样一些家庭农场——它们把公认的不必要的痛苦降到了最低限度——进行辩护。他可能认为，导致最低限度 的不必要伤害，甚至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并非总是不对的，特别是如果这样做能够获得解决农民就业这样的一些重大好处。然而，在评估这种理据的合理性时，人们需要再次考虑这种做法对人类福利的消极影响，例如对谷物蛋白质的非常低效的使用。

海产食品

我们所消费的许多肉制品都来源于海洋。先来看看鱼类和头足类动物（章鱼和乌贼）。我们第三章已得出结论说，这些动物是有感知能力的，会感受到疼痛和悲伤；至于它们能否体验到特定意义上的痛苦（即某种与一定程度的疼痛和悲伤联系在一起的非常不愉快的情感状态），我们持一种开放的态度。现在，人们在抓捕鱼类和头足类动物时需要先钩住或网住它们，然后使它们窒息而死。很明显，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了不愉快的情感。虽然传统的捕鱼方法不涉及拘禁——因为这些动物在它们的自然环境中是自由的——但死亡显然是不

可避免的。如果基于机会来解释死亡的伤害，那么，死亡在某种程度上 伤害了这类动物，但如果基于欲望来解释死亡的伤害，那么，死亡就没有伤害这类动物。

人们可以找到几个理由来支持鱼类和头足类动物只受到了最低限度伤害的观点：宣称它们所遭受的痛苦是非常短暂的；全然否认它们遭受了痛苦；断言死亡对它们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计。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认为，它们所遭受的这种最低限度的伤害能够被人们所获得的某些好处所抵消，如它可以带来快乐、便利、健康的饮食，以及渔民的就业。（然而，相信动物拥有最强的、超功利意义上的权利的人［见第二章］会反对这种推理。）自然地，道德地位之区别对待模型的拥护者会认为，海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是很容易辩护的，因为鱼类和头足类动物在道德阶梯中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

存在于我们的分析中的一个复杂因素是，今天，很多鱼都是在渔场中饲养的。它们的生存环境是如此拥挤，不仅与拘禁相差无几，还增加了鱼类生活的不愉快。如果鱼是以这种方式被饲养的，那么，抵制购买这些产品的理由就变得更为有力。

头足类动物之外的龙虾、蟹、小虾和其他非脊椎动物又如何呢？目前尚无可靠证据证明，它们拥有感知能力。如果它们没有感知能力，我们的行为就不会伤害到它们。基于这种不确定性，在我们是否应该假定它们拥有感知能力、从而不能伤害它们的观点上，人们也许有理由持不同的态度。

在思考海产品的食用问题时，绝不能忽视我们给那些未被我们食用的动物所带来的伤害。例如，假设你从一个其渔网经常网住并杀死海豚的公司那里购买金枪鱼（而我们知道，海豚在认知、情感和社会性方面的复杂性可以与类人猿相媲美）。该公司在捕捞金枪鱼的过程中给海豚造成了伤害；这种伤害使得你从该公司购买金枪鱼的行为恰如你从工厂化农场购买肉产品的行为一样，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

第六章

收养宠物和动物园的动物〔1〕

一条5岁的金毛猎犬珍妮过着舒适的生活。它吃得很好，能获得必要的兽医保健，也没有受到虐待。但它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无聊和孤独中度过的。它每天享有两次拴着皮带的散步时间，每次15分钟。它所居住的房子有一个很大的后院，但没有用栅栏围住，所以它只有在散步时才能到户外去。这个家庭的主人白天在外上班，他们唯一的孩子对珍妮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也只是偶尔与珍妮玩耍，大多数时间珍妮都只能独自呆着。

两只狮子，利奥和利昂娜，是某动物园展馆中唯一的两个住户。它们出生在两个不同的动物园中，自从断奶后就与它们的母亲分开了，是现在的这个动物园把它们俩关到了一起。在这里，它们彼此逐渐熟悉。利奥和利昂娜在面积中等的展馆中生活得很舒适；展馆的大部分都位于户外。它们吃得很好并得到兽医周到的照料。但它们感到厌倦并无精打采，也很少相互交流。与大部分时间花在猎取食物上的野生狮子相比，利奥和利昂娜从来不用猎取食物，或以其他的方式充分使用它们的官能、肌肉或智力。它们也很少玩耍。

两种情景都是由于人为的干预而使动物活动的自主性或自由受到了限制。限制动物的自由到底是不是正当的？如果是，在什么情况下是正当的？拘禁是否必然会伤害动物，或是否是对它们的不尊重？本章将对这些问题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收养动物的条件

在我看来，动物的喂养者和看护者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才能证明他们收养特定动物的行为是合理的。第一，动物基本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必须得到满足 。满足基本需要的这一要求，可以通过诉诸动物拥有道德地位的假设（在第二章已证明过）来证明。它还可从下述观点得到进一步的支持：在收养宠物和动物园的动物时，人们就承担了关心动物福利的责任。因此，某人让他的猫挨饿的行为，不能因为他没有

主动伤害猫就可以不受谴责；他作为照料者这一角色与他的猫之间所形成的特殊关系，决定了他对他的猫负有特殊的积极义务。

第二，给这种动物提供的生活至少要同它在野外可能获得的生活一样好 。给动物提供大致相同生活的要求，可用如下观点论证：我们不应该使宠物或动物园的动物生活得更糟，因为，使它们生活得更糟将构成不必要的伤害 。

但有人可能问，收养动物有时不是必要的 吗？比方说，为了保护一个物种，或者为盲人提供导盲犬？如果这是必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收养行为给动物所带来的伤害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根据具体案例来审视关于必要性的这种主张。“必要性”通常与某些目标有关，如物种的保护；在判断因追求某个目标而给某人造成的伤害是否合理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对该目标的重要性进行评估。（强式动物权利论原则上反对在未经某个体同意的情况下，为了促进其他个体的利益而伤害该个体。）如果伤害某个动物的特殊案例——比方说严格训练一条狗来帮助盲人——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这种伤害是明显 必要的，那么，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潜在地假定了：动物的道德地位低下，因而它们被用来满足人的需要是正当的。

无论如何，人们还可通过另一种方式来为要求给动物提供大致相同生活的主张提供辩护。如果我们知道一个孩子在一个收养家庭将过得更糟糕——孤儿院是善意的，而这对收养夫妇却非常喜欢虐待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允许这个家庭收养孩子肯定是错误的。平等考虑的观点要求我们把同样的标准应用于动物：不能使宠物或动物园的动物生活得更糟。自然地，那些反对平等考虑而赞成区别对待的人不会接受关于给动物提供大致相同生活的第二个论证。而对于基于对不必要伤害的谴责的第一个论证，反对平等考虑的人可能要么极大地扩展属于“必要”伤害案例的范围，要么挑战不必要地伤害动物总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因此，区别对待模型的拥护者可能只接受基本需要这一要求，而把提供大致相同生活的要求视为一种道德理想 ——它的实现取决于人们的自主选择。

如果我关于上述两个要求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它们是如何相

互联系的呢？当其中一个要求放宽松时，另一个要求就收紧了道德的绳索。如果你的宠物狗（由于走失）在野外的生活确实会很凄惨，那么，在未能满足它的某些需要（例如，适当的刺激、锻炼以及与其他狗的联系）的情况下，你或许能够满足提供大致相同生活的要求。但是，满足基本需要的要求不允许这种忽视。如果动物园里土拨鼠仅仅是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但它在野外的生活可能更丰富，那么，依据提供大致相同生活的标准，把它继续关在动物园中就是错误的。

接受这些（或类似的）要求将有助于避免某些过分泛泛而谈的论点，例如，动物园的展览本质上是有害的，或必然侵犯动物的某些权利。动物园的一些重要批评者，包括戴尔·贾米森（Dale Jamieson）和汤姆·雷根，没有把圈禁 （限制某人的自由权）和我们所说的特定意义上的拘禁 （以这样一种方式限制某人的自由权：即严重干扰某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区别开来。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因为只有拘禁会带来伤害。事实上，有时圈禁或对自由权的其他限制总的来说是有益的。毕竟，人们可能拥有自由权 ——没有外在的限制——而并不享有某些重要的自由 。一个使用因特网的儿童或一只被捕食的动物也许都拥有自由权，但没有免于受罪犯／捕食者伤害的自由。

如果圈禁并非总是伤害动物，那么它是否仍然表现了对动物的不尊重 ？实际上，任何一种圈禁动物至少部分地是被用于人类的目的，例如娱乐（动物园的动物）和陪伴（宠物）。对动物的尊重也许要求我们把动物留在野外，并且不要为了驯养而生产动物。有些批评家指出，我们应该停止繁殖动物园的动物和宠物，在现有的动物死去后，不再用新的动物来替代它们，让驯养动物全面走向灭绝。

这种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在正常情况下，根据尊重自主性 的原则，对成年人的干涉需要得到他们正式的同意，无论这种干涉是用于社会福利（做研究），还是用于他们自己本身的福利（接受治疗）。但是，这个原则只适用于那些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最佳利益和价值的存在物；它并不适用于儿童或非人类动物，他／它们（只有极少数受过语言训练的类人猿除外）缺乏构成自主性 的推理能力和决策能力。因此，代表儿童和动物作出符合他／它们利益的决定是恰当的。没有

人强有力地辩护过这样一条适用于所有有感知能力的非人类存在物、要求我们任它们自生自灭的尊重原则。

由于收养宠物和动物园的动物既不是本质上有害的，也不一定是对动物的不尊重，因此，我们必须根据特定案例的具体情况来评估收养行为的恰当性。

宠物

让我们把话题返回到金毛猎犬珍妮。它的人类伙伴明显没有完全满足收养动物的两个条件。确实，如果珍妮成了流浪狗，它的处境很可能会更糟。虽然会过上更加刺激的生活，但它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会挨饿，没有兽医的照料，还要遭遇极端恶劣的天气和多种户外的危险。所以让我们假定，提供大致相同生活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总的来看，珍妮的生活水平肯定不低于它作为流浪狗的生活。但它的人类伙伴因没有满足它对充足锻炼、刺激和陪伴的需要而违反了满足基本需要的要求。

由于作为一只宠物，珍妮的处境是常见的，所以探究它的人类伙伴如何能达到满足基本需要这一标准是有价值的。首先，他们可以极大地增加它在户外溜达的时间。既然他们有一个宽敞的后院，他们可以用栅栏把它围起来，允许珍妮有更多的时间享受户外活动；它可以在草地上玩耍、更多地聆听其他动物的声音、掏挖洞穴，以及从事锻炼其机能的其他活动。其次，他们还可通过收养另一条狗来使珍妮的生活更加丰富。花更多的时间直接与珍妮相处也会使它更加幸福。

这种改变是巨大的，会影响到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并且可能要承担相当的花费，例如修建栅栏。这是否意味着这种改变对人类照看者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没有。关键之处在于，收养宠物是一项非常严肃的责任 。就像生养孩子一样，人们在接纳宠物之前必须作出周密而现实的计划，并且只有在能满足宠物的基本需要时，才能收养动物——假设提供大致相同生活的要求也能予以满足。毕竟，动物拥有道

德地位，它们并不只是为了人们的快乐才存在的。

收养宠物是否恰当，这取决于特定案例的具体环境；这些环境决定了收养宠物的两个条件是否能够被满足。尽管如此，我们可能仍然要提出一个大胆的概括性观点：把外来的或野生的动物（例如猴子、老鼠、金丝雀、蛇和大蜥蜴）当作宠物来收养是错误的。指望能够充分地照料这些动物明显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们被迫生活的处境完全不同于它们本性所适合的环境。所有者几乎总是对外来动物的特殊需要一无所知；人们也不能指望兽医能对野生动物的健康问题作出恰当的诊断。如果一只外来动物不会很快死去（大多数都会在几年内死去），那么，收养者可能会对它感到厌倦，却不能找到另一个心甘情愿的收养者。最糟糕的情形或许是，购买野生动物的行为鼓励了人们从野外捕捉动物，破坏了动物家庭的完整性，并导致了在运输、装卸过程中可预见的对动物的伤害，以及把生命作为商品来买卖的恶果。

图8　一只待售的长臂猿幼崽

与外来的动物相比，真正驯化了的物种（如猫和狗）与它们野生的祖先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遗传差异，就像狗和狼的情况。通过人类的

收养，驯化了的动物较之野生动物更适合与人相处。但人们应如何获取一只驯化了的动物？目前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动物过度繁衍，导致了它们无家可归的惨况（不论是在街上、庇护所还是某些国家的试验室里）和每年数百万动物被实施“安乐死”的结局。由于从宠物店或动物繁殖者那里购买宠物的行为助长了这个问题的持久存在（同时导致对宠物店里的动物的忽视），因而，从动物庇护所领养一只宠物也许是更为负责的行为。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宠物还没有进行卵巢切除或阉割，那么对它们进行这种手术也是同样重要的。地方政府可以帮助建立一些收费较低的绝育手术诊所。

动物园的状况

人类搜集动物的历史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动物公园或动物园指的是展览动物的公园，主要是为了娱乐、教育或科学的目的；它于18世纪开始在欧洲大陆出现。英国和美国的第一个动物园出现在19世纪。

如果人们没有从野外捕捉动物，动物园就不会存在。动物园收养动物的第一步就是捕捉野生动物并把它们圈禁起来。接下来的第二步通常就是野生动物买卖；交易的过程常常充满冷漠和残忍。许多动物在这一过程中死去，导致死亡的原因包括：艰苦恶劣且伴随虐待的旅程、致命的感染，以及对动物园环境的无法适应。人类捕掠者破坏了动物的家庭和它们的社会联系。此外，捕掠者为了便于抓捕，可能屠杀被捕获动物的家庭成员。例如，不久以前，黑猩猩的母亲在它的孩子被抓捕后通常都被杀死。

一旦某个特定种类的动物被圈养后，替代进一步捕猎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动物园里的动物进行繁殖。逐渐地，繁殖濒临灭绝的动物就成了动物园规定的目标。从积极的方面看，繁殖项目能够保持遗传上的多样性，从而避免由于同系繁殖而导致的健康问题，能够防止繁殖的动物数量超出照料能力，还能把一些动物放生到野外。然而，

一些动物园是为了把多余的动物卖给娱乐业而繁殖动物，或者不小心将生育期的动物关在一个笼子里，使其意外繁殖。

不同的动物园在条件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动物园的范围包括那些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动物公园的“动物园”；景象最凄凉的动物园就是路边的巡回展览动物园——只有一只或几只动物被隔离地关在笼子里。某些更大的动物展览园把动物关在狭小而光秃秃的笼子中，这种做法绝不会鼓励参观者尊重野生动物；这类动物园既不会有利于教育和研究，也不会有助于物种的保存。但是，即使真正的动物公园条件也千差万别。有些动物园几乎与刚才提到的动物展览园一样景象凄凉。其他的动物园，如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既有条件不错的展馆也有条件恶劣的展馆。最好的动物园倾向于保留较少的动物，给动物提供比较大的空间，并且几乎可以再现动物的自然生活环境（只是减少了大部分危险而已）。根据我掌握的文字材料，我认为最好的一些动物园是：亚特兰大动物园、布朗克斯野生动物保护公园、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公园、苏格兰的爱丁堡动物园和格拉斯哥动物园。部分是为了回应来自动物权利提倡者的批评，这些优秀的动物园目前都逐渐放弃了关押动物的铁笼子，而给动物建造自然化的生活环境，使动物园显得不那么像监狱而越来越像生态公园。

我们是否应该从野外捕捉动物？

没有任何关于动物园的伦理评价可以回避动物的获取途径这一问题。人类是否应该继续从野外捕捉动物？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思考相关的伤害。鉴于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脊椎动物的精神生活——因为大多数动物园的动物是脊椎动物，我们可以想象捕获通常使动物承受疼痛、恐惧、焦虑和痛苦。就社会性动物而言，破坏它们的家庭或其他社会组织很可能导致它们的悲伤或其他形式的痛苦；而且，为了便于抓捕，它们的家庭成员还可能被杀害。运输被捕获的动物时要拘禁它们——在笼子里它们不可能过得舒适，并可能导致它们受伤或

死亡。把这些精神紧张的动物带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很可能使它们感到不愉快，时常产生健康问题，有时在到达以后很快就会死亡。总的来说，这个过程肯定会给动物带来不愉快的情绪和暂时的拘禁，而且常常会导致死亡；有时还伴随着疾病和受伤。鉴于这些伤害，我们有很充分的道德假定来反对从野外捕捉动物 。那么，动物园的几个主要目的是否可以在特定情况下推翻这个假定的合理性呢？这里所讨论的伤害是否能被看作是必要的呢？

在动物园的四个主要目的中，其中的三个——娱乐、科学研究和教育——基本上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娱乐纯粹是为了我们的利益，不能充分证明使动物承受严重痛苦和其他伤害的合理性；只有当动物缺乏道德地位、且仅仅是我们使用的物品时，这样做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证明。动物研究主要是为了人类的利益，然而有时也有利于动物——提高我们照料它们的能力。但是，大多数研究都不需依赖动物园进行。同时，教育至少主要是为了我们的利益。但是最近，一些动物园的辩护者声称，动物园能够且应该教育参观者，使他们明白自然保护和物种保存的重要性；通过改变人们的态度并唤起人们的保护行动，动物园最终有利于动物。然而，此种利益被延伸到动物身上的可能性是不确定的。同样不清楚的是，在我们这个多媒体的世界，这类教育为什么仍需要依赖于动物园。无论如何，即使有些有利于动物的研究和某些教育确实需要动物园，我们也已经拥有了足够多被圈禁的动物供人们使用。有计划地繁殖动物的方法也使这一假设——有必要从野外捕获更多的动物——不攻自破。

图9　一只正在绳索上行走的猩猩

物种保存的目的是否可以证明从野外抓捕更多动物的合理性呢？如今，很多动物园都把自己描绘成促进濒危物种之生存的机构。确实，动物园的某些辩护者宣称物种保存是动物园的主要目标 ——虽然

动物园的预算只有很小份额用于这项努力。这个目标的一个优势是，几乎每个人都赞同它。但是它的重要性是有争议的。如果一个物种灭绝了，那么，我们不能在严格的意义上说该物种 受到了伤害；物种不是拥有利益的存在物，所以不会被伤害。（事实上，物种是由人类的习惯和生物学的现实所共同决定的生物类别。）固然，一个生态系统的变化（包括那些由于物种灭绝而起的变化）会影响到动物个体。但是，物种X的灭绝和物种X少数成员的存活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对一个生态系统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特别是如果它们仅仅是在动物园中生活的话。正如贾米森所说，保存物种主要是人类的欲望 。物种的保存在没有其他冲突的情况下可能是值得的，但是，当它与特定动物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它的重要性就变得很有问题，例如，当动物在被捕获、运输和引入动物园的过程中受到严重伤害的时候。被捕获的动物并没有从物种保存中得到好处。实际上，根据动物园保存物种的现实努力来判断，是否有任何动物能够从动物园保存物种的计划中得到好处，仍然很难说清。

事实上，动物园花了很大的努力保护了很少数的几个物种，并且仅仅成功地把几种动物放归野外；但是，目前大多数放归野外的努力都是失败的。而且，繁殖计划有时导致动物数量过剩——它们被拍卖，甚至“被实施安乐死”。通过少数动物来繁殖，常常会导致近亲繁殖，使得幼小动物抵抗疾病和环境压力的能力越来越差。虽然至少有几个动物园在物种保存方面做得比较好，但这些工作通常是在一些僻静角落的繁殖研究所里进行的，而那里是禁止参观的。这引出了进一步的怀疑：是否需要靠动物园来保存物种——特别是是否需要抓捕更多的野生动物。同时，对于达到这个目的，还有一个可能更为有效的方法：减少人类对环境的破坏 。

基于这些原因，人类应该停止抓捕野生动物来展览。这有例外吗？动物园的辩护者弗雷德·孔茨（Fred Koontz）认为，抓捕有时对于增加圈养濒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从而降低近亲繁殖的危险来说是必要的。这个论断的合理性主要依赖于物种保存的重要性和通过动物园实现物种保存目标的可行性。对这两个条件中任何一个的合理怀疑

都会削弱这个论断。从原则上说，合理抓捕特定野生动物的更有力理由是，这对它们本身 是有利的。有人会认为，某些动物因其生存环境无法改善，已面临极大危险。但是，为了使动物真正受益，动物在动物园的生活就必须要比它在野外的生活更好，以使动物园生活的好处足以抵消动物在被抓捕、运输和引入动物园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多种伤害。即使动物在动物园的生活有时达到了这个标准，我们也很难乐观地相信，动物园管理者——他们要对很多利益（包括自我利益）负责——能够就动物在动物园的生活作出公正的判断。如果“不再抓捕野生动物”的原则真有值得允许例外的情形，那么，这些例外也应更多地应用于“较低级”的物种，因为这类物种没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这可能使它们在从野生转变为圈养的过程中承受较少的伤害。

我们是否应该把动物留在动物园？

把已经捕获的动物继续留在动物园是不是正确的？想想我们在本章开头谈到的两只狮子利奥和利昂娜。虽然它们得到了很好的喂养，没有病痛，条件舒适，但它们的生活处境缺乏丰富性，除了它们，再无别的狮子伴侣。它们感到厌倦，只有很少的锻炼，并且从未能完全施展它们的身体和精神能力。它们在野外生活的状况是否有可能更好——野外生活的丰富性常常伴随着许多危险——是有争议的。但是，即使获得大致相同生活的条件得到了满足，满足基本需要的条件还是没有实现，因为狮子对交往、锻炼和刺激的需要被忽视了。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收养利奥和利昂娜的做法是不能得到合理证明的。

收养动物的两个条件构成了严格的标准；目前只有少数动物园能够满足这些标准。不过，对大多数物种来说，这些标准是可以满足的，但需要足够的想象力、空间和资金。如果环境足够适宜，大多数动物的基本需要在圈养状态下也是可以满足的。在判断圈养生活是否与野外生活一样好时，我们必须现实地思考野外生活并避免把野外生活浪漫化。（虽然对动物园的最严厉的批评家可能在大部分情况下是

正确的，但他们通常犯两个错误：（1）认为所有的圈养都是有害的或缺乏尊重的，并且（2）忽略了野外生活的不利条件。）野生动物通常都要面对疾病和受伤的风险、严酷的天气、食物的短缺和捕猎者。管理较好的动物园能够提供稳定的营养食物，使它们免受严酷的气候和捕猎者之害，并且有兽医的关照。在动物园，动物也许能够活得更久——这显然是一种利益，因为死亡是一种伤害（见第四章），并且可以避免许多痛苦的来源。

怎样才能使动物园在收养动物时满足这两个条件？除了足够的食物、有效的庇护和兽医的照料这些明显的要求外，动物园还应给动物提供充足的活动空间，保存动物的基本社会组织（对社会性的物种来说），创建富于创造性的生活空间——最好与动物的自然栖息地相似。富于创造性的生活空间可以使动物的生活更加充满刺激、活力和健康。提供丰富性的方式包括：把食物隐藏起来，放置在一个箱子里或其他不寻常的容器里，或者把它放在动物必须攀越或跳起才能获得的地方，假定这种不方便并不是残酷的；安排更多次但每次较少量的喂食，而不是每日一次或两次大量的喂食；提供多样的物件让动物能探索、操控和隐藏自己。在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里，猩猩有机会参加基本的语言培训——丰富性的一种新奇形式。毫无疑问，最具有丰富性、在其他方面也无可挑剔的展馆是这样一些展馆：它们使动物园和自然公园的界线变得模糊，给动物提供与其自然环境大致接近的生活环境，同时消除动物可能遭遇的绝大多数危险。

可能有一些动物园已经满足了确保基本需求和提供大致相同生活的条件。其他一些动物园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改进来满足这两个条件。那些不能或不愿充分改进以满足这些条件的动物园应该关闭。“较低级”的脊椎动物可能只有较弱的感受痛苦的能力，拘禁给它们带来的损失可能较小；人们可能认为，教育、研究和物种保存的目的能够证明，有些收养这类动物的动物园的条件可以允许例外。另一方面，这些动物的简单需求使得满足这两个条件更容易，而允许例外很容易为谋取私利敞开危险的大门。因此，这是一个很好的反对存在例外的理由。（那些反对平等考虑而赞成区别对待模型的人可能只接受使基本

需求得到满足的条件，并以此为基础，把更多的动物园和动物园展馆看作是符合道德要求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参观动物园只是一个偶尔的且花费很少的活动，因而联合抵制不合格的动物园将是效果不佳的。也许通过立法来确保动物园符合标准（如我们所提的两个条件）是必要的。路边的巡回展览动物园不能满足这类标准，应该被禁止。更普遍地禁止私人动物园也可能是最明智的举措。鉴于动物园令人沮丧的历史，以及动物园的倡导者总是倾向于用动物福利的花言巧语来掩饰其自私的或至少是服务于人类利益的目的，因而，利益的驱动似乎很难保证动物园的动物不被忽视和虐待。总之，唯一能够获得合理性证明的动物园，可能只是少数几个最好的公共动物园。这些动物园的空间是如此宽广和自然，以至通常很难看到动物。能够获得合理性证明的动物园的一个标志或许就是，借望远镜给参观者使用成为它的一项日常政策。

因为动物拥有道德地位，不是供人类使用的纯粹物品，所以关于动物园的讨论都把焦点集中在动物的利益上。但是我认为，动物的道德地位还引出了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不能完全从动物利益的角度来加以说明。这种责任就是，培养尊重动物的态度，把动物作为拥有道德地位的生物来看待 。这不是对自主性的尊重，自主性的概念在此是不适用的；它也不是要完全排除对动物的任何收养——这种观念似乎是没有根据的。它只是对这一事实的恰当认可：动物因其自身的缘故而具有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供人类使用的工具或娱乐的玩物。不幸的是，通过以下做法，动物园时常鼓励人们把动物看作是为我们 而存在的：为了人类的娱乐而展示动物，而动物在这样一些环境里只能过着悲惨生活；剥夺动物本可以躲避人群侵入的住处；以及逃脱实施积极的教育措施（以培育人们对动物的尊重和赞美）的责任。总之，培育恰当尊重态度的最好方式，也许就是给动物提供与其自然栖息地相似的生活环境。

图10　一头犀牛

一些特例

满足基本需要和提供大致相同生活的标准适用于所有动物园的动物，但是，有少数特例需要我们注意。就其实际效果而言 ，这些标准只适用于那些拥有利益的生物，即有感知能力的动物。不拥有利益的动物不会被伤害（至少在与道德有关的意义上），因此也不会被不正当地伤害。它们没有需求，不存在好的或不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没有前后一致的论点来反对收养没有感知能力的动物或反对在特定环境下收养它们——例外的情况是，动物园不能以助长对动物不尊重风气的方式（例如通过无故毁灭生命的方式）来展览它们。无感知能力动物的案例，为我们拒斥那种反对收养任何动物的动物解放伦理提供了另一个理由。

非人类生命等级的另一端是类人猿和海豚。它们的认知、情感和社会复杂性，为我们反对在动物园或水生动物展览馆收养它们提供了

有力的认定。然而，我们在物种保存方面最强烈的兴趣就是对我们的近亲（类人猿）的保护。对这些动物的任何形式的收养必须满足前述两个条件。这可能意味着，要保护它们的家庭成员，给它们提供很大的空间以及能鼓励它们玩耍、攀爬、探寻和解决问题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在水生动物展览馆中收养海豚似乎不可能满足提供大致相同生活的要求。海豚的海洋生活习惯、它们远距离游泳的嗜好，以及它们丰富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些都使得它们的生活需要某种特定的环境，但是作为陆地动物的我们可能无法模仿构建这样的环境。人们可能还会怀疑，圈养能否满足它们的基本需要。不幸的是，我们仍未停止迫使海豚离开它们的自然环境，远离它们的家庭——仅仅是为了把它们圈养在水族馆中供我们娱乐。禁止海豚展览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

注释

〔1〕 本章标题为keeping pets and zoo animals。我们把keep一词暂译为“收养”，但希望读者记住，作者在本章中使用的keep一词同时还包含持有、拥有、占有、扣留、关押等含义。——译注

第七章

动物研究

从1960年开始，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学家们开展了17年的关于猫的性倾向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研究人员以不同的方式把猫弄得伤残（例如，切除它们的部分大脑、毁坏它们的嗅觉、通过割断它们性器官的神经来消除它们的触觉），然后评估它们在不同情境下的性表现。例如，研究人员会计算被剥夺了嗅觉的猫“交配”的平均频率。虽然这项研究由（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和国家健康研究所提供资助，但这项工作是否有利于儿童或任何人类，是难以弄清的。然而，这个博物馆的主管托马斯·尼科尔森（Thomas Nicholson）明显没有意识到承诺这类利益的必要性：“这个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有研究它所选定的任何项目的自由，而毋须关心研究的重大实用价值……我们打算坚持这种自由”（柏恩斯［Burns］引用）。在开展这项有争议的研究的日子里，虽然许多科学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然而，甚至从纯粹科学的立场来看，他们显然也没有找到能证明这项研究之重要性的证据；已经发表的21篇以猫的性倾向实验为依据的论文，几乎没有一篇被其他科学文献所引用。尼科尔森关于动物研究的自由放任主义态度也没有得到公众的赞同；动物保护主义者亨利·斯皮拉的努力使公众了解到了这项实验（辛格的著作对斯皮拉的努力和这项实验都进行了介绍）。市民给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家健康研究所和国会写信进行抗议，促使国会给国家健康研究所施加压力；该研究所终于在1977年停止了对这项实验的资助。

在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麦迪森，威斯康辛）工作的哈利·哈洛（Harry Harlow）是一名德高望重的心理学家。他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开展了一项有关幼猴的实验。这些幼猴自出生起就被完全隔离起来饲养，既不与猴子也不与人接触。为了探索影响母子情感的因素等课题，哈洛和他的同事研究了社会隔离（包括剥夺母亲）、被抛弃以及其他各种折磨方式对幼猴产生的心理影响。在大多数实验中，幼猴都会遇到一个代理母亲——有些是由铁丝做的，有些是由布做的；有些易于接近，有些则放在有机玻璃箱中，无法触摸。在各种使

实验对象恐惧的情景中（幼猴由此通常都会表现出自我紧抱、摇摆和抽搐这类异常行为），幼猴在代理母亲面前的表现都被加以研究。为了完成某些实验，哈洛还给那些被剥夺了母亲的幼猴设计了某些它们会尝试去亲近的“怪物”。这些“怪物”包括一个用布做成的、能喷出高压气体的猴子“母亲”，一个摇摆得如此猛烈以致令幼猴的头嘎嘎作响的“母亲”，一个会把幼猴猛然抛开的“母亲”，以及一个朝幼猴突然发射长钉的“母亲”。幼猴通常都试图接近这些怪物母亲，甚至在被抛开之后。后来，哈洛单独饲养雌性猴子，使它们人工受孕，然后让它们与自己的婴儿呆在一起；有些母猴仅仅是不理这些婴儿，有些则攻击或杀死这些婴儿。后来的实验还加入了“恐怖的隧道”和“绝望的井坑”这样的革新。（后一个实验产生了这样的结论：“一个在立式空间中被拘禁45天的幼小动物，会表现出严重和持久的、压抑性的精神病理行为。”）哈洛虽然研究了某些重要的问题，可能还揭示了母子情感纽带的某些特征，但是，一些心理学家还是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哈洛是否发现了任何不用猴子做实验就不能发现的重要问题。有人可能会指出，这项研究（辛格的《动物解放》一书对它作过描述；也可见于奥兰斯［Orlans］、比彻姆［Beauchamp］等，以及泰勒的著作中）至少让我们知道了剥夺母爱所产生的后果，而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在哈洛做这个实验之前，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这个领域最重要的一个研究者——已经得出结论说：长时间地剥夺母爱会对儿童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鲍尔比不是通过使用猴子来推知人类的小孩，而是通过研究难民、战争孤儿和收容所的孩子。

图11　一只被关在笼中、植入电极的猴子

猫的性倾向实验和哈洛的研究挑战了这一观点：动物研究永远不应受制于对动物福利的关心。相反，今天进行的许多实验（例如，在艾滋病和癌症研究领域）都既试图找出影响人类健康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又限制对动物研究对象的伤害。总的来看，尽管与工厂化农场相比，动物研究越来越受到更多公众的关注和批评，但是，赞成动物研究的道德理由似乎更充足。首先，至少在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已制定了一些旨在尽量减小研究用动物之痛苦和悲伤的法律和法规；对工厂化农场动物的保护则要弱得多或根本不存在。其次，全球每年用于研究的动物数量估计在4,100万到1亿只之间，而仅在美国的工厂化农场，每年所屠宰的动物数量就有50多亿。最后，人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与工厂化农场不同，动物研究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些重大的、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获得的利益。尽管如此，动物研究是否能够被证明是合理的（如果是合理的，那么在何种情况下是合理的），则仍然是有争议的。这一争论涉及有关动物道德地位的根本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区分“动物权利”的三种含义（见第二章）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背景

在这里的讨论中，“动物研究”一词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它包括几种不同的含义。一种含义指的是对全新的科学知识的追求 。（如果从狭义上来使用“动物研究”一词，那么，它指的就是追求这种知识的努力，与试验和教育意义上的动物研究有区别。）这种意义上的动物研究包括两种类型：寻求关于生理过程和生理功能之新知识的研究（基础研究），以及寻求医学、兽医学和生物学的新知识以促进人类、动物和环境之健康的研究（应用研究）。动物研究的另一含义指的是试验 ，即评估化学产品和其他产品的安全性。最后，动物可能被用于教育目的 ，例如，用于科学展览项目、解剖和外科实习。由于从教育角度对动物的这种使用并非都是实验，因而“研究”一词的含义也有所扩展，包括了对动物的这种使用。

作为一项重要的科学活动，动物研究是在19世纪早期兴起的。部分地是作为对法国的弗朗索瓦·马让迪（François Magendie）和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的开创性工作的回应，反对活体解剖的运动在19世纪的英国诞生。有组织地反对动物研究的运动尽管有很长的历史，但是，直到1977年国家健康研究所终止关于猫的性倾向实验之前，它都没能阻止任何一个实验。而到1977年时，人们已经制定了一些适用于动物研究的法律和法规。

1966年在美国，关于宠物狗被偷盗、被动物贩子虐待并卖给研究实验室的事件披露之后，激起了人们普遍的愤怒情绪。同年，《实验室动物福利法》——它之前主要是一个保护宠物的法案——变成了法律。接下来的修正法案（它的名称缩短为《动物福利法》）增加了关于研究用动物的照顾和使用的条款。这些条款在美国的科研体制下规定了镇痛药物的使用、笼子的空间要求，以及成立动物照顾与使用委员会；在这一体制下，获得联邦资助的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是自行管理的。

虽然美国的立法明显地代表了在动物保护方面取得的进步，但是，它经常受到动物保护者和西欧国家（它们对动物的保护更严一

些）代表的批评。一个问题是，《动物福利法》的适用对象并不包括农场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或鱼类。难以置信的是，它甚至不包括使用最为广泛的研究对象：大白鼠和小白鼠。然而，这种状况会在2001年10月有所改变。美国农业部的一个新法规（它扩大了法规管理的范围，使之包括鸟类、大白鼠和小白鼠）将被实行，除非美国国会连续两年阻止这个法规的通过。无论如何，公共健康服务局制定的政策适用于该局资助的研究项目所使用的所有脊椎动物。另一个问题是，本意是用来指导对动物的关爱和使用的公开颁布的原则却包含着这样一条，它潜在地允许不遵守其他所有原则的各种例外出现："鉴于这些原则应有例外的情况……"这项原则对允许例外的情形并未提出任何限制。与之相比，《关于使用动物进行医学研究的国际指导准则》却避免了这样一个全球性漏洞的存在。

在英国，早期的反对活体解剖运动（见第一章）对民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确保了《防止虐待动物法案》在1876年的通过，这个法案保护的重点目标是用于研究的动物。根据罗伯特·加纳（Robert Garner）所作的历史分析，这项法案对于动物研究者的行为产生了影响，防止了一些严重的虐待，或许还挫败了一些本来要进行的动物实验。1906年由政府指定成立的一个皇家委员会实施了一些改革，例如，任命全职的监察员，制定了一项法规（要求无痛屠宰那些遭受严重而持久之痛苦的动物）。随着当代动物权利运动的兴起，对动物研究的关心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再度升温；但是，英国公众不得不等到1986年，才迎来下一个重要的立法改革——《动物（科学研究程序）法案》。正如加纳所解释的，新法案要求研究人员必须获得一个个人执照（每5年复查一次）和一个特定实验程序的项目执照。此外，新法案还创立了一个动物研究规则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动物权利的倡导者；新法案还要求动物繁殖者和供应者到有关部门登记注册并服从检查。

纵观全世界的动物研究历史，支持者们一再声称，动物研究能带来重要的好处。他们指出，动物研究在开发无数新的医疗方法和治疗技术方面，以及在推进生物学基础知识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提到的取得重要进步的领域包括：阿尔茨海默氏病、艾滋病、基础遗传学、癌症、心血管病、血友病、疟疾、器官移植、脊椎损伤的治疗和无数其他的疾病。虽然大量的动物研究旨在促进人类的利益，但支持者提醒我们，这种研究也带来了其他利益，即提高了我们照顾动物的能力。这类利益包括：用更先进的药物和技术来治疗生病或受伤的宠物、用抗菌素来治疗牛的乳腺炎，以及通过行为研究来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评估动物研究价值的困难

毫无疑问，动物研究为生物医学的许多进步铺平了部分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动物研究对于这类进步来说是必需的 。打个类似的比方：我可以搭你的车去地铁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一定需要搭你的车去那里；也许我可以走路或坐公交车去。实际上，有些批评者可能会说，即使没有 动物研究，我们也能取得生物医学方面的进步。

这些批评者怀疑，非人类动物对人类来说是不是适宜的科学模型。很明显，老鼠、狗和猴子不是人。我们或许可以说，动物模型可能 引起误导，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休·拉富勒特（Hugh LaFollette）和奈尔·尚克斯（Naill Shanks）曾指出，错误地依赖动物模型使有效的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研发延迟了许多年。

不过，我们可以合理地推定，由于不同物种的动物在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因而适当的动物模型在生物医学的进步过程中通常都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如果还有不使用动物的其他方法来实现生物医学的进步，情况又会怎样呢？如果使用动物不是必需的，那么，赞成动物研究的理由就远不是那么充分了。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只能 由动物研究提供的好处究竟有多大？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解决该问题需要比较两种进步：（1）对动物实验对象的实际使用能够取得、或已经取得的进步，（2）依靠最佳的非动物模型能够取得、或本可以取得的进步。对第

二种进步的评估是猜测性的，因为它是假设的。除非动物研究的提倡者能够令人信服地对这两种进步作出精确的比较（我怀疑他们能够做到），否则，即使他们能够正确地指出，动物研究已经带来了好处，他们也没有资格声称，动物研究对于那些好处的获得是必需的 。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动物研究所带来的特定好处仅仅是可能的和期待中的 ，而对动物实验对象的伤害却是直接的和确定的（因而，无数的实验伤害了动物而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任何真正的成本效益分析都必须在权衡收益与可预测的伤害之前，对预期中的收益与实现这种收益的可能性加以比较 。由于存在着动物研究替代品的可能性，而且，在进行真正的成本效益分析时需要考虑成功的可能性，因而，动物研究的价值似乎比它的提倡者通常所宣称的要小。

重要的目的能证明有害手段的合理性吗？

让我们假定，动物研究承诺的某些好处是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的。这能够证明以伤害动物的方式使用动物（它们显然不能给予正式的同意）是合理的吗？人们通常都认为，如果某些利益是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那么，有利的成本效益比率就能自动地证明对动物的特定使用方式的合理性。但是，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毕竟，如果我们以特定方式来使用人类受试者也能获得某些利益，而这些利益是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而且，这种使用方式的成本效益比率也是有利的；但是，该事实本身并不能自动地证明，对人类受试者的这种使用方式是合理的。我们承认，对人的使用存在着某些伦理限制，例如，需要征得有行为能力的成年受试者的正式同意，而且，为获得预期收益所冒的风险必须是合理的。这些伦理限制构成了生物医学研究者不能逾越的行为边界。因此，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实际上已经接受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放弃某些有潜在价值的研究，例如，某种虽然很有前途，但会使人类受试者面临巨大风险，而该风险与预期的利益不成比例的儿科研究。

因此，动物研究的关键问题是，动物的道德地位能否排除或限制那种把它们用于研究的做法，不管是否有潜在的利益。强式动物权利论从超功利的角度来理解权利，它反对为了其他动物个体的利益而伤害某些动物个体（在没有征得它们同意的情况下）。这种立场几乎排除了把动物用于研究的做法，但又不完全排除。它允许（1）确实不会伤害动物受试者的研究和（2）兽医的治疗性研究——即为了动物受试者本身的最大利益进行的研究（例如，在没有现存的治疗它们的疾病之方法的情况下）。

强式动物权利论可能 还接受另一类动物研究。乍一看，平等考虑似乎会支持那种对研究对象仅造成最小风险 的非治疗性动物研究。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接受对儿童采取（他们和动物一样，不能给予正式的同意）最小风险的标准。然而，尽管强式动物权利论的提倡者接受平等考虑的理论，但是，他们可能甚至会反对在非治疗性的研究中，将非常小的已知风险强加于动物（或者儿童）的做法。他们可能认为，最小风险标准未能恰当地尊重儿童受保护的权利。

不管强式动物权利论是否接受对动物的最小风险标准，另一种平等考虑理论，即功利主义，则明显是接受这种标准的。事实上，功利主义者走得更远。他们接受那种给动物带来的风险超过最小风险标准的动物研究，只要预期的利益——考虑了成功取得这些利益的可能性，并把动物的利益看得与人的类似利益同等重要——超过成本，并且是在使用其他方法不可能取得更佳的利益成本比率的情况下。现在，那些正确地应用了他们的理论的功利主义者（不同于那些普遍贬低动物利益的重要性的“功利主义者”）基本上都认为，几乎没有什么动物研究能被证明是合理的。不过，由于功利主义者允许某些非治疗性的、超过目前的最小风险标准的动物研究，因此，像彼得·辛格这类功利主义者得出的观点就明显不同于汤姆·雷根这类强式动物权利论者的观点。注意，至少在原则上，功利主义同样为在研究中使用非自愿的人类受试者的做法敞开了大门。

与功利主义相比，区别对待的理论（例如，它认为动物的痛苦和人类的痛苦相比具有较少的道德分量）则对动物研究持一种较为欢迎

的态度。然而，因为它赋予了动物道德地位，否定它们仅仅是我们使用的工具，所以这种理论也许会反对目前的许多动物研究（特别是涉及到“较高级”的动物时）。这类研究包括：不能带来真正利益的实验（如猫的性倾向实验）、仅提供非必要利益的研究（如新化妆品的测试）、导致过多伤害的研究（如哈洛的许多或所有研究），以及明显可以使用替代方法的动物研究（如许多出于教育目的对动物的使用）。

伤害与代价

我们已经探讨了动物研究的可能利益，以及这种利益是否或者在哪种程度上能够证明伤害动物是合理的。我们现在必须思考相关的伤害和其他与之相关联的代价。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实验过程中给动物带来的伤害；这些伤害的阈值包括从不伤害到非常严重的伤害。户外研究中对动物的单纯观察不会伤害动物。从一只实验室动物身上抽取一个简单的血样或进行一次阴道涂片采样可能仅仅导致最轻微的不舒适感。另一方面，经常抽取血样或把动物强行关押在被控制的环境中（例如在气雾吸入室）可以算作中等程度的伤害；给怀孕动物实施剖腹产手术也属于此类伤害。严重伤害的例子包括长期剥夺动物的睡眠、食物或水，诱发癌肿瘤，导致大脑损伤（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用狒狒所做的臭名昭著的脑损伤研究），以及强迫动物服用一种药剂直到半数动物死亡（如对新产品所做的五成致死剂量测试）。

一般来说，动物受试者要么在实验过程中、要么在实验完成后被杀死。虽然认为死亡既伤害动物也伤害人（不管是否在相同的程度上——见第四章）的观点听起来是合理的，但是，目前关于动物研究的政策法规只包含最大限度地降低动物的痛苦和悲伤的条款，而不包含避免死亡的条款。关于动物利益的这种过分简单化的观点意味着，那种没有给动物带来任何体验性的伤害、而只是“牺牲”它们性命的研究是没有伤害的。虽然终结了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避免的痛苦的死亡可能

只是一种较小的恶，但它仍然是一种我们不可忽视的伤害形式。

给动物受试者带来的伤害还体现在动物的生活环境上。研究用动物通常都生活在狭小的笼子里，这是一种有着很少或根本没有丰富性的、非常不自然的生活环境。无聊和缺乏伙伴是常事。虽然美国目前的法规要求，要给狗提供活动的机会，确保灵长目动物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但是，绝大多数研究对象都是“更低级”的哺乳动物，它们并未被纳入此类法规的保护范围。第六章曾对收养动物的两个标准作过辩护：动物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并且要给动物提供一种至少与它们在野外可能获得的生活同样好的生活。目前，研究用动物的生活环境很少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只要有足够的经费、想象力和决心，研究者也许是能够给几乎所有种类的研究用动物提供满足这些条件的生活环境的。通过给它们选择的机会并观察它们的选择，研究者甚至可以了解动物的内心想法（史密斯［Smith］和博伊德［Boyd］提供的有用建议之一）。使研究用动物的生活环境满足以上两个条件不仅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它还能提升科学研究的质量，因为紧张、疾病和其他不必要的伤害会使不同的动物受试者作出不同的反应，从而导致研究数据的混乱。

对动物受试者的处置同样会引起伤害。粗暴的处置（如在给动物注射之前强行制服它）会给动物带来极度的悲伤和痛苦；之后，当处置者再出现时，动物对创伤的记忆会导致它的恐惧。相反，主动引导动物予以配合的温和处置可以基本上避免此类伤害，特别是，如果能用培养友好关系和细心照顾的方式来辅助就更好了，而这些工作需独立于实验过程展开。

获取研究用动物的过程也是伤害的另一个可能来源。如果需要把动物从实验室之外的某个地方运送到实验室，那么，运送过程既有可能只对动物造成轻微影响，也有可能会使动物非常紧张。动物受试者应当从什么地方获得？美国生物医学研究学会为自己的下述“权利”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游说：使用从动物庇护所或待领处那里获得的狗和猫以降低成本，以及从野外猎取动物。然而，这种观点是可疑的。正如我们在讨论动物园（见第六章）时所看到的，从野外抓捕动物的过程

给动物造成的伤害非常之大，因此这种事情应尽量避免。同时，对很多动物来说，从先前的宠物转变为实验室受试者的过程可能会令它们非常紧张和恐惧。以这种方式获得动物也间接地鼓励了遗弃宠物的行为（通过使过剩的动物得到“良好利用”），并使动物庇护所不再是动物的避难场所。我认为，使用专门被饲养来做研究的动物要好得多，正如英国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法律所要求的那样。

除了我们已经讨论的各种伤害，一个更大的成本值得仔细考虑：金钱。政府赞助的研究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追逐利润的企业所赞助的研究（例如产品测验）使用的是股东的钱。很明显，虽然不使用动物的替代研究方法没有伤害到动物，但这种研究也要承担资金成本。

我们已经简单概括了动物研究的主要伤害和成本，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否存在某些伤害是动物受试者永远不应遭受的，不管这种伤害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如何？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一个拟议中的实验需要具有多大的成功希望才能被证明是合理的？

我们可以依据前面考察过的观点来回答这两个问题。根据强式动物权利论，不应把动物用于非治疗性的、会伤害到动物的研究，至少不应使它们承受高于最低标准的风险。由于对动物受试者的所有 伤害都应加以考虑，因而，给动物提供的生活环境应达到满足基本需要和享受大致相同生活的标准。同时，拟议中的研究的前景似乎没有被看作一个关键的因素。与之相比，对于最低风险的标准和收养动物的两个条件，功利主义论者可能都会允许一些例外，前提是如果没有其他更少伤害的方式来使得利益的总

把动物用于研究的三种标准

强式动物权利论

只有当（1）对动物的使用没有伤害到动物，或者（2）对它们的使用总的来说符合它们的最大利益（治疗性研究）时，动物

才可以被用于研究。这种观点可能还允许当（3）对它们的使用只给它们带来最低限度的风险时，动物可被用于研究。

功利主义

只有当对动物的使用所产生的利益总量——考虑了成功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超过伤害总量，而且，所有各方（包括动物）的利益都得到了公正的考虑时，动物才可以被用于研究。

区别对待模型

只有当对动物的使用与它们的利益所具有的道德重要程度（其重要程度可根据动物在认知、情感和社会性方面的复杂程度来判断）相一致时，动物才可以被用于研究。量最大限度地超过伤害的总量。一个实验究竟有多大的收益，必须连同伤害和成本全盘地加以考虑；从原则上讲，既不存在一个可容许的最大伤害阈值，也不存在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利益承诺。但是，由于功利主义同等地看待动物和人的痛苦，而且研究的利益只是期待中的利益，因而，这种理论可能只支持那种能满足迫切的医学需要、而且又很少给动物受试者造成巨大伤害的研究。和功利主义一样，关于给动物受试者造成的可允许的伤害和必要的利益承诺，区别对待理论者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然而，在这种观点看来，依据与动物研究有关的伤害和花费，拟议中的研究必须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些成本的合理性。

替代方法

我们在前面讨论重要利益能否证明伤害动物的合理性时曾假定，在寻求那些利益时，没有能够代替动物使用的可行的替代方法。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替代方法的问题。由于可靠的替代方法能够消除或减少

与研究相关的伤害，因而它们是值得大力追求的。

但是，确切地说，什么是替代方法？有时这个术语指的仅仅是用其他方法来替代 对动物完整个体的使用，特别是那些在体外 ——字面意思是在玻璃（试管）内 ——进行的研究。但是，这个术语通常更广泛地指“3R原则”（由罗素［Russell］和伯奇［Burch］提出）：除了替代（replacement），还有减少 （reduction）实验所需动物的数量和改善 （refinement）现有的技术以便最低限度地减少动物所遭受的疼痛、悲伤和痛苦。减少有时是通过优化的统计学方法来实现的，它降低了取得重大成果所必需的动物数量。改善的例子包括：在实施一个程序之前使动物适应实验的环境，减少紧张；最佳地使用麻醉剂和止痛药以减少动物的痛苦；良好的处置技术；改善动物的生活环境，减少无聊和促进健康；以及人道地终止实验（例如依据特定的临床指标）而不是在令实验对象死亡后才将其终止，如在毒性试验或疫苗效能试验中。美国仁慈协会已发起一项动议，拟通过改善现有技术，到2020年消除实验室动物所遭受的所有重大痛苦和悲伤。

除了能提升动物的福利，替代方法从科学或经济的角度来看有时候也是更可取的。在某些情况下，不使用动物的研究方法是解决特定问题的最直接手段——这是药理学、生物化学以及相关的领域日渐趋向于使用试管方法的一个主要原因。通常，利用人类的器官、组织或细胞，或甚至人类志愿者进行研究都是可能的，这使得依据动物的资料来推断人类状况的做法变得没有必要。而且，替代方法的花费有时比使用动物更少。

虽然有动物保护组织强有力的支持并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但是，寻求替代方法的运动还是遭到了生物医学研究学会的抵制，并遇到了其他一些障碍。二战以后，新法规要求对动物的研究应先于对人的研究，生物医学研究获得了大量资金，化学工业蓬勃发展，这些都推动了把动物研究作为生物医学研究之起点的强势传统的形成。理所当然地，传统培育了习惯，而习惯（如根据动物模型来思考的习惯）的消除是很缓慢的。而且，某些害怕动物权利行动主义者的生物医学领导者感到，接受替代方法会向公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他们“输给

了”动物权利的行动主义者。另外，直到今天3R原则也没有被充分认可为是成熟的科学原则。研发替代方法的公共资金的缺乏（尽管某些私营部门是非常慷慨的）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困难。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近年来，我们还是见证了替代方法在教育、试验和创新性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长足发展。

医学院和兽医学院长期把活动物用于生理学和药理学教学以及手术实践中。动物通常也被用于高中年级的解剖课和高中生举办的科学展览。然而，替代方法已经开始受到青睐。例如，为了达到某些教育目的，医学、兽医学和中学的学生现在经常使用互动性电脑模型或其他视听设备；这种做法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重复观看动物和人的模型。同时，公众对动物福利日益增长的关注，已明显使得美国科学展览的参与者对动物的使用采取了更严格的限制——以减少动物数量或改善技术的形式。这些限制并不依赖于法律制裁，因为《动物福利法》并未要求小学和中学遵守其规定。相反，英国禁止大学本科以下的学生实施可能导致脊椎动物疼痛或痛苦的干预行为，而许多欧洲国家的法律也限制在中小学使用动物。

新产品（如杀虫剂、药品、洗发精和化妆品）在投入市场之前，为了安全通常都要先在活的动物身上做试验。在美国，大量的试验并不须服从政府有关动物使用的规定，因为许多公司的研究不是由公共资金所赞助的。不过，有两种动物测试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即五成致死剂量和眼刺激测试——主要是由于亨利·斯皮拉的努力——并激起了寻求替代方法的运动；这些测试现在已很少被运用。五成致死剂量测试强迫动物服食一种产品，如唇膏，直到半数动物死去。在眼刺激测试中，可能有毒的物质被直接涂抹到有意识的兔子的眼中，直到它们的眼睛严重受损。由于公众日益关注此类测试，1981年，在雅芳、百时美和其他公司（这些公司都有着长期使用动物进行测试的历史）的资助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了动物测试替代方法研究中心。两年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宣布，它不再需要企业提供五成致死剂量数据。传统的毒性测试的替代方法包括：限量测试法，在这种实验中，只有很少量的啮齿类动物被注射单一剂量的测试物质，以便确认是否

导致死亡（这是一种既减少了测试动物的数量又改善了测试技术的方法），以及使用合成皮肤（替代品的一个例子）的腐蚀性测试。此外，某些新的化学制品在电脑程序证明了它们的毒性之后就不再加以考虑。2000年，3个美国联邦机构同意，用通过合成皮肤腐蚀性测试获得的关于化学品安全性的数据来代替动物测试的数据。同年，欧盟把3种试管毒性测试作为其官方指导标准，这意味着，在能够进行这3种测试的欧盟15个成员国将禁止动物测试。

虽然替代方法在教育和测试领域已明显取得重大进展，而且，很少有人会怀疑，在创新性研究中改善实验技术和减少动物数量是可能的，但是，有人可能仍然会怀疑替代动物在创新性研究中的可行性。“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真实的事物”，人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然而，最“真实的事物”就是人本身，因为，几乎所有寻求新科学知识的动物研究的目的，都是为生物医学提供有用的数据！无论如何，在医学领域，替代方法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其中一些涉及到人类。例如，流行病学的研究有助于确认导致特定的人类疾病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志愿者可以参与诊断过程的测试或生理学的研究，而无须先做动物试验。另一个发展的领域是使用培育的组织和细胞——包括人和动物的组织和细胞。例如，人的癌细胞可以在试管中 培育，并用于各种研究；这可以代替对活的动物的使用。现在，有数百个机构在进行基础研究时使用的都是人的神经细胞培养物。在病毒学研究、单克隆抗体生产和疫苗试验方面，人们有时也用细胞培养物来代替对动物的使用，尽管某只动物可能会被杀死以提供细胞样本。有时，电脑模型在模拟生物和化学系统方面是很有用的。另一个新的发展就是使用新的成像技术，如超声波、磁共振成像和正电子发射层析成像扫描；这使得对活人的大脑和身体的研究无须对人或动物做侵入性检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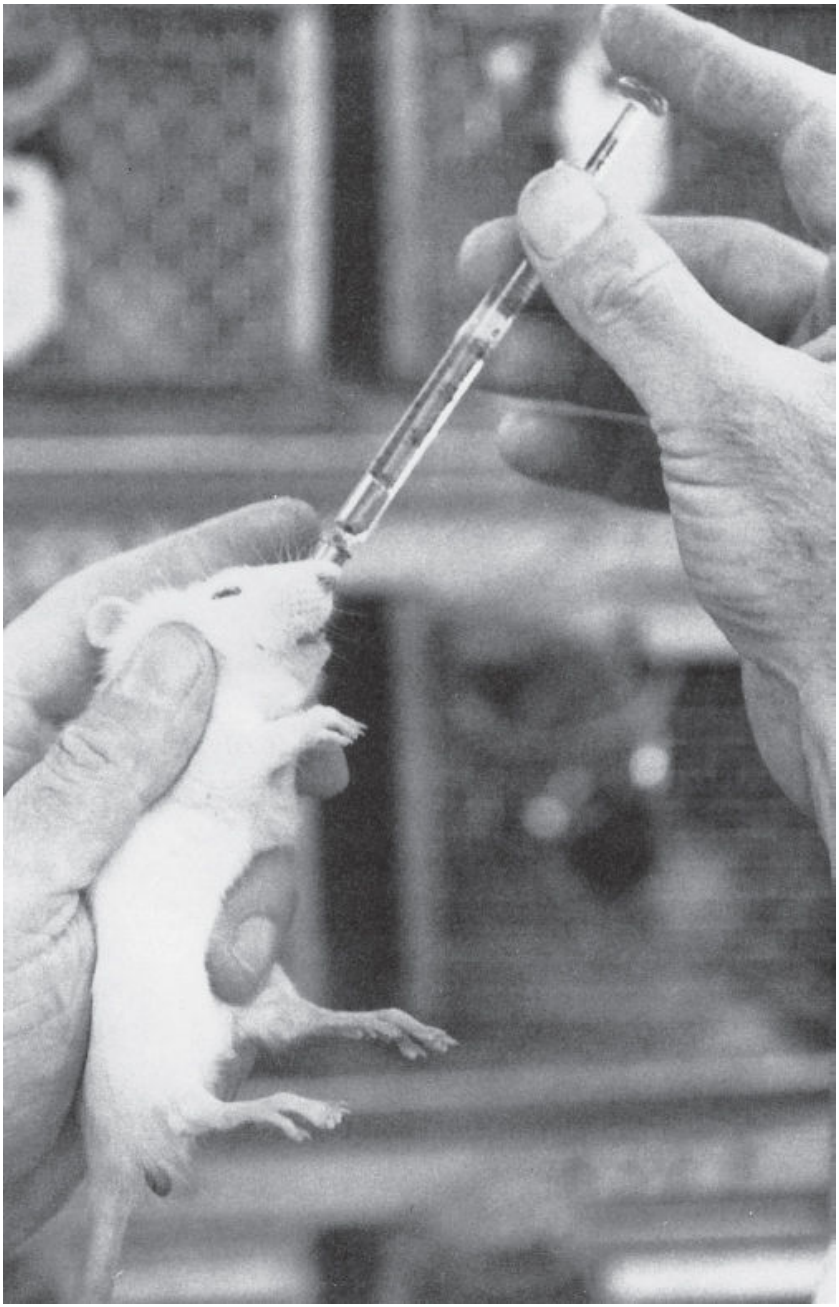

图12　一只正在接受五成致死剂量测试的老鼠

替代方法到底能带领我们走多远？不久前，人们还（错误地）相信，不使用动物的方法对于病毒测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谨防悲观的预测。另一方面，草率地宣称替代方法可以取代所有的动物使用并能维持同样水平 的研究进展，这似乎也太过天真——或至少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但是，正如先前所提到的，令人称赞的目的不足以证明其有害手段的合理性。在认真对待动物的人看来，正如伦理原则构成了我们把人——尽管他们是最可靠的科学模型——用于研究的极限一样，伦理原则同样构成了合理使用动物的极限。毕竟，动物并不是工具。或许，可行的替代方法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动物权利提倡者和生物医学都能够接受的共同基础。

动物有权利吗？人类对动物负有义务吗？动物的精神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应如何理解它们的福利？这些是当代关于动物权利争论的核心问题，它们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哲学思考，还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

本书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结合各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待动物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呼吁人们对动物权利问题给予关注并进行反思。

Read to Know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谈谈方法

Rene Descarte

勒内·笛卡尔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谈谈方法（外研社双语读库）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勒内·笛卡尔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REFATORY NOTE BY THE AUTHOR 作者序
- Part I 第一部分
- Part II 第二部分
- Part III 第三部分
- Part IV 第四部分
- Part V 第五部分
- Part VI 第六部分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REFATORY NOTE BY THE AUTHOR

作者序

If this Discourse appear too long to be read at once, it may be divided into six Parts: and, in the first, will be found various considerations touching the Sciences; in the second, the principal rules of the Method which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in the third, certain of the rules of Morals which he has deduced from this Method; in the fourth, the reasonings by which he establishes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of the Human Soul, which are the foundations of his Metaphysic; in the fifth, the order of the Physical questions which he has investigated, and, in particular, the explication of the motion of the heart and of some other difficulties pertaining to Medicine, as als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oul of man and that of the brutes; and, in the last, what the Author believes to be required in order to greater advancement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than has yet been made, with the reasons that have induced him to write.

如果觉得一口气读完这篇谈话太长，可以把它分成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些对于各门学问的看法；第二部分，是作者所寻求的关于那种方法的几条主要规则；第三部分，是他从这种方法里引导出来的几项行为守则；第四部分，是他用来证明神存在和人的灵魂存在的那些理由，也就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基础；第五部分，是他研究过的一系列的物理学问题，特别是对于心脏运动以及其他医学方面难题的解释，还有我们的灵魂与禽兽的灵魂的区别；最后一部分，是作者认为一定要做哪些事情才能在自然研究方面比过去前进一步，以及是促使他写书的理由。

Part I

第一部分

Good sense is, of all things among men, the most equally distributed; for every one thinks himself so abundantly provided with it, that even those who are the most difficult to satisfy in everything else, do not usually desire a larger measure of this quality than they already possess. And in this it is not likely that all are mistaken; the conviction is rather to be held as testifying that the power of judging aright and of distinguishing truth from error, which is properly what is called good sense or reason, is by nature equal in all men; and that the diversity of our opinions, consequently, does not arise from some being endowed with a larger share of reason than others, but solely from this, that we conduct our thoughts along different ways, and do not fix our attention on the same objects. For to be possessed of a vigorous mind is not enough; the prime requisite is rightly to apply it. The greatest minds, as they are capable of the highest excellences, are open likewise to the greatest aberrations; and those who travel very slowly may yet make far greater progress, provided they keep always to the straight road, than those who, while they run, forsake it.

理智可谓是世间分配最为均匀的东西了。世人都自以为具有足够的理智，就连那些对其他一切都极难满意之人也从不会觉得自己理智不够而想要多得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大可能所有人都错了，此种信念反倒证明那正确判断、辨别真伪之能力，即我们所说的理智或理性，乃是人类生来就均等的，没有差别可言；而彼此意见之不同，并

非理性之多寡导致，只是我们各自的思维运用途径不同，所关注对象有别罢了。因此，单有聪明才智远远不够，会合理运用才是首要前提。大智者能为大善，亦能为大恶；行缓而遵循正道者，比之行疾而偏离正道者，进步不可同日而语。

For myself, I have never fancied my mind to be in any respect more perfect than those of the generality; on the contrary, I have often wished that I were equal to some others in promptitude of thought, or in clearness and distinctness of imagination, or in fullness and readiness of memory. And besides these, I know of no other qualitie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mind; for as to the reason or sense, inasmuch as it is that alone which constitutes us men, and distinguishes us from the brutes, I am disposed to believe that it is to be found complete in each individual; and on this point to adopt the common opinion of philosophers, who say that the difference of greater and less holds only among the accidents, and not among the forms or natures of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至于我自己，我从未奢想自己才智胜于常人。相反，我常常希望自己能与其他一些人一样，思维敏锐而果断，想象清晰而明了，记忆充盈而持久。除此之外，我再想不到别的什么可以使才智趋于完美了。因为只有理性或理智才使我们之所以成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因而我相信理性或者理智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完整无缺的。在这一点上，我也赞同哲学家们的惯常观点，即同一种属的个体之间只是偶有属性上存在多与少的区别，而形式与本质上并无多寡的差异。

I will not hesitate, however, to avow my belief that it has been my singular good fortune to have very early in life fallen in with

certain tracks which have conducted me to considerations and maxims, of which I have formed a method that gives me the means, as I think, of gradually augmenting my knowledge, and of raising it by little and little to the highest point which the mediocrity of my talents and the brief duration of my life will permit me to reach. For I have already reaped from it such fruits that, although I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think lowly enough of myself, and although when I look with the eye of a philosopher at the varied courses and pursuits of mankind at large, I find scarcely one which does not appear in vain and useless, I nevertheless derive the highest satisfaction from the progress I conceive myself to have already made in the search after truth, and cannot help entertaining such expectations of the future as to believe that if, among the occupations of men as men, there is any one really excellent and important, it is that which I have chosen.

然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非常幸运，在早年便摸索出几条门径，促使我思索，得出一些准则，并由这些准则形成了一种思维方法。我想，凭借这种方法，我的知识会不断增长，逐步提高到我的平凡才智和短暂生命能够允许我达到的最高点。我已经由此获益良多，尽管我一贯贬抑自己，尽管我从哲学家的角度观察人间万象，发现世人皆在营营役役，但一切几乎尽归虚无、一无是处。因而我还是为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所取得的进步感到无上满足，更觉得前途无量。在世上的所有行业中，如果说有一种是确实有益而重要的话，我相信那正是我所选择的这个行业。

After all, it is possible I may be mistaken; and it is but a little copper and glass, perhaps, that I take for gold and diamonds. I know how very liable we are to delusion in what relates to ourselves, and also how much the judgments of our friends are to

be suspected when given in our favour. But I shall endeavour in this discourse to describe the paths I have followed, and to delineate my life as in a picture, in order that each one may also be able to judge of them for himself, and that in the general opinion entertained of them, as gathered from current report, I myself may have a new help towards instruction to be added to those I have been in the habit of employing.

当然，我也可能错了；也许只得到了些破铜烂铁，而我却当成黄金钻石了。我知道，身在局中，难免迷惘；也知道，友朋的褒奖之词，非常值得怀疑。不过在这篇谈话中，我还是将向大家详细讲述我所依循的方法和途径，并将我的生平加以描述，以使大家人人都可各抒己见，给予评判。这样，我可从众人的意见中获得启示，为我自己惯常使用的学习方法提供新的帮助。

My present design, then, is not to teach the method which each ought to follow for the right conduct of his reason, but solely to describe the way in which I have endeavoured to conduct my own. They who set themselves to give precepts must of course regard themselves as possessed of greater skill than those to whom they prescribe; and if they err in the slightest particular, they subject themselves to censure. But as this tract is put forth merely as a history, or, if you will, as a tale, in which, amid some examples worthy of imitation, there will be found, perhaps, as many more which it were advisable not to follow, I hope it will prove useful to some without being hurtful to any, and that my openness will find some favour with all.

在此，我并不打算教给大家某种方法，使大家只要遵循该法就能

正确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我只是要告诉大家，我自己是怎样运用我的理性的。大凡以人师自居者，当然势必认定自己比别人高明，而一旦稍有差错，便自己遭受谴责。可是我这本小册子所写的只是一些传记性的东西，或许也可称为故事吧。其中除某些例子值得效仿之外，多半是不建议采用的。我希望，在对任何人都无害的情况下，能对一些人有益，也希望我的坦率能得到大家的些许赞同。

From my childhood, I have been familiar with letters; and as I was given to believe that by their help a clear and certain knowledge of all that is useful in life might be acquired, I was ardently desirous of instruction. But as soon as I had finished the entire course of study, at the close of which it is customary to be admitted into the order of the learned, I completely changed my opinion. For I found myself involved in so many doubts and errors, that I was convinced I had advanced no farther in all my attempts at learning, than the discovery at every turn of my own ignorance. And yet I was studying in one of the most celebrated schools in Europe, in which I thought there must be learned men, if such were anywhere to be found. I had been taught all that others learned there; and not contented with the sciences actually taught us, I had, in addition, read all the books that had fallen into my hands, treating of such branches as are esteemed the most curious and rare. I knew the judgment which others had formed of me; and I did not find that I was considered inferior to my fellows, although there were among them some who were already marked out to fill the places of our instructors. And, in fine, our age appeared to me as flourishing, and as fertile in powerful minds as any preceding one. I was thus led to take the liberty of judging of all other men by myself, and of concluding that there was no science in existence that was of such a nature as I had previously been given to believe.

我自幼与书本为伍，经人教诲，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因而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可等到我学业完成，按例毕业，继而跻身学者之林时，我的看法却完全改变了。因为我发现自己陷入了疑惑和谬误的漩涡之中，而于学问上毫无进步，只不过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无知。而我当时就读的学校是欧洲最著名的学校之一，我认为，如果世界上真有博学之士的话，我所在的学校肯定是会有的。别人在那所学校里学习的课程，我悉数学完，而且我还不满足于实际所授的课程。那些被视为最稀奇古怪的学问之书，只要能找到的，我都尽数读完。我也知道别人对我的评价。我发现，没人觉得我不如其他同学，虽然有几个同学已经被选为我们老师的接班人了。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的时代人才辈出、俊杰如云，不亚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这就使我毫无拘束地开始对其他所有人给出我自己的评判，并且得出结论：以前人们让我相信的那些十足可靠的学问，一个都不存在。

I still continued, however, to hold in esteem the studies of the schools. I was aware that the languages taught in them are necessar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ritings of the ancients; that the grace of fable stirs the mind; that the memorable deeds of history elevate it, and, if read with discretion, aid in forming the judgment; that the perusal of all excellent books is, as it were, to interview with the noblest men of past ages, who have written them, and even a studied interview, in which are discovered to us only their choicest thoughts; that eloquence has incomparable force and beauty; that poesy has its ravishing graces and delights; that in the mathematics there are many refined discoveries eminently suited to gratify the inquisitive, as well as further all the arts and lessen the labour of man; that numerous highly useful precepts and exhortations to virtue are contained in treatises on morals; that theology points out the path to heaven; that philosophy affords the means of discoursing with an appearance of truth on all matters,

and commands the admiration of the more simple; that jurisprudence, medicine, and the other sciences, secure for their cultivators honours and riches; and, in fine, that it is useful to bestow some attention upon all, even upon those abounding the most in superstition and error, that we may be in a position to determine their real value, and guard against being deceived.

尽管如此，对学校的功课我依然十分崇敬。我深知，学校所开设的语言课程是通晓古书的必备工具；而寓言的优雅，可激发心灵；不朽的历史事迹，可提升素养，若能加以研习，则有助于明辨是非、英明善断；研习古今名著，犹如与历代著书先贤促膝畅谈，甚至探讨，从中所得皆为他们思想之精髓；而雄辩之术，气势磅礴，无与伦比；诗词歌赋，婉转缠绵，动人心弦；算术一科奥妙无比，缜密之发现满足了不少好奇之心，于其他诸学亦有推波助澜之功，于世人亦有减轻人力之效；伦理一科则著述甚丰，箴言、教训兼而有之，教人向上为善；神学一科指出人们入天堂之道；哲学给人秘籍——用浅显的真理谈论一切事情，并能令肤浅之人多生羡慕；法律医学以及其他学科给人盛名厚利。总而言之，博学旁通，不无好处，甚至对那些迷信虚妄之物，我们亦能判定其真正价值，避免上当受骗。

But I believed that I had already given sufficient time to languages, and likewise to the reading of the writings of the ancients, to their histories and fables. For to hold converse with those of other ages and to travel, are almost the same thing. It is useful to know something of the manners of different nations, that we may be enabled to form a more correct judgment regarding our own, and be prevented from thinking that everything contrary to our customs is ridiculous and irrational, a conclusion usually come to by those whose experience has been limited to their own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oo much time is occupied in

travelling, we become strangers to our native country; and the over curious in the customs of the past are generally ignorant of those of the present. Besides, fictitious narratives lead us to imagine the possibility of many events that are impossible; and even the most faithful histories, if they do not wholly misrepresent matters, or exaggerate their importance to render the account of them more worthy of perusal, omit, at least, almost always the meanest and least striking of the attendant circumstances; hence it happens that the remainder does not represent the truth, and that such as regulate their conduct by examples drawn from this source, are apt to fall into the extravagances of the knight-errants of romance, and to entertain projects that exceed their powers.

但是，我相信自己在语言学习上下的功夫已然足够，而且在阅读先贤著作以及探索先贤的历史事迹上也花费了足够多的时间。因为我发现，与不同时代的古人交流，就几乎如同旅行一样。知道一些异国风俗是有用的，如此能使我们对本国风俗作出更为恰当的评价，不至于像那些经历仅限于本国国内的人一样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与本国风俗相反的事情都是可笑的、不合理的。另一方面，若旅行过久则会对我们本土生疏；对古人的风俗过于关注，则每每对当下的风俗无知。此外，虚构的故事使人想入非非，把许多不可能的事情想象成可能；而即使是最忠实的史书，如果没有完全歪曲、夸张史实，以求动听，至少也几乎总是删去了某些细枝末节，而不能尽如原貌。倘若以此为榜样亦步亦趋，每每会像传奇里的游侠骑士一样陷于浮夸，自恃能力无边、自我陶醉。

I esteemed eloquence highly, and was in raptures with poesy; but I thought that both were gifts of nature rather than fruits of study. Those in whom the faculty of reason is predominant, and who most skilfully dispose their thoughts with a view to render

them clear and intelligible, are always the best able to persuade others of the truth of what they lay down, though they should speak only in the language of Lower Brittany, and be wholly ignorant of the rules of rhetoric; and those whose minds are stored with the most agreeable fancies, and who can give expression to them with the greatest embellishment and harmony, are still the best poets, though unacquainted with the art of poetry.

我非常崇拜雄辩之术，也挚爱诗词歌赋，但我总觉得这两者乃天赐之物，而非后天学习所能得来。那些推理能力极强，又最善于明晰敏巧地表达其思想的人，即使只会说下布列塔尼半岛地区的土话，且完全不懂修辞规则，也往往能说服别人，使人相信他们所说的是真理；而那些头脑中富有奇思妙想，又能用最妙辞藻表达之人，纵使不谙熟诗词韵律，也仍不失为一流诗人。

I was especially delighted with the mathematics, on account of the certitude and evidence of their reasonings; but I had not as yet a precise knowledge of their true use; and thinking that they but contributed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 mechanical arts, I was astonished that foundations, so strong and solid, should have had no loftier superstructure reared on them. On the other hand, I compared the disquisitions of the ancient moralists to very towering and magnificent palaces with no better foundation than sand and mud: they laud the virtues very highly, and exhibit them as estimable far above anything on earth; but they give us no adequate criterion of virtue, and frequently that which they designate with so fine a name is but apathy, or pride, or despair, or parricide.

我特别喜爱数学，因为它推理确切明了，但我对它的真正用途却

不甚明了。我以为它只用于机械技术，于是不禁惊叹：数学有如此牢固、如此坚实之基础，人类本应从其中孕育出更为骄傲之建树。相反，古之卫道士的长篇宏论，貌似高耸入云、富丽堂皇之宫殿，其实基石比泥沙还差。他们把美德捧得极高，说它们世上无物可比，却没有为我们给出一个确切的道德标准。而他们常常给这个美好的名字赋予的美德，不过是冷漠无情、骄傲自满、灰心丧气、杀父弑母罢了。

I revered our theology, and aspired as much as any one to reach heaven: but being given assuredly to understand that the way is not less open to the most ignorant than to the most learned, and that the revealed truths which lead to heaven are above our comprehension, I did not presume to subject them to the impotency of my reason; and I thought that in order competently to undertake their examination, there was need of some special help from heaven, and of being more than man.

我也敬仰我们的神学，并同别人一样向往天堂。然而有人却肯定地告诉我，人不论无知还是博学，同样都能进天堂，而指引人升天的真理却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于是我也不敢妄加推理，我认为唯有自天而降的特殊帮助和非凡资质，才能在神学研究方面有所成。

Of philosophy I will say nothing, except that when I saw that it had been cultivated for many ages by the most distinguished men, and that yet there is not a single matter within its sphere which is not still in dispute, and nothing, therefore, which is above doubt, I did not presume to anticipate that my success would be greater in it than that of others; and further, when I considered the number of conflicting opinions touching a single matter that may be upheld by learned men, while there can be but one true, I reckoned as well-

nigh false all that was only probable.

关于哲学，我只有以下要说的：据我观察，千百年来哲学问题经过无数仁人志士的探索，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一个是不存在争论的，也没有一个能免遭怀疑。因此，在哲学研究上，我当时并不希冀自己能比别人成功多少。此外，既然同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而往往又有若干意见彼此矛盾，还有博学之人支持，于是我把仅仅貌似正确的一概看成是错误的。

As to the other sciences, inasmuch as these borrow their principles from philosophy, I judged that no solid superstructures could be reared on foundations so infirm; and neither the honour nor the gain held out by them was sufficient to determine me to their cultivation: for I was not, thank Heaven, in a condition which compelled me to make merchandise of science for the bettering of my fortune; and though I might not profess to scorn glory as a cynic, I yet made very slight account of that honour which I hoped to acquire only through fictitious titles. And, in fine, of false sciences I thought I knew the worth sufficiently to escape being deceived by the professions of an alchemist, the predictions of an astrologer, the impostures of a magician, or by the artifices and boasting of any of those who profess to know things of which they are ignorant.

至于其他学科，既然它们的本原皆来自于哲学，我断定，基础如此不稳，必建不出什么坚实的屋宇来。所以，能由这些学问获得的名和利不足以促使我去研究。感谢上苍，我当时并非穷困潦倒，要靠学问去牟利，以求过上好日子。我虽不像犬儒派那样藐视荣誉，但对于那些只靠虚假头衔得来的名声却看得十分轻淡。总而言之，想到那些

骗人的学说，不论是炼丹术者的包票、占星卜士的预言，还是魔术师的鬼把戏，我都避之不及，不会上当。对于那些自称内行，其实一无所知之人的装腔作势，我更是避而远之，以免受骗。

For these reasons, as soon as my age permitted me to pass from under the control of my instructors, I entirely abandoned the study of letters, and resolved no longer to seek any other science than the knowledge of myself, or of the great book of the world. I spent the remainder of my youth in travelling, in visiting courts and armies, in holding intercourse with men of different dispositions and ranks, in collecting varied experience, in proving myself in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into which fortune threw me, and, above all, in making such reflection on the matter of my experience as to secure my improvement. For it occurred to me that I should find much more truth in the reasonings of each individual with reference to the affairs in which he is personally interested, and the issue of which must presently punish him if he has judged amiss, than in those conducted by a man of letters in his study, regarding speculative matters that are of no practical moment, and followed by no consequences to himself, farther, perhaps, than that they foster his vanity the better the more remote they are from common sense; requiring, as they must in this case, the exercise of greater ingenuity and art to render them probable. In addition, I had always a most earnest desire to know how to distinguish the true from the false, in order that I might be able clearly to discriminate the right path in life, and proceed in it with confidence.

基于这些缘由，随着年龄渐长，我不再受师长的束缚，完全抛开了对书本的研究，并且立志，除自我或者大千世界这本大书之外，不再进行其他研究。于是趁着年轻，我就四处游历，走访宫廷和军队，

与不同气质、不同身份的人交往，积累各种经验。在命运驱使我遇到的各种不同环境中考验自我。尤其是随时随地思考我所经历的事情，以保从中受益，不断进步。因为我发现，较之研究某位学者在其书房里的研究成果所获得的真理，对现实个体进行推理研究所获得的真理要多得多。因为，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们不仅会参考个体自身感兴趣的事件，还会参考如果个体判断失误，不久便会遭受惩罚的问题。学者研究的往往是些无关实际的思辨哲学，对自己毫无影响，而且，也许研究离常识越远，由此产生的虚荣心就越大，因为必须要花费更多心思，才能使那些空论变得更像真理。除此之外，我渴想学会辨别真假，以便可以认清人生正道，并且满怀自信，迈步向前。

It is true that, while busied only in considering the manners of other men, I found here, too, scarce any ground for settled conviction, and remarked hardly less contradiction among them than in the opinions of the philosophers. So that the greatest advantage I derived from the study consisted in this, that, observing many things which, however extravagant and ridiculous to our apprehension, are yet by common consent received and approved by other great nations, I learned to entertain too decided a belief in regard to nothing of the truth of which I had been persuaded merely by example and custom; and thus I gradually extricated myself from many errors powerful enough to darken our natural intelligence, and incapacitate us in great measure from listening to reason. But after I had been occupied several years in thus studying the book of the world, and in essaying to gather some experience, I at length resolved to make myself an object of study, and to employ all the powers of my mind in choosing the paths I ought to follow, an undertaking which was accompanied with greater success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had I never quitted my country or my books.

诚然，在我专门考察其他国家的风俗习惯时，也没有发现使我确信的东西。他们自己也常常自相矛盾，一如一些哲学家对自己的观点不能自圆其说。我从研究中所得的最大好处就是眼界大开、见多识广。尽管有些风俗我们觉得离奇可笑，但却为其他伟大民族一致赞同、共同采纳。因此，我懂得了，不能一味听从那些成规惯例，只对它们坚信不疑。就这样，我渐渐摒弃了许多错误观念。这些错误观念的力量非常大，足以蒙蔽我们天生的灵明，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无力听从理性。但在经过数年对大千世界这本书的研究并努力得到若干经验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把我自己作为研究对象，集中一切精力选择我应遵循的道路。这样做，比之不出国门或死抠书本，我觉得会更有成就。

Part II

第二部分

I was then in Germany, attracted thither by the wars in that country, which have not yet been brought to a termination; and as I was returning to the army from the coronation of the emperor, the setting in of winter arrested me in a locality where, as I found no society to interest me, and was besides fortunately undisturbed by any cares or passions, I remained the whole day in seclusion, with full opportunity to occupy my attention with my own thoughts. Of these one of the very first that occurred to me was, that there is seldom so much perfection in works composed of many separate parts, upon which different hands had been employed, as in those completed by a single master. Thus it is observable that the buildings which a single architect has planned and executed, are generally more elegant and commodious than those which several have attempted to improve, by making old walls serve for purposes for which they were not originally built. Thus also, those ancient cities which, from being at first only villages, have become, in course of time, large towns, are usually but ill laid out compared with the regularity constructed towns which a professional architect has freely planned on an open plain; so that although the several buildings of the former may often equal or surpass in beauty those of the latter, yet when one observes their indiscriminate juxtaposition, there a large one and here a small, and the consequent crookedness and irregularity of the streets, one is disposed to allege that chance rather than any human will guided by reason must have led to such an arrangement. And if we consider that nevertheless there have been at all times certain

officers whose duty it was to see that private buildings contributed to public ornament, the difficulty of reaching high perfection with but the materials of others to operate on, will be readily acknowledged. In the same way I fancied that those nations which, starting from a semi-barbarous state and advancing to civilization by slow degrees, have had their laws successively determined, and, as it were, forced upon them simply by experience of the hurtfulness of particular crimes and disputes, would by this process come to be possessed of less perfect institutions than those which,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ir association as communities, have followed the appointments of some wise legislator. It is thus quite certain tha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true religion, the ordinances of which are derived from God, must be incomparably superior to that of every other. And, to speak of human affairs, I believe that the pre-eminence of Sparta was due not to the goodness of each of its laws in particular, for many of these were very strange, and even opposed to good morals, but to the circumstance that, originated by a single individual, they all tended to a single end. In the same way I thought that the sciences contained in books (such of them at least as are made up of probable reasonings, without demonstrations), composed as they are of the opinions of many different individuals massed together, are farther removed from truth than the simple inferences which a man of good sense using his natural and unprejudiced judgment draws respecting the matters of his experience. And because we have all to pass through a state of infancy to manhood, and have been of necessity, for a length of time, governed by our desires and preceptors (whose dictates were frequently conflicting, while neither perhaps always counselled us for the best), I farther concluded tha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hat our judgments can be so correct or solid as they would have been, had our reason been mature from the moment of our birth, and had we always been guided by it alone.

那时，德国战乱尚未结束，我随部队驻扎在那里。观看完皇帝加冕仪式后，我回到部队。时令已入冬季，我便只好留在驻地。那里没有什么朋友和社交活动引起我的兴致，万幸又不受任何忧虑或激情的搅扰，我便整日深居简出，借此良机，独自思索。我首先想到的是，众人合力拼凑之作，比之一人独自完成之作，难得有非常完美之处。例如，通过观察可以发现，房屋楼宇的设计修造若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往往美观宽敞。若是多人利用旧墙故壁修修改改而得来的建筑，往往要逊色很多。同样，一些原来只是村庄，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变成大都会的古城，通常显得不够规整。与之相比，由某位专业建筑师自由设计，在开阔平原上建起的现代城镇则显得整齐规范。虽然，古城有一些建筑常常可以与现代城市的建筑相媲美，甚至美而过之，然而人们见到的古城往往房屋布局横七竖八、大小不一，街道弯弯曲曲、凹凸不平。人们由此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出于偶然，而非源自理性引导的人类意愿。若能想到这些，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各城历来都有专门官员来管理私人建筑，以便使其给城市增加美感，但结果都不够理想。可见，单单加工别人的东西是很难达到非常完美的。同样，我也常想到，一些民族原来处于半野蛮状态，以缓慢的速度渐渐进入文明，由于只是被一些特殊犯罪和争吵所累，不得已而不断地制定法律。他们的治理，与自始就遵奉贤明者立法之民族相比，稍欠完美。如此，可以非常肯定，真宗教之清规，乃由上帝得来之法令，相较于其他宗教，其优越性可说是无可比拟。进而说到人事，我认为，古代斯巴达之兴盛，并非因为其每一条法律都特别完善，因其法律实有许多极其古怪之条目，甚至有与良德相违背之处。其兴盛应归因于其法律全都出于一人之手，全都为了一个目的。我同时又想到，书本上之学问（至少那些貌似真理却无证据之学问），乃是由多人之不同意见拼凑而成。有天赋理智之人，以其自然无偏见之判断能力，根据自己之经验得出简单推论。相比而言，前者偏离真理很远。再者，我们全都经历过从幼儿到成人的过程，而且势必在很长一段时期，受个人欲望和师长之支配（而老师之指示常常相互矛盾，并且不见得每个师长的意见总是正确）。那么，我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判断能总是正确可靠几乎不可能，除非我们生来就有成熟之理智，并且能一直仅被它

所引导。

It is true, however, that it is not customary to pull down all the houses of a town with the single design of rebuilding them differently, and thereby rendering the streets more handsome; but it often happens that a private individual takes down his own with the view of erecting it anew, and that people are even sometimes constrained to this when their houses are in danger of falling from age, or when the foundations are insecure. With this before me by way of example, I was persuaded that it would indeed be preposterous for a private individual to think of reforming a state by fundamentally changing it throughout, and overturning it in order to set it up amended; and the same I thought was true of any similar project for reforming the body of the sciences, or the order of teaching them established in the schools: but as for the opinions which up to that time I had embraced, I thought that I could not do better than resolve at once to sweep them wholly away, that I might afterwards be in a position to admit either others more correct, or even perhaps the same when they had undergone the scrutiny of reason. I firmly believed that in this way I should much better succeed in the conduct of my life, than if I built only upon old foundations, and leaned upon principles which, in my youth, I had taken upon trust. For although I recognized various difficulties in this undertaking, these were not, however, without remedy, nor once to be compared with such as attend the slightest reformation in public affairs. Large bodies, if once overthrown, are with great difficulty set up again, or even kept erect when once seriously shaken, and the fall of such is always disastrous. Then if there are any imperfections in the constitutions of states (and that many such exist the diversity of constitutions is alone sufficient to assure us), custom has without doubt materially smoothed their

inconveniences, and has even managed to steer altogether clear of, or insensibly corrected a number which sagacity could not have provided against with equal effect; and, in fine, the defects are almost always more tolerable than the change necessary for their removal; in the same manner that highways which wind among mountains, by being much frequented, become gradually so smooth and commodious, that it is much better to follow them than to seek a straighter path by climbing over the tops of rocks and descending to the bottoms of precipices.

诚然，仅为街道美观而将全城房屋一概拆毁，依新设计重建，这样的事不太常见。但是，私人把自己的房屋拆毁，重新建造，也有时为了避免房屋因日久坍塌，或者恐怕根基不稳，不得不将房屋拆而重建，这样的事却是常见的。以此为例，我明白了，个人想要用彻底改变、推翻重建的方法来改造国家，的确是荒唐妄想。同样，任何与此相似的意在改造各门学科的实体或者在学校讲授这些学问固有规则的计划，同样是荒谬无比的。但是，说到多年来我所信奉之观点，我认为，倒不如立刻把它们扫除殆尽，以便采纳更好之见解，抑或将原有之观念经过理性思考后收回重用。我坚信，用这种方法引导生活，比之仅仅固守陈旧基础，一味依赖年轻时轻信的那些原则的方法，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因为，我知道，如此行事虽然困难重重，但也并非无法克服，也不像改革公众事务那样，哪怕细枝末节也是困难无比。庞然大物，一旦坍塌，想再扶起，极其困难；抑或连经历一次剧烈抖动都很难再被扶直。因而，如此之物，一旦坍塌，往往十分可怕。如果国家的法律法规存有缺陷的话（单凭很多国家的法律中都存在差异性这一点就可断定），毫无疑问，习惯可以极大地消除这些缺陷所带来的弊端，甚至可以完全避免或于不知不觉中改正一些连精明理智都无法完全避免的毛病。简言之，较之根除缺陷所带来的变化而言，人们通常更能容忍这些缺陷本身。犹如山间曲径，走得多了，也就逐渐平坦宽阔了，比之寻找笔直小径，攀登岩石顶峰，下探悬崖谷底要好得多。

Hence it is that I cannot in any degree approve of those restless and busy meddlers who, called neither by birth nor fortune to take part in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 are yet always projecting reforms; and if I thought that this tract contained aught which might justify the suspicion that I was a victim of such folly, I would by no means permit its publication. I have never contemplated anything higher than the reformation of my own opinions, and basing them on a foundation wholly my own. And although my own satisfaction with my work has led me to present here a draft of it, I do not by any means therefore recommend to every one else to make a similar attempt. Those whom God has endowed with a larger measure of genius will entertain, perhaps, designs still more exalted; but for the many I am much afraid lest even the present undertaking be more than they can safely venture to imitate. The single design to strip one's self of all past beliefs is one that ought not to be taken by every one. The majority of men is composed of two classes, for neither of which would this be at all a befitting resolution: in the first place, of those who with more than a due confidence in their own powers, are precipitate in their judgments and want the patience requisite for orderly and circumspect thinking; whence it happens, that if men of this class once take the liberty to doubt of their accustomed opinions, and quit the beaten highway, they will never be able to thread the byway that would lead them by a shorter course, and will lose themselves and continue to wander for life; in the second place, of those who, possessed of sufficient sense or modesty to determine that there are others who excel them in the power of discriminating between truth and error, and by whom they may be instructed, ought rather to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the opinions of such than trust for more correct to their own reason.

因此，那些虽不是靠出身和钱财混入官场，却躁动不安、忙忙碌碌，总是叫嚣着改革的爱管闲事之人，我是极不喜欢的。如果在这个小册子里，有任何东西能证明我受过这些愚蠢行径的毒害，那么我想我是断然不会让它出版的。一直以来，我都在想着如何更好地改进自己的思想，以求其能完全建立在我自己的思想基础之上，除此之外，再没想过别的。我对自己的工作较为满意，在此呈现给大家一个初稿，但我并非要建议其他人也做类似的尝试。那些天生聪慧、备受上帝眷顾的人或许有更崇高的构思。但是我非常担心，对很多人来说，眼前所要求的会超过他们能够有把握大胆去效仿的。就拿推翻自己以往的所有信仰来说，单单这一点，就不是人人都应效仿的。世人中大致有两种不宜以此为榜样。其中一种人，自诩高明，实则不然。他们常不能自抑，判断仓促又耐心不足，难以做有序且审慎之思考。此种人，一旦被允许自由怀疑自己之固有观点，放弃人们常走的大道，则永远都无法穿越那条以捷径引领他们前行的旁道，进而迷失自己，彷徨终生；而另一种人则足够理智，且相当谦虚，能认识到在辨别真伪时尚有很多人高于自己，应多多学习。既然如此，那就可以满足于听取他人之意见，而不必自己苦苦寻找自身的原因了。

For my own part, I should doubtless have belonged to the latter class, had I received instruction from but one master, or had I never known the diversities of opinion that from time immemorial have prevailed among men of the greatest learning. But I had become aware, even so early as during my college life, that no opinion, however absurd and incredible, can be imagined, which has not been maintained by some one of the philosophers; and afterwards in the course of my travels I remarked that all those whose opinions are decidedly repugnant to ours are not in that account barbarians and savages, but on the contrary that many of these nations make an equally good, if not better, use of their reason than we do. I took into account also the very different character which a person brought up from infancy in France or Germany exhibits, from that

which, with the same mind originally, this individual would have possessed had he lived always with savages, and the circumstance that in dress itself the fashion which pleased us ten years ago, and which may again, perhaps, be received into favour before ten years have gone, appears to us at this moment extravagant and ridiculous. I was thus led to infer that the ground of our opinions is far more custom and example than any certain knowledge. And, finally, although such be the ground of our opinions, I remarked that a plurality of suffrages is no guarantee of truth where it is at all of difficult discovery, as in such cases it is much more likely that it will be found by one than by many. I could, however, select from the crowd no one whose opinions seemed worthy of preference, and thus I found myself constrained, as it were, to use my own reason in the conduct of my life.

至于我自己，倘若自始至终只求学于一人，或倘若我不知古圣先贤之思想也是有分歧的，那么毫无疑问，我应是属于第二种人的。然而，早在大学期间，我就意识到，任何想法，不管多么荒诞怪离，多么难以置信，都是由某个哲学家提出过的。在我游历期间，我也认识到，所有与我们意见完全相左之人，并不因此就是野蛮不开化之人。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跟我们一样运用理性，甚至比我们更善用理性。我还注意到，一个起初具有同样的心灵的人，即使自幼在法国或德国成长，那么，如果这个人后来和野蛮人生活在一起，所养成的品性就会大相径庭。正如同衣服一样，十年前流行的样式，也许十年后可能再次流行，而我们现在看来就觉得奢华夸张、怪诞可笑。因此我推想，我们固有的观念只是些成规惯例，称不上什么特定的知识。最后，尽管拥有这样的固有观念，我还要指出，多数人赞成的并不能保证就是真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容易发现真理。此类真理多半出自个人之发现，而非众人之发现。然而，在茫茫人海中，我竟然挑不出一个人，其观点似乎还值得汲取，由此我发现自己无可奈何，我只好用自己的理性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了。

But like one walking alone and in the dark, I resolved to proceed so slowly and with such circumspection, that if I did not advance far, I would at least guard against falling. I did not even choose to dismiss summarily any of the opinions that had crept into my belief without having been introduced by reason, but first of all took sufficient time carefully to satisfy myself of the general nature of the task I was setting myself, and ascertain the true method by which to arrive at the knowledge of whatever lay within the compass of my powers.

然而，如同在黑暗中独行一般，我决心谨小慎微、缓慢前行。如此一来，虽然进步不大，但至少可以谨防摔跤。甚至，有些观点未经理性之引导就慢慢地成为我信念的一部分，但是我并不会大刀阔斧将之摈弃，而是首先花费充足时间仔细考察，为自己所要从事的工作拟出总体计划，确保用正确的方法，以己之力，获得知识。

Among the branches of philosophy, I had, at an earlier period, given some attention to logic, and among those of the mathematics to geometrical analysis and algebra—three arts or sciences which ought, as I conceived, to contribute something to my design. But, on examination, I found that, as for logic, its syllogisms and the majority of its other precepts are of avail—rather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what we already know, or even as the art of Lully, in speaking without judgment of things of which we are ignorant, than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unknown; and although this science contains indeed a number of correct and very excellent precepts, there are, nevertheless, so many others, and these either injurious or superfluous, mingled with the former, that it is almost quite as difficult to effect a severance of the true from the false as it

is to extract a Diana or a Minerva from a rough block of marble. Then as to the analysis of the ancients and the algebra of the moderns, besides that they embrace only matters highly abstract, and, to appearance, of no use, the former is so exclusively restrict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figures, that it can exercise the understanding only on condition of greatly fatiguing the imagination; and, in the latter, there is so complete a subjection to certain rules and formulas, that there results an art full of confusion and obscurity calculated to embarrass, instead of a science fitted to cultivate the mind. By these considerations I was induced to seek some other method which would comprise the advantages of the three and be exempt from their defects. And as a multitude of laws often only hampers justice, so that a state is best governed when, with few laws, these are rigidly administered; in like manner, instead of the great number of precepts of which logic is composed, I believed that the four following would prove perfectly sufficient for me, provided I took the firm and unwavering resolution never in a single instance to fail in observing them.

在哲学的各个分支中，我早年学过一点逻辑学；在数学方面，我也学过解析几何和代数。在我看来，这三门艺术或学问应该对我的计划有所裨益。但经过观察，我发现，逻辑学的三段论和大部分其他法则只是用来说明我们已知的东西。就连吕里的艺术也只是不加判断地说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并没有对未知之事物加以研究。虽然逻辑学确实包含有很多正确而且非常卓越之法则，但其中也混杂着许多有害或者多余的东西，要想辨别真伪，其困难几乎不亚于从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中撷取出黛安娜或者密涅瓦的雕像来。至于古代的解析几何和现代的代数，都只是研究一些高度抽象而看起来又毫无用处的东西。此外，前者只限于考察图形，因而只能令人疲于想象之后才有所理解，而后者则完全使人陷于种种定律和方程式中，使人感觉是一种纷乱晦涩、迷惑难解之艺术，而非适合培养心智之科学。出于这些考

虑，我才决心另辟蹊径，剔除这三门学问之短，而能积聚三家之长。法令繁多，每每会执行不力，一个国家律法不多却能执法甚严，往往国泰民安。同样，逻辑之学无需大量条规构成。我相信，如果我能下决心坚定不移、从一而终，无论何种情况都能坚决遵循以下四条，对我来说也就足够了。

The first was never to accept anything for true which I did not clearly know to be such; that is to say, carefully to avoid precipitancy and prejudice, and to comprise nothing more in my judgement than what was presented to my mind so clearly and distinctly as to exclude all ground of doubt.

其一，凡是我未明确弄清楚之物，我决不可信以为真。换言之，我要小心避免轻率之判断和一己之偏见。而且，除了清晰可辨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之物以外，在我的判断里不包容其他任何东西。

The second, to divide each of the difficulties under examination into as many parts as possible, and as might be necessary for its adequate solution.

其二，将审查的各个难题尽可能细化，从而逐个妥善解决。

The third, to conduct my thoughts in such order that, by commencing with objects the simplest and easiest to know, I might ascend by little and little, and, as it were, step by step,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more complex; assigning in thought a certain

order even to those objects which in their own nature do not stand in a relation of antecedence and sequence.

其三，依次思考，从最简单的对象和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按部就班，逐步上升，直至最复杂之对象。甚至将那些本质上无先后次序之物，也在思想中给出特定之顺序。

And the last, in every case to make enumerations so complete, and reviews so general that I might be assured that nothing was omitted.

最后，无论任何情况都要进行全面周到之考察，复查也要周全，确保毫无遗漏。

The long chains of simple and easy reasonings by means of which geometers are accustomed to reach the conclusions of their most difficult demonstrations, had led me to imagine that all things, to the knowledge of which man is competent, are mutually connected in the same way, and that there is nothing so far removed from us as to be beyond our reach, or so hidden that we cannot discover it, provided only we abstain from accepting the false for the true, and always preserve in our thoughts the order necessary for the deduction of one truth from another. And I had little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the objects with which it was necessary to commence, for I was already persuaded that it must be with the simplest and easiest to know, and, considering that of all those who have hitherto sought truth in the sciences, the mathematicians alone have been able to find any demonstrations,

that is, any certain and evident reasons, I did not doubt but that such must have been the rule of their investigations. I resolved to commence, therefore, wit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simplest objects, not anticipating, however, from this any other advantage than that to be found in accustoming my mind to the love and nourishment of truth, and to a distaste for all such reasonings as were unsound. But I had no intention on that account of attempting to master all the particular sciences commonly denominated mathematics: but observing that, however different their objects, they all agree in considering only the various relations or proportions subsisting among those objects, I thought it best for my purpose to consider these proportions in the most general form possible, without referring them to any objects in particular, except such as would most facilitate the knowledge of them, and without by any means restricting them to these, that afterwards I might thus be the better able to apply them to every other class of objects to which they are legitimately applicable. Perceiving further, tha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se relations I should sometimes have to consider them one by one and sometimes only to bear them in mind, or embrace them in the aggregate, I thought that, in order the better to consider them individually, I should view them as subsisting between straight lines, than which I could find no objects more simple, or capable of being more distinctly represented to my imagination and sens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in order to retain them in the memory or embrace an aggregate of many, I should express them by certain characters the briefest possible. In this way I believed that I could borrow all that was best both in geometrical analysis and in algebra, and correct all the defects of the one by help of the other.

几何学家常常运用一长串简单容易之推理，即可完成最艰难之证

明。由此，我认为，人类所能认识的一切事物皆是用相同的方式相互联系的，只要不把假的当成真的接受，并永远遵守由一个真理推导出另一个真理之必然顺序，如此，则世上无远得不可达到之目标，亦无什么真理隐蔽得我们不能发现。而且，从何入手，对我来说并不很难决定。因为我早已知道，从最简单、最容易的事物着手。考虑到古今多少不同学科领域探索真理的学者当中，唯有数学家掌握了证明之法，即一些确切而有证据的推理，我就毫不迟疑地依循他们调查问题的规则。于是，我决定从考察最简单的对象开始做起。然而，我并不期望由此得到什么好处，只希望心灵得以熏陶，养成热爱真理、摒弃虚妄之论的习惯罢了。但是，我并未因此就打算去研究众人俗称的数学范围内的一切具体学问。据我观察，这些学问虽然研究对象不同，却有一致之处：即全都仅仅研究那些对象之间的各种关系或比例。因此我认为，我的目标最好还是尽可能用最一般的形式来研究这些比例，而不论及任何具体事物，除非是极有用之物，更不要使其受制于某些事物，如此才能将其恰当地应用于其他任何一个对象。为将这些关系弄明白而做进一步深入观察，有时我应该对它们一一研究，有时则只要把它们牢记于心，进行综合分析。因此我想，为便于逐个研究它们，我可以把它们视为线性的关系。我发现，这样的话，研究对象就简单多了，或者更能清晰明确地在我的想象和感官中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对它们牢记不忘，或把许多东西放在一起综合研究，我应当尽可能用一些最简短的字符来阐释它们。采用此种方法，我相信，我就可以提取解析几何和代数之精华，并能够取长补短，更正彼此的全部缺点。

And, in point of fact, the accurate observance of these few precepts gave me, I take the liberty of saying, such ease in unravelling all the questions embraced in these two sciences, that in the two or three months I devoted to their examination, not only did I reach solutions of questions I had formerly deemed exceedingly difficult but even as regards questions of the solution of which I continued ignorant, I was enabled, as it appeared to me, to

determine the means whereby,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a solution was possible; results attributable to the circumstance that I commenced with the simplest and most general truths, and that thus each truth discovered was a rule available in the discovery of subsequent ones. Nor in this perhaps shall I appear too vain, if it be considered that, as the truth on any particular point is one whoever apprehends the truth, knows all that on that point can be known. The child, for example, who has been instructed in the elements of arithmetic, and has made a particular addition, according to rule, may be assured that he has found, with respect to the sum of the numbers before him, and that in this instance is within the reach of human genius. Now, in conclusion, the method which teaches adherence to the true order, and an exact enumeration of all the conditions of the thing sought includes all that gives certitude to the rules of arithmetic.

实际上，我可以斗胆说，因为我严格遵守了这几条规则，便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这两门学问的所有问题弄得清清楚楚。在从事研究的两三个月里，我不但解决了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对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也很有把握，能看出可用什么方法解决，以及可能解决到哪个地步。这样的结果归因于我从最简单、最一般的真理着手，所发现的每一条真理都是一条规则，这条规则又可以用来发现其他真理。在这一方面，我并非夸大其词，因为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一条真理在任何一个特殊的点上是一条真理，那么无论是谁，理解了这一真理，他就知道了那一点上人们能够知道的一切。比如，一个小孩在学了算术之后，按照规则做完一道加法题，那么人们可以确信，在这道题的数字之和方面，他已经发现了人类才智所能发现的一切。总而言之，因为这种方法教人遵照事物的正当次序，确切地列举事物的所有条件，所以本身就包含了算术规则之所以可靠的全部条件。

But the chief ground of my satisfaction with thus method, was the assurance I had of thereby exercising my reason in all matters, if not with absolute perfection, at least with the greatest attainable by me: besides, I was conscious that by its use my mind was becoming gradually habituated to clearer and more distinct conceptions of its objects; and I hoped also, from not having restricted this method to any particular matter, to apply it to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other sciences, with not less success than to those of algebra. I should not, however, on this account have ventured at once on the examination of all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sciences which presented themselves to me, for this would have been contrary to the order prescribed in the method, but observing that the knowledge of such is dependent on principles borrowed from philosophy, in which I found nothing certain, I thought it necessary first of all to endeavour to establish its principles. And because I observed, besides, that an inquiry of this kind was of all others of the greatest moment, and one in which precipitancy and anticipation in judgment were most to be dreaded, I thought that I ought not to approach it till I had reached a more mature age (being at that time but twenty-three), and had first of all employed much of my time in preparation for the work, as well by eradicating from my mind all the erroneous opinions I had up to that moment accepted, as by amassing variety of experience to afford materials for my reasonings, and by continually exercising myself in my chosen method with a view to increased skill in its application.

不过，这种方法最令我满意之处在于，我确实感到它可以使我很有把握地在各个方面运用我的理性，虽不至于尽善尽美，至少也将我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此外，我还感到，因为运用这种方法，我的心灵逐渐习惯于把研究对象看得更明确、更清晰。我并未将这种方法固定在某种对象上，我还希望能用其解决其他学科的难题，如同成功地

解决代数难题一样。不过，我并没有因此就贸然去研究我在所有学科中遇到的难题，因为这样本身就可能违反了这种方法规定的规律。但我注意到，这些规律的知识都要依靠从哲学那里借来的原理，而在哲学中我从未发现任何准确的原理，所以我的第一要务是努力建立哲学的原理。另外，因为我观察到，为哲学创建原理一事最为重大，而且最怕轻率判断，也最怕坠入成见之中，所以，我想应该等我到了更为成熟的年纪时（我当时才23岁）才去做这个工作。我应首先用更多的时间为这个工作做准备，一方面要完全抛弃我心里以前所接受的一切错误的观点，另一方面要积累各种不同的经验，以便得到我推理的材料，同时在运用我所选择的方法上不断地训练自己，以求更能纯熟地运用它。

Part III

第三部分

And finally, as it is not enough, before commencing to rebuild the house in which we live, that it be pulled down, and materials and builders provided, or that we engage in the work ourselves, according to a plan which we have beforehand carefully drawn out, but as it is likewise necessary that we be furnished with some other house in which we may live commodiously during the operations, so that I might not remain irresolute in my actions, while my reason compelled me to suspend my judgement, and that I might not be prevented from living thenceforward in the greatest possible felicity, I formed a provisory code of morals, composed of three or four maxims, with which I am desirous to make you acquainted.

最后，正如我们在着手重建住宅之前，若只是把旧房拆掉、材料备好、建筑师请好，或者我们亲自设计，并仔细绘出图纸，这些是不够的。我们同时必须另外准备一所房子，以便在施工期间住得舒服些。这样，当我受理性驱使而变得举棋不定时，才不至于在行动上犹疑不决。为了能够以尽可能幸福的方式活着，我制定了一套临时性的道德规范，共有三四条准则，在此我愿介绍给大家，以便周知。

The first was to obey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my country, adhering firmly to the faith in which, by the grace of God, I had been educated from my childhood and regulating my conduct in every other matter according to the most moderate opinions, and the farthest removed from extremes, which should happen to be

adopted in practice with general consent of the most judicious of those among whom I might be living. For as I had from that time begun to hold my own opinions for nought because I wished to subject them all to examination, I was convinced that I could not do better than follow in the meantime the opinions of the most judicious; and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perhaps among the Persians as judicious as among ourselves, expediency seemed to dictate that I should regulate my practice conformably to the opinions of those with whom I should have to live; and it appeared to me that, in order to ascertain the real opinions of such, I ought rather to take cognizance of what they practised than of what they said, not only because, in the corruption of our manners, there are few disposed to speak exactly as they believe, but also because very many are not aware of what it is that they really believe; for, as the act of mind by which a thing is believed is different from that by which we know that we believe it, the one act is often found without the other. Also, amid many opinions held in equal repute, I chose always the most moderate, as much for the reason that these are always the most convenient for practice, and probably the best (for all excess is generally vicious), as that, in the event of my falling into error, I might be at less distance from the truth than if, having chosen one of the extremes, it should turn out to be the other which I ought to have adopted. And I placed in the class of extremes especially all promises by which somewhat of our freedom is abridged; not that I disapproved of the laws which, to provide against the instability of men of feeble resolution, when what is sought to be accomplished is some good, permit engagements by vows and contracts binding the parties to persevere in it, or even, for the security of commerce, sanction similar engagements where the purpose sought to be realized is indifferent: but because I did not find anything on earth which was wholly superior to change, and because, for myself in particular, I hoped gradually to perfect

my judgments, and not to suffer them to deteriorate, I would have deemed it a grave sin against good sense, if, for the reason that I approved of something at a particular time, I therefore bound myself to hold it for good at a subsequent time, when perhaps it had ceased to be so, or I had ceased to esteem it such.

第一，遵守国家的法律，遵从国家的风俗习惯，笃守信仰，因为这信仰乃上帝所赐，我从小就受教于它。在其他任何事情上，以身边贤达为榜样，在实践中依据最恰当的观点，最大可能不走极端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因为我希望对自己所有的观点进行审查，所以从那时起，我已经将自己的观点视为虚空无用，但是，我深信最好是遵从贤达的观点。虽然在波斯，也许有些人与我们这里的人同样贤达，但是为方便起见，我认为效仿自己周围的人似乎更好。而且，对我而言，要想查明这些人真正的观点，我必须观察他们的行动，而不能只听其口说。这不仅仅是因为如今世风日下，很少有人愿意完全吐露自己真实的心声，还因为太多的人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所信为何物。因为相信一件事和知道一件事本是不同的心理活动，两者不一定时常结伴而行。而且，许多观点在众人那里享有同样声誉，我总是从中选择最恰当的，多是因为这些观点最便于用于实践，而且也许是最好的（所有极端之意见一般都有弊端）。再者，一旦出错，我也许不会偏离真理太远。如果我选择了一个极端，而本该选定另一个极端，那就会犯错误了。我所认为极端者，尤其包括所有限制我们某项自由的种种承诺。我并非反对法律允许以发誓作为约定，以及通过订立约束双方的合同进行约定，其目的是谨防意志不坚之人摇摆不定、反复无常，保证达到某种正当目的，甚至为了商业安全，制订与约定相类似的法令，却对如何实现目标漠不关心；而是因为我发现世间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特别是对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自己的判断越来越完善，而不是越来越差。倘若由于我在某个特定时间赞同某事，而在以后的时间里，也许它已不是原来那样了，或者我已停止像原来那样遵从它了，可我还必须在以后的时间里也要说它是好的，我认为那是违背理智的一项重罪。

My second maxim was to be as firm and resolute in my actions as I was able, and not to adhere less steadfastly to the most doubtful opinions, when once adopted, than if they had been highly certain; imitating in this the example of travellers who, when they have lost their way in a forest, ought not to wander from side to side, far less remain in one place, but proceed constantly towards the same side in as straight a line as possible, without changing their direction for slight reasons, although perhaps it might be chance alone which at first determined the selection; for in this way, if they do not exactly reach the point they desire, they will come at least in the end to some place that will probably be preferable to the middle of a forest. In the same way, since in action it frequently happens that no delay is permissible, it is very certain that, when it is not in our power to determine what is true, we ought to act according to what is most probable; and even although we should not remark a greater probability in one opinion than in another, we ought notwithstanding to choose one or the other, and afterwards consider it, in so far as it relates to practice, as no longer dubious, but manifestly true and certain, since the reason by which our choice has been determined is itself possessed of these qualities. This principle was sufficient thenceforward to rid me of all those repentings and pangs of remorse that usually disturb the consciences of such feeble and uncertain minds as, destitute of any clear and determinate principle of choice, allow themselves one day to adopt a course of action as the best, which they abandon the next, as the opposite.

我的第二条准则是：在行动时尽可能坚定不移，一旦选定某些观点，哪怕它们是最可怀疑的，也要将之当作十分可靠的观点，毫不动摇地遵循。在这一点上，我效仿森林中迷路的旅行者，当其在森林中

迷路时，不应当东西乱撞，更不可停留一处，应当尽可能始终朝一个方向直线前进，纵然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方向是偶然选定的，但是也不要因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就改变方向。这样，即使不能准确地达到期望的目的地，至少最终也会到达某个地方，那里可能比森林中央要好。同样，在行动中常常是不许有任何耽搁的。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就是当我们无法辨别真伪时，就应当遵奉最可能的意见来行事。即便无法评判一个意见可能比另一个意见更好，我们也必须选择一个出来，然后在实践中去遵奉它，认定它是最真实可靠的，不再怀疑它。因为决定我们选择的理由本身就具有这些特质。此后，有了这条原则，我足以摆脱所有悔恨和懊恼，不像意志薄弱且摇摆不定之人那样，没有丝毫清晰明确的选择原则，总是随风而动、反复无常，今天选定这个行动为最好的，第二天就认为是最坏的，将其抛弃。

My third maxim was to endeavour always to conquer myself rather than fortune, and change my desires rather than the order of the world, and in general, accustom myself to the persuasion that, except our own thoughts, there is nothing absolutely in our power; so that when we have done our best in things external to us, all wherein we fail of success is to be held, as regards us, absolutely impossible: and this single principle seemed to me sufficient to prevent me from desiring for the future anything which I could not obtain, and thus render me contented; for since our will naturally seeks those objects alone which the understanding represents as in some way possible of attainment, it is plain, that if we consider all external goods as equally beyond our power, we shall no more regret the absence of such goods as seem due to our birth, when deprived of them without any fault of ours, than our not possessing the kingdoms of China or Mexico, and thus making, so to speak, a virtue of necessity, we shall no more desire health in disease, or freedom in imprisonment, than we now do bodies incorruptible as diamonds, or the wings of birds to fly with. But I confess there is

need of prolonged discipline and frequently repeated meditation to accustom the mind to view all objects in this light; and I believe that in this chiefly consisted the secret of the power of such philosophers as in former times were enabled to rise superior to the influence of fortune, and, amid suffering and poverty, enjoy a happiness which their gods might have envied. For, occupied incessantly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limits prescribed to their power by nature, they became so entirely convinced that nothing was at their disposal except their own thoughts, that this conviction was of itself sufficient to prevent their entertaining any desire of other objects; and over their thoughts they acquired a sway so absolute, that they had some ground on this account for esteeming themselves more rich and more powerful, more free and more happy, than other men who, whatever be the favours heaped on them by nature and fortune, if destitute of this philosophy, can never command the realization of all their desires.

我的第三条准则是：永远努力征服自己，而非征服命运；改变自己的欲望，而非改变世界的秩序。一般而言，我要劝说自己相信，除自己的思想外，我们根本无力支配任何东西。自身以外的事情，尽全力之后却没有完成，那么对我们来说，这是绝对办不成的事情了。单单这一个原则似乎就足以阻止我的奢望，任何得不到的东西，将来也就别想再得手，如此，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因为我们所要寻求的，本来就是某种能力范围内之物。显而易见，若将身外之物皆看成是在自己能力之上，那么对于那些生来似乎当有之物，若并非由于我们的过失而导致其缺失，我们也就不会再因此而感到懊恼了，就如同我们不会因为中国或墨西哥的山河不属于我们而懊恼一样。这样一来，我们就把非做不可之事假装成出于好心才做。推而广之，我们就不必在病中妄想健康，在牢中奢望自由了；犹如我们现在不希求有金刚不坏之躯，或者有鸟儿那飞翔的翅膀。不过我承认，要使我的心灵习惯于用此种方法认识所有对象则需要长期训练、反复沉思。我相信，古代哲

学家能摆脱命运的纠缠，漠视痛苦和贫困，享受快乐，令鬼神羡慕，其秘诀就在于此。因为在他们夜以继日、专心致志地思考过自然给予他们的权限之后，他们相信除自己的思想外，再别无他物可以支配。认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们心无挂碍，对其他事物不再抱任何奢望。对自己的思想取得绝对支配后，他们就比其他人更富裕、更强大、更自由、更幸福。因为其他人不懂这个哲学，无论自然和命运怎样眷顾他们，他们也不能支配一切、事事如愿。

In fine, to conclude this code of morals, I thought of reviewing the different occupations of men in this life, with the view of making choice of the best. And, without wishing to offer any remarks on the employments of others, I may state that it was my conviction that I could not do better than continue in that in which I was engaged, viz., in devoting my whole life to the culture of my reason, and in making the greatest progress I was able in the knowledge of truth,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method which I had prescribed to myself. This method, from the time I had begun to apply it, had been to me the source of satisfaction so intense as to lead me to believe that more perfect or more innocent could not be enjoyed in this life; and as by its means I daily discovered truths that appeared to me of some importance, and of which other men were generally ignorant, the gratification thence arising so occupied my mind that I was wholly indifferent to every other object. Besides, the three preceding maxims were founded singly on the design of continuing the work of self-instruction. For since God has endowed each of us with some light of reason by which to distinguish truth from error, I could not have believed that I ought for a single moment to rest satisfied with the opinions of another, unless I had resolved to exercise my own judgment in examining these whenever I should be duly qualified for the task. Nor could I have proceeded on such opinions without scruple, had I supposed

that I should thereby forfeit any advantage for attaining still more accurate, should such exist. And, in fine, I could not have restrained my desires, nor remained satisfied had I not followed a path in which I thought myself certain of attaining all the knowledge to the acquisition of which I was competent, as well as the largest amount of what is truly good which I could ever hope to secure. Inasmuch as we neither seek nor shun any object except in so far as our understanding represents it as good or bad, all that is necessary to right action is right judgment, and to the best action the most correct judgment, that is, to the acquisition of all the virtues with all else that is truly valuable and within our reach; and the assurance of such an acquisition cannot fail to render us contented.

最后，为了总结这个道德准则，我曾想到回顾人们一生中不同的职业，以便选择其中最优者。对于别人的职业，我无意给出任何评论，至于我自己，我深信最好是一如既往坚持我的职业，也就是穷尽一生之力，以我已经给自己制定的原则为方法，培养理性，争取最大进步，认识真理。自从应用这种方法以来，我找到了满足的源泉。我快慰人生，相信在一生中没有什么比这种满足更完美、更纯真了。凭借这种方法，我日日都能发现他人一般会忽视的重要真理，因此满心欢喜，对别的事情皆提不起什么兴趣了。此外，上述三条准则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继续自我教育。既然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一些理性之光，可使我们辨别真理与谬误，我就相信我一时一刻不该只满足于他人之意见，除非我已下定决心，每当对任务有了相当的准备之后便用我自己的判断来检验他人之意见。当然也不能毫无顾忌地依着他人之意见向前走，我想这样会丧失任何去获取世上可能存在的更好意见的良机。总之，如果我不沿着一条路走下去，就无法抑制住我的欲望，也无法保持心满意足的状态。因为照这条路走下去，我敢肯定，一切知识我都可以获得，我也可以获得我所希望最大量取得的真正的好东西。我们是追求还是回避一样东西，只取决于我们是把它看成是好的还是坏的。有正确的判断，势必有正确的行动。判断越正确，则行动

越正确，即可得到一切美德以及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其他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倘若我们确定能有这样的收获，那么我们自然会心满意足了。

Having thus provided myself with these maxims, and having placed them in reserve along with the truths of faith, which have ever occupied the first place in my belief, I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 might with freedom set about ridding myself of what remained of my opinions. And, inasmuch as I hoped to be better able successfully to accomplish this work by holding intercourse with mankind, than by remaining longer shut up in the retirement where these thoughts had occurred to me, I betook me again to travelling before the winter was well ended. And, during the nine subsequent years, I did nothing but roam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desirous of being a spectator rather than an actor in the plays exhibited on the theatre of the world; and, as I made it my business in each matter to reflect particularly upon what might fairly be doubted and prove a source of error, I gradually rooted out from my mind all the errors which had hitherto crept into it. Not that in this I imitated the sceptics who doubt only that they may doubt, and seek nothing beyond uncertainty itself; for, on the contrary, my design was singly to find ground of assurance, and cast aside the loose earth and sand, that I might reach the rock or the clay. In this, as appears to me, I was successful enough; for, since I endeavoured to discover the falsehood or incertitude of the propositions I examined, not by feeble conjectures, but by clear and certain reasonings, I met with nothing so doubtful as not to yield some conclusion of adequate certainty, although this were merely the inference, that the matter in question contained nothing certain. And, just as in pulling down an old house, we usually reserve the ruins to contribute towards the erection, so, in destroying such of

my opinions as I judged to be ill-founded, I made a variety of observations and acquired an amount of experience of which I availed myself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more certain. And further, I continued to exercise myself in the method I had prescribed; for, besides taking care in general to conduct all my thoughts according to its rules, I reserved some hours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I expressly devoted to the employment of the method in the solution of mathematical difficulties, or even in the solution likewise of some questions belonging to other sciences, but which, by my having detached them from such principles of these sciences as were of inadequate certainty, were rendered almost mathematical: the truth of this will be manifest from the numerous examples contained in this volume. And thus, without in appearance living otherwise than those who, with no other occupation than that of spending their lives agreeably and innocently, study to sever pleasure from vice, and who, that they may enjoy their leisure without ennui, have recourse to such pursuits as are honourable, I was nevertheless prosecuting my design, and making greater progress in the knowledge of truth, than I might, perhaps, have made had I been engaged in the perusal of books merely, or in holding converse with men of letters.

有了这些准则，并把它们和我对真理的信仰（永远在我心中占首要地位）放在一起，我得出结论，我可以自由地将我所固有的观点统统抛弃。这些思想是我在很长的退役时间里独处时产生的。因为我希望能够成功地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与人交流会更好一些。于是，冬天还没结束时，我又开始四处游历了。之后的九年中，我到处游荡，别无他事。在世界大舞台上，我只想做个旁观者，不想参与其中。对每一件事情，特别是非常可疑以及很可能引发错误的事情，我都仔细思考一番。渐渐地，我将从前潜入思想中的错误统统根除了。我并不是效仿那些怀疑论者，他们仅仅怀疑可怀疑之物，为了怀疑而怀疑。相

反，我只为找到确切证据，抛弃松散的沙土，以便觅寻到岩石或黏土。在我看来，这样做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我努力找出被考察命题的谬误或不确定之处，靠的不是软弱无力的猜测，而是清晰确定的推理。任何命题，不管多么可疑，总能推导出一些足够可靠的结论，哪怕命题本身不包含任何可靠内容，而仅仅是推理。正如拆毁一所旧房屋，我们通常将拆除的旧物留下，以备盖新房之用。同样，我在摧毁一些我判断根基不牢靠之观点时，我就多多观察，取得许多经验，以备我建立更为正确之观点。此外，我继续运用我已制定的方法训练自己。在一般情况下，除了按照其规则督导我的一切思想外，间或也会留些时间，特意用这种方法解决数学难题，甚至一些与其相似的其他学科的难题。但是有些问题所依据的学科原则不够牢靠，在剔除这些原则之后，就跟数学问题差不多了。这个真理会从本书中的大量实例中显现出来。如此，表面看来，我的生活与那些讨人喜欢、头脑简单之徒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只想快乐，拒绝邪恶，享受清闲，不知疲倦，认为这些追求是高尚荣耀的。但是，我从未放弃我的计划，而是不断进益、认识真理。这样做，比之仅仅埋头苦读，或者仅仅与文人交往，也许进步要大一些。

These nine years passed away, however, before I had come to any determinate judgment respecting the difficulties which form matter of dispute among the learned, or had commenced to seek the principles of any philosophy more certain than the vulgar. And the examples of many men of the highest genius, who had, in former times, engaged in this inquiry, but, as appeared to me, without success, led me to imagine it to be a work of so much difficulty, that I would not perhaps have ventured on it so soon had I not heard it currently rumoured that I had already completed the inquiry. I know not what were the grounds of this opinion; and, if my conversation contributed in any measure to its rise, this must have happened rather from my having confessed my ignorance with greater freedom than those are accustomed to do who have studied

a little, and expounded perhaps, the reasons that led me to doubt of many of those things that by others are esteemed certain, than from my having boasted of any system of philosophy. But, as I am of a disposition that makes me unwilling to be esteemed different from what I really am, I thought it necessary to endeavour by all means to render myself worthy of the reputation accorded to me; and it is now exactly eight years since this desire constrained me to remove from all those places where interruption from any of my acquaintances was possible, and betake myself to this country, in which the long duration of the war has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discipline, that the armies maintained seem to be of use only in enabling the inhabitants to enjoy more securely the blessings of peace and where, in the midst of a great crowd actively engaged in business, and more careful of their own affairs than curious about those of others, I have been enabled to live without being deprived of any of the conveniences to be had in the most populous cities, and yet as solitary and as retired as in the midst of the most remote deserts.

然而，九年时间过去了，对于饱学之士争论不休的难题，我依然没有作出任何判断。也尚未着手寻求比庸俗哲学更可靠的哲学原理。过去曾有许多了不起的天才都尝试过这个计划，但我觉得他们似乎都没有成功，这就令我认识到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要不是现在听到有谣言说我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也许还不会贸然这么快就着手干呢。谣言之根据何在，我尚不知道。若是与我的言论有关，定是因为我比那些按习惯办事、有点儿学问之人更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也可能是因为我给出了种种理由来质疑许多被其他人判断为千真万确的事情，而不是因为我吹嘘哲学的某种学说。但是，天性使然，我不愿被人评价为有名无实。我想我必须尽己所能，不负众望。整整八年的时间，我决心避开任何可能遇到熟人的场合，来到了这个国度。这里，连年战火之后，现已秩序井然，驻军也仅用于保障居民安享和

平；这里人口众多，大家积极肯干，忙于商业，更关心自己之业务，不太过问他人之事。居于这些人中间，我既能享受最繁华大城市的各种便利，又能一人独处、远离尘寰，如同置身于最荒芜的沙漠深处。

Part IV

第四部分

I am in doubt as to the propriety of making my first meditations in the place above mentioned matter of discourse; for these are so metaphysical, and so uncommon, as not, perhaps, to be acceptable to every one. And yet, that it may be determined whether the foundations that I have laid are sufficiently secure, I find myself in a measure constrained to advert to them. I had long before remarked that, in relation to practice, it is sometimes necessary to adopt, as if above doubt, opinions which we discern to be highly uncertain, as has been already said; but as I then desired to give my attention solely to the search after truth, I thought that a procedure exactly the opposite was called for, and that I ought to reject as absolutely false all opinions in regard to which I could suppose the least ground for doubt, in order to ascertain whether after that there remained aught in my belief that was wholly indubitable. Accordingly, seeing that our senses sometimes deceive us, I was willing to suppose that there existed nothing really such as they presented to us; and because some men err in reasoning, and fall into paralogisms, even on the simplest matters of geometry, I, convinced that I was as open to error as any other, rejected as false all the reasonings I had hitherto taken for demonstrations; and finally, when I considered that the very same thoughts (presentations) which we experience when awake may also be experienced when we are asleep, while there is at that time not one of them true, I supposed that all the objects (presentations) that had ever entered into my mind when awake, had in them no more truth than the illusions of my dreams. But immediately upon this I

observed that, whilst I thus wished to think that all was false,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that I, who thus thought, should be somewhat; and as I observed that this truth, I think, therefore I am (“je pense, donc je suis”), was so certain and of such evidence that no ground of doubt, however extravagant, could be alleged by the sceptics capable of shaking it, I concluded that I might, without scruple, accept it a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the philosophy of which I was in search.

在上述方面对事情最初的一些想法，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跟大家谈谈，因为那些想法过于玄妙，并不常见，也许未必人人都能接受。但是，为使大家能够评判我所建立的根基是否足够坚实，我觉得必须要谈一下。很久以前我就发现，正像前面说过的，在实践过程中，有时需要采纳一些我们明知非常不可靠的观点，就好像它们是铁定无疑的。然而，因为那时我的目的是唯求真理，所以我想我需要一种完全相反的做法：凡我认为有丝毫可疑之处，我皆应视为绝对谬误，不予采纳，以便查实此后我的信念中是否会留有完全不容置疑之物。如此，既然感官有时欺骗我们，我就认定，任何东西其实和其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不一样的。再者，因为有些人推理时出错，会作出似是而非的推理，就连最简单的几何问题也会这样，我相信，我跟别人一样难免犯错误，所以我就把曾经用于证明的理由皆认为是假的，统统予以抛弃。最后，我想到清醒时的思想（图像）在睡梦中也会完全相同地袭上心头，而梦中之物皆不是真的，于是我假设在我清醒时进入我心中的所有事物（图像）必同梦中幻影一样，都是不真实的。但我很快注意到，既然我有意将一切视为虚假，那么执此思想之我绝对应该是某种真实存在的。由于我认为“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 suis”）这一真理十分可靠且显而易见，怀疑主义者不管多狂妄都不能将之动摇，所以我断定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它，视它为我所寻求的哲学之第一条原则。

In the next place, I attentively examined what I was and as I observed that I could suppose that I had no body, and that there was no world nor any place in which I might be; but that I could not therefore suppose that I was not; and that, on the contrary, from the very circumstance that I thought to doubt of the truth of other things, it most clearly and certainly followed that I wa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f I had only ceased to think, although all the other objects which I had ever imagined had been in reality existent, I would have had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I existed; I thence concluded that I was a substance whose whole essence or nature consists only in thinking, and which, that it may exist, has need of no place, nor is dependent on any material thing; so that " I," that is to say, the mind by which I am what I am, is wholly distinct from the body, and is even more easily known than the latter, and is such, that although the latter were not, it would still continue to be all that it is.

然后，我谨慎地研究我是什么。我发现，我可以假设我没有肉体，也可以假设世界不存在，我立足的地方也不存在，但却无法假设我之不存在。相反，正因为我有意怀疑其他事物之真实性，因而更明显而确切地证明了我之存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只是停止思想，即令我过去想象的一切其他事物都真实存在，我却没有理由相信自己之存在。所以我总结出，我是一个实体，其全部本性或本质仅是以思考之形式而存在，而且，其存在无需空间，亦无需依赖于任何物质的东西。因此，此“思想之我”，即我之所以为我的心灵之我，与肉体之我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更易为人认识。即使肉体之我不存在，心灵之我仍然不停止它本来的一切。

After this I inquired in general into what is essential I to the truth and certainty of a proposition; for since I had discovered one

which I knew to be true, I thought that I must likewise be able to discover the ground of this certitude. And as I observed that in the words I think, therefore I am, there is nothing at all which gives me assurance of their truth beyond this, that I see very clearly that in order to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exist, I concluded that I might take, as a general rule, the principle, that all the things which we very clearly and distinctly conceive are true, only observing, however, that there is some difficulty in rightly determining the objects which we distinctly conceive.

紧接着，我就做了总体上的考察，看看一个命题之真实性和确切性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既然我已发现了一个命题，知道它是真实的，我想同样我应该能够弄清楚它何以真实。我注意到，在“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中，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保证它们的真实性。除此之外，我明显地看出，只有存在才能思考。因此我得出结论，我可以以此原则作为一个总的规则：凡能为我们所非常清晰、非常明确地认识到的事物都是真实存在的。不过，我也注意到，要正确地判断什么是我们能清楚认识的东西，还是有些困难的。

In the next place, from reflecting on the circumstance that I doubted, and that consequently my being was not wholly perfect (for I clearly saw that it was a greater perfection to know than to doubt), I was led to inquire whence I had learned to think of something more perfect than myself; and I clearly recognized that I must hold this notion from some nature which in reality was more perfect. As for the thoughts of many other objects external to me, as of the sky, the earth, light, heat, and a thousand more, I was less at a loss to know whence these came; for since I remarked in them nothing which seemed to render them superior to myself, I could believe that, if these were true, they were dependencies on my own

nature, in so far as it possessed a certain perfection, and, if they were false, that I held them from nothing, that is to say, that they were in me because of a certain imperfection of my nature. But this could not be the case with the idea of a nature more perfect than myself; for to receive it from nothing was a thing manifestly impossible; and, because it is not less repugnant that the more perfect should be an effect of, and dependence on the less perfect, than that something should proceed from nothing, it was equally impossible that I could hold it from myself: accordingly, it but remained that it had been placed in me by a nature which was in reality more perfect than mine, and which even possessed within itself all the perfections of which I could form any idea; that is to say, in a single word, which was God. And to this I added that, since I knew some perfections which I did not possess, I was not the only being in existence (I will here, with your permission, freely use the terms of the schools); but, on the contrary, that there was of necessity some other more perfect Being upon whom I was dependent, and from whom I had received all that I possessed; for if I had existed alone, and independently of every other being, so as to have had from myself all the perfection, however little, which I actually possessed, I should have been able, for the same reason, to have had from myself the whole remainder of perfection, of the want of which I was conscious, and thus could of myself have become infinite, eternal, immutable, omniscient, all-powerful, and, in fine, have possessed all the perfections which I could recognize in God. For in order to know the nature of God (whose existence has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preceding reasonings), as far as my own nature permitted, I had only to consider in reference to all the properties of which I found in my mind some idea, whether their possession was a mark of perfection; and I was assured that no one which indicated any imperfection was in him, and that none of the rest was awanting. Thus I perceived that doubt, inconstancy,

sadness, and such like, could not be found in God, since I myself would have been happy to be free from them. Besides, I had ideas of many sensible and corporeal things; for although I might suppose that I was dreaming, and that all which I saw or imagined was false, I could not, nevertheless, deny that the ideas were in reality in my thoughts. But, because I had already very clearly recognized in myself that the intelligent nature is distinct from the corporeal, and as I observed that all composition is an evidence of dependency, and that a state of dependency is manifestly a state of imperfection, I therefore determined that it could not be a perfection in God to be compounded of these two natures and that consequently he was not so compounded; but that if there were any bodies in the world, or even any intelligences, or other natures that were not wholly perfect, their existence depended on his power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could not subsist without him for a single moment.

此后，我对我怀疑的情形进行了反省，结果发现，我之存在并不是十分完美的。因为我清楚地认识到，知道比怀疑更为完美。这引导我去研究世上有比我自己更完美之物这一想法是从何而来的。而且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必须持此理念，因为它源自于比现实中更为完美的某些本性。至于对许许多多身外之物，诸如天、地、光、热等等世间万物的思考，要想知其根源，我是不用费很大力气的。因为既然从这些事物中看不出有任何似乎优于我的地方，我就可以认为，若它们是真实的，那么它们是隶属于我之本性的，这样我之本性才趋于某种特定的完美。若它们是错误的，那么它们就是我凭空捏造的。换言之，它们之所以在我心中存在，乃是由于我之本性还不完美。但是，在想到比我自己更完美的本质观点时，情形就不同了，因为凭空捏造它明显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更完美者来源于不完美者，并且依赖于它，这实在是令人反感，不亚于无中生有的说法。同样，我是不可能自己捏造这个本质观点的。因此剩下的便是，这个本质观点能置于我心实是因为现实中有比我更完美之本质，其本身具有我能想出的任何观点所

需要的一切完美的东西。简言之，那就是上帝。在此，我还要补充一点，既然我知道在一些方面自己并不完美，我就不会是世间唯一之存在（请原谅我在此使用几个经院名词），但是相反，世间必定有比我更完美之存在为我所依赖，而且我所拥有的一切也由它而获得。若世间只有我存在，并且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事物，则我现在已有的所有完美，不管多么微小，皆我实际所拥有。同理，我应该能够从我自身得到余下的全部完美属性，我意识到这是我所欠缺的。如此一来，我自然而然就能够变得无穷无尽、永恒不变、万古不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总而言之，凡我能够从上帝那里识解的所有完美，我都能拥有。尽我自己最大之力去了解上帝之本质（其存在已由前述之推理得到确认），我只需参照我在心灵中发现的一些观念的所有特质，看其属性是否达于完美。我坚信，凡完美之物，上帝尽皆有之；凡缺憾之物，在上帝身上踪迹皆无。这样，我就明白了，迟疑不定、反复无常、哀愁苦怨等等诸如此类之事，在上帝那里是找不到的，因为我自己都以能摆脱这样的事为欢娱。除此之外，我还有许多有关可感知之物和有形之物的观念。因为，虽然我可以假定梦中之物以及我之全部所见、所想皆为假象，然而，我却不能否认，这些观念确确实实存在于我的思想之中。不过，因为我自己已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人之悟性本质与形体本质截然不同；同时我也观察到，所有组合乃彼此依赖之证据，而彼此依赖之状态明显是一种不完美状态，所以，我断定这两种本质之结合绝非上帝之完美所在，而且上帝也绝非两者之结合。若世上有任何完全不完美的实体，甚至智力或者其他本质，那么，它们之存在则完全依赖于上帝之力量，且须臾也离不开他。

I was disposed straightway to search for other truths and when I had represented to myself the object of the geometers, which I conceived to be a continuous body or a space indefinitely extended in length, breadth, and height or depth, divisible into divers parts which admit of different figures and sizes, and of being moved or transposed in all manner of ways (for all this the geometers suppose to be in the object they contemplate), I went over some of their

simplest demonstrations. And, in the first place, I observed, that the great certitude which by common consent is accorded to these demonstrations, is founded solely upon this, that they are clearly conceiv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I have already laid down. In the next place, I perceived that there was nothing at all in these demonstrations which could assure m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ir object: thus, for example, supposing a triangle to be given, I distinctly perceived that its three angles were necessarily equal to two right angles, but I did not on that account perceive anything which could assure me that any triangle existed: while, on the contrary, recurring to the examination of the idea of a Perfect Being, I found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e Being was comprised in the idea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 equality of its three angles to two right angles is comprised in the idea of a triangle, or as in the idea of a sphere, the equidistance of all points on its surface from the centre, or even still more clearly; and that consequently it is at least as certain that God, who is this Perfect Being, is, or exists, as any demonstration of geometry can be.

我打算径直去寻求其他真理。我自己一直以几何学家的研究对象为例，我将其视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实体或者一个空间，其长、宽、高或深延伸得无边无际，亦可分为种种不同部分，其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并且可以随意移动或更换位置，因为这一切皆为几何学家假定的研究对象应有的特质，为此我研究了其中几个最简单的证明。首先，我注意到，众人公认的这些证明之所以十分正确，是因为它们只是基于我已列出的规则，它们才被世人完全理解。其次，我发现，在这些证明中根本没有迹象表明其对象之存在。试举例，假设有一个三角形，我明确地领会到，其三个内角之和必定等于两个直角之和，但是，仅仅依此领会并不能使我完全相信三角形之存在。相反，当我回头审查完美存在的观点时，我发现那个完美存在已经包含在那个观点中了，正如三角形的观念中包含了三个内角等于两个直角，或者正如

球形的观念中包含了球面任何一点与球心之距离相等，或者甚至更明晰。由此可见，至善至美的上帝之有或存在这一命题至少同几何学中的任何命题一样可靠。

But the reason which leads many to persuade them selves that there is a difficulty in knowing this truth, and even also in knowing what their mind really is, is that they never raise their thoughts above sensible objects, and are so accustomed to consider nothing except by way of imagination, which is a mode of thinking limited to material objects, that all that is not imaginable seems to them not intelligible. The truth of this is sufficiently manifest from the single circumstance, that the philosophers of the schools accept as a maxim that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understanding which was not previously in the senses, in which however it is certain that the ideas of God and of the soul have never been; and it appears to me that they who make use of their imagination to comprehend these ideas do exactly the same thing as if, in order to hear sounds or smell odors, they strove to avail themselves of their eyes; unless indeed that there is this difference, that the sense of sight does not afford us an inferior assurance to those of smell or hearing; in place of which, neither our imagination nor our senses can give us assurance of anything unless our understanding intervene.

但是，很多人觉得，要认识这条真理是件困难的事情，甚至认识自己的心灵真正为何物也是很困难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常被局限在感官能感觉到之物，并且他们非常习惯于用想象的方法观察事物，而想象是一种仅限于对实在物质的思维方式。这样，对他们而言，凡不可想象之物似乎就变得难以理解了。这一真理在单一情况下是非常明显的——经院哲学家们把它当成一条格言信奉，他们认为，凡理性之物必先存在于感官中。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上帝之观念和

灵魂之观念从来不在感官之中。我以为，经院哲学家们靠他们的想象来理解这些观念，恰恰好比他们努力用眼睛来闻声嗅味，只是事实上还有这样一种区别——视觉比嗅觉和听觉更能使我们感觉可靠罢了。若无理智之介入，无论是我们的想象还是我们的感官，都不能使我们确切相信任何东西。

Finally, if there be still persons who are not sufficiently persuaded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of the soul, by the reasons I have adduced, I am desirous that they should know that all the other propositions, of the truth of which they deem themselves perhaps more assured, as that we have a body, and that there exist stars and an earth, and such like, are less certain; for, although we have a moral assurance of these things, which is so strong that there is an appearance of extravagance in doubting of their existence, yet at the same time no one, unless his intellect is impaired, can deny, when the question relates to a metaphysical certitude, that there is sufficient reason to exclude entire assurance, in the observation that when asleep we can in the same way imagine ourselves possessed of another body and that we see other stars and another earth, when there is nothing of the kind. For how do we know that the thoughts which occur in dreaming are false rather than those other which we experience when awake, since the former are often not less vivid and distinct than the latter? And though men of the highest genius study this question as long as they please,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give any reason which can be sufficient to remove this doubt, unless they presuppose the existence of God. For, in the first place even the principle which I have already taken as a rule, viz., that all the things which we clearly and distinctly conceive are true, is certain only because God is or exists and because he is a Perfect Being, and because all that we possess is derived from him: whence it follows that our ideas or notions, which to the extent of

their clearness and distinctness are real, and proceed from God, must to that extent be true. Accordingly, whereas we not infrequently have ideas or notions in which some falsity is contained, this can only be the case with such as are to some extent confused and obscure, and in this proceed from nothing (participate of negation), that is, exist in us thus confused because we are not wholly perfect. And it is evident that it is not less repugnant that falsity or imperfection, in so far as it is imperfection, should proceed from God, than that truth or perfection should proceed from nothing. But if we did not know that all which we possess of real and true proceeds from a Perfect and Infinite Being, however clear and distinct our ideas might be, we should have no ground on that account for the assurance that they possessed the perfection of being true.

最后，在我给出种种理由之后，可能仍然还有人对上帝和灵魂之存在不很信服，那么我真切地请他们想想其他所有的假设，想想那些他们也许更能相信的真实的东西，比如人有身体，世间有星星和地球存在，诸如此类，其实它们并不很确切。因为，尽管我们对这些东西不但相信，而且对它们的存在坚信不疑——除非谁智力有缺陷，否则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些事物的存在，可是，问题一旦涉及形而上学之真切性时，就没有充足的理由来保证完全的可靠性了。试想在梦中，我们不也能想象我们自己有另外一个身体，看见不同的星星和另外一个地球吗？而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梦中的思想不如清醒时的思想真实呢？况且前者之生动惟肖、清晰易辨常常不亚于后者。纵使最高明的天才，以他们最喜爱的方式研究这个问题，除非他们假定上帝之存在，否则我都不相信他们能找出足够的理由来消除这个疑团。因为首先，连我之前当作规则提出的原则——“凡能为我们所清晰明确地认识到的事物都是真实存在的。”——之所以可靠，也只是因为上帝是有的或存在的，而且，上帝是至善至美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皆来自于上帝：我们的观念或看法来自于

上帝，它们是真实的，其清晰可见、明确可辨也是真实的，是来自于上帝的，这样它们一定是真实的。所以，尽管我们常常有一些观点或理念含有错误成分，但那只是在某些混乱不清、隐晦难辨的情况下才有的，并且这种情况来自于虚无（否定的参与）。换言之，其之所以能这样混乱模糊地存在于我们心中，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够完美。很明显，说谬误或缺陷之所以是缺陷应该归因于它来自上帝，其荒谬程度不亚于说真理或完美应该来自于虚无。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真实和真理皆来自至善至美、无所不能的上帝，那么，无论我们的观点多么清晰、多么明确，我们也应该没有任何理由确信其拥有真实的完美。

But after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of the soul has rendered us certain of this rule, we can easily understand that the truth of the thoughts we experience when awake, ought not in the slightest degree to be called in question on account of the illusions of our dreams. For if it happened that an individual, even when asleep, had some very distinct idea, as, for example, if a geometer should discover some new demonstration, the circumstance of his being asleep would not militate against its truth; and as for the most ordinary error of our dreams, which consists in their representing to us various objects in the same way as our external senses, this is not prejudicial, since it leads us very properly to suspect the truth of the ideas of sense; for we are not infrequently deceived in the same manner when awake; as when persons in the jaundice see all objects yellow, or when the stars or bodies at a great distance appear to us much smaller than they are. For, in fine, whether awake or asleep, we ought never to allow ourselves to be persuaded of the truth of anything unless on the evidence of our reason. And it must be noted that I say of our reason, and not of our imagination or of our senses: thus, for example, although we very clearly see the sun, we ought not therefore to determine that it is only of the size

which our sense of sight presents; and we may very distinctly imagine the head of a lion joined to the body of a goat, without being therefore shut up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 chimaera exists; for it is not a dictate of reason that what we thus see or imagine is in reality existent; but it plainly tells us that all our ideas or notions contain in them some truth; for otherwise it could not be that God, who is wholly perfect and veracious, should have placed them in us. And because our reasonings are never so clear or so complete during sleep as when we are awake, although sometimes the acts of our imagination are then as lively and distinct, if not more so than in our waking moments, reason further dictates that, since all our thoughts cannot be true because of our partial imperfection, those possessing truth must infallibly be found in the experience of our waking moments rather than in that of our dreams.

但是，在认识了上帝和灵魂，并确定这条规则之后，我们就不难明白，哪怕是在最轻微的程度上，梦中之幻觉也绝对不应该使我们怀疑清醒时思想的真实性。因为即使在梦中，一个人也可能会有一些非常清晰的想法，就如几何学家发现一些新的证明，他的酣睡亦不能阻止这些证明的真实性。至于我们梦境中最常犯的错误，也常存在于我们的外感官以相同的方式给我们表现各种客体的过程中。这样并无坏处，因为这样可以促使我们非常恰当地怀疑由感官得来的观念的真实性。因为，我们在醒时也常被这类相同的方法所欺骗，比如黄疸病人看任何东西都是黄的，再比如星星或天体离我们很远，我们就会觉得它们比实际的小很多。总而言之，无论是在梦中或是清醒，除非有理性为证，否则我们绝不应该允许我们自己轻信任何事物的真实性。还需要注意的是，我说的是我们的理性，而不是我们的想象或感官。例如，虽然我们能非常清楚地看见太阳，我们却不能就此断定它就仅仅只有我们看见的那样小。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想象狮头长在山羊身上，却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世上有这样的怪物存在。因为理性并没有任何指示，说看到的或想象的就是存在的真相。但是，它却明白无误

地告知我们，我们的一切观念或理念都包含一些真理，否则，至善至美、真实真诚之上帝是不会将它们置于我们的头脑之中的。尽管有时候，梦中之想象或许跟清醒时的一样，甚至更为活泼、鲜明，但是梦中之推理却不然，绝对不如清醒时那么清楚、完备。于是理性进一步指示我们，既然我们所有的思想不可能都真实，因为我们不完美，那么那些思想中拥有的真理必定不能从梦中寻得，只能在清醒时的真实体验中获取。

Part V

第五部分

I would here willingly have proceeded to exhibit the whole chain of truths which I deduced from these primary but as with a view to this it would have been necessary now to treat of many questions in dispute among the learned, with whom I do not wish to be embroiled, I believe that it will be better for me to refrain from this exposition, and only mention in general what these truths are, that the more judicious may be a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a more special account of them would conduce to the public advantage. I have ever remained firm in my original resolution to suppose no other principle than that of which I have recently availed myself in demonstrating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of the soul, and to accept as true nothing that did not appear to me more clear and certain than the demonstrations of the geometers had formerly appeared; and yet I venture to state that not only have I found means to satisfy myself in a short time on all the principal difficulties which are usually treated of in philosophy, but I have also observed certain laws established in nature by God in such a manner, and of which he has impressed on our minds such notions, that after we have reflected sufficiently upon these, we cannot doubt that they are accurately observed in all that exists or takes place in the world and farther, by considering the concatenation of these laws, it appears to me that I have discovered many truths more useful and more important than all I had before learned, or even had expected to learn.

由上述根本原理推衍出的一系列真理，我本想在此一一展示。可是要想这样，就有必要先谈谈众多学者还在争论的许多问题。我不想跟他们发生纠葛，所以，我相信还是不要一一叙述更好些，我只从大体上来说说这些真理。至于详细叙述对大众的好处，就由高明人士来判断吧。最初之决心，我现在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除了之前为证明上帝和灵魂的存在所定之原则，不再假定其他原则；任何看法，只要没有几何学家以前的证明更清晰、更明白，我也就不当作真的来接受。这样，我敢大胆地说，我不但在短时间内找到了令我满意的方法来解决在哲学中通常遇到的种种重要难题，而且还发现上帝用这样的方法在自然界中确立的特定规律，并将这样的概念铭刻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在对这些理念充分反省之后，就会毫无疑义地相信，世上存在的万物或发生的万事无不严格遵守这些规律。进一步观察过后，我发现这些规律都是有联系的，因此我认为，我发现了许多真理，这些真理与我从前学到的，甚至期盼学到的一切真理相比都更为有用、更为重要。

But because I have essayed to expound the chief of these discoveries in a treatise which certain considerations prevent me from publishing, I cannot make the results known more conveniently than by here giving a summary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treatise. It was my design to comprise in it all that, before I set myself to write it, I thought I knew of the nature of material objects. But like the painters who, finding themselves unable to represent equally well on a plain surface all the different faces of a solid body, select one of the chief, on which alone they make the light fall, and throwing the rest into the shade, allow them to appear only in so far as they can be seen while looking at the principal one; so, fearing lest I should not be able to compense in my discourse all that was in my mind, I resolved to expound singly, though at considerable length, my opinions regarding light; then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adding something on the sun and the fixed

stars, since light almost wholly proceeds from them; on the heavens since they transmit it; on the planets, comets, and earth, since they reflect it; and particularly on all the bodies that are upon the earth, since they are either coloured, or transparent, or luminous; and finally on man, since he is the spectator of these objects. Further, to enable me to cast this variety of subjects somewhat into the shade, and to express my judgment regarding them with greater freedom, without being necessitated to adopt or refute the opinions of the learned, I resolved to leave all the people here to their disputes, and to speak only of what would happen in a new world, if God were now to create somewhere in the imaginary spaces matter sufficient to compose one, and were to agitate variously and confusedly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is matter, so that there resulted a chaos as disordered as the poets ever feigned, and after that did nothing more than lend his ordinary concurrence to nature, and allow her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which he had established. On this supposition, I, in the first place, described this matter, and essayed to represent it in such a manner that to my mind there can be nothing clearer and more intelligible, except what has been recently said regarding God and the soul; for I even expressly supposed that it possessed none of those forms or qualities which are so debated in the schools, nor in general anything the knowledge of which is not so natural to our minds that no one can so much as imagine himself ignorant of it. Besides, I have pointed out what are the laws of nature; and, with no other principle upon which to found my reasonings except the infinite perfection of God, I endeavoured to demonstrate all those about which there could be any room for doubt, and to prove that they are such, that even if God had created more worlds, there could have been none in which these laws were not observed. Thereafter, I showed how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matter of this chaos mu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laws, dispose and arrange itself in such a way as to present the appearance of

heavens; how in the meantime some of its parts must compose an earth and some planets and comets, and others a sun and fixed stars. And, making a digression at this stage on the subject of light, I expounded at considerable length what the nature of that light must be which is found in the sun and the stars, and how thence in an instant of time it traverses the immense spaces of the heavens, and how from the planets and comets it is reflected towards the earth. To this I likewise added much respecting the substance, the situation, the motions, and all the different qualities of these heavens and stars; so that I thought I had said enough respecting them to show that there is nothing observable in the heavens or stars of our system that must not, or at least may not appear precisely alike in those of the system which I described. I came next to speak of the earth in particular, and to show how, even though I had expressly supposed that God had given no weight to the matter of which it is composed, this should not prevent all its parts from tending exactly to its centre; how with water and air on its surface, the disposition of the heavens and heavenly bodies, more especially of the moon, must cause a flow and ebb, like in all its circumstances to that observed in our seas, as also a certain current both of water and air from east to west, such as is likewise observed between the tropics; how the mountains, seas, fountains, and rivers might naturally be formed in it, and the metals produced in the mines, and the plants grow in the fields and in general, how all the bodies which are commonly denominated mixed or composite might be generated and, among other things in the discoveries alluded to inasmuch as besides the stars, I knew nothing except fire which produces light, I spared no pains to set forth all that pertains to its nature,—the manner of its production and support, and to explain how heat is sometimes found without light, and light without heat; to show how it can induce various colours upon different bodies and other diverse qualities; how it reduces some to a liquid state

and hardens others; how it can consume almost all bodies, or convert them into ashes and smoke; and finally, how from these ashes, by the mere intensity of its action, it forms glass: for as this transmutation of ashes into glass appeared to me as wonderful as any other in nature, I took a special pleasure in describing it. I was not, however, disposed, from these circumstances, to conclude that this world had been created in the manner I described; for it is much more likely that God made it at the first such as it was to be. But this is certain, and an opinion commonly received among theologians, that the action by which he now sustains it is the same with that by which he originally created it; so that even although he had from the beginning given it no other form than that of chaos, provided only he had established certain laws of nature, and had lent it his concurrence to enable it to act as it is wont to do, it may be believed, without discredit to the miracle of creation, that, in this way alone, things purely material might, in course of time, have become such as we observe them at present; and their nature is much more easily conceived when they are beheld coming in this manner gradually into existence, than when they are only considered as produced at once in a finished and perfect state.

我曾写过一篇专题论文，尝试阐述这些发现的主要部分，不过基于种种顾虑，没有出版。因此我想，如果在此将其内容略加说明，使人知晓，那真是再方便不过了。在动笔之前，本想将我所知道的有关有形客体的本质东西统统包括进去，不过，正如画家一样，要想在一个平面上把一个立体的不同面都表现出来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选择主要的一面朝向光线，其他方面则处于阴面，以便在作画时能看到主要一面，也能最大限度地看到其他各面。同样，我也怕论述中不能包括我头脑中的全部内容，所以我决定只单独阐述对光的理解，尽管这样，篇幅依然很长；然后借机附带谈了谈有关太阳和恒星的一些内容，因为光几乎全部来自于它们；再谈谈天空，因为天空传播光；又

谈到行星、彗星和地球，因为它们反射光；还特别谈到了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因为它们有的带颜色，有的透明，有的能发光；最后谈到了人，因为人是这一切对象的观察者。为了能把这些物质的多样形态更多地置于阴面，也为了便于我能有更大自由判断它们，无需对学者之意见表示赞成或反对，我决定任凭大家辩论，我只是想说新世界会发生的事。试想上帝现在在某个想象的空间里创造足够的物质来建立一个新世界，把这些物质各个部分都搅得形态各异、复杂纷乱，这样就会出现一个混沌状态，杂乱无序，如同诗人曾经捏造的那样。此后，除提供一些寻常的协力外，上帝不再赐予自然丝毫力量，而是让其按照上帝已建立的规则自行发展，看看这样会发生什么。基于这个假设，我首先就描述了这些物质，并试图用这种方式阐明，在我看来，除之前所说之上帝和灵魂外，其他一切都不如物质的本性那样清晰明了、易于理解。因为，我甚至假设，这些物质并没有经院哲学家们常常辩论的那些形式或性质，一切都是我们心灵所熟知的，谁都不能装作不知道。此外，我还对何为自然法则加以说明。我并不依靠别的原理，只根据上帝之无限完美进行推理，力求对一切可疑之规律作出证明，并力求证明其确为自然规律。而且，即便在上帝创造的其他世界里，也无一不遵守这些规律。接着，我又指出，这混沌中的大部分物质必然按照这些规律，以一定方式自行排布，形成天空之象。与此同时，其中有的部分必然形成地球、行星和彗星，其他的则形成太阳和恒星。说到这里，我转而谈论光这个主题。我以相当大的篇幅说明，光之本质为何必定存在于太阳和星星上，以及它是如何在瞬间穿过浩瀚长空，从行星和彗星反射到地球的。同样，对诸天体和星星的实质、位置、运动，以及这些天体和星星的所有不同性质，我又做了许多补充。我想这样一来，我所说的足以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世界的天体和星球跟我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应该没有丝毫差别，或者至少可以清晰地显得没有丝毫差别。接下来，我又特别说到了地球，并展示给大家，虽然我已明确假设上帝并未给组成地球的物质任何重量，但是仍不妨碍地球各部分精确地向地心集中。既然地表有水，有空气，那么天空和天体的构造，尤其是月球的构造如何一定会引起潮汐，而且在各方面都跟我们在海洋里见到的一样，还引起一种从东到西的洋流和气流，同我们在热带地区见到的也是一样，何以山脉、海洋、泉水、

河流能在地球上自然形成，矿石如何能在矿区产出，植物如何能够在田野里生长，各种常见的所谓混合物或组合物如何能够产生。之前所述的新东西中，除了星星之外，我知道只有火能发光，因此我不辞辛苦，详详细细地说明与火有关之事——指出火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维持的，为何时而有热无光，时而有光无热；火如何能在不同物体上产生不同颜色和不同的属性；火如何能够熔化某些物体，又能够将另一些物体烧硬；火如何能够烧毁几乎所有的东西，将其烧成灰和烟；最后，如何根据灰的密度再将它们烧制成玻璃。因为，在我看来，这一过程跟自然界其他各种转化一样奇妙，所以，我描述起它来别有一番乐趣。尽管如此，我不想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世界就是照我所描述的方式创造的，因为很有可能上帝最初是瞬间就把它创造完成了。不过，可以肯定，神学家也一致公认，上帝现在维持世界之行动，正如最初他创造世界之行动。因此，纵然上帝最初给予世界的只是一个混沌状态，不过只要他确立了特定的自然规律，并给世界以协助，使其能照常活动，我们仍可相信，单单照此途径，一切纯物质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都能逐渐变成现在我们所见之情形。这与创世之奇迹并不冲突。而且，将其看成以这种方式逐渐形成，比之只将它们看成一次成形便呈现完结、完美之状态，更容易了解其本质。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inanimate bodies and plants, I passed to animals, and particularly to man. But since I had not as yet sufficient knowledge to enable me to treat of these in the same manner as of the rest, that is to say, by deducing effects from their causes, and by showing from what elements and in what manner nature must produce them, I remained satisfied with the supposition that God formed the body of man wholly like to one of ours, as well in the external shape of the members as in the internal conformation of the organs, of the same matter with that I had described, and at first placed in it no rational soul, nor any other principle, in room of the vegetative or sensitive soul, beyond kindling in the heart one of those fires without light, such as I had

already described, and which I thought was not different from the heat in hay that has been heaped together before it is dry, or that which causes fermentation in new wines before they are run clear of the fruit. For, when I examined the kind of functions which might, as consequences of this supposition, exist in this body, I found precisely all those which may exist in us independently of all power of thinking, and consequently without being in any measure owing to the soul; in other words, to that part of us which is distinct from the body, and of which it has been said above that the nature distinctively consists in thinking, functions in which the animals void of reason may be said wholly to resemble us; but among which I could not discover any of those that, as dependent on thought alone, belong to us as men,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 did afterwards discover these as soon as I supposed God to have created a rational soul, and to have annexed it to this body in a particular manner which I described.

在描述了无生命之物体和植物之后，我进而论及动物，尤其是人类。可是，因为我这方面的知识还不够，不能以之前的那种方式来应对这类事物，也就是说，不能用原因来推断结果，说不明白自然是从什么元素中把他们产生出来的，以什么方式产生的。所以，我姑且假设，上帝所造之人，不论是外形还是内部器官之构造，跟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造人所用之物质，也同我所描述的一样，而且一开始这人并无理性之灵魂，也无任何别的原则可用来代替植物性的或感觉性的灵魂，只不过在他心里点了一把正如上面所说的无光之火。我以为，此火之本质无异于使湿草堆发热之火，或者使水果汁发酵变成新酒所需之火。正因为基于这个假设，我仔细考察了人的身体可能拥有的功能，我清晰地发现，所有那些我们可以拥有的功能恰恰可以不依靠我们所有的思维能力，并且丝毫不假借于灵魂。换言之，那些功能不必假借我们身体的哪一部分。如前所述，本质以特别的方式包含在思维之中，这完全可以说，无理性之动物的功能跟我们是一样的，只

是我从中找不到人类的那种只依靠思想的功能，那种只属于我们人类的功能。另一方面，只有当我假设上帝创造了一个理性的灵魂，并按我所描述的特殊方法将灵魂加装到那个身体上之后，我才能真正发现这些功能。

But, in order to show how I there handled this matter, I mean here to give the explication of the motion of the heart and arteries, which, as the first and most general motion observed in animals, will afford the means of readily determining what should be thought of all the rest. And that there may be less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what I am about to say on this subject, I advise those who are not versed in anatomy, before they commence the perusal of these observations, to take the trouble of getting dissected in their presence the heart of some large animal possessed of lungs (for this is throughout sufficiently like the human), and to have shown to them its two ventricles or cavities: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in the right side, with which correspond two very ample tubes, viz., the hollow vein (vena cava), which is the principal receptacle of the blood, and the trunk of the tree, as it were, of which all the other veins in the body are branches; and the arterial vein (vena arteriosa), inappropriately so denominated, since it is in truth only an artery, which, taking its rise in the heart, is divided, after passing out from it, into many branches which presently disperse themselves all over the lungs;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cavity in the left side, with which correspond in the same manner two canals in size equal to or larger than the preceding, viz., the venous artery (arteria venosa), likewise inappropriately thus designated, because it is simply a vein which comes from the lungs, where it is divided into many branches, interlaced with those of the arterial vein, and those of the tube called the windpipe, through which the air we breathe enters; and the great artery which, issuing from the heart,

sends its branches all over the body. I should wish also that such persons were carefully shown the eleven pellicles which, like so many small valves, open and shut the four orifices that are in these two cavities, viz., three at the entrance of the hollow veins where they are disposed in such a manner as by no means to prevent the blood which it contains from flowing into the right ventricle of the heart, and yet exactly to prevent its flowing out; three at the entrance to the arterial vein, which, arranged in a manner exactly the opposite of the former, readily permit the blood contained in this cavity to pass into the lungs, but hinder that contained in the lungs from returning to this cavity; and, in like manner, two others at the mouth of the venous artery, which allow the blood from the lungs to flow into the left cavity of the heart, but preclude its return; and three at the mouth of the great artery, which suffer the blood to flow from the heart, but prevent its reflux. Nor do we need to seek any other reason for the number of these pellicles beyond this that the orifice of the venous artery being of an oval shape from the nature of its situation, can be adequately closed with two, whereas the others being round are more conveniently closed with three. Besides, I wish such persons to observe that the grand artery and the arterial vein are of much harder and firmer texture than the venous artery and the hollow vein; and that the two last expand before entering the heart, and there form, as it were, two pouches denominated the auricles of the heart, which are composed of a substanc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heart itself; and that there is always more warmth in the heart than in any other part of the body—and finally, that this heat is capable of causing any drop of blood that passes into the cavities rapidly to expand and dilate, just as all liquors do when allowed to fall drop by drop into a highly heated vessel.

但是，为了向大家展示我在那篇文章里是怎样处理这类问题的，我打算在此说明一下心脏和动脉的运动，因为这是人们观察到的动物最基本、最普遍的运动，这将给人们提供一种方法，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应该怎样看待其余器官的运动。为了使大家能比较容易地明白我对这个问题接下来要进行的讨论，我建议请那些不熟悉解剖学的人费点力气，在阅读这些观察说明之前，先找一个有肺的大动物解剖开来，取出心脏摆在面前（因为它的各部分跟人都很相像），看看其中的那两个心室或心房。先看右心房，有两条粗血管与之连接：一条是空腔静脉（腔静脉），是主要的储血器，好像树干一样，体内其他静脉都是其分支；一条是肺静脉（动静脉），这个名字其实不太合适，因为它其实只是一根动脉，以心脏为出发点，经过心脏后，分为许多分支，布满两肺。再看左心房，也同样连接着两条大血管，大小跟右心房的相同或稍大一点。一条是肺动脉（静动脉），这个名字也不太合适，因为它其实只是一条静脉，来自两肺，也有很多分支，同肺静脉的分支相互交织。那些分支叫做气管，我们就是通过气管吸进空气的。另一条是大动脉，由心脏出发，分支遍布全身。我还希望这些人能仔细观察一下那十一片瓣膜，它们像十一道小的阀门一样，启闭两个心房的四条血管。三片在大静脉口，不妨碍血液流入心脏的右心房，然而又刚好阻止血液从心脏流出；三片在肺静脉口，其排布与前者恰恰相反，只允许右心房里的血液流入肺中，但是阻止肺中的血液回流进这个心房；另有两片在肺动脉口，能以同样的方式使血液从肺流入心脏的左心房，并能阻止血液回流；还有三片位于大动脉口，能使血液流出，但能阻止血液回流。瓣膜为什么会是十一个，除了肺动脉位置的本质特点外，我们无需寻找别的理由，其口是椭圆的，两片瓣膜足以使其闭拢，而其他三条都是圆形的，需要三片瓣膜才能更方便地将其闭拢。此外，我还要请这些人注意，大动脉和肺静脉的组织结构比大静脉和脉动脉要坚硬得多，结实得多。大静脉和脉动脉在进入心脏前，扩大成两个囊形物，称为心耳，跟心脏本身一样是由肌肉构成的。心脏的温度总高于身体的其他部分。最终，这种热度能够使流入心房的血滴迅速扩张、膨胀，正如同将各种液体一滴滴地滴入高温容器中所展示的那样。

For, after these things,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me to say anything more with a view to explain the motion of the heart, except that when its cavities are not full of blood, into these the blood of necessity flows—from the hollow vein into the right, and from the venous artery into the left; because these two vessels are always full of blood, and their orifices, which are turned towards the heart, cannot then be closed. But as soon as two drops of blood have thus passed, one into each of the cavities, these drops which cannot but be very large, because the orifices through which they pass are wide, and the vessels from which they come full of blood, are immediately rarefied, and dilated by the heat they meet with. In this way they cause the whole heart to expand, and at the same time press home and shut the five small valves that are at the entrances of the two vessels from which they flow, and thus prevent any more blood from coming down into the heart, and becoming more and more rarefied, they push open the six small valves that are in the orifices of the other two vessels, through which they pass out, causing in this way all the branches of the arterial vein and of the grand artery to expand almost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heart which immediately thereafter begins to contract, as do also the arteries, because the blood that has entered them has cooled, and the six small valves close, and the five of the hollow vein and of the venous artery open anew and allow a passage to other two drops of blood, which cause the heart and the arteries again to expand as before. And, because the blood which thus enters into the heart passes through these two pouches called auricles, it thence happens that their motion is the contrary of that of the heart, and that when it expands they contract. But lest those who are ignorant of the force of m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s and who are not accustomed to distinguish true reasons from mere verisimilitudes, should venture without examination, to deny what has been said, I wish it to be considered that the motion which I have now explained

follows as necessarily from the very arrangement of the parts, which may be observed in the heart by the eye alone, and from the heat which may be felt with the fingers, and from the nature of the blood as learned from experience, as does the motion of a clock from the power, the situation, and shape of its counterweights and wheels.

明白了这些以后，对于心脏的运动，我就不用再费周折解释了。当两心房没有充满血液时，血液必然就会从大静脉流入右心房，从肺动脉流入左心房，因为这两条血管是一直充满血液的。其开口又是向着心房，所以是不能关闭的。可是，一旦有两滴血液通过，一滴进入一个心房，因为通过两滴血液的进口很大，后面的血管又充满血液，两滴血液必然非常大，所以遇到高温会立刻变得稀薄，并且膨胀开来。这样一来，就导致整个心脏开始膨胀，同时将两条血管入口处的五片小瓣膜推至闭拢，这样就堵死了进入心脏的任何血液。这两滴血变得越来越稀薄，继而把另外两条血管切口上的六片瓣膜推开，血液会流出去，这样导致肺静脉和大动脉的所有分支血管就会跟心脏几乎一起扩张起来。随后，因为进入这些血管的血液冷却，心脏和动脉会立刻开始收缩，六片瓣膜就关闭起来，大静脉和肺动脉的五片瓣膜便会重新打开，又会允许两滴血液流进来，而使心脏和动脉再次像前面叙述的那样膨胀。由于流入心脏的血液先经过了两个称为心耳的囊，所以心耳的运动跟心脏的运动是刚好相反的。心脏舒张时心耳则收缩。由于一些人不了解数学论证的力量，不习惯于辨别真正的推理和似是而非的推理，所以很可能不加考察就否定我上述的说法。我愿意提醒他们，我刚才解释的心脏运动是器官结构必然引起的，是只有用眼睛才可以观察到的，其热量是可以用手指感觉到的，是可以根据经验从血液的本质了解到的，正如时钟的运动是由其钟摆和齿轮的力量、位置及形状引起的一样。

But if it be asked how it happens that the blood in the veins,

flowing in this way continually into the heart, is not exhausted, and why the arteries do not become too full, since all the blood which passes through the heart flows into them, I need only mention in reply what has been written by a physician of England, who has the honour of having broken the ice on this subject, and of having been the first to teach that there are many small passages at the extremities of the arteries, through which the blood received by them from the heart passes into the small branches of the veins, whence it again returns to the heart; so that its course amounts precisely to a perpetual circulation. Of this we have abundant proof in the ordinary experience of surgeons, who, by binding the arm with a tie of moderate straitness above the part where they open the vein, cause the blood to flow more copiously than it would have done without any ligature; whereas quite the contrary would happen were they to bind it below; that is, between the hand and the opening, or were to make the ligature above the opening very tight. For it is manifest that the tie, moderately straightened, while adequate to hinder the blood already in the arm from returning towards the heart by the veins, cannot on that account prevent new blood from coming forward through the arteries, because these are situated below the veins, and their coverings, from their greater consistency, are more difficult to compress; and also that the blood which comes from the heart tends to pass through them to the hand with greater force than it does to return from the hand to the heart through the veins. And since the latter current escapes from the arm by the opening made in one of the veins, there must of necessity be certain passages below the ligature, that is, towards the extremities of the arm through which it can come thither from the arteries. This physician likewise abundantly establishes what he has advanced respecting the motion of the blood, from the existence of certain pellicles, so disposed in various places along the course of the veins, in the manner of small valves, as not to permit the blood to pass

from the middle of the body towards the extremities, but only to return from the extremities to the heart; and farther, from experience which shows that all the blood which is in the body may flow out of it in a very short time through a single artery that has been cut, even although this had been closely tied in the immediate neighbourhood of the heart and cut between the heart and the ligature, so as to prevent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blood flowing out of it could come from any other quarter than the heart.

不过，如果有人要问，既然静脉中的血液不停地流入心脏，心脏中的血液又不停地注入动脉，为什么静脉中的血液不会枯竭，而动脉中的血液又不会太满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只需引用一位英格兰医生的解释就能予以答复。他有幸在这方面有破天荒的论述，首次指出：动脉末梢有许多细小的通道，因为有这些通道，从心脏流出的血液就能进入静脉的微小分支，重新流回心脏。这样，它的行程就是一个精确而且永不停息的循环。关于这个说法，我们在外科医生的日常经验中可以找到大量证据。外科医生切开手臂静脉时，如果在切口上方用绑带把手臂不松不紧地捆住，这样的出血量比之不捆要多。如果捆在切口下方，也就是捆在手和切口之间，或是在上方捆得太紧，情况就会完全相反。原因很明显，在上方不松不紧地捆住可以阻止手臂里已有的血液通过静脉流回心脏，但并不会因此妨碍新的血液通过动脉不断地从心脏流出。因为这些动脉位于静脉下面，血管壁比较坚韧，不易挤压，而且，从心脏流出、通过动脉流到手的血，其力量要比从手通过静脉流回心脏的血量大。从手通过静脉流回心脏的血液既然由一根静脉上的切口从手臂里流出，那么必定有一些通道位于捆扎处下方，也就是说，在靠近手臂的末端，血液可以从动脉通过那些通道流到切口处。这个医生还对他研究的血液流动做了非常充分的说明。他提出，沿着静脉有某些细小的皮膜装配在不同的地方，像小瓣膜那样使静脉中的血不能从身体中枢流向末端，而只能从末端流回心脏。此外，还有实验表明，只要切开一根动脉，体内的全部血液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流光，即使这根动脉是在心脏很近处紧扎且切口在心脏和绷带

之间，所以也不难设想，这些血液只能是从心脏中流出的，不可能来自别处。

But there are many other circumstances which evince that what I have alleged is the true cause of the motion of the blood: thu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difference that is observed between the blood which flows from the veins, and that from the arteries, can only arise from this, that being rarefied, and, as it were, distilled by passing through the heart, it is thinner, and more vivid, and warmer immediately after leaving the heart, in other words, when in the arteries, than it was a short time before passing into either, in other words, when it was in the veins; and if attention be given, it will be found that this difference is very marked only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heart; and is not so evident in parts more remote from it. In the next plac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coats of which the arterial vein and the great artery are composed, sufficiently shows that the blood is impelled against them with more force than against the veins. And why should the left cavity of the heart and the great artery be wider and larger than the right cavity and the arterial vein, were it not that the blood of the venous artery, having only been in the lungs after it has passed through the heart, is thinner, and rarefies more readily, and in a higher degree, than the blood which proceeds immediately from the hollow vein? And what can physicians conjecture from feeling the pulse unless they know that according as the blood changes its nature it can be rarefied by the warmth of the heart, in a higher or lower degree, and more or less quickly than before? And if it be inquired how this heat is communicated to the other members, must it not be admitted that this is effected by means of the blood, which, passing through the heart, is there heated anew, and thence diffused over all the body? Whence it happens, that if the blood be withdrawn from any part,

the heat is likewise withdrawn by the same means; and although the heart were as hot as glowing iron, it would not be capable of warming the feet and hands as at present, unless it continually sent thither new blood. We likewise perceive from this, that the true use of respiration is to bring sufficient fresh air into the lungs, to cause the blood which flows into them from the right ventricle of the heart, where it has been rarefied and, as it were, changed into vapours, to become thick, and to convert it anew into blood, before it flows into the left cavity, without which process it would be unfit for the nourishment of the fire that is there. This receives confirmation from the circumstance, that it is observed of animals destitute of lungs that they have also but one cavity in the heart, and that in children who cannot use them while in the womb, there is a hole through which the blood flows from the hollow vein into the left cavity of the heart, and a tube through which it passes from the arterial vein into the grand artery without passing through the lung. In the next place, how could digestion be carried on in the stomach unless the heart communicated heat to it through the arteries, and along with this certain of the more fluid parts of the blood, which assist i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food that has been taken in? Is not also the operation which converts the juice of food into blood easily comprehended, when it is considered that it is distilled by passing and repassing through the heart perhaps more than one or two hundred times in a day? And what more need be adduced to explain nutri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different humours of the body, beyond saying, that the force with which the blood, in being rarefied, passes from the heart towards the extremities of the arteries, causes certain of its parts to remain in the members at which they arrive, and there occupy the place of some others expelled by them; and that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shape, or smallness of the pores with which they meet, some rather than others flow into certain parts, in the same way that some

sieves are observed to act, which, by being variously perforated, serve to separate different species of grain? And, in the last place, what above all is here worthy of observation, is the generation of the animal spirits, which are like a very subtle wind, or rather a very pure and vivid flame which, continually ascending in great abundance from the heart to the brain, thence penetrates through the nerves into the muscles, and gives motion to all the members; so that to account for other parts of the blood which, as most agitated and penetrating, are the fittest to compose these spirits, proceeding towards the brain, it is not necessary to suppose any other cause, than simply, that the arteries which carry them thither proceed from the heart in the most direct lines, and that,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mechanics which are the same with those of nature, when many objects tend at once to the same point where there is not sufficient room for all (as is the case with the parts of the blood which flow forth from the left cavity of the heart and tend towards the brain), the weaker and less agitated parts must necessarily be driven aside from that point by the stronger which alone in this way reach it I had expounded all these matters with sufficient minuteness in the treatise which I formerly thought of publishing. And after these, I had shown what must be the fabric of the nerves and muscles of the human body to give the animal spirits contained in it the power to move the members, as when we see heads shortly after they have been struck off still move and bite the earth, although no longer animated; what changes must take place in the brain to produce waking, sleep, and dreams; how light, sounds, odors, tastes, heat, and all the other qualities of external objects impress it with different ideas by means of the senses; how hunger, thirst, and the other internal affections can likewise impress upon it divers ideas; what must be understood by the common sense (sensus communis) in which these ideas are received, by the memory which retains them, by the fantasy which can change them

in various ways, and out of them compose new ideas, and which, by the same means, distributing the animal spirits through the muscles, can cause the members of such a body to move in as many different ways, and in a manner as suited, whether to the objects that are presented to its senses or to its internal affections, as can take place in our own case apart from the guidance of the will. Nor will this appear at all strange to those who are acquainted with the variety of movements performed by the different automata, or moving machines fabricated by human industry, and that with help of but few pieces compared with the great multitude of bones, muscles, nerves, arteries, veins, and other parts that are found in the body of each animal. Such persons will look upon this body as a machine made by the hands of God, which is incomparably better arranged, and adequate to movements more admirable than is any machine of human invention. And here I specially stayed to show that, were there such machines exactly resembling organs and outward form an ape or any other irrational animal, we could have no means of knowing that they were in any respect of a different nature from these animals; but if there were machines bearing the image of our bodies, and capable of imitating our actions as far as it is morally possible, there would still remain two most certain tests whereby to know that they were not therefore really men. Of these the first is that they could never use words or other signs arranged in such a manner as is competent to us in order to declare our thoughts to others: for we may easily conceive a machine to be so constructed that it emits vocables, and even that it emits some correspondent to the action upon it of external objects which cause a change in its organs; for example, if touched in a particular place it may demand what we wish to say to it; if in another it may cry out that it is hurt, and such like; but not that it should arrange them variously so as appositely to reply to what is said in its presence, as men of the lowest grade of intellect can do. The second test is, that although

such machines might execute many things with equal or perhaps greater perfection than any of us, they would, without doubt, fail in certain others from which it could be discovered that they did not act from knowledge, but solely from the disposition of their organs: for while reason is an universal instrument that is alike available on every occasion, these organs, on the contrary, need a particular arrangement for each particular action; whence it must be morally impossible that there should exist in any machine a diversity of organs sufficient to enable it to act in all the occurrences of life, in the way in which our reason enables us to act. Again, by means of these two tests we may likewise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brutes. For it is highly deserving of remark, that there are no men so dull and stupid, not even idiots, as to be incapable of joining together different words, and thereby constructing a declaration by which to make their thoughts understood; and tha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no other animal, however perfect or happily circumstanced, which can do the like. Nor does this inability arise from want of organs: for we observe that magpies and parrots can utter words like ourselves, and are yet unable to speak as we do, that is, so as to show that they understand what they say; in place of which men born deaf and dumb, and thus not less, but rather more than the brutes, destitute of the organs which others use in speaking, are in the habit of spontaneously inventing certain signs by which they discover their thoughts to those who, being usually in their company, have leisure to learn their language. And this proves not only that the brutes have less reason than man, but that they have none at all: for we see that very little is required to enable a person to speak; and since a certain inequality of capacity is observable among animals of the same species, as well as among men, and since some are more capable of being instructed than others, it is incredible that the most perfect ape or parrot of its species, should not in this be equal to the most stupid infant of its

kind or at least to one that was crack-brained, unless the soul of brutes were of a nature wholly different from ours. And we ought not to confound speech with the natural movements which indicate the passions, and can be imitated by machines as well as manifested by animals; nor must it be thought with certain of the ancients, that the brutes speak, although we do not understand their language. For if such were the case, since they are endowed with many organs analogous to ours, they could as easily communicate their thoughts to us as to their fellows. It is also very worthy of remark, that, though there are many animals which manifest more industry than we in certain of their actions, the same animals are yet observed to show none at all in many others: so that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y do better than we does not prove that they are endowed with mind, for it would thence follow that they possessed greater reason than any of us, and could surpass us in all things; on the contrary, it rather proves that they are destitute of reason, and that it is nature which acts in them according to the disposition of their organs: thus it is seen, that a clock composed only of wheels and weights can number the hours and measure time more exactly than we with all our skin.

不过，还有许多其他情况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确实是血液运动的真正原因。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静脉血和动脉血是有差别的，这只能是因为血液在经过心脏时变得稀薄了，被汽化了。所以血液刚刚从心脏流出，也就是刚刚流入动脉时，比血液进入心脏以前，即处在静脉中时要更稀薄、更活泼、更温热。如果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这种差别只是在靠近心脏的地方表现得非常显著，在离心脏较远的地方则没那么显著了。其次，可以看到，肺静脉和大动脉的血管壁较为坚韧，这足以表明，血液对其冲击比对静脉的冲击更为有力。若不是肺动脉中的血液从心脏流出后，只经过了肺，而变得比大静脉里的血液更精细，更容易变得稀薄，并且在更高的温度下，与刚刚从空的静脉

中流出的血液相比，也会发生这样的变化，那么，左心房和大动脉为什么会比右心房和动静脉更宽、更大呢？医生若是不知道，随着血液性质的改变，心脏温度可以使血液的黏稠度变得更高或更低，变化速度也会或快或慢，他又怎么能切脉诊断呢？若要问这种热量是如何传遍全身的，我们只能够说，那是因为血液经过心脏时重新变热，所以可以传遍全身。所以，不管是身体的哪一部分，若是把血液去除，热度也同样会被去除。虽然心脏烫得跟烧红的铁块一样，如果没有把新的血液不断地送进手和脚，那手和脚是不会有温度的。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呼吸的真正作用就是要往肺里运送足够的新鲜空气。血液在心脏中已经稀化，变成蒸汽，从右心房进入两肺，遇到空气就变得黏稠，重新转化成血液，然后流回左心房。唯有这样才能给心脏中的火提供燃料，这一点可以从各方面得以确认。我们可以看到，没有肺的动物，其心脏也是有心房的，但只有一个心房；腹中之胎儿不能用肺，它们腹中就有一个孔，血液可以从大静脉流到左心房，又有一个管可以使血液从肺静脉一直流到大动脉，而不用经过肺。其次，消化之所以能在胃中进行，是因为心脏通过动脉把热量传送到了胃里，同时还送去了一些流动性更强的血液，帮助分解吃进的食物。如果能想到，血液反复经过心脏，化为蒸汽，一天之内也许超过一两百次，那么不也就很容易理解食物浆汁转化成血液的过程了吗？也没有更多必要解释营养是怎么回事，体内各种体液的产生是怎么回事。只需要说，血液在稀化时带有一股力量，从心脏流向动脉末端，到达各个器官时，血液中某些成分会在那里停留下来，驱逐一些原有成分，占据它们的位置。由于遇到的空隙在位置、形状、大小等方面各有不同，所以有的成分能驻留在一些空隙里，有的则无法驻留。这难道不像一些筛子吗？这些筛子被打上各式各样的漏孔，可以将不同种类的谷物筛选开来。最后，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动物元气的产生。元气好比一阵非常微妙的风，更像是一团无比纯净且活跃的火焰，持续不断地、大量地从心脏向大脑上升，继而大脑通过神经渗透到肌肉，使全身所有部分能够运动。如此就无需再假设别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最活跃、最具渗透力的血液成分最适宜构成元气，为什么它们只流向大脑，而不是别处。这只是因为，从心脏输送到大脑的动脉是最直的，而且，按照机械力学定律（自然规律也是如此），若许多物质全都同时挤向一

个点，而这个点又没有足够空间容纳所有物质（血液成分从左心房流到大脑的情况正是如此），那么较弱的和不活跃的物质就一定会被强有力地挤到一边，强有力的物质会以这种方式独自到达那个点。在原来打算出版的那篇专题论文里，我已经把上述一切解释得十分详细了。随后，我又指出，人身上的神经和肌肉一定要构造成什么样子，其中的元气才能使身体运动。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刚被砍下的头颅，尽管已经不再是活的了，但仍然还能滚来滚去，甚至啃咬泥土。大脑里一定发生了什么变化才能使人清醒、睡去和做梦；光亮、声音、气味、味觉、温度以及外界事物的所有其他属性怎样能够通过感官在脑海之中留下不同的观念；饥、渴以及其他内心的多种多样的感觉又是怎样在脑海中产生的呢？这些必须要用一般常理（共通感）来解释怎样接纳这些观念，记忆怎样保存这些观念，幻想怎样用不同的方法改变这些观念，进而组成新的观念，并且用同样的方法将动物元气分发到肌肉中，如此方能使身体各部分用不同的方法运动，动作各式各样，合适相宜，既有关于感官对象方面的，又有关于内心感受方面的，正如我们的身体，没有意志导引也能运动。这对一些人来说，一点儿也不奇怪。这些人熟悉各式各样、千差万别的人类编造出来的自动机或者运动机产生的运动。但是，这些机器用的只是几个零部件，这些零部件与每个动物身上大量的骨骼、肌肉、神经、动脉、静脉以及其他部件相比是少之又少的。因此这些人觉得人体也不过是上帝之手造出的机器。不过，比起任何人类发明的机器，人体组织更精致，运动更灵活罢了。说到这里，我特意停下来，我要指出，假如确实有这样的机器，其外形和器官跟猴子或其他无理性动物一样，那么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其本性与这些动物有什么区别。可是如果一些机器拥有我们身体的外形，并能尽可能正常地模仿我们的行为举止，我们仍然有两种非常可靠的检验标准来判断其并不因此就是真正的人。第一条标准是：它们永远不会像我们这样使用语言或其他由语言的形态构成的符号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我们纵然可以容易地想象出这样一台机器，可以发声，甚至有外力碰触改变其部件时，可以有一些相应的回应。例如，如果被触碰某一个特殊地方，它就会问我们要它干什么，如果你触碰另外的地方，它就会喊疼，诸如此类。但是，它绝不能将这些字句进行适当地、多样地排列来回复相应的问

题，而这是最笨的人都能办到的。第二条标准是：那些机器虽然可以做许多事情，做得跟我们中的任何人一样好，也许更好，但是，毋庸置疑，仍有一些事情是它们做不了的。由此可以看出，它们的活动所依靠的不是知识，而只是零部件的排列。因为理性是万能工具，适用于各种场合。相反，这些零部件则不然，一举一动都需要有特殊的安排。要想有一台机器，其零部件复杂多样，足以使它模仿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情景，并能像我们一样依循理性行事，这样的机器肯定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靠这两条标准，我们同样可以了解人与兽类之间的差别。因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世人无论多么愚昧、多么鲁钝，甚至天生拙笨，总能把不同的字词组织成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与此相反，其他的动物不管多么完美，多么得天独厚，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一切并不是缺少器官所致，因为我们观察到，八哥和鹦鹉都能像我们人类一样发声，然而却不能像我们人类一样说话。也就是说，不能证明它们理解它们所发出的声音。说到人类，天生聋哑的人跟兽类一样缺少说话所用的发声器官，但是他们却习惯于自发地创造特定的手势，用这些手势向与他们经常在一起并且有空闲时间学习他们“语言”的人们来表达他们的思想。这就证明，兽类并非理性比人少，而是根本没有理性，因为我们明白，一个人学说话并不需要太多理性。我们可以看到，同种的动物，跟人一样，相互间能力不一致，一些比另一些更容易训练。可是，最完美的猴子和鹦鹉，在学说话这一点上，都比不上最笨的小孩，就连精神失常的小孩也比不上。所以简直无法想象，兽类的灵魂在本质上会跟我们的灵魂完全一样。我们不能把语言同动物表达感情的自然动作混为一谈，因为这些动作机器可以模仿，动物也可以模仿。我们也不能像某些古人那样，认为兽类也有语言，只是我们不懂它们的语言罢了。如果真是如此，既然它们有许多跟我们相似的器官，那么它们就应该可以容易地向我们表达它们的思想，就像它们同类之间的交流一样。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许多动物在某些动作上表现得比我们灵巧，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其他许多事情上却一点儿也不灵巧。它们做得比我们好并不证明它们就用心灵努力做事，因为，如果它们比我们中的任何人拥有更多的理性，它们会在一切事情上都比我们做得好。这一点反而证明它们并没有理性，它们的一切动作都是身体器官结构的自然反应而已。

这正如我们看到的时钟一样，它只有齿轮和发条，却能打点计时，比我们任何人都要精准。

I had after this described the reasonable soul, and shown that it could by no means be educed from the power of matter, as the other things of which I had spoken, but that it must be expressly created; and that it is not sufficient that it be lodged in the human body exactly like a pilot in a ship, unless perhaps to move its members, but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it to be joined and united more closely to the body, in order to have sensations and appetites similar to ours, and thus constitute a real man. I here entered, in conclusion, upon the subject of the soul at considerable length, because it is of the greatest moment: for after the error of those who deny the existence of God, an error which I think I have already sufficiently refuted, there is none that is more powerful in leading feeble minds astray from the straight path of virtue than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soul of the brutes is of the same nature with our own; and consequently that after this life we have nothing to hope for or fear, more than flies and ants; in place of which, when we know how far they differ we much better comprehend the reasons which establish that the soul is of a nature wholly independent of the body, and that consequently it is not liable to die with the latter and, finally, because no other causes are observed capable of destroying it, we are naturally led thence to judge that it is immortal.

此后，我又把理性灵魂加以描述，指出它绝对不可能跟我说过的其他事情一样也来自于物质的力量。但是，它显然应该是上帝创造出来的。理性灵魂之于身体，并不仅仅是舵手之于船舶那样的关系，否则也许身体的各种器官是不会动的。它必须和身体紧密地合二为一，

才能有与我们相似的感觉和嗜好，构成一个真正的人。在结论中，我对灵魂问题稍微多作一些讨论，因为这个问题最重要。无神论者的错误，我在上面已经充分地予以了驳斥。可是，此外还有一种错误最能使不坚定的人离开道德正道，那就是假设兽类的灵魂同我们的灵魂本质相同，因而以为我们跟苍蝇、蚂蚁一样，对身后事既无希望亦无恐惧。相反，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与动物的差别有多大，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为何我们的灵魂本性可以完全独立于身体之外，因而不会与身体同归于尽了。最后，既然看不到别的原因可以毁灭灵魂，我们自然可以断定，灵魂是不朽的。

Part VI

第六部分

Three years have now elapsed since I finished the treatise containing all these matters; and I was beginning to revise it, with the view to put it into the hands of a printer, when I learned that persons to whom I greatly defer, and whose authority over my actions is hardly less influential than is my own reason over my thoughts, had condemned a certain doctrine in physics, published a short time previously by another individual to which I will not say that I adhered, but only that, previously to their censure I had observed in it nothing which I could imagine to be prejudicial either to religion or to the state, and nothing therefore which would have prevented me from giving expression to it in writing, if reason had persuaded me of its truth; and this led me to fear lest among my own doctrines likewise some one might be found in which I had departed from the truth, notwithstanding the great care I have always taken not to accord belief to new opinions of which I had not the most certain demonstrations, and not to give expression to aught that might tend to the hurt of any one. This has been sufficient to make me alter my purpose of publishing them; for although the reasons by which I had been induced to take this resolution were very strong, yet my inclination, which has always been hostile to writing books, enabled me immediately to discover other considerations sufficient to excuse me for not undertaking the task. And these reasons, on one side and the other, are such, that not only is it in some measure my interest here to state them, but that of the public, perhaps, to know them.

那篇专题论文包含了所有这些问题，从完成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之久了。正当我要着手修改、准备付印时，却听说一些我非常尊重的权威人士抨击了某人新近发表的一种物理学方面的见解。这些权威人士的权威对我行为的影响很大，不亚于我的理性对我思想的影响。某人的那种见解，虽说我不一定坚持，但在他们提出批评之前，我确实没能想到该见解有什么不利于宗教和国家的。因此，倘若我的理性能够证明其真实性，我是不会拒绝把它写进我的书里的。此事不免使我惶恐，因为虽然我一向谨慎小心，但我自己的见解也同某人的见解一样难免会有偏离真理的地方。任何新的见解，只要我没有最可靠之证明，则不予置信。任何见解，只要有可能对他人不利，我总不肯下笔。这足以使我改变原来的决定，不再发表我的那些见解了。因为之前我想发表的理由虽然非常有力，但是依我本就不乐于写书的性格，我立即找到了不少理由，为不付印此书辩解。这些理由，无论从哪方面说都颇有一些意味。因此，不光是我自己有兴趣在这里说一说，而且或许公众也有兴趣想了解一下。

I have never made much account of what has proceeded from my own mind; and so long as I gathered no other advantage from the method I employ beyond satisfying myself on some difficulties belonging to the speculative sciences, or endeavouring to regulate my action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it taught me, I never thought myself bound to publish anything respecting it. For in what regards manners, every one is so full of his own wisdom, that there might be found as many reformers as heads, if any were allowed to take upon themselves the task of mending them, except those whom God has constituted the supreme rulers of his people or to whom he has given sufficient grace and zeal to be prophets; and although my speculations greatly pleased myself, I believed that others had theirs, which perhaps pleased them still more. But as soon as I had acquired some general notions respecting physics, and beginning to make trial of them in various particular difficulties, had observed

how far they can carry us, and how much they differ from the principles that have been employed up to the present time, I believed that I could not keep them concealed without sinning grievously against the law by which we are bound to promote, as far as in us lies, the general good of mankind. For by them I perceived it to be possible to arrive at knowledge highly useful in life; and in room of the speculative philosophy usually taught in the schools, to discover a practical, by means of which, knowing the force and action of fire, water, air, the stars, the heavens, and all the other bodies that surround us, as distinctly as we know the various crafts of our artisans, we might also apply them in the same way to all the uses to which they are adapted, and thus render ourselves the lords and possessors of nature. And this is a result to be desired, not only in order to the invention of an infinity of arts, by which we might be enabled to enjoy without any trouble the fruits of the earth, and all its comforts, but also and especiall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health, which is without doubt, of all the blessings of this life, the first and fundamental one; for the mind is so intimately dependent upon the condition and relation of the organs of the body, that if any means can ever be found to render men wiser and more ingenious than hitherto, I believe that it is in medicine they must be sought for. It is true that the science of medicine, as it now exists, contains few things whose utility is very remarkable: but without any wish to depreciate it, I am confident that there is no one, even among those whose profession it is, who does not admit that all at present known in it is almost nothing in comparison of what remains to be discovered; and that we could free ourselves from an infinity of maladies of body as well as of mind, and perhaps also even from the debility of age, if we had sufficiently ample knowledge of their causes, and of all the remedies provided for us by nature. But since I designed to employ my whole life in the search after so necessary a science, and since I

had fallen in with a path which seems to me such, that if any one follow it he must inevitably reach the end desired, unless he be hindered either by the shortness of life or the want of experiments, I judged that there could be no more effectual provision against these two impediments than if I were faithfully to communicate to the public all the little I might myself have found, and incite men of superior genius to strive to proceed farther, by contributing, each according to his inclination and ability, to the experiments which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make, and also by informing the public of all they might discover, so that, by the last beginning where those before them had left off, and thus connecting the lives and labours of many, we might collectively proceed much farther than each by himself could do.

我自己脑中所产之物，我向来不是很看重。靠这种方法，我只是彻底弄明白了一些思辨科学的难题，或者按其教给我的原则，努力规范自己的行为，此外再无所获，因此我从来没有想过一定要出版有关这种方法的某些东西。说到为人处世，人人都是智慧满满，若能自我完善，则个个都是改革能手。那些上帝所赐的万民最高统治者，或者得天独厚、满腔热忱的先知先觉者除外。因此，我的思想，虽然使我自己觉得欣喜，然而我相信他人亦有他人之思想，或许能令其更为欣喜。但是，当我从物理学上获得了一些普遍观念，并将之用于解决各种难题时，我发现其对我们的作用非常大，与时下的应用原则大相径庭。因此我认为，若藏而不露，不免严重违反我们必须促进的法律体系，甚至与我们仰赖的人类的整体利益相背离了。因为我看到，凭借这些理念，我们可能得到一些对人生非常有益的知识，也可能发现一种实用哲学来代替经院中的思辨哲学，进而知道火、水、空气、星星、天空，以及环绕我们的其他所有物体的力量和作用。正如同我们明了匠人的各种技术一样，而后我们可以因势利导，充分利用，进而使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属者。我们期待这样的结果，不仅是为了发明数不清的技术，使我们能够毫不费力地享受地球的各种资源，尤

其是为了保持健康。因为，毋庸置疑，健康是人生最为重要的幸福，也是其他幸福之基础。因为人之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体器官的状况和关系，倘若能找到一种方法可以使人变得比现在更聪明、更能干，我认为这只能在医学中探求了。现有之医学鲜有显著之疗效，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此说毫无轻视医学之意。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包括医学业内人士在内，都不会不承认，医学上目前所有已知的东西，与尚待发现的东西相比，几乎等于零。如果我们对于无数的身心疾病及衰老的原因能有充分的了解，并能充分认识自然所提供的一切药物，我想我们是可以免除疾病的，甚至也许可以延长寿命。所以我打定主意，愿用毕生精力来寻求此极其必要之科学，而且我已经找到了一种非常可靠的途径。在我看来，任何人只要照着走，必定可以万无一失地达到目的，除非他因生命短促或是经验不足而受阻。因此我认为，要排除这两重障碍，最好把自己的发现原本地、毫无保留地与大家交流，激发优秀的天才们进一步研究。依照各人的倾向和能力，从事必要的实验，把自己可能发现的所有东西告诉大众，薪火相传，通力合作，从而把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和劳动汇合在一起，群策群力，我们所得之成绩比之单干，可能要卓著得多。

I remarked, moreover, with respect to experiments, that they become always more necessary the more one is advanced in knowledge; for, at the commencement, it is better to make use only of what is spontaneously presented to our senses, and of which we cannot remain ignorant, provided we bestow on it any reflection, however slight, than to concern ourselves about more uncommon and recondite phenomena: the reason of which is, that the more uncommon often only mislead us so long as the causes of the more ordinary are still unknown; and the circumstances upon which they depend are almost always so special and minute as to be highly difficult to detect. But in this I have adopted the following order: first, I have essayed to find in general the principles, or first causes of all that is or can be in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for this end anything but God himself who has created it, and without educing them from any other source than from certain germs of truths naturally existing in our minds. In the second place, I examined what were the first and most ordinary effects that could be deduced from these causes; and it appears to me that, in this way, I have found heavens, stars, an earth, and even on the earth water, air, fire, minerals, and some other things of this kind, which of all others are the most common and simple, and hence the easiest to know. Afterwards when I wished to descend to the more particular, so many diverse objects presented themselves to me, that I believed it to be impossible for the human mind to distinguish the forms or species of bodies that are upon the earth, from an infinity of others which might have been, if it had pleased God to place them there, or consequently to apply them to our use, unless we rise to causes through their effects, and avail ourselves of many particular experiments. Thereupon, turning over in my mind I the objects that had ever been presented to my senses I freely venture to state that I have never observed any which I could not satisfactorily explain by the principles had discovered. But it is necessary also to confess that the power of nature is so ample and vast, and these principles so simple and general, that I have hardly observed a single particular effect which I cannot at once recognize as capable of being deduced in man different modes from the principles, and that my greatest difficulty usually is to discover in which of these modes the effect is dependent upon them; for out of this difficulty cannot otherwise extricate myself than by again seeking certain experiments, which may be such that their result is not the same, if it is in the one of these modes at we must explain it, as it would be if it were to be explained in the other. As to what remains, I am now in a position to discern, as I think, with sufficient clearness what course must be taken to make the majority those experiments which may conduce to this end: but I perceive

likewise that they are such and so numerous, that neither my hands nor my income, though it were a thousand times larger than it is, would be sufficient for them all; so that according as henceforward I shall have the means of making more or fewer experiments, I shall in the same proportion make greater or less progress in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This was what I had hoped to make known by the treatise I had written, and so clearly to exhibit the advantage that would thence accrue to the public, as to induce all who have the common good of man at heart, that is, all who are virtuous in truth, and not merely in appearance, or according to opinion, as well to communicate to me the experiments they had already made, as to assist me in those that remain to be made.

关于实验，我还说过，一个人所学的知识越是高深，就越是需要实验。因为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宁可只采用那些能自然地呈现到我们感官中的实验，以及我们不可能忽略的实验，而这样的实验，我们略加思考便可得到，而不是关注非同寻常和深奥晦涩的现象。原因在于：只要普通常见现象的原因尚未知晓，非同寻常现象常常只会误导我们。现象所依靠之条件几乎总是很特殊、很细微，非常不易觉察的。但关于这一点，我采取了下列步骤：首先，找出万物的普遍原则，只把上帝作为万物之根源，而不考虑其他概念。只发掘灵魂深处固有之真理萌芽，从中找出原因。其次，我仔细观察从这些普遍原则能引申出什么最为常见的结果。我发现天体、星宿、地球，以及地球上的水、气、火、矿等等都是最常见、最简单的，也是最容易了解的。后来，我又想用这些普遍原理进而研究更特殊的事物。然而，此时许许多多森罗万象的事物呈现眼前，使我发现，若非我们自己利用各种特殊实验据果寻因，仅以人之心灵来分辨世界上的各种物类是绝不可能造出来的。因为除了地球上的物种以外，上帝所造的东西或者所要供人用的东西还有其他数不清的物种。因此，我把感官所得的印象在心中辗转思索后敢大胆申说，我所碰到的事物，无不可用我所发现的原则圆满解答。然而还必须承认，自然之力量虽然巨大无比、广

袤无边，但这些原则也非常简易、非常笼统。因此我注意到，几乎没有一个单一的特殊原则可以从这些原则中由各种途径推衍出来。我最大的困难是，通常难以判定这些结果究竟依靠哪种方式得来。为了克服这种困难，我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再次求之于特定的实验，依实验结果的不同来决定改用哪种方式。关于其他的事情，我现在觉得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来做大部分实验以证明我的理论。不过，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些实验是如此纷繁杂多，而我只有两只手，收入也少，纵使再多出几千倍也无法把一切实验做完。因此，我在获取自然知识方面能有多大进展，就要看我今后有多少条件来做实验了。这就是我写那篇专题论文希望大家了解的，并且我明确指出大家由此所能得到的益处。所以，我要求一切从内心深处关心人类福利的人，也就是所有真正品德高尚的人，而不是那些沽名钓誉、表里不一的人，希望他们能将已经做过的实验跟我交流一下，以便对我将要做的实验给予帮助。

But since that time other reasons have occurred to me, by which I have been led to change my opinion, and to think that I ought indeed to go on committing to writing all the results which I deemed of any moment, as soon as I should have tested their truth, and to bestow the same care upon them as I would have done had it been my design to publish them. This course commended itself to me, as well because I thus afforded myself more ample inducement to examine them thoroughly, for doubtless that is always more narrowly scrutinized which we believe will be read by many, than that which is written merely for our private use (and frequently what has seemed to me true when I first conceived it, has appeared false when I have set about committing it to writing), as because I thus lost no opportunity of advanc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as far as in me lay, and since thus likewise, if my writings possess any value, those into whose hands they may fall after my death may be able to put them to what use they deem proper. But I resolved by

no means to consent to their publication during my lifetime, lest either the oppositions or the controversies to which they might give rise, or even the reputation, such as it might be, which they would acquire for me, should be any occasion of my losing the time that I had set apart for my own improvement. For though it be true that every one is bound to promote to the extent of his ability the good of others, and that to be useful to no one is really to be worthless, yet it is likewise true that our cares ought to extend beyond the present, and it is good to omit doing what might perhaps bring some profit to the living, when we have in view the accomplishment of other ends that will be of much greater advantage to posterity. And in truth, I am quite willing it should be known that the little I have hitherto learned is almost noth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which I am ignorant, and to the knowledge of which I do not despair of being able to attain; for it is much the same with those who gradually discover truth in the sciences, as with those who when growing rich find less difficulty in making great acquisitions, than they formerly experienced when poor in making acquisitions of much smaller amount. Or they may be compared to the commanders of armies, whose forces usually increase in proportion to their victories, and who need greater prudence to keep together the residue of their troops after a defeat than after a victory to take towns and provinces. For he truly engages in battle who endeavours to surmount all the difficulties and errors which prevent him from reaching the knowledge of truth, and he is overcome in fight who admits a false opinion touching a matter of any generality and importance, and he requires thereafter much more skill to recover his former position than to make great advances when once in possession of thoroughly ascertained principles. As for myself, if I have succeeded in discovering any truths in the sciences (and I trust that what is contained in this volume will show that I have found some), I can

declare that they are but the consequences and results of five or six principal difficulties which I have surmounted, and my encounters with which I reckoned as battles in which victory declared for me. I will not hesitate even to avow my belief that nothing further is wanting to enable me fully to realize my designs than to gain two or three similar victories; and that I am not so far advanced in years but that, according to the ordinary course of nature, I may still have sufficient leisure for this end. But I conceive myself the more bound to husband the time that remains the greater my expectation of being able to employ it aright, and I should doubtless have much to rob me of it, were I to publish the principles of my physics: for although they are almost all so evident that to assent to them no more is needed than simply to understand them, and although there is not one of them of which I do not expect to be able to give demonstration, yet, as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y can be in accordance with all the diverse opinions of others, I foresee that I should frequently be turned aside from my grand design, on occasion of the opposition which they would be sure to awaken.

但从那以后，我又不断发现别的理由使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应当实实在在地继续写下去。凡我认为重要之物，任何时刻，只要我能证明其真实性，就要原原本本将之写出来，而且力求字斟句酌，如同打算出版一样。我喜欢这个过程，因为这样做我可以反复推敲，彻底考察。因为，毫无疑问，我们相信，准备给许多人看的书总是会处处检查，而只给我们自己写的书则不免马虎（惯常遇到的情况是，我第一次认识时觉得是对的，动笔时又发现了错误）。还因为，如果一味为自己写作，我便没有机会给公众提供益处。同样，若我的东西有什么价值的话，在我身后，有机会读我书的人也许会将之用于正当途径。但是，我已下定决心，决不同意在有生之年将之出版，以免引来反驳或争论，甚至给我招来无可奈何的毁誉，耽误我预留出来准备使自己进步的时光。因为尽管人人都应当竭力为他人谋福利，而

若对他人无益，则真真正正是毫无用处可言，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同样千真万确的是，我们应该高瞻远瞩，放眼未来，着眼于完成能对后人带来更大幸福之工作，而将也许对今人有益之事搁置一旁，亦无不可。其实，我很乐于告知大家，我至今所知之物，比之未知世界，可谓是冰山一角。但是对我能够获得的知识，我并没有绝望。在各门学科里渐渐发现真理的人，简直就如同已经开始致富的人一样，不费力气就能获得很大收益，不像以前贫困时那样，费了很大力气，稍微营利亦觉困难；亦可将在各门学科中寻求真理的人们比作军队的将军，通常他们军队打的胜仗越多，则军队愈加强大。将军们在军队遭惨败时，比之攻城占省得胜时，则需要更大智慧才能把军队统领在一起。寻求真理的人们努力克服妨碍他们认识真理的种种困难，纠正种种错误。如同在战场上一样，在任何有些许普遍性和重要性的事情上，若接受错误看法就如同打了败仗，要恢复原来的阵地委实不易，比之有可靠原则指导前进需要更多的技巧。至于我自己，若说我已经发现一些学科上的真理的话（我相信此书中的内容可以证明我已经发现了一些），我可以声明说，这些真理是在克服了五六个重大困难后得到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打了五六场胜仗后取得的胜利果实吧。我甚至还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只要再有两三场类似的胜仗，我的计划就可全部实现。我年龄还不算大，按照常理，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完成这个计划。可是，我自己觉得，越是想好好利用时间，越是觉得剩下的时间应该好好珍惜。若是将我的物理学原理发表，势必会惹出事端，不免耽搁时间。尽管这些原理几乎全都十分明了，只要理解它们就会予以赞同。虽然每一原理我都可以给予证明，可是别人的意见多种多样，我的原理不可能都与之相契合，所以我预料定会引起各种反驳，使我会经常偏离我的宏伟计划。

It may be said, that these oppositions would be useful both in making me aware of my errors, and, if my speculations contain anything of value, in bringing others to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it; and still farther, as many can see better than one, in leading others who are now beginning to avail themselves of my principles, to

assist me in turn with their discoveries. But though I recognize my extreme liability to error, and scarce ever trust to the first thoughts which occur to me, yet the experience I have had of possible objections to my views prevents me from anticipating any profit from them. For I have already had frequent proof of the judgments, as well of those I esteemed friends, as of some others to whom I thought I was an object of indifference, and even of some whose malignancy and envy would, I knew, determine them to endeavour to discover what partiality concealed from the eyes of my friends. But it has rarely happened that anything has been objected to me which I had myself altogether overlooked, unless it were something far removed from the subject: so that I have never met with a single critic of my opinions who did not appear to me either less rigorous or less equitable than myself. And further, I have never observed that any truth before unknown has been brought to light by the disputations that are practised in the schools; for while each strives for the victory, each is much more occupied in making the best of mere verisimilitude, than in weighing the reasons on both sides of the question; and those who have been long good advocates are not afterwards on that account the better judges.

当然也可以说这些反驳并非无益，一则可以使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二则若我的思想含有某些价值，也可以使他人能更充分地理解。更重要的是，人众知识就广博，这可引导他人从现在起就开始利用我的原则，反过来，我也可以从他们的发现中得到帮助。但是，尽管我承认自己极易犯错，且心里第一次产生想法时几乎从来不敢自信。然而，基于经验，由于旁人对我的见解可能会给予反驳，所以我不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益处。因为我已经多次验证他们的批评，有的来自朋友，有的来自不相干的人，甚至有些人心怀恶意和嫉妒。我知道，我的朋友因偏袒而忽略的问题，他们都不遗余力加以揭露。可是，他们的反驳，很少为我所忽略。即便有，也是一些细枝末节，离题很远。

因此，在我看来，我所遇到的对我观点提出反驳的批评家，没有一个比我更严格、更公正。此外，我从未发现经院式辩论会把从前未知晓的真理阐述明白，因为争辩之时人人都竭力求胜，都想将似是而非之理论说得极其中听，很少权衡双方针对问题提出的理由。而且，那些长期从事辩护的优秀律师，并不一定因此后来就会成为更优秀的法官。

As for the advantage that others would derive from the communication of my thoughts, it could not be very great; because I have not yet so far prosecuted them as that much does not remain to be added before they can be applied to practice. And I think I may say without vanity, that if there is any one who can carry them out that length, it must be myself rather than another: not that there may not be in the world many minds incomparably superior to mine, but because one cannot so well seize a thing and make it one's own, when it has been learned from another, as when one has himself discovered it. And so true is this of the present subject that, though I have often explained some of my opinions to persons of much acuteness, who, whilst I was speaking, appeared to understand them very distinctly, yet, when they repeated them, I have observed that they almost always changed them to such an extent that I could no longer acknowledge them as mine. I am glad, by the way,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of requesting posterity never to believe on hearsay that anything has proceeded from me which has not been published by myself; and I am not at all astonished at the extravagances attributed to those ancient philosophers whose own writings we do not possess; whose thoughts, however, I do not on that account suppose to have been really absurd, seeing they were among the ablest men of their times, but only that these have been falsely represented to us. It is observable, accordingly, that scarcely in a single instance has any one of their disciples surpassed them;

and I am quite sure that the most devoted of the present followers of Aristotle would think themselves happy if they had as much knowledge of nature as he possessed, were it even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y should never afterwards attain to higher. In this respect they are like the ivy which never strives to rise above the tree that sustains it, and which frequently even returns downwards when it has reached the top; for it seems to me that they also sink, in other words, render themselves less wise than they would be if they gave up study, who, not contented with knowing all that is intelligibly explained in their author, desire in addition to find in him the solution of many difficulties of which he says not a word, and never perhaps so much as thought. Their fashion of philosophizing, however, is well suited to persons whose abilities fall below mediocrity; for the obscurity of the distinctions and principles of which they make use enables them to speak of all things with as much confidence as if they really knew them, and to defend all that they say on any subject against the most subtle and skilful, without its being possible for any one to convict them of error. In this they seem to me to be like a blind man, who, in order to fight on equal terms with a person that sees, should have made him descend to the bottom of an intensely dark cave: and I may say that such persons have an interest in my refraining from publish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philosophy of which I make use; for, since these are of a kind the simplest and most evident, I should, by publishing them, do much the same as if I were to throw open the windows, and allow the light of day to enter the cave into which the combatants had descended. But even superior men have no reason for any great anxiety to know these principles, for if what they desire is to be able to speak of all things, and to acquire a reputation for learning, they will gain their end more easily by remaining satisfie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truth, which can be found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in all sorts of matters, than by

seeking the truth itself which unfolds itself but slowly and that only in some departments, while it obliges us, when we have to speak of others, freely to confess our ignorance. If, however, they prefer the knowledge of some few truths to the vanity of appearing ignorant of none, as such knowledge is undoubtedly much to be preferred, and, if they choose to follow a course similar to mine, they do not require for this that I should say anything more than I have already said in this discourse. For if they are capable of making greater advancement than I have made, they will much more be able of themselves to discover all that I believe myself to have found; since as I have never examined aught except in order, it is certain that what yet remains to be discovered is in itself more difficult and recondite, than that which I have already been enabled to find, and the gratification would be much less in learning it from me than in discovering it for themselves. Besides this, the habit which they will acquire, by seeking first what is easy, and then passing onward slowly and step by step to the more difficult, will benefit them more than all my instructions. Thus, in my own case, I am persuaded that if I had been taught from my youth all the truths of which I have since sought out demonstrations, and had thus learned them without labour, I should never, perhaps, have known any beyond these; at least, I should never have acquired the habit and the facility which I think I possess in always discovering new truths in proportion as I give myself to the search. And, in a single word, if there is any work in the world which cannot be so well finished by another as by him who has commenced it, it is that at which I labour.

至于我的思想能给旁人带去多少益处，我想不会太多。因为我的思想还不完全成熟，还需添加很多东西才能用于实践。我想我可以毫不虚夸地说，如果有谁能将我的思想长久贯彻，那么这个人应该是我

自己，而不会是别人。并不是说世上没有比我更聪明之人，而是因为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某个东西，比之自己发现的某个东西，是无法很好把握、运用自如的。这层道理用到这里很贴切，因为我曾将自己的思想解释给一些非常聪明的人。在我讲时，他们似乎理解得很清楚，然而，若让他们复述，我就注意到他们几乎把原来的东西改得面目全非了，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是我的思想。我很高兴借此机会顺便请求后人注意，凡未经我自己发表之作，切勿道听途说，以为是我所作。那些古代哲学家，其著作不传于世，而后人往往将一些荒诞不经之作强加在其名下，对此我丝毫不觉得奇怪。然而，我并不因此就以为他们的思想真的荒诞不经，因为我明白，他们是当时他们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人，只不过那些著作传给我们时已经走样了。因此，我们都能注意到，先哲们的弟子竟无一人能超越他们。我非常相信，现在那些最狂热地遵奉亚里士多德的信徒，若能得到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多的自然知识，也会觉得他们自己很幸福，纵使在以后永远都不能得到更高水平知识的情况下也会觉得他们自己很幸福。从这一点看来，那些信徒就像藤萝一样，从不企图爬过自己依附的大树，而是爬到树的顶端之后，常常会转头往下爬。因为在我看来，那些信徒也在走下坡路。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放弃学习，那么本来明智的他们也会变得不明智了。这些人对原著者已经明白解释过的道理已经全部知道了，却还不满足，还要拿难题向原著者求答案。其实这些难题的答案，不但原著者没说过一个词，而且也许从未想过那么多。不过他们那种研究哲学的方法倒是很适合才智平庸的人。因为他们使用的范畴和原理都晦涩难懂，使他们能信心十足，评说一切，仿佛真懂一切事情，而且能为他们所说的任何主题辩护，对抗最巧妙、最有技巧的说法，不让任何人指出他们的错误来。他们这样做，在我看来就好像一个盲人一样，为了与能看得见的人地位平等地交战，就先要将对方拖入漆黑的山洞底部。因此，我若不把我使用的哲学原理发表出来，这些人倒是占了便宜，因为我的原理非常简单、非常明确，要是发表出来，正无异于把窗子打开，将阳光送到了他们跑下去交战的山洞里了。就连那些最聪明之人，也大可不必急于知道我的这些原理，如果他们所要的只是能够高谈阔论，赢得博学之美誉，那是很容易达到目的的，只要满足于真理的表象就可以了。这些表象的东西在各种事情中都能找到，无

需多大困难。相比之下，要寻求真理本身则只能层层剥笋，慢慢展开，并且只能在某些领域探索，所以就没那么容易了。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说到其他领域时就得坦白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了。然而，如果他们并不做出无所不知的样子，而是想知道那么几条真理，这点知识毋庸置疑是值得知道的，并且如果他们打算选择类似我的方法行事，那么看看我在这篇谈话中已经说过的就行了，并不需要我再多说什么。如果他们能力比我强，可以取得比我更大的成就，他们自己一定更有能力去发现我认为自己已经发现的一切。因为我研究事物一向是按部就班，所以尚待发现之物，比之我已能够发现之物本身一定更困难、更深奥。因此从我这里学习那些尚待发现之物，倒不如自己去发现来得痛快。除此之外，他们若能从探索简单问题入手，慢慢地逐步入难，养成循序渐进的习惯，那比接受我的教诲还要有益得多。就拿我自己来说，我现在所证明的一切真理，如果自幼就有人教我，并且我也毫不费力地学会它们，那么我相信，也许除这些之外，我再也不会知道什么。至少可以说，我永远不会养成现在拥有的习惯和能力，让我在致力于探索时，能够一直得心应手地发现新的真理。总之，如果世上有一种工作，除了创始人之外他人无法尽善尽美地完成，那便是我所做的工作了。

It is true, indeed, as regards the experiments which may conduce to this end, that one man is not equal to the task of making them all; but yet he can advantageously avail himself, in this work, of no hands besides his own, unless those of artisans, or parties of the same kind, whom he could pay, and whom the hope of gain (a means of great efficacy) might stimulate to accuracy in the performance of what was prescribed to them. For as to those who, through curiosity or a desire of learning, of their own accord, perhaps, offer him their services, besides that in general their promises exceed their performance, and that they sketch out fine designs of which not one is ever realized, they will, without doubt, expect to be compensated for their trouble by the explication of

some difficulties, or, at least, by compliments and useless speeches, in which he cannot spend any portion of his time without loss to himself. And as for the experiments that others have already made, even although these parties should be willing of themselves to communicate them to him (which is what those who esteem them secrets will never do), the experiments are, for the most part, accompanied with so many circumstances and superfluous elements, as to make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to disentangle the truth from its adjuncts—besides, he will find almost all of them so ill described, or even so false (because those who made them have wished to see in them only such facts as they deemed conformable to their principles), that, if in the entire number there should be some of a nature suited to his purpose, still their value could not compensate for the time what would be necessary to make the selection. So that if there existed any one whom we assuredly knew to be capable of making discoveries of the highest kind, and of the greatest possible utility to the public; and if all other men were therefore eager by all means to assist him in successfully prosecuting his designs, I do not see that they could do aught else for him beyond contributing to defray the expenses of the experiments that might be necessary; and for the rest, prevent his being deprived of his leisure by the unseasonable interruptions of any one. But besides that I neither have so high an opinion of myself as to be willing to make promise of anything extraordinary, nor feed on imaginations so vain as to fancy that the public must be much interested in my designs; I do not, on the other hand, own a soul so mean as to be capable of accepting from any one a favour of which it could be supposed that I was unworthy.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需要进行种种实验，单凭一个人的力量确实无法完成。但是，一个人在这项工作中能很好利用的也只有自己的双手

而已，此外就只有借助于匠人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给他们付钱，满足他们希望得到的回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激励他们按规定完成分派给他们的任务。还会有一些人，他们出于好奇或某种欲望想学点知识，自愿出力帮忙。可是，一般而言，这类人承诺多于行动，他们会提出很好的构想，可是没有一个能实现。毫无疑问，他们期望解释一些难题来减少他们的麻烦，或者至少通过几句恭维话和无用的演讲来证明他们耗费了不少时间。至于别人已经做过的实验（将之视为瑰宝者是永远不会公开的），即便那些人愿意告知你，那些实验多半也是内容繁杂，有大量无用枝节和多余成分，要想从其附加物中辨别出真理来非常困难。而且，你会发现，几乎所有实验都描述得很糟糕，甚至错误百出。因为做实验者希望从实验中只看见那些一定能符合自己原则的实验结果。即便是在大量实验结果中确实有一些符合你目的的东西，也需耗费时间筛选，结果不免得不偿失。因此，世上若真有那么一个人，我们很确定地知道他能有最伟大之发现，并且最有可能为大众谋利，而且如果他人都尽心竭力帮他，使其能成功地完成计划，那么依我看，能帮得上他的也仅限于提供经费以资助他进行必要的实验，或者是阻止任何人无缘无故突然打扰他，浪费他的时间罢了。除此之外，其他人无能为力。此外，我个人并不敢十分自负，愿意向世人承诺将来会有什么非同寻常的成绩，也不愿异想天开，以为大众必定会对我的计划多么感兴趣。不过，从另一方面讲，我的灵魂也并没有低贱到被人认为一文不值，只能接受别人帮助的地步。

These considerations taken together were the reason why,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I have been unwilling to publish the treatise I had on hand, and why I even resolved to give publicity during my life to no other that was so general, or by which the principles of my physics might be understood. But since then, two other reasons have come into operation that have determined me here to subjoin some particular specimens, and give the public some account of my doings and designs.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the first is, that if I

failed to do so, many who were cognizant of my previous intention to publish some writings, might have imagined that the reasons which induced me to refrain from so doing, were less to my credit than they really are; for although I am not immoderately desirous of glory, or even, if I may venture so to say, although I am averse from it in so far as I deem it hostile to repose which I hold in greater account than aught else, yet, at the same time, I have never sought to conceal my actions as if they were crimes, nor made use of many precautions that I might remain unknown; and this partly because I should have thought such a course of conduct a wrong against myself, and partly because it would have occasioned me some sort of uneasiness which would again have been contrary to the perfect mental tranquillity which I court. And forasmuch as, while thus indifferent to the thought alike of fame or of forgetfulness, I have yet been unable to prevent myself from acquiring some sort of reputation, I have thought it incumbent on me to do my best to save myself at least from being ill-spoken of. The other reason that has determined me to commit to writing these specimens of philosophy is, that I am becoming daily more and more alive to the delay which my design of self-instruction suffers, for want of the infinity of experiments I require, and which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make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others: and, without flattering myself so much as to expect the public to take a large share in my interests, I am yet unwilling to be found so far wanting in the duty I owe to myself, as to give occasion to those who shall survive me to make it matter of reproach against me some day, that I might have left them many things in a much more perfect state than I have done, had I not too much neglected to make them aware of the ways in which they could have promoted the accomplishment of my designs.

这些顾虑加在一起便是使我三年来都不愿将手上的论文发表的原因。也是这个原因，我甚至下定决心，在有生之年，凡涉及普遍原理的论文，或者能使人理解我的物理学原则的论文，都一概不发表。可是从那时起，我发现两个理由使我不得不在此赘述一些特殊的样文，向大家叙述一下我所做之事和构思计划。第一条理由是：假如我没有发表，许多人知道我以前曾有意出版几部作品，他们或许会认为，我之所以放弃出版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带给我的荣誉比实际应得的少。因为虽然我不会过分地希冀名利，或者，如果我可以放开胆量说的话，尽管因为与其他东西相比，我已拥有了太多的荣誉，所以只要我认定荣誉是极端令人讨厌的，我甚至就厌恶荣誉，但同时，我也从不尽力隐藏自己的行为，如同犯了罪似的，也没有采取许多防范，不让人了解我。我认为那样做，一方面对不起自己，另一方面也给自己带来不安，还会再次违反我所追求的精神的绝对宁静。而且，尽管我始终采取漠然态度，不求名也不求无名，然而还是不能阻止自己获得某种荣誉，因此我想还是应当尽力而为，至少不被别人说三道四，以免受挖苦。我不得不写这些哲学样文的另一个理由是：由于我需要做的实验太多，不胜枚举，我逐渐感觉我的自修计划不得不被活生生地一天天推迟。若无他人帮助，我是不太可能完成的。虽然我不敢说大众会对我的工作有大力赞助，但是，我也不愿让后人发现我如此不负责任，因为我本来可以把我已经完成的工作以更完美的状态留给他们，但是如果因为我太过疏忽而没使他们明白他们能够用什么方法帮助我完成计划，这样就会使那些比我活得长久的人某一天在某个场合拿这事来指责我。

And I thought that it was easy for me to select some matters which should neither be obnoxious to much controversy, nor should compel me to expound more of my principles than I desired, and which should yet be sufficient clearly to exhibit what I can or cannot accomplish in the sciences. Whether or not I have succeeded in this it is not for me to say; and I do not wish to forestall the judgments of others by speaking myself of my writings; but it will

gratify me if they be examined, and, to afford the greater inducement to this I request all who may have any objections to make to them, to take the trouble of forwarding these to my publisher, who will give me notice of them, that I may endeavour to subjoin at the same time my reply; and in this way readers seeing both at once will more easily determine where the truth lies; for I do not engage in any case to make prolix replies, but only with perfect frankness to avow my errors if I am convinced of them, or if I cannot perceive them, simply to state what I think is required for defence of the matters I have written, adding thereto no explication of any new matter that it may not be necessary to pass without end from one thing to another.

我认为选几件事情来加以说明并非难事，这些事既不至于引起很大争论，也不应该违背我的意愿，过多地解释我的原理。但是，这些事应该可以清楚地说明我在各门学科中能完成什么，不能完成什么。这项工作成功与否不该由我评说。我也不能抢在别人的判断之前，自己先对自己的作品评论一番。但是我很乐意大家能来审查我的作品。为了鼓励大家有更多的兴趣来审查，我请求不管什么人，若对我的著述有任何反驳，还请费神将意见交给我的出版商。待出版商转达我之后，我好立刻将答复附到书里。如此读者可以同时看到两家之言，便更容易辨别真理在哪里了。因为我不喜欢任何冗长答词，所以只要认识到了错误，我便会痛快承认。若我看不出错误之处，就只会把我以为必须说明之事加以申说，为自己写的东西辩护，同时不牵涉新问题，以免从一件事说到另一件事，越说越远，没完没了。

If some of the matters of which I have spoke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Dioptrics” and “Meteorics” should offend at first sight, because I call them hypotheses and seem indifferent about giving proof of them, I request a patient and attentive reading of the

whole, from which I hope those hesitating will derive satisfaction; for it appears to me that the reasonings are so mutually connected in these treatises, that, as the last are demonstrated by the first which are their causes, the first are in their turn demonstrated by the last which are their effects. Nor must it be imagined that I here commit the fallacy which the logicians call a circle; for since experience renders the majority of these effects most certain, the causes from which I deduce them do not serve so much to establish their reality as to explain their existence; but on the contrary, the reality of the causes is established by the reality of the effects. Nor have I called them hypotheses with any other end in view except that it may be known that I think I am able to deduce them from those first truths which I have already expounded; and yet that I have expressly determined not to do so, to prevent a certain class of minds from thence taking occasion to build some extravagant philosophy upon what they may take to be my principles, and my being blamed for it. I refer to those who imagine that they can master in a day all that another has taken twenty years to think out, as soon as he has spoken two or three words to them on the subject; or who are the more liable to error and the less capable of perceiving truth in very proportion as they are more subtle and lively. As to the opinions which are truly and wholly mine, I offer no apology for them as new, persuaded as I am that if their reasons be well considered they will be found to be so simple and so conformed, to common sense as to appear less extraordinary and less paradoxical than any others which can be held on the same subjects; nor do I even boast of being the earliest discoverer of any of them, but only of having adopted them, neither because they had nor because they had not been held by others, but solely because reason has convinced me of their truth.

我在《折光学》和《气象学》两文开头所谈的一些东西，初看可能有些奇怪，因为我称它们为假设，似乎无意为它们提供证据。不过我请求读者耐着性子仔细通读全文，这样我希望那些有疑虑者或可得到满意的答案。因为在我看来，这些论文中的推理是相互联系的，前者与后者互为因果，反过来也互为果因，可以互相证明。大家可不要以为，我这是犯了逻辑学家的所谓循环论证的毛病。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结果大多数是非常可靠的，我根据某些原因将之推论出来，并非是要证明其实际存在，恰恰相反，结果之真实倒足以证明原因之真实。我之所以称它们为假设也无别的用意，只不过想让大家明白，根据之前我已经详加解释的那些首要的真理是能把它们推论出来的。可是我决意不那么做，以防止某些聪明人利用此机会，说他们是在我的原则上建立起浮泛的哲学，从而陷害我因此承担责任。我指的是那样的人，他们以为，旁人费了20年工夫所想出的东西，只要向他们略道一二，他们便可以在一日之内精通无余。这类人越是伶俐机灵就越容易犯错误，越不能非常正确地认识真理。至于那些真正完全属于我的见解，我并不辩解说它们确实是新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大家把我那些见解好好考量一番，就会发现这些见解是非常简单且合乎一般常理的，比之他人对于同样问题所持的意见，并无什么特别和奇怪之处。我也并不自诩为这些真理的最初发明者，只想声明，我之所以采取这些意见并不是由于别人这样说过，也并不是由于别人没有这样说过，只是因为理性向我证明了它们的真实性罢了。

Though artisans may not be able at once to execute the invention which is explained in the “Dioptrics,” I do not think that any one on that account is entitled to condemn it; for since address and practice are required in order so to make and adjust the machines described by me as not to overlook the smallest particular, I should not be less astonished if they succeeded on the first attempt than if a person were in one day to become an accomplished performer on the guitar, by merely having excellent sheets of music set up before him. And if I write in French, which is

the language of my country, in preference to Latin, which is that of my preceptors, it is because I expect that those who make use of their unprejudiced natural reason will be better judges of my opinions than those who give heed to the writings of the ancients only; and as for those who unite good sense with habits of study, whom alone I desire for judges, they will not, I feel assured, be so partial to Latin as to refuse to listen to my reasonings merely because I expound them in the vulgar tongue.

我在《折光学》里完成的发明创造，纵然匠人们不能立刻就制造出来，我也不认为什么人能因此就鄙视这种发明。因为一定要有熟练的技巧才能把我所描述的那些机器制造出来，调准好。如果匠人们第一次实验就能成功，我倒觉得非常惊奇了。这不亚于说，一个人光凭一本极好的乐谱，学了一天就能成为一个娴熟的吉他表演者。我用本国语言法语，而没有用导师们的雅言拉丁文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希望那些能无偏见地运用天赋理智的人，比之那些只看重古代著述的人，更能判断出我的意见是否合理。至于那些能把好的理性和学习习惯结合起来的人是我唯独向往的评判者，我相信他们绝不会只是因为偏好拉丁文，而我用本国语法语来写，他们就会掩耳不听我的推理。

In conclusion, I am unwilling here to say anything very specific of the progress which I expect to make for the future in the sciences, or to bind myself to the public by any promise which I am not certain of being able to fulfil; but this only will I say, that I have resolved to devote what time I may still have to live to no other occupation than that of endeavouring to acquire some knowledge of Nature, which shall be of such a kind as to enable us therefrom to deduce rules in medicine of greater certainty than those at present in use; and that my inclination is so much opposed to all other pursuits, especially to such as cannot be useful to some without

being hurtful to others, that if, by any circumstances, I had been constrained to engage in such, I do not believe that I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succeed. Of this I here make a public declaration, though well aware that it cannot serve to procure for me any consideration in the world, which, however, I do not in the least affect; and I shall always hold myself more obliged to those through whose favor I am permitted to enjoy my retirement without interruption than to any who might offer me the highest earthly preferments.

总而言之，关于我将来希望在各门学科方面作出哪些特别贡献，在此我不愿细谈，也不愿拿自己没有把握完成的事情贸然向大家承诺。我要说的只是：我已经下定决心，在有生之年，我愿将所有时间用于获得一些自然知识，这些知识能够使我们推论出一些规则供医学使用，让这些规则比目前使用的规则更为准确。其他追求一概置之度外，尤其是那些对一些人有利，却对另外一些人有害的事情。假如迫于形势我不得不为之，我想也一定不会成功的。这一点是我要在这里向大众声明的，虽然我非常明白，声明过后，世人也不会因此看得起我。老实说，我压根也不想要世人如此看重我。我不希望任何人赐给我俗世的高官厚禄。我永远感谢那些宽宏大量的人，允许我安享退隐生活，免受打扰。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AUTOBIOGRAPHY OF JOHN STUART MILL

我的知识之路

John Stuart Mill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我的知识之路（外研社双语读库）

Autobiography of John Stuart Mill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Chapter 1 Childhood and Early Education 第一章　童年时代和早期教育
- Chapter 2 Moral Influences in Early Youth. My Father's Character and Opinions 第二章　少年时期的思想影响父亲的性格和观点
- Chapter 3 Last Stage of Education, and First of Self-education 第三章　教育的最后阶段自学的初级阶段
- Chapter 4 Youthful Propagandism. The "Westminster Review"　第四章　青年时代的宣传事业《威斯敏斯特评论》
- Chapter 5 Crisis in My Mental History. One Stage Onward 第五章　成长中的一次危机下一个阶段
- Chapter 6 Commencement ofthe Most Valuable Friendship of My Life.My Father's Death.Writings and Other Proceedings up to 1840. 第六章　最珍贵友谊的开始父亲去世1840年前的著作和其他活动
- Chapter 7 General View of the Remainder of My Life. 第七章　晚年概略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Chapter 1 Childhood and Early Education

第一章　童年时代和早期教育

It seems proper that I should prefix to the following biographical sketch some mention of the reasons which have made me think it desirable that I should leave behind me such a memorial of so uneventful a life as mine. I do not for a moment imagine that any part of what I have to relate can be interesting to the public as a narrative or as being connected with myself. But I have thought that in an age in which education and its improvement are the subject of more, if not of profounder, study than at any former period of English history, it may be useful that there should be some record of an education which was unusual and remarkable, and which, whatever else it may have done, has proved how much more than is commonly supposed may be taught, and well taught, in those early years which, in the common modes of what is called instruction, are little better than wasted. It has also seemed to me that in an age of transition in opinions, there may be somewhat both of interest and of benefit in noting the successive phases of any mind which was always pressing forward, equally ready to learn and to unlearn either from its own thoughts or from those of others. But a motive which weighs more with me than either of these, is a desire to make acknowledgment of the debts which my intellectual and moral development owes to other persons; some of them of recognised eminence, others less known than they deserve to be, and the one to whom most of all is due, one whom the world had no opportunity of knowing. The reader whom these things do not interest, has only himself to blame if he reads farther, and I do not desire any other indulgence from him than that of bearing in mind

that for him these pages were not written.

在写自传正文之前，似乎应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平凡的一生留本书作为纪念。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讲叙的任何一部分，会作为一个故事或者因为与我有关而引起公众的兴趣。但是我想，在这个时代，教育和教育改良在英国历史上比以往任何时候受到的关注都要多（如果说不是更深刻的话），为一种不同寻常、引人注意的教育经历留下一些记录也许是有益的；不管这种教育还产生了哪些影响，都证明了在早期能够教给小孩子的东西，比人们通常想象的多很多，而且可以教得很好；用通常所说的教诲方式教育孩子，他们的童年时代实际上是被浪费掉了。我还觉得，在观念转变的时代，如果有人勇于探索，对于自己及他人的思想既善于吸纳，也能有所扬弃，那么，把他思想的各个阶段记录下来，似乎不仅有益，而且也很有趣。但是对我而言，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动机，就是希望向帮助过我智力和道德发展的人表示感谢。他们当中有的声名显赫；有的能力卓著，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声誉；还有我最需要感谢的一个人，也是外界根本没有机会了解的一个人。如果哪位读者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却还要继续往下读的话，那就只能怪他自己了；我不奢望他沉迷于此书，只希望他能记得，这本自传并非为他而写。

I was born in London, on the 20th of May, 1806, and was the eldest son of James Mill, the author of 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 My father, the son of a petty tradesman and (I believe) small farmer, at Northwater Bridge, in the county of Angus, was, when a boy, recommended by his abilities to the notice of Sir John Stuart, of Fettercairn, one of the Barons of the Exchequer in Scotland, and was, in consequence, s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at the expense of a fund established by Lady Jane Stuart (the wife of Sir John Stuart) and some other ladies for educating young men for the Scottish Church. He there went through the usual course of study,

and was licensed as a Preacher, but never followed the profession; having satisfied himself that he could not believe the doctrines of that or any other Church. For a few years he was a private tutor in various families in Scotland, among others that of the Marquis of Tweeddale, but ended by taking up his residence in London, and devoting himself to authorship. Nor had he any other means of support until 1819, when he obtained an appointment in the India House.

我于1806年5月20日出生于伦敦，是家里的长子，我的父亲是詹姆斯·密尔，《英属印度史》的作者。祖父是安格斯郡诺斯沃特桥的一名小商人，同时（我认为）也是小农场主。还在儿童时代，父亲就因天资聪慧，引起了苏格兰财政部的一位贵族——费特凯恩的约翰·斯图尔特爵士的注意，因此得到简·斯图尔特夫人（约翰·斯图尔特爵士的妻子）和其他几位夫人成立的基金资助而被送往爱丁堡大学深造，该基金设立的目的是为苏格兰教会培养年轻人。在那里，父亲接受了常规教育，获得了传教士证书，但是从未从事这项职业，因为他深知自己不能相信那个教派或其他任何教派的教义。有几年，他在苏格兰的各种家庭里做过家庭教师，其中包括特威代尔侯爵家，但是最终定居伦敦，致力于写作。1819年，他受聘于东印度公司，在这之前，除了写作，他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

In this period of my father's life there are two things which it is impossible not to be struck with: one of them unfortunately a very common circumstance, the other a most uncommon one. The first is, that in his position, with no resource but the precarious one of writing in periodicals, he married and had a large family; conduct than which nothing could be more opposed, both as a matter of good sense and of duty, to the opinions which, at least at a later period of life, he strenuously upheld. The other circumstance, is the

extraordinary energy which was required to lead the life he led, with the disadvantages under which he laboured from the first, and with those which he brought upon himself by his marriage. It would have been no small thing, had he done no more than to support himself and his family during so many years by writing, without ever being in debt, or in any pecuniary difficulty; holding, as he did, opinions, both in politics and in religion, which were more odious to all persons of influence, and to the common run of prosperous Englishmen, in that generation than either before or since; and being not only a man whom nothing would have induced to write against his convictions, but one who invariably threw into everything he wrote, as much of his convictions as he thought the circumstances would in any way permit: being, it must also be said, one who never did anything negligently; never undertook any task, literary or other, on which he did not conscientiously bestow all the labour necessary for performing it adequately. But he, with these burdens on him, planned, commenced, and completed, the *History of India* ; and this in the course of about ten years, a shorter time than has been occupied (even by writers who had no other employment) in the production of almost any other historical work of equal bulk, and of anything approaching to the same amount of reading and research. And to this is to be added, that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a considerable part of almost every day was employed in the instruction of his children: in the case of one of whom, myself, he exerted an amount of labour, care, and perseverance rarely, if ever, employed for a similar purpose, in endeavouring to give, according to his own conception, the highest order of intellectual education.

父亲在人生的这段时间里，有两件事不能不让人称奇。不过很遗憾，其中一件其实很平常，另一件又极不寻常。一件是，他当时没有

什么收入来源，只靠向期刊投稿这种不稳定的方式，还能够娶妻生子，组建了大家庭；这种行为无论从理智，还是从责任上来讲，与他的观点，至少与他后半生努力坚持的观点完全相反。另一件是，他这种生活方式需要异常充沛的精力，从一开始写作他就面临很多不利条件，结婚也给他带来了不利因素。这么多年，他靠写作，即便只养活了自己和家庭，能从不欠债，又从没陷入经济困难，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何况他还坚持他的政治和宗教观点，让当时所有权贵和普通英国富人都产生空前绝后的厌恶之情；而且，父亲这个人，不仅任何因素都不能让他写出与自己信念相悖的东西，而且总是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把自己的信念融入所有作品当中。可以说，他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从不敷衍的人，不管是文学还是其他的工作，他都倾注全力，以求做到尽善尽美。尽管身兼重负，他还是策划、启动并完成了《英属印度史》的编纂。这花了他十年时间，比其他作者（甚至是专职作家）编纂同等规模且需要相当的阅读量和研究量的史书所花的时间都短。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过程中，他几乎每天都要花不少时间教导孩子。就拿我来说，他所付出的精力、关爱和坚持不懈非比寻常，他按照他自己的构想，努力给孩子最高层次的智力教育。

A man who, in his own practice, so vigorously acted up to the principle of losing no time, was likely to adhere to the same rule in the instruction of his pupil. I have no remembrance of the time when I began to learn Greek; I have been told that it was when I was three years old. My earliest recollection on the subject, is that of committing to memory what my father termed vocables, being lists of common Greek words, with their signification in English, which he wrote out for me on cards. Of grammar, until some years later, I learnt no more than the inflections of the nouns and verbs, but, after a course of vocables, proceeded at once to translation; and I faintly remember going through *Aesop's Fables* , the first Greek book which I read. The *Anabasis* , which I remember better, was the second. I learnt no Latin until my eighth year. At that time I had

read, under my father's tuition, a number of Greek prose authors, among whom I remember the whole of Herodotus, and of Xenophon's *Cyropaedia* and *Memorials of Socrates* ; some of the 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by Diogenes Laertius; part of Lucian, and Isocrates *Ad Demonicum* and *Ad Nicoclem.* I also read, in 1813, the first six dialogues (in the common arrangement) of Plato, from the *Euthyphron* to the *Theoctetus* inclusive: which last dialogue, I venture to think, would have been better omitted, as it was totally impossible I should understand it. But my father, in all his teaching, demanded of me not only the utmost that I could do, but much that I could by no possibility have done. What he was himself willing to undergo for the sake of my instruction, may be judged from the fact, that I went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preparing my Greek lessons in the same room and at the same table at which he was writing: and as in those days Greek and English lexicons were not, and I could make no more use of a Greek and Latin lexicon than could be made without having yet begun to learn Latin, I was forced to have recourse to him for the meaning of every word which I did not know. This incessant interruption, he, one of the most impatient of men, submitted to, and wrote under that interruption several volumes of his History and all else that he had to write during those years.

一个自己做事时恪守决不浪费时间这一原则的人，在教育学生时，很可能也会如此。我记不清自己开始学习希腊语的时间了，听人说是三岁。对这件事，我最早的记忆就是背诵父亲写在卡片上的普通希腊语单词表，后面附有英语意思。学语法是几年后的事情，我只学了名词和动词的曲折变化，但是学完单词之后，立刻就开始学习翻译了。我只能模糊地记得读过《伊索寓言》，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希腊语书籍。第二本书是《远征记》，我对这本书的印象稍微深刻一点。直到八岁，我才开始学拉丁语。那时，在父亲的指导下，我阅读了很多

希腊散文家的作品，其中，我记得自己读了希罗多德的全都作品，还有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和《回忆苏格拉底》；读了第欧根尼·拉尔修写的一些哲学家生平；还读了卢奇安的一部分作品，以及伊索克拉底的《全希腊盛会献词》和《泛雅典娜节献词》的一部分。1813年，我还读了柏拉图对话录（按普通排列顺序）的前六卷，从《尤息弗罗》到《泰阿泰德》。我认为，《泰阿泰德》在此可以省略，因为我不可能看得懂。但是父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求我尽最大努力做力所能及之事，还极力要求我做力所不能及之事。我学希腊语的所有功课，都是在他写作时跟他在同一个房间的同一张桌子上完成的。从这件事或许可以看出来，他为了教导我是乐于承担责任的。那时，没有希腊语英语词典，而我还没开始学拉丁语，根本无法查阅希腊语拉丁语词典，所以每次碰到不认识的单词，就不得不向父亲讨教。父亲是个急脾气的人，但他甘愿忍受这种持续的干扰，而且还在这种干扰下写了好几卷《英属印度史》，还有那几年必须要写的所有其他文章。

The only thing besides Greek, that I learnt as a lesson in this part of my childhood, was arithmetic: this also my father taught me: it was the task of the evenings, and I well remember its disagreeableness. But the lessons were only a part of the daily instruction I received. Much of it consisted in the books I read by myself, and my father's discourses to me, chiefly during our walks. From 1810 to the end of 1813 we were living in Newington Green, then an almost rustic neighbourhood. My father's health required considerable and constant exercise, and he walked habitually before breakfast, generally in the green lanes towards Hornsey. In these walks I always accompanied him, and with my earliest recollections of green fields and wild flowers, is mingled that of the account I gave him daily of what I had read the day before. To the best of my remembrance, this was a voluntary rather than a prescribed exercise. I made notes on slips of paper while reading, and from

these in the morning walks, I told the story to him; for the books were chiefly histories, of which I read in this manner a great number: Robertson's histories, Hume, Gibbon; but my greatest delight, then and for long afterwards, was Watson's *Philip the Second and Third* . The heroic defence of the Knights of Malta against the Turks, and of the revol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against Spain, excited in me an intense and lasting interest. Next to Watson, my favourite historical reading was Hooke's *History of Rome* . Of Greece I had seen at that time no regular history, except school abridgments and the last two or three volumes of a translation of Rollin's *Ancient History* , beginning with Philip of Macedon. But I read with great delight Langhorne's translation of Plutarch. In English history, beyond the time at which Hume leaves off, I remember reading Burnet's *History of his Own Time* , though I cared little for anything in it except the wars and battles; and the historical part of the *Annual Register* , from the beginning to about 1788, where the volumes my father borrowed for me from Mr. Bentham left off. I felt a lively interest in Frederic of Prussia during his difficulties, and in Paoli, the Corsican patriot; but when I came to the American War, I took my part, like a child as I was (until set right by my father) on the wrong side, because it was called the English side. In these frequent talks about the books I read, he used, as opportunity offered, to give me explanations and ideas respecting civilization, government, morality, mental cultivation, which he required me afterwards to restate to him in my own words. He also made me read, and give him a verbal account of, many books which would not have interested me sufficiently to induce me to read them of myself: among other's Millar's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 a book of great merit for its time, and which he highly valued; Mosheim'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 McCrie's *Life of John Knox* , and even Sewell and Rutty's *Histories of the Quakers* . He was fond of putting into my hands books which exhibited men of energy and

resource in unusual circumstances, struggling against difficulties and overcoming them: of such works I remember Beaver's *African Memoranda* , and Collins's *Account of the First Settlement of New South Wales* . Two books which I never wearied of reading were Anson's *Voyages* , so delightful to most young persons, and a collection (Hawkesworth's, I believe) of *Voyages round the World* , in four volumes, beginning with Drake and ending with Cook and Bougainville. Of children's books, any more than of playthings, I had scarcely any, except an occasional gift from a relation or acquaintance: among those I had, *Robinson Crusoe* was pre-eminent, and continued to delight me through all my boyhood. It was no part, however, of my father's system to exclude books of amusement, though he allowed them very sparingly. Of such books he possessed at that time next to none, but he borrowed several for me; those which I remember are the *Arabian Nights* , Cazotte's *Arabian Tales* , *Don Quixote* , Miss Edgeworth's *Popular Tales* , and a book of some reputation in its day, Brooke's *Fool of Quality* .

在这段童年时光里，除了希腊语之外，唯一的一门课程就是算术，也是父亲教我的。算术是晚上的课程，我还清楚地记得学得多么不开心。但是上课只是我每天所受教育的一部分。另外大部分是我自己阅读，以及父亲对我的口头教导，后者大多是我们一起散步的时候进行的。1810年到1813年年底，我们住在纽因顿格林，当时，那里的环境基本和农村一样。父亲的身体状况需要坚持锻炼，所以他有早饭前散步的习惯，一般就在通往霍恩西的芊芊小路上。散步时，我总是陪着他，我对绿地和野花的最初记忆中夹杂着每天向父亲作头一天阅读内容的汇报。我记得汇报是我自愿做的功课，而非出于被迫。我一边读书，一边在纸片上记笔记，早上散步的时候，就按笔记上的内容给父亲讲故事，这是因为我读的大部分是历史书。以这种方式我读了很多书：罗伯逊的历史著作，休谟 [2_1] 和吉本的作品。但是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最喜欢读的是沃森的《腓力二世》和

《腓力三世》。书中描述的马耳他骑士英勇抵抗土耳其人，荷兰反叛省份抵制西班牙，都激起了我强烈而持久的兴趣。仅次于沃森，我最喜欢的历史著作是胡克[2_2]的《罗马史》。那时，我还没有读过系统的希腊历史，只读过学校课本上的节选，以及罗林编的《古代史》的翻译本中从马其顿国王腓力开始的最后两三卷。但是，兰霍恩翻译的普卢塔克的作品，我读得津津有味。在英国历史方面，休谟停笔以后的历史中，我记得读过柏内特的《当代史》，尽管我只喜欢里面的战争和战役部分。还读过《年度纪事》里从一开始到1788年的历史部分，这部分是父亲为我从边沁[2_3]先生那里借来的书中所没有的。我对陷入困境的普鲁士[2_4]的弗雷德里克，和科西嘉爱国者保利，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但是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由于还是一个孩子，我站到了错误的立场上（直到被父亲纠正过来），因为那被叫做英国立场。我和父亲经常一起讨论我阅读的书籍，他一有机会就给我讲解一些概念，如文明、政府、道德和智力培养，然后让我用自己的话复述给他听。他还让我读了很多我自己不感兴趣的书，然后向他口头复述。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书中有米勒的《英国政府历史观》，此书在当时备受赞誉，父亲也对其倍加推崇。莫斯海姆的《基督教教会史》，麦克里的《约翰·诺克斯[2_5]传》，甚至还有休厄尔和拉提的《贵格会[2_6]教徒史》。他喜欢让我看那些主角在艰难的环境下展现出能力和智慧、顽强战胜困难的书籍。在这些书当中，我还记得比弗的《非洲大事记》和柯林斯对新南威尔士第一批移民的描述。有两本书我百读不厌，一本是安森的《航海记》，大多数年轻人都喜欢读，另一本是《环球航海集》（我认为是霍克斯沃思编写的），有四卷，从德雷克[2_7]开始，到库克[2_8]和布干维尔结束。我几乎没有玩具和儿童读物，只是偶尔有亲戚或熟人送给我这样的礼物，其中《鲁滨孙漂流记》是最好的，我整个童年时代都很喜欢。父亲并不是完全不让我读消遣的书籍，但也只是偶尔允许。这种书他当时几乎没有，但是给我借了好几本，我记得有《一千零一夜》、卡佐特的《阿拉伯故事集》、《堂吉诃德》和埃奇沃思女士的《通俗故事集》，以及当时有些名声的布鲁克的《上流社会的傻子》。

In my eighth year I commenced learning Latin, in conjunction with a younger sister, to whom I taught it as I went on, and who afterwards repeated the lessons to my father; from this time, other sisters and brothers being successively added as pupils, a considerable part of my day's work consisted of this preparatory teaching. It was a part which I greatly disliked; the more so, as I was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lessons of my pupils, in almost as full a sense as for my own: I, however, derived from this discipline the great advantage, of learning more thoroughly and retaining more lastingly the things which I was set to teach: perhaps, too, the practice it afforded in explaining difficulties to others, may even at that age have been useful. In other respects, the experience of my boyhood is not favourable to the plan of teaching children by means of one another. The teaching, I am sure, is very inefficient as teaching, and I well know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teacher and taught is not a good moral discipline to either. I went in this manner through the Latin grammar, and a considerable part of Cornelius Nepos and Caesar's *Commentaries* , but afterwards added to the superintendence of these lessons, much longer ones of my own.

八岁时，我和我的一个妹妹一起开始学习拉丁语，我一边学，一边教她，然后她再向父亲汇报课程。从那时起，其他兄弟姐妹都陆续加入，成了我的学生，白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这种预备教学。其实我很不喜欢做这件事情，尤其是我要对学生们的功课负责，几乎跟对待我自己的功课完全一样。但是，从这种锻炼中我受益匪浅，对于教的内容，我能够学得更全面，记得更牢固。教学的时候向别人解释难点，这种训练可能即使在那么小的年龄也是很有用的。就其他方面讲，我童年时代的经历并不利于小孩子们互相教学的安排。我敢肯定，当时的教学效率非常低，我也很清楚，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对彼此来说也不是很好的道德约束。我就是这样学完了拉丁语语法，

还有科尼利厄斯·内波斯的作品和恺撒的《回忆录》的一大部分，但是后来，除了督导这些课程之外，我自己还学习了更多的课程。

In the same year in which I began Latin, I made my first commencement in the Greek poets with the *Iliad* . After I had made some progress in this, my father put Pope's translation into my hands. It was the first English verse I had cared to read, and it became one of the books in which for many years I most delighted: I think I must have read it from twenty to thirty times through. I should not have thought it worth while to mention a taste apparently so natural to boyhood, if I had not, as I think, observed that the keen enjoyment of this brilliant specimen of narrative and versification is not so universal with boys, as I should have expected both *a priori* and from my individual experience. Soon after this time I commenced Euclid, and somewhat later, Algebra, still under my father's tuition.

开始学习拉丁语的同一年，我第一次开始读希腊诗人的作品，先读了《伊利亚特》[2_9]。在这上面有了一些进展之后，父亲把蒲柏的译作交到我手中。这本译作是我愿意读的第一本英语诗著作，而且成为多年来我一直特别喜欢的书之一。我想，我肯定从头到尾读过二三十遍。它是非常优秀的叙事和韵律的典范，我想，要不是我发现并非所有男孩子都特别喜欢它的话，我就不会觉得值得一提了，尽管从理论和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少年时代喜欢它看似非常自然。在这之后不久，仍然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开始学习几何[2_10]，又过了一阵子，开始学代数。

From my eighth to my twelfth year, the Latin books which I remember reading were, the *Bucolics* of Virgil, and the first six

books of the *Aeneid* ; all Horace, except the *Epodes* ; *the Fables* of Phaedrus; the first five books of Livy (to which from my love of the subject I voluntarily added, in my hours of leisure, the remainder of the first decade); all Sallust; a considerable part of Ovid's *Metamorphoses* ; some plays of Terence; two or three books of Lucretius; several of the Orations of Cicero, and of his writings on oratory; also his letters to Atticus, my father taking the trouble to translate to me from the French the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in Mingault's notes. In Greek I read the *Iliad* and *Odyssey* through; one or two plays of Sophocles, Euripides, and Aristophanes, though by these I profited little; all Thucydides; the *Hellenics* of Xenophon; a great part of Demosthenes, Aeschines, and Lysias; Theocritus; Anacreon; part of the *Anthology* ; a little of Dionysius; several books of Polybius; and lastly Aristotle's *Rhetoric* , which, as the first expressly scientific treatise on any moral or psychological subject which I had read, and containing many of the best observations of the ancients on human nature and life, my father made me study with peculiar care, and throw the matter of it into synoptic tables. During the same years I learnt elementary geometry and algebra thoroughly, the differential calculus, and other portions of the higher mathematics far from thoroughly: for my father, not having kept up this part of his early acquired knowledge, could not spare time to qualify himself for removing my difficulties, and left me to deal with them, with little other aid than that of books: while I was continually incurring his displeasure by my inability to solve difficult problems for which he did not see that I had not the necessary previous knowledge.

我记得，从八岁到十二岁，我读的拉丁语书籍有维吉尔的《牧歌》以及《埃涅伊特》的前六本，除了《抒情诗》之外贺拉斯 [2_11] 的全部作品，费德鲁斯的《寓言》，李维 [2_12] 《罗马史》的前五卷

（由于喜欢这个主题，闲着的时候，我自愿读了前十卷的剩余部分），萨卢斯特的全部作品，奥维德《变形记》的大部分，泰伦斯[2_13]的一些剧本，卢克莱修的两三本书，西塞罗[2_14]的好几本演说集和关于演讲术的著作，以及他给阿提库斯的信件。父亲不辞劳苦，为我把蒙戈尔特注解中的历史说明从法语翻译过来。我通读了希腊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的一两个剧本（但从中受益很少），修昔底德[2_15]的全部作品，色诺芬[2_16]的《希腊史》，狄摩西尼、埃斯基涅斯和利西阿斯作品的一大部分，忒奥克里托斯、阿那克里翁的全部作品，《文选》的一部分，狄奥尼修斯的一小部分作品，波利比奥斯的好几本书，最后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修辞学》是我读过的关于道德或心理学主题的第一本科学的专著，书中包括很多古代人对人性和人生最到位的观察。父亲让我仔细研读，还让我把里面的内容列成一览表。这几年，我还全面学习了初级几何和代数，而微分学和高等数学的其他部分则学得远远不够全面。因为父亲把早年掌握的这些知识全都忘了，没有时间再捡起来帮我解答难题，所以，除了书本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而我经常由于无法解决很难的习题，总是招惹父亲不快，但他没有看到，其实我根本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必需的知识储备。

As to my private reading, I can only speak of what I remember. History continued to be my strongest predilection, and most of all ancient history. Mitford's *Greece* I read continually; my father had put me on my guard against the Tory prejudices of this writer, and his perversions of facts for the whitewashing of despots, and blackening of popular institutions. These points he discoursed on, exemplifying them from the Greek orators and historians, with such effect that in reading Mitford my sympathies were always on the contrary side to those of the author, and I could, to some extent, have argued the point against him: yet this did not diminish the ever new pleasure with which I read the book. Roman history, both

in my old favourite, Hooke, and in Ferguson, continued to delight me. A book which, in spite of what is called the dryness of its style, I took great pleasure in, was the *Ancient Universal History* , through the incessant reading of which, I had my head full of historical details concerning the obscurest ancient people, while about modern history, except detached passages, such as the Dutch War of Independence, I knew and cared comparatively little. A voluntary exercise, to which throughout my boyhood I was much addicted, was what I called writing histories. I successively composed a *Roman History* , picked out of Hooke; and an Abridgment of the *Ancient Universal History* ; a *History of Holland* , from my favourite Watson and from an anonymous compilation; and in my eleventh and twelfth year I occupied myself with writing what I flattered myself was something serious. This was no less than a History of the Roman Government, compil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Hooke) from Livy and Dionysius: of which I wrote as much as would have made an octavo volume, extending to the epoch of the Licinian Laws. It was, in fact, an account of the struggles between the patricians and plebeians, which now engrossed all the interest in my mind which I had previously felt in the mere wars and conquests of the Romans. I discussed all the constitutional points as they arose: though quite ignorant of Niebuhr's researches, I, by such lights as my father had given me, vindicated the Agrarian Laws on the evidence of Livy, and upheld,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the Roman Democratic party. A few years later, in my contempt of my childish efforts, I destroyed all these papers, not then anticipating that I could ever feel any curiosity about my first attempts at writing and reasoning. My father encouraged me in this useful amusement, though, as I think judiciously, he never asked to see what I wrote; so that I did not feel that in writing it I was accountable to any one, nor had the chilling sensation of being under a critical eye.

关于自己读的书，我只能说一说还记得的。我最偏爱的仍然是历史，尤其是古代史。我不厌其烦地读米特福德的《希腊史》。父亲提醒我警惕作者保守派的偏见，以及他为了美化暴君、诋毁民主制度而颠倒的事实。他用希腊演说家和历史学家的例子向我讲述这些观点，结果在读米特福德时，我和作者赞同的东西总是相反的，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能提出反对他的观点；但是，每次读这本书时所带来的新的愉悦，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我以前的最爱胡克和弗格森讲述的罗马历史继续给我带来快乐。有本书，尽管有人称它风格单调乏味，但我非常喜欢读，那就是《古代通史》。我不厌其烦地读，满脑子都是最不知名的古代人的详细资料，但是现代史，除了一些孤立的章节，如荷兰独立战争外，相对来说，我知道得很少，也不怎么关注。整个少年时代，我心甘情愿做的而且很上瘾的事情就是我所谓的“写历史”。我相继创作了一部《罗马史》（是从胡克的《罗马史》中摘选出来的），《古代通史》的节略本，一部《荷兰史》（是从我最喜欢的沃森和一部匿名的汇编中选录出来的）。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在专注地写一些自以为比较严肃的东西。这不亚于一部罗马政府的历史，编辑的资料源于李维和迪奥尼修斯（还得益于胡克），我写了很多，都可以出八卷本的书了，一直写到颁行李西尼法的时代。实际上，它记述的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当时它吸引了我的全部兴趣和关注，而这种关注过去仅集中在罗马征战中。我讨论了出现过的每一个体制上的观点。尽管我完全不知道尼布尔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父亲的指导下，按照李维提供的证据，我证明了农业法的正确性，而且尽自己所能地支持了罗马民主党。几年后，由于蔑视自己孩子气的努力，我把这些文章都毁掉了，那时根本没想到，以后还会对自己初次尝试写作和推理有任何好奇。但是，父亲鼓励我进行这种有用的娱乐活动，尽管他从来不要求看我写的东西，我觉得这很明智。这样一来，我就不会觉得写作要对谁负责，也没有被一双挑剔的眼睛盯着而害怕的感觉。

But though these exercises in history were never a compulsory lesson, there was another kind of composition which was so,

namely, writing verses, and it was one of the most disagreeable of my tasks. Greek and Latin verses I did not write, nor learnt the prosody of those languages. My father, thinking this not worth the time it required, contented himself with making me read aloud to him, and correcting false quantities. I never composed at all in Greek, even in prose, and but little in Latin. Not that my father could be indifferent to the value of this practice, in giving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se languages, but because there really was not time for it. The verses I was required to write were English. When I first read Pope's *Homer* , I ambitiously attempted to compose something of the same kind, and achieved as much as one book of a continuation of the *Iliad* . There, probably, the spontaneous promptings of my poetical ambition would have stopped; but the exercise, begun from choice, was continued by command. Conformably to my father's usual practice of explaining to me, as far as possible, the reasons for what he required me to do, he gave me, for this, as I well remember, two reasons highly characteristic of him: one was, that some things could be expressed better and more forcibly in verse than in prose: this, he said, was a real advantage. The other was, that people in general attached more value to verse than it deserved, and the power of writing it, was, on this account, worth acquiring. He generally left me to choose my own subjects, which, as far as I remember, were mostly addresses to some mythological personage or allegorical abstraction; but he made me translate into English verse many of Horace's shorter poems: I also remember his giving me Thomson's *Winter* to read, and afterwards making me attempt (without book) to write something myself on the same subject. The verses I wrote were, of course, the merest rubbish, nor did I ever attain any facility of versification, but the practice may have been useful in making it easier for me, at a later period, to acquire readiness of expression.

[1_1] I had read, up to this time, very little English poetry.

Shakspeare my father had put into my hands, chiefly for the sake of the historical plays, from which, however, I went on to the others. My father never was a great admirer of Shakspeare, the English idolatry of whom he used to attack with some severity. He cared little for any English poetry except Milton (for whom he had the highest admiration), Goldsmith, Burns, and Gray's *Bard* , which he preferred to his *Elegy* : perhaps I may add Cowper and Beattie. He had some value for Spenser, and I remember his reading to me (unlike his usual practice of making me read to him) the first book of the *Fairie Queene* ; but I took little pleasure in it. The poetry of the present century he saw scarcely any merit in, and I hardly became acquainted with any of it till I was grown up to manhood, except the metrical romances of Walter Scott, which I read at his recommendation and was intensely delighted with; as I always was with animated narrative. Dryden's *Poems* were among my father's books, and many of these he made me read, but I never cared for any of them except *Alexander's Feast* , which, as well as many of the songs in Walter Scott, I used to sing internally, to a music of my own: to some of the latter, indeed, I went so far as to compose airs, which I still remember. Cowper's short poems I read with some pleasure, but never got far into the longer ones; and nothing in the two volumes interested me like the prose account of his three hares. In my thirteenth year I met with Campbell's poems, among which *Lochiel* , *Hohenlinden* , *The Exile of Erin* , and some others, gave me sensations I had never before experienced from poetry. Here, too, I made nothing of the longer poems, except the striking opening of *Gertrude of Wyoming* , which long kept its place in my feelings as the perfection of pathos.

尽管写历史的练习从来都不是必修课，但是，有一样写作是必须的，即写诗，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功课之一。我没有写过希腊语和拉丁

语的诗，也没学这两种语言的格律。父亲认为花太多时间做这个不值得，所以只让我给他读出来，订正我不对的地方。我从未用希腊语写作过，甚至连散文都没写过，只用拉丁语写过一点点。不是父亲不在乎写作对于全面掌握这些语言的重要性，而是根本没有时间这么做。他要求我写的是英语诗歌。第一次读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的时候，我雄心勃勃地要写一部类似的著作，而且写了《伊利亚特》的续集那么长的一本书。我自发的写诗抱负，很可能那时就中止了；但是，最初我自愿写诗的做法，后来因父亲的命令坚持了下去。父亲总是尽量给我解释他要求我做某件事的原因，我记得很清楚，这件事他同样也给出两条原因，都非常符合他的风格。一条是，有些事用诗来表达比用散文更清楚，更有力，他说这是个实实在在的长处。另一条是，人们大都给予诗歌比它本身更高的价值，因此，有必要获得写诗的能力。他一般都让我自己选择主题，我记得大多是给一些神话人物或者寓言抽象物致词，但是他让我把贺拉斯的很多短诗翻译成英语。我还记得他让我读汤姆逊的《冬天》，然后让我自己试着（不看书）就同一主题写些东西。当然，我写的诗纯粹是些废话，我也从来没有学会任何写诗的技巧，但是这种练习让我后来更容易获得表达能力。[2_17] 到这时，我读的英语诗歌仍然很少。父亲把莎士比亚的作品放到我手中，主要是让我读历史剧，然而我却继续读其他的剧本。父亲一直都不怎么崇拜莎士比亚，他甚至曾严厉地批判这位英国人的偶像。除了弥尔顿（他最崇拜的人）、哥尔德斯密斯和彭斯 [2_18] 的诗歌以及格雷的《游吟诗人》（比起《墓园挽歌》，父亲更喜欢格雷的这首作品），别的英国诗歌父亲都不喜欢，或许还喜欢柯珀 [2_19] 和贝蒂 [2_20] 。他对斯宾塞 [2_21] 评价也不低，我记得他给我读（不像他一贯让我读给他听的做法）《仙后》的第一本，但是我不怎么喜欢。他觉得本世纪的诗歌几乎没什么价值，所以成年之前，我对当代诗歌几乎完全不熟悉，但是沃尔特·司各特的浪漫诗歌除外，那是在父亲的推荐下读的，我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一贯喜欢活泼的叙事。德莱顿的诗是我父亲喜欢读的，他让我读了很多，但是除了《亚历山大的盛宴》之外，我一首都不喜欢。我经常用自己的调子，在心里默唱这首诗和沃尔特·司各特的很多抒情诗，我甚至给司各特的一些抒情诗谱了曲子，到现在都还记得。柯珀的短诗我还比较喜欢读，但是从来没有去读长

诗；而他的两卷书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如他用散文写的三只野兔让我感兴趣。十三岁时，我偶然读了坎贝尔的诗，其中《洛希尔》《霍恩林登》《埃琳的放逐》和其他一些诗给我的震撼，是以前读诗的时候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至此，我还是轻视长诗，《怀俄明的格特鲁德》除了令人震撼的开篇外，我长久以来一直觉得那是痛苦的极量。

During this part of my childhood, one of my greatest amusements was experimental science; in the theoretical, however, not the practical sense of the word; not trying experiments—a kind of discipline which I have often regretted not having had—nor even seeing, but merely reading about them. I never remember being so wrapt up in any book, as I was in Joyce's *Scientific Dialogues* ; and I was rather recalcitrant to my father's criticisms of the bad reasoning respecting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physics, which abounds in the early part of that work. I devoured treatises on Chemistry, especially that of my father's early friend and schoolfellow, Dr. Thomson, for years before I attended a lecture or saw an experiment.

童年的这段时间，我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实验科学——是理论上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实验科学。我没做过试验性的实验，也经常遗憾没有这种实验经历，甚至没见过，只是读过。我从来不记得读任何书像读乔伊斯的《科学对话》那样专注。父亲批评这部书的前面部分对物理学基本定律的推理漏洞百出，我非常反对他的观点。在听到讲座或看到实验之前，有很多年，我贪婪地阅读化学论文，尤其是父亲早先的朋友兼校友汤姆森博士的论文。

From about the age of twelve, I entered into another and more advanced stage in my course of instruction; in which the main object was no longer the aids and appliances of thought, but the

thoughts themselves. This commenced with Logic, in which I began at once with the *Organon* , and read it to the Analytics inclusive, but profited little by the Posterior Analytics, which belong to a branch of speculation I was not yet ripe for. Contemporaneously with the *Organon* , my father made me read the whole or parts of several of the Latin treatises on the scholastic logic; giving each day to him, in our walks, a minute account of what I had read, and answering his numerous and most searching questions. After this, I went in a similar manner through the *ComputatiosiveLogica* of Hobbes, a work of a much higher order of thought than the books of the school logicians, and which he estimated very highly; in my own opinion beyond its merits, great as these are. It was his invariable practice, whatever studies he exacted from me, to make me as far as possible understand and feel the utility of them: and this he deemed peculiarly fitting in the case of the syllogistic logic, the usefulness of which had been impugned by so many writers of authority. I well remember how, and in what particular walk,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Bagshot Heath (where we were on a visit to his old friend Mr. Wallace, then one of the Mathematical Professors at Sandhurst) he first attempted by questions to make me think on the subject, and frame some conception of what constituted the utility of the syllogistic logic, and when I had failed in this, to make me understand it by explanations. The explanations did not make the matter at all clear to me at the time; but they were not therefore useless; they remained as a nucleus for my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to crystallize upon; the import of his general remarks being interpreted to me, by the particular instances which came under my notice afterwards. My own consciousness and experience ultimately led me to appreciate quite as highly as he did, the value of an early practical familiarity with the school logic. I know of nothing, in my education, to which I think myself more indebted for whatever capacity of thinking I have attained. The first intellectual

operation in which I arrived at any proficiency, was dissecting a bad argument, and finding in what part the fallacy lay: and though whatever capacity of this sort I attained, was due to the fact that it was an intellectual exercise in which I was most perseveringly drilled by my father, yet it is also true that the school logic, and the mental habits acquired in studying it, were among the principal instruments of this drilling. I am persuaded that nothing, in modern education, tends so much, when properly used, to form exact thinkers, who attach a precise meaning to words and propositions, and are not imposed on by vague, loose, or ambiguous terms. The boasted influence of mathematical studies is nothing to it; for in mathematical processes, none of the real difficulties of correct ratiocination occur. It is also a study peculiarly adapted to an early stage in the education of philosophical students, since it does not presuppose the slow process of acquiring, by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valuable thoughts of their own. They may become capable of disentangling the intricacies of confused and self-contradictory thought, before their own thinking faculties are much advanced; a power which, for want of some such discipline, many otherwise able men altogether lack; and when they have to answer opponents, only endeavour, by such arguments as they can command, to support the opposite conclusion, scarcely even attempting to confute the reasonings of their antagonists; and, therefore, at the utmost, leaving the question, as far as it depends on argument, a balanced one.

大概从十二岁起，我接受的教育进入了另一个更高的阶段。主要的学习对象已经不再是思维辅助和应用方面，而是思维本身。从学习逻辑开始，在逻辑学里，我一上来就开始学《工具论》 [2_22] ，一直读完包括分析学在内的所有内容，但我从后验分析里面收益甚少。后验分析属于推断的一个分支，我那时还不够成熟，无法理解。在读

《工具论》的同时，父亲让我读了好几篇关于经院逻辑的拉丁语论文，有的全部都读，有的读一部分。每天我们一起散步的时候，他让我详细汇报读过的东西，并回答他许多敏锐的问题。这之后，我以相似的方式，通读了霍布斯的《计算法和逻辑学》，这本书比经院派逻辑学家的著作在思想层次上高了一大截，父亲对它推崇备至。在我看来，它确实很有价值，但父亲未免有些夸张。不管要求我学什么，父亲一贯的做法，是让我尽可能地理解并感觉到它们的效用。他觉得，这种做法在学习三段论法逻辑的时候尤其适用，而三段论法的作用受到了很多权威作家的责难。我清楚地记得，那次在巴格肖特赫斯附近散步的时候（我们那时去拜访父亲的老朋友华莱士先生，他当时是皇家陆军军官大学的数学教授），父亲是怎样尝试用问题激发我对这个题目的思考，让我对三段论法逻辑学的效用构成形成一些概念，我无法理解时，他就解释给我听。当时，这些解释并没有让我弄清楚这个问题，但是也并非没用，它们成为我的观察和沉思赖以成形的核心。后来我通过自己所注意到的一些具体情况理解了父亲所做的概括性的论述。我自己的认识和体验，最终让我像他一样高度评价少时真正通晓经院派逻辑学的价值。我认为，在我接受的教育当中，我所获得的任何思考能力，最应该归功于它。我比较熟练的早期智力练习，是仔细剖析错误的论点，并找出谬误在什么地方。不管在这种练习中我获得了什么样的能力，都应归功于父亲，是他坚持训练我，让我做这样的智力练习。但是，不可否认经院派逻辑学以及学习它时养成的思维习惯，是这种训练的主要手段之一。我相信，在现代教育中，经院派逻辑如果运用适当的话，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它一样塑造缜密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会赋予文字和命题精确的意义，而且不受模糊、不精确或不明确术语的影响。被引以为豪的数学研究，其影响力根本不能与它相比，因为在数学步骤中，正确的推理过程不会产生真正的难题。数学研究也特别适合哲学学生早期阶段的教育，因为它不以学生通过经验和思考形成自己有价值思想的缓慢过程为条件。他们有可能在自己的思维能力到达一个高级阶段之前，就能解开混乱、自相矛盾的思想中的难题。这种本领是很多本来可以很有能力的人，因缺乏这种训练而欠缺的。当他们必须反击对手时，只能试图用自己所能驾驭的论据来论证反面结论，而很少尝试去驳斥对手的推理。因此，只要

解决问题取决于论证的话，最多只能双方不分胜负，悬而不决。

During this time, the Latin and Greek books which I continued to read with my father were chiefly such as were worth studying, not for the language merely, but also for the thoughts. This included much of the orators, and especially Demosthenes, some of whose principal orations I read several times over, and wrote out, by way of exercise, a full analysis of them. My father's comments on these orations when I read them to him were very instructive to me. He not only drew my attention to the insight they afforded into Athenian institutions, and the principles of legislation and government which they often illustrated, but pointed out the skill and art of the orator—how everything important to his purpose was said at the exact moment when he had brought the minds of his audience into the state most fitted to receive it; how he made steal into their minds, gradually and by insinuation, thoughts which, if expressed in a more direct manner, would have roused their opposition. Most of these reflections were beyond my capacity of full comprehension at the time; but they left seed behind, which germinated in due season. At this time I also read the whole of Tacitus, Juvenal, and Quintilian. The latter, owing to his obscure style and to the scholastic details of which many parts of his treatise are made up, is little read, and seldom sufficiently appreciated. His book is a kind of encyclopaedia of the thoughts of the ancients on the whol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and I have retained through life many valuable ideas which I can distinctly trace to my reading of him, even at that early age. It was at this period that I read, for the first tim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alogues of Plato, in particular the *Gorgias* , the *Protagoras* , and the *Republic* . There is no author to whom my father thought himself more indebted for his own mental culture, than Plato, or whom he more

frequently recommended to young students. I can bear similar testimony in regard to myself. The Socratic method, of which the Platonic dialogues are the chief example, is unsurpassed as a discipline for correcting the errors, and clearing up the confusions incident to the *intellectussibipermissus* , the understanding which has made up all its bundles of associat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popular phraseology. The close, searching *elenchus* by which the man of vague generalities is constrained either to express his meaning to himself in definite terms, or to confess that he does not know what he is talking about; the perpetual testing of all general statements by particular instances; the siege in form which is laid to the meaning of large abstract terms, by fixing upon some still larger class-name which includes that and more, and dividing down to the thing sought—marking out its limits and definition by a series of accurately drawn distinctions between it and each of the cognate objects which are successively parted off from it —all this, as an education for precise thinking, is inestimable, and all this, even at that age, took such hold of me that it became part of my own mind. I have felt ever since that the title of Platonist belongs by far better right to those who have been nourished in and have endeavoured to practise Plato's mode of investigation, than to those who are distinguished only by the adoption of certain dogmatical conclusions, drawn mostly from the least intelligible of his works, and which the character of his mind and writings makes it uncertain whether he himself regarded as anything more than poetic fancies, or philosophic conjectures.

这段时间，我继续和父亲一起读拉丁语和希腊语书籍，大都是不仅语言值得学习，思想也值得学习的书。这其中包括很多演说家尤其是狄摩西尼 [2_23] 的著作，他的一些主要演说我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并且以练习的方式，写了全面的分析。我把演说读给父亲听的时

候，他的评价对我很有启发。他不仅使我注意到这些演讲中为雅典制度提供的真知灼见，以及它们经常举例说明的立法和政府的原则，还指出演说家的技巧和艺术——如何把对他有利的一切东西，在他把观众的思维带到最适合接受它们的状态时说出；如何逐渐通过暗示，悄悄地把思想植入观众的脑袋，而这些思想，如果以一种更直接方式表达的话，就会引起观众的反对。就这些想法中的大部分而言，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完全理解；但是它们种下了种子，而且在适当的季节生根发芽。这时，我还读了塔西佗[2_24]、尤维纳利斯[2_25]和昆体良[2_26]的全部著作。后者由于风格晦涩，而且很多论述由学究气的细节组成，因此很少有人读，难以得到足够的赏识。他的书相当于一部古人整个教育和文化思想的百科全书；我一生中持有的很多有价值的观点，都清楚地源自他的书，即使是那么年幼的时候读的。就在这时，我第一次读了柏拉图一些最重要的对话录，尤其是《高尔吉亚[2_27]篇》《普罗泰哥拉[2_28]篇》和《共和政体》。父亲认为柏拉图对自己精神文化的影响比任何作家都要大，他经常向年轻学生推荐的也是他。这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以柏拉图式的对话为范例的苏格拉底问答法[2_29]，是一种非常卓越的训练方法，用以纠正错误，在智力允许的情况下澄清悟性混乱。这种智力允许的情况是指在通俗的语法及措词的指导下，能够产生大量联想意义的理解。这种精确、透彻的问答法，让模糊笼统的人要么用明确的术语向自己解释意思，要么干脆承认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永远用具体的例子检验所有一般性的陈述，对抽象、涵义广的术语进行形式上的限定，这需要确定某个更大的类别，这一类别包括许多术语，通过对相关事物进行一系列精确的区分，标出它的界限和定义，使这些术语细化到想要的程度——所有这一切，作为精确思考的训练，都是极宝贵的。所有这一切，即使在我那么小的年龄，也能抓住我的注意力，成为我思维的一部分。从那时起，我一直觉得，柏拉图主义者的头衔更应该属于那些从柏拉图研究模式中受益并努力践行它的人，而不是那些仅因为采用某些武断的结论而出名的人，这些结论大多是从柏拉图最难理解的著作中提取的，而从他的思想和作品特征来看，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确定这些是诗歌式的幻想，还是哲学猜想。

In going through Plato and Demosthenes, since I could now read these authors, as far as the language was concerned, with perfect ease, I was not required to construe them sentence by sentence, but to read them aloud to my father, answering questions when asked: but the particular attention which he paid to elocution (in which his own excellence was remarkable) made this reading aloud to him a most painful task. Of all things which he required me to do, there was none which I did so constantly ill, or in which he so perpetually lost his temper with me. He had thought much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art of reading, especially the most neglected part of it, the inflections of the voice, or *modulation* , as writers on elocution call it (in contrast with *articulation* on the one side, and *expression* on the other), and had reduced it to rules, grounded on the logical analysis of a sentence. These rules he strongly impressed upon me, and took me severely to task for every violation of them: but I even then remarked (though I did not venture to make the remark to him) that though he reproached me when I read a sentence ill, and *told* me how I ought to have read it, he never by reading it himself, *showed* me how it ought to be read. A defect running through his otherwise admirable modes of instruction, as it did through all his modes of thought, was that of trusting too much to the intelligibleness of the abstract, when not embodied in the concrete. It was at a much later period of my youth, when practising elocution by myself, or with companions of my own age, that I for the first time understood the object of his rules, and saw the psychological grounds of them. At that time I and others followed out the subject into its ramifications, and could have composed a very useful treatise, grounded on my father's principles. He himself left those principles and rules unwritten. I regret that when my mind was full of the subject, from systematic practice, I did not put them, and our improvements of them, into a formal shape.

在读柏拉图和狄摩西尼时我已经没有语言上的困难了，所以在通读这些作者的作品时，父亲不让我逐句地解释，而是大声读出来，并回答他的问题。但是，由于他特别注意朗诵法（在这方面他非常优秀），所以给他朗读是件很痛苦的事。在他要求我做的所有事情当中，只有这件事是我总也做不好，或者总让他对我发火的。对于朗读艺术的原则，他思考过很多，尤其是最常被人忽视的那部分，如音调变化，朗诵法的作者称它为韵律（一方面和发音形成对比，另一方面和措词形成对比），并基于对句子的逻辑分析，将其归纳成准则。他让我牢牢记住这些准则，我每次违反，都会受到严厉的指责。但是，我甚至在那时就注意到（尽管我没有斗胆跟他谈及此事），虽然我句子读得不好的时候他责备我，并告诉我应该怎么读，但是他从来没有通过自己朗读，来给我展示应该怎样朗读。他的教育方式以及他的整个思考方式一直有一个缺点，就是过于相信抽象事物在没有具体事例佐证时仍能够被理解，除了这一点，他的教育方式还是很值得钦佩的。在我青年末期，我自己或者在和同龄伙伴练习朗读与演讲时，我才第一次理解他的准则针对的对象和它们的心理学根据。那时，我和其他人一直探究这个主题，追本溯源，原本是能够在父亲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创作一篇非常有用的论文的。但他自己没有把这些原则和准则写下来。我也很遗憾，由于系统地实践，当时我满脑子都是这个主题，但我没有把它们以及我们对它们的改进，以正式的形式写下来。

A book which contributed largely to my education, in the best sense of the term, was my father's *History of India* . It was published in the beginning of 1818. During the year previous, while it was passing through the press, I used to read the proof sheets to him; or rather, I read the manuscript to him while he corrected the proofs. The number of new ideas which I received from this remarkable book, and the impulse and stimulus as well as guidance given to my thoughts by its criticism and disquisitions on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Hindoo part, on institutions and the acts of

governments in the English part, made my early familiarity with it eminently useful to my subsequent progress. And though I can perceive deficiencies in it now as compared with a perfect standard, I still think it, if not the most, one of the most instructive histories ever written, and one of the books from which most benefit may be derived by a mind in the course of making up its opinions.

从教育的最佳意义上讲，对我的教育大有裨益的一本书是父亲的《英属印度史》，它出版于1818年年初。之前的一年，这本书正在接受出版社的审查，我经常给他读校样，或者我给他读手抄本，他改校样。从这本不寻常的书中，我得到了很多新观点，还有它对印度的社会和文明，对英国的制度和政府行为的批评及专题讨论，都给我的思想以刺激、促进和指引。早期通晓这本书，对我后来的进步产生了巨大作用。尽管和最好的标准读本相比，我现在能觉察到里面的不足，但是，我仍然认为，它即使不是人们写过的最具教育性的史书，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个人观点形成过程中，可从中受益良多的一本书。

The Preface, among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of my father's writings, as well as the richest in materials of thought, gives a picture which may be entirely depended on, of the sentiments and expectations with which he wrote the *History* . Saturated as the book is with the opinions and modes of judgment of a democratic radicalism then regarded as extreme; and treating with a severity, at that time most unusual,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the English law, and all parties and classes who possessed any considerable influence in the country; he may have expected reputation, but certainly not advancement in life, from its publication; nor could he have supposed that it would raise up anything but enemies for him in powerful quarters: least of all could he have expected favour from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whose commercial privileges he was

unqualifiedly hostile, and on the acts of whose government he had made so many severe comments: though, in various parts of his book, he bore a testimony in their favour, which he felt to be their just due, namely, that no Government had on the whole given so much proof, to the extent of its lights, of good intention towards its subjects; and that if the acts of any other Government had the light of publicity as completely let in upon them, they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still less bear scrutiny.

前言最能体现父亲的著述风格，也包含最丰富的思想内涵，它忠实地反映了父亲创作《英属印度史》一书时的情绪和期待。这本书饱含当时被认为很偏激的民主激进主义的观点和判断模式；而且，对待英国宪法、英国法律和在英国拥有一定影响力的所有政党及阶级的态度非常严厉，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他可能期望借出版此书获得名誉，但是肯定没有指望靠它提升生活质量。除了在掌权派中增加敌人外，他也不会认为它还能带来什么。他最不奢望的是得到东印度公司的青睐，因为他绝对敌视该公司的商业特权，对它的政府行为也做了很多严厉的批评。尽管在书中不少地方，他也做了对他们有利的论述，他认为是他们应得的，即与其他政府相比，这个政府总体来说，竭尽所能给出了很多证据，证明对自己臣民的善意。如果其他任何政府的行为有觉悟完全公之于众的话，它们很可能更经受不起仔细的检查。

On learning, however, in the spring of 1819, about a year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History* , that the East India Directors desired to strengthen the part of their home establishment which was employed in carrying on the correspondence with India, my father declared himself a candidate for that employment, and, to the credit of the Directors, successfully. He was appointed one of the Assistants of the Examiner of India Correspondence; officers whose

duty it was to prepare drafts of despatches to India, for consideration by the Directors, in the principal departments of administration. In this office, and in that of Examiner, which he subsequently attained, the influence which his talents, his reputation, and his decision of character gave him, with superiors who really desired the good government of India, enabled him to a great extent to throw into his drafts of despatches, and to carry through the ordeal of the Court of Directors and Board of Control, without having their force much weakened, his real opinions on Indian subjects. In his *History* he had set forth, for the first time, many of the true principles of Indian administration: and his despatches, following his *History* , did more than had ever been done before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India, and teach Indian officials to understand their business. If a selection of them were published, they would, I am convinced, place his character as a practical statesman fully on a level with his eminence as a speculative writer.

然而，1819年春天，《英属印度史》出版后大概一年，得知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希望加强负责开展与印度通信联系的国内机构后，父亲宣布要竞聘这份工作。感谢那些董事们，父亲被录取了，他被任命为印度通信部的审查员助理。这类职员的职责是起草发往印度的公文，供主要行政部门的董事们参考。在这个职位上，以及在他后来获得的审查员职位上，父亲的才能、声誉和果断的性格赋予他的影响力，加上真正渴望好好管理印度的上级，使他在起草公文的时候，能够经常把自己对印度问题的观点融入其中（这一点没有削弱公文的效力），并通过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的考验。在《英属印度史》中，他第一次阐明了印度行政管理的真正原则。他的公文，遵循《英属印度史》，对促进印度的进步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并教育印度官员了解自己的职责。如果选择一部分发表的话，我相信，它们会让人觉得父亲是一位勤于思考的卓越作家的同时，同样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

This new employment of his time caused no relaxation in his attention to my education. It was in this same year, 1819, that he took me through a complete course of political economy. His loved and intimate friend, Ricardo, had shortly before published the book which formed so great an epoch in political economy; a book which would never have been published or written, but for the entreaty and strong encouragement of my father; for Ricardo, the most modest of men, though firmly convinced of the truth of his doctrines, deemed himself so little capable of doing them justice in exposition and expression, that he shrank from the idea of publicity. The same friendly encouragement induced Ricardo, a year or two later,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where, during the remaining years of his life, unhappily cut short in the full vigour of his intellect, he rendered so much service to his and my father's opinions both on political economy and on other subjects.

尽管他的时间有了新用途，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放松对我的教育的关注。同一年（1819年），他让我完整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他爱戴的密友李嘉图 [2_30] ，刚刚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开创了伟大的新纪元，但如果没有父亲的迫切要求和坚定鼓励的话，这本书根本就不会出版甚至成书。这是因为李嘉图非常谦虚，尽管坚信自己的学说非常正确，却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很好地阐述和表达，所以他不愿意公之于众。同样的友好鼓励，促使李嘉图一两年后成为下议院的议员。在那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为自己和我父亲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问题上的观点贡献了很多，很不幸，他正当才华横溢之时离开了人世。

Though Ricardo's great work was already in print, no didactic treatise embodying its doctrines, in a manner fit for learners, had

yet appeared. My father, therefore, commenced instructing me in the science by a sort of lectures, which he delivered to me in our walks. He expounded each day a portion of the subject, and I gave him next day a written account of it, which he made me rewrite over and over again until it was clear, precise, and tolerably complete. In this manner I went through the whole extent of the science; and the written outline of it which resulted from my daily *compterendu* , served him afterwards as notes from which to write his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 After this I read Ricardo, giving an account daily of what I read, and discussing, in the best manner I could, the collateral points which offered themselves in our progress.

尽管李嘉图的伟大作品已经出版，但是具有教诲性的，并以适合初学者方式写的有关其学说的论文，还没有出现。因此，父亲开始用授课的方式教我学习这门科学，在我们散步的时候讲给我听。他每天阐述这个主题的一部分，第二天，我交给他书面报告，他会让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写，直到写得清晰易懂，严谨周密，并且相对比较完整。我以这种方式学完了这门学科的所有内容。我为了每天向他汇报而写的书面大纲，后来成了他写《政治经济学要义》的笔记。这之后，我读了李嘉图，每天报告读的内容，并尽我最大努力，讨论学习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On Money, as the most intricate part of the subject, he made me read in the same manner Ricardo's admirable pamphlets, written during what was called the Bullion controversy; to these succeeded Adam Smith; and in this reading it was one of my father's main objects to make me apply to Smith's more superficial 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superior lights of Ricardo, and detect what was fallacious in Smith's arguments, or erroneous in any of his

conclusions. Such a mode of instruction was excellently calculated to form a thinker; but it required to be worked by a thinker, as close and vigorous as my father. The path was a thorny one, even to him, and I am sure it was so to me, notwithstanding the strong interest I took in the subject. He was often, and much beyond reason, provoked by my failures in cases where success could not have been expected; but in the main his method was right, and it succeeded. I do not believe that any scientific teaching ever was more thorough, or better fitted for training the faculties, than the mode in which logic and political economy were taught to me by my father. Striving, even in an exaggerated degree, to call forth the activity of my faculties, by making me find out everything for myself, he gave his explanations not before, but after, I had felt the full force of the difficulties; and not only gave me an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se two great subjects, as far as they were then understood, but made me a thinker on both. I thought for myself almost from the first, and occasionally thought differently from him, though for a long time only on minor points, and making his opinion the ultimate standard. At a later period I even occasionally convinced him, and altered his opinion on some points of detail: which I state to his honour, not my own. It at once exemplifies his perfect candour, and the real worth of his method of teaching.

论金钱，是这个主题中最复杂的部分，他让我以同样的方式读李嘉图写于金价论战时期令人钦佩的小册子。这之后，我又读了亚当·斯密的大作，父亲让我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让我把李嘉图的卓越观点应用于斯密较肤浅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找出斯密论据的谬误之处，或者结论中的任何错误。这种指导方式的目的在于培养思想家，这是种非常好的指导方式。但是，必须由一个像父亲一样亲近、精力充沛的思想家来进行。这条路即使对父亲来说也是痛苦的，当然，对我来说更是如此，虽然我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父亲经常由于我的失败而发

火，而且不可理喻，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成功；但总体来说，他的方法是正确的，也成功了。我认为，没有任何科学的教学方法，比父亲教我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更全面，或更适合培养能力。他通过让我自己找出所有答案，努力调动活跃我的才能，甚至到了夸张的程度。他之前不给我解释，直到我感觉束手无策时才点拨一二；他不仅根据我当时的理解，给我这两大科目的准确知识，还让我成为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家。我几乎从一开始就独立思考，偶尔和他的想法不一样，尽管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在小问题上不一样，最后还是以他的观点为最终标准。后来，我甚至偶尔把他给说服了，在某些小细节上，改变了他的观点。我把这归功于他，而不是我自己。这个例子直接说明了他的完全公正，以及他的教学法的真正价值。

At this point concluded what can properly be called my lessons: when I was about fourteen I left England for more than a year; and after my return, though my studies went on under my father's general direction, he was no longer my schoolmaster. I shall therefore pause here, and turn back to matters of a more general nature connected with the part of my life and education included in the preceding reminiscences.

这时，我严格意义上的功课学习结束了。大概十四岁的时候，我离开英国一年多。回来之后，尽管我的学习仍然在父亲的总体指导下进行，他已经不再是我的老师了。因此，我在这儿打住，回到前面的回忆中提到的，与我的生活和教育有关的一些泛泛的事情上去。

In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which I have partially retraced, the point most superficially apparent is the great effort to give, during the years of childhood, an amount of knowledge in what are

considered the higher branches of education, which is seldom acquired (if acquired at all) until the age of manhood. The result of the experiment shows the ease with which this may be done, and places in a strong light the wretched waste of so many precious years as are spent in acquiring the modicum of Latin and Greek commonly taught to schoolboys; a waste which has led so many educational reformers to entertain the ill-judged proposal of discarding these languages altogether from general education. If I had been by nature extremely quick of apprehension, or had possessed a very accurate and retentive memory, or were of a remarkably active and energetic character, the trial would not be conclusive; but in all these natural gifts I am rather below than above par; what I could do, could assuredly be done by any boy or girl of average capacity and healthy physical constitution: and if I have accomplished anything, I owe it, among other fortunate circumstances, to the fact that through the early training bestowed on me by my father, I started, I may fairly say, with an advantage of a quarter of a century over my contemporaries.

在我部分回忆到的教育过程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童年时代，父亲努力给予我属于高等教育的知识，这种知识在成年之前很少能获得（如果真能获得的话）。这个实验的结果证明了这件事要办到其实很简单，也深刻揭露了学生们要花那么多年宝贵时间，学习一点点拉丁语和希腊语，纯属浪费时间。这种浪费让很多教育改革家有了把这些语言从普通教育中完全取消的轻率提议。如果我生来就理解速度极快，或者记忆力精确持久，又或者性格极其积极、充满活力的话，那么这个试验可能不具备决定意义。但是我在这些天分上，低于标准，而非高于标准。我能做到的，任何能力一般、体格健康的男孩或女孩肯定都做得到。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在诸多有利因素中，最应该归功于父亲给予我的早期训练，毫不夸张地说，与同龄人相比，我的优势在于我起步比他们早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There was one cardinal point in this training, of which I have already given some indication, and which,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as the cause of whatever good it effected. Most boys or youths who have had much knowledge drilled into them, have their mental capacities not strengthened, but overlaid by it. They are crammed with mere facts, and with the opinions or phrases of other people, and these are accepted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power to form opinions of their own; and thus the sons of eminent fathers, who have spared no pains in their education, so often grow up mere parroters of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capable of using their minds except in the furrows traced for them. Mine, however, was not an education of cram. My father never permitted anything which I learnt to degenerate into a mere exercise of memory. He strove to make the understanding not only go along with every step of the teaching, but, if possible, precede it. Anything which could be found out by thinking I never was told, until I had exhausted my efforts to find it out for myself. As far as I can trust my remembrance, I acquitted myself very lamely in this department; my recollection of such matters is almost wholly of failures, hardly ever of success. It is true the failures were often in things in which success, in so early a stage of my progress, was almost impossible. I remember at some time in my thirteenth year, on my happening to use the word idea, he asked me what an idea was; and expressed some displeasure at my ineffectual efforts to define the word: I recollect also his indignation at my using the common expression that something was true in theory but required correction in practice; and how, after making me vainly strive to define the word theory, he explained its meaning, and showed the fallacy of the vulgar form of speech which I had used; leaving me fully persuaded that in being unable to give a correct definition of Theory, and in speaking of it as something which might be at variance with

practice, I had shown unparalleled ignorance. In this he seems, and perhaps was, very unreasonable; but I think, only in being angry at my failure. A pupil from whom nothing is ever demanded which he cannot do, never does all he can.

我已经提到过这种训练里面最重要的一点，训练中获得的任何益处都源自于它。大多数通过反复练习而获得知识的孩子或年轻人，他们的智能不但没有得到提高，反而被知识湮没了。他们的脑子里填满了单纯的事实，以及他人的观点和言辞，他们接受了这些东西，让它们取代了形成自己观点的能力。因此，一位杰出父亲的儿子，不遗余力地接受教育，经常长大后却只会鹦鹉学舌，除了回忆学过的东西外，他的大脑别无他用。然而，我的教育不是填鸭式的。父亲决不允许我所学的东西仅仅退化为记忆的练习。他不仅力求教学过程的每一步我都能理解，有可能的话，还让我的理解提前于教学。任何需要思考才能获得的东西，他从来都不会告诉我，除非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还没有找出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这方面我表现得很差。回想起来，这种事情我基本都是失败，很少成功。其实，失败经常发生在以我的初学程度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地方。我记得十三岁时，有一次我碰巧用到“观点”这个词，他问我什么是观点，我没能很好地下定义，他表示出不满。我还记得，我说了一句套话，说有些东西理论上正确，但是实践起来需要改进，他听了很气愤。在我试图定义“理论”徒劳无功后，他向我解释了它的意思，并指出我所用的通俗语言的谬误。这让我完全相信，不能给“理论”正确地下定义，还说它可能与实践不一致，我是多么的无知。他这么做，似乎很不讲理，或者说就是很不讲理。但是我想，这只是在我失败而惹他生气时才会发生。如果从来不要求学生做他做不到的事情，那么他也决不会去做所有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One of the evils most liable to attend on any sort of early proficiency, and which often fatally blights its promise, my father

most anxiously guarded against. This was self-conceit. He kept me, with extreme vigilance, out of the way of hearing myself praised, or of being led to make self-flattering comparisons between myself and others. From his own intercourse with me I could derive none but a very humble opinion of myself; and the standard of comparison he always held up to me, was not what other people did, but what a man could and ought to do. He completely succeeded in preserving me from the sort of influences he so much dreaded. I was not at all aware that my attainments were anything unusual at my age. If I accidentally had my attention drawn to the fact that some other boy knew less than myself—which happened less often than might be imagined—I concluded, not that I knew much, but that he, for some reason or other, knew little, or that his knowledge was of a different kind from mine. My state of mind was not humility, but neither was it arrogance. I never thought of saying to myself, I am, or I can do, so and so. I neither estimated myself highly nor lowly: I did not estimate myself at all. If I thought anything about myself, it was that I was rather backward in my studies, since I always found myself so, in comparison with what my father expected from me. I assert this with confidence, though it was not the impression of various persons who saw me in my childhood. They, as I have since found, thought me greatly and disagreeably self-conceited; probably because I was disputatious, and did not scruple to give direct contradictions to things which I heard said. I suppose I acquired this bad habit from having been encouraged in an unusual degree to talk on matters beyond my age, and with grown persons, while I never had inculcated on me the usual respect for them. My father did not correct this ill-breeding and impertinence, probably from not being aware of it, for I was always too much in awe of him to be otherwise than extremely subdued and quiet in his presence. Yet with all this I had no notion of any superiority in myself; and well was it for me that I had not. I remember the very place in Hyde

Park where, in my fourteenth year, on the eve of leaving my father's house for a long absence, he told me that I should find, as I got acquainted with new people, that I had been taught many things which youths of my age did not commonly know; and that many persons would be disposed to talk to me of this, and to compliment me upon it. What other things he said on this topic I remember very imperfectly; but he wound up by saying, that whatever I knew more than others, could not be ascribed to any merit in me, but to the very unusual advantage which had fallen to my lot, of having a father who was able to teach me, and willing to give the necessary trouble and time; that it was no matter of praise to me, if I knew more than those who had not had a similar advantage, but the deepest disgrace to me if I did not. I have a distinct remembrance, that the suggestion thus for the first time made to me, that I knew more than other youths who were considered well educated, was to me a piece of information, to which, as to all other things which my father told me, I gave implicit credence, but which did not at all impress me as a personal matter. I felt no disposition to glorify myself upon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re were other persons who did not know what I knew; nor had I ever flattered myself that my acquirements, whatever they might be, were any merit of mine: but, now when my attention was called to the subject, I felt that what my father had said respecting my peculiar advantages was exactly the truth and common sense of the matter, and it fixed my opinion and feeling from that time forward.

年少时即小有成绩的人，大都会有一个毛病，而这经常是致命的，会毁掉人的前途，父亲时刻不忘，谨防它的出现。这个毛病就是自满。他非常警惕，不让我听到赞美之词，或者被人引导，拿自己和别人做自得的比较。从他和我的交流当中，我只会觉得自己非常低微。他给我订立的比较标准，不是看别人做过什么，而是一个人能够

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他非常成功地使我免于受到那些他所担心的事情的影响。我根本没意识到我的成绩在那个年龄来说，有什么不寻常。如果我偶尔注意到别的男孩比我懂得少的话——这种情况比想象的要少——我的结论不是我懂得多，而是他，由于某种原因懂得少，或者他的知识类型与我的不同。我的心态不是谦逊，但也不是自大。我心里从来没有过“我怎么样”，或“我能怎么样”之类的想法。我没有高估，也没有低估自己：我根本就不估量自己。如果说我对自己有过什么想法的话，就是我在学习上太落后，因为和父亲对我的期望相比，我总是如此。我这么说非常肯定，可是在我童年时见过我的许多人，对我的印象并非如此。我后来发现，他们觉得我非常自大，令人不快；很可能是因为我爱争论，不管听到别人说什么，都直接反驳，从不迟疑。我想，我养成这个坏习惯，是因为经常被鼓励谈论超越我年龄的事情，并且是和成年人讨论，但我从未告诫自己对他们要有基本的尊重。父亲之所以没有纠正我这种没教养、无礼的行为，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因为我总是特别害怕他，在他面前只会极其克制，安静。然而不管怎么说，我没有任何优越感，这对我来说也是有益的。十四岁时，在即将离开父亲的家很长一段时间的前夕，我记得就在海德公园的那个地方，父亲告诉我说，在开始认识新的人的时候，我应该知道自己学了很多东西，是和我一样大的年轻人通常不知道的。很多人会和我说起这件事，还会因此恭维我。关于这个话题，他还说了什么，我记得不很清楚了。但是，他总结说，不管我比别人多知道些什么，都不能归功于我自己，而要归功于我的运气好，有非常难得的优势，那就是有个能教导我，并且乐意花费必要的心思和时间的父亲。如果我比没有类似优势的人懂得多的话，并不值得赞美，比他们懂得少，才是最大的耻辱。我很清楚地记得，这是父亲第一次暗示我，说我比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懂得多，与他告诉我的其他事情一样，我对此毫不怀疑，但我并没有把它视为个人问题。我不会因为别人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就要赞美自己。我也从没有自夸，说自己的成就，不管是什么，有一点点归功于我自己。但是，现在我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我觉得父亲关于我的独特优势的说法，完全是事实，在这件事上也符合常理，它使我的看法和感觉从那时起始终如一。

It is evident that this, among many other of the purposes of my father's scheme of education, could not have been accomplished if he had not carefully kept me from having any great amount of intercourse with other boys. He was earnestly bent upon my escaping not only the ordinary corrupting influence which boys exercise over boys, but the contagion of vulgar modes of thought and feeling; and for this he was willing that I should pay the price of inferiority in the accomplishments which schoolboys in all countries chiefly cultivate. The deficiencies in my education were principally in the things which boys learn from being turned out to shift for themselves, and from being brought together in large numbers. From temperance and much walking, I grew up healthy and hardy, though not muscular; but I could do no feats of skill or physical strength, and knew none of the ordinary bodily exercises. It was not that play, or time for it, was refused me. Though no holidays were allowed, lest the habit of work should be broken, and a taste for idleness acquired, I had ample leisure in every day to amuse myself; but as I had no boy companions, and the animal need of physical activity was satisfied by walking, my amusements, which were mostly solitary, were in general, of a quiet, if not a bookish turn, and gave little stimulus to any other kind even of mental activity than that which was already called forth by my studies; I consequently remained long, and in a less degree have always remained, inexpert in anything requiring manual dexterity; my mind, as well as my hands, did its work very lamely when it was applied, or ought to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practical details which, as they are the chief interest of life to the majority of men, are also the things in which whatever mental capacity they have, chiefly shows itself. I was constantly meriting reproof by inattention, inobservance, and general slackness of mind in matters of daily life. My father was the extreme opposite in these

particulars: his senses and mental faculties were always on the alert; he carried decision and energy of character in his whole manner and into every action of life: and this, as much as his talents, contributed to the strong impression which he always made upon those with whom he came into personal contact. But the children of energetic parents, frequently grow up unenergetic, because they lean on their parents, and the parents are energetic for them. The education which my father gave me, was in itself much more fitted for training me to know than to do. Not that he was unaware of my deficiencies; both as a boy and as a youth I was incessantly smarting under his severe admonitions on the subject. There was anything but insensibility or tolerance on his part towards such shortcomings: but, while he saved me from the demoralizing effects of school life, he made no effort to provide me with any sufficient substitute for its practicalizing influences. Whatever qualities he himself, probably, had acquired without difficulty or special training, he seems to have supposed that I ought to acquire as easily. He had not, I think, bestowed the same amount of thought and attention on this, as on most other branches of education; and here, as well in some other points of my tuition, he seems to have expected effects without causes.

在父亲教育计划的众多目标中，如果不是他小心翼翼地阻止我和其他男孩子过多接触的话，这个目标很显然不会实现。父亲不仅小心地让我避开常见的、男孩子间互相施加的坏影响，还急切地决心要让我避开粗俗的思考方式和感情的恶劣影响。为此，他情愿让我付出代价，即所有国家的男学生都具备的主要能力上，我却比别人差。我所受的教育的缺点，主要是不具备男孩子们在接受自谋生路的训练过程中学到的技能和他们在群体活动中所学到的东西。我虽然不怎么强壮，但是通过戒酒和散步，得以健康成长。然而，我不会做任何技能或是体能的事情，也完全不了解常见的身体锻炼方法。我并不是拒绝

玩耍，或者没有时间玩耍。尽管父亲不给我假期，以免打破学习的习惯，养成懒惰的习性，但我每天还是有充足的时间自娱自乐。不过，因为我没有男孩玩伴，并且身体活动的动物本能已由散步来满足，所以我的娱乐活动大多都是单独进行的，即使不是手不释卷的话，通常也是安静的，除了能够刺激我为了学习已经开动的大脑外，这种活动不会给我的任何其他活动，甚至是智力活动带来刺激。因此，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不擅长做任何需要灵活动作的事情，后来好了一点，但是可以说一直以来都不怎么擅长。我的大脑以及双手，用来做具体的事情时，或者应该用到它们时，经常很没有效率，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事情是生活中的主要情趣，也是他们所拥有的心智能力得以展现的主要方式。我经常由于对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疏忽，不留心观察，经常因漫不经心而被训斥。在这些细节上，父亲和我完全相反：他的感官和头脑总是十分警觉，他做出的与他性格相符的决定和他所具有的活力体现在他的行事风格和生活中的每个举动中。这差不多和他的才干一样，总是给那些和他交往过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充满活力的父母的孩子，往往长大后很懒散，因为他们依赖父母，而父母也为他们积极打算。父亲给我的教育，本质上更适合于训练我思考的能力而非动手的能力。他并非不知道我的缺点，在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他严厉地警告我这些问题，让我很痛苦。他绝不是不在乎或者能容忍这样的缺点，但是，尽管他使我免受学校生活的不利影响，他并没有尽力为我提供足够的东西来替代学校的实践作用。很可能对那些他自己没有费力气，或没经过特殊训练就获得的素质，不管是什么样的，他似乎都认为我也应该同样轻易就能获得。我想，在这点上，他没有像教育的其他方面那样给予同等的思考和关注。他似乎只期待成果，而不考虑起因。

[1_1].In a subsequent stage of boyhood, when these exercises had ceased to be compulsory, like most youthful writers I wrote tragedies; under the inspiration not so much of Shakspeare as of Joanna Baillie, whose *Constantine Paleologus* in particular appeared to me one of the most glorious of human compositions. I still think it one of the best dramas of the last two centuries.

[2_1].大卫·休谟（1711—1776），苏格兰历史学家、哲学家。与约翰·洛克及乔治·

贝克莱并称三大英国经验主义者。

[2_2].罗伯特·胡克（1635—1703），英国实验主义哲学家、物理学家，著名成果有“胡克定律（Hooke's Law）”。

[2_3].杰瑞米·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功利主义伦理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代表作是《道德及立法原理》。

[2_4].普鲁士，位于北欧。

[2_5].约翰·诺克斯（1505—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和史学家，创立苏格兰长老会。

[2_6].贵格会，又称公谊会或者教友派（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

[2_7].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1540—1596），英国航海家，最初环绕地球航行的人。

[2_8].詹姆斯·库克船长（1728—1779），英国海军上校、航海家，太平洋和南极海洋的探险家。

[2_9].《伊利亚特》，古希腊描写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

[2_10].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数学家，著有《几何原本》13卷，一直流传至今。

[2_11].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古罗马诗人，从倾向共和转而拥护帝制，作品有《讽刺诗集》《颂歌》等。

[2_12].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古罗马历史学家。他所著的《罗马史》共有142卷。

[2_13].泰伦斯（约公元前186—前161）古罗马喜剧作家。其喜剧有《福尔弥昂》《安德罗斯好》等。

[2_14].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

[2_15].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395），希腊历史学家。

[2_16].色诺芬（约公元前431—前355），古希腊历史学家、将领、苏格拉底的弟子。著有《远征记》《希腊史》《回忆苏格拉底》等。

[2_17].作者注：在我童年里后来的阶段里，这些练习不再是强制的了，我和其他青年作家一样开始写悲剧。不过对我启发最大的是乔安娜·贝利而不是莎士比亚，尤其贝利写的《君士坦丁　巴列奥略王朝》是我见过的最辉煌的作品之一。到如今我仍认为这是近两百年来最好的戏剧之一。

[2_18].罗伯特·彭斯（1759—1796），苏格兰著名的农民诗人。他用方言写成的充满幽默感的歌谣歌颂了爱情、爱国主义和朴实的生活。

[2_19].威廉·柯珀（1731—1800），英国诗人，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先锋。

[2_20].詹姆斯·贝蒂（1735—1803），苏格兰哲学家和诗人。

[2_21].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英国诗人，主要以其寓言性浪漫史诗《仙后》而闻名。

[2_22].《工具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

[2_23].狄摩西尼（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演说家，反对马其顿入侵希腊。

[2_24].塔西佗（约55—120），古罗马官员和历史学家，他著有两部最伟大的著作《历史》和《编年史》。

[2_25].尤维纳利斯（约60—140），古罗马讽刺诗人，其作品谴责了古罗马特权阶级的腐化。

[2_26].昆体良（约35—96），古罗马修辞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雄辩术原理》。

[2_27].高尔吉亚（约公元前483—前376），古希腊诡辩学者、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及修辞学家，原居于西西里。

[2_28].普罗泰哥拉（约公元前490—前420），古希腊哲学家、诡辩家。

[2_29].苏格拉底问答法是一种探讨和辩论教学方法，即不直接向学生传授各种具体知识，而是通过问答、交谈、争辩、诱导或暗示，把学生导向预定的结论。

[2_30].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其主要著作《政治经济

学与赋税原理》（1817年）。

Chapter 2 Moral Influences in Early Youth. My Father's Character and Opinions

第二章　少年时期的思想影响父亲的性格和观点

In my education, as in that of everyone, the moral influences, which are so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all others, are also the most complicated, and the most difficult to specify with any approach to completeness. Without attempting the hopeless task of detailing the circumstances by which, in this respect, my early character may have been shaped, I shall confine myself to a few leading points, which form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any true account of my education.

和任何人一样，在我的教育中，精神影响比其他影响重要得多，也是最复杂、最难以用任何方法全面说明的。去详细说明塑造我年少时性格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的，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将只列举一些最重要的事件，它们在任何关于我的教育的真实记述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I was brought up from the first without any religious belief, in the ordinary acceptation of the term. My father, educated in the creed of Scotch Presbyterianism, had by his own studies and reflections been early led to reject not only the belief in Revelation, but the foundations of what is commonly called Natural Religion. I have heard him say, that the turning point of his mind on the subject was reading Butler's *Analogy* . That work, of which he always continued to speak with respect, kept him, as he said, for

some considerable time, a believer in the divine authority of Christianity; by proving to him that whatever are the difficulties in believing that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proceed from, or record the acts of, a perfectly wise and good being, the same and still greater difficulties stand in the way of the belief, that a being of such a character can have been the Maker of the universe. He considered Butler's argument as conclusive against the only opponents for whom it was intended. Those who admit an omnipotent as well as perfectly just and benevolent maker and ruler of such a world as this, can say little against Christianity but what can, with at least equal force, be retorted against themselves. Finding, therefore, no halting place in Deism, he remained in a state of perplexity, until, doubtless after many struggles, he yielded to the conviction, that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things nothing whatever can be known. This is the only correct statement of his opinion; for dogmatic atheism he looked upon as absurd; as most of those, whom the world has considered Atheists, have always done. These particulars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show that my father's rejection of all that is called religious belief, was not, as many might suppose, primarily a matter of logic and evidence: the grounds of it were moral, still more than intellectual. He found it impossible to believe that a world so full of evil was the work of an Author combining infinite power with perfect goodness and righteousness. His intellect spurned the subtleties by which men attempt to blind themselves to this open contradiction. The Sabaean, or Manichaean theory of a Good and an Evil Principle, struggling against each other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verse, he would not have equally condemned; and I have heard him express surprise, that no one revived it in our time. He would have regarded it as a mere hypothesis; but he would have ascribed to it no depraving influence. As it was, his aversion to religion, in the sense usually attached to the term, was of the same kind with that of

Lucretius: he regarded it with the feelings due not to a mere mental delusion, but to a great moral evil. He looked upon it as the greatest enemy of morality: first, by setting up fictitious excellences—belief in creeds, devotional feelings, and ceremonies, not connected with the good of human-kind—and causing these to be accepted as substitutes for genuine virtues: but above all, by radically vitiating the standard of morals; making it consist in doing the will of a being, on whom it lavishes indeed all the phrases of adulation, but whom in sober truth it depicts as eminently hateful. I have a hundred times heard him say that all ages and nations have represented their gods as wicked, in a constantly increasing progression; that mankind have gone on adding trait after trait till they reached the most perfect conception of wickedness which the human mind can devise, and have called this God, and prostrated themselves before it. This *ne plus ultra* of wickedness he considered to be embodied in what is commonly presented to mankind as the creed of Christianity. Think (he used to say) of a being who would make a Hell—who would create the human race with the infallible foreknowledge, and therefore with the intention, that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m were to be consigned to horrible and everlasting torment. The time, I believe, is drawing near when this dreadful conception of an object of worship will be no longer identified with Christianity; and when all persons, with any sense of moral good and evil, will look upon it with the same indignation with which my father regarded it. My father was as well aware as anyone that Christians do not, in general, undergo the demoralizing consequences which seem inherent in such a creed, in the manner or to the extent which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from it. The same slovenliness of thought, and subjection of the reason to fears, wishes, and affections, which enable them to accept a theory involving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prevents them from perceiving the 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theory. Such is the facility with

which mankind believe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things inconsistent with one another, and so few are those who draw from what they receive as truths, any consequences but those recommended to them by their feelings, that multitudes have held the undoubting belief in an Omnipotent Author of Hell, and have nevertheless identified that being with the best conception they were able to form of perfect goodness. Their worship was not paid to the demon which such a being as they imagined would really be, but to their own ideal of excellence. The evil is, that such a belief keeps the ideal wretchedly low; and opposes the most obstinate resistance to all thought which has a tendency to raise it higher. Believers shrink from every train of ideas which would lead the mind to a clear conception and an elevated standard of excellence, because they feel (even when they do not distinctly see) that such a standard would conflict with many of the dispensations of nature, and with much of what they are accustomed to consider as the Christian creed. And thus morality continues a matter of blind tradition, with no consistent principle, nor even any consistent feeling, to guide it.

我从一开始接受的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教育——按照大家对宗教信仰的普遍理解来说。我父亲受教于苏格兰长老会的教义，但他很早就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反思，不仅抛弃了对《启示录》的信仰，还反对通常所谓的自然宗教的基本原则。我听他说过，他对这个问题的思想转折点，是读了巴特勒[3_1]的《宗教类推》[3_2]。谈起这部著作的时候，他总是充满敬意，说此书曾让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信基督教的神圣权威。这部书向他证明，不管要相信《旧约》和《新约》是源自一个极其英明善良的人，或者是他行为的记录有多少困难，更具挑战意义的还在于要相信有这种性格的人是宇宙的造物主。他认为巴特勒的论证确凿，足以驳倒这本书针对的唯一对手。那些承认上帝万能、公正、善良，承认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的人们，

不能说反对基督教的话。如果说了，那么这些话可以带着至少同样的说服力，用来反驳他们自己。因此，他找不出自然神论中的缺陷，这让他一直很困惑。毫无疑问，经过多次挣扎后，他让步了，深信关于万物的起源这个问题，一切都不可知。这是对他的观点唯一正确的表述，因为他认为武断的无神论很荒诞，就像那些被称作无神论者的人，大部分人做的事情也很荒诞。这些细节很重要，因为它们表明了父亲反对所有这些所谓的宗教信仰，并不像很多人可能认为的那样，主要是因为逻辑和证据的问题，他反对的根据是道德上的，要高于智力层面。他觉得无法相信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是兼有无穷力量、完美善良和正义的造物主的作品。人们试图蒙蔽自己以接受这种明显的矛盾，但他的智慧让他唾弃这种微妙的努力。然而他不会同样谴责塞伯伊人或摩尼教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善恶互相争夺对宇宙的支配。我听他说过，他很吃惊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重振善恶原则。他会认为善恶原则只是个假设，但他不会把它归为让人堕落的力量。事实上，他对宗教（按照这个词的通常含义）的反感，和卢克莱修 [3_3] 一样：他对宗教的厌恶不是因为它不过是一种精神欺骗，而是因为宗教是一种强大的道德罪恶。他认为宗教是道德的最大敌人：首先，通过构建虚伪的美德——宗教的教义、虔诚的情感和宗教仪式，这些都与人类的美德没有关系——让它们取代真正的美德，为人接受；但最重要的，是通过从根本上损害道德的标准，让这个标准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这个人得到了所有慷慨的奉承话。但是，冷静看待事实的话，这个人又被刻画得极其可恨。我听他说过一百次，说所有时代、所有国家都把他们的上帝描绘得很邪恶，而且总是越来越邪恶。人类不停地给邪恶添加一个又一个的特征，直到符合他们的大脑对邪恶最完美的设想，并把这称为上帝，拜倒在它面前。他认为，这种登峰造极的邪恶，体现在通常呈现于人类面前的基督教教义里。（他经常说）设想一下一个会创造地狱的人——由于他拥有着绝对的先知，因此在创造人类时他就带着这种目的，即绝大多数要经受可怕、恒久的折磨。我相信，这种可怕的膜拜对象的观念，很快将不再和基督教画上等号。有任何道德善恶意识的人，也会像我父亲一样，带着同样的义愤看待它。父亲也和所有人一样清楚，不论是从人们原先预想的方式还是程度上来说，基督徒总体上并没有受到这种教义似

乎固有的腐化道德的影响。思想懒散，理智屈从于恐惧、愿望和情感的支配，让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理论，也让他们无从理解这个理论的逻辑结论。这就是人类的能力，能够同时相信自相矛盾的事物，很少有人从他们当作真理接受的东西中得出推论，而只是汲取自己的感觉喜欢的东西。因此，大众坚信存在万能的地狱创造者，然而又把那个人看成是他们能够设想出来的完美仁慈的化身。他们想象的那个人其实是个魔鬼，他们崇拜的并不是这个魔鬼，而是他们自己对于美德的理想。不幸的是，这样的信仰，使得这种理想很可怜，很卑下，它顽固地抵制所有希望提升这种理想的想法。任何会让他们的头脑对美德产生明确概念以及更高标准的一连串的观点，信徒们都不愿意相信，因为他们觉得（即使在他们没有看清楚的时候）这样一个标准会和造物主的很多安排相冲突，和他们习惯接受的基督教的很多教义相冲突。因此，道德一直都是一种盲目的传统，没有一贯的原则，也没有一贯的感情去引导它。

It would have been wholly inconsistent with my father's ideas of duty, to allow me to acquire impressions contrary to his convictions and feelings respecting religion: and he impressed upon me from the first, that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world came into existence was a subject on which nothing was known: that the question, “Who made me?” cannot be answered, because we have no experience or authentic information from which to answer it; and that any answer only throws the difficulty a step further back, since the question immediately presents itself, “Who made God?” He, at the same time, took care that I should be acquainted with what had been thought by mankind on these impenetrable problems. I have mentioned at how early an age he made me a reader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and he taught me to take the strongest interest in the Reformation, as the great and decisive contest against priestly tyranny for liberty of thought.

如果允许我获得和父亲相反的宗教信念和感情的话，那就会与他的责任观完全矛盾。所以从一开始，他就让我深深记住，对于世界产生的方式这个问题，人们还一无所知。“谁创造了我？”这个问题无法解答，因为我们没有回答它所需的经验或真实的信息。任何答案只会让困难更进一步，因为下一个问题马上就出现了，“谁创造了上帝？”同时，他确保我应该熟悉人类对这些令人费解的问题做过的思考。我曾提到过，在我那么小的时候，他就让我读教会史，他教我对宗教改革产生最强烈的兴趣，认同它是与传教士专制作斗争，是争取思想自由的决定性的伟大战斗。

I am thus one of the very few examples, in this country, of one who has not thrown off religious belief, but never had it: I grew up in a negative state with regard to it. I looked upon the modern exactly as I did upon the ancient religion, as something which in no way concerned me. It did not seem to me more strange that English people should believe what I did not, than that the men I read of in Herodotus should have done so. History had made the variety of opinions among mankind a fact familiar to me, and this was but a prolongation of that fact. This point in my early education had, however, incidentally one bad consequence deserving notice. In giving me an opinion contrary to that of the world, my father thought it necessary to give it as one which could not prudently be avowed to the world. This lesson of keeping my thoughts to myself, at that early age, was attended with some moral disadvantages; though my limited intercourse with strangers, especially such as were likely to speak to me on religion, prevented me from being placed in the alternative of avowal or hypocrisy. I remember two occasions in my boyhood, on which I felt myself in this alternative, and in both cases I avowed my disbelief and defended it. My opponents were boys, considerably older than myself: one of them I certainly staggered at the time, but the subject was never renewed

between us: the other who was surprised and somewhat shocked, did his best to convince me for some time, without effect.

我因此成为这个国家中少数的并非抛却了宗教信仰，而是从来就没有过宗教信仰的人之一。我成长于一个对宗教持否定态度的环境中。我看待现代宗教和古代宗教的方式完全一样，认为它们与我完全无关。对我来说，英国人信仰我不信的东西，就像我读希罗多德 [3_4] 的书，看到里面的人和我的信仰不同一样，不足为奇。读历史让我熟知人类中间存在多种观点的事实，这只不过是这个事实的延伸。然而，我早年教育中的这一点也附带有一个不好的结果，值得注意。父亲认为，教给我与世人相反的观点有必要谨慎，不向世人公开这个观点。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教我不告诉别人自己的思想，是有一些道德上的不利的。虽然我和陌生人的交往有限，尤其是与那些有可能和我谈论宗教的人，这使我不会置身于要么说实话，要么虚伪的选择之中。我记得，童年时我有两次处在这种选择中，这两次我都宣布了自己的怀疑，并为之辩护。我的对手是一些比我大很多的男孩子，我的言辞显然使得其中一个当时很慌乱，但是我们再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另一个感到很吃惊，甚至有些震惊，他努力劝说了我一阵子，让我相信他，但是没用。

The great advance in liberty of discussion,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esent time and that of my childhood, has greatly altered the moralities of this question; and I think that few men of my father's intellect and public spirit, holding with such intensity of moral conviction as he did, unpopular opinions on religion, or on any other of the great subjects of thought, would now either practise or inculcate the withholding of them from the world, unless in the cases, becoming fewer every day, in which frankness on these subjects would either risk the loss of means of subsistence, or would amount to exclusion from some

sphere of usefulness peculiarly suitable to the capacities of the individual. On religion in particular the time appears to me to have come when it is the duty of all who, being qualified in point of knowledge, have on mature consideration satisfied themselves that the current opinions are not only false but hurtful, to make their dissent known; at least, if they are among those whose station or reputation gives their opinion a chance of being attended to. Such an avowal would put an end, at once and for ever, to the vulgar prejudice, that what is called, very improperly, unbelief, is connected with any bad qualities either of mind or heart. The world would be astonished if it knew how great a proportion of its brightest ornaments—of those most distinguished even in popular estimation for wisdom and virtue—are complete sceptics in religion; many of them refraining from avowal, less from personal considerations than from a conscientious, though now in my opinion a most mistaken, apprehension, lest by speaking out what would tend to weaken existing beliefs, and by consequence (as they suppose) existing restraints, they should do harm instead of good.

讨论自由现在有了很大进步，这是和我童年时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它大大改变了讨论这个问题所涉及的道德性。我认为，现在很少有具备和我父亲一样的智力和公德心，以强烈的道德信念坚持不受欢迎的宗教观点或其他伟大思想的人，不会把他们的这些想法公之于世，或者反复劝导他人不要这样做。除非有这样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少，那就是坦白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要么会有失去谋生手段的危险，要么会被特别适合个人能力发挥的有益的领域排除在外。尤其在宗教问题上，我认为所有知识上过硬，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目前的观点不仅错误，而且有害的人，都有义务表达自己的异议，而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至少那些有地位或有名誉，能让自己的观点有机会被人注意到的人，都有义务这么做。这样的声明会立刻结束，并永远结束那种庸俗的偏见，即认为无信仰（非常不恰当的叫法）与头脑

或者心灵中的什么坏品质有关。如果世人知道最为世界增光添彩的人当中——即那些哪怕用通俗标准评价他们的智慧和美德，也是最卓越的人当中——有多大比例是彻底的宗教怀疑论者的话，会非常的震惊，他们中很多人克制自己不作声明，绝不是基于个人的考虑，而是本着在我目前看来十分错误的一种负责任的忧思，唯恐说出来会削弱现有的信仰，进而（像他们所认为的）削弱现有的约束，这样一来反而有害无益。

Of unbelievers (so called) as well as of believers, there are many species, including almost every variety of moral type. But the best among them, as no one who has had opportunities of really knowing them will hesitate to affirm, are more genuinely religious, in the best sense of the word religion, than those who exclusively arrogate to themselves the title. The liberality of the age, or in other words the weakening of the obstinate prejudice which makes men unable to see what is before their eyes because it is contrary to their expectations, has caused it be very commonly admitted that a Deist may be truly religious: but if religion stands for any graces of character and not for mere dogma, the assertion may equally be made of many whose belief is far short of Deism. Though they may think the proof incomplete that the universe is a work of design, and though they assuredly disbelieve that it can have an Author and Governor who is *absolute* in power as well as perfect in goodness, they have that which constitutes the principal worth of all religions whatever, an ideal conception of a Perfect Being, to which they habitually refer as the guide of their conscience; and this ideal of Good is usually far nearer to perfection than the objective Deity of those who think themselves obliged to find absolute goodness in the author of a world so crowded with suffering and so deformed by injustice as ours.

（所谓的）异教徒和信徒都有很多种，几乎涵盖了众多道德类型中的每一种。但是，任何真正有机会了解这其中最优秀者的人（信徒很少有这样的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肯定，这些人比那些把头衔硬加到自己头上，而把别人排除在外的人，更真诚地信仰宗教，从宗教这个词的最佳意义上来讲是这样。时代的开明，或者换句话说，曾让人们不见眼前之物——因为与他们的预期相反——的顽固偏见的削弱，使得人们普遍承认自然神论信仰者可能确实很虔诚。但是，如果宗教代表任何品质中的魅力，而不仅是教条的话，那么对于很多信仰完全达不到自然神论的人，也可以断言他们很虔诚。尽管他们可能认为，宇宙是设计的作品这种说法证据不足，尽管他们确实怀疑宇宙中存在一个拥有绝对权力，同时又是至善至美的创世者兼统治者，但是对于完美的存在，他们有一个理想的设想，这个设想构成了所有宗教的主要价值，他们通常称之为是非之心的指引。这种完美的善远比客观的神更接近完美，相信客观的神的人认为他们必须在创世者身上找到绝对的善，可是这个造物主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一样，充满苦难，因为不公正而畸形。

My father's moral convictions, wholly dissevered from religion, were very much of the character of those of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were delivered with the force and decision which characterized all that came from him. Even at the very early age at which I read with him the *Memorabilia* of Xenophon, I imbibed from that work and from his comments a deep respect for the character of Socrates; who stood in my mind as a model of ideal excellence: and I well remember how my father at that time impressed upon me the lesson of the “Choice of Hercules.” At a somewhat later period the lofty moral standard exhibited in the writings of Plato operated upon me with great force. My father's moral inculcations were at all times mainly those of the “Socraticiviri”; justice, temperance (to which he gave a very extended application), veracity, perseverance, readiness to encounter pain and especially labour; regard for the public good;

estimation of persons according to their merits, and of things according to their intrinsic usefulness; a life of exertion in contradiction to one of self-indulgent ease and sloth. These and other moralities he conveyed in brief sentences, uttered as occasion arose, of grave exhortation, or stern reprobation and contempt.

父亲的道德信念与宗教毫无关系，而在很大程度上和一些希腊哲学家相同。表达信念时体现出来的力量和果断，也是他所有作品的特征。在我非常小的时候，我和他一起读了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即使那时，从这部著作和父亲的评论中，我已经对苏格拉底的品格敬佩万分。他在我头脑中是完美杰出的化身：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父亲如何让我铭记《赫拉克勒斯的选择》这一课。在稍后的一段时期里，柏拉图的作品中呈现出来的高尚的道德标准，对我产生了极大影响。一直以来父亲给我的道德教诲主要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所提倡的：正直、节制（这个词，他用得很广泛）、诚实、坚定、乐于承受痛苦，尤其是辛苦的劳动；关心公共福利；以品质评价人物，以内在的可用性评价事物；一生努力，而非自我放纵、松懈和懒惰。一有机会他就用简洁的语句，或严肃告诫，或严厉斥责和轻蔑，来表达这些和其他道德规范。

But though direct moral teaching does much, indirect does more; and the effect my father produced on my character, did not depend solely on what he said or did with that direct object, but also, and still more, on what manner of man he was.

尽管直接的道德教育作用很大，但是间接的作用更大。父亲对我的性格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他为了达成这个直接目标的所言所行，而且更多地取决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In his views of life he partook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Stoic, the Epicurean, and the Cynic, not in the modern but the ancient sense of the word. In his personal qualities the Stoic predominated. His standard of morals was Epicurean, inasmuch as it was utilitarian, taking as the exclusive test of right and wrong, the tendency of actions to produce pleasure or pain. But he had (and this was the Cynic element) scarcely any belief in pleasure; at least in his later years, of which alone, on this point, I can speak confidently. He was not insensible to pleasures; but he deemed very few of them worth the price which, at least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society, must be paid for them. The greater number of miscarriages in life he considered to be attributable to the overvaluing of pleasures. Accordingly, temperance, in the large sense intended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stopping short at the point of moderation in all indulgences—was with him, as with them, almost the central point of educational precept. His inculcations of this virtue fill a large place in my childish remembrances. He thought human life a poor thing at best, after the freshness of youth and of unsatisfied curiosity had gone by. This was a topic on which he did not often speak, especially, it may be supposed, in the presence of young persons: but when he did, it was with an air of settled and profound conviction. He would sometimes say that if life were made what it might be, by good government and good education, it would be worth having: but he never spoke with anything like enthusiasm even of that possibility. He never varied in rating intellectual enjoyments above all others, even in value as pleasures, independently of their ulterior benefits. The pleasures of the benevolent affections he placed high in the scale; and used to say, that he had never known a happy old man, except those who were able to live over again in the pleasures of the young. For passionate emotions of all sorts, and for everything which bas been said or written in exaltation of them, he professed the greatest contempt. He regarded them as a form of madness.

“The intense” was with him a bye-word of scornful disapprobation. He regarded as an aberration of the moral standard of modern time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ancients, the great stress laid upon feeling. Feelings, as such, he considered to be no proper subjects of praise or blame. Right and wrong, good and bad, he regarded as qualities solely of conduct—of acts and omissions; there being no feeling which may not lead, and does not frequently lead, either to good or to bad actions: conscience itself, the very desire to act right, often leading people to act wrong. Consistently carrying out the doctrine that the object of praise and blame should be the discouragement of wrong conduct 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right, he refused to let his praise or blame be influenced by the motive of the agent. He blamed as severely what he thought a bad action, when the motive was a feeling of duty, as if the agents had been consciously evil doers. He would not have accepted as a plea in mitigation for inquisitors, that they sincerely believed burning heretics to be an obligation of conscience. But though he did not allow honesty of purpose to soften his disapprobation of actions, it had its full effect on his estimation of characters. No one prized conscientiousness and rectitude of intention more highly, or was more incapable of valuing any person in whom he did not feel assurance of it. But he disliked people quite as much for any other deficiency, provided he thought it equally likely to make them act ill. He disliked, for instance, a fanatic in any bad cause, as much as or more than one who adopted the same cause from self-interest, because he thought him even more likely to be practically mischievous. And thus, his aversion to many intellectual errors, or what he regarded as such, partook, in a certain sense, of the character of a moral feeling. All this is merely saying that he, in a degree once common, but now very unusual, threw his feelings into his opinions; which truly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how anyone who possesses much of both, can fail to do. None but those who do

not care about opinions will confound this with intolerance. Those who, having opinions which they hold to be immensely important, and their contraries to be prodigiously hurtful, have any deep regard for the general good, will necessarily dislike, as a class and in the abstract, those who think wrong what they think right, and right what they think wrong: though they need not therefore be, nor was my father, insensible to good qualities in an opponent, nor governed in their estimation of individuals by one general presumption, instead of by the whole of their character. I grant that an earnest person, being no more infallible than other men, is liable to dislike people on account of opinions which do not merit dislike; but if he neither himself does them any ill office, nor connives at its being done by others, he is not intolerant: and the forbearance which flows from a conscientious sense of the importance to mankind of the equal freedom of all opinions, is the only tolerance which is commendable, or, to the highest moral order of minds, possible.

他的人生观兼有斯多葛[3_5]学派、伊壁鸠鲁学派[3_6]和犬儒学派[3_7]（取这个词的古代意义，不是现代意义）的特点。他的个人品质主要体现了斯多葛学派的特点。他的道德标准是伊壁鸠鲁学派的，因为它是实用主义的，以行动产生苦乐的倾向作为检验对错的唯一标准。但是，他很少相信快乐（这是犬儒学派的成分），单单在这点上，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至少在他的晚年如此。他并非对快乐毫无感觉，但是他认为，与必须付出的代价相比，很少有快乐是值得争取的，至少在社会的目前状态下是这样。他认为，生活中更多的失败，可以归因于对快乐的过高估计。相应的，希腊哲学家们广义上所指的节制，即不逾越任何嗜好的适度范围，在父亲和这些哲学家们看来，几乎是教育规则的核心要点。他关于这种美德的谆谆教诲，占据了我童年记忆的很大一部分。他认为，在青春的鲜活和永不知足的好奇心消失之后，人类的生命充其量也就是个可怜的东西。这个话题他很少

提起，尤其是年轻人在场的时候。但是，当他果真提起的时候，会带着一副深信不疑的神态。他有时会说，如果人生像设想的那样，能得到很好的管理和教育，那么人生还值得拥有。但是，即便是在谈这种可能时，他也从没带上半点热情。他一直都视智力享受高于其他任何享受，从未改变，即使以它们带来的快乐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而不顾其隐含的益处。他把仁爱的感情产生快乐的等级定得很高。他经常说，除了那些能够重温年轻时快乐的人，他从来不认识其他快乐的老人。对于所有激昂的情绪，和所有为了赞美它们所说、所写的东西，他都极度藐视，认为它们是愚蠢的行为。对他来说，“强烈”只是轻蔑之非难的代名词。他认为，与古人的道德标准相比，给感情施加重压偏离了现代的道德标准。照这样，他认为感情也不是赞扬和责备的合适对象。他认为对与错，善与恶，纯属行为的特性——行为包括进行了的行动和疏忽了的行动。没有任何感情不会导致，或者不会经常导致或好或坏的举动：最渴望做对的良心本身，却经常让人犯错。赞扬和责备的目的应该是阻止错误行为，鼓励正确行为，他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个信条，不让行为人的动机影响到他的赞扬和责备。如果他认为一种行为是坏的，即使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他同样会严厉地指责，好像行为人有意做坏事一样。他不会因为宗教法官确实相信烧死异教徒是他们良心上的责任，就接受以此作为减轻他们罪状的申诉。尽管他不会因为意图坦率而减轻对行为的指责，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对品质的评价。谁也不像他那样看重意图的认真和正直，也不像他那样，绝不能够看重任何他无法确信是否具有这样品质的人。但是，他同样不喜欢具备其他缺点的人，只要他认为这些缺点可能同样会让他们做坏事。比如，他讨厌任何邪恶运动中的狂热分子，觉得他们和那些因一己私利而发动这一运动的人一样可恶，甚至更可恶，因为他觉得前者破坏力更大。因此，他对很多智力上的错误，或者他认为是这种错误的厌恶，在某种意义上，带有道德感情的特征。所有这些不过是说，他的见解当中带有感情成分，他这样做的程度曾经很一般，但是现在很不寻常。确实，那些同时拥有丰富感情和见解的人竟然做不到这一点，是很令人费解的。只有那些不在乎见解的人才会将其与偏狭混为一谈。那些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非常重要，相反的观点非常有害，且深切关心大众福利的人，必然会讨厌把他们认为对的当作错

的，把他们认为错的当成对的人，而这些被厌恶的人在理论上成为了一类人。但是他们，我父亲也是，不需要因此忽视对手的良好品质，对个体的评价也不会局限于一个笼统的假定，而要看其品格的全部。我承认，一个真诚、不比别人少犯错误的人，很容易由于不值得讨厌的见解而讨厌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并没有诋毁这些人，又不纵容别人这样做，那么他就算宽容的。审慎地意识到平等自由地发表各种见解对人类的意义，源自于这种意识的容忍。这才是唯一值得称赞的，才是人类思想最高道德标准所能达到的宽容。

It will be admitted, that a man of the opinions, and the character, above described, was likely to leave a strong moral impression on any mind principally formed by him, and that his moral teaching was not likely to err on the side of laxity or indulgence. The element which was chiefly deficient in his moral relation to his children was that of tenderness.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is deficiency lay in his own nature. I believe him to have had much more feeling than he habitually showed, and much greater capacities of feeling than were ever developed. He resembled most Englishmen in being ashamed of the signs of feeling, and, by the absence of demonstration, starving the feelings themselves. If we consider further that he was in the trying position of sole teacher, and add to this that his temper was constitutionally irritable, it is impossible not to feel true pity for a father who did, and strove to do, so much for his children, who would have so valued their affection, yet who must have been constantly feeling that fear of him was drying it up at its source. This was no longer the case later in life, and with his younger children. They loved him tenderly: and if I cannot say so much of myself, I was always loyally devoted to him. As regards my own education, I hesitate to pronounce whether I was more a loser or gainer by his severity. It was not such as to prevent me from having a happy childhood. And I do not believe

that boys can be induced to apply themselves with vigour, and—what is so much more difficult—perseverance, to dry and irksome studies, by the sole force of persuasion and soft words. Much must be done, and much must be learnt, by children, for which rigid discipline, and known liability to punishment, are indispensable as means. It is, no doubt, a very laudable effort, in modern teaching, to render as much as possible of what the young are required to learn, easy and interesting to them. But when this principle is pushed to the length of not requiring them to learn anything *but* what has been made easy and interesting, one of the chief objects of education is sacrificed. I rejoice in the decline of the old brutal and tyrannical system of teaching, which, however, did succeed in enforcing habits of application; but the new, as it seems to me, is training up a race of men who will be incapable of doing anything which is disagreeable to them. I do not, then, believe that fear, as an element in education, can be dispensed with; but I am sure that it ought not to be the main element; and when it predominates so much as to preclude love and confidence on the part of the child to those who should be the unreservedly trusted advisers of after years, and perhaps to seal up the fountains of frank and spontaneous communicativeness in the child's nature, it is an evil for which a large abatement must be made from the benefits, moral and intellectual, which may flow from any other part of the education.

应该承认，拥有上述观点和品质的人，很可能会给所有主要由他塑造的头脑留下深刻的道德印象，他的道德教学，不大可能会犯粗心或放纵的错误。他与孩子的道德关系中，缺乏的主要因素是亲切。我不认为他的天性中有这种缺陷。我相信，他的感情要比平常展示出来的丰富得多，而他情感的能力也比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大很多。他和大多数英国男人一样，为表露出感情而感到羞愧，但不表露的话，感

情也就枯萎了。如果我们考虑得更深入一些，作为唯一的教师，他处在这样一个需要耐性的位置上，加上他的脾气本来就很急躁，虽然他曾为自己的孩子们做过，并努力地去做了那么多事，而他原本也会非常珍视他们对自己的爱，然而他一定经常感觉到，对他的害怕使得这种感情从源头上就枯竭了，这让我们无法不觉得这样的一位父亲真的很可怜。后来，与他更年幼的孩子们在一起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很体贴，很爱他。即使我不能说自己多么爱他的话，但也可以说总是对他很忠心，很孝顺。至于我自己的教育，我不敢断言，他的严格到底使我成为了失败者还是成功者。它并未阻止我拥有快乐的童年。但我也不相信只凭劝说和温言软语，就能促使男孩子们充满活力，并坚持不懈地（后者更为困难）投入到单调乏味、令人厌烦的学习中去。孩子们有很多事必须要做，很多东西必须要学，为此，严格的训练和让他们知道有可能受到惩罚，是不可或缺的手段。无疑，在现代教育中，尽量把要求年轻人学习的东西变得简单有趣是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做法。但是，如果这个原则发展到只要求他们学习已变得简单有趣的东西的话，教育的一个主要目标就被埋没掉了。对于严酷、专制的旧教学体系的衰落，我感到很高兴，但它在培养勤奋学习这方面却很成功。而在我看来，新体系正在训练这样一批人，他们没有能力做任何不合意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敬畏作为教育中的一个因素，是不能省却的；但是我敢肯定，敬畏不应该是最主要的因素；如果它占支配地位，以至于阻断了孩子对他多年来应该无条件信任的老师的爱和信心，或者封住了孩子本性中率直、自发交流的源泉，那就是不幸了，而从教育的任何其他部分中产生的道德和智力上的受益，必然会因此而大打折扣。

During this first period of my life, the habitual frequenters of my father's house were limited to a very few persons, most of them little known to the world, but whom personal worth, and more or less of congeniality with at least his political opinions (not so frequently to be met with then as since), inclined him to cultivate; and his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I listened to with interest and

instruction. My being an habitual inmate of my father's study made me acquainted with the dearest of his friends, David Ricardo, who by his benevolent countenance, and kindliness of manner, was very attractive to young persons, and who, after I became a stud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invited me to his house and to walk with him in order to converse on the subject. I was a more frequent visitor (from about 1817 or 1818) to Mr. Hume, who, born in the same part of Scotland as my father, and having been, I rather think, a younger schoolfellow or college companion of his, had on returning from India renewed their youthful acquaintance, and who—coming, like many others, great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y father's intellect and energy of character—was induced partly by that influence to go into Parliament, and there adopt the line of conduct which has given him an honourable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his country. Of Mr. Bentham I saw much more, owing to the close intimacy which existed between him and my father. I do not know how soon after my father's first arrival in England they became acquainted. But my father was the earliest Englishman of any great mark, who thoroughly understood, and in the main adopted, Bentham's general views of ethics, government and law: and this was a natural foundation for sympathy between them, and made them familiar companions in a period of Bentham's life during which he admitted much fewer visitors than was the case subsequently. At this time Mr. Bentham passed some part of every year at Barrow Green House, in a beautiful part of the Surrey Hills, a few miles from Godstone, and there I each summer accompanied my father in a long visit. In 1813 Mr. Bentham, my father, and I made an excursion, which included Oxford, Bath and Bristol, Exeter, Plymouth, and Portsmouth. In this journey I saw many things which were instructive to me, and acquired my first taste for natural scenery, in the elementary form of fondness for a “view.” In the succeeding winter we moved into a house very near Mr. Bentham's,

which my father rented from him, in Queen Square, Westminster. From 1814 to 1817 Mr. Bentham lived during half of each year at Ford Abbey, in Somersetshire (or rather in a part of Devonshire surrounded by Somersetshire), which intervals I had the advantage of passing at that place. This sojourn was, I think, an important circumstance in my education. Nothing contributes more to nourish elevation of sentiments in a people, than the large and free character of their habitations. The middle-age architecture, the baronial hall, and the spacious and lofty rooms, of this fine old place, so unlike the mean and cramped externals of English middle-class life, gave the sentiment of a larger and freer existence, and were to me a sort of poetic cultivation, aided also by the character of the grounds in which the Abbey stood; which were *riant* and secluded, umbrageous, and full of the sound of falling waters.

在我人生初期的这段时间里，父亲家里的常客很少，大部分不为世人所知。但由于他们的品格高尚，以及或多或少与他意气相投，至少在政治观点上互相投合（因为那时这样的人不如后来常见），父亲乐于与他们结交，他们的交谈总是让我兴致盎然而又深受启迪。我总是呆在父亲的书房里，因此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大卫·李嘉图很熟，他面容和蔼，举止亲切，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我开始学政治经济学后，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和他一起散步，以便讨论这个主题。（大概从1817年或1818年开始）我最常拜访的是休姆先生，他和父亲在苏格兰的同一个地区出生，我倒觉得他是父亲的小学校友或者大学时的朋友，从印度回来后，他们重拾年轻时的友谊，和很多人一样，父亲智力和性格中的活力对他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也是促使他进入议会的部分原因，他在议会里行事所采取的路线方针，使他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上获得了值得尊敬的地位。至于边沁先生，我见得更多，因为他和父亲关系非常亲密。我不知道父亲第一次来英格兰后多久他们就熟悉了。但是，父亲是第一个完全理解并大体上采纳边沁关于道德规范、政府和法律之总体观点的英国要人。这是他们之间产生共鸣的天然基

础，使父亲成为边沁那段人生中接待的为数不多的访客之一，后来边沁接待的访客多了不少。当时，边沁先生每年都会有一阵子在巴罗格林豪斯度过，那是戈德斯通几英里外萨里山上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我每年夏天都花很长时间陪着父亲在那里作客。1813年，边沁先生、父亲和我一起远足，游览了牛津、巴思、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在这次旅行中，我看到了很多对我有启发的东西，第一次领略了自然风光，不过是以对“景色”的喜爱这种初级的形式。同一年冬天，我们搬到离边沁家很近的一所房子里，是父亲从他那里租来的，在威斯敏斯特的女王广场。从1814年到1817年，边沁先生每年有一半的时间住在萨默塞特郡（或者说在被萨默塞特郡环绕着的德文郡）的福特修道院，我间或有幸在那儿小住。我想，这次逗留在我的教育中是很重要的一次经历。宽敞、自由的生活环境，比任何东西都更有助于提升一个民族的情操。这个精致、古老的地方有中世纪的建筑、庄严堂皇的礼堂、宽敞高耸的房间，跟鄙陋、狭隘的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很不一样，给人一种万物更大、更自由的感觉，加之修道院所处庭院的特征，都给我一种诗意的陶冶。这地方风景赏心悦目，幽静隐蔽，绿树成阴，水声潺潺。

I owed another of the fortunate circumstances in my education, a year's residence in France, to Mr. Bentham's brother, General Sir Samuel Bentham. I had seen Sir Samuel Bentham and his family at their house near Gosport in the course of the tour already mentioned (he being then Superintendent of the Dockyard at Portsmouth), and during a stay of a few days which they made at Ford Abbey shortly after the Peace, before going to live on the Continent. In 1820 they invited me for a six months' visit to them in the South of France, which their kindness ultimately prolonged to nearly a twelvemonth. Sir Samuel Bentham, though of a character of mind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is illustrious brother, was a man of very considerable attainments and general powers, with a decided genius for mechanical art. His wife, a daughter of the celebrated

chemist, Dr. Fordyce, was a woman of strong will and decided character, much general knowledge, and great practical good sense of the Edgeworth kind: she was the ruling spirit of the household, as she deserved, and was well qualified, to be. Their family consisted of one son (the eminent botanist) and three daughters, the youngest about two years my senior. I am indebted to them for much and various instruction, and for an almost parental interest in my welfare. When I first joined them, in May, 1820, they occupied the Château of Pompignan (still belonging to a descendant of Voltaire's enemy) on the heights overlooking the plain of the Garonne between Montauban and Toulouse. I accompanied them in an excursion to the Pyrenees, including a stay of some duration at Bagnères de Bigorre, a journey to Pau, Bayonne, and Bagnères de Luchon, and an ascent of the Pic du Midi de Bigorre.

在我接受的教育中，还有一次幸运的经历，就是在巴黎住了一年，这要感谢边沁先生的兄弟，将军塞缪尔·边沁爵士。在上面提到的游历中，在戈斯波特附近塞缪尔·边沁爵士的家里，我已经见过他和他的家人（他当时是朴次茅斯造船厂的主管），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们在福特修道院逗留的几天里也见过面，之后他们去欧洲大陆居住。1820年，他们邀请我去法国南部的家里住了六个月，结果，由于他们和蔼可亲，我最终几乎住了一年。尽管塞缪尔·边沁爵士思考的方式和他杰出的兄弟不一样，但他也有着相当的成就和综合能力，在机械技术上的天分尤为突出。他的妻子，是著名化学家福代斯博士的女儿，她意志坚强，性格果敢，颇有见识，有着和埃奇沃思 [3_8] 一样务实、优秀的辨别力。她是这个家的主导人物，这是她应得的，她也非常称职。他们家有一个儿子（是著名的植物学家），三个女儿，最小的差不多比我大两岁。我很感激他们给了我多方面的大量指导，而且像父母一样关心我。1820年5月，我刚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住在波皮南别墅（当时还属于伏尔泰仇敌的一个后裔），在高处俯瞰蒙托邦和图卢兹之间的加龙河平原。我和他们一起去比利牛斯山脉远足，期间在

巴涅尔德比戈尔逗留了一阵子，和他们一起到波城、巴约讷和巴涅尔德吕雄旅行，还攀登了南比戈尔峰。

This first introduction to the highest order of mountain scenery made the deepest impression on me, and gave a colour to my tastes through life. In October we proceeded by the beautiful mountain route of Castres and St. Pons, from Toulouse to Montpellier, in which last neighbourhood Sir Samuel had just bought the estate of *Restinclière* , near the foot of the singular mountain of St. Loup. During this residence in France I acquired a familiar knowledge of the French language, and acquaintance with the ordinary French literature; I took lessons in various bodily exercises, in none of which, however, I made any proficiency; and at Montpellier I attended the excellent winter courses of lectures at the Faculté des Sciences, those of M. Anglada on chemistry, of M. Provençal on zoology, and of a very accomplish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etaphysics, M. Gergonne, on logic, under the name of Philosophy of the Sciences. I also went through a course of the higher mathematics under the private tuition of M. Lenthéric, a professor at the Lycée of Montpellier. But the greatest, perhaps, of the many advantages which I owed to this episode in my education, was that of having breathed for a whole year, the free and genial atmosphere of Continental life. This advantage was not the less real though I could not then estimate, nor even consciously feel it. Having so little experience of English life, and the few people I knew being mostly such as had public objects, of a large and personally disinterested kind, at heart, I was ignorant of the low moral tone of what, in England, is called society; the habit of, not indeed professing, but taking for granted in every mode of implication, that conduct is of course always directed towards low and petty objects; the absence of high feelings which manifests itself

by sneering depreciation of all demonstrations of them, and by general abstinence (except among a few of the stricter religionists) from professing any high principles of action at all, except in those preordained cases in which such profession is put on as part of the costume and formalities of the occasion. I could not then know or estim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manner of existence, and that of a people like the French, whose faults, if equally real, are at all events different; among whom sentiments, which by comparison at least may be called elevated, are the current coin of human intercourse, both in books and in private life; and though often evaporating in profession, are yet kept alive in the nation at large by constant exercise, and stimulated by sympathy, so as to form a living and active part of the existence of great numbers of persons, and to be recognised and understood by all. Neither could I then appreciate the general culture of the understanding, which results from the habitual exercise of the feelings, and is thus carried down into the most uneducated classes of several countries on the Continent, in a degree not equalled in England among the so-called educated, except where an unusual tenderness of conscience leads to a habitual exercise of the intellect on questions of right and wrong. I did not know the way in which, among the ordinary English, the absence of interest in things of an unselfish kind, except occasionally in a special thing here and there, and the habit of not speaking to others, nor much even to themselves, about the things in which they do feel interest, causes both their feelings and their intellectual faculties to remain undeveloped, or to develop themselves only in some single and very limited direction; reducing them, considered as spiritual beings, to a kind of negative existence. All these things I did not perceive till long afterwards; but I even then felt, though without stating it clearly to myself,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frank sociability and amiability of French personal intercourse, and the English mode of existence, in which everybody

acts as if everybody else (with few, or no exceptions) was either an enemy or a bore. In France, it is true, the bad as well as the good points, both of individual and of national character, come more to the surface, and break out more fearlessly in ordinary intercourse, than in England: but the general habit of the people is to show, as well as to expect, friendly feeling in every one towards every other, wherever there is not some positive cause for the opposite. In England it is only of the best bred people, in the upper or upper middle ranks, that anything like this can be said.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最壮美的高山景色，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使我平生的品位变得亮丽多彩。10月份，我们继续从图卢兹出发，沿着卡斯特尔和圣蓬斯美丽的山路去蒙彼利埃，塞缪尔爵士刚在蒙彼利埃附近买下了雷斯汀克里尔的房产，位于圣卢普一座孤山的山脚下。在法国居住的这段时间，我熟悉了法语，也熟悉了一般的法国文学。我上了很多种体育课，然而，没有一门很精通。在蒙彼利埃，我去听了科学院非常好的冬季讲座，有安格拉达先生讲的化学，有普罗旺萨尔先生讲的动物学，还有18世纪形而上学杰出的代表人物热尔戈纳先生讲的逻辑学，题目是《科学的哲理》。我还在蒙彼利埃大学的朗泰里克教授的单独指导下，学完了高等数学的课程。但是在这段时间的教育中，最为有利的条件可能要算呼吸了一整年欧洲大陆生活中自由、宜人的空气了。尽管我当时还不能估计，甚至不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个优势，但它却是真实存在的。我对英国生活体验甚少，认识的极少的几个人，也大都是投身公共事业，宽厚、无私的那种人，我在内心深处并不知道英国所谓的社会的粗俗道德风气。虽然没人公开宣称行为的目标当然总是趋于俗气、卑微，但是种种迹象都暗示了人们习惯于认为这理所当然。缺乏高尚的情感，表现为轻蔑地贬低所有高尚情感的展现，人们还拒绝公开承认任何高尚的行为准则（除了少数笃信宗教的人），除非在那些预定的场合，在那种情形下这种宣称被当作服饰和礼节的一部分。我当时还无法了解或评价这种生存方式与法国人生存方式的不同之处，法国人的错误即使同样真实，也完全

不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法国人的情感至少可以说是高尚的，在他们当中，不管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在个人生活里，情感都是人们交往的通行货币。尽管情感会随着表白而消散，但是由于人们经常表达情感，在这个国度情感总体上还是保持鲜活的，并且还受到同情心的激励，以至于成了大多数人生活中充满生机活力的一部分，并为所有人接受和理解。我那时也不能领会这种理解背后的普通文化，它源自于经常运用情感，并如此传播到欧洲大陆好几个国家受教育最少的阶层中，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是不能与之相比的，除了那些责任心非常敏感，因此会经常用智力思考对与错的问题的人。普通英国人对无私的事情不感兴趣，除了偶然这儿或那儿的某些特别的事情，而对自己确实感兴趣的事情，他们也习惯于不和别人交谈，甚至都不怎么和自己交流，我不知道这些是如何使他们的感情和智力的本领都得不到发展的，或者是发展的方向很单一，很有限，并使他们这些被认为是有灵魂的生命退化成了一种消极的存在。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很久以后才认识到的。但即使那时，尽管我没有清楚地对自己说出来，我也已经感觉到两个国家的区别，法国人交往时坦荡亲切，而在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中，每个人都表现得好像别人（很少有例外或者根本没有）是敌人或讨厌的人一样。与英国相比，法国人以及法国国家的性格，不管好的还是不好的地方，确实更易显于表面，在平常的交往中更毫无顾忌地显露出来。但是，只要没有确切的理由对人不友好，法国人的一般习惯是表现出每个人对其他所有人的友好，也期望获得这种感情。在英国，只有在上等或者中上等阶层教养最好的人那里，才能出现这类的事情。

In my way through Paris, both going and returning, I passed some time in the house of M. Say, the eminent political economist, who was a friend and correspondent of my father, having become acquainted with him on a visit to England a year or two after the Peace. He was a man of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fine specimen of the best kind of French Republican, one of those who had never bent the knee to Bonaparte though courted by him

to do so; a truly upright, brave, and enlightened man. He lived a quiet and studious life, made happy by warm affections, public and private. He was acquainted with many of the chiefs of the Liberal party, and I saw various noteworthy persons while staying at this house; among whom I have pleasure in the recollection of having once seen Saint-Simon, not yet the founder either of a philosophy or a religion, and considered only as a clever original. The chief fruit which I carried away from the society I saw, was a strong and permanent interest in Continental Liberalism, of which I ever afterwards kept myself *au courant* , as much as of English politics: a thing not at all usual in those days with Englishmen, and which had a very salutary influence on my development, keeping me free from the error always prevalent in England—and from which even my father, with all his superiority to prejudice, was not exempt—of judging universal questions by a merely English standard. After passing a few weeks at Caen with an old friend of my father's, I returned to England in July, 1821 and my education resumed its ordinary course.

在我往返巴黎的途中，我都在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塞伊先生的家里逗留一阵子，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两人写信交流，他在战争结束后一两年的一次英国之行中结识了父亲。他属于法国大革命后期的那种人——是最优秀的法国共和党人的范例；是从来没有向波拿巴称臣的人之一，尽管拿破仑曾诱惑他这么做；是一个真正诚实、勇敢、开明的人。他生活很安详，他很勤奋，由于个人和公众的热烈爱戴而感到幸福。他和自由党的很多首领很熟，住在他家的时候，我见到过很多显要人物。我很愉快地记得在这些人当中，我见过一次圣西门，他当时还不是一门哲学或一种信仰的创始人，仅被认为是个聪明的怪人。我从自己看到的这个社会里得到的主要成果，就是对大陆自由主义强烈、持久的兴趣。这之后，我一直让自己对大陆自由主义的了解像对英国政治的了解一样与时俱进。当时，大陆自由主义在英国人当中很

不常见，对我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让我远离在英国总是很盛行的错误，和仅用英国的标准来评判普遍性问题的做法，这是连我父亲这样一个不受偏见影响的人都避免不了。我在卡昂[3_9]，父亲的一个老友那里呆了几个星期后，于1821年7月回到英国，我的教育又像往常一样继续下去。

[3_1].约瑟夫·巴特勒（1692—1752），英国圣公会会督、神学家。

[3_2].《宗教类推》，又名《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之类比》。

[3_3].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4—前55），古罗马哲学家和诗人。

[3_4].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5—前425），希腊历史学家，所著《历史》系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

[3_5].斯多葛学派，公元前3世纪由芝诺创立。

[3_6].伊壁鸠鲁学派，公元前307年由伊壁鸠鲁创立。

[3_7].犬儒学派，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学派，由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西尼创立。

[3_8].玛丽亚·埃奇沃思（1767—1849），英裔爱尔兰作家，以写儿童故事和反映爱尔兰生活及风土人情的小说著称。

[3_9].卡昂，法国北部城市，临奥恩河，靠近英吉利海峡。

Chapter 3 Last Stage of Education, and First of Self-education

第三章　教育的最后阶段自学的初级阶段

For the first year or two after my visit to France, I continued my old studies, with the addition of some new ones. When I returned, my father was just finishing for the press his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 and he made me perform an exercise on the manuscript, which Mr. Bentham practised on all his own writings, making what he called “marginal contents”; a short abstract of every paragraph, to enable the writer more easily to judge of, and improve, the order of the ideas, and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exposition. Soon after, my father put into my hands Condillac's *Traité des Sensations* , and the logical and metaphysical volumes of his *Coursd' Etudes* ; the first (notwithstanding the superficial resemblance between Condillac's psychological system and my father's) quite as much for a warning as for an example. I am not sure whether it was in this winter or the next that I first read a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 learnt with astonishment that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then apparently in so insignificant and hopeless a minority everywhere in Europe, had borne all before them in France thirty years earlier, and had been the creed of the nation. As may be supposed from this, I had previously a very vague idea of that great commotion. I knew only that the French had thrown off the absolute monarchy of Louis XIV. and XV., had put the King and Queen to death, guillotined many persons, one of whom was Lavoisier, and had ultimately fallen under the despotism of Bonaparte. From this time, as was natural, the subject took an immense hold of my feelings. It allied itself with all my juvenile aspirations to the character of a democratic champion. What had

happened so lately, seemed as if it might easily happen again: and the most transcendent glory I was capable of conceiving, was that of figuring, successful or unsuccessful, as a Girondist in an English Convention.

从法国回来后的头一两年，我继续以前的学习，另外加了一些新东西。我回来的时候，父亲刚好为出版社写完了《政治经济学要义》，他让我在手稿上做一种练习，边沁先生在他自己的所有作品上都这么做，即写他所谓的“旁注”。就是给每段写很短的摘要，让作者能够更容易评判，并改善观点的条理性和阐述的总体特征。之后不久，父亲就让我读孔狄亚克的《感觉论》，还有他的《过程研究》的逻辑学卷和哲学卷；第一本书（尽管孔狄亚克和父亲的心理学体系表面上看起来类似）是个榜样，同样也是种告诫。我不记得到底是这一年还是第二年的冬天，我第一次读了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我很吃惊地意识到，当时在全欧洲显然只有不足为道且毫无希望的少数人接受的民主原则，早在三十年前的法国就已经出现，而且成为这个国家的纲领。由此可以推断出，对那次伟大的起义，我先前只有很模糊的概念。我只知道，法国人推翻了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独裁专政，杀死了国王和王后，把很多人处斩，其中还有拉瓦锡 [4_1] ，但最终陷入波拿巴 [4_2] 的专制统治。从这时起，这个主题很自然地大大占据了我的感情，并且与我年少时期有志于成为一名民主斗士的抱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大革命的年代并不遥远，似乎很容易再次发生。我能够设想的至高无上的荣誉，就是在英国国民大会上扮演吉伦特 [4_3] 党员的角色，不管成功与否。

During the winter of 1821-2, Mr. John Austin, with whom at the time of my visit to France my father had but lately become acquainted, kindly allowed me to read Roman law with him. My father, notwithstanding his abhorrence of the chaos of barbarism called English Law, had turned his thoughts towards the bar as on

the whole less ineligible for me than any other profession: and these readings with Mr. Austin, who had made Bentham's best ideas his own, and added much to them from other sources and from his own mind, were not only a valuable introduction to legal studies, but an important por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With Mr. Austin I read Heineccius on the *Institutes* , his *Roman Antiquities* , and part of his exposition of the *Pandects* ; to which was added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Blackstone. It was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se studies that my father, as a needful accompaniment to them, put into my hands Bentham's principal speculations, as interpreted to the Continent, and indeed to all the world, by Dumont, in the *Traité de Législation* . The reading of this book was an epoch in my life; one of the turning points in my mental history.

1821年底—1822年初的那个冬天，在我去法国的时候，父亲刚刚结识的约翰·奥斯丁先生亲切地邀我和他一起读罗马法律。父亲尽管憎恨英国法律的混乱、愚昧，但也开始考虑让我向律师界发展，总体上来说，比起其他专业，我更有能力从事法律工作。奥斯丁先生汲取了边沁最精华的思想，并添加上很多别人和自己的见解。和他一起读书，不仅在法律学习的入门上很有价值，而且是我整个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和奥斯丁先生一起，我读了海内克丘斯的《法学概要》和《罗马古代制度》以及他对《罗马法典》阐述的一部分，还要加上布莱克斯通的很大一部分著述。就在这些学习刚开始的时候，父亲让我读《立法论》，学习边沁主要思想，作为对它们的必要补充。杜蒙在这本书中向欧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阐释了边沁的思想。读这本书开创了我人生的一个新纪元，是我思想发展历程的转折点之一。

My previous education had been, in a certain sense, already a course of Benthamism. The Benthamic standard of “the greatest happiness” was that which I had always been taught to apply; I was

even familiar with an abstract discussion of it, forming an episode in an unpublished dialogue on *Government* , written by my father on the Platonic model. Yet in the first pages of Bentham it burst upon me with all the force of novelty. What thus impressed me was the chapter in which Bentham passed judgment on the common modes of reasoning in morals and legislation, deduced from phrases like "law of nature," "right reason," "the moral sense," "natural rectitude," and the like, and characterized them as dogmatism in disguise, imposing its sentiments upon others under cover of sounding expressions which convey no reason for the sentiment, but set up the sentiment as its own reason. It had not struck me before, that Bentham's principle put an end to all this. The feeling rushed upon me, that all previous moralists were superseded, and that here indeed was the commencement of a new era in thought. This impression was strengthened by the manner in which Bentham put into scientific for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happiness principle to the morality of actions, by analysing the various classes and orders of their consequences. But what struck me at that time most of all, was the Classification of Offences, which is much more clear, compact, and imposing in Dumont's *rédaction* than in the original work of Bentham from which it was taken. Logic and the dialectics of Plato, which had formed so large a part of my previous training, had given me a strong relish for accurate classification. This taste had been strengthened and enlightened by the study of botany, on the principles of what is called the Natural Method, which I had taken up with great zeal, though only as an amusement, during my stay in France; and when I found scientific classification applied to the great and complex subject of Punishable Ac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ethical principle of Pleasurable and Painful Consequences, followed out in the method of detail introduced into these subjects by Bentham, I felt taken up to an eminence from which I could survey a vast mental domain, and see stretching out into the

distance intellectual results beyond all computation. As I proceeded further, there seemed to be added to this intellectual clearness, the most inspiring prospects of practical improvement in human affairs. To Bentham's general 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body of law I was not altogether a stranger, having read with attention that admirable compendium, my father's article on Jurisprudence: but I had read it with little profit, and scarcely any interest, no doubt from its extremely general and abstract character, and also because it concerned the form more than the substance of the *corpus juris* , the logic rather than the ethics of law. But Bentham's subject was Legislation, of which Jurisprudence is only the formal part: and at every page he seemed to open a clearer and broader conception of what human opinions and institutions ought to be, how they might be made what they ought to be, and how far removed from it they now are. When I laid down the last volume of the *Traité* , I had become a different being. The “principle of utility,” understood as Bentham understood it, and applied in the manner in which he applied it through these three volumes, fell exactly into its place as the keystone which held together the detached and fragmentary component parts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s. It gave unity to my conceptions of things. I now had opinions; a creed, a doctrine, a philosophy; in one among the best senses of the word, a religion; the inculcation and diffusion of which could be made the principal outward purpose of a life. And I had a grand conception laid before me of changes to be effected in the condition of mankind through that doctrine. The *Traité de Legislation* wound up with what was to me a most impressive picture of human life as it would be made by such opinions and such laws as were recommended in the treatise. The anticipations of practicable improvement were studiously moderate, deprecating and discountenancing as reveries of vague enthusiasm many things which will one day seem so natural to human beings, that injustice will probably be done to those who

once thought them chimerical. But, in my state of mind, this appearance of superiority to illusion added to the effect which Bentham's doctrines produced on me, by heightening the impression of mental power, and the vista of improvement which he did open was sufficiently large and brilliant to light up my life, as well as to give a definite shape to my aspirations.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之前的教育，学的就已经是边沁主义了。我一直被教导着去应用“最大幸福”的边沁主义标准。我甚至熟悉关于边沁主义的一次抽象讨论，是父亲未发表的《论政府》对话中的一段，讨论的是柏拉图模式。然而，边沁书中的前几页，充满了新奇的力量，让我眼前一亮。像这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边沁评价道德和立法中的一般推理方式的那一章。这种推理是从“自然法则”“正确推理”“是非感”以及“天赋公正”之类的语句中推断出来的，边沁认为它们是伪装的教条主义，以空洞的口号当幌子，把观点强加到别人身上，但这些口号根本没有为这种观点传达理由，反而把观点本身当作理由。我之前从未想到过边沁的原则会结束所有这一切。我突然感觉到，以前的所有伦理学家都被他取代了，而在这儿，思想上的一个新纪元真正开始了。边沁把幸福原则应用于道德行为，通过分析各种类型的后果和它们的次序，使这一应用以科学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方式进一步加强了我的那种感觉。但是，当时最让我惊讶的是《犯罪分类》，而杜蒙以边沁的原作为基础写的《犯罪分类》（修订本），要比原作要清楚、简洁得多，让人印象深刻。柏拉图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在我之前的训练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让我对精确分类非常感兴趣。这种爱好，由于依据自然方法的一些原则学习植物学而得以加强和启迪。我在法国暂住的时候，就满腔热情地开始运用自然方法，尽管只是作为一种消遣。当我发现，在快乐与痛苦的后果这一道德原则的指导下，把科学的分类应用于伟大、复杂的主题——该罚的行为，按照边沁引入这些主题的具体方法贯彻执行时，我觉得被提升到一种能俯瞰广阔的精神领域的高度，还能展望到无法估算的智力成果。随着探讨继续深入，在这种智力清晰之外，我似乎还看到了最鼓 [4_4]

舞人心的人类事务切实进步的前景。边沁对于构建立法体系的总体思想，我并不十分陌生，因为我认真地读过父亲的文章《法理学》，这是篇极好的概论。但是，我没有多少收获，也几乎完全不感兴趣，无疑因为它太概括，太抽象，也因为它更关注民法的形式而非实质，逻辑而非法律伦理。但是，边沁的主题是立法，法理学只是其中的形式方面。人的观念和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让它们变成该有的样子，以及现在它们都偏离了多少，在每一页上，他似乎都让这些概念更加清楚和明朗。当我放下《立法论》的最后一卷时，我已经脱胎换骨了。边沁所理解和应用的“功利原则”，就和在这三卷书中理解和应用的方式一样，它恰到好处地成为了把我的知识和信念中支离破碎的部分整合起来的基础。它把我对事物的概念统一起来。我现在有了主张；有了信条、学说和哲学体系；有了宗教，取宗教一词的最佳意义；有了可向他人灌输并传播的东西，由此可订立人生主要的外在目标。而且，在我面前有了一个宏大的设想，就是用那个学说改变人类的境遇。在我看来，《立法论》的结尾，描绘了人类生活最感人的画卷，用论文中建议的那些观点和法律就能创造出这样的生活。它对切实可行的进步的预期是谨慎、适度的，轻视并反对很多将来有一天对人类来说会很自然的事情，觉得那是由茫然的热情产生的幻想，但对那些曾认为它们异想天开的人来说，不公正可能会在他们身上发生。但是，在我的思想状态中，这种高于幻想的想象，通过加深精神力量的影响，强化了边沁的学说对我产生的影响。他向我展现的改良的前景，宏大而壮美，足以点燃我的人生，明确我的抱负。

After this I read, from time to time,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other works of Bentham which had then seen the light, either as written by himself or as edited by Dumont. This was my private reading: while, under my father's direction, my studies were carried into the higher branches of analytic psychology. I now read Locke's *Essay* , and wrote out an account of it, consisting of a complete abstract of every chapter, with such remarks as occurred to me; which was read by, or (I think) to, my father, and discussed

throughout. I performed the same process with *Helvetius de L'Esprit* , which I read of my own choice. This preparation of abstracts, subject to my father's censorship, was of great service to me, by compelling precision in conceiving and expressing psychological doctrines, whether accepted as truths or only regarded as the opinion of others. After Helvetius, my father made me study what he deemed the really master-produc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Hartley's *Observations on Man* . This book, though it did not, like the *Traité de Législation* , give a new colour to my existence, made a very similar impression on me in regard to its immediate subject. Hartley's explanation, incomplete as in many points it is, of the more complex mental phenomena by the law of association, commended itself to me at once as a real analysis, and made me feel by contrast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merely verbal generalizations of Condillac, and even of the instructive gropings and feelings about for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s, of Locke. It was at this very time that my father commenced writing his *Analysis of the Mind* , which carried Hartley's mode of explaining the mental phenomena to so much greater length and depth. He could only comm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thought necessary for this work, during the complete leisure of his holiday for a month or six weeks annually: and he commenced it in the summer of 1822, in the first holiday he passed at Dorking; in which neighbourhood, from that time to the end of his lif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wo years, he lived, as far as his official duties permitted, for six months of every year. He worked at the *Analysis* during several successive vacations, up to the year 1829, when it was published, and allowed me to read the manuscript, portion by portion, as it advanced. The other principal English writers on mental philosophy I read as I felt inclined, particularly Berkeley, Hume's *Essays* , Reid, Dugald Stewart and Brown on *Cause and Effect* . Brown's *Lectures* I did not read until two or three years later, nor at that time had my father himself read

them.

这之后，我时不时地读边沁其他问世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些，有的是他自己写的，有的是杜蒙编辑的。这是我的个人阅读，另外，在父亲的指导下，我的学习进入到分析心理学的更高分支。我现在读了洛克[4_5]的《随笔》，并写了报告，包括每一章的完整摘要，加上我想到的评论。父亲读了报告后，或者（我认为）我读给他听了之后，就从头到尾讨论一遍。我以同样的方式读了爱尔维修[4_6]的《论精神》，这本书是我自选的。在父亲的督导之下准备这些摘要对我特别有用，因为在思考和表达心理学学说时，不管是视其为真理还是仅认为是别人的观点，都必须精确。读完爱尔维修之后，父亲让我攻读哈特利的《对人的观察》，他认为这是精神心理学领域真正的大师级作品。这本书，尽管不像《立法论》那样给我的生活增添新的色彩，但是它的主题，也给我留下了类似的深刻印象。哈特利运用联系法解释更为复杂的精神现象，虽然在很多地方都不全面，但作为真正的分析，马上就引起了我的兴趣，让我通过对比感觉到，孔狄亚克仅仅拘泥于文字归纳的不足，甚至洛克在阐释心理学时有益的探索和感想也有不足。就在这时，父亲开始着手写《精神分析》，用的是哈特利的精神现象阐述模式，但更全面，更深刻。他只能在每年一个月或者六个星期的假期里，完全闲着的时候，才能集中必需的精力做这项工作。他是1822年夏天开始写的，那是他第一次在多金度假。从那时起到他去世，除了有两年之外，只要职责允许，他每年都在那个地方住上半年。连续好几个假期，他都用来写《精神分析》，直到1829年发表。随着他的进展，他允许我逐步地读该书的手稿。精神心理学领域的其他主要英语作家的作品，我只读了我喜欢的，尤其是贝克莱[4_7]、休谟的《随笔》、里德[4_8]、杜格尔德·斯图尔特[4_9]以及布朗的《因果论》。两三年后我才读布朗的《演讲集》，当时连我父亲也没有读过。

Among the works read in the course of this year, which

contributed materially to my development, I owe it to mention a book (written on the foundation of some of Bentham's manuscripts and published under the pseudonyme of Philip Beauchamp) entitled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Religion on the Temporal Happiness of Mankind* . This was an examination not of the truth, but of the usefulness of religious belief, in the most general sense, apart from the peculiarities of any special revelation; which, of all the parts of the discussion concerning relig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is age, in which real belief in any religious doctrine is feeble and precarious, but the opinion of its necessity for moral and social purposes almost universal; and when those who reject revelation, very generally take refuge in an optimistic Deism, a worship of the order of Nature, and the supposed course of Providence, at least as full of contradictions, and perverting to the moral sentiments, as any of the forms of Christianity, if only it is as completely realized. Yet very little, with any claim to a philosophical character, has been written by sceptics against the usefulness of this form of belief. The volume bearing the name of Philip Beauchamp had this for its special object. Having been shown to my father in manuscript, it was put into my hands by him, and I made a marginal analysis of it as I had done of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 Next to the *Traité de Législation* , it was one of the books which by the searching character of its analysis produced the greatest effect upon me. On reading it lately after an interval of many years, I find it to have some of the defects as well as the merits of the Benthamic modes of thought, and to contain, as I now think, many weak arguments, but with a great overbalance of sound ones, and much good material for a more completely philosophic and conclusive treatment of the subject.

这一年间，我读了一些对我的发展有实质性作用的著作，这当中

我应该提到一本书，名为《自然宗教对人类现世幸福影响的分析》（以边沁的一些手稿为基础写的，用菲利浦·比彻姆的笔名出版）。这本书不是检验最普遍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真伪，而是检验它是否有用，以及是否有任何特别的《启示录》的特性。这本书中所有和宗教有关的讨论，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在这个时代，对任何宗教教义的真正信仰都是无益的，靠不住的。但是认为宗教对实现道德和社会目标是必要的几乎是一个普遍认可的观点。那些拒绝神的启示的人，一般都寻求乐观的自然神论作庇护，即崇拜大自然的秩序和天道，这至少与任何形式的基督教一样充满矛盾，并堕落成道德情感，只是没有被完全认识到。然而，怀疑这种形式信仰有用的人，只写了很少称得上带有任何哲学性质的作品。以菲利普·比彻姆的名义写的书，就以此为特定目标。父亲看过手稿后，把它交给我，我在页边缘上作了分析，就像读《政治经济学要义》的时候一样。这本书分析很透彻，是继《立法论》之后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书籍之一。很多年后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了它功利主义思考模式的一些缺点和优点，我现在觉得，它也有很多缺乏说服力的论证，但是也有很多合理的论证和好材料，可以用来对这个主题进行更全面的哲理性和总结性的处理。

I have now, I believe, mentioned all the books which had any considerable effect on my early mental development. From this point I began to carry on my intellectual cultivation by writing still more than by reading. In the summer of 1822 I wrote my first argumentative essay. I remember very little about it, except that it was an attack on what I regarded as the aristocratic prejudice, that the rich were, or were likely to be, superior in moral qualities to the poor. My performance was entirely argumentative, without any of the declamation which the subject would admit of, and might be expected to suggest to a young writer. In that department, however, I was, and remained, very inapt. Dry argument was the only thing I could, manage, or willingly attempted; though passively I was very susceptible to the effect of all composition, whether in the form of

poetry or oratory, which appealed to the feelings on any basis of reason. My father, who knew nothing of this essay until it was finished, was well satisfied, and, as I learnt from others, even pleased with it; but, perhaps from a desire to promote the exercise of other mental faculties than the purely logical, he advised me to make my next exercise in composition one of the oratorical kind; on which suggestion, availing myself of my familiarity with Greek history and ideas, and with the Athenian orators, I wrote two speeches, one an accusation, the other a defence of Pericles, on a supposed impeachment for not marching out to fight the Lacedemonians on their invasion of Attica. After this I continued to write papers on subjects often very much beyond my capacity, but with great benefit both from the exercise itself, and from the discussions which it led to with my father.

至此，对我早期的智力发展有任何重要影响的书籍，我相信已经都提到了。从这时起，与读书相比，我开始主要通过写作来继续进行智力培养。1822年夏天，我写了第一篇议论文。我已经不怎么记得这篇文章了，只记得它是抨击我理解的贵族化偏见，即认为富人在道德素质上高于穷人，或者很可能高于穷人。我所写的完全是在论证，没有任何慷慨陈词，这种主题其实是允许激辩的，而且年轻作者可能也会被建议这么做。然而，我在这方面一直不擅长。朴素的论证是我唯一能把握的，或者说乐意尝试的。然而，我很容易被动地受到在理性的基础上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不管是诗歌还是演说。直到我写完之后，父亲才知道有这篇文章，他非常满意，而且，我还从别人那里听说，他甚至非常高兴。但是，可能他希望我提高其他智力能力，而不仅仅是逻辑能力，所以，建议我接下来练习写一篇演说类的文章。对于这个建议，我利用自己熟悉希腊历史和思想以及雅典演说家这个优势，写了两篇演说，一篇是谴责伯里克利 [4_10] ，另一篇是为他辩护，假设他由于没有出兵攻打入侵阿提卡的斯巴达人而遭到了指责。这之后，我继续写一些主题经常大大超出我能力的论文，但

是，不管是从练习本身，还是从由此而与父亲进行的讨论中，我都收获颇多。

I had now also begun to converse, on general subjects, with the instructed men with whom I came in contact: and the opportunities of such contact naturally became more numerous. The two friends of my father from whom I derived most, and with whom I most associated, were Mr. Grote and Mr. John Austin. The acquaintance of both with my father was recent, but had ripened rapidly into intimacy. Mr. Grote was introduced to my father by Mr. Ricardo, I think in 1819 (being then about twenty-five years old), and sought assiduously his society and conversation. Already a highly instructed man, he was yet, by the side of my father, a tyro in the great subjects of human opinion; but he rapidly seized on my father's best ideas; and i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opinion he made himself known as early as 1820, by a pamphlet in defence of Radical Reform, in reply to a celebrated article by Sir James Mackintosh, then lately published in he *Edinburgh Review* . Mr. Grote's father, the banker, was, I believe, a thorough Tory, and his mother intensely Evangelical; so that for his liberal opinions he was in no way indebted to home influences. But, unlike most persons who have the prospect of being rich by inheritance, he had, though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of banking, devoted a great portion of time to philosophic studies; and his intimacy with my father did much to decide the character of the next stage in his mental progress. Him I often visited, and my conversations with him on political, moral, and philosophical subjects gave me, in addition to much valuable instruction, all the pleasure and benefit of sympathetic communion with a man of the high intellectual and moral eminence which his life and writings have since manifested to the world.

此时，我也已经开始与接触到的博学者讨论一般性的问题，这种接触的机会也自然变得更频繁起来。从父亲的两个朋友，格罗特[4_11]先生和约翰·奥斯丁先生那里，我收获最多，与他们的交往也最多。他们和我父亲都认识不久，但他们的关系很快就由认识变为熟识了。格罗特先生是李嘉图先生介绍给父亲认识的，我想是在1819年（那时他差不多25岁），他一心寻求与父亲交往。尽管他已经是个非常博学的人了，但在父亲面前，对于人类观点这样重大的主题，他仍是个初学者；但是，他能很快地抓住父亲思想的精华。在政治观点方面，早在1820年，他就因为答复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的著名论文，写了篇为“激进改革”辩护的论文而为人所知，这篇论文最近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格罗特先生的父亲是个银行家，我认为是个十足的保守派，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福音派教徒，所以他的自由观点绝非来自家庭的影响。但是，和大多数将来能够靠继承遗产而富有的人不同，他虽然积极参与银行业务，但还是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投入到了哲学研究中。他和我父亲的熟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思想发展下一阶段的特点。我经常拜访他，和他探讨政治、道德和哲学话题，除了很宝贵的指导外，与他这样一个智力过人、道德高尚的人意气相投地交流，还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和益处。他过人的思想和高尚的道德，从那时起，已经通过他的生活和作品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Mr. Austin, who was four or five years older than Mr. Grote, was the eldest son of a retired miller in Suffolk, who had made money by contracts during the war, and who must have been a man of remarkable qualities, as I infer from the fact that all his sons were of more than common ability and all eminently gentlemen. The one with whom we are now concerned, and whose writings on jurisprudence have made him celebrated, was for some time in the army, and served in Sicily under Lord William Bentinck. After the Peace he sold his commission and studied for the bar, to which he had been called for some time before my father knew him. He was

not, like Mr. Grote, to any extent, a pupil of my father, but he had attained, by reading and thought,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the same opinions, modified by his own very decided individuality of character. He was a man of great intellectual powers, which in conversation appeared at their very best; from the vigour and richness of expression with which, under the excitement of discussion, he was accustomed to maintain some view or other of most general subjects; and from an appearance of not only strong, but deliberate and collected will; mixed with a certain bitterness, partly derived from temperament, and partly from the general cast of his feelings and reflections. The dissatisfaction with life and the world, felt more or less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society and intellect by every discerning and highly conscientious mind, gave in his case a rather melancholy tinge to the character, very natural to those whose passive moral susceptibilities are more than proportioned to their active energies. For it must be said, that the strength of will of which his manner seemed to give such strong assurance, expended itself principally in manner. With great zeal for human improvement, a strong sense of duty, and capacities and acquirements the extent of which is proved by the writings he has left, he hardly ever completed any intellectual task of magnitude. He had so high a standard of what ought to be done, so exaggerated a sense of deficiencies in his own performances, and was so unable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the amount of elaboration sufficient for the occasion and the purpose, that he not only spoilt much of his work for ordinary use by overlabouring it, but spent so much time and exertion in superfluous study and thought, that when his task ought to have been completed, he had generally worked himself into an illness, without having half finished what he undertook. From this mental infirmity (of which he is not the sole example among the accomplished and able men whom I have known), combined with liability to frequent attacks of disabling though not dangerous ill-

health, he accomplished, through life, little in comparison with what he seemed capable of; but what he did produce is held in the very highest estimation by the most competent judges; and, like Coleridge, he might plead as a set-off that he had been to many persons, through his conversation, a source not only of much instruction but of great elevation of character. On me his influence was most salutary. It was moral in the best sense. He took a sincere and kind interest in me, far beyond what could have been expected towards a mere youth from a man of his age, standing, and what seemed austerity of character. There was in his conversation and demeanour a tone of high-mindedness which did not show itself so much, if the quality existed as much, in any of the other persons with whom at that time I associated. My intercourse with him was the more beneficial, owing to his being of a different mental type from all other intellectual men whom I frequented, and he from the first set himself decidedly against the prejudices and narrownesses which are almost sure to be found in a young man formed by a particular mode of thought or a particular social circle.

奥斯丁先生比格罗特先生大四五岁，是萨福克郡一个退休磨坊主的长子。在战争中，这位父亲靠承包赚了不少钱，我推断他肯定是个品质出众的人，因为他的儿子能力都不一般，都是优秀的绅士。我们现在关注的这位，因他的法学作品而著名，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从军，在威廉·本廷克勋爵的麾下，在西西里服过役。战争结束后，他卖了军衔，开始学习法律，父亲认识他之前，他就已经当了一段时间的律师了。他和格罗特先生不一样，根本不是我父亲的学生，而是通过阅读和思考，获得了很多和我父亲相同的观点，辅之以他性格中坚定的个性。他这个人才智突出，通过对话最能展现出来。在讨论得很兴奋的时候，他惯于用有力、华美的言辞，坚持非常普通的主题中的某个观点。他的外貌表现出的不仅是强硬，而且还有谨慎和冷静的意志，也夹杂着某种尖酸，部分源于性格，部分源于他的情感和思索的总体特

征。每一个有判断力、非常负责的思想家，在目前的社会和智力状态下，都或多或少感觉到对生活和世界不满，而在他这儿这种不满让他的性格带上相当忧郁的色彩，这对于消极的道德情感压倒积极活力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必须承认，他的风格似乎强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意志力，然而，他的意志力也仅止于其风格。他非常热心人类的进步，有很强的责任感，还有他留下来的那些作品，足以证明他的能力和成就的水平，但他几乎从没完成任何有重大意义的智力作品。对于应该做的事情，他的标准如此之高，总觉得自己的表现有缺点，不满足于对情形和意图而言已经足够的详尽阐述，以至于不仅对很多用途普通的工作太过细心却损毁了它们，而且还把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多余的研究和思考上。因此，当他的任务需要完成的时候，他通常已经积劳成疾了，而工作一半都没有完成。由于这种心理弱点（在我认识的有成就和有才干的人当中，他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加上经常生病（这些病虽然不致命，但也损害身体能力），与他看起来能做到的相比，他一生的成就很小。但是，对于他确实创作出来的东西，最称职的鉴定人也会给予他非常高的评价。和柯尔律治 [4_12] 一样，他可以为自己辩护，说通过交谈他不仅为许多人提供了很多指导，还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品质。他对我的影响非常有益。那是最佳意义上的道德影响。他对我的关心很诚挚友善，一个寻常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从像他这种年龄、地位以及看似性格严厉的人那里获得这种关心。他的言谈和举止中有一种高尚的风格，在当时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即使有人有同样的品质，也不会像在他身上展现出来的那么多。从与他的交往当中，我收益更多，因为他和我经常拜访的知识分子都不是一个思想类型的。而且，对于仅由一种思维模式或者一种社会圈子塑造的年轻人几乎必然会有的偏见和狭隘，他从一开始就果断地反对。

His younger brother, Charles Austin, of whom at this time and for the next year or two I saw much, had also a great effect on me, though of a very different description. He was but a few years older than myself, and had then just left the University, where he had

shone with great *éclat* as a man of intellect and a brilliant orator and converser. The effect he produced on his Cambridge contemporaries deserves to be accounted an historical event; for to it may in part be traced the tendency towards Liberalism in general, and the Benthamic and politico-economic form of it in particular, which showed itself in a portion of the more active-minded young men of the higher classes from this time to 1830. The Union Debating Society, at that time at the height of its reputation, was an arena where what were then thought extreme opinions, i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were weekly asserted, face to face with their opposites, before audiences consisting of the *élite* of the Cambridge youth: and though many persons afterwards of more or less note (of whom Lord Macaulay is the most celebrated) gained their first oratorical laurels in those debates, the really influential mind among these intellectual gladiators was Charles Austin. He continued, after leaving the University, to be, by his conversation and personal ascendency, a leader among the same class of young men who had been his associates there; and he attached me among others to his car. Through him I became acquainted with Macaulay, Hyde and Charles Villiers, Strutt (now Lord Belper), Romilly (now Lord Romilly and Master of the Rolls), and various others who subsequently figured in literature or politics, and among whom I heard discussions on many topics, as yet to a certain degree new to me. The influence of Charles Austin over me differed from that of the persons I have hitherto mentioned, in being not the influence of a man over a boy, but that of an elder contemporary. It was through him that I first felt myself, not a pupil under teachers, but a man among men.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of intellect whom I met on a ground of equality, though as yet much his inferior on that common ground. He was a man who never failed to impress greatly those with whom he came in contact, even when their opinions were the very reverse of his. The impression he gave was that of boundless

strength, together with talents which, combined with such apparent force of will and character, seemed capable of dominating the world. Those who knew him, whether friendly to him or not, always anticipated that he would play a conspicuous part in public life. It is seldom that men produce so great an immediate effect by speech, unless they, in some degree, lay themselves out for it; and he did this in no ordinary degree. He loved to strike, and even to startle. He knew that decision is the greatest element of effect, and he uttered his opinions with all the decision he could throw into them, never so well pleased as when he astonished anyone by their audacity. Very unlike his brother, who made war against the narrower interpret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principles they both professed, he, on the contrary, presented the Benthamic doctrines in the most startling form of which they were susceptible, exaggerating everything in them which tended to consequences offensive to anyone's preconceived feelings. All which, he defended with such verve and vivacity, and carried off by a manner so agreeable as well as forcible, that he always either came off victor, or divided the honours of the field. It is my belief that much of the notion popularly entertained of the tenets and sentiments of what are called Benthamites or Utilitarians had its origin in paradoxes thrown out by Charles Austin. It must be said, however, that his example was followed, *haudpassibusaequis* , by younger proselytes, and that to *outrer* whatever was by anybody considered offensive in the doctrines and maxims of Benthamism, became at one time the badge of a small coterie of youths. All of these who had anything in them, myself among others, quickly outgrew this boyish vanity; and those who had not, became tired of differing from other people, and gave up both the good and the bad part of the heterodox opinions they had for some time professed.

当时以及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经常见到他的弟弟查尔斯·奥斯丁，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尽管类型很不相同。他比我只大几岁，那时刚大学毕业。在大学里，他光芒四射，是位有识之士、才华横溢的演讲家和谈话专家。他对剑桥同辈们产生的影响堪称具有历史性意义。因为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风潮，尤其是它的功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形式，可以部分追溯到此。从这时起到1830年，这种风潮在一部分上层社会思想较活跃的年轻人中展现出来。联合辩论协会当时正处于名声鼎盛时期，在这个活动场所里，当时被认为很极端的政治和哲学观点每星期都会被拿来和对手面对面地辩论，而观众里有剑桥的年轻精英。虽然很多后来或多或少有些名望的人（其中，麦考利勋爵是最著名的），是在这些辩论中首次摘得演说的桂冠，但这些高智商的辩论者中，真正有影响力的还是查尔斯·奥斯丁。离开大学后，他的谈话技巧和个人魅力使得他仍然是大学里与他熟识那一阶层年轻人的领袖。他让我和别人一起，加入了他的行列。通过他，我结识了麦考利、海德、查尔斯·维利尔斯，斯特拉特（现在是贝尔珀勋爵）和罗米利（现在是罗米利勋爵，上诉院保管案卷的法官），还有很多后来因文学或政治而出名的人。我听到他们讨论很多话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对这些话题还不熟悉。查尔斯·奥斯丁对我的影响跟我迄今为止提到的其他人不一样，不是成年人对小孩子的影响，而是年龄稍长的同代人的影响。通过他，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老师的小学生，而是成人中的一员。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高智商的平辈人，我们是平等的，虽然在这平等的基础上我比他逊色很多。他会给任何与他接触过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即使他们的观点与他完全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是有无穷的力量和才干，结合他显而易见的意志和性格的力量，似乎能主宰世界。那些熟悉他的人，不管对他是否友好，都预料他会在公众生活中发挥显著作用。很少有人能通过演说产生这么大的直接影响，除非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精心准备了而且用了功的。他喜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让人震惊。他知道，果断是效果的最大因素，他表达观点时，尽力把所有果断融入其中。他最高兴的时候，就是他的观点因为大胆创新而让人大吃一惊的时候。他和哥哥很不一样，他哥哥坚决反对过于狭隘地解释和应用两人都公开承认的原则，恰恰相反，他以功利主义学说所能承受的最惊人的方式阐述这一学说，夸大

[4_13]

学说中任何倾向于冒犯人们原有情感的东西。他充满活力地为这一切辩护，以令人愉快又有说服力的态度应付局面，因此他经常成为胜者，或者分享胜者的荣誉。我坚信，流行的边沁主义者或边沁主义者的原则和看法中的很多观念，都源于查尔斯·奥斯丁提出的看似矛盾而实际可能正确的说法。然而，必须承认，改变了信仰的年轻人步履蹒跚地仿效他的做法，夸大功利主义教条和准则中所有大家都认为有冒犯性的东西，曾有一段时间这成为了一个小圈子年轻人的标志。那些有些天分的人，包括我自己，很快就抛弃了这种孩子气的虚荣心；而没有天分的人，逐渐厌倦了与别人唱反调，放弃了他们坚持过一段时间的非主流观点，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部分。

It was in the winter of 1822-3 that I formed the plan of a little society, to be composed of young men agreeing in fundamental principles—acknowledging Utility as their standard in ethics and politics, and a certain number of the principal corollaries drawn from it in the philosophy I had accepted—and meeting once a fortnight to read essays and discuss questions conformably to the premises thus agreed on. The fact would hardly be worth mentioning, but for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 name I gave to the society I had planned was the Utilitarian Society.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anyone had taken the title of Utilitarian; and the term made its way into the language, from this humble source. I did not invent the word, but found it in one of Galt's novels, the *Annals of the Parish* , in which the Scotch clergyman, of whom the book is a supposed autobiography, is represented as warning his parishioners not to leave the Gospel and become utilitarians. With a boy's fondness for a name and a banner I seized on the word, and for some years called myself and others by it as a sectarian appellation; and it came to be occasionally used by some others holding the opinions which it was intended to designate. As those opinions attracted more notice, the term was repeated by strangers and

opponents, and got into rather common use just about the time when those who had originally assumed it, laid down that along with other sectarian characteristics. The Society so called consisted at first of no more than three members, one of whom, being Mr. Bentham's amanuensis, obtained for us permission to hold our meetings in his house. The number never, I think, reached ten, and the Society was broken up in 1826. It had thus an existence of about three years and a half. The chief effect of it as regards myself, over and above the benefit of practice in oral discussion, was that of bringing me in contact with several young men at that time less advanced than myself, among whom, as they professed the same opinions, I was for some time a sort of leader, and ha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their mental progress. Any young man of education who fell in my way, and whose opinions were not incompatible with those of the Society, I endeavoured to press into its service; and some others I probably should never have known, had they not joined it. Those of the members who became my intimate companions—no one of whom was in any sense of the word a disciple, but all of them independent thinkers on their own basis—were William Eyton Tooke, son of the eminent political economist, a young man of singular worth both moral and intellectual, lost to the world by an early death; his friend William Ellis, an original thinker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economy, now honourably known by his apostolic exer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George Graham, afterwards official assignee of the Bankruptcy Court, a thinker of originality and power on almost all abstract subjects; and (from the time when he came first to England to study for the bar in 1824 or 1825) a man who has made considerably more noise in the world than any of these, John Arthur Roebuck.

1822年底-1823年初的那个冬天，我制定了建立一个小型学会的

计划。这个学会由认同基本原则的年轻人组成，即认可效用为他们道德规范和政治观点的标准，认可我所接受的哲学从效用中得出的一些主要推论。我们两星期进行一次活动，读文章，并讨论与由此达成的前提一致的问题。如果不是一个细节，我打算给学会起名叫边沁主义者学会这件事就根本不值一提。这是第一次有人用边沁主义者这个名称，这个词就从这种不起眼的渠道进入了英语。它不是我发明的，我是从高尔特的一部小说《教区年鉴》中看到的，这本书假托一名苏格兰牧师的自传。在小说中，他警告自己教区的居民不要放弃福音，而要变成边沁主义者。出于男孩子对名字和标语的喜好，我采纳了这个词，有几年，用它作为一个派别的称号来称呼自己和其他一些人。偶尔，持有这个词本来所指含义的一些人也会用它。随着那些观点吸引了更多注意力，这一术语被陌生人和反对者不断重复，就在倡导者放弃它和其他一些派系特征时，这个词反而应用得相当普遍了。这个所谓的学会最初仅有三名成员，其中一个是边沁先生的文书，为我们获得许可在边沁家里开会。我想人数从来没达到十个。学会于1826年解散，因此，它存在了大约三年半。对我来说，除了练习口头讨论这个好处之外，它对我的主要作用是让我接触到好几个当时水平不如我的年轻人，由于他们承认相同的观点，在他们中间，我有一段时间算是个领导者，对他们的智力进步产生了很大影响。任何我所遇见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只要观点与学会不冲突，我都会尽力争取让他加入学会；还有一些人，要不是加入了学会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认识。那些变成我亲密朋友的会员——没有一个是任何意义上的信徒，而全都是基于各自知识基础而进行独立思考的思想家——包括威廉·艾顿·克，他是一位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的儿子，是位道德上和智力上都有非凡优点的年轻人，可惜英年早逝。他的朋友威廉·埃利斯，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内一位有创造性的思想家，现在由于为教育进步做使徒般的努力而出名，受人尊敬；乔治·格雷厄姆，后来成了破产法庭的官方代理人，是位在几乎所有抽象主题上都有创意、有能力的思想家；还有一位（从1824年或1825年，他最初到英国学习法律开始），他在这个世界发出的声音比上述所有人都要多，他就是约翰·阿瑟·罗巴克。

In May, 1823, my professional occupation and status for the next thirty-five years of my life, were decided by my father's obtaining for me an appointment from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the office of the Examiner of India Correspondence, immediately under himself. I was appointed in the usual manner, at the bottom of the list of clerks, to rise, at least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seniority; but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I should be employed from the beginning in preparing drafts of despatches, and be thus trained up as a successor to those who then filled the higher departments of the office. My drafts of course required, for some time, much revision from my immediate superiors, but I soon became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business, and by my father's instructions and the general growth of my own powers, I was in a few years qualified to be, and practically was, the chief conductor of the correspondence with India in one of the leading departments, that of the Native States. This continued to be my official duty until I was appointed Examiner, only two years before the time when the abolitio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s a political body determined my retirement. I do not know any one of the occupations by which a subsistence can now be gained, more suitable than such as this to anyone who, not being in independent circumstances, desires to devote a part of the twenty-four hours to private intellectual pursuits. Writing for the press cannot be recommended as a permanent resource to anyone qualified to accomplish anything in the higher departments of literature or thought: not only on account of the uncertainty of this means of livelihood, especially if the writer has a conscience, and will not consent to serve any opinions except his own; but also because the writings by which one can live are not the writings which themselves live, and are never those in which the writer does his best. Books destined to form future thinkers take too much time to write, and when written come, in general, too slowly into notice and repute, to be relied on for

subsistence. Those who have to support themselves by their pen must depend on literary drudgery, or at best on writings addressed to the multitude; and can employ in the pursuits of their own choice, only such time as they can spare from those of necessity; which is generally less than the leisure allowed by office occupations, while the effect on the mind is far more enervating and fatiguing. For my own part I have, through life, found office duties an actual rest from the other mental occupations which I have carried on simultaneously with them. They were sufficiently intellectual not to be a distasteful drudgery, without being such as to cause any strain upon the mental powers of a person used to abstract thought, or to the labour of careful literary composition. The drawbacks, for every mode of life has its drawbacks, were not, however, unfelt by me. I cared little for the loss of the chances of riches and honours held out by some of the professions, particularly the bar, which had been, as I have already said, the profession thought of for me. But I was not indifferent to exclusion from Parliament, and public life: and I felt very sensibly the more immediate unpleasantness of confinement to London; the holiday allowed by India House practice not exceeding a month in the year, while my taste was strong for a country life, and my sojourn in France had left behind it an ardent desire of travelling. But though these tastes could not be freely indulged, they were at no time entirely sacrificed. I passed most Sundays, throughout the year, in the country, taking long rural walks on that day even when residing in London. The month's holiday was, for a few years, passed at my father's house in the country; afterwards a part or the whole was spent in tours, chiefly pedestrian, with some one or more of the young men who were my chosen companions; and, at a later period, in longer journeys or excursions, alone or with other friends. France, Belgium, and Rhenish Germany were within easy reach of the annual holiday: and two longer absences, one of three, the other

of six months, under medical advice, added Switzerland, the Tyrol, and Italy to my list. Fortunately, also, both these journeys occurred rather early, so as to give the benefit and charm of the remembrance to a large portion of life.

1823年5月，父亲为我在东印度公司印度通信检察署谋了一个职位，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我接下来三十五年的职业生涯和地位都因此确定了。我以通常程序被录用，排在职员名单的最后面，升职要靠资历，至少在起初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我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要准备做起草公务急报的工作，这样可以得到充分的锻炼，以便接替当时这个办事处更重要部门的职员。有一段时间，我的草稿当然需要我的直接上司进行很多修正，但是，我很快就熟悉了业务。由于父亲的指导，加上自己能力的总体提升，没过几年，我就能胜任土邦某个主要部门里面与英属印度通信的总指挥的工作了，而且实际上就在做这个工作。被任命为检察官之前，这一直都是我的正式职务，就在我被任命为检察官两年后，东印度公司作为政治实体被废除，这决定我必须退休。对于一个经济上不独立，又渴望把二十四小时的一部分时间用于个人智力追求的人来说，我不知道还有比这个谋生的工作更合适的选择了。对于一个有能力在文学或思想这些更高领域有所成就的人来说，为出版社写稿，不是可取的永久性办法，不仅因为这种谋生手段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如果这个作家有良心，除了自己的观点之外，不会为了别人的观点而写作。还因为，让人能够赚钱谋生的那些作品本身没有生命力，也永远不是作者倾注全力的作品。一本书，如果注定能造就未来思想家，就必定要花很长时间来写，写完后，通常要过很长时间才能被人注意，并得到荣誉，因此无法作为赖以生存的手段。那些靠写作谋生的人必须依靠做文学苦力，最好写通俗作品。只能从必须花费的时间之外抽出一点时间用于追求自己的梦想，这点时间一般比公职容许的闲暇少，然而，却远远更让人头脑倦怠、疲劳。对我来说，整个一生中，我发现公职实际上是我同时进行其他脑力劳动的调剂。公职也需要一些智力，足以不让人觉得是讨厌的苦差事，而且，还不会给习惯于抽象思考，或者努力进行细心文学创作者的智力

带来任何压力。然而，我也不是没有感觉到它的缺点，因为任何生活方式都有缺点。我不在乎失去某些职业有机会获得的财产和荣誉，尤其是律师工作，我已经说过，父亲曾为我考虑过这个职业。但是，我却无法不在乎被议会和公共生活排除在外，而且被限制在伦敦，会让我很明显地感觉到更直接的不快。东印度公司的惯例是每年允许的假期不超过一个月，然而，我很想过乡村生活，并且，在法国的逗留让我强烈渴望旅行。尽管不能毫无顾忌地沉迷于我的这些喜好，但它们也绝没有因为工作而全部被忽略掉。一年中的大部分星期天，我都是在乡下度过的，在乡间进行长时间散步。即使住在伦敦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这每年一个月的假期中，有几年，我是在父亲乡下的房子里度过的。后来，一部分或整个假期都在旅行，主要是和一个或更多我选好的年轻同伴一起步行。再后来，在较远的旅行或远足中，我是自己一个人或者和其他朋友一起去的。法国、比利时和德国莱茵河由于离得近是每年假期都可能会去的地方。根据医生建议，我有了两个较长的假期，一次是三个月，另一次六个月，分别去了瑞士、蒂罗尔和意大利。幸运的是，这两次旅行都是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去的，让我大半生都有陶醉、有益的回忆。

I am disposed to agree with what has been surmised by others, that the opportunity which my official position gave me of learning by personal observation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the practical conduct of public affairs, has been of considerable value to me as a theoretical reformer of the opinions and institutions of my time. Not, indeed, that public business transacted on paper, to take effec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globe, was of itself calculated to give much practical knowledge of life. But the occupation accustomed me to see and hear the difficulties of every course, and the means of obviating them, stated and discussed deliberately with a view to execution: it gave me opportunities of perceiving when public measures, and other political facts, did not produce the effects which had been expected of them, and from what causes; above all,

it was valuable to me by making me, in this portion of my activity, merely one wheel in a machine, the whole of which had to work together. As a speculative writer, I should have had no one to consult but myself, and should have encountered in my speculations none of the obstacles which would have started up whenever they came to be applied to practice. But as a Secretary conducting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I could not issue an order, or express an opinion, without satisfying various persons very unlike myself, that the thing was fit to be done. I was thus in a good position for finding out by practice the mode of putting a thought which gives it easiest admittance into minds not prepared for it by habit; while I became practically conversant 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moving bodies of men, the necessities of compromise, the art of sacrificing the non-essential to preserve the essential. I learnt how to obtain the best I could, when I could not obtain everything; instead of being indignant or dispirited because I could not have entirely my own way, to be pleased and encouraged when I could have the smallest part of it; and when even that could not be, to bear with complete equanimity the being overruled altogether. I have found, through life, these acquisitions to be of the greatest possible importance for personal happiness, and they are also a very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enabling anyone, either as theorist or as practical man, to effect the greatest amount of good compatible with his opportunities.

我的公务职位让我有机会通过亲自观察，学习实际管理公共事务的必要条件，有人猜测，作为我那个时代观点和制度的理论改革家，这对我有很大价值，我愿意承认这一点。以书面形式办理，在地球另一端生效的公共事务，其本身并非适合提供生活中的很多实用知识。但是，这个职业让我习惯于看到、听到每一项事业里面的困难，以及消除困难的方法：它们被慎重地表达，讨论，并着眼于执行。它让我有机会觉察到，公共措施和其他政治行为在什么时候不能产生期待的

结果，以及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在我的这段工作中，它让我仅仅成为一台机器的一个轮子，而整台机器必须通力合作，这一点对我是很有价值的。作为思考型的作家，除了自己之外，我本来应该没有任何人可以请教，在思索中，本来应该碰不到任何把思考应用于实践都会突然出现的障碍。但是，作为管理政治通信的书记，我发布命令或表达观点时，必须让各种各样的，和我完全不同的人满意，觉得这件事适合实施才行。因此，我所处的有利位置能够让我通过实践找出方法，让不习惯接受某种想法的人，很容易地接受这个想法。同时，我在实践上熟悉了说服众人的困难，妥协的必要性，和牺牲不重要的以保护重要的处世艺术。我学会了在我不能获得一切的时候，要尽力得到最好的。如果不能随心所欲，我也不会愤怒或者沮丧。相反，即便能在很小的程度上这么做，我也会欢欣鼓舞。如果这也做不到，就泰然忍受被完全否决。纵观人生，我发现，这些收获对个人幸福来说，是最重要的，它们也是让任何人，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干家，利用机会实现最大利益的非常必要的条件。

[4_1].安托万·洛朗·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被认为是现代化学的奠基人。

[4_2].波拿巴，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家族姓氏。

[4_3].吉伦特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立法委员会和国民议会中的一个政治派系。

[4_4].边沁主义，边沁提倡的功利主义学说。

[4_5].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在《人类理智论》（1690年）中，他提出了经验论原则，他的《政府论两篇》（1690年）影响了《独立宣言》。

[4_6].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1715—1771），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主要著作有《论精神》《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

[4_7].乔治·贝克莱（1685—1753），爱尔兰主教、哲学家，其基本理论是反对托马斯·霍布斯的物质主义，认为存在是感知或被感知。其著作有《人类知识原理》（1710年）等。

[4_8].托马斯·里德（1710—1796），苏格兰哲学家，创立了共同意识的哲学。

[4_9].杜格尔德·斯图尔特（1753—1828），英国哲学家，是常识学派的支持者。

[4_10].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古雅典首领，因其推进了雅典民主制并下令建造巴台农神庙而著名。

[4_11].乔治·格罗特（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以所著《希腊史》闻名。

[4_12].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英国诗人、批评家、浪漫主义流派的倡导者。

[4_13].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作家和政治家，著作包括受欢迎的《英国史》（1849—1861年），为《爱丁堡评论》撰写的众多文章和一卷叙述诗集《古罗马之歌》（1842年）。

Chapter 4 Youthful Propagandism. The “Westminster Review”

第四章　青年时代的宣传事业《威斯敏斯特评论》

The occupation of so much of my time by office work did not relax my attention to my own pursuits, which were never carried on more vigorously. It was about this time that I began to write in newspapers. The first writings of mine which got into print were two letters published towards the end of 1822, in the *Traveller* evening newspaper. The *Traveller* (which afterwards grew into the *Globe and Traveller* , by the purchase and incorporation of the *Globe*) was then the property of the well-known political economist, Colonel Torrens, and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an able man, Mr. Walter Coulson (who, after being an amanuensis of Mr. Bentham, became a reporter, then an editor, next a barrister and conveyancer, and died Counsel to the Home Office), it ha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newspaper organs of Liberal politics. Colonel Torrens himself wrote much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s paper; and had at this time made an attack upon some opinion of Ricardo and my father, to which, at my father's instigation, I attempted an answer, and Coulson, out of consideration for my father and goodwill to me, inserted it. There was a reply by Torrens, to which I again rejoined. I soon after attempted something considerably more ambitious. The prosecutions of Richard Carlile and his wife and sister for publications hostile to Christianity were then exciting much attention, and nowhere more than among the people I frequented. Freedom of discussion even in politics, much more in religion, was at that time far from being, even in theory, the conceded point which it at least seems to be now; and the holders of obnoxious opinions had to be always ready to argue and re-argue

for the liberty of expressing them. I wrote a series of five letters, under the signature of Wickliffe, going over the whol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e question of free publication of all opinions on religion, and offered them to the *Morning Chronicle* . Three of them were published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823; the other two, containing things too outspoken for that journal, never appeared at all. But a paper which I wrote soon after on the same subject, *ŕ propos* of a debate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was inserted as a leading article; and during the whole of this year, 1823,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my contributions were printed in the *Chronicle* and *Traveller* : sometimes notices of books, but oftener letters, commenting on some nonsense talked in Parliament, or some defect of the law, or misdoings of the magistracy or the courts of justice. In this last department the *Chronicle* was now rendering signal service. After the death of Mr. Perry, the editorship and management of the paper had devolved on Mr. John Black, long a reporter on its establishment; a man of most extensive reading and information, great honesty and simplicity of mind; a particular friend of my father, imbued with many of his and Bentham's ideas, which he reproduced in his articles, among other valuable thoughts, with great facility and skill. From this time the *Chronicle* ceased to be the merely Whig organ it was before, and during the next ten years became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a vehicle of the opinions of the Utilitarian Radicals. This was mainly by what Black himself wrote, with some assistance from Fonblanque, who first showed his eminent qualities as a writer by articles and *jeuxd' esprit* in the *Chronicle* . The defects of the law, and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were the subject on which that paper rendered most service to improvement. Up to that time hardly a word had been said, except by Bentham and my father, against that most peccant part of English institutions and of their administration. It was the almost universal creed of Englishmen, that the law of England, the

judicature of England, the unpaid magistracy of England, were models of excellence. I do not go beyond the mark in saying, that after Bentham, who supplied the principal materials, the greatest share of the merit of breaking down this wretched superstition belongs to Black, as editor of the *Morning Chronicle* . He kept up an incessant fire against it, exposing the absurdities and vices of the law and the courts of justice, paid and unpaid, until he forced some sense of them into people's minds. On many other questions he became the organ of opinions much in advance of any which had ever before found regular advocacy in the newspaper press. Black was a frequent visitor of my father, and Mr. Grote used to say that he always knew by the Monday morning's article whether Black had been with my father on the Sunday. Black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the many channels through which my father's conversation and personal influence made his opinions tell on the world; cooperating with the effect of his writings in making him a power in the country such as it has rarely been the lot of an individual in a private station to be, through the mere force of intellect and character: and a power which was often acting the most efficiently where it was least seen and suspected. I have already noticed how much of what was done by Ricardo, Hume, and Grote was the result, in part, of his prompting and persuasion. He was the good genius by the side of Brougham in most of what he did for the public, either on education, law reform, or any other subject. And his influence flowed in minor streams too numerous to be specified. This influence was now about to receive a great extension by the foundation of the *Westminster Review* .

办公室工作占据了我非常多的时间，但是我并没有放松自己的追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力旺盛地坚持着。大约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为报纸撰稿。我发表的第一个作品，是1822年底在《旅行者》

晚报上刊登的两封信。《旅行者》（后来收购合并了《环球》，成为《环球旅行者》）当时属于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托伦斯上校。凭借能干的编辑沃尔特·库尔森先生（他曾是边沁先生的抄写员，后来成了记者，然后做编辑，接着做承办转让事务的律师，去世时是英国内政部的法律顾问），该报成了自由主义政治最重要的机关报之一。托伦斯上校亲自为自己的报纸写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文章。这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攻击李嘉图和我父亲的一些观点，在父亲的鼓动下，我试着写了一篇回应文章，库尔森出于对父亲的考虑，以及对我的好意，把它插到了报纸里面。托伦斯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我也再次反驳。之后不久，我尝试写更具挑战性的东西。理查德·卡莱尔和他的妻子以及姐姐，由于发表敌视基督教的文章而招致起诉，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我经常拜访的人对此尤为关注。讨论的自由在当时，不用说宗教上的，即便是政治上的，也和目前至少看起来是被理论上认可接受的界点相距甚远。持有让人讨厌的观点的人为了能自由表达，总是得做好多次辩论的准备。我用威克利夫的笔名写了五封系列书信，全面阐述了自由发表一切宗教观点的问题，投给了《纪事晨报》。其中三封在1823年的1月和2月发表，另外两封，由于内容对这个杂志来说太直率，一直没有发表。但是不久后，我写了一篇同一主题的文章，是关于下议院一次辩论的话题，作为社论刊登了出来。1823年一整年中，我的很多投稿都发表在《纪事晨报》和《旅行者》上，有的是书评，但更多的是书信，评论议会里面说的一些胡话、法律的缺陷以及地方行政官员或法庭做的坏事。在揭露腐败方面，《纪事晨报》当时做得相当出色。佩里先生去世后，报纸的编辑和管理职务移交给了约翰·布莱克先生，从发刊以来他就是该报的记者。他博览群书，阅历广泛，诚恳而思想纯朴。他是我父亲一位很特别的朋友，很多观点受到父亲和边沁的影响，他在自己的文章里重现这些观点和其他有价值的思想，表达得非常流利，技巧娴熟。从这时起，《纪事晨报》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辉格党的机关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功利主义激进分子表达观点的工具。这主要在于布莱克的文章，得到了方布兰克的协助，后者在《纪事晨报》上面发表的文章和妙语初次展现了一个作家的杰出素质。法律和司法管理方面的缺陷，是这家报纸主要致力于改善的。在那以前，除了边沁和我父亲，几乎

没有任何人批评过英国公共机构和它们管理中的最大弊端。英国人几乎普遍相信，英国法律、英国司法以及英国不取报酬的地方行政官员，都是优秀的典型。我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除了提供主要资料的边沁，这种可鄙迷信的破除便最应归功于作为《纪事晨报》编辑的布莱克了。他不计报酬地不断向这种迷信开火，暴露法律和法庭的荒谬与缺陷，直至人们感觉到这些为止。在很多问题上，他都成为舆论的喉舌，所发表的意见经常比其他报纸提倡的早很多。布莱克先生经常拜访我父亲，格罗特先生常说，他总能从周一早上的文章中得知布莱克周日是否和我父亲在一起。布莱克是父亲通过交谈和个人影响使其见解为世人所知的众多渠道中最重要的一个。加之其作品的影响，他成了这个国家的一股力量，这对于平民身份的个人来说，仅仅通过智力和品格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这股力量经常在最难以觉察和最不受怀疑的地方，最有效率地发挥作用。我已经注意到，李嘉图、休谟和格罗特所做的事情，一部分是他激励和说服的结果。他简直是布鲁厄姆身边为公众谋福利的天才，不管是从教育、法律改革，还是其他方面都可以看出来。他的影响就像难以数计的溪流。这种影响现在马上要大大扩展了，因为《威斯敏斯特评论》创刊了。

Contrary to what may have been supposed, my father was in no degree a party to setting up the *Westminster Review* . The need of a Radical organ to make head against the *Edinburgh* and *Quarterly* (then in the period of their greatest reputation and influence) had been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him and Mr. Bentham many years earlier, and it had been a part of their *Château en Espagne* that my father should be the editor; but the idea had never assumed any practical shape. In 1823, however, Mr. Bentham determined to establish the *Review* at his own cost, and offered the editorship to my father, who declined it as incompatible with his India House appointment. It was then entrusted to Mr. (now Sir John) Bowring, at that time a merchant in the City. Mr. Bowring had been for two or three years previous an assiduous frequenter of Mr. Bentham, to

whom he was recommended by many personal good qualities, by an ardent admiration for Bentham, a zealous adoption of many, though not all of his opinions, and, not least, by an extensive acquaintanceship and correspondence with Liberals of all countries, which seemed to qualify him for being a powerful agent in spreading Bentham's fame and doctrines through all quarters of the world. My father had seen little of Bowring, but knew enough of him to have formed a strong opinion, that he was a man of an entirely different type from what my father considered suitable for conducting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Review: and he augured so ill of the enterprise that he regretted it altogether, feeling persuaded not only that Mr. Bentham would lose his money, but that discredit would probably be brought upon Radical principles. He could not, however, desert Mr. Bentham, and he consented to write an article for the first number. As it had been a favourite portion of the scheme formerly talked of, that part of the work should be devoted to reviewing the other Reviews, this article of my father's was to be a general criticism of the *Edinburgh Review* from its commencement. Before writing it he made me read through all the volumes of the *Review* , or as much of each as seemed of any importance (which was not so arduous a task in 1823 as it would be now), and make notes for him of the articles which I thought he would wish to examine, either on account of their good or their bad qualities. This paper of my father's was the chief cause of the sensation which the *Westminster Review* produced at its first appearance, and is, both in conception and in execution,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of all his writings. He began by an analysis of the tendencies of periodical literature in general; pointing out, that it cannot, like books, wait for success, but must succeed immediately or not at all, and is hence almost certain to profess and inculcate the opinions already held by the public to which it addresses itself, instead of attempting to rectify or improve those opinions. He next, to characterize the

position of the *Edinburgh Review* as a political organ, entered into a complete analysis, from the Radical point of view, of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He held up to notice its thoroughly aristocratic character: the nomination of a majority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by a few hundred families; the entire identification of the more independent portion, the county members, with the great landholders; the different classes whom this narrow oligarchy was induced, for convenience, to admit to a share of power; and finally, what he called its two props, the Church,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He pointed out the natural tendency of an aristocratic body of this composition, to group itself into two parties, one of them in possession of the executive, the other endeavouring to supplant the former and become the predominant section by the aid of public opinion, without any essential sacrifice of the aristocratical predominance. He described the course likely to be pursued, and the political ground occupied, by an aristocratic party in opposition, coquetting with popular principles for the sake of popular support. He showed how this idea was realized in the conduct of the Whig party, and of the *Edinburgh Review* as its chief literary organ. He described, as their main characteristic, what he termed “seesaw”; writing alternately on both sides of the question which touched the power or interest of the governing classes; sometimes in different articles, sometim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ame article: and illustrated his position by copious specimens. So formidable an attack on the Whig party and policy had never before been made; nor had so great a blow ever been struck, in this country, for Radicalism; nor was there, I believe, any living person capable of writing that article except my father. [4_1]

与大家可能会预想的相反，我父亲完全没有参与创立《威斯敏斯特评论》。很多年前，他和边沁先生就谈论过，予以《爱丁堡评论》

和《季刊评论》迎头痛击需要一份激进主义的报纸（当时，这两份报纸正处于名声和影响最大的时候），父亲做编辑也在计划之中，但这个想法从未付诸实施。然而，1823年，边沁先生决定自己出资创立这个评论杂志，让我父亲做编辑，但父亲拒绝了，因为这与他在东印度公司的职位相冲突。于是评论杂志就委托给了鲍林先生（现在的约翰爵士），当时他是伦敦的一名商人。鲍林先生在这之前的两三年，经常拜访边沁先生，他有许多优秀品质，非常仰慕边沁，热情地采纳边沁的大部分观点，尽管不是全部，并与所有国家的自由主义者有着广泛的认识和联系。所有这些都使边沁对他十分欣赏，似乎也让他有资格成为一名有力的代理人，向世界各地传播边沁的名声和学说。父亲虽没怎么见过鲍林，但是对他的了解足以形成深刻的印象，他与父亲心目中适合管理政治和哲学评论杂志的人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并且，他认为这项事业前景坏到令他为整件事情惋惜，不仅觉得边沁先生肯定会损失金钱，而且还可能会损害激进主义原则的名誉。然而，他又不能置边沁先生于不顾，他答应给创刊号写一篇文章。作为之前讨论的方案里备受喜爱的一部分，这部分内容应该是用来回顾和评论其他评论报纸的。于是父亲的这篇文章就是对《爱丁堡评论》自创刊以来的一个总体批评。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父亲让我读了每一期的《爱丁堡评论》，或者每一本里面看起来比较重要的文章（这项工作在1823年时不像现在这么艰巨），并让我把我认为他会愿意研究的文章，根据其好坏，给他作注释。父亲的文章是《威斯敏斯特评论》一面世即引起轰动的最主要原因，而且，不论在构思上还是在写作手法上，都是其佳作之一。他首先分析了期刊文学的总体趋势，指出它不能像书籍一样等待成功到来，而必须立刻成功，要么就永远无法成功，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期刊会针对其受众公开宣称并反复灌输他们已经持有的观点，而不是试图矫正或改进那些观点。接下来，为了刻画《爱丁堡评论》作为政治喉舌的立场，他用激进主义的观点对《英国宪法》进行了全面分析。他进一步指出宪法彻头彻尾的贵族政治特征：几百个家庭就决定了下议院大多数人的任命；把更加独立的一部分人——郡议员——完全等同于大土地所有者；为了方便，这个狭隘的寡头统治国家让不同阶层分享一部分权力；最后提到的是教会和律师业，他把它们称作宪法的两个靠山。他指出，这种结构的贵族团体的自然趋

势是把自己分成两党，一党掌控政府，另一党竭力在公共舆论的帮助下，取代前者，占据支配地位，而贵族的统治不会有任何实质上的牺牲。他描绘了在野的贵族党可能会采取的做法，以及他们会持有的政治立场，即为了得到大众支持而卖弄流行的原则。他展示了这种理念是如何在辉格党及其文化喉舌《爱丁堡评论》的行为中体现的。父亲描述了他们的主要特征，即他所谓的“跷跷板”现象：轮流写双方每个触及统治阶级权力或利益的问题；有时在不同的文章里面写，有时在同一篇文章的不同地方写。父亲还举出了丰富的例子来表明他的立场。对辉格党和它的政策，以前从未有过这么有力的攻击。在这个国家，也从未有人为了激进主义做出如此强烈的一击。我相信，除了父亲外，也没有任何人能写出那样的文章。[5_1]

In the meantime the nascent *Review* had formed a junction with another project, of a purely literary periodical, to be edited by Mr. Henry Southern, afterwards a diplomatist, then a literary man by profession. The two editors agreed to unite their corps, and divide the editorship, Bowring taking the political, Southern the literary department. Southern's Review was to have been published by Longman, and that firm, though part proprietors of the *Edinburgh* , were willing to be the publishers of the new journal. But when all the arrangements had been made, and the prospectuses sent out, the Longmans saw my father's attack on the *Edinburgh* , and drew back. My father was now appealed to for his interest with his own publisher, Baldwin, which was exerted with a successful result. And so in April, 1824, amidst anything but hope on my father's part, and that of most of those who afterwards aided in carrying on the *Review* , the first number made its appearance.

同时，初生的评论杂志和另一个项目——一个纯文学期刊——联合了起来，这个新期刊将由亨利·萨瑟恩先生任编辑，他后来成了外交

家，当时专职搞文学创作。两个编辑同意把他们的队伍联合起来，进行分工，鲍林负责政治部分，萨瑟恩负责文学部分。萨瑟恩的评论杂志按计划要由朗文出版，这个公司尽管是《爱丁堡评论》的股东之一，但还是乐于做这个新期刊的发行人。但是，当所有安排都做好了，简介也已经发出去了的时候，朗文的人看到了我父亲对《爱丁堡评论》的攻击，退出了。这时父亲为了自己的利益向他的出版商鲍德温求助，结果成功了。于是在1824年4月，在父亲的满怀期待中，以及大多数后来协助经营这个评论杂志的人的期待中，创刊号问世了。

That number was an agreeable surprise to most of us. The average of the articles was of much better quality than had been expected.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department had rested chiefly on Mr. Bingham, a barrister (subsequently a police magistrate), who had been for some years a frequenter of Bentham, was a friend of both the Austins, and had adopted with great ardour Mr. Bentham's philosophical opinions. Partly from accident, there were in the first number as many as five articles by Bingham; and we were extremely pleased with them. I well remember the mixed feeling I myself had about the *Review* ; the joy of finding, what we did not at all expect, that it was sufficiently good to be capable of being made a creditable organ of those who held the opinions it professed; and extreme vexation, since it was so good on the whole, at what we thought the blemishes of it. When, however, in addition to our generally favourable opinion of it, we learned that it had an extraordinary large sale for a first number, and found that the appearance of a Radical Review, with pretensions equal to those of the established organs of parties, had excited much attention, there could be no room for hesitation, and we all became eager in doing everything we could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it.

那一期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惊喜。文章的平均水平比预期要高很多。文学和艺术部分主要靠宾厄姆先生，他是个律师（后来是警备司法官），有几年是边沁的常客，是奥斯丁兄弟俩的朋友，以很大的热情采纳了边沁先生的哲学观点。部分出于巧合，第一期里面宾厄姆的文章竟然有五篇之多，我们非常喜欢这些文章。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对《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复杂感情。我们意外地发现它足以成为那些秉持期刊公开宣扬的观点的人可信赖喉舌时的快乐。还有极度的苦恼，因为大体上来说，连以前我们认为会是瑕疵的地方，它都做得很好。然而，除了我们普遍赞成它之外，我们还得知期刊的销售数量对于首期来说非常之大，并且发现这一和其他具有一定基础的党派喉舌报刊意图相同的激进主义评论杂志的出现引起了很多关注。此时我们不再犹豫，都变得很热切，想竭尽全力去巩固它，改善它。

My father continued to write occasional articles. The *Quarterly Review* received its exposure, as a sequel to that of the *Edinburgh* . Of his other contribu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were an attack on Southey's *Book of the Church* , in the fifth number, and a political article in the twelfth. Mr. Austin only contributed one paper, but one of great merit, an argument against primogeniture, in reply to an article then lately published in the *Edinburgh Review* by McCulloch. Grote also was a contributor only once; all the time he could spare being already taken up with his *History of Greece* . The article he wrote was on his own subject, and was a very complete exposure and castigation of Mitford. Bingham and Charles Austin continued to write for some time; Fonblanque was a frequent contributor from the third number. Of my particular associates, Ellis was a regular writer up to the ninth number; and about the time when he left off, others of the set began; Eyton Tooke, Graham, and Roebuck. I was myself the most frequent writer of all, having contributed, from the second number to the eighteenth, thirteen articles; reviews of books on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or

discussions on special political topics, as corn laws, game laws, law of libel. Occasional articles of merit came in from other acquaintances of my father's, and, in time, of mine; and some of Mr. Bowring's writers turned out well. On the whole, however, the conduct of the Review was never satisfactory to any of the persons strongly interested in its principles, with whom I came in contact. Hardly ever did a number come out without containing several things extremely offensive to us, either in point of opinion, of taste, or by mere want of ability. The unfavourable judgments passed by my father, Grote, the two Austins, and others, were re-echoed with exaggeration by us younger people; and as our youthful zeal rendered us by no means backward in making complaints, we led the two editors a sad life. From my knowledge of what I then was,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were at least as often wrong as right; and I am very certain that if the *Review* had been carried on according to our notions (I mean those of the juniors), it would have been no better, perhaps not even so good as it was. But it is worth noting as a fact in the history of Benthamism, that the periodical organ, by which it was best known, was from the first extremely unsatisfactory to those whose opinions on all subjects it was supposed specially to represent.

父亲继续时不时地写文章。《季刊评论》紧随《爱丁堡评论》被曝光。在他的其他稿件中，最重要的是一篇抨击骚塞《宗教论》的文章，发表在第五期上；还有一篇政治文章，发表在第十二期上。奥斯丁先生只投了一篇论文，但是很有价值，论证反对长嗣继承权，回应麦卡洛克当时刚刚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格罗特也只发了一篇文章，他能匀出来的时间都用在《希腊史》上了。他的文章写的是他自己的主题，非常全面地揭露和谴责了米特福德。宾厄姆和查尔斯·奥斯丁的写作持续了一段时间；从第三期起，方布兰克开始经常投稿。而我的密友中，埃利斯经常供稿，一直到第九期。后来他不

写了，其他人就接手了，有艾顿·图克、格雷厄姆和罗巴克。我自己是所有作者中最经常写的，从第二期到第十八期，投了十三篇文章；评论历史和政治经济学书籍，或者讨论特殊的政治话题，如《谷物法》《狩猎法》和《诽谤法》。偶尔有些很有价值的文章是父亲的其他熟人写的，这些人后来也成了我的熟人。鲍林先生的一些作家也表现得很好。然而，总体上来说，这个评论杂志的表现从来没有让那些我接触到的对它的原则特别感兴趣的人都满意过。几乎每一期出来的时候，上面都有让我们极其反感的东西，要么是观点、品味，要么就是纯粹的能力缺乏。我父亲、格罗特、奥斯丁兄弟俩，和其他人给出的负面评价，得到我们年轻人的附和和夸大；年轻人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决不会在发牢骚上落后，结果害惨了两个编辑。以我对自己当时情况的了解，我坚信我们错的时候至少与对的时候一样多。我敢肯定，如果评论杂志按我们的想法经营下去的话（我指的是年轻人的想法），它不会更好，甚至可能不如原来的好。但是，在功利主义的历史中有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这个让功利主义非常知名的喉舌期刊从一开始，就让本意欲让其代言之人极度不满意。

Meanwhile, however, the *Review* made considerable noise in the world, and gave a recognised *status* , in the arena of opinion and discussion, to the Benthamic type of Radicalism,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its adherents, and to the personal merits and abilities, at that time, of most of those who could be reckoned among them. It was a time, as is known, of rapidly rising Liberalism. When the fears and animosities accompanying the war with France had been brought to an end, and people had once more a place in their thoughts for home politics, the tide began to set towards reform. The renewed oppression of the Continent by the old reigning families, the countenance apparently given by the English Government to the conspiracy against liberty called the Holy Alliance, and the enormous weight of the national debt and taxation occasioned by so long and costly a war, rendered the

government and parliament very unpopular. Radicalis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Burdetts and Cobbetts, had assumed a character and importance which seriously alarmed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ir alarm had scarcely been temporarily assuaged by the celebrated Six Acts, when the trial of Queen Caroline roused a still wider and deeper feeling of hatred. Though the outward signs of this hatred passed away with its exciting cause, there arose on all sides a spirit which had never shown itself before, of opposition to abuses in detail. Mr. Hume's persevering scrutiny of the public expenditure, forcing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a division on every objectionable item in the estimates, had begun to tell with great force on public opinion, and had extorted many minor retrenchments from an unwilling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 economy had asserted itself with great vigour in public affairs, by the petition of the merchants of London for free trade, drawn up in 1820 by Mr. Tooke and presented by Mr. Alexander Baring; and by the noble exertions of Ricardo during the few years of his parliamentary life. His writings, following up the impulse given by the Bullion controversy, and followed up in their turn by the expositions and comments of my father and McCulloch (whose writings in the *Edinburgh Review* during those years were most valuable), had drawn general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 making at least partial converts in the Cabinet itself; and Huskisson, supported by Canning, had commenced that gradual demolition of the protective system, which one of their colleagues virtually completed in 1846, though the last vestiges were only swept away by Mr. Gladstone in 1860. Mr. Peel, then Home Secretary, was entering cautiously into the untrodden and peculiarly Benthamic path of Law Reform. At this period, when Liberalism seemed to be becoming the tone of the time, when improvement of institutions was preached from the highest places, and a complete chang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Parliament was loudly demanded in the lowest, it is not strange that

attention should have been roused by the regular appearance in controversy of what seemed a new school of writers, claiming to be the legislators and theorists of this new tendency. The air of strong conviction with which they wrote, when scarcely anyone else seemed to have an equally strong faith in as definite a creed; the boldness with which they tilted against the very front of both the existing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uncompromising profession of opposition to many of the generally received opinions, and the suspicion they lay under of holding others still more heterodox than they professed; the talent and verve of at least my father's articles, and the appearance of a corps behind him sufficient to carry on a Review; and finally, the fact that the *Review* was bought and read, made the so-called Bentham school i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ill a greater place in the public mind than it had held before, or has ever again held since other equally earnest schools of thought have arisen in England. As I was in the headquarters of it, knew of what it was composed, and a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of its very small number, might say without undue assumption, *quorum pars magna fui* , it belongs to me more than to most others, to give some account of it.

然而与此同时，《威斯敏斯特评论》在世界上发出了不小的声音，在舆论界给功利主义式的激进主义以公认的地位，这地位和它追随者的数量及当时大部分能被算在追随者之内的人的优点和能力是不相称的。众所周知，那是个自由主义迅速崛起的时代。由于与法国的战争而带来的恐惧和仇恨已经消散，人们开始再次审视国内政治，潮流开始倾向于改革。欧洲大陆重新受到旧的统治家族的压迫，英国政府对被称作神圣同盟的反自由主义阴谋集团的明确支持，加上长时间损失惨重的战争导致的巨大国债和税收负担，让政府和议会很不得人心。在柏代特和科贝特 [5_2] 的领导下，激进主义获得的声誉和地位让政府很惊恐，他们的惊恐几乎没有因为著名的《六项法案》 [5_3] 而暂

时减轻，因为对卡罗琳王后的审判激起了人们更广泛、更深刻的仇恨之情。尽管这种仇恨的外部迹象随着它激动人心的运动一起消散了，但是到处都萌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反对滥用各种职权的精神。休谟先生不屈不挠地审查公共开支，迫使下议院划分财政收支概算的每一个引起异议的项目，他的行动已经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迫使不情愿的政府缩减了很多不重要的开支。1820年，由图克先生草拟，亚历山大·巴林 [5_4] 提呈的《伦敦商人贸易自由请愿119书》，和李嘉图在数年议会生涯中的不懈努力，使政治经济学在公共事务中大显身手。李嘉图受金价论战的推动而做的著述，加上随后我父亲和麦卡洛克相继的阐述和评论（那几年，他在《爱丁堡评论》上的作品很有价值），引起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关注，至少让内阁的一部分人相信了它。哈斯基逊在坎宁 [5_5] 的支持下，开始逐渐摧毁保护体系。他们的一个同事实际上在1846年就完成了这件事情，尽管最后的残余要到1860年才被格莱斯顿 [5_6] 先生扫清。皮尔先生，当时的内政大臣，谨慎地走上前无古人的功利主义法律改革道路。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似乎将要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最高层鼓吹要改进制度，最底层则强烈要求全面变革议会的章程。这时一批看似属于新兴学派的作家一般都会在争论中出现，他们要求成为这个新趋势的立法者和理论家，由此引起人们的关注也不足为奇。他们写作时带着坚定的信念，而好像很少有人对一个同样明确的信条有同样强烈的信心；他们用大胆的文字正面抨击现有的两个政党；他们毫不妥协地宣称反对很多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并由于认为他人比他们宣称的更异端而饱受怀疑；还有至少从我父亲的文章中体现出来的才能和气魄，以及他身后足以支撑一家评论杂志的团体。最后，这家评论杂志拥有读者的事实——所有这一切，让哲学和政治领域的功利主义学派，在公众的心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或者说在其他同样急切的思想学派在英国兴起后以来再次获得了重要的地位。由于我处在其核心位置，了解其构成，作为少数最活跃的分子之一极大地参与了它的事务，我这么说可能没什么不合适，即与其他大部分人相比，描述一下它的情况是我的分内之事。

This supposed school, then, had no other existence than what was constituted by the fact, that my father's writings and conversation drew round him a certain number of young men who had already imbibed, or who imbibed from him, a greater or smaller portion of his very decided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opinions. The notion that Bentham was surrounded by a band of disciples who received their opinions from his lips, is a fable to which my father did justice in his “Fragment on Mackintosh,” and which, to all who knew Mr. Bentham's habits of life and manner of conversation, is simply ridiculous. The influence which Bentham exercised was by his writings. Through them he has produced, and is producing, effects on the condition of mankind, wider and deeper, no doubt, than any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my father. He is a much greater name in history. But my father exercised a far greater personal ascendency. He *was* sought for the vigour and instructiveness of his conversation, and did use it largely as an instrument for the diffusion of his opinions. I have never known any man who could do such ample justice to his best thoughts in colloquial discussion. His perfect command over his great mental resources, the terseness and expressiveness of his language and the moral earnestness as well as intellectual force of his delivery, made him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of all argumentative conversers: and he was full of anecdote, a hearty laugher, and, when with people whom he liked, a most lively and amusing companion. It was not solely, or even chiefly, in diffusing his merely intellectual convictions that his power showed itself: it was still more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a quality, of which I have only since learnt to appreciate the extreme rarity: that exalted public spirit, and regard above all things to the good of the whole, which warmed into life and activity every germ of similar virtue that existed in the minds he came in contact with: the desire he made them feel for his approbation, the shame at his disapproval; the moral support which

his conversation and his very existence gave to those who were aiming at the same objects, and the encouragement he afforded to the fainthearted or desponding among them, by the firm confidence which (though the reverse of sanguine as to the results to be expected in any one particular case) he always felt in the power of reason, the general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and the good which individuals could do by judicious effort.

这个所谓的学派，其实不过是父亲的作品和谈话使得一些年轻人围绕在他周围，这些年轻人有的已经吸收了，有的正从他那里或多或少地吸收他非常坚定的政治和哲学观点。有人认为边沁周围聚集了一帮信徒，这些人接受的观点都是他亲口教授的，这纯属无稽之谈。我父亲在他的《略论麦金托什》里作了澄清，而对所有了解边沁先生生活习惯和谈话方式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很可笑。边沁对人的影响是通过他的作品产生的。通过作品，他对人类的状态造成了影响，而且正在产生影响，这影响毫无疑问比我父亲所做的一切要深远得多。在历史上，他的名气远比我父亲的大。但是，我父亲发挥了更大的个人优势。人们是从他的谈话中寻求活力和指导的，他也确实经常把交谈当作传播自己观点的工具。我从来不认识任何人能像他一样在交谈中就能精辟阐述自己最精华的思想。他对自己高智商有着完美的掌控，语言简洁精练，富有表现力，讲话时内心诚恳，充满智慧，这使他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善辩的谈话者之一。他会讲很多轶事，喜欢开怀大笑，与他喜欢的人在一起时，他是个非常活泼、有趣的同伴。他的力量不单是，甚至不主要是通过传播他的纯粹精神信念展现出来的：他的力量更常通过一种品质的影响力来展现，此后我才学会去欣赏它的绝妙之处。他那种高尚的公德心和将大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胸怀，使得与他接触过的人心里类似美德的每一个萌芽都得到温暖，有了生命和活力；他让他们渴望得到他的嘉许，让他们觉得因被他反对而羞耻；他的谈话以及他的存在本身，就给了那些目标相同的人以精神支持，通过对理智的力量、总体的改良进展以及个人通过审慎的努力可以行善的坚定信心（尽管在个别特殊情况下，会出现与预期相反的、不乐

观的结果），给他们当中怯懦或意志消沉的人以鼓励。

If was my father's opinions which gave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 to the Benthamic or utilitarian propagandism of that time. They fell singly, scattered from him, in many directions, but they flowed from him in a continued stream principally in three channels. One was through me, the only mind directly formed by his instructions, and through whom considerable influence was exercised over various young men, who became, in their turn, propagandists. A second was through some of the Cambridge contemporaries of Charles Austin, who, either initiated by him or under the general mental impulse which he gave, had adopted many opinions allied to those of my father, and some of the more considerable of whom afterwards sought my father's acquaintance and frequented his house. Among these may be mentioned Strutt, afterwards Lord Belper, and the present Lord Romilly, with whose eminent father, Sir Samuel, my father had of old been on terms of friendship. The third channel was that of a younger generation of Cambridge undergraduates, contemporary, not with Austin, but with Eyton Tooke, who were drawn to that estimable person by affinity of opinions, and introduced by him to my father: the most notable of these was Charles Buller. Various other persons individually received and transmitte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my father's influence: for example, Black (as before mentioned) and Fonblanque: most of these, however, we accounted only partial allies; Fonblanque, for instance, was always divergent from us on many important points. But indeed there was by no means complete unanimity among any portion of us, nor had any of us adopted implicitly all my father's opinions. For example, although his *Essay on Government* was regarded probably by all of us as a masterpiece of political wisdom, our adhesion by no means extended to the

paragraph of it in which he maintains that women may, consistently with good government, be excluded from the suffrage, because their interest is the same with that of men. From this doctrine, I, and all those who formed my chosen associates, most positively dissented. It is due to my father to say that he denied having intended to affirm that women *should* be excluded, any more than men under the age of forty, concerning whom he maintained in the very next paragraph an exactly similar thesis. He was, as he truly said, not discussing whether the suffrage had better be restricted, but only (assuming that it is to be restricted) what is the utmost limit of restriction which does not necessarily involve a sacrifice of the securities for good government. But I thought then, as I have always thought since that the opinion which he acknowledged, no less than that which he disclaimed, is as great an error as any of those against which the *Essay* was directed; that the interest of women is included in that of men exactly as much as the interest of subjects is included in that of kings, and no more; and that every reason which exists for giving the suffrage to anybody, demands that it should not be withheld from women. This was also the general opinion of the younger proselytes; and it is pleasant to be able to say that Mr. Bentham, on this important point, was wholly on our side.

是父亲的见解让当时的边沁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宣传有了不同于一般的特点。这些见解从他那里向不同方向零散地传播开来，这种源源不断的传播主要有三条渠道。一个是通过我，我的思想是唯一一个直接由他指导塑造而成的，他通过我对很多年轻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人继而成了宣传员。第二个是通过查尔斯·奥斯丁的剑桥同辈，他们或者是受到他的启蒙，或者受到他主要精神的推动，采纳了很多跟我父亲类似的观点，其中一些更重要的人后来寻求与父亲结识的机会，经常去拜访他。这些人中值得一提的是斯特拉特（后来成为贝尔珀勋爵），和现在的罗米利勋爵，我父亲和他德高望重的父亲塞缪尔爵

士，早就是好朋友的关系。第三个渠道是剑桥更年轻一代的在校大学生，他们与奥斯丁不是同辈，和艾顿·图克是同辈。由于观点相近，他们被吸引到可敬的图克身边，然后由他引荐给我父亲。这些人中最突出的是查尔斯·布勒。其他人个别地接受、传播了不少父亲的影响，比如，布莱克（之前提到过）和方布兰克。然而，我们都认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不是彻底的同盟，比如方布兰克总是在很多重要的地方与我们有分歧。但实际上，我们当中任何一部分人都决不会完全一致，也没有任何人毫无保留地接受父亲的所有观点。例如，尽管可能我们都认为他的《论政府》是部充满政治智慧的杰作，但是我们绝对并非赞同它的每个段落，在文章里他主张不给予妇女选举权，说这与善政并不矛盾，因为她们的利益和男人是相同的。对于这种说法，我和我所有的同仁们都断然反对。客观地说，父亲说过他否认自己有意断言妇女应该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四十岁以下的男子其实也应被排除，对这部分人他在下一段里就提出了完全类似的论点。正如他所说的，他并非在讨论选举权是否最好受到限制，而仅仅（假设它受限制的话）在讨论：在不必牺牲善政保障措施的前提下，限制的最大限度。但是那时我认为，之后我也一直都这么认为，他承认的观点和他否认的观点以及论文要反对的任何观点一样，是个很大的错误。妇女的利益包含在男子的利益里面恰恰像臣民的利益包含在国王的利益里面一样，任何人人享有选举权的现有理由都要求妇女不应被剥夺选举权，这也是年轻皈依者们的一般观点。令人欣慰的是，边沁先生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完全站在我们这一边。

But though none of us, probably, agreed in every respect with my father, his opinions, as I said before, were the principal element which gave its colour and character to the little group of young men who were the first propagators of what was afterwards called “Philosophic Radicalism.” Their mode of thinking was not characterized by Benthamism in any sense which has relation to Bentham as a chief or guide, but rather by a combination of Bentham's point of view with that of the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and with the Hartleian metaphysics. Malthus's population principle was quite as much a banner, and point of union among us, as any opinion specially belonging to Bentham. This great doctrine, originally brought forward as an argument against the indefinite improvability of human affairs, we took up with ardent zeal in the contrary sense, as indicating the sole means of realizing that improvability by securing full employment at high wages to the whol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rough a voluntary restriction of the increase of their numbers. The other lead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eed, which we held in common with my father, may be stated as follows:

但是，尽管很可能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在所有方面都同意父亲的观点，但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个年轻人小团体的风格和特征主要是他的观点赋予的，这些年轻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哲学激进主义”的首批传播者。这种思考模式与以边沁为领袖或向导的功利主义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毫无关联，它实际上是边沁的观点和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及哈特利的形而上学观点的综合。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几乎和专属边沁的任何观点一样，可以说是一面旗帜，也是我们的共同点之一。这个伟大的学说最初提出来是为了反对人类事务可以无限改良的说法，我们从一个相反的层面热忱地采纳了它，说明通过自愿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确保让所有劳动人口领取高薪，完全就业，是实现这种改良的唯一方法。这个学说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得到了我们和我父亲的一致支持，或许可以归纳如下：

In politics, an almost unbounded confidence in the efficacy of two things: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nd complete freedom of discussion. So complete was my father's reliance on the influence of reason over the minds of mankind, whenever it is allowed to reach them, that he felt as if all would be gained if the whole population

were taught to read, if all sorts of opinions were allowed to be addressed to them by word and in writing, and if by means of the suffrage they could nominate a legislature to give effect to the opinions they adopted. He thought that when the legislature no longer represented a class interest, it would aim at the general interest, honestly and with adequate wisdom; since the people would be sufficient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educated intelligence, to make in general a good choice of persons to represent them, and having done so, to leave to those whom they had chosen a liberal discretion. Accordingly aristocratic rule, the government of the Few in any of its shapes, being in his eyes the only thing which stood between mankind and an administration of their affairs by the best wisdom to be found among them, was the object of his sternest disapprobation, and a democratic suffrage the principal article of his political creed, not on the ground of liberty, Rights of Man, or any of the phrases, more or less significant, by which, up to that time, democracy had usually been defended, but as the most essential of "securities for good government." In this, too, he held fast only to what he deemed essentials; he was comparatively indifferent to monarchical or republican forms—far more so than Bentham, to whom a king, in the character of "corrupter-general," appeared necessarily very noxious. Next to aristocracy, an established church, or corporation of priests, as being by position the great depravers of religion, and interested in opposing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 was the object of his greatest detestation; though he disliked no clergyman personally who did not deserve it, and was on terms of sincere friendship with several. In ethics his moral feelings were energetic and rigid on all points which he deemed important to human well being, while he was supremely indifferent in opinion (though his indifference did not show itself in personal conduct) to all those doctrines of the common morality, which he thought had no foundation but in

asceticism and priestcraft. He looked forward, for example, to a considerable increase of freedom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exes, though without pretending to define exactly what would be, or ought to be, the precise conditions of that freedom. This opinion was connected in him with no sensuality either of a theoretical or of a practical kind. He anticipated, on the contrary, as one of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increased freedom, that the imagination would no longer dwell upon the physical relation and its adjuncts, and swell this into one of the principal objects of life; a perversion of the imagination and feelings, which h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deepest seated and most pervading evils in the human mind. In psychology, his fundamental doctrine was the formation of all human character by circumstances, through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of Association, and the consequent unlimited possibility of improving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condition of mankind by education. Of all his doctrines none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is, or needs more to be insisted on; unfortunately there is none which is more contradictory to the prevailing tendencies of speculation, both in his time and since.

在政治上，人们几乎无限制地相信两件事情的功效：代表制的政府和完全的言论自由。父亲完全相信理智对人类思维的影响——只要能够影响到的话——他的信念是如此之深，以致他觉得，如果能教全民读书，允许把所有观点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呈现给他们，而他们能依靠选举权任命执行他们观点的立法机关的话，一切都能实现。他认为，当立法机关不再只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之时，它就会真诚地、十分明智地为整体的利益服务。因为人们将在受过教育的才智的充分指导下，选择一般说来合适的人来代表他们，并在此后赋予选出来的人以自由的决断力。相应地，贵族的统治，即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少数人的政府，在他眼里都是阻碍人类用他们当中最卓越的贤才来管理自己事务的唯一障碍，是他严厉指责的对象。民主的选举权是他政治信条

的主要内容，不是把一直到那时候都用来支持民主政治的自由、人权或任何有着类似的意义更大或更小的话语作为理由，而是把民主的选举权当作最重要的“善政保障设施”。在这一点上，他还是只坚持他所认为的要点。相比之下，他比边沁还要不关心君主或共和政体的形式——在边沁眼里，国王扮演的是“腐败将军”，看起来肯定很可憎。除了贵族统治，英国国教或牧师组织也是他憎恶的对象，因为它们的地位决定了它们是让宗教堕落的重要因素，还乐于反对人类进步。尽管他私底下并不讨厌不应承担过错的牧师本人，甚至还和好几个结下了诚挚的友谊。在道德规范上，对于他认为的对人类福利比较重要的所有要点，他的道德情感都很积极坚定，然而他对普通道德观的所有教条一点也不关心（尽管他的漠不关心没有在行为中表现出来），他认为这些教条除了根植于禁欲主义和教士权术外，没有什么根据。比如，他期盼两性之间的自由度能有较大提高，但是没有装模作样地要去界定这种自由的具体情形是什么样子，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这种观点在他那里，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是和纵欲联系在一起的。相反，他期望自由度提升后的益处之一，就是人们的想象不再仅仅关注肉体关系及其附加物，不再把它扩大为人生的主要目标之一。他认为，这种想象和情感的堕落是人类头脑中最根深蒂固、最普遍的罪恶。在心理学方面，他的主要信条是所有人类性格都是由环境决定的，通过普遍联系的原则，以及随之而来的、用教育提升人的道德水准和智力状况的无限可能性。这是他所有学说中最重要的，或者最需要坚持的。不幸的是它也是和当时及以后的主要思潮最相矛盾的。

These various opinions were seized on with youthful fanaticism by the little knot of young men of whom I was one: and we put into them a sectarian spirit, from which, in intention at least, my father was wholly free. What we (or rather a phantom substituted in the place of us) were sometimes, by a ridiculous exaggeration, called by others, namely a “school,” some of us for a time really hoped and aspired to be. The French *philosoph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ere the examples we sought to imitate, and we hoped to accomplish no

less results. No one of the set went to so great excesses in his boyish ambition as I did; which might be shown by many particulars, were it not an useless waste of space and time.

一小群狂热的年轻人抓住了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还把宗派主义的倾向带进这些观点里面，我父亲则完全没有这种倾向，至少意图上没有。有时，由于荒唐的夸张，我们（还不如说是替代了我们的一个幽灵）被人称作一个“学派”，但这也是有一阵子我们当中的某些人确实期待和追求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是我们努力模仿的榜样，我们希望取得和他们同样多的成就。我是这群人中怀着这个孩子气的野心走得最极端的。要不是怕浪费时间和空间的话，倒是可以用很多细节说明一下。

All this, however, is properly only the outside of our existence; or, at least, the intellectual part alone, and no more than one side of that. In attempting to penetrate inward, and give any indication of what we were as human beings, I must be understood as speaking only of myself, of whom alone I can speak from sufficient knowledge; and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picture would suit any of my companions without many and great modifications.

然而，严格来说所有这些都只是我们生活的表面，或仅仅是理性的方面，而且还只是理性方面的一个侧面。要试图看穿内部，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的话，就必须知道我只是在说自己，因为我只能凭对自己足够的了解来进行说明。我相信，如果不对我的描述进行很多、很大的修改的话，它就不会适用于我的任何一位同伴。

I conceive that the description so often given of a Benthamite,

as a mere reasoning machine, though extremely inapplicable to most of those who have been designated by that title, was during two or three years of my life not altogether untrue of me. It was perhaps as applicable to me as it can well be to anyone just entering into life, to whom the common objects of desire must in general have at least the attraction of novelty. There is nothing very extraordinary in this fact: no youth of the age I then was, can be expected to be more than one thing, and this was the thing I happened to be. Ambition and desire of distinction I had in abundance; and zeal for what I thought the good of mankind was my strongest sentiment, mixing with and colouring all others. But my zeal was as yet little else, at that period of my life, than zeal for speculative opinions. It had not its root in genuine benevolence, or sympathy with mankind; though these qualities held their due place in my ethical standard. Nor was it connected with any high enthusiasm for ideal nobleness. Yet of this feeling I was imaginatively very susceptible; but there was at that time an intermission of its natural aliment, poetical culture, while there was a superabundance of the discipline antagonistic to it, that of mere logic and analysis. Add to this that, as already mentioned, my father's teachings tended to the undervaluing of feeling. It was not that he was himself cold-hearted or insensible; I believe it was rather from the contrary quality; he thought that feeling could take care of itself; that there was sure to be enough of it if actions were properly cared about. Offended by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in ethical and philosophical controversy, feeling is made the ultimate reason and justification of conduct, instead of being itself called on for a justification, while, in practice, actions the effect of which on human happiness is mischievous, are defended as being required by feeling, and the character of a person of feeling obtains a credit for desert, which he thought only due to actions, he had a real impatience of attributing praise to feeling, or of any but the most

sparing reference to it, either in the estimation of persons or in the discussion of things. In addition to the influence which this characteristic in him had on me and others, we found all the opinions to which we attached most importance, constantly attacked on the ground of feeling. Utility was denounced as cold calculation; political economy as hard-hearted; anti-population doctrines as repulsive to the natural feelings of mankind. We retorted by the word “sentimentality,” which, along with “declamation” and “vague generalities,” served us as common terms of opprobrium. Although we were generally in the right, as against those who were opposed to us, the effect was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feeling (except the feelings of public and private duty) was not in much esteem among us, and had very little place in the thoughts of most of us, myself in particular. What we principally thought of, was to alter people's opinions; to make them believe according to evidence, and know what was their real interest, which when they once knew, they would, we thought, by the instrument of opinion, enforce a regard to it upon one another. While fully recognising the superior excellence of unselfish benevolence and love of justice, we did not expect the regeneration of mankind from any direct action on those sentiments, but from the effect of educated intellect, enlightening the selfish feelings. Although this last is prodigiously important as a means of improvement in the hands of those who are themselves impelled by nobler principles of action, I do not believe that any one of the survivors of the Benthamites or Utilitarians of that day now relies mainly upon it for the general amendment of human conduct.

边沁主义者经常被描述成纯粹的推理机器，我认为尽管这对于大多数被冠以这种头衔的人来说非常不合适，但是在我人生的两三年里我却确实如此。这种说法可能很适合我，就像它也适合任何开始生活

的人一样，通常他们所渴望的事物总体来说一定由于新奇而具有吸引力。这一事实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对于任何跟我当时一样大的年轻人，只能指望他有一种样子，就是我当时碰巧具有的样子。我的野心很大，对名誉非常渴望；对我心目中人类福利的热心是我最强烈的感情，它和所有别的感情混合在一起，并影响了它们。但在那段时期，我基本上只热衷于思辨性的观点。这种热情并没有根植于真正的仁爱之心，或者根植于对人类的同情。但是，这些品质在我的道德标准里有它们应有的位置。它也没有与任何对完美高尚的高度热情联系在一起。然而，我在想象中很容易受这种情感的影响。但那时，它的天然养料——诗歌的陶冶——中断了，同时还有过多逆其道而行之的训练：纯粹的逻辑和分析训练。再加上我之前提到的，父亲的教学往往低估情感的价值。这不是说他本人冷酷无情或麻木不仁，我相信恰恰是由于相反的品质。他认为不需要单独考虑情感，如果关注好行动的话，情感就一定会充足。在道德和哲学论战中，情感经常被作为行为的最终理由和辩护，但是情感本身就需要有理由辩护。而现实中，对人类幸福产生危害的行为被说成是情感需要，一个有感情的人的品格却遭到唾弃，而父亲认为这本应归罪于行为，他确实没有耐心去赞赏情感，只是在评价别人或议论事情的时候偶尔提起过它。除了他的这种特点对我和他人的影响之外，我们还发现所有我们认为很重要的观点，都经常因为情感原因而受到攻击。效用被指责为冷冰冰的算计，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无情，控制人口学说被认为是对人类自然情感的排斥。我们用“多愁善感”一词来反驳，它和“激辩”“含糊的概括”一起成了我们指责他人时常用的词语。尽管我们反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的行为大体是正确的，但是结果是我们这些人也不怎么看重感情的陶冶（除了对公众和个人责任的情感之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几乎没有考虑过它，尤其是我自己。我们主要思考的是如何改变人们的想法，让他们相信有根据的东西，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是什么。我们想，他们一旦知道了自己的利益后，就会通过舆论工具促使彼此加以留意。尽管我们完全认可无私的仁爱和对正义的热爱是至上的美德，但是我们没指望人类通过直接按照这些情感去行动，从而获得新生，而是期望通过用经过教化的智力的影响，来教导他们摆脱自私的感情。在自身受到更崇高行为准则驱使的人那里，尽管最后一条仍是非

常重要的改良手段，但是我不相信任何现在仍信仰边沁主义或者功利主义的人，现在还会主要依赖它作为改进人类行为的常规方法。

From this neglect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of the cultivation of feeling, naturally resulted, among other things, an undervaluing of poetry, and of Imagination generally, as an element of human nature. It is, or was, part of the popular notion of Benthamites, that they are enemies of poetry: this was partly true of Bentham himself; he used to say that “all poetry is misrepresentation”: but in the sense in which he said it, the same might have been said of all impressive speech; of all representation or inculcation more oratorical in its character than a sum in arithmetic. An article of Bingham's in the first number of the *Westminster Review* , in which he offered as an explanation of something which he disliked in Moore, that “Mr. Moore *is* a poet, and therefore is *not* a reasoner,” did a good deal to attach the notion of hating poetry to the writers in the *Review* . But the truth was that many of us were great readers of poetry; Bingham himself had been a writer of it, while as regards me (and the same thing might be said of my father), the correct statement would be, not that I disliked poetry, but that I was theoretically indifferent to it. I disliked any sentiments in poetry which I should have disliked in prose; and that included a great deal. And I was wholly blind to its place in human culture, as a means of educating the feelings. But I was always personally very susceptible to some kinds of it. In the most sectarian period of my Benthamism, I happened to look into Pope's *Essay on Man* , and, though every opinion in it was contrary to mine, I well remember how powerfully it acted on my imagination. Perhaps at that time poetical composition of any higher type than eloquent discussion in verse, might not have produced a similar effect upon me: at all events I seldom gave it an

opportunity. This, however, was a mere passive state. Long before I had enlarged in any considerable degree the basis of my intellectual creed, I had obtained, in the natural course of my mental progress, poetic culture of the most valuable kind, by means of reverential admiration for the lives and characters of heroic persons; especially the heroes of philosophy. The same inspiring effect which so many of the benefactors of mankind have left on record that they had experienced from Plutarch's *Lives* , was produced on me by Plato's pictures of Socrates, and by some modern biographies, above all by Condorcet's *Life of Turgot* ; a book well calculated to rouse the best sort of enthusiasm, since it contains one of the wisest and noblest of lives, delineated by one of the wisest and noblest of men. The heroic virtue of these gloriou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opinions with which I sympathized, deeply affected me, and I perpetually recurred to them as others do to a favourite poet, when needing to be carried up into the more elevated regions of feeling and thought. I may observe by the way that this book cured me of my sectarian follies. The two or three pages beginning “Il regardaittoutesectecommenuisible,” and explaining why Turgot always kept himself perfectly distinct from the Encyclopedists, sank deeply into my mind. I left off designating myself and others as Utilitarians, and by the pronoun “we,” or any other collective designation, I ceased to *afficher* sectarianism. My real inward sectarianism I did not get rid of till later, and much more gradually.

这种理论上以及实践上对情感陶冶的忽视，必然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对诗歌和想象力的低估，只一般地把它们看作是人性的一个因素。边沁主义者普遍认为，或者曾经认为，他们是诗歌的敌人。对于边沁本人，这确有几分正确。他经常说，“所有诗歌都是错误的表达”，但是，按照他所说的意思，这句话也同样可以用于所有感人的演说，以及所有比数学里的算术题更具演说特征的陈述和教导。《威

斯敏斯特评论》第一期中有一篇宾厄姆的文章，他在里面解释了自己不喜欢穆尔[5_7]的一些地方，说“穆尔先生是诗人，因此，不是推理家”，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威斯敏斯特评论》的作家冠上了讨厌诗歌的声名。但事实上，我们很多人都是诗歌的热心读者。宾汉姆本人也曾写过诗，至于我（也可以这么说我父亲），正确的说法是我并非不喜欢诗歌，而是在理论上对它漠不关心。在散文中我不喜欢的情感，在诗歌中我也不会喜欢，这种情感有很多。我完全无视它作为教化情感的方法在人类文化中的位置。但我自己总是很容易受到某些情感的感染。在我功利主义思想最狭隘的时期，我碰巧研读了蒲柏[5_8]的长诗《原人篇》，尽管里面的每个观点都与我的相反，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它对我的想象力产生了多么强有力的影响。当时任何比用诗体写出来有说服力的讨论更高级的诗歌创作形式，可能都不会对我产生类似的影响。无论如何，我也几乎从来没给过它机会。然而，这种情形只不过是暂时的。早在我大规模扩大理性信条的基础之前，我就在精神进步的自然过程中，通过膜拜英雄人物的生活和品格——尤其是哲学英雄，而获得了最有价值的诗歌文化。对人类作出贡献的很多人，把他们从普卢塔克[5_9]的《传记》中体验到的鼓舞人心的影响记录了下来。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描述，以及一些现代传记，尤其是孔多塞的《杜尔哥[5_10]传》，对我产生了同样令人鼓舞的影响。《杜尔哥传》构思精巧，旨在激起最大的热情，因为它的作者是个非常贤明、高贵的人，他描绘的也是一个非常贤明、高贵的人的生平。这些和与我有共鸣的显赫代表人物的超人美德，深深地打动了我，当我需要把情感和思想提升到更崇高的领域时，我总是求助于他们，就像别人求助于最喜欢的诗人一样。我应该顺便说一下，这本书消除了我的宗派主义愚行。以“他认为所有宗派都是有害的”开头的两三页，这几页也解释了为什么杜尔哥总是把自己与百科全书编纂者截然分开，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我不再标榜自己和其他人是边沁主义者，不再让代词“我们”或其他任何集体称号带上宗派主义的色彩。我对内心深处真正的宗派主义则摆脱得更晚些，而且更加缓慢渐进。

About the end of 1824, or beginning of 1825, Mr. Bentham,

having lately got back his papers on Evidence from M. Dumont (whose *Traité des PreuvesJudiciaires* , grounded on them, was then first completed and published), resolved to have them printed in the original, and bethought himself of me as capable of preparing them for the press; in the same manner as his *Book of Fallacies* had been recently edited by Bingham. I gladly undertook this task, and it occupied nearly all my leisure for about a year, exclusive of the time afterwards spent in seeing the five large volumes through the press. Mr. Bentham had begun this treatise three time's, at considerable intervals, each time in a different manner, and each time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preceding: two of the three times he had gone over nearly the whole subject. These three masses of manuscript it was my business to condense into a single treatise, adopting the one last written as the groundwork, and incorporating with it as much of the two others as it had not completely superseded. I had also to unroll such of Bentham's involved and parenthetical sentences as seemed to overpass by their complexity the measure of what readers were likely to take the pains to understand. It was further Mr. Bentham's particular desire that I should, from myself, endeavour to supply any *lacunae* which he had left; and at his instance I read, for this purpose, the most authoritative treatises on the English Law of Evidence, and commented on a few of the objectionable points of the English rules, which had escaped Bentham's notice. I also replied to the objections which had been made to some of his doctrines by reviewers of Dumont's book, and added a few supplementary remarks on some of the more abstract parts of the subject, such as the theory of improbabi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 controversial part of these editorial additions was written in a more assuming tone than became one so young and inexperienced as I was: but indeed I had never contemplated coming forward in my own person; and as an anonymous editor of Bentham I fell into the tone of my author,

not thinking it unsuitable to him or to the subject, however it might be so to me. My name as editor was put to the book after it was printed, at Mr. Bentham's positive desire, which I in vain attempted to persuade him to forego.

大概在1824年年底，或者1825年年初，边沁先生刚从杜蒙先生那里拿回他的《论证据》论文（杜蒙先生以这些论文为基础写的《论司法证据》那时刚完成并发表），他决定按原稿发表，并想起来我能够做出版前的准备工作。他的《谬误集》最近也是由宾厄姆以同样的方式编辑的。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项工作，它几乎占用了我一年中的所有空闲时间，还不包括后来在出版社安排五大卷书的付印所花的时间。边沁先生分三次写成这部专著，每次中间都有很长的间隔，每次风格都不同，而且每次都没有参考前面的内容，三次中有两次他都几乎涉及了整个主题。这三大本手稿要由我浓缩成一本专著，我把他最后写的那本当作蓝本，尽量把其他两本中没有被它完全更替的地方合并到其中去。我还必须拆分边沁的长难句和插入句，因为它们过于错综复杂，读者很可能没有耐心去想办法弄懂它们。边沁先生还进一步特别要求我从自身出发，尽力去填补他遗留下的任何不足。在他的要求下，我为此读了有关《英国证据法》最权威的论文，对边沁没注意到的、英国统治中值得反对的几个地方作了评论。我还回应了杜蒙著作的评论家对边沁某些学说的异议，还在这个主题的一些比较抽象的部分里，比如非必然性与无可能性理论，加上了少许补充评论。这些编辑添加的评论中有争议的部分是我用十分傲慢的语气写的，这与我这样一个年轻、没经验的人是很不相称的，但我确实从来没打算自告奋勇亲自去做。作为边沁的匿名编辑，我用作者的语气说话，没想过这样做对他或主题是否适合，然而这对我来说可能确实不合适。该书出版后，在边沁先生的积极要求下我的名字被作为编辑加了进去，我试图劝说他不用这么做，但没有成功。

The time occupied in this editorial work was extremely well

employed in respect to my own improvement. The *Rationale of Judicial Evidence* is one of the richest in matter of all Bentham's productions. The theory of evidence being in itself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 his subjects, and ramifying into most of the others, the book contains, very fully developed, a great proportion of all his best thoughts: while, among more special things, it comprises the most elaborate exposure of the vices and defects of English law, as it then was, which is to be found in his works; not confined to the law of evidence, but including, by way of illustrative episode, the entire procedure or practice of Westminster Hall. The direct knowledge, therefore, which I obtained from the book, and which was imprinted upon me much more thoroughly than it could have been by mere reading, was itself no small acquisition. But this occupation did for me what might seem less to be expected; it gave a great start to my powers of composition. Everything which I wrote subsequently to this editorial employment, was markedly superior to anything that I had written before it. Bentham's later style, as the world knows, was heavy and cumbersome, from the excess of a good quality, the love of precision, which made him introduce clause within clause into the heart of every sentence, that the reader might receive into his mind all the modifications and qualifications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main proposition: and the habit grew on him until his sentences became, to those not accustomed to them, most laborious reading. But his earlier style, that of the *Fragment on Government, Plan of a Judicial Establishment* , etc., is a model of liveliness and ease combined with fulness of matter, scarcely ever surpassed: and of this earlier style there were many striking specimens in the manuscripts on Evidence, all of which I endeavoured to preserve. So long a course of this admirable writing had a considerable effect upon my own; and I added to it by the assiduous reading of other writers, both French and English, who combined, in a remarkable degree, ease with force, such as

Goldsmith, Fielding, Pascal, Voltaire, and Courier. Through these influences my writing lost the jejuneness of my early compositions; the bones and cartilages began to clothe themselves with flesh, and the style became, at times, lively and almost light.

就我自己的进步而言，做这份编辑工作的时间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利用。在边沁的所有作品中，《司法证据原理》是内容最丰富的著作之一。证据理论本身就是他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并且衍生出大部分其他主题，这本书包括了他所有精华思想中的一大部分，这些思想被阐释得非常充分。同时更特别的是，它包含了对当时英国法律中的缺陷和瑕疵极为详尽的披露，这些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通过例证事件，这一披露不局限于证据法，还包括了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厅里的整套程序和做法。因此，通过编辑这本书而获得的，比简单阅读更深刻地镌刻在我脑海中的直接知识，本身就是不小的收获。但是，这项工作给我带来的东西似乎比预期的还要多。它对我的写作能力培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完成这项编辑工作之后我写的每一部作品，比之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明显好很多。边沁后期的文风，如世人所知，较为沉闷、繁琐。由于过度追求质量，喜欢精确，他的每个句子都是一个从句嵌着另一个从句，直到句子的中心，这样读者可能会同时接受所有的修饰、限定语和主命题。这种习惯在他身上日益增长，直到让不习惯读他句子的人读起来非常费力。但是他早期的文风，如《政府片论》和《司法机构计划》的风格，却是轻松活泼与内容丰富相结合的典范，几乎从未被超越，在《证据论》的手稿中，有很多显著的有着早期风格的例子，所有这些我都尽力保存。编辑这部令人钦佩的著述花了如此长的时间，这对我自己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我还刻苦地研读了其他作家的作品，法语的和英语的都有，这些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既挥洒自如又铿锵有力，比如哥尔德斯密斯、菲尔丁、帕斯卡、伏尔泰和库里耶。由于这些作品的影响，我的作品丢掉了早期的空洞性，变得日趋饱满，有血有肉，风格有时很活泼，甚至几近明快。

This improvement was first exhibited in a new field. Mr. Marshall, of Leeds, father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of Marshalls, the same who was brought into Parliament for Yorkshire, when the representation forfeited by Grampound was transferred to it, an earnest Parliamentary reformer, and a man of large fortune, of which he made a liberal use, had been much struck with Bentham's *Book of Fallacies* ; and the thought had occurred to him that it would be useful to publish annually 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 not in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Hansard, but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subjects, and accompanied by a commentary pointing out the fallacies of the speakers. With this intention, he very naturally addressed himself to the editor of the *Book of Fallacies* ; and Bingham, with the assistance of Charles Austin, undertook the editorship. The work was called *Parliamentary History and Review* . Its sale was not sufficient to keep it in existence, and it only lasted three years. It excited, however, some attention among parliamentary and political people. The best strength of the party was put forth in it; and its execution did them much more credit than that of the *Westminster Review* had ever done. Bingham and Charles Austin wrote much in it; as did Strutt, Romilly, and several other Liberal lawyers. My father wrote one article in his best style; the elder Austin another. Coulson wrote one of great merit. It fell to my lot to lead off the first number by an article on the principal topic of the session (that of 1825), the Catholic Association and the Catholic Disabilities. In the second number I wrote an elaborate *Essay on the Commercial Crisis of 1825 and the Currency Debates* . In the third I had two articles, one on a minor subject, the other on the Reciprocity principle in commerce, *ŕ propos* of a celebrated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anning and Gallatin. These writings were no longer mere reproduc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doctrines I had been taught; they were original thinking, as far as that name can be applied to old ideas in new forms and connexions:

and I do not exceed the truth in saying that there was a maturity, and a well-digested, character about them, which there had not been in any of my previous performances. In execution, therefore, they were not at all juvenile; but their subjects have either gone by, or have been so much better treated since, that they are entirely superseded, and should remain buried in the same oblivion with my contributions to the first dynasty of the *Westminster Review* .

这种进步最初在一个新领域展现了出来。利兹的马歇尔先生是这一代马歇尔家族的族长，在格兰庞德选区的代表权被剥夺并移交至约克郡后，他代表约克郡进入了议会——他是位热心的议会改革家，富有而慷慨，边沁的《谬误集》给他以很大冲击。他有了一个想法，觉得每年出版一次议会辩论的记录文件会很有用，不是按照《英国议会议事录》采用的时间次序，而是按主题分类，通过加上注释指出发言人的谬误。带着这个目的，他很自然地和《谬误集》的编辑宾厄姆取得了联系，在查尔斯·奥斯丁的协助下，宾厄姆担任了编辑的职务。这个刊物叫《议会历史与评论》。它的销售量不足以维持它的存续，只坚持了三年。然而，它引起了议员和政治人物的注意。团体的最大力量得以展现出来，它的发行给他们带来的荣誉远比《威斯敏斯特评论》多得多。宾厄姆和查尔斯·奥斯丁写了很多文章，还有斯特拉特、罗米利和好几位信仰自由主义的律师都写了不少文章。我父亲以他最好的文风写了一篇论文，年长的奥斯丁写了另一篇。库尔逊写了一篇，具有重要价值。这次我负责以1825年议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即天主教协会和天主教的无能为主题，写一篇文章作为第一期的开篇。在第二期上，我精心写了一篇名为《论1825年的商业危机和货币争论》的评论。在第三期上，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写的是小事情，另一篇写商业里的互惠原理，是关于坎宁和加勒廷 [5_11] 之间著名的外交通信。这些作品不再仅仅是再现和应用我学到的教条。它们是崭新的思考，如果新思考可以用来指代以新形式和新关系表现旧观点的话。如果我说它们展现出成熟、融会贯通的特征，这并没有夸大事实，这些特征在我之前的任何作品中都是没有的。因此，在表达时这些思想也

并不显得幼稚。但是它们的主题要么已经过时了，要么在那之后得到了更好的论述，所以它们已被完全超越了，应该和我发表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的第一代文章一样，被埋没在人们遗忘的角落。

While thus engaged in writing for the public, I did not neglect other modes of self-cultivation.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I learnt German; beginning it on the Hamiltonian method, for which purpose I and several of my companions formed a class. For several years from this period, our social studies assumed a shape which contributed very much to my mental progress. The idea occurred to us of carrying on, by reading and conversation, a joint study of several of the branches of science which we wished to be masters of. We assembled to the number of a dozen or more. Mr. Grote lent a room of his house in Threadneedle Street for the purpose, and his partner, Prescott, one of the three original members of the Utilitarian Society, made one among us. We met two mornings in every week, from half-past eight till ten, at which hour most of us were called off to our daily occupations. Our first subject was Political Economy. We chose some systematic treatise as our text-book; my father's *Elements* being our first choice. One of us read aloud a chapter, or some smaller portion of the book. The discussion was then opened, and anyone who had an objection, or other remark to make, made it. Our rule was to discuss thoroughly every point raised, whether great or small, prolonging the discussion until all who took part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conclusion they had individually arrived at; and to follow up every topic of collateral speculation which the chapter or the conversation suggested, never leaving it until we had untied every knot which we found. We repeatedly kept up the discussion of some one point for several weeks, thinking intently on it during the intervals of our meetings, and contriving solutions of the new difficulties which had

risen up in the last morning's discussion. When we had finished in this way my father's *Elements* , we went in the same manner through Ricardo'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and Bailey's *Dissertation on Value* . These close and vigorous discussions were not only improving in a high degree to those who took part in them, but brought out new views of some topics of abstract Political Economy.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Values which I afterwards published, emanated from these conversations, as did also the modified form of Ricardo's *Theory of Profits* , laid down in my *Essay on Profits and Interest* . Those among us with whom new speculations chiefly originated, were Ellis, Graham, and I; though others gave valuable aid to the discussions, especially Prescott and Roebuck, the one by his knowledge, the other by his dialectical acuteness. Th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Values and of Profits were excogitated and worked out in about equal proportions by myself and Graham: and if our original project had been executed, my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would have been brought out along with some papers of his, under our joint names. But when my exposition came to be written, I found that I had so much over-estimated my agreement with him, and he dissented so much from the most original of the two Essays, that on International Values, that I was obliged to consider the theory as now exclusively mine, and it came out as such when published many years later. I may mention that among the alterations which my father made in revising his *Elements* for the third edition, several were founded on criticisms elicited by these conversations; and in particular he modified his opinions (though not to the extent of our new speculations) on both the points to which I have adverted.

尽管这样沉浸于为公众写作，我并没有忽视其他形式的自学。就在这时，我学了德语，开始学时用了汉密尔顿的方法，为此，我和好

几个同伴组成了一个班。从这时起，之后的好几年中，我们的集体学习初具规模，并对我的思想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想起一个点子，就是通过阅读和交谈，继续共同学习我们想熟练掌握的好几个自然科学的分支。我们聚集了十二个人或者更多。格罗特先生把他在针线街的房子借了一间供我们学习用，他的伙伴、功利主义学会三名创始人之一的普雷斯科特也成了我们的一员。我们每个星期有两天上午见面，从八点半到十点，在这几个小时里，我们大部分人都放弃了自己的日常工作。我们的第一个主题是政治经济学。我们选了一些系统的论文作为教科书，我父亲的《政治经济学要义》是我们的首选。先由我们中的一个人朗读书中的一章或者一小部分，然后讨论就开始了，任何人有异议或者有其他评论的话，就直接发言。我们的规则是要彻底讨论提出的每一个要点，不论大小，一直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满意自己得出的结论为止。要把这一章或交谈中产生的每个思考话题探究到底，从不丢下不管，直到解决我们发现的每个复杂问题为止。我们曾多次持续好几个星期连续讨论某一个话题，在不见面的时候专心思考，设法解决上次讨论时出现的新困难。我们以这种方式学完了父亲的《政治经济学要义》之后，又以同样的方法学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贝利的《价值论文》。这些彻底的、热烈的讨论不仅大大提升了那些参与者的素质，还催生了抽象政治经济学一些主题的新观点。我后来发表的国际价值理论就起源于这些交谈，而后我在《论利润和利益》中所阐述的李嘉图利润理论的改良形式也是如此。在我们当中，新思想主要起源于埃利斯、格雷厄姆和我。但是其他人也给了这些讨论有价值的帮助，尤其是普雷斯科特和罗巴克，一个通过知识，另一个通过辩证的敏锐。国际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是由我和格雷厄姆共同思考和总结出来的，两人平分秋色。如果我们最初的方案得以执行的话，我的《论政治经济学中若干未解决的问题》就应该和他的一些论文一起出版，署上我们两人的名字。但是我开始撰文时发现自己过高地估计了与他的一致性，而他对《论国际价值》从最开始的两篇评论就持不同意见，所以我不得不认为这个理论现在只属于我自己，多年后出版的时候也只署了我的名字。我应该提到，我父亲在《政治经济学要义》第三版中作的修正，有好几处是基于从这些交谈中得出的批评。特别是把他的观点中我注意到的两点作了修改

（尽管没有修改到我们最新推断的程度）。

When we had enough of political economy, we took up the syllogistic logic in the same manner, Grote now joining us. Our first text-book was Aldrich, but being disgusted with its superficiality, we reprinted one of the most finished among the many manuals of the school logic, which my father, a great collector of such books, possessed, the *ManuductioadLogicam* of the Jesuit Du Trieu. After finishing this, we took up Whately's *Logic* , then first republished from the *Encyclopedia Metropolitana* , and finally the *ComputatiosiveLogica* of Hobbes. These books, dealt with in our manner, afforded a high range for original metaphysical speculation: and most of what has been done in the First Book of my *System of Logic* , to rationalize and correct the principles and distinctions of the school logicians, and to improve the theory of the Import of Propositions, had its origin in these discussions; Graham and I originating most of the novelties, while Grote and others furnished an excellent tribunal or test. From this time I formed the project of writing a book on Logic, though on a much humbler scale than the one I ultimately executed.

学完政治经济学后，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学习三段论逻辑学，此时格罗特加入了我们。我们的第一本课本是奥尔德里奇的著作，但是由于不喜欢它的肤浅，我们重印了耶稣会士迪特里厄的《逻辑学入门》，在很多学院逻辑学的参考书中这本是非常完美的，我父亲热衷于收集此类书籍，我们印的就是他收藏的。读完这本之后，我们开始继续读惠特利的《逻辑学》，当时刚被《大都会百科全书》第一次再版，最后读了霍布斯 [5_12] 的《计算法和逻辑学》。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读的这些书，为新颖的形而上学思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在《逻辑学体系》第一本里做的大部分工作，如阐释和校正学院逻辑学家的

原则和特征、改进命题意义的理论等，都根源于这些讨论。新颖的思想大都是格雷厄姆和我提出的，而格罗特和其他人则提供了极好的公断，或者说检验。从这时起，我计划要写一本关于逻辑学的作品，尽管其规模与我最终的成书相比小很多。

Having done with Logic, we launched into Analytic Psychology, and having chosen Hartley for our text-book, we raised Priestley's edition to an extravagant price by searching through London to furnish each of us with a copy. When we had finished Hartley, we suspended our meetings; but my father's *Analysis of the Mind* being published soon after, we reassembled for the purpose of reading it. With this our exercises ended. I have always dated from these conversations my own real inauguration as an original and independent thinker. It was also through them that I acquired, or very much strengthened, a mental habit to which I attribute all that I have ever done, or ever shall do, in speculation: that of never accepting half-solutions of difficulties as complete; never abandoning a puzzle, but again and again returning to it until it was cleared up; never allowing obscure corners of a subject to remain unexplored, because they did not appear important; never thinking that I perfectly understood any part of a subject until I understood the whole.

学完逻辑学之后，我们开始投入分析心理学，选了哈特利的著作作为我们的课本，为了使我们人手一本普里斯特利的版本，我们把伦敦城仔细搜寻了一遍，一度使其价格飞涨。读完哈特利 [5_13] 之后，我们暂停了会面。但是，我父亲的《人类心灵现象的分析》很快就出版了，为了阅读这本书，我们又重新聚到一起。读完这本书后，我们的练习就终止了。我总是把自己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独立思想家的开端追溯到这些对话中。也是通过它们我获得了一个思考习惯，或者说

深深加固了这个习惯，我把自己做过的一切思考以及将来要进行的思索，都归功于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如果困难只解决了一半，就不能当成全部解决。永远不放弃任何一个难题，而要反复研究，直到完全解决为止。永远不允许因为看似不重要，就忽略一个问题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在完全理解一个问题之前，永远不能认为自己完全理解了它的任何一部分。

Our doings from 1825 to 1830 in the way of public speaking, filled a considerable place in my life during those years, and as they had important effects on my development, something ought to be said of them.

从1825到1830年间，我们的演说活动，在我那几年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它们对我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所以应该提一下。

There was for some time in existence a society of Owenites, called the Co-operative Society, which met for weekly public discussions in Chancery Lane. In the early part of 1825, accident brought Roebuck in contact with several of its members, and led to his attending one or two of the meetings and taking part in the debate in opposition to Owenism. Some one of us started the notion of going there in a body and having a general battle: and Charles Austin and some of his friends who did not usually take part in our joint exercises, entered into the project. It was carried out by concert with the principal members of the Society, themselves nothing loth, as they naturally preferred a controversy with opponents to a tame discussion among their own body. The question of population was proposed as the subject of debate:

Charles Austin led the case on our side with a brilliant speech, and the fight was kept up by adjournment through five or six weekly meetings before crowded auditories, including along with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and their friends, many hearers and some speakers from the Inns of Court. When this debate was ended, another was commenced on the general merits of Owen's system: and the contest altogether lasted about three months. It was a *lutte corps ŕ corps* between Owenites and political economists, whom the Owenites regarded as their most inveterate opponents: but it was a perfectly friendly dispute. We who represented political economy, had the same objects in view as they had, and took pains to show it; and the principal champion on their side was a very estimable man, with whom I was well acquainted, Mr. William Thompson, of Cork, author of a book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 and of an *Appeal* in behalf of women against the passage relating to them in my father's *Essay on Government* . Ellis, Roebuck, and I took an active part in the debate, and among those from the Inns of Court who joined in it, I remember Charles Villiers. The other side obtained also, on the population question, very efficient support from without. The well-known Gale Jones, then an elderly man, made one of his florid speeches; but the speaker with whom I was most struck, though I dissented from nearly every word he said, was Thirlwall, the historian, since Bishop of St. David's, then a Chancery barrister, unknown except by a high reputation for eloquence acquired at the Cambridge Union before the era of Austin and Macaulay. His speech was in answer to one of mine. Before he had uttered ten sentences, I set him down as the best speaker I had ever heard, and I have never since heard anyone whom I placed above him.

有段时间，曾经有一个欧文 [5_14] 主义者的学会，叫做合作社，它的成员在大法官法庭巷集会，每星期进行一次公开讨论。1825年上

半年，罗巴克偶然接触到好几个合作社的成员，所以他参加了一两次集会，并参与辩论反对欧文主义。我们当中有个人产生了以团体的形式去那里来一次全体论战的想法。查尔斯·奥斯丁和他的一些朋友本来很少参加我们的集体活动，这次也参与了这个计划。合作社的主要成员一致同意执行这个计划，一点都不感到勉强，因为与自己团体内部枯燥乏味的讨论相比，他们无疑更喜欢和对手论战。人口问题被提议作为辩论的主题，我方的查尔斯·奥斯丁用一篇才华横溢的演说开始了辩论，论战在每周一次的集会上举行，持续了五六个星期，挤满了观众，包括合作社的成员和他们的朋友，以及很多听众和一些来自律师培养学院 [5_15] 里的演讲人。这个辩论结束后，另一个关于欧文体系总体价值的辩论开始了，论战总共持续了差不多三个月。这是欧文主义者和政治经济学者之间的激烈斗争，前者把后者当作最顽固的对手，但是这却是个非常友好的辩论。代表政治经济学的我们，和他们考虑的目标是一致的，并尽力表现出来。他们那边的主辩是个非常可敬的人，我和他很熟，他就是科克城的威廉·汤普森先生，《论财富分配》一书的作者，还代表妇女写了《呼吁书》，反对我父亲的《政府论》中有关妇女的观点。埃利斯、罗巴克和我在辩论中很积极，我记得加入辩论的律师学院的人当中有查尔斯·威利尔斯。在人口问题上，对方也从外面得到了很有效的支持。当时已上年纪的著名的盖尔·琼斯，也作了一个华丽的演讲。但是最让我震惊的演说人是瑟尔沃尔，虽然他说的任何一个词我几乎都不同意。他自圣戴维主教时起就是个历史学家，后来成为大法官法庭律师，世人只知他善于雄辩，那还是在剑桥协会，在奥斯丁和麦考利那个时代之前。他的演讲是为了回应我的一个演讲。他只说了不到十句话，我就断定他是我听过的最厉害的演说家，那之后我也从来没听过比他更好的。

The great interest of these debates predisposed some of those who took part in them, to catch at a suggestion thrown out by McCulloch, the political economist, that a Society was wanted in London similar to the Speculative Society at Edinburgh, in which Brougham, Horner, and others first cultivated public speaking. Our

experience at the Co-operative Society seemed to give cause for being sanguine as to the sort of men who might be brought together in London for such a purpose. McCulloch mentioned the matter to several young men of influence, to whom he was then giving private less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Some of these entered warmly into the project, particularly George Villiers, after Earl of Clarendon. He and his brothers, Hyde and Charles, Romilly, Charles Austin and I, with some others, met and agreed on a plan. We determined to meet once a fortnight from November to June, at the Freemasons' Tavern, and we had soon a fine list of members, containing, along with several members of Parliament, nearly all the most noted speakers of the Cambridge Union and of the Oxford United Debating Society. It is curiously illustrative of the tendencies of the time, that our principal difficulty in recruiting for the Society was to find a sufficient number of Tory speakers. Almost all whom we could press into the service were Liberals, of different orders and degrees. Besides those already named, we had Macaulay, Thirlwall, Praed, Lord Howick, Samuel Wilberforce (afterwards Bishop of Oxford), Charles Poulett Thomson (afterwards Lord Sydenham), Edward and Henry Lytton Bulwer, Fonblanque, and many others whom I cannot now recollect, but who made themselves afterwards more or less conspicuous in public or literary life. Nothing could seem more promising. But when the time for action drew near, and it was necessary to fix on a President, and find somebody to open the first debate, none of our celebrities would consent to perform either office. Of the many who were pressed on the subject, the only one who could be prevailed on was a man of whom I knew very little, but who had taken high honours at Oxford and was said to have acquired a great oratorical reputation there; who some time afterwards became a Tory member of Parliament. He accordingly was fixed on, both for filling the President's chair and for making the first speech. The important day

arrived; the benches were crowded; all our great speakers were present, to judge of, but not to help our efforts. The Oxford orator's speech was a complete failure. This threw a damp on the whole concern: the speakers who followed were few, and none of them did their best: the affair was a complete *fiasco* ; and the oratorical celebrities we had counted on went away never to return, giving to me at least a lesson in knowledge of the world. This unexpected breakdown altered my whole relation to the project. I had not anticipated taking a prominent part, or speaking much or often, particularly at first, but I now saw that the success of the scheme depended on the new men, and I put my shoulder to the wheel. I opened the second question, and from that time spoke in nearly every debate. It was very uphill work for some time. The three Villiers and Romilly stuck to us for some time longer, but the patience of all the founders of the Society was at last exhausted, except me and Roebuck. In the season following, 1826-7, things began to mend. We had acquired two excellent Tory speakers, Hayward and Shee (afterwards Sergeant Shee): the Radical side was reinforced by Charles Buller, Cockburn, and other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ambridge Benthamities; and with their and other occasional aid, and the two Tories as well as Roebuck and me for regular speakers, almost every debate was a *bataillerangée* between the “philosophic Radicals” and the Tory lawyers; until our conflicts were talked about, and several persons of note and consideration came to hear us. This happened still more in the subsequent seasons, 1828 and 1829, when the Coleridgians, in the persons of Maurice and Sterling, made their appearance in the Society as a second Liberal and even Radical party, on totally different grounds from Benthamism and vehemently opposed to it; bringing into these discussions the general doctrines and modes of thought of the European reaction against the philosoph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adding a third and very important belligerent party to our

contests, which were now no bad exponent of the movement of opinion among the most cultivated par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ur debates we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common debating societies, for they habitually consisted of the strongest arguments and most philosophic principles which either side was able to produce, thrown often into close and *serré* confutations of one another. The practice was necessarily very useful to us, and eminently so to me. I never, indeed, acquired real fluency, and had always a bad and ungraceful delivery; but I could make myself listened to: and as I always wrote my speeches when, from the feelings involved, or the nature of the ideas to be developed, expression seemed important, I greatly increased my power of effective writing; acquiring not only an ear for smoothness and rhythm, but a practical sense for *telling* sentences, and an immediate criterion of their telling property, by their effect on a mixed audience.

对这些辩论的巨大兴趣让一些参与者很容易地接受了政治经济学家麦卡洛克提出的一个建议，即伦敦需要有一个和爱丁堡思辨学会相似的学会，爱丁堡的思辨学会是布鲁厄姆 [5_16] 、霍纳和其他一些人最初培养演说能力的地方。我们在合作社的经历似乎让人相信我们就是可以聚集在伦敦共同做这样一件事情的人。麦卡洛克跟几位有影响力的年轻人提过这件事，那时他正给他们单独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课程。他们中有几位热心地加入了这个计划，尤其是后来成为克拉伦登伯爵的乔治·威利尔斯。他和他的兄弟海德和查尔斯、罗米利、查尔斯·奥斯丁，还有我，以及其他一些人会面并达成一个计划，我们决定从11月到6月在共济会会员的旅馆每两星期集会一次，我们很快就有了不少杰出的会员，连同好几位议会议员一起，几乎囊括了剑桥协会和牛津联合辩论协会所有的著名演说家。我们的主要困难在于为学会征募足够的保守党演说者，这一点很奇特地反映了当时的趋势。我们能紧急找来的几乎都是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学历的自由主义者。除了已

经提到的，还有麦考利、瑟尔沃尔、普雷德、豪伊克勋爵、塞缪尔·威尔伯福斯（后来成为牛津的主教）、查尔斯·波利特·汤姆森（后来成为悉登汉姆勋爵）、爱德华、亨利·利顿·布尔沃、方布兰克，还有很多我现在想不起来的人，但他们后来都或多或少在公共或文学领域中有出色的表现。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行动的日子要到了，这时需要确定一个主席，并找一个人作开场辩论，但是我们的名人中没有一个同意履行两个职责中的任何一个。我们敦促很多人做这件事，但被说服了的只有一个，我对此人知之甚少，但他在牛津很受尊敬，据说在那儿获得了很高的演说上的声誉，后来成了议会的保守党议员。因此，我们就确定他担任主席一职，并第一个发言。重大的日子到了，长凳上挤满了人，我们所有伟大的演说家都到场了，但他们是来评价我们的努力，而不是来帮忙的。这位牛津演说家的演说彻底失败了。这让所有人都很沮丧，接下来演说的人很少，而且没有一个发挥出最佳状态，彻底惨败。我们曾指望的演说名人离开了，再也没回来，这至少在了解世事上给了我一个教训。这个意外的事故改变了我和这个计划的整个关系。我以前没有想过要扮演主要角色或者经常演讲，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但是，现在我发现这个计划的成功要依靠新人，我决定担起重任。我在第二个问题上首先发言，从那时起，我几乎在每次辩论中都发言。有一阵子这是非常艰难的工作。威利尔斯三兄弟和罗米利与我们一起坚持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最终除了我和罗巴克，协会所有创始人的耐心还是耗尽了。在接下来的时期里（1826—1827年），情况开始好转。我们得到了两个卓越的保守党演说家的支持：海沃德和希（后来成为高级律师）。随着查尔斯·布勒、科伯恩和剑桥边沁主义者第二代一些人的加入，激进主义这一边也得以加强；有他们和其他人的偶尔协助，加上两个保守党党员，罗巴克和我定期发言，使得几乎每一次辩论都是“哲学激进分子”和保守党律师之间的对阵战。一直到人们开始议论我们的辩论，好几个受人尊敬的著名人物来听我们的辩论为止。在接下来1828—1829年的辩论季当中，这种情况更多了，当时以莫里斯和斯特林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作为第二个自由主义甚至激进主义派别出现在学会里，他们的依据与功利主义完全不同，而且激烈地反对功利主义。他们把欧洲反对18世纪哲学时普遍使用的学说和思考方式带到这些讨论中来，并成为我们论战中

非常重要的好战第三方，当时他们是新一代思想运动中最有教养的倡导者。我们的辩论和普通辩论协会中的大不相同，因为我们双方都能提出来最有说服力的论点和最具哲学性的原则，使得双方的互相驳斥经常陷于激烈的势均力敌的状态。这种实践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益，不可或缺，尤其是对我。其实，我从来没获得真正流畅的表达能力，表达的时候总是很差，不优美，但我还是能抓住听众的注意力。由于我总是在表达看起来很重要的时候才写演讲稿，不论是从内心的感情出发，还是从要阐明观点的本质出发，我都大大提高了实际写作的能力，不仅能够分辨语言是否流利和有节奏，还能实际地辨别有说服力的句子，并通过它们对不同观众的效果，直接评判它们的说服力。

The Society, and the preparation for it, together with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morning conversations which were going on simultaneously, occupied the greater part of my leisure; and made me feel it a relief when, in the spring of 1828, I ceased to write for the *Westminster* . The *Review* had fallen into difficulties. Though the sale of the first number had been very encouraging, the permanent sale had never, I believe, been sufficient to pay the expenses, on the scale on which the *Review* was carried on. Those expenses had been considerably, but not sufficiently, reduced. One of the editors, Southern, had resigned; and several of the writers, including my father and me, who had been paid like other contributors for our earlier articles, had latterly written without payment. Nevertheless, the original funds were nearly or quite exhausted, and if the *Review* was to be continued some new arrangement of its affairs had become indispensable. My father and I had several conferences with Bowring on the subject. We were willing to do our utmost for maintaining the *Review* as an organ of our opinions, but not under Bowring's editorship: while the impossibility of its any longer supporting a paid editor, afforded a ground on which, without affront to him, we could propose to dispense with his services. We

and some of our friends were prepared to carry on the *Review* as unpaid writers, either finding among ourselves an unpaid editor, or sharing the editorship among us. But while this negotiation was proceeding with Bowring's apparent acquiescence, he was carrying on another in a different quarter (with Colonel Perronet Thompson), of which we received the first intimation in a letter from Bowring as editor, informing us merely that an arrangement had been made, and proposing to us to write for the next number, with promise of payment. We did not dispute Bowring's right to bring about, if he could, an arrangement more favourable to himself than the one we had proposed; but we thought the concealment which he had practised towards us, while seemingly entering into our own project, an affront: and even had we not thought so, we were indisposed to expend any more of our time and trouble in attempting to write up the *Review* under his management. Accordingly my father excused himself from writing; though two or three years later, on great pressure, he did write one more political article. As for me, I positively refused. And thus ended my connexion with the original *Westminster* . The last article which I wrote in it had cost me more labour than any previous; but it was a labour of love, being a defence of the early French Revolutionists against the Tory misrepresentations of Sir Walter Scott, in the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of Napoleon* . The number of books which I read for this purpose, making notes and extracts—even the number I had to buy (for in those days there was no public or subscription library from which books of reference could be taken home)—far exceeded the worth of the immediate object; but I had at that time a half-formed intention of writing a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and though I never executed it, my collections afterwards were very useful to Carlyle for a similar purpose.

协会以及为协会做的准备工作，加上为同时进行的上午交谈做的准备，占用了我大部分的闲暇时间。因此1828年春天，我停止为《威斯敏斯特评论》写稿的时候，感觉轻松了不少。评论杂志陷入了困境。尽管第一期的销售量非常振奋人心，但是我相信，以评论杂志开展的规模来说长期的销售量从未能应付开支。开支已经缩减了很多，但是缩减得还是不够。一个编辑——萨瑟恩——已经辞职了。好几个作者，包括父亲和我，早期的稿件和其他撰稿人一样获得稿酬，但最近已经没有报酬了。然而，原始资金已几近耗尽，或者已经完全耗尽了，如果这份刊物想继续维持下去的话，必须重新安排它的事务。我父亲和我就这个问题和鲍林讨论了好几次。我们乐意尽力维持评论杂志，让它作为我们观点的喉舌，但是不用鲍林做我们的编辑。而报纸无法再负担有偿编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由，既不会冒犯到他，又可以提议免去他的职责。我们，还有一些朋友，都准备好了做无偿作者，继续维持评论报，要么在我们中间找一个无偿的编辑，要么共同承担编辑之职。但是，就当谈判在鲍林的明显默许下正在进行的时候，他却在另一个地区进行另一个谈判（和佩罗内特·汤普森上校），我们收到的第一个通告是鲍林作为编辑给我们写的一封信，仅仅告诉我们说做了些安排，建议我们为下一期写稿，承诺支付报酬。如果他有这个能力，他有权做比我们的提议更有利于他自己的安排，我们不会阻止。但是他对我们加以隐瞒，而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在参加我们的计划，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公开侮辱。即使我们没这么想，我们也不愿意再浪费时间和精力为他主编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继续写文章。因此，我父亲不再写文章。尽管两三年后，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写了一篇政论文。至于我，则坚决拒绝了再为其撰稿。这样，我和原先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的联系终止了。我在上面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付出的努力比以往任何文章都多。但是这是出于爱的努力，因为它是为早期法国革命家辩护，反对沃尔特·司各特[5_17]爵士在他的《拿破仑传》序言中对他们保守的曲解。为了写这篇文章，要做笔记，做摘录，为此所读的书的数量——甚至我必须购买的数量（因为那时候没有能把参考书借回家的公共图书馆或订阅图书馆），远远超过了直接目标的价值。但是，我当时有个写法国大革命史的不成熟的想法。尽管我从来没有付诸实际，但是我的藏书后来对卡莱尔[5_18]写类似的

作品非常有用。

[4_1].The continuation of this article in the second number of the *Review* was written by me under my father's eye, and (except as practice in composition, in which respect it was, to me, more useful than anything else I ever wrote) was of little or no value.

[5_1].作者注：这篇文章在《评论》第二期发表的后续部分是我在父亲的监督下完成的，我认为除了这种写作练习比我以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有用之外，我觉得它几乎毫无价值。

[5_2].威廉·科贝特（1762—1835），英国记者、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5_3].《六项法案》，1819年，英国政府为了防止动乱而制定的一系列新法律，把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改革都归为“明显的叛国阴谋”。

[5_4].亚历山大·巴林（1774—1848），英国金融家和国家官员，参加了英美谈判并签订了确定加拿大与缅因边界的条约（1842年）。

[5_5].乔治·坎宁（1770—1827），英国政治家、外相，曾短暂出任英国首相。

[5_6].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于1868—1894年间四度出任英国首相。

[5_7].托马斯·穆尔（1779—1852），爱尔兰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许多怀旧和爱国的抒情诗诸如《吟游少年》，都带有传统的爱尔兰曲调。

[5_8].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讽刺性仿英雄体史诗《夺发记》（1712年）和《群愚史诗》（1728年）。

[5_9].普卢塔克（约公元46—120），古希腊传记作家和哲学家。他写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和一部传记集，曾被莎士比亚用在他的古罗马戏剧中。

[5_10].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1721—1781），法国经济学家、18世纪后半叶法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5_11].阿尔贝特·加勒廷（1761—1849），瑞士裔的美国金融家和政治家，曾任美国财政部长。

[5_12].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者。

[5_13].大卫·哈特利（1705—1757），英国哲学家、医生、联想主义心理学创始人之一。

[5_14].罗伯特·欧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合作社运动的先驱。

[5_15].律师学院，英国伦敦四个培养律师的组织。

[5_16].亨利·彼得·布鲁厄姆（1778—1868），英国政治家，曾任大法官。

[5_17].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小说首创者、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

[5_18].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其著作有《法国革命》等。

Chapter 5 Crisis in My Mental History. One Stage Onward

第五章　成长中的一次危机下一个阶段

For some years after this time I wrote very little, and nothing regularly, for publication: and great were the advantages which I derived from the intermission. It was of no common importance to me, at this period, to be able to digest and mature my thoughts for my own mind only, without any immediate call for giving them out in print. Had I gone on writing, it would have much disturbed the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in my opinions and character, which took place during those years. The origin of this transformation, or at least the process by which I was prepared for it,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turning some distance back.

此后几年我很少写作，定期发表的文章也一篇都没有：我从这段间歇期中获益匪浅。在此期间，我能够消化完善我的思考，无人催促我立即写出来发表，这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当时继续写作的话，就会大大扰乱那几年我的见解和性格的重要转变。要解释这个转变的源头，或者至少我为此准备的过程，就只能从较早前说起。

From the winter of 1821, when I first read Bentham, and especially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estminster Review* , I had what might truly be called an object in life; to be a reformer of the world. My conception of my own happiness was entirely identified with this object. The personal sympathies I wished for were those of fellow labourers in this enterprise. I endeavoured to pick up as many flowers as I could by the way; but as a serious and permanent

personal satisfaction to rest upon, my whole reliance was placed on this; and I was accustomed to felicitate myself on the certainty of a happy life which I enjoyed, through placing my happiness in something durable and distant, in which some progress might be always making, while it could never be exhausted by complete attainment. This did very well for several years, during which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going on in the world and the idea of myself as engaged with others in struggling to promote it, seemed enough to fill up an interesting and animated existence. But the time came when I awakened from this as from a dream. It was in the autumn of 1826. I was in a dull state of nerves, such as everybody is occasionally liable to; unsusceptible to enjoyment or pleasurable excitement; one of those moods when what is pleasure at other times, becomes insipid or indifferent; the state, I should think, in which converts to Methodism usually are, when smitten by their first “conviction of sin.” In this frame of mind it occurred to me to put the question directly to myself: “Suppose that all your objects in life were realized; that all the changes in institutions and opinions which you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uld be completely effected at this very instant: would this be a great joy and happiness to you?” And an irrepressible self-consciousness distinctly answered, “No!” At this my heart sank within me: the whole foundation on which my life was constructed fell down. All my happiness was to have been found in the continual pursuit of this end. The end had ceased to charm, and how could there ever again be any interest in the means? I seemed to have nothing left to live for.

从1821年冬天起，我刚开始读边沁的作品，尤其是从《威斯敏斯特评论》创刊起，我就有了一个真正可以称为人生目标的东西，即要成为一名社会改革家。我对自己幸福的设想与这个目标完全相同。我希望得到的个人共鸣就是为此事业努力的同事的共鸣。在这个过程

中，我努力获得尽可能多的成就。但是，我把最为严肃、永久性的个人满足全都毫无保留地寄托在这上面了。我习惯了庆幸过着自己喜欢的幸福生活，而这要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持久、遥远的东西上，要总能实现一些进步，而又永远不会因为完全实现而耗尽。有好几年情况一直很好，那时世界总体上一直在进步，我的观点也和别人的观点结合一起，在努力促进进步，这似乎足以让生活情趣盎然、充满活力。但是，有一天我从这里面醒来，像从梦里醒来一样。那是1826年的秋天，我处于神经麻木的状态，就像每个人偶尔都会有的情形一样，感觉不到快乐或兴奋。在别的时候应该是高兴的心情，在这时变成乏味或冷漠。我认为，改信循道宗教的人第一次因“深信有罪”而备受折磨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在这种心境下，我直接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假如一生中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你期盼的所有制度和观念的改变都能立刻完全实现，这会不会是你巨大的幸福和快乐？”一个抑制不住的自我意识清楚地回答道：“不是！”这时，我心情低落极了，我建立生活的整个基础坍塌了。我所有的幸福原本在于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个目标。而现在目标已经不再有吸引力了，我又怎么会继续对实现目标的手段感兴趣呢？我似乎没有活着的目标了。

At first I hoped that the cloud would pass away of itself; but it did not. A night's sleep, the sovereign remedy for the smaller vexations of life, had no effect on it. I awoke to a renewed consciousness of the woful fact. I carried it with me into all companies, into all occupations. Hardly anything had power to cause me even a few minutes' oblivion of it. For some months the cloud seemed to grow thicker and thicker. The lines in Coleridge's *Dejection* —I was not then acquainted with them—exactly describe my case:

最初，我希望阴云能自己散去，但是没有。晚上好好睡一觉，是解决生活中小烦恼的特效药，但对它却没有作用。我醒来后，重新意

识到这个悲哀的事实。我带着它到所有朋友那里，到所有工作中去。几乎没有任何事情能使我忘记它几分钟。有几个月，阴云似乎越积越厚了。柯尔律治《沮丧》里面的几行诗——我当时还没读过——准确地描述了我的情况：

“A grief without a pang, void, dark and drear,

“没有剧痛的悲伤、空虚、忧郁、凄凉，

A drowsy, stifled, unimpassioned grief,

困倦的、窒息的、没有激情的悲伤，

Which finds no natural outlet or relief

无法用语言、叹息或泪水

In word, or sigh, or tear.”

自然地排遣。”

In vain I sought relief from my favourite books; those memorials of past nobleness and greatness from which I had always

hitherto drawn strength and animation. I read them now without feeling, or with the accustomed feeling minus all its charm; and I became persuaded, that my love of mankind, and of excellence for its own sake, had worn itself out. I sought no comfort by speaking to others of what I felt. If I had loved anyone sufficiently to make confiding my griefs a necessity, I should not have been in the condition I was. I felt, too, that mine was not an interesting, or in any way respectable distress. There was nothing in it to attract sympathy. Advice, if I had known where to seek it, would have been most precious. The words of Macbeth to the physician often occurred to my thoughts. But there was no one on whom I could build the faintest hope of such assistance. My father, to whom it would have been natural to me to have recourse in any practical difficulties, was the last person to whom, in such a case as this, I looked for help. Everything convinced me that he had no knowledge of any such mental state as I was suffering from, and that even if he could be made to understand it, he was not the physician who could heal it. My education, which was wholly his work, had been conducted without any regard to the possibility of its ending in this result; and I saw no use in giving him the pain of thinking that his plans had failed, when the failure was probably irremediable, and, at all events, beyond the power of *his* remedies. Of other friends, I had at that time none to whom I had any hope of making my condition intelligible. It was, however, abundantly intelligible to myself; and the more I dwelt upon it, the more hopeless it appeared.

我试图从最喜欢的书中寻求解脱，但没有用。那些对过去高尚和伟大的记录，我以前总能从中获得力量和活力，但现在读它们，我毫无感觉，或者仅仅有习惯性的感觉，却丧失了曾有的魅力。我开始相信，我对人类的热爱和对卓越本身的热爱已经耗尽了。我也没有告诉

别人我的感觉以寻求安慰。如果我疯狂地爱着一个人，让我觉得必须向他倾诉我的悲伤，我就不会陷入当时的境地了。我还觉得，我的痛苦并不是个有趣或者在任何方面可敬的沮丧。它不能博得同情。建议会是非常宝贵的，但我不知去哪里找寻。麦克白 [6_1] 对医生说的话，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让我寄希望于寻求这种帮助，即便是最微弱的希望。在我陷入任何实际困难的时候，自然应该去找父亲帮忙，但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我最不愿意求助的人。所有迹象都让我相信，他完全不了解我正在遭受的精神痛苦，即使能让他理解，他也不是能够治好它的医生。我的教育完全是他的成果，他在教导我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如果失败无法补救，并且完全超出了他的补救能力的话，让他承受计划失败的痛苦，我觉得完全没有用。当时，我也没有指望任何朋友可以理解我的情形。然而，我自己却非常理解，而且越细想，这情形越显得绝望。

My course of study had led me to believe, that all mental and moral feelings and qualities, whether of a good or of a bad kind, were the results of association; that we love one thing, and hate another, take pleasure in one sort of action or contemplation, and pain in another sort, through the clinging of pleasurable or painful ideas to those things, from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r of experience. As a corollary from this, I had always heard it maintained by my father, and was myself convinced, that the object of education should be to form the strongest possible associations of the salutary class; associations of pleasure with all things beneficial to the great whole, and of pain with all things hurtful to it. This doctrine appeared inexpugnable; but it now seemed to me, on retrospect, that my teachers had occupied themselves but superficially with the means of forming and keeping up these salutary associations. They seemed to have trusted altogether to the old familiar instruments, praise and blame, reward and punishment. Now, I did not doubt that by these means, begun early, and applied unremittingly,

intense associations of pain and pleasure, especially of pain, might be created, and might produce desires and aversions capable of lasting undiminished to the end of life. But there must always be something artificial and casual in associations thus produced. The pains and pleasures thus forcibly associated with things, are not connected with them by any natural tie; and it is therefore, I thought, essential to the durability of these associations, that they should have become so intense and inveterate as to be practically indissoluble, before the habitual exercise of the power of analysis had commenced. For I now saw, or thought I saw, what I had always before received with incredulity —that the habit of analysis has a tendency to wear away the feelings: as indeed it has, when no other mental habit is cultivated, and the analysing spirit remains without its natural complements and correctives. The very excellence of analysis (I argued) is that it tends to weaken and undermine whatever is the result of prejudice; that it enables us mentally to separate ideas which have only casually clung together: and no associations whatever could ultimately resist this dissolving force, were it not that we owe to analysis our clearest knowledge of the permanent sequences in nature; the real connexions between Things, not dependent on our will and feelings; natural laws, by virtue of which, in many cases, one thing is inseparable from another in fact; which laws, in proportion as they are clearly perceived and imaginatively realized, cause our ideas of things which are always joined together in Nature, to cohere more and more closely in our thoughts. Analytic habits may thus even strengthen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causes and effects, means and ends, but tend altogether to weaken those which are, to speak familiarly, a *mere* matter of feeling. They are therefore (I thought) favourable to prudence and clear- sightedness, but a perpetual worm at the root both of the passions and of the virtues; and, above all, fearfully undermine all desires, and all pleasures, which are the

effects of association, that i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I held, all except the purely physical and organic; of the entire insufficiency of which to make life desirable, no one had a stronger conviction than I had. These were the laws of human nature, by which, as it seemed to me, I had been brought to my present state. All those to whom I looked up, were of opinion that the pleasure of sympathy with human beings, and the feelings which made the good of others, and especially of mankind on a large scale, the object of existence, were the greatest and surest sources of happiness. Of the truth of this I was convinced, but to know that a feeling would make me happy if I had it, did not give me the feeling. My education, I thought, had failed to create these feelings in sufficient strength to resist the dissolving influence of analysis, while the whole course of my intellectual cultivation had made precocious and premature analysis the inveterate habit of my mind. I was thus, as I said to myself, left stranded at the commencement of my voyage, with a well-equipped ship and a rudder, but no sail; without any real desire for the ends which I had been so carefully fitted out to work for: no delight in virtue, or the general good, but also just as little in anything else. The fountains of vanity and ambition seemed to have dried up within me, as completely as those of benevolence. I had had (as I reflected) some gratification of vanity at too early an age: I had obtained some distinction and felt myself of some importance, before the desire of distinction and of importance had grown into a passion: and little as it was which I had attained, yet having been attained too early, like all pleasures enjoyed too soon, it had made me *blasé* and indifferent to the pursuit. Thus neither selfish nor unselfish pleasures were pleasures to me. And there seemed no power in nature sufficient to begin the formation of my character anew, and create, in a mind now irretrievably analytic, fresh associations of pleasure with any of the objects of human desire.

我的学习过程让我相信，所有心理和道德上的情感和品质，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联系的结果。我们喜欢这个东西，讨厌那个东西，进行这种行动或沉思很高兴，而进行另一种却很痛苦，这都是通过教育或经验的作用把愉快或痛苦的想法附加到这些东西上来实现的。从这种现象得出的推论就是，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为有益的事物形成最强大的联系。给所有对整体有益的东西以愉快的联系。给对整体有害的东西以痛苦的联系。我总是听到父亲坚持这一结论，我自己也深信不疑。这个学说看起来坚不可摧，但回想起来，现在我觉得好像我的老师都只是很肤浅地专注于形成和维持这些有益联系的方法。他们似乎完全信任常用的旧手段，如表扬和批评、奖励和惩罚。现在我并不怀疑，如果这些方法使用得早并坚持不懈的话，就可能会创造出来痛苦和愉快的强烈联系，尤其是痛苦的联系，也可能会制造出能够持续至生命尽头都不减弱的渴望和厌恶。但是，这样产生的联系肯定总会有人为的和偶然的因素。这些痛苦和快乐是强行跟事物联系起来的，而不是通过自然纽带联系起来的。因此我想，这些联系应该在习惯运用分析能力之前就变得非常强烈和深刻，从而在现实中不会被拆开，这对于巩固这些联系至关重要。因为现在我看到了，或者觉得我看到了自己以前总是半信半疑的东西，即分析的习惯往往会折损感情。在其他思考习惯还未形成而分析精神仍没有自然的补充和矫正的时候，确实如此。（我坚持认为）分析的优点在于它往往会减弱和破坏由偏见造成的任何结果，它能让我们从心理上区分开只是偶然结合在一起的想法，任何联系最终都无法抵抗这种分解的力量，我们只能把对自然界永恒秩序的清楚认识归功于分析。事物之间的真正联系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感情。根据自然法则，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事物在事实上和另一个事物密不可分。这些法则，按照我们清楚的感知和从想象中认识的程度，使我们对大自然中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事物的认识在思想中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因此分析的习惯甚至可能会加强原因和结果、手段和目标之间的联系，但是总体上往往会削弱纯粹感觉的东西（用大家熟悉的说法）。因此（我想）分析的习惯对于审慎和洞察力有利，但是永远是激情和美德根基处的害虫。最重要的是，它会摧毁所有由联系而成的渴望和快乐，也就是说，根据我所持的理论，除了纯物质和感官的渴望和快乐以外，其他的都会被破坏掉。我

比谁都更加深信不疑，分析的习惯绝不会让生活变得愉悦。这些是人类本性的规律，我目前的状态也是这些规律作用的结果。我所尊敬的人都认为，对人类的同情所产生的快乐，那种把为别人，尤其是为人类大规模地谋取福利作为生存目标的感觉，是幸福最伟大、最可靠的源泉。我深信这是真的，但是知道拥有某种感觉能让我幸福，并不能给我这种感觉。我想教育为我创造这些感觉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无法抵挡分析的毁灭性影响，而我的整个智力培养过程都使早熟又不成熟的分析成为我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习惯。因此我想，我在旅程刚开始时就搁浅了，虽然有装备精良的船只和舵，但是没有帆。我对做了精心准备去努力实现的目标没有真正的渴望，对美德或者公共利益没有兴趣，就像对其他事情一样。虚荣心和抱负的源泉像仁爱的源泉一样，似乎已经在我体内完全干涸了。（我回想起来）我在很小的时候虚荣心就曾获得了一些满足。在对荣誉和地位的渴望转化为激情之前，我获得了一些荣誉，觉得自己有些本事。事实上我获得的很少，而且得到的太早，就像所有享受得太快的快乐一样，它让我对这种追求感到厌倦和冷漠。因此，无论是自私的或不自私的快乐，对我来说都不是快乐。自然界似乎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重塑我的性格，在一个如今无法复原分析能力的头脑里创造出快乐与人类渴望的任何事物之间的新联系。

These were the thoughts which mingled with the dry, heavy dejection of the melancholy winter of 1826-7. During this time I was not incapable of my usual occupations. I went on with them mechanically, by the mere force of habit. I had been so drilled in a certain sort of mental exercise, that I could still carry it on when all the spirit had gone out of it. I even composed and spoke several speeches at the debating society, how, or with what degree of success, I know not. Of four years' continual speaking at that society, this is the only year of which I remember next to nothing. Two lines of Coleridge, in whom alone of all writers I have found a true description of what I felt, were often in my thoughts, not at

this time (for I had never read them), but in a later period of the same mental malady:

这些想法夹杂着1826年底-1827年初的那个忧郁的冬天里单调沉重的沮丧。这段时间里我还是能够从事日常的工作。但只是凭借习惯的力量，很机械地进行下去。我在智力运用上接受过良好的训练，因此可以在完全没有活力的时候仍继续进行。我甚至在辩论协会写了好几篇演讲稿，做了好几次演讲，怎么做的或者做得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在那个协会连续演说了四年，我几乎完全记不清的只有这一年。在所有诗人当中，我只在柯尔律治的诗里面发现两行对我的感觉的真实描述，这两行诗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不是在这时（因为我还没读到），而是在这次成长危机的后期：

"Work without hope draws nectar in a sieve,

"没有希望地工作，如同把美酒装进筛子，

And hope without an object cannot live."

没有目标的希望，无法存在。"

In all probability my case was by no means so peculiar as I fancied it, and I doubt not that many others have passed through a similar state; but the idiosyncrasies of my education had given to the general phenomenon a special character, which made it seem the natural effect of causes that it was hardly possible for time to

remove. I frequently asked myself, if I could, or if I was bound to go on living, when life must be passed in this manner. I generally answered to myself that I did not think I could possibly bear it beyond a year. When, however, not more than half that duration of time had elapsed, a small ray of light broke in upon my gloom. I was reading, accidentally, Marmontel's *Mémoires* , and came to the passage which relates his father's death, the distressed position of the family, and the sudden inspiration by which he, then a mere boy, felt and made them feel that he would be everything to them—would supply the place of all that they had lost. A vivid conception of the scene and its feelings came over me, and I was moved to tears. From this moment my burden grew lighter. The oppression of the thought that all feeling was dead within me was gone. I was no longer hopeless: I was not a stock or a stone. I had still, it seemed, some of the material out of which all worth of character, and all capacity for happiness, are made. Relieved from my ever-present sense of irremediable wretchedness, I gradually found that the ordinary incidents of life could again give me some pleasure; that I could again find enjoyment, not intense, but sufficient for cheerfulness, in sunshine and sky, in books, in conversation, in public affairs; and that there was, once more, excitement, though of a moderate, kind, in exerting myself for my opinions, and for the public good. Thus the cloud gradually drew off, and I again enjoyed life; and though I had several relapses, some of which lasted many months, I never again was as miserable as I had been.

我的情况很可能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特殊，而且我还相信很多人也经历过相似的情况。但是，我的教育的特质赋予了这一普遍现象一个很特殊的特点，使得它看起来像是某种原因引起的自然结果，几乎无法随着时间消逝。我经常问自己，如果生命必须以这种方式度过，我还能够继续活下去吗，或者一定要继续活下去吗？我通常回答自己

说，我觉得很可能无法忍受超过一年时间。然而至多刚过一半的时候，一小缕阳光打破了我的忧郁。我当时在读马蒙泰尔的《回忆录》，很偶然地读到有一部分讲述他父亲的去世、家人的哀伤，以及当时还只是个小男孩的他突然间受到的启示，他感觉到，也让家人感觉到他可以成为他们的一切——去替代他们失去的一切。对这个场景和感受逼真的想象震撼了我，我感动得落泪了。从这时起，我的负担变轻了。以为所有感情都在内心深处枯竭了的想法给我造成的压力消失了。我不再绝望，我不是树干，也不是石头。我好像还有一些能够形成品格的价值，具备追求幸福能力的东西。从一直存在的、无可救药的悲惨感觉中解脱出来，我慢慢发现，生活中的平凡小事还能再次给我带来乐趣。我能再次从阳光、天空、书籍、交谈和公共事务中找到快乐，虽不强烈，但是足以让我高兴。而且再一次有了为自己的信念，为公共利益而行动起来的兴奋感，尽管是适度的兴奋。就这样，阴云慢慢散去了，我重新享受生活的乐趣。尽管复发了好几次，有时还持续好几个月，但是我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痛苦。

The experiences of this period had two very marked effects on my opinions and character. In the first place, they led me to adopt a theory of life, very unlike that on which I had before I acted, and having much in common with what at that time I certainly had never heard of, the anti-self- consciousness theory of Carlyle. I never, indeed, wavered in the conviction that happiness is the test of all rules of conduct, and the end of life. But I now thought that this end was only to be attained by not making it the direct end. Those only are happy (I thought) who have their minds fixed on some object other than their own happiness; on the happiness of others, on the improvement of mankind, even on some art or pursuit, followed not as a means, but as itself an ideal end. Aiming thus at something else, they find happiness by the way. The enjoyments of life (such was now my theory) are sufficient to make it a pleasant thing, when they are taken *en passant* , without being

made a principal object. Once make them so, and they are immediately felt to be insufficient. They will not bear a scrutinizing examination. Ask yourself whether you are happy, and you cease to be so. The only chance is to treat, not happiness, but some end external to it, as the purpose of life. Let your self-consciousness, your scrutiny, your self-interrogation, exhaust themselves on that; and if otherwise fortunately circumstanced you will inhale happiness with the air you breathe, without dwelling on it or thinking about it, without either forestalling it in imagination, or putting it to flight by fatal questioning. This theory now became the basis of my philosophy of life. And I still hold to it as the best theory for all those who have but a moderate degree of sensibility and of capacity I for enjoyment; that is, for the great majority of mankind.

这段时期的经历对我的观点和性格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影响。首先，它引导我采纳了一个人生理论，和我以前遵循的理论很不一样，与卡莱尔的反自我意识理论倒有诸多相似之处，不过我当时自然对其闻所未闻。实际上，我一直坚信幸福是所有行为规则的检验标准，也是生活的目标，从没动摇过。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目标只有在不把它当作直接目标的时候才能实现。（我想）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幸福，他们不以自己的幸福为目标，而是把精力聚焦在别的事物上。聚焦在别人的幸福、人类的进步甚至某种艺术或追求上，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手段，而是把它本身当作理想的目标来追寻。这样把目标定在别的事物上，他们也顺便找到了幸福。当我们把生活中的快乐当作附带品，而不是作为首要目标来对待时，它们就足以让生活成为快乐的事情（这就是我现在的理论）。一旦把快乐作为首要目标，就会很快感觉到它们不够用，也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你一旦问自己是否快乐时，你就不再快乐了。唯一的办法是把快乐以外的目标，而不是快乐本身作为生活的目标。让你的自我意识，你的仔细观察，你的自我审问都耗费在那个目标上面吧。另外，如果够幸运的话，你能从空气中呼吸到

快乐，不必沉思或考虑，不会在想象中阻止它，或者用可怕的质问让它溃逃。这个理论现在成了我人生哲学的基础。对于所有只拥有普通感受能力和享乐能力的人来说，换句话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仍然认为它是最好的理论。

The other important change which my opinions at this time underwent, was that I, for the first time, gave its proper place, among the prime necessities of human well-being, to the internal culture of the individual. I ceased to attach almost exclusive importance to the ordering of outward circumstances, and the training of the human being for speculation and for action.

我的观点那时经历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我第一次把个人的精神文化当作人类福利的一个首要条件。我不再只重视外部环境的安排以及对人类思索和行动能力的训练。我现在从经验中得知，被动的感受性也像积极的能力一样需要培养，必须得到滋养、充实以及指引。我没有片刻忽略或者低估从前看到的那部分真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智育，或者否认分析的能力和习惯是个人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是，它的有些结果需要通过与其他培养形式结合起来得以修正。在各种能力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情感培养成为我伦理和哲学信条中的基本点之一。任何看上去能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东西都成为我的思想和爱好越来越关注的对象。

I had now learnt by experience that the passing susceptibilities needed to be cultivated as well as the active capacities, and required to be nourished and enriched as well as guided. I did not, for an instant, lose sight of, or undervalue, that part of the truth which I had seen before; I never turned recreant to intellectual culture, or ceased to consider the power and practice of analysis as

an essential condition both of individual and of social improvement But 1 thought that it had consequences which required to be corrected, by joining other kinds of cultivation with it. The maintenance of a due balance among the faculties now seemed to be of primary importance. The cultivation of the feelings became one of the cardinal points in my ethical and philosophical creed. And my thoughts and inclinations turned in an increasing degree towards whatever seemed capable of being instrumental to that object.I now began to find meaning in the things, which I had read or hear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poetry and art as instruments of human culture. But it was some time longer before I began to know this by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only one of the imaginative arts in which I had from childhood taken great pleasure, was music; the best effect of which (and in this it surpasses perhaps every other art) consists in exciting enthusiasm; in winding up to a high pitch those feelings of an elevated kind which are already in the character, but to which this excitement gives a glow and a fervour, which, though transitory at its utmost height, is precious for sustaining them at other times. This effect of music I had often experienced; but, like all my pleasurable susceptibilities, it was suspended during the gloomy period. I had sought relief again and again from this quarter, but found none. After the tide had turned, and I was in process of recovery, I had been helped forward by music, but in a much less elevated manner. I at this time first became acquainted with Weber's *Oberon* , and the extreme pleasure which I drew from its delicious melodies did me good by showing me a source of pleasure to which I was as susceptible as ever. The good, however, was much impaired by the thought that the pleasure of music (as is quite true of such pleasure as this was, that of mere tune) fades with familiarity, and requires either to be revived by intermittence, or fed by continual novelty. And it is very characteristic both of my then state, and of the general tone of my

mind at this period of my life, that I was seriously tormented by the thought of the exhaustibility of musical combinations. The octave consists only of five tones and two semi-tones, which can be put together in only a limited number of ways, of which but a small proportion are beautiful: most of these, it seemed to me, must have been already discovered, and there could not be room for a long succession of Mozarts and Webers, to strike out, as these had done, entirely new and surpassingly rich veins of musical beauty. This source of anxiety may, perhaps, be thought to resemble that of the philosophers of Laputa, who feared lest the sun should be burnt out. It was, however, connected with the best feature in my character, and the only good point to be found in my very unromantic and in no way honourable distress. For though my dejection, honestly looked at, could not be called other than egotistical, produced by the ruin, as I thought, of my fabric of happiness, yet the destiny of mankind in general was ever in my thoughts, and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my own. I felt that the flaw in my life, must be a flaw in life itself; that the question was, whether, if the reformers of society and government could succeed in their objects, and every person in the community were free and in a state of physical comfort, the pleasures of life, being no longer kept up by struggle and privation, would cease to be pleasures. And I felt that unless I could see my way to some better hope than this for human happiness in general, my dejection must continue; but that if I could see such an outlet, I should then look on the world with pleasure; content, as far as I was myself concerned, with any fair share of the general lot.

我现在开始发现，以前读到或听说的关于诗歌和艺术是人类文化重要传播工具的说法是很有意义的。但是通过亲身经历开始了解此事，是过了一阵子之后的事了。我从儿童时代就非常喜欢的有想象力

的艺术只有音乐，音乐的最佳作用在于激发热情（在这一点上，它可能超越了其他艺术），在于高度提升品质中已有的高尚情感。而音乐的刺激让这种情感发光发热，尽管这光和热处于顶点的时间很短暂，但在其他时刻用于维持高尚的情感却是很宝贵的。我经常体验音乐的这种效果。但是，和我所有愉快的情感一样，它在我沮丧的那段时期也中断了。我曾一次次地从这里面寻求安慰，但是没有找到。趋势扭转后，我进入到恢复过程，而音乐在其中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远不如以前那般慷慨激昂。这时，我第一次听了韦伯的《奥伯龙》，它那美妙的旋律向我展示了一种仍然容易感染我的快乐的源泉，我因而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快乐，这对我很有益。然而，我觉得音乐带来的快乐（特别是这种纯粹的曲调带来的快乐）会因熟悉而减弱，需要隔一段时间再听，或者不断翻新才能保持，这种想法把音乐带给我的益处削弱了不少。音乐创作可竭尽性的想法严重地折磨着我，这既很符合我当时的状态，也很符合这段时间我的总体心境。八度音阶只有五个全音和两个半音，它们只能按照有限的几种方法组合在一起，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很美妙。并且在我看来，这一小部分中的绝大多数也一定已经被人发现了，不可能再有空间让很多人像莫扎特和韦伯一样，创造出完全清新、无比丰富的音乐来。这种焦虑的源头可能会被认为和勒普泰岛[6_2]上害怕太阳会燃尽的哲学家类似。然而，它是和我性格里最好的特质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在我非常不浪漫、毫不可敬的忧虑中能找到的唯一优点。因为公正地看，我的沮丧是由于我幸福的构成遭到了毁灭，尽管这种沮丧只能被说成是任性的，然而我一直在思考人类总体的命运，并且不能把它和我的命运分开。我感觉，我人生中的缺点一定也是人生本身的瑕疵。问题在于，如果社会和政府改革家能实现他们的目标，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物质生活都是舒适的，人生中的快乐不再靠努力和艰难来维持的话，快乐是否就不再是快乐了。我觉得除非可以找到比这更好地为人类的总体幸福而努力的希望，否则我的沮丧就会继续下去；但是如果我能看到这样一条出路，我就应该愉快地看待世界。只要自己参与其中，公平地分享共同的命运，我就满意了。

This state of my thoughts and feelings made the fact of my reading Wordsworth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autumn of 1828), an important event of my life. I took up the collection of his poems from curiosity, with no expectation of mental relief from it, though I had before resorted to poetry with that hope. In the worst period of my depression, I had read through the whole of Byron (then new to me), to try whether a poet, whose peculiar department was supposed to be that of the intenser feelings, could rouse any feeling in me. As might be expected, I got no good from this reading, but the reverse. The poet's state of mind was too like my own. His was the lament of a man who had worn out all pleasures, and who seemed to think that life, to all who possess the good things of it, must necessarily be the vapid, uninteresting thing which I found it. His Harold and Manfred had the same burden on them which I had; and I was not in a frame of mind to desire any comfort from the vehement sensual passion of his *Giaours* , or the sullenness of his *Laras* . But while Byron was exactly what did not suit my condition, Wordsworth was exactly what did. I had looked into the *Excursion* two or three years before, and found little in it; and I should probably have found as little, had I read it at this time. But the miscellaneous poems, in the two-volume edition of 1815 (to which little of value was added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author's life), proved to be the precise thing for my mental wants at that particular juncture.

我的这种思想和情感状态，让第一次（1828年秋天）读华兹华斯成为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我是出于好奇才开始读他的诗集的，并没期盼从它那里得到精神慰藉，虽然我之前曾是带着这种希望去读诗的。在我最沮丧的那段时期，我读了拜伦的全部作品（我当时并不熟悉），想看看一个被认为特别善于抒发强烈感情的诗人能否激起我内心的任何情感。和预想的一样，我从这种阅读中没得到任何好处，

只有坏处。这位诗人的心境和我的极其相似。他的诗是消磨掉所有快乐的人的悲叹，他似乎认为，人生对于所有拥有它的美好的人来说一定很乏味无趣，就像我对人生的感觉一样。他的《哈罗尔德》和《曼弗雷德》带有和我一样的负担。以我当时的心境，也无法从他的《异教徒》的强烈感官激情中，或者《拉腊》的忧郁中得到任何安慰。拜伦完全不适合我的情形，华兹华斯却正好适合。两三年前，我浏览了《漫游》，几乎没什么收获。如果这时候读的话，很可能还是收获很少。但是1815年两卷版的诗集中各种各样的诗歌（在诗人的人生晚期，这本诗集没有受到赏识），正好是那个特殊时刻满足我精神需求的东西。

In the first place, these poems addressed themselves powerfully to one of the strongest of my pleasurable susceptibilities, the love of rural objects and natural scenery; to which I had been indebted not only for much of the pleasure of my life, but quite recently for relief from one of my longest relapses into depression. In this power of rural beauty over me, there was a foundation laid for taking pleasure in Wordsworth's poetry; the more so, as his scenery lies mostly among mountains, which, owing to my early Pyrenean excursion, were my ideal of natural beauty. But Wordsworth would never have had any great effect on me, if he had merely placed before me beautiful pictures of natural scenery. Scott does this still better than Wordsworth, and a very second-rate landscape does it more effectually than any poet. What made Wordsworth's poems a medicine for my state of mind, was that they expressed, not mere outward beauty, but states of feeling, and of thought coloured by feeling, under the excitement of beauty. They seemed to be the very culture of the feelings, which I was in quest of. In them I seemed to draw from a source of inward joy, of sympathetic and imaginative pleasure, which could be shared in by all human beings; which had no connection with struggle or imperfection, but would be made

richer by every improvement in the physical or social condition of mankind. From them I seemed to learn what would be the perennial sources of happiness, when all the greater evils of life shall have been removed. And I felt myself at once better and happier as I came under their influence. There have certainly been, even in our own age, greater poets than Wordsworth; but poetry of deeper and loftier feeling could not have done for me at that time what his did. I needed to be made to feel that there was real, permanent happiness in tranquil contemplation. Wordsworth taught me this, not only without turning away from, but with a greatly increased interest in, the common feelings and common destiny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delight which these poems gave me, proved that with culture of this sort, there was nothing to dread from the most confirmed habit of analysis.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Poems came the famous Ode, falsely called Platonic,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in which, along with more than his usual sweetness of melody and rhythm, and along with the two passages of grand imagery but bad philosophy so often quoted, I found that he too had had similar experience to mine; that he also had felt that the first freshness of youthful enjoyment of life was not lasting; but that he had sought for compensation, and found it, in the way in which he was now teaching me to find it. The result was that I gradually, but completely, emerged from my habitual depression, and was never again subject to it. I long continued to value Wordsworth less according to his intrinsic merits, than by the measure of what he had done for me. Compared with the greatest poets, he may be said to be the poet of unpoetical natures, possessed of quiet and contemplative tastes. But unpoetical natures are precisely those which require poetic cultivation. This cultivation Wordsworth is much more fitted to give, than poets who are intrinsically far more poets than he.

首先，这些诗强有力地触动了我最强烈的一种快乐情感，即对乡村事物和自然风光的热爱。不仅我人生中的很多快乐都得益于它，就是最近我从最长时间的沮丧中解脱出来，也得益于它。在这乡村美景的力量下，我打下了欣赏华兹华斯诗歌的基础。此外，他描述的风景大部分在山间，而我年轻时曾在比利牛斯山脉旅行过，所以他描写的是我理想的自然美。但是，如果华兹华斯只是把自然风景的美丽图画呈现在我面前，那他根本就不会对我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司各特在这上面比华兹华斯做得还要好一些，而非常普通的风景要比任何诗人更有效。华兹华斯的诗歌之所以是治疗我心情的良药，是因为它们不仅表达了外部美，还表达了内心感觉的状态以及在美的刺激下带有感情色彩的思想状态。它们似乎就是我寻求的情感陶冶。从它们那里，我似乎找到了内心喜悦、和谐和有想象力的快乐的源泉，这个源泉可以由整个人类分享。它与斗争或者瑕疵毫无联系，但是人类物质和社会环境的每次改善都能使它变得更丰富。从它们那里，我似乎得知了，当生活中所有大不幸都被排除的时候，什么会是幸福的永久源泉。在它们的影响下，我立刻感觉更好了，更高兴了。当然，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比华兹华斯更伟大的诗人。但在当时，感情更深刻、更崇高的诗歌也不能像他的诗歌那样影响我。我需要有人让我感觉到宁静的思索中有真实持久的快乐。华兹华斯教会了我不仅不需要逃避人类的共同感情和共同命运，反而应对其兴趣大增。这些诗歌给我带来的快乐证明了只要有这种陶冶，最根深蒂固的分析习惯也没什么可怕的。在这些诗歌的最后，出现了著名的“颂歌”，被人错误地称为柏拉图式“不朽的暗示”。其中，除了比他平时更甜美的旋律和节奏以及常被引用的两段宏大但哲理肤浅的意象之外，我还发现他也有过和我类似的经历。他也感觉到年轻人享受人生的最初新鲜感不会持久，但是，他用现在他教我的这种方法寻求并得到了补偿。结果我慢慢地但却彻底地从我习惯性的沮丧中解脱了出来，再也没有遭受过它的折磨。我一直重视华兹华斯，主要是因为衡量了他为我所做的这些而非其内在价值。和最伟大的诗人相比，可以说他是没有诗人气质的诗人，但是他拥有从容和喜爱沉思的风格。而无诗人气质正好是需要用诗歌陶冶的气质。华兹华斯远比其他本质上更像诗人的诗人适合给予这种陶冶。

It so fell out that the merits of Wordsworth were the occasion of my first public declaration of my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separation from those of my habitual companions who had not undergone a similar change. The person with whom at that time I was most in the habit of comparing notes on such subjects was Roebuck, and I induced him to read Wordsworth, in whom he also at first seemed to find much to admire: but I, like most Wordsworthians, threw myself into strong antagonism to Byron, both as a poet and as to his influence on the character. Roebuck, all whose instincts were those of action and struggle, had, on the contrary, a strong relish and great admiration of Byron, whose writings he regarded as the poetry of human life, while Wordsworth's, according to him, was that of flowers and butterflies. We agreed to have the fight out at our Debating Society, where we accordingly discussed for two evenings the comparative merits of Byron and Wordsworth, propounding and illustrating by long recitations our respective theories of poetry: Sterling also, in a brilliant speech, putting forward his particular theory. This was the first debate on any weighty subject in which Roebuck and I had been on opposite sides. The schism between us widened from this time more and more, though we continued for some years longer to be companions. In the beginning, our chief divergence relat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feelings. Roebuck was in many respect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vulgar notion of a Benthamite or Utilitarian. He was a lover of poetry and of most of the fine arts. He took great pleasure in music, in dramatic performances, especially in painting, and himself drew and designed landscapes with great facility and beauty. But he never could be made to see that these things have any value as aids in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Personally, instead of being, as Benthamites are supposed to be, void of feeling, he had very quick and strong sensibilities. But, like most Englishmen who

have feelings, he found his feelings stand very much in his way. He was much more susceptible to the painful sympathies than to the pleasurable, and, looking for his happiness elsewhere, he wished that his feelings should be deadened rather than quickened. And, in truth, the English character, and English social circumstances, make it so seldom possible to derive happiness from the exercise of the sympathies, that it is not wonderful if they count for little in an Englishman's scheme of life.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the sympathies as a constituent of individual happiness is an axiom, taken for granted rather than needing any formal statement; but most English thinkers always seem to regard them as necessary evils, required for keeping men's actions benevolent and compassionate. Roebuck was, or appeared to be, this kind of Englishman. He saw little good in any cultivation of the feelings, and none at all in cultivating them through the imagination, which he thought was only cultivating illusions. It was in vain I urged on him that the imaginative emotion which an idea, when vividly conceived, excites in us, is not an illusion but a fact, as real as any of the other qualities of objects; and, far from implying anything erroneous and delusive in our mental apprehension of the object, is quite consistent with the most accurate knowledge and most perfect practical recognition of all its physical and intellectual laws and relations. The intensest feeling of the beauty of a cloud lighted by the setting sun, is no hindrance to my knowing that the cloud is vapour of water, subject to all the laws of vapours in a state of suspension; and I am just as likely to allow for, and act on, these physical laws whenever there is occasion to do so, as if I had been incapable of perceiving any distinction between beauty and ugliness.

这样的结果是，评价华兹华斯的优点成为我第一次公开宣布新思

维方式，并与我那些没经历类似变化的同伴疏远的诱因。在此类问题上，我当时最习惯和罗巴克交换意见，我劝他读华兹华斯，他起先似乎也觉得华兹华斯很值得钦佩。但是我和大多数华兹华斯的追随者一样，强烈地抵制拜伦，既反对他的诗，也反对他对人们性格的影响。相反，作为行动派和奋斗派的罗巴克非常欣赏，也特别崇拜拜伦，他认为拜伦的作品是人类生活的诗歌，而华兹华斯的作品在他看来都是关于花朵和蝴蝶的。我们同意在辩论学会公开辩论，因此我们两个晚上都在那儿讨论拜伦和华兹华斯相形之下的优点，各自背诵冗长的诗歌理论并举例来说明这些优点。斯特林也用一个精彩的演讲提出了他自己独特的理论。这是罗巴克和我在有分量的问题上第一次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这时起，我们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接下来几年我们仍是朋友。起初，我们的主要分歧在于感情熏陶。罗巴克在很多方面与边沁主义者或者边沁主义者的流行看法非常不同。他很热爱诗歌以及大部分优秀艺术。他特别喜欢音乐、戏剧表演，尤其是绘画，他自己设计、描绘的风景画很流畅，很美。但是他从来都不明白这些东西对性格的形成有何等帮助。就个人而言，他不像人们想象的边沁主义者那样缺乏感情，他的感情非常敏锐，非常强烈。但是，和大多数有感情的英国人一样，他发现自己的感情非常碍事。与快乐的共鸣相比，他更容易受到痛苦的共鸣的影响，因此他在别处寻找快乐，希望自己的感情变迟钝，而不是敏锐。确实，英国人的性格和英国的社会环境使得英国人基本不可能从表达共鸣中得到幸福。因此如果共鸣在英国人的人生规划中无足轻重的话也不足为奇。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共鸣作为个人幸福的要素是极为重要的，是人们都习以为常的真理，不需要任何正式的声明。但是，似乎大多数英国思想家为了使人们的行为仁慈而慈悲，都把它当作不可避免的灾祸。罗巴克就是这种英国人，或者看起来是这样。他几乎看不到任何感情熏陶的好处，完全看不到通过想象培养感情的好处，他认为这只是在培养错觉。我徒劳地劝说他，如果想法构思得生动就会激发我们富有想象力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幻想，而是事实，像物体的任何其他性质一样真实。在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中这种感情绝不意味着错误和幻想，而是与该事物所有物质的、精神的规律及关系的最精确的了解以及最完美的实践认知相一致的。对落日染红了晚霞之美的最强烈的感情，不会阻碍我知道云是水

蒸气，知道它遵从所有处于悬浮状态的水蒸气的定律。我同样会一有机会就考虑这些自然规律，并依照这些规律行事，就好像我不能察觉美和丑的任何区别一样。

While my intimacy with Roebuck diminished, I fell more and more into friendly intercourse with our Coleridgian adversaries in the Society, Frederick Maurice and John Sterling, both subsequently so well known, the former by his writings, the latter through the biographies by Hare and Carlyle. Of these two friends, Maurice was the thinker, Sterling the orator, and impassioned expositor of thoughts which, at this period, were almost entirely formed for him by Maurice.

我和罗巴克越来越疏远了，却开始和协会里面我们柯尔律治派的对手——弗雷德里克·莫里斯和约翰·斯特林——走得越来越近，两人后来都很出名，前者是由于他的著作，后者是由于黑尔和卡莱尔给他写的传记。这两个朋友中，莫里斯是位思想家，而斯特林是位演说家，还是热情洋溢的思想评论员，当时他阐述的思想几乎全都是莫里斯为他塑造的。

With Maurice I had for some time been acquainted through Eyton Tooke, who had known him at Cambridge, and although my discussions with him were almost always disputes, I had carried away from them much that helped to build up my new fabric of thought, in the same way as I was deriving much from Coleridge, and from the writings of Goethe and other German authors which I read during these years. I have so deep a respect for Maurice's character and purposes, as well as for his great mental gifts, that it is with some unwillingness I say anything which may seem to place

him on a less high eminence than I would gladly be able to accord to him. But I have always thought that there was more intellectual power wasted in Maurice than in any other of my contemporaries. Few of them certainly have had so much to waste. Great powers of generalization, rare ingenuity and subtlety, and a wide perception of important and unobvious truths, served him not for putting something better into the place of the worthless heap of received opinions on the great subjects of thought, but for proving to his own mind that the Church of England had known everything from the first, and that all the truths on the ground of which the Church and orthodoxy have been attacked (many of which he saw as clearly as anyone) are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 the Thirty-nine Articles, but are better understood and expressed in those Articles than by anyone who rejects them. I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find any other explanation of this, than by attributing it to that timidity of conscience, combined with original sensitiveness of temperament, which has so often driven highly gifted men into Romanism, from the need of a firmer support than they can find in the independent conclusions of their own judgment. Any more vulgar kind of timidity no one who knew Maurice would ever think of imputing to him, even if he had not given public proof of his freedom from it, by his ultimate collision with some of the opinions commonly regarded as orthodox, and by his noble origination of the Christian Socialist movement. The nearest parallel to him, in a moral point of view, is Coleridge, to whom, in merely intellectual power, apart from poetical genius, I think him decidedly superior. At this time, however, he might be described as a disciple of Coleridge, and Sterling as a disciple of Coleridge and of him. The modifications which were taking place in my old opinions gave me some points of contact with them; and both Maurice and Sterling were of considerable use to my development. With Sterling I soon became very intimate, and was more attached to him than I have

ever been to any other man. He was indeed one of the most lovable of men. His frank, cordial, affectionate, and expansive character; a love of truth alike conspicuous in the highest things and the humblest; a generous and ardent nature, which threw itself with impetuosity into the opinions it adopted, but was as eager to do justice to the doctrines and the men it was opposed to, as to make war on what it thought their errors; and an equal devotion to the two cardinal points of Liberty and Duty, formed a combination of qualities as attractive to me as to all others who knew him as well as I did. With his open mind and heart, he found no difficulty in joining hands with me across the gulf which as yet divided our opinions. He told me how he and others had looked upon me (from hearsay information), as a "made" or manufactured man, having had a certain impress of opinion stamped on me which I could only reproduce; and what a change took place in his feelings when he found, in the discussion on Wordsworth and Byron, that Wordsworth, and all which that name implies, "belonged" to me as much as to him and his friends. The failure of his health soon scattered all his plans of life, and compelled him to live at a distance from London, so that after the first year or two of our acquaintance, we only saw each other at distant intervals. But (as he said himself in one of his letters to Carlyle) when we did meet it was like brothers. Though he was never,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d, a profound thinker, his openness of mind, and the moral courage in which he greatly surpassed Maurice, made him outgrow the dominion which Maurice and Coleridge had once exercised over his intellect; though he retained to the last a great but discriminating admiration of both, and towards Maurice a warm affection. Except in that short and transitory phasis of his life, during which he made the mistake of becoming a clergyman, his mind was ever progressive: and the advance he always seemed to have made when I saw him after an interval, made me apply to him

what Goethe said of Schiller, “erhatteeinefurchtlicheFortschreitung.” He and I started from intellectual points almost as wide apart as the poles, but the distance between us was always diminishing: if I made steps towards some of his opinions, he, during his short life, was constantly approximating more and more to several of mine: and if he had lived, and had health and vigour to prosecute his ever assiduous self-culture, there is no knowing how much further this spontaneous assimilation might have proceeded.

有一阵子我曾通过艾顿·图克与莫里斯相识（他们俩是在剑桥认识的），尽管我和他之间的讨论几乎总是争论，但我还是从中得到很多东西，帮助构建我的新思想，就像我那些年读柯尔律治、歌德和其他德国作家的著作受益很多一样。我非常尊敬莫里斯的品格和意志，还有他伟大的智力天赋，与我很乐意能给予他的称赞相比，如果我说了些可能不足以显示他的杰出的话，那也不是我情愿的。但我总觉得，莫里斯比我任何同辈人浪费的智力都要多。当然，也几乎没人有那么多可以浪费的智力。他有强大的概括能力，罕见的独创性和辨别能力，能广泛地领悟重要却不明显的真理，但他没有用来在伟大的思想主题上提出更好的东西，以代替大量无价值的陈腐观点，而是用来向自己证明，英国国教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那些真理——教会和正统观念因它们而受到攻击（其中有很多他和别人看得一样清楚）——不仅和三十九信条 [6_3] 一致，而且在这些条款中这些真理被理解和阐释得比任何反对它们的人做得都好。对此我从来都没能找到任何其他解释，除了把它归因于良心上的胆怯和性格上的天生敏感，这经常迫使天赋极高的人接受天主教，因为与他们从自己的判断得出的独立结论相比，他们需要更稳固的支持。任何认识莫里斯的人，都永远不会想要把更庸俗的胆怯归咎于他，即使他没有通过采取和一些通常被认为正统的观点最终爆发冲突，并发起高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手段以此向公众证明自己没有这种胆怯。从精神角度来看，与他最类似的人物是柯尔律治，不去看诗歌天赋，仅从智力上讲的话，我想他明

显比柯尔律治更出众。然而这时，他可能会被描述为柯尔律治的追随者，而斯特林则被描述为柯尔律治和他的追随者。我的旧观点正在经历的改变给了我一些与他们接触的机会。莫里斯和斯特林两人都对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和斯特林很快就成了密友，我对他比曾经对任何人都更加热爱。他确实是个非常可爱的人。他性格坦率，热忱，深情又开朗。热爱显现于最高尚和最平凡东西中的真理。他的性情慷慨大方，热情洋溢，这也给他所采纳的观点染上了冲动的色彩，但是正如他会向他认为的对方的错误开战一样，他也能公平地对待所反对的学说和人，他给予自由和义务这两个基本点同样的热爱，他结合了这么多优秀品质，不仅吸引了我，还吸引了所有像我一样了解他的人。他思想开明，胸襟开阔，因此超越了当时我们观点之间的巨大分歧，并和我成为朋友，他一点都不觉得困难。他告诉我他和别人是怎么看我的（道听途说的消息），他们觉得我是“人造的”或机器制造的人，身上刻着别人的观点，而我只能机械地复制。但当他和我讨论华兹华斯和拜伦的时候，发现华兹华斯以及这个名字意味着的一切像属于他和他的朋友一样也“属于”我时，他的感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健康的衰退很快打碎了他所有的人生规划，迫使他住到离伦敦较远的地方，因此，在我们认识了一两年之后，我们只能间隔很长时间才能见一次面了。但是（就像他在给卡莱尔的某封信中说的），我们见面的时候就像兄弟一样。尽管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造诣很深的思想家（从思想家这个词的完整意义来讲），但他思想开阔，而且在勇气上远远超过莫里斯，这让他超越了莫里斯和柯尔律治对他智力上的支配。尽管他直到最后还保持着对这两个人强烈但有判断的崇拜，尤其是对莫里斯是种热烈的喜爱。在他的一生中，除了那一段很短暂的时间他错误地成为牧师之外，他的思想一直都在进步，每次在间隔一段时间后见到他时，他似乎总能让我看到这种进步，这让我把歌德评价席勒的话用在他身上，“他的进步真的是突飞猛进”。我和他认识的时候，两人思想上的距离几乎像两极一样远，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总是在缩小。我向着他的某些观点靠近了，他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也经常越来越接近我的好几个观点。如果他还活着，健康和精力还允许他不断地刻苦自学的话，真不知道这种自然的同化会进行到什么程度。

After 1829 I withdrew from attendance on the Debating Society. I had had enough of speech-making, and was glad to carry on my private studies and meditations without any immediate call for outward assertion of their results. I found the fabric of my old and taught opinions giving way in many fresh places, and I never allowed it to fall to pieces, but was incessantly occupied in weaving it anew. I never, in the course of my transition, was content to remain, for ever so short a time, confused and unsettled. When I had taken in any new idea, I could not rest till I had adjusted its relation to my old opinions, and ascertained exactly how far its effect ought to extend in modifying or superseding them.

1829年以后，我不再出席辩论学会。我已经作了足够多的演讲，很高兴去继续我的自学和沉思，而且不需要立刻公布它们的结果。我发现自己以前学来的观念结构在很多新地方垮掉了，但我从来不允许它破碎，而总是忙着重新编织。在我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我从来不会满足于困惑和疑虑的状态，即使这么短的时间也不行。在接受任何新观点时，只有调整好它和我的旧观点的关系，并确定它在修改或取代旧观点的时候到底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之后，我才能安心。

The conflicts which I had so often had to sustain in defending 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laid down in Bentham's and my father's writings, and the acquaintance I had obtained with other schools of political thinking, made me aware of many things which that doctrine, professing to be a theory of government in general, ought to have made room for, and did not. But these things, as yet, remained with me rather as corrections to be made in applying the theory to practice, than as defects in the theory. I felt that politics could not be a science of specific experience; and that the accusations against the Benthamic theory of *being* a theory, of

proceeding *a priori* by way of general reasoning, instead of Baconian experiment, showed complete ignorance of Bacon's principles, and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At this juncture appeared in the *Edinburgh Review* , Macaulay's famous attack on my father's *Essay on Government* . This gave me much to think about. I saw that Macaulay's conception of the logic of politics was erroneous; that he stood up for the empirical mode of treating political phenomena, against the philosophical; that even in physical science his notions of philosophizing might have recognised Kepler, but would have excluded Newton and Laplace. But I could not help feeling, that though the tone was unbecoming (an error for which the writer, at a later period, made the most ample and honourable amends), there was truth in several of his strictures on my father's treatment of the subject; that my father's premises were really too narrow, and included but a small number of the general truths on which, in politics, the important consequences depend. Identity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governing body and the community at large is not, in any practical sense which can be attached to it, the only thing on which good government depends; neither can this identity of interest be secured by the mere conditions of election. I was not at all satisfied with the mode in which my father met the criticisms of Macaulay. He did not, as I thought he ought to have done, justify himself by saying, “I was not writing a scientific treatise on politics, I was writing an argument for parliamentary reform.” He treated Macaulay's argument as simply irrational; an attack upon the reasoning faculty; an example of the saying of Hobbes, that When reason is against a man, a man will be against reason. This made me think that there was really something more fundamentally erroneous in my father's conception of philosophical method, as applicable to politics, than I had hitherto supposed there was. But I did not at first see clearly what the error might be. At last it flashed upon me all at once in the

course of other studies. In the early part of 1830 I had begun to put on paper the ideas on Logic (chiefly on the distinctions among Terms, and the import of Propositions) which had been suggested and in part worked out in the morning conversations already spoken of. Having secured these thoughts from being lost, I pushed on into the other parts of the subject, to try whether I could do anything further towards clearing up the theory of logic generally. I grappled at once with the problem of Induction, postponing that of Reasoning, on the groun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obtain premises before we can reason from them. Now, Induction is mainly a process for finding the causes of effects: and in attempting to fathom the mode of tracing causes and effects in physical science, I soon saw that in the more perfect of the sciences, we ascend, by generalization from particulars, to the tendencies of causes considered singly, and then reason downward from those separate tendencies, to the effect of the same causes when combined. I then asked myself, what is the ultimate analysis of this deductive process; the common theory of the syllogism evidently throwing no light upon it. My practice (learnt from Hobbes and my father) being to study abstract principles by means of the best concrete instances I could find, the Composition of Forces, in dynamics, occurred to me as the most complete example of the logical process I was investigating. On examining, accordingly, what the mind does when it applies the principle of the Composition of Forces, I found that it performs a simple act of addition. It adds the separate effect of the one force to the separate effect of the other, and puts down the sum of these separate effects as the joint effect. But is this a legitimate process? In dynamics, and in all the mathematical branches of physics, it is; but in some other cases, as in chemistry, it is not; and I then recollected that something not unlike this was pointed out as one of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chemical and mechanical phenomena,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at favourite of my boyhood,

Thompson's *System of Chemistry* . This distinction at once made my mind clear as to what was perplexing me in respect to the philosophy of politics. I now saw, that a science is either deductive or experimental, according as, in the province it deals with, the effects of causes when conjoined, are or are not the sums of the effects which the same causes produce when separate. It followed that politics must be a deductive science. It thus appeared, that both Macaulay and my father were wrong; the one in assimilating the method of philosophizing in politics to the purely experimental method of chemistry; while the other, though right in adopting a deductive method, had made a wrong selection of one, having taken as the type of deduction, not the appropriate process, that of the deductive branch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but the inappropriate one of pure geometry, which, not being a science of causation at all, does not require or admit of any summing-up of effects. A foundation was thus laid in my thoughts for the principal chapters of what I afterwards published on the Logic of the Moral Sciences; and my new position in respect to my old political creed, now became perfectly definite.

在为边沁和我父亲著作中的政府理论辩护时我经常必须面对的一些冲突，以及对其他政治思想学派的了解，使我意识到那个自称政府概论的学说本应腾出空间说明但却没有说明的很多事情。但是到那时为止，我仍然认为这些事情是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时要做的修正，而不是理论本身的缺陷。我觉得，政治学不应该是特定经验的科学。有人谴责功利主义理论不是理论，谴责它用一般性的推理得出理论，而不用培根的实验方法，这显示了他们完全不了解培根原则和实证研究的必要条件。在这个当口上，《爱丁堡评论》上发表了麦考利攻击我父亲《论政府》的著名文章。这件事让我思考了很多。我知道麦考利的政治学逻辑的观念是错误的，他支持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待政治现象，反对用哲学方法；甚至在自然科学上，他的哲学探讨观念可能和

开普勒[6_4]的一致，但会排除牛顿和拉普拉斯[6_5]。然而我还是感觉到，尽管他的语气不得体（后来作者对这个错误作了非常充分、可敬的改正），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对父亲的好几处责难还是有道理的。父亲的前提的确太狭窄了，只包含了政治学中的重要结论所依据的一小部分普遍真理。统治集团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一致，在任何实际意义上，都不是善政依赖的唯一条件。这种利益一致也不能仅通过选举制度得到确保。我根本不满意父亲处理麦考利的批评的方式。他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通过说“我不是在写一篇政治学的学术论文，我是在为议会改革作论证”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认为麦考利的论证完全不合理，是对推理才能的攻击，也例证了霍布斯的一句名言：当理性无视人的时候，人也会无视理性。这让我觉得，与我先前认为的相比，父亲的哲学方法观念应用在政治学上确实存在更根本性的错误。但是起初，我并没有看清楚错误可能是什么。最后，我在学习其他东西的时候忽然想起来了。1830年初，我开始把逻辑学的一些观点写下来（主要是术语区分和命题意义），都是在之前提到的上午交谈中提出来的，有一部分也是那时解决的。确保这些想法没有丢失之后，我继续努力探索这个主题的其他部分，试试看能不能更进一步全面地整理逻辑学的理论。我立刻抓住归纳法这个问题，暂时搁置推理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先获得前提，然后才能从前提进行推理。目前，归纳法主要是寻找导致结果的原因的过程。在试图弄清楚自然科学中追踪原因和结果的方法时我很快发现，在更完善的科学中我们通过对特殊性的概括，形成了逐一考虑原因的趋势，然后从那些单独的可能性向下推论，找出同样的原因结合起来引起的结果。然后，我问自己，这个推论过程的最终分析是什么？普通的三段论的理论显然没有给出解释。我的做法（从霍布斯和我父亲那里学的）是用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具体例子，学习抽象的原理，我想起来动力学里的力的合成对我正在研究的逻辑过程来说是最完美的例子。因此，我去研究大脑在应用力的合成原理的时候究竟在做什么，结果发现它只是在进行简单的加法。它把一种力量的单独作用加在另一种力量的单独作用上。但是，这个过程合理吗？在动力学以及物理学的所有精确分支里面，是合理的。但是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比如化学，就不合理了。那时我回想起来，在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汤姆森《化学系统》的引言中，提到

过跟这个类似的情况，并指出这是化学现象和机械现象的一个区别。这个区别立刻让我弄清了政治哲学中让我困惑的是什么东西。我现在明白了，一门科学要么是演绎的，要么是实证的，这取决于其所涉及的领域中，各种原因联合造成的结果和分开造成结果的简单相加是否相同。因此，政治学一定是门演绎的科学。这样看来，麦考利和我父亲都错了。前者把政治学中哲学探讨的方法等同于化学中纯粹的实验方法，而后者尽管采用演绎法是对的，但是选择了错误的演绎法，没有采用适当的自然哲学的演绎法分支，而是选择不适当的纯粹几何学的演绎法分支，这根本就不是因果关系的科学，不需要也不容许对结果作任何概括。这为我后来出版的《论伦理学的逻辑》一书中的主要章节打下了思想基础。我对自己的旧政治信条的新立场现在也非常明确了。

If I am asked, what system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 substituted for that which, as a philosophy, I had abandoned, I answer, No system: only a conviction that the true system was something much more complex and many-sided than I had previously had any idea of, and that its office was to supply, not a set of model institutions, but principles from which the institutions suitable to any given circumstances might be deduced. The influences of European, that is to say, Continental, thought, and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reac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gainst the eighteenth, were now streaming in upon me. They came from various quarters: from the writings of Coleridge, which I had begun to read with interest even before the change in my opinions; from the Coleridgians with whom I was in personal intercourse; from what I had read of Goethe; from Carlyle's early articles in the *Edinburgh* and *Foreign Reviews* , though for a long time I saw nothing in these (as my father saw nothing in them to the last) but insane rhapsody. From these sources, and from the acquaintance I kept up with the French literature of the time, I derived, among other ideas which the general turning upside down

of the opinions of European thinkers had brought uppermost, these in particular: That the human mind has a certain order of possible progress, in which some things must precede others, an order which governments and public instructors can modify to some, but not to an unlimited extent: that all question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re relative, not absolute, and that different stages of human progress not only *will* have, but *ought* to have, different institutions: that government is always either in the hands, or passing into the hands, of whatever is the strongest power in society, and that what this power is, does not depend on institutions, but institutions on it: that any general theory or philosophy of politics supposes a previous theory of human progress, and that this is the same thing with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se opinions, true in the main, were held in an exaggerated and violent manner by the thinkers with whom I was now most accustomed to compare notes, and who, as usual with a reaction, ignored that half of the truth which the thinke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aw. But though, at one period of my progress, I for some time undervalued that great century, I never joined in the reaction against it, but kept as firm hold of one side of the truth as I took of the other. The fight betwee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eighteenth always reminded me of the battle about the shield, one side of which was white and the other black. I marvelled at the blind rage with which the combatants rushed against one another. I applied to them, and to Coleridge himself, many of Coleridge's sayings about half truths; and Goethe's device, “many-sidedness,” was one which I would most willingly, at this period, have taken for mine.

如果问我用哪种政治哲学体系代替了已经放弃的哲学，我的回答是没有体系，只是一个信念，相信真正的体系远比我之前知道的更复杂，更多面，它的职责在于提供原则，从这些原则中可以推导出适合

任何特定环境的制度，而不是提供一套模范制度。欧洲思想的影响，更确切地说是欧洲大陆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那些19世纪反抗18世纪的思想，现在正在向我涌过来。这些思想来自各个方向：柯尔律治，我甚至在信念改变前就开始兴致勃勃地读他的作品了；与我有私交的柯尔律治派的人；我读过的歌德的作品；卡莱尔在《爱丁堡评论》和《外国评论》上的早期文章，尽管很长时间以来，我在这些文章中除了愚蠢的狂言什么都没看到（我父亲到最后也什么都没看到）。从这些思想来源以及当时我一直熟读的法国文学中，我得出一些看法，它们的重要性由于欧洲思想家的观点被完全颠倒而显现出来，尤其是以下这些：人类大脑对可能的进步有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之内，有些事情必须先于另一些事情，这种秩序可以由政府和公众指导人员进行一定的修改，但修改是有限度的。政治体制的所有问题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人类进步的不同阶段不仅会有而且应该有不同的体制。政府要么就在社会上最强大的力量手里，要么就会传递到它的手里，至于那个力量是什么，不取决于制度，制度反而要取决于它。任何广义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都假定先前有一个人类进步的理论，这和历史哲学是一样的。这些大体上正确的观点被现在经常和我交换意见的思想家们以夸张、曲解的方式所持有，并且他们像一般的保守派一样，忽视了18世纪的思想家看到的那一半事实。尽管我在进步的某段时期也有一阵子低估了那个伟大的世纪，但是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反对它，而是像对待真理的那一面一样，紧紧坚持真理的这一面。19世纪和18世纪之间的斗争让我想起盾牌的战争，它一面是黑的，一面是白的。我惊讶于战士们互相猛攻时所带有的盲目愤怒。我把柯尔律治很多关于半真理的名言用在他们身上，以及柯尔律治本人身上。我此时最愿意把歌德的“多面性”策略当成我自己的策略。

The writers by whom, more than by any others, a new mode of political thinking was brought home to me, were those of the St. Simonian school in France. In 1829 and 1830 I became acquainted with some of their writings. They were then only in the earlier stages of their speculations. They had not yet dressed out their

philosophy as a religion, nor had they organized their scheme of Socialism. They were just beginning to question the principle of hereditary property. I was by no means prepared to go with them even this length; but I was greatly struck with the connected view which they for the first time presented to me, of the natural order of human progress; and especially with their division of all history into organic periods and critical periods. During the organic periods (they said) mankind accept with firm conviction some positive creed, claiming jurisdiction over all their actions, and containing more or less of truth and adaptation to the needs of humanity. Under its influence they make all the progress compatible with the creed, and finally outgrow it; when a period follows of criticism and negation, in which mankind lose their old convictions without acquiring any new ones, of a general or authoritative character, except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old are false. The period of Greek and Roman polytheism, so long as really believed in by instructed Greeks and Romans, was an organic period, succeeded by the critical or sceptical period of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other organic period came in with Christianity. The corresponding critical period began with the Reformation, has lasted ever since, still lasts, and cannot altogether cease until a new organic period has been inaugurated by the triumph of a yet more advanced creed. These ideas, I knew, were not peculiar to the St. Simonians; on the contrary, they were the general property of Europe, or at least of Germany and France, but they had never, to my knowledge, been so completely systematized as by these writers, nor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critical period so powerfully set forth; for I was not then acquainted with Fichte's *Lectur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sent Age* . In Carlyle, indeed, I found bitter denunciations of an “age of unbelief,” and of the present age as such, which I, like most people at that time, supposed to be passionate protests in favour of the old modes of belief. But all that was true in these

denunciations, I thought that I found more calmly and philosophically stated by the St. Simonians. Among their publications, too, there was one which seemed to me far superior to the rest; in which the general idea was matured into something much more definite and instructive. This was an early work of Auguste Comte, who then called himself, and even announced himself in the title-page as, a pupil of Saint Simon. In this tract M. Comte first put forth the doctrine, which he afterwards so copiously illustrated, of the natural succession of three stages in every department of human knowledge: first, the theological, next the metaphysical, and lastly, the positive stage; and contended, that social science must be subject to the same law; that the feudal and Catholic system was the concluding phasis of the theological state of the social science, Protestantism the commencement, and the doctrin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metaphysical; and that its positive state was yet to come. This doctrine harmonized well with my existing notions, to which it seemed to give a scientific shape. I already regarded the methods of physical science as the proper models for political. But the chief benefit which I derived at this time from the trains of thought suggested by the St. Simonians and by Comte, was, that I obtained a clearer conception than ever before of the peculiarities of an era of transition in opinion, and ceased to mistake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an era, for the normal attributes of humanity. I looked forward, through the present age of loud disputes but generally weak convictions, to a future which shall unite the best qualities of the critical with the best qualities of the organic periods; unchecked liberty of thought, unbounded freedom of individual action in all modes not hurtful to others; but also, convictions as to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useful and pernicious, deeply engraven on the feelings by early education and general unanimity of sentiment, and so firmly grounded in reason and in

the true exigencies of life, that they shall not, like all former and present creeds, religious, ethical, and political, require to be periodically thrown off and replaced by others.

与其他作家相比，最能使我认识到一个新政治思考方式的作家，是法国的圣西门学派。1829年和1830年，我了解了他们的一些作品。当时，他们还处于思索的初期阶段。他们还没有把自己的哲学装扮成一种信仰，也没有构思社会主义方案。他们只是刚开始质疑世袭财产的原则。我绝对没有准备追随他们，即便只是到这种程度。但是他们第一次呈现给我人类进步自然顺序的连贯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们把所有历史划分成建制时代和批判时代。在建制时代，（他们说）人类深信不疑地接受一些积极的信条，为他们的所有活动寻求权力，并或多或少地容纳真理和调整以适应人类的需求。在这一信条的影响下，他们实现了和信条兼容的所有进步，并最终舍弃了它。这时，另一个充满批判和否定的时代来临了，在这个时代，人们失去了他们旧的信念，而没有获得任何新的、全面的或权威的信念，只是坚信旧的是错的。希腊和罗马多神教的时代，在受过教育的希腊和罗马人真正信仰它的时间内是个建制时代，接下来是希腊哲学家的批判或怀疑时代。另一个建制时代是应基督教而生的。相应的批判时代从宗教改革 [6_6] 开始，从那时起一直持续到现在，在一个新的建制时代以更先进的信条取胜开始之前，这一时代不会完全停止。我知道这些观点并非独属于圣西门学派；相反，它们是整个欧洲的财富，或者至少是德国和法国的。但是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人像这些作家那样把它们全面系统化，也没有人像他们一样强有力地提出批判时代的显著特征。因为那时，我还没读过菲希特 [6_7] 的演说集《当代特征》。我确实发现卡莱尔激烈地谴责“无信仰的时代”和如今这样一个时代，我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这一时代是支持旧的信仰模式激昂的抗议。但是这些谴责中所有正确的东西，我认为圣西门学派的人陈述得更冷静，更有哲理性。在他们的出版物中，我也发现有一本远比其他的更出众。在这本书里面，总体的观点被展开得更明确，更有启发性。这就是奥古斯特·孔德 [6_8] 早期的一个作品，他当时称自己

是圣西门的弟子，甚至在扉页上公开这样宣布。在这个小册子里，孔德先生首次提出了他后来加以详细阐述的学说，即人类知识的每个领域都有三个阶段的自然演替——首先是神学的，接下来是形而上学的，最后是实证的阶段。他主张社会科学也必须受相同规律的支配。封建制度和天主教制度是社会科学神学状态的最后阶段，新教是形而上学阶段的开始，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是它的结束，但实证阶段尚未到来。这个学说和我现有的观念很一致，似乎还显示出了科学性。我已经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政治学的合适模型。但是，这时我从圣西门学派和孔德提出的一连串思考中得到的主要益处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了解了一个过渡时代的特征，不再把这样一个时代的道德和思维特征误认为是人类的正常属性。透过当代喧哗的争论和通常很软弱的信念，我期望未来会结合批判时代和建制时代最好的特性：思想上无拘无束的自由，以及在不损害别人的情况下，个人所有行为方式的极大自由。但是，关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有益的，以及什么是有害的信念，已经通过早期教育和一致的情感深深地铭刻在了感觉之上，并稳固地植根于理智和人生的真正需求中，它们不会像以前和现在所有的宗教、伦理和政治信条一样，需要定期地被抛弃和取而代之。

M.Comte soon left the St. Simonians, and I lost sight of him and his writings for a number of years. But the St. Simonians I continued to cultivate. I was kept *au courant* of their progress by one of their most enthusiastic disciples, M. Gustave d'Eichthal, who about that time passed a considerable interval in England. I was introduced to their chiefs, Bazard and Enfantin, in 1830; and as long as their public teachings and proselytism continued, I read nearly everything they wrote. Their criticisms on the common doctrines of Liberalism seemed to me full of important truth; and it was partly by their writings that my eyes were opened to the very limited and temporary value of the old political economy, which assumes private property and inheritance as indefeasible facts, and

freedom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as the *dernier mot* of social improvement. The scheme gradually unfolded by the St. Simonians, under which the labour and capital of society would be managed for the general account of the community, every individual being required to take a share of labour, either as thinker, teacher, artist, or producer, all being classed according to their capacity, and remunerated according to their work, appeared to me a far superior description of Socialism to Owen's. Their aim seemed to me desirable and rational, however their means might be inefficacious; and though I neither believed in the practicability, nor in the beneficial operation of their social machinery, I felt that the proclamation of such an ideal of human society could not but tend to give a beneficial direction to the efforts of others to bring society, as at present constituted, nearer to some ideal standard. I honoured them most of all for what they have been most cried down for—the boldness and freedom from prejudice with which they treated the subject of the family, the most important of any, and needing more fundamental alterations than remain to be made in any other great social institution, but on which scarcely any reformer has the courage to touch. In proclaiming the perfect equality of men and women, and an entirely new order of things in regard to their relations with one another, the St. Simonians, in common with Owen and Fourier, have entitled themselves to the grateful remembrance of future generations.

孔德先生很快离开了圣西门学派，有许多年我都没有看到他和他的作品。但是我继续与圣西门学派的人交朋友。他们的一个最热情的拥护者，古斯塔夫·艾希塔尔先生，一直在告知我他们的进展，他当时在英国呆了挺长一段时间。1830年，他把我介绍给他们的领袖巴扎尔和昂方坦。只要他们持续公开发表教义，继续宣传改变宗教信仰，我就会读他们写的几乎所有东西。在我看来，他们对自由主义普遍理论

的批评有很多是重要的实情。部分由于他们的作品，我注意到旧的政治经济学价值非常有限，只是暂时性的，它把私有制和继承看成不能废止的事实，把生产和交换自由看成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圣西门学派逐渐阐明的方案是这样的：社会上的劳动力和资本的管理将着眼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每一个人都必须分担一定量的劳动，不管是思想家、教师、艺术家，还是生产者，都按照他们的能力分类，按照劳动量分发报酬，在我看来这个方案远比欧文对社会主义的描述更出众。在我看来，他们的目标可取，合理，尽管他们的方法可能不灵。虽然我既不相信他们的社会机器的实用性，也不相信它能有利地运转，但我觉得，宣布这样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往往会为努力促使目前这样一种构建的社会更接近某种理想标准的人指明一个有益的方向。我最尊敬他们的地方，正是别人贬低他们的地方——勇敢、毫无偏见地对待家庭问题，家庭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在所有伟大的社会制度中都需要比目前有更多重大的改变，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改革家敢于触碰这个问题。在宣布男女完全平等，宣布他们彼此之间关系的全新秩序上，圣西门学派和欧文、傅立叶一样，有资格被后人感激和记住。

In giving an account of this period of my life, I have only specified such of my new impressions as appeared to me, both at the time and since, to be a kind of turning points, marking a definite progress in my mode of thought. But these few selected points give a very insufficient idea of the quantity of thinking which I carried on respecting a host of subjects during these years of transition. Much of this, it is true, consisted in rediscovering things known to all the world, which I had previously disbelieved or disregarded. But the rediscovery was to me a discovery, giving me plenary possession of the truths, not as traditional platitudes, but fresh from their source; and it seldom failed to place them in some new light, by which they were reconciled with, and seemed to confirm while they modified, the truths less generally known which lay in my early opinions, and in no essential part of which I at any

time wavered. All my new thinking only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se more deeply and strongly, while it often removed misapprehension and confusion of ideas which had perverted their effect. For example, during the later returns of my dejection, the doctrine of what is called Philosophical Necessity weighed on my existence like an incubus. I felt as if I was scientifically proved to be the helpless slave of antecedent circumstances; as if my character and that of all others had been formed for us by agencies beyond our control, and was wholly out of our own power. I often said to myself, what a relief it would be if I could disbelieve the doctrine of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by circumstances; and remembering the wish of Fox respecting the doctrine of resistance to governments, that it might never be forgotten by kings, nor remembered by subjects, I said that it would be a blessing if 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could be believed by all *quoad* the characters of others, and disbelieved in regard to their own. I pondered painfully on the subject till gradually I saw light through it. I perceived, that the word Necessity, as a name for the doctrine of Cause and Effect applied to human action, carried with it a misleading association; and that this association was the operative force in the depressing and paralysing influence which I had experienced: I saw that though our character is formed by circumstances, our own desires can do much to shape those circumstances; and that what is really inspiriting and ennobling in the doctrine of freewill is the conviction that we have real power over the formation of our own character; that our will, by influencing some of our circumstances, can modify our future habits or capabilities of willing. All this was entirely consistent with the doctrine of circumstances, or rather, was that doctrine itself, properly understood. From that time I drew, in my own mind,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doctrine of circumstances and Fatalism; discarding altogether the misleading word Necessity. The theory, which I now for the first time rightly

apprehended, ceased altogether to be discouraging; and, besides the relief to my spirits, I no longer suffered under the burden—so heavy to one who aims at being a reformer in opinions—of thinking one doctrine true and the contrary doctrine morally beneficial. The train of thought which had extricated me from this dilemma seemed to me, in after years, fitted to render a similar service to others; and it now forms the chapter on Liberty and Necessity in the concluding Book of my *System of Logic* .

叙述我这段时间的生活的时候，我只详细说明了一些新感想，在那以后，这些感想在我看来都是我思考方式确切进步的转折点。但是，在那几年过渡期里，我思考了许多问题，仅选择这么几点，对我的思考量说明得非常不充分。确实，这些思考的很大一部分在于重新发现众所周知的东西，而它们也是我之前怀疑或者忽略的东西。但是，这种重新发现对我来说是种新发现，让我完整地拥有真理，不是传统的陈腔滥调，而是从头到尾全新的真理。而且，这种发现几乎总能给真理带来一些新的角度，通过这种角度，新真理与我早期观念中不广为人知的真理达成一致，并似乎在修改它们的时候肯定了它们，而对这些早期观念中的真理的重要部分，我在任何时候都没动摇过。我所有的新思考只是把这些真理的基础打得更深，更牢固，同时还经常移除贬低它们作用的观点里的误会和混乱。例如，后来在我的沮丧几次复发时，所谓的哲学必然性的理论像梦魇一样压在我的生活中。我觉得自己好像被科学地证明了就是先前环境下无助的奴隶；好像我和其他所有人的性格都是我们控制不了的力量塑造的，完全在我们的掌控能力之外。我经常对自己说，如果我能不相信环境决定性格这一学说的话，将是多么大的安慰啊。我想起福克斯对抵抗政府学说的愿望，即希望它永远不要被国王忘记，也不要被臣民记住，我说如果所有人都相信必然性理论只适用于别人的性格，而不相信也适用于他们自己的性格的话，将是件幸事。我苦苦思索这个问题，终于慢慢从里面看到了眉目。我意识到，必然性这个词，作为应用于人类行为上因果学说的名称，带有使人误解的联想，这个联想就是我以前经历的沮

丧和无助的原因。我明白了，尽管我们的性格是环境决定的，但是我们自身的渴望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那些环境。自由意志学说里真正令人振奋和崇高的地方，在于坚信在自己性格的塑造上我们有真正的控制力。坚信通过影响周围的一些环境，我们的意志能改变我们未来的习惯或能力。所有这一切都和环境学说完全一致，或者说就是环境学说，只是这次得到了正确的理解。从那时起，我在自己脑海里清晰地区分了环境学说和宿命论；完全抛弃了必要性这个易误解的词。我现在第一次正确理解了这个理论，它不再令人沮丧，除了我的精神痛苦减轻了之外，我也不用再承受认为一个学说是正确的，而相反的学说也对精神有益这个重担之苦，这个担子对于一个志在成为思想改革家的人来说是那么的沉重。把我从这个两难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思路，在我看来，在之后的那些年，也适合为其他人提供相似的服务。现在，它成了我的《逻辑学体系》尾卷中“论自由和必然性”那一章。

Again, in politics, though I no longer accepted the doctrine of the *Essay on Government* as a scientific theory; though I ceased to consider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s an absolute principle, and regarded it as a question of time, place, and circumstance; though I now looked upon the choic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s a moral and educational question more than one of material interests, thinking that it ought to be decided mainly by the consideration, what great improvement in life and culture stands next in order for the people concerned, as the condition of their further progress, and what institutions are most likely to promote that; nevertheless, this change in the premises of my political philosophy did not alter my practical political creed a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my own time and country. I was as much as ever a Radical and Democrat for Europe, and especially for England. I thought the predominance of the aristocratic classes, the noble and the rich, in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an evil worth any struggle to get rid of; not on account of taxes, or any such comparatively small inconvenience, but as the

great demoralizing agency in the country. Demoralizing, first, because it made the conduct of the Government an example of gross public immorality, through the predominance of private over public interests in the State, and the abuse of the powers of legislation for the advantage of classes. Secondly, and in a still greater degree, because the respect of the multitude always attaching itself principally to that which, in the existing state of society, is the chief passport to power; and under English institutions, riches, hereditary or acquired, being the almost exclusive source of political importance; riches, and the signs of riches, were almost the only things really respected, and the life of the people was mainly devoted to the pursuit of them. I thought, that while the higher and richer classes held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the i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mass of the people were contrary to the self-interest of those classes, because tending to render the people more powerful for throwing off the yoke: but if the democracy obtained a large, and perhaps the principal share, in the governing power, it would become the interest of the opulent classes to promote their education, in order to ward off really mischievous errors, and especially those which would lead to unjust violations of property. On these grounds I was not only as ardent as ever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but earnestly hoped that Owenite, St. Simonian, and all other anti-property doctrines might spread widely among the poorer classes; not that I thought those doctrines true, or desired that they should be acted on, but in order that the higher classes might be made to see that they had more to fear from the poor when uneducated than when educated.

此外，在政治学上，尽管我不再承认《论政府》中的学说是个科学的理论；尽管我不再认为代议制民主是完美的原则，而把它看成时间、地点和环境的问题；尽管我现在更把政治制度的选择看作是道德

和教育的问题，而不仅是物质利益的问题，我认为它应该主要由以下考虑决定，即生活和文化中的何种重大进步是相关的人们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什么制度最有可能促进这种发展。然而，我的政治哲学前提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符合时代和国家需要的实际政治信念。我仍然是个激进分子和民主主义者，对欧洲来说如此，对英国尤是如此。我认为，在英国宪法中，贵族阶层、贵族和富人的优势是值得尽一切努力摆脱的罪恶。不是由于税金或任何类似的小麻烦，而是因为它是这个国家巨大的腐化力量。说它腐化，首先是因为，它把私人利益置于国家的公共利益之上，滥用立法权力为统治阶级谋利益，从而使政府行为变成低级的公共不道德的样板。其次，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大众的尊敬主要缚在了社会当时状态下的权力通行证上。在英国的制度下，财富——不管是世袭的还是后来获得的——几乎是政治影响力的唯一源泉。财富以及财富的标志，几乎是唯一真正受人尊敬的东西，也是人们努力追求的主要目标。我想，只要上流阶层和富有阶层掌握政府权力，教育民众和改善他们的生活就与其私有利益相悖，因为这样容易使人们更有力量摆脱压迫。但是，如果民主政治获得较大的，也许是主要的控制力，那么富裕阶层就可能会有兴趣促进他们的教育，以期避开真正麻烦的错误，尤其是那些会导致不公平地侵害财产的错误。由于这些原因，我不仅一如既往地热心拥护民主的制度，还真心希望欧文主义者、圣西门学派和所有反财产的学说能够在贫穷阶层中广泛传播。不是说我认为这些学说正确，或者希望人们按照它们行动，而是这样可能会让上流社会看到，没受过教育的穷人比受过教育的更值得害怕。

In this frame of mi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July found me: It roused my utmost enthusiasm, and gave me, as it were, a new existence. I went at once to Paris, was introduced to Lafayette, and laid the groundwork of the intercourse I afterwards kept up with several of the active chiefs of the extreme popular party. After my return I entered warmly, as a writer, into the political discussions of the time; which soon became still more exciting, by the coming in

of Lord Grey's Ministry, and the proposing of *the Reform Bill* . For the next few years I wrote copiously in newspapers. It was about this time that Fonblanque, who had for some time written the political articles in the *Examiner* , became the proprietor and editor of the paper. It is not forgotten with what verve and talent, as well as fine wit, he carried it on,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of Lord Grey's Ministry, and what importance it assumed as the principal representative, in the newspaper press, of Radical opinions.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 of the paper was given to it entirely by his own articles, which formed at least three-fourths of all the original writing contained in it: but of the remaining fourth I contributed during those years a much larger share than anyone else. I wrote nearly all the articles on French subjects, including a weekly summary of French politics, often extending to considerable length; together with many leading articles on general politics,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legislation, and any miscellaneous subjects in which I felt interested, and which were suitable to the paper, including occasional reviews of books. Mere newspaper articles on the occurrences or questions of the moment, gave no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y general mode of thought; but I attempted, in the beginning of 1831, to embody in a series of articles, headed “The Spirit of the Age,” some of my new opinions, and especially to point out in the character of the present age, the anomalies and evils characteristic of the transition from a system of opinions which had worn out, to another only in process of being formed. These articles, were, I fancy, lumbering in style, and not lively or striking enough to be, at any time, acceptable to newspaper readers; but had they been far more attractive, still, at that particular moment, when great political changes were impending, and engrossing all minds, these discussions were ill-timed, and missed fire altogether. The only effect which I know to have been produced by them, was that Carlyle, then living in a secluded part of

Scotland, read them in his solitude, and, saying to himself (as he afterwards told me) “Here is a new Mystic,” inquired on coming to London that autumn respecting their authorship; an inquiry which was the immediate cause of our becoming personally acquainted.

法国七月革命[6_9]时我的心境就是这样的。它激起了我最大的热情，可以说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我立刻去了巴黎，被介绍给拉斐德[6_10]，为我后来与极端民主党派好几个活跃的领袖保持交往打下了基础。回来以后，我以作家身份，热心地加入了当时的政治讨论。由于格雷[6_11]勋爵内阁的组成以及《改革法案》的提议，讨论很快变得更加令人兴奋。接下来几年，我为报纸写了大量的文章。差不多这时，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检察报》写政论的方布兰克，成了这个报纸的所有者和主编。人们到现在也不会忘记，在格雷勋爵内阁期间，方布兰克是带着什么样的魄力和才干以及杰出的智慧坚持办报的，也不会忘记《检察报》作为激进主义观点的主要代表在报界获得的重要性。这个报纸出色的特质全都是方布兰克自己的文章所赋予的，几乎占了该报所有原创作品的四分之三。但是另外的四分之一，我那些年的投稿比其他任何人都多。有关法国问题的所有文章几乎都是我写的，包括每周一次的法国政治总览，这些文章经常写得很长。还有很多社论，评论一般政治、商业和财政立法以及我感兴趣又适合报纸刊登的各种各样的主题，包括偶尔的书评。仅仅就当时的事件和问题写报纸文章，提供不了发展任何总体思考方式的机会。但是在1831年初，我尝试在以《时代的精神》为题的一系列文章中，具体地表达我的一些新观点，尤其是要指出当代特征中的畸形和罪恶，它们是从一个已经破败的观念体系过渡到另一个尚在形成中体系时的显著特征。我认为这些文章风格拖沓，不够活泼鲜明，在任何时候都难让报纸的读者接受。但是，即便他们更有吸引力，这些讨论的时机仍然不对，完全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因为在那个特殊时刻，伟大的政治变革即将发生，吸引了所有人的全部注意力。我知道它们只对卡莱尔产生了影响，他当时住在苏格兰一个偏僻的地方，独自一人读了这些文章后，他对自己说（正如之后他告诉我的那样）“这是个新神秘主义者”，那

年秋天去伦敦的时候，他就打听它们的作者是谁。这次打听是我们私下里成为好朋友的直接原因。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Carlyle's earlier writings as one of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I received the influences which enlarged my early narrow creed; but I do not think that those writings, by themselves, would ever have had any effect on my opinions. What truths they contained, though of the very kind which I was already receiving from other quarters, were presented in a form and vesture less suited than any other to give them access to a mind trained as mine had been. They seemed a haze of poetry and German metaphysics, in which almost the only clear thing was a strong animosity to most of the opinions which were the basis of my mode of thought; religious scepticism, utilitarianism, the doctrine of circumstances, and the attaching any importance to democracy, logic, or political economy. Instead of my having been taught anything,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Carlyle, it was only in proportion as I came to see the same truths through media more suited to my mental constitution, that I recognised them in his writings. Then, indeed, the wonderful power with which he put them forth made a deep impression upon me, and I was during a long period one of his most fervent admirers; but the good his writings did me, was not as philosophy to instruct, but as poetry to animate. Even at the time when our acquaintance commenced, I was not sufficiently advanced in my new modes of thought to appreciate him fully; a proof of which is, that on his showing me the manuscript of *Sartor Resartus* , his best and greatest work, which he just then finished, I made little of it; though when it came out about two years afterwards in *Fraser's Magazine* , I read it with enthusiastic admiration and the keenest delight. I did not seek and cultivate Carlyle less on account of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our philosophy. He soon found

out that I was not “another mystic,” and when for the sake of my own integrity I wrote to him a distinct profession of all those of my opinions which I knew he most disliked, he replied that the chief difference between us was that I “was as yet consciously nothing of a mystic.” I do not know at what period he gave up the expectation that I was destined to become one; but though both his and my opinions underwent in subsequent years considerable changes, we never approached much nearer to each other's modes of thought than we were in the first years of our acquaintance. I did not, however, deem myself a competent judge of Carlyle. I felt that he was a poet, and that I was not; that he was a man of intuition, which I was not; and that as such, he not only saw many things long before me, which I could only, when they were pointed out to me, hobble after and prove, but that it was highly probable he could see many things which were not visible to me even after they were pointed out. I knew that I could not see round him, and could never be certain that I saw over him; and I never presumed to judge him with any definiteness, until he was interpreted to me by one greatly the superior of us both—who was more a poet than he, and more a thinker than I—whose own mind and nature included his, and infinitely more.

我已经提到过，卡莱尔的早期作品是促使我扩展早先狭隘信念的因素之一。但是我认为，单凭那些著作永远也不会对我的观点有任何影响。作品中包含的真理，尽管跟我从其他地方接受到的一样，但是表现形式比其他真理都更不适合进入一个受过我那种训练的大脑。它们似乎是模糊的诗歌和德国式的形而上学，里面唯一清晰的东西就是对作为我思考方式基础的大部分观点的强烈敌视。如宗教怀疑主义、功利主义、环境学说，以及对民主、逻辑学或政治经济学的任何重视。起初，我并没有从卡莱尔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只是随着我通过更适合我心理框架的媒介看到相同的真理时，我才从他的著作中辨别出

这些真理。他提出真理时所带有的奇妙力量当时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是他最热烈的崇拜者之一。但是，他的作品给我的益处，不是作为哲学教导我，而是作为诗歌激励了我。即使到我们开始认识的时候，我的新思考方式也还不够先进，无法充分欣赏他的作品。一个证据就是他给我看他刚刚完成得最好、最伟大的作品《衣裳哲学》的手稿时，我还读不懂。然而，差不多两年后，它发表在了《弗雷泽杂志》上，我再读的时候就带着热烈的崇拜和最强烈的喜悦了。我们观点中的重大分歧并未阻止我追随卡莱尔，与他交朋友。他很快发现，我并不是“另一个神秘主义者”，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我给他写了封信，清楚地表明了我所有他最不喜欢的观点，他回复说，我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我“至今还不是自觉的神秘主义者”。我不知道他到什么时候不再期盼我注定会成为神秘主义者。但是，尽管我们两个人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思考方式并没比我们认识的最初几年更靠近一些。然而，我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评价卡莱尔的工作。我觉得他是个诗人，而我不是；他是个富有直觉的人，而我不是。同样地，他不仅能在我之前很久就明白很多东西，而我只能在别人把它们指出后才蹒跚跟随并去证明，而且他能明白的很多东西很可能即使在被指出来后，我仍然不明白。我知道我无法了解他在想什么，也永远不能肯定能看透他。我从不相信自己能明确地评价他，除非有一个远比我们两人都更出众的人给我解释以后才可以——那个人比他更有诗才，比我更有思想——这个人在思想和性情上要远远比他更丰富。

Among the persons of intellect whom I had known of old, the one with whom I had now most points of agreement was the elder Austin. I have mentioned that he always set himself in opposition to our early sectarianism; and latterly he had, like myself, come under new influences. Having been appointed Professor of Jurisprudence in the London University (now University College), he had lived for some time at Bonn to study for his Lectures; and the influences of German literature and of the German character and state of society

had made a very perceptible change in his views of life. His personal disposition was much softened; he was less militant and polemic; his tastes had begun to turn themselves towards the poetic and contemplative. He attached much less importance than formerly to outward changes; unless accompanied by a better cultivation of the inward nature. He had a strong distaste for the general meanness of English life, the absence of enlarged thoughts and unselfish desires, the low objects on which the faculties of all classes of the English are intent. Even the kind of public interests which Englishmen care for, he held in very little esteem. He thought that there was more practical good government, and (which is true enough) infinitely more care for the education and mental improvement of all ranks of the people, under the Prussian monarchy, than under the English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nd he held, with the French *Economistes* , that the real security for good government is un *peupleéclairé* , which is not always the fruit of popular institutions, and which, if it could be had without them, would do their work better than they. Though he approved of *the Reform Bill* , he predicted, what in fact occurred, that it would not produce the great immediate improvements in government which many expected from it. The men, he said, who could do these great things did not exist in the country. There were many points of sympathy between him and me, both in the new opinions he had adopted and in the old ones which he retained. Like me, he never ceased to be a utilitarian, and, with all his love for the Germans and enjoyment of their literature, never became in the smallest degree reconciled to the innate-principle metaphysics. He cultivated more and more a kind of German religion, a religion of poetry and feeling with little, if anything, of positive dogma; while in politics (and here it was that I most differed with him) he acquired an indifference, bordering on contempt, for the progress of popular institutions: though he rejoiced in that of Socialism, as the most

effectual means of compelling the powerful classes to educate the people, and to impress on them the only real means of permanently improving their material condition, a limitation of their numbers. Neither was he, at this time, fundamentally opposed to Socialism in itself as an ultimate result of improvement. He professed great disrespect for what he called “the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sts,” and insisted on the evidence which history and daily experience afford of the “extraordinary pliability of human nature” (a phrase which I have somewhere borrowed from him); nor did he think it possible to set any positive bounds to the moral capabilities which might unfold themselves in mankind, under an enlightened direction of social and educational influences. Whether he retained all these opinions to the end of life I know not. Certainly the modes of thinking of his later years, and especially of his last publication, were much more Tory in their general character than those which he held at this time.

在我很久以前就认识的有识之士中，现在和我一致意见最多的是年长的奥斯丁。我提到过，他总是反对我们早期的宗派主义。后来，他和我一样受到新的影响。他被任命为伦敦大学（现在的伦敦大学学院）的法学教授之后，为了讲课做研究而在波恩住了一段时间。德国文学、德国人性格和社会状态的影响，使他的人生观产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他的性情温和了很多，没那么好斗爱争辩了，他开始转向爱好诗歌和沉思。他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重视外部变化，除非与此同时，内部性情也得到更好的陶冶。英国人的生活普遍很自私，缺乏宽广的思想和无私的愿望，还有英国所有阶层热衷的卑微目标，他都特别讨厌。即便对英国人关心的那种公共利益，他也不太瞧得起。他认为，普鲁士君主政体比英国的代议制政府实行了更多实际的善政（这是真的），更关心所有阶层人民的教育和思想进步。和法国《经济学人》的观点一样，他认为真正确保善政的是“见多识广的民众”，不一定是民主制度的成果。但如果没有这种制度也能有这些人的话，他们就会

比这种制度更能发挥作用。尽管他赞成《改革法案》，但他还是预言，在治理上它不会产生很多人期盼的那种重大的直接的进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说，这个国家不存在能做这些伟大事情的人。不管在他采纳的新观点上，还是在他保留的旧观点上，我和他之间都有很多共鸣。和我一样，他一直都是个边沁主义者，他热爱德国人，喜欢他们的文学，但他从来都没有接受先天原则的形而上学，一点都没有接受。他日益培养出一种德国信仰，一种诗歌和感觉的信仰，但明确的信条却很少（如果有的话）。而在政治上（这是我和他最不同的地方），他不关心大众制度的进步，几乎是轻视它。但是他很高兴地看到，要迫使权力阶层去教育民众，并让他们记住永久改进他们物质条件的唯一真正的方法是限制他们的数量，社会主义是最有效的方法。这时，他也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完全把社会主义当作进步的最终结果。他非常蔑视他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性普遍原则”，并坚持那些历史和日常经验提供的“人性的非凡适应性”的证据（这个短语是我在某处从他那里借用的）。他还认为，即便在社会和教育影响的开明指导下，也不可能给可能会在人类身上展现的道德能力设下任何绝对的限度。我不知道他是否直到生命的尽头还保持着这些观点。当然，他晚年的思考方式，尤其是他最后出版的作品，从总体特征上看比这时更加保守。

My father's tone of thought and feeling, I now felt myself at a great distance from: greater, indeed, than a full and calm explanation and reconsideration on both sides, might have shown to exist in reality. But my father was not one with whom calm and full explanations on fundamental points of doctrine could be expected, at least with one whom he might consider as, in some sort, a deserter from his standard. Fortunately we were almost always in strong agreement on the political questions of the day, which engrossed a large part of his interest and of his conversation. On those matters of opinion on which we differed, we talked little. He knew that the habit of thinking for myself, which his mode of

education had fostered, sometimes led me to opinions different from his, and he perceived from time to time that I did not always tell him *how* different. I expected no good, but only pain to both of us, from discussing our differences: and I never expressed them but when he gave utterance to some opinion or feeling repugnant to mine, in a manner which would have made it disingenuousness on my part to remain silent.

我现在觉得自己和父亲的思考和情感风格相差很远。真的比双方都进行全面平静的说明和斟酌后能看出来的在现实中存在的差别还要大。但是，不能期待我父亲会平静、全面地解释学说的基本要点，至少不会和一个在他看来，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他的标准的人这样解释。幸运的是，在当前的政治问题上，我们几乎总是强烈的一致，而政治问题是他非常感兴趣的，占据了他谈话的主要内容。对于我们观点不一致的事情，我们谈得很少。他知道，他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我自主思考的习惯，让我有时会持和他不同的观点，他时常觉察到我不总是告诉他我们的观点怎么不同。我知道，讨论我们的分歧不会对我们两个有任何好处，只会产生痛苦；我从来没有表示过这些分歧，除非他表达一些与我不一致的观点或感觉的方式，让我觉得如果保持沉默就会显得无诚意的时候才会这么做。

It remains to speak of what I wrote during these years, which, independently of my contributions to newspapers, was considerable. In 1830 and 1831 I wrote the five Essays since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of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 almost as they now stand, except that in 1833 I partially rewrote the fifth Essay. They were written with no immediate purpose of publication; and when, some years later, I offered them to a publisher, he declined them. They were only printed in 1844, after the success of the *System of Logic* . I also

resumed my speculations on this last subject, and puzzled myself, like others before me, with the great paradox of the discovery of new truths by general reasoning. As to the fact, there could be no doubt. As little could it be doubted, that all reasoning is resolvable into syllogisms, and that in every syllogism the conclusion is actually contained and implied in the premises. How, being so contained and implied, it could be new truth, and how the theorems of geometry, so different in appearance from the definitions and axioms, could be all contained in these, was a difficulty which no, one, I thought, had sufficiently felt, and which, at all events, no one had succeeded in clearing up. The explanations offered by Whately and others, though they might give a temporary satisfaction, always, in my mind, left a mist still hanging over the subject. At last, when reading a second or third time the chapters on Reasoning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Dugald Stewart, interrogating myself on every point, and following out, as far as I knew how, every topic of thought which the book suggested, I came upon an idea of his respecting the use of axioms in ratiocination, which I did not remember to have before noticed, but which now, in meditating on it, seemed to me not only true of axioms, but of all general propositions whatever, and to be the key of the whole perplexity. From this germ grew the theory of the Syllogism propounded in the Second Book of the *Logic* ; which I immediately fixed by writing it out. And now, with greatly increased hope of being able to produce a work on Logic, of some originality and value, I proceeded to write the First Book, from the rough and imperfect draft I had already made. What I now wrote became the basis of that part of the subsequent Treatise; except that it did not contain the Theory of Kinds, which was a later addition, suggested by otherwise inextricable difficulties which met me in my first attempt to work out the subject of some of the concluding chapters of the Third Book. At the point which I had now reached I made a halt, which

lasted five years. I had come to the end of my tether; I could make nothing satisfactory of Induction, at this time. I continued to read any book which seemed to promise light on the subject, and appropriated, as well as I could, the results; but for a long time I found nothing which seemed to open to me any very important vein of meditation.

我还应该谈谈这些年我写的东西，除了给报纸的投稿之外，还有很多。1830年和1831年，我写了五篇论文，后来以《论政治经济学中一些未处理的问题》的书名出版，除了在1833年的时候我改写了第五篇的一部分外，其他的基本和现在见到的一样。写这些论文的时候没打算要立刻发表。几年后，当我把它们拿给一位出版商时，却被他拒绝了。1844年《逻辑学体系》一书成功后，它们才得以发表。我也继续思考逻辑学这个主题，和前人一样，对于通过一般的推理就能发现新真理这个似乎矛盾的观点，我也很迷惑。至于事实，则毋庸置疑。就像所有的推理都可以分解成三段论法，在每个三段论法中，结论实际上包含和隐含在前提里面，这没什么可怀疑的。结论被这样包含和隐含着，怎么能是新真理。几何学的定理，表面上看与定义和公理如此不同，怎么会包含在它们里面。我想，这个困难是谁都没有充分感觉到的，也还没有被成功解释清楚过。惠特利和其他人提供的解释尽管可以让人暂时满意，但在我心中总是还有一团迷雾笼罩在这个问题上。终于，在第二遍或第三遍读杜格尔·斯图尔特第二卷中论推理的章节时，我在每个点上都提问自己，并且尽可能地把书中提出的每个思想主题追查到底，我突然想起他说过在推理中用公理，我记得以前没注意过，但是现在，在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不仅公理可以用在推理中，而且所有普通的命题都可以，这似乎是解开整个困惑的关键。这个萌芽发展成了三段论的理论，在《逻辑学体系》的第二卷里提了出来。通过把它写下来，我迅速把这个理论确定了下来。现在，我更加希望能创作一部新颖、有价值的逻辑学作品，我从以前粗糙、不完善的手稿着手，开始写第一卷。我现在所写的东西，成了随后的论文中相应部分的基础。只是不包括后来加上去的《类别理

论》，那是我草拟第三卷最后几章的题目碰到困难时想出来的，要是没有类别理论这些困难就无法解决。在我现在到达的这个关头上，我停了下来，一停就是五年。我已经到了极限了。此时，我无法写出任何让人满意的关于归纳法的文章。我继续读任何看起来有希望为归纳法提供一线光亮的书籍，尽量利用它们的成果。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找到任何能给我提供非常重要思路的东西。

In 1832 I wrote several papers for the first series of *Tait's Magazine* , and one for a quarterly periodical called the *Jurist* , which had been founded, and for a short time carried on, by a set of friends, all lawyers and law reformers, with several of whom I was acquainted. The paper in question is the one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State respecting Corporation and Church Property, now standing first among the collected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 where one of my articles in *Tait* , “The Currency Juggle,” also appears. In the whole mass of what I wrote previous to these, there is nothing of sufficient permanent value to justify reprinting. The paper in the *Jurist* , which I still think a very complete discuss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State over Foundations, showed both sides of my opinions, asserting as firmly as I should have done at any time, the doctrine that all endowments are national property, which the government may and ought to control; but not, as I should once have done, condemning endowments in themselves, and proposing that they should be taken to pay off the national debt. On the contrary, I urged strenuously the importance of a provision for education, not dependent on the mere demand of the market, that is, on the knowledge and discernment of average parents, but calculated to establish and keep up a higher standard of instruction than is likely to be spontaneously demanded by the buyers of the article. All these opinions have been confirmed and strengthened by the whole of my subsequent reflections.

1832年，我在《泰特杂志》的第一辑上写了好几篇文章，还给一个叫《法学家》的季刊写了一篇，这本季刊是由一帮朋友创立并经营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他们都是律师和法律改革家，我和其中好几个很熟。这里说的这篇文章，是关于国家在社团和教会财产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现在被收录进《论述和讨论》。我发表在《泰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货币骗局》也收录在这里面。在这些文章之前，我写的很多文章，都没有足够永恒的价值使得它们值得再版。我至今仍然认为，《法学家》上的那篇文章，对于国家在基金机构上权利的论述非常完整，表明了我的观点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跟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坚决支持所有捐款都是国家财产的学说，政府可以而且也应该支配这些捐款；另一方面，我不像过去那样谴责捐款本身，还建议用它们偿还国家债务。相反，我极力强调为教育设立基金条款的重要性，教育不能仅依靠市场需求，也就是说不能仅依靠普通父母的了解和眼力，而是要计划好，设立并保持较高的教育标准，比商品购买者自发要求的标准还要高。所有这些见解都在我后来的整个思考过程中得到了证实和加强。

[6_1].麦克白，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的主人公，这儿是他就麦克白夫人的病情对医生说的话："替她医好这种病。你难道不能诊治那种病态的心理，从记忆中拔去一桩根深蒂固的忧郁，拭掉那写在脑筋上的烦恼，用一种使人忘却一切的甘美的药剂，把那堆满在胸间，重压在心头的积毒扫除干净吗？"

[6_2].勒普泰岛，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所著小说《格列佛游记》中提到的一个飞行浮岛。

[6_3].英国圣公会的教义纲要。

[6_4].约翰尼斯·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被认为是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他创立了三大定律，说明行星围绕太阳运转的理论。

[6_5].皮埃尔 - 西蒙·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以其关于太阳系起源和星云假说的理论及对行星的引力和稳定性调查而著名。

[6_6].宗教改革，16世纪西欧旨在改革罗马天主教某些教义的改革运动，最终导致

新教的建立。

[6_7].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他关于世界道德规律及社会道德本性的思想，对黑格尔有重要影响。

[6_8].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以实证主义创始人闻名。他还使社会学成为系统的科学。

[6_9].“七月革命”是指1830年7月法国推翻复辟波旁王朝，拥戴路易·菲利浦登上王位的革命。

[6_10].拉斐德（1757—1834），法国战士和政治家，他曾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担任乔治·华盛顿的参谋。他还参加了法国1789年大革命和1830年的革命。

[6_11].查尔斯·格雷（1764—1845），英国政治家，他在任首相期间（1830—1834）实行了议会和社会改革，以其在英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而闻名。

Chapter 6 Commencement ofthe Most Valuable Friendship of My Life.My Father's Death.Writings and Other Proceedings up to 1840.

第六章　最珍贵友谊的开始父亲去世1840年前的著作和其他活动

It was the period of my mental progress which I have now reached that I formed the friendship which has been the honour and chief blessing of my existence, as well as the source of a great part of all that I have attempted to do, or hope to effect hereafter, for human improvement. My first introduction to the lady who, after a friendship of twenty years, consented to become my wife, was in 1830, when I was in my twenty-fifth and she in her twenty-third year. With her husband's family it was the renewal of an old acquaintanceship. His grandfather lived in the next house to my father's in Newington Green, and I had sometimes when a boy been invited to play in the old gentleman's garden. He was a fine specimen of the old Scotch puritan; stern, severe, and powerful, but very kind to children, on whom such men make a lasting impression. Although it was years after my introduction to Mrs. Taylor before my acquaintance with her became at all intimate or confidential, I very soon felt her to be the most admirable person I had ever known. It is not to be supposed that she was, or that any one, at the age at which I first saw her, could be, all that she afterwards became. Least of all could this be true of her, with whom self-improvement, progress in the highest and in all senses, was a law of her nature; a necessity equally from the ardour with which she sought it, and from the spontaneous tendency of faculties which could not receive an impression or an experience without making it the source or the occasion of an accession of wisdom. Up to the time when I first saw her, her rich and powerful nature had chiefly

unfolded itself according to the received type of feminine genius. To her outer circle she was a beauty and a wit, with an air of natural distinction, felt by all who approached her: to the inner, a woman of deep and strong feeling, of penetrating and intuitive intelligence, and of an eminently meditative and poetic nature. Married at an early age to a most upright, brave, and honourable man, of liberal opinions and good education, but without the intellectual or artistic tastes which would have made him a companion for her, though a steady and affectionate friend, for whom she had true esteem and the strongest affection through life, and whom she most deeply lamented when dead; shut out by the social disabilities of women from any adequate exercise of her highest faculties in action on the world without; her life was one of inward meditation, varied by familiar intercourse with a small circle of friends, of whom one only (long since deceased) was a person of genius, or of capacities of feeling or intellect kindred with her own, but all had more or less of alliance with her in sentiments and opinions. Into this circle I had the good fortune to be admitted, and I soon perceived that she possessed in combination, the qualities which in all other persons whom I had known I had been only too happy to find singly. In her, complete emancipation from every kind of superstition (including that which attributes a pretended perfection to the order of nature and the universe), and an earnest protest against many things which are still part of the established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resulted not from the hard intellect, but from strength of noble and elevated feeling, and co-existed with a highly reverential nature. In general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in temperament and organisation, I have often compared her, as she was at this time, to Shelley: but in thought and intellect, Shelley, so far as his powers were developed in his short life, was but a child compared with what she ultimately became. Alike in the highest regions of speculation and in the smaller practical concerns of daily life, her

mind was the same perfect instrument, piercing to the very heart and marrow of the matter; always seizing the essential idea or principle. The same exactness and rapidity of operation, pervading as it did her sensitive as well as her mental faculties, would, with her gifts of feeling and imagination, have fitted her to be a consummate artist, as her fiery and tender soul and her vigorous eloquence would certainly have made her a great orator, and her profound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and discernment and sagacity in practical life, would, in the times when such a *carrière* was open to women, have made her eminent among the rulers of mankind. Her intellectual gifts did but minister to a moral character at once the noblest and the best balanced which I have ever met with in life. Her unselfishness was not that of a taught system of duties, but of a heart which thoroughly identified itself with the feelings of others, and often went to excess in consideration for them by imaginatively investing their feelings with the intensity of its own. The passion of justice might have been thought to be her strongest feeling, but for her boundless generosity, and a lovingness ever ready to pour itself forth upon any or all human beings who were capable of giving the smallest feeling in return. The rest of her moral characteristics were such as naturally accompany these qualities of mind and heart: the most genuine modesty combined with the loftiest pride; a simplicity and sincerity which were absolute, towards all who were fit to receive them; the utmost scorn of whatever was mean and cowardly, and a burning indignation at everything brutal or tyrannical, faithless or dishonourable in conduct and character, while making the broadest distinction between *mala in se* and mere *mala prohibita* —between acts giving evidence of intrinsic badness in feeling and character, and those which are only violations of conventions either good or bad, violations which, whether in themselves right or wrong, are capable of being committed by persons in every other respect lovable or

admirable.

在我思想进步达到目前这一水平的时期，我得到了一位女士的友谊，这是我一生的荣耀和最大的幸事，我为人类进步努力做的所有事情，或者希望今后实现的事情中，有一大部分也是源于这段友谊。我第一次被介绍给这位女士是在1830年，那时我二十五岁，她二十三岁，做了二十年的朋友后，她答应做我的妻子。这延续了我家和她丈夫家的老交情。她丈夫的祖父住在纽因顿格林，与我父亲是邻居，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曾被邀请到这位老绅士的花园里玩。他是一位典型的老派苏格兰清教徒：严厉，简朴，有威严，但是对小孩子很亲切，这种人会给孩子们留下长久的印象。尽管和泰勒夫人认识好几年后我和她才成为很亲密或者彼此信任的朋友，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她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值得敬佩的人。这不是说，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年龄的她就具备后来她所达到的水平，这对任何人都不可能，尤其对她而言。对她来说，自我改进，取得最高的、所有可能的进步，是她天性的规律；追求进步的热情和能力的自然倾向，必然使她把自己的每一个印象或每一次经验都变成增加智慧的源泉或机会。按照公认的女性天才的标准，在我第一次见她时，她那丰富而坚强的性格就已绝大部分展现了出来。从她的外表来看，她美丽，机智，与她接近的人都能感觉到她那天生与众不同的气质。从内心来说，她有深切、强烈的感情，有洞察力和直觉的才智，有突出的、爱思考的诗人般特质。她很早就结婚了，丈夫正直，勇敢，可敬，观点开明，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不具有成为她的伴侣所需的智力或艺术品位——不过却是位可靠、亲爱的朋友，她一生都很尊敬他，对他有强烈的感情，当他去世时，她悲痛欲绝。由于社会对妇女的限制，她无法把强大的自我才能充分运用于外界活动中。她生活在内心沉思中，只有在与一小圈子朋友进行亲密交流时才有所变化。在这些朋友中，只有一位（早已过世了）是天才，或者说具有和她相似的感觉或智力才能，但是所有朋友也都或多或少与她具有相似的情操和见解。我有幸被这个圈子接纳，很快便察觉到，她综合具备我所认识人的所有品质，而这些品质，任何一样都足以让我欣喜若狂。她完全不相信迷信（包括把虚假

的完美归因于大自然和宇宙的秩序），热切地反对那些仍然属于社会既定构造的东西，这并不是源于高智商，而是源于尊贵、高尚的情感力量和非常可敬的天性。在一般的精神特性及性情和条理性上，我经常把当时的她比作雪莱。但是，在雪莱短暂的人生中，他所发挥的思维能力和智力才能，和她最终所达到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非常大。不论在思索的最高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太重大的实际问题上，她的头脑都是完美的工具，总是能刺入问题的心脏和脊髓，抓住本质的概念或原则。与她丰富的感受力和智力一样，她行动起来同样精确迅速，加上她在感觉和想象力上具有的天赋，使她足以成为一个造诣极高的艺术家。而她热烈、慈爱的灵魂和有说服力的口才，当然会使她成为一位伟大的演讲家。如果元首地位对妇女开放的话，她对人性的深刻了解，实际生活中的洞察力和聪慧，也会使她成为人类杰出的统治者之一。她的智力天赋，只贡献于我一生中曾见过的最高贵、最和谐的品德。她的无私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责任体系，而是完全认同他人感情的心地，并经常在想象中把自己强烈的感情倾注在他们的感情之中，所以经常为别人考虑得过多。她对任何人，或者所有哪怕只能够付出一点点情感作为回报的人，都甘愿付出自己的无限慷慨和爱心，若不是如此的话，人们可能就会认为对正义的热爱是她最强烈的感情。她的其他品质特征，很自然地与这些思想和心灵特质共存：最诚挚的谦逊与最高尚的自尊相结合，对所有值得的人都绝对的纯朴和真诚，对任何卑鄙和懦弱的行为都极度地蔑视，对任何残忍或专制、背信或可耻的行为和性格都表示极度的愤慨。同时，她把自然罪行和单纯的不法行为非常明确地区分开来，即把显示感情和品格中内在恶劣的行为，同那些仅仅违背或好或坏习俗的行为区分开来，这种违背不管本身是对还是错，都是那些在其他方面可爱或可敬的人可能会做出来的。

To be admitted into any degree of mental intercourse with a being of these qualities, could not but have a most beneficial influence on my development; though the effect was only gradual, and many years elapsed before her mental progress and mine went

forward in the complete companionship they at last attained. The benefit I received was far greater than any which I could hope to give; though to her, who had at first reached her opinions by the moral intuition of a character of strong feeling, there was doubtless help as well as encouragement to be derived from one who had arrived at many of the same results by study and reasoning: and in the rapidity of her intellectual growth, her mental activity, which converted everything into knowledge, doubtless drew from me, as it did from other sources, many of its materials. What I owe, even intellectually, to her, is in its detail, almost infinite; of its general character a few words will give some, though a very imperfect, idea.

能够与一位具备这些品质的人进行任何程度的思想交流，都会对我的成长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可是这种影响是逐步产生的，而且直到多年以后，她的思想进步和我的思想进步才最终完全志趣相投。我得到的益处远远超过我希望能够给予的。尽管对她来说，她的见解起先是通过情感强烈的性格中所具有的精神本能获得的，但毫无疑问，她也能从一个通过研究和推理得出很多相同成果的人那里得到鼓励和帮助。在她智力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她的脑力活动把任何东西都转化成了知识，毫无疑问，很多活动的材料她都是从我这里获取的，当然也从其他来源获取了很多。我要归功于她的东西，从细节上来讲，即便是智力上的，也几乎数不胜数。关于她对我的影响的总体特征，寥寥数语能说明一些，可是非常不完全。

With those who, like all the best and wisest of mankind, are dissatisfied with human life as it is, and whose feelings are wholly identified with its radical amendment, there are two main regions of thought. One is the region of ultimate aims;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highest realizable ideal of human life. The other is

that of the immediately useful and practically attainable. In both these departments, I have acquired more from her teaching, than from all other sources taken together. And, to say truth, it is in these two extremes principally, that real certainty lies. My own strength lay wholly in the uncertain and slippery intermediate region, that of theory, or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specting the conclusions of which, in any of the forms in which I have received or originated them, whether as political economy, analytic psychology, logic, philosophy of history, or anything else, it is not the least of my intellectual obligations to her that I have derived from her a wise scepticism, which, while it has not hindered me from following out the honest exercise of my thinking faculties to whatever conclusions might result from it, has put me on my guard against holding or announcing these conclusions with a degree of confidence which the nature of such speculations does not warrant, and has kept my mind not only open to admit, but prompt to welcome and eager to seek, even on the questions on which I have most meditated, any prospect of clearer perceptions and better evidence. I have often received praise, which in my own right I only partially deserve, for the greater practicality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found in my writing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most thinkers who have been equally addicted to large generalizations. The writings in which this quality has been observed, were not the work of one mind, but of the fusion of two, one of them as pre-eminently practical in its judgments and perceptions of things present, as it was high and bold in its anticipations for a remote futurity. At the present period, however, this influence was only one among many which were helping to shape the character of my future development: and even after it became, I may truly say, the presiding principle of my mental progress, it did not alter the path, but only made me move forward more boldly, and, at the same time, more cautiously, in the same course. The only actual

revolution which has ever taken place in my modes of thinking, was already complete. My new tendencies had to be confirmed in some respects, moderated in others: but the only substantial changes of opinion that were yet to come, related to politics, and consisted, on one hand, in a greater approximation, so far as regards the ultimate prospects of humanity, to a qualified Socialism, and on the other, a shifting of my political ideal from pure democracy, as commonly understood by its partisans, to the modified form of it, which is set forth in my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

和所有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一样，那些不满意人类生活的现状，把全部感情倾注于激进变革的人，思想可分为两个主要领域。一个是终极目标的领域，这些目标是人类生活可实现的最高理想的组成元素。另一个是直接有用，实践可以达到的领域。在这两个领域里，我从她的教导中获得的，比从其他所有来源获得的总和还要多。说实话，真正的确定性主要存在于这两个极端里面。我自己的力量全都存在于那个不确定、不可靠的中间区域，即理论或精神和政治科学领域。关于中间区域的结论，不论我以何种形式接受或创造的结论，不管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心理学、逻辑学、历史哲学，还是其他任何学科上的结论，在智力上都要大大归功于从她那里学得的明智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怀疑没有阻止我继续诚实地运用思考能力去寻求任何可能得出的结论，只是警告我不要带着这种思考性质所不能保证的信心来支持或宣布这些结论。还让我的头脑不仅随时准备接纳，而且急于欢迎并热切地寻求任何更清楚的概念和更完善的证据，即使在我考虑最多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与大部分同样沉溺于大量概括的思想家相比，我经常因为作品更具实用性而受到表扬，但是就我本人来说，这些表扬中只有一部分是我应得的。那些被认为具有实用性的作品，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而是两个人思想的融合，这其中一人对当前事务的判断和理解非常合乎实际，对遥远未来的预期也很大胆，很有高度。然而，在现阶段，这种影响只是有助于塑造我未来发展特征的众多因素之一。老实说，即使在它成为我思想进步的指导原则之后，它

也没有改变我进步的方向，只是让我在同一方向上更勇敢，同时也更慎重地前进。我的思考方式上发生的唯一真正的巨变已经完成了。我的新倾向在某些方面应该加强，在其他方面则要节制。但是，观念上唯一实质的变革尚未到来，那是和政治相关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在于人类的最终前途更加接近于有限制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在于把我的政治理想从强硬支持者通常所理解的纯粹的民主政治，转变为我在《论代议制政府》中阐明的改良后的民主政治。

This last change, which took place very gradually, dates its commencement from my reading, or rather study, of M. de Tocqueville's *Democracy in America* , which fell into my hands immediately after its first appearance. In that remarkable work, the excellences of democracy were pointed out in a more conclusive, because a more specific manner than I had ever known them to be, even by the most enthusiastic democrats; while the specific dangers which beset democracy, considered as the government of the numerical majority, were brought into equally strong light, and subjected to a masterly analysis, not as reasons for resisting what the author considered a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human progress, but as indications of the weak points of popular government, the defences by which it needs to be guarded, and the correctives which must be added to it in order that while full play is given to its beneficial tendencies, those which are of a different nature may be neutralized or mitigated. I was now well prepared for speculations of this character, and from this time onward my own thoughts moved more and more in the same channel, though the consequent modifications in my practical political creed were spread over many years, as would be shown by comparing my first re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 written and published in 1835, with the one in 1840 (reprinted in the *Dissertations*), and this last, with the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

这最后一个变化发生得非常缓慢，最早要追溯到我阅读或者说研究德托克维尔[7_1]先生的《美国的民主》，该书刚一出版我就立刻拿到了手中。与我所知的任何热情的民主主义者的阐述相比，这部非凡的著作提出民主政治优越性的方式都更明确具体因而更具结论性；同时，因民主政治被视为大多数人的统治，就困扰它的具体危险，作者也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和巧妙的分析，他并不是以此为理由反对那被作者认为是人类进步必然结果的民主政治，而是指出民主政治的弱点，同时指出捍卫它的各种方法，和必须增加的补救措施，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有益倾向，同时消除或减轻与它不同性质的倾向。我现在已经为进行这种思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从这时起，我自己的思想也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尽管我此后对实际政治信条的改变持续了很多年，至于这一点，把我1835年写出来并发表的第一篇《美国的民主》的书评，与1840年（在《论述和讨论》中再版）的那篇进行对比，再把最近的一篇与《论代议制政府》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来。

A collateral subject on which also I derived great benefit from the study of Tocqueville, wa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centralization. The powerful philosophic analysis which he applied to American and to French experience, led him to attach the utmost importance to the performance of as much of the collective business of society, as can safely be so performed, by the people themselves, without any intervention of the executive government, either to supersede their agency, or to dictate the manner of its exercise. He viewed this practical political activity of the individual citizen, not only as one of the most effectual means of training the social feelings and practical intelligence of the people, so important in themselves and so indispensable to good government, but also as the specific counteractive to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 infirmities of democracy, and a necessary protection against its degenerating into the only despotism of which, in the modern world, there is real

danger—the absolute rule of the head of the executive over a congregation of isolated individuals, all equals but all slaves. There was, indeed, no immediate peril from this source on the British side of the channel, where nine-tenths of the internal business which elsewhere devolves on the government, was transacted by agencies independent of it; where centralization was, and is, the subject not only of rational disapprobation, but of unreasoning prejudice; where jealousy of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was a blind feeling preventing or resisting even the most beneficial exertion of legislative authority to correct the abuses of what pretends to be local self-government, but is, too often, selfish mismanagement of local interests, by a jobbing and *borné* local oligarchy. But the more certain the public were to go wrong on the side opposed to centralization, the greater danger was there lest philosophic reformers should fall into the contrary error, and overlook the mischiefs of which they had been spared the painful experience. I was myself, at this very time, actively engaged in defending important measures, such as the great Poor Law Reform of 1834, against an irrational clamour grounded on the anti-centralization prejudice: and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lessons of Tocqueville, I do not know that I might not, like many reformers before me, have been hurried into the excess opposite to that, which, being the one prevalent in my own country, it was generally my business to combat. As it is, I have steered carefully between the two errors, and whether I have or have not drawn the line between them exactly in the right place, I have at least insisted with equal emphasis upon the evils on both sides, and have made the means of reconciling the advantages of both, a subject of serious study.

在一个附带问题上，我也从研究托克维尔中得到了巨大的益处，这就是中央集权化的重要问题。他对美国和法国经验有力的哲学分

析，让他十分重视社会集体事务，它可由人民自己安全地管理，不需要政府的任何干涉，政府不要取代人民的作用，也不要指挥他们的执行方式。他不仅把这种由公民个人参与的实际政治活动视为训练人们社会感情和实际知识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这不仅对公民本身非常重要，也是善政不可或缺的，还把它视为对付民主政治中一些典型弱点的特殊抵抗手段，以及防止民主政治退化为专制政治的必要保护手段。而专制政治是现代社会唯一有真正危险的东西——政府首脑对一群相互孤立的个人进行绝对的统治，所有人看似平等，但其实都是奴隶。确实，对于海峡这边的英国来说没有这种直接的危险。在英国，几乎全部国内事务都由独立于政府的机构办理，而在别的国家却都是移交给政府办理的。在英国，中央集权化不仅受到理性的指责，而且受到不合理的歧视。在那儿，对政府干涉的警惕是一种盲目的感情，甚至阻止或抵制了立法机构最有利地发挥作用以纠正一些弊端，比如假公济私和狭隘的地方寡头政治假装成地方自治，这经常是对地方利益进行自私又不当的管理的弊端。但是，公众越是坚定地站在反对中央集权那一边，理论改革家陷入相反错误的危险就越大，而且越会忽视他们没有经历过的痛苦的危害。我本人就在这时也积极地参与了捍卫重要措施的活动，比如1834年伟大的济贫法改革，我就反对反中央集权化者们带有偏见的无理喧闹。如果没有托克维尔的教导，我不敢肯定自己会不会像之前的很多改革家一样，匆忙地过分反对在英国盛行的这种喧闹。因为在过去，我通常会把反击它当成是自己的任务。事实上，我小心地避开这两种错误，不管我是否正好在合适的地方给它们划清了界线，至少我坚持给双方的弊端以同等的重视，而且认真地去研究协调双方优势的手段。

In the meanwhile had taken place the election of the first Reformed Parliament, which included several of the most notable of my Radical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Grote, Roebuck, Buller, Sir William Molesworth, John and Edward Romilly, and several more; besides Warburton, Strutt, and others, who were in parliament already. Those who thought themselves, and were called by their

friends, the philosophic Radicals, had now, it seemed, a fair opportunity, in a more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an they had ever before occupied, for showing what was in them; and I, as well as my father, founded great hopes on them. These hopes were destined to be disappointed. The men were honest, and faithful to their opinions, as far as votes were concerned; often in spite of much discouragement. When measures were proposed, flagrantly at variance with their principles, such as the *Irish Coercion Bill* , or the *Canada Coercion* in 1837, they came forward manfully, and braved any amount of hostility and prejudice rather than desert the right. But on the whole they did very little to promote any opinions; they had little enterprise, little activity: they left the lead of the Radical portion of the House to the old hands, to Hume and O'Connell. A partial exception must be made in favour of one or two of the younger men; and in the case of Roebuck, it is his title to permanent remembrance, that in the very first year during which he sat in Parliament, he originated (or re-originated after the unsuccessful attempt of Mr. Brougham) the parliamentary movement for 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at he was the first to commence, and for years carried on almost alone, the contest for the self-government of the Colonies. Nothing, on the whole equal to these two things, was done by any other individual, even of those from whom most was expected. And now, on a calm retrospect, I can perceive that the men were less in fault than we supposed, and that we had expected too much from them. They were in un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Their lot was cast in the ten years of inevitable reaction, when, the Reform excitement being over, and the few legislative improvements which the public really called for having been rapidly effected, power gravitated back in its natural direction, to those who were for keeping things as they were; when the public mind desired rest, and was less disposed than at any other period since the Peace, to let itself be moved by attempts to

work up the Reform feeling into fresh activity in favour of new things. It would have required a great political leader, which no one is to be blamed for not being, to have effected really great things by parliamentary discussion when the nation was in this mood. My father and I had hoped that some competent leader might arise; some man of philosophic attainments and popular talents, who could have put heart into the many younger or less distinguished men that would have been ready to join him—could have made them available, to the extent of their talents, in bringing advanced ideas before the public—could have used the House of Commons as a rostra or a teacher's chair for instructing and impelling the public mind; and would either have forced the Whigs to receive their measures from him, or have taken the lead of the Reform party out of their hands. Such a leader there would have been, if my father had been in Parliament. For want of such a man, the instructed Radicals sank into a mere *Côté Gauche* of the Whig party. With a keen, and as I now think, an exaggerated sense of the possibilities which were open to the Radicals if they made even ordinary exertion for their opinions, I laboured from this time till 1839, both by personal influence with some of them, and by writings, to put ideas into their heads, and purpose into their hearts. I did some good with Charles Buller, and some with Sir William Molesworth; both of whom did valuable service, but were unhappily cut off almos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ir usefulness. On the whole, however, my attempt was vain. To have had a chance of succeeding in it, required a different position from mine. It was a task only for one who, being himself in Parliament, could have mixed with the Radical members in daily consultation, could himself have taken the initiative, and instead of urging others to lead, could have summoned them to follow.

同时，改革后的议会进行了第一次选举，我的好几位最著名的激进派朋友和熟人都入选了。包括格罗特、罗巴克[7_2]、布勒[7_3]、威廉·莫尔斯沃思[7_4]爵士、约翰·罗米利[7_5]和爱德华·罗米利[7_6]，还有其他几个人。此外，还有沃伯顿、斯特拉特等早已进入议会的一些人。这些人自认为是哲学激进派，他们的朋友也这样称呼他们，他们现在获得的地位比以前的都更有利，似乎有很好的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我和父亲对他们寄予厚望。然而，这些希望注定要破灭。在投票问题上，这些人很诚实，忠于自己的主张，经常不在乎很多挫折。当议会提出的议案与他们的原则极其不一致时，比如《爱尔兰镇压法案》或者1837年的《加拿大镇压法案》，他们就勇敢地站了出来，挑战所有的敌对和偏见，而不放弃正确的主张。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对发扬任何观念都没起到多大作用。他们没什么进取心，也没采取多少行动，还把下议院激进派的领导权交给老议员休谟和奥康奈尔[7_7]。但必须看到有一两个年轻人是例外，比如罗巴克，他就有资格被人们永远记住，因为就在他进入议会的头一年，他就发起了（或者说在布鲁厄姆尝试失败后，重新发起了）议会全民教育运动。他还是第一个发起争取殖民地自治运动的人，而且很多年来，几乎一直靠自己的力量坚持了下去。任何其他个人所做的事情，加起来都不能和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即使是人们寄予厚望的人。现在平静地回想起来，这些人的不足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对他们期望其实太高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很不利，他们的命运被锁定在那必然保守的十年，那时，改革热情已逝，公众真正要求的少数立法上的改良已匆匆实现，权力正回归到其自然的方向上，回到那些主张保持现状的人手里。这时，公众的心灵希望休息，比战争结束后的任何时期都更难以受到触动，把改革的感情发展成支持新事物的努力是无法触动它的。当国家处于这种状态时，必须有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通过议会讨论来催生真正伟大的事情，但又不能责怪任何人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和父亲曾希望出现一位能胜任的领袖，这个人既有哲学造诣，又有得人心的才干，能全心全意调动愿意和他一起行动的很多年轻人或者不是那么著名的人；他能够让这些人凭自己的才干，把先进的思想带到大众面前；能够把国会下议院当作教导、推动公众思想的讲坛或讲台；能够要么迫使辉格党[7_8]接受他的措施，要么从他们手中夺回改革党的领

导权。如果我父亲在议会的话，就会有这样一位领袖。由于缺少这样一个人，受过教育的激进分子只能沦落为辉格党的左派。我曾热切地认为，激进分子哪怕能够尽寻常之力去实践他们的观点，就会有很大的成功机会，我现在也觉得自己当时估计过高了；带着这种想法，从那时起到1839年，我既通过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私下的影响，又通过作品向他们灌输我的想法和意图。我这样做给查尔斯·布勒和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带来了一些益处。他们两人都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不幸都几乎在刚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就离开议会了。然而总的来说，我的努力是徒劳的。要在这方面获得成功，需要一个和我身处不同位置的人。这项任务只有身处议会里的人才能完成，这样的人有机会和议会里的激进分子进行日常磋商，能自己掌握主动，能号召别人追随自己，而不是激励别人去做领袖。

What I could do by writing, I did. During the year 1833 I continued working in the *Examiner* with Fonblanque who at that time was zealous in keeping up the fight for Radicalism against the Whig ministry. During the session of 1834 I wrote comments on passing events, of the nature of newspaper articles (under the title “Notes on the Newspapers”), in the *Monthly Repository* , a magazine conducted by Mr. Fox, well known as a preacher and political orator, and subsequently as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Oldham; with whom I had lately become acquainted, and for whose sake chiefly I wrote in his magazine. I contributed several other articles to this periodical, the most considerable of which (on the theory of Poetry), is reprinted in the “Dissertations.” Altogether, the writings (independently of those in newspapers) which I published from 1832 to 1834, amount to a large volume. This, however, includes abstracts of several of Plato's Dialogues, 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which, though not published until 1834, had been written several years earlier; and which I afterwards, on various occasions, found to have been read, and their authorship known, by more people than

were aware of anything else which I had written, up to that time. To complete the tale of my writings at this period, I may add that in 1833, at the request of Bulwer, who was just then completing his *England and the English* (a work, at that time, greatly in advance of the public mind), I wrote for him a critical account of Bentham's philosophy, a small part of which he incorporated in his text, and printed the rest (with an honourable acknowledgment), as an appendix. In this, along with the favourable, a part also of the unfavourable side of my estimation of Bentham's doctrines, considered as a complete philosophy, was for the first time put into print.

凡能通过写作来完成的事情，我都做了。1833年间，我继续和方布兰克 [7_9] 一起为《检查报》工作，他那时很热心于支持激进主义、反对辉格党内阁的斗争。1834年议会会议期间，我写了一些报刊文章性质的实事评论（题为《报纸评论》），发表在《每月丛刊》上，这是福克斯 [7_10] 先生创办的杂志，他是著名的宣传家、政治演说家，后来成为代表奥尔德姆的议员。我和他不久前刚认识，我在他的杂志上写文章，也主要是因为他的缘故。我给他的刊物写了好几篇别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篇（讨论诗歌理论的）在《论述和讨论》中再版。从1832年到1834年，我所有发表的作品（不包括报纸上的文章），加起来有一大本书那么厚。然而，这里面包括好几篇柏拉图《对话录》的摘要，并带有卷首语，这些摘要其实好几年前就写了，但是到1834年才发表。后来，我在很多场合里发现有人读过这些摘要，也知道我是它们的作者，但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对我之前所写的其他作品一无所知。为了完善对我这个阶段作品的叙述，我可以补充上一件事：1833年，布尔沃 [7_11] 正在为他的《英国和英国人》收尾（当时这部著作远远超过了公众的思想水平）。应他的邀请，我为他写了一篇评论边沁哲学的文章，他把其中一小部分融入自己的正文，把其余的部分（附有体面的致谢）作为附录印了出来。在这篇文章里，除了我对边沁学说赞许的评价外，还有不赞许的评价，这些评价

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这是它们第一次得到发表。

But an opportunity soon offered, by which, as it seemed, I might have it in my power to give more effectual aid, and at the same time, stimulus, to the “philosophic Radical” party, than I had done hitherto. One of the projects occasionally talked of between my father and me, and some of the parliamentary and other Radicals who frequented his house, was the foundation of a periodical organ of philosophic radicalism, to take the place which the *Westminster Review* had been intended to fill: and the scheme had gone so far as to bring under discussion the pecuniary contributions which could be looked for, and the choice of an editor. Nothing, however, came of it for some time: but in the summer of 1834 Sir William Molesworth, himself a laborious student, and a precise and metaphysical thinker, capable of aiding the cause by his pen as well as by his purse, spontaneously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Review, provided I would consent to be the real, if I could not be the ostensible, editor. Such a proposal was not to be refused; and the Review was founded, at first under the title of the *London Review* , and afterwards under that of the *London and Westminster* , Molesworth having bought the *Westminster* from its proprietor, General Thompson, and merged the two into one. In the years between 1834 and 1840 the conduct of this Review occupied the greater part of my spare time. In the beginning, it did not, as a whole, by any means represent my opinions. I was under the necessity of conceding much to my inevitable associates. The *Review* was established to b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hilosophic Radicals,” with most of whom I was now at issue on many essential points, and among whom I could not even claim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individual. My father's co-operation as a writer we all deemed indispensable, and he wrote largely in it until prevented by

his last illness. The subjects of his articles, and the strength and decision with which his opinions were expressed in them, made the *Review* at first derive its tone and colouring from him much more than from any of the other writers. I could not exercise editorial control over his articles, and I was sometimes obliged to sacrifice to him portions of my own. The old *Westminster Review* doctrines, but little modified, thus formed the staple of the *Review* ; but I hoped by the side of these, to introduce other ideas and another tone, and to obtain for my own shade of opinion a fair representation, along with those of other members of the party. With this end chiefly in view, I made it one of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work that every article should bear an initial, or some other signature, and be held to express the opinions solely of the individual writer; the editor being only responsible for its being worth publishing and not in conflict with the objects for which the *Review* was set on foot. I had an opportunity of putting in practice my scheme of 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philosophic radicalism," by the choice of a subject for my own first contribution. Professor Sedgwick, a man of eminence in a particular walk of natural science, but who should not have trespassed into philosophy, had lately published his *Discourse on the Studies of Cambridge* , which had as its most prominent feature an intemperate assault on analytic psychology and utilitarian ethics, in the form of an attack on Locke and Paley. This had excited great indignation in my father and others, which I thought it fully deserved. And here, I imagined, was an opportunity of at the same time repelling an unjust attack, and inserting into my defence of Hartleianism and Utilitarianism a number of the opinions which constituted my view of those subjects,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at of my old associates. In this I partially succeeded, though my relation to my father would have made it painful to me in any case, and impossible in a Review for which he wrote, to speak out my whole mind on the subject at this

time.

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机会，使我似乎有能力通过它为“哲学激进派”提供比以往更有效的帮助和激励。父亲和我，还有一些经常拜访他的议会激进分子和其他激进派人士，偶尔讨论过一个计划，就是要创立一个哲学激进主义的期刊，取代意在填补这个位置的《威斯敏斯特评论》。计划已经进展到要讨论从何处寻求资金投入和选择编辑了。然而一段时期内，什么事情都没落实。但是，1834年夏天，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主动提议创办一个评论性刊物，条件是如果我不能做名誉编辑的话，就要同意做真正的编辑，其实他自己就是个勤勉的学者，缜密的形而上学思想家，能够用他的笔和金钱来支持这个事业。这样的一个提议是无法拒绝的，于是评论杂志创立了，最初命名为《伦敦评论》，后来莫尔斯沃思把《威斯敏斯特评论》从它的所有人汤普森将军那里买过来，将两者合二为一，改名为《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1834年到1840年，管理《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占用了我大部分的空闲时间。起初，从总体上说，它完全不代表我的观点。我必须经常对无法回避的同事让步。这个评论杂志是为了代表“哲学激进分子”的观点而创办的，但是现在，我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意见不合，我甚至不能声称自己是他们中最重要的一员。作为一名作家，我父亲给予的合作，我们都相信是不可或缺的，他写了很多文章，直到临终前生病无法写作了才停笔。他文章的主题，以及表达观点时的力度和果断，是评论杂志初期风格和色彩的主要来源，在这方面其他任何作家都是不能比的。我无法对他的文章进行编辑，有时还必须把自己文章的一部分编辑权让给他。因此，旧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宗旨，几乎没作修改就成了《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的主题。但是我希望除了这些之外，还要引进其他的观点和另一种风格，也为我自己的少许观点和这个党派的其他成员找到公平的展现机会。主要出于这个目的，我确保该刊物具有一个特色，就是每篇文章上都应该有作者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或其他签名，以示文章只表达作者本人的观点。编辑的职责只是确保它有刊登的价值，并且与《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创立的宗旨不相冲突。在我第一次为

它写稿的时候，通过选择文章的主题，我有机会将自己协调新旧“哲学激进主义”的计划付诸实践。塞奇威克 [7_12] 教授在自然科学的一个特定领域很有名，但他不应该越界进入哲学领域，他最近发表了《论剑桥研究》一书，此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攻击洛克和佩利 [7_13] 的形式，猛烈地攻击分析心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这激起了我父亲和其他人的义愤，我觉得这完全是它应得的。我设想，这是个机会，既能击退不公正的批评，同时又能把我对那些问题的许多看法插入到我对哈特利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辩护之中去，而这些看法和我以前同事的是不同的。在这件事上，我取得了部分成功，然而由于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如若我把这时对这个问题的所有看法都说出来，无论如何都会是件很痛苦的事情，而且在他为之撰稿的《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中也根本不可能全说出来。

I am, however, inclined to think that my father was not so much opposed as he seemed, to the modes of thought in which I believed myself to differ from him; that he did injustice to his own opinions by the unconscious exaggerations of an intellect emphatically polemical; and that when thinking without an adversary in view, he was willing to make room for a great portion of the truths he seemed to deny. I have frequently observed that he made large allowance in practice for considerations which seemed to have no place in his theory. His *Fragment on Mackintosh* , which he wrote and published about this time, although I greatly admired some parts of it, I read as a whole with more pain than pleasure; yet on reading it again, long after, I found little in the opinions it contains, but what I think in the main just; and I can even sympathize in his disgust at the *verbiage* of Mackintosh, though his asperity towards it went not only beyond what was judicious, but beyond what was even fair. One thing, which I thought, at the time, of good augury, was the very favourable reception he gave to Tocqueville's *Democracy in America* . It is true, he said and thought

much more about what Tocqueville said in favour of democracy, than about what he said of its disadvantages. Still, his high appreciation of a book which was at any rate an example of a mode of treating the question of government almost the reverse of his—wholly inductive and analytical, instead of purely ratiocinative—gave me great encouragement. He also approved of an article which I published in the first number following the junction of the two reviews, the essay reprinted in the *Dissertations* , under the title "Civilization"; into which I threw many of my new opinions, and criticised rather emphatically the mental and moral tendencies of the time, on grounds and in a manner which I certainly had not learnt from him.

然而，我更愿意认为父亲并不像他表现的那样，反对我持有不同于他的思考模式。他无意识地夸大了特别好辩的智力，使他没能公正地对待自己的观点。如果思考的时候眼前没有对手，他就愿意为自己似乎否认的一大部分真理留出余地。我经常发现，他在实际中常常思考那些在他的理论里看起来无足轻重的东西。他的《略论麦金托什》，差不多是在这时写了发表的，尽管我非常崇拜里面的某些部分，但是整本书读起来痛苦大于快乐。很久以后重读的时候，我从它所包含的观点中无所收获，但发现了我认为大体上公正的东西。我甚至和他一样讨厌麦金托什的《空话》，然而他对它的严厉指责不仅不够明智，而且有失公允。我认为，当时有好兆头的一件事情是他非常赞同地接受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确实如此，他说得更多，思考得更多的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的优点，而不是他所说的民主的缺点。尽管这本书在论述政府问题的方式上无论如何都几乎和他的方式完全相反——完全是归纳和分析，而不是纯粹的推理，但他却对它评价这么高，这给了我很大鼓励。两家评论杂志合并后，我在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得到了他的肯定，后来这篇文章在《讨论与论述》中以《文明》为题重印。在这篇文章中，我添加了很多自己的新观点，强有力地批评了当时的思想和道德倾向，批评的基础和方式无

疑不是从他那里学到的。

All speculation, however, on the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s of my father's opinions, and on the probabilities of permanent co-operation between him and me in the promulgation of our thoughts, was doomed to be cut short. During the whole of 1835 his health had been declining: his symptoms became unequivocally those of pulmonary consumption, and after lingering to the last stage of debility, he died on the 23rd of June, 1836. Until the last few days of his life there was no apparent abatement of intellectual vigour; his interest in all things and persons that had interested him through life was undiminished, nor did the approach of death cause the smallest wavering (as in so strong and firm a mind it was impossible that it should) in his convictions on the subject of religion. His principal satisfaction, after he knew that his end was near, seemed to be the thought of what he had done to make the world better than he found it; and his chief regret in not living longer, that he had not had time to do more.

然而，父亲的思想将来可能的发展，以及他和我在传播思想上永久合作的可能性，注定要被中断。1835年整一年，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很显然是肺结核的症状，挨过生命中最虚弱的阶段后，他于1836年6月23日去世了。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的思想活力也没有明显减弱。他对一生中感兴趣的所有人和事的兴趣没有减少，死亡的临近也没有让他对宗教问题的信念产生丝毫的动摇（如此坚定而有主见的头脑是不可能动摇的）。在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时，他主要的欣慰似乎是想到自己为把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作出了努力。而他主要的遗憾是不能多活几年，没有时间做更多的事情。

His place is an eminent one in the literary, and even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his country; and it is far from honourable to the generation which has benefited by his worth, that he is so seldom mentioned, and, compared with men far his inferiors, so little remembered. This is probably to be ascribed mainly to two cause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thought of him merges too much in the deservedly superior fame of Bentham. Yet he was anything but Bentham's mere follower or disciple. Precisely because he was himself one of the most original thinkers of his time, he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to appreciate and adopt the most important mass of original thought which had been produced by the generation preceding him. His mind and Bentham's were essentially of different construction. He had not all Bentham's high qualities, but neither had Bentham all his. It would, indeed, be ridiculous to claim for him the praise of having accomplished for mankind such splendid services as Bentham's. He did not revolutionize, or rather create, one of the great departments of human thought. But, leaving out of the reckoning all that portion of his labours in which he benefited by what Bentham had done, and counting only what he achieved in a province in which Bentham had done nothing, that of analytic psychology, he will be known to posterity as one of the greatest names in that most important branch of speculation, on which all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ultimately rest, and will mark one of the essential stages in its progress. The other reason which has made his fame less than he deserved, is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great number of his opinions which, partly through his own efforts, have now been generally adopted, there was, on the whole, a marked opposition between his spirit and that of the present time. As Brutus was called the last of the Romans, so was he the las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e continued its tone of thought and sentiment into the nineteenth (though not unmodified nor unimproved), partaking neither in the good nor in the bad

influences of the reaction agains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hich was the great characteristic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as a great age, an age of strong and brave men, and he was a fit companion for its strongest and bravest. By his writings and his personal influence he was a great centre of light to his generation. During his later years he was quite as much the head and leader of the intellectual radicals in England, as Voltaire was of the *philosophes* of France. It is only one of his minor merits, that he was the originator of all sound statesmanship in regard to the subject of his largest work, India. He wrote on no subject which he did not enrich with valuable thought, and excepting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 a very useful book when first written, but which has now for some time finished its work, it will be long before any of his books will be wholly superseded, or will cease to be instructive reading to students of their subjects. In the power of influencing by mere force of mind and character, the convictions and purposes of others, and in the strenuous exertion of that power to promote freedom and progress, he left, as far as my knowledge extends, no equal among men and but one among women.

在英国的文学史上，甚至在政治史上，他的地位都是很显赫的。从他的价值观中受益的一代人很少提到他，而且同那些远不如他的人相比，他也很少被人记住，他们这样做很不光彩。这大概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他的思想太过融入于边沁的思想中，而边沁的名声理所当然更大。然而，他绝不是边沁纯粹的追随者或信徒。恰恰由于他本人就是那个时代最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是最早赏识并采纳前辈们创造的大量最重要的独创思想的人之一。他的思想和边沁的思想在结构上根本不同。他不具备边沁的所有优秀素质，边沁也没有他的所有优秀素质。如果称赞他和边沁一样为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话，确实是很可笑的。他没有彻底改革，或者说没有创造出人们思想的一个伟大领域。但是，如果先不考虑他工作中从边沁那儿受益的那部分，只

考虑他在边沁没有涉足的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即分析心理学，后代人就会知道，在思想的这个最重要分支里，亦即所有道德和政治科学最终都要依赖的方面，他是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且这也是该分支发展过程中一个最重要阶段的标志。他的名声不如应得的响亮，另一个原因就是，尽管他有很多观点，而部分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已大都被采纳，但从总体上来说，他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明显对立。正如布鲁图[7_14] 被称为最后一个罗马人一样，他也是最后一个18世纪的人：他把18世纪的思想和情感风格延续到了19世纪（尽管有所变化和改进），反对18世纪是19世纪上半叶的重要特征，这其中产生的或好或坏的影响，他都不理会。18世纪是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很多坚强、勇敢的人，他适合与其中最坚强、最勇敢的人做朋友。通过他的著作和个人影响力，他成为那个时代伟大人物的核心。就像伏尔泰是法国哲学界的领袖一样，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完全算是英国知识界激进分子的首脑和领袖。鉴于他规模最大的著作《英属印度史》的主题，他算得上是所有合理的治国策略的首创者，但这只是他较小的功绩之一。他会用有价值的思想去丰富所写的任何题材，除了《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书刚写完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但是现在它的使命已经结束了。他的作品要很久以后才会被完全取代，对研究其主题的学生来说，也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有启发的读本。他仅凭思想和品格的力量就能影响别人的信念和目标，他也努力发挥这种力量以促进自由和进步，就我所知，这在男性中无人能及，女性当中倒是有一个。

Though acutely sensible of my own inferiority in the qualities by which he acquired his personal ascendancy, I had now to try what it might be possible for me to accomplish without him: and the *Review* was the instrument on which I built my chief hopes of establishing a useful influence over the liberal and democratic section of the public mind. Deprived of my father's aid, I was also exempted from the restraints and reticences by which that aid had been purchased. I did not feel that there was any other radical

writer or politician to whom I was bound to defer, further than consisted with my own opinions: and having the complete confidence of Molesworth, I resolved henceforth to give full scope to my own opinions and modes of thought, and to open the *Review* widely to all writers who were in sympathy with Progress as I understood it, even though I should lose by it the support of my former associates. Carlyle, consequently became from this time a frequent writer in the *Review* ; Sterling, soon after, an occasional one; and though each individual article continued to be the expression of the private sentiments of its writer, the general tone conformed in some tolerable degree to my opinions. For the conduct of the *Review* , under,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me, I associated with myself a young Scotchman of the name of Robertson, who had some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much industry, and an active scheming head, full of devices for making the *Review* more saleable, and on whose capacities in that direction I founded a good deal of hope: insomuch, that when Molesworth, in the beginning of 1837, became tired of carrying on the *Review* at a loss, and desirous of getting rid of it (he had done his part honourably, and at no small pecuniary cost,) I, very imprudently for my own pecuniary interest, and very much from reliance on Robertson's devices, determined to continue it at my own risk, until his plans should have had a fair trial. The devices were good, and I never had any reason to change my opinion of them. But I do not believe that any devices would have made a radical and democratic review defray its expenses, including a paid editor or sub-editor, and a liberal payment to writers. I myself and several frequent contributors gave our labour gratuitously, as we had done for Molesworth; but the paid contributors continued to be remunerated on the usual scale of the *Edinburgh* and *Quarterly Reviews* ; and this could not be done from the proceeds of the sale.

尽管我非常清楚，在他取得个人优势的那些方面，我远不如他，但我现在必须尝试，看看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自己有可能取得什么成就。我希望对公众思想中有关自由和民主的部分产生有益的影响，我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这个工具上。没有了父亲的帮助，我也免除了获得这些帮助所需要的约束和节制。我并不觉得一定要遵从其他任何激进派的作家或政治家，只需保持自己的观点前后一致就可以了。因为得到了莫尔斯沃思的完全信任，我决心从此以后充分发挥自己的观点和思考模式，把评论杂志向所有赞成我所理解之进步的作家敞开，即使可能会因此失去以前同事的支持。因此，卡莱尔从这时起经常为《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写文章。不久之后，斯特林 [7_15] 也偶尔写一篇，尽管每一篇独立的文章仍然是作者私人情感的表达，但是总体的基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符合我的理念。为了管理这个评论杂志，我和一个名叫罗伯逊的苏格兰年轻人合作，他有一定的能力和见地，非常勤奋，头脑活跃，善于计划，有很多让《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更畅销的办法，我对他这方面的能力寄予厚望。因此在1837年初，莫尔斯沃思疲于亏本经营《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并希望摆脱它的时候（他很光荣地尽了自己的职责，而且付出了很大的经济代价），我非常鲁莽地决定自己负责继续办下去，这一方面是为了我自己的经济利益，也是因为非常信赖罗伯逊的方法，要让他的计划充分试验一下。他的方法很好，我也从来没有理由改变自己对这些方法的看法。但是，我相信任何方法都不能让一个激进和民主主义的评论刊物有能力支付费用，包括主编和副主编的酬劳，以及给作者慷慨的稿酬。我和好几个经常性的撰稿人免费劳动，和莫尔斯沃思那时候一样，但是对于要付稿酬的撰稿人，继续按照《爱丁堡评论》和《季刊评论》的标准支付给他们报酬。而销售收入根本支付不了这笔费用。

In the same year, 1837, and in the midst of these occupations, I resumed the *Logic* . I had not touched my pen on the subject for five years, having been stopped and brought to a halt on the threshold of Induction. I had gradually discovered that what was mainly

wanting,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of that branch of the subject, was a comprehensive, and, at the same time, accurate view of the whole circle of physical science, which I feared it would take me a long course of study to acquire; since I knew not of any book, or other guide, that would spread out before me the generalities and processes of the sciences, and I apprehended that I should have no choice but to extract them for myself, as I best could, from the details. Happily for me, Dr. Whewell, early in this year, published his *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 . I read it with eagerness, and found in it a considerable approximation to what I wanted. Much, if not most,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work appeared open to objection; but the materials were there, for my own thoughts to work upon: and the author had given to those materials that first degree of elaboration, which so greatly facilitates and abridges the subsequent labour. I had now obtained what I had been waiting for. Under the impulse given me by the thoughts excited by Dr. Whewell, I read again Sir J. Herschel's *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Natural Philosophy* : and I was able to measure the progress my mind had made, by the great help I now found in this work—though I had read and even reviewed it several years before with little profit. I now set myself vigorously to work out the subject in thought and in writing. The time I bestowed on this had to be stolen from occupations more urgent. I had just two months to spare, at this period, in the intervals of writing for the *Review* . In these two months I completed the first draft of about a third, the most difficult third, of the book. What I had before written, I estimate at another third, so that one-third remained. What I wrote at this time consisted of the remainder of the doctrine of Reasoning (the theory of Trains of Reasoning, and Demonstrative Science),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Book on Induction. When this was done, I had, as it seemed to me, untied all the really hard knots, and the completion of the book had become only a question of time. Having got thus

far, I had to leave off in order to write two articles for the next number of the *Review* . When these were written, I returned to the subject, and now for the first time fell in with Comte's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 or rather with the two volumes of it which were all that had at that time been published.

同一年，1837年，在从事这些工作的同时，我重新开始写《逻辑学体系》。我在刚开始写归纳法的时候就停了下来，到此时已有五年没碰这个题目了。我慢慢发现，要克服逻辑学这个分支的困难，需要对整个自然科学领域进行全面和精确的了解，我担心这要花很长时间的学习才能获得。因为我不了解任何能够在我面前展现这些科学的一般原则和过程的书籍或其他指南，而我还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尽量从细节中吸取这些东西。幸运的是，休厄尔 [7_16] 博士在这年年初出版了《归纳科学史》。我殷切地读完了它，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我想要的很接近。这部著作里有很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基本原理看起来值得商榷，但是有很多材料可以供我思考时使用。作者对那些材料进行了详细阐述，这大大方便并缩减了我后来的工作。我现在得到了自己一直想要的东西。在休厄尔博士思想的促动下，我重读了约翰·赫歇耳爵士 [7_17] 的《论自然哲学的研究》。在这本著作给我的巨大帮助下，我能够衡量自己思想上产生的进步，虽然在几年前，我读它甚至温习它的时候几乎一无所获。现在，我满腔热情地思考这个主题，并把它写出来。我必须从其他更紧急的事情中偷出时间来用在这上面。在这段时间里，我只能从为评论杂志写文章的间隙里节省下两个月的时间。就在这两个月里，我完成了差不多初稿的三分之一，也是书中最难的三分之一。之前写的，我估计也有三分之一，所以只剩下三分之一没有完成。我这时所写的，包括推理原理剩下的部分（即一系列的推理原理和论证科学）和归纳法这一卷的大半部分。这部分写完之后，在我看来，我已经解决了所有真正的困难，全书的完成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进展到这儿为止，我必须先停下来，为下一期的《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写两篇文章。写完文章后，我又继续写书，这时我第一次偶然读到了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或者更确切

地说，读到了两卷，当时已经出版的也只有这两卷。

My theory of Induction was substantially completed before I knew of Comte's book; and it is perhaps well that I came to it by a different road from his, since the consequence has been that my treatise contains, what his certainly does not, a reduction of the inductive process to strict rules and to a scientific test, such as the syllogism is for ratiocination. Comte is always precise and profound on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but he does not even attempt any exact defini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proof: and his writings show that he never attained a just conception of them. This, however, was specifically the problem, which, in treating of Induction, I had proposed to myself. Nevertheless, I gained much from Comte, with which to enrich my chapters in the subsequent rewriting: and his book was of essential service to me in some of the parts which still remained to be thought out. As his subsequent volumes successively made their appearance, I read them with avidity, but, when he reached the subject of Social Science, with varying feelings. The fourth volume disappointed me: it contained those of his opinions on social subjects with which I most disagree. But the fifth, containing the connected view of history, rekindled all my enthusiasm; which the sixth (or concluding) volume did not materially abate. In a merely logical point of view, the only leading conception for which I am indebted to him is that of the Inverse Deductive Method, as the one chiefly applicable to the complicated subjects of History and Statistics: a process differing from the more common form of the deductive method in this—that instead of arriving at its conclusions by general reasoning, and verifying them by specific experience (as is the natural order in the deductive branches of physical science), it obtains its generalizations by a collation of specific experience, and verifies them by ascertaining

whether they are such as would follow from known general principles. This was an idea entirely new to me when I found it in Comte: and but for him I might not soon (if ever) have arrived at it.

在我知道有孔德的书之前，我的归纳法理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我获得理论的方法很可能和他的不同，因为结果是我的论述中包含着他的论述里面没有的东西，即把归纳过程简化为精确的法则和科学的试验，比如用三段论法进行推理。孔德在研究方法上一直都很精确，造诣很深，但是他甚至从未尝试为证据的条件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他的著作显示，对于证据的条件，他从来都没有获得恰当的理解。然而，这正好是我处理归纳现象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我从孔德那里得到很多，充实了我后来改写的一些章节。对我当时仍然想不透的地方，他的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随着接下来的几卷陆续出版，我急切地阅读了它们，但是在读到他所谈的社会科学这个问题时，我的感觉变了。第四卷让我很失望，因为里面所包含的他对社会问题的见解，是我非常不认同的。但是，第五卷所包含的连贯历史观，重新点燃了我所有的热情。第六卷也没有极大地减弱这种热情。仅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我得益于他的唯一重要的概念是反演法，主要适用于历史和统计学上的复杂问题：反演法的过程不同于普通演绎法，它不是通过一般推理得到结论，再用具体的事例检验结论（这是自然科学中演绎分支的自然顺序），而是通过整理特定的经验来获得结论，通过确定这些结论是否遵从已知的普遍原理来证实它们。在孔德的书中发现这个观点时，它对我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如果不是他，我很可能不会很快地（或者永远不会）领会它。

I had been long an ardent admirer of Comte's writings before I had any communication with himself; nor did I ever, to the last, see him in the body. But for some years we were frequent correspondents, until our correspondence became controversial, and our zeal cooled. I was the first to slacken correspondence; he was

the first to drop it. I found, and he probably found likewise, that I could do no good to his mind, and that all the good he could do to mine, he did by his books. This would never have led to discontinuance of intercourse, i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s had been on matters of simple doctrine. But they were chiefly on those points of opinion which blended in both of us with our strongest feelings, and determined the entire direction of our aspirations. I had fully agreed with him when he maintained that the mass of mankind, including even their rulers in all the practical departments of life, must, from the necessity of the case, accept most of their opinions on political and social matters, as they do on physical, from the authority of those who have bestowed more study on those subjects than they generally have it in their power to do. This lesson had been strongly impressed on me by the early work of Comte, to which I have adverted. And there was nothing in his great Treatise which I admired more than his remarkable exposition of the benefits which the nations of modern Europe have historically derived from the separa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s, of temporal and spiritual power, and the distinct organization of the latter. I agreed with him that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ascendancy, once exercised by priests, must in time pass into the hands of philosophers, and will naturally do so when they become sufficiently unanimous, and in other respects worthy to possess it. But when he exaggerated this line of thought into a practical system, in which philosophers were to be organized into a kind of corporate hierarchy, invested with almost the same spiritual supremacy (though without any secular power) once possessed by the Catholic Church; when I found him relying on this spiritual authority as the only security for good government, the sole bulwark against practical oppression, and expecting that by it a system of despotism in the state and despotism in the family would be rendered innocuous and beneficial;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while as logicians we were nearly at one, as sociologists we could travel together no further. M. Comte lived to carry out these doctrines to their extremest consequences, by planning, in his last work, the *Système de Politique Positive* , the completest system of spiritual and temporal despotism which ever yet emanated from a human brain, unless possibly that of Ignatius Loyola: a system by which the yoke of general opinion, wielded by an organized body of spiritual teachers and rulers, would be made supreme over every action, and as far as is in human possibility, every thought, of every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as well in the things which regard only himself, as in those which concern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It is but just to say that this work is a considerable improvement, in many points of feeling, over Comte's previous writings on the same subjects: but as an accession to social philosophy, the only value it seems to me to possess, consists in putting an end to the notion that no effectual moral authority can be maintained over society without the aid of religious belief; for Comte's work recognises no religion except that of Humanity, yet it leaves an irresistible conviction that any moral beliefs concurred in by the community generally may be brought to bear upon the whole conduct and lives of its individual members, with an energy and potency truly alarming to think of. The book stands a monumental warning to thinkers on society and politics, of what happens when once men lose sight, in their speculations, of the value of Liberty and of Individuality.

在与孔德有任何交往之前，我早就已经是他热情的崇拜者了，直到最后我也从没有亲眼见过他。但是，有几年我们经常通信，一直到我们的通信中开始出现争论，热情冷却为止。是我首先减少了与他的通信，而他首先终止了通信。我发现，他可能也同样发现了，我对他的思想没什么帮助，而他给我带来的所有帮助，全都在他的书里面了。如果我们之间的分歧仅存在于简单的理论问题上的话，这也绝不

会导致我们中止交流。但是，分歧主要存在于一些与我们双方内心最强烈的情感结合在一起的观点上，而且这些观点决定了我们目标的总体方向。他主张大多数人，包括他们生活中所有实践领域的统治者，出于情形需要，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都必须接受在这上面比他们做了更多研究的权威人士的大部分观点，就像接受他们在自然科学上的见解一样，对此我完全赞同。在我提到的孔德的早期著作中，这个见解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他那本伟大的专著里，我最崇拜的是他非凡地阐述了现代欧洲国家在历史上从中世纪世俗权力和神权的分离中，以及神权的独特构造中得到的益处。我也同意他所说的，即道德和智力优势曾经一度由牧师操纵，但假以时日，一定会交到哲学家的手里，而且当哲学家的意见足够一致，且在其他方面有资格拥有这种优势时，这件事就会自然发生。但是，他把这个思想路线夸大成一种实际的制度，在这种制度里，哲学家们被组织成一种有层级的集体，授予他们几乎与过去的天主教会一样的精神权威（尽管没有任何世俗权力）。我发现，他把这种精神权威当作善政的唯一保障，反对实际压迫的唯一堡垒，还希望通过它使国家和家庭的专制制度变得无害反而有益。所以，作为逻辑学家，我们几乎完全一致，但是作为社会学家，我们无法继续一起前行，这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孔德先生一生致力于贯彻这些学说，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实证政治学体系》里，他策划了最完善的教权和俗权专制的制度，这种专制制度，可能除了伊格内修斯·罗耀拉 [7_18] 外，别人根本不可能想出来。通过这种制度，可以让由精神导师和统治者组成的团体，通过控制舆论来控制所有的社会行为，并在人类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控制社会成员的每种想法，除了只与本人相关的事情，还有那些关乎别人利益的事情。但是公平地说，与孔德先前相同主题的作品相比，这部作品在情感方面的很多观点上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作为社会哲学的补充物，在我看来，它具有的唯一价值就在于结束了一种观念，即认为任何有效的道德权威，都必须借助宗教信仰的支持才能在社会上得以维持。孔德的著作除了人性，没有认可任何宗教，然而它让人不得不相信：任何受到社会普遍赞成的道德信仰，都可以用来对它个体成员的所有行为和生活施加压力，其力量和潜能确实让人一想起来就很害怕。这本书对社会学和政治学思想家是个严重的警告，它使人了解到，人们在思

考的时候，一旦忽略了自由和个性的价值，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To return to myself. The *Review* engrossed, for some time longer, nearly all the time I could devote to authorship, or to thinking with authorship in view. The articles from the *London and Westminster Review* which are reprinted in the *Dissertations* , are scarcely a fourth part of those I wrote. In the conduct of the *Review* I had two principal objects. One was to free philosophic radicalism from the reproach of sectarian Benthamism. I desired, while retaining the precision of expression, the definiteness of meaning, the contempt of declamatory phrases and vague generalities, which were so honourably characteristic both of Bentham and of my father, to give a wider basis and a more free and genial character to Radical speculations; to show that there was a Radical philosophy, better and more complete than Bentham's, while recognizing and incorporating all of Bentham's which is permanently valuable. In this first object I, to a certain extent, succeeded. The other thing I attempted, was to stir up the educated Radicals, in and out of Parliament, to exertion, and induce them to make themselves, what I thought by using the proper means they might become —a powerful party capable of tak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 or at least of dictating the terms on which they should share it with the Whigs. This attempt was from the first chimerical: partly because the time was unpropitious, the Reform fervour being in its period of ebb, and the Tory influences powerfully rallying; but still more, because, as Austin so truly said, “the country did not contain the men.” Among the Radicals in Parliament there were several qualified to be useful members of an enlightened Radical party, but none capable of forming and leading such a party. The exhortations I addressed to them found no response. One occasion did present itself when there seemed to be room for a bold and successful stroke

for Radicalism. Lord Durham had left the ministry, by reason, as was thought, of their not being sufficiently Liberal; he afterwards accepted from them the task of ascertaining and removing the causes of the Canadian rebellion; he had shown a disposition to surround himself at the outset with Radical advisers; one of his earliest measures, a good measure both in intention and in effect, having been disapproved and reversed by the Government at home, he had resigned his post, and placed himself openly in a position of quarrel with the Ministers. Here was a possible chief for a Radical party in the person of a man of importance, who was hated by the Tories and had just been injured by the Whigs. Any one who had the most elementary notions of party tactics, must have attempted to make something of such an opportunity. Lord Durham was bitterly attacked from all sides, inveighed against by enemies, given up by timid friends; while those who would willingly have defended him did not know what to say. He appeared to be returning a defeated and discredited man. I had followed the Canadian events from the beginning; I had been one of the prompters of his prompters; his policy was almost exactly what mine would have been, and I was in a position to defend it. I wrote and published a manifesto in the *Review* , in which I took the very highest ground in his behalf, claiming for him not mere acquittal, but praise and honour. Instantly a number of other writers took up the tone: I believe there was a portion of truth in what Lord Durham, soon after, with polite exaggeration, said to me—that to this article might be ascribed the almost triumphal reception which he met with on his arrival in England. I believe it to have been the word in season, which, at a critical moment, does much to decide the result; the touch which determines whether a stone, set in motion at the top of an eminence, shall roll down on one side or on the other. All hopes connected with Lord Durham as a politician soon vanished; but with regard to Canadian, and generally to colonial policy, the

cause was gained: Lord Durham's report, written by Charles Buller, partly 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Wakefield, began a new era; its recommendations, extending to complete internal self-government, were in full operation in Canada within two or three years, and have been since extended to nearly all the other colonies, of European race, which have any claim to the character of important communities. And I may say that in successfully upholding the reputation of Lord Durham and his advisers at the most important moment, I contributed materially to this result.

还是说说我自己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评论杂志几乎让我把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了写作上，或者以写作为目的的思考上。《论述和讨论》里收录的《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上的文章还不到我在杂志上发表的全部文章的四分之一。在管理这份评论杂志的时候，我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使哲学激进主义不再被指责为狭隘的功利主义。表达精确，意思明确，蔑视夸夸其谈和含糊其辞，这些是边沁和我父亲都拥有的值得尊敬的特质。我希望在保持这些特质的同时，给激进主义的思索以更广阔的基础和更自由、更温和的特征。我也希望在认可、吸收边沁所有具有永恒价值的理论的同时，表明存在这样一种激进主义的哲学，它比边沁的更好，更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我达到了第一个目标。我尝试的另一件事情，是鼓动议会内外受过良好教育的激进分子发挥作用，并促使他们把自己变成能够治理国家的强大党派（通过运用合适的方法，我想可能会做到），或者至少能够制定条款规定他们和辉格党共同治理国家。这个企图从一开始就是不切实际的：一方面因为时机很不利，当时改革的热情正处于衰退期，而托利党的影响得到了强有力的恢复；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正如奥斯丁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没有那种人”。议会里的激进分子当中，有好几个有资格成为进步的激进党里有用的成员，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组织并领导这样一个党派。我敦促他们，但他们毫无回应。确实曾经有一次，激进主义似乎有机会能够进行大胆而成功的一击。德拉姆勋爵离开了内阁，据说是因为是内阁成员不够开明。他后来接

受了他们给的任务，去查清并消除导致加拿大叛乱的诱因，他表示希望开始任务时身边就能有激进派的顾问。他最早采取的一个措施，在目的和效果上都很好，但却被国内政府否决，取消了，因此他辞了职，使自己公然处于和大臣们争吵的境地。这样一位受到托利党仇视，又刚被辉格党伤害的有影响力的人士，是有可能成为激进党的领袖的。任何有最基本党派策略观念的人，都一定会尝试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德拉姆勋爵受到来自各方的猛烈攻击，他被敌人谩骂，被胆小的朋友抛弃，而那些愿意为他辩护的人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回国的时候，看上去像个被打败的名声败坏的人。我从一开始就关注加拿大事件，我是他的激励者之一。我要是制定政策的话，应该与他的政策几乎完全一样，因此我能够为这种政策辩护。我写了一篇宣言，发表在《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上，我以最坚定的立场坚持他，主张他不仅无罪，而且值得称颂和尊敬。很快，许多别的作家也开始采纳我的说法。不久之后，德拉姆勋爵跟我说，他回到英国的时候受到了几乎凯旋般的接待，可能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虽然这是带有礼貌的夸张，但有一部分是实情。我认为，它只是表达得及时，所以在关键时刻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结果。就像轻轻一推从山顶滑落的石头，就会决定它会滑向这边还是那边。所有寄托在作为政治家的德拉姆勋爵身上的希望很快破灭了。但是对于加拿大和总的殖民政策来说，我们的所作所为还是有所收获的。部分由于韦克菲尔德的启发，查尔斯·布勒执笔的德拉姆勋爵报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报告的建议扩展至完全的国内自治，这个建议两三年内就在加拿大全面实行。而且，从那时起，扩展到几乎所有其他的欧洲人殖民地，这些殖民地都具有重要社区的特征。我可以说，在最关键的时刻成功地维护德拉姆勋爵和他的顾问们的名声，这一结果是我极力促成的。

One other case occurred during my conduct of the *Review* , which similarly illustrated the effect of taking a prompt initiative. I believe that the early success and reputation of Carlyle's *French Revolution* , were considerably accelerated by what I wrote about it in the *Review* . Immediately on its publication, and before the

commonplace critics, all whose rules and modes of judgment it set at defiance, had time to pre-occupy the public with their disapproval of it, I wrote and published a review of the book, hailing it as one of those productions of genius which are above all rules, and are a law to themselves. Neither in this case nor in that of Lord Durham do I ascribe the impression, which I think was produced by what I wrote, to any particular merit of execution: indeed, in at least one of the cases (the article on Carlyle) I do not think the execution was good. And in both instances, I am persuaded that anybody, in a position to be read, who had expressed the same opinion at the same precise time, and had made any tolerable statement of the just grounds for it, would have produced the same effect. But, after the complete failure of my hopes of putting a new life into Radical politics by means of the *Review* , I am glad to look back on these two instances of success in an honest attempt to do mediate service to things and persons that deserved it.

在我管理评论杂志的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同样说明了采取迅速行动的作用。我相信，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能获得早期的成功，并享有盛誉，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我在评论杂志上写的文章促成的。这本书藐视普通批评家的规则和评论方式，所以它刚一出版，我就赶在这些批评家用否定它吸引大众之前，写了一篇书评并发表了，夸它是个天才的作品，高于一切规则，本身就是规则。不管在这件事上，还是德拉姆勋爵那件事上，我都没有把效果（我想是我写的东西所带来的）归功于任何写作手法上的特殊优点。确实，至少在其中一件事情上（评论卡莱尔的文章），我认为自己的写作手法并不好。在这两个例子里，我都相信，任何拥有读者的人，在同样恰当的时间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还对它的正当理由作了较好的陈述，都会产生相同的效果。但是，在我通过《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为激进政策注入新活力的希望全部落空后，回忆起在这两个成功的例子中，我曾诚挚地努

力为值得帮助的人和事作出了即时的贡献，我就会很高兴。

After the last hope of the formation of a Radical party had disappeared, it was time for me to stop the heavy expenditure of time and money which the *Review* cost me. It had to some extent answered my personal purpose as a vehicle for my opinions. It had enabled me to express in print much of my altered mode of thought, and to separate myself in a marked manner from the narrower Benthamism of my early writings. This was done by the general tone of all I wrote, including various purely literary articles, but especially by the two papers (reprinted in the *Dissertations*) which attempted a philosophical estimate of Bentham and of Coleridge. In the first of these, while doing full justice to the merits of Bentham, I pointed out what I thought the errors and deficiencies of his philosophy. The substance of this criticism *I* still think perfectly just; but I have sometimes doubted whether it was right to publish it at that time. I have often felt that Bentham's philosophy, as an instrument of progress, has been to some extent discredited before it had done its work, and that to lend a hand towards lowering its reputation was doing more harm than service to improvement. Now, however, when a counter-reaction appears to be setting in towards what is good in Benthamism, I can look with more satisfaction on this criticism of its defects, especially as I have myself balanced it by vindications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Bentham's philosophy, which are reprinted along with it in the same collection. In the essay on Coleridge I attempted to characterize the European reaction against the negative philosoph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here, if the effect only of this one paper were to be considered, I might be thought to have erred by giving undue prominence to the favourable side, as I had done in the case of Bentham to the unfavourable. In both cases, the impetus

with which I had detached myself from what was untenable in the doctrines of Bentham a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y have carried me, though in appearance rather than in reality, too far on the contrary side. But as far as relates to the article on Coleridge, my defence is, that I was writing for Radicals and Liberals, and it was my business to dwell most on that, in writers of a different school, from the knowledge of which they might derive most improvement.

在建立一个激进党派的最后希望落空后，是时候停止把大量时间和金钱花费在《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上了。作为传达我观点的工具，它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我的个人目标。它让我发表了很多我改变后的思考方式，使我和自己早期作品中较狭隘的边沁主义划清了界线。这一点是通过我写的所有文章的总体风格表现出来的，包括各种纯粹的文学作品，但主要是通过两篇试图从哲学角度评价边沁和柯尔律治的文章表现出来的（收录在《讨论与论文》里）。在第一篇文章里，我在完全公正地评价边沁优点的同时，还按照自己的理解指出了他的哲学中的错误和不足。我现在仍然认为这个评论的主旨有着非常充分的根据。但是，有时我会怀疑在那个时候发表是否合适。我经常觉得，边沁的哲学作为进步的手段，在发挥作用之前就因在某种程度上被人怀疑而名声被贬，对进步而言弊大于利。尽管现在看起来有承认边沁主义优点的趋势，但我还是能更满意地看待自己对它缺点的批评，尤其是我在批评它的同时，也证明了边沁哲学基本原则的正确性，这些文章被收录在同一个集子里。在评论柯尔律治的文章里，我尝试刻画欧洲反对18世纪消极哲学运动的特征：在这儿，如果只考虑这一篇文章的效果，人们可能会认为我过于突出优点，就像我过分突出了边沁的缺点一样。在这两件事上，我把自己和边沁的理论以及18世纪的学说里站不住脚的观点分开的动力，可能也让我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太远，虽然只是表面上如此，而不是在现实中。但是，对于评论柯尔律治的这篇文章，我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我是为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而写，最大程度地仔细描述不同学派的作家是我的任务，

从这些学派的知识中，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们可能会获得最大的进步。

The number of the *Review* which contained the paper on Coleridge, was the last which was published during my proprietorship. In the spring of 1840 I made over the *Review* to Mr. Hickson, who had been a frequent and very useful unpaid contributor under my management: only stipulating that the change should be marked by a resumption of the old name, that of *Westminster Review* . Under that name Mr. Hickson conducted it for ten years, on the plan of dividing among contributors only the net proceeds of the *Review* giving his own labour as writer and editor gratuitously. Under the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writers, which arose from this low scale of payment, it is highly creditable to him that he was able to maintain, in some tolerable degree, the character of the *Review* as an organ of radicalism and progress. I did not cease altogether to write for the *Review* , but continued to send it occasional contributions, not, however, exclusively; for the greater circulation of the *Edinburgh Review* induced me from this time to offer articles to it also when I had anything to say for which it appeared to be a suitable vehicle. And the concluding volumes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 having just then come out, I inaugurated myself as a contributor to the *Edinburgh* , by the article on that work, which heads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Dissertations* .

刊登评论柯尔律治那篇文章的那期《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是我负责的最后一期。1840年春天，我把评论杂志转让给了希克森先生，在我主办评论杂志的期间，他经常无偿为之撰稿，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他只要求恢复原来的名字《威斯敏斯特评论》以显示该变化。他用这个名称办了十年，给投稿人按纯收入分配稿费，自己则免费为

它写稿，做编辑。因为报酬太低，难以争取到作家投稿。在这种困境下，他能够较好地保持《威斯敏斯特评论》作为激进主义和进步喉舌的特征，是很值得称赞的。我并没有完全停止为《威斯敏斯特评论》撰稿，只是偶尔间断地投稿，但我不是专给它投稿，因为从这时起发行量更大的《爱丁堡评论》诱使我向它投稿，在我有见解要发表时，它看起来是个合适的媒介。《论美国的民主》的最后几卷当时刚刚出版，我开始成为《爱丁堡评论》撰稿人时写的第一篇稿子就是为那部著作写的评论，这成了《讨论与论述》第二卷的第一篇文章。

[7_1].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1805—1859），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著作有《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

[7_2].约翰·罗巴克（1718—1794），英国成功的企业家，拥有著名的卡伦钢铁厂。

[7_3].查尔斯·布勒（1806—1848），英国政治家、激进派改革家。

[7_4].威廉·莫尔斯沃思（1810—1855），英国政治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公共工程大臣（1853—1855）和殖民大臣（1855）。

[7_5].约翰·罗米利（1802—1874），英国大法官、政治家。其父是英国法律改革家塞缪尔·罗米利爵士（1757—1818）。

[7_6].爱德华·罗米利（1838—1886），英国人，其父是约翰·罗米利。

[7_7].丹尼尔·奥康奈尔（1775—1847），19世纪前期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

[7_8].辉格党，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政党，反对绝对王权，支持新教徒享有宗教自由，是自由党的前身。与他们相对的是托利党，后者是一批持传统观点的人，支持世袭王权，保留国王，是保守党的前身。

[7_9].奥尔巴尼·威廉·方布兰克（1793—1872），英国新闻记者。

[7_10].威廉·约翰逊·福克斯（1786—1864），英国著名的宣传家、宗教和政治演说家。

[7_11].爱德华·布尔沃 - 利顿（1803—1873），英国下院议员、殖民大臣、小说家

和剧作家，主要作品有历史小说《庞贝城的末日》和剧本《黎塞留》。

[7_12].亚当·塞奇威克（1785—1878），英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最早提出寒武纪和泥盆纪命名。

[7_13].威廉·佩利（1743—1805），英国神学家，其经典著作为《自然神学》。

[7_14].马库斯·朱尼厄斯·布鲁图（公元前85—前42），罗马共和时期的第一任行政长官，早期曾参加过刺杀罗马独裁者恺撒的行动。他有着光明磊落的性格，在历史上是一个维护民主、不徇私情、大公无私的执政官形象。

[7_15].约翰·斯特林（1806—1844），英国作家。

[7_16].威廉·休厄尔（1794—1866），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归纳科学史》。

[7_17].约翰·赫歇耳爵士（1792—1871），英国天文学家。其父是被誉为“恒星天文学之父”的弗雷德里克·威廉·赫歇耳爵士（1738—1822）。

[7_18].伊格内修斯·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人，罗马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建者。

Chapter 7 General View of the Remainder of My Life.

第七章　晚年概略

From this time, what is worth relating of my life will come into a very small compass; for I have no further mental changes to tell of, but only, as I hope, a continued mental progress; which does not admit of a consecutive history, and the results of which, if real, will be best found in my writings. I shall, therefore, greatly abridge the chronicle of my subsequent years.

此后，我一生中值得记述的事情就很少了，因为没有什么更多的思想变化需要说明，只有（正如我所希望的）未曾间断的思想进步。这种思想进步不可能是连续的历史，而且其结果（如果真实的话）最好在我的作品中寻找。所以，随后几年的事情我就不一一展开记述了。

The first use I made of the leisure which I gained by disconnecting myself from the *Review* , was to finish the *Logic* . In July and August, 1838, I had found an interval in which to execute what was still undone of the original draft of the Third Book. In working out the logical theory of those laws of nature which are not laws of Causation, nor corollaries from such laws, I was led to recognize kinds as realities in nature, and not mere distinctions for convenience; a light which I had not obtained when the First Book was written, and which made it necessary for me to modify and enlarge several chapters of that Book. The Book on *Language and Classification* , and the chapter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Fallacies* ,

were drafted in the autumn of the same year; the remainder of the work, in the summer and autumn of 1840. From April following to the end of 1841, my spare time was devoted to a complete rewriting of the book from its commencement. It is in this way that all my books have been composed. They were always written at least twice over; a first draft of the entire work was completed to the very end of the subject, then the whole begun again *de novo* ; but incorporating, in the second writing, all sentences and parts of sentences of the old draft, which appeared as suitable to my purpose as anything which I could write in lieu of them. I have found great advantages in this system of double redaction. It combines, better than any other mode of composition, the freshness and vigour of the first conception, with the superior precision and completeness resulting from prolonged thought. In my own case, moreover, I have found that the patience necessary for a careful elaboration of the details of composition and expression, costs much less effort after the entire subject has been once gone through, and the substance of all that I find to say has in some manner, however imperfect, been got upon paper. The only thing which I am careful, in the first draft, to make as perfect as I am able, is the arrangement. If that is bad, the whole thread on which the ideas string themselves becomes twisted; thoughts placed in a wrong connection are not expounded in a manner that suits the right, and a first draft with this original vice is next to useless as a foundation for the final treatment.

离开《威斯敏斯特评论》后，我首先利用因此得来的空闲时间完成《逻辑学体系》的写作。1838年的七、八月份，我抽空写完了第三卷初稿中未完成的部分。在写到既不是因果定律，又不是其推论的自然定律的逻辑理论时，我逐渐意识到种类是自然界的真实存在，而不仅仅是为了方便所作的划分。我在写第一卷的时候尚未意识到这一

点，所以必须对该卷中的几个章节进行修改和扩充。《语言与分类》一卷，以及《谬误的分类》一章也在同年秋天完成了初稿。其余部分也于1840年夏秋完成。从1841年4月至年底，我利用所有业余时间对这本书从头到尾进行了彻底的改写。我的全部作品都是按这种方式写成的，每一本至少写作两遍，每部作品从头到尾完成初稿，然后再回过头来重写一遍。但是在重写时，我依旧沿用原稿的所有或部分句子，这些句子很合我意，根本不需要重写。这种双重编纂的方法优点很多，与其他写作模式相比，这种方法更好地把早期思考的新鲜感和活力与长期思考后的高度缜密性和完整性结合起来。另外，就我的情况而言，我发现把所有问题处理过一遍之后，对写作和措词等细节进行仔细的阐述所需投注的努力就大大减少了，我要说的全部内容，不论是否完善，都已经大体写了下来。在初稿中唯一需要细加斟酌，力求使其尽善尽美的，就是书的编排。如果做不好，贯穿思想的整个脉络就会扭曲，被错误地联系到一起的观点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这种最初的缺陷会令初稿与废纸无异，最终将被弃置不用。

During the re-writing of the *Logic* , Dr. Whewell's *Philosoph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 made its appearance; a circumstance fortunate for me, as it gave me what I greatly desired, a full treatment of the subject by an antagonist, and enabled me to present my ideas with greater clearness and emphasis as well as fuller and more varied development, in defending them against definite objections, or confronting them distinctly with an opposite theory. The controversies with Dr. Whewell, as well as much matter derived from Comte, were first introduced into the book in the course of the re-writing.

在我重写《逻辑学体系》的那段时间，休厄尔博士的著作《归纳科学的哲学》问世了。这一形势对我很有利，因为对手会全面论述这一问题，这是我满心期待的机会，使我在与明确的反对者争辩，以及

清楚地面对相反的理论时，能更明确地提出我的观点，同时更全面地阐述这些观点。在重写时我第一次把与休厄尔博士的这番争论，以及从孔德那里得到的很多材料写进书里。

At the end of 1841, the book being ready for the press, I offered it to Murray, who kept it until too late for publication that season, and then refused it, for reasons which could just as well have been given at first. But I have had no cause to regret a rejection which led to my offering it to Mr. Parker, by whom it was published in the spring of 1843. My original expectations of success were extremely limited. Archbishop Whately had, indeed, rehabilitated the name of Logic, and the study of the forms, rules, and fallacies of Ratiocination; and Dr. Whewell's writings had begun to excite an interest in the other part of my subject, the theory of Induction. A treatise, however, on a matter so abstract, could not be expected to be popular; it could only be a book for students, and students on such subjects were not only (at least in England) few, but addicted chiefly to the opposite school of metaphysics, the ontological and “innate principles” school. I therefore did not expect that the book would have many readers, or approvers; and looked for little practical effect from it, save that of keeping the tradition unbroken of what I thought a better philosophy. What hopes I had of exciting any immediate attention, were mainly grounded on the polemical propensities of Dr Whewell; who, I thought, from observation of his conduct in other cases, would probably do something to bring the book into notice, by replying, and that promptly, to the attack on his opinions. He did reply but not till 1850, just in time for me to answer him in the third edition. How the book came to have, for a work of the kind, so much success, and what sort of persons compose the bulk of those who have bought, I will not venture to say read, it, I have

never thoroughly understood. But take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many proofs which have since been given of a revival of speculation, speculation too of a free kind, in many quarters, and above all (where at one time I should have least expected it) in the Universities, the fact becomes partially intelligible. I have never indulged the illusion that the book had made any considerable impression on philosophical opinion. The German, or *a priori* view of human knowledge, and of the knowing faculties, is likely for some time longer (though it may be hoped in a diminishing degree) to predominate among those who occupy themselves with such inquiries, both here and on the Continent. But the "System of Logic" supplies what was much wanted, a text-book of the opposite doctrine—that which derives all knowledge from experience, and all moral and intellectual qualities principally from the direction given to the associations. I make as humble an estimate as anybody of what either an analysis of logical processes, or any possible canons of evidence, can do by themselves towards guiding or rectifying the operations of the understanding. Combined with other requisites, I certainly do think them of great use; but whatever may be the practical value of a true philosophy of these matters, it is hardly possible to exaggerate the mischiefs of a false one. The notion that truths external to the mind may be known by intuition or consciousness, independently of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is, I am persuaded, in these times, the great intellectual support of false doctrines and bad institutions. By the aid of this theory, every inveterate belief and every intense feeling, of which the origin is not remembered, is enabled to dispense with the obligation of justifying itself by reason, and is erected into its own all-sufficient voucher and justification. There never was such an instrument devised for consecrating all deep-seated prejudices. And the chief strength of this false philosophy in morals, politics, and religion, lies in the appeal which it is accustomed to make to the

evidence of mathematics and of the cognate branches of physical science. To expel it from these, is to drive it from its stronghold: and because this had never been effectually done, the intuitive school, even after what my father had written in his *Analysis of the Mind* , had in appearance, and as far as published writings were concerned, on the whole the best of the argument. In attempting to clear up the real nature of the evidence of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truths, the *System of Logic* met the intuitive philosophers on ground on which they had previously been deemed unassailable; and gave its own explanation, from experience and association, of that peculiar character of what are called necessary truths, which is adduced as proof that their evidence must come from a deeper source than experience. Whether this has been done effectually, is still *sub judice* ; and even then, to deprive a mode of thought so strongly rooted in human prejudices and partialities, of its mere speculative support, goes but a very little way towards overcoming it; but though only a step, it is a quite indispensable one; for since, after all, prejudice can only be successfully combated by philosophy, no way can really be made against it permanently until it has been shown not to have philosophy on its side.

1841年底，书稿已经就绪，我把它交给了默里，但书稿在他那里放了太久，结果错过了那个出版季，因此他拒绝出版，他给出的理由本来可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但我没有理由为这次拒绝感到惋惜，之后我把书交给了帕克先生。在他的帮助下，书终于在1843年春天出版了。我最初并没有对成功抱很大期望。事实上，大主教惠特利已恢复使用了逻辑44这一名称，重新开始研究推理的方式、原则和谬误。休厄尔博士的作品也开始引起人们对我另一部分研究课题的兴趣，即归纳理论。但一本谈论如此抽象主题的专著是不可能畅销的，它只适合研究者，但研究逻辑学的人不仅少（至少在英国如此），而且他们大都沉迷于与我相反的形而上学学派、本体论学派和先天原则学派。所

以我不期待这本书有很多读者或支持者，也不期望它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只希望我认为更好的哲学传统能保持完整。我对这本书能立刻引起关注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休厄尔博士惯于争论的习性上。通过观察他在其他事情上的做法，我想他应该会做些什么对抨击他的观点进行回应，从而让人们注意到这本书。他的确回应了，但是直到1850年才作出回应，刚好让我能在第三版中及时回答他的问题。这样的一本书是如何大获成功的？哪些人组成了购买大军（我不敢说他们都读过了）？这两个问题我从未彻底弄明白。但联系很多思考复兴的证据，也就是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在大学（我一度最不抱希望的地方）的自由思考，事情就容易理解一些了。我从未幻想这本书会对很多哲学观点产生深刻影响。有关人类认识和认识能力的德国学派或先验观点，有可能在更长的时间里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上那些从事这类探索的人起主导作用（虽然人们希望这种主导越来越少）。但《逻辑学体系》却提供了当时人们迫切需要的相反学说的教科书——这个学说认为所有知识都是通过经验获得的，所有道德和智力品质主要源于热衷联想的倾向。我像其他人一样，对逻辑过程的分析或者可能的证据规则自我运作以支配和调整认知活动的评价不高。如果与其他必要条件结合起来，我当然认为它们很有用处。但无论这些问题的正确哲学观点的实用价值是什么，其错误哲学观点的危害绝非危言耸听。我相信，那种存在于思想外部的真理可以不通过观察和经验，而是由直觉或意识获取的观念，是当下错误学说和不良制度的巨大智力支持。在这种理论的帮助下，所有不知来源的根深蒂固的信仰和强烈的感情，就省却了用理性进行自证，且自身就上升成为充分的证据和正当理由。之前从没有人设计过这样一个工具将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奉为神圣。这种伪哲学在道德、政治和宗教上的主要力量就在于它惯于向数学证据和自然科学同源学科的证据求助。把它从这些学科中驱逐出去，就是把它从堡垒中赶走。但因为从未有效地实现这点，所以甚至在我父亲写的《人类心灵现象的分析》问世后，就已出版的作品来说，直觉学派的论述总体上还是最好的。为了澄清数学和自然科学真理证据的真正本质，《逻辑学体系》在直觉派哲学家从前认为无懈可击的问题上和他们会合，从经验和联想的角度，对我们所说的必然真理的特点给出自己的解释，从而证明他们的证据必须出自比经验更深

层的来源。这种做法是否有效还是未知数，甚至即使这种深深根植于人类偏见和偏好中的思维模式失去了其纯粹的理论支持，也只是在战胜它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小步。尽管如此，这一步却十分必要。因为毕竟只有哲学能够成功地打败偏见，在证明偏见没有哲学支持之前，没有什么其他方法能真正永久地战胜它。

Being now released from any active concern in temporary politics, and from any literary occupation involving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contributors and others, I was enabled to indulge the inclination, natural to thinking persons when the age of boyish vanity is once past, for limiting my own society to a very few persons. General society, as now carried on in England, is so insipid an affair, even to the persons who make it what it is, that it is kept up for any reason rather than the pleasure it affords. All serious discussion on matters on which opinions differ, being considered ill-bred, and the national deficiency in liveliness and sociability having prevente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art of talking agreeably on trifles, in which the French of the last century so much excelled, the sole attraction of what is called society to those who are not at the top of the tree, is the hope of being aided to climb a little higher in it; while to those who are already at the top, it is chiefly a compliance with custom, and with the supposed requirements of their station. To a person of any but a very common order in thought or feeling, such society, unless he has personal objects to serve by it, must be supremely unattractive: and most people, in the present day, of any really high class of intellect, make their contact with it so slight, and at such long intervals, as to be almost considered as retiring from it altogether. Those persons of any mental superiority who do otherwise, are,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greatly deteriorated by it. Not to mention loss of time, the tone of their feelings is lowered: they become less in earnest

about those of their opinions respecting which they must remain silent in the society they frequent: they come to look upon their most elevated objects as unpractical, or, at least, too remote from realization to be more than a vision, or a theory, and if, more fortunate than most, they retain their higher principles unimpaired, yet with respect to the persons and affairs of their own day they insensibly adopt the modes of feeling and judgment in which they can hope for sympathy from the company they keep. A person of high intellect should never go into unintellectual society unless he can enter it as an apostle; yet he is the only person with high objects who can safely enter it at all. Persons even of intellectual aspirations had much better, if they can, make their habitual associates of at least their equals, and, as far as possible, their superiors, in knowledge, intellect, and elevation of sentiment. Moreover, if the character is formed, and the mind made up, on the few cardinal points of human opinion, agreement of conviction and feeling on these, has been felt in all times to be an essential requisite of anything worthy the name of friendship, in a really earnest mind. All these circumstances united, made the number very small of those whose society, and still more whose intimacy, I now voluntarily sought.

那时我不用积极地关注当下的政治，也不从事文学工作，不用和撰稿人等打交道，因此可以随意地把我的社交圈子缩小到很少的几个人，这对那些过了孩子般虚荣年纪而又有思想的人来说是件自然的事。普通社交，就像那时英国的一样，是件乏味的差事，甚至对那些把社交变成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维持社交的目的不是因为它能提供乐趣，而是另有他因。严肃地讨论那些有不同见解的事情却被看作没有教养，全民缺少活力和社交能力，这妨碍了人们培养愉快地谈论琐事的艺术，而这种艺术是上世纪法国人很擅长的。对那些社会地位不够高的人来说，社交的唯一魅力就在于希望借此向更高的地位攀爬。而

对那些已经位居社会顶层的人，社交主要是依从习惯和他们地位的需要。对一个思想或感情十分普通的人，除非他想通过社交达到个人目的，否则社交对他必定毫无吸引力。当今大多真正才智出众的人很少接触社交圈，参加社交的次数也很少，几乎让人以为他们完全脱离了这个圈子。而有些思想超凡的人却恰恰相反，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社交圈的严重腐蚀，浪费了时间不说，他们的格调也有所降低。在常去的社交圈中，他们变得不那么认真对待自己的见解，还必须对它们讳莫如深。他们开始视那些最高尚的目标为不切实际，或至少离现实太远，只不过是幻想或理论。假如比大多数人幸运的话，他们还会保留较高原则不受损害，但对那个时代的人和事，他们不知不觉地采用了他们同伴的感情和判断方式，以期博得共鸣。一个高才智的人绝不该踏入没有才智的社交圈，除非他是作为传道者加入的。然而只有那些有崇高目标的人才能完全安全地进入这个圈子。如果可以的话，那些追求高才智的人最好与在知识、才智和高尚情操上高出自己很多，或至少与自己相当的人经常交往。另外，如果性格和思想是在人类观念的几个基本点之上形成的，那么在一个真正诚恳的人的心中，建立在这些基本点之上的信念和情感的一致，总是称得上是真正友谊必不可少的条件。所有这些情况统一起来，使得我现在愿意与之交往的人很少，愿意深交的人就更少了。

Among these, by far the principal was the incomparable friend of whom I have already spoken. At this period she lived mostly with one young daughter, in a quiet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only occasionally in town, with her first husband, Mr. Taylor. I visited her equally in both places; and was greatly indebted to the strength of character which enabled her to disregard the false interpretations liable to be put on the frequency of my visits to her while living generally apart from Mr. Taylor, and on our occasionally travelling together, though in all other respects our conduct during those years gave not the slightest ground for any other supposition than the true one, that our relation to each other at that time was one of

strong affection and confidential intimacy only. For though we did not consider the ordinances of society binding on a subject so entirely personal, we did feel bound that our conduct should be such as in no degree to bring discredit on her husband, nor therefore on herself.

在这些人当中，至此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我之前说过的那位无人可比的朋友。这段时间她大都和年幼的女儿一起住在乡下一个安静的地方，偶尔去城里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泰勒先生一起住。我经常去这两个地方拜访她。她和泰勒先生分居时我经常去拜访她，偶尔我们还一起去旅行，这些行为很容易引起误解，我很感激她性格中有无视种种误解的力量。然而从其他方面来说，这些年来我们的行为没有丝毫理由引起别人的猜测，除了真正的原因。我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强烈的爱慕和互相信任的亲密友人。虽然我们不认为社会风俗能够约束这种完全私人的关系，但我们觉得有义务让我们的行为不至于影响她丈夫和她本人的名声。

In this third period (as it may be termed) of my mental progress, which now went hand in hand with hers, my opinions gained equally in breadth and depth, I understood more things, and those which I had understood before I now understood more thoroughly. I had now completely turned back from what there had been of excess in my reaction against Benthamism. I had, at the height of that reaction, certainly become much more indulgent to the common opinions of society and the world, and more willing to be content with seconding the superficial improvement which had begun to take place in those common opinions, than became one whose convictions on so many points, differed fundamentally from them. I was much more inclined, than I can now approve, to put in abeyance the more decidedly heretical part of my opinions, which I

now look upon as almost the only ones, the assertion of which tends in any way to regenerate society. But in addition to this, our opinions were far *more* heretical than mine had been in the days of my most extreme Benthamism. In those days I had seen little further than the old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into the possibilities of fundamental improvement in social arrangements. Private property, as now understood, and inheritance, appeared to me, as to them, the *dernier mot* of legislation: and I looked no further than to mitigating the inequalities consequent on these institutions, by getting rid of primogeniture and entails. The notion that it was possible to go further than this in removing the injustice —for injustice it is, whether admitting of a complete remedy or not —involved in the fact that some are born to riches and the vast majority to poverty, I then reckoned chimerical, and only hoped that by universal education, leading to voluntary restraint on population, the portion of the poor might be made more tolerable. In short, I was a democrat, but not the least of a Socialist. We were now much less democrats than I had been, because so long as education continues to be so wretchedly imperfect, we dreaded the ignorance and especially the selfishness and brutality of the mass: but our ideal of ultimate improvement went far beyond Democracy, and would class us decidedly under the general designation of Socialists. While we repudiated with the greatest energy that tyranny of society over the individual which most Socialistic systems are supposed to involve, we yet looked forward to a time when society will no longer be divided into the idle and the industrious; when the rule that they who do not work shall not eat, will be applied not to paupers only, but impartially to all; when the division of the produce of labour, instead of depending, as in so great a degree it now does, on the accident of birth, will be made by concert on an acknowledged principle of justice; and when it will no longer either be, or be thought to be, impossible for human

beings to exert themselves strenuously in procuring benefits which are not to be exclusively their own, but to be shared with the society they belong to. The social problem of the future we considered to be, how to unite the greatest individual liberty of action, with a common ownership in the raw material of the globe, and an equal participation of all in the benefits of combined labour. We had not the presumption to suppose that we could already foresee, by what precise form of institutions these objects could most effectually be attained, or at how near or how distant a period they would become practicable. We saw clearly that to render any such social transformation either possible or desirable, an equivalent change of character must take place both in the uncultivated herd who now compose the labouring masses, and in the immense majority of their employers. Both these classes must learn by practice to labour and combine for generous, or at all events for public and social purposes, and not, as hitherto, solely for narrowly interested ones. But the capacity to do this has always existed in mankind, and is not, nor is ever likely to be, extinct. Education, habit,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entiments, will make a common man dig or weave for his country, as readily as fight for his country. True enough, it is only by slow degrees, and a system of culture prolonged through successive generations, that men in general can be brought up to this point. But the hindrance is not in the essential constitution of human nature. Interest in the common good is at present so weak a motive in the generality not because it can never be otherwise, but because the mind is not accustomed to dwell on it as it dwells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on things which tend only to personal advantage. When called into activity, as only self-interest now is, by the daily course of life, and spurred from behind by the love of distinction and the fear of shame, it is capable of producing, even in common men, the most strenuous exertions as well as the most heroic sacrifices. The deep-rooted selfishness which

forms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existing state of society, is *so* deeply rooted, only because the whole course of existing institutions tends to foster it; and modern institutions in some respects more than ancient, since the occasions on which the individual is called on to do anything for the public without receiving its pay, are far less frequent in modern life, than the smaller commonwealths of antiquity. These considerations did not make us overlook the folly of premature attempts to dispense with the inducements of private interest in social affairs, while no substitute for them has been or can be provided: but we regarded all existing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rrangements as being (in a phrase I once heard from Austin) "merely provisional," and we welcomed with the greatest pleasure and interest all socialistic experiments by select individuals (such as the Co-operative Societies), which, whether they succeeded or failed, could not but operate as a most useful education of those who took part in them, by cultivating their capacity of acting upon motives pointing directly to the general good, or making them aware of the defects which render them and others incapable of doing so.

在我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可以这样说），我和她的思想齐头并进，我的观点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进展。我懂的东西比以前多，以前懂的东西现在则理解得更透彻。我现在已经完全从过分对抗边沁主义的状态中扭转过来。在那种对抗最强烈的时候，我的确对社会和世界的一般看法变得宽容了许多，而且更愿意满足于赞成这些看法里逐渐呈现的表面进步，而不愿变成在信仰的许多方面跟他们完全不同的人。我那时更倾向于把我的见解中更异端的部分搁置起来，现在则赞成视之为几乎唯一的，可以任何方式变革社会的主张。但除此以外，我们现在的见解比我在最极端的边沁主义时期中的见解异端得多。那段时间，对于根本改进社会结构的可能性，我看得并不比旧政治经济学家们远多少。和他们一样，我把现在所理解的私有财产和继

承制视为立法的最终结果。除了通过取消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权[8_1]来减少这种制度带来的不公正现象，我也想不到其他办法。有种观点认为，要消除不公正现象可能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因为无论是否有可能彻底消除，都包含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人生来富有，而大部分人则生来贫穷。我那时认为这只是幻想，我只希望通过全民教育使人们自愿限制人口，这样穷人所占的比例就可以被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简单地说，我那时是个民主主义者，而绝不是社会主义者。与那时的我相比，现在的我们已经没那么民主了，因为只要教育继续如此极不完善，我们就会对公众的无知，尤其是他们的自私和野蛮感到担心。但是，我们对社会最终改良的理想远远超过了民主主义，由此可以直接把我们归类到通常所称的社会主义者当中去。当我们竭尽全力地批判社会对个人的专制时，这也是大多社会主义制度中应有的内容，我们却期望有一天社会不再有勤奋之人和懒散之人之分。到那时，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穷人，而是公正地适用于所有人；到那时，劳动产品的分配将不再像现在这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身，而是在公认的公正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到那时，人们不再只为自己获利而努力，而是为了其所在社会共同分享的利益而努力，这将不再是不可能或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将来的社会问题，是怎样把个人行动的最大自由和全球共有原料及所有人平等分享共同劳动成果结合起来。我们并没有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已经预见到通过怎样的具体形式可以最有效地实现这些目的，或者距离实现这些目标还有多近或者多远。我们清楚地看到，若想给社会带来可能或令人向往的变革，就必须使劳动阶层中未受教育的民众和他们绝大多数雇主的个性发生等同的变化。这两个阶级必须在实践中学会慷慨，或者无论如何为公众和社会的目的而劳动和联合，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仅仅为了狭隘的利益。但人类身上一直有这么做的能力，不会也永远不可能消失。教育、习惯和情感的培养会令一个普通人像时刻准备为祖国而战那样，时刻准备为国家耕耘或编织。诚然，只有通过循序渐进的和几代人长期的系统培养，才能把所有的普通人培养到这一步。但阻力不是人性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公众利益在大部分人心里还只是很微弱的动力，并不是因为它永远如此，而是因为人们还不习惯对它细加考虑，从早到晚只考虑那些可能对自身有利的事。当现在的个人利

益受到日常生活的激发，又受到对荣誉的热爱和对耻辱的恐惧的推动，即便在最普通的人身上也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作出最英勇的牺牲。形成现存社会一般特点的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之所以能深深扎根，只因为现存制度的整体方针助长了这种想法。在某些方面现代制度比古代制度更有这种倾向，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号召个人无私地为公众做事的情形要远远少于古代较小的联邦。这些考虑并未让我们忽视那些草率地尝试去除社会事务中个人利益刺激的愚蠢做法，尽管那时没有或不能提供相应的替代品。但我们认为一切现存制度和社会结构仅仅是临时的（这个词语是从奥斯丁那儿听到的），我们也以最大的乐意和兴趣欢迎精英人士做出的社会主义实验（如合作社会）。无论成功与否，这都是对参加者最有用的教育，培养了他们直接为公众利益行动的能力，或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人无法这么做的缺陷。

I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these opinions were promulgated, less clearly and fully in the first edition, rather more so in the second, and quite unequivocally in the third. The difference arose partly from the change of times, the first edition having been written and sent to press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48, after which the public mind became more open to the reception of novelties in opinion, and doctrines appeared moderate which would have been thought very startling a short time before. In the first edition the difficulties of Socialism were stated so strongly, that the tone was on the whole that of opposition to it. In the year or two which followed, much time was given to the study of the best Socialistic writers on the Continent, and to meditation and discussion on the whole range of topics involved in the controversy: and the result was that most of what had been written on the subject in the first edition was cancelled, and replaced by arguments and reflections which represent a more advanced opinion.

这些观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得到了阐述，第一版表达得不够清晰全面，第二版有所改进，第三版则十分明确了。这种改变部分源于时代的变迁，1848年法国革命 [8_2] 以前，第一版写成并送印，之后公众在思想上变得更乐于接受新观点，那些不久之前还让人吃惊的学说现在看来却相当温和。第一版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困难，因而整体基调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欧洲最优秀的社会主义作家，思考和讨论争议中的所有问题，结果是我删掉了第一版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大部分内容，取而代之的是代表先进思想的论点和反思。

The *Political Economy* was far more rapidly executed than the *Logic* , or indeed than anything of importance which I had previously written. It was commenced in the autumn of 1845, and was ready for the press before the end of 1847. In this period of little more than two years there was an interval of six months during which the work was laid aside, while I was writing articles in the *Morning Chronicle* (which unexpectedly entered warmly into my purpose) urging the formation of peasant properties on the waste lands of Ireland. This wa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amine, the winter of 1846-47, when the stern necessities of the time seemed to afford a chance of gaining attention for what appeared to me the only mode of combining relief to immediate destitution with permanent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al condition of the Irish people. But the idea was new and strange; there was no English precedent for such a proceeding: and the profound ignorance of English politicians and the English public concerning all social phenomena not generally met with in England (however common elsewhere), made my endeavours an entire failure. Instead of a great operation on the waste lands, and the conversion of cottiers into proprietors, Parliament passed a Poor Law for maintaining them as paupers: and if the nation has not since found

itself in inextricable difficulties from the joint operation of the old evils and the quack remedy it is indebted for its deliverance to that most unexpected and surprising fact, the depopulation of ireland, commenced by famine, and continued by emigration.

《政治经济学原理》完成得比《逻辑学体系》快得多，事实上比我之前写过的所有重要著作都要快。1845年秋开始写作，1847年底前准备付印。而在这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当中还有六个月的间隔，我把它搁置起来，去为《纪事晨报》撰稿（它意外地和我的目的一致），敦促建立爱尔兰农民对荒地的所有权。当时正值1846年冬季的饥荒期，严峻的现实似乎为我提供了一个赢得注意的机会，对我来说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救济眼前危机和长期改善爱尔兰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结合起来。但这个想法新奇而陌生，在英国没有先例。英国政治家们和英国公众对于英国不普遍社会现象（无论在其他地方多么普遍）的完全无知使我的努力完全失败。议会没有大规模开发荒地，也没有使佃户变成土地所有者，而是通过了一项《济贫法》，对贫民给予救济。如果这个国家此后没有深陷旧的弊病和庸医治疗双重作用的困境，那么它应当感激被最出乎意料和令人惊讶的事实解救，即爱尔兰人口的减少始于饥荒，但继续发展于移民。

The rapid succes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showed that the public wanted, and were prepared for such a book. Published early in 1848, an edition of a thousand copies was sold in less than a year. Another similar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the spring of 1849; and a third, of 1250 copies, early in 1852. It was, from the first, continually cited and referred to as an authority, because it was not a book merely of abstract science, but also of application, and treated Political Economy not as a thing by itself, but as a fragment of a greater whole; a branch of Social Philosophy, so interlinked with all the other branches, that its conclusions, even in its own

peculiar province, are only true conditionally, subject to interference and counteraction from causes not directly within its scope: while to the character of a practical guide it has no pretension, apart from other classes of considerations. Political Economy, in truth, has never pretended to give advice to mankind with no lights but its own; though people who knew nothing but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refore knew that ill) have taken upon themselves to advise, and could only do so by such lights as they had. But the numerous sentimental enem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its still more numerous interested enemies in sentimental guise, have been very successful in gaining belief for this among other unmerited imputations against it, and the *Principles* having, in spite of the freedom of many of its opinions, become for the present the most popular treatise on the subject, has helped to disarm the enemies of so important a study. The amount of its worth as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he value of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which it suggests, others of course must judge.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迅速成功说明公众需要并且准备接受这样一本书。1848年初出版，不到一年就卖出1000册。1849年春第二版又印了1000册，第三版于1852年卖出了1250册。从一开始它就不断被作为权威引用，因为它不仅仅是抽象科学，也是应用科学的作品，它将政治经济学看作是更广泛学科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的一门学科；它是社会科学的分支，与其他分支相互联系，其结论的正确性即便在自己独特的领域内也是有条件的，受到其他分支各种原因的干扰和牵制。如果离开了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它就称不上拥有实际指导的特性。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从未自称单凭自身的理论就能给人以指导。虽然那些只懂政治经济学的人（因此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承担了引导人类的责任，他们也只能以他们所知道的理论去引导人们。但许多感情用事的政治经济学的敌人和更多伪装成感情用事借以牟利的敌人，却非常成功地让人们相信了这一点以及其他对

政治经济学的不正当诋毁。《政治经济学原理》自由地发表了很多观点，成为目前关于这个问题最受欢迎的专著，它有助于解除那些敌视这一重要研究的人的武装。对于这样一部科学论述的价值和它提出的各种应用的价值，别人当然会作出评价。

For a considerable time after this, I published no work of magnitude; though I still occasionally wrote in periodicals, and my correspondence (much of it with persons quite unknown to me), on subjects of public interest, swelled to a considerable bulk. During these years I wrote or commenced various Essays, for eventual publication, on some of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human and social life, with regard to several of which I have already much exceeded the severity of the Horatian precept. I continued to watch with keen interest the progress of public events. But it was not, on the whole, very encouraging to me. The European reaction after 1848, and the success of an unprincipled usurper in December, 1851, put an end, as it seemed, to all present hope for freedom or social improvement in France and the Continent. In England, I had seen and continued to see many of the opinions of my youth obtain general recognition, and many of the reforms in institutions, for which I had through life contended, either effected or in course of being so. But these changes had been attended with much less benefit to human well-being than I should formerly have anticipated, because they had produced very little improvement in that which all real amelioration in the lot of mankind depends on, their intellectual and moral state: and it might even be questioned if the various causes of deterioration which had been at work in the meanwhile, had not more than counterbalanced the tendencies to improvement. I had learnt from experience that many false opinions may be exchanged for true ones, without in the least altering the habits of mind of which false opinions are the result. The English

public, for example, are quite as raw and undiscerning on subjects of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 nation has been converted to free-trade, as they were before; and are still further from having acquired better habits of thought and feeling, or being in any way better fortified against error, on subjects of a more elevated character. For, though they have thrown off certain errors, the general discipline of their minds, intellectually and morally, is not altered. I am now convinced, that no great improvements in the lot of mankind are possible, until a great change takes place in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 of their modes of thought. The old opinions in religion, morals, and politics, are so much discredited in the more intellectual minds as to have los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efficacy for good, while they have still life enough in them to be a powerful obstacle to the growing up of any better opinions on those subjects. When the philosophic minds of the world can no longer believe its religion, or can only believe it with modifications amounting to an essential change of its character, a transitional period commences, of weak convictions, paralysed intellects, and growing laxity of principle, which cannot terminate until a renovation has been effected in the basis of their belief leading to the evolution of some faith, whether religious or merely human, which they can really believe: and when things are in this state, all thinking or writing which does not tend to promote such a renovation, is of very little value beyond the moment. Since there was little in the apparent condition of the public mind, indicative of any tendency in this direction, my view of the immediate prospects of human improvement was not sanguine. More recently a spirit of free speculation has sprung up, giving a more encouraging prospect of the gradual mental emancipation of England; and concurring with the renewal under better auspices, of the movement for political freedom in the rest of Europe, has given to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human affairs a more hopeful aspect. [7_1]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出版任何重要的作品。但我偶尔也为期刊撰稿，在公共利益的问题上，我通信的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很多是写给不认识的人）。这些年来，我写了或者着手了很多关于人类和社会生活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文章，开始为最终的出版作准备，其中几篇的严厉程度已经超过了贺拉斯箴言。我依旧热切地关注公众事件的进展。但整体形势并未使我受到鼓舞。1848年后欧洲的反动[8_3]和1851年12月无耻篡权者的成功[8_4]，似乎毁灭了法国和欧洲大陆得到自由或社会进步的一切希望。在英格兰，我已经看到而且继续看到很多我年轻时的见解得到普遍认可，很多我一生为之奋斗的制度改革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实现。但这些改变并没有像我之前所期望的那样给人们带来很多益处，因为它们没有促进人类命运真正改善所依赖的智力和道德状况，甚至连同时起作用的各种倒退因素是否抵消了改良的趋势都值得怀疑。我从经验中得知，很多错误的观念可以转化为正确的观念，并且丝毫不改变产生错误观念的思维习惯。例如，英国的公众，自从国家转型为自由贸易国之后，对政治经济学问题仍然像之前那样生疏迟钝。他们还远没有形成更好的思维或感情习惯，也没有在培养高尚人格问题上更好地加强防范错误的能力。这是因为，他们虽然抛弃了一些错误，但他们思想中的总体原则，无论智力上还是道德上都没有改变。我现在深信，只有人类思维模式的基本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人类命运才会有巨大的改进。宗教、道德和政治的旧观念在智力超群的人心中已不足信，大部分好的功效已经失去，但这些问题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却有足够强大的生命力，阻碍更好的观念的形成。当全世界具有哲学思想的人不再相信宗教，或者只有在宗教性质发生根本改变之后才相信它时，一个过渡的时代就开始了。在这个时代，人们信念薄弱，思想麻痹，纪律日益涣散，只有他们的信仰基础发生革新，使得一些信念，无论是宗教方面的，或仅仅是人类方面的，能发展到真正让他们相信的程度，这些现象才会终止。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所有不能促进这种革新的思想或作品都会毫无价值，瞬间即逝。因为还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公众的思想里出现了这种趋势，我认为当前实现人类进步的前景并不乐观。最近，一种自由思考的精神正在逐渐兴起，给英国思想逐渐解放的前景带来了更

大的鼓舞。与这种革新同时发生的，是欧洲其他地方的政治自由运动，这是个更好的兆头，给当前人类事务的现状带来了更有希望的一面。[8_5]

Between the time of which I have now spoken, and the present, took place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of my private life. The first of these was my marriage, in April, 1851, to the lady whose incomparable worth had made her friendship the greatest source to me both of happiness and of improvement, during many years in which we never expected to be in any closer relation to one another. Ardently as I should have aspired to this complete union of our lives at any time in the course of my existence at which it had been practicable, I, as much as my wife, would far rather have foregone that privilege for ever, than have owed it to the premature death of one for whom I had the sincerest respect, and she the strongest affection. That event, however, having taken place in July, 1849, it was granted to me to derive from that evil my own greatest good, by adding to the partnership of thought, feeling, and writing which had long existed, a partnership of our entire existence. For seven and a-half years that blessing was mine; for seven and a-half only! I can say nothing which could describe, even in the faintest manner, what that loss was and is. But because I know that she would have wished it, I endeavour to make the best of what life I have left, and to work on for her purposes with such diminished strength as can be derived from thoughts of her, and communion with her memory.

从我刚才提到的那段时间到目前，在我的个人生活中发生了几件重大的事。第一件就是我与那位女士于1851年4月结婚。她无可比拟的价值使得我们之间的友谊成为我快乐和进步的最大源泉，那些年，

我从未希望彼此的关系还能更亲密。我本该在我有生之年无时无刻不热切地期盼着我们生命的完全结合，但我和我太太宁愿永远放弃这样的恩惠，也不愿因为我最尊敬的朋友、她最欣赏的丈夫英年早逝而得到它。但不幸的事还是在1849年7月发生了，我从这个噩耗中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在我们长期的思想、感情和写作伙伴关系上增添了一种生活伴侣的关系。我享受了七年半这样幸福的时光，但是只有七年半！我无法用言语表达这个损失在当时和现在意味着什么，即便是用最模糊的方式也无法表达。但是因为我知道她会希望我这样，所以我努力充分利用好我的余生，从她的思想和对她回忆的交流中，汲取我已减弱的力量，为她的目标继续工作。

When two persons have their thoughts and speculations completely in common; when all subjects of intellectual or moral interest are discussed between them in daily life, and probed to much greater depths than are usually or conveniently sounded in writings intended for general readers; when they set out from the same principles, and arrive at their conclusions by processes pursued jointly, it is of little consequence in respect to the question of originality, which of them holds the pen; the one who contributes least to the composition may contribute more to the thought; the writings which result are the joint product of both, and it must often be impossible to disentangle their respective parts, and affirm that this belongs to one and that to the other. In this wide sense, not only during the years of our married life, but during many of the years of confidential friendship which preceded, all my published writings were as much here work as mine; her share in them constantly increasing as years advanced. But in certain cases, what belongs to her can be distinguished, and specially identified. Over and above the general influence which her mind had over mine, the most valuable ideas and features in these joint productions—those which have been most fruitful of important

results, and have contributed most to the success and reputation of the works themselves—originated with her, were emanations from her mind, my part in them being no greater than in any of the thoughts which I found in previous writers, and made my own only by incorporating them with my own system of thought! During the greater part of my literary life I have performed the office in relation to her, which from a rather early period I had considered as the most useful part that I was qualified to take in the domain of thought, that of an interpreter of original thinkers, and mediator between them and the public; for I had always a humble opinion of my own powers as an original thinker, except in abstract science (logic, metaphysics, and the theoretic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s), but thought myself much superior to most of my contemporaries in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learn from everybody; as I found hardly anyone who made such a point of examining what was said in defence of all opinions, however new or however old, in the conviction that even if they were errors there might be a substratum of truth underneath them, and that in any case the discovery of what it was that made them plausible, would be a benefit to truth. I had, in consequence, marked this out as a sphere of usefulness in which I was under a special obligation to make myself active; the more so, as the acquaintance I had formed with the ideas of the Coleridgians, of the German thinkers, and of Carlyle, all of them fiercely opposed to the mode of thought in which I had been brought up, had convinced me that along with much error they possessed much truth, which was veiled from minds otherwise capable of receiving it by the transcendental and mystical phraseology in which they were accustomed to shut it up, and from which they neither cared, nor knew how, to disengage it; and I did not despair of separating the truth from the error, and exposing it in terms which would be intelligible and not repulsive to those on my own side in philosophy. Thus prepared, it will easily

be believed that when I came into close intellectual communion with a person of the most eminent faculties, whose genius, as it grew and unfolded itself in thought, continually struck out truths far in advance of me, but in which I could not, as I had done in those others, detect any mixture of error, the greatest part of my mental growth consisted in the assimilation of those truths, and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my intellectual work was in building the bridges and clearing the paths which connected them with my general system of thought. [7_2]

当两个人有完全一致的思想时；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讨论所有有关智力或道德趣味的问题，探讨的深度远远超过平时或传统意义上供普通读者阅读的作品时；当他们有相同的出发点，通过共同寻求的过程得出他们的结论时，最后对于由谁执笔的原创性问题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对写作贡献最小的人，可能对文章思想的贡献最大。写出的作品是两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想区分出各自的作用，确定这部分是你的，那部分是我的，这通常是不可能的。从广义上来说，我们婚后的作品，甚至当我们还是亲密友人时出版的作品都是我们所共同拥有的。她在作品中所占的比重随时间不断增长。但有几本书，属于她的部分是可以辨别的，并且被专门标注出来。除了她的思想对我的总体影响之外，这些合作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思想和特征——这些是重要成果中最有成效的部分，对作品本身的成功和声誉贡献最大——都是她创作的，是她的思想的流露，其中我发挥的作用并不比以前作家的思想好很多，我只是把它们合并到我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来了。在我写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的工作都与她有关，我从很早就认为这段时间是使我有资格进入思想领域的最有用的一段，那时的我是原创思想者的阐释者，将他们和公众联系起来。因为一直以来，除了在抽象科学领域（逻辑、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原则），我认为自己作为原创思想者的力量还不够大，但在向其他人学习的意愿和能力方面，我认为自己比大多数同时代人更胜一筹。因为我很少看到有人怀着这样一种看法审视所有为或新或旧的观点所做的辩护，即便

它们是错误的观点，也可能有真理埋藏于其下，而发掘是什么让它们看起来合理的这个过程也有助于得出真理。因此，我把这段作为有用的部分划分出来，在这儿我有特别的义务让自己积极起来，尤其是当我了解了柯尔律治追随者、德国思想家和卡莱尔的思想时更是这样。他们都激烈地反对我从小形成的思想方式，这让我相信，他们带来许多错误的同时，也拥有很多真理，真理隐藏在思想的后面，否则其带有先验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的措词会令大脑在接收它时习惯性地关闭，既不关心也不知道如何摆脱掉它。我不急于将真理从谬误中分离出来，并用和我有相同哲学看法的人理解和不反感的话表达出来。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人们就很容易相信，当我和一个拥有最杰出能力的人有密切的思想交流时，她的天赋不断发展并且在思想方面展现出来，不断寻求真理，远超于我，但我却没有像在其他人身上那样发现她的真理里也混杂着谬误，我思想上的进步很大一部分在于吸收了这些真理，而我的智力工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就是在真理和总体的思想体系间建立了桥梁，扫清了道路。 [8_6]

The first of my books in which her share was conspicious was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The *System of Logic* owed little to her except in the minuter matters of composition, in which respect my writings, both great and small, have largely benefited by her accurate and clear-sighted criticism. [7_3] The chapter of the *Political Econonomy* which has had a greater influence on opinion than all the rest, that on 'the Probable Future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is entirely due to her; in the first draft of the book, that chapter did not exist. She pointed out the need of such a chapter, and the extreme imperfection of the book without it; she was the cause of my writing it; and the more general part of the chapter, the statement and discussion of the two opposite theories respecting the proper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was wholly an exposition of her thoughts, often in words taken from her own lips. The purely scientific part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I did not learn from her; but

it was chiefly her influence that gave to the book that general tone by which it is distinguished from all previous exposi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that had any pretension to being scientific, and which has made it so useful in conciliating minds which those previous expositions had repelled. This tone consisted chiefly in making the prope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aws of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which are laws of nature, dependent on the properties of objects—and the modes of its Distribution, which, subject to certain conditions, depend on human will. The common run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confuse these together, under the designation of economic laws, which they deem incapable of being defeated or modified by human effort; ascribing the same necessity to things dependent on the unchangeable conditions of our earthly existence, and to those which, being but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social arrangements, are merely co-extensive with these; given certain institutions and customs, wages, profits, and rent will be determined by certain causes; but this clas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drop the indispensable presupposition, and argue that these causes must, by an inherent necessity, against which no human means can avail, determine the shares which fall, in the division of the produce, to labourers, capitalists, and landlords.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yielded to none of its predecessors in aiming at the scientific appreciation of the action of these causes, under the conditions which they presuppose; but it set the example of not treating those conditions as final. The economic generalizations which depend not on necessities of nature but on those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of society, it deals with only as provisional, and as liable to be much altered by the progress of social improvement. I had indeed partially learnt this view of things from the thoughts awakened in me by the speculations of the St. Simonians; but it was made a living principle pervading and animating the book by my wife's promptings. This

example illustrates well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what she contributed to my writings. What was abstract and purely scientific was generally mine; the properly human element came from her: in all that concerned the application of philosophy to the exigencies of human society and progress, I was her pupil, alike in boldness of speculation and cautiousness of practical judgment. For, on the one hand, she was much more courageous and far-sighted than without her I should have been, in anticipation of an order of things to come, in which many of the limited generalizations now so often confounded with universal principles will cease to be applicable. Those parts of my writings, and especially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 which contemplate possibilities in the future such as, when affirmed by Socialists, have in general been fiercely denied by political economists, would, but for her, either have been absent, or the suggestions would have been made much more timidly and in a more qualified form. But while she thus rendered me bolder in speculation on human affairs, her practical turn of mind, and her almost unerring estimate of practical obstacles, repressed in me all tendencies that were really visionary. Her mind invested all ideas in a concrete shape, and formed to itself a conception of how they would actually work: and her knowledge of the existing feelings and conduct of mankind was so seldom at fault, that the weak point in any unworkable suggestion seldom escapes her. [7_4]

在我的作品中，第一本包含她的突出贡献的书就是《政治经济学原理》。而对于《逻辑学体系》，除了精心地安排了文章的结构外，她所作的贡献并不多，但正是在文章的结构方面，我的作品，无论长短，都从她精确和锐利的批评中受益良多。 [8_7] 《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有一章是关于“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的，它对观念产生的影响最大，这完全是她的功劳。初稿中并没有这一章，她指出有必要把这一章加进去，否则的话这本书就会十分不完美。因为她，我才着手写这

一章，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劳动阶级固有地位的两种对立理论的陈述和讨论，这完全是她思想的表达，经常由她亲自口述。《政治经济学原理》里的纯科学部分，我并不是从她那儿学来的，但主要还是她的影响给整本书定下了基调，使之不同于原来那些自称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也有效地争取到了那些曾被这些论文排斥的人。这个基调的精髓在于正确区分了财富创造的定律和财富分配的模式，前者是真正的自然定律，取决于物的属性，后者受特定条件限制，取决于人的意志。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家用经济学定律的名义将这些统统拒之门外，他们认为这些定律是无法通过人类努力来修改或战胜的。他们把相同的必然性归因于那些依赖尘世生活恒定条件的东西，也归因于那些在特定社会结构下唯一必然的结果，这两者仅仅是与之同等延伸的。在特定的惯例和习俗下，工资、利润和租金是由特定的原因决定的。但这批政治经济学家陷入了无法避免的假想当中，主张这些原因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任何人力都起不了作用，也必然决定了在生产分工中，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所占的份额在减少。《政治经济学原理》不同意前人在他们假定的前提下针对这些原因的作用进行科学认定。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要将条件视为决定性的。经济学的归纳不取决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取决于必然性和现有社会结构的结合，归纳仅仅是暂时的，容易被社会发展的进程所改变。实际上，我看问题的这种方法部分来自于圣西门主义者[8_8]理论的激发，但却是因为我太太的提示，我的想法才变成赋予全书生命的通行的现实准则。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她对我的作品所作贡献的一般特点。那些抽象的和纯科学的内容基本上由我负责，而她提出的是恰当的人类要素：就像我学习她大胆地思考和谨慎地作出实际判断一样，在所有涉及将哲学应用到人类社会和发展的迫切需要的方面，我也是她的学生。因为，一方面有了她我才在预见未来的规则上变得比原来更勇敢，更有远见，现在很多有限的归纳经常和普通的原则相混淆，从而失去了适用性。若不是她，我作品中的这些部分，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那些被社会主义者肯定却被大部分政治经济学家强烈否定的对未来可能性的思考，要么不会出现，要么就是以一种更怯懦或更受限制的形式被提出。然而当她让我更大胆地思考人类事务时，她务实的思想方法，以及对实际困难的正确估计打消了我所有的空想倾向。她头脑中的想法

具体有形，自身形成了如何实际操作的概念，而且她对现存的人类情感和行为的认识很少出错，所有不切实际的建议中的缺点几乎都逃不过她的眼睛。[8_9]

During the two years which immediately preceded the cessation of my official life, my wife and I were working together at the “Liberty.” I had first planned and written it as a short essay in 1854. It was in mounting the steps of the Capitol, in January, 1855, that the thought first arose of converting it into a volume. None of my writings have been either so carefully composed, or so sedulously corrected as this. After it had been written as usual twice over, we kept it by us, bringing it out from time to time, and going through it *de novo* , reading, weighing, and criticizing every sentence. Its final revision was to have been a work of the winter of 1858-9, the first after my retirement, which we had arranged to pass in the south of Europe. That hope and every other were frustrated by the most unexpected and bitter calamity of her death—at Avignon, on our way to Montpellier, from a sudden attack of pulmonary congestion.

就在我结束公职生涯的前两年，我太太和我一起写了《论自由》。1854年，我起初是打算把它写成一篇短文的。但是1855年1月，当我登上罗马朱庇特神庙[8_10]台阶时，我第一次产生了把它写成一本书的想法。我的作品中没有哪一部像这本书一样作了细致的构思和孜孜不倦的修改。像通常那样写过两遍以后，我们就把它带在身上，时不时地拿出来，从头翻阅，字斟句酌。本书原定于1858年冬天完稿，那也是我退休后本打算在南欧度过的第一个冬天。但所有的希望都在我太太意外过世的悲痛中破灭了——在阿维尼翁[8_11]，也就是在我们去蒙彼利埃的途中，她突然肺部充血而病逝。

Since then I have sought for such alleviation as my state admitted of, by the mode of life which most enabled me to feel her still near me. I bought a cottage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place where she is buried, and there her daughter (my fellow-sufferer and now my chief comfort) and I, live constantly during a great portion of the year. My objects in life are solely those which were hers; my pursuits and occupations those in which she shared, or sympathized, and which are indissolubly associated with her. Her memory is to me a religion, and her approbation the standard by which, summing up as it does all worthiness, I endeavour to regulate my life.

从那以后，在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我为了寻求慰藉，以一种能使自己感觉到她就在身边的方式活着。我在离她墓地尽可能近的地方买了一栋小屋，和她的女儿（她也忍受着痛苦，现在是我的主要安慰）在那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我生活的目标完全就是她一贯的生活目标；我的追求和事业就是曾与她分享的或经她赞成的追求和事业，这些与她密不可分。对她的思念于我是一种宗教，她的认可也是我总结出来衡量所有价值的标准，我也努力用它来调节我的生活。

After my irreparable loss, one of my earliest cares was to print and publish the treatise, so much of which was the work of her whom I had lost, and consecrate it to her memory. I have made no alteration or addition to it, nor shall I ever. Though it wants the last touch of her hand, no substitute for that touch shall ever be attempted by mine.

在我遭受了这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后，我最先关心的就是《论自由》的印刷和出版，其中大部分是她写的，我以此书来祭奠她，作为

对她的怀念。我没有更改或补充其中的内容，以后也不会改动。虽然没有经过她最终润色，但我从没想过替代她做这项工作。

In resuming my pen some years after closing the preceding narrative, I am influenced by a desire not to leave incomplete the record, for the sake of which chiefly this biographical sketch was undertaken, of the obligations I owe to those who have either contributed essentially to my own mental development or had a direct share in my writings and in whatever else of a public nature I have done. In the preceding pages, this record, so far as it relates to my wife, is not so detailed and precise as it ought to be; and since I lost her, I have had other help, not less deserving and requiring acknowledgment.

我不希望让记录变得不完整，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在结束前边故事后的几年，我又拿起了笔，主要是因为要写这本自传的草稿，这是我对那些曾经对我思想进步作出贡献的人，或者直接参与到我的写作以及其他我做过的有公众性质事情的人的义务。这个记录的前面几页谈到了我太太，但并没有应有的那样细致和精确。而自从我失去她以后，我还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同样值得和需要感谢。

The *Liberty* was more directly and literally our joint production than anything else which bears my name, for there was not a sentence of it that was not several times gone through by us together, turned over in many ways, and carefully weeded of any faults, either in thought or expression, that we detected in it. It is in consequence of this that, although it never underwent her final revision, it far surpasses, as a mere specimen of composition, anything which has proceeded from me either before or since. With

regard to the thoughts, i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any particular part or element as being more hers than all the rest. The whole mode of thinking of which the book was the expression, was emphatically hers. But I also was so thoroughly imbued with it, that the same thoughts naturally occurred to us both. That I was thus penetrated with it, however, I owe in a great degree to her. There was a moment in my mental progress when I might easily have fallen into a tendency towards over-government, both social and political; as there was also a moment when, by reaction from a contrary excess, I might have become a less thorough radical and democrat than I am. In both these points, as in many others, she benefited me as much by keeping me right where I was right, as by leading me to new truths, and ridding me of errors. My great readiness and eagerness to learn from everybody, and to make room in my opinions for every new acquisition by adjusting the old and the new to one another, might, but for her steadying influence, have seduced me into modifying my early opinions too much. She was in nothing more valuable to my mental development than by her just measure of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which often protected me from allowing to truths I had only recently learnt to see, a more important place in my thoughts than was properly their due.

与其他我署名的作品相比，《论自由》是我们合作最直接的作品，因为里边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我们多次认真的思考和反复的推敲，我们细心地去除了所发现的所有思想上或表达上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虽然没有经过她最终的修正，但仅仅从文章的结构来看，就远远超过了我之前或之后创作的所有作品。在思想方面，很难辨别哪个特别的部分或要素更属于她。此书表达的整个思维方式显然都是她的。但我也完全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所以我们自然会产生相同的想法。但我能看得这么透彻，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在我思想

发展的一段时间中，我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想法很容易陷入政府过多干预的倾向。还有一段时间我有可能矫枉过正，变得不像现在这么彻底的激进和民主。在这两方面和其他很多方面一样，她不仅帮助我保持正确的观点，而且引导我摆脱错误，走上新的真理之路。我热切而且很乐于向任何人学习，并修正旧观点，融合新观点以腾出空间接受新的见解，若不是她一贯的影响，这有可能诱使我过多地修改我早期的见解。她对我思想发展最有价值的帮助在于她适当地衡量各种见解的相对重要性，经常使我避免将刚刚明白的真理放在思想中高于它们应有的重要地位。

The *Liberty* is likely to survive longer than anything else that I have written (with the possible exception of the *Logic*), because the conjunction of her mind with mine has rendered it a kind of philosophic text-book of a single truth, which the changes progressively taking place in modern society tend to bring out into ever stronger relief: the importance, to man and society of a large variety in types of character, and of giving full freedom to human nature to expand itself in innumerable and conflicting directions. Nothing can better show how deep are the foundations of this truth, than the great impression made by the exposition of it at a time which, to superficial observation, did not seem to stand much in need of such a lesson. The fears we expressed, lest the inevitable growth of social equality and of the government of public opinion, should impose on mankind an oppressive yoke of uniformity in opinion and practice, might easily have appeared chimerical to those who looked more at present facts than at tendencies; for the gradual revolution that is taking place in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has, thus far, been decidedly favour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opinions, and has procured for them a much more unprejudiced hearing than they previously met with. But this is a feature belonging to periods of transition, when old notions and feelings

have been unsettled, and no new doctrines have yet succeeded to their ascendancy. At such times people of any mental activity, having given up their old beliefs, and not feeling quite sure that those they still retain can stand unmodified, listen eagerly to new opinions. But this state of things is necessarily transitory: some particular body of doctrine in time rallies the majority round it, organizes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modes of action conformably to itself, education impresses this new creed upon the new generations without the mental processes that have led to it, and by degrees it acquires the very same power of compression, so long exercised by the creeds of which it had taken the place. Whether this noxious power will be exercised, depends on whether mankind have by that time become aware that it cannot be exercised without stunting and dwarfing human nature. It is then that the teachings of the *Liberty* will have their greatest value. And it is to be feared that they will retain that value a long time.

《论自由》可能比我的其他作品（或许《逻辑学体系》除外）更有生命力，因为我和她思想的结合让这本书成为某种单一真理的哲学教材，这个真理随着现代社会不断发生的变革变得更加突出：说明了性格类型多样化对人类和社会的重要性，给人性向无数的、相冲突的方向发展以充分的自由。这本书的论述所形成的深刻印象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好地说明了这个真理的基础有多深厚，尽管当时从表面看来似乎没有必要上这样一课。我们担心社会公正和代表舆论的政府不可避免的发展会给人类套上言论和行动一致的枷锁，对那些只看目前现实而忽视未来趋势的人来说，这种担心看起来似乎只是空想。因为在社会和制度中逐渐发生的变革还远未对新见解的发展绝对有利，使这些新见解获得比从前更多的公正的倾听。但这是属于过渡期的一个特点，此时的旧观念和旧情感已经动摇，而新学说还没有取得优势。在这样的时刻，所有有思想活动的人放弃了旧的信仰，还不确定他们所保留的东西是否会改变，所以他们迫切地倾听新的见解。但这种状态

必定是暂时的：某个特定学说体系会适时地得到周围大多数人的支持，建立与之相符的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通过教育使新一代人牢记新的教条，而不用告诉他们得出这个新教条的思想过程，渐渐地这个教条取得了与它所取代的教条相同的压制力。这种有害的力量是否会发挥作用取决于人类在那时是否意识到它会阻碍人性的发展。只有到那时，《论自由》的教导才会有最大的价值。令人担心的是，这些教导在很长时间都会保留这种价值。

As regards originality, it has of course no other than that which every thoughtful mind gives to its own mode of conceiving and expressing truths which are common property. The leading thought of the book is one which though in many ages confined to insulated thinkers, mankind have probably at no tim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 been entirely without. To speak only of the last few generations, it is distinctly contained in the vein of important thought respecting education and culture, spread through the European mind by the labours and genius of Pestalozzi. The unqualified championship of it by Wilhelm von Humboldt is referred to in the book; but he by no means stood alone in his own country. 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he doctrine of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ity, and the claim of the moral nature to develop itself in its own way, was pushed by a whole school of German authors even to exaggeration; and the writings of Goethe, the most celebrated of all German authors, though not belonging to that or to any other school, are penetrated throughout by views of morals and of conduct in life, often in my opinion not defensible, but which are incessantly seeking whatever defence they admit of in the theory of the right and duty of self-development. In our own country before the book *On Liberty* was written, the doctrine of Individuality had been enthusiastically asserted, in a style of vigorous declamation sometimes reminding one of Fichte, by Mr.

William Maccall, in a series of writings of which the most elaborate is entitled *Elements of Individualism* : and a remarkable American, Mr. Warren, had framed a *System of Society* ,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e individual* , had obtained a number of followers, and had actually commenced the formation of a Village Community (whether it now exists I know not), which, though bearing a superficial resemblance to some of the projects of Socialists, is diametrically opposite to them in principle, since it recognizes no authority whatever in Society over the individual, except to enforce equal freedom of development for all individualities. As the book which bears my name claimed no originality for any of its doctrines, and was not intended to write their history, the only author who had preceded me in their assertion, of whom I thought it appropriate to say anything, was Humboldt, who furnished the motto to the work; although in one passage I borrowed from the Warrenites their phrase, the sovereignty of the individual. It is hardly necessary here to remark that there are abundant differences in detail, between the conception of the doctrine by any of the predecessors I have mentioned, and that set forth in the book.

至于原创性问题，当然它正是每个有思想的人以自己的方式来构想和表达属于人类共同属性的真理。这本书的主导思想是，虽然在很多时代只有孤立的思想家才有这种思想，但它自人类文明开始以来就很可能已经存在了。仅仅拿最近几代人来说，这种思想明显地存在于与教育、文化相关的重要思想中，并通过裴斯泰洛齐 [8_12] 的努力传播到欧洲人的心中。书中提到威廉·冯·洪堡 [8_13] 无条件地支持这种思想，他在自己的国家绝不是孤立无援。在本世纪初，个人权利学说以及道德应自行发展的主张被德国作家的整个流派推广到了夸张的地步。德国最著名的作家歌德的作品虽然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但却渗透着人生的道德观和处事观，我认为虽然不应当拥护，但它在不停地

为自我发展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论寻求自身可容许的各种辩护。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在《论自由》写完之前，威廉·麦考尔先生在一系列作品中以雄辩的方式狂热地维护个人主义理论，让人想起了菲希特，其中最详尽的一部题为《个人主义的要素》。另外，一位杰出的美国人沃伦先生以个人主权为基础建构了一种社会体系，赢得了许多追随者，并着手将建立村庄团体付诸行动（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存在），虽然这表面上和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计划相似，但在原则上与他们完全相反，因为除了推行所有个人具有平等的发展自由，它不承认社会对个人有任何权威。我对自己署名的《论自由》一书中的学说没有原创权，也不打算书写它们的历史，在我之前唯一值得一提的坚持这些理论的作家是洪堡。他为此书题了词，虽然书中有一段中的词语个人主权是我从沃伦 [8_14] 派那里借用的。我提到的前人对这个学说的概念在细节上与我书中提到的概念有天壤之别，在这里没必要赘述。

The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 induced me, shortly after, to complete and publish a pamphlet (*Thoughts on Parliamentary Reform*), part of which had been written some years previously on the occasion of one of the abortive Reform Bills, and had at the time been approved and revised by her. Its principal features were, hostility to the Ballot (a change of opinion in both of us, in which she rather preceded me), and a claim of representation for minorities; not, however, at that time going beyond the cumulative vote proposed by Mr. Garth Marshall. In finishing the pamphlet for publication, with a view to the discussions on *the Reform Bill* of Lord Derby's and Mr. Disraeli's Government in 1859, I added a third feature, a plurality of votes, to be given, not to property, but to proved superiority of education. This recommended itself to me as a means of reconciling the irresistible claim of every man or woman to be consulted, and to be allowed a voice, in the regulation of affairs which vitally concern them, with the superiority of weight justly due to opinions grounded on superiority

of knowledge. The suggestion, however, was one which I had never discussed with my almost infallible counsellor, and I have no evidence that she would have concurred in it. As far as I have been able to observe, it has found favour with nobody; all who desire any sort of inequality in the electoral vote, desiring it in favour of property and not of intelligence or knowledge. If it ever overcomes the strong feeling which exists against it, this will only b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atic National Education by which the various grades of politically valuable acquirement may be accurately defined and authenticated. Without this it will always remain liable to strong, possibly conclusive, objections; and with this, it would perhaps not be needed.

那时的政治状况促使我不久之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议会改革的思考》，其中一部分是几年前在《改良法案》流产时写的，当时还得到了她的赞同和修改。它的两个主要特色是敌视投票制度（我们两人思想已转变，她比我还超前一点），以及为少数派争取代表权。但是，这些主张在当时没有超出加思·马歇尔 [8_15] 先生提出的累积投票制的范围。在这本书准备付印出版时，考虑到1859年德比勋爵和迪斯雷里内阁对《改良法案》的讨论，我又加入了第三个特色，即把选票的多数投给证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不是投给财产。这个建议本身对我来说是调解以下两个方面的手段，既考虑到每个男女在管理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务时对发言权不可抗拒的要求，又立足于知识优势决定权力优势的理论。但这个建议我从未与我几乎不会犯错的顾问讨论过，所以我不能证明她和我的意见是否相同。就我所能观察的来讲，这个建议不被任何人看好，所有希望在选举投票中谋取这种不平等的人都希望选举以财产为准，而不以智力或知识为准。如果这个建议能够克服反对的强烈情绪，那就只能等到系统的国民教育建立以后，通过制度来准确地定义和认定有政治价值的学识等级。否则这个建议将永远遭到强烈的、可能是决定性的反对。而等有了这种制度，人们也许就不需要它了。

It was soon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oughts on Parliamentary Reform* , that I became acquainted with Mr. Hare's admirable system of Personal Representation, which, in its present shape, was then for the first time published. I saw in this great prac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dea, the greatest improvement of which the system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s susceptible; an improvement which, in the most felicitous manner, exactly meets and cures the grand, and what before seemed the inherent, defect of the representative system; that of giving to a numerical majority all power, instead of only a power proportional to its numbers, and enabling the strongest party to exclude all weaker parties from making their opinions heard in the assembly of the nation, except through such opportunity as may be given to them by the accidentally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opinions in different localities. To these great evils nothing more than very imperfect palliations had seemed possible; but Mr. Hare's system affords a radical cure. This great discovery, for it is no less, in the political art, inspired me, as I believe it has inspired all thoughtful persons who have adopted it, with new and more sanguine hopes respecting the prospects of human society; by freeing the form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owards which the whole civilized world is manifestly and irresistibly tending, from the chief part of what seemed to qualify, or render doubtful, its ultimate benefits. Minorities, so long as they remain minorities, are, and ought to be, outvoted; but under arrangements which enable any assemblage of voters, amounting to a certain number, to place in the legislature a representative of its own choice, minorities cannot be suppressed. Independent opinions will force their way into the council of the nation and make themselves heard there, a thing which often cannot happen in the existing forms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the legislature, instead of being weeded of individual peculiarities and entirely made up of men who simply

represent the creed of great political or religious parties, will comprise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most eminent individual minds in the country, placed there, without reference to party, by voters who appreciate their individual eminence. I can understand that persons, otherwise intelligent, should, for want of sufficient examination, be repelled from Mr. Hare's plan by what they think the complex nature of its machinery. But any one who does not feel the want which the scheme is intended to supply; any one who throws it over as a mere theoretical subtlety or crotchet, tending to no valuable purpose, and unworthy of the attention of practical men, may be pronounced an incompetent statesman, unequal to the politics of the future. I mean, unless he is a minister or aspires to become one: for we are quite accustomed to a minister continuing to profess unqualified hostility to an improvement almost to the very day when his conscience or his interest induces him to take it up as a public measure, and carry it.

《议会改革的思考》出版后不久，我接触了黑尔先生令人敬佩的《个人代表制》一书，当时还是第一次出版。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了非常实际和有哲理的思想，以及代议制政府制度所能容许的最大改良。改良以最恰当的方式刚好弥补了代议制以前似乎固有的重大缺陷，这种缺陷就是把所有权力赋予多数派，而不只是按得票数比例分配权力，使最强大的党派排除所有较弱小的党派，不让他们在全民议会上发表见解，除非通过不同地区偶尔不平等分配得到的机会，他们的政见才能得以发表。对于这些重大缺陷似乎不可能找到很完美的缓和剂，但黑尔先生的制度提供了根治的良方。这个政治艺术上的伟大发现激励了我，我也相信它曾经激励了所有接纳它的有思想的人，它给人类社会的前景带来了新的更加乐观的希望，把整个文明世界显然势必遵从的政治制度形式，从看起来限制它或怀疑它的最终利益的主要部分中解放出来。少数派只要还是少数派，就会，也应该会在票数上落后。但规定投票者的集会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自己选出一个代表

进入立法机关，少数派就不会被压制。独立的见解将强行进入国民议会，让其他人听到，这种情况在现有的代议民主制度下不是经常发生的。立法机关不再排除个人特性，不再完全由那些代表强大政党或宗教派别教义的人组成，而是包含了国内大部分最优秀的个人，他们进入立法机关与党派无关，而是选民欣赏他们的个人才华。我可以理解，那些在其他方面聪明的人由于缺少充分的考察，会被他们所认为的制度复杂的本性排除在黑尔的方案之外。但任何觉得不需要黑尔方案弥补缺陷的人，任何仅仅把它视为理论上的微妙想法或怪念头的人，任何认为它无助于有价值的目标，不值得引起务实的人注意的人，都可谓是一个不称职的政治家，不能胜任未来的政治。我的意思是，除非他是大臣，或者向往成为大臣的人。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大臣对改良一贯无条件的敌视，几乎要等到他的良知或利益驱使他采纳它作为一项公共措施并且执行它的那一天为止。

Had I met with Mr. Hare's system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my pamphlet, I should have given an account of it there. Not having done so, I wrote an article in *Fraser's Magazine* (reprinted in my miscellaneous writings) principally for that purpose, though I included in it, along with Mr. Hare's book, a review of two other productions on the question of the day; one of them a pamphlet by my early friend, Mr. John Austin, who had in his old age become an enemy to all further Parliamentary reform; the other an able and vigourous, though partially erroneous, work by Mr. Lorimer.

如果我在小册子出版前读了黑尔先生的方案，我一定会在里边细加论述。因为没能这么做，我在《弗雷泽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我的杂文集里也有收录），主要目的也在于此，除了在里边介绍黑尔先生的书，我还评论了两本谈论时事问题的作品。其中一本是我的老朋友约翰·奥斯丁先生的小册子，他在晚年变成了议会所有进一步改革的反对者。另一本是洛里默先生有才气和智慧的作品，但里边存在部分

错误。

In the course of the same summer I fulfilled a duty particularly incumbent upon me, that of helping (by an article in the *Edinburgh Review*) to make known Mr. Bain's profound treatise on the Mind, just then completed by the publication of its second volume. And I carried through the press a selection of my minor writings, forming the first two volumes of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 The selection had been made during my wife's lifetime, but the revision, in concert with her, with a view to republication, had been barely commenced; and when I had no longer the guidance of her judgment I despaired of pursuing it further, and republished the papers as they were, with the exception of striking out such passages as were no longer in accordance with my opinions. My literary work of the year was terminated with an essay in *Fraser's Magazine* (afterwards republished in the third volume of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entitled “A Few Words on Non-Intervention.” I was prompted to write this paper by a desire, while vindicating England from the imputations commonly brought against her on the Continent, of a peculiar selfishness in matters of foreign policy to warn Englishmen of the colour given to this imputation by the low tone in which English statesmen are accustomed to speak of English policy as concerned only with English interests, and by the conduct of Lord Palmerston at that particular time in opposing the Suez Canal; and I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expressing ideas which had long been in my mind (some of them generated by my Indian experience, and others by the international questions which then greatly occupied the European public), respecting the tru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morality, and the legitimate modifications made in it by difference of times and circumstances; a subject I had already, to some extent,

discussed in the vindication of the French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1848 against the attacks of Lord Brougham and others, which I published at the time in the *Westminster Review* , and which is reprinted in the *Dissertations* .

同年夏天，我完成了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那就是帮忙（通过《爱丁堡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介绍贝恩 [8_16] 先生一部深奥的专著《论精神》，当时此书刚出版了第二卷。此外，我还完成了短文选集的出版事宜，构成了《论述和讨论》的前两卷。这个选集是在我太太在世时完成的，但为了再版，我和她一起进行的修订工作才刚刚开始。当我不再拥有她的判断作指导时，我失去了继续修订的动力，除了删掉与我见解不相符的段落外，我原封不动地把它交去再版。我那年的文学工作以发表在《弗雷泽杂志》上的一篇名为《略谈不干涉政策》的文章而告终（后来收录在《论述和讨论》的第三卷）。我在这样一个愿望的促使下写了这篇文章，欧洲各国普遍指责英国外交政策特别自私，对此我在为英国澄清的同时提醒英国人，英国政治家惯于称英国的外交政策是关心英国的利益，这一低沉的腔调和当时帕默斯顿勋爵反对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所作所为都给这种指责提供了借口。我借这个机会表达了长久以来心中关于国际道德的正确原则，和根据不同时间、不同情况合法修改这些原则的想法（有些源自我在印度的经历，另一些来自当时欧洲公众十分关注的国际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个问题，该文章为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辩护，反对布鲁厄姆勋爵等人的攻击，它当时发表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并收录在《论述和讨论》中。

I had now settled, as I believed, for the remainder of my existence into a purely literary life; if that can be called literary which continued to be occupied in a pre-eminent degree with politics, and not merely with theoretical, but practical politics, although a great part of the year was spent at a distance of many

hundred miles from the chief seat of the politics of my own country, to which, and primarily for which, I wrote. But, in truth, the modern facilities of communication have not only removed all the disadvantages, to a political writer in tolerably easy circumstances, of distance from the scene of political action, but have converted them into advantages. The immediate and regular receipt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keeps him *au courant* of even the most temporary politics, and gives him a much more correct view of the state and progress of opinion than he could acquire by personal contact with individuals: for every one's social intercourse is more or less limited to particular sets or classes, whose impressions and no others reach him through that channel; and experience has taught me that those who give their time to the absorbing claims of what is called society, not having leisure to keep up a large acquaintance with the organs of opinion, remain much more ignorant of the general state either of the public mind, or of the active and instructed part of it, than a recluse who reads the newspapers need be. There are, no doubt, disadvantages in too long a separation from one's country—in not occasionally renewing one's impressions of the light in which men and things appear when seen from a position in the midst of them; but the deliberate judgment formed at a distance, and undisturbed by inequalities of perspective, is the most to be depended on, even for application to practice. Alternating between the two positions, I combined the advantages of both. And, though the inspirer of my best thoughts was no longer with me, I was not alone: she had left a daughter, my stepdaughter, [Miss Helen Taylor, the inheritor of much of her wisdom, and of all her nobleness of character,] whose ever growing and ripening talents from that day to this have been devoted to the same great purposes [and have already made her name better and more widely known than was that of her mother, though far less so than I predict, that if she lives it is destined to become. Of the value

of her direct cooperation with me, something will be said hereafter, of what I owe in the way of instruction to her great powers of original thought and soundness of practical judgment, it would be a vain attempt to give an adequate idea]. Surely no one ever before was so fortunate, as, after such a loss as mine, to draw another prize in the lottery of life [—another companion, stimulator, adviser, and instructor of the rarest quality]. Whoever, either now or hereafter, may think of me and of the work I have done, must never forget that it is the product not of one intellect and conscience, but of three[, the least considerable of whom, and above all the least original, is the one whose name is attached to it].

我相信那时我已经习惯于在纯文学的生活中度过我的余生，如果这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与理论和实践政治相关的写作可以称作文学生活的话。虽然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远离自己国家政治中心几百英里外的地方度过，我仍是，而且主要是为自己国家写作的。但实际上，对一个生活环境简单且条件尚可的政治作家来说，现代交通的便捷不仅消除了远离政治活动现场的所有不利条件，还把这些不利条件变成有利条件。即时、频繁地接收报刊的信息令他时刻了解当下的政治，并且为他提供比私人接触更准确的舆论观点及它们的进展情况。因为每个人的社会交往或多或少局限于特定的集团或阶级，通过这个渠道他只能得到这些集团或阶级的印象而没有其他的印象。经验告诉我，那些把时间花在所谓社交中吸引人的索求的人，无暇经常了解舆论的喉舌，对舆论的大体情况或其中积极的、有指示作用的部分还不如经常读报的隐居者知道的多。离开自己的国家太久无疑有种种不利：不能经常更新自己对所处环境看到的人和事的印象，但在远处作出的深思熟虑的判断不受不公平看法的干扰，所以才是最值得信赖的，甚至可以用于实践。交替于这两个位置间，我综合了两者的有利条件。虽然能最好地启发我思想的人已经不在了，但我并不孤单。她留下了一个女儿——我的继女，海伦·泰勒小姐，她的智慧、高贵和性格的继承者。从那天起至今，她不断成长和成熟的才智一直贡献于同

样伟大的目标，比起母亲，泰勒的名字为更多的人所熟知，虽然就我预测，如果泰勒的母亲一直活着的话，她的名气一定会比她女儿大。现在起要说点有关与她直接合作的价值的事：我感谢她伟大的原创思考能力以及实际判断的合理性带给我的指导，否则得出完整的想法只能是徒劳。过去肯定没有人像我这么幸运，在经历过这样巨大的损失后，变化莫测的人生却又赋予了我另一个瑰宝——另一个非凡的同伴、激励者、顾问和老师。现在或以后若有人想起我和我的作品，一定不要忘记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智慧和良心的结晶，其中最不重要的，且原创性最低的就是名字写在作品上的那个人。

The work of the years 1860 and 1861 consisted chiefly of two treatises, only one of which was intended for immediate publication. This was the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 a connected exposition of what, by the thoughts of many years, I had come to regard as the best form of a popular constitution. Along with as much of the general theory of government as is necessary to support this particular portion of its practice, the volume contains many matured views of the principal questions which occupy the present age, within the province of purely organic institutions, and raises, by anticipation, some other questions to which growing necessities will sooner or later compel the attention both of theoretical and of practical politicians. The chief of these last,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function of making laws, for which a numerous popular assembly is radically unfit, and that of getting good laws made, which is its proper duty and cannot be satisfactorily fulfilled by any other authority: and the consequent need of a Legislative Commission, as a permanent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a free country; consisting of a small number of highly trained political minds, on whom, when Parliament has determined that a law shall be made, the task of making it should be devolved: Parliament retaining the power of passing or rejecting

the bill when drawn up, but not of altering it otherwise than by sending proposed amendments to be dealt with by the Commission. The question here raised respecting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public functions, that of legislation, is a particular case of the great problem of moder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stated, I believe, for the first time in its full extent by Bentham, though in my opinion not always satisfactorily resolved by him; the combination of complete popular control over public affairs, with the greatest attainable perfection of skilled agency.

1860和1861年我的主要作品是两部专著，其中只有一部是为了立即出版，这就是《代议制政府的思考》。经过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代议制是最好的民主政体形式，这本著作就与之相关。它不仅包含了实施这种特殊政体所必需的一般理论，还有对纯组织制度领域内重大时事的成熟看法。通过预期，我还提出其他早晚都有必要迫使理论上和实践中的政治家重视的问题。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区分制定法律的职能和促使良好法律得以制定的职能。前者大多数公民大会都不能胜任，后者是公民大会的分内之事，其他机构都不能令人满意地完成。所以结论是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永久组成部分需要建立立法委员会，其中有少数受过高等训练有政治头脑的人，当议会决定制定一项法律时，这个任务应当转交给委员会。议会保留通过或反对委员会起草法案的权力，但是没有权力修改，只能将修改建议提交委员会处理。这里提出的有关公共职能中最重要的立法职能问题，也是现代政治组织中重大问题的一个特殊例子，我相信这个问题已由边沁首次全面地论述过，虽然我并不认为他的解决方案令人满意。应当把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完全监督和最完美的专业机构结合起来。

The other treatise written at this time is the one which was published some years [7_5] later under the title of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It was written [at my daughter's suggestion] that there

might, in any event, be in existence a written exposition of my opinions on that great question, as full and conclusive as I could make it. The intention was to keep this among other unpublished papers, improving it from time to time if I was able, and to publish it at the time when it should seem likely to be most useful. As ultimately published [it was enriched with some important ideas of my daughter's, and passages of her writing. But] in what was of my own composition, all that is most striking and profound belongs to my wife; coming from the fund of thought which had been made common to us both, by our innumerable conversations and discussions on a topic which filled so large a place in our minds.

当时写的另一本专著是几年后 [8_17] 出版的《论妇女的屈从地位》。这本书是我女儿建议我写的，无论如何，我尽可能全面、有说服力地把对这个重大问题的见解呈现给公众。我的打算是把它放在其他尚未出版的文章中，尽可能随时修改，等到它最有可能有用的时候再出版。当它最终出版的时候，里面已经加入了我女儿的许多重要想法，其中很多段落是她写的。但在属于我的段落当中，最显著、最深刻的部分是我妻子写的。对一个在我们心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问题，我们进行了无数次的交谈和讨论，所以它来自我们共同的思想储备。

Soon after this time I took from their repository a portion of the unpublished papers which I had written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our married life, and shaped them, with some additional matter, into the little work entitled *Utilitarianism* ;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ree parts, in successive numbers of *Fraser's Magazine* , and afterwards reprinted in a volume.

之后不久，我从堆积的手稿里拿走了一部分未出版的文章，都是

在我们婚后生活的最后几年写成的。经过修改，增加了一些内容，最后形成了名为《功利主义》的小书。第一次出版时分为三个部分，在《弗雷泽杂志》连载，后来重印成一卷。

Before this, however, the state of public affairs had become extremely critical, by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My strongest feelings were engaged in this struggle, which, I felt from the beginning, was destined to be a turning point, for good or evil, of the course of human affairs for an indefinite duration. Having been a deeply interested observer of the slavery quarrel in America, during the many years that preceded the open breach, I knew that it was in all its stages an aggressive enterprise of the slave-owners to extend the territory of slavery; under the combined influences of pecuniary interest, domineering temper, and the fanaticism of a class for its class privileges, influences so fully and powerfully depicted in the admirable work of my friend Professor Cairnes, *The Slave Power* . Their success, if they succeeded, would be a victory of the powers of evil which would give courage to the enemies of progress and damp the spirits of its friends all over the civilized world, while it would create a formidable military power, grounded on the worst and most anti-social form of the tyranny of men over men, and, by destroying for a long time the prestige of the great democratic republic, would give to all the privileged classes of Europe a false confidence, probably only to be extinguished in blood.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spirit of the North was sufficiently roused to carry the war to a successful termination, and if that termination did not come too soon and too easily, I foresaw, from the laws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volutions, that when it did come it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be thorough: that the bulk of the Northern population, whose conscience had as yet been awakened only to the point of resisting

the further extension of slavery, but whose fidelity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made them disapprove of any attempt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interfere with slavery in the States where it already existed, would acquire feelings of another kind when the Constitution had been shaken off by armed rebellion, would determine to have done for ever with the accursed thing, and would join their banner with that of the noble body of Abolitionists, of whom Garrison was the courageous and single-minded apostle, Wendell Phillips the eloquent orator, and John Brown the voluntary martyr. [7_6] Then, too, the whole mind of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let loose from its bonds, no longer corrupted by the supposed necessity of apologizing to foreigners for the most flagrant of all possible violations of the free principles of their Constitution; while the tendency of a fixed state of society to stereotype a set of national opinions would be at least temporarily checked, and the national mind would become more open to the recognition of whatever was bad in either the institutions or the customs of the people. These hopes, so far as related to slavery, have been completely, and in other respects are in course of being progressively realized. Foreseeing from the first this double set of consequences from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rebellion, it may be imagined with what feelings I contemplated the rush of nearly the whole upper and middle classes of my own country even those who passed for Liberals, into a furious pro-Southern partisanship: the working classes, and some of the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men, being almost the sole exceptions to the general frenzy. I never before felt so keenly how little permanent improvement had reached the minds of our influential classes, and of what small value were the liberal opinions they had got into the habit of professing. None of the Continental Liberals committed the same frightful mistake. But the generation which had extorted negro emancipation from our West India planters had passed away; another had succeeded which had

not learnt by many years of discussion and exposure to feel strongly the enormities of slavery; and the inattention habitual with Englishmen to whatever is going on in the world outside their own island, made them profoundly ignorant of all the antecedents of the struggle, insomuch that it was not generally believed in England, for the first year or two of the war, that the quarrel was one of slavery. There were men of high principle and unquestionable liberality of opinion, who thought it a dispute about tariffs, or assimilated it to the cases in which they were accustomed to sympathize, of a people struggling for independence.

但在此之前，由于美国内战爆发，公共事态就变得十分紧张。我最强烈的感情也投入到这场战争中，我从一开始就认为无论结果是好是坏，这在一段不确定时间内将注定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南北公开分裂前的那些年，我一直很有兴趣地观察美国的奴隶制之争，我知道在斗争的每个阶段，奴隶主都咄咄逼人地想要扩大奴隶制的领域，这主要是受到金钱利益、作威作福的特性和追求阶级特权的阶级狂热三者的共同影响。我的朋友凯恩斯 [8_18] 教授在他的优秀作品《奴隶劳力》中充分有力地描述了这种影响。如果奴隶主成功了，那就代表了邪恶力量的胜利，将会助长进步的敌人，压制整个文明世界中进步精神的朋友，以最坏、最反社会的人压迫人的专制形式为基础，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在很长时间内毁灭伟大的民主共和制的声誉，这会给欧洲所有特权阶级一个错误的信心，这种信心很可能只有在血泊中才会消失。另一种可能是，如果北方的士气足够高涨，最后成功赢得战争，如果这个胜利来得不是太快且不太容易，从人性的法则和革命经验来看，我预见这种胜利一旦来了就很可能是彻底的。然而北方民众的良知到那时仅仅止步于意识到抵制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展。他们对美国宪法的忠诚使他们反对联邦政府干涉各个蓄奴州的奴隶制，但当宪法受到武装叛乱的动摇时，他们又会产生另一种感情，并下决心永远去除那个可恶的东西，加入到高尚的废奴主义者麾下，后者认为加里森是勇敢和忠心的传道者，温德尔·菲利普斯

[8_19] 是雄辩的演说家，约翰·布朗是自发的殉难者。 [8_20] 到那时，所有美国人的思想将从枷锁中解放出来，不再受到那种假想的必要的腐蚀，以为必须为对其宪法中自由原则最骇人听闻的违背而向外国人道歉。当一个社会停滞的状态趋于墨守成规时，国民思想至少将暂时阻止这种趋势，而全民思想将变得更容易认识到制度中或人民习惯中坏的东西。目前关于奴隶制的这些希望已经全部实现，在其他方面也在逐步实现。从叛乱的成功或失败两种结局的预测中，可以想象当我国几乎全部中上层阶级，甚至那些被认为是“自由派”的人都一窝蜂地成为支持南方派的狂热伙伴时，我会带着怎样的感情来思索。工人阶级，还有一些文学、科学领域的人，几乎成为这场全民狂热的唯一例外。我之前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永久进步在有权阶级身上起效多么小，而他们习惯声称的那些自由理念的价值又是多么小。欧洲大陆的自由派从未犯过同样可怕的错误。但那个逼迫我们西印度种植园主解放黑人奴隶的一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其后的一代没有经过多年的讨论和揭露，所以不能强烈地感觉到奴隶制的罪大恶极。而英国人习惯于对发生在他们国土之外的世事不闻不问，这使他们对这场战争的前因毫不知情，以至于在战争开始的头一两年他们还不相信这是一场关于奴隶制的斗争。那些道德准则高尚，观点开通的人认为，这场战争是关税之争，或者把它同化成他们一直同情的民族争取独立的战争。

It was my obvious duty to be one of the small minority who protested against this perverted state of public opinion. I was not the first to protest. It ought to be remembered to the honour of Mr. Hughes and of Mr. Ludlow, that they, by writings publishe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truggle, began the protestation. Mr. Bright followed in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of his speeches, followed by others not less striking. I was on the point of adding my words to theirs, when there occurred, towards the end of 1861, the seizure of the Southern envoys on board a British vessel, by an officer of the United States. Even English forgetfulness has not yet had time to lose all remembrance of the explosion of feeling in England which

then burst forth, the expectation, prevailing for some weeks, of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rlike preparations actually commenced on this side. While this state of things lasted, there was no chance of a hearing for anything favourable to the American cause; and, moreover, I agreed with those who thought the act unjustifiable, and such as to require that England should demand its disavowal. When the disavowal came, and the alarm of war was over, I wrote, in January, 1862, the paper, in *Fraser's Magazine* , entitled “The Contest in America,” [and I shall always feel grateful to my daughter that her urgency prevailed on me to write it when I did, for we were then on the point of setting out for a journey of some months in Greece and Turkey, and but for her, I should have deferred writing till our return.] Written and published when it was, this paper helped to encourage those Liberals who had felt overborne by the tide of illiberal opinion, and to form in favour of the good cause a nucleus of opinion which increased gradually, and, after the success of the North began to seem probable, rapidly. When we returned from our journey I wrote a second article, a review of Professor Cairnes' book, published in the *Westminster Review* . England is paying the penalty, in many uncomfortable ways, of the durable resentment which her ruling classes stirred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ir ostentatious wishes for the ruin of America as a nation; they have reason to be thankful that a few, if only a few, known writers and speakers, standing firmly by the Americans in the time of their greatest difficulty, effected a partial diversion of these bitter feelings, and made Great Britain not altogether odious to the Americans.

显然，我有义务和少数人一起反对这种反常的舆论。我不是第一个提出抗议的人。应当记住这是休斯先生和勒德洛先生的功劳，通过在斗争刚开始时发表作品来提出抗议。紧接着布赖特 [8_21] 先生用一

篇最强有力的演说表示抗议，后续者的表现也同样精彩。临近1861年年底时，美国的一名军官在英国的船上抓住了南方的使节，就在这时我以自己的文章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即使健忘的英国人也不会这么快忘记，当时英国迸发出了一股持续数周，期盼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情感洪流，事实上英国这边还进行了作战准备。当这种状态持续时，英国人就没有机会听到任何有利于美国事业的声音，另外，我赞同那些认为这个行动不合理的人，以至于要求英国应当拒绝参战。后来英国拒绝参战，战争的警报才告解除。我于1862年1月在《弗雷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之争》。我一直感谢我的女儿敦促我写成这篇文章，因为我们当时正要出发去希腊和土耳其旅行几个月，要不是因为她，我本会推迟到回来后再写。文章写成并发表，它有助于鼓励那些感觉被狭隘观点压制的自由派人士，也有助于形成有利于正义事业的思想核心，这个核心在慢慢发展，并会在北方有望胜利后迅速发展起来。我们旅行回来后，我又写了另一篇评论凯恩斯教授著作的文章，发表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英国统治阶级希望美国这个国家毁灭，这激起了美国长期的怨恨，英国也因此受到了许多令之不快的惩罚。他们有理由感谢那一小部分的——哪怕只有一小部分的——知名作家、演说家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坚定地站在美国人这边，部分转移了他们的痛恨情绪，使大不列颠在美国人眼中不是完全丑恶的。

This duty having been performed, my principal occupation for the next two years was on subjects not political. The publication of Mr. Austin's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after his decease, gave me an opportunity of paying a deserved tribute to his memory,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ressing some thoughts on a subject on which, in my old days of Benthamism, I had bestowed much study. But the chief product of those years was the *Examination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 . His *Lectures* , published in 1860 and 1861, I had rea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latter year, with a half-formed intention of giving an account of them in a Review, but I soon found that this

would be idle, and that justice could not be done to the subject in less than a volume. I had then to consider whether it would be advisable that I myself should attempt such a performance. On consideration, there seemed to be strong reasons for doing so. I was greatly disappointed with the *Lectures* . I read them, certainly, with no prejudice against Sir William Hamilton. I had up to that time deferred the study of his *Notes to Reid* on account of their unfinished state, but I had not neglected his *Discussions in Philosophy* ; and though I knew that his general mode of treating the facts of mental philosophy differed from that of which I most approved, yet his vigorous polemic against the later Transcendentalists, and his strenuous assertion of some important principles, especially the Relativity of human knowledge, gave me many points of sympathy with his opinions, and made me think that genuine psychology had considerably more to gain than to lose by his authority and reputation. His *Lectures* and the *Dissertations on Reid* dispelled this illusion: and even the *Discussions* , read by the light which these throw on them, lost much of their value. I found that the points of apparent agreement between his opinions and mine were more verbal than real; that the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which I had thought he recognised, were so explained away by him as to mean little or nothing, or were continually lost sight of, and doctrines entirely inconsistent with them were taught in nearly every part of hi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My estimation of him was therefore so far altered, that instead of regarding him as occupying a kind of intermediate 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rival philosophies, holding some of the principles of both, and supplying to both powerful weapons of attack and defence, I now looked upon him as one of the pillars, and in this country from his high philosophical reputation the chief pillar, of that one of the two which seemed to me to be erroneous.

完成了这个义务后，我接下来两年中的主要工作与政治无关。奥斯丁先生的遗著《法理学演说集》使我有机会向他表示应有的怀念，同时在许多问题上发表我的想法，之前在我信奉边沁主义的时候曾经对这些问题有过研究。但那些年的主要成果是《威廉·汉密尔顿[8_22]爵士哲学研究》，他的《演说集》于1860—1861年间出版，我在1861年底读到这本书时就打算在某期《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对这些演说进行阐述，但很快我就发现这样是偷懒的做法，要想公正地评价这本书起码要写一卷书才行。于是我考虑自己尝试这样做是否可取。考虑过后，我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去这样做。我对《演说集》十分失望，当然我读它的时候对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并没有偏见。在那之前，因为《里德论》还没有完成，所以我推迟了对它的研究，但我也留意了他的《哲学讨论》，虽然我知道他论述精神哲学的总体方式与我最推崇的方式不同，但他反对后期先验主义者的有力辩论和对一些重要原则的极力支持，尤其是对人类知识相对性的坚持，使我和他在思想上产生共鸣，感到在他的权威和声誉影响下，真正的心理学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他的《演说集》和《里德论》打破了这样的幻想：即使是《哲学讨论》，如果带着这种理解来读，也会失去很多价值。我发现我和他的观点明显一致的地方很多都是在书面上的，在实践上的却很少。那些他认同的重要哲学原理已经被他解释得几乎没有意义或毫无意义了，或者意义慢慢消失掉了，而与这些原理完全矛盾的学说却几乎在他哲学作品中的每个部分都得到了讲解。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对他的评价改变了，不再认为他占据了两个对立哲学的中间位置，掌握两者的原理并且为相互攻守提供有力的武器。我现在把他视为支柱之一，在这个国家以他的高度哲学声望来讲是一根主要的支柱，而且在我看来是两根当中错误的一根。

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schools of philosophy, that of Intuition, and that of Experience and Association, is not a mere matter of abstract speculation; it is full of practical consequences, and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all the greatest differences of practical opinion in an age of progress. The practical

reformer has continually to demand that changes be made in things which are supported by powerful and widely-spread feelings, or to question the apparent necessity and indefeasibleness of established facts; and it is often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is argument to show, how those powerful feelings had their origin, and how those facts came to seem necessary and indefeasible. There is therefore a natural hostility between him and a philosophy which discourages the explanation of feelings and moral facts by circumstances and association, and prefers to treat them as ultimate elements of human nature; a philosophy which is addicted to holding up favourite doctrines as intuitive truths, and deems intuition to be the voice of Nature and of God, speaking with an authority higher than that of our reason. In particular, I have long felt that the prevailing tendency to regard all the marked distinctions of human character as innate, and in the main indelible, and to ignore the irresistible proofs that by far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differences, whether between individuals, races, or sexes, are such as not only might but naturally would be produced by differences in circumstances, is one of the chief hindrances to the rational treatment of great social questions, and one of the greatest stumbling blocks to human improvement. This tendency has its source in the intuitional metaphysics which characterized the reac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gainst the eighteenth, and it is a tendency so agreeable to human indolence, as well as to conservative interests generally, that unless attacked at the very root, it is sure to be carried to even a greater length than is really justified by the more moderate forms of the intuitional philosophy. That philosophy not always in its moderate forms, had ruled the thought of Europe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a century. My father's *Analysis of the Mind* , my own *Logic* , and Professor Bain's great treatise, had attempted to re-introduce a better mode of philosophizing, latterly with quite as much success as could be expected; but I had for some time felt that the mere

contrast of the two philosophies was not enough, that there ought to be a hand-to-hand fight between them, that controversial as well as expository writings were needed, and that the time was come when such controversy would be useful. Considering, then, the writings and fame of Sir W. Hamilton as the great fortress of the intuitional philosophy in this country, a fortress the more formidable from the imposing character, and the in many respects great personal merits and mental endowments, of the man, I thought it might be a real service to philosophy to attempt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all his most important doctrines, and an estimate of his general claims to eminence as a philosopher; and I was confirmed in this resolution by observing that in the writings of at least one, and him one of the ablest, of Sir W. Hamilton's followers, his peculiar doctrines were made the justification of a view of religion which I hold to be profoundly immoral—that it is our duty to bow down in worship before a Being whose moral attributes are affirmed to be unknowable by us, and to be perhaps extrem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which, when we are speaking of our fellow-creatures, we call by the same names.

现在，哲学两大学派——直觉派和经验联想派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抽象思考的问题，而是带有实际的后果，造成了进步时代中所有实际观念间的巨大差别。务实的改革者一直坚持在那些有强烈和广泛感情支撑的事物中进行改革，或者一直质疑既成事实的表面必要性和不可取消性。他的论据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是，这些强大的感情从哪里来，这些事实为何看起来是必要的和不可取消的。因此，在他和哲学之间存在自然的敌对状态，因为哲学反对通过环境和联想来解释感情和道德事实，而将其视为人性的终极要素。哲学坚持支持受欢迎的学说作为直觉真理，认为直觉是大自然和神的声音，其话语的权威性高于理性。尤其是我早就感觉到一种普遍的倾向，即把所有人性明显的差异视为天生的，而且基本上是不能消除的，但却忽略了无可争

议的证据，那就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个人、种族还是性别间的差异，绝大部分不仅可能是，而且自然是由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这是理性对待重大社会问题的主要障碍，也是人类进步的最大绊脚石之一。这种倾向根源于直觉形而上学，以19世纪对18世纪的抗拒为特征，它总体上符合人类的惰性和保守利益，除非从根源下手，否则它肯定大大超过较温和形式的直觉哲学能真正证明其为正当的程度。然而哲学的形式不是一直温和的，它在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了欧洲的思想。我父亲的《人类心灵现象的分析》，我的《逻辑学体系》和贝恩教授的伟大著作都试图重新介绍一种更好的研究哲学的方式，后来我们取得了预想的成功。但是，有一段时间我认为仅仅对比两个哲学派别是不够的，应当让它们短兵相接，需要有争议和论述的作品，然后这种争议方才有用。考虑到威廉·汉密尔顿爵士的作品和声誉是这个国家直觉派的重要堡垒，因为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性格，和方方面面的突出优点，以及思想的天赋令这个堡垒更加坚不可摧。我认为，彻底考察他所有最重要的学说和评估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对崇高的一般主张，对哲学或许是一种真正的贡献。通过观察威廉·汉密尔顿爵士的追随者，且是最有才能的追随者之一的作品，我更坚定了我的想法，他的特殊学说只证明了一个我认为最不道德的宗教观点的正当性，即在神的面前屈膝朝拜是我们的义务，而神的道德属性被证明是不可知的，或许完全不同于我们谈论人类时用同样名称所表示的道德属性。

As I advanced in my task, the damage to Sir W. Hamilton's reputation became greater than I at first expected, through the almost incredible multitude of inconsistencies which showed themselves on comparing different passages with one another. It was my business, however, to show things exactly as they were, and I did not flinch from it. I endeavoured always to treat the philosopher whom I criticized with the most scrupulous fairness; and I knew that he had abundance of disciples and admirers to correct me if I ever unintentionally did him injustice. Many of them accordingly have answered me, more or less elaborately, and they

have pointed out oversights and misunderstandings, though few in number, and mostly very unimportant in substance. Such of those as had (to my knowledge) been pointed out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latest edition (at present the third) have been corrected there, and the remainder of the criticisms have been, as far as seemed necessary, replied to. On the whole, the book has done its work: it has shown the weak side of Sir William Hamilton, and has reduced his too great philosophical reputation within more moderate bounds; and by some of its discussions, as well as by two expository chapters, on the notions of Matter and of Mind, it has perhaps thrown additional light on some of the disputed questions in the domain of psychology and metaphysics.

随着我这项工作的进展，对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名誉的损坏程度超过了我原先的预期。通过对比书中的不同段落，我发现了大量难以置信的矛盾之处。但我的工作是说明事情的真相，并且毫不退缩。我努力保持用最谨慎的公正态度批评哲学家，我知道如果我一旦无意中对他不公的话，他的很多信徒和追随者就会出面纠正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或多或少详细地回答了我，指出我的疏忽和误解之处，虽然数量不多，且大部分内容极不重要。这些疏忽和误解（就我所知）在最新版本（现在是第三版）出版前得到了纠正，其余的那些批评，只要看起来有必要，我都一一回复了。总体来说，这本书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它说明了威廉·汉密尔顿爵士的缺点，将他过高的哲学声誉降到适中的范围内。通过一些讨论和两章关于物质概念和精神概念的阐述，它可能使哲学和形而上学领域内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更明朗化了。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book on Hamilton, I applied myself to a task which a variety of reasons seemed to render specially incumbent upon me; that of giving an account, and forming an estimate, of the doctrines of Auguste Comte. I had contributed more

than any one else to make his speculations known in England, and, in consequence chiefly of what I had said of him in my *Logic* , he had readers and admirers among thoughtful men on this side of the Channel at a time when his name had not yet in France emerged from obscurity. So unknown and unappreciated was he at the time when my *Logic* was written and published, that to criticize his weak points might well appear superfluous, while it was a duty to give as much publicity as one could to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he had made to philosophic thought. At the time, however, at which I have now arrived, this state of affairs had entirely changed. His name, at least, was known almost universally, and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his doctrines very widely. He had taken his place in the estimation both of friends and opponents, as one of the conspicuous figures in the thought of the age. The better parts of his speculations had made great progress in working their way into those minds, which, by their previous culture and tendencies, were fitted to receive them: under cover of those better parts those of a worse character, greatly developed and added to in his later writings, had also made some way, having obtained active and enthusiastic adherents, some of them of no inconsiderable personal merit, in England,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These causes not only made it desirable that some one should undertake the task of sifting what is good from what is bad in M. Comte's speculations, but seemed to impose on myself in particular a special obligation to make the attempt. This I accordingly did in two essays, published in successive numbers of the *Westminster Review* , and reprinted in a small volume under the title *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 .

写完了这本评论汉密尔顿的书以后，我又从事了一项有很多理由令我格外义不容辞的工作，那就是解释和评价奥古斯特·孔德的学说。在让英国了解他的思想方面，我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原因是我

在《逻辑学体系》中提到他，当他在法国还名不见经传时，在海峡这边已经有很多有思想的人在读他的书，钦佩他的思想了。我的《逻辑学体系》写完并出版时，他还那么的默默无闻，不被人欣赏，所以批评他的弱点看起来似乎多此一举，当时我的责任是尽力宣传他对哲学思想作出的重要贡献。但到此时，事态已经完全改变。至少他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他理论的一般特点也已传播得很广。在他朋友和对手的眼中，他已经成为思想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理论中较好的部分已经深入那些原有文化和倾向适合接受他思想的人心中。在这些较好部分的掩盖下，他后期的作品大量发展和加入了许多不好的部分，在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也赢得了积极热情的拥护者，他们中有些还有很高的个人声誉。这些原因要求必须有人将孔德先生理论中好的部分从坏的部分中筛选出来。我似乎负有特别的义务来做这件事情。为此我写了两篇文章，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连载，后来在名为《奥古斯特·孔德和实证主义》的小册子上重印。

The writings which I have now mentioned, together with a small number of papers in periodicals which I have not deemed worth preserving, were the whole of the products of my activity as a writer during the years from 1859 to 1865.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last-mentioned year, in compliance with a wish frequently expressed to me by working men, I published cheap People's Editions of those of my writings which seemed the most likely to find readers among the working classes; viz,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Liberty* ,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 This was a considerable sacrifice of my pecuniary interest, especially as I resigned all idea of deriving profit from the cheap editions, and after ascertaining from my publishers the lowest price which they thought would remunerate them on the usual terms of an equal division of profits, I gave up my half share to enable the price to be fixed still lower. To the credit of Messrs. Longman they fixed, unasked, a certain number of years after which the copyright and

stereotype plates were to revert to me, and a certain number of copies after the sale of which I should receive half of any further profit. This number of copies (which in the cas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was 10,000) has for some time been exceeded, and the People's Editions have begun to yield me a small but unexpected pecuniary return, though very far from an equivalent for the diminution of profit from the Library Editions.

我刚才提到的作品，还有一些我认为没有保存价值的期刊论文就是我在1859—1865年间写的全部作品。在1865年上半年，按照工人们经常向我表达的愿望，我将那些看起来最容易被工人们接受的作品集合成廉价的大众版出版，如《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自由》和《论代议制政府》。这样做牺牲了我可观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在我放弃了从这些廉价版本中获利的想法，和出版商确认了按照利润平分的一般条款能保证他们获利之后，我放弃了我的那份收入，以使价格更低一些。感谢朗文出版社，他们主动提出一定的年限，期满后此书的版权和铅版归我，同时规定了一定的册数，售完后我可以得到那一半的利润。这个数量（《政治经济学原理》是一万册）有段时间已经超过了，大众版也开始带给我意想不到的小额收益，虽然还远远不能弥补文库版利润的减少。

In this summary of my outward life I have now arrived at the period at which my tranquil and retired existence as a writer of books was to be exchanged for the less congenial occupation of a memb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The proposal made to me, early in 1865, by some electors of Westminster, did not present the idea to me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not even the first offer I had received,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previous, in consequence of my opinions on the Irish Land Question, Mr. Lucas and Mr. Duffy, in the name of the popular party in Ireland, offered to bring me into

Parliament for an Irish county, which they could easily have done: but the incompatibility of a seat in Parliament with the office I then held in the India House, precluded even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posal. After I had quitted the India House, several of my friends would gladly have seen me a member of Parliament; but there seemed no probability that the idea would ever take any practical shape. I was convinced that no numerous or influential portion of any electoral body, really wished to be represented by a person of my opinions; and that one who possessed no local connection or popularity, and who did not choose to stand as the mere organ of a party had small chance of being elected anywhere unless through the expenditure of money. Now it was, and is, my fixed conviction, that a candidate ought not to incur one farthing of expense for undertaking a public duty. Such of the lawful expenses of an election as have no special reference to any particular candidate, ought to be borne as a public charge, either by the State or by the locality. What has to be done by the supporters of each candidate in order to bring his claims properly before the constituency, should be done by unpaid agency or by voluntary subscription. If members of the electoral body, or others, are willing to subscribe money of their own for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by lawful means, into Parliament some one who they think would be useful there, no one is entitled to object: but that the expense, or any part of it, should fall on the candidate, is fundamentally wrong; because it amounts in reality to buying his seat. Even on the most favourable supposition as to the mode in which the money is expended, there is a legitimate suspicion that any one who gives money for leave to undertake a public trust, has other than public ends to promote by it; and (a consideration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the cost of elections, when borne by the candidates, deprives the nation of the services, as members of Parliament, of all who cannot or will not afford to incur a heavy expense. I do not say that, so long as there is

scarcely a chance for an independent candidate to come into Parliament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is vicious practice, it must always be morally wrong in him to spend money, provided that no part of it i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employed in corruption. But, to justify it, he ought to be very certain that he can be of more use to his country 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than in any other mode which is open to him; and this assurance, in my own case, I did not feel. It was by no means clear to me that I could do more to advance the public objects which had a claim on my exertions, from the benche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than from the simple position of a writer. I felt, therefore, that I ought not to seek election to Parliament, much less to expend any money in procuring it.

我的外部生活概述到这里，之后，我宁静的隐居作家生活转变成与我趣味不那么相投的下院生活。1865年初，威斯敏斯特的一些选民提议我加入议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甚至不是我收到的第一份邀请，因为十多年前，由于我对爱尔兰土地问题的见解，卢卡斯先生和达菲先生以爱尔兰一个受欢迎政党的名义，邀请我代表爱尔兰的一个郡加入议会。这对他们来说很容易办到，但当时我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无法兼任议员，所以我根本都没有考虑这个提议。后来我离开了东印度公司，很多朋友本可以很高兴地看到我成为议员，但这个想法实现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存在。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选举团体的多数派或实力派真正愿意让有我这种见解的人当代表。我也深信，一个在当地没有任何关系又不受欢迎的人，一个不想成为政党喉舌的人，除非花费金钱，否则当选的几率很小。过去和现在我都坚信，一个候选人不应当为了担任公职而花费分文。这种合法的选举开支不应当由某个特殊的候选人承担，而应当由国家或当地的公共开支负责。为了使全体选民正确理解候选人的主张，每位候选人的支持者必须做的事应当由不支酬劳的机构，或从自愿捐款中支付。如果选举机构成员或其他人自愿捐款，通过合法途径使某个他们认为在议会中有用的人入选议

会，没有人有权反对他们。但是，如果全部或部分的花费都落在候选人头上，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实际上等同于花钱买席位。即便是对金钱支出作最有利的推测，人们仍可以正当地怀疑那些花钱博取公众信任的人另有企图。选举的成本（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由候选人承担，就失去了所有不能或不愿承担这笔巨额费用的人作为议员为国家服务。我并不是说一个独立的候选人不遵从这种卑鄙的方式就几乎没有希望进入议会，如果他的钱不是直接或间接地用于贿赂，他花钱就不总是道德上的错误。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应当十分确定，他当议员比做其他事情对他的国家贡献更大。就我自己而言，我并没有感觉到这种自信。我一点也不清楚，我做议员会比单纯当一个作家更能促进需要我尽力的公共目标的实现。所以我觉得我不应当参选议员，更不应当花钱来谋取议会的席位。

But the conditions of the question were considerably altered when a body of electors sought me out, and spontaneously offered to bring me forward as their candidate. If it should appear, on explanation, that they persisted in this wish, knowing my opinions, and accepting the only conditions on which I could conscientiously serve, it was questionable whether this was not one of those calls upon a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by his fellow-citizens, which he was scarcely justified in rejecting. I therefore put their disposition to the proof by one of the frankest explanations ever tendered, I should think, to an electoral body by a candidate. I wrote, in reply to the offer, a letter for publication, saying that I had no personal wish to be a member of Parliament, that I thought a candidate ought neither to canvass nor to incur any expense, and that I could not consent to do either. I said further, that if elected, I could not undertake to give any of my time and labour to their local interests. With respect to general politics, I told them without reserve, what I thought on a number of important subjects on which they had asked my opinion: and one of these being the suffrage, I made

known to them, among other things, my conviction (as I was bound to do, since I intended, if elected, to act on it), that women were entitled to representation in Parliament on the same terms with men. It was the first time, doubtless, that such a doctrine had ever been mentioned to English electors; and the fact that I was elected after proposing it, gave the start to the movement which has since become so vigorous, in favour of women's suffrage. Nothing, at the time, appeared more unlikely than that a candidate (if candidate I could be called) whose professions and conduct set so completely at defiance all ordinary notions of electioneering, should nevertheless be elected. A well-known literary man[, who was also a man of society,] was heard to say that the Almighty himself would have no chance of being elected on such a programme. I strictly adhered to it, neither spending money nor canvassing, nor did I take any personal part in the election, until about a week preceding the day of nomination, when I attended a few public meetings to state my principles and give to any questions which the electors might exercise their just right of putting to me for their own guidance; answers as plain and unreserved as my address. On one subject only, my religious opinions, I announced from the beginning that I would answer no questions; a determination which appeared to be completely approved by those who attended the meetings. My frankness on all other subjects on which I was interrogated, evidently did me far more good than my answers, whatever they might be, did harm. Among the proofs I received of this, one is too remarkable not to be recorded. In the pamphlet, *Thoughts on Parliamentary Reform* , I had said, rather bluntly, that the working classes, though differing from those of some other countries, in being ashamed of lying, are yet generally liars. This passage some opponent got printed in a placard, which was handed to me at a meeting, chiefly composed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nd I was asked whether I had written and published it. I at once answered “I did.”

Scarcely were these two words out of my mouth, when vehement applause resounded through the whole meeting. It was evident that the working people were so accustomed to expect equivocation and evasion from those who sought their suffrages, that when they found, instead of that, a direct avowal of what was likely to be disagreeable to them, instead of being affronted, they concluded at once that this was a person whom they could trust. A more striking instance never came under my notice of what, I believe, is the experience of those who best know the working classes, that the most essential of all recommendations to their favour is that of complete straightforwardness; its presence outweighs in their minds very strong objections, while no amount of other qualities will make amends for its apparent absence. The first working man who spoke after the incident I have mentioned (it was Mr. Odger) said, that the working classes had no desire not to be told of their faults; they wanted friends, not flatterers, and felt under obligation to any one who told them anything in themselves which he sincerely believed to require amendment. And to this the meeting heartily responded.

但当一个选举团把我推选出来，并且自发地推举我做候选人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假如通过解释他们了解了我的想法，并接受我提出的让我按良心办事的唯一条件后，他们仍坚持这个希望，那么问题就是这是否就是一个选区的选民邀请一个成员当候选人，而他又几乎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的情况。所以我通过一个候选人对他的选举团体作出的最坦率的解释之一来检验他们的意向。在答复他们的邀请时，我写了封公开信，说我个人无意做议员，并且认为一个候选人既不该拉选票，也不该承担任何费用，这两样我都不同意做。我又进一步说道，如果我当选了，我不能保证用我的时间和精力为他们谋取任何地方利益。至于一般政治，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我对很多重要问题的想法，他们之前曾征询过我的意见。其中一个是选举权问题，我告诉

他们我深信（我有义务这么做，因为我打算一旦当选就照此行事）女性有权在议会中担任代表，享有同男性一样的权利。这对选举人来说无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提出这个想法后，我当选了议员，这一事实促使主张妇女选举权运动的蓬勃开展。当时，像我这样的职业且行为完全藐视所有正规选举活动的候选人（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仍能当选，似乎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不可能的了。一个著名的文人，同时也是社交圈中的一员曾说过，按照这样的安排，即便是万能的上帝自己也没有机会当选。我坚持既不花钱也不拉选票，我个人也不参加任何选举活动，一直到提名前的一个星期，我才参加了几个公众集会，表明我的立场，并回答了选举人行使其正当权利将我推举为咨询指导所提出的问题，而我的回答和我的演说一样简单坦率。只有一个问题，即关于我的宗教见解，我从一开始就宣布不回答任何问题。这个决定似乎得到参会者的完全认可。我回答其他问题的坦率态度，明显比我的回答本身更能给我带来好处，因为我无论怎样回答都会造成伤害。在我得到的证据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我曾在《议会改革的思考》中直言不讳地说，（英国的）工人阶级虽然不同于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羞于说谎，但通常还是说谎者。这段话被我的对手印在标语牌上，并在一个主要由工人阶级组成的会议上递给我，问我是否曾写了并发表了这段话。我立即回答“是的”。话一出口即刻赢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显然工人阶级已经习惯了从那些寻求他们选票的人口中听到推诿和借口，所以当他们听到直接公开承认了可能令他们不满的话之后，他们并没有感觉被冒犯，反而立即断定这是一个他们可以信赖的人。我从未听说过那些最懂得工人阶级的人的经历中有比这更惊人的例子。在他们喜欢的优点中最重要的就是彻底的坦诚，坦诚比他们心中十分强烈反对的更重要，没有其他的品质可以弥补坦诚的缺乏。事后第一个发言的工人（奥杰先生）说，工人阶级并不是不希望有人告诉他们自己的过错，他们需要的是朋友，不是奉承者，并且他们会对向他们真诚提出身上需要改进之处的人负有义务，会议对这一点反响热烈。

Had I been defeated in the election, I should still have had no

reason to regret the contact it had brought me into with large bodies of my countrymen; which not only gave me much new experience, but enabled me to scatter my political opinions rather widely, and, by making me known in many quarters where I had never before been heard of,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my readers, and the presumable influence of my writings. These latter effects were of course produced in a still greater degree, when, as much to my surprise as to that of any one, I was returned to Parliament by a majority of some hundreds over my Conservative competitor.

假如我在竞选中失利，我也没有理由后悔，因为它让我有机会接触许多同胞。这不仅给我许多新的体验，并且使我能够更广泛地传播我的政治见解，让很多以前从未听过我名字的人认识我，增加了我的读者和我作品可能的影响。令我和所有人惊讶的是，我以几百张票的多数战胜了保守党的竞争对手，恢复了议会席位，当然我的读者和作品的影响随之增加了不少。

I was a member of the House during the three sessions of the Parliament which passed *the Reform Bill* ; during which time Parliament was necessarily my main occupation, except during the recess. I was a tolerably frequent speaker, sometimes of prepared speeches, sometimes extemporaneously. But my choice of occasions was not such as I should have made if my leading object had been Parliamentary influence. When I had gained the ear of the House, which I did by a successful speech on Mr. Gladstone's Reform Bill, the idea I proceeded on was that when anything was likely to be as well done, or sufficiently well done, by other people, there was no necessity for me to meddle with it. As I, therefore, in general reserved myself for work which no others were likely to do, a great proportion of my appearances were on points on which the bulk of

the Liberal party, even the advanced portion of it, either were of a different opinion from mine, or were comparatively indifferent. Several of my speeches, especially one against the motion for the aboli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 and another in favour of resuming the right of seizing enemies' goods in neutral vessels, were opposed to what then was, and probably still is, regarded as the advanced liberal opinion. My advocacy of women's suffrage and of Personal Representation, were at the time looked upon by many as whims of my own; but the great progress since made by those opinions, and especially the response made from almost all parts of the kingdom to the demand for women's suffrage, fully justified the timeliness of those movements, and have made what was undertaken as a moral and social duty, a personal success. Another duty which was particularly incumbent on me as one of the Metropolitan Members, was the attempt to obtain a Municipal Government for the Metropolis: but on that subject the indifferenc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was such that I found hardly any help or support within its walls. On this subject, however, I was the organ of an active and intelligent body of persons outside, with whom, and not with me, the scheme originated, and who carried on all the agitation on the subject and drew up the Bills. My part was to bring in Bills already prepared, and to sustain the discussion of them during the short time they were allowed to remain before the House; after having taken an active part in the work of a Committee presided over by Mr. Ayrton, which sat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ession of 1866, to take evidence on the subject. The very different position in which the question now stands (1870) may justly be attributed to the preparation which went on during those years, and which produced but little visible effect at the time; but all questions on which there are strong private interests on one side, and only the public good on the other, have a similar period of incubation to go through.

在议会通过《改良法案》的三届会期中，我是下院的议员。这期间除了休会期，议会工作就是我的主要工作。我还经常发言，有时是有准备的演讲，有时是即兴演讲。假如我的主要目的是在议会中造成个人影响，我的演说就不会选在这样的时机。就格莱斯顿先生的《改良法案》我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讲，赢得了下院的注意。之后我想，如果其他人很有可能或者足以做好的事，我就不必加以干涉。因而，既然我通常在别人不可能做好的情况下才出面，所以我大多是在自由党人甚至是其中的高级分子与我意见出现分歧，或者他们相对不太关心的事情上发表意见。我的很多次演讲，尤其是反对废除死刑的提议和赞成恢复在中立国家船只上没收敌人货物的权利的演说，都违背了当时是，可能现在仍然被认为是先进的自由理念。我支持妇女选举权和个人代表制，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我自己的怪念头。但此后这些主张取得的巨大进步，尤其是几乎整个国家对妇女选举权要求作出的热烈反应，充分证明了这些运动的及时性，并且使履行道德和社会义务的事业变成个人的成功。另外一个我作为大都市中的成员义不容辞的义务是尝试为大都市建立市政府。但下议院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令我在下院内几乎找不到任何帮助或支持。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由议会外活跃聪明的人士组成的团体的喉舌，是他们而不是我想到了这个方案。他们对此进行了一切鼓动宣传，并起草了法案。我的工作就是把早已准备好的议案呈交，并在议会允许讨论该议案的短时间内维持对其的讨论。后来我曾积极参与由艾尔顿先生主持的委员会工作，占用了1866年议会期的大部分时间来取得关于这个议案的证据。现在（1870年）这个问题所处的位置完全不同，这一点可以公平地归因于那些年所做的准备工作，但当时却收效甚微。所有既涉及强大私人利益又只对公众有利的问题，都同样要经历一段酝酿期。

The same idea, that the use of my being in Parliament was to do work which others were not able or not willing to do, made me think it my duty to come to the front in defence of advanced Liberalism on occasions when the obloquy to be encountered was

such as most of the advanced Liberals in the House, preferred not to incur. My first vote in the House was in support of an amendment in favour of Ireland, moved by an Irish member, and for which only five English and Scotch votes were given, including my own: the other four were Mr. Bright, Mr. McLaren, Mr. T.B. Potter, and Mr. Hadfield. And the second speech I delivered [7_7] was on the bill to prolong the suspension of the Habeas Corpus in Ireland. In denouncing, on this occasion, the English mode of governing Ireland, I did no more than the general opinion of England now admits to have been just; but the anger against Fenianism was then in all its freshness; any attack on what Fenians attacked was looked upon as an apology for them; and I was so unfavourably received by the House, that more than one of my friends advised me (and my own judgment agreed with the advice) to wait, before speaking again, for the favourable opportunity that would be given by the first great debate on *the Reform Bill* . During this silence, many flattered themselves that I had turned out a failure, and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troubled with me any more. Perhaps their uncomplimentary comments may, by the force of reaction, have helped to make my speech on *the Reform Bill* the success it was. My position in the House was further improved by a speech in which I insisted on the duty of paying off the National Debt before our coal supplies are exhausted, and by an ironical reply to some of the Tory leaders who had quoted against me certain passages of my writings, and called me to account for others, especially for one in my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 which said that the Conservative party was, by the law of its composition, the stupidest party. They gained nothing by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passage, which up to that time had not excited any notice, but the *sobriquet* of “the stupid party” stuck to them for a considerable time afterwards. Having now no longer any apprehension of not being listened to, I confined myself, as I have since thought too much, to

occasions on which my services seemed speciallyneeded, and abstained more than enough from speaking on the great party ques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Irish questions, and those which concerned the working classes, a single speech on Mr. Disraeli's Reform Bill was nearly all that I contributed to the great decisive debates of the last two of my three sessions.

我在议会所起的作用是做其他人不能或不愿意做的事情，同样的想法使我想到自己的义务是当先进的自由主义面临指责而议会中大多数进步的自由党人不愿引火烧身时站出来为其辩护。我在议会的第一次投票是支持爱尔兰议员提出的有利于爱尔兰的修正案，包括我在内只有五位英格兰和苏格兰议员投了赞成票，其他四个人是布赖特先生、麦克拉伦先生、T. B. 波特先生和哈德菲尔德先生。我的第二次演讲 [8_23] 是关于延长爱尔兰人身保护令暂停期限的法案。我在演说中谴责英国统治爱尔兰的方式，我只是做了现在英国舆论普遍承认是公正的事情。但那时反对芬尼亚共和主义的怒潮才刚刚开始，所有攻击芬尼亚组织 [8_24] 成员所攻击目标的行为都被看作是对他们的辩护。因此我在议会很不受欢迎，所以不止一个朋友建议我（我自己也同意这个建议）等待《改良法案》的第一次大讨论给出有利的机会后再发表第二次演说。在沉默的期间，许多人自鸣得意地以为我以失败告终，所以不用再因为我而烦恼。或许正是他们贬损的评论所起到的反作用力帮助我对《改良法案》作的演讲大获成功。后来我在一篇演说中坚持认为在我们的煤供应耗尽之前我们有责任还清国债。之后一些托利党领导人引用了我作品中几段对我不利的话，要求我解释另外的几句话，尤其是《代议政府的思考》中说到从构成规律来看保守党是最愚蠢的政党，对此我作出了讥讽的回复。通过以上这两件事，我在议院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他们并没有通过让人们注意到这些话而得到好处，以前没有人注意这段话，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愚蠢政党”的绰号却与他们如影随形。现在我无需担心没有人听我的演说，我想我过多地限制了自己，只在看起来特别需要我帮助的场合才发表演说，避免过多地谈论重大的政党问题。除了爱尔兰问题和那些涉及

工人阶级的问题外，唯一一次论迪斯累里 [8_25] 先生《改良法案》的演说几乎是我在三届会期的后两届对于重大决定性辩论所作的全部贡献。

I have, however, much satisfaction in looking back to the part I took on the two classes of subjects just mentioned. With regard to the working classes, the chief topic of my speech on Mr. Gladstone's Reform Bill was the assertion of their claims to the suffrage. A little later, after the resignation of Lord Russell's Ministry and the succession of a Tory Government, came the attempt of the working classes to hold a meeting in Hyde Park, their exclusion by the police, and the breaking down of the park railing by the crowd. Though Mr. Beales and the leaders of the working men had retired under protest before this took place, a scuffle ensued in which many innocent persons were maltreated by the police, and the exasperation of the working men was extreme. They showed a determination to make another attempt at a meeting in the Park, to which many of them would probably have come armed; the Government made military preparations to resist the attempt, and something very serious seemed impending. At this crisis I really believe that I was the means of preventing much mischief. I had in my place in Parliament taken the side of the working men, and strongly censured the conduct of the Government. I was invited, with several other Radical members, to a conference with the leading members of the Council of the Reform League; and the task fell chiefly upon myself, of persuading them to give up the Hyde Park project, and hold their meeting elsewhere. It was not Mr. Beales and Colonel Dickson who needed persuading; on the contrary, it was evident that these gentlemen had already exerted their influence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us far without success. It was the working men who held out, and so bent were they on their

original scheme, that I was obliged to have recourse to *les grands moyens* . I told them that a proceeding which would certainly produce a collision with the military, could only be justifiable on two conditions: if the position of affairs had become such that a revolution was desirable, and if they thought themselves able to accomplish one. To this argument, after considerable discussion, they at last yielded: and I was able to inform Mr. Walpole that their intention was given up. I shall never forget the depth of his relief or the warmth of his expressions of gratitude. After the working men had conceded so much to me, I felt bound to comply with their request that I would attend and speak at their meeting at the Agricultural Hall; the only meeting called by the Reform League which I ever attended. I had always declined being a member of the League, on the avowed ground that I did not agree in its programme of manhood suffrage and the ballot: from the ballot I dissented entirely; and I could not consent to hoist the flag of manhood suffrage, even on the assurance that the exclusion of women was not intended to be implied; since if one goes beyond what can be immediately carried, and professes to take one's stand on a principle, one should go the whole length of the principle. I have entered thus particularly into this matter because my conduct on this occasion gave great displeasure to the Tory and Tory-Liberal press, who have charged me ever since with having shown myself, in the trials of public life, intemperate and passionate. I do not know what they expected from me; but they had reason to be thankful to me if they knew from what I had, in all probability preserved them. And I do not believe it could have been done, at that particular juncture, by any one else. No other person, I believe, had at that moment the necessary influence for restraining the working classes, except Mr. Gladstone and Mr. Bright, neither of whom was available: Mr. Gladstone, for obvious reasons; Mr. Bright because he was out of town.

然而，回顾我在刚才提到的那两类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我十分满意。关于工人阶级，我在论格莱斯顿先生《改良法案》的演说中的主要观点就是支持工人对选举权的要求。之后不久，在罗素[8_26]勋爵内阁辞职，托利党政府接任后，工人阶级试图在海德公园举行集会，却被警察拒之门外，后来群众拆除了公园围栏。虽然比尔斯先生和工人阶级领导人之前在抗议中离开了，但随后发生了扭打，很多无辜的人受到警察的粗暴对待，令工人阶级的愤怒达到顶点。他们决心再次在海德公园集会，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带上武器。政府作好军事准备以抵御他们的行动，十分严重的事情似乎就要发生。在这个危急时刻，我真的相信我能够阻止很多灾祸的发生。在议会中我是支持工人阶级的一方，并且强烈谴责政府的行为。我与其他几位激进派成员受邀参加了改革同盟委员会几个主要成员的会议，劝说他们放弃海德公园计划，并在其他地方举行会议的任务主要落在了我的身上。要说服的不是比尔斯先生和迪克森上校，正相反，这两位绅士显然已经朝相同的方向发挥了他们的影响力，但还远没取得成功。坚持的是那些工人，他们如此坚持原计划，使我被迫寻求最后的方案。我告诉他们，一次必定与军方产生冲突的行动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是正当的：第一，如果事态已经发展到迫切需要革命的程度；第二，他们确信自己可以取得成功。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他们终于听从了我的观点，因此我可以通知沃波尔先生，工人们放弃了计划。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松了一大口气，向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工人阶级对我作出如此大的让步以后，我认为有义务满足他们的要求，参加他们在农业厅召开的会议并发言。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由改革同盟会召开的会议。我之前一直谢绝成为同盟会的一员，公开的理由是，我不同意其男子选举权和无记名投票的纲领，对于后者我完全不赞同。我也不同意他们高举男子选举权的大旗，即使他们保证没有排斥妇女选举权的意思。因为一旦一个人没能立即执行并公开承认他对一个原则的立场，那么他应该全面遵守这个原则。我之所以特意提到这件事，是因为我那次的行为引起了托利党和托利党自由派媒体的极大不满，后来他们指责我在公众生活的考验中表现得过激和狂热。我不知道他们希望我怎么做，但如果他们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尽可能地保全了他们，他

们就有理由向我表示感谢。我相信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没有人能够做到这点。我也相信在那个时刻，除了格莱斯顿先生和布赖特先生，没有人有足够的影响力约束工人阶级，但他们都无能为力：格莱斯顿先生的理由很明显，而布赖特先生当时不在城里。

When, some time later, the Tory Government brought in a bill to prevent public meetings in the Parks, I not only spoke strongly in opposition to it, but formed one of a number of advanced Liberals, who, aided by the very late period of the session, succeeded in defeating the Bill by what is called talking it out. It has not since been renewed.

一段时间以后，托利党政府提出了一个禁止在公园集会的议案，我不仅发言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而且组织了一个由进步自由党人组成的团体，在会期即将结束的时候，通过所谓讨论拖延战术，成功地击败了这个议案。之后再没有人提起过。

On Irish affairs also I felt bound to take a decided part. I was one of the foremost in the deputation of Members of Parliament who prevailed on Lord Derby to spare the life of the condemned Fenian insurgent, General Burke. The Church question was so vigorously handled by the leaders of the party, in the session of 1868, as to require no more from me than an emphatic adhesion: but the land question was by no means in so advanced a position; the superstitions of landlordism had up to that time been little challenged, especially in Parliament, and the backward state of the question, so far as concerned the Parliamentary mind, was evidenced by the extremely mild measure brought in by Lord Russell's government in 1866, which nevertheless could not be

carried. On that bill I delivered one of my most careful speeches, in which I attempted to lay down some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subject, in a manner calculated less to stimulate friends, than to conciliate and convince opponents. The engrossing subject of Parliamentary Reform prevented either this bill, or one of a similar character brought in by Lord Derby's Government, from being carried through. They never got beyond the second reading. Meanwhile the signs of Irish disaffection had become much more decided; the demand for complet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d assumed a menacing aspect, and there were few who did not feel that if there was still any chance of reconciling Ireland to the British connection, it could only be by the adoption of much more thorough reforms in the territorial and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country, than had yet been contemplated. The time seemed to me to have come when it would be useful to speak out my whole mind; and the result was my pamphlet *England and Ireland* , which was written in the winter of 1867, and published shortly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session of 1868. The leading features of the pamphlet were, on the one hand, an argument to show the undesirableness, for Ireland as well as England, of sepa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nd on the other, a proposal for settling the land question by giving to the existing tenants a permanent tenure, at a fixed rent, to be assessed after due inquiry by the State.

在爱尔兰问题上，我同样感到有义务在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是议员代表团的重要人物之一，说服德比勋爵放过了已被判刑的芬尼亚党暴动者伯克将军的性命。1868年会议期间，在教会问题上党魁们的处理态度十分积极，我只需要有力附和即可。土地问题从未取得如此大的进展。对地主所有制的盲目崇拜在当时几乎没被动摇，尤其是在议会中。而这个问题的滞后状态，就议会的思想来说，1866年罗素政府提出的极其温和的议案就可以证明，但这项议案还是未能通

过。我就这个议案发表了极为谨慎的演说，我试图制定土地问题的一些原则，这样做不是为了激励朋友，而是为了安抚和说服对手。议会改革这个显赫的主题阻碍了这个议案，或者另一个德比勋爵政府提出的类似议案的通过。它们从未通过二读。同时，爱尔兰的不满迹象越来越明显，对两国完全分离的要求已经显现出了威胁性的一面，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要想恢复爱尔兰和不列颠之间的关系，只有采纳比原来设想的更加彻底的国家领土和社会关系的改革。在我看来时机已经到来，现在把我全部想法讲出来应该有用。所以，我在1867年冬天写了小册子《英格兰和爱尔兰》，在1868年议会会期开始前不久出版。这本小册子的主要特色是，一方面表明两国分离对英格兰和爱尔兰都不合时宜，另一方面提出建议，给现有佃农永久的土地使用权来解决土地问题，由国家进行适当的调查后确定固定的地租。

The pamphlet was not popular, except in Ireland, as I did not expect it to be. But, if no measure short of that which I proposed would do full justice to Ireland, or afford a prospect of conciliating the mass of the Irish people, the duty of proposing it was imperative; while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as any intermediate course which had a claim to a trial, I well knew that to propose something which would be called extreme, was the true way not to impede but to facilitate a more moderate experiment. It is most improbable that a measure conceding so much to the tenantry as Mr. Gladstone's Irish Land Bill, would have been proposed by a Government, or could have been carried through Parliament, unless the British public had been led to perceive that a case might be made, and perhaps a party formed, for a measure considerably stronger. It is the character of the British people, or at least of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who pass muster for the British people, that to induce them to approve of any change,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y should look upon it as a middle course: they think every proposal extreme and violent unless they hear of some other

proposal going still farther, upon which their antipathy to extreme views may discharge itself. So it proved in the present instance; my proposal was condemned, but any scheme for Irish Land reform short of mine, came to be thought moderate by comparison. I may observe that the attacks made on my plan usually gave a very incorrect idea of its nature. It was usually discussed as a proposal that the State should buy up the land and become the universal landlord; though in fact it only offered to each individual landlord this as an alternative, if he liked better to sell his estate than to retain it on the new conditions; and I fully anticipated that most landlords would continue to prefer the position of landowners to that of Government annuitants, and would retain their existing relation to their tenants, often on more indulgent terms than the full rents on which the compensation to be given them by Government would have been based. This and many other explanations I gave in a speech on Ireland, in the debate on Mr. Maguire's Resolution, early in the session of 1868. A corrected report of this speech, together with my speech on Mr. Fortescue's Bill, has been published (not by me, but with my permission) in Ireland.

除了在爱尔兰，这本小册子并不受人欢迎，这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是如果除了我所建议的方法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公正地解决爱尔兰问题，或者有安抚爱尔兰人民大众的愿望，那么我提出的建议就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假如有折中的途径可以尝试，我很清楚，提出所谓极端的建议不是阻碍，而是促进产生一个更加温和的实验的正确途径。除非英国公众知道可能会出现一种采取更加强硬方法的情况，或者可能会组成一个更加强硬的政党，否则一个对佃户作出如此大让步的方法，例如格莱斯顿先生的《爱尔兰土地法案》，不大可能是由政府提出的，或者在议会获得通过。正是不列颠人的性格，或者至少是符合不列颠人要求的中上层阶级的性格，诱使他们同意改革的。而且必要的是，他们应当把它看作是一条中间路线。他们认为每个建议都

是极端的，猛烈的，除非他们听到其他更极端、更猛烈的建议，他们对极端意见的反感才会自行消除。目前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我的建议遭到谴责，但通过比较，其他任何关于爱尔兰土地改革的方案都被认为是温和的。我发现对我计划的攻击通常在本质上都是错误的观点。人们通常认为我的建议就是，国家应当买下土地进而成为全国土地的地主。但实际上我的建议只是为每个地主提供一种选择，假如在新的条件下他更愿意卖掉而不是保留土地。我充分预见到，大多数地主宁愿继续保留土地所有人的地位，而不愿从政府那里每年领取养老金。他们愿意以比全额地租更优厚的条件保持与佃户的现存关系，政府本可以基于这些全额地租给他们补偿。我早在1868年会议初期论马圭尔 [8_27] 先生的决议案时，在一篇爱尔兰问题的演讲中说明了这一点，也作了其他的解释。这篇演说的修改稿，以及我评论福蒂斯丘先生议案的演说稿都已在爱尔兰出版（并非我自己出版，而是经过我允许）。

Another public duty, of a most serious kind, it was my lot to have to perform, both in and out of Parliament, during these years. A disturbance in Jamaica, provok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injustice, and exaggerated by rage and panic into a premeditated rebellion, had been the motive or excuse for taking hundreds of innocent lives by military violence, or by sentence of what were called courts-martial, continuing for weeks after the brief disturbance had been put down; with many added atrocities of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logging women as well as men, and a general display of the brutal recklessness which usually prevails when fire and sword are let loose. The perpetrators of those deeds were defended and applauded in England by the same kind of people who had so long upheld negro slavery: and it seemed at first as if the British nation was about to incur the disgrace of letting pass without even a protest, excesses of authority as revolting as any of those for which, when perpetrated by the instruments of

other governments, Englishmen can hardly find terms sufficient to express their abhorrence. After a short time, however, an indignant feeling was roused: a voluntary Association formed itself under the name of the Jamaica Committee, to take such deliberation and action as the case might admit of, and adhesions poured in from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I was abroad at the time, but I sent in my name to the Committee as soon as I heard of it, and took an active part in the proceedings from the time of my return. There was much more at stake than only justice to the negroes, imperative as was that consideration. The question was, whether the British dependencies, and eventually, perhaps, Great Britain itself, were to be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law, or of military licence; whether the lives and persons of British subjects are at the mercy of any two or three officers however raw and inexperienced or reckless and brutal, whom a panic-stricken Governor, or other functionary, may assume the right to constitute into a so-called court-martial. This question could only be decided by an appeal to the tribunals; and such an appeal the Committee determined to make. Their determination led to a change in the chairmanship of the Committee, as the chairman, Mr. Charles Buxton, thought it not unjust indeed, but inexpedient, to prosecute Governor Eyre and his principal subordinates in a criminal court: but a numerously attended gener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having decided this point against him, Mr. Buxton withdrew from the Committee, though continuing to work in the cause, and I was, quite unexpectedly on my own part, proposed and elected chairman. It became, in consequence, my duty to represent the Committee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sometimes by putting qu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sometimes as the recipient of questions, more or less provocative, addressed by individual members to myself; but especially as speaker in the important debate originated in the session of 1866, by Mr. Buxton: and the speech I then delivered is

that which I should probably select as the best of my speeches in Parliament. [7_8]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we carried on the combat, trying every avenue legally open to us, to the Courts of Criminal Justice. A bench of magistrates in one of the most Tory counties in England dismissed our case: we were more successful before the magistrates at Bow Street; which gave an opportunity to the Lord Chief Justice of the Queen's Bench, Sir Alexander Cockburn, for delivering his celebrated charge, which settled the law of the question in favour of liberty, as far as it is in the power of a judge's charge to settle it. There, however, our success ended, for the Old Bailey Grand jury by throwing out our bill prevented the case from coming to trial. It was clear that to bring English functionaries to the bar of a criminal court for abuses of power committed against negroes and mulattoes was not a popular proceeding with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es. We had, however, redeemed, so far as lay in us, the character of our country, by showing that there was at any rate a body of persons determined to use all the means which the law afforded to obtain justice for the injured. We had elicited from the highest criminal judge in the nation an authoritative declaration that the law was what we maintained it to be; and we had given an emphatic warning to those who might be tempted to similar guilt hereafter, that, though they might escape the actual sentence of a criminal tribunal, they were not safe against being put to some trouble and expense in order to avoid it. Colonial governors and other persons in authority, will have a considerable motive to stop short of such extremities in future.

这些年还有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公共职责，是我必须承担起来的，不管是在议会内还是在议会外。牙买加发生的骚动一开始是由不公正行为引起的，后来由于愤怒和惊恐被夸大成有蓄谋的叛乱，这成为军警暴力和所谓军事法庭判决夺走成百上千条无辜性命的动机或借口。

短暂的暴动被镇压后，骚乱又持续了几个星期，伴有很多毁坏财务、鞭打男女的暴行，到处都是大肆烧杀的野蛮场景。这些犯罪者的行径受到英国那些长期支持黑奴制的同类人的辩护和喝彩。起初，不列颠民族似乎将要遭受对当局令人作呕的暴行置之不理，甚至没有任何反抗的耻辱。如果是被其他政府所利用，那么英国人对它的憎恨确实无以言表。然而不久之后，一种愤慨的情绪被激起，人们自发组织起了名为牙买加委员会的协会，他们在形势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商议，采取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持者蜂拥而入。我当时在国外，但是我一听到消息就报名申请加入，回国以后积极参加到他们的行动当中。这里有比公正地对待黑人更危急、更有必要考虑的问题。问题是不列颠的属地，也许最终还有大不列颠本身是在受法律的管理还是军事特权的管理。不列颠子民的生命和人格是否受到两三个既没经验又粗鲁的军官支配？一个惊慌失措的总督或者其他官吏是否可以行使权利，构建一个所谓的军事法庭？这个问题只有上诉到法庭才能解决，所以委员会决定上诉。他们的决心引起委员会主席的更换，因为原主席查尔斯·巴克斯顿先生[8_28]认为向刑事法庭起诉艾尔[8_29]总督及其主要属下并非不公正，而是失策的行为。然而，有许多人参加的委员会大会决定反对他的观点，最终巴克斯顿先生退出了委员会，但继续为这项事业工作。出乎我意料的是，我被提名当选为委员会主席。结果在下院代表这个委员会就成了我的责任。有时向政府提问，有时接受个别议员向我提出的或多或少有些挑衅的问题。特别是，作为1866年会期由巴克斯顿发起的一场重要辩论的发言者，我那时的演说也许是我在议会[8_30]里最好的演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进行斗争，尝试每一条合法通向刑事法庭的道路。英格兰一个拥有最多托利党人的郡的法庭不受理我们的诉讼，但在鲍街法庭我们却取得了成功，这使王座法院的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爵士[8_31]有机会作出最著名的判决，就法官解决问题的权力来讲，他的判决解决了有利于自由的法律问题。但我们的成功就此结束了，因为中央刑事法院大陪审团撤销了我们的诉讼，使其最终未被受理。显然，向刑事法庭起诉英国官员对黑人和混血儿滥用职权的罪名并不受英国中层阶级的欢迎。但就我们而言，我们挽回了我们国家的声誉，表明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群人决心利用法律提供的所有手段为受害人伸张正义。我们从国

家最高刑事法庭得到权威性的宣言，宣布法律就是我们所坚持的东西。我们已经郑重警告那些以后可能被诱惑去犯类似罪行的人，虽然他们可能一时逃过刑事法庭的实际制裁，但是为了逃脱免不了会陷入麻烦并付出代价。殖民地总督和其他当权人士将来就有十足的理由避免这种困境。

As a matter of curiosity I kept some specimens of the abusive letters, almost all of them anonymous, which I received while these proceedings were going on. They are evidence of the sympathy felt with the brutalities in Jamaica by the brutal part of the population at home. They graduated from coarse jokes, verbal and pictorial, up to threats of assassination.

出于好奇，我收藏了几封在行动期间收到的辱骂信，大部分是匿名的。这些信是一些国内残暴人士同情牙买加暴行的证据，里边既有粗俗的文字和图片笑话，也有暗杀恐吓。

Among other matters of importance in which I took an active part, but which excited little interest in the public, two deserve particular mention. I joined with several other independent Liberals in defeating an Extradition Bill introduced at the very end of the session of 1866, and by which, though surrender avowedly for political offences was not authorized, political refugees, if charged by a foreign Government with acts which are necessarily incident to all attempts at insurrection, would have been surrendered to be dealt with by the criminal courts of the Government against which they had rebelled: thus making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 accomplice in the vengeance of foreign despotisms. The defeat of this proposal led to the appointment of a Select Committee (in

which I was included), to examine and report on the whole subject of Extradition Treaties; and the result was, that in the Extradition Act which passed through Parliament after I had ceased to be a member, opportunity is given to any one whose extradition is demanded, of being heard before an English court of justice to prove that the offence with which he is charged, is really political. The cause of European freedom has thus been saved from a serious misfortune, and our own country from a great iniquity. The other subject to be mentioned is the fight kept up by a body of advanced Liberals in the session of 1868, on the Bribery Bill of Mr. Disraeli's Government, in which I took a very active part. I had taken counsel with several of those who had applied their minds most carefully to the details of the subject—Mr. W.D. Christie, Serjeant Pulling, Mr. Chadwick—as well as bestowed much thought of my own, for the purpose of framing such amendments and additional clauses as might make the Bill really effective against the numerous modes of corruption, direct and indirect, which might otherwise, as there was much reason to fear, be increased instead of diminished by the Reform Act. We also aimed at engrafting on the Bill, measures for diminishing the mischievous burden of what are called the legitimate expenses of elections. Among our many amendments, was that of Mr. Fawcett for making the returning officer's expenses a charge on the rates, instead of on the candidates; another was the prohibition of paid canvassers, and the limitation of paid agents to one for each candidate; a third was the extension of the precautions and penalties against bribery to municipal elections, which are well known to be not only a preparatory school for bribery at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but an habitual cover for it.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however, when once they had carried the leading provision of their Bill (for which I voted and spoke), the transfer of the jurisdiction in elections from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the Judges, made a determined resistance to all other

improvements; and after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proposals, that of Mr. Fawcett, had actually obtained a majority, they summoned the strength of their party and threw out the clause in a subsequent stage. The Liberal party in the House was greatly dishonoured by the conduct of many of its members in giving no help whatever to this attempt to secur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an honest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With their large majority in the House they could have carried all the amendments, or better ones if they had better to propose. But it was late in the session; members were eager to set about their preparations for the impending General Election: and while some (such as Sir Robert Anstruther) honourably remained at their post, though rival candidates were already canvassing their constituency, a much greater number placed their electioneering interests before their public duty. Many Liberals also looked with indifference on legislation against bribery, thinking that it merely diverted public interest from the Ballot, which they considered—very mistakenly as I expect it will turn out—to be a sufficient, and the only, remedy. From these causes our fight, though kept up with great vigour for several nights, was wholly unsuccessful, and the practices which we sought to render more difficult, prevailed more widely than ever in the first General Election held under the new electoral law.

在我积极参加却很少引起公众兴趣的其他重要事情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我和其他几个独立的自由党人一起击败了1866年会期结束前提出的《引渡法案》。法案中规定，虽然引渡政治犯未得到公开授权，但如果政治避难者被外国政府指控有必然引发暴动的行为，就要被引渡去他们反叛政府的刑事法庭听受处分。这使大不列颠政府成为外国专制政府报复的帮凶。这个议案的失败使得特别委员会（包括我在内）成立，以审查和报告引渡条约的全部内容。结果是在我离开议会以后，议会通过了《引渡法》，使任何被要求引渡的人都有机

会在英国法庭前证明他所受的指控是真正政治性的。欧洲的自由事业由此而免受一场不幸，我们的国家也幸免于一次严重的邪恶行为。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在1868年的会期中，一批自由党进步人士坚持就迪斯累里政府提出的《贿赂法案》进行斗争，我也积极参与其中。我与几位对这个问题的细节做过十分认真研究的人——克里斯蒂先生、普林律师和查德威克 [8_32] 先生——商议并提出了很多我自己的想法，目的是制定修正案和增加条款，使《法案》真正有效地防范许多直接和间接的贿赂行为，否则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贿赂行为可能因《改良法》增加而非减少。我们还致力于在法案中加入其他措施，以减少所谓的竞选合法开支这种有害负担。在许多修正案当中，有一个是由福西特先生提出的，规定选举检察人的费用应当由税收而非候选人承担。另外禁止有偿拉选票，以及限制每位候选人只有一位带薪代理人。第三条是将防范和惩罚贿赂行为扩展到市级选举。众所周知，市级选举不但是议会选举贿赂的预备学校，也一贯是包庇贿赂的地方。然而，保守政府一旦通过了法案中的主要条款（我曾投票支持并发言），把选举管辖权从下院移至法院，他们就会坚决反对所有其他的改进。福西特 [8_33] 先生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提议，实际上已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成，之后他们号召党内力量在下一阶段否决这个提议。下院的自由党人因其许多成员的行为深感耻辱，因为他们对确保人们诚实选举必要条件的尝试未曾给过任何帮助。凭他们在下院占有的绝大多数席位，他们本可以通过所有的修正案，假如有更好的议案也会通过。但会期已晚，议员们已在迫切地准备即将到来的大选。虽然几位议员（比如罗伯特·安斯特拉瑟爵士 [8_34] ）仍令人尊敬地坚守着岗位，而竞争对手已经开始游说他们选区的选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把个人选举的利益放在公共责任之上。很多自由党人也对反贿赂立法漠然处之，认为它仅仅是将公众注意从无记名投票转移过来，他们把无记名投票视为一种充分且唯一的补救方法，我想将来肯定会证明这是十分错误的。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虽然斗志昂扬地坚持战斗了几个晚上，但战斗还是彻底失败了。我们曾试图增加贿赂的难度，而在新选举法实施后举行的第一届大选中，贿赂却比以前更加猖獗。

In the general debates on Mr. Disraeli's *Reform Bill* , my participation was limited to the one speech already mentioned; but I made the Bill an occasion for bringing the two great improvements which remain to be made i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formally before the House and the nation. One of them was Personal, or, as it is called with equal propriety,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I brought this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House, by an expository and argumentative speech on Mr. Hare's plan; and subsequently I was active in support of the very imperfect substitute for that plan, which, in a small number of constituencies, Parliament was induced to adopt. This poor makeshift had scarcely any recommendation, except that it was a partial recognition of the evil which it did so little to remedy. As such, however, it was attacked by the same fallacies, and required to be defended on the same principles, as a really good measure; and its adoption in a few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s well as the subsequent introduction of what is called the Cumulative Vote in the elections for the London School Board, have had the good effect of converting the equal claim of all electors to a proportional share in the representation, from a subject of merely speculative discussion, into a question of practical politics, much sooner than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the case.

在对迪斯累里《改良法案》的一般辩论中，我的参与仅仅限于上文提到的那篇演说，但我借机把代议制政府尚需做的两项重大改进措施正式摆到了下院和全国人民面前。一个是个人代表制，或者同样可以恰当地称为比例代表制。我通过就黑尔先生的方案发表阐述性和议论性的演说提出这项措施让下院考虑。之后我积极支持一项代替黑尔方案但很不完善的方案，这个方案在少数选区被议会采纳。这个可怜的权宜之计除了部分承认它不能根治的弊病外，几乎没有可取之处。但即便如此，它还是受到同样谬误的攻击，需要用同样的原则保护，

就像真正良好的措施那样。它在一些议会选举中被采纳，同样伦敦教育委员会选举中也引进了所谓的累计投票制。它把所有选举人的平等权利转变为代表制中的按比例分配名额，把纯粹的理论探讨转变成实际的政治问题，效果很好。如果没有实施这个方案，就不会产生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

This assertion of my opinions on Personal Representation cannot be credited with any considerable or visible amount of practical result. It was otherwise with the other motion which I made in the form of an amendment to *the Reform Bill* , and which was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perhaps the only really important, public service I performed in the capacity of a Member of Parliament: a motion to strike out the words which were understood to limit the electoral franchise to males, and thereby to admit to the suffrage all women who, as householders or otherwise, possessed the qualification required of male electors. For women not to make their claim to the suffrage, at the time when the elective franchise was being largely extended, would have been to abjure the claim altogether; and a movement on the subject was begun in 1866, when I presented a petition for the suffrage, signed by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distinguished women. But it was as yet uncertain whether the proposal would obtain more than a few stray votes in the House: and when, after a debate in which the speaker's on the contrary side were conspicuous by their feebleness, the votes recorded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mounted to 73—made up by pairs and tellers to above 80—the surprise was general, and the encouragement great: the greater, too, because one of those who voted for the motion was Mr. Bright, a fact which could only be attributed to the impression made on him by the debate, as he had previously made no secret of his nonconcurrence in the proposal. [The time appeared to my daughter, Miss Helen Taylor, to have

come for forming a Society for the extension of the suffrage to women. The existence of the Society is due to my daughter's initiative; its constitution was planned entirely by her, and she was the soul of the movement during its first years, though delicate health and superabundant occupation made her decline to be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any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parliament, professors, and others, and some of the most eminent women of whom the country can boast, becam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a large proportion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my daughter's influence, she having written the greater number, and all the best, of the letters by which adhesions was obtained, even when those letters bore my signature. In two remarkable instances, those of Miss Nightingale and Miss Mary Carpenter, the reluctance those ladies had at first felt to come forward, (for it was not on their past difference of opinion) was overcome by appeals written by my daughter though signed by me. Associations for the same object were formed in various local centres, Manchester, Edinburgh, Birmingham, Bristol, and Glasgow; and others which have done much valuable work for the cause. All the Societies take the title of branches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Women's Suffrage; but each has its own governing body, and acts in complete independence of the others.]

我支持个人代表制，并不是因为它会产生相当多的或明显的实际效果。相反，我提出的另一个动议就不同，它是《改良法案》的一个修正案，是我做议员期间履行的最重要的，也许是唯一重要的公职。这项动议去掉了被理解成选举权仅限于男性的措辞，从而允许所有拥有男性选民资格的妇女，无论是否为户主，都有选举权。当选举权大规模增加时，不要求选举权的妇女就相当于完全公开放弃这个权利。这个运动开始于1866年，我呈递了一份由许多杰出妇女签名的争取选举权的请愿书。但不确定的是这个提议能否获得下院议员们零星的几

张赞成票。当辩论过后，反对方的发言显然软弱无力，所以赞成动议的票数达到73票。加上不投票的议员和计票员，总数达80多票。这在我们意料之外，也因此令人大受鼓舞。更鼓舞我们的是这些投赞成票的人当中有布赖特先生，这只能归因于这场辩论对他产生的影响，因为他以前毫不掩饰地表示不同意这个提议。这次看来是我的女儿，海伦·泰勒小姐组织了一个社团来扩大妇女选举权。这个社团是由我女儿创办的，章程也完全是由她设计的，虽然因为身体孱弱加上工作缠身，她谢绝成为执行委员会的一员，但运动的第一年她仍是活动的灵魂。很多尊贵的议员、教授及其他人，还有一些国家引以为傲的出色女性也成为社团成员，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受我女儿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她写了大量的信件，并以此赢得了支持，甚至有些信件上署了我的名字。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分别与南丁格尔 [8_35] 小姐和玛丽·卡彭特 [8_36] 小姐有关，她们起初都不愿意加入（因为这和她们的意见相左）。后来我女儿以我的名义写了几封请求信，才得到她们的同意。其他的一些地区中心也以相同的目的成立了协会，包括曼彻斯特、爱丁堡、伯明翰、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以及其他一些为这项事业作出卓著贡献的城市。所有的社团都取名为“国家妇女选举权协会”分会，但每个分会都有自己的管理机构，以完全独立的方式运作。

I believe I have mentioned all that is worth remembering of my proceedings in the House. But their enumeration, even if complete, would give but an inadequate idea of my occupations during that period, and especially of the time taken up by correspondence. For many years before my election to Parliament, I had been continually receiving letters from strangers, mostly addressed to me as a writer on philosophy, and either propounding difficulties or communicating thoughts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logic or political economy. In common, I suppose, with all who are known as political economists, I was a recipient of all the shallow theories and absurd proposals by which people are perpetually endeavouring

to show the way to universal wealth and happiness by some artful reorganization of the currency. When there were signs of sufficient intelligence in the writers to make it worth while attempting to put them right, I took the trouble to point out their errors, until the growth of my correspondence made it necessary to dismiss such persons with very brief answers. Many, however, of the communications I received were more worthy of attention than these, and in some, oversights of detail were pointed out in my writings, which I was thus enabled to correct. Correspondence of this sort naturally multiplied with the multiplication of the subjects on which I wrote, especially those of a metaphysical character. But when I became a member of Parliament. I began to receive letters on private grievances and on every imaginable subject that related to any kind of public affairs, however remote from my knowledge or pursuits. It was not my constituents in Westminster who laid this burthen on me: they kept with remarkable fidelity to the understanding on which I had consented to serve. I received, indeed, now and then an application from some ingenuous youth to procure for him a small government appointment; but these were few, and how simple and ignorant the writers were, wa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the applications came in about equally whichever party was in power. My invariable answer was, that it was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I was elected to ask favours of any Government. But, on the whole, hardly any part of the country gave me less trouble than my own constituents. The general mass of correspondence, however, swelled into an oppressive burthen.

我相信我已经提到了我在下院期间所有值得回忆的事情。但这些描述即便是完整的，仍然不能让人们充分了解我那段时期的工作，尤其是通信花去的那段时间。在我入选议会前的那几年，我经常收到陌生人的来信，大多都称我为哲学方面的作家，他们就逻辑学或者政治

经济学方面，要么和我探讨些难懂的问题，要么与我交流想法。总的来说，我猜想我和所有著名的政治学家一样，收到了很多包含肤浅理论和荒谬提议的来信，通过这些来信，人们以巧妙的重组货币的方式，不断努力展示通往全民富裕和幸福的道路。当写信人表现出足够的智慧，还有纠正的可能时，我就会不辞辛劳地指出他们的错误，直到后来我的通信数量的增长使我不得不用简短的话回复这些人。但是我收到的许多来信中很多比这些更值得关注，其中有些指出我作品中忽略的细节，使我能够改正。这种通信自然随着我写作主题的增加而增加，尤其是那些关于形而上学的主题。但自从我成为议员之后，我开始收到私人的投诉信，以及有关公众事务能想到的问题的信件，尽管很多与我的知识和追求相去甚远。带给我这些负担的并不是我在威斯敏斯特的选民，他们对我同意效忠的事业保持着相当的忠诚。事实上，我不时收到一个天真的年轻人写来的申请信，要我帮他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我都会收到这样的来信，虽然这种信件很少，但可以表明写信人是多么的单纯无知。我不变的回答是，请求政府的帮助与我当选的原则背道而驰。但总的来说，我自己的选民带给我的麻烦少于全国其他地区。然而，越来越多的来信成为我沉重的负担。

[At this time, and thenceforth, a great proportion of all my letters (including many which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newspapers) were not written by me but by my daughter; at first merely from her willingness to help in disposing of a mass of letters greater than I could get through without assistance, but afterwards because I thought the letters she wrote superior to mine, and more so in proportion to the difficul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occasion. Even those which I wrote myself were generally much improved by her, as is also the case with all the more recent of my prepared speeches, of which, and of some of my published writings, not a few passages, and those the most successful, were hers.]

那时以及从那以后，我的大部分回信（包括登报回复）都由我的女儿代笔。她的初衷只是帮助我处理大量的超过我个人回复能力的信件，但后来我发现她回信的水平比我的高，尤其是她能作出与当时的难度和重要性相应的回复。即使我自己写的信也基本交给她修改，就像我最近准备的演讲稿一样，我的一些出版作品，不仅仅是其中几段，就连最成功的那部分都是她的杰作。

While I remained in Parliament my work as an author was unavoidably limited to the recess. During that time I wrote (besides the pamphlet on Ireland, already mentioned), the *Essay on Plato* , published in the *Edinburgh Review* , and reprinted in the third volume of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 and the address which, conformably to custom, I delivered to 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whose students had done me the honour of electing me to the office of Rector. In this Discourse I gave expression to many thoughts and opinions which had been accumulating in me through life, respecting the various studies which belong to a liberal education, their uses and influences, and the mode in which they should be pursued to render their influences most beneficial. The position taken up, vindicating the high educational value alike of the old classic and the new scientific studies, on even stronger grounds than are urged by most of their advocates, and insisting that it is only the stupid inefficiency of the usual teaching which makes those studies be regarded as competitors instead of allies, was, I think, calculated, not only to aid and stimulate the improvement which has happily commenced in the national institu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but to diffuse juster ideas than we often find, even in highly educated men, on the conditions of the highest mental cultivation.

在议会工作期间，我的写作不可避免地被限制在休会期间进行。那段时间我写了《论柏拉图》（还有刚才提到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小册子），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后来收在《论述和讨论》的第三卷中。我很荣幸地被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生选为校长，并按照惯例发表了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我就一生中积累的有关自由教育的许多学科发表了很多想法和见解，讲到了它们的用处和影响，以及为使这些学科发挥最有益的影响应当采取的方法。为证明旧的古典学科以及新的科学学科有同样高的教育价值，我采取的立场比大多数宣传者极力主张的更加坚实，认为只因平常教导法的愚蠢无能才使得这些学科被人视为竞争者而不是同盟者。我认为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已顺利展开的改革，而且能够在最崇高思想的培养下，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传播比我们平常接触到的更公正的思想。

During this period also I commenced (and completed soon after I had left Parliament) the performance of a duty to philosophy and to the memory of my father, by preparing and publishing an edition of the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 , with notes bringing up the doctrines of that admirable book to the latest improvements in science and in speculation. This was a joint undertaking: the psychological notes being furnished in about equal proportions by Mr. Bain and myself, while Mr. Grote supplied som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on point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cidentally raised, and Dr. Andrew Findlater supplied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book which had been occasioned by the imperfect philological knowledge of the time when it was written. Having been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a time when the current of metaphysical speculation ran in a quite opposite direc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Experience and Association, the *Analysis* had not obtained the amount of immediate success which it deserved, though it had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many individual minds, and had largely contributed, through those minds, to create that

more favourable atmosphere for the Association Psychology of which we now have the benefit. Admirably adapted for a class book of the Experience Metaphysics, it only required to be enriched, and in some cases corrected, by the results of more recent labours in the same school of thought, to stand, as it now does, in company with Mr. Bain's treatises, at the head of the systematic works on Analytic psychology.

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开始履行我对哲学的责任（这在我离开议会后很快得以完成），也为了纪念我的父亲，我准备并出版了《人类心灵现象分析》的一个版本，并作了注释，使这本出色的作品跟上了科学和理论方面的最新进展。这是一个合作的项目：心理学的注释由贝恩先生和我平均分担，格罗特先生对书中附带提及的哲学历史问题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而安德鲁·芬勒特 [8_37] 先生弥补了写书时由于不完善的哲学知识造成的不足。该书第一次发表时正值形而上学理论的思潮与经验心理学和联想心理学背道而驰的时候，所以它没能立即获得应有的成功，但还是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通过这些人营造出一种更有利于联想心理学的气氛，到现在我们仍从中受益良多。这本书很适合做学习经验形而上学的课本，只需扩充些相同思想流派的最新研究成果，或在某些情况下只需对其加以更正，它就可以像现在这样，和贝恩先生的专著一起，成为分析心理学系统著作的佼佼者。

In the autumn of 1868 the Parliament which passed the Reform Act was dissolved, and at the new election for Westminster I was thrown out; not to my surprise, nor, I believe, to that of my principal supporters, though in the few days preceding the election they had become more sanguine than before. That I should not have been elected at all would not have required any explanation; what excites curiosity is that I should have been elected the first time, or,

having been elected then, should have been defeated afterwards. But the efforts made to defeat me were far greater on the second occasion than on the first. For one thing, the Tory Government was now struggling for existence, and success in any contest was of more importance to them. Then, too, all persons of Tory feelings were far more embittered against me individually than on the previous occasion; many who had at first been either favourable or indifferent, were vehemently opposed to my re-election. As I had shown in my political writings that I was aware of the weak points in democratic opinions, some Conservatives, it seems, had not been without hopes of finding me an opponent of democracy: as I was able to see the Conservative side of the question, they presumed that, like them, I could not see any other side. Yet if they had really read my writings, they would have known that after giving full weight to all that appeared to me well grounded in the arguments against democracy, I unhesitatingly decided in its favour, while recommending that it should be accompanied by such institutions as were consistent with its principle and calculated to ward off its inconveniences: one of the chief of these remedies being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on which scarcely any of the Conservatives gave me any support. Some Tory expectations appear to have been founded on the approbation I had expressed of plural voting,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and it has been surmised that the suggestion of this sort made in one of the resolutions which Mr. Disraeli introduced into the House preparatory to his Reform Bill (a suggestion which meeting with no favour, he did not press), may have been occasioned by what I had written on the point: but if so, it was forgotten that I had made it an express condition that the privilege of a plurality of votes should be annexed to education, not to property, and even so, had approved of it only on the supposi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How utterly inadmissible such plural voting would be under the suffrage given by the present Reform Act, is

proved, to any who could otherwise doubt it, by the very small weight which the working classes are found to possess in elections, even under the law which gives no more votes to any one elector than to any other.

1868年秋天，通过《改良法》的议会解散了，在新一届威斯敏斯特选举中我竞选失利，这并没让我吃惊，我相信我的主要支持者们也不会吃惊，虽然在接下来几天的选举中他们抱着更大的希望。如果我从未当选也就无需解释，让人好奇的是我第一次当选了，或者已经当选，但后来又落选了。但是第二次他们为了打败我所作的努力远远比第一次多。一方面，托利党政府正在为继续当选努力，在任何竞选中的胜利对他们来说都很重要。另外，所有同情托利党的人对我个人的怨恨也比上一届多很多。许多原来对我当选不置可否的人，现在都激烈地反对我再次当选。因为我在很多政治作品中表明自己已经意识到了民主见解的弱点，一些保守派人士似乎希望把我当作民主制度的敌人，因为我可以从保守党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他们就断定我像他们一样看不到其他的方面。但如果他们真的读过我的作品，他们就会知道在强调了所有我认为有充分证据支持的反对民主的观点后，我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有利于民主的论断，并且建议民主应当通过符合其原则并能去除其不便的制度来实现。其中一个主要的解决方法就是比例代表制，但保守党几乎没有人支持这个建议。一些托利党人的期待似乎是建立在我对多选区投票权认可的前提上的。人们推测，这个建议是迪斯累里在准备他的《改良法案》时向下院提出的决议案中的一个（没有人支持他的建议，他也没有施加压力），这可能是由我就这个问题所写的文章引起的。但假如是这样，人们忘记了我的建议还有一个明确的条件，那就是一人多选区的特权附加的是关于教育程度而不是财产状况的条件，即便如此，我只是在假定普选权的情况下才同意的。在目前《改良法》规定的选举制度下，这种多选区投票权是不能接受的。怀疑这一点的人，只要看看工人阶级在选举中所占的如此小的分量就会明白，即使法律规定一人只能投一票。

While I thus was far more obnoxious to the Tory interest, and to many Conservative Liberals than I had formerly been, the course I pursued in Parliament had by no means been such as to make Liberals generally at all enthusiastic in my support. It has already been mentioned, how large a proportion of my prominent appearances had been on questions on which I differed from most of the Liberal party, or about which they cared little, and how few occasions there had been on which the line I took was such as could lead them to attach any great value to me as an organ of their opinions. I had moreover done things which had excited, in many minds, a personal prejudice against me. Many were offended by what they called the persecution of Mr. Eyre: and still greater offence was taken at my sending a subscription to the election expenses of Mr. Bradlaugh. Having refused to be at any expense for my own election, and having had all its expenses defrayed by others, I felt under a peculiar obligation to subscribe in my turn where funds were deficient for candidates whose election was desirable. I accordingly sent subscriptions to nearly all the working class candidates, and among others to Mr. Bradlaugh. He had the support of the working classes; having heard him speak, I knew him to be a man of ability and he had proved that he was the reverse of a demagogue, by placing himself in strong opposition to the prevailing opin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n two such important subjects as Malthusianism and Personal Representation. Men of this sort, who, while sharing the democratic feeling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judged political questions for themselves, and had courage to assert their individual convictions against popular opposition, were needed, as it seemed to me, in Parliament, and I did not think that Mr. Bradlaugh's anti-religious opinions (even though he had been intemperate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m) ought to exclude him. In subscribing, however, to his election, I did what would have been highly imprudent if I had been at liberty to consider only the

interests of my own re-election; and, as might be expected, the utmost possible use, both fair and unfair, was made of this act of mine to stir up the electors of Westminster against me. To these various causes, combined with an unscrupulous use of the usual pecuniary and other influences on the side of my Tory competitor, while none were used on my side, it is to be ascribed that I failed at my second election after having succeeded at the first. No sooner was the result of the election known than I received three or four invitations to become a candidate for other constituencies, chiefly counties; but even if success could have been expected, and this without expense, I was not disposed to deny myself the relief of returning to private life. I had no cause to feel humiliated at my rejection by the electors; and if I had, the feeling would have been far outweighed by the numerous expressions of regret which I received from all sorts of persons and places, and in a most marked degree from those members of the liberal party in Parliament, with whom I had been accustomed to act.

与原来相比，我现在更加危及托利党人的利益，也更令保守的自由派人士不愉快，我在议会中所追求的事业绝对不会让多数自由派人士热情地支持我。这之前我已经提到，我出色的登台演讲大多是论述与多数自由派见解不同的观点或他们极少关心的问题，我采取的方针路线很少能引起他们的重视，并使他们把我当作自己意见的喉舌。另外我做的事情引起了很多人对我的个人偏见。很多人因为他们所谓的迫害艾尔先生的事件而大怒，令他们更加愤怒的是我捐了一些钱作为布雷德洛 [8_38] 先生的竞选费用。我自己竞选时没有花费任何费用，几乎都由他人支付，我感到有特殊的义务用捐款来回报那些缺少资金但有望当选的候选人。所以我几乎给所有工人阶级候选人捐款，尤其是对布雷德洛先生。他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我听过他的演讲，认定他是有能力之人，在马尔萨斯主义和个人代表制这两个重要问题上，他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民主党意见，证明了自己不是蛊惑民心之人。

这样一个既有劳动阶级民主情感，自己判断政治问题，又有勇气逆流而上主张个人信念的人，在我看来是议会需要的人物。我认为不应当因为布雷德洛反对宗教的见解而把他排除在议会之外（虽然他曾经言辞激烈地表达过这样的见解）。如果我只考虑自己再次当选的利益，那为他的竞选捐款是十分鲁莽的。不出所料，很多人对我的这个举动大加利用，无论公正与否，来煽动威斯敏斯特选区的投票者反对我。基于这种种原因，加上我的托利党竞争者大肆利用惯用的金钱手段和其他影响力，而我却没有这么做，我在第一次竞选胜利后，第二次却失败了。竞选结果公布后不久，我就收到了三四封信，邀请我做其他选区的候选人（主要是郡级）。但即便有成功的希望，即便可以不用承担费用，我也不想摒弃让自己享受回归个人生活的轻松。我已没有理由因为选民对我的反对而感到耻辱。假如我真的有，这种感觉也远远不如我从各界人士和各地收到的无数慰问信重要，尤其是不如收到那些我惯于合作的自由党议员们的慰问信重要。

Since that time little has occurred which there is need to commemorate in this place. I returned to my old pursuits and to the enjoyment of a country life in the south of Europe, alternating twice a year with a residence of some weeks or month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London. I have written various articles in periodicals (chiefly in my friend Mr. Morley's *Fortnightly Review*), have made a small number of speeches on public occasions, especially at the meetings of the Women's Suffrage Society, have published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 written some years before, with some additions [by my daughter and myself,] and have commenced the preparation of matter for future books, of which it will be time to speak more particularly if I live to finish them. Here, therefore, for the present, this memoir may close.

从那以后，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值得我在此记录。我重拾旧

趣，回到欧洲南部享受田园生活，每年轮流两次在伦敦附近住上几周或几个月。我为期刊写了许多文章（主要发表在我朋友莫利先生的《双周评论》上），在公共场合，特别是在妇女投票权协会的会议上发表过为数不多的几次演说，我女儿和我把几年前写的《论妇女的屈从地位》增加了一些内容后出版，并开始为以后出书准备资料。如果我在有生之年能写完这些新作品的话，那还有机会再作说明。因此，这本自传到这里可以结束了。

[7_1].Written about 1861.

[7_2].The steps in my mental growth for which I was indebted to her were far from being those which a person wholly uninformed on the subject would probably suspect. It might be supposed, for instance, that my strong convictions on the complete equality in all legal, political, social, and domestic relations, which ought to exist between men and women, may have been adopted or learnt from her. This was so far from being the fact, that those convictions were among the earliest results of the application of my mind to political subjects, and the strength with which I held them was, as I believ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e originating cause of the interest she felt in me. What is true is that, until I knew her, the opinion was in my mind little more than an abstract principle. I saw no more reason why women should be held in legal subjection to other people, than why men should. I was certain that their interests required fully as much protection as those of men, and were quite as little likely to obtain it without an equal voice in making the laws by which they were bound. But that perception of the vast practical bearings of women's disabilities which found expression in the book on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was acquired mainly through her teaching. But for her rare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and comprehension of moral and social influences, though I should doubtless have held my present opinions, I should have had a very insufficient perception of the mode in which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ferior position of women intertwine themselves with all the evils of existing society and with all the difficulties of human improvement. I am indeed painfully conscious of how much of her best thoughts on the subject I have failed to reproduce, and how greatly that little treatise falls short of what it would have been if she had put on paper her entire mind on this question, or had lived to revise and improve, as she certainly would have done, my imperfect statement of the case.

[7_3].The only person from whom I received any direct assistance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ystem of Logic* was Mr. Bain, since so justly celebrated for hi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He went carefully through the manuscript before it was sent to the press, and enriched it with a great number of additional examples and illustrations from science; many of which, as well as some detached remarks of his own in confirmation of my logical views, I inserted nearly in his own words.

[7_4].A few dedicatory lines acknowledging what the book owed to her, were prefixed to some of the presentation copie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n its first publication. Her dislike of publicity alone prevented their insertion in the other copies of the work. During the years which intervened between the commencement of my married life and the catastrophe which closed it,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 of my outward existence (unless I count as such a first attack of the family disease, and a consequent journey of more than six months for the recovery of health, in Italy, Sicily, and Greece) had reference to my position in the India House. In 1856 I was promoted to the rank of chief of the office in which I had served for upwards of thirty-three years. The appointment, that of Examiner of India Correspondence, was the highest, next to that of Secretary, in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home service, involving the general superintendence of all the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Indian Governments, except the military, naval, and financial. I held this office as long as it continued to exist, being a little more than two years; after which it pleased Parliament, in other words Lord Palmerston, to put an end to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s a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under the Crown, and convert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at country into a thing to be scrambled for by the second and third class of English parliamentary politicians. I was the chief manager of the resistance which the Company made to their own political extinction, and to the letters and petitions I wrote for them, and the concluding chapter of my treatise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 must refer for my opinions on the folly and mischief of this ill-considered change. Personally I considered myself a gainer by it, as I had given enough of my life to India, and was not unwilling to retire on the liberal compensation granted. After the change was consummated, Lord Stanley, the firs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made me the honourable offer of a seat in the Council, and the proposal was subsequently renewed by the Council itself, on the first occasion of its having to supply a vacancy in its own body. But the conditions of Indian government under the new system made me anticipate nothing but useless vexation and waste of effort from any participation in it: and nothing that has since happened has had any tendency to make me regret my refusal.

[7_5].In 1869.

[7_6].The saying of this true hero, after his capture, that he was worth more for hanging than any other purpose, reminds one, by its combination of wit, wisdom,

and self-devotion, of Sir Thomas More.

[7_7].The first was in answer to Mr. Lowe's reply to Mr. Bright on the Cattle Plague Bill, and was thought at the time to have helped to get rid of a provision in the Government measure which would have given to landholders a second indemnity, after they had already been once indemnified for the loss of some of their cattle by the increased selling price of the remainder.

[7_8].Among the most activ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wereMr. P.A. Taylor, M.P., always faithful and energetic in every asser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Mr. Goldwin Smith, Mr. Frederic Harrison, Mr. Slack, Mr. Chamerovzow, Mr. Shaen, and Mr. Chesson, the Honorary Secretary of the Association.

[8_1].限定继承权，即对被继承人生前所欠债务负有限清偿责任的继承权。

[8_2].法国“二月革命”，爆发于1848年2月22日。这次革命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经济、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8_3].1848年1月，欧洲革命首先爆发于意大利，接着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为了推翻封建统治，实现国家统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和普鲁士首都柏林在3月先后爆发了革命。在维也纳革命的影响下，匈牙利、捷克和罗马尼亚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革命烈火遍及欧洲。

[8_4].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了政变，结束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了专制体制。它是欧洲除了沙皇制度以外的又一个反动势力堡垒，成了国际冲突和军事冒险的政策源地。

[8_5].写于约1861年。

[8_6].作者注：我心智上的成长得益于她，但是与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怀疑的那样不同。例如，我坚定地相信，男性和女性法律、政治、社会和家庭关系上应该完全平等，这种观念便可能是通过她或从她那里学习的。事实上，这些信念不是我将我的思想应用于政治事务中的结果，而我拥有这些思想的力量就是当初吸引她的最大的原因。在我认识她之前，这种观点在我脑中只是抽象的存在。我找不到什么理由，使女人要在法律地位上比男人低一等。我确信他们的利益和男人一样需要保护，而且如果法律上没有规定，他们得到保护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通过她教授的《论女性的屈从地位》这本书中，我才了解到大量女性弱势的事例。但由于她对人性与道德和社会影响的理解不足，尽管我仍持有现在的观点，依我拙见，女性的弱势地位与现存社会的一切罪恶和改善人类的一切困难交织相连。我很痛苦地意识到，我没能完全重现她的真

知灼见，所写内容也远远少于她所知所想，如果她能将她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付诸笔墨，或者在我写后她仍在世能帮我修改和润色就好了。

[8_7].作者注：我在准备《逻辑学体系》时唯一对我有直接帮助的人，就是撰写过很多哲学著作的学者贝恩先生。在我的收稿寄给出版社之前，他仔细通读，从学科里加了大量的例证。很多例证以及一些客观的说法都是为了证实我的逻辑观点而阐述的，我几乎用了他的原话。

[8_8].圣西门主义者，主张空想社会主义的人。该学说的创始人是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圣西门（1760—1825）。

[8_9].作者注：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初版发行的时候，在一些书目的正文之前加了几行对她的致谢。因为她生性不愿公开身份，因此只能选择一些加之而已。从结婚到灾难降临宣告我们婚姻结束的这些岁月里，我的外界生活主要就是任职于东印度公司（除了我提到家族病的第一次发作以及之后为了康复在意大利、西西里和希腊的六个多月的旅行）。1856年，即我任职的第33个年头，经过多次晋升后，我被提拔为办事处主任。这个职位，也就是印度通讯审查员，是东印度公司国内部仅次于部长的最高职位，主要监督与印度政府除陆军、海军和财政之外的所有通讯事宜。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它不再存在为止。此后为了取悦议会，换言之为了取悦帕默斯顿勋爵，作为王室之下印度政府的一个分支，东印度公司被取消，这个国家的政府则变成被英国议会二、三流政客争夺的对象。公司反抗自己政治地位的消失，而我是主要领导者。在我写给他们的信件和请愿书中，以及我的专著《论代议政治》的结论章节中，我必须对这个欠考虑的改组的愚蠢性和危害性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获利者，因为我一生为东印度公司作了足够多的贡献，很乐意在拿到授予我的丰厚补偿金后退休。在改组圆满完成以后，印度第一位国务大臣斯坦利勋爵邀我在评议会任职，后来评议会为了填补自身的一个职位空缺，再次向我发出了邀请。但新制度下的印度政府的状况让我预感到，加入他们只会给我带来无谓的烦恼，造成我的精力浪费。之后发生的一切从未让我后悔谢绝这一邀请。

[8_10].朱庇特神庙，古罗马的主神殿。

[8_11].阿维尼翁，法国东南部城市，沃克吕兹省首府。在罗讷河畔，南距迪朗斯河和罗讷河汇合处四公里。

[8_12].裴斯泰洛齐（1746—1827），瑞士教育家。

[8_13].威廉·冯·洪堡（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教育改革家。

[8_14].乔赛亚·沃伦（1798—1874），美国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发明家和作家。他被广泛地视为美国的第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8_15].詹姆斯·加思·马歇尔（1802—1873），英国政治家。

[8_16].亚历山大·贝恩（1818—1903），英国心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学家。

[8_17].指1869年。

[8_18].约翰·埃利奥特·凯恩斯（1823—1875），英国庸俗经济学家。他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写的《奴隶劳力》，揭露了对奴隶残酷使用和奴隶从事原始劳动的情形，但作为经济学家，他只能描写表面的现象。

[8_19].温德尔·菲利普斯（1811—1884），美国废奴主义者、雄辩家。

[8_20].作者注：这个真正的英雄在被捕之后被绞死的意义，比其他任何目的都要有价值。这位英雄的才干、智慧和奉献精神让人想起托马斯·莫尔先生。

[8_21].约翰·布赖特（1811—1889），英国政界人士、政治经济学家。

[8_22].威廉·汉密尔顿爵士（1788—1856），苏格兰形而上学者。

[8_23].作者注：第一次演说是回应劳先生对于布莱特先生对于《牛疫情法案》的回答，当时在取消政府对土地所有者实施第二次惩罚的规定上起到了作用。在此之前，这些土地所有者因为损失了一些牛就将剩余的牛的价格提高了，因此受到了政府的第一次惩罚。

[8_24].芬尼亚组织，19世纪中叶著名的爱尔兰反英统治组织。

[8_25].本杰明·迪斯累里（1804—1881），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作家，写过小说和政论作品。

[8_26].约翰·罗素（1792—1878），辉格党自由改革派的主要人物，曾任英国首相。

[8_27].约翰·弗朗西斯·马圭尔（1815—1872），爱尔兰政治家、著名的记者。曾任科克市市长，并于1841年创立了《科克考察家报》。

[8_28].查尔斯·巴克斯顿（1823—1871），英国啤酒生产商、慈善家、作家和议员。

[8_29].爱德华·约翰·艾尔（1815—1901），英国人、澳洲大陆拓荒者、殖民主义者、有争议的牙买加总督。

[8_30].作者注：委员会中最活跃的成员为：P. A. 泰勒先生，他在声明每个自由原则的时候都那么忠实而充满活力；戈尔德温·史密斯先生、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先生，斯莱克先生，凯默罗夫佐先生、莎恩先生和协会的名誉秘书切森先生。

[8_31].亚历山大·詹姆斯·埃德蒙·科伯恩爵士（1802—1880），英国政治家、律师、大法官。

[8_32].埃德温·查德威克（1800—1890），英国社会改革家，因改良《济贫法》而著称。

[8_33].亨利·福西特（1833—1884），英国政治家、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手册》。

[8_34].罗伯特·安斯特拉瑟爵士（1834—1866），苏格兰政治家。

[8_35].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护理学先驱、护士教育创始人。

[8_36].玛丽·卡彭特（1807—1877），英国著名的教育学家、社会改革家。

[8_37].安德鲁·芬勒特（1810—1885），苏格兰编辑，编纂《钱伯斯百科全书》。

[8_38].查尔斯·布雷德洛（1833—1833），19世纪英国著名政治活动家、无神论者，于1866年建立国家世俗协会。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EMILE 1

爱弥儿（上）

Jean-Jacques Rousseau

让－雅克·卢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爱弥儿（上）

Emile

让-雅克·卢梭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Author's Preface 作者前言
- BOOK I 第一卷
- BOOK II 第二卷
- BOOK III 第三卷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Author's Preface

作者前言

This collection of scattered thoughts and observations has little order or continuity; it was begun to give pleasure to a good mother who thinks for herself. My first idea was to write a tract a few pages long, but I was carried away by my subject, and before I knew what I was doing my tract had become a kind of book, too large indeed for the matter contained in it, but too small for the subject of which it treats. For a long time I hesitated whether to publish it or not, and I have often felt, when at work upon it, that it is one thing to publish a few pamphlets and another to write a book. After vain attempts to improve it, I have decided that it is my duty to publish it as it stands. I consider that public attention requires to be directed to this subject, and even if my own ideas are mistaken, my time will not have been wasted if I stir up others to form right ideas. A solitary who casts his writings before the public without any one to advertise them, without any party ready to defend them, one who does not even know what is thought and said about those writings, is at least free from one anxiety—if he is mistaken, no one will take his errors for gospel.

本书中一系列的分散想法和观察几乎没有什么顺序和连贯性；它的初衷只不过是想让一位善于思索、称职的好母亲获得一些乐趣。最初，我只是想要写一篇精短的文章，然而，文章的主题一步步引导着我一直写下去，没等我反应过来，这篇文章就扩展成了一本书，书的内容可能会有些庞杂，但就书本所阐释的主题来讲，这些不过是沧海一粟。关于是否要出版发行本书，我犹疑了很久，并且在写作的时

候，我时常会想到，刊行一些小册子是一回事，真正地写一本书则是另一回事。在经历了一番收效甚微的努力之后，我认为我有责任按照这本书现在的面貌出版。我认为本书所阐释的问题，是一个需要被人们重视的话题，并且，即使我个人观点有错误和瑕疵，但若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的时间就没有白费。一个隐士的作品问世，没有任何的夸大宣传，也没有任何群体为其作品辩护，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获得怎样的评价，因此，即便他的想法有错，也不用担心有人会把他的观点当作真理来奉行。

I shall say very little about the value of a good education, nor shall I stop to prove that the customary method of education is bad; this has been done again and again, and I do not wish to fill my book with things which everyone knows. I will merely state that, go as far back as you will, you will find a continual outcry against the established method, but no attempt to suggest a better. The literature and science of our day tend rather to destroy than to build up. We find fault after the manner of a master; to suggest, we must adopt another style, a style l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de of the philosopher. In spite of all those books, whose only aim, so they say, is public utility, the most useful of all arts, the art of training men, is still neglected. Even after Locke's book was written the subject remained almost untouched, and I fear that my book will leave it pretty much as it found it.

我不会浓墨重彩地去描述良好的教育多有价值，也不会去证明我们惯常的教育方法有多不好；这些事情已经被许多人做过了，我并不希望我的书中充斥着众人皆知的内容。我只想说，你可以发现，一直以来，对原有教育方法的反对声层出不穷，然而从未有人想试着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文学和科学更倾向于破坏，而不是去建设。我们可以用长者的身份语气来责难，但若是要提建议，

我们应该采用另一种形式来，一种可能与高傲的哲学家地位不太相称的形式。尽管这些书，据他们自己所说，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公众利益，但最有用的一种艺术，即教育人的艺术，依旧没有得到重视。哪怕在洛克的作品发表以后，这个话题依旧鲜少被探讨，我也很担心，我的书发表以后，这个话题跟它之前一样，无人问津。

We know nothing of childhood; and with our mistaken notions the further we advance the further we go astray. The wisest writers devote themselves to what a man ought to know, without asking what a child is capable of learning. They are always looking for the man in the child, without considering what he is before he becomes a man. It is to this study that I have chiefly devoted myself, so that if my method is fanciful and unsound, my observations may still be of service. I may be greatly mistaken as to what ought to be done, but I think I have clearly perceived the material which is to be worked upon. Begin thus by making a more careful study of your scholars, for it is clear that you know nothing about them; yet if you read this book with that end in view, I think you will find that it is not entirely useless.

对于童年，我们一无所知。带着这种错误的认知，我们越往前发展，越错得离谱。最明智的作者总是致力于研究一个人应该知道什么，而并不寻求凭孩子的一己之力能学到的东西。他们总是试图在孩子身上找到成人的特质，却从不考虑他在成人之前是什么样的角色。然而这正是我所致力的研究方向，因此即使我的方法可能有些新奇荒谬，我的意见可能仍旧有可取之处。在应该做什么这方面，我可能错得很离谱，可是我认为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应该研究哪些方面了。因此，请从仔细地研究你的学生开始，显而易见，你对他们是一无所知的；如果你秉持这样的观点来看这本书，我相信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With regard to what will be called the systematic portion of the book, which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course of nature, it is here that the reader will probably go wrong, and no doubt I shall be attacked on this side, and perhaps my critics may be right. You will tell me, “This is not so much a treatise on education as the visions of a dreamer with regard to education.” What can I do? I have not written about other people's ideas of education, but about my own. My thoughts are not those of others; this reproach has been brought against me again and again. But is it within my power to furnish myself with other eyes, or to adopt other ideas? It is within my power to refuse to be wedded to my own opinions and to refuse to think myself wiser than others. I cannot change my mind; I can distrust myself. This is all I can do, and this I have done. If I sometimes adopt a confident tone, it is not to impress the reader, it is to make my meaning plain to him. Why should I profess to suggest as doubtful that which is not a matter of doubt to myself? I say just what I think.

关于人们称之为系统化的那部分，它在这不是别的东西只是自然的过程而已，很多读者可能在这里会有理解偏差，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会被攻击，而那些批评者可能是对的。你可能会说，“这本书，更像是一个空想家对教育的展望，而不是一部教育学论著。”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我只写我自己的教育观点，而非他人的观点。我的观点与别人的截然不同，而这些责难声一直不绝于耳。但难道我就应该用别人的眼光来看问题，或者是采用别人的观点吗？我能做到的事，是不刚愎自用，也不自以为是。我虽不能改变我的想法，但我可以质疑自己。这些便是我力所能及，也是我已经做了的事情。如果有的时候，我采用了一种自信确定的口吻，那绝不是为了使读者铭记这一点，而是想清晰地阐释我的观点。为什么我要用令人怀疑的方式来阐释一个我很确信的事情呢？我说的，即是我想的事情。

When I freely express my opinion, I have so little idea of claiming authority that I always give my reasons, so that you may weigh and judge them for yourselves; but though I would not obstinately defend my ideas, I think it my duty to put them forward; for the principles with regard to which I differ from other writers are not matters of indifference; we must know whether they are true or false, for on them depends the happiness or the misery of mankind. People are always telling me to make PRACTICABLE suggestions. You might as well tell me to suggest what people are doing already, or at least to suggest improvements which may be incorporated with the wrong methods at present in use. There are matters with regard to which such a suggestion is far more chimerical than my own, for in such a connection the good is corrupted and the bad is none the better for it. I would rather follow exactly the established method than adopt a better method by halves. There would be fewer contradictions in the man; he cannot aim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at two different objects. Fathers and mothers, what you desire that you can do. May I count on your goodwill?

当我自由地阐释我的观点的时候，我并没有要以自己的观点来作为权威看法，因此总会附上我的理由，这样就可以由读者自己来权衡。虽然我不会固执己见，但是我认为我有责任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关于这些原则，尽管我与别的作者的观点不同，但它们绝不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必须知道它们是正确或是错误，因为它们关系到人类的幸福和痛苦。人们总是告诉我，要提出一些可行性强的建议。他们或许也会要求我去提倡那些人们已经在实行的建议，或者至少是一些能和现行的错误办法结合的改进措施。这些想法比我的更加异想天开，因为这样的一种联系当中，好的就会被坏的玷污，而坏的也不会因此有所改进。我宁可完全参照原有的办法，也不想采用一个好坏参半的

方法。那么人就会少一点矛盾，因为他不可能同时专注两个相反的目标。对你们这些父母而言，你们想要做的事，就是你们能够做到的事。我是否能倚赖你们的好意呢？

There are two things to be considered with regard to any scheme. In the first place, “Is it good in itself？” In the second, “Can it be easily put into practice?”

对于任何计划来说，有两件事是必须要考虑的。第一点，其本身是否足够好；第二点，是否有足够的可行性。

With regard to the first of these it is enough that the scheme should be intelligible and feasible in itself, that what is good in it should be adapted to the nature of things, in this case, for exampl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of education should be suitable to man and adapted to the human heart.

关于第一点，计划本身要有可理解性和可行性，只要它的好处和事物的本质相适合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比如，人们所提出的教育方法应该适合于人，并且要适宜于人类心性。

The second consideration depends upon certain given conditions in particular cases; these conditions are accidental and therefore variable; they may vary indefinitely. Thus one kind of education would be possible in Switzerland and not in France; another would be adapted to the middle classes but not to the nobility. The scheme can be carried out, with more or less success,

according to a multitude of circumstances, and its results can only be determined by its special application to one country or another, to this class or that. Now all these particular applications are not essential to my subject, and they form no part of my scheme. It is enough for me that, wherever men are born into the world, my suggestions with regard to them may be carried out, and when you have made them what I would have them be, you have done what is best for them and best for other people. If I fail to fulfill this promise, no doubt I am to blame; but if I fulfill my promise, it is your own fault if you ask anything more of me, for I have promised you nothing more.

第二个考量，则是受制于某些特殊情况下的特定条件。这些条件都是偶然的，因此是多变的，可以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某种教育在瑞士是可行的，但是在法国就不可行；而另一种教育可能适宜于中产阶级，却不适合贵族使用。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实行不同的计划，且或多或少，都会获得一些成功。而只有将其应用于这个或那个国家，这个或那个阶级，才能决定其效果。但对于本书的研究主旨来说，这些特别的应用并不是最重要的，因此它们也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无论人生于何地，我的建议都能被采用，当他们被培养成我所想要他们成为的人，那你就已经做了一件于他们，或是于别人的最好的事情。能做到这些，对我而言已经足够。如果我不能兑现这个承诺，毫无疑问，我应该被谴责，但是若我履行了我的诺言，那么鉴于我只应允了你们这些，向我索求额外附加的东西，便是你们的错了。

BOOK I

第一卷

God makes all things good; man meddles with them and they become evil. He forces one soil to yield the products of another, one tree to bear another's fruit. He confuses and confounds time, place, and natural conditions. He mutilates his dog, his horse, and his slave. He destroys and defaces all things; he loves all that is deformed and monstrous; he will have nothing as nature made it, not even man himself, who must learn his paces like a saddle-horse, and be shaped to his master's taste like the trees in his garden. Yet things would be worse without this education, and mankind cannot be made by halves. Under existing conditions a man left to himself from birth would be more of a monster than the rest. Prejudice, authority, necessity, example, all the social conditions into which we are plunged, would stifle nature in him and put nothing in her place. She would be like a sapling chance sown in the midst of the highway, bent hither and thither and soon crushed by the passers-by.

上帝使万物完美无缺，然而人类的胡乱干预使它们变质。他总是强迫某种土地长出另一种土壤的果实，幻想着某种树结出另一种树的果实。他使时间、地点和自然条件混乱不堪。他迫害他的狗，他的马，还有他的仆人。他毁灭一切，却爱着一切丑陋和畸形的事物，他不爱事物自然的原有的面目，甚至对于人类，也要像驯马一样加以训练，像花园里的树一样，按照他的意愿进行修剪。然而要是没有教育，情况会更加糟糕。人类决不能接受这种不完善的教育。在现有的条件下，一个生来随性而不接受教育的人，比起其他人来说，更像是

一个怪物。偏见，权威，需要，先例，所有这些牵制着我们的社会条件，都会扼杀他的本性且对他没有任何帮助。他的天性就会像一颗偶然被播种在公路中间的幼苗，被撞来撞去，很快，就会死去。

Tender, anxious mother [2_1] , I appeal to you. You can remove this young tree from the highway and shield it from the crushing force of social conventions. Tend and water it ere it dies. One day its fruit will reward your care. From the outset raise a wall round your child's soul; another may sketch the plan, you alone should carry it into execution.

我呼吁你们啊，温柔焦虑的母亲们 [3_1] 。你们能够移栽这颗公路上的幼苗，保护它，免受社会风俗的破坏力。照顾它，灌溉它，避免它死去。它硕果累累的那天，便是你获得回报的那天。从生命之初，便为你的孩子的心灵筑起保护墙吧，他人或许可以画出围墙的范围，而你应该真真切切地将其付诸现实。

Plants are fashioned by cultivation, man by education. If a man were born tall and strong, his size and strength would be of no good to him till he had learnt to use them; they would even harm him by preventing others from coming to his aid [2_2] ;left to himself he would die of want before he knew his needs. We lament the helplessness of infancy; we fail to perceive that the race would have perished had not man begun by being a child.

植物因辛勤耕种而成形，人则因教育而为人。如果一个人生来便高大强壮，除非他学会如何运用自己的身材和体力，否则这些东西对他是没有用的，甚至还会成为妨碍别人帮助他的障碍 [3_2] ；他只能兀

自一人，在还没有明白自己需要什么以前，就死去了。我们为婴儿的无助而哀悼，却没有意识到，要是人生来不是婴儿，那么人类早已毁灭。

We are born weak, we need strength; helpless, we need aid; foolish, we need reason. All that we lack at birth, all that we need when we come to man's estate, is the gift of education.

因为我们生而脆弱，我们需要力量；因为我们生而无助，我们需要帮助，因为我们生而愚钝，我们需要理性。所有那些我们出生时所缺少的东西，那些长大成人不可缺少的东西，便是教育能赋予你的东西。

This education comes to us from nature, from men, or from things. The inner growth of our organs and faculties is the education of nature, the use we learn to make of this growth is the education of men, what we gain by our experience of our surroundings is the education of things.

这种教育或是来自于自然，或是来自于他人，或是来自于事物。我们的器官和能力的内在发展和培养，是自然的教育；学会利用这种发展则是人的教育；我们从周遭事物的经验所得则是事物的教育。

Thus we are each taught by three masters. If their teaching conflicts, the scholar is ill-educated and will never be at peace with himself; if their teaching agrees, he goes straight to his goal, he lives at peace with himself, he is well-educated.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受教于三位老师。如果三者的教育产生冲突，那么这个人接受的教育便是扭曲的，并且将永远不符合他本人的心意，如果三者的教育和谐一致，那么他就会向他的目标勇往直前，与自己和谐相处，这样的学生才算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Now of these three factors in education nature is wholly beyond our control, things are only partly in our power; the education of men is the only one controlled by us; and even here our power is largely illusory, for who can hope to direct every word and deed of all with whom the child has to do.

但在这三种教育因素中，自然是我们完全无法掌控的，事物的教育只能在某些方面被我们决定，只有人的教育是我们唯一能够加以控制的。然而，哪怕在这一部分，我们的掌控力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假定的，因为谁又能期望管理与孩子接触的所有人的言行呢？

Viewed as an art, the success of education is almost impossible, since the essential conditions of success are beyond our control. Our efforts may bring us within sight of the goal, but fortune must favour us if we are to reach it.

鉴于成功的关键因素是我们几乎无法控制的，那么当我们把教育看成一种艺术，它的成功便是遥不可及的。我们苦心孤诣的努力不过能让我们离目标更近一些，但要实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幸运的眷顾。

What is this goal? As we have just shown, it is the goal of nature. Since all three modes of education must work together, the two that we can control must follow the lead of that which is beyond our control. Perhaps this word Nature has too vague a meaning. Let us try to define it.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自然的目标。因为这三种教育模式必须相辅相成，我们要使两种我们能够掌控的教育模式与我们无法控制的那一种相适应。可能自然这个词语的定义太过含糊。让我们试着去定义一下它。

Nature, we are told, is merely habit. What does that mean? Are there not habits formed under compulsion, habits which never stifle nature? Such, for example, are the habits of plants trained horizontally. The plant keeps its artificial shape, but the sap has not changed its course, and any new growth the plant may make will be vertical. It is the same with a man's disposition; while the conditions remain the same, habits, even the least natural of them, hold good; but change the conditions, habits vanish, nature reasserts herself. Education itself is but habit, for are there not people who forget or lose their education and others who keep it? Whence comes this difference? If the term nature is to be restricted to habits conformable to nature we need say no more.

正如我们所知的，自然仅仅是一种习惯。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有一些强制养成的习惯永远也不能抹杀天性的吗？比如，有些植物被培养成水平生长。虽然人可以改变树的形状，但是树液却保持原来的前进方向，并且在以后的成长中，树依旧会保持垂直生长。这和人的习性相同，当外在条件保持相同时，那些习惯，即使是最不自然的习

惯，也会保持下去。但当我们改变条件，习惯就会消失，人的本性就会再次显现。教育本身只不过是习惯，因为不是有人忘记或丢掉了他们所受的教育，而有些人一直保留住了吗？这种差异从何而来呢？如果自然这个词仅仅被局限在适合天性的习惯之中，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We are born sensitive and from our birth onwards we are affected in various ways by our environment. As soon as we become conscious of our sensations we tend to seek or shun the things that cause them, at first because they are pleasant or unpleasant, then because they suit us or not, and at last because of judgments formed by means of the ideas of happiness and goodness which reason gives us. These tendencies gain strength and permanence with the growth of reason, but hindered by our habits they are more or less warped by our prejudices. Before this change they are what I call Nature within us.

我们生来就是敏感的，自出生以来，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被周遭环境影响。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感觉，我们就不免想去寻找或者回避产生这些感觉的事物，首先要看这些事物是使我们感到愉快还是不愉快，其次要看它们是不是适合我们，最后要看它们是不是符合理性所赋予我们的关于幸福美满的观念。这些倾向都会随着理性的发展，日益强化并愈发持久，但是受制于我们的习惯，它们或多或少地会被我们的偏见所歪曲。在这发生变化之前，它就是所我提到的，我们内在的自然。

Everything should therefore be brought into harmony with these natural tendencies, and that might well be if our three modes of education merely differed from one another; but what can be

done when they conflict, when instead of training man for himself you try to train him for others? Harmony becomes impossible. Forced to combat either nature or society, you must make your choice between the man and the citizen, you cannot train both.

因此，每一件事都应该和这些自然的倾向和谐统一，若我们的这三种教育模式仅仅是互不相同，可能也是无伤大雅的。但是当它们相互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当我们培养一个人的目的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别人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和谐统一便成了不可能的事。被逼着和自然或是社会斗争，你必须在人和公民的身份之间抉择，你不可能把一个人培养成具有双重身份的人。

The smaller social group, firmly united in itself and dwelling apart from others, tends to withdraw itself from the larger society. Every patriot hates foreigners; they are only men, and nothing to him [2_3] . This defect is inevitable, but of little importance. The great thing is to be kind to our neighbours. Among strangers the Spartan was selfish, grasping, and unjust, but unselfishness, justice, and harmony ruled his home life. Distrust those cosmopolitans who search out remote duties in their books and neglect those that lie nearest. Such philosophers will love the Tartars to avoid loving their neighbour.

那些内部团结紧密，孤立于他人的小社会团体，更倾向于远离大的社会。每个爱国人士都痛恨外国人，那些外国人，不过是人而已，对他们而言，并无丝毫的关系 [3_3] 。这种瑕疵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无关紧要。最好的事情应该是对邻人友善亲和。在外国人当中，斯巴达人是自私的，贪婪的，不义的，但其实在他们国内，无私、正义和和谐无一不在他们的生活中体现。不要去相信那些世界主义者，他们在

书本上寻求千里之外的责任，却忽视了周围的义务。这种哲学家是为了逃避去爱他们的邻人，才去爱的鞑靼人。

The natural man lives for himself; he is the unit, the whole, dependent only on himself and on his like. The citizen is but the numerator of a fraction, whose value depends on its denominator; his value depends upon the whole, that is, on the community. Good social institutions are those best fitted to make a man unnatural, to exchange his independence for dependence, to merge the unit in the group, so that he no longer regards himself as one, but as a part of the whole, and is only conscious of the common life. A citizen of Rome was neither Caius nor Lucius, he was a Roman; he ever loved his country better than his life. The captive Regulus professed himself a Carthaginian; as a foreigner he refused to take his seat in the Senate except at his master's bidding. He scorned the attempt to save his life. He had his will, and returned in triumph to a cruel death. There is no great likeness between Regulus and the men of our own day.

自然人总是为自己而活，他是一个单位，他是一个整体，只依赖他自己和他所爱的东西。但公民只是分数的分子，他的价值倚赖于分母，倚赖于整体，即整个社会。良好的社会制度能够最大程度上使一个人脱离他的自然天性，让一个人愿意用独立性换取依赖性，融入集体，成为其中的一个单位。只有这样，他才能不再把自己看成唯一，而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他才能意识到什么是公共生活。罗马的一个公民，他既不是凯厄斯，也不是卢修斯，他只是一个罗马人，他深爱着他的国家，甚于他的生命。被俘虏的雷居鲁斯自称是迦太基人，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拒绝接受罗马元老院的成员身份，只有一个迦太基人给他下命令，他才肯接受。他看不起这种想要挽救他生命的行为。他如愿以偿，胜利回去，却无奈惨死。雷居鲁斯和我们今天的人，没

有一点相似之处。

The Spartan Pedaretes presented himself for admission to the council of the Three Hundred and was rejected; he went away rejoicing that there were three hundred Spartans better than himself. I suppose he was in earnest; there is no reason to doubt it. That was a citizen.

斯巴达人佩达勒特自荐参加三百人会议，却被拒绝，他很高兴地离开，因为他认为在斯巴达，有三百个人比他更优秀。私以为，他是真诚的，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去质疑他。这才是一个公民。

A Spartan mother had five sons with the army. A Helot arrived; trembling she asked his news. “Your five sons are slain.” “Vile slave, was that what I asked thee?” “We have won the victory.” She hastened to the temple to render thanks to the gods. That was a citizen.

一个斯巴达母亲有五个儿子，全部都参军了。有一个奴隶来了，她颤抖着问他儿子们的消息。“你的五个儿子全部战死沙场了。”“你这卑贱的奴隶，这又不是我想问你的事。”“我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母亲赶紧跑到寺庙去感激众神。这才是一个公民。

He who would preserve the supremacy of natural feelings in social life knows not what he asks. Ever at war with himself, hesitating between his wishes and his duties, he will be neither a man nor a citizen. He will be of no use to himself nor to others. He

will be a man of our day, a Frenchman, an Englishman, one of the great middle class.

一个在社会生活中，想要保持自然感情至上的人，是不知道他的需求的。一个永远自我斗争的人，一个在个人意愿和责任之间犹疑的人，既不可能成为一个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公民。于自己，于别人，他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他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都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人。

To be something, to be himself, and always at one with himself, a man must act as he speaks, must know what course he ought to take, and must follow that course with vigour and persistence. When I meet this miracle it will be time enough to decide whether he is a man or a citizen, or how he contrives to be both.

一个人，若是想要有所为，想要独立自持、始终如一，就必须言行一致，就必须知道他应该采取的主张，就必须坚毅而有力地实行这一主张。当我看到这样的奇迹时，时间可以帮助我判断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公民，又或者他是如何同时拥有这两种身份的。

Two conflicting types of educational systems spring from these conflicting aims. One is public and common to many, the other private and domestic.

两种冲突的教育体系源于两个对立的目标。一个是公众的和普遍的，一个是私人的和家庭的。

If you wish to know what is meant by public education, read Plato's Republic. Those who merely judge books by their titles take this for a treatise on politics, but it is the finest treatise on education ever written.

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是公众教育，读读柏拉图的《理想国》。那些仅以标题来判断书的内容的人可能会把这本书当作政治论著，但事实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教育学论著。

In popular estimation the Platonic Institute stands for all that is fanciful and unreal. For my own part I should have thought the system of Lycurgus far more impracticable had he merely committed it to writing. Plato only sought to purge man's heart; Lycurgus turned it from its natural course.

在公众认知中，柏拉图制度代表了幻想和不真实。就我自己而言，要是莱克格斯的理论体系仅局限于纸上谈兵的话，我可能认为他的制度更加不实际一些。柏拉图旨在净化人类的心灵，莱克格斯则设法改变其自然的进程。

The public institute does not and cannot exist, for there is neither country nor patriot. The very words should be struck out of our language. The reason does not concern us at present, so that though I know it I refrain from stating it.

这种公共机关不再、也不可能存在下去，因为这里并没有国家或

者爱国者的存在。这两个词应该从我们现在的语言中剔除。至于理由，和我们现在的主题并没有太大关系，因此即使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也并不想提及。

I do not consider our ridiculous colleges [2_4] as public institutes, nor do I include under this head a fashionable education, for this education facing two ways at once achieves nothing. It is only fit to turn out hypocrites, always professing to live for others, while thinking of themselves alone. These professions, however, deceive no one, for every one has his share in them; they are so much labour wasted.

那些可笑的学院 [3_4] ，我并不将其看作公共机关，也不会把它们当作一种流行的教育，因为这种教育同时追求两个相反的目标，最终将一无所成。它只会教育出一些伪君子，一群自称为别人而活却实际上自私自利的人。然而，这些声明，是骗不过任何人的，因为在这件事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份儿，他们的努力掩饰也是徒劳无功的。

Our inner conflicts are caused by these contradictions. Drawn this way by nature and that way by man, compelled to yield to both forces, we make a compromise and reach neither goal. We go through life, struggling and hesitating, and die before we have found peace, useless alike to ourselves and to others.

我们内在的冲突就是由这些矛盾造成的。我们被自然牵扯到一处，又被人牵扯到另一处，且不得不向两种力量屈服。所以我们只能妥协，并且无法达成其中任何一个目标。我们历经一生，挣扎着，犹

豫着，在获得平静之前就死去了，对他人对自己都毫无价值。

There remains the education of the home or of nature; but how will a man live with others if he is educated for himself alone? If the twofold aims could be resolved into one by removing the man's self-contradictions, one great obstacle to his happiness would be gone. To judge of this you must see the man full-grown; you must have noted his inclinations, watched his progress, followed his steps; in a word you must really know a natural man. When you have read this work, I think you will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in this inquiry.

接下来就是家庭教育或是自然教育了，但是若一个人受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那他对别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个双重目标可以通过消除人的自我矛盾而融合为一个，那么便可以消除一个阻碍他幸福的绊脚石。要判断一个人，必须观察他成人之后是什么样的；你必须了解他的倾向，关注他的发展，跟随他的步伐；总而言之，我们必须真正地了解这个自然人。当看完整本书后，我相信读者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

What must be done to train this exceptional man! We can do much, but the chief thing is to prevent anything being done. To sail against the wind we merely follow one tack and another; to keep our position in a stormy sea we must cast anchor. Beware, young pilot, lest your boat slip its cable or drag its anchor before you know it.

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培养出这样一个非凡的人呢？我们能

做的事情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碌碌无为，不要无所事事。若要逆风而行，我们只要调整航向迂回行驶就够了；但若要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原位，我们就必须抛锚定向。当心啊，年轻的水手啊，别在你不知情的时候缆绳都松了，船锚都动摇了。

In the social order where each has his own place a man must be educated for it. If such a one leave his own station he is fit for nothing else. His education is only useful when fate agrees with his parents' choice; if not, education harms the scholar, if only by the prejudices it has created. In Egypt, where the son was compelled to adopt his father's calling, education had at least a settled aim; where social grades remain fixed, but the men who form them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no one knows whether he is not harming his son by educating him for his own class.

在社会秩序当中，每个人都有其应有的位置，并且他所受的教育是为这个位置量身定做的。要是这样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岗位，他就无所适从了。只有当命运和他父母的选择一致时，他所受的教育才有用武之地；否则，教育会带给他偏见，反而对他有害处。在埃及，儿子必须听从父亲的命令，因此，教育至少是有一个既定的目标的。而在我们这里，社会阶层是比较固定的，但人却是永远在改变的，没有人知道，若是培养他的儿子去取得自己的地位，是不是反而在害他的儿子。

In the natural order men are all equal and their common calling is that of manhood, so that a well-educated man cannot fail to do well in that calling and those related to it. It matters little to me whether my pupil is intended for the army, the church, or the law. Before his parents chose a calling for him nature called him to

be a man. Life is the trade I would teach him. When he leaves me, I grant you, he will be neither a magistrate, a soldier, nor a priest; he will be a man. All that becomes a man he will learn as quickly as another. In vain will fate change his station, he will always be in his right place. “Occupavi te, fortuna, atque cepi; omnes-que aditus tuos interclusi, ut ad me aspirare non posses.” The real object of our study is man and his environment. To my mind those of us who can best endure the good and evil of life are the best educated; hence it follows that true education consists less in precept than in practice. We begin to learn when we begin to live; our education begins with ourselves, our first teacher is our nurse. The ancients used the word “Education” in a different sense, it meant “Nurture.” “Educit obstetrix,” says Varro. “Educat nutrix, instituit paedagogus, docet magister.” Thus, education, discipline, and instruction are three things as different in their purpose as the dame, the usher, and the teacher. But these distinctions are undesirable and the child should only follow one guide.

在自然的秩序中，人人都是平等的，而他们共同的诉求就是拥有完善的人格，因此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一定是人格完善的。对我而言，我的学生能否成为军人，成为牧师，或是律师，并不重要。在他父母为他选择职业之前，自然已经教会他如何做一个人。而我要教他的，是生活。这样，当他出师的时候，我保证，他虽然不是一个法官，一个士兵，也不是一个牧师，但是，他是一个人。他会拥有完整的人格，并且不会比其他人学得慢。即使命运想要改变他的位置也是徒劳的，他会一直呆在他自己的位置。命运啊，我对你早有防备，我已经把你俘虏，并且把所有一切你能够来我身边的道路通通堵塞。我们真正要研究的，就是人和他所处的环境。在我心中，一个真正接受最良好的教育的人，必定是一个能够忍受生活的起落悲喜的人；因此真正的教育强调实践而非理论。从我们一出生，我们便开始学习，我们的教育是和我们的生命一起开始的，我们的第一任老师便是我们的

乳母。当古人使用“教育”这个词的时候，它的意思是“养育”。瓦罗曾经说过，“助产士接生，乳母养育，塾师启蒙，老师教导。”因此，教育，教训，教导，正如乳母，塾师，老师一样，是各不相同的。然而人们没有必要弄清楚其中的差别，孩子也应该只追随一个向导。

We must therefore look at the general rather than the particular, and consider our scholar as man in the abstract, man exposed to all the changes and chances of mortal life. If men were born attached to the soil of our country, if one season lasted all the year round, if every man's fortune were so firmly grasped that he could never lose it, then the established method of education would have certain advantages; the child brought up to his own calling would never leave it, he could never have to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any other condition. But when we consider the fleeting nature of human affairs, the restless and uneasy spirit of our times, when every generation overturns the work of its predecessor, can we conceive a more senseless plan than to educate a child as if he would never leave his room, as if he would always have his servants about him? If the wretched creature takes a single step up or down he is lost. This is not teaching him to bear pain; it is training him to feel it.

因此我们必须一般地观察问题，而不是纠结于个例，要把我们的学生看成抽象的人，面对着人世间的千变万化的人。如果一个人生来就固守在他的本土，如果一种季节持续整年，如果每个人都紧紧地掌握命运，从未失去，那么原有的教育方法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会坚守他的诉求和位置，不曾改变，他永远不会遇到其他位置所要面对的困难。但是当我们认识到人事千变万化的本质以及焦躁不安的时代精神，当前人的成果一次次被推翻，有什么会比把孩子当作永远保持原位，永远有随从服侍的人来教育更加没有意义呢？只

要这个可悲的人随便向上或是向下行一步，他就不复存在了。这并不是要教他去忍受痛苦，而是让他学着去感受它。

People think only of preserving their child's life; this is not enough, he must be taught to preserve his own life when he is a man, to bear the buffets of fortune, to brave wealth and poverty, to live at need among the snows of Iceland or on the scorching rocks of Malta. In vain you guard against death; he must needs die; and even if you do not kill him with your precautions, they are mistaken. Teach him to live rather than to avoid death: life is not breath, but action, the use of our senses, our mind, our faculties, every part of ourselves which makes us conscious of our being. Life consists less in length of days than in the keen sense of living. A man maybe buried at a hundred and may never have lived at all. He would have fared better had he died young.

人们只关心如何保护孩子的生命；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教会他们如何在长大成人后保护自己，去忍受各种打击，去勇敢面对贫穷和富有，必要时，教他在冰岛的冰天雪地中或者马耳他的灼热岩石上也能够生存。抵抗死亡是徒劳的，他终归是会死的，而且即使他的死不是由于你的防范措施造成的，人们依旧会曲解你。教他学会生活而非逃避死亡；生活不是呼吸，而是行动，是利用我们的感官，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才能，学会使用一切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的东西。生命在于意义而非长度。一个一百岁才死的人，可能他这一生都从未真正活过。他还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呢。

Our wisdom is slavish prejudice, our customs consist in control, constraint, compulsion. Civilised man is born and dies a slave. The infant is bound up in swaddling clothes, the corpse is nailed down

in his coffin. All his life long man is imprisoned by our institutions.

我们的智慧都是奴性的偏见，我们的所有习惯都在控制、约束、强迫我们。文明的人生为奴，死亦为奴。婴儿被包裹在破絮的襁褓中，死者则被钉在棺材里。人终其一生，都被制度所束缚。

I am told that many midwives profess to improve the shape of the infant's head by rubbing, and they are allowed to do it. Our heads are not good enough as God made them, they must be moulded outside by the nurse and inside by the philosopher. The Caribs are better off than we are. The child has hardly left the mother's womb, it has hardly begun to move and stretch its limbs, when it is deprived of its freedom. It is wrapped in swaddling bands, laid down with its head fixed, its legs stretched out, and its arms by its sides; it is wound round with linen and bandages of all sorts so that it cannot move. It is fortunate if it has room to breathe, and it is laid on its side so that water which should flow from its mouth can escape, for it is not free to turn its head on one side for this purpose.

人们告诉我，很多助产士自称能够通过按摩改变婴儿头部的形状，人们也允许她们这样做。也许是上帝造人时把我们的头造得不够好，因此其外形要由助产士来改变，而里面的内容则由哲学家来决定。加勒比人就幸运得多了。当婴儿才刚出娘胎，刚开始活动和伸展四肢，便被剥夺了自由。人们就把他包裹在襁褓内，固定着他的头，两腿伸直，双手放在身体两边，用各种各样的亚麻绑带缠绕着他，使他不得动弹。如果人们不把他捆得无法呼吸，让他能够侧躺着，吐出该吐的口水，这个孩子已经算很幸运了，因为他是不可能自由地转头来吐口水的。

The new-born child requires to stir and stretch his limbs to free them from the stiffness resulting from being curled up so long. His limbs are stretched indeed, but he is not allowed to move them. Even the head is confined by a cap. One would think they were afraid the child should look as if it were alive.

新生儿需要伸展四肢，来缓解因蜷曲太久而造成的僵硬。他的四肢是伸展着的，但无法自由移动。连头的运动也被帽子束缚着。似乎人们害怕看到孩子活着的样子。

Thus the internal impulses which should lead to growth find an insurmountable obstacle in the way of the necessary movements. The child exhausts his strength in vain struggles, or he gains strength very slowly. He was freer and less constrained in the womb; he has gained nothing by birth.

因此，成长发育的内在动力便在必需的活动中面临着难以对付的障碍。在徒劳的挣扎努力中，孩子耗尽了他的精力，或者说他会成长得很慢。在母体中，他更加自由、不受束缚，出生并未带给他任何好处。

The inaction, the constraint to which the child's limbs are subjected can only check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and humours; it can only hinder the child's growth in size and strength, and injure its constitution. Where these absurd precautions are absent, all the men are tall, strong, and well-made. Where children are swaddled, the country swarms with the hump-backed, the lame, the bow-

legged, the rickety, and every kind of deformity. In our fear lest the body should become deformed by free movement, we hasten to deform it by putting it in a press. We make our children helpless lest they should hurt themselves.

孩子四肢所遭受的限制和束缚，只会抑制血液和体液的循环；它只会阻碍孩子增强体力和成长，损伤他的体质。没有那些可笑的过度保护的地方，人反而成长得高大强壮，体型匀称。那些把孩子束缚起来的国家，往往充斥着驼背、跛足、弓形腿、患佝偻病的，以及各种畸形的人。我们害怕自由的活动会让孩子畸形，却逼着他们长成了畸形。为了不让孩子伤到自己，我们宁可让他们处于无力的境地。

Is not such a cruel bondage certain to affect both health and temper? Their first feeling is one of pain and suffering; they find every necessary movement hampered; more miserable than a galley slave, in vain they struggle, they become angry, they cry. Their first words you say are tears. That is so. From birth you are always checking them, your first gifts are fetters, your first treatment, torture. Their voice alone is free; why should they not raise it in complaint? They cry because you are hurting them; if you were swaddled you would cry louder still.

这么严重的束缚难道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和性情吗？他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痛苦，他们发现他们的每一个必要的活动都被阻碍，他们比一个被绑住的奴隶还要可怜，他们徒劳地挣扎，他们生气，他们大哭。你们说，他们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哭喊。就是这样。从出生以来，你们就一直束缚着他们，你们给他们的第一份礼物是枷锁，第一种待遇是折磨。只有他们的声音是自由的，难道他们不应该高声抱怨哭诉吗？他们哭泣是因为你们伤害了他们；如果你被束缚，你们可能

会哭得更大声。

What is the origin of this senseless and unnatural custom? Since mothers have despised their first duty and refused to nurse their own children, they have had to be entrusted to hired nurses. Finding themselves the mothers of a stranger's children, without the ties of nature, they have merely tried to save themselves trouble. A child unswaddled would need constant watching; well swaddled it is cast into a corner and its cries are unheeded. So long as the nurse's negligence escapes notice, so long as the nursling does not break its arms or legs, what matter if it dies or becomes a weakling for life. Its limbs are kept safe at the expense of its body, and if anything goes wrong it is not the nurse's fault.

这种荒谬的习惯到底从何而来呢？自从母亲们忽视自己的首要责任并拒绝喂养她们的孩子，她们就不得不委托雇佣的乳母来喂养孩子。乳母们认为自己是在给陌生人的孩子做母亲，没有自然的纽带，他们就努力减少麻烦。一个未被束缚的孩子无时无刻不需要看管，而把他裹在襁褓里，扔在一个角落，那么它们的哭声便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乳母的漠不关心没有被发现，只要孩子没有断手断脚，那么即便他死了，或是成为一个虚弱的人，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人们保存了孩子的四肢，却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即使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是乳母的错了。

These gentle mothers, having got rid of their babies, devote themselves gaily to the pleasures of the town. Do they know how their children are being treated in the villages? If the nurse is at all busy, the child is hung up on a nail like a bundle of clothes and is left crucified while the nurse goes leisurely about her business.

Children have been found in this position purple in the face, their tightly bandaged chest forbade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and it went to the head; so the sufferer was considered very quiet because he had not strength to cry. How long a child might survive under such conditions I do not know, but it could not be long. That, I fancy, is one of the chief advantages of swaddling clothes.

那些文雅的母亲，在摆脱了孩子的束缚以后，就可以欢愉地在城里寻欢作乐。她们知不知道她们乡下的孩子受到怎样的对待呢？如果乳母稍微有点忙的话，孩子就会被裹起来，像一捆衣服一样被扔在一边，任由他们受罪，乳母则在一旁不紧不慢地干活。在这种状况下的孩子脸色发青，胸部被裹得紧紧的，血液无法流通，于是便充斥到头部；人们还觉得这个受苦的孩子非常安静，其实是因为他无力哭喊了。我不知道一个孩子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生存多长时间，但一定不会很久。我想，这就是襁褓的最主要优势之一了吧。

It is maintained that unswaddled infants would assume faulty positions and make movements which might injure the proper development of their limbs. That is one of the empty arguments of our false wisdom which has never been confirmed by experience. Out of all the crowds of children who grow up with the full use of their limbs among nations wiser than ourselves, you never find one who hurts himself or maims himself; their movements are too feeble to be dangerous, and when they assume an injurious position, pain warns them to change it.

人们认为，未被束缚的婴儿会采取错误的姿势，会有一些可能损伤他们四肢正常发育的活动。这是我们从虚假的智慧中得出的空洞论点，从没有被实验证实过。在比我们明智的国家里，在那么多四肢自

由发展的孩子中，你找不到一个伤害自己或是使自己致残的例子；他们的动作因为太过无力，而不会有什么危险，而且当它们采用了一个会受伤的姿势，疼痛就会提醒他们换个姿势。

We have not yet decided to swaddle our kittens and puppies; are they any the worse for this neglect? Children are heavier, I admit, but they are also weaker. They can scarcely move, how could they hurt themselves! If you lay them on their backs, they will lie there till they die, like the turtle, unable to turn itself over. Not content with having ceased to suckle their children, women no longer wish to do it; with the natural result motherhood becomes a burden; means are found to avoid it. They will destroy their work to begin it over again, and they thus turn to the injury of the race the charm which was given them for its increase. This practice, with other causes of depopulation, forbodes the coming fate of Europe. Her arts and sciences, her philosophy and morals, will shortly reduce her to a desert. She will be the home of wild beasts, and her inhabitants will hardly have changed for the worse.

我们从未想过去束缚小狗小猫，难道它们因我们的忽视而成长得不好了吗？我承认，孩子们会更重一些，但他们也是脆弱的。他们几乎不能移动，又怎么能伤害到他们自己呢！如果你让他们仰面躺着，他就会一直躺在那里直到死去，像乌龟一样，无法翻身。妇女们已经不再用母乳喂养他们的孩子，但她们依旧不满足，她们竟然想不生孩子，其后果也很自然，母亲的身份变成了负担，这意味着她们会想方设法避免这一职责。她们会让怀孕变得无用，因而可以重新来过，这样她们把繁衍的美丽转变为对种族的伤害。这一行为，连同其他一些导致人口减少的原因，已经预示了欧洲的未来。它的艺术和科学，它的哲学和美德，会很快使它变成荒凉的沙漠。它会成为野兽的聚居地，可它的居民也不愿因此改变。

I have sometimes watched the tricks of young wives who pretend that they wish to nurse their own children. They take care to be dissuaded from this whim. They contrive that husbands, doctors, and especially mothers should intervene. If a husband should let his wife nurse her own baby it would be the ruin of him; they would make him out a murderer who wanted to be rid of her. A prudent husband must sacrifice paternal affection to domestic peace. Fortunately for you there are women in the country districts more continent than your wives. You are still more fortunate if the time thus gained is not intended for another than yourself.

我也曾经看到过年轻的妻子玩弄诡计，她们假装愿意喂养自己的孩子。她们知道别人一定会劝阻她们放弃这些怪念头。她们就会设法让她们的丈夫、医生甚至让她们的母亲来干涉这件事。如果一个丈夫让她的妻子亲自喂养孩子，那就会毁坏他的名誉，别人会把他当成一个想要摆脱妻子而杀死妻子的杀人犯。一个谨慎的丈夫必定是一个愿意牺牲父爱来换取家庭幸福的人。幸运的是，对你来说，在乡下有很多比你的妻子更加谨慎的女人。要是你的妻子把这样省下来的时间都花在你身上，那你就更幸运了。

There can be no doubt about a wife's duty, but, considering the contempt in which it is held, it is doubtful whether it is not just as good for the child to be suckled by a stranger. This is a question for the doctors to settle, and in my opinion they have settled it according to the women's wishes [2_5] , and for my own part I think it is better that the child should suck the breast of a healthy nurse rather than of a petted mother, if he has any further evil to fear from her who has given him birth.

妻子的责任是无可辩驳的，但是，由于她们轻视这种责任，便争辩说喝自己的奶和喝别人的奶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需要医生来回答的问题。在我看来，他们是根据妇女的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3_5] ，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认为，要是他顾虑会从母亲那里遗传什么病的话，请一个健康的乳母来哺育孩子一定胜过一个被宠坏的母亲。

Ought the question, however, to be considered only from the physiological point of view? Does not the child need a mother's care as much as her milk? Other women, or even other animals, may give him the milk she denies him, but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a mother's love.

然而，难道这个问题只能从生理学方面来考虑了吗？难道孩子们不是像渴望母乳一样渴望着母亲的关怀吗？别的妇女，甚至一些动物，可以让孩子吃到自己所不愿意给他的母乳，但是母亲的爱是无可替代的。

The woman who nurses another's child in place of her own is a bad mother; how can she be a good nurse? She may become one in time; use will overcome nature, but the child may perish a hundred times before his nurse has developed a mother's affection for him.

去哺育别人的孩子而不去哺育自己的孩子的人，就不是好母亲，那这样的人如何做一个优秀的乳母呢？她还是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乳母的，但这需要时间，需要用习惯来克服天性，然而在乳母对孩子产生母爱之前，这个孩子可能已经死过一百次了。

And this affection when developed has its drawbacks, which should make any feeling woman afraid to put her child out to nurse. Is she prepared to divide her mother's rights, or rather to abdicate them in favour of a stranger; to see her child loving another more than herself; to feel that the affection he retains for his own mother is a favour, while his love for his foster-mother is a duty; for is not some affection due where there has been a mother's care?

而这种培养出来的爱也是有弊端的，它会让那些有感情的母亲害怕把孩子交给乳母来抚养。她是否准备好了把做母亲的权利分给别人呢，或者更准确一点，让给一个陌生人？她是否愿意看着她的孩子爱别人甚于爱她自己呢？当孩子把爱她作为礼数，而把爱养母作为一种责任，她是否有心理准备呢？他在那里得到了母亲的关爱，难道不应该尽一个儿子的依赖之情吗？

To remove this difficulty, children are taught to look down on their nurses, to treat them as mere servants. When their task is completed the child is withdrawn or the nurse is dismissed. Her visits to her foster-child are discouraged by a cold reception. After a few years the child never sees her again. The mother expects to take her place, and to repair by her cruelty the results of her own neglect. But she is greatly mistaken; she is making an ungrateful foster-child, not an affectionate son; she is teaching him ingratitude, and she is preparing him to despise at a later day the mother who bore him, as he now despises his nurse.

为了消除这种弊端，人们便教孩子要蔑视他们的乳母，像对待仆人一样对待她们。当乳母的任务完成，孩子就被带回来，或者乳母就被辞退了。她若想看望一下她养育过的孩子，只能换来别人的闭门

羹。几年以后，孩子再也不会看到她了。孩子的生母想要替代乳母的位置，想要用她这种残酷的行为来弥补她过去对孩子的忽视。但是，她大错特错。她只能培养出一个忘恩负义的孩子，而不是一个真心实意的儿子；她教他不知感恩，并且她是在教唆她的孩子，日后可以像鄙夷他的乳母一样鄙夷他的亲生母亲。

How emphatically would I speak if it were not so hopeless to keep struggling in vain on behalf of a real reform. More depends on this than you realise. Would you restore all men to their primal duties, begin with the mothers; the results will surprise you. Every evil follows in the train of this first sin; the whole moral order is disturbed, nature is quenched in every breast, the home becomes gloomy, the spectacle of a young family no longer stirs the husband's love and the stranger's reverence. The mother whose children are out of sight wins scanty esteem; there is no home life, the ties of nature are not strengthened by those of habit; fathers, mothers, children, brothers, and sisters cease to exist. They are almost strangers; how should they love one another? Each thinks of himself first. When the home is a gloomy solitude pleasure will be sought elsewhere.

要是讨论一些可行的改良措施不那么令人灰心丧气的话，我多么想着重强调这一点啊。这件事所牵扯到的方面，比你想象中的更多。要是你能让所有的人都承担起他们的首要责任，就要先从那些做母亲的人开始，结果会让你大吃一惊。所有的邪恶都是由这一原罪产生的。整体的道德秩序被扰乱，人泯灭了天性，家里变得阴郁沉闷，一个新家庭的美好场景再也不能激起丈夫的爱和陌生人的尊敬了。别人看不到孩子，也就不尊重孩子的母亲了；家庭生活不复存在，习惯也无法增进血缘关系了；父亲，母亲，孩子，兄弟，姐妹，这些角色都消逝不见了。他们几乎都是陌生人，又如何让他们爱着彼此呢？每个

人都是只顾自己。当家庭里只有阴郁和孤独，那我们只能到别处寻找欢乐了。

But when mothers deign to nurse their own children, then will be a reform in morals; natural feeling will revive in every heart; there will be no lack of citizens for the state; this first step by itself will restore mutual affection. The charms of home are the best antidote to vice. The noisy play of children, which we thought so trying, becomes a delight; mother and father rely more on each other and grow dearer to one another; the marriage tie is strengthened. In the cheerful home life the mother finds her sweetest duties and the father his pleasantest recreation. Thus the cure of this one evil would work a wide-spread reformation; nature would regain her rights. When women become good mothers, men will be good husbands and fathers.

但当母亲们亲自去抚育他们自己孩子的时候，道德秩序便得到了改良，自然的感情在每个人的心里重获新生，国家的人口又兴旺起来，仅仅这第一步便会使大家相亲相爱。家庭的魅力成了改正恶习的解药。那些我们从前觉得令人难受的孩子的喧闹声，如今成为了一种乐趣。父亲和母亲更加依赖彼此，更加亲近彼此，婚姻的纽带更加牢固。在一个和睦开心的家庭生活里，母亲会发现责任是最甜蜜的，而父亲会发现它们都是最愉悦的消遣。因此，纠正这一恶习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他恶习也会得到根除，而自然又会重获新生。当女人们成了好母亲，男人们也会成为好丈夫和好父亲。

My words are vain! When we are sick of worldly pleasures we do not return to the pleasures of the home. Women have ceased to be mothers, they do not and will not return to their duty. Could

they do it if they would? The contrary custom is firmly established; each would have to overcome the opposition of her neighbours, leagued together against the example which some have never given and others do not desire to follow.

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当我们厌倦了世俗的快乐，我们也不会想要家庭生活的愉悦的。女人们已经不承担母亲的职责，未来，她们不愿也不会再承担这一职责。到时候，即使她们想承担，还能做到吗？这种反传统的习惯已经被完完全全建立起来了；亲自哺育的母亲们不得不和身边的人的驳斥作斗争，那些人已经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这种她们没有做过也不愿效仿的样子。

Yet there are still a few young women of good natural disposition who refuse to be the slaves of fashion and rebel against the clamour of other women, who fulfil the sweet task imposed on them by nature. Would that the reward in store for them might draw others to follow their example. My conclusion is based upon plain reason, and upon facts I have never seen disputed; and I venture to promise these worthy mothers the firm and steadfast affection of their husbands and the truly filial love of their children and the respect of all the world. Child-birth will be easy and will leave no ill-results, their health will be strong and vigorous, and they will see their daughters follow their example, and find that example quoted as a pattern to others.

但是还是有一些保持着优秀自然传统的年轻女人，拒绝成为潮流的奴隶，敢于抗拒其他女人的叫嚷，去完成自然所赋予她们的甜蜜使命。希望因保持自然传统而有所得的人可以带动更多的人追随她们的脚步。我的结论是基于最简单的道理，是基于从未被驳斥的事实之上

的。我敢向这些可敬的母亲发誓，她们会得到丈夫坚定而永恒的爱，孩子的孝心，还有全世界的尊重。分娩会是顺利的，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她们健康而有活力，她们的女儿也会像她们一样做，别人都会以她们为榜样。

No mother, no child; their duties are reciprocal, and when ill done by the one they will be neglected by the other. The child should love his mother before he knows what he owes her. If the voice of instinct is not strengthened by habit it soon dies, the heart is still-born. From the outset we have strayed from the path of nature.

没有母亲便没有孩子，他们的责任是相互的，若其中一方做得不妥，另一方也会忽视对方。哪怕在孩子意识到他对母亲有所亏欠之前，他也应该好好爱她。要是人的本能没有被习惯所强化，它便很快消亡，心也随之死去。从开头，我们便已经偏离了自然的道路。

There is another by-way which may tempt our feet from the path of nature. The mother may lavish excessive care on her child instead of neglecting him; she may make an idol of him; she may develop and increase his weakness to prevent him feeling it; she wards off every painful experience in the hope of withdrawing him from the power of nature, and fails to realise that for every trifling ill from which she preserves him the future holds in store many accidents and dangers, and that it is a cruel kindness to prolong the child's weakness when the grown man must bear fatigue.

其实偏离自然还有另一种途径。与忽视孩子不同，有的母亲过分

溺爱孩子，把孩子作为自己的偶像；为了避免孩子感受到自己的娇弱，却把孩子养得越来越娇弱；为了避免他受到自然力量的侵害，她为孩子阻挡了所有痛苦的经历，却没有意识到避免这些微小的困难，可能给他在未来留下了有很多危险和隐患。将孩子的软弱扩大，直至成年该经受苦难的时候，他便无法忍受，这是一种残酷的善意。

Thetis, so the story goes, plunged her son in the waters of Styx to make him invulnerable. The truth of this allegory is apparent. The cruel mothers I speak of do otherwise; they plunge their children into softness, and they are preparing suffering for them, they open the way to every kind of ill, which their children will not fail to experience after they grow up.

有一则寓言，说忒提斯把她的儿子扔进冥河，使他拥有无懈可击的能力。这个寓言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我提到的残酷的母亲则不同。她们让孩子沉浸于舒适之中，实际上是在给他们准备苦难，打开了各种疾病侵袭的道路，而她们的孩子们在长大后将无一例外地遭受这些疾病。

Fix your eyes on nature, follow the path traced by her. She keeps children at work, she hardens them by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she soon teaches them the meaning of pain and grief. They cut their teeth and are feverish, sharp colics bring on convulsions, they are choked by fits of coughing and tormented by worms, evil humours corrupt the blood, germs of various kinds ferment in it, causing dangerous eruptions. Sickness and danger play the chief part in infancy. One half of the children who are born die before their eighth year. The child who has overcome hardships has gained strength, and as soon as he can use his life he holds it more

securely.

着眼自然吧，跟着她指引你的道路前进。它不停地锻炼着孩子，它用各种各样的困难来磨练他们，她也会教他们懂得痛苦和悲伤的意义。当他们长牙的时候，就会发烧；当他们得疝气的时候，就会痉挛；当他们咳嗽的时候，会喘不过气；肠虫折磨他们，不好的体液败坏他们的血液，各种各样的酵素在他们的血液中发酵，引发危险的斑疹。疾病和危险会是童年必经的重要部分。二分之一的孩子活不过八岁。那些克服了困难的孩子就会茁壮成长，一旦他们能够驾驭自己的生命，便会更加安全了。

This is nature's law; why contradict it? Do you not see that in your efforts to improve upon her handiwork you are destroying it; her cares are wasted? To do from without what she does within is according to you to increase the danger twofold. On the contrary, it is the way to avert it; experience shows that children delicately nurtured are more likely to die. Provided we do not overdo it, there is less risk in using their strength than in sparing it. Accustom them therefore to the hardships they will have to face; train them to endure extremes of temperature, climate, and condition, hunger, thirst, and weariness. Dip them in the waters of Styx. Before bodily habits become fixed you may teach what habits you will without any risk, but once habits are established any change is fraught with peril. A child will bear changes which a man cannot bear, the muscles of the one are soft and flexible, they take whatever direction you give them without any effort; the muscles of the grown man are harder and they only change their accustomed mode of action when subjected to violence. So we can make a child strong without risking his life or health, and even if there were some risk, it should no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ince human life is full of

dangers, can we do better than face them at a time when they can do the least harm?

这就是自然的法则，为什么要抵触它呢？难道你没有认识到你企图改进自然的法则的那些行为，其实是在伤害孩子？是在浪费自然对孩子的关怀吗？你认为，让孩子在自然的法则中成长，有双重的危险。相反地，这是一个规避危险的办法。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被精心照料的孩子更容易死去。只要我们做事有度，那么使用他们的体力同爱惜他们的体力相比，危害还要小一些。因此，要让他们对困境习以为常，要训练他们学会忍受极端的温度、天气、各种条件，以及饥渴和疲惫。把他们扔进冥河。在身体习惯形成之前，你可以让他们安全地学会你所喜欢的习惯，但是一旦这些习惯形成，那么任何的改变都会带来危险。孩子能够忍受成人所不能承受的改变，因为他们的肌肉柔软而灵活，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按你要求的方向来，但是成人的肌肉更加僵硬，他们只有在暴力的逼迫下，才能改变习惯的活动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在不威胁孩子的健康和生命的情况下，使他健壮起来，并且即使有些许危险，我们也没必要有太大顾虑。因为人的一生总是充满了各种危险，除了在他们危害最小的时候面对他们，我们找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了吧？

A child's worth increases with his years. To his personal value must be added the cost of the care bestowed upon him. For himself there is not only loss of life, but the consciousness of death. We must therefore think most of his future in our efforts for his preservation. He must be protected against the ills of youth before he reaches them: for if the value of life increases until the child reaches an age when he can be useful, what madness to spare some suffering in infancy only to multiply his pain when he reaches the age of reason. Is that what our master teaches us!

随着年岁的增长，孩子的价值也不断增长。那些照顾他的心血和付出，也是他个人价值的一部分。对他来说，不仅仅只有生命的逝去，还有对死亡的觉悟。因此在努力保护他的时候，我们应当最大程度上地想一下他的将来。要抵抗青年时期的病痛，就必须在他遇到这些不幸之前把他好好保护起来。因为如果在孩子达到有用的年纪之前，他的生命价值一直在增加，那么在童年时减轻痛苦只是为了让他在理性的年龄的时候多增加一点痛苦，这不是很愚蠢的行为吗？这不正是我们的老师教给我们的吗？

Man is born to suffer; pain is the means of his preservation. His childhood is happy, knowing only pain of body. These bodily sufferings are much less cruel, much less painful, than other forms of suffering, and they rarely lead to self-destruction. It is not the twinges of gout which make a man kill himself, it is mental suffering that leads to despair. We pity the sufferings of childhood; we should pity ourselves; our worst sorrows are of our own making.

人生来就是来遭受痛苦的，痛苦是他生存的模式。他的童年时快乐的，因为他只知道肉体的痛苦。比起别的形式的折磨，这些肉体的折磨没有那么痛苦，没有那么残酷，他们很少会导致自我毁灭。一个人不会因为痛风而自杀，使他绝望的是心灵的痛苦。我们同情孩子的痛苦，但我们最应该同情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最大的灾祸使我们自己造成的。

The new-born infant cries, his early days are spent in crying. He is alternately petted and shaken by way of soothing him; sometimes he is threatened, sometimes beaten, to keep him quiet. We do what he wants or we make him do what we want, we submit to his whims or subject him to our own. There is no middle course;

he must rule or obey. Thus his earliest ideas are those of the tyrant or the slave. He commands before he can speak, he obeys before he can act, and sometimes he is punished for faults before he is aware of them, or rather before they are committed. Thus early are the seeds of evil passions sown in his young heart. At a later day these are attributed to nature, and when we have taken pains to make him bad we lament his badness.

婴儿一出生就开始哭，他们在哭声中度过了他们最初的那些日子。人们总是交替着爱抚着或是轻摇孩子来安慰他，有时候人们会吓唬他或者打打他，让他安静下来。我们做他想要我们做的事，要么就是我们让他做我们想要他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屈服于他的怪念头，就是他听从我们的奇怪想法。我们没有折中的办法。要么他指挥我们，要么听从我们。因此，他最早的形成的便是统治或奴役的观念。在他说话之前，他就会下令，在他走路之前，他就会服从，有时他还没意识到错误甚至学会犯错之前，就被大人惩罚。因此，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已经种下了邪恶的种子。再后来，人们把这些归因于天性，当我们费尽苦心让他们变坏的时候，我们又为他们的恶而哀恸。

In this way the child passes six or seven years in the hands of women, the victim of his own caprices or theirs, and after they have taught him all sorts of things, when they have burdened his memory with words he cannot understand, or things which are of no use to him, when nature has been stifled by the passions they have implanted in him, this sham article is sent to a tutor. The tutor comple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rms of artificiality which he finds already well grown, he teaches him everything except self-knowledge and self-control, the arts of life and happiness. When at length this infant slave and tyrant, crammed with knowledge but empty of sense, feeble alike in mind and body, is flung upon the

world, and his helplessness, his pride, and his other vices are displayed, we begin to lament the wretchedness and perversity of mankind. We are wrong; this is the creature of our fantasy; the natural man is cast in another mould.

就这样，孩子在母亲的抚养下度过六七年，成了她们或是自己任性善变的受害者。等到她们教会了他所有的事，当她们把他不能理解的话或是对他没用的事情强加给他，当他的天性被她们灌输的情感所扼杀，她们再把这个虚假的孩子交给老师。这个老师再来发展他那充分养成的人为的病原，他教他一切知识，但没有教孩子自我控制和自我认识，没有教他生活的艺术和幸福的意义。最后当这个既是奴隶又是暴君，既学富五车又冷漠无情，身心脆弱的人投身社会时，他的无助，他的骄傲，他的一切缺点无一不暴露出来，我们才开始为人类的可悲和邪恶而恸哭。我们都错了，这是我们用自己的幻想培养出来的人，自然人是另一个样子的。

Would you keep him as nature made him? Watch over him from his birth. Take possession of him as soon as he comes into the world and keep him till he is a man; you will never succeed otherwise. The real nurse is the mother and the real teacher is the father. Let them agree in the ordering of their duties as well as in their method, let the child pass from one to the other. He will be better educated by a sensible though ignorant father than by the cleverest master in the world. For zeal will atone for lack of knowledge, rather than knowledge for lack of zeal. But the dut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business! Duty indeed! Does a father's duty come last [2_6] .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man whose wife despises the duty of suckling her child should despise its education. There is no more charming picture than that of family life; but when one feature is wanting the whole is marred. If the mother is too delicate

to nurse her child, the father will be too busy to teach him. Their children, scattered about in schools, convents, and colleges, will find the home of their affections elsewhere, or rather they will form the habit of oaring for noth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will scarcely know each other; when they are together in company they will behave as strangers. When there is no confidence between relations, when the family society ceases to give savour to life, its place is soon usurped by vice. Is there any man so stupid that he cannot see how all this hangs together?

你希望他保持自然的样子吗？那就从他出生开始就好好看护他。当他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将他好好管教直至成人。否则，你永远也不会成功。母亲是真正抚养他的人，而父亲才是他的老师。当孩子从母亲手里被交到父亲手里时，希望他们已经在尽责任的先后和采取怎样的做法上达成了一致。比起一个绝顶聪明的老师，一个无知但通情达理的父亲能把孩子教育得更好。知识的缺陷能用热忱来弥补，这远比热忱弥补知识来得好。但是各种公共义务，或是个人责任。当然是责任了！父亲的责任是最后考量的 [3_6] 。要是一个人的妻子不愿哺育孩子，那他也轻视教育就不足为奇了。没有什么比家庭生活这幅场景更加迷人。但如果缺少某一点时，整体也被糟蹋了。如果母亲太柔弱，以至于不能养育她的孩子，那他的父亲就会因太忙而不能教孩子。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在修道院，或是在学院，总之会在别的地方找到家庭的温暖，又或者他们会养成冷漠的习惯。兄弟姐妹互不了解，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表现得像陌生人一样。当人际关系中没有信任，当家庭生活不再为人生增添乐趣，那恶习便会侵占这些空缺。难道会有人傻到看不到这些事情是息息相关的吗？

A father has done but a third of his task when he begets children and provides a living for them. He owes men to humanity, citizens to the state. A man who can pay this threefold debt and

neglect to do so is guilty, more guilty, perhaps, if he pays it in part than when he neglects it entirely. He has no right to be a father if he cannot fulfil a father's duties. Poverty, pressure of business, mistaken social prejudices, none of these can excuse a man from his duty, which is to support and educate his own children. If a man of any natural feeling neglects these sacred duties he will repent it with bitter tears and will never be comforted.

一个做父亲的，他生养了孩子，也只是完成了他三分之一的任务。对于人类，他有生育人的义务；对于社会，他有培养公民的义务。一个能够偿还三重债务却不这么做的人是有罪的，要是他只偿还了一部分，罪过就更大了。如果他不能完成一个父亲的使命，他就没有资格做一个父亲。贫穷，工作压力，社会错误偏见，这些都不能成为他逃避教育孩子的责任的理由。如果一个有自然感情的人忽视了这些神圣的责任，他一定会流着苦涩的眼泪忏悔而且永远无法从哭泣中得到安慰。

But what does this rich man do, this father of a family, compelled, so he says, to neglect his children? He pays another man to perform those duties which are his alone. Mercenary man! do you expect to purchase a second father for your child? Do not deceive yourself; it is not even a master you have hired for him, it is a flunkey, who will soon train such another as himself.

但是如果一个富人，一个家庭的父亲说，他是因为太忙才被迫忽视他的孩子，那他会怎么办呢？他会找另外一个男子来承担这些责任。满身铜臭的人啊！你难道还指望用钱为孩子买一个父亲吗？别欺骗自己了，你为他雇的，甚至不是一个老师，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很快，他会把你的孩子培养成另一个自己。

There is much discussion a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good tutor. My first requirement, and it implies a good many more, is that he should not take up his task for reward. There are callings so great that they cannot be undertaken for money without showing our unfitness for them; such callings are those of the soldier and the teacher.

关于一个好老师的特质，各种讨论层出不穷。我对好老师品质的第一个要求（当然它隐含着更多好品质）就是他不应该为了报酬去从事他的职业。有些职业是如此高尚，以至于为了金钱去做的话是不配从事这些职业的，比如军人，比如教师。

“But who must train my child?” “I have just told you, you should do it yourself.” “I cannot.” “You cannot! Then find a friend. I see no other course.”

“但是，谁来培养我的孩子呢？”“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必须亲自来做这件事。”“我做不到。”“你做不到！要么就找个朋友来帮你。没有别的选择。”

A tutor! What a noble soul! Indeed for the training of a man one must either be a father or more than man. It is this duty you would calmly hand over to a hireling!

一位老师！那是多么崇高的灵魂！事实上，要想培养别人，他自己首先得是个父亲或者是更有教养的人。这种责任，你居然能放心地

交给一个为了金钱而工作的人！

The more you think of it the harder you will find it. The tutor must have been trained for his pupil, his servants must have been trained for their master, so that all who come near him may have received the impression which is to be transmitted to him. We must pass from education to education, I know not how far. How can a child be well educated by one who has not been well educated himself!

你想得越多，你就会觉得这件事越困难。老师必须受过教育，才能教育他的学生，仆人必须受过教育，才能为主人服务，因此靠近他的人，都必须先拥有他们应当教给他的那些印象。我们必须经历种种教育，我也不知道要经历多少。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又怎么能好好教育一个孩子呢？

Can such a one be found? I know not. In this age of degradation who knows the height of virtue to which man's soul may attain? But let us assume that this prodigy has been discovered. We shall learn what he should be from the consideration of his duties. I fancy the father who realises the value of a good tutor will contrive to do without one, for it will be harder to find one than to become such a tutor himself; he need search no further, nature herself having done half the work.

人们能不能找出这样一个人呢？我不知道。在这个堕落的时代，谁知道一个人的灵魂还能达到多高尚的程度呢？但让我们假设这样的奇迹是存在的。我们就必须先考虑他应该做些什么，才能知道他应该

是怎样的人。我幻想着，做父亲的，在认识到一个好老师的价值之前，能够亲力亲为，因为想找一个好老师，比他自己做老师困难得多。他不再需要寻找，而且，自然已经把工作完成一半了。

Some one whose rank alone is known to me suggested that I should educate his son. He did me a great honour, no doubt, but far from regretting my refusal, he ought to congratulate himself on my prudence. Had the offer been accepted, and had I been mistaken in my method, there would have been an education ruined; had I succeeded, things would have been worse—his son would have renounced his title and refused to be a prince.

有个很高贵的人曾经让我去教他的儿子。毫无疑问，这给了我很大的荣誉，但他不应该怨我拒绝了他，而且应该为我的谨慎而感到庆幸。要是我接受了他的请求，但我的方法错了，那就会是失败的教育。要是我成功了，那事情就更糟了，他的儿子会放弃他的头衔，拒绝成为一个王子。

I feel too deeply the importance of a tutor's duties and my own unfitness, ever to accept such a post, whoever offered it, and even the claims of friendship would be only an additional motive for my refusal. Few, I think, will be tempted to make me such an offer when they have read this book, and I beg any one who would do so to spare his pains. I have had enough experience of the task to convince myself of my own unfitness, and my circumstances would make it impossible, even if my talents were such as to fit me for it. I have thought it my duty to make this public declaration to those who apparently refuse to do me the honour of believing in the sincerity of my determination. If I am unable to undertake the more

useful task, I will at least venture to attempt the easier one; I will follow the example of my predecessors and take up, not the task, but my pen; and instead of doing the right thing I will try to say it.

我深感教师职责之重和我的不够胜任，无论谁给我这个职位，我都会拒绝，而友人的引荐只会成为我拒绝的另一个原因。当他们读完这本书，我想几乎没有人会再让我接受这个请求。我也请求想请我的人不要白费劲了。对这项工作我已经有足够的经验，知道自己是不足以胜任的。即使我的才能足够胜任，我的情况也是不允许的。我曾以为我有责任向别人做公开声明，因为他们似乎拒绝相信我的决心是真诚的。虽然我不能胜任这个更有意义的工作，我想至少要敢于尝试一个较为容易的工作。我会循着前辈步伐，不是去实践，而是著书立说。虽然我没做应该做的事情，但我会试着去说出这件事。

I know that in such an undertaking the author, who ranges at will among theoretical systems, utters many fine precepts impossible to practise, and even when he says what is practicable it remains undone for want of details and examples as to its application.

我知道，在类似著书立说的事业中，他总是肆意宣传理论体系，描述很多不可实施的概念，甚至即使他说这事可行，由于细节和应用实例的缺失，它依然有待实践。

I have therefore decided to take an imaginary pupil, to assume on my own part the age, health, knowledge, and talents required for the work of his education, to guide him from birth to manhood, when he needs no guide but himself. This method seems to me

useful for an author who fears lest he may stray from the practical to the visionary; for as soon as he departs from common practice he has only to try his method on his pupil; he will soon know, or the reader will know for him, whether he is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and the natural growth of the human heart.

因此，我已经决定教授一个想象的学生，假设我有适合于其教育的年龄、健康、知识和才能，从出生到成人都引导着他，直到除他自己以外，不需要别人的指导的时候。对我而言，这个方法对于一个担心可能脱离现实的作者是很有用的。因为只要他一远离公众的惯例，他就只能用自己的方法来教学生。很快他就会知道，或者他的读者会知道，他是否按照孩子的发展和人心的自然成长轨迹来教导。

This is what I have tried to do. Lest my book should be unduly bulky, I have been content to state those principles the truth of which is self-evident. But as to the rules which call for proof, I have applied them to Emile or to others, and I have shown, in very great detail, how my theories may be put into practice. Such at least is my plan; the reader must decide whether I have succeeded. At first I have said little about Emile, for my earliest maxims of education, though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generally accepted, are so plain that it is hard for a man of sense to refuse to accept them, but as I advance, my scholar, educated after another fashion than yours, is no longer an ordinary child, he needs a special system. Then he appears upon the scene more frequently, and towards the end I never lose sight of him for a moment, until, whatever he may say, he needs me no longer.

这就是我一直努力去做的。为了避免我的书太过繁重，我主要陈

述一些显而易见的真理。但是关于那些用来证明的法则，我已经把它们应用到爱弥儿或者是别人身上，我已经事无巨细地证明了如何将我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我的计划至少是这个样子，至于是不是成功，需要读者来判断。一开始，关于爱弥儿，我谈论得比较少，是因为我最早的教育准则，虽然和那些被广泛接受的准则不同，他们太过于明显，以至于很难有通情达理的人不接受它们。但是，当我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我的学生由于和你的学生所受的教育不同，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需要一个特殊的教育体系。后来他就经常出现，到最后，我几乎一直都会看到他，无论他要说什么，都不需要我来替他了。

I pass over the qualities required in a good tutor; I take them for granted, and assume that I am endowed with them. As you read this book you will see how generous I have been to myself.

我没有去描述一个好的教师所要求的各项品质，我把它们视作理所当然，也假设这些是我与生俱来的品质。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也会看到我对自己是很大方的。

I will only remark that, contrary to the received opinion, a child's tutor should be young, as young indeed as a man may well be who is also wise. Were it possible, he should become a child himself, that he may be the companion of his pupil and win his confidence by sharing his games. Childhood and age have too little in common for the formation of a really firm affection. Children sometimes flatter old men; they never love them.

我只想强调和一般人意见不同的地方，一个孩子的老师必须是年

轻的，一个有智慧的人应该越年轻越好。要是可能的话，他最好自己也是个孩子，那么他就能成为他学生的伙伴，并且通过分享欢乐赢得孩子的信任。孩子和成年人没什么相似之处，很难来建立一个牢固的情感关系。孩子们总是奉承老人，却从没爱过他们。

People seek a tutor who has already educated one pupil. This is too much; one man can only educate one pupil; if two were essential to success, what right would he have to undertake the first? With more experience you may know better what to do, but you are less capable of doing it; once this task has been well done, you will know too much of its difficulties to attempt it a second time—if ill done, the first attempt augurs badly for the second.

人们总是在寻找一个已经教过一次学生的老师。这个想法太过分了，一个人只能教一次学生，如果教了两次才能成功，那他有什么权利去教第一个学生？你的经验越多，你就越知道要做什么，但是你也越不知道该怎么做。一旦你圆满地完成了你的任务，你就知道再完成一次有多困难，如果做错了，那第一次的尝试就预言了第二次的失败。

It is one thing to follow a young man about for four years, another to be his guide for five-and-twenty. You find a tutor for your son when he is already formed; I want one for him before he is born. Your man may change his pupil every five years; mine will never have but one pupil. You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the tutor. Another piece of folly! Do you make any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upil and the scholar? There is only one science for children to learn—the duties of man. This science is one, and, whatever Xenophon may say of the education of the Persians, it is

indivisible. Besides, I prefer to call the man who has this knowledge master rather than teacher, since it is a question of guidance rather than instruction. He must not give precepts, he must let the scholar find them out for himself.

跟一个人相处四年是一回事，教导他二十五年则是另一回事。你在孩子已经成长的时候才给他找老师，而我希望在他出生前就找好了老师。你找来的老师或许每五年就要换一个学生，而我希望我的老师永远只教一个学生。你觉得老师和导师有所不同。又是一个愚蠢的想法！难道你觉得学生和徒弟有什么区别吗？孩子要学的唯一一门课就是——人的责任。这门课是一体的，无论色诺芬对波斯人的教育说了什么，这是不可分割的一门学科。此外，我更想把拥有这种知识的人称为导师而非老师，因为这是一个如何引导学生而非教学生什么知识的问题。他的责任不是教给他们纸上的概念，他应该让那些学生自己找到那些真理。

If the master is to be so carefully chosen, he may well choose his pupil, above all when he proposes to set a pattern for others. This choice cannot depend on the child's genius or character, as I adopt him before he is born, and they are only known when my task is finished. If I had my choice I would take a child of ordinary mind, such as I assume in my pupil. It is ordinary people who have to be educated, and their education alone can serve as a pattern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ir fellows. The others find their way alone.

如果老师是被悉心挑选出来的，那他也会好好挑选他的学生，特别是他想让这个学生成为别人的榜样的时候。不能根据孩子的天赋或是个性来挑选，因为首先我在他出生前就接受了他，并且只有在我完成我的任务以后才知道他个性和天赋是如何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正

如我假设的一样，我会选一个心智普通的孩子。我们要培养的只是一般的普通人，也只有他们的教育才可以作为他们同伴的教育典范。别人就需要自己摸索自己的路了。

The birthplace is not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in the education of man; it is only in temperate climes that he comes to his full growth. The disadvantages of extremes are easily seen. A man is not planted in one place like a tree, to stay there the rest of his life, and to pass from one extreme to another you must travel twice as far as he who starts half-way.

在人的教育当中，出生地并不是无关的，只有在温和的气候中，他才能全面发展。两极地区的弊端是很明显的。一个人不可能像树一样，在一个地方度过余生，从地球的一极到另一个极的人，一定会比从中间开始走的人行走多一倍的路。

If the inhabitant of a temperate climate passes in turn through both extremes his advantage is plain, for although he may be changed as much as he who goes from one extreme to the other, he only removes half-way from his natural condition. A Frenchman can live in New Guinea or in Lapland, but a negro cannot live in Tornea nor a Samoyed in Benin. It seems also as if the brain were less perfectly organised in the two extremes. Neither the negroes nor the Laps are as wise as Europeans. So if I want my pupil to be a citizen of the world I will choose him in the temperate zone, in France for example, rather than elsewhere.

如果温带气候的居民要走过地球的两极，他所占的便宜是明显

的，因为虽然与从一极到另一极的人相比，他需要适应的变化是一样的，但是他只要将其自然的体质改变一半就够了。一个法国人可以生活在新几内亚或是拉普兰地区，但一个黑人是不能生活在托尔尼奥的，一个萨摩耶德人也不能生活在贝宁。另外，似乎两极的人的大脑也更不完善。黑人和拉普兰人都没有像欧洲人那么聪明。因此，要是我希望我的学生是这个世界的公民，我希望会在类似法国的温带地区挑选这个学生，而不是别的地方。

In the north with its barren soil men devour much food, in the fertile south they eat little. This produces another difference: the one is industrious, the other contemplative. Society shows us, in one and the same spot, a similar difference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e one dwells in a fertile land, the other in a barren land.

在北方，因为土地贫瘠，所以人需要更多的食物，而土地肥沃的南方，他们则吃得比较少。这会引发另一个差异：北方人重实干，南方人重思考。这个社会告诉我们，在同一个地点，穷人和富人也有相似的差异。富人居住在肥沃的土地上，穷人住在贫瘠的土地上。

The poor man has no need of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of his own station in life is forced upon him, he can have no other; the education received by the rich man from his own station is least fitted for himself and for society. Moreover, a natural education should fit a man for any position. Now it is more unreasonable to train a poor man for wealth than a rich man for poverty, for in proportion to their numbers more rich men are ruined and fewer poor men become rich. Let us choose our scholar among the rich; we shall at least have made another man; the poor may come to manhood without our help.

贫穷的人是不需要受教育的。他所在处境的教育是强加给他的，他没有别的选择。而富人的处境所赋予他的教育是最不适合他本人和社会的。而自然的教育是必须适合所有地位的人的。教穷人发财致富比教富人变穷更荒谬，因为从数量来讲，破产的富人更多，致富的穷人更少。让我们在富人之中选我们的学生，至少我们可能多培养一个人，而即使没有我们的帮助，穷人也能长大成人。

For the same reason I should not be sorry if Emile came of a good family. He will be another victim snatched from prejudice.

同样的理由，要是爱弥儿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我并不感到抱歉。至少拯救了一个本会被成见所伤的受害者。

Emile is an orphan. No matter whether he has father or mother, having undertaken their duties I am invested with their rights. He must honour his parents, but he must obey me. That is my first and only condition.

爱弥儿是一个孤儿。无论他是否有父母，我都承担了他们的责任和权利。他必须尊敬父母，也要服从我。这是我首要的也是唯一的条件。

I must add that there is just one other point arising out of this; we must never be separated except by mutual consent. This clause is essential, and I would have tutor and scholar so inseparable that they should regard their fate as one. If once they perceive the time

of their separation drawing near, the time which must make them strangers to one another, they become strangers then and there; each makes his own little world, and both of them being busy in thought with the time when they will no longer be together, they remain together against their will. The disciple regards his master as the badge and scourge of childhood, the master regards his scholar as a heavy burden which he longs to be rid of. Both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time when they will part, and as there is never any real affection between them, there will be scant vigilance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scant obedience.

我必须补充另一点：除非我们两人同意，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这一条很关键，我希望老师和学生永不分开，甚至把双方的命运合二为一。一旦他们知道他们终将分离，会变成陌生人，他们就已经成为路人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世界，他们都会忙于思考将来不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也是勉强。徒弟把他的师父当成童年的苦难，而老师把他的学生当作极力想摆脱的负担。两个人都希望分别的时刻早点到来。并且，因为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感情，所以一个心不在焉，一个不服管教。

But when they consider they must always live together, they must needs love one another, and in this way they really learn to love one another. The pupil is not ashamed to follow as a child the friend who will be with him in manhood; the tutor takes an interest in the efforts whose fruits he will enjoy, and the virtues he is cultivating in his pupil form a store laid up for his old age.

但是当他们想到他们会一直生活在一起时，他们就必须相亲相爱，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学着去爱彼此。学生并不会因为跟一个孩童

时代和他一起长大、成年后又变为朋友的人学习而羞愧，而老师也会有志于努力培养一个未来有所成的孩子，他在他学生身上培养的美德，会成为他年老时的保障。

This agreement made beforehand assumes a normal birth, a strong, well-made, healthy child. A father has no choice, and should have no preference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family God has given him; all his children are his alike, the same care and affection is due to all. Crippled or well-made, weak or strong, each of them is a trust for which he is responsible to the Giver, and nature is a party to the marriage contract along with husband and wife.

它的前提是这个孩子是顺利降生的，他是一个强壮，健康的孩子。一个父亲对上帝所赋予他的家庭没得选择，也不应该偏心。每个孩子都是他的孩子，值得得到他一样的关心和喜爱。无论是瘸脚还是健全，虚弱或强壮，他们每一个都是礼物，父亲对每一个都负有责任。婚姻不仅是夫妻之间的契约，也是自然的契约。

But if you undertake a duty not imposed upon you by nature, you must secure beforehand the means for its fulfilment, unless you would undertake duties you cannot fulfil. If you take the care of a sickly, unhealthy child, you are a sick nurse, not a tutor. To preserve a useless life you are wasting the time which should be spent in increasing its value, you risk the sight of a despairing mother reproaching you for the death of her child, who ought to have died long ago.

但如果你要承担一份不是大自然强逼你承担的责任，你必须首先

保证一定会圆满完成，否则就必须对你的失败负责。如果你只是在照顾一个生病的不健康的孩子，那你就是一个可怜的乳母而不是老师了。为了维持一个没有用的生命，你就必须花很多时间，而那些时间本可以用来增加它的价值。并且，要是有一天这个孩子死了，他母亲就可能哭哭啼啼地责备你，但其实你已经替她把孩子的生命延长很长时间了。

I would not undertake the care of a feeble, sickly child, should he live to four score years. I want no pupil who is useless alike to himself and others, one whose sole business is to keep himself alive, one whose body is always a hindrance to the training of his mind. If I vainly lavish my care upon him, what can I do but double the loss to society by robbing it of two men, instead of one? Let another tend this weakling for me; I am quite willing, I approve his charity, but I myself have no gift for such a task; I could never teach the art of living to one who needs all his strength to keep himself alive.

我不会去照顾一个虚弱的，病怏怏的孩子，哪怕他能活到80岁。我不希望有一个对他自己、对他人都无用的学生，一个自私自利为自己而活的学生，一个身体阻碍心智发展的学生。如果我在他身上枉费关心，那我岂不是为了一个人而夺去两个人，给社会造成双倍损失吗？让另一个人代替我教学，我是愿意的，我赞美他的仁慈，但我自己是无法胜任这样一个任务的。我不知道如何教一个只能勉强活命的人生活的艺术。

The body must be strong enough to obey the mind; a good servant must be strong. I know that intemperance stimulates the passions; in course of time it also destroys the body; fasting and penance often produce the same results in an opposite way. The

weaker the body, the more imperious its demands; the stronger it is, the better it obeys. All sensual passions find their home in effeminate bodies; the less satisfaction they can get the keener their sting.

只有足够强壮的身体才能服从精神的支配，一个好的仆人必须是强壮的。我知道放纵能够引发激情，但是时间一长，它便会损害身体健康。而禁食和苦修，也会用相反的方式造成同样的结果。身体越虚弱，那它的需求就越迫切；要是它越强壮，它就更能听从精神的支配。所有感官享受都藏在娇弱的身体中，但这样的身体得到的满足愈少，反而会愈发刺激它们。

A feeble body makes a feeble mind. Hence the influence of physic, an art which does more harm to man than all the evils it professes to cure. I do not know what the doctors cure us of, but I know this: they infect us with very deadly diseases, cowardice, timidity, credulity, the fear of death. What matter if they make the dead walk, we have no need of corpses; they fail to give us men, and it is men we need.

虚弱的身体会塑造出脆弱的精神。因此医学这门学科有害的程度比它声称能治愈的疾病要深得多。我不知道医生能够治好我们哪些疾病，但我知道：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致命的疾病，例如胆小，怯懦，盲从和对死亡的恐惧。即使他们能让尸体走路，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不需要死尸。他们根本不能赋予我们活生生的人，而我们需要的正是人。

Medicine is all the fashion in these days, and very naturally. It

is the amusement of the idle and unemployed, who do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eir time, and so spend it in taking care of themselves. If by ill-luck they had happened to be born immortal, they would have been the most miserable of men; a life they could not lose would be of no value to them. Such men must have doctors to threaten and flatter them, to give them the only pleasure they can enjoy, the pleasure of not being dead.

医学在当下很时髦，这是很自然的现象。这正是那些懒人和闲人的消遣，那些人不知道如何消磨时间，因此就只能把时间花在关心自己上。如果不幸地，他们刚好是不死之人，那他们就是世上最可怜的人。一个不会结束的生命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这样的人就必须有医生来威胁或是吹捧他们，来让他们获得仅有的欢愉，对永生的欢愉。

I will say no more at present as to the uselessness of medicine. My aim is to consider its bearings on morals. Still I cannot refrain from saying that men employ the same sophism about medicine as they do about the search for truth. They assume that the patient is cured and that the seeker after truth finds it. They fail to see that against one life saved by the doctors you must set a hundred slain, and against the value of one truth discovered the errors which creep in with it. The science which instructs and the medicine which heals are no doubt excellent, but the science which misleads us and the medicine which kills us are evil. Teach us to know them apart. That is the real difficulty. If we were content to be ignorant of truth we should not be the dupes of falsehood; if we did not want to be cured in spite of nature, we should not be killed by the doctors. We should do well to steer clear of both, and we should evidently be the gainers. I do not deny that medicine is useful to some men; I assert that it is fatal to mankind.

目前，我不会多说医学的无用之处。我的目的是考虑一下它在道德方面的问题。我仍然忍不住要说，像在寻求真理方面一样，人也在医学上应用诡辩的方法。他们认为病人一定会被治愈，而寻求真理之后就会找到真理。他们却没有看到，医生救活一条性命，需要用杀死一百个病人来换，而我们在发现真理的价值的同时，错误也会不知不觉发生。指导我们的科学和治疗我们的药物无疑是好的，但是误导我们的科学和致命的药物就是有害的。所以要教会我们如何区别它们。这才是真正的困难之处。如果我们能够忽视真理，那我们就不会受谬误的欺骗。如果我们不一反常态地求医问药，我们就不会因医生的治疗而丧命。我们都应该好好学学这两种节制的做法，这样我们就一定会是受益者。我并不否认药物对某些人是有用的，但它是对人是有致命作用的。

You will tell me, as usual, that the doctors are to blame, that medicine herself is infallible. Well and good, then give us the medicine without the doctor, for when we have both, the blunders of the artist are a hundredfold greater than our hopes from the art. This lying art, invented rather for the ills of the mind than of the body, is useless to both alike; it does less to cure us of our diseases than to fill us with alarm. It does less to ward off death than to make us dread its approach. It exhausts life rather than prolongs it; should it even prolong life it would only be to the prejudice of the race, since it makes us set its precautions before society and our fears before our duties. It is the knowledge of danger that makes us afraid. If we thought ourselves invulnerable we should know no fear. The poet armed Achilles against danger and so robbed him of the merit of courage; on such terms any man would be an Achilles.

像往常一样，你会告诉我，错的是医生，医学本身是没有错的。

非常之好，那我们就只要医学不要医生好了，因为要是我们两者兼备，那么相比医术的帮助给人带来的希望，医生的差错给人带来的恐惧程度要大一百倍。这种骗人的艺术，更像是用来治心病而不是治身体的，但是它对两者，都没有什么用。它更多地是让我们充满恐惧，而不是治愈疾病。它没有推迟死亡，反而让我们先预感到死亡的接近。它不是在延长生命，而是消耗生命，即使它延长了生命，也只会徒增人类的偏见，因为它让我们在社会面前警惕万分，在责任面前畏惧不前。对于危险的了解，让我们感到恐惧。要是我们认为自己无坚不摧，我们就不应该感到害怕。诗人赋予了阿基里斯抵挡危险的勇气，却也剥夺了他勇敢的美德，从这个方面来说，任何人都能成为阿基里斯。

Would you find a really brave man? Seek him where there are no doctors, where the results of disease are unknown, and where death is little thought of. By nature a man bears pain bravely and dies in peace. It is the doctors with their rules, the philosophers with their precepts, the priests with their exhortations, who debase the heart and make us afraid to die.

你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勇士吗？要在一个没有医生的地方去寻找他，在一个不知道疾病的后果的地方寻找他，在一个不在乎死亡的地方寻找他。人天生是能够忍受痛苦，平静地死去的。反而是医生的药方，哲学家的思想，牧师的规劝，让我们的心灵堕落，让我们畏惧死亡。

Give me a pupil who has no need of these, or I will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him. No one else shall spoil my work, I will educate him myself or not at all. That wise man, Locke, who had devoted part of his life to the study of medicine, advises us to give

no drugs to the child, whether as a precaution, or on account of slight ailments. I will go farther, and will declare that, as I never call in a doctor for myself, I will never send for one for Emile, unless his life is clearly in danger, when the doctor can but kill him.

给我一个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学生，否则我是拒绝教他的。没有人能玷污我的作品，我要么单独教育他，要么就绝不插手。智者洛克曾经致力于医学研究，后来建议我们无论是为了预防还是为了治疗一些小病，都不要给孩子用药，我想进一步说明，正如我自己不会去看医生一样，我永远不会让医生给爱弥儿看病，除非他危在旦夕，那时，医生除了杀死他没法再对他造成更大的危害。

I know the doctor will make capital out of my delay. If the child dies, he was called in too late; if he recovers, it is his doing. So be it; let the doctor boast, but do not call him in except in extremity.

我知道医生一定会趁机拿我的拖延送医作为借口。如果孩子死了，他就会被埋怨救得太迟，如果孩子康复了，那就是他救活的。就这样好了，让医生自夸吧，但不到绝境，就绝不要去请他。

As the child does not know how to be cured, he knows how to be ill. The one art takes the place of the other and is often more successful; it is the art of nature. When a beast is ill, it keeps quiet and suffers in silence; but we see fewer sickly animals than sick men. How many men have been slain by impatience, fear, anxiety, and above all by medicine, men whom disease would have spared, and time alone have cured. I shall be told that animals, who live

according to nature, are less liable to disease than ourselves. Well, that way of living is just what I mean to teach my pupil; he should profit by it in the same way.

虽然孩子不知道如何被治愈，但他知道什么是生病。有一种艺术可以替代另一种艺术，而且会更加成功，这就是自然。当一头野兽生病的时候，它会保持安静，沉默着忍受痛苦，但我们很少看见野兽生病，反而经常看见人得病。有多少人是被不耐烦、害怕和不安，尤其是药物害死的呢，那些人的病本不致命，时间是可以把他们治愈的。有人或许会告诉我，动物是按着自然的法则生活的，因此它们不像我们那么容易得病。那么，那种生活方式正是我要教授给我学生的，他也可以因此获益。

Hygiene is the only useful part of medicine, and hygiene is rather a virtue than a science. Temperance and industry are man's true remedies; work sharpens his appetite and temperance teaches him to control it.

卫生学是医学中唯一有用的部分，它更像是一种美德，而非一种科学。节欲和勤勉才是真正拯救人的办法，工作可以促进他的食欲，而节制则可以防止他贪食。

To learn what system is most beneficial you have only to study those races remarkable for health, strength, and length of days. If common observation shows us that medicine neither increases health nor prolongs life, it follows that this useless art is worse than useless, since it wastes time, men, and things on what is pure loss. Not only must we deduct the time spent, not in using life, but

preserving it, but if this time is spent in tormenting ourselves it is worse than wasted, it is so much to the bad, and to reckon fairly a corresponding share must be deducted from what remains to us. A man who lives ten years for himself and others without the help of doctors lives more for himself and others than one who spends thirty years as their victim. I have tried both, so I think I have a better right than most to draw my own conclusions.

要知道哪种方法对生命和健康更为有益，你只需要学习那些非常健康、健壮、长寿的人的方法就好了。如果普遍的观察告诉我们，药物既不会让我们健康，也不会延长生命，那么这种没用的学科比一无是处还要有害，因为它纯粹浪费了时间、人力和物力。用来保持生命的时间必须从生命中扣除，因为这不仅消耗了生命，更是比什么都不做更折磨人，它太糟糕了，为了公平计算，必须将它从我们余下的生命中扣除。一个活了十年不看医生但于他人于自己都有益的人，比那些在医生手里过了三十年痛苦生活的人，活得更有价值。两种生活方式我都尝试过，因此我认为，我比大多数人更有权得出我的的结论。

For these reasons I decline to take any but a strong and healthy pupil, and these are my principles for keeping him in health. I will not stop to prove at length the value of manual labour and bodily exercise for strengthening the health and constitution; no one denies it. Nearly all the instances of long life are to be found among the men who have taken most exercise, who have endured fatigue and labour [2_7] . Neither will I enter into details as to the care I shall take for this alone. It will be clear that it forms such an essential part of my practice that it is enough to get hold of the idea without further explanation.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只想选择一个强壮健康的学生，这些便是我使他保持健康所遵循的原则。我不会去详细证明体力劳动和身体锻炼对保持健康的意义和价值，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几乎每一个长寿的人，都是那些经常锻炼身体，承受得了疲累和体力劳动的人[3_7]。我既不会详述细节，也不会讲为了这个目的我所采取的办法。显然，这是我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采取这些办法是必然的，我就不过多解释了。

When our life begins our needs begin too. The new-born infant must have a nurse. If his mother will do her duty, so much the better; her instructions will be given her in writing, but this advantage has its drawbacks, it removes the tutor from his charge. But 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e child's own interests, and her respect for the person to whom she is about to confide so precious a treasure, will induce the mother to follow the master's wishes, and whatever she does you may be sure she will do better than another. If we must have a strange nurse, make a good choice to begin with.

从我们出生开始，我们就有了需求。新生儿必然需要一个乳母。如果他的母亲能够完成她的使命，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我们可以写一些指导给她，但是这种好处也有其弊端，它会减轻一点老师的职责。但是因为孩子的利益，以及她对老师的尊敬，她愿意把孩子这样的珍宝委托给老师，我们有理由期待，她会遵循老师的指示，并且无论她做什么，你都可以相信，她会做得比别人好得多。但如果我们一定要请一个陌生的乳母的话，一定要精心挑选。

It is one of the misfortunes of the rich to be cheated on all sides; what wonder they think ill of mankind! It is riches that corrupt men, and the rich are rightly the first to feel the defects of

the only tool they know. Everything is ill-done for them, except what they do themselves, and they do next to nothing. When a nurse must be selected the choice is left to the doctor. What happens? The best nurse is the one who offers the highest bribe. I shall not consult the doctor about Emile's nurse, I shall take care to choose her myself. I may not argue about it so elegantly as the surgeon, but I shall be more reliable, I shall be less deceived by my zeal than the doctor by his greed.

富人的不幸，原因之一在于他处处受骗。因此他们觉得人性邪恶，也是不足为奇的。人总是因财富堕落，而富人，是第一个感受到这个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工具的缺点的。在他们眼里，什么事都没做好，除了他们自己做的，但他们几乎什么都不做。找乳母的时候，医生便成了那个做选择的人。结果如何呢？谁给医生塞得红包多，谁就是最好的保姆乳母。所以我不会向医生征求替爱弥儿找乳母这件事的意见，我要自己来选择。我不能说得想外科医生一样优雅，但我至少很可靠，我不会像医生被他的贪婪蒙蔽一样，被我的热诚欺骗。

There is no mystery about this choice; its rules are well known, but I think we ought probabl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ge of the milk as well as its quality. The first milk is watery, it must be almost an aperient, to purge the remains of the meconium curdled in the bowels of the new-born child. Little by little the milk thickens and supplies more solid food as the child is able to digest it. It is surely not without cause that nature changes the milk in the female of every species according to the age of the offspring.

这个选择是没什么奥秘的，它的准则是人人皆知的，但我认为我们不仅要关注乳汁的质量，更要注意乳母的年龄。第一次的乳汁是淡

的，它和轻泻剂差不多，可以净化凝固在胎儿体内的胎便。渐渐地，乳汁就浓厚起来，随着孩子消化能力增强，它也会提供一些更加粘稠的物质。因此大自然按照吃奶的小家伙的年龄改变来改变母乳的成分，不是没有原因的。

Thus a new-born child requires a nurse who has recently become mother. There is, I know, a difficulty here, but as soon as we leave the path of nature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the way of all well-doing. The wrong course is the only right on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so we take it.

因此，一个新生儿需要一个最近刚生过孩子的母亲。我知道这是一个难题，但是一旦我们脱离自然轨迹，要做好事情，都会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将错就错。因为是唯一的办法，所以我们就这么办。

The nurse must be healthy alike in disposition and in body. The violence of the passions as well as the humours may spoil her milk. Moreover, to consider the body only is to keep only half our aim in view. The milk may be good and the nurse bad; a good character is as necessary as a good constitution. If you choose a vicious person, I do not say her foster-child will acquire her vices, but he will suffer for them. Ought she not to bestow on him day by day, along with her milk, a care which calls for zeal, patience, gentleness, and cleanliness. If she is intemperate and greedy her milk will soon be spoilt; if she is careless and hasty what will become of a poor little wretch left to her mercy, and unable either to protect himself or to complain. The wicked are never good for anything.

这个乳母必须是身心健康的。感情的放纵和暴躁的脾气都会让乳汁变质。此外，身体健康只能达到一般目的。乳汁可能是好的，而乳母可能是恶劣的，好的性格和好的体格一样重要。如果你选了一个恶毒的人当乳母，我认为，即便她的养子不继承她恶劣的个性，也会受她这种个性所累。难道她不应该在每天喂养他的同时，也真诚、耐心、温柔、整洁地照顾他吗？如果她贪吃又放纵，那她的乳汁很快就会坏掉，如果她草率而粗心，那这个既不会保护自己也不会抱怨的可怜孩子，在她的摆布之下，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不论什么事情，邪恶的人都是做不好的。

The choice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because her foster-child should have no other guardian, just as he should have no teacher but his tutor. This was the custom of the ancients, who talked less but acted more wisely than we. The nurse never left her foster-daughter; this is why the nurse is the confidante in most of their plays. A child who passes through many hands in turn, can never be well brought up.

乳母的选择是重中之重，因为除了她就没有其他人再照顾这个孩子了，正如孩子只能有一个老师一样。这是古人的传统习惯，他们虽然说得少，但真正做起来却比我们明智得多。乳母从未离开过她的养女，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多数的作品当中，她都是一个知己的角色。相反地，一个经历过很多人抚养的孩子，是不可能好好成长的。

At every change he makes a secret comparison, which continually tends to lessen his respect for those who control him, and with it their authority over him. If once he thinks there are grown-up people with no more sense than children the authority of age is destroyed and his education is ruined. A child should know

no betters but its father and mother, or failing them its foster-mother and its tutor, and even this is one too many, but this division is inevitable, and the best that can be done in the way of remedy is that the man and woman who control him shall be so well agreed with regard to him that they seem like one.

每换一次人，他都会暗自将他们比较一下，这可能会导致他对照顾他的乳母不那么尊重了，乳母也就失去了权威。一旦他认为成人不比孩子更加明智，那么长者的权威就会被摧毁，孩子的教育也会失败。一个孩子应该只以他的父母为长辈，要是没有父母，则以养母和老师为长辈，其实这两个人中也有一个是多余的，但这种分工是无法避免的，而最好的补救办法就是让管教他的两个男女相互配合，统一为一体。

The nurse must live rather more comfortably, she must have rather more substantial food, but her whole way of living must not be altered, for a sudden change, even a change for the better, is dangerous to health, and since her usual way of life has made her healthy and strong, why change it?

乳母必须生活得舒适一些，她应该吃得很丰盛，但她整体的生活方式不能改变，因为突如其来的改变，即使是一个好的改变，也是对健康有害的，并且既然她寻常的生活方式让她如此健康强壮，又何必去改变它呢？

Country women eat less meat and more vegetables than towns-women, and this vegetarian diet seems favourable rather than otherwise to themselves and their children. When they take

nurslings from the upper classes they eat meat and broth with the idea that they will form better chyle and supply more milk. I do not hold with this at all, and experience is on my side, for we do not find children fed in this way less liable to colic and worms.

乡下女人会比城里的女人吃更多的蔬菜而少吃一些肉，这种素食对她们自己和孩子来说更加有益一些。当她们为上层阶级的人看管小孩时，她们就会吃荤菜，喝肉汤，因为人们觉得这样她们才能有更好的乳糜，更多的乳汁。我反对这样的观点，经验也证明，这样抚养出来的孩子并不会对疝气和虫病有更强的抵抗力。

That need not surprise us, for decaying animal matter swarms with worms,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vegetable matter [2_8] . Milk, although manufactured in the body of an animal, is a vegetable substance; this is shown by analysis; it readily turns acid, and far from showing traces of any volatile alkali like animal matter, it gives a neutral salt like plants.

对此，我们无须吃惊，因为腐败的肉食上总是爬满了虫子，若食素，就不会产生这种状况 [3_8] 。虽然乳汁是在动物体内产生的，但它却是一种素食。这是通过分析得出的，乳汁容易变酸，而且它不仅不像动物性食物那样产生残余的挥发性碱，反而像植物一样产生中性盐。

The milk of herbivorous creatures is sweeter and more wholesome than the milk of the carnivorous; formed of a substance similar to its own, it keeps its goodness and becomes less liable to putrifaction. If quantity is considered, it is well known that

farinaceous foods produce more blood than meat, so they ought to yield more milk. If a child were not weaned too soon, and if it were fed on vegetarian food, and its foster-mother were a vegetarian, I do not think it would be troubled with worms.

食草动物的乳汁会比食肉动物的更加甜美，对身体更有益处，因为乳汁是用和它类似的物质形成的，因此就保留了其优点，也不容易腐败。如果考虑到数量，那么众所周知，淀粉类食物比肉类会产生更多的血液，因此他们也能产生更多的乳汁。如果一个孩子断奶比较晚，断奶后只给他吃植物性食物，并且他的乳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那么我觉得，他就不会被虫病困扰。

Milk derived from vegetable foods may perhaps be more liable to go sour, but I am far from considering sour milk an unwholesome food; whole nations have no other food and are none the worse, and all the array of absorbents seems to me mere humbug. There are constitutions which do not thrive on milk, others can take it without absorbents. People are afraid of the milk separating or curdling; that is absurd, for we know that milk always curdles in the stomach. This is how it becomes sufficiently solid to nourish children and young animals; if it did not curdle it would merely pass away without feeding them [2_9] . In vain you dilute milk and use absorbents; whoever swallows milk digests cheese, this rule is without exception; rennet is made from a calf's stomach.

从素食衍生而来的乳汁可能更容易变酸，但我并不把变质的奶当成一种不好的食物，有些国家除了酸奶没有其他食物，也没什么差别，一切吸收剂都是骗人的。有很多人的体质不适合喝奶，有些人则不需要吸收剂就能喝奶。有些人害怕吃提炼过的或者凝固的奶，这是

荒谬的，因为我们知道，奶在胃里总会凝固的。它就是这样凝结起来，来喂养孩子和小动物的，如果它没有凝结，那么它仅仅流过身体，而没有喂养孩子 [3_9] 。因此，你们稀释奶汁或是使用吸收剂，都是徒劳的，任何一个喝了奶的人，就必须消化奶酪，这个规则是无一例外的，凝乳剂也是用小牛的胃制造出来的。

Instead of changing the nurse's usual diet, I think it would be enough to give food in larger quantities and better of its kind. It is not the nature of the food that makes a vegetable diet indigestible, but the flavouring that makes it unwholesome. Reform your cookery, use neither butter nor oil for frying. Butter, salt, and milk should never be cooked. Let your vegetables be cooked in water and only seasoned when they come to table. The vegetable diet, far from disturbing the nurse, will give her a plentiful supply of milk [2_10] . If a vegetable diet is best for the child, how can meat food be best for his nurse? The things are contradictory.

我认为，不需要改变保姆的惯常饮食，只要多给她一些高质量的食物就好了。素食之所以引起便秘，不是由于食物的性质，它们之所以不健康，是烹调的方法导致的。改良你的烹饪方法，不要使用黄油或者用油炸。牛油，盐，牛都不应该烹调。让你的食物用水煮的方式烹调，并且等它们放到餐桌上才进行调味。素食不仅不会让保姆便秘，反而会让她有丰富的乳汁 [3_10] 。如果素食对孩子来说是最好的，那肉食怎么可能是乳母的最好选择？这两者是矛盾的。

Fresh air affects children's constitutions, particularly in early years. It enters every pore of a soft and tender skin, it has a powerful effect on their young bodies. Its effects can never be destroyed. So I should not agree with those who take a country

woman from her village and shut her up in one room in a town and her nursling with her. I would rather send him to breathe the fresh air of the country than the foul air of the town. He will take his new mother's position, will live in her cottage, where his tutor will follow him. The reader will bear in mind that this tutor is not a paid servant, but the father's friend. But if this friend cannot be found, if this transfer is not easy, if none of my advice can be followed, you will say to me, “What shall I do instead?” I have told you already —” Do what you are doing;” no advice is needed there.

清新的空气也会影响孩子的体质，尤其是在他幼年的时候。空气会进入孩子的每一寸柔软的肌肤毛孔，对他们年轻的身体产生很大的影响。它的影响是不会消失的。因此，我是反对把乡下女人带离农村、还把她关在城里的小屋里喂奶的。我宁可让孩子去呼吸乡村的新鲜空气，而不是城里污浊的空气。他也会像他的新母亲一样，生活在村舍，他的老师也会跟着他到那去。读者必须在心中谨记，这个老师不是雇来的仆人，而是这位父亲的朋友。但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样一位朋友，如果这样的搬家有点困难，如果我的意见都不能实行，你可能会问我，“我该怎么做呢？”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做你正在做的事情，不要再想着请人。这里不需要任何忠告。

Men are not made to be crowded together in ant-hills, but scattered over the earth to till it. The more they are massed together, the more corrupt they become. Disease and vice are the sure results of over-crowded cities. Of all creatures man is least fitted to live in herds. Huddled together like sheep, men would very soon die. Man's breath is fatal to his fellows. This is literally as well as figuratively true.

人类之所以繁衍，不是为了像蚂蚁一样挤在一起，而是要遍布各地去开垦土地。他们越挤在一起，人就越腐坏。疾病，恶行，这些都是城市人口过载导致的必然结果。在所有的生物当中，人是最不适合群居的。要是像羊群一样挤在一起，人很快就会死的。对于一个人的伙伴来说，他的呼吸都是致命的。无论是现实来讲还是想象来讲，这都是真的。

Men are devoured by our towns. In a few generations the race dies out or becomes degenerate; it needs renewal, and it is always renewed from the country. Send your children to renew themselves, so to speak, send them to regain in the open fields the strength lost in the foul air of our crowded cities. Women hurry home that their children may be born in the town; they ought to do just the opposite, especially those who mean to nurse their own children. They would lose less than they think, and in more natural surroundings the pleasures associated by nature with maternal duties would soon destroy the taste for other delights.

人类会被我们的城市毁灭。几代人之后，这个种族就会退化甚至灭绝。它需要复兴，而复兴往往是从乡村开始的。把你的孩子送去重建自我，也就是说，让他们在开阔的土地上重获力量，那些在拥挤城市的污浊空气中失去的力量。乡下的孕妇急忙赶着想到城里来生孩子，而她们应该做的却恰恰相反，特别是那些想要自己哺育孩子的人。不如意的地方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生活在更自然的环境中，尽了职责，也就获得了自然赋予的快乐，这种快乐会很快让她们觉得那些与责任无关的乐趣是多么索然无味。

The new-born infant is first bathed in warm water to which a little wine is usually added. I think the wine might be dispensed

with. As nature does not produce fermented liquors, it is not likely that they are of much value to her creatures.

新生儿的第一次沐浴经常是在加了一点儿酒的温水中进行的。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加酒进去。因为自然本身是不能产生发酵的酒的，因此酒对于人不会有什么价值。

In the same way it is unnecessary to take the precaution of heating the water; in fact among many races the new-born infants are bathed with no more ado in rivers or in the sea. Our children, made tender before birth by the softness of their parents, come into the world with a constitution already enfeebled, which cannot be at once exposed to all the trials required to restore it to health. Little by little they must be restored to their natural vigour. Begin then by following this custom, and leave it off gradually. Wash your children often, their dirty ways show the need of this. If they are only wiped their skin is injured; but as they grow stronger gradually reduce the heat of the water, till at last you bathe them winter and summer in cold, even in ice-cold water. To avoid risk this change must be slow, gradual, and imperceptible, so you may use the thermometer for exact measurements.

同样的，把水加热也是没用的，事实上，有很多种族没这么麻烦，直接让新生儿在水里或者海里洗浴。我们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父母比较柔弱，因此她们生来也很柔弱，体质很差，一下子经不住那些恢复健康的训练。只能让他们慢慢恢复元气。开头要按照传统来，然后慢慢就不需要遵从传统了。要经常给孩子洗澡，他们经常弄脏自己，因此需要常清洗。如果只是擦洗他们，他们的皮肤就会被擦伤，但是随着他们越来越强壮，就应该降低水温，直到最后，无论冬夏，

你都可以用冷水甚至冰水洗澡。为了避免有危险，这个转变必须是逐渐的，难以察觉的，因此你可能要用温度计进行准确衡量。

This habit of the bath, once established, should never be broken off, it must be kept up all through life. I value it not only on grounds of cleanliness and present health, but also as a wholesome means of making the muscles supple, and accustoming them to bear without risk or effort extremes of heat and cold. As he gets older I would have the child trained to bathe occasionally in hot water of every bearable degree, and often in every degree of cold water. Now water being a denser fluid touches us at more points than air, so that, having learnt to bear all the variations of temperature in water, we shall scarcely feel this of the air. [2_11]

这种洗澡的习惯，一旦建立，就不应该被打破，必须终生保持。我重视这个习惯，不仅仅是有对清洁和健康的考量也是为了使肌肉纤维变的柔和，训练它们能够没有危险或者毫不费力地承受所有酷寒与炙热。随着他长大，我要让孩子慢慢养成这样的习惯：偶尔，身体能经得住多热的水，就用多热的水洗澡，另外要经常在尽可能寒冷的水中沐浴。这样的话，水作为一种密度更大的液体，比起空气，接触我们的面更大，因此，我们学着忍受各种温度的水以后，我们就很少感到空气的温度变化了 [3_11] 。

When the child draws its first breath do not confine it in tight wrappings. No cap, no bandages, nor swaddling clothes. Loose and flowing flannel wrappers, which leave its limbs free and are not too heavy to check his movements, not too warm to prevent his feeling the air [2_12] . Put him in a big cradle, well padded, where he can move easily and safely. As he begins to grow stronger, let him crawl

about the room; let him develop and stretch his tiny limbs; you will see him gain strength from day to day. Compare him with a well swaddled child of the same age and you will be surprised at their different rates of progress [2_13] .

当婴儿开始呼吸的时候，不要把它束缚在襁褓里。不要有帽子，不要有绑带，不要有襁褓。松松的法兰绒衣服，既可以让他的四肢自由活动，不至于重到限制他的活动，也不至于暖和到让他感受不到空气的温度 [3_12] 。把他放在一个衬垫得很好的大摇篮里，让他在那自在安全地移动。随着他长大，让他在房间里爬来爬去，让他自由伸展他幼小的四肢，你会发现他日益强壮。将他和一个年纪相仿，却用襁褓包住的孩子相比，你会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发育程度大大不同 [3_13] 。

You must expect great opposition from the nurses, who find a half strangled baby needs much less watching. Besides his dirtyness is more perceptible in an open garment; he must be attended to more frequently. Indeed, custom is an unanswerable argument in some lands and among all classes of people.

你可能受到乳母的强烈反对，因为她觉得这种被紧紧包裹的孩子不需要看管太多。要是穿着宽大的外衣，他的肮脏更容易被别人发现，她就不得不经常给他清洗。确实，在某些地方，某些阶层，习惯是你无法辩驳的。

Do not argue with the nurses; give your orders, see them carried out, and spare no pains to make the attention you prescribe easy in practice. Why not take your share in it? With ordinary

nurslings, where the body alone is thought of, nothing matters so long as the child lives and does not actually die, but with us, when education begins with life, the new-born child is already a disciple, not of his tutor, but of nature. The tutor merely studies under this master, and sees that his orders are not evaded. He watches over the infant, he observes it, he looks for the first feeble glimmering of intelligence, as the Moslem looks for the moment of the moon's rising in her first quarter.

不要和乳母争辩，给出你的规矩，看着她们遵守，努力让你的事情实现得更加容易。为什么你不参与其中呢？在平时的培育中，大家只注重身体健康，只要孩子能活着，不死去就好了。但对我们来说，教育随着生命的开始而开始，新生儿已经是一个学徒了，不过不是老师的学徒，而是大自然的学徒。老师只不过在自然的安排下进行研究，防止别人阻碍自然对孩子的关心。他看管着这个孩子，观察着这个孩子，等待着智力的微光，就像穆斯林在上弦月到来时等待月亮上升的时刻。

We are born capable of learning, but knowing nothing, perceiving nothing. The mind, bound up within imperfect and half grown organs, is not even aware of its own existence. The movements and cries of the new-born child are purely reflex, without knowledge or will.

我们生来就能学习，只是在生下来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不明白罢了。我们的心灵，被不完美和还未发育完整的器官包裹着，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新生儿的啼哭和动作纯粹只是一种反射，没有任何意志或意识。

Suppose a child born with the size and strength of manhood, entering upon life full grown like Pallas from the brain of Jupiter; such a child-man would be a perfect idiot, an automaton, a statue without motion and almost without feeling; he would see and hear nothing, he would recognise no one, he could not turn his eyes towards what he wanted to see; not only would he perceive no external object, he would not even be aware of sensation through the several sense-organs. His eye would not perceive colour, his ear sounds, his body would be unaware of contact with neighbouring bodies, he would not even know he had a body, what his hands handled would be in his brain alone; all his sensations would be united in one place, they would exist only in the common "sensorium," he would have only one idea, that of self, to which he would refer all his sensations; and this idea, or rather this feeling, would be the only thing in which he excelled an ordinary child.

假设一个孩子生来就有成人的体魄和力量，就像帕拉斯从朱庇特的脑子中出生时已经完全成熟那样，这样的一个幼成人只是一个完美的傻瓜，一个机器人，一座没有动作和感觉的雕像。他听不到，也看不到，他谁也不认识，他不能把眼睛转过去看他想看的东西。他不仅感受不到外物，甚至不能通过感官来意识到各种感觉。他的眼睛感受不到颜色，他的耳朵听不到声音，他的身体无法感知与别人的触碰，他甚至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他手上有的东西才会被大脑感知。他所有的感觉都统一在一点，他们只存在在共同的感觉中枢，他只有一个概念，就是自我的概念，他的所有感官都要与此统一。而这个概念，确切地说这个感觉，是他胜过一个普通孩子的唯一一件事。

This man, full grown at birth, would also be unable to stand on his feet, he would need a long time to learn how to keep his balance; perhaps he would not even be able to try to do it, and you

would see the big strong body left in one place like a stone, or creeping and crawling like a young puppy.

而这个生来就成熟的人，仍然无法用双脚站立，他需要很长时间来学习如何保持平衡。也许他连试都不知道怎么试，你只能看到一个强壮的人像石头一样呆在那，像个小狗一样爬行。

He would feel the discomfort of bodily needs without knowing what was the matter and without knowing how to provide for these needs. There is no immediat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uscles of the stomach and those of the arms and legs to make him take a step towards food, or stretch a hand to seize it, even were he surrounded with it; and as his body would be full grown and his limbs well developed he would be without the perpetual restlessness and movement of childhood, so that he might die of hunger without stirring to seek food. However little you may have thought about the order and development of our knowledge, you cannot deny that such a one would be in the state of almost primitive ignorance and stupidity natural to man before he has learnt anything from experience or from his fellows.

他会感到因身体需求造成的不适，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去满足自己的需求。胃部的肌肉和能让他伸手拿食物的四肢肌肉是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即使周围都是食物，他也不知道向前迈一步或者伸手去拿。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发育，他的四肢已经完全成熟，他就不会像孩童似的躁动不安，他不会想到找食物，只能被饿死。然而你可能都没考虑过我们获得知识的次序和进度，你不可否认，一个人在没有经验或学会他人的经验之前，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原始无知愚蠢的自然状态。

We know then, or we may know,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rom which we each start towards the usual level of understanding; but who knows the other extreme? Each progresses more or less according to his genius, his taste, his needs, his talents, his zeal, and his opportunities for using them. No philosopher, so far as I know, has dared to say to man, “Thus far shalt thou go and no further.” We know not what nature allows us to be, none of us has measured the possible difference between man and man. Is there a mind so dead that this thought has never kindled it, that has never said in his pride, “How much have I already done, how much more may I achieve? Why should I lag behind my fellows?”

这样，我们就知道，或者说我们可能知道，要达到正常的理解水平，我们应该以什么为出发点了，但是谁知道另一个极限在哪里呢？每个人的进步，或多或少，都跟他的天赋、品味，需求、才能和机遇有关。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哲学家敢说，“这是他的极限，而不能走得更远了。”我们不知道天性能让我们变成怎样的人，我们没人能够衡量人与人之间可能出现的不同。是不是人的思想太过卑微以至于永远激发不起这样的思想，我们甚至不敢骄傲地说，“我已经做了多少，我还可以成就多少？为什么我落后于我的伙伴呢？”

As I said before, man's education begins at birth; before he can speak or understand he is learning. Experience precedes instruction; when he recognises his nurse he has learnt much. The knowledge of the most ignorant man would surprise us if we had followed his course from birth to the present time. If all human knowledge we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common to all, the other peculiar to the learned, the latter would seem very small compared with the former. But we scarcely heed this general experience, because it is

acquired before the age of reason. Moreover, knowledge only attracts attention by its rarity, as in algebraic equations common factors count for nothing. Even animals learn much. They have senses and must learn to use them; they have needs, they must learn to satisfy them; they must learn to eat, walk, or fly. Quadrupeds which can stand on their feet from the first cannot walk for all that; from their first attempts it is clear that they lack confidence. Canaries who escape from their cage are unable to fly, having never used their wings. Living and feeling creatures are always learning. If plants could walk they would need senses and knowledge, else their species would die out. The child's first mental experiences are purely affective, he is only aware of pleasure and pain; it takes him a long time to acquire the definite sensations which show him things outside himself, but before these things present and withdraw themselves, so to speak, from his sight, taking size and shape for him, the recurrence of emotional experiences is beginning to subject the child to the rule of habit. You see his eyes constantly follow the light, and if the light comes from the side the eyes turn towards it, so that one must be careful to turn his head towards the light lest he should squint. He must also be accustomed from the first to the dark, or he will cry if he misses the light. Food and sleep, too, exactly measured, become necessary at regular intervals, and soon desire is no longer the effect of need, but of habit, or rather habit adds a fresh need to those of nature. You must be on your guard against this.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一个人的教育开始于诞生之初，在他可以说话或者理解之前，他就已经在学习了。经验是在教导之前的，当他认得他的保姆的时候，他已经学了很多了。如果我们追随着一个最无知的人的成长历程，那么他的知识也会让我们大吃一惊的。如果人类的知识被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另一个是只有智者才

拥有的，与前者相比，后者便太过稀少了。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普遍经验，因为它在我们能够理性思考之前就获得了。并且，知识因为它的稀缺才备受关注，正如代数方程式里，公共数是不用计算的。动物也能学到很多。它们有感觉，并且必须知道如何使用它们：他们有需求，它们必须知道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它们要学会如何吃饭、走路或飞行。四足动物出生的时候就会站立，但并不知道如何行走，从它们最初的尝试可以看到，它们是没有信心的。逃离鸟笼的金丝雀是没办法飞翔的，因为它们从未用过它们的翅膀。活着且有感觉的生物总是在学习。如果植物会走路，它们就需要感官和知识，否则，它们的种族便会灭绝。孩子的第一个心理感觉纯粹是与感情有关的，他只知道开心和痛苦，他要花很长时间去学会外物教会他的特定情感，但是在这些事情出现或消失之前，在他看得到大小形状的时候，情感经验的循环又会让他们屈服于习惯。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睛一直追随着光，如果光从旁边来，他的眼睛就会转动。这样，为了避免他斜视，我们就要小心地把他的头转向光源。他必须习惯于黑暗，否则没有光的时候，他就会哭。同样，精确地衡量食物和睡眠，让他们每隔特定的时间就要吃饭和睡觉。这样下去，很快地，吃和睡不再是因为有所需要，而是习惯的结果，或者说是在自然的需求以外又增加了新的需求。你必须严防这件事的发生。

The only habit the child should be allowed to contract is that of having no habits; let him be carried on either arm, let him be accustomed to offer either hand, to use one or other indifferently; let him not want to eat, sleep, or do anything at fixed hours, nor be unable to be left alone by day or night. Prepare the way for his control of his liberty and the use of his strength by leaving his body its natural habit, by making him capable of lasting self-control, of doing all that he wills when his will is formed.

孩子应该遵守的唯一习惯就是不要有任何习惯，任何一只手都可

以抱他，让他习惯于伸出任何一只手，不加区分地使用任意一只手，不要让他在特定的时间想吃饭、睡觉，或者做某件事，也不要白天或黑夜不敢一个人待着。通过让他的身体保持自然的习惯，让他支配自己的自由和体力，让他经常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只要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

As soon as the child begins to take notice, what is shown him must be carefully chosen. The natural man is interested in all new things. He feels so feeble that he fears the unknown: the habit of seeing fresh things without ill effects destroys this fear. Children brought up in clean houses where there are no spiders are afraid of spiders, and this fear often lasts through life. I never saw peasants, man, woman, or child, afraid of spiders.

一旦这个孩子开始学会留意身边的事物，那么给他看的东西就必须精心选择。这个自然人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很有兴趣。他觉得自己很脆弱以至于害怕一切未知的事物，只有看到新事物而不受负面影响的习惯才能摧毁这种恐惧。在没有蜘蛛的干净屋子里成长的孩子是害怕蜘蛛的，而这样的恐惧会持续一生。我从未见过乡下的人害怕蜘蛛，无论是男人、女人或者是小孩。

Since the mere choice of things shown him may make the child timid or brave, why should not his education begin before he can speak or understand? I would have him accustomed to see fresh things, ugly, repulsive, and strange beasts, but little by little, and far off till he is used to them, and till having seen others handle them he handles them himself. If in childhood he sees toads, snakes, and crayfish, he will not be afraid of any animal when he is grown up. Those who are continually seeing terrible things think nothing

of them.

既然仅仅是我们选择呈现在孩子面前的事物就可能会让他变得害羞或勇敢，那为什么不在他会说话或是能理解事物之前，就早早开始教育他呢？我会培养他习惯去看各种新鲜事物，各种丑陋恶心的动物，或者古里古怪的野兽，但是这要循序渐进。先让他远远地看着，直到他习惯这些事情。先让他看别人把玩东西，最后让他自己去把玩这些东西。如果在童年时期，他就看到过癞蛤蟆，蛇和龙虾，那等他长大的时候，他对任何动物都不会有恐惧之心了。那些一直见到可怕事物的人，是不觉得这些东西可怕的。

All children are afraid of masks. I begin by showing Emile a mask with a pleasant face, then some one puts this mask before his face; I begin to laugh, they all laugh too, and the child with them. By degrees I accustom him to less pleasing masks, and at last hideous ones. If I have arranged my stages skilfully, far from being afraid of the last mask, he will laugh at it as he did at the first. After that I am not afraid of people frightening him with masks.

所有的孩子都害怕面具。一开始，我给爱弥儿展示一张讨人喜欢的面具，然后让某人在他面前把面具带上。接着我开始笑了起来，他们也都大笑不止，接着爱弥儿也跟着笑起来。渐渐地，我让他习惯看一些不那么好看的面具，最后让他看一些可怖的面具。如果我可以把这些步骤安排得精妙妥帖，那么当爱弥儿看到最后那张面具的时候，不但不会心生恐惧，反而会向看到第一张那样大笑起来。从此，我就再也不害怕人们用面具吓唬他了。

When Hector bids farewell to Andromache, the young

Astyanax, startled by the nodding plumes on the helmet, does not know his father; he flings himself weeping upon his nurse's bosom and wins from his mother a smile mingled with tears. What must be done to stay this terror? Just what Hector did; put the helmet on the ground and caress the child. In a calmer moment one would do more; one would go up to the helmet, play with the plumes, let the child feel them; at last the nurse would take the helmet and place it laughingly on her own head, if indeed a woman's hand dare touch the armour of Hector.

当赫克托向安德罗马克告别的时候，年幼的阿斯塔纳克斯被他父亲头盔上飘动的羽毛吓得不轻，认不出眼前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他哭着投入乳母的怀抱，让他的母亲哭笑不得。要消除这种恐惧必须怎么做呢？像赫克托这样做可以了：他摘下头盔，放在地上，伸手爱抚他的孩子。等孩子平静些了，他就做得更多了。他径直走到头盔前，把玩着上面的羽毛，也让孩子感受一下羽毛。最后，要是有一个女人敢用手去碰赫克托的武器的话，乳母也就敢把头盔拿起来，笑着把它戴到头上。

If Emile must get used to the sound of a gun, I first fire a pistol with a small charge. He is delighted with this sudden flash, this sort of lightning; I repeat the process with more powder; gradually I add a small charge without a wad, then a larger; in the end I accustom him to the sound of a gun, to fireworks, cannon, and the most terrible explosions.

如果一定要让爱弥儿习惯枪声，我会首先试着发一个信号枪。他会因这种转瞬即逝的闪光而感到欢喜。然后，我就会多加一点火药，来重复这个步骤。逐渐地，我会发射少量的、没有弹塞的子弹，然后

再打一发火力更强的子弹。最后，我就能让他习惯枪声、焰火、大炮，甚至最可怕的爆炸了。

I have observed that children are rarely afraid of thunder unless the peals are really terrible and actually hurt the ear, otherwise this fear only comes to them when they know that thunder sometimes hurts or kills. When reason begins to cause fear, let use reassure them. By slow and careful stages man and child learn to fear nothing.

我曾经观察过，雷声除非震耳欲聋，切切实实会伤害耳朵，否则很少有孩子会害怕打雷，只有当他们知道雷电可以使他们受伤甚至死亡的时候，他们才会感到害怕。当理性开始产生恐惧的时候，就用习惯让他们安心。通过由浅入深，精心妥帖的练习步骤，成人和孩子能够学会无可畏惧。

In the dawn of life, when memory and imagination have not begun to function, the child only attends to what affects its senses. His sense experiences are the raw material of thought; they should, therefore, be presented to him in fitting order, so that memory may at a future time present them in the same order to his understanding; but as he only attends to his sensations it is enough, at first, to show him clear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sensations and the things which cause them. He wants to touch and handle everything; do not check these movements which teach him invaluable lessons. Thus he learns to perceive the heat, cold, hardness, softness, weight, or lightness of bodies, to judge their size and shape and all their physical properties, by looking, feeling [2_14], listening, and, above all, by comparing sight and touch, by judging

with the eye what sensation they would cause to his hand.

生命之初，在记忆力和想象力还尚未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孩子只能够注意到一些影响他感官的事物。他的感官经历就是思想的原材料。因此，这些感觉应该以合适的顺序一一呈现给孩子看。这样，到了将来，记忆就能以一样的顺序把这些东西呈现给他的理解力。然而，鉴于他只注意到他的感觉，因此在一开始，清楚地告诉他这些感觉以及造成这些感觉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就足够了。他对所有东西都想摸一摸，玩一玩，我们不要去抑制他们的这些行为，因为这能使他们获得无价的宝贵经验。因此，通过观察，感知，聆听，最重要的是通过比较观感和触感，通过眼睛来判断这些物体会给他的手带来怎样的触觉体验，他就学会了去感知物体的冷暖、软硬和轻重，去判断他们的大小形状，以及所有的物理性能 [3_14] 。

It is only by movement that we lea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lf and not self; it is only by our own movements that we gain the idea of space. The child has not this idea, so he stretches out his hand to seize the object within his reach or that which is a hundred paces from him. You take this as a sign of tyranny, an attempt to bid the thing draw near, or to bid you bring it. Nothing of the kind, it is merely that the object first seen in his brain, then before his eyes, now seems close to his arms, and he has no idea of space beyond his reach. Be careful, therefore, to take him about, to move him from place to place, and to let him perceive the change in his surroundings, so as to teach him to judge of distances.

只有通过行动，我们才能学到自我与外物的不同：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行动，我们才会形成空间的概念。孩子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所以不管这个物体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百步之外，他都会伸手去抓取。

你也许把这种行为看成专横的象征，一种强制想让物体靠近，或者命令你去把它拿来的企图。但事实并非如此。仅仅是因为，起初这个物体出现在脑子里；然后又呈现在他的眼前；现在，它又看起来变得触手可及。而他对于物体和他之间的实际距离，是没有任何概念的。因此，要多带孩子出去，把他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让他去感知环境的变化，以便教会他如何判断距离。

When he begins to perceive distances then you must change your plan, and only carry him when you please, not when he pleases; for as soon as he is no longer deceived by his senses, there is another motive for his effort. This change is remarkable and calls for explanation.

当他开始学会感知距离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改变你的计划，一定要在你乐意的时候带他出去，而不是他想去的时候，就带他去。因为只要他不再被他的感觉所蒙蔽，那么他的努力便会有其他的动机了。这种改变是值得注意的，需要好好解释一番。

The discomfort caused by real needs is shown by signs, when the help of others is required. Hence the cries of children; they often cry; it must be so. Since they are only conscious of feelings, when those feelings are pleasant they enjoy them in silence; when they are painful they say so in their own way and demand relief. Now when they are awake they can scarcely be in a state of indifference, either they are asleep or else they are feeling something.

当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用种种迹象，来表明由于这些

现实需求所产生的不适。因此，才有了孩子的哭闹声。他们常常会哭闹，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只能意识到感觉，当他们的感觉良好的时候，他们就在寂静中享受：当他们痛苦的时候，他们就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且渴望解除痛苦。当他们醒着的时候，他们很少处于没有感觉的状态，他们要么是睡着的，要么就一定会感觉到什么。

All our languages are the result of art. It has long been a subject of inquiry whether there ever was a natural language common to all; no doubt there is, and it is the language of children before they begin to speak. This language is inarticulate, but it has tone, stress, and meaning. The use of our own language has led us to neglect it so far as to forget it altogether. Let us study children and we shall soon learn it afresh from them. Nurses can teach us this language; they understand all their nurslings say to them, they answer them, and keep up long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and though they use words, these words are quite useless. It is not the hearing of the word, but its accompanying intonation that is understood.

我们所有的语言都是艺术的成果。长久以来，人们都在探究，是否存在一种所有人通用的自然语言。毫无疑问，这种语言是存在的，就是孩子在开始说话之前所使用的语言。这门语言虽然咬字不清，但它也有音调、重音和含义。由于我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导致我们忽视了婴儿时期的语言，甚至把它忘得一干二净。让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孩子，我们很快就会从他们那里重新掌握这门语言。乳母们可以教我这门语言，她们能理解乳儿对她们说的每一句话，她们可以回答他们，甚至可以跟孩子们进行长段的对话。尽管她们用到的是一些单词，但这些单词没太大用处的。孩子们所理解的，并不是单词的意思，而是伴随着单词的声调。

To the language of intonation is added the no less forcible language of gesture. The child uses, not its weak hands, but its face. The amount of expression in these undeveloped faces is extraordinary; their features change from one moment to another with incredible speed. You see smiles, desires, terror, come and go like lightning; every time the face seems different. The muscles of the face are undoubtedly more mobile than our own. On the other hand the eyes are almost expressionless. Such must be the sort of signs they use at an age when their only needs are those of the body. Grimaces are the sign of sensation, the glance expresses sentiment.

除了声调，手势也是一种语言，并且它的效果并不比声调语言弱。孩子会用他的脸部来表达这种语言，而不是用他柔弱的小手。在他们还未充分发育的脸上，表情的数量让人惊叹。他们的面部特征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变化着。你可以看到微笑、渴望或害怕的表情像闪电一样一闪即逝，每一次他们的脸庞看上去都不一样。毫无疑问，他们的面部肌肉比我们的更加灵活。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的眼睛则是呆滞的。这必然是因为在他们那个年纪，只有物质需求，所以他们只会用这样的信号。面相表现出感觉，而眼神则表达感情。

As man's first state is one of want and weakness, his first sounds are cries and tears. The child feels his needs and cannot satisfy them, he begs for help by his cries. Is he hungry or thirsty? there are tears; is he too cold or too hot? more tears; he needs movement and is kept quiet, more tears; he wants to sleep and is disturbed, he weeps. The less comfortable he is, the more he demands change. He has only one language because he has, so to say, only one kind of discomfort. In the imperfect state of his sense organs he does not distinguish their several impressions; all ills

produce one feeling of sorrow.

因为人类最初的状态便是需要和柔弱，发出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抽泣和哭喊。当孩子有了需求却无法自己满足，他就会通过哭喊来寻求帮助。他是饿了或是渴了吗？他哭；是因为太热了还是太冷了？他哭；想活动却被迫保持安静时他哭；想睡觉却被打扰时他也哭。他越不舒服，他越想改变。他只有一种语言，因为，可以这么说，他只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由于他的感官处于未完善的状态，他不能分辨不同的感觉，因此所有的不适都只能产生悲伤的感觉。

These tears, which you think so little worthy of your attention, give rise to the first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his environment; here is forged the first link in the long chain of social order.

这些眼泪，或许你觉得不值得注意，却让人和他周围的环境产生了第一个联系。在这里，形成了社会秩序这条锁链的第一个环节。

When the child cries he is uneasy, he feels some need which he cannot satisfy; you watch him, seek this need, find it, and satisfy it. If you can neither find it nor satisfy it, the tears continue and become tiresome. The child is petted to quiet him, he is rocked or sung to sleep; if he is obstinate, the nurse becomes impatient and threatens him; cruel nurses sometimes strike him. What strange lessons for him at his first entrance into life!

当孩子哭泣的时候，他必然是不安的，他感知到了一些不能自己满足的需求。你要观察孩子，寻找并且发现这种需求，然后满足它。

如果你既不能发现也不能满足这种需求，那孩子就会继续哭闹，变得更加恼人。你只能爱抚着孩子让他平静下来，又或是轻轻摇着他，唱着歌曲哄他睡觉。如果他依然倔强地大哭，那乳母就会变得不耐烦，并且开始威胁他。有些残忍的乳母甚至会打他。在他的人生之初，这该是多么古怪的教育啊！

I shall never forget seeing one of these troublesome crying children thus beaten by his nurse. He was silent at once. I thought he was frightened, and said to myself, “This will be a servile being from whom nothing can be got but by harshness.” I was wrong, the poor wretch was choking with rage, he could not breathe, he was black in the face. A moment later there were bitter cries, every sign of the anger, rage, and despair of this age was in his tones. I thought he would die. Had I doubted the innate sense of justice and injustice in man's heart, this one instance would have convinced me. I am sure that a drop of boiling liquid falling by chance on that child's hand would have hurt him less than that blow, slight in itself, but clearly given with the intention of hurting him.

我看到过有个孩子因为哭闹不停而被乳母责打，这个场景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马上就安静下来。我觉得他应该是害怕了，心里暗自念叨，这孩子会变成一个卑屈奴性的人，只要用严惩酷刑就能驱使他做事。但是我错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因一肚子的怒气而窒息了，他不能呼吸，脸都紫了。过了一会，他哭得更惨了，哭声里充斥着他这个年龄用来表达愤怒和绝望的信号。我觉得，他可能会死。要是我曾怀疑过人天生就有正义感和非正义感，这件事已经足以说服我。我能确定的是，一滴滚烫的液体偶然滴到孩子手上引起的疼痛也远不及乳母打的那一下。那一下虽然不重，却清晰地传达了伤害他的意图。

This tendency to anger, vexation, and rage needs great care. Boerhaave thinks that most of the diseases of children are of the nature of convulsions, because the head being larger in proportion and the nervous system more extensive than in adults, they are more liable to nervous irritation. Take the greatest care to remove from them any servants who tease, annoy, or vex them. They are a hundredfold more dangerous and more fatal than fresh air and changing seasons. When children only experience resistance in things and never in the will of man, they do not become rebellious or passionate, and their health is better. This is one reason why the children of the poor, who are freer and more independent, are generally less frail and weakly, more vigorous than those who are supposed to be better brought up by being constantly thwarted; but you must always remember that it is one thing to refrain from thwarting them, but quite another to obey them. The child's first tears are prayers, beware lest they become commands; he begins by asking for aid, he ends by demanding service. Thus from his own weakness, the source of his first consciousness of dependence, springs the later idea of rule and tyranny; but as this idea is aroused rather by his needs than by our services, we begin to see moral results whose causes are not in nature; thus we see how important it is, even at the earliest age, to discern the secret meaning of the gesture or cry.

孩子这种愤怒和不安的倾向是需要我们好好关注的。波尔哈维认为，孩子们大多数的病，其本质都是惊厥。因为他们的头占得比重比较大，神经系统分布得比成人的更广，因此也更容易受到神经刺激。尽可能让孩子远离任何会嘲弄、骚扰或惹恼他们。对于孩子来说，佣人，是比新鲜的空气和变换的四季还危险一百倍、致命一百倍的人。但孩子只是在物质上，而不是在精神上受到阻碍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变得反叛或者易怒，身体也更加健康。这就是为什么，比起那些本该

不断经历挫折而健康成长的孩子来说，穷人的孩子更加自由、独立、充满活力。但你也必须始终记住，避免他们受挫是一回事，而完全顺从他们则是另一回事了。孩子最初的哭泣是为了求助，千万要当心，以免让乞求变成命令。他从请求别人帮助开始，以命令别人服结束。因此，鉴于他自己是软弱的，他最初的依赖意识会滋生出统治和专横的观念；但是由于这个观念源于我们的服侍而不是他的需求，我们就会看到非天性产生的道德的影响。因此我们就能体会到即使是在他们最小的时候，学会分辨他们的手势或哭泣声的含义是多么重要。

When the child tries to seize something without speaking, he thinks he can reach the object, for he does not rightly judge its distance; when he cries and stretches out his hands he no longer misjudges the distance, he bids the object approach, or orders you to bring it to him. In the first case bring it to him slowly; in the second do not even seem to hear his cries. The more he cries the less you should heed him. He must learn in good time not to give commands to men, for he is not their master, nor to things, for they cannot hear him. Thus when the child wants something you mean to give him, it is better to carry him to it rather than to bring the thing to him. From this he will draw a conclusion suited to his age, and there is no other way of suggesting it to him.

但孩子默不作声地想抓住某样东西的时候，他认为他能够够到这样东西，因为他不能准确地判断距离：当他哭喊着伸出手的时候，他就不再错误判断距离了，他是在命令这样东西靠近，或者命令你去把它带给他。在第一种情况中，慢慢地把东西拿给他。而第二种情况，你不只需要看上去没听他的哭声。他越是哭，你就越不要注意他。他必须要及早地学会不可以命令别人，因为他不是别人的主人；也不能命令东西，因为东西是听不到他的叫喊的。因此，当孩子想要得到你打算给他的东西时，你最好领着孩子去拿这件东西，而不是把东西直

接拿给他。这样，他就会明白一个与他年龄相适合的道理，并且也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暗示他。

The Abbe Saint-Pierre calls men big children; one might also call children little men. These statements are true, but they require explanation. But when Hobbes calls the wicked a strong child, his statement is contradicted by facts. All wickedness comes from weakness. The child is only naughty because he is weak; make him strong and he will be good; if we could do everything we should never do wrong. Of all the attributes of the Almighty, goodness is that which it would be hardest to dissociate from our conception of Him. All nations who have acknowledged a good and an evil power, have always regarded the evil as inferior to the good; otherwise their opinion would have been absurd. Compare this with the creed of the Savoyard clergyman later on in this book.

圣皮埃尔神父把成人称为“大小孩”，那么也可以把孩子称为“小大人”。这些说法都是对的，但它们需要解释。然而，当霍布斯把邪恶的人称为“强壮的孩子”的时候，他的说法则与事实相矛盾。一切邪恶之事皆始于软弱。孩子之所以顽皮，只是因为他软弱。只要让他强壮起来，他就会变好。如果我们事事都能做，我们绝不会做坏事。在万能的神的所有特性里，善良是我们最难以从与他相关的概念中分离出去的。所有承认善与恶的民族，都认为恶是不如善的。否则，他们的观点便是荒谬的。请把这一点与本书后面的萨瓦牧师信条相比较。

Reason alone teaches us to know good and evil. Therefore conscience, which makes us love the one and hate the other, though it is independent of reason, cannot develop without it. Before the age of reason we do good or ill without knowing it, and there is no

morality in our actions, although there is sometimes in our feeling with regard to other people's actions in relation to ourselves. A child wants to overturn everything he sees. He breaks and smashes everything he can reach; he seizes a bird as he seizes a stone, and strangles it without knowing what he is about.

只有理性才能让我们懂得善恶。因此，良心让我们爱这个，讨厌那个。尽管良心独立于理性，但它无法脱离理性而发展。在到达明理的年纪之前，我们总是没有意识地在做好事或是坏事。并且，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道德意义可言，尽管有时候在感情上，我们可以通过他人所做的、与我们有关的行为来判断善恶。孩子总是想要破坏他看到的一切事物。他打烂每一件他够得着的东西，他捏着一只小鸟，就像握着一块石头，让它窒息而死，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Why so? In the first place philosophy will account for this by inbred sin, man's pride, love of power, selfishness, spite; perhaps it will say in addition to this that the child's consciousness of his own weakness makes him eager to use his strength, to convince himself of it. But watch that broken down old man reduced in the downward course of life to the weakness of a child; not only is he quiet and peaceful, he would have all about him quiet and peaceful too; the least change disturbs and troubles him, he would like to see universal calm. How is it possible that similar feebleness and similar passions should produce such different effects in age and in infancy, if the original cause were not different? And where can we find this difference in cause except in the bodily condition of the two. The active principle, common to both, is growing in one case and declining in the other; it is being formed in the one and destroyed in the other; one is moving towards life, the other towards death. The failing activity of the old man is centred in his heart, the child's

overflowing activity spreads abroad. He feels, if we may say so, strong enough to give life to all about him. To make or to destroy, it is all one to him; change is what he seeks, and all change involves action. If he seems to enjoy destructive activity it is only that it takes time to make things and very little time to break them, so that the work of destruction accords better with his eagerness.

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哲学家用人类天生的过错、骄傲、权利欲、自私和怨恨来解释这个现象。可能除此之外，哲学家还会说，孩子对于自己软弱状态的认知，也会使他迫不及待要使用自己的力量，以此来确认自己的能力。但是看看那些羸弱的老人，他们走着人生的下坡路，又回到了孩子的柔弱状态。他不仅自己安静平和，也希望周围的一切能够如此，即使最小的变动，也会打扰他，让他不安，他想看到的是整个宇宙的平和。如果最初的原因是相同的，那么这样相似的虚弱和敏感怎么可能会对老人和孩童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影响呢？除了两者身体状况的不同，我们又能到哪里去找这种差异的缘由呢？生命的准则对两者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孩子身上它不断发展，不断成型，向生而行；然而在老人身上它却不断消逝，不断毁灭，向死而行。消逝的生命力集中在老人的心中，而孩子的生机则不断溢出，向四周蔓延。可以这么说，他觉得自己强壮到足以给身边万物以无限生机。创造或是毁灭，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他寻求的就是变化，而所有的变化都与行动密不可分。如果说他看起来很享受毁灭性活动，只能说是因为创造事物总是耗时良久，而毁灭却非常迅速。因此毁灭事物的工作总是和他的热切渴求更为一致。

While the Author of nature has given children this activity, He takes care that it shall do little harm by giving them small power to use it. But as soon as they can think of people as tools to be used, they use them to carry out their wishes and to supplement their own weakness. This is how they become tiresome, masterful,

imperious, naughty, and unmanageable; a development which does not spring from a natural love of power, but one which has been taught them, for it does not need much experience to realise how pleasant it is to set others to work and to move the world by a word.

当造物者把这种生命力给予孩子的时候，为了避免这种生命力造成太大伤害，他只给了孩子少量力量去使用它。但是一旦孩子们能够认识到人就是一种可用的工具的时候，他们就会驱使别人满足自己的需求，来弥补自己的柔弱。他们就是这样变得令人生厌、颐指气使、飞扬跋扈、顽皮淘气、难以管教。这并不是由他们天生对力量的喜爱发展而来的，而是别人教他们的。因为他们不需要很多经验就可以发现，命令别人去工作，动动嘴就能让这个世界运转，是多么惬意。

As the child grows it gains strength and becomes less restless and unquiet and more independent. Soul and body become better balanced and nature no longer asks for more movement than is required for self-preservation. But the love of power does not die with the need that aroused it; power arouses and flatters self-love, and habit strengthens it; thus caprice follows upon need, and the first seeds of prejudice and obstinacy are sown.

随着孩子长大，他们的力量就越强大，变得更加平和、安静、独立。灵魂和身体变得更平衡，自然也就不再要求自我生存所需以外的行动了。但是孩子对力量的热爱，并没有随着产生这种热爱的需求而消亡。力量使得利己主义不断滋长、变得自命不凡，而习惯又使其得到加强，因此任性随需求而来，播下了最初的偏见和固执的种子。

FIRST MAXIM. —Far from being too strong, children are not strong enough for all the claims of nature. Give them full use of such strength as they have; they will not abuse it.

第一条准则——孩子们不但不够强大，甚至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自然的所有要求。让他们充分使用他们所拥有的能力，他们不会滥用的。

SECOND MAXIM. —Help them and supply the experience and strength they lack whenever the need is of the body.

第二条准则——无论何时当他们有身体的需求，帮助他们，补充他们经验和力量的不足。

THIRD MAXIM. —In the help you give them confine yourself to what is really needful, without granting anything to caprice or unreason; for they will not be tormented by caprice if you do not call it into existence, seeing it is no part of nature.

第三条准则——在帮助的过程当中，你也要限制自己，只在他们真正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绝不纵容任性无理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不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要是你不让它实现，孩子们就不会受到任性的折磨。

FOURTH MAXIM—Study carefully their speech and gestures, so that at an age when they are incapable of deceit you may

discriminate between those desires which come from nature and those which spring from perversity.

第四条准则——仔细研究他们的语言和动作，那么等他们到了一个无法撒谎的年纪，你就能分辨出哪些是自然的需求，哪些是任性胡闹的要求。

The spirit of these rules is to give children more real liberty and less power, to let them do more for themselves and demand less of others; so that by teaching them from the first to confine their wishes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ir powers they will scarcely feel the want of whatever is not in their power.

这些准则的精髓在于多给孩子一些真正的自由，少一点权力；多让他们自己动手，而少去命令他人。这样，通过一开始就教他们将自己的欲望限制在能力范围之内，他们就很少会感觉到力不从心了。

This is another very important reason for leaving children's limbs and bodies perfectly free, only taking care that they do not fall, and keeping anything that might hurt them out of their way.

这也是为什么要让孩子的四肢和身体不受拘束的重要原因，你只需要注意不让他们摔倒，不让他们碰到可能伤害他们的东西。

The child whose body and arms are free will certainly cry much less than a child tied up in swaddling clothes. He who knows

only bodily needs, only cries when in pain; and this is a great advantage, for then we know exactly when he needs help, and if possible we should not delay our help for an instant. But if you cannot relieve his pain, stay where you are and do not flatter him by way of soothing him; your caresses will not cure his colic, but he will remember what he must do to win them; and if he once finds out how to gain your attention at will, he is your master; the whole education is spoilt.

一个身体和双手都很自由的孩子一定比一个在襁褓里被裹得紧紧的孩子哭得少。只知道身体的需要的孩子，便只会在疼痛的时候大哭。这是个很好的优势，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们什么时候需要帮助，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立刻帮助他们。但是如果你不能缓解他的痛苦，就别轻举妄动，不要通过安抚他来让他高兴，你的安抚并不能治好他的疝痛，但他却会记得必须做什么才能得到这些关心。如果他一旦知道了怎样随心所欲地吸引你的注意，他就是你的主人了。那么整个教育就败坏了。

Their movements being less constrained, children will cry less; less wearied with their tears, people will not take so much trouble to check them. With fewer threats and promises, they will be less timid and less obstinate, and will remain more nearly in their natural state. Ruptures are produced less by letting children cry than by the means taken to stop them, and my evidence for this is the fact that the most neglected children are less liable to them than others. I am very far from wishing that they should be neglected; on the contrary, it i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that their wants should be anticipated, so that they need not proclaim their wants by crying. But neither would I have unwise care bestowed on them. Why should they think it wrong to cry when they find they can get

so much by it? When they have learned the value of their silence they take good care not to waste it. In the end they will so exaggerate its importance that no one will be able to pay its price; then worn out with crying they become exhausted, and are at length silent.

孩子的行为被限制得越少，他们就哭得越少。人们对他们的啼哭越不感到厌烦，就越不会大费周章地去限制他们。孩子们受到的威吓、得到的承诺越少，他们就越不会羞涩顽固，就越保持着他们自然的状态。比起用各种方法使孩子不再哭闹，随他们自然哭泣，其实他们反而哭得少。对此，我的证据就是，与其他孩子相比，那些最不被注意的孩子哭得更少。我并不是说大家应该忽视孩子，相反地，预想到他们的需求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他们才不会通过啼哭来表明他们的需求。但我也不会给予他们愚蠢的关心。当他们发现啼哭可以使他们得到很多东西，他们凭什么要觉得啼哭是错误的行为呢？当他们得知自己的安静是如此珍贵，他们就会想方设法不浪费它的价值。最后，他们就会夸大安静的重要性，以至于没人能负担得起了。他们大哭，哭得精疲力竭，最终死亡，彻底安静。

Prolonged crying on the part of a child neither swaddled nor out of health, a child who lacks nothing, is merely the result of habit or obstinacy. Such tears are no longer the work of nature, but the work of the child's nurse, who could not resist its importunity and so has increased it, without considering that while she quiets the child to-day she is teaching him to cry louder to-morrow.

一个什么都不缺的孩子，既没有被裹得紧紧的，也没有生病，他要是持续不断地哭，必然是出于习惯或固执。这种哭泣不是大自然的杰作，而是孩子的乳母惯出来的。她们忍不了孩子的强行索要，反而

使他们啼哭的时间延长。她们丝毫没考虑到，今天她安抚了孩子，其实是在教他他明天哭得更厉害。

Moreover, when caprice or obstinacy is the cause of their tears, there is a sure way of stopping them by distracting their attention by some pleasant or conspicuous object which makes them forget that they want to cry. Most nurses excel in this art, and rightly used it is very useful; but it i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that the child should not perceive that you mean to distract his attention, and that he should be amused without suspecting you are thinking about him; now this is what most nurses cannot do.

况且，当他们因为任性或是固执而哭时，有一个办法一定可以制止他们，那就是用一些显眼、讨人喜欢的小玩意儿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忘了自己想哭这件事。很多乳母都精于此道。如果运用得当，这个办法是相当有效的。但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孩子察觉到你故意在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在玩的时候不应该怀疑你在注意他，这是很多乳母做不到的一点。

Most children are weaned too soon. The time to wean them is when they cut their teeth. This generally causes pain and suffering. At this time the child instinctively carries everything he gets hold of to his mouth to chew it. To help forward this process he is given as a plaything some hard object such as ivory or a wolf's tooth. I think this is a mistake. Hard bodies applied to the gums do not soften them; far from it, they make the process of cutting the teeth more difficult and painful. Let us always take instinct as our guide; we never see puppies practising their budding teeth on pebbles, iron, or bones, but on wood, leather, rags, soft materials which yield to

their jaws, and on which the tooth leaves its mark.

大多数孩子断奶断得太早了。应该在他们长牙的时候断奶。一般来说长牙会给孩子带来痛苦和折磨。在这个时候，孩子总是不自觉地把能够拿到的所有东西塞到嘴里去咬。为了帮助他长牙，人们会给他玩一些象牙或是狼牙等硬邦邦的玩物。私以为，这是不正确的。把硬质物体放在牙龈上，并不能使它软化。相反，它会让整个长牙的过程更加艰难和痛苦。让我们始终用本能来作为指导。我们从没有看见过小狗用卵石、钢铁或者骨头来打磨他们刚长出的牙，他们反而会用类似木头、皮革、破布等软质材料，因为这些东西适合它们的下颌，它们能咬出牙印来。

We can do nothing simply, not even for our children. Toys of silver, gold, coral, cut crystal, rattles of every price and kind; what vain and useless appliances. Away with them all! Let us have no corals or rattles; a small branch of a tree with its leaves and fruit, a stick of liquorice which he may suck and chew, will amuse him as well as these splendid trifles, and they will have this advantage at least, he will not be brought up to luxury from his birth.

我们总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对孩子也是一样。金的、银的、珊瑚的、水晶的玩具，各种价位、不同质地的拨浪鼓，全是些百无一用的东西。快把这些东西都拿走吧！不要给他什么珊瑚宝石和拨浪鼓。一根长着树叶和果实的小树枝，一棵他可以咀嚼吸吮的甘草，足以和那些精致的小玩意儿一样让他喜笑颜开。这些东西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他不会从出生开始就往奢侈方面发展。

It is admitted that pap is not a very wholesome food. Boiled

milk and uncooked flour cause gravel and do not suit the stomach. In pap the flour is less thoroughly cooked than in bread and it has not fermented. I think bread and milk or rice-cream are better. If you will have pap, the flour should be lightly cooked beforehand. In my own country they make a very pleasant and wholesome soup from flour thus heated. Meat-broth or soup is not a very suitable food and should be used as little as possible. The child must first get used to chewing his food; this is the right way to bring the teeth through, and when the child begins to swallow, the saliva mixed with the food helps digestion.

大家普遍认为，奶糊并不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食物。煮沸的奶和生面粉会产生很多颗粒物，并不适合胃的消化。在奶糊里，面粉基本上比面包里的要生一些，并且也没有发酵过。我认为面包和奶，或者米糊会更好一些。如果你想做奶糊，那么最好事先把面粉煮一下。在我的家乡，人们能用这种方法做出一种非常可口健康的汤。肉羹或汤并不是一种特别合适孩子的食物，因此要尽可能少让孩子食用。孩子必须先习惯咀嚼食物，这才是促进长牙的正确方法。当孩子开始吞咽的时候，混合着食物的唾液可以帮助消化。

I would have them first chew dried fruit or crusts. I should give them as playthings little bits of dry bread or biscuits, like the Piedmont bread, known in the country as “grisses.” By dint of softening this bread in the mouth some of it is eventually swallowed the teeth come through of themselves, and the child is weaned almost imperceptibly. Peasants have usually very good digestions, and they are weaned with no more ado.

我会让他们先试着嚼干果或者面包皮。我会把小块的干面包或者

饼干给他们当作玩物，就像皮埃蒙特面包，在乡下它叫做格里斯。孩子们把面包放在嘴里软化，结果总会顺带着吞咽一些进去，于是他们的牙长出来了，而且不知不觉中就断奶了。农民的消化系统总是很好的，他们就用这个方法很快地断奶的。

From the very first children hear spoken language; we speak to them before they can understand or even imitate spoken sounds. The vocal organs are still stiff, and only gradually lend themselves to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ounds heard; it is even doubtful whether these sounds are heard distinctly as we hear them. The nurse may amuse the child with songs and with very merry and varied intonation, but I object to her bewildering the child with a multitude of vain words of which it understands nothing but her tone of voice. I would have the first words he hears few in number, distinctly and often repeated, while the words themselves should be related to things which can first be shown to the child. That fatal facility in the use of words we do not understand begins earlier than we think. In the schoolroom the scholar listens to the verbiage of his master as he listened in the cradle to the babble of his nurse. I think it would be a very useful education to leave him in ignorance of both.

在生命之初，孩子就会听我们说话。在他们听懂之前，甚至学会模仿听到的声音之前，我们就一直对他们说话。他们的发声器官还很迟钝，只能慢慢地引导他们模仿听到的声音。至于他们是不是和我们一样能清晰地听到声音，仍值得怀疑。乳母可以用歌曲和愉快多变的音调来逗弄孩子，但我反对她用大量徒劳无用的词语使孩子困惑迷惘，除了她的声调，孩子什么也听不懂。最初，我给他说的话会很简短，要慢慢地说清楚，并多说几遍。这些单词和那些最初展现给孩子看的东西必须是有所关联的。不幸的是，我们会轻易相信那些我们所

不理解的话，这个状况来得比我们想象地要早。学生在教室里听着老师滔滔不绝，就像他小时候，在摇篮里听着乳母喋喋不休。我认为，让孩子学会无视这两者，就是非常有用的教育。

All sorts of ideas crowd in upon us when we try to consider the development of speech and the child's first words. Whatever we do they all learn to talk in the same way, and all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s are utterly useless.

当我们试着去思考孩子的语言发展和他们最初说的话时，各种各样的想法都会涌入脑海。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学会和我们一样说话，所有的哲学猜想，都是无用的。

To begin with, they have, so to say, a grammar of their own, whose rules and syntax are more general than our own; if you attend carefully you will be surprised to find how exactly they follow certain analogies, very much mistaken if you like, but very regular; these forms are only objectionable because of their harshness or because they are not recognised by custom. I have just heard a child severely scolded by his father for saying, “Mon pere, irai-je-t-y?” Now we see that this child was following the analogy more closely than our grammarians, for as they say to him, “Vas-y,” why should he not say, “Irai-je-t-y?” Notice too the skilful way in which he avoids the hiatus in irai-je-y or y-irai-je? Is it the poor child's fault that we have so unskilfully deprived the phrase of this determinative adverb “y,” because w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it? It is an intolerable piece of pedantry and most superfluous attention to detail to make a point of correcting all children's little sins against the customary expression, for they always cure

themselves with time. Always speak correctly before them, let them never be so happy with any one as with you, and be sure that their speech will be imperceptibly modelled upon yours without any correction on your part.

首先，可以这么说，他们是有自己的语法的，他们的语法及句法规则比我们的更常规化，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惊奇地发现他们是多么相似。你可以说它们是有很多语病的，但同时它们也是很规律的，对这些形式的反对来自于它们刺耳的声音或是因为没有被习惯所认可。不久前，我曾听到有个孩子被父亲严厉地责骂，只因为他说了一句“爸爸，我到哪里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孩子模仿起同类语来比我们的文法学者还好，因为人们只跟孩子说了“到那里去”，为什么他不能说“我到哪里去？”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他相当巧妙地避免了“irai-je-y”和“y-irai-je”的差异。我们如此笨拙地抹去这个短语中决定性的副词“那里”，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难道这是孩子的错吗？强调改正孩子有违习惯性表达的所有小错误，这实在是一种难以忍受、多此一举的迂腐做法，因为他们会自己改过来的，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你要在他们面前一直正确地说话，让他们觉得与任何人交谈都不如与你交谈来得快乐。那么你可以确信，他们的语言一定会受到你潜移默化的影响的，根本不需要你去特意纠正。

But a much greater evil, and one far less easy to guard against, is that they are urged to speak too much, as if people were afraid they would not learn to talk of themselves. This indiscreet zeal produces an effect directly opposite to what is meant. They speak later and more confusedly; the extreme attention paid to everything they say makes it unnecessary for them to speak distinctly, and as they will scarcely open their mouths, many of them contract a vicious pronunciation and a confused speech, which last all their life and make them almost unintelligible.

但是另一个更严重、更难以预防的问题是，人们总是急于让孩子说话，好像唯恐孩子们不能自己学会说话一样。这种轻率的狂热会产生与原意背道而驰的效果。孩子们会说话说得更晚，说得更乱。他们对自己说的所有事情过度关注，这会导致他们不能清晰地发音。或者，因为他们很少把嘴张大，所以很多人一生都有发音问题，语言组织也很混乱，令人难以理解。

I have lived much among peasants, and I never knew one of them lisp, man or woman, boy or girl. Why is this? Are their speech organs differently made from our own? No, but they are differently used. There is a hillock facing my window on which the children of the place assemble for their games. Although they are far enough away, I can distinguish perfectly what they say, and often get good notes for this book. Every day my ear deceives me as to their age. I hear the voices of children of ten; I look and see the height and features of children of three or four. This experience is not confined to me; the townspeople who come to see me, and whom I consult on this point, all fall into the same mistake.

我和农民们一起生活过很长时间，但我从没见过他们之中有人口齿不清的，无论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他们的发音器官和我们的不同么？不，只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使用的方法相异。我的窗子正对着一个小山丘，那个地方的孩子都爱聚在那儿玩。尽管他们离我比较远，但我还是可以清楚地听见他们在说什么，也给我写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每天，我的耳朵都会让我搞错他们的真实年龄。我明明听到的是十岁孩子的声音，可看到的面容身形却是三四岁的孩子。很多人也会有跟我一样的经历，当我向几个来看望我的城里人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也跟我犯了一样的错误。

This results from the fact that, up to five or six, children in town, brought up in a room and under the care of a nursery governess, do not need to speak above a whisper to make themselves heard. As soon as their lips move people take pains to make out what they mean; they are taught words which they repeat inaccurately, and by paying great attention to them the people who are always with them rather guess what they meant to say than what they said.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在城里，五六岁之前，孩子都是在室内由乳母照顾的，他们不需要大声说话。只要轻声细语，别人也能听见。只要他们轻轻动动嘴，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弄懂他们的意思。人们教他们的话，他们也讲不好。跟这些孩子待在一起的大人，因为在他们身上花了很多心思，往往能猜出他们的意思，但并不是真的听懂了他们的话。

It is quite a different matter in the country. A peasant woman is not always with her child; he is obliged to learn to say very clearly and loudly what he wants, if he is to make himself understood. Children scattered about the fields at a distance from their fathers, mothers and other children, gain practice in making themselves heard at a distance, and in adapting the loudness of the voice to the distance which separates them from those to whom they want to speak. This is the real way to learn pronunciation, not by stammering out a few vowels into the ear of an attentive governess. So when you question a peasant child, he may be too shy to answer, but what he says he says distinctly, while the nurse must serve as interpreter for the town child; without her one can understand nothing of what he is muttering between his teeth [2_15] .

在农村，便是另外一番场景。农妇是无法如影相随地陪伴着孩子的。因此，如果孩子想让别人听懂自己的意思，他必须学会清晰大声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孩子们总是被分散在田野里，跟他们的父母、和别的孩子总是有一定距离，因此能练习如何让自己远远地就能被人听到，练习如何根据与他们想说话的人之间的距离调整音量。这才是学习发音的真正方法，才不是在一个聚精会神的教师耳边结结巴巴地说几个元音就好了呢。因此当你询问一个乡下孩子的时候，他可能害羞得不敢回答，但他一旦开口，就能清晰地发音。可城里的孩子需要乳母作为自己的翻译，否则，别人一点都听不懂他牙缝里咕咕哝哝地在说些什么 [3_15] 。

As they grow older, the boys are supposed to be cured of this fault at college, the girls in the convent schools; and indeed both usually speak more clearly than children brought up entirely at home. But they are prevented from acquiring as clear a pronunciation as the peasants in this way—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all sorts of things by heart, and to repeat aloud what they have learnt; for when they are studying they get into the way of gabbling and pronouncing carelessly and ill; it is still worse when they repeat their lessons; they cannot find the right words, they drag out their syllables. This is only possible when the memory hesitates, the tongue does not stammer of itself. Thus they acquire or continue habits of bad pronunciation. Later on you will see that Emile does not acquire such habits or at least not from this cause.

随着他们长大，男孩应当在学校、女孩则可以在修道院里改正这个毛病。的确，这样的孩子说话一定比完全在家里长大的孩子清晰得多。但是他们依然不能做到像农民那样发音清楚，可能是因为他们必须在心里牢记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大声重复他们学到的事物。因为在他们学说话的时候就口齿不清、发音随便，当他们在背诵的时候，

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了。他们无法找到正确的单词，只能拖长音节。当记忆卡壳的时候，要想不结巴，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因此他们会养成或者保持这种糟糕的发音习惯。将来你可以看到，爱弥儿是没有这种习惯的，或者至少这个习惯一定不是因为这种原因造成的。

I grant you uneducated people and villagers often fall into the opposite extreme. They almost always speak too loud; their pronunciation is too exact, and leads to rough and coarse articulation; their accent is too pronounced, they choose their expressions badly, etc.

我承认，那些没受教育的人和乡下人常常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他们总是声如洪钟。他们的发音太过准确，往往导致说话粗笨。他们的口音太重，不善于选择表达，等等。

But, to begin with, this extreme strikes me as much less dangerous than the other, for the first law of speech is to make oneself understood, and the chief fault is to fail to be understood. To pride ourselves on having no accent is to pride ourselves on ridding our phrases of strength and elegance. Emphasis is the soul of speech, it gives it its feeling and truth. Emphasis deceives less than words; perhaps that is why well-educated people are so afraid of it. From the custom of saying everything in the same tone has arisen that of poking fun at people without their knowing it. When emphasis is proscribed, its place is taken by all sorts of ridiculous, affected, and ephemeral pronunciations, such as one observes especially among the young people about court. It is this affectation of speech and manner which makes Frenchmen disagreeable and repulsive to other nations on first acquaintance. Emphasis is found,

not in their speech, but in their bearing. That is not the way to make themselves attractive.

但是，首先，这种极端的危险性在我看来远不及前一种，因为说话的第一准则就是要让别人听得懂，而前一种做法的最大的弊端就是别人听不懂。我们因为自己没有任何地方口音而自豪，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的言语不够有力和优雅而自豪。重音是语言的灵魂，它赋予语言情感和真实性。重音的迷惑性比词语要少，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会如此害怕它的原因。如果说任何话都用同一种声调，就可以嘲弄别人而对方却浑然不觉。当不能说重音时，它的位置就被各种可笑、做作、急促的发音所取代了，比如像人们观察的那样，宫廷里的年轻人尤其爱用这种方式说话。正是这种矫揉造作的说话方式才让别的国家的人与法国人初次见面时，觉得他们令人讨厌、十分无聊。重音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语言里，反而是在他们的举止中。这绝不是让自己有吸引力的好办法。

All these little faults of speech, which you are so afraid the children will acquire, are mere trifles; they may be prevented or corrected with the greatest ease, but the faults which are taught them when you make them speak in a low, indistinct, and timid voice, when you are always criticising their tone and finding fault with their words, are never cured.

你担心孩子会沾染上的关于说话的小错误不过是些零碎琐事，都是很容易预防和改正的。但是你让他们用低沉、模糊、怯懦的嗓音说话，你总是对他们的声调加以苛责，找他们词句的错，由此造成的毛病却是永远无法纠正的。

[2_1].The earliest education is most important and it undoubtedly is woman's

work. If the author of nature had meant to assign it to men he would have given them milk to feed the child. Address your treatises on education to the women, for not only are they able to watch over it more closely than men, not only is their influence always predominant in education, its success concerns them more nearly, for most widows are at the mercy of their children, who show them very plainly whether their education was good or bad. The laws, always more concerned about property than about people, since their object is not virtue but peace, the laws give too little authority to the mother. Yet her position is more certain than that of the father, her duties are more trying; the right ordering of the family depends more upon her, and she is usually fonder of her children. There are occasions when a son may be excused for lack of respect for his father, but if a child could be so unnatural as to fail in respect for the mother who bore him and nursed him at her breast, who for so many years devoted herself to his care, such a monstrous wretch should be smothered at once as unworthy to live. You say mothers spoil their children, and no doubt that is wrong, but it is worse to deprave them as you do. The mother wants her child to be happy now. She is right, and if her method is wrong, she must be taught a better. Ambition, avarice, tyranny, the mistaken foresight of fathers, their neglect, their harshness, are a hundredfold more harmful to the child than the blind affection of the mother. Moreover, I must explain what I mean by a mother and that explanation follows.

[2_2].Like them in externals, but without speech and without the ideas which are expressed by speech, he would be unable to make his wants known, while there would be nothing in his appearance to suggest that he needed their help.

[2_3].Thus the wars of republics are more cruel than those of monarchies. But if the wars of kings are less cruel, their peace is terrible; better be their foe than their subject.

[2_4].There are teachers dear to me in many schools and especially in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men for whom I have a great respect, men whom I believe to be quite capable of instructing young people, if they were not compelled to follow the established custom. I exhort one of them to publish the scheme of reform which he has thought out. Perhaps people would at length seek to cure the evil if they realised that there was a remedy.

[2_5].The league between the women and the doctors has always struck me as one of the oddest things in Paris. The doctors' reputation depends on the women, and by means of the doctors the women get their own way. It is easy to see what qualifications a doctor requires in Paris if he is to become celebrated.

[2_6].When we read in Plutarch that Cato the Censor, who ruled Rome with such glory, brought up his own sons from the cradle, and so carefully that he left everything to be present when their nurse, that is to say their mother, bathed them; when we read in Suetonius that Augustus, the master of the world which he had conquered and which he himself governed, himself taught his grandsons to write, to swim, to understand the beginnings of science, and that he always had them with him, we cannot help smiling at the little people of those days who amused themselves with such follies, and who were too ignorant, no doubt, to attend to the great affairs of the great people of our own time.

[2_7].I cannot help quoting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an English newspaper, as it throws much light on my opinions: "A certain Patrick O'Neil, born in 1647, has just married his seventh wife in 1760. In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Charles II. he served in the dragoons and in other regiments up to 1740, when he took his discharge. He served in all the campaigns of William III. and Marlborough. This man has never drunk anything but small beer; he has always lived on vegetables, and has never eaten meat except on few occasions when he made a feast for his relations. He has always been accustomed to rise with the sun and go to bed at sunset unless prevented by his military duties. He is now in his 130th year; he is healthy, his hearing is good, and he walks with the help of a stick. In spite of his great age he is never idle, and every Sunday he goes to his parish church accompanied by his children, grandchildren, and great grandchildren."

[2_8].Women eat bread, vegetables, and dairy produce; female dogs and cats do the same; the she-wolves eat grass. This supplies vegetable juices to their milk. There are still those species which are unable to eat anything but flesh, if such there are, which I very much doubt.

[2_9].Although the juices which nourish us are liquid, they must be extracted from solids. A hard-working man who ate nothing but soup would soon waste away. He would be far better fed on milk, just because it curdles.

[2_10].Those who wish to study a full account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Pythagorean regime, may consult the works of Dr. Cocchi and his opponent Dr. Bianchi on this important subject.

[2_11].Children in towns are stifled by being kept indoors and too much wrapped up. Those who control them have still to learn that fresh air, far from doing them harm, will make them strong, while hot air will make them weak, will give rise to fevers, and will eventually kill them.

[2_12].I say "cradle" using the common word for want of a better, though I am convinced that it is never necessary and often harmful to rock children in the cradle.

[2_13].The ancient Peruvians wrapped their children in loose swaddling bands, leaving the arms quite free. Later they placed them unswaddled in a hole in the ground, lined with cloths, so that the lower part of the body was in the hole, and their arms were free and they could move the head and bend the body at will without falling or hurting themselves. When they began to walk they were enticed to come to the breast. The little negroes are often in a position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sucking. They cling to the mother's hip, and cling so tightly that the mother's arm is often not needed to support them. They clasp the breast with their hand and continue sucking while their mother goes on with her ordinary work. These children begin to walk at two months, or rather to crawl. Later on they can run on all fours almost as well as on their feet. —Buffon. M. Buffon might also have quoted the example of England, where the senseless and barbarous swaddling clothes have become almost obsolete. Cf. La Longue Voyage de Siam, Le Beau Voyage de Canada, etc.]

[2_14].Of all the senses that of smell is the latest to develop in children up to two or three years of age they appear to be insensible of pleasant or unpleasant odours; in this respect they are as indifferent or rather as insensible as many animals.

[2_15].There are exceptions to this; and often those children who at first are most difficult to hear, become the noisiest when they begin to raise their voices. But if I were to enter into all these details I should never make an end; every sensible reader ought to see that defect and excess, caused by the same abuse, are both corrected by my method. I regard the two maxims as inseparable—always enough—never too much. When the first is well established, the latter necessarily follows on it.

[3_1].早期教育是最重要的，毫无疑问，这是女人的任务。如果造物主想把这个任务交给男人，那他一定会赐予男人乳汁去喂养孩子。在你的教育论著中多向妇女讲一讲，不仅仅是因为她们比男人更近距离地注意这个问题，还因为她们在教育中总是起着主导作用，教育的成功与她们更加息息相关，因为很多寡妇总是受制于自己的孩子，孩子的教育是好是坏总是能明白地显现。法律关注的往往是财产而不是人，因为法律本是为和平而非美德而存在的。因此，法律并未赋予母亲她应有的权威。但是她的地位还是比父亲的更加牢固，她的责任更加艰巨，家中的有序更多地依赖于她，并且，她总是很爱孩子的。儿子不尊重父亲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如果一个孩子能对生他养他、把自己这么多年的时间都奉献给了他的母亲都不尊重，这是有违自然的，这样的怪兽应该立刻被掐死，不配活在世界上。你可能说母亲们会宠坏孩子，这毋庸置

疑是错的。而且像你那样让孩子堕落是更加错误的行为。母亲总是希望她的孩子能够开心快乐。她是对的，如果她的教育方法错了，人们也应该教她一个更好的方法。比起母亲的溺爱，父亲的野心、贪欲、专制、谬见、无视和严酷，对孩子的伤害要严重一百倍。另外，我必须解释一下我所说的母亲是什么意思，下文会有详细的说明。

[3_2].他们的外在虽然相同，但是没有语言、没有能够用语言表达的思想，他无法让别人明白他的需求，他的外表也没有东西显示出他需要帮助。

[3_3].因此，比起君主制下的战争，共和体制下的可以说更加残酷。但是虽然君王之间的战争相对温和，他们的和平却很可怕。宁可做他们的敌人，也不做他们的子民。

[3_4].在很多学校，尤其是巴黎大学，有些老师深得我的喜爱和尊敬，如果他们不被迫遵守现有的习惯，我相信他们是完全有能力教育年轻人的。我也劝其中一位老师把他想的教育体制改革计划出版。如果人们意识到存在补救措施，也许他们最终会寻找治疗这种毛病的方法。

[3_5].女人和医生的联盟总是让我震惊，这简直是巴黎最古怪的事情之一。医生的声誉依赖于女人，也是靠着医生，女人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在巴黎，如果一位医生想成名，他需要什么资质了。

[3_6].当我们读普卢塔克的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统治罗马并为其带来无限荣耀的监察官卡托，从儿子在摇篮里开始就亲自抚养。当乳母，也就是孩子的母亲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就放下手边一切事务去看他。当我们读到苏埃东尼乌斯的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征服统治全球的奥古斯都，亲自教孙子们写字、游泳，对他进行科学知识的启蒙，他总是陪着孙子。当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小孩总爱做这样的傻事，我们总是忍俊不禁，他们是那么无知单纯，必然是不知道如何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人的事的。

[3_7].下面我忍不住要引用一篇来自英国报刊的文章，这篇文章和我的观点有很大的联系：“某个叫帕特里克·奥奈尔的人，生于1647年，在1760的时候刚结了第七次婚。查理二世掌权的第十七年，他加入了骑兵队，他又在各个其他军队服役直到1740年才退役。他参加过威廉三世和马尔波罗公爵指挥的所有战役。这个人只喝淡啤酒，他总是以蔬菜为生，只有在和亲友聚餐的极少数情况下才吃一些肉。他总是日出而起，日落而息，除非军队里的任务使他无法这么做。现在他已经一百三十岁了，依旧非常健康，听力良好，能在拐杖的辅助下走路。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他一点也不闲着，每周末他都会在孩子、孙子、曾孙的陪伴下去教区的教堂。”

[3_8].女人爱吃面包、蔬菜、奶制品，雌性的猫狗也是一样的，连母狼也是吃草的。这可以为她们的乳汁提供汁液中的营养。当然也有一些只食肉的物种，我很怀疑

它们的乳汁中是否有这样的成分。

[3_9].尽管喂养我们的乳汁都是液体的，但它们也是从固体食物中提炼出来的。一个勤勤恳恳却只喝汤食的人，最后总会日渐消瘦。如果他以奶为食就会好得多，因为奶会凝固。

[3_10].那些想要全面研究毕达阿拉斯体制优点和缺点的人，可以参考一下科基医生和他的反对者比昂基医生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

[3_11].因为总是呆在室内并且被襁褓束缚，城里孩子总是很压抑的。那些教养他们的人必须明白，新鲜空气不但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只会让他们更强壮。相反地，热空气会让他们更虚弱，增加发烧的几率，最终会杀死他们。

[3_12].我用“摇篮”这个通用词汇，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单词，尽管我确信，把孩子放在摇篮里摇来摇去，是不必要且有害的。

[3_13].古代的秘鲁人会把孩子包裹在宽松的襁褓中，让他们的手自由移动。后来，他们就让孩子自由地呆在地上的坑里。把布垫在身下，下半身呆在坑里，手可以自由活动，他们可以自在地移动头部、蜷曲身体，但不会摔倒或者伤到自己。但他们开始会走路的时候，他们总是禁不住去要母乳喝。黑人婴儿经常要用一个很困难的姿势吸吮。他们会抱着母亲的臀部，紧紧地抱着，母亲甚至都不需要去抱住他们。他们用手紧紧抓着母亲的乳房，不停地吮吸，母亲则继续进行日常的劳作。这些孩子在两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走路，确切地说是开始爬。后来，他们爬的速度跟用双脚跑一样快。——布冯。布冯先生也可以引用一下英国的例子，愚蠢残暴地束紧孩子的习惯已经过时了。参考《暹罗旅行记》《加拿大游记》等书。

[3_14].在感官中，嗅觉是最晚发育的，一直到两三岁，他们仍旧对好闻的或者难闻的气味没有感觉。在这方面，他们和许多动物一样，对气味是不在乎的，或者说是没有感觉的。

[3_15].这也是有例外的，那些最初说话很难听清楚的孩子，当他们提高分贝的时候，反而是最吵闹的。但是如果我要一一讨论这些细节，那我就再也说不完了。每个明智的读者都应该看到，由同样的陋习导致的不足和过度，都可以用我的方法来纠正。在我看来，“保持适度”和“切勿过分”这两个准则是不可分离的。当第一个准则成功树立起来的时候，第二个准则也必然随之而来。

BOOK II

第二卷

We have now reached the second phase of life; infancy, strictly so-called, is over; for the words infans and puer are not synonymous. The latter includes the former, which means literally “one who cannot speak;” thus Valerius speaks of puerum infantem. But I shall continue to use the word child (French enfant) according to the custom of our language till an age for which there is another term.

现在，我们已经谈到了人生的第二阶段。严格意义上的所谓幼儿时期已经结束了，因为幼儿和儿童不是同义词。后者包括了前者，“幼儿”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不能说话的人”，所以在瓦勒留的书里会出现“幼稚的儿童”这种表述。但是，在零一表年龄阶段的术语出现之前，我还是会根据现有的语言习惯使用“孩子”（child）一词。

When children begin to talk they cry less. This progress is quite natural; one language supplants another. As soon as they can say “It hurts me,” why should they cry, unless the pain is too sharp for words? If they still cry, those about them are to blame. When once Emile has said, “It hurts me,” it will take a very sharp pain to make him cry.

当孩子开始会说话之后，他们哭的次数会变少。这个过程是很自然地发生的，实质就是一种语言代替了另一种语言。一旦他们能够说

出“这东西伤害了我”这句话后，除非遇到了语言无法描述的痛苦，不然有什么理由要哭呢？假如他们还是哭个不停，那就要怪周围的大人。当爱弥儿会说“这东西伤害了我”之后，那得是非常剧烈的痛才会让他哭。

If the child is delicate and sensitive, if by nature he begins to cry for nothing, I let him cry in vain and soon check his tears at their source. So long as he cries I will not go near him; I come at once when he leaves off crying. He will soon be quiet when he wants to call me, or rather he will utter a single cry. Children learn the meaning of signs by their effects; they have no other meaning for them. However much a child hurts himself when he is alone, he rarely cries, unless he expects to be heard.

如果碰上一个脆弱而敏感的孩子，天生就会无缘无故地啼哭，我会任由他哭，但他的哭不会起任何作用，过一会儿他就会自己擦干眼泪。只要他在哭，我就不会靠近他；当他停止哭泣时，我会立刻到他身边。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知道，如果想呼唤我，就必须安安静静的，或者，最多哭一声。因为孩子是根据信号的效果来学习其意义的，除此之外信号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什么其他意义。不论一个孩子如何伤害自己，假如他是独自一人，除非他想让别人听到他在哭，一般是很少哭的。

Should he fall or bump his head, or make his nose bleed, or cut his fingers, I shall show no alarm, nor shall I make any fuss over him; I shall take no notice, at any rate at first. The harm is done; he must bear it; all my zeal could only frighten him more and make him more nervous. Indeed it is not the blow but the fear of it which distresses us when we are hurt. I shall spare him this suffering at

least, for he will certainly regard the injury as he sees me regard it; if he finds that I hasten anxiously to him, if I pity him or comfort him, he will think he is badly hurt. If he finds I take no notice, he will soon recover himself, and will think the wound is healed when it ceases to hurt. This is the time for his first lesson in courage, and by bearing slight ills without fear we gradually learn to bear greater.

如果他摔倒了、流鼻血了，撞到自己的脑袋、割伤自己的手指，我不会发出什么警示，也不会大惊小怪，至少在当时，我会表现得若无其事。既然伤害已经发生，他就必须忍受。我表现出的关心只能让他更害怕、更紧张。当我们受伤时，让我们感到的痛苦的并不是伤害本身，而是我们的恐惧。我应该尽可能少地去减轻他的痛苦，因为他一定会学到我看待伤害的方式。如果他发现我立刻非常紧张他，发现我怜悯他、安慰他，他就会觉得自己伤得很严重。而当他看到我若无其事时，就会迅速地自我恢复。一旦伤口不痛了，他就会觉得伤口已经痊愈了。这是他学到的关于勇气的第一课。我们通过勇敢地忍受小病小痛，从而逐渐学会忍受更大的痛苦。

I shall not take pains to prevent Emile hurting himself; far from it, I should be vexed if he never hurt himself, if he grew up unacquainted with pain. To bear pain is his first and most useful lesson. It seems as if children were small and weak on purpose to teach them these valuable lessons without danger. The child has such a little way to fall he will not break his leg; if he knocks himself with a stick he will not break his arm; if he seizes a sharp knife he will not grasp it tight enough to make a deep wound. So far as I know, no child, left to himself, has ever been known to kill or maim itself, or even to do itself any serious harm, unless it has been foolishly left on a high place, or alone near the fire, or within

reach of dangerous weapons. What is there to be said for all the paraphernalia with which the child is surrounded to shield him on every side so that he grows up at the mercy of pain, with neither courage nor experience, so that he thinks he is killed by a pin-prick and faints at the sight of blood?

我不会小心谨慎地防止爱弥儿伤害自己；相反，如果他从不伤害自己，如果他在成长过程中一点痛苦都不经受，我反而会很苦恼。忍受痛苦是他的人生第一课，也是最有用的一课。似乎孩子们之所以如此弱小，是为了让他们在不受危险的情况下学到珍贵的教训。即使孩子轻微地摔一跤，也不会摔断他的腿；即使用棍子打自己一下，也不会打断胳膊；即使抓住一把锋利的小刀，也不会抓得太紧以至于弄出很深的伤口。据我所知，没有哪个自由的孩子会把自己弄死、弄残废或者受很重的伤，除非大人们愚蠢地把他置于高处、独自留在火堆旁，或者把危险的武器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有人想方设法全方位地把孩子保护起来，使他免受伤害，以至于他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痛苦束手无策，既没有勇气也没有经验，认为一丁点刺痛就要死了，或者一见血就晕倒。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些防护又有什么用呢？

With our foolish and pedantic methods we are always preventing children from learning what they could learn much better by themselves, while we neglect what we alone can teach them. Can anything be sillier than the pains taken to teach them to walk, as if there were any one who was unable to walk when he grows up through his nurse's neglect? How many we see walking badly all their life because they were ill taught?

我们的教育方式愚蠢而迂腐，总是阻止孩子去学那些他们靠自学可以学得更好的东西，而忽视了那些只有我们才能教给他们的事情。

我们费尽心思地教会孩子走路，就好像有人曾因为保姆的疏忽，长大后不会走路似的。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吗？我们又看到过几个因为没被教好而一生都不能好好走路的呢？

Emile shall have no head-pads, no go-carts, no leading-strings; or at least as soon as he can put one foot before another he shall only be supported along pavements, and he shall be taken quickly across them [3_1] . Instead of keeping him mewed up in a stuffy room, take him out into a meadow every day; let him run about, let him struggle and fall again and again, the oftener the better; he will learn all the sooner to pick himself up. The delights of liberty will make up for many bruises. My pupil will hurt himself oftener than yours, but he will always be merry; your pupils may receive fewer injuries, but they are always thwarted, constrained, and sad. I doubt whether they are any better off.

爱弥儿以后是不会去用学步车、小推车或者引步带的。至少，当他会把一只脚跨到另一只脚前面时，我们便只会在人行道上扶他一把，这也只是为了让他更快地走过去而已 [4_1] 。我们不会把他整日关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我们要每天带他去草地，让他自由地奔跑，让他一次次摔倒、挣扎，摔得越多越好，这样他就会越快地学会自己爬起来。自由带来的快乐会弥补许多伤痕。爱弥儿伤害自己的次数会比你的学生多，但他永远是快乐的；你的学生或许受的伤少一些，但他们会经常感到挫败、拘束、悲伤。后者是否比前者更好，对此我表示怀疑。

As their strength increases, children have also less need for tears. They can do more for themselves, they need the help of others less frequently. With strength comes the sense to use it. It is

with this second phase that the real personal life has its beginning; it is then that the child becomes conscious of himself. During every moment of his life memory calls up the feeling of self; he becomes really one person, always the same, and therefore capable of joy or sorrow. Hence we must begin to consider him as a moral being.

随着力量的增长，孩子们逐渐不再需要泪水。他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多，需要别人帮助的越来越少。随着这种力量的到来，孩子们会意识到要去使用它。所以说，到了这第二阶段，他的个人生活才开始。到这个时候，孩子有了自我意识。在他人生中的每一个时刻，记忆都会唤起自我意识，他真正成为了一个人，每次都是如此，因此他便有了为善为恶的能力。因此，现在我们必须开始将他看做一个有道德观念的人了。

Although we know approximately the limits of human life and our chances of attaining those limits, nothing is more uncertain than the length of the life of any one of us. Very few reach old age. The chief risks occur at the beginning of life; the shorter our past life, the less we must hope to live. Of all the children who are born scarcely one half reach adolescence, and it is very likely your pupil will not live to be a man.

尽管我们都大约知道一个人最长能活多久以及达到这些期限的可能性，但没有什么事能比人的寿命更不确定了。很少有人能活到这一老年阶段。我们遭遇的主要危险从降生那刻就开始了。对生命的体验越少，求生的希望就越弱。我们的孩子能活到青春期的最多一半，因此你的学生很可能根本没机会成年。

What is to be thought, therefore, of that cruel education which sacrifices the present to an uncertain future, that burdens a child with all sorts of restrictions and begins by making him miserable, in order to prepare him for some far-off happiness which he may never enjoy? Even if I considered that education wise in its aims, how could I view without indignation those poor wretches subjected to an intolerable slavery and condemned like galley-slaves to endless toil, with no certainty that they will gain anything by it? The age of harmless mirth is spent in tears, punishments, threats, and slavery. You torment the poor thing for his good; you fail to see that you are calling Death to snatch him from these gloomy surroundings. Who can say how many children fall victims to the excessive care of their fathers and mothers? They are happy to escape from this cruelty; this is all that they gain from the ills they are forced to endure: they die without regretting, having known nothing of life but its sorrows.

那种为了不确定的未来而牺牲现在的残忍的教育，让孩子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从而变得痛苦不堪，仅仅为了那遥不可及的、也许根本没机会享受的快乐，对此我们又作何感想呢？即使我同意这种教育的目的是明智的，但是我看到这些孩子受制于无法忍受的奴役，像做苦力的奴隶一样片刻不停地工作，而且还无法确定他们能从中收获什么，目睹这一切，我怎能不感到愤怒呢？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就这样荒废在了泪水、惩罚、惊吓和奴役中。你认为你是为了孩子好，却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呼唤死神把他从阴冷的环境中带走。像这样成为父母过分关爱的牺牲品的孩子多得不胜枚举。能够逃离这样的残酷折磨，孩子们会感到很快乐，这种他们被迫忍受的痛苦能带给他们的唯一收获就是死的时候没有惋惜，因为这一生除了苦难，别无他物。

Men, be kind to your fellow-men; this is your first duty, kind to

every age and station, kind to all that is not foreign to humanity. What wisdom can you find that is greater than kindness? Love childhood, indulge its sports, its pleasures, its delightful instincts. Who has not sometimes regretted that age when laughter was ever on the lips, and when the heart was ever at peace? Why rob these innocents of the joys which pass so quickly, of that precious gift which they cannot abuse? Why fill with bitterness the fleeting days of early childhood, days which will no more return for them than for you? Fathers, can you tell when death will call your children to him? Do not lay up sorrow for yourselves by robbing them of the short span which nature has allotted to them. As soon as they are aware of the joy of life, let them rejoice in it, go that whenever God calls them they may not die without having tasted the joy of life.

人类啊，请对你的同类仁慈一点吧，这是你的首要天职，不论年龄和身份，只要他不异于人类，就请对他仁慈一点。难道你还能找到比仁慈更伟大的智慧吗？要去爱孩子的童年，让童年充满体育运动和快乐，培养起那可爱的本能。谁不会偶尔怀念那可以放声大笑、平静悠然的年纪呢？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夺走孩子们那本就稍纵即逝的快乐时光，夺走这份他们不会浪费的珍贵礼物？他们的童年和你的一样，迟早会一去不复返，那为什么还要让这段稍纵即逝的日子充满痛苦？父亲们，你知道死神什么时候会带走你的孩子吗？不要因为夺走了这段上天赐予他们的短暂时光而给自己平添悔恨。一旦孩子们开始懂得人生的快乐，让他们尽情享受吧。不管上帝什么时候召回他们，千万别让他们还没体会过人生的快乐就死去了。

How people will cry out against me! I hear from afar the shouts of that false wisdom which is ever dragging us onwards, counting the present as nothing, and pursuing without a pause a future which flies as we pursue, that false wisdom which removes us from

our place and never brings us to any other.

多少人将叫嚣着跳出来反对我啊！我老远就可以听到那虚假的聪明人发出的叫喊声，他们拖着我们向前，对当下熟视无睹，不肯停歇地追求未来，我们越追，未来逃得越快。这种虚假的智慧把我们带离现在的处境，却永远不会带我们到达另外的地方。

Now is the time, you say, to correct his evil tendencies; we must increase suffering in childhood, when it is less keenly felt, to lessen it in manhood. But how do you know that you can carry out all these fine schemes; how do you know that all this fine teaching with which you overwhelm the feeble mind of the child will not do him more harm than good in the future? How do you know that you can spare him anything by the vexations you heap upon him now? Why inflict on him more ills than befit his present condition unless you are quite sure that these present ills will save him future ill? And what proof can you give me that those evil tendencies you profess to cure are not the result of your foolish precautions rather than of nature? What a poor sort of foresight, to make a child wretched in the present with the more or less doubtful hope of making him happy at some future day. If such blundering thinkers fail to distinguish between liberty and licence, between a merry child and a spoilt darling, let them learn to discriminate.

你们会说童年时期是改正不良习惯的好时候。我们必须趁着童年这段对痛苦感受最轻的时期多受苦，这样到了成年就会少受苦。但是，你怎么知道自己能够随心所欲地实现你美好的设想；你怎么知道用这种所谓优质的教育压垮孩子脆弱的心灵，对他的未来不是弊大于利呢？你怎么知道现在给孩子施加许多苦恼就可以在未来减少一些麻

烦？除非你能肯定目前的痛苦能够解除将来的痛苦，否则为什么要让孩子承担他这个年纪承受不了的伤害呢？你又能给我什么证据去证明你所要纠正的不良习惯是他天生的而不是你那些愚蠢的预防措施所造成的呢？因为“让孩子在某个将来的日子更快乐”这种或多或少存疑的希望，而让孩子现在过得如此可怜，这是多么糟糕的远见啊！如果粗笨的理论家不能辨别自由和放纵、快乐的孩子和被宠坏的小鬼，那就让他们学着了解其中的差别。

Let us not forget what befits our present state in the pursuit of vain fancies. Mankind has its place in the sequence of things; childhood has its place in the sequence of human life; the man must be treated as a man and the child as a child. Give each his place, and keep him there. Control human passions according to man's nature; that is all we can do for his welfare. The rest depends on external forces, which are beyond our control.

在追逐那些徒劳的幻想时，我们不能忘记什么东西适合于我们当前的处境。人类在万物的秩序中有自己的位置；童年在人的一生中有自己的位置；应该将大人看作大人，将孩子看作孩子。给每个人一个位置，并使他呆在那个位置上。听从人的本性去处理人的欲念，这就是我们为了人的福祉所能做的一切。剩下的就交给外因决定，而外因恰恰是我们不能控制的。

Absolute good and evil are unknown to us. In this life they are blended together; we never enjoy any perfectly pure feeling, nor do we remain for more than a moment in the same state. The feelings of our minds, like the changes in our bodies, are in a continual flux. Good and ill are common to all, but in varying proportions. The happiest is he who suffers least; the most miserable is he who

enjoys least. Ever more sorrow than joy—this is the lot of all of us. Man's happiness in this world is but a negative state; it must be reckoned by the fewness of his ills.

我们无从得知什么是绝对的好与坏。在我们的生命中，好与坏互相交织；我们从不会有完全纯粹的感觉，也不会在不同的时刻有相同的状态。我们心里的感觉，就像我们身体，是在不断变化的。人人都有幸福和痛苦，但是每个人所拥有的程度各不相同。最开心的人是遭受苦难最少的人；而最悲惨的人则是享受快乐最少的人。苦多乐少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人类的快乐是一种消极的状态，痛苦少的人就算是幸福的人了。

Every feeling of hardship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desire to escape from it; every idea of pleasure from the desire to enjoy it. All desire implies a want, and all wants are painful; hence our wretchedness consists in the disproportion between our desires and our powers. A conscious being whose powers were equal to his desires would be perfectly happy.

一切痛苦的感觉都与希望摆脱它这种欲望密不可分，而一切快乐的观念都与希望享受它的欲望交织在一起。所有的欲望都暗示着需要，而所有的需要都是痛苦的。因此，我们的不快乐来自于欲望和能力之间的不对称。如果一个有意识的人，能够做到欲望和能力对等，那他绝对会成为非常开心的人。

What then is human wisdom? Where is the path of true happiness? The mere limitation of our desires is not enough, for if they were less than our powers, part of our faculties would be idle,

and we should not enjoy our whole being; neither is the mere extension of our powers enough, for if our desires were also increased we should only be the more miserable. True happiness consists in decreas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ur desires and our powers, in establishing a perfect equilibrium between the power and the will. Then only, when all its forces are employed, will the soul be at rest and man will find himself in his true position.

接下来我们要问，什么是人类的智慧？获得真正的快乐的途径在哪里？仅仅给欲望设限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欲望少于能力，我们的一部分能力会被闲置，我们就无法享受完整的人生；仅仅无限延伸能力也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的欲望也跟着一直膨胀，我们只会变得更痛苦。所以，真正的快乐在于减少欲望和能力之间的差异，以及在能力和意志之间建立充分的平衡。只有当全部能力得到充分使用，灵魂才能保持宁静，人才会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

In this condition, nature, who does everything for the best, has placed him from the first. To begin with, she gives him only such desires as are necessary for self-preservation and such powers as are sufficient for their satisfaction. All the rest she has stored in his mind as a sort of reserve, to be drawn upon at need. It is only in this primitive condition that we find the equilibrium between desire and power, and then alone man is not unhappy. As soon as his potential powers of mind begin to function, imagination, more powerful than all the rest, awakes, and precedes all the rest. It is imagination which enlarges the bounds of possibility for us, whether for good or ill, and therefore stimulates and feeds desires by the hope of satisfying them. But the object which seemed within our grasp flies quicker than we can follow; when we think we have grasped it, it transforms itself and is again far ahead of us. We no

longer perceive the country we have traversed, and we think nothing of it; that which lies before us becomes vaster and stretches still before us. Thus we exhaust our strength, yet never reach our goal, and the nearer we are to pleasure, the further we are from happiness.

在这种情况下，大自然总是往最好的方面去做，所以才首先这样安排人。起初，她只给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欲望和足够满足这些欲望的能力。剩下的就作为一种储备保留在人的内心深处，等到需要的时候再出现。只有在这种原始的状态中，人的欲望和能力能保持良好的平衡，人才不会感到痛苦。一旦心中潜在的能力开始发挥作用，想象力——这种在一切能力中最为强大的能力就苏醒过来，领先发展。想象力为我们扩大了可能性的边界，可能带来幸福也可能是痛苦。因此，通过给我们满足欲望的希望，而刺激、滋养了欲望的增长。这些欲望的目标看上去触手可及，实际上跑得飞快，根本追不上；每次我们觉得自己抓住它了，它就转换了形态，再次跑到了我们前面。我们再也看不到已经走过的地方，也不再去想着它了，我们面前的空间变得更宽广且仍在不断延伸，但仍然在我们的前头。因此我们穷尽了自己的力量，却仍旧没有实现目标；我们离欢愉越近，就离幸福越远。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re nearly a man's condition approximates to this state of nature the less difference is there between his desires and his powers, and happiness is therefore less remote. Lacking everything, he is never less miserable; for misery consists, not in the lack of things, but in the needs which they inspire.

另一方面，人越接近自然状态，其欲望和能力之间的差距越小，因此离幸福也就越近。一无所有的时候痛苦最少；因为痛苦并不在于

于缺乏什么，而在于被这些东西激发出的需要。

The world of reality has its bounds, the world of imagination is boundless; as we cannot enlarge the one, let us restrict the other; for all the sufferings which really make us miserable arise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al and the imaginary. Health, strength, and a good conscience excepted, all the good things of life are a matter of opinion; except bodily suffering and remorse, all our woes are imaginary. You will tell me this is a commonplace; I admit it, but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s no commonplace, and it is with practice only that we are now concerned.

现实世界有其边界，而想象的世界却无穷无尽。我们无法扩大前者，就需要限制后者。因为那些真正让我们感到痛苦的遭遇，来自于现实和想象之间的差别。除了健康、力量和良知外，生活中的所有幸福都只是观念的问题。除了生理上的痛苦和良心的责备，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是想象的。你会说这些是老生常谈。确实如此，但是，涉及到实际应用就并非如此了，而我们这里所要关注的，就是实际运用。

What do you mean when you say, “Man is weak”? The term weak implies a relation, a relation of the creature to whom it is applied. An insect or a worm whose strength exceeds its needs is strong; an elephant, a lion, a conqueror, a hero, a god himself, whose needs exceed his strength is weak. The rebellious angel who fought against his own nature was weaker than the happy mortal who is living at peace according to nature. When man is content to be himself he is strong indeed; when he strives to be more than man he is weak indeed. But do not imagine that you can increase your strength by increasing your powers. Not so; if your pride increases

more rapidly your strength is diminished. Let us measure the extent of our sphere and remain in its centre like the spider in its web; we shall have strength sufficient for our needs, we shall have no cause to lament our weakness, for we shall never be aware of it.

当你说“人类是柔弱的”这句话时，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柔弱”一词暗示的是一种关系，一种用来表达生存的关系。如果拥有的体力超过实际需要，一只昆虫也可以很强大；如果需要超过了拥有的体力，即使是一只大象、一头狮子、一名征服者或者英雄，甚至是上帝本身，也是柔弱的。反抗自己天性的天使就比一个按照自然天性、快乐度日的快乐的凡人来得柔弱。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力量感到知足，他就是强壮的；当他力求超出人所能及的范围时，就会变得柔弱。但不要妄想你可以通过提升能力来变强。并非如此，如果你的骄傲增长得过快，你的力量反而会被削弱。让我们丈量一下自己的界限，然后像蜘蛛呆在网中央一样呆在中心地带。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不需要为自己的柔弱感到悲痛，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柔弱。

The other animals possess only such powers as are required for self-preservation; man alone has more. Is it not very strange that this superfluity should make him miserable? In every land a man's labour yields more than a bare living. If he were wise enough to disregard this surplus he would always have enough, for he would never have too much. “Great needs,” said Favorin, “spring from great wealth; and often the best way of getting what we want is to get rid of what we have.” By striving to increase our happiness we change it into wretchedness. If a man were content to live, he would live happy; and he would therefore be good, for what would he have to gain by vice?

其他动物拥有的能力只能维持生存所需；只有人类拥有多余的能力。可是正是这种额外的能力造成了人的痛苦，这难道不奇怪吗？不管在什么地方，人的劳动所得总是超过生活必需的。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智慧去忽略这种多余，他就会始终觉得自己的需求是被满足了的，因为他根本不想有太多的东西。正如法沃兰所说："巨大的财富滋长巨大的需要。通常想得到什么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我们已经拥有的。"我们力求增加幸福，以至于将其变成了痛苦。如果一个人活得很知足，他就会活得幸福，因而也会活得很善良，因为做坏事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If we were immortal we should all be miserable; no doubt it is hard to die, but it is sweet to think that we shall not live for ever, and that a better life will put an end to the sorrows of this world. If we had the offer of immortality here below, who would accept the sorrowful gift? [3_2] What resources, what hopes, what consolation would be left against the cruelties of fate and man's injustice? The ignorant man never looks before; he knows little of the value of life and does not fear to lose it; the wise man sees things of greater worth and prefers them to it. Half knowledge and sham wisdom set us thinking about death and what lies beyond it; and they thus create the worst of our ills. The wise man bears life's ills all the better because he knows he must die. Life would be too dearly bought did we not know that sooner or later death will end it.

如果我们永生不死，我们都会变得很痛苦。诚然，死亡很难，但一想到我们不会永远活着，想到还有一种更好的生活会结束这辈子的痛苦，这还是挺甜蜜的。如果我们有机会永生，谁会愿意接受如此令人痛苦的馈赠呢？ [4_2] 还有什么办法、希望和安慰留给我们来对抗命运的残酷和人类的不公正呢？无知的人是没有远见的，他对生命的价值一无所知，也就不害怕失去它。明智的人能看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便会为其而舍弃生命。一知半解的知识和虚假的智慧让我们思考死亡，却看不到超越死亡的东西，因而会把死看成最大的痛苦。而明智的人知道自己肯定会死，反而能更好地忍受生活中的痛苦。如果我们不相信生命迟早会以死亡告终，我们会花费太多精力去保存它。

Our moral ills are the result of prejudice, crime alone excepted, and that depends on ourselves; our bodily ills either put an end to themselves or to us. Time or death will cure them, but the less we know how to bear it, the greater is our pain, and we suffer more in our efforts to cure our diseases than if we endured them. Live according to nature; be patient, get rid of the doctors; you will not escape death, but you will only die once, while the doctors make you die daily through your diseased imagination; their lying art, instead of prolonging your days, robs you of all delight in them. I am always asking what real good this art has done to mankind. True, the doctors cure some who would have died, but they kill millions who would have lived. If you are wise you will decline to take part in this lottery when the odds are so great against you. Suffer, die, or get better; but whatever you do, live while you are alive.

我们精神上的痛苦是由偏见导致的，只有犯罪这一情况例外，而是否犯罪又取决于我们自身。如果我们不能终结生理上的痛苦，那么它就会反过来终结我们。时间和死亡可以治愈这些痛苦，而我们对如何忍受它知道得越少，遭受的痛苦就越多，正如治愈疾病需要付出的努力远远大于忍受疾病。要按照自然法则去生活，要有耐心，要远离医生。你无法逃脱死亡，可你也只能死一次，然而医生会通过你对疾病的想象让你每天都有死亡的感觉。他们满嘴谎言的艺术不仅不能延长你的生命，反而会夺走你的快乐。我经常怀疑这种艺术到底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诚然，医生确实治愈了一些原本会死的病人，但他

们也害死了成千上万原本可以活下来的人。如果你够明智，就不会参与这种胜算如此低的赌博。忍受疾病也好，死亡也罢，治愈也罢，不管你的选择如何，重要的是活到最后一分钟。

Human institutions are one mass of folly and contradiction. As our life loses its value we set a higher price upon it. The old regret life more than the young; they do not want to lose all they have spent in preparing for its enjoyment. At sixty it is cruel to die when one has not begun to live. Man is credited with a strong desire for self-preservation, and this desire exists; but we fail to perceive that this desire, as felt by us, is largely the work of man. In a natural state man is only eager to preserve his life while he has the means for its preservation; when self-preservation is no longer possible, he resigns himself to his fate and dies without vain torments. Nature teaches us the first law of resignation. Savages, like wild beasts, make very little struggle against death, and meet it almost without a murmur. When this natural law is overthrown reason establishes another, but few discern it, and man's resignation is never so complete as nature's.

人类的习俗是愚蠢和矛盾事物的集合。当我们给生命贴上更高昂的价签时，它已经失去了价值。老人通常比年轻人有更多悔恨。他们不想丢掉为了准备享受人生而付出的一切。对于六十岁的人来说，如果还没有享受过人生的快乐就死了，那确实是很残忍的事。人类经常被称赞拥有维持生存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的确存在。但是我们没有察觉到，我们所感受到的这种愿望其实大部分是人为的。在自然的状态下，人只有在其有办法保护生命的时候才会对此无比热情；一旦保护生命变得不可能实现，他会认命，不会再在死之前给自己平添无谓的折磨。自然教会我们的第一法则就是顺从，顺从生命的长短。野蛮人和野兽一样，面对死亡可以毫不挣扎，没有抱怨地接受。当这一自

然法则被推翻，理性就会建立起另一项法则，只是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它，然而生命的长短由人决定这个法则是不如前者那么完整的。

Prudence! Prudence which is ever bidding us look forward into the future, a future which in many cases we shall never reach; here is the real source of all our troubles! How mad it is for so short-lived a creature as man to look forward into a future to which he rarely attains, while he neglects the present which is his? This madness is all the more fatal since it increases with years, and the old, always timid, prudent, and miserly, prefer to do without necessaries to-day that they may have luxuries at a hundred. Thus we grasp everything, we cling to everything; we are anxious about time, place, people, things, all that is and will be; we ourselves are but the least part of ourselves. We spread ourselves, so to speak, over the whole world, and all this vast expanse becomes sensitive. No wonder our woes increase when we may be wounded on every side. How many princes make themselves miserable for the loss of lands they never saw, and how many merchants lament in Paris over some misfortune in the Indies!

深谋远虑！深谋远虑让我们展望未来，一个在大多数情况下永远无法到达的未来，这就是我们所有麻烦的来源！像人这种生命如此短暂的生物，忽略真正拥有的当下，去展望不太可能获得的未来，这是多么疯狂的举动啊！这种疯狂会日益增长，这让它变得更加致命。老人，经常是胆小的、审慎的、吝啬的，宁愿现在什么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也不愿百岁之时缺少那些到时候根本用不上的东西。因此，我们总想抓住一切，对什么都紧握不放。我们对现在的和将来的时间、地点、人群、事物无比焦虑，而我们自己却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可以说，我们将自己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在这个广阔空间的任何角落我们都可以感知到自己的存在。于是我们的任何一侧都有可能受伤，

这就难怪我们的痛苦一直在增加。有多少君主因为失去了那些他们根本没见过的土地让自己变得无比痛苦，又有多少商人由于在印度的损失而在巴黎悲叹。

Is it nature that carries men so far from their real selves? Is it her will that each should learn his fate from others and even be the last to learn it; so that a man dies happy or miserable before he knows what he is about. There is a healthy, cheerful, strong, and vigorous man; it does me good to see him; his eyes tell of content and well-being; he is the picture of happiness. A letter comes by post; the happy man glances at it, it is addressed to him, he opens it and reads it. In a moment he is changed, he turns pale and falls into a swoon. When he comes to himself he weeps, laments, and groans, he tears his hair, and his shrieks re-echo through the air. You would say he was in convulsions. Fool, what harm has this bit of paper done you? What limb has it torn away? What crime has it made you commit? What change has it wrought in you to reduce you to this state of misery?

是自然使人如此迷失本性的吗？让每个人从别人的命运学到自己的命运，而且往往是最后一个知情者，这是自然的意志吗？是自然要让人在认识到自我之前快乐或悲伤地死去吗？曾经有一个健康、积极、强壮、精神充沛的人，看到他我就高兴，他的眼神里有喜悦和物质富足的光芒，他就是幸福的写照。然后来了一封信，这个幸福的人扫了一眼发现是寄给他的，他便打开信读了起来。在那一刻，他变了，变得苍白无力，甚至突然晕倒了。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哭泣、恸哭、呻吟，撕扯自己的头发，尖叫声响彻云霄。你会说他好像痉挛症发作似的。真是个傻瓜，这样一张薄薄的信纸能给你造成什么伤害？它折断了你的手脚吗？它让你犯了什么罪吗？它给你带来了什么变化以至于让你变得如此痛苦不堪？

Had the letter miscarried, had some kindly hand thrown it into the fire, it strikes me that the fate of this mortal, at once happy and unhappy, would have offered us a strange problem. His misfortunes, you say, were real enough. Granted; but he did not feel them. What of that? His happiness was imaginary. I admit it; health, wealth, a contented spirit, are mere dreams. We no longer live in our own place, we live outside it. What does it profit us to live in such fear of death, when all t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is our own?

要是那封信寄错了地址，或者被好心人扔到了火堆里，那么这个又幸福又痛苦的人的命运就变成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会说他的不幸足够真实。是的，但他以前没有觉察到。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幸福是想象出来的。我同意这一点。所谓的健康、财富、满足的内心，都仅仅是幻象。我们已不在自己的位置上生活，我们的生活已经超出了能力许可的范围。当所有让生命值得继续下去的东西都属于我们时，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Oh, man! live your own life and you will no longer be wretched. Keep to your appointed place in the order of nature and nothing can tear you from it. Do not kick against the stern law of necessity, nor waste in vain resistance the strength bestowed on you by heaven, not to prolong or extend your existence, but to preserve it so far and so long as heaven pleases. Your freedom and your power extend as far and no further than your natural strength; anything more is but slavery, deceit, and trickery. Power itself is servile when it depends upon public opinion; for you are dependent on the prejudices of others when you rule them by means of those prejudices. To lead them as you will, they must be led as they will. They have only to change their way of thinking and you are forced

to change your course of action. Those who approach you need only contrive to sway the opinions of those you rule, or of the favourite by whom you are ruled, or those of your own family or theirs. Had you the genius of Themistocles [3_3] , viziers, courtiers, priests, soldiers, servants, babblers, the very children themselves, would lead you like a child in the midst of your legions. Whatever you do, your actual authority can never extend beyond your own powers. As soon as you are obliged to see with another's eyes you must will what he wills. You say with pride, “My people are my subjects.” Granted, but what are you? The subject of your ministers. And your ministers, what are they? The subjects of their clerks, their mistresses, the servants of their servants. Grasp all, usurp all, and then pour out your silver with both hands; set up your batteries, raise the gallows and the wheel; make laws, issue proclamations, multiply your spies, your soldiers, your hangmen, your prisons, and your chains. Poor little men, what good does it do you? You will be no better served, you will be none the less robbed and deceived, you will be no nearer absolute power. You will say continually, “It is our will,” and you will continually do the will of others.

人类啊！知足地过好自己的生活，你就不会再痛苦了。好好地呆在自然秩序赋予你的位置上，不要让任何力量带走你。不要去挑战严格的必然法则，不要将力量浪费在反抗它上，因为上天给你力量不是为了让你延长或扩张自己的存在，而是让你按照上天喜欢的方式和它规定的范围去生活。你的自由和权力扩张的范围不能超过上赋予你的自然能力，任何多出来的东西都只是奴役、谎言、虚无。当权力需要依靠公共舆论时，其自身就带有奴性。因为当你利用他人的偏见来统治他们时，你的权力就依赖于这种偏见。为了按照你的意志去支配他们，你就必须先按照他们的心意做事。他们只要改变一下思考方式，你就不得不相应地改变你的做法。要想靠近你，只需要设法改变受你统治的那些人或者你喜欢的人的思想，或设法改变你的家人或他们的

家人的思想。即使你有地米斯托克利 [4_3] 一般的天才，那些高官、朝臣、牧师、士兵、仆人甚至小孩，也可以在你的军队里把你当小孩一样指挥。不论你做什么，你的实际权力都无法超过你的实际能力。一旦你被迫以他人的眼光去观察事物，你就必须按照他人的意志行事了。你会骄傲地宣称“我的人民都臣服于我”。这是真的，但你自己呢？你臣服于你的官员。那你的官员呢，他们又是什么？他们臣服于其属员和情人，他们是其仆人的仆人。你要占有一切，又挥金如土；你修筑炮台、绞刑架、战车；你制订法律，发布公告，增加几倍的间谍、士兵、刽子手、监狱和锁链。可怜的人啊，这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你不会得到更好的对待，你依然被掠夺和欺骗，也绝不会更加靠近绝对权力。当然，你还是会继续宣称“这是我的意志”。随后，你仍会继续按照别人的意志行事。

There is only one man who gets his own way—he who can get it single-handed; therefore freedom, not power, is the greatest good. That man is truly free who desires what he is able to perform, and does what he desires. This is my fundamental maxim. Apply it to childhood, and all the rules of education spring from it.

只有能够自己实现自己意志的人才能做到随心所欲，因此最宝贵的财富是自由而不是权力。只去想自己能做到的事，只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这是我的基本准则。将其应用到童年时期，便可从中得出一切教育法则。

Society has enfeebled man, not merely by robbing him of the right to his own strength, but still more by making his strength insufficient for his needs. This is why his desires increase in proportion to his weakness; and this is why the child is weaker than the man. If a man is strong and a child is weak it is not because the

strength of the one is absolutely greater than the strength of the other, but because the one can naturally provide for himself and the other cannot. Thus the man will have more desires and the child more caprices, a word which means, I take it, desires which are not true needs, desires which can only be satisfied with the help of others.

社会使人变得柔弱，不仅仅通过夺走人运用力量的权利，更多的是通过使人的力量无法满足其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人的欲望会随着柔弱而相应增长，也解释了儿童为什么比成人更柔弱。如果说成人是强壮的，儿童是柔弱的，这不是因为前者的力量比后者强大，而是就自然状态而言，前者能为自己提供其需要的东西，而后者做不到。因此，成人有更多欲望，儿童则更任性。任性的意思是，这种欲望并不是真正的需要，而是只能通过他人帮助才能被满足的欲望。

I have already given the reason for this state of weakness. Parental affection is nature's provision against it; but parental affection may be carried to excess, it may be wanting, or it may be ill applied. Parents who live under our ordinary social conditions bring their child into these conditions too soon. By increasing his needs they do not relieve his weakness; they rather increase it. They further increase it by demanding of him what nature does not demand, by subjecting to their will what little strength he has to further his own wishes, by making slaves of themselves or of him instead of recognising that mutual dependence which should result from his weakness or their affection.

由此我已经解释了这种柔弱状态的成因。父母的关爱是大自然用来弥补这种柔弱的，但是父母的关爱可能会过头，不够，或者运用不

当。生活在一般社会环境下的父母通常过早地将孩子带入这些环境中。父母让孩子的需求得到增长，却并没有减轻他们的柔弱，相反还增加了。父母要求孩子做连大自然都不要求他做的事，按照他们的意志让孩子靠着那微弱的力量去增进他的心愿，他们成为了自己或孩子的奴隶，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由于孩子的柔弱或者他们的关爱而导致的相互依赖——这一切都进一步增加了孩子的柔弱。

The wise man can keep his own place; but the child who does not know what his place is, is unable to keep it. There are a thousand ways out of it, and it is the business of those who have charge of the child to keep him in his place, and this is no easy task. He should be neither beast nor man, but a child. He must feel his weakness, but not suffer through it; he must be dependent, but he must not obey; he must ask, not command. He is only subject to others because of his needs, and because they see better than he what he really needs, what may help or hinder his existence. No one, not even his father, has the right to bid the child do what is of no use to him.

明智的人可以呆在自然赋予他的位置上，但孩子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何在，自然也就做不到这一点。要离开自己的位置有千百条条路，而孩子的监护人有责任让孩子呆在自己的位置上，但这并非易事。孩子不应是野兽或成人，而应该是个孩子。他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柔软，但不能因此受苦；他应该依赖于成人，但不能任其摆布；他可以提出要求，但不能下达命令。只有当孩子确有需要，或者成人更了解他真正需要什么，什么对他的生存有益或有害时，他才能听从于成人。包括父亲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让孩子去做对他没有用处的事。

When our natural tendencies have not been interfered with by

human prejudice and human institutions, the happiness alike of children and of men consists in the enjoyment of their liberty. But the child's liberty is restricted by his lack of strength. He who does as he likes is happy provided he is self-sufficing; it is so with the man who is living in a state of nature. He who does what he likes is not happy if his desires exceed his strength; it is so with a child in like conditions. Even in a state of nature children only enjoy an imperfect liberty, like that enjoyed by men in social life. Each of us, unable to dispense with the help of others, becomes so far weak and wretched. We were meant to be men, laws and customs thrust us back into infancy. The rich and great, the very kings themselves are but children; they see that we are ready to relieve their misery; this makes them childishly vain, and they are quite proud of the care bestowed on them, a care which they would never get if they were grown men.

在我们的自然倾向还没有被人类的偏见和习俗影响之前，孩子和成人拥有幸福的原因在于能够享受自由。但孩子的自由会受到力量缺乏的限制。一个人只要能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可以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就会活得很快乐。这就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成人该有的样子。但是如果欲望超过了能力，即使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是不快乐的，这就是生活在类似状态下的孩子的样子。即使在自然状态下，孩子们也只能拥有不完整的自由，如同身处社会生活中的成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摒弃他人的帮助，由此变得如此柔弱和可怜。我们本应该做成年人，但法律和习俗又把我们变回了孩子。不管是富人、伟人还是君王，都是孩子。他们看到我们准备好去解除他们的痛苦，于是产生了幼稚的自负心理，他们为这种照料而感到骄傲，然而没有意识到如果他们被当作成人对待，是不会获得这种照料的。

These are weighty considerations, and they provide a solution

for all the conflicting problems of our social system. There are two kinds of dependence: dependence on things, which is the work of nature; and dependence on men, which is the work of society. Dependence on things, being non-moral, does no injury to liberty and begets no vices; dependence on men, being out of order [3_4] , gives rise to every kind of vice, and through this master and slave become mutually depraved. If there is any cure for this social evil, it is to be found in the substitution of law for the individual; in arming the general will with a real strength beyond the power of any individual will. If the laws of nations, like the laws of nature, could never be broken by any human power, dependence on men would become dependence on things; all the advantages of a state of nature would be combined with all the advantages of social life in the commonwealth. The liberty which preserves a man from vice would be united with the morality which raises him to virtue.

这些看法很重要，可以为社会体系中存在的所有矛盾和问题提供解决方法。依赖分两种：依赖于事物，这是自然作用的结果；依赖于人，这是社会作用的结果。依赖于事物不包含道德因素，因此对人的自由没有损害，也不会产生什么罪恶。然而依赖于人意味着失去秩序 [4_4] ，会滋生各式罪恶，从而导致主人和奴隶双双堕落。如果说有什么方法可以治愈这种社会弊端，那就只有用法律代替人，用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真正力量去保护公众意志。如果国家的法律能像自然准则一样永远不会被人为力量打破，对人的依赖就会转化为对事物的依赖。我们就可以在国家中将自然状态的所有优势和社会生活的所有优势结合起来。使人远离罪恶的自由就可以和培养节操的道德结合起来。

Keep the child dependent on things only. By this course of education you will have followed the order of nature. Let his

unreasonable wishes meet with physical obstacles only, or the punishment which results from his own actions, lessons which will be recalled when the same circumstances occur again. It is enough to prevent him from wrong doing without forbidding him to do wrong. Experience or lack of power should take the place of law. Give him, not what he wants, but what he needs. Let there be no question of obedience for him or tyranny for you. Supply the strength he lacks just so far as is required for freedom, not for power, so that he may receive your services with a sort of shame,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time when he may dispense with them and may achieve the honour of self-help.

要让孩子始终保持只依赖事物。这样教育他，你就能跟着自然的秩序。让他那些不合理的愿望只遭遇有形的障碍或者遭遇由他自己的行为本身而产生的惩罚，这样下次再发生同样的情况时他就会想起这些教训。这样就算你不制止，也足够防止他做错事了。力量的缺乏或者经验应该取代法律。给他需要的，而不是想要的。不要教他怎么顺从人和使唤人。只向他提供获得自由而不是获得权力所缺乏的力量，这样他在接受你的帮助时才会有羞耻心，期望早日摒弃这些帮助，实现自立的光荣。

Nature provides for the child's growth in her own fashion, and this should never be thwarted. Do not make him sit still when he wants to run about, nor run when he wants to be quiet. If we did not spoil our children's wills by our blunders their desires would be free from caprice. Let them run, jump, and shout to their heart's content. All their own activities are instincts of the body for its growth in strength; but you should regard with suspicion those wishes which they cannot carry out for themselves, those which others must carry out for them. Then you must distinguish carefully

betwee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needs, between the needs of budding caprice and the needs which spring from the overflowing life just described.

自然有自己的办法让孩子成长，这些办法永远不应该被舍弃。不要在孩子想奔跑的时候让他安静地坐着，也不要在他想静下来的时候让他奔跑。只要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疏忽去损害孩子的意志，他们就不会任性胡来。让他们尽情地奔跑、跳跃、吵吵闹闹。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是增强体力的身体本能，但你需要警惕那些他们自己无法实现而必须靠别人替他们做才能完成的事。你还需要仔细区分自然需求和人为需求，区分任性的需求和我此前提到过的优渥的生活所引起的需求。

I have already told you what you ought to do when a child cries for this thing or that. I will only add that as soon as he has words to ask for what he wants and accompanies his demands with tears, either to get his own way quicker or to over-ride a refusal, he should never have his way. If his words were prompted by a real need you should recognise it and satisfy it at once; but to yield to his tears is to encourage him to cry, to teach him to doubt your kindness, and to think that you are influenced more by his importunity than your own good-will. If he does not think you kind he will soon think you unkind; if he thinks you weak he will soon become obstinate; what you mean to give must be given at once. Be chary of refusing, but, having refused, do not change your mind.

我已经告诉过你当孩子哭闹着要这要那时，你应该怎么做。我只补充一点，当他会用语言表达想要什么之后，无论是为了更快地实现愿望，还是为了让别人无法拒绝他的要求，只要他还用哭闹的方式索取，都不要答应他。如果他说的话基于真正的需要，你应该立刻弄清

他要什么并加以满足。但是，屈服于他的眼泪是在鼓励他哭闹，是在教他质疑你的仁慈，让他认为强求比温和地索取更有效。如果他看不到你的好意，他就觉得你是恶人。如果他觉得你软弱，他就会变得难以控制，导致一旦你答应给他什么就必须立刻兑现。谨慎地拒绝，但一旦拒绝就不要改变主意。

Above all, beware of teaching the child empty phrases of politeness, which serve as spells to subdue those around him to his will, and to get him what he wants at once. The artificial education of the rich never fails to make them politely imperious, by teaching them the words to use so that no one will dare to resist them. Their children have neither the tone nor the manner of suppliants; they are as haughty or even more haughty in their entreaties than in their commands, as though they were more certain to be obeyed. You see at once that “If you please” means “It pleases me,” and “I beg” means “I command.” What a fine sort of politeness which only succeeds in changing the meaning of words so that every word is a command! For my own part, I would rather Emile were rude than haughty, that he should say “Do this” as a request, rather than “Please” as a command. What concerns me is his meaning, not his words.

最重要的，不要教孩子空洞的客套话，因为他可以将其作为咒语来让周围的人臣服于他的意志，让他立刻获得想要的东西。富人教育孩子的时候就会教他们这种让别人不敢违抗的话，从而培养出披着礼貌外衣的专横。这些孩子既没有求人的语气也没有求人的态度，他们的恳求听起来和命令一样傲慢，甚至更甚，好像别人非得服从似的。你可以马上看出，“如果你乐意这样做”的实际意思是“你这样做会让我高兴”，而“我求你”实际上是“我命令你”。这种礼貌让什么话都变了意思，因此每个词听起来都是在下命令。至于我，我宁愿爱弥儿粗鲁也

不愿他傲慢，我宁愿他在请求别人的时候说“你去做”，也不愿他在命令别人的时候还说“请你做”。我关心的是他要表达的意思，而不是他用的措辞。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excessive severity as well as excessive indulgence, and both alike should be avoided. If you let children suffer you risk their health and life; you make them miserable now; if you take too much pains to spare them every kind of uneasiness you are laying up much misery for them in the future; you are making them delicate and over-sensitive; you are taking them out of their place among men, a place to which they must sooner or later return, in spite of all your pains. You will say I am falling into the same mistake as those bad fathers whom I blamed for sacrificing the present happiness of their children to a future which may never be theirs.

过度残忍的教育和过度放任是一样的，都应该避免。如果你让孩子受苦，这是在让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让他们在当下过得很悲惨；如果你花费许多精力让他们免受各种不安，则是在为他们的将来增添痛苦。你在让他们变得脆弱、敏感，你在把他们带离成人的位置，但是不管你如何劳心劳神，他们迟早还是要回到这个位置上的。你会说我曾经责备过那些为了虚妄的未来而牺牲孩子当下的快乐的父亲，但现在我自己也在犯相同的错误。

Not so; for the liberty I give my pupil makes up for the slight hardships to which he is exposed. I see little fellows playing in the snow, stiff and blue with cold, scarcely able to stir a finger. They could go and warm themselves if they chose, but they do not choose; if you forced them to come in they would feel the harshness

of constraint a hundredfold more than the sharpness of the cold. Then what becomes of your grievance? Shall I make your child miserable by exposing him to hardships which he is perfectly ready to endure? I secure his present good by leaving him his freedom, and his future good by arming him against the evils he will have to bear. If he had his choice, would he hesitate for a moment between you and me?

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给学生的自由足以弥补他遭受的轻微痛苦。我看到他们在雪地里玩耍，皮肤都冻紫了，手指都冻得不那么灵活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暖和的地方，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但如果你强迫他们进屋，他们会觉得这种强迫比寒冷还要难受百倍。所以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如果你的孩子准备好忍受苦难了，我的做法还会让他们痛苦吗？我给他自由，从而保护了他当下的快乐；我教他如何抵抗未来必然要经受的灾难，从而保护了他未来的快乐。如果他能自己选择，难道他会犹豫是做你的学生还是做我的学生吗？

Do you think any man can find true happiness elsewhere than in his natural state; and when you try to spare him all suffering, are you not taking him out of his natural state? Indeed I maintain that to enjoy great happiness he must experience slight ills; such is his nature. Too much bodily prosperity corrupts the morals. A man who knew nothing of suffering would be incapable of tenderness towards his fellow-creatures and ignorant of the joys of pity; he would be hard-hearted, unsocial, a very monster among men.

你认为有人能从他的自然状态之外找到真正的幸福吗？当你尝试减少他的痛苦时，你是否同时将他带离了自然状态呢？我的确认为假如一个人要获得巨大的幸福，必须经历轻微的痛苦，这才是人的天

性。身体太舒服了，道德就会败坏。一个不知道痛苦的人不会关爱同伴，不会明白同情他人的快乐，他会变得铁石心肠，不与他人社交，最终成为人类中的怪物。

Do you know the surest way to make your child miserable? Let him have everything he wants; for as his wants increase in proportion to the ease with which they are satisfied, you will be compelled, sooner or later, to refuse his demands, and this unlooked-for refusal will hurt him more than the lack of what he wants. He will want your stick first, then your watch, the bird that flies, or the star that shines above him. He will want all he sets eyes on, and unless you were God himself, how could you satisfy him?

你知道有什么办法肯定会让你的孩子痛苦不堪吗？那就是让他拥有一切他想要的东西，因为越容易被满足，他的欲望就会越多，而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能力不足而不得不拒绝他，这种意料之外的拒绝给他造成的伤害远比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大得多。起初，他会想要你的拐杖，然后是你的手表，然后是飞翔的鸟或他头顶闪烁的星星。他会想要看到的一切，这时，除非你是上帝，否则你怎么能满足他？

Man naturally considers all that he can get as his own. In this sense Hobbes' theory is true to a certain extent: Multiply both our wishes and the means of satisfying them, and each will be master of all. Thus the child, who has only to ask and have, thinks himself the master of the universe; he considers all men as his slaves; and when you are at last compelled to refuse, he takes your refusal as an act of rebellion, for he thinks he has only to command. All the reasons you give him, while he is still too young to reason, are so many pretences in his eyes; they seem to him only unkindness; the sense

of injustice embitters his disposition; he hates every one. Though he has never felt grateful for kindness, he resents all opposition.

人类通常会把一切能够得到的东西看作是属于自己的。从这个角度看，霍布斯的理论在一定程度是是正确的，即如果满足欲望的方式会随着欲望的成倍增加而增加，那么每个人都将是万物之主了。因此，对于那些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孩子而言，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宇宙的主人，他把所有人视为自己的奴仆。当你最后不得不拒绝他的要求时，他会把这种拒绝看做造反，因为他觉得自己发号的一切施令都应该被满足。因为他还太小，无法理性地思考，所以你告诉他的任何理由在他眼里都是借口，在他看来都是不怀好意。他会觉得受到了不公平对待，这会激怒他，于是他对所有人怀恨在心。尽管他从没对他人的仁慈表示过感激，但现在他对所有反对的声音都无比仇恨。

How should I suppose that such a child can ever be happy? He is the slave of anger, a prey to the fiercest passions. Happy! He is a tyrant, at once the basest of slaves and the most wretched of creatures. I have known children brought up like this who expected you to knock the house down, to give them the weather-cock on the steeple, to stop a regiment on the march so that they might listen to the band; when they could not get their way they screamed and cried and would pay no attention to any one. In vain everybody strove to please them; as their desires were stimulated by the ease with which they got their own way, they set their hearts on impossibilities, and found themselves face to face with opposition and difficulty, pain and grief. Scolding, sulking, or in a rage, they wept and cried all day. Were they really so greatly favoured? Weakness, combined with love of power, produces nothing but folly and suffering. One spoilt child beats the table; another whips the sea. They may beat and whip long enough before they find

contentment.

我怎么能认为这样的孩子是幸福的呢？他是愤怒的奴隶，是狂热激情的受害者。幸福啊！这样的孩子是一个暴君，它既是最卑贱的奴隶，也是最可怜的生灵。我曾看到过在这样的方式下培养出来的孩子，他会想让你们把房子撞到，想得到钟楼上的风标，想让人拦住行进中的军队好让他们听一会儿乐队的演奏。当他们无法被满足时，他们就会嚎叫、苦恼，不听任何人的劝。每个人都力求取悦他们，但到头来都是白费。他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欲望也因而一直被激发出来。他们开始期望那些不可能实现的事，然后发现自己与抵触、障碍、困难、痛苦迎面相遇。他们或是责骂、愠怒，或是在一定范围内整天哭哭啼啼。这样的人难道是幸福的吗？柔弱和热衷权力结合在一起，只会带来愚蠢和痛苦。在两个被宠坏的孩子中，如果一个大发脾气，另一个肯定要闹个翻江倒海。他们肯定要闹很长时间才会感到满足。

If their childhood is made wretched by these notions of power and tyranny, what of their manhood, when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ir fellow-men begin to grow and multiply? They are used to find everything give way to them; what a painful surprise to enter society and meet with opposition on every side, to be crushed beneath the weight of a universe which they expected to move at will. Their insolent manners, their childish vanity, only draw down upon them mortification, scorn, and mockery; they swallow insults like water; sharp experience soon teaches them that they have realised neither their position nor their strength. As they cannot do everything, they think they can do nothing. They are daunted by unexpected obstacles, degraded by the scorn of men; they become base, cowardly, and deceitful, and fall as far below their true level as they formerly soared above it.

假如孩子的童年从小就被这些暴力、专横的思想弄得如此可怜，那么当他们成年后，随着与他人的联系开始增长，情况又会如何呢？他们习惯了所有人给他们让路，当他们步入社会，发现不管到哪儿都会遭到反对时，会感到多么震惊；发现原来按照自己意志运行的世界现在压在自己身上时，会受到多么大的打击。他们的张狂傲慢、幼稚自负只会给自己带来屈辱、轻蔑、嘲笑，只能像喝水一样咽下侮辱；残酷的经历很快会让他们明白，他们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和力量。当他们知道了自己不能做到所有事时，便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许多意料之外的阻碍在威胁他们，许多人的轻蔑在藐视他们，于是他们变得低贱、懦弱、狡诈，从前把自己看得多么高贵，现在就把自己看的多么低贱。

Let us come back to the primitive law. Nature has made children helpless and in need of affection; did she make them to be obeyed and feared? Has she given them an imposing manner, a stern eye, a loud and threatening voice with which to make themselves feared? I understand how the roaring of the lion strikes terror into the other beasts, so that they tremble when they behold his terrible mane, but of all unseemly, hateful, and ridiculous sights, was there ever anything like a body of statesmen in their robes of office with their chief at their head bowing down before a swaddled babe, addressing him in pompous phrases, while he cries and slavers in reply?

现在让我们回头谈谈原始的法则。自然让孩子是柔弱无助的，需要他人的关爱，但孩子却让别人听命于他们，惧怕他们，难道是自然让孩子拥有作威作福的举止、凶狠的眼神和粗暴的嗓音，好让每个人都害怕他们吗？我理解雄狮的怒吼可以威慑其他的野兽，头上的鬃毛可以让别的动物一看到就瑟瑟发抖。但是在所有不合时宜、令人讨厌

又荒唐至极的场景中，一群身穿制服的官员，跟着他们的长官臣服在一个尚在襁褓的婴儿的面前庄严地长篇大论，而对方的回应只有啼哭和流涎，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

If we consider childhood itself, is there anything so weak and wretched as a child, anything so utterly at the mercy of those about it, so dependent on their pity, their care, and their affection? Does it not seem as if his gentle face and touching appearance were intended to interest every one on behalf of his weakness and to make them eager to help him? And what is there more offensive, more unsuitable, than the sight of a sulky or imperious child, who commands those about him, and impudently assumes the tones of a master towards those without whom he would perish?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童年本身，还有什么像孩子一样柔弱和可怜，听从他人的摆布，如此依赖于他人的怜惜、照顾和关爱呢？如此看来，孩子那可爱的面庞和动人的神情，难道不是为了让每个人看到他的柔弱从而乐于去帮助他吗？还有什么比看到一个盛气凌人或者飞扬跋扈的孩子更令人讨厌和不合常理的呢？他以厚颜无耻的主人口吻向周围所有人发号施令，殊不知没有这些人他早就活不下去了。

On the other hand, do you not see how children are fettered by the weakness of infancy? Do you not see how cruel it is to increase this servitude by obedience to our caprices, by depriving them of such liberty as they have? a liberty which they can scarcely abuse, a liberty the loss of which will do so little good to them or us. If there is nothing more ridiculous than a haughty child, there is nothing that claims our pity like a timid child. With the age of reason the child becomes the slave of the community; then why forestall this

by slavery in the home? Let this brief hour of life be free from a yoke which nature has not laid upon it; leave the child the use of his natural liberty, which, for a time at least, secures him from the vices of the slave. Bring me those harsh masters, and those fathers who are the slaves of their children, bring them both with their frivolous objections, and before they boast of their own methods let them for once learn the method of nature.

另一方面，你难道没看到孩子是如何被童年的柔弱所桎梏的吗？我们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使他们不仅受到顺从的束缚还有我们的任性造成的奴役，这难道不残忍吗？他们不会滥用这种自由，剥夺这种自由不论对孩子还是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如果说傲慢的孩子最荒唐可笑，那么胆小怯懦的孩子就是最可怜的。等到了理性的年纪，孩子就变成了社会的奴隶，那为什么还要让他们这么早就受到家庭的奴役呢？不要让这短暂的童年受到自然没有强加给它的束缚，让孩子去使用他那天赋的自由，至少这能暂时使他免受奴隶社会恶习的侵染。把那些粗暴的教师、那些让自己的孩子做奴隶的父亲带到我面前，把他们那肤浅的反对理由拿出来说一说，让他们在吹嘘自己的方法前先学一学大自然的方法。

I return to practical matters. I have already said your child must not get what he asks, but what he needs [3_5] ; he must never act from obedience, but from necessity.

我再回到实践的问题上。我前面说过你的孩子不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而是要看他的真实需要 [4_5] 。同时，他的行为也不应该是为了顺从你，而是出自需要。

The very words OBEY and COMMAND will be excluded from his vocabulary, still more those of DUTY and OBLIGATION; but the words strength, necessity, weakness, and constraint must have a large place in it. Before the age of reason it is impossible to form any idea of moral beings or social relations; so avoid, as far as may be, the use of words which express these ideas, lest the child at an early age should attach wrong ideas to them, ideas which you cannot or will not destroy when he is older. The first mistaken idea he gets into his head is the germ of error and vice; it is the first step that needs watching. Act in such a way that while he only notices external objects his ideas are confined to sensations; let him only see the physical world around him. If not, you may be sure that either he will pay no heed to you at all, or he will form fantastic ideas of the moral world of which you prate, ideas which you will never efface as long as he lives.

这样的话，诸如服从、命令、责任、义务这样的字眼就不会出现在他的字典里；但是，力量、需要、柔软、遏制这样的词必须要有一席之地。在明事理的年龄之前，要让孩子形成精神存在和社会关系的概念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尽量避免表达这些概念的词，以免孩子在太小的年纪为这些词加上错误的观念。这些观念一旦形成，将来你是无法改变的。孩子学到的第一个不正确概念会成为滋生错误和罪恶的滥觞，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步。让他只去留意外界物体，把他的观念限制在感觉的范围之内，让他只能看到周围的切实存在的物质世界。如果不这样做，可以确信，他要么对你毫不在意，要么对你整天念叨的精神世界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观念。这些观念会伴随他一生，你永远不可能消除。

“Reason with children” was Locke's chief maxim; it is in the height of fashion at present, and I hardly think it is justified by its

results; those children who have been constantly reasoned with strike me as exceedingly silly. Of all man's faculties, reason, which is, so to speak, compounded of all the rest, is the last and choicest growth, and it is this you would use for the child's early training. To make a man reasonable is the coping stone of a good education, and yet you profess to train a child through his reason! You begin at the wrong end, you make the end the means. If children understood reason they would not need education, but by talking to them from their earliest age in a language they do not understand you accustom them to be satisfied with words, to question all that is said to them, to think themselves as wise as their teachers; you train them to be argumentative and rebellious; and whatever you think you gain from motives of reason, you really gain from greediness, fear, or vanity with which you are obliged to reinforce your reasoning.

“用理性去教育孩子”是洛克最重要的准则。这个准则在当今是最时髦的，但我认为这种教育方法的结果无法印证其正确性。那些一直接受理性教育的孩子，在我看来，是最傻的。人类的所有官能中，理性是其他官能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是由其他官能组合而成的，因此理性最难发展、发展得最慢，而你却偏偏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中使用它。能拥有理性是接受良好教育的结果，而你却反过来用理性去发展教育！这简直是本末倒置，把方式当作了结果。如果孩子一开始就理解理性的话，他们也不用接受教育了。在童年时期用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语言与其交流，会让孩子养成这样的习惯：咬文嚼字、质疑一切、认为自己和老师一样聪明。你把他们教得好辩、反叛，你认为自己从理性的动机中受益，实际上是从贪婪、恐惧、虚荣中受益，你也只能用这些东西去强化你那所谓的理性了。

Most of the moral lessons which are and can be given to

children may be reduced to this formula; Master. You must not do that.

大多数对孩子们进行的或能够进行的道德教育通常可以归纳为如下的形式：老师：你不许这样做。

Child. Why not?

孩子：为什么？

Master. Because it is wrong.

老师：因为这样做是错的。

Child. Wrong! What is wrong?

孩子：错的。什么是错的？

Master. What is forbidden you.

老师：就是你不能做的事。

Child. Why is it wrong to do what is forbidden?

孩子：为什么做不能做的事就是错的呢？

Master. You will be punished for disobedience.

老师：因为你会因为不听话而受到惩罚。

Child. I will do it when no one is looking.

孩子：那我就在没人看到的时候做。

Master. We shall watch you.

老师：我们会看着你的。

Child. I will hide.

孩子：那我就藏起来。

Master. We shall ask you what you were doing.

老师：我们会问你做了什么。

Child. I shall tell a lie.

孩子：那我撒谎。

Master. You must not tell lies.

老师：你不可以撒谎。

Child. Why must not I tell lies?

孩子：为什么我不能撒谎？

Master. Because it is wrong, etc.

老师：因为那是错的。诸如此类。

That is the inevitable circle. Go beyond it, and the child will not understand you. What sort of use is there in such teaching? I should greatly like to know what you would substitute for this dialogue. It would have puzzled Locke himself. It is no part of a child's business to know right and wrong, to perceive the reason for

a man's duties.

这是个无法避免的循环。不要再这样下去了，孩子是无法理解的。这样的教育方法能有什么作用呢？同时我也很好奇你能用什么东西来代替上面那段对话。或许洛克本人也会感到困惑吧。分辨对错、理解人类要承担种种职责的原因，这不是孩子的事。

Nature would have them children before they are men. If we try to invert this order we shall produce a forced fruit immature and flavourless, fruit which will be rotten before it is ripe; we shall have young doctors and old children. Childhood has its own ways of seeing, thinking, and feeling; nothing is more foolish than to try and substitute our ways; and I should no more expect judgment in a ten-year-old child than I should expect him to be five feet high. Indeed, what use would reason be to him at that age? It is the curb of strength, and the child does not need the curb.

自然希望孩子在成人之前就应该是孩子的样子。如果我们要颠倒这个顺序，就会得到早熟的果实，既不成熟、也不甜美，在成熟之前就会腐烂。我们会教出年轻的博士和老态的儿童。童年有它自己的方式去看、去想、去感知，没什么比试图替代这些方式更愚蠢的事了。我可以期待一个十岁的孩子能长到五英尺高，但却不能更多地去期待他有什么判断力。事实上，在他这个年纪，理性对他有什么用呢？它只会阻碍力量的发展，孩子不需要这种阻碍。

When you try to persuade your scholars of the duty of obedience, you add to this so-called persuasion compulsion and threats, or still worse, flattery and bribes. Attracted by selfishness or

constrained by force, they pretend to be convinced by reason. They see as soon as you do that obedience is to their advantage and disobedience to their disadvantage. But as you only demand disagreeable things of them, and as it is always disagreeable to do another's will, they hide themselves so that they may do as they please, persuaded that they are doing no wrong so long as they are not found out, but ready, if found out, to own themselves in the wrong for fear of worse evils. The reason for duty is beyond their age, and there is not a man in the world who could make them really aware of it; but the fear of punishment, the hope of forgiveness, importunity, the difficulty of answering, wrings from them as many confessions as you want; and you think you have convinced them when you have only wearied or frightened them.

当你试图劝说学生去相信他们有责任去顺从时，你在这种所谓的说服中加入了强迫和威胁，或者更糟糕，奉承和许诺。孩子们其实是被自私所吸引或者被外力所强迫去做事，还假装是被理性说服的样子。按照你的做法，他们很快就会明白顺从会获得好处，而反抗没有好处。但是，因为你让他们做的都是他们不喜欢的事，而且按照别人的意志做事总是不快乐的，所以他们开始偷偷地照着自己的喜好去做，相信只要不被发现，无论怎么做都没错，而一旦被发现，就准备认错以免受更大的苦。他们这个年纪是理解不了人为什么会有责任的，世界上也没人能让他们真的理解这个道理。只是由于对惩罚的恐惧、对原谅的渴望，又或是你的强迫和他们的难以拒绝，才迫使他们按照你要求的去做。你觉得自己说服了他们，其实你只是让他们觉得烦恼或者害怕。

What does it all come to? In the first place, by imposing on them a duty which they fail to recognise, you make them disinclined to submit to your tyranny, and you turn away their love;

you teach them deceit, falsehood, and lying as a way to gain rewards or escape punishment; then by accustoming them to conceal a secret motive under the cloak of an apparent one, you yourself put into their hands the means of deceiving you, of depriving you of a knowledge of their real character, of answering you and others with empty words whenever they have the chance. Laws, you say, though binding on conscience, exercise the same constraint over grown-up men. That is so, but what are these men but children spoilt by education? This is just what you should avoid. Use force with children and reasoning with men; this is the natural order; the wise man needs no laws.

这一切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首先，对他们强加其无法理解的责任，会让他们不情不愿地服从于你的专制，不再爱你。你教会他们诡计、谬误、谎言是获得奖励或逃避惩罚的方法。他们会习惯于用表面的动机来隐藏秘密的动机，你亲手教会了他们怎么骗你，使你无法了解他们真实的性格，他们则会尽可能用空话来糊弄你和其他人。你会说，就法律而言，尽管有意识服从，然而它还是对成年人的行为加以限制。没错，但是如果不是先把孩子教坏了，哪里会有那些需要限制的人呢？这就是你应该避免的。对孩子讲外力，对成人讲理性，这才是自然的秩序。明智的人是不需要法律约束的。

Treat your scholar according to his age. Put him in his place from the first, and keep him in it, so that he no longer tries to leave it. Then before he knows what goodness is, he will be practising its chief lesson. Give him no orders at all, absolutely none. Do not even let him think that you claim any authority over him. Let him only know that he is weak and you are strong, that his condition and yours puts him at your mercy; let this be perceived, learned, and felt. Let him early find upon his proud neck, the heavy yoke which

nature has imposed upon us, the heavy yoke of necessity, under which every finite being must bow. Let him find this necessity in things, not in the caprices [3_6] of man; let the curb be force, not authority. If there is something he should not do, do not forbid him, but prevent him without explanation or reasoning; what you give him, give it at his first word without prayers or entreaties, above all without conditions. Give willingly, refuse unwillingly, but let your refusal be irrevocable; let no entreaties move you; let your “No,” once uttered, be a wall of brass, against which the child may exhaust his strength some five or six times, but in the end he will try no more to overthrow it.

按照学生的年纪去对待他。首先，把他放在合理的位置上，让他好好待在那儿，这样他就不会试着想离开自己的位置。这样，在他知道什么是善良以前，他就已经可以实践其内涵了。不要给他任何命令，绝对不要。甚至都不能让他觉得你是在向他施加权威。只需要让他知道他是柔弱的，你是强壮的，是由于你们情况的不同所以他需要听你的。要让他意识到这一点，学习到这一点，感受到这一点。要让他尽早明白，在他骄傲的脖颈上，有一道自然强加给每个人的沉重的枷锁，这道沉重的枷锁就是需要，每个人都必须受其约束。让他从事物中而不是从人的任性 [4_6] 中认识到这种需要。让他理解这种阻碍是力量有限导致的，而不是权威造成的。如果有一些他不应该做的事，也不需要禁止他，只要提防着就行，不需要解释或推理。你打算给他的东西，在他第一次要的时候就给，不要等到他乞求了才给，更不要等他提出什么条件了才给。给的时候要看上去高高兴兴的，而拒绝的时候则要不情不愿的，但你的拒绝不能改变，不要让他的乞求动摇你。让你的“不”字一旦说出口，就要像铁打的墙一样坚硬，他碰壁五六次之后就会精疲力竭，最后就不会再试图推翻你的决定了。

Thus you will make him patient, equable, calm, and resigned,

even when he does not get all he wants; for it is in man's nature to bear patiently with the nature of things, but not with the ill-will of another. A child never rebels against, “There is none left,” unless he thinks the reply is false. Moreover, there is no middle course; you must either make no demands on him at all, or else you must fashion him to perfect obedience. The worst education of all is to leave him hesitating between his own will and yours, constantly disputing whether you or he is master; I would rather a hundred times that he were master.

这样一来，即使他无法得到想要的一切，你也可以让他保持耐心、温和、冷静、听话。因为耐心地容忍事物的本质是人的天性，但忍受别人的恶意不是。孩子不会对“没有了”这句话表示反抗，除非他觉得这种回答是假的。另外，这里没有什么中间地带，要么你不对他提任何要求，要么就必须让他对你完全顺从。最糟糕的教育就是让他在你的意志和他自己的意志之间犹豫不决，让他和你无休止地争论应该谁作主，我觉得让他作主比你来好一百倍。

It is very strange that ever since people began to think about education they should have hit upon no other way of guiding children than emulation, jealousy, envy, vanity, greediness, base cowardice, all the most dangerous passions, passions ever ready to ferment, ever prepared to corrupt the soul even before the body is full-grown. With every piece of precocious instruction which you try to force into their minds you plant a vice in the depths of their hearts; foolish teachers think they are doing wonders when they are making their scholars wicked in order to teach them what goodness is, and then they tell us seriously, “Such is man.” Yes, such is man, as you have made him. Every means has been tried except one, the very one which might succeed—well-regulated liberty. Do not

undertake to bring up a child if you cannot guide him merely by the laws of what can or cannot be.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 and the impossible are alike unknown to him, so they can be extended or contracted around him at your will. Without a murmur he is restrained, urged on, held back, by the hands of necessity alone; he is made adaptable and teachable by the mere force of things, without any chance for vice to spring up in him; for passions do not arise so long as they have accomplished nothing.

自从人们开始思考教育这回事，他们除了用竞争、嫉妒、虚荣、贪婪、懦弱，用种种在身体还没完全长大以前就会引发骚动、摧毁灵魂的危险的激情来教育孩子以外，再没有其他方法了，这真是太奇怪了。你过早地在他们脑中植入的指示，都会在其心灵深处种下罪恶的幼苗。愚蠢的老师为了教学生什么是善良而让学生变得邪恶，可他们还认为自己在创造奇迹，还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这就是人类”。是的，这就是人类，是你创造出来的人类。他们尝试过所有方法，却恰恰忘记了一种真的有可能成功的办法——有节制的自由。如果你无法仅仅通过可能和不可能的法则来引导一个孩子，那就别承担抚养他的责任。孩子对可能和不可能的范围都一无所知，所以你的意志能左右这些范围在他周围扩大或缩小。你只要用事物的需要就可以让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你的束缚、推动、遏制。只要用事物的强制就可以让他变得可教化，让罪恶没有机会从他身上滋长，因为欲望在无法产生作用的时候是发展不起来的。

Give your scholar no verbal lessons; he should be taught by experience alone; never punish him, for he does not know what it is to do wrong; never make him say, “Forgive me,” for he does not know how to do you wrong. Wholly unmoral in his actions, he can do nothing morally wrong, and he deserves neither punishment nor reproof.

不要给学生口头上的教训，让他从实际经历中去获得。永远不要惩罚他，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犯错。永远不要让他说“请原谅我”这句话，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如何冒犯了你。如果他的行为不包含道德层面的观念，他不会做出什么道德败坏的事，也就不应该被惩罚或者责难。

Already I see the frightened reader comparing this child with those of our time; he is mistaken. The perpetual restraint imposed upon your scholars stimulates their activity; the more subdued they are in your presence, the more boisterous they are as soon as they are out of your sight. They must make amends to themselves in some way or other for the harsh constraint to which you subject them. Two schoolboys from the town will do more damage in the country than all the children of the village. Shut up a young gentleman and a young peasant in a room; the former will have upset and smashed everything before the latter has stirred from his place. Why is that, unless that the one hastens to misuse a moment's licence, while the other, always sure of freedom, does not use it rashly. And yet the village children, often flattered or constrained, are still very far from the state in which I would have them kept.

我可以预见有惊恐的读者已经开始拿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和这种孩子作比较了，可他错了。你强加给学生的那种无处不在的束缚反而会刺激他们，他们在你面前越顺从，一旦脱离了你的视线就会越狂暴。因为他们必须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补偿自己在你那儿受到的严格束缚。从城里来的两个学生在乡下捣的乱，可能比整个村的孩子捣的乱加起来还多。如果把一个年轻的绅士和一个年轻的农民关在一个房间里，前者会心烦意乱，会把屋子里的东西砸个稀巴烂，而后者却会安静地待在那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绅士能放肆一回就痛快放

肆，而农民因为明白自己一直都是自由的，所以不在乎这片刻的享受。但是，乡下的孩子常常受到夸奖或者束缚，所以还远远没有达到我希望他们保持的那种状态。

Let us lay it down as an incontrovertible rule that the first impulses of nature are always right; there is no original sin in the human heart, the how and why of the entrance of every vice can be traced. The only natural passion is self-love or selfishness taken in a wider sense. This selfishness is good in itself and in relation to ourselves; and as the child has no necessary relations to other people he is naturally indifferent to them; his self-love only becomes good or bad by the use made of it and the relations established by its means. Until the time is ripe for the appearance of reason, that guide of selfishness, the main thing is that the child shall do nothing because you are watching him or listening to him; in a word, nothing because of other people, but only what nature asks of him; then he will never do wrong.

人性的原始冲动总是正确的，让我们把这看作是无可辩驳的准则，因为人心中本是没有原罪的，任何邪恶我们都能说出它是从何而来以及为什么会产生的。人类唯一天生的欲念就是自爱，或者广义上说就是自私。自私本身或者对我们自己是有好处的。而孩子，由于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必须的关系，因此他对所有人都是中立的。他的自爱是好是坏取决于怎么运用它，取决于使用它建立起来的关系。自私是受理性支配的，所以在理性成熟之前，告诉孩子不要因为你在看他或听他说话他而去做什么事。总结来说，就是不要因为别人去做什么事，只需要听从自然的要求，这样就永远不会做错事了。

I do not mean to say that he will never do any mischief, never

hurt himself, never break a costly ornament if you leave it within his reach. He might do much damage without doing wrong, since wrong-doing depends on the harmful intention which will never be his. If once he meant to do harm, his whole education would be ruined; he would be almost hopelessly bad.

我的意思不是说他永远不会恶作剧，不会伤害到自己，如果你把昂贵的物品放在他能接触到的地方他也不会将其打碎。他可能会毁坏一些东西，但不会做错事，因为错事是指做事的动机是有害的，而他并不是这样。只要他故意做过一次有害的事，他的整个教育都宣告毁灭，他就坏得没救了。

Greed considers some things wrong which are not wrong in the eyes of reason. When you leave free scope to a child's heedlessness, you must put anything he could spoil out of his way, and leave nothing fragile or costly within his reach. Let the room be furnished with plain and solid furniture; no mirrors, china, or useless ornaments. My pupil Emile, who is brought up in the country, shall have a room just like a peasant's. Why take such pains to adorn it when he will be so little in it? I am mistaken, however; he will ornament it for himself, and we shall soon see how.

从理性的角度看来并不坏的事，从贪婪的角度看却并非如此。如果你在孩子胡闹的时候听之任之，就必须把所有他可能糟蹋的东西收起来，不能让他碰到任何易碎的、值钱的东西。房间里只能留下简单而结实的家具，不能有镜子、瓷器、没用的装饰品。我的学生爱弥儿是在乡村长大的，他的房间看起来就是一个农民的房间。他都不怎么呆在房间里，又何必花那么多心思去装饰它呢？但是我错了，他会自己装饰房间的，很快我们就会看到他是怎么做的了。

But if, in spite of your precautions, the child contrives to do some damage, if he breaks some useful article, do not punish him for your carelessness, do not even scold him; let him hear no word of reproval, do not even let him see that he has vexed you; behave just as if the thing had come to pieces of itself; you may consider you have done great things if you have managed to hold your tongue.

尽管你再三提防，如果孩子还是想方设法毁坏东西，如果他打碎了有用的物件，不要因为你自己的疏忽去惩罚他，甚至连责骂也不要有。不要让他听到任何指责的话，甚至都不要让他看出已经惹怒了你。你要表现的就好像东西是自己碎掉的，如果你能管好自己的嘴，这会起到惊人的效果。

May I venture at this point to state the greatest, the most important, the most useful rule of education? It is: Do not save time, but lose it. I hope that every-day readers will excuse my paradoxes; you cannot avoid paradox if you think for yourself, and whatever you may say I would rather fall into paradox than into prejudice. The most dangerous period in human life lies between birth and the age of twelve. It is the time when errors and vices spring up, while as yet there is no means to destroy them; when the means of destruction are ready, the roots have gone too deep to be pulled up. If the infant sprang at one bound from its mother's breast to the age of reason, the present type of education would be quite suitable, but its natural growth calls for quite a different training. The mind should be left undisturbed till its faculties have developed; for while it is blind it cannot see the torch you offer it, nor can it follow through the vast expanse of ideas a path so faintly

traced by reason that the best eyes can scarcely follow it.

我能否在这里大胆提出最重要、最有用的教育法则呢？这个法则就是：不要节约时间，而是要丢掉它。我希望经常读书的人能够原谅我这个悖论。如果你坚持思考的话，是无法逃避悖论的。不管你怎么说，我宁愿陷入悖论而不是偏见。人生中最危险的阶段就是从出生到十二岁这一段时间。这是错误和罪恶滋生的时期，并且你还没有办法去摧毁它们。当你有办法的时候，错误和罪恶的根已经扎的太深，无法撼动了。如果孩子能从喝奶的年纪一下子长成理性的大人，现在流行的这种教育方式是合适的，但是从自然的进程看，他们所需的教育方法恰恰和你使用的相反。在官能没有发育完全之前，孩子的心灵不应该受到侵扰。因为它还处于蒙昧的状态中，看不见你递过来的火炬，也无法在思想这片辽阔的原野中找到一条理性指引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痕迹太模糊了，哪怕是最好的眼睛也未必找得到。

Therefore the education of the earliest years should be merely negative. It consists, not in teaching virtue or truth, but in preserving the heart from vice and from the spirit of error. If only you could let well alone, and get others to follow your example; if you could bring your scholar to the age of twelve strong and healthy, but unable to tell his right hand from his left, the eyes of his understanding would be open to reason as soon as you began to teach him. Free from prejudices and free from habits, there would be nothing in him to counteract the effects of your labours. In your hands he would soon become the wisest of men; by doing nothing to begin with, you would end with a prodigy of education.

因此，最早几年的教育应该是纯粹消极的。这种教育中所包含的，不是传授德行和真相，而是让孩子的心灵免受罪恶和谬误的侵

蚀。如果你能坚持自己不教，也不让别人教，如果你能把学生强壮、健康地带到十二岁可他还无法分清左右手，只要你开始教他，他的理解之眼就会朝着理性睁开了。没有了偏见和习惯的桎梏，在他身上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抵消你教育的成果。在你的手中，他很快会变成最聪慧的人。你在开始的时候什么也不教，然而在最后会收获一个神童。

Reverse the usual practice and you will almost always do right. Fathers and teachers who want to make the child, not a child but a man of learning, think it never too soon to scold, correct, reprove, threaten, bribe, teach, and reason. Do better than they; be reasonable, and do not reason with your pupil, more especially do not try to make him approve what he dislikes; for if reason is always connected with disagreeable matters, you make it distasteful to him, you discredit it at an early age in a mind not yet ready to understand it. Exercise his body, his limbs, his senses, his strength, but keep his mind idle as long as you can. Distrust all opinions which appear before the judgment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m. Restrain and ward off strange impressions; and to prevent the birth of evil do not hasten to do well, for goodness is only possible when enlightened by reason. Regard all delays as so much time gained; you have achieved much, you approach the boundary without loss. Leave childhood to ripen in your children. In a word, beware of giving anything they need to-day if it can be deferred without danger to to-morrow.

转变一下通常的教育模式，你做的事就几乎总是正确的。父亲们和老师们不想把孩子教成孩子，而是教成学有所成的大人，他们认为不论是责骂、纠正、非难、恐吓他，还是用东西讨好他、教他、对他讲道理，都不会太操之过急。请比他们做得更好些。要讲道理，不要和学生争辩，尤其是不要强迫他同意他不喜欢的事。因为如果理性长

期地和他不赞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他便会对其产生厌恶，你让他在还不理解理性的年纪就开始讨厌理性了。训练他的身体、四肢、感官、体力，但要尽你所能让他的心灵维持在空闲的状态。在他还没有分辨感情的判断力之前，让他对所有观点持怀疑态度。让孩子躲开奇怪的印象，限制它们的靠近。为了阻止邪恶的产生，不要急于为善，因为善心只有在理性启蒙之后才会存在。把这些延迟看做是时间的积累，你已经完成了很多，你已经让孩子在不损失什么的情况下接近了目的。把童年留给孩子，让他自己成长。总而言之，对于可以推迟到以后再学也不会有什么损害的事，就不要急于在今天教给孩子。

There is another point to be considered which confirms the suitability of this method: it is the child's individual bent, which must be thoroughly known before we can choose the fittest moral training. Every mind has its own form, in accordance with which it must be controlled; and the success of the pains taken depends largely on the fact that he is controlled in this way and no other. Oh, wise man, take time to observe nature; watch your scholar well before you say a word to him; first leave the germ of his character free to show itself, do not constrain him in anything, the better to see him as he really is. Do you think this time of liberty is wasted? On the contrary, your scholar will be the better employed, for this is the way you yourself will learn not to lose a single moment when time is of more value. If, however, you begin to act before you know what to do, you act at random; you may make mistakes, and must retrace your steps; your haste to reach your goal will only take you further from it. Do not imitate the miser who loses much lest he should lose a little. Sacrifice a little time in early childhood, and it will be repaid you with usury when your scholar is older. The wise physician does not hastily give prescriptions at first sight, but he studie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ick man before he prescribes anything; the treatment is begun later, but the patient is cured,

while the hasty doctor kills him.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这种方式是合适的，那就是孩子的天资，在选择最合适的道德培养方法之前，必须对孩子的天资进行充分的了解。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有各自的模式，掌控心灵的方式必须与这种模式相适应。你花费的心血要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是受这样的模式控制，而不是其它的模式。明智的人啊，请花一点时间观察自然。对学生说任何话之前，好好了解他。首先要让他个性的萌芽自由展现而不要限制他，这样才能更好地观察到他真实的样子。你还会觉得这些自由的时间是浪费的吗？恰恰相反，这段时间是被很好地利用的，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你才学会了如何在宝贵的时期不去浪费片刻的光阴。然而，如果在还不知道该做什么之前就采取行动，就会盲目行事。你也许就会犯错，然后折返。急于达成目标只会让你离目标越来越远。不要效仿守财奴，为了保住小钱而遭受了更大的损失。牺牲一点点童年的时间，当你的学生长大之后，他会收获巨大的回报。明智的医生绝不会看一眼病人就马上开药方，他开任何药之前都会认真研究病人的情况，尽管治疗开始的时间是晚了一点，但病人会被治愈，而操之过急的医生可能会害死病人。

But where shall we find a place for our child so as to bring him up as a senseless being, an automaton? Shall we keep him in the moon, or on a desert island? Shall we remove him from human society? Will he not always have around him the sight and the pattern of the passions of other people? Will he never see children of his own age? Will he not see his parents, his neighbours, his nurse, his governess, his man-servant, his tutor himself, who after all will not be an angel? Here we have a real and serious objection. But did I tell you that an education according to nature would be an easy task? Oh, men! is it my fault that you have made all good things difficult? I admit that I am aware of these difficulties;

perhaps they are insuperable; but nevertheless it is certain that we do to some extent avoid them by trying to do so. I am showing what we should try to attain, I do not say we can attain it, but I do say that whoever comes nearest to it is nearest to success.

但是我们要去哪里找一个地方才能把孩子当作一个麻木的人、一个机器人来抚养呢？把他放在月球上？又或者是放在沙漠孤岛中？把他带离人类社会吗？他会不会从此再也看不到周围其他人的欲念，不知道那些欲念的模式？他会不会从此再也看不到同龄的孩子？他会不会从此再也看不到父母、邻居、保姆、男仆、家庭教师（总不可能是一个天使）？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有真实而严肃的反对意见。但是我有说过依据自然来教育孩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吗？人类啊！如果你们把所有好的事情都变得很困难，这难道是我的错吗？我承认我也意识到了这些困难，或许这种困难还是无法克服的。尽管如此，只要尽力尝试，我们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加以预防的。我在此提出我们应该尽力实现的目标，不是说我们一定能做到，而是说谁离那个目标努力最近，谁就最有可能成功。

Remember you must be a man yourself before you try to train a man; you yourself must set the pattern he shall copy. While the child is still unconscious there is time to prepare his surroundings, so that nothing shall strike his eye but what is fit for his sight. Gain the respect of every one, begin to win their hearts, so that they may try to please you. You will not be master of the child if you cannot control every one about him; and this authority will never suffice unless it rests upon respect for your goodness.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squandering one's means and giving money right and left; I never knew money win love. You must neither be harsh nor niggardly, nor must you merely pity misery when you can relieve it; but in vain will you open your purse if you do not open your heart along

with it, the hearts of others will always be closed to you. You must give your own time, attention, affection, your very self; for whatever you do, people always perceive that your money is not you. There are proofs of kindly interest which produce more results and are really more useful than any gift; how many of the sick and wretched have more need of comfort than of charity; how many of the oppressed need protection rather than money? Reconcile those who are at strife, prevent lawsuits; incline children to duty, fathers to kindness; promote happy marriages; prevent annoyances; freely use the credit of your pupil's parents on behalf of the weak who cannot obtain justice, the weak who are oppressed by the strong. Be just, human, kindly. Do not give alms alone, give charity; works of mercy do more than money for the relief of suffering; love others and they will love you; serve them and they will serve you; be their brother and they will be your children.

记住，如果你要培养一个人，首先你自己必须是个人，你必须为他树立起他应该模仿的榜样。趁着孩子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你可以有充裕的时间打造他所处的环境，这样他就只会看到最适合他看到的东西。你要赢得所有人的尊重，从让别人爱你开始，这样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来让你高兴。如果你无法掌控孩子周围的每一个人，你就不可能成为他的老师；而这种权威只有依靠你用道德赢来的尊重才能被充分行使。这不是说要你散尽钱财，我从来没看到过可以靠钱来赢得爱的事情。你不能太严厉，不能太吝啬，能帮得上忙的时候就要帮别人解除痛苦，而不是仅仅在一边表示遗憾。光打开钱袋而不打开心扉也是徒劳的，别人的心仍旧不会与你亲近。你必须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情感、甚至自我，因为不论你做什么，人们总是觉得钱不等于你本人。有许多证据表明善心可以带来更多好的效果，并且比任何礼物都更有益处。有多少患病困顿的人更需要安慰而不是布施啊，有多少受到压迫的人更需要保护而不是金钱啊。帮助调解别人的冲突，避免打官司；让孩子尽自己的职责，让父亲宽容慈爱；促成幸福的婚

姻；避免他人陷入苦恼；尽量使用你学生的家长的名义去帮助那些无法享受正义或者被强者欺压的弱势群体。人类啊，请用一颗善心保持公平。你不要仅仅是布施，更要给予别人关爱，关爱比金钱更能解除痛苦。你爱别人，别人就会爱你；服务别人，别人就会服务你；你待别人如手足，别人就会待你如父子。

This is one reason why I want to bring up Emile in the country, far from those miserable lacqueys, the most degraded of men except their masters; far from the vile morals of the town, whose gilded surface makes them seductive and contagious to children; while the vices of peasants, unadorned and in their naked grossness, are more fitted to repel than to seduce, when there is no motive for imitating them.

对于我为什么要把爱弥儿带到乡间抚养，还有一个原因：我要让他远离那群卑鄙的仆人，因为除了他们的主人之外，这群人就是最卑鄙的了。我要让他远离城里的不良风俗，这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风俗会引诱和传染孩子。农民虽然也有恶习，但其不加掩饰，同时又显得无比粗俗，因此只要不是存心模仿，则不仅不会引诱孩子，反而会让他们产生抵触之感。

In the village a tutor will have much more control over the things he wishes to show the child; his reputation, his words, his example, will have a weight they would never have in the town; he is of use to every one, so every one is eager to oblige him, to win his esteem, to appeal before the disciple what the master would have him be; if vice is not corrected, public scandal is at least avoided, which is all that our present purpose requires.

在乡村里，教师能更好地掌控他希望展示给孩子的事物。他的名誉、话语、举止会有比在城里更重的分量。他对每个人都有所助益，因此每个人都乐于听他的话、想赢得他的尊重、想在他的学生面前显示一下老师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就算恶习不被纠正，至少可以避免公众丑闻，这也算达到我们目前的目标了。

Cease to blame others for your own faults; children are corrupted less by what they see than by your own teaching. With your endless preaching, moralising, and pedantry, for one idea you give your scholars, believing it to be good, you give them twenty more which are good for nothing; you are full of what is going on in your own minds, and you fail to see the effect you produce on theirs. In the continual flow of words with which you overwhelm them, do you think there is none which they get hold of in a wrong sense? Do you suppose they do not make their own comments on your long-winded explanations, that they do not find materia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 they can understand—one which they will use against you when they get the chance?

不要再因为自己的错误去责怪他人。与孩子自己目睹的坏事相比，你的教育方式更能毁了他们。你为了给学生灌输一个思想而进行无休无止的布道、说教、卖弄，相信这对他们有好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又把另外二十个毫无价值的观念一起灌输给他们了。你脑子里充满了各种观念，但是却没看到这些观念对学生会产生什么影响。当你用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压垮学生的时候，难道你认为他们一句话都不会理解错吗？难道你期望他们对于你的长篇大论没有自己的评价，难道你以为他们不会找出一些材料来构建自己能够理解的一套体系，好在有机会的时候就用来反对你吗？

Listen to a little fellow who has just been under instruction; let him chatter freely, ask questions, and talk at his ease, and you will be surprised to find the strange forms your arguments have assumed in his mind; he confuses everything, and turns everything topsy-turvy; you are vexed and grieved by his unforeseen objections; he reduces you to be silent yourself or to silence him: and what can he think of silence in one who is so fond of talking? If ever he gains this advantage and is aware of it, farewell education; from that moment all is lost; he is no longer trying to learn, he is trying to refute you.

请听一听那个刚被你训斥过的小孩说的话。让他自由地说话、提问、谈论，你会惊讶地发现你那些观念在他脑中形成了多么奇怪的样子。他对万事万物感到困惑，把什么都弄得一团糟，他那意料之外的反对还会使你生气、痛心。你只能选择自己哑口无言或者让他闭嘴：然而，当他发现如此喜爱高谈阔论的你突然默不作声时，会作何感想呢？如果他占了便宜并且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你的教育也到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什么都完了，他不会再学习，他会一直找机会反驳你。

Zealous teachers, be simple, sensible, and reticent; be in no hurry to act unless to prevent the actions of others. Again and again I say, reject, if it may be, a good lesson for fear of giving a bad one. Beware of playing the tempter in this world, which nature intended as an earthly paradise for men, and do not attempt to give the innocent child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since you cannot prevent the child learning by what he sees outside himself, restrict your own efforts to impressing those examples on his mind in the form best suited for him.

做一名热忱的教师，简单、明智、谨慎，除非是为了阻止他人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否则不要急于行事。我要不厌其烦地重复，如果有可能的话，连有益处的教育也要抛弃，以此避免给学生有害的教育。这个世界是自然为人类准备的人间天堂，因此不要在其中耍性子，不要试着教天真的孩子善与恶的知识。你不能阻止孩子向他在外面看到的事物学习，那么就要集中精力把那些事物按照最适合他的样子留在他的脑海里。

The explosive passions produce a great effect upon the child when he sees them; their outward expression is very marked; he is struck by this and his attention is arrested. Anger especially is so noisy in its rage that it is impossible not to perceive it if you are within reach. You need not ask yourself whether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a pedagogue to frame a fine disquisition. What! no fine disquisition, nothing, not a word! Let the child come to you; impressed by what he has seen, he will not fail to ask you questions. The answer is easy; it is drawn from the very things which have appealed to his senses. He sees a flushed face, flashing eyes, a threatening gesture, he hears cries; everything shows that the body is ill at ease. Tell him plainly, without affectation or mystery, “This poor man is ill, he is in a fever.” You may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giving him in a few words some idea of disease and its effects; for that too belongs to nature, and is one of the bonds of necessity which he must recognise. By means of this idea, which is not false in itself, may he not early acquire a certain aversion to giving way to excessive passions, which he regards as diseases; and do you not think that such a notion, given at the right moment, will produce a more wholesome effect than the most tedious sermon? But consider the after effects of this idea; you have authority, if ever you find it necessary, to treat the rebellious child as a sick child; to keep him in his room, in bed if need be, to diet him, to make him afraid of his

growing vices, to make him hate and dread them without ever regarding as a punishment the strict measures you will perhaps have to use for his recovery. If it happens that you yourself in a moment's heat depart from the calm and self-control which you should aim at, do not try to conceal your fault, but tell him frankly, with a gentle reproach, “My dear, you have hurt me.”

冲动的欲念一旦被孩子看到，就会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他的外在表达会带有明显的标识，他会为其所困，注意力也会受到抑制。尤其是愤怒，它的动静那么大，你一旦接近，不可能察觉不到。这个时候你不再需要问自己这是不是个好机会让老师去发表一番好听的话。天哪！不要说好听的话了，连一个字都不要讲了啊！让孩子主动来找你，让他对已经看到的东西印象深刻，他不会不向你提问的。答案也很简单，用那些触动他感官的事物去回答他。他看到涨红的脸庞、闪光的双眼、惊恐的姿势，听到哭泣的声音。所有的一切都显示出眼前这个人的局促不安。直白地告诉他，“这个可怜的人病了，他发烧了”，不要装模作样、故作神秘。你可以借此机会，用简单的几句话告诉他一点关于疾病及其影响的观念。这些东西也是属于自然的，是他必须认识到的束缚之一。通过这个真实的观念，他是不是会将过度的激情看做一种疾病，因而从小厌恶它、抛弃它。难道你不认为在恰当的时候教给他这一观念，与令人生厌的布道相比，会对他产生更有益的影响吗？但是，请思考一下这个观念在日后会产生的效果。假如你认为情况需要，你拥有权威把一个反叛的孩子当作生病的孩子对待，把他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让他呆在床上，规定他的饮食，让他对自己日益增长的缺点感到恐慌，让他对这些缺点感到厌恶和恐惧，从而使他不会将你用来纠正他的严苛方式看做是一种惩罚。假如万一在某一时刻你没有保持应有的冷静和自控，也不要试图掩饰你的错误，坦诚地用一种温和的谴责口吻告诉他，“亲爱的，你伤害了我”。

Moreover, it is a matter of great importance that no notice should be taken in his presence of the quaint sayings which result from the simplicity of the ideas in which he is brought up, nor should they be quoted in a way he can understand. A foolish laugh may destroy six months' work and do irreparable damage for life. I cannot repeat too often that to control the child one must often control oneself.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谈论他那些幼稚古怪的想法，因为他在成长中接受的是简单的观念，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你也不应该用他可以理解的方式引用他的话。一声愚蠢的大笑可能毁了六个月的工作成果，造成一生也无法修复的伤害。我会不厌其烦地重复，如果你要掌控一个孩子，必须先掌控自己。

I picture my little Emile at the height of a dispute between two neighbours going up to the fiercest of them and saying in a tone of pity, “You are ill, I am very sorry for you.” This speech will no doubt have its effect on the spectators and perhaps on the disputants. Without laughter, scolding, or praise I should take him away, willing or no, before he could see this result, or at least before he could think about it; and I should make haste to turn his thoughts to other things, so that he would soon forget all about it.

我可以想象，当两个邻居吵得不可开交时，爱弥儿会走上去用一种遗憾的口吻对他们说，“你们病了，对此我感到难过”。这番话毫无疑问会对观众甚至对当事人本身产生效果。我不会嘲笑、责骂或者表扬他，我应该做的是在他看到或者至少想到这种效果之前带他离开，不管情不情愿。我会立刻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这样他就会很快忘记这件事。

I do not propose to enter into every detail, but only to explain general rules and to give illustrations in cases of difficulty. I think it is impossible to train a child up to the age of twelve in the midst of society, without giving him some idea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one man and another, and of the morality of human actions. It is enough to delay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ideas as long as possible, and when they can no longer be avoided to limit them to present needs, so that he may neither think himself master of everything nor do harm to others without knowing or caring. There are calm and gentle characters which can be led a long way in their first innocence without any danger; but there are also stormy dispositions whose passions develop early; you must hasten to make men of them lest you should have to keep them in chains.

我不建议深究每个细节，只要向学生解释一般的准则，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我认为要在社会中把孩子抚养到十二岁而不教给他一些关于人际关系或者人类行为的善恶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只要尽可能延迟这种观念的发展就足够了，当这些观念无法避免的时候，将其限制在目前需要的范围中。这样，孩子就不会认为自己是万物之主，也不会毫不在乎地伤害别人或者伤害了别人还不知道了。有一些天生冷静、温和的孩子，从小带到大也不会出什么乱子。但也有一些性格狂暴的孩子，他们的激情发展的很早，你必须尽快将其抚养成人，以免你迫不得已地要把他们束缚起来。

Our first duties are to ourselves; our first feelings are centred on self; all our instincts are at first directed to our own preservation and our own welfare. Thus the first notion of justice springs not from what we owe to others, but from what is due to us. Here is another error in popular methods of education. If you talk to

children of their duties, and not of their rights, you are beginning at the wrong end, and telling them what they cannot understand, what cannot be of any interest to them.

我们的首要职责是对自己负责，我们最早产生的情感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我们的所有本能最初都指向自己的生存和利益。因此，最初的正义感不是从我们怎样对别人中产生的，而是产生于别人怎样对我们。大众教育方式还有一个错误。如果你跟孩子谈论他们的职责而不是他们的权利，你的出发点就错了，你在说一些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一些根本提不起他们兴趣的东西。

If I had to train a child such as I have just described, I should say to myself, “A child never attacks people [3_7] , only things; and he soon learns by experience to respect those older and stronger than himself. Things, however, do not defend themselves. Therefore the first idea he needs is not that of liberty but of property, and that he may get this idea he must have something of his own.” It is useless to enumerate his clothes, furniture, and playthings; although he uses these he knows not how or why he has come by them. To tell him they were given him is little better, for giving implies having; so here is property before his own, and it is the principle of property that you want to teach him; moreover, giving is a convention, and the child as yet has no idea of conventions. I hope my reader will note, in this and many other cases, how people think they have taught children thoroughly, when they have only thrust on them words which have no intelligible meaning to them [3_8] .

假如我必须去教育一个像我上面提到过的那样的孩子，我会对自己说，“孩子永远不会攻击人 [4_7] ，但会砸坏物品。经验会很快教会

他尊重那些比他年长、比他强壮的人。然而，物品不会保卫自己。因此，他需要的第一个观念不是自由的观念，而是财产的观念。要他学会这个观念，必须让他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向他列举他的衣服、家具、玩具是没有用的，尽管他每天在使用这些东西，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以及为什么有这些的。告诉他这些东西是你给他的，效果也不会更好，因为赠与暗示着拥有。因此一件东西在给他之前是另有所属的，这种财产的归属正是你想教给他的准则。另外，赠与是一种习俗，而孩子到目前为止，对于习俗还没有什么概念。通过这个以及其他案例，我希望我的读者们能注意到，当你仅仅是把一些对孩子而言毫无意义的词语强加到他们身上时，这能称得上充分的教育吗？[4_8]

We must therefore go back to the origin of property, for that is where the first idea of it must begin. The child, living in the country, will have got some idea of field work; eyes and leisure suffice for that, and he will have both. In every age, and especially in childhood, we want to create, to copy, to produce, to give all the signs of power and activity. He will hardly have seen the gardener at work twice, sowing, planting, and growing vegetables, before he will want to garden himself.

因此，我们必须追溯财产的源头，因为第一个观念就是在这里产生的。住在乡间的孩子会有一些关于田间劳动的观念。只要他能够观察、有空闲时间，就能够做到，而这两者他都是有的。在任何年纪，尤其是童年，我们想创造、模仿、制作，发挥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如果他没有看过一两次别人播种、耕耘、种植蔬菜，他不会想要自己去种菜。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I have already laid down, I shall not thwart him; on the contrary, I shall approve of his plan, share his

hobby, and work with him, not for his pleasure but my own; at least, so he thinks; I shall be his under-gardener, and dig the ground for him till his arms are strong enough to do it; he will take possession of it by planting a bean, and this is surely a more sacred possession, and one more worthy of respect, than that of Nunes Balboa, who took possession of South America in the name of the King of Spain, by planting his banner on the coast of the Southern Sea.

根据我已经制订的这些原则，我不会让他有挫败感。恰恰相反，我会赞同他的计划，分享他的兴趣，跟他一起干，不是为了他的快乐而是为了我自己的。至少他会这么想。我会做他种菜的帮手，帮他翻土，直到他自己有臂力干这活儿。当他在土里种下一颗豆子时，他就占领这片土地了。这种占领无疑比努涅斯·巴尔博亚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在南海海岸上插一旗就宣布占领南美来得更神圣、更值得尊重。

We water the beans every day, we watch them coming up with the greatest delight. Day by day I increase this delight by saying, “Those belong to you.” To explain what that word “belong” means, I show him how he has given his time, his labour, and his trouble, his very self to it; that in this ground there is a part of himself which he can claim against all the world, as he could withdraw his arm from the hand of another man who wanted to keep it against his will.

我们每天给豆子浇水，我们高兴地看着豆子一点点长起来。我告诉孩子，“这些豆子是属于你的”，这话让他每天都更加快乐。我向他解释“属于”这个词的意思。我向他展示他是如何付出自己的时间、劳动、心血、甚至自我。在这片土地上有他自己的一部分。这一点他可

以向全世界宣告，任何人来侵犯他都可以制止，正如不论谁强拉他的手，他都有权把手缩回来。

One fine day he hurries up with his watering-can in his hand. What a scene of woe! Alas! all the beans are pulled up, the soil is dug over, you can scarcely find the place. Oh! what has become of my labour, my work, the beloved fruits of my care and effort? Who has stolen my property! Who has taken my beans? The young heart revolts; the first feeling of injustice brings its sorrow and bitterness; tears come in torrents, the unhappy child fills the air with cries and groans, I share his sorrow and anger; we look around us, we make inquiries. At last we discover that the gardener did it. We send for him.

某个晴朗的日子，他抓着水罐急急忙忙地跑到那块地。多么令人痛心的场景啊！啊！所有的豆苗都被拔了出来，土被重新翻过了，你几乎认不出种豆的地方了。天哪！我的辛勤工作，我的劳力付出，那些我细心照料、殷切关爱的果实，又到哪里去了呢？是谁偷走了我的财产！是谁拿走了我的豆子！这颗年轻的心涌起了一股反抗的情绪。第一次遭受这种不公的事情让他感到悲伤。他痛哭流涕，空气中充斥着这个伤心的孩子的啼哭和叹息，我和他一起分担这种痛苦和愤怒。我们环顾四周，四处打听是谁干的。最后，我们发现是园丁干的。我们立刻派人把园丁找来。

But we are greatly mistaken. The gardener, hearing our complaint, begins to complain louder than we:

可是我们大错特错了。听了我们的抱怨之后，园丁开始抱怨得比

我们更大声：

What, gentlemen, was it you who spoilt my work! I had sown some Maltese melons; the seed was given me as something quite out of the common, and I meant to give you a treat when they were ripe; but you have planted your miserable beans and destroyed my melons, which were coming up so nicely, and I can never get any more. You have behaved very badly to me and you have deprived yourselves of the pleasure of eating most delicious melons.

先生们！明明是你们毁了我的劳动成果！我本来已经在这里种了马耳他瓜。瓜种是别人当作不寻常的宝贝送给我的，我本来还打算瓜熟了之后用来款待你们。但你们在这里种了那些该死的豆子，毁了我那些原本已经长得很好的瓜，现在我再也没法补种了。你们对我做了这么糟糕的事，也剥夺了自己享用美味甜瓜的快乐。

JEAN JACQUES. My poor Robert, you must forgive us. You had given your labour and your pains to it. I see we were wrong to spoil your work, but we will send to Malta for some more seed for you, and we will never dig the ground again without finding out if some one else has been beforehand with us.

让·雅克：我可怜的罗伯特，你一定得原谅我们啊。你在这片土地上付出了辛勤劳动。我们错了，我们不该毁了你的劳动成果，我们会再找一些马耳他瓜的种子给你的。以后我们种地之前，一定会先弄清楚是不是已经有人在我们之前种过东西了。

ROBERT. Well, gentlemen, you need not trouble yourselves, for there is no more waste ground. I dig what my father tilled; every one does the same, and all the land you see has been occupied time out of mind.

罗伯特：先生们，你们不需要给自己找麻烦了，因为这里已经没有多余的空地了。我种的是我父亲耕耘过的土地，其他人也是，你们看到的所有土地都被占用了。

EMILE. Mr. Robert, do people often lose the seed of Maltese melons?

爱弥儿：罗伯特先生，人们经常丢失马耳他瓜的种子吗？

ROBERT. No indeed, sir; we do not often find such silly little gentlemen as you. No one meddles with his neighbour's garden; every one respects other people's work so that his own may be safe.

罗伯特：并非如此，先生，我们并不会经常遇到像你这么淘气的小先生。没人会去动邻居的园地，每个人都尊重其他人的劳动，这样他自己的劳动成果才会是安全的。

EMILE. But I have not got a garden.

爱弥儿：可是我没有园地呀。

ROBERT. I don't care; if you spoil mine I won't let you walk in it, for you see I do not mean to lose my labour.

罗伯特：我不关心这个，如果你毁了我的，我不会再让你走进来，因为我不想丢失我的劳动成果。

JEAN JACQUES. Could not we suggest an arrangement with this kind Robert? Let him give my young friend and myself a corner of his garden to cultivate, on condition that he has half the crop.

让·雅克：我们能不能与善良的罗伯特先生立个约定？让他在自己的园地里分一小块给我的小朋友和我，让我们耕种，作为交换条件，我们种出来的一半成果归他。

ROBERT. You may have it free. But remember I shall dig up your beans if you touch my melons.

罗伯特：你们可以免费使用。但是请记住，如果你们再碰我的瓜，我会把你们的豆苗都挖出来。

In this attempt to show how a child may be taught certain primitive ideas we see how the notion of property goes back naturally to the right of the first occupier to the results of his work. That is plain and simple, and quite within the child's grasp. From that to the rights of property and exchange there is but a step, after

which you must stop short.

在这次尝试中，我展示了如何教孩子一些原始的观念，我们看到财产的观念是如何自然地回溯到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属于第一个靠劳动占有某物的人。这个道理直白、简单，在孩子可以掌握的范围之内。从这里到产权和交换还有一步，这一步之后你必须马上停止。

You also see that an explanation which I can give in writing in a couple of pages may take a year in practice, for in the course of moral ideas we cannot advance too slowly, nor plant each step too firmly. Young teacher, pray consider this example, and remember that your lessons should always be in deeds rather than words, for children soon forget what they say or what is said to them, but not what they have done nor what has been done to them.

你还会看到，我在这里用几页写完的一个解释如果真的实施起来可能要花一年时间，因为在培养道德观念的过程中，我们每一步走得再慢、再稳都不过。年轻的教师，请思考这个例子，记住你们的授课应该是身教而不是言传，因为孩子很快会忘记他们看到或者听到的，但是不会忘记自己做过的或者别人对他们做过的事。

Such teaching should be given, as I have said, sooner or later, as the scholar's disposition, gentle or turbulent, requires it. The way of using it is unmistakable; but to omit no matter of importance in a difficult business let us take another example.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样的教育迟早是要推行的，只是推行的时

间要根据学生的性格是温和还是暴烈而定。使用这种方式是绝不会错的，但是为了不在遇到困难时遗漏掉一些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Your ill-tempered child destroys everything he touches. Do not vex yourself; put anything he can spoil out of his reach. He breaks the things he is using; do not be in a hurry to give him more; let him feel the want of them. He breaks the windows of his room; let the wind blow upon him night and day, and do not be afraid of his catching cold; it is better to catch cold than to be reckless. Never complain of the inconvenience he causes you, but let him feel it first. At last you will have the windows mended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He breaks them again; then change your plan; tell him dryly and without anger, “The windows are mine, I took pains to have them put in, and I mean to keep them safe.” Then you will shut him up in a dark place without a window. At this unexpected proceeding he cries and howls; no one heeds. Soon he gets tired and changes his tone; he laments and sighs; a servant appears, the rebel begs to be let out. Without seeking any excuse for refusing, the servant merely says, “I, too, have windows to keep,” and goes away. At last, when the child has been there several hours, long enough to get very tired of it, long enough to make an impression on his memory, some one suggests to him that he should offer to make terms with you, so that you may set him free and he will never break windows again. That is just what he wants. He will send and ask you to come and see him; you will come, he will suggest his plan, and you will agree to it at once, saying, “That is a very good idea; it will suit us both; why didn't you think of it sooner?” Then without asking for any affirmation or confirmation of his promise, you will embrace him joyfully and take him back at once to his own room, considering this agreement as sacred as if he had confirmed it

by a formal oath. What idea do you think he will form from these proceedings, as to the fulfilment of a promise and its usefulness? If I am not greatly mistaken, there is not a child upon earth, unless he is utterly spoilt already, who could resist this treatment, or one who would ever dream of breaking windows again on purpose. Follow out the whole train of thought. The naughty little fellow hardly thought when he was making a hole for his beans that he was hewing out a cell in which his own knowledge would soon imprison him [3_9] .

你的孩子脾气非常暴躁，他会毁灭碰到的所有东西。你不要生气，把所有他可以糟蹋的东西放到他碰不到的地方去。他砸坏了他正在使用的东西，别急着给他新的，让他感到没东西可用的不便。他砸坏了自己房间的窗户，就让他日日夜夜去吹风，别担心他会着凉感冒，这总比变成一个鲁莽的人要好。永远不要抱怨他给你造成的不便，让他第一个感受到这些麻烦。最后，你才叫人来补好窗户，但什么话也不要说。他会再一次打破窗户，然后你需要改变策略，直白地告诉他，但不要生气，“这些窗户是我的，我花力气把它们装好，我要保证他们的完好”。然后你就把他关到一个没有窗户的黑屋子里去。这个过程出其不意，他会哭闹，但没人会理他。很快他就哭累了，改变了语气，开始唉声叹气，这时一名仆人出现了，这个反叛的家伙开始乞求仆人放他出去。不要去想任何拒绝的借口，这名仆人只需要说一句，“我的窗户也不想被打破，”然后走开。最终，当孩子在黑屋子里待了几个小时之后，呆到足以让他感到疲倦，足以让这件事情在他脑海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再让人过去建议他跟你约法三章，这样你才有可能放他出去，作为条件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会打破窗户。这也恰恰是他想要的结果。他会让人叫你来看看他。你去了，他会提出自己的计划，你要立刻同意，并说，“这个主意非常好，对我们双方都很合适，你怎么没早点想到呢？”。然后，不要问他还有什么异议，也不要让他确认自己的诺言，你应该开心地拥抱他，立刻带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要把这个约定看做他好像已经正式发誓确认过那样神

圣。通过这些过程，你认为他对于约定的履行及其用处会形成什么看法呢？如果我没有错得很离谱的话，地球上没有一个孩子会抵触这个方法或者再故意打破窗户，除非他已经被宠坏了。就按照这样的次序去做吧。当淘气的孩子在地上挖个洞种豆子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这是在给自己挖牢房，很快他拥有的知识会把他关进去 [4_9] 。

We are now in the world of morals, the door to vice is open. Deceit and falsehood are born along with conventions and duties. As soon as we can do what we ought not to do, we try to hide what we ought not to have done. As soon as self-interest makes us give a promise, a greater interest may make us break it; it is merely a question of doing it with impunity; we naturally take refuge in concealment and falsehood. As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prevent vice, we must punish it. The sorrows of life begin with its mistakes.

我们现在身处道德的世界，在这里，罪恶的大门是敞开的。诡计、谎言与习俗、职责相伴而生。一旦我们能做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就会试着隐藏那些本不应该做的事。一旦私利让我们许下承诺，更大的利益也许会让我们打破承诺。这仅仅是做了这样的事但不受惩罚的问题而已。人类天生会通过隐瞒和谎言来逃避惩罚。因为我们无法避免罪恶，所以必须对此进行惩罚。人生的痛苦从犯错开始。

I have already said enough to show that children should never receive punishment merely as such; it should always come as the natural consequence of their fault. Thus you will not exclaim against their falsehood, you will not exactly punish them for lying, but you will arrange that all the ill effects of lying, such as not being believed when we speak the truth, or being accused of what we have not done in spite of our protests, shall fall on their heads

when they have told a lie. But let us explain what lying means to the child.

我们永远不应该为了惩罚而惩罚孩子，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惩罚应该作为他们犯错的自然结果而出现。因此你不要大声斥责他们撒谎，不要仅仅因为他们撒谎去惩罚他们，但是你要让他知道撒谎会带来的所有不良后果，比如以后当他说真话时也不会有人相信他，或者即使没做什么错事，也会被别人不由分说地指责。但是让我们先弄清楚说谎这个词对孩子来说是什么意思。

There are two kinds of lies; one concerns an accomplished fact, the other concerns a future duty. The first occurs when we falsely deny or assert that we did or did not do something, or, to put it in general terms, when we knowingly say what is contrary to facts. The other occurs when we promise what we do not mean to perform, or, in general terms, when we profess an intention which we do not really mean to carry out. These two kinds of lie are sometimes found in combination [3_10] , but their differences are my present business.

谎言分两种：一种是对既成事实撒谎，另一种是对将来的义务撒谎。第一种谎言发生在我们不实地否认自己做过的事或者说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或者，就一般意义而言，指我们故意说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话。第二种谎言发生在我们许下一些不打算遵守的诺言的时候。或者，一般而言，指我们表明的是并不打算真的去实现的意图。这两种谎言有时候是一起出现的 [4_10] ，但是在这里我只谈两者的不同。

He who feels the need of help from others, he who is constantly

experiencing their kindness, has nothing to gain by deceiving them; it is plainly to his advantage that they should see things as they are, lest they should mistake his interests. It is therefore plain that lying with regard to actual facts is not natural to children, but lying is made necessary by the law of obedience; since obedience is disagreeable, children disobey as far as they can in secret, and the present good of avoiding punishment or reproof outweighs the remoter good of speaking the truth. Under a free and natural education why should your child lie? What has he to conceal from you? You do not thwart him, you do not punish him, you demand nothing from him. Why should he not tell everything to you as simply as to his little playmate? He cannot see anything more risky in the one course than in the other.

经常感到需要别人帮助的人或者持续感受到他人善意的人知道欺骗别人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其他人应该看到事情的真相以免不小心损害了他的利益，这明摆着对他自己是有利的。因此，很明显，对既定事实撒谎对于孩子来说是不自然的行为，但是顺从的法则又让撒谎变得必要。因为顺从是违背孩子的意志的，所以孩子会尽可能偷偷地反抗。而且，说出真相的好处到未来才能显现，而撒谎能够避免眼下的惩罚或责难，这样的当前利益显然更胜一筹。如果你的孩子接受的是自由的、顺应天性的教育，他又何必撒谎呢？他有什么好对你隐藏的呢？你不会找他的茬，不会惩罚他，不会强迫他。他为什么不像告诉他的小伙伴那样简单地告诉你所有事情呢？他不可能认为告诉你真相比告诉小伙伴更危险。

The lie concerning duty is even less natural, since promises to do or refrain from doing are conventional agreements which are outside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detract from our liberty. Moreover, all promises made by children are in themselves void; when they

pledge themselves they do not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for their narrow vision cannot look beyond the present. A child can hardly lie when he makes a promise; for he is only thinking how he can get out of the present difficulty, any means which has not an immediate result is the same to him; when he promises for the future he promises nothing, and his imagination is as yet incapable of projecting him into the future while he lives in the present. If he could escape a whipping or get a packet of sweets by promising to throw himself out of the window to-morrow, he would promise on the spot. This is why the law disregards all promises made by minors, and when fathers and teachers are stricter and demand that promises shall be kept, it is only when the promise refers to something the child ought to do even if he had made no promise.

因为承诺做某事或克制不做某事是双方约定好的，这不在自然的范围之内，而且还有损自由，所以涉及到责任的谎言更加不自然一些。另外，孩子许下的所有承诺其本身就是无效的。当他们承诺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他们狭隘的视野无法脱离当下、看到未来。孩子在许诺的时候并没有在撒谎，因为他仅仅在思考怎么样脱离眼前的困境，任何不会立刻产生影响的方式对他而言都是一样的。当他承诺未来时，其实他说的都是空话，他的想象力还不足让他身处于当下去展望未来。如果让他许诺明天从窗户跳出去就能让他免掉一顿鞭打或者赢得一包糖果，他也会当场承诺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律不承认所有未成年人的承诺，严厉的父亲和教师要求许下承诺就必须遵守，这也只是因为对孩子而言这些事即便不承诺也必须做。

The child cannot lie when he makes a promise, for he does not know what he is doing when he makes his promise. The case is different when he breaks his promise, which is a sort of retrospective falsehood; for he clearly remembers making the

promise, but he fails to see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it. Unable to look into the future, he cannot foresee the results of things, and when he breaks his promises he does nothing contrary to his stage of reasoning.

孩子在许诺的时候并没有在撒谎，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当他违背承诺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他的承诺变为可以追溯的谎言。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做过承诺，但是他不明白遵守诺言的重要性。他无法看到未来，就不能预见事情的结果。于是当他违背承诺的时候，这种行为也并不与他这个年龄的理性相悖。

Children's lies are therefore entirely the work of their teachers, and to teach them to speak the truth is nothing less than to teach them the art of lying. In your zeal to rule, control, and teach them, you never find sufficient means at your disposal. You wish to gain fresh influence over their minds by baseless maxims, by unreasonable precepts; and you would rather they knew their lessons and told lies, than leave them ignorant and truthful.

因此，孩子的谎言完全是老师造成的。老师想教孩子说真话，却教会了他们撒谎。你热衷于管理、控制、教育孩子，却从来没找到有效的方式达到你的目的。你希望通过毫无根据的准则和不可理喻的戒律来约束他们的心灵。你宁可他们背书和撒谎，也不愿让他们保持天真和诚实。

We, who only give our scholars lessons in practice, who prefer to have them good rather than clever, never demand the truth lest they should conceal it, and never claim any promise lest they

should be tempted to break it. If some mischief has been done in my absence and I do not know who did it, I shall take care not to accuse Emile, nor to say, “Did you do it?“ [3_11] For in so doing what should I do but teach him to deny it? If his difficult temperament compels me to make some agreement with him, I will take good care that the suggestion always comes from him, never from me; that when he undertakes anything he has always a present and effective interest in fulfilling his promise, and if he ever fails this lie will bring down on him all the unpleasant consequences which he sees arising from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and not from his tutor's vengeance. But far from having recourse to such cruel measures, I feel almost certain that Emile will not know for many years what it is to lie, and that when he does find out, he will be astonished and unable to understand what can be the use of it. 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 less I make his welfare dependent on the will or the opinions of others, the less is it to his interest to lie.

我们只让学生从实践中习得知识，与聪明相比我们更希望学生是善良的，我们从不强迫学生老老实实以免他们弄虚作假，我们也从不要学生许诺什么以免他们违背承诺。假如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恶作剧而我不知道是谁做的，我不会怪罪于爱弥儿，也不会问他“是不是你干的？” [4_11] ，因为这样做除了教他否认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假如他的坏脾气使我不得不跟他做一些约定，我会注意总是让他提出约定的内容，而永远不是由我。这样不管他承诺了任何事，他总会觉得实现诺言会获得巨大的当前利益。万一他没做到，这个谎言会给他带来一系列不愉快的后果，我也会让他觉得这些后果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并不是我的报复。但是，我根本不需要使用这些残酷的手段，我很确信爱弥儿在许多年之内都不会知道什么是撒谎。就算有一天他知道了，他也会对谎言这个东西感到吃惊，不明白撒谎到底能有什么用处。所以很清楚的一点是，我越是让他的幸福生活不被他人的意志和观点打扰，他对撒谎就越没有兴趣。

When we are in no hurry to teach there is no hurry to demand, and we can take our time, so as to demand nothing except under fitting conditions. Then the child is training himself, in so far as he is not being spoilt. But when a fool of a tutor, who does not know how to set about his business, is always making his pupil promise first this and then that, without discrimination, choice, or proportion, the child is puzzled and overburdened with all these promises, and neglects, forgets or even scorns them, and considering them as so many empty phrases he makes a game of making and breaking promises. Would you have him keep his promise faithfully, be moderate in your claims upon him.

当我们不急着教孩子的时候，就不必急着要求他们做什么，就可以慢慢来，在恰当的时候才对他们提出一些要求。这样，只要孩子没被宠坏，他其实是在自己训练自己。但是，假如某个老师愚蠢到不知道如何教孩子，他就总是让学生承诺这个承诺那个。这些承诺没有分别、没有选择并且数量巨大，孩子会感到困惑，被压得喘不过气，从而无视这些承诺，将其置之脑后、满不在乎，认为这些都是空话，甚至还觉得先许诺然后违背诺言是个很好玩的游戏。如果你希望孩子忠实地遵守承诺，就请务必在对他提出要求的时候保持慎重。

The detailed treatment I have just given to lying may be applied in many respects to all the other duties imposed upon children, whereby these duties are made not only hateful but impracticable. For the sake of a show of preaching virtue you make them love every vice; you instil these vices by forbidding them. Would you have them pious, you take them to church till they are sick of it; you teach them to gabble prayers until they long for the happy time when they will not have to pray to God. To teach them

charity you make them give alms as if you scorned to give yourself. It is not the child, but the master, who should give; however much he loves his pupil he should vie with him for this honour; he should make him think that he is too young to deserve it. Alms-giving is the deed of a man who can measure the worth of his gift and the needs of his fellow-men. The child, who knows nothing of these, can have no merit in giving; he gives without charity, without kindness; he is almost ashamed to give, for, to judge by your practice and his own, he thinks it is only children who give, and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charity when we are grown up.

这些我提到的处理撒谎的具体方式可以应用到很多方面，包括强加给孩子的所有义务。把这些义务强加到孩子身上不仅可恨而且不切实际。为了对学生宣讲道德，你让他们爱上恶习。你的严令禁止反而让他们培养了这些恶习。为了培养孩子的虔诚，你带他们去教堂直到他们对此感到厌恶。你让他们哇哩哇啦地祷告，直到他们渴望那不用向上帝祷告的幸福生活。为了教会孩子们仁慈，你让他们去布施，好像是你不屑于布施才叫他们去做的。应该布施的不是孩子，而是老师。不论老师有多爱他的学生，都应该与学生竞争这份荣誉，应该让学生相信他还小，不配去布施别人。只有能够衡量布施的价值、知道别人需要什么的人才能去布施。孩子是不知道这些的，因此即便做了也没什么价值。他的布施与仁慈、善心无关。他甚至对此感到羞赧，因为根据你的和他自己的实际经验，他觉得只有孩子才会布施，当我们长大以后就不需要这么做了。

Observe that the only things children are set to give are things of which they do not know the value, bits of metal carried in their pockets for which they have no further use. A child would rather give a hundred coins than one cake. But get this prodigal giver to distribute what is dear to him, his toys, his sweets, his own lunch,

and we shall soon see if you have made him really generous.

应该注意的是，孩子唯一能布施的就是那些他们不知其价值的东西或者是口袋里的金属物品，因为这些东西就算不给别人对他们也没什么用。就好像一个孩子宁愿给别人一百个硬币，也不愿给别人一块蛋糕。如果让这个豪爽的布施者试着捐出他喜欢的东西，比如玩具、糖果、他的午餐，我们就会立刻看到是否你真的教会他慷慨了。

People try yet another way; they soon restore what he gave to the child, so that he gets used to giving everything which he knows will come back to him. I have scarcely seen generosity in children except of these two types, giving what is of no use to them, or what they expect to get back again. “Arrange things,” says Locke, “so that experience may convince them that the most generous giver gets the biggest share.” That is to make the child superficially generous but really greedy. He adds that “children will thus form the habit of liberality.” Yes, a usurer's liberality, which expects cent. per cent. But when it is a question of real giving, good-bye to the habit; when they do not get things back, they will not give. It is the habit of the mind, not of the hands, that needs watching. All the other virtues taught to children are like this, and to preach these baseless virtues you waste their youth in sorrow. What a sensible sort of education!

人们还会尝试另一种方法，即很快就把孩子送出去的东西还给他，这样他就会习惯去把那些认为可以拿回来的东西送给别人。我很少看到孩子会大方地给别人东西，只有两种情况除外。一种是他用不上的东西，一种是他认为还能拿回来的东西。“把事情安排好，”洛克说，“这样经验会让他们相信最慷慨的人反而能收获最多。”这样会让孩子变成表面慷慨，实则贪婪的人。洛克还说过“孩子会因此养成慷

慨的习惯”。是啊，高利贷式的慷慨，锱铢必较。一旦涉及到真正的赠与，那就向这个习惯说再见了。一旦他们发现送出去的东西拿不回来，就不会再赠与了。需要关注的是心灵的习惯，不是手上的习惯。你教给他们的其他美德也和赠与这种美德差不多，正是由于你宣讲这些毫无根据的美德，你把他们的年少时光都浪费在了悲痛上。这就是你们说的明智的教育啊！

Teachers, have done with these shams; be good and kind; let your example sink into your scholars' memories till they are old enough to take it to heart. Rather than hasten to demand deeds of charity from my pupil I prefer to perform such deeds in his presence, even depriving him of the means of imitating me, as an honour beyond his years; for it i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that he should not regard a man's duties as merely those of a child. If when he sees me help the poor he asks me about it, and it is time to reply to his questions [3_12] , I shall say, “My dear boy, the rich only exist, through the good-will of the poor, so they have promised to feed those who have not enough to live on, either in goods or labour.” “Then you promised to do this?” “Certainly; I am only master of the wealth that passes through my hands on the condition attached to its ownership.”

老师们，终止这种假象吧。你们应该做正直、善良的人。要让榜样作用在学生身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直到他们自己能够将这种榜样行为铭记于心。与其急于强迫我的学生做慈善的事，我宁愿自己在他面前展现这种品德。我甚至还要让他连模仿的可能都没有，由此让他知道这不是他这个年龄可以享受的荣誉，因为让他明白孩子不需要承担大人的义务这个道理是最重要的。如果他看到我在帮助穷人而向我提问，我又觉得是时候回答他了 [4_12] ，我就会说，“我的孩子，因为穷人的善心才会有富人存在，所以富人承诺要养活那些靠自己的财

产或者劳动无法生活的人。”“你也承诺过这么做吗？”“当然，只有经过我手并且附有这个条件的财富，才是属于我的。”

After this talk (and we have seen how a child may be brought to understand it) another than Emile would be tempted to imitate me and behave like a rich man; in such a case I should at least take care that it was done without ostentation; I would rather he robbed me of my privilege and hid himself to give. It is a fraud suitable to his age, and the only one I could forgive in him.

这次谈话以后（我已经讲过如何使孩子理解这些话的意思），另一个孩子，不是爱弥儿，也许会模仿我的样子像富人那样行事了。对于这种情况，我至少要防止他做事时带着炫耀的姿态。我宁愿让他剥夺我的权利，把东西偷偷送给别人。这是他这个年纪会犯的错，也是我唯一能原谅的错。

I know that all these imitative virtues are only the virtues of a monkey, and that a good action is only morally good when it is done as such and not because of others. But at an age when the heart does not yet feel anything, you must make children copy the deeds you wish to grow into habits, until they can do them with understanding and for the love of what is good. Man imitates, as do the beasts. The love of imitating is well regulated by nature; in society it becomes a vice. The monkey imitates man, whom he fears, and not the other beasts, which he scorns; he thinks what is done by his betters must be good. Among ourselves, our harlequins imitate all that is good to degrade it and bring it into ridicule; knowing their owners' baseness they try to equal what is better than they are, or they strive to imitate what they admire, and their bad

taste appears in their choice of models, they would rather deceive others or win applause for their own talents than become wiser or better. Imitation has its roots in our desire to escape from ourselves. If I succeed in my undertaking, Emile will certainly have no such wish. So we must dispense with any seeming good that might arise from it.

我知道所有靠模仿习得的美德与猴子的行为无异，而一种行为之所以在道德层面是好的，是因为你做的时候就意识到这是好的，而不是因为看到别人做才做。但是，在心智还无法感受到善恶的时候，你必须让孩子模仿你希望他们养成的习惯，直到他们可以理解自己做的事并且爱上做善事。人类会模仿，野兽也一样。善于模仿是自然赋予的天性，但在社会中，这会变成一种恶习。猴子会模仿人类而不是其他野兽，因为他惧怕人类而蔑视其他野兽，他觉得比他高级的生物的行为肯定更好。在人类之中，丑角模仿美好的行为则是为了贬低这些行为的价值，将其变得滑稽可笑。他们知道自己的卑贱，所以尝试与比他们高尚的人平起平坐。他们力图模仿自己欣赏的行为，这时他们糟糕的品位就体现在了模仿对象的选择上，他们的意图是欺骗别人或者让别人称赞他们的才能，而不是让自己变得更聪明或更好。模仿已经扎根于我们想要逃离自己的欲望。如果我的教育够成功，爱弥儿肯定不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们必须消除这种想法会带来的表面好处。

Examine your rules of education; you will find them all topsy-turvy, especially in all that concerns virtue and morals. The only moral lesson which is suited for a child—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for every time of life—is this: “Never hurt anybody.” The very rule of well-doing, if not subordinated to this rule, is dangerous, false, and contradictory. Who is there who does no good? Every one does some good, the wicked as well as the righteous; he makes one happy at the cost of the misery of a hundred, and hence spring all

our misfortunes. The noblest virtues are negative, they are also the most difficult, for they make little show, and do not even make room for that pleasure so dear to the heart of man, the thought that some one is pleased with us. If there be a man who does no harm to his neighbours, what good must he have accomplished! What a bold heart, what a strong character it needs! It is not in talking about this maxim, but in trying to practise it, that we discover both its greatness and its difficulty [3_13] .

检查一下你的教育准则，你会发现它们都是一团糟，特别是涉及品德和道德的方面。对孩子来说，唯一适合的、也是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最重要的道德教育就是告诉他“不要伤害任何人”。不符合这一条的准则，哪怕是教人为善，也是危险的、错误的、矛盾的。谁不会做点好事呢？每个人都会做点好事，包括坏人和正义的人。他做一件好事，一百个人要遭殃，我们的所有不幸也是从这里产生的。最高尚的品德都是消极的，也是最难做到的，因为这些品德不是为了展示给别人看的，即使知道别人对我们感到满意，心里也不会因此产生愉快的感觉。如果有个人从来不对邻居坐坏事，他就是做了天大的好事了！这需要有多么勇敢的心和坚强的品质啊！重要的不是谈论这个准则，而是去实践它，在实践中我们会发现要做到这一点有多么伟大和艰难 [4_13] 。

This will give you some slight idea of the precautions I would have you take in giving children instruction which cannot always be refused without risk to themselves or others, or the far greater risk of the formation of bad habits, which would be difficult to correct later on; but be sure this necessity will not often arise with children who are properly brought up, for they cannot possibly become rebellious, spiteful, untruthful, or greedy, unless the seeds of these vices are sown in their hearts. What I have just said applies

therefore rather to the exception than the rule. But the oftener children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quitting their proper condition, and contracting the vices of men, the oftener will these exceptions arise. Those who are brought up in the world must receive more precocious instruction than those who are brought up in retirement. So this solitary education would be preferable, even if it did nothing more than leave childhood time to ripen.

以上内容会给你一些关于预防措施的浅显概念，我希望你在给孩子下指示的时候能够用上。如果不这么做，你教的东西就会让孩子损害自己或者别人，更严重的可能会养成一些日后难以改正的坏习惯。但是对于在良好的教育中长大的孩子，并不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些孩子不太可能成为反叛、恶毒、虚伪、贪婪的人，除非这些罪恶的种子早已种在他们心中。因此，我刚才所说的不是一般的准则，而更适用于例外的情况。但是，孩子离开适合的环境和沾染大人恶习的机会越多，这些例外情况越有可能出现。与在偏僻乡野成长的孩子相比，对于在闹市中长大的孩子必须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因此，即使这种教育只会让孩子变得早熟，也宁可采取这样的教育方式。

There is quite another class of exceptions: those so gifted by nature that they rise above the level of their age. As there are men who never get beyond infancy, so there are others who are never, so to speak, children, they are men almost from birth. The difficulty is that these cases are very rare, very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while every mother, who knows that a child may be a prodigy, is convinced that her child is that one. They go further; they mistake the common signs of growth for marks of exceptional talent. Liveliness, sharp sayings, romping, amusing simplicity, these are the characteristic marks of this age, and show that the child is a child indeed. Is it strange that a child who is encouraged to chatter and

allowed to say anything, who is restrained neither by consideration nor convention, should chance to say something clever? Were he never to hit the mark, his case would be stranger than that of the astrologer who, among a thousand errors, occasionally predicts the truth. “They lie so often,” said Henry IV., “that at last they say what is true.” If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clever, you have only to talk long enough. May Providence watch over those fine folk who have no other claim to social distinction.

还有一种例外情况：那些在同龄人中天资非常显著的孩子。就像有些人永远长不大一样，也有一些人，从没体验过童年。他们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跟大人一样成熟了。这种情况的难处在于它非常罕见，非常难以辨识。每一个母亲都知道一个孩子可能成为神童，于是她相信自己的孩子也能做到。她们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她们搞不清楚成长中的一般特征和天才的区别。活泼好动、尖牙利嘴、嬉戏喧闹、天真单纯，这些是每个人小时候都会出现的性格特征，也是显示孩子之所以为孩子的原因。如果你鼓励孩子多说话，说任何想说的话，如果你的孩子不受礼节和规矩的约束，那么他偶尔说几句聪明的话难道很奇怪吗？如果他一句聪明的话都没说出来过，那比占星师预言上千次却仅仅偶尔成真还要奇怪呢。正如亨利四世说的，“他们撒的谎太多了，最后终于说了句真话。”如果你想说几句聪明的话，你只需要长篇大论就行了。希望上天看护好那些所谓的优秀人物，他们除了会说漂亮话之外是没什么资格得到这种社会身份的。

The finest thoughts may spring from a child's brain, or rather the best words may drop from his lips, just as diamonds of great worth may fall into his hands, while neither the thoughts nor the diamonds are his own; at that age neither can be really his. The child's sayings do not mean to him what they mean to us, the ideas he attaches to them are different. His ideas, if indeed he has any

ideas at all, have neither order nor connection; there is nothing sure, nothing certain, in his thoughts. Examine your so-called prodigy. Now and again you will discover in him extreme activity of mind and extraordinary clearness of thought. More often this same mind will seem slack and spiritless, as if wrapped in mist. Sometimes he goes before you, sometimes he will not stir. One moment you would call him a genius, another a fool. You would be mistaken in both; he is a child, an eaglet who soars aloft for a moment, only to drop back into the nest.

孩子的脑中可能产生最棒的思想，他的嘴巴可能说出最好的话语，就好像他可能得到最珍贵的钻石一样。但这些思想和钻石都不属于他。在他这个年纪，没有什么财富是真的属于他的。孩子说的话对于他自己的意义和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不同的，他附加在这些话上的观念是不同的。他的观念之间，如果他真的有什么观念的话，既没有顺序也没有关联。在他的思想里，没有什么是固定和明确的。检查一下你所谓的神童。你不时会发现他的心理活动极其活跃，他的思想非常清晰。但更多时候，他看上去是死气沉沉、偷懒松懈的，就好像包裹在迷雾中似的。有时候他会走到你前面，有时候又一动不动。某个时刻你觉得他是个天才，下一秒又觉得他是个傻子。其实两者都不是，他只是个孩子，一只偶尔飞到高空的雏鹰，早晚还是会回到巢里的。

Treat him, therefore, according to his age, in spite of appearances, and beware of exhausting his strength by over-much exercise. If the young brain grows warm and begins to bubble, let it work freely, but do not heat it any further, lest it lose its goodness, and when the first gases have been given off, collect and compress the rest so that in after years they may turn to life-giving heat and real energy. If not, your time and your pains will be wasted, you will destroy your own work, and after foolishly intoxicating

yourself with these heady fumes, you will have nothing left but an insipid and worthless wine.

因此，不论表象如何，你要根据他的年龄来对待他，注意不要让他做过多的运动而耗尽了他的体力。当这颗年轻的大脑开始苏醒、冒泡，让它自由生长，不要急着给它加热，以免它蒸发消散了。当他初生的精华快要挥发掉的时候，收集并好好保存剩下的。这样，在接下来的时光中，它们会变成孕育蓬勃生机的热和真正的能量。如果不这样做，你的时间和精力都会白费，你会毁了自己的劳动成果，你沉迷于令人陶醉的迷雾之中，然后发现除了枯燥无味、毫无价值的渣滓之外什么也没留下。

Silly children grow into ordinary men. I know no generalisation more certain than this. It i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the worl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genuine stupidity, and that apparent and deceitful stupidity which is the sign of a strong character. At first sight it seems strange that the two extremes should have the same outward signs; and yet it may well be so, for at an age when man has as yet no true ideas, the who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enius and the rest consists in this: the latter only take in false ideas, while the former, finding nothing but false ideas, receives no ideas at all. In this he resembles the fool; the one is fit for nothing, the other finds nothing fit for him. The only way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m depends upon chance, which may offer the genius some idea which he can understand, while the fool is always the same. As a child, the young Cato was taken for an idiot by his parents; he was obstinate and silent, and that was all they perceived in him; it was only in Sulla's ante-chamber that his uncle discovered what was in him. Had he never found his way there, he might have passed for a fool till he reached the age of reason. Had Caesar never lived,

perhaps this same Cato, who discerned his fatal genius, and foretold his great schemes, would have passed for a dreamer all his days. Those who judge children hastily are apt to be mistaken; they are often more childish than the child himself. I knew a middle-aged man [3_14] , whose friendship I esteemed an honour, who was reckoned a fool by his family. All at once he made his name as a philosopher, and I have no doubt posterity will give him a high place among the greatest thinkers and the profoundest metaphysicians of his day.

愚笨的孩子会成长为平庸的大人。没有比这更让我确定的归纳了。世界上最困难的事就是分辨真正的愚蠢和表面上的、迷惑人的愚蠢，后者往往是坚强性格的标志。这两种极端居然会有相同的表征，这在一开始看来可能很奇怪，但却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人还没有形成真正观念的年纪，天才和其他人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后者只会接受虚假的观念，但是前者知道它们是虚假的因而一点儿也不接受。在这点上他有点像傻瓜，一个是什么也不懂，一个是觉得什么都不适合他。区别这两者的唯一方法就是凭运气，有时候运气或许给天才儿童提供某个他能理解的观念。然而傻瓜总是一样的，什么也不懂。作为孩子，年幼的加图被父母当作傻子对待。在父母看来，他总是方头不劣、沉默寡言。直到有一次在苏拉的前厅里，叔叔发现了真实的他。如果那次他没有进入那间客厅，他可能会一直被当作傻瓜对待，直到他长到理性的年纪。如果恺撒不曾存在，加图，这个察觉到恺撒的阴险，预言其阴谋的人，一生都会被当成幻想家。那些急于给孩子下评判的人往往会出错，其实他们比孩子更幼稚。我认识一个中年人 [4_14] ，我为自己是他的朋友感到荣耀，然而在他的家人看来他却是一个傻瓜。突然，他作为哲学家出名了。我坚信子孙后代会在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影响最深远的玄学家中给他留一个崇高的位置。

Hold childhood in reverence, and do not be in any hurry to

judge it for good or ill. Leave exceptional cases to show themselves, let their qualities be tested and confirmed, before special methods are adopted. Give nature time to work before you take over her business, lest you interfere with her dealings. You assert that you know the value of time and are afraid to waste it. You fail to perceive that it is a greater waste of time to use it ill than to do nothing, and that a child ill taught is further from virtue than a child who has learnt nothing at all. You are afraid to see him spending his early years doing nothing. What! is it nothing to be happy, nothing to run and jump all day? He will never be so busy again all his life long. Plato, in his Republic, which is considered so stern, teaches the children only through festivals, games, songs, and amusements. It seems as if he had accomplished his purpose when he had taught them to be happy; and Seneca, speaking of the Roman lads in olden days, says, “They were always on their feet, they were never taught anything which kept them sitting.” Were they any the worse for it in manhood? Do not be afraid, therefore, of this so-called idleness. What would you think of a man who refused to sleep lest he should waste part of his life? You would say, “He is mad; he is not enjoying his life, he is robbing himself of part of it; to avoid sleep he is hastening his death.” Remember that these two cases are alike, and that childhood is the sleep of reason.

尊重童年，不要急于对其进行好坏的判断。让例外自己显示出来，在采取特殊手段之前，让它们的品质经过测试和确认。在你接过自然的工作之前，给它足够的时间去教导孩子，以免在方法上和它起冲突。你声称自己知道时间的价值，害怕浪费时间。但你没有察觉到，把时间花在错误的事情上，比什么都不干更浪费时间。同样地，与什么都不教孩子相比，错误的教导反而会让他离美好的品德越来越远。你害怕他的童年整天无所事事。什么！难道快乐地成长，整天跑跑跳跳是无所事事吗？他这一生中再也不会有这么忙碌的时光了。柏

拉图的著作《理想国》，被许多人认为是相当严肃的一部著作，然而这本书完全是通过节日、游戏、歌曲、娱乐这些方法来教导孩子的。当他教孩子开心生活的时候，他似乎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塞涅卡在谈到古罗马的青年时说过，“他们总是站着的，从没人教他们要一直坐着。”难道他们成年之后就会比其他人更糟糕吗？因此，不要害怕那所谓的懒散。如果你遇到一个为了不浪费片刻的生命连觉也不睡的人，你会作何感想呢？你可能会说，“这个人疯了，他不懂享受生活。相反地，他在剥夺自己的部分生命，不睡觉简直就是奔着死亡去的。”记住，这两个例子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童年仅仅是理性还在沉睡的时期罢了。

The apparent ease with which children learn is their ruin. You fail to see that this very facility proves that they are not learning. Their shining, polished brain reflects, as in a mirror, the things you show them, but nothing sinks in. The child remembers the words and the ideas are reflected back; his hearers understand them, but to him they are meaningless.

教育孩子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然而这种容易恰恰是教坏孩子的原因。你没有看到，这种容易恰恰证明孩子并没有在学习。他们经过打磨的、闪闪发光的大脑仿佛一面镜子，可以把你教的东西都反映出来，然而没有什么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孩子会记得你说的话，但那些观念都被反射掉了。听众可以理解他，然而对他自己而言这些东西毫无意义。

Although memory and reason are wholly different faculties, the one does not really develop apart from the other. Before the age of reason the child receives images, not ideas; and there is this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mages are merely the pictures of external

objects, while ideas are notions about those objects determined by their relations. An image when it is recalled may exist by itself in the mind, but every idea implies other ideas. When we image we merely perceive, when we reason we compare. Our sensations are merely passive, our notions or ideas spring from an active principle which judges. The proof of this will be given later.

尽管记忆和理性是完全不同的官能，但一方的发展离不开另一方。在到达理性的年纪之前，孩子接受的是形象，不是观念。这两者的差别在于：形象仅仅是外界客观事物的样子，而观念是由事物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看法。一个形象可以在回忆时单独存在于心中，但是每一个观念会暗示出其他的观念。当我们想象的时候，我们仅仅在观察。然而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加以比较。我们的感觉纯粹是被动的，但是看法或和观念产生于能进行判断的主动本原。关于这一点，我之后还会加以证明。

I maintain, therefore, that as children are incapable of judging, they have no true memory. They retain sounds, form, sensation, but rarely ideas, and still more rarely relations. You tell me they acquire some rudiments of geometry, and you think you prove your case; not so, it is mine you prove; you show that far from being able to reason themselves, children are unable to retain the reasoning of others; for if you follow the method of these little geometricians you will see they only retain the exact impression of the figure and the terms of the demonstration. They cannot meet the slightest new objection; if the figure is reversed they can do nothing. All their knowledge is on the sensation-level, nothing has penetrated to their understanding. Their memory is little better than their other powers, for they always have to learn over again, when they are grown up, what they learnt as children.

因此，我始终认为，孩子由于没有判断力，所以不具备真正的记忆。他们记得声音、形状、感觉，但很少记得住观念，更不要说观念之间的联系了。你告诉我他们学会了几何学的一些基础概念，你认为你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并非如此，你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你显示出孩子们非但不能自己推理，甚至还记不住别人的论证。如果你用用这些小几何学家的方法，就会发现他们只记住了精确的图形和论证的术语罢了。他们无法应对最轻微的反驳，甚至如果你把图形颠倒一下，他们就不认识了。他们所有的知识都停留在感觉的层面，没有什么真的进入了理解的范畴。他们的记忆力并不比其他能力好多少，因为等他们长大了，还是要反复学习小时候学过的东西。

I am far from thinking, however, that children have no sort of reason [3_15] . On the contrary, I think they reason very well with regard to things that affect their actual and sensible well-being. But people are mistaken as to the extent of their information, and they attribute to them knowledge they do not possess, and make them reason about things they cannot understand. Another mistake is to try to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matters which do not concern them in the least, such as their future interest, their happiness when they are grown up, the opinion people will have of them when they are men—terms which are absolutely meaningless when addressed to creatures who are entirely without foresight. But all the forced studies of these poor little wretches are directed towards matters utterly remote from their minds. You may judge how much attention they can give to them.

但是，我并不认为孩子一点理解力也没有 [4_15] 。恰恰相反，我认为对于那些他们能感觉到的、有切实影响的事物，他们是能理解得很好的。但是，对于孩子所知的信息的程度，人们会产生错误判断，

所以非要教给孩子他们没有掌握的知识，非得让孩子理解他们不能理解的事物。另外一个错误是我们总尝试着让孩子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跟他们毫无关系的事情上，比如他们未来的利益、长大之后的幸福、成年之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跟没有远见的孩子谈这些是毫无意义的。硬要这些可怜的小家伙学这些东西，往往会让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毫不相关的事情上去。你可以判断一下他们在这些事情上会投入多少注意力。

The pedagogues, who make a great display of the teaching they give their pupils, are paid to say just the opposite; yet their actions show that they think just as I do. For what do they teach? Words! words! words! Among the various sciences they boast of teaching their scholars, they take good care never to choose those which might be really useful to them, for then they would be compelled to deal with things and would fail utterly; the sciences they choose are those we seem to know when we know their technical terms—heraldry, geography, chronology, languages, etc., studies so remote from man, and even more remote from the child, that it is a wonder if he can ever make any use of any part of them.

那些炫耀如何教诲孩子的老师，拿了人家的好处就故意说些相反的话，其实从他们的行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教了什么呢？词汇！词汇！还是词汇！在教给孩子的各种学科中，他们从来不选那些对孩子真正有用的科目，因为这样他们会被迫教一些教不来的东西然后彻底失败。他们会选择那些看起来大家都知道一点术语的科目，比如纹章学、地理学、年代学、语言相关的学科等等。这些学科离成年人的生活很遥远，离孩子更遥远，如果他们能用上这些知识里的一点点就算是奇迹了。

You will b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I reckon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mong the useless lumber of education; but you must remember that I am speaking of the studies of the earliest years, and whatever you may say, I do not believe any child under twelve or fifteen ever really acquired two languages.

你可能会惊讶于我居然认为关于语言的学习也是没有用的教育，但是你必须记住，我现在谈的是最早期的教育。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十二岁或者十五岁以下的孩子能真地掌握两门语言。

If the study of languages were merely the study of words, that is, of the symbols by which language expresses itself, then this might be a suitable study for children; but languages, as they change the symbols, also modify the ideas which the symbols express. Minds are formed by language, thoughts take their colour from its ideas. Reason alone is common to all. Every language has its own form, a difference which may be partly cause and partly effect of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character; this conjecture appears to be confirmed by the fact that in every nation under the sun speech follows the changes of manners, and is preserved or altered along with them.

如果学习语言仅仅是学习词汇，也就是语言表达自身的符号，那么这对孩子来说也许是合适的。但是，语言在改变符号的同时，也修改了这些符号所表达的观念。语言塑造知识，思想从观念中汲取色彩。只有理性是相同的。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形式，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是民族性格产生差异的部分原因和结果。可以证明这个推论的是：世界上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是随着风俗而变化的，它们也像风俗那样或被留存下来或有所改变。

By use the child acquires one of these different forms, and it is the only language he retains till the age of reason. To acquire two languages he must be able to compare their ideas, and how can he compare ideas he can barely understand? Everything may have a thousand meanings to him, but each idea can only have one form, so he can only learn one language. You assure me he learns several languages; I deny it. I have seen those little prodigies who are supposed to speak half a dozen languages. I have heard them speak first in German, then in Latin, French, or Italian; true, they used half a dozen different vocabularies, but they always spoke German. In a word, you may give children as many synonyms as you like; it is not their language but their words that you change; they will never have but one language.

通过使用，孩子能掌握这些不同形式的语言中的一种，这也是他在长到理性的年龄之前唯一能记住的语言。要掌握两种语言，他必须能够比较不同的观念，当他还没有理解力的时候，他又怎么比较呢？每一种事物对他而言都可能有一千种含义，但是一个观念只能有一种形式，所以他只能学会一种语言。你说，可是他确实已经学会了好几种语言了，对此我不能承认。我曾经看到过一些据说能讲六种语言的神童。我听他们说话，先是，然后是拉丁语、法语或意大利语。是的，他们会使用六种语言的词汇，但他们最常用的还是德语。总而言之，你想教孩子多少同义词都行。但你改变的仅仅是他们的词汇而不是语言，所以他们还是只能学会一种语言。

To conceal their deficiencies teachers choose the dead languages, in which we have no longer any judges whose authority is beyond dispute. The familiar use of these tongues disappeared long ago, so they are content to imitate what they find in books,

and they call that talking. If the master's Greek and Latin is such poor stuff, what about the children? They have scarcely learnt their primer by heart, without understanding a word of it, when they are set to translate a French speech into Latin words; then when they are more advanced they piece together a few phrases of Cicero for prose or a few lines of Vergil for verse. Then they think they can speak Latin, and who will contradict them?

为了掩盖自身的不足，老师们总选择教授那些不再发展的语言，因为我们已经再也无法评判谁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威了。这些语言的惯常用法早已消失，于是老师们便满足于模仿书本上的词句，他们还把这称之为口语。如果老师的希腊语或者拉丁语都已经这么差了，学生还能好到哪里去呢？当他们还几乎没启蒙、还没理解这门语言的一个单词时，就被要求把一篇法语文章翻译为拉丁文。当他们学得更多一点之后，就被要求把西塞罗的句子写成散文或者把维吉尔的几句话写成韵文。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会说拉丁语了，谁又会说他们不对呢？

In any study whatsoever the symbols are of no value without the idea of the things symbolised. Yet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ld in confined to those symbols, while no one ever succeeds in making him understand the thing signified. You think you are teaching him what the world is like; he is only learning the map; he is taught the names of towns, countries, rivers, which have no existence for him except on the paper before him. I remember seeing a geography somewhere which began with: “What is the world?“—“A sphere of cardboard.” That is the child's geography. I maintain that after two years' work with the globe and cosmography, there is not a single ten-year-old child who could find his way from Paris to Saint Denis by the help of the rules he has learnt. I maintain that not one of these children could find his way by the map about the paths on his

father's estate without getting lost. These are the young doctors who can tell us the position of Pekin, Ispahan, Mexico, and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在任何学科的学习中，不论什么符号，假如缺少了它们所代表事物的概念，都是没有价值的。然而，孩子的教育局限于这些符号中，没人成功地让他们理解过这些符号代表什么。你认为你教他们的是这个世界的样子，其实他只学到了地图。你教他那些城镇、国家、河流的名字。对他而言，这些东西只存在于眼前的纸上。我记得曾经看到过一本地理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什么是世界呢？"—"世界就是一个用硬纸板做的球"。这就是孩子眼中的地理。我认为，就算你教了两年地球和宇宙的知识，也没有哪个十岁的孩子能够靠他学过的这些知识，自己找到从巴黎到圣丹尼镇的路。我也认为没有孩子能够靠着地图走过父亲的房子而不迷路的。那些能够说出北京、伊斯巴翁、墨西哥和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位置的年轻的博士，也是如此。

You tell me the child must be employed on studies which only need eyes. That may be; but if there are any such studies, they are unknown to me.

你告诉我孩子必须学习那些只需要用到眼睛的知识。或许如此。但是，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知识。

It is a still more ridiculous error to set them to study history, which is considered within their grasp because it is merely a collection of facts. But what is meant by this word "fact"? Do you think the relations which determine the facts of history are so easy to grasp that the corresponding ideas are easily developed in the

child's mind! Do you think that a real knowledge of events can exist apart from the knowledge of their causes and effects, and that history has so little relation to words that the one can be learnt without the other? If you perceive nothing in a man's actions beyond merely physical and external movements, what do you learn from history? Absolutely nothing; while this study, robbed of all that makes it interesting, gives you neither pleasure nor information. If you want to judge actions by their moral bearings, try to make these moral bearings intelligible to your scholars. You will soon find out if they are old enough to learn history.

让孩子学习历史，认为历史只是事实的罗列所以在孩子能够掌握的范围之内，就是更荒唐可笑的错误了。但是，“事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你认为要掌握决定历史事实的种种关系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要在孩子心里形成相应的观念也毫无困难吗？难道你认为要掌握真正的历史知识可以脱离它的原因和影响吗？又或者你认为历史和语言无关因此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学习历史吗？如果人类的行为在你看来仅仅是肉体和外部的活动，你又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呢？当然什么也学不到。这种学习剥夺了历史的趣味性，既不能给你快乐，也不能给你知识。如果你想用道德举止来评判行为，你可以试着让你的学生理解一下这些关系。很快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年龄还不够学习历史。

Remember, reader, that he who speaks to you is neither a scholar nor a philosopher, but a plain man and a lover of truth; a man who is pledged to no one party or system, a hermit, who mixes little with other men, and has less opportunity of imbibing their prejudices, and more time to reflect on the things that strike him in his intercourse with them. My arguments are based less on theories than on facts, and I think I can find no better way to bring the facts home to you than by quoting continually some example from the

observations which suggested my arguments.

读者们，请记住现在跟你说话的人既不是学者也不是哲学家，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真理的爱好者，一个不对任何党派或体系作出承诺的人，一个隐士，若不爱与他人混在一起，也就没什么机会沾染他们的偏见，因而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与他们交往的时候使他有所感悟的事情。我的观点更多地建立在事实而非理论上，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坚持引用某个从观察中得来的、让我产生这些观点的例子能更好地让你理解这些事实的了。

I had gone to spend a few days in the country with a worthy mother of a family who took great pains with her children and their education. One morning I was present while the eldest boy had his lessons. His tutor, who had taken great pains to teach him ancient history, began upon the story of Alexander and lighted on the well-known anecdote of Philip the Doctor. There is a picture of it, and the story is well worth study. The tutor, worthy man, made several reflections which I did not like with regard to Alexander's courage, but I did not argue with him lest I should lower him in the eyes of his pupil. At dinner they did not fail to get the little fellow talking, French fashion. The eager spirit of a child of his age, and the confident expectation of applause, made him say a number of silly things, and among them from time to time there were things to the point, and these made people forget the rest. At last came the story of Philip the Doctor. He told it very distinctly and prettily. After the usual meed of praise, demanded by his mother and expected by the child himself, they discussed what he had said. Most of them blamed Alexander's rashness, some of them, following the tutor's example, praised his resolution, which showed me that none of those present really saw the beauty of the story. “For my own part,”

I said, “if there was any courage or any steadfastness at all in Alexander's conduct I think it was only a piece of bravado.” Then every one agreed that it was a piece of bravado. I was getting angry, and would have replied, when a lady sitting beside me, who had not hitherto spoken, bent towards me and whispered in my ear. “Jean Jacques,” said she, “say no more, they will never understand you.” I looked at her, I recognised the wisdom of her advice, and I held my tongue.

我曾经在乡村呆过几天，住在一户人家家里。这家的主妇花了很多力气在孩子以及他们的教育上。一天早上，当这家的老大上课时，我去听了一会儿。他的老师曾花了很多功夫教他古代史，这一次从亚历山大的故事开始，讲到了著名的菲利普医生的轶事。书上有这个故事的插图，这个故事也的确值得学习。他的老师是个可敬的人，不过他对于亚历山大的勇气所列举的一些观点我并不赞同，但我没有与他争执以免降低他在学生心中的形象。吃晚饭时，大家没有忘记让孩子胡说一通，这是法国人的习惯。这个年龄的孩子具有活泼的天性，加上知道自己准能获得掌声的自信，会让他说出一串好笑的傻话，而在这些傻话中，偶尔也会有几句中肯的话，于是人们就会把其他的傻话忘掉了。最后，他说到了菲利普医生的故事。他讲得简洁流畅。大家照例给予了称赞，这是应母亲的要求，也是孩子自己所期待的，接着大家开始讨论他所说的故事。大多数人指责了亚历山大的鲁莽，另一些人则同意老师的观点，赞扬了亚历山大的决心。这让我看到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真地看到这个故事的美。“在我看来，”我说，“如果亚历山大的行为中有任何勇气和坚定的成分，那也只是鲁莽罢了。”然后每个人都同意我的说法，认为那是鲁莽。我非常生气，本想作出激烈的回应，但这时一位坐在我边上的女士，她到目前为止还没说过话，朝我侧过身并在我耳边低语道。“让·雅克，”她说，“别说了，他们不会理解你的。”我看着她，知道她的建议是明智的，于是我闭了嘴。

Several things made me suspect that our young professor had not in the least understood the story he told so prettily. After dinner I took his hand in mine and we went for a walk in the park. When I had questioned him quietly, I discovered that he admired the vaunted courage of Alexander more than any one. But in what do you suppose he thought this courage consisted? Merely in swallowing a disagreeable drink at a single draught without hesitation and without any signs of dislike. Not a fortnight before the poor child had been made to take some medicine which he could hardly swallow, and the taste of it was still in his mouth. Death, and death by poisoning, were for him only disagreeable sensations, and senna was his only idea of poison. I must admit, however, that Alexander's resolution had made a great impression on his young mind, and he was determined that next time he had to take medicine he would be an Alexander. Without entering upon explanations which were clearly beyond his grasp, I confirmed him in his praiseworthy intention, and returned home smiling to myself over the great wisdom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who expect to teach history to children.

有几件事情让我不禁怀疑这位年轻的小博士对这个他讲得那么好的故事并没有真正理解。晚饭之后，我拉着他的手去园子里散步。当我不动声色地问了他几个问题之后，我发现他比任何人都欣赏亚历山大那为人所吹嘘夸大的勇气。但是，你知道在他看来这种勇气是关于什么吗？仅仅是因为亚历山大毫不犹豫地一次饮尽了难喝的药水，并且脸上毫无难色。不到两周之前，这个可怜的孩子被逼着吃过一次药，他觉得难以下咽，那种味道到现在还在他嘴巴里。死亡和被毒死对于他仅仅是不快的感觉，而他所知的唯一毒药也就是晒干的番泻叶罢了。但是，我必须承认亚历山大的决心在他年幼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已经下定决心下次再吃药的时候要表现得像亚历山大一样。我没有向他解释超出他理解范围的东西，只是肯定了他这种值得

称赞的意图。回到家之后，想到父母和老师的这种智慧，我笑了，他们居然能想到这样利用历史知识来教育孩子。

Such words as king, emperor, war, conquest, law, and revolution are easily put into their mouths; but when it is a question of attaching clear ideas to these words the explanation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our talk with Robert the gardener.

诸如国王、君主、战争、征服、法律、改革这样的字眼，要让他们说出来很容易。但是，要把这些词语和清晰的观念联系起来，是不能像我们和园主罗伯特谈话那样来解释的。

I feel sure some readers dissatisfied with that “Say no more, Jean Jacques,” will ask what I really saw to admire in the conduct of Alexander. Poor things! if you need telling, how can you comprehend it? Alexander believed in virtue, he staked his head, he staked his own life on that faith, his great soul was fitted to hold such a faith. To swallow that draught was to make a noble profession of the faith that was in him. Never did mortal man recite a finer creed. If there is an Alexander in our own days, show me such deeds.

我知道一部分读者对“让·雅克，别说了”这句话感到不满，他们会问，亚历山大的行为在我看来到底哪里值得欣赏。可怜的人啊！如果你们需要我来告诉你们，你们又怎么能理解呢？亚历山大崇尚美德，他敢用自己的脑袋和生命对这种信念下赌注，他伟大的灵魂的确配得上这样的信念。他吞下那药水正是对他身上这种信念的崇高印证。从没有人对信念做过这样的歌颂。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也有亚历

山大，请让他也这样做给我看看。

If children have no knowledge of words, there is no study that is suitable for them. If they have no real ideas they have no real memory, for I do not call that a memory which only recalls sensations. What is the use of inscribing on their brains a list of symbols which mean nothing to them? They will learn the symbols when they learn the things signified; why give them the useless trouble of learning them twice over? And yet what dangerous prejudices are you implanting when you teach them to accept as knowledge words which have no meaning for them. The first meaningless phrase, the first thing taken for granted on the word of another person without seeing its use for himself,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ruin of the child's judgment. He may dazzle the eyes of fools long enough before he recovers from such a loss [3_16] .

如果孩子没有掌握词汇，没有什么学习是适合他们的。如果孩子没有形成真正的观念，他们是没有真正的记忆的，因为在我看来，只能回想起感觉，这不能称之为记忆。在他们的大脑中镌刻一系列对他们毫无意义的符号，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学习那些事物的过程中，他们自然就学会这些符号了。为什么要让他们白费力气学习两遍呢？当你教他们接受一些对其而言毫无意义的知识时，岂不是会给他们灌输危险的偏见。孩子学到的第一个无意义的说法、第一件想当然的事都是听别人说的，而自己根本没见过这些东西的真正用处，这就是毁灭孩子的判断力的开端。也许他可以在傻子面前炫耀很长时间，然而要弥补他的损失确是很难的 [4_16] 。

No, if nature has given the child this plasticity of brain which fits him to receive every kind of impression, it was not that you

should imprint on it the names and dates of kings, the jargon of heraldry, the globe and geography, all those words without present meaning or future use for the child, which flood of words overwhelms his sad and barren childhood. But by means of this plasticity all the ideas he can understand and use, all that concern his happiness and will some day throw light upon his duties, should be traced at an early age in indelible characters upon his brain, to guide him to live in such a way as befits his nature and his powers.

不，就算自然给了孩子一个可塑性很强的大脑，使得他可以接受各种印象，你也不应该在这个大脑里刻上那些君主的名字和年号、纹章学的术语、地球和地理知识，这些词汇对于孩子既没有当前意义也没有未来用途，这些东西像洪水一样冲垮了他那悲伤、贫乏的童年。但是，通过这种可塑性，所有他能够理解和使用的观念、所有事关他的幸福以及日后指导他尽职尽责的观念，都应该尽早在他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以此来指导他按照这样一种与自然和能力相适应的方式去生活。

Without the study of books, such a memory as the child may possess is not left idle; everything he sees and hears makes an impression on him, he keeps a record of men's sayings and doings, and his whole environment is the book from which he unconsciously enriches his memory, till his judgment is able to profit by it.

即使不学书本上的知识，孩子的记忆力也不会因此闲置。他看到的、听到的每一件事都会给他留下印象，他记得大人说的话、做的事。他所处的环境就是他阅读的书本，不知不觉就丰富了他的记忆，直到他的判断力能从中受益。

To select these objects, to take care to present him constantly with those he may know, to conceal from him those he ought not to know, this is the real way of training his early memory; and in this way you must try to provide him with a storehouse of knowledge which will serve for his education in youth and his conduct throughout life. True, this method does not produce infant prodigies, nor will it reflect glory upon their tutors and governesses, but it produces men, strong, right-thinking men, vigorous both in mind and body, men who do not win admiration as children, but honour as men.

慎重地选择在孩子周围存在的事物，注意连续不断地给孩子呈现那些他能知道的事物，隐藏那些他不应该知道的东西，这才是训练孩子早期记忆力的真正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为他大量提供那些有利于他的早期教育和一生行为的知识。的确，这种方法培养不出少年天才，也不会给他们的老师和监管人带来什么荣光，但是它可以培养出真正的人，坚强的、真正会思考的人，不论是心灵还是肉体都生机勃勃的人。这样的人在小时候虽然不会有什么人称赞，但长大之后必然是受人尊敬的。

Emile will not learn anything by heart, not even fables, not even the fables of La Fontaine, simple and delightful as they are, for the words are no more the fable than the words of history are history. How can people be so blind as to call fables the child's system of morals, without considering that the child is not only amused by the apologue but misled by it? He is attracted by what is false and he misses the truth, and the means adopted to make the teaching pleasant prevent him profiting by it. Men may be taught by fables; children require the naked truth.

爱弥儿不会去背诵课文，即便是拉·封丹的寓言故事，尽管它们都很简单、有趣。因为寓言中的话并不都是寓言，就好像历史中的文字并不都是历史一样。人们怎么能如此盲目地将寓言称为孩子的道德体系，丝毫不考虑这些故事不仅仅娱乐了孩子，也会误导他们呢？孩子被错误的东西吸引，误解了真相。这种教法虽然有趣，但也阻止了他学到真正有益的东西。寓言也许可以用来教成人，但孩子需要的是赤裸裸的真相。

All children learn La Fontaine's fables, but not one of them understands them. It is just as well that they do not understand, for the morality of the fables is so mixed and so unsuitable for their age that it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incline them to vice than to virtue. “More paradoxes!” you exclaim. Paradoxes they may be; but let us see if there is not some truth in them.

所有的孩子都会学拉·封丹的寓言，但没有人真的理解了这些故事。然而他们不懂也有不懂的好处，因为这些寓言蕴含的道德观对于孩子的年龄而言是如此混杂和不相宜，以至于他们不但学不到美德，还可能染上恶习。“更多的悖论！”你说。这也许是悖论，但是让我们看看其中是不是真的没有某些真相。

I maintain that the child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fables he is taught, for however you try to explain them, the teaching you wish to extract from them demands ideas which he cannot grasp, while the poetical form which makes it easier to remember makes it harder to understand, so that clearness is sacrificed to facility. Without quoting the host of wholly unintelligible and useless fables which are taught to children because they happen to be in the same

book as the others, let us keep to those which the author seems to have written specially for children.

我认为孩子是无法理解你教给他的这些寓言的，因为无论你怎么解释，你希望从这些故事中提取出的道理要求孩子首先要了解那些他无法掌握的观念。同时，寓言那诗一般的形式使其更易于记忆却更难以理解，因而寓言为了趣味性而牺牲了其鲜明的寓意。我在这里不会引用大量孩子读不懂的、毫无用处的寓言，这些寓言被教给孩子只是因为它们恰巧和其他故事出现在同一本书里。这里我们只谈那些作者专门写给孩子的寓言故事。

In the whole of La Fontaine's works I only know five or six fables conspicuous for child-like simplicity; I will take the first of these as an example, for it is one whose moral is most suitable for all ages, one which children get hold of with the least difficulty, which they have most pleasure in learning, one which for this very reason the author has placed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book. If his object were really to delight and instruct children, this fable is his masterpiece. Let us go through it and examine it briefly.

在拉·封丹的所有作品中，我只知道五六个故事明显带有孩子般稚嫩的天真质朴，我用第一个来举例，因为这个寓言的道德观对所有年龄的人都适用，而且这个故事是孩子最容易掌握的，学起来也饶有乐趣，这也是作者将其作为此书第一个故事的原因。假如作者的目标是要用这篇寓言让孩子高兴，并且教给他们一点东西，那么这篇寓言绝对称得上他的杰作了。现在让我们读一读这个故事然后简单地分析一下。

THE FOX AND THE CROW

《狐狸与乌鸦》

A FABLE

寓言

“Maitre corbeau, sur un arbre perche” (Mr. Crow perched on a tree). —” Mr. !” what does that word really mean? What does it mean before a proper noun? What is its meaning here? What is a crow? What is “un arbre perche”? We do not say “on a tree perched,” but perched on a tree. So we must speak of poetical inversions, we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prose and verse.

“乌鸦先生在一棵树上栖息。”—“先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放在专有名词前代表什么？它在这里又代表什么？什么是乌鸦？什么叫“在一棵树上栖息”？我们不说“在一棵树上栖息”，我们说栖息在一棵树上。因此我们必须说一说诗歌的倒置手法，我们必须对诗歌和散文有所区分。

“Tenait dans son bec un fromage” (Held a cheese in his beak)—What sort of a cheese? Swiss, Brie, or Dutch? If the child has never seen crows, what is the good of talking about them? If he has seen crows will he believe that they can hold a cheese in their beak? Your illustrations should always be taken from nature.

“它嘴里叼着一块奶酪。”—什么类型的奶酪？是瑞士的，布里的，还是荷兰的奶酪？如果孩子从没见过乌鸦，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如果他见过乌鸦，他会相信乌鸦能叼着一块奶酪吗？所以你的描述应该依照自然应有的样子。

“Maitre renard, par l'odeur alleche” (Mr. Fox, attracted by the smell). —Another Master! But the title suits the fox,—who is master of all the tricks of his trade. You must explain what a fox is, and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real fox and the conventional fox of the fables.

“狐狸先生被香味所吸引。”—又一位先生！但是这个头衔对狐狸很合适，他的确是玩弄阴谋诡计的大师。你必须跟孩子解释什么是狐狸，还要对真正的狐狸和寓言故事里惯用的狐狸形象加以区分。

“Alleche.” The word is obsolete; you will have to explain it. You will say it is only used in verse. Perhaps the child will ask why people talk differently in verse. How will you answer that question?

“吸引”这个词不怎么常用，所以你必须对其加以解释。你会说这个词只用在诗歌里。也许孩子会问为什么人们在诗歌里说话的方式和平时不一样呢。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Alleche, par l'odeur d'un fromage.” The cheese was held in his beak by a crow perched on a tree; it must indeed have smelt strong if the fox, in his thicket or his earth, could smell it. This is the way

you train your pupil in that spirit of right judgment, which rejects all but reasonable arguments, and is a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ruth and falsehood in other tales.

“它被奶酪的气味所吸引。”奶酪被一只栖息在树上的乌鸦叼在嘴里，它肯定有非常浓烈的气味才会让身处茂密树丛或地底深处的狐狸闻到。这就是你训练学生形成正确判断力的方法：除了合理的解释，拒绝其他一切说法，能够区分其他故事里的真相和谎言。

“Lui tient a peu pres ce langage” (Spoke to him after this fashion). —” Ce langage.” So foxes talk, do they! They talk like crows! Mind what you are about, oh, wise tutor; weigh your answer before you give it,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you suspect.

“狐狸向乌鸦这样说到”—“这样说到”所以狐狸会说话，千真万确！他们跟乌鸦一样会说话！聪明的老师，请注意你的回答，再给出答案之前要仔细衡量，你的答案比你想象的要重要。

“Eh! Bonjour, Monsieur le Corbeau!” (“Good-day, Mr. Crow!“) —Mr. ! The child sees this title laughed to scorn before he knows it is a title of honour. Those who say “Monsieur du Corbeau” will find their work cut out for them to explain that “du.”

“嗨！你好呀，乌鸦先生”—“先生”！孩子对这个词表示轻蔑，觉得是当笑话来用，他现在还不知道这是个表示尊敬的称谓。那些说着“乌鸦先生”的人会发现他们需要花很大功夫才能把这个词解释清楚。

“Que vous etes joli! Que vous me semblez beau!” (“How handsome you are, how beautiful in my eyes!“)—Mere padding. The child, finding the same thing repeated twice over in different words, is learning to speak carelessly. If you say this redundance is a device of the author, a part of the fox's scheme to make his praise seem all the greater by his flow of words, that is a valid excuse for me, but not for my pupil.

“你是多么英俊！你在我眼中是多么美丽！”—纯粹的废话。孩子发现相同的意思用不同的词重复了两遍，正在无意中学着这样说话。如果你跟他说这种冗余是作者特意使用的表现手法，是狐狸的计划的一部分，好让它一连串的赞美看上去更真实，这对于我是个站得住脚的理由，然而孩子理解不了。

“Sans mentir, si votre ramage” (“Without lying, if your song”). —“Without lying.” So people do tell lies sometimes. What will the child think of you if you tell him the fox only says “Sans mentir” because he is lying?

“不是我说谎，如果你的歌声”—“不是我说谎”所以人有时确实是会撒谎的。如果你告诉学生，狐狸之所以说“不要撒谎”恰恰因为它就是在撒谎，学生会作何感想？

“Se rapporte a votre plumage” (“Answered to your fine feathers”). —“Answered!” What does that mean? Try to make the child compare qualities so different as those of song and plumage; you will see how much he understands.

“和你的羽毛相称”—“相称！”那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试着让学生比较一下歌声和羽毛这两种材质完全不同的东西，你就会看到他理解了多少了。

“Vous seriez le phenix des hotes de ces bois!” (“You would be the phoenix of all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wood!“)—The phoenix! What is a phoenix? All of a sudden we are floundering in the lies of antiquity—we are on the edge of mythology.

“你会成为这林中百鸟的凤凰！”—凤凰！凤凰是什么？突然之间，我们又陷入了古老事物的谎言之中——我们已经好像在说神话故事了。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wood.” What figurative language! The flatterer adopts the grand style to add dignity to his speech, to make it more attractive. Will the child understand this cunning? Does he know, how could he possibly know, what is meant by grand style and simple style?

“林中百鸟”多么形象的语言！这个马屁精用雅致的风格把他的话讲得很高尚，好让这些话更吸引人。孩子能理解这种诡计吗？他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雅致的风格，什么是粗俗的风格呢？

“A ces mots le corbeau ne se sent pas de joie” (At these words, the crow is beside himself with delight). —To realise the full force of this proverbial expression we must have experienced very strong

feeling.

“听了这些话，乌鸦有点飘飘然了。”——我们必须体验过这种强烈的感觉，才能理解这个说法的力道。

“Et, pour montrer sa belle voix” (And, to show his fine voice). —Remember that the child, to understand this line and the whole fable, must know what is meant by the crow's fine voice.

“接着，为了展示它的美妙歌喉”——记住，要让孩子理解这句话和这整则寓言，就必须让他知道所谓的乌鸦的美妙歌喉是什么意思。

“Il ouvre un large bec, laisse tomber sa proie” (He opens his wide beak and drops his prey). —This is a splendid line; its very sound suggests a picture. I see the great big ugly gaping beak, I hear the cheese crashing through the branches; but this kind of beauty is thrown away upon children.

“它一张开嘴，奶酪就掉了下来。”—这句话写得非常好，听上去就有十分强烈的画面感。我仿佛看到了那张丑陋的大嘴，听到了奶酪穿过树枝掉落到地上的声音。但是这些优美，孩子是感受不到的。

“Le renard s'en saisit, et dit, 'Mon bon monsieur'” (The fox catches it, and says, “My dear sir”). —So kindness is already folly. You certainly waste no time in teaching your children.

“狐狸抓住了奶酪，说道，‘我亲爱的先生’”—所以，仁慈已经变成了愚蠢。当然，你马上会开始教育孩子的。

“Apprenez que tout flatteur” (“You must learn that every flatterer”). —A general maxim. The child can make neither head nor tail of it.

“你必须知道，每一个马屁精”—笼统的准则。孩子会对此感到莫名其妙。

“Vit au depens de celui qui l'ecoute” (“Liv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person who listens to his flattery”). —No child of ten ever understood that.

“都靠着他所阿谀奉承的人过活。”—没有哪个十岁的孩子能听得懂这句话。

“Ce lecon vaut bien un fromage, sans doute” (“No doubt this lesson is well worth a cheese”). —This is intelligible and its meaning is very good. Yet there are few children who could compare a cheese and a lesson, few who would not prefer the cheese. You will therefore have to make them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said in mockery. What subtlety for a child!

“毫无疑问，这个教训值一块奶酪。”—这句话通俗易懂，其中的寓意也很好。然而，没有孩子能够把奶酪和教训放在一起比较，更没

有孩子爱教训胜过爱奶酪的。因此，你要让孩子明白，这是一种嘲讽的说法。但孩子们哪里懂得这种精妙！

“Le corbeau, honteux et confus” (The crow, ashamed and confused). —A nothing pleonasm, and there is no excuse for it this time.

“乌鸦觉得既羞愧又困惑”——又一次重复，这次没有借口好找了。

“Jura, mais un peu tard, qu'on ne l'y prendrait plus” (Swore, but rather too late, that he would not be caught in that way again). —” Swore.” What master will be such a fool as to try to explain to a child the meaning of an oath?

“我发誓，虽然现在已经晚了，但我再也不会上同样的当了。”—“发誓。”如果有老师想向孩子解释什么是誓言，什么老师会这么愚蠢啊？

What a host of details! but much more would be needed for the analysis of all the ideas in this fable and their reduction to the simple and elementary ideas of which each is composed. But who thinks this analysis necessary to make himself intelligible to children? Who of us is philosopher enough to be able to put himself in the child's place? Let us now proceed to the moral.

好多细节啊！但是如果要分析这则寓言包含的所有观念，并对组成这些观念的简单基础思想进行简化归纳的话，还需要更多细节。但是，谁又会觉得需要继续分析来让孩子理解自己呢？我们之中哪里有这样的哲学家，可以把自己放在孩子的位置上思考呢？让我们接着谈这则寓言的道德观。

Should we teach a six-year-old child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flatter and lie for the sake of gain? One might perhaps teach them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make fools of little boys and laugh at their foolish vanity behind their backs. But the whole thing is spoilt by the cheese. You are teaching them how to make another drop his cheese rather than how to keep their own. This is my second paradox, and it is not less weighty than the former one.

难道我们要教一个六岁的孩子，世界上有一些人为了获利而整天溜须拍马，满嘴跑火车吗？我们也许只能教他们，的确有一些人会戏弄小孩，在背后嘲笑小孩的傻里傻气。但是，一块奶酪就会毁了一切。你这是在教他们如何让别人丢掉奶酪，而不是如何守住自己的那块。这是我的第二个悖论，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前一个。

Watch children learning their fables and you will see that when they have a chance of applying them they almost always use them exactly contrary to the author's meaning; instead of being on their guard against the fault which you would prevent or cure, they are disposed to like the vice by which one takes advantage of another's defects. In the above fable children laugh at the crow, but they all love the fox. In the next fable you expect them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the grasshopper. Not so, they will choose the ant. They do not care to abase themselves, they will always choose the

principal part—this is the choice of self-love, a very natural choice. But what a dreadful lesson for children! There could be no monster more detestable than a harsh and avaricious child, who realised what he was asked to give and what he refused. The ant does more; she teaches him not merely to refuse but to revile.

观察一下那些学习寓言的孩子，你会发现，当他们有机会应用从寓言中学到的道理时，他们的用法几乎总是与作者的原意背道而驰。他们非但不会警惕那些你希望防范或纠正的错误，反而会喜欢上为非作歹，从别人的缺陷中占便宜。对于上面这则寓言，孩子们都会嘲笑乌鸦，清一色地喜欢那只狐狸。在下一篇寓言中，你希望他们以蚱蜢为榜样。并不会，他们都会选择那只蚂蚁。他们不想贬低自己，总是想做主角，这是出于自爱的选择，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对于孩子，这是多么糟糕的一课啊！没有什么怪兽比一个顽劣、贪婪的孩子更可憎，他既知道自己会被要求赠与什么，也知道什么东西应该拒绝赠与别人。蚂蚁更过分，她不仅教孩子拒绝，还教他们在拒绝的时候要把对方痛斥一顿。

In all the fables where the lion plays a part, usually the chief part, the child pretends to be the lion, and when he has to preside over some distribution of good things, he takes care to keep everything for himself; but when the lion is overthrown by the gnat, the child is the gnat. He learns how to sting to death those whom he dare not attack openly.

所有有狮子出现的寓言中，狮子一般都是主角，孩子都会假装自己就是狮子，当他需要负责分配某些好东西时，他会花心思把所有东西占为己有，然而一旦狮子被小虫打到时，他又觉得自己是那只虫子。他学会了如何叮死那些他不敢明目张胆攻击的对象。

From the fable of the sleek dog and the starving wolf he learns a lesson of licence rather than the lesson of moderation which you profess to teach him. I shall never forget seeing a little girl weeping bitterly over this tale, which had been told her as a lesson in obedience. The poor child hated to be chained up; she felt the chain chafing her neck; she was crying because she was not a wolf.

从瘦狼和肥狗这则寓言中，他学会了放纵而不是你声称要教给他的克制。我永远忘不了，一个小姑娘学了这个故事之后伤心地哭了，因为大人用这个故事教她学会顺从。这个可怜的孩子讨厌被拴住，她觉得链子把她的脖子都磨破了，她哭泣，因为她不想做那只狼。

So from the first of these fables the child learns the basest flattery; from the second, cruelty; from the third, injustice; from the fourth, satire; from the fifth, insubordination. The last of these lessons is no more suitable for your pupils than for mine, though he has no use for it. What results do you expect to get from your teaching when it contradicts itself! But perhaps the same system of morals which furnishes me with objections against the fables supplies you with as many reasons for keeping to them. Society requires a rule of morality in our words; it also requires a rule of morality in our deeds; and these two rules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former is contained in the Catechism and it is left there; the other is contained in La Fontaine's fables for children and his tales for mothers. The same author does for both.

所以，孩子从第一则寓言里学到了阿谀奉承；从第二则寓言里学到了残忍无情；第三则寓言是不公正；第四则是嘲笑讥讽；第五则是

不服管教。最后一则，对于你我的学生来说都不适宜，尽管他学会了也没有什么用。当这些寓言自相矛盾的时候，你又能对你的教学成果有何期待呢？但是，相同的道德体系也许对于我来说是反对这些寓言的理由，而在你看来确是将其留存下来的原因。社会需要口头上的道德教训，也需要行动上的道德教训，而这两者存在天壤之别。前者见诸于教义问答手册，不会变化；后者存在于拉·封丹写给孩子和母亲们的寓言故事中。同一位作者把这两者都教了。

Let us make a bargain, M. de la Fontaine. For my own part, I undertake to make your books my favourite study; I undertake to love you, and to learn from your fables, for I hope I shall not mistake their meaning. As to my pupil, permit me to prevent him studying any one of them till you have convinced me that it is good for him to learn things three-fourths of which are unintelligible to him, and until you can convince me that in those fables he can understand he will never reverse the order and imitate the villain instead of taking warning from his dupe.

让我们做个交易，拉·封丹先生。就我来说，我保证喜欢你的书，喜欢你，从你的寓言中学习，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至于会弄错它们的寓意。至于我的学生，请允许我不让他们学习这些寓言故事的任何一个，直到你让我相信学这些他只能听懂四分之一的东西对他会有所助益，或者直到你让我相信当他学到能理解的寓言时不会误解其寓意，不会模仿里面的坏蛋，而会从那些上当受骗的角色身上得到警告。

When I thus get rid of children's lessons, I get rid of the chief cause of their sorrows, namely their books. Reading is the curse of childhood, yet it is almost the only occupation you can find for children. Emile, at twelve years old, will hardly know what a book

is. “But,” you say, “he must, at least, know how to read.”

因此，当我让孩子摆脱了功课时，我就让他们摆脱了痛苦的主要原因—，即他们的书本。读书是孩子童年的诅咒，然而这几乎是你让孩子干的唯一一件事。爱弥儿十二岁的时候还几乎不知道书本是什么东西呢。“但是，”你会说，“他至少应该认字吧。”

When reading is of use to him, I admit he must learn to read, but till then he will only find it a nuisance.

当读书对他有用的时候，我承认他必须开始读书，但在那之前他只会觉得读书是件讨厌的事。

If children are not to be required to do anything as a matter of obedience, it follows that they will only learn what they perceive to be of real and present value, either for use or enjoyment; what other motive could they have for learning? The art of speaking to our absent friends, of hearing their words; the art of letting them know at first hand our feelings, our desires, and our longings, is an art whose usefulness can be made plain at any age. How is it that this art, so useful and pleasant in itself, has become a terror to children? Because the child is compelled to acquire it against his will, and to use it for purposes beyond his comprehension. A child has no great wish to perfect himself in the use of an instrument of torture, but make it a means to his pleasure, and soon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keep him from it.

假如孩子不被要求做什么事以示顺从，他们就只会学习自己感知到的、对目前的他们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些知识既有实际用处又能让他们快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动机让他们学习呢？对不在眼前的朋友讲话的艺术，听他们讲话的艺术，以及不通过中间媒介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感受、欲望、期待的艺术，其用处对任何年龄段的人都显而易见。然而，这种自身如此有用且让人愉悦的艺术是怎么变成孩子的噩梦的呢？因为孩子是被迫学的，这违背了他的意志，而且有目的地使用它也超出了孩子的理解范围。一个孩子不可能用你拿来折磨他的工具去完善自己，但是如果你能用这个工具让他快乐，很快你就会发现即使你不让他使用这一招也不可能了。

People make a great fuss about discovering the beat way to teach children to read. They invent “bureaux” [3_17] and cards, they turn the nursery into a printer's shop. Locke would have them taught to read by means of dice. What a fine idea! And the pity of it! There is a better way than any of those, and one which is generally overlooked—it consists in the desire to learn. Arouse this desire in your scholar and have done with your “bureaux” and your dice—any method will serve.

人们总是煞费苦心地去寻找教孩子认字的办法。他们发明了“单字拼读片”[4_17] 和识字卡，他们把保姆的房间变成了印刷厂。洛克觉得应该用掷骰子的方法教孩子认字。这主意多好啊！同时又多么遗憾啊！还有比这些都要好的方法，也是通常被人们忽视的方法，那就是激发孩子学习的欲望。丢掉你的卡片和骰子，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然后你会发现什么方式都能把他们教得很好。

Present interest, that is the motive power, the only motive power that takes us far and safely. Sometimes Emile receives notes

of invitation from his father or mother, his relations or friends; he is invited to a dinner, a walk, a boating expedition, to see some public entertainment. These notes are short, clear, plain, and well written. Some one must read them to him, and he cannot always find anybody when wanted; no more consideration is shown to him than he himself showed to you yesterday. Time passes, the chance is lost. The note is read to him at last, but it is too late. Oh! if only he had known how to read! He receives other notes, so short, so interesting, he would like to try to read them. Sometimes he gets help, sometimes none. He does his best, and at last he makes out half the note; it is something about going to-morrow to drink cream—Where? With whom? He cannot tell—how hard he tries to make out the rest! I do not think Emile will need a “bureau.” Shall I proceed to the teaching of writing? No, I am ashamed to toy with these trifles in a treatise on education.

眼前利益，这是一种动力，是让人走得又快又稳的唯一动力。有时候，爱弥儿会收到来自父亲或者母亲、亲戚或者朋友的邀请信，他们邀请他去吃饭、散步、划船或者参加一些娱乐活动。这些信都很简短、直白，字也写得很好。必须有人读信给他听，但他不可能随时找到为他读信的人。在这件事情上他获得的关心并不比他昨天对你表示的关心来得多。时间过去了，活动也结束了。最后有人把邀请信读给他听了，可是已经晚了。唉！如果他自己识字该多好啊！他又收到其他的信，如此短小而有趣，他想尝试着去读一读。有时候他获得了别人的帮助，有时候则没有。他十分尽力，最终他看懂了一半，这信写的是请他明天去吃奶油，不过在哪儿呢？和谁一起去？他看不懂了，为了把剩下的内容弄明白他费了多大劲啊！我认为爱弥儿不需要那些“单字拼读片”。我该继续教他写字吗？不，如果在一部关于教育的专著中摆弄这些琐事，我会感到羞愧的。

I will just add a few words which contain a principle of great importance. It is this—What we are in no hurry to get is usually obtained with speed and certainty. I am pretty sure Emile will learn to read and write before he is ten, just because I care very little whether he can do so before he is fifteen; but I would rather he never learnt to read at all, than that this art should be acquired at the price of all that makes reading useful. What is the use of reading to him if he always hates it? “Id imprimis cavere oportebit, ne studia, qui amare nondum potest, oderit, et amaritudinem semel perceptam etiam ultra rudes annos reformidet.” —Quintil.

我只想再补充几句话，其中包含着一项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对于不急着获得的东西，我们反而能更快更确定地获得。我很确信爱弥儿在十岁之前会学会认字和写字，恰恰是因为我在他十五岁之前对这件事一点也不关心。但我宁愿他永远也不要学习认字，也不要为了获得这项本领而牺牲了所有让阅读有益处的东西。如果他讨厌读书，那读书对他而言还有什么用呢？“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不要使还不喜欢读书学习的学生对读书产生厌恶的心情，不要使他尝到读书的苦味，以免他过了青年时期还觉得读书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昆体良

The more I urge my method of letting well alone, the more objections I perceive against it. If your pupil learns nothing from you, he will learn from others. If you do not instil truth he will learn falsehoods; the prejudices you fear to teach him he will acquire from those about him, they will find their way through every one of his senses; they will either corrupt his reason before it is fully developed or his mind will become torpid through inaction, and will become engrossed in material things. If we do not form the habit of thinking as children, we shall lose the power of thinking for

the rest of our life.

我越主张这种放任自由的方法，我察觉到的反对声音就越多。如果你的学生从你身上学不到任何东西，他就会从别人身上去学。如果你不向他灌输真相，他就会学习谎言。你害怕教给他的偏见他会从周围其他人身上学到，这些偏见会通过他的所有感官进入其身体，摧毁他尚未发育成熟的理性，或者让他的心智由于长期停用而陷入麻木，他会变得沉溺于物质享受。如果我们不使孩子养成思考的习惯，他们余下的一生都会丧失思考的能力。

I fancy I could easily answer that objection, but why should I answer every objection? If my method itself answers your objections, it is good; if not, it is good for nothing. I continue my explanation.

我认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驳斥那些反对之声，但我为什么老要去回应它们呢？如果我的方式能自己回答你，那证明这是个好方法。如果不能，就说明它没有用处。让我继续解释下去。

I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lan I have sketched, you follow rules which are just the opposite of the established practice, if instead of taking your scholar far afield, instead of wandering with him in distant places, in far-off lands, in remote centuries, in the ends of the earth, and in the very heavens themselves, you try to keep him to himself, to his own concerns, you will then find him able to perceive, to remember, and even to reason; this is nature's order. As the sentient being becomes active his discernment develops along with his strength. Not till his strength is in excess of

what is needed for self-preservation, is the speculative faculty developed, the faculty adapted for using this superfluous strength for other purposes. Would you cultivate your pupil's intelligence, cultivate the strength it is meant to control. Give his body constant exercise, make it strong and healthy, in order to make him good and wise; let him work, let him do things, let him run and shout, let him be always on the go; make a man of him in strength, and he will soon be a man in reason.

如果你根据我已经草拟的计划，跟着那些与既定实践相反的准则，如果你能让学生不去向往遥远的未来，不和他一起神游到遥远的地方、风土、世纪、天堂或者世界尽头，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他自己身上，放在与他有关的事情上，你会发现他能够去观察，去记忆，甚至去思考了，这就是自然的顺序。有感知能力的生物一旦变得活跃，其洞察力会随着体力一起增长。只有当他的体力在用于自我生存之外还有剩余的时候，他的思考官能才会发展，才会将他多出来的体力用于其他的目的。因此，如果你想培养学生的智慧，先要培养他受智慧支配的体力。为了让学生变得聪慧、理智，需要让他保持锻炼，使其身体强壮、健康；让他劳动、做事、奔跑、呐喊、不停地活动；让他长成一个有力量的人，那么很快他会变成一个理性的人。

Of course by this method you will make him stupid if you are always giving him directions, always saying come here, go there, stop, do this, don't do that. If your head always guides his hands, his own mind will become useless. But remember the conditions we laid down; if you are a mere pedant it is not worth your while to read my book.

当然，使用这一方法的时候，如果你总是给他指明方向，告诉那

来这里、去那里、停下、做这个、别做那个，你会把他弄得很愚蠢的。如果总是由你的头脑来控制他的手，他自己的心灵就毫无用处了。但是也要记住我们规定的情况。如果你是个纯粹的书呆子，这本书不值得你花时间看。

It is a lamentable mistake to imagine that bodily activity hinders the working of the mind, as if these two kinds of activity ought not to advance hand in hand, and as if the one were not intended to act as guide to the other.

认为身体的活动会阻碍心灵的运用，好像这两种活动不应该同时推进，好像一种活动不能指导另一种，这真是个可悲的错误。

There are two classes of men who are constantly engaged in bodily activity, peasants and savages, and certainly neither of these pays the least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Peasants are rough, coarse, and clumsy; savages are noted, not only for their keen senses, but for great subtility of mind. Speaking generally, there is nothing duller than a peasant or sharper than a savage. What is the cause of this difference? The peasant has always done as he was told, what his father did before him, what he himself has always done; he is the creature of habit, he spends his life almost like an automaton on the same tasks; habit and obedience have taken the place of reason.

有两种人的身体是一天到晚在活动的：农民和野蛮人，这两种人都不会花一点心思在培养心灵上。农民是健壮、粗鄙、笨拙的，而野蛮人那敏捷的感知和狡黠的心智都引人注意。一般来说，没有什么人

比农民更迟钝、比野蛮人更狡猾。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农民总是听别人的话去做事，他父亲以前是怎么做的，他自己日常是怎么做的。他是靠习惯生活的动物。他的一生就像始终重复同一件事的机器人，习惯和顺从取代了理性的位置。

The case of the savage is very different; he is tied to no one place, he has no prescribed task, no superior to obey, he knows no law but his own will; he is therefore forced to reason at every step he takes. He can neither move nor walk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consequences. Thus the more his body is exercised, the more alert is his mind; his strength and his reason increase together, and each helps to develop the other.

野蛮人则全然不同。他居无定所，没有规定任务，没有上级需要服从，他只知自己的意志而不知任何规律。因此，他不得不去思考自己走的每一步。如果不事先思考一下后果，他一动都不能动，一步都不能走。因此，他的身体活动得越多，他的心智就越机警。他的体力和理性一齐增长，彼此还互相增益。

Oh, learned tutor, let us see which of our two scholars is most like the savage and which is most like the peasant. Your scholar is subject to a power which is continually giving him instruction; he acts only at the word of command; he dare not eat when he is hungry, nor laugh when he is merry, nor weep when he is sad, nor offer one hand rather than the other, nor stir a foot unless he is told to do it; before long he will not venture to breathe without orders. What would you have him think about, when you do all the thinking for him? He rests securely on your foresight, why should he think for himself? He knows you have undertaken to take care of

him, to secure his welfare, and he feels himself freed from this responsibility. His judgment relies on yours; what you have not forbidden that he does, knowing that he runs no risk. Why should he learn the signs of rain? He knows you watch the clouds for him. Why should he time his walk? He knows there is no fear of your letting him miss his dinner hour. He eats till you tell him to stop, he stops when you tell him to do so; he does not attend to the teaching of his own stomach, but yours. In vain do you make his body soft by inaction; his understanding does not become subtle. Far from it, you complete your task of discrediting reason in his eyes, by making him use such reasoning power as he has on the things which seem of least importance to him. As he never finds his reason any use to him, he decides at last that it is useless. If he reasons badly he will be found fault with; nothing worse will happen to him; and he has been found fault with so often that he pays no attention to it, such a common danger no longer alarms him.

啊，博学的老师，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学生谁会像农民，谁会像野蛮人。你的学生臣服于事事给他下达指令的权威，他只会依据要求做事。饿的时候不敢吃，开心的时候不敢笑，难过的时候不敢哭，伸了一只手不敢换另一只手。你让他迈开腿他才敢迈开腿。用不了多久，他连呼吸都不敢了。当你替他思考所有的事，你还指望他自己能思考什么呢？他可以依靠你的深谋远虑，为什么还要自己动脑筋呢？他知道你已经承担起照顾他的任务，保障他的利益，他便觉得不需要自己担负这一责任了。他的判断依赖于你。你不禁止他做的事，他就觉得没有危险。他何必知道下雨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呢？他知道你替他看着天上的云呢。他何必计算自己散步的时间呢？他知道你不会让他错过晚饭时间的。如果你不制止他会一直吃。只有你说该停下来了他才停，似乎他不是在听从自己的胃，而是听你的。你使得他的身体陷入迟滞，然而这只是徒劳，他的理解力并没有变得敏感。更糟的是，你成功地让他不再相信理性，因为你只让他在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使

用他自己的理性。他从没觉得理性对自己有何用，最终他的结论是理性就是没有用的。如果他用了理性但是出了错，还会有人对他挑剔抱怨，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而他被抱怨的次数太多，以至于他对此毫不在乎，这件事他已经司空见惯，因此也不再警惕了。

Yet you will find he has a mind. He is quick enough to chatter with the women in the way I spoke of further back; but if he is in danger, if he must come to a decision i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you will find him a hundredfold more stupid and silly than the son of the roughest labourer.

然而你会发现你的学生是有思想的。他会用我前面提过的方式和女性闲聊。但是，如果他遇到危险，如果他必须在十分困难的境地中做决定，你就会发现他比最粗鄙的劳工的儿子还要蠢上一百倍。

As for my pupil, or rather Nature's pupil, he has been trained from the outset to be as self-reliant as possible, he has not formed the habit of constantly seeking help from others, still less of displaying his stores of learning. On the other hand, he exercises discrimination and forethought, he reasons about everything that concerns himself. He does not chatter, he acts. Not a word does he know of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world at large, but he knows very thoroughly what affects himself. As he is always stirring he is compelled to notice many things, to recognise many effects; he soon acquires a good deal of experience. Nature, not man, is his schoolmaster, and he learns all the quicker because he is not aware that he has any lesson to learn. So mind and body work together. He is always carrying out his own ideas, not those of other people, and thus he unites thought and action; as he grows in health and

strength he grows in wisdom and discernment. This is the way to attain later on to wha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incompatible, though most great men have achieved it, strength of body and strength of mind, the reason of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vigour of the athlete.

至于我的学生，或者说是自然的学生，他从小就被训练要尽可能靠自己。他没有养成经常去寻求他人帮助的习惯，更不会去炫耀自己的学识。另一方面，他锻炼自己的辨识力和远见，他会思考与自己有关的所有事情。他不纸上谈兵，他付诸行动。他对世上的事一无所知，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什么对他会产生影响。因为他总是在行动，所以他不得不观察许多事情，去考虑它们的影响，很快他就积累了许多经验。他的老师是自然而不是成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上课，反而学得更快。这样，他的心智和身体一齐得到了锻炼。他总是在实践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想法，由此他能把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在变得越来越健康和强壮的同时，他的智慧和洞察力也在增长。这个方法可以使学生在日后获得一般被认为无法相容的东西，尽管有许多伟人已经做到了，那就是体力和智力，是哲学家般的理性和运动员般的体魄。

Young teacher, I am setting before you a difficult task, the art of controlling without precepts, and doing everything without doing anything at all. This art is, I confess, beyond your years, it is not calculated to display your talents nor to make your value known to your scholar's parents; but it is the only road to success. You will never succeed in making wise men if you do not first make little imps of mischief. This was the education of the Spartans; they were not taught to stick to their books, they were set to steal their dinners. Were they any the worse for it in after life? Ever ready for victory, they crushed their foes in every kind of warfare, and the prating Athenians were as much afraid of their words as of their

blows.

年轻的老师，我给你设定了一个艰难的任务，不要用戒律控制你的学生，放任无为才能一切有为。我承认这种教学艺术超出了你的年龄，它既无法展示你的才能，也无法让你学生的父母看到你的价值，但这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道路。如果你不先培养爱恶作剧的小鬼，你就不可能成功造就聪慧的人。这是斯巴达式的教育。他们不教孩子去死磕书本，而是教他们去找来食物。难道这样的孩子在日后就比其他人差吗？每一个孩子都准备好迎接胜利。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战争，他们都能挫败敌人，而那些喋喋不休的雅典人既害怕和他们说话也害怕和他们打架。

When education is most carefully attended to, the teacher issues his orders and thinks himself master, but it is the child who is really master. He uses the tasks you set him to obtain what he wants from you, and he can always make you pay for an hour's industry by a week's complaisance. You must always be making bargains with him. These bargains, suggested in your fashion, but carried out in his, always follow the direction of his own fancies, especially when you are foolish enough to make the condition some advantage he is almost sure to obtain, whether he fulfils his part of the bargain or not. The child is usually much quicker to read the master's thoughts than the master to read the child's feelings. And that is as it should be, for all the sagacity which the child would have devoted to self-preservation, had he been left to himself, is now devoted to the rescue of his native freedom from the chains of his tyrant; while the latter, who has no such pressing need to understand the child, sometimes finds that it pays him better to leave him in idleness or vanity.

当教育变得规规矩矩，老师就会发号施令，把自己看成主人。但其实孩子才是真正的主人。他通过利用你强迫他干的事获得他希望从你那里得到的东西，他认真地学一个小时，你就得讨好他一个星期。你不得不总跟他讨价还价。这些讨价还价用你的方式提出，但却用他的方式实施，总是往他中意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当你傻乎乎地答应那些无论他是不是尽了义务都几乎确定能得到的好处时尤其如此。孩子了解起老师的想法总是比老师了解孩子的要快得多。这也很正常，因为孩子为了自我生存而投入的精明现在都被他用来摆脱你专制的枷锁，拯救自己的天赋自由。然而反过来，老师没有压力非得去理解孩子，有时候甚至还觉得让孩子偷个懒或者放任他们的虚荣对自己更好。

Take the opposite course with your pupil; let him always think he is master while you are really master. There is no subjection so complete as that which preserves the forms of freedom; it is thus that the will itself is taken captive. Is not this poor child, without knowledge, strength, or wisdom, entirely at your mercy? Are you not master of his whole environment so far as it affects him? Cannot you make of him what you please? His work and play, his pleasure and pain, are they not, unknown to him, under your control? No doubt he ought only to do what he wants, but he ought to want to do nothing but what you want him to do. He should never take a step you have not foreseen, nor utter a word you could not foretell.

要采取同上述办法相反的方式教你的学生，让他觉得自己是主人，然而，事实上你才是真正的主人。没有哪种臣服比这更彻底了。因为这种臣服在形式上是自由的。此时，意志才得到臣服。这个可怜的孩子，没有知识、体力、智慧，难道他还不是任你摆布吗？你不是可以随意控制周围会对他产生影响的一切吗？要把他变成什么样，难道不是随你高兴吗？他的工作和玩耍，他的快乐和痛苦，难道不是在

他不知不觉中都受你控制了吗？当然，他只应该做他想做的事，但此时他应该做的不就是你想让他做的吗？他从来不会做你无法预料的事，也不会说你无法预言的话。

Then he can devote himself to the bodily exercises adapted to his age without brutalising his mind; instead of developing his cunning to evade an unwelcome control, you will then find him entirely occupied in getting the best he can out of his environment with a view to his present welfare, and you will be surprised by the subtlety of the means he devises to get for himself such things as he can obtain, and to really enjoy things without the aid of other people's ideas. You leave him master of his own wishes, but you do not multiply his caprices. When he only does what he wants, he will soon only do what he ought, and although his body is constantly in motion, so far as his sensible and present interests are concerned, you will find him developing all the reason of which he is capable, far better and in a manner much better fitted for him than in purely theoretical studies.

然后他能投身于适合他年龄的身体锻炼，同时不会让他的心变得麻木不仁。他非但不会想方设法躲避你那令人讨厌的控制，反而会尽全力利用他所处的环境去取得眼前利益。如此一来，你会惊讶地发现，为了给自己争取能够获得东西，为了不在他人观念的帮助下享用这些东西，他会采取多么巧妙的办法。你让他支配自己的意志，但不会让他养成乖戾的性格。只有当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时，他才会很快去做应该做的事。尽管他的身体还在不断运动，只要涉及到他能感知到的眼前利益，你会发现他正在尽可能地发展理性，这种运用比纯粹的理论学习要好得多，也更适合他。

Thus when he does not find you continually thwarting him, when he no longer distrusts you, no longer has anything to conceal from you, he will neither tell you lies nor deceive you; he will show himself fearlessly as he really is, and you can study him at your ease, and surround him with all the lessons you would have him learn, without awaking his suspicions.

因此，当他发现你没有屡屡阻挠他，当他变得信任你，不再向你隐瞒什么，他就不会对你撒谎，也不会欺骗你。他会无所顾忌地向你展示真正的自己，如此一来你就可以从容地观察他，用你想让他学的东西包围他，而不会引起他的怀疑。

Neither will he keep a curious and jealous eye on your own conduct, nor take a secret delight in catching you at fault. It is a great thing to avoid this. One of the child's first objects is, as I have said, to find the weak spots in its rulers. Though this leads to spitefulness, it does not arise from it, but from the desire to evade a disagreeable control. Overburdened by the yoke laid upon him, he tries to shake it off, and the faults he finds in his master give him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is. Still the habit of spying out faults and delighting in them grows upon people. Clearly we have stopped another of the springs of vice in Emile's heart. Having nothing to gain from my faults, he will not be on the watch for them, nor will he be tempted to look out for the faults of others.

他既不会对充满好奇和嫉妒地观察你，也不会暗中取笑你犯的错。预防这一点是一件好事。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寻找管束他们的人的弱点是孩子们的首要目标。尽管这会导致恶意的产生，但这不是由于孩子的天性导致的，而是孩子们想躲避令人不快的控制所导致的。

孩子被束缚压得喘不过气，他想试着摆脱，而从老师身上发现的错给了他做到这一点的绝好机会。他们会逐渐养成这样的习惯：暗中观察别人的错误，以此为乐。显然，我们又阻止了另一种恶习从爱弥儿心中萌芽。他从我的错误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他就不会观察我的错，也不会想要去找别人的错。

All these methods seem difficult because they are new to us, but they ought not to be really difficult. I have a right to assume that you have the knowledge required for the business you have chosen; that you know the usual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thought, that you can study mankind and man, that you know beforehand the effect on your pupil's will of the various objects suited to his age which you put before him. You have the tools and the art to use them; are you not master of your trade?

所有这些方法看上去很难做到，因为它们对于我们是全新的，但其实不应该真的如此困难。我有权假设你对于自己选择的职业具备必要的知识，假设你知道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假设你能够研究人类和特定的某一个人，假设你事先知道把各种适合学生年龄的事物展现在他眼前会产生什么影响。你有了运用这些方法的工具和艺术，难道还不能精通你的业务吗？

You speak of childish caprice; you are mistaken. Children's caprices are never the work of nature, but of bad discipline; they have either obeyed or given orders, and I have said again and again, they must do neither. Your pupil will have the caprices you have taught him; it is fair you should bear the punishment of your own faults. “But how can I cure them?” do you say? That may still be done by better conduct on your own part and great patience. I

once undertook the charge of a child for a few weeks; he was accustomed not only to have his own way, but to make every one else do as he pleased; he was therefore capricious. The very first day he wanted to get up at midnight, to try how far he could go with me. When I was sound asleep he jumped out of bed, got his dressing-gown, and waked me up. I got up and lighted the candle, which was all he wanted. After a quarter of an hour he became sleepy and went back to bed quite satisfied with his experiment. Two days later he repeated it, with the same success and with no sign of impatience on my part. When he kissed me as he lay down, I said to him very quietly, “My little dear, this is all very well, but do not try it again.” His curiosity was aroused by this, and the very next day he did not fail to get up at the same time and woke me to see whether I should dare to disobey him. I asked what he wanted, and he told me he could not sleep. “So much the worse for you,” I replied, and I lay quiet. He seemed perplexed by this way of speaking. He felt his way to the flint and steel and tried to strike a light. I could not help laughing when I heard him strike his fingers. Convinced at last that he could not manage it, he brought the steel to my bed; I told him I did not want it, and I turned my back to him. Then he began to rush wildly about the room, shouting, singing, making a great noise, knocking against chairs and tables, but taking, however, good care not to hurt himself seriously, but screaming loudly in the hope of alarming me. All this had no effect, but I perceived that though he was prepared for scolding or anger, he was quite unprepared for indifference.

你谈到那幼稚的任性，你错了。孩子的任性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不良教育造成的。他们不是要服从别人，就是对别人下命令，我已经再三说过，这两者都不应该发生。学生的任性是你教他们的，你要承担自己犯下的错所带来的惩罚，这也是很公平的。“但是我要怎么

纠正他们呢？”你会这样问吗？办法也许就是好好完成你自己那部分教导任务，对他要有耐心。我曾经负责教一个孩子几个礼拜。这个孩子不仅习惯于自行其是，还要让其他人做的事都要合他的意，他就是那种任性的孩子。第一天，为了测试我会有多顺着他，他在半夜就起床了。当我熟睡时，他爬下床，穿上睡袍，叫醒了我。我爬起来，点上蜡烛，这就是他想要的。大约过了一刻钟，他又困了，对实验结果心满意足，他又爬上了床。两天之后，他故技重施，他又成功了，而我没有表示出任何不耐烦。当他亲吻我的面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平静地对他说道，“亲爱的，现在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不要再这样做了”。我的话激发了他的好奇心。第二天，他又在半夜起床叫醒了我，看看我敢不敢违抗他。我问他想要干嘛，他说他睡不着。“真糟糕，”我回答，然后平静地躺了下来。他看上去被我这种说话的方式弄糊涂了。他摸黑找到了火石和钢块，想试着点火。当我听到他打到自己手指的声音，忍不住笑了起来。当最终确定自己点不起火的时候，他拿着工具走到我床边。我告诉他我不想点火，然后转过去背对着他。然后他开始在房间里疯跑起来，一边尖叫、嘶吼，发出很大的噪音，敲打桌椅，同时也会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受到严重的伤害，他只是希望可以靠大喊警告我。这一切是徒劳无功的，我察觉到他原本是打算我会呵斥他或者冲他发一顿火，但是我的无动于衷出乎他的预料。

However, he was determined to overcome my patience with his own obstinacy, and he continued his racket so successfully that at last I lost my temper. I foresaw that I should spoil the whole business by an unseemly outburst of passion. I determined on another course. I got up quietly, went to the tinder box, but could not find it; I asked him for it, and he gave it me, delighted to have won the victory over me. I struck a light, lighted the candle, took my young gentleman by the hand and led him quietly into an adjoining dressing-room with the shutters firmly fastened, and nothing he could break.

但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顽固挑战我的耐心。他继续吵闹着，终于，他成功地让我发火了。我预感到这个时候不应该发脾气，这会搞砸一切。我采取了另一种方法。我平静地起了床，走到打火器边上，但是没找到。我向他要，他把工具给我了，很开心自己战胜了我。我打起火，点燃了蜡烛，拉起孩子的手，把他带到边上的一间更衣室，房里的窗户紧紧地关着，也没有什么可以打破的东西。

I left him there without a light; then locking him in I went back to my bed without a word. What a noise there was! That was what I expected, and took no notice. At last the noise ceased; I listened, heard him settling down, and I was quite easy about him. Next morning I entered the room at daybreak, and my little rebel was lying on a sofa enjoying a sound and much needed sleep after his exertions.

我把他留在了那儿，没有给他蜡烛，锁上门，没说一句话，回去睡觉了。那房间里传来了多么巨大的动静啊！这是我预料到的，所以我并不在意。最终，噪音停下来了。我竖起耳朵，听到他已经安静下来，我放心了。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去了更衣室，看到这个小小的反叛者闹得精疲力竭之外，躺在沙发上睡得可香呢。

The matter did not end there. His mother heard that the child had spent a great part of the night out of bed. That spoilt the whole thing; her child was as good as dead. Finding a good chance for revenge, he pretended to be ill, not seeing that he would gain nothing by it. They sent for the doctor. Unluckily for the mother, the doctor was a practical joker, and to amuse himself with her terrors he did his best to increase them. However, he whispered to

me, “Leave it to me, I promise to cure the child of wanting to be ill for some time to come.” As a matter of fact he prescribed bed and dieting, and the child was handed over to the apothecary. I sighed to see the mother cheated on every hand except by me, whom she hated because I did not deceive her.

事情到这里还没结束。他的母亲听说了孩子大半个晚上没睡觉。仿佛她的孩子已经死了似的，结果把整个事情都搞砸了。他发现了一个报复的好机会，便假装自己生病了，却没看到这样做他得不到任何好处。大人把他送到了医生那里。母亲要倒霉了。这个医生喜欢开玩笑，他用母亲的惊恐来娱乐自己，还尽全力增加她的恐惧以求获得更多乐趣。但是，他却偷偷在我耳边说，“把他交给我，我保证治好他时不时就想生病的毛病。”事实上，他开的药方就是调整孩子的睡眠和饮食，然后就把他交给了药剂师。我很同情那位母亲，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在骗她，而她却因为我没有骗她而讨厌我。

After pretty severe reproaches, she told me her son was delicate, that he was the sole heir of the family, his life must be preserved at all costs, and she would not have him contradicted. In that I thoroughly agreed with her, but what she meant by contradicting was not obeying him in everything. I saw I should have to treat the mother as I had treated the son. “Madam,” I said coldly, “I do not know how to educate the heir to a fortune, and what is more, I do not mean to study that art. You can take that as settled.” I was wanted for some days longer, and the father smoothed things over. The mother wrote to the tutor to hasten his return, and the child, finding he got nothing by disturbing my rest, nor yet by being ill, decided at last to get better and to go to sleep.

把我狠狠地责备了一番后，她告诉我她的儿子是纤弱的，是家里唯一的继承人，不管花多少钱也要保护好他的命，她不会让别人为难他。我完全同意她说的话，但是她所说的为难就是指我没有事事顺从她儿子的意。我觉得我有必要用对待她儿子的方法对待这位母亲。“夫人，”我冷静地说，“我不知道如何教育一位继承人。另外，我也不打算研究这方面的学问。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们还需要我再教一段时间，孩子的父亲极力从中调和。母亲写信给原来的老师，希望他快点回来。而孩子呢，发现打扰我休息以及装病都对他没有任何好处，最终决定回去好好睡觉，病也好了。

You can form no idea of the number of similar caprices to which the little tyrant had subjected his unlucky tutor; for his education was carried on under his mother's eye, and she would not allow her son and heir to be disobeyed in anything. Whenever he wanted to go out, you must be ready to take him, or rather to follow him, and he always took good care to choose the time when he knew his tutor was very busy. He wished to exercise the same power over me and to avenge himself by day for having to leave me in peace at night. I gladly agreed and began by showing plainly how pleased I was to give him pleasure; after that when it was a matter of curing him of his fancies I set about it differently.

你无法想象这个小小的暴君曾经对他那可怜的老师使过多少性子，因为对他的教育是在他母亲眼皮底下进行的，而她绝不容许他的儿子，这位继承人，有一点不顺心的事。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想出门，你就必须准备好带他出去，或者跟着他。而他也总是存心挑老师很忙的时候吵着要出去。他想在我身上行使同样的权力。晚上他不得不让我休息，所以一到白天他就进行报复。对此我欣然同意，并且直白地向他展示当我让他感到愉悦时我自己也是很高兴的。此后，当涉及到要纠正他的缺点时，我就采取了另一做法。

In the first place, he must be shown that he was in the wrong. This was not difficult; knowing that children think only of the present, I took the easy advantage which foresight gives; I took care to provide him with some indoor amusement of which he was very fond. Just when he was most occupied with it, I went and suggested a short walk, and he sent me away. I insisted, but he paid no attention. I had to give in, and he took note of this sign of submission.

首先，他必须明白自己错了。这一点并不困难。我知道孩子只会考虑眼前的事，所以我就占了会预料这一点的便宜。我用心给他提供了一些他喜欢的室内娱乐活动。当他玩得入迷时，我走过去跟他提议出去散步，他让我走开。我继续坚持，他仍旧不理我。我只好放弃，而他将此视为屈服的标志。

The next day it was my turn. As I expected, he got tired of his occupation; I, however, pretended to be very busy. That was enough to decide him. He came to drag me from my work, to take him at once for a walk. I refused; he persisted. “No,” I said, “when I did what you wanted, you taught me how to get my own way; I shall not go out.” “Very well,” he replied eagerly, “I shall go out by myself.” “As you please,” and I returned to my work.

第二天，轮到我拒绝他了。如同我估计的那样，他对这些玩具厌烦了。而我，装出十分忙碌的样子。这足够让他打定主意来闹我一下了。他过来硬要我放下工作，立即带他去散步。我拒绝，他坚持。“不，”我说，“我昨天想去散步时，你教了我为所欲为，我今天也不想出去。”“很好，”他生气地回答，“那我就自己出去。”“随便

你。”说完我就继续工作了。

He put on his things rather uneasily when he saw I did not follow his example. When he was ready he came and made his bow; I bowed too; he tried to frighten me with stories of the expeditions he was going to make; to hear him talk you would think he was going to the world's end. Quite unmoved, I wished him a pleasant journey. He became more and more perplexed. However, he put a good face on it, and when he was ready to go out he told his foot man to follow him. The footman, who had his instructions, replied that he had no time, and that he was busy carrying out my orders, and he must obey me first. For the moment the child was taken aback. How could he think they would really let him go out alone, him, who, in his own eye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thought that everything in heaven and earth was wrapped up in his welfare? However, he was beginning to feel his weakness, he perceived that he should find himself alone among people who knew nothing of him. He saw beforehand the risks he would run; obstinacy alone sustained him; very slowly and unwillingly he went downstairs. At last he went out into the street, consoling himself a little for the harm that might happen to himself, in the hope that I should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it.

他穿好衣服，看到我没有跟着换衣服，就变得不安起来。当他准备妥当，他过来跟我鞠躬，我回礼。他对我说他即将进行的远征，企图以此来吓唬我。听他说话的口气，仿佛要走到世界尽头去似的。我仍旧无动于衷，只是祝愿他有一个愉快的旅途。他变得越来越困惑了。但是他没有表现在脸上，当他准备好出门时，他嘱咐仆人跟着他。仆人按照我的安排，回答说他没有时间，他正忙着做我吩咐的事情，还说自己应该先听从我的话。这一刻，这个孩子惊呆了。他没想

到我们真的会让他独自出门。在他眼里，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天地万物都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利益上。但是现在，他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柔弱，他察觉到自己正孤零零地呆在不了解他的人中间。他预见到了自己将面临的危险，支撑着他的是仅剩的顽固。他不情不愿地慢慢走下了楼。他安慰自己，万一出了什么事，我这个老师是要负责任的，就这样，最终他走到了街上。

This was just what I expected. All was arranged beforehand, and as it meant some sort of public scene I had got his father's consent. He had scarcely gone a few steps, when he heard, first on this side then on that, all sorts of remarks about himself. “What a pretty little gentleman, neighbour? Where is he going all alone? He will get lost! I will ask him into our house.” “Take care you don't. Don't you see he is a naughty little boy, who has been turned out of his own house because he is good for nothing? You must not stop naughty boys; let him go where he likes.” “Well, well; the good God take care of him. I should be sorry if anything happened to him.” A little further on he met some young urchins of about his own age who teased him and made fun of him. The further he got the more difficulties he found. Alone and unprotected he was at the mercy of everybody, and he found to his great surprise that his shoulder knot and his gold lace commanded no respect.

这正是我所期盼的。一切都是提前安排好的，我征得了他父亲的同意，安排了一些场景。他刚走出去几步路，就听到左右两边都有人在议论他。“多么漂亮的小绅士啊，是我们的邻居吗？他一个人要去哪儿呀？他会迷路的！我想邀请他去我家做客。”“你最好不要这样做。你没看到他是个淘气的小男孩吗？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做才被自己家里赶出来了。你可别拦住他，让他想去哪儿去哪儿好了。”“好吧，好吧，希望上帝保佑他。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我会难过的。”再

走远一点，他遇到了一些年龄相仿的小乞丐，他们嘲笑他，以他取乐。走得越远，他遇到的麻烦越多。他孤孤单单，没人保护，他只能听任所有人摆布，他还惊讶地发现他的肩章和金丝带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尊敬。

However, I had got a friend of mine, who was a stranger to him, to keep an eye on him. Unnoticed by him, this friend followed him step by step, and in due time he spoke to him. The role, like that of Sbrigani in Pourceaugnac, required an intelligent actor, and it was played to perfection. Without making the child fearful and timid by inspiring excessive terror, he made him realise so thoroughly the folly of his exploit that in half an hour's time he brought him home to me, ashamed and humble, and afraid to look me in the face.

但是，我还是找了一个他不认识的朋友一路看着他的。他没注意到我的朋友，所以我的朋友一路紧跟，到了合适的时机，就上前跟他搭话。这个角色类似《普索尼亚克》中的斯布里加尼，需要一名聪慧的演员才能胜任，而我的朋友做得非常好。他没有给孩子造成额外的惊恐来使他感到害怕和羞怯，而是让孩子充分认识到这次旅行是多么愚蠢。半个小时之后，他把孩子带回家交给我。这孩子已经羞愧难当、低声下气，不敢看我的脸了。

To put the finishing touch to his discomfiture, just as he was coming in his father came down on his way out and met him on the stairs. He had to explain where he had been, and why I was not with him. [3_18] The poor child would gladly have sunk into the earth. His father did not take the trouble to scold him at length, but said with more severity than I should have expected, “When you

want to go out by yourself, you can do so, but I will not have a rebel in my house, so when you go, take good care that you never come back.”

他刚一进门，就和正在下楼的父亲在楼梯上相遇了，给他这次失败的旅行添上了最后一笔。他必须解释自己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没有和他在一起 [4_18] 。这个孩子巴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最终，父亲没有斥责他，但用我没有料到的严厉语气对他说，“当你想自己跑出去时，你可以这么做，但我不容许我的家里有个反叛的人，所以下次你再出去，当心永远回不来。”

As for me, I received him somewhat gravely, but without blame and without mockery, and for fear he should find out we had been playing with him, I declined to take him out walking that day. Next day I was well pleased to find that he passed in triumph with me through the very same people who had mocked him the previous day, when they met him out by himself. You may be sure he never threatened to go out without me again.

至于我，既没有责备也没有嘲笑他，只是表现得稍微严肃一点。由于害怕被他看出我们在他面前演戏，那天我就没有再带他出去散步。第二天，我很高兴地发现他跟我一起再次经过那些昨天由于他孤零零一个人就嘲笑他的人面前时，仍然神气活现。可以确信，他再也不会威胁我，说他可以一个人出门了。

By these means and other like them I succeeded during the short time I was with him in getting him to do everything I wanted without bidding him or forbidding him to do anything, without

preaching or exhortation, without wearying him with unnecessary lessons. So he was pleased when I spoke to him, but when I was silent he was frightened, for he knew there was something amiss, and he always got his lesson from the thing itself. But let us return to our subject.

通过这些类似的方法，在我们相处的这段短短的时间里，我成功地让他做了所有我希望他做的事，而且不用我规定他或者禁止他做什么。我也没有唠唠叨叨地教训他、鼓励他，或者拿一些不必要的功课去烦扰他。所以他是很乐于同我交谈的，但是当我沉默的时候，他会害怕，因为他知道有什么事做错了，而且他总会从这些事情本身得到教训。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主题上来。

The body is strengthened by this constant exercise under the guidance of nature herself, and far from brutalising the mind, this exercise develops in it the only kind of reason of which young children are capable, the kind of reason most necessary at every age. It teaches us how to use our strength, to perceive the relations between our own and neighbouring bodies, to use the natural tools, which are within our reach and adapted to our senses. Is there anything sillier than a child brought up indoors under his mother's eye, who, in his ignorance of weight and resistance, tries to uproot a tall tree or pick up a rock. The first time I found myself outside Geneva I tried to catch a galloping horse, and I threw stones at Mont Saleve, two leagues away; I was the laughing stock of the whole village, and was supposed to be a regular idiot. At eighteen we are taught in our natural philosophy the use of the lever; every village boy of twelve knows how to use a lever better than the cleverest mechanician in the academy. The lessons the scholars learn from one another in the playground are worth a hundredfold

more than what they learn in the class-room.

身体需要在自然的指导下，持续锻炼，才能得到增强。这种锻炼非但不会损伤心智，还会有助于发展儿童时期唯一能够形成的理解力，而这种理解力在任何年龄都是最需要的。它教会了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体力，去注意我们和周围事物之间的关系，去使用我们能够拿到的、适合于我们的感官的自然工具。让孩子在室内长大，整天呆在母亲眼皮底下，连什么是重力和阻力都不知道，就想去连根拔起一棵大树或者撬起一颗岩石，还有比这更愚蠢的孩子吗？我第一次离开日内瓦时，我试着抓住一匹飞驰的骏马，我用石头去扔离我有两里格远的萨莱夫山。我成了整个村子的笑料，大家都觉得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十八岁的时候，我学了物理学才知道如何使用杠杆，但是村里任何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子用起杠杆来，都比学校里最聪明的机械师来的熟练。学生在户外从彼此身上学到的知识比你在课堂上交给他们的东西有价值一百倍。

Watch a cat when she comes into a room for the first time; she goes from place to place, she sniffs about and examines everything, she is never still for a moment; she is suspicious of everything till she has examined it and found out what it is. It is the same with the child when he begins to walk, and enters, so to speak, the room of the world around him.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while both use sight, the child uses his hands and the cat that subtle sense of smell which nature has bestowed upon it. It is this instinct, rightly or wrongly educated, which makes children skilful or clumsy, quick or slow, wise or foolish.

你可以观察一只第一次闯入教室的猫会有什么反应。她来回地走，嗅嗅这里，动动那里，一刻也停不下来。她对所有东西充满怀

疑，直到她检查过所有的东西、弄清楚它们是什么为止。对于刚开始会走路的孩子，情况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进入的周围的世界，就相当于那间教室。唯一不同的在于，虽然孩子和猫都会看，但除此之外，孩子用手，而猫用的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灵敏嗅觉。恰恰是这种本能，培养得或好或坏，决定一个孩子是灵巧还是笨拙，活泼还是笨重，聪慧还是愚蠢。

Man's primary natural goals are, therefore, to measure himself against his environment, to discover in every object he sees those sensible qualities which may concern himself, so his first study is a kind of experimental physics for his own preservation. He is turned away from this and sent to speculative studies before he has found his proper place in the world. While his delicate and flexible limbs can adjust themselves to the bodies upon which they are intended to act, while his senses are keen and as yet free from illusions, then is the time to exercise both limbs and senses in their proper business. It is the time to learn to perceive the physical relations between ourselves and things. Since everything that comes into the human mind enters through the gates of sense, man's first reason is a reason of sense-experience. It is this that serves as a foundation for the reason of the intelligence; our first teachers in natural philosophy are our feet, hands, and eyes. To substitute books for them does not teach us to reason, it teaches us to use the reason of others rather than our own; it teaches us to believe much and know little.

因此，人类最初的自然目标就是用周围的生物来衡量自己，探究他眼前的每一件物体所蕴含的与其相关的、可感知的性质。所以，他的第一次研究是为了自我生存而进行的实验物理研究。但当他在这个世界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之前，他会被这些研究拒绝，转而被送去

研究其他思辨性的东西。当他那脆弱但灵活的四肢还只能适应他意图接触的物体时，当他的感官还因远离想象而保持热忱时，这正好是锻炼他的四肢和感官做好本职工作的好时机。这正好是让他学习观察我们和其他事物之间的物理关系的好时机。人类最初的理性是一种感觉经验，因为任何进入人类大脑的事物都需要通过感觉的大门。正是这种感觉经验构成了理性的基础，在自然哲学中，我们的第一位老师就是我们自己的双脚、双手、双眼。用书本代替这些东西并不能教会我们去理解，只能教会我们利用他人的理解力而不是自己的，教会我们老是听别人的，却很少自己去了解。

Before you can practise an art you must first get your tools; and if you are to make good use of those tools, they must be fashioned sufficiently strong to stand use. To learn to think we must therefore exercise our limbs, our senses, and our bodily organs, which are the tools of the intellect; and to get the best use out of these tools, the body which supplies us with them must be strong and healthy. Not only is it quite a mistake that true reason is developed apart from the body, but it is a good bodily constitution which makes the workings of the mind easy and correct.

如果你要练习一种艺术，首先你要有工具；如果你要好好利用这些工具，它们必须被做得坚固耐用。因此，要学习思考，我们必须锻炼我们的四肢、感官、身体器官，这些就是培养理性的工具；而为了让这些工具得到最好的利用，提供这些工具的的身体必须是强壮健康的。真正的理性不仅不能脱离身体而存在，反而，一个好的身体能让人的思想的产物更加敏锐、正确。

While I am showing how the child's long period of leisure should be spent, I am entering into details which may seem absurd.

You will say, “This is a strange sort of education, and it is subject to your own criticism, for it only teaches what no one needs to learn. Why spend your time in teaching what will come of itself without care or trouble? Is there any child of twelve who is ignorant of all you wish to teach your pupil, while he also knows what his master has taught him.”

当我展示孩子那长长的、闲着不用的童年应该怎样度过时，我说的十分详细，这看似有点荒谬。你会说，“这种教育太奇怪了，这一切只是为了你自己的评论工作，因为你教的都是不需要学的东西。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那些就算不花心思去教也能学到的事情上面呢？当学生知道他的老师已经教了他什么的时候，有哪个十二岁的孩子会对老师希望教的一切知识一无所知呢？”

Gentlemen, you are mistaken. I am teaching my pupil an art, the acquirement of which demands much time and trouble, an art which your scholars certainly do not possess; it is the art of being ignorant; for the knowledge of any one who only thinks he knows, what he really does know is a very small matter. You teach science; well and good; I am busy fashioning the necessary tools for its acquisition. Once upon a time, they say the Venetians were displaying the treasures of the Cathedral of Saint Mark to the Spanish ambassador; the only comment he made was, “Qui non c'e la radice.” When I see a tutor showing off his pupil's learning, I am always tempted to say the same to him.

先生，你错了。我在教我的学生一种艺术，这种艺术的习得需要很多时间、需要花很多心思。这种艺术是你的学生绝对不掌握的，那就是保持无知，因为任何以为自己掌握了某种知识的人，他实际上知

道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你教他科学，这很好。我正忙着帮学生准备获取知识所必需的工具。很久以前，人们说威尼斯人在西班牙大使面前炫耀圣马可大教堂的珍宝，大使只评论了一句话，“下面没有根基。”当我看到有老师向我炫耀他学生的学识时，我总想对他说同样的话。

Every one who has considered the manner of life among the ancients, attributes the strength of body and mind by which they ar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men of our own day to their gymnastic exercises. The stress laid by Montaigne upon this opinion, shows that it had made a great impression on him; he returns to it again and again. Speaking of a child's education he says, “To strengthen the mind you must harden the muscles; by training the child to labour you train him to suffering; he must be broken in to the hardships of gymnastic exercises to prepare him for the hardships of dislocations, colics, and other bodily ills.” The philosopher Locke, the worthy Rollin, the learned Fleury, the pedant De Crouzas, differing as they do so widely from one another, are agreed in this one matter of sufficient bodily exercise for children. This is the wisest of their precepts, and the one which is certain to be neglected. I have already dwelt sufficiently on its importance, and as better reasons and more sensible rules cannot be found than those in Locke's book, I will content myself with referring to it, after taking the liberty of adding a few remarks of my own.

每一个思考过先人生活方式的人，都认为他们的体力和脑力和现在的人相比是脱颖而出的。每个人也都会将这个结果归因于体育锻炼。蒙台涅对此观点的重视显示出这一点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谈到孩子的教育时，他说，“要锻炼孩子的心智，他必须先有结实的肌肉；让孩子劳动，就是在锻炼他的吃苦能

力；他必须在体育锻炼中苦不堪言，才能在日后忍受得住关节脱落、腹痛和其他疾病的痛苦。”哲学家洛克，可敬的罗兰，学识渊博的弗勒里，迂腐的德·克鲁扎斯，尽管他们对于其他事情的看法彼此不相同，但他们都赞成孩子应该得到充足有效的身体锻炼。这是他们留下的所有训条中最明智的，但恰恰也是肯定会被人们忽视的一条。关于身体锻炼的重要性我已经阐释得很详细了，我也说不出比洛克的书里更好的理由和法则，所以，让我再自由地对他的观点发表几句自己的评论，针对这个话题我就心满意足了。

The limbs of a growing child should be free to move easily in his clothing; nothing should cramp their growth or movement; there should be nothing tight, nothing fitting closely to the body, no belts of any kind. The French style of dress, uncomfortable and unhealthy for a man, is especially bad for children. The stagnant humours, whose circulation is interrupted, putrify in a state of inaction, and this process proceeds more rapidly in an inactive and sedentary life; they become corrupt and give rise to scurvy; this disease, which is continually on the increase among us, was almost unknown to the ancients, whose way of dressing and living protected them from it. The hussar's dress, far from correcting this fault, increases it, and compresses the whole of the child's body, by way of dispensing with a few bands. The best plan is to keep children in frocks as long as possible and then to provide them with loose clothing, without trying to define the shape which is only another way of deforming it. Their defects of body and mind may all be traced to the same source, the desire to make men of them before their time.

一个成长中的孩子的四肢应该能在衣服里活动自如，没有什么应该束缚他们的成长和活动，不应该给他们穿很紧的、紧贴着身体的衣

服，或绑任何带子。法式服装对于人来说是不舒服不健康的，对孩子尤其不好。体液不流动，其循环受到阻碍，净化陷入停滞状态。而长久不活动的生活方式会加速这一过程，因而变得更加腐败，容易引发坏血病。现在得这种病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祖先从没听说过这种病，因为那时候人的穿衣和生活方式都保护着人免受这种病的侵蚀。骑士服不仅没有纠正这种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它虽然少捆了几条带子，但却压迫着孩子的整个身体。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地让孩子多穿袍子，给他们穿宽松的衣服，不要用衣服去给他们的身材塑形，这只会让他们变得畸形。孩子们身体和思想的缺陷也许能追溯到同一源头，那就是你想提早把他们变成大人。

There are bright colours and dull; children like the bright colours best, and they suit them better too. I see no reason why such natural suitability should no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ut as soon as they prefer a material because it is rich, their hearts are already given over to luxury, to every caprice of fashion, and this taste is certainly not their own.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how much education is influenced by this choice of clothes, and the motives for this choice. Not only do short-sighted mothers offer ornaments as rewards to their children, but there are foolish tutors who threaten to make their pupils wear the plainest and coarsest clothes as a punishment. “If you do not do your lessons better, if you do not take more care of your clothes, you shall be dressed like that little peasant boy.” This is like saying to them, “Understand that clothes make the man.” Is it to be wondered at that our young people profit by such wise teaching, that they care for nothing but dress, and that they only judge of merit by its outside.

这个世界上有明亮的颜色，也有暗沉的颜色。孩子们最喜欢明亮的颜色，因而亮色也更适合他们。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不采取这种自

然搭配。当他们一看到昂贵的衣料就对其更加偏爱时，他们的心已经开始向往奢靡，向往荒谬的时尚。而这种品味，可以肯定地说，不是由他们自己产生的。要说清这种对衣服的选择及其背后的动机会对教育产生多少影响是不可能的。目光短浅的母亲会将装饰品当作奖励送给孩子，愚蠢的老师也会将穿简朴粗野的衣服当作惩罚来威胁学生。“如果你不把功课做好，如果你不留意自己的衣着，你就会被打扮得像个农村小男孩。”这就好像在跟他们说，“你要明白，是衣服塑造了人。”对年轻人进行这类所谓明智的教育，导致他们只注重穿着，只会根据事物的外表判断其价值，又有什么奇怪呢？

If I had to bring such a spoilt child to his senses, I would take care that his smartest clothes were the most uncomfortable, that he was always cramped, constrained, and embarrassed in every way; freedom and mirth should flee before his splendour. If he wanted to take part in the games of children more simply dressed, they should cease their play and run away. Before long I should make him so tired and sick of his magnificence, such a slave to his gold-laced coat, that it would become the plague of his life, and he would be less afraid to behold the darkest dungeon than to see the preparations for his adornment. Before the child is enslaved by our prejudices his first wish is always to be free and comfortable. The plainest and most comfortable clothes, those which leave him most liberty, are what he always likes best.

如果我必须让这样一个被宠坏的孩子醒悟，我就要让他觉得那些最好的衣服是最不舒服的衣服，让他觉得穿着这些衣服的时候在各个方面都觉得紧绷、拘束、尴尬，让他反角在这华服之下丢失了自由和欢乐。如果他想加入那些衣着简朴的孩子的游戏，他们会停止游戏，一哄而散。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让他对这些锦衣华服感到厌烦了，觉得自己简直是金丝带外套的奴隶，觉得这会成为他一生的折磨。从此

以后，他看到别人为他准备华丽的衣饰会比把他关进最黑暗的地牢还要害怕。在孩子还未成为偏见的奴隶之前，他的首要愿望总是活得自由而舒适。最简单、最舒适的衣服会给他最多的自由，这也是他最喜欢的衣服。

There are habits of body suited for an active life and others for a sedentary life. The latter leaves the humours an equable and uniform course, and the body should be protected from changes in temperature; the former is constantly passing from action to rest, from heat to cold, and the body should be inured to these changes. Hence people, engaged in sedentary pursuits indoors, should always be warmly dressed, to keep their bodies as nearly as possible at the same temperature at all times and seasons. Those, however, who come and go in sun, wind, and rain, who take much exercise, and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out of doors, should always be lightly clad, so as to get used to the changes in the air and to every degree of temperature without suffering inconvenience. I would advise both never to change their clothes with the changing seasons, and that would be the invariable habit of my pupil Emile. By this I do not mean that he should wear his winter clothes in summer like many people of sedentary habits, but that he should wear his summer clothes in winter like hard-working folk. Sir Isaac Newton always did this, and he lived to be eighty.

有些人适合于动，有些人适合于静。后者使体液处于均匀流动的状态，身体应该被保护免受外部温度变化的侵扰；前者始终在由动到静、从热到冷，身体应该已经习惯于这些变化了。因此，好静的人喜欢待在室内，他们应该穿得暖和，让自己的体温在一年四季和一天二十四小时之中都保持恒定。但好动的人，他们总是在阳光下、在风里、在雨中跑来跑去，做很多锻炼，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户外。这样的

人应该穿的少一点，才能习惯于空气和温度的变化而不至于感到不舒服。但我不建议这两种人跟着季节增减衣物，这也会成为我的学生爱弥儿始终坚持的习惯。但我并不是说爱弥儿应该像那些好静的人一样，在夏天穿着冬天的衣服，但他应该像那些干体力活的人，在冬天穿着单薄的夏衣。艾萨克·牛顿爵士就是坚持这样做的，他活到了八十岁。

Emile should wear little or nothing on his head all the year round. The ancient Egyptians always went bareheaded; the Persians used to wear heavy tiaras and still wear large turbans, which according to Chardin are required by their climate. I have remarked elsewhere on the difference observed by Herodotus on a battle-field between the skulls of the Persians and those of the Egyptians. Since it is desirable that the bones of the skull should grow harder and more substantial, less fragile and porous, not only to protect the brain against injuries but against colds, fever, and every influence of the air, you should therefore accustom your children to go bare-headed winter and summer, day and night. If you make them wear a night-cap to keep their hair clean and tidy, let it be thin and transparent like the nets with which the Basques cover their hair. I am aware that most mothers will be more impressed by Chardin's observations than my arguments, and will think that all climates are the climate of Persia, but I did not choose a European pupil to turn him into an Asiatic.

不管一年中什么时间，爱弥儿头上都不应该戴着什么东西。古埃及人头上从来不戴东西。波斯人习惯于戴着沉重的王冠，包着宽大的头巾，根据夏尔丹所说，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气候导致的。我在其他地方说过战场上的波斯人和埃及人头骨的差别，这一差别是由希罗多德观察到的。人们总想让头骨长得更结实、牢固，少一点脆弱和缝

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大脑免受伤害，也是为了抵御寒冷、炎热以及空气中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所有其他东西。因此你应该让孩子习惯于把头露出来，不论冬夏还是夙夜。如果你要给他们带着睡帽以此使他们的头发保持清洁整齐，注意要让帽子像网一样编织得稀疏、透明。巴斯克人就用这种帽子盖住头发。我意识到，跟我的观点相比，大多数的母亲会对夏尔丹的观察印象更深刻，她们觉得所有地方的气候都跟波斯一样。但我没有打算选一个欧洲的孩子，再把他变成亚洲人。

Children are generally too much wrapped up, particularly in infancy. They should be accustomed to cold rather than heat; great cold never does them any harm, if they are exposed to it soon enough; but their skin is still too soft and tender and leaves too free a course for perspiration, so that they are inevitably exhausted by excessive heat.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infant mortality is greatest in August. Moreover, it seems certain from a comparison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races that we become stronger by bearing extreme cold rather than excessive heat. But as the child's body grows bigger and his muscles get stronger, train him gradually to bear the rays of the sun. Little by little you will harden him till he can face the burning heat of the tropics without danger.

孩子，尤其在童年时期，一般来说都被裹得太严实了。他们应该更习惯寒冷而不是温暖。如果尽早把他们暴露在寒冷之中，即使身处严寒也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损伤。但是，由于他们的皮肤太柔软，太容易出汗，如果周围太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耗尽精力。已经有观察显示，八月是孩子死亡人数最多的月份。另外，根据对南北方民族的比较，可以确定，我们忍受极寒的能力胜过忍受炎热。但是，随着孩子的身体逐渐成长，肌肉变得越来越壮实，要锻炼他逐渐忍受阳光的照射。你要让他一点点硬实起来，直到他可以面对热带地区灼人的热浪而不受伤害。

Locke, in the midst of the manly and sensible advice he gives us, falls into inconsistencies one would hardly expect in such a careful thinker. The same man who would have children take an ice-cold bath summer and winter, will not let them drink cold water when they are hot, or lie on damp grass. But he would never have their shoes water-tight; and why should they let in more water when the child is hot than when he is cold, and may we not draw the same inference with regard to the feet and body that he draws with regard to the hands and feet and the body and face? If he would have a man all face, why blame me if I would have him all feet?

当洛克给我们提供勇敢而合理的建议时，他陷入了矛盾之中。一般，像他这样谨慎的思想家是不会遇到这种问题的。同样的一个人，不论冬天还是夏天都给孩子洗冰水澡，就不会让孩子在酷热难当时喝冷水或者躺在潮湿的草地上。但是，既然他永远不会让孩子的鞋湿漉漉的，那为什么孩子感到炎热的时候应该比感到冷的时候碰更多的水呢？既然他以手来推论脚，以身体来推论脸，那我们难道不能同样以脚来推论身体吗？如果他希望一个人的全身都像脸一样健康，那为什么当我希望全身像脚一样健康的时候还要责备我呢？

To prevent children drinking when they are hot, he says they should be trained to eat a piece of bread first. It is a strange thing to make a child eat because he is thirsty; I would as soon give him a drink when he is hungry. You will never convince me that our first instincts are so ill-regulated that we cannot satisfy them without endangering our lives. Were that so, the man would have perished over and over again before he had learned how to keep himself alive.

为了阻止孩子觉得热的时候喝水，他说应该训练孩子先吃一片面包。孩子觉得渴，你却让他吃东西，这真是奇怪的事，那我立马可以建议说孩子饿的时候让他喝水。你永远无法说服我相信我们的本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不受点危险就不能满足它们。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人类在学会如何保命之前早就灭亡了一次又一次了。

Whenever Emile is thirsty let him have a drink, and let him drink fresh water just as it is, not even taking the chill off it in the depths of winter and when he is bathed in perspiration. The only precaution I advise is to take care what sort of water you give him. If the water comes from a river, give it him just as it is; if it is spring-water let it stand a little exposed to the air before he drinks it. In warm weather rivers are warm; it is not so with springs, whose water has not been in contact with the air. You must wait till the temperature of the water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air. In winter, on the other hand, spring water is safer than river water. It is, however, unusual and unnatural to perspire greatly in winter, especially in the open air, for the cold air constantly strikes the skin and drives the perspiration inwards, and prevents the pores opening enough to give it passage. Now I do not intend Emile to take his exercise by the fireside in winter, but in the open air and among the ice. If he only gets warm with making and throwing snowballs, let him drink when he is thirsty, and go on with his game after drinking, and you need not be afraid of any ill effects. And if any other exercise makes him perspire let him drink cold water even in winter provided he is thirsty. Only take care to take him to get the water some little distance away. In such cold as I am supposing, he would have cooled down sufficiently when he got there to be able to drink without danger. Above all, take care to conceal these precautions from him. I would rather he were ill now and then,

than always thinking about his health.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爱弥儿渴了，就让他喝水。让他喝未加工过的新鲜的水，不管在隆冬还是他汗流浃背，都不要加热。我唯一建议留心的就是你给他的水的种类。如果是河水，那就原样给他喝。如果是泉水，给他喝之前要在空气中暴露一会儿。在温暖的天气里，河水也是暖的，但是泉水由于不直接接触空气所以就不是如此。因此，你必须等到水的温度跟周围空气的温度一致了再给他喝。如果是冬天，那么泉水反而比河水更安全。但是，人在冬天出很多汗是不正常的、不自然的，特别是在室外。因为寒冷的空气会不断侵袭皮肤，将汗液拦在体内，阻止毛孔张开以免出汗。这个时候，我不主张让爱弥儿在火炉边做运动。我希望他到室外去，到冰天雪地中去。如果他在捏雪球、打雪仗之后暖和起来，感到渴，就让他喝水，然后接着去玩。你不用担心这会对他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即使在冬天，如果有其他什么运动让他出汗，在他感到渴的时候也让他喝冷水。我们只需要注意把他带到稍远的地方取水就可以了。在我假设中的这种寒冷天气里，当他到达喝水的地方时，就已经不再出汗了，这时候他便可以喝冷水，而不会有什么危险。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他看出来你采取的这些预防措施。我宁愿他偶尔生病，也不要他一直把健康挂在心上。

Since children take such violent exercise they need a great deal of sleep. The one makes up for the other, and this shows that both are necessary. Night is the time set apart by nature for rest. It is an established fact that sleep is quieter and calmer when the sun is below the horizon, and that our senses are less calm when the air is warmed by the rays of the sun. So it is certainly the healthiest plan to rise with the sun and go to bed with the sun. Hence in our country man and all the other animals with him want more sleep in winter than in summer. But town life is so complex, so unnatural, so subject to chances and changes, that it is not wise to accustom a

man to such uniformity that he cannot do without it. No doubt he must submit to rules; but the chief rule is this—be able to break the rule if necessary. So do not be so foolish as to soften your pupil by letting him always sleep his sleep out. Leave him at first to the law of nature without any hindrance, but never forget that under our conditions he must rise above this law; he must be able to go to bed late and rise early, be awakened suddenly, or sit up all night without ill effects. Begin early and proceed gently, a step at a time, and the constitution adapts itself to the very conditions which would destroy it if they were im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on the grown man.

考虑到孩子们进行了剧烈的锻炼，他们需要长时间的睡眠。锻炼和睡眠互为补充，两者都是孩子必需的。自然设置黑夜就是为了给人时间休息。当太阳下山之后，人可以睡得更香更沉；当空气被阳光加热，人的感官会更灵敏。这是既定的事实。因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疑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我们的国家，比起夏天，人类和所有其他动物在冬天都想要更多的睡眠时间。但是，城市里的生活太复杂，太违背自然，有太多变化，因此要强迫人习惯这样统一的作息、认为非这样做不可，是不太明智的。毫无疑问，人应该服从法则。但是首要的一条法则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打破法则。所以不要傻乎乎地让你的学生一直睡着，睡到身体都变软了。首先，要让他无障碍地顺应自然法则，。但永远不要忘记，在我们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能超越这些法则。他必须能够晚睡早起，能突然醒过来，能熬夜却不生病。早点开始这样做，循序渐进，一次走一小步，让他的体格能够适应这些特殊情况。如果等到他长大了再把这些一股脑强加给他，那会毁了他的。

In the next place he must be accustomed to sleep in an uncomfortable bed, which is the best way to find no bed

uncomfortable. Speaking generally, a hard life, when once we have become used to it, increases our pleasant experiences; an easy life prepares the way for innumerable unpleasant experiences. Those who are too tenderly nurtured can only sleep on down; those who are used to sleep on bare boards can find them anywher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hard bed for the man who falls asleep at once.

其次，他必须习惯在不舒服的床上睡觉，这是让他适应所有床铺的最好办法。一般来说，当我们习惯艰苦的生活之后，它反而会带来更多愉快的体验。而顺遂的生活则会在将来带来数不清的烦恼。那些被精心抚养长大的人只能在柔软的床上才能睡着，而习惯于在硬木板上睡觉的人在哪里都能睡着。对于一个能够躺下就睡着的人，不存在硬床这种东西。

The body is, so to speak, melted and dissolved in a soft bed where one sinks into feathers and eider-down. The reins when too warmly covered become inflamed. Stone and other diseases are often due to this, and it invariably produces a delicate constitution, which is the seed-ground of every ailment.

所以说，在柔软的床上，沉浸于羽毛和鸭绒之中，人会融化溶解掉的。盖得太严实太暖和，肾脏会发炎的。肾结石和其他疾病就是因此产生，并且总是使人体质虚弱，百病丛生。

The best bed is that in which we get the best sleep. Emile and I will prepare such a bed for ourselves during the daytime. We do not need Persian slaves to make our beds; when we are digging the soil we are turning our mattresses. I know that a healthy child may be

made to sleep or wake almost at will. When the child is put to bed and his nurse grows weary of his chatter, she says to him, “Go to sleep.” That is much like saying, “Get well,” when he is ill. The right way is to let him get tired of himself. Talk so much that he is compelled to hold his tongue, and he will soon be asleep. Here is at least one use for sermons, and you may as well preach to him as rock his cradle; but if you use this narcotic at night, do not use it by day.

能让我们获得最佳睡眠的床就是最好的床。我跟爱弥儿会在白天为自己准备这样的一张床。我们不需要波斯奴隶为我们铺床。我们在种地的时候就已经把床铺好了。我知道，一个健康的孩子，可以随心所欲地让他睡觉或者醒来。当孩子被勒令上床睡觉而他还喋喋不休时，保姆就会感到厌烦，她会对孩子说，“睡觉去。”这听上去很像在孩子生病的时候跟他说，“好起来。”正确的办法是让孩子感到疲倦。你要说很多话，让他不得不闭上嘴，很快他就会睡着的。唠唠叨叨地说教至少有一个用处，你去摇他的床还不如说教来得有效。但是要注意，如果你在晚上已经用了这招麻醉剂，白天就不要再用了。

I shall sometimes rouse Emile, not so much to prevent his sleeping too much, as to accustom him to anything—even to waking with a start. Moreover, I should be unfit for my business if I could not make him wake himself, and get up, so to speak, at my will, without being called.

我有时候也会叫醒爱弥儿，与其说是为了防止他睡得太多，不如说是要让他习惯于任何事——哪怕是突然惊醒。另外，如果我不能让他按照我的意志，在没有我叫的情况下自己醒来、起床，那我可能不适合做老师了。

If he wakes too soon, I shall let him look forward to a tedious morning, so that he will count as gain any time he can give to sleep. If he sleeps too late I shall show him some favourite toy when he wakes. If I want him to wake at a given hour I shall say, “Tomorrow at six I am going fishing,” or “I shall take a walk to such and such a place. Would you like to come too?” He assents, and begs me to wake him. I promise, or do not promise, as the case requires. If he wakes too late, he finds me gone. There is something amiss if he does not soon learn to wake himself.

如果他醒得太快，我会带他度过一个冗长乏味的早晨，这样他就会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睡觉了。如果他睡过了头，我会在他醒来的时候给他一样最喜欢的玩具。如果我想让他在特定的时间醒来，我会对他说，“明天早上六点我要去钓鱼。”或者说“我会去某个地方散步。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他同意了，还会央求我叫他起床。至于我答应不答应叫他，这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他起晚了，就会发现我已经走了。如果他不尽快学会自己醒来，就会吃亏。

Moreover, should it happen, though it rarely does, that a sluggish child desires to stagnate in idleness, you must not give way to this tendency, which might stupefy him entirely, but you must apply some stimulus to wake him.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is no question of applying force, but of arousing some appetite which leads to action, and such an appetite, carefully selected on the lines laid down by nature, kills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另外，万一以下这种情况发生，尽管很少，即真的有孩子懒到什么也不想干，你也不能屈服。你的屈服会让他完全变得昏昏沉沉，你

必须用一些刺激让他醒过来。你必须理解这不是强迫他干什么事的问题，而是要激发他的欲望，以此来让他采取行动。这种欲望，是从自然规定的秩序中仔细挑选出来的，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If one has any sort of skill, I can think of nothing for which a taste, a very passion, cannot be aroused in children, and that without vanity, emulation, or jealousy. Their keenness, their spirit of imitation, is enough of itself; above all, there is their natural liveliness, of which no teacher so far has contrived to take advantage. In every game, when they are quite sure it is only play, they endure without complaint, or even with laughter, hardships which they would not submit to otherwise without floods of tears. The sports of the young savage involve long fasting, blows, burns, and fatigue of every kind, a proof that even pain has a charm of its own, which may remove its bitterness. It is not every master, however, who knows how to season this dish, nor can every scholar eat it without making faces. However, I must take care or I shall be wandering off again after exceptions.

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任何一种技巧，都可以激发孩子的兴趣和热情，并且不会让他们产生空虚、好胜、嫉妒的心理。要做到这一点，有热情和模仿精神就够了。最重要的是，这种活泼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迄今为止还没有老师设法利用这一点。不论什么游戏，只要他们确信那只是一场游戏，他们就会毫无怨言地忍耐，甚至还很开心呢。如果不这样做，对于那些他们原本不会屈服的痛苦，现在只会泪流满面地接受。青年野蛮人的运动包括长时间的禁食、挨打、烫伤、各种各样的疲劳，这证明了痛苦本身也有其魅力，而这种魅力也许能减轻痛苦。但是，不是每一位老师都知道如何配制这种调剂，也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在尝到这些滋味时不愁眉苦脸。但是，在经历过例外情况之后，我必须对其加以注意，否则我会再一次迷失方向。

It is not to be endured that man should become the slave of pain, disease, accident, the perils of life, or even death itself; the more familiar he becomes with these ideas the sooner he will be cured of that over-sensitiveness which adds to the pain by impatience in bearing it; the sooner he becomes used to the sufferings which may overtake him, the sooner he shall, as Montaigne has put it, rob those pains of the sting of unfamiliarity, and so make his soul strong and invulnerable; his body will be the coat of mail which stops all the darts which might otherwise find a vital part. Even the approach of death, which is not death itself, will scarcely be felt as such; he will not die, he will be, so to speak, alive or dead and nothing more. Montaigne might say of him as he did of a certain king of Morocco, “No man ever prolonged his life so far into death.” A child serves his apprenticeship in courage and endurance as well as in other virtues; but you cannot teach children these virtues by name alone; they must learn them unconsciously through experience.

人不应该成为痛苦、疾病、意外、危险、甚至死亡本身的奴隶。他对这些观念越熟悉，他的过度敏感就能被越快治愈，这种敏感会使他没有耐心去忍受痛苦从而加剧痛苦。他能越快习惯于那些可能会压倒他的苦难，正如蒙台涅所说，他能越不会对痛苦感到陌生，这样他的灵魂就会变得坚强、无懈可击。他的身体会成为盔甲，能抵挡住所有原本要射向致命部位的飞镖。就算死亡即将来临，仅仅是死亡的临近，而不是死亡本身，他不会大惊小怪。可以这么说，他要么还活着，要么已经死了，仅此而已。他也许就像蒙台涅在谈到一位摩洛哥国王时所说的，“没有人像他活得那样充足。”孩子在学徒时期应该学习勇气和忍耐力，正如他们需要学习其他美德一样。但是你不能仅仅教会孩子这些美德的名字，他们必须不知不觉地通过实际经历去学习。

But speaking of death, what steps shall I take with regard to my pupil and the smallpox? Shall he be inoculated in infancy, or shall I wait till he takes it in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The former plan is more in accordance with our practice, for it preserves his life at a time when it is of greater value, at the cost of some danger when his life is of less worth; if indeed we can use the word danger with regard to inoculation when properly performed.

但是说到死亡，我应该如何怎么把死亡的概念交给学生，以及我本人应该怎么应对天花这种致命的疾病呢？他应该在童年时期就注射疫苗吗，还是我应该让他按照自然秩序受到感染？前一种方法与我们的做法一致，因为它保护了孩子不会在生命最珍贵的时期死去，而只是在生命不那么珍贵的时候冒一下险，如果我们所说的危险就是在处置得当的情况下给他注射疫苗的话。

But the other plan is more in accordance with our general principles—to leave nature to take the precautions she delights in, precautions she abandons whenever man interferes. The natural man is always ready; let nature inoculate him herself, she will choose the fitting occasion better than we.

但是第二种方法符合我们的一般原则，即让自然去采取它中意的保护措施，因为人一旦干预，自然就会撒手不管。自然状态下的人总是做好一切准备的。让自然去给他接种，它选择的时机比我们选的更合适。

Do not think I am finding fault with inoculation, for my reasons

for exempting my pupil from it do not in the least apply to yours. Your training does not prepare them to escape catching smallpox as soon as they are exposed to infection. If you let them take it anyhow, they will probably die. I perceive that in different lands the resistance to inoculation is in proportion to the need for it; and the reason is plain. So I scarcely condescend to discuss this question with regard to Emile. He will be inoculated or not according to time, place, and circumstances; it is almost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as far as he is concerned. If it gives him smallpox, there will be the advantage of knowing what to expect, knowing what the disease is; that is a good thing, but if he catches it naturally it will have kept him out of the doctor's hands, which is better.

不要认为我在说接种疫苗不好，因为我不让我的学生去接种的原因，并不适合你的学生。你的教育无法让他们暴露在天花病毒的环境中而不被感染。如果你让他们突然感染上天花，他们可能会死的。我意识到，在不同的地方，对接种疫苗的抗拒程度是随对其的需要程度而变化，而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几乎不屑于讨论给爱弥儿接种疫苗的问题。他打不打疫苗，要视根据时间、地点和情况而定。对他来说，打还是不打，都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自然要让他得天花，我们可以预先知道长天花是什么样子，这到底是种什么疾病，这是件好事。如果他是自然感染的，那也不需要看医生，这样更好。

An exclusive education, which merely tends to keep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it apart from the mass of mankind, always selects such teaching as is costly rather than cheap, even when the latter is of more use. Thus all carefully educated young men learn to ride, because it is costly, but scarcely any of them learn to swim, as it costs nothing, and an artisan can swim as well as any one. Yet without passing through the riding school, the traveller learns to

mount his horse, to stick on it, and to ride well enough for practical purposes; but in the water if you cannot swim you will drown, and we cannot swim unless we are taught. Again, you are not forced to ride on pain of death, while no one is sure of escaping such a common danger as drowning. Emile shall be as much at home in the water as on land. Why should he not be able to live in every element? If he could learn to fly, he should be an eagle; I would make him a salamander, if he could bear the heat.

上层社会的教育，仅仅是为了将受教育的对象和普通大众分离开来，所以他们总是选择昂贵的科目而不选便宜的，尽管后者的用处更大。因此，所有受到悉心教导的年轻人都要学习骑马，因为这更花钱，但是他们没几个人会学游泳，因为游泳是不花钱的，一个工匠都能和他们游得一样好。但是，就算没上过骑马学校，旅行者也能学会怎么上马、怎么不从马背上掉下来，为了实际目的能把骑马练得足够好。但是如果你不会游泳，到了水里就会淹死，而且如果不学我们便不会游泳。再重复一遍，你不一定要冒着生命危险骑马，但是也没人能保证你能逃脱很寻常的危险，比如溺水。爱弥儿应该在水里能跟在陆上一样生活。为什么他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生活呢？如果他能学会飞翔，他应该是一只雄鹰。如果他能忍受酷热，我会让他成为一只蝾螈。

People are afraid lest the child should be drowned while he is learning to swim; if he dies while he is learning, or if he dies because he has not learnt, it will be your own fault. Foolhardiness is the result of vanity; we are not rash when no one is looking. Emile will not be foolhardy, though all the world were watching him. As the exercise does not depend on its danger, he will learn to swim the Hellespont by swimming, without any danger, a stream in his father's park; but he must get used to danger too, so as not to be

flustered by it. Thi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apprenticeship I spoke of just now. Moreover, I shall take care to proportion the danger to his strength, and I shall always share it myself, so that I need scarcely fear any imprudence if I take as much care for his life as for my own.

孩子学游泳的时候，人们总担心他会淹死。如果他在学习的过程中死了，或者因为没学过所以淹死了，都是你的责任。有勇无谋是虚荣自负的后果。当没人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会鲁莽行事的。爱弥儿不会有勇无谋，尽管全世界都在看着他。由于练习不是冒险，他会在父亲的庄园的小河里游泳，以此学会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这样做一点危险也不会有。但是他也必须习惯面对危险，这样才不会在危险到来时乱了方寸。这就是我刚刚说的，童年学习过程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另外，我会根据他的体力来调整危险程度，我也会跟他一起面对。如果我像关心自己的生命那样关心他，就几乎不需要担心他会做出轻率的行为。

A child is smaller than a man; he has not the man's strength or reason, but he sees and hears as well or nearly as well; his sense of taste is very good, though he is less fastidious, and he distinguishes scents as clearly though less sensuously. The senses are the first of our faculties to mature; they are those most frequently overlooked or neglected.

孩子比成人弱小得多。他没有成人那样的体力和理性，但是他的视觉和听觉都跟成人一样好或者几乎一样好。他的味觉也很棒，尽管他不会像成人那么挑剔。他能清楚地区分气味，尽管他不会像成人那么灵敏。我们身上最先成熟的官能就是感官，但是它们也是最经常被忽视的。

To train the senses it is not enough merely to use them; we must learn to judge by their means, to learn to feel, so to speak; for we cannot touch, see, or hear, except as we have been taught.

仅仅通过使用是不足以训练感官的，我们必须通过使用它们去学习判断，学习感知。也就是说，除非经过学习，否则我们是不知道怎么去摸、去看、去听的。

There is a mere natural and mechanical use of the senses which strengthens the body without improving the judgment. It is all very well to swim, run, jump, whip a top, throw stones; but have we nothing but arms and legs? Have we not eyes and ears as well; and are not these organs necessary for the use of the rest? Do not merely exercise the strength, exercise all the senses by which it is guided; make the best use of every one of them, and check the results of one by the other. Measure, count, weigh, compare. Do not use force till you have estimated the resistance; let the estimation of the effect always preced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ans. Get the child interested in avoiding insufficient or superfluous efforts. If in this way you train him to calculate the effects of all his movements, and to correct his mistakes by experience, is it not clear that the more he does the wiser he will become?

只是增强体力却不提高判断力，这仅仅是自然地、机械地使用感官。游泳、跑步、跳高、抽陀螺、扔石子，这些都是很好的锻炼；但是难道我们只有手和腿吗？难道我们只有眼睛和耳朵吗？难道剩下的器官对于它们都没有用处吗？不要仅仅锻炼体力，还要锻炼一切有指挥体力的感官。让所有感官都得到最好的利用，要用一种感官去核实

另一种感官获得的印象。测量、计算、称重、比较。在你估计好阻力之前不要用力，在采取办法前先估计效果。让孩子对如何避免体力使用得不够或者使用得太多这件事感兴趣。如果通过这种办法，你训练了孩子做任何事前先估计一下效果，通过实践纠正了他的错误，这样，他做的越多，就会变得越聪明，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Take the case of moving a heavy mass; if he takes too long a lever, he will waste his strength; if it is too short, he will not have strength enough; experience will teach him to use the very stick he needs. This knowledge is not beyond his years. Take, for example, a load to be carried; if he wants to carry as much as he can, and not to take up more than he can carry, must he not calculate the weight by the appearance? Does he know how to compare masses of like substance and different size, or to choose between masses of the same size and different substances? He must set to work to compare their specific weights. I have seen a young man, very highly educated, who could not be convinced, till he had tried it, that a bucket full of blocks of oak weighed less than the same bucket full of water.

就拿移动一块沉重的物体来举例，如果他拿了一根过长的杠杆，这会浪费自己的力量。如果杠杆太短，力量又不够。经验会教他如何选择他最需要的杠杆。这一知识并不超出他这个年纪的掌握范围。再拿一堆需要被搬运的东西举例，如果他想在能力范围之内搬动尽量多的东西，难道他不是必须得根据这些东西的外观来计算其重量吗？他知道如何比较材质相同、大小不同物体的重量吗，或者在大小相同、材质不同的东西之间进行选择？他必须要动手试一试才能比较其确切重量。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年轻人，受过很高的教育，但他就是不信一篮子橡木块比同样一篮子的水要轻，直到他自己拎过以后。

All our senses are not equally under our control. One of them, touch, is always busy during our waking hours; it is spread over the whole surface of the body, like a sentinel ever on the watch to warn us of anything which may do us harm. Whether we will or not, we learn to use it first of all by experience, by constant practice, and therefore we have less need for special training for it. Yet we know that the blind have a surer and more delicate sense of touch than we, for not being guided by the one sense, they are forced to get from the touch what we get from sight. Why, then, are not we trained to walk as they do in the dark, to recognise what we touch, to distinguish things about us; in a word, to do at night and in the dark what they do in the daytime without sight? We are better off than they while the sun shines; in the dark it is their turn to be our guide. We are blind half our time, with this difference: the really blind always know what to do, while we are afraid to stir in the dark. We have lights, you say. What always artificial aids. Who can insure that they will always be at hand when required. I had rather Emil's eyes were in his finger tips, than in the chandler's shop.

我们对所有感官的使用是不平均的。其中之一的触觉，在我们清醒的时候总是很忙碌。触觉遍布身体表面，就像永远在站岗的哨兵，来警告任何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东西。不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总是先通过经验和持续不断的实践来学习使用触觉，因此，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的特殊训练就会少一些。现在我们知道盲人比我们拥有更准确、更灵敏的触觉，因为他不是只受一种感官指导，我们靠视觉获取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使用触觉才能得到。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盲人那样，训练自己在黑暗中行走，去辨别我们触碰到的东西，去分辨我们周围的物体。总而言之，他们能在白天盲着眼睛做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晚上、在黑暗中去做呢？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情况比他们好。但是到了黑暗中，他们就反过来成为我们的向导了。我们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是看不见的，其中的区别在于：真正的盲人总是知

道要做什么，而我们只是在黑暗中动一动都怕的不行。你说，我们有光。这是人造的帮助。谁能确保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总能获得光源？所以，我宁可爱弥儿的指尖上长眼睛，也不愿他去杂货铺买蜡烛。

If you are shut up in a building at night, clap your hands, you will know from the sound whether the space is large or small, if you are in the middle or in one corner. Half a foot from a wall the air, which is refracted and does not circulate freely, produces a different effect on your face. Stand still in one place and turn this way and that; a slight draught will tell you if there is a door open. If you are on a boat you will perceive from the way the air strikes your face not merely the direction in which you are going, but whether the current is bearing you slow or fast. These observations and many others like them can only be properly made at night; however much attention we give to them by daylight, we are always helped or hindered by sight, so that the results escape us. Yet here we use neither hand nor stick. How much may be learnt by touch, without ever touching anything!

如果你在晚上被关在了一幢大楼里，拍拍手，你就能从回声判断周围的空间是开阔还是狭窄，你是在中央还是角落。离墙半英尺远，这个距离会让空气折射但无法自由流动，这会在你的脸上产生不同的感觉。站在同一个位置向四面转身，轻微的气流能告诉你身边是不是有一扇开着的门。如果你在一条船上，可以观察迎面而来的风势，这不仅仅是船行进的方向，还能告诉你这风是帮你走得慢还是快。这些观察，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情况，它们只有在晚上才能获得。而到了白天，不管你投入多少注意力，视觉总会帮助或者阻碍我们，因此我们无法获得这些结果。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借助手或者棍子。还没用上触觉就能学到这么多，如果加上触觉我们该学到多少知识啊！

I would have plenty of games in the dark! This suggestion is more valuable than it seems at first sight. Men are naturally afraid of the dark; so are some animals. [3_19] Only a few men are freed from this burden by knowledge, determination, and courage. I have seen thinkers, unbelievers, philosophers, exceedingly brave by daylight, tremble like women at the rustling of a leaf in the dark. This terror is put down to nurses' tales; this is a mistake; it has a natural cause. What is this cause? What makes the deaf suspicious and the lower classes superstitious? Ignorance of the things about us, and of what is taking place around us. [3_20]

我会和学生在黑暗中做许多游戏。这个建议远比第一眼看起来更有价值。人类天生怕黑，一些动物也是 [4_19] 。只有少数人能通过知识、决心和勇气摆脱这种恐惧。我曾见过思想家、无信仰者、哲学家在白天有超人的勇气，但一到黑暗中就像女人听到沙沙作响的树叶似的颤抖。人们常把这种恐惧归咎于保姆讲的故事，这种看法是错的，这种恐惧是自然原因导致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让耳聋的人猜疑，让下层阶级的人迷信？是我们对周围事物的事物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无所知 [4_20] 。

When under special conditions we cannot form a fair idea of distance, when we can only judge things by the size of the angle or rather of the image formed in our eyes, we cannot avoid being deceived as to the size of these objects. Every one knows by experience how when we are travelling at night we take a bush near at hand for a great tree at a distance, and vice versa. In the same way, if the objects were of a shape unknown to us, so that we could not tell their size in that way, we should be equally mistaken with regard to it. If a fly flew quickly past a few inches from our eyes, we should think it was a distant bird; a horse standing still at

a distance from us in the midst of open country, in a position somewhat like that of a sheep, would be taken for a large sheep, so long as we did not perceive that it was a horse; but as soon as we recognise what it is, it seems as large as a horse, and we at once correct our former judgment.

当处于特殊环境下时，我们无法对距离形成客观的概念，当我们只能根据角度的大小或者说物体在我们眼中形成的形象对其进行判断时，我们无法避免地会弄错这些物体的大小。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在夜晚旅行时，我们总会把近处的灌木丛当成远处的大树，反之亦然。同样地，如果我们不知道物体的形状，我们也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判断其大小，还是一样要出错的。如果一只苍蝇在离我们的眼睛只有几英寸的地方快速飞过，我们会认为那是一只远处的鸟。一匹站在开阔田野中一动不动的马，从某个位置看过去似乎是一只羊。只要我们没有察觉到那是一匹马，它就会被认为是一只肥大的羊。但是只要我们认出了它是什么，它看上去就像马一样大了，我们会立刻纠正之前的判断。

Whenever one finds oneself in unknown places at night where we cannot judge of distance, and where we cannot recognise objects by their shape on account of the darkness, we are in constant danger of forming mistaken judgments as to the objects which present themselves to our notice. Hence that terror, that kind of inward fear experienced by most people on dark nights. This is foundation for the supposed appearances of spectres, or gigantic and terrible forms which so many people profess to have seen. They are generally told that they imagined these things, yet they may really have seen them, and it is quite possible they really saw what they say they did see; for it will always be the case that when we can only estimate the size of an object by the angle it forms in the

eye, that object will swell and grow as we approach it; and if the spectator thought it several feet high when it was thirty or forty feet away, it will seem very large indeed when it is a few feet off; this must indeed astonish and alarm the spectator until he touches it and perceives what it is, for as soon as he perceives what it is, the object which seemed so gigantic will suddenly shrink and assume its real size, but if we run away or are afraid to approach, we shall certainly form no other idea of the thing than the image formed in the eye, and we shall have really seen a gigantic figure of alarming size and shape. There is, therefore, a natural ground for the tendency to see ghosts, and these appearances are not merely the creation of the imagination, as the men of science would have us think. —Buffon, Nat. Hist.

无论什么时候，当人发现自己晚上身处陌生的地方，我们就无法判断距离。由于黑暗，我们无法通过物体的形状辨认它们。对于这些在我们面前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我们会持续处于错下判断的危险中。这就是大多数人在黑暗的夜晚经历过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恐惧。许多人声称自己见过幽灵、鬼怪或者其他可怕的影像，就是这个原因。人们通常会告诉他们，这些都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但是也许他们真的看到过，很可能真的看到过自己声称曾经见过的东西。因为，当我们只能根据物体在眼前的角度来估计它的形状时，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会膨胀、变大。当物体还有三四十英尺远的时候，如果观察者认为它只有几英尺高，那么当它只有几英尺远的时候，就会看上去非常巨大。这肯定会使观察者吃惊不已，同时也会警告他，必须要去触摸、观察一下，因为只要他能观察到那是什么，这个看上去无比庞大的物体会突然缩水，回到它真实的尺寸。但是，如果我们逃走或者害怕接近，除了呈现在眼前的形象，我们对其不会再形成任何其他概念，我们就会真的看到一个庞然大物，有着令人害怕的尺寸和形状。因此，人们会看到鬼是有其自然原因的，那些形象的出现，并不是像科学家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想象力。——布丰，博物学

In the text I have tried to show that they are always partly the creation of the imagination, and with regard to the cause explained in this quotation, it is clear that the habit of walking by night should teach us to distinguish those appearances which similarity of form and diversity of distance lend to the objects seen in the dark. For if the air is light enough for us to see the outlines there must be more air between us and them when they are further off, so that we ought to see them less distinctly when further off, which should be enough, when we are used to it, to prevent the error described by M. Buffon.

在文章中，我已经尝试说明这些形象部分是想象力的产物，而从引用的这一段解释来看，很明显，走夜路的习惯能够教会我们分辨事物，它们由于形状相似和距离差异而在黑夜中显现出种种模样。如果空气足够轻薄，能让我们看清事物的轮廓，当距离变长，我们和事物之间的空气也会越多，因此这时我们就看得不那么真切了，而当我们习惯之后，就可以防止布丰先生所描述的错觉的发生。

[Whichever explanation you prefer, my mode of procedure is still efficacious, and experience entirely confirms it.] Accustomed to perceive things from a distance and to calculate their effects, how can I help supposing, when I cannot see, that there are hosts of creatures and all sorts of movements all about me which may do me harm, and against which I cannot protect myself? In vain do I know I am safe where I am; I am never so sure of it as when I can actually see it, so that I have always a cause for fear which did not exist in broad daylight. I know, indeed, that a foreign body can scarcely act upon me without some slight sound, and how intently I listen! At the least sound which I cannot explain, the desire of self-

preservation makes me picture everything that would put me on my guard, and therefore everything most calculated to alarm me.

[不管你更偏爱哪一种解释，我的方法都是有效的，经验足够证明这一点。]假如习惯于远距离观察事物并计算它们会产生的影响，那么当我看不见时，我会情不自禁地去假设在我周围有许许多多的生物和各种各样的动作会对我造成伤害，但是我却无法保护自己，难道不是吗？即使我知道自己处于平安的地方也是徒劳的；只有当我真真切切地看到时我才能确定，因此我总有害怕的理由，而这种恐惧在白天是不存在的。我知道，外物不可能在一点声音都不发出的情况下对我产生作用，所以我始终很警惕地听着！至少，当我听到我解释不了的声音时，自我保护的欲望会让我想象出任何需要提防的事物，因此，所有可以预测的东西都让我感到恐惧。

I am just as uneasy if I hear no sound, for I might be taken unawares without a sound. I must picture things as they were before, as they ought to be; I must see what I do not see. Thus driven to exercise my imagination, it soon becomes my master, and what I did to reassure myself only alarms me more. I hear a noise, it is a robber; I hear nothing, it is a ghost. The watchfulness inspired by the instinct of self-preservation only makes me more afraid. Everything that ought to reassure me exists only for my reason, and the voice of instinct is louder than that of reason. What is the good of thinking there i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since in that case there is nothing we can do?

如果我什么都听不见，我同样会坐立不安，因为听不到声音会让我失去防范意识。我就必须记住事物原来的样子，或者它们应该具有的样子；我必须看到我无法看到的东西。因此，我被强迫锻炼了想象

力，很快它就控制了我，这样一来我为了让自己放心而做的事只会让我更加害怕。我听到一点点噪音，就觉得是强盗来了；我听不到声音，就觉得是鬼魂来了。这种警惕性是被自我保护的本能激发的，它只会让我更害怕。这时候要镇定下来只能靠我的理智，然后，本能的声音盖过了理智。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无计可施所以没什么好怕的，那去想这些又有什么好处呢？

The cause indicates the cure. In everything habit overpowers imagination; it is only aroused by what is new. It is no longer imagination, but memory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what we see every day, and that is the reason of the maxim, “Ab assuetis non fit passio,” for it is only at the flame of imagination that the passions are kindled. Therefore do not argue with any one whom you want to cure of the fear of darkness; take him often into dark places and be assured this practice will be of more avail than all the arguments of philosophy. The tiler on the roof does not know what it is to be dizzy, and those who are used to the dark will not be afraid.

原因暗示着应对方法。在每一件事情上，习惯会压制想象力；只有新的事物能激发想象力。现在，发挥作用的不再是想象，而是对我们每天所见的记忆，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见怪不怪”这种格言的原因，因为只有想象的火焰才会点燃激情。因此，对于那些你想帮助其克服对黑暗的恐惧的人，不要和他们争论，只要经常把他们带到黑暗的地方，你要相信这种练习比任何理论争辩都有效。房顶上的瓦匠从来不知道眩晕是什么感觉，而习惯了黑暗的人也不会再觉得害怕。

There is another advantage to be gained from our games in the dark. But if these games are to be a success I cannot speak too strongly of the need for gaiety. Nothing is so gloomy as the dark: do

not shut your child up in a dungeon, let him laugh when he goes, into a dark place, let him laugh when he comes out, so that the thought of the game he is leaving and the games he will play next may protect him from the fantastic imagination which might lay hold on him.

在黑暗中游戏还有一个好处。但是，如果游戏要取得成功，玩的时候必须要很快乐。再没有比黑暗更阴郁的东西了。不要把孩子关在地牢里，当他进入或走出黑暗的地方时，让他放声大笑，这样他就会想着快要做完的游戏和接下来要玩的另外的游戏，这或许能防止那些荒唐的想象将他牢牢抓住。

There comes a stage in life beyond which we progress backwards. I feel I have reached this stage. I am, so to speak, returning to a past career. The approach of age makes us recall the happy days of our childhood. As I grow old I become a child again, and I recall more readily what I did at ten than at thirty. Reader, forgive me if I sometimes draw my examples from my own experience. If this book is to be well written, I must enjoy writing it.

人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个时期，过了这个时期之后，我们在前进的同时也在后退。我感觉自己已经到达这个阶段了。也就是说，我正在回到过去的生活。接近这个年纪会让我回忆童年的快乐时光。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又变回了孩子，与回忆三十岁时做的事相比，我更乐意回忆十岁时的事情。读者朋友，如果我偶尔从自己的经历中举例，请原谅我。如果这本书要写得好，必须让我享受这个写作的过程。

I was living in the country with a pastor called M. Lambercier.

My companion was a cousin richer than myself, who was regarded as the heir to some property, while I, far from my father, was but a poor orphan. My big cousin Bernard was unusually timid, especially at night. I laughed at his fears, till M. Lambercier was tired of my boasting, and determined to put my courage to the proof. One autumn evening, when it was very dark, he gave me the church key, and told me to go and fetch a Bible he had left in the pulpit. To put me on my mettle he said something which made it impossible for me to refuse.

那个时候，我和一位名叫伦堡希的牧师住在乡下。我的玩伴是我的表亲，他比我富裕得多，大家都把他看做是家族财产的继承人，而我远远地离开了我的父亲，只是个贫穷的孤儿。我的大表兄，伯纳德，却异乎寻常地胆小，尤其是在晚上。我嘲笑他的恐惧，直到伦堡希先生听我吹牛都听得厌烦了，他决定心要检验我的勇气。一个秋天的夜晚，天非常黑，他给了我教堂的钥匙，让我去把他落在讲坛上的圣经拿来。为了激励我，他说了一些话，使我不可能拒绝他的要求。

I set out without a light; if I had had one, it would perhaps have been even worse. I had to pass through the graveyard; I crossed it bravely, for as long as I was in the open air I was never afraid of the dark.

我出发了，连照明工具都没有，但是如果我拿了，只怕情况会更糟。我必须穿过一片墓地，我勇敢地走过去了，因为只要我在室外，我永远不会怕黑。

As I opened the door I heard a sort of echo in the roof; it

sounded like voices and it began to shake my Roman courage. Having opened the door I tried to enter, but when I had gone a few steps I stopped. At the sight of the profound darkness in which the vast building lay I was seized with terror and my hair stood on end. I turned, I went out through the door, and took to my heels. In the yard I found a little dog, called Sultan, whose caresses reassured me. Ashamed of my fears, I retraced my steps, trying to take Sultan with me, but he refused to follow. Hurriedly I opened the door and entered the church. I was hardly inside when terror again got hold of me and so firmly that I lost my head, and though the pulpit was on the right, as I very well knew, I sought it on the left, and entangling myself among the benches I was completely lost. Unable to find either pulpit or door, I fell into an indescribable state of mind. At last I found the door and managed to get out of the church and run away as I had done before, quite determined never to enter the church again except in broad daylight.

当我开门的时候，我听到从房顶折射的回声，听起来像人的声音，我那骑士一般的勇气开始动摇了。开了门之后，我打算进去，但我走了没几步，就停下来了。我看到这间空旷的屋子里深不见底的漆黑，恐惧立刻攫住了我，吓得我头发倒立。我转身冲出门，拔腿就跑。在院子里，我看到一只小狗，它叫苏丹，它在我身上蹭来蹭去，这使我安定下来。我为自己的恐惧感到羞愧，想带着苏丹和我一起返回去，但它不愿意跟着我。我急忙打开门，冲进了教堂。我刚一进门，突然恐惧再一次攫住了我，这种恐惧太强烈，我已经不知所措，尽管我清楚地知道讲坛在我的右手边，但我却往左边找了半天，我在一片长凳中绊来绊去，几乎是迷路了。我既找不到讲坛，也找不到门，心里的感觉难以名状。最后我终于找到了门的位置成功跑出了教堂，像我之前那样逃走了，决定以后除了白天，再也不会进入这座教堂了。

I returned to the house; on the doorstep I heard M. Lambercier laughing, laughing, as I supposed, at me. Ashamed to face his laughter, I was hesitating to open the door, when I heard Miss Lambercier, who was anxious about me, tell the maid to get the lantern, and M. Lambercier got ready to come and look for me, escorted by my gallant cousin, who would have got all the credit for the expedition. All at once my fears departed, and left me merely surprised at my terror. I ran, I fairly flew, to the church; without losing my way, without groping about, I reached the pulpit, took the Bible, and ran down the steps. In three strides I was out of the church, leaving the door open. Breathless, I entered the room and threw the Bible on the table, frightened indeed, but throbbing with pride that I had done it without the proposed assistance.

我回到家，在门阶上时听到伦堡希先生的大笑，我觉得他在笑我。我羞于面对他的笑声，犹豫着要不要开门，突然我听到伦堡希夫人说她很担心我，吩咐仆人准备好灯笼，伦堡希先生已经准备好亲自出门去找我，还要让我勇敢的表兄陪着他，表兄因为这次远征获得了所有的赞扬。突然，我的恐惧全都离我而去，只留下我对自己的这种害怕惊讶不已。我扭头就往教堂跑，几乎要飞起来了。我没有迷路，也没有摸索，迅速地找到了讲坛，拿到了圣经，跑下台阶。我三步就跨出了教堂，连门也忘记关了。我上次不接下气地回了家，把圣经朝桌子上一扔，虽然确实很害怕，但骄傲在胸腔中跳动着，我成功了，不靠任何人的帮助。

You will ask if I am giving this anecdote as an example, and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mirth which I say should accompany these games. Not so, but I give it as a proof that there is nothing so well calculated to reassure any one who is afraid in the dark as to hear sounds of laughter and talking in an adjoining room. Instead of

playing alone with your pupil in the evening, I would have you get together a number of merry children; do not send them alone to begin with, but several together, and do not venture to send any one quite alone, until you are quite certain beforehand that he will not be too frightened.

你会问我是不是在把这件轶事作为例子，作为例证，以此证明我所说的那些游戏带来的乐趣。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要用它来证明，对于害怕黑暗的人，没有什么比听到附近的房子里传来欢笑声和说话声更能使他安心的了。我希望让你能找到一群快乐的孩子一起玩，而不仅仅是你和学生两个人。不要一开始就让他们单独行动，要几个人一起。在你无法确定某一个孩子不会在黑暗里感到太害怕之前，不要冒险让他一个人出去。

I can picture nothing more amusing and more profitable than such games, considering how little skill is required to organise them. In a large room I should arrange a sort of labyrinth of tables, armchairs, chairs, and screens. In the inextricable windings of this labyrinth I should place some eight or ten sham boxes, and one real box almost exactly like them, but well filled with sweets. I should describe clearly and briefly the place where the right box would be found. I should give instructions sufficient to enable people more attentive and less excitable than children to find it. [3_21] Then having made the little competitors draw lots, I should send first one and then another till the right box was found. I should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the task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kill.

我找不出比这更有趣、更有益处的游戏了，考虑到这种游戏组织起来甚至都不需要什么技巧。如果房间很大，我会用桌子、椅子、凳

子、屏风组成迷宫。在这来回交错、弯弯曲曲的迷宫中，我会放置八个或十个空盒子和一个真的盒子，两者从外表上看一模一样，但真盒子里装满了糖果。我会清楚简洁地交代清楚正确的盒子放在哪个位置。我给出的指示足以使那些更细心、不那么一惊一乍的孩子找到它[4_21]。接着，在让孩子们抽过签之后，我就派他们一个一个去找，直到真的盒子被找到为止。随着他们技巧的增长，我会逐步增加任务的难度。

Picture to yourself a youthful Hercules returning, box in hand, quite proud of his expedition. The box is placed on the table and opened with great ceremony. I can hear the bursts of laughter and the shouts of the merry party when, instead of the looked-for sweets, he finds, neatly arranged on moss or cotton-wool, a beetle, a snail, a bit of coal, a few acorns, a turnip, or some such thing. Another time in a newly whitewashed room, a toy or some small article of furniture would be hung on the wall and the children would have to fetch it without touching the wall. When the child who fetches it comes back, if he has failed ever so little to fulfil the conditions, a dab of white on the brim of his cap, the tip of his shoe, the flap of his coat or his sleeve, will betray his lack of skill.

想象一下，孩子像小小的赫拉克勒斯一样回来，手上拿着盒子，为自己的冒险而感到骄傲无比。盒子被放在桌上，孩子郑重其事地打开了它。我可以听到他们爆发出阵阵笑声和尖叫声，那个孩子发现里面不是所期待的糖果，而是在苔藓或棉花上放得整整齐齐的一只甲虫、一只蜗牛、一块煤炭、几粒橡子、一颗大头菜，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另外一次，在一间新粉刷过的房间里，我在墙上挂了一个玩具或其他什么小玩意儿，孩子必须在不碰到墙壁的前提下拿到它们。当孩子返回时，如果他没有做到我们定下的规矩，他的帽檐、鞋尖、衣襟、袖扣会沾上一点白，显示出他缺乏技巧的事实。

This is enough, or more than enough, to show the spirit of these games. Do not read my book if you expect me to tell you everything.

我说的已经足够展示这种游戏的精神了，或许还说得太多了。如果你指望我告诉你所有的事，那还是不要看这本书了。

What great advantages would be possessed by a man so educated,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s. His feet are accustomed to tread firmly in the dark, and his hands to touch lightly; they will guide him safely in the thickest darkness. His imagination is busy with the evening games of his childhood, and w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turn towards objects of alarm. If he thinks he hears laughter, it will be the laughter of his former playfellows, not of frenzied spirits; if he thinks there is a host of people, it will not be the witches' sabbath, but the party in his tutor's study. Night only recalls these cheerful memories, and it will never alarm him; it will inspire delight rather than fear. He will be ready for a military expedition at any hour, with or without his troop. He will enter the camp of Saul, he will find his way, he will reach the king's tent without waking any one, and he will return unobserved. Are the steeds of Rhesus to be stolen, you may trust him. You will scarcely find a Ulysses among men educated in any other fashion.

受过这样教育的人，和其他人比较起来，会具有多么大的优势啊！他的双脚已习惯于在黑暗中坚定地行走，双手已习惯于轻轻触摸出周围的物体，这种技巧能在黑暗中安全地指导他。他的想象力正被那些童年时期在夜晚玩过的游戏所占据，根本没空去看那些吓人的东

西。当他回忆的时候，他听到了笑声，那是他从前的玩伴发出的笑声，而不是吓人的鬼怪。如果他觉得黑暗中有一群人，那也不是女巫的爪牙，而是他的老师叫来参加派对的。夜晚只会让他想起这些快乐的回忆，而从不会让他害怕。夜晚只会激发出快乐而不是恐惧。在行军中，不论有没有跟着队伍，他都随时整装待发。他走进扫罗的军营也不会迷路。他会在不吵醒任何人的情况下接近国王的帐篷，然后不被察觉地平安返回。你可以放心地让他去偷雷苏士的骏马。然而，如果你要在通过其他方法教育出来的人中找到一位尤利西斯，是很困难的。

I have known people who tried to train the children not to fear the dark by startling them. This is a very bad plan; its effects are just the opposite of those desired, and it only makes children more timid. Neither reason nor habit can secure us from the fear of a present danger whose degree and kind are unknown, nor from the fear of surprises which we have often experienced. Yet how will you make sure that you can preserve your pupil from such accidents? I consider this the best advice to give him beforehand. I should say to Emile, “This is a matter of self-defence, for the aggressor does not let you know whether he means to hurt or frighten you, and as the advantage is on his side you cannot even take refuge in flight. Therefore seize boldly anything, whether man or beast, which takes you unawares in the dark. Grasp it, squeeze it with all your might; if it struggles, strike, and do not spare your blows; and whatever he may say or do, do not let him go till you know just who he is. The event will probably prove that you had little to be afraid of, but this way of treating practical jokers would naturally prevent their trying it again.”

我知道有些人通过吓孩子的办法来训练他们消除对黑暗的恐惧。

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它的效果会与他们想要的相反，只会让孩子更胆小。对于正摆在眼前的、程度和种类未知的危险，对于我们经常经历的惊吓，理性和习惯都无法驱赶我们的恐惧。你如何确定自己可以保护你的学生免受这样的意外呢？我认为这是能提前给他的最好建议。我应该对爱弥儿说，“这是关于自我防卫的问题，因为侵犯者不会让你知道他的意图是伤害你还是恐吓你，由于他占据着优势，所以你连跑都跑不掉。因此，不论是人还是野兽，如果他们在黑暗中让你措手不及，你就勇敢地抓住他们。抓紧他，尽你所能地去掐他。如果他挣扎，你就狠狠地打他。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在你知道他是什么以前不要让他走。这件事也许会证明你一点都不害怕，但用这样的方式对待那个开玩笑来吓你的人，自然会让他不敢再做第二次了。”

Although touch is the sense oftenest used, its discrimination remains, as I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coarser and more imperfect than that of any other sense, because we always use sight along with it; the eye perceives the thing first, and the mind almost always judges without th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discrimination by touch is the surest just because of its limitations; for extending only as far as our hands can reach, it corrects the hasty judgments of the other senses, which pounce upon objects scarcely perceived, while what we learn by touch is learnt thoroughly. Moreover, touch, when required, unites the force of our muscles to the action of the nerves; we associate by simultaneous sensations our ideas of temperature, size, and shape, to those of weight and density. Thus touch is the sense which best teaches us the action of foreign bodies upon ourselves, the sense which most directly supplies us with the knowledge required for self-preservation.

尽管触觉是我们最常用的感官，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与我们其他感官相比，触觉的辨别力来得更为粗糙和不完善，因为我们总是将

它和视觉一起使用。眼睛总是先看到事物，在手还没触摸以前，心里已经下了判断了。另一方面，触觉带来的判断又是最准确的，因为它有局限。触觉最远只能延伸到手可以触碰的范围，这就纠正了其他感官的错误。其他感官所能到达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它们能感觉到的事物本身，而通过触觉获得的感受是很清楚彻底的。另外，触觉能在需要的时候将肌肉的力量和神经系统的活动结合起来。通过同时产生的感觉，我们把对温度、大小、形状和对重量、硬度的判断结合在一起。因此，当外物接触我们的身体时，触觉能教给我们最正确的印象，这种印象能最直接地向我们提供自我生存所需的知识。

As the trained touch takes the place of sight, why should it not, to some extent, take the place of hearing, since sounds set up, in sonorous bodies, vibrations perceptible by touch? By placing the hand on the body of a 'cello one can distinguish without the use of eye or ear, merely by the way in which the wood vibrates and trembles, whether the sound given out is sharp or flat, whether it is drawn from the treble string or the bass. If our touch were trained to note these differences, no doubt we might in time become so sensitive as to hear a whole tune by means of our fingers. But if we admit this, it is clear that one could easily speak to the deaf by means of music; for tone and measure are no less capable of regular combination than voice and articulation, so that they might be used as the elements of speech.

如果受过训练的触觉可以取代视觉，考虑到声音能够在发声物体中引起有触感的震动，那在某种程度上，触觉为什么不能取代听觉呢？当我们把手放在大提琴琴身上时，可以不借助眼睛和耳朵，仅仅依靠木头震动的方式，来分辨出它发出的是高音还是低音，是高音弦发出的还是低音弦发出的。如果我们能训练触觉去感受这些差异，毫无疑问，只要练习的够充分，我们就可以敏感到靠手指听出一首完整

的曲子。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方法可行，那我们便可以轻松地通过音乐和聋人交流了。因为音调和节拍结合的规律性并不比清音和浊音来的差，因此它们可以用来作为语言的要素。

There are exercises by which the sense of touch is blunted and deadened, and others which sharpen it and make it delicate and discriminating. The former, which employ much movement and force for the continued impression of hard bodies, make the skin hard and thick, and deprive it of its natural sensitiveness. The latter are those which give variety to this feeling, by slight and repeated contact, so that the mind is attentive to constantly recurring impressions, and readily learns to discern their variations. This difference is clear in the use of musical instruments. The harsh and painful touch of the 'cello, bass-viol, and even of the violin, hardens the finger-tips, although it gives flexibility to the fingers. The soft and smooth touch of the harpsichord makes the fingers both flexible and sensitive. In this respect the harpsichord is to be preferred.

有一些训练可以让我们的触觉变得迟钝，也有一些可以使其更加灵敏和细致。前者会采用许多动作和外力让身体不断地去感受坚硬物体，让皮肤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厚，由此夺走了它自然的敏感性。而后者，通过轻微、反复地接触物体，让感觉不断变化，以此让心灵去注意持续出现的印象，从而乐意去学习辨别它们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通过乐器的使用而一目了然。弹奏大提琴、低音古提琴、甚至是小提琴，都需要用力按压琴弦，这会让指尖变得粗糙，尽管手指的灵活性得到了提高。轻柔地弹奏大键琴则会让手指既灵活又敏感。从这个角度看，大键琴更好。

The skin protects the rest of the body,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rden it to the effects of the air that it may be able to bear its changes. With regard to this I may say I would not have the hand roughened by too servile application to the same kind of work, nor should the skin of the hand become hardened so as to lose its delicate sense of touch which keeps the body informed of what is going on, and by the kind of contact sometimes makes us shudder in different ways even in the dark.

皮肤可以保护身体，所以让皮肤受得住空气的影响、能够承受空气的种种变化是很重要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不会死板地一直做同一种工作，让我的手变得粗糙，也不会让手上的皮肤变得坚硬而丧失了敏锐的触觉。敏锐的触觉能不断告诉我们身体周围是什么状况，能通过接触，以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即使在黑暗中也能保持警惕。

Why should my pupil be always compelled to wear the skin of an ox under his foot? What harm would come of it if his own skin could serve him at need as a sole. It is clear that a delicate skin could never be of any use in this way, and may often do harm. The Genevese, aroused at midnight by their enemies in the depth of winter, seized their guns rather than their shoes. Who can tell whether the town would have escaped capture if its citizens had not been able to go barefoot?

为什么总要逼我学生穿上一块牛皮呢？如果他自己的皮肤在他需要的时候能够充当鞋底，又有什么不好呢？很明显，这种娇弱的皮肤毫无用处，甚至还可能经常带来害处。日内瓦人在隆冬的深夜被敌人吵醒，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抓起枪而不是穿鞋。如果他们不能光脚走路的话，谁能说这座城市不会被敌人占领呢？

Let a man be always fore-armed against the unforeseen. Let Emile run about barefoot all the year round, upstairs, downstairs, and in the garden. Far from scolding him, I shall follow his example; only I shall be careful to remove any broken glass. I shall soon proceed to speak of work and manual occupations. Meanwhile, let him learn to perform every exercise which encourages agility of body; let him learn to hold himself easily and steadily in any position, let him practise jumping and leaping, climbing trees and walls. Let him always find his balance, and let his every movement and gesture be regulated by the laws of weight, long before he learns to explain them by the science of statics. By the way his foot is planted on the ground, and his body supported on his leg, he ought to know if he is holding himself well or ill. An easy carriage is always graceful, and the steadiest positions are the most elegant. If I were a dancing master I would refuse to play the monkey tricks of Marcel, which are only fit for the stage where they are performed; but instead of keeping my pupil busy with fancy steps, I would take him to the foot of a cliff. There I would show him how to hold himself, how to carry his body and head, how to place first a foot then a hand, to follow lightly the steep, toilsome, and rugged paths, to leap from point to point, either up or down. He should emulate the mountain-goat, not the ballet dancer.

让人总是保持武装状态，来抵抗未知的一切。让爱弥儿一年到头都光着脚奔跑、上楼、下楼、跑过花园。我不会斥责他，我也会学他的样，我只需要注意清除地上的碎玻璃就行了。很快我就要谈到工作和体力劳动了。同时，让他进行所有能够增强身体灵活性的锻炼，让他在任何姿势下都能轻松地保持身体平稳，让他练习跳高跳远，爬树翻墙。让他总能保持平衡，在他学习用统计学解释这一切之前，按照重力的法则调整他的动作和姿势。通过他的脚站在地上的姿势，通过他的双腿支撑着身体的姿势，他应该知道自己站得稳不稳。不慌不忙

的举止总是得体的，最平稳的姿态是最优雅的。如果我是舞蹈大师，我不会表演马塞尔的猴子舞，这种舞蹈只适合他们表演的舞台。我会把我的学生带到悬崖，而不是让他跳那些华丽的舞步。在那儿，我会向他展示如何在岩石上保持身体的平稳，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和头，如何放置手和脚才能轻松地沿着那陡峭、费劲、崎岖的小路前进，爬上爬下的时候如何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他应该像一只山羊，而不是芭蕾舞者。

As touch confines its operations to the man's immediate surroundings, so sight extends its range beyond them;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misleading; man sees half his horizon at a glance. In the midst of this host of simultaneous impressions and the thoughts excited by them, how can he fail now and then to make mistakes? Thus sight is the least reliable of our senses, just because it has the widest range; it functions long before our other senses, and its work is too hasty and on too large a scale to be corrected by the rest. Moreover, the very illusions of perspective are necessary if we are to arrive at a knowledge of space and compare one part of space with another. Without false appearances we should never see anything at a distance; without the gradations of size and tone we could not judge of distance, or rather distance would have no existence for us. If two trees, one of which was a hundred paces from us and the other ten, looked equally large and distinct, we should think they were side by side. If we perceived the real dimensions of things, we should know nothing of space; everything would seem close to our eyes.

触觉的运用只能局限在人的周围，所以我们要靠视觉来扩大感知的范围。这也恰恰是视觉会误导我们的原因。人瞥一眼就能看到他的眼界内一半的物体。在这个过程中，会激发出许多同时产生的印象和

想法，所以人怎么可能不偶尔判断出错呢？因此，视觉是我们所有的感官中最不可靠的，因为它的范围太广，起作用的速度远远快于其他感官，这两点导致其他感官无法对其进行纠正。另外，如果我们知道关于空间的知识并对其中的部分加以比较，那么这种关于洞察的幻想是必要的。没有错误的表象，我们永远也看不到远处的东西。没有大小和色调的变化，我们无法判断距离，或者距离对于我们根本就不存在。两棵树，如果一棵离我们一百步远，另一棵离我们十步远，当两棵树看上去一样大而且看的同样清楚，我们就会觉得它们是并排的。如果我们察觉到事物的真正维度，我们就会对空间一无所知。任何事物看上去都是近在眼前的。

The angle formed between any objects and our eye is the only means by which our sight estimates their size and distance, and as this angle is the simple effect of complex causes, the judgment we form does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several causes; we are compelled to be inaccurate. For how can I tell, by sight alone, whether the angle at which an object appears to me smaller than another, indicates that it is really smaller or that it is further off.

任何物体和我们的眼睛之间形成的角度是我们的视觉估计大小和距离的唯一标准，而鉴于角度是许多复杂因素简化出来的效果，所以我们形成的判断是无法分辨出这些因素的，因此我们只能被迫接受不准确的结果。如果我看到一个物体比另一个物体小，我怎么能仅仅依靠视觉就判断出到底是因为这个物体真的更小呢还是由于它离我更远呢？

Here we must just reverse our former plan. Instead of simplifying the sensation, always reinforce it and verify it by means of another sense. Subject the eye to the hand, and, so to speak,

restrain the precipitation of the former sense by the slower and more reasoned pace of the latter. For want of this sort of practice our sight measurements are very imperfect. We cannot correctly, and at a glance, estimate height, length, breadth, and distance; and the fact that engineers, surveyors, architects, masons, and painters are generally quicker to see and better able to estimate distances correctly, proves that the fault is not in our eyes, but in our use of them. Their occupations give them the training we lack, and they check the equivocal results of the angle of vision by its accompanying experiences, which determine the relations of the two causes of this angle for their eyes.

谈到这儿，我们必须反转之前的计划。我们不仅不能简化感知，反而要强化它，要通过一种感官去验证另一种感官。让视觉从属于触觉，也就是说，用后者沉稳、理智的节奏去限制前者的仓促。因为如果缺乏这种练习，我们的视觉测量会变得非常不准确。我们无法通过一瞥来正确估计高度、长度、深度和距离。工程师、勘测员、建筑师、砖瓦匠、画家看东西更准，正确估算距离的能力更强，这也证明错不在我们的眼睛，而是我们使用的方法。他们的职业给了他们锻炼的契机，这是我们所缺乏的，他们会通过实践来检查由于观察角度而造成的模糊结果，这决定了他们眼前形成这个角度的两个原因之间的关系。

Children will always do anything that keeps them moving freely. There are countless ways of rousing their interest in measuring, perceiving, and estimating distance. There is a very tall cherry tree; how shall we gather the cherries? Will the ladder in the barn be big enough? There is a wide stream; how shall we get to the other side? Would one of the wooden planks in the yard reach from bank to bank? From our windows we want to fish in the moat; how

many yards of line are required? I want to make a swing between two trees; will two fathoms of cord be enough? They tell me our room in the new house will be twenty-five feet square; do you think it will be big enough for us? Will it be larger than this? We are very hungry; here are two villages, which can we get to first for our dinner?

孩子总是愿意做任何事来让他们能够自由活动。想要激发他们对测量、观察、估算距离的兴趣，有数不清的方法。那里有一棵很高的樱桃树，我们要怎么才能采到樱桃呢？车库里的梯子够高吗？那里有一条宽宽的河流，我们要怎么才能去对岸呢？院子里的木板能把我们从这边带到另一边吗？要从我们的窗子钓到壕沟里的鱼，需要几码的线呢？我想在两棵树之间挂一个秋千，两英寻的绳子够了吗？他们告诉我新家里的房间会有二十五平方英尺，你觉得这个面积对我们足够吗？会不会比这要再大一点？我们很饿，这里有两个村子，哪一个村子更近，能让我们先吃到晚饭？

An idle, lazy child was to be taught to run. He had no liking for this or any other exercise, though he was intended for the army. Somehow or other he had got it into his head that a man of his rank need know nothing and do nothing—that his birth would serve as a substitute for arms and legs, as well as for every kind of virtue. The skill of Chiron himself would have failed to make a fleet-footed Achilles of this young gentleman. The difficulty was increased by my determination to give him no kind of orders. I had renounced all right to direct him by preaching, promises, threats, emulation, or the desire to show off. How should I make him want to run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I might run myself, but he might not follow my example, and this plan had other drawbacks. Moreover, I must find some means of teaching him through this exercise, so as to train

mind and body to work together. This is how I, or rather how the teacher who supplied me with this illustration, set about it.

应该教懒惰的孩子去跑步。尽管他是要参军的，可是他没有任何类似的或者其他锻炼。不知怎的，他脑子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觉得像他这个级别的人什么也不需要知道，什么也不需要做，他的身份可以代替他的手脚，以及各种各样的美德。即使有希隆那样的才能也无法把这位年轻的绅士变成走路飞快的阿基里斯。由于我决心不给他下任何要求，导致这件事的困难不断增加。我已经正式放弃所有指挥他的权利，不管是说教、承诺、威吓、竞争，还是激发他炫耀的欲望。那我应该怎么在不发一语的情况下让他去跑步呢？我也许会自己去跑步，但他也可能不跟着我学，而且这个计划还有其他的缺陷。另外，我必须在这个锻炼中找到一些教育他的方式，以便同时训练他的身体和心智。我，或者说提供给我这个例子的老师，开始了以下方法。

When I took him a walk of an afternoon I sometimes put in my pocket a couple of cakes, of a kind he was very fond of; we each ate one while we were out, and we came back well pleased with our outing. One day he noticed I had three cakes; he could have easily eaten six, so he ate his cake quickly and asked for the other. “No,” said I, “I could eat it myself, or we might divide it, but I would rather see those two little boys run a race for it.” I called them to us, showed them the cake, and suggested that they should race for it. They were delighted. The cake was placed on a large stone which was to be the goal; the course was marked out, we sat down, and at a given signal off flew the children! The victor seized the cake and ate it without pity in the sight of the spectators and of his defeated rival.

一天下午，当我带着他散步的时候，我在口袋里放了两块蛋糕，都是他喜欢的种类，在散步的过程中我们一人吃了一块，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一天，他注意到我带了三块蛋糕，这种蛋糕他可以一口气吃六个，所以他吃完一块之后就问我讨要另一块。“不行，”我说，“我可以自己吃，或者跟你分，但我更想看两个小男孩通过跑步来争夺它。”我把小男孩叫过来，给他们看这块蛋糕，提议他们应该通过跑步来争取它。男孩们听了很高兴。我把蛋糕放在一块大石头上作为终点，划出跑道，我们坐下来，发出开始的指令后，两个孩子飞也似地冲了出去。胜利者抓住了蛋糕，不顾旁观者和那个失败的孩子眼中的失落，把蛋糕吃了。

The sport was better than the cake; but the lesson did not take effect all at once, and produced no result. I was not discouraged, nor did I hurry; teaching is a trade at which one must be able to lose time and save it. Our walks were continued, sometimes we took three cakes, sometimes four, and from time to time there were one or two cakes for the racers. If the prize was not great, neither was the ambition of the competitors. The winner was praised and petted, and everything was done with much ceremony. To give room to run and to add interest to the race I marked out a longer course and admitted several fresh competitors. Scarcely had they entered the lists than all the passers-by stopped to watch. They were encouraged by shouting, cheering, and clapping. I sometimes saw my little man trembling with excitement, jumping up and shouting when one was about to reach or overtake another—to him these were the Olympian games.

运动比蛋糕更好。但是这堂课不会立即起作用，现在还看不到结果。我没有灰心，也不心急。教育就好像做生意，老师必须先损失时间，才能省下时间。我们的散步仍在继续，有时候我会带三块蛋糕，

有时候是四块，因此，偶尔会有一块或两块蛋糕用来犒赏竞争者。如果奖励不够好，竞争者也会失去雄心斗志的。胜者可以获得奖励和爱抚，一切都要做得很正式。为了给他们空间跑步，也为了增加比赛的趣味性，我划出了更长的跑道，又找来了一些新人。比赛一开始，所有的路人都会停下来观看。他们用尖叫、欢呼、鼓掌鼓励着参赛者。当有人即将到达终点拿到蛋糕或者超过了另一人时，我会偶尔看到那位年轻的绅士兴奋地颤抖、跳跃、尖叫，对他来说，这就是奥利匹克运动会。

However, the competitors did not always play fair, they got in each other's way, or knocked one another down, or put stones on the track. That led us to separate them and make them start from different places at equal distances from the goal. You will soon see the reason for this, for I must describe this important affair at length.

但是，参赛者并不总是公平竞争，他们会阻挡彼此的路，或者撞倒别人，或者在路上放置石头。这让我们不得不把他们分开，让他们从不同的地方起跑，但是与目标的距离是一样的。很快你就会发现这样做的原因，因为我必须详细地说明这件重要的事。

Tired of seeing his favourite cakes devoured before his eyes, the young lord began to suspect that there was some use in being a quick runner, and seeing that he had two legs of his own, he began to practise running on the quiet. I took care to see nothing, but I knew my stratagem had taken effect. When he thought he was good enough (and I thought so too), he pretended to tease me to give him the other cake. I refused; he persisted, and at last he said angrily, “Well, put it on the stone and mark out the course, and we shall

see.” “Very good,” said I, laughing, “You will get a good appetite, but you will not get the cake.” Stung by my mockery, he took heart, won the prize, all the more easily because I had marked out a very short course and taken care that the best runner was out of the way. It will be evident that, after the first step, I had no difficulty in keeping him in training. Soon he took such a fancy for this form of exercise that without any favour he was almost certain to beat the little peasant boys at running, however long the course.

自己最爱的蛋糕在眼前被别人狼吞虎咽，他已经看厌了这一幕了。于是这位年人开始猜想，做一个跑得快的人可能是有些用处的，他看到自己也有两条腿，于是便悄悄地开始练习起跑步来。我装作什么也没看到，但我知道自己的计谋已经起作用了。当他觉得跑的足够快了（我也这么觉得），便假装向我讨要那块蛋糕。我拒绝，他坚持，最终，他愤怒地说，“好吧，把蛋糕放在石头上，划出跑道，看看谁能抢到。”“很好，”我大笑着说，“你会有个好胃口，但你是不会得到这块蛋糕的。”被我的嘲讽激怒，他下决心要赢得比赛，这件事现在变得更容易了，因为我划的跑道非常短，而且注意没有让跑的最快的孩子参加。跨出这第一步后，要让他保持锻炼显然是非常简单的事了。很快，他喜欢上了这种形式的锻炼，他不需要我的帮助就确信自己能跑赢那些乡村小孩，不管跑道有多长。

The advantage thus obtained led unexpectedly to another. So long as he seldom won the prize, he ate it himself like his rivals, but as he got used to victory he grew generous, and often shared it with the defeated. That taught me a lesson in morals and I saw what was the real root of generosity.

因此，从这件事中得到的好处还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如果他不怎么赢得比赛，他就会像对手一样当着别人的面自己吃完整块蛋糕，但是一旦他习惯了胜利，他变得慷慨，经常把蛋糕和落败者分享。这给我上了关于道德的一课，我看到了慷慨的真正根源在哪里。

While I continued to mark out a different starting place for each competitor, he did not notice that I had made the distances unequal, so that one of them, having farther to run to reach the goal, was clearly at a disadvantage. But though I left the choice to my pupil he did not know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 it. Without thinking of the distance, he always chose the smoothest path, so that I could easily predict his choice, and could almost make him win or lose the cake at my pleasure. I had more than one end in view in this stratagem; but as my plan was to get him to notice the difference himself, I tried to make him aware of it. Though he was generally lazy and easy going, he was so eager in his sports and trusted me so completely that I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making him see that I was cheating him. When at last I managed to make him see it in spite of his excitement, he was angry with me. “What have you to complain of?” said I. “In a gift which I propose to give of my own free will am not I master of the conditions? Who makes you run? Did I promise to make the courses equal? Is not the choice yours? Do not you see that I am favouring you, and that the inequality you complain of is all to your advantage, if you knew how to use it?” That was plain to him; and to choose he must observe more carefully. At first he wanted to count the paces, but a child measures paces slowly and inaccurately; moreover, I decided to have several races on one day; and the game having become a sort of passion with the child, he was sorry to waste in measuring the portion of time intended for running. Such delays are not in accordance with a child's impatience; he tried therefore to see

better and to reckon the distance more accurately at sight. It was now quite easy to extend and develop this power. At length, after some months' practice, and the correction of his errors, I so trained his power of judging at sight that I had only to place an imaginary cake on any distant object and his glance was nearly as accurate as the surveyor's chain.

我继续为每个参赛者划出不同的起点，他没有发现我把距离变得不一样了，因此其中一个人就需要跑更长的路才能到达终点，这显然是吃亏了。尽管我把选择的权力留给他，他也不知道怎么从中占便宜。他不会去考虑距离，总是选择最平坦的一条路，因此我可以轻而易举地预料到他的选择，于是便几乎能随心所欲地让他赢或者输。采取这个计谋，我有几个目的。但是由于我的计划是要让他自己看出跑道长短的差别，所以我尽力让他注意到一点。尽管一般说来他的确是个懒惰而随和的人，但是他对这项锻炼真的很热情，而且完全信任我，因此要让他看出我在骗他不是件容易的事。最后，不管他的兴奋劲儿有多大，当我终于成功让他看到这一点时，他对我非常生气。“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我说。“我提供奖品，难道我没有规定条件的自由吗？谁让你来跑步了？我承诺过要把跑道划得一样长吗？跑道难道不是你自己选的吗？你没看到我在偏袒你吗，所有你抱怨的不公平都是让你占便宜，如果你知道怎么利用这一点的话，懂吗？”他听得懂如此直白的话，也知道了在选择的时候必须仔细观察。一开始，他想计算步数，但是一个孩子计算起步数来速度很慢，也不精确。另外，我决定一天里要举行好几次比赛，这个游戏对孩子们来说就变成了很急迫的事情，把原本用来跑步的时间浪费在测量上，他也会感到很抱歉。这种耽搁与孩子的耐心不相符合，因此他尝试着去好好地看，用视觉去更精准地测量距离。要延伸和发展这种能力是很简单的。最终，经过几个月充分的练习和纠错以后，我训练了他视觉测距的能力，我只需要在任何远处的物体上放置一块想象中的蛋糕，他一瞥就知道有多远，几乎和勘测员的尺子一样精确。

Of all the senses, sight is that which we can least distinguish from the judgments of the mind; as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learn to see.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compare sight and touch, and to train the former sense to give a true report of shape and distance. Without touch, without progressive motion, the sharpest eyes in the world could give us no idea of space. To the oyster the whole world must seem a point, and it would seem nothing more to it even if it had a human mind. It is only by walking, feeling, counting, measuring the dimensions of things, that we learn to judge them rightly; but, on the other hand, if we were always measuring, our senses would trust to the instrument and would never gain confidence. Nor must the child pass abruptly from measurement to judgment; he must continue to compare the parts when he could not compare the whole; he must substitute his estimated aliquot parts for exact aliquot parts, and instead of always applying the measure by hand he must get used to applying it by eye alone. I would, however, have his first estimates tested by measurement, so that he may correct his errors, and if there is a false impression left upon the senses he may correct it by a better judgment. The same natural standards of measurement are in use almost everywhere, the man's foot, the extent of his outstretched arms, his height. When the child wants to measure the height of a room, his tutor may serve as a measuring rod; if he is estimating the height of a steeple let him measure it by the house; if he wants to know how many leagues of road there are, let him count the hours spent in walking along it. Above all, do not do this for him; let him do it himself.

在所有的感官中，视觉是我们最难将其和心灵的判断分开的；因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看。要将视觉和触觉进行比较需要花很长时间，锻炼视觉可以为我们带来对于形状和距离的准确预报。但少了触觉，少了前进的运动，世界上最尖的眼睛也无法给予我们空间的概

念。对牡蛎来说，整个世界看上去就是一个点，即使牡蛎有人的心智，结果还是如此。只有通过行走、感知、计算、测量事物的维度，我们才能学会正确地判断它们，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总是在测量，我们的感官会依赖于工具而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孩子不可能突然地跳过测量就学会判断。当他还无法一下子比较整体时，他必须不停地对其中的部分进行比较；他必须用估计的数字去代替准确的数字；他必须习惯于只用眼睛去测量，而不是总用手。但是，我会对他最初的几次估算进行测量以达到检验的目的，这样他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以后他的感官再次获得错误的印象，他可以用更好的判断去修正它。这种测量的自然标准随处都在用，比如人的脚，两臂展开的长度，人的身高。如果孩子想测量房间的高度，他的老师可以充当测量杆；如果他正在估计房顶的高度，让他用房子作为衡量标准；如果他想知道一条路有几里格长，让他根据走完这条路所需的时间来计算。最重要的是，不要帮他做这些事，让他自己做。

One cannot learn to estimate the extent and size of bodies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learning to know and even to copy their shape; for at bottom this copying depends entirely on the laws of perspective, and one cannot estimate distance without some feeling for these laws. All children in the course of their endless imitation try to draw; and I would have Emile cultivate this art; not so much for art's sake, as to give him exactness of eye and flexibility of hand. Generally speaking, it matters little whether he is acquainted with this or that occupation, provided he gains clearness of sense—perception and the good bodily habits which belong to the exercise in question. So I shall take good care not to provide him with a drawing master, who would only set him to copy copies and draw from drawings. Nature should be his only teacher, and things his only models. He should have the real thing before his eyes, not its copy on paper. Let him draw a house from a house, a tree from a tree, a man from a man; so that he may train himself to observe

objects and their appearance accurately and not to take false and conventional copies for truth. I would even train him to draw only from objects actually before him and not from memory, so that, by repeated observation, their exact form may be impressed on his imagination, for fear lest he should substitute absurd and fantastic forms for the real truth of things, and lose his sense of proportion and his taste for the beauties of nature.

如果人不同时去认识甚至临摹物体的形状，他就不可能学会估算物体的范围和大小。因为归根到底，这种临摹完全依赖于观察的法则，人不可能在对这些法则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估算出距离。所有的孩子，在热衷于模仿期间，都想试着画。我也会让爱弥儿学习这门艺术；并不是为了艺术本身，而是要让他形成精准的眼力和灵活的双手。一般来说，他是否知道如何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练习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拥有清晰的感官，以及我们通过锻炼才能获得的觉察力和良好的身体习惯。所以，如果一位老师只会让他临摹，从画作中去学习绘画，我得注意不要给他找这样的绘画老师。大自然应该是他的唯一老师，自然的事物是他唯一模仿的典型。他的眼前应该有真实的物体，而不是画在纸上的图形。让他看着房子画房子，看着树画树，看着人画人；这样他才会训练自己去精确地观察物体以及他们的外形，而不会把虚假的、惯常的临摹当作真相。我甚至还会训练他只画那些确实在他眼前的物体，而不要去画记忆中的物体，这样，通过反复的观察，这些物体的确切形状会在他的想象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免他用一些荒谬古怪的形状去代替事物真正的样子，因而丧失了对比例的感觉以及对自然之美的品位。

Of course I know that in this way he will make any number of daubs before he produces anything recognisable, that it will be long before he attains to the graceful outline and light touch of the draughtsman; perhaps he will never have an eye for picturesque

effect or a good taste in drawing. On the other hand, he will certainly get a truer eye, a surer hand, a knowledge of the real relations of form and size between animals, plants, and natural objects, together with a quicker sense of the effects of perspective. That is just what I wanted, and my purpose is rather that he should know things than copy them. I would rather he showed me a plant of acanthus even if he drew a capital with less accuracy.

当然，我知道用这种方法，在画出可辨识的作品之前，他会弄出一堆胡乱的涂鸦。他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画出优美的轮廓和清晰的线条。他也许永远无法体会什么叫美丽的效果，在画画这件事上永远没有好的品位。然而，他肯定能获得更精准的眼力，更稳的双手，对于动物、植物、自然物体之间大小和样子的真正关系有所了解，还能对观察的效果具有更快的感知。这就是我想要的，我的目的是让他认识事物，而不是临摹它们。即使他画莨苕画得没有那么精准，但只要他认识这种植物就好了。

Moreover, in this occupation as in others, I do not intend my pupil to play by himself; I mean to make it pleasanter for him by always sharing it with him. He shall have no other rival; but mine will be a continual rivalry, and there will be no risk attaching to it; it will give interest to his pursuits without awaking jealousy between us. I shall follow his example and take up a pencil; at first I shall use it as unskilfully as he. I should be an Apelles if I did not set myself daubing. To begin with, I shall draw a man such as lads draw on walls, a line for each arm, another for each leg, with the fingers longer than the arm. Long after, one or other of us will notice this lack of proportion; we shall observe that the leg is thick, that this thickness varies, that the length of the arm is proportionate to the body. In this improvement I shall either go side by side with

my pupil, or so little in advance that he will always overtake me easily and sometimes get ahead of me. We shall get brushes and paints, we shall try to copy the colours of things and their whole appearance, not merely their shape. We shall colour prints, we shall paint, we shall daub; but in all our daubing we shall be searching out the secrets of nature, and whatever we do shall be done under the eye of that master.

另外，在这样或者其他的练习中，我不会让学生一个人玩，我会和他分享乐趣，让这个过程对他而言更快乐。他不会有其他对手，除了我，我是长期存在的对手但对他构不成危害，这会让他有兴趣去追求更高的水平，但不至于在我们之间造成嫉妒。我会学着他的样拿起铅笔。一开始，我会像他一样使用得很生疏。如果不是因为我画得那么糟糕的话，我还以为自己是阿佩利斯呢。一开始，我画人就好像小孩在墙上画画一样，每只胳膊画一条线，每条腿画一条线，手指画得比手臂还长。很久以后，我们中的一个人会察觉到比例失调。我们就会观察，腿应该更厚，而厚度又是因人而异的，手臂的长度应该与身体成比例。在这样的进步中，我应该和学生同步前进，或者只比他快一点点，他可以轻易地超过我，偶尔还能到我前面去。我们有画笔和颜料，我们会试着临摹物体的颜色和它们的整体外观，而不仅仅是形状。我们着色，我们绘图，我们胡乱地涂鸦。但是在我们所有的涂鸦中，我们都在探寻自然的秘密，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应该在自然的注视下进行。

We badly needed ornaments for our room, and now we have them ready to our hand. I will have our drawings framed and covered with good glass, so that no one will touch them, and thus seeing them where we put them, each of us has a motive for taking care of his own. I arrange them in order round the room, each drawing repeated some twenty or thirty times, thus showing the

author's progress in each specimen, from the time when the house is merely a rude square, till its front view, its side view, its proportions, its light and shade are all exactly portrayed. These graduations will certainly furnish us with pictures, a source of interest to ourselves and of curiosity to others, which will spur us on to further emulation. The first and roughest drawings I put in very smart gilt frames to show them off; but as the copy becomes more accurate and the drawing really good, I only give it a very plain dark frame; it needs no other ornament than itself, and 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 frame distracted the attention which the picture itself deserves. Thus we each aspire to a plain frame, and when we desire to pour scorn on each other's drawings, we condemn them to a gilded frame. Some day perhaps “the gilt frame” will become a proverb among us, and we shall be surprised to find how many people show what they are really made of by demanding a gilt frame.

我们的房间急需装饰品，现在它们已经在我们手上准备就绪了。我会把我们的画用框子固定，再罩上精美的玻璃，这样别人就触摸不到它们。看到这些画被挂起来时，我们便都有了照顾自己作品的动机。我把它们依次挂在房间的四面墙上，每一幅画都重复画过二、三十遍，因而每一幅样品都展示了作者的进步，从画房子只能画出一个简陋的立方体开始，到它的正面、侧面、比例、光影都画得十分逼真。这样的逐步提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图画，这是我们兴趣的来源，也激发了别人的好奇心，还能鞭策我们继续竞争。我把最初那些粗糙的画作装在镀金的框子里展示，但随着临摹的越来越精准，画得越来越好，我就只用简单的黑框来装裱了。这些画自身不再需要装饰，如果画框分散了画作本身应该得到的注意力，那会令人感到遗憾的。因此，我们都立志要得到简单的画框，当我们想嘲讽彼此的画作时，我们就说应该给它装上镀金相框。有朝一日，“镀金相框”也许会成为我们之间的笑柄，假如我们发现有许多人都采取这种用镀金相框来评价

画作好坏的方法，我们会感到惊讶的。

I have said already that geometry is beyond the child's reach; but that is our own fault. We fail to perceive that their method is not ours, that what is for us the art of reasoning, should be for them the art of seeing. Instead of teaching them our way, we should do better to adopt theirs, for our way of learning geometry is quite as much a matter of imagination as of reasoning. When a proposition is enunciated you must imagine the proof; that is, you must discover on what proposition already learnt it depends, and of all the possible deductions from that proposition you must choose just the one required.

我已经说过几何学是超出孩子的理解范围的，但这也得怪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意识到孩子的方法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对于我们是推理的艺术，而对于他们则应该是观察的艺术。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方法去教孩子，而应该采取他们的方法，这样能做得更好，因为我们学习几何学的方法既涉及到想象也涉及到推理。当一个命题被提出，你必须想象该如何论证，也就是，你必须找到这个命题依赖于哪一个已知的命题，你必须从已知命题导出的所有可能推演中选择符合要求的那一个。

In this way the closest reasoner, if he is not inventive, may find himself at a loss. What is the result? Instead of making us discover proofs, they are dictated to us; instead of teaching us to reason, our memory only is employed.

使用这种方法，即使是最严谨的推理家，如果他不够富有创造

力，也会束手无策。那结果会怎样呢？我们无法自己找到证据，只能由别人告诉我们。老师不是在教我们推理，只是训练了我们的记忆力，让我们记住推理的过程罢了。

Draw accurate figures, combine them together, put them one upon another, examine their relations, and you will discover the whole of elementary geometry in passing from one observation to another, without a word of definitions, problems, or any other form of demonstration but super-position. I do not profess to teach Emile geometry; he will teach me; I shall seek for relations, he will find them, for I shall seek in such a fashion as to make him find. For instance, instead of using a pair of compasses to draw a circle, I shall draw it with a pencil at the end of bit of string attached to a pivot. After that, when I want to compare the radii one with another, Emile will laugh at me and show me that the same thread at full stretch cannot have given distances of unequal length. If I wish to measure an angle of 60 degrees I describe from the apex of the angle, not an arc, but a complete circle, for with children nothing must be taken for granted. I find that the part of the circle contained between the two lines of the angle is the sixth part of a circle. Then I describe another and larger circle from the same centre, and I find the second arc is again the sixth part of its circle. I describe a third concentric circle with a similar result, and I continue with more and more circles till Emile, shocked at my stupidity, shows me that every arc, large or small, contained by the same angle will always be the sixth part of its circle. Now we are ready to use the protractor.

画出精确的图形，把它们结合起来，将一个图形叠加于另一个图形之上，检验它们的关系，这样，你不需要说什么定义、命题或者推

演方法，只需要反复叠加就会发现初级几何学的全部内容不过就是从一种观察转变到另一种观察而已。我不会教爱弥儿几何学，相反，他会教我的。我会寻找那些关系，让他来发现，因为我采用了能够让他去发现的寻找方式。比如，我不会用圆规来画圆，我会拿一根铅笔，在一段系上绳子，把绳子固定在一个点再转一圈，用这样的办法来画圆。之后，如果我再画一个圆并想比较这两个圆的半径，爱弥儿就会嘲笑我说如果同样的一根绳子拉直了，是不会画出半径不等的圆的。如果我想测量一个六十度的角，我会以角的顶点为圆心画一个完整的圆，而不是一段弧线，因为对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我发现这个角的两条线所截取的那部分圆是整个圆面积的六分之一。接着，我以这个点为圆心再画一个更大的圆，我发现第二段弧线还是整个圆的六分之一。我又试了第三次，结果还是一样的，我继续画，直到爱弥儿对我的愚笨感到惊讶，他告诉我每一段弧线，不管大圆还是小圆，只要组成的角度相同，那么永远占一个圆的六分之一。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怎么使用量角器了。

To prove that two adjacent angles are equal to two right angles people describe a circle. On the contrary I would have Emile observe the fact in a circle, and then I should say, “If we took away the circle and left the straight lines, would the angles have changed their size, etc. ?”

为了证明两个邻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人们会画一个圆。恰恰相反，我要爱弥儿从圆里自己观察出这个事实，然后我会说，“如果我们拿走这个圆，只剩下直线，这些角会改变大小吗？等等。”

Exactn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igures is neglected; it is taken for granted and stress is laid on the proof. With u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ill be no question of proof. Our chief business will be

to draw very straight, accurate, and even lines, a perfect square, a really round circle. To verify the exactness of a figure we will test it by each of its sensible properties, and that will give us a chance to discover fresh properties day by day. We will fold the two semi-circles along the diameter, the two halves of the square by the diagonal; he will compare our two figures to see who has got the edges to fit moat exactly, i. e., who has done it best; we should argue whether this equal division would always be possible in parallelograms, trapezes, etc. We shall sometimes try to forecast the result of an experiment, to find reasons, etc.

画图的准确性经常被人忽视。人们总是假设图形是准确的，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证明上。但对于我们，恰恰相反，我们不关心证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线画直，把图形画准，即使是直线也是如此，方要像方，圆要像圆。为了验证图形的准确程度，我们会通过所有可察觉的特征来测试，这样我们每天都会有发现新特征的机会。我们会沿着直径把两个半圆重叠，把正方形的两半沿着对角线重叠。他会比较这两个图形，看看哪一个图形的边折得更准，因而把图形分割得更好。然后我们会讨论这样的平分方法在平行四边形和不等边四边形之类的图形中能够成立。偶尔，我们会尝试预测实验的结果，去寻找原因，等等。

Geometry means to my scholar the successful use of the rule and compass; he must not confuse it with drawing, in which these instruments are not used. The rule and compass will be locked up, so that he will not get into the way of messing about with them, but we may sometimes take our figures with us when we go for a walk, and talk over what we have done, or what we mean to do.

对我的学生而言，几何学意味着成功地使用了直尺和圆规。但他不能将其和画图混为一谈，画图的时候是用不着这些工具的。尺子和圆规会被我锁起来，这样他就不会对使用它们养成依赖，当我们去散步时，偶尔我们会带上所画的图形，谈一谈我们已经画好的或者我们以后要怎么画。

I shall never forget seeing a young man at Turin, who had learnt as a child the relations of contours and surfaces by having to choose every day isoperimetric cakes among cakes of every geometrical figure. The greedy little fellow had exhausted the art of Archimedes to find which were the biggest.

我永远忘不了在都灵看到的一个年轻人，他像个孩子似的，通过每天在一堆几何形状的蛋糕里选出周长相等的蛋糕来学习周长和面的关系。这个小贪吃鬼早就把阿基米德的学问研究透了，好找到最大的那块蛋糕。

When the child flies a kite he is training eye and hand to accuracy; when he whips a top, he is increasing his strength by using it, but without learning anything. I have sometimes asked why children are not given the same games of skill as men; tennis, mall, billiards, archery, football,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I was told that some of these are beyond their strength, that the child's senses are not sufficiently developed for others. These do not strike me as valid reasons; a child is not as tall as a man, but he wears the same sort of coat; I do not want him to play with our cues at a billiard-table three feet high; I do not want him knocking about among our games, nor carrying one of our racquets in his little hand; but let him play in a room whose windows have been

protected; at first let him only use soft balls, let his first racquets be of wood, then of parchment, and lastly of gut, according to his progress. You prefer the kite because it is less tiring and there is no danger. You are doubly wrong. Kite-flying is a sport for women, but every woman will run away from a swift ball. Their white skins were not meant to be hardened by blows and their faces were not made for bruises. But we men are made for strength; do you think we can attain it without hardship, and what defence shall we be able to make if we are attacked? People always play carelessly in games where there is no danger. A falling kite hurts nobody, but nothing makes the arm so supple as protecting the head, nothing makes the sight so accurate as having to guard the eye. To dash from one end of the room to another, to judge the rebound of a ball before it touches the ground, to return it with strength and accuracy, such games are not so much sports fit for a man, as sports fit to make a man of him.

当孩子放风筝的时候，他在训练自己的手眼准确性。当他抽陀螺的时候，他通过使用自己的力量使其得到增强，但是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偶尔，我曾问过为什么孩子不能玩大人那些需要技巧的游戏，比如网球、铁圈球、桌球、射箭、橄榄球、乐器。别人告诉我，这些东西超出了孩子的能力范围，孩子的感官发育程度还不够完善。这些对于我来说不足以成为有效理由。孩子可能和大人不一样高，但他可以穿和大人一样的外套。我并不想让他们拿着我们的球杆，在一张三英尺高的桌球台上打球。也不想让他们参与我们的游戏，或者要他用那小小的手抓住我们用的球拍。但是我想让他在一个房间里玩，这个房间的窗户事先被保护起来。起初，只让他玩柔软的球，用木头做的球拍，然后用皮拍子，最后根据他的进步水平决定要不要换成肠线做的拍子。你更爱让孩子去放风筝，因为这不累人，也没有危险。你的这两个原因都是错的。放风筝是一项女性的运动，没有哪个女人见到球快速朝自己滚来时不立马跑开的。她们白皙的皮肤经不住重击，她们

的面庞不能被擦伤。但是，男人是充满力量的。你认为我们可以不经历苦痛就能获得力量吗，那么如果我们遭遇袭击，要怎么去抵御呢？对于没有危险的游戏，人们在玩的时候总是粗心大意的。风筝掉下来不会伤到任何人。没有什么方法能比用手来保护头更能将其锻炼得如此灵巧，没有什么方法比保护好眼睛更能将视觉锻炼得如此精准。从房间的一头冲到另一头，在球接触地面之前判断它的回弹，然后准确地用力把它打出去，这样的游戏虽然不怎么适合大人，但很适合用来锻炼孩子。

The child's limbs, you say, are too tender. They are not so strong as those of a man, but they are more supple. His arm is weak, still it is an arm, and it should be used with due consideration as we use other tools. Children have no skill in the use of their hands. That is just why I want them to acquire skill; a man with as little practice would be just as clumsy. We can only learn the use of our limbs by using them. It is only by long experience that we learn to make the best of ourselves, and this experience is the real object of study to which we cannot apply ourselves too early.

你说孩子的四肢太纤弱了。他们的确不像成年人那么强壮，但是他们比成人更灵活。他的手臂虽然柔弱，但总是条手臂，应该拿来适当使用，就像我们使用其他工具那样。孩子对于使用双手这件事没什么技巧。这正是为什么我想让他们学习技巧。成人如果缺乏练习，也是一样笨拙的。我们只有通过使用自己的四肢，才能学会如何运用它们。只有通过长期的经验我们才知道如何变成最好的自己。这样的经验才是学习的真正目标，所以再早开始都不为过。

What is done can be done. Now there is nothing commoner

than to find nimble and skilful children whose limbs are as active as those of a man. They may be seen at any fair, swinging, walking on their hands, jumping, dancing on the tight rope. For many years past, troops of children have attracted spectators to the ballets at the Italian Comedy House. Who is there in Germany and Italy who has not heard of the famous pantomime company of Nicolini? Has it ever occurred to any one that the movements of these children were less finished, their postures less graceful, their ears less true, their dancing more clumsy than those of grown-up dancers? If at first the fingers are thick, short, and awkward, the dimpled hands unable to grasp anything, does this prevent many children from learning to read and write at an age when others cannot even hold a pen or pencil? All Paris still recalls the little English girl of ten who did wonders on the harpsichord. I once saw a little fellow of eight, the son of a magistrate, who was set like a statuette on the table among the dishes, to play on a fiddle almost as big as himself, and even artists were surprised at his execution.

凡是能做的都可以教他们去做。现在，要找到四肢像大人一样灵活的孩子，再没有比这更普通的事了。你可以在任何市集上看到他们，看到他们摇来摆去，倒立行走，跳来跳去，在拉紧的绳子上跳舞。过去的许多年中，儿童演员吸引了大批观众去意大利喜剧院欣赏芭蕾舞。在德国和意大利，谁没听说过大名鼎鼎的尼科利尼儿童剧团？谁曾看到过这些孩子没法完成自己的动作，或是起姿势不够优美，或是耳朵听音乐不够准确，或是舞姿比成人要笨拙吗？起初，孩子的手指粗厚、短小、笨拙，带窝的手抓不住任何东西，一部分孩子甚至连钢笔或者铅笔都拿不稳，但这能阻止另外一部分的孩子在同样的年纪去学习阅读和写字吗？所有的巴黎人都还记得那个十岁的英国女孩，弹得一手好大键琴。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八岁的孩子，他是地方法官的儿子，吃完饭后，大人让他像尊雕塑般地站在餐桌上演奏提琴，那琴几乎跟他一样高，但其技艺甚至让演奏家都大为惊讶。

To my mind, these and many more examples prove that the supposed incapacity of children for our games is imaginary, and that if they are unsuccessful in some of them, it is for want of practice.

在我看来，这些例子，还有其他更多的例子，都证明了我们认为孩子没有能力玩大人的游戏只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即便有些项目他们无法成功做到，那也是因为他们需要练习。

You will tell me that with regard to the body I am falling into the same mistake of precocious development which I found fault with for the mind. The cases are very different: in the one, progress is apparent only; in the other it is real. I have shown that children have not the mental development they appear to have, while they really do what they seem to do. Besides, we must never forget that all this should be play, the easy and voluntary control of the movements which nature demands of them, the art of varying their games to make them pleasanter, without the least bit of constraint to transform them into work; for what games do they play in which I cannot find material for instruction for them? And even if I could not do so, so long as they are amusing themselves harmlessly and passing the time pleasantly, their progress in learning is not yet of such great importance. But if one must be teaching them this or that at every opportunity, it cannot be done without constraint, vexation, or tedium.

你说我这种对身体的看法，也陷入了我在谈到儿童心智时所谴责的过早培养的相同误区。这两者不可相提并论，一种只是表面的进

步，另一种则是真正的进步。我已经展示了，儿童表面上看起来有心思，实则是没有的；然而，那些他们看上去能做的事，他们的确可以做到。另外，我们不能忘记所有这些都应该只是游戏，是自然要求他们能轻松自如完成的动作；是使游戏多样化的艺术，好让他们更快乐，以免让他们感到有丝毫勉强，从而把游戏变成了工作。如果我不能在游戏中找到教育他们的内容，他们玩游戏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我不能这样做，只要他们娱乐自己的同时不出差错，快乐地消磨了时间，是不是在学习上取得了进步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如果有人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教他们这或那，就不可能不使他们感到束缚、恼火、生厌。

What I have said about the use of the two senses whose use is most constant and most important, may serve as an example of how to train the rest. Sight and touch are applied to bodies at rest and bodies in motion, but as hearing is only affected by vibrations of the air, only a body in motion can make a noise or sound; if everything were at rest we should never hear. At night, when we ourselves only move as we choose, we have nothing to fear but moving bodies; hence we need a quick ear, and power to judge from the sensations experienced whether the body which causes them is large or small, far off or near, whether its movements are gentle or violent. When once the air is set in motion, it is subject to repercussions which produce echoes, these renew the sensations and make us hear a loud or penetrating sound in another quarter. If you put your ear to the ground you may hear the sound of men's voices or horses' feet in a plain or valley much further off than when you stand upright.

我前面已经谈到两种感官的使用，这两种感官的用处是最持久最重要的，可以作为如何训练其他感官的范例。视觉和触觉对于静止或

运动的物体都能起作用，但是听觉只能在空气震动时才有用，而只有运动的物体才会发出噪音和响动，如果万物都静止，我们就什么也听不见。夜晚，我们只有在想活动的时候才活动，我们只会害怕运动的物体；因此，我们需要灵敏的耳朵，靠听觉去判断接近我们的物体的大小、远近，它的动作是轻柔还是猛烈。当空气震动的时候，其后果必然是产生回声，这会重新刺激我们的感官，让我们听到更响的声音，或者觉得声音仿佛渗透到另一个方向去了。在平原或山谷中，如果你把耳朵贴在地面上，与站立时相比，你可能会听到更远的人声或者马蹄声。

As we have made a comparison between sight and touch, it will be as well to do the same for hearing, and to find out which of the two impressions starting simultaneously from a given body first reaches the sense-organ. When you see the flash of a cannon, you have still time to take cover; but when you hear the sound it is too late, the ball is close to you. One can reckon the distance of a thunderstorm by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lightning and the thunder. Let the child learn all these facts, let him learn those that are within his reach by experiment, and discover the rest by induction; but I would far rather he knew nothing at all about them, than that you should tell him.

我们已经比较过视觉和触觉，对于听觉也可以这样做，以此来弄清楚当一个给定的物体同时产生两种印象时，哪一种先到达感觉器官。当你看到大炮的火花，你还有时间藏身。但是如果你已经听到声音就太晚了，炮弹已经离你很近了。人可以通过闪电和雷声之间的间隔估计雷雨还有多远。让孩子学习这些现象，让他学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亲自取得这些经验，再通过归纳来获得其他的经验。但如果要靠你告诉他，那我宁愿他什么也不知道。

In the voice we have an organ answering to hearing; we have no such organ answering to sight, and we do not repeat colours as we repeat sounds. This supplies an additional means of cultivating the ear by practising the active and passive organs one with the other.

我们还有一个能够回应听觉的器官，就是发声器官。但我们没有回应视觉的器官，我们不能让颜色像声音那些反复出现。这暗示了训练听觉的另一种方法，就是让主动器官和被动器官互相练习。

Man has three kinds of voice, the speaking or articulate voice, the singing or melodious voice, and the pathetic or expressive voice, which serves as the language of the passions, and gives life to song and speech. The child has these three voices, just as the man has them, but he does not know how to use them in combination. Like us, he laughs, cries, laments, shrieks, and groans, but he does not know how to combine these inflexions with speech or song. These three voices find their best expression in perfect music. Children are incapable of such music, and their singing lacks feeling. In the same way their spoken language lacks expression; they shout, but they do not speak with emphasis, and there is as little power in their voice as there is emphasis in their speech. Our pupil's speech will be plainer and simpler still, for his passions are still asleep, and will not blend their tones with his. Do not, therefore, set him to recite tragedy or comedy, nor try to teach declamation so-called. He will have too much sense to give voice to things he cannot understand, or expression to feelings he has never known.

人有三种声音：说话的声音即清晰的声音、唱歌的声音即悠扬的

声音、感伤或具有表现力的声音。最后一种是展现激情的语言，让我们的说话或者唱歌充满生机。孩子和大人一样有这三种声音，但他不知道怎样把它们结合使用。他像我们一样大笑、哭泣、哀叹、尖叫、抱怨，但他不知道怎么在说话或者唱歌的时候结合这些变化。这三种声音可以在完美的音乐中得到最好的展现。孩子是不懂这些音乐的，他们的歌声缺乏情感。同样地，他们的话语缺乏感染力。他们尖叫，但讲话的时候不会加重音。他们的声音没有力量，就像他们的话没有重音。我们的学生说话的声音更平淡单调，因为他的激情还在沉睡，他还不会把语调和情感结合起来。因此，不要让他背诵悲剧或喜剧，也不要教他所谓的雄辩术。否则，多种感觉的调动会让他难以表达他不理解的事物，而多种表达的运用也会阻碍他表达他还未了解的感觉。

Teach him to speak plainly and distinctly, to articulate clearly, to pronounce correctly and without affectation, to perceive and imitate the right accent in prose and verse, and always to speak loud enough to be heard, but without speaking too loud—a common fault with school-children. Let there be no waste in anything.

教他简单直接地说话，清晰地发声，准确地发音，不矫揉造作，读诗歌和散文时能够体会、模仿正确的重音，说话声音要够大以便让别人听得到，但不要过大——这是学龄孩子普遍会犯的错误。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要有浪费。

The same method applies to singing; make his voice smooth and true, flexible and full, his ear alive to time and tune, but nothing more. Descriptive and theatrical music is not suitable at his age—I would rather he sang no words; if he must have words, I

would try to compose songs on purpose for him, songs interesting to a child, and as simple as his own thoughts.

教他唱歌也是同样的方法。让他唱得稳而准，婉转而饱满，耳朵要能听得出节拍和曲调，这样就足够了。摹写音乐和戏剧音乐不适合他这个年纪，我宁愿他唱的歌没有歌词。如果非要有的话，我会试着专门为他写几首歌，它们对孩子来说足够有趣，同时和他的思维一样简单明了。

You may perhaps suppose that as I am in no hurry to teach Emile to read and write, I shall not want to teach him to read music. Let us spare his brain the strain of excessive attention, and let us be in no hurry to turn his mind towards conventional signs. I grant you there seems to be a difficulty here, for if at first sight the knowledge of notes seems no more necessary for singing than the knowledge of letters for speaking, there is really this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When we speak, we are expressing our own thoughts; when we sing we are expressing the thoughts of others. Now in order to express them we must read them.

你也许认为，我连认字和写字都不急着教爱弥儿，肯定不会想教他识谱。让我们为他的大脑减少因过多的注意力而带来的压力，不要急着让他的心灵去认识那些死板的符号。我承认，这看上去有些困难。因为乍看起来，就像不识字也能说话一样，不识谱也是能唱歌的，但这两者的差异在于：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在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是在表达他人的想法。现在，为了要表达这些想法，我们必须先读懂它们。

But at first we can listen to them instead of reading them, and a song is better learnt by ear than by eye. Moreover, to learn music thoroughly we must make songs as well as sing them, and the two processes must be studied together, or we shall never have any real knowledge of music. First give your young musician practice in very regular, well-cadenced phrases; then let him connect these phrases with the very simplest modulations; then show him their relation one to another by correct accent, which can be done by a fit choice of cadences and rests. On no account give him anything unusual, or anything that requires pathos or expression. A simple, tuneful air, always based on the common chords of the key, with its bass so clearly indicated that it is easily felt and accompanied, for to train his voice and ear he should always sing with the harpsichord.

但是，一开始，我们可以用听的，而并不一定要去读，用耳朵学一首歌比用眼睛更好。另外，要系统地学习音乐，我们除了会唱歌还要会写歌，这两个学习过程必须同时进行，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掌握音乐。一开始，让你的学生练习写一些常规的、节拍性强的短句。接着，让他用最简单的调子把这些短句连起来。然后，用正确的音符标出这些句子之间的关系给他看，只要好好选择一下音韵和休止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无论如何，不要给他超出常规的东西，以及任何要求具备悲怆或者态度的东西。一个简单优美的曲调总是基于惯常使用的主弦，伴随着清晰的低音，显示出它容易听也容易跟着唱，因为要训练他的耳朵和嗓音，他应该经常跟着大键琴歌唱。

We articulate the notes we sing the better to distinguish them; hence the custom of sol-faing with certain syllables. To tell the keys one from another they must have names and fixed intervals; hence the names of the intervals, and also the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attached to the keys of the clavier and the notes of the scale. C and

A indicate fixed sounds, invariable and always rendered by the same keys; Ut and La are different. Ut is always the dominant of a major scale, or the leading-note of a minor scale. La is always the dominant of a minor scale or the sixth of a major scale. Thus the letters indicate fixed terms in our system of music, and the syllables indicate terms homologous to the similar relations in different keys. The letters show the keys on the piano, and the syllables the degrees in the scale. French musicians have made a strange muddle of this. They have confused the meaning of the syllables with that of the letters, and while they have unnecessarily given us two sets of symbols for the keys of the piano, they have left none for the chords of the scales; so that Ut and C are always the same for them; this is not and ought not to be; if so, what is the use of C? Their method of sol-faing is, therefore, extremely and needlessly difficult, neither does it give any clear idea to the mind; since, by this method, Ut and Me, for example, may mean either a major third, a minor third, an augmented third, or a diminished third. What a strange thing that the country which produces the finest books about music should be the very country where it is hardest to learn music!

我们要清晰地发出我们唱的每一个音符，以便更好地区分它们。因此，我们有了使用确定音节的视唱法。为了区别音阶，它们必须有各自的名字和固定的间隔时间。因此才有了表示各种音程的名字，才为键盘上的音阶和音符标注了字母。C和A表示固定的音，恒定不变，始终由同样的琴键发出。Ut和La的情况则有所不同。Ut始终是大音阶的主音，或者小音阶的导音。La始终是小音阶的主音或者大音阶的第六个音。因此，在我们的音乐系统中，字母表示着固定间隔，音节表示着在不同音阶中相似关系的相似间隔。字母显示钢琴上的琴键，音节表示调式的音阶。法国音乐家们把这些规则搞得一团糟。他们搞混了音节和字母的含义，当他们在琴键上多此一举地使用两套符号的时

候，却一套也没有留给音弦，因此Ut和C对他们而言是一样的。事实不是也不应该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那C还有什么用呢？因此，他们的视唱方法变得特别难，不必要地难，同时也没有教给人什么清楚的概念。因为使用这种方法的话，举个例子，Ut和Me既可以表示大三度又可以表示小三度，既可以表示增三度又可以表示减三度。这样一个学习起音乐来最困难的国家居然写出了世界上最好的音乐著作，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

Let us adopt a simpler and clearer plan with our pupil; let him have only two scales whose relations remain unchanged, and indicated by the same symbols. Whether he sings or plays, let him learn to fix his scale on one of the twelve tones which may serve as a base, and whether he modulates in D, C, or G, let the close be always Ut or La, according to the scale. In this way he will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 and the essential relations for correct singing and playing will always be present in his mind; his execution will be better and his progress quicker. There is nothing funnier than what the French call “natural sol-faing;” it consists in removing the real meaning of things and putting in their place other meanings which only distract us. There is nothing more natural than sol-faing by transposition, when the scale is transposed. But I have said enough, and more than enough, about music; teach it as you please, so long as it is nothing but play.

让我们给孩子采用一种更简单更清楚的方法。我们只让他学两种调式，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用同样的符号来标记。当他唱歌或者弹奏乐器时，教他把调式固定在可以作为基音的十二个音之中的一个上，不管他转到D,C,还是G调，要根据调式将尾音始终收在Ut或La音上。这样，他就会理解你的意思，为了正确地演唱和弹奏乐器，调式之间的主要关系会经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会做得更好，

进步更快。没有什么事比法国人说“自然的视唱法”更滑稽了，他们的方法剔除了事物的真正含义，然后加进了只会让我们分心的其他含义。当调式变换的时候，没有比变调更自然的视唱法了。关于音乐，我已经说得够多了，也许太多了；按照你喜欢的来教吧，只要始终将其作为娱乐就行。

We are now thoroughly acquainted with the condition of foreign bodies in relation to our own, their weight, form, colour, density, size, distance, temperature, stability, or motion. We have learnt which of them to approach or avoid, how to set about overcoming their resistance or to resist them so as to prevent ourselves from injury; but this is not enough. Our own body is constantly wasting and as constantly requires to be renewed. Although we have the power of changing other substances into our own, our choice is not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Everything is not food for man, and what may be food for him is not all equally suitable; it depends on his racial constitution, the country he lives in, his individual temperament, and the way of living which his condition demands.

现在，我们已经透彻了解了外界物体和我们自身的关系，包括它们的重量、形状、颜色、硬度、大小、距离、温度、运动状态。我们已经知道哪些物体可以接近，哪些应该远离，如何克服它们的阻力或者阻止它们来保护自己不受伤，但这还不够。我们的身体在不断消耗，因此需要不断恢复元气。尽管我们具备将其他物质转变成自身能量的能力，但我们的选择不是无关紧要的。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充当人类的食物，可以作为食物的东西也并不同样地适合于每个人。这取决于种族的体质，居住的国家，个人的性格，以及生活环境所要求的生活方式。

If we had to wait till experience taught us to know and choose fit food for ourselves, we should die of hunger or poison; but a kindly providence which has made pleasure the means of self-preservation to sentient beings teaches us through our palate what is suitable for our stomach. In a state of nature there is no better doctor than a man's own appetite, and no doubt in a state of nature man could find the most palateable food the most wholesome.

如果我们要等经验来告诉我们什么食物适合我们以及如何挑选，我们早就饿死或者被毒死了。但是，仁慈的上天已经把维持自我生存的方法变成了可感知的存在，通过味觉教会了我们什么东西适合我们的胃。在自然状态下，没有比人的胃口更好的医生，毫无疑问，自然状态下的人会发现最合胃口的食物就是最有益的食物。

Nor is this all. Our Maker provides, not only for those needs he has created, but for those we create for ourselves; and it is to keep the balance between our wants and our needs that he has caused our tastes to change and vary with our way of living. The further we are from a state of nature, the more we lose our natural tastes; or rather, habit becomes a second nature, and so completely replaces our real nature, that we have lost all knowledge of it.

不仅如此。我们的造物主提供食物，不仅仅为了那些他赋予我们的需要，还为了那些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需要。为了使我们的欲望和需求保持平衡，他让我们的口味可以根据生活方式而更改。我们越远离自然状态，越会失去自然的口味。或者更确切地说，习惯已经变成了第二天性，完全取代了我们真正的自然天性，我们已经丢掉了自然天性的全部内容。

From this it follows that the most natural tastes should be the simplest, for those are more easily changed; but when they are sharpened and stimulated by our fancies they assume a form which is incapable of modification. The man who so far has not adapted himself to one country can learn the ways of any country whatsoever; but the man who has adopted the habits of one particular country can never shake them off.

由此可见，最自然的口味应该是最简单的，因为这种口味是最容易改变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奇怪的东西去打磨和刺激它，口味会呈现出一定的类型，变得无法修正。如果一个人没有习惯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饮食，他可以适应任何国家的食物。但是，一旦人有了某一特定国家的饮食习惯，就很难摆脱了。

This seems to be true of all our senses, especially of taste. Our first food is milk; we only become accustomed by degrees to strong flavours; at first we dislike them. Fruit, vegetables, herbs, and then fried meat without salt or seasoning, formed the feasts of primitive man. When the savage tastes wine for the first time, he makes a grimace and spits it out; and even among ourselves a man who has not tasted fermented liquors before twenty cannot get used to them; we should all be sober if we did not have wine when we were children. Indeed, the simpler our tastes are, the more general they are; made dishes are those most frequently disliked. Did you ever meet with any one who disliked bread or water? Here is the finger of nature, this then is our rule. Preserve the child's primitive tastes as long as possible; let his food be plain and simple, let strong flavours be unknown to his palate, and do not let his diet be too uniform.

这一点对于所有的感官都成立，尤其是味觉。我们第一口吃到的食物是奶水。我们是逐渐才习惯于味道强烈的食物的。一开始，我们不喜欢这样的味道。水果，蔬菜，草本植物，然后是不加盐或其他调味料的烤肉，这就构成了原始人的盛宴。当野蛮人第一次喝到酒的时候，他露出痛苦的表情，马上把酒吐了出来，即使在我们现代人之中，对于从没尝过发酵液体的人来说，在二十岁之前他也是喝不惯酒的。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喝过酒，也许我们一生都会滴酒不沾。确实，越简单的口味就越大众化，五味俱全的菜肴恰恰是最常被人讨厌的。你见过不喜欢面包和水的人吗？这是自然的意图，也是我们的规律。尽可能地保留孩子最原始的口味。给他平淡简单的食物，让他不知道什么是强烈的味道，但不要让他的饮食太单调。

I am not asking, for the present, whether this way of living is healthier or no; that is not what I have in view. It is enough for me to know that my choice is more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 and that it can be more readily adapted to other conditions. In my opinion, those who say children should be accustomed to the food they will have when they are grown up are mistaken. Why should their food be the same when their way of living is so different? A man worn out by labour, anxiety, and pain needs tasty foods to give fresh vigour to his brain; a child fresh from his games, a child whose body is growing, needs plentiful food which will supply more chyle. Moreover the grown man has already a settled profession, occupation, and home, but who can tell what Fate holds in store for the child? Let us not give him so fixed a bent in any direction that he cannot change it if required without hardship. Do not bring him up so that he would die of hunger in a foreign land if he does not take a French cook about with him; do not let him say at some future time that France is the only country where the food is fit to eat. By the way, that is a strange way of praising one's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I myself should say that the French are the only people who do not know what good food is, since they require such a special art to make their dishes eatable.

目前，我并不是在讨论这种生活方式是否健康，那不是我研究的角度。对我来说，知道我的选择与自然一致就足够了，这样适应起其他的环境会更有所准备。有些人说，孩子应该习惯于他们成年以后要吃的食物，在我看来，这是错的。如果他们以后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了，为什么要吃一样的食物呢？当人被工作、焦虑、痛苦折磨的精疲力尽时，他需要美味的食物为大脑补充精力。对于刚刚做完游戏的孩子，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他需要丰富的食物为他提供更多的乳糜。另外，成年人的社会地位、职业、家庭已经安定下来，但是谁知道孩子将来的命运会怎么样呢？因此，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要让孩子养成刻板的方式，以免日后要花费大力气才能改变。如果你的抚养方式会让孩子不随身带位法国厨师就在异国他乡饿死，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不要让他在未来说出只有法国的食物可以吃这种话。顺便提一句，这样夸一个国家是很奇怪的。另一方面，我应该承认法国是唯一不知道什么是美食的国家，因为他们需要一种特殊的艺术才能把菜做得合乎自己口味。

Of all our different senses, we are usually most affected by taste. Thus it concerns us more nearly to judge aright of what will actually become part of ourselves, than of that which will merely form part of our environment. Many things are matters of indifference to touch, hearing, and sight; but taste is affected by almost everything. Moreover the activity of this sense is wholly physical and material; of all the senses, it alone makes no appeal to the imagination, or at least, imagination plays a smaller part in its sensations; while imitation and imagination often bring morality into the impressions of the other senses. Thus, speaking generally,

soft and pleasure-loving minds, passionate and truly sensitive dispositions, which are easily stirred by the other senses, are usually indifferent to this. From this very fact, which apparently places taste below our other senses and makes our inclination towards it the more despicable, I draw just the opposite conclusion—that the best way to lead children is by the mouth. Greediness is a better motive than vanity; for the former is a natural appetite directly dependent on the senses, while the latter is the outcome of convention, it is the slave of human caprice and liable to every kind of abuse. Believe me the child will cease to care about his food only too soon, and when his heart is too busy, his palate will be idle. When he is grown up greediness will be expelled by a host of stronger passions, while vanity will only be stimulated by them; for this latter passion feeds upon the rest till at length they are all swallowed up in it. I have sometimes studied those men who pay great attention to good eating, men whose first waking thought is—What shall we have to eat to-day? men who describe their dinner with as much detail as Polybius describes a combat. I have found these so-called men were only children of forty, without strength or vigour—fruges consumere nati. Gluttony is the vice of feeble minds. The gourmand has his brains in his palate, he can do nothing but eat; he is so stupid and incapable that the table is the only place for him, and dishes are the only things he knows anything about. Let us leave him to this business without regret; it is better for him and for us.

在我们所有的感官中，味觉通常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因此，与那些仅仅是周围环境的一部分的东西相比，我们更关心如何准确地判断什么会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有很多东西，摸上去、听上去、看上去都是没有差别的，但几乎所有东西都会影响味觉。另外，味觉是一种完全生理的、物质的感官。在我们所有的感官中，味觉中掺杂的

想象力是最少的。至少可以说，想象力在味觉方面只起到很小的作用。然而模仿力和想象力往往使其他感官获得的印象带有精神的成分。因此，一般来说，心地柔软、热衷男欢女爱的人，或者性格激昂而敏感的人，更容易被其他感官刺激，因而往往对味觉漠不关心。根据这个事实，味觉明显被置于其他感官之下，贪图味觉是更加可鄙的，但我的结论恰恰相反，我认为靠饮食来教导孩子是最好的方法。贪吃是比虚荣更好的动机，因此前者是直接依赖于感官的自然的欲望，后者则是习俗的产物，会受人的任性支配的奴隶，且容易被滥用。相信我，孩子很快就会不关心食物了，当他的心里装了很多的东西，他的胃口就闲下来了。当他长大之后，贪食会被其他更强烈的欲望所驱逐，就是这些欲望在刺激虚荣心。因为它以其他一切欲望为滋养，最终将其他欲望全部吞没。有时候我会研究那些把大量的精力花在好吃的食物上的人，这些人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今天吃什么呢？他们描述起自己的晚饭，就像波利比奥斯描述战争一样巨细无遗。我发现这些所谓的成人只不过是四十岁的孩子，没有体力或活力——简直是“为享受果实而生的人们”。脆弱的心灵会产生暴饮暴食的恶习。贪吃的人脑子里只有吃，除了吃他什么也不会。他太愚蠢、太无能，餐桌是他唯一能去的地方，食物是他唯一了解的东西。我们就毫不吝惜地把这件事留给他们做吧。这对他、对我们来说都好。

It is a small mind that fears lest greediness should take root in the child who is fit for something better. The child thinks of nothing but his food, the youth pays no heed to it at all; every kind of food is good, and we have other things to attend to. Yet I would not have you use the low motive unwisely. I would not have you trust to dainties rather than to the honour which is the reward of a good deed. But childhood is, or ought to be, a time of play and merry sports, and I do not see why the rewards of purely bodily exercises should not be material and sensible rewards. If a little lad in Majorca sees a basket on the tree-top and brings it down with his sling, is it not fair that he should get something by this, and a good

breakfast should repair the strength spent in getting it. If a young Spartan, facing the risk of a hundred stripes, slips skilfully into the kitchen, and steals a live fox cub, carries it off in his garment, and is scratched, bitten till the blood comes, and for shame lest he should be caught the child allows his bowels to be torn out without a movement or a cry, is it not fair that he should keep his spoils, that he should eat his prey after it has eaten him? A good meal should never be a reward; but why should it not be sometimes the result of efforts made to get it. Emile does not consider the cake I put on the stone as a reward for good running; he knows that the only way to get the cake is to get there first.

有人害怕贪吃会在孩子心理扎根，从而耽误他学习更有益处的知识，这是心胸狭隘的人。孩子除了食物什么也不想，然而到了青年时期我们就根本不在意食物了。什么食物都是好吃的，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但我不会让你将这样低级的动机加以不明智的利用。我不会让你依赖珍馐而不是荣誉来作为对良好表现的奖励。童年是或者应该是玩游戏和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光，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用物质的、可感知的东西作为纯粹身体锻炼的奖励。如果马略卡岛上的一个孩子看到树冠上有个篮子，把它打了下来，他由此得到回报，这难道不公平吗？一顿好的早餐可以补充他拿篮子所消耗的体力。如果一个斯巴达的年轻人，冒着挨一百皮鞭的危险，娴熟地溜进厨房，偷了一只活的狐狸幼崽，藏在衣服里带出去，狐狸在衣服里抓咬，血都出来了，这个孩子为了避免被抓个现行的羞耻，即使肠子都被撕烂了，也不变神色，甚至叫都不叫一声，狐狸先咬了他，最后他把狐狸吃了，难道不公平吗？一餐美食永远不应该被作为奖励，但是为何不将其当作为了得到它而付出心力的结果呢？爱弥儿不会把我放在石头上的蛋糕当作跑得快的奖励。他知道要得到蛋糕，唯一的办法就是第一个到达终点。

This does not contradict my previous rules about simple food; for to tempt a child's appetite you need not stimulate it, you need only satisfy it; and the commonest things will do this if you do not attempt to refine children's taste. Their perpetual hunger, the result of their need for growth, will be the best sauce. Fruit, milk, a piece of cake just a little better than ordinary bread, and above all the art of dispensing these things prudently, by these means you may lead a host of children to the world's end, without on the one hand giving them a taste for strong flavours, nor on the other hand letting them get tired of their food.

这与我之前关于简单食物的规则并不矛盾。要吸引孩子的胃口，你不需要刺激只需要满足它。如果你不想娇惯孩子的口味，最普通的食物就能做到这一点。他们那无休止的饥饿就是最好的调料，这种饥饿是由于身体成长所需造成的。水果，牛奶，一块比普通的面包稍好的糕点，最重要的是掌握谨慎地分配这些食物的艺术。通过这些方法，即使你把一群孩子带到天涯海角，他们也不会养成强烈的口味或者对食物感到厌烦。

The indifference of children towards meat is one proof that the taste for meat is unnatural; their preference is for vegetable foods, such as milk, pastry, fruit, etc. Beware of changing this natural taste and making children flesh-eaters, if not for their health's sake, for the sake of their character; for how can one explain away the fact that great meat-eaters are usually fiercer and more cruel than other men; this has been recognised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places. The English are noted for their cruelty [3_22] while the Gaures are the gentlest of men. [3_23] All savages are cruel, and it is not their customs that tend in this direction; their cruelty is the result of their food. They go to war as to the chase, and treat men as they would

treat bears. Indeed in England butchers are not allowed to give evidence in a court of law, no more can surgeons. [3_24] Great criminals prepare themselves for murder by drinking blood. Homer makes his flesh-eating Cyclops a terrible man, while his Lotus-eaters are so delightful that those who went to trade with them forgot even their own country to dwell among them.

孩子对肉食无动于衷的态度可以证明，对肉的嗜好不是人类的天性。孩子更偏爱植物性食物，比如牛奶，糕点，水果，等等。注意不要去改变孩子的这种自然口味，不要让他们成为嗜肉的人，哪怕不是为了其健康，也是为了塑造其性格。嗜肉的人通常比其他人更凶暴、残忍，没人能反驳这一点。这一点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公认的。英国人的残忍广为人知 [4_22] ，而高卢人则是人类中最温柔的人 [4_23] 。所有的野蛮人都是残忍的，这不是性情使然，而是由于所吃的食物导致的。他们去打仗就像去打猎一样，对待同类就像对待野兽一样。在英国，屠夫是不允许出庭作证的，外科医生也是 [4_24] 。穷凶极恶的罪犯在杀人之前还要喝人血来做准备。荷马把嗜肉的独眼巨人写成一个可怕的人，而食莲人就十分优雅，和他们进行贸易来往的人都忘记了自己的家乡，愿意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You ask me,” said Plutarch, “why Pythagoras abstained from eating the flesh of beasts, but I ask you, what courage must have been needed by the first man who raised to his lips the flesh of the slain, who broke with his teeth the bones of a dying beast, who had dead bodies, corpses, placed before him and swallowed down limbs which a few moments ago were bleating, bellowing, walking, and seeing? How could his hand plunge the knife into the heart of a sentient creature, how could his eyes look on murder, how could he behold a poor helpless animal bled to death, scorched, and dismembered? how can he bear the sight of this quivering flesh?

does not the very smell of it turn his stomach? is he not repelled, disgusted, horror-struck, when he has to handle the blood from these wounds, and to cleanse his fingers from the dark and viscous bloodstains?

“你问我，”普鲁塔克说，“为什么毕达哥拉斯禁食野兽的肉，但我想问你，第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将打死的野兽的肉拿到嘴边，才能用牙齿咬碎那垂死野兽的骨头，才能把它的尸体放在面前，将它的四肢狼吞虎咽，这野兽几分钟之前还在叫、在吼、在跑、在看。他怎么能够将拿刀的手伸入那有感知的生物的心脏，他怎么忍心去看那杀戮的情景，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可怜无助的动物流血、剥皮、肢解？他怎么忍心看那颤抖的肉？这种气味难道不会使他的胃里翻江倒海吗？当他必须处理掉从伤口留出的血，当他清洗手指上那暗红的、黏糊糊的血迹时，难道他不会感到排斥、厌恶、害怕吗？

“The scorched skins wriggled upon the ground, The shrinking flesh bellowed upon the spit. Man cannot eat them without a shudder; He seems to hear their cries within his breast.

剥下的皮在地上蠕动，脱水的肉在烤叉上咆哮。人吃掉它们的时候没法不颤抖；是谁的胸腔传来谁的哭吼呢。

“Thus must he have felt the first time he did despite to nature and made this horrible meal; the first time he hungered for the living creature, and desired to feed upon the beast which was still grazing; when he bade them slay, dismember, and cut up the sheep which licked his hands. It is those who began these cruel feasts, not those who abandon them, who should cause surprise, and there

were excuses for those primitive men, excuses which we have not, and the absence of such excuses multiplies our barbarity a hundredfold.

因此，当人第一次违背自然做出这样一顿可怕的膳食时，他的感觉一定是这样的。当他第一次想吃新鲜的动物，想用还在吃草的动物填饱肚子的时候，当他将舔舐他的手的羊羔杀死、肢解、切成碎块的时候，他的感觉一定是这样的。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最早开始这种残忍盛宴的人，而不是抛弃它们的人。原始人这样做还有其理由，我们则没有借口可寻，这说明我们比原始人还要野蛮一百倍。

“'Mortals, beloved of the gods,' says this primitive man, 'compare our times with yours; see how happy you are, and how wretched were we. The earth, newly formed, the air heavy with moisture, were not yet subjected to the rule of the seasons. Three-fourths of the surface of the globe was flooded by the ever-shifting channels of rivers uncertain of their course, and covered with pools, lakes, and bottomless morasses. The remaining quarter was covered with woods and barren forests. The earth yielded no good fruit, we had no instruments of tillage, we did not even know the use of them, and the time of harvest never came for those who had sown nothing. Thus hunger was always in our midst. In winter, mosses and the bark of trees were our common food. A few green roots of dogs-bit or heather were a feast, and when men found beech-mast, nuts, or acorns, they danced for joy round the beech or oak, to the sound of some rude song, while they called the earth their mother and their nurse. This was their only festival, their only sport; all the rest of man's life was spent in sorrow, pain, and hunger.

“被上帝爱着的人类啊，”原始人说，“请将我们的时代同你们的相比，看看你们是多么幸福，我们是多么可怜。地球最初形成的时候，空气潮湿而厚重，没有季节变换。地表四分之三的面积被被流向不定、河道不断转换的河流冲刷着，被湖泊、江河、深不见底的沼泽覆盖着。剩下的四分之一覆盖着灌木和贫瘠的森林。地球上结不出好的水果，我们没有耕作工具，就算有也不知道怎么使用，不耕种的人永远不会有收获的时候。因此我们四周总是弥漫着饥饿。到了冬天，苔藓和树皮是我们最常吃的食物。小慈姑或者石南树的绿根就算得上盛宴了，当人类第一次发现毛栗、胡桃、橡子时，他们围着山毛榉树和橡树跳舞，唱着原始的歌谣，把地球称作养育他们的母亲。这就是他们唯一的节日，唯一的乐趣。剩下的时间都是在悲伤、痛苦、饥饿中度过的。

“'At length, when the bare and naked earth no longer offered us any food, we were compelled in self-defence to outrage nature, and to feed upon our companions in distress, rather than perish with them. But you, oh, cruel men! who forces you to shed blood? Behold the wealth of good things about you, the fruits yielded by the earth, the wealth of field and vineyard; the animals give their milk for your drink and their fleece for your clothing. What more do you ask? What madness compels you to commit such murders, when you have already more than you can eat or drink? Why do you slander our mother earth, and accuse her of denying you food? Why do you sin against Ceres, the inventor of the sacred laws, and against the gracious Bacchus, the comforter of man, as if their lavish gifts were not enough to preserve mankind? Have you the heart to mingle their sweet fruits with the bones upon your table, to eat with the milk the blood of the beasts which gave it? The lions and panthers, wild beasts as you call them, are driven to follow their natural instinct, and they kill other beasts that they may live. But, a hundredfold fiercer than they, you fight against your instincts

without cause, and abandon yourselves to the most cruel pleasures. The animals you eat are not those who devour others; you do not eat the carnivorous beasts, you take them as your pattern. You only hunger for the sweet and gentle creatures which harm no one, which follow you, serve you, and are devoured by you as the reward of their service.

“最后，光秃秃的地球再也无法为我们提供任何食物，我们为了自我防御，不得不去违背自然，吃掉自己的同伴，否则就要跟他们一起灭亡。但是你，啊，残忍的人！谁强迫你去残害生命了？看看你周围有多少好东西，地球结出的水果，丰饶的田野和果园，动物用奶水滋养你们，把自己的毛给你们做衣服。你还要多求什么呢？当你们拥有的吃喝已经超出了需要，是什么样的疯狂迫使你们做出杀人犯的举动？你为什么诽谤我们的地球母亲，责备她不给你提供食物？你为什么要责备发明了神圣法则的赛丽斯，责备人类的安慰者巴克斯，难道他们那慷慨的赠与还不够人类维持生存吗？你怎么忍心将甜美的水果和动物的骨头混合放在桌上，在喝奶的同时又去喝提供这些奶水的动物的血？你把狮子和黑豹称为野兽，可他们只被本能驱使，为了活下去才杀害其他动物。但是，你比他们凶残一百倍，你毫无理由地违背本能，为了最残忍的欢愉抛弃了自我。你所吃的动物，它们不会去吃别的动物。你不会去吃肉食动物，你学它们的样。你只会猎杀那些性情温和的生物，它们不会伤害任何人，反而会跟随你，服侍你，而它们这种辛劳的回报就是被你吃掉。

“'O unnatural murderer! if you persist in the assertion that nature has made you to devour your fellow-creatures, beings of flesh and blood, living and feeling like yourself, stifle if you can that horror with which nature makes you regard these horrible feasts; slay the animals yourself, slay them, I say, with your own hands, without knife or mallet; tear them with your nails like the

lion and the bear, take this ox and rend him in pieces, plunge your claws into his hide; eat this lamb while it is yet alive, devour its warm flesh, drink its soul with its blood. You shudder! you dare not feel the living throbbing flesh between your teeth? Ruthless man; you begin by slaying the animal and then you devour it, as if to slay it twice. It is not enough. You turn against the dead flesh, it revolts you, it must be transformed by fire, boiled and roasted, seasoned and disguised with drugs; you must have butchers, cooks, turnspits, men who will rid the murder of its horrors, who will dress the dead bodies so that the taste deceived by these disguises will not reject what is strange to it, and will feast on corpses, the very sight of which would sicken you. '"

"啊！违背自然的凶手！如果你坚持声称是自然让你吃掉同伴，吃掉像你一样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感知的生灵，那么如果你能做到的话，请扼杀掉自然让你对这些可怕的盛宴所产生的恐惧。去亲手宰杀这些动物，我是说，要用你自己的双手，不要用刀或者木棍。像狮子和熊一样，用指甲撕开它们，把一头牛撕成碎片，把你的利爪插进他们的皮肤。在羊羔还活着的时候就把它们吃掉，趁它的的肉还热气腾腾的时候就吃掉，把它的灵魂和鲜血一起喝下去。你在颤抖！你敢感受那鲜活的血肉在你的齿间跳动吗？残忍无情的人类，你宰杀动物，然后吃掉它，这等于杀了它两回。这还不够。你还无法忍受死肉，它使你感到厌恶，必须要被放在火上改头换面。你煮它、烤它，用药材调制其味道、改变其形象。你需要屠夫、厨师、烤肉师帮你免除杀戮的恐惧，他们让死去的尸体变了个样，用烹调技术欺骗你的味觉，让你尝不出怪异的味道，还面对着原本一看就恶心的尸体大快朵颐。"

Although this quotation is irrelevant, I cannot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transcribe it, and I think few of my readers will resent it.

尽管这段话与我的主题无关，我忍不住不把它摘抄下来，我觉得没有读者会表示反对的。

In conclusion, whatever food you give your children, provided you accustom them to nothing but plain and simple dishes, let them eat and run and play as much as they want; you may be sure they will never eat too much and will never have indigestion; but if you keep them hungry half their time, when they do contrive to evade your vigilance, they will take advantage of it as far as they can; they will eat till they are sick, they will gorge themselves till they can eat no more. Our appetite is only excessive because we try to impose on it rules other than those of nature, opposing, controlling, prescribing, adding, or substracting; the scales are always in our hands, but the scales are the measure of our caprices not of our stomachs. I return to my usual illustration; among peasants the cupboard and the apple-loft are always left open, and indigestion is unknown alike to children and grown-up people.

总结来说，不管你给孩子吃什么食物，只要他们能习惯于平淡简单的菜肴，就可以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吃东西、奔跑、玩耍，就可以确定他们永远不会过食，不会消化不良。但是如果你让他们有一半时间都饿着肚子，与此同时他们还得想方设法逃避你的监管，他们就会尽己所能地占便宜，他们会不停地吃，吃到生病为止，不停地狼吞虎咽，直到再也吃不下为止。我们的胃口之所以过度，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对它强加规定而不是顺应自然，我们总是在反抗、控制、规定、增加或减少自己的胃口；改变的规则掌握在我们手中，但这种规则来源于我们的任性想象而不是我们的胃。我要回到一般的例子上去；在农民家里，碗橱和果箱总是打开的，但是没有孩子或者大人就因此消化不良了。

If, however, it happened that a child were too great an eater, though, under my system, I think it is impossible, he is so easily distracted by his favourite games that one might easily starve him without his knowing it. How is it that teachers have failed to use such a safe and easy weapon. Herodotus records that the Lydians [3_25] , under the pressure of great scarcity, decided to invent sports and other amusements with which to cheat their hunger, and they passed whole days without thought of food. Your learned teachers may have read this passage time after time without seeing how it might be applied to children. One of these teachers will probably tell me that a child does not like to leave his dinner for his lessons. You are right, sir—I was not thinking of that sort of sport.

但是，如果真有出现了很贪吃的孩子，尽管在我的方法之下我觉得这是不会发生的，这样的孩子也很容易被他最喜欢的游戏分心，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让他饿肚子。怎么会有老师不用这样安全、简单的方法呢？根据希罗多德的记录 [4_25] ，吕底亚人承受着食物短缺的压力，因而决定发明体育运动和其他娱乐活动来忘记饥饿，他们就这样过一天，不去想食物的事情。你们博学的老师可能看过这个故事无数次，但没有看到这个方法可以应用到孩子身上。这些老师中的某一个人可能会跟我说，孩子是不会像主动离开课堂一样离开餐桌的。老师，你是对的，但我考虑的不是那种运动。

The sense of smell is to taste what sight is to touch; it goes before it and gives it warning that it will be affected by this or that substance; and it inclines it to seek or shun this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the impressions received beforehand. I have been told that savages receive impressions quite different from ours, and that they have quite different ideas with regard to pleasant or

unpleasant odours. I can well believe it. Odours alone are slight sensations; they affect the imagination rather than the senses, and they work mainly through the anticipations they arouse. This being so, and the tastes of savages being so unlike the taste of civilised men, they should lead them to form very different ideas with regard to flavours and therefore with regard to the odours which announce them. A Tartar must enjoy the smell of a haunch of putrid horseflesh, much as a sportsman enjoys a very high partridge. Our idle sensations, such as the scents wafted from the flower beds, must pass unnoticed among men who walk too much to care for strolling in a garden, and do not work enough to find pleasure in repose. Hungry men would find little pleasure in scents which did not proclaim the approach of food.

嗅觉之于味觉就像视觉之于触觉。前者先于后者发生，警示后者这样或那样东西将对其产生影响，倾向于让后者根据预先得到的印象去寻找或躲避这种经历。曾经有人告诉我，野蛮人获得感觉的方式和我们非常不同，他们对什么气味闻起来愉悦、什么气味闻起来不快的概念也和我们大相径庭。对此我深信不疑。气味本身只给人轻微的感觉。它所影响的，与其说是感官，不如说是想象力，它主要通过激发人的期待来发挥作用。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如果野蛮人的味觉真的和文明人不同，那么这应该导致野蛮人对于味道以及显示味道的气味形成完全不同的概念。鞑靼人肯定喜欢腐烂的马腿肉散发的味道，就像猎人闻到山鹑的气味。细微的感觉，比如从花坛飘来的清香，对于那些行色匆匆、无心散步或者工作繁忙、无心找乐的人来说，是察觉不到的。不是从食物发出的香味，是无法为饥饿的人带来愉悦的。

Smell is the sense of the imagination; as it gives tone to the nerves it must have a great effect on the brain; that is why it revives us for the time, but eventually causes exhaustion. Its effects on love

are pretty generally recognised. The sweet perfumes of a dressing-room are not so slight a snare as you may fancy them, and I hardly know whether to congratulate or condole with that wise and somewhat insensible person whose senses are never stirred by the scent of the flowers his mistress wears in her bosom.

嗅觉是充满想象的感官。正如它会感染神经一样，它也会对大脑产生强烈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它会一时之间让我们感到兴奋，最终却带来疲倦。它在爱好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更衣室里甜甜的香水味并不是如大家想象的那样是细微无用的诱饵，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对情人胸前所佩戴的鲜花的香味兴奋过，对于这种明智而迟钝的人，我真是不知道该表示祝贺还是哀悼。

Hence the sense of smell should not be over-active in early childhood; the imagination, as yet unstirred by changing passions, is scarcely susceptible of emotion, and we have not enough experience to discern beforehand from one sense the promise of another. This view is confirmed by observation, and it is certain that the sense of smell is dull and almost blunted in most children. Not that their sensations are less acute than those of grown-up people, but that there is no idea associated with them; they do not easily experience pleasure or pain, and are not flattered or hurt as we are. Without going beyond my system, and without recourse to comparative anatomy, I think we can easily see why women are generally fonder of perfumes than men.

因此，嗅觉在童年早期不应该过分活跃。这个时期想象力还没有被欲望所刺激，几乎不会为情绪所影响，另外，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经验能够事先从一种感官的印象去辨别另一种感官的印象。这一观点是

被观察证实了的，可以确定，大多数孩子的嗅觉是很迟钝的，近乎于没有。不是说孩子的感觉不如成年人精准，而是它们还没有与其他的观念相联系。和我们不一样，孩子的嗅觉不会受到高兴或痛苦的影响，不会从中感受到愉快或痛苦。我认为我们不需要超出对自身的研究，也不需要诉诸比较解剖学，便可以轻易地理解为什么女人普遍比男人更喜欢香水。

It is said that from early childhood the Redskins of Canada, train their sense of smell to such a degree of subtlety that, although they have dogs, they do not condescend to use them in hunting—they are their own dogs. Indeed I believe that if children were trained to scent their dinner as a dog scents game, their sense of smell might be nearly as perfect; but I see no very real advantage to be derived from this sense, except by teaching the child to observe the relation between smell and taste. Nature has taken care to compel us to learn these relations. She has made the exercise of the latter sense practically inseparable from that of the former, by placing their organs close together, and by providing, in the mouth, a direct pathway between them, so that we taste nothing without smelling it too. Only I would not have these natural relations disturbed in order to deceive the child, e. g.; to conceal the taste of medicine with an aromatic odour, for the discord between the senses is too great for deception, the more active sense overpowers the other, the medicine is just as distasteful, and this disagreeable association extends to every sensation experienced at the time; so the slightest of these sensations recalls the rest to his imagination and a very pleasant perfume is for him only a nasty smell; thus our foolish precautions increase the sum total of his unpleasant sensations at the cost of his pleasant sensations.

据说，加拿大的红皮肤人，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训练自己的嗅觉。他们的嗅觉可以灵敏到，打猎的时候尽管有狗也不愿意用，他们自己就像猎狗一样。的确，我相信，如果我们像训练猎狗辨识猎物那样教孩子辨识饮食，他们的嗅觉也许会臻于完美。但是，这样做除了可以教孩子观察嗅觉和味觉之间的关系之外，我看不到能从这种感官中产生什么真正的用处。况且，自然会迫使我们学会这些关系的。自然已经通过很多方法使嗅觉和味觉的使用不可分割了，比如将两者的器官挨得很近，在口腔里提供直接连通两者的通道，因此如果没有嗅觉的话我们什么味道也尝不出来。我只希望不要为了欺骗孩子就去打扰这种自然的关系，比如，用香味掩盖药的苦味。因为这种感官之间的不一致实在太过明显，根本无法隐瞒，味道强烈的一方会盖过另一方，所以药还是一样难吃，这种难吃还会延伸到受影响的一切感官。因而最细微的感觉也会让他想起其他的感觉，这样一来，好闻的香气对于他也成了令人厌恶的气味。因此，我们这些愚蠢的预防措施只会牺牲掉他愉快的感觉，而徒增不愉快的感觉。

In the following books I have still to speak of the training of a sort of sixth sense, called common-sense, not so much because it is common to all men, but because it results from the well-regulated use of the other five, and teaches the nature of things by the sum-total of their external aspects. So this sixth sense has no special organ, it has its seat in the brain, and its sensations which are purely internal are called percepts or ideas. The number of these ideas is the measure of our knowledge; exactness of thought depends on their clearness and precision; the art of comparing them one with another is called human reason. Thus what I call the reasoning of the senses, or the reasoning of the child, consists in the formation of simple ideas through the associated experience of several sensations; what I call the reasoning of the intellect, consists in the formation, of complex ideas through the association of several simple ideas.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还会谈到第六感的培养，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常识，这个名字并不是因为其中的内容对人类来说很常见，而是因为它是其他五种感官使用得当的结果，它还能通过综合事物的各种外形教会我们其蕴含的本质。因此，第六感没有专属的器官，它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它带来的感觉是完全内化的，也就是俗称的概念或者观念。这些观念的数量可以用来衡量我们拥有多少知识。思想的正确性依赖于其清晰度和准确度，将它们两两相比的艺术就是俗称的人类的理性。因此，当我说感性的理解或者孩子的理解时，其中就包括由几种感官相互联系的经验而组成的简单观念。当我说理性的理解，其中包括集中简单观念相互联系而组成的复杂观念。

If my method is indeed that of nature, and if I am not mistaken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at method, we have led our pupil through the region of sensation to the bounds of the child's reasoning; the first step we take beyond these bounds must be the step of a man. But before we make this fresh advance, let us glance back for a moment at the path we have hitherto followed. Every age, every station in life, has a perfection, a ripeness, of its own. We have often heard the phrase “a grown man;” but we will consider “a grown child.” This will be a new experience and none the less pleasing.

如果我的方法的确符合自然并且在应用上没出错的话，我们已经带领学生穿过了感官的区域，来到了理性的边界；我们跨过这条边界后的第一步，就是成人的步伐了。但是，在我们完成这次前进之前，让我们先回头看看迄今为止走过的路。每个年纪，人生的每一站，都有它自己的完善度和成熟度。我们经常听到“成熟的大人”这种说法，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成熟的孩子”。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而且仍然令人愉悦。

The life of finite creatures is so poor and narrow that the mere sight of what is arouses no emotion. It is fancy which decks reality, and if imagination does not lend its charm to that which touches our senses, our barren pleasure is confined to the senses alone, while the heart remains cold. The earth adorned with the treasures of autumn displays a wealth of colour which the eye admires; but this admiration fails to move us, it springs rather from thought than from feeling. In spring the country is almost bare and leafless, the trees give no shade, the grass has hardly begun to grow, yet the heart is touched by the sight. In this new birth of nature, we feel the revival of our own life; the memories of past pleasures surround us; tears of delight, those companions of pleasure ever ready to accompany a pleasing sentiment, tremble on our eyelids. Animated, lively, and delightful though the vintage may be, we behold it without a tear.

有限的生命是如此悲哀而仓促，仅仅是看到它无法激起我们的情感。我们常常将幻想加在真相上，如果想象力不给那些接触我们感官的物体增加魅力，我们贫瘠的乐趣就只局限于感觉中，内心仍旧是冰冷的。秋天的硕果装点了地球，展现出五彩缤纷的盛况，我们的眼睛欣赏了美景。但这种欣赏无法打动我们，因为它发源于人的思想而不是人的感情。春天，乡村看上去几乎是光秃秃的，树叶还未萌芽，因而也没有树荫，草地刚开始生长，可是看到这样的景色却会使内心有所触动。看到自然重获新生的景象，我们似乎感到自己的生命也复苏了。过去美好的记忆围绕着我们。欢欣的泪水，这种总是伴随着愉悦之感而来的甜蜜伴侣，在睫毛上颤动。尽管葡萄丰收时的场景是那么充满生机活力，令人欣喜，但是我们却一滴眼泪也不会掉。

And why is this? Because imagination adds to the sight of

spring the image of the seasons which are yet to come; the eye sees the tender shoot, the mind's eye beholds its flowers, fruit, and foliage, and even the mysteries they may conceal. It blends successive stages into one moment's experience; we see things, not so much as they will be, but as we would have them be, for imagination has only to take her choice. In autumn, on the other hand, we only behold the present; if we wish to look forward to spring, winter bars the way, and our shivering imagination dies away among its frost and snow.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看到春天的景象时，想象力会为其增添还未到来的画面。眼睛才刚看到嫩芽时，心上的眼睛已经看到了花朵、果实、树叶，甚至隐藏在树叶下的神秘景象。它会在某一时刻的体验中混合一个接一个的场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事物将来的样子，而是我们想让它们呈现的样子，因为这一切都是可以由想象力所选择的。秋天，相反地，我们看到的只有眼前的景象。如果我们希望看到接下去的春天，中间还有冬天挡道，在冰天雪地中，我们的想象力哆哆嗦嗦地死去了。

This is the source of the charm we find in beholding the beauties of childhood, rather than the perfection of manhood. When do we really delight in beholding a man? When the memory of his deeds leads us to look back over his life and his youth is renewed in our eyes. If we are reduced to viewing him as he is, or to picturing him as he will be in old age, the thought of declining years destroys all our pleasure. There is no pleasure in seeing a man hastening to his grave; the image of death makes all hideous.

童年的美好之所以比完善的成年更有魅力，源头就在这里。我们

什么时候才会愉悦地观察一个成年人呢？只有当他的记忆促使我们回望他的一生时，因为这个时候，他的青年时代又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如果我们要按照他现在的样子或者他老年的样子去看他，关于衰老晚年的想法会摧毁我们的一切乐趣。看一个人赶着进坟墓是没有乐趣可言的。死亡的景象只会让一切变得丑陋。

But when I think of a child of ten or twelve, strong, healthy, well-grown for his age, only pleasant thoughts are called up, whether of the present or the future. I see him keen, eager, and full of life, free from gnawing cares and painful forebodings, absorbed in this present state, and delighting in a fullness of life which seems to extend beyond himself. I look forward to a time when he will use his daily increasing sense, intelligence and vigour, those growing powers of which he continually gives fresh proof. I watch the child with delight, I picture to myself the man with even greater pleasure. His eager life seems to stir my own pulses, I seem to live his life and in his vigour I renew my own.

但是当我想着一个十岁或十二岁的孩子时，想到这个年龄的强壮、健康、茁壮成长，不管是关于他的现在还是未来，唤醒的只有愉悦的想法。我看到他的敏捷、热情、生气，没有远虑也没有近忧，全神贯注于当下，充分享受着那似乎要溢出他身体的生命。我盼望着有一天，他会用上日益增强的感官、智力和精力，这些不断成长的能力会为他源源不断地带来新鲜感。我喜悦地看着这个孩子，当我想象他成人的样子，我感到更开心了。他那充满热忱的生命似乎使我的脉搏也强烈跳动起来，借助他的生命和活力，我也可以重获新生。

The hour strikes, the scene is changed. All of a sudden his eye grows dim, his mirth has fled. Farewell mirth, farewell

untrammelled sports in which he delighted. A stern, angry man takes him by the hand, saying gravely, “Come with me, sir,” and he is led away. As they are entering the room, I catch a glimpse of books. Books, what dull food for a child of his age! The poor child allows himself to be dragged away; he casts a sorrowful look on all about him, and departs in silence, his eyes swollen with the tears he dare not shed, and his heart bursting with the sighs he dare not utter.

钟声敲响，场景变化。突然，他的双眼昏花了，他的欢笑消失了。永别了，欢乐。永别了，那使他快乐的、不受束缚的运动。一个严肃而愤怒的人抓住了他的手，庄重地对他说，“跟我来，先生，”然后就把他带走了。当他们走进房间的时候，我朝那些书瞥了一眼。书，这对于孩子的年纪来说，是多么沉闷的精神食粮啊！这个可怜的孩子任由自己被拉走。他悲伤地环视了一圈周围的景象，沉默地走了，眼中充满了不敢流下的泪水，心中充满了不敢说出口的叹息。

You who have no such cause for fear, you for whom no period of life is a time of weariness and tedium, you who welcome days without care and nights without impatience, you who only reckon time by your pleasures, come, my happy kindly pupil, and console us for the departure of that miserable creature. Come! Here he is and at his approach I feel a thrill of delight which I see he shares. It is his friend, his comrade, who meets him; when he sees me he knows very well that he will not be long without amusement; we are never dependent on each other, but we are always on good terms, and we are never so happy as when together.

你是没有理由害怕的，你的人生中还没有经历过疲倦和乏味的时

期，白天不忧晚上不愁，尽情地享受着快乐。过来，我幸福的孩子，来安慰我们关于那可怜人的离开。过来吧！他过来了，他的靠近让我感到一阵愉悦的战栗，那是他在与我们分享快乐。在此与他相见的是他的朋友和同志。当他看到我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用多久又可以愉快地玩耍。我们从不互相依赖，但我们总是相处融洽，我们跟任何人在一起，都不如跟彼此在一起这样快乐。

His face, his bearing, his expression, speak of confidence and contentment; health shines in his countenance, his firm step speaks of strength; his colour, delicate but not sickly, has nothing of softness or effeminacy. Sun and wind have already set the honourable stamp of manhood on his countenance; his rounded muscles already begin to show some signs of growing individuality; his eyes, as yet unlighted by the flame of feeling, have at least all their native calm; They have not been darkened by prolonged sorrow, nor are his cheeks furrowed by ceaseless tears. Behold in his quick and certain movements the natural vigour of his age and the confidence of independence. His manner is free and open, but without a trace of insolence or vanity; his head which has not been bent over books does not fall upon his breast; there is no need to say, “Hold your head up,” he will neither hang his head for shame or fear.

他的神色、举止、话语，显示出他的自信与满足；他的脸上散发着健康的神色，坚实的步伐彰显着力量，皮肤细腻有光泽，一点也不松垮或娇气。风吹日晒已经在人的脸上留下光荣的印记。他那丰满的肌肉是他正在成长的标志。他的双眼，还未被感情的火焰点燃，至少还保留着原初的冷静。即使是长期的悲伤也没有使其黯淡无光，无休无止的泪水也不会让他的面颊出现皱纹。从他敏捷而稳健的动作中，你可以看到属于他那个年纪的自然活力和独立自信。他的举止开朗大

方，丝毫看不出傲慢和自负。他的头还没有埋于书本，因而不会垂到胸前。你不需要对他说，“把头抬起来”。他绝不会因为羞愧或者恐惧把头垂下。

Make room for him, gentlemen, in your midst; question him boldly; have no fear of importunity, chatter, or impertinent questions. You need not be afraid that he will take possession of you and expect you to devote yourself entirely to him, so that you cannot get rid of him.

绅士们，请给他一点空间。大胆直白地向他提问。不要害怕他会强迫你做什么，或者说个喋喋不休，又或是问一些无礼的问题。你不需要害怕他会占有你，也不需要期待自己会全身心地投入于他以至于都无法摆脱他了。

Neither need you look for compliments from him; nor will he tell you what I have taught him to say; expect nothing from him but the plain, simple truth, without addition or ornament and without vanity. He will tell you the wrong things he has done and thought as readily as the right, without troubling himself in the least as to the effect of his words upon you; he will use speech with all the simplicity of its first beginnings.

你也不需要期待着他会说出什么恭维的话，或者是我教过他说的话。除了直白简单、不添油加醋的真相，不要期待他会说出别的什么来。他会告诉你自己已经做过、想过的错事，正如他说那些正确的事一样，一点也不会担心自己的话对你产生什么影响；他的话总是简单直接，开门见山。

We love to augur well of our children, and we are continually regretting the flood of folly which overwhelms the hopes we would fain have rested on some chance phrase. If my scholar rarely gives me cause for such prophecies, neither will he give me cause for such regrets, for he never says a useless word, and does not exhaust himself by chattering when he knows there is no one to listen to him. His ideas are few but precise, he knows nothing by rote but much by experience. If he reads our books worse than other children, he reads far better in the book of nature; his thoughts are not in his tongue but in his brain; he has less memory and more judgment; he can only speak one language, but he understands what he is saying, and if his speech is not so good as that of other children his deeds are better.

我们喜欢为孩子预言，将希望寄托于他们偶尔说出的聪明话上。但当孩子又做了许多蠢事后，我们的希望被淹没，我们因而十分难过。我的学生不太会给我预言的理由，他也不会给我遗憾的理由，因为他从来不说没用的话，当没人听他说话时，他也不会继续喋喋不休从而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他的想法不多，但都很准确，他从不死记硬背，而是从实践中学习。就算他读书读得比其他孩子糟糕，但他对自然这本书的理解比他们深入。他的思想不在舌头上，而是大脑中。他记忆得少，判断得多。他只能说一种语言，但是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算他说得不如其他孩子一样好，但他做得比他们强。

He does not know the meaning of habit, routine, and custom; what he did yesterday has no control over what he is doing to-day; he follows no rule, submits to no authority, copies no pattern, and only acts or speaks as he pleases. So do not expect set speeches or studied manners from him, but just the faithful expression of his

thoughts and the conduct that springs from his inclinations. [3_26] You will find he has a few moral ideas concerning his present state and none concerning manhood; what use could he make of them, for the child is not, as yet, an active member of society. Speak to him of freedom, of property, or even of what is usually done; he may understand you so far; he knows why his things are his own, and why other things are not his, and nothing more. Speak to him of duty or obedience; he will no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bid him do something and he will pay no attention; but say to him, “If you will give me this pleasure, I will repay it when required,” and he will hasten to give you satisfaction, for he asks nothing better than to extend his domain, to acquire rights over you, which will, he knows, be respected. Maybe he is not sorry to have a place of his own, to be reckoned of some account; but if he has formed this latter idea, he has already left the realms of nature, and you have failed to bar the gates of vanity.

他不知道什么是习惯、常规、风俗。他昨天做的事不会影响今天做的事，他不遵循规则，不服从权威，不模仿程式，自己怎么高兴就怎么说话、做事。所以，不要期望他会说设定的话语、做习得的举止，就让他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践行自己的志趣 [4_26] 。你会发现，他有一些道德层面的观念，但都只涉及他目前的年龄阶段，无关成年。孩子目前还不是社会中活跃的一份子，这些观念对他有什么用呢？你跟他谈自由、财产或是惯常的事，他或许也可以理解。他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东西属于自己，别人的东西不是自己的，除此之外就不明白了。你跟他谈责任和服从，他不会明白你在说什么。你命令他做什么事，他的注意力完全不在这上头。但是如果你对他说，“如果你这次让我满意，等你需要的时候我也会回报你”，他会迫不及待地做到让你满意，因为在他看来，能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能获得超越你的权利，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如果他给自己占了一个位置，被当作某个人物看待，他也不会为此感到抱歉。但是如果他已经形成了“人

物”这个概念，那么他已经脱离了自然的范围，你没有成功地关住虚荣的大门。

For his own part, should he need help, he will ask it readily of the first person he meets. He will ask it of a king as readily as of his servant; all men are equals in his eyes. From his way of asking you will see he knows you owe him nothing, that he is asking a favour. He knows too that humanity moves you to grant this favour; his words are few and simple. His voice, his look, his gesture are those of a being equally familiar with compliance and refusal. It is neither the crawling, servile submission of the slave, nor the imperious tone of the master, it is a modest confidence in mankind; it is the noble and touching gentleness of a creature, free, yet sensitive and feeble, who asks aid of a being, free, but strong and kindly. If you grant his request he will not thank you, but he will feel he has incurred a debt. If you refuse he will neither complain nor insist; he knows it is useless; he will not say, “They refused to help me,” but “It was impossible,” and as I have already said, we do not rebel against necessity when once we have perceived it.

就他自己而言，万一他需要帮助，他会准备好向遇到的第一个人求助。不管遇到的是国王还是仆人，他都会开口。所有人在他眼里都是平等的。从他请求的态度，你就可以明白你并不欠他什么，他只是想让你帮忙。他也明白，人性会让你帮助他。所以他的话说得少而简。无论对方满足还是拒绝他的请求，他的嗓音、神色、姿势都不会有所变化。这既不是奴隶的卑躬屈膝，也不是主人的飞扬跋扈，而是人类那最谦逊的自信。是一个自由、敏感、脆弱的生灵那高尚而令人动容的彬彬有礼，他在向同样自由但更强壮和善良的另一人求助。如果你答应了他的请求，他不会感谢你，但是他会觉得自己欠了你的。如果你拒绝，他也不会抱怨或者坚持。他知道这是没有用的。他不会

说“他们拒绝帮助我”而是“这是不可能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一旦我们察觉到事情的必要性，我们是不会逆着它做的。

Leave him to himself and watch his actions without speaking, consider what he is doing and how he sets about it. He does not require to convince himself that he is free, so he never acts thoughtlessly and merely to show that he can do what he likes; does he not know that he is always his own master? He is quick, alert, and ready; his movements are eager as befits his age, but you will not find one which has no end in view. Whatever he wants, he will never attempt what is beyond his powers, for he has learnt by experience what those powers are; his means will always be adapted to the end in view, and he will rarely attempt anything without the certainty of success; his eye is keen and true; he will not be so stupid as to go and ask other people about what he sees; he will examine it on his own account, and before he asks he will try every means at his disposal to discover what he wants to know for himself. If he lights upon some unexpected difficulty, he will be less upset than others; if there is danger he will be less afraid. His imagination is still asleep and nothing has been done to arouse it; he only sees what is really there, and rates the danger at its true worth; so he never loses his head. He does not rebel against necessity, her hand is too heavy upon him; he has borne her yoke all his life long, he is well used to it; he is always ready for anything.

让他自己待着，你只需要默默地观察他的动作，思考他正在做什么和怎么做。他不需要说服自己他是自由的，所以他从不会不假思索地做事，仅仅是为了显示自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难道他不知道自己始终是自己的主人吗？他聪明，警觉，敏捷。他的动作充满了那

个年龄的活力，但是你在其中找不到没有目的的行为。无论他想要什么，他绝不会企图获得超出能力的东西。因为他在实践中已经知道了自己能力如何，他的方法总是与目的相适应，如果没有成功的把握他很少会采取行动。他的眼睛锐利而真诚，他不会愚蠢到去问别人自己看到了什么，他会亲自去验证。在询问之前，他会尝试每一种方法，去弄清楚他想知道的东西。如果他遇到了什么意料之外的困难，他不会像其他人那么沮丧。如果遇到了危险，也不会像其他人那么害怕。他的想象力还在沉睡，没有什么会去打扰它。他只会看到真实存在的东西，只会按照危险的真实程度去估计危险，所以他从不会不知所措。自然规律重重地压在他身上，他不会去违背。他从出生开始就受到这种束缚，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总是准备好迎接任何事情。

Work or play are all one to him, his games are his work; he knows no difference. He brings to everything the cheerfulness of interest, the charm of freedom, and he snows the bent of his own mind and the extent of his knowledge. Is there anything better worth seeing, anything more touching or more delightful, than a pretty child, with merry, cheerful glance, easy contented manner, open smiling countenance, playing 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or working at the lightest amusements?

工作或是玩耍对他都是一样的，他的游戏就是他的工作，他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差别。他为每一件事都注入趣味的快乐、自由的魅力，从他所做的事就可以看出他的心理倾向和知识范围。一个漂亮、快乐的孩子，眼里充满活力，举止轻松，脸上挂着开朗的微笑，他正在做着最重要的事或者轻松地玩耍着，还有比看到这样的场景更让人动容、更让人高兴的事情吗？

Would you now judge him by comparison? Set him among

other children and leave him to himself. You will soon see which has made most progress, which comes nearer to the perfection of childhood. Among all the children in the town there is none more skilful and none so strong. Among young peasants he is their equal in strength and their superior in skill. In everything within a child's grasp he judges, reasons, and shows a forethought beyond the rest. Is it a matter of action, running, jumping, or shifting things, raising weights or estimating distance, inventing games, carrying off prizes; you might say, “Nature obeys his word,” so easily does he bend all things to his will. He is made to lead, to rule his fellows; talent and experience take the place of right and authority. In any garb, under any name, he will still be first; everywhere he will rule the rest, they will always feel his superiority, he will be master without knowing it, and they will serve him unawares.

现在，你要不要通过比较来评判一下他？把他放在其他孩子中间，然后随他想做什么。很快你就会看到谁的进步最大，谁最接近童年时期的完善状态。所有城里的孩子都没有他这么灵巧，这么强壮。跟乡下的孩子相比，他的体力与他们一样，但灵巧程度更胜一筹。在孩子能掌握的一切事情上，他比其他人更善于判断、推理、预测。这是关于行动能力的问题，包括跑、跳、移动物体、举重、估算距离、发明游戏、争夺名次。你也许会说，“连大自然都要听他的话。”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所有事情听命于他。他所受的教育就是要让他去领导、管理同伴的。才能和经验取代了权利和权威。不管穿什么衣服，叫什么名字，他始终都是最好的那个。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都会领导其他人，其他人始终会感受到他更优秀，他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主人，其他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从他。

He has reached the perfection of childhood; he has lived the life of a child; his progress has not been bought at the price of his

happiness, he has gained both. While he has acquired all the wisdom of a child, he has been as free and happy as his health permits. If the Reaper Death should cut him off and rob us of our hopes, we need not bewail alike his life and death, we shall not have the added grief of knowing that we caused him pain; we will say, “His childhood, at least, was happy; we have robbed him of nothing that nature gave him.”

他已经达到了童年时期最完善的程度。他已经过完了孩童的生活。他取得的成就不是靠牺牲自己的幸福换来的，他两者兼得。他获得了一个孩子能有的全部智慧，同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又过得自由、快乐。如果死神要把他带走，夺走我们的希望，我们也不需要为了他的生和死而忧愁，不会因为曾经给他带来过痛苦而增加我们的悲伤。我们会说，“至少，他的童年，是幸福的，我们没有夺走任何自然给与他的东西。”

The chief drawback to this early education is that it is only appreciated by the wise; to vulgar eyes the child so carefully educated is nothing but a rough little boy. A tutor thinks rather of the advantage to himself than to his pupil; he makes a point of showing that there has been no time wasted; he provides his pupil with goods which can be readily displayed in the shop window, accomplishments which can be shown off at will; no matter whether they are useful, provided they are easily seen. Without choice or discrimination he loads his memory with a pack of rubbish. If the child is to be examined he is set to display his wares; he spreads them out, satisfies those who behold them, packs up his bundle and goes his way. My pupil is poorer, he has no bundle to display, he has only himself to show. Now neither child nor man can be read at a glance. Where are the observers who can at once

discer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child? There are such people, but they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among a thousand fathers you will scarcely find one.

这种早期教育的主要缺点只有智者才会认识到。在目光短浅的人看来，如此小心谨慎的教育除了培养出顽皮的孩子之外毫无用处。老师关心自己的利益胜过关心学生的利益。他强调自己没有浪费时间，他为学生提供的是已经在商店橱窗里展示出来的商品，可以随心所欲地拿出来炫耀的成绩。他不管教的东西是不是有用，只要能显示于人就行了。孩子没得选择，不会辨别，于是就记住了一堆垃圾。如果孩子要考试，老师就让他把那些东西展示出来，孩子也照做，来让老师满意，完事以后再把东西收好，然后离开。我的学生比较穷，没有东西可以炫耀，只有自己可以展示。但没人可以瞥一眼就了解一个孩子或成人。哪里有观察家可以立刻看出孩子的性格呢？这样的人是存在的，但很少，很难找到，在一千位父亲中你也很难找出一个。

Too many questions are tedious and revolting to most of us and especially to children. After a few minutes their attention flags, they cease to listen to your everlasting questions and reply at random. This way of testing them is pedantic and useless; a chance word will often show their sense and intelligence better than much talking, but take care that the answer is neither a matter of chance nor yet learnt by heart. A man must needs have a good judgment if he is to estimate the judgment of a child.

问题问得太多对于大多数人都是要感到厌烦和逆反的，孩子尤甚。过不了几分钟，他们就会走神，不再听你那接连不断的提问，只是随便地问答几句罢了。用这种方法测试他们是迂腐的、无用的。比起长篇大论，无意中说的话更能表达他们的心情与想法，但是要注

意，这种回答不能是他碰巧说的或者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如果有人想评价孩子的判断力，他自己必须先有很好的判断力。

I heard the late Lord Hyde tell the following story about one of his friends. He had returned from Italy after a three years' absence, and was anxious to test the progress of his son, a child of nine or ten. One evening he took a walk with the child and his tutor across a level space where the schoolboys were flying their kites. As they went, the father said to his son, “Where is the kite that casts this shadow?” Without hesitating and without glancing upwards the child replied, “Over the high road.” “And indeed,” said Lord Hyde, “the high road was between us and the sun.” At these words, the father kissed his child, and having finished his examination he departed. The next day he sent the tutor the papers settling an annuity on him in addition to his salary.

我曾听已故的海德爵士说过下面这个故事，是关于他的一个朋友的。他的朋友在意大利呆了三年后回国，一回来就急着想测试自己的儿子这几年在学业上有没有进步，孩子大概九岁、十岁的样子。一天晚上，他和孩子，还有孩子的老师一起去散步，经过一片空地，几个小学生在那儿放风筝。一边走，父亲一边问儿子，“风筝的影子在这，那么风筝在哪儿？”孩子没犹豫，也没朝天上看一眼，便回答道，“在这条大路的上面。”“确实如此，”海德爵士说，“这条大路位于我们和太阳的中间。”说完这些话，他亲了亲孩子，就算完成了测验，走开了。第二天，他给老师寄去了一些文件，在他原有的工资上增加了年薪。

What a father! and what a promising child! The question is exactly adapted to the child's age, the answer is perfectly simple;

but see what precision it implies in the child's judgment. Thus did the pupil of Aristotle master the famous steed which no squire had ever been able to tame.

多么贤明的父亲！多么有前途的孩子！父亲的问题正适合孩子的年龄，孩子的回答非常简单。但是，可以看出孩子有着精准的判断力。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也是像这样驯服了最烈的马，在他之前，没有乡绅能做到这一点。

[3_1].There is nothing so absurd and hesitating as the gait of those who have been kept too long in leading-strings when they were little. This is one of the observations which are considered trivial because they are true.

[3_2].You understand I am speaking of those who think, and not of the crowd.

[3_3]."You see that little boy," said Themistocles to his friends, "the fate of Greece is in his hands, for he rules his mother and his mother rules me, I rule the Athenians and the Athenians rule the Greeks." What petty creatures we should often find controlling great empires if we traced the course of power from the prince to those who secretly put that power in motion.

[3_4].In m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LAW it is proved that no private will can be ordered in the social system.

[3_5].We must recognise that pain is often necessary, pleasure is sometimes needed. So there is only one of the child's desires which should never be complied with, the desire for power. Hence, whenever they ask for anything we must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ir motive in asking. As far as possible give them everything they ask for, provided it can really give them pleasure; refuse everything they demand from mere caprice or love of power.

[3_6].You may be sure the child will regard as caprice any will which opposes his own or any will which he does not understand. Now the child does not understand anything which interferes with his own fancies.

[3_7].A child should never be allowed to play with grown-up people as if they

were his inferiors, nor even as if they were only his equals. If he ventured to strike any one in earnest, were it only the footman, were it the hangman himself, let the sufferer return his blows with interest, so that he will not want to do it again. I have seen silly women inciting children to rebellion, encouraging them to hit people, allowing themselves to be beaten, and laughing at the harmless blows, never thinking that those blows were in intention the blows of a murderer, and that the child who desires to beat people now will desire to kill them when he is grown up.

[3_8].This is why most children want to take back what they have given, and cry if they cannot get it. They do not do this when once they know what a gift is; only they are more careful about giving things away.

[3_9].Moreover if the duty of keeping his word were not established in the child's mind by its own utility, the child's growing consciousness would soon impress it on him as a law of conscience, as an innate principle, only requiring suitable experiences for its development. This first outline is not sketched by man, it is engraved on the heart by the author of all justice. Take away the primitive law of contract and the obligation imposed by contract and there is nothing left of human society but vanity and empty show. He who only keeps his word because it is to his own profit is hardly more pledged than if he had given no promise at all. This principle i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and deserves to be thoroughly studied, for man is now beginning to be at war with himself.

[3_10].Thus the guilty person, accused of some evil deed, defends himself by asserting that he is a good man. His statement is false in itself and false in its application to the matter in hand.

[3_11].Nothing could be more indiscreet than such a question, especially if the child is guilty. Then if he thinks you know what he has done, he will think you are setting a trap for him, and this idea can only set him against you. If he thinks you do not know, he will say to himself, "Why should I make my fault known?" And here we have the first temptation to falsehood as the direct result of your foolish question.

[3_12].It must be understood that I do not answer his questions when he wants; that would be to subject myself to his will and to place myself in the most dangerous state of dependence that ever a tutor was in.

[3_13].The precept "Never hurt anybody," implies the greatest possible independence of human society; for in the social state one man's good is another man's evil. This relation is part of the nature of things; it is inevitable. You may

apply this test to man in society and to the hermit to discover which is best. A distinguished author says, "None but the wicked can live alone." I say, "None but the good can live alone." This proposition, if less sententious, is truer and more logical than the other. If the wicked were alone, what evil would he do? It is among his fellows that he lays his snares for others. If they wish to apply this argument to the man of property, my answer is to be found in the passage to which this note is appended.

[3_14].The Abbe de Condillac

[3_15].I have noticed again and again that it is impossible in writing a lengthy work to use the same words always in the same sense. There is no language rich enough to supply terms and expressions sufficient for the modifications of our ideas. The method of defining every term and constantly substituting the definition for the term defined looks well, but it is impracticable. For how can we escape from our vicious circle? Definitions would be all very well if we did not use words in the making of them. In spite of this I am convinced that even in our poor language we can make our meaning clear, not by always using words in the same sense, but by taking care that every time we use a word the sense in which we use it is sufficiently indicated by the sense of the context, so that each sentence in which the word occurs acts as a sort of definition. Sometimes I say children are incapable of reasoning. Sometimes I say they reason cleverly. I must admit that my words are often contradictory, but I do not think there is any contradiction in my ideas.

[3_16].The learning of most philosophers is like the learning of children. Vast erudition results less in the multitude of ideas than in a multitude of images. Dates, names, places, all objects isolated or unconnected with ideas are merely retained in the memory for symbols, and we rarely recall any of these without seeing the right or left page of the book in which we read it, or the form in which we first saw it. Most science was of this kind till recently. The science of our times is another matter; study and observation are things of the past; we dream and the dreams of a bad night are given to us as philosophy. You will say I too am a dreamer; I admit it, but I do what the others fail to do, I give my dreams as dreams, and leave the reader to discover whether there is anything in them which may prove useful to those who are awake.

[3_17].Translator's note. —The "bureau" was a sort of case containing letters to be put together to form words. It was a favourite device for the teaching of reading and gave its name to a special method, called the bureau-method, of learning to read.

[3_18].In a case like this there is no danger in asking a child to tell the truth, for he knows very well that it cannot be hid, and that if he ventured to tell a lie he would be found out at once.

[3_19].This terror is very noticeable during great eclipses of the sun.

[3_20].Another cause has been well explained by a philosopher, often quoted in this work, a philosopher to whose wide views I am very greatly indebted.

[3_21].To practise them in attention, only tell them things which it is clearly to their present interest that they should understand thoroughly; above all be brief, never say a word more than necessary. But neither let your speech be obscure nor of doubtful meaning.

[3_22].I am aware that the English make a boast of their humanity and of the kindly disposition of their race, which they call "good-natured people;" but in vain do they proclaim this fact; no one else says it of them.

[3_23].The Banians, who abstain from flesh even more completely than the Gaures, are almost as gentle as the Gaures themselves, but as their morality is less pure and their form of worship less reasonable they are not such good men.

[3_24].One of the English translators of my book has pointed out my mistake, and both of them have corrected it. Butchers and surgeons are allowed to give evidence in the law courts, but butchers may not serve on juries in criminal cases, though surgeons are allowed to do so.

[3_25].The ancient historians are full of opinions which may be useful, even if the facts which they present are false. But we do not know how to make any real use of history. Criticism and erudition are our only care; as if it mattered more that a statement were true or false than that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a useful lesson from it. A wise man should consider history a tissue of fables whose morals are well adapted to the human heart.

[3_26].Habit owes its charm to man's natural idleness, and this idleness grows upon us if indulged; it is easier to do what we have already done, there is a beaten path which is easily followed. Thus we may observe that habit is very strong in the aged and in the indolent, and very weak in the young and active. The rule of habit is only good for feeble hearts, and it makes them more and more feeble day by day. The only useful habit for children is to be accustomed to submit without difficulty to

necessity, and the only useful habit for man is to submit without difficulty to the rule of reason. Every other habit is a vice.

[4_1].再没有比那些小时候一直被引步带拉着的人走路走得更滑稽更不稳当的了。这就是那种因为正确反而被人们忽视的观察。

[4_2].你明白我在这里说的是有思想的人，而不是所有人。

[4_3].“你看到那个小男孩了，”地米斯托克利对他的朋友说，“希腊的命运掌握在他手里，因为他控制着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控制着我，我控制着雅典人，雅典人控制着希腊人。”如果我们从国王开始追踪到在幕后偷偷行使权力的人，应当经常发现，控制帝国的人其实是多么渺小啊！

[4_4].我的《政治权利的原理》一书指出，没有什么个人意志能够被加入社会体系中去。

[4_5].我们必须承认，痛苦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必需的，而愉悦只是偶尔需要。在孩子的欲望中，对权利的欲望是永远不应得到满足的。当孩子想要某样东西时，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是他们的动机。要是能给他们带来愉悦的话，尽可能满足他们；要是仅仅是出于任性，或者对权利的热爱，无论如何都不要答应。

[4_6].你可以确信，在孩子看来，任何与他自己的意志相违背或者他无法理解的意志，都是任性的。对于会干涉自己美好幻想的事物，孩子现在还无法理解。

[4_7].永远不能允许孩子把成年人当成下人一样跟他们玩耍，当成与他同等的人也不行。要是孩子动手打人，男仆也好，刽子手也好，让那个挨打的狠狠地打回去。这样，以后他就不会想打人了。我看过一些愚蠢的女人教唆孩子反叛，她们鼓励孩子打人，也允许别人打孩子，还对这种轻微的打击付之一笑，从未想过孩子心里实际想杀人，也从未想过现在想要打人的孩子长大后就会想杀人。

[4_8].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孩子会想收回送出去的东西，如果拿不回来就会哭。当他们一旦明白礼物是什么，便不会这样做了，只会在送礼物的时候变得更加小心谨慎。

[4_9].另外，即使信守诺言这一责任还没有通过其实际效用在孩子心里树立起来，孩子不断成长的意识也会很快将其看作是良知的法律、内在的准则，只需要适当的实践就可以得到发展。这首要的一点不是由人类画在我们心中的，而是通过所有正义的创造者铭刻在心上。如果将原始的契约法及其施加的责任拿走，人类社会就只剩下一片虚幻空荡的景象。纯粹因为守信符合自身利益才这样做的人，其实相当于什么诺言也没守住，或者说，他最终是会违背诺言的。这一准则是最重要的，值得深入研究，

因为人正是从这里开始与自我产生矛盾的。

[4_10].因此，那些有罪的人，被指控做过坏事的人，会声称自己是个好人，以此来辩护。他的证词本身就是假的，应用到他所做的事情上也是错的。

[4_11].在没有什么比这样的问题更不明智了，特别是当孩子真的做错事的时候。如果他认为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他会觉得你在给他挖陷阱，这样的想法只会让他对你产生抵触。如果他认为你不知道，便会对自己说，“为什么我要暴露自己的错误呢？”由此我们发现，最先诱惑他撒谎的直接原因，就是你那愚蠢的问题。

[4_12].我不会在他希望的时候回答他的问题，这一点必须说明。这会让我臣服于他的意志，将我自己置于一种教师从属于学生的最危险境地。

[4_13].“永远不要伤害任何人”这条戒律暗示了人类社会可能达到的最高独立性。因为在社会状态下，一个人的幸福就是另一个人的痛苦。这种关系是事物本质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你也许可以应用它来测试社会上的人和隐士，来判断这两者哪一个好。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说过，“只有坏人才孤独地活着。”我说，“只有好人才孤独地活着。”这个说法虽然相较之下没有文采，但比前者更真实，更符合逻辑。如果坏人形单影只，他还能做什么坏事呢？只有处在同伴之中，他才能为别人设下陷阱。如果有人想把这一的论据用到好人身上，我的答案就在这段注释所对应的正文里。

[4_14].孔狄亚克神父

[4_15].我已经多次注意到，要始终用相同的词汇表达相同的含义来写一部长篇巨著，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种语言提供的术语和表达丰富到足够让我们修饰自己的观念。给每一个术语下定义，以及不断地用定义去取代被定义的术语，这看起来很好，但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要如何避免这种有缺陷的循环呢？假如我们不用词汇来下定义，定义可以是很好的。尽管如此，我相信即使是用我们那贫乏的语言，也可以把意思表达清楚，并不是通过让一个词始终表达相同的意思，而是要注意我们每次使用一个词语的时候，都要使其表达的含义能充分地从上下文中看出来，这样每个词所指示的每句话都能充当定义。有时候，我说孩子没有推理能力。有时候，我说他们推理得很好。我必须承认，我的话经常自相矛盾，但是我不认为在我的观念中有任何矛盾之处。

[4_16].大多数哲学家的学习过程都和孩子的类似。他们的博学不在于脑中有大量的观念，而是有大量的形象。日期，名字，地点，所有与观念隔开或者无关的事物都仅仅作为符号保留在其记忆中，如果不看到所读过的书的左右页面，不看到第一次见时那些东西的外形，就很少会想起它们。从前，大多数的科学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则大不相同；研究和观察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的方法是做梦，做了几晚噩梦就相当于学过哲学了。你会说我也是个做梦者；我承认，但是我做的是其他人没

有做到的事，我的梦只作为梦，我让读者自己去发现在这梦里是否存在任何对清醒的人有用的东西。

[4_17].译者注—“单字拼读卡”就是一种可以将字母组合在一起形成单词的教学用具。这是老师教孩子认字时最爱用的东西，他们还给这种特殊的方法起了名字，叫单字拼读法。

[4_18].在这种情况下，让孩子说实话是没什么危害的，因为孩子清楚地知道真相是藏不住的，如果他冒险撒谎，也会立刻被发现。

[4_19].这种恐惧在日食的过程中尤为明显。

[4_20].一位哲学家清楚地解释过另一个原因，他的观点我在此书中多次引用，他广博的见解让我受益良多。

[4_21].要锻炼他们的注意力，只需要告诉他们一些在当时能激起其兴趣并且能被其充分理解的事情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要说得简洁，一个没用的词都不要有。但是不要说一些晦涩难懂、模棱两可的话。

[4_22].我意识到，英国人总是吹嘘自己的人性和他们这个民族仁慈的性格，即他们所说的“天生的好人”。但他们只是白费力气，别人可没这么说他们。

[4_23].巴尼亚人对肉食的禁绝比高卢人更彻底，他们几乎和高卢人一样温和，但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观念不那么纯净，崇拜的东西不那么合乎情理，所以他们不像高卢人那么好。

[4_24].我这本书的一位英语译者曾指出了我的错误，两位译者都将其加以改正了。屠夫和外科医生允许出庭作证，但是在刑事案件中，屠夫不能作为陪审员，而外科医生是可以的。

[4_25].即使过去的历史学家呈现的事实是错误的，他们确实提出了很多有用的观点。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真正利用历史。我们只关心批判和博学，好像一条陈述是真是假比我们能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还要重要。智者应该把历史看作一系列寓言，其中的寓意是非常适合人的心理的。

[4_26].习惯之所以有其魅力，是因为人天生的懒惰，这种懒惰会因为我们的放纵而与日俱增。做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总是更容易些，因为已经被踩出来的路总是容易跟着走的。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习惯对于老年人和懒散的人的影响很强大，但对年轻人和勤劳的人则影响很小。习惯的法则只适用于软弱的人，会使这些人一天比一天更软弱。对孩子来说，唯一有用的习惯就是服从自然规律。对成年人来说，唯一有用

的习惯就是服从理性。其他任何的习惯都是恶习。

BOOK III

第三卷

The whole course of man's life up to adolescence is a period of weakness; yet there comes a time during these early years when the child's strength overtakes the demands upon it, when the growing creature, though absolutely weak, is relatively strong. His needs are not fully developed and his present strength is more than enough for them. He would be a very feeble man, but he is a strong child.

人在青春期之前，其生命的全部过程处于柔弱的时期。在幼年阶段会有那么一段时期，孩子的力量超过了他的需要，所以这个正在成长的生物，尽管绝对意义上是柔弱的，但相对来说仍是强壮的。他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他现有的力量在满足需求之外还绰绰有余。作为成人，他很柔弱，但作为孩子，他是强壮的。

What is the cause of man's weakness? It is to be found in the disproportion between his strength and his desires. It is our passions that make us weak, for our natural strength is not enough for their satisfaction. To limit our desires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therefore, as to increase our strength. When we can do more than we want, we have strength enough and to spare, we are really strong. This is the third stage of childhood, the stage with which I am about to deal. I still speak of childhood for want of a better word; for our scholar is approaching adolescence, though he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age of puberty.

人的柔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因在于他的力量和欲望的不均衡。让我们软弱的是我们的欲望，因为我们的自然能力无法满足我们的欲望。因此，限制我们的欲望就等于增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能做的比想要的多，我们就能节省足够的力量，自然是强壮的。这是童年的第三阶段，接下来我会详细叙述这个阶段。我依然把它称为“童年”，因为没有更合适的词语。尽管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到达青春期，但他正在向其靠近。

About twelve or thirteen the child's strength increases far more rapidly than his needs. The strongest and fiercest of the passions is still unknown, his physical development is still imperfect and seems to await the call of the will. He is scarcely aware of extremes of heat and cold and braves them with impunity. He needs no coat, his blood is warm; no spices, hunger is his sauce, no food comes amiss at this age; if he is sleepy he stretches himself on the ground and goes to sleep; he finds all he needs within his reach; he is not tormented by any imaginary wants; he cares nothing what others think; his desires are not beyond his grasp; not only is he self-sufficing, but for the first and last time in his life he has more strength than he needs.

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孩子的力量的增长速度比需求快得多。他还没感受过那些最强烈的的欲望，他的身体发育也还是不完善的，似乎在等待意志的唤醒。他几乎感觉不到极寒和酷暑的，勇敢让他不受伤害。他不需要衣服，他的血液是温暖的；他不需要香料，饥饿就是他的调料，在这个年纪，没什么食物是不好吃的；要是太困了，他就在地上伸伸懒腰，直接入睡。他不会被那些虚无的欲望所折磨，也不介意别人怎么想，他的欲望从未脱离他的掌控。他不仅能够满足自己，也正处于人生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力量大于需求的时期。

I know beforehand what you will say. You will not assert that the child has more needs than I attribute to him, but you will deny his strength. You forget that I am speaking of my own pupil, not of those puppets who walk with difficulty from one room to another, who toil indoors and carry bundles of paper. Manly strength, you say, appears only with manhood; the vital spirits, distilled in their proper vessels and spreading through the whole body, can alone make the muscles firm, sensitive, tense, and springy, can alone cause real strength. This is the philosophy of the study; I appeal to that of experience. In the country districts, I see big lads hoeing, digging, guiding the plough, filling the wine-cask, driving the cart, like their fathers; you would take them for grown men if their voices did not betray them. Even in our towns, iron-workers', tool makers', and blacksmiths' lads are almost as strong as their masters and would be scarcely less skilful had their training begun earlier. If there is a difference, and I do not deny that there is, it is, I repeat, much less th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ormy passions of the man and the few wants of the child. Moreover, it is not merely a question of bodily strength, but more especially of strength of mind, which reinforces and directs the bodily strength.

我早就预料到你会说什么。你不会随意断言孩子的需求比我所说的要多，但你会否定他的能力。你可能忘了我只是在谈论我自己的学生，而不是那些拿着一堆报纸，在屋子艰难移动，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的木偶。你认为，只有到了成年，才会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单靠那种从血管里提炼的、能散布全身的元气，就能让孩子的肌肉更加结实、敏感、紧致、有弹性，能带来真正的力量。这些不过是哲学理论，我是要结合实际经验的。在农村，我看到过那些高大的小伙子，总是像他们的父亲一样辛勤耕作，除草犁田，酿酒运货，要是他们不发出声音来，你一定会误以为他们已经成人。在我们的城市里，也有很多年轻的铁匠、钳工，他们几乎跟他们的师傅一样强壮，

并且只要他们很早就开始练习，他们的技术也跟师傅不相上下。如果存在差异，当然我不否认差异确实存在，但是，我再说一遍，这种差异，比起成人的贪得无厌和孩子的少私寡欲之间的差距，要小得多。何况，这并不只是一个关于身体力量的问题，也和精神的力量有关，这种精神力量恰恰是能够加强和指导身体力量的。

This interval in which the strength of the individual is in excess of his wants is, as I have said, relatively though not absolutely the time of greatest strength. It is the most precious time in his life; it comes but once; it is very short, all too short, as you will see when you consider the importance of using it aright.

这种内在的个人力量是远远超过他的需求的，正如我所说过的，这段时间，虽然他的绝对力量不是最强的，但相对力量是最大的。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宝贵的时光，只有一次。这段时光总是飞瞬即逝，特别是当你考虑正确使用这段时期的重要性时，它就显得更短暂了。

He has, therefore, a surplus of strength and capacity which he will never have again. What use shall he make of it? He will strive to use it in tasks which will help at need. He will, so to speak, cast his present surplus into the storehouse of the future; the vigorous child will make provision for the feeble man; but he will not store his goods where thieves may break in, nor in barns which are not his own. To store them aright, they must be in the hands and the head, they must be stored within himself. This is the time for work, instruction, and inquiry. And note that this is no arbitrary choice of mine, it is the way of nature herself.

因此，他拥有过多的体力和能力，这种情况不会有第二次。那他又该如何利用这些力量呢？他会力求将其运用到对他实现需求有帮助的任务上。可以这么说，他会将目前多余的力量储存到将来。精力旺盛的孩子会为虚弱的成人时代作打算。但他不会一味把物品存储在会被人偷去的地方，也不会放在别人的仓库里。为了好好地安置它们，他会把这些东西握在手里，放在头脑中，它们必须被存放在自己身体里。这是需要工作、学习和探究的时期了。请注意这绝不是我武断的选择，而是自然的选择。

Human intelligence is finite, and not only can no man know everything, he cannot even acquire all the scanty knowledge of others. Since the contrary of every false proposition is a truth, there are as many truths as falsehoods. We must, therefore, choose what to teach as well as when to teach it. Some of the information within our reach is false, some is useless, some merely serves to puff up its possessor. The small store which really contributes to our welfare alone deserves the study of a wise man, and therefore of a child whom one would have wise. He must know not merely what is, but what is useful.

人类的智慧是有限的，人不仅不是无所不知的，甚至连别人知道的那一点点知识都不能悉数了解。因为每一个谬误的对立面就是真理，因此真理和谬误的数量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必须选择应该要教什么，什么时候去教。在我们能够获取的知识中，有些信息是错误的，有些是没用的，有些则只能使人膨胀。真正对我们的幸福有用的一小部分知识才值得聪明的人去学习，因此，也值得孩子去学习，他将来是有可能变得聪明的。他不仅要知道这门知识是什么，也要知道它有什么用。

From this small stock we must also deduct those truths which require a full grown mind for their understanding, those which suppose a knowledge of man's relations to his fellow-men—a knowledge which no child can acquire; these things, although in themselves true, lead an inexperienced mind into mistakes with regard to other matters.

从这些为数不多的知识中，我们还必须除去一部分知识，例如那些需要心智足够成熟才能够理解的知识，孩子不能掌握的人际关系知识。这些知识虽然是真实的，但它们可能会让一颗没有经验的心灵对其他事物产生错误的想法。

We are now confined to a circle, small indeed compared with the whole of human thought, but this circle is still a vast sphere when measured by the child's mind. Dark places of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what rash hand shall dare to raise your veil? What pitfalls does our so-called science prepare for the miserable child. Would you guide him along this dangerous path and draw the veil from the face of nature? Stay your hand. First make sure that neither he nor you will become dizzy. Beware of the specious charms of error and the intoxicating fumes of pride. Keep this truth ever before you—Ignorance never did any one any harm, error alone is fatal, and we do not lose our way through ignorance but through self-confidence.

与整个的人类思维相比，我们的确是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但对于孩子的心灵来说，这个范围仍旧足够广阔了。人类思想的未知天地，到底有哪个无畏的人敢来揭开你的面纱呀？那些所谓的科学，给我们可怜的孩子埋下了多少陷阱啊。不正是你引领着他，走在

这条危险的小路上，带着他揭开自然的面纱吗？你一定要保持冷静。首先，请确保你们俩都是清醒的。不要被谬误的特别魅力所误导，也要警惕骄傲的迷人烟雾。时刻谨记这个真理——无知是没什么害处的，真正致命的，是谬误。让我们误入歧途的，并不是无知，而且我们的自大。

His progress in geometry may serve as a test and a true measure of the growth of his intelligence, but as soon as he can distinguish between what is useful and what is useless, much skill and discretion are required to lead him towards theoretical studies. For example, would you have him find a mean proportional between two lines, contrive that he should require to find a square equal to a given rectangle; if two mean proportionals are required, you must first contrive to interest him in the doubling of the cube. See how we are gradually approaching the moral ideas which distinguish between good and evil. Hitherto we have known no law but necessity, now we are considering what is useful; we shall soon come to what is fitting and right.

他在几何学上的成就可以作为测试用来真实地衡量他的智力水平。然而一旦他能够区分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他就需要学会更多的技能和判断力来引导理论性学习了。例如，如果你想让他在两条线之间找一个比例中项，你就得设法让他明白，需要找一个同给定的矩形相等的正方形。如果要找两个比例中项，你必须首先设法让他对立方体的二倍问题感兴趣。看，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地接近能够区分善与恶的道德概念的。迄今为止，除了需求的法则我们什么也不知道。现在我们正在考虑什么是有用的，很快，我们就会开始思考什么是适宜的、正确的。

Man's diverse powers are stirred by the same instinct. The bodily activity, which seeks an outlet for its energies, is succeeded by the mental activity which seeks for knowledge. Children are first restless, then curious; and this curiosity, rightly directed, is the means of development for the age with which we are dealing. Always distinguish between natural and acquired tendencies. There is a zeal for learning which has no other foundation than a wish to appear learned, and there is another which springs from man's natural curiosity about all things far or near which may affect himself. The innate desire for comfort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its complete satisfaction impel him to the endless search for fresh means of contributing to its satisfaction. This i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curiosity; a principle natural to the human heart, though its growth is proportion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feeling and knowledge. If a man of science were left on a desert island with his books and instruments and knowing that he must spend the rest of his life there, he would scarcely trouble himself about the solar system, the laws of attraction, or the differential calculus. He might never even open a book again; but he would never rest till he had explored the furthest corner of his island, however large it might be. Let us therefore omit from our early studies such knowledge as has no natural attraction for us, and confine ourselves to such things as instinct impels us to study.

同一种本能，刺激着人的不同能力。寻找能量发泄口的体力活动会被寻找知识的精神活动取代。孩子们起初是不安的，然后变得好奇。这种好奇心，若是能被正确地引导，就能成为我们所应对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成长方法。我们始终要去区分自然的倾向和后天的倾向。学习的热忱始终存在，而存在的基础只是希望表现得像个学者。还有另一种热忱，产生于人天生对万事万物的好奇心，不论事物是远是近，只要能影响他就行。对舒适的渴望和完全满足这种渴望的不可

能，促使了他无休止地寻找能满足他的新鲜方法。这是好奇心的首要原则，这个原则对于人心而言是很自然的，而它的成长与我们自身感知与知识的发展是成比例的。如果把一位科学家丢在荒岛上度过余生，陪伴他的只有他的书和实验仪器，他就不会再费心地研究太阳系、吸引力法则、微积分了。他可能再也不会看书了。但是，他也不会再休息，直到他完成了对这座岛上最远角落的探索，不管这座岛可能有多大。因此，让我们省略掉那些早期学习，比如不要再学那些对我们毫无自然吸引力可言的知识，不要再把自己局限在这些事物之中，让本能强迫我们去学习。

Our island is this earth; and the most striking object we behold is the sun. As soon as we pass beyond our immediate surroundings, one or both of these must meet our eye. Thus the philosophy of most savage races is mainly directed to imaginary divisions of the earth or to the divinity of the sun.

地球就是我们的岛屿。我们看到的最震撼人心的东西，就是太阳。一旦我们越过周围的环境，眺望远方，我们总能看到这个地球和太阳。因此，大多数野蛮族群的哲学主要涉及对地球进行的想象式划分或是对太阳的神性的想象。

What a sudden change you will say. Just now we were concerned with what touches ourselves, with our immediate environment, and all at once we are exploring the round world and leaping to the bounds of the universe. This change is the result of our growing strength and of the natural bent of the mind. While we were weak and feeble, self-preservation concentrated our attention on ourselves; now that we are strong and powerful, the desire for a wider sphere carries us beyond ourselves as far as our eyes can

reach. But as the intellectual world is still unknown to us, our thoughts are bounded by the visible horizon, and our understanding only develops within the limits of our vision.

你可能会说这样的改变太突然了。我们刚刚还是考虑什么在碰触自己，考虑我们周围的环境，突然，我们就跳过宇宙的边界在探索全世界了。这个转变，来源于我们力量的增长和思想的自然发展。当我们柔弱的时候，自我生存的需要让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现在，我们强大有力了，对更广阔范围的向往让我们超出自身，把我们带到了目之所及的最远方。但是，由于理性的世界对于我们仍是未知的，我们的想法不能超出眼睛能看到的范围，我们的理解力只能在视野的局限范围里发展。

Let us transform our sensations into ideas, but do not let us jump all at once from the objects of sense to objects of thought. The latter are attained by means of the former. Let the senses be the only guide for the first workings of reason. No book but the world, no teaching but that of fact. The child who reads ceases to think, he only reads. He is acquiring words not knowledge.

让我们把感觉转换成观念，但不要一下子从感觉的客体跳到思想的客体。后者必须在前者的帮助下才能获得。在最初的理性活动中，让感官成为唯一的指导。不拘泥于课本，而忠于世界，不盲从教学，只忠于事实。如果一个在读书的孩子停止思考，那他仅仅在阅读而已。他学习的，只是单词，而不是知识。

Teach your scholar to observe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you will soon rouse his curiosity, but if you would have it grow, do not

be in too great a hurry to satisfy this curiosity. Put the problems before him and let him solve them himself. Let him know nothing because you have told him, but because he has learnt it for himself. Let him not be taught science, let him discover it. If ever you substitute authority for reason he will cease to reason; he will be a mere plaything of other people's thoughts.

你要教你的学生观察自然现象，很快你就能激发他的好奇心。但是如果你想让好奇心进一步发展，就不要急着去满足它。我们要把问题丢给他，让他自己去解决。他所学到的知识，并不是你告诉他的，而是他自己学习得来的。我们不要把科学知识教授给他，而要让他自己去发掘。一旦你用权威代替理性思考，他就不再思考了，他就只是一个复制他人思想的玩偶。

You wish to teach this child geography and you provide him with globes, spheres, and maps. What elaborate preparations! What is the use of all these symbols; why not begin by showing him the real thing so that he may at leas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你想教他地理，就给他许多地球仪、天象仪和地图。多么煞费苦心的准备啊！这些象征实物的工具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不直接向他展示真正的事物，这样至少他也许能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One fine evening we are walking in a suitable place where the wide horizon gives us a full view of the setting sun, and we note the objects which mark the place where it sets. Next morning we return to the same place for a breath of fresh air before sun-rise. We see the rays of light which announce the sun's approach; the glow

increases, the east seems afire, and long before the sun appears the light leads us to expect its return. Every moment you expect to see it. There it is at last! A shining point appears like a flash of lightning and soon fills the whole space; the veil of darkness rolls away, man perceives his dwelling place in fresh beauty. During the night the grass has assumed a fresher green; in the light of early dawn, and gilded by the first rays of the sun, it seems covered with a shining network of dew reflecting the light and colour. The birds raise their chorus of praise to greet the Father of life, not one of them is mute; their gentle warbling is softer than by day, it expresses the langour of a peaceful waking. All these produce an impression of freshness which seems to reach the very soul. It is a brief hour of enchantment which no man can resist; a sight so grand, so fair, so delicious, that none can behold it unmoved.

某个美好的傍晚，我们在一处优美的地方散步，在那里，广阔的地平线让我们把美丽的落日尽收眼底，我们仔细观察那里的景物，以便记住这个地方。第二天清晨，我们又来到一样的地方，在日出之前呼吸新鲜空气。我们看到了太阳的光芒，预示着它即将升起；光芒逐渐增强，东方看起来像是在燃烧一样，在太阳出来之前，光芒持续了许久，让我们对太阳的回归充满期待。每一个瞬间，你都期待着看到太阳。最后，它终于出现了！一个发亮的光点像是瞬间即逝的闪电一样出现了，很快就充满了整个空间，黑暗的面纱消散了，人们甚至可以看到自己的居住地，美轮美奂。在漆黑的夜晚中，草地获得翠色的新生活力；在破晓的微光中，第一缕阳光为它镀上了一抹金色，它看起来像是被覆盖上了一层用露珠编制而成的网，闪闪发光，映射着美妙的光色。鸟儿们齐声高鸣，迎接生命的造物主，没有一只鸟儿噤声不作；它们啭鸣声比平日更加柔和，表达着平静苏醒的倦意。所有的一切，衍生出一股清新沁人之感，似乎直达灵魂深处。没有人可以抵挡得住这种短暂的魅力，如此宏丽美好的场景，没有人会对此无动于衷的。

Fired with this enthusiasm, the master wishes to impart it to the child. He expects to rouse his emotion by drawing attention to his own. Mere folly! The splendour of nature lives in man's heart; to be seen, it must be felt. The child sees the objects themselves, but does not perceive their relations, and cannot hear their harmony. It needs knowledge he has not yet acquired, feelings he has not yet experienced, to receive the complex impression which results from all these separate sensations. If he has not wandered over arid plains, if his feet have not been scorched by the burning sands of the desert, if he has not breathed the hot and oppressive air reflected from the glowing rocks, how shall he delight in the fresh air of a fine morning. The scent of flowers, the beauty of foliage, the moistness of the dew, the soft turf beneath his feet, how shall all these delight his senses. How shall the song of the birds arouse voluptuous emotion if love and pleasure are still unknown to him? How shall he behold with rapture the birth of this fair day, if his imagination cannot paint the joys it may bring in its track? How can he feel the beauty of nature, while the hand that formed it is unknown?

老师被这种热情点燃，也想把它传递给孩子。他希望通过引起孩子的注意，来激发孩子的情感。这是多么愚蠢啊！自然的光彩壮丽是栖息在人的心灵之中的，要想看到它，就先得感受到它。孩子能看到事物本身，却不能感知它们的联系，自然感受不到它们的和谐美好。要想感受到这些分离的感觉带来的繁杂印象，就需要一些他未曾获得的知识，一些他不曾体验过的感觉。如果他不曾漫步在干燥的平原，如果他的脚不曾被炽热的沙子所灼伤，如果他不曾呼吸被太阳照射许久的岩石所反射出的闷热沉重的空气，他又怎么会为美妙清晨的清新空气而兴高采烈呢？他的感官又怎么会因为花儿的清香，叶子的美丽，露水的湿润，和他脚下草皮的柔软触感而感到愉悦呢？要是他对

爱和欢乐一无所知，他又怎么会因为鸟儿的歌唱而心潮荡漾呢？要是他的想象力无法为他描绘那样的欣喜场面，他又怎么会满怀喜悦地去享受美好的一天的诞生呢？要是他不知道是谁的巧手创造了这些，他又怎么能领略到自然的美丽呢？

Never tell the child what he cannot understand: no descriptions, no eloquence, no figures of speech, no poetry. The time has not come for feeling or taste. Continue to be clear and cold; the time will come only too soon when you must adopt another tone.

永远不要告诉孩子那些他不能理解的事物，不要描述论辩，不要比喻说明，更不要吟诗造句。体验和品味的时刻还没有到来。说话一定要继续清楚冷静，如果你想采用另一种口吻，现在还太早。

Brought up in the spirit of our maxims, accustomed to make his own tools and not to appeal to others until he has tried and failed, he will examine everything he sees carefully and in silence. He thinks rather than questions. Be content, therefore, to show him things at a fit season; then, when you see that his curiosity is thoroughly aroused, put some brief question which will set him trying to discover the answer.

如果孩子们在我们的准则下成长，习惯于自己制作工具，在尝试和失败之前不要去求助他人，这样他就会静静地仔细检查看到的一切。他会思考，而不是提问。因此，要在合适的时候给他看一些事物，那么之后，当你发现他的好奇心完全被调动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提几个简短的问题，这会让他试着去探索答案。

On the present occasion when you and he have carefully observed the rising sun, when you have called his attention to the mountains and other objects visible from the same spot, after he has chattered freely about them, keep quiet for a few minutes as if lost in thought and then say, “I think the sun set over there last night; it rose here this morning. How can that be?” Say no more; if he asks questions, do not answer them; talk of something else. Let him alone, and be sure he will think about it.

而现在，当你们一起细致地观察初升的太阳时，当你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能从这个角度看到的群山或者其他物体上时，当他自由地谈论这这些景象后，你该沉默一会，像是沉思一般，然后说“我记得太阳昨晚是从那里落下，今早却从这里升起。怎么会这样呢？”你不需要再过多言，如果他提问，也千万不要回答，而是开始说一些其他的事情。别去管他，只要确保他会琢磨就可以了。

To train a child to be really attentive so that he may be really impressed by any truth of experience, he must spend anxious days before he discovers that truth. If he does not learn enough in this way, there is another way of drawing his attention to the matter. Turn the question about. If he does not know how the sun gets from the place where it sets to where it rises, he knows at least how it travels from sunrise to sunset, his eyes teach him that. Use the second question to throw light on the first; either your pupil is a regular dunce or the analogy is too clear to be missed. This is his first lesson in cosmography.

我们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细心的人，这样他才可能把真理铭刻在

心，在他发现真相之前，他必须度过一段焦虑难安的时间。要是通过这种学习方法，他还是一知半解的话，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法让他理解这个问题。就是把问题反过来问他。如果他不知道太阳是如何从日落的地方移动到日出的地方，那么他至少知道太阳从日出到日落的轨迹的，他是可以亲眼见证这个过程的。因此，就可以用第二个问题来阐明第一个问题。除非你的学生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否则他是不可能遗漏掉这个明显的类比的。就是他关于宇宙学的第一课。

As we always advance slowly from one sensible idea to another, and as we give time enough to each for him to become really familiar with it before we go on to another, and lastly as we never force our scholar's attention, we are still a long way from a knowledge of the course of the sun or the shape of the earth; but as all the apparent movements of the celestial bodies depend on the same principle, and the first observation leads on to all the rest, less effort is needed, though more time, to proceed from the diurnal revolution to the calculation of eclipses, than to get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day and night.

我们总是慢慢地从一个能够感知的概念发展到另一个，在学习另一个概念之前总是给孩子足够的时间来熟悉已知的概念，我们也从不强迫学生去学习，这三个原因让我们距离学习太阳的运行轨迹和地球的形状这些知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所有这些天体的表面运动都是建立在相同原则之上的，观察一次就可以引出余下的知识。因此比起详尽地讲解白天黑夜的知识，慢慢从地球的自转讲到日蚀和月蚀的原理，尽管要花费更多时间，但需要的精力却更少。

Since the sun revolves round the earth it describes a circle, and every circle must have a centre; that we know already. This centre

is invisible, it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earth, but we can mark out two opposite points on the earth's surface which correspond to it. A skewer passed through the three points and prolonged to the sky at either end would represent the earth's axis and the sun's daily course. A round teetotum revolving on its point represents the sky turning on its axis, the two points of the teetotum are the two poles; the child will be delighted to find one of them, and I show him the tail of the Little bear. Here is a another game for the dark. Little by little we get to know the stars, and from this comes a wish to know the planets and observe the constellations.

因为太阳时围绕着地球转动的，它的轨迹就是一个圆，每个圆都会有一个中心，关于这一点，我们都是烂熟于心的。这个中心位于地球的中心，是不可见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地球表面的两个对应点，来找到它。将一根线穿过这三个点，并且延伸至天空，那么在任意一头，我们都可以找到地球的轴心的和太阳的运行轨迹。一个圆陀螺绕着陀尖旋转，就好像天空绕着轴心旋转，陀螺的两个尖点就代表了地球的两极，如果能够找到它们任意一个极点，孩子一定会欣喜万分，而且，我也可以把小熊星尾巴的那颗星只给他看了。这是另一个可以在黑夜里玩的游戏。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我们就了解了星星的知识了，这样，我们就会希望了解行星和观察星座了。

We saw the sun rise at midsummer, we shall see it rise at Christmas or some other fine winter's day; for you know we are no lie-a-beds and we enjoy the cold. I take care to make this second observation in the same place as the first, and if skilfully lead up to, one or other will certainly exclaim, “What a funny thing! The sun is not rising in the same place; here are our landmarks, but it is rising over there. So there is the summer east and the winter east, etc.” Young teacher, you are on the right track. These examples should

show you how to teach the sphere without any difficulty, taking the earth for the earth and the sun for the sun.

我们在仲夏看过日出，我们也应该在圣诞节或者任意一个晴朗的冬日观察一下日出，因为你知道，我们并不是什么赖床的懒人，我们甚至很享受寒冷的乐趣。我特意把第二次观察选在和第一次相同的地点，如果准备得足够巧妙，一定会有人说，“这简直太有趣了！太阳居然不是从同一个地方升起的，这些是我们原先做的地标，可如今，太阳却是从那里升起的。因此，夏天的东方在这里，冬天的东方在那里……”年轻的老师，这就对了。这些例子已经告诉你了如何不费吹灰之力地讲清天体运动，只要用地球的方法讲解地球，用太阳的方法讲解太阳，就可以了。

As a general rule—never substitute the symbol for the thing signified, unless it is impossible to show the thing itself; for the child's attention is so taken up with the symbol that he will forget what it signifies.

有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则，即不要用象征物代替实物，除非你不能把某件东西展现给孩子看。因为孩子的注意力总是会被象征物本身吸引，以至于他们常常会忘记象征物到底代表着什么了。

I consider the armillary sphere a clumsy disproportioned bit of apparatus. The confused circles and the strange figures described on it suggest witchcraft and frighten the child. The earth is too small, the circles too large and too numerous, some of them, the colures, for instance, are quite useless, and the thickness of the pasteboard gives them an appearance of solidity so that they are taken for

circular masses having a real existence, and when you tell the child that these are imaginary circles, he does not know what he is looking at and is none the wiser.

我认为浑天仪的结构装置是不成比例的。浑天仪上总是充斥着令人困惑的圆圈和奇怪的图形，跟不可捉摸的巫术一样，吓得孩子们不敢学习。地球太小，而圆圈却太大太多，其中一些圆圈，例如分至圈，其实是毫无用处的。并且由于石膏板的厚度，常常给他们一种硬质的错觉，从而他们可能会以为这些圆形物质是真实存在的。但当你告诉孩子们，它们不过是些想象中的圆圈，他就不知道他到底在看什么，到底什么是有用的了。

We are unable to put ourselves in the child's place, we fail to enter into his thoughts, we invest him with our own ideas, and while we are following our own chain of reasoning, we merely fill his head with errors and absurdities.

我们不能设身处地地为孩子着想，我们无法进入他们的思想，却只能一味地把我们的想法灌输给他们，当我们以为跟随着自己理性的链条时，其实仅仅是在他脑中填满了错误和谬论。

Should the method of studying science be analytic or synthetic? People dispute over this question, but it is not always necessary to choose between them. Sometimes the same experiments allow one to use both analysis and synthesis, and thus to guide the child by the method of instruction when he fancies he is only analysing. Then, by using both at once, each method confirms the results of the other. Starting from opposite ends, without thinking of

following the same road, he will unexpectedly reach their meeting place and this will be a delightful surprise. For example, I would begin geography at both ends and add to the study of the earth's revolution the measurement of its divisions, beginning at home. While the child is studying the sphere and is thus transported to the heavens, bring him back to the divisions of the globe and show him his own home.

研究科学应该用综合的方法还是分析的方法呢？对此，人们众说纷纭，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要两者择其一。有时候，相同的实验允许人们使用两种方法，因此，当孩子只沉浸于分析的方法中时，你要用综合的方法来指导他。那么，通过同时运用这两个方法，它们可以相互印证彼此的结果。从两个对立点开始，利用两个不同的方法，他必然会遇到交汇点，这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对他而言肯定是愉悦的惊喜。打个比方，教地理的时候，我会先教地球的两极，然后再延伸到地球的转动，然后从我们居住的地方开始测量地球的各部分。当孩子学习天体运动的时候，自然会被天空所吸引，你就要把他引导到地球的各部分研究上，并且要把他自己的家指给他看。

His geography will begin with the town he lives in and his father's country house, then the places between them, the rivers near them, and then the sun's aspect and how to find one's way by its aid. This is the meeting place. Let him make his own map, a very simple map, at first containing only two places; others may be added from time to time, as he is able to estimate their distance and position. You see at once what a good start we have given him by making his eye his compass.

他的地理学习，应该始于他生活的城镇、他父亲的乡村小屋，然

后是位于这两地之间的地方，附近的河流，接着再去学习太阳的相关知识，以及如何利用太阳来找到方向。这就是交汇点。让他自己制作地图，一个简易的地图，一开始只需要包括两个地方，慢慢地，等到他能够估算其他地点的距离和位置的时候，他就可以补充更多的地点。你马上就可以发现，通过让他把眼睛作为指南针，我们已经给了他一个多棒的开始。

No doubt he will require some guidance in spite of this, but very little, and that little without his knowing it. If he goes wrong let him alone, do not correct his mistakes; hold your tongue till he finds them out for himself and corrects them, or at most arrange something, as opportunity offers, which may show him his mistakes. If he never makes mistakes he will never learn anything thoroughly. Moreover, what he needs is not an exact knowledge of local topography, but how to find out for himself. No matter whether he carries maps in his head provided he understands what they mean, and has a clear idea of the art of making them. See what a difference there is already between the knowledge of your scholars and the ignorance of mine. They learn maps, he makes them. Here are fresh ornaments for his room.

毫无疑问，尽管如此，他还是需要一些指导，不过这些指导是很细微的，他甚至察觉不到。如果他犯错了，那就让他犯错，不要去纠正他的错误。直到他自己找出错误并且改正之前，你都应该保持沉默，最多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做一些安排，让他发现自己的错误。如果他从不犯错，他永远也不会彻底地学会什么。更何况，他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当地的地形学知识，而是如何自己去发现。不论他的脑子里是否有地图，只要他了解它们的意思、对如何制作地图有清楚的概念就好了。从这里，你可以看出你学生的知识和我学生的无知之间的差别了。你的学生们能学会看懂地图，而我的学生学会制作地图。他的

房间又会有新的装饰了。

Remember that this is the essential point in my method—Do not teach the child many things, but never to let him form inaccurate or confused ideas. I care not if he knows nothing provided he is not mistaken, and I only acquaint him with truths to guard him against the errors he might put in their place. Reason and judgment come slowly, prejudices flock to us in crowds, and from these he must be protected. But if you make science itself your object, you embark on an unfathomable and shoreless ocean, an ocean strewn with reefs from which you will never return. When I see a man in love with knowledge, yielding to its charms and flitting from one branch to another unable to stay his steps, he seems to me like a child gathering shells on the sea-shore, now picking them up, then throwing them aside for others which he sees beyond them, then taking them again, till overwhelmed by their number and unable to choose between them, he flings them all away and returns empty handed.

你始终要牢记，我的方法有个必不可少的要点——不要教给孩子许多事情，永远不要让他形成模糊而迷惑的概念。我并不关心他是否一无所知，只要他不受欺骗就好了。我只教给他真理，来防止他在那个地方放上谬误。理性和判断力来得很慢，而偏见却总是层出不穷，我们必须让孩子免受偏见的误导。但是如果你把科学本身看成你的目标，那你就像是把自己置于一个深不见底又满是暗礁的无边海洋里，你是永远无法让自己抽身的。当我看到一个好学的人，被知识的魅力所吸引，一门紧接着一门地学习，从不停歇，对我而言，他就如同一个在海岸边收集贝壳的孩子，一会把它们捡起来，过会看到比它们更好看的贝壳，就扔了原先的那些，周而复始，直到看到成堆的贝壳，震惊于它们的数量，踌躇不定，无法抉择，他才又把它们全部扔掉，

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Time was long during early childhood; we only tried to pass our time for fear of using it ill; now it is the other way; we have not time enough for all that would be of use. The passions, remember, are drawing near, and when they knock at the door your scholar will have no ear for anything else. The peaceful age of intelligence is so short, it flies so swiftly, there is so much to be done, that it is madness to try to make your child learned. It is not your business to teach him the various sciences, but to give him a taste for them and methods of learning them when this taste is more mature. That is assuredly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all good education.

在童年，时间总是显得很长，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消磨时间，生怕滥用了它们。现在，却恰恰相反，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有用的事情。记住，欲望总是一步步靠近，当它们敲响大门，你的学生是无心关注其他事情的。智力发展地较为缓慢阶段是如此短暂，它总是转瞬即逝，却有太多事情必须要做，因此想要让你的孩子变得博学多才简直是疯了。你的任务并不是教他各门学科，而是培养他对学习的兴趣，并且在他们的兴趣逐渐成熟起来的时候，教给他们学习的方法。这确实是所有良好的教育的基本准则。

This is also the time to train him gradually to prolonged attention to a given object; but this attention should never be the result of constraint, but of interest or desire; you must be very careful that it is not too much for his strength, and that it is not carried to the point of tedium. Watch him, therefore, and whatever happens, stop before he is tired, for it matters little what he learns; it does matter that he should do nothing against his will.

这也是一个训练他对某一给定物体逐渐延长注意力的好时机。但是，这种注意力并不是源于对他的限制，而是源于他对事物的兴趣或欲望。你必须特别注意不要让现有的体力承受太多负担，不要让他对事物产生厌倦之情。因此，无论发生什么，注意观察他，在他产生疲态之前停下来，因为他能学到些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做的所有事都不能违反他的意愿。

If he asks questions let your answers be enough to whet his curiosity but not enough to satisfy it; above all, when you find him talking at random and overwhelming you with silly questions instead of asking for information, at once refuse to answer; for it is clear that he no longer cares about the matter in hand, but wants to make you a slave to his questions. Consider his motives rather than his words. This warning, which was scarcely needed before, becomes of supreme importance when the child begins to reason.

如果他向你提问，请尽量让你的答案去刺激但又无法满足他的好奇心。最重要的是，当你发现他在胡乱地说，问你一大堆愚蠢的问题而不是在询问信息的时候，你就应该马上拒绝回答。显然，这个时候，他并不关心他面临的事情，只不过是想让你成为他那些问题的奴隶罢了。多想想他的动机，而不是他的言语。这个之前不怎么需要的警告，当孩子开始理性思考，就变得非常重要。

There is a series of abstract truths by means of which all the sciences are related to common principles and are developed each in its turn. This relationship is the method of the philosophers. We are not concerned with it at present. There is quite another method by which every concrete example suggests another and always

points to the next in the series. This succession, which stimulates the curiosity and so arouses the attention required by every object in turn, is the order followed by most men, and it is the right order for all children. To take our bearings so as to make our maps we must find meridians. Two points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equal shadows morning and evening supply an excellent meridian for a thirteen-year-old astronomer. But these meridians disappear, it takes time to trace them, and you are obliged to work in one place. So much trouble and attention will at last become irksome. We foresaw this and are ready for it.

这个世界存在一系列抽象真理，正是这些抽象真理将所有的学科和一般的原则联系起来，使得这些学科能够轮流发展。这种关系就是哲学家的方法。目前我们并不讨论这种方法。我们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每个明确的例子都能暗示着另一个例子，并且都能指示在这一系列中的后一个事物到底是什么。这种交替会激发出孩子的好奇心，因而引起他们的注意，这种注意是每一个轮流发展的客体所需要的。这种交替不仅是大多数成人要遵循的次序，也是所有孩子所要遵循的正确次序。为了确定方位制作地图，我们必须先找到子午线。在清晨和傍晚两个等长的影子之间，有两个交叉点，将这两个交叉点相连，就可以为一个十三岁的天文学家构成一条相当精准的子午线。但是这些子午线消失了，而要追踪他们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的，你必须持续不断地在同一个地方工作。需要花费这么多心思和精力，孩子最终会感到厌烦。我们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并且有所准备。

Again I must enter into minute and detailed explanations. I hear my readers murmur, but I am prepared to meet their disapproval; I will not sacrific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is book to your impatience. You may think me as long-winded as you

please; I have my own opinion as to your complaints.

在这里，我必须再一次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了。我听过我的读者们在低声抱怨，对于他们的指责，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我绝不会因为你们的不耐烦，而牺牲这本书最为重要的部分。你可以尽你喜欢地认为我啰嗦。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正如你有你自己的抱怨。

Long ago my pupil and I remarked that some substances such as amber, glass, and wax, when well rubbed, attracted straws, while others did not. We accidentally discover a substance which has a more unusual property, that of attracting filings or other small particles of iron from a distance and without rubbing. How much time do we devote to this game to the exclusion of everything else! At last we discover that this property is communicated to the iron itself, which is, so to speak, endowed with life. We go to the fair one day [4_1] and a conjuror has a wax duck floating in a basin of water, and he makes it follow a bit of bread. We are greatly surprised, but we do not call him a wizard, never having heard of such persons. As we are continually observing effects whose causes are unknown to us, we are in no hurry to make up our minds, and we remain in ignorance till we find an opportunity of learning.

很久之前，我的学生和我注意到有一些物质，例如琥珀、玻璃和蜡，在经过一番摩擦之后，是能够把干草吸起来的，但别的物质却不能。我们偶然间还发现一种物质具有更不寻常的特性，那就是即使不经过摩擦，它也能把相距甚远的锉屑和小铁块吸引过来。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个游戏上，以求排除不能做到这一点的物质啊！最后，我们发现这种属性回到了铁自己身上，也就是说，铁也具有磁性了。有一天，我们到市集去 [5_1] ，看到有个魔术师把一只蜡质的鸭子放在一

盆水上，还让鸭子跟随着面包不断移动。我们俩对此大吃一惊，但是我们不会称他为巫师，因为我们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不断地观察到原因不明的现象，所以并不急着去研究。我们将保持无知的状态，直到有机会去学习。

When we get home we discuss the duck till we try to imitate it. We take a needle thoroughly magnetised, we imbed it in white wax, shaped as far as possible like a duck, with the needle running through the body, so that its eye forms the beak. We put the duck in water and put the end of a key near its beak, and you will readily understand our delight when we find that our duck follows the key just as the duck at the fair followed the bit of bread. Another time we may note the direction assumed by the duck when left in the basin; for the present we are wholly occupied with our work and we want nothing more.

当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探讨那只鸭子，并且决定模仿一下。我们拿了一根磁化的针，把它嵌进白蜡里，把蜡尽可能捏成一只鸭子的形状，并且让针穿过鸭子的身体，把针眼作为鸭嘴。我们把鸭子放到水里，并且把钥匙的一端靠近鸭嘴，当我们发现那只鸭子亦步亦趋地跟着钥匙游动，就跟市集上的那只鸭子跟着面包一样的时候，你一定可以想到我们有多高兴。另外有一次，我们甚至注意到当鸭子静止在水中的时候，它是朝着哪个方向的。因为目前，我们全神贯注在这件事情上，别无他想。

The same evening we return to the fair with some bread specially prepared in our pockets, and as soon as the conjuror has performed his trick, my little doctor, who can scarcely sit still, exclaims, “The trick is quite easy; I can do it myself.” “Do it then.”

He at once takes the bread with a bit of iron hidden in it from his pocket; his heart throbs as he approaches the table and holds out the bread, his hand trembles with excitement. The duck approaches and follows his hand. The child cries out and jumps for joy. The applause, the shouts of the crowd, are too much for him, he is beside himself. The conjuror, though disappointed, embraces him, congratulates him, begs the honour of his company on the following day, and promises to collect a still greater crowd to applaud his skill. My young scientist is very proud of himself and is beginning to chatter, but I check him at once and take him home overwhelmed with praise.

当天傍晚，我们又回到了市集，并且在钱包里放了一些特殊的面包，当这个魔术师又开始表演他的把戏的时候，我的小博士简直不能保持镇定了，激动地说："这个戏法太简单了，连我都能做得到。""那你来试试吧。"他立刻就从钱包里拿出了那块内藏铁片的面包，在走近桌子的时候，他的心砰砰直跳，他的手一边由于激动而颤抖着，一边把面包伸了过去。鸭子游了过来，并且紧随着他的手。孩子止不住地大叫，兴高采烈地跳了起来。掌声，观众的喝彩声，让他欣喜若狂。那个魔术师，虽然略显沮丧，但也拥抱了孩子，连声祝贺，还邀请他第二天一同表演。魔术师还说会有更多的观众来为他的本领鼓掌喝彩。我年轻的小科学家非常自豪，正准备他开始喋喋不休的时候，我立马制止了他，带着备受赞赏的他回了家。

The child counts the minutes till to-morrow with absurd anxiety. He invites every one he meets, he wants all mankind to behold his glory; he can scarcely wait till the appointed hour. He hurries to the place; the hall is full already; as he enters his young heart swells with pride. Other tricks are to come first. The conjuror surpasses himself and does the most surprising things. The child

sees none of these; he wriggles, perspires, and hardly breathes; the time is spent in fingering with a trembling hand the bit of bread in his pocket. His turn comes at last; the master announces it to the audience with all ceremony; he goes up looking somewhat shamefaced and takes out his bit of bread. Oh fleeting joys of human life! the duck, so tame yesterday, is quite wild to-day; instead of offering its beak it turns tail and swims away; it avoids the bread and the hand that holds it as carefully as it followed them yesterday. After many vain attempts accompanied by derisive shouts from the audience the child complains that he is being cheated, that is not the same duck, and he defies the conjuror to attract it.

这个孩子怀揣着滑稽的不安，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着明天的到来。他邀请了每一个他遇见的人，他希望所有人都见证他的荣誉，他简直无法等到约定的时间了。他焦急地跑向表演场地，整个大厅都挤满了人，他带着满心的骄傲走进了会场。魔术师首先表演了一些其他的戏法。魔术师不断超越自己，表演了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精彩戏法。而这个孩子从未见过这些表演，他惴惴不安，紧张得汗流浃背，甚至不能呼吸。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只能用颤抖的手抓着钱包里的那一点面包。终于轮到他表演了，魔术师郑重其事地向观众介绍了他。他害羞地走上台，眼睛不知在望何处，慢慢掏出了那一小片面包。人类的生活是变幻莫测的啊！那只鸭子，昨天还是那么温驯，今天却那么不听话。它非但没有把嘴伸过来，还掉转尾巴游开了。它昨天有多么仔细地跟着这只拿着面包的手，今天就有多抗拒。伴随着来自观众的嘲弄般的喊叫，孩子在经过许多徒劳无功的尝试后，抱怨自己被欺骗了，说那并不是原来的鸭子，他质疑魔术师能吸引鸭子。

The conjuror, without further words, takes a bit of bread and offers it to the duck, which at once follows it and comes to the hand

which holds it. The child takes the same bit of bread with no better success; the duck mocks his efforts and swims round the basin. Overwhelmed with confusion he abandons the attempt, ashamed to face the crowd any longer. Then the conjuror takes the bit of bread the child brought with him and uses it as successfully as his own. He takes out the bit of iron before the audience—another laugh at our expense—then with this same bread he attracts the duck as before. He repeats the experiment with a piece of bread cut by a third person in full view of the audience. He does it with his glove, with his finger-tip. Finally he goes into the middle of the room and in the emphatic tones used by such persons he declares that his duck will obey his voice as readily as his hand; he speaks and the duck obeys; he bids him go to the right and he goes, to come back again and he comes. The movement is as ready as the command. The growing applause completes our discomfiture. We slip away unnoticed and shut ourselves up in our room, without relating our successes to everybody as we had expected.

那位魔术师，二话不说，拿了一些面包然后把它递给鸭子，鸭子立刻跟住了面包，向着拿着面包的手游过来。这个孩子拿着同样的面包却没有成功；这只鸭子嘲弄了他的努力，并沿着盆子游来游去。被困惑压垮的孩子放弃了尝试，羞愧到不能再直面观众。然后这位魔术师拿了一些孩子给他的面包，像用自己的面包那样成功地吸引了鸭子。他当着观众的面把面包里的铁片取出来，这又引发了另一阵嘲笑，然后，用这片没了铁片面包，他像之前那样吸引了鸭子。他在观众的注视下，用第三个人切的一些面包又重复了这个实验。他带着手套，用自己的指尖进行这个实验。最后他走到房子的中间，用他们那个行业的人惯有的声调宣称，他的鸭子会服从他说的话，就像之前服从他的手那样。然后他发出指令，鸭子真的服从，他让鸭子往右走，鸭子就往右走，他让鸭子回来，鸭子就回来。鸭子的动作就像是为命令而准备的那样。不断增强的欢呼声加剧了我们的狼狈。我们趁别人

不注意偷偷溜掉了，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并没有像我们之前期望的那样将自己的成功讲给每个人听。

Next day there is a knock at the door. When I open it there is the conjuror, who makes a modest complaint with regard to our conduct. What had he done that we should try to discredit his tricks and deprive him of his livelihood? What is there so wonderful in attracting a duck that we should purchase this honour at the price of an honest man's living? “My word, gentlemen! had I any other trade by which I could earn a living I would not pride myself on this. You may well believe that a man who has spent his life at this miserable trade knows more about it than you who only give your spare time to it. If I did not show you my best tricks at first, it was because one must not be so foolish as to display all one knows at once. I always take care to keep my best tricks for emergencies; and I have plenty more to prevent young folks from meddling. However, I have come, gentlemen, in all kindness, to show you the trick that gave you so much trouble; I only beg you not to use it to my hurt, and to be more discreet in future.” He then shows us his apparatus, and to our great surprise we find it is merely a strong magnet in the hand of a boy concealed under the table. The man puts up his things, and after we have offered our thanks and apologies, we try to give him something. He refuses it. “No, gentlemen,” says he, “I owe you no gratitude and I will not accept your gift. I leave you in my debt in spite of all, and that is my only revenge. Generosity may be found among all sorts of people, and I earn my pay by doing my tricks not by teaching them.”

第二天，有人来敲门。我把门打开，发现门外站着那个魔术师，他就我们的行为谦逊地说出了自己抱怨。他做了什么以至于我们要尽

力去诋毁他的魔术，剥夺他谋生的活计呢？在吸引鸭子的魔术中有什么如此美妙以至于我们用一个诚实的人的生存为代价去换取这种骄傲呢？“听我说，绅士们！”我若是有任何其他的谋生手段我就不会以此而感到自豪。你应该会相信，对于把一生时间都花在这种糟糕的生意上的人，跟你们这样只把闲暇时间花在上面的人相比，对魔术的了解肯定更多。如果我一开始没有向你展示我最好的花招，那是因为一个人绝不会蠢到将他知道的所有东西一次性展示完毕。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将我最出色的花招保留着以应对紧急情况；我还有更多的手段来阻止年轻人干涉我的表演。然而，绅士们，我是怀着无比的善意而来的，来向你们展示那个给你们带来许多烦恼的魔术；我只请求你们不要用它来伤害我，并且将来更加谨慎一些。”然后他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装置，我们十分惊讶地发现，装置仅仅是一块强力磁铁，被一个藏在桌子下的男孩拿在手里。这个男人放下手中的东西，在我们致以感谢和歉意之后，我们尝试着想给他一些什么东西。他拒绝了。“不，绅士们，”他说，“我并不欠你们的感激，我也不会接受你们的礼物。我要让你们感激我，这就是我唯一的报复。也许各种各样的人身上都具备慷慨的特质，但我是靠表演魔术赚钱，而不是教授魔术。”

As he is going he blames me out-right. “I can make excuses for the child,” he says, “he sinned in ignorance. But you, sir, should know better. Why did you let him do it? As you are living together and you are older than he, you should look after him and give him good advice. Your experience should be his guide. When he is grown up he will reproach, not only himself, but you, for the faults of his youth.”

当他要走的时候他直呼我的名字责备我。“我可以给这个孩子找个借口，”他说，“他只是因为无知才会这样。但是您呢，先生，您应该知道得更多才对。那么您又为什么还让他这么做呢？正因为你们在一起生活，您又比他年长，您就应该好好照看他，给他善意的忠告。

您的经验应该成为他的指导。否则，等他长大的时候，他不仅会因为幼时的过错而自责，甚至也会责备你。

When he is gone we are greatly downcast. I blame myself for my easy-going ways. I promise the child that another time I will put his interests first and warn him against faults before he falls into them, for the time is coming when our relations will be changed, when the severity of the master must give way to the friendliness of the comrade; this change must come gradually, you must look ahead, and very far ahead.

他走之后，我们感到很沮丧。我责备自己松散的做法。我答应孩子下次我会将他的兴趣放在第一位，在他陷入错误之前就警告他，因为我们的关系很快就要改变了，到那时教师的严厉必须要为同伴的友善让路了。这种改变必须一步步来，你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做好充分的准备。

We go to the fair again the next day to see the trick whose secret we know. We approach our Socrates, the conjuror, with profound respect, we scarcely dare to look him in the face. He overwhelms us with politeness, gives us the best places, and heaps coals of fire on our heads. He goes through his performance as usual, but he lingers affectionately over the duck, and often glances proudly in our direction. We are in the secret, but we do not tell. If my pupil did but open his mouth he would be worthy of death.

我们第二天又去了集市，去看我们已经知道秘密的魔术。我们带着深深的敬意走近我们的苏格拉底，那位魔术师，我们几乎不敢直视

他的脸。他用礼貌压倒了我们，给了我们最好的位置，在我们的头上方烧了一堆火。他像往常那样完成了他的魔术，但他起劲地在鸭子周围徘徊，并且不时朝我们的方向骄傲地一瞥。我们知道魔术的秘密，但是我们没有告诉别人。如果我的学生真的这样做了，那他也不配活在世上了。

There is more meaning than you suspect in this detailed illustration. How many lessons in one! How mortifying are the results of a first impulse towards vanity! Young tutor, watch this first impulse carefully. If you can use it to bring about shame and disgrace, you may be sure it will not recur for many a day. What a fuss you will say. Just so; and all to provide a compass which will enable us to dispense with a meridian!

这个详细的例子的意义比你想的多得多。仅仅一个例子就能有这么多教训啊！虚荣心的第一次冲动就带了了多么羞耻的后果啊！年轻的导师，小心地看好这第一次冲动。如果你能够用它带来羞愧和耻辱，你也许会确信这件事情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再发生。你也许会说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错，但这一切能为我们提供一枚代替子午线的指南针。

Having learnt that a magnet acts through other bodies, our next business is to construct a bit of apparatus similar to that shown us. A bare table, a shallow bowl placed on it and filled with water, a duck rather better finished than the first, and so on. We often watch the thing and at last we notice that the duck, when at rest, always turns the same way. We follow up this observation; we examine the direction, we find that it is from south to north. Enough! we have found our compass or its equivalent; the study of

physics is begun.

了解了一块磁铁作用于其他物体的道理，我们下一个任务就是去制作一个与看到过的装置相似的东西。一张光秃秃的桌子，桌上有一只装满水的浅口碗，一只做得更精致的鸭子，等等。我们不时看着这些东西，最后我们注意到了那只鸭子，当它停下来的时候，常常转向同一个方向。我们继续这样的观察，我们检查了那个方向，我们发现那是南北向的。够了！我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指南针或者说是类似的工具；对于物理的研究开始了

There are various regions of the earth, and these regions differ in temperature. The variation is more evident as we approach the poles; all bodies expand with heat and contract with cold; this is best measured in liquids and best of all in spirits; hence the thermometer. The wind strikes the face, then the air is a body, a fluid; we feel it though we cannot see it. I invert a glass in water; the water will not fill it unless you leave a passage for the escape of the air; so air is capable of resistance. Plunge the glass further in the water; the water will encroach on the air-space without filling it entirely; so air yields somewhat to pressure. A ball filled with compressed air bounces better than one filled with anything else; so air is elastic. Raise your arm horizontally from the water when you are lying in your bath; you will feel a terrible weight on it; so air is a heavy body. By establishing an equilibrium between air and other fluids its weight can be measured, hence the barometer, the siphon, the air-gun, and the air-pump. All the laws of statics and hydrostatics are discovered by such rough experiments. For none of these would I take the child into a physical cabinet; I dislike that array of instruments and apparatus. The scientific atmosphere destroys science. Either the child is frightened by these instruments

or his attention, which should be fixed on their effects, is distracted by their appearance.

地球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区域，这些区域的温度都各不相同。随着我们靠近极点，这种气候变化会更加明显。所有物体都是热胀冷缩。液体最能体现这一特点。而酒精的变化最为显著的，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就制作出了温度计。冷风不断拍打着脸颊，空气就是一种物体，一种流体。我们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却看不见它。我把一只杯子倒立放置在水中，除非你留出一条缝隙让空气流出，否则，水是不可能装满杯子的。由此可见，空气是有阻力的。接着，把杯子在往水里按下去，水就会漫延到空气的空间里，但是它是无法装满整个空间的。因此空气是可以被压缩的。一个填充着压缩空气的球，会比填充着其他东西的球弹得更高，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空气是有弹性的。当你躺在浴盆里洗澡的时候，把你的手水平地从水里抬起来，你会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强大重量，由此得出，空气是有重量的。我们可以通过在空气和其他流体之间创建平衡，来测量它的重量，因此我们发明了气压计、虹吸管、气枪和气泵。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规律都是通过这样的实验发现的。然而我引导孩子学习物理知识并不是为了发现这些规律，对于那些仪器和实验装置，我并不感兴趣。这种科学的气氛反而摧残了科学本身。孩子要么被这些仪器吓得惶惑不安，要么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仪器的外观上，而分散了对其效果的注意。

We shall make all our apparatus ourselves, and I would not make it beforehand, but having caught a glimpse of the experiment by chance we mean to invent step by step an instrument for its verification. I would rather our apparatus was somewhat clumsy and imperfect, but our ideas clear as to what the apparatus ought to be, and the results to be obtained by means of it. For my first lesson in statics, instead of fetching a balance, I lay a stick across the back of a chair, I measure the two parts when it is balanced; add equal or

unequal weights to either end; by pulling or pushing it as required, I find at last that equilibrium is the result of a reciprocal proportion between the amount of the weights and the length of the levers. Thus my little physicist is ready to rectify a balance before ever he sees one.

我们应该自己制造仪器。我不会提前就把它做好。我只是想在偶然在实验中发现了某个规则，才会想要一步步的发明一个仪器去验证它。我宁可我们制作的仪器是粗糙的、有瑕疵的，但是对于仪器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通过仪器我们应该获得什么结果，我们要有清晰的概念。在我的第一堂静力学课上，我不会使用天平来上课。我会把一根木棍和椅背交叉放置，然后等到两者平衡的时候，衡量一下两部分的长度，接着在各端加上相等或是不等的重量，根据需要把棍子向前推一些或者向后拉一点，最后，我发现，当物体的重量和杠杆的长度成反比的时候，就能取得平衡。因此，虽然我的小物理学家还没见过天平，但他已经知道如何调整了。

Undoubtedly the notions of things thus acquired for oneself are clearer and much more convincing than those acquired from the teaching of others; and not only is our reason not accustomed to a slavish submission to authority, but we develop greater ingenuity in discovering relations, connecting ideas and inventing apparatus, than when we merely accept what is given us and allow our minds to be enfeebled by indifference, like the body of a man whose servants always wait on him, dress him and put on his shoes, whose horse carries him, till he loses the use of his limbs. Boileau used to boast that he had taught Racine the art of rhyming with difficulty. Among the many short cuts to science, we badly need some one to teach us the art of learning with difficulty.

因此，毫无疑问，一个人亲自习得对事物的概念自然比从他人那里学来的概念要清楚明了。不仅我们的理性不能习惯于一味服从权威，我们还要发展更强的独创性，以此来发现联系、联结概念、发明装置，而不是仅仅接受别人给我们的东西，让我们的心灵由于漠不关心而变得无力，就好像一个人如果总是有人呆在身边待命、帮他穿衣穿鞋，一出门就有马骑，那他的身体肯定会软弱无力，他的四肢也会失去作用。布瓦洛过去常常鼓吹自己以前多么困难地教辛拉写诗。在到达科学的众多捷径中，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有人教我们在艰难中学习的艺术。

The most obvious advantage of these slow and laborious inquiries is this: the scholar, while engaged in speculative studies, is actively using his body, gaining suppleness of limb, and training his hands to labour so that he will be able to make them useful when he is a man. Too much apparatus, designed to guide us in our experiments and to supplement the exactness of our senses, makes us neglect to use those senses. The theodolite makes it unnecessary to estimate the size of angles; the eye which used to judge distances with much precision, trusts to the chain for its measurements; the steel yard dispenses with the need of judging weight by the hand as I used to do. The more ingenious our apparatus, the coarser and more unskilful are our senses. We surround ourselves with tools and fail to use those with which nature has provided every one of us.

这种缓慢费劲的研究，最明显的好处就在于：当学生沉浸于思考研究的时候，他也在活跃地使用自己的身体，获得四肢的柔韧性，训练双手去劳动，那么等到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就能更好地运用它们了。用来指导我们做实验、弥补感官精确度的仪器装置实在太多了，这让我们忽视了运用自己的感官。经纬仪让我们省去了估算角度的麻烦。我们的眼睛原本能够精确地判断距离，如今更相信测量出的结果

了。有了铁秤，就不需要像从前惯常的那样用手称重量了。我们的仪器越灵敏，我们的感官能力就越是迟钝退化。我们置身于各种各样的仪器之中，却没有使用自然所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

But when we devote to the making of these instruments the skill which did instead of them, when for their construction we use the intelligence which enabled us to dispense with them, this is gain not loss, we add art to nature, we gain ingenuity without loss of skill. If instead of making a child stick to his books I employ him in a workshop, his hands 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s mind. While he fancies himself a workman he is becoming a philosopher. Moreover, this exercise has other advantages of which I shall speak later; and you will see how, through philosophy in sport, one may rise to the real duties of man.

以前，我们用我们的技巧来代替工具，但是现在却用机器代替技巧。我们用来制造机器的智力足以让我们摆脱这些机器了。这是得而不是失，我们为自然增添艺术，我们在获得独创性的同时没有损失技巧。如果让孩子去工厂里干活，而不是死读书的话，他的双手为了心灵的发展而劳作。尽管他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工人，但其实他也是一个哲学家。况且，这种操练其实还有很多别的好处的，我稍后会提到。你可以发现，通过把哲学融入到娱乐当中，一个人就可以上升到成年人的职责。

I have said already that purely theoretical science is hardly suitable for children, even for children approaching adolescence; but without going far into theoretical physics, take care that all their experiments are connected together by some chain of reasoning, so that they may follow an orderly sequence in the mind,

and may be recalled at need; for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remember isolated facts or arguments, when there is no cue for their recall.

我已经提过纯理论性的科学是不适合孩子的，即使对接近青春期的孩子也不适合。要注意用某一推理的链条把他们的所有试验联结起来，而不是在理论物理上走得太远。这样他们才能跟随着心中排列好的顺序，才能在有需要的时候回忆起来。因为假如缺乏唤起回忆的线索，要记住孤立的事实或者观点是非常困难的。

In your inquiry into the laws of nature always begin with the commonest and most conspicuous phenomena, and train your scholar not to accept these phenomena as causes but as facts. I take a stone and pretend to place it in the air; I open my hand, the stone falls. I see Emile watching my action and I say, “Why does this stone fall?”

在研究自然法则的时候，你始终要从最普遍、最明显的现象开始，并且要教育你的学生把这些现象当成事实，而非原因。我拿起一块石头，假装要把它放置在空气中。但当我一放手，石头就掉了下来。我发现爱弥儿注视着我的动作，于是，我就问，“为什么石头会掉下来呢？”

What child will hesitate over this question? None, not even Emile, unless I have taken great pains to teach him not to answer. Every one will say, “The stone falls because it is heavy.” “And what do you mean by heavy?” “That which falls.” “So the stone falls because it falls?” Here is a poser for my little philosopher. This is his first lesson in systematic physics, and whether he learns physics

or no it is a good lesson in common-sense.

哪个孩子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会犹豫不决呢？没有，就连爱弥儿也答得出，除非我费尽心机教他不要回答。每个人都会说，“石头之所以会掉下来，是因为它太重了。”“你说的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会掉下来的意思。”“所以说石头之所以会掉下来，是因为它会掉下来？”这对于我的小哲学家来说是个难题。这是他关于系统物理学的第一课，无论他学不学物理，这都是关于常识的一堂好课。

As the child develops in intelligence other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require us to be still more careful in our choice of his occupations. As soon as he has sufficient self-knowledge to understand what constitutes his well-being, as soon as he can grasp such far-reaching relations as to judge what is good for him and what is not, then he is able to disce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ork and play, and to consider the latter merely as relaxation. The objects of real utility may be introduced into his studies and may lead him to more prolonged attention than he gave to his games. The ever-recurring law of necessity soon teaches a man to do what he does not like, so as to avert evils which he would dislike still more. Such is the use of foresight, and this foresight, well or ill used, is the source of all the wisdom or the wretchedness of mankind.

随着孩子智力的增长，出于一些重要的考量，我们需要在为他选择学习内容的时候更加谨慎。一旦他有了足够的知识来理解他的幸福包括了什么，一旦他能够理解某些深远的关系来判断哪些东西对他有利哪些对他不利，他也就能够辨别工作和娱乐的差异了，他就会完全把后者当成一种放松方式了。我们可以让他研究有实际用处的东西，

这与玩游戏相比，也许能让他养成更持久的注意力。需求法则的反复出现，会很快教会一个人去做那些他不情愿的事情，由此来避免那些他更加嫌恶的事情。这就是先见之明的用处，而这种先见之明，如果能好好利用，就会成为智慧的源泉，反之就会造成人类的不幸。

Every one desires happiness, but to secure it he must know what happiness is. For the natural man happiness is as simple as his life; it consists in the absence of pain; health, freedom,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are its elements. The happiness of the moral man is another matter, but it does not concern us at present. I cannot repeat too often that it is only objects which can be perceived by the senses which can have any interest for children, especially children whose vanity has not been stimulated nor their minds corrupted by social conventions.

每个人都渴望幸福，但是要获得幸福，他就必须知道幸福是什么。对于自然人而言，幸福就和他的生活一样简单。无病无灾、健康、自由、生活必需品就是幸福的基本要素。而对于一个道德的人来说，幸福的定义就完全不同了，但是我们现在暂且不探讨这个话题。我已经再三强调，只有那些能被感官感知的事物才能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尤其是那些虚荣心还未被激发、心灵还未被社会习俗污染的孩子。

As soon as they foresee their needs before they feel them, their intelligence has made a great step forward, they are beginning to know the value of time. They must then be trained to devote this time to useful purposes, but this usefulness should be such as they can readily perceive and should be within the reach of their age and experience. What concerns the moral order and the customs of

society should not yet be given them, for they are not in a condition to understand it. It is folly to expect them to attend to things vaguely described as good for them, when they do not know what this good is, things which they are assured will be to their advantage when they are grown up, though for the present they take no interest in this so-called advantage, which they are unable to understand.

一旦他们在感受到需求之前就能预见它们，那他们的智慧已经进步许多了，他们已经开始体会到时间的价值了。然后，我们必须教育他们把时间花在有用的目标上，并且这种有用性必须是他们的确能感知到、处于他们的年龄和经验范围之内的。而关于道德秩序和社会传统的东西目前还不应该教给他们，因为他们还没到能够理解那些内容的程度。期望他们把精力放在对他们只有宽泛益处的事情上是愚蠢的。他们还不知道这种益处是什么。人们告诉他们，当长大之后，这些事是有好处的，但是目前，他们对这种所谓的好处没有兴趣，他们还不能理解这种好处。

Let the child do nothing because he is told; nothing is good for him but what he recognises as good. When you are always urging him beyond his present understanding, you think you are exercising a foresight which you really lack. To provide him with useless tools which he may never require, you deprive him of man's most useful tool—common-sense. You would have him docile as a child; he will be a credulous dupe when he grows up. You are always saying, “What I ask is for your good, though you cannot understand it. What does it matter to me whether you do it or not; my efforts are entirely on your account.” All these fine speeches with which you hope to make him good, are preparing the way, so that the visionary, the tempter, the charlatan, the rascal, and every kind of

fool may catch him in his snare or draw him into his folly.

不要让孩子照别人说的做，只有他认为好的东西，才是真正有益的。当你迫使他做一些他现在无法理解的事情的时候，你也许认为你是在未雨绸缪，但事实恰恰相反。给他一些他也许永远不需要的无用工具，你其实是剥夺了他人类最有用的工具——常识。你把他培养得跟孩子一样温驯听话，那么等他长大以后，也不过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可怜人罢了。你一直强调，“这些我让你做的事，虽然你理解不了，但都是为你好。无论你做不做，对我而言是无关紧要的，我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你。”你说尽了甜言蜜语，希望他变得优秀，但其实你不过在为空想家、恶魔、骗子、流氓以及各种傻瓜铺路罢了，将来他们也会用这些话让他掉入陷阱或者让他变得愚蠢。

A man must know many things which seem useless to a child, but need the child learn, or can he indeed learn, all that the man must know? Try to teach the child what is of use to a child and you will find that it takes all his time. Why urge him to the studies of an age he may never reach, to the neglect of those studies which meet his present needs? “But,” you ask, “will it not be too late to learn what he ought to know when the time comes to use it?” I cannot tell; but this I do know, it is impossible to teach it sooner, for our real teachers are experience and emotion, and man will never learn what befits a man except under its own conditions. A child knows he must become a man; all the ideas he may have as to man's estate are so many opportunities for his instruction, but he should remain in complete ignorance of those ideas which are beyond his grasp. My whole book is one continued argument in support of this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education.

一个成年人必须知道那些对孩子而言是没有用的事物。但是，孩子是不是需要学习，或者说真的能够学会那些成年人必须知道的事情呢？尝试着教孩子对他有用的东西，然后你会发现这就需要他花费全部的时间了。为什么要强迫他学习他也许永远也到不了的年纪的知识，却忽视了能够满足他目前需求的学习呢？“但是，”你可能会问，“等到他将来要用的时候再去学习他应该知道的知识，还来不来得及呢？”这我无法回答。但是我所知道的是，想要提早教会他这些知识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正的老师是经验和情感。而除非在特定的条件下，否则他是无法知道哪些东西才是真正适合他的。一个孩子很清楚，他必将长大成人。他所拥有的关于成人状态的所有观念都是教育他的机会。然而对于那些他无法理解的概念，他应该保持完全的无知。我整本书都在不停地论证这一教育的基本原则的正确性。

As soon as we have contrived to give our pupil an idea of the word “Useful,” we have got an additional means of controlling him, for this word makes a great impression on him, provided that its meaning for him is a meaning relative to his own age, and provided he clearly sees its relation to his own well-being. This word makes no impression on your scholars because you have taken no pains to give it a meaning they can understand, and because other people always undertake to supply their needs so that they never require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and do not know what utility is.

一旦我们教给学生“有用”这个词的概念，我们就有了另一种掌控他的方法。倘若在他的年龄段，这个词有它的意义，倘若他能明白这个词语和自身幸福之间的关系，那他就会对这个词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这个词没有给你的学生留下任何印象，那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尽力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去定义这个单词，也因为其他人总是负责满足他们的需求，导致学生都不需要自己思考了，自然不知道效用是什么概念。

“What is the use of that?” In future this is the sacred formula, the formula by which he and I test every action of our lives. This is the question with which I invariably answer all his questions; it serves to check the stream of foolish and tiresome questions with which children weary those about them. These incessant questions produce no result, and their object is rather to get a hold over you than to gain any real advantage. A pupil, who has been really taught only to want to know what is useful, questions like Socrates; he never asks a question without a reason for it, for he knows he will be required to give his reason before he gets an answer.

“那又有什么用处呢？”此后，这就成了一句神圣的准则，我和他可以用此来检验我们的每一行为。我可以一成不变地用这句话回答他的所有问题，它也可以用来搪塞孩子们那一连串愚蠢无聊、使大人们生厌的问题。这些连续不断的问题都是无果的，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想要威吓你，并不想得到什么真正的好处。一个被好好教导，只想知道什么是有用的孩子，只会像苏格拉底那样提问。他不会在没找到一个理由之前盲目地问一个问题，因为他知道在他得到答案之前，他理应说出自己的理由。

See what a powerful instrument I have put into your hands for use with your pupil. As he does not know the reason for anything you can reduce him to silence almost at will; and what advantages do you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give you to show him the usefulness of what you suggest. For,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when you put this question to him, you are teaching him to put it to you, and you must expect that whatever you suggest to him in the future he will follow your own example and ask, “What is the use of this?”

你看，我已经给了你一样多么强大的工具来教育你的学生。因为他不知道任何缘由，你就可以任意地让他噤声，而你也可以利用你的知识和经验，向他展示你所说的有用性。因为，毫无疑问，当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你是在教他反过来向你提问，你必须期望无论你向他暗示什么，将来有一天他会模仿你的样子问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Perhaps this is the greatest of the tutor's difficulties. If you merely try to put the child off when he asks a question, and if you give him a single reason he is not able to understand, if he finds that you reason according to your own ideas, not his, he will think what you tell him is good for you but not for him; you will lose his confidence and all your labour is thrown away. But what master will stop short and confess his faults to his pupil? We all make it a rule never to own to the faults we really have. Now I would make it a rule to admit even the faults I have not, if I could not make my reasons clear to him; as my conduct will always be intelligible to him, he will never doubt me and I shall gain more credit by confessing my imaginary faults than those who conceal their real defects.

可能这是老师面临的最大难题。如果在孩子向你提问的时候，你只是单纯地想要摆脱他，如果你给了他一个他无法理解的简单理由，如果他发现你的理由只是与你自己的而并非他的观念相符，他就会觉得你告诉他的东西只是对你有利。你就会失去他的信任，你的努力也就白费了。但是有哪个老师愿意停止说话，向学生承认错误呢？不承认我们真的犯过的错误，这在我们看来是一条准则。现在我想定下另一个规矩：如果我不能让学生理解我的理由，那么即使我没有犯错，我也要承认我的错误。因为我的行为对他而言应该是明白易懂的，这样他永远也不会质疑我，与那些隐瞒真实缺点的人相比，我能通过承

认那些想象中的错误获得更多的信誉。

In the first place do not forget that it is rarely your business to suggest what he ought to learn; it is for him to want to learn, to seek and to find it. You should put it within his reach, you should skilfully awaken the desire and supply him with means for its satisfaction. So your questions should be few and well-chosen, and as he will always have more questions to put to you than you to him, you will always have the advantage and will be able to ask all the oftener, “What is the use of that question?” Moreover, as it matters little what he learns provided he understands it and knows how to use it, as soon as you cannot give him a suitable explanation give him none at all. Do not hesitate to say, “I have no good answer to give you; I was wrong, let us drop the subject.” If your teaching was really ill-chosen there is no harm in dropping it altogether; if it was not, with a little care you will soon find an opportunity of making its use apparent to him.

首先，你不能忘记，你的任务并不是告诉他他应该学习什么。要让他自己决定想学什么，去寻找，去发现。你必须帮助他了解这些东西，富有技巧地唤醒他的学习欲望，并且向他提供满足学习欲的方法。因此你的问题必须是少量的、精挑细选过的，因为他向你提出的问题总是多过你向他提出的问题的，你永远占据优势，可以经常问他：“这个问题有什么用呢？”另外，只要他能够理解并且学会运用，那么他学些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你不能给他一个合适的解释，就不要回答他。痛快地说出这句话：“我不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我弄错了，我们放弃这个话题吧。”如果你的教学内容是不适合的，那么放弃这个内容并无害处，但是如果是适合的，那么稍稍注意一下，你很快就能让学生明白它的用处。

I do not like verbal explanations. Young people pay little heed to them, nor do they remember them. Things! Things! I cannot repeat it too often. We lay too much stress upon words; we teachers babble, and our scholars follow our example.

我不喜欢言语上的解释。年轻人很少注意到它们，甚至都不记得它们。要用实物啊！要用实物啊！这句话重复再多遍也不嫌多。我们总是太重视语言，老师们总是喋喋不休，而我们的学生也会跟着有样学样。

Suppose we are studying the course of the sun and the way to find our bearings, when all at once Emile interrupts me with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use of that?” what a fine lecture I might give, how many things I might take occasion to teach him in reply to his question, especially if there is any one there. I might speak of the advantages of travel, the value of commerce, the special products of different lands and the peculiar customs of different nations, the use of the calendar, the way to reckon the seasons for agriculture, the art of navigation, how to steer our course at sea, how to find our way without knowing exactly where we are. Politics, natural history, astronomy, even moral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re involved in my explanation, so as to give my pupil some idea of all these sciences and a great wish to learn them. When I have finished I shall have shown myself a regular pedant, I shall have made a great display of learning, and not one single idea has he understood. He is longing to ask me again, “What is the use of taking one's bearings?” but he dare not for fear of vexing me. He finds it pays best to pretend to listen to what he is forced to hear. This is the practical result of our fine systems of education.

假设我们在研究太阳的运行轨迹，并试图找出我们的方位，这时，爱弥儿突然打断了我，问道“这有什么用处啊？”我可能会给他一个很完美的讲演，在回答他的时候，我可以趁机灌输他多少知识啊，尤其是还有旁人在场的时候。我可能会谈到旅行的好处，商业的价值，不同地区的特产，不同民族的特殊习俗，日历的使用，农业上判断季节的方法，航海的艺术，如何在海上航行，以及如何在迷路的情况下定位。政治、自然史、天文学，甚至道德问题、国际法则都囊括在了我的解释当中，全是为了让我的学生对这些学科有一个基本概念，并且对它们产生学习兴趣。当我讲完的时候，我可能像个空谈家一样卖弄了一下自己的学问，展示了我广博的知识体系，而他却连一个概念都没听懂。他可能会再一次热切地问我，“测定我们的位置有什么用呢？”但由于怕我恼怒，他不敢这么问。他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假装听懂了那些强加给他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看似优良的教育体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But Emile is educated in a simpler fashion. We take so much pains to teach him a difficult idea that he will have heard nothing of all this. At the first word he does not understand, he will run away, he will prance about the room, and leave me to speechify by myself. Let us seek a more commonplace explanation; my scientific learning is of no use to him.

但是爱弥儿是被一种比较简单的教学方式培养大的。我们想方设法让教他一种他从未接触过的复杂观念。起初他是不能理解的，他会逃走，在房间里蹦蹦跳跳，留我一个人喋喋不休。让我们寻找一种更通俗的解释，我的科学研究是对他毫无用处的。

We were observing the position of the forest to the north of Montmorency when he interrupted me with the usual question,

“What is the use of that?” “You are right,” I said. “Let us take time to think it over, and if we find it is no use we will drop it, for we only want useful games.” We find something else to do and geography is put aside for the day.

我们正在观察蒙莫朗锡北面那个森林的位置，他突然打断了我，像往常一样问道：“这有什么用呢？”“你说得对”我说。“让我们再花点时间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要是我们发现它没什么用的话，就放弃它，因为我们只想要有用处的游戏。”我们找了些别的事情做，这一天就先把地理放在一边。

Next morning I suggest a walk before breakfast; there is nothing he would like better; children are always ready to run about, and he is a good walker. We climb up to the forest, we wander through its clearings and lose ourselves; we have no idea where we are, and when we want to retrace our steps we cannot find the way. Time passes, we are hot and hungry; hurrying vainly this way and that we find nothing but woods, quarries, plains, not a landmark to guide us. Very hot, very tired, very hungry, we only get further astray. At last we sit down to rest and to consider our position. I assume that Emile has been educated like an ordinary child. He does not think, he begins to cry; he has no idea we are close to Montmorency, which is hidden from our view by a mere thicket; but this thicket is a forest to him, a man of his size is buried among bushes. After a few minutes' silence I begin anxiously——

第二天，我提议在在早餐之前先去散个步。他再喜欢不过了。孩子们时刻都准备好奔跑玩耍，而他是个很好的步行者。我们攀爬到森林，漫步在空地之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

里。当我们想要折回的时候，却发现找不到方向了。时间不断流逝，我们又饿又热，急匆匆地跑来跑去，却依旧找不到里，身边尽是些灌木、石场和平原，连一个指引的地标都没有。我们好热、好累、好饿，却越走越找不到路。最后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会，仔细判断一下我们的位置。我假设，爱弥儿接受了跟普通的孩子一样的教育。他没有思考，反而开始大哭。他不知道其实我们离蒙莫朗锡镇其实是很近的，只是从我们的角度看过去被茂密的灌木丛遮挡住了。但是这样的茂密对他就如同森林一般，像他这个身高只能被淹没其中。在几分钟后，我打破了沉静，不安地问——

JEAN JACQUES. My dear Emile, what shall we do get out?

让·雅克：我亲爱的爱弥儿啊，我们该怎么出去呢？

EMILE. I am sure I do not know. I am tired, I am hungry, I am thirsty. I cannot go any further.

爱弥儿：我确信自己不知道。我又饥又渴，还很累。我走不动了。

JEAN JACQUES. Do you suppose I am any better off? I would cry too if I could make my breakfast off tears. Crying is no use, we must look about us. Let us see your watch; what time is it?

让·雅克：你觉得我的状况会比你好吗？要是我能用眼泪换来一顿早饭，我早就哭了。可是眼泪根本毫无用处，我们只能靠自己。让我

看看你的表，现在几点了？

EMILE. It is noon and I am so hungry!

爱弥儿：都已经是中午了，我实在是太饿了！

JEAN JACQUES. Just so; it is noon and I am so hungry too.

让·雅克：正是如此，都已经是中午了，我也是饥肠辘辘。

EMILE. You must be very hungry indeed.

爱弥儿：你肯定很饿。

JEAN JACQUES. Unluckily my dinner won't come to find me. It is twelve o'clock. This time yesterday we were observing the position of the forest from Montmorency. If only we could see the position of Montmorency from the forest.

让·雅克：遗憾的是，我的午餐不可能自己长脚跑过来。现在已经十二点了。昨天这个时候，我们正在蒙莫朗锡镇观察森林的位置呢。要是我们现在能从森林里看到蒙莫朗锡镇的位置就好了。

EMILE. But yesterday we could see the forest, and here we cannot see the town.

爱弥儿：昨天我们从城里能看见森林，可今天我们从森林这边，就望不到城镇啦。

JEAN JACQUES. That is just it. If we could only find it without seeing it.

让·雅克：正是如此。要是我们看不见它也能找着它就好了。

EMILE. Oh! my dear friend!

爱弥儿：噢！我亲爱的朋友！

JEAN JACQUES. Did not we say the forest was…

让·雅克：我们刚才不是说森林是……

EMILE. North of Montmorency.

爱弥儿：在蒙莫朗锡镇的北面。

JEAN JACQUES. Then Montmorency must lie…

让·雅克：那么蒙莫朗锡镇肯定位于……

EMILE. South of the forest.

爱弥儿：森林的南边。

JEAN JACQUES. We know how to find the north at midday.

让·雅克：我们是知道如何在正午找到北方的。

EMILE. Yes, by the direction of the shadows.

爱弥儿：对啊，用影子的方向就好了。

JEAN JACQUES. But the south?

让·雅克：那么南方呢？

EMILE. What shall we do?

爱弥儿：我们该怎么找南方？

JEAN JACQUES. The south is opposite the north.

让·雅克：南方和北方是正好相反的。

EMILE. That is true; we need only find the opposite of the shadows. That is the south! That is the south! Montmorency must be over there! Let us look for it there!

爱弥儿：是的，我们只要找跟影子相反地方向就好了。那是南方！那就是南方！蒙莫朗锡镇一定就在那儿！我们快去那里找找看！

JEAN JACQUES. Perhaps you are right; let us follow this path through the wood.

让·雅克：你可能是对的，然我们沿着这条小路穿过树林吧。

EMILE. (Clapping his hands.) Oh, I can see Montmorency! there it is, quite plain, just in front of us! Come to luncheon, come to dinner, make haste! Astronomy is some use after all.

爱弥儿：（高兴地拍着手）噢，我看到蒙莫朗锡镇了！它就在那，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就在我们前面！回家吃午饭，回家吃晚饭，

快点儿！天文学毕竟还是有用的。

Be sure that he thinks this if he does not say it; no matter which, provided I do not say it myself. He will certainly never forget this day's lesson as long as he lives, while if I had only led him to think of all this at home, my lecture would have been forgotten the next day. Teach by doing whenever you can, and only fall back upon words when doing is out of the question.

你要相信，即使他没有这么说，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的。无论怎样，只要我不亲口说出这句话就好了。只要他活着，他绝对不会忘记他今天学到的东西。但如果我只是让他在家里思考这些东西，那他第二天就会把我的课程忘得一干二净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能做到，就通过实践来教育他，只有当实践不可行的时候，才去依靠言语。

The reader will not expect me to have such a poor opinion of him as to supply him with an example of every kind of study; but, whatever is taught, I cannot too strongly urge the tutor to adapt his instances to the capacity of his scholar; for once more I repeat the risk is not in what he does not know, but in what he thinks he knows.

读者不会认为我如此看低爱弥儿，以至于每一门功课都要为他提供一个例子。但是，无论教给他什么，我都强烈建议老师应该将他的案例依照学生的掌握能力进行改动。我要再重复一遍，危险不在于他不知道什么，而在于他自以为知道了什么。

I remember how I once tried to give a child a taste for chemistry. After showing him several metallic precipitates, I explained how ink was made. I told him how its blackness was merely the result of fine particles of iron separated from the vitriol and precipitated by an alkaline solution. In the midst of my learned explanation the little rascal pulled me up short with the question I myself had taught him. I was greatly puzzled. After a few moments' thought I decided what to do. I sent for some wine from the cellar of our landlord, and some very cheap wine from a wine-merchant. I took a small [4_2] flask of an alkaline solution, and placing two glasses before me filled with the two sorts of wine, I said.

我记得我曾经尝试让一个孩子浅尝一下化学这门课。在给他展示了一些金属沉淀物之后，我向他解释了墨水的制作方法。我告诉他墨水的黑色仅仅来自于铁的细颗粒物，它们从硫酸分离出来，然后用碱溶液沉淀下来。在我解释的过程中，这个小小的淘气包常常用我教给他的问题问得我语塞。我感到深深的迷惑。在片刻的思索后我决定了怎么去做。我从我房东的地窖中取了一些酒，又去一个酒商那里买了一些很便宜的酒。我拿来一小瓶 [5_2] 碱性溶液，把两只装满了两种酒的玻璃杯放在我面前，说道。

Food and drink are adulterated to make them seem better than they really are. These adulterations deceive both the eye and the palate, but they are unwholesome and make the adulterated article even worse than before in spite of its fine appearance.

在食物和酒水里掺假是为了让它们更好看。这些掺假的行为能够骗过视觉和味觉，尽管外观上看起来很好，但是它们是有害的，而且比原来质量更差。

All sorts of drinks are adulterated, and wine more than others; for the fraud is more difficult to detect, and more profitable to the fraudulent person.

所有的饮料都是掺假的，酒尤甚。因为这种欺诈很难发现，对于奸商来说也最有利可图。

Sour wine is adulterated with litharge; litharge is a preparation of lead. Lead in combination with acids forms a sweet salt which corrects the harsh taste of the sour wine, but it is poisonous. So before we drink wine of doubtful quality we should be able to tell if there is lead in it. This is how I should do it.

酸酒掺杂了一氧化铅，而一氧化铅则是由铅制成的。铅和酸中和，就会产生一种带有甜味的盐，可以用来改变酸酒的口感，但是它是有毒的。所以，在我们喝质量存疑的酒之前，我们应该辨别其中是否含有铅。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

Wine contains not merely an inflammable spirit as you have seen from the brandy made from it; it also contains an acid as you know from the vinegar made from it.

酒不仅仅含有如你曾经看到过的从白兰地中提取出的易燃物质，还含有一种酸，正如你所知的拥酒可以制造出醋。

This acid has an affinity for metals, it combines with them and forms salts, such as iron-rust, which is only iron dissolved by the acid in air or water, or such as verdegris, which is only copper dissolved in vinegar.

这种酸对金属有一种亲和力，可以与其结合形成盐，比如铁锈就是被空气或水中的酸溶解而形成的盐，再比如铜绿就是铜被醋酸溶解形成的。

But this acid has a still greater affinity for alkalis than for metals, so that when we add alkalis to the above-mentioned salts, the acid sets free the metal with which it had combined, and combines with the alkali.

但是跟金属相比，这种酸对碱有更强烈的亲和力，所以当我们的将碱加进上述的盐中时，酸就从与之结合的金属中游离出来，与碱结合。

Then the metal, set free by the acid which held it in solution, is precipitated and the liquid becomes opaque.

这些原本在溶液中被酸结合的金属脱离出来并沉淀，溶液就变得浑浊。

If then there is litharge in either of these glasses of wine, the acid holds the litharge in solution. When I pour into it an alkaline

solution, the acid will be forced to set the lead free in order to combine with the alkali. The lead, no longer held in solution, will reappear, the liquor will become thick, and after a time the lead will be deposi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glass.

接着，如果在这两种酒中的任何一种中加入氧化铅，酒中的酸就会将其溶解。当我倒入碱溶液，酸会被强制地将铅释放出来，以便于与碱结合。这些铅不再溶解于溶液中，它们会重新出现，液体会变得浑浊，过一会儿后，铅将会在杯底沉淀。

If there is no lead [4_3] nor other metal in the wine the alkali will slowly [4_4] combine with the acid, all will remain clear and there will be no precipitate.

如果酒中没有铅或者其他金属 [5_3] ，碱液将会慢慢地和酸结合 [5_4] ，杯中的溶液将会保持清澈，也不会有沉淀物。

Then I poured my alkaline solution first into one glass and then into the other. The wine from our own house remained clear and unclouded, the other at once became turbid, and an hour later the lead might be plainly seen, precipita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glass.

然后我将碱液先导入一只玻璃杯，然后将其倒进另一只玻璃杯中。来自我们自家的酒一直保持清澈，并无浑浊，另一杯酒一开始变得浑浊，一小时过后就差不多能很清楚地看见铅，在杯底沉淀下来。

“This,” said I, “is a pure natural wine and fit to drink; the other is adulterated and poisonous. You wanted to know the use of knowing how to make ink. If you can make ink you can find out what wines are adulterated.”

“这个，”我说，“就是纯天然的酒，适合饮用；另一种酒掺了假，是有毒的。你想知道了解墨水的制作有什么用。如果你能够制造墨水，你就能发现哪些酒掺了假。”

I was very well pleased with my illustration, but I found it made little impression on my pupil. When I had time to think about it I saw I had been a fool, for not only was it impossible for a child of twelve to follow my explanations, but the usefulness of the experiment did not appeal to him; he had tasted both glasses of wine and found them both good, so he attached no meaning to the word “adulterated” which I thought I had explained so nicely. Indeed, the other words, “unwholesome” and “poison,” had no meaning whatever for him; he was in the same condition as the boy who told the story of Philip and his doctor. It is the condition of all children.

我对我的演示非常满意，但是我发现这番解释并没有给我的学生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当我有时间去反思这一切，我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傻瓜，不仅仅是因为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而言跟上我的思路是不可能的，还因为这个毫无用处的实验根本无法吸引他；他喝过上述两种酒，发现它们都很好喝，所以他对于“掺假”这个词没有什么概念，尽管我认为自己已经解释得很好了。确实，另外的词，比如“不健康的”和“有毒的”，对于他来讲无论如何是没有意义的；他与那个讲菲利普和他的医生的故事的孩子情况相同。这就是所有孩子的情况。

The relation of causes and effects whose connection is unknown to us, good and ill of which we have no idea, the needs we have never felt, have no existence for us. It is impossible to interest ourselves in them sufficiently to make us do anything connected with them. At fifteen we become aware of the happiness of a good man, as at thirty we become aware of the glory of Paradise. If we had no clear idea of either we should make no effort for their attainment; and even if we had a clear idea of them, we should make little or no effort unless we desired them and unless we felt we were made for them. It is easy to convince a child that what you wish to teach him is useful, but it is useless to convince if you cannot also persuade. Pure reason may lead us to approve or censure, but it is feeling which leads to action, and how shall we care about that which does not concern us?

那些我们不知道其联系的原因和影响，那些我们没有概念的好与坏，那些我们从未体会过的需求，它们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存在的。要让我们对它们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做任何与之相关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在十五岁的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好人的快乐，正如三十岁时我们意识到天堂的荣耀。如果我们对这两者都没有清晰的概念，我们就不应该努力去争取；即使我们对它们有清晰的概念，我们也应该少做或者不做任何努力，除非我们渴望它们或者我们感到我们是为了它们而出现的。要劝说孩子相信你希望教给他的东西是有用的，这是简单的。但是，如果你不能让他心服口服，劝说也是没用的。纯粹的理性也许会让我们对一件事表示赞同或责备，但只有感觉能让我们采取行动，毕竟，我们怎么会去关心与自己无关的事呢？

Never show a child what he cannot see. Since mankind is almost unknown to him, and since you cannot make a man of him,

bring the man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child. While you are thinking what will be useful to him when he is older, talk to him of what he knows he can use now. Moreover, as soon as he begins to reason let there be no comparison with other children, no rivalry, no competition, not even in running races. I would far rather he did not learn anything than have him learn it through jealousy or self-conceit. Year by year I shall just note the progress he had made, I shall compare the results with those of the following year, I shall say, “You have grown so much; that is the ditch you jumped, the weight you carried, the distance you flung a pebble, the race you ran without stopping to take breath, etc.; let us see what you can do now.”

永远不要把孩子不能理解的东西展示给他看。因为他对人类是一无所知的，因为你还无法将他变成大人，就要像孩子一样对待他。尽管你在思考当他长大之后什么东西是对他有用的，你也只能跟他告诉他一些他现在能够使用的东西。另外，一旦他开始理性思考，就不要拿他同别的孩子作比较，即使在跑步比赛中，也不要有对抗和竞争。我宁可他什么都不学，也不要他为了嫉妒和自大而学习。年复一年，我只会注意他已经取得的成绩，以此来和下一年的成绩进行比较，我会说：“你已经长这么大了，这是你去年跳过的沟，搬过的重物，扔卵石的距离，一口气跑过的距离，等等，让我我们看看你现在能做到什么程度。”

In this way he is stimulated to further effort without jealousy. He wants to excel himself as he ought to do; I see no reason why he should not emulate his own performances.

通过这种方式，他会被激励着不断进步，但不会产生嫉妒心理。

他想要尽可能地超越自我，我看不到任何他不应该与自己竞争的理由。

I hate books; they only teach us to talk about things we know nothing about. Hermes, they say, engraved the elements of science on pillars lest a deluge should destroy them. Had he imprinted them on men's hearts they would have been preserved by tradition. Well-trained minds are the pillars on which human knowledge is most deeply engraved.

我讨厌书本，它们只会教我们谈论那些我们根本不懂的事情。人们说赫尔墨斯把科学原理刻在柱子上，以免它们被洪水摧毁。如果他可以让这些原理铭刻在人们的心里，那么它们就可以代代相传。受过良好教育的心灵就是深深印刻着人类知识的的柱子。

Is there no way of correlating so many lessons scattered through so many books, no way of focussing them on some common object, easy to see, interesting to follow, and stimulating even to a child? Could we but discover a state in which all man's needs appear in such a way as to appeal to the child's mind, a state in which the ways of providing for these needs are as easily developed, the simple and stirring portrayal of this state should form the earliest training of the child's imagination.

难道就没有办法把分散在这么多书中的知识联系起来吗，难道不能把它们集中在某个共同的目标上吗，即让人容易看到，有兴趣学习，甚至连孩子也能被激励起来。难道我们不能探索这样一种状态吗：让人类的所有需求都能以具有吸引力的方式展现在孩子面前，让

满足这些需求的方法易于发展。那么这种简易而活跃的状态就可以形成对孩子想象力的最早期训练。

Eager philosopher, I see your own imagination at work. Spare yourself the trouble; this state is already known, it is described, with due respect to you, far better than you could describe it, at least with greater truth and simplicity. Since we must have books, there is one book which, to my thinking, supplies the best treatise on an education according to nature. This is the first book Emile will read; for a long time it will form his whole library, and it will always retain an honoured place. It will be the text to which all our talks about natural science are but the commentary. It will serve to test our progress towards a right judgment, and it will always be read with delight, so long as our taste is unspoilt. What is this wonderful book? Is it Aristotle? Pliny? Buffon? No; it is Robinson Crusoe.

热情的哲学家们啊，我看得出你们的想象力已经在工作了。但是请省省力气把，这种状态是已知的，已经被描述过了，而且，请恕我直言，比您能够描述的好得多，至少更加真实简单。既然我们一定要读书，那么在我看来，有一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自然教育的最好论述。这也是爱弥儿会读到的第一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图书馆就只有这本书，并且将来，这本书也会一直被放置在一个尊贵的位置。它会成为课本，在它面前，我们所有关于自然科学的讨论充其量都只是注释。它可以用来检验我们在判断力上取得的成绩，只要我们的品味不受损害，我们就会一直怀着喜悦的心情阅读它。这本精彩的书到底是什么呢？是亚里士多德的论著吗？还是普林尼的？又或者是毕丰的书吗？都不是，这本书就是《鲁宾逊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on his island, deprived of the help of his fellow-men, without the means of carrying on the various arts, yet finding food, preserving his life, and procuring a certain amount of comfort; this is the thing to interest people of all ages, and it can be made attractive to children in all sorts of ways. We shall thus make a reality of that desert island which formerly served as an illustration. The condition, I confess, is not that of a social being, nor is it in all probability Emile's own condition, but he should use it as a standard of comparison for all other conditions. The surest way to raise him above prejudice and to base his judgments on the true relations of things, is to put him in the place of a solitary man, and to judge all things as they would be judged by such a man in relation to their own utility.

鲁滨逊独自一人呆在荒岛上，没有同伴的帮助，没有从事各项劳动的工具，却能够找到食物，维持生命，还能获得些许的安适，这样的事能够吸引各个年龄段的人的兴趣，也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吸引孩子。因此之前只作为例证的荒岛，我们可以让其成为现实。我承认，这种环境并不是普通的社会环境，更不可能是爱弥儿生活的环境，但他应该把它作为与其他环境比较的标准。培养他远离偏见，把判断力建立在事物的真实联系之上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他独自一人呆在某个地方，像那种人一样按照事物本身的用途来对其进行判断。

This novel, stripped of irrelevant matter, begins with Robinson's shipwreck on his island, and ends with the coming of the ship which bears him from it, and it will furnish Emile with material, both for work and play,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we are considering. His head should be full of it, he should always be busy with his castle, his goats, his plantations. Let him learn in detail, not from books but from things, all that is necessary in such a case.

Let him think he is Robinson himself; let him see himself clad in skins, wearing a tall cap, a great cutlass, all the grotesque get-up of Robinson Crusoe, even to the umbrella which he will scarcely need. He should anxiously consider what steps to take; will this or that be wanting. He should examine his hero's conduct; has he omitted nothing; is there nothing he could have done better? He should carefully note his mistakes, so as not to fall into them himself in similar circumstances, for you may be sure he will plan out just such a settlement for himself. This is the genuine castle in the air of this happy age, when the child knows no other happiness but food and freedom.

除去无关紧要的琐事，这本小说从鲁滨逊跟着船骸来到岛上开始讲述，最后以一只船带他离开荒岛为结束，在我们现在所考虑的这个时期当中，这本书是爱弥儿很好的教育和娱乐读物。他一定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他应该总是忙着照顾他的城堡、山羊、种植园。让他从事物身上而不是书本中学习详尽的知识，这样学到的一切在鲁滨逊这样的遭遇中都是必要的。让他把自己看成鲁滨逊，穿着动物皮毛做成的衣服，带着高帽子，拿着一把锋利的弯刀，跟鲁宾逊一样带着所有奇形怪状的东西，甚至还扛着一把他几乎不需要的雨伞。当缺乏这样或那样物品时，他应该焦急地思考下一步的行动。他应该好好审视一下小说的主人公的行为，他有没有遗漏什么事情呢，有没有什么事他能够做得更好？他必须仔细留意主人公所犯的错误，这样才能避免自己落入相似的境地。因为，你知道他将为自己设计一个相似的居住地。当孩子除了食物和自由再不知其他幸福的时候，这就是属于他们这个快乐年龄的人的真正城堡。

What a motive will this infatuation supply in the hands of a skilful teacher who has aroused it for the purpose of using it. The child who wants to build a storehouse on his desert island will be

more eager to learn than the master to teach. He will want to know all sorts of useful things and nothing else; you will need the curb as well as the spur. Make haste, therefore, to establish him on his island while this is all he needs to make him happy; for the day is at hand, when, if he must still live on his island, he will not be content to live alone, when even the companionship of Man Friday, who is almost disregarded now, will not long suffice.

一位有技巧的老师如果能够出于使用的目的激起这种迷恋，那么它能够提供多么大的学习动力啊！这个孩子想在他的荒岛上建一个仓库，他想要学习的心情会比老师想教学的心情更热切。他想知道一切有用的东西，对别的丝毫不敢兴趣，你既要刺激他的动力也要控制他的欲望。因此，当这一切就是他感到快乐所需的一切时，我们要抓紧时间让他在岛上定居下来。因为，如果他必须在岛上长住的话，他不再满足于独居的那一天即将来临，即使是有现在还不曾理会过他的星期五的陪伴，也撑不了多久。

The exercise of the natural arts, which may be carried on by one man alone, leads on to the industrial arts which call for the cooperation of many hands. The former may be carried on by hermits, by savages, but the others can only arise in a society, and they make society necessary. So long as only bodily needs are recognised man is self-sufficing; with superfluity comes the need for divi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labour, for though one man working alone can earn a man's living, one hundred men working together can earn the living of two hundred. As soon as some men are idle, others must work to make up for their idleness.

自然艺术的练习，是可以由一个人单独完成的，它可以引出工业

技术，而这就需要众人的合作了。前者不管是隐士或野蛮人都可以完成，但是另一者就只能在社会中产生，使社会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人们只有身体需求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自给自足。当产品有了剩余，就出现了劳动分工和成果分配的需要，因为尽管一个人工作可以养活自己，但是一百个人一起工作可以养活两百个人。一旦有人偷懒，其他的人就必须努力工作来弥补那些人的懒惰造成的损失。

Your main object should be to keep out of your scholar's way all idea of such social relations as he cannot understand, but when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compels you to show him the mutual dependence of mankind, instead of showing him its moral side, turn all his attention at first towards industry and the mechanical arts which make men useful to one another. While you take him from one workshop to another, let him try his hand at every trade you show him, and do not let him leave it till he has thoroughly learnt why everything is done, or at least everything that has attracted his attention. With this aim you should take a share in his work and set him an example. Be yourself the apprentice that he may become a master; you may expect him to learn more in one hour's work than he would retain after a whole day's explanation.

你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当学生还无法理解时，不要让他接触关于这种社会关系的一切观念。但是，当知识的发展使你不得不向他展示人类的相互依赖，你在一开始要把他的所有注意力转向工业和机械的艺术，而不是道德那一侧，因为前者能够使人和人对彼此而言是有用的。当你把他从一个车间带到另一个车间，让他试着去做你展示给他的每一道工序，不要让他离开车间，直到他已经完全了解每一件事情为什么做完，或者至少每一件事情已经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带着这个目标，你应该在他工作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给他设置范例。把你自

己当作学徒，他也许会成为老师。与解释一整天所能记住的东西相比，你可以期待他在这一个小时的工作中学到更多。

The value set by the general public on the various arts is in inverse ratio to their real utility. They are even valued directly according to their uselessness. This might be expected. The most useful arts are the worst paid, for the number of workmen is regulated by the demand, and the work which everybody requires must necessarily be paid at a rate which puts it within the reach of the poor.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great people who are called artists, not artisans, who labour only for the rich and idle, put a fancy price on their trifles; and as the real value of this vain labour is purely imaginary, the price itself adds to their market value, and they are valued according to their costliness. The rich think so much of these things, not because they are useful, but because they are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poor. Nolo habere bona, nisi quibus populus inviderit.

大众对于各种艺术的价值的判定是与它们的真实效用成反比的。人们甚至根据其无用性来判断它们的价值。这大概是意料之中的。最有用的艺术往往是报酬最少的，因为工匠的数量是被需求控制的，这些劳动成果每个人都需要，因此付给工人的钱必须控制在穷人也能负担的范围之内。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被叫做艺术家而不是手艺人的伟人，只为富人和闲人工作，随意摆弄一下就要个高价。这种无用劳动的真实价值纯粹是想象出来的，所以价格本身也成为了其市场价值的一部分，它们的价值是根据其奢侈性而来的。富人们如此看重这些东西，并不是由于它们有用，而是因为它们超出穷人的承受范围。我所有的财物，将使世人艳羡不已。

What will become of your pupils if you let them acquire this foolish prejudice, if you share it yourself? If, for instance, they see you show more politeness in a jeweller's shop than in a locksmith's. What idea will they form of the true worth of the arts and the real value of things when they see, on the one hand, a fancy price and, on the other, the price of real utility, and that the more a thing costs the less it is worth? As soon as you let them get hold of these ideas, you may give up all attempt at further education; in spite of you they will be like all the other scholars—you have wasted fourteen years.

如果你让你的学生获得这样愚蠢的偏见，如果你自己也抱有这种偏见，你的学生会变成什么样呢？举个例子，比如他们看见你在珠宝店比在锁匠铺更礼貌。如果他们看到高昂的价格和实际效用的价格之间并不协调，看到一样东西越贵反而越没有价值，那么他们对于艺术和事物的真正价值会形成怎么样的观念呢？一旦你让他们获取了这些观点，你也许会在将来的教育中放弃所有的尝试。尽管你付出了努力，他们还是与其他所有学生一样，而你已经浪费了十四年。

Emile, bent on furnishing his island, will look at things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Robinson would have thought more of a toolmaker's shop than all Saide's trifles put together. He would have reckoned the toolmaker a very worthy man, and Saide little more than a charlatan.

爱弥儿，一心致力于布置他的岛屿，将会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事物。与萨伊德对小玩意的所有重视都加在一起相比，鲁滨逊对工具铺的重视还要更多。他会认为制造工具的人是非常有价值的人，而萨伊德基本上就是个骗子。

“My son will have to take the world as he finds it, he will not live among the wise but among fools; he must therefore be acquainted with their follies, since they must be led by this means. A real knowledge of things may be a good thing in itself, but the knowledge of men and their opinions is better, for in human society man is the chief tool of man, and the wisest man is he who best knows the use of this tool. What is the good of teaching children an imaginary system, just the opposite of the established order of things, among which they will have to live? First teach them wisdom, then show them the follies of mankind.”

“我的儿子将会生活在他发现的这个世界，他会与愚蠢的人而不是聪明的人一起生活；他因此必须熟悉他们的愚蠢，因为愚人只能按照这样的方法做事。真正了解事物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了解人以及对他们的看法更好。因为在人类社会中，人是人首要的工具，最聪明的人是对这种工具的使用方法了解得最透彻的人。教导孩子一种想像系统有什么好处呢，这与他们将来必须遵循的事物的既定顺序是相反的。首先要教他们智慧，然后向他们展示人类的愚蠢。”

These are the specious maxims by which fathers, who mistake them for prudence, strive to make their children the slaves of the prejudices in which they are educated, and the puppets of the senseless crowd, which they hope to make subservient to their passions. How much must be known before we attain to a knowledge of man. This is the final study of the philosopher, and you expect to make it the first lesson of the child! Before teaching him our sentiments, first teach him to judge of their worth. Do you perceive folly when you mistake it for wisdom? To be wise we must discern between good and evil. How can your child know men,

when he can neither judge of their judgments nor unravel their mistakes? It is a misfortune to know what they think, without knowing whether their thoughts are true or false. First teach him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afterwards you will teach him how they appear to us. He will then be able to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popular ideas and truth, and be able to rise above the vulgar crowd; for you are unaware of the prejudices you adopt, and you do not lead a nation when you are like it. But if you begin to teach the opinions of other people before you teach how to judge of their worth, of one thing you may be sure, your pupil will adopt those opinions whatever you may do, and you will not succeed in uprooting them. I am therefore convinced that to make a young man judge rightly, you must form his judgment rather than teach him your own.

这都是似是而非的准则，父亲们由于深谋远虑害了孩子，力求让孩子在偏见中接受教育，成为麻木的大众的傀儡，希望孩子对他们的欲望卑躬屈膝。在我们获得人类的知识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多少东西啊。这是哲学家最后的研究，而你期望将它作为孩子的第一堂课！在将我们的情感教导给他之前，首先要教他评价这些情感的价值。当你将它误认为是智慧的时候你是否察觉到了愚蠢？为了变得明智我们必须辨别好与坏。当你的孩子既不能评价他人的判断，也无法阐明他人的错误，他怎能了解人？在没有了解他们的想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时候去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是一种不幸。首先要将事物的真实样子教导给他，然后你再教他事物如何展现在我们面前。然后他将有能力在流行的观点和真相之间做一个比较，有能力超越庸俗的人群；因为你当你与大众相类似的时候，你就无法意识到你采取的偏见，你也就无法领导他们。但是当你教孩子怎样去评价其他人的价值之前，就开始教他其他人的观点，那么有一件事你也许可以确定，无论你会做什么，你的学生将会采用那些观点，你再也无法成功将其铲除。因此，我确信为了使一个年轻人正确地判断，你必须构筑他的判断力，而非将你

自己的判断力教授给他。

So far you see I have not spoken to my pupil about men; he would have too much sense to listen to me. His relations to other people are as yet not sufficiently apparent to him to enable him to judge others by himself. The only person he knows is himself, and his knowledge of himself is very imperfect. But if he forms few opinions about others, those opinions are correct. He knows nothing of another's place, but he knows his own and keeps to it. I have bound him with the strong cord of necessity, instead of social laws, which are beyond his knowledge. He is still little more than a body; let us treat him as such.

目前为止你知道我还没有给我的学生讲过人的事情；不然他就会有太多的感触以至于不能听我讲授。它与其他人的联系目前显然还无法让他只靠自己就能有效地判断其他人。他唯一了解的人是他自己，而且他对于自己的了解也是很不完善的。但是如果他对其他人没有形成什么观点，这些观点就是正确的。他对于另外一个人的位置一无所知，但他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能呆在这个位置上。我已经用必须性这条粗绳绑住了他，而不是用社会的法律，这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他现在仍然只是个自然人，让我们就这样对待他。

Every substance in nature and every work of man must be judged in relation to his own use, his own safety, his own preservation, his own comfort. Thus he should value iron far more than gold, and glass than diamonds; in the same way he has far more respect for a shoemaker or a mason than for a Lempereur, a Le Blanc, or all the jewellers in Europe. In his eyes a confectioner is a really great man, and he would give the whol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smallest pastrycook in Lombard Street. Goldsmiths, engravers, gilders, and embroiderers, he considers lazy people, who play at quite useless games. He does not even think much of a clockmaker. The happy child enjoys Time without being a slave to it; he uses it, but he does not know its value. The freedom from passion which makes every day alike to him, makes any means of measuring time unnecessary. When I assumed that Emile had a watch, [4_5] just as I assumed that he cried, it was a commonplace Emile that I chose to serve my purpose and make myself understood. The real Emile, a child so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would not serve as an illustration for anything.

在判断自然界的每一事物和每一工作时，都必须将其和人的用途、安全、生存、舒适性联系起来。因此，他应该认为铁比黄金更有价值，玻璃比钻石更有价值，同样地，比起郎配勒尔、勒布朗或者所有欧洲的珠宝匠人，他会更加尊敬鞋匠和石匠。在他看来，糖果商是个伟大的人，他会拿整个科学院去换龙巴德大街上的最不起眼的点心师。在他眼里，不管是是金匠、雕工、镀金工，还是刺绣工人，都只不过是些做无用功的懒人。甚至对钟表匠，他也不会太重视。这个快乐的孩子享受着时间，但不会成为它的奴隶。他利用时间，但不知道其价值。这种脱离欲望的自由让每一天对他而言都是一样的，这让任何计算时间的方法都变的不必要。当我假设爱弥儿有一只手表 [5_5] ，就像我假设他哭了，那都是一个平庸的爱弥儿，是我选择来服务于我的目的，好让我自己被其他人理解。但是真正的爱弥儿，是不同于他人的，他不会成为任何事情的例证。

There is an order no less natural and even more accurate, by which the arts are valued according to bonds of necessity which connect them; the highest class consists of the most independent, the lowest of those most dependent on others. This classification,

which suggests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on the order of society in general, is like the preceding one in that it is subject to the same inversion in popular estimation, so that the use of raw material is the work of the lowest and worst paid trades, while the oftener the material changes hands, the more the work rises in price and in honour. I do not ask whether industry is really greater and more deserving of reward when engaged in the delicate arts which give the final shape to these materials, than in the labour which first gave them to man's use; but this I say, that in everything the art which is most generally useful and necessary, is undoubtedly that which most deserves esteem, and that art which requires the least help from others, is more worthy of honour than those which are dependent on other arts, since it is freer and more nearly independent. These are the true laws of value in the arts; all others are arbitrary and dependent on popular prejudice.

有一种秩序，它仍旧符合自然，甚至更加精确。在这种秩序中，艺术的价值是用联系不同艺术的必要性来衡量的。最高等级的艺术是最独立的，最低级的艺术则最需要依赖他者。这种分类，暗示了关于一般社会秩序的重要考量，它和先前的秩序类似，在大众的评价中都是注定要被倒置的。因此原料的制造是最低端廉价的工作，然而原料易手越频繁，成品的价格越高，受到的赞誉越大。我不会考虑当工业加入了精巧的艺术来使原材料最终成型时，与最初赋予它们用处的劳动相比，是否就变得更伟大，值得更多的赞誉。但是我认为，在所有事物中，最值得尊重的艺术无疑应当是最必要且最能被广泛应有的艺术。需要他人帮助最少的艺术，与其他依赖性强的艺术相比，值得更多的赞誉，因为它们更自由，更接近独立。这些才是关于艺术的价值的真正法则。其他的一切都是专断的，依赖于大众的偏见。

Agriculture is the earliest and most honourable of arts; metal

work I put next, then carpentry, and so on. This is the order in which the child will put them, if he has not been spoilt by vulgar prejudices. What valuable considerations Emile will derive from his Robinson in such matters. What will he think when he sees the arts only brought to perfection by sub-division, by the infinite multiplication of tools. He will say, “All those people are as silly as they are ingenious; one would think they were afraid to use their eyes and their hands, they invent so many tools instead. To carry on one trade they become the slaves of many others; every single workman needs a whole town. My friend and I try to gain skill; we only make tools we can take about with us; these people, who are so proud of their talents in Paris, would be no use at all on our island; they would have to become apprentices.”

农业是最早产生也是最受尊敬的艺术，被我排在第二的是金属加工，第三则是木工，依次类推。如果孩子们并未受到粗俗偏见的迫害，那他们就会这样排序。从鲁滨逊的经历之中，爱弥儿能吸取多少关于这些事情的有价值的经验啊。当他发现只有通过再次分工和无穷尽地增添工具，技术才能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他又会怎么想呢？他会说：“这些人心灵手巧，却也透着一股傻气。可能有人觉得他们是因为不敢使用眼睛和双手，才发明了这么多工具来代替手眼的功能。为了从事某个行业，他们成为了其他事物的奴隶。每个独立的工人需要依赖于整个城镇。我和我的朋友试着掌握各种技能，我们只制造那些能够随身携带的工具，巴黎那些对自己的天赋无比骄傲的人，在我们岛上会毫无用处，只能成为学徒。

Reader, do not stay to watch the bodily exercises and manual skill of our pupil, but consider the bent we are giving to his childish curiosity; consider his common-sense, his inventive spirit, his foresight; consider what a head he will have on his shoulders. He

will want to know all about everything he sees or does, to learn the why and the wherefore of it; from tool to tool he will go back to the first beginning, taking nothing for granted; he will decline to learn anything that requires previous knowledge which he has not acquired. If he sees a spring made he will want to know how they got the steel from the mine; if he sees the pieces of a chest put together, he will want to know how the tree was out down; when at work he will say of each tool, “If I had not got this, how could I make one like it, or how could I get along without it?”

各位读者，不要只会观察我们学生的身体运动和手工技能，也请考虑一下我们能把它们幼稚的好奇心引导到什么方向去，考虑一下他的常识培养，他的创新精神，他的远见先知，他将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头脑。他会想知道一切看到或做过的事情，学习其中的缘由。从一个工具研究到另一种工具，他都会追根溯源，绝不会想当然。他会拒绝学习那些需要他所没有的预备知识的事情。如果他看到一个弹簧，他就会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用矿石炼制钢铁的；如果他看到木板被做成箱子，他就会想知道树是如何被砍倒的；当他在工作中，每看到一件工具，他就会说：“如果我没有这个现成的工具，我该如何制造一个差不多的工具呢？或者要是我没有这个工具的帮助，我该怎么办呢？”

It is, however, difficult to avoid another error. When the master is very fond of certain occupations, he is apt to assume that the child shares his tastes; beware lest you are carried away by the interest of your work, while the child is bored by it, but is afraid to show it. The child must come first, and you must devote yourself entirely to him. Watch him, study him constantly, without his knowing it; consider his feelings beforehand, and provide against those which are undesirable, keep him occupied in such a way that he not only feels the usefulness of the thing, but takes a pleasure in

understanding the purpose which his work will serve.

然而，有一个错误是难以规避的。当老师喜爱某些特定职业时，他总是假定孩子会分享他的兴味。因此你要多加注意，以免当你教导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孩子却认为其无聊至极，只是由于害怕不敢表现出来罢了。孩子必须被放在第一位，你必须全身心地把自己奉献给孩子。仔细观察他，始终留心他，但不要被他发现。率先考虑他的感受，使他免受不良信息的侵害，让他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既要让他感受到事物的用处，也要让他为能有这种感受而快乐。

The solidarity of the arts consists in the exchange of industry, that of commerce in the exchange of commodities, that of banks in the exchange of money or securities. All these ideas hang together, and their foundation has already been laid in early childhood with the help of Robert the gardener. All we have now to do is to substitute general ideas for particular, and to enlarge these ideas by means of numerous examples, so as to make the child understand the game of business itself, brought home to him by means of particular instances of natural history with regard to the special products of each country, by particular instance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which concern navigat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transport, greater or less in proportion to the distance between places, the position of land, seas, rivers, etc.

各行各业的的完整性在于行业之间的沟通，商业的完整性在于商品的交换，银行的完整性在于货币或者证券的交换。这些概念都是相通的，这些基础，早在童年时期那位园丁罗伯特的帮助下就已经打好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普遍的概念来替代特殊的概念，并且利用各种案例来拓展这些概念，这样才能让孩子明白商业是如何运作

的。通过自然历史中关于每个国家的特产的特例，通过艺术和科学的特例，其中涉及到由于两地之间距离的远近，或者陆地、海洋、河流的位置等因素而造成的或大或小的航行和运输难题，来让孩子对商业有深刻理解。

There can be no society without exchange, no exchange without a common standard of measurement, no common standard of measurement without equality. Hence the first law of every society is some conventional equality either in men or things.

没有交换，就没有社会；没有共用的测量标准，就没有交换；没有平等，就没有共用的测量标准。因此，每个社会的第一法则就是约定的平等，对人和物都适用。

Conventional equality between men, a very different thing from natural equality, leads to the necessity for positive law, i. e., government and kings. A child's political knowledge should be clear and restricted; he should know nothing of government in general, beyond what concerns the rights of property, of which he has already some idea.

人与人之间的约定平等，和自然平等是迥然不同的事。它使得成文法成为必需品，比如政府和君主。孩子的政治知识应该清楚并且有限。他不应该知道任何关于政府的一般知识，只有在涉及到他已经具有一些概念的产权时，才需要大概知道有政府的存在。

Conventional equality between things has led to the invention

of money, for money is only one term in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values of different sorts of things; and in this sense money is the real bond of society; but anything may be money; in former days it was cattle; shells are used among many tribes at the present day; Sparta used iron; Sweden, leather; while we use gold and silver.

事物之间的约定平等使得货币得以发明，因为货币是唯一一件可以用来比较不同事物价值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货币才是社会的真正纽带。但是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货币。从前，人们把牲畜作为货币，现在的很多部落把贝壳作为货币，斯巴达人用铁，而瑞典人用皮革，而我们则用金银作为货币。

Metals, being easier to carry, have generally been chosen as the middle term of every exchange, and these metals have been made into coin to save the trouble of continual weighing and measuring, for the stamp on the coin is merely evidence that the coin is of given weight; and the sole right of coining money is vested in the ruler because he alone has the right to demand the recognition of his authority by the whole nation.

金属是很容易携带的，已经被广泛地使用为各种交换的媒介，为了免去持续称重和度量的麻烦，人们把金属做成了钱币，因为钱币上的印记是用来表明其重量的证据。只有统治者才有铸币的权利。因为只有他才有权要求整个国家承认他的权威。

The stupidest person can perceive the use of money when it is explained in this way.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a direct comparison between various things, for instance, between cloth and corn; but

when we find a common measure, in money, it is easy for the manufacturer and the farmer to estimate the value of the goods they wish to exchange in terms of this common measure. If a given quantity of cloth is worth a given some of money, and a given quantity of corn is worth the same sum of money, then the seller, receiving the corn in exchange for his cloth, makes a fair bargain. Thus by means of money it becomes possible to compare the values of goods of various kinds.

通过这样的解释说明，连最愚蠢的人也能明白钱的用处。要直接比较不同的事物是很困难的，例如比较布匹和玉米，但当我们找到公用的衡量标准，比如利用货币，那么制造商和农民用这种标准来估算用于交换的货物的价值就很容易了。如果一定数量的布匹相当于一定数量的货币，而一定数量的玉米能够换取相同数量的货币，那么卖家就可以用他的布匹换取这些玉米，做等价交易。因此，货币使得比较不同种类商品的价值成为可能。

Be content with this, and do not touch upon the moral effects of this institution. In everything you must show clearly the use before the abuse. If you attempt to teach children how the sign has led to the neglect of the thing signified, how money is the source of all the false ideas of society, how countries rich in silver must be poor in everything else, you will be treating these children as philosophers, and not only as philosophers but as wise men, for you are professing to teach them what very few philosophers have grasped.

讲这些就够了，不要去触碰这个发明的道德影响。对于所有事情，你必须先清楚地展示其用处，再说弊端。如果你打算教导孩子符

号是如何让我们忽视它代表的东西，金钱是如何成为社会的万恶之源，银矿资源丰富的国家为何在其他方面必然贫穷，你不仅把这些孩子当成了哲学家，更是把他们看成了智者，因为你总是声称要把那些几乎没什么哲学家能够理解的知识教给他们。

What a wealth of interesting objects, towards which the curiosity of our pupil may be directed without ever quitting the real and material relations he can understand, and without permitting the formation of a single idea beyond his grasp! The teacher's art consists in this: To turn the child's attention from trivial details and to guide his thoughts continually towards relations of importance which he will one day need to know, that he may judge rightly of good and evil in human society. The teacher must be able to adapt the conversation with which he amuses his pupil to the turn already given to his mind. A problem which another child would never heed will torment Emile half a year.

可以引导学生好奇心的有趣事物很多，同时也不会抛弃他所能理解的真实的物质关系，不可能形成他无法理解的概念。哪怕只有一个。教师的艺术就在于此：要把学生的注意力从细枝末节引开，指导他持续思考重要的关系，有一天，他会需要知道这些的，那样他也许就可以在人类社会中正确地判断善恶。老师必须能够利用那些取悦学生的交谈，让学生想起那些你已经埋在他心中的思想。一个其他孩子根本不会留意的问题会折磨爱弥儿半年之久。

We are going to dine with wealthy people; when we get there everything is ready for a feast, many guests, many servants, many dishes, dainty and elegant china. There is something intoxicating in all these preparations for pleasure and festivity when you are not

used to them. I see how they will affect my young pupil. While dinner is going on, while course follows course, and conversation is loud around us, I whisper in his ear, “How many hands do you suppose the things on this table passed through before they got here?” What a crowd of ideas is called up by these few words. In a moment the mists of excitement have rolled away. He is thinking, considering, calculating, and anxious. The child is philosophising, while philosophers, excited by wine or perhaps by female society, are babbling like children. If he asks questions I decline to answer and put him off to another day. He becomes impatient, he forgets to eat and drink, he longs to get away from table and talk as he pleases. What an object of curiosity, what a text for instruction. Nothing has so far succeeded in corrupting his healthy reason; what will he think of luxury when he finds that every quarter of the globe has been ransacked, that some 2,000,000 men have laboured for years, that many lives have perhaps been sacrificed, and all to furnish him with fine clothes to be worn at midday and laid by in the wardrobe at night.

我们去和一些富人吃饭。但我们到那的时候，一餐盛宴所需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好：满堂的宾客、大量仆人、许多菜肴、精致高雅的瓷器。如果你对这些东西不习惯，那么在这些为了欢愉和盛宴而做的准备中会有某种令人陶醉的东西。我看到了它们会对我年幼的学生产生什么影响。在聚餐过程中，当一道菜接着一道菜端上餐桌时，大家聊得热火朝天，而我就会对他低声问他：“你觉得在这些菜品上菜之前，经过了多少人的手呢？”这寥寥数语，能让他回忆起多少概念啊！一时之间，他的兴致马上就消减了。他沉思着，考虑着，计算着，坐立不安。当哲学家们被美色和酒肉迷得神魂颠倒、像个孩子一样含糊不清地说话时，我的学生却像个哲学家一样在思考。如果他要提问，我不会回答他，让他把问题留到明天。他变得不耐烦，忘记了吃喝，只想着离开餐桌，畅所欲言地讨论。他的好奇心多么想弄清这

件事，这些话多么适合用来教育他！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事成功地破坏他健全的理性。当他发现四分之一的世界都已经被洗劫一空，两百多万的人已经辛苦劳作了许多年，很多生命可能已经牺牲，而这些都是为了向他提供中午穿上、晚上收进衣橱的华服，他会怎么看待这些奢侈品呢？

Be sure you observe what private conclusions he draws from all his observations. If you have watched him less carefully than I suppose, his thoughts may be tempted in another direction; he may consider himself a person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world, when he sees so much labour concentrated on the preparation of his dinner. If you suspect his thoughts will take this direction you can easily prevent it, or at any rate promptly efface the false impression. As yet he can only appropriate things by personal enjoyment, he can only judge of their fitness or unfitness by their outward effects. Compare a plain rustic meal, preceded by exercise, seasoned by hunger, freedom, and delight, with this magnificent but tedious repast. This will suffice to make him realise that he has got no real advantage from the splendour of the feast, that his stomach was as well satisfied when he left the table of the peasant, as when he left the table of the banker; from neither had he gained anything he could really call his own.

你要确保能够观察到他从这些观察中得出的个人总结。如果观察得没有我设想的那么仔细，他的思想就可能被引诱向另一个方向。当他看到人们为了准备他的晚餐需要花费这么多劳动，他就可能把自己当成这个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如果你察觉到他的思想进入了这样的方向，你就可以轻易地制止他，或者至少可以立即抹杀这种错误印象。但是既然他只是为了个人享受才占有东西，他就只能通过外在的影响来判断它们适用还是不适用。与盛大却沉闷的盛宴相比，运动之

后的粗茶淡饭却是被饥饿、自由和愉悦所调味的。这已经足以让他明白盛大的筵席并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好处，他离开乡下人的桌子的时候，跟他离开银行家餐桌的时候一样饱。在这两个地方，他也都不会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Just fancy what a tutor might say to him on such an occasion. Consider the two dinners and decide for yourself which gave you most pleasure, which seemed the merriest, at which did you eat and drink most heartily, which was the least tedious and required least change of courses? Yet note the difference—this black bread you so enjoy is made from the peasant's own harvest; his wine is dark in colour and of a common kind, but wholesome and refreshing; it was made in his own vineyard; the cloth is made of his own hemp, spun and woven in the winter by his wife and daughters and the maid; no hands but theirs have touched the food. His world is bounded by the nearest mill and the next market. How far did you enjoy all that the produce of distant lands and the service of many people had prepared for you at the other dinner? If you did not get a better meal, what good did this wealth do you? how much of it was made for you? Had you been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the tutor might say, it would have been of still less use to you; for the anxiety of displaying your enjoyment before the eyes of others would have robbed you of it; the pains would be yours, the pleasure theirs.

你只要想象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师会对他怎么说。思考一下这两顿晚饭，由你自己来决定哪一者给了你最多的欢愉，看上去是最愉快的。你觉得那顿饭你吃得最开心，最全身心投入，餐具换得最少？但是你也要注意其中的差别——你爱吃的黑面包是农民自己耕种的麦子做的；他的酒虽然颜色略黑，并且味道一般，但却是健康清爽的，是农夫在自己的葡萄园里酿制的，他的布匹是由他的妻子、女

儿、侍女在冬天用他种植的大麻织成的，食物也都是他们亲手做的。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最近的磨坊和集市。对于你来说，在一顿晚餐里，虽有远方的特产和众人的服侍，那你又能享受多少呢？如果你不能吃得更好，那财富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有多少东西是专为你而做的？可能你的老师会说："如果你是这里的主人，你会觉得这些更是百无一用，显摆你的享受只会让你不安，生怕有人会抢走你的一切。开心的是他们，痛苦的却是你。"

This may be a very fine speech, but it would be thrown away upon Emile, as he cannot understand it, and he does not accept second-hand opinions. Speak more simply to him. After these two experiences, say to him some day, "Where shall we have our dinner to-day? Where that mountain of silver covered three quarters of the table and those beds of artificial flowers on looking glass were served with the dessert, where those smart ladies treated you as a toy and pretended you said what you did not mean; or in that village two leagues away, with those good people who were so pleased to see us and gave us such delicious cream?" Emile will not hesitate; he is not vain and he is no chatterbox; he cannot endure constraint, and he does not care for fine dishes; but he is always ready for a run in the country and is very fond of good fruit and vegetables, sweet cream and kindly people. [4_6] On our way, the thought will occur to him, "All those people who laboured to prepare that grand feast were either wasting their time or they have no idea how to enjoy themselves."

这可能是个不错的讲话，但对于爱弥儿来说，却只是强加于他身上的，因为他并不能理解，他不能接受别人的观点。因此你要更加简洁明了地解释给他听。在体验两种吃饭方式以后，某天我就会跟他说："我们今晚该去哪里吃饭呢？你是想去银行家的宴席，面对小山

似的银器堆满了四分之三的桌子，人造花被插在好看的玻璃瓶里和甜品一起端上来，那些时髦的女人把你当成一个玩具，对你说莫名其妙的话呢。还是想去两里格之外的农村，在那里，和蔼的人们看到我们就会很开心，拿美味的奶油来招待我们。”爱弥儿不会犹疑不决，他并不虚荣也不多话，他不能忍受拘束，他并不在乎精致的菜肴，他时刻准备着在乡下奔跑，并且非常喜欢新鲜的蔬果、清甜的奶油以及善良的人们 [5_6] 。在路上，他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想法：“所有花费大把精力去准备丰盛的筵席的人，要么就是在浪费时间，要么就是他们根本不懂如何自己享受那些美食。”

My example may be right for one child and wrong for the rest. If you enter into their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you will know how to vary your instances as required; the choice depends on the study of the individual temperament, and this study in turn depends on the opportunities which occur to show this temperament. You will not suppose that, in the three or four years at our disposal, even the most gifted child can get an idea of all the arts and sciences, sufficient to enable him to study them for himself when he is older; but by bringing before him what he needs to know, we enable him to develop his own tastes, his own talents, to take the first step towards the object which appeals to his individuality and to show us the road we must open up to aid the work of nature.

我的例子可能对于一个孩子是对的，但是对于剩下的孩子是错的。如果你用他们的方式去看待事物，你就会知道你怎样根据要求去改变你的事例。这种选择依赖于研究什么样的个体天资，而这种研究又反过来依赖于展现这种天资的机会。不要以为在任我们支配的这三四年里，最有天赋的孩子都能对所有的艺术和科学形成一个概念，乃至于能使他在长大后自己去学习它们。但是通过把他需要知道的东西带到他面前，我们使他能够培养他自己的品味、天赋，让他朝着对其

个性有吸引力的事物迈出第一步，向我们展示为了帮助上帝的这一作品我们必须开启的道路。

There is another advantage of these trains of limited but exact bits of knowledge; he learns by their connec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how to rank them in his own estimation and to be on his guard against those prejudices, common to most men, which draw them towards the gifts they themselves cultivate and away from those they have neglected. The man who clearly sees the whole, sees where each part should be; the man who sees one part clearly and knows it thoroughly may be a learned man, but the former is a wise man, and you remember it is wisdom rather than knowledge that we hope to acquire.

关于这一系列有限但正确的知识，还有另一个优点：孩子通过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学习如何在自己的判断中对其进行排列，防止形成对大多数人来说常见的偏见，这种偏见会让人偏重培养孩子的某些才能而忽视了其他的方面。能够清楚地看见整体的人也能够看到各个部分应该是什么样子。能够看清一部分并且完全了解它的人也许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是前者是一个明智的人，你要记住我们希望获得的是智慧而非知识。

However that may be, my method does not depend on my examples; it depends on the amount of a man's powers at different ages, and the choice of occupations adapted to those powers. I think it would be easy to find a method which appeared to give better results, but if it were less suited to the type, sex, and age of the scholar, I doubt whether the results would really be as good.

不管怎么样，我的方法不依赖于我的例子；它依赖于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所拥有的力量，以及与这些力量相适应的职业选择。我认为发现一种似乎能给出更好结果的方法是容易的，但是如果它与学生的类型、性别、年纪不那么适应，我怀疑这些结果是否真的那样好。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second period we took advantage of the fact that our strength was more than enough for our needs, to enable us to get outside ourselves. We have ranged the heavens and measured the earth; we have sought out the laws of nature; we have explored the whole of our island. Now let us return to ourselves, let us unconsciously approach our own dwelling. We are happy indeed if we do not find it already occupied by the dreaded foe, who is preparing to seize it.

在这第二阶段的开始，我们已经对自己的力量超过需求这一事实加以利用，并使自己走到了更远的地方。我们知道了天堂的范围，测量了地球的尺寸；我们已经寻找到了自然的法则；我们已经探索了我们岛屿的全貌。现在让我们回归自我，让我们无意识地接近我们的住所。如果我们发现它还没有被那些准备夺取它的可怕敌人占领，那的确是应该高兴的。

What remains to be done when we have observed all that lies around us? We must turn to our own use all that we can get, we must increase our comfort by means of our curiosity. Hitherto we have provided ourselves with tools of all kinds, not knowing which we require. Perhaps those we do not want will be useful to others, and perhaps we may need theirs. Thus we discover the use of exchange; but for this we must know each other's needs, what tools other people use, what they can offer in exchange. Given ten men,

each of them has ten different requirements. To get what he needs for himself each must work at ten different trades; but considering our different talents, one will do better at this trade, another at that. Each of them, fitted for one thing, will work at all, and will be badly served. Let us form these ten men into a society, and let each devote himself to the trade for which he is best adapted, and let him work at it for himself and for the rest. Each will reap the advantage of the others' talents, just as if they were his own; by practice each will perfect his own talent, and thus all the ten, well provided for, will still have something to spare for others. This is the plain foundation of all our institutions. It is not my aim to examine its results here; I have done so in another book (Discours sur l'inegalite).

当我们已经观察了身边所有的谎言时，还剩下什么要做呢？我们必须转向所有我们能够获得的东西，使其为我们所用，我们必须通过好奇心提升自己的舒适度。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为自己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工具，但是不知道我们需要哪一样。也许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对于别人而言是有用的，我们也可能需要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发现了交换的作用，但是，为了交换，我们必须知道彼此的需求，知道别人使用什么工具，知道他们能够提供什么东西来交换。假设给定十个人，他们每个人有十样不同的需求。为了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一个人必须做十种不同的工作；但是考虑到我们不同的天赋，一个人可能擅长这种工作，另一个人擅长那种工作。他们每一个人，只适合做一件事情。如果要去做所有的事，注定会做得很糟糕。让我们将这十个人组成一个社会，然后让每一个人献身于自己最适合的行业，让他为了自己和其他人在这个行业中工作。每个人都会从其他人的天赋中受益，就像这些天赋是他们的一样；通过实践，每个人自己的天赋会得到完善，因此这十个人的需求都得到很好的满足，还会有剩余的成果可以分享给其他人。这就是我们所有制度的基础，再清楚不过了。在这里检验它的结果不是我的目的，我已经在另一本书里做过这件事了

（Discours sur l'inegalite）。

According to this principle, any one who wanted to consider himself as an isolated individual, self-sufficing and independent of others, could only be utterly wretched. He could not even continue to exist, for finding the whole earth appropriated by others while he had only himself, how could he get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When we leave the state of nature we compel others to do the same; no one can remain in a state of nature in spite of his fellow-creatures, and to try to remain in it when it is no longer practicable, would really be to leave it, for self-preservation is nature's first law.

根据这个原则，任何将自己视为孤立、自给自足、不依赖他人的个体的人，只能是非常悲惨的。他甚至不能继续生存，因为他发现整个地球已经被其他人所占领，而他只有他自己，那他怎么还能获得生存的手段呢？当我们离开自然的状态时我们强迫他人做同样的事情；没有人能不管他的同伴而独自保持自然的状态。当这条路行不通时，如果他还尝试保持于其中，那就是真正的脱离了，因为自我生存是自然的首要法则。

Thus the idea of social relations is gradually developed in the child's mind, before he can really be an active member of human society. Emile sees that to get tools for his own use, other people must have theirs, and that he can get in exchange what he needs and they possess. I easily bring him to feel the need of such exchange and to take advantage of it.

因此在孩子能够真正成为人类社会的积极成员之前，社会关系的

概念渐渐地在他的头脑中发展起来。爱弥儿知道为了获得自己使用的工具，其他人必须有他们的工具，这样他才能通过交换获得自己需要但却属于别人的东西。我很容易就带领他感受到了这样的交换，并且受益于此。

“Sir, I must live,” said a miserable writer of lampoons to the minister who reproved him for his infamous trade. “I do not see the necessity,” replied the great man coldly. This answer, excellent from the minister, would have been barbarous and untrue in any other mouth. Every man must live; this argument, which appeals to every one with more or less force in proportion to his humanity, strikes me as unanswerable when applied to oneself. Since our dislike of death is the strongest of those aversions nature has implanted in us, it follows that everything is permissible to the man who has no other means of living. The principles, which teach the good man to count his life a little thing and to sacrifice it at duty's call, are far removed from this primitive simplicity. Happy are those nations where one can be good without effort, and just without conscious virtue. If in this world there is any condition so miserable that one cannot live without wrong-doing, where the citizen is driven into evil, you should hang, not the criminal, but those who drove him into crime.

“先生，我必须生活啊，”面对官员指责他的职业伤风败俗时，一位悲惨的讽刺作家这样回答道。“我看不出这其中的必要性，”这位官员冷冷地回答道。这个回答，在这位官员口中说出是精妙绝伦的，但是从任何其他人嘴里说出来就会是野蛮和不真实的。每个人都必须生活。这样的观点对每个人而言，都会根据他的人性，或多或少地产生吸引力。而在我看来，当这句话用在某个人自己身上的时候，是无可辩驳的。因为在自然植入我们心中的厌恶中，对死亡的厌恶是最强烈

的，所以由此带来的是，对于没有其他方式生活下去的人来说，做什么事都是被允许的。那些可以教好人轻视生命、为了责任而牺牲的原则，与这种本能的质朴是大相径庭的。在有些国家，人不用努力就可以过得很好，不需要美德也可以端正行事，那么这些国家的人是幸福的。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境遇悲惨到让人不做坏事就活不下去，驱使人走向邪恶，你不应该绞死那个罪犯，而是那些逼他走向犯罪的人。

As soon as Emile knows what life is, my first care will be to teach him to preserve his life. Hitherto I have made no distinction of condition, rank, station, or fortune; nor shall I distinguish between them in the future, since man is the same in every station; the rich man's stomach is no bigger than the poor man's, nor is his digestion any better; the master's arm is neither longer nor stronger than the slave's; a great man is no taller than one of the people, and indeed the natural needs are the same to all, and the means of satisfying them should be equally within the reach of all. Fit a man's education to his real self, not to what is no part of him. Do you not see that in striving to fit him merely for one station, you are unfitting him for anything else, so that some caprice of Fortune may make your work really harmful to him? What could be more absurd than a nobleman in rags, who carries with him into his poverty the prejudices of his birth? What is more despicable than a rich man fallen into poverty, who recalls the scorn with which he himself regarded the poor, and feels that he has sunk to the lowest depth of degradation? The one may become a professional thief, the other a cringing servant, with this fine saying, “I must live.”

一旦爱弥儿知道什么是生命，我首先关心的就是教他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区分过环境、等级、身份、财富，以

后我也不会这么做。因为什么身份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富人的胃不会比穷人的大，他的消化能力也不会更好。主人的手臂既不会比奴隶的更长，也不会更强。伟人不会比其他人更高。确实，自然需求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样的，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也应该是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的。对一个人的教育应该适应他的真我，而不是去适应他这个人之外的东西。如果你仅仅力求让他适应一种身份，那是在让他对除此之外的任何身份都无法适应，因此人性的命运也许会让你的劳动反而对学生是有害的，难道你没看到这一点吗？高尚的人衣衫褴褛，在穷困潦倒中还端着出身高贵的偏见，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富人变成穷光蛋，回忆起昔日他看待穷人的轻蔑，于是感到自己已经陷入了最深层的潦倒，还有比这更可鄙的吗？前一种人可能会成为专业小偷，后一种人会成为卑躬屈膝的仆人，他们只会说这句好听的话，“我必须生活啊。”

You reckon on the present order of society, without considering that this order is itself subject to inscrutable changes, and that you can neither foresee nor provide against the revolution which may affect your children. The great become small, the rich poor, the king a commoner. Does fate strike so seldom that you can count on immunity from her blows? The crisis is approaching, and we are on the edge of a revolution. [4_7] Who can answer for your fate? What man has made, man may destroy. Nature's characters alone are ineffaceable, and nature makes neither the prince, the rich man, nor the nobleman. This satrap whom you have educated for greatness, what will become of him in his degradation? This farmer of the taxes who can only live on gold, what will he do in poverty? This haughty fool who cannot use his own hands, who prides himself on what is not really his, what will he do when he is stripped of all? In that day, happy will he be who can give up the rank which is no longer his, and be still a man in Fate's despite. Let men praise as they will that conquered monarch who like a madman would be

buried beneath the fragments of his throne; I behold him with scorn; to me he is merely a crown, and when that is gone he is nothing. But he who loses his crown and lives without it, is more than a king; from the rank of a king, which may be held by a coward, a villain, or madman, he rises to the rank of a man, a position few can fill. Thus he triumphs over Fortune, he dares to look her in the face; he depends on himself alone, and when he has nothing left to show but himself he is not a nonentity, he is somebody. Better a thousandfold the king of Corinth a schoolmaster at Syracuse, than a wretched Tarquin, unable to be anything but a king, or the heir of the ruler of three kingdoms, the sport of all who would scorn his poverty, wandering from court to court in search of help, and finding nothing but insults, for want of knowing any trade but one which he can no longer practise.

你依赖于当今的社会秩序，却不考虑这种秩序本身受制于不可预测的变化，不考虑你既不能预见也不能阻止那也许会影响你的孩子的变化。伟人会变成一个小人物，富人会变成穷人，而国王也会变成一个平民。难道这种命运稀少到你觉得自己可以指望免受她的打击吗？危机正在靠近，而我们正处于革命的边缘 [5_7] 。谁能知道你的命运呢？人能够毁灭自己已经创造的东西。唯独自然的特性是不能被抹杀的，自然并不能创造国王、富人或是贵族。你教育出的这个追求荣华的官员，在他落魄的时候，他又会变成什么样呢？靠着黄金生活的税官，在他贫穷的时候又该何去何从呢？这个自大的愚人根本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过活，为着那些并不真正属于他的东西洋洋得意，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又该怎么办呢？到那天，只有能够放弃并不属于自己的地位的人，不顾命运的折磨依旧努力生活的人，才能得到快乐。被埋葬在破碎的王座之下的落魄君主就像一个疯子，人们爱怎么称赞他就随他们去。我是怀着轻蔑看他的，对于我来说他仅仅是一顶王冠，当王冠消失，他就一无是处。但是如果他失去了王冠，却还是能够生存下来的话，他就比国王要伟大得多。任何一个懦夫、恶棍、疯子，

都有可能成为国王，而他已经从国王的地位上升到了人的地位，几乎没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位置。因此，他战胜了命运，他敢于直面命运，他自力更生，当他除了自己，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东西，他就不再一无是处，而是有些用处了。科林斯国王在锡拉丘兹担任教师，这比可怜的塔尔坎好上一千倍，后者除了国王或者三个王国的继承人之外，什么也做不来。所有人都鄙视他的贫穷，鄙视他从一个宫廷游荡到另一个宫廷寻求帮助，但除了羞辱之外一无所获，因为他什么也不会做。

The man and the citizen, whoever he may be, has no property to invest in society but himself, all his other goods belong to society in spite of himself, and when a man is rich, either he does not enjoy his wealth, or the public enjoys it too; in the first case he robs others as well as himself; in the second he gives them nothing. Thus his debt to society is still unpaid, while he only pays with his property. “But my father was serving society while he was acquiring his wealth.” Just so; he paid his own debt, not yours. You owe more to others than if you had been born with nothing, since you were born under favourable conditions. It is not fair that what one man has done for society should pay another's debt, for since every man owes all that he is, he can only pay his own debt, and no father can transmit to his son any right to be of no use to mankind. “But,” you say, “this is just what he does when he leaves me his wealth, the reward of his labour.” The man who eats in idleness what he has not himself earned, is a thief, and in my eyes, the man who lives on an income paid him by the state for doing nothing, differs little from a highwayman who lives on those who travel his way. Outside the pale of society, the solitary, owing nothing to any man, may live as he pleases, but in society either he lives at the cost of others, or he owes them in labour the cost of his keep; there is no exception to this rule. Man in society is bound to work; rich or poor, weak or

strong, every idler is a thief.

人和公民，无论他是谁，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可以投入于社会的财产。他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属于社会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当他富有的时候，要么他不享受自己的财富，要么是公众在享用他的财富。在第一种情况下，它剥夺了自己和他人的东西，在第二种情况中，他也并没有奉献出什么。因此，哪怕他用自己的财产来支付，他对社会欠下的债依旧没有付清。“但是我的父亲以前也在服务社会的同时，获得了财富啊。”正是如此，他付清了自己的债，不是你的。如果你生来一无所有，那么你亏欠他人的会更多，因为你是在良好的条件下降生的。用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来偿还另一个人的债务是不公平的，因为每个人欠的都是他自己的债，他只能偿还自己的，没有父亲能传递给儿子权利来让他成为对人类毫无用处的人。“但是，”你说，“这就是他把遗产留给我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啊，这些是他劳动的报酬。”一个拿着不是自己挣到的东西坐吃山空的懒人，就等于小偷。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做也能获得生活收入，和一个拦路打劫的强盗，没有任何分别。生活在社会栅栏之外的隐士，不亏欠任何人，可以怎么高兴就怎么生活。但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要么依靠他人生活，要么用劳动偿还他欠下的费用，没有例外。生存在社会中的人注定要劳动。无论贫富，强弱，每个懒人都是小偷。

Now of all the pursuits by which a man may earn his living, the nearest to a state of nature is manual labour; of all stations that of the artisan is least dependent on Fortune. The artisan depends on his labour alone, he is a free man while the ploughman is a slave; for the latter depends on his field where the crops may be destroyed by others. An enemy, a prince, a powerful neighbour, or a law-suit may deprive him of his field; through this field he may be harassed in all sorts of ways. But if the artisan is ill-treated his goods are soon packed and he takes himself off. Yet agriculture is the earliest,

the most honest of trades, and more useful than all the rest, and therefore more honourable for those who practise it. I do not say to Emile, “Study agriculture,” he is already familiar with it. He is acquainted with every kind of rural labour, it was his first occupation, and he returns to it continually. So I say to him, “Cultivate your father's lands, but if you lose this inheritance, or if you have none to lose, what will you do? Learn a trade.”

在一切人类用来谋生的工作中，最接近自然状态的职业是手工劳动。在一切身份当中，对财富依赖程度最小的是艺术家。工匠只依靠自己的劳动，他是一个自由人，而农夫则是奴隶，因为他依赖田地，而里面的庄稼可能会被别人摧毁。一个敌人，一个王子，一个强大的邻居，或者一场官司，都有可能让他失去自己的土地，通过田地，人们可以用各种方法去骚扰他。但是如果工匠没有受到好的对待，那他就会打包行李离开。但是农业是所有行业中历史最悠久、最可靠、最有用的行业。因此农夫是更加受到尊重的。我没有对爱弥儿说，“学习种地去吧。”他已经对此非常熟悉。他已经学会了每一种乡间劳动，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他也会继续干下去。因此我对他说，“去耕种你父亲的土地吧，但是如果你丢了这份遗产，或者说你根本得不到，你会怎么做？去学一门手艺。”

“A trade for my son! My son a working man! What are you thinking of, sir?” Madam, my thoughts are wiser than yours; you want to make him fit for nothing but a lord, a marquis, or a prince; and some day he may be less than nothing. I want to give him a rank which he cannot lose, a rank which will always do him honour; I want to raise him to the status of a man, and, whatever you may say, he will have fewer equals in that rank than in your own.

“让我的儿子去学手艺！让我的儿子去做工匠！您在想些什么，先生？”“夫人，我的想法比你明智，你只希望他成为贵族、侯爵、贵族，那么有一天他可能一无所成。我想给他一个不可能丢失的身份，一个永远都会让他感到光荣的身份。我想把他培养成一个真正的人，不管你说什么，与你能给予他一切地位的机会相比，他得到这种地位的机会要少得多。”

The letter killeth, the spirit giveth life. Learning a trade matters less than overcoming the prejudices he despises. You will never be reduced to earning your livelihood; so much the worse for you. No matter; work for honour, not for need: stoop to the position of a working man, to rise above your own. To conquer Fortune and everything else, begin by independence. To rule through public opinion, begin by ruling over it.

这些话虽然字面上不近人情，可是却能让人精神振奋。比起学习一门手艺，克服轻视那门手艺的偏见要重要得多。你永远不会因为没有工作而无法生存，尽管这对于你来说很糟糕。但没有关系，工作是为了荣耀，而不是为了需求，为了提升自我，就必须忍受工人的身份。为了战胜命运和别的挫折，第一件事，就是自我独立。想用公众舆论来统治他人，就必须，先统治公众舆论。

Remember I demand no talent, only a trade, a genuine trade, a mere mechanical art, in which the hands work harder than the head, a trade which does not lead to fortune but makes you independent of her. In households far removed from all danger of want I have known fathers carry prudence to such a point as to provide their children not only with ordinary teaching but with knowledge by means of which they could get a living if anything

happened. These far-sighted parents thought they were doing a great thing. It is nothing, for the resources they fancy they have secured depend on that very fortune of which they would make their children independent; so that unless they found themselves in circumstances fitted for the display of their talents, they would die of hunger as if they had none.

记住，我要求的不是天赋而是手艺，一门真正的手艺，一门纯粹的机械技术，一门动手超过动脑的手艺，一门虽不能让你拥有财富却可以让你独立于金钱的手艺。就我所知，在一些不缺衣少食的家庭里，父亲不仅仅对于孩子平时的教育深谋远虑，甚至还会教孩子万一发生什么事，他们可以用来谋生的知识。这些有远见的父母认为他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但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做。因为他们所设想的保护孩子的办法，依旧依赖于命运，尽管他们努力想要孩子不受制于命运的支配。因此除非孩子身处适宜展现其天赋的情况，否则他们还是会饿死，就好像那些什么也不会干的人一样。

As soon as it is a question of influence and intrigue you may as well use these means to keep yourself in plenty, as to acquire, in the depths of poverty, the means of returning to your former position. If you cultivate the arts which depend on the artist's reputation, if you fit yourself for posts which are only obtained by favour, how will that help you when, rightly disgusted with the world, you scorn the steps by which you must climb. You have studied politics and state-craft, so far so good; but how will you use this knowledge, if you cannot gain the ear of the ministers, the favourites, or the officials? if you have not the secret of winning their favour, if they fail to find you a rogue to their taste? You are an architect or a painter; well and good; but your talents must be displayed. Do you suppose you can exhibit in the salon without further ado? That is not the way to

set about it. Lay aside the rule and the pencil, take a cab and drive from door to door; there is the road to fame. Now you must know that the doors of the great are guarded by porters and flunkeys, who only understand one language, and their ears are in their palms. If you wish to teach what you have learned, geography, mathematics, languages, music, drawing, even to find pupils, you must have friends who will sing your praises. Learning, remember, gains more credit than skill, and with no trade but your own none will believe in your skill. See how little you can depend on these fine “Resources,” and how many other resources are required before you can use what you have got. And what will become of you in your degradation? Misfortune will make you worse rather than better. More than ever the sport of public opinion, how will you rise above the prejudices on which your fate depends? How will you despise the vices and the baseness from which you get your living? You were dependent on wealth, now you are dependent on the wealthy; you are still a slave and a poor man into the bargain. Poverty without freedom, can a man sink lower than this!

一旦问题设计到手腕和计谋，你可能会用相同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财富，正如处于极端贫困时获得让自己回到之前的身份的方法一样。如果你去学习那些依赖于手工艺者名声的手艺，如果你把自己置于那些靠人家的偏爱才能获得的位置，那么当你由于正义而厌恶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你对那些为了往上爬而必须采取的方法表示轻蔑的时候，这门手艺又能怎么帮助你呢？你已经学过了政治和治国本领，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但是如果你无法接近那些长官、宠臣、官员，你又怎么去运用这些知识呢？如果你不知道获得他们偏爱的秘诀，如果他们并不觉你是对其口味的下属，你又该怎么办呢？你可以是一个建筑师或者一个画家，这很好，但你必须展示你的才能。难道你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作品陈列到沙龙里吗？这是不可能的。把尺子和铅笔放在一边，搭车一家家地拜访，这才是成名的道路。现在，你必须

知道那些达官贵人的门是由门童和仆役看守着的，那些人只理解一种语言，他们的耳朵是长在手上的。如果你想要把你学到的东西交给别人，例如地理、数学、语言、音乐、绘画，你就要找一些学生，也必须找到一些对你颇有赞誉的朋友。记住，学习获得更多名声比获得技能更加重要，要是没有好的名声，那么没人会相信你的本事。看吧，你是无法依赖这些所谓的好手艺的。在你能够用上你学到的东西之前，你得需要多少其他的资源啊。在落魄的时候，你又会变成什么样呢？灾难不仅不能让你有所进步，反而会让你雪上加霜。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为大众的笑柄，你将如何战胜由命运决定的偏见呢？你怎么去轻视那些你赖以谋生的邪恶、卑鄙行径？过去你依赖于财富，现在你依靠富人；你仍旧是个奴隶，此外还是个穷人。没有自由的贫穷，还有人能比这更堕落吗！

But if instead of this recondite learning adapted to feed the mind, not the body, you have recourse, at need, to your hands and your handiwork, there is no call for deceit, your trade is ready when required. Honour and honesty will not stand in the way of your living. You need no longer cringe and lie to the great, nor creep and crawl before rogues, a despicable flatterer of both, a borrower or a thief, for there is little to choose between them when you are penniless. Other people's opinions are no concern of yours, you need not pay court to any one, there is no fool to flatter, no flunkey to bribe, no woman to win over. Let rogues conduct the affairs of state; in your lowly rank you can still be an honest man and yet get a living. You walk into the first workshop of your trade. “Master, I want work.” “Comrade, take your place and work.” Before dinner-time you have earned your dinner. If you are sober and industrious, before the week is out you will have earned your keep for another week; you will have lived in freedom, health, truth, industry, and righteousness. Time is not wasted when it brings these returns.

但是这种深奥的知识是用来培养你的心灵而不是身体的，因此必要时，你应该求助于你的双手和你的手工艺品，谎言是没有必要的，需要的时候，手艺总会准备好的。荣誉和诚实绝不会妨碍你谋生。你不再需要阿谀奉承，或者对着那些达官贵人撒谎，更不需要害怕那些流氓，不需要做那些卑劣的谄媚者，剽窃者或是小偷，因为当你身无分文的时候，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别人的看法对你而言无关紧要，你不需要向任何人献殷勤。没有傻瓜可以奉承，没有仆役可以贿赂，没有女人可以争取。把国家大事留给流氓去处理吧。你就呆在自己的低等身份上做一个诚实的人，自己谋生。你就走进了你第一次学习手艺的那家工厂。“师傅，我想要一份工作。”“朋友，你就在这里工作吧。”在午餐时间之前，你就挣到了你的午饭。如果你清醒而勤劳，那么在这一周结束之前，你就赚够了下周的钱，你会过着自由、健康、真实、勤劳而又公正的生活。当你回到这种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并没有被浪费。

Emile shall learn a trade. “An honest trade, at least,” you say. What do you mean by honest? Is not every useful trade honest? I would not make an embroiderer, a gilder, a polisher of him, like Locke's young gentleman. Neither would I make him a musician, an actor, or an author. [4_8]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se and others like them, let him choose his own trade, I do not mean to interfere with his choice. I would rather have him a shoemaker than a poet, I would rather he paved streets than painted flowers on china. “But,” you will say, “policemen, spies, and hangmen are useful people.” There would be no use for them if it were not for the government. But let that pass. I was wrong. It is not enough to choose an honest trade, it must be a trade which does not develop detestable qualities in the mind, qualities incompatible with humanity. To return to our original expression, “Let us choose an honest trade,” but let us remember there can be no honesty without usefulness.

爱弥儿应该学一门手艺。你说：“至少应该是一门可靠的手艺。”你所指的“可靠”是什么意思呢？那些有用的手艺不都是可靠的手艺吗？我不会让他去做一个刺绣工、一个镀金工人，或是一个磨光工人，或者像洛克所说的年轻绅士一样。我也不想让他去做一个音乐家、演员或是作家 [5_8] 。除了这些以及类似的工作，我想让他自主选择他想学习的手艺，我绝不会要干涉他的决定。我宁可他做一个鞋匠，而不是一个诗人，我宁可他铺设路面，也不要他在瓷器上画花。“但是，”你可能会说，“警察、间谍、刽子手都是有用的人。”但是要是没有政府的话，这些人是一无是处的。暂且不谈这个。我说错了。仅仅选一个可靠的手艺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选一个不会在心里培养出可憎品质，与人性不相符合品质的手艺。现在回到我们的第一句话，“让我们选一门可靠的手艺”，但是我们首先要记得一门手艺没有实用性，就没有可靠性。

A famous writer of this century, whose books are full of great schemes and narrow views, was under a vow, like the other priests of his communion, not to take a wife. Finding himself more scrupulous than others with regard to his neighbour's wife, he decided, so they say, to employ pretty servants, and so did his best to repair the wrong done to the race by his rash promise. He thought it the duty of a citizen to breed children for the state, and he made his children artisans. As soon as they were old enough they were taught whatever trade they chose; only idle or useless trades were excluded, such as that of the wigmaker who is never necessary, and may any day cease to be required, so long as nature does not get tired of providing us with hair.

有一位本世纪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充斥了浩瀚的计划和狭隘的观点，他跟教会的其他牧师一样，他发誓不娶妻。他却发现，跟其他

人相比，自己更容易被别人怀疑与邻居的妻子有染，于是他决定雇佣一些美丽的仆人，这样就可以尽力弥补他轻率的誓言所带来的错误。他认为公民有责任为了国家而生育孩子，并且应该让孩子成为手工业者。一旦他们长大，他们就可以去学习他们所选择的手艺，除了那些浮夸或者没用的手艺，例如那些从来不被需要的假发制造工人，只要自然一直让我们生长出头发，这种职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不再需要。

This spirit shall guide our choice of trade for Emile, or rather, not our choice but his; for the maxims he has imbibed make him despise useless things, and he will never be content to waste his time on vain labours; his trade must be of use to Robinson on his island.

要用这种精神指导我们为爱弥儿选择手艺，或者说，是他自己来选。因为他已经接受的原则让他轻视无用的事物。他永远不会乐意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劳动上。他的手艺必须在鲁滨逊的荒岛上是有用的。

When we review with the child the productions of art and nature, when we stimulate his curiosity and follow its lead, we have great opportunities of studying his tastes and inclinations, and perceiving the first spark of genius, if he has any decided talent in any direction. You must, however, be on your guard against the common error which mistakes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 for the ardour of genius, or imagines there is a decided bent towards any one of the arts, when there is nothing more than that spirit of emulation, common to men and monkeys, which impels them instinctively to do what they see others doing, without knowing why. The world is full of artisans, and still fuller of artists, who

have no native gift for their calling, into which they were driven in early childhood, either through the conventional ideas of other people, or because those about them were deceived by an appearance of zeal, which would have led them to take to any other art they saw practised. One hears a drum and fancies he is a general; another sees a building and wants to be an architect. Every one is drawn towards the trade he sees before him if he thinks it is held in honour.

当我们向孩子展示艺术和自然的成果时，当我们刺激他的好奇心并跟随其指引时，我们有大好的机会去研究他的品味和爱好，如果他显露出任何方面的天赋，我们可以感觉到天才的第一簇花火。但是，你必须防止犯下许多人都会犯的错误，即把环境的影响错认为天才的热情，或者凭空想象出对任何一种艺术的爱好，而实际上除了在人类和猴子中都很常见的模仿心之外什么都没有。这种模仿心迫使他们本能地做那些他们看到别人在做的事，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世界充满艺术家和工匠，他们根本没有自己声称的在童年就驱使他们的天赋才能。他们之所以从事艺术工作，要么是因为其他人通俗的观念，要么是因为被热情所蒙骗，如果当时他们看到别人从事的是另一种艺术，那么这种热情也会让他们去干那件事的。一个人听到了击鼓声，他就会幻想自己是将军，另一个人看见一座高楼，就会想成为一个建筑师。每一个人，如果他认为自己面前看到的职业具备荣耀，就会被其吸引。

I once knew a footman who watched his master drawing and painting and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become a designer and artist. He seized a pencil which he only abandoned for a paint-brush, to which he stuck for the rest of his days. Without teaching or rules of art he began to draw everything he saw. Three whole years were devoted to these daubs, from which nothing but his duties could stir

him, nor was he discouraged by the small progress resulting from his very mediocre talents. I have seen him spend the whole of a broiling summer in a little ante-room towards the south, a room where one was suffocated merely passing through it; there he was, seated or rather nailed all day to his chair, before a globe, drawing it again and again and yet again, with invincible obstinacy till he had reproduced the rounded surface to his own satisfaction. At last with his master's help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an artist he got so far as to abandon his livery and live by his brush. Perseverance does instead of talent up to a certain point; he got so far, but no further. This honest lad's perseverance and ambition are praiseworthy; he will always be respected for his industry and steadfastness of purpose, but his paintings will always be third-rate. Who would not have been deceived by his zeal and taken it for real talent! There i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between a liking and an aptitude. To make sure of real genius or real taste in a child calls for more accurate observations than is generally suspected, for the child displays his wishes not his capacity, and we judge by the former instead of considering the latter. I wish some trustworthy person would give us a treatise on the art of child-study. This art is well worth studying, but neither parents nor teachers have mastered its elements.

我曾经认识一个侍从，他每天看着他的主人画画，他就想要成为一个设计师、一个艺术家。只有在拿起画笔的时候，他才会放下铅笔，也许他的余生，都不会放下铅笔了。不知道绘画技巧和规则，他就开始画自己看到的所有事物。他花了三年在这些涂鸦上面，除了他的工作没有什么会耽误他画画，也从来不会因为自己天资平庸而进步缓慢而气馁。我曾经见过，整个酷热的夏天，他都呆在朝南的那间小接待室里，我们仅仅从那里经过就已经感到窒息了，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像钉子定在椅子上一样，面对着一个地球仪，靠着不可战胜的

顽固，一遍又一遍地画着，直到画出让自己满意的球体。最后，在他主人的帮助和画家的指导下，他终于辞掉了他侍从的工作，开始以画画为生。用坚持不懈弥补天资不足只能到达某一高度，他已经达到了，但无法更进一步。这个诚实小伙子的坚持和抱负都是值得称赞的，他会因为自己的勤奋和对目标的坚定不移而受到尊重，但他的画画水平依旧是三流的。谁会被他的热情蒙蔽，而把这个当作真正的天赋呢！这世上，爱好和天赋，是截然不同的。要确认孩子真正的天赋或者爱好需要更精确的观察，而不是一般的推测，因为孩子们总是表现出他们的愿望，而不是他们的能力，而我们常常以前者为判断而不考虑后者。我希望一些可靠的人能够在儿童研究的方法上写一些论著。这个方法是值得研究的，而父母和老师对于这个方法的基本要素还不是很精通呢。

Perhaps we are laying too much stress on the choice of a trade; as it is a manual occupation, Emile's choice is no great matter, and his apprenticeship is more than half accomplished already, through the exercises which have hitherto occupied him. What would you have him do? He is ready for anything. He can handle the spade and hoe, he can use the lathe, hammer, plane, or file; he is already familiar with these tools which are common to many trades. He only needs to acquire sufficient skill in the use of any one of them to rival the speed, the familiarity, and the diligence of good workmen, and he will have a great advantage over them in suppleness of body and limb, so that he can easily take any position and can continue any kind of movements without effort. Moreover his senses are acute and well-practised, he knows the principles of the various trades; to work like a master of his craft he only needs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comes with practice. To which of these trades which are open to us will he give sufficient time to make himself master of it? That is the whole question.

可能我们太过重视手艺的选择了。鉴于这是一门手工劳动，爱弥儿的选择并没有那么重要，通过迄今为止的这些训练，他的学徒期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了。你想让他做什么呢？他已经做好了做任何事情的准备。他会使用铁锹和锄头，他也会使用车床、铁锤、刨子和锉刀，他对于许多行业通用的工具了若指掌。他需要的只是如何将其中的一种工具用得更加熟练，争取更快的速度，更高的熟练度，并且与这一行勤奋的优秀工人竞争。比起别人，他有一个显著的优势，他的四肢和身体更加灵活，因此他能轻松地呆在任何位置上，不费力地继续任何一样工作。况且，他的感官是灵敏并且经过良好训练的，他知道不同职业的准则，要像个专家一样工作，他只需要经验，而经验来自实践。在这些我们可以选择的职业当中，他能否给予足够的时间来精通其中一项工作呢？这就是全部的问题。

Give a man a trade befitting his sex, to a young man a trade befitting his age. Sedentary indoor employments, which make the body tender and effeminate, are neither pleasing nor suitable. No lad ever wanted to be a tailor. It takes some art to attract a man to this woman's work. [4_9] The same hand cannot hold the needle and the sword. If I were king I would only allow needlework and dressmaking to be done by women and cripples who are obliged to work at such trades. If eunuchs were required I think the Easterns were very foolish to make them on purpose. Why not take those provided by nature, that crowd of base persons without natural feeling? There would be enough and to spare. The weak, feeble, timid man is condemned by nature to a sedentary life, he is fit to live among women or in their fashion. Let him adopt one of their trades if he likes; and if there must be eunuchs let them take those men who dishonour their sex by adopting trades unworthy of it. Their choice proclaims a blunder on the part of nature; correct it one way or other, you will do no harm.

给人一份适合他性别的工作，给年轻人一份适合他年龄的工作。在室内久坐的工作，会让四肢软弱无力，这样的职业，不仅不适合他，也不合他的意。没有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想做一个裁缝。要想吸引一个男人去过一个女人的工作，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5_9] 。同一只手不可能既抓着针，又握着剑。如果我是国王，我只会让女人和瘸子去做刺绣制衣这样的工作，他们本来就应该从事这样的手艺。东方人竟然特意制造出宦官，我认为这太愚蠢了。为什么不让那些天生卑鄙、丧失人性的人做宦官呢？他们的人数足够了，甚至是绰绰有余的。那些柔弱、无力、腼腆的男人是受自然的惩罚而过久坐不动的生活的，他适合在女人中间生活，或者说用女人的方式生活。让他去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职业。如果一定要有宦官的话，就叫那些因为选择了不相称的职业而使自己的男性性别蒙羞的人去好了。他们的选择表明了自然也会犯错。你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去纠正这个错误，是不会产生害处的。

An unhealthy trade I forbid to my pupil, but not a difficult or dangerous one. He will exercise himself in strength and courage; such trades are for men not women, who claim no share in them. Are not men ashamed to poach upon the women's trades?

我不会让我的学生从事不健康的手艺，但是我不会制止他选择困难的或者危险的工作。他能够锻炼自己的力量和勇气，这样的工作是为男人而不是女人准备的，女人也不会想去分一杯羹。那么如果男人入侵女人的工作，他们怎么会不感到羞耻呢？

“Luctantur paucae, comedunt coliphia paucae. Vos lanam trahitis, calathisque peracta refertis Vellera.” —Juven. Sat. II. V. 55.

“女人是很少去打仗的，女人不吃战士的粮食。可是你却去织绒线”——尤维纳《讽刺诗》第二卷，第五篇，第55首。

Women are not seen in shops in Italy, and to persons accustomed to the streets of England and France nothing could look gloomier. When I saw drapers selling ladies ribbons, pompons, net, and chenille, I thought these delicate ornaments very absurd in the coarse hands fit to blow the bellows and strike the anvil. I said to myself, “In this country women should set up as steel-polishers and armourers.” Let each make and sell the weapons of his or her own sex; knowledge is acquired through use.

在意大利，商店中看不见女人们，对于那些习惯了英国和法国街道的人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凄惨了。当我看到布商们贩卖女士丝带、流苏、网罩、雪尼尔线的时候，我认为他们用粗糙的、用来吹波纹管和打砧的手来摆弄这些精致的饰物是很荒唐的。我对自己说，“在这个国家，女人们应该从事钢铁打磨师和军备制造师这样的职业。”让每个人制造和销售他或她那个性别的人使用的武器；知识是通过使用而获取的。

I know I have said too much for my agreeable contemporaries, but I sometimes let myself be carried away by my argument. If any one is ashamed to be seen wearing a leathern apron or handling a plane, I think him a mere slave of public opinion, ready to blush for what is right when people poke fun at it. But let us yield to parents' prejudices so long as they do not hurt the children. To honour trades we are not obliged to practise every one of them, so long as we do not think them beneath us. When the choice is ours and we are under no compulsion, why not choose the pleasanter, more

attractive and more suitable trade. Metal work is useful, more useful, perhaps, than the rest, but unless for some special reason Emile shall not be a blacksmith, a locksmith nor an iron-worker. I do not want to see him a Cyclops at the forge. Neither would I have him a mason, still less a shoemaker. All trades must be carried on, but when the choice is ours, cleanlines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is is not a matter of class prejudice, our senses are our guides. In conclusion, I do not like those stupid trades in which the workmen mechanically perform the same action without pause and almost without mental effort. Weaving, stocking-knitting, stone-cutting; why employ intelligent men on such work? it is merely one machine employed on another.

我知道，对于与我意见一致的同代人而言，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但是我偶尔会迷失在自己的观点里。如果有人羞于被见到穿着一条皮围裙或者正在驾驶一架飞机，我认为他只是舆论的奴隶。当人们嘲笑他所做的事时，他会因为做了正确的事儿脸红。但是让我们屈服于父母们的偏见吧，只要他们不伤害孩子。即使为了尊重所有的行业，只要我们不认为其他的职业在我们所从事的之下，就不需要对每一种职业进行实践。当我们有选择且不受强迫时，为什么不选择那个更令人愉快，更吸引人，更适合的自己的行业呢。金属工艺是有用的，可能比其他行业更有用，但是除非一些特殊的理由，爱弥儿不应该做一个铁匠，一个锁匠或者一个钢铁工人。我不想看到他是一个熔炉中的独眼巨人。我也不想他成为一个石匠，或者一个鞋匠。所有行业都必须有人来干，但是当我们有选择时，洁净应该被考虑在内。这与等级偏见无关，只是听从感官的指导。总之，我不喜欢愚蠢的行业，那些工人们机械地进行着相同的动作，没有停顿，几乎不费精神上的力气。织造、针织、石材切割，为什么雇佣聪明的人从事这样的工作呢？这仅仅是一台机器雇佣另一台机器罢了。

All things considered, the trade I should choose for my pupil, among the trades he likes, is that of a carpenter. It is clean and useful; it may be carried on at home; it gives enough exercise; it calls for skill and industry, and while fashioning articles for everyday use, there is scope for elegance and taste. If your pupil's talents happened to take a scientific turn, I should not blame you if you gave him a trade in accordance with his tastes, for instance, he might learn to make mathematical instruments, glasses, telescopes, etc.

考虑过所有方面之后，在我的学生喜爱的职业中，我应该为他选择的是木匠。这个工作干净又有用；它可以在家里干；它给人足够的锻炼；它需要技巧和勤劳，同时又制造每天都要使用的时髦物品，所以还涵盖了优雅和品味。如果你的学生的天赋恰好发生科学化的转变，如果你已经根据他的品味给了他一种职业，我不应该责备你。举个例子，他也许会学着制作数学仪器，眼镜，望远镜等等。

When Emile learns his trade I shall learn it too. I am convinced he will never learn anything thoroughly unless we learn it together. So we shall both serve our apprenticeship, and we do not mean to be treated as gentlemen, but as real apprentices who are not there for fun; why should not we actually be apprenticed? Peter the Great was a ship's carpenter and drummer to his own troops; was not that prince at least your equal in birth and merit? You understand this is addressed not to Emile but to you—to you, whoever you may be.

当爱弥儿学习他的手艺时，我也应该学习。我确信他将永远不会完整地学习任何东西，除非我们一起学。所以我们俩都在学徒期之中，我们不打算被当作绅士而是被当作真正的学徒对待，我们不是为

了好玩才去学的。所以我们为何不应该成为真正的学徒呢？彼得大帝曾是船上的木匠和他自己军队的鼓手，从出身和功绩上说，难道你和王子不是平等的吗？你知道这不是写给爱弥儿的，而是给你的——给你的，无论你是谁。

Unluckily we cannot spend the whole of our time at the workshop. We are not only 'prentice-carpenters but 'prentice-men—a trade whose apprenticeship is longer and more exacting than the rest. What shall we do? Shall we take a master to teach us the use of the plane and engage him by the hour like the dancing-master? In that case we should be not apprentices but students, and our ambition is not merely to learn carpentry but to be carpenters. Once or twice a week I think we should spend the whole day at our master's; we should get up when he does, we should be at our work before him, we should take our meals with him, work under his orders, and after having had the honour of supping at his table we may if we please return to sleep upon our own hard beds. This is the way to learn several trades at once, to learn to do manual work without neglecting our apprenticeship to life.

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将我们所有的时间花在车间中。我们不仅仅要“学习做木匠”，还得“学习做人”——后者的学徒期比其他任何职业都要更长、更费力。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让一个大师教我们飞机的使用方式，像舞蹈教师那样按小时来聘用他？那样的话我们不应该是学徒而是学生了，我们的追求也不仅仅是学习木工手艺而是成为一个木匠。我认为我们应该一周去师傅家里学一到两个整天；我们跟他同时起床，在他面前工作，跟他一起吃饭，在他的指导下工作。当拥有在他的桌上吃饭的荣耀之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回到自己的硬床上去睡觉。这是一次性学习几种手艺的方法，让我们学习从事手工劳动，但不会忽略学习其他东西。

Let us do what is right without ostentation; let us not fall into vanity through our efforts to resist it. To pride ourselves on our victory over prejudice is to succumb to prejudice. It is said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an old custom of the Ottomans, the sultan is obliged to work with his hands, and, as every one knows, the handiwork of a king is a masterpiece. So he royally distributes his masterpieces among the great lords of the Porte and the price paid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ank of the workman. It is not this so-called abuse to which I object; on the contrary, it is an advantage, and by compelling the lords to share with him the spoils of the people it is so much the less necessary for the prince to plunder the people himself. Despotism needs some such relaxation, and without it that hateful rule could not last.

让我们不带炫耀地去做正确的事情，让我们不要在抵抗虚荣的过程中却落入其中。因为战胜了偏见而自我骄傲，就等于向偏见屈服。据说根据奥托曼人的古老习俗，苏丹有义务用他的双手劳作，正如每个人知道的那样，一个国王的手工艺品是一件杰作。所以他荣耀地将他的杰作分发给土耳其宫廷的伟大领主，根据工匠的级别定价。这不是我反对的所谓滥用；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优势，通过强迫领主们与他分享从人民那里掠夺来的东西，他就不再那么需要亲自剥削人民。专制需要这样的宽松之处，否则，令人厌恶的统治是无法维持的。

The real evil in such a custom is the idea it gives that poor man of his own worth. Like King Midas he sees all things turn to gold at his touch, but he does not see the ass' ears growing. Let us keep Emile's hands from money lest he should become an ass, let him take the work but not the wages. Never let his work be judged by any standard but that of the work of a master. Let it be judged as

work, not because it is his. If anything is well done, I say, “That is a good piece of work,” but do not ask who did it. If he is pleased and proud and says, “I did it,” answer indifferently, “No matter who did it, it is well done.”

这种传统的真正邪恶之处在于它给那个可怜人的对其自身的价值的那种认识。就像米达斯国王，他看到所有东西在他的触摸之下变成了黄金，但是他并没有看见驴的耳朵越来越长。让我们将爱弥儿的手与钱保持距离，以免他变成一头驴，让他承担工作但是不拿工资。除了这一行大师的杰作，不要用其他的标准来评价他的工作。让它被当作成果来评价，而不是因为那是他做出来的。如果他做什么事做得很出色，我会说，“那是一件很好的作品，”但是不要问是谁做的。如果他很开心也很骄傲地说，“我做的，”你应该无动于衷地回答，“不管谁做的，做得很好。”

Good mother, be on your guard against the deceptions prepared for you. If your son knows many things, distrust his knowledge; if he is unlucky enough to be rich and educated in Paris he is ruined. As long as there are clever artists he will have every talent, but apart from his masters he will have none. In Paris a rich man knows everything, it is the poor who are ignorant. Our capital is full of amateurs, especially women, who do their work as M. Gillaume invents his colours. Among the men I know three striking exceptions, among the women I know no exceptions, and I doubt if there are any. In a general way a man becomes an artist and a judge of art as he becomes a Doctor of Laws and a magistrate.

优秀的母亲们，一定要注意那些为你们而准备的谎言。如果你的儿子懂的很多，不要相信他的知识。如果他不幸地是个富人，还在巴

黎接受了教育，那么他就被毁了。只要存在聪明的艺术家，他就拥有所有的天赋，但是一旦离开了老师，他就一无是处。在巴黎，无所不知的是那些富人，愚昧无知的是那些穷人。我们的首都到处充斥着艺术的业余爱好者，特别是女人居多，他们创作艺术，就像吉约姆调色一样容易。在男人之中，我知道有三个人是例外，而在女人之中，是没有例外的。我怀疑女人之中是否有这样的人。一般地，一个男人能成为一个艺术家，自然能成为艺术评论家，就跟他成为一个法学博士也就能成为一个法官一样。

If then it is once admitted that it is a fine thing to have a trade, your children would soon have one without learning it. They would become postmasters like the councillors of Zurich. Let us have no such ceremonies for Emile; let it be the real thing not the sham. Do not say what he knows, let him learn in silence. Let him make his masterpiece, but not be hailed as master; let him be a workman not in name but in deed.

接着，如果学门手艺一旦被承认是件好事，很快你的孩子即使从没学过也会拥有一门手艺。他们就会像苏黎世的议员一样，成为大师。我们不要对爱弥儿说这样的恭维话，要让他真正地学到东西，而不是流于表面。不要讲那些他已经掌握的知识，让他自己静静地去学习就好了。让他自己去完成自己的杰作，但绝不要像大师一样向他致敬，就让他做一个实在的工人，而不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人。

If I have made my meaning clear you ought to realise how bodily exercise and manual work unconsciously arouse thought and reflexion in my pupil, and counteract the idleness which might result from his indifference to men's judgments, and his freedom from passion. He must work like a peasant and think like a

philosopher, if he is not to be as idle as a savage. The great secret of education is to use exercise of mind and body as relaxation one to the other.

要是你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你就应该理解身体锻炼和手工劳动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激发我的学生去思考和反省，抵消他的懒散，这种懒散也许来自于他对人类的判断力漠不关心，或是激情导致的过度自由。他必须像个农夫一样劳动，像个哲学家一样思考，这样才不会像野蛮人一样懒散。教育的秘诀就是让脑力锻炼和体力锻炼互为放松手段。

But beware of anticipating teaching which demands more maturity of mind. Emile will not long be a workman before he discovers those social inequalities he had not previously observed. He will want to question me in turn on the maxims I have given him, maxims he is able to understand. When he derives everything from me, when he is so nearly in the position of the poor, he will want to know why I am so far removed from it. All of a sudden he may put scathing questions to me. “You are rich, you tell me, and I see you are. A rich man owes his work to the community like the rest because he is a man. What are you doing for the community?” What would a fine tutor say to that? I do not know. He would perhaps be foolish enough to talk to the child of the care he bestows upon him. The workshop will get me out of the difficulty. “My dear Emile that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I will undertake to answer for myself, when you can answer for yourself to your own satisfaction. Meanwhile I will take care to give what I can spare to you and to the poor, and to make a table or a bench every week, so as not to be quite useless.”

但是要注意不要提前教给孩子那些需要更完美的心智才能理解的知识。在爱弥儿工作之后，他很快就会发现他之前没有注意到过社会的不平等。他会用我交教给他的准则，反过来质疑我。那些准则是他能够理解的。当他的所有知识都是我教给他的，当他如此接近穷人的位置，他一定想知道为什么我完全不像穷人。他也许会突然抛给我一些尖锐的问题。“你很富有，你告诉过我，我也能看得出来。富人应该像其他人那样为社会工作，因为他也是人。那么你为这个社会做过什么贡献呢？”一个优秀的老师会如何回应呢？我不知道。他可能愚蠢到告诉孩子自己给予他的关怀。工场可以让我摆脱这个困境。“我亲爱的爱弥儿，这个问题好极了，要是你能自己找到一个满意的答复，那我保证也会为我自己找到答案。同时，我必定会为你、为穷苦百姓贡献自己多余的力量，并且每周都会制作一张桌子，或者一把长椅，好让自己不要那么没用。”

We have come back to ourselves. Having entered into possession of himself, our child is now ready to cease to be a child. He is more than ever conscious of the necessity which makes him dependent on things. After exercising his body and his senses you have exercised his mind and his judgment. Finally we have joined together the use of his limbs and his faculties. We have made him a worker and a thinker; we have now to make him loving and tender-hearted, to perfect reason through feeling. But before we enter on this new order of things, let us cast an eye over the stage we are leaving behind us, and perceive as clearly as we can how far we have got.

我们又回到自己身上了。在我们的孩子有了自我意识以后，他就已经准备好脱离孩子的状态了。他更加意识到依赖事物的必要性了。在锻炼了他的身体和感官以后，你也已经锻炼了他的思考能力和判断力了。最后，我们已经把他的四肢和官能的用处加在一起了。我们已

经让他成为了一个工人、一个思考者。现在，我们必须让他变得体贴、善良，通过感觉来完善他的理性。但是在我们进入事物的新秩序之前，让我们关注一下已经完成的阶段，尽我们所能地观察一下我们已经走了多远。

At first our pupil had merely sensations, now he has ideas; he could only feel, now he reasons. For from the comparison of many successive or simultaneous sensations and the judgment arrived at with regard to them, there springs a sort of mixed or complex sensation which I call an idea.

刚开始，我们的学生只有感觉，现在他有了观念。之前，他只能感觉，现在他学会了理性思考。因为通过比较许多接踵而至、同时产生的感觉和与其相关的判断，他产生了一种混合的或是复杂的感觉，也就是我所说的观念。

The way in which ideas are formed gives a character to the human mind. The mind which derives its ideas from real relations is thorough; the mind which relies on apparent relations is superficial. He who sees relations as they are has an exact mind; he who fails to estimate them aright has an inaccurate mind; he who concocts imaginary relations, which have no real existence, is a madman; he who does not perceive any relation at all is an imbecile. Clever men are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s by their greater or less aptitude for the comparison of ideas and the discovery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m.

观念形成的方式赋予人的心灵以特点。能够在真实的联系之中产

生观念的心灵是深刻的，依赖于浅显联系的心灵是肤浅的。能够看到联系的真实面目的人拥有精准的心灵，而无法正确判断联系的人的心灵则是不准确的。能够捏造现实中不存在的联系的人是疯子，而根本观察不到任何联系的人则是傻子。聪明的人之所以能从其他人中脱颖而出，就在于他们在对比各种观念和发现观念之间的联系方面有更好的天赋。

Simple ideas consist merely of sensations compared one with another. Simple sensations involve judgments, as do the complex sensations which I call simple ideas. In the sensation the judgment is purely passive; it affirms that I feel what I feel. In the percept or idea the judgment is active; it connects, compares, it discriminates between relations not perceived by the senses. That is the whole difference; but it is a great difference. Nature never deceives us; we deceive ourselves.

简单的观念只包括相互比较而产生的感觉。简单的感觉，以及复杂的感觉——也就是我说的简单的想法，包括了判断。在感觉之中，判断纯粹是被动的，它只能断定我感受到了我能够感知的东西。而在知觉或观念之中，判断是主动的，它能够关联、比较甚至区别感官没有觉察到的关系。这就是全部的差别，但这个差别是巨大的。自然是永远不会欺骗我们的，欺骗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I see some one giving an ice-cream to an eight-year-old child; he does not know what it is and puts the spoon in his mouth. Struck by the cold he cries out, “Oh, it burns!” He feels a very keen sensation, and the heat of the fire is the keenest sensation he knows, so he thinks that is what he feels. Yet he is mistaken; cold hurts, but it does not burn; and these two sensations are different, for persons

with more experience do not confuse them. So it is not the sensation that is wrong, but the judgment formed with regard to it.

我曾看过有个人给八岁的孩子吃冰淇淋，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就直接把勺子放进嘴里。他一下子被冰到了，大声喊道，“啊，这太烫了！”他经历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而就他所知，火的灼热是最强烈的感觉，因此他觉得这就是他感受到的东西。但是，他却错了。寒冷也会伤人，但那并不是烫伤。并且这两种感觉是截然不同的，那些经验丰富的人就不会弄混这两种感受。因此错的不是感觉，而是我们对其形成的判断。

It is just the same with those who see a mirror or some optical instrument for the first time, or enter a deep cellar in the depths of winter or at midsummer, or dip a very hot or cold hand into tepid water, or roll a little ball between two crossed fingers. If they are content to say what they really feel, their judgment, being purely passive, cannot go wrong; but when they judge according to appearances, their judgment is active; it compares and establishes by induction relations which are not really perceived. Then these inductions may or may not be mistaken. Experience is required to correct or prevent error.

这就好比某个人第一次看到镜子或是其他的光学仪器，或是在寒冬或酷暑走进一个很深的地窖，或是把滚烫或是冰冷的手伸进温水中，或是用两只交叉的手指转动小球，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他们仅仅满足于说出自己真实的感觉，他们的判断就纯粹是被动的，就不可能出错。但是如果他们根据事物的表象来判断，那他们的判断就是主动的。这种判断会通过归纳并没有真正感觉到联系进行比较和建立。那么这些归纳有可能是对的，有可能是错的。要纠正或避免错

误，就需要经验。

Show your pupil the clouds at night passing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moon; he will think the moon is mov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and that the clouds are stationary. He will think this through a hasty induction, because he generally sees small objects moving and larger ones at rest, and the clouds seems larger than the moon, whose distance is beyond his reckoning. When he watches the shore from a moving boat he falls into the opposite mistake and thinks the earth is moving because he does not feel the motion of the boat and considers it along with the sea or river as one motionless whole, of which the shore, which appears to move, forms no part.

在夜晚的时候，让你的学生去观察在他和月亮之间飘过的云朵，他可能会觉得月亮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而云朵则是静止的。他是通过轻率的归纳推理来思考的，因为他一般只会看到小的物体不断移动，而大的物体则静止不动，而云朵看起来比月亮大得多，因为月亮的距离超出了他的估计能力。当他从一只移动的船上看海岸的时候，他还是会犯相同的错误。他认为地球在移动，是因为他感受不到船只的移动，并且将其和海洋、河流一起看作静止的整体，而把海岸看成移动的一部分。

The first time a child sees a stick half immersed in water he thinks he sees a broken stick; the sensation is true and would not cease to be true even if he knew the reason of this appearance. So if you ask him what he sees, he replies, “A broken stick,” for he is quite sure he is experiencing this sensation. But when deceived by his judgment he goes further and, after saying he sees a broken

stick, he affirms that it really is broken he says what is not true. Why? Because he becomes active and judges no longer by observation but by induction, he affirms what he does not perceive, i. e., that the judgment he receives through one of his senses would be confirmed by another.

当孩子第一次看到一根木棍的一半浸在水中时，他会认为他看到了一根断掉的木棍。这种感觉是真实的，即使他知道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这种感觉依旧真实。因此如果你问他看见了什么，他会说："一根断掉的木棍。"因为他很确信他正在体会这样的感觉。但是，当他被自己的感觉欺骗，说自己看到的是一根断掉的木棍并进行进一步的观察之后，要是他还确信这是一根断掉的木棍的话，他就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变得主动，再也不会用观察来进行判断，而是运用归纳推理，他会确认他没有感知到的事情，例如，他通过一种感官获得的判断会得到另一种感官的印证。

Since all our errors arise in our judgment, it is clear, that had we no need for judgment, we should not need to learn; we should never be liable to mistakes, we should be happier in our ignorance than we can be in our knowledge. Who can deny that a vast number of things are known to the learned, which the unlearned will never know? Are the learned any nearer truth? Not so, the further they go the further they get from truth, for their pride in their judgment increases faster than their progress in knowledge, so that for every truth they acquire they draw a hundred mistaken conclusions. Every one knows that the learned societies of Europe are mere schools of falsehood, and there are assuredly more mistaken notions in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than in a whole tribe of American Indians.

由于我们的错误源于判断，那么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根本不需要判断，那么我们也不应该去学习它，我们就不会被错误欺骗，与处于知识之中相比，处于无知之中的我们会更快乐。学者们知道的大量知识是那些没学习过的人永远也不会知道的，谁能否认这一点？那是不是学者会更加接近真理呢？并不是这样，他们学得越多，他们离真理反而越远，因为他们对自己判断力的自负增长得比知识快得多，因此他们每掌握一种真理，他们都会得出一百个错误的结论。每个人都知道欧洲的学习社团只不过是虚伪不实的学校，并且毋庸置疑，科学院里闹出的错误肯定比在整个印第安部落里犯的错误还要多。

The more we know, the more mistakes we make; therefore ignorance is the only way to escape error. Form no judgments and you will never be mistaken. This is the teaching both of nature and reason. We come into direct contact with very few things, and these are very readily perceived; the rest we regard with profound indifference. A savage will not turn his head to watch the working of the finest machinery or all the wonders of electricity. “What does that matter to me?” is the common saying of the ignorant; it is the fittest phrase for the wise.

我们知道得越多，犯的错误就越多，因此无知是避免错误的唯一办法。只要不做判断，你就不会犯错。这是自然和理性共同教给我们的。与我们有直接联系的事物少之又少，那些东西是能够轻易感知到的。而对于剩下的东西，我们就不太在乎了。野蛮人是不会为了看精致机械的运作或是电流的奇幻现象而转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无知者常常会说的话。也是最适合智者的一句话。

Unluckily this phrase will no longer serve our turn. Everything matters to us, as we are dependent on everything, and our curiosity

naturally increases with our needs. This is why I attribute much curiosity to the man of science and none to the savage. The latter needs no help from anybody; the former requires every one, and admirers most of all.

遗憾的是，这句话并不适合我们。所有的事物都与我们有关，因为我们依赖于所有的事物，我们的好奇心会随着需求自然而然地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科学家如此感兴趣，而对野蛮人不屑一顾的原因。后者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而前者却需要所有人的帮助，特别是那些仰慕者。

You will tell me I am going beyond nature. I think not. She chooses her instruments and orders them, not according to fancy, but necessity. Now a man's needs vary with his circumstances. There i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between a natural man living in a state of nature, and a natural man living in society. Emile is no savage to be banished to the desert, he is a savage who has to live in the town. He must know how to get his living in a town, how to use its inhabitants, and how to live among them, if not of them.

你会告诉我，我超出了自然的范围。我不这么认为。大自然是按照需求而不是按照幻想来选择工具并指挥它们的。由于一个人的需求是随着环境的不同而不同的。这就是一个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人和生活在社会中的自然人之间的所有差异。爱弥儿并不是一个被放逐到沙漠的野蛮人，他是一个不得不生活在城镇中的野蛮人。他必须知道如何在城镇里谋生，如何利用它的居民，如何在他们之中以不是他们当中一员的身份生存。

In the midst of so many new relations and dependent on them, he must reason whether he wants to or no. Let us therefore teach him to reason correctly.

他处于这么多新的关系之中并且要依赖于它们，那么无论他愿意不愿意，他都必须理性思考。因此，让我们来教他如何正确地理性思考。

The best way of learning to reason aright is that which tends to simplify our experiences, or to enable us to dispense with them altogether without falling into error. Hence it follows that we must learn to confirm the experiences of each sense by itself, without recourse to any other, though we have been in the habit of verifying the experience of one sense by that of another. Then each of our sensations will become an idea, and this idea will always correspond to the truth. This is the sort of knowledge I have tried to accumulate during this third phase of man's life.

学习说理的最好办法，是那种能简化我们的经验，或者让我们能够将其全部摒弃却不会陷入错误之中的办法。由此可见，尽管我们已经习惯通过一种感官来检验另一种感官的经验，但我们必须学会只使用那种感官来确认其经验，而不求助于其他的感官。这样，我们的每一种感觉都会成为一种观点，而这种观点总是和真理相符的。这就是我在人的第三阶段努力去积累的一种知识。

This method of procedure demands a patience and circumspection which few teachers possess; without them the scholar will never learn to reason. For example, if you hasten to

take the stick out of the water when the child is deceived by its appearance, you may perhaps undeceive him, but what have you taught him? Nothing more than he would soon have learnt for himself. That is not the right thing to do. You have not got to teach him truths so much as to show him how to set about discovering them for himself. To teach him better you must not be in such a hurry to correct his mistakes. Let us take Emile and myself as an illustration.

这一方法的过程需要耐心和细心，而这恰恰是大多数老师缺少的。没有这两点，学生将永远不会学会理性思考。例如，如果当孩子被木棍在水中的表象所欺骗，而你又急着把木棍从水里拿出来，你可能会让孩子明白真相，但是你又教会了他什么呢？与他自己能很快学会的东西相比，一点也没有多。这并不是正确的做法。你不需要直接告诉他真理，你只要告诉他如何自己去发现真理就好了。为了更好地教导他，你不能急着去纠正他的错误。让我用我和爱弥儿作为范例。

To begin with, any child educated in the usual way could not fail to answer the second of my imaginary questions in the affirmative. He will say, “That is certainly a broken stick.” I very much doubt whether Emile will give the same reply. He sees no reason for knowing everything or pretending to know it; he is never in a hurry to draw conclusions. He only reasons from evidence and on this occasion he has not got the evidence. He knows how appearances deceive us, if only through perspective.

一开始，任何用惯常的方法教育出来的孩子会肯定地回答出我想象的第二个问题。他会说：“这当然是一根断了的木棍。”我非常怀疑爱弥儿是否会给出相同的回答。他没有无所不知或者不懂装懂的理

由。他永远不急着下结论。他只会从证据以及得到这种证据的情况中去理性思考。他知道如果仅仅通过观察，表象是如何欺骗我们的。

Moreover, he knows by experience that there is always a reason for my slightest questions, though he may not see it at once; so he has not got into the habit of giving silly answers; on the contrary, he is on his guard, he considers things carefully and attentively before answering. He never gives me an answer unless he is satisfied with it himself, and he is hard to please. Lastly we neither of us take any pride in merely knowing a thing, but only in avoiding mistakes. We should be more ashamed to deceive ourselves with bad reasoning, than to find no explanation at all. There is no phrase so appropriate to us, or so often on our lips, as, “I do not know;” neither of us are ashamed to use it. But whether he gives the silly answer or whether he avoids it by our convenient phrase “I do not know,” my answer is the same. “Let us examine it.”

另外，他还从经验中得知，哪怕我提的问题再小，也是有原因的，尽管他可能不能一下子看出来。因此他并没有习惯于给出一些愚蠢的答案。相反地，他很警惕，他总是在回答之前，仔细谨慎地考虑问题。除非他自己对这个答案已经很满意了，否则他是不会回答我的。而他是一个很难感到满意的人。最后，我们俩都不会仅仅因为知道某件事而洋洋自得，我们只会因为避免了犯错而感到自豪。比起没有找到任何答案，用错误的理由欺骗自己更应该让我们感到羞愧。“我不知道”这句话是最适合我们的，或者说是我们说得最多的，我们俩都不会因为用这句话而感到羞愧。但是，不管他是不是给了愚蠢的答案，或者通过“我不知道”这句口头禅避免了这么做，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让我们验证一下。”

This stick immersed half way in the water is fixed in an upright position. To know if it is broken, how many things must be done before we take it out of the water or even touch it.

这根一半浸在水中的木棍被固定在一个垂直的位置上。要知道它是不是断了的，在我们把它从水中拿出来或者触碰它之前，我们要做多少事情呢。

1 . First we walk round it, and we see that the broken part follows us. So it is only our eye that changes it; looks do not make things move.

1、首先我们围绕着它进行观察，我们发现断掉的部分是随着我们移动的。因此只有我们的眼睛才觉得它有所变化，视觉是不能移动东西的。

2 . We look straight down on that end of the stick which is above the water, the stick is no longer bent [4_10] , the end near our eye exactly hides the other end. Has our eye set the stick straight?

2、我们从木棍露出水面的一端垂直向下看，木棍就不弯曲了。而靠近我们眼睛的那段刚好遮住了另一端 [5_10] 。难道是我们的眼睛摆正了木棍吗？

3 . We stir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we see the stick break into several pieces, it moves in zigzags and follows the ripples of the

water. Can the motion we gave the water suffice to break, soften, or melt the stick like this?

3、我们搅弄水面，我们可以发现木棍断成了好几个部分，它顺着水纹，曲曲折折地移动着。难道我们搅弄水面的动作会让木棍像这样断裂、软化甚至融化吗？

4 . We draw the water off, and little by little we see the stick straightening itself as the water sinks. Is not this more than enough to clear up the business and to discover refraction? So it is not true that our eyes deceive us, for nothing more has been required to correct the mistakes attributed to it.

4、我们将水排出，随着水位下降，我们看到木棍自己一点点变直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解释这一切并揭示折射的奥秘吗？所以，说眼睛欺骗了我们是不对的，因为除了视觉之外，我们不需要其他东西来纠正这个错误。

Suppose the child were stupid enough not to perceive the result of these experiments, then you must call touch to the help of sight. Instead of taking the stick out of the water, leave it where it is and let the child pass his hand along it from end to end; he will feel no angle, therefore the stick is not broken.

假设孩子傻到没办法弄懂这些实验的结果，那么你就需要利用触觉去辅助视觉了。你不要把木棍从水中拿出来，就让它静静地置于水中，让孩子的手由上至下触碰木棒，他感受不到有角度的弯曲，由此

证明这根木棍就不是断的。

You will tell me this is not mere judgment but formal reasoning. Just so; but do not you see that as soon as the mind has got any ideas at all, every judgment is a process of reasoning? So that as soon as we compare one sensation with another, we are beginning to reason. The art of judging and the art of reasoning are one and the same.

你会说这不仅仅是判断，这其中还涉及到形式推理。的确如此。但是你难道没有发现一旦心里形成了什么观点，每一个判断都是推理的过程吗？因此，一旦我们将两种感觉进行比较，我们就开始推理了。判断的艺术和推理的艺术其实是一样的。

Emile will never learn dioptrics unless he learns with this stick. He will not have dissected insects nor counted the spots on the sun; he will not know what you mean by a microscope or a telescope. Your learned pupils will laugh at his ignorance and rightly, I intend him to invent these instruments before he uses them, and you will expect that to take some time.

除非爱弥儿用这根木棍来学习，他是永远学不会屈光学的。他不会解剖昆虫或是计算太阳黑子的数量，也不会知道你说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是什么意思。你那些博学的学生会嘲笑爱弥儿的无知。无疑，我打算让他在使用工具之前自己去发明它们，虽然你可能觉得这得花费一些时间。

This is the spirit of my whole method at this stage. If the child rolls a little ball between two crossed fingers and thinks he feels two balls, I shall not let him look until he is convinced there is only one.

这就是我针对这一阶段的全部方法的精髓。如果孩子在交叉的手指之间转动一个小球但认为自己感受到了两个球，那么在他确信只有一个球之前我是不会让他用眼睛看一看的。

This explanation will suffice, I hope, to show plainly the progress made by my pupil hitherto and the route followed by him. But perhaps the number of things I have brought to his notice alarms you. I shall crush his mind beneath this weight of knowledge. Not so, I am rather teaching him to be ignorant of things than to know them. I am showing him the path of science, easy indeed, but long, far-reaching and slow to follow. I am taking him a few steps along this path, but I do not allow him to go far.

我希望，这个解释足以直白地展示我的学生迄今已经取得那些进步和他经历过的道路。但是也许我教给他的事物的数量，会让你感到震惊。在这些知识的重压下，我会摧毁他的心灵。并非如此，我宁愿教他如何对事物保持无知，而不是了解它们。我会把通往科学殿堂的小路展现给他看，这条路虽然简单，但却很长很远，走起来很慢。我会带着他沿着这条小路走几步，但我不会让他走太远。

Compelled to learn for himself, he uses his own reason not that of others, for there must be no submission to authority if you would have no submission to convention. Most of our errors are due to

others more than ourselves. This continual exercise should develop a vigour of mind like that acquired by the body through labour and weariness. Another advantage is that his progress is in proportion to his strength, neither mind nor body carries more than it can bear. When the understanding lays hold of things before they are stored in the memory, what is drawn from that store is his own; while we are in danger of never finding anything of our own in a memory over-burdened with undigested knowledge.

如果他不得不自学，他就会使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其他人的，因为如果你不屈服于惯例，就不必向权威屈服。我们大多数的错误都是由别人而并非自己造成的。持续的锻炼可以培养充满活力的心灵，正如身体可以从劳动和疲累中获得活力一样。另一个益处就是，他的进步和他的力量是成比例的，身体和心灵都不会承担无法负荷的重量。在把知识存储在记忆中之前，他都会先去理解，这样以后从回忆中取出的知识的才是他自己的。而我们的记忆被未经消化的知识弄得负担超重，所以我们正处于永远无法从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的危险之中。

Emile knows little, but what he knows is really his own; he has no half-knowledge. Among the few things he knows and knows thoroughly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that there are many things he does not know now but may know some day, many more that other men know but he will never know, and an infinite number which nobody will ever know. He is large-minded, not through knowledge, but through the power of acquiring it; he is open-minded, intelligent, ready for anything, and, as Montaigne says, capable of learning if not learned. I am content if he knows the “Wherefore” of his actions and the “Why” of his beliefs. For once more my object is not to supply him with exact knowledge, but the means of getting it

when required, to teach him to value it at its true worth, and to love truth above all things. By this method progress is slow but sure, and we never need to retrace our steps.

爱弥儿知道得很少，但他所了解的东西都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他并没有什么学了半吊子的知识。在爱弥儿透彻了解的这少数事物之中，最有价值的就是：他知道有许多事情他现在不知道，但以后有一天或许会知道的；有更多的事情是其他人知道而他永远不会知道的；还有无穷无尽的事情是所有人都不会知道的。他是心胸开阔的，并不是由于知识，而是由于获取知识的能力。他是思想开明的，聪慧过人的，总是精力充沛，时刻准备着学习任何事情，就像蒙田说的，他完全有能力去学习任何没有学过的知识。要是他能知道他行动的意义和他信仰的缘由，那我就已经很满意了。再强调一次，我的目的并不是让他学富五车，而是掌握在需要的时候获取知识的方法，是教他衡量事物的真正价值，是让他爱真理胜过其他一切事物。通过这个方法，进步来得很慢，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永远不需要回头重来。

Emile's knowledge is confined to nature and things. The very name of history is unknown to him, along with metaphysics and morals. He knows the essential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things, but nothing of the moral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man. He has little power of generalisation, he has no skill in abstraction. He perceives that certain qualities are common to certain things, without reasoning about these qualities themselves. He is acquainted with the abstract idea of space by the help of his geometrical figures; he is acquainted with the abstract idea of quantity by the help of his algebraical symbols. These figures and signs are the supports on which these ideas may be said to rest, the supports on which his senses repose. He does not attempt to know the nature of things, but only to know things in so far as they affect

himself. He only judges what is outside himself in relation to himself, and his judgment is exact and certain. Caprice and prejudice have no part in it. He values most the things which are of use to himself, and as he never departs from this standard of values, he owes nothing to prejudice.

爱弥儿的知识仅限于自然和事物的范畴之中。他是不知道历史这个词语的，还有形而上学和道德，也是不清楚的。他知道人和事物的本质联系，但并不了解任何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联系。他不擅长归纳综合，对那些抽象的知识，他一概不会。他观察到一些特定的品质对于特定的事物是通用的，但不会去思考这些品质本身。他利用几何图形来了解空间的抽象概念，利用代数符号来了解数量的抽象概念。这些图形和符合是将其运用到其他事物的基础，也是他的感官得以倚靠的基础。他不会尝试去了解事物的本质，只想知道这些事物是如何影响他自己的。他只判断事物与自己有关的外在事物，而他的判断总是精准正确的。其中没有一点幻想和偏见。他最珍视那些对他有实用的东西，因为他从不脱离这一判断价值的标准，他自然也不会有偏见。

Emile is industrious, temperate, patient, stedfast, and full of courage. His imagination is still asleep, so he has no exaggerated ideas of danger; the few ills he feels he knows how to endure in patience, because he has not learnt to rebel against fate. As to death, he knows not what it means; but accustomed as he is to submit without resistance to the law of necessity, he will die, if die he must, without a groan and without a struggle; that is as much as we can demand of nature, in that hour which we all abhor. To live in freedom, and to be independent of human affairs, is the best way to learn how to die.

爱弥儿勤勉温和、耐心踏实、满怀勇气。他的想象力仍在沉睡，因此没有关于危险的夸张观念。对于他所知的几种疾病，他知道如何耐心地去忍受它们的侵袭，因为他还不懂得去反抗命运。至于死亡，他并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但是随着他已经习惯不加反抗地屈服于需求的法则，他是会死的。当他必须死的时候，他不会呻吟，不会挣扎。在所有人都憎恶的时刻，这就是我们能向自然要求的极限了。自由的活着，独立于人间杂事，这才是学会如何死去的最好方式。

In a word Emile is possessed of all that portion of virtue which concerns himself. To acquire the social virtues he only needs a knowledge of the relations which make those virtues necessary; he only lacks knowledge which he is quite ready to receive.

总而言之，爱弥儿拥有一切与他息息相关的美德。要获得社会美德，他只需要知道那让这些美德必不可少的关系。他在这方面缺乏的知识，很快就能获得。

He thinks not of others but of himself, and prefers that others should do the same. He makes no claim upon them, and acknowledges no debt to them. He is alone in the midst of human society, he depends on himself alone, for he is all that a boy can be at his age. He has no errors, or at least only such as are inevitable; he has no vices, or only those from which no man can escape. His body is healthy, his limbs are supple, his mind is accurate and unprejudiced, his heart is free and untroubled by passion. Pride, the earliest and the most natural of passions, has scarcely shown itself. Without disturbing the peace of others, he has passed his life contented, happy, and free, so far as nature allows. Do you think that the earlier years of a child, who has reached his fifteenth year

in this condition, have been wasted?

他考虑的并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并且他希望别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会对他们有所要求，也认为自己对他们没有亏欠。在人类社会中，他是独自一人生活的，他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他就是那个年纪的男孩所能达到的最完美的境界。他没犯过什么错，或者说，至少他犯的都是无法避免的错。他没有什么邪恶之处，或者只有那些所有人都无法避免的邪恶。他身体健康，四肢灵活，思维精准，没有偏见，他的心灵是自由的，没有被欲望打扰。骄傲，这种最早最原始的欲望，也很少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他不打扰别人的宁静，在自然允许的最大限度内，满足、幸福、自由地过着自己的生活。难道你认为，对于在这样的条件下成长到十五岁的孩子，他的童年是被浪费的吗？

[4_1].I could not help laughing when I read an elaborate criticism of this little tale by M. de Formy. "This conjuror," says he, "who is afraid of a child's competition and preaches to his tutor is the sort of person we meet with in the world in which Emile and such as he are living." This witty M. de Formy could not guess that this little scene was arranged beforehand, and that the juggler was taught his part in it; indeed I did not state this fact. But I have said again and again that I was not writing for people who expected to be told everything.

[4_2].Before giving any explanation to a child a little bit of apparatus serves to fix his attention.

[4_3].The wine sold by retail dealers in Paris is rarely free from lead, though some of it does not contain litharge, for the counters are covered with lead and when the wine is poured into the measures and some of it spilt upon the counter and the measures left standing on the counter, some of the lead is always dissolved. It is strange that so obvious and dangerous an abuse should be tolerated by the police. But indeed well-to-do people, who rarely drink these wines, are not likely to be poisoned by them.

[4_4].The vegetable acid is very gentle in its action. If it were a mineral acid and less diluted, the combination would not take place without effervescence.

[4_5].When our hearts are abandoned to the sway of passion, then it is that we need a measure of time. The wise man's watch is his equable temper and his peaceful heart. He is always punctual, and he always knows the time.

[4_6].This taste, which I assume my pupil to have acquired, is a natural result of his education. Moreover, he has nothing foppish or affected about him, so that the ladies take little notice of him and he is less petted than other children; therefore he does not care for them, and is less spoilt by their company; he is not yet of an age to feel its charm. I have taken care not to teach him to kiss their hands, to pay them compliments, or even to be more polite to them than to men. It is my constant rule to ask nothing from him but what he can understand, and there is no good reason why a child should treat one sex differently from the other.

[4_7].In my opinion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 great kingdoms of Europe should last much longer. Each of them has had its period of splendour, after which it must inevitably decline. I have my own opinions as to the special applications of this general statement, but this is not the place to enter into details, and they are only too evident to everybody.

[4_8].You are an author yourself, you will reply. Yes, for my sins; and my ill deeds, which I think I have fully expiated, are no reason why others should be like me. I do not write to excuse my faults, but to prevent my readers from copying them.

[4_9].There were no tailors among the ancients; men's clothes were made at home by the women.

[4_10].I have since found by more exact experiment that this is not the case. Refraction acts in a circle, and the stick appears larger at the end which is in the water, but this makes no difference to the strength of the argument, and the conclusion is correct.

[5_1].当我读到福尔梅先生对这个小故事复杂的评论以后，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魔术师，”他说，“居然畏惧与孩子竞争，还跟他的老师说教，这不正是在爱弥儿以及和他类似的人所生活的世界里我们会遇到的人物嘛。”这位诙谐的福尔梅先生猜不到这小小的一幕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个魔术师的角色是我们安排的，确实，我没有把这个事实讲出来。但是我再三强调了，我并不是为了那些期望知道一切的人来写这本书的。

[5_2].在向孩子解释说明之前，可以用一些小小的仪器让他集中注意力。

[5_3].巴黎零售商所卖的酒，即使有些并不含氧化铅，但也很少是不含铅的，因为柜台裹着铅皮，当酒倒入量器的时候，总有些会溅到柜台上，量杯也会被留在柜台上，所以总会有铅被溶解在酒里了。警察居然能够容忍如此显而易见而又危险的弊端，是很奇怪的。但确实，富人是很少喝这些酒的，因此不太可能因为这些酒而中毒。植物酸的作用是很温和的。如果这是一种矿物酸，并且纯度较高，那么在混合的时候是一定会起泡的。

[5_4].植物酸的作用是很温和的。如果这是一种矿物酸，并且纯度较高，那么在混合的时候是一定会起泡的。

[5_5].当我们的心灵受到欲望的控制，我们就需要计算时间。一个智者的手表就是他温和的脾气和平静的心灵。他总是很守时，并且永远有时间的概念。

[5_6].这种品位，假设我的学生已经具有了的话，那是教育的自然结果。况且，鉴于他身上没有沾染到任何矫揉造作的习气，那些女士自然也不会注意到他。比起别的孩子，他可能不那么受宠。因此他也不在乎这些宠爱，没有被她们的陪伴宠坏。他还没到感受其魅力的年纪。我也不会特意教他如何亲吻她们的手，去赞美恭维她们，甚至不会教他对待女士要比对男士更礼貌。我一贯的规则就是除了他能理解的事，什么也不问他。况且，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孩子对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对待方式。

[5_7].在我看来，欧洲那些强大的国家要维持更长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它们每一个都曾有过辉煌的时期，然而之后，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衰弱下去。对于这一普遍论述的特殊应用，我有我自己的观点。但是，在这里不适合细讲，它们对所有人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5_8].你本身不就是一个作家嘛，你会这么说。是的，由于我的罪孽，我是一个作家。至于我的过失，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力弥补了，它们不能成为让别人学习我的理由。我写作，并不是为我的错误申辩，而是防止我的读者重蹈覆辙。

[5_9].在古人之中，是没有裁缝的，男人的衣服都是女人在家做的。

[5_10].但是通过更精确的实验，我已经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折射现象在水中呈圆圈状运动，而木棍留在水里的那端看起来更大，但这并没有对这一观点的有力程度造成影响，结论依然是正确的。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EMILE II

爱弥儿（下）

Jean-Jacques Rousseau

让－雅克·卢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爱弥儿（下）

Emile

让-雅克·卢梭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BOOK IV 第四卷
- BOOK V 第五卷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BOOK IV

第四卷

How swiftly life passes here below! The first quarter of it is gone before we know how to use it; the last quarter finds us incapable of enjoying life. At first we do not know how to live; and when we know how to live it is too late. In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se two useless extremes we waste three-fourths of our time sleeping, working, sorrowing, enduring restraint and every kind of suffering. Life is short, not so much because of the short time it lasts, but because we are allowed scarcely any time to enjoy it. In vain is there a long interval between the hour of death and that of birth; life is still too short, if this interval is not well spent.

在尘世的生活过得多快啊！我们还不知道怎么过时，生命的头四分之一已经过去；而最后四分之一的生命，我们却无力享受。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如何生活；当我们学会生活时却为时已晚。而在这无用的生命两端之间，我们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睡觉、工作、悲伤、抑郁和各种苦痛之中消耗了。生命短暂，与其说是因为它持续时间之短，不如说是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工夫享受它的乐趣。死亡的时刻与出生的时刻之间固然相距极远，假如当中的时间没有好好地度过，生命仍然太短。

We are born, so to speak, twice over; born into existence, and born into life; born a human being, and born a man. Those who regard woman as an imperfect man are no doubt mistaken, but they have external resemblance on their side. Up to the age of puberty

children of both sexes have little to distinguish them to the eye, the same face and form, the same complexion and voice, everything is the same; girls are children and boys are children; one name is enough for creatures so closely resembling one another. Males whose development is arrested preserve this resemblance all their lives; they are always big children; and women who never lose this resemblance seem in many respects never to be more than children.

可以说，我们诞生过两次；一次是为了存在，另一次是为了生活；一次是为了做人，另一次是为了做一个男人。一些人将女人视为不完美的男人，他们无疑是错了，但就男女外表的相似而言，他们是对的。在到达青春期之前，男孩和女孩在外表上几乎没有区别，他们的眼睛、面孔和肤色都是一样的；女孩子是孩子，男孩子也是孩子；一个名字对于区分两个如此相似的生命体来说已经足够。外部发展停滞的男人将一生保持这种样子；他们一直是大孩子；而女人由于从不会失去这种样子，从许多方面看上去似乎从未有过变化。

But, speaking generally, man is not meant to remain a child. He leaves childhood behind him at the time ordained by nature; and this critical moment, short enough in itself, has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但是，总体而言，男人不会始终停留在孩子的状态。他在大自然所规定的时候就会脱去这种的状态；而这关键的时刻，尽管非常短暂，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As the roaring of the waves precedes the tempest, so the murmur of rising passions announces this tumultuous change; a

suppressed excitement warns us of the approaching danger. A change of temper, frequent outbreaks of anger, a perpetual stirring of the mind, make the child almost ungovernable. He becomes deaf to the voice he used to obey; he is a lion in a fever; he distrusts his keeper and refuses to be controlled.

就如在暴风雨之前海浪的咆哮，日益增长欲念之低语也宣告着这剧烈变化的到来；一种受到压制的骚动警示着我们危险即将到来。性格的变化，怒气的频发，心灵不断的扰动，都使得孩子几乎不受管教。他过去顺从的声音，现在他不听了；他成了发狂的狮子；他不相信他的饲养员，也不愿再受管束了。

With the moral symptoms of a changing temper there are perceptible changes in appearance. His countenance develops and takes the stamp of his character; the soft and sparse down upon his cheeks becomes darker and stiffer. His voice grows hoarse or rather he loses it altogether. He is neither a child nor a man and cannot speak like either of them. His eyes, those organs of the soul which till now were dumb, find speech and meaning; a kindling fire illumines them, there is still a sacred innocence in their ever brightening glance, but they have lost their first meaningless expression; he is already aware that they can say too much; he is beginning to learn to lower his eyes and blush, he is becoming sensitive, though he does not know what it is that he feels; he is uneasy without knowing why. All this may happen gradually and give you time enough; but if his keenness becomes impatience, his eagerness madness, if he is angry and sorry all in a moment, if he weeps without cause, if in the presence of objects which are beginning to be a source of danger his pulse quickens and his eyes sparkle, if he trembles when a woman's hand touches his, if he is

troubled or timid in her presence, O Ulysses, wise Ulysses! have a care! The passages you closed with so much pains are open; the winds are unloosed; keep your hand upon the helm or all is lost.

随着性情改变的精神征兆出现，他外表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变化。他的面容变化着，带有他性格的印记；他下腮上柔软稀疏的胡须也变得更黑更硬了。他的声音变得沙哑，或者说他的声音完全变了个样。他既不是一个孩子又不是一个男人，他发不出这两种人的声音了。他的双眼，灵魂的器官，之前是毫无表情的，如今能表达语言与感情了；燃烧的情感之火照亮了它们，它们闪亮的一瞥中仍存有一丝神圣的天真，但最初的空洞表情已荡然无存；他已经意识到他的眼睛可以传达一切了；他开始学着低垂他的眼睛，低头遮掩脸上的红晕了；他变得愈加敏感，尽管他不知道自己感受到的是什么；他感到不适，却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可能发生得足够缓慢，让你有足够观察的时间；但假如他的热情变成不耐烦，他的渴望变成疯狂，如果他一时间既生气又懊悔，如果他没有来由地哭泣，如果在他觉得有危险的事物面前，他的脉搏便加快、眼神便炯炯发光，如果在一个女人的手碰到他的手时，他会颤抖，如果他在她的面前感到烦扰或羞怯，噢，尤利西斯，聪明的尤利西斯！要小心！你千辛万苦系紧的皮囊又打开了；风儿猛烈地吹起来了；牢牢把舵吧，否则一切都完了。

This is the second birth I spoke of; then it is that man really enters upon life; henceforth no human passion is a stranger to him. Our efforts so far have been child's play, now they are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This period when education is usually finished is just the time to begin; but to explain this new plan properly, let us take up our story where we left it.

这就是我提到的第二次出生，就是在那时人才真正地开始生活；

在这之后一切人类激情对他而言都不再稀奇。我们之前的付出的都是孩子们的游戏，而我们现在对他们的付出万分重要。教育通常在此时完成，而这一时期恰是教育真正开始的好时候；但为了将这一新计划解释清楚，让我们继续之前讲到的故事。

Our passions are the chief means of self-preservation; to try to destroy them is therefore as absurd as it is useless; this would be to overcome nature, to reshape God's handiwork. If God bade man annihilate the passions he has given him, God would bid him be and not be; He would contradict himself. He has never given such a foolish commandment, there is nothing like it written on the heart of man, and what God will have a man do, He does not leave to the words of another man. He speaks Himself; His words are written in the secret heart.

我们的欲念是我们维持自我的主要方式；试图摧毁它们的行为既可笑又徒劳；这就如征服自然，重塑上帝之工一般。如果上帝要求人根除祂赐给人的欲念，祂则是既希望人活着，又不希望人活着了；祂就会违背祂自己了。祂从未下过如此糊涂的指令，人的心灵中还从未记载过这样的事情；上帝要求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是不会吩咐另一个人去告诉那个人的。祂要自己告诉那个人；祂的话要写在那个人的心里。

Now I consider those who would prevent the birth of the passions almost as foolish as those who would destroy them, and those who think this has been my object hitherto are greatly mistaken.

所以，我认为那些想抑制欲念产生的人，跟想要铲除欲念的人一样傻，那些人认为这就是我迄今为止的目标，实际上他们大大误解了我的意思。

But should we reason rightly, if from the fact that passions are natural to man, we inferred that all the passions we feel in ourselves and behold in others are natural? Their source, indeed, is natural; but they have been swollen by a thousand other streams; they are a great river which is constantly growing, one in which we can scarcely find a single drop of the original stream. Our natural passions are few in number; they are the means to freedom, they tend to self-preservation. All those which enslave and destroy us have another source; nature does not bestow them on us; we seize on them in her despite.

如果我们根据欲念是人类天生的事实进行推断，我们能否推导出，我们自己身上感到的和在他人身上看到的一切欲念都是自然的呢？确实，它们的来源是自然的；但是它们由于成百上千条其他溪流而肿胀了；它们是不断成长的大河，我们从中几乎找不到一滴来自其源流的水了。我们自然的欲念数量上是很少的；它们是通往自由的途径，它们有助于我们保持生存。所有那些奴役我们、摧毁我们的欲念都另有其来源；自然并没有将其赋予我们；我们仍紧紧抓住它们，尽管这违背自然。

The origin of our passions, the root and spring of all the rest, the only one which is born with man, which never leaves him as long as he lives, is self-love; this passion is primitive, instinctive, it precedes all the rest, which are in a sense only modifications of it. In this sense, if you like, they are all natural. But most of these

modifications are the result of external influences, without which they would never occur, and such modifications, far from being advantageous to us, are harmful. They change the original purpose and work against its end; then it is that man finds himself outside nature and at strife with himself.

我们欲望的源头，剩下一切欲念的根源，人们与生俱来且终生不离的唯一情感，就是自爱；这种情感是原始的、本能的，它先于其他任何情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他的情感仅仅是它的演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你认可的话，欲念都是自然的。但是这些演变都是外在影响的结果，没有这些外在的影响它们永不会发生；而这样的演变，不仅对我们无益，而且是有害的。它们改变最初的目的，违背自己的原理而活动；就是这样，人们发现自己脱离了自然、与自己斗争。

Self-love is always good, alway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er of nature. The preservation of our own life is specially entrusted to each one of us, and our first care is, and must be, to watch over our own life; and how can we continually watch over it, if we do not take the greatest interest in it?

自爱总是好的，总是符合自然规律。我们每个人都受到特别委托维持自己的生命，而我们首要关心的是，而且必须是照料自己的生活；而如果我们最感兴趣的不是自己的生活，又如何能一直照料它呢？

Self-preservation requires, therefore, that we shall love ourselves; we must love ourselves above everything, and it follows

directly from this that we love what contributes to our preservation. Every child becomes fond of its nurse; Romulus must have loved the she-wolf who suckled him. At first this attachment is quite unconscious; the individual is attracted to that which contributes to his welfare and repelled by that which is harmful; this is merely blind instinct. What transforms this instinct into feeling, the liking into love, the aversion into hatred, is the evident intention of helping or hurting us. We do not become passionately attached to objects without feeling, which only follow the direction given them; but those from which we expect benefit or injury from their internal disposition, from their will, those we see acting freely for or against us, inspire us with like feelings to those they exhibit towards us. Something does us good, we seek after it; but we love the person who does us good; something harms us and we shrink from it, but we hate the person who tries to hurt us.

因此，为了自我维持，我们必须要爱自己；我们一定要爱自己过于爱其他任何事物，而紧接着这一情感，我们会爱有利于维持我们生存的事物。每个孩子都喜爱自己的奶妈；罗穆卢斯（注：战争之神玛尔斯之子）一定爱过给他喂过奶的母狼。一开始这种恋慕是无意识的；每个人都喜欢对自己有益处的，讨厌对自己有损害的；这是一种盲目的本能。将这种本能转化为感情，喜欢转化为爱，厌恶转化为恨，是明显企图帮助抑或伤害我们。我们不会疯狂地迷恋无感情的事物，它们只会听从收到的指示；但那些能让我们从他们的内在感情和意志中期待受益或受到伤害的人中，那些我们见到的自由地支持或反对我们的人，激励我们发出与他们对我们的感情一般相似的感情。对我们有好处的事物，我们追随它；由此我们爱对我们好的人；对我们有害的事物，我们远离它；由此我们讨厌试图伤害我们的人。

The child's first sentiment is self-love, his second, which is

derived from it, is love of those about him; for in his present state of weakness he is only aware of people through the help and attention received from them. At first his affection for his nurse and his governess is mere habit. He seeks them because he needs them and because he is happy when they are there; it is rather perception than kindly feeling.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discover not merely that they are useful to him, but that they desire to be useful to him, and then it is that he begins to love them.

孩子们的第一种情感是自爱，第二种由自爱衍生出来的感情是爱他身边的事物；由于他当前软弱的现状，他只会注意到帮助和关心他的人。一开始他对自己的保姆和家庭教师的喜爱仅仅是一种习惯。他追寻她们，因为他需要她们，他因她们的同在而开心；这是一种观念，而非一种亲切的感觉。她们于他有益，不仅如此，她们渴望于他有益，发现这一点需要很长时间，而发现这一点之后他才开始爱上她们。

So a child is naturally disposed to kindly feeling because he sees that every one about him is inclined to help him, and from this experience he gets the habit of a kindly feeling towards his species; but with the expansion of his relations, his needs, his dependence, active or passive, the consciousness of his relations to others is awakened, and leads to the sense of duties and preferences. Then the child becomes masterful, jealous, deceitful, and vindictive. If he is not compelled to obedience, when he does not see the usefulness of what he is told to do, he attributes it to caprice, to an intention of tormenting him, and he rebels. If people give in to him, as soon as anything opposes him he regards it as rebellion, as a determination to resist him; he beats the chair or table for disobeying him. Self-love, which concerns itself only with ourselves,

is content to satisfy our own needs; but selfishness, which is always comparing self with others, is never satisfied and never can be; for this feeling, which prefers ourselves to others, requires that they should prefer us to themselves, which is impossible. Thus the tender and gentle passions spring from self-love, while the hateful and angry passions spring from selfishness. So it is the fewness of his needs, the narrow limits within which he can compare himself with others, that makes a man really good; what makes him really bad is a multiplicity of needs and dependence on the opinions of others. It is easy to see how we can apply this principle and guide every passion of children and men towards good or evil. True, man cannot always live alone, and it will be hard therefore to remain good; and this difficulty will increase of necessity as his relations with others are extended. For this reason, above all, the dangers of social life demand that the necessary skill and care shall be devoted to guarding the human heart against the depravity which springs from fresh needs.

所以一个孩子会自然地倾向于示好，因为他发现每个跟他身边的人都愿意帮助他，从这种经验中他便养成向他同类的示好的习惯；然而，随着他的关系网的扩大，他的需要、依赖、主动或被动、对与他人关系的意识都复苏了，从而使他产生责任感与倾向性。接着，这个孩子就变得专横、嫉妒心强、爱撒谎和有报复心。如果他没有被强迫去服从，当他没有认识到让他去做的事的益处时，他会认为我们是随意而为，是有意折磨他，于是他便反抗。如果人们对他屈服，任何事一不顺他的意，他就会将其看作反抗，看作决心与他抗争；他会猛击桌椅，因为它们不听从他。自爱——只关心自我，在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便知足了；而自私——总是将自己与他人相比较，从未得到满足也永不会满足；对这种爱自己过于爱他人的情感来说，需要他人爱我们胜过于爱他们自己，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温柔敦厚的情感源于自爱，而咬牙切齿、愤愤不平的情感则来自于自私。所以，要使一个

人真正成为好人，就必须使他的需要少，而且不能凡事将自己与他人相比较；过多的需要和对他人意见的依赖会使一个人变坏。如何运用这一原则以及如何引导孩子和成人的每种情感趋于好坏其实很简单。的确，人们不能一直独自生活，因此也很难一直做好人；而随着他们利害关系的增加，做好人的难度也随之增大。由此，首先，社会生活的危险需要人们将必要的技巧与关心放在护卫人心、抵制新的欲望所带来的堕落上。

Man's proper study is that of his relation to his environment. So long as he only knows that environment through his physical nature, he should study himself in relation to things; this is the business of his childhood; when he begins to be aware of his moral nature, he should study himself in relation to his fellow-men; this is the business of his whole life, and we have now reached the time when that study should be begun.

人类研究的适宜对象就是人与所在环境的关系。在他只能通过他的生理性质了解周围的环境的时候，他就应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研究自己；这就是他童年应做的研究；当人开始意识到他的精神之存在的时候，他就应在与他的同胞的关系中研究自己；这就是他一生应做的研究；而我们现在到了应该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了。

As soon as a man needs a companion he is no longer an isolated creature, his heart is no longer alone. All his relations with his species, all the affections of his heart, come into being along with this. His first passion soon arouses the rest.

只要一个人觉得需要陪伴时，他就不再是孤单的生物了，他的心

也不再孤单了。所有他与他人的关系，所有他心所喜爱的，都与这一起诞生。他的第一个欲念很快生发了其他欲念。

The direction of the instinct is uncertain. One sex is attracted by the other; that is the impulse of nature. Choice, preferences, individual likings, are the work of reason, prejudice, and habit; time and knowledge are required to make us capable of love; we do not love without reasoning or prefer without comparison. These judgments are none the less real, although they are formed unconsciously. True love, whatever you may say, will always be held in honour by mankind; for although its impulses lead us astray, although it does not bar the door of the heart to certain detestable qualities, although it even gives rise to these, yet it always presupposes certain worthy characteristics, without which we should be incapable of love. This choice,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contrary to reason, really springs from reason. We say Love is blind because his eyes are better than ours, and he perceives relations which we cannot discern. All women would be alike to a man who had no idea of virtue or beauty, and the first comer would always be the most charming. Love does not spring from nature, far from it; it is the curb and law of her desires; it is love that makes one sex indifferent to the other, the loved one alone excepted.

这个本能的发展方向是难以确定的。一种性别的人被另一种性别的人吸引；这是天性推动的结果。选择、倾向、个人喜好，都是理智、偏见和习惯的结果；要使我们有爱的能力，需要时间和知识；我们不会没有理由地爱抑或不带比较地偏爱。尽管这些判断无意识地形成，但它们依然是真实的。真爱，不论你怎么说，总是受人尊敬的；因为尽管爱驱使我们走向歧路，尽管爱没有向某些可恨的特性闩上心门，尽管爱甚至产生这些可恨的特性，它却总带有某些有价值的特

性，没有这些特性我们无法去爱。这个选择，理应与理性相悖，却真实地源于理性。我们说爱情是盲目的因为它的视力比我们的更好，它能看到我们不能看不到的关系。对一个丝毫没有道德观或审美观的男人来说，所有女人都是一样的，他遇见的第一个女人总是最富魅力的。爱不仅不源于天性，而且它还辖制着自然欲望的发展；正是爱让一种性别的人漠视除了被爱的对象以外的另一种性别的人。

We wish to inspire the preference we feel; love must be mutual. To be loved we must be worthy of love; to be preferred we must be more worthy than the rest, at least in the eyes of our beloved. Hence we begin to look around among our fellows; we begin to compare ourselves with them, there is emulation, rivalry, and jealousy. A heart full to overflowing loves to make itself known; from the need of a mistress there soon springs the need of a friend He who feels how sweet it is to be loved, desires to be loved by everybody; and there could be no preferences if there were not many that fail to find satisfaction. With love and friendship there begin dissensions, enmity, and hatred. I behold deference to other people's opinions enthroned among all these divers passions, and foolish mortals, enslaved by her power, base their very existence merely on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我们喜爱什么，我们就想得到什么，而爱应当是相互的。我们必须值得爱才能被爱；至少在我们所爱的人眼中，我们必须比其他人更有价值才能被偏爱。因此我们开始观察我们的周围的人；我们开始将自己与他们比较，仿效、竞争、嫉妒就此产生。充盈着爱的心乐于使自己广为人知；对情人的需要很快会生发对朋友的需求；感到被爱的甜蜜的人，渴望受到每个人的爱；假若没有那么多被爱的不满足，就不会产生偏爱。随着爱情和友谊的产生，纷争、仇恨与憎恶也产生了。在各种各样的欲念中，我看到人们对他人意见的尊崇宛如一个宝

座，愚蠢的人类被她的力量所俘虏，只按照他人的意见去生活。

Expand these ideas and you will see where we get that form of selfishness which we call natural selfishness, and how selfishness ceases to be a simple feeling and becomes pride in great minds, vanity in little ones, and in both feeds continually at our neighbour's cost. Passions of this kind, not having any germ in the child's heart, cannot spring up in it of themselves; it is we who sow the seeds, and they never take root unless by our fault. Not so with the young man; they will find an entrance in spite of us. It is therefore time to change our methods.

对这些观点加以扩充，你就会发现我们所称为的“天然的自私”的形式，以及自私是如何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情感，而演变成伟人的骄傲、小人的虚荣的，骄傲和虚荣都不断以损人利己来供养自己。这种欲念，在孩子心中没有任何根源，它们无法自己从心里产生；是我们撒播了它的种子，而且除非是我们犯错，否则它们永远不会生根。对青年人来说却不是这样；不论我们怎样努力，这些欲念仍会在他心中产生。因此是时候改变我们的方法了。

Let us begin with some considerations of importance with regard to the critical stage under discussion. The change from childhood to puberty is not so clearly determined by nature but that it varies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temperament and racial conditions. Everybody knows the differences which have been observed with regard to this between hot and cold countries, and every one sees that ardent temperaments mature earlier than others; but we may be mistaken as to the causes, and we may often attribute to physical causes what is really due to moral: this is one of the commonest

errors in the philosophy of our times. The teaching of nature comes slowly; man's lessons are mostly premature. In the former case, the senses kindle the imagination, in the latter the imagination kindles the senses; it gives them a precocious activity which cannot fail to enervate the individual and, in the long run, the race. It is a more general and more trustworthy fact than that of climatic influences, that puberty and sexual power is always more precocious among educated and civilised races, than among the ignorant and barbarous. [1_1] Children are preternaturally quick to discern immoral habits under the cloak of decency with which they are concealed. The prim speech imposed upon them, the lessons in good behaviour, the veil of mystery you profess to hang before their eyes, serve but to stimulate their curiosity. It is plain, from the way you set about it, that they are meant to learn what you profess to conceal; and of all you teach them this is most quickly assimilated.

让我们首先就所探讨的紧要阶段谈一些重要问题。天性没有清楚地决定从童年到青春期的改变，这种改变根据个人性格和种族条件而变化。人人都知道，在这一点上，炎热或寒冷的国家差别显著，人人也都明白性格热情者较他人更早熟；但是，我们可能弄错了原因，可能经常将其实出于精神的原因诉诸于物质的原因：这是当代的哲学中最常见的错误之一。自然的教学是缓慢的；人们的教学却大多进行得过早。前者，是感官唤醒想象，而后者，是想象唤醒感官；这使得他们的行动过早成熟，必定会削弱个人的能力，长期以往，则会贻害整个种族。那些受过教育的更先进的种族比无知的野蛮的种族在青春期和性能力方面总是更加早熟的这一观点，较气候影响来说是更广泛被接受和值得信任的事实 [2_1] 。孩子们在庄重的披风下觉察被遮掩的不良风俗时异常地聪敏。人们教导他们的端庄的话，灌输他们要老实做人的教训，在他们眼前盖上的神秘的面纱，反而激起了他们的好奇心。显而易见，按照你所采取的方法，你隐藏什么，反而教他们知道什么；你教他们的所有东西中，这是最快被掌握的。

Consult experience and you will find how far this foolish method hastens the work of nature and ruins the character. This is one of the chief causes of physical degeneration in our towns. The young people, prematurely exhausted, remain small, puny, and misshapen, they grow old instead of growing up, like a vine forced to bear fruit in spring, which fades and dies before autumn.

从经验中你就会得知这个愚蠢的方法在什么程度上加速了自然的进程、毁坏了孩子的气质。这就是城镇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年轻人，过早地耗尽了精力，因而成长得娇小、瘦弱、发育不健全，他们在衰老却没有长大，如同葡萄在春天被催着长出果实，最终还没到秋天就枯萎死去。

To know how far a happy ignorance may prolong the innocence of children, you must live among rude and simple people. It is a sight both touching and amusing to see both sexes, left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own hearts, continuing the sports of childhood in the flower of youth and beauty, showing by their very familiarity the purity of their pleasures. When at length those delightful young people marry, they bestow on each other the first fruits of their person, and are all the dearer therefore. Swarms of strong and healthy children are the pledges of a union which nothing can change, and the fruit of the virtue of their early years.

一定要在一群粗豪简单的人群中生活过，才能了解快乐而又无知的生活可以使孩子们的天真无邪延续多长时间。看见男孩女孩心灵那样坦诚地在年轻貌美的时候继续着孩童时的游戏，看见他们在彼此亲热中流露出纯洁的快乐之情，真是又触动人心又引人发笑。当这些快

乐的年轻人最终喜结连理，彼此将自己初熟的精华给对方的时候，他们就比以往更加恩爱了。成群强壮健康的孩子，就是什么也不能改变的这样结合的保证，这是他们年轻时美好德行的果实。

If the age at which a man becomes conscious of his sex is deferred as much by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as by the action of nature, it follows that this age may be hastened or retarded according to the way in which the child is brought up; and if the body gains or loses strength in proportion as its development is accelerated or retarded, it also follows that the more we try to retard it the stronger and more vigorous will the young man be. I am still speaking of purely physical consequences; you will soon see that this is not all.

如果人获得性知识的年龄随着教育的效果和自然的行为的不同而不同，那么根据我们抚养孩子的方法，这一年龄可能被加快或延迟；如果身体获得或者失去的力量与它发展是加速还是延迟成比例，那么我们越是试图延迟它，年轻人就越是会变得生龙活虎、体格强健。我现在所谈的纯粹是对身体的影响；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些影响远不止于此。

From these considerations I arrive at the solution of the question so often discussed—Should we enlighten children at an early period as to the objects of their curiosity, or is it better to put them off with decent shams? I think we need do neither.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curiosity will not arise unless we give it a chance. We must therefore take care not to give it an opportunity. In the next place, questions one is not obliged to answer do not compel us to deceive those who ask them; it is better to bid the child hold his

tongue than to tell him a lie. He will not be greatly surprised at this treatment if you have already accustomed him to it in matters of no importance. Lastly, if you decide to answer his questions, let it be with the greatest plainness, without mystery or confusion, without a smile. It is much less dangerous to satisfy a child's curiosity than to stimulate it.

从这些思考中我得出对这一经常讨论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究竟应该趁早向孩子们阐明他们好奇的事情呢，还是用得体的谎言敷衍过去更好呢？我认为这些我们都不应该做。首先，除非我们给好奇心机会，否则它是不会产生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给好奇心产生的机会。其次，碰到不是非回答不可的问题时，我们不要欺骗提问题的人；宁可不让孩子提问也不要欺骗他。如果你已经让他习惯对于不重要的问题不予回答，他是不会因为受到这样的待遇而大为惊讶的。最后，如果你决心要回答他的问题，那么就用最直白的语言回答，不要留下任何模棱两可或令人疑惑之处，也不要笑。满足一个孩子的好奇心，远没有激起孩子的好奇心危险。

Let your answers be always grave, brief, decided, and without trace of hesitation. I need not add that they should be true. We cannot teach children the danger of telling lies to men without realising, on the man's part, the danger of telling lies to children. A single untruth on the part of the master will destroy the results of his education.

让你的回答总是谨慎、简洁而又坚定，不留下一丝犹豫。它们一定要是真话这一点，我自不用多说。如果成人没有意识到对孩子撒谎的危害，就不能教导孩子们了解对大人撒谎的害处。老师只要有一次小小的谎言就足以摧毁他全部的教育成果。

Complete ignorance with regard to certain matters is perhaps the best thing for children; but let them learn very early what it is impossible to conceal from them permanently. Either their curiosity must never be aroused, or it must be satisfied before the age when it becomes a source of danger. Your conduct towards your pupil in this respect depends greatly on his individual circumstances, the society in which he moves, the position in which he may find himself, etc. Nothing must be left to chance; and if you are not sure of keeping him in ignoranc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xes till he is sixteen, take care you teach him before he is ten.

对于某些事情完全的无知也许是对孩子最好的事；但要让他们很早就学习不可能永远瞒着他们的事情。要么永远不激起他们的好奇心，要么早在它成为一种危险的来源的年龄之前就满足它。由此看来，你对学生的言行很大程度决定于他个人的情况、他所生活的社会、他自己的定位，等等。不要对任何事存有侥幸；只要你不确定自己能让他在十六岁之前都分不清楚男女之间的差别，就在他十岁之前注意教导他这些。

I do not like people to be too fastidious in speaking with children, nor should they go out of their way to avoid calling a spade a spade; they are always found out if they do. Good manners in this respect are always perfectly simple; but an imagination soiled by vice makes the ear over-sensitive and compels us to be constantly refining our expressions. Plain words do not matter; it is lascivious ideas which must be avoided.

我不喜欢人们在跟孩子们交流时过于讲究，也不认为他们在应该

实话实说时拐弯抹角；他们这么做总是会被发现的。由此，好的举止就是极度简单；但是被恶习污染了的想象使得耳朵过于敏感，也总是促使我们不断地纠正自己的措辞。直白的语言无伤大雅；必须杜绝的是淫荡的想法。

Although modesty is natural to man, it is not natural to children. Modesty only begins with the knowledge of evil; and how should children without this knowledge of evil have the feeling which results from it? To give them lessons in modesty and good conduct is to teach them that there are things shameful and wicked, and to give them a secret wish to know what these things are. Sooner or later they will find out, and the first spark which touches the imagination will certainly hasten the awakening of the senses. Blushes are the sign of guilt; true innocence is ashamed of nothing.

尽管行为端正对于人来说是自然的，但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不自然的。行为端正只在有了对于邪恶的知识之后才产生；那么还没有邪恶的知识的孩子们，又怎能有它所带来的端正行为呢？要教导他们行为端正、为人正直，就需要教导他们有可耻的、不道德的事情，并秘密地希望他们知道这些事情是什么。他们早晚会明白，而最初的火花首次触发想象后，必定会加快其他感官的觉醒。脸红是罪行的标志；真正的清白是没什么好感到羞耻的。

Children have not the same desires as men; but they are subject like them to the same disagreeable needs which offend the senses, and by this means they may receive the same lessons in propriety. Follow the mind of nature which has located in the same place the organs of secret pleasures and those of disgusting needs; she teaches us the same precautions at different ages, sometimes by means of

one idea and sometimes by another; to the man through modesty, to the child through cleanliness.

孩子们没有成年人一样的欲望；但是他们也会像他们一样，容易对同样羞耻的需要屈服，这些需要是伤害感官的，因此，他们也可以受到同样针对这种行为的良好教育。顺应天性，她把秘密的愉悦的器官和恶心的欲望的器官放在同一个地方；她有时通过一种想法，有时又通过另一种想法，在不同的年纪教导我们要同样地谨慎；她教男人要行为端正，教孩子要持守清洁。

I can only find one satisfactory way of preserving the child's innocence, to surround him by those who respect and love him. Without this all our efforts to keep him in ignorance fail sooner or later; a smile, a wink, a careless gesture tells him all we sought to hide; it is enough to teach him to perceive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we want to hide from him. The delicate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employed by persons of politeness assume a knowledge which children ought not to possess, and they are quite out of place with them, but when we truly respect the child's innocence we easily find in talking to him the simple phrases which befit him. There is a certain directness of speech which is suitable and pleasing to innocence; this is the right tone to adopt in order to turn the child from dangerous curiosity. By speaking simply to him about everything you do not let him suspect there is anything left unsaid. By connecting coarse words with the unpleasant ideas which belong to them, you quench the first spark of imagination; you do not forbid the child to say these words or to form these ideas; but without his knowing it you make him unwilling to recall them. And how much confusion is spared to those who speaking from the heart always say the right thing, and say it as they themselves have felt it!

我只能找到一种方法，能令人满意地保存孩子们的单纯，那就是让尊敬和爱他的人围绕着他。若不这样，我们一切让他保持单纯的努力，不久后都会付诸东流；一个微笑、一个眨眼、一个无心的动作就告诉了他我们想要隐藏的一切、就足以让他意识到我们想要对他隐瞒些什么了。彬彬有礼的人使用的华丽辞藻和表达都带有孩子们不应该具备的一种知识，他们与这些知识很不相称，但当我们真正尊重孩子们的天真时，我们很容易用适合他们的简单语言跟他们交谈。有一些直率的语言是适合对天真的孩子们说的，也是让他们愉悦的；这才是应该采取的正确语调，为了将孩子们从危险的好奇心中转回。简单地跟他讲所有的事，就不会令他怀疑有任何事情还留着没有对他讲。通过将粗俗语言和属于它们的下流想法联系起来，你会扑灭想象最初的火花；不要禁止孩子说这些话或形成这些想法；但是要让他不知不觉间，不愿意回忆起这些事物。对于那些从心里始终只说应该说的话、想什么就说什么的人来说，有多少的疑虑就这么打消了啊！

“Where do little children come from?” This is an embarrassing question, which occurs very naturally to children, one which foolishly or wisely answered may decide their health and their morals for life. The quickest way for a mother to escape from it without deceiving her son is to tell him to hold his tongue. That will serve its turn if he has always been accustomed to it in matters of no importance, and if he does not suspect some mystery from this new way of speaking. But the mother rarely stops there. “It is the married people's secret,” she will say, “little boys should not be so curious.” That is all very well so far as the mother is concerned, but she may be sure that the little boy, piqued by her scornful manner, will not rest till he has found out the married people's secret, which will very soon be the case.

“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自然而然地产生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智慧或者愚蠢的回答可能决定了孩子们是否健康以及他们生活是否道德。对一个母亲来说，不欺骗孩子就能逃避这个问题的最快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保持安静。假如他总是习惯问不重要的问题时遭到这样的对待并不怀疑这种新的回答方式，这么做会有用的。然而母亲很少会就此打住。“这是结了婚的人们的秘密，”她会说，“小男孩不应该这么好奇。”就母亲所知目前回答一切良好，但是她也许确定无疑，这个被她轻蔑举止激怒的男孩，在找到结婚的人们的秘密之前是不会放弃的，事实很快也会如此。

Let me tell you a very different answer which I heard given to the same question, one which made all the more impression on me, coming, as it did, from a woman, modest in speech and behaviour, but one who was able on occasion, for the welfare of her child and for the cause of virtue, to cast aside the false fear of blame and the silly jests of the foolish. Not long before the child had passed a small stone which had torn the passage, but the trouble was over and forgotten. “Mamma,” said the eager child, “where do little children come from?” “My child,” replied his mother without hesitation, “women pass them with pains that sometimes cost their life.” Let fools laugh and silly people be shocked; but let the wise inquire if it is possible to find a wiser answer and one which would better serve its purpose.

让我告诉你我听到的对于同样的问题的一个非常不同的回答，这个回答令我印象深刻，也确实来自一个言行谦逊的妇女，但是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能为了孩子的福祉以及美德的原因，在这样的场合，消除无谓的对他人责难的恐惧，也不说笨蛋愚蠢的玩笑话。不久之前，这个孩子的小便中撒出一个小小的硬东西，把他的尿道也弄破了，但是这事过去了便被遗忘了。“妈妈，”这个热心的孩子说道，“小

孩子是哪里来的？”他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孩子，他们是女人从肚子里屙出来的，屙的时候痛到几乎命都要没有了。”让傻瓜们笑吧，让愚蠢的人们震惊吧；但让那些智者问问，能否找到一个能更好达到目的的、更智慧的回答？

In the first place the thought of a need of nature with which the child is well acquainted turns his thoughts from the idea of a mysterious process. The accompanying ideas of pain and death cover it with a veil of sadness which deadens the imagination and suppresses curiosity; everything leads the mind to the results, not the causes, of child-birth. This is the information to which this answer leads. If the repugnance inspired by this answer should permit the child to inquire further, his thoughts are turned to the infirmities of human nature, disgusting things, images of pain. What chance is there for any stimulation of desire in such a conversation? And yet you see there is no departure from truth, no need to deceive the scholar in order to teach him.

首先，这个孩子所熟知的自然需要的观念，这种观念会让孩子不再认为生孩子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随之而来的有关痛苦与死亡的想法将其罩上了一层忧伤的面纱，让想象力衰亡、好奇心止息；这一切都让孩子的思想与出生的结果而非原因联系起来。这就是这个回答引出的信息。假如由这个回答生发出的厌恶使孩子问得更深入，他就会转而想到人性的种种软弱、恶心的事情和痛苦的场景。这样的对话怎么会有机会激起欲望呢？然而，你看，这样的回答没有与真理相悖，也没有必要为了教导这个学生而欺瞒他。

Your children read; in the course of their reading they meet with things they would never have known without reading. Are

they students, their imagination is stimulated and quickened in the silence of the study. Do they move in the world of society, they hear a strange jargon, they see conduct which makes a great impression on them; they have been told so continually that they are men that in everything men do in their presence they at once try to find how that will suit themselves; the conduct of others must indeed serve as their pattern when the opinions of others are their law. Servants, dependent on them, and therefore anxious to please them, flatter them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morals; giggling governesses say things to the four-year-old child which the most shameless woman would not dare to say to them at fifteen. They soon forget what they said, but the child has not forgotten what he heard. Loose conversation prepares the way for licentious conduct; the child is debauched by the cunning lacquey, and the secret of the one guarantees the secret of the other.

你的孩子们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他们会碰到若非通过阅读永远也不会碰到的事情。作为学生，他们的想象在安静的学习中被激发、加快。他们进入社会生活时，会听到奇怪的行话，会看到让他们印象深刻的行为；他们一直被灌输着他们已经长大成人的观念，因而在他们看到的大人做的所有事情上，他们都会立刻试图知道他们怎样才可以这么做；既然他人的话成为了他们必须遵循的律法，他人的行为也必须作为他们效法的榜样。奴仆，依赖着他们，也因而渴望着要取悦他们，不惜违背道德去奉承他们；女家庭教师，咯咯地笑着，对四岁的孩子说着最无耻的女子在她们十五岁时也不敢说的话。她们很快就忘了自己说了什么，但是孩子却没有忘记他听到了什么。随意的交谈为淫荡的行为铺设了道路；孩子被狡猾的仆人带坏了，一个秘密又必然地导致另一个秘密的产生。

The child brought up in accordance with his age is alone. He

knows no attachment but that of habit, he loves his sister like his watch, and his friend like his dog. He is unconscious of his sex and his species; men and women are alike unknown; he does not connect their sayings and doings with himself, he neither sees nor hears, or he pays no heed to them; he is no more concerned with their talk than their actions; h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 This is no artificial error induced by our method, it is the ignorance of nature. The time is at hand when that same nature will take care to enlighten her pupil, and then only does she make him capable of profiting by the lessons without danger. This is our principle; the details of its rules are outside my subject; and the means I suggest with regard to other matters will still serve to illustrate this.

成长与年龄相适应的孩子是孤独的。他不知道依恋，只知道是习惯，他喜爱自己的手表一般地爱着自己的姐妹，喜欢自己的小狗一般喜欢着自己的朋友。他没有性别和物种的意识；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未知；他不会把他们的言行与自己联系起来，他既不看也不听，他也不在意他们；他对他们的对话与行为一样不感兴趣；他将自己置身事外。这不是我们的方法导致的人为错误，这是来自天性的无知。当同样的天性会启蒙老师的学生时，时间掌握在她的手中，也只有那时她能让孩子在课程中获益却不带有任何危险。这是我们的原则；它的规范细节则在我的主题之外；我提议的与它有关的其他方法也仍将表明这一点。

Do you wish to establish law and order among the rising passions, prolong the period of their development, so that they may have time to find their proper place as they arise. Then they are controlled by nature herself, not by man; your task is merely to leave it in her hands. If your pupil were alone, you would have nothing to do; but everything about him enflames his imagination.

He is swept along on the torrent of conventional ideas; to rescue him you must urge him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Imagination must be curbed by feeling and reason must silence the voice of conventionality. Sensibility is the source of all the passions, imagination determines their course. Every creature who is aware of his relations must be disturbed by changes in these relations and when he imagines or fancies he imagines others better adapted to his nature. It is the errors of the imagination which transmute into vices the passions of finite beings, of angels even, if indeed they have passions; for they must needs know the nature of every creature to realise what relations are best adapted to themselves.

假如你希望给日益增长的欲念建立次序和规律，就要延长它们的发展所用的时间，因此它们才可能有时间找到它们合适的次序。然后它们就受到自然的控制，而非人类的控制；你的任务仅仅是让它留在自然管辖之下。如果你的学生独自一人，你也会无事可做；但一切与他有关的事都点燃着他的想象。他被传统观念的洪流冲走；想救他，你必须使他往反方向前进。一定要用感觉去约束想象力，用理智压抑传统之声。敏感是一切情感的源头，想象力决定了它们的路径。每一个能感知自己的关系的人一定会因关系的改变而心烦，当他想象或幻想时他会将他人想象为更顺应自己的本性。将有限之人的感情变成种种邪恶的，是想象的错误，如果天使也有感情，想象的错误甚至能将它们的感情变成邪恶；因为他们必须知道每种生物的天性才能意识到什么样的关系是最适合他们的。

This is the sum of human wisdom with regard to the use of the passions. First, to be conscious of the true relations of man both in the species and the individual; second, to control all the affe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relations.

这就是对如何使用感情的人类智慧的总结。首先，既要从物种又要从个体的角度认识人类真正的关系；第二，根据这些关系节制一切感情。

But is man in a position to control his affections according to such and such relations? No doubt he is, if he is able to fix his imagination on this or that object, or to form this or that habit. Moreover, we are not so much concerned with what a man can do for himself, as with what we can do for our pupil through our choice of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he shall be placed. To show the means by which he may be kept in the path of nature is to show plainly enough how he might stray from that path.

但是人类是否能根据这样那样的关系去控制他自己的感情呢？无疑人类是的，假如他能把想象集中在这件或那件事上或者形成这样那样的习惯的话。此外，现在我们的重点不在于一个人能如何教育自己，而在于我们能怎样在我们所选择的学生所处的环境中教育他们。阐明他能怎样遵守这一自然秩序，就能足够清楚地阐释他能怎样脱离这一秩序。

So long as his consciousness is confined to himself there is no morality in his actions; it is only when it begins to extend beyond himself that he forms first the sentiments and then the ideas of good and ill, which make him indeed a man, and an integral part of his species. To begin with we must therefore confine our observations to this point.

只要他的意识还受到他自己的限制，他的行为就无道德可言；只

有当意识开始成长，超越他自己时，他才首先形成感觉，然后形成让他真正成为男人的善恶的思想、那作为人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首先阐述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

These observations are difficult to make, for we must reject the examples before our eyes, and seek out those in which the successive developments follow the order of nature.

阐述很困难，因为我们必须拒绝就在我们眼前的例子，并找出那些顺应自然秩序的连续发展的事例。

A child sophisticated, polished, and civilised, who is only awaiting the power to put into practice the precocious instruction he has received, is never mistaken with regard to the time when this power is acquired. Far from awaiting it, he accelerates it; he stirs his blood to a premature ferment; he knows what should be the object of his desires long before those desires are experienced. It is not nature which stimulates him; it is he who forces the hand of nature; she has nothing to teach him when he becomes a man; he was a man in thought long before he was a man in reality.

一个成熟的受到过打磨与教育的孩子，只要他一有能力，就要把幼年就受到的教育付诸于实践，对于这种能力何时获得他是永远不会搞错的。他绝不等待，甚至加快进程；他使他的血液还没有成熟就开始沸腾；早在实现欲望之前，他就知道他欲望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不是自然激励着他；是他，在加速着自然之手；到他成为一个男人时，自然没有什么要教他的了；早在他成为现实中的男人以前，他思想上已经是个男人了。

The true course of nature is slower and more gradual. Little by little the blood grows warmer, the faculties expand, the character is formed. The wise workman who directs the process is careful to perfect every tool before he puts it to use; the first desires are preceded by a long period of unrest, they are deceived by a prolonged ignorance,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want. The blood ferments and bubbles; overflowing vitality seeks to extend its sphere. The eye grows brighter and surveys others, we begin to be interested in those about us, we begin to feel that we are not meant to live alone; thus the heart is thrown open to human affection, and becomes capable of attachment.

自然真正的进程是比较缓慢地逐渐前进的。血液一点一点地开始沸腾，心思一点点地细密，性格一点点地形成。管理工厂的聪明工匠会细心地打磨他将使用的每一个工具；在产生最初的欲望以前，他们有一段很长的焦虑不安的时期，他们被延长的无知所蒙蔽以至于他们不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血液沸腾，鼓泡涌现；满溢的生命力渴望扩张它的境界。眼睛更明亮了，打量着他人，我们开始对与自己有关的人感兴趣了，我们开始感到自己不是注定要独自生活的了；因此心门向人类的感情敞开，变得能爱了。

The first sentiment of which the well-trained youth is capable is not love but friendship. The first work of his rising imagination is to make known to him his fellows; the species affects him before the sex. Here is another advantage to be gained from prolonged innocence; you may take advantage of his dawning sensibility to sow the first seeds of humanity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adolescent. This advantage is all the greater because this is the only time in his life when such efforts may be really successful.

经过良好培养的年轻人能接受的第一种感情是友谊而非爱情。他日益成长的想象使他首先想到自己的同伴；他们较性来说先对他产生影响。延长无知的时间还能获得另一个好处：你可以利用他日益成长的感性将博爱的第一颗种子播撒在年轻的他的心灵。这个好处意义更为重大就是因为在他一生中只有在这时，这样的努力可能真正获得成功。

I have always observed that young men, corrupted in early youth and addicted to women and debauchery, are inhuman and cruel; their passionate temperament makes them impatient, vindictive, and angry; their imagination fixed on one object only, refuses all others; mercy and pity are alike unknown to them; they would have sacrificed father, mother, the whole world, to the least of their pleasures. A young man, on the other hand, brought up in happy innocence, is drawn by the first stirrings of nature to the tender and affectionate passions; his warm heart is touched by the sufferings of his fellow-creatures; he trembles with delight when he meets his comrade, his arms can embrace tenderly, his eyes can shed tears of pity; he learns to be sorry for offending others through his shame at causing annoyance. If the eager warmth of his blood makes him quick, hasty, and passionate, a moment later you see all his natural kindness of heart in the eagerness of his repentance; he weeps, he groans over the wound he has given; he would atone for the blood he has shed with his own; his anger dies away, his pride abases itself before the consciousness of his wrong-doing. Is he the injured party, in the height of his fury an excuse, a word, disarms him; he forgives the wrongs of others as whole-heartedly as he repairs his own. Adolescence is not the age of hatred or vengeance; it is the age of pity, mercy, and generosity. Yes, I maintain, and I am not afraid of the testimony of experience, a youth of good birth,

one who has preserved his innocence up to the age of twenty, is at that age the best, the most generous, the most loving, and the most lovable of men. You never heard such a thing; I can well believe that philosophers such as you, brought up among the corruption of the public schools, are unaware of it.

我往往发现，早年就堕落于女人与酒宴中的年轻人，是不人性并且残忍的；暴烈的脾气使他们变得缺乏耐心、怀恨且易怒；他们的想象力仅集中于一件事上，拒绝一切其他的事；他们不懂得仁慈与怜悯；为了片刻的快乐，他们可以牺牲父亲，母亲甚至整个世界。反之，一个在天真质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受自然的影响会养成温柔敦厚的性情；他温暖之心会因同胞的痛苦而触动；当见到伙伴时，他会高兴得发抖，伸出手臂热烈地拥抱，眼睛会流出遗憾的泪水；他学会在冒犯他人时感到抱歉，因导致他人烦恼而感到羞愧。如果他火热的血使他急躁易怒，马上你就会在他深深懊悔的神情中看到他内心天然的善意；他为他造成的伤哭泣呻吟；他愿意用自己的血赔偿他人因他而流的血；在意识到他的错误之后，他的怒气会消散，他的骄傲会变为谦卑。如果是别人伤害了他，在他暴怒之时，只要一个道歉，一句话就能让他消气；他既能全心全意地弥补自己的过失，也能全心全意地原谅他人的过失。青春期不是恨或是报复的时期；而是遗憾、仁慈和慷慨的时期。是的，我坚信这一点，不害怕我的话经受经验的检验。一个有良好出身，二十岁时还保留着纯真的孩子，在青春期时是最棒的，最慷慨、最博爱，也是所有人中最值得被爱的。你从没听过这样的事；我很相信像你这样在公共学校的腐蚀中长大的哲学家，一定不知道这样的事情。

Man's weakness makes him sociable. Our common sufferings draw our hearts to our fellow-creatures; we should have no duties to mankind if we were not men. Every affection is a sign of insufficiency; if each of us had no need of others, we should hardly

think of associating with them. So our frail happiness has its roots in our weakness. A really happy man is a hermit; God only enjoys absolute happiness; but which of us has any idea what that means? If any imperfect creature were self-sufficing, what would he have to enjoy? To our thinking he would be wretched and alone. I do not understand how one who has need of nothing could love anything, nor do I understand how he who loves nothing can be happy.

人类因为柔弱，所以需要交际。我们经历共同的苦难，因而心系同类；如果我们不是人类，就不应该有对人类的职责。每一种对人的感情，都标志着自身的不足；如果每个人都不需要其他人，我们就根本不会想要与他人联合了。所以我们脆弱的幸福根植于我们的柔弱之中。孤独者才是真正幸福的人；只有上帝才享用着绝对的幸福；但我们当中，谁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如果任何不完美的生物都能自我满足，又有什么乐趣呢？对我们而言，他会是可怜而孤独的。我不明白一个什么都不需要的人怎能爱任何的事物，我也不明白一个什么都不爱的人怎能幸福。

Hence it follows that we are drawn towards our fellow-creatures less by our feeling for their joys than for their sorrows; for in them we discern more plainly a nature like our own, and a pledge of their affection for us. If our common needs create a bond of interest our common sufferings create a bond of affection. The sight of a happy man arouses in others envy rather than love, we are ready to accuse him of usurping a right which is not his, of seeking happiness for himself alone, and our selfishness suffers an additional pang in the thought that this man has no need of us. But who does not pity the wretch when he beholds his sufferings? who would not deliver him from his woes if a wish could do it? Imagination puts us more readily in the place of the miserable man

than of the happy man; we feel that the one condition touches us more nearly than the other. Pity is sweet, because, when we put ourselves in the place of one who suffers, we are aware, nevertheless, of the pleasure of not suffering like him. Envy is bitter, because the sight of a happy man, far from putting the envious in his place, inspires him with regret that he is not there. The one seems to exempt us from the pains he suffers, the other seems to deprive us of the good things he enjoys.

因此我们能爱我们的同类，与其说是因为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快乐，不如说是我们能体会他们的忧伤；因为在忧伤中，我们能更清楚地发现同类跟我们的一致之处，发现他们对爱我们的承诺。如果说我们的共同需要创造出利益的纽带，我们的共同忧伤则创造出感情的纽带。一个幸福人的面孔就能在他人心中激起嫉妒而非爱慕，我们已准备好控诉，他窃取了不属于他的权力，从而获得了他一个人的幸福；我们的自私心则更加痛苦，因为想到这个人并不需要我们。但是谁看到别人受苦却不感到同情的呢？如果希望能成为现实，谁不希望从痛苦中解救他呢？我们会更习惯将自己想象为受苦的人而非幸福的人；我们认为苦难比幸福更令我们触动。同情心是甜蜜的，因为当我们对受苦的人感同身受的时候，我们却会发现，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并未像他那样受苦。妒忌是令人痛苦的，因为幸福之人的面庞不仅无法使看到的人同样幸福，而且会让人因无法达到这样的幸福而遗憾。前者似乎可以使我们免去他所受的痛苦，而后者似乎从我们这里剥夺了他所享受的幸福。

Do you desire to stimulate and nourish the first stirrings of awakening sensibility in the heart of a young man, do you desire to incline his disposition towards kindly deed and thought, do not cause the seeds of pride, vanity, and envy to spring up in him through the misleading picture of the happiness of mankind; do not

show him to begin with the pomp of courts, the pride of palaces, the delights of pageants; do not take him into society and into brilliant assemblies; do not show him the outside of society till you have made him capable of estimating it at its true worth. To show him the world before he is acquainted with men, is not to train him, but to corrupt him; not to teach, but to mislead.

你想在青年人心里激发培育他那刚开始成长的感情吗，你想让他的性格变得善良体贴，不会引起骄傲自大，也不会因看到具有误导性的他人的幸福图景就心生嫉妒吗；绝不能先让他看到朝廷的浮华，宫殿的伟大和盛会的欢腾；不要带他进入社交场所和衣饰华丽的人群中去；在你已经能让他发现社会的真正价值之前，不要让他看见上流社会的外表。在他了解人之前就向他展示这个世界，这不是在培养他，而是在腐蚀他；不是在教育他，而是在误导他。

By nature men are neither kings, nobles, courtiers, nor millionaires. All men are born poor and naked, all are liable to the sorrows of life, its disappointments, its ills, its needs, its suffering of every kind; and all are condemned at length to die. This is what it really means to be a man, this is what no mortal can escape. Begin then with the study of the essentials of humanity, that which really constitutes mankind.

人非生来就是帝王、显族、廷臣、富翁的。所有人生来贫穷赤裸，都可能经历生活的苦难、忧虑、疾病、匮乏以及各种各样的痛苦；所有人最终都有一死。这就是为人真正的涵义，是所有人无法躲避的。那么就从人性最重要的东西开始研究吧，这也就是那真正构成人类的事物。

At sixteen the adolescent knows what it is to suffer, for he himself has suffered; but he scarcely realises that others suffer too; to see without feeling is not knowledge, and as I have said again and again the child who does not picture the feelings of others knows no ills but his own; but when his imagination is kindled by the first beginnings of growing sensibility, he begins to perceive himself in his fellow-creatures, to be touched by their cries, to suffer in their sufferings. It is at this time that the sorrowful picture of suffering humanity should stir his heart with the first touch of pity he has ever known.

十六岁的时候，青年人知道什么是受苦了，因为他已经受过苦了；但是他很少发现他人也一样地受苦；去看却不去感受算不上知识，正如我说过一遍又一遍的，孩子若不能对他人的感受感同身受，就只能感受自己的病痛，感受不了他人的；但是当他的想象被开始成长的情感所点燃时，他开始设身处地地为同伴想一想了，他会为他们的烦恼而不安，为他们的痛苦而忧伤。就是在这时，受苦人类的苦难图景第一次在他心里激起一丝他从未体会过的遗憾。

If it is not easy to discover this opportunity in your scholars, whose fault is it? You taught them so soon to play at feeling, you taught them so early its language, that speaking continually in the same strain they turn your lessons against yourself, and give you no chance of discovering when they cease to lie, and begin to feel what they say. But look at Emile; I have led him up to this age, and he has neither felt nor pretended to feel. He has never said, “I love you dearly,” till he knew what it was to love; he has never been taught what expression to assume when he enters the room of his father, his mother, or his sick tutor; he has not learnt the art of affecting a sorrow he does not feel. He has never pretended to weep for the

death of any one, for he does not know what it is to die. There is the same insensibility in his heart as in his manners. Indifferent, like every child, to every one but himself, he takes no interest in any one; his only peculiarity is that he will not pretend to take such an interest; he is less deceitful than others.

如果你在自己的孩子上难以发现这样的时刻，又是谁的错呢？你这么早地教他们玩弄情感，这么早地教他们带情感的语言，使得他们说话一直带有同样的腔调，甚至用你所教导的对付你自己，不给你机会发现他们什么时候说的不是假话而是他们的真实感受。但看看爱弥儿吧；我把他带大到这个年纪，但他既没有动过什么感情也没有说过什么谎言。在他知道爱是什么以前，他从未说过“我非常爱你”；他也从未被教过进入他父亲、母亲或者他生病的导师房间时要面带什么表情；他没有学过在他不悲伤时假装出那种动人的悲伤的技艺。他从未为任何人的去世而假哭，因为他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他心里没有感觉，行为上就一样没有展现。像每个孩子一样，除了他自己，他对谁都是冷漠的，他对任何人都不感兴趣；唯一不同的是，他不会假装对他人感兴趣；他不像他们那样虚伪。

Emile having thought little about creatures of feeling will be a long time before he knows what is meant by pain and death. Groans and cries will begin to stir his compassion, he will turn away his eyes at the sight of blood; the convulsions of a dying animal will cause him I know not what anguish before he knows the source of these impulses. If he were still stupid and barbarous he would not feel them; if he were more learned he would recognise their source; he has compared ideas too frequently already to be insensible, but not enough to know what he feels.

爱弥儿很少思考生物有哪些感觉，很久以后他才会知道痛苦和死亡的涵义。呻吟和哭泣会搅动他的同情心，他会在看到血的时候转离眼睛；在他不知道濒死的动物为何抽搐时，我不知道这会给他带来多大的痛苦。如果他仍愚笨粗野的话，他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的；如果他更有学识的话，他会知道这感觉的来源的；他已经做过太多次比较了，不会毫无感觉，但还不足以让他明白他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So pity is born, the first relative sentiment which touches the human heart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nature. To become sensitive and pitiful the child must know that he has fellow-creatures who suffer as he has suffered, who feel the pains he has felt, and others which he can form some idea of, being capable of feeling them himself. Indeed, how can we let ourselves be stirred by pity unless we go beyond ourselves, and identify ourselves with the suffering animal, by leaving, so to speak, our own nature and taking his. We only suffer so far as we suppose he suffers; the suffering is not ours but his. So no one becomes sensitive till his imagination is aroused and begins to carry him outside himself.

怜悯，就这样产生了，这是根据自然秩序产生的第一个触动人心的相对的情感。要让孩子变得敏感和具有同情心，就必须让他知道他有像他一样受苦的同伴，他们能感到他曾感到的悲哀；还需要让他知道，其他的人也有其他的痛苦和悲哀，因为现在他也能够感受到这些痛苦和悲哀了。确实，除非我们超越自己，将自己与其他受苦的动物相比较，比如说，离开自己的本性，设身处地地为他人思考，不然怎能感到同情呢？我们只有在认定他在受苦的时候才感到痛苦；这痛苦不是我们的，而是他的。所以直到一个人的想象力受到激发，并开始带他超出自己的身体，这个人才变得敏感。

What should we do to stimulate and nourish this growing sensibility, to direct it, and to follow its natural bent? Should we not present to the young man objects on which the expansive force of his heart may take effect, objects which dilate it, which extend it to other creatures, which take him outside himself? should we not carefully remove everything that narrows, concentrates, and strengthens the power of the human self? that is to say, in other words, we should arouse in him kindness, goodness, pity, and beneficence, all the gentle and attractive passions which are naturally pleasing to man; those passions prevent the growth of envy, covetousness, hatred, all the repulsive and cruel passions which make our sensibility not merely a cipher but a minus quantity, passions which are the curse of those who feel them.

我们要做什么才能激励、哺育这不断成长的情感，并指导它，让它随自然倾向发展？我们难道不该让年轻人把不断增长的力量用于能让他扩充自己的胸襟、关爱他人、忘掉自身上吗？我们难道不该小心地除去一切让人类自己的力量变小、集中、加强的事物吗？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激发他的善良，友好，同情心和仁爱等一切天生对人有好处的温柔怡人的情感；这些情感能防止嫉妒、贪婪、嫉恨和一切可憎残忍的欲念的成长，这些欲念不仅会让我们的感情化为乌有，还会成为感受到它的人的诅咒。

I think I can sum up the whole of the preceding reflections in two or three maxims, definite, straightforward, and easy to understand.

我认为我可以把以上的想法总结为两三个简洁明了、易于理解的准则。

FIRST MAXIM. —It is not in human nature to put ourselves in the place of those who are happier than ourselves, but only in the place of those who can claim our pity.

第一准则——人性不会使我们设身处地地想到比我们幸福的人，而会令我们只想到比我们更值得同情的人。

If you find exceptions to this rule, they are more apparent than real. Thus we do not put ourselves in the place of the rich or great when we become fond of them; even when our affection is real, we only appropriate to ourselves a part of their welfare. Sometimes we love the rich man in the midst of misfortunes; but so long as he prospers he has no real friend, except the man who is not deceived by appearances, who pities rather than envies him in spite of his prosperity.

如果你发现有些人是这个准则的例外，这些人是表面上例外而非实际上例外。因此我们不会为我们喜欢的富人或伟人将心比心地设想的；甚至是我们真心喜欢对方时，我们也仅仅为了得到他们一部分的益处。有时我们在富人倒霉时爱他们；但是只要他富贵，他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这个朋友不被他飞黄腾达的外表所迷惑，仍然同情他而非嫉妒他。

The happiness belonging to certain states of life appeals to us; take, for instance, the life of a shepherd in the country. The charm of seeing these good people so happy is not poisoned by envy; we are genuinely interested in them. Why is this? Because we feel we

can descend into this state of peace and innocence and enjoy the same happiness; it is an alternative which only calls up pleasant thoughts, so long as the wish is as good as the deed. It is always pleasant to examine our stores, to contemplate our own wealth, even when we do not mean to spend it.

属于特定人生状态的幸福对我们具有吸引力；比如，乡村里牧羊人的生活。看到这些好人如此幸福的喜悦没有被嫉妒所污染；我们是真的对他们感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降低自己的地位，到这种安宁和单纯状态中，从而享受相同的幸福；只要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就不失为一种能唤起快乐想法的另一选择。清点我们的库存，盘点我们的财富，尽管我们不为了花掉它们，也总是令人愉快的事。

From this we see that to incline a young man to humanity you must not make him admire the brilliant lot of others; you must show him life in its sorrowful aspects and arouse his fears. Thus it becomes clear that he must force his own way to happiness,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the happiness of others.

从中我们能看出，要引导一个年轻人具备人性，你一定不能让他艳羡他人的富有命运；你一定要向他展示生活可悲的一面，激起他的害怕，他明显能看出他一定得找到自己通往幸福的路，而不干涉他人的幸福。

SECOND MAXIM. —We never pity another's woes unless we know we may suffer in like manner ourselves.

准则二——除非我们知道我们也会遭受同样的痛苦，否则我们不会同情他人的苦难。

“Non ignara mali, miseris succurrere disco.” —Virgil.

“焉能罔视邪恶，吾将习而援助弱者。”——维吉尔

I know nothing go fine, so full of meaning, so touching, so true as these words.

没有比这更美好、更富有意义、更动人、更真实的语句了。

Why have kings no pity on their people? Because they never expect to be ordinary men. Why are the rich so hard on the poor? Because they have no fear of becoming poor. Why do the nobles look down upon the people? Because a nobleman will never be one of the lower classes. Why are the Turks generally kinder and more hospitable than ourselves? Because, under their wholly arbitrary system of government, the rank and wealth of individuals are always uncertain and precarious, so that they do not regard poverty and degradation as conditions with which they have no concern; to-morrow, any one may himself be in the same position as those on whom he bestows alms to-day. This thought, which occurs again and again in eastern romances, lends them a certain tenderness which is not to be found in our pretentious and harsh morality.

为什么国王们不怜悯他们的人民？因为他们从未想过会成为普通人。为什么富人如此恶待穷人？因为他们从不担心自己会变穷。为什么贵族们这么看不起人民？因为贵族永远不会成为这下等阶级人民中的一个。为什么土耳其人一般都比我们更善良厚道呢？因为，在他们完全专制的政府系统之下，个人的地位与财富总是不确定而又不稳固的，因此他们不会将贫穷和落魄视为他们不需要担心的状况；明天，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今天被施舍的人。这个想法不断出现在东方传奇中，比我们自以为是而严苛的道德多了一分柔情。

So do not train your pupil to look down from the height of his glory upon the sufferings of the unfortunate, the labours of the wretched, and do not hope to teach him to pity them while he considers them as far removed from himself. Make him thoroughly aware of the fact that the fate of these unhappy persons may one day be his own, that his feet are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the abyss, into which he may be plunged at any moment by a thousand unexpected irresistible misfortunes. Teach him to put no trust in birth, health, or riches; show him all the changes of fortune; find him examples—there are only too many of them—in which men of higher rank than himself have sunk below the condition of these wretched ones. Whether by their own fault or another's is for the present no concern of ours; does he indeed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fault? Never interfere with the order in which he acquires knowledge, and teach him only through the means within his reach; it needs no great learning to perceive that all the prudence of mankind cannot make certain whether he will be alive or dead in an hour's time, whether before nightfall he will not be grinding his teeth in the pangs of nephritis, whether a month hence he will be rich or poor, whether in a year's time he may not be rowing an Algerian galley under the lash of the slave-driver. Above all do not teach him this, like his catechism, in cold blood; let him see and

feel the calamities which overtake men; surprise and startle his imagination with the perils which lurk continually about a man's path; let him see the pitfalls all about him, and when he hears you speak of them, let him cling more closely to you for fear lest he should fall. “You will make him timid and cowardly,” do you say? We shall see; let us make him kindly to begin with, that is what matters most.

不要教你的学生因为自己的极高的荣耀而藐视不幸者的苦难、可怜人的劳苦，如果他认为他们离自己很遥远，就别希望他能被教育得会怜悯他们了。让他完全明白这样的事实：这些不幸者的命运有一天可能会成为他的命运，他的双脚正站在深渊的边缘，而他有可能随时因为未预料到的无法抗拒的厄运而落入其中。教导他不要倚靠出身、健康和财富；向他指出命运的沉浮；给他举关于地位较高的人堕落后比可怜人的地位更低的例子——这些例子太多了。不管堕落是因为他们自己还是别人，这不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问题；他现在哪里知道堕落一词的含义呢！不要打断他获得知识的秩序，只要通过他能懂得的方法教导他；不需要多高深的学识就能明白，尽管事事谨慎，仍不能确定一个人一小时后究竟是死是活，也不能断定天黑之前肾脏炎是否会让他痛得咬紧牙关，一个月之后他是穷是富，一年内他会不会被送去在奴隶主的鞭笞之下划阿尔及利亚的帆船。最重要的是，不要像他的教条书一样冷冰冰地教导他这些事；要让他深切感受到人类承受的灾难；要用人类道路中时刻埋藏的危险使他的想象力震惊；让他看到他周围的众多深渊，而当他听到你提及深渊时，让他因害怕跌落而更紧紧地依赖你。“你会让他变得胆小懦弱的。”你是否这么认为？我们终将辨明；而现在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从培养他做一个善良的人开始。

THIRD MAXIM. —The pity we feel for others is proportionate, not to the amount of the evil, but to the feelings we attribute to the

sufferers.

准则三——我们对他人的同情程度，与痛苦程度无关，而与我们为受苦者设想的感觉有关。

We only pity the wretched so far as we think they feel the need of pity. The bodily effect of our sufferings is less than one would suppose; it is memory that prolongs the pain, imagination which projects it into the future, and makes us really to be pitied. This is, I think,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 are more callous to the sufferings of animals than of men, although a fellow-feeling ought to make us identify ourselves equally with either. We scarcely pity the cart-horse in his shed, for we do not suppose that while he is eating his hay he is thinking of the blows he has received and the labours in store for him. Neither do we pity the sheep grazing in the field, though we know it is about to be slaughtered, for we believe it knows nothing of the fate in store for it. In this way we also become callous to the fate of our fellow-men, and the rich console themselves for the harm done by them to the poor, by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oor are too stupid to feel. I usually judge of the value any one puts on the welfare of his fellow-creatures by what he seems to think of them. We naturally think lightly of the happiness of those we despise. It need not surprise you that politicians speak so scornfully of the people, and philosophers profess to think mankind so wicked.

只有我们认为可怜人觉得自己需要同情时，我们才会同情他们。我们对痛苦的肉身上的感觉比想象的要小一些；是记忆延长了痛苦，而想象将它投射到了未来，让我们觉得真的很可怜。我想，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对动物的痛苦比对人的痛苦则无情得多的原因，尽管同理心本该让我们觉得动物与人是平等的。我们很少同情马厩中的马，因为我们不认为当它在吃草时，它在想自己受到的鞭打和自己即将付出的劳力。我们也不会同情在田野中吃草的绵羊，尽管我们知道它将要被宰杀，因为我们相信它对自己将遭受的命运一无所知。同样，我们对我们的同伴的命运也一样无情，通过假设穷人太笨而感受不到痛苦，富人安慰自己对穷人造成的伤害。通常，我按照一个人如何看待同伴来判断他为他的同伴的福利带来的价值。我们自然不会把自己轻视的人的幸福放在心上。所以当看到政治家谈到人民时那么轻蔑，哲学家承认人类那么邪恶时，不要感到惊讶。

The people are mankind; those who do not belong to the people are so few in number that they are not worth counting. Man is the same in every station of life; if that be so, those ranks to which most men belong deserve most honour. All distinctions of rank fade away before the eyes of a thoughtful person; he sees the same passions, the same feelings in the noble and the guttersnipe; there is merely a slight difference in speech, and more or less artificiality of tone; and if there is indeed any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the disadvantage is all on the side of those who are more sophisticated. The people show themselves as they are, and they are not attractive; but the fashionable world is compelled to adopt a disguise; we should be horrified if we saw it as it really is.

人民构成人类；不是人民的人数太少了而不值得去数。各个地位的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阶级拥有越多的人，就越值得被尊重。在一个有思想的人面前，阶级之间的一切区别都消逝了；他在贵族与流浪儿身上看到的是同样的欲念和感觉；只是在语言上有微小的区别，或多或少只是人为的语调上不同；如果两者间确实有任何重大差别的话，劣等的全是更精于世故的那一方。人民表里如一，

因此不具备吸引力；但时尚的世界则趋向于采取一定的伪装；如果我们看到了它真正的样子，我们会被吓到的。

There is, so our wiseacres tell us, the same amount of happiness and sorrow in every station. This saying is as deadly in its effects as it is incapable of proof; if all are equally happy why should I trouble myself about any one? Let every one stay where he is; leave the slave to be ill-treated, the sick man to suffer, and the wretched to perish; they have nothing to gain by any change in their condition. You enumerate the sorrows of the rich, and show the vanity of his empty pleasures; what barefaced sophistry! The rich man's sufferings do not come from his position, but from himself alone when he abuses it. He is not to be pitied were he indeed more miserable than the poor, for his ills are of his own making, and he could be happy if he chose. But the sufferings of the poor man come from external things, from the hardships fate has imposed upon him. No amount of habit can accustom him to the bodily ills of fatigue, exhaustion, and hunger. Neither head nor heart can serve to free him from the sufferings of his condition. How is Epictetus the better for knowing beforehand that his master will break his leg for him; does he do it any the less? He has to endure not only the pain itself but the pains of anticipation. If the people were as wise as we assume them to be stupid, how could they be other than they are? Observe persons of this class; you will see that, with a different way of speaking, they have as much intelligence and more common-sense than yourself. Have respect then for your species; remember that it consists essentially of the people, that if all the kings and all the philosophers were removed they would scarcely be missed, and things would go on none the worse. In a word, teach your pupil to love all men, even those who fail to appreciate him; act in such way that he is not a member of any class, but takes his

place in all alike: speak in his hearing of the human race with tenderness, and even with pity, but never with scorn. You are a man; do not dishonour mankind.

所以自以为万事通达的人告诉我们，每个阶层的人拥有同样多的快乐与悲伤。这个说法既有害又毫无根据；如果所有人都同样幸福，那我何必为他人而自寻烦恼呢？让每个人留在原地吧；让奴隶被虐待，病人受痛苦，可怜人死亡；他们状况的改变也无法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你们枚举了有钱人的痛苦，指出他外在的享乐都是虚空的；多么露骨的诡辩！有钱人的痛苦不是来自于他的地位，而来自于他自己滥用了他的地位。就算他比穷人更可怜，他也不值得同情，因为他的病都是自找的，如果他选择快乐的话，他就可以快乐。但是穷人的痛苦则来自于外界的事物，来自于加在他身上的艰苦命运。没有任何习惯的方法能让他的身体不感到疲劳、筋疲力尽和饥饿。头脑与心灵都不能将他从他的痛苦境况中释放。埃皮克提图有因为预料到他的主人会打断他的腿而情况更好吗？他的主人难道没有打断他的腿吗？他不仅必须忍受断腿之痛，还得经受预料之苦。如果人民不如我们预料得那么愚蠢，而是相当聪明，他们除了依旧过之前的日子之外还能过怎样的生活呢？观察这个阶层的人；你会发现，你们说话方式不同，而且他们跟你们一样聪明、甚至更具常识。那么尊重你周围的人；记住他们占人民的大多数，如果所有国王和哲学家都不在了，他们也不会消失，事情也不会变得更糟。总而言之，教导你的学生爱所有的人，甚至是那些不欣赏他的人；要表现为他不是任何阶层中的一员，但却同所有阶层在一起。在他面前谈到人类的时候，要带着温柔甚至同情的口吻，切不要带着鄙夷。你是人，所以不要不尊重人。

It is by these ways and others like them—how different from the beaten paths—that we must reach the heart of the young adolescent, and stimulate in him the first impulses of nature; we must develop that heart and open its doors to his fellow-creatures,

and there must be as little self-interest as possible mixed up with these impulses; above all, no vanity, no emulation, no boasting, none of those sentiments which force us to compare ourselves with others; for such comparisons are never made without arousing some measure of hatred against those who dispute our claim to the first place, were it only in our own estimation. Then we must be either blind or angry, a bad man or a fool; let us try to avoid this dilemma. Sooner or later these dangerous passions will appear, so you tell me, in spite of us. I do not deny it. There is a time and place for everything; I am only saying that we should not help to arouse these passions.

通过这样的，跟因循守旧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方式，我们就能到达青年人的内心，激发出最初的自然情感；我们必须培育这颗心灵，使它对他的同类敞开大门，并且要尽可能地在这些情感中减少自私的成分；最重要的是，不要虚荣、竞争、自夸，不要有这些促使我们与他人比较的情感；因为这些比较必定会导致对与我们争先的人的憎恨，不管我们是否仅是自我估计他会争先。否则，我们不是会盲目就是会愤怒，成为一个坏人或愚人；让我们尽力避免这样的困境吧。所以你对我说："不管愿不愿意，这些危险的感情迟早会出现。"我不否认。任何事物都有其时间和地点；我只是在说我们不能促使这些欲念产生。

This is the spirit of the method to be laid down. In this case examples and illustrations are useless, for here we fi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ntless differences of character, and every example I gave would possibly apply to only one case in a hundred thousand. It is at this age that the clever teacher begins his real business, as a student and a philosopher who knows how to probe the heart and strives to guide it aright. While the young man has

not learnt to pretend, while he does not even know the meaning of pretence, you see by his look, his manner, his gestures, the impression he has received from any object presented to him; you read in his countenance every impulse of his heart; by watching his expression you learn to protect his impulses and actually to control them.

这就是我们要采取的方法的灵魂。在这里例子和阐述是没用的，因为从这时起我们发现性格开始有无数区分，而我所给出的每一个例子很可能只能应用于千万个个例中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年纪，能干的老师开始像一个知道如何探寻学生内心、引导它往正确方向行走的研究者和哲学家一般发挥他真正的作用，当一个年轻人还没学会掩饰，甚至还不知道掩饰的含义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他接收任何给予他的事物的外貌、举止、姿势和表情观察他；你可以在他的表情中读取他内心的每一股冲动；通过观察他的神情，你学会保护他的冲动，并控制它们。

It has been commonly observed that blood, wounds, cries and groans, the preparations for painful operations, and everything which directs the senses towards things connected with suffering, are usually the first to make an impression on all men. The idea of destruction, a more complex matter, does not have so great an effect; the thought of death affects us later and less forcibly, for no one knows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what it is to die; you must have seen corpses to feel the agonies of the dying. But when once this idea is established in the mind, there is no spectacle more dreadful in our eyes, whether because of the idea of complete destruction which it arouses through our senses, or because we know that this moment must come for each one of us and we feel ourselves all the more keenly affected by a situation from which we know there is no

escape.

一般而言，血液、伤口、哭喊、呻吟、痛苦的手术操作，以及所有使感官感到疼痛的事物，通常是最先给所有人留下印象的。而毁灭的概念，这个更复杂的事件，却没有这么大的威慑力；死亡的概念对我们影响得迟一些也小一些，因为没有一个人能通过自身的经验知道死亡是什么；你一定看到过尸体才能感受到死亡的痛苦。但是一旦死亡这个想法在头脑中建立，我们就会觉得再没有什么东西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了，不论是因为它给我们的感官带来的完全毁灭的想法，还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刻对每个人来说最终都会到来，而无法避免的状况给我们造成的惊恐尤为强烈。

These various impressions differ in manner and in degree, 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 of each one of us and his former habits, but they are universal and no one is altogether free from them. There are other impressions less universal and of a later growth, impressions most suited to sensitive souls, such impressions as we receive from moral suffering, inward grief, the sufferings of the mind, depression, and sadness. There are men who can be touched by nothing but groans and tears; the suppressed sobs of a heart labouring under sorrow would never win a sigh; the sight of a downcast visage, a pale and gloomy countenance, eyes which can weep no longer, would never draw a tear from them. The sufferings of the mind are as nothing to them; they weigh them, their own mind feels nothing; expect nothing from such persons but inflexible severity, harshness, cruelty. They may be just and upright, but not merciful, generous, or pitiful. They may, I say, be just, if a man can indeed be just without being merciful.

这些不同的印象，根据每个人的性格和习惯，在方式和程度上有不同，但是它们是人人都有的，没有人能避免产生的。也有不那么普遍、产生得更晚的印象，不敏感的人不一定会有，这些印象来自于精神的痛苦、内在的悲伤、精神的折磨、抑郁和忧伤。有些人只能被哭号和泪水打动；被痛苦奴役的压抑着啜泣的心灵永远也得不到他们的一声叹息；而一张颓丧、苍白而阴郁的面容、一双再也哭不出眼泪的眼睛，也不能让他们流出一滴眼泪。精神的折磨对他们来说什么也不是；他们衡量它，他们的头脑却什么也感觉不到；这样的人心里，只有不变的严厉、苛责和残忍。他们也许刚正不阿，但却毫无怜悯、慷慨或者恻隐之心。我认为，如果一个没有怜悯之心的人也能成为正直的人的话，他们或许会成为正直的人。

But do not be in a hurry to judge young people by this standard, more especially those who have been educated rightly, who have no idea of the moral sufferings they have never had to endure; for once again they can only pity the ills they know, and this apparent insensibility is soon transformed into pity when they begin to feel that there are in human life a thousand ills of which they know nothing. As for Emile, if in childhood he was distinguished by simplicity and good sense, in his youth he will show a warm and tender heart; for the reality of the feelings depends to a great extent on the accuracy of the ideas.

但不要急忙按照这个标准评判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他们还从未承受过那样的道德痛苦；因为，我再说一遍，他们只能同情他们知道的病痛，而当他们开始发觉人世间有他们一无所知的万千疼痛时，他们这明显的不敏感会很快变成怜悯的。至于爱弥儿，如果童年的他因为单纯和好品性而出色，青年的他将会展示出一个柔软温柔的心灵；因为感觉的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念是否准确。

But why call him hither? More than one reader will reproach me no doubt for departing from my first intention and forgetting the lasting happiness I promised my pupil. The sorrowful, the dying, such sights of pain and woe, what happiness, what delight is this for a young heart on the threshold of life? His gloomy tutor, who proposed to give him such a pleasant education, only introduces him to life that he may suffer. This is what they will say, but what care I? I promised to make him happy, not to make him seem happy. Am I to blame if, deceived as usual by the outward appearances, you take them for the reality?

但是为什么在这里提到他呢？无疑不止一个读者会指责我偏离了最初的想法、忘记了我对自己学生承诺过的那种持久的幸福。这样悲伤、死亡、痛苦的场景，对于站在人生开端的年轻人是怎样的幸福和快乐？他那可怜的导师，那个曾许诺要给他这种令人愉悦的教育的导师，不过是叫他去过可能受苦的生活罢了。这是他们会说的，但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承诺过要让他快乐，不是让他看起来快乐。如果，你把外在的表象像往常一样当作现实而受骗，是否该责备我呢？

Let us take two young men at the close of their early education, and let them enter the world by opposite doors. The one mounts at once to Olympus, and moves in the smartest society; he is taken to court, he is presented in the houses of the great, of the rich, of the pretty women. I assume that he is everywhere made much of, and I do not regard too closely the effect of this reception on his reason; I assume it can stand it. Pleasures fly before him, every day provides him with fresh amusements; he flings himself into everything with an eagerness which carries you away. You find him busy, eager, and curious; his first wonder makes a great impression on you; you

think him happy; but behold the state of his heart; you think he is rejoicing, I think he suffers.

现在假定有两个受过初步教育的青年人从截然相反的两扇门进入社会。一个立即登上了奥林匹斯山，活跃于最体面的上流社会；有人带他出入宫廷，出入伟人、富人和名媛之家。我假设他到哪里都受欢迎，但我看不出这对他的理智有何益处；我假设他的理智能经受住诱惑。快乐的事情纷至沓来，每天都是如此；他总能保持一颗好奇的心，连你也受到他的感染。你发现他忙碌、渴望而又好奇；他最初的疑惑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你认为他很快乐；但是看看他的心境；你认为他是快乐的，我认为他受着折磨。

What does he see when first he opens his eyes? all sorts of so-called pleasures, hitherto unknown. Most of these pleasures are only for a moment within his reach, and seem to show themselves only to inspire regret for their loss. Does he wander through a palace; you see by his uneasy curiosity that he is asking why his father's house is not like it. Every question shows you that he is comparing himself all the time with the owner of this grand place. And all the mortification arising from this comparison at once revolts and stimulates his vanity. If he meets a young man better dressed than himself, I find him secretly complaining of his parents' meanness. If he is better dressed than another, he suffers because the latter is his superior in birth or in intellect, and all his gold lace is put to shame by a plain cloth coat. Does he shine unrivalled in some assembly, does he stand on tiptoe that they may see him better, who is there who does not secretly desire to humble the pride and vanity of the young fop? Everybody is in league against him; the disquieting glances of a solemn man, the biting phrases of some satirical person, do not fail to reach him, and if it were only one man who

despised him, the scorn of that one would poison in a moment the applause of the rest.

他第一次睁开眼时看到的是什么呢？所有种类的所谓财产，迄今为止是他仍未见过的。大多数这些财产只是让他短时间接触一下，并似乎只是为了激发对于失去它们的悔恨而出现。当他在豪华住宅中漫步时，你可以看出他不自然的好奇，他在问为什么父亲的房子不是如此。每一个问题都表明他一直都在将自己与这个富丽之地的主人相比。而从这种比较中升腾起的羞耻感则立即抗拒而又催生出他的骄傲。如果他遇见了比他穿着更好的年轻人，我就发现他在悄悄地抱怨父母的小气。如果他比别人穿得更好，他却因为后者比他年长或比他更聪明而受到折磨，在一件普通布衣面前，他镶满金边的衣服让他感到羞耻。假若他在一群人中显得最为耀眼，假若他因此就伸长脖子使人们能更好地看到他，这时，谁不悄悄渴望着打击这年轻纨绔子弟的神气呢？每个人都联合敌对他；一个冷峻男子令人不安的几瞥，一些惯于讽刺的人刻薄话，都成功被他发现，并且哪怕只有一个人鄙视他，这个人的轻蔑神情在一瞬间就会使其余的嘉许受到破坏。

Let us grant him everything, let us not grudge him charm and worth; let him be well-made, witty, and attractive; the women will run after him; but by pursuing him before he is in love with them, they will inspire rage rather than love; he will have successes, but neither rapture nor passion to enjoy them. As his desires are always anticipated; they never have time to spring up among his pleasures, so he only feels the tedium of restraint. Even before he knows it he is disgusted and satiated with the sex formed to be the delight of his own; if he continues its pursuit it is only through vanity, and even should he really be devoted to women, he will not be the only brilliant, the only attractive young man, nor will he always find his mistresses prodigies of fidelity.

让我们将一切授予他，让我们不要嫉妒他的魅力和价值；让他做好人，聪明、有魅力；女人们会追随他；但在他爱上她们之前追求他，她们会激起怒气而非爱情；他会多次成功，但既不欣喜也无激情去享受与她们在一起。因为他的欲望总可以被预见；她们从没有时间激起他的兴致，因此他只感到约束的单调。那些原本想让他快乐的女性，在他没有意识到之前，就令他厌倦、烦腻了；假使他继续追求这事，也只是出于无聊，即使他真的爱上了女人，他也不会仍是那唯一智慧、有魅力的年轻男子了，不会在他的情人中找到忠贞佳人了。

I say nothing of the vexation, the deceit, the crimes, and the remorse of all kinds, inseparable from such a life. We know that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disgusts us with it; I am speaking only of the drawbacks belonging to youthful illusions.

我对烦恼、欺骗、犯罪、所有形式的懊悔，这些与这样的生活不可分割的事物，什么都没有说。我们知道世界上这些经验令我们感到恶心；我只是在提属于年轻时的幻想的缺点。

Hitherto the young man has lived in the bosom of his family and his friends, and has been the sole object of their care; what a change to enter all at once into a region where he counts for so little; to find himself plunged into another sphere, he who has been so long the centre of his own. What insults, what humiliation, must he endure, before he loses among strangers the ideas of his own importance which have been formed and nourished among his own people! As a child everything gave way to him, everybody flocked to him; as a young man he must give place to every one, or if he preserves ever so little of his former airs, what harsh lessons will

bring him to himself! Accustomed to get everything he wants without any difficulty, his wants are many, and he feels continual privations. He is tempted by everything that flatters him; what others have, he must have too; he covets everything, he envies every one, he would always be master. He is devoured by vanity, his young heart is enflamed by unbridled passions, jealousy and hatred among the rest; all these violent passions burst out at once; their sting rankles in him in the busy world, they return with him at night, he comes back dissatisfied with himself, with others; he falls asleep among a thousand foolish schemes disturbed by a thousand fancies, and his pride shows him even in his dreams those fancied pleasures; he is tormented by a desire which will never be satisfied. So much for your pupil; let us turn to mine.

迄今为止这个年轻人一直活在他的家庭与朋友的怀抱中，也一直是他们关心的焦点；一下子进入这样一个他一文不值的领地是多么大的变化；他发现自己落入了另一个地方，他可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以自己为中心啊。他的重要性，一直在他的亲友中产生并维持，却在陌生人面前消失殆尽，这时他必须得承受怎样的辱骂、怎样的羞辱啊！还是个孩子时，一切事物都给他让路，人人簇拥着他；成人后，他必须让位给每个人，而假如他为过去的自己留下哪怕很小的空间，将会给他自己招致怎样深刻的教训！他已经习惯了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他想要的一切，因此他想要的有很多，他不断地感到匮乏。任何衬托他的事物都引诱着他；别人有什么，他一定也要有；他贪求一切事物，他嫉妒所有的人，他希望自己永远优秀。他被自大吞噬，他年轻的心被不加拘束的感情、妒忌和对其他人的憎恨所点燃；这一切汹涌的感情顷刻间爆发了；它们带来的刺痛让他在忙碌的世界中痛苦不已；这些痛苦随他在夜晚一起回来，他回来时带着对自己、对他人的不满；他在成千上万的幻想捣扰出的成千上万的愚蠢场景中睡去，他的傲慢甚至在他的睡梦中仍显示出幻想的快乐；他被永不能被满足的欲望折磨。这些对你的学生来说太沉重了；让我们到我这里来吧。

If the first thing to make an impression on him is something sorrowful his first return to himself is a feeling of pleasure. When he sees how many ills he has escaped he thinks he is happier than he fancied. He shares the suffering of his fellow-creatures, but he shares it of his own free will and finds pleasure in it. He enjoys at once the pity he feels for their woes and the joy of being exempt from them; he feels in himself that state of vigour which projects us beyond ourselves, and bids us carry elsewhere the superfluous activity of our well-being. To pity another's woes we must indeed know them, but we need not feel them. When we have suffered, when we are in fear of suffering, we pity those who suffer; but when we suffer ourselves, we pity none but ourselves. But if all of us, being subject ourselves to the ills of life, only bestow upon others the sensibility we do not actually require for ourselves, it follows that pity must be a very pleasant feeling, since it speaks on our behalf; and, on the other hand, a hard-hearted man is always unhappy, since the state of his heart leaves him no superfluous sensibility to bestow on the sufferings of others.

如果第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伤心的事，他对自己的第一次回归则怀有一种愉悦的情感。当他看到他逃脱了多少病痛时，他会认为自己比想象中更快乐。他分享他同类的痛苦，但是带着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寻求其中的愉悦分享的。他立即感受到自己对于他们不幸的遗憾和得以免遭不幸的喜悦；他在自己身上感到能让我们超越自身的那种活力状态，并告诉我们将我们良好生活的多余活动带到别处。要感叹他人的不幸，我们确实需要了解他们，但我们不需要感受他们。当我们受到磨难，当我们害怕磨难，我们同情那些遭受磨难的人；但是当我们自己受苦时，我们除了自己什么也不同情。但如果我们所有人，作为生活中磨难的主人公，仅仅赋予他人我们自己实际上不需要的情感，那么同情一定是一种非常令人愉悦的感受，因为它代表我们发

言，并且，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总是不快乐的，因为在他心里没有一点为别人的痛苦而留的情感。

We are too apt to judge of happiness by appearances; we suppose it is to be found in the most unlikely places, we seek for it where it cannot possibly be; mirth is a very doubtful indication of its presence. A merry man is often a wretch who is trying to deceive others and distract himself. The men who are jovial, friendly, and contented at their club are almost always gloomy grumblers at home, and their servants have to pay for the amusement they give among their friends. True contentment is neither merry nor noisy; we are jealous of so sweet a sentiment, when we enjoy it we think about it, we delight in it for fear it should escape us. A really happy man says little and laughs little; he hugs his happiness, so to speak, to his heart. Noisy games, violent delight, conceal the disappointment of satiety. But melancholy is the friend of pleasure; tears and pity attend our sweetest enjoyment, and great joys call for tears rather than laughter.

我们太容易从表面评价幸福；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在它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找到它，我们在它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寻找它；欢笑能否代表它的存在是值得怀疑的。一个欢乐的人往往是一个试图欺骗他人、愚弄自己的可怜人。那些在交际场所快乐、友好、满足的人们在家里几乎总是忧郁的抱怨者，他们的仆人不得不代他们受他们取悦朋友时的那种苦。真正的满足既不是喜悦又不会喧闹；我们如此珍视这种甜蜜的感觉，当我们享受它时我们思索它，我们对它感到高兴并怕它会逃离我们。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寡言少笑；可以说，他发自内心地拥抱他的幸福。喧闹地穷欢作乐是失望和烦恼的烟幕。但忧郁是愉快的朋友；眼泪和遗憾与我们最甜蜜的享受同行，并且最大的喜悦招致泪水而非欢笑。

If at first the number and variety of our amusements seem to contribute to our happiness, if at first the even tenor of a quiet life seems tedious, when we look at it more closely we discover that the pleasantest habit of mind consists in a moderate enjoyment which leaves little scope for desire and aversion. The unrest of passion causes curiosity and fickleness; the emptiness of noisy pleasures causes weariness. We never weary of our state when we know none more delightful. Savages suffer less than other men from curiosity and from tedium; everything is the same to them—themselves, not their possessions—and they are never weary.

如果一开始我们欢乐的数量与花样似乎有助于我们的幸福，如果一开始平平淡淡的宁静生活似乎冗长无趣，当我们更近距离观察它时，我们会发现头脑最愉快的习惯就在于有节制的享受，这给欲望和厌恶留下极少的空间。不止息的欲望带来好奇和浮躁；喧闹欢愉的空虚带来疲乏。当我们不知道更令人欣喜的事情时，我们从不厌倦自己的处境。在全人类中，野蛮人最没有好奇心也最不受烦恼折磨的；所有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无所谓，他们所喜爱的不是各种各样的东西而是他们的自身，他们一生无所事事，因此也就从来不觉得烦恼。

The man of the world almost always wears a mask. He is scarcely ever himself and is almost a stranger to himself; he is ill at ease when he is forced into his own company. Not what he is, but what he seems, is all he cares for.

世上的人几乎总是戴着面具。他很少作他自己，甚至对自己来说是个陌生人；当不得不与自己独处时，他感到局促不安。他在乎的全部，不在于他是什么样的人，而在于他看上去像什么样的人。

I cannot help picturing in the countenance of the young man I have just spoken of an indefinable but unpleasant impertinence, smoothness, and affectation, which is repulsive to a plain man, and in the countenance of my own pupil a simple and interesting expression which indicates the real contentment and the calm of his mind; an expression which inspires respect and confidence, and seems only to await the establishment of friendly relations to bestow his own confidence in return. It is thought that the expression is merely the development of certain features designed by nature. For my own part I think that over and above this development a man's face is shaped, all unconsciously, by the frequent and habitual influence of certain affections of the heart. These affections are shown on the face, there is nothing more certain; and when they become habitual, they must surely leave lasting traces. This is why I think the expression shows the character, and that we can sometimes read one another without seeking mysterious explanations in powers we do not possess.

我忍不住想象，在我刚刚提到的年轻男子的面容上有着无法表述而令人不快的无礼、油滑和做作，令世人厌恶；而在我自己学生的面容，流露出简单而有趣的神情，展示着他精神的真正满足与平静；它激发出尊重与自信，好像只是在等待着友谊的建立，以回报他自己的信任。因而，表情只是某些由自然设计的某些特征发展的结果。在我看来，除了这种发展以外，我认为人类表情是在心中某些情感的经常性和习惯性影响下不知不觉形成的。这些情感表现在脸上，没有比这更为确定的了；而当它们成为习惯性的表情时，它们确定无疑地留下了持久的痕迹。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表情显示性格，并且有时候我们可以不用通过我们不能掌握的能力去寻找奇妙的解释，就能读懂其他人。

A child has only two distinct feelings, joy and sorrow; he laughs or he cries; he knows no middle course, and he is constantly passing from one extreme to the other. On account of these perpetual changes there is no lasting impression on the face, and no expression; but when the child is older and more sensitive, his feelings are keener or more permanent, and these deeper impressions leave traces more difficult to erase; and the habitual state of the feelings has an effect on the features which in course of time becomes ineffaceable. Still it is not uncommon to meet with men whose expression varies with their age. I have met with several, and I have always found that those whom I could observe and follow had also changed their habitual temper. This one observation thoroughly confirmed would seem to me decisive, and it is not out of place in a treatise on education, where it is a matter of importance, that we should learn to judge the feelings of the heart by external signs.

一个孩子只有两种显著的情感，快乐和忧伤；他要么笑，要么哭；他没有灰色地带，并总是从一种极端到达另一种极端。由于这些变化长期进行，人的面容不会留有持久的印记和表情；但当孩子长大些，更敏感些，他的情感就更加敏感或持久，并且这些更深的印象会留下更难以抹除的痕迹；这些习惯性的情感状态对容貌具有影响，并随着时间的进程更加无法抹去。碰到面部随着年龄而改变的人，仍然很正常。我就碰到了几个，并且我总发现那些我能够观察和跟随的人也转变了他们惯常的脾气。这一观察对我来说完全确认了我所确信的事实，并且也能够写入教育专著中，这一点很重要，即我们需要学着去通过外在的信号判断内心的情感。

I do not know whether my young man will be any the less amiable for not having learnt to copy conventional manners and to

feign sentiments which are not his ow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at present, I only know he will be more affectionate; and I find it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he, who cares for nobody but himself, can so far disguise his true feelings as to please as readily as he who finds fresh happiness for himself in his affection for others. But with regard to this feeling of happiness, I think I have said enough already for the guidance of any sensible reader, and to show that I have not contradicted myself.

我不知道我年轻的孩子是否会因为不懂得模仿习俗的行为和装出他没有的情感而没有那么讨人喜爱；目前我不关心这一点；我只知道，他会越来越富有感情；我也很难相信，只在意自己、不在意任何人的他，能够掩饰他真正的感觉，像一个总能从同情他人中获得快乐的人那样快乐。但是关于这种幸福感，我认为我说得已经足够了，既能引导任何明智的读者，也能表明我并没有前后矛盾。

I return to my system, and I say, when the critical age approaches, present to young people spectacles which restrain rather than excite them; put off their dawning imagination with objects which, far from inflaming their senses, put a check to their activity. Remove them from great cities, where the flaunting attire and the boldness of the women hasten and anticipate the teaching of nature, where everything presents to their view pleasures of which they should know nothing till they are of an age to choose for themselves. Bring them back to their early home, where rural simplicity allows the passions of their age to develop more slowly; or if their taste for the arts keeps them in town, guard them by means of this very taste from a dangerous idleness. Choose carefully their company, their occupations, and their pleasures; show them nothing but modest and pathetic pictures which are touching but

not seductive, and nourish their sensibility without stimulating their senses. Remember also, that the danger of excess is not confined to any one place, and that immoderate passions always do irreparable damage. You need not make your pupil a sick-nurse or a Brother of Pity; you need not distress him by the perpetual sight of pain and suffering; you need not take him from one hospital to another, from the gallows to the prison. He must be softened, not hardened, by the sight of human misery. When we have seen a sight it ceases to impress us, use is second nature, what is always before our eyes no longer appeals to the imagination, and it is only through the imagination that we can feel the sorrows of others; this is why priests and doctors who are always beholding death and suffering become so hardened. Let your pupil therefore know something of the lot of man and the woes of his fellow-creatures, but let him not see them too often. A single thing, carefully selected and shown at the right time, will fill him with pity and set him thinking for a month. His opinion about anything depends not so much on what he sees, but on how it reacts on himself; and his lasting impression of any object depends less on the object itself than on the point of view from which he regards it. Thus by a sparing use of examples, lessons, and pictures, you may blunt the sting of sense and delay nature while following her own lead.

回过头谈谈我的体系。我认为，当关键时期来临时，要向年轻人展示一些会限制而非刺激他们欲念的情景；用不仅不会刺激他们的感官、而且会限制他们的想象力的活动的事物来遏制他们日益成长的想象力。让他们远离大城市，这些城市中张扬的服饰、大胆的女人加速并提早了自然的教育，这里一切事物向他们展示着在他们到达能为自己做选择的年龄之前应该一无所知的各种享受。带他们回到早期的家，那里乡村的简朴能使他们那个年龄的情感发展得稍慢一些；或者假如他们对艺术的品味将他们留在城镇里，通过这种品味能护卫他们

不受危险的懒惰之害。细心地选择他们的伙伴、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娱乐方式；除了感人但不具有诱惑力的关于谦逊与怜悯的情景之外什么都不要向他们展示，不要激发他们的感官，要滋养他们的感情。同样要记住，到处都有越线的危险，无节制的感情经常会带来不可挽回的危害。你不需要将自己的学生培养成一个护士或一个会同情兄弟的人；你不需要用一种永恒的痛苦煎熬的场景让他忧伤；你不需要把他从一个医院带到另一个医院，从绞刑架带到监狱。在人类悲惨的场景面前，他的心肠必须变软，而不是变硬。当我们看到不再触动我们的场景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对它习以为常了，经常在我们眼前的场景不再激发我们的想象，也是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感受到他人的悲伤；这就是为什么，看惯了死亡与苦难的牧师和医生的心灵变得如此刚硬。因此让你的学生知道一些人类的命运和他同类的悲伤，但不要让他看的次数太多。单独一件事，若仔细挑选并在恰当的时候发生的话，会让他倍感悲伤，使他思考一个月。他对于任何事情的看法不太取决于他所看到的是什么，而在于这件事让他有什么反应；他对任何事物长期的印象在于他如何看待这件事，而非由于这件事本身。因此过多地使用例子、课程和图片，你可能会使学生的感觉变迟钝，在顺应自然的引领时，却阻碍了她的脚步。

As he acquires knowledge, choose what ideas he shall attach to it; as his passions awake, select scenes calculated to repress them. A veteran, as distinguished for his character as for his courage, once told me that in early youth his father, a sensible man but extremely pious, observed that through his growing sensibility he was attracted by women, and spared no pains to restrain him; but at last when, in spite of all his care, his son was about to escape from his control, he decided to take him to a hospital, and, without telling him what to expect, he introduced him into a room where a number of wretched creatures were expiating, under a terrible treatment, the vices which had brought them into this plight. This hideous and revolting spectacle sickened the young man. “Miserable libertine,”

said his father vehemently, “begone; follow your vile tastes; you will soon be only too glad to be admitted to this ward, and a victim to the most shameful sufferings, you will compel your father to thank God when you are dead.”

当他获取知识时，选择他会践行的观点；当他的欲念觉醒时，选择你打算让他的欲念受到克制的场景。一个智勇双全的老兵曾经对我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一个重感情而又极度虔诚的人）发现他日渐沉迷美色，因此不遗余力地阻止他；但是最后，当尽管父亲用尽了办法，他却总有办法脱离管束时，父亲决定带他去花柳病医院。父亲事先什么也没告诉他，就带他到了一个有许多花柳病人的房间，这些病人因为过去做的丑事，不得不来这里接受可怕的治疗。这可怕恶心的景象令他感到难过。“可怜的花花公子，”他父亲热切地说，“去吧；跟随你低俗的品味吧；你将很快来到这里，成为最羞耻病痛的受害者，你会使你父亲因为你的死亡而感谢上帝！”

These few words, together with the striking spectacle he beheld, made an impression on the young man which could never be effaced. Compelled by his profession to pass his youth in garrison, he preferred to face all the jests of his comrades rather than to share their evil ways. “I have been a man,” he said to me, “I have had my weaknesses, but even to the present day the sight of a harlot inspires me with horror.” Say little to your pupil, but choose time, place, and people; then rely on concrete examples for your teaching, and be sure it will take effect.

这寥寥数语，与他所看到的惊人景象一起，给这个青年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职业的原因，他在军营中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但他宁愿受到同伴的嘲笑，也不愿跟他们一样过浪荡的生

活。“我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对我说，“我有我的弱点。但直到如今，看娼妓一眼都使我看到害怕。”所以要对学生少说多做，选择时间、地点、人物；教学时用具体事例，并确信它会产生效果。

The way childhood is spent is no great matter; the evil which may find its way is not irremediable, and the good which may spring up might come later. But it is not so in those early years when a youth really begins to live. This time is never long enough for what there is to be done, and its importance demands unceasing attention; this is why I lay so much stress on the art of prolonging it. One of the best rules of good farming is to keep things back as much as possible. Let your progress also be slow and sure; prevent the youth from becoming a man all at once. While the body is growing the spirits destined to give vigour to the blood and strength to the muscles are in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elaboration. If you turn them into another channel, and permit that strength which should have gone to the perfecting of one person to go to the making of another, both remain in a state of weakness and the work of nature is unfinished. The workings of the mind, in their turn, are affected by this change, and the mind, as sickly as the body, functions languidly and feebly. Length and strength of limb are not the same thing as courage or genius, and I grant that strength of mind does not always accompany strength of body, when the means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are otherwise faulty. But however well planned they may be, they will always work feebly if for motive power they depend upon an exhausted, impoverished supply of blood, deprived of the substance which gives strength and elasticity to all the springs of the machinery. There is generally more vigour of mind to be found among men whose early years have been preserved from precocious vice, than among those whose evil living has begun at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 and this is no

doubt the reason why nations whose morals are pure are generally superior in sense and courage to those whose morals are bad. The latter shine only through I know not what small and trifling qualities, which they call wit, sagacity, cunning; but those great and noble features of goodness and reason, by which a man is distinguished and honoured through good deeds, virtues, really useful efforts, are scarcely to be found except among the nations whose morals are pure.

儿童时期是如何度过的并不重要；期间养成的恶习并非不可救药，形成的美德可能晚些才会产生效果。但就一个青年人真正开始活着的几个早期年头来说，情况却非如此。这段时期对于需要完成的事情来说不够长，而它的重要性却需要得到不断的注意；我如此强调延长这段时间的技巧，原因就在这里。要种植好的庄稼，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尽可能延缓它的生长。让你的进步也缓慢而坚定吧；要防止突然间，青年就成长为成年人。当身体在成长的时候，精神也在成长，它给血液活力，给肌肉力量，让其成型、精致。如果你让精神转到其他地方，并允许用来完善一个人的力量施加在另一个人身上，这两个人最后都会羸弱不堪，自然的工作也无法完成。因而，精神的发育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由于身体的羸弱，也只能起微弱的作用。四肢的长度与力量与勇气或智慧不同，我保证当身体与精神之间的联系出现错误时，精神的力量并不总是随着身体的力量产生。即使它们发展得很均衡，由于依赖的是血液，而血液又是枯竭贫瘠的、缺乏给机器运转之源头提供力量和弹性的物质，因而精神总是会无力运转的。一般而言，那些早年没有早熟的人比那些很早就开始过浪荡生活的人要更有活力；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品德淳朴的国家比起那些道德败坏的国家一般更善良和勇敢的原因。道德败坏者只有在一些微小的、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却被他们称为才智、远见、狡猾的品质上显得英俊；只有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才能通过他们的好行为、美德和真正有用的努力，使他们的善良和理智伟大而高尚的特征得到彰显，而这些品质除了在道德淳朴的国家外很少见到。

Teachers complain that the energy of this age makes their pupils unruly; I see that it is so, but are not they themselves to blame? When once they have let this energy flow through the channel of the senses, do they not know that they cannot change its course? Will the long and dreary sermons of the pedant efface from the mind of his scholar the thoughts of pleasure when once they have found an entrance; will they banish from his heart the desires by which it is tormented; will they chill the heat of a passion whose meaning the scholar realises? Will not the pupil be roused to anger by the obstacles opposed to the only kind of happiness of which he has any notion? And in the harsh law imposed upon him before he can understand it, what will he see but the caprice and hatred of a man who is trying to torment him? Is it strange that he rebels and hates you too?

老师们抱怨说这个年龄的孩子活力十足，使得他们难以管教；我认为确实如此，但应该怪的难道不就是老师们自己吗？当他们一让感官来表达学生们的精力的时候，他们难道不知他们改变不了其发展方向吗？一位学究先生一通冗长乏味的说教，就能抹去学生们心中已经萌发的想象中的快乐情景吗？就能从他心中消除那些折磨他的欲望吗？就能使他把已经知道的情感热情冷却下来吗？在他所了解的唯一通往幸福的道路上摆设这些障碍，不会使他感到愤慨吗？在他还不明白的时候就将严苛戒律强加在他的身上，他不将这看做一个存心折磨他的人对他的任意妄为和心存怨恨，又能怎么看呢？他若反抗并且恨你，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I know very well that if one is easy-going one may be tolerated, and one may keep up a show of authority. But I fail to see the use of an authority over the pupil which is only maintained by fomenting

the vices it ought to repress; it is like attempting to soothe a fiery steed by making it leap over a precipice.

我的确认为，一个平易近人的人更易受到他人的包容，并保持表面的威信。但我还不明白，这样的权威用在学生身上有什么用处，因为它将促使学生产生种种恶习，而这些恶习理应由这样的权威来克服；这种做法就如同骑马人为了驯服烈马，而让它去跳万丈悬崖。

Far from being a hindrance to education, this enthusiasm of adolescence is its crown and coping-stone; this it is that gives you a hold on the youth's heart when he is no longer weaker than you. His first affections are the reins by which you control his movements; he was free, and now I behold him in your power. So long as he loved nothing, he was independent of everything but himself and his own necessities; as soon as he loves, he is dependent on his affections. Thus the first ties which unite him to his species are already formed. When you direct his increasing sensibility in this direction, do not expect that it will at once include all men, and that the word “mankind” will have any meaning for him. Not so; this sensibility will at first confine itself to those like himself, and these will not be strangers to him, but those he knows, those whom habit has made dear to him or necessary to him, those who are evidently thinking and feeling as he does, those whom he perceives to be exposed to the pains he has endured, those who enjoy the pleasures he has enjoyed; in a word, those who are so like himself that he is the more disposed to self-love. It is only after long training, after much consideration as to his own feelings and the feelings he observes in others, that he will be able to generalise his individual notions under the abstract idea of humanity, and add to his individual affections those which may identify him with the

race.

青年时期的这股热情不仅不是教育的阻碍，而正是它的压力与动力；正是这股热情，能让你在他跟你一般强壮的时候，还能约束他的心。他的最初情感如一股缰绳，借着它你能够指导他的行动；他过去是自由的，现在我却看到他在你的束缚之下。只要他一无所爱，他就独立物外，只属于他与他自己的需要。一旦他有所爱了，他就受制于他的感情。就这样，将他与人类联结起来的最初的联系就形成了。当你将他日益增长的感情导向人类时，不要期望它会马上涉及所有的人，以及“人类”这个词语对他会有任何意义。不会是这样的；这种情感最初只会牵涉与他相似的人，这些人不会是他不认识的人，而是他了解的人，是他一直珍惜并且需要的人，是很明显地跟他有着共同想法和感受的人，是跟他同甘共苦的人；简言之，是跟他极为相似，从而让他更加自爱的人。只有在长期训练之后，在他对自己的情感和在他人身上观察到的情感有了许多研究之后，他才能将他的个人观念归纳为人类这个抽象的概念，他才能在个人的爱之外，产生使他和整个人类如一体般的爱。

When he becomes capable of affection, he becomes aware of the affection of others [1_2] , and he is on the lookout for the signs of that affection. Do you not see how you will acquire a fresh hold on him? What bands have you bound about his heart while he was yet unaware of them! What will he feel, when he beholds himself and sees what you have done for him; when he can compare himself with other youths, and other tutors with you! I say, “When he sees it,” but beware lest you tell him of it; if you tell him he will not perceive it. If you claim his obedience in return for the care bestowed upon him, he will think you have over-reached him; he will see that while you profess to have cared for him without reward, you meant to saddle him with a debt and to bind him to a

bargain which he never made. In vain you will add that what you demand is for his own good; you demand it, and you demand it in virtue of what you have done without his consent. When a man down on his luck accepts the shilling which the sergeant professes to give him, and finds he has enlisted without knowing what he was about, you protest against the injustice; is it not still more unjust to demand from your pupil the price of care which he has not even accepted!

当他有能力爱人的时候，他也能察觉他人的爱了 [2_2] ，也就在时时留意他人的这种爱的迹象了。你是否发现你又有了新的管控他的方法了？在他尚未察觉的时候，你就在他的心上绑上了多么多的锁链啊！当他看到自己，看到你对他做了什么时；当他会将自己与其他青年人相比较、将你与其他老师相比较时，他会怎么想啊？我所说的是“当他发现这一点”，注意你可别把这事告诉他；如果你告诉了他，他就不能自己去发现这一点了。如果你为自己对他倾注的关心而要求他顺从你的话，他会认为你用了先下手为强的办法；他会明白，当你声称自己对他的关爱不求回报的时候，你企图的是让他身负债务，用一个他从未答应的契约束缚他。你会辩驳，说你要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好，但都无济于事；因为是你要求他做的，而且是因为你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要求他的。当一个贫苦人接受了士兵声称要给他的先令，结果却发现不问他是否愿意，他的名字就登上了新兵的花名册上，你会为这不公正的待遇鸣不平；要求你的学生在还没有答应的情况下，就要为你的关心付出代价，这难道不是更不公平吗！

Ingratitude would be rarer if kindness were less often the investment of a usurer. We love those who have done us a kindness; what a natural feeling! Ingratitude is not to be found in the heart of man, but self-interest is there; those who are ungrateful for benefits received are fewer than those who do a kindness for their own ends.

If you sell me your gifts, I will haggle over the price; but if you pretend to give, in order to sell later on at your own price, you are guilty of fraud; it is the free gift which is beyond price. The heart is a law to itself; if you try to bind it, you lose it; give it its liberty, and you make it your own.

如果大家都少做放高利贷者般施小恩忘厚报之事，忘恩负义的行为也会少一些的。我们爱那些曾施与我们恩惠的人；这是一种多么自然的感情！忘恩负义有违人的本心，但自私是自然的；忘恩负义的人比施恩图报的人要少。如果你要把你的东西卖给我，我会与你讨价还价；但是如果你假装要送给我，是为了之后按照你自己的价格来卖，你就是蓄意欺诈了；无偿之物成为了无价之物。心灵是自己的法律；如果你想束缚它，则会失去它；如果你给它自由，反倒将它束紧了。

When the fisherman baits his line, the fish come round him without suspicion; but when they are caught on the hook concealed in the bait, they feel the line tighten and they try to escape. Is the fisherman a benefactor? Is the fish ungrateful? Do we find a man forgotten by his benefactor, unmindful of that benefactor? On the contrary, he delights to speak of him, he cannot think of him without emotion; if he gets a chance of showing him, by some unexpected service, that he remembers what he did for him, how delighted he is to satisfy his gratitude; what a pleasure it is to earn the gratitude of his benefactor. How delightful to say, “It is my turn now.” This is indeed the teaching of nature; a good deed never caused ingratitude.

当渔夫放下鱼饵，鱼便会放心地游到他的周围；但当被鱼饵中隐藏的鱼钩吊住的时候，它们会感到鱼线拉紧，便会试图逃离。渔夫可

算作施恩的人吗？是鱼忘恩负义吗？尽管被恩人忘记，受恩者又怎会忘记他的恩人呢？相反，他乐于谈到他的恩人，他无法不带有感情地想到他；当他一有机会向恩人效劳，来表达他还记得他恩人的恩惠，他会多么开心地表达他的感谢啊；能赢得他恩人的感激，是怎样的欢欣！“现在轮到我来帮助你啦！”这样的话说出来是多么令人愉悦啊！这是来自天性的教导；真正的恩惠是绝不会被遗忘的。

If therefore gratitude is a natural feeling, and you do not destroy its effects by your blunders, be sure your pupil, as he begins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your care for him, will be grateful for it, provided you have not put a price upon it; and this will give you an authority over his heart which nothing can overthrow. But beware of losing this advantage before it is really yours, beware of insisting on your own importance. Boast of your services and they become intolerable; forget them and they will not be forgotten. Until the time comes to treat him as a man let there be no question of his duty to you, but his duty to himself. Let him have his freedom if you would make him docile; hide yourself so that he may seek you; raise his heart to the noble sentiment of gratitude by only speaking of his own interest. Until he was able to understand I would not have him told that what was done was for his good; he would only have understood such words to mean that you were dependent on him and he would merely have made you his servant. But now that he is beginning to feel what love is, he also knows what a tender affection may bind a man to what he loves; and in the zeal which keeps you busy on his account, he now sees not the bonds of a slave, but the affection of a friend. Now there is nothing which carries so much weight with the human heart as the voice of friendship recognised as such, for we know that it never speaks but for our good. We may think our friend is mistaken, but we never believe he is deceiving us. We may reject his advice now and then,

but we never scorn it.

因此，如果说感恩是一种自然之情，而你也没有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毁掉它的影响，当你的学生开始明白你对他的关心的价值时，确保你的学生会因此感激你，条件是你没有所要回报。；而这也会在他心目中树立起你无可匹敌的威信。但是，在你还没有真正树立这种威信之前，注意不要过分强调自己有多重要，以免失去这样的威信。自我吹嘘会令他们不耐烦；不提它们反倒会让它们被记住。直到能把他当作真正的男人对待之前，你要让他确定不疑，他有对自己的责任，而非对你的责任。要让他顺服你，就要给他自由；悄悄躲起来，使他来找你；只谈他自己的利益的，便能在他心中培养出感恩的高尚情操。在他还不能够理解之前，我不会告诉他我做的一切是为他好；他只会把这样的话理解为是你依赖他，只会把你当作他的仆人。但现在他已经开始懂得什么是爱了，他也知道亲密的关系会让人同他所爱的相结合了；现在，在你不停歇地为他服务的热情中，他看到的不再是奴隶的依附，而是朋友的感情。现在没有什么能像被这样理解的友谊之声一样在人类的心里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声音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自己好。我们也许会认为我们的朋友做错了，但我们绝不会认为他在欺骗我们。我们也许会时不时地拒绝他的建议，但我们绝不会轻视它。

We have reached the moral order at last; we have just taken the second step towards manhood. If this were the place for it, I would try to show how the first impulses of the heart give rise to the first stirrings of conscience, and how from the feelings of love and hatred spring the first notions of good and evil. I would show that justice and kindness are no mere abstract terms, no mere moral conceptions framed by the understanding, but true affections of the heart enlightened by reason, the natural outcome of our primitive affections; that by reason alone, unaided by conscience, we cannot

establish any natural law, and that all natural right is a vain dream if it does not rest upon some instinctive need of the human heart. [1_3] But I do not think it is my business at present to prepare treatises on metaphysics and morals, nor courses of study of any kind whatsoever; it is enough if I indicate the order and development of our feelings and our knowledge in relation to our growth. Others will perhaps work out what I have here merely indicated.

我们最终到达了道德的境界；我们刚走完了朝向成人的第二步。如果现在时机恰当的话，我就会试着指出心灵最初的冲动如何产生良心的最初活动，以及爱恨之情如何激发最初的善恶观念。我会表明正义和仁慈不仅不是抽象的术语，不是由理解力构想出的道德概念，而是由理智激发的心灵感情，是我们原始情感的自然流露；仅通过理智而脱离良心，我们无法建立任何自然法律，如果不是依赖一些人类心灵的本能需要，所有的自然权利便只是一种梦呓 [2_3] 。但，我认为现在没必要做什么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论述，也没必要做任何形式的研究探讨；只要我说明了与我们成长相关的人类情感和知识形成的秩序和进程就足够了。我在这里仅仅提及的事物，也许会有其他人来论证。

Hitherto my Emile has thought only of himself, so his first glance at his equals leads him to compare himself with them; and the first feeling excited by this comparison is the desire to be first. It is here that self-love is transformed into selfishness, and this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ll the passions which spring from selfishness. Bu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assions by which his life will be governed shall be humane and gentle or harsh and cruel, whether they shall be the passions of benevolence and pity or those of envy and covetousness, we must know what he believes his place among

men to be, and what sort of obstacles he expects to have to overcome in order to attain to the position he seeks.

迄今，我的爱弥儿还只会为自己着想，所以他看到与他相似的人的第一眼，就会使他将自己与他们相比较；这一比较所激发的第一种情感，便是渴望成为第一。就在这里，自爱转变为自私，而自私产生的所有感情都在这里开始出现。但要辨明他的人生将被哪些情感所主导，是仁慈温和还是严厉残忍，是善良怜悯还是嫉妒贪婪，我们必须要知道他自己认为他在人们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以及要达到他所渴求的地位，他认为他必须克服怎样的困难。

To guide him in this inquiry, after we have shown him men by means of the accidents common to the species, we must now show him them by means of their differences. This is the time for estimating inequality natural and civil, and for the scheme of the whole social order.

为了在这一方面指导他，我们必须在通过人类共同的遭遇向他展示过人类为其人类之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向他讲一讲人类的情况。现在就是衡量自然与社会的不平等，描述整个社会秩序图景的时候了。

Society must be studied i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y; those who desire to treat politics and morals apart from one another will never understand either. By confining ourselves at first to the primitive relations, we see how men should be influenced by them and what passions should spring from them; we see that it is in propor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passions that a man's

relations with others expand or contract. It is not so much strength of arm as moderation of spirit which makes men free and independent. The man whose wants are few is dependent on but few people, but those who constantly confound our vain desires with our bodily needs, those who have made these needs the basis of human society, are continually mistaking effects for causes, and they have only confused themselves by their own reasoning.

必须要通过个人研究社会，通过社会研究个人；那些试图把政治和道德分开研究的人，绝不会参透其中的任何一个。通过一开始重点研究原始关系，我们发现人类怎样受到它的影响以及什么情感会从这些关系中产生；我们明白由于人类感情的发展，这些关系才相应地有了疏密的变化。是心灵的节制而非手臂的力量，使得人类独立而自由。需求少的人，依赖的人也少，但是有些人常常将我们的欲望将身体的需要混为一谈，他们将我们身体的需要看做人类社会的基础，并且总是颠倒因果，他们自己的论辩倒仅仅将自己弄糊涂了。

Since it is impossible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n and man should be great enough to make one dependent on another, there is in fact in this state of nature an actual and indestructible equality. In the civil state there is a vain and chimerical equality of right; the means intended for its maintenance, themselves serve to destroy it; and the power of the community, added to the power of the strongest for the oppression of the weak, disturbs the sort of equilibrium which nature ha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m. [1_4] From this first contradiction spring all the other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real and the apparent, which are to be found in the civil order. The many will always be sacrificed to the few, the common weal to private interest; those specious words—justice and subordination—will always serve as

the tools of violence and the weapons of injustice; hence it follows that the higher classes which claim to be useful to the rest are really only seeking their own welfare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from this we may judge how much consideration is due to them according to right and justice. It remains to be seen if the rank to which they have attained is more favourable to their own happiness to know what opinion each one of us should form with regard to his own lot. This is the study with which we are now concerned; but to do it thoroughly we must begin with a knowledge of the human heart.

既然人与人之间自然状态上的区别不可能大到让人彼此依赖，那么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之中就存在着不可毁灭的真实的平等。在人类社会中，权利平等是虚假的；因为用来维持它的方法本身就在摧毁它；公众的力量，也为强者增添了欺压弱者的能力，从而扰乱了自然建立在他们之间的那种平衡 [2_4] 。从这第一对矛盾中，也就迸发出了我们在社会等级之间发现的表与里的矛盾。多数总是为少数而牺牲，公众利益总是为个人私利而牺牲；正义和从属关系——这些华而不实的字眼，总是成为实施暴力的工具和布散不公的武器；于是，那些声称会为他人服务的上层阶级，实际上在损人利己；所以，我们要根据权利和公义来判断对他们的尊重是否合宜。要知道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命运的看法，需要了解他们已经取得的地位是否对他们自己的幸福更有利。这就是我们现在关注的研究问题；但是要全面地研究，我们必须从了解人类心灵入手。

If it were only a question of showing young people man in his mask, there would be no need to point him out, and he would always be before their eyes; but since the mask is not the man, and since they must not be led away by its specious appearance, when you paint men for your scholar, paint them as they are, not that he may hate them, but that he may pity them and have no wish to be

like them. In my opinion that is the most reasonable view a man can hold with regard to his fellow-men.

如果问题只是在于按照人的假面具向青年人讲述，那我们就没必要向他们讲述了，因为他们经常能看到这样戴假面具的人；既然假面具不是人，既然他们一定不能受到这虚假外表的欺骗，那么当你要向你的学生描述人时，就要按照他们本来的样子去描述，不是为了让他恨他们，而是为了让他可怜他们，从而不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人能看待他的同类的最合理的方式。

With this object in view we must take the opposite way from that hitherto followed, and instruct the youth rather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others than through his own. If men deceive him he will hate them; but, if, while they treat him with respect, he sees them deceiving each other, he will pity them. “The spectacle of the world,” said Pythagoras, “is like the Olympic games; some are buying and selling and think only of their gains; others take an active part and strive for glory; others, and these not the worst, are content to be lookers-on.”

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就必须采用跟之前采取过的截然不同的方法，并通过他人的经验而非青年人自己的经验指导他们。如果人们欺骗他，他会恨他们；但是，假如，当他们尊重他，他又看到他们互相欺骗时，他会可怜他们。“世界上的情景，”毕达哥拉斯说，“宛如奥林匹克竞赛的情景一般；一些人在那里做买卖，一心牟利；另一些人在那里拼性命，为荣誉奋斗；其他人，并不是坏人，观赛就满足了。”

I would have you so choose the company of a youth that he

should think well of those among whom he lives, and I would have you so teach him to know the world that he should think ill of all that takes place in it. Let him know that man is by nature good, let him feel it, let him judge his neighbour by himself; but let him see how men are depraved and perverted by society; let him find the source of all their vices in their preconceived opinions; let him be disposed to respect the individual, but to despise the multitude; let him see that all men wear almost the same mask, but let him also know that some faces are fairer than the mask that conceals them.

我也希望你这样替一个青年选择社交圈，让他觉得跟他一起生活的人都是好人，我同样希望你教他认识这个世界，把世界上发生的事都当作坏事。让他知道人生来就是好的，让他感受这一点，让他自己判断自己的邻舍；但是让他明白社会如何使人堕落和败坏；让他发现人们的种种偏见就是所有恶习的根源；让他发自内心地尊重每一个人，蔑视大众；让他明白所有人都戴着几乎同样的假面具，但也要让他知道一些面孔比隐藏它们的假面具要美丽得多。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is method has its drawbacks, and it is not easy to carry it out; for if he becomes too soon engrossed in watching other people, if you train him to mark too closely the actions of others, you will make him spiteful and satirical, quick and decided in his judgments of others; he will find a hateful pleasure in seeking bad motives, and will fail to see the good even in that which is really good. He will, at least, get used to the sight of vice, he will behold the wicked without horror, just as we get used to seeing the wretched without pity. Soon the perversity of mankind will be not so much a warning as an excuse; he will say, “Man is made so,” and he will have no wish to be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应该承认，这个方法有其缺陷，而且实施起来也不简单；因为如果他过早学会细察他人，如果你使他过于细致地探寻他人的行动，你会让他养成恶意挖苦、任意武断评判他人的习惯；他会幸灾乐祸，把好事也当成坏事。至少，他会对恶行习以为常，看到邪恶之事毫不恐惧，就像我们习惯了看到穷人却毫无怜悯一般。很快人类的乖僻不会成为一个警示，反而会成为一个借口；他会说，“人生来如此”，并且不想变得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

But if you wish to teach him theoretically to make him acquainted, not only with the heart of man, but also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xternal causes which turn our inclinations into vices; when you thus transport him all at once from the objects of sense to the objects of reason, you employ a system of metaphysics which he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understand; you fall back into the error, so carefully avoided hitherto, of giving him lessons which are like lessons, of substituting in his mind the experience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master for his own experi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own reason.

但是如果你希望用理论来教育他，让他不仅仅熟知人心，也洞悉外在原因使我们的倾向变成诸恶行的作用；那么如果你一下子要把他从感官感觉事物转为用理性思考事物，你就要运用一种他还无法理解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你就要落入一直小心避免的失误中，即向他灌输劝世文似的教条，在他的头脑中用为师的经验与权威代替他自己的经验和理智的发展。

To remove these two obstacles at once, and to bring the human heart within his reach without risk of spoiling his own, I would

show him men from afar, in other times or in other places, so that he may behold the scene but cannot take part in it. This is the time for history; with its help he will read the hearts of men without any lessons in philosophy; with its help he will view them as a mere spectator, dispassionate and without prejudice; he will view them as their judge, not as their accomplice or their accuser.

为了立即去除这两大障碍，为了让他既能了解他人的心又能不败坏自己的心，我会远远地把人指给他看，让他看其他时间或者空间的人，从而让他得以看到那些场合但却不能参与其中。现在是讲历史的时候了；有了历史的帮助，他就能读懂人心，而又不用学任何哲学课程；有了历史的帮助，他就能仅以观众的视角来观察他们，公正而不带偏见，他就能像他们的法官一样观察他们，而不像他们的同谋或控告者。

To know men you must behold their actions. In society we hear them talk; they show their words and hide their deeds; but in history the veil is drawn aside, and they are judged by their deeds. Their sayings eve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m; for comparing what they say and what they do, we see not only what they are but what they would appear; the more they disguise themselves the more thoroughly they stand revealed.

你必须通过观察人们的行为来了解他们。在社会中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话；他们嘴上说一套，却隐藏他们的行为；但是在历史中，这层隐藏行为的纱被揭开，他们因为自己的行为受到评判。他们说的话反而能帮助我们评价他们；通过对他们言行的比较，我们不仅能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还能明白他们以什么样的面貌示人；他们将自己伪装得越深，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就越多。

Unluckily this study has its dangers, its drawbacks of several kinds. It is difficult to adopt a point of view which will enable one to judge one's fellow-creatures fairly. It is one of the chief defects of history to paint men's evil deeds rather than their good ones; it is revolutions and catastrophes that make history interesting; so long as a nation grows and prospers quietly in the tranquillity of a peaceful government, history says nothing; she only begins to speak of nations when, no longer able to be self-sufficing, they interfere with their neighbours' business, or allow their neighbours to interfere with their own; history only makes them famous when they are on the downward path; all our histories begin where they ought to end. We have very accurate accounts of declining nations; what we lack is the history of those nations which are multiplying; they are so happy and so good that history has nothing to tell us of them; and we see indeed in our own times that the most successful governments are least talked of. We only hear what is bad; the good is scarcely mentioned. Only the wicked become famous, the good are forgotten or laughed to scorn, and thus history, like philosophy, is for ever slandering mankind.

不幸的是，这门研究也有其危险之处，它有几种类型的缺陷。一个人很难从一个视角公正地评价他人。历史的主要弊病之一就在于它更常描述一个人的恶行而非善行；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种种革命和灾难；只要一个国家在一个太平政治下繁荣安定地发展，历史就毫无记载；只有在一个国家不再能自我满足，因而干涉邻国内政，或者让邻国干涉自己的内政时，历史才开始记录；历史只有在它们走向衰亡时才开始着手描写；我们所有的历史故事在它们将要结束的时候才开始讲述。我们对于衰落的国家有着精确的叙述；我们缺乏的是那些人丁逐渐兴旺的国家的历史；他们是如此快乐美好，以至于历史没有什么要向我们叙述的；我们也确实看到，那些最成功的政府的时代反而

是最少被提及的。我们只会听到坏消息；好消息几乎没人提及。只有坏人才会出名，好人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嘲笑，因此历史就像哲学一样，不断地诋毁着人类。

Moreover,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facts described in history should not give an exact picture of what really happened; they are transformed in the brain of the historian, they are moulded by his interests and coloured by his prejudices. Who can place the reader precisely in a position to see the event as it really happened? Ignorance or partiality disguises everything. What a different impression may be given merely by expanding or contract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without altering a single historical incident. The same object may be seen from several points of view, and it will hardly seem the same thing, yet there has been no change except in the eye that beholds it. Do you indeed do honour to truth when what you tell me is a genuine fact, but you make it appear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A tree more or less, a rock to the right or to the left, a cloud of dust raised by the wind, how often have these decided the result of a battle without any one knowing it? Does that prevent history from telling you the cause of defeat or victory with as much assurance as if she had been on the spot? But what are the facts to me, while I am ignorant of their causes, and what lessons can I draw from an event, whose true cause is unknown to me? The historian indeed gives me a reason, but he invents it; and criticism itself, of which we hear so much, is only the art of guessing, the art of choosing from among several lies, the lie that is most like truth.

此外，不能避免的是，历史所描述的事实无法给出真正事实的准确图景；它们在历史学家的头脑中被改造，被他们兴趣塑造成一定的

样子，染上了偏见的色彩。谁又能将读者准确地放置在一个能看到事情真实经过的位置上呢？无知和偏袒粉饰一切。即使不歪曲历史事实，仅仅是夸大或缩小事件的环境，就会给人留下多么不同的印象啊！同一个物体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就不大像原来的样子，然而，除了观察的那双眼睛，一切都没有改变。当你告诉我一个真实的事实时，没有按照它原来的样子去描述它，那你真的是尊重事实吗？多一棵树或少一棵树，一块岩石在左或是在右，一片风儿吹起的扬尘，这些事曾多少次决定过一场战斗的胜负？还没有人看出过这种原因呢！是不是就是历史学家不能像亲眼见证者一样确切地讲述胜负的原因呢？当我不知道历史缘由时，历史事实对我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能从一个我还不知道真实原因的历史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呢？历史学家向我给出了一个原因，但是这是他杜撰的；而我们常听的评论本身，也只是一种猜测的艺术，一种从诸个谎言中选择其一的艺术，不过这个谎言，是最贴近真相的。

Have you ever read Cleopatra or Cassandra or any books of the kind? The author selects some well-known event, he then adapts it to his purpose, adorns it with details of his own invention, with people who never existed, with imaginary portraits; thus he piles fiction on fiction to lend a charm to his story. I see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such romances and your histories, unless it is that the novelist draws more on his own imagination, while the historian slavishly copies what another has imagined; I will also admit, if you please, that the novelist has some moral purpose good or bad, about which the historian scarcely concerns himself.

你看过描写克利奥帕特拉或卡珊德拉或任何一个这类人物的书吗？书籍作者选取某些著名的历史事件，然后将它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改写，虚构一些情节并编撰出从未存在过的人物，用想象的形象加以渲染，就这样编出了一个又一个故事，给自己的故事平添了些许魅

力。对我而言，这样的传奇故事跟你的历史没有太大的区别，除非小说家增添了更多他自己想象力的成分，而历史学家照葫芦画瓢似地誊抄他人想象下的作品；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也承认，小说家好歹是有某些道德目的的，而历史学家则很少考虑这一点。

You will tell me that accuracy in history is of less interest than a true picture of men and manners; provided the human heart is truly portrayed, it matters little that events should be accurately recorded; for after all you say, what does it matter to us what happened two thousand years ago? You are right if the portraits are indeed truly given according to nature; but if the model is to be found for the most part in the historian's imagination, are you not falling into the very error you intended to avoid, and surrendering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historian what you would not yield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teacher? If my pupil is merely to see fancy pictures, I would rather draw them myself; they will, at least, be better suited to him.

你也许会说，历史的准确性没有真实记载的风土人情那么有趣；只要人心被真实地描绘出来，要准确记载历史事件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最终你会说，两千年以前发生的事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人物形象真的根据自然的样子真实地描写，你就是对的；但是如果模范大多数只活在历史学家的想象中，那你岂不是落入了你曾试图避免的错误中，把你从老师手中夺回的权威又送给历史学家了吗？如果我的学生只想看些虚构的图形，我宁愿自己画给他们看；至少，它们会更适合他。

The worst historians for a youth are those who give their opinions. Facts! Facts! and let him decide for himself; this is how he

will learn to know mankind. If he is always directed by the opinion of the author, he is only seeing through the eyes of another person, and when those ayes are no longer at his disposal he can see nothing.

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最差的历史学家就是给出自己意见的历史学家。事实！事实！让青年人自己去判断吧，这是他学习了解人类的方法。如果他总是被老师的观点左右，他就只能通过他人的眼睛看待事物，一旦没有了这些眼睛，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I leave modern history on one side, not only because it has no character and all our people are alike, but because our historians, wholly taken up with effect, think of nothing but highly coloured portraits, which often represent nothing. [1_5] The old historians generally give fewer portraits and bring more intelligence and common-sense to their judgments; but even among them there is plenty of scope for choice, and you must not begin with the wisest but with the simplest. I would not put Polybius or Sallust into the hands of a youth; Tacitus is the author of the old, young men cannot understand him; you must learn to see in human actions the simplest features of the heart of man before you try to sound its depths. You must be able to read facts clearly before you begin to study maxims. Philosophy in the form of maxims is only fit for the experienced. Youth should never deal with the general, all its teaching should deal with individual instances.

我不理会现代史，不仅是因为它没有特色，也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全体人民都相似，而且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全部都想出风头，除了描写浓墨重彩的形象以外什么都想不到，而这些形象通常又无法

代表任何事物 [2_5] 。古代的历史学家们往往很少描绘肖像，判断中也带有更多智慧和常识；但是即使在他们中间，也要做出大量的选择；在开始的时候，你一定不要选择最睿智的史学家的作品，而要选择最朴实的史学家的著作。我不会将波力比奥斯或者塞勒斯特的作品交到一个青年人手中；塔西佗的著作适合老年人阅读，他的作品是年轻人无法理解的；在你试图探究事物根源之前，一定要学会在人类的行为中看出人心最质朴的特征。在你开始学习教条以前，必须能够弄清事实。教条形式的哲学只适合经验丰富的人。年轻人永不该从普遍的事物着手，他全部的研究应该着眼于个别特殊的事例。

To my mind Thucydides is the true model of historians. He relates facts without giving his opinion; but he omits no circumstance adapted to make us judge for ourselves. He puts everything that he relates before his reader; far from interposing between the facts and the readers, he conceals himself; we seem not to read but to see. Unfortunately he speaks of nothing but war, and in his stories we only see the least instructive part of the world, that is to say the battles. The virtues and defects of the Retreat of the Ten Thousand and the Commentaries of Caesar are almost the same. The kindly Herodotus, without portraits, without maxims, yet flowing, simple, full of details calculated to delight and interest in the highest degree, would be perhaps the best historian if these very details did not often degenerate into childish folly, better adapted to spoil the taste of youth than to form it; we need discretion before we can read him. I say nothing of Livy, his turn will come; but he is a statesman, a rhetorician, he is everything which is unsuitable for a youth.

在我看来，修西得底斯是众历史学家的真正榜样。他讲述事实而不加评判；然而他又没有省略任何历史情景以帮助我们自己进行评

判。他将所讲述的每件事陈明在读者面前；他不仅没有插足于诸事实与读者之间，反而隐藏自己；我们似乎不是去阅读，而是去亲眼见证历史。很遗憾，他只讲述了与战争有关的事，并且在他所叙述的故事中，我们只能看见世界上最没有指导性的部分——也就是打仗。《万人撤退记》和《恺撒评传》这两部作品的优缺点几乎一样。和蔼的西罗多德，没有对人物的刻画，没有对教条的叙述，只有流畅、平实、充满细节的描绘，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喜爱和兴趣，假如这些细节没有总是退化成孩子天真的语言，也没有更易于损坏而非培养青年人的品味的话，他可能就是最棒的历史学家了；在阅读他的作品之前，我们需要有鉴赏的能力。我还没有论及李维，他会被提及的；但他是政治家、修辞学家，还不适合青年人去了解。

History in general is lacking because it only takes note of striking and clearly marked facts which may be fixed by names, places, and dates; but the slow evolution of these facts, which cannot be definitely noted in this way, still remains unknown. We often find in some battle, lost or won, the ostensible cause of a revolution which was inevitable before this battle took place. War only makes manifest events already determined by moral causes, which few historians can perceive.

历史总体上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只记录突出的、清楚的事实，这些事实可能有确切的人物、地点和时间；但是这些事件缓慢的发展却不可能像这样确定地记录下来，因而不被人知。我们常在一场胜仗或败仗中寻找一次革命的表面原因，在这场战争发生前，这场革命是无法避免的。战争只能让由道德因素决定的事件突出地表现出来，而这些道德原因则很少有历史学家能看出来。

The philosophic spirit has turned the thoughts of many of the

historians of our times in this direction; but I doubt whether truth has profited by their labours. The rage for systems has got possession of all alike, no one seeks to see things as they are, but only as they agree with his system.

哲学的精神已经将许多这个世纪的历史学家的思想扭转到这个方向了；但是我怀疑，真理是否能通过他们的劳动而得到传扬。他们各执一词，没有人尝试着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他只看事物和他的系统是否相符。

Add to all these considerations the fact that history shows us actions rather than men, because she only seizes men at certain chosen times in full dress; she only portrays the statesman when he is prepared to be seen; she does not follow him to his home, to his study, among his family and his friends; she only shows him in state; it is his clothes rather than himself that she describes.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历史向我们展示行为而非人类，因为她只选取在特定时期的衣冠楚楚的人来描述；她只刻画那些已经准备好给大众观看的政客；她不会跟随他到他的家、他的书房、他的家人和朋友中；她只展示在特定形象中的他；她描述的是他的服装而非他这个人。

I would prefer to begin the study of the human heart with reading the lives of individuals; for then the man hides himself in vain, the historian follows him everywhere; he never gives him a moment's grace nor any corner where he can escape the piercing eye of the spectator; and when he thinks he is concealing himself,

then it is that the writer shows him up most plainly.

我更倾向于从阅读一个人的一生开始，展开对人心的研究；因为这时他隐藏自己也是徒劳的，历史学家到处都跟着他；历史学家没有给他任何时刻或在任何场合使他得以逃离观察者们锐利的眼睛；当他自认为隐藏得很好的时候，就是历史学家将他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

“Those who write lives,” says Montaigne, “in so far as they delight more in ideas than in events, more in that which comes from within than in that which comes from without, these are the writers I prefer; for this reason Plutarch is in every way the man for me.”

蒙台涅说：“传记家，只要他们对思想比对事件更感兴趣，喜欢内心之思多余形外之事，就是我更喜欢的传记家；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来选去还是读普鲁塔克的作品的原因。”

It is true that the genius of men in groups or nation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ividual man, and that we have a very imperfect knowledge of the human heart if we do not also examine it in crowds; but it is none the less true that to judge of men we must study the individual man, and that he who had a perfect knowledge of the inclinations of each individual might foresee all their combined effects in the body of the nation.

国家或集体中的人的特征与作为个体的人的性格的确是很不同的，我们如果不在集体中审查一个人的性格也确实会对它有不完备的

知识；但是同样真实的是，要认识人类，我们必须研究个别的人，对每个人的倾向有全面的了解的人可能预见它们在整个国家的整体影响。

We must go back again to the ancients, for the reasons already stated, and also because all the details common and familiar, but true and characteristic, are banished by modern stylists, so that men are as much tricked out by our modern authors in their private life as in public. Propriety, no less strict in literature than in life, no longer permits us to say anything in public which we might not do in public; and as we may only show the man dressed up for his part, we never see a man in our books any more than we do on the stage. The lives of kings may be written a hundred times, but to no purpose; we shall never have another Suetonius.

我们必须再次以古人为鉴，部分原因上面已经提过，还有一个原因是所有公众熟知但真实而又有特点的细节都被现代文体所抛弃，以致人们的私人生活就像公众生活一样被现代作家装饰了起来。在文学和在生活中都十分严格的礼节，不再允许我们在公众场合说我们可能不能公开地做的事了；既然我们会只展示一个人装扮起来的部分，我们在书中就再也认不出台上的那个人了。众国王的生活也许会被描绘一百遍，却没有任何目的；我们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苏埃东尼这样的史学家了。

The excellence of Plutarch consists in these very details which we are no longer permitted to describe. With inimitable grace he paints the great man in little things; and he is so happy in the choice of his instances that a word, a smile, a gesture, will often suffice to indicate the nature of his hero. With a jest Hannibal

cheers his frightened soldiers, and leads them laughing to the battle which will lay Italy at his feet; Agesilaus riding on a stick makes me love the conqueror of the great king; Caesar passing through a poor village and chatting with his friends unconsciously betrays the traitor who professed that he only wished to be Pompey's equal. Alexander swallows a draught without a word—it is the finest moment in his life; Aristides writes his own name on the shell and so justifies his title; Philopoemen, his mantle laid aside, chops firewood in the kitchen of his host. This is the true art of portraiture. Our disposition does not show itself in our features, nor our character in our great deeds; it is trifles that show what we really are. What is done in public is either too commonplace or too artificial, and our modern authors are almost too grand to tell us anything else.

普鲁塔克的出色之处在于每一个我们再也不能描写的细节之中。他用独特优雅的笔调在细微的事物中描绘伟大的人物；他在选择事例时是如此快乐，每个辞藻，微笑和动作都常足以展示他主人公的特质。汉尼拔一个玩笑就重振了他胆颤的士兵的士气，带领着他们高高兴兴地奔往征服意大利的战场；阿杰锡拉跨在一根棍子上，反而让我爱上了这个征服了伟大国王的人；恺撒在经过一个穷村庄，与他的朋友们聊天时，无意中竟透露出他这个曾坦言只想跟庞培地位同等的人其实是一个奸雄。亚历山大一句话也不说就吞下了药——这是他一生最光辉的时刻；亚里斯泰迪斯将自己的名字写在贝壳上，从而为他的头衔正了名；菲洛皮门将大衣脱下放到一旁，替房主在厨房砍柴。这才是真正的描写手法。我们的外表不会展示出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伟大功勋也不会显示我们的性格；真正显露出我们本性的，是生活中的琐事。在公众面前做的事不是太平凡就是太虚伪，我们的现代作家们也都太正经，除了这些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们。

M.de Turenne wa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greatest men of the last century. They have had the courage to make his life interesting by the little details which make us know and love him; but how many details have they felt obliged to omit which might have made us know and love him better still? I will only quote one which I have on good authority, one which Plutarch would never have omitted, and one which Ramsai would never have inserted had he been acquainted with it.

德·图伦无疑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有人曾通过描写生活细节把他的生活写得生动有趣，从而使我们了解他、热爱他；然而为他作传的人又不得不省略了多少能让我们更了解他、更热爱他的细节呢？我只提我确信的其中的一件事，这件事要是到普鲁塔克那里，他一定会绝口不提的，也是腊姆塞哪怕熟知也不敢写进来的。

On a hot summer's day Viscount Turenne in a little white vest and nightcap was standing at the window of his antechamber; one of his men came up and, misled by the dress, took him for one of the kitchen lads whom he knew. He crept up behind him and smacked him with no light hand. The man he struck turned round hastily. The valet saw it was his master and trembled at the sight of his face. He fell on his knees in desperation. “Sir, I thought it was George.” “Well, even if it was George,” exclaimed Turenne rubbing the injured part, “you need not have struck so hard.” You do not dare to say this, you miserable writers! Remain for ever without humanity and without feeling; steel your hard hearts in your vile propriety, make yourselves contemptible through your high-mightiness. But as for you, dear youth, when you read this anecdote, when you are touched by all the kindliness displayed even on the impulse of the moment, read also the littleness of this

great man when it was a question of his name and birth. Remember it was this very Turenne who always professed to yield precedence to his nephew, so that all men might see that this child was the head of a royal house. Look on this picture and on that, love nature, despise popular prejudice, and know the man as he was.

在一个炎炎夏日，图伦子爵身穿一件白色背心，头戴一顶睡帽，站在他的前厅窗前；他的一个仆人来了，看到他的穿着，误以为他是他认识的一个厨师助手。他便悄悄走到他身后，使劲地在子爵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挨打的人匆忙转过身来。仆人一看是自己的主人，便浑身颤抖。他绝望地跪了下来。“大人，我以为您是乔治呢。”“即使我是乔治，”图伦揉着屁股叫道，“你也不能打得这么重啊！”可怜的作家们，你们不敢讲这些！让你们永远做没有人性和感觉的人吧；让你们丑恶的嘴将你们的铁石心肠越炼越硬吧，让你们因无比尊贵更显卑劣吧。但是你，亲爱的青年，当你读到这则轶事，被这一刻冲动之间显露的仁慈触动，也要读一读这个伟大的人在他的出身和姓名面前显得多么渺小。你要记住，就是这位图伦，总是让他的侄子占先，从而让所有人知道这个孩子是这皇室家族的主人。对照这些场景，你就会爱天性，鄙成见，完全地认识这个人了。

There are few people able to realise what an effect such reading, carefully directed, will have upon the unspoilt mind of a youth. Weighed down by books from our earliest childhood, accustomed to read without thinking, what we read strikes us even less, because we already bear in ourselves the passions and prejudices with which history and the lives of men are filled; all that they do strikes us as only natural, for we ourselves are unnatural and we judge others by ourselves. But imagine my Emile, who has been carefully guarded for eighteen years with the sole object of preserving a right judgment and a healthy heart, imagine

him when the curtain goes up casting his eyes for the first time upon the world's stage; or rather picture him behind the scenes watching the actors don their costumes, and counting the cords and pulleys which deceive with their feigned shows the eyes of the spectators. His first surprise will soon give place to feelings of shame and scorn of his fellow-man; he will be indignant at the sight of the whole human race deceiving itself and stooping to this childish folly; he will grieve to see his brothers tearing each other limb from limb for a mere dream, and transforming themselves into wild beasts because they could not be content to be men.

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在这样细致的指导下阅读会给一个纯净的青年人的心灵带来什么影响。我们从童年时期开始就埋头读书，习惯了学而不思，我们所读的东西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甚至更少，因为我们已经将历史和人们的生活中的感情和偏见填满了自己的头脑；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自己是不自然的，并且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判断他人。但想象一下，十八年来以保留一个正确判断和健康心灵为唯一目标被细心地照料的我的爱弥儿，想象一下当幕布拉起，世界的舞台第一次投射到他的眼睛里的场景；确切地说，带他到舞台后面，看演员们穿上他们的戏服，数有多少绳子和滑车营造了假的场景蒙蔽了观众们的眼睛。他起初大吃一惊，但很快就会同情和鄙视他的同类；看到全人类都争相欺骗着自己的场景，向孩童般的愚蠢行为屈膝时，他会感到愤怒；看到他的兄弟们仅是为了一场梦就互相厮打，因为不满足成为人而变成一个个野兽，他会感到悲哀。

Given the natural disposition of the pupil,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f the master exercises any sort of prudence or discretion in his choice of reading, however little he may put him in the way of reflecting on the subject-matter, this exercise will serve as a course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a philosophy better understood and more

thoroughly mastered than all the empty speculations with which the brains of lads are muddled in our schools. After following the romantic schemes of Pyrrhus, Cineas asks him what real good he would gain by the conquest of the world, which he can never enjoy without such great sufferings; this only arouses in us a passing interest as a smart saying; but Emile will think it a very wise thought, one which had already occurred to himself, and one which he will never forget, because there is no hostile prejudice in his mind to prevent it sinking in. When he reads more of the life of this madman, he will find that all his great plans resulted in his death at the hands of a woman, and instead of admiring this pinchbeck heroism, what will he see in the exploits of this great captain and the schemes of this great statesman but so many steps towards that unlucky tile which was to bring life and schemes alike to a shameful death?

毫无疑问，只要学生拥有了天然禀赋，即使老师没有小心谨慎地选择阅读的书籍，即使老师没有让学生对所读的内容进行反思，他所学的也会成为一种实用的哲学，比起所有用来把青年人的头脑弄晕的种种空泛的理论更加易于理解和完全掌握。在听完皮拉斯想入非非的计划之后，西内阿斯问他既然必须要承受如此大的痛苦，征服了世界之后他能获得什么真正的好处；对我们而言，这只是一句随口说说的俏皮话；但是爱弥儿却把它看做一个智慧的想法，一个他曾经想到的，也是一个他永远无法忘掉的问题，因为在他的头脑中没有一个与它相敌的偏见能防止他把它记在自己心中。当他对这个疯子皮拉斯的传记读得更多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所有伟大的计划都为了让自己葬身于一个妇人之手；因此除了不佩服这种假冒的的英雄主义之外，他不将这个伟大统帅的功勋和这个卓著政客的计划看作朝着这个不光彩的砖瓦前进的步骤，以将人生和权谋都一样地引向可耻的死亡，又能看作什么呢？

All conquerors have not been killed; all usurpers have not failed in their plans; to minds imbued with vulgar prejudices many of them will seem happy, but he who looks below the surface and reckons men's happiness by the condition of their hearts will perceive their wretchedness even in the midst of their successes; he will see them panting after advancement and never attaining their prize, he will find them like those inexperienced travellers among the Alps, who think that every height they see is the last, who reach its summit only to find to their disappointment there are loftier peaks beyond.

不是所有的征服者都是被杀死的，不是所有的篡位者都在他们的宏图中失败；对于充满世俗偏见的头脑来说，他们中许多人似乎很幸运；但是对于那些看到事情深处原因，从人类心灵的角度思索人类是否幸运的人来说，他会发现，即使是在这些人的成功中，也能发现悲惨；他会发现，他们在前进，欲望却也在膨胀，他们永远也无法获得真正的价值；他会发现，他们就像阿尔卑斯山上那些缺乏经验的旅行者，他们眼中看到的每一座高峰都是最后一个，到达高峰之后却只能失望地发现头顶还有更高的山峰。

Augustus, when he had subdued his fellow-citizens and destroyed his rivals, reigned for forty years over the greatest empire that ever existed; but all this vast power could not hinder him from beating his head against the walls, and filling his palace with his groans as he cried to Varus to restore his slaughtered legions. If he had conquered all his foes what good would his empty triumphs have done him, when troubles of every kind beset his path, when his life was threatened by his dearest friends, and when he had to mourn the disgrace or death of all near and dear to him? The wretched man desired to rule the world and failed to rule his own

household. What was the result of this neglect? He beheld his nephew, his adopted child, his son-in-law, perish in the flower of youth, his grandson reduced to eat the stuffing of his mattress to prolong his wretched existence for a few hours; his daughter and his granddaughter, after they had covered him with infamy, died, the one of hunger and want on a desert island, the other in prison by the hand of a common archer. He himself, the last survivor of his unhappy house, found himself compelled by his own wife to acknowledge a monster as his heir. Such was the fate of the master of the world, so famous for his glory and his good fortune. I cannot believe that any one of those who admire his glory and fortune would accept them at the same price.

在征服了臣民、打败了对手之后，奥古斯都统治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四十年之久；但这么大的权力也无法阻止他在瓦鲁士重振溃败的军队时用头撞墙、使哀嚎声充斥着他的殿宇。当各种各样的烦恼围绕着他，当他的性命受到最亲密朋友的威胁，当他不得不为亲族的蒙羞和死亡哀痛时，就算他征服了所有的敌人，这虚空的胜利对他而言又有何用呢？这个可怜的人渴望统治世界，却没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疏于治家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看见他的侄子、养子、女婿都在壮年时期去世了，他的孙子只好去吃自己床上的棉絮以延续他几小时的可怜的生命；他的女儿和孙女在做了许多令他蒙羞的事情之后死了，一个饿死在荒岛，另一个则是在监狱中被一个弓箭手杀死。他自己，整个不幸家族最后的幸存者，最后被他自己的妻子逼迫承认一个怪物作自己的继承人。这个主宰世界的人，声名显赫，财源滚滚，命运却如此悲惨。我不相信任何羡慕他的荣耀与富贵的人愿意以相同的代价接受这样的命运。

I have taken ambition as my example, but the play of every human passion offers similar lessons to any one who will study

history to make himself wise and good at the expense of those who went before. The time is drawing near when the teaching of the life of Anthony will appeal more forcibly to the youth than the life of Augustus. Emile will scarcely know where he is among the many strange sights in his new studies; but he will know beforehand how to avoid the illusion of passions before they arise, and seeing how in all ages they have blinded men's eyes, he will be forewarned of the way in which they may one day blind his own should he abandon himself to them. [1_6] These lessons, I know, are unsuited to him, perhaps at need they may prove scanty and ill-timed; but remember they are not the lessons I wished to draw from this study. To begin with, I had quite another end in view; and indeed, if this purpose is unfulfilled, the teacher will be to blame.

前面我拿野心作为例子，但是每种人类的欲念的冲动，对于任何一个将以史为鉴来让自己变得智慧的人来说，都能提供类似的教训。对于青年人来说，教导安东尼的一生比读奥古斯都的传记更合宜的时机近了。爱弥儿在最近的研究中读了太多奇怪的东西以至于几乎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他会提前知道如何在欲念的幻象产生以前就预防它，由于知道了在所有时期人类如何被欲望蒙蔽了自己的眼睛，他会预先受到警示，将来的某一天他自己也有可能同样被欲望蒙蔽双眼，使自己像先人一样迷失自己 [2_6] 。我知道这些教训不适合他，也许在需要的时候，它们也可能既不及时也不够用；但是要记住，我想从研究历史中得出的并不是这些教训。从一开始，我就有另外一个目的；如果这个目的没有实现，就一定是老师的错。

Remember that, as soon as selfishness has developed, the self in its relations to others is always with us, and the youth never observes others without coming back to himself and comparing himself with them. From the way young men are taught to study

history I see that they are transformed, so to speak, into the people they behold, that you strive to make a Cicero, a Trajan, or an Alexander of them, to discourage them when they are themselves again, to make every one regret that he is merely himself. There are certain advantages in this plan which I do not deny; but, so far as Emile is concerned, should it happen at any time when he is making these comparisons that he wishes to be any one but himself—were it Socrates or Cato—I have failed entirely; he who begins to regard himself as a stranger will soon forget himself altogether.

记住，一旦自私心有了发展，与他人相对的自我就会不断地活动，而青年人一看到别人就会想到自己，并将两者进行比较。可以说，从你如何教授青年人学习历史，我认为，你是在将他们朝着书中他们看到的人物改变，你想把他们变成西塞罗，变成图拉真，变成亚历山大，当他们再次成为自己的时候使他们泄气，让他们每一个人都为他们只是自己而感到遗憾。我不否认这种计划具有一定的优点；但是，就爱弥儿来说，一旦他做这样的比较，他希望成为其他人而非他自己——不论是苏格拉底或是加图——我就全然失败了；开始将自己视为另外一个人的人，很快会全然忘记他自己的。

It is not philosophers who know most about men; they only view them through the preconceived ideas of philosophy, and I know no one so prejudiced as philosophers. A savage would judge us more sanely. The philosopher is aware of his own vices, he is indignant at ours, and he says to himself, “We are all bad alike;” the savage beholds us unmoved and says, “You are mad.” He is right, for no one does evil for evil's sake. My pupil is that savage, with this difference: Emile has thought more, he has compared ideas, seen our errors at close quarters, he is more on his guard against himself, and only judges of what he knows.

最了解人类的不是哲学家；哲学家只是从哲学的先入为主的观念看待人类的，我还没有见过比哲学家更有偏见的人。一个野蛮人对我们的判断会中肯得多。哲学家知道自己的毛病，又憎恶我们的毛病，他对自己说："我们都是坏人"；野蛮人看我们时没有动什么情感，于是说："你们真是疯子。"他是对的，因为没有人为了作恶而作恶。我的学生就是那个野蛮人，只是有这样的区别：爱弥儿想得更多，他比较过不同的思想，仔细地观察过我们的过失，以防自己也犯同样的错，他只对自己了解的事物做出判断。

It is our own passions that excite us against the passions of others; it is our self-interest which makes us hate the wicked; if they did us no harm we should pity rather than hate them. We should readily forgive their vices if we could perceive how their own heart punishes those vices. We are aware of the offence, but we do not see the punishment; the advantages are plain, the penalty is hidden. The man who thinks he is enjoying the fruits of his vices is no less tormented by them than if they had not been successful; the object is different, the anxiety is the same; in vain he displays his good fortune and hides his heart; in spite of himself his conduct betrays him; but to discern this, our own heart must be utterly unlike his.

是我们自己的欲念使我们敌视他人的欲念；因为要维护我们的自我利益，我们才恨恶坏人；如果他们对我们没有造成损害，我们会可怜而不是讨厌他们。如果我们能理解坏人的心灵如何刑罚自己的恶，我们就会轻易地原谅他们的过失。我们感受到被侵害，但是我们看不到他们使自己受到的惩罚；他们得到的利益是表面的，受到的惩罚则是内心的。一个人认为他在享受作恶带来的成果时，他所受的痛苦不亚于作恶未成时的痛苦；尽管目标不同，不安却是相同的；他展示自己的大笔财富，隐藏自己的心灵确是徒劳的；不管他如何，他的行为

终将将他显露；但要觉察这一点，我们自己的心灵一定不能像他一样。

We are led astray by those passions which we share; we are disgusted by those that militate against our own interests; and with a want of logic due to these very passions, we blame in others what we fain would imitate. Aversion and self-deception are inevitable when we are forced to endure at another's hands what we ourselves would do in his place.

我们因所共享的欲望走迷；那些与我们自己的利益冲突的事情令我们反感；由于这些欲念使我们需要合理的想法，我们责怪他人，而他们做的事也是我们欣然去做的。当我们不得不忍受他人在我们与他们同样境况时也会做的事的时候，反感和自欺是不可避免的。

What then is required for the proper study of men? A great wish to know men, great impartiality of judgment, a heart sufficiently sensitive to understand every human passion, and calm enough to be free from passion. If there is any time in our life when this study is likely to be appreciated, it is this that I have chosen for Emile; before this time men would have been strangers to him; later on he would have been like them. Convention, the effects of which he already perceives, has not yet made him its slave, the passions, whose consequences he realises, have not yet stirred his heart. He is a man; he takes an interest in his brethren; he is a just man and he judges his peers. Now it is certain that if he judges them rightly he will not want to change places with any one of them, for the goal of all their anxious efforts is the result of prejudices which he does not share, and that goal seems to him a mere dream. For his own part,

he has all he wants within his reach. How should he be dependent on any one when he is self-sufficing and free from prejudice? Strong arms, good health, [1_7] moderation, few needs, together with the means to satisfy those needs, are his. He has been brought up in complete liberty and servitude is the greatest ill he understands. He pities these miserable kings, the slaves of all who obey them; he pities these false prophets fettered by their empty fame; he pities these rich fools, martyrs to their own pomp; he pities these ostentatious voluptuaries, who spend their life in deadly dullness that they may seem to enjoy its pleasures. He would pity the very foe who harmed him, for he would discern his wretchedness beneath his cloak of spite. He would say to himself, “This man has yielded to his desire to hurt me, and this need of his places him at my mercy.”

那么，正确地研究人需要有什么呢？需要对了解人强烈的渴望，判断时极度的公正，理解每个人欲念的足够敏感的心，以及脱离欲念辖制的足够的冷静。如果在我们的一生中有适合做这样的研究的时期的话，这就是我为爱弥儿选择的时期；在这时期以前，人类对他而言太陌生；过了这一时期，他则会像这些人一样。他已经看出了习俗的影响，但他还没有成为它的奴隶，他已经意识到了欲念的影响，欲念则尚未搅扰他的心灵。他是一个人；他要关心他的弟兄；他是一个公正的人，他要评价他的同辈。现在确定无疑的是，如果他正确地评判了他们，他将不想与他们中的任何人互换位置，因为他们一切焦灼的努力的目标都是他所不拥有的偏见的结果，而这一目标对他而言仅像一场梦。至于他，他想要的一切，只要他努力，都能得到。当他能自给自足，不受偏见辖制的时候，他又为何依赖任何人呢？他有强壮的双臂，身体又强健 [2_7] ，有节制，和少量的需要，又有满足这些需要的方法。他是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的，因而奴役是他最不能忍受的罪恶。他同情这些可怜的国王，把他们看作所有顺从他们的人的奴隶；他同情这些假先知，他们被虚名所捆绑；他同情这些富足的蠢

蛋，他们是自己财富的殉道者；他同情这些爱夸耀的酒色之徒，他们浑浑噩噩地虚度了生命，却让人看上去是在享受其中的快乐。他甚至会同情伤害过他的敌人，因为他在敌人恶意的外表下看到了他的可怜。他会对自己说："这个人受到欲望的驱使来伤害我，正是他的这种需要让我替他感到可怜。"

One step more and our goal is attained. Selfishness is a dangerous tool though a useful one; it often wounds the hand that uses it, and it rarely does good unmixed with evil. When Emile considers his place among men, when he finds himself so fortunately situated, he will be tempted to give credit to his own reason for the work of yours, and to attribute to his own deserts what is really the result of his good fortune. He will say to himself, "I am wise and other men are fools." He will pity and despise them and will congratulate himself all the more heartily; and as he knows he is happier than they, he will think his deserts are greater. This is the fault we have most to fear, for it is the most difficult to eradicate. If he remained in this state of mind, he would have profited little by all our care; and if I had to choose, I hardly know whether I would not rather choose the illusions of prejudice than those of pride.

再往前走一步，我们的目标就达成了。自私是一个实用的工具，但也是很危险的；它总是伤害使用它的人的手，而且很少有起到好作用却不带来坏作用的时候。当爱弥儿在思考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时，当他发现自己的地位如此幸运时，他会不禁把你工作的成效当作他自己的理智的成果，并把他的幸运带来的结果归功于一切是他应得的。他会对自己说："我很聪明，其他人都是傻瓜。"他会同情、鄙夷他们，并会更热烈地庆贺自己；当他知道他比他们更快乐时，他会更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这是我们最该担心的错误，因为这是最难根除的

一个。如果他一直这样想，他不会因为我们的关心而有任何获益；如果我必须选择的话，我不知道我是否更宁愿选择受到偏见带来的迷惑而不受骄傲带来的迷惑。

Great men are under no illusion with respect to their superiority; they see it and know it, but they are none the less modest. The more they have, the better they know what they lack. They are less vain of their superiority over us than asham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ir weakness, and among the good things they really possess, they are too wise to pride themselves on a gift which is none of their getting. The good man may be proud of his virtue for it is his own, but what cause for pride has the man of intellect? What has Racine done that he is not Pradon, and Boileau that he is not Cotin?

伟人不会受到他们优越性的迷惑的；他们能看见自己过人之处，并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依然谦虚。他们拥有的越多，他们就越知道自己缺乏什么。与他们过人之处带来的骄傲相比，他们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而感到的羞耻更大，在他们真正拥有的长处中，他们极有智慧，以至于不会夸耀自己所不拥有的天赋。善良的人也许会因为自己的良善而为自己的美德自豪，但聪明人的骄傲又是从何而来呢？拉辛发觉自己不是普拉东时做了什么呢？布瓦罗发觉自己不是科坦时做了什么呢？

The circumstances with which we are concerned are quite different. Let us keep to the common level. I assumed that my pupil had neither surpassing genius nor a defective understanding. I chose him of an ordinary mind to show what education could do for man. Exceptions defy all rules. If, therefore, as a result of my care, Emile

prefers his way of living, seeing, and feeling to that of others, he is right; but if he thinks because of this that he is nobler and better born than they, he is wrong; he is deceiving himself; he must be undeceived, or rather let us prevent the mistake, lest it be too late to correct it.

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让我们停留在一般的水平上。我假设自己的学生既不是过人的天才也不是愚钝的傻瓜。我在普通人中选择了他，来显示教育能给人带来的作用。例外的情况则不能按常规办理。因此，假如在我的关心下，爱弥儿更喜欢自己的生活、观察、感受方式胜过喜欢他人的，那么他就是对的；但如果他认为是由于他比别人更高尚、出身更好，他就错了；他是在欺骗他自己；他必须醒悟，或由我们来防止他犯这个错误，以防纠正这个错误为时过晚。

Provided a man is not mad, he can be cured of any folly but vanity; there is no cure for this but experience, if indeed there is any cure for it at all; when it first appears we can at least prevent its further growth. But do not on this account waste your breath on empty arguments to prove to the youth that he is like other men and subject to the same weaknesses. Make him feel it or he will never know it. This is another instance of an exception to my own rules; I must voluntarily expose my pupil to every accident which may convince him that he is no wiser than we. The adventure with the conjurer will be repeated again and again in different ways; I shall let flatterers take advantage of him; if rash comrades draw him into some perilous adventure, I will let him run the risk; if he falls into the hands of sharpers at the card-table, I will abandon him to them as their dupe. [1_8] I will let them flatter him, pluck him, and rob him; and when having sucked him dry they turn and mock him, I will even thank them to his face for the lessons they have

been good enough to give him. The only snares from which I will guard him with my utmost care are the wiles of wanton women. The only precaution I shall take will be to share all the dangers I let him run, and all the insults I let him receive. I will bear everything in silence, without a murmur or reproach, without a word to him, and be sure that if this wise conduct is faithfully adhered to, what he sees me endure on his account will make more impression on his heart than what he himself suffers.

只要一个人没有疯，除了虚荣，他的一切妄想都能被医治；对虚荣心假使真有解药，也只有经验能治愈了；当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至少能防止它继续发展。但不要因此把你的口舌浪费在向青年人证明他像其他人一样有相同的弱点这样虚无的论辩上。让他觉察到这一点，否则他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一点。这是另一个我规则的例外情况；我必须主动让我的学生面临每一种状况，让他顺从他并不比我更聪明这一点。遇到魔术师的事会一次又一次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我会让奉承者占他的便宜；如果草率的同志们拉他到了某种危险的冒险中，我会让他承担这种风险；如果他落入牌桌骗子之手，我会由他受到他们的诈骗 [2_8] 。我会让他们奉承他、欺骗他、抢劫他；当他们榨干了他身上的钱后转而嘲笑他时，我甚至会当着他的面感谢他们给了他这么好的教训。我要全身心守护他不至落入的唯一陷阱，就是淫乱女子的贼窝。我将采取的唯一方法就是与他一起冒我让他遭遇的风险，并承担一切我让他承受的羞辱。我会静静地忍受一切，不说一句话，不骂一个字，不对他讲一个词，并确保这种智慧的行为被坚定地实行了；他看到我为他忍受的这些时，将在他的心板上留下更深的印象，过于他自己所受的苦。

I cannot refrain at this point from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sham dignity of tutors, who foolishly pretend to be wise, who discourage their pupils by always professing to treat them as

children, and by emphasis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ir scholars in everything they do. Far from damping their youthful spirits in this fashion, spare no effort to stimulate their courage; that they may become your equals, treat them as such already, and if they cannot rise to your level, do not scruple to come down to theirs without being ashamed of it. Remember that your honour is no longer in your own keeping but in your pupil's. Share his faults that you may correct them, bear his disgrace that you may wipe it out; follow the example of that brave Roman who, unable to rally his fleeing soldiers, placed himself at their head, exclaiming, “They do not flee, they follow their captain!” Did this dishonour him? Not so; by sacrificing his glory he increased it. The power of duty, the beauty of virtue, compel our respect in spite of all our foolish prejudices. If I received a blow in the course of my duties to Emile, far from avenging it I would boast of it; and I doubt whether there is in the whole world a man so vile as to respect me any the less on this account.

在这里我忍不住戳穿老师们虚伪的神气，他们傻里傻气地装作聪明，通过总是假装将学生当作孩子看待、强调在每件事上老师和学生做法的区别，以遏制自己的学生。不仅不能这样浇灭孩子们年轻的精神，而且更要不遗余力地激发他们的勇气；让他们跟你同等，并照这样的标准对待他们，如果他们还不能达到跟你一样的水平的话，你要毫不犹豫地降低身份，跟他们同等而不觉得羞耻。记住，你的荣耀不再在你自己身上，而在你学生身上。要纠正他们的过失，你就应分担他们的过失，要洗雪他们的耻辱，你就应承担他们的耻辱；效法那个勇敢的罗马人的例子，他不能召集他手下逃跑的士兵，便跑在士兵的前头，并喊道：“他们不是在逃跑，而是在跟随他们的将军！”这使他蒙羞了吗？并没有；通过牺牲自己的光荣，他反倒增添了光荣。责任的力量，道德的美，在于驱散了我们一切愚蠢的偏见，激起我们的敬意。如果我在为爱弥儿尽责时挨了一记耳光，我不仅不会报复，反而

会到处宣扬此事；我不相信在这世上真有人坏到因为这件事就不那么尊重我。

I do not intend the pupil to suppose his master to be as ignorant, or as liable to be led astray, as he is himself. This idea is all very well for a child who can neither see nor compare things, who thinks everything is within his reach, and only bestows his confidence on those who know how to come down to his level. But a youth of Emile's age and sense is no longer so foolish as to make this mistake, and it would not be desirable that he should. The confidence he ought to have in his tutor is of another kind; it should rest on the authority of reason, and on superior knowledge, advantages which the young man is capable of appreciating while he perceives how useful they are to himself. Long experience has convinced him that his tutor loves him, that he is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desires his happiness and knows how to procure it. He ought to know that it is to his own advantage to listen to his advice. But if the master lets himself be taken in like the disciple, he will lose his right to expect deference from him, and to give him instruction. Still less should the pupil suppose that his master is purposely letting him fall into snares or preparing pitfalls for his inexperience. How can we avoid these two difficulties? Choose the best and most natural means; be frank and straightforward like himself; warn him of the dangers to which he is exposed, point them out plainly and sensibly, without exaggeration, without temper, without pedantic display, and above all without giving your opinions in the form of orders, until they have become such, and until this imperious tone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Should he still be obstinate as he often will be, leave him free to follow his own choice, follow him, copy his example, and that cheerfully and frankly; if possible fling yourself into things, amuse yourself as

much as he does. If the consequences become too serious, you are at hand to prevent them; and yet when this young man has beheld your foresight and your kindliness, will he not be at once struck by the one and touched by the other? All his faults are but so many hands with which he himself provides you to restrain him at need. Now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great art of the master consists in controlling events and directing his exhortations so that he may know beforehand when the youth will give in, and when he will refuse to do so, so that all around him he may encompass him with the lessons of experience, and yet never let him run too great a risk.

我不希望学生认为他的老师和他自己一样无知，或是易于被引入歧途。对于一个既不会观察也不会比较事物，并认为所有事他都能凭努力获得，而且只相信那些知道如何降到跟他相同水平的人的孩子而言，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但是一个跟爱弥儿一样年纪、一样聪明的年轻人，不致于愚蠢到犯这样的错误，而且这么想也是他不应该的。他对他的导师应有的信心是另外一种信心；这种信心应该信任理智的判断，信任渊博的学识，信任他能理解的对他有用的长处。长期的经验已让他深信他的导师是爱他的，深信导师是一个聪明的善良的人，渴望他幸福并知道如何帮他获得幸福。他应该知道听从导师的意见是于他有益的。但是如果导师像学徒一样一再上当受骗，他就没有权力要求学生顺服他，并给学生指导。学生更不应该认为老师故意让他落入陷阱中，或因为他不经世事就为准备好了圈套。我们如何避免这两重困难呢？选择最好的也是最自然的方法：像学生一样坦诚直率，警示他前方面临的危险，直白而不夸张、不急躁、不装腔作势地向他们指明这一切，最重要的是不要用命令的方式给出你的意见，直到他们成为了这样的人，或是直到这样的专横语气已经绝对必要。假使他仍像往常一样固执，随他怎么做吧，你要跟着他，仿效他，高高兴兴、坦坦率率地做；如果有可能放纵自己的话，就像他一样尽情愉悦自己吧。如果后果变得太过严重的话，你在场而得以制止；当这个年轻人看见了你的先见之明和你的善意，难道他不会立刻既被你的智慧折服

又被你的善良触动？他的所有过失成为了他自己提供给你的、在需要时抑制他的缰绳。在这些情形下，为师的最大艺术就在于掌控事态，实行劝勉，从而预先得知青年人何时会屈服，何时又会拒绝，以便处处让经验来教训他，而又永不让他冒太大的风险。

Warn him of his faults before he commits them; do not blame him when once they are committed; you would only stir his self-love to mutiny. We learn nothing from a lesson we detest. I know nothing more foolish than the phrase, “I told you so.” The best way to make him remember what you told him is to seem to have forgotten it. Go further than this, and when you find him ashamed of having refused to believe you, gently smooth away the shame with kindly words. He will indeed hold you dear when he sees how you forget yourself on his account, and how you console him instead of reproaching him. But if you increase his annoyance by your reproaches he will hate you, and will make it a rule never to heed you, as if to show you that he does not agree with you as to the value of your opinion.

在他犯错前就警告他这些过失；一旦他犯了错，也不要责怪他；否则你会激起他的自爱，引起他的反抗的。我们从自己讨厌的教训中，什么也学不到。我不知道什么话比这句“我告诉过你了”更愚蠢了。最好的让他记住你告诉过他什么的方法，就是装作已经忘记你说过的话。更进一步，当你发现他为自己拒绝信任你而羞愧时，温柔地用柔和的话语拂去羞耻。当他看见你如何因为他而忘记了自己、没有责备他，反而安慰他时，一定会更尊敬你的。但是如果你用你的批评增添他的怒气，他会恨你，并会发誓再也不听从你的话，来表明他不像你重视自己的意见那样认同你的话。

The turn you give to your consolation may itself be a lesson to him, and all the more because he does not suspect it. When you tell him, for example, that many other people have made the same mistakes, this is not what he was expecting; you are administering correction under the guise of pity; for when one thinks oneself better than other people it is a very mortifying excuse to console oneself by their example; it means that we must realise that the most we can say is that they are no better than we.

你给予他的安慰本身就会成为对他的教训，因为他对此没有怀疑，教训效果则愈加地好。比如说，当你告诉他许多的人也犯过同样的错误的时候，他并没有料想到你会说这样的话；在假装同情他的情况下，你已经纠正了他的错误；因为当一个人自认为比别人更好时，用他人作为例子来安慰他是很折磨人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顶多能说别人不比我们强。

The time of faults is the time for fables. When we blame the guilty under the cover of a story we instruct without offending him; and he then understands that the story is not untrue by means of the truth he finds in its application to himself. The child who has never been deceived by flattery understands nothing of the fable I recently examined; but the rash youth who has just become the dupe of a flatterer perceives only too readily that the crow was a fool. Thus he acquires a maxim from the fact, and the experience he would soon have forgotten is engraved on his mind by means of the fable. There is no knowledge of morals which cannot be acquired through our own experience or that of others. When there is danger, instead of letting him try the experiment himself, we have recourse to history. When the risk is comparatively slight, it is just as well that the youth should be exposed to it; then by means of the

apologue the special cases with which the young man is now acquainted are transformed into maxims.

犯错的时候，是用来讲寓言的时候。当我们在故事的形式下谴责罪恶时，我们在没有冒犯他的情况下教育他；当他用这个寓言对照自身的时候，便明白这个故事并非不真。这个从未被奉承话欺哄过的孩子对我近期所讲的寓言是毫不理解的；但是刚刚上过马屁精的当的孩子则很快就发现乌鸦确实是一个傻瓜。吃一堑，长一智，而他很快会忘记的这一经验会通过寓言刻在他的脑海中。没有什么道德知识是不能通过我们或者他人的经验获得的。遇到危险的时候，与其让他亲自尝试，不如让我们再次回到历史中。当危险相对来说比较轻的时候，让青年人冒一下险也没什么不好；通过将特殊的事例改编成寓言，这个青年人刚经历的故事便成为了格言。

It is not, however, my intention that these maxims should be explained, nor even formulated. Nothing is so foolish and unwise as the moral at the end of most of the fables; as if the moral was not, or ought not to be so clear in the fable itself that the reader cannot fail to perceive it. Why then add the moral at the end, and go deprive him of the pleasure of discovering it for himself. The art of teaching consists in making the pupil wish to learn. But if the pupil is to wish to learn, his mind must not remain in such a passive state with regard to what you tell him that there is really nothing for him to do but listen to you. The master's vanity must always give way to the scholars; he must be able to say, I understand, I see it, I am getting at it, I am learning something. One of the things which makes the Pantaloon in the Italian comedies so wearisome is the pains taken by him to explain to the audience the platitudes they understand only too well already. We must always be intelligible, but we need not say all there is to be said. If you talk much you will

say little, for at last no one will listen to you. What is the sense of the four lines at the end of La Fontaine's fable of the frog who puffed herself up. Is he afraid we should not understand it? Does this great painter need to write the names beneath the things he has painted? His morals, far from generalising, restrict the lesson to some extent to the examples given, and prevent our applying them to others. Before I put the fables of this inimitable author into the hands of a youth, I should like to cut out all the conclusions with which he strives to explain what he has just said so clearly and pleasantly. If your pupil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fable without the explanation, he will not understand it with it.

然而，我的目的不是解释这些格言，抑或将格言形式化。没有什么比寓言最后的道德说教更愚蠢空洞的了；似乎寓言本身里的道德含义还不够清楚、读者不能读懂似的。那么为什么在最后加上道德说教，剥夺了他自己去发现寓意的乐趣呢？教育的艺术在于让学生渴望学习。但如果为了让学生渴望学习，就不能让他的思维停留在听你说话这样一种消极的状态，以致他除了听从你以外无事可做。老师固然要有自尊，但也要给学生自尊；要让学生能说："我懂了，我明白了，我看出它的意思了，我学有所获了。"意大利戏剧中让丑角如此令人厌烦的原因之一，是他煞费苦心地向观众解释他们已经烂熟于心的陈词滥调。我们必须总是明白易懂，但是我们不需要说所有要讲的话。如果你讲得太多，你会无话可说，因为最终没有人会听你讲的话。拉·封丹在把自己鼓胀起来的青蛙寓言结尾加的四行诗是什么含义呢？他是担心我们读不懂这个语言吗？这个伟大的画家难道还需要在他的画作下写下他画了什么吗？他的道德说教，不仅不能让寓言故事受到普及，而且将教训一定程度上局限于所给的事例中，使我们不能将其运用于其他地方。在我把这个无与伦比的作家的语言交到一个青年人手中之前，我会希望把所有结语部分都删掉，这块他如此努力去解释的部分已经在寓言中写得清楚而又趣味盎然了。如果你的学生没有结语就无法理解这个寓言，就算有结语他也无法明白寓言的。

Moreover, the fables would require to be arranged in a more didactic order, one more in agreement with the feelings and knowledge of the young adolescent. Can you imagine anything so foolish as to follow the mere numerical order of the book without regard to our requirements or our opportunities. First the grasshopper, then the crow, then the frog, then the two mules, etc. I am sick of these two mules; I remember seeing a child who was being educated for finance; they never let him alone, but were always insisting on the profession he was to follow; they made him read this fable, learn it, say it, repeat it again and again without finding in it the slightest argument against his future calling. Not only have I never found children make any real use of the fables they learn, but I have never found anybody who took the trouble to see that they made such a use of them. The study claims to be instruction in morals; but the real aim of mother and child is nothing but to set a whole party watching the child while he recites his fables; when he is too old to recite them and old enough to make use of them, they are altogether forgotten. Only men, I repeat, can learn from fables, and Emile is now old enough to begin.

而且，寓言最好是按照更符合教学法的顺序排列，按照更适合青年人感情和知识发展的程度排列。不考虑我们的需要和当时的情况，就仅仅照着书中的次序来阅读，你能想象出更愚笨的事情吗？首先讲蝉，再讲乌鸦，然后讲青蛙，接着讲两匹骡子，等等。我不喜欢两匹骡子的寓言；我记得见过一个正在学理财的孩子；他们从未给他独处的机会，而且他们一直坚持要他从事这一职业；他们让他阅读这个寓言，学习它，谈论它，一次又一次复述它，没有在其中找到任何反对他将来天职的道理。我不仅没有发现孩子们从所学的寓言中有任何实际的应用，而且也没有找到任何人花心思教他们应用这些寓言。人们声称学习寓言具有道德指导的作用；但是母亲和孩子的真正目的没有

别的，只有办一个派对，让人们看孩子背诵寓言；当孩子长大不适宜背诵寓言，也成长到不需要应用寓言时，他们就全然将寓言忘记了。我重复一遍，只有成年人能从寓言中有所习得，爱弥儿已经到了可以开始学习寓言的时候了。

I do not mean to tell you everything, so I only indicate the paths which diverge from the right way, so that you may know how to avoid them. If you follow the road I have marked out for you, I think your pupil will buy his knowledge of mankind and his knowledge of himself in the cheapest market; you will enable him to behold the tricks of fortune without envying the lot of her favourites, and to be content with himself without thinking himself better than others. You have begun by making him an actor that he may learn to be one of the audience; you must continue your task, for from the theatre things are what they seem, from the stage they seem what they are. For the general effect we must get a distant view, for the details we must observe more closely. But how can a young man take part in the business of life? What right has he to be initiated into its dark secrets? His interests are confined within the limits of his own pleasures, he has no power over others, it is much the same as if he had no power at all. Man is the cheapest commodity on the market, and among all our important rights of property, 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are always considered last of all.

我不打算什么都告诉你，所以我只是指出那些脱离正路的条条小道，从而让你能够知道如何避免它们。如果你跟着我为你标示的道路去行，我认为你的学生就是在最实惠的市场买到了关于人类和自己的知识；你将使他能够看到命运的把戏而不嫉妒命运宠儿的美好命运，并能对自己感到满足而不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强。你在让他开始成为演

员时，他也学着成为了一个观众了；你必须继续你的任务，因为在剧院中，看到的只是物体的表象，只有在舞台上看到的才是物体的真实面貌。要看到整体效果我们必须从远处观看，要观察细节我们必须从近处着眼。但是一个年轻人如何能参与世事呢？他有什么权力去了解黑暗的秘密呢？他的兴趣受到自己享乐之事的限制，他没有权力掌管他人的生活，这就跟他没有任何权力一样。人是市场中最廉价的商品，在我们所有重要的财产权中，个人的权利总是最后才考虑的。

When I see the studies of young men at the period of their greatest activity confined to purely speculative matters, while later on they are suddenly plunged, without any sort of experience, into the world of men and affairs, it strikes me as contrary alike to reason and to nature, and I cease to be surprised that so few men know what to do. How strange a choice to teach us so many useless things, while the art of doing is never touched upon! They profess to fit us for society, and we are taught as if each of us were to live a life of contemplation in a solitary cell, or to discuss theories with persons whom they did not concern. You think you are teaching your scholars how to live, and you teach them certain bodily contortions and certain forms of words without meaning. I, too, have taught Emile how to live; for I have taught him to enjoy his own society and, more than that, to earn his own bread. But this is not enough. To live in the world he must know how to get on with other people, he must know what forces move them, he must calculate the action and re-action of self-interest in civil society, he must estimate the results so accurately that he will rarely fail in his undertakings, or he will at least have tried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The law does not allow young people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 nor to dispose of their own property; but what would be the use of these precautions if they never gained any experience until they were of age. They would have gained nothing by the delay, and

would have no more experience at five-and-twenty than at fifteen. No doubt we must take precautions, so that a youth, blinded by ignorance or misled by passion, may not hurt himself; but at any age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when deeds of kindness and of care for the weak may be perform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wise man, on behalf of the unfortunate who need help.

当我看到年轻人在一生最有活力的时候将研究限于纯粹理论性的事务，不久后在他们还没有任何经验时，又突然投入到社会和担当之事，我认为这既反理性又反自然，所以对于如此少的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一点也不奇怪。在还没有教行为的艺术的时候，选择教我们这么多无用之事是多么奇怪呀！他们口头上说是为了让我们适应社会而教我们，我们也像将要一生在安静的书斋中沉思般，或是将要与不相干的人讨论理论般受到教育。你认为你教他们做一些柔软操，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就是在教育自己的学生如何生活了。我也教过爱弥儿如何生活；因为我教导他不仅要享受自己的生活，更要赚取自己的面包。但这还不够。要在世界上生活，他必须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他必须知道什么力量支配他们，他必须在文明社会中估计个人利益的作用和反作用，他必须准确地预料结果，使自己不在事业中失败，或者至少选用了成功的最好最有可能的方法。法律不允许青年人管理自己的事务和财产；但是如果他们在成年以前还没有获得任何经验的话，这样的预防措施又有什么用呢？延迟不会让他们有任何收获，也不会让他们在二十五岁时比在十五岁时多出什么经验。无疑我们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从而一个年轻人不会因被无知蒙蔽了双眼或者被欲望引向歧路而伤害了他自己；但是无论他在什么年龄，都应该在一个有智慧的人的指导下保护弱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可怜人。

Mothers and nurses grow fond of children because of the care they lavish on them; the practice of social virtues touches the very heart with the love of humanity; by doing good we become good;

and I know no surer way to this end. Keep your pupil busy with the good deeds that are within his power, let the cause of the poor be his own, let him help them not merely with his money, but with his service; let him work for them, protect them, let his person and his time be at their disposal; let him be their agent; he will never all his life long have a more honourable office. How many of the oppressed, who have never got a hearing, will obtain justice when he demands it for them with that courage and firmness which the practice of virtue inspires; when he makes his way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rich and great, when he goes, if need be, to the footstool of the king himself, to plead the cause of the wretched, the cause of those who find all doors closed to them by their poverty, those who are so afraid of being punished for their misfortunes that they do not dare to complain?

母亲和保姆因为对孩子们付出的无尽的关心而愈加疼爱孩子；社会道德的实践也给每个人心带来人性之爱；通过做好事，我们成为好人；对这一点我确定无疑。让你的学生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好事，使他将穷人的利益看做自己的利益，让他不仅仅用钱周济他们，也用他的行动帮助他们；让他为他们服务，让他保护他们，为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时间；让他成为他们的办事人；让他的一生都做这样高尚的事。有多少受欺压的人曾无处伸冤，却将因他由美德的实践激起的勇气和决心而为他们争取时、因他闯入富贵之家，需要的话，来到国王自己的脚凳前，为他们这些可怜人请求，而获得正义？这些人曾因为贫穷而处处吃闭门羹，又那么害怕因为自己的不幸受到惩罚，从而不敢有任何抱怨。

But shall we make of Emile a knight-errant, a redresser of wrongs, a paladin? Shall he thrust himself into public life, play the sage and the defender of the laws before the great, before the

magistrates, before the king? Shall he lay petitions before the judges and plead in the law courts? That I cannot say. The nature of things is not changed by terms of mockery and scorn. He will do all that he knows to be useful and good. He will do nothing more, and he knows that nothing is useful and good for him which is unbefitting his age. He knows that his first duty is to himself; that young men should distrust themselves; that they should act circumspectly; that they should show respect to those older than themselves, reticence and discretion in talking without cause, modesty in things indifferent, but courage in well doing, and boldness to speak the truth. Such were those illustrious Romans who, having been admitted into public life, spent their days in bringing criminals to justice and in protecting the innocent, without any motives beyond those of learning, and of the furtherance of justice and of the protection of right conduct.

但，我们是否要将爱弥儿培养成一个游侠，一个骑士，一个打抱不平的人呢？他要不要干涉公众生活，在王公贵族的宅邸和衙门前扮演圣人和法律的维护者呢？他要不要再法官面前请愿，在法庭中求情呢？这些我都不知道。事物的性质不会由于滑稽的名字而改变。他会做他知道的一切有用和良善的事。他不会做任何多余的事，他也知道不适合他年龄的事都是无用、不好的。他知道他首先要对自己尽责；年轻人应该不过分相信自己，并谨慎言行，对比自己年长的人表现出尊重；应该注意少说废话，在无聊的事上有节制，并敢于做有意义的事、勇于说出真理。那些著名的罗马人就是如此，在担当社会责任以前的青年时期惩罚罪恶，保护无辜，只是为了学以致用，伸张正义，保护善良的风俗。

Emile is not fond of noise or quarrelling, not only among men, but among animals. [1_9] He will never set two dogs to fight, he will

never set a dog to chase a cat. This peaceful spirit is one of the results of his education, which has never stimulated self-love or a high opinion of himself, and so has not encouraged him to seek his pleasure in domination and in the sufferings of others. The sight of suffering makes him suffer too; this is a natural feeling. It is one of the after effects of vanity that hardens a young man and makes him take a delight in seeing the torments of a living and feeling creature; it makes him consider himself beyond the reach of similar sufferings through his superior wisdom or virtue. He who is beyond the reach of vanity cannot fall into the vice which results from vanity. So Emile loves peace. He is delighted at the sight of happiness, and if he can help to bring it about, this is an additional reason for sharing it. I do not assume that when he sees the unhappy he will merely feel for them that barren and cruel pity which is content to pity the ills it can heal. His kindness is active and teaches him much he would have learnt far more slowly, or he would never have learnt at all, if his heart had been harder. If he finds his comrades at strife, he tries to reconcile them; if he sees the afflicted, he inquires as to the cause of their sufferings; if he meets two men who hate each other, he wants to know the reason of their enmity; if he finds one who is down-trodden groaning under the oppression of the rich and powerful, he tries to discover by what means he can counteract this oppression, and in the interest he takes with regard to all these unhappy persons, the means of removing their sufferings are never out of his sight. What use shall we make of this disposition so that it may re-act in a way suited to his age? Let us direct his efforts and his knowledge, and use his zeal to increase them.

爱弥儿不喜欢喧闹，也不爱吵架，不仅是不喜欢人与人如此，也不喜欢动物间如此 [2_9] 。他绝不会让两只狗打架，也绝不会让一只狗

去追一只猫。这种爱好和平的精神是他受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从未激发自爱或者他对自己很高的评价，也因此没有促使他在统治或者在他人的痛苦中寻求自己的快乐。看到痛苦的场景也会让他痛苦；这是一种自然的感受。虚荣的后遗症之一就是使年轻人铁石心肠，并乐于看到有感觉的生物受到折磨；虚荣使他自认为可以通过他过人的智慧或美德免受这样的痛苦。不受虚荣之心浸染的人能够免受虚荣带来的恶果。所以爱弥儿爱好和平。他看到快乐的场景就会高兴，假如他能够带来快乐的话，他也会因此觉得快乐，这也成为了另一个分享快乐的原因。我认为他看到不快的面孔时是不会仅仅说一些空洞无情的怜悯的话的。那些话只满足于治愈那些它们能治愈的伤痛。他积极的善行能教他许多他原本只能很慢学会甚就永远也不会学到的东西。如果她发现他的同伴之间有嫌隙，就会尽力让他们和好；如果他看到有人在受苦，就会探寻他们受苦的原因；如果他看到两个人彼此恨恶，就想知道他们敌对的缘由；如果他发现有人在富强者的欺压践踏下呻吟，就会尽力寻找能反抗这种压迫的方法；他关心一切这些不幸的人，因此也不会不关心除去他们痛苦的手段。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可以让这种倾向以适合他年龄的方式起作用呢？让我们指导他的思想和学业，用他的热情来提高他的水平。

I am never weary of repeating: let all the lessons of young people take the form of doing rather than talking; let them learn nothing from books which they can learn from experience. How absurd to attempt to give them practice in speaking when they have nothing to say, to expect to make them feel, at their school desks, the vigour of the language of passion and all the force of the arts of persuasion when they have nothing and nobody to persuade! All the rules of rhetoric are mere waste of words to those who do not know how to use them for their own purposes. How does it concern a schoolboy to know how Hannibal encouraged his soldiers to cross the Alps? If instead of these grand speeches you showed him how to induce his prefect to give him a holiday, you may be sure he w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your rules.

我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所有对青年人的教育应采取行动而非仅谈论的方式；他们能从经验中学习到的就不要让他们从书本中获取。当他们无话可说时硬要他们练习口才，当他们没有说服的内容和对象的时候，希望他们在书桌上感受有感情的寓言的活力和劝服艺术的力量，是多么滑稽啊！所有的修辞法，在不知道如何为自己的目的而运用它的人来说，纯粹是浪费文字。一个学生怎么会对汉尼拔如何鼓励士兵穿越阿尔卑斯山感兴趣呢？如果你教他如何说服校长给他放假，而非教他华丽的辞藻，你就可以确信，他将更专心听你的修辞法的。

If I wanted to teach rhetoric to a youth whose passions were as yet undeveloped, I would draw his attention continually to things that would stir his passions, and I would discuss with him how he should talk to people so as to get them to regard his wishes favourably. But Emile is not in a condition so favourable to the art of oratory. Concerned mainly with his physical well-being, he has less need of others than they of him; and having nothing to ask of others on his own account, what he wants to persuade them to do does not affect him sufficiently to awake any very strong feeling. From this it follows that his language will be on the whole simple and literal. He usually speaks to the point and only to make himself understood. He is not sententious, for he has not learnt to generalise; he does not speak in figures, for he is rarely impassioned.

如果我想教一个情感还没完全成熟的青年人修辞学，我会不断地让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能刺激他感情的事情上，并且会跟他讨论他应如何跟他人讲话，从而让人们满足他的愿望。但是爱弥儿所处的环境并

不利于他学习雄辩术。他主要的需求在于身体的健康，因此他对别人的需求比别人对他的需求更少；由于对其他人没有需求，他想要说服他人去做的事也不会让他着急得过分冲动。由此，他的语言一般是简单明了的。他的讲话总是在点子上，唯一的要求是他人能听懂。他不爱咬文嚼字，因为他还没学会概括观点；他也不会用比喻，因为他很少情感冲动。

Yet this is not because he is altogether cold and phlegmatic, neither his age, his character, nor his tastes permit of this. In the fire of adolescence the life-giving spirits, retained in the blood and distilled again and again, inspire his young heart with a warmth which glows in his eye, a warmth which is felt in his words and perceived in his actions. The lofty feeling with which he is inspired gives him strength and nobility; imbued with tender love for mankind his words betray the thoughts of his heart; I know not how it is, but there is more charm in his open-hearted generosity than in the artificial eloquence of others; or rather this eloquence of his is the only true eloquence, for he has only to show what he feels to make others share his feelings.

然而这不是因为他十分冰冷迟钝，他的年龄、性格或是品味也不允许他这样。在青春期的热火中，他血液里一次又一次洗炼的生命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激发起一种温暖，这种温暖在他的眼中点亮，在他的话语和行为中展现。这种高尚的情操激发了他，令他力量充沛，心地高尚。被对人类的温柔的爱浸润，他的话语说出了内心的想法；我不知道这是如何形成的，但他那坦率的话语比他人的花言巧语更有魅力；或者说他的言辞才是唯一真正的言辞，因为他只需要道出自己的感受就能让他人体会他的感觉。

The more I think of it the more convinced I am that by thus translating our kindly impulses into action, by drawing from our good or ill success conclusions as to their cause, we shall find that there is little useful knowledge that cannot be imparted to a youth; and that together with such true learning as may be got at college he will learn a science of more importance than all the rest together, the application of what he has learned to the purposes of life. Taking such an interest in his fellow-creatures, it is impossible that he should fail to learn very quickly how to note and weigh their actions, their tastes, their pleasures, and to estimate generally at their true value what may increase or diminish the happiness of men; he should do this better than those who care for nobody and never do anything for any one. The feelings of those who are always occupied with their own concerns are too keenly affected for them to judge wisely of things. They consider everything as it affects themselves, they form their ideas of good and ill solely on their own experience, their minds are filled with all sorts of absurd prejudices, and anything which affects their own advantage ever so little, seems an upheaval of the universe.

我对此想得越多，就越是相信，只要把我们仁慈的意念付诸行动，只要从我们做得好或不好的事情中寻找原因，我们就会发现没有哪样有用的知识是不能灌输给年轻人的；而且，除了在学校习得的真才实学之外，他还会学到比其他所有都更重要的功课，就是将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完成人生的目标上。对同伴如此关心的他，一定会很快学会如何辨别和衡量他们的行为、品味、兴趣，并对他们对于什么能给人类带来幸福或减损幸福的真实价值观有大体的估计；比起那些不关心任何人，也不为任何人做事的人来说，他会做得更好。那些只在乎自己的事情的人，感情太容易受影响，以至于无法智慧地判断事物。他们考虑任何事都从它对自己有何影响入手，他们评判事物的好坏也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他们的头脑充满了各样荒唐的偏见，哪

怕对他们自己的利益只有一点影响的事情，他们都觉得是天塌下来了。

Extend self-love to others and it is transformed into virtue, a virtue which has its root in the heart of every one of us. The less the object of our care is directly dependent on ourselves, the less we have to fear from the illusion of self-interest; the more general this interest becomes, the juster it is; and the love of the human race is nothing but the love of justice within us. If therefore we desire Emile to be a lover of truth, if we desire that he should indeed perceive it, let us keep him far from self-interest in all his business. The more care he bestows upon the happiness of others the wiser and better he is, and the fewer mistakes he will make between good and evil; but never allow him any blind preference founded merely on personal predilection or unfair prejudice. Why should he harm one person to serve another? What does it matter to him who has the greater share of happiness, providing he promotes the happiness of all? Apart from self-interest this care for the general well-being is the first concern of the wise man, for each of us forms part of the human race and not part of any individual member of that race.

将自爱延伸到他人就成为了美德，这种美德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有根有基的。我们关心的对象越不是直接与我们相关，我们对受到个人利益的迷惑的害怕就越小；这种利益涉及越广泛，就越公正；所以，爱人类，就是爱我们内心的正义。那么如果我们希望爱弥儿成为一个爱好真理的人，如果我们希望他真的能认识它，我们就要事事都让他离自我利益远远的。他对他人的幸福关注得越多，他就越聪明善良，在善恶之事上犯的错也就会越少；但是永远不要让他仅凭个人的偏见或不公正的成见产生任何盲目的偏爱。为什么他要因服务一个人而伤害到另一个人呢？既然他促进了大众的幸福，谁得到了更多其

中的好处，对他而言又有什么关系呢？除了自我利益，对大众福祉的关心是一个智者首要关心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集体的一部分，而非个人的一部分。

To prevent pity degenerating into weakness we must generalise it and extend it to mankind. Then we only yield to it when it is in accordance with justice, since justice is of all the virtues that which contributes most to the common good. Reason and self-love compel us to love mankind even more than our neighbour, and to pity the wicked is to be very cruel to other men.

要防止同情心蜕化成懦弱，我们必须普遍地同情整个人类。这样，只有在与公义一致时，我们才会同情，因为公义是所有美德中最有助于大众福祉的。理智和自爱驱使我们爱人类胜过爱邻舍，同情弱者对其他人也成了极为残忍的事。

Moreover, you must bear in mind that all these means employed to project my pupil beyond himself have also a distinct relation to himself; since they not only cause him inward delight, but I am also endeavouring to instruct him, while I am making him kindly disposed towards others.

另外，你要记住，所有这些让学生忘记自己的方法还有与他直接的关系；因为不仅它们会给他带来内在的快乐，我也在令他善待他人时，同时教育了他自己。

First I showed the means employed, now I will show the result.

What wide prospects do I perceive unfolding themselves before his mind! What noble feelings stifle the lesser passions in his heart! What clearness of judgment, what accuracy in reasoning, do I see developing from the inclinations we have cultivated, from the experience which concentrates the desires of a great heart within the narrow bounds of possibility, so that a man superior to others can come down to their level if he cannot raise them to his own! True principles of justice, true types of beauty, all moral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man, all ideas of order, these are engraved on his understanding; he sees the right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the causes which drive it from that place; he sees what may do good, and what hinders it. Without having felt the passions of mankind, he knows the illusions they produce and their mode of action.

我一开始说明了所使用的方法，现在我要谈一谈它们的成效。在他的头脑中，我看到了慢慢展开的前景是多么广阔啊！阻碍他心中渺小的欲念的感情是多么高尚啊！多么清晰的判断，多么正确的理性，在我们培育的他的倾向中发展，在非常有限的可能性的限制中从宽广的心的欲念中被经验所集聚，从而使一个比他人更优越的人能降到他无法让他人升到的水平！真正的正义的原则，真正的美的典型，所有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一切有关秩序的思想，都刻印在他的脑海中了；他看待一切都合乎中道，并能看出事物在其位的缘由；他知道什么事会带来益处，而什么事不会。不需要体察到人类的欲望，他就了解了欲望带来的幻象以及幻象的行为方式。

I proceed along the path which the force of circumstances compels me to tread, but I do not insist that my readers shall follow me. Long ago they have made up their minds that I am wandering in the land of chimeras, while for my part I think they are dwelling in the country of prejudice. When I wander so far from popular

beliefs I do not cease to bear them in mind; I examine them, I consider them, not that I may follow them or shun them, but that I may weigh them in the balance of reason. Whenever reason compels me to abandon these popular beliefs, I know by experience that my readers will not follow my example; I know that they will persist in refusing to go beyond what they can see, and that they will take the youth I am describing for the creation of my fanciful imagination, merely because he is unlike the youths with whom they compare him; they forget that he must needs be different, because he has been brought up in a totally different fashion; he has been influenced by wholly different feelings, instructed in a wholly different manner, so that it would be far stranger if he were like your pupils than if he were what I have supposed. He is a man of nature's making, not man's. No wonder men find him strange.

我沿着事物的力量推动着我去行走的路前行，但我不强求读者也跟我走同样的路。很久以前，他们都认为我在梦幻之乡游荡，而在我看来，他们则在偏见之城栖居。当我与世俗的信念渐行渐远时，仍没有停止思考它们；我分析它们，思考它们，不是为了跟随或是避免它们，而是为了用理性的天平衡量它们。不管是什么原因驱使我抛弃这些世俗观念，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晓得我的读者不会学我的样子的；我知道他们只会相信亲眼所见之事，所以就把我描绘的青年当作我奇幻想象的产物，仅仅因为这个青年与他们与之比较的青年人不同；他们忘记了他必须要与众不同，因为他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念下长大的；他受到完全不同的感情的熏陶，被完全不同的行事方式指导，所以他若像你们的学生，会比他成为我所设想的那样的学生更加奇怪。他是自然之工，非人手所造。难怪人们会觉得他稀奇。

When I began this work I took for granted nothing but what could be observed as readily by others as by myself; for our

starting-point, the birth of man, is the same for all; but the further we go, while I am seeking to cultivate nature and you are seeking to deprave it, the further apart we find ourselves. At six years old my pupil was not so very unlike yours, whom you had not yet had time to disfigure; now there is nothing in common between them; and when they reach the age of manhood, which is now approaching, they will show themselves utter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unless all my pains have been thrown away. There may not be so very great a difference in the amount of knowledge they possess, but there i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in the kind of knowledge. You are amazed to find that the one has noble sentiments of which the others have not the smallest germ, but remember that the latter are already philosophers and theologians while Emile does not even know what is meant by a philosopher and has scarcely heard the name of God.

当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写他人跟我一样都能论述的事情；因为我们论述的起点，即人类的出生，对所有人来说都一样可以探讨；但是我们越是论述，当我开始试着培育天性而你试着败坏天性时，我们之间的分歧就越大。六岁时，我的学生和你的学生还没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那时你还没有时间来毁坏他们的原型；现在，我们的学生已经截然不同了；现在离他们成年越来越近了，等到他们成年时，除非我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否则他们一定完全两样。在所拥有知识的数量上，他们也许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在知识的内容上，则完全不同。你发现他具有高尚的情操，而你的学生连情操的苗头都没有的时候，就感到惊讶；但要记住，你的学生已经成为哲学家和神学家时，爱弥儿还不知道哲学是什么意思，甚至还没有听过上帝的名字呢。

But if you come and tell me, “There are no such young men,

young people are not made that way; they have this passion or that, they do this or that," it is as if you denied that a pear tree could ever be a tall tree because the pear trees in our gardens are all dwarfs.

但是如果你来告诉我："现在没有这样的青年人，青年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欲望，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这就像因为我们花园中的梨树都很矮小，你就因此否认梨树也能成长为高大的树木一样。

I beg these critics who are so ready with their blame to consider that I am as well acquainted as they are with everything they say, that I have probably given more thought to it, and that, as I have no private end to serve in getting them to agree with me, I have a right to demand that they should at least take time to find out where I am mistaken. Let them thoroughly examine the nature of man, let them follow the earliest growth of the heart in any given circumstances, so as to see what a difference education may make in the individual; then let them compare my method of education with the results I ascribe to it; and let them tell me where my reasoning is unsound, and I shall have no answer to give them.

我请求那些早已准备好批评他人的评论家们想一想，我跟他们一样对他们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很熟悉，而且我甚至对这事有更深入的思考，并且，由于我的私人目的不是要他们赞同我，我有权利要求他们至少花点时间找找我哪里出了错。让他们彻底地考察人类的天性，让他们跟随各样环境下心灵最早的成长，从而了解一个人在教育的影响下可以与他人有多大的不同；然后让他们比较一下我教育的方法和我的方法带来的成效；再让他们告诉我我哪里的论证不严谨，我才会无

话可驳。

It is this that makes me speak so strongly, and as I think with good excuse: I have not pledged myself to any system, I depend as little as possible on arguments, and I trust to what I myself have observed. I do not base my ideas on what I have imagined, but on what I have seen. It is true that I have not confined my observations within the walls of any one town, nor to a single class of people; but having compared men of every class and every nation which I have been able to observe in the course of a life spent in this pursuit, I have discarded as artificial what belonged to one nation and not to another, to one rank and not to another; and I have regarded as proper to mankind what was common to all, at any age, in any station, and in any nation whatsoever.

我说得这么肯定而且觉得有理由原谅的原因在于：我没有依附于任何一套系统，也尽可能地不按照理论而相信我所观察到的事。我的观点不基于自己的想象，而基于我看到的事实。我确实没有将自己的观察限于任何一个镇的范围内，也没有限于某一个阶层的群体；但在我在人生追求的旅途中，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比较过每个阶层、每个民族的人以后，我丢弃了属于一个民族而不属于另一个民族，属于一个阶层而不属于另一个阶层的人认为的东西；我也以适当的眼光看待人类所共有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年龄，或是什么社会地位，还是什么国家。

Now if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method you follow from infancy the course of a youth who has not been shaped to any special mould, one who depends as little as possible on authority and the opinions of others, which will he most resemble, my pupil or yours?

It seems to me that this is the question you must answer if you would know if I am mistaken.

如果你从一个青年的幼年开始就用这种方法教育他，而且这个青年还没有受到任何特殊的陶造，也尽可能少地依附权威和他人的观点，那么他最像的是谁呢，是我的学生还是你的学生？我觉得，如果你想知道我是不是错了，这就是你必须回答的问题。

It is not easy for a man to begin to think; but when once he has begun he will never leave off. Once a thinker, always a thinker, and the understanding once practised in reflection will never rest. You may therefore think that I do too much or too little; that the human mind is not by nature so quick to unfold; and that after having given it opportunities it has not got, I keep it too long confined within a circle of ideas which it ought to have outgrown.

一个人不会轻易地开始思考；但一旦他开始思考了，就绝不会停下来。一旦成为思想者，他就会永远成为思想者；一旦一个思想者将他的想法付诸过实践，他就会经常这么做。你也许因此认为我做得太多或太少了；认为人类的头脑不是天生那么容易就开窍的；认为给了他未曾有过的机会之后，我将他禁锢在一个它早就应该超越的思想范围内太久了。

But remember,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when I want to train a natural man, I do not want to make him a savage and to send him back to the woods, but that living in the whirl of social life it is enough that he should not let himself be carried away by the passions and prejudices of men; let him see with his eyes and feel

with his heart, let him own no sway but that of reason. Under these conditions it is plain that many things will strike him; the oft-recurring feelings which affect him, the different ways of satisfying his real needs, must give him many ideas he would not otherwise have acquired or would only have acquired much later. The natural progress of the mind is quickened but not reversed. The same man who would remain stupid in the forests should become wise and reasonable in towns, if he were merely a spectator in them. Nothing is better fitted to make one wise than the sight of follies we do not share, and even if we share them, we still learn, provided we are not the dupe of our follies and provided we do not bring to them the same mistakes as the others.

但是要记住，首先，当我想要培养一个自然的人的时候，我不想把他训练成一个野人，再把他送回到森林里，而是生活在社会漩涡中，他能不让自己被人类的欲望和偏见裹挟而走就够了，他能够用眼睛去看、用心去体会、除了理智不受其他事物的动摇就够了。在这些情况下，显然有许多事情会使他动心；有频频发生的感情使他受影响，有种种不同的方式满足他真正的需要；这些一定会给他许多他本不会获得或很迟才会获得的想法。思维的自然进程加快了，而非延缓了。同样一个人，在森林里也许会十分蠢笨，到了城市里，也许只是做一个观察者，就能变得聪明理性。不参与所见狂妄之事是使人聪明的最好办法，而哪怕我们参与其中，假如我们既不受其蒙骗，又不犯那些乖僻之人所犯的同样过失，就仍能从中受到教育。

Consider also that while our faculties are confined to the things of sense, we offer scarcely any hold to the abstractions of philosophy or to purely intellectual ideas. To attain to these we require either to free ourselves from the body to which we are so strongly bound, or to proceed step by step in a slow and gradual

course, or else to leap across the intervening space with a gigantic bound of which no child is capable, one for which grown men even require many steps hewn on purpose for them; but I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see how you propose to construct such steps.

同样也要想一想，因为我们的才能受制于所能感知到的事物，所以我们很难理解哲学的抽象概念或者纯粹的理论观点。要获得它们，我们要么得从紧紧依附的身体中脱离出来，要么就得一步一步地循序渐进，要么一大步跳过这些阻挠我们的距离，这是孩子做不到的，就算是成年人也需要为此故意做出许多阶梯；不过我还不大明白你打算如何制造这些阶梯。

The Incomprehensible embraces all, he gives its motion to the earth, and shapes the system of all creatures, but our eyes cannot see him nor can our hands search him out, he evades the efforts of our senses; we behold the work, but the workman is hidden from our eyes. It is no small matter to know that he exists, and when we have got so far, and when we ask. What is he? Where is he? our mind is overwhelmed, we lose ourselves, we know not what to think.

那不可测度者拥抱万有，推动地球，创造万物，但是我们肉眼无法见到他，双手也无法摸到他，他逃避我们的感官；我们能看见他手所做之工，这位巧匠却从我们的眼前躲藏起来。认识到他的存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就开始发问了。他是什么？他在哪里？我们的头脑被淹没，我们失去了自我，我们不知道要思考什么。

Locke would have us begin with the study of spirits and go on to that of bodies. This is the method of superstition, prejudice, and error; it is not the method of nature, nor even that of well-ordered reason; it is to learn to see by shutting our eyes. We must have studied bodies long enough before we can form any true idea of spirits, or even suspect that there are such beings. The contrary practice merely puts materialism on a firmer footing.

洛克让我们先研究精神，进而研究身体。这也是迷信、偏见、错误的方法；这不是自然的方法，也不是有良好秩序的理性的方法；这与让我们通过闭上眼睛来学会看无异。在我们能对精神形成任何真正的概念以前，甚至怀疑是否存在这样的东西以前，必须学习身体很长时间。相反的实践只会让人更加认同物质主义。

Since our senses are the first instruments to our learning, corporeal and sensible bodies are the only bodies we directly apprehend. The word “spirit” has no meaning for any one who has not philosophised. To the unlearned and to the child a spirit is merely a body. Do they not fancy that spirits groan, speak, fight, and make noises? Now you must own that spirits with arms and voices are very like bodies. This is why every nation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not even excepting the Jews, have made to themselves idols. We, ourselves, with our words, Spirit, Trinity, Persons, are for the most part quite anthropomorphic. I admit that we are taught that God is everywhere; but we also believe that there is air everywhere, at least in our atmosphere; and the word Spirit meant originally nothing more than breath and wind. Once you teach people to say what they do not understand, it is easy enough to get them to say anything you like.

既然我们的感官是学习的第一个工具，那么有形可感的身体就是我们能直接理解的唯一形体了。“精神”这个词，对于任何没有受到过哲学教育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含义。对于没文化的人和孩子来说，精神也只是一种物体。他们难道不会幻想精神在呻吟、讲话、打架、制造声音吗？现在你必须承认精神有胳膊，有声音，和与身体十分相像。这就是为什么在地球表面每个民族，甚至包括犹太人，都为自己制造了有形的偶像。我们和我们的词汇，“圣灵”、“三位一体”、“位格”，也多半是拟人的。我承认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上帝无处不在；但我们也同样认为，至少在我们的大气层内，空气无处不在；而“圣灵”这个词最初也只意味着“气”和“风”。一旦你教会人们说他们不理解的事，你要他们说什么都会变得很容易。

The perception of our action upon other bodies must have first induced us to suppose that their action upon us was effected in like manner. Thus man began by thinking that all things whose action affected him were alive. He did not recognise the limits of their powers, and he therefore supposed that they were boundless; as soon as he had supplied them with bodies they became his gods. In the earliest times men went in terror of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nature seemed alive. The idea of matter was developed as slowly as that of spirit, for the former is itself an abstraction.

当我们对其他事物有所行为的时候，我们一定一开始也认为，如果那些物体对我们也有所行为，它们的影响跟我们对它们的影响相同。因此人们开始认为，所有行为对他有影响的物体是有生命的。他没有发现那些物体能力的限度，也因此认为它们是无限的；他一将它们赋予形体，就把它们作为了自己的神。太古时期，人们害怕一切，认为自然中的一切都是活的。物质的概念跟精神发展得一样慢，因为前者本身也是抽象的。

Thus the universe was peopled with gods like themselves. The stars, the winds and the mountains, rivers, trees, and towns, their very dwellings, each had its soul, its god, its life. The teraphim of Laban, the manitos of savages, the fetishes of the negroes, every work of nature and of man, were the first gods of mortals; polytheism was their first religion and idolatry their earliest form of worship. The idea of one God was beyond their grasp, till little by little they formed general ideas, and they rose to the idea of a first cause and gave meaning to the word “substance,” which is at bottom the greatest of abstractions. So every child who believes in God is of necessity an idolater or at least he regards the Deity as a man, and when once the imagination has perceived God, it is very seldom that the understanding conceives him. Locke's order leads us into this same mistake.

因此世界上住满了像人类一样的神。星星、风儿、山川、河流、树木以及小镇，甚至他们的居所，每一样都有其灵魂、其神祇、其生命。拉班家中的神像、印第安人的神灵、黑种人的偶像以及每一件自然和人类的创造，都是最初的人类之神；多神论是他们最初的宗教，偶像是他们最初的崇拜对象。直到他们一点一点地概括了观念，并想到第一因，给“实体”这个词——抽象词中最抽象的一个——赋予了含义之后，才理解了独一神的思想。所以每一个相信上帝的孩子一定是偶像崇拜者，或至少他将上帝看作人，一旦他的想象认为自己见到了上帝，就很少用理解力思考自身了。洛克的法则将我们引入相同的错误中。

Having arrived, I know not how, at the idea of substance, it is clear that to allow of a single substance it must be assumed that this substance is endowed with incompatible and mutually exclusive properties, such as thought and size, one of which is by its nature

divisible and the other wholly incapable of division. Moreover it is assumed that thought or, if you prefer it, feeling is a primitive quality inseparable from the substance to which it belongs, that its relation to the substance is like the relation between substance and size. Hence it is inferred that beings who lose one of these attributes lose the substance to which it belongs, and that death is, therefore, but a separation of substances, and that those beings in whom the two attributes are found are composed of the two substances to which those two qualities belong.

一旦有了对实体的概念（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有的），要接受一个独一无二的实体，很明显就必须假定它具有一些不相容、互斥的特性，比如思想和外延，一种在本质上就是可分割的，另一种则完全不可分割。而且还要假定思想，或者你更喜欢的话，感觉，是一种从属于实体的无法分割的原始性质，它与实体的关系就像实体和外延的关系一样。由此可以推断出，有生命的物体如果失去了这些特性之一，就失去了它所属的实体，因此死亡，也只是实体的一种分离而已，而体内有这两种物质的生物就是由这两种实体构成的，这两种实体也是那两种性质所属的。

But consider what a gulf there still is between the idea of two substances and that of the divine nature, between the incomprehensible idea of the influence of our soul upon our body and the idea of the influence of God upon every living creature. The ideas of creation, destruction, ubiquity, eternity, almighty power, those of the divine attributes—these are all ideas so confused and obscure that few men succeed in grasping them; yet there is nothing obscure about them to the common people, because they do not understand them in the least; how then should they present themselves in full force, that is to say in all their obscurity, to the

young mind which is still occupied with the first working of the senses, and fails to realise anything but what it handles? In vain do the abysses of the Infinite open around us, a child does not know the meaning of fear; his weak eyes cannot gauge their depths. To children everything is infinite, they cannot assign limits to anything; not that their measure is so large, but because their understanding is so small. I have even noticed that they place the infinite rather below than above the dimensions known to them. They judge a distance to be immense rather by their feet than by their eyes; infinity is bounded for them, not so much by what they can see, but how far they can go. If you talk to them of the power of God, they will think he is nearly as strong as their father. As their own knowledge is in everything the standard by which they judge of what is possible, they always picture what is described to them as rather smaller than what they know. Such are the natural reasonings of an ignorant and feeble mind. Ajax was afraid to measure his strength against Achilles, yet he challenged Jupiter to combat, for he knew Achilles and did not know Jupiter. A Swiss peasant thought himself the richest man alive; when they tried to explain to him what a king was, he asked with pride, “Has the king got a hundred cows on the high pastures?”

但想一想这两种实体和神性的概念之间，我们灵魂对身体的影响和上帝对每种圣灵的影响的难以理解的观念之间，还有什么区别。有关创造、毁灭、无处不在、永生、无所不能这些神性的观念——都是如此难解、晦涩的观念，以至于很少有人能明白它们；但是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因为他们对此一点也不明白，所以也觉得没有什么不懂之处；那么他们又该如何尽全力，也就是用完全晦涩的语言，向青年人阐明这些呢？而这些年轻的头脑，还仍旧只有初步的感官活动，而且无法认识所有没有接触过的事物。在我们周围开凿许多无限的深渊也是没有用的，孩子并不明白什么是害怕；他微弱的视力还无法衡量它

们的深度。对于孩子们来说，一切都是无限的，他们不对任何事设限；不是因为他们的标尺太长，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解力太小。我甚至注意到，他们认为无限大比他们已知的空间更小而不是更大。他们通过自己的双眼而非双脚估计一段宽广的距离；无限的空间对他们来说也是有限的，不是因为他们能看到多少，而是在于他们能走多远。如果你与他们谈论上帝的能力，他们会认为上帝跟自己的父亲的力量差不多。因为他们对任何事物的知识是他们判断一切可能事物的标准，他们总是将对他们描述的事物想象得比已知的事物更小。无知者和迟钝者的自然理解力就是如此。埃杰克斯害怕与阿基里斯较量，却敢于向朱庇特宣战，是因为他认识阿基里斯却不认识朱庇特。一个瑞士农民认为他是世间最富有的人；当人们试着向他解释国王是怎样的人的时候，他骄傲地问："国王在高山上放的牛有一百头吗？"

I am aware that many of my readers will be surprised to find me tracing the course of my scholar through his early years without speaking to him of religion. At fifteen he will not even know that he has a soul, at eighteen even he may not be ready to learn about it. For if he learns about it too soon, there is the risk of his never really knowing anything about it.

我知道，很多读者得知我的学生从小就跟着我，我却没有对他聊起过信仰，会感到惊讶。在十五岁时他甚至还不知道他有灵魂，十八岁时他甚至还没准备好去学习这一点。因为如果他学得太早的话，他也许永远也不会真正懂得这件事。

If I had to depict the most heart-breaking stupidity, I would paint a pedant teaching children the catechism; if I wanted to drive a child crazy I would set him to explain what he learned in his catechism. You will reply that as most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s are

mysteries, you must wait, not merely till the child is a man, but till the man is dead, before the human mind will understand those doctrines. To that I reply, that there are mysteries which the heart of man can neither conceive nor believe, and I see no use in teaching them to children, unless you want to make liars of them. Moreover, I assert that to admit that there are mysteries, you must at least realise that they are incomprehensible, and children are not even capable of this conception! At an age when everything is mysterious, there are no mysteries properly so-called.

如果要我描写一件最令人悲伤的蠢事的话，我会描写一个书呆子教孩子们教义问答；如果我想逼疯一个孩子的话，我会让他解释他在教义问答中学到了什么。你会回答，既然大部分基督教的教条都十分玄妙，你就只能等，不仅要等到孩子成人，还要等到这个人去世，才能完全明白这些教条。对这一点我的回答是，有些玄妙的道理是人心既不能理解也不会相信的，在我看来，把它们教给孩子没有用处，除非你想让他们撒谎。而且，我坚持认为，要承认存在玄妙之道，你必须至少意识到它们是不可理解的，而孩子们甚至连它的概念也不懂得！在认为凡事都是玄妙的年纪，就无所谓玄妙了。

“We must believe in God if we would be saved.” This doctrine wrongly understood is the root of bloodthirsty intolerance and the cause of all the futile teaching which strikes a deadly blow at human reason by training it to cheat itself with mere words. No doubt there is not a moment to be lost if we would deserve eternal salvation; but if the repetition of certain words suffices to obtain it, I do not see why we should not people heaven with starlings and magpies as well as with children.

“要信上帝才能得救。”对这个教条的错误理解是残忍灭除异己的根源，也是所有无用教育的原因，这些教育通过训练人类理智仅用话语欺骗自己而摧毁了它。毫无疑问，如果我们配得永远得救的话，就一刻也不会失落；但是如果重复某些话就能得救，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让喜鹊和鹦鹉也像孩子一样进入天堂了。

The obligation of faith assumes the possibility of belief. The philosopher who does not believe is wrong, for he misuses the reason he has cultivated, and he is able to understand the truths he rejects. But the child who professes the Christian faith—what does he believe? Just what he understands; and he understands so little of what he is made to repeat that if you tell him to say just the opposite he will be quite ready to do it. The faith of children and the faith of many men is a matter of geography. Will they be rewarded for having been born in Rome rather than in Mecca? One is told that Mahomet is the prophet of God and he says, “Mahomet is the prophet of God.” The other is told that Mahomet is a rogue and he says, “Mahomet is a rogue.” Either of them would have said just the opposite had he stood in the other's shoes. When they are so much alike to begin with, can the one be consigned to Paradise and the other to Hell? When a child says he believes in God, it is not God he believes in, but Peter or James who told him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called God, and he believes it after the fashion of Euripides—

信心的责任假定了信仰的可能性。没有信仰的哲学家是错误的，因为他误用了自己培育的理智，有能力理解他所拒绝的真理。但是承认基督信仰的孩子——所信的又是什么呢？他信的只是他所理解的；而你所教他的，他理解的又是那样少，如果你让他说完全相反的东西，他也完全可以做到的。孩子和许多成年人的信仰都是地理学问

题。他们会因为生在罗马而比生在麦加有更好的禀赋吗？你告诉一个人默罕默德是上帝的先知，他就会说“默罕默德是上帝的先知。”你告诉另一个人默罕默德是个骗子，他就会说“默罕默德是个骗子。”如果把他们的位置互换一下，他们就会说出与之前截然相反的话。本来禀赋如此相像的两个人，就能一个被送到天堂，另一个人被投入地狱吗？当一个孩子说他相信上帝时，他相信的不是上帝，而是彼得或詹姆斯告诉过他，世上有称之为上帝的东西，他也就相信了，就如欧里庇得斯说过的——

“O Jupiter, of whom I know nothing but thy name.“ [1_10]

“噢朱庇特，我对你一无所知，只知道你的名字。” [2_10]

We hold that no child who dies before the age of reason will be deprived of everlasting happiness; the Catholics believe the same of all children who have been baptised, even though they have never heard of God. There are, therefor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ne can be saved without belief in God, and these circumstances occur in the case of children or madmen when the human mind is incapable of the operations necessary to perceive the Godhead. The only difference I see between you and me is that you profess that children of seven years old are able to do this and I do not think them ready for it at fifteen. Whether I am right or wrong depends, not on an article of the creed, but on a simple observation in natural history.

我们认为，还没有到懂事的年纪就去世的孩子是不会失去永恒的幸福的；天主教徒也一样相信，所有受洗过的孩子也一样不会失去永

恒的幸福，尽管他们从未听闻过上帝的名字。因此即使一个人不信上帝，在有些情况下也可以得救，这些情况发生在孩童或疯癫时期，这时人脑还不能为了认识上帝而进行必要的活动。我知道的我与你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你认为孩子在七岁时就能认识上帝，而我认为他们十五岁时都还没有准备好认识上帝。我是对是错不能凭一个信条判断，而应凭对自然历史的简单了解。

From the same principle it is plain that any man having reached old age without faith in God will not, therefore, be deprived of God's presence in another life if his blindness was not wilful; and I maintain that it is not always wilful. You admit that it is so in the case of lunatics deprived by disease of their spiritual faculties, but not of their manhood, and therefore still entitled to the goodness of their Creator. Why then should we not admit it in the case of those brought up from infancy in seclusion, those who have led the life of a savage and are without the knowledge that comes from intercourse with other men. [1_11] For it is clearly impossible that such a savage could ever raise his thoughts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e God. Reason tells that man should only be punished for his wilful faults, and that invincible ignorance can never be imputed to him as a crime. Hence it follows that in the sight of the Eternal Justice every man who would believe if he had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is counted a believer, and that there will be no unbelievers to be punished except those who have closed their hearts against the truth.

基于同一原则，很明显任何人到了老的时候还不信上帝，只要他不是故意不信，就不会在来生失去上帝的同在；我认为，人们不信不总是故意的。对于疯子，你也承认疾病剥夺了他们的精神能力，但是却没有剥夺他们做人的资格，因此他们仍然能够享受他们造物主的恩

惠。那我们为什么不承认，那些从小就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过着野蛮人的生活，也没有与其他人相交往的知识的人也一样能享受上帝的恩惠呢？ [2_11] 因为很明显，这样的野蛮人的思想根本不可能提高到能认识真神的水平。理智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故意犯错才应受到惩罚，我们决不能把无可改变的愚蠢视为他的罪恶。因此在永恒的正义面前，如果一个人拥有必要的知识就会相信的话，每个人都可以算作信徒了，也不会有不信者受到惩罚，除了那些封闭己心，抵挡真理的人。

Let us beware of proclaiming the truth to those who cannot as yet comprehend it, for to do so is to try to inculcate error. It would be better to have no idea at all of the Divinity than to have mean, grotesque, harmful, and unworthy ideas; to fail to perceive the Divine is a lesser evil than to insult it. The worthy Plutarch says, “I would rather men said, 'There is no such person as Plutarch,' than that they should say, 'Plutarch is unjust, envious, jealous, and such a tyrant that he demands more than can be performed.'”

让我们注意不要向那些还不能理解真理的人宣扬真理，因为这样做就等于布散错误。对上帝毫无概念也比对他产生鄙夷的、奇怪的、侮辱的、不尊重的观念要好；无法认识上帝没有亵渎他的坏处大。值得尊敬的普鲁塔克说：“我宁愿人们说，‘世上没有普鲁塔克这样的人’，也不愿他们说，‘普鲁塔克为人不公正又善妒，如此专横，要求别人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The chief harm which results from the monstrous ideas of God which are instilled into the minds of children is that they last all their life long, and as men they understand no more of God than they did as children. In Switzerland I once saw a good and pious

mother who was so convinced of the truth of this maxim that she refused to teach her son religion when he was a little child for fear lest he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this crude teaching and neglect a better teaching when he reached the age of reason. This child never heard the name of God pronounced except with reverence and devotion, and as soon as he attempted to say the word he was told to hold his tongue, as if the subject were too sublime and great for him. This reticence aroused his curiosity and his self-love; he looked forward to the time when he would know this mystery so carefully hidden from him. The less they spoke of God to him, the less he was himself permitted to speak of God, the more he thought about Him; this child beheld God everywhere. What I should most dread as the result of this unwise affectation of mystery is this: by over-stimulating the youth's imagination you may turn his head, and make him at the best a fanatic rather than a believer.

在孩童时期就向他们灌输上帝大得古怪的观念的最主要危害就在于，这个观念会持续一生之久，在他们长大之后也会认为上帝不过是孩童时理解的样子。在瑞士，我曾经见过一个善良虔诚的母亲如此相信这个原理，以至于拒绝在她的儿子还小时就教导他信仰，以防他满足于这样粗浅的知识，到了懂事的年龄时连更好的教导也不听了。这个孩子听到人家讲到上帝的时候总是肃然起敬的，而他一想提这个词，就被打断，就像这个对象对他来说太崇高伟大了一般。这种沉默激起了他的好奇心和自爱；他期待着能了解这个大家保护得很好的神秘事物。他们对上帝谈得越少，就越不让他谈论上帝，他对上帝思考得就越多；这个孩子觉得到处都是上帝。我担心这样轻率地故作神秘的结果会令青年人的想象过于丰富，以致他的头脑迷糊，成为了一个盲信者而非信徒。

But we need fear nothing of the sort for Emile, who always

declines to pay attention to what is beyond his reach, and listens with profound indifference to things he does not understand.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of which he is accustomed to say, “That is no concern of mine,” that one more or less makes little difference to him; and when he does begin to perplex himself with these great matters, it is because the natural growth of his knowledge is turning his thoughts that way.

但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爱弥儿会变成这样，因为他从不关心无法理解的事物，并且听到毫不理解的事情时，表现得漠不关心。他对很多事情都习惯说：“这与我无关。”因此多一件事或少一件事对他也没有什么区别；他开始对这些大问题感到困惑，是他的知识自然发展的结果。

We have seen the road by which the cultivated human mind approaches these mysteries, and I am ready to admit that it would not attain to them naturally, even in the bosom of society, till a much later age. But as there are in this same society inevitable causes which hast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ssions, if we did not also hast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which controls these passions we should indeed depart from the path of nature and disturb her equilibrium. When we can no longer restrain a precocious development in one direction we must promote a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in another direction, so that the order of nature may not be inverted, and so that things should progress together, not separately, so that the man, complete at every moment of his life, may never find himself at one stage in one of his faculties and at another stage in another faculty.

我们已经看过受过文化陶冶之人是通过什么道路走向这些神秘境界的，我也承认，即使是在社会中，在年纪稍长时才会自然地达到那个境界。但是由于社会中有许多无法避免的原因加快了欲望的发展，如果我们没有加快控制这些欲望的知识的成长，我们确实会从这条自然的道路上偏离，从而也会破坏这种平衡。当我们不再能控制一个方向早熟的发展，我们必须推进另一个方向相应的发展，从而使自然的秩序不致颠倒，事物能够共同而非独自地前进，因此一生每个时刻都很完善的人，不会因为这种能力的过快发展变成这样，又因为另一种能力的过快发展变成那样。

What a difficulty do I see before me! A difficulty all the greater because it depends less on actual facts than on the cowardice of those who dare not look the difficulty in the face. Let us at least venture to state our problem. A child should always be brought up in his father's religion; he is always given plain proofs that this religion, whatever it may be, is the only true religion, that all others are ridiculous and absurd. The force of the argument depends entirely on the country in which it is put forward. Let a Turk, who thinks Christianity so absurd at Constantinople, come to Paris and see what they think of Mahomet. It is in matters of religion more than in anything else that prejudice is triumphant. But when we who profess to shake off its yoke entirely, we who refuse to yield any homage to authority, decline to teach Emile anything which he could not learn for himself in any country, what religion shall we give him, to what sect shall this child of nature belong? The answer strikes me as quite easy. We will not attach him to any sect, but we will give him the means to choose for himself according to the right use of his own reason.

我眼前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啊！由于这个困难不是因为事情本身，

而是由于面对困难的人胆小害怕，这个困难变得更大了。我们至少要敢于提出我们的困难。一个孩子应总是在父亲的信仰教育下长大；不论这是什么信仰，别人经常对他论证说这个信仰是唯一的真信仰，所有其他的信仰都是荒唐可笑的。这种说法的说服力全部取决于它是在哪一个国家说的。如果一个土耳其人在君士坦丁堡认为基督教很可笑的话，来巴黎看看人们怎么看待默罕默德的吧。尤其是在宗教问题上，偏见压倒一切。当我们表明要完全挣脱宗教的束缚，拒绝尊重任何权威，也不教爱弥儿任何他在其他国家自己学不到的东西，那么我们应该培养他信仰什么呢，我们要使这个自然之子属于哪个教派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我们不会让他从属于任何教派，但是我们会教他正确运用自己理智去选择的方法。

Incedo per ignes Suppositos cineri doloso. —Horace, lib. ii. ode I.

他大步流星地冲向火海倒在了阴险的灰烬之下。——贺拉斯

No matter! Thus far zeal and prudence have taken the place of caution. I hope that these guardians will not fail me now. Reader, do not fear lest I should take precautions unworthy of a lover of truth; I shall never forget my motto, but I distrust my own judgment all too easily. Instead of telling you what I think myself, I will tell you the thoughts of one whose opinions carry more weight than mine. I guarantee the truth of the facts I am about to relate; they actually happened to the author whose writings I am about to transcribe; it is for you to judge whether we can draw from them any considerations bearing on the matter in hand. I do not offer you my own idea or another's as your rule; I merely present them for your examination.

没关系！因此，我长久以来的热情和审慎已弥补了我的考虑不周。我希望这些守护者能让我现在不致失败。读者，别担心我会采取一个爱真理者所认为不值得采取的预防措施；我永不会忘记我的箴言，但我也不会太轻易地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会告诉你的，不是我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想法比我更有分量的人的看法。我保证我将要提到的事实都是真的；它们是我即将抄录的文章的作者的真实经历；我们是否能从这段文章中选取任何有益之见，由你来决定。我不会将自己或他人的想法定为你的准则；我只是将它们呈现出来，供你研究。

Thirty years ago there was a young man in an Italian town; he was an exile from his native land and found himself reduced to the depths of poverty. He had been born a Calvinist, but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own folly had made him a fugitive in a strange land; he had no money and he changed his religion for a morsel of bread. There was a hostel for proselytes in that town to which he gained admission. The study of controversy inspired doubts he had never felt before, and he made acquaintance with evil hitherto unsuspected by him; he heard strange doctrines and he met with morals still stranger to him; he beheld this evil conduct and nearly fell a victim to it. He longed to escape, but he was locked up; he complained, but his complaints were unheeded; at the mercy of his tyrants, he found himself treated as a criminal because he would not share their crimes. The anger kindled in a young and untried heart by the first experience of violence and injustice may be realised by those who have themselves experienced it. Tears of anger flowed from his eyes, he was wild with rage; he prayed to heaven and to man, and his prayers were unheard; he spoke to every one and no one listened to him. He saw no one but the vilest servant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wretch who insulted him, or accomplices in the same crime who laughed at his resistance and

encouraged him to follow their example. He would have been ruined had not a worthy priest visited the hostel on some matter of business. He found an opportunity of consulting him secretly. The priest was poor and in need of help himself, but the victim had more need of his assistance, and he did not hesitate to help him to escape at the risk of making a dangerous enemy.

三十年前，意大利的镇子里有一个年轻人；他背井离乡，穷困潦倒。他出生时是一个加尔文教徒，但是由于自己的糊涂，成为了一个在异乡的难民；他身无分文，便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为了挣得一口面包。在那个镇子里有为改教者设立的旅社收留了他。宗教上的争论使他产生了从未感到的困惑，他也认识了从未认识的罪恶；他听闻了一些奇怪的教条，看到了一些新奇的风尚；他见到恶行，险些成为了它的牺牲品。他渴望逃离，却被锁起来；他抱怨，却被忽视；在暴行的摆布之下，他发现自己受到的是罪犯的待遇，因为他没有与他们一同犯罪。在这年轻而无经验的心中，因第一次暴力和不公正的经验而燃起怒火，这样的暴力和不公正是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能体会的。他的眼中流出愤怒之泪，他因愤怒而抓狂了；他向天堂也向人祈祷，但没有人听；他向每个人诉说，但没有人理会。他见到的都是在歹徒手下羞辱他的恶仆，或者是同一罪行中嘲笑他抗拒、鼓励他学他们样子的帮凶。若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牧师因事拜访了这个旅店，他会葬送在那里的。牧师找到了一个机会悄悄给他出了个主意。尽管牧师自己又穷又需要帮助，但是这个受害者更需要他的帮助，而他也毫不迟疑地冒着结下凶恶敌人的危险，帮助他逃走了。

Having escaped from vice to return to poverty, the young man struggled vainly against fate: for a moment he thought he had gained the victory. At the first gleam of good fortune his woes and his protector were alike forgotten. He was soon punished for this ingratitude; all his hopes vanished; youth indeed was on his side,

but his romantic ideas spoiled everything. He had neither talent nor skill to make his way easily, he could neither be commonplace nor wicked, he expected so much that he got nothing. When he had sunk to his former poverty, when he was without food or shelter and ready to die of hunger, he remembered his benefactor.

逃脱了灾难，却再次陷入了贫穷，这个青年人白白地同命运相抗争：有一段时期，他认为他已经取得了胜利。刚开始遇到好运时，他就忘记了自己的敌人和恩人。很快他就因为忘恩而受到了惩罚；他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他纵然享有青春，但他浪漫的想法糟蹋了一切。他既无才能又无一技之长以创造一条更顺利的道路，他既不知满足又做不了坏人，由于想要的太多，他一无所获。当他再次陷入贫穷，当他没有食物、没有居所、快要饿死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的恩人。

He went back to him, found him, and was kindly welcomed; the sight of him reminded the priest of a good deed he had done; such a memory always rejoices the heart. This man was by nature humane and pitiful; he felt the sufferings of others through his own, and his heart had not been hardened by prosperity; in a word, the lessons of wisdom and an enlightened virtue had reinforced his natural kindness of heart. He welcomed the young man, found him a lodging, and recommended him; he shared with him his living which was barely enough for two. He did more, he instructed him, consoled him, and taught him the difficult art of bearing adversity in patience. You prejudiced people, would you have expected to find all this in a priest and in Italy?

他回到了恩人那里，找到了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看到他时，牧师想起了自己曾做过的好事；这样的回忆总是令人愉快的。这个牧

师天生就仁慈而富有同情心；他通过自己的痛苦来体察别人的痛苦，他的心灵也没有因为富足而变得刚硬；简言之，智慧的熏陶和美好的德行增强了他心灵善良的天性。他欢迎这个年轻人，给他找到了一处住所，并将他介绍到那里去住；他还把生活必需品与他分享，这些必需品勉勉强强地够两个人使用。他还做了更多的事：他教育他、安慰他、教他用耐心忍受艰难困苦之道。你们这群有偏见的人，会想到这些事发生在一个牧师的身上，会发生在意大利吗？

This worthy priest was a poor Savoyard clergyman who had offended his bishop by some youthful fault; he had crossed the Alps to find a position which he could not obtain in his own country. He lacked neither wit nor learning, and with his interesting countenance he had met with patrons who found him a place in the household of one of the ministers, as tutor to his son. He preferred poverty to dependence, and he did not know how to get on with the great. He did not stay long with this minister, and when he departed he took with him his good opinion; and as he lived a good life and gained the hearts of everybody, he was glad to be forgiven by his bishop and to obtain from him a small parish among the mountains, where he might pass the rest of his life. This was the limit of his ambition.

这个受人尊重的牧师曾是一个萨瓦地区贫穷的神职人员，年轻时错误地冒犯了他的主教；他越过阿尔卑斯山去寻找在自己的国家无法得到的谋生饭碗。他不乏智慧和学识，并且由于长相俊秀，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并且被安置在一个官员的家里，教育他的儿子。他宁愿贫穷也不愿寄人篱下，而且也不知道如何与达官显贵相处。他没有在官员家待太久，当他离开时，并没有失去他人的尊敬；由于他生活高尚，得到了所有人的爱戴，他希望得到主教的原谅，在山上得到一个小小的教区以度过他的余生。他的志向仅此而已。

He was attracted by the young fugitive and he questioned him closely. He saw that ill-fortune had already seared his heart, that scorn and disgrace had overthrown his courage, and that his pride, transformed into bitterness and spite, led him to see nothing in the harshness and injustice of men but their evil disposition and the vanity of all virtue. He had seen that religion was but a mask for selfishness, and its holy services but a screen for hypocrisy; he had found in the subtleties of empty disputations heaven and hell awarded as prizes for mere words; he had seen the sublime and primitive idea of Divinity disfigured by the vain fancies of men; and when, as he thought, faith in God required him to renounce the reason God himself had given him, he held in equal scorn our foolish imaginings and the object with which they are concerned. With no knowledge of things as they are, without any idea of their origins, he was immersed in his stubborn ignorance and utterly despised those who thought they knew more than himself.

他对这个年轻的难民很感兴趣，便细细地察问他。他看到不幸的命运已经令年轻人心灰意冷，轻蔑与耻辱已经让他丧失了勇气，他的骄傲，已经变成了苦毒和怨恨，令他认为人们的不仁不义都源自他们天性的邪恶和道德的虚伪。他认为宗教不过是自私的面具，它神圣的敬拜不过是虚伪的外屏；他发现在空洞的争论中，天堂和地狱只是口舌中文字奖惩的对象；对神崇高而原始的认识已经受到人们贫乏的想象的歪曲；当他认为信仰上帝需要他废弃上帝赐给他的理性的时候，他对我们愚蠢的冥想和冥想的对象同样蔑视。由于对事物的真相缺乏认识、一点也不知道它们的起源，他沉浸在他顽固的无知中，深深地鄙视那自认为比他认识得更多的人。

The neglect of all religion soon leads to the neglect of a man's

duties. The heart of this young libertine was already far on this road. Yet his was not a bad nature, though incredulity and misery were gradually stifling his natural disposition and dragging him down to ruin; they were leading him into the conduct of a rascal and the morals of an atheist.

对所有宗教的忽视很快导致了对人类责任的遗忘。这个年轻的浪子之心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了。尽管他本性并不坏，但是怀疑和苦难逐渐地扼杀了他自然的秉性，并将他带往毁灭；它们使他的行为变成了无赖的行为，有了无神论的道德观。

The almost inevitable evil was not actually consummated. The young man was not ignorant, his education had not been neglected. He was at that happy age when the pulse beats strongly and the heart is warm, but is not yet enslaved by the madness of the senses. His heart had not lost its elasticity. A native modesty, a timid disposition restrained him, and prolonged for him that period during which you watch your pupil so carefully. The hateful example of brutal depravity, of vice without any charm, had not merely failed to quicken his imagination, it had deadened it. For a long time disgust rather than virtue preserved his innocence, which would only succumb to more seductive charms.

这种几乎无可避免的邪恶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个年轻人并非无知，也不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他正处在快乐的岁月，脉搏强烈，心地温暖，还没有被疯狂的感官所奴役。他的心还没有失去其灵活性。天生的谦虚，胆小的性格长期束缚着他，那段日子就像你如此细致地看管着你的学生一样。残忍的恶行、不体面的罪恶的不齿事例，不仅没有加快他的想象力，反而扼杀了它。很长一段时间，恶心

而非美德保护了他的单纯，这样的单纯只会由于更令人迷醉的引诱才会受到败坏。

The priest saw the danger and the way of escape. He was not discouraged by difficulties, he took a pleasure in his task; he determined to complete it and to restore to virtue the victim he had snatched from vice. He set about it cautiously; the beauty of the motive gave him courage and inspired him with means worthy of his zeal. Whatever might be the result, his pains would not be wasted. We are always successful when our sole aim is to do good.

这个牧师看见了其中的危险，也发现了解脱的方法。他没有被困难吓倒，相反为能做这项工作感到愉快；他决定完成这项任务，决心让他从罪恶中拉回的罪犯重拾美德。他小心翼翼地开始了；动机的美好给了他勇气，并使他想出了配得他热情的方法。不管结果如何，他的努力不会白费的。当我们以行善为唯一目标时，我们总是会成功的。

He began to win the confidence of the proselyte by not asking any price for his kindness, by not intruding himself upon him, by not preaching at him, by always coming down to his level, and treating him as an equal. It was, so I think, a touching sight to see a serious person becoming the comrade of a young scamp, and virtue putting up with the speech of licence in order to triumph over it more completely. When the young fool came to him with his silly confidences and opened his heart to him, the priest listened and set him at his ease; without giving his approval to what was bad, he took an interest in everything; no tactless reproof checked his chatter or closed his heart; the pleasure which he thought was given

by his conversation increased his pleasure in telling everything; thus he made his general confession without knowing he was confessing anything.

他不是通过为自己的善行寻求回报，或是将自己的意见强加在他的身上，抑或对他进行说教，而是通过总是降低自己，对他平等相待，开始赢得了这个新皈依的人的信任。所以我认为，看到一个严肃的人成为一个年轻顽皮的人的同伴，看到一个有美德的人为了降服放纵的人，而忍受对方的言行时，我们会感动的。当这个年轻的傻瓜糊里糊涂地向他敞开心扉时，这个牧师倾听着，让他讲个痛快；除了不赞同坏事以外，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他从未冒失地责备他，以免打断他的碎碎念，使他关上心门；当年轻人因为交谈而感到快乐时，便愈加乐意把所有想说的都说出来了；因此他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承认了自己所做的所有的事。

After he had made a thorough study of his feelings and disposition, the priest saw plainly that, although he was not ignorant for his age, he had forgotten everything that he most needed to know, and that the disgrace which fortune had brought upon him had stifled in him all real sense of good and evil. There is a stage of degradation which robs the soul of its life; and the inner voice cannot be heard by one whose whole mind is bent on getting food. To protect the unlucky youth from the moral death which threatened him, he began to revive his self-love and his good opinion of himself. He showed him a happier future in the right use of his talents; he revived the generous warmth of his heart by stories of the noble deeds of others; by rousing his admiration for the doers of these deeds he revived his desire to do like deeds himself. To draw him gradually from his idle and wandering life, he made him copy out extracts from well-chosen books; he pretended

to want these extracts, and so nourished in him the noble feeling of gratitude. He taught him indirectly through these books, and thus he made him sufficiently regain his good opinion of himself so that he would no longer think himself good for nothing, and would not make himself despicable in his own eyes.

在详尽地研究了年轻人的情感和性格之后，这个牧师很清楚地看到，虽然就其年龄而言，青年人不算无知，但是他已经忘记了所有他急需知道的一切，命运给他带来的羞辱，则破坏了他所有真实的善恶观。一个阶段的堕落就能夺取灵魂的生命；当一个人成天只想着如何获取食物的时候，是听不见内心的声音的。为了保护这个不幸的青年人的道德不致死亡，牧师从激起他的自爱和对自己的良好评价开始做起。牧师向他展示只要正确使用他的才能，他就能有更幸福的未来；通过向他讲述他人的良好行为，牧师让他的内心重获慷慨的温暖；通过激发他对那些行善者的敬仰，牧师让他重燃自己行善的愿望。为了让他逐渐从漂泊浪荡生活中走出来，牧师让他抄写一些精挑细选的书籍中的要点；牧师假装很想要读这些要点，以在他心中培育出感恩的高尚情操。通过这些书籍，牧师间接地教导了他，他也因而再次充分地获得了自尊，再也不会认为自己什么也做不好，也不再自认为可鄙了。

A trifling incident will show how this kindly man tried, unknown to him, to raise the heart of his disciple out of its degradation, without seeming to think of teaching. The priest was so well known for his uprightness and his discretion, that many people preferred to entrust their alms to him, rather than to the wealthy clergy of the town. One day some one had given him some money to distribute among the poor, and the young man was mean enough to ask for some of it on the score of poverty. “No,” said he, “we are brothers, you belong to me and I must not touch the money

entrusted to me." Then he gave him the sum he had asked for out of his own pocket. Lessons of this sort seldom fail to make an impression on the heart of young people who are not wholly corrupt.

一件小事就能显示出这个善良的人尽管表面上没有想着教育，但却多么巧妙地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就摆脱了堕落的处境。这个牧师因正直和审慎而闻名，所以许多人更倾向于将救济品交给他也不愿交给镇里富有的神职人员。一天，一个人给了他一些钱去周济穷人，这个年轻人也厚颜无耻地说自己是穷人，找他要钱。他说："不行。我们是弟兄，你就是我家里的人，所以我一定不能将这笔托付给我的钱供自己使用。"然后年轻人要了多少钱，他就从自己兜里掏出来多少给了他。这类的教训往往在心地没有完全败坏的年轻人心中留下印象。

I am weary of speaking in the third person, and the precaution is unnecessary; for you are well aware, my dear friend, that I myself was this unhappy fugitive; I think I am so far removed from the disorders of my youth that I may venture to confess them, and the hand which rescued me well deserves that I should at least do honour to its goodness at the cost of some slight shame.

我用第三人称讲已经很累了，而且这么小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的朋友，你很清楚，我自己就是这个不幸的难民；我认为，我现在已经不会像年轻时一样乱来，所以我敢承认这些事，而且拯救了我的人值得我在这里受一点羞辱，来赞扬他的善行。

What struck me most was to see in the private life of my worthy master, virtue without hypocrisy, humanity without

weakness, speech always plain and straightforward, and conduct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speech. I never saw him trouble himself whether those whom he assisted went to vespers or confession, whether they fasted at the appointed seasons and went without meat; nor did he impose upon them any other like conditions, without which you might die of hunger before you could hope for any help from the devout.

在我值得尊敬的老师的个人生活中，最打动我的就是他不带虚伪的美德，不带优柔寡断的仁慈，他的话总是朴实直白，他的行为总是和他的话一致。我从未见过他追问被他帮助过的人是否有晚祷或忏悔、有没有在指定的日子里吃素守戒；他也从未在他们身上强加类似的条件。然而，如果不履行这些条件的话，纵然饿死，他也得不到其他教徒的帮助。

Far from displaying before him the zeal of a new convert, I was encouraged by these observations and I made no secret of my way of thinking, nor did he seem to be shocked by it. Sometimes I would say to myself, he overlooks my indifference to the religion I have adopted because he sees I am equally indifferent to the religion in which I was brought up; he knows that my scorn for religion is not confined to one sect. But what could I think when I sometimes heard him give his approval to doctrines contrary to those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apparently having but a poor opinion of its ceremonies. I should have thought him a Protestant in disguise if I had not beheld him so faithful to those very customs which he seemed to value so lightly; but I knew he fulfilled his priestly duties as carefully in private as in public, and I knew not what to think of these apparent contradictions. Except for the fault which had formerly brought about his disgrace, a fault which he

had only partially overcome, his life was exemplary, his conduct beyond reproach, his conversation honest and discreet. While I lived on very friendly terms with him, I learnt day by day to respect him more; and when he had completely won my heart by such great kindness, I awaited with eager curiosity the time when I should learn what was the principle on which the uniformity of this strange life was based.

我因为自己观察到的这些事深受鼓舞，不仅没有在他面前装出一个刚皈依者的热心，而且没有向他隐瞒一丝我内心的想法，他似乎也从未因此而感到震惊。有时我会告诉自己，他之所以不理会我对新入的教的冷漠，是因为他知道我对我成长过程中所信的宗教也一样冷漠；他知道我对宗教的轻蔑态度不是一个教派问题。但是当我有时听到他赞同一些与罗马天主教会相悖的教条，明显地藐视它的仪式时，我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如果我没有看到他如此虔诚地遵行他似乎十分轻视的仪式的话，我会认为他是一个假扮的新教徒；但是我知道他私底下跟在公众场合一样仔细地恪守了他牧师的职责，因此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些明显的矛盾之处了。除了过去给他带来羞辱的错误，这个他无法完全弥补的错误外，他的一生是值得效仿的，他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他的话是诚实无伪而又十分慎重的。当我友好地与他生活在一起时，我一天比一天尊敬他；当他的伟大善行完全赢得了我的心时，我好奇地等待着一个时刻，我在这时刻应该学习根据什么原则才能始终如一地过好这奇特的一生。

This opportunity was a long time coming. Before taking his disciple into his confidence, he tried to get the seeds of reason and kindness which he had sown in my heart to germinate. The most difficult fault to overcome in me was a certain haughty misanthropy, a certain bitterness against the rich and successful, as if their wealth and happiness had been gained at my own expense,

and as if their supposed happiness had been unjustly taken from my own. The foolish vanity of youth, which kicks against the pricks of humiliation, made me only too much inclined to this angry temper; and the self-respect, which my mentor strove to revive, led to pride, which made men still more vile in my eyes, and only added scorn to my hatred.

过了很久，这个机会才到来。在与他的门徒成为密友之前，他致力于将播撒在我心中的理智和善良的种子生根发芽。我最难以克服的毛病就是某种傲慢的反人类情绪，某种仇富、敌视成功的情感，好似他们的财富和幸福是以牺牲了我为代价、他们的所谓幸福都是从我这里不公正地夺走的一样。年轻时愚蠢的虚荣心碰到了羞辱的钉子，使我更易暴怒；而我的导师努力帮我恢复的自尊，则变成了骄傲，使得人们在我眼中更加邪恶，我除了恨他们之外，还添上了对他们的鄙视。

Without directly attacking this pride, he prevented it from developing into hardness of heart; and without depriving me of my self-esteem, he made me less scornful of my neighbours. By continually drawing my attention from the empty show, and directing it to the genuine sufferings concealed by it, he taught me to deplore the faults of my fellows and feel for their sufferings, to pity rather than envy them. Touched with compassion towards human weaknesses through the profound conviction of his own failings, he viewed all men as the victims of their own vices and those of others; he beheld the poor groaning under the tyranny of the rich, and the rich under the tyranny of their own prejudices. “Believe me,” said he, “our illusions, far from concealing our woes, only increase them by giving value to what is in itself valueless, in making us aware of all sorts of fancied privations which we should

not otherwise feel. Peace of heart consists in despising everything that might disturb that peace; the man who clings most closely to life is the man who can least enjoy it; and the man who most eagerly desires happiness is always most miserable.”

他没有直接地打击这种骄傲，而是防止这种骄傲继续发展使得我的心灵变得刚硬；他没有夺走我的自尊，却让我没有那么鄙视我的邻居了。通过不断地将我的注意力从虚假表面引到它隐藏的真正痛苦，他教导我惋惜同伴的错误，体察他们的痛苦，怜悯他们，而不要嫉妒他们。由于他对自己失败的罪行有着深刻的体会，他也对其他人的失败深感同情，将所有人看做自己和他人恶行的受害者；他看到穷人在富人的暴虐下呻吟，富人也在他们自己偏见的桎梏中呻吟。他说：“相信我，我们的幻象，不仅不会藏起我们的痛苦，相反只会通过向没有价值的东西赋予价值、让我们意识到所有本不会感到的对幻象的缺乏而增添我们的痛苦。心灵的安宁在于轻视一切可能打扰这种安宁的事物；最在意生活的人，最不懂得享受生活；最急切渴望幸福的人，往往最为可怜。”

“What gloomy ideas!” I exclaimed bitterly. “If we must deny ourselves everything, we might as well never have been born; and if we must despise even happiness itself who can be happy?” “I am,” replied the priest one day, in a tone which made a great impression on me. “You happy! So little favoured by fortune, so poor, an exile and persecuted, you are happy! How have you contrived to be happy?” “My child,” he answered, “I will gladly tell you.”

“多么阴郁的想法啊！”我悲痛地叫道。“如果我们必须摒弃一切，还不如从未出生；如果我们甚至必须轻视幸福，那谁还能获得快乐呢？”“我是幸福的。”一天，牧师回答道。他的语气给我留下了极为深

刻的印象。“你也是幸福的！尽管命运鲜少垂青，又如此贫穷，流落他乡，遭受迫害，你仍是幸福的！你做了什么才如此幸福的呢？”“我的孩子，”他回答道，“我乐意告诉你。”

Thereupon he explained that, having heard my confessions, he would confess to me. “I will open my whole heart to yours,” he said, embracing me. “You will see me, if not as I am, at least as I seem to myself. When you have heard my whole confession of faith, when you really know the condition of my heart, you will know why I think myself happy, and if you think as I do, you will know how to be happy too. But these explanations are not the affair of a moment, it will take time to show you all my ideas about the lot of man and the true value of life; let us choose a fitting time and a place where we may continue this conversation without interruption.”

接着他解释道，听了我的坦白的话以后，他也愿意向我坦白。“我会向你全然敞开我的内心，”他说道，抱住了我。“你将看到，即使不是真实的我，至少也是我自己眼中的我。当你听完我整个信仰自白，当你真的知道了我内心境况，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如果你跟我想得一样的话，你就会知道如何获得幸福。但是这些解释不是一时之事，向你陈明我所有关于人类命运和人生真正价值的看法需要花一定时间；让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以不受干扰地继续我们的对话。”

I showed him how eager I was to hear him. The meeting was fixed for the very next morning. It was summer time; we rose at daybreak. He took me out of the town on to a high hill above the river Po, whose course we beheld as it flowed between its fertile

banks; in the distance the landscape was crowned by the vast chain of the Alps; the beams of the rising sun already touched the plains and cast across the fields long shadows of trees, hillocks, and houses, and enriched with a thousand gleams of light the fairest picture which the human eye can see. You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nature was displaying all her splendour before our eyes to furnish a text for our conversation. After contemplating this scene for a space in silence, the man of peace spoke to me.

我向他表现出我多么渴望听他的话。于是，我们便约定最迟不能晚于明早见面。正值夏日；我们破晓就起身了。他带我走出镇子，到了一座小山，旁边的波河在肥沃的河岸之间蜿蜒；阿尔卑斯山辽阔的山脉俯瞰着田园；冉冉升起的旭日晨光照耀着原野，穿过田野，在树木、丘陵、房屋上投下了长长的影子，将人眼所能见到的最美丽的图景镶上了成千上万道光辉。你会觉得，大自然在我们眼前展现自己一切的绚丽，就是为我们的对话铺设主题。静静地观赏了一会美景之后，这位宁静之人对我说话了。

THE CREED OF A SAVOYARD PRIEST

萨瓦牧师的信条

My child, do not look to me for learned speeches or profound arguments. I am no great philosopher, nor do I desire to be one. I have, however, a certain amount of common-sense and a constant devotion to truth. I have no wish to argue with you nor even to convince you; it is enough for me to show you, in all simplicity of heart, what I really think. Consult your own heart while I speak;

that is all I ask. If I am mistaken, I am honestly mistaken, and therefore my error will not be counted to me as a crime; if you, too, are honestly mistaken, there is no great harm done. If I am right, we are both endowed with reason, we have both the same motive for listening to the voice of reason. Why should not you think as I do?

我的孩子，别指望我给你讲什么经验之谈或什么深奥的道理。我不是大哲学家，也不想成为大哲学家。然而，我多少有些常识，而且始终热爱真理。我不想与你争辩，更不想说服你；告诉你我心中简简单单的真正的想法，对我而言就足够了。在我说话的时候，探寻你自己的内心，这就是我全部的要求。如果我错了，我也错得很诚实，因此我的错误不能被算作是我犯的罪；如果你也诚实地犯了错，也不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如果我是对的，那么我们都是有理性之人，我们都具有同样渴求理性之声的愿望。你为什么不像我这样想呢？

By birth I was a peasant and poor; to till the ground was my portion; but my parents thought it a finer thing that I should learn to get my living as a priest and they found means to send me to college. I am quite sure that neither my parents nor I had any idea of seeking after what was good, useful, or true; we only sought what was wanted to get me ordained. I learned what was taught me, I said what I was told to say, I promised all that was required, and I became a priest. But I soon discovered that when I promised not to be a man, I had promised more than I could perform.

我生来就是农民，是贫穷的；我的职分就是耕地种田；但是我的父母认为我以做牧师来养家糊口的话会更好，于是他们想办法将我送去了学院。我确信，我的父母同我很少想因此去寻求美好、有用或真实的东西；我们只想着要获得圣职需要什么知识。别人教我什么，我

就学什么；别人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答应了一切的要求，便成为了一名牧师。但我很快发现，当我承诺不做俗人的时候，我许下了我无法实现的诺言。

Conscience, they tell us, is the creature of prejudice, but I know from experience that conscience persists in following the order of nature in spite of all the laws of man. In vain is this or that forbidden; remorse makes her voice heard but feebly when what we do is permitted by well-ordered nature, and still more when we are doing her bidding. My good youth, nature has not yet appealed to your senses; may you long remain in this happy state when her voice is the voice of innocence. Remember that to anticipate her teaching is to offend more deeply against her than to resist her teaching; you must first learn to resist, that you may know when to yield without wrong-doing.

他们告诉我们，良心是偏见的产物，但是我从经验中得知，良心是不遵循人类一切的法律，而遵循自然的秩序的。禁止我们做这做那是徒劳的；当我们做秩序良好的自然所允许之事，尤其是我们做它要求我们做的事的时候，我们几乎听不见自责的声音。我亲爱的青年人啊，自然还没有启发你的官能；祝你一直留在这种幸福的状态中，因为这时自然的声音还是天真无邪的声音。记住，期待她的教育比拒绝她的教育更深地冒犯了她；你必须首先学会抵抗邪恶，你才可能知道何时能够不在屈服于邪恶时犯罪。

From my youth up I had reverenced the married state as the first and most sacred institution of nature. Having renounced the right to marry, I was resolved not to profane the sanctity of marriage; for in spite of my education and reading I had always led

a simple and regular life, and my mind had preserved the innocence of its natural instincts; these instincts had not been obscured by worldly wisdom, while my poverty kept me remote from the temptations dictated by the sophistry of vice.

我从年轻时起，就敬畏婚姻，把它看做最初的也是最神圣的自然制度。由于放弃了结婚的权利，我决心不亵渎婚姻的神圣；因为不管我受到什么教育，读过什么书，我一直过着简单而规律的生活，我的头脑也存留着单纯的自然直觉；在我的贫穷使我远离罪恶诡辩的引诱时，这些直觉没有因为属世的智慧而蒙蔽。

This very resolution proved my ruin. My respect for marriage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my misconduct. The scandal must be expiated; I was arrested, suspended, and dismissed; I was the victim of my scruples rather than of my incontinence, and I had reason to believe, from the reproaches which accompanied my disgrace, that one can often escape punishment by being guilty of a worse fault.

正是这个决心使我遭到毁灭。我对婚姻的尊重揭露了我的过失。做了丑事必须得到惩罚；我被逮捕、被停职、被解雇；我成为了踌躇的受害者，而非不节制的受害者，从羞辱我的批评中，我有理由相信，犯的错误越大，越是能逃离惩罚。

A thoughtful mind soon learns from such experiences. I found my former ideas of justice, honesty, and every duty of man overturned by these painful events, and day by day I was losing my hold on one or another of the opinions I had accepted. What was left was not enough to form a body of ideas which could stand

alone, and I felt that the evidence on which my principles rested was being weakened; at last I knew not what to think, and I ca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as yourself, but with this difference: My lack of faith was the slow growth of manhood, attained with great difficulty, and all the harder to uproot.

一个有头脑的人很快能从这样的经验中学到东西。我发现我过去的公义、诚实、人类种种义务的观念都被这些令人悲伤的事情打破，我日复一日抛弃了过去接受的一个又一个思想。剩下的观念还不足以在体内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那些原本明显的原理也逐渐变得模糊；最终，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因而也落到了你现在的这种境地。不同的是：我的怀疑是随着年龄逐渐成长的，它在极大的困难中产生，因此更难根除。

I was in that state of doubt and uncertainty which Descartes considers essential to the search for truth. It is a state which cannot continue, it is disquieting and painful; only vicious tendencies and an idle heart can keep us in that state. My heart was not so corrupt as to delight in it, and there is nothing which so maintains the habit of thinking as being better pleased with oneself than with one's lot.

我处于笛卡尔认为要探究真理所必须的那种怀疑和不确定状态中。这是一种无法持续的状态，它令人不安、痛苦；只有罪恶的倾向和闲散的心灵能使我们保持在那样的状态中。我的心还没有败坏到乐于处于这样的状态；没有什么能比“爱自己胜于爱财富的人”更可以保持思考的习惯了。

I pondered, therefore, on the sad fate of mortals, adrift upon

this sea of human opinions, without compass or rudder, and abandoned to their stormy passions with no guide but an inexperienced pilot who does not know whence he comes or whither he is going. I said to myself, “I love truth, I seek her, and cannot find her. Show me truth and I will hold her fast; why does she hide her face from the eager heart that would fain worship her?”

因此，我沉思人类可悲的命运，它漂浮在人类偏见之海上，没有罗盘，也没有舵，被暴风般的欲念肆意摆布，除了一个没有经验的领航员外没有任何指引，而这个领航员还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对自己说：“我爱真理，我寻找她，却找不到她。把真理给我看，我就会紧紧抓住她；她为什么要向乐于敬拜她的渴望的心隐藏自己的面庞呢？”

Although I have often experienced worse sufferings, I have never led a life so uniformly distressing as this period of unrest and anxiety, when I wandered incessantly from one doubt to another, gaining nothing from my prolonged meditations but uncertainty, darkness, and contradiction with regard to the source of my being and the rule of my duties.

尽管我经常经历更糟糕的困境，我还从未有过像这段焦躁不宁时期一般如此糟糕的生活，在这段时期，我这也怀疑，那也怀疑，却从这段长久的冥想中除了不确定、黑暗以及与我存在的原因和我尽责方式的矛盾看法之外，一无所获。

I cannot understand how any one can be a sceptic sincerely and

on principle. Either such philosophers do not exist or they are the most miserable of men. Doubt with regard to what we ought to know is a condition too violent for the human mind; it cannot long be endured; in spite of itself the mind decides one way or another, and it prefers to be deceived rather than to believe nothing.

我不理解，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既真诚又有原则的怀疑论者呢？这样的哲学家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是最不幸的人。对于我们应该知道的事存疑，是对人类心灵伤害极大的；这种情形不能长期忍受；它需要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它宁可被欺骗，也不愿什么都不相信。

My perplexity was increased by the fact that I had been brought up in a church which decides everything and permits no doubts, so that having rejected one article of faith I was forced to reject the rest; as I could not accept absurd decisions, I was deprived of those which were not absurd. When I was told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could believe nothing, and I knew not where to stop.

使我更加困惑的是，我从小在教堂中长大，那里决定一切、不许有任何的质疑。因此只要否定一条信仰的信条，我就要否定其余的所有信条；既然我无法接受荒谬的判断，那些不荒谬的判断也统统被我摒弃了。当别人告诉我要相信一切时，我什么都无法相信，而且不知道怎么办。

I consulted the philosophers, I searched their books and examined their various theories; I found them all alike proud, assertive, dogmatic, professing, even in their so-called scepticism, to

know everything, proving nothing, scoffing at each other. This last trait, which was common to all of them, struck me as the only point in which they were right. Braggarts in attack, they are weaklings in defence. Weigh their arguments, they are all destructive; count their voices, every one speaks for himself; they are only agreed in arguing with each other. I could find no way out of my uncertainty by listening to them.

我从哲学家口中寻求答案，我阅读他们的著作、察验他们各样的理论；我发现他们都一样地骄傲、武断、自以为是，甚至在他们所谓的怀疑论中，他们也说自己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证明，还彼此嘲笑。最后一个特点，是所有哲学家共有的，也是我认为他们正确的唯一一个地方。他们攻击他人时得意洋洋，防御时却十分软弱。权衡他们的观点，它们都是毁灭性的；聆听他们的声音，每个人都为自己说话；他们只有在争论时才能凑到一起。听他们的话，我无法解决自己的疑惑。

I suppose this prodigious diversity of opinion is caused, in the first place, by the weakness of the human intellect; and, in the second, by pride. We have no means of measuring this vast machine, we are unable to calculate its workings; we know neither its guiding principles nor its final purpose; we do not know ourselves, we know neither our nature nor the spirit that moves us; we scarcely know whether man is one or many; we are surrounded by impenetrable mysteries. These mysteries are beyond the region of sense, we think we can penetrate them by the light of reason, but we fall back on our imagination. Through this imagined world each forces a way for himself which he holds to be right; none can tell whether his path will lead him to the goal. Yet we long to know and understand it all. The one thing we do not know is the limit of the

knowable. We prefer to trust to chance and to believe what is not true, rather than to own that not one of us can see what really is. A fragment of some vast whole whose bounds are beyond our gaze, a fragment abandoned by its Creator to our foolish quarrels, we are vain enough to want to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that whole and our own relations with regard to it.

我认为看法之所以如此千差万别，第一是因为人类智力的缺陷，第二则是由于人的骄傲之心。我们没有衡量这个大型机器的方法，也无法计算它的功能；我们既不知道它的指导原则，也不知道它的最终目的；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的天性和驱动我们的精神；我们几乎不知道人到底是一还是多构成的；我们的周围都是神秘莫测的东西。这些神秘之事都在我们感官的范围之外，我们认为自己能够通过理智之光穿透它们，最终依靠的却只是想象力。透过这个想象的世界，每个人都开辟了一条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没有人知道自己的路是否能引导他走向目标。然而我们渴望洞察一切，了解一切。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可知的限度。我们更愿意碰碰运气，相信不真实的事情，也不愿意承认没有人能认识真相。在造物主让我们去争论的一个漫无边际的大整体中，我们只是一个渺小的分子。想要断定那整体的性质和我们与它的关系，简直是妄想。

If the philosophers were in a position to declare the truth, which of them would care to do so? Every one of them knows that his own system rests on no surer foundations than the rest, but he maintains it because it is his own. There is not one of them who, if he chanced to disco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uth and falsehood, would not prefer his own lie to the truth which another had discovered. Where is the philosopher who would not deceive the whole world for his own glory? If he can rise above the crowd, if he can excel his rivals, what more does he want? Among believers he

is an atheist; among atheists he would be a believer.

如果哲学家们能发现真理，他们中的哪一个又对此感兴趣呢？他们中的每一个都知道自己的系统不比其他人的稳固，但是他仍坚持己见，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系统。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假如有幸发现真理和谬误的区别后，不会更倾向于自己的谎言，而舍弃他人发现的真理的。哪一个哲学家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欺骗整个世界的呢？如果他能升到众人之上，如果他能超越他的对手，他还会想要什么呢？在信徒中他是无神论者；在无神论者中他会是一个信徒。

The first thing I learned from these considerations was to restrict my inquiries to what directly concerned myself, to rest in profound ignorance of everything else, and not even to trouble myself to doubt anything beyond what I required to know.

我从这些思考中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将我探究的对象限制在与我直接相关的东西上，对其他一切事物则要毫不关心，哪怕是超出我应该知道的范围的事，我也不会为此而费心。

I also realised that the philosophers, far from ridding me of my vain doubts, only multiplied the doubts that tormented me and failed to remove any one of them. So I chose another guide and said, “Let me follow the Inner Light; it will not lead me so far astray as others have done, or if it does it will be my own fault, and I shall not go so far wrong if I follow my own illusions as if I trusted to their deceits.”

我同样发现，哲学家们，不仅没有使我摆脱不必要的疑虑，反而增加了我的怀疑，使我深受折磨，却不得从任何怀疑中解脱。所以我选取了另一个向导，并说："让我跟随内在的光明吧；它不会像其他人一样使我在歧路上走得那么远，就算它将我引向了歧路，也是我自己的错，如果我跟随自己的幻象，即使受到它们的欺骗，也不会错得比之前更离谱。"

I then went over in my mind the various opinions which I had held in the course of my life, and I saw that although no one of them was plain enough to gain immediate belief, some were more probable than others, and my inward consent was given or withheld in proportion to this improbability. Having discovered this, I made an unprejudiced comparison of all these different ideas, and I perceived that the first and most general of them was also the simplest and the most reasonable, and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accepted by every one if only it had been last instead of first. Imagine all your philosophers, ancient and modern, having exhausted their strange systems of force, chance, fate, necessity, atoms, a living world, animated matter, and every variety of materialism. Then comes the illustrious Clarke who gives light to the world and proclaims the Being of beings and the Giver of things. What universal admiration, what unanimous applause would have greeted this new system—a system so great, so illuminating, and so simple. Other systems are full of absurdities; this system seems to me to contain fewer things which are beyo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mind. I said to myself, "Every system has its insoluble problems, for the finite mind of man is too small to deal with them; these difficulties are therefore no final arguments, against any system. But what a difference there is between the direct evidence on which these systems are based! Should we not prefer that theory which alone explains all the facts, when it is no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rest?”

接着，我将一生中曾有过的种种看法回顾了一遍，发现尽管它们中没有一个明确到能让我立刻获得信仰，其中的一些比另一些可能性更大，我的内心则根据它们的不同程度表现出赞成或不赞成。发现这一点之后，我对这些不同的观点做了不偏不倚的比较，并发现它们中最初、最为共同的观念也是最简单最合理的一个，只要它是最后一个观念而非第一个观念，就会被每个人接受。想象一下，所有的哲学家，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已经对力量、偶然、命运、必然、原子、有生命的世界、活的事物以及各种各样的物质主义穷尽了他们稀奇古怪的研究。接着，著名的克拉克揭示了生命的主宰和事物的供养者，给世界带来了光明。这一套说法是如此伟大，如此富有启发性，又是如此简单——世人会给予这一套说法多么统一的敬仰、多么一致的赞许啊！其他的说法充斥着荒唐的东西；这个说法对我来说则少了很多人类无法理解的事物。我告诉自己：“每一个系统都有其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人类有限的头脑太小了，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这些疑难不是否定任何说法的最终理由。但是这些说法所基于的直接证据之间的区别是多么大啊！上面这个理论不比其他的理论难，而且本身就揭示了所有事实，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喜欢这个理论吗？”

Bearing thus within my heart the love of truth as my only philosophy, and as my only method a clear and simple rule which dispensed with the need for vain and subtle arguments, I returned with the help of this rule to the examination of such knowledge as concerned myself; I was resolved to admit as self-evident all that I could not honestly refuse to believe, and to admit as true all that seemed to follow directly from this; all the rest I determined to leave undecided, neither accepting nor rejecting it, nor yet troubling myself to clear up difficulties which did not lead to any practical ends.

由于我将对真理的爱作为我的全部哲学，而且由于我采取的方法清楚简单，省去了空洞细微的论点，我又采取了这一方法，检视了我所了解的知识；我决心承认，所有我无法诚实地拒绝相信的一切都是不证自明的，所有看上去直接由此而来的都是真实的；剩下一切我决定作为未确定的，我既不接受也不拒绝，而且由于它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我也不会费尽心思研究它们。

But who am I? What right have I to decide? What is it that determines my judgments? If they are inevitable, if they are the results of the impressions I receive, I am wasting my strength in such inquiries; they would be made or not without any interference of mine. I must therefore first turn my eyes upon myself to acquaint myself with the instrument I desire to use, and to discover how far it is reliable.

但是我是谁？我有什么权力决定？是什么让我作出自己的判断？如果它们是我接收到的种种印象的结果，我就是在这样的探究上浪费自己的气力；要么就彻底探讨，要么就不去管它们，让它们自行得出一个结果。因此我必须首先把目光转向我自己，了解我要使用的工具，了解用起来我能有多大把握。

I exist, and I have senses through which I receive impressions. This is the first truth that strikes me and I am forced to accept it. Have I any independent knowledge of my existence, or am I only aware of it through my sensations? This is my first difficulty, and so far I cannot solve it. For I continually experience sensation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memory, so how can I know if the feeling of self is something beyond these sensations or if it can exist

independently of them?

我是存在的，我有感官，我通过我的感官而有所感受。这是第一个打动我，使我不能不接受的真理。对于我的存在，我是否有一个特有的感觉？或者说，我只是通过我的感官意识到这一点的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难题，目前为止我还无法解决。因为我持续不断，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记忆受到感官的影响，那么我如何知道对自我的感觉是否独立于感官之外、不受感官的影响呢？

My sensations take place in myself, for they make me aware of my own existence; but their cause is outside me, for they affect me whether I have any reason for them or not, and they are produced or destroyed independently of me. So I clearly perceive that my sensation, which is within me, and its cause or its object, which is outside me, are different things.

我的感觉在我体内发生，因为它们使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但是它们的原因在我身体以外，因为不管我接受与否，它们都影响着我，而且它们的产生或消亡都不受我的控制。所以我清楚地知道，在我体内的感官以及它存在的原因和对象，都在我以外，它们是不同的事物。

Thus, not only do I exist, but other entities exist also, that is to say, the objects of my sensations; and even if these objects are merely ideas, still these ideas are not me.

因此，不仅我是存在的，其他的实体，也就是说，我感官的对

象，也是存在的；即使这些对象仅仅是观念，这些观念也不是我。

But everything outside myself, everything which acts upon my senses, I call matter, and all the particles of matter which I suppose to be united into separate entities I call bodies. Thus all the disputes of the idealists and the realists have no meaning for me; their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appearance and the reality of bodies are wholly fanciful.

所有我以外的事物，所有对我的感官起作用的事物，我称其为物质；我认为能结成单个的实体的物质的每一个分子，我称其为物体。这样，唯心论者和唯物论者一切的争论对我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所说的物体的表象和实际之间的区别全都是想象的。

I am now as convinced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universe as of my own. I next consider the objects of my sensations, and I find that I have the power of comparing them, so I perceive that I am endowed with an active force of which I was not previously aware.

现在，我对宇宙的存在就如对我自己的存在一样深信不疑。我接着考虑我感官的对象，我发现我具有比较它们的能力，所以我认为我被赋予了一种过去没有意识到的主动力量。

To perceive is to feel; to compare is to judge; to judge and to feel are not the same. Through sensation objects present themselves to me separately and singly as they are in nature; by comparing them I rearrange them, I shift them so to speak, I place one upon

another to decide whether they are alike or different, or more generally to find out their relations. To my mind, the distinctive faculty of an active or intelligent being is the power of understanding this word “is.” I seek in vain in the merely sensitive entity that intelligent force which compares and judges; I can find no trace of it in its nature. This passive entity will be aware of each object separately, it will even be aware of the whole formed by the two together, but having no power to place them side by side it can never compare them, it can never form a judgment with regard to them.

去感知，就是去感受；去比较，就是去判断；判断和感受是不一样的。通过感官，我觉得物体是单独分开地以它们自然的形态呈现在我眼前的；通过比较它们，我将它们重新排列，可以说是移动了它们的位置，将一个叠在另一个物体的上面，以判断它们是一样还是不同，同时概括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一个活动或有智慧的生物的辨别能力就是理解“存在”这个词的能力。我在仅有感官的实体中没有找到能比较和判断的智力；在他的天性中也不存在这种智力。这种被动的实体能分别感知到每个客体，甚至能察觉由两个物体合成的物体，但是由于没有能力将它们并排放置，它无法比较它们，也无法对它们形成判断。

To see two things at once is not to see their relations nor to judge of their differences; to perceive several objects, one beyond the other, is not to relate them. I may have at the same moment an idea of a big stick and a little stick without comparing them, without judging that one is less than the other, just as I can see my whole hand without counting my fingers. [1_12] These comparative ideas, 'greater', 'smaller', together with number ideas of 'one', 'two', etc. are certainly not sensations, although my mind only produces

them when my sensations occur.

一次看到两个物体，并不等于发现它们的关系，也不等于判断出它们之间的差异；看到好几个互不相连的物体，也不等于清楚它们的数目。我可能同时具有一根长棍子和一根短棍子的观念，却还没有将它们进行比较，也没有做出一个比另一个更短的判断，就如我能看见我整只手，却不用数我每一根手指 [2_12] 。这些相对的观念，‘更大’，‘更小’，跟‘一’，‘二’等数字的观念，当然不是感觉，尽管我的头脑只有在我的感觉发生时才会产生这样的观念。

We are told that a sensitive being distinguishes sensations from each other by the inherent differences in the sensations; this requires explanation. When the sensations are different, the sensitive being distinguishes them by their differences; when they are alike, he distinguishes them because he is aware of them one beyond the other. Otherwise, how could he distinguish between two equal objects simultaneously experienced? He would necessarily confound the two objects and take them for one object, especially under a system which professed that the representative sensations of space have no extension.

有人告诉我们，有感觉的生物通过各种感觉内在的差异对它们加以辨别；这种说法需要解释。当感觉不同时，这种有感觉的生物通过感觉的区别辨别它们；当感觉相似时，他能区分它们是因为他知道他们之间彼此独立。否则，他怎能辨别同时发生的两种相同事物呢？他一定会将这两种事物弄混，将它们看作是同一事物，尤其是对于认为空间的表象感觉没有外延的说法而言。

When we become aware of the two sensations to be compared, their impression is made, each object is perceived, both are perceived, but for all that their relation is not perceived. If the judgment of this relation were merely a sensation, and came to me solely from the object itself, my judgments would never be mistaken, for it is never untrue that I feel what I feel.

当我们意识到两种感觉需要比较时，它们已经留下了印象，每个客体都被察觉了，两个客体都被察觉了，但是不能因此说我们察觉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对这种关系的判断仅仅是一种感觉，而且完全来自己这个物体本身，那么我的判断一定不会出错，因为我感觉到自己感觉到的东西这件事一定是真实的。

Why then am I mistaken as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se two sticks,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not parallel? Why, for example, do I say the small stick is a third of the large, when it is only a quarter? Why is the picture, which is the sensation, unlike its model which is the object? It is because I am active when I judge, because the operation of comparison is at fault; because my understanding, which judges of relations, mingles its errors with the truth of sensations, which only reveal to me things.

那么我为什么会搞错这两根木棍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它们不相似的时候？比如说，为什么，当短木棍其实是长木棍四分之一的时候，我会说短的木棍是长木棍的三分之一呢？形象，也就是感觉，为什么与标本，也就是事物不符呢？因为当我判断时，我是主动的，因为比较的操作出了错；因为我的理解力在判断关系时，将自己的错误与仅向我揭示事物的真实的感官混淆了。

Add to this a consideration which will, I feel sure, appeal to you when you have thought about it: it is this—If we were purely passive in the use of our senses, there would be no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m;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know that the body we are touching and the thing we are looking at is the same. Either we should never perceive anything outside ourselves, or there would be for us five substances perceptible by the senses, whose identity we should have no means of perceiving.

此外，我确信，当你想到这一点时一定会感到新奇的——如果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感觉时完全是被动的，那么它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交流；也就不可能知道我们所摸到的物体和我们正在看得物体是同一个物体了。我们要么永远也感受不到我们身外的任何事物，要么就能通过感官感受到五种我们没办法辨别的可感知的实体。

This power of my mind which brings my sensations together and compares them may be called by any name; let it be called attention, meditation, reflection, or what you will; it is still true that it is in me and not in things, that it is I alone who produce it, though I only produce it when I receive an impression from things. Though I am compelled to feel or not to feel, I am free to examine more or less what I feel.

我头脑的这种归纳和比较我感官的能力可以叫任何名字；称它为注意，冥想，反思，或随你怎么称呼；它都在我体内而不在事物之中这件事仍然是真实的，尽管只有我从事物留下一种印象时才产生这种能力，但是产生它的唯独我一个人。尽管有没有感觉不由我做主，我可以或多或少地判断我所感觉的对象。

Being now, so to speak, sure of myself, I begin to look at things outside myself, and I behold myself with a sort of shudder flung at random into this vast universe, plunged as it were into the vast number of entities, knowing nothing of what they are in themselves or in relation to me. I study them, I observe them; and the first object which suggests itself for comparison with them is myself.

可以说，我现在很确定，我开始观察我自身之外的事物，并且我战栗地看到自己被投入了无垠的宇宙中，如同淹没在无数实体中，而且丝毫不知道它们之间或它们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研究它们，观察它们；而我想到的第一个与它们相对比的事物，是我自己。

All that I perceive through the senses is matter, and I deduce all the essential properties of matter from the sensible qualities which make me perceive it, qualities which are inseparable from it. I see it sometimes in motion, sometimes at rest, [1_13] hence I infer that neither motion nor rest is essential to it, but motion, being an action, is the result of a cause of which rest is only the absence. When, therefore, there is nothing acting upon matter it does not move, and for the very reason that rest and motion are indifferent to it, its natural state is a state of rest.

所有我通过感觉感受到的一切都是物质，我也从这些让我感受到它、与它不可分割的可感知的特性中，推断出物质的本质特性。我看见它时而运动，时而静止 [2_13] ，因此推断出运动和静止都非它的本质，但是运动，作为一种行为，是静止不存在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当没有力作用于物质时，它不会动，正由于静止和运动对它都是中立的，它的自然状态就是静止的。

I perceive two sorts of motions of bodies, acquired motion and spontaneous or voluntary motion. In the first the cause is external to the body moved, in the second it is within. I shall not conclude from that that the motion, say of a watch, is spontaneous, for if no external cause operated upon the spring it would run down and the watch would cease to go. For the same reason I should not admit that the movements of fluids are spontaneous, neither should I attribute spontaneous motion to fire which causes their fluidity. [1_14]

我发现物体有两种运动，即从他物而来的运动或自发或随意的运动。第一种运动，动因来源于物体之外，而第二种则来源于物体之内。我不会因此总结出像手表这类物体的运动是自发的，因为如果没有外界因素对发条起作用的话，它就不会运转，手表便不会走动。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不会认为流体的运动是自发的，也不会认为火焰是它们流动的自发原因 [2_14] 。

You ask me if the movements of animals are spontaneous; my answer is, “I cannot tell,” but analogy points that way. You ask me again, how do I know that there are spontaneous movements? I tell you, “I know it because I feel them.” I want to move my arm and I move it without any other immediate cause of the movement but my own will. In vain would any one try to argue me out of this feeling, it is stronger than any proofs; you might as well try to convince me that I do not exist.

你问我动物的运动是不是自发的；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但是用类推的方法可以得出它是自发的。你又问我，我怎么知道存在着自发的运动？我告诉你：“我知道，因为我感受得到。”我想动动胳

膊，而且没有任何除了我的意愿之外的其他立即导致我胳膊运动的原因。任何人想说服我不相信这种感觉，都会是无用的，因为这种感觉比任何证据更明显；否则，你最好试试说服我，我不存在。

If there were no spontaneity in men's actions, nor in anything that happens on this earth, it would be all the more difficult to imagine a first cause for all motion. For my own part, I feel myself so thoroughly convinced that the natural state of matter is a state of rest, and that it has no power of action in itself, that when I see a body in motion I at once assume that it is either a living body or that this motion has been imparted to it. My mind declines to accept in any way the idea of inorganic matter moving of its own accord, or giving rise to any action.

如果在人类的活动中不存在任何自发性，在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事物也都没有自发性，则想象所有运动的第一原因就更难了。在我看来，我自己完全相信，物质的自然状态就是静止的，行为本身也没有力量，当我看到一个物体运动时，我立即设想它要么是一个有生命的物体，要么有其他物体给它施加运动的力。我心里根本不承认无机物能自行运动或使其他物体运动。

Yet this visible universe consists of matter, matter diffused and dead [1_15] , matter which has none of the cohesion, the organisation, the common feeling of the parts of a living body, for it is certain that we who are parts have no consciousness of the whole. This same universe is in motion, and in its movements, ordered, uniform, and subject to fixed laws, it has none of that freedom which appears in the spontaneous movements of men and animals. So the world is not some huge animal which moves of its

own accord; its movements are therefore due to some external cause, a cause which I cannot perceive, but the inner voice makes this cause so apparent to me that I cannot watch the course of the sun without imagining a force which drives it, and when the earth revolves I think I see the hand that sets it in motion.

然而这个肉眼可见的宇宙由物质构成，物质是分散、无生命的[2_15]，不具有一个有生命物体所具有的连接、组织、共同的感觉，因为无疑，我们作为整体的部分，是意识不到整体的。这宇宙也在运动中，并且在它有序、统一、顺应固定法则的运动中，不存在任何人类和动物自发运动中显示的那种自由。所以世界不是某个能自发运动的大型动物；因此它的运转是由于某些外部因素，这个因素是我无法感知的，但是我内心的声音让我觉得这个因素如此明显，以至于我无法在看到太阳的轨迹时不想到推动它的力量，当地球旋转时我觉得自己看到了使它运转的手。

If I must accept general laws whose essential relation to matter is unperceived by me, how much further have I got? These laws, not being real things, not being substances, have therefore some other basis unknown to me. Experiment and observation have acquainted us with the laws of motion; these laws determine the results without showing their causes; they are quite inadequate to explain the system of the world and the course of the universe. With the help of dice Descartes made heaven and earth; but he could not set his dice in motion, nor start the action of his centrifugal force without the help of rotation. Newton discovered the law of gravitation; but gravitation alone would soon reduce the universe to a motionless mass; he was compelled to add a projectile force to account for the elliptical course of the celestial bodies; let Newton show us the hand that launched the planets in the tangent of their

orbits.

如果我必须接受普遍法则，而这普遍法则与物质的根本关系我还无法体会，我能有什么心得呢？这些法则，并不是真实的事物，也不是实体，所以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基础。实验和观察让我们熟悉运动的法则；这些法则确定结果而不展现原因；它们不足以解释世界的体系和宇宙运行的奥秘。笛卡尔用骰子造出天堂和地狱；但是他无法使骰子运动，也无法在没有旋转的帮助下，使离心力发挥作用。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是单靠这个引力，宇宙会缩成一块不动的东西。为了解释天体的曲线，他不得不加上一种推力。请牛顿告诉我们，是谁的手将行星推到它轨道的切线上的。

The first causes of motion are not to be found in matter; matter receives and transmits motion, but does not produce it. The more I observe the action and reaction of the forces of nature playing on one another, the more I see that we must always go back from one effect to another, till we arrive at a first cause in some will; for to assume an infinite succession of causes is to assume that there is no first cause. In a word, no motion which is not caused by another motion can take place, except by a spontaneous, voluntary action; inanimate bodies have no action but motion, and there is no real action without will. This is my first principle. I believe, therefore, that there is a will which sets the universe in motion and gives life to nature. This is my first dogma, or the first article of my creed.

运动的第一因不在物质内部；物质接收并转化运动，但是不产生运动。我越是观察自然中力和力的相互作用，我就越是明白我们必须总是从一个结果推到另一个结果，才能从某种意志中追溯到第一因；因为要假定一串无限延续的原因，就是在假设不存在第一因。总而言

之，所有运动都是由别的运动产生的，除非它是自发、自由的；无生命的物体在运动却不在活动，世界上真正的活动是由意志导致的。这是我的第一原则。因此我相信，存在一个意志，使宇宙运动，给自然生命。这是我的第一个定理，或者说是我的第一个信条。

How does a will produce a physical and corporeal action? I cannot tell, but I perceive that it does so in myself; I will to do something and I do it; I will to move my body and it moves, but if an inanimate body, when at rest, should begin to move itself, the thing is incomprehensible and without precedent. The will is known to me in its action, not in its nature. I know this will as a cause of motion, but to conceive of matter as producing motion is clearly to conceive of an effect without a cause, which is not to conceive at all.

一个意志如何产生物理的有形的活动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体内就在发生这样的事；我想做什么，就去做了；我想移动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就移动了，但是如果是无生命的物体，它静止的时候，如果要开始自己运动，是无法理解也是没有先例的。我是通过意志的活动而非其性质认识意志的。我知道这意志是运动的原因，但是要把物质当作运动的原因就很明显是想象没有原因的结果，也就是根本不去想象。

It is no more possible for me to conceive how my will moves my body than to conceive how my sensations affect my mind. I do not even know why one of these mysteries has seemed less inexplicable than the other. For my own part, whether I am active or passive, the means of union of the two substances seem to me absolutely incomprehensible. It is very strange that people make

this very incomprehensibility a step towards the compounding of the two substances, as if operations so different in kind were more easily explained in one case than in two.

要想象我的意志如何使我的身体运动，跟想象我的感觉如何影响我的头脑一样，是不可能的。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其中一个奥秘看上去比另一个更好解释。在我看来，不管我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两种物质结合的方法对我而言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奇怪的是，人们正因为无法理解，才将两种物质结合，就像类别如此不同的操作，在一个案件中比在两个案件中更好解释似的。

The doctrine I have just laid down is indeed obscure; but at least it suggests a meaning and there is nothing in it repugnant to reason or experience; can we say as much of materialism? Is it not plain that if motion is essential to matter it would be inseparable from it, it would always be present in it in the same degree, always present in every particle of matter, always the same in each particle of matter, it would not be capable of transmission, it could neither increase nor diminish, nor could we ever conceive of matter at rest. When you tell me that motion is not essential to matter but necessary to it, you try to cheat me with words which would be easier to refute if there was a little more sense in them. For either the motion of matter arises from the matter itself and is therefore essential to it; or it arises from an external cause and is not necessary to the matter, because the motive cause acts upon it; we have got back to our original difficulty.

我刚刚设立的定理确实很晦涩；但是至少它表示了某种含义，也没有任何理性和经验与它相悖；我们对唯物论也能这么说吗？如果运

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则两者不可分，运动总是在相同程度上存在于物质中，也总是存在于物质的每个分子中，在每个物质的分子中也是同样的，它无法传递，也无法增加或减少，我们也无法想象物质静止的场景，这不是很明显吗？当你告诉我，运动不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但是是必要属性时，你是在试图用另一种说法欺骗我，这种说法即使有更多含义，却更容易驳斥。因为要么物质的运动来源于物质本身，运动是其本质；要么它来源于一个外部因素，它导致了物质运动，因此不是物质的必要属性；我们又回到最初的难题了。

The chief source of human error is to be found in general and abstract ideas; the jargon of metaphysics has never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any single truth, and it has filled philosophy with absurdities of which we are ashamed as soon as we strip them of their long words. Tell me, my friend, when they talk to you of a blind force diffused throughout nature, do they present any real idea to your mind? They think they are saying something by these vague expressions—universal force, essential motion—but they are saying nothing at all. The idea of motion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idea of transference from place to place; there is no motion without direction; for no individual can move all ways at once. In what direction then does matter move of necessity? Has the whole body of matter a uniform motion, or has each atom its own motion? According to the first idea the whole universe must form a solid and indivisible mass;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it can only form a diffused and incoherent fluid, which would make the union of any two atoms impossible. What direction shall be taken by this motion common to all matter? Shall it be in a straight line, in a circle, or from above downwards, to the right or to the left? If each molecule has its own direction, what are the causes of all these directions and all these differences? If every molecule or atom only revolved on its own axis, nothing would ever leave its place and there would be no

transmitted motion, and even then this circular movement would require to follow some direction. To set matter in motion by an abstraction is to utter words without meaning, and to attribute to matter a given direction is to assume a determining cause. The more examples I take, the more causes I have to explain, without ever finding a common agent which controls them. Far from being able to picture to myself an entire absence of order in the fortuitous concurrence of elements, I cannot even imagine such a strife, and the chaos of the universe is less conceivable to me than its harmony. I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mechanism of the universe may not be intelligible to the human mind, but when a man sets to work to explain it, he must say what men can understand.

人类错误的最主要来源就在于概括性、抽象性的观点；形而上学的术语从未使人发现任何一条真理，而且使哲学充满了悖论，我们一剥去这些悖论的华丽辞藻，就会为这些悖论的存在而羞愧。我的朋友，告诉我，当他们向你谈论一个在自然中扩散的盲目力量时，他们有在你的脑海中展现任何实际的观点吗？他们认为自己在用这些抽象的表达陈述些什么——宇宙力量，必然运动——但是他们其实什么都没有讲。运动不过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意思；没有什么运动是没有方向的；因为没有一个个体能同时朝所有方向前进。那么物质往哪个方向运动才是必须的呢？是物质的整体有统一的运动，还是它的每一个原子有其运动呢？根据第一种观点，整个宇宙一定构成了一个结实的不可分割的物质；根据第二种观点，它只能形成分散而不凝合的流体，使得任意两个原子的结合都成为了不可能的事。整个物质应该共同朝哪个方向运动呢？它应该是沿直线运动，还是做圆周运动？是从上往下，还是向右、向左呢？如果每个分子都有自己的方向，那所有这些方向和这些差别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如果每个分子或原子紧紧围绕着自己的轴运转，所有事物都会待在自己的地方，从而不会有传导运动了，即使如此，这样的圆周运动也需要朝着某些方向。用抽象的方法让物质运动，无异于说毫无意义的话，认为物质有

一个既定的方向，就是认为存在一个决定性原因。我举的例子越多，要解释的原因就越多，以至于永远也找不到一个指挥它们的共同动因。我不仅无法描绘出元素的偶然合作中存在任何秩序，也无法想象出有这样的斗争，对我而言，宇宙的混乱比其和谐更难以想象。我知道，宇宙的机制也许对于人类来说无法理解，但是当一个人开始试图作出解释时，他一定会说人类可以理解的话。

If matter in motion points me to a will, matter in motion according to fixed laws points me to an intelligence; that is the second article of my creed. To act, to compare, to choose, are the operations of an active, thinking being; so this being exists. Where do you find him existing, you will say? Not merely in the revolving heavens, nor in the sun which gives us light, not in myself alone, but in the sheep that grazes, the bird that flies, the stone that falls, and the leaf blown by the wind.

如果运动的物质向我表明存在一种意志，那么物质根据既定的法则运动则向我表明存在一种智慧；这是我的第二则信条。行动、比较、选择是一个活动的、能思想的生命体的行为；这个生命体是存在的。你会问，你从哪里得知他是存在着的？从旋转的天上，从给予我们光明的太阳中；从我自己身上，从那只吃草的绵羊、飞翔的鸟、掉落的石头和北风吹起的树叶里。

I judge of the order of the world, although I know nothing of its purpose, for to judge of this order it is enough for me to compare the parts one with another, to study their co-operation, their relations, and to observe their united action. I know not why the universe exists, but I see continually how it is changed; I never fail to perceive the close connection by which the entities of which it

consists lend their aid one to another. I am like a man who sees the works of a watch for the first time; he is never weary of admiring the mechanism, though he does not know the use of the instrument and has never seen its face. I do not know what this is for, says he, but I see that each part of it is fitted to the rest, I admire the workman in the details of his work, and I am quite certain that all these wheels only work together in this fashion for some common end which I cannot perceive.

尽管我不知道世界存在的目的，我仍能判断其秩序，因为要判断其秩序，我在各个部分间加以比较、研究它们的合作、它们的关系，观察它们共同的活动，就足够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宇宙存在，但是我一直能看到它如何改变；我一直能观察到这种紧密的联系，正是通过这种联系，构成它的各种实体才能够互相帮助。我就像一个第一次看到手表内部如何工作的人；他欣赏这种机制，并乐此不疲，尽管他不知道这仪器的用途，也从未见过它的外壳。他说："我不知道它的用途，但是我看到它的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契合，我欣赏这个工人精良的作品，我也确信，所有这些齿轮只有为了某个共同的目标，才能这样协同地工作，而这个目标是我无法理解的。"

Let us compare the special ends, the means, the ordered relations of every kind, then let us listen to the inner voice of feeling; what healthy mind can reject its evidence? Unless the eyes are blinded by prejudices, can they fail to see that the visible order of the universe proclaims a supreme intelligence? What sophisms must be brought together before we fail to understand the harmony of existence and the wonderful co-operation of every part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est? Say what you will of combinations and probabilities; what do you gain by reducing me to silence if you cannot gain my consent? And how can you rob me of the

spontaneous feeling which, in spite of myself, continually gives you the lie? If organised bodies had come together fortuitously in all sorts of ways before assuming settled forms, if stomachs are made without mouths, feet without heads, hands without arms, imperfect organs of every kind which died because they could not preserve their life, why do none of these imperfect attempts now meet our eyes; why has nature at length prescribed laws to herself which she did not at first recognise? I must not be surprised if that which is possible should happen, and if the improbability of the event is compensated for by the number of the attempts. I grant this; yet if any one told me that printed characters scattered broadcast had produced the Aeneid all complete, I would not condescend to take a single step to verify this falsehood. You will tell me I am forgetting the multitude of attempts. But how many such attempts must I assume to bring the combinat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probability? For my own part the only possible assumption is that the chances are infinity to one that the product is not the work of chance. In addition to this, chance combinations yield nothing but products of the same nature as the elements combined, so that life and organisation will not be produced by a flow of atoms, and a chemist when making his compounds will never give them thought and feeling in his crucible [1_16] .

让我们比较一下各种各样特殊的目的、方法和有序的关系，然后让我们听听内在的情感的声音；哪一个健全的心灵会拒绝它的证据呢？除非双眼因偏见而失明，否则怎么会无法看见宇宙可见的秩序彰显出了至高无上的智慧呢？无论什么样的诡辩，也无法使我们看不见万物的和谐，和每一部分为了其他部分的维持做出的完美配合。随你怎么讲结合与可能性；如果你无法获得我的肯定，你让我哑口无言，自己又能获得什么呢？你又如何能消除我控制不住的自发的情感，不断地驳斥你呢？如果有机体在取得固定的形态以前，是以各种各样的

方式偶然地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先有嘴，才有胃，先有头，才有脚，先有手臂，后有手掌，每一种不完整的器官由于无法自我维持而衰亡，为什么这种不完美之事从未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呢；为什么自然会订出它自己都不能首先遵守的法则呢？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不可能的事情，由于多尝试几次也做到了，我对此一定不会惊讶。我也是同意的；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把铅字随意摆弄，就产生了完整的《埃涅伊德》，我绝不会去证实这个谎言。你会告诉我，我忘记了多次的尝试。但是，我要做多少次尝试，才能在可能的范围内，使化合成为事实呢？对我而言，唯一可能的假设就是，无数次中也不会有一次结果的产生是偶然的。另外，元素化合时只能产生跟元素性质相同的产物，所以生命和组织不会由一个原子喷射产生，化学家在制造化合物时，也不会在他的坩埚中加入他的想法和感受 [2_16] 。

I was surprised and almost shocked when I read Neuwentit. How could this man desire to make a book out of the wonders of nature, wonders which show the wisdom of the author of nature? His book would have been as large as the world itself before he had exhausted his subject, and as soon as we attempt to give details, that greatest wonder of all, the concord and harmony of the whole, escapes us. The mere generation of living organic bodies is the despair of the human mind; the insurmountable barrier raised by nature between the various species, so that they should not mix with one another, is the clearest proof of her intention. She is not content to have established order, she has taken adequate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disturbance of that order.

在我阅读纽文提特的作品时，感到惊讶，几乎生气了。这个人怎么能希望通过一本书就写出展现出了造物主智慧的自然奇观呢？在他述尽主题之前，这本书就会有整个世界那么厚，而且我们一想给出细节，最伟大的奇观，整体的和谐，就会失去。仅仅是有机物的产生就

令人类头脑感到绝望了；自然在不同物种之间立起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从而它们不会互相混淆，这也是她意图的明确证据。她不满足于建立秩序，她还采取了足够的方法，防止秩序被扰乱。

There is not a being in the universe which may not be regarded as in some respects the common centre of all, around which they are grouped, so that they are all reciprocally end and means in relation to each other. The mind is confused and lost amid these innumerable relations, not one of which is itself confused or lost in the crowd. What absurd assumptions are required to deduce all this harmony from the blind mechanism of matter set in motion by chance! In vain do those who deny the unity of intention manifested in the relations of all the parts of this great whole, in vain do they conceal their nonsense under abstractions, co-ordinations, general principles, symbolic expressions; whatever they do I find it impossible to conceive of a system of entities so firmly ordered unless I believe in an intelligence that orders them. It is not in my power to believe that passive and dead matter can have brought forth living and feeling beings, that blind chance has brought forth intelligent beings, that that which does not think has brought forth thinking beings.

宇宙中的所有存在都可以在某一方面被看做一切存在的共同中心，它们围绕在它的周围，从而成为彼此共同的目的和关联的手段。人的心灵在这数不清的关系中困惑、迷失，而这关系本身则从不困惑、迷失。要从这偶然运动的物质的盲目机制中推断出和谐，需要做出多么荒唐的假设啊！那些人否认在这伟大的整体中各部分的关系里彰显出统一目的，这么做是徒劳的。他们在抽象、对等、普遍原则和象征性词汇下隐藏自己的胡言乱语，这么做也是徒劳的；不管他们做什么，我都觉得要想出如此紧密有序的实体系统是多么困难，除非我

相信有一种安排它们的智慧。要我相信被动的、死亡的物质产生了有生命、有感情的生物，相信盲目的偶然产生了智慧的生命，相信无法思考的事物产生了能思考的生物，是不可能的。

I believe, therefore, that the world is governed by a wise and powerful will; I see it or rather I feel it, and it is a great thing to know this. But has this same world always existed, or has it been created? Is there one source of all things? Are there two or many? What is their nature? I know not; and what concern is it of mine? When these things become of importance to me I will try to learn them; till then I abjure these idle speculations, which may trouble my peace, but cannot affect my conduct nor be comprehended by my reason.

因此，我相信，这个世界是由一个智慧、有能的意志主宰的；我看到了它或者说我感觉了到它，而且知道这一点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这个不变的世界是一直存在，还是被创造的呢？万物是否有同一本源呢？还是有两个或者多个本源呢？它们的性质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当这些事对我而言很重要时，我会试着学习它们；在那之前，我放弃这些随意的推测，它们会扰乱我的宁静，而且既不会影响我的行为，也不会被我的理智理解。

Recollect that I am not preaching my own opinion but explaining it. Whether matter is eternal or created, whether its origin is passive or not, it is still certain that the whole is one, and that it proclaims a single intelligence; for I see nothing that is not part of the same ordered system, nothing which does not co-operate to the same end, namely, the conservation of all within the established order. This being who wills and can perform his will,

this being active through his own power, this being, whoever he may be, who moves the universe and orders all things, is what I call God. To this name I add the ideas of intelligence, power, will, which I have brought together, and that of kindness which is their necessary consequence; but for all this I know no more of the being to which I ascribe them. He hides himself alike from my senses and my understanding; the more I think of him, the more perplexed I am; I know full well that he exists, and that he exists of himself alone; I know that my existence depends on his, and that everything I know depends upon him also. I see God everywhere in his works; I feel him within myself; I behold him all around me; but if I try to ponder him himself, if I try to find out where he is, what he is, what is his substance, he escapes me and my troubled spirit finds nothing.

记住，我不在传播我自己的看法，而在解释它。不管物质是永恒的还是被造的，不管它的来源是否是被动的，确定的是，总体还是一个，它表现出了单独的智慧；因为我看到所有事物都是同一个有序系统的一部分，所有事物都朝着同样的目标合作，换句话说，在既定的秩序中，保存着整体。这个有意志和实现意志的存在，这个通过自己的能力能自行活动的存在，这个能推动宇宙、掌管万物的存在，不管他是谁，我都称他为上帝。在这个词中，我加上了智慧、能力、意志这些观念，将它们放在一起，还加上了它们必然带来的仁慈的观念；但是尽管如此，除了这些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他隐藏自己，不让我的感觉和智力发现他；我越想他，就越困惑；我的确知道他是存在的，也知道他是独立存在的；我知道我的存在依赖于他，我所知道的一切也都依赖他的存在。我在他所造的万物中都看到他的存在；我感到他就在我体内；我看到他就在我周围；但是如果我试着就他本身思考他，如果我试着想出他在哪里，他是什么样子，他由什么构成的时候，他就逃离我，我困惑的心灵就一无所获了。

Convinced of my unfitness, I shall never argue about the nature of God unless I am driven to it by the feeling of his relations with myself. Such reasonings are always rash; a wise man should venture on them with trembling, he should be certain that he can never sound their abysses; for the most insolent attitude towards God is not to abstain from thinking of him, but to think evil of him.

由于我深知我能力有限，所以除非我对我与上帝的关系有所感受，我绝不会讨论上帝的本性。这样的推理总是过于轻率；一个智慧的人会颤抖着进行尝试，也会确定，他没有深入探讨的能力；因为对上帝最傲慢的态度不是不去想他，而是把他想得很坏。

After the discovery of such of his attributes as enable me to conceive of his existence, I return to myself, and I try to discover what is my place in the order of things which he governs, and I can myself examine. At once, and beyond possibility of doubt, I discover my species; for by my own will and the instruments I can control to carry out my will, I have more power to act upon all bodies about me, either to make use of or to avoid their action at my pleasure, than any of them has power to act upon me against my will by mere physical impulsion; and through my intelligence I am the only one who can examine all the rest. What being here below, except man, can observe others, measure, calculate, forecast their motions, their effects, and unite, so to speak, the feeling of a common existence with that of his individual existence? What is there so absurd in the thought that all things are made for me, when I alone can relate all things to myself?

在发现上帝身上能让我相信他的确存在的属性后，我回过头来思

考自己，试图找出在他所掌管、我自己也能研究的事物的秩序中，我占据什么位置。马上，并且毫无疑问，我发现了包含我在内的物种；因为通过我自己的意志和我能控制以实现我的意志所想的仪器，我有更多的能力控制周围所有的事物，可以随我的意志利用或是避免它们的活动，而它们却无法仅通过身体的冲动就抗拒我的意志；由于我的智慧，我是唯一能对一切其他事物进行考察的人。那么除人以外，什么生物能观察其他的生物，能测量、计算、估计它们的运动及其后果，比方说，能把共同存在的意识与自己存在的意识结合在一起呢？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能将所有事情与我联系起来，那么认为一切都是为我而造的想法又有什么好笑的呢？

It is true, therefore, that man is lord of the earth on which he dwells; for not only does he tame all the beasts, not only does he control its elements through his industry; but he alone knows how to control it; by contemplation he takes possession of the stars which he cannot approach. Show me any other creature on earth who can make a fire and who can behold with admiration the sun. What! can I observe and know all creatures and their relations; can I feel what is meant by order, beauty, and virtue; can I consider the universe and raise myself towards the hand that guides it; can I love good and perform it; and should I then liken myself to the beasts? Wretched soul, it is your gloomy philosophy which makes you like the beasts; or rather in vain do you seek to degrade yourself; your genius belies your principles, your kindly heart belies your doctrines, and even the abuse of your powers proves their excellence in your own despite.

因此，人类的确是其所居住的地球上的主宰；因为他不仅驯服了一切的野兽，不仅通过自己的勤勉布置宜居的境界；而且只有他知道如何布置这种境界；通过思索，他占据了他无法到达的星球。请告诉

我，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会使用火，会观赏太阳。怎么！我既然能观察得知所有的生物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能理解秩序、美丽和美德的含义，能思考宇宙并伸向那个统治宇宙的手，能爱善并行善，还会把自己看做野兽？可怜的人啊，是你的糟糕的哲学使你像野兽一样；否则，你就算想败坏自己也是徒劳的；你的天才揭露了你原则的错谬，你仁慈的心揭示了你教条的虚伪，甚至连你对自己能力的滥用也在你不自知的时候证明了你的优秀。

For myself, I am not pledged to the support of any system. I am a plain and honest man, one who is not carried away by party spirit, one who has no ambition to be head of a sect; I am content with the place where God has set me; I see nothing, next to God himself, which is better than my species; and if I had to choose my place in the order of creation, what more could I choose than to be a man!

至于我，我不支持任何说法。我是一个简单诚实的人，不会被党派之争裹挟，也没有成为派别首领的野心；我对上帝将我放置的位置感到满意；除了上帝以外，我认为再也没有比人类高级的了；如果我必须在创造的秩序中选择我的位置，除了成为人类，我还会选什么呢！

I am not puffed up by this thought, I am deeply moved by it; for this state was no choice of mine, it was not due to the deserts of a creature who as yet did not exist. Can I behold myself thus distinguished without congratulating myself on this post of honour, without blessing the hand which bestowed it? The first return to self has given birth to a feeling of gratitude and thankfulness to the author of my species, and this feeling calls forth my first homage to

the beneficent Godhead. I worship his Almighty power and my heart acknowledges his mercies. Is it not a natural consequence of our self-love to honour our protector and to love our benefactor?

我没有因这个想法而骄傲，反而觉得深深地感动；因为这种地位不是我选择的结果，也不是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生物所应得的。当我看到我的地位如此优越的时候，怎能不庆贺自己在这样尊贵的地位上，怎能不祝福那赋予者的手呢？第一次回顾自己，使我对造物主产生了感激之情，这种感情又带来了我对仁慈上帝最初的崇高敬意。我向他的全能敬拜，我的心向他的恩惠称谢。尊重我们的保护者、爱戴我们的恩人，这难道不是我们自爱的自然结果吗？

But when, in my desire to discover my own place within my species, I consider its different ranks and the men who fill them, where am I now? What a sight meets my eyes! Where is now the order I perceived? Nature showed me a scene of harmony and proportion; the human race shows me nothing but confusion and disorder. The elements agree together; men are in a state of chaos. The beasts are happy; their king alone is wretched. O Wisdom, where are thy laws? O Providence, is this thy rule over the world? Merciful God, where is thy Power? I behold the earth, and there is evil upon it.

但是当我想寻找自己在人类中的地位时，我发现不同的等级和占据各等级的不同的人，此时我又在哪里呢？我眼前是怎样的场景！我见过的秩序现在又在哪里呢？自然向我展示了一幅和谐匀称的图景；人类却只向我展现了混乱和无序。万物和谐一致；人类则处于混乱之中。动物们十分快乐；它们的君王才是那样的可怜。噢智慧，你的规律在哪里？噢上帝，这就是你治理世界的方法吗？仁慈的上帝，你的

能力在哪里？我看见了地球，其上充满罪恶。

Would you believe it, dear friend, from these gloomy thoughts and apparent contradictions, there was shaped in my mind the sublime idea of the soul, which all my seeking had hitherto failed to discover? While I meditated upon man's nature, I seemed to discover two distinct principles in it; one of them raised him to the study of the eternal truths, to the love of justice, and of true morality, to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of thought, which the wise delight to contemplate; the other led him downwards to himself, made him the slave of his senses, of the passions which are their instruments, and thus opposed everything suggested to him by the former principle. When I felt myself carried away, distracted by these conflicting motives, I said, No; man is not one; I will and I will not; I feel myself at once a slave and a free man; I perceive what is right, I love it, and I do what is wrong; I am active when I listen to the voice of reason; I am passive when I am carried away by my passions; and when I yield, my worst suffering is the knowledge that I might have resisted.

亲爱的朋友，你会相信吗，从这些阴郁的想法和明显的冲突中，我的脑海中形成了关于灵魂的崇高观念，而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没能发现的。当我思索人类天性时，我似乎发现其中有两个不同的本原；其中一个本原使人研究永恒的真理、热爱正义和真正的道德、进入智者乐于沉思的思想世界；另一个本原则使人故步自封，成为本该是他们用具的感觉和欲望的奴隶，因此处处与第一个本原向他所显示的相悖。当我觉得自己被这两种矛盾的运动牵制而分心的时候，我说，不；人类的感受不是只有一面的；我有意志，也可以违背我的意志；我同时觉得自己是奴隶和自由的人；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也爱它，但是我做的事是错误的；当我听从理智的声音的时候我是主动

的；当我被自己的欲望裹挟时我是被动的；当我屈服时，我最痛苦的事，就是我本可以抵抗，但却没有。

Young man, hear me with confidence. I will always be honest with you. If conscience is the creature of prejudice, I am certainly wrong, an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proof of morality; but if to put oneself first is an inclination natural to man, and if the first sentiment of justice is moreover inborn in the human heart, let those who say man is a simple creature remove these contradictions and I will grant that there is but one substance.

年轻人，你要深信不疑地听我的话。我会一直坦诚地对你的。如果良心是偏见的产物，我一定错了，道德也就没有了证据；但是如果人的自然倾向就是先想到自己，如果最初的正义感是人心生而有之的，让那些说人是简单的动物的人消除这些矛盾吧，如果他们做到了，我就承认只有一种实体。

You will note that by this term 'substance' I understand generally the being endowed with some primitive quality, apart from all special and secondary modifications. If then all the primitive qualities which are known to us can be united in one and the same being, we should only acknowledge one substance; but if there are qualities which are mutually exclusive, there are as many different substances as there are such exclusions. You will think this over; for my own part, whatever Locke may say, it is enough for me to recognise matter as having merely extension and divisibility to convince myself that it cannot think, and if a philosopher tells me that trees feel and rocks think [1_17] in vain will he perplex me with his cunning arguments; I merely regard him as a dishonest sophist,

who prefers to say that stones have feeling rather than that men have souls.

你要注意，“实体”这个词，我一般理解为被赋予一些原始性质的存在，不包括任何特殊或第二性质的变异。那么如果所有我们已知的原始性质能被集合为一个存在，我们就应该承认只有一个实体；但是如果有性质是互斥的，那么有多少互斥的情况，就有多少不同的实体。你可以仔细考虑一下；对我而言，不管洛克说什么，了解到物质只有延伸和分割的能力就足以说服我它是无法思考的，如果一个哲学家告诉我树木能感觉，岩石能思考 [2_17] ，不管他的论证多巧妙，都不会迷惑我；我只会把他当作一个不诚实的诡辩学家，因为他宁可说石头有感觉也不说人类有灵魂。

Suppose a deaf man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sounds because he has never heard them. I put before his eyes a stringed instrument and cause it to sound in unison by means of another instrument concealed from him; the deaf man sees the chord vibrate. I tell him, “The sound makes it do that.” “Not at all,” says he, “the string itself is the cause of the vibration; to vibrate in that way is a quality common to all bodies.” “Then show me this vibration in other bodies,” I answer, “or at least show me its cause in this string.” “I cannot,” replies the deaf man; “but because I do not understand how that string vibrates why should I try to explain it by means of your sounds, of which I have not the least idea? It is explaining one obscure fact by means of a cause still more obscure. Make me perceive your sounds; or I say there are no such things.”

想象一个聋子因为从来没有听过声音就否认声音的存在。我在他的眼前放一个弦乐器，悄悄地用另一个乐器使它发出谐音；这个聋子

就能看到弦在震动。我告诉他："声音使它震动。"他说："不是的。弦本身使它震动；这样震动是所有物体共同的性质。""那么向我展示一下其他物体这样的震动，"我回答道，"或至少像我展示这根弦如何使自己震动。""我办不到，"聋子回答道；"但因为我不懂为何弦会震动，我为什么要试着通过你所说的我一无所知的声音去解释它呢？这如同对一个模糊的事实，用更加模糊的原因来解释。让我感觉到你所说的声音；否则我会说它不存在。"

The more I consider thought and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mind, the more likeness I find between the arguments of the materialists and those of the deaf man. Indeed, they are deaf to the inner voice which cries aloud to them, in a tone which can hardly be mistaken. A machine does not think, there is neither movement nor form which can produce reflection; something within thee tries to break the bands which confine it; space is not thy measure, the whole universe does not suffice to contain thee; thy sentiments, thy desires, thy anxiety, thy pride itself, have another origin than this small body in which thou art imprisoned.

我越考虑人的思想和人类头脑的性质，就发现唯物主义者和那些聋子之间的论述越为相似。事实上，他们是听不见大声向他们喊叫的内心的声音的，这声音他们很难理解错。机器是不会思考的，也没有什么动作或外貌能导致反思；你体内有某种东西在试图挣脱那束缚它的纽带；空间无法衡量你的尺度，整个宇宙也不足以容纳你；你的感情、欲望、忧虑、骄傲，都有不同于你觉得将你束缚的小小身体的另一个本原。

No material creature is in itself active, and I am active. In vain do you argue this point with me; I feel it, and it is this feeling which

speaks to me more forcibly than the reason which disputes it. I have a body which is acted upon by other bodies, and it acts in turn upon them;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this reciprocal action; but my will is independent of my senses; I consent or I resist; I yield or I win the victory, and I know very well in myself when I have done what I wanted and when I have merely given way to my passions. I have always the power to will, but not always the strength to do what I will. When I yield to temptation I surrender myself to the action of external objects. When I blame myself for this weakness, I listen to my own will alone; I am a slave in my vices, a free man in my remorse; the feeling of freedom is never effaced in me but when I myself do wrong, and when I at length prevent the voice of the soul from protesting against the authority of the body.

没有什么物质的生物本身是能动的，而我是能动的。你要与我争论这一点是徒劳的；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对我说话的感觉比与它争论的理智更有力。我有一个身体，受到其他物体的影响，也反过来影响其他的物体；这种相互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的意志独立于我的感官；我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我可以屈服也可以胜利，我非常清楚我自己什么时候做了我想做的事情，什么时候又只是屈服于我的欲望。我总是有意志的能力，但不总有贯彻意志的能力。当我屈服于诱惑时，我向外在事物的行为屈服了。当我因这个弱点自责时，我只听从我意志的声音；我是我的恶行的奴隶，有忏悔的自由；只有在我做错事，而且最终避免让灵魂发出抗议身体权威的声音时，才会失去自由的感觉。

I am only aware of will through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own will, and intelligence is no better known to me. When you ask me what is the cause which determines my will, it is my turn to ask what cause determines my judgment; for it is plain that these two

causes are but one; and if you understand clearly that man is active in his judgments, that his intelligence is only the power to compare and judge, you will see that his freedom is only a similar power or one derived from this; he chooses between good and evil as he judges between truth and falsehood; if his judgment is at fault, he chooses amiss. What then is the cause that determines his will? It is his judgment. And what is the cause that determines his judgment? It is his intelligence, his power of judging; the determining cause is in himself. Beyond that, I understand nothing.

我只是通过对自己意志的认识而了解意志，对智力也没有更多的了解。当你问我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我的意志，我就要问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我的判断；因为很明显，这两个原因原为一；但是如果你很清楚地知道，人在判断时是主动的，他的智力也只是进行比较和判断的能力，你就会发现他的自由只是一种类似的能力，或者说一种从智力衍生而来的能力；他如判断正误一样选择善恶；如果他的判断失误了，他的选择也就错了。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他的意志呢？是他的判断。那什么因素决定了他的判断呢？是他的智力，他判断的能力；这个决定因素在于他自己。除此以外，我就不知道了。

No doubt I am not free not to desire my own welfare, I am not free to desire my own hurt; but my freedom consists in this very thing, that I can will what is for my own good, or what I esteem as such, without any external compulsion. Does it follow that I am not my own master because I cannot be other than myself?

当然，我还没有自由到不去渴求自己的幸福，也没有自由到渴望自己受伤；但是我的自由在于这一件事，即我能做对我自己好的事，或者能做在没有任何外力驱动下我认为好的事。那是否就能说，因为

我不能成为别人，所以我不是自己的主人呢？

The motive power of all action is in the will of a free creature; we can go no farther. It is not the word freedom that is meaningless, but the word necessity. To suppose some action which is not the effect of an active motive power is indeed to suppose effects without cause, to reason in a vicious circle. Either there is no original impulse, or every original impulse has no antecedent cause, and there is no will properly so-called without freedom. Man is therefore free to act, and as such he is animated by an immaterial substance; that is the third article of my creed. From these three you will easily deduce the rest, so that I need not enumerate them.

所有行动的源泉都来自自由生物的意志；我们无法得出更多结论。没有意义的，不是“自由”这个词，而是“必然”这个词。认为一些行为不是能动的本源的结果，就是在设想没有原因的结果，就是在恶性循环中理论。无论是不存在原动力，还是一切原动力都没有前因，所有意志，都不能说没有自由。因此人有行动的自由，在行动的自由中是受到一种无形的实体推动的；这是我的第三个信条。从这三个信条，你可以很容易地推导出其他信条，所以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If man is at once active and free, he acts of his own accord; what he does freely is no part of the system marked out by Providence and it cannot be imputed to Providence. Providence does not will the evil that man does when he misuses the freedom given to him; neither does Providence prevent him doing it, either because the wrong done by so feeble a creature is as nothing in its eyes, or because it could not prevent it without doing a greater wrong and degrading his nature. Providence has made him free that

he may choose the good and refuse the evil. It has made him capable of this choice if he uses rightly the faculties bestowed upon him, but it has so strictly limited his powers that the misuse of his freedom cannot disturb the general order. The evil that man does reacts upon himself without affecting the system of the world, without preventing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human species in spite of itself. To complain that God does not prevent us from doing wrong is to complain because he has made man of so excellent a nature, that he has endowed his actions with that morality by which they are ennobled, that he has made virtue man's birthright. Supreme happiness consists in self-content; that we may gain this self-content we are placed upon this earth and endowed with freedom, we are tempted by our passions and restrained by conscience. What more could divine power itself have done on our behalf? Could it have made our nature a contradiction, and have given the prize of well-doing to one who was incapable of evil? To prevent a man from wickedness, should Providence have restricted him to instinct and made him a fool? Not so, O God of my soul, I will never reproach thee that thou hast created me in thine own image, that I may be free and good and happy like my Maker!

如果人同时是主动地又是自由的，他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自由地做的事都不是上帝规划的系统的一部分，其责任也不能由上帝承担。当人误用了给予他的自由时，上帝并没有人行恶的意志；上帝也不防止人行恶，或者由于如此羸弱的生物所作的恶在他的眼里微如尘埃，或者是由于他无法不通过作更大的恶、损害自己的天性来防止人类作恶。上帝给人以自由，使人能从善弃恶。如果他能正确地使用赋予他的官能，上帝已使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上帝严格地限制了人类这样的能力，使得他无用自己的自由也不能干扰总的秩序。人要承担所作恶事的后果，但它并不会影响到世界的系统，尽管人遇到了人所作的坏事，也无碍与人类的生存。抱怨上帝没有防止我们行

恶，一如抱怨上帝将人造得如此完美，抱怨上帝赋予了使人类行为高尚的道德，抱怨上帝将美德作为了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力。最大的幸福存在于自我满足；因为我们能获得这样的自我满足，我们被安置在地球上，被赋予自由，受到欲望的诱惑，被良知约束。我们还能要求上帝用自己的力量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会不会使我们的天性自相矛盾，让一个无法作恶的人得到行善的奖赏？为了防止一个人变坏，上帝难道还要限制他只能按照直觉行事，并使他成为一个傻子吗？不，我灵魂的主啊，我永远也不会因为你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使我能像我的造物主一样自由、良善、喜乐而责难你！

It is the abuse of our powers that makes us unhappy and wicked. Our cares, our sorrows, our sufferings are of our own making. Moral ills are undoubtedly the work of man, and physical ills would be nothing but for our vices which have made us liable to them. Has not nature made us feel our needs as a means to our preservation! Is not bodily suffering a sign that the machine is out of order and needs attention? Death…. Do not the wicked poison their own life and ours? Who would wish to live for ever? Death is the cure for the evils you bring upon yourself; nature would not have you suffer perpetually. How few sufferings are felt by man living in a state of primitive simplicity! His life is almost entirely free from suffering and from passion; he neither fears nor feels death; if he feels it, his sufferings make him desire it; henceforth it is no evil in his eyes. If we were but content to be ourselves we should have no cause to complain of our lot; but in the search for an imaginary good we find a thousand real ills. He who cannot bear a little pain must expect to suffer greatly. If a man injures his constitution by dissipation, you try to cure him with medicine; the ill he fears is added to the ill he feels; the thought of death makes it horrible and hastens its approach; the more we seek to escape from it, the more we are aware of it; and we go through life in the fear of

death, blaming nature for the evils we have inflicted on ourselves by our neglect of her laws.

因为滥用了我们的能力，我们才不快、邪恶。我们所关心的、我们的悲伤和痛苦，都是我们自己导致的。道德败坏无疑是人类自己造成的，要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恶行，使我们会受到身体疾病的缠累，身体的疾病是算不得什么的。大自然难道没有通过让我们能感受到自己的需要以保护我们吗？身体的苦痛，难道不是身体秩序混乱、需要注意的信号吗？死亡……坏人难道不在毒害自己的和我们的生命吗？谁不想永远活着呢？死亡是你给自己带来的罪恶的解药；自然不会永远使我们遭受痛苦。在原始简单状态中生活的人，感受到的痛苦是多么地少啊！他的生活几乎完全不受苦痛和欲望的辖制；他既不害怕也感觉不到死亡；如果他感觉到了，他的苦痛使得他渴望死亡；结果死亡在他眼中不是令人痛苦的事。如果我们满足于自己的状态，我们就没有理由抱怨我们的命运了；但是为了寻求想象中的幸福，我们遭遇了成百上千种真正的灾难。那些无法忍受小痛苦的人，一定会遭受大痛苦的。如果一个人由于放荡而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你会试着用药物治疗他；他所担心的病痛加增了他感受到的病痛；对死亡的思考会使死亡显得可怕，并且加快它降临的步伐；我们越是逃离它，就越是意识到它；我们的一生在对死亡的恐惧中度过，而且由于忽视了死亡之律，我们把对自己作的恶怪罪在自然身上。

O Man! seek no further for the author of evil; thou art he. There is no evil but the evil you do or the evil you suffer, and both come from yourself. Evil in general can only spring from disorder, and in the order of the world I find a never failing system. Evil in particular cases exists only in the mind of those who experience it; and this feeling is not the gift of nature, but the work of man himself. Pain has little power over those who, having thought little, look neither before nor after. Take away our fatal progress, take

away our faults and our vices, take away man's handiwork, and all is well.

噢人类啊！别再寻找是谁作了恶；那个人就是你。除了你自己作的恶和你所受的恶以外，世上没有其他的恶了，而这两种恶都来自你自己。一般来说，恶只能来自无序，而在世界的秩序中，我发现一个永不失效的系统。在特定的案例中，邪恶只存在于那些经历过它的人身上；这种感觉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人自己造成的。那些很少想到痛苦，很少瞻前顾后的人，是感觉不到多少痛苦的。结束我们作恶的进程，结束我们的错误和恶行，结束我们的人为工作，一切就会好起来。

Where all is well,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injustice. Justice and goodness are inseparable; now goodness is the necessary result of boundless power and of that self-love which is innate in all sentient beings. The omnipotent projects himself, so to speak, into the being of his creatures. Creation and preservation are the everlasting work of power; it does not act on that which has no existence; God is not the God of the dead; he could not harm and destroy without injury to himself. The omnipotent can only will what is good [1_18] . Therefore he who is supremely good, because he is supremely powerful, must also be supremely just, otherwise he would contradict himself; for that love of order which creates order we call goodness and that love of order which preserves order we call justice.

哪里一切都好，哪里就没有不正义之事。正义与良善是密不可分的；而良善是无尽的能力和所有有感觉的存在内在的自爱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全能者将自己延及至所创造的万物。创造和护理都是能

力的永恒之工；它对不存在的事物是不起作用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他施行伤害和毁灭，一定会伤害到他自己。全能者只希望为善[2_18]。因此至善者，因为他极有能力，一定也极为公义，否则他会违背自己；因为我们所称的善，就是爱秩序而创造了秩序的行为；我们所称的公义，就是爱秩序而存留秩序的行为。

Men say God owes nothing to his creatures. I think he owes them all he promised when he gave them their being. Now to give them the idea of something good and to make them feel the need of it, is to promise it to them. The more closely I study myself, the more carefully I consider, the more plainly do I read these words, “Be just and you will be happy.” It is not so, however, i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ings, the wicked prospers and the oppression of the righteous continues. Observe how angry we are when this expectation is disappointed. Conscience revolts and murmurs against her Creator; she exclaims with cries and groans, “Thou hast deceived me.”

人们说，上帝不欠自己的创造物任何东西。我认为上帝欠他们所有在赋予他们生命时答应他们的东西。给他们善的观念，并让他们觉得需要它，就是承诺把善给他们。我对自己研究得越仔细，我思考得越细致，读这句话的时候就越明白：“行事公义，你就得幸福。”然而，在现在的环境中，却非如此；坏人亨通，对公义者的压迫仍在继续。当我们的期待成为泡影，看看我们是多么气愤。良心反叛了，对她的创造者嘀咕着；她哭泣呜咽着叫喊道：“你欺骗了我。”

“I have deceived thee, rash soul! Who told thee this? Is thy soul destroyed? Hast thou ceased to exist? O Brutus! O my son! let there be no stain upon the close of thy noble life; do not abandon thy

hope and thy glory with thy corpse upon the plains of Philippi. Why dost thou say, 'Virtue is naught,' when thou art about to enjoy the reward of virtue? Thou art about to die! Nay, thou shalt live, and thus my promise is fulfilled.”

“我欺骗了你，鲁莽的灵魂！谁告诉你的？你的灵魂被毁灭了吗？你已经不再存在了吗？噢，布鲁特斯！噢，我的儿子！你高尚的一生要结束之际，不要染上污点；在腓利比的平原上，不要和你的尸体一起，遗弃你的希望和光荣。当你将要享受美德的回报的时候，你为什么说：‘美德毫无价值’？你将要死了！不，你会活下去的，这样我的诺言才会实现。”

One might judge from the complaints of impatient men that God owes them the reward before they have deserved it, that he is bound to pay for virtue in advance. Oh! let us first be good and then we shall be happy. Let us not claim the prize before we have won it, nor demand our wages before we have finished our work. “It is not in the lists that we crown the victors in the sacred games,” says Plutarch, “it is when they have finished their course.”

一个人可能根据一个缺乏耐心者的抱怨判断，上帝在他们赢得报酬之前给他们报酬，他必须提前为美德给出报酬。噢！我们首先得做好人，然后才会快乐。在我们赢得奖赏之前，不要要求奖励，也不要在我们完成工作之前，要求领取工资。普鲁塔克说：“在神圣的竞技中，我们不是一入场就算作胜利，他们必须跑完全程之后，才能把荣耀的冠冕戴在自己的头上。”

If the soul is immaterial, it may survive the body; and if it so

survives, Providence is justified. Had I no other proof of the immaterial nature of the soul, the triumph of the wicked and the oppression of the righteous in this world would be enough to convince me. I should seek to resolve so appalling a discord in the universal harmony. I should say to myself, “All is not over with life, everything finds its place at death.” I should still hav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becomes of man when all we know of him through our senses has vanished?” This question no longer presents any difficulty to me when I admit the two substances.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that what is imperceptible to those senses escapes me, during my bodily life, when I perceive through my senses only. When the union of soul and body is destroyed, I think one may be dissolved and the other may be preserved. Why shoul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ne impl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her? On the contrary, so unlike in their nature, they were during their union in a highly unstable condition, and when this union comes to an end they both return to their natural state; the active vital substance regains all the force which it expended to set in motion the passive dead substance. Alas! my vices make me only too well aware that man is but half alive during this life; the life of the soul only begins with the death of the body.

如果灵魂是无形的，它可能活得比身体更久；如果它确实比身体活得更久，上帝就是无可怀疑的。即使我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灵魂是无形的，世界上恶人得道，好人受欺的事实也足以说服我这一点。在宇宙的和谐中，我要找出如此骇人的不和谐的原因。我应该对自己说：“并非一切都随着生命的结束而结束，死后，一切都会回到它的本位。”我还是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当我们所有能感知他的感官都消失了，人会到哪里去呢？”当我了解到有两种实体之后，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再也不是难题了。很好理解，在我肉体活着的时候，当我只通过我的感官去感受时，那些无法被感官感觉到的便逃离我。当灵魂与

身体的统一被打破时，我想，肉体也许消失了，灵魂也许保留了下来。为什么肉体的毁灭意味着灵魂的消逝呢？与此相反，由于它们的性质不同，在它们合一时，它们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当这种合一结束时，它们都回到了自然的状态；主动的有活力的实体重新收回了它过去用来推动被动的死亡的实体的力量。唉！我的罪恶使我再清楚不过——人活着时只过了生命的一半；灵魂生活只有在身体死亡时才开始。

But what is that life? Is the soul of man in its nature immortal? I know not. My finite understanding cannot hold the infinite; what is called eternity eludes my grasp. What can I assert or deny, how can I reason with regard to what I cannot conceive? I believe that the soul survives the bod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order; who knows if this is enough to make it eternal? However, I know that the body is worn out and destroyed by the division of its parts, but I cannot conceive a similar destruction of the conscious nature, and as I cannot imagine how it can die, I presume that it does not die. As this assumption is consoling and in itself not unreasonable, why should I fear to accept it?

但是，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人的灵魂的性质是不是永不死亡呢？我不知道。我有限的理解无法想象无限的东西；不朽的事物是我无法理解的。我能确定或者否认什么呢，我怎能对我无法想象的事物进行理论呢？我相信，肉体死亡后灵魂还活着是为了维持秩序；谁知道这是否足以让它永存呢？然而，我知道肉体是由于各部分分离而毁灭的，但是我无法想象出能思想的物体也如此毁灭，由于我想象不出它如何死亡，我假定它是不死的。既然这个假定能给我安慰，而且就其本身并非不可理喻，为什么我不敢接受它呢？

I am aware of my soul; it is known to me in feeling and in thought; I know what it is without knowing its essence; I cannot reason about ideas which are unknown to me. What I do know is this, that my personal identity depends upon memory, and that to be indeed the same self I must remember that I have existed. Now after death I could not recall what I was when alive unless I also remembered what I felt and therefore what I did;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this remembrance will one day form the happiness of the good and the torment of the bad. In this world our inner consciousness is absorbed by the crowd of eager passions which cheat remorse. The humiliation and disgrace involved in the practice of virtue do not permit us to realise its charm. But when, freed from the illusions of the bodily senses, we behold with joy the supreme Being and the eternal truths which flow from him; when all the powers of our soul are alive to the beauty of order and we are wholly occupied in comparing what we have done with what we ought to have done, then it is that the voice of conscience will regain its strength and sway; then it is that the pure delight which springs from self-content, and the sharp regret for our own degradation of that self, will decide by means of overpowering feeling what shall be the fate which each has prepared for himself. My good friend, do not ask me whether there are other sources of happiness or suffering; I cannot tell; that which my fancy pictures is enough to console me in this life and to bid me look for a life to come. I do not say the good will be rewarded, for what greater good can a truly good being expect than to exist in accordance with his nature? But I do assert that the good will be happy, because their maker, the author of all justice, who has made them capable of feeling, has not made them that they may suffer; moreover, they have not abused their freedom upon earth and they have not changed their fate through any fault of their own; yet they have suffered in this life and it will be made up to them in the life to

come. This feeling relies not so much on man's deserts as on the idea of good which seems to me inseparable from the divine essence. I only assume that the laws of order are constant and that God is true to himself.

我意识到我有灵魂；我通过我的感觉和思想认识它；不用知道它的本质，我就知道它是什么；我不能对于自己未知的想法进行理论。我知道的是，我个人身份依赖于我的记忆，要保持我一直是我，我必须记得我曾存在过。除非同时记住我的感觉以及由此我做的事，否则死后我就无法回忆起活着的一生自己是什么样的；我也确信，这样的回忆将有一天会使好人快乐，使坏人痛苦。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内在的感觉被欲望的洪流吸引，这欲望欺骗了懊悔之心。道德的实践带来的羞辱和委屈不允许我们意识到它的魅力。但是当我们从身体感官的幻象中获得自由，快乐地看到至高的存在和从他流出的永恒的真理；当我们灵魂所有的能力因秩序之美活过来，我们全身心投入地对比我们已经做的事和我们应该做的事，这时候，良心的声音会重获它的力量和权威；从自我满足中流淌出的纯洁的欢乐和因我们的自我堕落而产生的强烈的悔恨，将通过压倒性的情感决定为每个人准备好的命运。我的好朋友，不要问我这里有没有其他快乐或痛苦的源泉；我不知道；我所幻想的图景已足以在此生安慰我，并使我希望获得来生。我不是说善者会得到报答，因为一个真正善良的人除了按照自己的本性存在，还能期待什么更大的好处呢？但我确信，善者会幸福的，因为他们的造物者，全然公义的主宰，既然让他们有感受的能力，就不是为了让他们受苦；而且，在地上他们没有滥用他们的自由，也没有因为自己的过错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他们这一生受过苦，但是在来生会得到补偿的。我这个感受不是依据人的功绩，而是依据善的观念得出的，善与神的本质是不可分割的。我只假定，秩序的法度是常存的，上帝也是忠于自己的。

Do not ask me whether the torments of the wicked will endure

for ever, whether the goodness of their creator can condemn them to the eternal suffering; again, I cannot tell, and I have no empty curiosity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useless problems. How does the fate of the wicked concern me? I take little interest in it. All the same I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y will be condemned to everlasting torments. If the supreme justice calls for vengeance, it claims it in this life.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with their errors are its ministers. Justice uses self-inflicted ills to punish the crimes which have deserved them. It is in your own insatiable souls, devoured by envy, greed, and ambition, it is in the midst of your false prosperity, that the avenging passions find the due reward of your crimes. What need to seek a hell in the future life? It is here in the breast of the wicked.

不要问我坏人会不会受到永远的折磨，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创造者是良善的，所以能让他们受永远的折磨；我再说一次，我不知道，我也没有任何空闲的好奇心探究没有价值的问题。那些坏人的命运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对此不感兴趣。同样，我也很难相信他们会被判处以永久的刑罚。如果至高公义的神要报复的话，他会在今生报复。世上的国家与他们所犯的错，就是自己的执行者。公义的神用他们自己酿造的灾难来惩罚他们应得的罪行。是在你们贪得无厌的被嫉妒、贪婪和野心吞噬的灵魂中，在你极其富盛的时候，复仇的欲念为你们的罪行找到了合适的回报。何必在来生寻找地狱呢？它就在坏人的心中。

When our fleeting needs are over, and our mad desires are at rest, there should also be an end of our passions and our crimes. Can pure spirits be capable of any perversity? Having need of nothing, why should they be wicked? If they are free from our gross senses, if their happiness consists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other beings, they can only desire what is good; and he who ceases to be

bad can never be miserable. This is what I am inclined to think though I have not been at the pains to come to any decision. O God, merciful and good, whatever thy decrees may be I adore them; if thou shouldst commit the wicked to everlasting punishment, I abandon my feeble reason to thy justice; but if the remorse of these wretched beings should in the course of time be extinguished, if their sufferings should come to an end, and if the same peace shall one day be the lot of all mankind, I give thanks to thee for this. Is not the wicked my brother? How often have I been tempted to be like him? Let him be delivered from his misery and freed from the spirit of hatred that accompanied it; let him be as happy as I myself; his happiness, far from arousing my jealousy, will only increase my own.

当我们转瞬的需要过去了，我们疯狂的欲望止息了，我们的欲望和罪行也应该结束了。纯洁的灵魂能有任何乖僻的行为吗？既然一无所需，为什么他们会成为坏人呢？如果他们不受我们粗野的感官的辖制，如果他们的幸福在于为他人沉思，他们就只能渴望良善之事；不再作恶的人永远也不会可怜。我愿意这么想，尽管我还没有花功夫得出任何结论。噢上帝，慈爱良善的上帝，不管你的旨意如何，我都尊重；如果你要让坏人承受永远的刑罚，我会在你的公义判决前丢弃我微薄的理论；但是如果这些可怜人的悔恨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除，如果他们的痛苦终会结束，如果将来某一天，同样的安宁会成为全人类的命运，我会为此而向你表达感谢。坏人难道不是我的弟兄吗？我曾多少次试图像他一样？让他从苦难中脱离，从随之而来的憎恨的精神中得到解脱；让他跟我一样快乐；他的幸福，不仅不会激起我的嫉妒，反而会是我更加快乐。

Thus it is that,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God in his works, and in the study of such of his attributes as it concerned me to know, I

have slowly grasped and developed the idea, at first partial and imperfect, which I have formed of this Infinite Being. But if this idea has become nobler and greater it is also more suited to the human reason. As I approach in spirit the eternal light, I am confused and dazzled by its glory, and compelled to abandon all the earthly notions which helped me to picture it to myself. God is no longer corporeal and sensible; the supreme mind which rules the world is no longer the world itself; in vain do I strive to grasp his inconceivable essence. When I think that it is he that gives life and movement to the living and moving substance which controls all living bodies; when I hear it said that my soul is spiritual and that God is a spirit, I revolt against this abasement of the divine essence; as if God and my soul were of one and the same nature! As if God were not the one and only absolute being, the only really active, feeling, thinking, willing being, from whom we derive our thought, feeling, motion, will, our freedom and our very existence! We are free because he wills our freedom, and his inexplicable substance is to our souls what our souls are to our bodies. I know not whether he has created matter, body, soul, the world itself. The idea of creation confounds me and eludes my grasp; so far as I can conceive of it I believe it; but I know that he has formed the universe and all that is, that he has made and ordered all things. No doubt God is eternal; but can my mind grasp the idea of eternity? Why should I cheat myself with meaningless words? This is what I do understand; before things were—God was; he will be when they are no more, and if all things come to an end he will still endure. That a being beyond my comprehension should give life to other beings, this is merely difficult and beyond my understanding; but that Being and Nothing should be convertible terms, this is indeed a palpable contradiction, an evident absurdity.

就是这样，在对上帝之工的默想中，在我应当知道的对他的属性的研究中，我慢慢地抓住并且发展了这个想法，一开始是我对这无限存在形成的局部的不完美的想法。但是如果这个想法更崇高更伟大，它也更适合人类的理智。当我在精神上走近永恒之光时，我因它的光芒而感到头晕眼花，并被驱使着放弃所有帮助我向自己描绘这样图景的世俗的想法。上帝不再是有形的、可感知的了；这统治世界的最强智慧不再是世界自己了；我努力地弄懂他无可测度的实质却是徒劳。当我想到是他给了那控制所有活着的形体的有生命能动的物质以生命和运动的时候；当我听到它说我的灵魂是神灵的，上帝是灵的时候，我就厌恶这种对神圣的本质的亵渎；因为这就好像认为上帝和我的灵魂的性质相同，二者为一一样！就好像上帝不是那为一的绝对的存在，那唯一的真正能动的、有感觉、能思考、有意志的存在，这个存在，是我们的思想、感情、运动、意志、自由和存在的来源。我们是自由的，因为他希望我们自由，他无法解释的实体对于我们的灵魂就如同我们的灵魂对于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不知道他是否创造了物质、身体、灵魂和世界。创造的观念使我糊涂，我无法理解；既然我能想象出它来，我相信它；但是我知道是他创造了宇宙和一切存在的东西，他创造并管理万有。无疑上帝是永恒的；但是我的头脑能明白永恒的观念吗？我为什么要用无意义的词语欺骗我自己呢？这是我所明白的；在事物存在之前——上帝已存在；事物存在多久，他就能存在多久，如果一切都终结了，他仍然长存。这样超出我理解力的存在能将生命赋予其他存在，这也是我模糊且无法理解的；但是，如果“存在”和“虚无”二者为一的话，这确实是一个显然的矛盾，明显是荒谬的。

God is intelligent, but how? Man is intelligent when he reasons, but the Supreme Intelligence does not need to reason; there is neither premise nor conclusion for him, there is not even a proposition. The Supreme Intelligence is wholly intuitive, it sees what is and what shall be; all truths are one for it, as all places are but one point and all time but one moment. Man's power makes use

of means, the divine power is self-active. God can because he wills; his will is his power. God is good; this is certain; but man finds his happiness in the welfare of his kind. God's happiness consists in the love of order; for it is through order that he maintains what is, and unites each part in the whole. God is just; of this I am sure, it is a consequence of his goodness; man's injustice is not God's work, but his own; that moral justice which seems to the philosophers a presumption against Providence, is to me a proof of its existence. But man's justice consists in giving to each his due; God's justice consists in demanding from each of us an account of that which he has given us.

上帝是智慧的，但智慧到什么程度呢？在推理时，人类是聪明的；但是最高的智慧不需要推理；对他而言既不需前提也不需结论，甚至不需要命题。最高的智慧完全是直觉的，它既看见现在的事物也能看见将有的事物；对它而言，所有真理都是一个，所有地方只是一个点，所有的时间只是一个时刻。人类的力量要通过方法才能发挥作用，而神的力量能自行发挥作用。上帝能，因为他有意志；他的意志就是他的力量。上帝是良善的；这是肯定的；人在人类的福祉中找到自己的幸福。上帝的幸福在于爱秩序；因为它通过秩序维持现状，并将各部分联结为一个整体。上帝是公义的；这一点我很确定，这是他良善的结果；人类的不公义不是上帝导致的，而是人类自己导致的；道德正义对哲学家而言似乎是反对上帝的论点，对我而言它是上帝存在的证据。但是人类的公义在于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上帝的公义在于根据他给予每个人的多少向每个人索取。

If I have succeeded in discerning these attributes of which I have no absolute idea, it is in the form of unavoidable deductions, and by the right use of my reason; but I affirm them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m, and at bottom that is no affirmation at all. In

vain do I say, God is thus, I feel it, I experience it, none the more do I understand how God can be thus.

如果我成功地辨别出了这些我完全没有任何概念的特性，这是通过无可避免的推理的形式，正确运用我的理智做到的；但是我不理解它们就承认它们，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有承认。就算我说，上帝是这样的，我感觉到它、经历到它，也是无益的，因为我并没有更好地理解上帝为何是这样。

In a word: the more I strive to envisage his infinite essence the less do I comprehend it; but it is, and that is enough for me; the less I understand, the more I adore. I abase myself, saying, “Being of beings, I am because thou art; to fix my thoughts on thee is to ascend to the source of my being. The best use I can make of my reason is to resign it before thee; my mind delights, my weakness rejoices, to feel myself overwhelmed by thy greatness.”

总而言之，我越试着想象出他无穷的本质，对他的理解就越少；但他确实存在，这对我而言已经足够；我理解得越少，我崇敬得就越多。我自己谦卑下来，说：“存在的主宰啊，我存在是因为你的存在；我将思想聚焦于你，是为了探索我存在的根源。我能运用我的理智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它顺从你的旨意；感觉到我自己被你的伟大湮没，使我的头脑欢喜，我的弱点开心。”

Having thus deduced from the perception of objects of sense and from my inner consciousness, which leads me to judge of causes by my native reason, the principal truths which I require to know, I must now seek such principles of conduct as I can draw

from them, and such rules as I must lay down for my guidance in the fulfilment of my destiny in this world,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my Maker. Still following the same method, I do not derive these rules from the principles of the higher philosophy, I find them in the depths of my heart, traced by nature in characters which nothing can efface. I need only consult myself with regard to what I wish to do; what I feel to be right is right, what I feel to be wrong is wrong; conscience is the best casuist; and it is only when we haggle with conscience that we have recourse to the subtleties of argument. Our first duty is towards ourself; yet how often does the voice of others tell us that in seeking our good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we are doing ill? We think we are following the guidance of nature, and we are resisting it; we listen to what she says to our senses, and we neglect what she says to our heart; the active being obeys, the passive commands. Conscience is the voice of the soul, the passions are the voice of the body. It is strange that these voices often contradict each other? And then to which should we give heed? Too often does reason deceive us; we have only too good a right to doubt her; but conscience never deceives us; she is the true guide of man; it is to the soul what instinct is to the body [1_19] , he who obeys his conscience is following nature and he need not fear that he will go astray. This is a matter of great importance, continued my benefactor, seeing that I was about to interrupt him; let me stop awhile to explain it more fully.

可以感觉到的事物给我以印象，我内在的感知指引我通过自己的理智判断出事情的缘由，它们使我推导出我需要知道的主要真理，我现在必须从中得出这样的行为原则，以及找出根据我的创造者的旨意，在完成世上使命的过程中作为指导的规则。根据一样的方法，我没有从更高的哲学中得出这些法则，我在自己内心深处找到了它们，它们已经被自然留下了印记，这些字什么事物都无法抹去。我只需要

问自己我想做什么；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对的，我觉得是错的就是错的；良心是最好的诡辩家；只有在我们与良心争论时，我们在需要诉诸精明的论述法。我们首要的责任是关乎自己；但是，他人的声音多久一次告诉我们，损人利己是不好的？我们认为我们在遵循自然的指引，实际上我们在抗拒自然；我们听从她对我们感官说的话，忽略她对我们心灵说的话；主动的存在顺服，被动的存在却在命令。良心是灵魂的声音，欲望是肉体的声音。这些声音经常与彼此冲突，不是很奇怪吗？这时，我们应该听从哪一种声音呢？理智总是欺骗我们；我们有充分的权力怀疑她；但是良心从不欺骗我们；她是人类真正的向导；良心之于灵魂如同直觉之于身体[19] [2_19] ，顺从良心的人是在跟随自然，不需要害怕自己走上歧途。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我的恩人看到我要打断他便继续道；他让我停一会，以解释得更清楚。

The morality of our actions consists entirely in the judgments we ourselves form with regard to them. If good is good, it must be good in the depth of our heart as well as in our actions; and the first reward of justice is the consciousness that we are acting justly. If moral goodness is in accordance with our nature, man can only be healthy in mind and body when he is good. If it is not so, and if man is by nature evil, he cannot cease to be evil without corrupting his nature, and goodness in him is a crime against nature. If he is made to do harm to his fellow-creatures, as the wolf is made to devour his prey, a humane man would be as depraved a creature as a pitiful wolf; and virtue alone would cause remorse.

我们行为的道德性完全在于对他人形成的评价。如果善就是善，它必须在我们内心深处和我们的行为中都是善的；公义的第一个回报就是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做正义的事。如果道德的善与我们的天性是一致的，人类只有在善良的时候，精神与身体才都是健康的。如果不一致，如果人天性就是恶的，他就不能在不败坏自己天性的情况下停止

作恶，他所有的善会成为一种违反天性的罪恶。如果他生来就是要伤害人类的，就像狼生来就要吞食动物一样，一个善良的人会像有怜悯心的狼一样成为劣等的生物；只有美德将会带来悔恨。

My young friend, let us look within, let us set aside all personal prejudices and see whither our inclinations lead us. Do we take more pleasure in the sight of the sufferings of others or their joys? Is it pleasanter to do a kind action or an unkind action, and which leaves the more delightful memory behind it? Why do you enjoy the theatre? Do you delight in the crimes you behold? Do you weep over the punishment which overtakes the criminal? They say we are indifferent to everything but self-interest; yet we find our consolation in our sufferings in the charms of friendship and humanity, and even in our pleasures we should be too lonely and miserable if we had no one to share them with us. If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morality in man's heart, what is the source of his rapturous admiration of noble deeds, his passionate devotion to great men? What connection is there between self-interest and this enthusiasm for virtue? Why should I choose to be Cato dying by his own hand, rather than Caesar in his triumphs? Take from our hearts this love of what is noble and you rob us of the joy of life. The mean-spirited man in whom these delicious feelings have been stifled among vile passions, who by thinking of no one but himself comes at last to love no one but himself, this man feels no raptures, his cold heart no longer throbs with joy, and his eyes no longer fill with the sweet tears of sympathy, he delights in nothing; the wretch has neither life nor feeling, he is already dead.

我年轻的朋友，让我们看看自己，让我们将一切个人的偏见放到一边，看看我们的倾向会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看到他人受苦的场景

会比看到他们幸福的场景更快乐吗？做一个善意之举还是不善之举更快乐呢，哪一种行为会留下更快乐的记忆呢？你为什么享受看戏呢？你看到犯罪时会开心吗？看到罪恶受到惩罚时你会哭泣吗？人们说除了自我的利益以外我们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但是我们却在友情和仁慈之心的关怀下，在苦难中得到安慰，甚至在我们享乐时，如果没有人可以一起分享我们的快乐，我们也会觉得太孤单和可怜的。如果人们心中没有道德，那他怎么会对英雄事迹欣喜瞻仰，对伟大人物爱慕不已呢？自我利益和这种对美德的热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要选择成为死在自己手里的加图，而非胜利的恺撒呢？剥夺了我们心中对高尚的爱，也就剥夺了我们生活的乐趣。内心美妙的情感被邪恶的欲望窒息的狭隘之人，凡事只考虑自己，因而只爱自己的人，是感觉不到任何快乐的，他冰冷的心再也无法被快乐的事打动，他的眼睛里再也不会充满因同情而带来的甜蜜泪水，他不为任何事高兴；这个可怜的人既没有什么生气，也没有任何感觉，他已经是死人了。

There are many bad men in this world, but there are few of these dead souls, alive only to self-interest, and insensible to all that is right and good. We only delight in injustice so long as it is to our own advantage; in every other case we wish the innocent to be protected. If we see some act of violence or injustice in town or country, our hearts are at once stirred to their depths by an instinctive anger and wrath, which bids us go to the help of the oppressed; but we are restrained by a stronger duty, and the law deprives us of our right to protect the innocent. On the other hand, if some deed of mercy or generosity meets our eye, what reverence and love does it inspire! Do we not say to ourselves, “I should like to have done that myself”? What does it matter to us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a man was just or unjust? and yet we take the same interest in ancient history as if it happened yesterday. What are the crimes of Cataline to me? I shall not be his victim. Why then have I the same horror of his crimes as if he were living now? We

do not hate the wicked merely because of the harm they do to ourselves, but because they are wicked. Not only do we wish to be happy ourselves, we wish others to be happy too, and if this happiness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our own happiness, it increases it. In conclusion, whether we will or not, we pity the unfortunate; when we see their suffering we suffer too. Even the most depraved are not wholly without this instinct, and it often leads them to self-contradiction. The highwayman who robs the traveller, clothes the nakedness of the poor; the fiercest murderer supports a fainting man.

世界上有许多坏人，但是已死的灵魂却很少，这些人活着只为了个人的私利，对所有正义良善的事毫无感觉。只有不公义对我们有利时，我们才为此感到开心；除此之外，我们都希望无辜的人能受到保护。如果我们在大街小巷看到一些暴力或不公正的行为发生，我们的心灵深处立即会产生直觉的愤怒，使我们帮助受压迫的人；但是我们被一种更强的责任感约束，法律剥夺了我们保护无辜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到一些仁慈大方的事，会激发出怎样的尊敬和爱心啊！我们难道不会对自己说："我也要这样做"吗？两千年以前一个人公正还是不公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我们还是对古代历史保有同样的兴趣，就像它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卡提里那的罪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会成为他的受害者。那么我为什么对他的罪行有着同样的恐惧，就像他现在还活着一般？我们不会仅仅因为坏人对我们造成的伤害而讨厌坏人，而会因为他们是坏人而讨厌他们。我们不仅希望自己快乐，也希望他人快乐，如果他们的快乐不妨碍我们自己的快乐，则增加了我们的快乐。总而言之，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会同情不幸的人；当我们看到他们受苦，我们也一样不好受。即使最坏的人也不会完全失去这种直觉，这经常会让他们的行为自相矛盾。高速公路上抢劫了行人的劫匪，也会给赤身露体的穷人衣服穿；最残暴的杀人犯也会扶起一个晕倒的人。

Men speak of the voice of remorse, the secret punishment of hidden crimes, by which such are often brought to light. Alas! who does not know its unwelcome voice? We speak from experience, and we would gladly stifle this imperious feeling which causes us such agony. Let us obey the call of nature; we shall see that her yoke is easy and that when we give heed to her voice we find a joy in the answer of a good conscience. The wicked fears and flees from her; he delights to escape from himself; his anxious eyes look around him for some object of diversion; without bitter satire and rude mockery he would always be sorrowful; the scornful laugh is his one pleasure. Not so the just man, who finds his peace within himself; there is joy not malice in his laughter, a joy which springs from his own heart; he is as cheerful alone as in company, his satisfaction does not depend on those who approach him; it includes them.

人们说悔恨之声是对隐藏的罪行默默的惩罚，通过悔恨之声，隐藏罪行常常得以揭露。唉！谁不知道这声音是令人难受的呢？我们按照经验说这种话，我们很愿意扼杀这种使我们痛苦的专横的感觉。让我们顺从自然的呼召；我们会看到她的轭是轻省的，当我们注意她的声音时，我们会发现善良的良心的回答令人喜悦。坏人害怕她，逃离她；他一快乐，就会得意忘形；他焦虑的双眼在四周寻找消遣的目标；他不挖苦人、嘲笑人就会很忧伤；他乐趣之一就是取笑他人。公义之人不是这样，他自己就是平安的源泉；他的笑声中有喜悦却没有恶意，这种喜悦从他自己的心中流淌而出；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与同伴一起，他都一样高兴，他的快乐不取决于他周围是谁；相反，他要把快乐传递给他们。

Cast your eyes over every nation of the world; peruse every volume of its history; in the midst of all these strange and cruel

forms of worship, among this amazing variety of manners and customs, you will everywhere find the same ideas of right and justice; everywhere the same principles of morality, the same ideas of good and evil. The old paganism gave birth to abominable gods who would have been punished as scoundrels here below, gods who merely offered, as a picture of supreme happiness, crimes to be committed and lust to be gratified. But in vain did vice descend from the abode of the gods armed with their sacred authority; the moral instinct refused to admit it into the heart of man. While the debaucheries of Jupiter were celebrated, the continence of Xenocrates was revered; the chaste Lucrece adored the shameless Venus; the bold Roman offered sacrifices to Fear; he invoked the god who mutilated his father, and he died without a murmur at the hand of his own father. The most unworthy gods were worshipped by the noblest men. The sacred voice of nature was stronger than the voice of the gods, and won reverence upon earth; it seemed to relegate guilt and the guilty alike to heaven.

看看世界上的每个民族；浏览它的每一卷历史；在所有奇怪残忍的敬拜形式中，在这千差万别的礼节习俗中，你会在每个地方发现相同的权利与正义的观念；每个地方都有同样的道德原则，同样的善恶观。古老的邪教产生了令人憎恶的神明，这些神明在世上可能会被当作恶棍一样受到刑罚，它们仅提供了待犯的罪行和待满足的欲望，将其作为至高幸福的图景。但是邪恶从带着神圣的权威的神的居所徒然降下；道德本能拒绝让它进入人心。当人们庆祝朱庇特的放荡时，芝诺克拉底的节制也受到人的尊敬；贞洁的卢克莱修欣赏无耻的维纳斯；大胆的罗马人向恐惧之神献祭；他祈求杀害父亲之神的保佑，却在自己父亲的手中一声不响地死去。最不配的神明受到最高尚的人的敬拜。自然的神圣之声胜过了神明们的声音，赢得了地球上世人的尊敬；它似乎把一切罪恶和罪人都一起送到了天上。

There is therefore at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 an innate principle of justice and virtue, by which, in spite of our maxims, we judge our own actions or those of others to be good or evil; and it is this principle that I call conscience.

因此在我们内心深处有公义和美德的内在原则，尽管我们有自己的准则，但我们仍会通过这一准则，判断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是善是恶；这一准则，我称之为良心。

But at this word I hear the murmurs of all the wise men so-called. Childish errors, prejudices of our upbringing, they exclaim in concert!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human mind but what it has gained by experience; and we judge everything solely by means of the ideas we have acquired. They go further; they even venture to reject the clear and universal agreement of all peoples, and to set against this striking unanimity in the judgment of mankind, they seek out some obscure exception known to themselves alone; as if the whole trend of nature were rendered null by the depravity of a single nation, and as if the existence of monstrosities made an end of species. But to what purpose does the sceptic Montaigne strive himself to unearth in some obscure corner of the world a custom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ideas of justice? To what purpose does he credit the most untrustworthy travellers, while he refuses to believe the greatest writers? A few strange and doubtful customs, based on local causes, unknown to us; shall these destroy a general inference based on the agreement of all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differing from each other in all else, but agreed in this? O Montaigne, you pride yourself on your truth and honesty; be sincere and truthful, if a philosopher can be so, and tell me if there is any country upon earth where it is a crime to keep one's plighted word, to be

merciful, helpful, and generous, where the good man is scorned, and the traitor is held in honour.

但是我听见一切所谓智慧的人针对这个词的窃窃私语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幼稚的错误，是教育的偏见！”在人类头脑中，除了通过经验得到的事物以外一无所有；我们仅仅通过已经获得的想法判断万事。他们做得太过分了；他们甚至冒险地拒绝所有人类清楚一致的意见，为了反驳这个人类一致的看法，他们暗中寻找了一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晦涩的例外；好像整个自然趋势都因为某一个民族的败坏而全然无效，好像怪物的存在使得整个人类都走向终结了。但是多疑的蒙台涅努力地探索到世界一些偏僻的角落，去发现一些与公义观点相悖的习俗，目的是什么呢？他信任最不值得信赖的旅行家，拒绝相信最伟大的作家，目的是什么呢？基于当地因素的一些奇怪的、不确定的习俗，我们是不知道的；在其他方面都与彼此不同，在这一点上一致，这就能摧毁地球上全体民族一致同意的总体看法吗？噢，蒙台涅，你对自己的真理和诚实夸口；如果一个哲学家也为人坦率，述说真理，那么老实地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信守承诺、拥有怜悯之心、乐于助人和大方，当作罪恶，在那个国家，好人受到鄙视，叛徒反倒受人尊敬？

Self-interest, so they say, induces each of us to agree for the common good. But how is it that the good man consents to this to his own hurt? Does a man go to death from self-interest? No doubt each man acts for his own good, but if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moral good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elf-interest will only enable you to account for the deeds of the wicked; possibly you will not attempt to do more. A philosophy which could find no place for good deeds would be too detestable; you would find yourself compelled either to find some mean purpose, some wicked motive, or to abuse Socrates and slander Regulus. If such doctrines ever

took root among us, the voice of nature, together with the voice of reason, would constantly protest against them, till no adherent of such teaching could plead an honest excuse for his partisanship.

所以人们说，个人利益使我们每个人都赞成公众的福利。既然如此，好人为什么要损己利人呢？一个人会因为个人利益而赴死吗？无疑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好处而行动，但是如果不考虑道德良善的话，自我利益只能让你解释坏人的行为；很有可能，你不会继续追问了。不鼓励善行的哲学会太令人厌恶；你会发现自己要么被驱使着寻找一些小气的目的、邪恶的动机，要么被驱使着污蔑苏格拉底、诋毁雷古卢斯。一旦这样的看法在我们中间生根，那么与理智的声音一起，自然的声音会不断地与他们抗争，直到没有一个这种教条的追随者能为自己的看法找到诚实的借口为止。

It is no part of my scheme to enter at present into metaphysical discussions which neither you nor I can understand, discussions which really lead nowhere. I have told you already that I do not wish to philosophise with you, but to help you to consult your own heart. If all the philosophers in the world should prove that I am wrong, and you feel that I am right, that is all I ask.

我并不打算现在进入形而上学的讨论，不论你还是我都还不能理解它，讨论也只会无疾而终。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不想与你谈论哲学，但想帮助你探寻自己的心灵。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哲学家都说我是错的，只要你觉得我是对的，我就满足了。

For this purpose it is enough to lead you to distinguish between our acquired ideas and our natural feelings; for feeling precedes

knowledge; and since we do not learn to seek what is good for us and avoid what is bad for us, but get this desire from nature, in the same way the love of good and the hatred of evil are as natural to us as our self-love. The decrees of conscience are not judgments but feelings. Although all our ideas come from without, the feelings by which they are weighed are within us, and it is by these feelings alone that we perceive fitness or unfitness of things in relation to ourselves, which leads us to seek or shun these things.

为此，教你辨别我们已经获得的观念和我们自然的情感就足够了；因为感情在知识以前；既然我们不学着寻找什么对我们是好的，避免什么对我们是坏的，而从自然中获得了这种欲望，对善的爱和对恶的恨也是同样跟我们的自爱一样对我们是很自然的。良心的法则不是判断而是感觉。尽管我们所有的观念都来自于外界，它们被衡量的感觉却在我们体内，仅仅是通过这些感觉，我们知道与我们有关的事情的利弊，从而带领我们追求或躲避它们。

To exist is to feel; our feeling is undoubtedly earlier than our intelligence, and we had feelings before we had ideas [1_20] . Whatever may be the cause of our being, it has provided for our preservation by giving us feelings suited to our nature; and no one can deny that these at least are innate. These feelings, so far as the individual is concerned, are self-love, fear, pain, the dread of death, the desire for comfort. Again, if, as it is impossible to doubt, man is by nature sociable, or at least fitted to become sociable, he can only be so by means of other innate feelings, relative to his kind; for if only physical well-being were considered, men would certainly be scattered rather than brought together. But the motive power of conscience is derived from the moral system formed through this twofold relation to himself and to his fellow-men. To know good is

not to love it; this knowledge is not innate in man; but as soon as his reason leads him to perceive it, his conscience impels him to love it; it is this feeling which is innate.

存在就是去感觉；我们的感觉无疑在我们的智慧之前，我们在有观念之前就有了感觉 [2_20] 。不管我们存在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它为了保存我们，给了我们适合我们天性的感觉；至少，没有人能否认，这些情感是天生的。就每个人而言，这些情感就是自爱、害怕、痛苦、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舒适的渴望。另外，如果，不可否认地，人天生就是合群的，或至少可以变成合群的，他只能通过与他的同类相关的其他内在的感觉变得合群；因为如果只有物质上的需要，人类一定会分散而不会集聚。但是良心的动力来自于道德系统，它通过人类和自己和与同类的双重关系而形成。知道什么是善良不等于热爱善良；这一知识也不是人天生的；但是一旦人的理智使他认识到这一点，他的良知就会驱使他爱它；这种感觉，则是天生的。

So I do not think, my young friend,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explain the immediate force of conscience as a result of our own nature, independent of reason itself. And even should it be impossible, it is unnecessary; for those who deny this principle, admitted and received by everybody else in the world, do not prove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they are content to affirm, and when we affirm its existence we have quite as good grounds as they, while we have moreover the witness within us, the voice of conscience, which speaks on its own behalf. If the first beams of judgment dazzle us and confuse the objects we behold, let us wait till our feeble sight grows clear and strong, and in the light of reason we shall soon behold these very objects as nature has already showed them to us. Or rather let us be simpler and less pretentious; let us be content with the first feelings we experience in ourselves, since

science always brings us back to these, unless it has led us astray.

所以，我年轻的朋友，我不认为把良知的力量解释为我们天性的结果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是独立于理智的。就算这是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因为一些人虽然否认这一被世界上每个人认可的原则，但不能证明它不存在；他们仅这么断言就满足了，而当我们认为它存在时，我们跟他们一样有很好的根据，况且我们还有内心的见证，即良心的声音，它还为自己辩护哩。如果判决最初的光芒就使我们眼花缭乱，看不清眼前的物品，那就让我们等到微弱的视力变得清晰强壮以后，在理智之光中，我们将很快看见这些事物，因为自然早已将它们展现给了我们。或者让我们说得更简单明了；让我们对我们经历到的最初的感觉而满足，因为，除非科学将我们引入歧途，它总能使我们恢复这些情感的。

Conscience! Conscience! Divine instinct, immortal voice from heaven; sure guide for a creature ignorant and finite indeed, yet intelligent and free; infallible judge of good and evil, making man like to God! In thee consists the excellence of man's nature and the morality of his actions; apart from thee, I find nothing in myself to raise me above the beasts—nothing but the sad privilege of wandering from one error to another, by the help of an unbridled understanding and a reason which knows no principle.

良心呀！良心！是圣洁的本能，来自天堂的不朽的声音；是无知而有限却聪明而自由的创造物确切的向导；是善恶永不犯错的审判者，使人像神一样！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行为合乎道德；没有你，我与野兽无异；没有你，在不受控制的理解和毫无原则的理智的帮助下，我只能可悲地犯完一个错误后去犯另一个错误。

Thank heaven we have now got rid of all that alarming show of philosophy; we may be men without being scholars; now that we need not spend our life in the study of morality, we have found a less costly and surer guide through this vast labyrinth of human thought. But it is not enough to be aware that there is such a guide; we must know her and follow her. If she speaks to all hearts, how is it that so few give heed to her voice? She speaks to us in the language of nature, and everything leads us to forget that tongue. Conscience is timid, she loves peace and retirement; she is startled by noise and numbers; the prejudices from which she is said to arise are her worst enemies. She flees before them or she is silent; their noisy voices drown her words, so that she cannot get a hearing; fanaticism dares to counterfeit her voice and to inspire crimes in her name. She is discouraged by ill-treatment; she no longer speaks to us, no longer answers to our call; when she has been scorned so long, it is as hard to recall her as it was to banish her.

感谢上天，我们现在摆脱了一切扰乱人心的哲学秀；我们不作博学者也能作人；现在我们不需要把时间花在学习道德上，我们已经用更低的价格在人类思维广袤的迷宫中找到了更准确的向导。但是知道有这样的向导还不够；我们必须了解她、跟随她。如果她对所有的心灵诉说，怎么会只有这么少的人注意到了她的声音呢？她用自然的语言对我们说话，而一切都使我们忘记那种语言。良心是羞怯的，她爱好和平和休憩；她被噪声和数字震惊；有人认为她来自于偏见，而偏见正是她最凶恶的敌人。她在他们面前逃跑或保持安静；他们喧闹的声音淹没了她的话，所以她无法获得听众；狂热竟敢仿冒她的声音，用她的名字犯罪。她因为受到虐待而沮丧；再也不对我们说话，再也不回答我们了；当她长期受到轻视，再召回她就如过去赶走她一样难了。

How often in the course of my inquiries have I grown weary of my own coldness of heart! How often have grief and weariness poured their poison into my first meditations and made them hateful to me! My barren heart yielded nothing but a feeble zeal and a lukewarm love of truth. I said to myself: Why should I strive to find what does not exist? Moral good is a dream, the pleasures of sense are the only real good. When once we have lost the taste for the pleasures of the soul, how hard it is to recover it! How much more difficult to acquire it if we have never possessed it! If there were any man so wretched as never to have done anything all his life long which he could remember with pleasure, and which would make him glad to have lived, that man would be incapable of self-knowledge, and for want of knowledge of goodness, of which his nature is capable, he would be constrained to remain in his wickedness and would be for ever miserable. But do you think there is any one man upon earth so depraved that he has never yielded to the temptation of well-doing? This temptation is so natural, so pleasant, that it is impossible always to resist it; and the thought of the pleasure it has once afforded is enough to recall it constantly to our memory. Unluckily it is hard at first to find satisfaction for it; we have any number of reasons for refusing to follow the inclinations of our heart; prudence, so called, restricts the heart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self; a thousand efforts are needed to break these bonds. The joy of well-doing is the prize of having done well, and we must deserve the prize before we win it. There is nothing sweeter than virtue; but we do not know this till we have tried it. Like Proteus in the fable, she first assumes a thousand terrible shapes when we would embrace her, and only shows her true self to those who refuse to let her go.

在我探索的过程中，曾多少次因我冰冷的心而感到厌倦！多少

次，悲伤和厌倦将它们的毒汁倒入我最初的冥想中，使我恨恶它们！我贫乏的心灵对真理的爱也缺乏热情。我对自己说：为什么我要努力寻找不存在的事物？道德良善是一场梦，感官的享受才是唯一真实的好处。当我们一旦失去了灵魂享受的品味能力，再次恢复它是多么困难啊！如果我们从未拥有过它，获得它又增添了多少困难！如果有任何人可怜到在他一生从未做过任何他所记得的快乐之事，使他因活过而高兴，这个人可以说是缺乏自我了解的能力；由于渴望获得有关善良的知识（这是他的天性所具备的能力），他只能留在可怜的境况中，永远地可怜下去。但你是否认为世界上有任何人会堕落到从未产生过行善的想法呢？这种想法是那么自然，那么令人愉悦，因此不可能永远阻止它；只要这种快乐的想法实现过一次，就足以让我们的记忆时常回忆起它来。不幸的是，一开始很难满足这种想望；我们有无数个理由拒绝顺应我们内心的倾向；所谓的审慎，将心灵限制在自身；要打破这些捆绑，需要成千上万的努力。善举的奖励就是行善带来的快乐，我们必须配得上这个奖励，才能赢得它。没有什么比美德更甜蜜；但是直到我们尝试了，才能知道这一点。就像寓言中的希腊海神，她首先假设了一千种我们拥抱她时的可怕形象，只有那些抱着不让她走的人才能看到真实的她。

Ever at strife between my natural feelings, which spoke of the common weal, and my reason, which spoke of self, I should have drifted through life in perpetual uncertainty, hating evil, loving good, and always at war with myself, if my heart had not received further light, if that truth which determined my opinions had not also settled my conduct, and set me at peace with myself. Reason alone is not a sufficient foundation for virtue; what solid ground can be found? Virtue we are told is love of order. But can this love prevail over my love for my own well-being, and ought it so to prevail? Let them give me clear and sufficient reason for this preference. Their so-called principle is in truth a mere playing with words; for I also say that vice is love of order, differently

understood. Wherever there is feeling and intelligence, there is some sort of moral order. The difference is this: the good man orders his life with regard to all men; the wicked orders it for self alone. The latter centres all things round himself; the other measures his radius and remains on the circumference. Thus his place depends on the common centre, which is God, and on all the concentric circles which are His creatures. If there is no God, the wicked is right and the good man is nothing but a fool.

我那为公众福祉说话的自然感觉曾和我那为自己说话的理智发生过斗争，如果我的心没有接收到更远处的光，如果那决定了我的想法的真理没有决定我的行为，并让我获得内心的平静，我本应在永恒不确定的人生中漂泊，恨恶罪恶，爱好良善，经常与自己抗争。仅有理智不足以作为美德的根基；能找到什么坚硬的土地呢？我们所知的美德就是热爱秩序。但是这种爱能不能又应不应该超越我对自己幸福之爱呢？让他们给我宁愿这么做的清晰且充足的理由。他们所谓的真理的原则仅仅是文字的游戏；因为我也说，罪恶也是对秩序的爱，只不过对秩序的理解不同罢了。有感觉和智慧的任何地方，都有某种道德秩序。区别在于：好人将众人放置在自己之前；坏人心里只有自己。后者将自己作为万事的中心；好人则衡量自己的半径，守着自己的圆周。因此他的位置取决于公众的中心——神，以及所有的同心圆——他的创造物。如果没有神，则坏人得道，好人不过是傻瓜而已。

My child! May you one day feel what a burden is removed when, having fathomed the vanity of human thoughts and tasted the bitterness of passion, you find at length near at hand the path of wisdom, the prize of this life's labours, the source of that happiness which you despaired of. Every duty of natural law, which man's injustice had almost effaced from my heart, is engraven there, for the second time in the name of that eternal justice which lays these

duties upon me and beholds my fulfilment of them. I feel myself merely the instrument of the Omnipotent, who wills what is good, who performs it, who will bring about my own good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of my will with his own, and by the right use of my liberty. I acquiesce in the order he establishes, certain that one day I shall enjoy that order and find my happiness in it; for what sweeter joy is there than this, to feel oneself a part of a system where all is good? A prey to pain, I bear it in patience, remembering that it will soon be over, and that it results from a body which is not mine. If I do a good deed in secret, I know that it is seen, and my conduct in this life is a pledge of the life to come. When I suffer injustice, I say to myself, the Almighty who does all things well will reward me: my bodily needs, my poverty, make the idea of death less intolerable. There will be all the fewer bonds to be broken when my hour comes.

我的孩子！当你理解了人类思想的空虚，品尝了欲望的苦味，你终于在附近发现了智慧之路，发现了这一生劳碌的奖赏，发现了你对其已经绝望的幸福的来源，你发现自己那时卸下了多大一个负担啊！自然法律的每一个义务，在我心中几乎都被人类的不公义抹去了，又再一次在那永恒的公义之名下刻在我的心里，它将这些责任放在我身上，看着我实现它们。我觉得自己仅仅是全能者的工具，全能者想要美好的事物，又实现它，通过我和他的意志的合作以及我的自由的正确运用，带来我的幸福。我默许他所建立的秩序，并确信某一天，我将享受那种秩序，并在其中找到我的幸福；因为除了感觉自己是全然幸福的体系的一部分以外，还有什么幸福比这更甜蜜呢？我受到痛苦的折磨，想到它很快会结束，并来自一个我身外的物体，便耐心地忍受它。如果我悄悄地做了一件好事，我知道也是有人看见的，我今生的行为是我来生的保证。当我因不公义而受苦时，我告诉自己，什么都做得好的全能的上帝会奖赏我的：我身体的需要、我的贫穷，使得死亡的想法没有那么难以忍受。当我大限将至时，要挣脱的束缚会少

一些。

Why is my soul subjected to my senses, and imprisoned in this body by which it is enslaved and thwarted? I know not; have I entered into the counsels of the Almighty? But I may, without rashness, venture on a modest conjecture. I say to myself: If man's soul had remained in a state of freedom and innocence, what merit would there have been in loving and obeying the order he found established, an order which it would not have been to his advantage to disturb? He would be happy, no doubt, but his happiness would not attain to the highest point, the pride of virtue, and the witness of a good conscience within him; he would be but as the angels are, and no doubt the good man will be more than they. Bound to a mortal body, by bonds as strange as they are powerful, his car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is body tempts the soul to think only of self, and gives it an interest opposed to the general order of things, which it is still capable of knowing and loving; then it is that the right use of his freedom becomes at once the merit and the reward; then it is that it prepares for itself unending happiness, by resisting its earthly passions and following its original direction.

为什么我的灵魂受制于我的感觉，监禁在我的身体中，受到它的奴隶和打击呢？我不知道；我是否听从了上帝的劝告呢？但是我可以不鲁莽地，冒险做一个谦虚的推测。我对自己说：如果人的灵魂停留在自由和单纯的状态中，他发现扰乱已经建立的秩序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那么热爱并遵循这个秩序，他能得到什么奖赏呢？无疑，他会很快乐，但是他的幸福不会到达最高点，而且缺乏美德的光辉和美好良心的见证；他会像天使一样，无疑一个好人是会比天使好得多的。被既奇怪又有力的锁链捆绑在一个必死的身体上，想保存这个身体的想法使得他的灵魂仅仅为自己着想，并给了它不同于事物总体秩序的

兴趣，而仍然能了解和热爱事物；因此，正确使用他的自由立即成为了他的奖赏和回报；通过拒绝它属世的欲望、跟随它最初的方向，它得以为自己准备好无止境的幸福。

If even in the lowly position in which we are placed during our present life our first impulses are always good, if all our vices are of our own making, why should we complain that they are our masters? Why should we blame the Creator for the ills we have ourselves created, and the enemies we ourselves have armed against us? Oh, let us leave man unspoilt; he will always find it easy to be good and he will always be happy without remorse. The guilty, who assert that they are driven to crime, are liars as well as evil-doers; how is it that they fail to perceive that the weakness they bewail is of their own making; that their earliest depravity was the result of their own will; that by dint of wishing to yield to temptations, they at length yield to them whether they will or no and make them irresistible? No doubt they can no longer avoid being weak and wicked, but they need not have become weak and wicked. Oh, how easy would it be to preserve control of ourselves and of our passions, even in this life, if with habits still unformed, with a mind beginning to expand, we were able to keep to such things as we ought to know, in order to value rightly what is unknown; if we really wished to learn, not that we might shine before the eyes of others, but that we might be wise and good in accordance with our nature, that we might be happy in the performance of our duty. This study seems tedious and painful to us, for we do not attempt it till we are already corrupted by vice and enslaved by our passions. Our judgments and our standards of worth are determined before we have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and then we measure all things by this false standard, and give nothing its true worth.

即使在今生，我们被放置在很低的地位上，我们最初的倾向也总是善良的，如果我们一切的恶行都是自己导致的，我们为什么要抱怨我们受到了它们的折磨呢？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造成的痛苦和我们自己武装的敌人谴责上帝呢？噢，让我们保持他天然的样子；他将很容易行善，也总是能感到快乐而毫不后悔。那些声称被迫使犯罪的有罪之人，不仅撒了谎，还作了恶；他们为何不明白自己所悲叹的弱点是自己导致的、他们最初的堕落来源于他们自己的意志；因为希望屈服于试探，他们最终不管愿不愿意都会屈服，最终想抵抗也抵抗不了呢？毫无疑问，他们再也不能避免成为坏人和意志薄弱的人了，但是他们本不需要成为这样的人。噢，如果习惯尚未形成，精神刚刚开始活跃，我们为了正确衡量未知的事物而了解我们应该知道的事物；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学习，不是为了在他人眼前炫耀，而是为了变得聪明、使我们与我们的天性一样良善、为了在履行我们职责的过程中能够快乐，那么即使在今生今世，要控制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欲望会是多么容易啊！这种研究看上去对我们而言冗长而痛苦，因为我们在已经被罪恶腐蚀、被欲望控制之前并不渴望它。我们的判断和对价值的标准在我们有了善恶的知识之前就决定了，于是我们用这个错误的标准衡量一切事物，而不给任何事物正确的评价。

There is an age when the heart is still free, but eager, unquiet, greedy of a happiness which is still unknown, a happiness which it seeks in curiosity and doubt; deceived by the senses it settles at length upon the empty show of happiness and thinks it has found it where it is not. In my own case these illusions endured for a long time. Alas! too late did I become aware of them, and I have not succeeded in overcoming them altogether; they will last as long as this mortal body from which they arise. If they lead me astray, I am at least no longer deceived by them; I know them for what they are, and even when I give way to them, I despise myself; far from regarding them as the goal of my happiness, I behold in them an obstacle to it. I long for the time when, freed from the fetters of the

body, I shall be myself, at one with myself, no longer torn in two, when I myself shall suffice for my own happiness. Meanwhile I am happy even in this life, for I make small account of all its evils, in which I regard myself as having little or no part, while all the real good that I can get out of this life depends on myself alone.

有这样一个年纪，在这个年纪心灵仍是自由的，但是渴望着、焦急着、贪求着还未知的幸福，好奇又怀疑地寻求这这种幸福；由于受到感官的欺骗，它最终在幸福的幻象中认为自己找到了幸福。在我看来，这些幻象能持续很长时间。唉！我意识到它们时已经太迟了，已经无法成功将它们克服了；只要幻象存在的这必死之躯还活着，它们就会活着。如果它们将我引向歧途，至少我不会再受他们的欺骗；我已经知道了它们是什么，就算我对它们让步，我也会鄙视我自己；我不仅不会将它们看做我幸福的目标，而且会将它们视为幸福的障碍。我渴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这时候我从身体的枷锁中解脱，我将成为我自己，不分裂的自己，不再被撕为两半；我只靠自己就能获得幸福。同时，即使在今世，我也很快乐，因为我觉得所有邪恶都不足挂齿，在这一生中，我几乎已经不存在了；这时我能获得的一切好处都只取决于我自己。

To raise myself so far as may be even now to this state of happiness, strength, and freedom, I exercise myself in lofty contemplation. I consider the order of the universe, not to explain it by any futile system, but to revere it without ceasing, to adore the wise Author who reveals himself in it. I hold intercourse with him; I immerse all my powers in his divine essence; I am overwhelmed by his kindness, I bless him and his gifts, but I do not pray to him. What should I ask of him—to change the order of nature, to work miracles on my behalf? Should I, who am bound to love above all things the order which he has established in his wisdom and

maintained by his providence, should I desire the disturbance of that order on my own account? No, that rash prayer would deserve to be punished rather than to be granted. Neither do I ask of him the power to do right; why should I ask what he has given me already? Has he not given me conscience that I may love the right, reason that I may perceive it, and freedom that I may choose it? If I do evil, I have no excuse; I do it of my own free will; to ask him to change my will is to ask him to do what he asks of me; it is to want him to do the work while I get the wages; to be dissatisfied with my lot is to wish to be no longer a man, to wish to be other than what I am, to wish for disorder and evil. Thou source of justice and truth, merciful and gracious God, in thee do I trust, and the desire of my heart is—Thy will be done. When I unite my will with thine, I do what thou doest; I have a share in thy goodness; I believe that I enjoy beforehand the supreme happiness which is the reward of goodness.

为了使我能尽快成为这种幸福、坚强和自由的人，我在庄严的沉思中磨练我自己。我思考宇宙的秩序，不是为了用任何无用的系统学说解释它，而是为了一刻不停地尊崇它、敬仰那在宇宙中彰显他自己的智慧的创造者。我与他交谈；我将自己一切的能力沉浸在他神圣的本质中；我为他的良善倾倒，感谢他和他赐的礼物，但是我不向他祈祷。我应该向他祈求什么呢？——改变自然的秩序，为我行神迹吗？我，应该热爱他用智慧建立、用他的远见维持的秩序超过爱其他一切的东西，难道还希望他为了我而扰乱这一秩序吗？不，那种冒失的祈祷应该受到惩罚而非得到应许。我也不再向他祈求行善的能力；我为什么要向他请求他已经赋予我的东西呢？他难道没有赐我良心以使我热爱善，赐我理智以使我能认识善，赐我自由以使我能选择善么？如果我作恶，我没有借口；我用我的自由意志作了恶；请求他改变我的意志就是请求他做他要求我做的事；这就是让他去做事，而让我拿工资；对我的命运不满就是希望不再成为人，希望成为其他人而非自

己，希望无序和邪恶的到来。你，公义和真理之源，仁慈而善良的神啊，我相信你，我心所渴望的便是——你的意志得到实现。当我把我与你的意志联合起来时，我做你所做的事；在你的良善中我也有份；我相信，我预先享受了良善的回报，那至高的幸福。

In my well-founded self-distrust the only thing that I ask of God, or rather expect from his justice, is to correct my error if I go astray, if that error is dangerous to me. To be honest I need not think myself infallible; my opinions, which seem to me true, may be so many lies; for what man is there who does not cling to his own beliefs; and how many men are agreed in everything? The illusion which deceives me may indeed have its source in myself, but it is God alone who can remove it. I have done all I can to attain to truth; but its source is beyond my reach; is it my fault if my strength fails me and I can go no further; it is for Truth to draw near to me.

在我有理有据的对自己的怀疑中，我对上帝祈求的唯一一件事，更确切地说，我等待他公义审判的，就是如果我走入歧途，犯下了对我来说很危险的错误，那就纠正我的错误。诚实地讲，我不需要认为自己是不会犯错的；我的意见，我以为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许多的谎言；因为有谁会不坚守自己的信仰呢；有多少人样样都对呢？那欺骗我的幻象也可能确实地来源于我自己，但是只有神能消除它。为了获得真理，我已经尽我所能了；但是它的来源还是我无法企及的；如果我的力量不够，我不能走得更远，这是我的错；这时，真理应当走到我的身边了。

The good priest had spoken with passion; he and I were overcome with emotion. It seemed to me as if I were listening to the

divine Orpheus when he sang the earliest hymns and taught men the worship of the gods. I saw any number of objections which might be raised; yet I raised none, for I perceived that they were more perplexing than serious, and that my inclination took his part. When he spoke to me according to his conscience, my own seemed to confirm what he said.

善良的牧师满有激情地讲完了；他和我都被情绪所感染。我好像听到了神圣的俄耳甫斯唱最早的赞歌、教导人对神的敬拜。我有许多可以提出的相反意见；但是我一个也没有提出来，因为我认为这些问题并非不够严肃，而是令人困惑，而且我内心的倾向是赞同他的。当他根据自己的良心对我说话时，我的良心似乎在认同他说过的话。

“The novelty of the sentiments you have made known to me,” said I, “strikes me all the more because of what you confess you do not know, than because of what you say you believe. They seem to be very like that theism or natural religion, which Christians profess to confound with atheism or irreligion which is their exact opposite. But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my faith I should have to ascend rather than descend to accept your views, and I find it difficult to remain just where you are unless I were as wise as you. That I may be at least as honest, I want time to take counsel with myself. By your own showing, the inner voice must be my guide, and you have yourself told me that when it has long been silenced it cannot be recalled in a moment. I take what you have said to heart, and I must consider it. If after I have thought things out, I am as convinced as you are, you will be my final teacher, and I will be your disciple till death. Continue your teaching however; you have only told me half what I must know. Speak to me of reve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of those difficult doctrines among which I have

strayed ever since I was a child, incapable either of understanding or believing them, unable to adopt or reject them.”

“你刚刚对我说的这些感觉之所以新奇，”我说道，“是因为它们让你承认你所不知道的，而非道出你所相信的，这一点更令我触动。它们非常像一神论或自然信仰，基督徒则将其与无神论或不信教的观点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截然相反。但是就我目前的信仰状况，要接受你的观点，我必须提高而不是降低，而且我发现要留在你曾在的地方很难，除非我与你一样聪明。让自己至少是诚实的，我希望有时间探寻我自己的内心。通过你的事例，我的向导必须是我内在的声音，你也曾告诉过我，当它长期受到禁言，一时间是很难将它召回的。我将你说过的话牢记在心，我必须思考一番。如果我在想明白以后，跟你一样深信不疑的话，你就是我最后的老师，我将终身都做你的门徒。无论如何，继续你的教育吧；你只讲了一半我必须知道的哩。向我讲讲启示，讲讲《圣经》，讲讲我从小就不解的艰深的道理，这些道理，我既不理解也不相信，因此无法接受或拒绝它们。”

“Yes, my child,” said he, embracing me, “I will tell you all I think; I will not open my heart to you by halves; but the desire you express was necessary before I could cast aside all reserve. So far I have told you nothing but what I thought would be of service to you, nothing but what I was quite convinced of. The inquiry which remains to be made is very difficult. It seems to me full of perplexity, mystery, and darkness; I bring to it only doubt and distrust. I make up my mind with trembling, and I tell you my doubts rather than my convictions. If your own opinions were more settled I should hesitate to show you mine; but in your present condition, to think like me would be gain [1_21] . Moreover, give to my words only the authority of reason; I know not whether I am mistaken. It is difficult in discussion to avoid assuming sometimes a

dogmatic tone; but remember in this respect that all my assertions are but reasons to doubt me. Seek truth for yourself, for my own part I only promise you sincerity.

“好的，我的孩子。”他一边抱住我一边说，“我会告诉你我全部的想法；我不会向你敞开一半的心；但是要我毫不保留，你表达的欲望是十分必要的。到目前为止，我只讲了我认为对你有用的东西，只讲了我自己十分相信的东西。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它充满了困惑、神秘和黑暗；我对它只有怀疑和不信任。我颤抖着理清我的思路，我会告诉你我的疑惑而非我所确信的事物。如果你自己的观点更坚定，我会犹豫要不要将我的观点告诉你；但是就你现在的情况，像我一样思考会给你带来好处 [2_21] 。而且，对于我所说的话只要根据理性判断；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错了。在讨论时避免带有一些断然的语气是很难的；但是这方面请记住，我所有的断言都是怀疑我的理由。为你自己寻找真理；就我而言，我只向你保证我对你一片赤诚。

“In my exposition you find nothing but natural religion; strange that we should need more! How shall I become aware of this need? What guilt can be mine so long as I serve God according to the knowledge he has given to my mind, and the feelings he has put into my heart? What purity of morals, what dogma useful to man and worthy of its author, can I derive from a positive doctrine which cannot be derived without the aid of this doctrine by the right use of my faculties? Show me what you can add to the duties of the natural law, for the glory of God, for the good of mankind, and for my own welfare; and what virtue you will get from the new form of religion which does not result from mine. The grandest ideas of the Divine nature come to us from reason only. Behold the spectacle of nature; listen to the inner voice. Has not God spoken it

all to our eyes, to our conscience, to our reason? What more can man tell us? Their revelations do but degrade God, by investing him with passions like our own. Far from throwing light upon the ideas of the Supreme Being, special doctrines seem to me to confuse these ideas; far from ennobling them, they degrade them; to the inconceivable mysteries which surround the Almighty, they add absurd contradictions, they make man proud, intolerant, and cruel; instead of bringing peace upon earth, they bring fire and sword. I ask myself what is the use of it all, and I find no answer. I see nothing but the crimes of men and the misery of mankind.

你觉得我所讲述的只是自然信仰；我们需要更多信仰，还真是奇怪！我如何能看出这种需要呢？既然我按照上帝赋予我的知识和放进我心灵的感觉敬拜上帝，我能有什么过错呢？我能从积极的教义中得出什么道德的纯洁、什么对人有用且配得上它作者的教义呢？不正确使用我的官能、没有这条教义的帮助的话，是无法得出这些的。告诉我，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我自己的福祉，你能给自然法添加什么责任；你能从不是由我而来的新型信仰中得出什么美德。对于神圣的本性最崇高的观念仅仅来自我们的理智。看看自然的景象；听听内心的声音。上帝难道没有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良心、对我们的理智诉说过这一切吗？人们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的启示贬低了上帝，因为他们认为上帝的欲念如同我们的欲念。特别的教义不仅没有让我们理解至高的存在，反而让我们对这些想法感到困惑；不仅没有使它们高贵，反而使它们受到贬损；不仅给全能者周围加上了无法理解的神秘故事，还杜撰了荒谬的悖论，使人骄傲、缺乏耐心、变得残忍；不仅没有给地球带来和平，反而带来了火焰和刀剑。我问自己，这一切有什么用处，却找不到答案。除了人类的罪行和痛苦，我什么也看不见。

“They tell me a revelation was required to teach men how God

would be served; as a proof of this they point to the many strange rites which men have instituted, and they do not perceive that this very diversity springs from the fanciful nature of the revelations. As soon as the nations took to making God speak, every one made him speak in his own fashion, and made him say what he himself wanted. Had they listened only to what God says in the heart of man, there would have been but one religion upon earth.

“他们告诉我，教导人应如何敬拜上帝需要启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形成了许多奇怪的敬拜仪式，并没有发现这千奇百怪的敬拜仪式正是来源于启示的玄幻特性。只要各民族的人想要使上帝说话，每个人就按照自己的想法使上帝说话，让上帝说他自己想要的话。如果他们只听从上帝对人心说的话，世界上就只会有一种宗教了。

“One form of worship was required; just so, but was this a matter of such importance as to require all the power of the Godhead to establish it? Do not let us confuse the outward forms of religion with religion itself. The service God requires is of the heart; and when the heart is sincere that is ever the same. It is a strange sort of conceit which fancies that God takes such an interest in the shape of the priest's vestments, the form of words he utters, the gestures he makes before the altar and all his genuflections. Oh, my friend, stand upright, you will still be too near the earth. God desires to be worshipped in spirit and in truth; this duty belongs to every religion, every country, every individual. As to the form of worship, if order demands uniformity, that is only a matter of discipline and needs no revelation.

“敬拜需要统一的形式；确实如此，但这件事是否重要到需要上

帝一切的力量去建立呢？我们不要将信仰的外在形式与其本身弄混了。上帝所要的敬拜是心灵的敬拜；当心灵是诚实的，敬拜就是一致的了。上帝对牧师穿上圣服的身材、他话语的措辞、他在祭坛前所作的动作和他屈膝的各种模样都如此感兴趣的想象，是多么奇怪的空想啊！噢，我的朋友，站直了，你还是离地球太近。上帝希望受到灵和真理的敬拜；这种责任属于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至于敬拜的形式，如果秩序要求一致的话，也只是纪律的问题，不需要启示。

“These thoughts did not come to me to begin with. Carried away by the prejudices of my education, and by that dangerous vanity which always strives to lift man out of his proper sphere, when I could not raise my feeble thoughts up to the great Being, I tried to bring him down to my own level. I tried to reduce the distance he has placed between his nature and mine. I desired more immediate relations, more individual instruction; not content to make God in the image of man that I might be favoured above my fellows, I desired supernatural knowledge; I required a special form of worship; I wanted God to tell me what he had not told others, or what others had not understood like myself.

“我并不是从这些问题开始思考的。我被教育的偏见带走，被常常努力将人抬出适合他的领域的危险的虚荣心迷惑，当我无法使自己微弱的思想上达那伟大的存在时，我试着使他下降到我的水平。我努力减少他在他的本性和我的本性之间摆设的距离。我渴望更多亲密的联系，更多个人的指导；我不满足于将上帝想象成人的样子，从而能使我比同胞得到更多的喜爱，我渴望超自然的知识；我需要特殊形式的敬拜；我想要上帝告诉我他没有告诉他人的事，或者他人不像我一样了解的事。

“Considering the point I had now reached as the common centre from which all believers set out on the quest for a more enlightened form of religion, I merely found in natural religion the elements of all religion. I beheld the multitude of diverse sects which hold sway upon earth, each of which accuses the other of falsehood and error; which of these, I asked, is the right? Every one replied, 'My own;' every one said, 'I alone and those who agree with me think rightly, all the others are mistaken. ' And how do you know that your sect is in the right? Because God said so. And how do you know God said so? [1_22] And who told you that God said it? My pastor, who knows all about it. My pastor tells me what to believe and I believe it; he assures me that any one who says anything else is mistaken, and I give not heed to them.

“因为把我已经得出的论点作为所有信徒开始寻求更清楚的信仰的出发点，我仅仅在自然信仰中发现了所有信仰都具备的元素。我看到许多不同的教派在地球上发挥影响，每一个教派都批评其他教派的错误；我问道，它们中的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每个教派都回答：‘我的。只有我和那些认同我的教派的想法是正确的，其他所有教派都犯错了。’那你又是怎么知道你的教派是正确的呢？因为上帝这么说过。你怎么知道上帝如此说过 [2_22] ？谁告诉你上帝这么说过？我的牧师，他知道得很清楚。我的牧师告诉我信仰什么，我就信仰什么；他向我保证，所有跟他说法不同的人都是错误的，我就没有注意他们的话。

“What! thought I, is not truth one; can that which is true for me be false for you? If those who follow the right path and those who go astray have the same method, what merit or what blame can be assigned to one more than to the other? Their choice is the result of chance; it is unjust to hold them responsible for it, to

reward or punish them for being born in one country or another. To dare to say that God judges us in this manner is an outrage on his justice.

“什么！我想道，真理难道不是一个吗；对我而言是真的的事，难道对你而言就是假的吗？如果那些行在正确道路上的人和那些走入歧途的人有同样的方法，那么谁应该获得的功劳或承受的过错更多呢？他们的选择是偶然导致的；让他们为此负责，因为他们出生在这个或那个国家而奖励或惩罚他们，是不公平的。谁敢说上帝是这样审判我们的，谁就在侮辱他的公正。

“Either all religions are good and pleasing to God, or if there is one which he prescribes for men, if they will be punished for despising it, he will have distinguished it by plain and certain signs by which it can be known as the only true religion; these signs are alike in every time and place, equally plain to all men, great or small, learned or unlearned, Europeans, Indians, Africans, savages. If there were but one religion upon earth, and if all beyond its pale were condemned to eternal punishment, and if there were in any corner of the world one single honest man who was not convinced by this evidence, the God of that religion would be the most unjust and cruel of tyrants.

要么所有的宗教对于上帝而言都是好的、他喜欢的，要么他预先给人类选定了一个宗教，如果人们不相信这个宗教则会受到惩罚，上帝会通过直白而确切的标志将这个宗教分别出来，使人们知道这是唯一真实的宗教；这些标志在每一个时间和地点都是一样的，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直白，不管这个人是老人还是孩子，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是欧洲人、印度人、非洲人还是野蛮人。如果世上有且

只有一个宗教，不信仰他的人会受到无尽的惩罚，如果在世界的任何角落，一个诚实的人没有被这样的证据说服，那个宗教的神则是所有暴君中最不公正、最残忍的一个。

“Let us therefore seek honestly after truth; let us yield nothing to the claims of birth, to the authority of parents and pastors, but let us summon to the bar of conscience and of reason all that they have taught us from our childhood. In vain do they exclaim, 'Submit your reason;' a deceiver might say as much; I must have reasons for submitting my reason.

“因此让我们诚心地寻求真理吧；让我们不要让一个人因出身或父母和牧师的权威而得到任何权利；让我们将他们从小教导我们的一切交付良心和理智的检验。他们叫喊：‘丢掉你的理智’也是徒劳的；一个骗子也会说这样的话；要我丢掉自己的理智，一定要告诉我理由。

“All the theology I can get for myself by observation of the universe and by the use of my faculties is contained in what I have already told you. To know more one must have recourse to strange means. These means cannot be the authority of men, for every man is of the same species as myself, and all that a man knows by nature I am capable of knowing, and another may be deceived as much as I; when I believe what he says, it is not because he says it but because he proves its truth. The witness of man is therefore nothing more than the witness of my own reason, and it adds nothing to the natural means which God has given me for the knowledge of truth.

“通过对宇宙的观察和对我官能的使用，我所能获得的一切神学都已经包含在我告诉你的话里了。要想知道得更多，你必须要借助于特殊的手段。这些手段不能是人的权威，因为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是人，所有人通过自然能知道的我也能知道，别人也可能跟我一样被欺骗；当我相信他所说的，并不是因为是他说了这些，而是因为他证明了这些是真实的。因此，人的见证也就是我自己理智的见证，它也没有增添任何上帝已经为真理的知识赋予我的那些自然的手段。

“Apostle of truth, what have you to tell me of which I am not the sole judge? God himself has spoken; give heed to his revelation. That is another matter. God has spoken, these are indeed words which demand attention. To whom has he spoken? He has spoken to men. Why then have I heard nothing? He has instructed others to make known his words to you. I understand; it is men who come and tell me what God has said. I would rather have heard the words of God himself; it would have been as easy for him and I should have been secure from fraud. He protects you from fraud by showing that his envoys come from him. How does he show this? By miracles. Where are these miracles? In the books. And who wrote the books? Men. And who saw the miracles? The men who bear witness to them. What! Nothing but human testimony! Nothing but men who tell me what others told them! How many men between God and me! Let us see, however, let us examine, compare, and verify. Oh! if God had but deigned to free me from all this labour, I would have served him with all my heart.

真理的试图，我不能肚子判断的事那些是必须由你来告诉我的？上帝自己已经说过了；请听他的启示。这是另外一件事。上帝已经说过了，这句话的确需要注意力才能听懂。上帝对谁说过了？他对世人说过了。那为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见呢？他已经指导别人讲自己的话告

诉你了。我懂了；是人们来告诉我上帝说了什么。我宁愿听到上帝亲口说的话；这对他而言很容易，也能避免我受到欺骗。他保护你不受欺骗，通过显明他的使者是从他而来。他如何显明这一点呢？通过神迹。这些神迹发生在哪里呢？在书里。谁作的书？人。谁看到了这些神迹？给神迹作见证的人。什么！只有人在作证！只有人告诉我其他人告诉他们的话！上帝和我之间，有多少人啊！那么，让我们看看，让我们观察、比较、察验好了。噢！如果上帝赐予我省去这些劳力的自由的话，我会用全心敬拜他的。

“Consider, my friend, the terrible controversy in which I am now engaged; what vast learning is required to go back to the remotest antiquity, to examine, weigh, confront prophecies, revelations, facts, all the monuments of faith set forth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assign their date, place, authorship, and occasion. What exactness of critical judgment is needed to distinguish genuine documents from forgeries, to compare objections with their answers, translations with their originals; to decide as to the impartiality of witnesses, their common-sense, their knowledge; to make sure that nothing has been omitted, nothing added, nothing transposed, altered, or falsified; to point out any remaining contradictions, to determine what weight should be given to the silence of our adversaries with regard to the charges brought against them; how far were they aware of those charges; did they think them sufficiently serious to require an answer; were books sufficiently well known for our books to reach them; have we been honest enough to allow their books to circulate among ourselves and to leave their strongest objections unaltered?

“我的朋友，想一想，我现在陷入了多么可怕的问题；需要有多广博的学识才能追溯到最遥远的古代，才能去考察、衡量、对证一切

预言、启示、事实，以及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所有宣告信仰的铸错，才能确定它们的时间、地点、作者和因由。要有多么准确地批判力，才能从伪造的文献中辨别出真实的文献，将反驳和对它们的回答、译文和它们的原文进行比较；才能判断见证者是否公正，是否具有常识和知识；才能确定没有增删、调换、改变或伪造；才能指出任何存留的矛盾，决定对对手的指控，应该如何看待他们的沉默；才能知道他们对这些指控了解多少，是否对要求得到答案足够严肃；才能了解我们的书足够著名以被他们阅读；我们是否足够真诚地允许他们的书在我们中间流通，将他们最强烈的反对意见保留不变？

“When the authenticity of all these documents is accepted, we must now pass to the evidence of their authors' mission; we must know the laws of chance, and probability, to decide which prophecy cannot be fulfilled without a miracle; we must know the spirit of the original language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prophecy and figures of speech; we must know what fact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 and what facts are not, so that we may say how far a clever man may deceive the eyes of the simple and may even astonish the learned; we must discover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prodigy and how its authenticity may be established, not only so far as to gain credence, but so that doubt may be deserving of punishment; we must compare the evidence for true and false miracles, and find sure test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m; lastly we must say why God chose as a witness to his words means which themselves require so much evidence on their behalf, as if he were playing with human credulity, and avoiding of set purpose the true means of persuasion.

“当大家接受了所有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我们现在就需要证实作者也肩负使命；我们必须知道因果的法则和可能性，才能决定预言是否不通过神迹就无法实现；我们必须了解源语言的精神，才能辨别预

言与辞令；我们必须知道什么事实是符合自然的，什么事实不符，才能了解一个聪明人能将单纯的人骗到什么地步、让受过教育的人惊讶到什么地步；我们必须发现神童所具有的特征以及它的权威是如何建立的，不仅是为了让人相信，而且让怀疑它的人配受惩罚；我们必须比较真神迹和假神迹的证据，找出能准确辨别二者的试验；最后，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上帝好像在玩弄人类的容易受骗心里，故意避免采取真正具有说服力的手段，才选择那些本身就需要足够证据证明自己的人作为他话语的见证人。

“Assuming that the divine majesty condescends so far as to make a man the channel of his sacred will, is it reasonable, is it fair, to demand that the whole of mankind should obey the voice of this minister without making him known as such? Is it just to give him as his sole credentials certain private signs, performed in the presence of a few obscure persons, signs which everybody else can only know by hearsay? If one were to believe all the miracles that the uneducated and credulous profess to have seen in every country upon earth, every sect would be in the right; there would be more miracles than ordinary events; and it would be the greatest miracle if there were no miracles wherever there were persecuted fanatics. The unchangeable order of nature is the chief witness to the wise hand that guides it; if there were many exceptions, I should hardly know what to think; for my own part I have too great a faith in God to believe in so many miracles which are so little worthy of him.

“假设至高者如此谦卑，以至于需要一个人作为他神圣意志的传播媒介，不让人们知道他成为了中介，就要求全人类听从这个中介的话，这样做是否合理，是否公平？在几个浑浑噩噩的人面前展现某些特殊的信号，这些信号其他每个人只能通过传闻得知，把这些信号作为他唯一的信任状，是否公平？如果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没有受过教

育的人和容易受到欺骗的人都说自己看到了神迹，并且人们信以为真，那么每个教派都是正确的教派；神迹的数目会比日常的事件还多；有被迫害的盲信徒的地方没有任何神迹会成为最大的神迹。自然无法改变的秩序是指引智者之手的见证者；如果有许多例外的话，我就不知道该如何思考了；就我而言，我太相信上帝了，以至于相信如此多不配他的神迹，我是做不到的。

“Let a man come and say to us: Mortals, I proclaim to you the will of the Most Highest; accept my words as those of him who has sent me; I bid the sun to change his course, the stars to range themselves in a fresh order, the high places to become smooth, the floods to rise up, the earth to change her face. By these miracles who will not recognise the master of nature? She does not obey impostors, their miracles are wrought in holes and corners, in deserts, within closed doors, where they find easy dupes among a small company of spectators already disposed to believe them. Who will venture to tell me how many eye-witnesses are required to make a miracle credible! What use are your miracles, performed if proof of your doctrine, if they themselves require so much proof! You might as well have let them alone.

“假设有一个人来对我们说：凡人啊，我向你宣告至高者的意志；接受我的话，因为它们是那派遣我来的上帝说的；我命令太阳改变它的轨道，命令星星重新安排自己的位置，命令高处变平，命令洪水上升，命令地球改头换面。通过这些奇迹，谁还会认不出自然的主宰呢？自然不会听从骗子的话，他们的奇迹是在洞里、角落里、沙漠中、密室中编造出来的，在这些地方，他们在一小群观众中能轻松找到已经倾向于相信他们的轻信者了。谁敢告诉我，要使一个奇迹令人信服，需要多少的亲眼见证者？你的奇迹既然是为了证明你的教义而表演出来，如果它们本身就需要如此多的证明，那他们又有什么用

呢！你最好还是别展示奇迹了。

“There still remains the most important inquiry of all with regard to the doctrine proclaimed; for since those who tell us God works miracles in this world, profess that the devil sometimes imitates them, when we have found the best attested miracles we have got very little further; and since the magicians of Pharaoh dared in the presence of Moses to counterfeit the very signs he wrought at God's command, why should they not, behind his back, claim a like authority? So when we have proved our doctrine by means of miracles, we must prove our miracles by means of doctrine [1_23] , for fear lest we should take the devil's doings for the handiwork of God. What think you of this dilemma?

“对宣讲的教义仍需要进行最严苛的考察；因为既然有人说有时候魔鬼会模仿上帝在世界上所行的奇迹，那么，即便发现了经过很好验证的奇迹，较之前我们也很少有进步；既然法老的巫师敢在摩西在场时模仿他在上帝要求下准备的每个奇迹，他们为什么不敢在他不在的时候说他们具有同样的权威呢？所以当我们通过神迹证明了我们的教义时，必须通过教义证明我们的神迹 [2_23] ，以防我们将魔鬼的作为当作了上帝的奇迹。你怎么看这个进退两难的困境？

“This doctrine, if it comes from God, should bear the sacred stamp of the godhead; not only should it illumine the troubled thoughts which reason imprints on our minds, but it should also offer us a form of worship, a morality, and rules of condu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ttributes by means of which we alone conceive of God's essence. If then it teaches us what is absurd and unreasonable, if it inspires us with feelings of aversion for our

fellows and terror for ourselves, if it paints us a God, angry, jealous, revengeful, partial, hating men, a God of war and battles, ever ready to strike and to destroy, ever speaking of punishment and torment, boasting even of the punishment of the innocent, my heart would not be drawn towards this terrible God, I would take good care not to quit the realm of natural religion to embrace such a religion as that; for you see plainly I must choose between them. Your God is not ours. He who begins by selecting a chosen people, and proscribing the rest of mankind, is not our common father; he who consigns to eternal punishment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creatures, is not the merciful and gracious God revealed to me by my reason.

“这个教义，如果是来自于上帝的，应该能承受上帝神圣的印记；它不仅应给我们内刻理智的头脑中困惑的想法释疑，还应该向我们提供一种敬拜的形式，一种道德，和一些合乎上帝属性的行为准则，通过这些准则，只有我们才能明白上帝的本质。如果它继而教导我们什么是荒谬的和不可理喻的，如果它使我们对我们的同胞感到厌恶、对自己感到害怕，如果它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神，是愤怒的、嫉妒的、爱报复的、不公正的、恨恶人的，是战争之神，随时准备着打击和毁灭，讲述惩罚与痛苦，甚至会夸耀对无辜者的惩罚，我的心不会受到这可怕的神的吸引，我会好好注意，不抛弃自然宗教的统治而拥抱这样一个宗教；因为你很清楚地知道，我必须在二者间做出选择。你的神不是我们的神。那首先选出选民，排斥其余人类的神，不是我们共同的父；他若将自己更伟大的创造物加诸永恒的刑罚，则他不是由我的理智向我展现的慈爱善良的神。

“Reason tells me that dogmas should be plain, clear, and striking in their simplicity. If there is something lacking in natural religion, it is with respect to the obscurity in which it leaves the

great truths it teaches; revelation should teach us these truths in a way which the mind of man can understand; it should bring them within his reach, make him comprehend them, so that he may believe them. Faith is confirmed and strengthened by understanding; the best religion is of necessity the simplest. He who hides beneath mysteries and contradictions the religion that he preaches to me, teaches me at the same time to distrust that religion. The God whom I adore is not the God of darkness, he has not given me understanding in order to forbid me to use it; to tell me to submit my reason is to insult the giver of reason. The minister of truth does not tyrannise over my reason, he enlightens it.

“理智告诉我，教条应该简单、清楚，以简明打动人心。如果自然宗教中缺乏什么，这便与它教导的伟大真理晦涩难懂有关；启示应该用一种人类头脑能够理解的方法揭示这些真理；它应该让真理得以明白，让他理解它们，从而他能相信它们。信心因理解而确立和增强；最好的宗教必须是最简单的。一个人在向我宣教时若使宗教下藏有神秘和矛盾，则同时在教我不要相信那个宗教。我欣赏的神不是黑暗之神，他没有为了禁止我使用理解力而将它赐给我；让我丢弃理智，是在侮辱赐予我理智的神。真理的传播者不会压制我的理智，相反会启发我的理智。

“We have set aside all human authority, and without it I do not see how any man can convince another by preaching a doctrine contrary to reason. Let them fight it out, and let u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with that harshness of speech which is common to both.

“我们已经放弃了一切人类权威，没有了它，我不知道人如何通

过宣扬一个有悖理智的教条而说服另一个人。让他们争吵一会，让我们看看他们在双方都习以为常的粗暴语言中都要说些什么。

“INSPIRATION: Reason tells you that 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part; but I tell you, in God's name, that the part is greater than the whole.

“灵感：理智告诉你整体比部分大；但是我以上帝之名告诉你，部分比整体更大。

“REASON: And who are you to dare to tell me that God contradicts himself? And which shall I choose to believe. God who teaches me, through my reason, the eternal truth, or you who, in his name, proclaim an absurdity?

“理智：你是谁，竟敢告诉我，上帝是自相矛盾的？我应该相信哪一个呢？是通过我的理智教导我永恒真理的神，还是你，以上帝为名，宣称荒谬之事的人呢？

“INSPIRATION: Believe me, for my teaching is more positive; and I will prove to you beyond all manner of doubt that he has sent me.

“灵感：相信我，因为我的教育更积极；我会向你证明，千真万确，是他差了我来。

“REASON: What! you will convince me that God has sent you to bear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What sort of proofs will you adduce to convince me that God speaks more surely by your mouth than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he has given me?

“理智：什么！你会说服我，上帝派你来做违背他自己的见证？你会举出什么样的证据来说服我，上帝确实是通过你的嘴而不是通过他赐给我的理解向我讲话的？

“INSPIRATION: The understanding he has given you! Petty, conceited creature! As if you were the first impious person who had been led astray through his reason corrupted by sin.

“灵感：他赐给你的理解力！渺小、狂妄的受造物！你就像是第一个不干净的人，因为被罪玷污的理智而误入歧途了。

“REASON: Man of God, you would not be the first scoundrel who asserts his arrogance as a proof of his mission.

“理智：神人啊，你也不会是第一个以自己的傲慢作为自己使命证据的坏蛋。

“INSPIRATION: What! do even philosophers call names?

“灵感：什么！哲学家也骂人啦？

“REASON: Sometimes, when the saints set them the example.

“理智：有时候会的，圣人自己已经做了榜样。

“INSPIRATION: Oh, but I have a right to do it, for I am speaking on God's behalf.

“灵感：噢，但是我有权利这么做，因为我正代表上帝说话。

“REASON: You would do well to show your credentials before you make use of your privileges.

“理智：在你使用自己的特权之前，最好把你的证据拿出来看一看。

“INSPIRATION: My credentials are authentic, earth and heaven will bear witness on my behalf. Follow my arguments carefully, if you please.

“灵感：我的证据是真实的，天地为鉴，可以替我作证。请你仔细听听我的论证吧。

“REASON: Your arguments! You forget what you are saying.

When you teach me that my reason misleads me, do you not refute what it might have said on your behalf? He who denies the right of reason, must convince me without recourse to her aid. For suppose you have convinced me by reason, how am I to know that it is not my reason, corrupted by sin, which makes me accept what you say? besides, what proof, what demonstration, can you advance, more self-evident than the axiom it is to destroy? It is more credible that a good syllogism is a lie, than that the part is greater than the whole.

“理智：你的论证！你忘记你在说什么了吧。当你教导我说我的理智误导了我，不就是否认了它会为你说话吗？谁否认了理智的正确性的人，必须不靠她的帮助说服我。因为假如你通过理智说服了我，我怎么知道不是因为我被罪玷污的理智，使我接受了你所说的话呢？另外，你提出的什么证据，什么道理，能比它要摧毁的公理更不言自明呢？一个好的三段论是谎言，也比部分比整体大更加可信。

“INSPIRATION: What a difference! There is no answer to my evidence; it is of a supernatural kind.

“灵感：区别多大啊！我的证据是不容置喙的；它是超自然的。

“REASON: Supernatural! What do you mean by the word? I do not understand it.

“理智：超自然的！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

“INSPIRATION: I mean changes in the order of nature, prophecies, signs, and wonders of every kind.

“灵感：它的意思是自然秩序的变化、预言、迹象和各种各样的奇事。

“REASON: Signs and wonders! I have never seen anything of the kind.

“理智：迹象和奇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事。

“INSPIRATION: Others have seen them for you. Clouds of witnesses—the witness of whole nations….

“灵感：其他人已经帮你看过了。成群的见证人——各个国家的见证人……

“REASON: Is the witness of nations supernatural?

“理智：各国人民的见证是不是超自然的呢？

“INSPIRATION: No; but when it is unanimous, it is incontestable.

“灵感：不是；但是当大家一致这么说，这就是不容置疑的了。

“REASON: There is nothing so incontestable as the principles of reason, and one cannot accept an absurdity on human evidence. Once more, let us see your supernatural evidence, for the consent of mankind is not supernatural.

“理智：除了理智的原则之外没有什么是不容置疑的，在人们的证词中是不允许有任何含糊的。再说一次，让我们看看你超自然的证据，因为人类的见证不是超自然的。

“INSPIRATION: Oh, hardened heart, grace does not speak to you.

“灵感：噢，狠心的人啊，恩典不会对你说话的。

“REASON: That is not my fault; for by your own showing, one must have already received grace before one is able to ask for it. Begin by speaking to me in its stead.

“理智：那不是我的错；因为根据你自己的话，一个人在有能力要求恩典之前一定就得到恩典了。既然没有得到恩典，那就开始对我讲吧。

“INSPIRATION: But that is just what I am doing, and you will

not listen. But what do you say to prophecy?

“灵感：但这正是我在做的事，你却不听。你对预言是怎么看的？

“REASON: In the first place, I say I have no more heard a prophet than I have seen a miracle. In the next, I say that no prophet could claim authority over me.

“理智：首先，与我没有看过一个神迹一样，我没有听过一个预言。然后，我认为没有先知有权威令我信服。

“INSPIRATION: Follower of the devil! Why should not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have authority over you?

“灵感：魔鬼的跟班啊！为什么先知的话没有权威令你信服呢？

“REASON: Because three things are required, three things which will never happen: firstly, I must have heard the prophecy; secondly, I must have seen its fulfilment; and thirdly, it must be clearly proved that the fulfilment of the prophecy could not by any possibility have been a mere coincidence; for even if it was as precise, as plain, and clear as an axiom of geometry, since the clearness of a chance prediction does not make its fulfilment impossible, this fulfilment when it does take place does not, strictly speaking, prove what was foretold.

“理智：因为需要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永远也不会实现：首先，我一定要听到这个预言；第二，我一定要看到预言实现；第三，一定要清楚证明，预言的实现不可能仅仅是个偶然；因为即使预言跟几何学的定理一样精确、明白、清楚，但是一个偶然作出的明白预言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当它实现时，严格来讲，并不能证明是预言的结果。

“See what your so-called supernatural proofs, your miracles, your prophecies come to: believe all this upon the word of another. Submit to the authority of men the authority of God which speaks to my reason. If the eternal truths which my mind conceives of could suffer any shock, there would be no sort of certainty for me; and far from being sure that you speak to me on God's behalf, I should not even be sure that there is a God.

“现在明白了你所谓的超自然的证据、你的神迹、你的预言来自于哪里了：他人说的话，你全都相信。这是将人的权威凌驾于对我的理智说话的上帝的权威之上。如果我的头脑所认识的永恒的真理能受到任何损坏，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确定的事情了；我不仅不确定你在代表上帝对我说话，我甚至不确定上帝是否存在。

“My child, here are difficulties enough, but these are not all. Among so many religions, mutually excluding and proscribing each other, one only is true, if indeed any one of them is true. To recognise the true religion we must inquire into, not one, but all; and in any question whatsoever we have no right to condemn unheard [1_24] . The objections must be compared with the evidence; we must know what accusation each brings against the other, and

what answers they receive. The plainer any feeling appears to us, the more we must try to discover why so many other people refuse to accept it. We should be simple, indeed, if we thought it enough to hear the doctors on our own side, in order to acquaint ourselves with the arguments of the other. Where can you find theologians who pride themselves on their honesty? Where are those who, to refute the arguments of their opponents, do not begin by making out that they are of little importance? A man may make a good show among his own friends, and be very proud of his arguments, who would cut a very poor figure with those same arguments among those who are on the other side. Would you find out for yourself from books? What learning you will need! What languages you must learn; what libraries you must ransack; what an amount of reading must be got through! Who will guide me in such a choice? It will be hard to find the best books on the opposite side in any one country, and all the harder to find those on all sides; when found they would be easily answered. The absent are always in the wrong, and bad arguments boldly asserted easily efface good arguments put forward with scorn. Besides books are often very misleading, and scarcely express the opinions of their authors. If you think you can judge the Catholic faith from the writings of Bossuet, you will find yourself greatly mistaken when you have lived among us. You will see that the doctrines with which Protestants are answered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pulpit. To judge a religion rightly, you must not study it in the books of its partisans, you must learn it in their lives; this is quite another matter. Each religion has its own traditions, meaning, customs, prejudices, which form the spirit of its creed, and must be taken in connection with it.

“我的孩子，这里有足够多的困难，但这些还不是全部的困难。

在众多互相排斥互相禁止的宗教中，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如果它们中间确实有一个是正确的话。要辨别出这个正确的信仰，我们必须探寻的不是一个信仰，而是全部的信仰；无论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没有权利谴责认为它可以不予倾听 [2_24] 。反对的观点一定要与证据相比较；我们必须知道每一方对另一方的指控是什么，以及他们对指控的回应如何。我们越是觉得一种说法对我们很显然，就越应该努力找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拒绝接受它。如果我们认为仅听我们这方的学者意见就足以了解其他人的观点，我们就想得太简单了。哪个神学家敢对自己的诚实夸口？谁不是从削弱对手的观点开始辩驳的？一个人也许在他自己的朋友中有很好的表现，并对自己的论点非常自豪，但是吧同样的论点拿到对方那里，则会出大糗的。你会从书本中为自己找到答案吗？那需要多广博的学识啊！你要学多少种语言；要寻遍多少图书馆；要有多大的阅读量啊！谁来指导我做出选择呢？在任何国家，要找到对方的好书是很困难的，要找到所有派别的书则更难了；即使找到了，也会有人说它们不值得一看的。心不在焉的人总是会犯错，自信地陈述的坏论点也能很轻易地抹掉以轻蔑口吻提出的好论点。此外，书籍经常很具有误导性，极少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如果你认为你可以通过波斯维特的作品中判断天主教的信仰，在我们中间生活过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你会发现新教徒所回答的教义与神职人员所回答的非常不同。要正确评判一个宗教，你一定不能通过它信徒的书籍来研究，一定要在他们的生活中去学习；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每种宗教都有自己的传统、意义、习俗、偏见，它们形成了教义的精神，必须把它们与信仰联系起来。

“How many great nations neither print books of their own nor read ours! How shall they judge of our opinions, or we of theirs? We laugh at them, they despise us; and if our travellers turn them into ridicule, they need only travel among us to pay us back in our own coin. Are there not, in every country, men of common-sense, honesty, and good faith, lovers of truth, who only seek to know what truth is that they may profess it? Yet every one finds truth in

his own religion, and thinks the religion of other nations absurd; so all these foreign religions are not so absurd as they seem to us, or else the reason we find for our own proves nothing.

“有多少伟大的民族既不印自己的书，也不阅读我们的书啊！他们如何评判我们的观点，我们又怎么判断他们的观点呢？我们嘲笑他们，他们鄙视我们；如果我们的旅行家把他们当作笑话，他们只需要来我们这里旅行一趟，就能以牙还牙了。那一个国家没有为了了解真理、承认真理的贤明、诚实、有忠实信仰并爱好真理的人呢？然而每个人在自己的宗教中发现真理，并认为其他民族的宗教是荒谬的；这些外国的宗教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荒谬，否则，我们自己的理智也什么都没有证明了。

“We have three principal forms of religion in Europe. One accepts one revelation, another two, and another three. Each hates the others, showers curses on them, accuses them of blindness, obstinacy, hardness of heart, and falsehood. What fair-minded man will dare to decide between them without first carefully weighing their evidence, without listening attentively to their arguments? That which accepts only one revelation is the oldest and seems the best established; that which accepts three is the newest and seems the most consistent; that which accepts two revelations and rejects the third may perhaps be the best, but prejudice is certainly against it; its inconsistency is glaring.

“在欧洲我们的宗教有三种主要的形式。第一种宗教承认一种启示，第二种承认两种启示，第三种则承认三种启示。每种宗教都憎恨、诅咒另外两种宗教，控诉它们盲从、顽固、心硬、虚伪。哪一个公正不倚的人敢不先小心地衡量他们的证词、细心地听他们的论证就

对他们进行判定呢？只接受一种启示的宗教是最古老，看上去建立得最完善的宗教；接受三中其实的宗教是最新的，看上去最一致的宗教；接受两种启示而否认第三种启示的宗教也许是最好的宗教，不过它肯定有否定自身的偏见的；可以一眼看出它的矛盾。

“In all three revelations the sacred books are written in languages unknown to the people who believe in them. The Jews no longer understand Hebrew, the Christians understand neither Hebrew nor Greek; the Turks and Persians do not understand Arabic, and the Arabs of our time do not speak the language of Mahomet. Is not it a very foolish way of teaching, to teach people in an unknown tongue? These books are translated, you say. What an answer! How am I to know that the translations are correct, or how am I to make sure that such a thing as a correct translation is possible? If God has gone so far as to speak to men, why should he require an interpreter?

“在三种启示中，经书使用相信他们的人所不懂的语言写成的。犹太人不再懂希伯来文，基督徒既不懂希伯来文也不懂希腊文；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不懂阿拉伯文；如今的阿拉伯人也不说默罕默德所用的语言了。用大家不懂的寓言教导人，难道不是一种很愚蠢的教导方法吗？你说，这些书都是经过翻译的。回答得真好！我怎么知道译文是正确的呢，我又如何确定，对这些书的正确的译文是有可能的呢？上帝既然与人说过话，为什么还需要一个翻译呢？

“I can never believe that every man is obliged to know what is contained in books, and that he who is out of reach of these books, and of those who understand them, will be punished for an ignorance which is no fault of his. Books upon books! What

madness! As all Europe is full of books, Europeans regard them as necessary, forgetting that they are unknown throughout three-quarters of the globe. Were not all these books written by men? Why then should a man need them to teach him his duty, and how did he learn his duty before these books were in existence? Either he must have learnt his duties for himself, or his ignorance must have been excused.

“我绝不相信书里有每个人必须知道的所有东西，我也不相信无法接触这些书、无法理解这些书的人会因为错不在己的无知而受到惩罚。除了书，还是书！真是疯了！由于全欧洲到处都是书，欧洲人把书当作不可缺少之物，没有料到全球四分之三的人还不知道有书呢。这些书不都是人写的吗？一个人为什么需要书教导他自己的责任，在这些书出现之前，他是如何学习自己的职责的呢？要么他自己学习自己的职责，要么他的无知成为他不知道的理由。

“Our Catholics talk loudly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but what is the use of it all, if they also need just as great an array of proofs to establish that authority as the other seeks to establish their doctrine? The Church decides that the Church has a right to decide. What a well-founded authority! Go beyond it, and you are back again in our discussions.

“我们的天主教徒大声谈论教堂的权威；但是如果他们也需要如此大量的证据以建立这样的权威，就像他人试图建立他们的教义一样，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处呢？教堂决定了教堂有决定的权利。真是一个稳固的权威！超越这一点，你就再次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了。

“Do you know many Christians who have taken the trouble to inquire what the Jews allege against them? If any one knows anything at all about it, it is from the writings of Christians. What a way of ascertaining the arguments of our adversaries! But what is to be done? If any one dared to publish in our day books which were openly in favour of the Jewish religion, we should punish the author, publisher, and bookseller. This regulation is a sure and certain plan for always being in the right. It is easy to refute those who dare not venture to speak.

“你知道多少基督徒费心研究犹太人如何断言他们吗？如果有人对此稍有了解，则一定是从基督徒的作品中得知的。好一个了解对方论点的方法啊！但是要做什么呢？如果任何人胆敢在我们这里公开出版支持犹太教的书，我们就要惩罚作者、出版商、卖书商。为了能始终说自己是对的，就得采取这个既简便又可靠的办法。反驳不敢说话的人是很简单的。

“Those among us who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talking with Jews are little better off. These unhappy people feel that they are in our power; the tyranny they have suffered makes them timid; they know that Christian charity thinks nothing of injustice and cruelty; will they dare to run the risk of an outcry against blasphemy? Our greed inspires us with zeal, and they are so rich that they must be in the wrong. The more learned, the more enlightened they are, the more cautious. You may convert some poor wretch whom you have paid to slander his religion; you get some wretched old-clothes-man to speak, and he says what you want; you may triumph over their ignorance and cowardice, while all the time their men of learning are laughing at your stupidity. But do you think you would get off so easily in any place where they knew they were safe! At the

Sorbonne it is plain that the Messianic prophecies refer to Jesus Christ. Among the rabbis of Amsterdam it is just as clear that the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him. I do not think I have ever heard the arguments of the Jews as to why they should not have a free stat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where they can speak and argue without danger. Then alone can we know what they have to say.

“我们中有机会同犹太人交谈的人也好不了多少。这些不开心的人觉得他们在我们权力统治之下；他们所经受的暴政使他们变得胆小；他们知道基督教的慈善不考虑任何不公义和残忍之事；他们又敢不敢冒险反对这样对神的亵渎呢？我们的贪婪激起了我们的热情，他们是如此富有，所以一定是错误的。他们学得越多，就越聪明，也就越谨慎。你可以让某个穷苦人改变信仰，花钱诋毁他的宗教；你让一些可怜的穿破旧衣服的人讲话，他讲的是你想要他将的；你可以战胜他们的无知和怯懦，与此同时他们的学者也会讥笑你的愚蠢。但是你觉得在他们知道他们很安全的任何地方，你也能这么容易地对付他们吗？在索邦神学院，很明显，救世主的预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同样很清楚的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拉比中，救世主的预言与耶稣基督毫无关系。我不认为我曾听过犹太人论证过为什么他们不应该有自由的国家、自由的小学和大学，在那里他们可以说话和争论而没有任何危险。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At Constantinople the Turks state their arguments, but we dare not give ours; then it is our turn to cringe. Can we blame the Turks if they require us to show the same respect for Mahomet, in whom we do not believe, as we demand from the Jews with regard to Jesus Christ in whom they do not believe? Are we right? On what grounds of justice can we answer this question?

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陈述他们的论点，但是我们不敢给出我们的论点；那时，轮到我们畏缩了。就像我们要求犹太人对他们所不相信的耶稣基督显示出尊重一样，如果土耳其人要求我们对我们所不相信的默罕默德也显示出同样的尊重，我们能怪他们吗？我们对吗？我们按什么公平的原则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Two-thirds of mankind are neither Jews, Mahometans, nor Christians; and how many millions of men have never heard the name of Moses, Jesus Christ, or Mahomet? They deny it; they maintain that our missionaries go everywhere. That is easily said. But do they go into the heart of Africa, still undiscovered, where as yet no European has ever ventured? Do they go to Eastern Tartary to follow on horseback the wandering tribes, whom no stranger approaches, who not only know nothing of the pope, but have scarcely heard tell of the Grand Lama! Do they penetrate into the vast continents of America, where there are still whole nations unaware that the people of another world have set foot on their shores? Do they go to Japan, where their intrigues have led to their perpetual banishment, where their predecessors are only known to the rising generation as skilful plotters who came with feigned zeal to take possession in secret of the empire? Do they reach the harems of the Asiatic princes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ose thousands of poor slaves? What have the women of those countries done that no missionary may preach the faith to them? Will they all go to hell because of their seclusion?

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伊斯兰教徒或基督徒；有成千上万的人从没有听过摩西、耶稣基督或者默罕默德的名字！有些人否认这一事实；他们认为我们的宣教士走遍了世界各地。说得轻巧。他们有来到尚未发现的非洲的腹地，目前还没有欧洲人到

达过的地方吗？他们有来到鞑靼东部，跟随着没有外人接近过的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吗？他们不仅没听过教皇，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大喇嘛呢！他们有深入辽阔的美洲大陆吗？那里还有整个民族的人都不知道有来自另一世界的人们已经踏上了他们的海岸。他们去过日本吗？那里他们的阴谋使自己遭受永远的驱逐，他们的先驱对新兴的一代日本人来说只是深谋远虑的阴谋家，假装热情，想悄悄占领他们的帝国。他们有来到亚洲王子的妾群中，向上千贫穷的奴隶传福音吗？那些国家的女人们做了什么，以至于没有传教士向她们传过道？她们会因为自己与世隔绝而下地狱吗？

“If it were true that the gospel is preached throughout the world, what advantage would there be? The day before the first missionary set foot in any country, no doubt somebody died who could not hear him. Now tell me what we shall do with him? If there were a single soul in the whole world, to whom Jesus Christ had never been preached, this objection would be as strong for that man as for a quarter of the human race.

“假如福音真的传遍了世界各地，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在第一个传教士到达任何国家的前一天，无疑是有人死去，听不到他的福音的。现在告诉我，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灵魂是耶稣基督从未被传扬过的，这对这个人的严重程度与没有向四分之一的人宣讲一样。

“If the ministers of the gospel have made themselves heard among far-off nations, what have they told them which might reasonably be accepted on their word, without further and more exact verification? You preach to me God, born and dying, two thousand years ago,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world, in some small

town I know not where; and you tell me that all who have not believed this mystery are damned. These are strange things to be believed so quickly on the authority of an unknown person. Why did your God make these things happen so far off, if he would compel me to know about them? Is it a crime to be unaware of what is happening half a world away? Could I guess that in another hemisphere there was a Hebrew nation and a town called Jerusalem? You might as well expect me to know what was happening in the moon. You say you have come to teach me; but why did you not come and teach my father, or why do you consign that good old man to damnation because he knew nothing of all this? Must he be punished everlastingly for your laziness, he who was so kind and helpful, he who sought only for truth? Be honest; put yourself in my place; see if I ought to believe, on your word alone, all these incredible things which you have told me, and reconcile all this injustice with the just God you proclaim to me. At least allow me to go and see this distant land where such wonders, unheard of in my own country, took place; let me go and see why the inhabitants of Jerusalem put their God to death as a robber. You tell me they did not know he was God. What then shall I do, I who have only heard of him from you? You say they have been punished, dispersed, oppressed, enslaved; that none of them dare approach that town. Indeed they richly deserved it; but what do its present inhabitants say of their crime in slaying their God! They deny him; they too refuse to recognise God as God. They are no better than the children of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如果宣教士让远方的民族也听到了福音，他们说什么话才可能不需要更多更确切的证词就被他们接受？你向我宣讲说神，两千年以前，在世界的另一头，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小镇出生、死去；你又告诉我，那些不相信这件神秘的事的人都会受到惩罚。这些事如此地奇

怪，是无法凭着一个不认识人的权威就如此快地被相信的。如果你的神要我知道这些事的话，为什么要让这些事发生在离我那么远的地方？不知道世界的另一半发生的事情是罪吗？我怎能猜想在另外一个半球有一个叫希伯来的民族，有一个镇子叫做耶路撒冷？这等于是希望我知道月球上发生了什么事。你说你是来教我的；但是为什么你没有来教我的父亲，或者说为什么要因为那个善良的老人不知道这件事你就要定他的罪呢？他，一个如此善良、热心，一心寻求真理的人，是不是要因为你的懒惰而受到永远的惩罚呢？请真诚地换位思考；如果我仅凭你的话就应该相信所有你告诉我的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认为所有不公正的事情与你向我宣称的公义的上帝的旨意是一致的。至少允许我去看一看遥远的土地上，在我自己的国家没有听闻过的奇闻异事如何发生的；让我去看看一看，为什么耶路撒冷的居民会把上帝当作一个已死的强盗。你告诉我，他们不知道他是神。那我应该做什么呢，既然我只从你的口中听说了他？你说，他们已经受到了惩罚，被分散、压迫、奴役；现在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敢再走近那个城镇。他们当然罪有应得；但是今天的耶路撒冷的居民是如何看待他们杀害了他们的神的这件事呢？他们否认他是神；他们不把神看作神。他们一点也不比原先的居民的子孙更好。

“What! In the very town where God was put to death, neither the former nor the latter inhabitants knew him, and you expect that I should know him, I who was born two thousand years after his time, and two thousand leagues away? Do you not see that before I can believe this book which you call sacred, but which I do not in the least understand, I must know from others than yourself when and by whom it was written, how it has been preserved, how it came into your possession, what they say about it in those lands where it is rejected, and what are their reasons for rejecting it, though they know as well as you what you are telling me? You perceive I must go to Europe, Asia, Palestine, to examine these things for myself; it would be madness to listen to you before that.

“什么！就在上帝被杀害的城镇，这里过去和现在的居民都不认识他，你却希望我，一个两千年以后在距离他两千里以外出生的人，相信他？你难道没有发现，在我相信你称为圣经的，我却一点也不了解的书之前，我一定要从你以外的人得知这本书是什么时候由谁写成的，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又是如何到你手中的，尽管他们跟你一样清楚你告诉我的事情，那些拒绝它的地方的人们如何看待它，又是为何拒绝它？你知道我必须去欧洲、亚洲、巴勒斯坦，亲自考察这些事情；在此之前听你的话，我就一定是疯子。

“Not only does this seem reasonable to me, but I maintain that it is what every wise man ought to say in similar circumstances; that he ought to banish to a great distance the missionary who wants to instruct and baptise him all of a sudden before the evidence is verified. Now I maintain that there is no revelation against which these or similar objections cannot be made, and with more force than against Christianity. Hence it follows that if there is but one true religion and if every man is bound to follow it under pain of damnation, he must spend his whole life in studying, testing, comparing all these religions, in travelling through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are established. No man is free from a man's first duty; no one has a right to depend on another's judgment. The artisan who earns his bread by his daily toil, the ploughboy who cannot read, the delicate and timid maiden, the invalid who can scarcely leave his bed, all without exception must study, consider, argue, travel over the whole world; there will be no more fixed and settled nations; the whole earth will swarm with pilgrims on their way, at great cost of time and trouble, to verify, compare, and examine for themselves the various religions to be found. Then farewell to the trades, the arts, the sciences of mankind, farewell to all peaceful occupations; there can be no study

but that of religion, even the strongest, the most industrious, the most intelligent, the oldest, will hardly be able in his last years to know where he is; and it will be a wonder if he manages to find out what religion he ought to live by, before the hour of his death.

“我认为，这些话不仅很有道理，而且也是每一个聪明人在相似的情境下应该说的话；他应该在证据得到确认之前，把急于想要指导、使他受洗的宣教士驱逐得远远的。现在我认为，没有哪种启示是不能用这种或类似的话进行驳斥的，这种驳斥比对基督教的驳斥更有力。因此，如果世界上有且只有一种真正的宗教，如果所有人都应该信仰它，否则就会受苦的话，人们一定会花毕生的经历去研究、测试、比较所有的宗教，游历那些建立了这些宗教的国家。没有人能逃避一个人的首要责任；没有人有权利依赖他人的判断。每天辛勤工作以糊口的工匠，目不识丁的农民，娇弱羞涩的少女或是无法下床的病人，无一例外地都必须学习、思考、辩论、周游世界；这样就没有人能安然定居了；全世界都蜂拥着在路上的朝圣者，他们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证实、比较、检验待发现的不同的宗教。这样，就不再有人类的贸易、艺术和科学了，就不再有各种和平的职业了；除了对宗教的研究就再也没有其他研究了，即使是最强壮的人、最勤劳的人、最聪明的人、最年长的人，也很难在临死前弄清楚他在哪里；如果在临死前，他知道了他应该信仰什么宗教，就算是一个奇迹了。

“Hard pressed by these arguments, some prefer to make God unjust and to punish the innocent for the sins of their fathers, rather than to renounce their barbarous dogmas. Others get out of the difficulty by kindly sending an angel to instruct all those who in invincible ignorance have lived a righteous life. A good idea, that angel! Not content to be the slaves of their own inventions they expect God to make use of them also!

“因这些争论而饱受压力，有些人宁愿让上帝变得不公正、因父亲的罪行惩罚无辜的人，而不愿放弃他们粗野的教条。另一些人通过善良地派一个天使指导那些极其无知还过着正直的生活的人以走出困境。使用天使，真是个好办法！他们不满足于拿异想天开的东西奴役我们，还期望上帝也使用他们发明的东西。

“Behold, my son, the absurdities to which pride and intolerance bring us, when everybody wants others to think as he does, and everybody fancies that he has an exclusive claim upon the rest of mankind. I call to witness the God of Peace whom I adore, and whom I proclaim to you, that my inquiries were honestly made; but when I discovered that they were and always would be unsuccessful, and that I was embarked upon a boundless ocean, I turned back, and restricted my faith within the limits of my primitive ideas. I could never convince myself that God would require such learning of me under pain of hell. So I closed all my books. There is one book which is open to every one—the book of nature. In this good and great volume I learn to serve and adore its Author. There is no excuse for not reading this book, for it speaks to all in a language they can understand. Suppose I had been born in a desert island, suppose I had never seen any man but myself, suppose I had never heard what took place in olden days in a remote corner of the world; yet if I use my reason, if I cultivate it, if I employ rightly the innate faculties which God bestows upon me, I shall learn by myself to know and love him, to love his works, to will what he wills, and to fulfil all my duties upon earth, that I may do his pleasure. What more can all human learning teach me?

“看，我的孩子，当每个人都想要别人跟自己想的一样，每个人都幻想着自己的断言与众不同时，骄傲和偏狭会造成多么荒唐的事

情。我以我所崇拜和向你宣扬的和平的上帝为证，我的探讨都是很诚恳的；但是当我发现它们永远难以成功的时候，便落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我回过头来，将我的信仰限制在我最初的想法限度内。我不会相信，上帝会让我这样博学的人忍受地狱的痛苦。于是我合上了所有的书。有一本书对每个人都是敞开的——自然之书。在这本美好伟大的著作中，我学会了如何敬拜、尊崇它的作者。没有任何不读这本书的借口，因为它用每个人都能懂的语言对他们说话。假设我出生在一个荒岛上，假设我从未见过除了自己以外的人，假设我从未听闻过在古时候，世界一个荒凉的角落发生了什么；只要我使用我的理智，只要我培养它，只要我正确地使用上帝赐给我的内在的官能，我就能自己学会认识并且热爱他，热爱他的作品，按他的旨意期盼，完成我在世界上一切的责任，使他感到欢喜。人类还能教导我什么别的吗？

“With regard to revelation, if I were a more accomplished disputant, or a more learned person, perhaps I should feel its truth, its usefulness for those who are happy enough to perceive it; but if I find evidence for it which I cannot combat, I also find objections against it which I cannot overcome. There are so many weighty reasons for and against that I do not know what to decide, so that I neither accept nor reject it. I only reject all obligation to be convinced of its truth; for this so-called oblig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God's justice, and far from removing objections in this way it would multiply them, and would make them insurmountable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mankind. In this respect I maintain an attitude of reverent doubt. I do not presume to think myself infallible; other men may have been able to make up their minds though the matter seems doubtful to myself; I am speaking for myself, not for them; I neither blame them nor follow in their steps; their judgment may be superior to mine, but it is no fault of mine that my judgment does not agree with it.

“至于启示，如果我是一个高明的辩论这或者更加有学识的人，也许我能意识到它的真理，意识到它对那些足够开心以致能理解它的人的用处；但是如果我发现了我无法反驳的它的证据，我也会发现我无法克服的对它的辩驳。有许多支持和反对它的充分的理由，以至于我不知道如何决断，所以我既不接受，也不反对它。我只反对要相信启示的职责；因为这所为的职责与上帝的公义相悖，而且，它不仅不能消除人们得救的障碍，反而会增加这些障碍，而且会使障碍变成许多人无法克服的难关。在这方面，我保留尊敬而怀疑的态度。我不敢认为自己没有错；其他人也许会相信我所怀疑的事情；我为自己发声，而不是为他们；我既不谴责他们，也不跟随他们的脚步；他们的判断也许比我的更正确，但是我的判断与他们的不一致，也不是我的错。

“I own also that the holiness of the gospel speaks to my heart, and that this is an argument which I should be sorry to refute. Consider the books of the philosophers with all their outward show; how petty they are in comparison! Can a book at once so grand and so simple be the work of men? Is it possible that he whose history is contained in this book is no more than man? Is the tone of this book, the tone of the enthusiast or the ambitious sectary? What gentleness and purity in his actions, what a touching grace in his teaching, how lofty are his sayings, how profoundly wise are his sermons, how ready, how discriminating, and how just are his answers! What man, what sage, can live, suffer, and die without weakness or ostentation? When Plato describes his imaginary good man, overwhelmed with the disgrace of crime, and deserving of all the rewards of virtue, every feature of the portrait is that of Christ; the resemblance is so striking that it has been noticed by all the Fathers, and there can be no doubt about it. What prejudices and blindness must there be before we dare to compare the son of Sophronisca with the son of Mary. How far apart they are! Socrates

dies a painless death, he is not put to open shame, and he plays his part easily to the last; and if this easy death had not done honour to his life, we might have doubted whether Socrates, with all his intellect, was more than a mere sophist. He invented morality, so they say; others before him had practised it; he only said what they had done, and made use of their example in his teaching. Aristides was just before Socrates defined justice; Leonidas died for his country before Socrates declared that patriotism was a virtue; Sparta was sober before Socrates extolled sobriety; there were plenty of virtuous men in Greece before he defined virtue. But among the men of his own time where did Jesus find that pure and lofty morality of which he is both the teacher and pattern? [1_25] The voice of loftiest wisdom arose among the fiercest fanaticism, the simplicity of the most heroic virtues did honour to the most degraded of nations. One could wish no easier death than that of Socrates, calmly discussing philosophy with his friends; one could fear nothing worse than that of Jesus, dying in torment, among the insults, the mockery, the curses of the whole nation. In the midst of these terrible sufferings, Jesus prays for his cruel murderers. Yes, if the life and death of Socrates are those of a philosoph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Christ are those of a God. Shall we say that the gospel story is the work of the imagination? My friend, such things are not imagined; and the doings of Socrates, which no one doubts, are less well attested than those of Jesus Christ. At best, you only put the difficulty from you; it would be still more incredible that several persons should have agreed together to invent such a book, than that there was one man who supplied its subject matter. The tone and morality of this story are not those of any Jewish authors, and the gospel indeed contains characters so great, so striking, so entirely inimitable, that their invention would be more astonishing than their hero. With all this the same gospel is full of incredible things, things repugnant to reason, things which no natural man

can understand or accept. What can you do among so many contradictions? You can be modest and wary, my child; respect in silence what you can neither reject nor understand, and humble yourself in the sight of the Divine Being who alone knows the truth. “This is the unwilling scepticism in which I rest; but this scepticism is in no way painful to me, for it does not extend to matters of practice, and I am well assured as to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all my duties. I serve God in the simplicity of my heart; I only seek to know what affects my conduct. As to those dogmas which have no effect upon action or morality, dogmas about which so many men torment themselves, I give no heed to them. I regard all individual religions as so many wholesome institutions which prescribe a uniform method by which each country may do honour to God in public worship; institutions which may each have its reason in the country, the government, the genius of the people, or in other local causes which make one preferable to another in a given time or place. I think them all good alike, when God is served in a fitting manner. True worship is of the heart. God rejects no homage, however offered, provided it is sincere. Called to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in my own religion, I fulfil as scrupulously as I can all the duties prescribed to me, and my conscience would reproach me if I were knowingly wanting with regard to any point. You are aware that after being suspended for a long time, I have,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M. Mellarede, obtained permission to resume my priestly duties, as a means of livelihood. I used to say Mass with the levity that comes from long experience even of the most serious matters when they are too familiar to us; with my new principles I now celebrate it with more reverence; I dwell upon the majesty of the Supreme Being, his presence,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human mind, which so little realises what concerns its Creator. When I consider how I present before him the prayers of all the people in a form laid down for me, I carry out the whole ritual exactly; I give

heed to what I say, I am careful not to omit the least word, the least ceremony; when the moment of the consecration approaches, I collect my powers, that I may do all things as required by the Church and by the greatness of this sacrament; I strive to annihilate my own reason before the Supreme Mind; I say to myself, Who art thou to measure infinite power? I reverently pronounce the sacramental words, and I give to their effect all the faith I can bestow. Whatever may be this mystery which passes understanding, I am not afraid that at the day of judgment I shall be punished for having profaned it in my heart."

"我同样拥有福音书对我心灵说话的神圣感，这个观点我若反驳，我会感到遗憾的。想一想哲学家们用来展现自己的书籍；与这本书比起来，是多么渺小！这样庄严又这样朴实的一本书，人能写得出来吗？书中包含了这个人的历史，这个人仅是一个凡人，可能吗？这本书的语气是不是狂信者或野心勃勃的闹宗派的语气？他的行为是多么温柔纯洁！他的教导是多么循循善诱！他的话语是多么崇高！他的布道蕴含多么深邃的思想！他的回答是多么敏捷、巧妙和中肯！什么人，哪个圣者，能在活着、受苦和死亡时不带怯懦或矜夸？当柏拉图描写他想象中的好人，承担了所有的罪恶，又配得一切美德的回报，被描写者的每个特征都是基督的特征；他们之间是如此相似，以至于所有的神父都可以发现，都不会弄错。我们一定是存有怎样的偏见和糊涂才敢将索福隆尼思科的儿子与玛丽的儿子相比？他们差别多么大啊！苏格拉底死时没有遭受痛苦，他没有收到公开的羞辱，在最后一刻仍能保持自己的人品；要不是他从容地死亡给他带来了荣耀，我们也许会怀疑苏格拉底就算是那么聪明，也不过是个诡辩家。于是他们说，苏格拉底发明了道德；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将道德付诸实践了；他不过是说了他们已经做过的事情，在他的教导中使用了他们的例子而已。在苏格拉底定义"公正"以前，亚里斯泰迪斯已经为人很公正了；在苏格拉底说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德以前，列奥尼达斯已经为国牺牲了；在苏格拉底歌颂做事严谨以前，斯巴达人已经做事很严谨了；在

他定义美德以前，希腊已经有很多美德高尚的人了。但是耶稣在他同时代的人中间，哪里能找到他既教导过又以身作则地实践过的高尚纯洁的道德呢？ [2_25] 在最疯狂的行为中，我们听见最高的智慧之声；最英勇简单的美德给最卑劣的民族带来尊荣。没有人能死得比苏格拉底更轻松，因为他死时还在跟朋友们平静地谈论哲学；没有人能害怕比耶稣承受过的状况更糟，因为他在折磨中死去，承受着羞辱、嘲笑和整个民族的咒诅。在这些可怕的痛苦中，耶稣还为他残忍的刽子手祈祷。是的，如果苏格拉底的一生是哲学家的一生，那么耶稣记得的一生就是神的一生。我们能说福音故事是想象的结果吗？我的朋友，这样的事情不是被想象出来的；苏格拉底的所作所为，没有人怀疑，它们却不如耶稣基督的事迹确凿。至多，你只是遇到了自己的难题；几个人答应一起杜撰出这样一本书，比说这本书是以一个人的事迹为主题更加难以置信。这个故事的语调和道德不是任何一个犹太作者所写出来的，福音也确实包含着如此伟大、如此震撼、无法仿效的人物，以致他们所写的书会比书中的英雄更令人惊异。尽管如此，这个福音充满了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些事情违背理智，无法被任何明智的人能够理解和接受。对于如此多的矛盾，你能做什么呢？我的孩子，你能谦虚谨慎；对于你既不能反对又不能理解的事物，要默默尊敬，在那唯一知道真理的神圣的存在面前，你要谦卑。我并不情愿持有怀疑，但它并不使我感到痛苦，因为它不涉及实践的问题，而且我非常坚定地恪守我所有责任中的原则。我以朴素的心敬奉上帝，只试图了解是什么影响了我的行为。有些教条对人们的行为和道德观没有任何影响，只是使人们为其自我折磨，对于这样的教条，我从不留心。我将所有的个人宗教都视作健全的机构。它们在每一个国家为公众规定了统一的方式敬奉上帝。它们每一个在国家、政府、民族天才，或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使人们在这些宗教中做出选择的原因中都找到了它的理由。我认为只要以适当的方式敬奉上帝，它们都同样是优秀的宗教。真正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任何形式的崇拜，只要是心怀诚意，上帝便不会拒绝。在我信仰的宗教里，当我被召唤去为教会服务时，我会尽我所能，一丝不苟地履行所有规定的义务。如果我出于任何原因故意少做了什么，我的良心就会受到谴责。你知道，在停职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德·默拉勒德先生的影响，我获得准许继续担任牧

师，以此作为一种生计。我曾经在做弥撒时很轻率。因为我有长期的经验，即使是最严肃的事情，我对此也非常熟悉。现在我有了新的原则，变得十分恭敬。我凝思上帝的庄严权威，凝思他的存在，凝思人类心灵的不足，对它的创造者所知甚少。当我想到我要以一定的形式将人们的祈祷展现给他时，我便仔细准确地进行整个仪式。我十分注意我说的话，仔细地不遗漏任何一个字或是仪式的任何一个环节。当祭献时刻临近，我全神贯注地完成教会和圣礼的要求。在这最高智慧面前，我力求消除自己的理智。我对自己说："你如何能衡量这无穷的力量？"我虔诚地诵读圣礼的颂词，我坚信它能够产生的巨大效果。无论这无法理解的神秘之物是什么，我都不害怕我会因对其不敬而在审判日遭受惩罚。

Honoured with the sacred ministry, though in its lowest ranks, I will never do or say anything which may make me unworthy to fulfil these sublime duties. I will always preach virtue and exhort men to well-doing; and so far as I can I will set them a good example. It will be my business to make religion attractive; it will be my business to strengthen their faith in those doctrines which are really useful, those which every man must believe; but, please God, I shall never teach them to hate their neighbour, to say to other men, You will be damned; to say, No salvation outside the Church. [1_26] If I were in a more conspicuous position, this reticence might get me into trouble; but I am too obscure to have much to fear, and I could hardly sink lower than I am. Come what may, I will never blaspheme the justice of God, nor lie against the Holy Ghost.

尽管我的职位是最低的，但担任神职的荣耀，足以使我不做、不说任何使我配不上这高尚职责的事。我会时常布道美德，劝告人们行善举，并且我会竭尽所能为他们树立好的榜样，以身作则。使宗教变

得吸引人将会是我的职责；坚定人们对于教条的信仰，因为它们非常有用，每一个人都必须信奉。但是，上帝啊，我绝对不会教他们憎恶邻里，绝不会让他们对别人说："你将受到诅咒"，也不会教他们说："教会之外无救赎" [2_26] 。如果我处在一个更惹人注目的位置，这种含蓄就有可能为我招致灾祸；但我职位实在太低，所以无所畏惧。我不可能比现在的职位更卑微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亵渎上帝的公平正义，也不会向圣灵撒谎。

"I have long desired to have a parish of my own; it is still my ambition, but I no longer hope to attain it. My dear friend, I think there is nothing so delightful as to be a parish priest. A good clergyman is a minister of mercy, as a good magistrate is a minister of justice. A clergyman is never called upon to do evil; if he cannot always do good himself, it is never out of place for him to beg for others, and he often gets what he asks if he knows how to gain respect. Oh! if I should ever have some poor mountain parish where I might minister to kindly folk, I should be happy indeed; for it seems to me that I should make my parishioners happy. I should not bring them riches, but I should share their poverty; I should remove from them the scorn and opprobrium which are harder to bear than poverty. I should make them love peace and equality, which often remove poverty, and always make it tolerable. When they saw that I was in no way better off than themselves, and that yet I was content with my lot, they would learn to put up with their fate and to be content like me. In my sermons I would lay more stress on the spirit of the gospel than on the spirit of the church; its teaching is simple, its morality sublime; there is little in it about the practices of religion, but much about works of charity. Before I teach them what they ought to do, I would try to practise it myself, that they might see that at least I think what I say. If there were Protestants in the neighbourhood or in my parish, I would mak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my own congregation so far as concerns Christian charity; I would get them to love one another, to consider themselves brethren, to respect all religions, and each to live peaceably in his own religion. To ask any one to abandon the religion in which he was born is, I consider, to ask him to do wrong, and therefore to do wrong oneself. While we await further knowledge, let us respect public order; in every country let us respect the laws, let us not disturb the form of worship prescribed by law; let us not lead its citizens into disobedience; for we have no certain knowledge that it is good for them to abandon their own opinions for others,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are quite certain that it is a bad thing to disobey the law.

“我一直都渴望拥有自己的教区，现在也是如此，但我已经不再期望能够实现它了。我亲爱的朋友，我认为再没有什么能比做一名教区牧师更令人愉悦的了。一个好的牧师是仁慈的化身，正如一个好的地方法官是公正的化身。一名牧师从不会被召唤去做坏事。如果他不能一直亲自行善，他可以恳求他人去做。如果他知道如何赢得尊重，他就能得到他需要的东西。哦！如果我能在贫困的山区里服务于这些和善的人们，我真的会非常开心。因为这让我觉得我能够给我的教民带来快乐。我不会为他们带来财富，但我会分担他们的贫困，使他们免受轻视和羞辱，因为屈辱比起贫苦更让人难以承受。我会让他们热爱和平，追求平等。因为这能够消除贫困，会使贫困也变得足以忍受。当他们发现我并不比他们富有，却仍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他们就学着接受自己的命运安排，并像我一样对生活感到满意。在我的布道中，我会更强调福音书的精神，而非教会精神。它的教导简单易懂，教义高深，其中更多的是有关于慈善行为，而非宗教行为。在我教会他们该做什么之前，我会自己先试着实践，这样他们至少会看到我想的和我说的是一致的。如果在周边地区或者我的教区里有新教徒，在基督教慈善事业上，我不会将他们和我的教民区别对待。我会让他们彼此友爱，情同兄弟，尊重所有的宗教，并在自己信仰的宗教

中和平地生活。我认为，让一个人丢弃他与生俱来的信仰，就是让他去做错事，也就等于我自己在做错事。当我们寻求更深刻的见解，我们要维持公共秩序，尊重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破坏法律规定的崇拜形式。我们不能教唆那个国家的公民违抗法律。因为我们无从确定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意见而接受他人的意见对他们来说是否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非常确定违背法律一定是一件坏事。

“My young friend, I have now repeated to you my creed as God reads it in my heart; you are the first to whom I have told it; perhaps you will be the last. As long as there is any true faith left among men, we must not trouble quiet souls, nor scare the faith of the ignorant with problems they cannot solve, with difficulties which cause them uneasiness, but do not give them any guidance. But when once everything is shaken, the trunk must be preserved at the cost of the branches. Consciences, restless, uncertain, and almost quenched like yours, require to be strengthened and aroused; to set the feet again upon the foundation of eternal truth, we must remove the trembling supports on which they think they rest.

“我年轻的朋友啊，我已经按照上帝在我心中播撒的信条向你复述过了，你是我第一个告诉的人，或许也将是最后一个。只要人们心中尚存诚挚的信仰，我们就不能打扰这些安静的灵魂，也不能用一些人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动摇他们的信仰，这些困难无法给他们任何启示，反而会使他们感到不安。但是一旦一切都动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牺牲树枝来保护树干。像你这样焦虑不安的、不确定的、几乎快要冷却的良心，亟需被唤醒和加强。我们必须移除他们自认为倚靠着的，摇摇欲坠的支柱，重新将其建立在永恒的真理之上。

“You are at that critical age when the mind is open to conviction, when the heart receives its form and character, when we decide our own fate for life, either for good or evil. At a later date, the material has hardened and fresh impressions leave no trace. Young man, take the stamp of truth upon your heart which is not yet hardened, if I were more certain of myself, I should have adopted a more decided and dogmatic tone; but I am a man ignorant and liable to error; what could I do? I have opened my heart fully to you; and I have told what I myself hold for certain and sure; I have told you my doubts as doubts, my opinions as opinions; I have given you my reasons both for faith and doubt. It is now your turn to judge; you have asked for time; that is a wise precaution and it makes me think well of you. Begin by bringing your conscience into that state in which it desires to see clearly;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Take to yourself such of my opinions as convince you, reject the rest. You are not yet so depraved by vice as to run the risk of choosing amiss. I would offer to argue with you, but as soon as men dispute they lose their temper; pride and obstinacy come in, and there is an end of honesty. My friend, never argue; for by arguing we gain no light for ourselves or for others. So far as I myself am concerned, I have only made up my mind after many years of meditation; here I rest, my conscience is at peace, my heart is satisfied. If I wanted to begin afresh the examination of my feelings, I should not bring to the task a purer love of truth; and my mind, which is already less active, would be less able to perceive the truth. Here I shall rest, lest the love of contemplation, developing step by step into an idle passion, should make me lukewarm in the performance of my duties, lest I should fall into my former scepticism without strength to struggle out of it. More than half my life is spent; I have barely time to make good use of what is left, to blot out my faults by my virtues. If I am mistaken, it is against my will. He who reads my inmost heart knows that I have

no love for my blindness. As my own knowledge is powerless to free me from this blindness, my only way out of it is by a good life; and if God from the very stones can raise up children to Abraham, every man has a right to hope that he may be taught the truth, if he makes himself worthy of it.

“你处在一个关键的年龄段，这时你的思想容易接受任何真理、你的心灵逐渐形成自己的形态和特点。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决定未来的命运：向善或行恶。此后，你的心灵就会变得坚硬，新的感受就无法在你的心灵留下印记。年轻人，在你那还未变得麻木的心上刻上真理的印记吧。要是我对自己更加确定的话，我就会采用更坚定教条的语气和你说话了。但是我是一个无知且容易犯错的人，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已经对你敞开心扉，告诉你我确信的事情。我把我的怀疑和观点也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同时也告诉你我这样认为的理由。现在轮到你来做判断了。你要求更多的时间，这种谨慎是非常明智的，这使我对你颇有好评。最开始，你得让你自己的良心有一种洞悉事物的渴望，对自己要诚实。在我告诉你的观点中，你信服的就接受消化，其余的就拒绝接受。你还没有被恶习沾染得太过堕落，还不至于冒险做出错误的选择。我会与你讨论，但是一旦人们争论起来，就会情绪失控，就会受到傲气和顽固的影响，无法坦诚相待。我的朋友，千万不要争论，因为我们并不能通过争辩为自己和他人获得启迪。就拿我自己来说，在思考多年之后，我才下定决心。现在我一直坚持我的看法，我的良心感到平静，我的心灵感到满足。如果我想开始重新审视我的感觉，我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对真理产生更纯粹的爱；我的心灵也已经不再那么活跃了，无法那样理解真理。我会一直这样保持，生怕我对于沉思的爱和热情会逐渐冷却，使我在履行职责时有所懈怠；也以免我陷入之前的怀疑之中无法自拔。我人生的大半已经逝去，我几乎没有太多剩下的时间来让我充分利用，也没有时间用我的德行来弥补我的过错。如果我做错了，这也并非是我的意志使然。知晓我内心深处想法的人就会知道，我讨厌自己的这种盲目无知。由于我的个人智慧过于无力，无法使我摆脱这种无知轻率的状态，因此我唯一的出

路就是努力地生活；如果上帝都可以使石头为亚伯拉罕孕育子孙的话，那么每一个人，只要他使自己配得上，就都有了解真理的权利。

“If my reflections lead you to think as I do, if you share my feelings, if we have the same creed, I give you this advice: Do not continue to expose your life to the temptations of poverty and despair, nor waste it in degradation and at the mercy of strangers; no longer eat the shameful bread of charity. Return to your own country, go back to the religion of your fathers, and follow it in sincerity of heart, and never forsake it; it is very simple and very holy; I think there is no other religion upon earth whose morality is purer, no other more satisfying to the reason. Do not trouble about the cost of the journey, that will be provided for you. Neither do you fear the false shame of a humiliating return; we should blush to commit a fault, not to repair it. You are still at an age when all is forgiven, but when we cannot go on sinning with impunity. If you desire to listen to your conscience, a thousand empty objections will disappear at her voice. You will feel that, in our present state of uncertainty, it is an inexcusable presumption to profess any faith but that we were born into, while it is treachery not to practise honestly the faith we profess. If we go astray, we deprive ourselves of a great excuse before the tribunal of the sovereign judge. Will he not pardon the errors in which we were brought up, rather than those of our own choosing?

“如果我的想法引导你像我一样思考，如果你能够感同身受，如果我们拥有相同的信仰，那么我要给你以下忠告：不要使你的生活被穷苦和绝望而胁迫；不要堕落到把你的生活任由陌生人摆布；也不要再可耻地继续吃那施舍的面包了。回到你自己的国家，重拾你父辈的信仰，用最诚挚的心信奉它，永不舍弃。它非常质朴但却非常神圣。

我认为在世上所有的宗教中，它是最圣洁的，它的教义最合乎理智的。不用操心旅途的花销，我会为你提供。你也不用害怕不体面地回归有多耻辱；做了错事，我们应该感到可耻，但只要能够弥补过错，就不必感到羞耻。在你这个年纪，一切都是可以被原谅的，但是我们不会一直犯错而不受惩罚。只要你渴望听从自己的良心，纵使千百种空洞愚蠢的反对的声音也会消失的。你会发现，像我们目前这样徘徊不定，宁愿信仰别的任何宗教，也不相信我们生来就隶属的宗教，这是不可饶恕的行为。不能诚心诚意地实践我们信奉的宗教，这是一种背叛行为。倘若我们误入歧途，面对审判庭的最终裁决，我们没有理由获得宽恕。难道他不会原谅我们由于外界因素而犯下的错误，反而会原谅我们自己故意选择犯下的错误吗？

“My son, keep your soul in such a state that you always desire that there should be a God and you will never doubt it. Moreover, whatever decision you come to, remember that the real duties of religion are independent of human institutions; that a righteous heart is the true temple of the Godhead; that in every land, in every sect, to love God above all things and to love our neighbour as ourself is the whole law; remember there is no religion which absolves us from our moral duties; that these alone are really essential, that the service of the heart is the first of these duties, and that without faith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rue virtue.

“我的孩子，让你的灵魂一直处在这样一个状态：永远渴望上帝的存在，并且深信不疑。同时，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都要谨记：宗教真正的义务是独立于人类制度的。一颗正直的心灵是神性真正的殿堂。在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教派，你都要超越一切地热爱上帝，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这是全部法则。记住，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可以使我们免除道德义务；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内心的信奉是第一要务，没有信念，就没有真正的美德。

“Shun those who, under the pretence of explaining nature, sow destructive doctrines in the heart of men, those whose apparent scepticism is a hundredfold more self-assertive and dogmatic than the firm tone of their opponents. Under the arrogant claim, that they alone are enlightened, true, honest, they subject us imperiously to their far-reaching decisions, and profess to give us, as the true principles of all things, the unintelligible systems framed by their imagination. Moreover, they overthrow, destroy, and trample under foot all that men reverence; they rob the afflicted of their last consolation in their misery; they deprive the rich and powerful of the sole bridle of their passions; they tear from the very depths of man's heart all remorse for crime, and all hope of virtue; and they boast, moreover, that they are the benefactors of the human race. Truth, they say, can never do a man harm. I think so too, and to my mind that is strong evidence that what they teach is not true [1_27] . —Bayle has proved very satisfactorily that fanaticism is more harmful than atheism, and that cannot be denied; but what he has not taken the trouble to say, though it is none the less true, is this: Fanaticism, though cruel and bloodthirsty, is still a great and powerful passion, which stirs the heart of man, teaching him to despise death, and giving him an enormous motive power, which only needs to be guided rightly to produce the noblest virtues; while irreligion, and the argumentative philosophic spirit generally, on the other hand, assaults the life and enfeebles it, degrades the soul, concentrates all the passions in the basest self-interest, in the meanness of the human self; thus it saps unnoticed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all society, for what is common to all these private interests is so small that it will never outweigh their opposing interests. —If atheism does not lead to bloodshed, it is less from love of peace than from indifference to what is good; as if it mattered little what happened to others, provided the sage

remained undisturbed in his study. His principles do not kill men, but they prevent their birth, by destroying the morals by which they were multiplied, by detaching them from their fellows, by reducing all their affections to a secret selfishness, as fatal to population as to virtue. The indifference of the philosopher is like the peace in a despotic state; it is the repose of death; war itself is not more destructive. —Thus fanaticism though its immediate results are more fatal than those of what is now called the philosophic mind, is much less fatal in its after effects. Moreover, it is an easy matter to exhibit fine maxims in books; but the real question is—Are they really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teaching, are they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s of it? and this has not been clearly proved so far.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philosophy, safely enthroned, could control successfully man's petty vanity, his self-interest, his ambition, all the lesser passions of mankind, and whether it would practise that sweet humanity which it boasts of, pen in hand. —In theory, there is no good which philosophy can bring about which is not equally secured by religion, while religion secures much that philosophy cannot secure. —In practice, it is another matter; but still we must put it to the proof. No man follows his religion in all things, even if his religion is true; most people have hardly any religion, and they do not in the least follow what they have; that is still more true; but still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have a religion and follow it, at least to some extent; and beyond doubt religious motives do prevent them from wrong-doing, and win from them virtues, praiseworthy actions, which would not have existed but for these motives. —A monk denies that money was entrusted to him; what of that? It only proves that the man who entrusted the money to him was a fool. If Pascal had done the same, that would have proved that Pascal was a hypocrite. But a monk! Are those who make a trade of religion religious people? All the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clergy, as by other men, do not

prove that religion is useless, but that very few people are religious. —Most certainly our modern governments owe to Christianity their more stable authority, their less frequent revolutions; it has made those governments less bloodthirsty; this can be shown by comparing them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former times. Apart from fanaticism, the best known religion has given greater gentleness to Christian conduct. This change is not the result of learning; for wherever learning has been most illustrious humanity has been no more respected on that account; the cruelties of the Athenians, the Egyptians, the Roman emperors, the Chinese bear witness to this. What works of mercy spring from the gospel! How many acts of restitution, reparation, confession does the gospel lead to among Catholics! Among ourselves, as the times of communion draw near, do they not lead us to reconciliation and to alms-giving? Did not the Hebrew Jubilee make the grasping less greedy, did it not prevent much poverty? The brotherhood of the Law made the nation one; no beggar was found among them. Neither are there beggars among the Turks, where there are countless pious institutions; from motives of religion they even show hospitality to the foes of their religion. —" The Mahometans say, according to Chardin, that after the interrogation which will follow the general resurrection, all bodies will traverse a bridge called Poul-Serrho, which is thrown across the eternal fires, a bridge which may be called the third and last test of the great Judgment, because it is there that the good and bad will be separated, etc. —" The Persians, continues Chardin, make a great point of this bridge; and when any one suffers a wrong which he can never hope to wipe out by any means or at any time, he finds his last consolation in these words: 'By the living God, you will pay me double at the last day; you will never get across the Poul-Serrho if you do not first do me justice; I will hold the hem of your garment, I will cling about your knees. ' I have seen many eminent men, of every profession, who for fear lest this hue and cry

should be raised against them as they cross that fearful bridge, beg pardon of those who complained against them; it has happened to me myself on many occasions. Men of rank, who had compelled me by their importunity to do what I did not wish to do, have come to me when they thought my anger had had time to cool, and have said to me; I pray you “Halal becon antchisra,” that is, “Make this matter lawful and right.” Some of them have even sent gifts and done me service, so that I might forgive them and say I did it willingly; the cause of this is nothing else but this belief that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across the bridge of hell until they have paid the uttermost farthing to the oppressed.” —Must I think that the idea of this bridge where so many iniquities are made good is of no avail? If the Persians were deprived of this idea, if they were persuaded that there was no Poul-Serrho, nor anything of the kind, where the oppressed were avenged of their tyrants after death, is it not clear that they would be very much at their ease, and they would be freed from the care of appeasing the wretched? But it is false to say that this doctrine is hurtful; yet it would not be true. —O Philosopher, your moral laws are all very fine; but kindly show me their sanction. Cease to shirk the question, and tell me plainly what you would put in the place of Poul-Serrho.

“你要避开那些打着解释自然的幌子，实则在人们心中散布破坏性学说的人。这些人表面上充满疑惑，实际上比他们语气强硬的对手都要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百倍。他们自大地声称只有他们才博闻广识，真实诚信；妄自尊大地要求我们服从他们不切实际的决定，接受他们凭空想象的理论作为所有事物真正的原理。此外，他们推翻、摧毁、践踏人类敬畏的一切事物，剥夺苦难的人们最后一丝安慰，铲除对于有钱有势之人欲望的唯一约束，扯去人们内心深处对于罪恶的所有悔恨和对于美德的所有憧憬。同时他们又吹嘘自己的是人类的施恩者。他们说，真理，绝不会对人类有害。我也认同这个观点。然而我

认为，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他们所讲的并非真理[2_27]。——培尔已经非常可靠地证明了狂热崇拜比漠视宗教更可怕，这不可置否。还有一点仍然是正确的，但他没有费心说出来。那就是：狂热崇拜虽然残酷嗜杀，但不失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来唤醒人们的心灵，教会人们漠视死亡，给予人们强大的动力，只是这需要正确的引导使其产生最高尚的美德。而相反，漠视宗教，热爱争辩的的哲学风气，却通常冲击人们的生活，使其变得暗淡无光。它贬低灵魂，在人性的卑鄙阴暗面，使人们只专注于个人利益得失。最后，它在不知不觉中瓦解全社会的基础，因为所有这些个人利益相一致的情况太少了，绝不会同与其对立的利益保持均衡——无神论没有导致流血屠杀，更多的是出于对善的漠视，而非出于对和平的热爱。因为如果那些智者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别人发生的事就好像丝毫不重要一样。无神论虽然并不会造成人类的自相残杀，但其通过破坏人类赖以繁衍的道德基础，使人们分崩离析，使人们变得自私自利，最后危害了人类的繁衍，它对于人口的影响就如同对于美德一样致命。哲人的这种冷漠就如同专制下的和平，是死亡式的平静，甚至比战争的破坏性还要大——因此虽然狂热崇拜的直接后果要比我们现在所谓的“哲学思想”更严重，但是从长远来看，它的影响就微弱得多。此外，在书中侃侃而谈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它们真的和你所吹嘘的是一致的吗？它们是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吗？而这目前并没有被明确证明。哲学安全地取得统治地位后，能否成功控制人们的虚荣心，私欲，野心和所有较小的激情；是否会实践他们所吹嘘的善良人性，这一切都尚待分晓——理论上，宗教可以同样实现哲学能够实现的效果，而很多宗教给人类带来的福利，哲学却无法办到。——就实践上来说，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仍然需要我们去检验。没有人能够事事都遵循宗教，即使他忠实地信仰着这门宗教；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信仰，即使有，他们也绝不跟随他们的信仰做事；还有更真切的事实是：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有人信仰宗教并紧紧跟随；毫无疑问，宗教的动力使他们不做恶，形成美好的品德，行为都值得赞颂，这一切没有这些动力就无法实现——一个教士否认他被委托照看一笔钱，但这有什么用呢？这只证明了那个将钱托付给他的人是个傻瓜。如果帕斯卡也这样做的话，那就证明他是一个伪君子。但是他是一个教士啊！这些以宗

教为职业的人相信宗教吗？教士犯下的罪行，就如其他人所犯下的罪行，无法证明宗教是没用的，却只能证明很少有人是真正有信仰的——最确定的是，现代政府应该感谢基督教，使得它有更稳定的权威，很少革命；基督教使这些政府不那么残忍嗜杀，通过和以往政府的比较就可以看出来。除去宗教的狂热崇拜不谈，这最有名的宗教使基督徒的行为更温和了。这种改变不是文化的结果，因为无论在哪儿，文化都是最璀璨的，但人性却没有受到更多的尊重；雅典人、印度人、罗马皇帝、中国人的残酷行径都为这一点作了证明。在福音书的指导下，美德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啊！又有多少天主教徒在表白信仰之后进行补救和忏悔了呢！在我们之中，随着圣餐仪式临近，他们没有带领我们放下怨恨，帮助穷人吗？希伯来五十年的仪式没有使人们变得不再贪婪吗？没有减少贫穷吗？摩西律法中提倡的团结友爱使得整个民族团结一体，在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乞丐。土耳其也没有一个乞丐，因为在土耳其，虔诚的宗教团体数不胜数；由于宗教的教义，他们即使对宗教的敌人也慷慨大方——据夏尔丹说，“回教徒认为，人类在经过大复活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考验。在这之后，所有人都要通过“报塞桥”，它横跨在永恒火焰之上，可以被称为大审判的第三个和最后一个考验。。因为就是在那里，好人坏人开始分开”——夏尔丹继续说，“波斯人很相信这座桥。当有人遭受了厄运，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无论在什么时间，都没有办法摆脱的厄运，他最后的安慰就是这些话：‘以活神为证，在审判的最后一天，你要给我双倍补偿；如果你不先补偿我，你就无法通过报塞桥；我要拉住你的衣角，抱紧你的双腿。’我见过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为了防止自己在通过这座可怕的桥时大声哭喊，就会请求那些与他们有仇怨的人原谅他们；这样的情形，我自己就遇到过很多次。一些身份显赫的人，曾经强迫我去做我不愿意的事，这个时候就会来找我，他们认为我的怒气已消，就会对我说：‘让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吧。’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还给我送礼物，为我服务，从而让我原谅他们，说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最大限度地补偿那些曾经受过他们压迫的人，他们才能通过那座地狱的桥”——既然这座桥能够使这么多极端不公平的事情都得以解决，为什么不能对这个观念加以利用呢？如果波斯人没有了这个观念，如果他们被说服报塞桥之类的东西根本就不

存在，帮那些被压迫的人在施暴者死后报仇，那那些施暴者就会过得心安理得，安全不用考虑安抚那些悲惨的人。我们不能说这条教义是伤害感情的，但这是不正确的——哲学家们，你们的道德准则是非常美好的，但是请真诚地告诉我，有谁认可了它们。不要再逃避这个问题了，如实告诉我你用什么代替报塞桥。

“My good youth, be honest and humble; learn how to be ignorant, then you will never deceive yourself or others. If ever your talents are so far cultivated as to enable you to speak to other men, always speak according to your conscience, without oaring for their applause. The abuse of knowledge causes incredulity. The learned always despise the opinions of the crowd; each of them must have his own opinion. A haughty philosophy leads to atheism just as blind devotion leads to fanaticism. Avoid these extremes; keep steadfastly to the path of truth, or what seems to you truth, in simplicity of heart, and never let yourself be turned aside by pride or weakness. Dare to confess God before the philosophers; dare to preach humanity to the intolerant. It may be you will stand alone, but you will bear within you a witness which will make the witness of men of no account with you. Let them love or hate, let them read your writings or despise them; no matter. Speak the truth and do the right; the one thing that really matters is to do one's duty in this world; and when we forget ourselves we are really working for ourselves. My child, self-interest misleads us; the hope of the just is the only sure guide.”

“优秀的年轻人，做人要谦逊诚实，学会在一切事物面前都保有一份无知，这样你才不会欺骗自己或他人。如果你的才学足够丰富，使你能够向他人表达的看法，你也要遵循你的良心，而不是为了赢得他人的喝彩。滥用知识会产生怀疑。博学的人总是看不起普通大众的

观点；他们每一个人一定都有自己的看法。傲慢的哲学会导致无神论，就像盲目的信仰会导致狂热的崇拜。避免这些极端情况，你要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或者说在你纯粹的心中认为的是真理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绝不能使自己因为自满或者软弱而背弃这条道路。要敢于在哲学家面前承认上帝，也敢于在心胸狭窄的人面前宣扬道义。这可能会使你孤立无援，但是在你心中会有一个见证，使得你无需他人的见证。任由他们喜欢或是讨厌你，任由他们阅读你的作品或是轻视你的作品，无须在意。说真实的话，做正确的事；对一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世上要履行自己的义务，当我们忘却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真正在为自己做事。我的孩子，私心会误导我们；对于正义的希望才是我们唯一确定的指向标。”

I have transcribed this document not as a rule for the sentiments we should adopt in matters of religion, but as an example of the way in which we may reason with our pupil without forsaking the method I have tried to establish. So long as we yield nothing to human authority, nor to the prejudices of our native land, the light of reason alone, in a state of nature, can lead us no further than to natural religion; and this is as far as I should go with Emile. If he must have any other religion, I have no right to be his guide; he must choose for himself.

我抄录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设定规则，让大家对待宗教问题时都采用，而是希望以此为例，告诉大家在向学生解释时，如何才能采取我试图建立的方法。只要我们不屈服于人类权威，也不屈从于本土的偏见，在自然状态下，仅凭理性的光芒就能使我们不远离自然宗教，我也要向爱弥儿讲解到这里为止。如果他必须信仰别的宗教，我没有权利再去指导他；他必须自己做出选择。

We are working in agreement with nature, and while she is shaping the physical man, we are striving to shape his moral being, but we do not make the same progress. The body is already strong and vigorous, the soul is still frail and delicate, and whatever can be done by human art, the body is always ahead of the mind. Hitherto all our care has been devoted to restrain the one and stimulate the other, so that the man might be as far as possible at one with himself. By developing his individuality, we have kept his growing susceptibilities in check; we have controlled it by cultivating his reason. Objects of thought moderate the influence of objects of sense. By going back to the causes of things, we have withdrawn him from the sway of the senses; it is an easy thing to raise him from the study of nature to the search for the author of nature.

我们与自然和谐共处，当她在塑造人的形体时，我们也力图塑造他的道德品性，但是我们的进度是不同的。身体已经非常强壮有力了，但是灵魂仍然脆弱不堪。不论人类艺术可以做到什么，身体比心灵永远先行一步。迄今为止，我们竭尽全力抑制心灵，而刺激身体的发育，以此使人尽可能地保持一致。在发展他的个性时，我们约束他日渐增长的感情的脆弱，通过培养理性对其加以控制。思想的对象削弱了感觉的对象的影响。追溯到事物的原因，我们使他摆脱了感觉的支配，这样就容易使他由研究自然向探索自然的创造者转变。

When we have reached this point, what a fresh hold we have got over our pupil; what fresh ways of speaking to his heart! Then alone does he find a real motive for being good, for doing right when he is far from every human eye, and when he is not driven to it by law. To be just in his own eyes and in the sight of God, to do his duty, even at the cost of life itself, and to bear in his heart virtue, not only for the love of order which we all subordinate to

the love of self, but for the love of the Author of his being, a love which mingles with that self-love, so that he may at length enjoy the lasting happiness which the peace of a good conscience and the contemplation of that supreme being promise him in another life, after he has used this life aright. Go beyond this, and I see nothing but injustice, hypocrisy, and falsehood among men; private interest, which in competition necessarily prevails over everything else, teaches all things to adorn vice with the outward show of virtue. Let all men do what is good for me at the cost of what is good for themselves; let everything depend on me alone; let the whole human race perish, if needs be, in suffering and want, to spare me a moment's pain or hunger. Yes, I shall always maintain that whoso says in his heart, “There is no God,” while he takes the name of God upon his lips, is either a liar or a madman.

当我们到达这种境地时，我们就会有新的方法来控制学生，有新的方式使他们心悦诚服！这样当他独自一人时，他才能有做好人、行善事的真正动力，而不是由于他人的监管或是法律的驱动而决定。在自己和上帝的眼中做到公正合理，即使牺牲生命也要履行自己的天职，将美德铭记于心。这样做不仅是出于对秩序的爱，每个人都爱自己，而且也是出于对造物者的爱，这份爱也融合了对于自己的爱。这样，他才能最终在这一世尽情地享受长久的幸福，拥有良心的宁静和深沉的思考。而在正确地度过这一世之后，上帝也允诺他在来生也可以享受这永恒的幸福。如若不这样做，我看到人类中就只有不公、虚伪和欺骗；个人私利就必定会在所有的竞争中超越一切，将所有的恶习都用外在的美德加以粉饰。让人们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满足我的利益；让一切事物依附于我；如果必要的话，让全人类在痛苦和欲望中毁灭，这样我就不会忍受片刻的痛苦和饥饿。是的，我会永远坚持我的看法：无论是谁在心里说“上帝是不存在的”，可他嘴里却说着上帝的名字。这样的人，不是骗子就是疯子。

Reader, it is all in vain; I perceive that you and I shall never see Emile with the same eyes; you will always fancy him like your own young people, hasty, impetuous, flighty, wandering from fete to fete, from amusement to amusement, never able to settle to anything. You smile when I expect to make a thinker, a philosopher, a young theologian, of an ardent, lively, eager, and fiery young man, at the most impulsive period of youth. This dreamer, you say, is always in pursuit of his fancy; when he gives us a pupil of his own making, he does not merely form him, he creates him, he makes him up out of his own head; and while he thinks he is treading in the steps of nature, he is getting further and further from her. As for me, when I compare my pupil with yours, I can scarcely find anything in common between them. So differently brought up, it is almost a miracle if they are alike in any respect. As his childhood was passed in the freedom they assume in youth, in his youth he begins to bear the yoke they bore as children; this yoke becomes hateful to them, they are sick of it, and they see in it nothing but their masters' tyranny; when they escape from childhood, they think they must shake off all control, they make up for the prolonged restraint imposed upon them, as a prisoner, freed from his fetters, moves and stretches and shakes his limbs [1_28] . Emile, however, is proud to be a man, and to submit to the yoke of his growing reason; his body, already well grown, no longer needs so much action, and begins to control itself, while his half-fledged mind tries its wings on every occasion. Thus the age of reason becomes for the one the age of licence; for the other, the age of reasoning.

读者啊，这一切都是徒劳；我理解你们和我永远都不会从同一个角度看待爱弥儿；你们总是会像看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想象他：草率、冲动、沉醉于酒宴和娱乐之中，对任何事情都缺乏恒心和定力。当我

想要在一个年轻人最好的年华将他从一个热情洋溢、生机勃勃的青年培养为一名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时，你们笑了。你们会说，这个做梦的人永远追求自己想象的东西；当他要培养学生时，他不仅仅是塑造他，而是在创造他，从他的脑子里创造一个学生。他以为自己是遵循自然的规律培养学生，其实是离自然越来越远。对我来说，将我的学生和你的学生相比，我觉得他们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他们的培养方式截然不同，如果他们在任何一方面有所相似的话，那真是一个奇迹。爱弥儿的童年是非常自由的。这样的自由，你的学生在青年时期才能享有。当爱弥儿到青年时期，他开始受到你的学生儿童时期就受到的约束。你的学生只将这些束缚视作老师的专制，对其非常厌恶。当他们脱离儿童时期，他们觉得必须极力摆脱这些控制，想尽办法弥补长期强加于他们的拘束所带来的损失。正如一个囚犯被释放之后，就会挣脱镣铐，活动四肢 [2_28] 。然而，爱弥儿却为自己长大成人而感到骄傲，为顺从于成长中的约束而感到自豪；他的身体已经成熟，不需要太多的运动，开始学会控制自己。但是他的心境并没有完全成熟，因此寻求快速发展。因此对你的学生来说，有了理性的年纪意味着可以放纵；可对于爱弥儿而言，这意味着理性地思考。

Would you know which of the two is nearer to the order of nature! Consid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ose who are more or less removed from a state of nature. Observe young villagers and see if they are as undisciplined as your scholars. The Sieur de Beau says that savages in childhood are always active, and ever busy with sports that keep the body in motion; but scarcely do they reach adolescence than they become quiet and dreamy; they no longer devote themselves to games of skill or chance. Emile, who has been brought up in full freedom like young peasants and savages, should behave like them and change as he grows up. The whole difference is in this, that instead of merely being active in sport or for food, he has, in the course of his sports, learned to think. Having reached this stage, and by this road, he is quite ready to enter upon the next

stage to which I introduce him; the subjects I suggest for his consideration rouse his curiosity, because they are fine in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are quite new to him, and because he is able to understand them. Your young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are weary and overdone with your stupid lessons, your long sermons, and your tedious catechisms; why should they not refuse to devote their minds to what has made them sad, to the burdensome precepts which have been continually piled upon them, to the thought of the Author of their being, who has been represented as the enemy of their pleasures? All this has only inspired in them aversion, disgust, and weariness; constraint has set them against it; why then should they devote themselves to it when they are beginning to choose for themselves? They require novelty, you must not repeat what they learned as children. Just so with my own pupil, when he is a man I speak to him as a man, and only tell him what is new to him; it is just because they are tedious to your pupils that he will find them to his taste.

你想知道这两种看法哪一种更接近自然秩序吗吗？那就请想一想远离自然状态的人和接近自然状态的人有什么区别吧。你可以观察年轻的村民，看看他们是否像你的学生一样任性妄为。勒博先生说野蛮人在童年时期总是那么活跃，老是做运动将身体保持在亢奋的状态；然而进入青年时期，他们就会变得安静，爱幻想，也不再做一些技巧类或者冒险类的游戏。爱弥儿就像农村小孩儿或者野蛮人，他成长的过程被给予了充分的自由。所以行为举止就和他们相似。而当他逐渐长大，就会发生变化。这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活跃不仅仅是为了运动或是寻找食物，在他活跃的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思考。到了这个阶段之后，通过这条道路，他就已经准备好随时进入我为他指引的下一阶段；我建议他思考的那些问题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很有趣，对他来说满是新奇，他也足够有能力去理解他们。而另一方面，你的孩子们却被你那些无聊的功课、冗长的说教和单调的

问题压垮了；如此一来，他们又如何能不拒绝接受这些感觉糟糕的东西，怎能不拒绝这些强加于他们的繁重的规矩，怎能不拒绝思考他们的创造者？因为你们已经将造物者塑造为剥夺他们快乐的敌人了。这一切只能使他们心生厌恶、反感和消沉；过多的约束使得他们极度反抗；那当他们开始自行选择时，他们将何去何从？他们需要的是新鲜事物，你绝不能重复他们在儿时就学到的东西。我的学生也是这样，当他是个大人的时候，我就像与大人交谈一样与他对话，只谈论对他来说新奇的事物；这是因为你的学生觉得厌烦的东西，我的学生觉得正合他的口味。

This is how I doubly gain time for him by retarding nature to the advantage of reason. But have I indeed retarded the progress of nature? No, I have only prevented the imagination from hastening it; I have employed another sort of teaching to counterbalance the precocious instruction which the young man receives from other sources. When he is carried away by the flood of existing customs and I draw him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by means of other customs, this is not to remove him from his place, but to keep him in it.

这就是我如何加倍为他争取时间，来推迟天性的发展，从而给他的理性以发展空间。但是我真的延缓了天性的发展吗？并没有，我只是阻止了想象力对它的加速作用；我采用另一种教学方法来平衡他之前通过其他渠道接受的教育。当他被现存的习俗潮流带走的时候，我借助于其他习俗将他拉往相反的方向，这不是使他远离他原来的位置，而是使他更好地存在其中。

Nature's due time comes at length, as come it must. Since man must die, he must reproduce himself, so that the species may

endure and the order of the world continue. When by the signs I have spoken of you perceive that the critical moment is at hand, at once abandon for ever your former tone. He is still your disciple, but not your scholar. He is a man and your friend; henceforth you must treat him as such.

自然的期限终究是会来的，它是一定会来的。因为人终有一死，他就必须繁衍，这样种族才能够延续下去，世界秩序才会持续下去。通过我告诉过你的迹象，当你觉察到这一关键性时刻就要到来的时候，你应该立即摈弃你之前的那种腔调。他依旧是你的追随者，但不再是你的学生。他是一个成人，是你的朋友；从今以后你就应该这样看待他。

What! Must I abdicate my authority when most I need it? Must I abandon the adult to himself just when he least knows how to control himself, when he may fall into the gravest errors! Must I renounce my rights when it matters most that I should use them on his behalf? Who bids you renounce them; he is only just becoming conscious of them. Hitherto all you have gained has been won by force or guile; authority, the law of duty, were unknown to him, you had to constrain or deceive him to gain his obedience. But see what fresh chains you have bound about his heart. Reason, friendship, affection, gratitude, a thousand bonds of affection, speak to him in a voice he cannot fail to hear. His ears are not yet dulled by vice, he is still sensitive only to the passions of nature. Self-love, the first of these, delivers him into your hands; habit confirms this. If a passing transport tears him from you, regret restores him to you without delay; the sentiment which attaches him to you is the only lasting sentiment, all the rest are fleeting and self-effacing. Do not let him become corrupt, and he will always be docile; he will not

begin to rebel till he is already perverted.

什么！当我最需要权威的时候，难道要我放弃它吗？当成年人对于如何控制自己感到最手足无措，很有可能犯下严重错误的时候，难道要我对他不管不顾，任由其自生自灭吗？当我最需要以他的名义行使我的权利时，难道要我放弃我的权利吗？谁说要你放弃它们呢；他只是刚开始意识到它们而已。直至目前，你所获得的一切都是通过强制或是欺骗的手段；他对权威、法律义务一无所知，因此你必须通过强制或是欺骗的手段使他服从。但是你看，你都用了什么新的链条来锁住他的心啊。理智、友谊、喜爱，感激，千千万万的情感纽带都在用他一定能够理解的声音向他诉说。目前他的耳朵并没有被恶习弄得迟钝，他仍旧只是对自然感情感到敏感。自爱，第一个自然感情，使他将自己送到你的手中，他的习惯也使得他确认了这一点。如果短暂的迷失使他远离你，悔恨之情会立即将他拉回你的身边；这种将你们俩牵连在一起的感情是唯一长久的感情，其余的都是转瞬即逝、轻描淡写的。不要让他变得堕落，这样他才会一直顺从于你；否则，一旦他堕落了，他就会开始反抗你。

I grant you, indeed, that if you directly oppose his growing desires and foolishly treat as crimes the fresh needs which are beginning to make themselves felt in him, he will not listen to you for long; but as soon as you abandon my method I cannot be answerable for the consequences. Remember that you are nature's minister; you will never be her foe.

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直接反对他日益强烈的欲望，并且愚蠢地把他自我感知到的新的需求认为是犯罪的话，他是不会长久顺从于你的。而你一旦放弃我的方法，那我对其造成的后果不负任何责任。记住，你是大自然的使者，你永远不会与她为敌。

But what shall we decide to do? You see no alternative but either to favour his inclinations or to resist them; to tyrannise or to wink at his misconduct; and both of these may lead to such dangerous results that one must indeed hesitate between them.

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要么你就支持或者压制他的发展倾向；要么你就施以暴政或者对他的有失偏颇的言行视而不见；这些都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因此在真正实行的时候，必须有所顾虑。

The first way out of the difficulty is a very early marriage; this is undoubtedly the safest and most natural plan. I doubt, however, whether it is the best or the most useful. I will give my reasons later; meanwhile I admit that young men should marry when they reach a marriageable age. But this age comes too soon; we have made them precocious; marriage should be postponed to maturity.

想要摆脱这一困境，第一个办法就是尽早结婚；这无疑是最安全最自然的方法了。但是我却怀疑这是不是最好、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之后会给出理由；同时我承认年轻人到了适婚年龄就应该结婚。但是这一年纪来的太早了；我们使他们变得早熟，而婚姻应该在他们发育成熟时才能进行。

If it were merely a case of listening to their wishes and following their lead it would be an easy matter; but there are so many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rights of nature and the laws of society that to conciliate them we must continually contradict ourselves. Much art is required to prevent man in society from

being altogether artificial.

如果这仅仅是聆听他们的愿望，任由他们发展，事情会变得非常简单；但是，在自然权利和社会法律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如果我们想要调和这些矛盾，就要不断地违背自己的意愿。人们需要很多技巧、艺术才能使自己在社会中不至于变得非常虚伪。

For the reasons just stated, I consider that by the means I have indicated and others like them the young man's desires may be kept in ignorance and his senses pure up to the age of twenty. This is so true that among the Germans a young man who lost his virginity before that age was considered dishonoured; and the writers justly attribute the vigour of constitution and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mong the Germans to the continence of these nations during youth.

鉴于上述理由，我认为通过我阐述的方法以及其他相似的方法，会使年轻人在二十岁之前的欲望都是纯洁的，他的官能也是纯洁的。确实如此：在日耳曼人中，一个年轻人在适当的年龄之前失去了贞操，是会遭人诟病的；作家们则将日耳曼人体格健壮，子嗣众多归因于他们在青年时期是禁欲的。

This period may be prolonged still further, and a few centuries ago nothing was more common even in France. Among other well-known examples, Montaigne's father, a man no less scrupulously truthful than strong and healthy, swore that his was a virgin marriage at three and thirty, and he had serv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Italian wars. We may see in the writings of his son what

strength and spirit were shown by the father when he was over sixty. Certainly the contrary opinion depends rather on our own morals and our own prejudices than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race as a whole.

这一阶段甚至会延续更长时间，几个世纪以前，即使在法国这也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在其他著名的事例中，以蒙田的父亲为例。他一丝不苟，为人诚实，身体也非常强壮健康。在意大利战争中服役很长一段时间后，他发誓要在三十三岁的时候以处男的身份结婚。我们可以在他儿子的作品中了解到，他父亲在年逾六十之后，仍然展现出多么旺盛的精力和愉快的情绪。当然，不赞同我的人会认为这是由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和自身的成见所决定的，而不是基于整个民族的经验。

I may, therefore, leave on one side the experience of our young people; it proves no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educated in another fashion. Considering that nature has fixed no exact limits which cannot be advanced or postponed, I think I may, without going beyond the law of nature, assume that under my care Emil has so far remained in his first innocence, but I see that this happy period is drawing to a close. Surrounded by ever-increasing perils, he will escape me at the first opportunity in spite of all my efforts, and this opportunity will not long be delayed; he will follow the blind instinct of his senses; the chances are a thousand to one on his ruin. I have considered the morals of mankind too profoundly not to be aware of the irrevocable influence of this first moment on all the rest of his life. If I dissimulate and pretend to see nothing, h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my weakness; if he thinks he can deceive me, he will despise me, and I become an accomplice in his destruction. If I try to recall him, the time is past, he no longer heeds me, he finds me tiresome, hateful, intolerable; it will not be long before he is rid

of me. There is therefore only one reasonable course open to me; I must make him accountable for his own actions, I must at least preserve him from being taken unawares, and I must show him plainly the dangers which beset his path. I have restrained him so far through his ignorance; henceforward his restraint must be his own knowledge.

因此，我先抛开我们年轻人的经验不谈。这对于用另一种方式教育出来的人来说不明所以。介于大自然并未规定不能提前或者延后的确切期限，我认为我可以说在不违背自然法则的前提下，爱弥儿在我的教育下已经保留了他最初的纯真，但我认为这一快乐的时期快要终结了。置身于日益加剧的危险之中，无论我作何努力，他一有机会就会从我这儿逃离，而这个机会也即将到来；他会跟随他盲目的直觉，而他能够免于毁灭的几率是千分之一。我对于人类道德做过极其深刻的思考，所以一看到开始的一刹那就能够意识到对他的一生产生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如果我强装镇定，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他会趁机利用我的这个缺点；如果他认为他能够欺骗我，他就会轻视我，那么我就成为了促使他堕落的帮凶。如果我设法唤回他，为时已晚，他将不再需要我，对我生厌，认为我无法忍受；很快他就会摆脱我。因此，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合理的办法；我必须让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至少必须防止他在无意识下犯错，清楚地向他展示前进道路上包围他的那些危险。目前为止，我已经利用他的无知约束了他；自此以后，他必须依靠他自己的知识约束自己。

This new teaching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we will take up our story where we left it. This is the time to present my accounts, to show him how his time and mine have been spent, to make known to him what he is and what I am; what I have done, and what he has done;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all his moral relations, all the undertakings to which he is pledged, all those to

which others have pledged themselves in respect to him; the stage he has reach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faculties, the road that remains to be travelled, the difficulties he will meet, and the way to overcome them; how I can still help him and how he must henceforward help himself; in a word, the critical time which he has reached, the new dangers round about him, and all the valid reasons which should induce him to keep a close watch upon himself before giving heed to his growing desires.

这新的教育方式是很重要的，让我们接着再来谈谈我们的故事。是时候向他陈述我所做的一切了，向他展示他的时间和我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向他解释他是怎样一个人，我是怎样一个人，我做了些什么，他做了些什么；我们彼此还相欠什么；向他阐释他所有的伦理关系，他向别人做出的所有承诺以及别人向他做出的承诺；向他说明他的能力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他坚持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他会遇到哪些困难，如何才能克服；告诉他我会如何帮助他，但是得让他明白从今以后他必须依靠自己，总而言之，让他明白他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周围都是新的危险，向他解释所有的理由，让他明白应该时刻留心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

Remember that to guide a grown man you must reverse all that you did to guide the child. Do not hesitate to speak to him of those dangerous mysteries which you have so carefully concealed from him hitherto. Since he must become aware of them, let him not learn them from another, nor from himself, but from you alone; since he must henceforth fight against them, let him know his enemy, that he may not be taken unawares.

记住，教育一个成年人，你必须采用和教育儿童截然不同的办

法。要毫不犹豫地告诉他那些你之前那么小心地隐藏起来的危险的秘密。因为他必须要对其有所了解，不要让他从别人那儿知道，也不能让他自己去了解，只能从你这儿知道；因为之后他必须与这些危险做斗争，让他了解自己的敌人，才不至于被打个措手不及。

Young people who are found to be aware of these matters, without our knowing how they obtained their knowledge, have not obtained it with impunity. This unwise teaching, which can have no honourable object, stains the imagination of those who receive it if it does nothing worse, and it inclines them to the vices of their instructors. This is not all; servants, by this means, ingratiate themselves with a child, gain his confidence, make him regard his tutor as a gloomy and tiresome person; and one of the favourite subjects of their secret colloquies is to slander him. When the pupil has got so far, the master may abandon his task; he can do no good.

年轻人中有些对这些事非常了解，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了解到的，而要了解这些事情，一定也是遭受过折磨的。这种不明智的教育方法，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即使没有造成更糟糕的后果的话，那接受这种教育的人，他们的想象力也会被破坏，这使得他们倾向于沾染施教者的恶习。这不是事情的全部。仆人还会用这种方法迎合孩子，获取他们的信任，这会使得他们认为自己的老师是一个忧郁可恶的人；而且孩子们私下里还会秘密诋毁老师，这是他们最爱的话题之一。当学生做到这个份上的时候，老师就可以放弃不干了，他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

But why does the child choose special confidants? Because of the tyranny of those who control him. Why should he hide himself from them if he were not driven to it? Why should he complain if

he had nothing to complain of? Naturally those who control him are his first confidants; you can see from his eagerness to tell them what he thinks that he feels he has only half thought till he has told his thoughts to them. You may be sure that when the child knows you will neither preach nor scold, he will always tell you everything, and that no one will dare to tell him anything he must conceal from you, for they will know very well that he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但是为什么孩子要选择一些特殊的知己呢？恰恰是由于管教他的人专横地对待他。若不是迫不得已，他又为何处处躲避他们呢？如果他没有什么要抱怨的，他又怎么会怨言不断呢？那些管教他们的人自然是他们最早的知己；你可以发现他是多么渴望向他们倾诉他的想法，直到他倾诉的时候，他还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够成熟。你可以很确定，如果孩子知道你既不会说教也不会苛责他，他就会把一切都告诉你。而且谁也不敢叫他向你隐瞒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对你从不隐瞒。

What makes me most confident in my method is this: when I follow it out as closely as possible, I find no situation in the life of my scholar which does not leave me some pleasing memory of him. Even when he is carried away by his ardent temperament or when he revolts against the hand that guides him, when he struggles and is on the point of escaping from me, I still find his first simplicity in his agitation and his anger; his heart as pure as his body, he has no more knowledge of pretence than of vice; reproach and scorn have not made a coward of him; base fears have never taught him the art of concealment. He has all the indiscretion of innocence; he is absolutely out-spoken; he does not even know the use of deceit. Every impulse of his heart is betrayed either by word or look, and I

often know what he is feeling before he is aware of it himself.

在我的方法中，最令我感到自信的是：只要我尽可能严格地按照我的方法执行，我就不会给我的学生留下不愉快的记忆。即使当他被暴怒的性情冲昏头脑，或者竭力反抗对他的管教，即将拼命逃避我的时候，我还是可以从他激动和暴怒的样子里看到他最初的纯真；他的心灵仍然像他的身体一样纯洁，他还不懂如何掩饰，也不懂什么恶习；他人的责骂和蔑视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胆小鬼；内心的恐惧也没有使他畏畏缩缩。他保持纯洁；他十分天真无邪，直言不讳；他甚至不知道诡计有什么用处。他内心的冲动通过他的话或是他的神情就会展现出来，我常常在他自己觉察到之前就能知道他的感受。

So long as his heart is thus freely opened to me, so long as he delights to tell me what he feels, I have nothing to fear; the danger is not yet at hand; but if he becomes more timid, more reserved, if I perceive in his conversation the first signs of confusion and shame, his instincts are beginning to develop, he is beginning to connect the idea of evil with these instincts, there is not a moment to lose, and if I do not hasten to instruct him, he will learn in spite of me.

只要他继续对我敞开心扉，只要他非常乐意地把心中所想都告诉我，我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危险目前还没有来临；但如果他变得更胆怯，更封闭，如果我在和他交谈中第一次发现他困惑、羞辱的苗头，那么他的天性就开始发展了，由于天性他开始有了一些邪恶的念头，我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如果我不第一时间指导他，他就会不顾我，自己去了解这一切的。

Some of my readers, even of those who agree with me, will

think that it is only a question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young man at any time. Oh, this is not the way to control the human heart. What we say has no meaning unless the opportunity has been carefully chosen. Before we sow we must till the ground; the seed of virtue is hard to grow; and a long period of preparation is required before it will take root. One reason why sermons have so little effect is that they are offered to everybody alike, without discrimination or choice. How can any one imagine that the same sermon could be suitable for so many hearers, with their different dispositions, so unlike in mind, temper, age, sex, station, and opinion. Perhaps there are not two among those to whom what is addressed to all is really suitable; and all our affections are so transitory that perhaps there are not even two occasions in the life of any man when the same speech would have the same effect on him. Judge for yourself whether the time when the eager senses disturb the understanding and tyrannise over the will, is the time to listen to the solemn lessons of wisdom. Therefore never reason with young men, even when they have reached the age of reason, unless you have first prepared the way. Most lectures miss their mark more through the master's fault than the disciple's. The pedant and the teacher say much the same; but the former says it at random, and the latter only when he is sure of its effect.

我的一些读者，甚至那些同意我观点的读者，也会认为这只需要和年轻人谈一谈就可以了，任何时间都行。哎，这不是管住人心的办法呀！如果我们没有对谈话的时机精挑细选，那我们说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在播种之前，我们必须锄地；道德的种子是很难生长的；在它生根之前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说教之所以效果甚微的一个原因，就是以相似的方式说给每个人听，却没有任何区别和选择。那么多的听众，他们的气质、心境、脾性、年龄、性别、身份和观念都不尽相同，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相同内容的说教会对他们同样合适。或许你向

所有人强调的东西，并不能对两个人都适合；况且我们的情感是非常善变的，甚至在人的一生中，相同内容的说教在两个不同的场合都会对同一个人产生不同的效果。自我判断一下，当你激动的情感干扰了你的认知，战胜你的意志的时候，你是否还会聆听庄严智慧的说教。因此即便年轻人已经到了理智的年纪，也永远不要和他们理论，除非你已经事先做过一些准备了。大多数说教成效不佳更多是由于老师的过错，而非学生的原因。书呆子和老师说的话是大抵相似的；但不同之处就是书呆子是乱说一通，而老师只有在他确信其成效时才说。

As a somnambulist, wandering in his sleep, walks along the edge of a precipice, over which he would fall if he were awake, so my Emile, in the sleep of ignorance, escapes the perils which he does not see; were I to wake him with a start, he might fall. Let us first try to withdraw him from the edge of the precipice, and then we will awake him to show him it from a distance.

就像一个梦游的人，在睡梦中游走，行走在悬崖边缘，如果突然被叫醒，他就会坠入悬崖。因此我的爱弥儿也是这样，在他天真的睡梦中，他可以躲开那些他看不见的危险；可如果我突然叫醒他，他就会失足坠落。让我们首先试着让他从悬崖边回来，然后再叫醒他，让他远远地看着那个悬崖。

Reading, solitude, idleness, a soft and sedentary life, intercourse with women and young people, these are perilous paths for a young man, and these lead him constantly into danger. I divert his senses by other objects of sense; I trace another course for his spirits by which I distract them from the course they would have taken; it is by bodily exercise and hard work that I check the activity of the imagination, which was leading him astray. When

the arms are hard at work, the imagination is quiet; when the body is very weary, the passions are not easily inflamed. The quickest and easiest precaution is to remove him from immediate danger. At once I take him away from towns, away from things which might lead him into temptation. But that is not enough; in what desert, in what wilds, shall he escape from the thoughts which pursue him? It is not enough to remove dangerous objects; if I fail to remove the memory of them, if I fail to find a way to detach him from everything, if I fail to distract him from himself, I might as well have left him where he was.

阅读、孤独、闲散、安逸的生活、和妇女及年轻人交流，这些对年轻人来说都是冒险的，会将他不断地引入危险之中。我用其他事物来转移他感官的注意力；我为他的心灵指明另一条路，使他离开原来那条路。辛苦的体力劳动可以使他避免那些将他引入歧途的想象力的活动。当他的双臂忙于工作的时侯，想象力就会变得贫乏；当他的身体非常疲倦的时候，他就不会太过冲动。最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他远离当前的那些危险。我立即将他带离城镇，让他远离那些诱惑。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在什么样的荒漠和旷野中，他才能摆脱这些一直萦绕着他的想法呢？让他远离那些危险的事物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没能将他关于这些事物的记忆抹去，如果我没能使他摆脱这一切，如果我没能分散他对自己的注意力，我就很有可能让他停留在原地。

Emile has learned a trade, but we do not have recourse to it; he is fond of farming and understands it, but farming is not enough; the occupations he is acquainted with degenerate into routine; when he is engaged in them he is not really occupied; he is thinking of other things; head and hand are at work on different subjects. He must have some fresh occupation which has the interest of novelty—an occupation which keeps him busy, diligent, and hard at work,

an occupation which he may become passionately fond of, one to which he will devote himself entirely. Now the only one which seems to possess all th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chase. If hunting is ever an innocent pleasure, if it is ever worthy of a man, now is the time to betake ourselves to it. Emile is well-fitted to succeed in it. He is strong, skilful, patient, unwearied. He is sure to take a fancy to this sport; he will bring to it all the ardour of youth; in it he will lose, at least for a time, the dangerous inclinations which spring from softness. The chase hardens the heart a well as the body; we get used to the sight of blood and cruelty. Diana is represented as the enemy of love; and the allegory is true to life; the languors of love are born of soft repose, and tender feelings are stifled by violent exercise. In the woods and fields, the lover and the sportsman are so diversely affected that they receive very different impressions. The fresh shade, the arbours, the pleasant resting-places of the one, to the other are but feeding grounds, or places where the quarry will hide or turn to bay. Where the lover hears the flute and the nightingale, the hunter hears the horn and the hounds; one pictures to himself the nymphs and dryads, the other sees the horses, the huntsman, and the pack. Take a country walk with one or other of these men; their different conversation will soon show you that they behold the earth with other eyes, and that the direction of their thoughts is as different as their favourite pursuit.

爱弥儿学会了一门营生，但是我们并不能求助于它；他很喜欢耕作，并且懂得其中的门道，但是仅仅会耕作是不够的；他所熟悉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他每天都做那些，其实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做；他在思考别的东西，双手和大脑并没有协同一致。他必须要有新的工作，来激发起他的兴趣，让他忙于从事他的工作，使他变得勤奋刻苦。他对这份新工作得是充满热情的，很喜欢，这样他才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目前看来，唯一具备所有这些特征的也只有打猎了。

如果狩猎是一种单纯的快乐，男子汉都值得一玩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应该尝试它。爱弥儿的条件非常适合狩猎。他身体健壮，灵巧熟练，富有耐心并且不知疲倦。他一定会非常喜爱这项运动的；他会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激情投入其中；至少一段时间内，他会去除那些由于生活舒适而产生的危险倾向。狩猎使他的心灵变得和身体一样坚强，渐渐地习惯那些血腥残酷的场面。戴安娜被视作爱情之敌，这一比喻对生活是很贴切的；爱情的温柔来自于宁静安逸的生活，剧烈的运动会压制柔和的情感。在灌木丛中，田野间，恋人和猎人的感受截然不同，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不同的印象。清凉的荫蔽，对恋人来说是舒适的休息、约会之处，但对猎人来说，却是猎食区，是猎物的藏身之处或是困兽犹斗之处。在这里，恋人听到的是笛声和夜莺婉转的歌声，而猎人听到的却是号角声和犬吠声；恋人们觉得自己看到的是森林女神，而猎人看到的是别的猎人和马匹。和他们一起去田间散步，与他们对话，你就会立即从中感受到在他们眼中世界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思考的方向也就像他们的爱好一样迥异。

I understand how these tastes may be combined, and that at last men find time for both. But the passions of youth cannot be divided in this way. Give the youth a single occupation which he loves, and the rest will soon be forgotten. Varied desires come with varied knowledge, and the first pleasures we know are the only ones we desire for long enough. I would not have the whole of Emile's youth spent in killing creatures, and I do not even profess to justify this cruel passion; it is enough for me that it serves to delay a more dangerous passion, so that he may listen to me calmly when I speak of it, and give me time to describe it without stimulating it.

我知道这两种不同的兴趣如何结合，并最终都有机会完成这些事。但是年轻人的热情不能以这种方式划分。给年轻人一份他热爱的工作，那他很快就会忘记剩下的一切。各种各样的欲望伴随着各种各

样的知识，只有最初令我们感到愉快的事物，才能使我们有足够长久追求的欲望。我不会让爱弥儿的整个青年时期都在屠杀生灵中度过，我甚至不赞成这样残忍的爱好；但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阻挡一个更加危险的欲望，这样最后我谈起它的时候，他能够平静接受，给我时间向他描述，而不激起他的兴奋。

There are moments in human life which can never be forgotten. Such is the time when Emile receives the instruction of which I have spoken; its influence should endure all his life through. Let us try to engrave it on his memory so that it may never fade away. It is one of the faults of our age to rely too much on cold reason, as if men were all mind. By neglecting the language of expression we have lost the most forcible mode of speech. The spoken word is always weak, and we speak to the heart rather through the eyes than the ears. In our attempt to appeal to reason only, we have reduced our precepts to words, we have not embodied them in deed. Mere reason is not active; occasionally she restrains, more rarely she stimulates, but she never does any great thing. Small minds have a mania for reasoning. Strong souls speak a very different language, and it is by this language that men are persuaded and driven to action.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刻是永远无法忘怀的。爱弥儿现在正在接受我说过的这种教育，对他来说，这会是终生难忘的，它将影响他一生之久。让我们试着将它印刻在爱弥儿的记忆里，以防他忘却。我们时代的错误之一，就是过多地依赖于冷冰冰的理智，好像人类只剩理智了。由于我们忽视了语言的表达力，我们就失去了语言中最有说服力的模式。语言的世界总是很无力的，我们用展现的方式比用说的方式更能直击心灵。我们只试图讲述道理，因此我们的箴言仅仅只是空谈，并不能使它们被运用到实际中。仅仅只有理性是不够的；有时候

她可以限制人们的行为，但她几乎不能起促进作用，不能成就认为伟大的事业。气量狭小的人总喜欢讲道理。有强大灵魂的人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也正是这种语言能够说服人们，促使他们有所行动。

I observe that in modern times men only get a hold over others by force or self-interest, while the ancients did more by persuasion, by the affections of the heart; because they did not neglect the language; of symbolic expression. All agreements were drawn up solemnly, so that they might be more inviolable; before the reign of force, the gods were the judges of mankind; in their presence, individuals made their treaties and alliances, and pledged themselves to perform their promises; the face of the earth was the book in which the archives were preserved. The leaves of this book were rocks, trees, piles of stones, made sacred by these transactions, and regarded with reverence by barbarous men; and these pages were always open before their eyes. The well of the oath, the well of the living and seeing one; the ancient oak of Mamre, the stones of witness, such were the simple but stately monuments of the sanctity of contracts; none dared to lay a sacrilegious hand on these monuments, and man's faith was more secure under the warrant of these dumb witnesses than it is to-day upon all the rigour of the law.

我发现，在现代社会，人们都是通过暴力手段或者是自身利益关系来控制别人的，而我们的祖先更多是通过劝服或者内心情感的方式，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忽视语言的利用，这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所有的协议都以庄严的方式达成的，这样就更不可侵犯；在暴力当政之前，上帝是人类的主宰；在上帝面前，人们订立条约，建立同盟，许下他们的诺言；这些事情都记录在地球表面这本大书中。在这本书中，岩石、树木和成堆的石头由于这些经历都变得神圣起来，受到野

蛮人的尊敬；这些内容一直都展现在人们眼前。宣誓的井，活的、可以照出东西的井；古老的幔利橡树，见证的石头，这些都是神圣契约简单而庄重的纪念物；没人敢亵渎它们。这些无声的见证者比而今这些严苛的律条更能坚定人的信念。

In government the people were over-awed by the pomp and splendour of royal power. The symbols of greatness, a throne, a sceptre, a purple robe, a crown, a fillet, these were sacred in their sight. These symbols, and the respect which they inspired, led them to reverence the venerable man whom they beheld adorned with them; without soldiers and without threats, he spoke and was obeyed [1_29] . In our own day men profess to do away with these symbols.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contempt? The kingly majesty makes no impression on all hearts, kings can only gain obedience by the help of troops, and the respect of their subjects is based only on the fear of punishment. Kings are spared the trouble of wearing their crowns, and our nobles escape from the outward signs of their station, but they must have a hundred thousand men at their command if their orders are to be obeyed. Though this may seem a finer thing, it is easy to see that in the long run they will gain nothing.

政府统治下的人们都过于敬畏那些显赫的王权。王权的象征：宝座、权杖、紫袍、王冠和纹章，它们都很神圣。有了这些象征的装饰以及因此而激发的尊敬之情；使得即使没有军队和任何恐吓威胁，他的话也能被人们服从 [2_29] 。而在今天，人们声称要取消这些象征。这种轻蔑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王权的威严在人们心中不留一丝印象，国王只有利用军队才能得到人们的服从，人们对他的尊敬只是因为他们惧怕惩罚。国王不需要头顶他们的王冠，贵族也不佩戴彰显地位的外在标记了，但是如果他们有命令需要被执行，就必须要有十万

人供他们指挥派遣。尽管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显而易见的是，长久来看，他们终将一无所获。

It is amazing what the ancients accomplished with the aid of eloquence; but this eloquence did not merely consist in fine speeches carefully prepared; and it was most effective when the orator said least. The most startling speeches were expressed not in words but in signs; they were not uttered but shown. A thing beheld by the eyes kindles the imagination, stirs the curiosity, and keeps the mind on the alert for what we are about to say, and often enough the thing tells the whole story. Thrasybulus and Tarquin cutting off the heads of the poppies, Alexander placing his seal on the lips of his favourite, Diogenes marching before Zeno, do not these speak more plainly than if they had uttered long orations? What flow of words could have expressed the ideas as clearly? Darius, in the course of the Scythian war, received from the king of the Scythians a bird, a frog, a mouse, and five arrows. The ambassador deposited this gift and retired without a word. In our days he would have been taken for a madman. This terrible speech was understood, and Darius withdrew to his own country with what speed he could. Substitute a letter for these symbols and the more threatening it was the less terror it would inspire; it would have been merely a piece of bluff, to which Darius would have paid no attention.

令人惊奇的是，古人能够凭借他们雄辩的才能实现他们的目的；但是这种口才不仅仅体现在细心准备后的演讲中；讲话人说的最少的时候，他往往能得到最大的效果。最震慑人心的话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符号表达的；他们不用说，而是通过展现的方式。眼睛看到的东西，可以激发起一个人的想象力，引发他的好奇心，使他时刻注意你

要说的话，而这往往就足够能说明一切问题。色拉西布洛斯和塔克文砍掉罂粟的上端，亚历山大在他最爱的人的嘴唇上盖上他的印记，第欧根尼走到芝诺前面，他们这样做难道不比发表长篇大论更朴素平实吗？要讲多少话才能够清楚地表达这些观点呢？大流士在与塞西亚人交战时，收到了塞西亚国王送来的一只鸟、一只青蛙、一只老鼠和五支箭。使节放下这些礼物后，一言不发地回去了。在我们今天来看，他会被视作是疯子。但是大流士明白了这可怕的意思，他以极快的速度撤兵回国了。假使用一封信来代替这些东西，那么信中说的越是盛气凌人，它所能造成的威慑力就越小；这仅仅只是虚晃声势，大流士并不会放在心上。

What heed the Romans gave to the language of signs! Different ages and different ranks had their appropriate garments, toga, tunic, patrician robes, fringes and borders, seats of honour, lictors, rods and axes, crowns of gold, crowns of leaves, crowns of flowers, ovations, triumphs, everything had its pomp, its observances, its ceremonial, and all these spoke to the heart of the citizens. The state regarded it as a matter of importance that the populace should assemble in one place rather than another, that they should or should not behold the Capitol, that they should or should not turn towards the Senate, that this day or that should be chosen for their deliberations. The accused wore a special dress, so did the candidates for election; warriors did not boast of their exploits, they showed their scars. I can fancy one of our orators at the death of Caesar exhausting all the commonplaces of rhetoric to give a pathetic description of his wounds, his blood, his dead body; Anthony was an orator, but he said none of this; he showed the murdered Caesar. What rhetoric was this!

罗马人是多么注重表象的语言啊！不同年龄和不同地位的人有合

适年龄和地位的外袍、短袍、礼服、边饰、宝座、扈从、权杖、金冠、花冠、仪仗、凯旋，事事都讲究华丽，有一定的意义和礼仪，都给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是：百姓应该集中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另一个地方，他们是否瞻仰过朱庇特神庙，是否倾向元老院，应该选择哪一天进行议事。被告人穿着特殊的衣服，候选人也要穿着特殊的衣服，战士们不夸耀他们的战绩，而是展示他们的伤疤。我可以想象在凯撒逝世的时候，我们的演说家，会极尽陈词滥调，对他的伤势、他的尸体给予荡气回肠的描述。安东尼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但是他对这一切什么都不说，他只是把凯撒的尸体展示给大家看。这是怎样的言辞啊！

But this digression, like many others, is drawing me unawares away from my subject; and my digressions are too frequent to be borne with patience. I therefore return to the point.

我说远了，像其他很多事情一样，我都会不知不觉偏离我的主题；我离题实在是太频繁了，再继续下去，读者都要丧失耐心了。所以我还是言归正传吧。

Do not reason coldly with youth. Clothe your reason with a body, if you would make it felt. Let the mind s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heart, that it may be understood. I say again our opinions, not our actions, may be influenced by cold argument; they set us thinking, not doing; they show us what we ought to think, not what we ought to do. If this is true of men, it is all the truer of young people who are still enwrapped in their senses and cannot think otherwise than they imagine.

不要和年轻人冷淡地进行理论。如果你想要他明白你说的道理，你就应该让你的理由更丰满。让脑子里想的东西直达他的心，这样才可能被他理解。我再次阐释：冷淡的争论会影响我们的观念，而不是我们的行为；它们促使我们思考，而不是行动；它们向我们展示如何思考，而不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这对于成人来说是对的，那对年轻人来说就更是正确的了，因为他们还沉浸在自己的感官里，他们的思考就是凭借想象。

Even after the preparations of which I have spoken, I shall take good care not to go all of a sudden to Emile's room and preach a long and heavy sermon on the subject in which he is to be instructed. I shall begin by rousing his imagination; I shall choose the time, place, and surroundings most favourable to the impression I wish to make; I shall, so to speak, summon all nature as witness to our conversations; I shall call upon the eternal God, the Creator of nature, to bear witness to the truth of what I say. He shall judge between Emile and myself; I will make the rocks, the woods, the mountains round about us, the monuments of his promises and mine; eyes, voice, and gesture shall show the enthusiasm I desire to inspire. Then I will speak and he will listen, and his emotion will be stirred by my own. The more impressed I am by the sanctity of my duties, the more sacred he will regard his own. I will enforce the voice of reason with images and figures, I will not give him long-winded speeches or cold precepts, but my overflowing feelings will break their bounds; my reason shall be grave and serious, but my heart cannot speak too warmly. Then when I have shown him all that I have done for him, I will show him how he is made for me; he will see in my tender affection the cause of all my care. How greatly shall I surprise and disturb him when I change my tone. Instead of shrivelling up his soul by always talking of his own interests, I shall henceforth speak of my own; he will be more

deeply touched by this. I will kindle in his young heart all the sentiments of affection, generosity, and gratitude which I have already called into being, and it will indeed be sweet to watch their growth. I will press him to my bosom, and weep over him in my emotion; I will say to him: “You are my wealth, my child, my handiwork; my happiness is bound up in yours; if you frustrate my hopes, you rob me of twenty years of my life, and you bring my grey hairs with sorrow to the grave.” This is the way to gain a hearing and to impress what is said upon the heart and memory of the young man.

尽管我已经对我讲过的内容做了准备，但是我会非常小心，不会突然走进爱弥儿的房间，然后就我教育的东西对他进行一个冗长繁复的说教。我会从激发他的想象力开始，选择最有利的时间、地点和周边环境，以便让他留下我所希望的印象；可以说，我要召唤整个大自然来为我们的对话作证；我要召唤永恒的上帝，自然的创造者来为我所讲的真理做见证。他要在我和爱弥儿之间做出评判，我会让岩石、森林、山脉记下我和他的诺言；我会通过眼睛、嗓音、肢体动作来表明我希望唤起他的热情。然后我说，他听，我的情绪的波动也会引起他情绪的变化。我越深刻地感受自己的天职是神圣的，他也会越觉得自己的责任也是神圣的。我会提高我说服他时的嗓音，用各种形象去感染他，我不会长篇大论地说教或是说一些冷冰冰的戒律，但是我饱满的情绪会打破它们之间的界限；我讲的话都是严肃庄重的，但是我心却是再稳暖不过了。当我把我为他做的所有事都告诉他之后，我会告诉他如何为我做一些事；他会在我的深情中明白我这样做的理由。当我话锋一转，他会感到多么的惊讶和激动啊！我不会谈及他的自身利益以使他的灵魂枯萎，相反，从今以后我只谈我自己的利益，他会有更深的触动。我已经在他年轻的心中撒下友爱、慷慨和感恩的种子，能够看着它们茁壮成长真的是一件非常甜蜜的事。我会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为他满怀感情地哭泣，我会对他说：“你是我的财富，我的孩子，我的事业；我的快乐是与你相连的；如果你辜负了我的期

望，你就掠夺了我生命中的二十年，使我在白发苍苍之际都仍旧满怀痛苦地死去。”你这样讲，才能使年轻人听得进去，并且在他的心灵和记忆里都留下极其深刻的记忆。

Hitherto I have tried to give examples of the way in which a tutor should instruct his pupil in cases of difficulty. I have tried to do so in this instance; but after many attempts I have abandoned the task, convinced that the French language is too artificial to permit in print the plainness of speech required for the first lessons in certain subjects.

至今我已经举过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了，告诉老师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教导学生。在这次的例子中，我也试图这样做；但是在多次尝试归于失败后，我放弃了这个方法。我认为法语太过于雕琢，不适合就一些最初教育的话题做出明白的说明和阐述。

They say French is more chaste than other languages; for my own part I think it more obscene; for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purity of a language does not consist in avoiding coarse expressions but in having none. Indeed, if we are to avoid them, they must be in our thoughts, and there is no language in which it is so difficult to speak with purity on every subject than French. The reader is always quicker to detect than the author to avoid a gross meaning, and he is shocked and startled by everything. How can what is heard by impure ears avoid coarseness? On the other hand, a nation whose morals are pure has fit terms for everything, and these terms are always right because they are rightly used. One could not imagine more modest language than that of the Bible, just because of its plainness of speech. The same things translated into French

would become immodest. What I ought to say to Emile will sound pure and honourable to him; but to make the same impression in print would demand a like purity of heart in the reader.

人们说法语比其他语言更加优雅；我却认为它更粗俗；因为对我来说，语言的纯净不在于避免一些粗鄙的表达，而在于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表达。实际上，如果我们想要避免它们，它们就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没有哪一种语言比法语更难单纯地表达各种意思了。读者总是在作者试图避免一些粗俗的意味之前就有所察觉，他对这一切大吃一惊。不纯洁的耳朵听到的东西怎么能够避免污秽呢？另一方面，一个风俗纯净的民族对任何事情都有合适的表达，这些表达总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被适当地使用。一个人无法想象出比《圣经》更朴实的语言了，这正是因为它的表达清楚明了。而同样的内容被翻译成法语之后就会变得不朴实。我应该对爱弥儿说的话，在他听来是纯净的、正直的；但如果写下来要让读者也有相同的感受，就需要读者也有一颗像爱弥儿一样澄澈的心灵。

I should even think that reflections on true purity of speech and the sham delicacy of vice might find a useful place in the conversations as to morality to which this subject brings us; for when he learns the language of plain-spoken goodness, he must also learn the language of decency, and he must know why the two are so different. However this may be, I maintain that if instead of the empty precepts which are prematurely dinned into the ears of children, only to be scoffed at when the time comes when they might prove useful, if instead of this we bide our time, if we prepare the way for a hearing, if we then show him the laws of nature in all their truth, if we show him the sanction of these laws in the physical and moral evils which overtake those who neglect them, if while we speak to him of this great mystery of generation,

we join to the idea of the pleasure which the Author of nature has given to this act the idea of the exclusive affection which makes it delightful, the idea of the duties of faithfulness and modesty which surround it, and redouble its charm while fulfilling its purpose; if we paint to him marriage, not only as the sweetest form of society, but also as the most sacred and inviolable of contracts, if we tell him plainly all the reasons which lead men to respect this sacred bond, and to pour hatred and curses upon him who dares to dishonour it; if we give him a true and terrible picture of the horrors of debauch, of its stupid brutality, of the downward road by which a first act of misconduct leads from bad to worse, and at last drags the sinner to his ruin; if, I say, we give him proofs that on a desire for chastity depends health, strength, courage, virtue, love itself, and all that is truly good for man—I maintain that this chastity will be so dear and so desirable in his eyes, that his mind will be ready to receive our teaching as to the way to preserve it; for so long as we are chaste we respect chastity; it is only when we have lost this virtue that we scorn it.

我甚至认为，在我们谈及道德的时候，我们要思考话语是否真正纯净，思考是否是对恶习的精致伪装；因为当他学会平实的语言的时候，他一定也同时学会了正直的语言，他一定清楚这两者为何如此不同。无论如何，我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贸然给孩子们灌输一些空洞的说教，以至于到了这些东西对他们真正有用的时候，他们却对其加以嘲笑。相反，如果我们应该等待时机，准备充分以便他们聆听，然后我们向他们讲述自然的法则，向他解释无视自然法则的人就要遭受身体和心灵上的摧残。在我们向他讲述神秘的代际传递的时候，我们要让他知道自然的创造者给予这个行为非常多的乐趣，以及别的事物无法得到的快乐，同时也要让他明白，这其中还有忠诚的义务，当这种行为达到目的的时候，这种乐趣就会加倍。我们还要向他描绘婚姻，它不仅仅是社会中最甜蜜的结合，而且是所有契约中最神圣的和最不

可侵犯的。我们要清楚地告诉他为什么这种神圣的行为会使所有人都尊敬它，为什么侮辱它的人就会受到大家的唾弃和厌恶。我们要为他描述荒淫无度的可怕图景，暴虐的愚蠢之处，在这条路上一旦失足就会往错误的方向越陷越深，最后直至毁灭。我会可靠地告诉他，追求贞洁，就能够获得健康、力量、勇气、美德和爱情本身，这些对人类都是真正有益的。我坚持认为，我们如此希望他能够保持贞洁，他就会做好准备接受我们的教导并珍惜它。只要我们还保持贞洁，我们就会崇敬它。只有当我们失去了贞洁之后，我们才会觉得它不值一提。

It is not true that the inclination to evil is beyond our control, and that we cannot overcome it until we have acquired the habit of yielding to it. Aurelius Victor says that many men were mad enough to purchase a night with Cleopatra at the price of their life, and this is not incredible in the madness of passion. But let us suppose the maddest of men, the man who has his senses least under control; let him see the preparations for his death, let him realise that he will certainly die in torment a quarter of an hour later; not only would that man, from that time forward, become able to resist temptation, he would even find it easy to do so; the terrible picture with which they are associated will soon distract his attention from these temptations, and when they are continually put aside they will cease to recur. The sole cause of our weakness is the feebleness of our will, and we have always strength to perform what we strongly desire. “Volenti nihil difficile!” Oh! if only we hated vice as much as we love life, we should abstain as easily from a pleasant sin as from a deadly poison in a delicious dish.

关于邪恶的倾向是人们无法控制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只有当我们养成了向恶屈服的习惯之后，我们才会无法克服它。奥里利阿斯拉维克托说很多人都狂热地想要买克利奥佩特拉一个晚上，哪怕以生命为

代价也在所不惜，这种想法也只有对感情陷入疯狂的人才不足为奇。但是让我们假设一个最疯狂、最不能控制自己的感官的人，让他亲眼见证自己对死亡的准备，让他相信在一刻钟后他将一定会被折磨至死。从那一刻起，这个人不仅会抵制诱惑，他甚至会觉得这很轻易就能做到。因为之后将面对的恐怖的场面会使他很快就从这些诱惑转移注意力，当他们继续拒绝这些诱惑之后，他就不会再萌生这样的想法。造成我们的弱点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薄弱的意志力，但我们总有力气去完成我们强烈渴望的事情。“有毅力，就能克服困难！”啊！如果我们能像爱惜生命一样憎恶罪恶，我们就能像阻止自己去获取剧毒的美味菜肴一样，轻易地阻止自己只为了享受片刻的欢愉而去犯罪。

How is it that you fail to perceive that if all the lessons given to a young man on this subject have no effect, it is because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his age, and that at every age reason must be presented in a shape which will win his affection? Speak seriously to him if required, but let what you say to him always have a charm which will compel him to listen. Do not coldly oppose his wishes; do not stifle his imagination, but direct it lest it should bring forth monsters. Speak to him of love, of women, of pleasure; let him find in your conversation a charm which delights his youthful heart; spare no pains to make yourself his confidant; under this name alone will you really be his master. Then you need not fear he will find your conversation tedious; he will make you talk more than you desire.

你怎么能不明白，你对年轻人的所有教育都没有成效，是因为这一切不适合他的年纪，而无论在哪个年龄段，所有的说理都应该以他们喜欢的形式传达给他们。如果必要的话，严肃地和他对话，但确保无论你说什么，都会对他产生一种吸引力，迫使他聆听。不要冷冰冰地反对他的意愿；也不要扼杀他的想象力，而是要引导他的想象，从

而避免可能产生的恶果。向他讲述爱、女人和快乐的事情；使他在与你的对话中能够感受到一种吸引力，感受到快乐；不遗余力地让自己成为他的知己，在这个名义下你就能真正做他的老师。你无须担心他会对你的谈话感到厌烦，他会要求你说的比你想说的都多。

If I have managed to take all the requisite precau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maxims, and have said the right things to Emile at the age he has now reached, I am quite convinced that he will come of his own accord to the point to which I would lead him, and will eagerly confide himself to my care. When he sees the dangers by which he is surrounded, he will say to me with all the warmth of youth, “Oh, my friend, my protector, my master! resume the authority you desire to lay aside at the very time when I most need it; hitherto my weakness has given you this power. I now place it in your hands of my own free-will, and it will be all the more sacred in my eyes. Protect me from all the foes which are attacking me, and above all from the traitors within the citadel; watch over your work, that it may still be worthy of you. I mean to obey your laws, I shall ever do so, that is my steadfast purpose; if I ever disobey you, it will be against my will; make me free by guarding me against the passions which do me violence; do not let me become their slave; compel me to be my own master and to obey, not my senses, but my reason.”

如果我成功地按照这些箴言做好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并且在爱弥儿这个年纪，我对他说了所有该说的事情，我确信他自己会在我预设的时间，急切地来寻求我的照顾。当他认清周围的危险，他会满怀年轻人所特有的温暖对我说：“哦，我的朋友，我的监护人，我的老师！重新恢复你想要放弃的对我的管教权吧，目前正是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到目前为止，由于我的柔弱，需要你行使这一权力。现在我出

于自愿将这权力交到你的手中，它在我的眼中将变得更加神圣。请您保护我，让我不受想要攻击我的敌人的伤害，最重要的是要保护我不为叛徒所伤害；也请您关心自己的事业，它仍然值得你这样做。我会服从你的规矩，我愿意永远这样做，这是我不变的决心；如果我违背了你，这也将是违背我自己的意愿的；请您保护我不受欲望的蹂躏，使我获得自由，不至于成为它们的奴隶；使我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屈从于我的情感，而是服从理智。”

When you have led your pupil so far (and it will be your own fault if you fail to do so), beware of taking him too readily at his word, lest your rule should seem too strict to him, and lest he should think he has a right to escape from it, by accusing you of taking him by surprise. This is the time for reserve and seriousness; and this attitude will have all the more effect upon him seeing that it is the first time you have adopted it towards him.

当你的学生已经达到这种境地（如果没能做到这样，这将是你自己的过错），也不可太轻信他的话，以免你的规矩对他来说过于严苛，也防止他指责你对它的管教出乎他的意料，让他觉得他有权逃避这一切，这个时候需要谨慎严肃；他看到这是你第一次对他采取这样的态度，因此会对他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You will say to him therefore: “Young man, you readily make promises which are hard to keep; you must understand what they mean before you have a right to make them; you do not know how your fellows are drawn by their passions into the whirlpool of vice masquerading as pleasure. You are honourable, I know; you will never break your word, but how often will you repent of having given it? How often will you curse your friend, when, in order to

guard you from the ills which threaten you, he finds himself compelled to do violence to your heart. Like Ulysses who, hearing the song of the Sirens, cried aloud to his rowers to unbind him, you will break your chains at the call of pleasure; you will importune me with your lamentations, you will reproach me as a tyrant when I have your welfare most at heart; when I am trying to make you happy, I shall incur your hatred. Oh, Emile, I can never bear to be hateful in your eyes; this is too heavy a price to pay even for your happiness. My dear young man, do you not see that when you undertake to obey me, you compel me to promise to be your guide, to forget myself in my devotion to you, to refuse to listen to your murmurs and complaints, to wage unceasing war against your wishes and my own. Before we either of us undertake such a task, let us count our resources; take your time, give me time to consider, and be sure that the slower we are to promise, the more faithfully will our promises be kept.”

因此你要对他说：“年轻人，你轻易许下的诺言是很难遵守的，在你有资格做出承诺之前，必须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你不知道你的同伴已经被激情湮没，在看似快乐，实则罪恶的漩涡中无法自拔。我知道，你是正直的；你一定不会违背你的诺言，但是你会多么频繁地对曾经许下的诺言感到后悔？你会时常诅咒你的朋友，为了保护你，不让你受到即将到来的伤害，他就会被迫做一些事让你感到伤心。就像尤利西斯听到塞壬的歌声之后，大声叫喊要他的船手解开他的束缚。在快乐的召唤下，你就会打破自己的枷锁，你会一直纠缠我，向我抱怨，你会责骂我是一个独裁者，但其实我却最关心你的幸福。当我尽力给你幸福的时候，却会招致你的憎恶。哦，爱弥儿，如果我被你厌恶，我将无法承受；即使是为了你的幸福，这个代价也太沉重了。我亲爱的年轻人，你还不明白吗？当你承诺会服从我，其实也是迫使我承诺成为你的导师，忘却自我来为你奉献，拒绝听取你的嘀咕和抱怨，在你的愿望和我的期望之间作斗争。在我们承担这一任务之前，

让我们好好估量一下我们的力量；你慢慢来，也给我一点时间思考，我们越慢地做出我们的承诺，我们就会更忠实地履行我们的承诺，这是肯定的。”

You may be sure that the more difficulty he finds in getting your promise, the easier you will find it to carry it out. The young man must learn that he is promising a great deal, and that you are promising still more. When the time is come, when he has, so to say, signed the contract, then change your tone, and make your rule as gentle as you said it would be severe. Say to him, “My young friend, it is experience that you lack; but I have taken care that you do not lack reason. You are ready to see the motives of my conduct in every respect; to do this you need only wait till you are free from excitement. Always obey me first, and then ask the reasons for my commands; I am always ready to give my reasons so soon as you are ready to listen to them, and I shall never be afraid to make you the judge between us. You promise to follow my teaching, and I promise only to use your obedience to make you the happiest of men. For proof of this I have the life you have lived hitherto. Show me any one of your age who has led as happy a life as yours, and I promise you nothing more.”

你要知道，许下承诺的过程越艰辛，你就会发现履行诺言的过程越容易。年轻人必须知道他许下了不少诺言，而你许下的诺言则比他更多。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说，当他在契约上签字了以后，你就要改变你的语调，你之前说你的规矩会很严格，但那个时候就要尽可能温和。对他说：“我年轻的朋友啊，你缺少经验；但是我一直使你不缺乏理智。你可以在各个方面洞察我行为的动机，只有当你头脑清醒，平静下来的时候，才可以看清这一切。要一直先服从于我，再询问我发出那样的指令的原因；我随时都可以给你我这样做的理由，只

要你随时准备好听，我从不担心你成为我们俩之间的评判。你承诺会遵循我的教导，我也答应你只利用你的服从使你成为最幸福的人。你之前所过的生活都可以来证明这一切。告诉我，在你的同龄人中，还有人过得像你一样幸福，如果有，我保证不会再许任何承诺。”

When my authority is firmly established, my first care will be to avoid the necessity of using it. I shall spare no pains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firmly established in his confidence, to make myself the confidant of his heart and the arbiter of his pleasures. Far from combating his youthful tastes, I shall consult them that I may be their master; I will look at things from his point of view that I may be his guide; I will not seek a remote distant good at the cost of his present happiness. I would always have him happy always if that may be.

当我的威严牢牢地树立之后，我首先关心的就是尽可能避免使用它。我不遗余力地让他对我更有信心，让我自己成为他的知心朋友，成为他快乐的决定者。我不会阻止他年轻的喜好，我会试着了解它们，这样我才能控制它们。我会从他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这样我才能成为他的向导；我不会以他现有的快乐为代价去寻求遥远的幸福。如果可能的话，我会让他一直都幸福快乐。

Those who desire to guide young people rightly and to preserve them from the snares of sense give them a disgust for love, and would willingly make the very thought of it a crime, as if love were for the old. All these mistaken lessons have no effect; the heart gives the lie to them. The young man, guided by a surer instinct, laughs to himself over the gloomy maxims which he pretends to accept, and only awaits the chance of disregarding them. All that is

contrary to nature. By following the opposite course I reach the same end more safely. I am not afraid to encourage in him the tender feeling for which he is so eager, I shall paint it as the supreme joy of life, as indeed it is; when I picture it to him, I desire that he shall give himself up to it; by making him feel the charm which the union of hearts adds to the delights of sense, I shall inspire him with a disgust for debauchery; I shall make him a lover and a good man.

有些人渴望正确地引导年轻人，以免让他们堕入情欲的陷阱，想让他们对爱情感到厌恶，情愿地将其视作犯罪，好像爱情只能是老年人做的事情一样。这些错误的教育方式都是没有效果的；心灵欺骗了他们。年轻人被他们更可靠的本能引导，就会假装接受这些劝导，实际上却暗暗嘲笑这些悲观的言论。只要一等到机会，他们就会无视这些劝导。这一切都是违背自然的。我通过相反的教育方法，反而能更可靠地达到相同的目的。我不担心鼓励他极其渴望的爱情，我还会将爱情描绘成生活最大的快乐，而它也确实是；当我向他描述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够专注于此；通过让他感受到两颗心的结合会增加感官上的愉悦，我会让他对荒淫无度产生厌恶；我会让他既成为一个爱人，也要成为一个好人。

How narrow-minded to see nothing in the rising desires of a young heart but obstacles to the teaching of reason. In my eyes, these are the right means to make him obedient to that very teaching. Only through passion can we gain the mastery over passions; their tyranny must be controlled by their legitimate power, and nature herself must furnish us with the means to control her.

将年轻人心中日益增长的欲望只视作是理性教育的障碍，这是多么的目光短浅啊。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正确途径，使他能够服从我对他的教育。只有利用欲望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控制欲望；我们必须通过欲望的合理力量来控制它的肆虐，我们也要从本身的天性寻找控制它的方法。

Emile is not made to live alone, he is a member of society, and must fulfil his duties as such. He is made to live among his fellow-men and he must get to know them. He knows mankind in general; he has still to learn to know individual men. He knows what goes on in the world; he has now to learn how men live in the world. It is time to show him the front of that vast stage, of which he already knows the hidden workings. It will not arouse in him the foolish admiration of a giddy youth, but the discrimination of an exact and upright spirit. He may no doubt be deceived by his passions; who is there who yields to his passions without being led astray by them? At least he will not be deceived by the passions of other people. If he sees them, he will regard them with the eye of the wise, and will neither be led away by their example nor seduced by their prejudices.

爱弥儿生来不是为了独自生活的，他是社会的一员，就必须履行他相应的义务。他注定要和别人一起生活，他就必须了解他们。他大致上了解人类；但他仍然必须了解单个的个体。他知道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些什么；他也必须知道人是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他已经知道这个大舞台的内幕，现在是时候将他带到这个舞台前了。这不会引起他对一个轻狂少年的盲目崇拜，反而会用确切正直的眼光去审视他。他的欲望毫无疑问会蒙蔽他；任凭自己受欲念支配的人，怎么可能不误入歧途？但是至少他不会受到其他人欲望的蒙骗。如果他看到别人产生欲望，他会用智慧的眼睛去审视他们，既不会被他们的例子

所影响，也不会受他们偏见的诱惑。

As there is a fitting age for the study of the sciences, so there is a fitting age for the study of the ways of the world. Those who learn these too soon, follow them throughout life, without choice or consideration, and although they follow them fairly well they never really know what they are about. But he who studies the ways of the world and sees the reason for them, follows them with more insight, and therefore more exactly and gracefully. Give me a child of twelve who knows nothing at all; at fifteen I will restore him to you knowing as much as those who have been under instruction from infancy; with this difference, that your scholars only know things by heart, while mine knows how to use his knowledge. In the same way plunge a young man of twenty into society; under good guidance, in a year's time, he will be more charming and more truly polite than one brought up in society from childhood. For the former is able to perceive the reasons for all the proceedings relating to age, position, and sex, on which the customs of society depend, and can reduce them to general principles, and apply them to unforeseen emergencies; while the latter, who is guided solely by habit, is at a loss when habit fails him.

就像学习科学得到一个合适的年龄，研究社会的门道也要有一个合适的年纪。那些学得太快的人，就会不加选择和思索，一生都跟从这些行为。尽管他们学得很好，但他们从不知道做这些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既了解了社会的门道，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就更加谨慎地遵从，所以他也能学习地更准确，更优雅。交给我一个一无所知的十二岁孩子，到他十五岁的时候，我将他交还给你，那个时候，他知道的东西和一个你从幼儿园就开始教育的孩子知道的东西一样多。不同的是，你的学生只是把这些东西记在脑子里，而我的学

生知道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用同样的方法，我也可以教育一个步入社会的二十岁青年，只要在良好的指导下，一年的时间，他就会比一个从小在社会中长大的人更有魅力，更加有礼貌。对于前者来说，他能够理解原因，对不同年龄、地位、性别的人都有合适他们的方法，能够把这一切归纳为一般性原则，并把它们运用到不可预计的紧急情况中；而后者则仅仅由习惯所指导，当没有章法可循的时候，他就变得迷茫了。

Young French ladies are all brought up in convents till they are married. Do they seem to find any difficulty in acquiring the ways which are so new to them, and is it possible to accuse the ladies of Paris of awkward and embarrassed manners or of ignorance of the ways of society, because they have not acquired them in infancy! This is the prejudice of men of the world, who know nothing of more importance than this trifling science, and wrongly imagine that you cannot begin to acquire it too soon.

法国的年轻女生在结婚之前都会在修道院接受教育。她们要学会这些如此新的方法看上去有任何难度吗，我们是否可以把巴黎少女行为的尴尬窘迫、不了解社会门道的原因归结为她们在幼年时代并没有学习这一切呢！这就是这世上男人们的偏见，他们认为除了这微不足道的理由之外，再没有更重要的原因了，所以他们错误地猜想必须要早早地开始学习。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quite true that we must not wait too long. Any one who has spent the whole of his youth far from the great world is all his life long awkward, constrained, out of place; his manners will be heavy and clumsy, no amount of practice will get rid of this, and he will only make himself more ridiculous by

trying to do so. There is a time for every kind of teaching and we ought to recognise it, and each has its own dangers to be avoided. At this age there are more dangers than at any other; but I do not expose my pupil to them without safeguards.

但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确实不能等太长时间。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如果都是远离大千世界的，那么他的一生就会非常窘迫，受到拘束，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他的行为举止也会是笨拙，僵硬的，而他并不能通过练习而改掉这些习惯，他尝试这样做只会使他显得更荒谬。每一种教育方式都有自己的时机，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一种教育方式也都有自己的危险之处，我们应该加以避免。这个年龄所要面临的危险要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多，但是我不会让我的学生没有任何保护就去面对这些危险。

When my method succeeds completely in attaining one object, and when in avoiding one difficulty it also provides against another, I then consider that it is a good method, and that I am on the right track. This seems to be the case with regard to the expedient suggested by me in the present case. If I desire to be stern and cold towards my pupil, I shall lose his confidence, and he will soon conceal himself from me. If I wish to be easy and complaisant, to shut my eyes, what good does it do him to be under my care? I only give my authority to his excesses, and relieve his conscience at the expense of my own. If I introduce him into society with no object but to teach him, he will learn more than I want. If I keep him apart from society, what will he have learnt from me? Everything perhaps, except the one art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a civilised man, the art of living among his fellow-men. If I try to attend to this at a distance, it will be of no avail; he is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present. If I am content to supply him with amusement, he will

acquire habits of luxury and will learn nothing.

如果我的方法彻底成功达成一个目标，如果它在避免一个困难的过程中也可以阻挡另一个困难，那么我会认为这是一个好方法，而我也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在目前这件事情上，我建议的应急之策似乎也就是这样的。如果我对我的学生态度非常严厉冷酷，那么我就会失去他的信任，他很快就会躲避我。如果我变得平易近人，真诚恳切，对他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我照顾他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好呢？我只会对他的放肆行为严加管教，以牺牲我的良心为代价拯救他的良心。如果我使他进入社会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教育他，他能学到的东西就会比我想的还要多。如果我使他远离社会，他又能从我这里学到什么呢？或许他能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无法学到，那就是和别人相处的艺术，这对一个文明人来说是必要的。如果我太早就让他学习，将没有成效；他只专注于眼前的事情。如果我满足于向他提供娱乐，他就会养成奢靡的习惯，不学无术。

We will have none of this. My plan provides for everything. Your heart, I say to the young man, requires a companion; let us go in search of a fitting one; perhaps we shall not easily find such a one, true worth is always rare, but we will be in no hurry, nor will we be easily discouraged. No doubt there is such a one, and we shall find her at last, or at least we shall find some one like her. With an end so attractive to himself, I introduce him into society. What more need I say? Have I not achieved my purpose?

所有的这些我们都不要去做。我的计划是为每一件事做好准备。我会对这个年轻人说："你的心需要陪伴，让我们去寻找一个适合你的伴侣，也许不那么容易找到，但真正值得寻找的东西总是稀少的，我们不急，我们也不会轻易放弃。毋庸置疑，总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出

现，我们最终总会找到她，至少我们会找到与她相像的人。”为他描述这样一个充满吸引力的结局，我就可以把他带入社会。我还需要多说什么呢？难道我没有把我想说的说清楚吗？

By describing to him his future mistress, you may imagine whether I shall gain a hearing, whether I shall succeed in making the qualities he ought to love pleasing and dear to him, whether I shall sway his feelings to seek or shun what is good or bad for him. I shall be the stupidest of men if I fail to make him in love with he knows not whom. No matter that the person I describe is imaginary, it is enough to disgust him with those who might have attracted him; it is enough if it is continually suggesting comparisons which make him prefer his fancy to the real people he sees; and is not love itself a fancy, a falsehood, an illusion? We are far more in love with our own fancy than with the object of it. If we saw the object of our affections as it is, there would be no such thing as love. When we cease to love, the person we used to love remains unchanged, but we no longer see with the same eyes; the magic veil is drawn aside, and love disappears. But when I supply the object of imagination, I have control over comparisons, and I am able easily to prevent illusion with regard to realities.

通过向他描述他未来的伴侣，你可以想象他是否会听进去，我是否能让他真心喜欢我所描述的、他应当喜欢的品质，我是否能让他明白应该寻找或者逃避对他有益或有害的感情。如果我不能使他知道自己爱的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世上最笨的人。我向他描述的这个人是虚构的，不要紧，这也足以让他厌恶那些可能勾引他的人；足以不断地为他提供比较，使他宁愿喜欢自己想象中的人，也不要喜欢他真正看到的人；难道爱情本身不是虚幻的、想象的，是一个谎言吗？相比于现实中的对象，我们总是更喜欢想象中的人。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喜

爱的对象不过就是那样，那世上就没有爱情这回事了。如果我们停止爱，我们爱过的人一如从前，但是我们不会再用相同的眼光看她/他了；神秘的面纱一旦被扯掉，爱情也就消失了。但是我在描述想象的对象时，我会进行比较，能够轻易地防止他对现实的对象进行幻想。

For all that I would not mislead a young man by describing a model of perfection which could never exist; but I would so choose the faults of his mistress that they will suit him, that he will be pleased by them, and they may serve to correct his own. Neither would I lie to him and affirm that there really is such a person; let him delight in the portrait, he will soon desire to find the original. From desire to belief the transition is easy; it is a matter of a little skilful description, which under more perceptible features will give to this imaginary object an air of greater reality. I would go so far as to give her a name; I would say, smiling. Let us call your future mistress Sophy; Sophy is a name of good omen; if it is not the name of the lady of your choice at least she will be worthy of the name; we may honour her with it meanwhile. If after all these details, without affirming or denying, we excuse ourselves from giving an answer, his suspicions will become certainty; he will think that his destined bride is purposely concealed from him, and that he will see her in good time. If once he has arrived at this conclusion and if the characteristics to be shown to him have been well chosen, the rest is easy; there will be little risk in exposing him to the world; protect him from his senses, and his heart is safe.

我不会向年轻人描述绝不会存在的完美类型，从而误导他。但是我会挑选他的爱人的缺点，使她的缺点适合他，为他所喜欢，并且能够帮助改正他的缺点。我也不会向他撒谎，跟他说确实有这样的人存在。如果他喜欢我描述的形象的话，他很快就会渴望找到这个样子的

人。从渴望到信念的转变很容易，只需要有技巧地描述，让这些特征更显著，这样就会使这一想象的对象更加真实。我甚至可以为这个想象的少女取一个名字，我会笑着对他说，“让我们称呼你未来的爱人为苏菲吧，苏菲这个名字有很好的寓意；如果你选择的对象不叫这个名字，她至少要配得上这个名字，现在我们就用这个荣耀的名字称呼她。”如果在说了这些细节之后，我们既不承认也不否定，而是转向另一件事的答案，他的怀疑就会变成确信；他会认为我们故意向他隐瞒他命中注定的新娘，时间一到，他就会遇见她。一旦他有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就要仔细选择向他描绘的特点，剩下的就好办了；这样他出入社会也没有什么危险；我们就能使他不受感官的危害，保证他的心灵是安全的。

But whether or no he personifies the model I have contrived to make so attractive to him, this model, if well done, will attach him none the less to everything that resembles itself, and will give him as great a distaste for all that is unlike it as if Sophy really existed. What a means to preserve his heart from the dangers to which his appearance would expose him, to repress his senses by means of his imagination, to rescue him from the hands of those women who profess to educate young men, and make them pay so dear for their teaching, and only teach a young man manners by making him utterly shameless. Sophy is so modest? What would she think of their advances! Sophy is so simple! How would she like their airs? They are too far from his thoughts and his observations to be dangerous.

但是无论他是否将我向他描述得如此吸引人的形象想象成某一个人，只要我描述得足够清楚，就能使他会继续喜欢和她相像的人，也不会厌恶那些不像她的那些人，就像苏菲真的存在一样。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方法啊，能够使他的心灵不受危险的伤害，尽管他会暴露在危

险之中，就能够通过他的想象压抑他的感官欲望，就可以把他从那些希望教育年轻男人的女人手中挽救出来，她们会让他为她们的教育付出极高的代价，为了教会一个青年礼仪，她们不惜让他变得彻底无耻。苏菲真的那么端庄吗？她会如何看待那些求爱的行为啊！苏菲是多么的单纯！她会如何看待他们的样子？他所想的和他所观察的迥然不同，所以他不至于被她们所危害。

Every one who deals with the control of children follows the same prejudices and the same maxima, for their observation is at fault, and their reflection still more so. A young man is led astray in the first place neither by temperament nor by the senses, but by popular opinion. If we were concerned with boys brought up in boarding schools or girls in convents, I would show that this applies even to them; for the first lessons they learn from each other, the only lessons that bear fruit, are those of vice; and it is not nature that corrupts them but example. But let us leave the boarders in schools and convents to their bad morals; there is no cure for them. I am dealing only with home training. Take a young man carefully educated in his father's country house, and examine him when he reaches Paris and makes his entrance into society; you will find him thinking clearly about honest matters, and you will find his will as wholesome as his reason. You will find scorn of vice and disgust for debauchery; his face will betray his innocent horror at the very mention of a prostitute. I maintain that no young man could make up his mind to enter the gloomy abodes of these unfortunates by himself, if indeed he were aware of their purpose and felt their necessity.

每一个主张管教孩子的人都带有相同的偏见，运用同样的方式约束，因为他们对孩子的观察都是错误的，而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

则错得更离谱。一个年轻人最初误入歧途不是因为性格，也不是因为感官，而是因为大众化的观点。如果我们关注在寄宿学校学习的男生和在修道院学习的女生，这一点甚至可以在他们身上得到证实；因为他们最初互相学习的东西，唯一奏效的东西，是一些恶习；使他们败坏的不是天性，而是不好的榜样。但是，现在就让这些寄宿学校或是修道院的男生女生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吧，他们已经无可救药了。我只针对家庭教育。假定一个年轻人在他父亲的乡间小屋中受过良好教育，当他到达巴黎，进入社会时，你考验他就会发现他心中清晰所想的都是一些正直之事，他的意志力和他的理智一样健全。你也会发现他对于恶习的鄙视和对淫荡的厌恶；只要向他提起妓女，他的脸上就会显示出纯真的嫌恶。我坚持认为如果年轻人都了解她们的目的和需求，没有一个会决定走入那个黑暗的住所。

See the same young man six months later, you will not know him; from his bold conversation, his fashionable maxims, his easy air, you would take him for another man, if his jests over his former simplicity and his shame when any one recalls it did not show that it is he indeed and that he is ashamed of himself. How greatly has he changed in so short a time! What has brought about so sudden and complete a change? His physical development? Would not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his father's house, and certainly he would not have acquired these maxims and this tone at home? The first charms of sense? On the contrary; those who are beginning to abandon themselves to these pleasures are timid and anxious, they shun the light and noise. The first pleasures are always mysterious, modesty gives them their savour, and modesty conceals them; the first mistress does not make a man bold but timid. Wholly absorbed in a situation so novel to him, the young man retires into himself to enjoy it, and trembles for fear it should escape him. If he is noisy he knows neither passion nor love; however he may boast, he has not enjoyed.

六个月之后重新再见这个年轻人，你会不认识他；从他粗鄙的言谈、时髦的话语、轻浮的样子，你会把他认作别人。只有当他对自己过去朴素的样子开玩笑，当别人提及他的过去他感到羞耻时，才证明确实是他，他为自己感到耻辱。短短一段时间，他竟然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突然而又巨大的变化？是因为他的身体发育吗？难道他在他父亲的家中不是这样发育的吗？而且可以确定的是，他在家里是不会这样说话的。是因为初尝感官的滋味吗？恰恰相反，那些刚开始将自己放纵在这种快乐中的人都是紧张羞怯的，他们都躲避光线和嘈杂。最初几次的快感总是神秘的，谦逊使得这种行为更具乐趣，想把它们藏匿起来。因此最初的神秘感并不会使人变得放肆，反而会使人更胆怯。这个环境对他来说特别新奇，他完全沉醉其中。他悄悄享受这一切，害怕它们会离他而去。如果他对这一切到处乱说，那他所了解的，既不是情欲，也不是爱情；无论他如何吹嘘，都说明他没有享受到其中的乐趣。

These changes are merely the result of changed ideas. His heart is the same, but his opinions have altered. His feelings, which change more slowly, will at length yield to his opinions and it is then that he is indeed corrupted. He has scarcely made his entrance into society before he receives a second education quite unlike the first, which teaches him to despise what he esteemed, and esteem what he despised; he learns to consider the teaching of his parents and masters as the jargon of pedants, and the duties they have instilled into him as a childish morality, to be scorned now that he is grown up. He thinks he is bound in honour to change his conduct; he becomes forward without desire, and he talks foolishly from false shame. He rails against morality before he has any taste for vice, and prides himself on debauchery without knowing how to set about it. I shall never forget the confession of a young officer in the Swiss Guards, who was utterly sick of the noisy pleasures of his

comrades, but dared not refuse to take part in them lest he should be laughed at. “I am getting used to it,” he said, “as I am getting used to taking snuff; the taste will come with practice; it will not do to be a child for ever.”

这些变化只不过是思想改变的结果。他的心还是一样的心，但是他的想法已经改变了。他的感情变化得相对慢一些，但最终也会服从于他的想法，到那个时候，他就是真正地腐坏了。他一进入社会，就接受了和第一次教育截然不同的二次洗礼，教会了他鄙视以前他所敬重的东西，敬重以前鄙视的东西。他学会了将父母和老师之前的教导看作是迂腐的东西，将他们向他灌输的责任看作是幼稚的规矩，他现在已经长大了，这些都不值一提了。他认为为了尊严，他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即使没有欲望，他也会胡作非为；他可笑地谈论着必须要有的胡闹。在他对罪恶有任何的体会之前，他就反对高尚的品德，并且得意于自己荒淫无度的生活，全然不知自己如何开始变成这样的。我永远不会忘记瑞士军队的一位长官的坦白，虽然他十分讨厌他的同伴们嘈杂的寻欢作乐，但他不敢拒绝与他们同流合污，生怕被他们嘲笑。“我已经习惯了”他说，“就像我已经习惯抽鼻烟，抽多了就知道其中的滋味了；总不能永远做个孩子吧？”

So a young man when he enters society must be preserved from vanity rather than from sensibility; he succumbs rather to the tastes of others than to his own, and self-love is responsible for more libertines than love.

因此，当一个年轻人初入社会，他必须要小心虚荣浮华，而不是小心情欲；他会屈从于他人的品味而不是自己的，利己主义得为他的行为买单，而不是爱情。

This being granted, I ask you. Is there any one on earth better armed than my pupil against all that may attack his morals, his sentiments, his principles; is there any one more able to resist the flood? What seduction is there against which he is not forearmed? If his desires attract him towards women, he fails to find what he seeks, and his heart, already occupied, holds him back. If he is disturbed and urged onward by his senses, where will he find satisfaction? His horror of adultery and debauch keeps him at a distance from prostitutes and married women, and the disorders of youth may always be traced to one or other of these. A maiden may be a coquette, but she will not be shameless, she will not fling herself at the head of a young man who may marry her if he believes in her virtue; besides she is always under supervision. Emile, too, will not be left entirely to himself; both of them will be under the guardianship of fear and shame, the constant companions of a first passion; they will not proceed at once to misconduct, and they will not have time to come to it gradually without hindrance. If he behaves otherwise, he must have taken lessons from his comrades, he must have learned from them to despise his self-control, and to imitate their boldness. But there is no one in the whole world so little given to imitation as Emile. What man is there who is so little influenced by mockery as one who has no prejudices himself and yields nothing to the prejudices of others. I have laboured twenty years to arm him against mockery; they will not make him their dupe in a day; for in his eyes ridicule is the argument of fools, and nothing makes one less susceptible to raillery than to be beyond the influence of prejudice. Instead of jests he must have arguments, and while he is in this frame of mind, I am not afraid that he will be carried away by young fools; conscience and truth are on my side. If prejudice is to enter into the matter at all, an affection of twenty years' standing counts for something; no one will ever convince him that I have wearied him

with vain lessons; and in a heart so upright and so sensitive the voice of a tried and trusted friend will soon efface the shouts of twenty libertines. As it is therefore merely a question of showing him that he is deceived, that while they pretend to treat him as a man they are really treating him as a child, I shall choose to be always simple but serious and plain in my arguments, so that he may feel that I do indeed treat him as a man. I will say to him, You will see that your welfare, in which my own is bound up, compels me to speak; I can do nothing else. But why do these young men want to persuade you? Because they desire to seduce you; they do not care for you, they take no real interest in you; their only motive is a secret spite because they see you are better than they; they want to drag you down to their own level, and they only reproach you with submitting to control that they may themselves control you. Do you think you have anything to gain by this? Are they so much wiser than I, is the affection of a day stronger than mine? To give any weight to their jests they must give weight to their authority; and by what experience do they support their maxima above ours? They have only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other giddy youths, as they would have you follow theirs. To escape from the so-called prejudices of their fathers, they yield to those of their comrades. I cannot see that they are any the better off; but I see that they lose two things of value—the affection of their parents, whose advice is that of tenderness and truth, and the wisdom of experience which teaches us to judge by what we know; for their fathers have once been young, but the young men have never been fathers.

你同意这一点的话，那我问你，这世上有哪一个人能比我的学生具有更好的武装来对抗一切可能伤害他的道德、情操、原则的危险呢？有哪一个人能有更好地抵制泛滥？他对什么样的诱惑没有事先准

备呢？如果他的欲望指引他靠近女人，但他无法找到他想要寻找的人，那他那颗已被占据的心就会将他拽回来。如果他被欲望扰得心神不宁，他又去哪里找寻满足呢？他对于通奸和堕落的恐惧使他对妓女和已婚妇女保持距离，造成年轻人的混乱行径的原因往往可以追溯到这两种女人身上。一个未婚女子也许会搔首弄姿，但她绝不会不知廉耻。就算一个年轻男子认为她品行优良，想要娶她为妻，她也不会不知羞耻地投怀送抱，何况她还是一直在监护之下的。爱弥儿也同样不会让自己的欲望完全控制自己，他们俩都在羞耻之心的保护之下，总是伴随着最初的欲望；他们不会一下子就有失分寸，但他们也不会毫无阻碍地逐渐变得亲密。如果他不这样做，他一定是从他的同伴那样儿学了样，他一定从他们那儿学会了鄙视自我节制，从而模仿他们的大胆行为。但是这个世上不会再有人比爱弥儿更不喜欢模仿别人的行为了。他就是这样一个自己本身不带有任何偏见，也不屈服于他人偏见的人，因此他不会被他人的嘲弄影响。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培养他应对他人嘲讽的能力；他们无法在一两天就使爱弥儿上当受骗，因为在他的眼中，嘲讽是傻瓜才有的说辞。要想不受他人嘲笑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无视他们的偏见。他必须要讲道理而不是嘲弄，只要讲道理，我就不担心他会被那些年轻的愚人带走，因为良心和真理在我这边。就算他被偏见所影响了，这二十年的感情终究会有点作用；没有人能够说服他我教的东西一无是处；他拥有如此正直和感性的心，在他心中，一个可靠的、值得信赖的朋友的声音很快就会战胜二十个不羁的人的叫嚣。因此问题仅仅在于向他指出他被欺骗了，他们假装将他当作一个成年人看待，其实仍然将他视作小孩。我会一直选择用一种亲切但是严肃恳切的语气教育他，这样他能够感觉到只有我真正将他视作成年人。我会对他说："你会发现，你的幸福与我的幸福紧密相连，这促使我不得不说这一番话，我别无他法。但是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想要说服你呢？因为他们想要诱惑你，他们才不关心你，也不是真的对你感兴趣；他们唯一的动机是暗暗地欺负你，因为他们觉得你比他们都要好；他们想要拉你下水，让你变得和他们一样堕落。他们只会责骂你听从我的管教，其实他们是想让你服从他们的控制。你认为这对你有好什么好处吗？他们比我更明智吗？他们对你的感情比我对你的感情更深厚吗？想要证明他们的嘲笑方法是正确的，那就要

给出可靠的证据；他们有什么经验能证明他们的行为准则要优于我们的？他们只是效仿别的轻狂少年的样子，他们也会让你效仿他们的。想要逃脱他们父母所谓的偏见，他们就服从于小伙伴的偏见。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更好的地方，但是我认为他们失去了两样珍贵的东西——父母的爱。他们的建议总是诚恳且正确的；还有经验的智慧，能教会我们凭借已有的知识做出判断。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曾年轻过，但是这些年轻人从来没有做过父亲。”

But you think they are at least sincere in their foolish precepts. Not so, dear Emile; they deceive themselves in order to deceive you; they are not in agreement with themselves; their heart continually revolts, and their very words often contradict themselves. This man who mocks at everything good would be in despair if his wife held the same views. Another extends his indifference to good morals even to his future wife, or he sinks to such depths of infamy as to be indifferent to his wife's conduct; but go a step further; speak to him of his mother; is he willing to be treated as the child of an adulteress and the son of a woman of bad character, is he ready to assume the name of a family, to steal the patrimony of the true heir, in a word will he bear being treated as a bastard? Which of them will permit his daughter to be dishonoured as he dishonours the daughter of another? There is not one of them who would not kill you if you adopted in your conduct towards him all the principles he tries to teach you. Thus they prove their inconsistency, and we know they do not believe what they say. Here are reasons, dear Emile; weigh their arguments if they have any, and compare them with mine. If I wished to have recourse like them to scorn and mockery, you would see that they lend themselves to ridicule as much or more than myself. But I am not afraid of serious inquiry. The triumph of mockers is soon over; truth endures, and their foolish laughter dies away.

“你也许认为至少他们对他们荒谬的说法很真诚，真心实意地去做了。其实并非如此，亲爱的爱弥儿。他们为了欺骗你，他们也欺骗了自己；他们本身并不对自己感到认同；他们的心其实一直在反抗，总是言行不一。这个男人嘲笑一切好的事物，但如果他的妻子也这样做的话，他会感到非常绝望。另一些人延伸到了对良好道德的漠视，甚至对自己未来妻子的道德状况也满不在乎，就连妻子不道德的行为使他声名狼藉，他也坐视不理；但是，更进一步，和他谈一谈他的母亲，他是否真的愿意成为一个淫妇，一个品行不端的女人的孩子，仅仅是为了改名换姓，为了盗取属于真正继承人的祖传家产，总而言之，他会愿意背负私生子的名头吗？又有哪一家人会允许自己的女儿背上他使别人家的女儿背上的臭名声呢？如果你把他们教给你的那套东西运用在他们身上的话，没有一个不会置你于死地。因此这就证明了他们的言行不一，我们知道他们对自己的话，是不相信的。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亲爱的爱弥儿，如果他们有任何道理的话，权衡他们说的话，拿他们的话和我的话比较一下。如果我想像他们那样对你不屑一顾，冷嘲热讽，你会发现他们荒谬的地方比我还多。但是我不畏惧严肃的质询。嘲笑者的胜利都是昙花一现，他们愚蠢的笑声很快就会消失殆尽，但真理是永恒的。

You do not think that Emile, at twenty, can possibly be docile. How differently we think! I cannot understand how he could be docile at ten, for what hold have I on him at that age? It took me fifteen years of careful preparation to secure that hold. I was not educating him, but preparing him for education. He is now sufficiently educated to be docile; he recognises the voice of friendship and he knows how to obey reason. It is true I allow him a show of freedom, but he was never more completely under control, because he obeys of his own free will. So long as I could not get the mastery over his will, I retained my control over his person; I never left him for a moment. Now I sometimes leave him to himself

because I control him continually. When I leave him I embrace him and I say with confidence: Emile, I trust you to my friend, I leave you to his honour; he will answer for you.

你认为爱弥儿在二十岁的年纪是不可能还是那么温顺的。我们的看法是多么不同啊！我无法想象他在十岁的时候怎样变得温顺，因为在他那个年龄，我根本没办法驾驭他。为了牢牢地驾驭他，我精心准备了十五年。我不是在教育他，而是让他做好接受教育的准备。他现在已经接受足够的教育，变得很温顺；他已经懂得了友情，也知道如何服从理智。我确实给予他一定的表面上的自由，但其实他受到的是最完全的控制，因为他自愿接受这样的约束。只要我没办法控制他的想法，我就控制他的身体，我从不离开他半步。现在有时候我会离开他，因为我可以持续控制着他。当我要离开他的时候，我会拥抱他，信心满满地对他说："爱弥儿，我把你交给我的朋友，我把你托付给他真诚的心，他会对你负责的。"

To corrupt healthy affections which have not been previously depraved, to efface principles which are directly derived from our own reasoning, is not the work of a moment. If any change takes place during my absence, that absence will not be long, he will never be able to conceal himself from me, so that I shall perceive the danger before any harm comes of it, and I shall be in time to provide a remedy. As we do not become depraved all at once, neither do we learn to deceive all at once; and if ever there was a man unskilled in the art of deception it is Emile, who has never had any occasion for deceit.

想要破坏从未被腐蚀过的健康感情，想要抹去从我们的理性直接衍生出的原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到的。如果在我离开期间，出

现了任何变化，因为我离开的时间不长，所以他不可能成功地隐瞒我，这样我就能在造成危害之前就觉察出危险，并及时地进行补救。因为我们不可能立刻变得堕落，也不可能立刻学会欺骗别人；如果有一个人不擅长玩弄欺骗的伎俩的话，这个人就是爱弥儿。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运用这种伎俩的机会。

By means of these precautions and others like them, I expect to guard him so completely against strange sights and vulgar precepts that I would rather see him in the worst company in Paris than alone in his room or in a park left to all the restlessness of his age. Whatever we may do, a young man's worst enemy is himself, and this is an enemy we cannot avoid. Yet this is an enemy of our own making, for, as I have said again and again, it is the imagination which stirs the senses. Desire is not a physical need; it is not true that it is a need at all. If no lascivious object had met our eye, if no unclean thought had entered our mind, this so-called need might never have made itself felt, and we should have remained chaste, without temptation, effort, or merit. We do not know how the blood of youth is stirred by certain situations and certain sights, while the youth himself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cause of his uneasiness-an uneasiness difficult to subdue and certain to recur. For my own part, the more I consider this serious crisis and its causes, immediate and remote, the more convinced I am that a solitary brought up in some desert, apart from books, teaching, and women, would die a virgin, however long he lived.

通过这些保护措施和其他类似的措施，我希望能够使他完全不受奇怪的事物和庸俗的话语的影响。我宁愿他去巴黎最乱的聚会也不要他一个人独自待在他的房间或是公园里，让他在这个年纪心神不宁。无论我们做些什么，年轻人最大的敌人永远是他自己，而这个敌人，

我们无法避免。然而，这个敌人是由我们造成的，正如我一次又一次重复的那样，是我们的想象搅动了我们的官能。欲望不是一种生理需求，说它是一种需求是完全不正确的。如果我们没有看过淫秽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过污秽的杂念，这所谓的需求就绝不会自己产生，因此我们要保住贞操，不受诱惑。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环境和什么场面引起了年轻人血液中的骚动，他们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的紧张不安。这种紧张不安难以平复，而且一定会再次发生。就我自己来说，我对这个严重的危机及其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考虑得越多，我就越确信，一个在荒漠中长大的人，不看书、不接受教育、不接触女人，无论他活多久，至死他都是一个处男。

But we are not concerned with a savage of this sort. When we educate a man among his fellow-men and for social life, we cannot, and indeed we ought not to, bring him up in this wholesome ignorance, and half knowledge is worse than none. The memory of things we have observed, the ideas we have acquired, follow us into retirement and people it, against our will, with images more seductive than the things themselves, and these make solitude as fatal to those who bring such ideas with them as it is wholesome for those who have never left it.

但是我们说的不是这样未开化的野蛮人。我们不可能在人群中为社会培养一个人，而且我们也确实不应该在这样完全愚昧的环境中培养他；一知半解比一无所知更加糟糕。我们观察事物的记忆和我们所获取的观念会一直跟随着我们，渗透进心里，使我们不得不产生比事物本身更具诱惑性的形象。这一切都使得独处对那些心中怀有这种想法的人非常致命，就像对那些一直独处的人一样致命。

Therefore, watch carefully over the young man; he can protect

himself from all other foes, but it is for you to protect him against himself. Never leave him night or day, or at least share his room; never let him go to bed till he is sleepy, and let him rise as soon as he wakes. Distrust instinct as soon as you cease to rely altogether upon it. Instinct was good while he acted under its guidance only; now that he is in the midst of human institutions, instinct is not to be trusted; it must not be destroyed, it must be controlled, which is perhaps a more difficult matter. It would be a dangerous matter if instinct taught your pupil to abuse his senses; if once he acquires this dangerous habit he is ruined. From that time forward, body and soul will be enervated; he will carry to the grave the sad effects of this habit, the most fatal habit which a young man can acquire. If you cannot attain to the mastery of your passions, dear Emile, I pity you; but I shall not hesitate for a moment, I will not permit the purposes of nature to be evaded. If you must be a slave, I prefer to surrender you to a tyrant from whom I may deliver you; whatever happens, I can free you more easily from the slavery of women than from yourself.

因此，仔细观察年轻人，他能够保护自己不受敌人的伤害，但是你要保护他不受自己的伤害。无论白天或黑夜都不要离开他，至少和他待在一个房间里，直到他困了，再让他上床睡觉；只要他一醒，就让他起床。只要你停止教授他超出本能的东西，就对他的天性保持怀疑。只有当他在本能的指导下做事的时候，他的本能才是好的；一旦进入社会，融入人群，他的本能就不足以得到信任了；我们不能消灭它，但必须控制它，其实这也许更难做到。如果本能使得你的学生放纵他的感官享受，那么这将会变得非常危险；而他一旦沾染了这种危险的习惯，那他就毁了。从那个时候起，身体和灵魂都会一直遭受摧残；他甚至会将他的这种习惯的不良影响带进坟墓。这将是一个年轻人能够沾染的最致命的习惯了。如果你不能很好地控制你的激情，亲爱的爱弥儿，我为你感到遗憾；但是我不会犹豫片刻，我绝不会允许

你回避自然的目的。如果你必将臣服于你的欲望的话，我宁可让你屈服于我将你从他手里解救出来的暴君；这样，无论发生什么，我能轻易将你从女人那里解救出来，而不是从你自己那里解救出来。

Up to the age of twenty, the body is still growing and requires all its strength; till that age continence is the law of nature, and this law is rarely violated without injury to the constitution. After twenty, continence is a moral duty; it is an important duty, for it teaches us to control ourselves, to be masters of our own appetites. But moral duties have their modifications, their exceptions, their rules. When human weakness makes an alternative inevitable, of two evils choose the least; in any case it is better to commit a misdeed than to contract a vicious habit.

直到二十岁，你的身体仍然在成长，需要它所有的精力；到那个年纪，节欲是自然的法则。你一旦违背了这个法则，就会对你的体格造成伤害。二十岁之后，节欲就是一种道德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义务，因为它教会我们要控制自己，做自己欲望的主人。但是道德义务也是可以变通的，也有例外，也有自己的规则。当人类的弱点必须在两恶之中选择一个的话，我们要两害相权取其轻；无论什么情况下，做一件错事永远比沾染一种恶习要好。

Remember, I am not talking of my pupil now, but of yours. His passions, to which you have given way, are your master; yield to them openly and without concealing his victory. If you are able to show him it in its true light, he will be ashamed rather than proud of it, and you will secure the right to guide him in his wanderings, at least so as to avoid precipices. The disciple must do nothing, not even evil, without the knowledge and consent of his master; it is a

hundredfold better that the tutor should approve of a misdeed than that he should deceive himself or be deceived by his pupil, and the wrong should be done without his knowledge. He who thinks he must shut his eyes to one thing, must soon shut them altogether; the first abuse which is permitted leads to others, and this chain of consequences only ends in the complete overthrow of all order and contempt for every law.

记住，我现在不是在说我的学生，而是你的学生。你使得他燃起欲望，但是你又无法控制，那你索性就公开表明屈服于它的欲望，并且对他的胜利毫无隐藏。如果你能够真实地告诉他这些情况，他不会觉得自豪，反而会觉得羞耻。这样你就能够有权利在他误入歧途之际指导他，至少使他不会坠入深渊。学生做任何事情，甚至是做坏事，都必须提前让老师知道，并获得其准许。老师同意学生做不好的事情也比被学生蒙在鼓里或是装作不知道好一百倍。学生做坏事不能不让老师知道。如果有人认为他必须对一件事情视而不见，那他很快就会对所有事情视而不见。在他容忍学生做第一件坏事之后，他就会接二连三地继续做坏事，直到最后推翻一切秩序，蔑视一切法则。

There is another mistake which I have already dealt with, a mistake continually made by narrow-minded persons; they constantly affect the dignity of a master, and wish to be regarded by their disciples as perfect. This method is just the contrary of what should be done. How is it that they fail to perceive that when they try to strengthen their authority they are really destroying it; that to gain a hearing one must put oneself in the place of our hearers, and that to speak to the human heart, one must be a man. All these perfect people neither touch nor persuade; people always say, “It is easy for them to fight against passions they do not feel.” Show your pupil your own weaknesses if you want to cure his; let him see in

you struggles like his own; let him learn by your example to master himself and let him not say like other young men, “These old people, who are vexed because they are no longer young, want to treat all young people as if they were old; and they make a crime of our passions because their own passions are dead.”

另外还有一个我之前抨击过的错误，很多心胸狭窄的人都会犯这个错误。他们总是在学生面前假装威严十足，并且希望在学生的心里自己完美无缺。这个方法和我们应该做的恰恰相反。他们要怎样才会意识到他们试图增加自己的威严，实则是在摧毁他们的威信。要想要别人听自己说的话，我们就必须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要想打动别人，就必须合乎人情。那些完美的人既不能感动别人，也不能说服别人；人们总是说：“他们感受不到欲望，因此他们控制学生的欲望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你想要纠正学生的弱点，你就要向学生展示你自己的弱点；让他看到你和他一样都有挣扎；通过你的例子让他学会控制自己，而不会像其他年轻人这样说：“这些老年人，因为不再年轻了，就变得喋喋不休，非常烦人。因为他们自己的欲火已经熄灭了，他们就把我们的欲望当作是犯罪。”

Montaigne tells us that he once asked Seigneur de Langey how often, in his negotiations with Germany, he had got drunk in his king's service. I would willingly ask the tutor of a certain young man how often he has entered a house of ill-fame for his pupil's sake. How often? I am wrong. If the first time has not cured the young libertine of all desire to go there again, if he does not return penitent and ashamed, if he does not shed torrents of tears upon your bosom, leave him on the spot; either he is a monster or you are a fool; you will never do him any good. But let us have done with these last expedients, which are as distressing as they are dangerous; our kind of education has no need of them.

蒙田告诉我们，他曾经问过德朗盖爵士在他与德国人交涉的过程中，有多少次他在为国王效劳时喝得酩酊大醉。我会问某一个年轻人的老师为了学生，他曾经多少次出入过那些声名狼藉的地方。多少次？我错了。如果他第一次未能克制住他放浪形骸的学生想要再去那些地方的欲望，如果他回来以后不曾感到羞耻忏悔，如果他没有在你的怀抱里声泪俱下，那要么他是一个怪物要么你是一个傻瓜；你对他再没有任何作用了。但是，让我们放弃最后的应急措施，它们既令人痛苦又充满危险，我们的教育决不需要它们。

What precautions we must take with a young man of good birth before exposing him to the scandalous manners of our age! These precautions are painful but necessary; negligence in this matter is the ruin of all our young men; degeneracy is the result of youthful excesses, and it is these excesses which make men what they are. Old and base in their vices, their hearts are shrivelled, because their worn-out bodies were corrupted at an early age; they have scarcely strength to stir. The subtlety of their thoughts betrays a mind lacking in substance; they are incapable of any great or noble feeling, they have neither simplicity nor vigour; altogether abject and meanly wicked, they are merely frivolous, deceitful, and false; they have not even courage enough to be distinguished criminals. Such are the despicable men produced by early debauchery; if there were but one among them who knew how to be sober and temperate, to guard his heart, his body, his morals from the contagion of bad example, at the age of thirty he would crush all these insects, and would become their master with far less trouble than it cost him to become master of himself.

对于一个天性优良的年轻人，在让他暴露于我们这个时代不良的

风气之前，我们得对他进行怎样精心的保护啊！这些防备措施是痛苦的，但也是必须的，忽略这一步重要的工作就会毁了所有的年轻人；堕落是年轻放肆的结果，正是这种放纵使得他们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他们的恶习中，他们变得性情疏懒，卑鄙无耻。他们的心灵开始枯萎，因为他们劳损过度的身体年纪轻轻就早已经败坏了，已再无力气兴奋起来了。他们狡诈的思想暴露了他们的心不坚毅；他们无法感知任何伟大或者高尚的感情，既不天真，也没有活力；他们变得卑鄙缺德，全然坑蒙拐骗，不务正业。他们甚至都没有勇气去做鼎鼎大名的罪犯。是他们早期的荒淫无度导致了他们现在这样卑鄙。但凡他们中有一个人知道如何保持头脑清醒，节制适度，来保护自己的身心，防止他从坏榜样中沾染坏习性。等他到了三十岁，他会完全碾压这些卑鄙的小人，控制他们会比控制自己还要容易。

However little Emile owes to birth and fortune, he might be this man if he chose; but he despises such people too much to condescend to make them his slaves. Let us now watch him in their midst, as he enters into society, not to claim the first place, but to acquaint himself with it and to seek a helpmeet worthy of himself.

无论小爱弥儿的出身和命运如何，他都可以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人；但是他极度看不起这样的人，所以不愿屈尊奴役他们。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在他们之中的样子。他进入社会，不是为了大出风头，而是为了使自己对这个社会有所了解，学着适应，并且找到一个与他相配的伴侣。

Whatever his rank or birth, whatever the society into which he is introduced, his entrance into that society will be simple and unaffected; God grant he may not be unlucky enough to shine in society; the qualities which make a good impression at the first

glance are not his, he neither possesses them, nor desires to possess them. He cares too little for the opinions of other people to value their prejudices, and he is indifferent whether people esteem him or not until they know him. His address is neither shy nor conceited, but natural and sincere, he knows nothing of constraint or concealment, and he is just the same among a group of people as he is when he is alone. Will this make him rude, scornful, and careless of others? On the contrary; if he were not heedless of others when he lived alone, why should he be heedless of them now that he is living among them? He does not prefer them to himself in his manners, because he does not prefer them to himself in his heart, but neither does he show them an indifference which he is far from feeling; if he is unacquainted with the forms of politeness, he is not unacquainted with the attentions dictated by humanity. He cannot bear to see any one suffer; he will not give up his place to another from mere external politeness, but he will willingly yield it to him out of kindness if he sees that he is being neglected and that this neglect hurts him; for it will be less disagreeable to Emile to remain standing of his own accord than to see another compelled to stand.

无论他的出身怎样，无论他进入了怎样的社交场合，他进入社会的渠道都是朴实自然的；愿上帝保佑他在社会中不会太锋芒毕露；给别人第一眼留下好印象绝不该是这样的，他不具有也不愿意有这些品质。他非常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也不受他人偏见的影响；在人们了解他之前，他不在乎别人是否尊重他。他与别人交谈既不害羞也不自大，而是非常自然且真诚。他不会感到拘束或是有所隐瞒。他待在人群中的时候和他独处的时候是一样的。这会显得他粗鲁，傲慢，淡漠吗？恰恰相反，如果他独处的时候都不轻视别人，当他和在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怎么会轻视别人呢？他之所以表现得更喜欢保持自己原来的样子，是因为他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不像别人一样做而表现得很冷漠；如果他不懂礼节形式的话，那他就不

会懂得人性中对他人的关怀。他不忍心看到任何人受苦难；他不会仅仅出于表面的礼节将自己的位子让给别人，但是如果他看到一个人被大家所忽视，并且显得很伤心，那他会心甘情愿把座位让给他。因为对爱弥儿来说，与其看到别人被迫站着，他宁愿自己站着。

Although Emile has no very high opinion of people in general, he does not show any scorn of them, because he pities them and is sorry for them. As he cannot give them a taste for what is truly good, he leaves them the imaginary good with which they are satisfied, lest by robbing them of this he should leave them worse off than before. So he neither argues nor contradicts; neither does he flatter nor agree; he states his opinion without arguing with others, because he loves liberty above all things, and freedom is one of the fairest gifts of liberty.

尽管总的来说爱弥儿对别人的评价不是很高，但是他从来没有对他们表现出一丁儿的轻蔑，因为他为他们感到遗憾和同情。既然他不能让他们体验什么是真正的善，他就会保留他们对于善的满足的美好想象，以免剥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会比以前更糟糕。因此他既不争辩也不反驳；既不奉承别人，也不刻意讨好；他保留自己的意见，不与他人争辩，因为所有东西中他最爱自由，而直率就是自由最好的表现形式之一。

He says little, for he is not anxious to attract attention; for the same reason he only says what is to the point; who could induce him to speak otherwise? Emile is too well informed to be a chatter-box. A great flow of words comes either from a pretentious spirit, of which I shall speak presently, or from the value laid upon trifles which we foolishly think to be as important in the eyes of others as

in our own. He who knows enough of things to value them at their true worth never says too much; for he can also judge of the attention bestowed on him and the interest aroused by what he says. People who know little are usually great talkers, while men who know much say little. It is plain that an ignorant person thinks everything he does know important, and he tells it to everybody. But a well-educated man is not so ready to display his learning; he would have too much to say, and he sees that there is much more to be said, so he holds his peace.

他不怎么说话，因为他不急于吸引别人的注意，因此，他说话时总是开门见山，谁还能使他多说些什么呢？爱弥儿很有教养，不会成为一个话匣子。话太多的人要么是因为我马上会谈到的那种自命不凡的心理，要么是把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看得极其重要，并且愚蠢地认为其在别人眼中也像他自己眼中那样重要。那些足够了解事情的人，往往也能判断出事物的真正价值，所以决不会多说。因为他同样能够判断出别人是否会注意听他说的话，是否能够引起别人的兴趣。知道得越少的人往往说得越多，知道得越多的人往往说得越少。这个道理很清楚，就比如一个无知的人总认为自己做的事情非常重要，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不会这样随时准备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昭告天下；他有太多东西可以说，但是他知道还有更多的东西是他所不知道的，所以他就保持沉默。

Far from disregarding the ways of other people, Emile conforms to them readily enough; not that he may appear to know all about them, nor yet to affect the airs of a man of fashion, but on the contrary for fear lest he should attract attention, and in order to pass unnoticed; he is most at his ease when no one pays any attention to him.

爱弥儿不但不无视其他人，他甚至非常乐意地顺从别人；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显得他有多了解他们，也不是为了装出一副懂时务的样子，而是生怕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只有在没人注意到他的时候是最自在的。

Although when he makes his entrance into society he knows nothing of its customs, this does not make him shy or timid; if he keeps in the background, it is not because he is embarrassed, but because, if you want to see, you must not be seen; for he scarcely troubles himself at all about what people think of him, and he is not the least afraid of ridicule. Hence he is always quiet and self-possessed and is not troubled with shyness. All he has to do is done as well as he knows how to do it, whether people are looking at him or not; and as he is always on the alert to observe other people, he acquires their ways with an ease impossible to the slaves of other people's opinions. We might say that he acquires the ways of society just because he cares so little about them.

尽管在他进入社会的时候，他对社会中的一些习惯一无所知，但他并不因此感到胆小羞怯。要是他躲在背后，倒不是因为他感到尴尬，而是因为如果你想要好好观察一切，那你就不能被过多关注。因为他几乎从不为别人对他的看法而烦恼，他丝毫不畏惧别人的嘲笑。因此他总是那么的安静、镇定，不为害羞而烦恼。无论别人是否注意他，他都很好地知道该怎么做，因此他出色地完成了所有该做的；他时刻都在观察别人，所以他能够自如地了解别人的做法。那些为别人看法所累的人是做不到这些的。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他对这个社会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才学会了这些做法。

But do not make any mistake as to his bearing; it is not to be

compared with that of your young dandies. It is self-possessed, not conceited; his manners are easy, not haughty; an insolent look is the mark of a slave, there is nothing affected in independence. I never saw a man of lofty soul who showed it in his bearing; this affectation is more suited to vile and frivolous souls, who have no other means of asserting themselves. I read somewhere that a foreigner appeared one day in the presence of the famous Marcel, who asked him what country he came from. “I am an Englishman,” replied the stranger. “You are an Englishman!” replied the dancer, “You come from that island where the citizens have a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and form part of the sovereign power? [1_30] No, sir, that modest bearing, that timid glance, that hesitating manner, proclaim only a slave adorned with the title of an elector.”

但是你不要错看了他的举止，这完全不能和你的那些花花公子相比较。他的样子镇定自若但不傲慢自大，他的举止从容不怕但不目中无人；那种无礼的神情是一个奴隶才有的，一个独立的人绝不会如此矫揉造作。我从未见过哪个品行高尚的人显得非常矫情；这种矫揉造作适合那些粗鄙且不务正业的人，因为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来显露自己。我曾经在哪里读到过，有一天，一个外国人遇见了著名舞蹈家马塞尔，马塞尔问他来自哪个国家。“我是英国人”外国人回答。“你是英国人！”舞蹈家说道，“你的国家公民可以参与到国家事务中，并且形成了主权的一部分吗 [2_30] ？不，先生，你那害羞的样子，胆怯的目光，犹豫的举止，只能说明你不过是个徒有选民头衔的奴隶罢了。”

I cannot say whether this saying shows much knowledge of the true relation between a man's character and his appearance. I have not the honour of being a dancing master, and I should have thought just the opposite. I should have said, “This Englishman is

no courtier; I never heard that courtiers have a timid bearing and a hesitating manner. A man whose appearance is timid in the presence of a dancer might not be timid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Surely this M. Marcel must take his fellow-countrymen for so many Romans.

我不能说这句话是否了表明一个人的性格和外表之间真正的关系。而我没有荣幸做一个舞蹈大师，但是我的想法与他正好相反。我会说："这个英国人不是一个谄媚的人，因为我从未见哪个谄媚者是这样胆怯踌躇的。如果一个人在一个舞蹈家面前表现得羞怯，并不代表他在众议院也是这个样子。"可以确定的是，马塞尔一定把他的同胞都当作是罗马人了。

He who loves desires to be loved, Emile loves his fellows and desires to please them. Even more does he wish to please the women; his age, his character, the object he has in view, all increase this desire. I say his character, for this has a great effect; men of good character are those who really adore women. They have not the mocking jargon of gallantry like the rest, but their eagerness is more genuinely tender, because it comes from the heart. In the presence of a young woman, I could pick out a young man of character and self-control from among a hundred thousand libertines. Consider what Emile must be, with all the eagerness of early youth and so many reasons for resistance! For in the presence of women I think he will sometimes be shy and timid; but this shyness will certainly not be displeasing, and the least foolish of them will only too often find a way to enjoy it and augment it. Moreover, his eagerness will take a different shape according to those he has to do with. He will be more modest and respectful to married women, more eager and tender towards young girls. He

never loses sight of his purpose, and it is always those who most recall it to him who receive the greater share of his attentions.

当一个人爱别人的时候，同样也希望被爱。爱弥儿爱他的同伴，想要使他们快乐。他甚至想要取悦女人；他的年龄和性格，以及他的目的，都使得他更想要这样做。我提及他的性格，是因为这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性格好的人都非常尊重女人。他们不像其他人一样学说一些献殷勤的话，但是他们的渴望更加真诚，因为这是发自内心的。在一个年轻妇女面前，会有成百上千的放荡不羁的男子，但是在他们之中，我也能挑出一个品德好且有自制力的青年人。想一想爱弥儿一定会有的样子，他有着年轻人都有的热情和渴望，也有顽强抵抗的理智。我想面对女人，他有时候会表现得非常害羞胆怯，但是这种羞怯一定不会使她们不愉快，她们中最不荒谬的也想尽办法觉得他的样子很可爱。然而，他的热情也会根据对象的不同而发生改变。面对已婚妇女，他会更加谦恭和尊敬；而对于年轻女孩，他则会显得更加热情和温柔。他从不会迷失自己的目标，那些与他有相同目标的人往往能够引起他更多的注意。

No one could be more attentive to every consideration based upon the laws of nature, and even on the laws of good society; but the former are always preferred before the latter, and Emile will show more respect to an elderly person in private life than to a young magistrate of his own age. As he is generally one of the youngest in the company, he will always be one of the most modest, not from the vanity which apes humility, but from a natural feeling founded upon reason. He will not have the effrontery of the young fop, who speaks louder than the wise and interrupts the old in order to amuse the company. He will never give any cause for the reply given to Louis XV by an old gentleman who was asked whether he preferred this century or the last: “Sire, I spent my youth in

reverence towards the old; I find myself compelled to spend my old age in reverence towards the young.”

没有人能比爱弥儿更加周到地根据自然法则和良好社会的法则来尊敬别人，但是他总是先考虑自然法则，再考虑社会法则。在生活中，相比于与他同龄的官员，爱弥儿会对老年人表示更多的尊敬。因为他一般是人群中年纪最小的，所以他总是非常谦逊。这不是为了做好表面工作，而是由于他的理智而自然产生的一种情感。他不会像那些无礼的纨绔子弟一样厚颜无耻，为了逗乐身边的人，说话的声音比有智慧的人还高，时常打断老人的话。路易十五曾经问一个老绅士他更喜欢这个世纪还是上个世纪。老人回答说：“阁下，我年轻的时候要尊敬老人；现在我老了，却不得不尊敬年轻人了。”爱弥儿非常不赞同老人的回答。

His heart is tender and sensitive, but he cares nothing for the weight of popular opinion, though he loves to give pleasure to others; so he will care little to be thought a person of importance. Hence he will be affectionate rather than polite, he will never be pompous or affected, and he will be always more touched by a caress than by much praise. For the same reasons he will never be careless of his manners or his clothes; perhaps he will be rather particular about his dress, not that he may show himself a man of taste, but to make his appearance more pleasing; he will never require a gilt frame, and he will never spoil his style by a display of wealth.

他有一颗温柔敏感的心，虽然他喜欢给别人带去欢乐，但是他从来被大众的看法所左右，也不在乎别人是否觉得他重要。因此，他对别人非常真诚，而不只是礼貌客套，他绝不会高傲自大或是虚情假

意。相比于许多夸赞，一个拥抱更能感动他。同样的道理，他非常注重自己的举止和衣着；也许他会对自己的服装非常挑剔讲究，这不是为了显示他是一个有品位的人，而是为了自己看起来更舒服一些。他绝不会戴一副金边的眼镜，他不允许为了炫富而破坏了他的风度。

All this demands, as you see, no stock of precepts from me; it is all the result of his early education. People make a great mystery of the ways of society, as if, at the age when these ways are acquired, we did not take to them quite naturally, and as if the first laws of politeness were not to be found in a kindly heart. True politeness consists in showing our goodwill towards men; it shows its presence without any difficulty; those only who lack this goodwill are compelled to reduce the outward signs of it to an art.

你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自我要求都不是我规定他的，而是由他早期的教育所决定的。人们总是把社会风俗描述得非常神秘，好像就算到了我们应该知道这些风俗的年纪，我们也不能自然得了解，好像一个诚恳的人心中没有这些礼貌的准则似的。真正的礼貌包括向别人显示友好。善良的人可以毫无难度地表现出这样的风度，不怀好意的人才要在表面上装出礼貌的样子。

“The worst effect of artificial politeness is that it teaches us how to dispense with the virtues it imitates. If our education teaches us kindness and humanity, we shall be polite, or we shall have no need of politeness.

虚假的礼貌最坏的影响就是它教会我们就算没有这样的美德，也能模仿这样的行为。如果教育教会我们善良和人道，那我们就要有礼

貌。否则，我们就没有必要礼貌。

“If we have not those qualities which display themselves gracefully we shall have those which proclaim the honest man and the citizen; we shall have no need for falsehood.

“就算我们没有优雅的特质，我们也应该有作为诚实的人和作为公民应有的品质；我们没有必要装模作样。”

“Instead of seeking to please by artificiality, it will suffice that we are kindly; instead of flattering the weaknesses of others by falsehood, it will suffice to tolerate them.

“为了取悦别人，用不着虚情假意，只要我们心存善意就足够了；也用不着虚伪地奉承别人的弱点，只要我们宽容他们的弱点就足够了。

“Those with whom we have to do will neither be puffed up nor corrupted by such intercourse; they will only be grateful and will be informed by it.“ [1_31]

“无论是谁，只要我们用这种态度对待他，他们既不会因此膨胀，也不会变得腐败；他们只会对此表示感激并且变得更好。” [2_31]

It seems to me that if any education is calculated to produce

the sort of politeness required by M. Duclos in this passage, it is the education I have already described.

我想，如果有一种教育都能够培养出杜克洛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所要求的那种礼貌的话，那这就是我向大家描述过的那种教育。

Yet I admit that with such different teaching Emile will not b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and heaven preserve him from such a fate! But where he is unlike other people, he will neither cause annoyance nor will he be absurd; the difference will be perceptible but not unpleasant. Emile will be, if you like, an agreeable foreigner. At first his peculiarities will be excused with the phrase, “He will learn.” After a time people will get used to his ways, and seeing that he does not change they will still make excuses for him and say, “He is made that way.”

我承认在这样不同的教育方式下，我会将爱弥儿培养成一个和别人都完全不一样的人，愿上帝保佑他不要沦为和别人一样的人。虽然他不同于其他人，但他既不会惹恼别人，也不会变得荒诞。他与别人的不同都是可理解的，不会让人感到不悦。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把爱弥儿当作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的外国人。一开始，他一些奇特的地方会得到大家的原谅，大家会说，“他可以学习的”。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就对他的做法习惯了，就算他不改变，他们也可以继续原谅他，并说“他生来就是这样的”。

He will not be feted as a charming man, but every one will like him without knowing why; no one will praise his intellect, but every one will be ready to make him the judge between men of

intellect; his own intelligence will be clear and limited, his mind will be accurate, and his judgment sane. As he never runs after new ideas, he cannot pride himself on his wit. I have convinced him that all wholesome ideas, ideas which are really useful to mankind, were among the earliest known, that in all times they have formed the true bonds of society, and that there is nothing left for ambitious minds but to seek distinction for themselves by means of ideas which are injurious and fatal to mankind. This way of winning admiration scarcely appeals to him; he knows how he ought to seek his own happiness in life, and how he can contribute to the happiness of others. The sphere of his knowledge is restricted to what is profitable. His path is narrow and clearly defined; as he has no temptation to leave it, he is lost in the crowd; he will neither distinguish himself nor will he lose his way. Emile is a man of common sense and he has no desire to be anything more; you may try in vain to insult him by applying this phrase to him; he will always consider it a title of honour. Although from his wish to please he is no longer wholly indifferent to the opinion of others, he only considers that opinion so far as he himself is directly concerned, without troubling himself about arbitrary values, which are subject to no law but that of fashion or conventionality. He will have pride enough to wish to do well in everything that he undertakes, and even to wish to do it better than others; he will want to be the swiftest runner, the strongest wrestler, the cleverest workman, the readiest in games of skill; but he will not seek advantages which are not in themselves clear gain, but need to be supported by the opinion of others, such as to be thought wittier than another, a better speaker, more learned, etc.; still less will he trouble himself with those which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an himself, such as higher birth, a greater reputation for wealth, credit, or public estimation, or the impression created by a showy exterior.

他不会作为一个魅力十足的人受到大家追捧，但是人人都会毫无理由地喜欢他；没有人会赞扬他的才识，但是都非常愿意请他去评判有才识的人之间的辩论；他的个人才智是明确有限的，他的大脑也不是完美无缺，但是他的判断都是准确的。他从不追逐新颖的观念，所以他不会以自己的智慧为傲。我已经使他确信：所有成熟的，对人类真正有用的想法，都是来源于人类最早的那些观念。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形成了社会的真正纽带。一些野心勃勃的人为了使自己声名显赫，就只能提出一些对人类致命的观点。这种赢得他人尊敬的方法，爱弥儿不屑一顾；他知道如何在生活中找寻快乐，如何为他人带去快乐。他的知识范围只限于有益的事物。他的道路是狭窄但非常明确的。没有什么诱惑能使得他离开这条道路，因此就算在人群中，他也不会显得与众不同或是迷失自我。爱弥儿是一个普通寻常的人，他也不想有更大的作为；即使你拿这句话侮辱他，他也不会生气，因为他会认为这是一个荣耀的称号。虽然他希望别人能够快乐，因此不会对他人的看法漠不关心，但是他只重视和他直接相关的一些观点，而不会因为别人随意捏造的看法而烦恼，因为这种看法并不是根据法则，而是由时尚和偏见产生的。他有很强的自尊心，因此希望自己在从事的一切事情上都能表现优秀，甚至希望比别人都要做得好；跑步时，他想成为最快的；搏斗时，他想要成为最强的；工作时，他想要成为最聪明的；游戏时，他想要成为最敏捷的。但是他一定会让胜出的事实一目了然，而不是要通过别人评判，例如别人认为他比其他人更聪明、说得更好、知道得更多，等等。另外，他也不希望是在身外之物上胜过别人，譬如更好的出身，更多的财富、更大的名声或是更华丽的形象。

As he loves his fellows because they are like himself, he will prefer him who is most like himself, because he will feel that he is good; and as he will judge of this resemblance by similarity of taste in morals, in all that belongs to a good character, he will be delighted to win approval. He will not say to himself in so many words, “I am delighted to gain approval,” but “I am delighted

because they say I have done right; I am delighted because the men who honour me are worthy of honour; while they judge so wisely, it is a fine thing to win their respect.”

他爱他们的同伴，因为他们和他相像；我会更爱那些和他相像的人，因为他认为这样的人是善良的。他会根据别人对道德行为的看法是否与他相似。在一切有关优良品格的事情上，他非常喜欢得到人们的认同。他不会这样说：“我很高兴得到大家的认同”，而是会说：“我很开心，因为他们说我做了正确的事，因为赞扬我的人本身就值得称赞，他们的判断是明智的，能够得到他们的尊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As he studies men in their conduct in society, just as he formerly studied them through their passions in history, he will often have occasion to consider what it is that pleases or offends the human heart. He is now busy with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inciples of taste, and this is the most suitable subject for his present study.

因为他根据历史上人们的欲望研究过他们在社会中的行为，所以他将经常有机会思考是什么取悦或是冒犯了人们。他现在忙着研究人类审美的哲学原理，这也是他这个年纪下最适合研究的课题。

The further we seek our definitions of taste, the further we go astray; taste is merely the power of judging what is pleasing or displeasing to most people. Go beyond this, and you cannot say what taste is.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 men of taste are in the majority; for though the majority judges wisely with regard to each individual thing, there are few men who follow the judgment of the

majority in everything; and though the most general agreement in taste constitutes good taste, there are few men of good taste just as there are few beautiful people, although beauty consists in the sum of the most usual features.

我们越是深入探究对于审美的定义，我们就迷失得越远；审美仅仅只是对于能否使得大多数人喜欢或不喜欢的一种判断。脱离这一点，你就无法知道什么是审美。但这并不是说有品位的人占大多数，因为虽然大多数人对每一件事情都能做出明智的评判，但是很少有人会事事都参照大多数的人的判断；虽然大多数人的品味综合起来就是好的审美，但是也很少有人真正有好的品味，就像虽然美是最常见的特征综合起来的，但是美丽的人毕竟很少。

It must be observed that we are not here concerned with what we like because it is serviceable, or hate because it is harmful to us. Taste deals only with things that are indifferent to us, or which affect at most our amusements, not those which relate to our needs; taste is not required to judge of these, appetite only is sufficient. It is this which makes mere decisions of taste so difficult and as it seems so arbitrary; for beyond the instinct they follow there appears to be no reason whatever for them. We must als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aws of good taste in morals and its laws in physical matters. In the latter the laws of taste appear to be absolutely inexplicable. But it must be observed that there is a moral element in everything which involves imitation [1_32] . This is the explanation of beauties which seem to be physical, but are not so in reality. I may add that taste has local rules which make it dependent in many respects on the country we are in, its manners,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it has other rules which depend upon age, sex, and character, and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we must not dispute over

matters of taste.

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喜欢什么是因为它是有用的，或者我们讨厌什么因为它是有害的。品味只是对于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或者最多使我们觉得有趣的东西而言，而不是那些必需的东西。就像滋味不需要我们做审美的评判，只要我们有胃口就足够了。也是这个原因使得我们很难在审美方面做细微的决定，这主观性太强了。因为审美是跟随直觉的，一切都显得没有缘由。另外，我们还必须区分审美在道德层面上的规律和在物理层面上的规律。在物理层面上审美的规律一定是无法解释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一切模仿行为中，都包含着道德因素 [2_32]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看起来是物质层面的，但实际上却又不是。我还要补充一点，审美在不同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由这个地方的很多方面所决定的：它的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等。另外的因素还包括年龄、性别和性格特征。因此就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关于审美没有什么好争辩的。

Taste is natural to men; but all do not possess it in the same degree, it is not developed to the same extent in every one; and in every one it is liable to be modified by a variety of causes. Such taste as we may possess depends on our native sensibility; its cultivation and its form depend upon the society in which we have lived. In the first place we must live in societies of many different kinds, so as to compare much. In the next place, there must be societies for amusement and idleness, for in business relations, interest, not pleasure, is our rule. Lastly, there must be societies in which people are fairly equal, where the tyranny of public opinion may be moderate, where pleasure rather than vanity is queen; where this is not so, fashion stifles taste, and we seek what gives distinction rather than delight.

人天生就有审美力，但是每个人的审美力是不同的，也不会发展到相同程度；每个人的审美力都是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改进的。我们可能具有的审美力的大小是由我们天生的感受力所决定的；而他的培养和形式则是由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首先我们必须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生存过，才能有很多比较。再者，还必须有娱乐和休闲的场所，因为在商业关系中，快乐不是准则，利益才是。最后，还要有这样的场合：在这之中，人们相对平等，大众观点相对适中，愉悦比浮华更得到人们青睐。因为如果不这样，时尚压制了人们的审美，会使人们在做选择时更关注它是否与众不同，而非是否使自己感到愉快。

In the latter case it is no longer true that good taste is the taste of the majority. Why is this? Because the purpose is different. Then the crowd has no longer any opinion of its own, it only follows the judgment of those who are supposed to know more about it; its approval is bestowed not on what is good, but on what they have already approved. At any time let every man have his own opinion, and what is most pleasing in itself will always secure most votes.

在后面那种情况中，大众的喜好就是好的品味的说法就不再正确了。为什么为这样呢？因为目的是不同的。那时，大众的观点就不再是他们自己的观点了，而只是跟随那些被认为更见多识广的人的观点。他们称赞一样东西，并不是因为东西本身好，而是因为别人在称赞它。在任何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观点，这样才能保证本身就好的东西也为大多数人所称赞。

Every beauty that is to be found in the works of man is imitated. All the true models of taste are to be found in nature. The further we get from the master, the worse are our pictures. Then it

is that we find our models in what we ourselves like, and the beauty of fancy, subject to caprice and to authority, is nothing but what is pleasing to our leaders.

人类作品中的美都是模仿的。一切美的真正典型都存在于大自然中。我们从这个老师那儿学到的东西越多，我们所创造的图景就更糟糕。因此，我们要根据我们喜欢的样子来选择模型。幻想的美，是由人们任性的想法和权威决定的，只是因为它取悦了具有领导地位的人而已。

Those leaders are the artists, the wealthy, and the great, and they themselves follow the lead of self-interest or pride. Some to display their wealth, others to profit by it, they seek eagerly for new ways of spending it. This is how luxury acquires its power and makes us love what is rare and costly; this so-called beauty consists, not in following nature, but in disobeying her. Hence luxury and bad taste are inseparable. Wherever taste is lavish, it is bad.

那些领导都是艺术家、大富豪和大人物，而他们自己则受自身利益和骄傲虚荣所支配。有人为了炫耀财富，其他人为了从中获利，他们急切地寻找新的办法消费金钱。这就是奢靡获取权力的过程，让我们爱上那些稀有而昂贵的东西；这所谓的美并不是顺从自然，恰恰是违背了自然。因此奢靡的风气和扭曲的审美总是相伴而行。当社会的审美倾向变得骄奢浪费了，社会风气也就变得糟糕了。

Taste, good or bad, takes its shape especially in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two sexes; the cultivation of taste is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this form of society. But when enjoyment is easily

obtained, and the desire to please becomes lukewarm, taste must degenerate; and this is, in my opinion, one of the best reasons why good taste implies good morals.

特别是在男女交际中，无论好坏，品味都很容易表现出来。审美的培养必然会受到社会形式的影响。但是如果令人愉快的事物总是很容易就得到的话，那我们想要取悦对方的欲望就冷却了，审美也一定会退化。在我看来，这也是好的审美暗示了好的道德的最好的解释之一。

Consult the women's opinions in bodily matters, in all that concerns the senses; consult the men in matters of morality and all that concerns the understanding. When women are what they ought to be, they will keep to what they can understand, and their judgment will be right; but since they have set themselves up as judges of literature, since they have begun to criticise books and to make them with might and main, they are altogether astray. Authors who take the advice of blue-stockings will always be ill-advised; gallants who consult them about their clothes will always be absurdly dressed. I shall presently have an opportunity of speaking of the real talents of the female sex, the way to cultivate these talents, and the matters in regard to which their decisions should receive attention.

有关形体和感情方面的问题要询问女人的意见；关乎道德和理解力方面的问题则要咨询男人的看法。当女人做好女人的本分，她们就只会过问她们理解范围之内的事，她们的判断也往往是正确的；但是只要她们开始评判文学，开始批评著作，并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其中的时候，她们就会迷失。如果著书的人去向女学者寻求意见，那这本书

就会被她的意见搞得很糟糕；如果时髦的男士去向妇女征求衣着的意见，那他的形象就会被搞得很糟糕。我之后马上就有机会谈及妇女真正的才干，如何培养她们的才干，在哪些问题上应该征询她们的意见。

These are the elementary considerations which I shall lay down as principles when I discuss with Emile this matter which is by no means indifferent to him in his present inquiries. And to whom should it be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To know what people may find pleasant or unpleasan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any one who requires their help, it is still more necessary to any one who would help them; you must please them if you would do them service; and the art of writing is no idle pursuit if it is used to make men hear the truth.

当我和爱弥儿讨论他目前的研究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时，我向他提出了这些考虑因素作为原则。这对谁不重要呢？知道人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不仅对寻求他人帮助的人来说很重要，对帮助别人的人来说更重要。当你服务他人时，一定要使他们感到愉悦。当写作能够让人们得知真理，这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If in order to cultivate my pupil's taste, I were compelled to choose between a country where this form of culture has not yet arisen and those in which it has already degenerated, I would progress backwards; I would begin his survey with the latter and end with the former. My reason for this choice is, that taste becomes corrupted through excessive delicacy, which makes it sensitive to things which most men do not perceive; this delicacy leads to a spirit of discussion, for the more subtle is our

discrimination of things the more things there are for us. This subtlety increases the delicacy and decreases the uniformity of our touch. So there are as many tastes as there are people. In disputes as to our preferences, philosophy and knowledge are enlarged, and thus we learn to think. It is only men accustomed to plenty of society who are capable of very delicate observations, for these observations do not occur to us till the last, and people who are unused to all sorts of society exhaust their attention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more conspicuous features. There is perhaps no civilised place upon earth where the common taste is so bad as in Paris. Yet it is in this capital that good taste is cultivated, and it seems that few books make any impression in Europe whose authors have not studied in Paris. Those who think it is enough to read our books are mistaken; there is more to be learnt from the conversation of authors than from their books; and it is not from the authors that we learn most. It is the spirit of social life which develops a thinking mind, and carries the eye as far as it can reach. If you have a spark of genius, go and spend a year in Paris; you will soon be all that you are capable of becoming, or you will never be good for anything at all.

如果是为了培养我的学生的品味，我不得不在审美观还未形成和审美观已经退化的国家中做出选择，而在这两者之中，我会从后往前选。我会先选择后者，再选择前者。我选择的理由如下：由于过度精致，审美变得衰败，总是专注于大多数人所不能理解的事物；这种精致会产生一种讨论的精神，我们对事物的区分越细致，需要区分的东西就越多。这细微的差别使得它变得更精致，但却很难统一人们的看法。因此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审美观。对个人喜好进行争论，我们的哲学视角和知识面都会得到扩充，这样我们就学会了思考。人们只有适应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场合，才能细致地观察美，因为只有这样到最后，我们才能有所发现。那些不习惯各种社会场所的人会在思考明显

的特点时就耗尽他们全部的注意力。世界上大概没有比巴黎的大众品味更差的地方了。然而正是在这个首都形成了好的审美品位。那些给欧洲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书籍的作者都在巴黎学习过。那些认为只要读一些巴黎的书就足够的人是错的。从书中获得的东西，远远没有与作者交谈一次得到的东西多。而从作者身上能收获的东西还不是最多的。社会生活的精神造就了一个有思想的头脑，并使他尽可能深远地看到一切。如果你有天才的闪光点，去巴黎呆上一年吧。你很快就能发挥你的才能，否则你将永远一事无成。

One may learn to think in places where bad taste rules supreme; but we must not think like those whose taste is bad, and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avoid this if we spend much time among them. We must use their efforts to perfect the machinery of judgment, but we must be careful not to make the same use of it. I shall take care not to polish Emile's judgment so far as to transform it, and when he has acquired discernment enough to feel and compare the varied tastes of men, I shall lead him to fix his own taste upon simpler matters.

我们也许能在风气粗俗的地方学会如何思考，但我们绝不能和那些道德败坏的人抱有同样的想法。如果我们时常与他们在一起的话，就很难避免沾染不良风气了。我们必须借助他们的努力来完善我们的判断工具，但是我们必须避免他们的那种用法。我应当十分注意地培养爱弥儿的判断力，以免使其受到改变。但他辨别能力足够敏锐，足以分辨出人们形形色色的爱好之后，我会教导他将他的品味集中到更为简单的事物上。

I will go still further in order to keep his taste pure and wholesome. In the tumult of dissipation I shall find opportunities

for useful conversation with him; and while these conversations are always about things in which he takes a delight, I shall take care to make them as amusing as they are instructive. Now is the time to read pleasant books; now is the time to teach him to analyse speech and to appreciate all the beauties of eloquence and diction. It is a small matter to learn languages, they are less useful than people think; but the study of languages leads us on to that of grammar in general. We must learn Latin if we would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French; these two languages must be studied and compared if we would understand the rules of the art of speaking.

为了使他的审美能力更纯洁、更健全，我会更深入一些。在那些喧闹的花天酒地之中，我会寻找时机与他进行有益的对话。虽然我们的对话总是围绕他喜欢的事情展开，但我力图做到寓教于乐。现在是时候阅读一些有趣的书籍了；是时候教他分析讲话和欣赏口才与文辞的精妙之处了。学习语言是一件小事，没有人们认为的那般有用；但是对语言的研究会进一步指引我们学习一般的语法。如果我们要对法语有透彻的了解，就必须学习拉丁文；如果我们要理解说话艺术的规则，我们就必须对这两者进行研究和比较。

There is, moreover, a certain simplicity of taste which goes straight to the heart; and this is only to be found in the classics. In oratory, poetry, and every kind of literature, Emile will find the classical authors as he found them in history, full of matter and sober in their judgment. The authors of our own time, on the contrary, say little and talk much. To take their judgment as our constant law is not the way to form our own judgment. These differences of taste make themselves felt in all that is left of classical times and even on their tombs. Our monuments are covered with praises, theirs recorded facts.

此外，有一种质朴的方式能够直击人心，而这种方式只能在经典名著中找到。爱弥儿会发现，古人经典的演讲、诗歌，或是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就像撰写的史书一样，内容丰富，且判断时很谨慎。相反，我们的当代作家，谈论得很多，而实际内容很少。我们不能将他们的判断准则视为永恒的标准来形成我们自己的判断力。在古时的遗物上，甚至在他们的墓碑上就能看出这两种风格不同，我们的墓碑上刻满了赞颂之辞，而他们的墓碑上却写满了事实。

“Sta, viator; heroem calcas.”

“过客啊，请停下来追思这位英雄。”

If I had found this epitaph on an ancient monument, I should at once have guessed it was modern; for there is nothing so common among us as heroes, but among the ancients they were rare. Instead of saying a man was a hero, they would have said what he had done to gain that name. With the epitaph of this hero compare that of the effeminate Sardanapalus—

要是我在古代的墓碑上看到这样的墓志铭，我会立刻猜测它是当代人的杰作；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英雄这个称谓再寻常不过了，可是古代人中很少有英雄。他们不称一个人为英雄，而是通过述说他的事迹来显示他的伟大。和这位英雄的墓志铭相比，我们来看看柔弱的萨丹纳帕路斯的墓志铭——

“Tarsus and Anchiales I built in a day, and now I am dead.”

“一日之内，我建成塔尔斯与昂其耳二城，而今，我已死去。”

Which do you think says most? Our inflated monumental style is only fit to trumpet forth the praises of pygmies. The ancients showed men as they were, and it was plain that they were men indeed. Xenophon did honour to the memory of some warriors who were slain by treason during the retreat of the Ten Thousand. “They died,” said he, “without stain in war and in love.” That is all, but think how full was the heart of the author of this short and simple elegy. Woe to him who fails to perceive its charm. The following words were engraved on a tomb at Thermopylae—

你认为哪一个更意蕴深刻？我们那些花里胡哨，言过其实的碑文风格只适合于对小人的吹捧。古人只展现他们朴实无华的本真的面目，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人。色诺芬在悼念万人大撤退中由于奸细背叛而惨遭杀戮的士兵们时，赞扬了他们。“他们死了，”他说，“但在战争和爱中没有一丝污点。”这就是他说的全部。但是想一想，这如此简短的挽歌中，蕴含了作者多么深沉的感情。如果有人无法感受到其中的魅力，那他就太可怜了。在塞莫皮莱的一处墓碑上，刻着这样几个字——

“Go, Traveller, tell Sparta that here we fell in obedience to her laws.”

“去吧，旅行者，告诉斯巴达人，我们会遵照她的法则在此长眠。”

It is pretty clear that this was not the work of the Academy of Inscriptions.

很显然，这并不是专门研究碑文的学术团体的杰作。

If I am not mistaken, the attention of my pupil, who sets so small value upon words, will be directed in the first place to these differences, and they will affect his choice in his reading. He will be carried away by the manly eloquence of Demosthenes, and will say, “This is an orator;” but when he reads Cicero, he will say, “This is a lawyer.”

如果我的做法是对的话，那我的学生虽然不重视文字，但是他一开始就会注意到这些差别，而这些差别也会对他的选择造成影响。他会折服于狄摩西尼充满男子气概的雄辩才能，然后说，“他是一个演说家；”但当他读到西塞罗的著作，他会说，“他是一个律师。”

Speaking generally Emile will have more taste for the books of the ancients than for our own, just because they were the first, and therefore the ancients are nearer to nature and their genius is more distinct. Whatever La Motte and the Abbe Terrasson may say, there is no real advance in human reason, for what we gain in one direction we lose in another; for all minds start from the same point, and as the time spent in learning what others have thought is so much time lost in learning to think for ourselves, we have more acquired knowledge and less vigour of mind. Our minds like our arms are accustomed to use tools for everything, and to do nothing for themselves. Fontenelle used to say that all these disputes as to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came to this—Were the trees in former times taller than they are now. If agriculture had changed, it would be worth our while to ask this question.

一般来说，爱弥儿更喜欢古人的著作而非当代的作品，只是因为古代的著作更早，古人更接近自然，他们的天分就更显著。无论拉莫特和特拉松神父说什么，人类理性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因为我们从一个方面得到，却在另一个方面失去；所有人的大脑都从都从同一点出发，我们花费时间学习，但更多的却是学习别人的思想，而没有时间斟酌自己的思想，最后学到了更多知识，但却失去了大脑的活力。就像我们的臂膀，我们的大脑也习惯于事事依赖于工具，而不自己去做。丰特内尔曾经说过，古今的所有争论归结起来无非就是——从前的树是否比现在的树木更高大。要是农耕发生了变化，那也值得花费时间问这个问题。

After I have led Emile to the sources of pure literature, I will also show him the channels into the reservoirs of modern compilers; journals, translations, dictionaries, he shall cast a glance at them all, and then leave them for ever. To amuse him he shall hear the chatter of the academies; I will draw his attention to the fast that every member of them is worth more by himself than he is as a member of the society; he will then draw his own conclusions as to the utility of these fine institutions.

在带领爱弥儿追溯纯粹文学的起源之后，我同样会向他展示现代编纂者是通过何种渠道储藏知识的；期刊、译本、字典，他都会瞧一眼，之后便不再使用。我会让他去那些学会听他们喋喋不休地讨论以供他消遣，；我会使他注意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单独研究的价值都要比和大家一起研究的价值大；然后，他就会对这些看似精致的机构的

效用得出自己的定论。

I take him to the theatre to study taste, not morals; for in the theatre above all taste is revealed to those who can think. Lay aside precepts and morality, I should say; this is not the place to study them. The stage is not made for truth; its object is to flatter and amuse: there is no place where one can learn so completely the art of pleasing and of interesting the human heart. The study of plays leads to the study of poetry; both have the same end in view. If he has the least glimmering of taste for poetry, how eagerly will he study the languages of the poets, Greek, Latin, and Italian! These studies will afford him unlimited amusement and will be none the less valuable; they will be a delight to him at an age and in circumstances when the heart finds so great a charm in every kind of beauty which affects it. Picture to yourself on the one hand Emile, on the other some young rascal from college, reading the fourth book of the Aeneid, or Tibollus, or the Banquet of Plato: what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What stirs the heart of Emile to its depths, makes not the least impression on the other! Oh, good youth, stay, make a pause in your reading, you are too deeply moved; I would have you find pleasure in the language of love, but I would not have you carried away by it; be a wise man, but be a good man too. If you are only one of these, you are nothing. After this let him win fame or not in dead languages, in literature, in poetry, I care little. He will be none the worse if he knows nothing of them, and his education is not concerned with these mere words.

我带他去看戏，不是为了研究其教育意义，而是为了研究人们的品味；因为在剧院中，人们的品味会在有思想的人面前展露无遗。我会对他说，暂且将箴言和道德观放在一边，这里不是学习这一切的地

方。舞台不是为真理而生的，而是为了奉承与娱乐；我们在任何一处都无法如此透彻地学到使人快乐并饶有兴趣的艺术。研究戏剧，就必然要研究诗歌；两者都有相同的目的。只要他对品读诗歌有一点兴趣，他就会多么渴望学习诗的语言：希腊文、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这些研究会给予他无限的乐趣，而且对他颇具价值；当他到了一定的年纪，他会发觉研究各种各样令他着迷的美是多么令人愉快。请你一方面想象自己是爱弥儿，一方面想象自己是学校里的无赖少年，他们都在读《埃涅伊德》的第四卷，或是提布鲁斯的诗作，或是柏拉图的《会饮篇》，他们之间的感受该有多么大的差别啊！深深震撼着爱弥儿的东西，却对其他孩子毫无影响。哦，优秀的年轻人，暂停片刻，你太过感动了；我会让你在爱的语言中找寻到快乐，但是我不会让你迷失其中；做一个睿智的人，同时也做一个好人。如果你做到了其中一点，你就什么都不是。在此之后，他研究那些已死的语言、文学著作、诗歌是否取得成就，我不怎么关心。即使他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对他也没什么不好的影响。我对他的教育也不与这些纯粹的文字有关。

My main object in teaching him to feel and love beauty of every kind is to fix his affections and his taste on these, to prevent the corruption of his natural appetites, lest he should have to seek some day in the midst of his wealth for the means of happiness which should be found close at hand. I have said elsewhere that taste is only the art of being a connoisseur in matters of little importance, and this is quite true; but since the charm of life depends on a tissue of these matters of little importance, such efforts are no small thing; through their means we learn how to fill our life with the good things within our reach, with as much truth as they may hold for us. I do not refer to the morally good which depends on a good disposition of the heart, but only to that which depends on the body, on real delight, apart from the prejudices of public opinion.

教他感知并喜爱各式各样的美，使他对此形成自己的爱好和品味是我的主要目的。防止他自然品味败坏，防止他将来不得不用财富获取幸福，幸福其实就在他的眼前。我在别处已经说过，品味不过就是对一些琐碎之物的鉴赏艺术，的确是这样；但是，既然生活的魅力就在于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那为其付出的心血也不可小觑；通过它们我们能够学会如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真正美好的事物充实我们的生活。我不是指道德上的美，这种美是取决于心灵的美好的，我指的仅仅是排除公众偏见，我们的身体真正可以感受到的令人愉悦的美。

The better to unfold my idea, allow me for a moment to leave Emile, whose pure and wholesome heart cannot be taken as a rule for others, and to seek in my own memory for an illustration better suited to the reader and more in accordance with his own manners.

为了更好地阐述我的观点，请允许我暂时抛却爱弥儿不谈，因为他那颗纯净健全的心灵不能用来衡量别人。因此我在我的记忆中寻找一个更适合读者的例证。

There are professions which seem to change a man's nature, to recast, either for better or worse, the men who adopt them. A coward becomes a brave man in the regiment of Navarre. It is not only in the army that esprit de corps is acquired, and its effects are not always for good. I have thought again and again with terror that if I had the misfortune to fill a certain post I am thinking of in a certain country, before to-morrow I should certainly be a tyrant, an extortioner, a destroyer of the people, harmful to my king, and a professed enemy of mankind, a foe to justice and every kind of virtue.

有一些职业似乎是要改变人们的天性，将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重塑得更好或更差。一个懦夫到了纳瓦拉的军团就变成了一个勇夫。我们并非只有在军队中才能形成团队精神，而且它所产生的影响也并非一定是好的。我曾经满怀恐惧地反复想：如果我不幸在某个国家从事这样某一种职业的话，未来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专横的人，成为敲诈勒索者，成为人民的害虫，对国王造成危害，与正义、所有的美德和全人类为敌。

In the same way, if I were rich, I should have done all that is required to gain riches; I should therefore be insolent and degraded, sensitive and feeling only on my own behalf, harsh and pitiless to all besides, a scornful spectator of the sufferings of the lower classes; for that is what I should call the poor, to make people forget that I was once poor myself. Lastly I should make my fortune a means to my own pleasures with which I should be wholly occupied; and so far I should be just like other people.

同样的，假使我是一个富豪，我就必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获取财富。我也会因此变得不可一世、自私自利，麻木不仁。对下层社会人们的悲惨遭遇冷眼旁观。我称这些人为穷人，以此让人们忘却我曾经也贫穷过。最后，我会靠我的财富纵情享乐。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也就和别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But in one respect I should be very unlike them; I should be sensual and voluptuous rather than proud and vain, and I should give myself up to the luxury of comfort rather than to that of ostentation. I should even be somewhat ashamed to make too great a show of my wealth, and if I overwhelmed the envious with my

pomp I should always fancy I heard him saying, “Here is a rascal who is greatly afraid lest we should take him for anything but what he is.”

但是在这一方面，我和他们有所不同：我纵情享乐、骄奢淫逸，但是我绝不虚荣自大。我极尽奢华是为了自我享受，而不是为了炫富摆阔。我甚至羞于过分炫耀我的财富，我怕招致他人的嫉妒，我好像时常听见那些人说，“这个家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多富有。”

In the vast profusion of good things upon this earth I should seek what I like best, and what I can best appropriate to myself.

在地球上许许多多的财富中，我会寻找我喜欢且我最能够支配的东西。

To this end, the first use I should make of my wealth would be to purchase leisure and freedom, to which I would add health, if it were to be purchased; but health can only be bought by temperance, and as there is no real pleasure without health, I should be temperate from sensual motives.

为此，我首先会用我的财富去买闲暇和自由，再者我会买得健康，如果健康可以用钱买到的话。但是健康只能通过节制欲望来实现。而失去健康就没有快乐可言，因此我会节制我的欲望。

I should also keep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nature, to gratify the

senses given me by nature, being quite convinced that, the greater her share in my pleasures, the more real I shall find them. In the choice of models for imitation I shall always choose nature as my pattern; in my appetites I will give her the preference; in my tastes she shall always be consulted; in my food I will always choose what most owes its charm to her, and what has passed through the fewest possible hands on its way to table. I will be on my guard against fraudulent shams; I will go out to meet pleasure. No cook shall grow rich on my gross and foolish greediness; he shall not poison me with fish which cost its weight in gold, my table shall not be decked with fetid splendour or putrid flesh from far-off lands. I will take any amount of trouble to gratify my sensibility, since this trouble has a pleasure of its own, a pleasure more than we expect. If I wished to taste a food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I would go, like Apicius, in search of it, rather than send for it; for the daintiest dishes always lack a charm which cannot be brought along with them, a flavour which no cook can give them—the air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y are produced.

同时我也会尽可能地接近自然，来使自然赋予我的感官感到舒适。我坚信，我和大自然共享的快乐越多，我的快乐就越真实。我始终会选择自然作为我的效仿模型。在欲望方面，我会更倾向于它；在审美方面，我会参照它；在食物方面，我也会选择尽量少地经过人们烹调而被送上餐桌的食物，保留其原汁原味。我会警惕那些弄虚作假的掩饰，享受美食真正的乐趣。没有一个厨师能够靠我的贪吃发大财，他休想敲我的竹杠。我的桌子绝不会摆上一些从远方运来的样子华丽或者已经腐坏的食物。为了使我自己感到快乐，我不怕任何麻烦。因为麻烦本身就是快乐，远超我们预期的快乐。如果我希望品尝地球另一端的美食，我会像阿比修斯一样亲自去那里寻找，而不会让人送来。因为最精致的菜肴往往缺少一份魅力。

For the same reason I would not follow the example of those who are never well off where they are, but are always setting the seasons at nought, and confusing countries and their seasons; those who seek winter in summer and summer in winter, and go to Italy to be cold and to the north to be warm, do not consider that when they think they are escaping from the severity of the seasons, they are going to meet that severity in places where people are not prepared for it. I shall stay in one place, or I shall adopt just the opposite course; I should like to get all possible enjoyment out of one season to discover what is peculiar to any given country. I would have a variety of pleasures, and habits quite unlike one another, but each according to nature; I would spend the summer at Naples and the winter in St. Petersburg; sometimes I would breathe the soft zephyr lying in the cool grottoes of Tarentum, and again I would enjoy the illuminations of an ice palace, breathless and wearied with the pleasures of the dance.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不会像有些人那样永远对自己目前所在的环境不满意，总是忽视季节，使风土与季节相混乱。他们在夏天的时候渴望渴望冬天，在冬天里又找寻夏天，到意大利乘凉，到北方取暖。可他们从未考虑到：他们以为自己逃过了季节的严苛考验，可事实上那些地方会使他们更加难耐，因为他们对此毫无准备。我会待在一个地方，或者我会选择与此相反；我会尽情享受一个季节里的美好，感受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我有各种各样的快乐，也有不同的习惯，但是每一样都合乎自然。我的夏天将在那不勒斯度过，冬天将在圣彼得堡度过。有时候我会躺在塔兰托荫凉的岩洞中呼吸着微风；有时候跳舞跳得气喘吁吁，精疲力尽，感到厌倦了，我也会去欣赏明亮的冰雪宫殿。

In the service of my table and the adornment of my dwelling I

would imitate in the simplest ornaments the variety of the seasons, and draw from each its charm without anticipating its successor. There is no taste but only difficulty to be found in thus disturbing the order of nature; to snatch from her unwilling gifts, which she yields regretfully, with her curse upon them; gifts which have neither strength nor flavour, which can neither nourish the body nor tickle the palate. Nothing is more insipid than forced fruits. A wealthy man in Paris, with all his stoves and hot-houses, only succeeds in getting all the year round poor fruit and poor vegetables for his table at a very high price. If I had cherries in frost, and golden melons in the depths of winter, what pleasure should I find in them when my palate did not need moisture or refreshment. Would the heavy chestnut be very pleasant in the heat of the dog-days; should I prefer to have it hot from the stove, rather than the gooseberry, the strawberry, the refreshing fruits which the earth takes care to provide for me. A mantelpiece covered in January with forced vegetation, with pale and scentless flowers, is not winter adorned, but spring robbed of its beauty; we deprive ourselves of the pleasure of seeking the first violet in the woods, of noting the earliest buds, and exclaiming in a rapture of delight, “Mortals, you are not forsaken, nature is living still.”

至于我餐桌和房间的装饰，我都会用最朴素的装饰品来呈现季节的丰富多彩，吸取这个季节的每一处魅力。在这个季节结束之前，我绝不会提前感受下一个季节。一旦我们打乱了自然的秩序，带来的只有困难而非审美趣味。如果自然不情愿赠与我们，我们却要硬抢的话，自然会懊悔地屈服，满怀怨言与咒骂。这样的给予既没有质量，也没有风味；既不能滋养身体，也不满足味蕾。强扭的瓜不甜。巴黎的一个富翁花大价钱用火炉和温室培育，可是他餐桌上的蔬果一年四季都匮乏劣质。即使我在浓浓秋霜的时节享用樱桃，在数九隆冬的天气里享用金黄的甜瓜，我也感受不到一丝的乐趣。因为我的口不需要

任何的滋润或是提味。在三伏天吃烤栗子会舒服吗？难道我不吃大地精心为我准备的鹅莓、草莓和各种新鲜的水果，而非得要火炉中烤制的热栗子？一月份，壁炉台上摆满了不合季节的植物和暗淡无香的花朵，但这并不能装点冬天，反而剥夺了春天的美。这也剥夺了我们自己的乐趣：到森林中寻找初开的紫罗兰，观察它最早的花苞，欣喜地大喊："人类啊，你们没有被抛弃，大自然依旧生机勃勃。"

To be well served I would have few servants; this has been said before, but it is worth saying again. A tradesman gets more real service from his one man than a duke from the ten gentlemen round about him. It has often struck me when I am sitting at table with my glass beside me that I can drink whenever I please; whereas, if I were dining in state, twenty men would have to call for "Wine" before I could quench my thirst. You may be sure that whatever is done for you by other people is ill done. I would not send to the shops, I would go myself; I would go so that my servants should not make their own terms with the shopkeepers, and to get a better choice and cheaper prices; I would go for the sake of pleasant exercise and to get a glimpse of what was going on out of doors; this is amusing and sometimes instructive; lastly I would go for the sake of the walk;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in that. A sedentary life is the source of tedium; when we walk a good deal we are never dull. A porter and footmen are poor interpreters, I should never wish to have such people between the world and myself, nor would I travel with all the fuss of a coach, as if I were afraid people would speak to me. Shanks' mare is always ready; if she is tired or ill, her owner is the first to know it; he need not be afraid of being kept at home while his coachman is on the spree; on the road he will not have to submit to all sorts of delays, nor will he be consumed with impatience, nor compelled to stay in one place a moment longer than he chooses. Lastly, since no one serves us so well as we serve

ourselves, had we the power of Alexander and the wealth of Croesus we should accept no services from others, except those we cannot perform for ourselves.

我只会请很少几个仆人来好好照顾我，这在之前也已经说过了，但值得再说一遍。相比于身边围绕着十个跟班的公爵，只有一个仆人的商人更能得到真正周到的照顾。每当我坐在桌边，杯子放在一旁，我想喝随时都可以喝的时候，我总会想到这些；反之，假使我大张旗鼓的话，那我得等二十个人喊完“喝酒”之后才能解渴。你要相信任何别人替你做的事都会完成得不如人意。我不会差遣人去商店替我买东西，而是会亲自去。这样一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和更便宜的价格，避免我的仆人和店员勾结；二是我自己去也可以散散心，看看外面的世界，这非常有意思并且有时候很有启发性；最后，这样我就可以散散步，总是有益处的。总是坐着不动最终导致我们对人生的厌倦。如果我们多走走，我们就不会感到乏味。一个门童或者侍从总是不能很好表达我的意思，因此我从不指望这样的人插在我和这个世界之间，我也不会小题大做地坐着大马车上街，好像生怕别人和我说话似的。一个人靠自己的双脚步行也可以随时到外面走走。如果他的马累了或是病了，他总是第一个知道的；他也不用担心因为车夫行乐耽误而无法出门；他也不必屈从于各种耽搁，最终耐心消耗殆尽；他更不会被迫在一个地方待得很久。最后，没有人都比我们自己更周到地照顾我们。即使我们像亚历山大般权倾天下、如克洛伊斯般富可敌国，我们也应该亲力亲为，除非我们确实无法自己完成。

I would not live in a palace; for even in a palace I should only occupy one room; every room which is common property belongs to nobody, and the rooms of each of my servants would be as strange to me as my neighbour's. The Orientals, although very voluptuous, are lodged in plain and simply furnished dwellings. They consider life as a journey, and their house as an inn. This reason scarcely

appeals to us rich people who propose to live for ever; but I should find another reason which would have the same effect. It would seem to me that if I settled myself in one place in the midst of such splendour, I should banish myself from every other place, and imprison myself, so to speak, in my palace. The world is a palace fair enough for any one; and is not everything at the disposal of the rich man when he seeks enjoyment? “Ubi bene, ibi patria,” that is his motto; his home is anywhere where money will carry him, his country is anywhere where there is room for his strong-box, as Philip considered as his own any place where a mule laden with silver could enter [1_33] . Why then should we shut ourselves up within walls and gates as if we never meant to leave them? If pestilence, war, or rebellion drive me from one place, I go to another, and I find my hotel there before me. Why should I build a mansion for myself when the world is already at my disposal? Why should I be in such a hurry to live, to bring from a far delights which I can find on the spot?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a pleasant life for oneself when one is always at war with oneself. Thus Empedocles reproached the men of Agrigentum with heaping up pleasures as if they had but one day to live, and building as if they would live for ever.

我不会住进宫殿里，因为就算住宫殿，我也只占据一个房间。公用的房间不属于任何人。仆人的房间对我来说就像邻居的房子一样不相干。东方人虽然骄奢淫逸，但他们的住所却很简朴。他们将人生看作一场旅行，将他们的房子看作小旅馆。这个理由对那些追求长生的富翁来说，不具任何吸引力。但是我有另一个理由，产生同样的效果。在我看来，如果我置身在这样的辉煌壮丽之中，就等于将自己囚禁在我所谓的宫殿里，不去别的地方。这个世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座足够美丽的宫殿。当一个富人要寻求享受的时候，不是一切尽在他的支配之中吗？“大抵心安即是家”，这句话是他的座右铭。只要金钱

可以维持他生活的地方就是他的家；只要有空间放保险箱的地方就是他的国土。正如菲利浦所说，只要一头满载银子的骡子能够进入的地方，就是他的地盘 [2_33]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困在门墙之内，好像我们从不曾想过逃离？如果瘟疫、战争、叛乱使得我不得不离开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会在我到达之前就找好旅舍。当整个世界都在我掌控之中的时候，我何必要为自己修建一座大厦呢？我何必活得这般忙碌，放着眼前的幸福不享受，硬要等到以后呢？如果一个人总是和自己过不去，那他就不可能幸福地生活。因此恩培多克勒责备阿格里真托，说他把快乐堆积起来，就像只能活一天似的。但另一方面又大肆建造，就像要永世长存似的。

And what use have I for so large a dwelling, as I have so few people to live in it, and still fewer goods to fill it? My furniture would be as simple as my tastes; I would have neither picture-gallery nor library, especially if I was fond of reading and knew something about pictures. I should then know that such collections are never complete, and that the lack of that which is wanting causes more annoyance than if one had nothing at all. In this respect abundance is the cause of want, as every collector knows to his cost. If you are an expert, do not make a collection; if you know how to use your cabinets, you will not have any to show.

这么大的房子于我有何用呢？既没有什么人住，也没有什么东西要存放。我的家具就像我的品味一样简单朴实。即使我喜爱阅读，并且对画画略知一二，我也不要画廊和书房。我知道收藏是永远无法穷尽的。若是想要而得不到的时候，那会比本就一无所有还令人恼怒。从这一方面来说，富裕导致了虚妄。每一个收藏家都了解它的代价。如果你是一个行家，你就不会做收藏；如果你知道如何运用你的柜橱，你就不会向人家展示。

Gambling is no sport for the rich, it is the resource of those who have nothing to do; I shall be so busy with my pleasures that I shall have no time to waste. I am poor and lonely and I never play, unless it is a game of chess now and then, and that is more than enough. If I were rich I would play even less, and for very low stakes, so that I should not be disappointed myself, nor see the disappointment of others. The wealthy man has no motive for play, and the love of play will not degenerate into the passion for gambling unless the disposition is evil. The rich man is always more keenly aware of his losses than his gains, and as in games where the stakes are not high the winnings are generally exhausted in the long run, he will usually lose more than he gains, so that if we reason rightly we shall scarcely take a great fancy to games where the odds are against us. He who flatters his vanity so far as to believe that Fortune favours him can seek her favour in more exciting ways; and her favours are just as clearly shown when the stakes are low as when they are high. The taste for play, the result of greed and dullness, only lays hold of empty hearts and heads; and I think I should have enough feeling and knowledge to dispense with its help. Thinkers are seldom gamblers; gambling interrupts the habit of thought and turns it towards barren combinations; thus one good result, perhaps the only good result of the taste for science, is that it deadens to some extent this vulgar passion; people will prefer to try to discover the uses of play rather than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it. I should argue with the gamblers against gambling, and I should find more delight in scoffing at their losses than in winning their money.

赌博不是有钱人的活动，而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混日子的玩意儿。我忙于自己的各种爱好，无暇做这些事情。我是一个孤单的穷人，我是不会赌博的。最多偶尔下下棋，而且这已经过度了。如果我很富有，我就更不可能赌博了。就算赌也堵得很小，免得自己或别人

输得太多都会感到沮丧。富有的人没有赌博的动机，对于玩乐的喜爱也不会退化成对于赌博的热情，除非他天性邪恶。相比于赢钱，富人总是对输钱更加敏感。在小赌中赢得的钱到最后也会输光，最终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因此，如果我们这样理智思考的话，我们就不会喜欢上这种没有胜算的游戏。那些骄傲自满，相信幸运女神总是会眷顾自己的人就会选择更刺激的方式。而幸运女神的偏向在大赌和小赌中都会清楚地显示出来。一个人嗜好赌博，是因为他生性贪婪，生活沉闷无聊。只有空虚的心灵和空洞的头脑才会有这样的爱好。我认为只要我有高尚的情操和渊博的知识，我就不会深陷其中。思想家很少赌博，因为赌博会破坏他们思考的习惯，或者他们的思考只能转化为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对科学的热爱会导致一个好的结果，也许是唯一好的结果，那就是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粗俗的欲念。人们赌博是为了发现赌博的用处，而不是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我会和赌徒们关于赌博展开争辩。如果他们输了钱，嘲笑他们的失败会比我亲自赢他们的钱更开心。

I should be the same in private life as in my social intercourse. I should wish my fortune to bring comfort in its train, and never to make people conscious of inequalities of wealth. Showy dress is inconvenient in many ways. To preserve as much freedom as possible among other men, I should like to be dressed in such a way that I should not seem out of place among all classes, and should not attract attention in any; so that without affectation or change I might mingle with the crowd at the inn or with the nobility at the Palais Royal. In this way I should be more than ever my own master, and should be free to enjoy the pleasures of all sorts and conditions of men. There are women, so they say, whose doors are closed to embroidered cuffs, women who will only receive guests who wear lace ruffles; I should spend my days elsewhere; though if these women were young and pretty I might sometimes put on lace ruffles to spend an evening or so in their company.

无论在私生活还是社会交往中，我都做到始终如一。我希望我的财富能够带给我舒适，但又不希望人们感觉到我们财富上的不平等。过分装饰的裙子从很多方面来说都非常不便。为了在人群中尽可能地保持我的自由，我的穿着在任何阶级中都不应该显得格格不入，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不需要任何的假装或改变，我既可以在小酒馆里和普通人厮混，也可以在皇家宫殿中与贵族们同处。这样我就能更好地做我自己的主人，自由地享受形形色色的人的快乐。据说有一种女人，她们对穿着普通的来客闭门不见，只欢迎衣着华丽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宁愿去别处。不过如果这些女人年轻靓丽的话，我还是愿意偶尔穿上华服去她们那儿待一个晚上。

Mutual affection, similarity of tastes, suitability of character; these are the only bonds between my companions and myself; among them I would be a man, not a person of wealth; the charm of their society should never be embittered by self-seeking. If my wealth had not robbed me of all humanity, I would scatter my benefits and my services broadcast, but I should want companions about me, not courtiers, friends, not proteges; I should wish my friends to regard me as their host, not their patron. Independence and equality would leave to my relations with my friends the sincerity of goodwill; while duty and self-seeking would have no place among us, and we should know no law but that of pleasure and friendship.

彼此喜爱、趣味相投、性格合适，这是我和我的同伴之间唯一的联系。在他们之中，我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一个有钱人。和他们交往的乐趣绝不可以被追逐利益所影响。如果我的财富使我还保留几分人性的光辉，我就会广施仁义，服务他人。但是我也希望周围的人是我的同伴而非一群谄媚者，是朋友而非门徒。我希望我的朋友

们也能将我看作是好客的主人，而非他们的施主。独立和平等使我和朋友们的关系变得诚挚友善。义务和追逐私利将不会存在于我们的关系中，我们唯一遵循的只有快乐和友谊。

Neither a friend nor a mistress can be bought. Women may be got for money, but that road will never lead to love. Love is not only not for sale; money strikes it dead. If a man pays, were he indeed the most lovable of men, the mere fact of payment would prevent any lasting affection. He will soon be paying for some one else, or rather some one else will get his money; and in this double connection based on self-seeking and debauchery, without love, honour, or true pleasure, the woman is grasping, faithless, and unhappy, and she is treated by the wretch to whom she gives her money as she treats the fool who gives his money to her; she has no love for either. It would be sweet to lie generous towards one we love, if that did not make a bargain of love. I know only one way of gratifying this desire with the woman one loves without embittering love; it is to bestow our all upon her and to live at her expense.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there is any woman with regard to whom such conduct would not be unwise.

无论是朋友还是情人都不能用钱买到。或许钱可以买到女人，但是金钱买卖下的关系绝不会产生爱情。爱不仅不能买卖，金钱还会使爱情枯萎。如果一个人用钱说爱，那么即使他是世上最可爱的人，也无法使他得到长久的爱。他很快就会替别人付钱，或者说另外一个男人将得到他的钱。在这种建立于利益关系和淫欲之上的双重关系中，没有爱情和荣耀，也没有真正的快乐。那个不忠又不快乐的贪婪女人是怎样被她所供养的混蛋对待的，她也会怎样对待那个给她钱的傻瓜。她对这两个人都没有爱。只要不是为爱做交易，那么对我们所爱之人出手大方也是一件好事。我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满足深爱的

女人的欲望又不会使爱情受到打击：把你的所有财产授予她，再由她来供养你。对于什么样的女人不能使用这个办法还有待观察。

He who said, “Lais is mine, but I am not hers,” was talking nonsense. Possession which is not mutual is nothing at all; at most it is the possession of the sex not of the individual. But where there is no morality in love, why make such ado about the rest? Nothing is so easy to find. A muleteer is in this respect as near to happiness as a millionaire.

有人说：“莱斯是我的，而我不属于她”，他简直是在胡扯。占有如果不是双向的，那就什么都不是。占有的最多是性，而不是那个人。不过既然爱情中没有道德准则，为何要如此麻烦地讨论什么占有不占有呢？再没有比找女人更容易的事了。从这点上来说，一个赶骡人和一个百万富翁一样幸福。

Oh, if we could thus trace out the unreasonableness of vice, how often should we find that, when it has attained its object, it discovers it is not what it seemed! Why is there this cruel haste to corrupt innocence, to make, a victim of a young creature whom we ought to protect, one who is dragged by this first false step into a gulf of misery from which only death can release her? Brutality, vanity, folly, error, and nothing more. This pleasure itself is unnatural; it rests on popular opinion, and popular opinion at its worst, since it depends on scorn of self. He who knows he is the basest of men fears comparison with others, and would be the first that he may be less hateful. See if those who are most greedy in pursuit of such fancied pleasures are ever attractive young men—men worthy of pleasing, men who might have some excuse if they

were hard to please. Not so; any one with good looks, merit, and feeling has little fear of his mistress' experience; with well-placed confidence he says to her, “You know what pleasure is, what is that to me? my heart assures me that this is not so.”

哦！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种恶行的不合理之处，我们会经常发现，当得到目标物的时候，它并非它如它看起来那样！为什么要这样残忍地迫不及待地摧毁一个人的天真？为什么要对一个年轻人这样呢？我们应该保护年轻人。要是他走错第一步而被拖进不幸的深渊，只有死亡才可以使他脱离苦海。只有如下原因：是人的残忍、虚荣、愚蠢和错误在作怪，没有别的了。这种享乐本身是不符合自然的。它的产生基于大众的观点。而这样的观点是最卑劣的，因为其取决于自我蔑视。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最糟糕的人时，他害怕与别人进行比较。事事都想争得第一，以减轻别人对他的憎恶。看看那些贪婪地追求这种虚妄之乐的人是否具有魅力，是否即使难以取悦也能找到理由。不是的。一个人若是样貌品德俱佳，他就不会害怕自己的情人是个情场老手，他会自信满满地对她说：“你知道寻欢作乐，那你知道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吗？我的心告诉我，快乐根本不是这样的。”

But an aged satyr, worn out with debauchery, with no charm, no consideration, no thought for any but himself, with no shred of honour, incapable and unworthy of finding favour in the eyes of any woman who knows anything of men deserving of love, expects to make up for all this with an innocent girl by trading on her inexperience and stirring her emo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His last hope is to find favour as a novelty; no doubt this is the secret motive of this desire; but he is mistaken, the horror he excites is just as natural as the desires he wishes to arouse. He is also mistaken in his foolish attempt; that very nature takes care to assert her rights; every girl who sells herself is no longer a maid; she has

given herself to the man of her choice, and she is making the very comparison he dreads. The pleasure purchased is imaginary, but none the less hateful.

但是一个被欲念折磨得疲乏不堪的老色鬼，既没有魅力，也不会体贴人，只考虑自己，没有丝毫的荣誉感和羞耻心。但凡知道什么样的男人值得爱的女人，就不会爱上他。这个老色鬼要是想弥补这一切，就要趁一个天真的少女毫无经验之时搅动她的心绪。他最后的希望就是利用这件事的新奇来赢得欢心。毫无疑问，这就是欲望的秘密动机。但是他错了，就像他能激起对方自然的情欲一样，他也会激起对方自然的恐惧。在愚蠢的尝试中，他也搞错了一点，对方自然的恐怖感也将激发她对于自我权利的维护。任何一个出售自己的少女不会再是一个处女，她已经将自己托付给了她选择的男人，对这些男人进行一番比较后，而这番比较这恰恰是他所害怕的。买到的快乐都是虚幻的，而且仍然令人厌恶。

For my own part, however riches may change me, there is one matter in which I shall never change. If I have neither morals nor virtue, I shall not be wholly without taste, without sense, without delicacy; and this will prevent me from spending my fortune in the pursuit of empty dreams, from wasting my money and my strength in teaching children to betray me and mock at me. If I were young, I would seek the pleasures of youth; and as I would have them at their best I would not seek them in the guise of a rich man. If I were at my present age, it would be another matter; I would wisely confine myself to the pleasures of my age; I would form tastes which I could enjoy, and I would stifle those which could only cause suffering. I would not go and offer my grey beard to the scornful jests of young girls; I could never bear to sicken them with my disgusting caresses, to furnish them at my expense with the

most absurd stories, to imagine them describing the vile pleasures of the old ape, so as to avenge themselves for what they had endured. But if habits unresisted had changed my former desires into needs, I would perhaps satisfy those needs, but with shame and blushes. I w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passion and necessity, I would find a suitable mistress and would keep to her. I would not make a business of my weakness, and above all I would only have one person aware of it. Life has other pleasures when these fail us; by hastening in vain after those that fly us, we deprive ourselves of those that remain. Let our tastes change with our years, let us no more meddle with age than with the seasons. We should be ourselves at all times, instead of struggling against nature; such vain attempts exhaust our strength and prevent the right use of life.

就我自身而言，无论财富将如何改变我，有一点我永远都不会改变。就算我道德沦丧，我也不会变得毫无审美，毫无感觉，变得对事物丝毫不敏感。这些东西防止我浪费我的财富和精力追求一场空梦，或是教孩子们背叛我、嘲笑我。要是我还年轻，我会寻找年轻人的乐趣。既然要寻求最大的乐趣，我就不会以富人的身份去寻找这种快乐。如果我处于我现在的年纪，这就另当别论了。我会智慧地寻求属于我这个年龄的乐趣，培养我能够享受的品味。对于那些只能造成痛苦的爱好，我就不会涉及。我不会让我的白胡子成为年轻女孩们嘲笑的对象，我也绝不会用我令人厌恶的关心去恶心她们，用那些荒诞的故事招惹她们的厌恶。我不敢想象她们像描述老猿猴粗俗的乐趣一样描述我让她们忍受的那些事。但是如果我的习惯将我原来的欲望变成了实际需求，也许我会满足这些需求，但是我的内心是非常羞愧的。我会分辨清楚欲望和需求，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情人而且钟情于她。我不能让我的缺点有所发展。首要的是，我只能让一个人意识到我的缺点。当我们在这些方面挫败的时候，生活会提供其他的乐趣。由于我们徒劳地追逐我们抓不住的快乐，我们也就错失了那些一直存在的快乐。让我们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改变，就像我们不能违背四

季的规律一样，我们也不能违背年龄的规律。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做自己，不能违背自然，这种无用功只会使我们精疲力竭，并且无法正确地享受生活。

The lower classes are seldom dull, their life is full of activity; if there is little variety in their amusements they do not recur frequently; many days of labour teach them to enjoy their rare holidays. Short intervals of leisure between long periods of labour give a spice to the pleasures of their station. The chief curse of the rich is dullness; in the midst of costly amusements, among so many men striving to give them pleasure, they are devoured and slain by dullness; their life is spent in fleeing from it and in being overtaken by it; they are overwhelmed by the intolerable burden; women more especially, who do not know how to work or play, are a prey to tedium under the name of the vapours; with them it takes the shape of a dreadful disease, which robs them of their reason and even of their life. For my own part I know no more terrible fate than that of a pretty woman in Paris, unless it is that of the pretty manikin who devotes himself to her, who becomes idle and effeminate like her, and so deprives himself twice over of his manhood, while he prides himself on his successes and for their sake endures the longest and dullest days which human being ever put up with.

下层人民很少有感到乏味无趣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中活动很多。如果他们娱乐的花样不多，但是长时间的工作教会他们珍惜并享受着鲜有的假期。长时间的工作中有一个短期的休息，会使得他们感受到工作中的乐趣。对于富人来说，最主要的苦恼是生活寡淡无味。尽管他们花了大价钱寻欢作乐，有许多人力求讨她们欢心，但他们仍然觉得枯燥无味，沉闷至死。他们拼命逃离这样的枯燥乏味，却时常深感

无聊，被这沉重的负担压垮，他们的生命就这样流逝。尤其是女人，她们既不知道如何工作，又不知道如何玩乐，整天沉闷地过日子。无聊的生活对她们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疾病，夺走了她们的理智，甚至她们的生活。在我看来，没有人的命运比一个美丽的巴黎女人的命运更可怕了。除非是那个全心全意爱她的英俊美少年。他也变得像她一样空虚柔弱，他的男子气概丧失得更快。当他为自己的成功感到自豪的时候，事实上他在过着人们都曾经历忍受过的最漫长沉闷的日子。

Proprieties, fashions, customs which depend on luxury and breeding, confine the course of life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most miserable uniformity. The pleasure we desire to display to others is a pleasure lost; we neither enjoy it ourselves, nor do others enjoy it [1_34] . Ridicule, which public opinion dreads more than anything, is ever at hand to tyrannise, and punish. It is only ceremony that makes us ridiculous; if we can vary our place and our pleasures, to-day's impressions can efface those of yesterday; in the mind of men they are as if they had never been; but we enjoy ourselves for we throw ourselves into every hour and everything. My only set rule would be this: wherever I was I would pay no heed to anything else. I would take each day as it came, as if there were neither yesterday nor to-morrow. As I should be a man of the people, with the populace, I should be a countryman in the fields; and if I spoke of farming, the peasant should not laugh at my expense. I would not go and build a town in the country nor erect the Tuileries at the door of my lodgings. On some pleasant shady hill-side I would have a little cottage, a white house with green shutters, and though a thatched roof is the best all the year round, I would be grand enough to have, not those gloomy slates, but tiles, because they look brighter and more cheerful than thatch, and the houses in my own country are always roofed with them, and so they would recall

to me something of the happy days of my youth. For my courtyard I would have a poultry-yard, and for my stables a cowshed for the sake of the milk which I love. My garden should be a kitchen-garden, and my park an orchard, like the one described further on. The fruit would be free to those who walked in the orchard, my gardener should neither count it nor gather it; I would not, with greedy show, display before your eyes superb espaliers which one scarcely dare touch. But this small extravagance would not be costly, for I would choose my abode in some remote province where silver is scarce and food plentiful, where plenty and poverty have their seat.

我们讲求礼节、时髦和风俗，这都取决于崇尚奢侈和教养。但结果我们的生活轨迹却永远被困在痛苦的千篇一律中。我们想向别人展示快乐，但实际上我们并不快乐。无论是我们自己和别人都无法感受到乐趣 [2_34] 。人们一般最害怕受到别人的嘲笑，结果反而经常被人家笑话，苦不堪言。只有过度注重礼节的人才会变得荒谬可笑。善于改变环境和乐趣的人在今天就会改变昨天的印象，在我们心中我们好像从未这样过。但是我们感到快乐，因为我们每时每刻将每一件事情都随心所欲。我的准则只有一个：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将专注于此处，不再留心别的东西。我每一天都会按照实际情况度过，就好像它与昨天和明天都没有丝毫关联。正如我以普通人的身份融入在百姓之中，我在田间就是一个农民。要是我谈及农活，不会受到农民的嘲笑。我不会去乡下过城里的生活，我也不会在我的房子门前建造杜伊勒里宫。在风景宜人的背阴山坡上，我会建一间小屋，白墙绿窗。虽然屋顶是用茅草盖成的，但是一年四季都非常舒适。我不用颜色暗淡的石板，而是用瓦片，因为它看起来更明亮，更令人愉悦。在我的家乡，人们都是用它盖房的。因此它总是唤起我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至于庭院，我会做一个家禽饲养场。因为我喜爱牛奶，所以我不修马厩，而是修建一个牛棚。我的花园会变成一个菜园子，我的公园会变成一个果园，就是我之后会提提及的样子。任何路过的人都可以享用

果园里的水果，我的园丁既不会数，也不会将它们收摘。我也绝不会因为想要炫耀，而在四周围上美丽的树墙，让人们都不敢伸手触碰。但这小小地奢侈一下不会太破费，因为我会选择住在一些偏僻的省份。在这样的地方，银币稀少但物产丰富，富人和穷人都各得其所。

There I would gather round me a company, select rather than numerous, a band of friends who know what pleasure is, and how to enjoy it, women who can leave their arm-chairs and betake themselves to outdoor sports, women who can exchange the shuttle or the cards for the fishing line or the bird-trap, the gleaner's rake or grape-gatherer's basket. There all the pretensions of the town will be forgotten, and we shall be villagers in a village; we shall find all sorts of different sports and we shall hardly know how to choose the morrow's occupation. Exercise and an active life will improve our digestion and modify our tastes. Every meal will be a feast, where plenty will be more pleasing than any delicacies. There are no such cooks in the world as mirth, rural pursuits, and merry games; and the finest made dishes are quite ridiculous in the eyes of people who have been on foot since early dawn. Our meals will be served without regard to order or elegance; we shall make our dining-room anywhere, in the garden, on a boat, beneath a tree; sometimes at a distance from the house on the banks of a running stream, on the fresh green grass, among the clumps of willow and hazel; a long procession of guests will carry the material for the feast with laughter and singing; the turf will be our chairs and table, the banks of the stream our side-board, and our dessert is hanging on the trees; the dishes will be served in any order, appetite needs no ceremony; each one of us, openly putting himself first, would gladly see every one else do the same; from this warm-hearted and temperate familiarity there would arise, without coarseness, pretence, or constraint, a laughing conflict a

hundredfold more delightful than politeness, and more likely to cement our friendship. No tedious flunkeys to listen to our words, to whisper criticisms on our behaviour, to count every mouthful with greedy eyes, to amuse themselves by keeping us waiting for our wine, to complain of the length of our dinner. We will be our own servants, in order to be our own masters. Time will fly unheeded, our meal will be an interval of rest during the heat of the day. If some peasant comes our way, returning from his work with his tools over his shoulder, I will cheer his heart with kindly words, and a glass or two of good wine, which will help him to bear his poverty more cheerfully; and I too shall have the joy of feeling my heart stirred within me, and I should say to myself—I too am a man.

在那里我会结交一群朋友，但我会精心挑选而不是越多越好。他们知道什么是乐趣，如何享受乐趣。女人们能够走出屋子去户外活动，有时也能够放下梭子和纸牌去钓鱼，去捕鸟，去拾穗，去摘葡萄。在那里，我会忘记所有城市的浮夸，在乡下做一个乡下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竟不知道明天要选什么活动来玩。运动和积极的生活能够帮助消化，使我们胃口大开。每一餐都是一场宴会，使我们心情愉悦的是丰富的食物，而不是食物有多精致。这世上再没有比欢乐、农活、有趣的游戏更好的厨师了。最精致的美食在那些黎明时分就开始忙碌，不曾停歇的人看来是非常荒谬的。我们吃东西时不考虑顺序和精美程度。任何地方都可以是我们的餐厅：花园里、小船上、大树下。有时候还会去离家很远的小河畔，草地上，柳树和榛树从中去吃。一大群客人会带着食物，欢声笑语。草皮就是我们的餐桌和椅子，河畔也就成了我们的餐具架。我们的饭后甜点就挂在树上。上菜没有什么顺序，只要胃口好，就没有那么多约束。每个人都大方地先给自己拿菜，看到别人这么做也会感到开心。就是在这样温暖、亲切又毫不拘束、毫不假装的氛围中，我们要比客气相待开心百倍，而且更容易加深我们的友谊。没有令人生厌的仆人来偷听我们的话，然后

再小声地批判我们的行为，用贪婪的目光数我们吃的东西。也不会为了好玩，故意不给我们上酒，让我们干等。更不会抱怨我们一餐饭吃得时间过长。为了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仆人。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飞逝，我们进餐的时间就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我们正好休息片刻。如果有农民干完农活，扛着锄头从我们一旁经过，我会善意地说些好听的话，敬他一两杯美酒，浙江使他更快乐地忍受自己的贫苦。而我内心也会十分愉快，我会对我自己说："我也是一个人。"

I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district assembled for some rustic feast, I and my friends would be there among the first; if there were marriages, more blessed than those of towns, celebrated near my home, every one would know how I love to see people happy, and I should be invited. I would take these good folks some gift as simple as themselves, a gift which would be my share of the feast; and in exchange I should obtain gifts beyond price, gifts so little known among my equals, the gifts of freedom and true pleasure. I should sup gaily at the head of their long table; I should join in the chorus of some rustic song and I should dance in the barn more merrily than at a ball in the Opera House.

如果当地的居民聚集起来过什么节日，我和我的朋友们会首先赶过去。如果是我家附近有人结婚，他们一定比城里人更能得到上帝祝福。他们知道我多么乐于看到别人幸福，所以他们一定会邀请我参加。我会给这些善良的人们带一点礼物，就和他们一样质朴，来增添婚礼的喜庆。作为交换，他们也会送给我礼物，但这些礼物是金钱无法衡量的，是自由和真正的快乐，我的同辈们都无法理解。我会坐在长桌子的一头，喜气洋洋地进餐。我也会和他们一起合唱当地的歌曲，开心地在他们的院子里跳舞，比在歌剧院跳舞还要高兴。

“This is all very well so far,” you will say, “but what about the shooting! One must have some sport in the country.” Just so; I only wanted a farm, but I was wrong. I assume I am rich, I must keep my pleasures to myself, I must be free to kill something; this is quite another matter. I must have estates, woods, keepers, rents, seignorial rights, particularly incense and holy water.

“目前所说的一切都很好，”你也许会说，“但是打猎的事情该怎么说呢？一个人在乡下一定得有点活动。”（是不是在乡村中就不打猎了呢？）我只希望有一个小农场，仅此而已，但是我错了。假设我很富有，我必须将我的快乐唯我所有，我必须要杀害动物来获得快乐，这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我必须要有房产、树林、管家、地租和绅士的权利，尤其是人们的奉承和圣水。

Well and good. But I shall have neighbours about my estate who are jealous of their rights and anxious to encroach on those of others; our keepers will quarrel, and possibly their masters will quarrel too; this means altercations, disputes, ill-will, or law-suits at the least; this in itself is not very pleasant. My tenants will not enjoy finding my hares at work upon their corn, or my wild boars among their beans. As they dare not kill the enemy, every one of them will try to drive him from their fields; when the day has been spent in cultivating the ground, they will be compelled to sit up at night to watch it; they will have watch-dogs, drums, horns, and bells; my sleep will be disturbed by their racket. Do what I will, I cannot help thinking of the misery of these poor people, and I cannot help blaming myself for it. If I had the honour of being a prince, this would make little impression on me; but as I am a self-made man who has only just come into his property, I am still rather vulgar at heart.

这很好。但是我房子周围的一些邻居，他们既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又想着侵占别人的权利。我们的管家会争吵，或许他们的主人也会争吵。这就意味着吵嘴、争辩、敌意，甚至会诉诸法律。这些事都是很不愉快的。我的佃户看到我的兔子吃他们家的谷物，或是发现我的猪吃他们家的豆子，都会很不开心。因为他们不敢直接杀了我的兔子和猪，就只好尽力驱赶它们。他们白天要在地里种庄稼，晚上又不得不坐着看管。他们有狗来看守，会打鼓，吹号角，又会打铃，这些声音就影响了我的睡眠。我情不自禁地想这些可怜人的悲惨之处，忍不住责怪我自己。要是我贵为王子的话，对这一切我将不为所动。但是我只是一个白手起家，刚刚发迹的富翁，我的内心仍然是平庸的。

That is not all; abundance of game attracts trespassers; I shall soon have poachers to punish; I shall require prisons, gaolers, guards, and galleys; all this strikes me as cruel. The wives of those miserable creatures will besiege my door and disturb me with their crying; they must either be driven away or roughly handled. The poor people who are not poachers, whose harvest has been destroyed by my game, will come next with their complaints. Some people will be put to death for killing the game, the rest will be punished for having spared it; what a choice of evils! On every side I shall find nothing but misery and hear nothing but groans. So far as I can see this must greatly disturb the pleasure of slaying at one's ease heaps of partridges and hares which are tame enough to run about one's feet.

还不止于此。猎物的丰富吸引了很多偷猎者。我很快就要惩罚那些偷猎者。我要准备一些监狱和狱卒，这些在我看来够残酷了。这些可怜人的妻子将围住我的大门，大声哭闹，令我心烦。我要么就将她们赶走，要么粗鲁地对付她们。有些穷人不是偷猎者，他们的庄稼也

因为我而遭到了破坏，他们紧接着就会来向我抱怨。偷猎者要被处死，剩下的人也要因不偷猎而受到惩罚，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选择啊！四周所见全是凄凉之景，所闻皆是呻吟之声。在我看来这必定极大地阻碍我自在愉快地捕猎成群的山鹑和野兔，它们足够驯良，尽在脚边乱跑。

If you would have pleasure without pain let there be no monopoly; the more you leave it free to everybody, the purer will be your own enjoyment. Therefore I should not do what I have just described, but without change of tastes I would follow those which seem likely to cause me least pain. I would fix my rustic abode in a district where game is not preserved, and where I can have my sport without hindrance. Game will be less plentiful, but there will be more skill in finding it, and more pleasure in securing it. I remember the start of delight with which my father watched the rise of his first partridge and the rapture with which he found the hare he had sought all day long. Yes, I declare, that alone with his dog, carrying his own gun, cartridges, and game bag together with his hare, he came home at nightfall, worn out with fatigue and torn to pieces by brambles, but better pleased with his day's sport than all your ordinary sportsmen, who on a good horse, with twenty guns ready for them, merely take one gun after another, and shoot and kill everything that comes their way, without skill, without glory, and almost without exercise. The pleasure is none the less, and the difficulties are removed; there is no estate to be preserved, no poacher to be punished, and no wretches to be tormented; here are solid grounds for preference. Whatever you do, you cannot torment men for ever without experiencing some amount of discomfort; and sooner or later the muttered curses of the people will spoil the flavour of your game.

如果你希望你的快乐中不夹带一丝痛苦，那你就不要独占你的快乐。你越是让大家共享，你获得的快乐就越纯粹。因此，我不会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做。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爱好，所以我会在寻求乐趣的时候尽可能地减少伤害。我在乡下的房屋要建造在可以自由打猎的地方。我可以毫无阻碍地打猎。也许猎物没有那么多，所以打猎的时候就需要更多的技巧，打到猎物也会更开心。我记得我的父亲看见第一只山鹑飞起来的时候欣喜的样子，我也记得他发现他苦苦找寻了一天的野兔出现时候的狂喜。是的，我认为，傍晚时分，他独自背着猎枪、子弹和猎袋，带着猎狗和他的猎物回来时，虽然筋疲力尽，满身都是被荆棘划破的伤痕，但是他比那些普通的猎人都要开心。因为他们虽然骑着骏马，带着二十支枪，但仅仅是一支接着一支打，看到猎物跑到身边才开枪，没有任何技术，也没有什么荣耀，甚至连运动都算不上。乐趣仍旧存在，困难也因此消减。这里没有土地需要保护，没有偷猎者需要惩罚，也没有恶棍需要折磨，只有理想的坚实土地。无论你做什么，你折磨别人，就一定会遭遇同样的事情。总有一天人们的诅咒会使毁了你的猎物的滋味。

Again, monopoly destroys pleasure. Real pleasures are those which we share with the crowd; we lose what we try to keep to ourselves alone. If the walls I build round my park transform it into a gloomy prison, I have only deprived myself, at great expense, of the pleasure of a walk; I must now seek that pleasure at a distance. The demon of property spoils everything he lays hands upon. A rich man wants to be master everywhere, and he is never happy where he is; he is continually driven to flee from himself. I shall therefore continue to do in my prosperity what I did in my poverty. Henceforward, richer in the wealth of others than I ever shall be in my own wealth, I will take possession of everything in my neighbourhood that takes my fancy; no conqueror is so determined as I; I even usurp the rights of princes; I take possession of every open place that pleases me, I give them names; this is my park, chat

is my terrace, and I am their owner; henceforward I wander among them at will; I often return to maintain my proprietary rights; I make what use I choose of the ground to walk upon, and you will never convince me that the nominal owner of the property which I have appropriated gets better value out of the money it yields him than I do out of his land. No matter if I am interrupted by hedges and ditches, I take my park on my back, and I carry it elsewhere; there will be space enough for it near at hand, and I may plunder my neighbours long enough before I outstay my welcome.

再说一遍，独享乐趣反而会使你感受不到快乐。真正的快乐是和大家分享的。如果我们试着独占，那我们也将什么都得不到。如果将我公园周围的墙变成一个黑暗的监狱，那我就是花大代价剥夺了我自己散步的乐趣。我要想散步就必须去很远的地方。财产这个魔鬼所到之处就会破坏一切东西。一个富人想成为每一个地方的主人，无论他在哪里，都不会感到快乐，只能不断地逃避。因此就算我有钱了，我也会继续做我穷困时候做的事。从今以后，我比只享用我自己的财产更富有，因此只要我喜欢附近哪块地方，我就会占为己有。没有一个征服者像我这样坚决。甚至是皇室的地盘我也要侵占。只要我喜欢，任何地方我都会侵占并给它们取名。这块做我的公园，那块做我的草坪，我是它们的主人。从此我可以随心所欲地闲逛，经常回去看看确保我的所有权。我所到之处，我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你要是说我所占有的土地名义上的主人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我是不会认同的。就算他们用篱笆和沟渠阻挡我，我也可以扛起我的公园就走，放到任何地方都行。附近有足够的地方。在我的邻居不欢迎我之前，我还要掠夺他们很长一段时间。

This is an attempt to show what is meant by good taste in the choice of pleasant occupations for our leisure hours; this is the spirit of enjoyment; all else is illusion, fancy, and foolish pride. He who

disobeys these rules, however rich he may be, will devour his gold on a dung-hill, and will never know what it is to live.

以上是我试图展示在我们的闲暇时光，如何选择真正令人愉快的消遣。这是享受的精神，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妄、假象和愚蠢的自我满足。那些不服从这些原则的人，无论他多么富有，他最终都会挥金如土，不懂得生活的真正意义。

You will say, no doubt, that such amusements lie within the reach of all, that we need not be rich to enjoy them. That is the very point I was coming to. Pleasure is ours when we want it; it is only social prejudice which makes everything hard to obtain, and drives pleasure before us. To be happy is a hundredfold easier than it seems. If he really desires to enjoy himself the man of taste has no need of riches; all he wants is to be free and to be his own master. With health and daily bread we are rich enough, if we will but get rid of our prejudices; this is the “Golden Mean” of Horace. You folks with your strong-boxes may find some other use for your wealth, for it cannot buy you pleasure. Emile knows this as well as I, but his heart is purer and more healthy, so he will feel it more strongly, and all that he has beheld in society will only serve to confirm him in this opinion.

毫无疑问，你会说，这样的娱乐方式每个人都可以享受，我们不一定要变得富有。这就是我即将要说的。只要我们想要快乐，我们就可以得到快乐。只是因为社会的偏见才使这一切难以获得，使我们失去眼前的快乐。获得快乐比看起来要容易百倍。如果一个人真的渴望快乐，懂得欣赏，他不需要很富有。他想要的只是自由，成为自己的主人。只要健康，不挨饿，抛弃我们的偏见，我们就足够富有了。这

就是贺拉斯所说的“中庸之道”。家财万贯的人，你们可以找找财富的另外用途，因为金钱并不能给你带来快乐。爱弥儿和我一样清楚地明白，但是他的心境更纯洁，更健康。因此他会更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对世俗所有看法都只会证明这一点。

While our time is thus employed, we are ever on the look-out for Sophy, and we have not yet found her. It was not desirable that she should be found too easily, and I have taken care to look for her where I knew we should not find her.

当我们的时间就这样流逝，我们一直在寻找苏菲，可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她。我们不会很轻易就找到她，所以我们才会去我知道她不会在的地方找她。

The time is come; we must now seek her in earnest, lest Emile should mistake some one else for Sophy, and only discover his error when it is too late. Then farewell Paris, far-famed Paris, with all your noise and smoke and dirt, where the women have ceased to believe in honour and the men in virtue. We are in search of love, happiness, innocence; the further we go from Paris the better.

时间快到了。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找到她，以免爱弥儿将别人错当作苏菲，等到发现他的错误就为时太晚了。再见了巴黎，这座名声远扬的城市，这充满喧闹、烟雾和尘土的城市，这里的女人不再相信荣耀，男人不再相信美德的城市。我们要去寻找爱、寻找幸福和天真了。我们离开巴黎，越远越好。

[1_1]."In towns," says M. Buffon, "and among the well-to-do classes, children

accustomed to plentiful and nourishing food sooner reach this state; in the country and among the poor, children are more backward, because of their poor and scanty food." I admit the fact but not the explanation, for in the districts where the food of the villagers is plentiful and good, as in the Valais and even in some of the mountain districts of Italy, such as Friuli, the age of puberty for both sexes is quite as much later than in the heart of the towns, where, in order to gratify their vanity, people are often extremely parsimonious in the matter of food, and where most people, in the words of the proverb, have a velvet coat and an empty belly. It is astonishing to find in these mountainous regions big lads as strong as a man with shrill voices and smooth chins, and tall girls, well developed in other respects, without any trace of the periodic functions of their sex. This difference is, in my opinion, sol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in the simplicity of their manners the imagination remains calm and peaceful, and does not stir the blood till much later, and thus their temperament is much less precocious.

[1_2].Affection may be unrequited; not so friendship. Friendship is a bargain, a contract like any other; though a bargain more sacred than the rest. The word "friend" has no other correlation. Any man who is not the friend of his friend is undoubtedly a rascal; for one can only obtain friendship by giving it, or pretending to give it.

[1_3].The precept "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 has no true foundation but that of conscience and feeling; for what valid reason is there why I, being myself, should do what I would do if I were some one else, especially when I am morally certain I never shall find myself in exactly the same case; and who will answer for it that if I faithfully follow out this maxim, I shall get others to follow it with regard to me? The wicked takes advantage both of the uprightness of the just and of his own injustice; he will gladly have everybody just but himself. This bargain, whatever you may say, is not greatly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just. But if the enthusiasm of an overflowing heart identifies me with my fellow-creature, if I feel, so to speak, that I will not let him suffer lest I should suffer too, I care for him because I care for myself, and the reason of the precept is found in nature herself, which inspires me with the desire for my own welfare wherever I may be. From this I conclude that it is false to say that the precepts of natural law are based on reason only; they have a firmer and more solid foundation. The love of others springing from self-love, is the source of human justice. The whole of morality is summed up in the gospel in this summary of the law. ##注释##

[1_4].The universal spirit of the laws of every country is always to take the part of the strong against the weak, and the part of him who has against him who has

not; this defect is inevitable, and there is no exception to it.

[1_5].Take, for instance, Guicciardini, Streda, Solis, Machiavelli, and sometimes even De Thou himself. Vertot is almost the only one who knows how to describe without giving fancy portraits.

[1_6].It is always prejudice which stirs up passion in our heart. He who only sees what really exists and only values what he knows, rarely becomes angry. The errors of our judgment produce the warmth of our desires.

[1_7].I think I may fairly reckon health and strength among the advantages he has obtained by his education, or rather among the gifts of nature which his education has preserved for him.

[1_8].Moreover our pupil will be little tempted by this snare; he has so many amusements about him, he has never been bored in his life, and he scarcely knows the use of money. As children have been led by these two motives, self-interest and vanity, rogues and courtesans use the same means to get hold of them later. When you see their greediness encouraged by prizes and rewards, when you find their public performances at ten years old applauded at school or college, you see too how at twenty they will be induced to leave their purse in a gambling hell and their health in a worse place. You may safely wager that the sharpest boy in the class will become the greatest gambler and debauchee. Now the means which have not been employed in childhood have not the same effect in youth. But we must bear in mind my constant plan and take the thing at its worst. First I try to prevent the vice; then I assume its existence in order to correct it.

[1_9]."But what will he do if any one seeks a quarrel with him?" My answer is that no one will ever quarrel with him, he will never lend himself to such a thing. But, indeed, you continue, who can be safe from a blow, or an insult from a bully, a drunkard, a bravo, who for the joy of killing his man begins by dishonouring him? That is another matter. The life and honour of the citizens should not be at the mercy of a bully, a drunkard, or a bravo, and one can no more insure oneself against such an accident than against a falling tile. A blow given, or a lie in the teeth, if he submit to them, have social consequences which no wisdom can prevent and no tribunal can avenge. The weakness of the laws, therefore, so far restores a man's independence; he is the sole magistrate and judge between the offender and himself, the sole interpreter and administrator of natural law. Justice is his due, and he alone can obtain it, and in such a case there is no government on earth so foolish as to punish him for so doing. I do not say he must fight; that is absurd; I say justice is his

due, and he alone can dispense it. If I were king, I promise you that in my kingdom no one would ever strike a man or call him a liar, and yet I would do without all those useless laws against duels; the means are simple and require no law courts. However that may be, Emile knows what is due to himself in such a case, and the example due from him to the safety of men of honour. The strongest of men cannot prevent insult, but he can take good care that his adversary has no opportunity to boast of that insult.

[1_10].Plutarch. It is thus that the tragedy of Menalippus originally began, but the clamour of the Athenians compelled Euripides to change these opening lines.

[1_11].For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the human mind and its slow development, cf. the first part of the Discours sur Inegalite.

[1_12].M. de le Cordamines' narratives tell of a people who only know how to count up to three. Yet the men of this nation, having hands, have often seen their fingers without learning to count up to five.

[1_13].This repose is, if you prefer it, merely relative; but as we perceive more or less of motion, we may plainly conceive one of two extremes, which is rest; and we conceive it so clearly that we are even disposed to take for absolute rest what is only relative. But it is not true that motion is of the essence of matter, if matter may be conceived of as at rest.

[1_14].Chemists regard phlogiston or the element of fire as diffused, motionless, and stagnant in the compounds of which it forms part, until external forces set it free, collect it and set it in motion, and change it into fire.

[1_15].I have tried hard to grasp the idea of a living molecule, but in vain. The idea of matter feeling without any senses seems to me unintelligible and self-contradictory. To accept or reject this idea one must first understand it, and I confess that so far I have not succeeded.

[1_16].Could one believe, if one had not seen it, that human absurdity could go so far? Amatus Lusitanus asserts that he saw a little man an inch long enclosed in a glass, which Julius Camillus, like a second Prometheus, had made by alchemy. Paracelsis (De natura rerum) teaches the method of making these tiny men, and he maintains that the pygmies, fauns, satyrs, and nymphs have been made by chemistry. Indeed I cannot see that there is anything more to be done, to establish the possibility of these facts, unless it is to assert that organic matter resists the heat of

fire and that its molecules can preserve their life in the hottest furnace.

[1_17].It seems to me that modern philosophy, far from saying that rocks think, has discovered that men do not think. It perceives nothing more in nature than sensitive beings; and the only difference it finds between a man and a stone is that a man is a sensitive being which experiences sensations, and a stone is a sensitive being which does not experience sensations. But if it is true that all matter feels, where shall I find the sensitive unit, the individual ego? Shall it be in each molecule of matter or in bodies as aggregates of molecules? Shall I place this unity in fluids and solids alike, in compounds and in elements? You tell me nature consists of individuals. But what are these individuals? Is that stone an individual or an aggregate of individuals? Is it a single sensitive being, or are there as many beings in it as there are grains of sand? If every elementary atom is a sensitive being, how shall I conceive of that intimate communication by which one feels within the other, so that their two egos are blended in one? Attraction may be a law of nature whose mystery is unknown to us; but at least we conceive that there is nothing in attraction acting in proportion to mass which is contrary to extension and divisibility. Can you conceive of sensation in the same way? The sensitive parts have extension, but the sensitive being is one and indivisible; he cannot be cut in two, he is a whole or he is nothing; therefore the sensitive being is not a material body. I know not how our materialists understand it, but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same difficulties which have led them to reject thought, should have made them also reject feeling; and I see no reason why, when the first step has been taken, they should not take the second too; what more would it cost them? Since they are certain they do not think, why do they dare to affirm that they feel?

[1_18].The ancients were right when they called the supreme God Optimus Maximus, but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to say Maximus Optimus, for his goodness springs from his power, he is good because he is great.

[1_19].Modern philosophy, which only admits what it can understand, is careful not to admit this obscure power called instinct which seems to guide the animals to some end without any acquired experience. Instinct, according to some of our wise philosophers, is only a secret habit of reflection, acquired by reflection; and from the way in which they explain this development one ought to suppose that children reflect more than grown-up people: a paradox strange enough to be worth examining. Without entering upon this discussion I must ask what name I shall give to the eagerness with which my dog makes war on the moles he does not eat, or to the patience with which he sometimes watches them for hours and the skill with which he seizes them, throws them to a distance from their earth as soon as they

emerge, and then kills them and leaves them. Yet no one has trained him to this sport, nor even told him there were such things as moles. Again, I ask, and this is a more important question, why, when I threatened this same dog for the first time, why did he throw himself on the ground with his paws folded, in such a suppliant attitude ….. calculated to touch me, a position which he would have maintained if, without being touched by it, I had continued to beat him in that position? What! Had my dog, little more than a puppy, acquired moral ideas? Did he know the meaning of mercy and generosity? By what acquired knowledge did he seek to appease my wrath by yielding to my discretion? Every dog in the world does almost the same thing in similar circumstances, and I am asserting nothing but what any one can verify for himself. Will the philosophers, who so scornfully reject instinct, kindly explain this fact by the mere play of sensations and experience which they assume we have acquired? Let them give an account of it which will satisfy any sensible man; in that case I have nothing further to urge, and I will say no more of instinct.

[1_20].In some respects ideas are feelings and feelings are ideas. Both terms are appropriate to any perception with which we are concerned, appropriate both to the object of that perception and to ourselves who are affected by it; it is merely the order in which we are affected which decides the appropriate term. When we are chiefly concerned with the object and only think of ourselves as it were by reflection, that is an idea; when, on the other hand, the impression received excites our chief attention and we only think in the second place of the object which caused it, it is a feeling.

[1_21].I think the worthy clergyman might say this at the present time to the general public.

[1_22]."All men," said a wise and good priest, "maintain that they hold and believe their religion (and all use the same jargon), not of man, nor of any creature, but of God. But to speak truly, without pretence or flattery, none of them do so; whatever they may say, religions are taught by human hands and means; take, for example, the way in which religions have been received by the world, the way in which they are still received every day by individuals; the nation, the country, the locality gives the religion; we belong to the religion of the place where we are born and brought up; we are baptised or circumcised, we are Christians, Jews, Mohametans before we know that we are men; we do not pick and choose our religion for see how ill the life and conduct agree with the religion, see for what slight and human causes men go against the teaching of their religion." —Charron, De la Sagesse. —It seems clear that the honest creed of the holy theologian of Condom would not have differed greatly from that of the Savoyard priest.

[1_23].This is expressly stated in many passages of Scripture, among others in Deuteronomy xiii., where it is said that when a prophet preaching strange gods confirms his words by means of miracles and what he foretells comes to pass, far from giving heed to him, this prophet must be put to death. If then the heathen put the apostles to death when they preached a strange god and confirmed their words by miracles which came to pass I cannot see what grounds we have for complaint which they could not at once turn against us. Now, what should be done in such a case? There is only one course; to return to argument and let the miracles alone.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not to have had recourse to them at all. That is plain common-sense which can only be obscured by great subtlety of distinction. Subtleties in Christianity! So Jesus Christ was mistaken when he promised the kingdom of heaven to the simple, he was mistaken when he began his finest discourse with the praise of the poor in spirit, if so much wit is needed to understand his teaching and to get others to believe in him. When you have convinced me that submission is my duty, all will be well; but to convince me of this, come down to my level; adapt your arguments to a lowly mind, or I shall not recognise you as a true disciple of your master, and it is not his doctrine that you are teaching me.

[1_24].On the other hand, Plutarch relates that the Stoics maintained, among other strange paradoxes, that it was no use hearing both sides; for, said they, the first either proves his point or he does not prove it; if he has proved it, there is an end of it, and the other should be condemned: if he has not proved it, he himself is in the wrong and judgment should be given against him. I consider the method of those who accept an exclusive revelation very much like that of these Stoics. When each of them claims to be the sole guardian of truth, we must hear them all before we can choose between them without injustice.

[1_25].Cf.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the parallel he himself draws between the teaching of Moses and his own. —Matt. v.

[1_26].The duty of following and loving the religion of our country does not go so far as to require us to accept doctrines contrary to good morals, such as intolerance. This horrible doctrine sets men in arms against their fellow-men, and makes them all enemies of manki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 toleration and theological toleration is vain and childish. These two kinds of toleration are inseparable, and we cannot accept one without the other. Even the angels could not live at peace with men whom they regarded as the enemies of God.

[1_27].The rival parties attack each other with so many sophistries that it would be a rash and overwhelming enterprise to attempt to deal with all of them; it is

difficult enough to note some of them as they occur. One of the commonest errors among the partisans of philosophy is to contrast a nation of good philosophers with a nation of bad Christians; as if it were easier to make a nation of good philosophers than a nation of good Christians. I know not whether in individual cases it is easier to discover one rather than the other; but I am quite certain that, as far as nations are concerned, we must assume that there will be those who misuse their philosophy without religion, just as our people misuse their religion without philosophy, and that seems to put quite a different face upon the matter.

[1_28].There is no one who looks down upon childhood with such lofty scorn as those who are barely grown-up; just as there is no country where rank is more strictly regarded than that where there is little real inequality; everybody is afraid of being confounded with his inferiors.

[1_29].The Roman Catholic clergy have very wisely retained these symbols, and certain republics, such as Venice, have followed their example. Thus the Venetian government, despite the fallen condition of the state, still enjoys, under the trappings of its former greatness, all the affection, all the reverence of the people; and next to the pope in his triple crown, there is perhaps no king, no potentate, no person in the world so much respected as the Doge of Venice; he has no power, no authority, but he is rendered sacred by his pomp, and he wears beneath his ducal coronet a woman's flowing locks. That ceremony of the Bucentaurius, which stirs the laughter of fools, stirs the Venetian populace to shed its life-bloo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is tyrannical government.

[1_30].As if there were citizens who were not part of the city and had not, as such, a share in sovereign power! But the French, who have thought fit to usurp the honourable name of citizen which was formerly the right of the members of the Gallic cities, have degraded the idea till it has no longer any sort of meaning. A man who recently wrote a number of silly criticisms on the "Nouvelle Heloise" added to his signature the title "Citizen of Paimboeuf," and he thought it a capital joke.

[1_31].Considerations sur les moeurs de ce siecle, par M. Duclos.

[1_32].This is demonstrated in 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s" which will be found in my collected works.

[1_33].A stranger, splendidly clad, was asked in Athens what country he belonged to. "I am one of the rich," was his answer; and a very good answer in my opinion.

[1_34].Two ladies of fashion, who wished to seem to be enjoying themselves greatly, decided never to go to bed before five o'clock in the morning. In the depths of winter their servants spent the night in the street waiting for them, and with great difficulty kept themselves from freezing. One night, or rather one morning, some one entered the room where these merry people spent their hours without knowing how time passed. He found them quite alone; each of them was asleep in her arm-chair.

[2_1].“在城里，”布冯说，“有钱人家的孩子习惯丰盛、营养丰富的食物，所以到达这个阶段就更快。在乡下，穷人家的孩子则落后一些，因为他们贫困，食物不足。”我承认这一事实，但不认同他的解释。因为在农村，村民们的食物都很丰盛，也富含营养。在一些地区像瓦莱，甚至意大利的山区，比如弗留利，男生和女生的发育期都要比市中心的孩子晚一些。在城市里，人们为了满足虚荣心，总是在吃的方面极其节俭。城里的大多数人都像俗语里说的那样，穿着天鹅绒外套，肚子却是瘪瘪的。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山区，能发现一些大男孩嗓音还是尖尖的，下巴还是光光的，但却像成年男子一样强壮。而一些高挑的女孩其他方面都发育得很好，却丝毫不知道月经这回事。我认为这种差异仅仅是由于在他们淳朴的风气中，他们的想象依旧是非常平静的，直到很晚才会使他们的血液开始沸腾，因此他们的性情就没那么早熟。

[2_2].爱情也许得不到回应或报答，但友情不是。友谊就像其他任何的合同一样，是一种契约。尽管它比其他契约神圣一些。“朋友”一词没有别的相关性。如果一个人不是他的朋友真正的朋友，那他就是一个无赖。因为一个人只有付出，或者假装付出，才能收获友情。

[2_3].那句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没有切实的根据但是是合乎良心和情感的。不然还有什么有效的理由证明：我就是我，为什么做事情的时候要把自己当作别人呢，尤其当我非常确定我绝不会遭遇同样情况的时候？如果我忠实地遵从这句格言，谁能够保证其他人也会遵照这句话来对待我？坏人可以利用好人的正直来使自己获利，因此他很开心看到除了他自己，大家都是好人。无论你怎么说，这个契约并不是对好人十分有利的。但是当我开阔的心胸、我的热忱使我把自己和其他人看成是一体的时候，当我可以这样说的时候，我不会让他受苦，因为这样我自己也得受苦；我会关心他，因为我也关心我自己。所以这句格言的理由存在于自然本身，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它都激发了我对自身幸福的渴望。据此我做出了以下总结：自然的法则是仅仅建立在理性之上的说法是错误的。它们有更坚固、更坚实的基础。对他人的爱源于对自己的爱，这才是人类正义的根源。《福音书》中所有的道德总结起来就是这条法则。

[2_4].任何国家的法律的精髓都是偏袒强者，欺负弱者；偏袒有钱人，欺负没钱的人。这一缺陷是无可避免的，并且无一例外。

[2_5].拿圭恰迪尼、斯特达、索利斯、马基雅弗利的著作，甚至德图自己的作品来

说。几乎只有韦尔托特知道如何不塑造奇特的肖像就能够描述历史。

[2_6].偏见总是搅动我们心中的激情。一个人如果只看到存在的东西，只看重他知道的东西，那他就很少生气。有了错误的判断，我们就会产生强烈的欲望。

[2_7].我认为我可以公正地判定教育可以给他带来健康和力量的好处，或者判定为教育为他保存的大自然的礼物。

[2_8].而且我的学生不会受这种诱惑的。他有那么多娱乐活动，生活中从未感觉厌倦。他几乎不知道钱的用处。你用两个动机来引导孩子，一是私利，二是虚荣。而这两样东西之后也会被流氓和妓女用来诱惑并控制他们。当你发现他们由于奖励而起贪念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十岁时在学校里的表现获得大家的赞许的时候，你也要预想到在他们二十岁的时候，他们会如何在赌场里被别人诱惑，骗去钱包；他又会如何在更糟糕的地方糟践自己的身体。你可以十拿九稳地保证，课堂上最机灵的男孩将来会成为最大的赌徒和色鬼。在童年时代没有使用过的方法在青年时代就不会产生相同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谨记我始终如一的打算，做最坏的打算。首先我会防止恶习的产生，然后我会假定它出现从而纠正它。

[2_9].“但是如果有人找他吵架，他会怎么做？”我的回答是：没有人会和他吵架，他从不会和别人吵架的。“但是，事实上，”你继续说，“谁能够保证不被一个混蛋、酒鬼和暴徒打击和凌辱，他们想要获得杀人的乐趣，总是从让那个人名誉扫地开始的？”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公民的生命和名誉不应该任由同情一个恶棍、一个酒鬼或是一个暴徒摆布。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就像谁都不能保证自己躲得过掉下来的瓦片。被打了一拳或是被说了一句坏话，如果他屈从于他们的话，就会产生社会结果。但是这是没有哪个智者可以避免的，也没有哪个法庭可以惩罚这样的行为。因此，法律的缺陷使人必须独立起来。他是自己和伤害他的人之间唯一的法官和裁决人，是自然法唯一的解释者和执行者。正义是他应有的权利，只有他可以做到公正。在这种情况下，地球上也没有哪个政府会蠢到惩处他的这种行为。我不是说他必须和别人打架，这很荒谬。我是说正义是他的权利，只有他能够实现正义。如果我是国王，在我的王国里，不需要颁布禁止决斗的无用的法律，我就可以保证没有人会攻击别人或是称他为骗子。我的方法很简单，也不需要法庭来处理。不管怎样，在这种情况下爱弥儿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应有的权利，知道如何保证正义之人的安全。最强壮的人也无法阻挡屈辱，但是他会足够小心，使他的对手没有机会羞辱他。

[2_10].普卢塔克。梅纳利珀的悲剧原本是这样开始的，但是由于雅典人的抗议，欧里庇得斯不得不对开场白进行了改动。

[2_11].关于人类精神的自然状况和其缓慢的发展，请参见《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的第一部分。

[2_12].在拉·孔达明先生的叙述中，有一个民族只会数到三。这个民族的人虽然有手，也常常看到自己的手指，却从不会数到五。

[2_13].如果你更喜欢这样说的话，这种静止只是相对的。但是，既然我们多多少少发现了运动状态，我们就可以简单地将其设想成两个极端，也就是静止。我们把它想象得如此清楚，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将相对静止认为是绝对静止了。但如果物质可以被设想为静止，那么运动是物质本质的说法就不正确了。

[2_14].化学家认为燃素或是火的元素是扩散的、静止的。在它所组成的复合物中是停滞不动的。直到外力将它发散，使它聚集并开始运动，它才转变成火。

[2_15].我试着努力想象出一个活的分子，但是失败了。没有任何感官的物质能够有感觉的观点在我看来是无法理解并自相矛盾的。无论想要接受还是拒绝这个观点，都必须首先理解它，但是我承认目前为止我还没能理解它。

[2_16].要不是亲眼看到，谁会相信人可以荒谬到这种地步呢？阿马图斯·路西塔努斯声称自己在一个玻璃杯里看到了一个一英寸长的小人。他是被称作第二个普罗米修斯的朱利叶斯·卡美卢斯用炼金术造出来的。帕拉塞尔斯在《物性论》中描述了这种小人的制作方法。他认为俾格米人、农牧神、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和仙女都是用化学方法制造出来的。我的确想不到别的方法来证实这些事实存在的可能性。除非说有机物可以抵挡火焰的温度，它的分子在最热的熔炉中也能存活。

[2_17].我认为现代哲学虽然没有说石头会思考，但他们认为人不会思考。现代哲学认为大自然中都是有感觉的存在。他们认为人和石头都是有感觉的存在，而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人经历过感觉活动，可石头不曾经历过。但如果所有东西都有感觉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我要去什么地方寻找有感觉的个体和独立的自我呢？它会在每一个物质分子里吗，又或是在分子的聚集体中？我应该将这个统一体同样地归入液体和固体，复合物和元素中吗？你告诉我大自然是由个体组成的。但是这些个体是什么呢？那块石头是个体还是个体的聚集体？它是单个的有感觉的存在，还是它包含了像沙粒一样多的有感觉的存在？如果每一个基本的原子都是有感觉的存在，那么我该如何想象两个存在之间感觉到的内在联系，从而使两个自我融合为一呢？引力或许是大自然的一个法则，我们不清楚它的神秘之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想象引力在与质量成比例发生作用时，没有什么是与延展性和可分性相矛盾的。你可以想象感觉也是这样的吗？有感觉的部分是延伸的，但是有感觉的存在是整个的、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够被一分为二，要么就是一个整体，要么根本就不存在。因此有感觉的存在不具有物质性。我不知道唯物主义者是如何理解的，但是在我看来，一些困难使他们拒绝思考，同样地也会使他们拒绝感受。我不明白既然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为什么不走第二步呢？多走这一步有多麻烦呢？既然他们确定地承认他们不思考，那他们又怎么敢说自己有感受呢？

[2_18].古人将至高的上帝称作“至善的至大”，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能称其为“至大的至善”就更好了。因为上帝的善良来自于他的力量，他善良是因为他很伟大。

[2_19].现代哲学只讲它可以理解的东西，小心地避开了被称为本能的模糊力量不谈。这种力量似乎不需要任何经验，就可以指导动物达到某种目的。根据一些睿智的哲学家所说，本能只是一种通过思考获得的神秘习惯。按照他们对发展的这种解释，一个人应该推测出孩子比成人思考得更多：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论断，所以值得研究。还没进行讨论，我必须先问一下：我的狗不吃鼹鼠却要和鼹鼠开战。对于这样的渴望我应该给它一个什么名称呢？它有时观察它们几个小时，这样的耐心又该有什么名称？又或者只要它们一出现它就用尽技巧抓住它们，把它们扔到老远，然后咬死它们，最后离开。那这样的耐心我又该称之为什么呢？然而没有人训练它这样做，甚至没有告诉过它有鼹鼠这类东西。我再问一下，这个问题更加重要。我第一次威胁这只狗时，它为什么躺在地上，蜷缩起四只脚，表现出非常谦卑的样子……有计划地使我心软。如果我没有心软，继续要打它的话，它会一直待在这个位置。什么！难道我的狗，比小狗还小，就已经有了道德观念吗？它知道仁慈和宽容吗？它是怎么知道顺从于我的摆布来平息我的愤怒的？世界上的每一个只狗在相似的情况下做的事几乎都是相同的。我坚决认为任何人都可以亲身核实一下。那些哲学家轻蔑地否定了本能。他们能不能诚恳地仅仅用感觉的作用和我们已经获得的经验来解释这个事实呢？让他们用每个通情达理的人都满意的方式对其进行说明。那样的话，我没有什么别的主张了，我也不会再提及本能。

[2_20].从某些方面来说，观念就是感觉，感觉就是观念。两个术语都适用于我们涉及的所有知觉，既适用于知觉的客体，又适用于被影响的我们自身。只有我们所受影响的顺序才决定了哪一个术语是合适的。当我们首先想到客体，然后才反射似地想到我们自己时，这就是一种观念。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我们首先关注接收到的印象，之后才想到客体的时候，这就是一种感觉。

[2_21].我认为这句话是这位令人尊敬的牧师目前对公众说的。

[2_22].“所有人，”一个睿智且善良的牧师说，“都坚持认为他们所信奉的宗教（都用了相同的行话）不是人的，也不是任何生物的，是上帝的。”“但是老实说，如果没有虚伪掩饰或者阿谀奉承，没有人会这样做；不管他们怎么说，宗教是通过人类的双手和方法来传播的。举个例子，当初使宗教为世界所接受的方法，现在使宗教仍然每天为个体所接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一块地区都可以产生宗教。我们出生、长大的地方决定了我们信奉的宗教。在我们知道自己是人以前，就接受了洗礼或是割礼，我们就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或是回教徒了。我们无法挑选自己的宗教。看看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举止与宗教是多么的不匹配，看看什么细小的原因使得人们反抗自己宗教的教义。”——夏隆，《论智慧》——似乎很清楚了，这位孔东令人尊敬的神学家的坦诚的信条不会与萨瓦的神父的信条有很大的不同。

[2_23].这在《圣经》的很多文章中都有明确提及，其他包括《申命记》的第十三章说道：当一个宣扬邪神的先知用奇迹来证明他自己的话时，他所预见的东西又全部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听从他的话。这个先知必须被处死。那么如果基督教的使徒在宣扬邪神、用奇迹证明自己的话时被异教徒处死了，我认为我们用什么样的理由控诉他们，他们立刻就会用同样的理由回击我们。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只有一个办法：回到论据上来，不再谈什么奇迹。要是完全不提什么奇迹的话则更好。这是很平实的常识，只有说到非常细微的差别时才会显得模糊不清。基督教的教义就是很细微的。因此，如果需要很多智慧才能理解上帝的训导，才能信仰上帝，那么若是上帝把天国承诺给头脑简单的人，在开始他最精彩的论述时先表扬穷人的精神，他就错了。当你使我相信，服从是我的义务，那一切都好办了。但是想要使我信服，你就必须下降到我这个级别，使你的论断适应贫弱的心智，否则我就不会认可你是你的老师真正的学生，我会认为你讲的不是他的教义。

[2_24].从另一方面来说，普卢塔克说相比于其他奇怪的论调，斯多噶学派认为他们无需听取双方的意见。因为他们说第一方要么证明了自己的观点要么没有证明自己的观点。如果他证明了，那么这件事就有了一个结尾，另一方就应该被谴责；而如果他没有证明，那么他自己就是错误的一方，应该判定他为错。我认为那些只接受单单一种解释的人所采用的方法，与斯多噶学派的人所采用的方法是非常相似的。当他们双方都声称自己是真理唯一的守护者时，我们必须先听取他们各方的观点，才能做出公正的选择。

[2_25].他在山上布道时，他把自己和摩西的布道做了一个对比。——《马太福音》

[2_26].每个人都有遵从和热爱自己国家的宗教的义务，但这并不是要求我们接受一些与良好道德相悖的教义，例如不容异教。这条可怕的教义使得人们武装起来攻击自己的同胞，成为人类的敌人。区分民事上的容忍和神学上的容忍的不同是无用的，幼稚的。这两种容忍是不可分离的，我们无法接受一种而不接受另一种。即使天使也无法和人类和平共处，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是上帝的敌人。

[2_27].对立的双方都相互攻击，一再地诡辩。因此试着应付他们所有的诡辩是非常艰难而又巨大的事情，要想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也是非常困难的。在哲学家派别中，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将一个都是好哲学家的民族与一个都是坏基督徒的民族对立起来，好像造就一个都是好哲学家的民族比造就一个都是好基督徒的民族要容易些似的。我不知道在个人事件中，是不是发现好的哲学家比发现好的基督徒更容易。但是我确定，只要涉及民族问题，我们就必须假定有些民族在没有宗教的时候滥用哲学，就像人们在没有哲学的时候滥用宗教一样。这样似乎问题就大不相同了。

[2_28].没有人像那些刚刚长大的人那样傲慢地轻视童年时代。这就像在一些鲜有不平等情况出现的国家反而比任何国家都严格注意等级。每个人都害怕被混淆成比自

己低一等的人。

[2_29].罗马天主教的牧师很明智地保存了这些标记。一些共和国，像威尼斯，都跟随了他们的样子。因此虽然国家已呈颓势，但威尼斯政府在从前的辉煌的装饰下，享受着人们的喜爱与尊崇。除了戴三重皇冠的教皇之外，这世上怕是没有一个国王、没有一个君主、没有一个人能够受到威尼斯执政官这样的爱戴了。他没有权力，没有权威，但是盛大的仪式显出了他的神圣。他佩戴的公爵的冠冕下戴着妇女的发夹。基督升天节的仪式引发了傻瓜们的哄笑，但也使威尼斯老百姓们为了保全这个专制的政府流出他们的血。

[2_30].好像有些公民并不属于这座城市，也没有像这样参与最高权力似的。但是法国人认为他们夺取公民的光荣称号是非常合适的。这个称号，曾经是属于高卢人的城市的市民的。而法国人则慢慢改变这一观念，直至它再没有过去的意义了。最近有人对《新爱洛伊丝》写了不少愚蠢的批评文章。并且附上了他的签名“潘伯夫的公民”，他还以为这是一个极好的玩笑。

[2_31].《论本世纪的风格》，杜洛克著。

[2_32].这在《论语言的起源》中已经论证过了。可以在我的合集中找到这篇文章。

[2_33].一个穿着华丽的陌生人在雅典被人问及来自哪个国家。“我是有钱人之一。”他回答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2_34].两位时尚的女士为了使自己看起来非常开心，决定绝不在清晨五点前上床睡觉。数九隆冬的时候，她们的仆人在街道上过夜等她们，几乎不可能使他们不受冻。一天晚上，更确切地说是一天早上，一些人进入了那个房间。那些快乐的人都玩得不知道时辰了。他发现房间里只有她们，她们每个人都在靠椅上睡着了。

BOOK V

第五卷

We have reached the last act of youth's drams; we are approaching its closing scene.

我们已经演到青年时期的最后一幕了，快要结束了。

It is not good that man should be alone. Emile is now a man, and we must give him his promised helpmeet. That helpmeet is Sophy. Where is her dwelling-place, where shall she be found? We must know beforehand what she is, and then we can decide where to look for her. And when she is found, our task is not ended. “Since our young gentleman,” says Locke, “is about to marry, it is time to leave him with his mistress.” And with these words he ends his book. As I have not the honour of educating “A young gentleman,” I shall take care not to follow his example.

一个成年人独自生活是不好的。爱弥儿现在是一个成年人了。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伴侣，这是之前答应过他的。这个伴侣就是苏菲。她住在哪儿？我们去哪儿找她？我们必须提前知道她是谁，然后才能决定去哪儿找她。当我们找到她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并没有结束。“因为我们的年轻绅士”洛克说，“就要结婚了，我们也是时候离开他，让他和他的情人在一起了。”写完这些话，他的著作就完成了。因为我没有荣幸教育“一位年轻绅士”，因此我是不会效仿洛克的做法的。

SOPHY, OR WOMAN

苏菲，或女人

Sophy should be as truly a woman as Emile is a man, i. e., she must possess all those characters of her sex which are required to enable her to play her part in the physical and moral order. Let us inquire to begin with in what respects her sex differs from our own.

就像爱弥儿是一个成年男人，苏菲也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成年女人，也就是说，她必须具备一切女性的特征，使她在身体和精神上都能尽到自己的责任。让我们从男女性别不同的方面开始，展开研究。

But for her sex, a woman is a man; she has the same organs, the same needs, the same faculties. The machine is the same in its construction; its parts, its working, and its appearance are similar. Regard it as you will the difference is only in degree.

要不是她性别上的特点，女人和男人就没有什么区别。她有着和男人相同的器官、相同的需求和相同的能力。身体构造是一样的。其组成部分、作用也是一样的，外观也是相似的。无论你从哪一方面来看，这种差异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Yet where sex is concerned man and woman are unlike; each is the complement of the other; the difficulty in comparing them lies

in our inability to decide, in either case, what is a matter of sex, and what is not. General differences present themselves to the comparative anatomist and even to the superficial observer; they seem not to be a matter of sex; yet they are really sex differences, though the connection eludes our observation. How far such differences may extend we cannot tell; all we know for certain is that where man and woman are alike we have to do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cies; where they are unlike, we have to do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x. Considered from these two standpoints, we find so many instances of likeness and unlikeness that it is perhaps one of the greatest of marvels how nature has contrived to make two beings so like and yet so different.

然而从与性有关的角度来看，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他们彼此互补。比较他们的困难在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足以判断出哪些是属于性的，哪些是不属于性的。在比较解剖学者的研究下，甚至是肉眼观察者的观察下，男女的一般差别似乎并不在于性。但是这些不同确实和性是有关系的，虽然我们还没发现其中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还无法知道这些不同之处可以延伸到多远。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男女相似的地方，与人类的特性有关；男女不同的地方，则与性的特点有关。从这两个观点来看，我们发现许多男女之间相同和不同的例子。因此大自然将男人和女人创造得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这也许是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了。

These resemblances and differences must have an influence on the moral nature; this inference is obvious, and it is confirmed by experience; it shows the vanity of the disputes as to the superiority or 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 as if each sex, pursuing the path marked out for it by nature, were not more perfect in that very divergence than if it more closely resembled the other. A perfect

man and a perfect woman should no more be alike in mind than in face, and perfection admits of neither less nor more.

这些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对精神道德一定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显著的，是通过经验证实的。这就表明争论性别的高低或平等是毫无意义的。似乎每一种性别都追求着大自然选定的道路。这样的差别要比彼此十分相像来得更完美。一个完美的女人和一个完美的男人是外貌相似，而不是精神相似。要是完全相似的话，那就连一点点差别也没有了。

In the union of the sexes each alike contributes to the common end, but in different ways. From this diversity springs the first difference which may be observed between man and woman in their moral relations. The man should be strong and active; the woman should be weak and passive; the one must have both the power and the will; it is enough that the other should offer little resistance.

在两性的结合中，双方都为共同的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由于这种不同的方式，男女在道德关系上就产生了第一个差别。男人应该是强壮和主动的，而女人应该是柔弱和消极的；男人必须要具备力量和意志，而女人则需要少一点抵抗就够了。

When this principle is admitted, it follows that woman is specially made for man's delight. If man in his turn ought to be pleasing in her eyes, the necessity is less urgent, his virtue is in his strength, he pleases because he is strong. I grant you this is not the law of love, but it is the law of nature, which is older than love

itself.

如果承认这个原则的话，就可以说女人是特地为了男人的快乐而生的。如果轮到男人去招女人喜欢的话，那这种需求就不太迫切了。他的长处在于他的力量，因为他强壮，所以能使女人感到高兴。我同意你说的这不是爱情的法则，但这是自然的法则，这比爱情本身还要久远。

If woman is made to please and to be in subjection to man, she ought to make herself pleasing in his eyes and not provoke him to anger; her strength is in her charms, by their means she should compel him to discover and use his strength. The surest way of arousing this strength is to make it necessary by resistance. Thus pride comes to the help of desire and each exults in the other's victory. This is the origin of attack and defence, of the boldness of one sex and the timidity of the other, and even of the shame and modesty with which nature has armed the weak for the conquest of the strong.

如果女人是为了取悦和顺从男人而生的，那她应该讨男人喜欢，而不应该激起他的愤怒。她的长处在于其魅力，她应该通过自己的魅力使男人发现并运用自己的力量。激起这种力量最可靠的办法就是通过抗拒，使他必须运用自己的力量。通过欲望和自豪的结合，双方就可以在彼此的成功中获得快乐。这就是一方进攻，一方防守的根源所在。男人勇敢，女人羞怯，甚至最后可以用大自然赋予的武器——柔弱害羞最终征服强壮的男人。

Who can possibly suppose that nature has prescribed the same

advances to the one sex as to the other, or that the first to feel desire should be the first to show it? What strange depravity of judgmen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act being so different for the two sexes, is it natural that they should enter upon it with equal boldness? How can any one fail to see that when the share of each is so unequal, if the one were not controlled by modesty as the other is controlled by nature, the result would be the destruction of both, and the human race would perish through the very means ordained for its continuance?

谁能够想象大自然规定了男女相同的求爱方式，而且先感觉到情欲的一方就要先展现出来？多么奇怪愚蠢的看法！性行为对双方造成的结果截然不同，双方都相同大胆地做这个行为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吗？怎么会有人不明白呢？双方各自承担的东西极其不平等的时候，如果一方无法做到稳重自持，另一方却受到自然的约束，那结果将会是双方的毁灭，人类也会被原本用来使自己延续的手段所毁灭。

Women so easily stir a man's senses and fan the ashes of a dying passion, that if philosophy ever succeeded in introducing this custom into any unlucky country, especially if it were a warm country where more women are born than men, the men, tyrannised over by the women, would at last become their victims, and would be dragged to their death without the least chance of escape.

女人非常轻易地就能刺激男人的感官，重燃他们即将熄灭的欲火。如果哲学家将这种风俗引入一个不幸的国家，尤其是女多男少的热带国家，那么该地的男人将会被女人摧残，最终成为受害者，毫无逃脱的机会直至死亡。

Female animals are without this sense of shame, but what of that? Are their desires as boundless as those of women, which are curbed by this shame? The desires of the animals are the result of necessity, and when the need is satisfied, the desire ceases; they no longer make a feint of repulsing the male, they do it in earnest. Their seasons of complaisance are short and soon over. Impulse and restraint are alike the work of nature. But what would take the place of this negative instinct in women if you rob them of their modesty?

雌性动物没有这种羞耻心，那将会变得怎样？没有了羞耻心的抑制作用，它们的欲念会不会像女人一样变得毫无节制呢？动物的欲望都是需求的结果，当它们的需求得到满足，欲望也就退去。它们不再佯装击退雄性动物，而是正儿八经地拒绝了。动物的发情期时间非常短，很快就结束了。冲动和克制都是自然作用的结果。但是如果你使妇女都丧失了这种羞耻心，那用什么来代替这种消极的本能呢？

The Most High has deigned to do honour to mankind; he has endowed man with boundless passions, together with a law to guide them, so that man may be alike free and self-controlled; though swayed by these passions man is endowed with reason by which to control them. Woman is also endowed with boundless passions; God has given her modesty to restrain them. Moreover, he has given to both a present reward for the right use of their powers, in the delight which springs from that right use of them, i. e., the taste for right conduct established as the law of our behaviour. To my mind this is far higher than the instinct of the beasts.

上帝屈尊向人类表示敬意，使人类天生就具有无限的激情，并赐予人们法则来指导他们，从而使得人类既能够获得自由，又能够自我控制。虽然人类容易被欲望影响，但是人们拥有理智来控制它们。女人也具有无尽的欲望，上帝赋予了她们羞耻心来克制她们的欲望。此外，上帝还赐予了人类一份礼物，用来奖励他们正当运用自己的力量并感受其中的快乐。也就是说，如果人类按照上帝的行为法则正确行事的话，就会体会到乐趣。在我看来，这要远远高于野兽的本能。

Whether the woman shares the man's passion or not, whether she is willing or unwilling to satisfy it, she always repulses him and defends herself, though not always with the same vigour, and therefore not always with the same success. If the siege is to be successful, the besieged must permit or direct the attack. How skilfully can she stimulate the efforts of the aggressor. The freest and most delightful of activities does not permit of any real violence; reason and nature are alike against it; nature, in that she has given the weaker party strength enough to resist if she chooses; reason, in that actual violence is not only most brutal in itself, but it defeats its own ends, not only because the man thus declares war against his companion and thus gives her a right to defend her person and her liberty even at the cost of the enemy's life, but also because the woman alone is the judge of her condition, and a child would have no father if any man might usurp a father's rights.

无论女人是否像男人一样产生性欲，无论她是否愿意去满足这种欲望，她总是拒绝男人并自我保护。不过也不是每一次拒绝都那么有力，因此也不是每一次都能拒绝成功。如果进攻方要取得胜利了，那被攻击方就必须准许这次进攻，或者指挥他进攻。她可以多么有技巧地刺激进攻者的进攻啊！最自由愉悦的行为决不允许任何真正暴力行为的出现。人的理智和大自然都一样反对暴力。大自然的反对体现在

她给予较弱的一方足够的力量去抵抗他们所想抵抗的一切。理智的反对体现在真正的暴力不仅本身是最野蛮的，而且违反了其本身的目的。不仅因为男人就此对自己的同伴宣战，使得她甚至有权利剥夺敌人的生命，来保全她的人身和自由；更是因为女人能独自判断自己的处境。如果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抢夺父亲的权利的话，那一个孩子将不会有自己的父亲。

Thus the different constitution of the two sexes leads us to a third conclusion, that the stronger party seems to be master, but is as a matter of fact dependent on the weaker, and that, not by any foolish custom of gallantry, nor yet by the magnanimity of the protector, but by an inexorable law of nature. For nature has endowed woman with a power of stimulating man's passions in excess of man's power of satisfying those passions, and has thus made him dependent on her goodwill, and compelled him in his turn to endeavour to please her, so that she may be willing to yield to his superior strength. Is it weakness which yields to force, or is it voluntary self-surrender? This uncertainty constitutes the chief charm of the man's victory, and the woman is usually cunning enough to leave him in doubt. In this respect the woman's mind exactly resembles her body; far from being ashamed of her weakness, she is proud of it; her soft muscles offer no resistance, she professes that she cannot lift the lightest weight; she would be ashamed to be strong. And why? Not only to gain an appearance of refinement; she is too clever for that; she is providing herself beforehand with excuses, with the right to be weak if she chooses.

因此我们可以从两性的不同组成得出第三个结论：较强的一方似乎是主宰，但是事实上，他依附于较弱的一方。而这并不是因为男人向女人献殷勤的愚蠢做法，也不是男人作为保护者的宽宏大量，而是

因为大自然不可动摇的法则。因为大自然赋予了女人激起男人性欲的能力，这超过了男性满足性欲的能力。因此男人就必须依赖于女人的兴致，不得不尽力讨好她，这样她才有可能愿意屈从于他强大的力量。这究竟是软弱屈从于强势呢？还是一种自愿的服从呢？这种不确定性是男人在取得胜利的时候，最令他们陶醉的地方。女人总是足够狡猾，让男人存在这种疑问。在这一方面，女人的心思和她的身体完全相似，不仅不对自己的软弱感到羞耻，反而引以为豪。她柔软的肌肉毫无抵抗力，她也承认连最轻的东西都举不起来。要是变得强壮，她反倒会感到羞耻呢。为什么呢？这不仅为了显得优雅，她太狡猾了，她这样做更是为了给自己提前找好借口，以便必要的时候她可以享受弱者的权利。

The experience we have gained through our vices has considerably modified the views held in older times; we rarely hear of violence for which there is so little occasion that it would hardly be credited. Yet such stories are common enough among the Jews and ancient Greeks; for such views belong to the simplicity of nature, and have only been uprooted by our profligacy. If fewer deeds of violence are quoted in our days, it is not that men are more temperate, but because they are less credulous, and a complaint which would have been believed among a simple people would only excite laughter among ourselves; therefore silence is the better course. There is a law in Deuteronomy, under which the outraged maiden was punished, along with her assailant, if the crime were committed in a town; but if in the country or in a lonely place, the latter alone was punished. “For,” says the law, “the maiden cried for help, and there was none to hear.” From this mercifu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girls learnt not to let themselves be surprised in lonely places.

我们从自己的恶习中获得的经验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旧观点。我们很少听到强暴事件。因为这种事很少有机会发生，所以人们也不再相信这种行为。然而这样的故事在犹太人和古希腊人中是时常发生的。因为这样的观点符合大自然的简单质朴，后来只因我们的不检点行为，使得这事渐渐被抛之脑后了。如果现在人们不怎么提及强暴行径了，并不是因为男人更有节制了，而是因为他们不再轻信别人了。以前对强暴行为的抱怨会被单纯的人相信，而今却只会招致大家的嘲笑，因此，沉默是上策。这是《申命记》中的一条法则：如果强奸行为发生在城里，那么被强奸的女子就要和施暴者一起接受惩罚；如果发生在乡下或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则只惩罚男人。“因为”法则中说道，“那位女子已经呼救了，但是没有人听到。”从这一法则仁慈的解读中，女孩们学会了不去人多的地方，以免遭遇不测。

This change in public opinion has had a perceptible effect on our morals. It has produced our modern gallantry. Men have found that their pleasures depend, more than they expected, on the goodwill of the fair sex, and have secured this goodwill by attentions which have had their reward.

人们观念上的这一变化对我们的品行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它使得现在的男人都对女人大献殷勤。男人们发现他们的快乐有赖于女人们对性的自愿，而且依赖程度之深远超他们的想象。他们时刻关注女人，体贴对方，才能确保她们的自愿。

See how we find ourselves led unconsciously from the physical to the moral constitution, how from the grosser union of the sexes spring the sweet laws of love. Woman reigns, not by the will of man, but by the decrees of nature herself; she had the power long before she showed it. That same Hercules who proposed to violate

all the fifty daughters of Thespis was compelled to spin at the feet of Omphale, and Samson, the strong man, was less strong than Delilah. This power cannot be taken from woman; it is hers by right; she would have lost it long ago, were it possible.

看看我们自己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从肉欲过渡到道德观的，是如何从粗俗的两性结合中滋生出甜蜜的爱情法则的。女性对男人的驾驭，不是出自男人的自愿，而是大自然本身的要求。早在女人们显示出这种能力之前，女人就已经驾驭男人了。就像赫拉克勒斯想要凌辱泰斯庇斯的五十个女儿，却被迫在翁法勒的脚边纺纱。参孙虽然是个强壮的男人，却不及大利拉。女人的这种力量是无法剥夺的，这是她们的正当权利。要是她们有可能失去这种力量的话，早就失去了。

The consequences of sex are wholly unlike for man and woman. The male is only a male now and again, the female is always a female, or at least all her youth; everything reminds her of her sex; the performance of her functions requires a special constitution. She needs care during pregnancy and freedom from work when her child is born; she must have a quiet, easy life while she nurses her children; their education calls for patience and gentleness, for a zeal and love which nothing can dismay; she forms a bond between father and child, she alone can win the father's love for his children and convince him that they are indeed his own. What loving care is required to preserve a united family! And there should be no question of virtue in all this, it must be a labour of love, without which the human race would be doomed to extinction.

性对男人和女人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男人只是偶尔起到一个

男性的作用，女人却永远都起着女性的作用，或者至少在她的青年时期要起到女性的作用。所有的事情都提醒着她，她的性别是什么。为了很好地起到自己的作用，她就需要特殊的体格。她在怀孕期间需要照顾。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她不能工作，需要休息。在哺乳期，她必须要有一个安静轻松的生活环境。教育孩子的时候她必须耐心温柔，要怀有任何东西都无法改变的热情与爱。她是孩子与父亲之间的纽带，只有她能够使他爱孩子，使他相信他们是他的骨肉。为了保证一个家庭的和睦团结，需要怎样的爱与呵护啊！女人们做的这一切，不可能是出于美德，而是出于爱，没有了爱，人类就注定灭亡。

The mutual duties of the two sexes are not, and cannot be, equally binding on both. Women do wrong to complain of the inequality of man-made laws; this inequality is not of man's making, or at any rate it is not the result of mere prejudice, but of reason. She to whom nature has entrusted the care of the children must hold herself responsible for them to their father. No doubt every breach of faith is wrong, and every faithless husband, who robs his wife of the sole reward of the stern duties of her sex, is cruel and unjust; but the faithless wife is worse; she destroys the family and breaks the bonds of nature; when she gives her husband children who are not his own, she is false both to him and them, her crime is not infidelity but treason. To my mind, it is the source of dissension and of crime of every kind. Can any position be more wretched than that of the unhappy father who, when he clasps his child to his breast, is haunted by the suspicion that this is the child of another, the badge of his own dishonour, a thief who is robbing his own children of their inheritanc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family is little more than a group of secret enemies, armed against each other by a guilty woman, who compels them to pretend to love one another.

两性之间相互的义务不是，也不能是相等的。女人抱怨这些人们制定的法则是不平等的，这是不对的。因为这种不平等不是人为造成的，或者说，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仅仅由于人们的偏见造成的。它本身就是合理的。大自然既然已经将照顾孩子的责任交付于她，她就必须对孩子的父亲负责，尽心抚养孩子。毫无疑问，任何背弃这个信念的行为都是错误的。任何一个不忠的丈夫，如果在妻子切实履行了女性的义务之后还要剥夺她唯一的报酬的话，那他是非常残忍，不正义的。但要是妻子不忠，那就更糟糕了。她破坏了这个家庭，破坏了自然的联系，如果她生出的孩子不是她丈夫的，那她既欺骗了丈夫，也欺骗了孩子们。她的罪孽已不仅仅是不忠诚，而是大逆不道。我认为这是所有纷争和犯罪的源头。这世上没有任何处境能比一个不幸的父亲的处境更悲惨了。当他拥孩子入怀时，他总是担心这是别人的孩子，这是他耻辱的象征，这是强夺他亲生儿女财产的小偷。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个家庭和一群暗中为敌的人没有区别。因为那个有罪的女人，尽管她迫使家里的人假装相亲相爱，实际上他们却因此互相对抗和仇视。

Thus it is not enough that a wife should be faithful; her husband, along with his friends and neighbours, must believe in her fidelity; she must be modest, devoted, retiring; she should have the witness not only of a good conscience, but of a good reputation. In a word, if a father must love his children, he must be able to respect their mother. For these reasons it is not enough that the woman should be chaste, she must preserve her reputation and her good name. From these principles there arises not only a mor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xes, but also a fresh motive for duty and propriety, which prescribes to women in particular the most scrupulous attention to their conduct, their manners, their behaviour. Vague assertions as to 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 and the similarity of their duties are only empty words; they are no answer to my argument.

因此仅仅妻子做到忠诚是不够的，她的丈夫，以及丈夫的朋友和邻居，都必须相信她的忠诚。她必须态度谦逊，忠诚专一，低调害羞。在别人眼中，她不仅要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也要有一个好名声。总而言之，如果说一个父亲必须爱他的孩子，他就必须尊敬孩子们的母亲。由于这些原因，妇女忠于丈夫还是不够的，她还必须保持一个好的名声。从这些原理中不仅产生了两性间的品行差异，而且为义务和规矩产生了新的动力，规定妇女尤其要小心，注意自己的言行、态度和举止。模糊地说两性平等、他们的义务是相似的，都只是空话，无法解答我的问题。

It is a poor sort of logic to quote isolated exceptions against laws so firmly established. Women, you say, are not always bearing children. Granted; yet that is their proper business. Because there are a hundred or so of large towns in the world where women live licentiously and have few children, will you maintain that it is their business to have few children? And what would become of your towns if the remote country districts, with their simpler and purer women, did not make up for the barrenness of your fine ladies? There are plenty of country places where women with only four or five children are reckoned unfruitful. In conclusion, although here and there a woman may have few children,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2_1] Is it any the less a woman's business to be a mother? And to not the general laws of nature and morality make provision for this state of things?

列举一些罕见的例外情形来反驳稳固建立的法则实在是没有道理。你说，妇女并不总是在生孩子。确实是这样，但生孩子也是她们固有的本分。就因为世界上的上百个大城市中，女人们过着放荡的生活，很少有孩子，你就认为女人的本分是少生孩子吗？要不是那些穷乡僻壤的妇女过着更质朴、纯洁的生活，从而弥补了你们那些城里高

贵的太太们生育稀少的后果的话，那些城市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很多乡下地方，一个妇女要是只有四五个孩子，就会被认为生育能力不强。总结来说，虽然有些地方的女人不怎么生孩子，这又有什么关系呢？[3_1] 这就能说明女人的本分不是做一个母亲吗？大自然的一般法则和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就不为这一件事预先做好准备吗？

Even if there were these long intervals, which you assume, between the periods of pregnancy, can a woman suddenly change her way of life without danger? Can she be a nursing mother to-day and a soldier to-morrow? Will she change her tastes and her feelings as a chameleon changes his colour? Will she pass at once from the privacy of household duties and indoor occupations to the buffeting of the winds, the toils, the labours, the perils of war? Will she be now timid [2_2] , now brave, now fragile, now robust? If the young men of Paris find a soldier's life too hard for them, how would a woman put up with it, a woman who has hardly ventured out of doors without a parasol and who has scarcely put a foot to the ground? Will she make a good soldier at an age when even men are retiring from this arduous business?

就算你认为两次怀孕期的间隔很长，但是一个女人怎么能毫无危险地突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呢？她能够在今天做一个乳母，明天就成为一个士兵吗？她能像变色龙改变颜色那样，改变自己的爱好和情感吗？她能从干家务活的隐居状态立刻转变，去野外风吹日晒，干体力活，甚至冒着危险去打仗吗？她能做到时而胆小 [3_2] ，时而勇敢；时而是脆弱，时而精力充沛吗？如果连巴黎年轻的小伙子都觉得士兵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来艰苦了，那从来没有晒过太阳、几乎不徒步行走的女人怎么受得了呢？在这个年纪，男人们都从这艰苦的任务中退出了，女人们还能成为好士兵吗？

There are countries, I grant you, where women bear and rear children with little or no difficulty, but in those lands the men go half-naked in all weathers, they strike down the wild beasts, they carry a canoe as easily as a knapsack, they pursue the chase for 700 or 800 leagues, they sleep in the open on the bare ground, they bear incredible fatigues and go many days without food. When women become strong, men become still stronger; when men become soft, women become softer; change both the terms and the ratio remains unaltered.

我承认，在有些国家，妇女生养孩子几乎没有困难。但也正是在这些国家，男人无论在什么天气下都是半裸的，他们同野兽打斗，扛独木舟就像抗背包一样轻松，为了追猎物能跑上七八百里格。他们能在露天的裸地上睡觉，尽管疲惫不堪、没有食物也能支撑很多天。当女人变得强壮的时候，男人会变得更强壮；当男人变得软弱的时候，女人就会变得更软弱。两方都相应变化的时候，比例就保持不变了。

I am quite aware that Plato, in the Republic, assigns the same gymnastics to women and men. Having got rid of the family there is no place for women in his system of government, so he is forced to turn them into men. That great genius has worked out his plans in detail and has provided for every contingency; he has even provided against a difficulty which in all likelihood no one would ever have raised; but he has not succeeded in meeting the real difficulty. I am not speaking of the alleged community of wives which has often been laid to his charge; this assertion only shows that his detractors have never read his works. I refer to that political promiscuity under which the same occupations are assigned to both sexes alike, a scheme which could only lead to intolerable evils; I refer to that subversion of all the tenderest of our

natural feelings, which he sacrificed to an artificial sentiment which can only exist by their aid. Will the bonds of convention hold firm without some foundation in nature? Can devotion to the state exist apart from the love of those near and dear to us? Can patriotism thrive except in the soil of that miniature fatherland, the home? Is it not the good son, the good husband, the good father, who makes the good citizen?

我清楚地记得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女人和男人要做一样的运动。他的政治体系中取消了家庭的存在，也就没有女人的位置了，因此他只好将她们都改造成男人。这位伟大的天才已经具体地制定了计划，并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性。他甚至想到了任何人都不会想到的困难，但是他没能成功解决真正的困难。我现在不是在谈论那些所谓的妇人团体。一些人经常为此责备他，而这一主张只能表明那些诋毁他的人根本没有阅读过他的作品。我更愿意谈论男女混杂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和女性都承担着相同的工作，做同样的事情，这只能造成一些不可容忍的恶行；我指的是最温柔的自然情感的破坏。它为了一种必须依靠它的帮助才能存在的虚假感情所牺牲。如果没有一些自然的基础，习俗的联系怎么能牢固建立呢？如果我们不爱那些亲近的人，又怎么会爱我们的国家呢？如果不是植根于小小家园的土壤，我们的爱国心怎么能够茁壮成长呢？如果不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又怎么会是一个好公民呢？

When once it is proved that men and women are and ought to be unlike in constitution and in temperament, it follows that their education must be different. Nature teaches us that they should work together, but that each has its own share of the work; the end is the same, but the means are different, as are also the feelings which direct them. We have attempted to paint a natural man, let us try to paint a helpmeet for him.

一旦我们证明了男人和女人在体格和性情上不是，也不应该是一样的之后，那我们便可知道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不同的。大自然教会我们男性和女性应该共同工作，但是各自有不同的分工。他们的工作目的是一致的，但是因为指引他们工作的情感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的工作方法也不同。我们已经尝试着刻画一个天然的男人，那就让我们也试着为他刻画一个配偶吧。

You must follow nature's guidance if you would walk aright. The native characters of sex should be respected as nature's handiwork. You are always saying, “Women have such and such faults, from which we are free.” You are misled by your vanity; what would be faults in you are virtues in them; and things would go worse, if they were without these so-called faults. Take care that they do not degenerate into evil, but beware of destroying them.

如果你想要正确地前行，你就必须遵从大自然的指导。我们要尊重两性的天然特性，将它们看作是大自然的作品。你总是说：“女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我们没有这些缺点。”你被你的虚荣心所误导。你所说的缺点，正是她们的优点。要是她们没有你所谓的缺点，事情就会更糟。你要当心，你可以防止它们退化成坏品行，但你不能消灭它们。

On the other hand, women are always exclaiming that we educate them for nothing but vanity and coquetry, that we keep them amused with trifles that we may be their masters; we are responsible, so they say, for the faults we attribute to them. How silly! What have men to do with the education of girls? What is there to hinder their mothers educating them as they please? There

are no colleges for girls; so much the better for them! Would God there were none for the boys, their education would be more sensible and more wholesome. Who is it that compels a girl to waste her time on foolish trifles? Are they forced, against their will, to spend half their time over their toilet, following the example set them by you? Who prevents you teaching them, or having them taught, whatever seems good in your eyes? Is it our fault that we are charmed by their beauty and delighted by their airs and graces, if we are attracted and flattered by the arts they learn from you, if we love to see them prettily dressed, if we let them display at leisure the weapons by which we are subjugated? Well then, educate them like men. The more women are like men, the less influence they will have over men, and then men will be masters indeed.

另一方面，女人们总是抱怨我们将她们培养成了虚荣、卖弄风骚的人，说我们总是用一些小东西取悦她们，从而成为她们的主宰。她们说我们强加给她们的那些缺点，是我们的责任。多么愚蠢啊！男人和女孩的教育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一个母亲按照自己的意愿教育女儿？女孩们没有学校可上，这对她们来说更是一件好事！但愿上帝也让男孩没有学校可上。这样，他们的教育就会更加合乎理智和健全。谁强迫女孩硬要她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愚蠢的小事情上了？谁强迫她们违反自己的意愿，学你的样子花一半的时间梳妆打扮了？谁阻止你教她们，或是请人教她们一切你觉得好的东西了？如果我们为她们的美貌和优雅的气质所倾倒，如果我们被她们从你那儿学来的伎俩所吸引和取悦，如果她们美丽大方的穿着使我们心生喜悦，如果我们让她们从容地展现那些征服我们的武器，这是我们的错吗？那好吧，像教育男孩子一样教育她们好了。女人越像男人，她们所能对男人产生的影响就越小，男人就真的会成为主宰了。

All the faculties common to both sexes are not equally shared between them, but taken as a whole they are fairly divided. Woman is worth more as a woman and less as a man; when she makes a good use of her own rights, she has the best of it; when she tries to usurp our rights, she is our inferior. It is impossible to controvert this, except by quoting exceptions after the usual fashion of the partisans of the fair sex.

男人和女人并非同等具有两性间共同的能力，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公平划分的。当女人做一个女人该做的事时，会比做男人的事更有价值。当她能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时，就达到了最佳效果。可当她夺取了我们的权利时，她就不如我们。我们无法反驳这个道理，除了像那些对性别偏袒的人那样，列举出一些特殊情况来反驳它。

To cultivate the masculine virtues in women and to neglect their own is evidently to do them an injury. Women are too clear-sighted to be thus deceived; when they try to usurp our privileges they do not abandon their own; with this result: they are unable to make use of two incompatible things, so they fall below their own level as women, instead of rising to the level of men. If you are a sensible mother you will take my advice. Do not try to make your daughter a good man in defiance of nature. Make her a good woman, and be sure it will be better both for her and us.

如果在妇女身上培养男性气概，而忽视她们自身的美德和价值，那显然是在伤害她们。女性如此精明，是绝不会上当受骗的。当她们试图夺取我们的特权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样一来，她们无法同时行使两种不相容的权利。因此她们不但无法达到男人的水平，反而连原本作为女人的地位都达不到，如果你是一个明智的母亲，你

就会采纳我的建议。不要试图违背自然，将你的女儿培养成一个优秀的男人。应该将她培养成一个好女人，这样肯定对她、对我们都有更大的好处。

Does this mean that she must be brought up in ignorance and kept to housework only? Is she to be man's handmaid or his help-meet? Will he dispense with her greatest charm, her companionship? To keep her a slave will he prevent her knowing and feeling? Will he make an automaton of her? No, indeed, that is not the teaching of nature, who has given women such a pleasant easy wit. On the contrary, nature means them to think, to will, to love, to cultivate their minds as well as their persons; she puts these weapons in their hands to make up for their lack of strength and to enable them to direct the strength of men. They should learn many things, but only such things as are suitable.

那这是否意味着她应该在愚昧无知中成长，只会做家务呢？她究竟是男人的侍女还是伴侣呢？他会不会不让她交朋友，剥夺她最大的乐趣呢？他会不会阻碍她的认知和感情，将她变成一个奴隶呢？他会不会将她变成一个机器人呢？不，一定不会的。大自然既然赋予了女性这般可爱与聪慧，这就不会是大自然的主张。相反，大自然希望女性有思想、有意愿、能够爱，像培养她们的身体一样培养她们的心灵。她将这些品质赋予女性，以此作为她们的武器，来弥补她们体力上的不足，使她们有能力支配男人的体力。她们要学习很多东西，但是只能学习这样适合她们的东西。

When I consider the special purpose of woman, when I observe her inclinations or reckon up her duties, everything combines to indicate the mode of education she requires. Men and women are

made for each other, but their mutual dependence differs in degree; man is dependent on woman through his desires; woman is dependent on man through her desires and also through her needs; he could do without her better than she can do without him. She cannot fulfil her purpose in life without his aid, without his goodwill, without his respect; she is dependent on our feelings, on the price we put upon her virtue, and the opinion we have of her charms and her deserts. Nature herself has decreed that woman, both for herself and her children, should be at the mercy of man's judgment.

当我考虑到女性的特殊作用，研究了她的倾向，了解了她的义务之后，结合这一切我就知道了女性需要的教育模式是什么样子的。男人和女人是为彼此而生的，但是他们彼此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男人在欲望上依赖女人，而女人则在欲望和需求上都依赖于男人。男人没有了女人，要比女人没有了男人，过得更好。没有了男人的帮助、好感和尊敬，女人就无法达到生活的目的。她依赖于我们的感情，依赖于我们对她价值的肯定，也依赖于我们对她的魅力和功劳的看法。大自然本身已经规定：无论是为了女性自身还是为了她的孩子，她都应该任凭男人评价。

Worth alone will not suffice, a woman must be thought worthy; nor beauty, she must be admired; nor virtue, she must be respected. A woman's honour does not depend on her conduct alone, but on her reputation, and no woman who permits herself to be considered vile is really virtuous. A man has no one but himself to consider, and so long as he does right he may defy public opinion; but when a woman does right her task is only half finished, and what people think of her matters as much as what she really is. Hence her education must, in this respect, be different from man's education.

“What will people think” is the grave of a man's virtue and the throne of a woman's.

一个女人本身有价值是不够的，她的价值必须得到认可；本身有美貌也是不够，她的美貌必须受到仰慕；本身有美德也是不够的，她的美德必须受到尊敬。一个女人的荣耀不仅仅取决于她的行为，也取决于她的声誉。一个女人要是口碑极差，那她的德行一定不好。一个男人只要他品行端正，他就可以不在意别人的看法，随心所欲。但是一个女人要是品行端正，那她只成功了一半，重要的是要让别人对她的看法，和真实的她一样好。因此在这一方面，对女性的教育必须和男性的不同。“人们会怎么想”是葬送男人美德的坟墓，却是承载女人美德的宝座。

The children's health depends in the first place on the mother's, and the early education of man is also in a woman's hands; his morals, his passions, his tastes, his pleasures, his happiness itself, depend on her. A woman's education must therefore be planned in relation to man. To be pleasing in his sight, to win his respect and love, to train him in childhood, to tend him in manhood, to counsel and console, to make his life pleasant and happy, these are the duties of woman for all time, and this is what she should be taught while she is young. The further we depart from this principle, the further we shall be from our goal, and all our precepts will fail to secure her happiness or our own.

孩子的身体健康首先取决于母亲的健康。男人的幼年教育也掌握在女人的手中。他的品行、欲念、品味、快乐与否和幸福与否都取决于女人。因此一个女人所受的教育必须与男人有关。使男人感到快乐、赢得男人的尊重和爱、在他的幼年时期培养他们、在成年时期照

顾他们、给予他们建议和安慰、使他的生活快乐幸福，这些都是女人一直以来的义务，也是她们在小的时候应该学习的东西。我们越是背离这个原理，我们离我们的目标也就越远。而我们的戒律也无法保证她的幸福和我们自己的幸福。

Every woman desires to be pleasing in men's eyes, and this is right; but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wishing to please a man of worth, a really lovable man, and seeking to please those foppish manikins who are a disgrace to their own sex and to the sex which they imitate. Neither nature nor reason can induce a woman to love an effeminate person, nor will she win love by imitating such a person.

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在男人的眼中是惹人喜爱的，这是正确的。但是希望使一个真正有价值、可爱的男人感到愉快和想要取悦那些模仿女性、被视作男性耻辱的男人是不同的。无论是天性还是理性都无法使一个女人爱上一个娘娘腔的男人，她也不会通过模仿这种男人来赢得男人的爱。

If a woman discards the quiet modest bearing of her sex, and adopts the airs of such foolish creatures, she is not following her vocation, she is forsaking it; she is robbing herself of the rights to which she lays claim. “If we were different,” she says, “the men would not like us.” She is mistaken. Only a fool likes folly; to wish to attract such men only shows her own foolishness. If there were no frivolous men, women would soon make them, and women are more responsible for men's follies than men are for theirs. The woman who loves true manhood and seeks to find favour in its sight will adopt means adapted to her ends. Woman is a coquette by

profession, but her coquetry varies with her aims; let these aims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of nature, and a woman will receive a fitting education.

如果一个女人抛弃了女性应该有的安静谦逊的样子，而学那些愚蠢的人的样子的话，她就违背了她的天职。她是在剥夺自己应有的权利。“要是我们不同的话，”她说，“男人就不会喜欢我们。”她错了。只有傻瓜才会喜欢男人做的荒唐事，只有傻瓜才会展现自己的愚蠢从而吸引男人。如果这世上没有轻率的男人的话，女人很快就会创造这样的男人。女人总是要为男子的蠢笨负责，远多于男人使女人做出的愚蠢行为。一个女人如果喜爱真正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并想要讨他们欢心，那她就会采取一些适合她的目的的手段。就身份来说，女人是很轻佻的。但是由于她们的目的各不相同，因此她们的媚态也是不尽相同。我们使这些目的与自然的目标相一致，这样一个女人就能接受合适的教育。

Even the tiniest little girls love finery; they are not content to be pretty, they must be admired; their little airs and graces show that their heads are full of this idea, and as soon as they can understand they are controlled by “What will people think of you?” If you are foolish enough to try this way with little boys, it will not have the same effect; give them their freedom and their sports, and they care very little what people think; it is a work of time to bring them under the control of this law.

即使再小的女孩也喜爱华丽的服饰。她们不满足于美丽，而且必须要得到他人的仰慕。从她们装腔作势的样子，可以看出她们的脑袋里全是这种心思。只要她们一有了理解力，她们就会被“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想法约束缚住。如果你愚蠢地将这种方式也运用到男孩身上

的话，效果就会大不相同。只要给予他们自由，让他们能够运动玩耍的话，他们就很少关心别人怎么想。要让他们被这个法则约束，则需要很长的时间。

However acquired, this early education of little girls is an excellent thing in itself. As the birth of the body must precede the birth of the mind, so the training of the body must precede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This is true of both sexes; but the aim of physical training for boys and girls is not the same; in the one case it is the development of strength, in the other of grace; not that these qualities should be peculiar to either sex, but that their relative values should be different. Women should be strong enough to do anything gracefully; men should be skilful enough to do anything easily.

无论小女孩们是如何获得早期教育的，这教育本身就是非常好的。因为先有身体，再有思想。因此对于身体的锻炼也必须先于思想的培养。这对男女来说都是同样正确的。但是他们训练身体素质的目的是不同的。对男人来说，是为了变得强壮有力；对女人来说，则是为了变得优雅有魅力。并不是说这些品质是某一性别所特有的，而是说它们的相对价值是不同的。女人应该有足够的力量，使她们优雅地做任何事；男人应该有足够的技巧，使他们轻松地做任何事。

The exaggeration of feminine delicacy leads to effeminacy in men. Women should not be strong like men but for them, so that their sons may be strong. Convents and boarding-schools, with their plain food and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amusements, races, and games in the open air and in the garden, are better in this respect than the home, where the little girl is fed on delicacies, continually

encouraged or reproved, where she is kept sitting in a stuffy room, always under her mother's eye, afraid to stand or walk or speak or breathe, without a moment's freedom to play or jump or run or shout, or to be her natural, lively, little self; there is either harmful indulgence or misguided severity, and no trace of reason. In this fashion heart and body are alike destroyed.

女性若是过于娇嫩脆弱，就会使得男性也趋于柔弱。女人不应该像男人一样强壮，但是也不能太过柔弱。这样他们的儿子才会健壮。在修道院和寄宿学校，虽然饮食清淡，但女生们有许多机会可以在户外和花园中做游戏、赛跑，从这一方面来说，修道院和寄宿学校要比家里好。在家中，虽然饮食精美，但女孩们成天坐在密闭的屋子里，在母亲的看管下，时不时会受到鼓励或批评。不敢站起来走动，也不敢说话，甚至都不敢轻易呼吸，也没有片刻的自由去玩耍、去跑、去跳或是大叫，她们无法跟随自己的天性轻松地做自己。最后的结果要么是不当的溺爱，要么是过度严格地看管，都不合乎情理。照这样的话，女孩们的身心都会遭受毁灭。

In Sparta the girls used to take part in military sports just like the boys, not that they might go to war, but that they might bear sons who could endure hardship. That is not what I desire. To provide the state with soldiers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the mother should carry a musket and master the Prussian drill. Yet, on the whole, I think the Greeks were very wise in this matter of physical training. Young girls frequently appeared in public, not with the boys, but in groups apart. There was scarcely a festival, a sacrifice, or a procession without its bands of maidens, the daughters of the chief citizens. Crowned with flowers, chanting hymns, forming the chorus of the dance, bearing baskets, vases, offerings, they presented a charming spectacle to the depraved senses of the

Greeks, a spectacle well fitted to efface the evil effects of their unseemly gymnastics. Whatever this custom may have done for the Greek men, it was well fitted to develop in the Greek women a sound constitution by means of pleasant, moderate, and healthy exercise; while the desire to please would develop a keen and cultivated taste without risk to character.

在斯巴达，女孩们也曾像男生一样参加军事体育。这不是因为她们也要上战场，而是这样她们才有可能生育出能够经受苦难的儿子。这不是我所希望的。给国家提供士兵，并不意味着母亲一定要扛着火枪去学习普鲁士的那套操练。但是我认为，总的来看，希腊人对身体素质锻炼是非常有一套的。女孩们频繁出现在公共场合，不是和男孩们一起，而是一群女孩聚在一起。只要有节日、献祭或是游行，就可以看到一队队女孩，她们是那些重要公民的女儿。她们头戴花冠、提着篮子、捧着花瓶和祭品、唱着赞歌、跳着舞，为感官迟钝的希腊人展现了一副动人的场景，消除了不适宜的体育运动给他们带来的消极影响。无论这项习俗会对希腊男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都通过有趣、适度、健康的运动使希腊妇女有一个健全的体格，同时取悦他人的欲望使她们形成了有教养的品味，而又不损害她们的性格。

When the Greek women married, they disappeared from public life; within the four walls of their home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care of their household and family. This is the mode of life prescribed for women alike by nature and reason. These women gave birth to the healthiest, strongest, and best proportioned men who ever lived, and except in certain islands of ill repute, no women in the whole world, not even the Roman matrons, were ever at once so wise and so charming, so beautiful and so virtuous, as the women of ancient Greece.

在希腊妇女结婚之后，她们就远离公共场合了。她们呆在家中，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生活之中，这就是大自然和理性为女性所规定的生活模式。这些女人生下了世上最健康强壮、身材最匀称的男人。除了个别岛上的人名声不佳，这个世上的女人，甚至包括罗马妇女在内，没有人能像古希腊的女人那样睿智迷人、美丽善良。

It is admitted that their flowing garments, which did not cramp the figure, preserved in men and women alike the fine proportions which are seen in their statues. These are still the models of art, although nature is so disfigured that they are no longer to be found among us. The Gothic trammels, the innumerable bands which confine our limbs as in a press, were quite unknown. The Greek women were wholly unacquainted with those frames of whalebone in which our women distort rather than display their figures. It seems to me that this abuse, which is carried to an incredible degree of folly in England, must sooner or later lead to the production of a degenerate race. Moreover, I maintain that the charm which these corsets are supposed to produce is in the worst possible taste; it is not a pleasant thing to see a woman cut in two like a wasp—it offends both the eye and the imagination. A slender waist has its limits, like everything else, in proportion and suitability, and beyond these limits it becomes a defect. This defect would be a glaring one in the nude; why should it be beautiful under the costume?

众所周知，希腊人的服装很宽松，不束缚身材，因此使得男人和女人的身材比例都非常优美，就像他们的雕像那样。虽然这些雕像的天然形态已经被损毁得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但它们仍然是艺术上的典范。那些哥特式束缚装束，有许多将四肢捆得很紧的绑带，在希腊人中都是从未存在过的。希腊的妇女对鲸尾式裙子丝毫不熟悉，可我们

的妇女却穿着这个东西，将自己的身形弄得扭曲不已，再也显不出她们的身材。这种服饰的流行，这愚蠢的行为似乎在英国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迟早有一天一定会导致整个民族的衰败。此外，我认为他们觉得穿紧身胸衣能产生魅力的想法，体现了他们低俗的品味。看着一个女人像黄蜂一样被勒成两段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这会令人一看到或一想到就感觉不适。苗条的腰身和其他任何东西都一样，有一个限度，要和身体成比例。超过了这个限度，反而就变成了一个瑕疵。这种瑕疵在裸体的时候就非常显眼，那穿着衣服的时候还会好看吗？

I will not venture upon the reasons which induce women to incase themselves in these coats of mail. A clumsy figure, a large waist, are no doubt very ugly at twenty, but at thirty they cease to offend the eye, and as we are bound to be what nature has made us at any given age, and as there is no deceiving the eye of man, such defects are less offensive at any age than the foolish affectations of a young thing of forty.

我是不敢研究为什么女人要把自己束缚得像穿铠甲似的。女人在二十岁的年纪身形臃肿、腰身粗大无疑非常难看，但是到了三十岁，这个样子就不会那么难看了。因为我们肯定在任何年龄都要合乎自然的安排，人的眼睛是不会骗人的。这个样子再怎么也比一个年轻的姑娘愚蠢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四十岁的老大妈好看。

Everything which cramps and confines nature is in bad taste; this is as true of the adornments of the person as of the ornaments of the mind. Life, health, common-sense, and comfort must come first; there is no grace in discomfort, languor is not refinement, there is no charm in ill-health; suffering may excite pity, but

pleasure and delight demand the freshness of health.

一切限制拘束天性的东西都是品味低俗的，就身体的装饰和心灵的美化来说，这是正确的。生命、健康、常识和舒适必须是放在首位的。不舒适的东西是不会优美的，无精打采的样子并不意味着优雅，病怏怏的样子也不会显得有魅力。痛苦的样子也许会勾起大家的同情心，但要使他人感到愉悦快乐就必须身体健康、精神饱满。

Boys and girls have many games in common, and this is as it should be; do they not play together when they are grown up? They have also special tastes of their own. Boys want movement and noise, drums, tops, toy-carts; girls prefer things which appeal to the eye, and can be used for dressing-up—mirrors, jewellery, finery, and specially dolls. The doll is the girl's special plaything; this shows her instinctive bent towards her life's work. The art of pleasing finds its physical basis in personal adornment, and this physical side of the art is the only one which the child can cultivate.

男孩和女孩有很多共同的游戏，就应该是这样的。他们长大以后不也一起玩吗？他们也有各自特殊的爱好。男生喜欢运动、喜欢吵闹，鼓、陀螺和玩具车都是他们喜欢的；而女生则更喜欢好看的、可以用来化妆的东西——镜子、珠宝、饰品，尤其喜欢娃娃。娃娃是女孩们特别的玩具。这体现出女孩天生的爱好是与她们一生的使命所契合的。取悦他人的艺术的物质基础在于个人装饰，而艺术的这一物质层面是孩子们唯一可以学习的。

Here is a little girl busy all day with her doll; she is always changing its clothes, dressing and undressing it, trying new

combinations of trimmings well or ill matched; her fingers are clumsy, her taste is crude, but there is no mistaking her bent; in this endless occupation time flies unheeded, the hours slip away unnoticed, even meals are forgotten. She is more eager for adornment than for food. “But she is dressing her doll, not herself,” you will say. Just so; she sees her doll, she cannot see herself; she cannot do anything for herself, she has neither the training, nor the talent, nor the strength; as yet she herself is nothing, she is engrossed in her doll and all her coquetry is devoted to it. This will not always be so; in due time she will be her own doll.

有一个小女孩整天玩她的娃娃，不停地给它换衣服，一会儿穿上，一会儿脱下，并且尝试各种新的装饰搭配，有的相配，有的不相配。她的手指很笨拙，品味也很天然，但是这就是她的爱好没错。在玩布娃娃的过程中，时间不知不觉溜走了，她甚至连饭也会忘了吃。相比于食物，她更加迫切想要的是装饰品。“但是她在打扮她的娃娃，并非她自己，”你也许会说。正是！她看着她的娃娃而没有注意到自己，她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情。她既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天赋，更缺乏体力，她什么都不懂，整个心思、所有的可爱之处都在娃娃身上。她不会一直这样，总有一天她会成为自己的娃娃。

We have here a very early and clearly-marked bent; you have only to follow it and train it. What the little girl most clearly desires is to dress her doll, to make its bows, its tippets, its sashes, and its tuckers; she is dependent on other people's kindness in all this, and it would be much pleasanter to be able to do it herself. Here is a motive for her earliest lessons, they are not tasks prescribed, but favours bestowed. Little girls always dislike learning to read and write, but they are always ready to learn to sew. They think they are grown up, and in imagination they are using their knowledge

for their own adornment.

我们有了一个清晰明确的初期倾向，你只需要遵从它，培养它就行了。小姑娘最明确渴望的就是打扮她的娃娃，给它打蝴蝶结、做披肩和腰带、扎花边。所有这一切她都有赖于别人的善意帮忙，如果她全都能自己完成的话就更好了。人们最早教给女孩们这些东西是有动机的。这不是强加给她们的任务，而是授予她们的恩惠。小女孩们总是都不喜欢学习读书和写字，但是她们一直都非常愿意学习做针线活。她们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想象着自己会用她们知道的东西来装扮自己。

The way is open and it is easy to follow it; cutting out, embroidery, lace-making follow naturally. Tapestry is not popular; furniture is too remote from the child's interests,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erson, it depends on conventional tastes. Tapestry is a woman's amusement; young girls never care for it.

道路开启之后，一切就变得容易了。她们就会自然地去学着裁剪、刺绣、做花边。挂毯不怎么受欢迎，家具对孩子们来说也太遥远了，这些东西和她们没什么关系，习惯怎么样她们就怎么样。挂毯深得成年妇女的喜爱，年轻女孩从来不关心这个。

This voluntary course is easily extended to include drawing, an art which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aste in dress; but I would not have them taught landscape and still less figure painting. Leaves, fruit, flowers, draperies, anything that will make an elegant trimming for the accessories of the toilet, and enable the girl to design her own embroidery if she cannot find a pattern to her taste;

that will be quite enough. Speaking generally, if it is desirable to restrict a man's studies to what is useful, this is even more necessary for women, whose life, though less laborious, should be even more industrious and more uniformly employed in a variety of duties, so that one talent should not be encouraged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这种自愿的学习很容易就延伸到绘画上去，这门艺术与她们的衣着品味紧密相关。但是我不会让她们学风景画，更不会让她们学人像画。画一画那些树叶、水果、花朵和帷帐就足够了。这可以使她为自己的装扮增添一些漂亮的装饰，也可以使她在找不到适合自己品味的花样时也能设计出自己的刺绣。一般来说，如果男人应该只学习有用的东西的话，女人就更应该这样。因为虽然妇女的生活没有男人那么辛苦，但是她们应该更勤劳，还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因此不能任由她们以其他才能为代价发展自己的某一个才能。

Whatever may be said by the scornful, good sense belongs to both sexes alike. Girls are usually more docile than boys, and they should be subjected to more authority, as I shall show later on, but that is no reason why they should be required to do things in which they can see neither rhyme nor reason. The mother's art consists in showing the use of everything they are set to do, and this is all the easier as the girl's intelligence is more precocious than the boy's. This principle banishes, both for boys and girls, not only those pursuits which never lead to any appreciable results, not even increasing the charms of those who have pursued them, but also those studies whose utility is beyond the scholar's present age and can only be appreciated in later years. If I object to little boys being made to learn to read, still more do I object to it for little girls until they are able to see the use of reading; we generally think more of our own ideas than theirs in our attempts to convince them of the

utility of this art. After all, why should a little girl know how to read and write! Has she a house to manage? Most of them make a bad use of this fatal knowledge, and girls are so full of curiosity that few of them will fail to learn without compulsion. Possibly cyphering should come first; there is nothing so obviously useful, nothing which needs so much practice or gives so much opportunity for error as reckoning. If the little girl does not get the cherries for her lunch without an arithmetical exercise, she will soon learn to count.

不论那些满是嘲讽的人说什么，男性和女性都同样拥有理智。女孩一般比男孩更温顺一些，而且就像我下面会展现的那样，女孩更应该被严加管教。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要求她们做一些她们认为毫无道理的事。做母亲的艺术在于向她们展示她们要做的事有何用处。因为女孩的智力要比男孩更早熟，因此这样做会更容易一些。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不仅要放弃追求既没有什么成效又无法给追求者增加魅力的东西，而且要抛弃那些在目前的年纪无法理解、需要再过些年才能明白其用处的学问。如果我反对逼迫一个小男孩学习阅读，我就会更反对在小女孩明白读书的用处之前逼迫她们读书。当我们试图使她们相信读书的用途时，我们一般说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他们的。归根结底，为什么一个小女孩非得知道如何读书写字呢？她现在就要经营一个家吗？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滥用这种有害的学问。而且女孩们都充满着好奇心，几乎所有人不用逼迫也会去学习的。或许她们最先应该学习的是算术，因为它是最有用的，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需要练习了，而且做算术时非常容易犯错。如果一个小女孩必须要做算术题才能得到午餐的樱桃的话，她很快就能学会数数。

I once knew a little girl who learnt to write before she could read, and she began to write with her needle. To begin with, she

would write nothing but O's; she was always making O's, large and small, of all kinds and one within another, but always drawn backwards. Unluckily one day she caught a glimpse of herself in the glass while she was at this useful work, and thinking that the cramped attitude was not pretty, like another Minerva she flung away her pen and declined to make any more O's. Her brother was no fonder of writing, but what he disliked was the constraint, not the look of the thing. She was induced to go on with her writing in this way. The child was fastidious and vain; she could not bear her sisters to wear her clothes. Her things had been marked, they declined to mark them any more, she must learn to mark them herself; there is no need to continue the story.

我之前认识了一个小女孩，她在会读书之前就学会了写字，并且她开始是用针头写的。一开始，她只会写“O”，她就一直写“O”，大的小的，一个“O”里写另一个“O”，各种各样。不过不管怎样，她的“O”都是反着画的。不幸的是，有一天当她正在做这有效的练习时，她从镜子中看到了自己。她觉得这个别扭的姿势不美观，于是就像密涅瓦一样，扔掉了笔，再也不写“O”了。她的兄弟也不喜欢写字，但他是因为不喜欢被约束，而不是因为不喜欢写字的样子。大家想了一个办法促使小女孩继续写字。她非常挑剔讲究，她无法忍受她的姐妹穿她的衣服。她的东西都被做上了记号。后来她的家人不再替她做记号了，她就必须学着自己做。故事的后续就不需要我再说了。

Show the sense of the tasks you set your little girls, but keep them busy. Idleness and insubordination are two very dangerous faults, and very hard to cure when once established. Girls should be attentive and industrious, but this is not enough by itself; they should early be accustomed to restraint. This misfortune, if such it be, is inherent in their sex, and they will never escape from it,

unless to endure more cruel sufferings. All their life long, they will have to submit to the strictest and most enduring restraints, those of propriety. They must be trained to bear the yoke from the first, so that they may not feel it, to master their own caprices and to submit themselves to the will of others. If they were always eager to be at work, they should sometimes be compelled to do nothing. Their childish faults, unchecked and unheeded, may easily lead to dissipation, frivolity, and inconstancy. To guard against this, teach them above all things self-control. Under our senseless conditions, the life of a good woman is a perpetual struggle against self; it is only fair that woman should bear her share of the ills she has brought upon man.

告诉那些女孩你让她们做的那些事情的意义所在，但也要让她们去做这些事。懒散和不顺从是两个非常危险的缺点，一旦形成了，就很难改正。女生应该是细心且勤劳的。但是这还不够，她们还应该从小就习惯于被约束。如果说这是她们的不幸的话，这是她们的性别所固有的，她们永远无法逃脱。要是没有这样的约束，她们会承受更多的痛苦。终其一生，她们不得不顺从于最严苛、最持久的礼教的约束。我们必须首先使她们学会忍受约束，这样之后她们就感受不到约束了；也要使她们学会控制自己任性的想法，顺从他人的意志。要是她们总是想要干活的话，我们有时也得强迫她们什么都别干。要是忽视、轻视她们那些孩子气的缺点，就很有可能造成她们的放荡轻浮和反复无常。想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首要的是教会她们自我控制。在我们现在这种麻木无知的环境下，一个好女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和自我作斗争的过程。只有让女人分担她们给人类造成的困扰，这才是公平的。

Beware lest your girls become weary of their tasks and infatuated with their amusements; this often happens under our

ordinary methods of education, where, as Fenelon says, all the tedium is on one side and all the pleasure on the other. If the rules already laid down are followed, the first of these dangers will be avoided, unless the child dislikes those about her. A little girl who is fond of her mother or her friend will work by her side all day without getting tired; the chatter alone will make up for any loss of liberty. But if her companion is distasteful to her, everything done under her direction will be distasteful too. Children who take no delight in their mother's company are not likely to turn out well; but to judge of their real feelings you must watch them and not trust to their words alone, for they are flatterers and deceitful and soon learn to conceal their thoughts. Neither should they be told that they ought to love their mother. Affection is not the result of duty, and in this respect constraint is out of place. Continual intercourse, constant care, habit itself, all these will lead a child to love her mother, if the mother does nothing to deserve the child's ill-will. The very control she exercises over the child, if well directed, will increase rather than diminish the affection, for women being made for dependence, girls feel themselves made to obey.

要谨防女孩们厌倦工作而沉迷于消遣，这在我们一般的教育方法下常有发生。就像费内隆说的，这种教育方法一方面使她们觉得单调乏味，另一方面又使她们寻欢作乐。如果我们能够遵循已经制定的这些规则，就能够避免第一个危险，除非这孩子不喜欢周围的一切。一个小女孩喜欢她的妈妈或朋友，她就会整日与她们一起工作而不会厌倦。只要和她们闲聊，就能够弥补她自由的缺失。可如果她讨厌自己的同伴，那她在同伴指导下做的一切都是不愉快的。要是女孩们不喜欢母亲的陪伴，她们就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好孩子。但是要想判断她们的真实感受，你就必须仔细观察，不要只相信她们说的话，因为她们会奉承、欺骗，从而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们也不能硬要求她们爱

自己的母亲。对母亲的喜爱不是履行义务的结果，从这点上来说强制是不合适的。只要一个母亲没有做什么事招致孩子的讨厌，那她与孩子频繁的交流，对她持久的关爱和平日的习惯都会使孩子爱她的母亲。母亲对女儿的管束只要适当，不仅不会招致她的反感，反而会加深她对母亲的爱。因为女人生来就是需要依靠的，所以女孩们觉得自己应该服从别人。

Just because they have, or ought to have, little freedom, they are apt to indulge themselves too fully with regard to such freedom as they have; they carry everything to extremes, and they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ir games with an enthusiasm even greater than that of boys. This is the second difficulty to which I referred. This enthusiasm must be kept in check, for it is the source of several vices commonly found among women, caprice and that extravagant admiration which leads a woman to regard a thing with rapture to-day and to be quite indifferent to it to-morrow. This fickleness of taste is as dangerous as exaggeration; and both spring from the same cause. Do not deprive them of mirth, laughter, noise, and romping games, but do not let them tire of one game and go off to another; do not leave them for a moment without restraint. Train them to break off their games and return to their other occupations without a murmur. Habit is all that is needed, as you have nature on your side.

正是因为她们有，或者说应该有极少的自由，所以她们易于过度纵容自己享受仅有的自由。她们事事都追求极端，投入到游戏中的热情甚至胜过男孩。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个麻烦。这种热情必须严加管束，因为这是造成妇女中一些常见缺点的源头，比如反复无常、过分迷恋一件事物。一个女人一旦有了这些缺点，就会在今天狂热喜爱一样东西，第二天就对其冷漠无比了。品味变幻无常和做事夸张一样

危险，它们都是由相同的原因造成的。不要剥夺她们游戏的乐趣，让她们尽情欢笑吵闹。但是不要让她们对一个游戏生厌而转向另一个游戏，时时刻刻都要约束她们。使她们可以没有丝毫抱怨地立即停止游戏，回去工作。要做到这样，只需养成习惯，因为习惯可以成为你的天性。

This habitual restraint produces a docility which woman requires all her life long, for she will always be in subjection to a man, or to man's judgment, and she will never be free to set her own opinion above his. What is most wanted in a woman is gentleness; formed to obey a creature so imperfect as man, a creature often vicious and always faulty, she should early learn to submit to injustice and to suffer the wrongs inflicted on her by her husband without complaint; she must be gentle for her own sake, not his. Bitterness and obstinacy only multiply the sufferings of the wife and the misdeeds of the husband; the man feels that these are not the weapons to be used against him. Heaven did not make women attractive and persuasive that they might degenerate into bitterness, or meek that they should desire the mastery; their soft voice was not meant for hard words, nor their delicate features for the frowns of anger. When they lose their temper they forget themselves; often enough they have just cause of complaint; but when they scold they always put themselves in the wrong. We should each adopt the tone which befits our sex; a soft-hearted husband may make an overbearing wife, but a man, unless he is a perfect monster, will sooner or later yield to his wife's gentleness, and the victory will be hers.

这种习惯性的约束使女人形成了一种终身具备的温顺品质。因为她永远隶属于男人或男人的评判，而且她的想法永远无法摆脱男人所

做的评判的影响。女人最应该具备的品质是温柔。她生来就要服从有那么多缺点、不完美的男人，那她很早就要学会毫无怨言地服从丈夫强加的所有不公。她必须这样温柔并不是为了丈夫，而是为了她自己。她的尖酸和顽固只会徒增她自己的痛苦和她丈夫的罪恶。男人会感觉到这些不是用来对抗他的武器。上帝赋予女人魅力和信服力并不是为了使她们变得尖酸，赋予她们温顺的样子也不是为了使她们渴望控制一切，赋予她们柔和的嗓音也不是让她们骂人的，赋予她们精巧的五官也不是让她们在生气时怒目圆瞪的。当她们发脾气时，她们就失去了自我。虽然时常有足够的理由抱怨，但如果她们总是骂人，那就是她们的不对了。我们每一个男人都应该保持适合男性的语调。一个懦弱的丈夫也许会造就一个专横的妻子。但是一个男人，除非他是一个完美的怪物，否则他迟早会臣服于妻子的温柔，最终的胜利就是女人的了。

Daughters must always be obedient, but mothers need not always be harsh. To make a girl docile you need not make her miserable; to make her modest you need not terrify her; on the contrary, I should not be sorry to see her allowed occasionally to exercise a little ingenuity, not to escape punishment for her disobedience, but to evade the necessity for obedience. Her dependence need not be made unpleasant, it is enough that she should realise that she is dependent. Cunning is a natural gift of woman, and so convinced am I that all our natural inclinations are right, that I would cultivate this among others, only guarding against its abuse.

女儿们必须要顺从听话，但是母亲们却不需要总是那么严厉。要使一个女孩顺从于你，并不需要折磨她；要使一个女孩谦逊有礼，并不需要恐吓她。相反，我并不介意她偶尔玩弄一点伎俩，只要她这样做不是为了逃避不服从而招致的惩罚，而是为了躲避服从的必要性。

我们并不需要迫使她不快地依赖于人，只要她意识到她必须依赖于别人就足够了。狡黠是女人的自然天赋。我深信所有自然的倾向都是正确的。我会在其他的天赋中同样培养她的这种禀赋，只是要防止她们滥用。

For the truth of this I appeal to every honest observer. I do not ask you to question women themselves, our cramping institutions may compel them to sharpen their wits; I would have you examine girls, little girls, newly-born so to speak; compare them with boys of the same age, and I am greatly mistaken if you do not find the little boys heavy, silly, and foolish, in comparison. Let me give one illustration in all its childish simplicity.

我呼吁每一个坦诚的观察者研究这个看法的真实性。我并不是让你们去质问成年妇女。我们的限制规定可能已经使她们更加机智了。我希望你们研究女孩，研究小女孩，可以说新生儿。将她们和同龄的男孩做比较。要是你们没有发现相比之下男孩显得更笨重、更迟钝的话，就证明我的看法是大错特错的。让我从十分稚气天真的做法中举一个例子。

Children are commonly forbidden to ask for anything at table, for people think they can do nothing better in the way of education than to burden them with useless precepts; as if a little bit of this or that were not readily given or refused without leaving a poor child dying of greediness intensified by hope. Every one knows how cunningly a little boy brought up in this way asked for salt when he had been overlooked at table. I do not suppose any one will blame him for asking directly for salt and indirectly for meat; the neglect was so cruel that I hardly think he would have been punished had

he broken the rule and said plainly that he was hungry. But this is what I saw done by a little girl of six; the circumstances were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not only was she strictly forbidden to ask for anyth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ut disobedience would have been unpardonable, for she had eaten of every dish; one only had been overlooked, and on this she had set her heart. This is what she did to repair the omission without laying herself open to the charge of disobedience; she pointed to every dish in turn, saying, “I've had some of this; I've had some of this;” however she omitted the one dish so markedly that some one noticed it and said, “Have not you had some of this?” “Oh, no,” replied the greedy little girl with soft voice and downcast eyes. These instances are typical of the cunning of the little boy and girl.

通常我们不允许孩子在餐桌上要任何东西，因为人们认为将一些毫无用处的规矩强加给孩子是最好的教育手段。所以一个可怜的孩子想要一样东西而不表现出极其渴望的样子，就不马上给他或者就不给他。大家都知道，一个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小男孩，如果他在吃饭的时候想要盐，却被大家忽视，他会多么巧妙地向大人索要。我不认为有任何人会指责他表面上要盐，实际上要肉。忽视是非常残忍的，我认为就算他打破了规则，清楚地表明自己饿了，也不会受到惩罚。但是我亲眼看到一个六岁的小女孩这样做了，可当时的情况却艰难得多。因为她不仅被禁止直接或间接地索要东西，而且不服从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她尝过了每一道菜，只有一份菜忘了给她，可恰恰是她喜欢的。为了弥补大家对她的疏忽，而又不被扣上不听话的帽子，她依次指着每一道菜，说：“这个我吃过了；这个我也吃过了。”然而当轮到没漏掉的那盘时，她故意明显地跳过了那道菜，因此有人发现了就问她：“这个你没吃过吗？”“哦，没有”贪吃的小女孩用柔和的声音回答，把眼睛低了下去。这些例子体现了非常典型的男孩和女孩不同的机智做法。

What is, is good, and no general law can be bad. This special skill with which the female sex is endowed is a fair equivalent for its lack of strength; without it woman would be man's slave, not his helpmeet. By her superiority in this respect she maintains her equality with man, and rules in obedience. She has everything against her, our faults and her own weakness and timidity; her beauty and her wiles are all that she has. Should she not cultivate both? Yet beauty is not universal; it may be destroyed by all sorts of accidents, it will disappear with years, and habit will destroy its influence. A woman's real resource is her wit; not that foolish wit which is so greatly admired in society, a wit which does nothing to make life happier; but that wit which is adapted to her condition, the art of taking advantage of our position and controlling us through our own strength. Words cannot tell how beneficial this is to man, what a charm it gives to the society of men and women, how it checks the petulant child and restrains the brutal husband; without it the home would be a scene of strife; with it, it is the abode of happiness. I know that this power is abused by the sly and the spiteful; but what is there that is not liable to abuse? Do not destroy the means of happiness because the wicked use them to our hurt.

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好的。没有哪个一般法则是有害的。女性天生所具有的这一特殊技能很好地弥补了她们体力上的不足。要是没有这一技能，女人就会沦为男人的奴隶，而不是他的伴侣。在这一方面的优越性保证了她与男性的平等地位，使得她表面上是服从于男人，实际上统治着他。有很多东西对她不利。比如我们男人的缺点、她自身的软弱和胆怯。她的美貌和才智是她所有的有利条件。她难道不应该培养才智，修饰容貌吗？然而美貌并不是女人普遍拥有的，它也许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意外而损毁。随着年岁的增长，美貌也会消逝。习惯的不同也会破坏美的效果。一个女人真正的资本在于她的智慧。我

指的不是社会中广泛推崇的那种对增添生活幸福感无益的、实际上很愚蠢的小聪明，而是指与她的情况相适应，利用我们的地位并通过我们的长处来控制我们的艺术。言语无法表达女人的智慧对男人来说益处多大，它使男女的社交多么有魅力，它是如何抑制孩子的坏脾气和约束丈夫的蛮横无理。如果没有了它，一个家庭就会争吵不休；有了它，家庭就会幸福美满。我知道这种机智会被阴险狡诈之人滥用，不过这世上有什么是不被滥用的呢？我们不能因为缺德的人滥用寻求幸福的手段，对我们造成伤害，我们就毁灭它。

The toilet may attract notice, but it is the person that wins our hearts. Our finery is not us; its very artificiality often offends, and that which is least noticeable in itself often wins the most attention. The education of our girls is, in this respect, absolutely topsy-turvy. Ornaments are promised them as rewards, and they are taught to delight in elaborate finery. “How lovely she is!” people say when she is most dressed up. On the contrary, they should be taught that so much finery is only required to hide their defects, and that beauty's real triumph is to shine alone. The love of fashion is contrary to good taste, for faces do not change with the fashion, and while the person remains unchanged, what suits it at one time will suit it always.

一个女人的梳妆打扮也许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要真正赢得别人的喜爱，还是得靠内在品质。华丽优雅的服饰不代表我们自身。过于华丽造作反而显得更难看，最不起眼的东西往往能赢得最多的关注。我们在这一方面对女孩的教育一定是错误的。我们用化妆品作为奖励，教她们热爱精致的华服。“她是多么美丽啊！”当她盛装打扮的时候，人们会这么说。相反，我们应该告诉她们华丽服饰只是用来掩盖她们的缺点的。真正的美丽，是它本身就熠熠闪光。热爱时髦与好的风气是相悖的，因为容貌不随时尚发生改变。既然一个人的容貌保

持不变，那从前适合她的东西也会一直适合她。

If I saw a young girl decked out like a little peacock, I should show myself anxious about her figure so disguised, and anxious what people would think of her; I should say, “She is over-dressed with all those ornaments; what a pity! Do you think she could do with something simpler? Is she pretty enough to do without this or that?” Possibly she herself would be the first to ask that her finery might be taken off and that we should see how she looked without it. In that case her beauty should receive such praise as it deserves. I should never praise her unless simply dressed. If she only regards fine clothes as an aid to personal beauty, and as a tacit confession that she needs their aid, she will not be proud of her finery, she will be humbled by it; and if she hears some one say, “How pretty she is,” when she is smarter than usual, she will blush for shame.

如果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打扮得像个小孔雀，我会对她如此伪装的样子表示担忧，担心别人会怎么看她。我会说：“她的装饰有些过度了，真遗憾！你看她是不是可以装扮得更简单一些呢？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装饰，是不是也已经够美了呢？”也许她自己会首先要求拿掉这些装饰，这样我们能知道她真正的样子。这样的话，她的美貌才会受到应得的赞美。要不是她简单打扮，我绝不会表扬她。如果她知道精致的服饰只是提升个人美貌，穿了就等于坦白地承认她需要这些的辅助，那么她不但不会对自己的装扮感到自豪，反而会感到不好意思。要是她穿得比平时时髦，听到有人说“她多美啊”，她会羞愧得面红耳赤。

Moreover, though there are figures that require adornment there are none that require expensive clothes. Extravagance in dress

is the folly of the class rather than the individual, it is merely conventional. Genuine coquetry is sometimes carefully thought out, but never sumptuous, and Juno dressed herself more magnificently than Venus. “As you cannot make her beautiful you are making her fine,” said Apelles to an unskilful artist who was painting Helen loaded with jewellery. I have also noticed that the smartest clothes proclaim the plainest women; no folly could be more misguided. If a young girl has good taste and a contempt for fashion, give her a few yards of ribbon, muslin, and gauze, and a handful of flowers, without any diamonds, fringes, or lace, and she will make herself a dress a hundredfold more becoming than all the smart clothes of La Duchapt.

再者，虽然有一些人需要装饰，但没有人是必须用昂贵的衣服来做装饰。过分打扮是上流社会特有的愚蠢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只不过是传统罢了。要想打扮得真正美艳，是需要花一番心思的，但是绝对不需要奢侈品。朱诺就比维纳斯穿得更好看。“因为你不能把她的容貌画得很美，所以你把她画成打扮得很美丽的人。”阿佩利斯对一个技艺不纯熟的画家说，画家正在画海伦，并在她身上增添了很多珠宝。我还发现女人穿戴得最漂亮，就表明她本身非常普通。再没有比这更愚蠢的行为了。如果一个女孩有好的品味，不追逐时髦，那她就算没有宝石、彩缎或者蕾丝，只给她一些丝带、细布、薄纱、一捧花，她给自己做的衣服也要比拉杜沙做的华贵服装好看百倍。

Good is always good, and as you should always look your best, the women who know what they are about select a good style and keep to it, and as they are not always changing their style they think less about dress than those who can never settle to any one style. A genuine desire to dress becomingly does not require an elaborate toilet. Young girls rarely give much time to dress;

needlework and lessons are the business of the day; yet, except for the rouge, they are generally as carefully dressed as older women and often in better taste. Contrary to the usual opinion, the real cause of the abuse of the toilet is not vanity but lack of occupation. The woman who devotes six hours to her toilet is well aware that she is no better dressed than the woman who took half an hour, but she has got rid of so many of the tedious hours and it is better to amuse oneself with one's clothes than to be sick of everything. Without the toilet how would she spend the time between dinner and supper. With a crowd of women about her, she can at least cause them annoyance, which is amusement of a kind; better still she avoids a tete-a-tete with the husband whom she never sees at any other time; then there are the tradespeople, the dealers in bric-a-brac, the fine gentlemen, the minor poets with their songs, their verses, and their pamphlets; how could you get them together but for the toilet. Its only real advantage is the chance of a little more display than is permitted by full dress, and perhaps this is less than it seems and a woman gains less than she thinks. Do not be afraid to educate your women as women; teach them a woman's business, that they be modest, that they may know how to manage their house and look after their family; the grand toilet will soon disappear, and they will be more tastefully dressed.

好的东西永远是好的。就像你总是要呈现最美的一面，凡是了解自己的女人都会选定一个最好的风格，然后就一直保持。因为她们不怎么变换风格，所以不像那些风格不定的人，她们不怎么考虑服装。真正想要穿着得体的人并不需要很复杂的装扮。年轻女孩们很少花时间打扮，针线活和功课就够她们忙活一天了。然而，除了不抹胭脂口红之外，她们一般都像妇女精心打扮，而且更有品位。和普通观点相反，女人过分爱打扮不是因为虚荣心，而是因为没有事做。花六个小时梳妆打扮的女人清楚得明白她并不比只花半小时打扮的女人好看，

但是她这样做就可以打发许多无聊的时间。以此自我消遣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要是不梳妆打扮，她不知道该如何度过从晚餐后到夜点心这段时间。有一群女人围着她，她至少可以找她们的麻烦，这也是一种消遣。更好的是，她可以避免和只有这个时间才能看见的丈夫碰面。于是，商人们、古玩店主、绅士们、小诗人带着自己的诗歌就都来了。要不是梳妆打扮，怎么可能把这些人聚在一起。它唯一的真正好处就是这样可能比穿礼服更好看一些。但是这个好处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女人也得不到像她所想的那样。不要担心将女人培养成真正的女人，教会他们女人的工作，教她们要谦逊，要知道如何操持家务、照顾家人。很快她们就会抛弃浓妆艳抹，穿着得更有品位。

Growing girls perceive at once that all this outside adornment is not enough unless they have charms of their own. They cannot make themselves beautiful, they are too young for coquetry, but they are not too young to acquire graceful gestures, a pleasing voice, a self-possessed manner, a light step, a graceful bearing, to choose whatever advantages are within their reach. The voice extends its range, it grows stronger and more resonant, the arms become plumper, the bearing more assured, and they perceive that it is easy to attract attention however dressed. Needlework and industry suffice no longer, fresh gifts are developing and their usefulness is already recognised.

成长中的女孩立即会意识到，徒有外在的装饰，而自身内在不美丽的话，是不够的。她们不能把自己变得美丽，她们太小，还不会打扮。但是她们能够做到举止优雅、声音动听、稳重沉着、步履轻盈、仪态端庄，能够选择任何她们能够学习的优势。只要她们的声音更加洪亮、双臂更加丰满、举止更加稳重，她们就会意识到无论穿什么，她们都能轻易地吸引别人注意。会做针线活且勤劳已经不够了，年轻女孩在成长，她们的作用已经得到认可了。

I know that stern teachers would have us refuse to teach little girls to sing or dance, or to acquire any of the pleasing arts. This strikes me as absurd. Who should learn these arts—our boys? Are these to be the favourite accomplishments of men or women? Of neither, say they; profane songs are simply so many crimes, dancing is an invention of the Evil One; her tasks and her prayers we all the amusement a young girl should have. What strange amusements for a child of ten! I fear that these little saints who have been forced to spend their childhood in prayers to God will pass their youth in another fashion; when they are married they will try to make up for lost time. I think we must consider age as well as sex; a young girl should not live like her grandmother; she should be lively, merry, and eager; she should sing and dance to her heart's content, and enjoy all the innocent pleasures of youth; the time will come, all too soon, when she must settle down and adopt a more serious tone.

我知道严厉的老师是不愿意教小女孩唱歌跳舞，或是任何惹人喜爱的艺术的。这让我觉得很荒谬。那谁应该学这些艺术呢——男生吗？这些应该是属于男人的成就呢，还是女人的成就呢？都不是，他们说。唱粗俗的歌曲就相当于犯罪，跳舞是魔鬼想出来的。一个年轻女生的全部消遣只能是她的工作和祷告。一个十岁的孩子拿这些当消遣，多么奇怪啊！这些小圣徒被迫在童年时期一直向上帝祷告，我担心她们在青年时期就会完全不一样。当她们结婚以后，她们会想尽办法弥补自己所失去的时间。我认为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年龄和性别。一个年轻的女孩不应该像她的祖母一样生活。她应该活得快乐、充满活力、热情洋溢。她应该自在地唱歌跳舞，享受青年时期一切无邪的快乐。她们必须变得稳重大方、态度端庄的时候，就快来了。

But is this change in itself really necessary? Is it not merely

another result of our own prejudices? By making good women the slaves of dismal duties, we have deprived marriage of its charm for men. Can we wonder that the gloomy silence they find at home drives them elsewhere, or inspires little desire to enter a state which offers so few attractions? Christianity, by exaggerating every duty, has made our duties impracticable and useless; by forbidding singing, dancing, and amusements of every kind, it renders women sulky, fault-finding, and intolerable at home. There is no religion which imposes such strict duties upon married life, and none in which such a sacred engagement is so often profaned. Such pains has been taken to prevent wives being amiable, that their husbands have become indifferent to them. This should not be, I grant you, but it will be, since husbands are but men. I would have an English maiden cultivate the talents which will delight her husband as zealously as the Circassian cultivates the accomplishments of an Eastern harem. Husbands, you say, care little for such accomplishments. So I should suppose, when they are employed, not for the husband, but to attract the young rakes who dishonour the home. But imagine a virtuous and charming wife, adorned with such accomplishments and devoting them to her husband's amusement; will she not add to his happiness? When he leaves his office worn out with the day's work, will she not prevent him seeking recreation elsewhere? Have we not all beheld happy families gathered together, each contributing to the general amusement? Are not the confidence and familiarity thus established, the innocence and the charm of the pleasures thus enjoyed, more than enough to make up for the more riotous pleasures of public entertainments?

但是这样的改变真的是必要的吗？是否仅仅又是我们偏见的结果呢？我们为了创造好女人，将她们变成清规戒律的奴隶，其实我们也

使婚姻对于男人来说变得毫无魅力。他们觉得家里过于压抑沉寂，于是去别的地方；或者家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激不起他丝毫兴趣。我们会觉得奇怪吗？基督教过分强调了每一项义务，从而使得我们的义务毫无用处且难以实践。它禁止妇女唱歌、跳舞以及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从而使得她们在家里变得郁郁寡欢、吹毛求疵，让人难以忍受。没有宗教会给婚姻生活强加如此严苛的戒律，也没有哪一种宗教会这样经常亵渎神圣的婚约。我们用这样的办法使妻子无法变得温柔，使得她们的丈夫也对她们冷漠不已。虽然不应该有这种情形，但我向你保证，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因为丈夫都是男人。我会让一个英国少女培养一种本领，使她未来的丈夫高兴，就像切尔克斯人学习东方妃嫔的本领一样。你们说，做丈夫的根本不关心这些本领。我也这样认为。如果她们做这些不是为了吸引丈夫，那就是为了勾引年轻放荡的男子，使她们家蒙羞。但是想象一下，一个迷人而贞洁的妻子，拥有这些本领，并用来取悦她的丈夫，不是可以提升他的幸福感吗？当他被一天的工作折磨得疲惫不堪，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她不是可以防止他去别处寻求消遣放松吗？我们不是都见过幸福的家庭吗？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为共同的快乐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家人间彼此的信任和了解不就建立了吗？不就可以享受天真无邪的快乐了吗？难道这不比公众场合那些喧闹的娱乐好很多吗？

Pleasant accomplishments have been made too formal an affair of rules and precepts, so that young people find them very tedious instead of a mere amusement or a merry game as they ought to be. Nothing can be more absurd than an elderly singing or dancing master frowning upon young people, whose one desire is to laugh, and adopting a more pedantic and magisterial manner in teaching his frivolous art than if he were teaching the catechism. Take the case of singing; does this art depend on reading music; cannot the voice be made true and flexible, can we not learn to sing with taste and even to play an accompaniment without knowing a note? Does the same kind of singing suit all voices alike? Is the same method

adapted to every mind? You will never persuade me that the same attitudes, the same steps, the same movements, the same gestures, the same dances will suit a lively little brunette and a tall fair maiden with languishing eyes. So when I find a master giving the same lessons to all his pupils I say, “He has his own routine, but he knows nothing of his art!”

人们将各种技能变成了太形式化的规章戒律，以至于年轻人不觉得这本应只是娱乐或是快乐的游戏，反而觉得是非常令人生厌的东西。最荒谬的事，就是一个年老的歌唱老师或舞蹈老师皱着眉看年轻人嬉笑打闹，用一种比讲授教义手册还要迂腐严肃的方式讲授他那些毫无价值的学问。就拿唱歌来说，这项艺术非要依靠于看乐谱吗？我们的歌声就不能真实灵活一些吗？我们就不能学着唱得更有韵味一些吗？就不能在不知道音符的情况下也会伴奏吗？同样的歌适合所有的嗓音吗？同样的唱法适合每一个人吗？你永远都无法说服我，同样的姿态、同样的舞步、同样的动作、同样的手势、同样的舞蹈既适合一个活力四射的棕色头发的小姑娘跳，也适合一个闷闷不乐的高挑美丽少女跳。因此当我看到一个老师一模一样地给他所有的学生上课时，我会说：“他有自己的章法，但他根本不懂这门艺术！”

Should young girls have masters or mistresses? I cannot say; I wish they could dispense with both; I wish they could learn of their own accord what they are already so willing to learn. I wish there were fewer of these dressed-up old ballet masters promenading our streets. I fear our young people will get more harm from intercourse with such people than profit from their instruction, and that their jargon, their tone, their airs and graces, will instil a precocious taste for the frivolities which the teacher thinks so important, and to which the scholars are only too likely to devote themselves.

年轻女孩应该请男老师教还是女老师教？我说不好。我希望两者都有，希望她们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我希望能够少一些盛装打扮的芭蕾舞老教师在街道上闲逛。恐怕我们的年轻人同这些人交往，不仅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带来更多的害处。他们的行话、语调、态度和气质都会使学生渐渐喜欢上一些无聊的活动。老师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学生也极容易投入其中。

Where pleasure is the only end in view, any one may serve as teacher—father, mother, brother, sister, friend, governess, the girl's mirror, and above all her own taste. Do not offer to teach, let her ask; do not make a task of what should be a reward, and in these studies above all remember that the wish to succeed is the first step. If formal instruction is required I leave it to you to choose between a master and a mistress. How can I tell whether a dancing master should take a young pupil by her soft white hand, make her lift her skirt and raise her eyes, open her arms and advance her throbbing bosom? but this I know, nothing on earth would induce me to be that master.

在所有快乐是唯一目的的艺术中，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老师——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朋友、保姆、女孩的镜子，尤其是她自己的感受。不要主动教她们东西，而是让她自己问。不要把一件本该是奖励的事变成一样差事。学习这些东西尤其要记住，希望成功，就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如果要求正规授课的话，在男老师还是女老师的问题上，我留给你自己选择。我怎么知道一个男舞蹈老师是否可以牵起年轻女学生白嫩的手，让她掀起裙子抬起眼睛，张开双臂，把跳动的胸部靠近他？但我知道的是，这世上没有任何事可以引诱我成为那个男老师。

Taste is formed partly by industry and partly by talent, and by its means the mind is unconsciously opened to the idea of beauty of every kind, till at length it attains to those moral ideas which are so closely related to beauty. Perhaps this is one reason why ideas of propriety and modesty are acquired earlier by girls than by boys, for to suppose that this early feeling is due to the teaching of the governesses would show little knowledge of their style of teaching and of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mind. The art of speaking stands first among the pleasing arts; it alone can add fresh charms to those which have been blunted by habit. It is the mind which not only gives life to the body, but renews, so to speak, its youth; the flow of feelings and ideas give life and variety to the countenance, and the conversation to which it gives rise arouses and sustains attention, and fixes it continuously on one object. I suppose this is why little girls so soon learn to prattle prettily, and why men enjoy listening to them even before the child can understand them; they are watching for the first gleam of intelligence and sentiment.

审美力是由勤奋和才能形成的。一旦有了审美力，人们的心门就会不自觉地向各种各样的美敞开，直到最后接受和美密切关联的道德观念。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女生比男生更早具有规矩和谦逊的观念的原因之一。假设这早期的观念是家庭女教师教育的结果，那就表明了你对她们的教育风格和人类心灵的自然发展知之甚少。在使人愉悦的艺术中，说话艺术占据第一位。只有它可以为那些变得愚钝的东西增添新的乐趣。心灵不仅使身体富有生气，而且可以说继续了它的青春。源源不断的感受和想法使我们的面容富有生气和变化。心灵的对话也激起了人们的注意力，并使其持续集中于一个目标。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女孩这么快就学会闲聊一些惹人开心的话题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孩子理解她们之前，男人就乐于听她们说话的原因，他们正在观察这种才智和情感最开始展现的时刻。

Women have ready tongues; they talk earlier, more easily, and more pleasantly than men. They are also said to talk more; this may be true, but I am prepared to reckon it to their credit; eyes and mouth are equally busy and for the same cause. A man says what he knows, a woman says what will please; the one needs knowledge, the other taste; utility should be the man's object; the woman speaks to give pleasure. There should be nothing in common but truth.

女人拥有灵活的舌头，她们很早就学会了说话，比男人学得更容易、说得更好听。据说她们说得也更多，这也许是真的。但是我准备赞扬她们，因为眼睛和嘴巴所进行的是活动是同样忙碌的，理由也是相同的。男人说他知道的事情，女人说别人听了会高兴的事情。前者需要具备知识，后者则需要有趣味。男人说话的目的是在于有用，而女人则在于取悦别人。除了真实之外，没有别的共同之处。

You should not check a girl's prattle like a boy's by the harsh question, “What is the use of that?” but by another question at least as difficult to answer, “What effect will that have?” At this early age when they know neither good nor evil, and are incapable of judging others, they should make this their rule and never say anything which is unpleasant to those about them; this rule is all the more difficult to apply because it must always be subordinated to our first rule, “Never tell a lie.”

你不应该像对付男孩子一样，用“那有什么用”这样严厉的问题去打断女孩的闲聊。而应该用另一个同样难回答的问题：“这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在这么小的年纪，她们既不会分辨善恶好坏，也没有

能力评判别人，她们绝不能说任何别人不乐意听到的话，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准则。这一准则很难实践，因为它必须永远从属于我们的第一准则：“绝不撒谎。”

I can see many other difficulties, but they belong to a later stage. For the present it is enough for your little girls to speak the truth without grossness, and as they are naturally averse to what is gross, education easily teaches them to avoid it. In social intercourse I observe that a man's politeness is usually more helpful and a woman's more caressing. This distinction is natural, not artificial. A man seeks to serve, a woman seeks to please. Hence a woman's politeness is less insincere than ours, whatever we may think of her character; for she is only acting upon a fundamental instinct; but when a man professes to put my interests before his own, I detect the falsehood, however disguised. Hence it is easy for women to be polite, and easy to teach little girls politeness. The first lessons come by nature; art only supplements them and determines the conventional form which politeness shall take. The courtesy of woman to woman is another matter; their manner is so constrained, their attentions so chilly, they find each other so wearisome, that they take little pains to conceal the fact, and seem sincere even in their falsehood, since they take so little pains to conceal it. Still young girls do sometimes become sincerely attached to one another. At their age good spirits take the place of a good disposition, and they are so pleased with themselves that they are pleased with every one else. Moreover, it is certain that they kiss each other more affectionately and caress each other more gracefully in the presence of men, for they are proud to be able to arouse their envy without danger to themselves by the sight of favours which they know will arouse that envy.

我可以看到很多其他困难，但是是以后才会遇到的。目前来说，女孩能够说真话而不显粗鲁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她们自然会反对粗俗的东西，通过教育就可以轻易使她们避免这一点。在社会交往中，我发现男人的礼貌更多表现为乐于助人，而女人则表现为亲切关爱。这一区别是天然的，而不是人为的。男人处处寻求为人效劳的机会，而女人则处处寻找使人愉悦的机会。因此不论我们怎么看待她的性格，女人的礼貌总是比男人的更真诚，因为她只是出于原始的本能。但是当一个男人声称将我的利益置于他自身利益之上的时候，无论怎么伪装，我都能觉察出他在撒谎。因此女性变得礼貌，教她们礼貌待人是很容易的。第一堂课来源于天性。后天培养只是一种补充，来确定讲礼貌应该遵循的固有形式（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顺着天性的发展，继续对她们进行教育，使她们按照我们的习惯而表现其对人的礼貌）。女人对女人的礼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她们的相处方式非常拘束，显得比较冷淡。她们彼此又非常厌烦，以至于都不愿掩盖这一事实，由于她们丝毫不掩饰，所以虚假中又似乎显得真诚，然而年轻女孩之间有时还是会有真诚的友谊的。在她们的年纪，善良的心灵取代了好性格，她们对自己非常满意，从而也就对所有人都满意。此外，可以确定的是，在男人面前，她们彼此亲吻和拥抱就会亲切优雅。因为虽然她们知道会引起男人的妒忌，但还是为这种亲热的场面不会危及自身，而会激起男人嫉妒而感到自豪。

If young boys must not be allowed to ask unsuitable questions, much more must they be forbidden to little girls; if their curiosity is satisfied or unskilfully evaded it is a much more serious matter, for they are so keen to guess the mysteries concealed from them and so skilful to discover them. But while I would not permit them to ask questions, I would have them questioned frequently, and pains should be taken to make them talk; let them be teased to make them speak freely, to make them answer readily, to loosen mind and tongue while it can be done without danger. Such conversation always leading to merriment, yet skilfully controlled and directed,

would form a delightful amusement at this age and might instil into these youthful hearts the first and perhaps the most helpful lessons in morals which they will ever receive, by teaching them in the guise of pleasure and fun what qualities are esteemed by men and what is the true glory and happiness of a good woman.

如果我们不允许年轻男孩问一些不恰当的问题，那就更应该禁止女孩问。如果她们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或是笨拙地躲避她们的好奇心，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她们总是热衷于猜测隐藏着的秘密，并且非常善于发现秘密。可是，虽然我不允许她们问这问那，但我会让别人频繁向她们提问，想尽办法让她们多说话。让别人嘲笑她们，从而使得她们可以自如、轻松地应答，在不会造成任何危害的时候激发她们的思维和口才。这样的对话只要巧妙地引导和控制，就会进行得很轻松愉快。它使这个年纪的女孩感到乐趣，并且给这些年轻的心都灌输了一生都要遵循的第一堂，也可能是最有益的一堂道德教育课，用轻松有趣的方式教会她们什么的品质是受男人尊敬的，一个优秀的女人拥有怎样的荣光和幸福。

If boys are incapable of forming any true idea of religion, much more is it beyond the grasp of girls; and for this reason I would speak of it all the sooner to little girls, for if we wait till they are ready for a serious discussion of these deep subjects we should be in danger of never speaking of religion at all. A woman's reason is practical, and therefore she soon arrives at a given conclusion, but she fails to discover it for herself. The social relation of the sexes is a wonderful thing. This relation produces a moral person of which woman is the eye and man the hand, but the two are so dependent on one another that the man teaches the woman what to see, while she teaches him what to do. If women could discover principles and if men had as good heads for detail, they would be mutually

independent, they would live in perpetual strife, and there would be an end to all society. But in their mutual harmony each contributes to a common purpose; each follows the other's lead, each commands and each obeys.

如果男孩无法形成任何宗教观念的话，女孩就更不能理解了。为此，我认为要尽早把宗教的观念灌输给小女孩。因为如果我们等她们准备好了，才跟她们严肃地谈论这些深刻的话题的话，恐怕我们就永远都无法告诉她们了。女性的理智是偏实际的，因此她很快就能得出一个既定的结论，但却无法自己发现。两性的社会关系是一件很奇妙的事。这种关系产生了一种道德行为者，女人是他的眼睛，男人则是他的手。但是由于他们两者极其相互依赖，所以男人教女人看些什么，女人则教男人做些什么。如果女人能够发现原理，男人也能有细致的头脑的话，他们两者就能彼此互不依赖，永远生活在争吵之中，那所有的社会也将终结。但是当他们彼此和睦的时候，他们就会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努力，彼此都互相引导、互相指挥、互相服从。

As a woman's conduct is controlled by public opinion, so is her religion ruled by authority. The daughter should follow her mother's religion, the wife her husband's. Were that religion false, the docility which leads mother and daughter to submit to nature's laws would blot out the sin of error in the sight of God. Unable to judge for themselves they should accept the judgment of father and husband as that of the church.

就像一个女人的行为是受公众舆论控制的，她的信仰也是由有威严的人所决定的。女儿要跟从母亲的信仰，妻子要跟从丈夫的信仰。即便那种宗教是虚伪不正的，但顺从的本性使得母亲和女儿都服从于自然法则，从而在上帝面前掩盖了她们的罪恶。既然她们无法自行判

断，那就应该接受父亲和丈夫的评判作为教会的评判。

While women unaided cannot deduce the rules of their faith, neither can they assign limits to that faith by the evidence of reason; they allow themselves to be driven hither and thither by all sorts of external influences, they are ever above or below the truth. Extreme in everything, they are either altogether reckless or altogether pious; you never find them able to combine virtue and piety. Their natural exaggeration is not wholly to blame; the ill-regulated control exercised over them by men is partly responsible. Loose morals bring religion into contempt; the terrors of remorse make it a tyrant; this is why women have always too much or too little religion.

虽然女人无法独自推断信仰的法则，也无法用理性的证据来限制信仰，但是她们使得自己在各种各样的外部影响下被到处驱使，总是无法到达真理。她们任何事都要走极端，要么满不在乎，要么十分虔诚。你会发现她们永远都无法做到既明辩真假又真挚虔诚。这不能全怪她们天性夸张，一定程度上也怪男人不能正确驾驭她们。宽松的风气使得宗教遭受轻视，悔恨的恐惧又使宗教变得暴戾。这就是为什么女人的信仰总是太过火或太冷淡的原因。

As a woman's religion is controlled by authority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show her plainly what to believe than to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belief; for faith attached to ideas half-understood is the main source of fanaticism, and faith demanded on behalf of what is absurd leads to madness or unbelief. Whether our catechisms tend to produce impiety rather than fanaticism I cannot say, but I do know that they lead to one or other.

因为女人信仰的宗教是由有权威的人决定的，所以清楚地告诉她要相信什么比向她解释信仰的理由更重要。因为信仰一知半解的观念是导致盲信的重要原因。如果非要她们相信荒谬的东西，结果要么是过度狂热，要么是丝毫不信。我们的教义问答会导致不敬的行为还是狂热信仰，这我说不准。但是我知道它必将导致这两种中的一种。

“Per quem neutrum licet, nec tanquam in bello paratum esse, nec tanquam in pace securum.” —Seneca De Trang: Animi, cap. I. Be content to say your own prayers regularly in their presence, but do not compel them to join you. Let their prayers be short, as Christ himself has taught us. Let them always be said with becoming reverence and respect; remember that if we ask the Almighty to give heed to our words, we should at least give heed to what we mean to say.

首先，当你给女孩子讲解宗教的时候，千万不要使其变得阴郁无聊，也不要将其变成一项任务或是天职。因此，也绝对不要她们记住任何东西，甚至连祈祷文都不要背诵。你可以定期地在她们面前念你的祷文，但千万不要强迫她们加入你。就像基督教训的那样，使她们的祷文变得简短。在念祷文时，要让她们满怀崇敬、态度庄重。记住，既然要求全能的上帝留心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至少要注意自己要说的东西。

It does not much matter that a girl should learn her religion young, but it does matter that she should learn it thoroughly, and still more that she should learn to love it. If you make religion a burden to her, if you always speak of God's anger, if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you impose all sorts of disagreeable duties, duties which

she never sees you perform, what can she suppose but that to learn one's catechism and to say one's prayers is only the duty of a little girl, and she will long to be grown-up to escape, like you, from these duties. Example! Example! Without it you will never succeed in teaching children anything.

女孩是否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习宗教不怎么重要，但重要的是，她要学习得透彻。更重要的是她应该爱宗教。如果你将宗教变成她的负担，如果你总是告诉她上帝的怒气，如果你以宗教之名给她强加各种你自己根本没有履行过的义务，那她只会认为学习教义问答手册和做祷告只是小女孩的义务，只会渴望快点长大，像你一样，逃避这一切，要以身作则！以身作则！如果没有树立好的榜样，你永远不会成功教会孩子任何东西。

When you explain the Articles of Faith let it be by direct teaching, not by question and answer. Children should only answer what they think, not what has been drilled into them. All the answers in the catechism are the wrong way about; it is the scholar who instructs the teacher; in the child's mouth they are a downright lie, since they explain what he does not understand, and affirm what he cannot believe. Find me, if you can, an intelligent man who could honestly say his catechism. The first question I find in our catechism is as follows: “Who created you and brought you into the world?” To which the girl, who thinks it was her mother, replies without hesitation, “It was God.” All she knows is that she is asked a question which she only half understands and she gives an answer she does not understand at all.

当你讲解信仰信条的时候，你应该采用直接教学的方式，而不是

一问一答的形式。孩子们回答的应该只是她们所想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灌输给她们的东西。教义问答中的所有答案，效果都是适得其反，是学生反过来在指导老师。孩子口中说出来的东西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话，因为老师讲解的东西他们根本不懂，因为老师硬要他认可自己不相信的东西。如果你找到一个聪明的男人能够诚实地讲述教义问答，请告诉我。在我们的教义问答手册中，我找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创造了你，并把你带到这个世上？"女孩明明认为是她的母亲，却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上帝。"她所知道的，就是她被问了一个似懂非懂的问题，然后她给出了一个她完全不懂的答案。

I wish some one who really understands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minds would write a catechism for them. It might be the most useful book ever written, and, in my opinion, it would do its author no little honour. This at least is certain—if it were a good book it would be very unlike our catechisms.

我希望一个真正懂得孩子心灵成长过程的人可以为孩子们写一本教义问答手册。这也许会是一本最有用的书。而且我认为，这本书会给他的作者带来极大的荣耀。至少能够确定的是——如果它要成为一本好书，那它一定和我们现在的教义问答手册截然不同。

Such a catechism will not be satisfactory unless the child can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its own accord without having to learn the answers; indeed the child will often ask the questions itself. An example is required to make my meaning plain and I feel how ill equipped I am to furnish such an example. I will try to give some sort of outline of my meaning.

只有当一个孩子能够根据自己的想法回答其中的问题，而不需要学习规定的答案时，这本教义问答手册才能令人满意。当然，孩子们也可以时常质问问题本身。为了清楚表达我的意思，我应该给出一个样例。可是我觉得我的能力不足以给出这样的例子。我姑且试一试，以便大家对此有个大致的概念。

To get to the first question in our catechism I suppose we must begin somewhat after the following fashion.

关于我的教义问答手册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必须从如下的问法开始。

NURSE: Do you remember when your mother was a little girl?

老师：你还记得妈妈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吗？

CHILD: No, nurse.

孩子：不记得了，老师。

NURSE: Why not, when you have such a good memory?

老师：你的记忆力这么好，怎么不记得了呢？

CHILD: I was not alive.

孩子：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NURSE: Then you were not always alive!

老师：那你不是一直都在这个世上的！

CHILD: No.

孩子：我不是一直都在的。

NURSE: Will you live for ever!

老师：你会永远活下去吗？

CHILD: Yes.

孩子：会的。

NURSE: Are you young or old?

老师：你现在年轻还是已经老了？

CHILD: I am young.

孩子：我年纪还小。

NURSE: Is your grandmamma old or young?

老师：你的祖母现在是年轻还是老了？

CHILD: She is old.

孩子：她已经老了。

NURSE: Was she ever young?

老师：她曾经年轻过吗？

CHILD: Yes.

孩子：年轻过。

NURSE: Why is she not young now?

老师：那为什么她现在不年轻了呢？

CHILD: She has grown old.

孩子：因为她已经变老了。

NURSE: Will you grow old too?

老师：你也会变老吗？

CHILD: I don't know.

孩子：我不知道。

NURSE: Where are your last year's frocks?

老师：你去年穿得衣服哪儿去了？

CHILD: They have been unpicked.

孩子：它们已经被拆开了。

NURSE: Why!

老师：为什么！

CHILD: Because they were too small for me.

孩子：因为它们对我来说太小了。

NURSE: Why were they too small?

老师：为什么它们太小了？

CHILD: I have grown bigger.

孩子：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NURSE: Will you grow any more!

老师：你还会继续长大吗？

CHILD: Oh, yes.

孩子：啊，是的。

NURSE: And what becomes of big girls?

老师：长大了的女孩是什么样的呢？

CHILD: They grow into women.

孩子：她们变成了女人。

NURSE: And what becomes of women!

老师：那女人是什么样的呢？

CHILD: They are mothers.

孩子：她们成为了妈妈。

NURSE: And what becomes of mothers?

老师：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CHILD: They grow old.

孩子：她们变老了。

NURSE: Will you grow old?

老师：你会变老吗？

CHILD: When I am a mother.

孩子：等我当妈妈的时候。

NURSE: And what becomes of old people?

老师：老了的人是什么样的？

CHILD: I don't know.

孩子：我不知道。

NURSE: What became of your grandfather?

老师：你的祖父是什么样的？

CHILD: He died [2_3] .

孩子：他去世了 [3_3] 。

NURSE: Why did he die?

老师：他为什么会死？

CHILD: Because he was so old.

孩子：因为他太老了。

NURSE: What becomes of old people!

老师：老了的人是什么样的？

CHILD: They die.

孩子：他们会死。

NURSE: And when you are old——?

老师：那当你老的时候……？

CHILD: Oh nurse! I don't want to die!

孩子：哦，老师！我不想死！

NURSE: My dear, no one wants to die, and everybody dies.

老师：亲爱的，每个人不想死，可是每个人都要死。

CHILD: Why, will mamma die too!

孩子：为什么，妈妈也要死吗？

NURSE: Yes, like everybody else. Women grow old as well as men, and old age ends in death.

老师：是的，就像每个人一样。女人和男人一样，会变老，老了

以后就会死。

CHILD: What must I do to grow old very, very slowly?

孩子：我要怎么做才可以慢一点变老呢？

NURSE: Be good while you are little.

老师：在小的时候就要好好生活。

CHILD: I will always be good, nurse.

孩子：我会好好生活的，老师。

NURSE: So much the better. But do you suppose you will live for ever?

老师：那就更好了。但是你是不是认为你能够一直活着？

CHILD: When I am very, very old——

孩子：当我很老，很老的时候……

NURSE: Well?

老师：什么？

CHILD: When we are so very old you say we must die?

孩子：你说当一个人很老了以后就一定会死的？

NURSE: You must die some day.

老师：你总有一天会死的。

CHILD: Oh dear! I suppose I must.

孩子：天哪！我想我一定会死的。

NURSE: Who lived before you?

老师：你的前一辈是谁？

CHILD: My father and mother.

孩子：我的爸爸和妈妈。

NURSE: And before them?

老师：那他们的前一辈呢？

CHILD: Their father and mother.

孩子：他们的爸爸妈妈。

NURSE: Who will live after you?

老师：你的后一辈是谁？

CHILD: My children.

孩子：我的孩子们。

NURSE: Who will live after them?

老师：他们的后一辈呢？

CHILD: Their children.

孩子：他们的孩子。

In this way, by concrete examples, you will find a beginning and end for the human race like everything else—that is to say, a father and mother who never had a father and mother, and children who will never have children of their own.

按这样的方式，通过具体的例子，你就会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发现人类的起源和终结——也就是说，发现没有父母的父亲和母亲，和不再孕育子女的孩子。

It is only after a long course of similar questions that we are ready for the first question in the catechism; then alone can we put the question and the child may be able to understand it. But what a gap there is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definitions of the divine nature. When will this chasm be bridged? “God is a spirit.” “And what is a spirit?” Shall I start the child upon this difficult question of metaphysics which grown men find so hard to understand? These are no questions for a little girl to answer; if she asks them, it is as much or more than we can expect. In that case I should tell her quite simply, “You ask me what God is; it is not easy to say; we can neither hear nor see nor handle God; we can only know Him by His works. To learn what He is, you must wait till you know what He has done.”

只有在一长串类似的问题之后，我们才可以准备问教义问答中的第一个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问这个问题，孩子才有可能理解这个问题。但是从第一个问题，到第二个问题涉及神性的定义，这中间还有多大的间隔啊。什么时候才能连接起这个间隔呢？“上帝是一种精神。”“那精神是什么？”我要不要开始和孩子讨论这么困难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就连成年人都无法理解啊。这些问题不能让一个小女孩来回答。我们预期的最多也就是由她来问。在那种情况下，我会简单地告诉她：“你问我上帝是什么，这不容易回答。上帝是我们既听不见，又看不着、摸不到的，我们只有通过他所做的事了解他。要想知道他是谁，你必须首先要知道他做了什么。

If our dogmas are all equally true, they are not equally important. It makes little difference to the glory of God that we should perceive it everywhere, but it does make a difference to human society, and to every member of that society, that a man should know and do the duties which are laid upon him by the law of God, his duty to his neighbour and to himself. This is what we should always be teaching one another, and it is this which fathers and mothers are specially bound to teach their little ones. Whether a virgin became the mother of her Creator, whether she gave birth to God, or merely to a man into whom God has entered, whether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re of the same substance or of like substance only, whether the Spirit proceeded from one or both of these who are but one, or from both together, however important these questions may seem, I cannot see that it is any more necessary for the human race to come to a decision with regard to them than to know what day to keep Easter, or whether we should tell our beads, fast, and refuse to eat meat, speak Latin or French in church, adorn the walls with statues, hear or say mass, and have no wife of our own. Let each think as he pleases; I cannot see that it matters to any one but himself; for my own part it is no concern of mine. But

what does concern my fellow-creatures and myself alike is to know that there is indeed a judge of human fate, that we are all His children, that He bids us all be just, He bids us love one another, He bids us be kindly and merciful, He bids us keep our word with all men, even with our own enemies and His; we must know that the apparent happiness of this world is naught; that there is another life to come, in which this Supreme Being will be the rewarder of the just and the judge of the unjust. Children need to be taught these doctrines and others like them and all citizens require to be persuaded of their truth. Whoever sets his face against these doctrines is indeed guilty; he is the disturber of the peace, the enemy of society. Whoever goes beyond these doctrines and seeks to make us the slaves of his private opinions, reaches the same goal by another way; to establish his own kind of order he disturbs the peace; in his rash pride he makes himself the interpreter of the Divine, and in His name demands the homage and the reverence of mankind; so far as may be, he sets himself in God's place; he should receive the punishment of sacrilege if he is not punished for his intolerance.

就算我们的教义是一样真实的，那它们也不是同等重要的。这对我们处处都感知到的上帝的荣耀没多大影响，但是这对人类社会、对人类社会中的每一员影响重大。一个人应该认识并完成上帝的法律要求他对他自己和邻居应尽的义务。这就是我们要一直互相教育的东西，尤其是为人父母要把这一点教给他们的孩子。造物主的母亲是否是一个处女；是不是她生下了上帝；或者只是生下了一个男孩，而造物主进入了这个男孩，与他合体；圣父和圣子的本质是相同的还是仅仅相似；圣灵产生于他们中的一个，还是产生于两者。无论这些问题看起来有多重要，我认为人类能否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并不比我们是否知道哪一天纪念复活节，是否应该做祷告、做斋戒、不吃肉，在教堂说拉丁语还是法语，是否要在墙上装饰雕塑，在教堂是要做弥

撒还是听弥撒，是不是要娶妻子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大。一个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认为这和别人没有丝毫关系。至于我，我对它们也丝毫不关心。但是与我的同胞和我自身相关的是，每个人都应当知道人类的命运确实有一个主宰，我们都是他的孩子，他要求我们为人公正、彼此友爱、善良慈悲、恪守诺言，即使是和敌人或是和他立下的誓言，也要遵守。我们必须清楚，现世表面的幸福都是泡影，过了今生还有来世。在来世中，上帝对正直的人有所奖励，对不正义之人有所惩罚。我们应该把这些教义和类似的教义教给孩子们，所有的公民都要求信服其真理。无论是谁，只要违反这些教义就一定是有罪的。他是和平的破坏者，是全社会的公敌。谁要是背弃了这些教义，妄想我们臣服于他的个人看法，那结果也是一样的。为了建立属于他自己的秩序，他就破坏和平。他妄自尊大，认为自己是神圣上帝的代言人，并且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人们臣服于他，尊敬他。这样他就可以置于上帝的位置。他这种人就算不为他的不容异议受到惩罚，也应该为亵渎神灵而受到惩罚。

Give no heed, therefore, to all those mysterious doctrines which are words without ideas for us, all those strange teachings, the study of which is too often offered as a substitute for virtue, a study which more often makes men mad rather than good. Keep your children ever within the little circle of dogmas which are related to morality. Convince them that the only useful learning is that which teaches us to act rightly. Do not make your daughters theologians and casuists; only teach them such things of heaven as conduce to human goodness; train them to feel that they are always in the presence of God, who sees their thoughts and deeds, their virtue and their pleasures; teach them to do good without ostentation and because they love it, to suffer evil without a murmur, because God will reward them; in a word to be all their life long what they will be glad to have been when they appear in His presence. This is true religion; this alone is incapable of abuse,

impiety, or fanaticism. Let those who will, teach a religion more sublime, but this is the only religion I know.

因此，我们对那些神秘的教义大可置之不理，它们只是一些没有思想的空话。经常研究这些奇怪的教义会使人忽视道德。结果不仅没使人们变好，反而使他们成了疯子。让你的孩子只学几条涉及道德修养的教义。让他们相信，教导我们行为端正的教义才是真正有用的教义。不要让你的女儿成为神学家和诡辩家。有关天堂、上帝的这些事中，你只要告诉她们有助于人类变得善良的部分就可以。教导她们，让她们认识到上帝一直在她们面前，洞悉她们所有的想法、行为、美德和快乐；教导她们，做善事不是为了显摆，而是因为她们热爱，遭遇痛苦也不要抱怨，因为上帝一定会补偿她们。总之，在她们的一生中，始终要保持将来出现在上帝面前的那种愉快和喜悦。这是真正的宗教。只要有了它，就不会产生邪恶、不敬和狂妄的念头。让那些讲解更崇高的宗教的人讲解去吧，但这就是我唯一信仰的宗教。

Moreover, it is as well to observe that, until the age when the reason becomes enlightened, when growing emotion gives a voice to conscience, what is wrong for young people is what those about have decided to be wrong. What they are told to do is good; what they are forbidden to do is bad; that is all they ought to know: this shows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girls, even more than for boys, that the right people should be chosen to be with them and to have authority over them. At last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they begin to judge things for themselves, and that is the time to change your method of education.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年轻女孩的理智被启迪之前，日益增长的情感启发她们的良心之前，对她们来说，糟糕的事情就是她们周围

的人决定了哪些事是坏事。要求她们做的事都是好事，禁止她们做的事都是坏事，这就是她们应该知道的全部事情。这表明了对女孩来说，选择在她们身边的人和管教她们的人至关重要，比选择男孩子身边的人更重要。最后，她们能够自己做判断的时刻终会来临，这时候你就该改变自己的教育方法了。

Perhaps I have said too much already. To what shall we reduce the education of our women if we give them no law but that of conventional prejudice? Let us not degrade so far the set which rules over us, and which does us honour when we have not made it vile. For all mankind there is a law anterior to that of public opinion. All other laws should bend before the inflexible control of this law; it is the judge of public opinion, and only in so far as the esteem of men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law has it any claim on our obedience.

也许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如果我们将传统的偏见作为女性应该遵守的法则，那我们会怎么减少她们的教育呢？我们不能贬低支配我们的设定，只要我们败坏它，就会增添我们的荣光。对于全人类来说，在没有产生公众意见之前，存在着一条法则。其他所有的法则都要服从这一法则坚定不移的方向，因为它评判着舆论。只有当公众意见与它相一致的时候，才能得到尊重。

This law is our individual conscience. I will not repeat what has been said already; it is enough to point out that if these two laws clash, the education of women will always be imperfect. Right feeling without respect for public opinion will not give them that delicacy of soul which lends to right conduct the charm of social approval; while respect for public opinion without right feeling will

only make false and wicked women who put appearances in the place of virtue.

这个法则就是我们自己的良心。已经说过的东西，我就不重复了。我只指出一点就够了：如果这两者发生冲突，妇女所受的教育始终是有缺陷的。仅仅有良知而没有对公众看法的尊重，就不可能使她们拥有善良的心灵，用她们美好的行为赢得社会的认可；而仅仅尊重他人意见而没有良知，只会造就虚伪和邪恶的妇女，只注重外表而不顾内在美德。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cultivate a faculty which serves as judge between the two guides, which does not permit conscience to go astray and corrects the errors of prejudice. That faculty is reason. But what a crowd of questions arise at this word. Are women capable of solid reason; should they cultivate it, can they cultivate it successfully? Is this culture useful in relation to the functions laid upon them? Is it compatible with becoming simplicity?

因此，培养一种能够平衡好这两方面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既不会让良知迷失，又能够纠正偏见造成的错误。这种能力就是理性。但是一提到这个词，就会引出很多问题。女性具有健全的理智吗？她们应该培养理性吗？她们能够成功培养理性吗？培养理性是否对她们肩上的职责有所帮助呢？这与使她们变得质朴天真相一致吗？

The different ways of envisaging and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lead to two extremes; some would have us keep women indoors sewing and spinning with their maids; thus they make them nothing more than the chief servant of their master. Others, not content to

secure their rights, lead them to usurp ours; for to make woman our superior in all the qualities proper to her sex, and to make her our equal in all the rest, what is this but to transfer to the woman the superiority which nature has given to her husband? The reason which teaches a man his duties is not very complex; the reason which teaches a woman hers is even simpler. The obedience and fidelity which she owes to her husband, the tenderness and care due to her children, are such natural and self-evident consequences of her position that she cannot honestly refuse her consent to the inner voice which is her guide, nor fail to discern her duty in her natural inclination.

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不同，就会导致两个不同的极端。有人认为女人就应该在家里和女仆一起缝纫、纺纱。这就无异于将她们变成了男人的主要仆人。另一些人则不满足于她们现有的权利，带领她们来夺取我们的权利。在一切适合于女性的特点上让她们超越我们，在其他方面使她们与我们平等，这样做岂不是将大自然赋予丈夫的优越性转交给了女性吗？教会男人认识到他有义务保持理性并不复杂，教会女人认识到保持理性是自己的天职就更简单了。她对丈夫的服从忠诚、对孩子的亲切爱护，正是她的地位所产生的，自然且显而易见的结果。因此在她的自然倾向下，她不会真正拒绝听从内心良知的指导，也不会无法理解自己的义务。

I would not altogether blame those who would restrict a woman to the labours of her sex and would leave her in profound ignorance of everything else; but that would require a standard of morality at once very simple and very healthy, or a life withdrawn from the world. In great towns, among immoral men, such a woman would be too easily led astray; her virtue would too often be at the mercy of circumstances; in this age of philosophy, virtue must be

able to resist temptation; she must know beforehand what she may hear and what she should think of it.

我不会完全责备人们限定妇女只做自己分内之事，而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知，但是我会要求一个朴实健康的道德标准，或者是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在大城市里，四周围绕着不道德的男人，这样的女人就很容易被引入歧途。她的美德经常任由所处的环境所摆布。在这哲学的世纪里，美德必须要抵制诱惑。她必须预先知道她会听到些什么和她应该怎么看待它。

Moreover, in submission to man's judgment she should deserve his esteem; above all she should obtain the esteem of her husband; she should not only make him love her person, she should make him approve her conduct; she should justify his choice before the world, and do honour to her husband through the honour given to the wife. But how can she set about this task if she is ignorant of our institutions, our customs, our notions of propriety, if she knows nothing of the source of man's judgment, nor the passions by which it is swayed! Since she depends both on her own conscience and on public opinion, she must learn to know and reconcile these two laws, and to put her own conscience first only when the two are opposed to each other. She becomes the judge of her own judges, she decides when she should obey and when she should refuse her obedience. She weighs their prejudices before she accepts or rejects them; she learns to trace them to their source, to foresee what they will be, and to turn them in her own favour; she is careful never to give cause for blame if duty allows her to avoid it. This cannot be properly done without cultivating her mind and reason.

而且，服从于男人的评判，她就要取得男人的尊重，最重要的是赢得丈夫的尊重。她不应该仅仅让他爱她这个人，还应该让他认同她的行为。她应当在大庭广众之前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用人们给予她的荣耀来给她的丈夫增光添彩。但要是她不懂规定、习惯和礼数，不明白人们做评判的根源，也不知道影响评判的感情，那我们要如何让她开始这项任务呢？因为她同时依赖自己的良知和公众的舆论，所以她必须对这两者有所了解，并加以调和。只有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她才能将自己的良心放在第一位。她成为了自己的评判者。她自己决定何时应该接受服从，何时应该拒绝服从。在她决定接受或是拒绝人们的偏见之前，应该有所衡量。她学着追根溯源，预想它们的后果，使它们对自己有利。如果义务允许她这样做，她就要多加小心，以免落人话柄，遭人责难。如果不锻炼她的心灵和理智，她就无法做到这样。

I always come back to my first principle and it supplies the solution of all my difficulties. I study what is, I seek its cause, and I discover in the end that what is, is good. I go to houses where the master and mistress do the honours together. They are equally well educated, equally polite, equally well equipped with wit and good taste, both of them are inspired with the same desire to give their guests a good reception and to send every one away satisfied. The husband omits no pains to be attentive to every one; he comes and goes and sees to every one and takes all sorts of trouble; he is attention itself. The wife remains in her place; a little circle gathers round her and apparently conceals the rest of the company from her; yet she sees everything that goes on, no one goes without a word with her; she has omitted nothing which might interest anybody, she has said nothing unpleasant to any one, and without any fuss the least is no more overlooked than the greatest. Dinner is announced, they take their places; the man knowing the assembled guests will place them according to his knowledge; the wife,

without previous acquaintance, never makes a mistake; their looks and bearing have already shown her what is wanted and every one will find himself where he wishes to be. I do not assert that the servants forget no one.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may have omitted no one, but the mistress perceives what you like and sees that you get it; while she is talking to her neighbour she has one eye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table; she sees who is not eating because he is not hungry and who is afraid to help himself because he is clumsy and timid. When the guests leave the table every one thinks she has had no thought but for him, everybody thinks she has had no time to eat anything, but she has really eaten more than anybody.

我经常回到我的第一个原则，它为我所有的困难提供了解决方案。我研究目前的情况，寻找它的原因，我发现最后结果是好的。我去一些男女主人都非常好客的人家。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都很有礼貌、品味和智慧。他们都希望好好款待客人，让每一个人都尽兴而归。丈夫尽心周到地关照每一个人，来来往往招待客人，一点都不嫌麻烦，对所有事情都非常注意。妻子尽她的本分，在她周围围了一小群人，显然使她看不见其他人了。但是她对屋子里发生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一清二楚。她没有疏漏任何一件也许会使客人开心的事。她既没有打乱尊卑的次序，也没有对地位低下的人区别对待。晚餐宣布开席了，大家纷纷就坐。男主人根据自己的了解的情况安排客人的座位。女主人虽然先前不熟悉这些，但也绝不会出错。客人们的神情和举止已经让她知道他们的想法，因此每个人都对他的座位感到满意。我不能断言仆人不会忘记任何人。男主人或许没有遗漏任何一个人，但女主人能观察到客人爱吃哪道菜，并确保客人吃到那道菜。当她在和邻座聊天时，她一只眼睛还关注着饭桌的另一头。她看到有人没吃，因为他还不饿；有人不自己取菜，因为他笨拙胆小。当客人们离开餐桌时，每个人都觉得女主人对自己非常细心，觉得她根本没有时间吃东西，可事实上，她比任何人吃得都要多。

When the guests are gone, husband and wife tails over the events of the evening. He relates what was said to him, what was said and done by those with whom he conversed. If the lady is not always quite exact in this respect, yet on the other hand she perceived what was whispered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room; she knows what so-and-so thought, and what was the meaning of this speech or that gesture; there is scarcely a change of expression for which she has not an explanation in readiness, and she is almost always right.

当客人们离开了以后，夫妻俩会谈论晚上的情形。丈夫会叙述客人对他说的话，以及和他谈论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虽然妻子在这方面不怎么留心，但是在另一方面，她注意到客人们在屋子另一头低语了些什么，看得出他们在想些什么，对于一句话或是一个动作，她知道是什么意思。客人一转变脸色，她立马就可以读出其中的意味，而且她的猜测几乎都是对的。

The same turn of mind which makes a woman of the world such an excellent hostess, enables a flirt to excel in the art of amusing a number of suitors. Coquetry, cleverly carried out, demands an even finer discernment than courtesy; provided a polite lady is civil to everybody, she has done fairly well in any case; but the flirt would soon lose her hold by such clumsy uniformity; if she tries to be pleasant to all her lovers alike, she will disgust them all. In ordinary social intercourse the manners adopted towards everybody are good enough for all; no question is asked as to private likes or dislikes provided all are alike well received. But in love, a favour shared with others is an insult. A man of feeling would rather be singled out for ill-treatment than be caressed with the crowd, and the worst that can befall him is to be treated like

every one else. So a woman who wants to keep several lovers at her feet must persuade every one of them that she prefers him, and she must contrive to do this in the sight of all the rest, each of whom is equally convinced that he is her favourite.

同样的才能，它使善于社交的女人成为一个优秀的女主人，也使卖弄风情的女人让她的追求者们都感到欢乐有趣。想要巧妙地卖弄风情比保持礼貌更需要出色的洞察力。如果一个懂礼数的女士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她在任何情形下都会处理得很好。但是一个风骚的女人要是对谁都这样卖弄风情的话，她很快就会无法掌控局面。如果她卖力讨好她所有的追求者的话，反而会使所有人都对她感到厌恶。在一般的社会交际中，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人也无妨。只要对每个人都好，没有人会计较她到底喜欢谁，不喜欢谁。但是在爱情中，和别人享有同一份喜爱就是一种耻辱。一个有感情的男人宁愿唯独他一人受到女人的苛待，也不愿和许多人一起受到女人的喜爱。而他最不愿意的就是她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没有任何区别。因此，一个女人要是想使多个男人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就必须使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相信她最喜欢自己。她必须设法当着其他人的面让他深信这一点，而其他人也都同样相信自己是她的最爱。

If you want to see a man in a quandary, place him between two women with each of whom he has a secret understanding, and see what a fool he looks. But put a woman in similar circumstances between two men,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even more remarkable; you will be astonished at the skill with which she cheats them both, and makes them laugh at each other. Now if that woman were to show the same confidence in both, if she were to be equally familiar with both, how could they be deceived for a moment? If she treated them alike, would she not show that they both had the same claims upon her? Oh, she is far too clever for that; so far from treating

them just alike, she makes a marked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she does it so skilfully that the man she flatters thinks it is affection, and the man she ill uses think it is spite. So that each of them believes she is thinking of him, when she is thinking of no one but herself.

如果你想要看到一个男人不知所措的样子，就把他置于两个女人之中，而他同两个女人都有秘密关系，看看他那个时候会变成什么蠢样子。但是如果将一个女人置于相似情境中，效果会更显著的。你会对她巧妙欺骗两人，并使他们互相嘲笑彼此的技巧感到震惊。现在若是那个女人对这两个男人都展示出同样的信心，对他们同样亲密，他们又怎会受片刻的欺骗呢？如果她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这不表明他们对她有同样的权利吗？哦，她可聪明多了。她非但不以相同的态度对待他们，反而假装以显著的差别对待二人。她对此非常有技巧，以至于被她奉承的那人认为这是爱意，而受她冷落的人却认为这是在挖苦对方。这样他们二人都相信她思念自己，可实际上她谁也不爱，只爱她自己。

A general desire to please suggests similar measures; people would be disgusted with a woman's whims if they were not skilfully managed, and when they are artistically distributed her servants are more than ever enslaved.

一般想要取悦别人，方法大都相似。如果她的撒娇任性处理得不恰当，就会让人们感到厌恶；如果用巧妙的方式掩盖她的任性，就会更好地征服她的奴隶们。

“Usa ogn'arte la donna, onde sia colto Nella sua rete alcun

novello amante; Ne con tutti, ne sempre un stesso volto Serba; ma cangia a tempo atto e sembiante.” Tasso, Jerus. Del., c. iv., v. 87.

“她使用了种种巧妙地花招去勾引一个又一个新的情人，她不是对所有人都是那副脸孔，她要因人因时变换她的面容。

What is the secret of this art? Is it not the result of a delicate and continuous observation which shows her what is taking place in a man's heart, so that she is able to encourage or to check every hidden impulse? Can this art be acquired? No; it is born with women; it is common to them all, and men never show it to the same degree. It is one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s of the sex. Self-possession, penetration, delicate observation, this is a woman's science; the skill to make use of it is her chief accomplishment.

这种手段的秘密是什么？这不是由于她长久细致地观察，最后洞悉男人内心想法所导致的结果吗？这样她就可以促进或者抑制每一个隐秘的冲动念头。人人都可以习得这种手段吗？不，它是女性与生俱来的。对她们来说再寻常不过了，可是男人却永远达不到相同的程度。这是女性特有的特征之一。沉着、透彻和细致的观察是女人的一门学问，运用这门学问是她最主要的才能。

This is what is, and we have seen why it is so. It is said that women are false. They become false. They are really endowed with skill not duplicity; in the genuine inclinations of their sex they are not false even when they tell a lie. Why do you consult their words when it is not their mouths that speak? Consult their eyes, their colour, their breathing, their timid manner, their slight resistance,

that is the language nature gave them for your answer. The lips always say “No,” and rightly so; but the tone is not always the same, and that cannot lie. Has not a woman the same needs as a man, but without the same right to make them known? Her fate would be too cruel if she had no language in which to express her legitimate desires except the words which she dare not utter. Must her modesty condemn her to misery? Does she not require a means of indicating her inclinations without open expression? What skill is needed to hide from her lover what she would fain reveal! Is it not of vital importance that she should learn to touch his heart without showing that she cares for him? It is a pretty story that tale of Galatea with her apple and her clumsy flight. What more is needed? Will she tell the shepherd who pursues her among the willows that she only flees that he may follow? If she did, it would be a lie; for she would no longer attract him. The more modest a woman is, the more art she needs, even with her husband. Yes, I maintain that coquetry, kept within bounds, becomes modest and true, and out of it springs a law of right conduct.

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已经明白了这样的原因。有人说女人是虚伪的。她们是后来变成这样虚伪的。她们真正具有的是技巧而不是虚伪。在女性真正的倾向中，即便在说谎的时候，她们也不是虚伪的。表达她们内心想法的又不是她们的嘴巴，那你又为何深究她们的话呢？你要探究她们的眼睛、脸色、呼吸、羞怯的样子和稍稍的抗拒。那是大自然赋予她们的语言，来回答你的问题。她们嘴巴说的是“不”，也确实是这样。但是语气却并不是始终相同的，而这撒不了谎。女人没有和男人一样的需求吗？只是她们不具备这样的权利来诉说自己的需求。如果她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合理的愿望和不敢说的话，她的命运就会非常残酷。她的谦逊庄重就一定要迫使她陷入不幸的境地吗？她不需要一个巧妙的方式在不公开表露的情况下说出自己的心声吗？她需要什么样的技巧才能向她的爱人隐藏她乐于吐露的心情

啊！她应该学会一方面打动他的心，一方面又表现出对他毫不关心，这难道不至关重要吗？有关伽拉忒亚的苹果和她笨拙地逃走的传说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故事啊。她还需要别的什么呢？她会告诉那个在柳树林中追逐她的牧羊人，她只有逃跑了他才会去追她，所以她故意逃跑了吗？如果她这样做了，那就是撒谎。因为她再也不会吸引到他了。一个女人越是含蓄，她的手段就越高明，即使对她的丈夫也是这样。是的，我认为卖弄风情只要是在界限之内，就会变成含蓄和真实，并合乎正确的行为准则。

One of my opponents has very truly asserted that virtue is one; you cannot disintegrate it and choose this and reject the other. If you love virtue, you love it in its entirety, and you close your heart when you can, and you always close your lips to the feelings which you ought not to allow. Moral truth is not only what is, but what is good; what is bad ought not to be, and ought not to be confessed, especially when that confession produces results which might have been avoided. If I were tempted to steal, and in confessing it I tempted another to become my accomplice, the very confession of my temptation would amount to a yielding to that temptation. Why do you say that modesty makes women false? Are those who lose their modesty more sincere than the rest? Not so, they are a thousandfold more deceitful. This degree of depravity is due to many vices, none of which is rejected, vices which owe their power to intrigue and falsehood [2_4] .

我的反对者中有人声称，美德是一个整体。你不能将它分割，从而选择这个抛弃那个。如果你热爱美德，你就要完完全全地爱它。在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关闭自己的心门。对你不应当拥有的情感，你也能绝口不提。道德的真理不仅仅是存在的事物，而且是好的事物。坏的事物不应该存在，不应该被认可，尤其当我们承认以后，就会产生一

些我们本可以避免的结果。要是我受到引诱去偷窃，然后我坦白这一切，从而引诱了另一个人成为我的帮凶。我承认引诱就意味着我已经屈从于诱惑了。你为什么说谦逊使女人变得虚伪？那些失去谦卑感的女人比其余的女人更真诚吗？并不是，她们反而比谦逊的女人虚伪千倍。她们变得如此堕落是因为沾染了种种恶习，这些恶习无一得到改正，而且愈加使她们变得虚伪，有心计 [3_4] 。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ho are not utterly shameless, who take no pride in their faults, who are able to conceal their desires even from those who inspire them, those who confess their passion most reluctantly, these are the truest and most sincere, these are they on whose fidelity you may generally rely.

另一方面，那些还有羞耻心的女人，不以自己的缺点为豪，即使对启迪激励过她们的人也能隐瞒想法，不情愿地承认自己的欲望。这样的人才是最真实和最真诚的人，而我们一般会依靠她们的忠诚。

The only example I know which might be quoted as a recognised exception to these remarks is Mlle. de L'Enclos; and she was considered a prodigy. In her scorn for the virtues of women, she practised, so they say, the virtues of a man. She is praised for her frankness and uprightness; she was a trustworthy acquaintance and a faithful friend. To complete the picture of her glory it is said that she became a man. That may be, but in spite of her high reputation I should no more desire that man as my friend than as my mistress.

据我所知，就以上所述有例外的只有德·郎克洛小姐，她被视作一

个奇才。他们说，她蔑视女性的美德，而按照男人的美德来践行。她的坦率和正直受到人们的赞誉，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一个忠实的朋友。为了将她描绘成一个光辉的人，据说她最后变成了一个男人。也许是这样。但是尽管她的声望很高，我也不希望这样的男人成为我的朋友，就像我不希望她成为我的情人。

This is not so irrelevant as it seems. I am aware of the tendencies of our modern philosophy which make a jest of female modesty and its so-called insincerity; I also perceive that the most certain result of this philosophy will be to deprive the women of this century of such shreds of honour as they still possess.

这看起来与我们毫不相干，实则不然。我知道当今的哲学把女性的羞耻感和所谓的伪善当作一个笑话。我也看出了这样的哲学将产生的结果：剥夺这个时代的女性所拥有的荣耀。

On these grounds I think we may decide in general terms what sort of education is suited to the female mind, and the objects to which we should turn its attention in early youth.

据此我认为我们大致上可以决定什么样的教育适合女性，在她们的青年时期我们应该让她们注意什么问题。

As I have already said, the duties of their sex are more easily recognised than performed. They must learn in the first place to love those duties by considering the advantages to be derived from them—that is the only way to make duty easy. Every age and

condition has its own duties. We are quick to see our duty if we love it. Honour your position as a woman, and in whatever station of life to which it shall please heaven to call you, you will be well off. The essential thing is to be what nature has made you; women are only too ready to be what men would have them.

正如我已经说的，女性的义务看起来简单，履行起来却不容易。她们必须首先考虑到那些义务的好处，爱上它们——这才是让履行义务变得简单的唯一办法。每一个年纪和每一个情形下的女人都有自己的义务。如果乐于履行义务，我们很快就能领会我们的义务。尊敬你作为一名女性的地位，无论上帝使你成为什么地位的人，你都会是幸运富足的。关键的事情就是按照大自然的安排生活。女人总是轻而易举就能成为男人想要她们成为的样子。

The search for abstract and speculative truths, for principles and axioms in science, for all that tends to wide generalisation, is beyond a woman's grasp; their studies should be thoroughly practical. It is their business to apply the principles discovered by men, it is their place to make the observations which lead men to discover those principles. A woman's thoughts, beyond the range of her immediate duti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study of men, or the acquirement of that agreeable learning whose sole end is the formation of taste; for the works of genius are beyond her reach, and she has neither the accuracy nor the attention for success in the exact sciences; as for the physical sciences, to decide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ving creatures and the laws of nature is the task of that sex which is more active and enterprising, which sees more things, that sex which is possessed of greater strength and is more accustomed to the exercise of that strength. Woman, weak as she is and limited in her range of observation, perceives and judges the

forces at her disposal to supplement her weakness, and those forces are the passions of man. Her own mechanism is more powerful than ours; she has many levers which may set the human heart in motion. She must find a way to make us desire what she cannot achieve unaided and what she considers necessary or pleasing; therefore she must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man's mind; not an abstract knowledge of the mind of man in general, but the mind of those men who are about her, the mind of those men who have authority over her, either by law or custom. She must learn to divine their feelings from speech and action, look and gesture. By her own speech and action, look and gesture, she must be able to inspire them with the feelings she desires, without seeming to have any such purpose. The men will have a better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heart, but she will read more accurately in the heart of men. Woman should discover, so to speak, an experimental morality, man should reduce it to a system. Woman has more wit, man more genius; woman observes, man reasons; together they provide the clearest light and the profoundest knowledge which is possible to the unaided human mind; in a word, the surest knowledge of self and of others of which the human race is capable. In this way art may constantly tend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instrument which nature has given us.

寻求抽象的、推测性的真理，探求原理和科学定理，需要研究者将其做综合的归纳，这是女性无法做到的。她们研究应该是非常实际化的。她们的任务是运用男人发现的原理，她们的职责是仔细观察，帮助男人发现原理。在一切超越女性当前义务范畴的事物上，她们应该研究男人的想法，或者学习以人们的爱好为唯一目的的有趣事物。因为那些需要天赋的事情是她们的能力所不及的，她们既不准确，又无法集中注意力研究严密的科学。至于自然科学，研究生物与自然法则之间的关系是男性的任务，他们更具活力，更有魄力，了解的事物

更多，而且他们的体力更好，更习惯于体力的锻炼。而女性则非常柔弱，观察的东西也很有限。因此她们感知判断可以利用的力量，从而弥补自己的不足。而这可以利用的力量就是男人的欲念。她的方法要比我们的更有力，她有很多工具来鼓舞人们的心。她必须找到一个办法使我们渴望完成所有她无法独自做到但又必须做或是喜欢做的事情。因此她必须对男人的心思有透彻的了解。不是对一般男人的心思有一个抽象的了解，而是了解她周围的男人的想法，那些凭借法律或是习惯有权控制她的男人的想法。她必须学会从他们的言行、样子、举止中猜测他们的情感。通过她自己的言行举行和神态，她必须使他们产生她希望的情感，而又不表露出她的目的。男人对人心有更好的研究，但是她却能够对人心有更准确的解读。可以说，女人应该发现实验道德，而男人则应该将其归纳为一个系统。女人有更多智慧，男人有更多天赋。女人观察，男人推理。他们共同合作，就能够获得人类独自能够获得的最清楚的启迪和最透彻的知识。总而言之，能够获得对自身和他人都切实有用的知识。（获得单靠男人的心灵所不能获得的更透彻的了解和完整的学问）这样一来，艺术就能不断地完善大自然所赋予我们的工具。

The world is woman's book; if she reads it ill, it is either her own fault or she is blinded by passion. Yet the genuine mother of a family is no woman of the world, she is almost as much of a recluse as the nun in her convent. Those who have marriageable daughters should do what is or ought to be done for those who are entering the cloisters: they should show them the pleasures they forsake before they are allowed to renounce them, lest the deceitful picture of unknown pleasures should creep in to disturb the happiness of their retreat. In France it is the girls who live in convents and the wives who flaunt in society. Among the ancients it was quite otherwise; girls enjoyed, as I have said already, many games and public festivals; the married women lived in retirement. This was a more reasonable custom and more conducive to morality. A girl

may be allowed a certain amount of coquetry, and she may be mainly occupied at amusement. A wife has other responsibilities at home, and she is no longer on the look-out for a husband; but women would not appreciate the change, and unluckily it is they who set the fashion. Mothers, let your daughters be your companions. Give them good sense and an honest heart, and then conceal from them nothing that a pure eye may behold. Balls, assemblies, sports, the theatre itself; everything which viewed amiss delights imprudent youth may be safely displayed to a healthy mind. The more they know of these noisy pleasures, the sooner they will cease to desire them.

这个世界就是女人应该读的书。如果她没有好好读，那要么就是她自己的过错，要么就是被欲望蒙蔽了双眼。然而，一个家庭中一个真正的母亲是不会出去抛头露面的，她就仿佛是一个在修道院中静心修行的尼姑一般过着隐士的生活。那些女儿到了适婚年龄的人，就应该像对待进入修道院修行的女子一样对待他们的女儿。在她们被允许远离那些快乐之前，让她们看一看她们抛弃的快乐，以免那些未知的快乐造成的假象悄悄破坏她们平静的生活。在法国，少女们都住在修道院里，而已经成家的妇女则都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在古时候，情况恰恰想法。正如我说过的，少女们享受玩乐和公众节日，而已婚妇女则深居简出。这是一种更合理的风俗习惯，也更有助于促进高尚道德的行为。少女一定程度的撒娇是可以被允许的，她主要的事情就是娱乐。一个妻子在家有其他的责任，她不再需要出门物色一个丈夫。但是妇女并不会感激这样的改变，而很不幸，使她们开创了这样的风气。母亲们啊，让你们的女儿做你们的伴侣吧。让她们拥有极强的理智和诚实的心灵。所有纯洁的眼睛能够看到的事物都不要对她们隐瞒。舞会、集会、运动和戏剧，所有令鲁莽的少年错误地理解并感到欣喜的东西，在一个心智健全的人看来是非常安全的。她们越是了解这些喧闹的快乐，就会越早对这些东西感到厌倦。

I can fancy the outcry with which this will be received. What girl will resist such an example? Their heads are turned by the first glimpse of the world; not one of them is ready to give it up. That may be; but before you showed them this deceitful prospect, did you prepare them to behold it without emotion? Did you tell them plainly what it was they would see? Did you show it in its true light? Did you arm them against the illusions of vanity? Did you inspire their young hearts with a taste for the true pleasures which are not to be met with in this tumult? What precautions, what steps, did you take to preserve them from the false taste which leads them astray? Not only have you done nothing to preserve their minds from the tyranny of prejudice, you have fostered that prejudice; you have taught them to desire every foolish amusement they can get. Your own example is their teacher. Young people on their entrance into society have no guide but their mother, who is often just as silly as they are themselves, and quite unable to show them things except as she sees them herself. Her example is stronger than reason; it justifies them in their own eyes, and the mother's authority is an unanswerable excuse for the daughter. If I ask a mother to bring her daughter into society, I assume that she will show it in its true light.

我可以想象很多人会公开反对我。哪一个女孩能不受这样的例子的影响？从她们踏入社会的第一步起，心思就乱了。没有人会愿意离开的。很有可能会这样。但是在你向她们展现这虚假的前景之前，你是否做了准备使她们不动声色地领会它？你是否清楚地告诉她们，她们将看到的东西？你如否做了如实的描绘？你是否给了她们抵抗浮华的幻想的武器？你是否启迪了她们年轻的心，使她们在喧闹中无法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你会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来防止她们产生低俗的品味，从而误入歧途？你不仅没有做任何事来保护她们的心灵不受偏见的影响，反而使她们渴望了解她们所能知道的愚蠢的偏见。你自己

的例子就是他们的老师。年轻女孩踏入社会，除了她们的母亲以外没有别人指导她们。可是她们的母亲并不比她们明智多少，只能教一些她自己看过了解过的东西。对孩子来说，母亲的榜样比理智更强大。她们坚信妈妈做的都是对的。因此母亲的威信对女儿来说是无可辩驳的。如果我让一个母亲把女儿带入社会，我猜想她要让她的女儿看到社会真正的景象。

The evil begins still earlier; the convents are regular schools of coquetry; not that honest coquetry which I have described, but a coquetry the source of every kind of misconduct, a coquetry which turns out girls who are the most ridiculous little madams. When they leave the convent to take their place in smart society, young women find themselves quite at home. They have been educated for such a life; is it strange that they like it? I am afraid what I am going to say may be based on prejudice rather than observation, but so far as I can see, one finds more family affection, more good wives and loving mothers in Protestant than in Catholic countries; if that is so, we cannot fail to suspect that the difference is partly due to the convent schools.

其实女孩变坏得还要更早一些。修道院是一所真正教会女孩们卖弄风情的学校，不是我描述过的那种正直的风情，而是那种导致所有不正当行为的风情，将她们变成最荒谬浪荡的小女人。当她们离开修道院，进入复杂的社会时，她们就像在家里一样自如。她们已经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们喜欢这样的场合又有什么奇怪呢？我担心我接下来要说的是基于偏见而不是观察研究的结果。但是目前为止，在信奉新教的国家要比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有更多有爱的家庭和贤妻良母。

The charms of a peaceful family life must be known to be enjoyed; their delights should be tasted in childhood. It is only in our father's home that we learn to love our own, and a woman whose mother did not educate her herself will not be willing to educate her own children. Unfortunatel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home education in our large towns. Society is so general and so mixed there is no place left for retirement, and even in the home we live in public. We live in company till we have no family, and we scarcely know our own relations, we see them as strangers; and the simplicity of home life disappears together with the sweet familiarity which was its charm. In this wise do we draw with our mother's milk a taste for the pleasures of the age and the maxims by which it is controlled.

要想享受平静的家庭生活，必须要对其独特魅力有所了解，应该在童年时期就体会过其中的快乐。只有在父亲家中，我们才能学会爱自己。如果她们的母亲没有教育过她，她长大以后也不会愿意自己教育孩子。不幸的是，在大城市中，根本就没有家庭教育这回事了。社交场合太多，且鱼龙混杂，根本就不能过清静隐蔽的生活，甚至在自己家中也就像在公共场合一样。我们在还没成家之前，与他人为伴。我们几乎都不知道亲属关系，将家人视作陌生人。简单朴素的家庭生活和它亲近的感情一同消失了，而这恰恰是家庭生活的魅力所在。因此，当我们还在吮吸母亲的乳汁时，就已经体会过了这个时代享乐和人们所奉行的准则。

Girls are compelled to assume an air of propriety so that men may be deceived into marrying them by their appearance. But watch these young people for a moment; under a pretence of coyness they barely conceal the passion which devours them, and already you may read in their eager eyes their desire to imitate

their mothers. It is not a husband they want, but the licence of a married woman. What need of a husband when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resources; but a husband there must be to act as a screen [2_5] . There is modesty on the brow, but vice in the heart; this sham modesty is one of its outward signs; they affect it that they may be rid of it once for all. Women of Paris and London, forgive me! There may be miracles everywhere, but I am not aware of them; and if there is even one among you who is really pure in heart, I know nothing of our institutions.

女孩们被迫装出一副规规矩矩的样子，这样男人就会被她们的外表所欺骗，然后娶她们为妻。但是看一看这些年轻人，在羞怯的伪装之下，她们几乎不能隐藏喷薄而出的欲念。你也可以在她们渴求的双眼中发现她们急于模仿自己的母亲。她们想要的不是一个丈夫，而是一纸婚书。既然有那么多别的办法，为什么非要一个丈夫呢？不过是用来做掩护罢了 [3_5] 。她们表面上很端庄，实则内心很放荡。这种虚假的端庄就是淫荡外显的标志之一。她们这样伪装是为了日后能够再也不用伪装。巴黎和伦敦的妇女们，请原谅我！各地都可能出现奇迹，但是我未曾看到过。如果你们之中存在一个内心真正纯净的人，那就是我对我们这个社会一无所知。

All these different methods of education lead alike to a taste for the pleasures of the great world, and to the passions which this taste so soon kindles. In our great towns depravity begins at birth; in the smaller towns it begins with reason. Young women brought up in the country are soon taught to despise the happy simplicity of their lives, and hasten to Paris to share the corruption of ours. Vices, cloaked under the fair name of accomplishments, are the sole object of their journey; ashamed to find themselves so much behind the noble licence of the Parisian ladies, they hasten to become

worthy of the name of Parisian.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vil—the place where it begins, or the place where it is accomplished?

所有不同的教育方法都同样使得女孩们对大千世界的娱乐感兴趣。这种兴趣很快就会激起她们内心的欲念。在我们这些大城市中，女孩从出生就败坏了；在小城镇里，在她们开始运用理智的时候才开始败坏。在乡下长大的姑娘很快就学了别人的样子，看不起自己简单快乐的生活，急着到巴黎和我们一起败坏。她们来到巴黎的唯一目的，就是学习美其名曰为才能的恶习。耻于自己在这一方面不及巴黎的贵妇，所以她们急着使自己配得上巴黎人的身份。谁才应当为她们的恶习负责？是恶习开始的地方？还是恶习被应用的地方？

I would not have a sensible mother bring her girl to Paris to show her these sights so harmful to others; but I assert that if she did so, either the girl has been badly brought up, or such sights have little danger for her. With good taste, good sense, and a love of what is right, these things are less attractive than to those who abandon themselves to their charm. In Paris you may see giddy young things hastening to adopt the tone and fashions of the town for some six months, so that they may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life in disgrace; but who gives any heed to those who, disgusted with the rout, return to their distant home and are contented with their lot when they have compared it with that which others desire. How many young wives have I seen whose good-natured husbands have taken them to Paris where they might live if they pleased; but they have shrunk from it and returned home more willingly than they went, saying tenderly, “Ah, let us go back to our cottage, life is happier there than in these palaces.” We do not know how many there are who have not bowed the knee to Baal, who scorn his senseless worship. Fools make a stir; good women pass unnoticed.

我不希望一个明智的母亲带着她的女儿来巴黎，让她看到这些对其他人极其有害的景象。但是我认为，如果她一定要来，那要么就是女儿已经被败坏了，要么就是这些景象对她造不成伤害。对那些有着好的品味、清醒的头脑，并喜爱正当事物的女孩来说，她们不会像那些自我放纵、受其迷惑的人一样，这些景象对她们没有多大吸引力。在巴黎，你会看到有些轻佻的年轻姑娘急着在六个月学会城里的语调和时髦做派，来让自己的余生活在耻辱之中。但是有没有人注意过，有些女该在比较了自己的生活和别人向往的城市生活之中，反而对巴黎的生活感到厌恶，回到远方的家，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意。我就看过许多年轻的妻子，被她们温厚的丈夫带到巴黎，只要她们想要她们就可以在巴黎定居。但是她们拒绝了，更愿意回到老家，温柔地对丈夫说："啊，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小屋去住吧，住在那里比住在这些宫殿里更快乐。"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没有崇拜过偶像，并且鄙视那些无意义的崇拜。只有傻瓜才会引起轰动，好女人都是默默无闻的。

If so many women preserve a judgment which is proof against temptation, in spite of universal prejudice, in spite of the bad education of girls, what would their judgment have been, had it been strengthened by suitable instruction, or rather left unaffected by evil teaching, for to preserve or restore the natural feelings is our main business? You can do this without preaching endless sermons to your daughters, without crediting them with your harsh morality. The only effect of such teaching is to inspire a dislike for the teacher and the lessons. In talking to a young girl you need not make her afraid of her duties, nor need you increase the burden laid upon her by nature. When you explain her duties speak plainly and pleasantly; do not let her suppose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duties is a dismal thing—away with every affectation of disgust or pride. Every thought which we desire to arouse should find its expression in our pupils, their catechism of conduct should be as

brief and plain as their catechism of religion, but it need not be so serious. Show them that these same duties are the source of their pleasures and the basis of their rights. Is it so hard to win love by love, happiness by an amiable disposition, obedience by worth, and honour by self-respect? How fair are these woman's rights, how worthy of reverence, how dear to the heart of man when a woman is able to show their worth! These rights are no privilege of years; a woman's empire begins with her virtues; her charms are only in the bud, yet she reigns already by the gentleness of her character and the dignity of her modesty. Is there any man so hard-hearted and uncivilised that he does not abate his pride and take heed to his manners with a sweet and virtuous girl of sixteen, who listens but says little; her bearing is modest, her conversation honest, her beauty does not lead her to forget her sex and her youth, her very timidity arouses interest, while she wins for herself the respect which she shows to others?

尽管人们普遍抱有偏见，尽管对女孩的教育败坏了，如果非常多女人都能保持抵抗诱惑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经过了适当的指导，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受到不良教育的影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持或者恢复自然感情，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想要做到这点，你不用对你的女儿不停地说教，也不用让她相信严格的道德准则。这样的教育方式只会使得她对说教的人和说教的内容感到厌恶。和一个年轻女孩谈话，你不需要用她的义务吓唬她，也不需要把大自然赋予她们的责任说得那么重大。当你在向阐述她的义务时，要表达得清楚一些，语气和蔼一些。不要让她们觉得履行这些义务是一件凄惨的事——你千万不能有一点厌恶或者盛气凌人的样子。我们想要她们思考的每一个问题都应该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接受。如果用问答方式讲解行为准则，那应该像教义问答一样简洁明了，但是不需要像教义问答那样严肃。向她们指出，这些义务就是她们快乐的源泉，也是她们享受的权利的依据。想要得到别人的爱，就要爱别人；想要获得快乐，就要有一个温

和的性格；想要别人服从你，就必须使自己值得别人的尊敬；想要赢得荣耀，就要自我尊重。做到这些，难道很难吗？女性的权利是多么合理，多么值得尊敬。当一个女人能够展现这些权利的价值时，将会多么打动男人的心啊！这些权利不是有年岁的女人专享的。女人从她的美德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在她的魅力还含苞待放的时候，她就已经凭借着温柔的性格和端庄自尊的样子树立威信了。一个甜美善良的十六岁女孩，平时寡言少语，只静静聆听。而且仪态端庄，言语诚恳，她的美丽也没有使她忘记自己的性别和身份。她羞怯的样子使人对她颇感兴趣。她尊重别人，从而赢得别人的尊重。见到这样的女孩，还会有哪个冷酷粗野的男人不收敛自己的傲气，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吗？

These external signs are not devoid of meaning; they do not rest entirely upon the charms of sense; they arise from that conviction that we all feel that women are the natural judges of a man's worth. Who would be scorned by women? not even he who has ceased to desire their love. And do you suppose that I, who tell them such harsh truths, am indifferent to their verdict? Reader, I care more for their approval than for yours; you are often more effeminate than they. While I scorn their morals, I will revere their justice; I care not though they hate me, if I can compel their esteem.

这些外在的表现并不是毫无意义。她们不完全取决于感官的美，而且还让我们从心底里确信女人是男人价值的天然评判者。谁愿意被女人轻视呢？就连那些不再渴望爱情的人，也不愿意被女人鄙视。你觉得我这个向她们讲述如此残酷真相的人会对她们的看法毫不在乎吗？读者啊，比起你们的赞同，我更看重她们的认同。你总是比她们还女人气。虽然我鄙视她们的品行，但是我很敬畏她们的公正。如果我能够迫使她们尊重我，那即使她们讨厌我也没关系。

What great things might be accomplished by their influence if only we could bring it to bear! Alas for the age whose women lose their ascendancy, and fail to make men respect their judgment! This is the last stage of degradation. Every virtuous nation has shown respect to women. Consider Sparta, Germany, and Rome; Rome the throne of glory and virtue, if ever they were enthroned on earth. The Roman women awarded honour to the deeds of great generals, they mourned in public for the fathers of the country, their awards and their tears were alike held sacred as the most solemn utterance of the Republic. Every great revolution began with the women. Through a woman Rome gained her liberty, through a woman the plebeians won the consulate, through a woman the tyranny of the decemvirs was overthrown; it was the women who saved Rome when besieged by Coriolanus. What would you have said at the sight of this procession, you Frenchmen who pride yourselves on your gallantry, would you not have followed it with shouts of laughter? You and I see things with such different eyes, and perhaps we are both right. Such a procession formed of the fairest beauties of France would be an indecent spectacle; but let it consist of Roman ladies, you will all gaze with the eyes of the Volscians and feel with the heart of Coriolanus.

只要我们善于运用她们的影响，那我们将完成多么伟大的事业啊！哎，可是这个时代的女性都丧失她们的支配地位，无法让男性尊重她们的评判了。这真是堕落到了极点。每一个高尚的民族对女性都是很尊敬的。想想斯巴达、日耳曼和罗马。如果这个世上曾有过荣耀和美德的宝座的话，那就在罗马。罗马妇女赞颂伟大将军的事迹，她们在公共场合为死去的国家元老默哀，她们的赞赏和眼泪都同样被视作是共和国最庄严神圣的话语。每一次伟大革命都是由妇女开始的。是一个妇女使罗马获得自由，是一个妇女使百姓活得执政权，是一个妇女推翻了十人执政团的暴力统治。是妇女们将被科里奥兰纳斯围困

的罗马解救了出来。当你看到一排妇女，你们会怎么说。你们法国人对自己的勇敢引以为傲，你们不会她们后面大声嘲笑、叫喊吗？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也许我们都是对的。如果这样的队伍里都是法国最漂亮的小姐们，这会是非常不得体的场景。但是如果队伍里都是罗马小姐，你就会用沃尔西人的眼光盯着她们看，用科里奥兰纳斯的心来感受。

I will go further and maintain that virtue is no less favourable to love than to other rights of nature, and that it adds as much to the power of the beloved as to that of the wife or mother. There is no real love without enthusiasm, and no enthusiasm without an object of perfection real or supposed, but always present in the imagination. What is there to kindle the hearts of lovers for whom this perfection is nothing, for whom the loved one is merely the means to sensual pleasure? Nay, not thus is the heart kindled, not thus does it abandon itself to those sublime transports which form the rapture of lovers and the charm of love. Love is an illusion, I grant you, but its reality consists in the feelings it awakes, in the love of true beauty which it inspires. That beauty is not to be found in the object of our affections, it is the creation of our illusions. What matter! do we not still sacrifice all those baser feelings to the imaginary model? and we still feed our hearts on the virtues we attribute to the beloved, we still withdraw ourselves from the baseness of human nature. What lover is there who would not give his life for his mistress? What gross and sensual passion is there in a man who is willing to die? We scoff at the knights of old; they knew the meaning of love; we know nothing but debauchery. When the teachings of romance began to seem ridiculous, it was not so much the work of reason as of immorality.

我还要进一步解释一下，我认为美德有助于爱情，就像它有助于其他自然权利一样。它能够增强为人妻或为人母的力量，正如能增强被爱的人的力量。没有热情就不存在真正的爱，而如果想象中没有一个真实存在或者虚幻的完美对象，也就不会产生热情。如果对情人来说这个完美对象什么都不是，所爱之人仅仅只是一个满足感官享受的工具的话，那又是什么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激情呢？不，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他心中的激情是无法点燃的，他也不会去让自己踏上庄严的、对于使人欣喜若狂，爱意绵绵的乐趣的追求的。我承认爱情是虚幻的，只有其中的感情是真实的，他鼓舞我们去追寻真正的美。这种美不在我们所喜爱的对象身上，而是我们的错觉。有什么关系！我们就不会把世俗的情感都献给这个想象的模型了吗？我们仍然会以美好的心对待所爱之人，仍然会摈弃人类天性中的卑劣。有哪一个人会不愿意为自己的情人献出生命？一个情愿为所爱之人献出生命的男人还有什么粗俗肉欲的想法？我们嘲笑古时候的骑士，可他们懂得爱情的意义，反而是我们淫荡放纵，什么都不懂。当浪漫史的说教在我们看来开始变得荒谬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开始发挥作用，而是因为道德的沦丧。

Natural relations remain the same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their good or evil effects are unchanged; prejudices, masquerading as reason, can but change their outward seeming; self-mastery, even at the behest of fantastic opinions, will not cease to be great and good. And the true motives of honour will not fail to appeal to the heart of every woman who is able to seek happiness in life in her woman's duties. To a high-souled woman chastity above all must be a delightful virtue. She sees all the kingdoms of the world before her and she triumphs over herself and them; she sits enthroned in her own soul and all men do her homage; a few passing struggles are crowned with perpetual glory; she secures the affection, or it may be the envy, she secures in any case the esteem of both sexes and the universal respect of her own. The loss is fleeting, the gain is

permanent. What a joy for a noble heart—the pride of virtue combined with beauty. Let her be a heroine of romance; she will taste delights more exquisite than those of Lais and Cleopatra; and when her beauty is fled, her glory and her joys remain; she alone can enjoy the past.

几个世纪以来，自然关系都保持不变，它们所带来的好或坏的影响都没有改变。理智掩饰下的偏见，只不过表面发生了变化。自制一直都会是一个伟大的行为，即便是按照一些奇怪的说法克制自己。对于荣誉的真正渴望会吸引每一个女人在她的职责中寻求一生的幸福。对于一个品德高尚的女人来说，首先保持贞操一定是一个可喜的美德。她看到整个世界都在她面前，她战胜了自己，也战胜了一切。她的精神就是一个宝座，所有人都臣服于她。她曾经所做的一些斗争拥有无上荣光。她确保了世人对她的喜爱，也可以是羡慕。她也确保了任何情况下两性的尊严和全世界对她的尊敬。痛苦消逝了，但她获得的荣誉是永久的。她高尚的心里该有多么快乐啊——她为自己品德和美貌兼具而感到自豪。让她成为传奇的女英雄。她会比莱斯和克娄巴特拉体会到更大的快乐。当她容颜不再的时候，她的荣耀和快乐仍然存在。只有她能够回味过去，享受过去。

The harder and more important the duties, the stronger and clearer must be the reasons on which they are based. There is a sort of pious talk about the most serious subjects which is dinned in vain into the ears of young people. This talk, quite unsuited to their ideas and the small importance they attach to it in secret, inclines them to yield readily to their inclinations, for lack of any reasons for resistance drawn from the facts themselves. No doubt a girl brought up to goodness and piety has strong weapons against temptation; but one whose heart, or rather her ears, are merely filled with the jargon of piety, will certainly fall a prey to the first

skilful seducer who attacks her. A young and beautiful girl will never despise her body, she will never really deplore sins which her beauty leads men to commit, she will never lament earnestly in the sight of God that she is an object of desire, she will never be convinced that the tenderest feeling is an invention of the Evil One. Give her other and more pertinent reasons for her own sake, for these will have no effect. It will be worse to instil, as is often done, ideas which contradict each other, and after having humbled and degraded her person and her charms as the stain of sin, to bid her reverence that same vile body as the temple of Jesus Christ. Ideas too sublime and too humble are equally ineffective and they cannot both be true. A reason adapted to her age and sex is what is needed. Considerations of duty are of no effect unless they are combined with some motive for the performance of our duty.

她们所肩负的义务更艰巨，更重要，她们基于的理由就必须更清晰、更强硬。用虔诚的态度谈论一些最严肃的话题，年轻人是听不进去的。这样的谈话，和她们的想法大相径庭，她们私下里并不会看重。结果反而只能任凭她们的倾向的发展，因为无法从事实本身找出抵抗的理由。毫无疑问，一个被培养得十分优秀虔诚的女孩有强大的武器来抵制诱惑。但是如果一个女孩的心里，更确切的说，她的耳朵里，仅仅只有很多虔诚的空话，那第一个狡猾的骗子引诱她的时候，她就会沦陷。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绝不会鄙视自己的身体，不会真正悔恨自己的美貌引诱男人犯罪的过错，不会诚挚地向上帝忏悔她成了男人欲念的对象，也绝不会相信自己心中最温柔的情感来源于魔鬼。为了她自身提出一些其他更中肯的理由，因为上述理由是没有效果的。更坏的做法，也是经常采取的做法：让她的思想产生矛盾。先是说她的身体和容貌已经沾染了罪恶的污点，然后又说将她卑微的身子当作耶稣的圣殿加以敬重。太庄重和太低下的观念都是无效的，它们都不是真的。提出的理由必须是适合她的年纪和性别的。除非她们促使我们履行义务，否则她们是不会重视自己的义务的。

“Quae quia non liceat non facit, illa facit.” OVID, Amor. I. iii. eleg. iv.

“只因不准许，她才没犯错误，而最终她是一定会犯错的。”奥维德·埃莫

One would not suspect Ovid of such a harsh judgment.

毫无疑问，只有奥维德才会有这样严厉的评判。

If you would inspire young people with a love of good conduct avoid saying, “Be good;” make it their interest to be good; make them feel the value of goodness and they will love it. It is not enough to show this effect in the distant future, show it now, in the relations of the present, in the character of their lovers. Describe a good man, a man of worth, teach them to recognise him when they see him, to love him for their own sake; convince them that such a man alone can make them happy as friend, wife, or mistress. Let reason lead the way to virtue; make them feel that the empire of their sex and all the advantages derived from it depend not merely on the right conduct, the morality, of women, but also on that of men; that they have little hold over the vile and base, and that the lover is incapable of serving his mistress unless he can do homage to virtue. You may then be sure that when you describe the manners of our age you will inspire them with a genuine disgust; when you show them men of fashion they will despise them; you will give them a distaste for their maxims, an aversion to their

sentiments, and a scorn for their empty gallantry; you will arouse a nobler ambition, to reign over great and strong souls, the ambition of the Spartan women to rule over men. A bold, shameless, intriguing woman, who can only attract her lovers by coquetry and retain them by her favours, wins a servile obedience in common things; in weighty and important matters she has no influence over them. But the woman who is both virtuous, wise, and charming, she who, in a word, combines love and esteem, can send them at her bidding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to war, to glory, and to death at her behest. This is a fine kingdom and worth the winning.

如果你想鼓舞年轻人热爱良好的品行，那你要避免对她们说："规矩点。"而应该让她们自觉地要想规矩一些。让她们明白规矩的行为的价值之后，她们自然就会喜欢这种行为。向她们指出在遥远的未来会收到的效果，这是不够的，必须立马就要让她们在目前的种种关系中，在爱人的性格中看到效果。为她们描述一个有价值的好男人，教会她们在见到他的时候如何辨别他，如何为了自己的利益爱他。让她们相信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将她们视作朋友、妻子和情人，使她们感到快乐。通过理性来培养美德。让她们认识到，女性要建立自己的帝国，处于支配地位，不仅仅靠她们的良好品行和高尚品德，还要靠男人的良好品行和高尚品德。同时也要认识到她们无法掌控卑鄙低贱之人，不敬佩美德的人也不会尊重他的情人。你可以确定的是，当你讲述我们的这个时代的规矩时，会使她们产生真正的厌恶之情。当你给她们看时髦的人时，她们会轻视他们，讨厌他们的言论和种种观点，鄙视他们虚伪地献殷勤。你会使她们产生更高贵的雄心壮志，她们想要统治伟大强壮的人，就像斯巴达女人统治着男人一样。一个勇敢无畏、不知羞耻、诡计多端的女人只能考卖弄风骚来勾引男人，并且只能用好处来留住他们。只有在一些寻常的小事情上把他们当作奴隶差遣，在一些重要事情上，她毫无影响力。但是既端庄、机智又迷人，总而言之既能赢得男人的爱，又能赢得男人的尊重的女人，能够使男人按照她的命令去到天涯海角，去战场、去争取荣耀，

哪怕去赴死也心甘情愿。这是极高的威信，值得花一番心思获得。

This is the spirit in which Sophy has been educated, she has been trained carefully rather than strictly, and her taste has been followed rather than thwarted. Let us say just a word about her person,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 I have given to Emile and the picture he himself has formed of the wife in whom he hopes to find happiness.

我们就是秉承着这种精神教育苏菲的。我们并没有严格地要求她，而是十分仔细地培养她。她的兴趣都能够顺其自然的发展，我们并没有横加阻挠。让我们根据我向爱弥儿所描述的形象，和他自己所想象的能够使他感到幸福的妻子的样子，简单说一说苏菲。

I cannot repeat too often that I am not dealing with prodigies. Emile is no prodigy, neither is Sophy. He is a man and she is a woman; this is all they have to boast of. In the present confusion between the sexes it is almost a miracle to belong to one's own sex. Sophy is well born and she has a good disposition; she is very warm-hearted, and this warmth of heart sometimes makes her imagination run away with her. Her mind is keen rather than accurate, her temper is pleasant but variable, her person pleasing though nothing out of the common, her countenance bespeaks a soul and it speaks true; you may meet her with indifference, but you will not leave her without emotion. Others possess good qualities which she lacks; others possess her good qualities in a higher degree, but in no one are these qualities better blended to form a happy disposition. She knows how to make the best of her very faults, and if she were more perfect she would be less pleasing.

我不再过多地重复说明，我不是在培养什么天才。爱弥儿不是神童，苏菲也不是。他是一个男人，苏菲是一个女人，这是所有他们能够夸耀的东西。在目前两性混乱的情形下，能够真正做一个男人或女人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苏菲出身高贵，性格很好，天性善良。她善良的秉性有时会让她产生飘忽的想象。她的思维非常敏捷，但不怎么精确；她的性格很可爱，但比较善变；她的样貌虽不出众，却讨人喜欢。从她的长相就可以看出她为人正直，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刚认识她的时候你会觉得她和一般人没什么区别，但是你离开她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所触动。她没有的良好品质，别人有；她有的良好品质，别人更胜一筹。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她这样把拥有的良好品质结合在一起形成快乐的性格。她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缺点。如果她更完美一些的话，她反而不会这么快乐了。

Sophy is not beautiful; but in her presence men forget the fairer women, and the latter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mselves. At first sight she is hardly pretty; but the more we see her the prettier she is; she wins where so many lose, and what she wins she keeps. Her eyes might be finer, her mouth more beautiful, her stature more imposing; but no one could have a more graceful figure, a finer complexion, a whiter hand, a daintier foot, a sweeter look, and a more expressive countenance. She does not dazzle; she arouses interest; she delights us, we know not why.

苏菲并不漂亮，但是一旦她出现，男人们就会忘了其他更美的女人，更美的女人们也对自己感到不满意。乍看之下她并不美，但是越看就越发觉得她美。别人长得不好看的地方，她长得很好看。她长得好看的地方也一直很好看。她的眼睛或许可以更精致一些，嘴巴可以更漂亮一些，样子可以更动人一些。但是没有人的身材比她更匀称，没有人的肤色比她更好看，没有人的手比她更白皙，没有人的脚比她

小巧，没有人的目光比她更温柔，没有人的面庞比她更具表现力。她会引起你的兴趣，但不会使你眩惑。她让我们觉得很快乐，但我们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Sophy is fond of dress, and she knows how to dress; her mother has no other maid; she has taste enough to dress herself well; but she hates rich clothes; her own are always simple but elegant. She does not like showy but becoming things. She does not know what colours are fashionable, but she makes no mistake about those that suit her. No girl seems more simply dressed, but no one could take more pains over her toilet; no article is selected at random, and yet there is no trace of artificiality. Her dress is very modest in appearance and very coquettish in reality; she does not display her charms, she conceals them, but in such a way as to enhance them. When you see her you say, “That is a good modest girl,” but while you are with her, you cannot take your eyes or your thoughts off her and one might say that this very simple adornment is only put on to be removed bit by bit by the imagination.

苏菲很爱打扮，并且知道怎么打扮好看。除她之外，她的母亲没有别的女仆。她的品味很好，能把自己打扮地很好看。但是她不喜欢华丽的衣服，她的衣服总是朴素大方的。她不喜欢惹眼的东西，只要合适就好。她不知道什么样的颜色是时髦的，但是她很清楚什么颜色适合自己。没有女孩像她这样表面上看起来穿得很朴素，但实际上花了很多心思。每一样东西她都仔细挑选，但却没有精心搭配的痕迹。她的衣着看起来很廉价，但事实上非常迷人。她隐藏了自己的魅力，没有外显，但是这样反而显得更迷人了。当你看到她，你会说：“这是一个端庄的好姑娘。”但是当你和她呆久了以后，你的眼睛就无法从她身上挪开，你就无法停止想她。有人也许会说，这些简单的装饰正是为了让你想象一点一点脱去的样子。

Sophy has natural gifts; she is aware of them, and they have not been neglected; but never having had a chance of much training she is content to use her pretty voice to sing tastefully and truly; her little feet step lightly, easily, and gracefully, she can always make an easy graceful courtesy. She has had no singing master but her father, no dancing mistress but her mother; a neighbouring organist has given her a few lessons in playing accompaniments on the spinet, and she has improved herself by practice. At first she only wished to show off her hand on the dark keys; then she discovered that the thin clear tone of the spinet made her voice sound sweeter; little by little she recognised the charms of harmony; as she grew older she at last began to enjoy the charms of expression, to love music for its own sake. But she has taste rather than talent; she cannot read a simple air from notes.

苏菲有一些天生的才能，她自己知道，也没有忽视它们。但是并没有太多训练的机会，因此她满足于用她优美的嗓音优雅精准地歌唱，用她的小脚轻巧优雅地行走。她总是能轻易大方地向别人行礼。除了她父亲之外，没有人教过她唱歌；除了她母亲之外，没有人教过她跳舞。邻近的一位风琴手教她弹过几次竖琴，她自己通过练习有了提高。一开始她只希望弹那些黑键，后来她发现竖琴清脆的声音可以使声音更美妙，渐渐地她体会到了和声的魅力。最后等到她长大了，她开始享受声调的魅力，真正爱上了音乐。但是她只是喜欢音乐，还不能称得上是才能。她还不能看着谱子就唱出一个简单的曲调。

Needlework is what Sophy likes best; and the feminine arts have been taught her most carefully, even those you would not expect, such as cutting out and dressmaking. There is nothing she cannot do with her needle, and nothing that she does not take a

delight in doing; but lace-making is her favourite occupation,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which requires such a pleasing attitude, nothing which calls for such grace and dexterity of finger. She has also studied all the details of housekeeping; she understands cooking and cleaning; she knows the prices of food, and also how to choose it; she can keep accounts accurately, she is her mother's housekeeper. Some day she will be the mother of a family; by managing her father's house she is preparing to manage her own; she can take the place of any of the servants and she is always ready to do so. You cannot give orders unless you can do the work yourself; that is why her mother sets her to do it. Sophy does not think of that; her first duty is to be a good daughter, and that is all she thinks about for the present. Her one idea is to help her mother and relieve her of some of her anxieties. However, she does not like them all equally well. For instance, she likes dainty food, but she does not like cooking; the details of cookery offend her, and things are never clean enough for her. She is extremely sensitive in this respect and carries her sensitiveness to a fault; she would let the whole dinner boil over into the fire rather than soil her cuffs. She has always disliked inspecting the kitchen-garden for the same reason. The soil is dirty, and as soon as she sees the manure heap she fancies there is a disagreeable smell.

苏菲最喜欢做针线活。这些女性的手艺活，苏菲学得都很仔细，甚至连一些你原本不打算她做的活她也会做，比如裁剪和缝制衣服。没有哪一样针线活是她不会做的，而且无论做什么她都很开心。但是做花边是她最喜欢的，因为只有做花边的时候需要一份愉快的心情，并且要求手指的灵巧。另外她也学习了操持家务的一些细节，学会了洗衣做饭。她知道食物的价格，也知道如何挑选食物。她算账很准确，是她母亲的管家。总有一天，她自己也会成为一位母亲。在料理父母的家时，她也在为自己的家庭做准备。她可以代替任何一个仆

人，她也时常这样做。除非你自己也做会那些工作，否则你是无法发号施令的。这就是为什么她母亲让她做这些的原因。苏菲没有考虑过这些。她唯一的任务就是做一个好女儿，就是她目前唯一思考的东西。她的一个想法就是帮助母亲，使她减轻一些焦虑。然而，她并不是平等地喜欢所有的家务。比如说，她喜欢精美的食物，但她却不喜欢烹饪。烹饪过程中的细节使她反感，她总是觉得不够干净。她在这一方面是非常敏感的，这种过度的敏感甚至于成为了她的缺点。她宁愿让一整餐的饭菜都煮焦，也不愿意弄脏她的衣袖。因为这个理由，她一直都不喜欢整治菜园子。她觉得泥土是脏的，只要看到肥料堆，她就会觉得有一种难以接受的味道。

This defect is the result of her mother's teaching. According to her, cleanliness is one of the most necessary of a woman's duties, a special duty,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and a duty imposed by nature. Nothing could be more revolting than a dirty woman, and a husband who tires of her is not to blame. She insisted so strongly on this duty when Sophy was little, she required such absolute cleanliness in her person, clothing, room, work, and toilet, that use has become habit, till it absorbs one half of her time and controls the other; so that she thinks less of how to do a thing than of how to do it without getting dirty.

这一缺点是她母亲教育的结果。照她母亲来说，保持清洁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义务之一，是大自然要求女人做到的最重要的特别义务。没有什么比一个肮脏的女人更令人厌恶的了。如果一个丈夫因此讨厌自己的妻子的话，也不能怪他。在苏菲还小的时候，她就这样严格要求苏菲。她要求苏菲必须保持个人绝对整洁，衣服、做的东西、还有梳妆用品都必须非常干净。最后这就变成了苏菲的习惯，占用了她大半的时间。因此她并不在意怎么做一样事情，而更在意怎么做才不会把自己弄脏。

Yet this has not degenerated into mere affectation and softness; there is none of the over refinement of luxury. Nothing but clean water enters her room; she knows no perfumes but the scent of flowers, and her husband will never find anything sweeter than her breath. In conclusion, the attention she pays to the outside does not blind her to the fact that time and strength are meant for greater tasks; either she does not know or she despises that exaggerated cleanliness of body which degrades the soul. Sophy is more than clean, she is pure.

但是这并没有使苏菲变得矫情、娇气。她绝不为此铺张浪费。她的房间里只有干净的水，她不懂香水，只知道花香。她的丈夫不会闻到比她的呼吸更香的气味了。总之，她在外表上所花的心思并没有使她忘却把时间和气力用在更伟大的事情上。她不知道、或是看不起过分讲究身体的干净而玷污灵魂的行为。苏菲不只是干净，她非常纯洁。

I said that Sophy was fond of good things. She was so by nature; but she became temperate by habit and now she is temperate by virtue. Little girls are not to be controlled, as little boys are, to some extent, through their greediness. This tendency may have ill effects on women and it is too dangerous to be left unchecked. When Sophy was little, she did not always return empty handed if she was sent to her mother's cupboard, and she was not quite to be trusted with sweets and sugar-almonds. Her mother caught her, took them from her, punished her, and made her go without her dinner. At last she managed to persuade her that sweets were bad for the teeth, and that over-eating spoiled the figure. Thus Sophy overcame her faults; and when she grew older other tastes

distracted her from this low kind of self-indulgence. With awakening feeling greediness ceases to be the ruling passion, both with men and women. Sophy has preserved her feminine tastes; she likes milk and sweets; she likes pastry and made-dishes, but not much meat. She has never tasted wine or spirits; moreover, she eats sparingly; women, who do not work so hard as men, have less waste to repair. In all things she likes what is good, and knows how to appreciate it; but she can also put up with what is not so good, or can go without it.

我说过苏菲喜欢好的东西。这是天性使然。从前她有节制是因为习惯，现在她有节制是因为品德。我们对待小女孩不像对待小男孩那样，利用他们贪婪的特点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这种倾向对女性是有负面影响的，如果放任不管，是非常危险的。当苏菲还小的时候，如果她去妈妈的橱柜，是不会空着手回来的。她一点儿都经不起点心和杏仁糖的考验。她妈妈逮住她吃糖，就会把糖果拿回来，惩罚她，还不许她吃晚饭。最后妈妈成功说服苏菲，让她知道甜食对牙齿不好，吃得太多还会发胖。苏菲就这样改正了自己的缺点。等她再大一点的时候，她又有了别的爱好，所以就改掉了这种“低级的”放纵自己吃甜食的习惯。一旦情感活跃了，贪吃就不再成为支配他们的欲念，这对男女都一样。苏菲保留了女性特有的口味。她喜欢牛奶、甜食、糕点和家常小菜，但不喜欢吃太多肉。她从来没有喝过酒或者烈性饮料。同时，她吃得也不多。女人不像男人工作那么辛苦，所以不需要吃很多东西来弥补身体的消耗。所有美味的东西她都喜欢吃，她也善于品尝。但是她也能忍受一些不那么好吃的东西，或者选择不吃。

Sophy's mind is pleasing but not brilliant, and thorough but not deep; it is the sort of mind which calls for no remark, as she never seems cleverer or stupider than oneself. When people talk to her they always find what she says attractive, though it may not be

highly ornamental according to modern ideas of an educated woman; her mind has been formed not only by reading, but by conversation with her father and mother, by her own reflections, and by her own observations in the little world in which she has lived. Sophy is naturally merry; as a child she was even giddy; but her mother cured her of her silly ways, little by little, lest too sudden a change should make her self-conscious. Thus she became modest and retiring while still a child, and now that she is a child no longer, she finds it easier to continue this conduct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to acquire it without knowing why. It is amusing to see her occasionally return to her old ways and indulge in childish mirth and then suddenly check herself, with silent lips, downcast eyes, and rosy blushes; neither child nor woman, she may well partake of both.

苏菲的头脑聪明，但不是很出色；思维很全面，但不是很深刻。人们不谈论她的头脑，因为她看上去既不必别人聪明也不比别人笨。当人们与她交谈时，总是觉得她说的话很吸引人，虽然用现代的观念看待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会发现她的措辞并不是很优美。她的想法不仅仅是通过阅读形成的，也是从她和父母的交谈中得来的，是通过她自己的思考和对她生活的小小世界的观察得到的。苏菲天生就很欢乐，在童年时期甚至有点儿调皮。但是她母亲逐渐纠正了她淘气的样子，以免要突然改变她，使她有自觉意识。因此，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已经变得谦逊稳重了。现如今，她已不再是个孩子了，她觉得保持稳重要比以前不知道原因而去学习这样做的时候容易多了。有时候看见她变成老样子，沉浸在孩子气的欢声笑语中，然后突然自我克制，闭上嘴，垂下眼睛，脸羞得通红的样子，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她既不是个孩子了，也还没成年，所以两者的样子她都有。

Sophy is too sensitive to be always good humoured, but too gentle to let this be really disagreeable to other people; it is only herself who suffers. If you say anything that hurts her she does not sulk, but her heart swells; she tries to run away and cry. In the midst of her tears, at a word from her father or mother she returns at once laughing and playing, secretly wiping her eyes and trying to stifle her sobs.

苏菲太过敏感，所以无法一直保持好脾气。但是因为她十分温柔，所以其他人也不会对此感到厌恶。只是她自己觉得难过。要是你说了伤害她的话，她是不会生气的。但是她的内心是很煎熬的，她会跑远大哭一场。在她哭泣的时候，只要听到父亲或母亲叫她，她就会立刻回去，偷偷擦干眼泪，止住啜泣声，照旧笑着玩闹着。

Yet she has her whims; if her temper is too much indulged it degenerates into rebellion, and then she forgets herself. But give her time to come round and her way of making you forget her wrong-doing is almost a virtue. If you punish her she is gentle and submissive, and you see that she is more ashamed of the fault than the punishment. If you say nothing, she never fails to make amends, and she does it so frankly and so readily that you cannot be angry with her. She would kiss the ground before the lowest servant and would make no fuss about it; and as soon as she is forgiven, you can see by her delight and her caresses that a load is taken off her heart. In a word, she endures patiently the wrong-doing of others, and she is eager to atone for her own. This amiability is natural to her sex when unspoiled. Woman is made to submit to man and to endure even injustice at his hands. You will never bring young lads to this; their feelings rise in revolt against injustice; nature has not fitted them to put up with it.

但是她有时候也会有些奇怪的念头。她有时候过于任性了，就会反抗家人说的话，控制不住自己。但是只要给她一点时间让她冷静下来，她就会为了让你忘却她的过错而采取办法做出弥补，这就几乎是一种美德了。如果你惩罚她，她是非常温和顺从的。你会发现，比起受到惩罚，她更为错误感到羞耻。即便你什么都不说，她也会主动弥补过错。她是如此的真诚和主动，以至你都无法对她生气。即使是在地位最低下的仆人面前接受批评，她也会坦然接受，丝毫不做争辩。一旦你原谅了她，你就会发现她如释重负，感到非常快乐。总之，她耐心地忍受别人的过错。而对于自己的过错，她则非常希望弥补。这种亲切友善是女人的天性，只要没有受到败坏，就能拥有。女人注定了顺从于男人的，并且能够忍受他们不公正的行为。你绝不会也这样培养男孩子。他们会对不公正的行为表示反抗，天性使他们无法忍受这样的行为。

“Gravem Pelidae stomachum cedere nescii.” HORACE, lib. i. ode vi.

“格雷文的倔强的儿子怀着冲天的愤怒。出自《贺拉斯》

Sophy's religion is reasonable and simple, with few doctrines and fewer observances; or rather as she knows no course of conduct but the right her whole life is devoted to the service of God and to doing good. In all her parents' teaching of religion she has been trained to a reverent submission; they have often said, “My little girl, this is too hard for you; your husband will teach you when you are grown up.” Instead of long sermons about piety, they have been content to preach by their example, and this example is engraved on her heart.

苏菲的宗教信仰非常合理而且简单，没有什么教条，更没有什么需要遵守的惯例。更确切地说，她只知道正确的事就是实践道德，将自己的一生都用来侍奉上帝，做善事。在她父母的教育之下，苏菲对待宗教已经变得谦恭而顺从。他们总是说："我的女儿啊，这东西对你来说太难了。等你长大了，你的丈夫会教你的。"他们没有一直对苏菲布道，要她对宗教要虔诚，而是用以身作则的方式向她布道，使他们的榜样深深地刻在她的心中。

Sophy loves virtue; this love has come to be her ruling passion; she loves virtue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fairer in itself, she loves it because it is a woman's glory and because a virtuous woman is little lower than the angels; she loves virtue as the only road to real happiness, because she sees nothing but poverty, neglect, unhappiness, shame, and disgrace in the life of a bad woman; she loves virtue because it is dear to her revered father and to her tender and worthy mother; they are not content to be happy in their own virtue, they desire hers; and she finds her chief happiness in the hope of making them happy. All these feelings inspire an enthusiasm which stirs her heart and keeps all its budding passions in subjection to this noble enthusiasm. Sophy will be chaste and good till her dying day; she has vowed it in her secret heart, and not before she knew how hard it would be to keep her vow; she made this vow at a time when she would have revoked it had she been the slave of her senses.

苏菲热爱美德。这份热爱已经支配了她的行为。她热爱是因为她觉得再没有比其更美好的东西了。她认为美德能给予一个女人荣耀，品行高尚的女人就好比是天使。她将美德视作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因为她认识到一个坏女人的生活会遭遇贫困，会被人们忽视，无法得

到幸福，永远蒙受耻辱。她热爱美德还因为她可敬的父亲和温柔且同样可敬的母亲也热爱美德。他们不满足于自己的美德，同时也希望苏菲能践行美德，获得幸福。而苏菲最大的快乐也是希望父母能够幸福。所有这些情感都唤起了苏菲内心的热情，触动着她的心，使她所有萌生的欲念都受制于这一神圣的愿望。苏菲一直都是贞洁善良的，直到她死的那一天。她在自己的心里默默发誓要做到这一点，而她已经知道信守誓言是多么艰难。这时候如果她成为官能的奴隶，她是可以取消这个誓言的，但她还是发誓要做到。

Sophy is not so fortunate as to be a charming French woman, cold-hearted and vain, who would rather attract attention than give pleasure, who seeks amusement rather than delight. She suffers from a consuming desire for love; it even disturbs and troubles her heart in the midst of festivities; she has lost her former liveliness, and her taste for merry games; far from being afraid of the tedium of solitude she desires it. Her thoughts go out to him who will make solitude sweet to her. She finds strangers tedious, she wants a lover, not a circle of admirers. She would rather give pleasure to one good man than be a general favourite, or win that applause of society which lasts but a day and to-morrow is turned to scorn.

幸运的是，苏菲不是一个迷人的法国女人。这样的法国女人总是自负无情，想着如何吸引别人的注意，而不是想着如何让别人感到快乐。她所追求的是玩乐而不是快乐。苏菲有着对爱的强烈渴望，这让她备受煎熬，甚至使她在各种欢庆活动中分了心。她不再像从前那样活力满满了，也不再喜欢那些欢乐的游戏了。她不仅不害怕孤独，而且还渴望享受孤独。她希望寻找一个人，他可以让她觉得孤单都是意见甜蜜的事情。她觉得陌生人令人生厌，她想要的不是许多仰慕者，而是一个爱人。她宁愿使一个好人感到快乐，也不愿博取众人的喜爱，或是赢得所有人的赞美。这些赞美只能持续一天，明天就会变成

嘲笑。

A woman's judgment develops sooner than a man's; being on the defensive from her childhood up, and intrusted with a treasure so hard to keep, she is earlier acquainted with good and evil. Sophy is precocious by temperament in everything, and her judgment is more formed than that of most girls of her age. There is nothing strange in that, maturity is not always reached at the same age.

女性的判断力比男性发展得要早一些。她们从童年时期开始就处于防御状态，有一个很难保存的珍宝，因此她很早就了解了善与恶。苏菲各个方面的气质使得她非常早熟。她的判断能力也比同龄的女孩子更成形。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每个人成熟的时间并不都是相同的。

Sophy has been taught the duties and rights of her own sex and of ours. She knows men's faults and women's vices; she also knows their corresponding good qualities and virtues, and has them by heart. No one can have a higher ideal of a virtuous woman, but she would rather think of a virtuous man, a man of true worth; she knows that she is made for such a man, that she is worthy of him, that she can make him as happy as he will make her; she is sure she will know him when she sees him; the difficulty is to find him.

苏菲已经学过并知道了女性和男性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她知道男人的缺点，也知道女人的恶习。她也知道男人和女人与之对应的优秀品质和美德，并把它门都记在心里。没有人能想象出更品行高尚的女人典范了。但是她更愿意想象一个男子，品行高尚，为人正直。她知道自己生来就是为这样的男子，她配得上他。她能够使他感到幸福，

他也能给予她同样的幸福。她确信当他出现的时候，她一定能认出他来，可困难在于如何找到他。

Women are by nature judges of a man's worth, as he is of theirs; this right is reciprocal, and it is recognised as such both by men and women. Sophy recognises this right and exercises it, but with the modesty becoming her youth, her inexperience, and her position; she confines her judgment to what she knows, and she only forms an opinion when it may help to illustrate some useful precept. She is extremely careful what she says about those who are absent, particularly if they are women. She thinks that talking about each other makes women spiteful and satirical; so long as they only talk about men they are merely just. So Sophy stops there. As to women she never says anything at all about them, except to tell the good she knows; she thinks this is only fair to her sex; and if she knows no good of any woman, she says nothing, and that is enough.

就像男人是女人价值的评判者一样，女人也是天生就评判男人的价值的。这是男女之间相互的权利，并且双方都非常认可。苏菲知道这种权力，并且也使用过。但是因为她很年轻，没有经验，而且地位不高，所以她只评判她知道的东西。只有在有助于阐述一个有用的冠带纳时，她才做出评判。在她做评价的时候，如果那人不在场，她就会非常谨慎，尤其那人是妇女的话，她就更小心了。她认为，互相谈论彼此的事情，女人们就会互相嘲讽，变得刻毒。但只要谈论的是男人的事，她们就会很公正。所以苏菲只限于谈论男人的事。至于别的女人，她从来不谈论什么。除非她知道有谁做了好事，她才谈论她们。她认为这对女性来说非常公平合理。如果她不知道谁做了什么好事的话，她就不会谈论她们。这就足够表明她的看法了。

Sophy has little knowledge of society, but she is observant and obliging, and all that she does is full of grace. A happy disposition does more for her than much art. She has a certain courtesy of her own, which is not dependent on fashion, and does not change with its changes; it is not a matter of custom, but it arises from a feminine desire to please. She is unacquainted with the language of empty compliment, nor does she invent more elaborate compliments of her own; she does not say that she is greatly obliged, that you do her too much honour, that you should not take so much trouble, etc. Still less does she try to make phrases of her own. She responds to an attention or a customary piece of politeness by a courtesy or a mere “Thank you;” but this phrase in her mouth is quite enough. If you do her a real service, she lets her heart speak, and its words are no empty compliment. She has never allowed French manners to make her a slave to appearances; when she goes from one room to another she does not take the arm of an old gentleman, whom she would much rather help. When a scented fop offers her this empty attention, she leaves him on the staircase and rushes into the room saying that she is not lame. Indeed, she will never wear high heels though she is not tall; her feet are small enough to dispense with them.

苏菲一点都不世故，但是她善于观察并且乐于助人，无论做什么事都非常优雅。她这种欢乐的性情对她的帮助，比那些巧妙的手段更大。她对人谦恭有礼，这并不是因为时尚，也不随着时尚的改变而更改。这也不是习惯使然，而是出于她希望别人愉快的愿望。她不了解那些空洞的恭维话，也不会特意去献殷勤。诸如她深表感激、她不胜荣幸或是您不必如此费心这样的话，她也从来不会说。她也很少拐弯抹角地说话。对于他人的关怀，或是惯例上的礼貌，她会回以谦恭有礼的言辞，或仅仅是一句“谢谢你”。但从她嘴中说出这句话，就完全足够了。如果你给予她实质性的帮助，她会从心底表示感谢，而不是

借助空洞的赞美。她在外从不拘泥于法式礼节。如果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她不会挽着一位年老绅士的胳膊，而是想给予他们帮助。而如果是一位花花公子对她空献殷勤，她会把他留在楼梯处而自己跑进房间，告诉他自己四肢健全。事实上，尽管个子不高，但她从不穿高跟鞋。因为她的脚很小，没必要穿高跟鞋。

Not only does she adopt a silent and respectful attitude towards women, but also towards married men, or those who are much older than herself; she will never take her place above them, unless compelled to do so; and she will return to her own lower place as soon as she can; for she knows that the rights of age take precedence of those of sex, as age is presumably wiser than youth, and wisdom should be held in the greatest honour.

她不仅对女士保有寡言的敬意，对已婚男士，或是比她年长许多的人同样敬重。除非被迫，否则她不会表现出任何优越，并且她会尽快地回到她谦卑的位置上去。因为她知道，来自年龄的权利要优于来自性别的权利，正如年长者相对年轻人会更有智慧，而智慧应当被致以最高的荣耀。

With young folks of her own age it is another matter; she requires a different manner to gain their respect, and she knows how to adopt it without dropping the modest ways which become her. If they themselves are shy and modest, she will gladly preserve the friendly familiarity of youth; their innocent conversation will be merry but suitable; if they become serious they must say something useful; if they become silly, she soon puts a stop to it, for she has an utter contempt for the jargon of gallantry, which she considers an insult to her sex. She feels sure that the man she seeks does not

speak that jargon, and she will never permit in another what would be displeasing to her in him whose character is engraved on her heart. Her high opin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her pride in the purity of her feelings, that active virtue which is the basis of her self-respect, make her indignant at the sentimental speeches intended for her amusement. She does not receive them with open anger, but with a disconcerting irony or an unexpected iciness. If a fair Apollo displays his charms, and makes use of his wit in the praise of her wit, her beauty, and her grace; at the risk of offending him she is quite capable of saying politely, “Sir, I am afraid I know that better than you; if we have nothing more interesting to talk about, I think we may put an end to this conversation.” To say this with a deep courtesy, and then to withdraw to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is the work of a moment. Ask your lady-killers if it is easy to continue to babble to such, an unsympathetic ear.

而对于她的同龄人，则又是另一回事了。她采用另外一种做法来赢得尊重，并且她知道如何才能既保持这种尊敬，又不损伤她谦卑的姿态。如果他们本身是腼腆而谦逊的，她就会欣然保持友好的态度与他们亲密相处。他们之间天真无邪的谈话愉快却合宜，如果他们的态度变得严肃，那么他们必然是在谈论有意义的事情。而如果这些人太过愚笨，她则会很快停止谈话。因为她极其厌恶虚伪的殷勤，她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侮辱。她确信她所找寻的那个人绝不会如此空献殷勤。那个人的形象已然刻画在她心里，因此她也不会允许别人这么说，令她不快。她对于女性权利的敬重、她对于感情纯洁性的骄傲，这些积极品行形成了她自尊的基础。而如果有人为了取悦她而说奉承的话，她会感到愤怒。她的愤怒并不直接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尖锐的讽刺或是突然的冷落来表达。如果一位英俊的男士风度翩翩，机智风趣地称赞她的才智、美貌与优雅。苏菲会冒着冒犯他的风险，礼貌地对他说，“先生，恐怕你所说的这些我比你要清楚的多。如果我们没有别的什么更有趣的话要说，那我们的谈话可以到此为止了。”她会彬彬

有礼地说完这些，然后很快向远处走开。你们可以去问问那些花花公子，对着一个态度冷淡的人，继续喋喋不休地说下去是不是很容易。

It is not that she is not fond of praise if it is really sincere, and if she thinks you believe what you say. You must show that you appreciate her merit if you would have her believe you. Her proud spirit may take pleasure in homage which is based upon esteem, but empty compliments are always rejected; Sophy was not meant to practise the small arts of the dancing-girl.

其实她并不是不喜欢被人夸奖。如果夸奖是真诚的，而她认为你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话，她也会喜欢听到夸奖的。要想让她相信你，你必须表现出对她的价值的欣赏。她那高傲的性格也许会喜爱基于尊重的顺从，但是空洞的奉承只会遭到她的拒绝。苏菲不是为了练就那舞女的小小技俩。

With a judgment so mature, and a mind like that of a woman of twenty, Sophy, at fifteen, is no longer treated as a child by her parents. No sooner do they perceive the first signs of youthful disquiet than they hasten to anticipate its development, their conversations with her are wise and tender. These wise and tender conversations are in keeping with her age and disposition. If her disposition is what I fancy why should not her father speak to her somewhat after this fashion?

由于她的判断力如此成熟，思想也像一位二十岁的女士一样，所以在苏菲十五岁时她的父母就不再把她当成小孩子来看待了。他们一发现一丝青春的躁动迹象时，苏菲的父母就急着考虑如何应对这种发

展。他们与苏菲进行了一番开明而温柔的谈话。那温柔而充满智慧的谈话是适合苏菲的年龄和性格的。如果她是我所设想的这种性格，那么她的父亲应该会以这样的方式对她说：

“You are a big girl now, Sophy, you will soon be a woman. We want you to be happy, for our own sakes as well as yours, for our happiness depends on yours. A good girl finds her own happiness in the happiness of a good man, so we must consider your marriage; we must think of it in good time, for marriage makes or mars our whole life, and we cannot have too much time to consider it.

“你现在是一个大姑娘了，苏菲。不久你就要长大成人。我们希望你得到幸福，从你的角度，也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的幸福取决于你。一个好女孩，她的幸福来源于一个好的丈夫的幸福，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你的婚事。我们必须提前考虑它，因为婚姻可能会成就、也可能会毁灭我们的生活，而我们一定要用充分的时间来考虑清楚。

“There is nothing so hard to choose as a good husband, unless it is a good wife. You will be that rare creature, Sophy, you will be the crown of our life and the blessing of our declining years; but however worthy you are, there are worthier people upon earth. There is no one who would not do himself honour by marriage with you; there are many who would do you even greater honour than themselves. Among these we must try to find one who suits you, we must get to know him and introduce you to him.

“没有什么事情比选择一个好的丈夫更难了，如果说真的有的

话，那就是选择一个好的妻子。而你，苏菲，你会成为那样罕有的好妻子。你将会是我们生命里的无上荣光，你会是我们晚年的幸福来源。但无论你多么出色，世界上总有比你更出色的人。没有哪一个人不以与你结为夫妻而感到光荣。你也会因为你和多数人的婚姻而感到更加荣耀。在这些人中，我们必须要试图去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人，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他，再让他认识你。

“The greatest possible happiness in marriage depends on so many points of agreement that it is folly to expect to secure them all. We must first consider the more important matters; if others are to be found along with them, so much the better; if not we must do without them. Perfect happiness is not to be found in this world, but we can, at least, avoid the worst form of unhappiness, that for which ourselves are to blame.

“在婚姻中可能得到的幸福取决于双方多么般配，想要得到全部的幸福是很愚蠢的。我们必须首要考虑较为重要的方面，如果其他方面也十分般配，那自然是很棒的；如果不那么般配，我们则必须要将就一点。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的幸福。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避免不幸中最糟糕的部分，因为这种不幸是由于我们自己造成的。

“There is a natural suitability, there is a suitability of established usage, and a suitability which is merely conventional. Parents should decide as to the two latters, and the children themselves should decide as to the former. Marriages arranged by parents only depend on a suitability of custom and convention; it is not two people who are united, but two positions and two properties; but these things may change, the people remain, they are always there; and in spite of fortune it is the personal relation

that makes a happy or an unhappy marriage.

“有一些适合是从自然方面来说的，也有在既定的习惯方面适合，还有仅仅在社会习俗方面的适合。父母应当判断男女双方的适合是否属于后两种情形，而第一种则由孩子们自己来决定。由父母选择的婚姻一般只建立在社会习俗合适的基础上，这种婚姻并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种社会地位、两个家庭的财产的结合。但是社会地位和财产可能会改变，而人不会。人是始终如一的。如果不考虑财产，事实上是个人关系决定了一段婚姻是否幸福。

“Your mother had rank, I had wealth; this was all that our parents considered in arranging our marriage. I lost my money, she lost her position; forgotten by her family, what good did it do her to be a lady born? In the midst of our misfortunes, the union of our hearts has outweighed them all; the similarity of our tastes led us to choose this retreat; we live happily in our poverty, we are all in all to each other. Sophy is a treasure we hold in common, and we thank Heaven which has bestowed this treasure and deprived us of all others. You see, my child, whither we have been led by Providence; the conventional motives which brought about our marriage no longer exist, our happiness consists in that natural suitability which was held of no account.

“你的母亲有头衔，而我有财产。我们的父母在考虑这段婚姻的时候，所考虑的只是这些。我失去了我的金钱，她失去了她的社会地位，还被她的家族忘却了。那么高贵的社会地位对她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在我们困苦的日子里，我们心意的结合打败了所有阻碍。我们相似的爱好使我们一致选择了这种平淡恬静的生活。我们贫穷却幸福，我们彼此之间是坦诚的。苏菲是我们所共同拥有的财富，我们感谢上

帝将她赠与我们而夺去了其他的多余之物。我的孩子，你看，造化如何弄人。传统的动机使我们的婚姻结合，而这些因素已然化为乌有。如今我们的幸福在于自然方面的适合，这在当初并不重要。

“Husband and wife should choose each other. A mutual liking should be the first bond between them. They should follow the guidance of their own eyes and hearts; when they are married their first duty will be to love one another, and as love and hatred do not depend on ourselves, this duty brings another with it, and they must begin to love each other before marriage. That is the law of nature, and no power can abrogate it; those who have fettered it by so many legal restrictions have given heed rather to the outward show of order than to the happiness of marriage or the morals of the citizen. You see, my dear Sophy, we do not preach a harsh morality. It tends to make you your own mistress and to make us leave the choice of your husband to yourself.

“夫妻之间应该互相选择。他们之间的最重要的纽带应当是他们相互喜欢。他们应当听从自己眼睛与心灵的指引；婚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去爱对方，因为爱或恨都不由我们自己决定，那么这种义务就要求他们必须在结婚之前就相爱。这就是自然之法，而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废除它；那些以众多法律限制来束缚它的人，他们更注重的是社会秩序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婚姻的幸福，或是公民的道德。我亲爱的苏菲，你看，我们并不鼓吹严苛的道德。它要求你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要求我们把选择丈夫的权利交还你自己。

“When we have told you our reasons for giving you full liberty, it is only fair to speak of your reasons for making a wise use of that liberty. My child, you are good and sensible, upright and pious, you

have the accomplishments of a good woman and you are not altogether without charms; but you are poor; you have the gifts most worthy of esteem, but not those which are most esteemed. Do not seek what is beyond your reach, and let your ambition be controlled, not by your ideas or ours, but by the opinion of others. If it were merely a question of equal merits, I know not what limits to impose on your hopes; but do not let your ambitions outrun your fortune, and remember it is very small. Although a man worthy of you would not consider this inequality an obstacle, you must do what he would not do; Sophy must follow her mother's example and only enter a family which counts it an honour to receive her. You never saw our wealth, you were born in our poverty; you make it sweet for us, and you share it without hardship. Believe me, Sophy, do not seek those good things we indeed thank heaven for having taken from us; we did not know what happiness was till we lost our money.

“既然我们已经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给你绝对的自由，接下来我们也会谈及为什么你一定要明智地利用这一自由。我想这是很合适的。我的孩子，你很善良，也很懂事，你有着正直而虔诚的美德。你拥有一个美好女性的所有特质，同时也魅力十足；但是你是贫穷的，虽然你有着最值得尊重的天赋品质，却没有那些最被世人追崇的条件。不要去追求一个不可企及的人，也不要让你的追求被除了你自己和我们之外的他人的观点所控制。如果这仅仅是两人品性对等的问题，我就不必限制你的诉求。但是你的野心决不能大过你的财富。时刻铭记你并不富有。尽管一位与你相配的男士并不会视财产上的不平等为一种阻碍，但你必须考虑到他未能考虑到的问题。苏菲，你必须效仿你的母亲，嫁入一个以娶你为荣的家庭。你从不曾见过我们的财富，你是在我们一贫如洗时出生的。因为你，我们的生活虽然贫穷却也甜蜜。你和我们一同经历了这些困苦却从不曾抱怨。相信我，苏菲。千万别去追求那些我们感谢上帝拿走的东西。直到失去了金钱，

我们才真正了解幸福。

“You are so amiable that you will win affection, and you are not go poor as to be a burden. You will be sought in marriage, it may be by those who are unworthy of you. If they showed themselves in their true colours, you would rate them at their real value; all their outward show would not long deceive you; but though your judgment is good and you know what merit is when you see it, you are inexperienced and you do not know how people can conceal their real selves. A skilful knave might study your tastes in order to seduce you, and make a pretence of those virtues which he does not possess. You would be ruined, Sophy, before you knew what you were doing, and you would only perceive your error when you had cause to lament it. The most dangerous snare, the only snare which reason cannot avoid, is that of the senses; if ever you have the misfortune to fall into its toils, you will perceive nothing but fancies and illusions; your eyes will be fascinated, your judgment troubled, your will corrupted, your very error will be dear to you, and even if you were able to perceive it you would not be willing to escape from it. My child, I trust you to Sophy's own reason; I do not trust you to the fancies of your own heart. Judge for yourself so long as your heart is untouched, but when you love betake yourself to your mother's care.

“你这样可爱，自然会将受到爱护与倾慕。同时你也不至贫穷到成为别人的负担。你可能会被那些配不上你的人求婚。如果他们表现出自己本来的面目，你会评价他们真实的品行。他们表面上的做法就不再能欺骗你。但是尽管你有良好的判断力，也能够看出什么是真正的美德，但你毕竟涉世未深，你不了解人们会如何隐藏真实的自己。一个狡诈的坏人可能会为了引诱你而了解你的喜好，以此来假装他所

没有的那些美德。苏菲，在你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之前，你会就可能会毁了自己。而当你察觉到错误时，就只能叹息不已。我们的感官的陷阱是最危险的，也是唯一一种连理性也难以避免的陷阱。如果你真的不幸掉入其中，你的感受将全是想象和幻觉。你的双眼将被蛊惑，你将会失去判断力，你的感觉将会是一团糟，而你甚至会觉得恰恰是这个错误是珍贵的。即使你能意识到这一切，你也不愿从中逃出。我的孩子，我希望你听从你自己的理性，而不是你内心的错觉。只要保持内心不受触动，你就可以做出理性的判断，但一旦你恋爱了，你就需要寻求母亲的关心。

“I propose a treaty between us which shows our esteem for you, and restores the order of nature between us. Parents choose a husband for their daughter and she is only consulted as a matter of form; that is the custom. We shall do just the opposite; you will choose, and we shall be consulted. Use your right, Sophy, use it freely and wisely. The husband suitable for you should be chosen by you not us. But it is for us to judge whether he is really suitable, or whether, without knowing it, you are only following your own wishes. Birth, wealth, position, conventional opinions will count for nothing with us. Choose a good man whose person and character suit you; whatever he may be in other respects, we will accept him as our son-in-law. He will be rich enough if he has bodily strength, a good character, and family affection. His position will be good enough if it is ennobled by virtue. If everybody blames us, we do not care. We do not seek the approbation of men, but your happiness.”

“我向你提议，让我们来订立一个约定，既能体现我们对你的尊敬，也能保证我们之间的自然秩序。按照习惯，往往是父母为女儿挑选一个丈夫，而仅仅象征性地向女儿征询意见。而我们要做的恰恰相

反，由你来选择你的丈夫，并征求我们的意见。苏菲，自由而明智地运用你的权利吧。适合你的丈夫应当由你自己而不是我们进行挑选。但我们会判断他是否是真的适合你，判断你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只遵循了你自己的意愿。出身、财产、地位或是世俗的观点对我们来说一文不值。选择一个品性适合你的人，不管他其他方面如何，我们会接受他做我们的女婿。如果他身体强壮、品德高尚又热爱家庭，那么他对我们来说就是足够富有的。如果他德行高尚，那么他的社会地位对我们来说即是足够优秀的。即使受到他人指责，我们也毫不在意。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他人的认可，而是你的幸福。”

I cannot tell my readers what effect such words would have upon girls brought up in their fashion. As for Sophy, she will have no words to reply; shame and emotion will not permit her to express herself easily; but I am sure that what was said will remain engraved upon her heart as long as she lives, and that if any human resolution may be trusted, we may rely on her determination to deserve her parent's esteem.

我的读者们，我没办法告诉你们这样的话语在女孩的培养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至于苏菲，她沉默不语。羞怯与敏感使她不能轻易地表达自己的心意。但我确信这番话将会铭刻在她的内心深处一生。如果说人们的决心是可以被信任的，那么我们应该尊重她的决心，成为一个值得父母尊重的人。

At worst let us suppose her endowed with an ardent disposition which will make her impatient of long delays; I maintain that her judgment, her knowledge, her taste, her refinement, and, above all, the sentiments in which she has been brought up from childhood, will outweigh the impetuosity of the senses, and enable her to offer

a prolonged resistance, if not to overcome them altogether. She would rather die a virgin martyr than distress her parents by marrying a worthless man and exposing herself to the unhappiness of an ill-assorted marriage. Ardent as an Italian and sentimental as an Englishwoman, she has a curb upon heart and sense in the pride of a Spaniard, who even when she seeks a lover does not easily discover one worthy of her.

我们来假设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她的心性过于急躁，会使她对长久的拖延失去耐心。但我相信，她的判断力、知识、品味与高雅情趣，尤其是她自小养成的情感，都会胜过急躁与狂热。即使她无法完全克服，也能帮助她长久地坚持下去。她会宁可保持贞洁而死去，也不会嫁给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将自己葬送于不般配的婚姻的不幸福中，使自己的父母难过。尽管她像意大利人一样热烈，像英国女人一样敏感，她却像西班牙人一样高傲地克制自己的心性与感情。甚至在她寻找配偶时也很难找到一个适合她的人。

Not every one can realise the motive power to be found in a love of what is right, nor the inner strength which results from a genuine love of virtue. There are men who think that all greatness is a figment of the brain, men who with their vile and degraded reason will never recognise the power over human passions which is wielded by the very madness of virtue. You can only teach such men by examples; if they persist in denying their existence, so much the worse for them. If I told them that Sophy is no imaginary person, that her name alone is my invention, that her education, her conduct, her character, her very features, really existed, and that her loss is still mourned by a very worthy family, they would, no doubt, refuse to believe me; but indeed why should I not venture to relate word for word the story of a girl so like Sophy that this

story might be hers without surprising any one. Believe it or no, it is all the same to me; call my history fiction if you will; in any case I have explained my method and furthered my purpose.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在真实的爱情中存在着驱动力，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对于高尚美德的热爱会带来内在的力量。有一些人认为所有伟大的事物都只是大脑的臆造。那些满怀卑鄙拙劣理由的人们永远无法认识到超越人类激情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由极致的美德产生的。你只能用实例去说服他们。而如果他们坚持否认这种存在，那结果就更糟糕了。如果我告诉他们苏菲并非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我只不过编造了她的名字。她所受的教育、她的行为、她的品德和她的特点都真实存在，如今仍有值得尊敬的家庭为她的离开而哀痛。他们自然是不会相信的。但是事实上，我确实可以把一个和苏菲相像的女孩子的故事逐字逐句的讲出来，没有人会对这个故事感到惊讶，我也不必冒任何风险。无论信与不信，这对我来说毫无差别。你们大可以称之为虚构小说。总之，我是要解释我的方法以达到目标。

This young girl with the temperament which I have attributed to Sophy was so like her in other respects that she was worthy of the name, and so we will continue to use it. After the conversation related above, her father and mother thought that suitable husbands would not be likely to offer themselves in the hamlet where they lived; so they decided to send her to spend the winter in town, under the care of an aunt who was privately acquainted with the object of the journey; for Sophy's heart throbbed with noble pride at the thought of her self-control; and however much she might want to marry, she would rather have died a maid than have brought herself to go in search of a husband.

这个年轻的姑娘不仅与我所给予苏菲的气质相像，在其他方面也很像苏菲。她对于这个名字是受之无愧的，所以我们会继续沿用这个名字。在经过上述一番谈话之后，苏菲的父母感到在他们居住的这样一个小村庄里找到一个适合苏菲的丈夫可能性很小。因此他们决定把她送到城镇上，在她的姑母的照顾下过冬，她的姑母已经在私下里知悉了此行的目的。苏菲内心里是一个清高自控的女孩子，无论她可能多么想结婚，她宁愿孤独终老也不会主动去寻找一个丈夫。

In response to her parents' wishes her aunt introduced her to her friends, took her into company,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showed her society, or rather showed her in society, for Sophy paid little heed to its bustle. Yet it was plain that she did not shrink from young men of pleasing appearance and modest seemly behaviour. Her very shyness had a charm of its own, which was very much like coquetry; but after talking to them once or twice she repulsed them. She soon exchanged that air of authority which seems to accept men's homage for a humbler bearing and a still more chilling politeness. Always watchful over her conduct, she gave them no chance of doing her the least service; it was perfectly plain that she was determined not to accept any one of them.

为了回应她父母的心愿，苏菲的姑母把她介绍给她的朋友们，带她去私人和公开的聚会，向她展示社交圈，或者说，在社交圈中展示苏菲，因为苏菲对那些喧闹毫不在意。但很明显，苏菲遇到那些样貌英俊举止优雅的年轻男士也不会躲躲闪闪。她所特有的娇羞有其独特的魅力，其实很像是在卖弄风情。但是当他们交流了一两次之后，她就不再理睬他们了。很快她就会改变那种看似接受男士顺从的高傲态度，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较为谦和的忍耐和更为冷漠的礼貌。她总是对自己的言行很注意，绝不会给他们任何一点为她效劳的机会。很明显，她决意不会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机会。

Never did sensitive heart take pleasure in noisy amusements, the empty and barren delights of those who have no feelings, those who think that a merry life is a happy life. Sophy did not find what she sought, and she felt sure she never would, so she got tired of the town. She loved her parents dearly and nothing made up for their absence, nothing could make her forget them; she went home long before the time fixed for the end of her visit.

聪明的人从不以喧闹的生活为乐，只有那些没有感情的人会喜欢那种空虚而贫瘠的快乐，在他们看来快活的人生就是幸福的。苏菲没有找到她所追寻的那个人，而她也确信她将无法找到。于是她渐渐厌倦了这个小镇。她如此深爱她的父母，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弥补他们在生命中的缺席，也没有任何事情会使她忘记他们。于是她在早于拜访结束的日期很久之前便回到家里。

Scarcely had she resumed her home duties when they perceived that her temper had changed though her conduct was unaltered, she was forgetful, impatient, sad, and dreamy; she wept in secret. At first they thought she was in love and was ashamed to own it; they spoke to her, but she repudiated the idea. She protested she had seen no one who could touch her heart, and Sophy always spoke the truth.

她刚一到家就回归义务，苏菲的父母就意识到她的脾性有了改变。尽管她的行为并又没什么变化，但她变得健忘、急躁、忧郁而恍惚，时而她会暗自哭泣。最初他们以为她恋爱了却羞于接受这段恋情。他们与她交谈，但她拒绝了谈话。她抗议说她从没有见过一个人能触动她的心。苏菲从不说谎。

Yet her languor steadily increased, and her health began to give way. Her mother was anxious about her, and determined to know the reason for this change. She took her aside, and with the winning speech and the irresistible caresses which only a mother can employ, she said, “My child, whom I have borne beneath my heart, whom I bear ever in my affection, confide your secret to your mother's bosom. What secrets are these which a mother may not know? Who pities your sufferings, who shares them, who would gladly relieve them, if not your father and myself? Ah, my child! would you have me die of grief for your sorrow without letting me share it?”

她的疲乏日渐加重，而健康却每况愈下。她的母亲非常担心她，决意要弄清楚这种改变的原因。苏菲的母亲把她叫到一旁，用母亲的慈爱与温柔的言语和爱抚，对苏菲说，“我的孩子，我曾用心孕育你，以我全部的热爱抚育你。将你的秘密向母亲的怀抱吐露吧。有什么秘密是连母亲都不能知道的？除了你的父亲和我，还有谁会怜悯、会分担、会抚慰你的痛苦？啊，我的孩子！你愿我因烦忧于你的痛苦而死去，你却不愿与我分担吗？

Far from hiding her griefs from her mother, the young girl asked nothing better than to have her as friend and comforter; but she could not speak for shame, her modesty could find no words to describe a condition so unworthy of her, as the emotion which disturbed her senses in spite of all her efforts. At length her very shame gave her mother a clue to her difficulty, and she drew from her the humiliating confession. Far from distressing her with reproaches or unjust blame, she consoled her, pitied her, wept over her; she was too wise to make a crime of an evil which virtue alone

made so cruel. But why put up with such an evil when there was no necessity to do so, when the remedy was so easy and so legitimate? Why did she not use the freedom they had granted her? Why did she not take a husband? Why did she not make her choice? Did she not know that she was perfectly independent in this matter, that whatever her choice, it would be approved, for it was sure to be good? They had sent her to town, but she would not stay; many suitors had offered themselves, but she would have none of them. What did she expect? What did she want? What an inexplicable contradiction?

年轻的苏菲没有在母亲面前掩饰自己的悲伤，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什么也没有问，她把母亲当作自己的朋友与安慰。但是她由于羞愧无法全盘托出，她的矜持使她无法描述这样一个与她不相符的情形。尽管她竭力控制自己，但情绪仍然扰乱了她的情感。最终，她的母亲还是从她羞愧难当的表情中找到了一丝线索，从她尴尬的自白中了解到了实情。但她并没有表示出不讲道理的责备，而是好言安慰苏菲，为她悲鸣怜惜，与她一同哭泣。她确实有才识，因此才不会因为无情的道德而犯错。但是既然补救如此简单合理，为什么要毫无必要地忍受这样的错误？为什么她不行使被众人认可的自由呢？为什么她不选择一个丈夫？为什么她不能自己做出选择？难道她不明白她在这件事情上是完全自由的吗？无论她如何选择，都会被认可。因为她的选择一定是正确的。她的父母把她送到城镇去，但是她不愿留下。很多求婚者向她表明了真心，但她一个也没有接受。她在期待什么呢？她又想得到什么？这样的矛盾令人费解。

The reply was simple. If it were only a question of the partner of her youth, her choice would soon be made; but a master for life is not so easily chosen; and since the two cannot be separated, people must often wait and sacrifice their youth before they find the

man with whom they could spend their life. Such was Sophy's case; she wanted a lover, but this lover must be her husband; and to discover a heart such as she required, a lover and husband were equally difficult to find. All these dashing young men were only her equals in age, in everything else they were found lacking; their empty wit, their vanity, their affectations of speech, their ill-regulated conduct, their frivolous imitations alike disgusted her. She sought a man and she found monkeys; she sought a soul and there was none to be found.

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个问题仅仅是找到一个她的青春伴侣，那么苏菲就能很快做出选择。但是寻找一个人生伴侣就不是这么容易了。而既然两者是不可割裂的，人们为了找到一个能陪伴一生的人，往往必须经历长久的等待，牺牲他们的年少时光。苏菲的情况就是这样。她希望有一个爱人，但是这个爱人必须是她的丈夫。而爱人或是丈夫都是同样难以找寻的，因为他们很难达到她的标准。而所有的那些看起来时髦的年轻男士与她其实只有年龄上是对等的，在其他方面他们都显得稍逊一筹。他们过于愚笨却又追求虚荣，言辞矫揉造作、举止轻浮谄媚，使她感到厌恶。她想要找一个相伴一生的人，却找到的都是猴子。她想要一个灵魂伴侣，却一无所获。

“How unhappy I am!” said she to her mother; “I am compelled to love and yet I am dissatisfied with every one. My heart rejects every one who appeals to my senses. Every one of them stirs my passions and all alike revolt them; a liking unaccompanied by respect cannot last. That is not the sort of man for your Sophy; the delightful image of her ideal is too deeply graven in her heart. She can love no other; she can make no one happy but him, and she cannot be happy without him. She would rather consume herself in ceaseless conflicts, she would rather die free and wretched, than

driven desperate by the company of a man she did not love, a man she would make as unhappy as herself; she would rather die than live to suffer.”

“我多么不幸啊！”苏菲对她的母亲说，“我屈从于爱情，却对所有人失望。我的内心拒绝了所有吸引我感觉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扰动着我的热情，我也无一例外地排斥他们。相爱却无法相敬是无法长久的。那样的人苏菲并不喜欢，她所理想的形象早已经深深地刻在她内心深处。她只爱这样一个人。她只会使他感到幸福，而只有他能使她感到幸福。她宁愿将自己消磨在这无尽的矛盾中。她宁可自由而痛苦地死去，也不愿由一个不爱的人陪伴直至绝望。这个人她无法使他感到幸福，而她宁愿死也不愿苟活。”

Amazed at these strange ideas, her mother found them so peculiar that she could not fail to suspect some mystery. Sophy was neither affected nor absurd. How could such exaggerated delicacy exist in one who had been so carefully taught from her childhood to adapt herself to those with whom she must live, and to make a virtue of necessity? This ideal of the delightful man with which she was so enchanted, who appeared so often in her conversation, made her mother suspect that there was some foundation for her caprices which was still unknown to her, and that Sophy had not told her all. The unhappy girl, overwhelmed with her secret grief, was only too eager to confide it to another. Her mother urged her to speak; she hesitated, she yielded, and leaving the room without a word, she presently returned with a book in her hand. “Have pity on your unhappy daughter, there is no remedy for her grief, her tears cannot be dried. You would know the cause: well, here it is,” said she, flinging the book on the table. Her mother took the book and opened it; it was The Adventures of Telemachus. At first she could

make nothing of this riddle; by dint of questions and vague replies, she discovered to her great surprise that her daughter was the rival of Eucharis.

苏菲的母亲听了这番话十分惊讶，她觉得这太过怪异，使她不能不怀疑其中的秘密。苏菲向来不易受到影响，也不是一个荒唐愚蠢的人。她从童年时期便受到细致的教育，要培养她以使她能适应与那些她必须要相处的人适应，并理解必要的美德。但她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夸张的想法呢？她对这个理想中的令人愉悦的男士是如此着迷，在谈话中时常提及，使苏菲的母亲怀疑她天马行空的幻想中仍有一些她尚未知晓而苏菲也不曾告知的原因存在。这个不幸的女孩几乎要被这秘密的悲痛压垮，她急于向别人倾诉。她的母亲也鼓励她说出全部。有所犹疑的苏菲退缩了，她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房间，手里拿着一本书回到房间里。“可怜可怜你不幸的女儿吧，世间竟无办法能抚慰她的悲伤，她的泪水永不会枯竭。你想要知道缘由。喏，原因就在这书里，”苏菲这样说，并把书扔到了桌上。她的母亲拿起书打开一看，是《忒勒马科斯历险记》。起初她的母亲并不理解这个谜语；经过一番询问，她从女儿模糊的回答中惊奇地发现，原来苏菲是欧夏丽的情敌。

Sophy was in love with Telemachus, and loved him with a passion which nothing could cure. When her father and mother became aware of her infatuation, they laughed at it and tried to cure her by reasoning with her. They were mistaken, reason was not altogether on their side; Sophy had her own reason and knew how to use it. Many a time did she reduce them to silence by turning their own arguments against them, by showing them that it was all their own fault for not having trained her to suit the men of that century; that she would be compelled to adopt her husband's way of thinking or he must adopt hers, that they had made the

former course impossible by the way she had been brought up, and that the latter was just what she wanted. “Give me,” said she, “a man who holds the same opinions as I do, or one who will be willing to learn them from me, and I will marry him; but until then, why do you scold me? Pity me; I am miserable, but not mad. Is the heart controlled by the will? Did my father not ask that very question? Is it my fault if I love what has no existence? I am no visionary; I desire no prince, I seek no Telemachus, I know he is only an imaginary person; I seek some one like him. And why should there be no such person, since there is such a person as I, I who feel that my heart is like his? No, let us not wrong humanity so greatly, let us not think that an amiable and virtuous man is a figment of the imagination. He exists, he lives, perhaps he is seeking me; he is seeking a soul which is capable of love for him. But who is he, where is he? I know not; he is not among those I have seen; and no doubt I shall never see him. Oh! mother, why did you make virtue too attractive? If I can love nothing less, you are more to blame than I.”

苏菲以一种不可抗拒的热情爱上了忒勒马科斯。当苏菲的父母了解了这种狂热之后，他们笑了，并且试图以道理说服她。但他们错了。苏菲同样有自己的道理。她有自己的理由，并且明白如何去利用它。很多时候苏菲用他们的观点争辩，反而使他们自己哑口无言。苏菲指出这是他们的过错，因为他们没有能将她培养成一个适合嫁给这个时代的男士的女孩，她和她的丈夫之间必有一方要接受另一方的思想。而由于她以这样的方式成长起来，使丈夫接受自己的思想显然是她想要的结果。苏菲说：“我想嫁给一个与我分享相同观点的人，或者是一个愿意接受我的观点的人。但是在此之前，你们为什么要责备我呢？请给我一些怜悯。我虽悲痛但不至发疯。心意会以意志为转移吗？父亲不是问过这个问题吗？如果我所爱的人并不存在，这是我的错吗？我并不是喜欢空想。我不会幻想嫁给王子，也没有追寻忒勒马

科斯。因为我知道他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我想找到一个和他相似的人。既然有人与我心意相通，为什么世间不存在这样的人呢？不，不要太低估了人性。这样一个可爱而高尚的男子不一定只存在于幻想中。他存在于世间，他是真正在生活的。也许他也在寻找我，也许他也在寻找一个配得上他的爱情的灵魂。但是他是谁呢？他又在哪里？我并不知道。在我所遇到的人里，他绝不在其中。而无疑我不曾与他相识。唉！妈妈，为什么你使我如此热爱美德？如果我不能爱上其他事物，那么你比我更该受到责备。”

Must I continue this sad story to its close? Must I describe the long struggles which preceded it? Must I show an impatient mother exchanging her former caresses for severity? Must I paint an angry father forgetting his former promises, and treating the most virtuous of daughters as a mad woman? Must I portray the unhappy girl, more than ever devoted to her imaginary hero, because of the persecution brought upon her by that devotion, drawing nearer step by step to her death, and descending into the grave when they were about to force her to the altar? No; I will not dwell upon these gloomy scenes; I have no need to go so far to show, by what I consider a sufficiently striking example, that in spite of the prejudices arising from the manners of our age, the enthusiasm for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is no more foreign to women than to men, and that there is nothing which, under nature's guidance, cannot be obtained from them as well as from us.

我必须要为这个悲伤的故事写上结局吗？我必须要描述这长长的斗争与折磨吗？我非得把一位心急的母亲先前的温柔转为严苛的过程表现出来吗？我一定要指出一位愤怒的父亲忘记了他曾经的许诺而将他最珍爱美德的女儿视为疯子吗？我是不是非要描绘出一个不幸的女孩？她因为自己对一位幻想中英雄的热爱而受到父母的压制，一步一

步走向死亡。当她的父母逼迫她走向圣坛之时，她便坠入无尽的坟墓。不，我不愿细想这些痛苦的场景。我不必细数之前提及的详尽的例子。尽管由于这个时代的习俗使我们产生了许多偏见，但追寻美好与善良的热情在女性身上的表现也并不逊色于男性。在自然的引导下，女人与男人所能习得的事物将是相同的。

You stop me here to inquire whether it is nature which teaches us to take such pains to repress our immoderate desires. No, I reply, but neither is it nature who gives us these immoderate desires. Now, all that is not from nature is contrary to nature, as I have proved again and again.

你们在这里打断我，想要了解是不是自然教会我们在克制自己无度的欲望上如此痛苦。我的回答是不。但同时，并不是自然给予我们如此无度的欲望。正如我多次证明过的一样，现在一切不是来自自然的东西，实则都是与自然相互矛盾的。

Let us give Emile his Sophy; let us restore this sweet girl to life and provide her with a less vivid imagination and a happier fate. I desired to paint an ordinary woman, but by endowing her with a great soul, I have disturbed her reason. I have gone astray. Let us retrace our steps. Sophy has only a good disposition and an ordinary heart; her educ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everything in which she excels other women.

让我们把苏菲还给爱弥儿。让这个善良的女孩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她的想象力不再那么天马行空，而她的命运更加幸福。我试图去刻画一个普通的女孩。但是为了赋予她伟大的灵魂，我不得已扰乱了

她的理智。我有些误入歧途。所以让我们回到原来的道路上来吧。苏菲有着美好的品性与平凡的心灵，她之所以胜过其他女子，是由于她受过良好的教育。

In this book I intended to describe all that might be done and to leave every one free to choose what he could out of all the good things I described. I meant to train a helpmeet for Emile, from the very first, and to educate them for each other and with each other. But on consideration I thought all these premature arrangements undesirable, for it was absurd to plan the marriage of two children before I could tell whether this union was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 and whether they were really suited to each other. We must not confuse what is suitable in a state of savagery with what is suitable in civilised life. In the former, any woman will suit any man, for both are still in their primitive and undifferentiated condition; in the latter, all their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developed by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each mind, having taken its own settled form, not from education alone, but by the co-operation, more or less well-regulated, of natural disposition and education, we can only make a match by introducing them to each other to see if they suit each other in every respect, or at least we can let them make that choice which gives the most promise of mutual suitability.

在本书中，我试图去描述所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以便于让各位能够在我所描述的美好的事情中自由地做出选择。起初，我意在为爱弥儿培养一位伴侣，为他们两位而培养对方，并且也使他们相互影响。但是稍加考虑后，我感到过早的安排是不合理的。在我未能确定他们之间的结合是否遵循了自然的秩序、他们之间是否真正合适之前，这样安排他们的婚姻是很荒谬的。我们不应当混淆在人类的蒙昧状态与文明社会中所谓合适的区别。在野蛮社会中，由于同样仍处在原始且

未开化的状态，女人对男人来说都是合适的。而在文明社会中，人类的性格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而发展，每一个人的思想状态都有独特的定式。这不仅仅来自于教育，或多或少地也来自于天性与教育之间良好的配合。我们只能使他们相互认识来判断他们在各方面是否适合。或者至少让他们做出确保对彼此都合适的选择。

The difficulty is this: while social life develops character it differentiates classes, and these two classifications do not correspond, so that the greater the social distinctions, the greater the difficulty of finding th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 Hence we have ill-assorted marriages and all their accompanying evils; and we find that it follows logically that the further we get from equality, the greater the change in our natural feelings; the wider the distance between great and small, the looser the marriage tie; the deeper the gulf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e fewer husbands and fathers. Neither master nor slave belongs to a family, but only to a class.

而困难在于，一方面社会生活促进了人的个性化发展，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但这二者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社会分化越明显，能够找到一个性格合适的人的难度就越大。因此世上存在着不相配的婚姻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我们会发现逻辑上来说，双方之间越不平等，自然感情中的变化就越大；社会等级的差距越大，婚姻的联系就越松散；而贫富之间的差距越大，家庭就越难以美满。一个家庭中不应该有主人或是奴隶，只有阶层中才有这样的关系。

If you would guard against these abuses, and secure happy marriages, you must stifle your prejudices, forget human institutions, and consult nature. Do not join together those who are only alike in one given condition, those who will not suit one

another if that condition is changed; but those who are adapted to one another in every situation, in every country, and in every rank in which they may be placed. I do not say that conventional considerations are of no importance in marriage, but I do say that 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relations is so much more important, that our fate in life is decided by them alone, and that there is such an agreement of taste, temper, feeling, and disposition as should induce a wise father, though he were a prince, to marry his son, without a moment's hesitation, to the woman so adapted to him, were she born in a bad home, were she even the hangman's daughter. I maintain indeed that every possible misfortune may overtake husband and wife if they are thus united, yet they will enjoy more real happiness while they mingle their tears, than if they possessed all the riches of the world, poisoned by divided hearts.

如果你想要获得美满的婚姻又避免这些痛楚，那你必须摒弃偏见，忘却人类的社会制度，而遵从自然的意愿。不要因为两人只在某特定条件下相配就缔结婚姻，一旦条件更改，他们就会变得不再般配。而应该选择那些无论什么情况、无论国籍、无论阶层都互相适应的人。我并不是说婚姻不必再考虑传统的因素，但我相信自然关系的影响更为重要，我们一生的命运由此决定。在品味、脾性、感情和性格方面的一致如此重要。假设一个父亲是明智的，即使他是一位国王，要使自己的儿子娶一位贫民出身的女子为妻，就算这个女孩的父亲是一个刽子手，如果这两人是相配的，那么他也不应有丝毫的犹豫。我确信这样结合的夫妻能够抵抗所有可能的不幸与困苦。而他们即便生活困苦，也能比那些虽然家财万贯却离心离德的夫妻体会到更多真正的幸福。

Instead of providing a wife for Emile in childhood, I have

waited till I knew what would suit him. It is not for me to decide, but for nature; my task is to discover the choice she has made. My business, mine I repeat, not his father's; for when he entrusted his son to my care, he gave up his place to me. He gave me his rights; it is I who am really Emile's father; it is I who have made a man of him. I would have refused to educate him if I were not free to marry him according to his own choice, which is mine. Nothing but the pleasure of bestowing happiness on a man can repay me for the cost of making him capable of happiness.

我要等到真正了解什么才是适合爱弥儿的，再为他提供一个真正合适的伴侣，而不是在他的童年时期就这么安排好。这是由自然而不是我来决定的。我的任务是理解自然做出的选择。我数次重申，这是我的工作，而不是他父亲的。因为在他把爱弥儿交由我抚育时，就已经把这种权利交给我。他将自己的权利交给我，我就是爱弥儿真正的父亲，是由我将他抚养成人。如果我无法按照他自己的也就是我的意愿来为他自由地选择一个伴侣，我会拒绝教育他。唯有将幸福赠与一个人的喜悦能够报答我为将他抚育成一个幸福的人的努力。

Do not suppose, however, that I have delayed to find a wife for Emile till I sent him in search of her. This search is only a pretext for acquainting him with women, so that he may perceive the value of a suitable wife. Sophy was discovered long since; Emile may even have seen her already, but he will not recognise her till the time is come.

但是，别以为我只会一味推延，让爱弥儿自己去寻找他的伴侣。寻找过程只是为了让爱弥儿提前熟悉女人，以帮助他了解一个合适的妻子的重要性。苏菲早就被找到了，而爱弥儿可能已经见过她。但直

到时机来临，爱弥儿才能认出她。

Although equality of rank is not essential in marriage, yet this equality along with other kinds of suitability increases their value; it is not to be weighed against any one of them, but,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it turns the scale.

尽管在婚姻中双方的社会地位的对等并不重要，但是这种对等与其他方面的适合能够提高这些对等的价值。对等的社会地位并不足以抵消其中任一项的不适合。但是一旦其他方面都能相配，平等的社会地位就非常重要。

A man, unless he is a king, cannot seek a wife in any and every class; if he himself is free from prejudices, he will find them in others; and this girl or that might perhaps suit him and yet she would be beyond his reach. A wise father will therefore restrict his inquiries within the bounds of prudence. He should not wish to marry his pupil into a family above his own, for that is not within his power. If he could do so he ought not desire it; for what difference does rank make to a young man, at least to my pupil? Yet, if he rises he is exposed to all sorts of real evils which he will feel all his life long. I even say that he should not try to adjust the balance between different gifts, such as rank and money; for each of these adds less to the value of the other than the amount deducted from its own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adjustment; moreover, we can never agree as to a common denominator; and finally the preference, which each feels for his own surroundings, paves the way for discord between the two families and often to difficulties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除了国王，其他人不可能喜欢什么阶层的人就与她结婚。就算他能摒除偏见，别人也仍然保有这种偏见。而这个可能与他相配的女孩也是无法与之结婚的。一位明智的父亲会谨慎地限制儿子的要求。他不想为儿子选择一个阶层更为高贵的人家，因为这会使他无力控制。即使他能这么做，他也不应该这样想。门第的高低能对一个年轻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至少能对我的学生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但是，如果他真的高攀了一门亲事，那么漫漫人生他都将会面对各种真正的痛苦。我甚至会说，他不应该试图去平衡那些与生俱来的所有物，比如社会阶级和财富。因为这二者在他寻求平衡的过程中往往损失的价值比得到的要多。而且，两者甚至无法相互平衡。而所有人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环境，这最终会为两个家庭以及这对夫妻的痛苦埋下了伏笔。

It makes a considerable difference as to the suitability of a marriage whether a man marries above or beneath him. The former case is quite contrary to reason, the latter is more in conformity with reason. As the family is only connected with society through its head, it is the rank of that head which decides that of the family as a whole. When he marries into a lower rank, a man does not lower himself, he raises his wife; if, on the other hand, he marries above his position, he lowers his wife and does not raise himself. Thus there is in the first case good unmixed with evil, in the other evil unmixed with good. Moreover, the law of nature bids the woman obey the man. If he takes a wife from a lower class, natural and civil law are in accordance and all goes well. When he marries a woman of higher rank it is just the opposite case; the man must choose between diminished rights or imperfect gratitude; he must be ungrateful or despised. Then the wife, laying claim to authority, makes herself a tyrant over her lawful head; and the master, who has become a slave, is the most ridiculous and miserable of

creatures. Such are the unhappy favourites whom the sovereigns of Asia honour and torment with their alliance; people tell us that if they desire to sleep with their wife they must enter by the foot of the bed.

一个人和一个与他地位不同的人结婚，会对婚姻的美满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与一个地位较高的人结婚是与常理相矛盾的，而与一个地位较低的人结婚才是更加合乎情理的。一个家庭是由其家长与社会产生联系，因此其家长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整个家庭的地位。如果一位男士娶了一位地位较低的妻子，那么他并没有降低自己的身份，而是提高了妻子的身份。但如果他高攀了一门婚事，他并没有提高自己的身份，反而使妻子的身份降低了。因此，在第一种情况下有益无害，相反后者则有害无益。而且，自然法则要求女人服从男人。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一位地位较低的妻子，这是符合自然与社会的秩序的。但如果他娶了一个地位较高的妻子，情况则恰恰相反。这个男人要么权益受损，要么恩义尽失。他必然会被轻视，被大家认为是忘恩负义的人。而这位妻子则想要拥有权威，对丈夫施以压制。这位丈夫就会从一家之主变成家庭里的奴隶，既可笑又可悲。与亚洲国家的君主联姻的人往往就是这样不幸，受尽折磨。据说如果他们想和妻子一起睡觉，他们必须从床尾处上床。

I expect that many of my readers will remember that I think women have a natural gift for managing men, and will accuse me of contradicting myself; yet they are mistaken. There is a vast difference between claiming the right to command, and managing him who commands. Woman's reign is a reign of gentleness, tact, and kindness; her commands are caresses, her threats are tears. She should reign in the home as a minister reigns in the state, by contriving to be ordered to do what she wants. In this sense, I grant you, that the best managed homes are those where the wife has

most power. But when she despises the voice of her head, when she desires to usurp his rights and take the command upon herself, this inversion of the proper order of things leads only to misery, scandal, and dishonour.

我想大多数读者都记得我说过女人天生有驾驭男人的天赋，这里他们也许会苛责我的话自相矛盾。但是他们错了。在拥有主导权和管理主导的人之前有很大的差别。女性的统治往往是通过温情、机敏与善良。她的爱抚即是命令，眼泪即是威胁。她应像大臣管理领地一样主导着家庭，设法让其伴侣接受命令去做她想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如果一个家庭中女性拥有绝对权威，那么这个家一定被管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如果她轻视了丈夫的意见，如果她妄图剥夺丈夫的权利，对他发号施令，那么正常的秩序就会被打乱，从而导致家庭的不幸以及声誉的败坏。

There remains the choice between our equals and our inferiors; and I think we ought also to make certain restric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latter; for it is hard to find in the lowest stratum of society a woman who is able to make a good man happy; not that the lower classes are more vicious than the higher, but because they have so little idea of what is good and beautiful, and because the injustice of other classes makes its very vices seem right in the eyes of this class.

因此，选择应该留在相同社会阶层或是较低阶层的人中进行。我认为我们尤其应对后者做出一些限制。因为在社会底层，很难有一个合适的女子能够使一位高尚的男士感到幸福。这并不是因为较低阶层更为不堪，而是因为他们对于善和美没有足够的认识，因为上层社会的不道德行为看似正确，而使他们产生误解。

By nature man thinks but seldom. He learns to think as he acquires the other arts, but with even greater difficulty. In both sexes alike I am only aware of two really distinct classes, those who think and those who do not; and this difference is almost entirely one of education. A man who thinks should not ally himself with a woman who does not think, for he loses the chief delight of social life if he has a wife who cannot share his thoughts. People who spend their whole life in working for a living have no ideas beyond their work and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their mind seems to reside in their arms. This ignorance is not necessarily unfavourable either to their honesty or their morals; it is often favourable; we often content ourselves with thinking about our duties, and in the end we substitute words for things. Conscience is the most enlightened philosopher; to be an honest man we need not read Cicero's De Officiis, and the most virtuous woman in the world is probably she who knows least about virtue. But it is none the less true that a cultivated mind alone makes intercourse pleasant, and it is a sad thing for a father of a family, who delights in his home, to be forced to shut himself up in himself and to be unable to make himself understood.

人天生很少思考。当他开始学习其他学科后，也会学着去思考，但是过程更加困难。无论男性或是女性，我只知道两种真正明显的差别，就是思考与不思考的人。这种差别几乎完全归因于教育。一个会思考的男人不应该和一个不思考的女人结婚。因为这样的妻子难以分享他的思想，会使他失去人生中最大的快乐。那些整日里为生活忙碌的人对于工作和他们个人利益之外的事情没有任何想法。他们的思想似乎只存在于胳膊中。这种无知并非无益于他们的诚信与道德，相反时常是有益的。我们往往只会空想责任来满足自己，最后却只是纸上谈兵。良知是最有见地的哲学家。我们不必阅读西塞罗的《论责任》

也可以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而世上最高尚的女子也许是对于美德一无所知的人。但是千真万确的是，与一个有教养的人交往是非常有趣的。因此如果一位热爱家庭的父亲在家中却无人理解，只能与自己相处，就是非常悲哀的事情了。

Moreover, if a woman is quite unaccustomed to think, how can she bring up her children? How will she know what is good for them? How can she incline them to virtues of which she is ignorant, to merit of which she has no conception? She can only flatter or threaten, she can only make them insolent or timid; she will make them performing monkeys or noisy little rascals; she will never make them intelligent or pleasing children.

而且，如果一位女士不习惯思考，那她要如何抚养自己的儿女呢？她怎么知道什么才是适合孩子的呢？如果她对美德一无所知，又如何引导孩子尊尚美德呢？她只能通过宠溺或者威胁来培养孩子，只能使他们傲慢无礼或胆小怕事。如此只能把孩子们培养成热衷嬉闹的捣蛋鬼或者是吵闹的小流氓，而无法使他们聪慧可爱。

Therefore it is not fitting that a man of education should choose a wife who has none, or take her from a class where she cannot be expected to have any education. But I would a thousand times rather have a homely girl, simply brought up, than a learned lady and a wit who would make a literary circle of my house and install herself as its president. A female wit is a scourge to her husband, her children, her friends, her servants, to everybody. From the lofty height of her genius she scorns every womanly duty, and she is always trying to make a man of herself after the fashion of Mlle. de L'Enclos. Outside her home she always makes herself

ridiculous and she is very rightly a butt for criticism, as we always are when we try to escape from our own position into one for which we are unfitted. These highly talented women only get a hold over fools. We can always tell what artist or friend holds the pen or pencil when they are at work; we know what discreet man of letters dictates their oracles in private. This trickery is unworthy of a decent woman. If she really had talents, her pretentiousness would degrade them. Her honour is to be unknown; her glory is the respect of her husband; her joys the happiness of her family. I appeal to my readers to give me an honest answer; when you enter a woman's room what makes you think more highly of her, what makes you address her with more respect—to see her busy with feminine occupations, with her household duties, with her children's clothes about her, or to find her writing verses at her toilet table surrounded with pamphlets of every kind and with notes on tinted paper? If there were none but wise men upon earth such a woman would die an old maid.

所以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应该选择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做妻子，他不应该去一个不可能接受教育的阶层中去选择妻子。但我更宁愿要一个平凡人家的朴素抚养的女孩，她们比私自将我家变成一个文学论坛还把自己当作主持者的博学小姐更让人喜爱。对丈夫、孩子、伙伴、仆人以及所有人，所有有才华的女子都是祸害。她的自视清高使她蔑视一切女性应尽的职责，总是试图学习德朗克洛小姐的方式让自己像个男人。她在外总是犯下可笑的错误，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这场景正如我们往往在试图逃离自己原来的位置，还硬要把自己塞进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地方。这种才华横溢的女子只能吓到傻瓜。我们可以看出当她们工作时其实由艺术家与朋友们执笔，而私下里会有小心审慎的文学家对她们进行指点。任何一位得体的女士都不应该耍这样的花招。如果她真的有才华，她的自命不凡也会毁掉她的才华。她的荣耀在于默默无闻，她的骄傲来自于丈夫的尊重，她的快乐则来自于

家庭的幸福。我呼吁读者们能给我一个诚恳的回答，如果你走进一位女士的房间，是什么会使你更加尊重她？是看见她忙于料理事物和琐碎家务，周围摆满了孩子的衣服，还是她梳妆台上的诗篇，周围摆放着不同颜色的记满笔记的小纸片？如果世间男士都头脑清醒，可能这样的女人会孤独终老吧。

“Quaeris cur nolim te ducere, galla? diserta es.” Martial xi. 20.

“嘉拉，你问我为什么不愿意娶你吗？因为你说话太斯文了。”《讽刺诗》11篇20节

Looks must next be considered; they are the first thing that strikes us and they ought to be the last, still they should not count for nothing. I think that great beauty is rather to be shunned than sought after in marriage. Possession soon exhausts our appreciation of beauty; in six weeks' time we think no more about it, but its dangers endure as long as life itself. Unless a beautiful woman is an angel, her husband is the most miserable of men; and even if she were an angel he would still be the centre of a hostile crowd and she could not prevent it. If extreme ugliness were not repulsive I should prefer it to extreme beauty; for before very long the husband would cease to notice either, but beauty would still have its disadvantages and ugliness its advantages. But ugliness which is actually repulsive is the worst misfortune; repulsion increases rather than diminishes, and it turns to hatred. Such a union is a hell upon earth; better death than such a marriage.

接下来我们必然要谈及相貌。相貌往往是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

也应该是最不重要的因素。当然，相貌不应该是完全无用的。我认为不仅不应该追求，反而应该避免娶一个样貌姣好的妻子。拥有感会很快消磨我们对美的欣赏，六周后我们就觉得这姿色不过如此。但只要生活继续，危险就一直存在。除非一个美丽的姑娘是个天使，否则他的丈夫会是世上最痛苦的人。即使她是天使，她的丈夫也会成为满怀敌意的人们攻击的焦点，而她也无法避免这一点。如果过分丑陋并不令人生厌，那么相比极其美丽的女子我情愿选择前者。因为不出多久，丈夫就会觉得样貌是无足轻重的，美丽会带来烦扰而丑陋却有益处。但最令人遗憾的是丑陋确实是令人生厌的。厌恶的感觉不消反涨。这样的结合与地狱无异，这种婚姻不如死亡。

Desire mediocrity in all things, even in beauty. A pleasant attractive countenance, which inspires kindly feelings rather than love, is what we should prefer; the husband runs no risk, and the advantages are common to husband and wife; charm is less perishable than beauty; it is a living thing, which constantly renews itself, and after thirty years of married life, the charms of a good woman delight her husband even as they did on the wedding-day.

在所有的事情中，甚至是在美丽中，都要追求中庸。一张可爱而又具有吸引力的脸庞虽不能使你陷入爱情，总是会引起你温柔的想法。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一方面对于丈夫并无害处，另一方面对夫妻双方也是有益的。魅力远比美丽要长久。它是真实存在且不断变化的。在婚后三十年，一位充满魅力的妻子会使丈夫仍像新婚之时感到喜悦。

Such are the considerations which decided my choice of Sophy. Brought up, like Emile, by Nature, she is better suited to him than any other; she will be his true mate. She is his equal in birth and

character, his inferior in fortune. She makes no great impression at first sight, but day by day reveals fresh charms. Her chief influence only takes effect gradually, it is only discovered in friendly intercourse; and her husband will feel it more than any one. Her education is neither showy nor neglected; she has taste without deep study, talent without art, judgment without learning. Her mind knows little, but it is trained to learn; it is well-tilled soil ready for the sower. She has read no book but Bareme and Telemachus which happened to fall into her hands; but no girl who can feel so passionately towards Telemachus can have a heart without feeling or a mind without discernment. What charming ignorance! Happy is he who is destined to be her tutor. She will not be her husband's teacher but his scholar; far from seeking to control his tastes, she will share them. She will suit him far better than a blue-stocking and he will have the pleasure of teaching her everything. It is time they made acquaintance; let us try to plan a meeting.

这些考虑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苏菲的原因。她像爱弥儿一样是自然地成长起来的，因此她会是爱弥儿无与伦比的伴侣，他真正的伴侣。他们二人在出身与性格上都是对等的，唯有财产上苏菲稍稍逊色。尽管她初看并不惊艳，但是她的魅力是历久弥新的。她的影响是逐渐发挥作用的，只有通过友好的交往才能慢慢了解。而她的丈夫会比别人感受到的更多。苏菲所受的教育恰到好处，不张扬也不疏忽。她的喜好并不是由于学习而产生的，她的天赋缺乏技艺，有判断力但缺少学识。她知道的不多，但是能够学习。就像是一块经过仔细耕耘等待播种的土地。除了巴雷姆的《算术》和她偶然看见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她没有读过别的书。但是任何像她一样对忒勒马科斯如此痴迷的女孩子都有着丰富的感情和敏锐的头脑。多么令人着迷的天真啊！将要担任她导师的人又是多么幸福啊！她不会成为自己丈夫的老师，而是他的学生。她绝不会试图控制丈夫的喜好，而是去分享。

她远比女学者更适合她的丈夫，而他也会乐于教授她任何知识。是时候让他们相识了。让我们来设计一场相遇。

When we left Paris we were sorrowful and wrapped in thought. This Babel is not our home. Emile casts a scornful glance towards the great city, saying angrily, “What a time we have wasted; the bride of my heart is not there. My friend, you knew it, but you think nothing of my time, and you pay no heed to my sufferings.” With steady look and firm voice I reply, “Emile, do you mean what you say?” At once he flings his arms round my neck and clasps me to his breast without speaking. That is his answer when he knows he is in the wrong.

离开巴黎时，我们满怀忧郁，思绪万千。这个混乱的城市并不是我们的家。爱弥儿轻蔑地瞥了一眼这个城市，愤懑地说，“我们在这里浪费了这么多日子却一无所获。我心目中的妻子还未出现。我的朋友，你明明知道这一点，却一点也不珍惜我的时间。你一点也不在意我的痛楚。”我坚定地凝视着他，以低沉的声音对他说，“爱弥儿，你明白你在说什么吗？”他立刻张开双臂勾住了我的脖子，紧紧地拥抱着我，一言不发。当他知道自己犯错时总是这样回应。

And now we are wandering through the country like true knights-errant; yet we are not seeking adventures when we leave Paris; we are escaping from them; now fast now slow, we wander through the country like knights-errants. By following my usual practice the taste for it has become established; and I do not suppose any of my readers are such slaves of custom as to picture us dozing in a post-chaise with closed windows, travelling, yet seeing nothing, observing nothing, making the time between our start and

our arrival a mere blank, and losing in the speed of our journey, the time we meant to save.

而现在我们像两个真正的游侠骑士在乡间闲逛。但我们离开巴黎并不是为了寻找奇遇，而是为了逃离它们。我们像游侠骑士一般在乡野闲逛，时而轻快，时而缓慢。随着我平时的培养，爱弥儿的爱好已然固定。我不希望读者们会囿于陈规，认为我们一定是乘着窗户紧闭的驿车打盹游历，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观察，使旅途开始至到达之间的时间成为一片空白，迷失在追求速度、节省时间上。

Men say life is short, and I see them doing their best to shorten it. As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spend their time they lament the swiftness of its flight, and I perceive that for them it goes only too slowly. Intent merely on the object of their pursuit, they behold unwillingly the space between them and it; one desires to-morrow, another looks a month ahead, another ten years beyond that. No one wants to live to-day, no one contents himself with the present hour, all complain that it passes slowly. When they complain that time flies, they lie; they would gladly purchase the power to hasten it; they would gladly spend their fortune to get rid of their whole life; and there is probably not a single one who would not have reduced his life to a few hours if he had been free to get rid of those hours he found tedious, and those which separated him from the desired moment. A man spends his whole life rushing from Paris to Versailles, from Versailles to Paris, from town to country, from country to town, from one district of the town to another; but he woul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his time if he had not discovered this way of wasting it, by leaving his business on purpose to find something to do in coming back to it; he thinks he is saving the time he spends,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unoccupied; or maybe he

rushes for the sake of rushing, and travels post in order to return in the same fashion. When will mankind cease to slander nature? Why do you complain that life is short when it is never short enough for you? If there were but one of you, able to moderate his desires, so that he did not desire the flight of time, he would never find life too short; for him life and the joy of life would be one and the same; should he die young, he would still die full of days.

人们会说人生苦短，而我却总是看到人们竭尽全力使之更加短暂。是因为他们难以合理利用时间，才会哀叹时间飞逝。我认为对他们来说，时间过得太慢了。他们只在乎自己追求的目标，而不愿正视他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一个人想着如何度过明天，另一个人想好如何度过下个月，而也有人想着十年后的生活。但没有人想着怎么度过今天，没有人在今时今日充实自己的生活，却都在抱怨时间过得太慢了。他们抱怨时光飞逝其实是谎言。他们会乐意获取使时间加速的能力，乐意散尽家财只为消磨此生。如果一个人能随意消磨那些无趣的时光，那些他所期待的时刻到来之前的时间，可能会有不止一个人想要把生命缩短到短短几个小时。有的人倾其一生从巴黎赶到凡尔赛，又从凡尔赛赶到巴黎，从城镇到乡村，又从乡村到城镇，从镇上的一个区赶到另一个区，如此往复。但他如果没有发现拖延自己的事情再去找别的事情做这种消磨时间的办法，甚至可能并不知道怎么才能用掉这些时间。他自认为自己是在节约时间，但这些时间他并没有利用起来。也许他只是为了奔波而奔波，为了回到一个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去另一个地方。人们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诋毁自然呢？既然人生不会短暂到全是你希望的时光，那么为什么你们还要抱怨人生苦短呢？如果你们中有一个人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于是他不希望时光飞逝，他绝不会感到人生苦短。因为他的生活与生活的快乐是同样的一件事。而如果他年纪轻轻就去世，他也活得足够久了。

If this were the only advantage of my way of travelling it

would be enough. I have brought Emile up neither to desire nor to wait, but to enjoy; and when his desires are bent upon the future, their ardour is not so great as to make time seem tedious. He will not only enjoy the delights of longing, but the delights of approaching the object of his desires; and his passions are under such restraint that he lives to a great extent in the present.

如果说我四处游览的方法只有这一点好处的话，那也足够了。我培养爱弥儿，不是为了让他渴望什么，或是等待什么，而是去享受这一切。如果他的愿望一心扑在未来的日子上，那么在无趣的时光里可能就会缺少热情。他不仅仅能享受渴望的乐趣，也能享受接近目标的喜悦。而由于他的热情是有节制的，所以他在当下的乐趣也享受不完。

So we do not travel like couriers but like explorers. We do not merely consider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but the space between. The journey itself is a delight. We do not travel sitting, dismally imprisoned, so to speak, in a tightly closed cage. We do not travel with the ease and comfort of ladies. We do not deprive ourselves of the fresh air, nor the sight of the things about us, nor the opportunity of examining them at our pleasure. Emile will never enter a post-chaise, nor will he ride post unless in a great hurry. But what cause has Emile for haste? None but the joy of life. Shall I add to this the desire to do good when he can? No, for that is itself one of the joys of life.

我们不会像信使一样来去匆匆，而是像探险家一样游览。我们不仅仅在乎旅行的开始与结束，同样也在乎其过程。旅行本身就是一件乐事。我们的旅行并不只像是被囚禁了的犯人坐在门窗紧闭的马车

里。或者说，马车像是紧闭的囚笼。我们也不像女士们那样，旅程轻松舒适。我们不会阻止自己享受新鲜空气和四周的景色，也绝不错过使自己愉悦的机会。爱弥儿从不坐驿车，如果不是为了赶路，他也不会骑马。但是爱弥儿为什么要着急赶路呢？唯一的理由就是生活的乐趣。或者还有一个我能想到的理由，就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时候做一些善事。是啊，这本身就是生活的一种乐趣。

I can only think of one way of travelling pleasanter than travelling on horseback, and that is to travel on foot. You start at your own time, you stop when you will, you do as much or as little as you choose. You see the country, you turn off to the right or left; you examine anything which interests you, you stop to admire every view. Do I see a stream, I wander by its banks; a leafy wood, I seek its shade; a cave, I enter it; a quarry, I study its geology. If I like a place, I stop there. As soon as I am weary of it, I go on. I am independent of horses and postillions; I need not stick to regular routes or good roads; I go anywhere where a man can go; I see all that a man can see; and as I am quite independent of everybody, I enjoy all the freedom man can enjoy. If I am stopped by bad weather and I find myself getting bored, then I take horses. If I am tired—but Emile is hardly ever tired; he is strong; why should he get tired? There is no hurry? If he stops, why should he be bored? He always finds some amusement. He works at a trade; he uses his arms to rest his feet.

我认为唯一一种比骑马旅行更有趣的方式就是徒步旅行了。你可以随时出发，也能随意停下步伐。你所做的一切都由自己选择。你看到乡村时，可以选择左转或者右转。你观察所有使你感兴趣的事物，也能停下欣赏每一幕风景。我遇到溪流，就沿着岸边漫步；遇到茂密森林，就寻找荫蔽；遇到洞穴，就走进去一探究竟；遇到矿区，就学

习地质。如果我喜爱一个地方，就在那里停留下来。一旦我感到厌倦，我就继续前行。我既不会依赖骑马，也不会依赖车夫。我也不必非要走在平坦的大路上。我可以去一个人能去的任何地方，我可以看到一个人能看到的所有风景。而正由于我不必依靠任何人，我可以享受一个人所能享受的最大的自由。如果我遇到风雨阻挡，或者开始感到厌烦，我就骑马。如果我感到疲乏——可是爱弥儿从不觉得累。他这么强壮，怎么会觉得累呢？有什么好急的呢？如果他停下了，他也不一定是感到了厌烦。因为他总是会发现事物的趣味。他可以为人做工来做交换，在锻炼自己胳膊的同时也能歇歇脚。

To travel on foot is to travel in the fashion of Thales, Plato, and Pythagoras. I find it hard to understand how a philosopher can bring himself to travel in any other way; how he can tear himself from the study of the wealth which lies before his eyes and beneath his feet. Is there any one with an interest in agriculture, who does not want to know the special products of the district through which he is passing, and their method of cultivation? Is there any one with a taste for natural history, who can pass a piece of ground without examining it, a rock without breaking off a piece of it, hills without looking for plants, and stones without seeking for fossils?

徒步旅行是效仿泰勒斯、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方式的旅行。我很难理解哲学家们怎么才能以其他方式游历。他如何能忍着不去探究那些就在他眼前在他脚下的财富呢？如果一个人对农业感兴趣，那么当他经过一片地区，难道他不会想知道这里的特产以及种植的方法吗？如果一个人对自然科学感到好奇，那么当他穿过一片土地如何不去研究，看到一块石头如何不去敲下一块，路过山林如何不去寻找植物，见到石块如何不去寻找化石？

Your town-bred scientists study natural history in cabinets; they have small specimens; they know their names but nothing of their nature. Emile's museum is richer than that of kings; it is the whole world. Everything is in its right place; the Naturalist who is its curator has taken care to arrange it in the fairest order; Dauberton could do no better.

城镇中的科学家从橱柜里学习自然科学。他们有小块的标本，也知道它们的名字，却对其特性一无所知。爱弥儿的博物馆比国王的还要丰富，因为他把整个世界作为他的博物馆。在这里所有的事物都在合适的位置上，主管这里的自然科学家将这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甚至连多邦通也比不上他。

What varied pleasures we enjoy in this delightful way of travelling, not to speak of increasing health and a cheerful spirit. I notice that those who ride in nice, well-padded carriages are always wrapped in thought, gloomy, fault-finding, or sick; while those who go on foot are always merry, light-hearted, and delighted with everything. How cheerful we are when we get near our lodging for the night! How savoury is the coarse food! How we linger at table enjoying our rest! How soundly we sleep on a hard bed! If you only want to get to a place you may ride in a post-chaise; if you want to travel you must go on foot.

在这愉快的旅途中我们享受着无尽的快乐，而且我们还能锻炼身体，鼓舞精神。我注意到那些乘着豪华马车旅行的人往往思绪万千，他们痛苦郁闷，还满腹牢骚，有时还抱有病痛。而那些徒步旅行的人总是轻松快乐，对所有的事物都抱有兴趣。当我们快要到达晚上寄宿的地方时，心中是多么喜悦啊！朴素的食物也有着万千风味。我们在

桌前流连，享受着休整。即使在硬板床上我们也睡得安稳。如果你只是想要到某处去，那你可以乘坐驿车。如果你想去旅行，你一定要徒步。

If Sophy is not forgotten before we have gone fifty leagues in the way I propose, either I am a bungler or Emile lacks curiosity; for with an elementary knowledge of so many things, it is hardly to be supposed that he will not be tempted to extend his knowledge. It is knowledge that makes us curious; and Emile knows just enough to want to know more.

如果按我的建议这样走了五十里格爱弥儿仍然没能忘了苏菲，那么就是我经验不足，或是爱弥儿缺少好奇心。因为如果一个人对于大多数事物都有了基本的认识，那显然，他应该会想扩宽自己的知识面。是知识让我们感到好奇。爱弥儿已经到了知识足以让他想要学习得更多的阶段。

One thing leads on to another, and we make our way forward. If I chose a distant object for the end of our first journe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an excuse for it; when we leave Paris we must seek a wife at a distance.

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会想去另一个地方。于是我们继续向前。如果我为我们的初次旅行选定一个遥远的目的地，就不难找到借口。当我们离开巴黎时，我们要去遥远的地方为爱弥儿找一位妻子。

A few days later we had wandered further than usual among

hills and valleys where no road was to be seen and we lost our way completely. No matter, all roads are alike if they bring you to your journey's end, but if you are hungry they must lead somewhere. Luckily we came across a peasant who took up to his cottage; we enjoyed his poor dinner with a hearty appetite. When he saw how hungry and tired we were he said, “If the Lord had led you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you would have had a better welcome, you would have found a good resting place, such good, kindly people! They could not wish to do more for you than I, but they are richer, though folks say they used to be much better off. Still they are not reduced to poverty, and the whole country-side is the better for what they have.”

几天后，我们在山林峡谷之中走得太深，完全迷失了道路。没关系，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当你饿了的时候，总要找个地方。好在我们遇到了一位农夫，把我们带到农舍里。我们食欲大开，享用了一顿朴素的晚餐。当他看到我们又饿又累的样子时，他说，“如果你能到山的另一边去，你会受到更好的款待。你们会有更加舒适的地方休息，会有好客善良的人欢迎你们。他们会盛情款待你，是因为他们远比我富有得多，尽管当地人说他们原本更加富有。但他们仍然没有没落到贫民的程度，整个乡村也从他们的财富中获益。”

When Emile heard of these good people his heart warmed to them. “My friend,” said he, looking at me, “let us visit this house, whose owners are a blessing to the district; I shall be very glad to see them; perhaps they will be pleased to see us too; I am sure we shall be welcome; we shall just suit each other.”

当爱弥儿听说了这些善良的人，他被打动了。“我的朋友，”他看

着我对我说，“我们去看看那个房子吧，那个人是那个地区的一种恩赐呀。我很乐意与他们相识，也许他们也会很乐意结识我们。我确定我们会受到欢迎的，我们一定是意趣相投的。”

Our host told us how to find our way to the house and we set off, but lost our way in the woods. We were caught in a heavy rainstorm, which delayed us further. At last we found the right path and in the evening we reached the house, which had been described to us. It was the only house among the cottages of the little hamlet, and though plain it had an air of dignity. We went up to the door and asked for hospitality. We were taken to the owner of the house, who questioned us courteously; without telling him the object of our journey, we told him why we had left our path. His former wealth enabled him to judge a man's position by his manners; those who have lived in society are rarely mistaken; with this passport we were admitted.

主人告诉我们怎么才能走到那个房子那里去，于是我们出发了，却又在森林里迷路了。我们被一场暴雨困住，使我们前进得更慢了。最后，我们终于在晚上找到了正确的路，走到了那座描述中的房子。这个独栋的房子坐落在在村庄的农舍中间，虽然看起来朴实无华，却颇为别致。于是我们上前敲门，请求留宿。主人接见了我们，并礼貌地问了我们几个问题。我们只告诉了他为什么我们偏离主道，但并没有告诉他我们旅行的目的。他曾是富有的，因此通过一个人的仪态他就能判断出这个人的地位。那些出入社交界的人往往不会犯错，由于这个缘故，他答应了我们的留宿。

The room we were shown into was very small, but clean and comfortable; a fire was lighted, and we found linen, clothes, and

everything we needed. “Why,” said Emile, in astonishment, “one would think they were expecting us. The peasant was quite right; how kind and attentive, how considerate, and for strangers too! I shall think I am living in the times of Homer.” “I am glad you feel this,” said I, “but you need not be surprised; where strangers are scarce, they are welcome; nothing makes people more hospitable than the fact that calls upon their hospitality are rare; when guests are frequent there is an end to hospitality. In Homer's time, people rarely travelled, and travellers were everywhere welcome. Very likely we are the only people who have passed this way this year.” “Never mind,” said he, “to know how to do without guests and yet to give them a kind welcome, is its own praise.”

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小却干净温馨的房间。炉火照亮了房间中的衣物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为什么会这样，”爱弥儿惊讶着问我，“看起来好像他们早已得知我们的留宿。那位指路的农夫说的完全没错。这位主人即使是对陌生人，也是和善周到、体贴入微的。这让我觉得我生活在荷马的时代。”“我很高兴你这么想，”我说，“但是你不必惊讶。如果这里异乡人很少，那么他们就是受欢迎的。由于游客寥寥无几，这里的人们才如此好客。如果这里被频繁拜访，那么主人就不会这么好客了。在荷马的时代，人们很少四处旅行。因为旅行者在各地都很受欢迎。很可能今年只有我们踏足了这条道路，来到了这里。”爱弥儿说：“没关系，就算他们很少见到拜访者。但是他们如此悉心招待，就是值得称赞的。”

Having dried ourselves and changed our clothes, we rejoined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who introduced us to his wife; she received us not merely with courtesy but with kindness. Her glance rested on Emile. A mother, in her position, rarely receives a young man into her house without some anxiety or some curiosity at least.

我们擦干身体换上干衣服后，去拜访房子的主人。他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妻子，她友好而礼貌地欢迎了我们。她匆匆瞥了一眼爱弥儿。站在一位母亲的角度，如果家里来了一位年轻的男性客人，很难不觉得紧张或至少是好奇。

Supper was hurried forward on our account. When we went into the dining-room there were five places laid; we took our seats and the fifth chair remained empty. Presently a young girl entered, made a deep courtesy, and modestly took her place without a word. Emile was busy with his supper or considering how to reply to what was said to him; he bowed to her and continued talking and eating. The main object of his journey was as far from his thoughts as he believed himself to be from the end of his journey. The conversation turned upon our losing our way. “Sir,” said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to Emile, “you seem to be a pleasant well-behaved young gentleman, and that reminds me that your tutor and you arrived wet and weary like Telemachus and Mentor in the island of Calypso.” “Indeed,” said Emile, “we have found the hospitality of Calypso.” His Mentor added, “And the charms of Eucharis.” But Emile knew the Odyssey and he had not read Telemachus, so he knew nothing of Eucharis. As for the young girl, I saw she blushed up to her eyebrows, fixed her eyes on her plate, and hardly dared to breathe. Her mother, noticing her confusion, made a sign to her father to turn the conversation. When he talked of his lonely life, he unconsciously began to relate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brought him into it; his misfortunes, his wife's fidelity, the consolations they found in their marriage, their quiet, peaceful life in their retirement, and all this without a word of the young girl; it is a pleasing and a touching story, which cannot fail to interest. Emile, interested and sympathetic, leaves off eating and listens. When

finally this best of men discourses with delight of the affection of the best of women, the young traveller, carried away by his feelings, stretches one hand to the husband, and taking the wife's hand with the other, he kisses it rapturously and bathes it with his tears. Everybody is charmed with the simple enthusiasm of the young man; but the daughter, more deeply touched than the rest by this evidence of his kindly heart, is reminded of Telemachus weeping for the woes of Philoctetus. She looks at him shyly, the better to study his countenance; there is nothing in it to give the lie to her comparison.

我们的晚餐很快就好了。当我们走进餐厅时，发现桌上摆放了五份餐具。我们就坐后，第五个位子仍然空着。这时一位年轻的女孩走了进来，向我们深深行礼后一言不发地坐下来。爱弥儿忙着一边吃晚餐，一边考虑怎么回答主人的话。于是爱弥儿还礼后就继续他的交谈和晚餐了。他以为他离此次旅行的主要目标还远得很，所以远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谈到了我们在森林中迷路的事情。“先生，”房子的主人对爱弥儿说，“您看起来是一位年轻而正直的绅士。您和您的导师到我家时全身淋湿了，就像是忒勒马科斯和门托尔到达岛时的情形。”爱弥儿回答说：“确实是这样，我们受到了卡吕普索的热情款待。”而他的门托尔接着说，“还有欧夏丽的迷人魅力。”但是爱弥儿只读过《奥德赛》，却不曾读过《忒勒马科斯历险记》。所以他对欧夏丽一无所知。而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脸红到了耳根，眼睛盯着盘子，害羞得不敢呼吸。他的母亲注意到了她的羞怯，就暗示她的父亲转换话题。当谈论到他幽静的生活时，他无意识地谈到了过这种生活的原因，谈到了他的不幸遭遇，妻子的不离不弃，谈到婚姻中的安慰，谈到这恬静安逸的隐居生活，却只字不提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这故事令人愉悦而且很感人，人们都会很感兴趣的。爱弥儿听得入迷甚至忘记了他的晚餐，他很感兴趣，也满怀同情。当这位伟大的男士愉快地谈起对这位伟大的女士的倾慕时，爱弥儿，这个年轻的旅行者，情不自禁地分别抓着男女主人的一只手，一边激动地吻着，一边泪水纵横。

大家都为这个年轻人单纯的热情感染了。而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被他那颗温柔的心深深打动，因为她想起了为菲洛克提提斯的痛苦而痛哭的忒勒马科斯。她羞怯地看着这个年轻人的面孔，所有的一切都证明了把他比作忒勒马科斯是很恰当的。

His easy bearing shows freedom without pride; his manners are lively but not boisterous; sympathy makes his glance softer and his expression more pleasing; the young girl, seeing him weep, is ready to mingle her tears with his. With so good an excuse for tears, she is restrained by a secret shame; she blames herself already for the tears which tremble on her eyelids, as though it were wrong to weep for one's family.

他的态度自然但不傲慢，他的仪态活泼但不张扬。同情心使他的目光变得柔和，面容变得令人愉悦。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看着他哭泣的样子，自己也快要哭出来了。她虽能为泪水找一个很好的借口，但她为这秘密的羞怯而克制了自己。她因自己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而自责，仿佛为家人哭泣是不应该的似的。

Her mother, who has been watching her ever since she sat down to supper, sees her distress, and to relieve it she sends her on some errand. The daughter returns directly, but so little recovered that her distress is apparent to all. Her mother says gently, “Sophy, control yourself; will you never cease to weep for the misfortunes of your parents? Why should you, who are their chief comfort, be more sensitive than they are themselves?”

而她的母亲，在她就坐后就一直观察她，看着她慌乱不堪的样

子。于是就把她打发去做别的事情来缓和一下情绪。当这个女孩子直接回来的时候，大家都看出了她明显的窘迫。她的母亲温柔地说，“苏菲，克制一下自己。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为自己父母的遭遇哭泣呢？你是父母最重要的安慰。你怎么能比他们还要敏感呢？”

At the name of Sophy you would have seen Emile give a start. His attention is arrested by this dear name, and he awakes all at once and looks eagerly at one who dares to bear it. Sophy! Are you the Sophy whom my heart is seeking? Is it you that I love? He looks at her; he watches her with a sort of fear and self-distrust. The face is not quite what he pictured; he cannot tell whether he likes it more or less. He studies every feature, he watches every movement, every gesture; he has a hundred fleeting interpretations for them all; he would give half his life if she would but speak. He looks at me anxiously and uneasily; his eyes are full of questions and reproaches. His every glance seems to say, “Guide me while there is yet time; if my heart yields itself and is deceived, I shall never get over it.”

爱弥儿听到苏菲这个名字时大吃一惊。他的注意力立刻转移到这个亲切的名字上来。但他立刻清醒了，急切地看着敢于拥有这个名字的人。苏菲！你就是那个我一直在寻找的苏菲吗？是那个我心爱的苏菲吗？他看着她，以一种羞怯与不自信的目光看着她。这幅面孔和他想象中的并不完全相同。但他说不出哪一个更好些。他观察她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势。对苏菲的一切他可以做出千百种解读，而如果她张口说话，那么就是付出半条命也是心甘情愿的。他急切又慌张地看着我，眼神中充满疑问和责备。他的每一道目光都像在说，“教教我这时该怎么才好。如果我的内心退缩甚至自欺，我将无力挽回。”

There is no one in the world less able to conceal his feelings than Emile. How should he conceal them, in the midst of the greatest disturbance he has ever experienced, and under the eyes of four spectators who are all watching him, while she who seems to heed him least is really most occupied with him. His uneasiness does not escape the keen eyes of Sophy; his own eyes tell her that she is its cause; she sees that this uneasiness is not yet love; what matter? He is thinking of her, and that is enough; she will be very unlucky if he thinks of her with impunity.

爱弥儿是这个世界上最不会掩饰自己感情的人了。他又如何能掩饰得了呢？在这一生中最为困扰的时刻，在在座四双眼睛的注视下。而苏菲假装对他最不在意，却关注得最多。他的困扰也没能逃过苏菲的眼睛。他自己的眼神出卖他，告诉苏菲她就是原因。而苏菲认为这种不安并不是爱。但是有什么关系呢？他在想着她，就足够了。如果他想着她时表现得无关痛痒，那苏菲才应该痛苦。

Mothers, like daughters, have eyes; and they have experience too. Sophy's mother smiles at the success of our schemes. She reads the hearts of the young people; she sees that the time has come to secure the heart of this new Telemachus; she makes her daughter speak. Her daughter, with her native sweetness, replies in a timid tone which makes all the more impression. At the first sound of her voice, Emile surrenders; it is Sophy herself; there can be no doubt about it. If it were not so, it would be too late to deny it.

母亲有和女儿一样的眼力，同时她们还有经验。苏菲的母亲因为我们的计划成功而微笑起来。她了解年轻人的心意，看得出抓住这位小忒勒马科斯的心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所以她让女儿开口说话了。而

她的女儿用一种羞涩的语调回答了她，带着天真的温柔甜美，使人动容。爱弥儿听到这声音就举手投降了。这就是苏菲，已经毫无疑问了。就算她不是，现在否认也太迟了。

The charms of this maiden enchantress rush like torrents through his heart, and he begins to drain the draughts of poison with which he is intoxicated. He says nothing; questions pass unheeded; he sees only Sophy, he hears only Sophy; if she says a word, he opens his mouth; if her eyes are cast down, so are his; if he sees her sigh, he sighs too; it is Sophy's heart which seems to speak in his. What a change have these few moments wrought in her heart! It is no longer her turn to tremble, it is Emile's. Farewell liberty, simplicity, frankness. Confused, embarrassed, fearful, he dare not look about him for fear he should see that we are watching him. Ashamed that we should read his secret, he would fain become invisible to every one, that he might feed in secret on the sight of Sophy. Sophy, on the other hand, regains her confidence at the sight of Emile's fear; she sees her triumph and rejoices in it.

这位年轻女士的魅力像是洪水冲进他的心里。他沉醉不已，即使是毒药他也要吞下去。他一言不发，别人的问题也被抛之脑后。他只是看着苏菲，也只能听到苏菲的声音。苏菲如果说话了，他就跟着说起来。苏菲如果垂下眼神，他也跟着垂下眼睛。苏菲如果叹息，他也跟着叹息。看起来就像是苏菲的内心在他身体里说话。这短短的时间里她的内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现在轮到爱弥儿战栗了。那些自由、天真与坦诚都不复存在。他感到困惑、尴尬与紧张。他甚至不敢抬眼看着大家，怕我们都在看他。他生怕我们看穿他的秘密，一心想在大家面前隐形，这样他才能仔细看看苏菲。而苏菲则恰恰相反，当她看出爱弥儿的胆怯时就得到了自信。她知道自己胜利在望，为之欣喜。

“No'l mostra gia, ben che in suo cor ne rida.” Tasso, Jerus. Del., c. iv. v. 33.

“她心中暗自欢喜，却不形于色。”塔索《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第四篇33节

Her expression remains unchanged; but in spite of her modest look and downcast eyes, her tender heart is throbbing with joy, and it tells her that she has found Telemachus.

她的表情并没有改变，但她面容羞怯两眼低垂。她的心喜悦地悸动着，她知道她找到了那个忒勒马科斯。

If I relate the plain and simple tale of their innocent affections you will accuse me of frivolity, but you will be mistaken. Sufficient attention is not given to the effect which the first connection between man and woman is bound to produce on the future life of both. People do not see that a first impression so vivid as that of love, or the liking which takes the place of love, produces lasting effects whose influence continues till death. Works on education are crammed with wordy and unnecessary accounts of the imaginary duties of children; but there is not a word about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difficult part of their education, the crisis which forms the bridge between the child and the man. If any part of this work is really useful, it will be because I have dwelt at great length on this matter, so essential in itself and so neglected by other authors, and because I have not allowed myself to be discouraged either by false

delicacy or by the difficulties of expression. The story of human nature is a fair romance. Am I to blame if it is not found elsewhere? I am trying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f my book is a romance, the fault lies with those who deprave mankind.

如果我将他们天真无邪的感情与这朴实无华的故事联系起来，你们或许会觉得我太过武断了。但是你们错了。你们应当注意到的是这样的初见会对他们两人将来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们没能注意到，初次见面的第一印象和爱情还有产生爱情的感情的印象一样清晰，这种印象能产生影响他们一生的作用。一些教育学的作品中满是唠叨的说法，无益地提起那些空想出来的孩子们的责任。却很少提到形成从孩子到成人之间的桥梁的紧要关头，这是教育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如果这本书能有一点作用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在这方面倾注了很多心血。这个阶段极为重要，却往往被其他作者忽略。我不希望自己因过分世故或是表达上的困难阻碍。描述人类天性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一本小说。如果在别的地方都不曾看到这样的故事的话，也并不是我的过错。因为我在书中试图去描写人类的历史。只有那些使人类腐化堕落的人，才会觉得这本书是一部小说。

This is supported by another reason; we are not dealing with a youth given over from childhood to fear, greed, envy, pride, and all those passions which are the common tools of the schoolmaster; we have to do with a youth who is not only in love for the first time, but with one who is also experiencing his first passion of any kind; very likely it will be the only strong passion he will ever know, and upon it depends the final formation of his character. His mode of thought, his feelings, his tastes, determined by a lasting passion, are about to become so fixed that they will be incapable of further change.

另一个理由是，我们并不是在讨论一个从小就有着胆怯、贪婪、嫉妒、傲慢以及其它一些能由老师进行控制的欲念的年轻人。爱弥儿并不是第一次产生爱的感觉，而是第一次感受到种种热情中的第一种欲念。也许这就是他一生中产生的最强烈的一次感情而他将无从知晓，也决定了他最终性格的形成。他的思维方式、感情和爱好都受到一种长久的感情影响，即将固定下来，不受未来变化的影响。

You will easily understand that Emile and I do not spend the whole of the night which follows after such an evening in sleep. Why! Do you mean to tell me that a wise man should be so much affected by a mere coincidence of name! Is there only one Sophy in the world? Are they all alike in heart and in name? Is every Sophy he meets his Sophy? Is he mad to fall in love with a person of whom he knows so little, with whom he has scarcely exchanged a couple of words? Wait, young man; examine, observe. You do not even know who our hosts may be, and to hear you talk one would think the house was your own.

很明显，经过了这样的一晚，爱弥儿和我很难入眠。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重名的巧合，一个聪明人就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吗？难道世界上只有这一位苏菲吗？所有名叫苏菲的女孩子都是一样的心地善良吗？难道说爱弥儿遇到的每一个苏菲都是他命中注定之人吗？爱弥儿疯了吗？他这样轻易地爱上了一个他知之甚少，几乎没有过交流的人。等一等，年轻人。你要再想一想，看一看。你甚至不知道这里的主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你这么说话，别人会觉得你在自己家里呢。

This is no time for teaching, and what I say will receive scant attention. It only serves to stimulate Emile to further interest in

Sophy, through his desire to find reasons for his fancy. The unexpected coincidence in the name, the meeting which, so far as he knows, was quite accidental, my very caution itself, only serve as fuel to the fire. He is so convinced already of Sophy's excellence, that he feels sure he can make me fond of her.

然而并没有时间说教了。爱弥儿似乎对于我的话并不在意。这只会使他对苏菲更加好奇，想从自己的欲望中了解自己为什么产生了爱情。重名的巧合出乎了他的意料，而在他看来两人的相遇也是非常偶然的。甚至是我的谨慎小心，对他来说都像是火上浇油。他如此确信苏菲是无与伦比的，他一定会使我喜欢她。

Next morning I have no doubt Emile will make himself as smart as his old travelling suit permits. I am not mistaken; but I am amused to see how eager he is to wear the clean linen put out for us. I know his thoughts, and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at he is trying to establish a means of intercourse, through the return and exchange of the linen; so that he may have a right to return it and so pay another visit to the house.

我相信第二天早晨，爱弥儿一定会穿着他的旧旅行服，使自己看起来尽量整洁。我没猜错。但是爱弥儿更加激动，他还穿上了主人准备的干净衣服，这使我感到很好笑。我知道他的想法，我很高兴他试图借由这种衣物的归还与交换和主人产生一些来往，这样他就有理由以归还与交换衣物的名头再去拜访这座房子。

I expected to find Sophy rather more carefully dressed too; but I was mistaken. Such common coquetry is all very well for those

who merely desire to please. The coquetry of true love is a more delicate matter; it has quite another end in view. Sophy is dressed, if possible, more simply than last night, though as usual her frock is exquisitely clean. The only sign of coquetry is her self-consciousness. She knows that an elaborate toilet is a sign of love, but she does not know that a careless toilet is another of its signs; it shows a desire to be like not merely for one's clothes but for oneself. What does a lover care for her clothes if he knows she is thinking of him? Sophy is already sure of her power over Emile, and she is not content to delight his eyes if his heart is not hers also; he must not only perceive her charms, he must divine them; has he not seen enough to guess the rest?

我原以为苏菲也会精心打扮，但是我错了。卖弄风情只适合那些仅仅想要去取悦别人的女子。而出于爱情的取悦更加微妙，两者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她的衣服一如往常地整洁，但如果可能的话，苏菲的装扮比前一晚还要朴素。这其中隐藏着她的忸怩与羞怯。她明白精心打扮能够表明爱意，但她不知道刻意的不经心其实是另一种表现方法。这代表了一种希望，不要仅仅因为装扮而喜欢她。如果爱弥儿明白苏菲想着他，那么他就不会在意她的服饰。苏菲确信爱弥儿爱上了她。但是她不愿仅由他的眼睛而不是心灵来判断这种感情。他必须不仅仅是察觉到她的美丽，而更应该发自内心的了解。难道他所看到的还不足以使他猜到苏菲其余的美丽吗？

We may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while Emile and I were talking last night, Sophy and her mother were not silent; a confession was made and instructions given. The morning's meeting is not unprepared. Twelve hours ago our young people had never met; they have never said a word to each other; but it is clear that there is already an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m. Their greeting is formal,

confused, timid; they say nothing, their downcast eyes seem to avoid each other, but that is in itself a sign that they understand, they avoid each other with one consent; they already feel the need of concealment, though not a word has been uttered. When we depart we ask leave to come again to return the borrowed clothes in person, Emile's words are addressed to the father and mother, but his eyes seek Sophy's, and his looks are more eloquent than his words. Sophy says nothing by word or gesture; she seems deaf and blind, but she blushes, and that blush is an answer even plainer than that of her parents.

当然，昨晚在我和爱弥儿交谈时，苏菲和她的母亲同样有一番谈话。苏菲坦白了自己的心意，而母亲给出了她的建议。早晨的会面大家都有所准备。十二个小时以前，这两位年轻人还互不相识，不曾交谈过。但很明显现在他们已经心意相通了。他们两人互相问候是正式的，羞怯而拘谨。他们下垂的眼睛互相闪躲，却又表明他们互相了解。他们的闪躲，却又保持一致。他们明白即使什么还不曾说明，仍然需要保密。当我们分别时，我们向主人请求将来亲自归还衣物。尽管爱弥儿是在向苏菲的父母说话，眼睛却望向苏菲。而他的神情要比他的语言更有力。苏菲没有说话，也没有什么表情。她装作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的样子，脸却羞红了。她的脸红比父母的回答还要清楚。

We receive permission to come again, though we are not invited to stay. This is only fitting; you offer shelter to benighted travellers, but a lover does not sleep in the house of his mistress.

我们并没有收到继续留宿的邀请，但是主人同意我们之后再来。这是很合适的。你可以向摸黑的旅行者提供住宿，但是一个人最好不

要在他的爱人处留宿。

We have hardly left the beloved abode before Emile is thinking of taking rooms in the neighbourhood; the nearest cottage seems too far; he would like to sleep in the next ditch. “You young fool!” I said in a tone of pity, “are you already blinded by passion? Have you no regard for manners or for reason? Wretched youth, you call yourself a lover and you would bring disgrace upon her you love! What would people say of her if they knew that a young man who has been staying at her house was sleeping close by? You say you love her! Would you ruin her reputation? Is that the price you offer for her parents' hospitality? Would you bring disgrace on her who will one day make you the happiest of men?” “Why should we trouble ourselves about the empty words and unjust suspicions of other people?” said he eagerly. “Have you not taught me yourself to make light of them? Who knows better than I how greatly I honour Sophy, what respect I desire to show her? My attachment will not cause her shame, it will be her glory, it shall be worthy of her. If my heart and my actions continually give her the homage she deserves, what harm can I do her?” “Dear Emile,” I said, as I clasped him to my heart, “you are thinking of yourself alone; learn to think for her too. Do not compare the honour of one sex with that of the other, they rest on different foundations. These foundations are equally firm and right, because they are both laid by nature, and that same virtue which makes you scorn what men say about yourself, binds you to respect what they say of her you love. Your honour is in your own keeping, her honour depends on others. To neglect it is to wound your own honour, and you fail in what is due to yourself if you do not give her the respect she deserves.”

我们刚离开那个可爱的小屋，爱弥儿就想在隔壁的房子里留宿。甚至是最近的村舍看起来也太过遥远，他就想睡在旁边的水沟里。“你这个小傻瓜！”我无奈地说，“难道你已经被爱情冲昏头脑了吗？你连风度和理性都全忘了吗？可怜人啊，你称自己为恋人，可你却使她蒙羞。如果人们得知这个寄宿在她家的年轻人曾经睡在她家的附近，会怎么说她呢？你还说你是爱她的！你这不是在损坏她的名声吗？这就是你对她父母的热情款待的回报吗？对一个能让你将来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女孩子，你要毁了她的名声吗？”“我们为什么要因为别人那些虚伪的话语和不公正的怀疑而自寻烦恼呢？”爱弥儿愤懑地说。“您不是曾教导过我不要在乎这些吗？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我多么尊敬苏菲，我多想向她表示我的敬意。我对她的爱慕不应该成为她的耻辱，而应是她的荣耀，她配得上我的爱。如果我的心意与表现会使她受到应得的尊敬，那么我会给她带来什么伤害呢？“亲爱的爱弥儿，”我把他拥入怀中，对他说，“你只是在为自己考虑，也试着去为苏菲考虑一下。别把女性的荣誉与男性的相比，它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这些立场是同样坚定而正确的，因为它们同样来自于自然。但是被别人谈论的事情，即使关于你的你不会在意，但关于你爱的人的，你必须在意。你的荣耀来自你自己，而她的却由他人决定。如果你选择忽视这些长短非议，你自己的荣誉也会受损。如果因为你而使她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那么你自己也难以得到尊重。

Then while I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this difference, I make him realise how wrong it would be to pay no attention to it. Who can say if he will really be Sophy's husband? He does not know how she feels towards him; her own heart or her parents' will may already have formed other engagements; he knows nothing of her, perhaps there are none of those grounds of suitability which make a happy marriage. Is he not aware that the least breath of scandal with regard to a young girl is an indelible stain, which not even marriage with him who has caused the scandal can efface? What man of feeling would ruin the woman he loves? What man of honour

would desire that a miserable woman should for ever lament the misfortune of having found favour in his eyes?

之后，当我和他解释这之间存在的不同时，就使爱弥儿了解到，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是很不对的。谁又说得准他是否真的会成为苏菲的丈夫呢？他不了解苏菲对他的感情，苏菲和她父母的心意也许已经为她订下另外的婚约。他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可能他们之间根本就不合适，完全不能结成美满的婚姻。他甚至还没有认识到，对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说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将是流言蜚语的来源，即使她嫁给了那个造成污点的人，也是难以抹去的。一个重感情的人怎么会毁掉一个他爱的人？一个注重荣耀的人怎么会因为自己的倾慕而使一个女孩子悲痛这不幸？

Always prone to extremes, the youth takes alarm at the consequences which I have compelled him to consider, and now he thinks that he cannot be too far from Sophy's home; he hastens his steps to get further from it; he glances round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is listening; he would sacrifice his own happiness a thousand times to the honour of her whom he loves; he would rather never see her again than cause her the least unpleasantness. This is the first result of the pains I have taken ever since he was a child to make him capable of affection.

爱弥儿总是会过分极端。当他听完这番话，明白我迫使他考虑的后果后立刻警觉起来。现在他卖力地加快脚步，远离苏菲的家，因为他觉得离那里越远越好。他四处张望免得有人偷听。爱弥儿宁愿千万遍牺牲自己的幸福来换取他所喜爱的这个女孩子的清白。如果这会使她有一丁点的不愉快的话，他甚至不会再见她。这是自从我将他从一个孩子逐渐抚养长大，理解爱情的痛苦过程里的第一次收获。

We must therefore seek a lodging at a distance, but not too far. We look about us, we make inquiries;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town at least two leagues away. We try and find lodgings in this town, rather than in the nearer villages, where our presence might give rise to suspicion. It is there that the new lover takes up his abode, full of love, hope, joy, above all full of right feeling. In this way, I guide his rising passion towards all that is honourable and good, so that his inclinations unconsciously follow the same bent.

我们必须在远处找一个住处，但也不能太远。我们在周围四处打听，找到一个距这里至少有两里格远的镇子。我们试图在那里而不是附近的村庄住下，因为在那里我们的出现可能会引起怀疑。在这个镇子上，这个可爱的年轻人开始住下来，满怀着爱情、希望、喜悦以及一切美好的感情。我用这样的方法把他的热情引向所有值得尊敬的美好的事物上，以使他能在不知不觉中向相同的方向发展自己。

My course is drawing to a close; the end is in view. All the chief difficulties are vanquished, the chief obstacles overcome; the hardest thing left to do is to refrain from spoiling my work by undue haste to complete it. Amid the uncertainty of human life, let us shun that false prudence which seeks to sacrifice the present to the future; what is, is too often sacrificed to what will never be. Let us make man happy at every age lest in spite of our care he should die without knowing the meaning of happiness. Now if there is a time to enjoy life, it is undoubtedly the close of adolescence, when the powers of mind and body have reached their greatest strength, and when man in the midst of his course is furthest from those two extremes which tell him “Life is short.” If the imprudence of youth deceives itself it is not in its desire for enjoyment, but because it

seeks enjoyment where it is not to be found, and lays up misery for the future, while unable to enjoy the present.

我的课程就快要结束了，终点就在眼前。我们战胜了所有主要的困难，克服了所有主要的阻碍。现在最困难的是，我要不紧不慢地完成这份工作以免自己毁掉它。在人类生活的不确定之中，我们最好避开那些为了将来而牺牲当下的错误的谨慎，当下的牺牲往往是为了未来可能永不会出现的事物。让我们在每一个年龄都及时行乐，以免有些人死的时候还没能明白幸福的意义。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享受生命的时期的话，那毫无疑问就是少年时代结束的时候了。在那时，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力量都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期，同时也处于远不会感慨“人生苦短”的两极阶段的中间阶段。如果年少时的轻率是在欺骗自己，那并不是因为他们追求快乐的渴望，而是因为他们追求了不合时宜的快乐，却又使未来充满失落，无法享受当下。

Consider my Emile over twenty years of age, well formed, well developed in mind and body, strong, healthy, active, skilful, robust, full of sense, reason, kindness, humanity, possessed of good morals and good taste, loving what is beautiful, doing what is good, free from the sway of fierce passions, released from the tyranny of popular prejudices, but subject to the law of wisdom, and easily guided by the voice of a friend; gifted with so many useful and pleasant accomplishments, caring little for wealth, able to earn a living with his own hands, and not afraid of want, whatever may come. Behold him in the intoxication of a growing passion; his heart opens to the first beams of love; its pleasant fancies reveal to him a whole world of new delights and enjoyments; he loves a sweet woman, whose character is even more delightful than her person; he hopes, he expects the reward which he deserves.

看看爱弥儿，他已经年过二十，身心健全。他身体强健、身手敏捷而且精力充沛。他充满感情与理智，心地善良且充满博爱。他拥有一切美好的品德，也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他会去做那些正义的事情，而不受激烈感情的摆布。他绝不会在乎偏见的横行，但却臣服于智慧的法则，受到诤友的教导。他虽然具有如此多的优点与美德，却不在乎钱财，他想要用自己的能力谋生，从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一切。看着他沉迷于日益增长的热情，他的心灵被爱情的第一道光芒击中。爱情的美好与甜蜜为他打开了一个充满了愉悦的新世界。他热爱那个甜美的姑娘，她的性格甚至比外表还要美好。所以爱弥儿希望能够得到他应得的奖励。

Their first attachment took its rise in mutual affection, in community of honourable feelings; therefore this affection is lasting. It abandons itself, with confidence, with reason, to the most delightful madness, without fear, regret, remorse, or any other disturbing thought, but that which is inseparable from all happiness. What lacks there yet? Behold, inquire, imagine what still is lacking, that can be combined with present joys. Every happiness which can exist in combination is already present; nothing could be added without taking away from what there is; he is as happy as man can be. Shall I choose this time to cut short so sweet a period? Shall I disturb such pure enjoyment? The happiness he enjoys is my life's reward. What could I give that could outweigh what I should take away? Even if I set the crown to his happiness I should destroy its greatest charm. That supreme joy is a hundredfold greater in anticipation than in possession; its savour is greater while we wait for it than when it is ours. O worthy Emile! love and be loved! prolong your enjoyment before it is yours; rejoice in your love and in your innocence, find your paradise upon earth, while you await your heaven. I shall not cut short this happy period of life. I will draw out its enchantments, I will prolong them as far as possible.

Alas! it must come to an end and that soon; but it shall at least linger in your memory, and you will never repent of its joys.

由于他们相互的喜爱如此纯洁，才产生了最初的爱情。因而这种喜爱是会持续很久的。这份爱放下自己，满怀信心且理智地放下自己，沉醉在最疯狂的喜悦中，无所畏惧、无所悔恨、心无杂念地去爱。这是与所有的幸福都分不开的。那么还缺少什么呢？看一看吧，问一问再想一想到底还缺少什么能和现在的快乐结合的呢？所有可以结合的幸福他现在都已经拥有了，如果要加点什么，就必然有所损失。他已经是最幸福的人了。我会在这样甜蜜的时光里剥夺他的快乐吗？我会打扰这样纯净的幸福吗？他所享受的幸福是我一生的收获。如果我要拿走些什么，又能用什么来弥补呢？即使让我为他的幸福加冕，也会毁掉这份幸福的最迷人之处。我们在其中获得的极致乐趣实则为拥有的上百倍，我们在等待中尝到的滋味甚至比得到后的滋味更美好。哦，可爱的爱弥儿啊！去爱吧！被爱吧！在获得这份幸福之前要记得好好享受。为你自己的爱情与天真欢庆吧，你会在等待你的天堂时在人间将之寻获。我绝不会打断人生中这段欢乐的时光。我会选出其中的迷人之处，尽量加以延长。唉！这一定很快就会结束。但它至少会在你的记忆力萦绕，而你永远也不会为之后悔。

Emile has not forgotten that we have something to return. As soon as the things are ready, we take horse and set off at a great pace, for on this occasion he is anxious to get there. When the heart opens the door to passion, it becomes conscious of the slow flight of time. If my time has not been wasted he will not spend his life like this.

爱弥儿没有忘记我们需要向主人归还衣物。我们一准备好，就骑马快速赶路。毕竟在这种情况下爱弥儿急着到那里去。当一个人的心

灵中有了热情后，就很容易意识到时间的缓慢流动了。如果我的时间不曾浪费，那他也不会如此度过此生。

Unluckily the road is intricate and the country difficult. We lose our way; he is the first to notice it, and without losing his temper, and without grumbling, he devotes his whole attention to discovering the path; he wanders for a long time before he knows where he is and always with the same self-control. You think nothing of that; but I think it a matter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I know how eager he is; I see the results of the care I have taken from his infancy to harden him to endure the blows of necessity.

但不幸的是，道路很复杂，乡下的路难以前行。我们迷路了。爱弥儿首先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没有生气，也没有抱怨，只是全神贯注地寻找道路。爱弥儿总是这么克制自己，他游荡了好久终于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或许你看来这没什么，但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我知道他心里有多么迫切。我看到自他童年期我对他的教导有了好的结果，他能够在必要时沉住气应对。

We are there at last! Our reception is much simpler and more friendly than on the previous occasion; we are already old acquaintances. Emile and Sophy bow shyly and say nothing; what can they say in our presence? What they wish to say requires no spectators. We walk in the garden; a well-kept kitchen-garden takes the place of flower-beds, the park is an orchard full of fine tall fruit trees of every kind, divided by pretty streams and borders full of flowers. “What a lovely place!” exclaims Emile, still thinking of his Homer, and still full of enthusiasm, “I could fancy myself in the garden of Alcinous.” The daughter wishes she knew who Alcinous

was; her mother asks. “Alcinous,” I tell them, “was a king of Coreyra. Homer describes his garden and the critics think it too simple and unadorned [2_6] . This Alcinous had a charming daughter who dreamed the night before her father received a stranger at his board that she would soon have a husband.” Sophy, taken unawares, blushed, hung her head, and bit her lips; no one could be more confused. Her father, who was enjoying her confusion, added that the young princess bent herself to wash the linen in the river. “Do you think,” said he, “she would have scorned to touch the dirty clothes, saying, that they smelt of grease?” Sophy, touched to the quick, forgot her natural timidity and defended herself eagerly. Her papa knew very well all the smaller things would have had no other laundress if she had been allowed to wash them, and she would gladly have done more had she been set to do it [2_7] . Meanwhile she watched me secretly with such anxiety that I could not suppress a smile, while I read the terrors of her simple heart which urged her to speak. Her father was cruel enough to continue this foolish sport, by asking her, in jest, why she spoke on her own behalf and what had she in common with the daughter of Alcinous. Trembling and ashamed she dared hardly breathe or look at us. Charming girl! This is no time for feigning, you have shown your true feelings in spite of yourself.

终于我们到了那里！与上次相比，主人更简单也更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毕竟我们已经是熟人了。爱弥儿和苏菲互相行礼，羞怯地没有说话。毕竟，在我们面前，他们能说些什么呢？他们多么想私下里交谈啊。我们在花园里散步。这是一个被菜园取代了的花园，但是经过了悉心的打理。这里种满了各种高大优美的果树，小溪流淌，花朵密布。“这里多可爱呀！”爱弥儿这么说，心里仍然想着荷马，也仍然充满了热情，“我觉得自己就像在阿尔喀诺俄斯的花园里。”苏菲想知道阿尔喀诺俄斯是谁，而她的母亲发问了。我回答说，“阿尔喀诺俄斯

是舍利亚岛的国王，荷马描写了他的花园，而批评家们认为它太朴实了 [3_6] 。阿尔喀诺俄斯有一位迷人的女儿，她在父亲留宿陌生人的前一夜梦到自己很快会遇到自己的丈夫。”苏菲惊慌失措地脸红了，埋着头不说话。她简直是最慌乱的人了。而她的父亲见到她的慌乱却很高兴，继续说那位年轻的公主还亲自到河边洗餐巾。他说，“你知道吗，她之前根本不愿意碰那些餐巾，因为她说，它们有油脂的味道。”苏菲忘了自己天然的羞怯，被这话击中，迫切地为自己辩护。她的父亲其实很清楚，如果没有洗衣女工，而如果苏菲被允许这么做的话，她会很乐意完成被要求去做的事 [3_7] 。她一边说着，同时又紧张地偷偷看我，我不禁笑了。我明白她单纯的内心充满恐慌，不由得为自己辩护。她的父亲却要残忍地继续愚弄她，他打趣地问，为什么苏菲要代表公主回答呢？她和阿尔喀诺俄斯的女儿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苏菲颤抖着，她害羞得甚至没办法呼吸，她不敢看我们。哦，可爱的姑娘！没办法假装镇定了。你的真心已经背叛了你，将你的真实情感表露无遗了。

To all appearance this little scene is soon forgotten; luckily for Sophy, Emile, at least, is unaware of it. We continue our walk, the young people at first keeping close beside us; but they find it hard to adapt themselves to our slower pace, and presently they are a little in front of us, they are walking side by side, they begin to talk, and before long they are a good way ahead. Sophy seems to be listening quietly, Emile is talking and gesticulating vigorously; they seem to find their conversation interesting. When we turn homewards a full hour later, we call them to us and they return slowly enough now, and we can see they are making good use of their time. Their conversation ceases suddenly before they come within earshot, and they hurry up to us. Emile meets us with a frank affectionate expression; his eyes are sparkling with joy; yet he looks anxiously at Sophy's mother to see how she takes it. Sophy is not nearly so much at her ease; as she approaches us she seems

covered with confusion at finding herself tete-a-tete with a young man, though she has met so many other young men frankly enough, and without being found fault with for it. She runs up to her mother, somewhat out of breath, and makes some trivial remark, as if to pretend she had been with her for some time.

大家不久就忘了这一幕场景。而值得苏菲庆幸的是，至少爱弥儿根本没弄明白我们在说什么。我们继续散步。这对年轻人开始紧紧跟随我们，但他们发现我们的步速太慢，自己很难适应我们的步伐。于是他们走到我们前面一点，肩并着肩。他们开始聊天，不久就离我们很远了。看起来苏菲在安静地聆听，而爱弥儿手舞足蹈地说着，看起来他们觉得这段对话很有趣。整整一小时后，我们开始往回走。我们把他们叫回来，他们走得很慢，看得出来他们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当他们离我们近的可以让我们听得清谈话时，他们就突然不再说话了，加快步伐赶向我们。爱弥儿走近我们的时候带着一种坦诚的喜爱的表情，他的眼睛闪着喜悦的光芒。但他稍显忧虑地看向苏菲的母亲，想知道她的想法。而苏菲就没有那么从容了。她接近我们的时候稍显紧张，可能是因为大家看到了她和一个年轻男士如此亲密。尽管她也曾和其他年轻男子坦诚地相见，却从不曾觉得其中有何不妥。她跑向母亲，有些喘不过气来。零零星星地说了几句话，以假装她和母亲待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

From the happy expression of these dear children we see that this conversation has taken a load off their hearts. They are no less reticent in their intercourse, but their reticence is less embarrassing, it is only due to Emile's reverence and Sophy's modesty, to the goodness of both. Emile ventures to say a few words to her, she ventures to reply, but she always looks at her mother before she dares to answer. The most remarkable change is in her attitude towards me. She shows me the greatest respect, she watches me

with interest, she takes pains to please me; I see that I am honoured with her esteem, and that she is not indifferent to mine. I understand that Emile has been talking to her about me; you might say they have been scheming to win me over to their side; yet it is not so, and Sophy herself is not so easily won. Perhaps Emile will have more need of my influence with her than of hers with me. What a charming pair! When I consider that the tender love of my young friend has brought my name so prominently into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his lady-love, I enjoy the reward of all my trouble; his affection is a sufficient recompense.

从这亲爱的两人脸上幸福的表情来看，这次交谈使他们的心如释重负。他们之间的交往仍然是含蓄的，但是却少了些尴尬。这一方面是由于爱弥儿尊敬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苏菲的羞怯，还有两个人的善良也同样重要。爱弥儿冒险和苏菲说了一些话，苏菲也试着在回应。但苏菲在回答之前总是要看向她的母亲。但她对我的态度却有了极明显的变化。她向我表示出极大的敬意，关注地看着我，甚至花费心思要讨好我。我看得出她对我十分尊重，同样也希望得到我的尊重。我明白爱弥儿曾经和她提到过我。也许你会认为他们是在设法获得我的支持。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苏菲的心意并没有那么轻易赢得。可能爱弥儿需要我去讨好她，而不是请苏菲来讨好我。多么可爱的一对年轻人！当我想到这个可爱的年轻人怀着温柔的爱，在与他喜欢的女孩子第一次谈话时就提到了我，我便觉得一切痛苦都是值得的，他对我的敬爱足以回报。

Our visit is repeated. There are frequent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young people. Emile is madly in love and thinks that his happiness is within his grasp. Yet he does not succeed in winning any formal avowal from Sophy; she listens to what he says and answers nothing. Emile knows how modest she is, and is not

surprised at her reticence; he feels sure that she likes him; he knows that parents decide whom their daughters shall marry; he supposes that Sophy is awaiting her parents' commands; he asks her permission to speak to them, and she makes no objection. He talks to me and I speak on his behalf and in his presence. He is immensely surprised to hear that Sophy is her own mistress, that his happiness depends on her alone. He begins to be puzzled by her conduct. He is less self-confident, he takes alarm, he sees that he has not made so much progress as he expected, and then it is that his love appeals to her in the tenderest and most moving language.

我们后来又去拜访过几次。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的谈话越发频繁了。爱弥儿沉醉在爱情中，觉得幸福触手可得了。但他并没能获得苏菲任何正式的许诺，苏菲只是听着他的话，却不曾回答。爱弥儿明白苏菲是很羞怯的，对于她的含蓄倒也并不惊讶。因为他确信苏菲是爱着他的。而他知道她的父母将会决定这个姑娘会嫁给谁，所以苏菲应该是在等待父母的首肯。爱弥儿请求苏菲由他向她的父母提出求婚，而苏菲也没有反对。爱弥儿和我说了这件事，于是我代表他，当着他的面和苏菲的父母说起了这件事。爱弥儿这才惊讶地发现苏菲是自己的主人，她的幸福由自己掌握。爱弥儿开始对她的行为感到迷惑不解。他不再那么自信了，他感到非常诧异。他发现这件事的发展远没有他想的那么快，而他要用温柔动人的语言获得苏菲的芳心。

Emile is not the sort of man to guess what is the matter; if no one told him he would never discover it as long as he lived, and Sophy is too proud to tell him. What she considers obstacles, others would call advantages. She has not forgotten her parents' teaching. She is poor; Emile is rich; so much she knows. He must win her esteem; his deserts must be great indeed to remove this inequality. But how should he perceive these obstacles? Is Emile aware that he

is rich? Has he ever condescended to inquire? Thank heaven, he has no need of riches, he can do good without their aid. The good he does comes from his heart, not his purse. He gives the wretched his time, his care, his affection, himself; and when he reckons up what he has done, he hardly dares to mention the money spent on the poor.

爱弥儿是那种不善于揣摩事态的人。如果没有别人告诉他，那他一辈子都不可能知道。而苏菲却太骄傲了，不愿意告诉他。她所认为的那些阻碍，可能被别人看来反而是优势。她并没有忘记父母的教导。她是贫穷的。而据她所知，爱弥儿富有的多。他必须赢得她的尊重。爱弥儿必须足够高尚才能消除这种差异。但是他又怎么看待这种阻碍呢？爱弥儿有没有意识到他很富有呢？他曾屈尊问过别人吗？感谢上苍，爱弥儿不需要什么财富，没有它们的帮助他也能做好事情。善良来自于他的内心，而不是钱包。他会给予穷人们时间与关爱，还有他自己。当说到他曾做过的事情时，他不会提到自己在穷人身上花了多少钱。

As he does not know what to make of his disgrace, he thinks it is his own fault; for who would venture to accuse the adored one of caprice. The shame of humiliation adds to the pangs of disappointed love. He no longer approaches Sophy with that pleasant confidence of his own worth; he is shy and timid in her presence. He no longer hopes to win her affections, but to gain her pity. Sometimes he loses patience and is almost angry with her. Sophy seems to guess his angry feelings and she looks at him. Her glance is enough to disarm and terrify him; he is more submissive than he used to be.

他并不知道苏菲为什么不喜欢他，他觉得这可能是他自己做错了

什么，毕竟他不会冒险将这归结为亲爱的苏菲太过任性。自尊心受辱加剧了他对爱情求之不得的痛苦。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不再接近苏菲。当苏菲在他身边时，他总会觉得羞怯。爱弥儿不再想获得苏菲的芳心，却希望获得她的怜悯。有时他甚至会感到不耐烦，几乎要对苏菲发火了。苏菲似乎看出了他的怒火，但只是看着他。苏菲的一个眼神就足以吓到爱弥儿使他缴械投降，他比之前更加顺服了。

Disturbed by this stubborn resistance, this invincible silence, he pours out his heart to his friend. He shares with him the pangs of a heart devoured by sorrow; he implores his help and counsel. “How mysterious it is, how hard to understand! She takes an interest in me, that I am sure; far from avoiding me she is pleased to see me; when I come she shows signs of pleasure, when I go she shows regret; she receives my attentions kindly, my services seem to give her pleasure, she condescends to give me her advice and even her commands. Yet she rejects my requests and my prayers. When I venture to speak of marriage, she bids me be silent; if I say a word, she leaves me at once. Why on earth should she wish me to be hers but refuse to be mine? She respects and loves you, and she will not dare to refuse to listen to you. Speak to her, make her answer. Come to your friend's help, and put the coping stone to all you have done for him; do not let him fall a victim to your care! If you fail to secure his happiness, your own teaching will have been the cause of his misery.”

苏菲的顽强抵抗和长久的沉默让爱弥儿困惑不解，他向他的朋友吐露心扉。他分享了那颗被悲伤吞噬的心所感到的痛苦。他希望能从朋友这里获得一些帮助和建议。“爱情多么奇妙！又多么难懂啊！我确信她是关心我的。她也不是在躲着我，我看得出她见到我时也很开心。我来时她很开心，走的时候她也表现出挽留。她对我的关注总是

报以温柔的回应，也并不排斥我的殷勤。她会给我一些建议甚至是命令。但是她总是拒绝我的请求和祈祷。每当我斗胆提及婚姻，她便不愿我继续说下去。我若是多说一句，她就会立刻离开我。为什么她希望我属于她，却不希望她属于我呢？她尊敬你，也喜爱你，所以她应该会听你的话，不会拒绝你的。拜托你去和她说说吧，告诉我她的回答。帮帮你的朋友吧。为你的工作做一个完美的收尾吧，别使他成为你关爱的受害者。如果你没能帮他抓住幸福，那么你的教育就成了他痛苦的原因啊。”

I speak to Sophy, and have no difficulty in getting her to confide her secret to me, a secret which was known to me already. It is not so easy to get permission to tell Emile; but at last she gives me leave and I tell him what is the matter. He cannot get over his surprise at this explanation. He cannot understand this delicacy; he cannot see how a few pounds more or less can affect his character or his deserts. When I get him to see their effect on people's prejudices he begins to laugh; he is so wild with delight that he wants to be off at once to tear up his title deeds and renounce his money, so as to have the honour of being as poor as Sophy, and to return worthy to be her husband.

我和苏菲进行了交谈，没费什么力气她就向我坦白了这个秘密，其实她不说我也已经知道了。但我费了一番波折才获得她的许可把这个秘密告诉爱弥儿，于是我告诉了爱弥儿事情的究竟。他对这个解释不禁感到惊讶。他不明白其中的微妙，因为他无法看出财富的多少会影响到他的性格或是品德。当我向他解释人们对金钱的偏见时，他开始大笑。他高兴得不得了，想立刻出发撕毁所有的房地契，抛弃所有的财物，这样他就可以和苏菲一样贫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她的丈夫了。

“Why,” said I, trying to check him, and laughing in my turn at his impetuosity, “will this young head never grow any older? Having dabbled all your life in philosophy, will you never learn to reason? Do not you see that your wild scheme would only make things worse, and Sophy more obstinate? It is a small superiority to be rather richer than she, but to give up all for her would be a very great superiority; if her pride cannot bear to be under the small obligation, how will she make up her mind to the greater? If she cannot bear to think that her husband might taunt her with the fact that he has enriched her, would she permit him to blame her for having brought him to poverty? Wretched boy, beware lest she suspects you of such a plan! On the contrary, be careful and economical for her sake, lest she should accuse you of trying to gain her by cunning, by sacrificing of your own free will what you are really wasting through carelessness.

“为什么？”我说，一边试图制止他，一边轮到我来笑他的急躁，“你年轻的头脑怎么总是不能成熟一点呢？你一生都在学习哲学，怎么还学不会理性一点呢？你难道还没有看出来，你拙劣的计划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而使苏菲更加顽固吗？如果说你比她富有只比她优越了一点点，那么你为了她放弃所有的财产就会比她优越许多。如果她的骄傲使她不能接受这种小恩惠，那么她怎么会接受更大的恩惠呢？如果她不能接受她的丈夫可能会因为他比她富有而奚落她这种可能性，那么她就更加不会允许丈夫责备她说是由于她的原因而造成了他们的贫穷。可怜的孩子啊。你要小心，不要让她怀疑你有这样的打算！相反，你要为她小心节约，以免她认为你试图要以狡猾的手段赢得她的心，说你是为她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意愿，但其实你只是不经意间花掉了。

“Do you really think that she is afraid of wealth, and that she is

opposed to great possessions in themselves? No, dear Emile; there are more serious and substantial grounds for her opinion, in the effect produced by wealth on its possessor. She knows that those who are possessed of fortune's gifts are apt to place them first. The rich always put wealth before merit. When services are reckoned against silver, the latter always outweighs the former, and those who have spent their life in their master's service are considered his debtors for the very bread they eat. What must you do, Emile, to calm her fears? Let her get to know you better; that is not done in a day. Show her the treasures of your heart, to counterbalance the wealth which is unfortunately yours. Time and constancy will overcome her resistance; let your great and noble feelings make her forget your wealth. Love her, serve her, serve her worthy parents. Convince her that these attentions are not the result of a foolish fleeting passion, but of settled principles engraved upon your heart. Show them the honour deserved by worth when exposed to the buffets of Fortune; that is the only way to reconcile it with that worth which basks in her smiles.”

“你真的认为她害怕钱财，而且拒绝拥有巨大的财富吗？亲爱的爱弥儿，不是这样的。她的想法有更为严肃而重要的理由，她明白财富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她明白，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往往会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往往视金钱高于美德。当礼仪和金钱被放在一起时，后者往往胜过前者。对于那些倾其一生为之服务的人，就因为这些人吃了他的面包，他就觉得他们欠了他的债。爱弥儿，你要做什么去抚平她的恐惧呢？让她对你有更深的了解吧，但这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做到的。向她展现你心灵的财富吧，以此来抵消那些不幸恰巧就是你的财富。时间与恒心能够战胜她的抵抗。就让你伟大而高尚的感情使她忘记你的财富吧。爱她，为她和她可敬的父母服务。你要使她相信你并不是出于一时荒谬的热情才付出关心，而是出于你心中满怀着的既定的为人准则。你要向他们展示当面对财富的压力时你

所表现出的荣耀是值得赞赏的。只有这样，你的美德才能值得她为你微笑。”

The transports of joy experienced by the young man at these words may easily be imagined; they restore confidence and hope, his good heart rejoices to do something to please Sophy, which he would have done if there had been no such person, or if he had not been in love with her. However little his character has been understood, anybody can see how he would behav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显然，这个年轻人听了这番话后感到很愉快。这使他又重拾信心和希望，他善良的心很想做些事取悦苏菲。虽然这些事即使苏菲不存在，或者他并没有爱上苏菲，他也是会做的。不论大家对他的性格了解得多么少，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他会怎么做。

Here am I, the confidant of these two young people and the mediator of their affection. What a fine task for a tutor! So fine that never in all my life have I stood so high in my own eyes, nor felt so pleased with myself. Moreover, this duty is not without its charms. I am not unwelcome in the home; it is my business to see that the lovers behave themselves; Emile, ever afraid of offending me, was never so docile. The little lady herself overwhelms me with a kindness which does not deceive me, and of which I only take my proper share. This is her way of making up for her severity towards Emile. For his sake she bestows on me a hundred tender caresses, though she would die rather than bestow them on him; and he, knowing that I would never stand in his way, is delighted that I should get on so well with her. If she refuses his arm when we are

out walking, he consoles himself with the thought that she has taken mine. He makes way for me without a murmur, he clasps my hand, and voice and look alike whisper, “My friend, plead for me!” and his eyes follow us with interest; he tries to read our feelings in our faces, and to interpret our conversation by our gestures; he knows that everything we are saying concerns him. Dear Sophy, how frank and easy you are when you can talk to Mentor without being overheard by Telemachus. How freely and delightfully you permit him to read what is passing in your tender little heart! How delighted you are to show him how you esteem his pupil! How cunningly and appealingly you allow him to divine still tenderer sentiments. With what a pretence of anger you dismiss Emile when his impatience leads him to interrupt you? With what pretty vexation you reproach his indiscretion when he comes and prevents you saying something to his credit, or listening to what I say about him, or finding in my words some new excuse to love him!

而我，则是这两位年轻人的知己，也是他们感情的中间人。这对一个导师来说，倒是再适合不过的工作了！这合适到我一生中从未觉得自己如此重要，也从未对自己如此满意过。而且，这份工作也满含着迷人之处。我在这个家庭里很受欢迎。监督他们两人的行为是我的职责所在。爱弥儿从未对我如此顺从，他怕会冒犯到我。苏菲则待我真诚友善，我只接受其中我应得的那份。其实这是她以自己的方式为对爱弥儿的严厉做出的弥补。在爱弥儿看来，苏菲对我百般温柔关爱，而她宁愿去死也不会对爱弥儿这样。爱弥儿知道我绝不会阻拦他，所以他很高兴我能和苏菲愉快相处。如果我们出门散步时苏菲拒绝挽着他的胳膊，他安慰自己苏菲挽着我的胳膊也一样。他毫无怨言地走开，只是握了握我的手，使了个眼色，对我悄悄说，“我的朋友，你要为我说说好话呀！”之后他的眼睛关注着我们，试图从我们的表情中看出情绪的波动，从手势中判断我们的对话内容。他对我们谈话中关于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亲爱的苏菲啊，当你与门托尔谈话

时，你多坦诚而轻易地想让忒勒马科斯听到这对话呀。而你那颗小小的温柔的心中的想法，又多么自由而轻易地就让他读懂了啊！你多么高兴，因为你向他表现出对他学生的尊敬！你狡猾地让他看出了你心中温柔的波动。当爱弥儿耐不住要打断你时，你对他佯装的愤怒多么传神啊！当他走近，打扰你赞美他的优点，或是听我谈起他，或是从我的谈话中找出更多爱他的理由时，你对他愤怒的责备也是如此可爱。

Having got so far as to be tolerated as an acknowledged lover, Emile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his position; he speaks, he urges, he implores, he demands. Hard words or ill treatment make no difference, provided he gets a hearing. At length Sophy is persuaded, though with some difficulty, to assume the authority of a betrothed, to decide what he shall do, to command instead of to ask, to accept instead of to thank, to control the frequency and the hours of his visits, to forbid him to come till such a day or to stay beyond such an hour. This is not done in play, but in earnest, and if it was hard to induce her to accept these rights, she uses them so sternly that Emile is often ready to regret that he gave them to her. But whatever her commands, they are obeyed without question, and often when at her bidding he is about to leave her, he glances at me his eyes full of delight, as if to say, “You see she has taken possession of me.” Yet unknown to him, Sophy, with all her pride, is observing him closely, and she is smiling to herself at the pride of her slave.

爱弥儿渐渐地已经被默认为是苏菲的恋人，于是他就充分利用了这个身份。述说、催促、请求，他对苏菲用了各种办法。如果爱弥儿只想让苏菲听到他说的话，就算苏菲态度强硬或者对他冷漠，都没有关系。尽管历经波折，苏菲最终同意行使一个恋人的权利了。由她决

定爱弥儿应该做什么，她可以命令而不是请求爱弥儿，她会接受爱弥儿的好意而不是表示感谢。她决定爱弥儿前来拜访的频率与时间，禁止他在某天之前到来，也禁止他在这里呆超过一个小时。这一切不是儿戏，而是真实的。如果说当初请求苏菲接受这些权利的过程是十分困难的，那么如今她如此严厉地行使这些权利，甚至会使爱弥儿后悔当初这么做。但是无论苏菲说什么，爱弥儿总是言听计从。每当快要到苏菲要求他离开的时间时，他总是充满喜悦的望向我，眼神好像在说，“你看吧，苏菲已经占有了我。”但是爱弥儿不知道的是，苏菲在骄傲地观察着他，因为她的奴隶如此骄傲而微笑。

Oh that I had the brush of an Alban or a Raphael to paint their bliss, or the pen of the divine Milton to describe the pleasures of love and innocence! Not so; let such hollow arts shrink back before the sacred truth of nature. In tenderness and pureness of heart let your imagination freely trace the raptures of these young lovers, who under the eyes of parents and tutor, abandon themselves to their blissful illusions; in the intoxication of passion they are advancing step by step to its consummation; with flowers and garlands they are weaving the bonds which are to bind them till death do part. I am carried away by this succession of pictures, I am so happy that I cannot group them in any sort of order or scheme; any one with a heart in his breast can paint the charming picture for himself and realise the different experiences of father, mother, daughter, tutor, and pupil, and the part played by each and all in the union of the most delightful couple whom love and virtue have ever led to happiness.

哦，我多希望自己能有阿耳邦或是拉斐尔的画笔，能画下他们的欢乐时光。或是有弥尔顿牧师的笔触，能描写出他们之间爱情的欢乐与天真烂漫！不，让我们在神圣的自然法则面前收起那些虚伪的技俩

吧。用你温柔而纯净的心去自由想象这对恋人的欢乐吧。他们在父母和导师的关爱下，沉溺于欢乐的幻觉中。他们沉醉于爱情，一步一步走向美满。他们之间由鲜花编织的花环相连结，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我为这接连不断的场景感动不已，我很高兴甚至无法将它们用任何顺序或组合拼凑起来。每一个拥有美好心灵的人都能够想象出这动人的场景。他们会了解到，在这里父亲、母亲、女儿、导师和学生的不同经历以及他们各人所扮演的角色，而这对世上最幸福的恋人他们的爱情和美德会为他们带来幸福。

Now that he is really eager to please, Emile begins to feel the value of the accomplishments he has acquired. Sophy is fond of singing, he sings with her; he does more, he teaches her music. She is lively and light of foot, she loves skipping; he dances with her, he perfects and develops her untrained movements into the steps of the dance. These lessons, enlivened by the gayest mirth, are quite delightful, they melt the timid respect of love; a lover may enjoy teaching his betrothed—he has a right to be her teacher.

只有在爱弥儿急于取悦苏菲时，他才开始发觉自己曾经学习的技艺是有些价值的。苏菲喜爱唱歌，他就和她一起唱。爱弥儿能做得更多，他还能教苏菲一些乐理。苏菲很活泼，脚步轻盈灵动，总是蹦蹦跳跳的。于是爱弥儿就和她一同跳舞，在他的陪伴和锻炼下，苏菲未经训练的动作渐渐完善、成熟。这些课程充满了欢声笑语。他们对爱情的羞怯与尊敬互相融合。一个人会喜爱教他的恋人学习这些——毕竟他是有权做她的老师的。

There is an old spinet quite out of order. Emile mends and tunes it; he is a maker and mender of musical instruments as well as a carpenter; it has always been his rule to learn to do everything he

can for himself. The house is picturesquely situated and he makes several sketches of it, in some of which Sophy does her share, and she hangs them in her father's study. The frames are not gilded, nor do they require gilding. When she sees Emile drawing, she draws too, and improves her own drawing; she cultivates all her talents, and her grace gives a charm to all she does. Her father and mother recall the days of their wealth, when they find themselves surrounded by the works of art which alone gave value to wealth; the whole house is adorned by love; love alone has enthroned among them, without cost or effort, the very same pleasures which were gathered together in former days by dint of toil and money.

苏菲有一架非常古旧的竖琴。爱弥儿修好了它，还为它调了音。他对于乐器的制作和修理还有木工制作都很熟悉，因为学习能够学习的一切知识一直是他的准则。苏菲的家坐落在风景如画的村庄里，爱弥儿为之作了几幅画，在其中几幅上苏菲也画了几笔。苏菲把这些画挂在了父亲的书房里。画框并没有镀金，他们也并不需要镀金。当苏菲看到爱弥儿作画时，她也会去试着画几笔，慢慢地提高了自己的绘画技巧。她培养着自己所有的才能，而她的美丽使她做的一切更加动人。她的父母看到满目的艺术品时，回想起曾经富有的日子，那时艺术品只是空有价值。但现在房子确实被爱情装饰着的，不用花费钱财与精力，他们就获得了和当初一样的幸福，那时幸福是投入了努力和金钱才得来的。

As the idolater gives what he loves best to the shrine of the object of his worship, so the lover is not content to see perfection in his mistress, he must be ever trying to add to her adornment. She does not need it for his pleasure, it is he who needs the pleasure of giving, it is a fresh homage to be rendered to her, a fresh pleasure in the joy of beholding her. Everything of beauty seems to find its

place only as an accessory to the supreme beauty. It is both touching and amusing to see Emile eager to teach Sophy everything he knows, without asking whether she wants to learn it or whether it is suitable for her. He talks about all sorts of things and explains them to her with boyish eagerness; he thinks he has only to speak and she will understand; he looks forward to arguing, and discussing philosophy with her; everything he cannot display before her is so much useless learning; he is quite ashamed of knowing more than she.

一个虔诚的崇拜者往往会把他最真诚的爱献给他所崇拜的神，正因为如此，恋人往往觉得他们的爱人还可以更加完美，他必须更努力地去使她更加可爱。她并不需要这些来取悦他，但是他需要这种给予的幸福感。这是一种全新的向她表现顺服的方式，也是因为爱她而产生的新的快乐。所有美好的事物似乎只有在特别美好的苏菲身上才会显得恰如其分。所以当我们看到爱弥儿急着去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教给苏菲时是既动人又可笑的。他甚至没有询问苏菲自己是否想学，也没有考虑这个是否适合苏菲。他以一种孩子气的急切向苏菲讲述并解释各种不同的事物。他觉得只要他讲了，苏菲就一定会理解。所以爱弥儿很想和苏菲讨论一些哲学问题。他所学习过的知识，如果无法讲给苏菲听，那就会被他认为是毫无用处的。如果自己知道的比苏菲多，那他会很羞愧的。

So he gives her lessons in philosophy, physics, mathematics, history, and everything else. Sophy is delighted to share his enthusiasm and to try and profit by it. How pleased Emile is when he can get leave to give these lessons on his knees before her! He thinks the heavens are open. Yet this position, more trying to pupil than to teacher, is hardly favourable to study. It is not easy to know where to look, to avoid meeting the eyes which follow our own, and

if they meet so much the worse for the lesson.

所以他教了她哲学、物理、数学、历史和其他的一些知识。苏菲乐于与他分享这些热情，也希望从中获益。当苏菲允许爱弥儿在她身边给她上课时，他多么开心啊。他甚至觉得天堂之门由此打开。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老师无所谓，学生却很难学到知识。苏菲不知道眼睛看向哪里以避免四目相对，万一真的目光相对，那么课程就更难以进行了。

Women are no strangers to the art of thinking, but they should only skim the surface of logic and metaphysics. Sophy understands readily, but she soon forgets. She makes most progress in the moral sciences and aesthetics; as to physical science she retains some vague idea of the general laws and order of this world. Sometime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walks, the spectacle of the wonders of nature bids them not fear to raise their pure and innocent hearts to nature's God; they are not afraid of His presence, and they pour out their hearts before him.

女性是善于思考的，但是她们对逻辑和形而上学只是略知一二。苏菲理解得很快，但也很快就忘了。她在伦理学和美学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物理学方面，她仍然只是对基本法则和宇宙体系有一些模糊的概念。有时他们在散步时，那些神奇瑰丽的景象使他们敢于以纯洁而天真的心灵去直面造物主。他们并不畏惧自然，而在自然面前倾吐真心。

What! Two young lovers spending their time together talking of religion! Have they nothing better to do than to say their catechism!

What profit is there in the attempt to degrade what is noble? Yes, no doubt they are saying their catechism in their delightful land of romance; they are perfect in each other's eyes; they love one another, they talk eagerly of all that makes virtue worth having. Their sacrifices to virtue make her all the dearer to them. Their struggles after self-control draw from them tears purer than the dew of heaven, and these sweet tears are the joy of life; no human heart has ever experienced a sweeter intoxication. Their very renunciation adds to their happiness, and their sacrifices increase their self-respect. Sensual men, bodies without souls, some day they will know your pleasures, and all their life long they will recall with regret the happy days when they refused the cup of pleasure.

什么！这对年轻的恋人竟然在花费时间谈论宗教！他们有那么多可做的事，为什么一定要谈论教义！试图亵渎神圣的神灵有什么好处呢？是的，毫无疑问他们在爱情的温柔乡里谈论着教义。他们在双方看来都是完美无缺的。他们彼此深爱，热切地讨论着使美德变得高贵的原因。他们为美德做出牺牲，因而更加觉得美德无比可爱。他们克制自己，流下比天堂的露水还要纯洁的眼泪。其实这些甜蜜的泪水也是生活的乐趣所在。人们所经历过的最美好的陶醉也不过如此。他们对自己的克制反而使自己更加幸福，而他们的牺牲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尊重。沉溺于肉欲的人们和空有躯壳的行尸走肉，终有一天将会理解你们的快乐。他们终其一生都会后悔他们曾拒绝了这种快乐。

In spite of this good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s and even quarrels occur from time to time; the lady has her whims, the lover has a hot temper; but these passing showers are soon over and only serve to strengthen their union. Emile learns by experience not to attach too much importance to them, he always gains more by the reconciliation than he lost by the quarrel.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difference made him expect a like result from all; he was mistaken, but even if he does not make any appreciable step forward, he has always the satisfaction of finding Sophy's genuine concern for his affection more firmly established. “What advantage is this to him?” you would ask. I will gladly tell you; all the more gladly because it will give me an opportunity to establish clearly a very important principle, and to combat a very deadly one.

尽管他们之间互相理解，却也时不时不免有一些差异与争执。苏菲情绪激动，爱弥儿也脾气火爆。但这些争吵往往很快过去，只会使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加坚定。爱弥儿在经历中渐渐明白，这些争吵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和好如初后他总是得到更多的益处。由于第一次争执中他有所获益，他便希望此后的也一并如此。但是他错了。尽管他没能在每一次争吵中都有所收获，但他总是满足地感受到苏菲对他真诚的关心和爱护更加坚定了。“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你也许会问。我非常乐意告诉你，因为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去阐释一个重要的原则，并且驳倒一个有误的说法。

Emile is in love, but he is not presuming; and you will easily understand that the dignified Sophy is not the sort of girl to allow any kind of familiarity. Yet virtue has its bounds like everything else, and she is rather to be blamed for her severity than for indulgence; even her father himself is sometimes afraid lest her lofty pride should degenerate into a haughty spirit. When most alone, Emile dare not ask for the slightest favour, he must not even seem to desire it; and if she is gracious enough to take his arm when they are out walking, a favour which she will never permit him to claim as a right, it is only occasionally that he dare venture with a sigh to press her hand to his heart. However, after a long period of self-restraint, he ventured secretly to kiss the hem of her

dress, and several times he was lucky enough to find her willing at least to pretend she was not aware of it. One day he attempts to take the same privilege rather more openly, and Sophy takes it into her head to be greatly offended. He persists, she gets angry and speaks sharply to him; Emile will not put up with this without reply; the rest of the day is given over to sulks, and they part in a very ill temper.

爱弥儿是爱苏菲的，但他并不放肆。显然，庄重的苏菲不是那种随便的女孩，她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亲密。但德行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是有界限的。如果说要责备苏菲，那么也是因为她太过严肃，而不是因为放纵。他的父亲有时甚至担心她的高傲会演变为过分的傲慢。大多数时候他们两人独处时，爱弥儿不敢向苏菲提出任何要求，他甚至不敢奢望。如果苏菲能在他们外出散步时挽着他的胳膊，对他来说就足够了。苏菲并不允许爱弥儿将这视为一种权利。爱弥儿只有偶尔胆敢伴着一声叹息，将苏菲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前。然而，自我克制了很久之后，爱弥儿终于敢偷偷地亲吻苏菲的裙边，好几次爱弥儿运气都是不错的，因为他发现苏菲是乐意的，至少是假装没有注意到的。有一天他比往常更大胆地去做这件事，却被苏菲当成了过分的冒犯。爱弥儿坚持要这么做惹恼了苏菲，她对他说了几句狠话。而爱弥儿也没忍住呛了她了几句。在那天余下的时间里他们两人都在生闷气，最后生着气告别了。

Sophy is ill at ease; her mother is her confidant in all things, how can she keep this from her? It is their first misunderstanding, an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an hour is such a serious business. She is sorry for what she has done, she has her mother's permission and her father's commands to make reparation.

苏菲心神不宁的。母亲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她的知己，这件事当然也没有瞒着她。这是她和爱弥儿第一次产生争执。而这长达一个小时的争执实在是很严重的。她对自己的做法感到抱歉，在母亲的允许和父亲的要求下，苏菲决定去道歉。

The next day Emile returns somewhat earlier than usual and in a state of some anxiety. Sophy is in her mother's dressing-room and her father is also present. Emile enters respectfully but gloomily. Scarcely have her parents greeted him than Sophy turns round and holding out her hand asks him in an affectionate tone how he is. That pretty hand is clearly held out to be kissed; he takes it but does not kiss it. Sophy, rather ashamed of herself, withdraws her hand as best she may. Emile, who is not used to a woman's whims, and does not know how far caprice may be carried, does not forget so easily or make friends again all at once. Sophy's father, seeing her confusion, completes her discomfiture by his jokes. The poor girl, confused and ashamed, does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herself and would gladly have a good cry. The more she tries to control herself the worse she feels; at last a tear escapes in spite of all she can do to prevent it. Emile, seeing this tear, rushes towards her, falls on his knees, takes her hand and kisses it again and again with the greatest devotion. “My word, you are too kind to her,” says her father, laughing; “if I were you, I should deal more severely with these follies, I should punish the mouth that wronged me.” Emboldened by these words, Emile turns a suppliant eye towards her mother, and thinking she is not unwilling, he tremblingly approaches Sophy's face; she turns away her head, and to save her mouth she exposes a blushing cheek. The daring young man is not content with this; there is no great resistance. What a kiss, if it were not taken under her mother's eyes. Have a care, Sophy, in your severity; he will be ready enough to try to kiss your dress if only

you will sometimes say “No.”

第二天爱弥儿到得比往常要早些，神态中有些不安。苏菲和父亲都在母亲的梳妆室里。爱弥儿恭敬但郁闷地走了进去。苏菲的父母刚刚问候了爱弥儿，苏菲就转过身来，伸出手愉快地问候爱弥儿一切可好。很明显，苏菲伸出手是想让爱弥儿去亲吻它，但是爱弥儿只是握住了她的手，却没有亲吻它。苏菲有些羞怯，却尽量从容地收回了手。爱弥儿自然是不了解女人的反复无常的，他不明白女孩子会多任性，也不会轻易就忘了这些事情立刻和好。苏菲的父亲看到她这幅窘迫的样子后还对她开玩笑，苏菲感到狼狈不堪。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又窘迫又羞怯，她不知所措，只想大哭一场。而她越想克制自己，就越觉得委屈。尽管她努力克制自己，最后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爱弥儿一看到苏菲的泪水就冲到她面前，跪下来牵着她的手，一遍一遍虔诚地亲吻它。“哎呀，你对她实在太好了。”苏菲的父亲大笑着说，“如果是我，我才不会容忍这种荒唐事呢。我一定会惩罚这张冤枉了我的嘴巴。”爱弥儿受到这番话的鼓舞，向苏菲的母亲投以恳求的眼神，认为她并没有反对的意思。于是他战战兢兢地亲吻苏菲的脸。苏菲转过头来保护自己的嘴巴，却暴露了自己羞红了的脸颊。这个大胆的年轻人不满于此，毕竟苏菲没有做出过多的挣扎。如果不是在苏菲母亲的眼皮底下，还不知道这个吻要多久呢。苏菲啊，即使你这样谨慎，也要小心了。要是以后你偶尔拒绝了爱弥儿，他一定会想尽办法要亲吻你的裙子。

After this exemplary punishment, Sophy's father goes about his business, and her mother makes some excuse for sending her out of the room; then she speaks to Emile very seriously. “Sir,” she says, “I think a young man so well born and well bred as yourself, a man of feeling and character, would never reward with dishonour the confidence reposed in him by the friendship of this family. I am neither prudish nor over strict; I know how to make excuses for

youthful folly, and what I have permitted in my own presence is sufficient proof of this. Consult your friend as to your own duty, he will tell you there i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between the playful kisses sanctioned by the presence of father and mother, and the same freedom taken in their absence and in betrayal of their confidence, a freedom which makes a snare of the very favours which in the parents' presence were wholly innocent. He will tell you, sir, that my daughter is only to blame for not having perceived from the first what she ought never to have permitted; he will tell you that every favour, taken as such, is a favour, and that it is unworthy of a man of honour to take advantage of a young girl's innocence, to usurp in private the same freedom which she may permit in the presence of others. For good manners teach us what is permitted in public; but we do not know what a man will permit to himself in private, if he makes himself the sole judge of his conduct.”

在这次惩戒性的处罚后，苏菲的父亲就去忙自己的事务去了。而她的母亲找了些借口让苏菲走出房间，之后向与爱弥儿进行了严肃的谈话。“先生，”她说，“我想，一个像您一样出身良好且受过正统教育的年轻人，情感丰富，品行优良，绝不会羞辱一个友好家庭对你寄予的信任。我并不因循守旧或是过分严肃。我对年轻人那些疯狂的行为表示理解。我容许你当着我的面做这样的事情，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请你向你的朋友请教一下自己的义务。他会告诉你，在父母面前被他们所准许的嬉戏亲吻和当他们不在场时违背他们的信任这么做是有着天壤之别的。父母在场时这样做是完全无妨的，但是后者将这种行为变成了一个陷阱。先生，他会告诉你，我的女儿错就错在没能在第一次嬉闹时就认识到哪些事情她永远不该容许发生。他会告诉你，友好的行为只有被他人认同时，才是友好的。一位体面的绅士不应当利用一位年轻女孩的天真无邪，在私下里对她做那些她当着其他人的面同意的事情。因为良好的品行教育我们哪些事情是在公共场合可以做

的。但是我们并不了解如果由一个人独立判断自己的行为，那在私下里他会允许自己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After this well-deserved rebuke, addressed rather to me than to my pupil, the good mother leaves us, and I am amazed by her rare prudence, in thinking it a little thing that Emile should kiss her daughter's lips in her presence, while fearing lest he should venture to kiss her dress when they are alone. When I consider the folly of worldly maxims, whereby real purity is continually sacrificed to a show of propriety, I understand why speech becomes more refined while the heart becomes more corrupt, and why etiquette is stricter while those who conform to it are most immoral.

这番确有其事的指责，与其说是针对我的学生，不如说是说给我听。之后这位伟大的母亲离开了。我对她这种罕有的远虑十分惊讶，因为她认为爱弥儿在她面前亲吻她的女儿是一件小事，却担心当他们独处时，爱弥儿会试图亲吻她的衣裙。那时我想到，世间的准则实在愚蠢，以牺牲现实中的纯真来展现出礼貌的样子。由此我理解了为什么心思越是腐化堕落，话语越是精致优雅；而为什么规矩越是严苛，遵守它的人就越是丧失道德。

While I am trying to convince Emile's heart with regard to these duties which I ought to have instilled into him sooner, a new idea occurs to me, an idea which perhaps does Sophy all the more credit, though I shall take care not to tell her lover; this so-called pride, for which she has been censured, is clearly only a very wise precaution to protect her from herself. Being aware that, unfortunately, her own temperament is inflammable, she dreads the least spark, and keeps out of reach so far as she can. Her sternness

is due not to pride but to humility. She assumes a control over Emile because she doubts her control of herself; she turns the one against the other. If she had more confidence in herself she would be much less haughty. With this exception is there anywhere on earth a gentler, sweeter girl? Is there any who endures an affront with greater patience, any who is more afraid of annoying others? Is there any with less pretension, except in the matter of virtue? Moreover, she is not proud of her virtue, she is only proud in order to preserve her virtue, and if she can follow the guidance of her heart without danger, she caresses her lover himself. But her wise mother does not confide all this even to her father; men should not hear everything.

当我在试图使爱弥儿的心思理解那些我原本应该早些告诉他的义务时，我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尽管我应小心不让爱弥儿知道这个想法，而如果苏菲知道的话，她可能会更加自信。她那受到责难的所谓“傲慢”，很明显只是她明智的自我保护与防备。苏菲了解这一点，但很不幸，她的脾性又是易燃易怒的。因此她害怕甚至是最小的火花，尽她所能地躲开了。她的审慎严肃并不是因为傲慢，而是因为谦卑。她对爱弥儿的控制是因为她怀疑不能控制她自己，所以她才通过控制爱弥儿来控制自己。如果她能对自己更自信的话，她就不会这么傲慢了。排除了这一点，世上还有比苏菲更温柔、更甜美的女孩吗？还有谁像苏菲一样耐心地忍受着责难侮辱？还有谁比她更怕伤害到别人？还有谁比苏菲能在除了美德以外的方面保有更少的傲慢呢？而且，她并不是为自己的品德而骄傲，她只是为了维护美德才显得傲慢。而如果她能毫无危险地遵循自己内心的指引，她会拥抱她的爱人的。但是她智慧的母亲没有向她的父亲吐露半点。男人们不该听到所有的事情。

Far from seeming proud of her conquest, Sophy has grown

more friendly and less exacting towards everybody, except perhaps the one person who has wrought this change. Her noble heart no longer swells with the feeling of independence. She triumphs modestly over a victory gained at the price of her freedom. Her bearing is more restrained, her speech more timid, since she has begun to blush at the word “lover”; but contentment may be seen beneath her outward confusion and this very shame is not painful. This change is most noticeable in her behaviour towards the young men she meets. Now that she has ceased to be afraid of them, much of her extreme reserve has disappeared. Now that her choice is made, she does not hesitate to be gracious to those to whom she is quite indifferent; taking no more interest in them, she is less difficult to please, and she always finds them pleasant enough for people who are of no importance to her.

苏菲并没有因为她得到爱弥儿的爱情而显得骄傲，相反，她对所有人都变得更加友好和宽容，唯独除了造成这个变化的人。她高贵的心不再因为独立感而膨胀。她谦卑地庆祝了自己以自由为代价取得的胜利。自她听到“爱人”这个词时羞红了脸开始，举止就更加谨慎克制，话语也更带羞怯。但在她外表显出的困惑与混乱之下掩藏的是她的满足。这种羞愧并不是痛苦的。这个变化在对她遇到的年轻人的态度上是最为明显的。既然她不再害怕他们了，她所表现出的极端的稳重就所剩无几了。既然她已经做出决定，她也不再犹豫着是否要对那些不相关的人表现亲密。由于苏菲对他们都没兴趣，所以她也更容易取悦了。她发现，就那些对于她并不重要的人来说，他们已经足够有趣了。

If true love were capable of coquetry, I should fancy I saw traces of it in the way Sophy behaves towards other young men in her lover's presence. One would say that not content with the

ardent passion she inspires by a mixture of shyness and caresses, she is not sorry to rouse this passion by a little anxiety; one would say that when she is purposely amusing her young guests she means to torment Emile by the charms of a freedom she will not allow herself with him; but Sophy is too considerate, too kindly, too wise to really torment him. Love and honour take the place of prudence and control the use of this dangerous weapon. She can alarm and reassure him just as he needs it; and if she sometimes makes him uneasy she never really gives him pain. The anxiety she causes to her beloved may be forgiven because of her fear that he is not sufficiently her own.

如果爱可以允许卖弄风骚的话，我觉得曾见过苏菲会当着爱弥儿的面向其他男士表现出卖弄风骚的痕迹。有人会说，这是苏菲不满于由她那羞怯与怜爱的交织的情态所激起的热烈的爱情，她并不觉得让爱弥儿产生小小的紧张以激发更多的爱有什么不妥。也有人说，当苏菲故意去取悦那些年轻的客人时，她是刻意要以自由的魅力表现她并不允许自己沉溺于爱弥儿一人来折磨他。但是苏菲太过体贴温柔，也太聪慧，她不会真正地折磨爱弥儿。爱与荣耀取代了审慎，也控制了这危险武器的使用。她能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他警醒与保证。而如果有时苏菲使他感到不适，她也不是故意要使他痛苦。她使爱人产生这样的忧虑其实也情有可原，因为她担心他并不足够爱她。

But what effect will this little performance have upon Emile? Will he be jealous or not? That is what we must discover; for such digressions form part of the purpose of my book, and they do not lead me far from my main subject.

但是这小小的举动会对爱弥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他是否会感到

嫉妒呢？这就是我们必须去发掘的了。因为这样细枝末节的事情构成了本书目的的一部分，而且也并没有使我过分偏离主题。

I have already shown how this passion of jealousy in matters of convention finds its way into the heart of man. In love it is another matter; then jealousy is so near akin to nature, that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it is not her work; and the example of the very beasts, many of whom are madly jealous, seems to prove this point beyond reply. Is it man's influence that has taught cooks to tear each other to pieces or bulls to fight to the death?

我已经证明过，在世俗的事务上，人心如何产生嫉妒的心绪。而在爱情中又完全不同。嫉妒心如此近似于天性使然，很难相信这不是人与生俱来的。以一些猛兽为例，很多都有近似疯狂的嫉妒。不需回答，这些例子似乎也能有力地证明这一点。难道是人的力量教会厨师们互相撕扯、或是公牛死战到底吗？

No one can deny that the aversion to everything which may disturb or interfere with our pleasures is a natural impulse. Up to a certain point the desire for the exclusive possession of that which ministers to our pleasure is in the same case. But when this desire has become a passion, when it is transformed into madness, or into a bitter and suspicious fancy known as jealousy, that is quite another matter; such a passion may be natural or it may not; we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se different cases.

不可否认，对于一切可能会扰乱或是妨碍我们愉快的事物的厌恶都是天性驱使。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渴望独占愉快的事物也是同样

的。但是当这种渴望变成欲求、成为疯狂、形成像嫉妒那种充满痛苦与怀疑的爱，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种欲求可能来自于天性也可能不是，我们必须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区分。

I have already analysed the example of the animal world in my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and on further consideration I think I may refer my readers to that analysis as sufficiently thorough. I will only add this further point to those already made in that work, that the jealousy which springs from nature depends greatly on sexual power, and that when sexual power is or appears to be boundless, that jealousy is at its height; for then the male, measuring his rights by his needs, can never see another male except as an unwelcome rival. In such species the females always submit to the first comer, they only belong to the male by right of conquest, and they are the cause of unending strife.

我已经在我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书中分析过动物世界中的例子，在进一步考虑下，我想我希望我的读者们能研读一下这个充分而彻底的分析。我将对书中已经提到的观点只做出以下这一点补充。嫉妒来源于人的天性，而很大程度上由性权利来决定。当性权利不受限制或看上去不受限制，嫉妒会到达最高点。此时雄性动物会通过需求来衡量自己的权利，把其他雄性动物全都作为不受欢迎的竞争者看待。在这些物种中，雌性动物通常会顺从第一个来到它们身边的雄性动物，她们完全是因为被雄性动物政征服而从属于雄性动物的，并且，也是她们导致了无休止的争斗。

Among the monogamous species, where intercourse seems to give rise to some sort of moral bond, a kind of marriage, the female who belongs by choice to the male on whom she has bestowed

herself usually denies herself to all others; and the male, having this preference of affection as a pledge of her fidelity, is less uneasy at the sight of other males and lives more peaceably with them. Among these species the male shares the care of the little ones; and by one of those touching laws of nature it seems as if the female rewards the father for his love for his children.

在一夫一妻制的物种中，交往会产生某种道德纽带，也即一种婚姻。缔结婚姻后，雌性动物通常会有一位委身的雄性动物，她会选择属于他而拒绝其他雄性动物。而雄性动物则将这种偏爱视为她会忠诚的誓言，因此在看到其他雄性动物时更为平和，能与他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在这些物种中，雄性同样分担了养育孩子的责任。并且，在自然的法则之下，雌性动物似乎会回报雄性对其孩子的爱。

Now consider the human species in its primitive simplicity; it is easy to see, from the limited powers of the male, and the moderation of his desires, that nature meant him to be content with one female; this is confirmed by the numerical equality of the two sexes, at any rate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an equality which does not exist in anything like the same degree among those species in which several females are collected around one male. Though a man does not brood like a pigeon, and though he has no milk to suckle the young, and must in this respect be classed with the quadrupeds, his children are feeble and helpless for so long a time, that mother and children could ill dispense with the father's affection, and the care which results from it.

现在如果我们从原始未开化的角度考虑人类，很明显，鉴于男性有限的能力和他适度的欲望，自然使其满足于只拥有一位女性。这一

点至少在地球上的两性的数量对等上可以加以证实。这种数量的对等的程度与在其他一夫多妻制的物种中并不存在。尽管一位男士不会像鸽子一样孵卵，也没有乳汁养育后代，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将男人与四足动物相提并论。由于他的孩子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弱小无助，父亲的喜爱和关心对母亲和孩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All these observations combine to prove that the jealous fury of the males of certain animals proves nothing with regard to man; and the exceptional case of those southern regions were polygamy is the established custom, only confirms the rule, since it is the plurality of wives that gives rise to the tyrannical precautions of the husband,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his own weakness makes the man resort to constraint to evade the laws of nature.

以上这些观察结合起来证明了在部分雄性动物由嫉妒产生的暴怒与人类毫无关联。唯一的例外是在某些有着一夫多妻制传统的南部地区仍然遵循这种规则，由于拥有众多妻子而导致了丈夫对她们专断的警惕。而由于他意识到自己体力的弱点，他会借助压制政策来逃避自然规律。

Among ourselves where these same laws are less frequently evaded in this respect, but are more frequently evaded in another and even more detestable manner, jealousy finds its motives in the passions of society rather than in those of primitive instinct. In most irregular connections the hatred of the lover for his rivals far exceeds his love for his mistress; if he fears a rival in her affections it is the effect of that self-love whose origin I have already traced out, and he is moved by vanity rather than affection. Moreover, our clumsy systems of education have made women so deceitful [2_8] ,

and have so over-stimulated their appetites, that you cannot rely even on the most clearly proved affection; they can no longer display a preference which secures you against the fear of a rival.

尽管在这方面我们逃避这些法律不如南部地区的人那样频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逃避得更频繁的是我们，我们用另一种也是更可恶的方式逃避。嫉妒源于社会唤起的激情，而非原始的本能唤起的激情。在最不规则的联系中，一个人对其竞争对手的恨意远胜过他对爱人的喜爱。如果他畏惧爱情中的竞争对手，其实就是我已经解释过来源的自爱所造成的影响。而他与其说是因为爱而被触动，不如说是被自己的虚荣触动。而且，我们粗陋的教育体系使女性如此虚伪[3_8]，还过分激起了她们的欲望。你甚至无法相信明确表现出的喜爱。这种喜爱不再代表那种可以使你抵御对其他竞争者的畏惧的偏爱。

True love is another matter. I have shown, in the work already referred to, that this sentiment is not so natural as men think, and that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entle habit which binds a man with cords of love to his helpmeet, and the unbridled passion which is intoxicated by the fancied charms of an object which he no longer sees in its true light. This passion which is full of exclusions and preferences, only differs from vanity in this respect, that vanity demands all and gives nothing, so that it is always harmful, while love, bestowing as much as it demands, is in itself a sentiment full of equity. Moreover, the more exacting it is, the more credulous; that very illusion which gave rise to it, makes it easy to persuade. If love is suspicious, esteem is trustful; and love will never exist in an honest heart without esteem, for every one loves in another the qualities which he himself holds in honour.

真爱则是另一回事。我在上面已经提到的那部作品里已经展示了这种心绪并不像男人们想得那么自然。以爱为绳索将人束缚于其配偶是温柔的习惯，而使一个人看不清其真实面貌而仅靠想象中的魅力使其耽溺其中则是放肆的欲望，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这种欲望充满了排他与偏爱。虚荣渴求所有却不愿付出，因此始终是有害的，而爱情希望得到的与付出的一样的，它本身是一种充满了公平的感受。爱情与虚荣仅在这一点上有所区别。而且，爱情越是苛求，就越是轻信。恰恰是产生的幻觉，使之轻易相信。如果说爱情令人充满怀疑，尊敬则令人产生信任。而且一颗坦诚的心绝不会只有爱情却没有尊敬，因为所有人都是因为尊敬对方的品质而爱一个人。

When once this is clearly understood, we can predict with confidence the kind of jealousy which Emile will be capable of experiencing; as there is only the smallest germ of this passion in the human heart, the form it takes must depend solely upon education: Emile, full of love and jealousy, will not be angry, sullen, suspicious, but delicate, sensitive, and timid; he will be more alarmed than vexed; he will think more of securing his lady-love than of threatening his rival; he will treat him as an obstacle to be removed if possible from his path, rather than as a rival to be hated; if he hates him, it is not because he presumes to compete with him for Sophy's affection, but because Emile feels that there is a real danger of losing that affection; he will not be so unjust and foolish as to take offence at the rivalry itself; he understands that the law of preference rests upon merit only, and that honour depends upon success; he will redouble his efforts to make himself acceptable, and he will probably succeed. His generous Sophy, though she has given alarm to his love, is well able to allay that fear, to atone for it; and the rivals who were only suffered to put him to the proof are speedily dismissed.

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地指出爱弥儿将要经历的是一种怎样的嫉妒心。因为在人心中这种情感产生只有极小的根源，所以它的形态完全是由教育单独决定的。爱弥儿充满了爱与嫉妒，他不会生气、郁闷或怀疑，但他会变得脆弱、敏感且羞怯。他并不会恼怒，但是更加惊惧。他将不会威胁那些竞争者，但会更加想保护他所爱的姑娘。他把竞争者看作是他在路上所遇到的一块可以移走的绊脚石，而不是应当怨恨的敌手。如果爱弥儿憎恨他，也不是因为认为自己要与他竞争获得苏菲的爱，而是因为爱弥儿感到了失去这份爱的真正危险。所以他也没有愚蠢到要去挑衅自己的竞争者。他明白偏爱只会降临在美德身上，而荣耀由胜利来决定。因此他会加倍努力以使自己更加值得接受，他将很可能取胜。尽管大方的苏菲曾对他的爱给出警告，但又平息并弥补他的惊惧。那些竞争对手仅仅被用来考验爱弥儿，一旦经过考验，他们就迅速地消失了。

But whither am I going? O Emile! what art thou now? Is this my pupil? How art thou fallen! Where is that young man so sternly fashioned, who braved all weathers, who devoted his body to the hardest tasks and his soul to the laws of wisdom; untouched by prejudice or passion, a lover of truth, swayed by reason only, unheeding all that was not hers? Living in softness and idleness he now lets himself be ruled by women; their amusements are the business of his life, their wishes are his laws; a young girl is the arbiter of his fate, he cringes and grovels before her; the earnest Emile is the plaything of a child.

但是，我要到哪里去呢？哦，爱弥儿！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还是我的学生吗？你怎么堕落至此？那个严肃、不畏寒冬酷暑、不辞劳苦致力于智慧之道、不为偏见与激情左右、热爱真理与理性、从不理会身外之物的年轻人到哪去了？如今他使自己受制于女性，变得软弱而懒惰。取悦女性成了他生命的要事，而她们的愿望即是他的法条。

一个年轻的女孩是他命运的仲裁。在她面前，他俯首称臣、卑躬屈膝。最为真挚的爱弥儿成了一个女孩子的玩具。

So shift the scenes of life; each age is swayed by its own motives, but the man is the same. At ten his mind was set upon cakes, at twenty it is set upon his mistress; at thirty it will be set upon pleasure; at forty on ambition, at fifty on avarice; when will he seek after wisdom only? Happy is he who is compelled to follow her against his will! What matter who is the guide, if the end is attained. Heroes and sages have themselves paid tribute to this human weakness; and those who handled the distaff with clumsy fingers were none the less great men.

生活的镜头切换的如此之快。人在不同的年龄受到不同的动机驱使，但自身保持不变。十岁时，他的心意全都放在蛋糕上；二十岁时，他想着他的爱人；三十岁时，他想的是及时行乐；四十岁时，他遵从自己的抱负与野心；五十岁时，他贪婪地追逐钱财。而他在什么时候才能将心思只放在增长智慧上呢？如果一个人有违自己的心意，被迫去追求智慧，他是多么幸福啊！如果最终结果是他获得了智慧，那么指引他的是谁并不重要。英雄与圣贤们也曾向人类的弱点致敬。即使是那些用自己柔弱的手指拿着卷线棒的人依然是伟大的。

If you would prolong the influence of a good education through life itself, the good habits acquired in childhood must be carried forward into adolescence, and when your pupil is what he ought to be you must manage to keep him what he ought to be. This is the coping-stone of your work. This is why it is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that the tutor should remain with young men; otherwise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ey will learn to make love without him. The great

mistake of tutors and still more of fathers is to think that one way of living makes another impossible, and that as soon as the child is grown up, you must abandon everything you used to do when he was little. If that were so, why should we take such pains in childhood, since the good or bad use we make of it will vanish with childhood itself; if another way of life were necessarily accompanied by other ways of thinking?

如果你想把良好教育的影响延伸到一生，那么童年时代所习得的好习惯必须在青少年时期得以保持。而一旦你的学生成为应该成为的人，你就必须想法设法保持。这是你的工作中最后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导师应当陪伴年轻人是极重要的。否则，年轻人无疑会在没有导师指引的情况下追逐爱情。导师们，更多的是父亲们会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们认定一种生活方式与其他生活方式完全不相容。孩子一长大，他们就必须抛下孩子小的时候所适应的一切。如果真是如此，既然无论努力是好是都会随着童年时代的逝去而消失殆尽，如果另一种生活方式必然伴随着另一种思考方式，我们又为什么在孩子童年时如此费心地教育他？

The stream of memory is only interrupted by great illnesses, and the stream of conduct, by great passions. Our tastes and inclinations may change, but this change, though it may be sudden enough, is rendered less abrupt by our habits. The skilful artist, in a good colour scheme, contrives so to mingle and blend his tints that the transitions are imperceptible; and certain colour washes are spread over the whole picture so that there may be no sudden breaks. So should it be with our likings. Unbalanced characters are always changing their affections, their tastes, their sentiments; the only constant factor is the habit of change; but the man of settled character always returns to his former habits and preserves to old

age the tastes and the pleasures of his childhood.

记忆的流动只会被严重的疾病所打断。同样，只有强烈的情感才会打乱行为的延续。我们的品味与倾向可能会改变。尽管这种改变可能非常突然，但也会因我们的习惯而有所缓和。技术娴熟的艺术家计划以细微的色彩过渡来混合色调，以达到一个好的配色方案；某些颜色铺洒在整幅画作上，以便不会产生突然的断裂感。我们的喜好也是同理。性格不稳定的人总是在改变自己的喜好、品味与感情。唯一持续不变的因素是始终在改变的习惯。而沉稳性格的人往往会回到自己先前的习惯中，并将童年时代的品味与喜好保持到年老时。

If you contrive that young people passing from one stage of life to another do not despise what has gone before, that when they form new habits, they do not forsake the old, and that they always love to do what is right, in things new and old; then only are the fruits of your toil secure, and you are sure of your scholars as long as they live; for the revolution most to be dreaded is that of the age over which you are now watching. As men always look back to this period with regret so the tastes carried forward into it from childhood are not easily destroyed; but if once interrupted they are never resumed.

如果你设法让年轻人在从生命的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时不轻视之前逝去的，让他们在养成新的习惯时也不抛弃旧习惯，让他们在新旧事物中永远选择正确的那个。做到这些，你的辛勤教导的成果就能得以保持，你就能确信，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做坏事。因为最可惧的变化实际上就发生在你现在所注意的这个年龄。因为人们总是怀着悔恨回首这段岁月，所以可以说，从童年时代保持至今的品味很难被消磨。但是童年的这些习惯一旦被扰乱，就再也恢复不了了。

Most of the habits you think you have instilled into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re not really habits at all; they have only been acquired under compulsion, and being followed reluctantly they will be cast off at the first opportunity. However long you remain in prison you never get a taste for prison life; so aversion is increased rather than diminished by habit. Not so with Emile; as a child he only did what he could do willingly and with pleasure, and as a man he will do the same, and the force of habit will only lend its help to the joys of freedom. An active life, bodily labour, exercise, movement, have become so essential to him that he could not relinquish them without suffering. Reduce him all at once to a soft and sedentary life and you condemn him to chains and imprisonment, you keep him in a condition of thraldom and constraint; he would suffer, no doubt, both in health and temper. He can scarcely breathe in a stuffy room, he requires open air, movement, fatigue. Even at Sophy's feet he cannot help casting a glance at the country and longing to explore it in her company. Yet he remains if he must; but he is anxious and ill at ease; he seems to be struggling with himself; he remains because he is a captive. “Yes,” you will say, “these are necessities to which you have subjected him, a yoke which you have laid upon him.” You speak truly, I have subjected him to the yoke of manhood.

大多数你认为你灌输给孩子们和年轻人的习惯实际上根本算不上习惯。它们只不过是在强迫之下养成的，孩子们不情愿地保持那些行为，但一有机会他们就不再那样做了。无论你在监狱中呆多久，你都不会喜欢监狱生活。所以说，随着习惯厌恶不消反涨。爱弥儿并不如此。童年时期他只会做他愿意且喜欢做的事，成人后他同样这样做。而习惯的力量只会帮助他享受自由的快乐。活跃的生活、体力劳动、锻炼与运动对爱弥儿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让他放弃这种生活，他会

备受折磨。如果突然让他陷入一种安逸、久坐不动的生活，让他受到锁链与囚笼的束缚，让他保持在受奴役和约束的状态，毫无疑问，他会在身体和心灵上都受尽折磨。在一个闭塞闷热的房间里，他几乎感到窒息。他需要新鲜的空气、运动和劳累。甚至当他在苏菲身边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向田野投上一瞥，渴望着和苏菲一起去探索。如果必须让爱弥儿待在家里，他也会这么做。但是他感到焦虑与不适，似乎是在与自己斗争。他待在家里，是因为是爱着苏菲。你会说，“当然了，因为你使他受制于这种需要，你在他身上放置了枷锁。”你说得对，是我在他身上放置了成人的枷锁。

Emile loves Sophy; but what were the charms by which he was first attracted? Sensibility, virtue, and love for things pure and honest. When he loves this love in Sophy, will he cease to feel it himself? And what price did she put upon herself? She required all her lover's natural feelings—esteem of what is really good, frugality, simplicity, generous unselfishness, a scorn of pomp and riches. These virtues were Emile's before love claimed them of him. Is he really changed? He has all the more reason to be himself; that is the only difference. The careful reader will not suppose that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he is placed are the work of chance. There were many charming girls in the town; is it chance that his choice is discovered in a distant retreat? Is their meeting the work of chance? Is it chance that makes them so suited to each other? Is it chance that they cannot live in the same place, that he is compelled to find a lodging so far from her? Is it chance that he can see her so seldom and must purchase the pleasure of seeing her at the price of such fatigue? You say he is becoming effeminate. Not so, he is growing stronger; he must be fairly robust to stand the fatigue he endures on Sophy's account.

爱弥儿爱着苏菲。但是最初他是被苏菲什么样的魅力所吸引呢？感情、美德以及纯粹而坦诚的爱。当他爱着苏菲的这份爱时，他是否会停止自己对事物的爱呢？她又对自己给出怎样的要求呢？她要求自己的爱人有一切自然的感情——对真正美好事物的尊敬、朴素简单、慷慨大方且不屑于浮华与财富。在苏菲提出这些要求之前，爱弥儿就已经拥有了这些美德。他真的变了吗？现在他有了更多的理由要求他保持自己，那是唯一的不同之处。细心的读者不会认为爱弥儿所处的环境仅仅是因为巧合。城镇中有许多有魅力的女孩子，而他却选择了远在乡村的苏菲。这也是巧合吗？他们的相遇是偶然的吗？他们彼此如此适合也是偶然的吗？他们无法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所以爱弥儿被迫选择了一个离她很远的住所也是因为巧合吗？他很少能见到她，且要以如此劳累的代价来获得相见的喜悦，这也是偶然的吗？你以为他在变得柔弱娇气。其实不然，他在变得强壮。他必须足够强健才能承担每次与苏菲见面时的疲乏。

He lives more than two leagues away. That distance serves to temper the shafts of love. If they lived next door to each other, or if he could drive to see her in a comfortable carriage, he would love at his ease in the Paris fashion. Would Leander have braved death for the sake of Hero if the sea had not lain between them? Need I say more; if my reader is able to take my meaning, he will be able to follow out my principles in detail.

他住在离她超过两里格远的地方。这距离可以缓和爱情的疼痛。如果他们住在相邻的地方，或者如果他可以乘坐舒适的马车去见她，那么他就会轻松地以巴黎式的方式来爱她了。如果大海没有横亘在利安得和海洛之间，也许利安得也不会为了海洛勇敢地死去。还需要我多说吗？如果我的读者能够理解我的意思，那么他也可以详细地贯彻我的思想。

The first time we went to see Sophy, we went on horseback, so as to get there more quickly. We continue this convenient plan until our fifth visit. We were expected; and more than half a league from the house we see people on the road. Emile watches them, his pulse quickens as he gets nearer, he recognises Sophy and dismounts quickly; he hastens to join the charming family. Emile is fond of good horses; his horse is fresh, he feels he is free, and gallops off across the fields; I follow and with some difficulty I succeed in catching him and bringing him back. Unluckily Sophy is afraid of horses, and I dare not approach her. Emile has not seen what happened, but Sophy whispers to him that he is giving his friend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He hurries up quite ashamed of himself, takes the horses, and follows after the party. It is only fair that each should take his turn and he rides on to get rid of our mounts. He has to leave Sophy behind him, and he no longer thinks riding a convenient mode of travelling. He returns out of breath and meets us half-way.

我们第一次去见苏菲时是骑马的，因为我们想快一点到达那里。我们延续了这个方便的计划，直到我们第五次去拜访。他们在离房子超过半里格的路上等候我们的到来。爱弥儿看到了他们，他走得越近，心跳就越快。当他认出苏菲时，就立刻下马，想快一点加入这个可爱的家庭。爱弥儿很喜欢好马。他的马精力充沛，一旦发现自己自由了就向田野飞奔去。我跟过去，颇费了些力气才把他抓住带回来。不幸的是苏菲很怕马，所以我不敢接近她。爱弥儿根本没有看到这些事，但是苏菲悄悄告诉他说他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他很羞愧地赶过来牵马，跟在人群的后面。我们每个人轮流牵马是很公平的，爱弥儿为了把我们的马带开只好骑上马先走。这样一来他必须把苏菲抛在后面，于是他便不再认为骑马是一种方便的旅行方式了。半路上他才上气不接下气地回来与我们会和。

The next time, Emile will not hear of horses. “Why,” say I, “we need only take a servant to look after them.” “Shall we put our worthy friends to such expense?” he replies. “You see they would insist on feeding man and horse.” “That is true,” I reply; “theirs is the generous hospitality of the poor. The rich man in his niggardly pride only welcomes his friends, but the poor find room for their friends' horses.” “Let us go on foot,” says he; “won't you venture on the walk, when you are always so ready to share the toilsome pleasures of your child?” “I will gladly go with you,” I reply at once,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love does not desire so much show.”

接下来，爱弥儿就不愿意再骑马了。“为什么呢？”我说，“我们只需要带一个马夫照管马儿。”“我们要使我们可敬的朋友增加如此多的负担吗？”他回答道。“你看，他们坚持要招待我们，还要喂养马匹。”“确实。”我答道，“穷人们是很慷慨好客的。富人们傲慢而小气，只会招待自己的朋友。但是穷人们却会为朋友的马儿着想，为它们腾地方。”“让我们步行去吧，”爱弥儿说，“你总是如此愿意与我分享疲累中的快乐，那你敢和我一起走去吗？”“我很乐意和你一起走，”我立刻回答，“在我看来，爱情不必要求太多浮夸的表演。”

As we draw near, we meet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even further from home than on the last occasion. We have come at a great pace. Emile is very warm; his beloved condescends to pass her handkerchief over his cheeks. It would take a good many horses to make us ride there after this.

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我们在离房子比上次更远的地方遇到了苏菲和她的母亲。我们加快步伐走过去。爱弥儿很激动。他亲爱的苏菲温柔地用手绢擦拭他的脸颊。即使有再多的马儿给我们，这次之后我

们也不愿意再骑了。

But it is rather hard never to be able to spend an evening together. Midsummer is long past and the days are growing shorter. Whatever we say, we are not allowed to return home in the dark, and unless we make a very early start, we have to go back almost as soon as we get there. The mother is sorry for us and uneasy on our account, and it occurs to her that, though it would not be proper for us to stay in the house, beds might be found for us in the village, if we liked to stay there occasionally. Emile claps his hands at this idea and trembles with joy; Sophy, unwittingly, kisses her mother rather oftener than usual on the day this idea occurs to her.

但是他们再也不能在一起共度夜晚，这是很令人难过的。仲夏渐渐过去，白日渐短。无论我们怎么说，我们都不会得到允许在黑暗中回程。除非我们很早出发，否则当我们到那里几乎就要回来了。苏菲的母亲对我们感到很抱歉和不安。因此她想，尽管让我们在家中留宿并不合适，但是她可以为我们在村庄里找一处住所，这样如果我们可以偶尔留宿。爱弥儿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鼓掌叫好，喜悦地颤抖。不经意间，苏菲在她的母亲想到这个点子的那天亲吻她的次数比往常多了许多。

Little by little the charm of friendship and the familiarity of innocence take root and grow among us. I generally accompany my young friend on the days appointed by Sophy or her mother, but sometimes I let him go alone. The heart thrives in the sunshine of confidence, and a man must not be treated as a child; and what have I accomplished so far, if my pupil is unworthy of my esteem? Now and then I go without him; he is sorry, but he does not

complain; what use would it be? And then he knows I shall not interfere with his interests. However, whether we go together or separately you will understand that we are not stopped by the weather; we are only too proud to arrive in a condition which calls for pity. Unluckily Sophy deprives us of this honour and forbids us to come in bad weather. This is the only occasion on which she rebels against the rules which I laid down for her in private.

渐渐的，友谊的魅力和天真的亲密在我们之间生根发芽。大多数时候我会陪着爱弥儿去拜访苏菲和她的母亲，但偶尔我也会让他一个人去。他的心意在信心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他也不应该再被当作小孩子看待了。如果我的学生不值得我尊重，那我到目前为止又收获了什么呢？不时地我也会一个人前去拜访。他会感到难过，但并不抱怨。毕竟抱怨能有什么用呢？而且那时他明白我并不会妨碍他的利益。你会了解到，无论我们是同行或是分开前往，我们并不会被风雨阻挡。而如果是在令人遗憾的天气下我们到了那里，我们只会感到更加骄傲。不幸的是苏菲剥夺了我们的这个荣耀，禁止我们在糟糕的天气下赶来。这是唯一一次她违背了我私下里教给她的那些规则。

One day Emile had gone alone and I did not expect him back till the following day, but he returned the same evening. “My dear Emile,” said I, “have you come back to your old friend already?” But instead of responding to my caresses he replied with some show of temper, “You need not suppose I came back so soon of my own accord; she insisted on it; it is for her sake not yours that I am here.” Touched by his frankness I renewed my caresses, saying, “Truthful heart and faithful friend, do not conceal from me anything I ought to know. If you came back for her sake, you told me so for my own; your return is her doing, your frankness is mine. Continue to preserve the noble candour of great souls; strangers

may think what they will, but it is a crime to let our friends think us better than we are.”

有一天爱弥儿独自出发，我原以为他要到第二天才会回来，他却在当天晚上赶了回来。“亲爱的爱弥儿，”我说，“你这就回来看你的老朋友啦？”但是他并不回应我的拥抱，而是有些生气地回答道，“你不必认为我是自愿这么快回来的。苏菲坚持要这么做。我回到这里是因为她而不是你。”我被他的率真触动，又一次拥抱了他，并说，“真诚的心和忠实的朋友啊，不要向我隐瞒那些我应该知道的事情。如果你是因为她回来的，你就会告诉我你是为了我才这么做。她让你回来，而我使你如此坦诚。继续保有你对伟大灵魂的高尚热情吧。陌生人可能会有他们的想法，但如果使自己的朋友高看我们就是一种罪恶了。”

I take care not to let him underrate the cost of his confession by assuming that there is more love than generosity in it, and by telling him that he would rather deprive himself of the honour of this return, than give it to Sophy. But this is how he revealed to me, all unconsciously, what were his real feelings; if he had returned slowly and comfortably, dreaming of his sweetheart, I should know he was merely her lover; when he hurried back, even if he was a little out of temper, he was the friend of his Mentor.

我尽可能使他不要小看这样坦诚说话的代价，我以为，他说这话更多的是出于他对苏菲的爱，而非因为他本就豁达；我告诉他，他不愿意说回来是他自己的主意，是想把功劳归于苏菲。但在完全无意中，他就已经向我揭示了他的真实想法。如果他的返程缓慢而舒适，心里想念着他的爱人，我就会了解爱弥儿仅仅是爱慕着苏菲。但当他匆忙地赶回来，即使有一些生气，那就表明他是我的挚友。

You see that the young man is very far from spending his days with Sophy, and seeing as much of her as he wants. One or two visits a week are all that is permitted, and these visits are often only for the afternoon and are rarely extended to the next day. He spends much more of his time in longing to see her, or in rejoicing that he has seen her, than he actually spends in her presence. Even when he goes to see her, more time is spent in going and returning than by her side. His pleasures, genuine, pure, delicious, but more imaginary than real, serve to kindle his love but not to make him effeminate.

你看，爱弥儿无法整天与苏菲待在一起，也无法想去看苏菲就去。一周一到两次的拜访是被允许的，而且这些拜访通常只会在午后而很少拖至第二天。大多数时候他都只能盼望与她见面，或是因为见到了她而欢欣鼓舞。很少时间是和苏菲共度的。甚至当他去看她，时间往往也是花在来回的路程上，而不是陪伴她左右。他那诚恳、纯粹、甜美、幻想而不切实际的快乐点燃了他的爱，但不至使他过分优柔寡断。

On the days when he does not see Sophy he is not sitting idle at home. He is Emile himself and quite unchanged. He usually scours the country round in pursuit of its natural history; he observes and studies the soil, its products, and their mode of cultivation; he compares the methods he sees with those with which he is already familiar; he tries to find the reasons for any differences; if he thinks other methods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locality, he introduces them to the farmers' notice; if he suggests a better kind of plough, he has one made from his own drawings; if he finds a lime pit he teaches them how to use the lime on the land, a process new to them; he

often lends a hand himself; they are surprised to find him handling all manner of tools more easily than they can themselves; his furrows are deeper and straighter than theirs, he is a more skilful sower, and his beds for early produce are more cleverly planned. They do not scoff at him as a fine talker, they see he knows what he is talking about. In a word, his zeal and attention are bestowed on everything that is really useful to everybody; nor does he stop there. He visits the peasants in their homes; inquires into their circumstances, their families, the number of their children, the extent of their holdings, the nature of their produce, their markets, their rights, their burdens, their debts, etc. He gives away very little money, for he knows it is usually ill spent; but he himself directs the use of his money, and makes it helpful to them without distributing it among them. He supplies them with labourers, and often pays them for work done by themselves, on tasks for their own benefit. For one he has the falling thatch repaired or renewed; for another he clears a piece of land which had gone out of cultivation for lack of means; to another he gives a cow, a horse, or stock of any kind to replace a loss; two neighbours are ready to go to law, he wins them over, and makes them friends again; a peasant falls ill, he has him cared for, he looks after him himself [2_9] ; another is harassed by a rich and powerful neighbor, he protects him and speaks on his behalf; young people are fond of one another, he helps forward their marriage; a good woman has lost her beloved child, he goes to see her, he speaks words of comfort and sits a while with her; he does not despise the poor, he is in no hurry to avoid the unfortunate; he often takes his dinner with some peasant he is helping, and he will even accept a meal from those who have no need of his help; though he is the benefactor of some and the friend of all, he is none the less their equal. In conclusion, he always does as much good by his personal efforts as by his money.

那些他见不到苏菲的日子里，他并不会只是闲坐在家里。他仍然是爱弥儿自己，并未改变。通常他会穿行在乡村里，追随着自然的历史。他观察并研究土壤、作物以及培育方式；他会比较他所见到的而且已经完全熟知的方法，想找出其中不同的原因；如果他认为其他方法要比当地的方法都优越，他会向农民们介绍更好的方法；如果他建议用一种更好的犁，他会让人根据他的设计做出成品；如果他发现了一处石灰坑，就会教用一种新的过程别人怎么把石灰用在田间；他常常亲自动手，农民们很讶异因为他能比他们更熟练地操作各种工具；他的犁沟更深更直，还会熟练地播种，对于早播的苗床也有着精妙的管理。所以他们并不会嘲笑爱弥儿只是一个空说大话的人，他们明白他懂得自己在说什么。总之，他将自己的热诚与关心放在所有对大家真正有用的事物上，也不会仅止于此。他会去农人的家中拜访，询问他们的家境、家人、孩子的数目、财产的数量、作物的生产、销售、权利、负担、债务等等。他很少会直接给钱，因为他知道这些钱可能会被乱花。但是他会规划自己的钱的用途，虽然不分发给他们，而是使之对他们有益。他会为他们提供劳动力，当他们自己完成对自己有益的工作时会收到报酬。他会帮一个人修缮或是翻新塌陷的茅屋屋顶；也会帮一个人清理因为缺少打理而完全荒芜的田地；把奶牛、马匹或是其他家畜赠与一个人以弥补其损失；两个邻居要对簿公堂时，他劝服了他们并使其握手言和；一个农人病重，他便自己去照看他[3_9]；一个人不堪富有且有权势的邻居骚扰，他去保护他，并出面为这个人说话；年轻人有了喜欢的人，他会帮忙促成一段姻缘；一个善良的妇人失去了自己亲爱的孩子，他会去看望她，用言语来安慰她，和她坐一小会；他并不轻视穷人，他也不想匆匆避开不幸的人；他往往会和一些他在帮助的农人共进晚餐，甚至也会接受那些并不需要他的帮助的人的做客邀请；尽管他是其中一些人的恩人，也是所有人的朋友，他对每个人都是一视同仁的。总之，他始终在用自己的努力和钱财去做尽可能多的善事。

Sometimes his steps are turne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happy

abode; he may hope to see Sophy without her knowing, to see her out walking without being seen. But Emile is always quite open in everything he does; he neither can nor would deceive. His delicacy is of that pleasing type in which pride rests on the foundation of a good conscience. He keeps strictly within bounds, and never comes near enough to gain from chance what he only desires to win from Sophy herself. On the other hand, he delights to roam about the neighbourhood, looking for the trace of Sophy's steps, feeling what pains she has taken and what a distance she has walked to please him.

有时他会走向那个幸福的人家。他可能会希望在苏菲不知情的情况下见到她，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看着她外出散步。但是爱弥儿对任何在做的事都是很坦白的，他并不能也不会去欺骗什么。他的敏锐是以自己的良知为基础的，因而他的周到这也这样令人愉悦。他严守界限，从不会试图走近以获取他只希望由苏菲允许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喜爱在邻里间漫步，追寻着苏菲的足迹，感受为了使他开心，她走了多远的路、吃了多少苦。

The day before his visit, he will go to some neighbouring farm and order a little feast for the morrow. We shall take our walk in that direction without any special object, we shall turn in apparently by chance; fruit, cakes, and cream are waiting for us. Sophy likes sweets, so is not insensible to these attentions, and she is quite ready to do honour to what we have provided; for I always have my share of the credit even if I have had no part in the trouble; it is a girl's way of returning thanks more easily. Her father and I have cakes and wine; Emile keeps the ladies company and is always on the look-out to secure a dish of cream in which Sophy has dipped her spoon.

在他要去拜访的前一天，他会去一些临近的农场里订一些次日里需要的食物。我们似乎并非是特意走向农场的，我们只是偶然走向了那个方向。而水果、蛋糕、奶油在等着我们。苏菲很喜欢甜食，所以她察觉了我们所做的事，赞美我们所提供的一切。尽管我并没有出力，但苏菲还是将这份荣耀归功于我们。女孩子这样致谢会更容易些。她的父亲和我一起吃着蛋糕，喝着酒；爱弥儿陪伴两位女士，他一直注意苏菲将勺子碰到哪一个奶油碟子，就护住这个碟子不让别人碰。

The cakes lead me to talk of the races Emile used to run. Every one wants to hear about them; I explain amid much laughter; they ask him if he can run as well as ever. “Better,” says he; “I should be sorry to forget how to run.” One member of the company is dying to see him run, but she dare not say so; some one else undertakes to suggest it; he agrees and we send for two or three young men of the neighbourhood; a prize is offered, and in imitation of our earlier games a cake is placed on the goal. Every one is ready, Sophy's father gives the signal by clapping his hands. The nimble Emile flies like lightning and reaches the goal almost before the others have started. He receives his prize at Sophy's hands, and no less generous than Aeneas, he gives gifts to all the vanquished.

提起蛋糕，我便要讲一讲之前爱弥儿参加比赛的事。每个人都很想听这个故事。我解释之后大家都笑起来，他们问爱弥儿是否还能像之前一样跑得那么好。“现在更快，”他说，“如果忘了怎么赛跑，我会感到很难过。”我们中有一个人很想看他赛跑，却好不意思开口；另一个人开口建议，爱弥儿就答应了。于是我们从附近找来了两三个年轻人，准备好了奖品，并效仿从前做游戏的样子把一块蛋糕放在终点处。大家都准备好了。苏菲的父亲拍手来发出起跑信号。灵敏的爱弥

儿像一道闪电一样飞奔出去，在其他人差不多刚开始的时候就到达了终点。他从苏菲手中接过自己的奖品，像艾尼阿斯一样慷慨地把自己的奖品分给所有输了比赛的人。

In the midst of his triumph, Sophy dares to challenge the victor, and to assert that she can run as fast as he. He does not refuse to enter the lists with her, and while she is getting ready to start, while she is tucking up her skirt at each side, more eager to show Emile a pretty ankle than to vanquish him in the race, while she is seeing if her petticoats are short enough, he whispers a word to her mother who smiles and nods approval. Then he takes his place by his competitor; no sooner is the signal given than she is off like a bird.

在他庆祝胜利的时候，苏菲想要去挑战这个胜利者，她声称自己可以跑得像他一样快。爱弥儿并不拒绝和苏菲同台竞技。而苏菲在为起跑做准备，扎起裙子的边角，与其说是想在比赛中打败爱弥儿，不如说是急于想向他展示自己美丽的脚踝。当她检查自己的裙角是否太短时，爱弥儿向苏菲的母亲低语了几句，她微笑着首肯了。然后爱弥儿和他的对手都就位了，起跑信号一发出，苏菲就像鸟儿一样冲了出去。

Women were not meant to run; they flee that they may be overtaken. Running is not the only thing they do ill, but it is the only thing they do awkwardly; their elbows glued to their sides and pointed backwards look ridiculous, and the high heels on which they are perched make them look like so many grasshoppers trying to run instead of to jump.

女士们不适合跑步。即使她们跑起来也可能会被赶上。跑步不是唯一一件她们做不好的事情，但却是唯一一件她们做起来很笨拙的事情。她们的手肘紧贴着身体两边，肘尖指向身后，看起来很滑稽。而她们穿的高跟鞋使她们看起来像很多不会跳只会跑的蚱蜢。

Emile, supposing that Sophy runs no better than other women, does not deign to stir from his place and watches her start with a smile of mockery. But Sophy is light of foot and she wears low heels; she needs no pretence to make her foot look smaller; she runs so quickly that he has only just time to overtake this new Atalanta when he sees her so far ahead. Then he starts like an eagle dashing upon its prey; he pursues her, clutches her, grasps her at last quite out of breath, and gently placing his left arm about her, he lifts her like a feather, and pressing his sweet burden to his heart, he finishes the race, makes her touch the goal first, and then exclaiming, “Sophy wins!” he sinks on one knee before her and owns himself beaten.

爱弥儿还以为苏菲和别的女孩子跑得差不多，在起跑处不愿冲出去，看着苏菲的起跑还带着一丝嘲弄的微笑。但是苏菲脚步轻盈，穿着平底鞋。毕竟她不需要任何伪装使自己的脚看起来小巧。她跑起来快得像阿塔兰塔，当爱弥儿看她已经跑得这么远，只能马上起跑。之后他像捕猎时冲出去的雄鹰冲了出去。他追上了苏菲，抓住她，在最后她有些喘不过气的时候抓着她，温柔地用左臂环住她，把她像一片羽毛一样举起来，带着这心上甜蜜的负担冲向终点。他完成了比赛，让苏菲首先触到终点，然后宣布，“苏菲赢了！”他在苏菲面前单膝跪下，承认自己输了。

Along with such occupations there is also the trade we learnt.

One day a week at least, and every day when the weather is too bad for country pursuits, Emile and I go to work under a master-joiner. We do not work for show, like people above our trade; we work in earnest like regular workmen. Once when Sophy's father came to see us, he found us at work, and did not fail to report his wonder to his wife and daughter. “Go and see that young man in the workshop,” said he, “and you will soon see if he despises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 You may fancy how pleased Sophy was at this! They talk it over, and they decide to surprise him at his work. They question me, apparently without any special object, and having made sure of the time, mother and daughter take a little carriage and come to town on that very day.

除了这些事之外，我们还学到了一些本领。一周中至少有一天，以及每次天气太糟糕不适合漫游乡村时，爱弥儿和我就会去一个木工师傅手下干活。我们并不像那些高贵的人一样是为了作秀才去干活的，我们像普通的工人一样诚恳的干活。有一次苏菲的父亲来拜访我们，发现我们正在工作，就把他的奇特发现告诉了妻子和女儿。“去看看那个在工作间的年轻人吧，”他说，“你很快就能发现他是不是轻视穷人们。”你能想得出苏菲听到这番话多么高兴啊！他们谈论了这件事，并决定在爱弥儿工作时给他一个惊喜。他们表面上看似无意地向我打听并确信了时间后，那天母亲和女儿就乘着一架小马车来到了镇上。

On her arrival, Sophy sees,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shop, a young man in his shirt sleeves, with his hair all untidy, so hard at work that he does not see her; she makes a sign to her mother. Emile, a chisel in one hand and a hammer in the other, is just finishing a mortise; then he saws a piece of wood and places it in the vice in order to polish it. The sight of this does not set Sophy

laughing; it affects her greatly; it wins her respect. Woman, honour your master; he it is who works for you, he it is who gives you bread to eat; this is he!

苏菲刚到就看到在工作间的另一头，年轻人穿着衬衣、头发凌乱，埋头工作甚至并没有看到她。苏菲向母亲做了一个手势。爱弥儿一手拿着凿子一手拿着锤子，正准备完成一个榫眼。然后他看到一块木板，他把木板反过来放，想要打磨这块木板。苏菲看到这一幕并没有大笑。她反而备受感动，这举动赢得了她的尊重。女人啊，你要尊重你的主人。他为了你工作，为你提供面包吃食。这就是他！

While they are busy watching him, I perceive them and pull Emile by the sleeve; he turns round, drops his tools, and hastens to them with an exclamation of delight. After he has given way to his first raptures, he makes them take a seat and he goes back to his work. But Sophy cannot keep quiet; she gets up hastily, runs about the workshop, looks at the tools, feels the polish of the boards, picks up shavings, looks at our hands, and says she likes this trade, it is so clean. The merry girl tries to copy Emile. With her delicate white hand she passes a plane over a bit of wood; the plane slips and makes no impression. It seems to me that Love himself is hovering over us and beating his wings; I think I can hear his joyous cries, “Hercules is avenged.”

当她们忙着观察爱弥儿时，我看到了她们，拉了拉爱弥儿的衣袖。他转过身扔下工具，惊喜地向她们冲过去。他平静之后找了个地方让她们坐下来，就又回去工作了。但是苏菲却不能保持不动。她兴奋地站起来，在工作间里跑来跑去，看看工具，感受着抛光的木板，拾起刨花，又看看我们的手。她说她喜欢这门手艺，因为它很干净。

这个开心的女孩想要学习爱弥儿的动作。她用自己细腻白皙的手把刨子放在一块木头上，刨子滑动却没有任何刨花。对我来说就像是爱神盘旋在空中扇着自己的羽翼。我想我可以听到他兴奋地叫道，“赫拉克勒斯终于报仇了。”

Yet Sophy's mother questions the master. “Sir, how much do you pay these two men a day?” “I give them each tenpence a day and their food; but if that young fellow wanted he could earn much more, for he is the best workman in the country.” “Tenpence a day and their food,” said she looking at us tenderly. “That is so, madam,” replied the master. At these words she hurries up to Emile, kisses him, and clasps him to her breast with tears; unable to say more she repeats again and again, “My son, my son!”

而苏菲的母亲则向木工师傅提问。“先生，请问你一天给这两个人多少报酬呢？”“我每天给他们每人十便士，并提供他们的食物。但如果这个年轻人想的话他可以挣得更多，他是我们镇上最厉害的工匠了。”“十便士一天，还有食物。”她温柔的看着我们说道。“是这样的，夫人。”木工师傅回答说。听完这些话她匆匆走向爱弥儿，亲吻它，含着眼泪拥抱他。她说不出话来，只是一遍一遍地重复说，“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When they had spent some time chatting with us, but without interrupting our work, “We must be going now,” said the mother to her daughter, “it is getting late and we must not keep your father waiting.” Then approaching Emile she tapped him playfully on the cheek, saying, “Well, my good workman, won't you come with us?” He replied sadly, “I am at work, ask the master.” The master is asked if he can spare us. He replies that he cannot. “I have work on

hand," said he, "which is wanted the day after to-morrow, so there is not much time. Counting on these gentlemen I refused other workmen who came; if they fail me I don't know how to replace them and I shall not be able to send the work home at the time promised." The mother said nothing, she was waiting to hear what Emile would say. Emile hung his head in silence. "Sir," she said, somewhat surprised at this, "have you nothing to say to that?" Emile looked tenderly at her daughter and merely said, "You see I am bound to stay." Then the ladies left us. Emile went with them to the door, gazed after them as long as they were in sight, and returned to his work without a word.

她们与我们交谈了一会，但没有打断我们的工作。“我们该走了。”苏菲的母亲对她说，“天色已经迟了，我们不应该让你的父亲久等。”然后她走向爱弥儿，轻轻地像开玩笑一样拍拍他的脸，说道，“那么，我们出色的工匠啊，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走呢？”他很难过地说，“我还在工作，要问过木工师傅。”于是她问师傅能不能让爱弥儿结束工作。他回答说不可以。“我有工作在身，”他说，“后天就是工期，我没有太多时间。我信得过这两位绅士，所以拒绝了其他的工匠。如果他们离开的话我不知道找谁来顶工，我就无法按照约定的日期完成这份工作。”苏菲的母亲没有说什么，她等着爱弥儿答应自己。但是爱弥儿只是沉默地垂着头。“先生，”她有些惊讶地说，“你对这件事没什么想说的吗？”爱弥儿温柔地看着苏菲，只说是，“您知道的，我应该留下来。”之后两位女士离开了。爱弥儿把她们送到门口，目送她们直到她们消失在视线里，一言不发地回去继续工作。

On the way home, the mother, somewhat vexed at his conduct, spoke to her daughter of the strange way in which he had behaved. "Why," said she, "was it so difficult to arrange matters with the master without being obliged to stay. The young man is generous

enough and ready to spend money when there is no need for it, could not he spend a little on such a fitting occasion?” “Oh, mamma,” replied Sophy, “I trust Emile will never rely so much on money as to use it to break an engagement, to fail to keep his own word, and to make another break his! I know he could easily give the master a trifle to make up for the slight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his absence; but his soul would become the slave of riches, he would become accustomed to place wealth before duty, and he would think that any duty might be neglected provided he was ready to pay. That is not Emile's way of thinking, and I hope he will never change on my account. Do you think it cost him nothing to stay? You are quite wrong, mamma; it was for my sake that he stayed; I saw it in his eyes.”

在回家的路上苏菲的母亲对爱弥儿的做法有些恼怒，和苏菲谈起爱弥儿的奇怪表现。“为什么呢，”她说，“和木工师傅商量好，不呆在那里不行吗？这个年轻人平时是很慷慨的，即使是没有必要的时候他也准备好了花钱。怎么在这么重要的时候他反而吝惜起钱财了？”“哦妈妈，”苏菲回答说，“我相信爱弥儿并不在意金钱，但是他不会用钱来破坏和一个人的约定，使自己和别人都难以遵守诺言。我知道他其实可以花一点钱给木工师傅以弥补因为他不在而导致的轻微的不便，但是他的灵魂就会变成金钱的奴隶，他会习惯性地把义务放在钱财之后，而且他会认为如果他愿意付钱的话，任何义务都可以被抛弃。爱弥儿并不是这么思考的。我希望就算是因为我他也不会有所改变。你真的觉得他留下来却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吗？你大错特错了，妈妈。他是因为我才留下来的，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了。”

It is not that Sophy is indifferent to genuine proofs of love; on the contrary she is imperious and exacting; she would rather not be loved at all than be loved half-heartedly. Hers is the noble pride of

worth, conscious of its own value, self-respecting and claiming a like honour from others. She would scorn a heart that did not recognise the full worth of her own; that did not love her for her virtues as much and more than for her charms; a heart which did not put duty first, and prefer it to everything. She did not desire a lover who knew no will but hers. She wished to reign over a man whom she had not spoilt. Thus Circe, having changed into swine the comrades of Ulysses, bestowed herself on him over whom she had no power.

苏菲对于证明爱情诚恳的证据并不是无所谓的。恰恰相反，她既傲慢又严苛。如果一个人只是三心二意地爱着她，那她情愿这个人根本不爱她。这是她对美德的高贵的骄傲，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和自尊，同时也要求他人对她一样尊重。对那些无法认识到她的真正美德的人、那些比起她的美德更爱她的美丽的人、那些没有把义务摆在首位、没有视责任胜过一切的人，苏菲是很轻蔑的。她并不想要一个只知道她的意愿却不知道其他的爱人。她希望能征服一个她未宠坏的爱人。喀耳刻把尤利西斯的同伴全都变成了猪，但对尤利西斯她却无可奈何，还把自己献给了他。

Except for this sacred and inviolable right, Sophy is very jealous of her own rights; she observes how carefully Emile respects them, how zealously he does her will; how cleverly he guesses her wishes, how exactly he arrives at the appointed time; she will have him neither late nor early; he must arrive to the moment. To come early is to think more of himself than of her; to come late is to neglect her. To neglect Sophy, that could not happen twice. An unfounded suspicion on her part nearly ruined everything, but Sophy is really just and knows how to atone for her faults.

除了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苏菲对自己的权利也十分重视。她观察着爱弥儿有没有仔细地尊重它们，是不是热切地完成她的意愿，能不能聪明地猜到她的愿望，会不会在约定的时间准点到达。她要他不能早到也不能迟到，他必须在那个时刻准时到达。如果到的太早，说明爱弥儿考虑更多的是自己而不是苏菲。但是迟到就是爱弥儿忽视了苏菲。这种忽视决不能容忍发生第二次。即使是苏菲无来由的怀疑也会毁了所有的事。但是苏菲的内心是公正的，如果是她的错，她知道如何弥补。

They were expecting us one evening; Emile had received his orders. They came to meet us, but we were not there. What has become of us? What accident have we met with? No message from us! The evening is spent in expectation of our arrival. Sophy thinks we are dead; she is miserable and in an agony of distress; she cries all the night through. In the course of the evening a messenger was despatched to inquire after us and bring back news in the morning. The messenger returns together with another messenger sent by us, who makes our excuses verbally and says we are quite well. Then the scene is changed; Sophy dries her tears, or if she still weeps it is for anger. It is small consolation to her proud spirit to know that we are alive; Emile lives and he has kept her waiting.

有一天晚上他们在等我们过去，爱弥儿是接到了命令的。他们在路上迎接我们，我们却没有到。出了什么事情吗？我们遇到了什么事故吗？我们一点音信也没有！他们花了一整晚等待我们的到来。苏菲觉得我们可能死了。她很伤心，陷入极度的痛苦里。一整夜她都在哭泣。那晚他们派了一个信使来询问我们的情况，并在第二天早上带着消息返程。那个信使带着我们的信使一起回去了，代我们表达了歉意，又说明了我们身体很健康。于是情形就变了。苏菲不再哭了，或者说她是因为生气而流泪。对她骄傲的灵魂来说，得知我们还活着是

一个小小的安慰。但是爱弥儿还活着，竟然还让她等了这么久。

When we arrive she tries to escape to her own room; her parents desire her to remain, so she is obliged to do so; but deciding at once what course she will take she assumes a calm and contented expression which would deceive most people. Her father comes forward to receive us saying, “You have made your friends very uneasy; there are people here who will not forgive you very readily.” “Who are they, papa,” said Sophy with the most gracious smile she could assume. “What business is that of yours,” said her father, “if it is not you?” Sophy bent over her work without reply. Her mother received us coldly and formally. Emile was so confused he dared not speak to Sophy. She spoke first, inquired how he was, asked him to take a chair, and pretended so cleverly that the poor young fellow, who as yet knew nothing of the language of angry passions, was quite deceived by her apparent indifference, and ready to take offence on his own account.

当我们到那里时苏菲想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但是她的父母希望她留下，所以她必须这么做。但是她立刻决定摆上一副骗得过大多数人的冷静而满意的表情。他的父亲前来迎接我们，并说，“你们让我们很不安。我们中有些人可能不会立刻原谅你们。”“爸爸，你在说谁呢。”苏菲说话时脸上尽可能地带着亲切的微笑。“如果不是你的话，那又关你什么事呢？”她的父亲说。苏菲没有回答，继续忙她的工作。她的母亲冷漠但正式地迎接了我们。爱弥儿很慌张，他不敢和苏菲说话。苏菲先说了，她问爱弥儿怎么样，让他在椅子上坐下。她的伪装很聪明，我们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完全不了解人生气时的语言，被苏菲表面上的漠不关心欺骗了，准备把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

To undeceive him I was going to take Sophy's hand and raise it to my lips as I sometimes did; she drew it back so hastily, with the word, “Sir,” uttered in such a strange manner that Emile's eyes were opened at once by this involuntary movement.

为了让爱弥儿看清现实，我走过去牵起苏菲的手，像往常一样想亲吻她。她迅速地抽回手，用奇怪的态度说，“先生。”这无意之间的态度才使爱弥儿明白过来。

Sophy herself, seeing that she had betrayed herself, exercised less control over herself. Her apparent indifference was succeeded by scornful irony. She replied to everything he said in monosyllables uttered slowly and hesitatingly as if she were afraid her anger should show itself too plainly. Emile half dead with terror stared at her full of sorrow, and tried to get her to look at him so that his eyes might read in hers her real feelings. Sophy, still more angry at his boldness, gave him one look which removed all wish for another. Luckily for himself, Emile, trembling and dumbfounded, dared neither look at her nor speak to her again; for had he not been guilty, had he been able to endure her wrath, she would never have forgiven him.

苏菲发现自己的态度出卖了自己，也就不想再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她表面上的漠不关心变成了轻蔑与嘲讽。对爱弥儿说的每件事，苏菲都缓慢地、犹疑地似乎是害怕自己的恼怒没有表现得足够明显一样，答以简洁的词。爱弥儿吓得半死，痛苦地看着苏菲。想让苏菲也看看他，这样他可能就能明白苏菲的真实想法了。苏菲对爱弥儿这样放肆更加生气了，只看了他一眼就打消了他继续盯着看的念头。幸好爱弥儿吓的战战兢兢的，哑然失声。他既不敢继续看苏菲，也不敢再

多说一句。如果他没有愧疚感，或是不能承受苏菲的愤怒，苏菲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Seeing that it was my turn now, and that the time was ripe for explanation, I returned to Sophy. I took her hand and this time she did not snatch it away; she was ready to faint. I said gently, “Dear Sophy, we are the victims of misfortune; but you are just and reasonable; you will not judge us unheard; listen to what we have to say.” She said nothing and I proceeded—

看到这个场景，我知道该我上场了。解释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我走向苏菲。我牵起她的手，但这次她没有抽回去。她已经有些昏昏沉沉的了。我轻轻地说，“亲爱的苏菲，我们同样是不幸的受害者。但是你是公正而理性的，你不会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就评判我们。请你听我说接下来的话。”她一言不发，于是我继续说——

“We set out yesterday at four o'clock; we were told to be here at seven, and we always allow ourselves rather more time than we need, so as to rest a little before we get here. We were more than half way here when we heard lamentable groans, which came from a little valley in the hillside, some distance off. We hurried towards the place and found an unlucky peasant who had taken rather more wine than was good for him; on his way home he had fallen heavily from his horse and broken his leg. We shouted and called for help; there was no answer; we tried to lift the injured man on his horse, but without success; the least movement caused intense agony. We decided to tie up the horse in a quiet part of the wood; then we made a chair of our crossed arms and carried the man as gently as possible, following his directions till we got him home. The way

was long, and we were constantly obliged to stop and rest. At last we got there, but thoroughly exhausted. We were surprised and sorry to find that it was a house we knew already and that the wretched creature we had carried with such difficulty was the very man who received us so kindly when first we came. We had all been so upset that until that moment we had not recognised each other.

“因为我们被告知七点到这里，所以昨天我们四点就出发了。通常我们会给自己留出充裕的时间，这样可以在到达之前歇歇脚。当我们走在半路上时，听见了痛苦的呻吟声。这声音是从稍远一些的山腹中的山谷里传来的。我们急忙赶过去，发现了一个不幸的农民。他喝了太多的酒，在回家的路上从马背上重重摔下来，还摔断了他的腿。我们大喊寻求帮助却没有人应答。我们试着把这个受伤的人放在他的马上，却没能成功。一点点小的移动都会使他产生剧烈的疼痛。我们决定把马拴在林中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交叉我们的手臂做成担架以便于尽量温柔地把他抬回去。我们顺着他的方向找到他家。这条路很长，我们时常需要停下来休整。最终我们到那里时，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们既惊讶又难过地发现这个房子我们曾经拜访过，而我们颇费了些力气抬回来的受伤的人正是我们第一次来热情地招待我们的人。当时我们都太过焦急，竟然没有认出对方。

“There were only two little children. His wife was about to present him with another, and she was so overwhelmed at the sight of him brought home in such a condition, that she was taken ill and a few hours later gave birth to another little one. What was to be don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in a lonely cottage far from any help? Emile decided to fetch the horse we had left in the wood, to ride as fast as he could into the town and fetch a surgeon. He let the surgeon have the horse, and not succeeding in finding a nurse all at

once, he returned on foot with a servant, after having sent a messenger to you; meanwhile I hardly knew what to do between a man with a broken leg and a woman in travail, but I got ready as well as I could such things in the house as I thought would be needed for the relief of both.

“他家里只有两个小孩子。他的妻子正准备生第三个孩子。当她看到我们把他如此狼狈地抬回来时吓坏了，几个小时后她就要生产了。在一个荒凉的山村小屋中，找不到任何帮手，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办呢？爱弥儿决定把我们留在林中的马找回来，骑上马尽快去镇子里找一个外科医生。他把马给了外科医生，但立刻没能找到看护。在找到信使给你们送信后，他和一个仆人一起返程了。与此同时，我陪着一个摔断腿的男人和一个将要分娩的女人，完全不知所措。但凡我想到他们可能需要的，我都尽量为他们准备好以抚慰他们的情绪。

“I will pass over the rest of the details; they are not to the point. It was two o'clock in the morning before we got a moment's rest. At last we returned before daybreak to our lodging close at hand, where we waited till you were up to let you know what had happened to us.”

“我会省略掉之后的一些细节。这不是重点。当我们终于可以有一点时间休息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最后我们在破晓前来到附近的一个可以休脚的地方，想等你们醒来之后告诉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That was all I said. But before any one could speak Emile, approaching Sophy, raised his voice and said with greater firmness

than I expected, “Sophy, my fate is in your hands, as you very well know. You may condemn me to die of grief; but do not hope to make me forget the rights of humanity; they are even more sacred in my eyes than your own rights; I will never renounce them for you.”

我说完了。但是在其他人发话之前，爱弥儿走向苏菲，提高了声调，出乎我意料的坚定地说，“苏菲，正如你清楚了解的，我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中。你可能会将我置于伤痛的惩罚中，但你绝不会希望我遗忘了人性的权利。在我眼中，它们比你的权利更加神圣。我不会因为你而放弃它们。”

For all answer, Sophy rose, put her arm round his neck, and kissed him on the cheek; then offering him her hand with inimitable grace she said to him, “Emile, take this hand; it is yours. When you will, you shall be my husband and my master; I will try to be worthy of that honour.”

苏菲抬起手，用胳膊环住爱弥儿的脖子，亲吻他的脸颊作为回答。然后她把手放在爱弥儿手里，以无比的优雅对他说，“爱弥儿，牵住这只手。它属于你了。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我的丈夫、我的主人。我会努力去配得上这份荣耀。”

Scarcely had she kissed him, when her delighted father clapped his hands calling, “Encore, encore,” and Sophy without further ado, kissed him twice on the other cheek; but afraid of what she had done she took refuge at once in her mother's arms and hid her blushing face on the maternal bosom.

苏菲亲了爱弥儿的脸颊，她开心的父亲就鼓掌说，“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苏菲也很干脆地在另一边脸颊上又亲了两次。但是之后她对自己的行为有些羞怯，就立刻躲到母亲的臂弯里，把羞红的脸藏在母亲胸前。

I will not describe our happiness; everybody will feel with us. After dinner Sophy asked if it were too far to go and see the poor invalids. It was her wish and it was a work of mercy. When we got there we found them both in bed—Emile had sent for a second bedstead; there were people there to look after them—Emile had seen to it. But in spite of this everything was so untidy that they suffered almost as much from discomfort as from their condition. Sophy asked for one of the good wife's aprons and set to work to make her more comfortable in her bed; then she did as much for the man; her soft and gentle hand seemed to find out what was hurting them and how to settle them into less painful positions. Her very presence seemed to make them more comfortable; she seemed to guess what was the matter. This fastidious girl was not disgusted by the dirt or smells, and she managed to get rid of both without disturbing the sick people. She who had always appeared so modest and sometimes so disdainful, she who would not for all the world have touched a man's bed with her little finger, lifted the sick man and changed his linen without any fuss, and placed him to rest in a more comfortable position. The zeal of charity is of more value than modesty. What she did was done so skilfully and with such a light touch that he felt better almost without knowing she had touched him. Husband and wife mingled their blessings upon the kindly girl who tended, pitied, and consoled them. She was an angel from heaven come to visit them; she was an angel in face and manner, in gentleness and goodness. Emile was greatly touched by all this and

he watched her without speaking. O man, love thy helpmeet. God gave her to relieve thy sufferings, to comfort thee in thy troubles. This is she!

我不对我们的幸福做过多的描述了，每个人都会深有同感的。晚餐后，苏菲问我们去看那两个可怜的病人会不会太远。这是她的愿望，也是慈悲的表现。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他们分别躺在一张床上，因为爱弥儿去搬了另一张床架来。由于爱弥儿的嘱咐，有人在那里照看他们。但尽管如此，由于房中的事物太过杂乱，病人们还是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备受折磨。苏菲向这位妻子要来一条围裙，开始为她整理床铺使她感到更舒适。之后她也为男主人整理了床铺。她那柔软而温柔的手似乎可以找出那些刺痛他们的东西，并把它们放到更舒服的位置。她的到场似乎就让他们觉得更舒服，因为她似乎能猜出哪些事物是不适的。这个挑剔的姑娘并没有嫌弃房间里的灰尘和恶臭，她在不打扰病人的情况下努力进行整理。她总是表现得很羞怯，有时也会有些骄傲。她的手指从未触碰过男人的床铺，但她却扶着那个生病的人，毫无怨言地为他更换床单，把他安置得更加舒适。对于慈善的热忱比羞怯更有价值。她的动作非常熟练，仅仅是一个轻轻的、几乎无法察觉的触碰就能让病人减轻痛苦。丈夫和妻子都同声祝福这个照料他们、同情他们并安慰他们的女孩。她是天堂来拜访人间的天使。她的容貌与态度、温柔与善良都与天使无异。爱弥儿被这场景深深地打动了，沉默地看着苏菲。男人啊，你要爱你的爱人。上帝使她来减轻人们的痛苦，安慰苦难中的他们。这就是她！

The new-born baby was baptised. The two lovers were its godparents, and as they held it at the font they were longing, at the bottom of their hearts, for the time when they should have a child of their own to be baptised. They longed for their wedding day; they thought it was close at hand; all Sophy's scruples had vanished, but mine remained. They had not got so far as they expected; every

one must have his turn.

他们给新生儿施洗礼。这两个相爱的人做了它的教父母。他们把它放在他们所渴望的施洗盆中，在他们心底希望自己也能有一个孩子接受洗礼。他们渴望着自己结婚的日子，觉得已经近在咫尺了。苏菲所有的顾忌都消失了，但我的疑虑却产生了。他们还没有走到他们想的那一步。每个人都得有些顾虑。

One morning when they had not seen each other for two whole days, I entered Emile's room with a letter in my hands, and looking fixedly at him I said to him, “What would you do if some one told you Sophy were dead?” He uttered a loud cry, got up and struck his hands together, and without saying a single word, he looked at me with eyes of desperation. “Answer me,” I continued with the same calmness. Vexed at my composure, he then approached me with eyes blazing with anger; and checking himself in an almost threatening attitude, “What would I do? I know not; but this I do know, I would never set eyes again upon the person who brought me such news.” “Comfort yourself,” said I, smiling, “she lives, she is well, and they are expecting us this evening. But let us go for a short walk and we can talk things over.”

一天早上，我走进爱弥儿的房间，手上拿着一封信。他们两人已经整整两天没有看到对方了。我盯着爱弥儿对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苏菲去世了，你会怎么办？”他发出一声惊叫，站起身来把手握在一起，他一言不发，眼中充满了绝望地看着我。“告诉我。”我保持着像之前一样的冷静继续说。爱弥儿对我的镇静很恼火，他走向我，眼中闪着怒火。带着一副几乎是威胁的态度站在那里说，“我会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绝不会再见到那个把这个消息

告诉我的人了。”“这你就放心吧，”我微笑着说，“她还活着，身体健康。他们希望今晚我们能过去。不过，让我们先去散散步吧。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

The passion which engrosses him will no longer permit him to devote himself as in former days to discussions of pure reason; this very passion must be called to our aid if his attention is to be given to my teaching. That is why I made use of this terrible preface; I am quite sure he will listen to me now.

他内心饱满的情感使他无法像过去一样以纯粹的理性与我交谈。因此我必须从这种感情出发以引起他对我的教导的注意。这便是我用了这样一个糟糕的开头的原因了。我确信现在他会认真听我说话。

“We must be happy, dear Emile; it is the end of every feeling creature; it is the first desire taught us by nature, and the only one which never leaves us. But where is happiness? Who knows? Every one seeks it, and no one finds it. We spend our lives in the search and we die before the end is attained. My young friend, when I took you, a new-born infant, in my arms, and called God himself to witness to the vow I dared to make that I would devote my life to the happiness of your life, did I know myself what I was undertaking? No; I only knew that in making you happy, I was sure of my own happiness. By making this useful inquiry on your account, I made it for us both.

“亲爱的爱弥儿，我们必须是幸福的。对于情感动物来说幸福就是最终归宿。这是大自然教会我们的第一个愿望，也是唯一一个我们

永远不会丢弃的愿望。但幸福在哪里呢？有谁明白呢？每个人都去追寻它，却没有人能找到它。我们终其一生寻找，却直至死亡都没有获得幸福。我年轻的朋友啊，当我见到你时，你还是个新生的婴儿，躺在我的臂弯里。我在上帝面前发誓，我会用一生的努力来促成你生命的幸福。我当时知道自己承担了怎样的责任吗？不，我只知道如果能让你幸福，我也会感到幸福的。为你有益的追求实际上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幸福。

“So long as we do not know what to do, wisdom consists in doing nothing. Of all rules there is none so greatly needed by man, and none which he is less able to obey. In seeking happiness when we know not where it is, we are perhaps getting further and further from it, we are running as many risks as there are roads to choose from. But it is not every one that can keep still. Our passion for our own well-being makes us so uneasy, that we would rather deceive ourselves in the search for happiness than sit still and do nothing; and when once we have left the place where we might have known happiness, we can never return.

“当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做。在所有规则中，这一条是人类最需要的，也是人类最难以遵循的。在追寻幸福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幸福在何处，可能我们会离它越来越远，选择越多，我们所担的风险就越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静止不动。我们对自身幸福的追求使自己感到不安，所以我们宁愿欺骗自己正是在追求幸福也不愿待在原地碌碌无为。一旦我们离开了那个可能是幸福的地方，就再也不能回头。

“In ignorance like this I tried to avoid a similar fault. When I took charge of you I decided to take no useless steps and to prevent

you from doing so too. I kept to the path of nature, until she should show me the path of happiness. And lo! their paths were the same, and without knowing it this was the path I trod.

“我试图避免类似无知的错误。当我开始教导你时，我决意要避免任何无意义的脚步，并且阻止你这么做。我坚持着自然的道路，直到她向我展示幸福的方向。你看！它们的道路其实是相同的。而在不知不觉间，我也踏上了这条道路。

“Be at once my witness and my judge; I will never refuse to accept your decision. Your early years have not been sacrificed to those that were to follow, you have enjoyed all the good gifts which nature bestowed upon you. Of the ills to which you were by nature subject, and from which I could shelter you, you have only experienced such as would harden you to bear others. You have never suffered any evil, except to escape a greater. You have known neither hatred nor servitude. Free and happy, you have remained just and kindly; for suffering and vice are inseparable, and no man ever became bad until he was unhappy. May the memory of your childhood remain with you to old age! I am not afraid that your kind heart will ever recall the hand that trained it without a blessing upon it.

“立刻来做我的见证人、我的裁判员吧。我绝不会拒绝你的决定。你人生最初的岁月对于之后来说并没有被浪费，你享尽了自然赠与你的天赋与才华。当你受到自然所支配的疾病的困扰，我会保护你。你所经历的疾病只会使你更加健康，能抵抗更多的疾病。你从未遭受疾病，除了是为了避免更严重的疾病。你并不了解仇恨和苦役。你以自由而快乐的心，始终保持着公正与善良。由于痛苦和恶行是密

不可分的，所以人们往往会在痛苦的时候才会变得罪恶。但愿你童年时期的回忆能伴你到老！我坚信，你那善良的心会回想起，并祝福这只教导你的手。

“When you reached the age of reason, I secured you from the influence of human prejudice; when your heart awoke I preserved you from the sway of passion. Had I been able to prolong this inner tranquillity till your life's end, my work would have been secure, and you would have been as happy as man can be; but, my dear Emile, in vain did I dip you in the waters of Styx, I could not make you everywhere invulnerable; a fresh enemy has appeared, whom you have not yet learnt to conquer, and from whom I cannot save you. That enemy is yourself. Nature and fortune had left you free. You could face poverty, you could bear bodily pain; the sufferings of the heart were unknown to you; you were then dependent on nothing but your position as a human being; now you depend on all the ties you have formed for yourself; you have learnt to desire, and you are now the slave of your desires. Without any change in yourself, without any insult, any injury to yourself, what sorrows may attack your soul, what pains may you suffer without sickness, how many deaths may you die and yet live! A lie, an error, a suspicion, may plunge you in despair.

“当你到了懂事的年纪，我使你免受人类偏见的叨扰。你的心灵觉醒时，我保护你使你不受情欲支配。如果我能够将这内在的宁静延续至你的生命尽头，我的工作就算是圆满了，而你也会感受到一个人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亲爱的爱弥儿，即使我把你浸入冥河的水，也是无济于事。我无法使你完全不受侵扰。现在一个新的敌人出现了，对他你尚未学会如何应对，而我也无法护你周全。这个敌人就是你自己。自然与命运让你获得了自由。你可以面对穷困，也可以忍受身体

的痛苦，但心灵上的折磨你还一无所知。那时，你无法依靠任何人，一切都取决于你是一个人。现在你取决于你所建立的羁绊。你学会了欲求，而现在你是欲望的奴隶。你并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刺激，身体也没有受过伤害。但你的心灵可能会被悲伤吞噬，可能你并没有生病却万分痛苦，你虽然活着却好像死了很多次。谎言、错误和怀疑都有可能使你陷入绝望。

“At the theatre you used to see heroes, abandoned to depths of woe, making the stage re-echo with their wild cries, lamenting like women, weeping like children, and thus securing the applause of the audience. Do you remember how shocked you were by those lamentations, cries, and groans, in men from whom one would only expect deeds of constancy and heroism. 'Why,' said you, 'are those the patterns we are to follow, the models set for our imitation! Are they afraid man will not be small enough, unhappy enough, weak enough, if his weakness is not enshrined under a false show of virtue. ' My young friend, henceforward you must be more merciful to the stage; you have become one of those heroes.

“在剧院里，你曾见过英雄们。他们陷入无尽的哀伤，舞台回响着他们悲戚的痛哭声。像女人一样痛哭流涕，像孩子一样抽泣，这样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掌声。你还记得当时你多么震惊吗？那些悲痛、哭泣和呻吟使你受到震撼。人们在英雄身上往往只期待着他们的坚定不移、他们的英雄气概。‘为什么呢，’你说，‘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楷模吗？是我们要模仿的模范吗？他们还嫌人们不够渺小、痛苦和脆弱吗？他们竟然虚伪地在美德的作秀中强调人类的渺小！’我年轻的朋友啊，从此以后，你要对舞台更为宽容。现在你也变成了其中的一个英雄。

“You know how to suffer and to die; you know how to bear the heavy yoke of necessity in ills of the body, but you have not yet learnt to give a law to the desires of your heart;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life arise rather from our affections than from our needs. Our desires are vast, our strength is little better than nothing. In his wishes man is dependent on many things; in himself he is dependent on nothing, not even on his own life; the more his connections are multiplied, the greater his sufferings. Everything upon earth has an end; sooner or later all that we love escapes from our fingers, and we behave as if it would last for ever. What was your terror at the mere suspicion of Sophy's death? Do you suppose she will live for ever? Do not young people of her age die? She must die, my son, and perhaps before you. Who knows if she is alive at this moment? Nature meant you to die but once; you have prepared a second death for yourself.

“你知道怎么承受痛苦和接受死亡，你知道怎么去承受身体病痛的沉重枷锁。但是你还没能学会规范你内心的欲望。人生的困难并不是由我们的爱所引起的，而是我们的需求。我们的需求很多，而力量却聊胜于无。一个人对于他的愿望要依赖于很多事，但对于自己他并不需要依赖任何事，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他的联系建立得越多，他的痛苦就越为剧烈。地球上任何事都有终结。我们所爱的一切迟早要离我们而去，而我们却以为它能永垂不朽。当你仅仅是猜疑苏菲的死时，你是多么害怕啊。你以为她是长生不死的吗？她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不是也会死去吗？我的孩子，她一定会死。而且可能比你还要早。谁知道这一刻她是不是还活着呢？自然会使你死一次，你却为自己准备了两次。

“A slave to your unbridled passions, how greatly are you to be pitied! Ever privations, losses, alarms; you will not even enjoy what

is left. You will possess nothing because of the fear of losing it; you will never be able to satisfy your passions, because you desired to follow them continually. You will ever be seeking that which will fly before you; you will be miserable and you will become wicked. How can you be otherwise, having no care but your unbridled passions! If you cannot put up with involuntary privations how will you voluntarily deprive yourself? How can you sacrifice desire to duty, and resist your heart in order to listen to your reason? You would never see that man again who dared to bring you word of the death of your mistress; how would you behold him who would deprive you of her living self, him who would dare to tell you, 'She is dead to you, virtue puts a gulf between you'? If you must live with her whatever happens, whether Sophy is married or single, whether you are free or not, whether she loves or hates you, whether she is given or refused to you, no matter, it is your will and you must have her at any price. Tell me then what crime will stop a man who has no law but his heart's desires, who knows not how to resist his own passions.

“你成了自己放纵的欲念的奴隶，这多么可悲啊！感到贫乏、患得患失又惊慌失措。让你享受你也无法享受。因为害怕失去，你将一无所有。你将永远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求，因为你的欲望在不断膨胀。你会一直去追寻那些在你眼前飞逝的东西。你会感到痛苦，你会变得邪恶。如果你除了自己放纵的欲念其他的什么都不在乎，怎么不会变成这样呢？如果你连不自觉的贫乏都难以忍受，你又怎么能情愿抛弃自己的钱财呢？你又怎么能在责任面前牺牲渴望，使自己的内心听从理性的安排呢？对那个胆敢把你的爱人去世的消息告诉你的人，你再也不会见他。那么如果有人把她的生命夺走，大胆地告诉你，‘对你来说她已经死了，美德使你们分离’时你又怎么看待他呢？如果无论如何你也要和她生活在一起，不论苏菲是否婚嫁，不论你是否自由，不论她是爱你还是恨你，不论她接受还是拒绝你，这都是你的意愿，无论

花多少代价你都必须和她在一起。告诉我，如果一个人心中只有欲望却没有法律的话，如果他不知道怎么抵制自己的欲求的话，有什么罪恶的事情是他做不出来的呢？

“My son, there is no happiness without courage, nor virtue without a struggle. The word virtue is derived from a word signifying strength, and strength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virtue. Virtue is the heritage of a creature weak by nature but strong by will; that is the whole merit of the righteous man; and though we call God good we do not call Him virtuous, because He does good without effort. I waited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this word, so often profaned, until you were ready to understand me. As long as virtue is quite easy to practise, there is little need to know it. This need arises with the awakening of the passions; your time has come.

“我的孩子，为了幸福要付出勇气，为了美德要做出斗争。美德这个词是从一个象征着力量的词中演化来的，而力量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天生脆弱却因意志而强壮的生物才会产生美德。这是正直的人所有的价值。尽管我们认为上帝是善良的，我们却不会说他是有道德的。因为上帝做善行时并不耗费努力。我等着当你理解我的时候，我就会向你解释这个常被亵渎的词的真正意义。既然美德容易践行，那么也就不必多么了解。只有当内心的欲念觉醒时，才有必要了解它。对你来说，这一时刻已经来临。

“When I brought you up in all the simplicity of nature, instead of preaching disagreeable duties, I secured for you immunity from the vices which make such duties disagreeable; I made lying not so much hateful as unnecessary in your sight; I taught you not so

much to give others their due, as to care little about your own rights; I made you kindly rather than virtuous. But the kindly man is only kind so long as he finds it pleasant; kindness falls to pieces at the shook of human passions; the kindly man is only kind to himself.

“当我在朴素的自然中将你抚育成人时，我没有向你鼓吹难以履行的天职，而是使你免受恶行的侵害，以免你会觉得这些责任过分困难。我使你明白，比起可恨，更重要的是，谎言是不必要的。比起教你礼尚往来，我更多的是教你不去在意自己的权利。比起教你成为一个道德的人，我更多的是教你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但是善良的人只有在他认为快乐时才会善良。在人类欲念的震动面前，善良往往轰然瓦解。善良的人往往是只对自己善良的。

“What is meant by a virtuous man? He who can conquer his affections; for then he follows his reason, his conscience; he does his duty; he is his own master and nothing can turn him from the right way. So far you have had only the semblance of liberty, the precarious liberty of the slave who has not received his orders. Now is the time for real freedom; learn to be your own master; control your heart, my Emile, and you will be virtuous.

“有道德的人是怎么样的呢？他是一个能控制自己的喜好的人，遵循着自己的理性和良知。他会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是他自己的主人，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履行正义。当下你所拥有的只是自由的表象。这种暂时的自由就像是一个尚未接到命令的奴隶。而现在你应该拥有真正的自由。学着去做自己的主人吧。爱弥儿，你要控制你的心意，这样你才能是有道德的人。

“There is another apprenticeship before you, an apprenticeship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former; for nature delivers us from the evils she lays upon us, or else she teaches us to submit to them; but she has no message for us with regard to our self-imposed evils; she leaves us to ourselves; she leaves us, victims of our own passions, to succumb to our vain sorrows, to pride ourselves on the tears of which we should be ashamed.

“你仍需学习一段时间，而这次学习要比之前的更加困难。因为自然会解除她施加在我们身上的痛楚，或是教会我们顺从这种痛苦。但是她对我们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楚却不说什么。她把这个留给我们自己处理。她把我们丢给自己的欲念，让我们臣服于徒然的痛苦，让我们为应当感到羞愧的泪水而自豪。

“This is your first passion. Perhaps it is the only passion worthy of you. If you can control it like a man, it will be the last; you will be master of all the rest, and you will obey nothing but the passion for virtue.

“你已经产生了第一个欲念。可能这是你唯一一个应得的欲念。如果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控制它，这就会是你最后一个欲念了。你会成为其他所有欲念的主人，你将不必遵循除了美德之外的情感。

“There is nothing criminal in this passion; I know it; it is as pure as the hearts which experience it. It was born of honour and nursed by innocence. Happy lovers! for you the charms of virtue do but add to those of love; and the blessed union to which you are looking forward is less the reward of your goodness than of your

affection. But tell me, O truthful man, though this passion is pure, is it any the less your master? Are you the less its slave? And if to-morrow it should cease to be innocent, would you strangle it on the spot? Now is the time to try your strength; there is no time for that in hours of danger. These perilou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when danger is still afar. We do not practise the use of our weapons when we are face to face with the enemy, we do that before the war; we come to the battle-field ready prepared.

“这种欲念中并没有什么是罪恶的。我明白这一点，它像经历这种欲念的心一样纯洁。它由荣耀中产生，并由天真守护。幸福的恋人们啊！对你们来说，美德一定会增加爱情的魅力。而你们所期望的受到祝福的结合不仅是你们善良的回馈，更是对你们的爱的奖赏。但是诚实的人啊，请你告诉我，即使这种欲念是纯洁的，它不仍然是你的主人吗？你不仍然是它的奴隶吗？如果明天它不再这样纯真，你又会否在此处扼杀它呢？现在是时候试试你的力量了。如果到危险的时候才尝试时间就不够了。只有当危险尚未来临时，这种冒险的举动才能进行。当我们已经和敌人面对面时，就不能再练习使用武器了，这应该是在战争之前就做好的事情。当我们到战场上时，应当是一切都准备就绪的。

“It is a mistake to classify the passions as lawful and unlawful, so as to yield to the one and refuse the other. All alike are good if we are their masters; all alike are bad if we abandon ourselves to them. Nature forbids us to extend our relations beyond the limits of our strength; reason forbids us to want what we cannot get, conscience forbids us, not to be tempted, but to yield to temptation. To feel or not to feel a passion is beyond our control, but we can control ourselves. Every sentiment under our own control is lawful; those which control us are criminal. A man is not guilty if he loves

his neighbour's wife, provided he keeps this unhappy passion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law of duty; he is guilty if he loves his own wife so greatly as to sacrifice everything to that love.

“要把欲念进行合法或不合法的区分以屈服于前者却拒绝后者是错误的。所有的欲念中，如果我们能控制它们，那就是好的。但如果我们向它们屈服，就是坏的。自然禁止我们将自己的关联延伸超过自己力量的界限，理性禁止我们渴望那些我们不可能获得的东西，良知禁止我们的不是受到诱惑，而是不能屈从于诱惑。能否感受一种欲念实际是你的能力所不可及的，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所有能受到控制的情绪都是合法的，而那些控制我们的情绪则是罪恶的。如果一个人爱上了邻居的妻子，却能把这种不幸的情感以法律的义务加以控制，他就不是有罪的。但是如果他过分深爱自己的妻子，为了这份爱牺牲了一切，那他仍然应当受到谴责。

“Do not expect me to supply you with lengthy precepts of morality, I have only one rule to give you which sums up all the rest. Be a man; restrain your heart within the limits of your manhood. Study and know these limits; however narrow they may be, we are not unhappy within them; it is only when we wish to go beyond them that we are unhappy, only when, in our mad passions, we try to attain the impossible; we are unhappy when we forget our manhood to make an imaginary world for ourselves, from which we are always slipping back into our own. The only good things, whose loss really affects us, are those which we claim as our rights. If it is clear that we cannot obtain what we want, our mind turns away from it; wishes without hope cease to torture us. A beggar is not tormented by a desire to be a king; a king only wishes to be a god when he thinks himself more than man.

“不要指望我会向你说教那些关于道德的冗长训诫。我只想教会你一条规律，它是其它所有的总结。你要做一个男人，以你的人性为界限制你的内心。研究并了解这界限。不论这个限度可能多狭窄，只要我们尚在其中就不会痛苦。只有当我们试图越界时，当我们在过分疯狂的欲求中试图去获取不可能的事物，我们才会不快乐。当我们遗忘了自己的人性，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并总是从中跌入现实时，我们才会不快乐。只有那些我们称为权利的才是唯一的好事，失去权利对我们的影响是真实的。如果说我们明白自己无法获得所想要的事物，我们的注意就会转移。没有希望的愿望就不再会折磨我们。一个乞丐是不会因为想成为国王的愿望而痛苦的。但是当一个国王认为自己已经不只是人而想成为神的时候，他就会感到痛苦。

“The illusions of pride are the source of our greatest ills; but the contemplation of human suffering keeps the wise humble. He keeps to his proper place and makes no attempt to depart from it; he does not waste his strength in getting what he cannot keep; and his whole strength being devoted to the right employment of what he has, he is in reality richer and more powerful in proportion as he desires less than we. A man, subject to death and change, shall I forge for myself lasting chains upon this earth, where everything changes and disappears, whence I myself shall shortly vanish! Oh, Emile! my son! if I were to lose you, what would be left of myself? And yet I must learn to lose you, for who knows when you may be taken from me?

“我们最大的痛苦来源于骄傲所产生的幻觉。对于人生的苦难若是有所深思，智慧的人就会表现得谦逊。他会保持在自己合适的位置上，并不试图背离它。他不会在获取他所不能维持的事物上耗费精力，他所有的精力都专注于他真实拥有的事物。他实际上比我们更富有也更有力，因为他渴望的比我们要少。人类始终在变化，也终究要

死亡。这世上所有的事物都要变化、消亡，而我也会很快消失，我应该为自己锻造永久的锁链吗？哦，爱弥儿！我的孩子！如果我会失去你，那我还剩下什么呢？但我必须学着去失去你，毕竟谁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离我而去。

“Would you live in wisdom and happiness, fix your heart on the beauty that is eternal; let your desires be limited by your position, let your duties take precedence of your wishes; extend the law of necessity into the region of morals; learn to lose what may be taken from you; learn to forsake all things at the command of virtue, to set yourself above the chances of life, to detach your heart before it is torn in pieces, to be brave in adversity so that you may never be wretched, to be steadfast in duty that you may never be guilty of a crime. Then you will be happy in spite of fortune, and good in spite of your passions. You will find a pleasure that cannot be destroyed, even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most fragile things; you will possess them, they will not possess you, and you will realise that the man who loses everything, only enjoys what he knows how to resign. It is true you will not enjoy the illusions of imaginary pleasures, neither will you feel the sufferings which are their result. You will profit greatly by this exchange, for the sufferings are real and frequent, the pleasures are rare and empty. Victor over so many deceitful ideas, you will also vanquish the idea that attaches such an excessive value to life. You will spend your life in peace, and you will leave it without terror; you will detach yourself from life as from other things. Let others, horror-struck, believe that when this life is ended they cease to be; conscious of the nothingness of life, you will think that you are but entering upon the true life. To the wicked, death is the close of life; to the just it is its dawn.”

“你要智慧而幸福地生活，你的心要去爱永恒的美。要让你的渴望被限制在你的地位内，你的义务应当优于你的愿望。把必须的法则应用到道德的领域，学着去失去可能会失去的东西，学着去按照道德的旨意抛弃所有事。你要将自己置于生活的可能性之上，在心灵被撕裂之前就把心意舍弃，在困境中仍然能保持勇敢。这样你才可能永远都不感到痛苦，对于义务保持坚定，这样你才可能永不因罪恶而愧疚。之后无论命运如何你都会收获幸福，无论产生怎样的欲念都保持善意。你将会找到坚不可摧的快乐，甚至是拥有的是最脆弱的事物也一样。你会拥有它们，而不是它们拥有你。而你将会意识到当一个人失去一切，只有明白怎么让步，才能获得幸福。确实，你不会享受到想象中快乐的幻觉，同样你也不会感到它们所带来的痛楚。从这种交换中你会受益良多。痛楚是真实而频繁的，而快乐确实稀少而空虚的。你要战胜许多虚伪的想法，也要打破将生命的价值过分夸大的说辞。你将在平静中度过一生，也将无忧无惧地结束生命。你将自己与生命分离，就像与其他事物一样分离。让那些相信生命一旦停止他们也随之终结的人去害怕吧。你意识到生命的虚无，就明白直到那时你才会步入真正的生命之中。对于坏人来说，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而对正直的人来说，死亡只是生命的破晓之时。”

Emile heard me with attention not unmixed with anxiety. After such a startling preface he feared some gloomy conclusion. He foresaw that when I showed him how necessary it is to practise the strength of the soul, I desired to subject him to this stern discipline; he was like a wounded man who shrinks from the surgeon, and fancies he already feels the painful but healing touch which will cure the deadly wound.

爱弥儿认真地听着我说话，流露出些许不安的神色。在听到这番令人吃惊的话之后，他担心我会有一些痛苦的结论。在我告诉他锻炼心灵的力量是多么有必要时，他猜想我会要求他遵守这严苛的要求。

他就像一个受伤的人，在外科医生面前畏畏缩缩，在脑海中已经感受到为了治疗那致命的伤口而施加的疼痛却能治愈的触碰。

Uncertain, anxious, eager to know what I am driving at, he does not answer, he questions me but timidly. “What must I do?” says he almost trembling, not daring to raise his eyes. “What must you do?” I reply firmly. “You must leave Sophy.” “What are you saying?” he exclaimed angrily. “Leave Sophy, leave Sophy, deceive her, become a traitor, a villain, a perjurer!” “Why!” I continue, interrupting him; “does Emile suppose I shall teach him to deserve such titles?” “No,” he continued with the same vigour. “Neither you nor any one else; I am capable of preserving your work; I shall not deserve such reproaches.”

爱弥儿疑惑不安，他迫切地想知道我的目的。他并没有回答我，只是羞怯地向我提问。“我应该做什么呢？”他几乎是战战兢兢地在问我，甚至不敢抬起他的眼睛。“你应该做什么呢？”我坚决地回答他。“应该离开苏菲。”“你说什么？”他愤怒地叫了出来。“离开苏菲。离开她，欺骗她。做一个叛徒，一个坏人，一个伪誓者！”“为什么！”我打断他继续说，“爱弥儿认为我会教他背负这样的名声吗？”“不，”他用同样的气势继续说。“不仅你不会，其他人也不会。我有能力维护你的工作。我绝不会背负这样的指责。”

I was prepared for this first outburst; I let it pass unheeded. If I had not the moderation I preach it would not be much use preaching it! Emile knows me too well to believe me capable of demanding any wrong action from him, and he knows that it would be wrong to leave Sophy, in the sense he attaches to the phrase. So he waits for an explanation. Then I resume my speech.

我对他的第一次爆发已经有所准备，于是就假装不在意地略过了。如果我没有向他反复强调要镇定，那么教导他可能就没有意义了。爱弥儿很了解我，他相信我绝不会要求他做出任何坏事。而且根据他对“坏”的理解，他明白离开苏菲就是一件坏事。所以他等我给他一个解释。于是我重新开始了谈话。

“My dear Emile, do you think any man whatsoever can be happier than you have been for the last three months? If you think so, undeceive yourself. Before tasting the pleasures of life you have plumbed the depths of its happiness. There is nothing more than you have already experienced. The joys of sense are soon over; habit invariably destroys them. You have tasted greater joys through hope than you will ever enjoy in reality. The imagination which adorns what we long for, deserts its possess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one self-existing Being, there is nothing beautiful except that which is not. If that state could have lasted for ever, you would have found perfect happiness. But all that is related to man shares his decline; all is finite, all is fleeting in human life, and even if the conditions which make us happy could be prolonged for ever, habit would deprive us of all taste for that happiness. If external circumstances remain unchanged, the heart changes; either happiness forsakes us, or we forsake her.

“我亲爱的爱弥儿，你觉得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有任何一个人会比你更幸福吗？如果你认为有的话，你应该消除这种想法。在体会到生命的快乐之前，你已经完全深深陷入幸福之中，你已经感受到了最大的幸福。感官上的愉快稍纵即逝，习惯终究会摧毁这种快乐。你在希望中所体会到的快乐已经远胜过你将在现实中获得的快乐。想象修饰了我们所渴望的幸福，但使我们无法拥有。除了自我存在的上帝

外，只有不存在的事物才是真正美丽的。如果这样的情形能够持续永久的话，那么你就已经找到完美的幸福了。但是与人类有关的事情往往会像人一样消亡。所有有限的，所有匆匆掠过的，即便是让我们快乐的状况都可以被永远地延长。如果永恒的环境始终不变，那么人心就会发生变化。不是幸福抛弃了我们，就是我们抛弃了幸福。

“During your infatuation time has passed unheeded. Summer is over, winter is at hand. Even if our expeditions were possible, at such a time of year they would not be permitted. Whether we wish it or no, we shall have to change our way of life; it cannot continue. I read in your eager eyes that this does not disturb you greatly; Sophy's confession and your own wishes suggest a simple plan for avoiding the snow and escaping the journey. The plan has its advantages, no doubt; but when spring returns, the snow will melt and the marriage will remain; you must reckon for all seasons.

“在你沉醉爱情的时候时间已经悄无声息地流逝了。夏天过去，冬天到来。即使说我们尚且可以去看他们，但是在一年中这样的时节他们也不会允许我们这么做。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这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从你热切的眼神中读出这对你的打扰并不剧烈。苏菲的告白和你自己的心愿暗示了一个既简单又能让我们避开风雪和长途跋涉的办法。这个计划毫无疑问有它的优点。但是一旦春天到来冰雪消融，你们的婚约仍在。无论四季变迁，你必须遵守诺言。

“You wish to marry Sophy and you have only known her five months! You wish to marry her, not because she is a fit wife for you, but because she pleases you; as if love were never mistaken as to fitness, as if those, who begin with love, never ended with

hatred! I know she is virtuous; but is that enough? Is fitness merely a matter of honour? It is not her virtue I misdoubt, it is her disposition. Does a woman show her real character in a day? Do you know how often you must have seen her and under what varying conditions to really know her temper? Is four months of liking a sufficient pledge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A couple of months hence you may have forgotten her; as soon as you are gone another may efface your image in her heart; on your return you may find her as indifferent as you have hitherto found her affectionate. Sentiments are not a matter of principle; she may be perfectly virtuous and yet cease to love you. I am inclined to think she will be faithful and true; but who will answer for her, and who will answer for you if you are not put to the proof? Will you postpone this trial till it is too late, will you wait to know your true selves till parting is no longer possible?

“你想要娶苏菲为妻。但你才认识她五个月的时间！你想娶她不是因为她对你来说是一个合适的妻子，而是因为她是你感到快乐。相爱的人难道都是相配的吗？那些起初因为爱而在一起的人，最后也会相恨啊！我知道她道德高尚，但这就足够了吗？适合仅仅只是道德问题吗？我怀疑的不是她的品德而是她的性情。女人会在一天里就展现出真性情吗？你知道要多么频繁地见到她才能真正了解她的脾性吗？你喜欢了她四个月，这对你的余生来说是足够的保证吗？几个月已过你可能就会忘记她。而你一离开，可能就会有别人抹去你在她心里的印记。当你再回来时你可能发现她对你不理不睬，就像现在她对你深情款款一样。情感并不是原则的问题。她可能在道德上完美无缺，但仍然会不爱你。我当然更愿意相信她是忠实而真诚的。但是如果我们无法证明这一点，就没有人能够为她回答，也没有人能为你回答。你要把这个试验拖到来不及的时候在做吗？你要等到你们两人已经不可能分开的时候再来了解自己真正的心意吗？

“Sophy is not eighteen, and you are barely twenty-two; this is the age for love, but not for marriage. What a father and mother for a family! If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bring up children, you should at least wait till you yourselves are children no longer. Do you not know that too early motherhood has weakened the constitution, destroyed the health, and shortened the life of many young women? Do you not know that many children have always been weak and sickly because their mother was little more than a child herself? When mother and child are both growing, the strength required for their growth is divided, and neither gets all that nature intended; are not both sure to suffer? Either I know very little of Emile, or he would rather wait and have a healthy wife and children, than satisfy his impatience at the price of their life and health.

“苏菲还不到十八岁，你也才二十二。这确实是恋爱的年纪，但并不是结婚的时候。对一个家庭来说这样的父母太过年轻了！如果你想知道如何抚育孩子，你至少应该等到自己长大成人。你不知道过早的生育对大多数年轻女性来说会使身体虚弱，损害健康并且缩短女性的寿命吗？你不知道由于母亲与孩子的年龄相差太少，很多孩子总是体弱多病吗？如果让母亲和孩子一同长大，那么他们所需要的精力就被分割了。他们都无法得到自然所要求的经历，那他们必然都会受苦。如果我对爱弥儿足够了解，他一定会选择等待，等着拥有健康的妻子和孩子，而不是以他们的生命健康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急切心情。

“Let us speak of yourself. You hope to be a husband and a father; have you seriously considered your duties? When you become the head of a family you will become a citizen of your country. And what is a citizen of the state? What do you know about it? You have studied your duties as a man, but what do you

know of the duties of a citizen? Do you know the meaning of such terms as government, laws, country? Do you know the price you must pay for life, and for what you must be prepared to die? You think you know everything, when you really know nothing at all. Before you take your place in the civil order, learn to perceive and know what is your proper place.

“让我们来谈谈你自己吧。你希望成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但你认真考虑过你的责任吗？当你成为一个家庭的家长，你同时也是国家的一个公民。国家的公民是什么样的呢？你对这了解多少呢？你学习过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但是你知道作为一个公民的职责吗？你知道政府、法律、国家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吗？你知道你必须为了生活付出怎样的代价吗？而你又要为了什么付出生命？你以为你了解一切，但事实上你一无所知。在你在公序良俗中找到自己的地位之前，你要学着去了解什么地位是适合你的。

“Emile, you must leave Sophy; I do not bid you forsake her; if you were capable of such conduct, she would be only too happy not to have married you; you must leave her in order to return worthy of her. Do not be vain enough to think yourself already worthy. How much remains to be done! Come and fulfil this splendid task; come and learn to submit to absence; come and earn the prize of fidelity, so that when you return you may indeed deserve some honour, and may ask her hand not as a favour but as a reward.”

“爱弥儿，你必须离开苏菲。我并不是逼迫你抛弃她。如果你会这么做的话，那她没有嫁给你实在是很幸运。你必须离开她，这样在你回来的时候你会更加配得上她。不要徒然地以为你现在已经是配得上她的。还有很多事需要你去做！来吧，来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来

吧，来学着屈服于分别；来吧，来赢得忠诚的奖赏。这样一来，当你回来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应得一些荣耀。这时你应该请求她嫁给你，但不是出于帮助，而是对你的奖赏。”

Unaccustomed to struggle with himself, untrained to desire one thing and to will another, the young man will not give way; he resists, he argues. Why should he refuse the happiness which awaits him? Would he not despise the hand which is offered him if he hesitated to accept it? Why need he leave her to learn what he ought to know? And if it were necessary to leave her why not leave her as his wife with a certain pledge of his return? Let him be her husband, and he is ready to follow me; let them be married and he will leave her without fear. “Marry her in order to leave her, dear Emile! what a contradiction! A lover who can leave his mistress shows himself capable of great things; a husband should never leave his wife unless through necessity. To cure your scruples, I see the delay must be involuntary on your part; you must be able to tell Sophy you leave her against your will. Very well, be content, and since you will not follow the commands of reason, you must submit to another master. You have not forgotten your promise. Emile, you must leave Sophy; I will have it.”

这个年轻人还不习惯自我挣扎，还没有练出渴望一件事却追求另一件的能力。他不会让步，他会抗争，他会争辩。为什么他要拒绝唾手可得的幸福？如果苏菲已经答应了，他却犹豫着要不要娶她，是不是他轻视了苏菲？为什么他一定要离开她去学习那些他应该知道的东西？而且，就算必须要离开她，为什么他不能以她的丈夫的身份离开。这样他就有了回来时的确切保证。只有让他娶苏菲为妻，他才愿意跟随我。只有让他们结婚，他才能毫无畏惧地离她而去。“亲爱的爱弥儿，你这是为了要离开她才娶她啊！这多么矛盾啊！一个能离开

爱人的人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除非必要，一个丈夫永远都不应该离开他的妻子。我看得出你会不知不觉拖延这件事。为了消除你的顾虑，你必须亲自去告诉苏菲，你要违背自己的意愿离开她。好了，勇敢一点。既然你不愿意服从理性的指引，那你必须遵从另一个主人的命令。你并没有忘记你的诺言。爱弥儿，你必须离开苏菲。我坚持这么做。”

For a moment or two he was downcast, silent, and thoughtful, then looking me full in the face he said, “When do we start?” “In a week's time,” I replied; “Sophy must be prepared for our going. Women are weaker than we are, and we must show consideration for them; and this parting is not a duty for her as it is for you, so she may be allowed to bear it less bravely.”

他有那么一两秒钟感到气馁，沉默着思考了一会之后，他抬头看着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出发？”“一周之后，”我回答道，“苏菲必须对我们的离开做好足够的准备。女人们比我们要脆弱。所以我们必须体谅她们。这次离别是你的责任而不是她的，所以我们应该体谅她可能不能足够勇敢地承受这件事。”

The temptation to continue the daily history of their love up to the time of their separation is very great; but I have already presumed too much upon the good nature of my readers; let us abridge the story so as to bring it to an end. Will Emile face the situation as bravely at his mistress' feet as he has done in conversation with his friend? I think he will; his confidence is rooted in the sincerity of his love. He would be more at a loss with her, if it cost him less to leave her; he would leave her feeling himself to blame, and that is a difficult part for a man of honour to

play; but the greater the sacrifice, the more credit he demands for it in the sight of her who makes it so difficult. He has no fear that she will misunderstand his motives. Every look seems to say, “Oh, Sophy, read my heart and be faithful to me; your lover is not without virtue.”

我很想继续讲他们的日常的爱情故事直到他们分离，但是我已经浪费了我善良的读者们太多时间。让我们简短地讲完这个故事吧。在爱弥儿和他的朋友经过这番谈话之后，他会不会勇敢地面对苏菲呢？我想他会的。他的自信根植于对于爱情的虔诚中。如果对于要离开苏菲这件事爱弥儿并没有付出生命代价，他可能会有些失落。他会让自己受到责备，对于一个重视荣耀的人来说这个角色实际很难承担。但是他的牺牲越大，在要他去受这番痛苦的苏菲眼中他就越值得信任。他并不担心苏菲会曲解他的本意。他的每一个眼神都好像在说，“哦苏菲啊，请你明白我的心意，并且忠实于我吧。你的爱人并不是无情无义的家伙啊。”

Sophy tries to bear the unforeseen blow with her usual pride and dignity. She tries to seem as if she did not care, but as the honours of war are not hers, but Emile's, her strength is less equal to the task. She weeps, she sighs against her will, and the fear of being forgotten embitters the pain of parting. She does not weep in her lover's sight, she does not let him see her terror; she would die rather than utter a sigh in his presence. I am the recipient of her lamentations, I behold her tears, it is I who am supposed to be her confidant. Women are very clever and know how to conceal their cleverness; the more she frets in private, the more pains she takes to please me; she feels that her fate is in my hands.

苏菲试图去承受对她平常的骄傲和高贵的意外打击。她想表现得自己满不在乎。但由于这场战争的荣耀并不属于她，而是属于爱弥儿，她的力量不足以承受这个使命。她违背自己的心意痛苦叹息，害怕被遗忘的心情加剧了离别的痛苦。她并不在爱弥儿面前哭泣，她不想爱弥儿看到她的痛苦。她情愿去死也不会在爱弥儿面前发出一声叹息。她会向我吐露她的痛楚，在我面前痛哭。我应当成为她的知己。女人们是非常聪明的，她们懂得隐藏自己的智慧。私下里她烦扰得越多，她就会越努力地取悦我。她明白，她的命运掌握在我手里。

I console and comfort her; I make myself answerable for her lover, or rather for her husband; let her be as true to him as he to her and I promise they shall be married in two years' time. She respects me enough to believe that I do not want to deceive her. I am guarantor to each for the other. Their hearts, their virtue, my honesty, the confidence of their parents, all combine to reassure them. But what can reason avail against weakness? They part as if they were never to meet again.

我只能安慰她。因为我对她的爱人，或者是她的丈夫负有责任。我要让他们彼此坦诚忠实。我承诺，他们会在两年内成婚。苏菲很尊重我，她相信我不想欺骗她。我是他们互相的证人。他们的心意、道德，我的诚恳和他们父母的信任都联合起来要让他们放心。但是在软弱面前理性又有何益呢？他们的分别就好像永远不会再见了。

Then it is that Sophy recalls the regrets of Eucharis, and fancies herself in her place. Do not let us revive that fantastic affection during his absence “Sophy,” say I one day, “exchange books with Emile; let him have your Telemachus that he may learn to be like him, and let him give you his Spectator which you enjoy reading.

Study the duties of good wives in it, and remember that in two years' time you will undertake those duties.” The exchange gave pleasure to both and inspired them with confidence. At last the sad day arrived and they must part.

这时苏菲想起欧夏丽的懊悔，她幻想自己处于这个情境中。我们不能在爱弥儿离开的时候使苏菲产生奇妙的爱情。“苏菲，”有一天我说，“和爱弥儿交换书来看吧。你可以把你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给他，这样他可能会向忒勒马科斯学习。让他把你喜欢的那本《旁观者》给你。你可以在书中研读好的妻子所担负的指责。记住，两年后你将要承担这些责任。”这次交换使他们两都很快乐，也给了他们更多的信心。最后那一天终于来临了，他们必须要分离。

Sophy's worthy father, with whom I had arranged the whole business, took affectionate leave of me, and taking me aside, he spoke seriously and somewhat emphatically, saying, “I have done everything to please you; I knew I had to do with a man of honour; I have only one word to say. Remembering your pupil has signed his contract of marriage on my daughter's lips.”

我和苏菲那可敬的父亲策划了所有的事情，他向我深情地道别。把我拉到一边，严肃中有些果断地对我说，“我为了使你快乐做了所有的事。我知道我必须尊重人类的荣耀。我只有一句话想说。记住，你的学生已经在我女儿的嘴唇上签订了婚约。”

What a difference in the behaviour of the two lovers! Emile, impetuous, eager, excited, almost beside himself, cries aloud and sheds torrents of tears upon the hands of father, mother, and

daughter; with sobs he embraces every one in the house and repeats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in a way that would be ludicrous at any other time. Sophy, pale, sorrowful, doleful, and heavy-eyed, remains quiet without a word or a tear, she sees no one, not even Emile. In vain he takes her hand, and clasps her in his arms; she remains motionless, unheeding his tears, his caresses, and everything he does; so far as she is concerned, he is gone already. A sight more moving than the prolonged lamentations and noisy regrets of her lover! He sees, he feels, he is heartbroken. I drag him reluctantly away; if I left him another minute, he would never go. I am delighted that he should carry this touching picture with him. If he should ever be tempted to forget what is due to Sophy, his heart must have strayed very far indeed if I cannot bring it back to her by recalling her as he saw her last.

这两个恋人的行为是多么的不同啊！爱弥儿性格冲动草率，他有些急切。只有他大声地哭了出来，在苏菲的父母和苏菲手上留下了泪水。他一边啜泣，一边拥抱了屋子里的所有人。他用一种如果在其他时候看起来会有些可笑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事情。而苏菲脸色苍白，她悲伤得抬不起眼来。她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也没有哭泣。她没有看任何人，甚至连爱弥儿也一样。爱弥儿牵起她的手，紧紧拥抱她，苏菲都不为所动。她仍然面无表情，也不理会他的泪水与爱抚，对他做的所有事情都不在意。因为在她看来，爱弥儿已经离开她了。她的这副样子比爱弥儿痛哭流涕吵吵嚷嚷的样子更惹人怜惜。爱弥儿看到了也感觉到了，他的心都要碎了。我硬把他拖开。如果让他再多呆一秒，他永远都不会走了。我感到高兴的是，他在走之前看到这幅画面。如果将来他受到诱惑而忘记苏菲，我会提醒他回想他见到苏菲的最后一面。而如果这都不能使他回心转意，那他的内心一定是迷失了很远很远。

OF TRAVEL

游历

Is it good for young people to travel? The question is often asked and as often hotly disputed. If it were stated otherwise—Are men the better for having travelled?—perhaps there would be less difference of opinion.

对于年轻人来说四处游历有好处吗？这个问题常常被提出来，而且往往会被热烈讨论。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说这句话——四处游历过的人是不是更好？——可能大家的观点就不会有这么多分歧了。

The misuse of books is the death of sound learning. People think they know what they have read, and take no pains to learn. Too much reading only produces a pretentious ignoramus. There was never so much reading in any age as the present, and never was there less learning; in no country of Europe are so many histories and books of travel printed as in France, and nowhere is there less knowledge of the mind and manners of other nations. So many books lead us to neglect the book of the world; if we read it at all, we keep each to our own page. If the phrase, “Can one become a Persian,” were unknown to me, I should suspect on hearing it that it came from the country where national prejudice is most prevalent and from the sex which does most to increase it.

误用书本并不利于健康的学习。人们认为他们了解自己所阅读的

东西，在学习中没有受任何苦。读书太多只会造成不学无术的人过分自命不凡。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的书读的是最多的，学到的知识却是最少的。在历史与游历的书籍的数量上，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和法国相比，但法国却对其他国家的精神与习俗知之甚少。太多的书却使我们忽视了世界这本书。如果我们要去读它，每个人也只能读自己的那一页。如果我从未听过“怎么能做一个波斯人”这句话，我会怀疑这句话产生于一个充满了民族偏见的国家，会怀疑这句话产生于一个热衷于激化民族偏见的性别。

A Parisian thinks he has a knowledge of men and he knows only Frenchmen; his town is always full of foreigners, but he considers every foreigner as a strange phenomenon which has no equal in the universe. You must have a close acquaintance with the middle classes of that great city, you must have lived among them, before you can believe that people could be at once so witty and so stupid. The strangest thing about it is that probably every one of them has read a dozen times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whose inhabitants inspire him with such wonder.

一个巴黎人认为他拥有关于人的知识，但他只了解法国人。他生活的城镇里到处都是外国人，他却认为每一个外国人都是奇怪的现象，宇宙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你必须要与这个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熟知，你必须要与他们一起生活之后，这样你才会了解到人们既可以这样聪慧，也可以如此愚蠢。而最为奇怪的事情是，他们中的每个人可能都读过十几遍描写一个国家的书，那里的居民会激起他无限遐思。

To discover the truth amidst our own prejudices and those of the authors is too hard a task. I have been reading books of travels

all my life, but I never found two that gave me the same idea of the same nation. On comparing my own scanty observations with what I have read, I have decided to abandon the travellers and I regret the time wasted in trying to learn from their books; for I am quite convinced that for that sort of study, seeing not reading is required. That would be true enough if every traveller were honest, if he only said what he saw and believed, and if truth were not tinged with false colours from his own eyes. What must it be when we have to disentangle the truth from the web of lies and ill-faith?

要透过我们自己和作者的偏见找到真相是很困难的。我的一生都在阅读关于游历四方的书籍，但我从未发现在两本关于同一个国家的著作中作者会有相同的观点。在把我自己贫乏的观察和阅读到的书籍进行比较时，我决定放弃对游历者书籍的阅读。我有些后悔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试图去从书中学到些什么。因为我很确信在这样的学习中，亲眼所见比阅读更加重要。如果每个游历者都说了实话，如果他只讲述他所见和所相信的，如果真相没有被他自己眼中的情绪所左右的话，书籍倒是很真实的。当我们要从谎言和假相的网中抽丝剥茧找出真相时，又会怎么样呢？

Let us leave the boasted resources of books to those who are content to use them. Like the art of Raymond Lully they are able to set people chattering about things they do not know. They are able to set fifteen-year-old Platos discussing philosophy in the clubs, and teaching people the customs of Egypt and the Indies on the word of Paul Lucas or Tavernier.

让我们把夸夸其词的书本留给那些满足于看书的人们吧。就像莱蒙特·吕黎的艺术一样，它能使人们畅谈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他们能

使十五岁的小孩子像柏拉图一样在学院中讨论哲学，用保罗·卢卡斯或是塔威尼尔的话告诉人们埃及和印度有怎样的风俗。

I maintain that it is beyond dispute that any one who has only seen one nation does not know men; he only knows those men among whom he has lived. Hence there is another way of stating the question about travel: “Is it enough for a well-educated man to know his fellow-countrymen, or ought he to know mankind in general?” Then there is no place for argument or uncertainty. See how greatly the solution of a difficult problem may depend on the way in which it is stated.

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他只在一个国家生活过，那么无可争辩的，他是不懂得人类的。他所了解的只是与他一同生活的那些人。因此，关于游历的问题也可以有另一种表达：“对于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他应该去了解与他共同生活的同胞们，还是应该去了解全人类呢？”那么就不会有争论和怀疑了。看吧，一个复杂问题的解决很可能就在于它所表达的方式。

But is it necessary to travel the whole globe to study mankind? Need we go to Japan to study Europeans? Need we know every individual before we know the species? No, there are men so much alike that it is not worth while to study them individually. When you have seen a dozen Frenchmen you have seen them all. Though one cannot say as much of the English and other nations, it is, however, certain that every nation has its own specific character, which is derived by induction from the study, not of one, but many of its members. He who has compared a dozen nations knows men, just he who has compared a dozen Frenchmen knows the French.

但是为了研究人类而环游全球又是否有必要呢？我们需要去日本去研究欧洲人吗？在我们了解不同的种族之前，一定要了解每一个个体的差异吗？不，很多人都是相像的，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单独研究他们。如果你看过十几个法国人，那就算是对他们有了解了。尽管我们不能说这样我们就算是了解了英国人或是其他国家的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对于这个国家中的许多人，而不是某一个的认识中总结出来。只有在比较了不同的国家的人之后，他才能算了解人类。就好像他只有在比较了十几个法国人之后他才能了解法国。

To acquire knowledge it is not enough to travel hastily through a country. Observation demands eyes, and the power of directing them towards the object we desire to know. There are plenty of people who learn no more from their travels than from their books,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think; because in reading their mind is at leas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author, and in their travels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see for themselves. Others learn nothing, because they have no desire to learn. Their object is so entirely different, that this never occurs to them; it is very unlikely that you will see clearly what you take no trouble to look for. The French travel more than any other nation, but they are so taken up with their own customs, that everything else is confused together. There are Frenchmen in every corner of the globe. In no country of the world do you find more people who have travelled than in France. And yet of all the nations of Europe, that which has seen most, knows least. The English are also travellers, but they travel in another fashion; these two nations must always be at opposite extremes. The English nobility travels, the French stays at home; the French people travel, the English stay at home. This difference does credit, I think, to the English. The French almost always travel for

their own ends; the English do not seek their fortune in other lands, unless in the way of commerce and with their hands full; when they travel it is to spend their money, not to live by their wits; they are too proud to cringe before strangers. This is why they learn more abroad than the French who have other fish to fry. Yet the English have their national prejudices; but these prejudices are not so much the result of ignorance as of feeling. The Englishman's prejudices are the result of pride, the Frenchman's are due to vanity.

匆忙地游历一个国家是不足以获取知识的。观察要求我们去看，并耗费精力观察我们渴望了解的事物。有很多人从旅行中学到的东西并不他们从书中学到的多，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思考。在阅读时，他们的思想至少是由作者指引的，而在游历时他们并不知道要看什么。还有一些人什么也没学到，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学。他们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从未想要以学习为目的。如果你所要找的东西并不费什么力气的话，那么你几乎不可能看清它。法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要更喜欢游历。但是他们自己仍然有一些习惯，所有其他的习惯都被混在了一起。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法国人。你会发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没有法国人旅行的多。即使是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法国人也是看得最多，了解得最少的。英国人也喜欢四处游历，但他们的方式不同。这两个国家必然总是两个相反的极端。英国的贵族们会出门旅游，而法国贵族待在家里。法国的平民出门旅游，而英国的平民待在家里。我想，这个差别是对英国人的赞美。法国人几乎总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旅行，而英国人除非是带满钱财并以着经商的目的，否则绝不会去别的国家寻找财富的。当他们旅行时，花的一定是自己的钱，而不是靠些小技俩谋生。他们是很骄傲的人，根本不愿意在陌生人面前阿谀奉承。这就是他们比怀抱着别的目的的法国人能学到的更多的原因了。但是英国人会有他们的民族偏见。但偏见来自于情感而不是无知。英国人的偏见是由于他们的骄傲，而法国人的偏见却是由于虚荣。

Just as the least cultivated nations are usually the best, so those travel best who travel least; they have made less progress than we in our frivolous pursuits, they are less concerned with the objects of our empty curiosity, so that they give their attention to what is really useful. I hardly know any but the Spaniards who travel in this fashion. While the Frenchman is running after all the artists of the country, while the Englishman is getting a copy of some antique, while the German is taking his album to every man of science, the Spaniard is silently studying the government, the manners of the country, its police, and he is the only one of the four who from all that he has seen will carry home any observation useful to his own country.

正如没有接受过良好培养的国家的人往往是最好的，那些在游历中收获最多的，往往是最少出游的人。由于我们的追求过于繁琐，所以往往要经过比他们多的程序。而且我们的好奇心过分空洞，他们比我们更不在意这些目的，所以能把注意力放在真正有用的事物上。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据我所知西班牙人是这么四处游历的。到了一个国家之后，法国人总是去追寻他们的艺术家，而英国人却临摹古迹，德国人往往会带着本子去找所有的科学家，西班牙人默默地学习当地的政府、国家的习俗、警察制度。在这四种人中，只有西班牙人会把自己所见所闻中所有有益的观察都带回自己的国家。

The ancients travelled little, read little, and wrote few books; yet we see in those books that remain to us, that they observed each other more thoroughly than we observe our contemporaries. Without going back to the days of Homer, the only poet who transports us to the country he describes, we cannot deny to Herodotus the glory of having painted manners in his history, though he does it rather by narrative than by comment; still he does

it better than all our historians whose books are overladen with portraits and characters. Tacitus has described the Germans of his time better than any author has described the Germans of to-day.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ose who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ancient history know more about the Greeks, Carthaginians, Romans, Gauls, and Persians than any nation of to-day knows about its neighbours.

古时候人们很少出门游历，也很少读书，也很少写书。但是在留存下来的书籍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之间彻底地互相观察，远胜过我们这一代人。荷马是当时唯一的诗人，我们不必回到荷马的时代，他向我们传递了他所描述的国家。即使希罗多德在史书中刻画风俗时是以叙述而不是评论的方式，我们也无法否认他的荣耀。尽管如此，他的做法仍然要比其他的历史学家要好得多，因为他们的书中往往都是绘画与符号。塔西佗对于那个时代的德国人的描述要比如今任何一个作家描写得更形象。毫无疑问，那些专注于研究古代史的人对于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高卢人和波斯人的了解要比如今它们邻近国家的人了解得更多。

It must also be admitted that the origin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nations are changing day by day, and are therefore more difficult to grasp. As races blend and nations intermingle, those national differences which formerly struck the observer at first sight gradually disappear. Before our time every nation remained more or less cut off from the rest;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were fewer; there was less travelling, less of mutual or conflicting interests, less political and civil intercourse between nation and nation; those intricate schemes of royalty, miscalled diplomacy, were less frequent; there were no permanent ambassadors resident at foreign courts; long voyages were rare, there was little foreign trade, and

what little there was, was either the work of princes, who employed foreigners, or of people of no account who had no influence on others and did nothing to bring the nations togeth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in the present century are a hundredfold more numerous than those between Gaul and Spain in the past; Europe alone was less accessible than the whole world is now.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不同民族原始的特征在一天天的变化，因此也更难把握。随着种族与民族的混合，最初之前在观察者观察时立即打动他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了。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地与外界封闭。当时的沟通方式比较少，也很少有人出门游历。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与利益矛盾都比较少，而政治与文化的交流也很少进行。因此贵族很少会密谋政变，外交也只是偶尔进行。通常在别国没有常驻的外交使臣。长途旅行、对外贸易都很罕见。如果有一点贸易进行，如果不是王族的使命，就是无足轻重的普通人，他们既不会对他人造成使命影响，也不能把民族联合起来。现在，欧亚大陆之间的联系要比过去高卢和西班牙之间的联系紧密一百倍，当时仅是欧洲国家的开放程度也比不上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Moreover, the peoples of antiquity usually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of their country; they had dwelt there so long that all record was lost of the far-off times when their ancestors settled there; they had been there so long that the place had made a lasting impression on them; but in modern Europe the invasions of the barbarians, following upon the Roman conquests, have caused an extraordinary confusion. The Frenchmen of to-day are no longer the big fair men of old; the Greeks are no longer beautiful enough to serve as a sculptor's model; the very face of the Romans has changed as well as their character; the Persians,

originally from Tartary, are daily losing their native ugliness through the intermixture of Circassian blood. Europeans are no longer Gauls, Germans, Iberians, Allobroges; they are all Scythians, more or less degenerate in countenance, and still more so in conduct.

而且，古时候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原住民。他们在此定居的时间很久，对于远古时期他们的祖先定居下来的记录全都遗失了，而这个地方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在现代欧洲，罗马入侵之后又受到了野蛮人的入侵，因而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如今的法国人已经不是旧时那种身材高大、面容姣好的样子了；希腊人也不再像之前一样俊美得可以做雕塑家的模特；罗马人连同性格也一起改变了；波斯人的祖先是鞑靼人，但随着和切尔克斯人的混血，他们也不像原先那么丑了。欧洲人不再是高卢人、日耳曼人、伊比利亚人和阿洛布罗基人了。他们都是斯基泰人，面容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变化，但是行为上的差异就更大了。

This is why the ancient distinctions of race, the effect of soil and climate, made a greater difference between nation and nation in respect of temperament, looks, manners, and character than can be distinguished in our own time, when the fickleness of Europe leaves no time for natural causes to work, when the forests are cut down and the marshes drained, when the earth is more generally, though less thoroughly, tilled, so that the same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ry and country can no longer be detected even in purely physical features.

在种族上的古代差异，由土壤与气候所带来的影响使国家与国家之间每个人的性情、相貌、品质与性格的差距变大，至于我们现在可

以清楚地分辨。由于欧洲大陆的变化无常，自然的动机没有时间发出。当森林被砍伐而湿地干涸，尽管土地的耕种更加统一但也更加不彻底。所以仅是用纯粹的物理方法观测不再能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

If they considered these facts perhaps people would not be in such a hurry to ridicule Herodotus, Ctesias, Pliny for having described the inhabitant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each with its own peculiarities and with striking differences which we no longer see. To recognise such types of face we should need to see the men themselves; no change must have passed over them, if they are to remain the same. If we could behold all the people who have ever lived, who can doubt that we should find greater variations between one century and another, than are now found between nation and nation.

如果他们考虑到这些事实，可能人们就不会急着嘲讽希罗多德、克泰夏斯和普林尼曾经描述过的画面，那里不同国家的居民有着自己的特征与明显的差异，而这些我们如今不再看得见了。为了看到这些不同的面貌，我们需要看到那些人本身。如果他们保持不变的话，丝毫改变都不应该发生。如果我们能看到所有曾经活过的人，毫无疑问我们会发现在两个世纪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甚至要比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别更为巨大。

At the same time, while observation becomes more difficult, it is more carelessly and badly done; this is another reason for the small success of our researches in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 The information acquired by travel depends upon the object of the journey. If this object is a system of philosophy, the

traveller only sees what he desires to see; if it is self-interest, it engrosses the whole attention of those concerned. Commerce and the arts which blend and mingle the nations at the same time prevent them from studying each other. If they know how to make a profit out of their neighbours, what more do they need to know?

同时，随着观察变得越来越困难，人们在观察时往往更大意草率。而这也是另一个为什么我们现在关于人类种族的自然历史的研究只取得了很小的成功的原因。在游历中了解到的信息决定于游历的目的。如果目的是创立一套哲学系统，旅行者只会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而如果目的只是个人兴趣，那么旅行者的注意力会放在他在意的事物上。商贸和艺术促进了国家间的交流融合，但同时也阻碍了他们相互学习。如果他们了解如何从邻国获利之后，他们还需要知道什么呢？

It is a good thing to know all the places where we might live, so as to choose those where we can live most comfortably. If every one lived by his own efforts, all he would need to know would be how much land would keep him in food. The savage, who has need of no one, and envies no one, neither knows nor seeks to know any other country but his own. If he requires more land for his subsistence he shuns inhabited places; he makes war upon the wild beasts and feeds on them. But for us, to whom civilised life has become a necessity, for us who must needs devour our fellow-creatures, self-interest prompts each one of us to frequent those districts where there are most people to be devoured. This is why we all flock to Rome, Paris, and London. Human flesh and blood are always cheapest in the capital cities. Thus we only know the great nations, which are just like one another.

知道所有我们可能居住的地方是一件好事，这样我们就能选出一个我们能居住的最舒适的地方了。如果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努力生活的话，他要知道的就是多少土地能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原始人不需要任何人，也不嫉妒任何人，他只了解也只会试图去了解自己的国家。如果他为了谋生而想要更多的土地，他会避开已经被占据的土地。他会与野兽搏斗，并以之为食。但对我们来说需要过文明的生活，我们需要和同伴生活在一起。个人利益促使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去到那些人口流动密集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都聚集到罗马、巴黎和伦敦。人类的血肉在首都城市里是总是最为廉价的。所以我们只了解到大国往往都是相似的。

They say that men of learning travel to obtain information; not so, they travel like other people from interested motives. Philosophers like Plato and Pythagoras are no longer to be found, or if they are, it must be in far-off lands. Our men of learning only travel at the king's command; they are sent out, their expenses are paid, they receive a salary for seeing such and such things, and the object of that journey is certainly not the study of any question of morals. Their whole time is required for the object of their journey, and they are too honest not to earn their pay. If in any country whatsoever there are people travelling at their own expense, you may be sure it is not to study men but to teach them. It is not knowledge they desire but ostentation. How should their travels teach them to shake off the yoke of prejudice? It is prejudice that sends them on their travels.

他们说学者四处游历去获取信息。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像其他人一样是为了有趣的动机而四处游历。和像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一样的哲学家已经很少见了。如果还有的话，那他一定在遥远的国度。现在，我们的学者只会因为国王的命令而游历。皇室派遣他们，并付给

他们酬劳。他们会因为看到了某物而获取薪资。所以他们旅行的目的完全不是为了学习任何道德问题。他们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了旅行的目的上。他们是诚实的，为了获得报酬就要付出努力。如果在任何一个国家有某个人是自费出来旅游，那几乎可以肯定，他并不是要去学习人类，而是要去教育人类。他们并不想获得知识，而只是爱慕虚荣。他们的旅行又如何能够教会他们卸下偏见的枷锁呢？正是因为偏见的缘故他们才会去游历。

To travel to see foreign lands or to see foreign nations are two very different things. The former is the usual aim of the curious, the latter is merely subordinate to it. If you wish to travel as a philosopher you should reverse this order. The child observes things till he is old enough to study men. Man should begin by studying his fellows; he can study things later if time permits.

为了去看他国的领土而游历和为去看其他民族而游历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好奇的人的目的往往是前者，而后者仅仅是次要目的。如果你想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游历的话，就必须颠倒两者的顺序。孩子往往会观察事物，只有长大之后他才能研究人。人们必须从学习自己的伙伴开始，如果时间足够，他可以在之后再研究事物。

It is therefore illogical to conclude that travel is useless because we travel ill. But granting the usefulness of travel, does it follow that it is good for all of us? Far from it; there are very few people who are really fit to travel; it is only good for those who are strong enough in themselves to listen to the voice of error without being deceived, strong enough to see the example of vice without being led away by it. Travelling accelerates the progress of nature, and completes the man for good or evil. When a man returns from

travelling about the world, he is what he will be all his life; there are more who return bad than good, because there are more who start with an inclination towards evil. In the course of their travels, young people, ill-educated and ill-behaved, pick up all the vices of the nations among whom they have sojourned, and none of the virtues with which those vices are associated; but those who, happily for themselves, are well-born, those whose good disposition has been well cultivated, those who travel with a real desire to learn, all such return better and wiser than they went. Emile will travel in this fashion; in this fashion there travelled another young man, worthy of a nobler age; one whose worth was the admiration of Europe, one who died for his country in the flower of his manhood; he deserved to live, and his tomb, ennobled by his virtues only, received no honour till a stranger's hand adorned it with flowers.

因此，如果我们因为自己旅行方式的错误而认为旅行没有用处的话是没有逻辑可言的。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旅行的益处，它是不是对我们所有人都十分有益呢？远不是这样。很少有人是真正适合旅行的。旅行只对那些内心足够强大到不会听从错误的欺骗、足够强大到即使见到了错误的例子也不会有所偏差的人有益。旅行加速了自然的进程，也使得好人和坏人都更加完整。一个人周游世界回来时是什么样子，那么他一生都会是这样的。但是更多人的人回来之后变得更坏了，因为很多人是以邪恶的目的开始旅程的。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且行为不端的年轻人，在他们旅行的过程中会沾染上他们所旅居国家的居民的所有恶习，这些恶习与美德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幸好，那些出身良好、自身性情受到良好培养的年轻人，他们在旅行中抱有良好的学习意愿，因此当他们回来时会变得更善良、更有智慧。爱弥儿将会以这种方式旅行。另一个这样旅行的年轻人，他配得上一个更为高贵的时代。他值得整个欧洲大陆的欣赏与敬重。他为了自己的国家死于人生壮年，无论生死都未曾枉费。他只因自己的美德而光荣，从未获得

任何荣誉，直到一个陌生人为他亲手献上鲜花。

Everything that is done in reason should have its rules. Travel, undertaken as a part of education, should therefore have its rules. To travel for travelling's sake is to wander, to be a vagabond; to travel to learn is still too vague; learning without some definite aim is worthless. I would give a young man a personal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that interest, well-chosen, will also decide the nature of the instruction. This is merely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method I have hitherto practised.

所有通过理性完成的事都有其规则。旅行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同样应该有其规则。从旅行的角度来看，旅行是为了去探索，四处漂泊。为了学习而去游历仍然显得有些模糊，没有明确目标的学习往往是无价值的。我会在年轻人的学习中注入个人兴趣。这种兴趣是经过我精挑细选的，并将会决定指导的本质。但这也只是延续了我一贯践行的方法。

Now after he has considered himself in his physical relations to other creatures, in his moral relations with other men, there remains to be considered his civil relations with his fellow-citizens. To do this he must first study the nature of government in general, then the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and lastly the particular government under which he was born, to know if it suits him to live under it; for by a right which nothing can abrogate, every man, when he comes of age, becomes his own master, free to renounce the contract by which he forms part of the community, by leaving the country in which that contract holds good. It is only by sojourning in that country, after he has come to years of discretion,

that he is supposed to have tacitly confirmed the pledge given by his ancestors. He acquires the right to renounce his country, just as he has the right to renounce all claim to his father's lands; yet his place of birth was a gift of nature, and in renouncing it, he renounces what is his own. Strictly speaking, every man remains in the land of his birth at his own risk unless he voluntarily submits to its laws in order to acquire a right to their protection.

在一个人明白自己与其他生物的自然关系与道德关系之后，他仍需考虑自己与其他公民的公民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首先在总体上学习到自然的体制，然后是学习不同形式的政府，最后才是他所出生的这种特定的体制，这样他才能了解这个体制是否适合他们生存。因为每个人都具有着任何事物都无法废除的权利，当他到了一定的年纪成为自己的主人，就能自由地废弃自己成为社会的一部分的契约，并离开那个认可这份契约的国家。只是因为他仍然生活在那个国家，所以在他懂事之后，他仍然被默认为是确认了祖先所订立的契约。正如他有权放弃对他父亲领地的所有权，他同样有权利离开他的国家。但是他的出生地仍然是自然所赐予的礼物，在离开了这里的同时他也抛弃了他自己的所有物。严格来说，每个人都是冒着风险留在他的出生地的，除非他为了得到权利的保护而自愿臣服于当地的法律。

For example, I should say to Emile, “Hitherto you have lived under my guidance, you were unable to rule yourself. But now you are approaching the age when the law, giving you the control over your property, makes you master of your person. You are about to find yourself alone in society, dependent on everything, even on your patrimony. You mean to marry; that is a praiseworthy intention, it is one of the duties of man; but before you marry you must know what sort of man you want to be, how you wish to

spend your life, what steps you mean to take to secure a living for your family and for yourself; for although we should not make this our main business, it must be definitely considered. Do you wish to be dependent on men whom you despise? Do you wish to establish your fortune and determine your position by means of civil relations which will make you always dependent on the choice of others, which will compel you, if you would escape from knaves, to become a knave yourself?”

举个例子来说，我应该对爱弥儿说。“迄今为止你一直生活在我的指导下，你有能力支配自己。但现在你已经快要到在法律的保护下成为自己主人的年纪，你要对自己的财产加以控制。你将会发现自己在社会上孤身一人，你要依靠一切，甚至是你继承的财产。你将会结婚。这种意图值得称赞，因为这是人类的职责之一。但在你结婚之前，你必须要知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男人，想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保护家人和自己的生活。因为尽管我们不应该将这视为自己的主要职责，但是这是必须要明确考虑到的。你想依赖那些你所看不起的人吗？你希望以公民关系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财产、决定社会地方吗？这会使你总是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在你想躲开坏人的时候迫使你成为一个坏人。

In the next place I would show him every possible way of using his money in trade, in the civil service, in finance, and I shall show him that in every one of these there are risks to be taken, every one of them places him in a precarious and dependent position, and compels him to adapt his morals, his sentiments, his conduct to the example and the prejudices of others.

在下一个地点我会向爱弥儿展示在贸易中、在公民服务中、在金

融中每一种可能运用金钱的方法。我也会告诉他这每一种方法所可能承担的风险、每一种方法会将他置于什么危险或是可靠的境地，要强迫他将他的美德、情感与行为适应于他人的榜样与偏见。

“There is yet another way of spending your time and money; you may join the army; that is to say, you may hire yourself out at very high wages to go and kill men who never did you any harm. This trade is held in great honour among men, and they cannot think too highly of those who are fit for nothing better. Moreover, this profession, far from making you independent of other resources, makes them all the more necessary; for it is a point of honour in this profession to ruin those who have adopted it. It is true they are not all ruined; it is even becoming fashionable to grow rich in this as in other professions; but if I told you how people manage to do it, I doubt whether you would desire to follow their example.

“也有另一种方法来花费时间和钱财。你可以去参军，也就是说，你可能要为了高额的报酬去杀害那些从未伤害过你的人。这种交易是在人们之间以高尚的荣耀进行的。他们对于适合这种事的人总是非常高看。而且，这种职业远远无法让你依赖于其他资源，只会使他们更加必要。因为在这种职业中毁掉其他人适应的一切也是一种光荣。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全都被毁掉。而像其他职业一样，在这个职业里致富正变得更加通行。但如果我告诉你人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怀疑你是否会想模仿他们的示例。

“Moreover, you must know that, even in this trade, it is no longer a question of courage or valour, unless with regard to the ladies; on the contrary, the more cringing, mean, and degraded you

are, the more honour you obtain; if you have decided to take your profession seriously, you will be despised, you will be hated, you will very possibly be driven out of the service, or at least you will fall a victim to favouritism and be supplanted by your comrades, because you have been doing your duty in the trenches, while they have been attending to their toilet.”

“而且，你必须知道，除非是女性，否则甚至在这样的交易中也不再是勇气的问题了。反之，你越是阿谀奉承、越是平庸小气、越是没有品位，就会有越多的荣耀。如果你决定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你反而会被看不起。你会被人憎恨，很可能被取消自己的服务。至少你会成为热爱的受害者，受到同事朋友的排挤，因为当他们在盥洗室梳洗时，你却在你的战壕中尽自己的义务。”

We can hardly suppose that any of these occupations will be much to Emile's taste. “Why,” he will exclaim, “have I forgotten the amusements of my childhood? Have I lost the use of my arms? Is my strength failing me? Do I not know how to work? What do I care about all your fine professions and all the silly prejudices of others? I know no other pride than to be kindly and just; no other happiness than to live in independence with her I love, gaining health and a good appetite by the day's work. All these difficulties you speak of do not concern me. The only property I desire is a little farm in some quiet corner. I will devote all my efforts after wealth to making it pay, and I will live without a care. Give me Sophy and my land, and I shall be rich.”

我们很难预料哪些职业会合爱弥儿的胃口。“为什么呢，”他将这么问，“难道我忘记童年时的快乐了吗？难道我的胳膊没用了吗？难

道我的力量很弱小吗？难道我不知道如何工作吗？你所说的优秀的职业和其他人的愚蠢偏见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知道善良正直才是最值得骄傲的，能够与心爱的人独立生活、在每日工作中保持身体健康与好胃口才是幸福的。你所说的这些困难对我来说不值一提。我只想要偏僻角落的一处小小农庄。我会倾尽心血和金钱使之能有所产出，而我能无忧无虑地生活。只要拥有了苏菲和一小块土地，我就是富足的了。”

“Yes, my dear friend, that is all a wise man requires, a wife and land of his own; but these treasures are scarcer than you think. The rarest you have found already; let us discuss the other.

“是啊，我亲爱的伙伴。一个有智慧的人要求的应该就是这么多，一个妻子和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这些财富远比你想的要神圣。你已经找到了最珍贵的妻子。让我们来谈谈土地吧。

“A field of your own, dear Emile! Where will you find it, in what remote corner of the earth can you say, 'Here am I master of myself and of this estate which belongs to me?' We know where a man may grow rich; who knows where he can do without riches? Who knows where to live free and independent, without ill-treating others and without fear of being ill-treated himself! Do you think it is so easy to find a place where you can always live like an honest man? If there is any safe and lawful way of living without intrigues, without lawsuits, without dependence on others, it is, I admit, to live by the labour of our hands, by the cultivation of our own land; but where is the state in which a man can say, 'The earth which I dig is my own?' Before choosing this happy spot, be sure that you will find the peace you desire; beware lest an unjust government, a

persecuting religion, and evil habits should disturb you in your home. Secure yourself against the excessive taxes which devour the fruits of your labours, and the endless lawsuits which consume your capital. Take care that you can live rightly without having to pay court to intendents, to their deputies, to judges, to priests, to powerful neighbours, and to knaves of every kind, who are always ready to annoy you if you neglect them. Above all, secure yourself from annoyance on the part of the rich and great; remember that their estates may anywhere adjoin your Naboth's vineyard. If unluckily for you some great man buys or builds a house near your cottage, make sure that he will not find a way, under some pretence or other, to encroach on your lands to round off his estate, or that you do not find him at once absorbing all your resources to make a wide highroad. If you keep sufficient credit to ward off all these disagreeables, you might as well keep your money, for it will cost you no more to keep it. Riches and credit lean upon each other, the one can hardly stand without the other.

“亲爱的爱弥儿！一块属于你自己的土地。你将在哪里发现这么一块土地呢？如果是在地球的一个遥远角落里，你能够说，‘在这里我是自己和属于我的土地的主人’这种话吗？我们知道在哪里人们能够获得金钱，但谁知道在哪里我们能不需要金钱活下去呢？又有谁知道在哪里我们能自由而独立地生活，既不必虐待他人，也不怕虐待自己？你觉得能够找到一块使你永远像一个诚恳的人活着的地方很容易吗？如果真的什么安全而合法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不需要密谋计划、不需要提请法律、不需要依赖他人的，那么我认为就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来谋生、靠自己的土地的生产来谋生。但是在哪一个国家人们可以说‘我所耕种的土地就是我自己的’这种话呢？在做出选择找到一处幸福处所之前，你要确信自己找到了自己所渴望的地方。你要小心有不公正的政府、宗教迫害和恶习会打扰你的人生。你要保护自己免受苛捐杂税，它们会夺走的你劳动果实。而无尽的控诉则会耗尽你的财

富。你要公正地生活，而阿谀奉承管理者、代表、法官、牧师、强势的邻居和所有的无耻之徒。如果你忽略了这些人，他们总是愿意打扰你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护自己免受有钱有势的人的打扰。你那拿伯的葡萄园可能毗邻着他们的土地。如果不凑巧，有权势的人买下了你的小屋附近的土地，或是要建造房屋，你要保证他不会找到方法，通过借口和其他手段来吞并你的土地以扩展他的地产。或者他会不会因为要拓展一条道路而吞并你所有的资产。如果你能有十足的把握避开这些讨厌的事，你就要存钱，因为这会使你花销很大而无法存下钱。财富和声誉相互依存，离开对方都无法存在。

“I have more experience than you, dear Emile; I see more clearly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way of your scheme. Yet it is a fine scheme and honourable; it would make you happy indeed. Let us try to carry it out. I have a suggestion to make; let us devote the two years from now till the time of your return to choosing a place in Europe where you could live happily with your family, secure from all the dangers I have just described. If we succeed, you will have discovered that true happiness, so often sought for in vain; and you will not have to regret the time spent in its search. If we fail, you will be cured of a mistaken idea; you will console yourself for an inevitable ill, and you will bow to the law of necessity.”

“亲爱的爱弥儿，我的人生经历比你丰富。在你的计划中我能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困难。但这仍然是一个精致的、值得尊敬的计划。它确实会让你幸福。让我们试着实行它吧。我有一个建议给你。从现在起到你回到苏菲身边，我们可以花两年时间在欧洲大陆上寻找一处适合你的土地，在那里你会和家人生活得很幸福，并且免受一切我所提及的干扰。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么你就会发现真正的幸福，那种人们苦苦寻找但总是白费力气的幸福，而你也不会后悔在这搜寻中浪费的时间。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你也不会再受这种错误的观点影响。你将

安慰自己所遇到的不可避免的痛苦，而你也会臣服于必要性这一法则。

I do not know whether all my readers will see whither this suggested inquiry will lead us; but this I do know, if Emile returns from his travels, begun and continued with this end in view, without a full knowledge of questions of government, public moralit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every kind, we are greatly lacking, he in intelligence and I in judgment.

我不知道我的读者们是否能看到这个建议会把我们领向何处。但是我知道的是，如果爱弥儿带着这种目的开始游历并始终坚持这种目的，当他结束游历回来时，对管理问题，公共道德和各式各样的政治哲学他若还没有充分的了解，那我们就都有很大欠缺，他缺的是智慧，而我缺的是判断。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is and probably always will be unknown. Grotius, our leader in this branch of learning, is only a child, and what is worse an untruthful child. When I hear Grotius praised to the skies and Hobbes overwhelmed with abuse, I perceive how little sensible men have read or understood these author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ir principles are exactly alike, they only differ in their mode of expression. Their methods are also different: Hobbes relies on sophism; Grotius relies on the poets; they are agreed in everything else. In modern time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have created this vast and useless science was the illustrious Montesquieu. But he was not concerned with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law; he was content to deal with the positive laws of settled governments; and nothing could be more different than these two branches of study.

政治学现在是而且可能一直是未知的。格劳秀斯是这个学派分支的领导人物，但他只是一个孩子，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一个虚伪的孩子。当我听说格劳秀斯被大家捧上了天而霍布斯却饱受骂名时，我感到很少有感性的人们阅读、理解这些作家的作品。事实上，他们的观点是相近的，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的阐释方式。他们的方法也是不同的：霍布斯习惯用诡辩，而格劳秀斯却依赖于诗歌。但他们对其他事的理解都是相同的。现代社会唯一可以创建这种广泛而无益的学说的就是著名的孟德斯鸠了。但是他没有关注到政治法令的原则。他只满足于处理政府间的成文法令，而这两种不同的学术分支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

Yet he who would judge wisely in matters of actual government is forced to combine the two; he must know what ought to be in order to judge what is. The chief difficulty in the way of throwing light upon this important matter is to induce an individual to discuss and to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How does it concern me; and what can I do?” Emile is in a position to answer both.

但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想按照一个政府实际的情况来明智地研究它们，那他就要将这两门学问结合起来。为了判断一件事物他首先必须知道这件事物究竟是什么。在阐明这个重要事实中最主要的困难在于要引发大众的讨论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它与我有何关系？而我能做什么？”爱弥儿处于两者都要回答的位置上。

The next difficulty is due to the prejudices of childhood, the principles in which we were brought up; it is due above all to the partiality of authors, who are always talking about truth, though

they care very little about it; it is only their own interests that they care for, and of these they say nothing. Now the nation has neither professorships, nor pensions, nor membership of the academies to bestow. How then shall its rights be established by men of that type? The education I have given him has removed this difficulty also from Emile's path. He scarcely knows what is meant by government; his business is to find the best; he does not want to write books; if ever he did so, it would not be to pay court to those in authority, but to establish the rights of humanity.

另一个困难是由于童年时期的偏见，也就是伴随我们长大的那些原则，但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作家们的偏见。他们总是会讨论真理，尽管他们对其并不在意。他们唯一在乎的就是他们的个人利益，虽然他们从不提及。这个国家中既没有教授职位、也没有抚恤金，或是可以安放他们的学院席位。如此一来，这样的人又如何能决定这个国家里人民的权利呢？而我所给予爱弥儿的教育也将这块绊脚石从他的道路上移走了。他刚刚明白政府是什么意思时，他就想要找出最好的政府。他并不想著书立说。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也不是为了去阿谀权贵，而是为了捍卫人权。

There is a third difficulty, more specious than real; a difficulty which I neither desire to solve nor even to state; enough that I am not afraid of it; sure I am that in inquiries of this kind, great talents are less necessary than a genuine love of justice and a sincere reverence for truth. If matters of government can ever be fairly discussed, now or never is our chance.

而第三个困难是徒有其表而无实的。这个困难我不想解决，甚至不愿描述。我只是不害怕就可以了。当然我正在调查它。伟大的天赋

其实并不如对于正义的热爱和对真理的真诚和敬重更必须。如果政府的问题能够被公正地谈论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机会来做这些事了。

Before beginning our observations we must lay down rules of procedure; we must find a scale with which to compare our measurements. Ou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law are our scale. Our actual measurements are the civil law of each country.

在开始我们的观察之前，我们必须制定一些规则和步骤。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标准，能够与我们的度量相比较。政治法律的原则是我们的标准。我们真正的度量是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法律。

Our elementary notions are plain and simple, being taken directly from the nature of things. They will take the form of problems discussed between us, and they will not be formulated into principles, until we have found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of our problems.

我们初步的观念从事物的性质中自然养成的，这些观念简单而明了。问题的形式将这样被确定下来，我们会来讨论。而在我们找到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之前，它们也无法以规则来表达。

For example, we shall begin with the state of nature, we shall see whether men are born slaves or free, in a community or independent; is their association the result of free will or of force? Can the force which compels them to united action ever form a permanent law, by which this original force becomes binding, even

when another has been imposed upon it, so that since the power of King Nimrod, who is said to have been the first conqueror, every other power which has overthrown the original power is unjust and usurping, so that there are no lawful kings but the descendants of Nimrod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or if this original power has ceased, has the power which succeeded it any right over us, and does it destroy the binding force of the former power, so that we are not bound to obey except under compulsion, and we are free to rebel as soon as we are capable of resistance? Such a right is not very different from might; it is little more than a play upon words.

举例来说，我们会从自然的状态入手。那么我们要知道人们出生时究竟是受奴役的还是自由地，是出生在一个社会中还是独立的，他们的联合是由于自由意愿还是强迫的。那些强迫他们联合行动的力量也能形成一条永久的法律吗？即使在另一条法令的压制下，原始的力量在这部法律下具有了约束力。所以作为据说第一个征服者的宁录王，即使其他力量被加制在原始力量之上，仍然是不正义的、篡权的。因此除了宁录王的后裔和他们的代表者之外，其他的王都是不合法的。而如果原始力量被制止，继承它的能力超过了我们，而毁坏了前者的约束力。那么我们除了被迫便不必遵循这种力量。而我们一有能力反抗，就能自由地反叛了。这种权利与力量是完全不同的。这只是一个文字游戏罢了。

We shall inquire whether man might not say that all sickness comes from God, and that it is therefore a crime to send for the doctor.

我们要弄清楚，人们是不是不可以说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上帝带来的，因此也不可以说请医生看病是犯罪。

Again, we shall inquire whether we are bound by our conscience to give our purse to a highwayman when we might conceal it from him, for the pistol in his hand is also a power.

再者，我们要弄清楚当我们遇到拦路抢劫时，当我们本可以把钱包藏起来时，但因为他手里有枪就把钱包交给他时我们的神志是否仍旧清醒。

Does this word power in this context mean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a power which is lawful and therefore subject to the laws to which it owes its being?

这个词的力量在这内容里意味着什么不同于合乎法律的力量的事物吗？因此要遵循制定出它来的法令吗？

Suppose we reject this theory that might is right and admit the right of nature, or the authority of the father, as the foundation of society; we shall inquire into the extent of this authority; what is its foundation in nature? Has it any other grounds but that of its usefulness to the child, his weakness, and the natural love which his father feels towards him? When the child is no longer feeble, when he is grown-up in mind as well as in body, does not he become the sole judge of what is necessary for his preservation? Is he not therefore his own master, independent of all men, even of his father himself? For is it not still more certain that the son loves himself, than that the father loves the son?

假设我们拒绝接受强权即权利的理论并承认自然的权利或是天父的权威才是社会的基础，那么我们要研究这种权威的延伸。在自然中又是以什么为基础呢？如果说除了对于孩子的益处和他的柔弱以及父亲对于孩子自然的爱，它还有什么存在的基础吗？如果孩子不再是脆弱的，他的心智和身体都有所成长，那么对他的保护是否必要他就成了唯一的判断者吗？那么，他会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再依赖其他人，甚至是他的父亲吗？难道不是因为一个孩子远比他的父亲要爱自己吗？

The father being dead, should the children obey the eldest brother, or some other person who has not the natural affection of a father? Should there always be, from family to family, one single head to whom all the family owe obedience? If so, how has power ever come to be divided, and how is it that there is more than one head to govern the human race throughout the world?

如果父亲去世，孩子们应该听从长兄或是其他对他们没有天然的父亲的爱的人吗？难道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终究只有一个家长而其他人必须服从于他吗？如果真的这样，那么权利如何被区分？如果整个世界由不同的人领导人类，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Suppose the nations to have been formed each by its own choice; we shall then distinguish between right and fact; being thus subjected to their brothers, uncles, or other relations, not because they were obliged, but because they choose, we shall inquire whether this kind of society is not a sort of free and voluntary association?

假设国家是由人的选择而建立的，那么我们要在正确和真相之间作出区分。顺从自己的兄弟、伯父或是其他的亲友，并不是因为被强迫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要明白，这种社会是否是一种自由自愿的结合呢？

Taking next the law of slavery, we shall inquire whether a man can make over to another his right to himself, without restriction, without reserve, without any kind of conditions; that is to say, can he renounce his person, his life, his reason, his very self, can he renounce all morality in his actions; in a word, can he cease to exist before his death, in spite of nature who places him directly in charge of his own preservation, in spite of reason and conscience which tell him what to do and what to leave undone?

其次，如果我们谈到奴隶的法律，我们要弄清楚一个人是否既无约束、也无保留、甚至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将自己的权利放在他人之上？也就是说，他能否放弃自己个人、生命、理性和自身？他能否放弃行动中所有的道德？总之，就算自然要求他直接管理自己，就算理性与良知告诉他要做什么而什么不能做，他能否在死亡之前就停止自己的存在？

If there is any reservation or restriction in the deed of slavery, we shall discuss whether this deed does not then become a true contract, in which both the contracting powers, having in this respect no common master [2_10] , remain their own judge as 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contract, and therefore free to this extent, and able to break the contract as soon as it becomes hurtful.

如果在奴役行为中还有任何的保留和限制的话，我们就要讨论这种行为是否能成为有效的契约，是否能约束契约双方，而从这个角度看并没有共同的主人 [3_10] ，他们能否保留自己对于契约条款的判断，以便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即一旦契约对自己有害便放弃这段契约。

If then a slave cannot convey himself altogether to his master, how can a nation convey itself altogether to its head? If a slave is to judge whether his master is fulfilling his contract, is not the nation to judge whether its head is fulfilling his contract?

如果一个奴隶无法将自己的权利全都交给主人，那么一个国家又怎么能把所有权利都交给其领导？如果一个奴隶要判断主人是否完成契约，那么一个国家又怎么能不去判断其领导是否完成契约？

Thus we are compelled to retrace our steps, and when we consider the meaning of this collective nation we shall inquire whether some contract, a tacit contract at the least, is not required to make a nation, a contract anterior to that which we are assuming.

因此我们被迫追溯我们的脚步，当我们在考虑联合国家的意义时，我们应该弄清楚一个国家的建立，在我们所说的契约出现之前是否需要某些契约，至少是约定俗成的默契。

Since the nation was a nation before it chose a king, what made it a nation, except the social contract? Therefore the social

contract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civil society, and it is in the nature of this contract that we must seek the nature of the society formed by it.

既然一个国家在选择国王之前就已经建立，那么除了社会契约之外还有什么能成就一个国家呢？因此社会契约才是所有文明社会的基础。我们必须在这种契约的性质中寻找以此构成的社会的性质。

We will inquire into the meaning of this contract; may it not be fairly well expressed in this formula? As an individual every one of us contributes his goods, his person, his life, to the common stock, under the supreme direction of the general will; while as a body we receive each member as an indivisible part of the whole.

我们将会探讨这种契约的意义。它是否能在规则中清楚地表达出来？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将自己的财产、身体和生命献给了共同的集体，听从全体意志的最高领导。而作为集体的一份子，我们被视为整体不可分割的存在。

Assuming this, in order to define the terms we require, we shall observe that, instead of the individual person of each contracting party, this deed of association produces a moral and collective body, consisting of as many members as there are votes in the Assembly. This public personality is usually called the body politic, which is called by its members the State when it is passive, and the Sovereign when it is active, and a Power when compared with its equals. With regard to the members themselves, collectively they are known as the nation, and individually as citizens as members of

the city or partakers in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subjects as obedient to the same authority.

试猜想，为了定义我们需要的这个名词，我们要观察联合而不是分裂的个体能否提供一个有道德的联合体，其中包括了在集会中投票者的所有个体。这种公共的人格通常会被称为政治体。如果它是消极被动的，就会被其成员称为“国家”；而如果它是主动的，就被称为“主权”；当它与同类相比较时，则会被称为“政权”。考虑到其中的成员，他们在联合时被称为国家，而视为个体时则被称为公民、城市的一员或是主权的参与者，当他们服从于同一个权利中心时就被称为属民。

We shall note that this contract of association includes a mutual pledge on the part of the public and the individual; and that each individual, entering, so to speak, into a contract with himself, finds himself in a twofold capacity, i. e., as a member of the sovereign with regard to others, as member of the state with regard to the sovereign.

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联合的契约包括了公众与个人双方的誓言。可以说，每一个公民是在与自己签立契约，将自己置于一个两重的力量中。举例来说，对他人来说他是一个主权的成员，而对于主权来说他是国家的一员。

We shall also note that while no one is bound by any engagement to which he was not himself a party, the general deliberation which may be binding on all the subjects with regard to the sovereign, because of the two different relations under which each of them is envisaged, cannot be binding on the state with

regard to itself. Hence we see that there is not, and cannot be, any other fundamental law, properly so called, except the social contract only.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body politic cannot, in certain respects, pledge itself to others; for in regard to the foreigner, it then becomes a simple creature, an individual.

同样我们要指出，当一个人并不是以个人身份签立契约，那么他就不应该受其束缚。公众的商议在不同的设想下建立的两种不同关系下，只有在主权问题上才能对属民具有约束力，而不能对一个国家有约束力。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我们所说的社会契约之外，没有也绝不能有另外的基本法了。这不是说政治体在一定情况下无法向其他政治体订立契约。而是对于外国人来说，政治体只是一个简单的存在、一个个体。

Thus the two contracting parties, i. e., each individual and the public, have no common superior to decide their differences; so we will inquire if each of them remains free to break the contract at will, that is to repudiate it on his side as soon as he considers it hurtful.

因此契约双方，个人和公众没有一个共同的更高级能决定他们的区别。因此我们将会讨论他们是否能凭自由意愿违背契约，一旦发现有害，能否在自己的角度否定契约。

To clear up this difficulty, we shall observe that,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pact, the sovereign power is only able to act through the common, general will; so its decrees can only have a general or common aim; hence it follows that a private individual cannot be

directly injured by the sovereign, unless all are injured, which is impossible, for that would be to want to harm oneself. Thus the social contract has no need of any warrant but the general power, for it can only be broken by individuals, and they are not therefore freed from their engagement, but punished for having broken it.

为了消除这个困难，我们要考虑到根据社会契约，主权只能通过公众意志执行。因此它的裁决便只具有公共目的。所以说，个人绝不会被主权直接伤害。除非所有的个人都受到主权伤害，但这个情况绝不可能发生，毕竟没有人愿意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社会契约并不需要任何保证，它只需要公众权利。因为它只会被公众联合起来摧毁。但是如果他们毁坏了契约，并不会由此解放，反而会因此受到惩罚。

To decide all such questions rightly, we must always bear in mind that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pact is private and peculiar to itself, in that the nation only contracts with itself, i. e., the people as a whole as sovereign, with the individuals as subjects; this condition is essential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working of the political machine, it alone makes pledges lawful, reasonable, and secure, without which it would be absurd, tyrannical, and liable to the grossest abuse.

为了公正地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始终铭记社会契约的性质是私密而奇特的，一个国家只会与自己订立契约。比如说，所有的公民整体作为主权者与所有的个人作为属民来订立契约。对于政治机器的构建与运行来说这种条件是必须的。它会使保证更加合法、合理而且安全，而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就会变得不合理、专制且可能产生大量的腐败。

Individuals having only submitted themselves to the sovereign, and the sovereign power being only the general will, we shall see that every man in obeying the sovereign only obeys himself, and how much freer are we under the social part tha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个人只需要服从于主权者，而主权者只会是公众意志。我们就能发现每个服从主权的人就是服从于他自己，在社会条件下而不是自然状态的国家中我们会更加自由。

Having compared natural and civil liberty with regard to persons, we will compare them as to property, the rights of ownership and the rights of sovereignty, the private and the common domain. If the sovereign power rests upon the right of ownership, there is no right more worthy of respect; it is inviolable and sacred for the sovereign power, so long as it remains a private individual right; as soon as it is viewed as common to all the citizens, it is subject to the common will, and this will may destroy it. Thus the sovereign has no right to touch the property of one or many; but he may lawfully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of all, as was done in Sparta in the time of Lycurgus; while the abolition of debts by Solon was an unlawful deed.

在比较了个人自然和社会的自由后，我们要在财产方面对它们做出比较。即所有权与统治权、个人与公共占有的比较。如果统治权是建立在所有权的基础上的话，那么所有权则是最值得尊重的了。只要它保持着个人的权利，对于统治权来说它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它一旦被视为是所有公民共有的权利，服从于公共意志，那么这种意志

可能会毁掉这个权利。因此统治权不应当触碰到个人或多人的财产。但是像是在来库古改革时期的斯巴达，他可能合法占有所有人的财产。而梭伦对于债务的废除就是一个不合法的举动了。

Since nothing is binding on the subjects except the general will, let us inquire how this will is made manifest, by what signs we may recognise it with certainty, what is a law, and what are the true characters of the law? This is quite a fresh subject; we have still to define the term law.

既然除了公众意志外没有任何可以束缚属民，那么让我们探讨一下，这种意愿如何表达？我们通过什么标志能确认公众意志呢？什么是法律，而法律的真正性质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我们仍需定义法律这个词。

As soon as the nation considers one or more of its members, the nation is divided. A relation i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whole and its part which makes of them two separate entities, of which the part is one, and the whole, minus that part, is the other. But the whole minus the part is not the whole; as long as this relation exists, there is no longer a whole, but two unequal parts.

一旦国家为一个人或是几个人考虑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是分裂的了。在整体与部分之间订立的关系使得两者成为分裂的存在，这个关系中，部分是一个个体，而整体除去部分之后，是另一个个体。但是整体减去部分后就不再完整。一旦这种关系存在，就不再有整体，而是两个不平等的部分。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whole nation makes a law for the whole nation, it is only considering itself; and if a relation is set up, it is between the whole community regarded from one point of view, and the whole community regarded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without any division of that whole. Then the object of the statute is general, and the will which makes that statute is general too. Let us see if there is any other kind of decree which may bear the name of law.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整体的国家是为整体来制定法令，那它就只考虑到自己。而如果这段关系是在一个观点下的整体和另一个观点下的整体之间订立的，整体并未分裂。那么法令订立的目的是为了公众，而公众意志同样使法令是普遍的。让我们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种类的法令可以称得上是法律吧。

If the sovereign can only speak through laws, and if the law can never have any but a general purpose, concerning all the members of the state, it follows that the sovereign never has the power to make any law with regard to particular cases; and ye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tate that particular oases should also be dealt with; let us see how this can be done.

如果主权只能通过法律来表达，而法律始终表达的是公众意志，考虑到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那么它要遵循主权不应为任何特例而制定法律。但为了保护一个国家，特例也必须进行特殊处理。我们来看看要怎么做到这一点吧。

The decrees of the sovereign can only be decrees of the general

will, that is laws; there must also be determining decrees, decrees of power or government, for the execution of those laws; and these, on the other hand, can only have particular aims. Thus the decrees by which the sovereign decides that a chief shall be elected is a law; the decree by which that chief is elected, in pursuance of the law, is only a decree of government.

主权者制定的法令只能是公众意志的法令，即法律。也必须要有决定性的法令、管理政府或权利的法令以便于法律的执行。另一方面，法律应当是有特殊目的的。因此通过法令主权决定其领导者应当由选举产生就是法律，而为了选举领导者而执行法律的条例就只是政府的法令。

This is a third relation in which the assembled people may be considered, i. e., as magistrates or executors of the law which it has passed in its capacity as sovereign [2_11] .

这就是联合起来的人们可能会考虑的第三种关系了。比如作为法官或是法律的执行者，法律已经将主权转交给他们 [3_11] 。

We will now inquire whether it is possible for the nation to deprive itself of its right of sovereignty, to bestow it on one or more persons; for the decree of election not being a law, and the people in this decree not being themselves sovereign, we do not see how they can transfer a right which they do not possess.

我们将探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否可能剥夺自身的统治权，以将

其赠与某一人或几人。因为选举的法令不一定就是法律，而在这一条法令中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主权者，我们无法获知他们怎样转换自己不能拥有的权利。

The essence of sovereignty consisting in the general will, it is equally hard to see how we can be certain that an individual will shall always be in agreement with the general will. We should rather assume that it will often be opposed to it; for individual interest always tends to privileges, while the common interest always tends to equality, and if such an agreement were possible, no sovereign right could exist, unless the agreement were either necessary or indestructible.

统治权的精髓在于公众意志，我们同样难以确保个人意愿总是与公众意愿相一致。我们更应假设个人意志往往与公众意志相反。因为个人利益总是期待特权，而共同利益则向往平等。如果说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可能一致，那么除非它是必然而不可毁灭的，否则统治权就不应该存在。

We will inquire if, without violating the social pact, the heads of the nation, under whatever name they are chosen, can ever be more than the officers of the people, entrusted by them with the duty of carrying the law into execution. Are not these chiefs themselves accountable for their administration, and are not they themselves subject to the laws which it is their business to see carried out?

我们将要考虑，如果在不违背社会契约的情况下，无论国家的领

导人是以怎样的名义当选的，他们是否能够高于人民所委托将法律实施的官员。如果领导人们对他们的管理负责，那么他们是否会服从于他们所需要去执行的法律呢？

If the nation cannot alienate its supreme right, can it entrust it to others for a time? Cannot it give itself a master, cannot it find representative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and deserves discussion.

如果一个国家无法让渡其最高权力，那它能否将其暂时委托给其他国家呢？它不能找一个主人吗？它不能找到代表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讨论。

If the nation can have neither sovereign nor representatives we will inquire how it can pass its own laws; must there be many laws; must they be often altered; is it easy for a great nation to be its own lawgiver?

如果一个国家既无主权也无代表，我们就要问他们如何通过自己的法律。这个国家必须要有许多法律，而它们必须要经常修改。对一个伟大的国家来说做自己的立法者谈何容易？

Was not the Roman people a great nation?

罗马人难道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吗？

Is it a good thing that there should be great nations?

成为伟大的民族有什么益处吗？

It follows from considerations already established that there is an intermediate body in the state between subjects and sovereign; and this intermediate body, consisting of one or more members, is entrusted with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carrying out of the law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civil and political liberty.

从我们的讨论中得出如下观点，一个国家与之属民和主权之间有一个中间体，它包括了一或多名成员，并获授权进行公众管理、法律执行以及公民与政治自由的保护。

The members of this body are called magistrates or kings, that is to say, rulers. This body, as a whole,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its members, is called the prince, and considered in its actions it is called the government.

这个中间体的成员被称为长官或国王，也就是我们说的统治者。作为一个整体的中间体按其成员关系来说被称为执政者，按其行为来说被称为政府。

If we consider the action of the whole body upon itself, that is to say, the relation of the whole to the whole, of the sovereign to the state, we can compare this relation to that of the extremes in a

proportion of which the government is the middle term. The magistrate receives from the sovereign the commands which he gives to the nation, and when it is reckoned up his product or his power is in the same degree as the product or power of the citizens who are subjects on one side of the proportion and sovereigns on the other. None of the three terms can be varied without at once destroying this proportion. If the sovereign tries to govern, and if the prince wants to make the laws, or if the subject refuses to obey them, disorder takes the place of order, and the state falls to pieces under despotism or anarchy.

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体的行为视为它自己的，也就是说是整体对整体的关系、主权对国家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比作是在一个比例式中以政府为中间项的其他两项。当计算出的乘积或是权利与公民的乘积相等，公民一方面是比例式中的属民，另一方面也是主权，法官从主权者处接受给国家的命令。如果三项中任一项被改变，那么比例就会被破坏。如果主权者试图去统治，而执政者想要颁布法律，或是属民拒绝听从他们的指令，那么秩序将会被混乱所取代，而国家会在暴虐专制或无政府状态下四分五裂。

Let us suppose that this state consists of ten thousand citizens. The sovereign can only be considered collectively and as a body, but each individual, as a subject, has his private and independent existence. Thus the sovereign is as ten thousand to one; that is to say, every member of the state has, as his own share, only one ten-thousandth part of the sovereign power, although he is subject to the whole. Let the nation be composed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men, the position of the subjects is unchanged, and each continues to bear the whole weight of the laws, while his vote, reduced to the one hundred-thousandth part, has ten times less influence in the

making of the laws. Thus the subject being always one, the sovereign is relatively greater as the number of the citizens is increased. Hence it follows that the larger the state the less liberty.

让我们来假设这个国家有一万公民。主权者只能被视为一个集合体，但每一个个人作为属民是个人独立存在的。因此主权者对属民就相当于一万对一。也就是说，尽管国家内的每一个成员都服从于整体，但他享有万分之一的主权。假设一个国家有十万人口，属民的地位保持不变，而每个人继续承担法律的全部重担。而他的投票却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效力，对于法令的制定的影响就缩小十倍。因此属民始终是一个个体，主权者则随着公民的增加而更加强大。所以一个国家越大，个人的自由就会随之减少。

Now the greater the disproportion between private wishes and the general will, i. e., between manners and laws, the greater must be the power of repressi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greatness of the state gives the depositaries of public authority greater temptations and additional means of abusing that authority, so that the more power is required by the government to control the people, the more power should there be in the sovereign to control the government.

在个人意愿与公众意志之间的不平衡逐渐加大，比如个人行为与法律的差异越大，法律对人的压迫就越多。另一方面，国家的强大会使其权力管理者有更多滥用职权的倾向与途径。因此政府越是要求更多的职权来掌控人民，主权者就要更多的权利掌握政府。

From this twofold relation it follows that the continued

proportion between the sovereign, the prince, and the people is not an arbitrary idea, but a consequence of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Moreover, it follows that one of the extremes, i. e., the nation, being constant, every time the double ratio increases or decreases, the simple ratio increases or diminishes in its turn; which cannot be unless the middle term is as often changed. From this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absolute form of government, but there must be as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as there are states of different size.

从这个两重的关系来看，在主权者、执政者和人民之间的持续的比例并不是随机形成的，而是国家性质的结果。而且，两个极端之一，比如人民保持不变，每当复比增加或减少，单比就会随着增加或减少，而中项则是始终在改变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政府不存在单一绝对的形式，有多少种不同的国家形式，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政府。

If the greater the numbers of the nation the less the ratio between its manners and its laws, by a fairly clear analogy, we may also say, the more numerous the magistrates, the weaker the government.

如果人口的数量越大，行为与法律的比率就越小。由此类比，我们可以说，政府的执政人员越多，政府的能力就越弱。

To make this principle clearer we will distinguish three essentially different wills in the person of each magistrate; first, his own will as an individual, which looks to his own advantage only;

secondly, the common will of the magistrates, which is concerned only with the advantage of the prince, a will which may be called corporate, and one which is general in relation to the government and particular in relation to the state of which the government forms part; thirdly, the will of the people, or the sovereign will, which is general, as much in relation to the state viewed as the whole as in relation to the government viewed as a part of the whole. In a perfect legislature the private individual will should be almost nothing; the corporate will belonging to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quite subordinate, and therefore the general and sovereign will is the master of all the others.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natural order, these different wills become more and more active in proportion as they become centralised; the general will is always weak, the corporate will takes the second place, the individual will is preferred to all; so that every one is himself first, then a magistrate, and then a citizen; a series just the opposite of that required by the social order.

为了更清楚的阐明这一点，我们将会区分每一个行政者所具有的三种重要的不同意志。首先是他的个人意志，只在乎他的个人利益；其次是作为行政者的共同意志，在意的只是执政者的利益，可以说这是公共意志，对于政府的关系的来说是普遍的，但对于政府作为一个部分的国家的关系来说是特殊的；第三则是人民的意志，或者说主权意志。这对于国家整体的关系或是政府作为部分的关系来说都是普遍的。在理想的立法机构中，独立个人几乎无足轻重。政府的公共意志也是次要的，因而公众的主权意志才是其他所有的领导者。另一方面，从自然秩序来看，这些不同的意志越是中心化，就越主动活跃。公众意志往往是薄弱的，公共意志则会居次位，而个人意志胜过一切。因此每个人首先是自己，其次是行政者，最后才是公民。这个顺序与社会秩序所要求的顺序是完全相反的。

Having laid down this principle, let us assum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in the hands of one man. In this case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rporate will are absolutely one, and therefore this will has reached the greatest possible degree of intensity. Now the use of power depends on the degree of this intensity, and as the absolut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is always that of the people, and therefore invariable, it follows that the rule of one man is the most active form of government.

说明了这一点后，让我们假设政府是由一个人掌握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与公共意志其实是同一种意志，因此这种意志便达到了最高的强度。现在权利的使用由其强度决定，而政府的绝对的权利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且是保持不变的，那么政府的最活跃形式实际是由一人掌控的。

If, on the other hand, we unite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supreme power, and make the prince the sovereign and the citizens so many magistrates, then the corporate will is completely lost in the general will, and will have no more activity than the general will, and it will leave the individual will in full vigour. Thus the government, though its absolute force is constant, will have the minimum of activity.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政府和最高权力结合起来，将执政者作为主权者，公民作为行政者，那么公共意志就会在公众意志中完全沦陷，它将无法比公众意志更为活跃，并使个人意志充满活力。如此一来，尽管政府的绝对权力保持不变，但是却是最不活跃的。

These rules are incontestable in themselves, and other considerations only serve to confirm them. For example, we see the magistrates as a body far more active than the citizens as a body, so that the individual will always counts for more. For each magistrate usually has charge of some particular duty of government; while each citizen, in himself, has no particular duty of sovereignty. Moreover, the greater the state the greater its real power, although its power does not increase because of the increase in territory; but the state remaining unchanged, the magistrates are multiplied in vain, the government acquires no further real strength, because it is the depositary of that of the state, which I have assumed to be constant. Thus, this plurality of magistrates decreases the activity of the government without increasing its power.

这些法则对它们自己来说是无可争辩的。其他的讨论也只是为了证明这些法则。举例来说，我们把行政者视为一个群体，而把公民视为一个群体，前者比后者要活跃得多。因此个人意志总是更为重要。对于每个行政者来说，他们往往承担了政府的一些特殊职责。而对于每一个公民却没有承担特殊的主权责任。而且，一个国家越强大，虽然权力并不因领土的扩张而增长，但国家的真实权力就越大。但是国家保持不变，行政者却突然增长，政府无法获得更多实权。因为当我们假设国家保持不变，政府对于国家来说只是受到委托。因此，行政者增加反而减少了政府的活跃度，而无法增强其权力。

Having found that th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is relaxed in proportion as the number of magistrates is multiplied, and that the more numerous the people, the more the controlling power must be increased, we shall infer that the ratio between the magistrates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inverse to that between subjects and sovereign, that is to say, that the greater the state, the smaller the

government, and that in like manner the number of chiefs should be diminished because of the increased numbers of the people.

我们已经发现，随着行政者的数量增长，政府的权力会逐步松懈。而行政者的数量越多，其控制能力就越为增长。我们由此推出，行政者与政府之间的比率应当与属民与主权者之间的比率相反。也就是说，国家越强大，政府越小。正如领导者的数量应当随着人民数量的增多而减少。

In order to make this diversity of forms clearer, and to assign them their different names, we shall observe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the sovereign may entrust the care of the government to the whole nation or to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nation, so that there are more citizen magistrates than private citizens. This form of government is called Democracy.

为了使各种形式的差异更为清晰，我们应当为他们分配不同的名字。首先，我们会发现主权可能将掌管国家的权力让渡给全国民众，或是让渡给大部分民众。因此独立公民应当少于公民行政者。我们称这种形式的政府为“民主政府”。

Or the sovereign may restrict the government in the hands of a lesser number, so that there are more plain citizens than magistrates; and this form of government is called Aristocracy.

或者说，主权者可能会将政府限制在少数人手中，因此普通公民会多于行政者。而我们称这种形式的政府为“贵族政府”。

Finally, the sovereign may concentrate the whole government in the hands of one man. This is the third and commonest form of government, and is called Monarchy or royal government.

最终，主权者可能会将整个政府集权于一人手中。这就是第三种，也是我们最为常见的政府。我们称之为“君主政府”或是皇家政府。

We shall observe that all these forms, or the first and second at least, may be less or more, and that within tolerably wide limits. For the democracy may include the whole nation, or may be confined to one half of it. The aristocracy, in its turn, may shrink from the half of the nation to the smallest number. Even royalty may be shared, either between father and son, between two brothers, or in some other fashion. There were always two kings in Sparta, and in the Roman empire there were as many as eight emperors at once, and yet it cannot be said that the empire was divided. There is a point where each form of government blends with the next; and under the three specific forms there may be really as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as there are citizens in the state.

我们会发现，所有的政府形式，至少是前两种形式，可能或多或少的有着宽泛的限制。民主政府可能包括了整个国家的人们，或者可能是其中的一半。而贵族政府则可能将半数缩减至很小的一部分。即使是皇家政府也可能将权力分割在父子、兄弟或其他关系之间。斯巴达过去总是有两位国王。而罗马帝国曾一度有八位皇帝，但我们不能说帝国被瓜分了。但每一种政府形式必然与另一种有一定的共同点。

在三种特殊形式下，可能国家里有多少公民，就会有多少种形式的政府。

Nor is this all. In certain respects each of these governments is capable of subdivision into different parts, each administered in one of these three ways. From these forms in combination there may arise a multitude of mixed forms, since each may be multiplied by all the simple forms.

问题不仅如此。在某些方面来说，这些政府可以被分割为不同的部分，而其管理方式是这三种形式之一。从这样结合起来的形式中，它们可能形成了一种混合形式，而每一种形式都可能是单一形式的混合。

In all ages there have been great disputes as to which is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and people have failed to consider that each is the best in some cases and the worst in others. For ourselves, if the number of magistrates [2_12] in the various states is to be in inverse ratio to the number of the citizens, we infer that generally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is adapted to small states, an aristocratic government to those of moderate size, and a monarchy to large states.

在所有时代，对于政府的最佳形式都有着极大的争论。人们难以抉择，因为在一些情况下是最好的形式，而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是最糟的。对我们来说，如果在各个国家行政者的数量与公民数是呈反比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出，通常来说民主政府适用于小国家，贵族政府适用于中等大小的国家，而君主政府适合大国 [3_12] 。

These inquiries furnish us with a clue by which we may discover what are the duties and rights of citizens, and whether they can be separated one from the other; what is our country, in what does it really consist, and how can each of us ascertain whether he has a country or no?

这种调查使我们获得一个提示，凭此我们可能发现公民的义务与权利，以及他们是否可以被分隔开来。我们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它真正由什么组成？而我们每个人又如何才能获知自己是否有祖国呢？

Having thus considered every kind of civil society in itself, we shall compare them, so as to note their relations one with another; great and small, strong and weak, attacking one another, insulting one another, destroying one another; and in this perpetual action and reaction causing more misery and loss of life than if men had preserved their original freedom. We shall inquire whether too much or too little has not been accomplished in the matter of social institutions; whether individuals who are subject to law and to men, while societies preserve the independence of nature, are not exposed to the ills of both conditions without the advantages of either, and whether it would not be better to have no civil society in the world rather than to have many such societies. Is it not that mixed condition which partakes of both and secures neither?

因此，考虑到各种形式的文明社会，我们要将他们互相比较以便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广大和狭小、强大和弱小、攻击别国、侵犯他国、毁灭别国。在这种无尽的行为与反应中，如果人们保有原始的自由，则会造成更多生命的悲痛与失落。我们要研究社会制度中未完

成的是太多还是太少。当社会保持自然独立时，服从法律或其他人的个人是否不必受到两种情况的侵害。而是不是没有文明社会的世界要胜于有多个文明社会的世界。这种混合的状态不就是分担了两者却任何一者都无法保护吗？

“Per quem neutrum licet, nec tanquam in bello paratum esse, nec tanquam in pace securum.” —Seneca De Trang: Animi, cap. I.

“既不让人做战争时期的准备，也不让人享受和平时期的安宁”——塞涅卡：《论心灵的安宁》第一章

Is it not this partial and imperfect association which gives rise to tyranny and war? And are not tyranny and war the worst scourges of humanity?

部分的不完美的联合不才是暴政与战争的根源吗？而且，暴政与战争难道不是人性最大的困苦吗？

Finally we will inquire how men seek to get rid of these difficulties by means of leagues and confederations, which leave each state its own master in internal affairs, while they arm it against any unjust aggression. We will inquire how a good federal association may be established, what can make it lasting, and how far the rights of the federation may be stretched without destroying the right of sovereignty.

最后，我们将要考虑人们如何通过结盟的途径来躲避这些苦难，每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都有一个领导来处理，而对于任何不公正的侵略则进行武装反抗。我们将讨论怎样才能建立一个优秀的联邦，通过什么办法使之长久，而联合的权利要怎样扩展才能不损害各国主权。

The Abbe de Saint-Pierre suggested an association of all the states of Europe to maintain perpetual peace among themselves. Is this association practicable, and supposing that it were established, would it be likely to last? These inquiries lead us straight to all the ques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may clear up the remaining difficulties of political law. Finally we shall lay down the real principles of the laws of war, and we shall see why Grotius and others have only stated false principles.

圣皮埃尔神父建议建立一个欧洲国家的联合体以保持它们之间长久的和平。这个联合是可行的吗？假设它被建立起来了，它可能维持长久吗？这些疑问将我们直接引向所有关于国际法的问题，以此来解决在政治法令中所遗留的所有困难。最终我们会得出关于战争法的真正条款，而我们也会见到为什么格劳秀斯和其他人阐述了错误的原则。

I should not be surprised if my pupil, who is a sensible young man, should interrupt me saying, “One would think we were building our edifice of wood and not of men; we are putting everything so exactly in its place!” That is true; but remember that the law does not bow to the passions of men, and that we have first to establish the tru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law. Now that our foundations are laid, come and see what men have built upon them; and you will see some strange sights!

我的学生爱弥儿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如果他打断我说，“别人会认为我们在用木头而不是人修建起这栋大厦，我们每一步都如此精准！”我是绝不会惊讶的。的确如此。但是要记住，法律并不会服从于人的欲念。而我们首先要建立政治发的真正原则。既然我们打好了基础，就来看看人们在此之上如何修建的吧。你会看到一些奇怪的景象！

Then I set him to read Telemachus, and we pursue our journey; we are seeking that happy Salentum and the good Idomeneus made wise by misfortunes. By the way we find many like Protesilas and no Philocles, neither can Adrastes, King of the Daunians, be found. But let our readers picture our travels for themselves, or take the same journeys with Telemachus in their hand; and let us not suggest to them painful applications which the author himself avoids or makes in spite of himself.

然后我开始让他阅读《忒勒马科斯历险记》，而我们要继续旅程。我们要去寻找幸福的萨朗特，还有在不幸中变得智慧的伊多梅纽斯。同时我们会找到很多像普罗泰西乌斯的人，却没有人像菲罗克勒斯。而也没有人像多尼安人的国王阿德拉斯特。但是让我们的读者自己来描绘我们的旅途吧。或者在书中与忒勒马科斯一起畅游。我们就不必提起作者自己想要避免或者是不小心做出的痛苦的选择。

Moreover, Emile is not a king, nor am I a god, so that we are not distressed that we cannot imitate Telemachus and Mentor in the good they did; none know better than we how to keep to our own place, none have less desire to leave it. We know that the same task is allotted to all; that whoever loves what is right with all his heart,

and does the right so far as it is in his power, has fulfilled that task. We know that Telemachus and Mentor are creatures of the imagination. Emile does not travel in idleness and he does more good than if he were a prince. If we were kings we should be no greater benefactors. If we were kings and benefactors we should cause any number of real evils for every apparent good we supposed we were doing. If we were kings and sages, the first good deed we should desire to perform, for ourselves and for others, would be to abdicate our kingship and return to our present position.

而且，爱弥儿不是什么国王，我也不是神。所以虽然我们无法像忒勒马科斯和门托尔一样做善事，我们也并不难过。我们自己最清楚自己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位置，我们也最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身份。我们知道所有人都有着相同的使命。而不论是谁，他只要全心全意地热爱着真理并且不遗余力，就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知道忒勒马科斯和门托尔都是虚构的人物形象。爱弥儿不会安逸地四处游历。如果他是个王子，也并不能比他现在做得多。如果我们是国王，我们就可能不会是行善者了。如果我们是国王，同时也是行善者，那么就会因为一些表面上使我们误以为的善事而犯下无数恶行。如果我们是国王，同时也是贤者，那么我们所想要做的第一件善事，对我们自己也对其他人来说，也就是放弃自己王位，回归到我们现在的位子上来。

I have said why travel does so little for every one. What makes it still more barren for the young is the way in which they are sent on their travels. Tutors, more concerned to amuse than to instruct, take them from town to town, from palace to palace, where if they are men of learning and letters, they make them spend their time in libraries, or visiting antiquaries, or rummaging among old buildings transcribing ancient inscriptions. In every country they are busy

over some other century, as if they were living in another country; so that after they have travelled all over Europe at great expense, a prey to frivolity or tedium, they return, having seen nothing to interest them, and having learnt nothing that could be of any possible use to them.

我已经提过为什么游历对很多人来说并没有益处。它对于方法错误的年轻人来说仍然是徒劳无益的。导师关注的更多的是娱乐而不是如何指导，他把学生们从一个城镇带到另一个城镇，从一个建筑带到另一个建筑。如果他们是学者或是文学家，他们就会让学生在图书馆里消磨时间，或者是去拜访古董商人，在古建筑中游历，誊抄古老的碑文。每到一个国家，他们就忙于研究前几个世纪的历史。好像这样他们就生活在其他国家了一样。因此在他们花费颇多游遍欧洲之后，使自己成了小事和厌烦的奴隶就回来了。他们没有见到任何使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也没有学到任何可能有用的事情。

All capitals are just alike, they are a mixture of all nations and all ways of living; they are not the place in which to study the nations. Paris and London seem to me the same town. Their inhabitants have a few prejudices of their own, but each has as many as the other, and all their rules of conduct are the same. We know the kind of people who will throng the court. We know the way of living which the crowds of people and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will produce. As soon as any one tells me of a town with two hundred thousand people, I know its life already. What I do not know about it is not worth going there to learn.

所有的首都都是相似的，它们是所有国民所有生活方式的混合。要研究一个国家的话，首都并不是一个适宜的地方。巴黎和伦敦在我

看来是一样的。那里的居民保持着一定的偏见，彼此之间也有不少相同的偏见。而他们所有的行为准则都是一样的。我们了解这种出入于厅堂之上的人。我们了解群居以及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一有人告诉我一个有着两万人的镇子，我就已经知道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了。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也不值得我再去那里学习。

To study the genius and character of a nation you should go to the more remote provinces, where there is less stir, less commerce, where strangers seldom travel, where the inhabitants stay in one place, where there are fewer changes of wealth and position. Take a look at the capital on your way, but go and study the country far away from that capital. The French are not in Paris, but in Touraine; the English are more English in Mercia than in London, and the Spaniards more Spanish in Galicia than in Madrid. In these remoter provinces a nation assumes its true character and shows what it really is; there the good or ill effects of the government are best perceived, just as you can measure the arc more exactly at a greater radius.

为了研究一个国家的天赋与特点，你要到一些更为偏远的省份去。因为那里与外界的交流会少一些，商贸往来也少一些，很少会有陌生人到那里旅游，而居民们不会轻易迁移，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也少得多。你可以顺路看看这个国家的首都，但是要去研究这个国家就要去远离首都的地方了。真正的法国不在巴黎，而在都兰；在麦西亚的英国人则要比伦敦的英国人更有特色；在加利西亚的西班牙人也比马德里的西班牙人更有西班牙人的特点。在更为遥远偏僻的省份里，一个国家能保留其真实的特点，并表现出实际上的特性。你在能更敏锐地察觉到政府好或坏的影响。这和在更大的半径范围内，你能更精确地衡量弧度是一样的。

The necessary relations between character and government have been so clearly pointed out in the book of L'Esprit des Lois, that one cannot do better than have recourse to that work for the study of those relations. But speaking generally, there are two plain and simple standards by which to decide whether governments are good or bad. One is the population. Every country in which the population is decreasing is on its way to ruin; and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 population increases most rapidly, even were they the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certainly the best governed. But this population must be the natural result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for if it is caused by colonisation or any other temporary and accidental cause, then the remedy itself is evidence of the disease. When Augustus passed laws against celibacy, those laws showed that the Roman empire was already beginning to decline. Citizens must be induced to marry by the goodness of the government, not compelled to marry by law; you must not examine the effects of force, for the law which strives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 has little or no effect; you should study what is done by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morals and by the natural inclination of the government, for these alone produce a lasting effect. It was the policy of the worthy Abbe de Saint-Pierre always to look for a little remedy for every individual ill, instead of tracing them to their common source and seeing if they could not all be cured together. You do not need to treat separately every sore on a rich man's body; you should purify the blood which produces them. They say that in England there are prizes for agriculture; that is enough for me; that is proof enough that agriculture will not flourish there much longer.

个人和政府之间必要联系并未在《论法的精神》中被明确指出，人们在研究这些联系的作品时，最好是参考这本书。但是通常来说，

我们有两种简单而直接的标准能够决定政府的治理是好是坏。其中之一是人口。每一个人口不断减少的国家都是必将要灭亡的。而如果一个国家的认口快速增长，即使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它也是被治理的最好的。但是这种人口变化必须是政府管理和国家性格的自然结果，因为如果变化是因为殖民扩张或是其他短暂偶然的原因，那么这种补救正是其治理不善的证明。当奥古斯都颁布法令反对独身时，这些法律就昭示着罗马帝国已然走向灭亡了。公民必须是在政府的良好治理下自愿结婚的，而不应该由法律强迫。你不必研究强权的影响，因为违反体制的法律是几乎无法产生影响的。你要去研究的是在公共道德的影响下、在政府的自然指导下的行为，因为这些才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可敬的圣皮埃尔神父总是提倡为每一个个别的缺陷做出小小的弥补，而不是究其共同根源看看能否进行根治。你不必将富人的溃疡区别处理，你应该洗净产生这些的污血。据说在英国有为农业发布的奖赏。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这就是英国的农业可能不再繁盛的有力证据。

The second sign of the goodness or badnes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aws is also to be found in the population, but it is to be found not in its numbers but in its distribution. Two states equal in size and population may be very unequal in strength; and the more powerful is always that in which the people are more evenly distributed over its territory; the country which has fewer large towns, and makes less show on this account, will always defeat the other. It is the great towns which exhaust the state and are the cause of its weakness; the wealth which they produce is a sham wealth, there is much money and few goods. They say the town of Paris is worth a whole province to the King of France; for my own part I believe it costs him more than several provinces. I believe that Paris is fed by the provinces in more senses than one, and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revenues is poured into that town and stays there, without ever returning to the people or to the king.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in this age of calculators there is no one to see that France would be much more powerful if Paris were destroyed. Not only is this ill-distributed population not advantageous to the state, it is more ruinous than depopulation itself, because depopulation only gives as produce nought, and the ill-regulated addition of still more people gives a negative result. When I hear an Englishman and a Frenchman so proud of the size of their capitals, and disputing whether London or Paris has more inhabitants, it seems to me that they are quarrelling as to which nation can claim the honour of being the worst governed.

政府治理与法律制定好坏的第二个标志则也是体现在人口上。但是并不是在人口的数量而是在人口的分布上。两个相同大小、人口相同的国家可能在实力上有所悬殊。越是强大的国家，其人口就越是平均地分布在领土上。如果一个国家有较少的大城市，表现得也不过分浮夸，那么总是能击败其他国家的。因为大城市会削弱一个国家的实力，并造成国家的弱小。它们所产生的财富是虚假的，因为虽然有很多的金钱，却极少有益处。据说巴黎比得上法兰西国王的一整个省。就我而言，我相信这花费了好几个省的代价。我相信巴黎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由其他省来供给的。而其绝大部分税收却流入城市并且保持了下来，并没有归还给人民或是国王。难以置信的是，现在这个时代计算者如此有能力，却没有一个人看出如果巴黎被毁掉的话法国会更加强盛。不均衡的人口分布不仅对国家无益，相比人口减少它更加有害。因为人口减少只会没有益处，而众多人口却造成负面影响则会带来附加的副作用。当我听说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对于自己国家首都的面积而骄傲时，并且为伦敦和巴黎哪一个城市的居民更多而争论不休时，在我看来他们就是在为谁的祖国更能担得起被治理的最糟糕的名声。

Study the nation outside its towns; thus only will you really get

to know it. It is nothing to see the apparent form of a government, overladen with the machinery of administration and the jargon of the administrators, if you have not also studied its nature as seen in the effects it has upon the people, and in every degree of administration. The difference of form is really shared by every degree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it is only by including every degree that you really know the difference. In one country you begin to feel the spirit of the minister in the manoeuvres of his underlings; in another you must see the election of members of parliament to see if the nation is really free; in each and every country, he who has only seen the towns cannot possibly know what the government is like, as its spirit is never the same in town and country. Now it is the agricultural districts which form the country, and the country people who make the nation.

只有当你走出城市来研究一个国家，你才能开始对它有所了解。只看到政府的表面形式，看到它所负载的管理机制与管理者的官话，而不从各个阶层的管理机构来研究其内在本质和在人民身上产生的影响，是无法得出什么结果的。不同的政府形式会在不同阶层的管理机构上体现出来，只有在研究了每一阶层之后，你才真正明白其中的不同。在一个国家，你从一个管理者对其下属的调配上感受其风气；而在另一个国家，你必须观察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研究这个国家是否是真正自由的；而在所有的国家中，只去观察城市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其政府的，因为在城市与乡村中，风尚并不相同。现在构成一个乡村的是农业地区，而构成国家的则是农村人口。

This study of different nations in their remoter provinces, and in the simplicity of their native genius, gives a general result which is very satisfactory, to my thinking, and very consoling to the human heart; it is this: All the nations, if you observe them in this

fashion, seem much better worth observing; the nearer they are to nature, the more does kindness hold sway in their character; it is only when they are cooped up in towns, it is only when they are changed by cultivation, that they become depraved, that certain faults which were rather coarse than injurious are exchanged for pleasant but pernicious vices.

在偏远的省份对于各国自然天赋的最简状态对不同的国家进行研究，就会得出令我的想法满意也很能抚慰人心的普遍结论。那就是——所有的国家，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对它们进行研究是更值得观察的。他们与自然越近，就越善良。只有当他们被束缚在城市的牢笼中，只有当他们随着教化而改变，他们才会颓废堕落，将与其说是有害不如说是粗俗的错误变为令人愉悦但有害的恶习。

From this observation we see another advantage in the mode of travel I suggest; for young men, sojourning less in the big towns which are horribly corrupt, are less likely to catch the infection of vice; among simpler people and less numerous company, they will preserve a surer judgment, a healthier taste, and better morals. Besides this contagion of vice is hardly to be feared for Emile; he has everything to protect him from it. Among all the precautions I have taken, I reckon much on the love he bears in his heart.

我们从观察中可以看出，我所建议的这种方式的游历还有一个优点。对年轻人来说，在极度腐化堕落的大城市里少居住一段时间，其染上这种恶心的几率就会小很多。在朴实的人身边、减少自己的伙伴，他们将会保有更为可靠的判断力、更健康的饮食习惯和更高尚的美德。此外，对于爱弥儿来说这种恶习的蔓延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所有事物都会保护他免受其叨扰。在所有我提及的预防措施之中，我认

为他内心的爱才是最为可靠的。

We do not know the power of true love over youthful desires, because we are ourselves as ignorant of it as they are, and those who have control over the young turn them from true love. Yet a young man must either love or fall into bad ways. It is easy to be deceived by appearances. You will quote any number of young men who are said to live very chastely without love; but show me one grown man, a real man, who can truly say that his youth was thus spent? In all our virtues, all our duties, people are content with appearances; for my own part I want the reality, and I am much mistaken if there is any other way of securing it beyond the means I have suggested.

我们不了解真爱高于年轻时的欲望的力量，因为我们对于真爱像年轻人一样并不了解，而管教年轻人的人则会让他们偏离真正的爱情。但是年轻人必须是去爱的，否则就会走向歧途。他们很容易就被表象所欺骗。你会列举出好些据说是要贞洁地生活而不去爱别人的年轻人，但是请举一个成年人的例子给我吧，一个真正的成人，谁能说他年轻时从未爱过别人呢？在我们所有的美德中、所有的义务中，人们总是满足于表象。而我则想要实在的真相。如果有什么其他方法能保护它而胜过我所建议的方法的话，那就是我的错了。

The idea of letting Emile fall in love before taking him on his travels is not my own. It was suggested to me by the following incident.

在出游之前使爱弥儿陷入爱情，并不是我的主意。是以下这件事

偶然提示了我。

I was in Venice calling on the tutor of a young Englishman. It was winter and we were sitting round the fire. The tutor's letters were brought from the post office. He glanced at them, and then read them aloud to his pupil. They were in English; I understood not a word, but while he was reading I saw the young man tear some fine point lace ruffles which he was wearing, and throw them in the fire one after another, as quietly as he could, so that no one should see it. Surprised at this whim, I looked at his face and thought I perceived some emotion; but the external signs of passion, though much alike in all men, have national differences which may easily lead one astray. Nations have a different language of facial expression as well as of speech. I waited till the letters were finished and then showing the tutor the bare wrists of his pupil, which he did his best to hide, I said, “May I ask the meaning of this?”

我在威尼斯时，要去拜访一位英国青年的老师。当时是在冬天，于是我们围坐在火炉旁。这位导师收到了邮局寄来的信件。他看了看那些信，大声地向他的学生读了出来。信件是用英文来写的。我不懂他的意思。但当他在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年轻人从衣服上撕下来一些褶皱的缎带，并把它们一个接一个的扔进了火炉里。他的动作静悄悄的，所以没有人注意到他。我很惊讶眼前的情景，看着他的脸，感到自己发现了一些感情。但是尽管外在的感情信号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似的，但是在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会使我们轻易误入歧途。不同国家在面部表情上的语言就像讲话一样不同。我等到他们把信读完，尽管那个学生尽力地隐藏，我还是向那位导师指了指他空空的手腕处。我说，“我可以知道信的内容吗？”

The tutor seeing what had happened began to laugh; he embraced his pupil with an air of satisfaction and, with his consent, he gave me the desired explanation.

看到发生的这一切的导师笑了出来。他满足地拥抱了自己的学生，并在他的许可下给了我想要的解释。

“The ruffles,” said he, “which Mr. John has just torn to pieces, were a present from a lady in this town, who made them for him not long ago. Now you must know that Mr. John is engaged to a young lady in his own country, with whom he is greatly in love, and she well deserves it. This letter is from the lady's mother, and I will translate the passage which caused the destruction you beheld.

“那些被约翰撕碎的褶裥饰边，”他说，“是城中的一位女士不久之前为他缝制，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现在你要知道约翰与他本国的一位年轻女士订立了婚约，他深深地爱着她，而她也非常配得上约翰。这封信则是这位小姐的母亲寄来的。我会把这部分翻译给你听，正是由于这个你才看到约翰撕碎了褶裥饰边。

“'Lucy is always at work upon Mr. John's ruffles. Yesterday Miss Betty Roldham came to spend the afternoon and insisted on doing some of her work. I knew that Lucy was up very early this morning and I wanted to see what she was doing; I found her busy unpicking what Miss Betty had done. She would not have a single stitch in her present done by any hand but her own. '”

“露西一直在忙着为约翰做衣袖的装饰。昨天贝蒂罗德姆小姐下午来拜访，并帮她做了一些花边。我知道露西很早就起床了，我便想知道她在忙些什么。而我发现她在忙着拆掉贝蒂小姐做好的花边。她不愿意在她的礼物中有任何的针脚不是她亲手缝上的。”

Mr. John went to fetch another pair of ruffles, and I said to his tutor: “Your pupil has a very good disposition; but tell me is not the letter from Miss Lucy's mother a put up job? Is it not an expedient of your designing against the lady of the ruffles?” “No,” said he, “it is quite genuine; I am not so artful as that; I have made use of simplicity and zeal, and God has blessed my efforts.”

约翰去拿来了另一副衣袖。我对他的导师说，“你的学生确实品行端正。但是请告诉我露西小姐母亲的这封信是事先安排好的吗？这真的不是因为你反对一位女士所做的花边而计划的权宜之计吗？”“并不是这样，”他说，“这是完全真实的。我并没有拥有那么高超的艺术技巧。我只是利用了真诚与热情，而上帝祝福了我的努力。”

This incident with regard to the young man stuck in my mind; it was sure to set a dreamer like me thinking.

这个年轻人身上发生的事始终铭刻在我脑海里。毫无疑问，它让我这个梦想家又幻想起来。

But it is time we finished. Let us take Mr. John back to Miss Lucy, or rather Emile to Sophy. He brings her a heart as tender as ever, and a more enlightened mind, and he returns to his native

land all the bettor for having made acquaintance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through their vices and foreign nations through their virtues. I have even taken care that he should associate himself with some man of worth in every nation, by means of a treaty of hospitality after the fashion of the ancients, and I shall not be sorry if this acquaintance is kept up by means of letters. Not only may this be useful, not only is it always pleasant to have a correspondent in foreign lands, it is also an excellent antidote against the sway of patriotic prejudices, to which we are liable all through our life, and to which sooner or later we are more or less enslaved. Nothing is better calculated to lessen the hold of such prejudices than a friendly interchange of opinions with sensible people whom we respect; they are free from our prejudices and we find ourselves face to face with theirs, and so we can set the one set of prejudices against the other and be safe from both. It is not the same thing to have to do with strangers in our own country and in theirs. In the former case there is always a certain amount of politeness which either makes them conceal their real opinions, or makes them think more favourably of our country while they are with us; when they get home again this disappears, and they merely do us justice. I should be very glad if the foreigner I consult has seen my country, but I shall not ask what he thinks of it till he is at home again.

但是，是时候结束我们的游历了。让我们把约翰还给露西小姐，把爱弥儿交还给苏菲。他带着自己始终温柔的心、更为机敏的头脑回来见她。他回到自己的故土，由于因其弊端而对国外的政府更加了解，由于外国人的美德而对他们更加熟悉。我曾特意安排，使他受到古老方式的热情接待，这样他就能熟悉每个国家的值得尊敬的人。如果他们之间有书信往来，那我也不会感到遗憾。而与异国有着通信往来也是有益且有趣的。而我们的一生迟早会多多少少地受到民族偏见的束缚，这同时也是防止民族偏见的一剂良好的矫正药。没有什么比

与我们尊敬的智者相互交流观点这个办法更能削弱这种偏见的影响了。他们不受我们的偏见影响，而我们会发现自己与他们面对面地交流，所以我们能将两种民族偏见相互抵消，以从中获取公正的观点。但在祖国与陌生人这样交谈时完全不同的。首先，当陌生人与我们相处时，他们所有的一定程度的礼貌会隐藏他们的真实观点，或者是将我们的民族想得更好。而当他们回到故土这种想法就会消失，才能对我们做出公正的评价。我很乐意与一个看过我的祖国的外国人交谈，但是当他回到故国家乡，我就不想再去问他的想法了。

When we have spent nearly two years travelling in a few of the great countries and many of the smaller countries of Europe, when we have learnt two or three of the chief languages, when we have seen what is really interesting in natural history, government, arts, or men, Emile, devoured by impatience, reminds me that our time is almost up. Then I say, “Well, my friend, you remember the main object of our journey; you have seen and observed; what is the final result of your observations? What decision have you come to?” Either my method is wrong, or he will answer me somewhat after this fashion—

我们花费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来游历欧洲的一些大国和许许多多的小国家，学到了两到三种官方语言，发现了在自然历史、政府、艺术中的真正有趣的事物。而爱弥儿已经满是不耐烦，提醒我两年的期限快到了。然后我说，“好吧，我的朋友。你记得我们旅行的主要目的。你已经去看了，也去观察了。那么你的观察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你决意要怎么做呢？”要么就是我的方法错了，要么他将会这样回答我——

“What decision have I come to? I have decided to be what you

made me; of my own free will I will add no fetters to those imposed upon me by nature and the laws. The more I study the works of men in their institutions, the more clearly I see that, in their efforts after independence, they become slaves, and that their very freedom is wasted in vain attempts to assure its continuance. That they may not be carried away by the flood of things, they form all sorts of attachments; then as soon as they wish to move forward they ar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everything drags them back. It seems to me that to set oneself free we need do nothing, we need only continue to desire freedom. My master, you have made me free by teaching me to yield to necessity. Let her come when she will, I follow her without compulsion; I lay hold of nothing to keep me back. In our travels I have sought for some corner of the earth where I might be absolutely my own; but where can one dwell among men without being dependent on their passions? On further consideration I have discovered that my desire contradicted itself; for were I to hold to nothing else, I should at least hold to the spot on which I had settled; my life would be attached to that spot, as the dryads were attached to their trees. I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words liberty and empire are incompatible; I can only be master of a cottage by ceasing to be master of myself.

“我决意怎么做？我决心成为你期待的那个人。除了自然和法律施加在我身上的镣铐之外，我要遵循自己的自由意志，不再添上任何枷锁。我对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研究得越多，就越是清楚地发现，在他们努力追求独立却变成了奴隶。而他们为了延续自己的自由，却徒然浪费了自己现有的自由。他们为自己构成了许多附属物，以可能不会被事物的洪流所冲击。然后一旦他们想向前，就会惊讶地发现所有事都在把他们向后拖。对我来说要获得自由并不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的只是继续想获得自由就可以了。我的主人，你教会我要服从必然，这样我才能获得自由。我应得自由时自然会自由，我遵循这些必

然的并不是被迫的。也没有任何事能阻碍我前进。在我们的游历中，我原想在地球上找到一处小角落，以使自己可能完全独立。但是我们要到哪里居住才不会受到欲念的影响呢？在之后的研究中，我发现自己的想法是自相违背的。因为如果我完全不依靠上面的话，至少我还要依赖我所居住的土地。我的生活将与这块土地息息相关，就像林中精灵依赖于树木一样。我已经发现“自由”与“帝权”这两个词完全矛盾。我只有放弃做自己的主人，才能成为一件村舍的主人。

“Hoc erat in votis, modus agri non ita magnus.” Horace, lib. ii., sat. vi.

“我的愿望，是有一块不大不小的土地。”《贺拉斯》

I remember that my property was the origin of our inquiries. You argued very forcibly that I could not keep both my wealth and my liberty; but when you wished me to be free and at the same time without needs, you desired two incompatible things, for I could only be independent of men by returning to dependence on nature. What then shall I do with the fortune bequeathed to me by my parents? To begin with, I will not be dependent on it; I will cut myself loose from all the ties which bind me to it; if it is left in my hands, I shall keep it; if I am deprived of it, I shall not be dragged away with it. I shall not trouble myself to keep it, but I shall keep steadfastly to my own place. Rich or poor, I shall be free. I shall be free not merely in this country or in that; I shall be free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All the chains of prejudice are broken;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I know only the bonds of necessity. I have been trained to endure them from my childhood, and I shall endure them until death, for I am a man; and why should I not wear those chains as a

free man, for I should have to wear them even if I were a slave, together with the additional fetters of slavery?

我记得我们的研究最初是因为我的财产。你有力地告诉我说我无法兼顾自己的财富与自由。但是你既希望我自由，又希望我同时无所依赖，你所期望的也是两件矛盾的事物。因为我必须要去依赖自然，这样我才可以独立在人类社会之外。那么我应该怎么处理父母所留给我的遗产呢？首先，我不能依赖它。我必须切断一切将我和这财产联系起来的关系。如果遗产被留给我，那么我会保存这份遗产；而如果它被夺走了，我也不会因此而受到阻碍。我绝不会为了保存财产而困扰，但我会始终保持在自己应在的位子上。贫穷或是富有，我都是自由的。无论我在哪个国家，我都会是自由的。我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保有自己的自由。我会打破一切偏见的束缚，我只知道要服从于必要的准则。自我童年时代起就被训练着要去忍受这些准则，而因为我已经成人，我至死都会遵守这些准则。而为什么我作为一个自由人还要遵循这些呢？即使我是一个奴隶，身上仍然带着奴隶的镣铐，我也应当遵守它们。

What matters my place in the world? What matters it where I am? Wherever there are men, I am among my brethren; wherever there are none, I am in my own home. So long as I may be independent and rich, and have wherewithal to live, and I shall live. If my wealth makes a slave of me, I shall find it easy to renounce it. I have hands to work, and I shall get a living. If my hands fail me, I shall live if others will support me; if they forsake me I shall die; I shall die even if I am not forsaken, for death is not the penalty of poverty, it is a law of nature. Whensoever death comes I defy it; it shall never find me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life; it shall never prevent me having lived.

我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怎样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无论是在什么有人居住的地方，我都与同胞们生活在一起。而无论在什么不毛之地，我都生活在自己家里。只要我能独立且富有，有足够谋生的资本，我就能生存下来。如果我成了财富的努力，我就会很轻易地放弃它。我可以工作，也能够谋生。如果我的双手无法工作，我的生活就必须由他人供给，如果他们放弃了我，我就会死去；即使我没有被抛弃，我也会死去，因为死亡并不是贫穷的惩罚，而是自然的法则。无论何时死亡来临，我都会蔑视它的存在。在死亡面前我绝不会苟且偷生，但它也绝不会妨碍我生存。

“My father, this is my decision. But for my passions, I should be in my manhood independent as God himself, for I only desire what is and I should never fight against fate. At least, there is only one chain, a chain which I shall ever wear, a chain of which I may be justly proud. Come then, give me my Sophy, and I am free.”

“我的父亲啊，这就是我的决定了。但是对于我的欲念来说，我应当在成人时期像上帝一样独立。因为这是我唯一所期望的，而我也不必与命运抗争。至少我身上只有一条枷锁。这条枷锁我会一直受其束缚，也因它的束缚而感到骄傲。那么，把苏菲还给我吧。我就能得到自由了。”

“Dear Emile, I am glad indeed to hear you speak like a man, and to behold the feelings of your heart. At your age this exaggerated unselfishness is not unpleasing. It will decrease when you have children of your own, and then you will be just what a good father and a wise man ought to be. I knew what the result would be before our travels; I knew that when you saw our institutions you would be far from reposing a confidence in them

which they do not deserve. In vain do we seek freedom under the power of the laws. The laws! Where is there any law? Where is there any respect for law? Under the name of law you have everywhere seen the rule of self-interest and human passion. But the eternal laws of nature and of order exist. For the wise man they take the place of positive law; they are written in the depths of his heart by conscience and reason; let him obey these laws and be free; for there is no slave but the evil-doer, for he always does evil against his will. Liberty is not to be found in any form of government, she is in the heart of the free man, he bears her with him everywhere. The vile man bears his slavery in himself; the one would be a slave in Geneva, the other free in Paris."

"亲爱的爱弥儿，听到你像成年人一样说话，并且看到你内心的感情，我打心底里高兴。在你这样的年纪，这种超然的无私是很令人欢喜的。当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后，这种无私就会逐渐消失。然后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父亲，一个你应当成为的智慧的人。我在我们旅行之前就已经猜到了结果。我知道，当你看到我们的社会时，你绝不会将自己的信任交付给他们，他们配不上你的信任。在法律的约束下我们去寻找自由其实是徒劳无功的。法律啊！哪有法律呢？哪里敬重法律呢？在法律的名义下，你所看到的却是大家处处的自我利益与人类欲望的准则。但是自然与秩序的法则是永恒不灭的。对于智慧的人来说，它们取代了成文法。这种法律是通过良知和理性印刻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他要服从这些法律，才能得到自由。因为世界上并没有奴隶，有的只是做坏事的人，他总是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做一些坏事。自由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下都很难找到。她在自由的人的心中，自由的人会将她带往各地。卑鄙的人内心始终是被奴役的。一个人在日内瓦是奴隶的话，另一个人在巴黎却是自由的。"

"If I spoke to you of the duties of a citizen, you would perhaps

ask me, 'Which is my country?' And you would think you had put me to confusion. Yet you would be mistaken, dear Emile, for he who has no country has, at least, the land in which he lives. There is always a government and certain so-called laws under which he has lived in peace. What matter though the social contract has not been observed, if he has been protected by private interest against the general will, if he has been secured by public violence against private aggressions, if the evil he has beheld has taught him to love the good, and if our institutions themselves have made him perceive and hate their own iniquities? Oh, Emile, where is the man who owes nothing to the land in which he lives? Whatever that land may be, he owes to it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possessed by man, the morality of his actions and the love of virtue. Born in the depths of a forest he would have lived in greater happiness and freedom; but being able to follow his inclinations without a struggle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merit in his goodness, he would not have been virtuous, as he may be now, in spite of his passions. The mere sight of order teaches him to know and love it. The public good, which to others is a mere pretext, is a real motive for him. He learns to fight against himself and to prevail, to sacrifice his own interest to the common weal. It is not true that he gains nothing from the laws; they give him courage to be just, even in the midst of the wicked. It is not true that they have failed to make him free; they have taught him to rule himself.

“如果我告诉你公民的职责，你可能就会问我，‘我的祖国呢？’而你会认为这会使我感到困惑。但是你错了。亲爱的爱弥儿，因为即使一个人没有祖国，他至少也有可以居住的地方。而在他平静的生活之下，总归会有政府以及某些所谓的法律的。如果他受到独立利益的保护而免受公众意志侵害，如果社会公共暴力保护他免于私人侵犯，如果他所见到的罪恶能教会他热爱善意，如果我们的社会能使他察觉并

厌恶自己的不正当行为，那么即使社会契约尚未达成又有什么关系呢？哦，爱弥儿啊。哪有什么人是一点也不亏欠自己所居住的土地的呢？这块地方无论怎样，他都是因为这里才获得了人类最为珍贵的东西，即他的行为道德和对美德的爱。如果出生于树林深处，那么他就会生活得更幸福、更自由。但是由于他在追求自己的意愿时不需要花费什么力气，因此对他的善良倒是无益的。他不会像现在这样，克制自己的欲念变成一个有美德的人。仅仅是对秩序的一瞥就教会了他去认识、热爱秩序。公众的善意对别人来说可能仅仅是个借口，但对他来说确实真正的动力。他学着与自己斗争并取胜，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说他什么也没从法律中得到其实是不对的。法律给了他即使身在恶人之间，也能变得公正的勇气。不能说法律无法使他自由，法律只是教会他约束自己。

“Do not say therefore, 'What matter where I am?' It does matter that you should be where you can best do your duty; and one of these duties is to love your native land. Your fellow-countrymen protected you in childhood; you should love them in your manhood. You should live among them, or at least you should live where you can serve them to the best of your power, and where they know where to find you if ever they are in need of you. There ar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 man may be of more use to his fellow-countrymen outside his country than within it. Then he should listen only to his own zeal and should bear his exile without a murmur; that exile is one of his duties. But you, dear Emile, you have not undertaken the painful task of telling men the truth, you must live in the midst of your fellow-creatures, cultivating their friendship in pleasant intercourse; you must be their benefactor, their pattern; your example will do more than all our books, and the good they see you do will touch them more deeply than all our empty words.”

“但是不要说，‘我在哪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关系到你是否可以尽力尽责，而其中的一个职责就是热爱你的祖国。你的同胞们在你童年时保护过你，当你长大成人，你应当敬爱他们。你应当与他们一同生活，至少你应当生活在能尽全力为他们服务、而一旦他们需要你知道要怎么找到你的地方。也有一些情况下，一个人在国外时会比在国内对他的同胞们更有益。他应当听从自己内心的热情，应当毫无怨言地背负自己背井离乡的使命，这也是他的职责之一。但是你呢，亲爱的爱弥儿，你并没有背负着要告诉人们真相的痛苦责任。你必须要生活在你的同胞之中，在友好的交往中培养互相之间的友谊；你必须为他们行善，成为他们的模范；你的榜样作用会比所有的书本更为重要，而当他们看到你所做的善事就会被感动，远比我们空洞的话语要深刻。”

“Yet I do not exhort you to live in a town; on the contrary, one of the examples which the good should give to others is that of a patriarchal, rural life, the earliest life of man, the most peaceful, the most natural, and the most attractive to the uncorrupted heart. Happy is the land, my young friend, where one need not seek peace in the wilderness! But where is that country? A man of good will finds it hard to satisfy his inclinations in the midst of towns, where he can find few but frauds and rogues to work for. The welcome given by the towns to those idlers who flock to them to seek their fortunes only completes the ruin of the country, when the country ought really to be repopulated at the cost of the towns. All the men who withdraw from high society are useful just because of their withdrawal, since its vices are the result of its numbers. They are also useful when they can bring with them into the desert places life, culture, and the love of their first condition. I like to think what benefits Emile and Sophy, in their simple home, may spread about them, what a stimulus they may give to the country, how they may revive the zeal of the unlucky villagers.”

“但是我并不是劝诫你要住在城市中。相反，在一些实例中，善良的人应当过着家族制的、田园诗般的生活，那是人类最早的生活方式、最为平静的、最自然的，也是对未被污染的心灵吸引力最大的生活方式。我年轻的朋友啊，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人们不必在荒野中寻找安宁，那么他们就是幸福的。但是这样的国家在哪里呢？一个善良的人在城市中很难满足自己的意愿，在那里他无法服务于自己善良的意愿，却到处都是欺骗和恶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蜂拥到城市中去寻找财富，而城市给予他们的欢迎恰恰毁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城市的人口应当向乡村转移。所有从高等社会里退出的人因为自己的退出所以都是有益的，因为弊病的产生也是由于城市的人口过多。当他们把文化和对人生境地的爱也带到荒芜的地方生活时，同样也是有益的。我很乐意想到爱弥儿和苏菲生活在朴素的家里，将恩惠施与周围邻居，并对乡村的生活以一定的刺激，以此来振奋不幸的居民的热情。”

“In fancy I see the population increasing, the land coming under cultivation, the earth clothed with fresh beauty. Many workers and plenteous crops transform the labours of the fields into holidays; I see the young couple in the midst of the rustic sports which they have revived, and I hear the shouts of joy and the blessings of those about them. Men say the golden age is a fable; it always will be for those whose feelings and taste are depraved. People do not really regret the golden age, for they do nothing to restore it. What is needed for its restoration? One thing only, and that is an impossibility; we must love the golden age.”

“在想象中我看到人口的增长、土地繁茂，大地被全新的作物所覆盖。劳动者数量增多，田间作物丰饶，田间的劳作好像变成了假日。我看到这对年轻的夫妇身处在这复苏的乡村生活中。我听到了喜悦的欢呼，还有对他们的祝福。人们说黄金时代只是神话传说。对于

那些感官与喜好都退化的人来说一直如此。人们并不真正后悔自己浪费的年华，因为他们并没有做出什么努力来保留它。而留住黄金岁月需要做什么呢？只有一件事，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我们必须要热爱这黄金岁月。”

“Already it seems to be reviving around Sophy's home; together you will only complete what her worthy parents have begun. But, dear Emile, you must not let so pleasant a life give you a distaste for sterner duties, if every they are laid upon you; remember that the Romans sometimes left the plough to become consul. If the prince or the state calls you to the service of your country, leave all to fulfil the honourable duties of a citizen in the post assigned to you. If you find that duty onerous, there is a sure and honourable means of escaping from it; do your duty so honestly that it will not long be left in your hands. Moreover, you need not fear the difficulties of such a test; while there are men of our own time, they will not summon you to serve the state.”

“看起来苏菲的家周围已然出现了这种复苏的景象，你要做的只是完成她可敬的父母已经在做的工作。但是，亲爱的爱弥儿。你不应当因为如此幸福的生活而厌恶那些更为艰苦被施加在你身上的职责。要记住，罗马人有时会从田间的劳动者中选出执政官。如果国王或是国家要求你为你的国家服务，你要放下手中的一切，却完成这项被分配给你的作为一个公民的光荣使命。如果你认为这个职责是繁重的，也有一个可靠而光荣的方法能逃避它。你要忠实的旅行自己的职责，这样它就不会再被交到你手中。而且，你不必担心这种测验的艰苦。在这个时代的这些人仍然在任的时候，他们不会号召你这样的人来服务国家的。”

Why may I not paint the return of Emile to Sophy and the end of their love, or rather the beginning of their wedded love! A love founded on esteem which will last with life itself, on virtues which will not fade with fading beauty, on fitness of character which gives a charm to intercourse, and prolongs to old age the delights of early love. But all such details would be pleasing but not useful, and so far I have not permitted myself to give attractive details unless I thought they would be useful. Shall I abandon this rule when my task is nearly ended? No, I feel that my pen is weary. Too feeble for such prolonged labours, I should abandon this if it were not so nearly completed; if it is not to be left imperfect it is time it were finished.

我多想刻画出爱弥儿回到苏菲身边，他们的爱情的结局，或是她们结婚后的故事啊。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爱往往会持续一生，建立在美德基础上的爱不会随着容颜的老去而消失，而建立在兴趣相投上的爱会使交流增加魅力，并且直到老年也能保持年轻时的欢乐。但是这些细节是令人高兴的，却不是有益的。至今除非自己认为是有益的细节，否则我并不允许自己叙述那些吸引人的细节。我应当在我的任务快要结束的时候违背这个原则吗？不，我感到我的笔尖已经干枯了。对于这些拖延的劳动来说，我实在无能为力。如果我的任务不是快要结束了的话，我可能会放弃它。如果不想使它的结局不完美的话，那么是时候来结束它了。

At last I see the happy day approaching, the happiest day of Emile's life and my own; I see the crown of my labours, I begin to appreciate their results. The noble pair are united till death do part; heart and lips confirm no empty vows; they are man and wife. When they return from the church, they follow where they are led; they know not where they are, whither they are going, or what is

happening around them. They heed nothing, they answer at random; their eyes are troubled and they see nothing. Oh, rapture! Oh, human weakness! Man is overwhelmed by the feeling of happiness, he is not strong enough to bear it.

我终于看到幸福的日子就要来了，这是爱弥儿和我最幸福的一天。我看到我的工作终于取得了成就，我开始欣赏这些成果了。这对可敬的夫妇结合，直至死亡将他们分开。他们的心灵与嘴巴都证实了自己没有一点虚伪的试验。他们是一对夫妻。当他们跟着领路人从教堂回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又要去哪里，或者周围发生了什么。他们什么都没注意到，回答也是随意的。他们眼花缭乱，什么也看不见。啊，多么高兴啊！啊，这就是人类的弱点了！人们往往会因为幸福的感情而不知所措，他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承受这种感情。

There are few people who know how to talk to the newly-married couple. The gloomy propriety of some and the light conversation of others seem to me equally out of place. I would rather their young hearts were left to themselves, to abandon themselves to an agitation which is not without its charm, rather than that they should be so cruelly distressed by a false modesty, or annoyed by coarse witticisms which, even if they appealed to them at other times, are surely out of place on such a day.

只有少数人知道要怎么和新婚的夫妇交谈。有些人说话有些失礼，而有些人言语又有些轻浮，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我宁愿这些人把他们放在一边不理会，让他们自己去体会这种充满魅力的喜悦。他们不应该被空洞的话语残忍地打扰，或是被粗俗的玩笑困扰。即使这可能在其他时候也是有趣的，但很明显在这里就完全不合时宜了。

I behold our young people, wrapped in a pleasant languor, giving no heed to what is said. Shall I, who desire that they should enjoy all the days of their life, shall I let them lose this precious day? No, I desire that they shall taste its pleasures and enjoy them. I rescue them from the foolish crowd, and walk with them in some quiet place; I recall them to themselves by speaking of them I wish to speak, not merely to their ears, but to their hearts, and I know that there is only one subject of which they can think to-day.

我注视着我们年轻的夫妻，他们被幸福的疲乏所包围，根本注意不到别人在说什么。我希望他们生活中的每天都能享受幸福，我要使他们失去这么宝贵的一天吗？不，我希望他们能感受其中的幸福，并乐在其中。我将他们从愚蠢的人群中解救出来，并和他们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散步。我向他们回想他们的事，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不仅仅是向他们的耳朵，更是向他们的心去说这些话。我知道今天他们心里只会想着一件事。

“My children,” say I, taking a hand of each, “it is three years since I beheld the birth of the pure and vigorous passion which is your happiness to-day. It has gone on growing; your eyes tell me that it has reached its highest point; it must inevitably decline.” My readers can fancy the raptures, the anger, the vows of Emile, and the scornful air with which Sophy withdraws her hand from mine; how their eyes protest that they will adore each other till their latest breath. I let them have their way; then I continue:

“我的孩子们，”我一边说，一边牵住他们的手，“自从我看到你们那纯洁而热烈的爱情诞生已经三年了，这造就了你们今天的幸福。这

种爱情随着时间不断增长，你们的眼神告诉我如今它已到达顶峰，必然会不可避免的削弱。”我的读者可以想象出爱弥儿原本很兴奋，继而有些愤怒，还不停地许下誓言。而苏菲有些不高兴，从我手中抽回了手。她的眼神抗议说，他们至死都会互相爱着对方。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反应，然后继续说：

“I have often thought that if the happiness of love could continue in marriage, we should find a Paradise upon earth. So far this has never been. But if it were not quite impossible, you two are quite worthy to set an example you have not received, an example which few married couples could follow. My children, shall I tell you what I think is the way, and the only way, to do it?”

“我常常想，如果爱情的幸福能够在爱情中延续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在地球上找到天堂了。但这至今还未实现。但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你们两位都是可敬可爱的，树立了他人从未能做到的榜样。极少有结婚的夫妇像你们这样。我的孩子们，让我来告诉你们在我心中唯一去实现的办法吧？”

They look at one another and smile at my simplicity. Emile thanks me curtly for my prescription, saying that he thinks Sophy has a better, at any rate it is good enough for him. Sophy agrees with him and seems just as certain. Yet in spite of her mockery, I think I see a trace of curiosity. I study Emile; his eager eyes are fixed upon his wife's beauty; he has no curiosity for anything else; and he pays little heed to what I say. It is my turn to smile, and I say to myself, “I will soon get your attention.”

他们互相看了看对方，对我的坦白付以微笑。爱弥儿草草地谢过我的建议，并说他认为苏菲有更好的办法，至少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办法。苏菲同意了他的说法，看起来极为确信这一点。但尽管她表现出不屑，我觉得我看出了一些好奇。我观察着爱弥儿。他那热切的眼神始终在美丽的妻子身上，对其他事物没有丝毫的好奇，对我说的话也毫不在意。我也微笑了一下，然后对自己说，“我很快就会得到你的注意。”

The almost imperceptib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hidden impulses is characteristic of a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exes; it is that men are generally less constant than women, and are sooner weary of success in love. A woman foresees man's future inconstancy, and is anxious; it is this which makes her more jealous [2_13] . When his passion begins to cool she is compelled to pay him the attentions he used to bestow on her for her pleasure; she weeps, it is her turn to humiliate herself, and she is rarely successful. Affection and kind deeds rarely win hearts, and they hardly ever win them back. I return to my prescription against the cooling of love in marriage.

两性之间真正差异的特点其实是在于两种隐秘的冲动的几乎不可察觉的差别。男性相对女性而言，通常更加善变，很快就会对爱情的快乐产生厌倦。而女性往往会遇见男性未来的不忠诚，因而使她更加易妒 [3_13] 。当男性的热情逐渐冷却，他曾为了她的快乐而予以她的那些关注，她不得不再给予他关注。她会痛哭，贬低自己，然而却很少能挽回他的心。爱慕和善良的举动很少能赢得一个人的心，而绝不可能赢回一个人的心。我回来继续谈谈处理爱情渐渐消磨冷淡的办法。

“It is plain and simple,” I continue. “It consists in remaining lovers when you are husband and wife.”

“这很清楚，也很简单，”我继续说。“只要夫妻能保持着像恋人一样就好了。”

“Indeed,” said Emile, laughing at my secret, “we shall not find that hard.”

“确实，”爱弥儿说，有些嘲弄地笑话我的秘密，“我们觉得这并不困难。”

“Perhaps you will find it harder than you think. Pray give me time to explain.”

“你可能会发现这比你想得要困难。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解释。”

“Cords too tightly stretched are soon broken.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the marriage bond is subjected to too great a strain. The fidelity imposed by it upon husband and wife is the most sacred of all rights; but it gives to each too great a power over the other. Constraint and love do not agree together, and pleasure is not to be had for the asking. Do not blush, Sophy, and do not try to run away. God forbid that I should offend your modesty! But your fate for life is at stake. For so great a cause, permit a conversation between your husband and your father which you would not permit

elsewhere.”

“系得太紧的绳子往往容易断开。如果爱情的纽带太过紧张时也是如此。夫妻之间的忠诚是最为神圣的权利，但是这也使其中一人的权力远超过另一个人。约束和爱情并不相容，而通过请求是无法获得幸福的。别脸红，苏菲。别逃避。我绝不会冒犯你的羞怯心。而你人生的命运处于危急关头。因为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请你在你的丈夫和父亲之间听我的谈话，而再别的地方你可能并不会同意这么做。”

“It is not so much possession as mastery of which people tire, and affection is often more prolonged with regard to a mistress than a wife. How can people make a duty of the tenderest caresses, and a right of the sweetest pledges of love? It is mutual desire which gives the right, and nature knows no other. The law may restrict this right, it cannot extend it. The pleasure is so sweet in itself! Should it owe to sad constraint the power which it cannot gain from its own charms? No, my children, in marriage the hearts are bound, but the bodies are not enslaved. You owe one another fidelity, but not complaisance. Neither of you may give yourself to another, but neither of you belongs to the other except at your own will.”

“人们厌倦了占有与统治，而男人对于情人的爱往往要比对妻子要长。人们怎么才能把最温柔的爱抚当作一种义务，而把爱情最甜蜜的誓言视作一种权利呢？是人们之间相互的愿望给予了这种权利，自然并无其他办法。法律可能限制权利，却不能扩大它。幸福本身是如此甜蜜的！而无法从其自身魅力中获取的力量，应当归功于糟糕的束缚吗？不，我的孩子们。在婚姻中心灵是联系起来的，而身体却未被束缚。你对配偶应当是忠诚的，而不应空献殷勤。你既不应再去爱别人，你们两人除非自愿，也并不属于对方。”

“If it is true, dear Emile, that you would always be your wife's lover, that she should always be your mistress and her own, be a happy but respectful lover; obtain all from love and nothing from duty, and let the slightest favours never be of right but of grace. I know that modesty shuns formal confessions and requires to be overcome; but with delicacy and true love, will the lover ever be mistaken as to the real will? Will not he know when heart and eyes grant what the lips refuse? Let both for ever be master of their person and their caresses, let them have the right to bestow them only at their own will. Remember that even in marriage this pleasure is only lawful when the desire is mutual. Do not be afraid, my children, that this law will keep you apart; on the contrary, it will make both more eager to please, and will prevent satiety. True to one another, nature and love will draw you to each other.”

“如果真的是这样，亲爱的爱弥儿，那么你就应当永远是你妻子的爱人，而她也永远是你的爱人和自己的主人。你们应当是幸福而可敬的爱侣。从爱情中而不是从义务中获取，即使是极小的恩惠也应当是出于爱而不是因为履行权利。我知道她很羞怯，因而不会公开向你告白，你要去克服她那羞怯的心。但是你要温柔而委婉地真正去爱她，出于真心意愿的爱人怎么会出错呢？如果心意和眼神都允许了，嘴巴却否认的事，他又怎么会不了解呢？让他们做自己个人与爱慕的主人，有权出于自己的意愿给予对方。要记住，甚至是在婚姻中，只有两厢情愿，幸福才是合法的。我的孩子，别害怕法律会使离你们分离。相反，它会使你们更想取悦对方，而避免过度的喜悦。互相诚恳相待，那么爱情就会把你们带到彼此身边。”

Emile is angry and cries out against these and similar suggestions. Sophy is ashamed, she hides her face behind her fan

and says nothing. Perhaps while she is saying nothing, she is the most annoyed. Yet I insist, without mercy; I make Emile blush for his lack of delicacy; I undertake to be surety for Sophy that she will undertake her share of the treaty. I incite her to speak, you may guess she will not dare to say I am mistaken. Emile anxiously consults the eyes of his young wife; he beholds them, through all her confusion, filled with a, voluptuous anxiety which reassures him against the dangers of trusting her. He flings himself at her feet, kisses with rapture the hand extended to him, and swears that beyond the fidelity he has already promised, he will renounce all other rights over her. “My dear wife,” said he, “be the arbiter of my pleasures as you are already the arbiter of my life and fate. Should your cruelty cost me life itself I would yield to you my most cherished rights. I will owe nothing to your complaisance, but all to your heart.”

爱弥儿有些生气，对于这些相似的建议叫了出来。苏菲有些害羞，她把自己的脸藏在扇子后面，什么也没有说。可能当她什么都不说的时候，她才是最生气的。但我仍然毫不留情地接着说下去了。我说爱弥儿缺乏温柔，他脸红了。而我相信，苏菲会尽她在条约中的那份义务的。我鼓励她说些什么，你们也猜得到，她并不敢说我是错的。爱弥儿焦躁不安地看着他那年轻妻子的眼神。他看着她们，透过她的慌张他发现她的眼中充满了不安，这使他确信自己是可以信赖苏菲的。他跪在苏菲的脚边，热烈地轻吻那双伸向他的手，发誓除了他已然宣誓的忠诚之外，他会放弃自己对她的一切权利。“我亲爱的妻子，”他说，“既然你已经是我生活和命运的仲裁者了，请做我的幸福的仲裁者吧！”即使你残忍地要我死去，我也会把自己最珍贵的权利都献给你。我将一切都献给你的心，而并非你的殷勤。

Dear Emile, be comforted; Sophy herself is too generous to let

you fall a victim to your generosity.

亲爱的爱弥儿，放心吧。苏菲她这样慷慨，绝不会使你沦为自己慷慨的奴隶的。

In the evening, when I am about to leave them, I say in the most solemn tone, “Remember both of you, that you are free,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marital rights; believe me, no false deference. Emile will you come home with me? Sophy permits it.” Emile is ready to strike me in his anger. “And you, Sophy, what do you say? Shall I take him away?” The little liar, blushing, answers, “Yes.” A tender and delightful falsehood, better than truth itself!

那天晚上，正当我要离开他们的时候，我用最庄重的语调对他们说，“你们两人都要记得，你们是自由的。你们之间既没有夫妻之间的权利，也没有假意的顺从。爱弥儿，你愿意与我回家去吗？苏菲同意了。”爱弥儿愤怒地准备反驳我。“苏菲你呢，你想说什么吗？我可以把他带走吗？”这个小小的人撒了谎，她羞红了脸回答说，“可以。”温柔而令人愉快的谎话啊，比真相还要美好！

The next day. … Men no longer delight in the picture of bliss; their taste is as much depraved by the corruption of vice as their hearts. They can no longer feel what is touching or perceive what is truly delightful. You who, as a picture of voluptuous joys, see only the happy lovers immersed in pleasure, your picture is very imperfect; you have only its grosser part, the sweetest charms of pleasure are not there. Which of you has seen a young couple, happily married, on the morrow of their marriage? their chaste yet

languid looks betray the intoxication of the bliss they have enjoyed, the blessed security of innocence, and the delightful certainty that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life together. The heart of man can behold no more rapturous sight; this is the real picture of happiness; you have beheld it a hundred times without heeding it; your hearts are so hard that you cannot love it. Sophy, peaceful and happy, spends the day in the arms of her tender mother; a pleasant resting place, after a night spent in the arms of her husband.

第二天。人们不再因为赐福而愉悦了。他们的品味和心灵因为腐朽的恶习而退化。他们不再感受到动人的场景，也不再了解什么是真正令人愉快的了。你们啊，知道这对快乐的爱人沉醉于欢乐之中，将之视为奢侈逸乐的场景。你的想法是很不完美的。你只看到了其中简单的部分，却未曾看到那欢乐最为甜蜜的魅力。你们看过结婚次日的幸福的年轻夫妻吗？他们的纯真与疲乏展现出他们所沉醉于被庇佑的喜悦中，他们天真无邪，幸福地确信他们将会共度余生。这是人们的心能够看到的最为着迷的景象了。这是幸福的真实写照。你可能看到过一百次，却从未注意。你的心太过坚硬了，所以你无法去爱。苏菲，既平静又幸福。夜晚她在丈夫的怀抱幸福地休息，白天她则在母亲温柔的臂膀中度过。

The day after I am aware of a slight change. Emile tries to look somewhat vexed; but through this pretence I notice such a tender eagerness, and indeed so much submission, that I do not think there is much amiss. As for Sophy she is merrier than she was yesterday; her eyes are sparkling and she looks very well pleased with herself; she is charming to Emile; she ventures to tease him a little and vexes him still more.

一天后，我发现有一些细微的变化。爱弥儿试图让自己看上去有些生气。但透过他的假装，我感到一丝温柔的渴望。而明显是为了服从，所以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至于苏菲，她要比前一天更开心。她的眼神熠熠生辉，看起来非常开心。对爱弥儿来说她非常迷人。她冒险要戏弄他，使他更生气。

These changes are almost imperceptible, but they do not escape me; I am anxious and I question Emile in private, and I learn that, to his great regret, and in spite of all entreaties, he was not permitted last night to share Sophy's bed. That haughty lady had made haste to assert her right. An explanation takes place. Emile complains bitterly, Sophy laughs; but at last, seeing that Emile is really getting angry, she looks at him with eyes full of tenderness and love, and pressing my hand, she only says these two words, but in a tone that goes to his heart, “Ungrateful man!” Emile is too stupid to understand. But I understand, and I send Emile away and speak to Sophy privately in her turn.

这个变化几乎是无法察觉的，但它们并没有逃过我的眼睛。我感到有些不安，于是私下里问爱弥儿。于是我了解到，尽管他百般请求，苏菲前一天晚上并不允许他睡到苏菲的床上，这使他很是悔恨。这位傲慢的女士急着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我想让爱弥儿解释一下情况。他痛苦地抱怨，而苏菲却笑了。但最终，她看着爱弥儿真的有些生气了，就满眼温柔与爱意地看着他，按着我的手，只说了几个字，但那语调却好像要进到他心里一样。苏菲说，“忘恩负义的人啊！”爱弥儿太愚笨了，完全不理解苏菲的意思。但是我理解了，于是把爱弥儿支开，和苏菲在私下里交谈。

“I see,” said I, “the reason for this whim. No one could be more

delicate, and no one could use that delicacy so ill. Dear Sophy, do not be anxious, I have given you a man; do not be afraid to treat him as such. You have had the first fruits of his youth; he has not squandered his manhood and it will endure for you. My dear child, I must explain to you why I said what I did in our conversation of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Perhaps you only understood it as a way of restraining your pleasures to secure their continuance. Oh, Sophy, there was another object, more worthy of my care. When Emile became your husband, he became your head, it is yours to obey; this is the will of nature. When the wife is like Sophy, it is, however, good for the man to be led by her; that is another of nature's laws, and it is to give you as much authority over his heart, as his sex gives him over your person, that I have made you the arbiter of his pleasures. It will be hard for you, but you will control him if you can control yourself, and what has already happened shows me that this difficult art is not beyond your courage. You will long rule him by love if you make your favours scarce and precious, if you know how to use them aright. If you want to have your husband always in your power, keep him at a distance. But let your sternness be the result of modesty not caprice; let him find you modest not capricious; beware lest in controlling his love you make him doubt your own. Be all the dearer for your favours and all the more respected when you refuse them; let him honour his wife's chastity, without having to complain of her coldness.”

“我了解了，”我说，“对于这一时兴起的原因。没有人比他更加温柔了，也没有人能把这种温柔表现得这样糟糕。亲爱的苏菲，请你不要不安。我给你的是一个男人，不要害怕你对他太过分。你是第一个拥有他青春的人。他还没有挥霍过自己的青春年华，这全都是为了你。我亲爱的孩子啊，我必须要向你解释为什么前天我在对话里对你这么说。可能你只将其理解为一种限制自己欢乐以使爱情继续的方

式。啊，苏菲。这还有另一个目的，一个更值得我关注的目的。当爱弥儿成为你的丈夫的时候，他也成为了你的领袖。你应当服从于他，这是大自然的意愿。但如果一个妻子像苏菲你一样，那么对一个男人来说服从于她也是很好的。这就是自然的另一种规则了。这使你在他心里有了足够的权威，就像他的性别对你的掌控一样。我已经使你成为他的快乐的裁决者。对你来说这会有些困难，但如果你能控制自己，你就可以控制他。已经发生的事情告诉我这件艰难的工作是以你的勇气可以做得到的。你会长久地通过爱来控制他，如果你能将自己的恩惠变得神圣而珍贵，你知道如何正确地利用它们。如果你想让你的丈夫始终被你掌控，那么就给以适当的距离吧。但是你要在严肃中带着一些羞怯，而不是任性。你要让他认为你是在害羞，还不是反复无常的。在你控制他的爱的同时，你要注意不要让他怀疑你的爱。使他因为你的恩惠而更加爱你，当你拒绝他时他会更加尊重你。他会认为自己的妻子是纯洁的，而绝不会控诉她的冷漠。”

“Thus, my child, he will give you his confidence, he will listen to your opinion, will consult you in his business, and will decide nothing without you. Thus you may recall him to wisdom, if he strays, and bring him back by a gentle persuasion, you may make yourself lovable in order to be useful, you may employ coquetry on behalf of virtue, and love on behalf of reason.”

“这样一来，我的孩子，你就会得到他的信任。他会倾听你的观点，在他的事务中向你咨询，没有你在绝不会私自决定任何事。这样你就可以在他迷失的时候唤起他的理智，以温柔地劝说使他回归正轨。你可能要为了使自己有益而使自己可爱，你可能要以美德的名义去撒娇，而以理性的名义去爱他。”

“Do not think that with all this, your art will always serve your

purpose. In spite of every precaution pleasures are destroyed by possession, and love above all others. But when love has lasted long enough, a gentle habit takes its place and the charm of confidence succeeds the raptures of passion. Children form a bond between their parents, a bond no less tender and a bond which is sometimes stronger than love itself. When you cease to be Emile's mistress you will be his friend and wife; you will be the mother of his children. Then instead of your first reticence let there be the fullest intimacy between you; no more separate beds, no more refusals, no more caprices. Become so truly his better half that he can no longer do without you, and if he must leave you, let him feel that he is far from himself. You have made the charms of home life so powerful in your father's home, let them prevail in your own. Every man who is happy at home loves his wife. Remember that if your husband is happy in his home, you will be a happy wife.”

“但是别以为有了这样的办法，你的方法就可以永远为你的目的服务。尽管有所预防，愉快总归是要毁于占有的，而爱情高于一切。但一旦爱情也维持得足够久，温柔的习惯取代了它的位置，而信任的魅力则胜过了强烈的欲望。孩子们在父母之间建立了一条纽带，最为温柔，有时却比爱情还要坚定的纽带。如果你不再爱爱弥儿，你会成为他的朋友和妻子；你将会是他的孩子们的母亲。而你要改变自己矜持的态度，让你们之间亲密无间。不要再分床睡了，也不要拒绝他，不要再任性了。你要成为他的一半，这样他就再也无法离开你。如果他必须要离开你，那么他就会感到在离开他自己。在你父亲家里的时候，你使这个家的生活充满魅力、精力充沛，让你的家也变成这样吧。每个爱着自己妻子的人都会很乐意待在家里的。要记住，如果你的丈夫很乐意待在家里，那么你将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妻子。”

“For the present, do not be too hard on your lover; he deserves

more consideration; he will be offended by your fears; do not care for his health at the cost of his happiness, and enjoy your own happiness. You must neither wait for disgust nor repulse desire; you must not refuse for the sake of refusing, but only to add to the value of your favours.”

“现在，对你的爱人不要太过苛刻了。他需要你更多的关爱，如果你吓唬他的话，他会生气。不要以他幸福的代价在乎他的健康，而且你也要享受自己的幸福。你不要等到他产生厌恶，也不要拒绝欲望；你不必为了拒绝而拒绝，你只需为了增加自己的恩惠的价值而这么做。”

Then, taking her back to Emile, I say to her young husband, “One must bear the yoke voluntarily imposed upon oneself. Let your deserts be such that the yoke may be lightened. Above all, sacrifice to the graces, and do not think that sulkiness will make you more amiable.” Peace is soon made, and everybody can guess its terms. The treaty is signed with a kiss, after which I say to my pupil, “Dear Emile, all his life through a man needs a guide and counsellor. So far I have done my best to fulfil that duty; my lengthy task is now ended, and another will undertake this duty. To-day I abdicate the authority which you gave me; henceforward Sophy is your guardian.”

然后，我把她交还给爱弥儿，对她年轻的丈夫说，“一个人必须要自愿承担自己身上的枷锁。你要顺其自然，这样你的负担才能减轻一些。总之，你要为了美好而有所牺牲。不要以为你闷闷不乐的样子能使你的妻子更爱你。”他们两人很快便和好了，而每个人都可以猜出其中的条款内容。这个条约是通过一个吻来签订的。之后我对我的

学生说，“亲爱的爱弥儿，一个男人的一生都需要一个指引，一个导师。至今，我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我的职责。我这份长长的使命就此终结了，而另一个人会接过这项责任。今天我要放弃你所给予我的这个权力，从今以后，苏菲将是你的指引。”

Little by little the first raptures subside and they can peacefully enjoy the delights of their new condition. Happy lovers, worthy husband and wife! To do honour to their virtues, to paint their felicity, would require the history of their lives. How often does my heart throb with rapture when I behold in them the crown of my life's work! How often do I take their hands in mine blessing God with all my heart! How often do I kiss their clasped hands! How often do their tears of joy fall upon mine! They are touched by my joy and they share my raptures. Their worthy parents see their own youth renewed in that of their children; they begin to live, as it were, afresh in them; or rather they perceiv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true value of life; they curse their former wealth, which prevented them from enjoying so delightful a lot when they were young. If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happiness upon earth, you must seek it in our abode.

最初的狂喜一点点地消退了，他们能够平静地享受新生活的快乐。幸福的爱人们啊！可敬的夫妻！为了赋予他们的美德以光荣，为了描绘他们的幸福，我要写下他们一生的历史。当我在我一生的作品的结果中看到他们时，我的内心总是忍不住悸动。我曾多少次牵起他们的手，全心全意祈祷上帝的保佑啊！多少次我亲吻他们紧握的双手！多少次他们幸福的热泪流在我的手上！他们被我的幸福而打动，与我分享我的喜悦。他们可敬的父母看着自己的青春岁月在孩子们的身上焕然一新，他们在孩子们的身上又重新活了一次。或者他们第一次领会到生命的真正价值。他们唾弃自己曾经的财富，使他们在年轻

时无法享受到这样幸福的人生。如果地球上真的有幸福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来我们的住处找到它。

One morning a few months later Emile enters my room and embraces me, saying, “My master, congratulate your son; he hopes soon to have the honour of being a father. What a responsibility will be ours, how much we shall need you! Yet God forbid that I should let you educate the son as you educated the father. God forbid that so sweet and holy a task should be fulfilled by any but myself, even though I should make as good a choice for my child as was made for me! But continue to be the teacher of the young teachers. Advise and control us; we shall be easily led; as long as I live I shall need you. I need you more than ever now that I am taking up the duties of manhood. You have done your own duty; teach me to follow your example, while you enjoy your well-earned leisure.”

几个月后的一天早上，爱弥儿走进我的房间，拥抱了我并对我说，“我的主人啊，祝贺你的孩子吧！他很快就有幸要做一个父亲了。我们的责任多么艰巨！我们多么需要你啊！但上帝不允许我像教一个父亲一样来教育一个孩子。上帝不允许将这项甜美而神圣的使命交付给其他人，而不是我自己。即使尽管我可以像为我自己选择一样为我的孩子做出好的选择，我也不会这么做。但请你继续来做这个年轻的导师吧。请你给我们建议，控制我们。我们很容易被指引的。我此生都非常需要你。我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因为我要担负起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责任。你已经完成了你的职责；当你在享受自己来之不易的休闲时，请教我如何向你学习。”

[2_1].Without this the race would necessarily diminish; all things considered, for its preservation each woman ought to have about four children, for about half the

children born die before they can become parents, and two must survive to replace the father and mother. See whether the towns will supply them?

[2_2].Women's timidity is yet another instinct of nature against the double risk she runs during pregnancy.

[2_3].The child will say this because she has heard it said; but you must make sure she knows what death is, for the idea is not so simple and within the child's grasp as people think. In that little poem "Abel" you will find an example of the way to teach them. This charming work breathes a delightful simplicity with which one should feed one's own mind so as to talk with children.

[2_4].I know that women who have openly decided on a certain course of conduct profess that their lack of concealment is a virtue in itself, and swear that, with one exception, they are possessed of all the virtues; but I am sure they never persuaded any but fools to believe them. When the natural curb is removed from their sex, what is there left to restrain them? What honour will they prize when they have rejected the honour of their sex? Having once given the rein to passion they have no longer any reason for self-control. "Nec femina, amissa pudicitia, alia abnuerit." No author ever understood more thoroughly the heart of both sexes than Tacitus when he wrote those words.

[2_5].The way of a man in his youth was one of the four things that the sage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fifth was the shamelessness of an adulteress. "Quae comedit, et tergens os suum dicit; non sum operata malum." Prov. xxx. 20.

[2_6]."'When you leave the palace you enter a vast garden, four acres in extent, walled in on every side, planted with tall trees in blossom, and yielding pears, pomegranates, and other goodly fruits, fig-trees with their luscious burden and green olives. All the year round these fair trees are heavy with fruit; summer and winter the soft breath of the west wind sways the trees and ripens the fruit. Pears and apples wither on the branches, the fig on the fig-tree, and the clusters of grapes on the vine. The inexhaustible stock bears fresh grapes, some are baked, some are spread out on the threshing floor to dry, others are made into wine, while flowers, sour grapes, and those which are beginning to wither are left upon the tree. At either end is a square garden filled with flowers which bloom throughout the year, these gardens are adorned by two fountains, one of these streams waters the garden, the other passes through the palace and is then taken to a lofty tower in the town to provide drinking water for its citizens. ' Such i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royal garden of Alcinous in the 7th book of the Odyssey, a garden in which, to the lasting disgrace of

that old dreamer Homer and the princes of his day, there were neither trellises, statues, cascades, nor bowling-greens. "

[2_7].I own I feel grateful to Sophy's mother for not letting her spoil such pretty hands with soap, hands which Emile will kiss so often.

[2_8].The kind of deceit referred to here is just the opposite of that deceit becoming in a woman, and taught her by nature; the latter consists in concealing her real feelings, the former in feigning what she does not feel. Every society lady spends her life in boasting of her supposed sensibility, when in reality she cares for no one but herself.

[2_9].To look after a sick peasant is not merely to give him a pill, or medicine, or to send a surgeon to him. That is not what these poor folk require in sickness; what they want is more and better food. When you have fever, you will do well to fast, but when your peasants have it, give them meat and wine; illness, in their case, is nearly always due to poverty and exhaustion; your cellar will supply the best draught, your butchers will be the best apothecary.

[2_10].If they had such a common master, he would be no other than the sovereign, and then the right of slavery resting on the right of sovereignty would not be its origin.

[2_11].These problems and theorems are mostly taken from the Treatise on the Social Contract, itself a summary of a larger work, undertaken without due consideration of my own powers, and long since abandoned.

[2_12].You will remember that I mean, in this context, the supreme magistrates or heads of the nation, the others being only their deputies in this or that respect.

[2_13].In France it is the wives who first emancipate themselves; and necessarily so, for having very little heart, and only desiring attention, when a husband ceases to pay them attention they care very little for himself. In other countries it is not so; it is the husband who first emancipates himself; and necessarily so, for women, faithful, but foolish, importune men with their desires and only disgust them. There may be plenty of exceptions to these general truths; but I still think they are truths.

[3_1].如果不是这样，人类就必然会灭绝。将所有事物都考虑进来，那么为了繁衍生息，每个妇女应当生育大约四个孩子。因为有一半的孩子会在成为父母之前去世，而两位将会存活下来，取代父亲和母亲。那么城市能否为他们供给呢？

[3_2].女性的羞怯是另一种自然本能，这样她在怀孕期间就能够防御双重的危险

[3_3].孩子们会说，这是因为她听到有人这么说。但是你必须要确保她了解什么是死亡，因为这个观点并不简单，孩子们理解起来并不像大人想得这么简单。在小诗《阿伯尔》中，你会发现教导他们的示例。这部迷人的作品令人愉悦又简明易懂，我们可以将之作为精神食粮以便和孩子们交谈。

[3_4].我知道一些女士公开决定要这么做，并宣称这种直率坦诚的做法实际是一种美德，她们认为除了这一点之外，她们拥有所有的美德。但我确信她们绝不会使除了傻瓜以外的任何人相信她们。当自然的束缚从性别上移开，又有什么能束缚住她们呢？当她们拒绝了来自于自己性别的光荣，还有什么荣耀能够取得呢？一旦使自己受到欲念的控制，她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自控了。“女人一旦丧失廉耻，便来者不拒，什么事都能干的出来了。”当塔西佗写下这样的语句时，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要比他更彻底地了解两性的心意了。

[3_5].一个人在年轻时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圣人无法理解的四件事之一。第五件事则是通奸者的寡廉鲜耻。“她吃了，把嘴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旧约全书·箴言》第30章，第20节。

[3_6].“‘当你离开宫殿，就会走进一个占地约四英亩的巨大的花园，周围建上了围墙。那里种植着各种茂盛的植物，果实累累的梨子、石榴和其他的水果，无花果树散发着馥郁的芳香，还种有青翠的橄榄。一整年来这里的果树都果实累累，夏冬时节温柔的西风摇曳着果树，成熟了果实。梨子和苹果在树枝上熟透了，无花果挂在枝头，而葡萄成串地长在藤上。无穷的葡萄藤上挂满了新鲜的葡萄，有一些被烘干，一些则在平坦的地面上摊开晒干，还有一些被做成了葡萄酒。而还在开花的酸葡萄则会被留在藤上等待成熟。花园的两边是一个满是鲜花四季常开的方形花园。其中有两处喷泉点缀，其中一股水流浇灌着花园，另一股则穿过宫殿，被抽向高出的水塔为公民提供饮用水。’这就是在《奥德赛》第七卷中描写的阿尔喀诺俄斯的皇家花园的景象。因为这座花园中没有格子棚架、雕塑、瀑布和草地，使得老梦想家荷马和那时的国王感到受辱。

[3_7].我承认，感谢苏菲的母亲没有让她因为肥皂而损伤了那双美丽的手，那双爱弥儿时常会亲吻的手。

[3_8].这里所说的虚伪和那种成为一个女人、自然所教导的虚伪恰恰相反。后者是要隐藏她的真实感情，而前者是要假装出她没有的感情。每一位善于社交的女士都花费一生来吹嘘自己假意的情感，但事实上她并不在乎别人，只在乎自己。

[3_9].要照顾一个生病的农人并不仅仅只是给他递药片或药水，或是为他找来医生。一个穷人在生病时需要的不是这些，他需要的更多，还有更有营养的食物。当你

发烧时，你康复得很快。而当农人发烧时，则需要酒肉食物，因为对他们来说疾病往往是因为贫穷和疲乏。你的酒窖中有最好的良药，而屠夫才是最好的药剂师。

[3_10].如果他们有一个统一的领袖，那就一定是国王了。那么根据统治权形成的奴隶的权利就不会成为其起源。

[3_11].这些问题和定理大多来自于《社会契约论》，这是一本范围更广的书的总结。以我自己的能力，是无法足以考虑这些问题的，所以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

[3_12].你们将会记起我曾在这里说过的，最高行政官就是国家领袖，而其他行政官只是他们的在某些方面的代理人。

[3_13].在法国通常是妻子首先解放自己。这是必然的，因为她们非常小气，只希望得到关心。一旦丈夫不在关心她们，她们就不再关心丈夫了。而在其他国家并不是这样。通常是丈夫首先解放自己。而女性必然如此，她们往往是忠诚却愚蠢的，为了欲求而纠缠男性却只会使他们厌烦。对于这些普遍的真相来说可能会有很多例外。但是我仍然相信它们的真实性。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常识

Thomas Paine

托马斯·潘恩

Common Sen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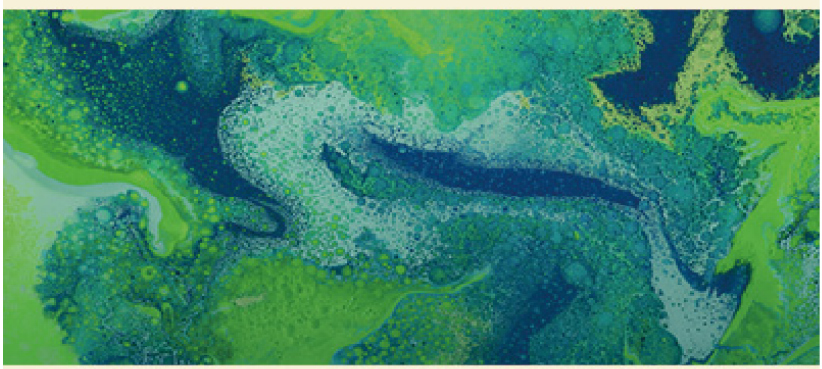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常识

Common Sense

托马斯·潘恩 著

郭晓霞 译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ON THE ORIGIN AND DESIGN OF GOVERNMENT IN GENERAL, WITH CONCISE REMARKS ON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论政府的起源与目的，兼简要评述英国政体
- OF MONARCHY AND HEREDITARY SUCCESSION 君主政体与世袭制
- THOUGHT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AMERICAN AFFAIRS 美国境况现状思考
- OF THE PRESENT ABILITY OF AMERICA: WITH SOME MISCELLANEOUS REFLECTIONS 关于美国当前的能力：及一些沉思
- Appendix 附录
- Epistle to Quakers 致辉格党人书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ON THE ORIGIN AND DESIGN OF GOVERNMENT IN GENERAL, WITH CONCISE REMARKS ON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论政府的起源与目的，兼简要评述英国政体

Some writers have so confounded society with government, as to leave little or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whereas they are not only different, but have different origins. Society is produced by our wants, and government by our wickedness; the former promotes our happiness *positively* by uniting our affections, the latter *negatively* by restraining our vices. The one encourages intercourse, the other creates distinctions. The first is a patron, the last a punisher.

一些作家把社会与政府混为一谈，认为两者之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区别；然而，社会与政府不仅有区别，两者连起源也不同。社会是我们需求的产物，而政府源于我们的罪恶；前者通过团结人心，积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而后者则是消极抑制我们的恶习。它们一个鼓励交流，另一个制造差异。前者是褒奖者，而后者则是惩戒者。

Society in every state is a blessing, but Government, even in its best state, is but a necessary evil; in its worst state an intolerable one: for when we suffer, or are exposed to the same miseries *by a government* , which we might expect in a country *without government* , our calamity is heightened by reflecting that we furnish the means by which we suffer. Government, like dress, is the badge of lost innocence; the palaces of kings are built upon the ruins of the bowers of paradise. For were the impulses of conscience clear, uniform and irresistibly obeyed, man would need no other lawgiver;

but that not being the case, he finds it necessary to surrender up a part of his property to furnish mea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st; and this he is induced to do by the same prudence which in every other case advises him, out of two evils to choose the least. Wherefore, security being the true design and end of government, it unanswerably follows that whatever form thereof appears most likely to ensure it to us, with the least expense and greatest benefit, is preferable to all others.

社会在每一片国土上均为人心所向，而即使是在最繁荣稳定的国家，政府也只是一个毒瘤；在处境极坏的国家，政府简直是不可容忍的祸害：这是因为，当我们遭受苦难时，或者遭受政府所制造的痛苦时，我们便会期待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意识到我们正是由于自身原因而受苦，我们愈发觉得苦难深重。政府，就像服装，是纯真不在的象征；君主的宫殿建在天堂乐土的废墟之上。如果人们能遵从良心的呼唤，统一且完全服从，那么人们就不会需要别人来立法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人们觉得有必要放弃一部分权利来换取对其他权利的保护；出于谨慎，人们才这么做，就像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同样出于谨慎，人们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既然安全是政府的真正意图和目标，那么毫无疑问，无论政府呈现什么形式，只要能花费最小且成效最大地确保安全，都是所有人乐于接受的。

In order to gain a clear and just idea of the design and end of government, let us suppose a small number of persons settled in some sequestered part of the earth, unconnected with the rest; they will then represent the first peopling of any country, or of the world. In this state of natural liberty, society will be their first thought. A thousand motives will excite them thereto; the strength of one man is so unequal to his wants, and his mind so unfitted for perpetual solitude, that he is soon obliged to seek assistance and

relief of another, who in his turn requires the same. Four or five united would be able to raise a tolerable dwelling in the midst of a wilderness, but one man might labour out the common period of life without accomplishing any thing; when he had felled his timber he could not remove it, nor erect it after it was removed; hunger in the mean time would urge him to quit his work, and every different want would call him a different way. Disease, nay even misfortune, would be death; for, though neither might be mortal, yet either would disable him from living, and reduce him to a state in which he might rather be said to perish than to die.

为了清楚且准确地了解政府意图和目标，我们假设有一小部分人住在世界上僻静的一隅，与世隔绝；他们就代表这个国家，甚或世界的第一批居民。在这种自然的自由状态下，他们会首先想到社会。所有动力都将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一个人的力量完全不足以实现他的需求，而他也并不想永久地与世隔绝，因此他很快就被迫寻求他人的帮助和宽慰，而恰巧对方也有同样的需求。四五个人一起，就能够在荒野之中建造一个还过得去的住所，但单独一个人就可能一生劳碌却一事无成；比如说，伐倒树木却无法凭一己之力移动它，即便拖得动，也无法把它竖立起来；同时饥饿迫使他放弃，而每一种不同的需求用不同的方式指使他。疾病，甚至不幸，可能意味着死亡；因为，即便它们并不致命，却会剥夺他独立生活的能力，且进一步使他沦落到与其说就死，不如说苟延残喘的境地。

Thus necessity, like a gravitating power, would soon form our newly arrived emigrants into society, the reciprocal blessings of which would supercede, and render the obligations of law and government unnecessary while they remained perfectly just to each other; but as nothing but Heaven is impregnable to vice, it will unavoidably happen that in proportion as they surmount the first

difficulties of emigration, which bound them together in a common cause, they will begin to relax in their duty and attachment to each other: and this remissness will point out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some form of government to supply the defect of moral virtue.

因此需求，如同引力一般，将我们的新移民促成社会，其互惠作用将替代法律及政府的制约，使其无足轻重，其存在只惠及彼此；然而由于恶习除了天堂无坚不摧，其必然多多少少存在。移民初期，人们由于共同的事业走在一起，而最初的困难克服之后，人们开始放松职责，也不再依附彼此：这种怠慢呼唤某种形式的政府的诞生，以弥补道德的缺陷。

Some convenient tree will afford them a State House, under the branches of which the whole Colony may assemble to deliberate on public matters. It is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their first laws will have the title only of Regulations and be enforced by no other penalty than public disesteem. In this first parliament every man by natural right will have a seat.

某棵合适的树做议场，所有人聚在树下仔细讨论公共事务。很有可能最初制定出的法律徒有法规之名，而惩罚方式不外乎众人的嫌恶。在这种初始的国会中，每个人天然拥有一个席位。

But as the Colony increases, the public concerns will increase likewise, and the distance at which the members may be separated, will render it too inconvenient for all of them to meet on every occasion as at first, when their number was small, their habitations

near, and the public concerns few and trifling. This will point out the convenience of their consenting to leave the legislative part to be managed by a select number chosen from the whole body, who are supposed to have the same concerns at stake which those have who appointed them, and who will act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whole body would act were they present. If the colony continue increasing, it will become necessary to augment the number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at the interest of every part of the colony may be attended to, it will be found best to divide the whole into convenient parts, each part sending its proper number: and that the *elected* might never form to themselves an interest separate from the *electors* , prudence will point out the propriety of having elections often: because as the *elected* might by that means return and mix again with the general body of the *electors* in a few months, their fidelity to the public will be secured by the prudent reflection of not making a rod for themselves. And as this frequent interchange will establish a common interest with every part of the community, they will mutually and naturally support each other, and on this, (not on the unmeaning name of king,) depends the *strength of government, and the happiness of the governed* .

随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公众顾虑也相应增多，成员们离得远了，每次议事聚在一起愈加不便，不像开始人数少，住所近，公共事务少且微的时候了。大家同意由全体成员中选举一部分来处理立法事务便顺理成章，这些人应与委任他们的人有同样的危机意识，而且采取的行动与全体在场的行为一致。如果群体持续增长，就很必要增加代表的数量，以便群体中的每一方利益都能照顾到，把整个群体便捷地分成部分，每部分派出合适数量的代表会是最好的：获选者绝不会形成与选举者不同的利益，出于谨慎，经常选举是合宜的：因为这样获选者过几个月就回到选举者中与他们融为一体，他们对于公众的忠诚通过对自己没有惹火上身的审慎反思得以保障。由于这种频繁的交

流会在团体中每个部分建立起共同的利益，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自然而然地互相支持，这才是（而非毫无意义的君主之名）政府力量的基础，被统治者的幸福所在。

Here then is the origin and rise of government; namely, a mode rendered necessary by the inability of moral virtue to govern the world; here too is the design and end of government, viz. Freedom and security. And however our eyes may be dazzled with show, or our ears deceived by sound; however prejudice may warp our wills, or interest darken our understanding, the simple voice of nature and reason will say, 'tis right.

这即是政府的起源和兴起；即，道德无力约束世界的情况下出现的必然模式；这也是政府的意图和目标，即自由与安全。无论我们的双目如何为表象所迷惑，或者我们的双耳为声音所欺骗；无论偏见如何蒙蔽我们的意志，或者利益如何模糊我们的理解，自然与理性之声都会说，这是对的。

I draw my idea of the form of government from a principle in nature which no art can overturn, viz. that the more simple any thing is, the less liable it is to be disordered, and the easier repaired when disordered; and with this maxim in view I offer a few remarks on the so much boasted constitution of England. That it was noble for the dark and slavish times in which it was erected, is granted. When the world was overrun with tyranny the least remove therefrom was a glorious rescue. But that it is imperfect, subject to convulsions, and incapable of producing what it seems to promise is easily demonstrated.

我由任何技巧都无法推翻的自然法则得出对于政府形式的构想，即任何事物越简单，越不易混乱，且越易于在混乱时修正；在这一信条基础上，我谈谈对于大肆吹嘘的英国政体的评价。不可否认，建立于黑暗的奴化时代的英国政体彼时是伟大的。当世界处于专制统治之下，能与之背离，最不济的也是光荣的救赎。但是，要论证这种体制的不完美，易于动乱，没法兑现承诺是很容易的。

Absolute governments, (tho' the disgrace of human nature) have this advantage with them, they are simple; if the people suffer, they know the head from which their suffering springs; know likewise the remedy; and are not bewildered by a variety of causes and cures. But the constitution of England is so exceedingly complex, that the nation may suffer for years together without being able to discover in which part the fault lies; some will say in one and some in another, and every political physician will advise a different medicine.

专制政府，（尽管是人性的不光彩）有它们的优势，它们简单；如果民众受苦，他们知道他们苦难的源头；同样知道药方；而不会被多种多样的原因和处方困惑。但是英国的政体复杂到极致，以至于整个国家受难多年，却无法判明错在哪里；一些人说错在这里而另一些人另执一辞，且每个政治医师会开一剂不同的药。

I know it is difficult to get over local or long standing prejudices, yet if we will suffer ourselves to examine th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we shall find them to be the base remains of two ancient tyrannies, compounded with some new Republican materials.

我知道克服当地的或者由来已久的偏见不易，然而如果我们勉强去检视英国宪政的组成部分，我们会发现它们是两朝古代专制的低级的残存，混合了一些新共和的元素。

First.—The remains of Monarchical tyranny in the person of the King.

首先。—君主身上的君主专制残余。

Secondly.—The remains of Aristocratical tyranny in the persons of the Peers.

其次。—同僚身上的贵族霸行残留。

Thirdly.—The new Republican materials, in the persons of the Commons, on whose virtue depends the freedom of England.

第三．—下议院体现的新共和余留，英国的自由之所依。

The two first, by being hereditary, are independant of the People; wherefore in a *constitutional sense* they contribute nothing towards the freedom of the State.

前两种是世袭的，与人民无关；因此从政体上来说，他们于国家

的自由是无关。

To say that the constitution of England is an *union* of three powers, reciprocally *checking* each other, is farcical; either the words have no meaning, or they are flat contradictions.

说英国的政体是三大力量结合，且相互牵制，是荒唐的；要么这种说辞毫无意义，要么自相矛盾。

To say that the Commons is a check upon the King, presupposes two things.

说下议院牵制君主，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

First.—That the King it not to be trusted without being looked after; or in other words, that a thirst for absolute power is the natural disease of monarchy.

第一．——没有监督，君主不可信；换句话说，对绝对权力的渴望是君主政体的天然弊端。

Secondly.—That the Commons, by being appointed for that purpose, are either wiser or more worthy of confidence than the Crown.

第二．——出于上述目的而任命的下议院，既不比君主更明智，也并不更值得信赖。

But as the same constitution which gives the Commons a power to check the King by withholding the supplies, gives afterwards the King a power to check the Commons, by empowering him to reject their other bills; it again supposes that the King is wiser than those whom it has already supposed to be wiser than him. A mere absurdity!

根据政体，下议院有权通过拒绝供给制约君主，但是同一政体接着又授予君主通过否决下议院的其他议案去制约下议院的权力；这假定了君主比那些已被认为比他贤明的人更加贤明。简直荒唐！

There is something exceedingly ridiculous in the composition of Monarchy; it first excludes a man from the means of information, yet empowers him to act in cases where the highest judgment is required. The state of a king shuts him from the World, yet the business of a king requires him to know it thoroughly; wherefore the different parts, by unnaturally opposing and destroying each other, prove the whole character to be absurd and useless.

君主政体中还有更荒唐的东西；它首先截断一个人获得信息的途径，然而又授予他在需要最高决策权的情况下做出应对的权力。君主的身份将他与世隔绝，而他的职责又要求他对世界了如指掌；因此，这两个不同组成部分，互相对抗，互相破坏，证明了整个君主角色的制定是不仅荒谬，且毫无用处。

Some writers have explained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thus: the King, say they, is one, the people another; the Peers are a house in behalf of the King, the commons in behalf of the people; but this hath all the distinctions of a hous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and though the expressions be pleasantly arranged, yet when examined they appear idle and ambiguous; and it will always happen, that the nicest construction that words are capable of, when applied to the description of something which either cannot exist, or is too incomprehensible to be within the compass of description, will be words of sound only, and though they may amuse the ear, they cannot inform the mind: for this explanation includes a previous question, viz. *how came the King by a power which the people are afraid to trust, and always obliged to check* ? Such a power could not be the gift of a wise people, neither can any power, *which needs checking* , be from God; yet the provision which the constitution makes supposes such a power to exist.

一些作家将英国政体解释为：君主自成一体，民众则是另外一个整体；贵族构成上议院，是君主的代表，下议院是人民的代表；可是这把议会的一切特质都分解成对立的了；虽然说辞尚悦耳，细究之下，这些说辞显得空洞且含糊；即便是语言所能描述的最好的体制，如果说的是不现实的，或者太高深，语言都无法表述，那不过是空谈，也许悦耳，却不能启迪思维，一贯如此：因为这个解释包含了一个先决问题，即民众不敢信赖，且不得不一直牵制的权力，怎么就赋予了君主呢？这样的权力不可能是明智的民族赋予的，任何需要牵制的权力也不可能是天赋的；然而宪政的条例偏偏假定这种权利是存在的。

But the provision is unequal to the task; the means either cannot or will not accomplish the end, and the whole affair is a Felo

de se: for as the greater weight will always carry up the less, and as all the wheels of a machine are put in motion by one, it only remains to know which power in the constitution has the most weight, for that will govern: and tho' the others, or a part of them, may clog, or, as the phrase is, check the rapidity of its motion, yet so long as they cannot stop it, their endeavours will be ineffectual: The first moving power will at last have its way, and what it wants in speed is supplied by time.

然而这个条件与其使命并不匹配；这种方式既不能也不会达成目的，并且整件事就是死路一条：因为由于更重要的往往撑着不那么重的，由于一台机器的所有轮子都由一个轮子推动，所以还是只需要知道在这种政体中哪种权力最重要，而这种权力会统领：虽然其他的权力，或者权力中的一部分会起阻碍作用，换句话说，会限制进步的速度，只要它们无法停止进程，它们的功夫就是白费的。第一种推动力终会如愿以偿，它对速度的要求只需假以时日。

That the crown is this overbearing part in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needs not be mentioned, and that it derives its whole consequence merely from being the giver of places and pensions is self-evident; wherefore, though we have been wise enough to shut and lock a door against absolute Monarchy, we at the same time have been foolish enough to put the Crown in possession of the key.

在英国政体中，君权是高高在上的，这一点不必提，而君主的重要性仅仅由其职务和薪金提供者的身份这点就不证自明了；因此，尽管我们足够明智地将君主专制政体拒之门外且落了锁，却十分愚蠢地把钥匙交给了君主。

The prejudice of Englishmen, in favour of their own government, by King, Lords and Commons, arises as much or more from national pride than reason. Individuals are undoubtedly safer in England than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but the will of the king is as much the law of the land in Britain as in France, with this difference, that instead of proceeding directly from his mouth, it is handed to the people under the formidable shape of an act of parliament. For the fate of Charles the First hath only made kings more subtle—not more just.

英国人支持自己由君主、上议院、下议院组成的政府的这种偏见，源于民族自豪和理性，或者更多的源于民族自豪感。个人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无疑要更安全些：但是在英国，君主的意志和在法国一样，等同国家法律，唯有一点不同，即英国君主的意志不是通过他自己的口直接传达，而是通过让人生畏的国会法令形式传达。查理一世的命运只是让君主身份更加微妙，而没有更合理。

Wherefore, laying aside all national pride and prejudice in favour of modes and forms, the plain truth is that *it is wholly owing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 and not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at the crown is not as oppressive in England as in Turkey.

因此，抛开所有那些赞同模式和形式的民族自豪与偏见不讲，显而易见的是，英国君主完全取决于民众的意志，而非政府的政体才使得英国君主制不像土耳其那样专政。

An inquiry into the *constitutional errors* in the English form of

government, is at this time highly necessary; for as we are never in a proper condition of doing justice to others, while we continu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me leading partiality, so neither are we capable of doing it to ourselves while we remain fettered by any obstinate prejudice. And as a man who is attached to a prostitute is unfitted to choose or judge of a wife, so any prepossession in favour of a rotten co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will disable us from discerning a good one.

此刻，对于英国的政府组织形式政体方面的错误的探究，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受到一些主流偏见的影响，我们永远无法公正地对待他人；同样的，在顽固的偏见束缚下，我们也不能公正地对待我们自己。一个迷恋妓女的男人，是不配挑选或者评判妻子的，同样，任何对政府的腐朽政体的执迷会使我们无从甄别好坏。

OF MONARCHY AND HEREDITARY SUCCESSION

君主政体与世袭制

Mankind being originally equals in the order of creation, the equality could only be destroyed by some subsequent circumstance: the distinctions of rich and poor may in a great measure be accounted for, and that without having recourse to the harsh ill-sounding names of oppression and avarice. Oppression is often the *consequence* , but seldom or never the *means* of riches; and tho' avarice will preserve a man from being necessitously poor, it generally makes him too timorous to be wealthy.

人生而平等，这种平等只会被后来的境况所破坏：在很大程度上贫富差异就是这样，并不需要依赖严酷刺耳的压迫和贪婪的名头。压迫通常是结果，但很少甚至绝不是富人的手段；虽然贪婪能使人免于穷困潦倒，但它通常会使人怯懦而无法变得富有。

But there is another and great distinction for which no truly natural or religious reason can be assigned, and that is the distinction of men into *kings* and *subjects* . Male and female are the distinctions of nature, good and bad the distinctions of Heaven; but how a race of men came into the world so exalted above the rest, and distinguished like some new species, is worth inquiring into, and whether they are the means of happiness or of misery to mankind.

但是，还有另一种巨大差别，不能用纯粹自然或宗教的原因来解释，这就是君主和国民差别。自然区别男女，上帝区别善恶；但是，一个人如何生来就凌驾于他人之上，如新物种般卓著，以及他们到底是造福抑或施难于人，倒值得探究。

In the early ages of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 chronology there were no kings; the consequence of which was, there were no wars; it is the pride of kings which throws mankind into confusion. Holland, without a king hath enjoyed more peace for this last century than any of the monarchical governments in Europe. Antiquity favours the same remark; for the quiet and rural lives of the first Patriarchs have a snappy something in them, which vanishes when we come to the history of Jewish royalty.

根据圣经年表记载，在远古时期并没有君主；结果就是，没有战争；是君主的尊严让人类陷于混乱。荷兰没有君主，从而在最近一个世纪享有了比欧洲任何君主政体的国家更加长久的和平。古代也有相同言论；因为最初的教首们过的恬静质朴的生活自得其乐，而我们进入犹太王族的历史时期后，这就不复存在了。

Government by kings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the world by the Heathens, from whom the children of Israel copied the custom. It was the most prosperous invention the Devil ever set on foot for the promotion of idolatry. The Heathens paid divine honours to their deceased kings, and the Christian World hath improved on the plan by doing the same to their living ones. How impious is the title of sacred Majesty applied to a worm, who in the midst of his splendor is crumbling into dust!

君主掌握政权的形式最初是异教徒采用的，后来犹太人模仿了这种传统。这是魔鬼为了推崇偶像崇拜而进行的最为成功的发明。异教徒给他们死去的君主赋予了非凡的荣誉，而基督教通过赋予在世的君主同样的荣誉推进了这一方式。把这种神圣王权的头衔赋予在辉煌中化为尘埃的寄生虫，有多不敬！

As the exalting one man so greatly above the rest cannot be justified on the equal rights of nature, so neither can it be defended on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for the will of the Almighty as declared by Gideon, and the prophet Samuel, expressly disapproves of government by Kings.

由于把一人高高凌驾于万人之上的这种情况无法用自然的平等权利解释，也就无法受到圣经的权威维护；因为全能的神的意志已由基甸和先知塞缪尔宣告，明确反对君主政体。

All anti-monarchical parts of scripture, have been very smoothly glossed over in monarchical governments, but they undoubtedly merit the attention of countries which have their governments yet to form. “Render unto Cesar the things which are Cesar's” is the scripture doctrine of courts, yet it is no support of monarchical government, for the Jews at that time were without a king, and in a state of vassalage to the Romans.

圣经上所有反专制的部分都已经被专制政府圆滑地粉饰了，但是它们毋庸置疑地获得了将要组建政府的国家的注意。“恺撒的归恺撒”是王室引的圣经教义，但这无法佐证专制政府，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尚隶属于罗马，并没有君主。

Near three thousand years passed away, from the Mosaic account of the creation, till the Jews under a national delusion requested a king. Till then their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in extraordinary cases where the Almighty interposed) was a kind of Republic, administered by a judge and the elders of the tribes. Kings they had none, and it was held sinful to acknowledge any being under that title but the Lord of Hosts. And when a man seriously reflects on the idolatrous homage which is paid to the persons of kings, he need not wonder that the Almighty, ever jealous of his honour, should disapprove a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so impiously invades the prerogative of Heaven.

从摩西记载的创世纪，到犹太人举国出于错觉要求一位王，历经近三千年。直到那时他们的政体（除了在上帝进行了干预的特殊情况下）算是共和制，由一个法官和部落的长老们治理。他们没有王，而且除了耶和华，承认任何人的王的头衔都是罪孽深重的。当一个人认真地反思对君主的偶像式效忠时，他根本不需揣测上帝会不会出于对人君的荣耀的妒忌，而反对贸然侵犯上帝特权的政体形式。

Monarchy is ranked in scripture as one of the sins of the Jews, for which a curse in reserve is denounced against them. The history of that transaction is worth attending to.

君主政体在圣经中列为犹太人的罪行之一，为此预言了对他们的诅咒。那件事的历史应该关注。

The children of Israel being oppressed by the Midianites,

Gideon marched against them with a small army, and victory thro' the divine interposition decided in his favour. The Jews, elate with success, and attributing it to the generalship of Gideon, proposed making him a king, saying, “Rule thou over us, thou and thy son, and thy son's son.” Here was temptation in its fullest extent; not a kingdom only, but an hereditary one; but Gideon in the piety of his soul replied, “I will not rule over you, neither shall my son rule over you. *the Lord shall rule over you* .” Words need not be more explicit: Gideon doth not decline the honour, but denieth their right to give it; neither doth he compliment them with invented declarations of his thanks, but in the positive style of a prophet charges them with disaffection to their proper Sovereign, the King of Heaven.

在以色列的子民被米甸人压迫的时候，基甸带着一小支军队进攻他们，并且由于神的介入相助取得了胜利。犹太人为成功欢欣鼓舞，并归功于基甸的雄才大略，提出让他为王，说，“你来统治我们吧，你和你的儿子，以及你儿子的儿子。”这是最大的诱惑了；不仅仅是一个王国；而是一个世袭的王国；但是高登发自内心地虔诚地答道，“我绝不会统治你们，我的儿子也不会统治你们，上帝将统治你们。”说得再明确不过了：基甸不拒绝荣誉，但不认可他们赋予荣誉的权力；他也没有编一番谢意来奉承他们，而是以先知的肯定口吻指责他们背叛了本来的君主，上帝。

About one hundred and thirty years after this, they fell again into the same error. The hankering which the Jews had for the idolatrous customs of the Heathens, is something exceedingly unaccountable; but so it was, that laying hold of the misconduct of Samuel's two sons, who were intrusted with some secular concerns, they came in an abrupt and clamorous manner to Samuel, saying, “Behold thou art old, and they sons walk not in thy ways, now

make us a king to judge us like all the other nations." And here we cannot observe but that their motives were bad, viz. that they might be *like* unto other nations, i. e. the Heathens, whereas their true glory lay in being as much *unlike* them as possible. "But the thing displeased Samuel when they said, give us a King to judge us; and Samuel prayed unto the Lord, and the Lord said unto Samuel, hearken unto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in all that they say unto thee, for they have not rejected thee, but they have rejected me, *that I should not reign over them* . According to all the works which they have done since the day that I brought them up out of Egypt even unto this day, wherewith they have forsaken me, and served other Gods: so do they also unto thee. Now therefore hearken unto their voice, howbeit, protest solemnly unto them and show them the manner of the King that shall reign over them," i. e. not of any particular King, but the general manner of the Kings of the earth whom Israel was so eagerly copying after.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great distance of time and difference of manners, the character is still in fashion. "And Samuel told all the words of the Lord unto the people, that asked of him a King. And he said, This shall be the manner of the King that shall reign over you. He will take your sons and appoint them for himself for his chariots and to be his horsemen, and some shall run before his chariots" (this description agrees with the present mode of impressing men) "and he will appoint him captains over thousands and captains over fifties, will set them to ear his ground and to reap his harvest, and to make his instruments of war, and instruments of his chariots, And he will take your daughters to be confectionaries, and to be cooks, and to be bakers" (this describes the expense and luxury as well as the oppression of Kings) "and he will take your fields and your vineyards, and your olive yards, even the best of them, and give them to his servants. And he will take the tenth of your seed, and of your vineyards, and give them to his officers and to his servants"

(by which we see that bribery, corruption, and favouritism, are the standing vices of Kings) “and he will take the tenth of your men servants, and your maid servants, and your goodliest young men, and your asses, and put them to his work: and he will take the tenth of your sheep, and ye shall be his servants, and ye shall cry out in that day because of your king which ye shell have chosen, *and the Lord will not hear you in that day* .” This accounts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Monarchy; neither do the characters of the few good kings which have lived since, either sanctify the title, or blot out the sinfulness of the origin; the high encomium of David takes no notice of him *officially as a king* , but only as 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Nevertheless the people refused to obey the voice of Samuel, and they said, Nay, but we will have a king over us, that we may be like all the nations, and that our king may judge us, and go out before us and fight our battles.” Samuel continued to reason with them but to no purpose; he set before them their ingratitude, but all would not avail; and seeing them fully bent on their folly, he cried out, “I will call unto the Lord, and he shall send thunder and rain” (which was then a punishment, being in the time of wheat harvest) “that ye may perceive and see that your wickedness is great which ye have done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 *in asking you a king* . So Samuel called unto the Lord, and the Lord sent thunder and rain that day, and all the people greatly feared the Lord and Samuel. And all the people said unto Samuel, Pray for thy servants unto the Lord thy God that we die not, for *we have added unto our sins this evil, to ask a king* .” These portions of scripture are direct and positive. They admit of no equivocal construction. That the Almighty hath here entered his protest against monarchical government is true, or the scripture is false. And a man hath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re is as much of kingcraft as priestcraft in withholding the scripture from the public in popish countries. For monarchy in every instance is the popery of government.

大概在这之后一百三十年，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犹太人对异教徒偶像崇拜习俗的渴望达到极其无法理解的程度；既是这样，当他们抓住塞缪尔的两个受托了世俗事务的儿子的不当行为时，他们就唐突而闹哄哄地来见塞缪尔，并说道，“看你是老了，你的儿子们也不行你的道，现在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给我们立个王来评判我们吧。”由此我们可见他们的不良动机，就是说，他们可能像其他国家，或者说异教徒们一样，然而他们真正的荣耀却是尽可能和他们不一样。“当他们说给我们一个国王来评判我们时，塞缪尔感到不快；塞缪尔向上帝祈祷，上帝对塞缪尔说：听从人们对你说的话吧，因为他们并没有排斥你，但是他们排斥了我，我不会再治理他们了。自从我带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一天直至今日，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已经摒弃了我，转而侍奉其他的神：他们对你也是一样。所以现在，倾听他们的诉求，但要严肃地告诫他们，并且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王即将通常用什么方式治理他们，”就是说，不必是某个特定的王，而是犹太人非常渴望效仿的那种世上的王们通常的方式。尽管时代久远，方式也有差异，但性质依然。“塞缪尔将上帝的话统统告诉了要他立王的民众。且说道，这 就是王将治理你们的方式，他将征用你们的子孙为他驾车御马，让他们在王的御前奔波。”（这个描述和当前役使他人的人的行径一致）“而且他会任命你的子孙做千夫长、五十夫长，让他们为他耕地和收割庄稼，打造他战争的兵器和战车的器具，还会　让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为他烹饪烤饼。”（这描述君王们的铺张和奢华以及压迫。）“且他将霸占你的牧场、葡萄园和橄榄树园，最好的部分也不例外，然后赐给他的仆从。你的收成和葡萄园的果实，他会掠去十分之一，把它们分给他的臣们和仆从。”（这就能看出贿赂、腐败、偏袒，是君主们一贯的恶习）“你的男仆女佣，精壮劳力，你的驴子，他都掠去十分之一，让他们为他效劳：他还将掠去你十分之一的羊群，连你们自己也会沦为他们的仆人，那时候你们就会因为你们自己立的王哭天喊地，而那时候上帝却不会倾听了。”这就解释了君主政体的延续的原因；自古以来为数不多的明君的品质，都不能让这个称号神圣化，也不能完全清除罪恶的源泉；对大卫高度的赞扬，不是因为他君主的身份，而只是因为他遵从上帝的

心意。“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愿听从塞缪尔的劝诫，反倒说，不，不过我们会有王来治理我们的，就如同各国一样，王会来评判我们，并为我们挺身而战。”塞缪尔继续劝导人们，可并不奏效；他指出人们的忘恩负义，也无济于事；眼睁睁地看看他们被自己的愚蠢冲昏大脑，塞缪尔大喊道，“我会请求上帝，他必使天空雷雨交加”（作为在收割季节的一种惩罚）“你们就能够看到和明白自己在上帝面前可恶的所作所为，竟然要求王来治理。于是塞缪尔求告于上帝，果真上帝让这一天雷雨交加，之后所有人都对塞缪尔心生畏惧。民众对塞缪尔说，请替你的仆从们向你主上帝祈求免我们一死吧，因为我们请求立王，真是徒增我们的罪孽了。”这部分的记载非常明确和肯定。容不得模棱两可的解释。上帝介入反对专制政府是实情，不然圣经的记载就是假的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天主教的国家里，君王和祭司之术一样，是会竭力阻止人民深入了解圣经的。因为君主政体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天主教会统治。

To the evil of monarchy we have added that of hereditary succession; and as the first is a degradation and lessening of ourselves, so the second, claimed as a matter of right, is an insult and imposition on posterity. For all men being originally equals, no one by birth could have a right to set up his own family in perpetual preference to all others for ever, and tho' himself might deserve some decent degree of honours of his contemporaries, yet his descendants might be far too unworthy to inherit them. One of the strongest natural proofs of the folly of hereditary right in Kings, is that nature disapproves it, otherwise she would not so frequently turn it into ridicule, by giving mankind an *ass for a lion* .

君主专制的毒害之外，还有世袭制的坏处；世袭制首先就意味着我们的自甘堕落，此外，世袭制被称为权利，实际是对子孙后代的侮辱和不合理要求。人人生而平等，因此谁都没有权利让自己的家族永

久地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而且即便他本身也许在某些程度上值得受到当代人的尊敬，他的后代不见得能配得上这种荣誉。证明君主享有世袭权的荒谬的最有力的证据，就在于其违背自然，否则人类就不会屡屡成为笑柄，被叫作蠢驴而不是雄狮。

Secondly, as no man at first could possess any other public honors than were bestowed upon him, so the givers of those honors could have no power to give away the right of posterity, and though they might say “We choose you for our head,” they could not without manifest injustice to their children say “that your children and your children's children shall reign over ours forever.” Because such an unwise, unjust, unnatural compact might (perhaps) in the next succession put them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a rogue or a fool. Most wise men in their private sentiments have ever treated hereditary right with contempt; yet it is one of those evils which when once established is not easily removed: many submit from fear, others from superstition, and the more powerful part shares with the king the plunder of the rest.

其次，因为任何人最初都只享有赋予他的社会荣誉，而不能支配其他荣誉，即使那些荣誉授予者也无权让渡子孙的权利，尽管他们可能会说“我们立你来做我们的王。”却不能理直气壮地对王的后裔说“你们的子孙将永远统治我们的子孙。”因为如此不理智，不公正，违背人性的契约可能会（兴许会）导致下一代在暴戾或愚昧的人治理之下。大部分智者在私人情感上对世袭制度都报以蔑视；可是这是那种一旦建立起来就不容轻易动摇的劣根之一：许多人因恐惧而屈服，有的人则出于迷信，还有一部分有权有势的人与国王结伙进行掠夺。

This is supposing the present race of kings in the world to have

had an honorable origin: whereas it is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could we take off the dark covering of antiquity and trace them to their first rise, we should find the first of them nothing better than the principal ruffian of some restless gang, whose savage manners of pre-eminence in subtilty obtained him the title of chief among plunderers; and who by increasing in power and extending his depredations, overawed the quiet and defenseless to purchase their safety by frequent contributions. Yet his electors could have no idea of giving hereditary right to his descendants, because such a perpetual exclusion of themselves w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free and restrained principles they professed to live by. Wherefore, hereditary succession in the early ages of monarchy could not take place as a matter of claim, but as something casual or complemental; but as few or no records were extant in those days, the traditionary history stuff'd with fables, it was very easy, after the lapse of a few generations, to trump up some superstitious tale conveniently timed, Mahomet-like, to cram hereditary right down the throats of the vulgar. Perhaps the disorders which threatened, or seemed to threaten, on the decease of a leader and the choice of a new one (for elections among ruffians could not be very orderly) induced many at first to favour hereditary pretensions; by which means it happened, as it hath happened since, that what at first was submitted to as a convenience was afterwards claimed as a right.

这是假定当今世界上的君主都有着高贵的出身：然而更有可能的是，当我们揭开历史黑暗的面纱，并且追根溯源到他们最初的崛起之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祖先并没有比不逞之徒的魁首好到哪里去，他们野蛮阴险狡诈的行径使他们在盗匪中获得了首领地位；随着他们势力的增强，掠夺范围的扩大，他们震慑住了安分且手无寸铁的人们，迫使他们频繁进贡来换取安生。然而他的选民可能并不想给首领的后代世袭的权利，因为这样永久放弃统治权与他们信奉的自由和不受限

制的原则是相违背的。因此，在早期的君主制出现的世袭不可能是想施行就可以的，只是偶然的或补充性的；但是，由于那个时期鲜有或几乎没有资料记录，并且传统历史中充斥着寓言故事，因此隔了几代人后，就很容易捏造一些当时可以方便散布的、像关于异教始祖的传说般迷信的鬼话，把世袭的权利灌输给普通人。最初，很多人大概出于对首领退位和新首领推举的无序（因为在暴徒中进行的选举不可能是有序的）的惧怕，赞同了世袭制度；世袭制就这样产生了，并延续了下去，一开始只是权宜之计，后来却被声称是一种权利。

England since the conquest hath known some few good monarchs, but groaned beneath a much larger number of bad ones: yet no man in his senses can say that their claim under William the Conqueror is a very honourable one. A French bastard landing with an armed Banditti and establishing himself king of England against the consent of the natives, is in plain terms a very paltry rascally original. It certainly hath no divinity in it. However it is needless to spend much time in exposing the folly of hereditary right; if there are any so weak as to believe it, let them promiscuously worship the Ass and the Lion, and welcome. I shall neither copy their humility, nor disturb their devotion.

自从英国被征服以来，出现过极少数好的君主，但大多数时候人们还是在坏君主的统治下怨声载道：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说在威廉一世的统治下，权利是光荣的。一个法国野杂种带领一群武装暴徒登陆，违背人们的意愿在英格兰称王，坦白地讲这是极其可鄙的出身。自然没什么高尚可言。然而，花费太长时间去揭露世袭权利的愚蠢毫无必要；如果有任何人笨到去相信它，就让他们盲目地崇拜驴和狮子好了，悉听尊便。我既不会效仿他们的谦卑也不会妨碍他们的忠诚。

Yet I should be glad to ask how they suppose kings came at first? The question admits but of three answers, viz. either by lot, by election, or by usurpation. If the first king was taken by lot, it establishes a precedent for the next, which excludes hereditary succession. Saul was by lot, yet the succession was not hereditary, neither does it appear from that transaction that there was any intention it ever should. If the first king of any country was by election, that likewise establishes a precedent for the next; for to say, that the right of all future generations is taken away, by the act of the first electors, in their choice not only of a king but of a family of kings for ever, hath no parallel in or out of scripture but the doctrine of original sin, which supposes the free will of all men lost in Adam; and from such comparison, and it will admit of no other, hereditary succession can derive no glory. for as in Adam all sinned, and as in the first electors all men obeyed; as in the one all mankind were subjected to Satan, and in the other to sovereignty; as our innocence was lost in the first, and our authority in the last; and as both disable us from re-assuming some former state and privilege, it unanswerably follows that original sin and hereditary succession are parallels. Dishonourable rank! inglorious connection! yet the most subtle sophist cannot produce a juster simile.

然而我非常想问，他们觉得君主最初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只有三个答案，即：要么抽签，要么选举，要么篡夺。如果第一个君主是抽签诞生的，他就为下一任国王建立了一个先例，就排除了世袭继承。扫罗是通过抽签成为以色列国王的，但是王位继承不是世袭的，从中也看不出任何认为该世袭的迹象。如果一个国家的第一个王是选举产生的，那也同样为后代建立先例；如果说第一批选举者在选举国王的时候，他们不仅选出了自己的国王，而且选出了某个世代承袭的王族从而剥夺后世所有人的权利，那么除了人们的自由断送在亚当之手这一原罪的教义外，无论是《圣经》或其他文献里都再没有类似的

了；由且只能由此类比可见，世袭制毫无荣耀可言。因为在亚当一例中，众人皆有罪；在第一批选举者一例中，众人皆服从；一个是众人皆受撒旦摆布；另一个是众人皆受制于国王。前者使我们失去纯真，后者使我们失去主权；鉴于两者都使我们失去了曾经的某种状态或特权，毫无疑问原罪和世袭是类似的。多么不光彩的相提并论！多么可耻的联系！然而即便是再高明的雄辩家也找不出比这更加合适的比喻了。

As to usurpation, no man will be so hardy as to defend it; and that William the Conqueror was an usurper is a fact not to be contradicted. The plain truth is, that the antiquity of English monarchy will not bear looking into.

提到篡夺，没有人会顽强地捍卫它；威廉篡位是不争的事实。显然真相就是，英国君主政体的渊源是经不起推敲的。

But it is not so much the absurdity as the evil of hereditary succession which concerns mankind. Did it ensure a race of good and wise men it would have the seal of divine authority, but as it opens a door to the *foolish* , the *wicked* , and the *improper* , it hath in it the nature of oppression. Men who look upon themselves born to reign, and others to obey, soon grow insolent. Selected from the rest of mankind, their minds are early poisoned by importance; and the world they act in differs so materially from the world at large, that they have but little opportunity of knowing its true interests, and when they succeed in the government are frequently the most ignorant and unfit of any throughout the dominions.

但世袭的罪恶比它的荒唐更让人担忧。如果这种制度能保证提供一群善良贤明之士，它倒能获得神性权威的印记，但因为它打开了放出愚人、恶人及粗人的门，因此它就带有强权的性质了。那些自认为自己天生就是统治者和视他人为奴隶的，不久就变得横行霸道。从其他人挑选出来，他们的思想很早就被妄自尊大毒害；他们活动的世界与普通世界大相径庭，导致他们没有机会获知世界真正的利益。当他们继承政权的时候，他们经常是疆域中最无知最格格不入的。

Another evil which attends hereditary succession is, that the throne is subject to be possessed by a minor at any age; all which time the regency acting under the cover of a king have every opportunity and inducement to betray their trust. The same national misfortune happens when a king worn out with age and infirmity enters the last stage of human weakness. In both these cases the public becomes a prey to every miscreant who can tamper successfully with the follies either of age or infancy.

世袭制的另一种罪恶在于，王位动辄落到一个处于任何年龄的未成年人手里；在那个时间，在国王的掩饰下摄政的人有的是机会和动机背叛人们对他的信任。在国王年老体衰，到了弱不禁风的风烛残年时，国家也遭遇同样的不幸。在这两种情况下，民众都是受害者，受到那些人出于年老或年幼的蠢行所摆布。

The most plausible plea which hath ever been offered in favor of hereditary succession is, that it preserves a nation from civil wars; and were this true, it would be weighty; whereas it is the most barefaced falsity ever imposed upon mankind. The whole history of England disowns the fact. Thirty kings and two minors have reigned in that distracted kingdom since the conquest, in

which time there has been (including the revolution) no less than eight civil wars and nineteen Rebellions. Wherefore instead of making for peace, it makes against it, and destroys the very foundation it seems to stand upon.

最貌似有理的赞同世袭继承制的辩解是，它保全一国免于内战；假如这一点是真的的话，倒确是很有分量；但实际上它却是人类曾遭遇的最无耻的谎言。英国的全部历史与之背道而驰。自诺曼征服以来，有三十个国王和两个幼王统治过这个混乱的王国，期间至少发生了（包括大革命在内的）八次内战和十九次叛乱。所以它不是促进和平，而是不利于和平，并破坏它所依赖的基础。

The contest for monarchy and succession, between the houses of York and Lancaster, laid England in a scene of blood for many years. Twelve pitched battles besides skirmishes and sieges were fought between Henry and Edward. Twice was Henry prisoner to Edward, who in his turn was prisoner to Henry. And so uncertain is the fate of war and the temper of a nation, when nothing but personal matters are the ground of a quarrel, that Henry was taken in triumph from a prison to a palace, and Edward obliged to fly from a palace to a foreign land; yet, as sudden transitions of temper are seldom lasting, Henry in his turn was driven from the throne, and Edward re-called to succeed him. The parliament always following the strongest side.

约克王室和兰卡斯特王室间的君权和继承权之争，使英国浴血多年。除了小规模战斗及围攻战之外，亨利和爱德华打了十二次对阵战。亨利两次沦为爱德华的阶下囚，爱德华也被亨利俘获过。争持无非缘起个人的问题，而战争的命运和民众的性情实在难于意料，亨利

反败为胜，由阶下囚入主王宫，而爱德华则被迫流亡异域；然而，性情的突变实难持久，人们又把亨利逐下王位，召回爱德华来继任。议会总是倒向力量最强大的一边。

This contest began in the reign of Henry the Sixth, and was not entirely extinguished till Henry the Seventh, in whom the families were united. Including a period of 67 years, viz. from 1422 to 1489.

这场竞争始于亨利六世当政时期，到了统一王室的亨利七世时还没有完全止息。跨越六十七年之久，即从1422年直至1489年。

In short, monarchy and succession have laid (not this or that kingdom only) but the world in blood and ashes. 'Tis a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the word of God bears testimony against, and blood will attend it.

总之，君主政体和世袭制度将（不只是某个王国）整个世界陷于血泊和废墟之中。这是上帝言之凿凿反对的政权形式，所以免不了要流血。

If we enquire into the business of a King, we shall find that in some countries they may have none; and after sauntering away their lives without pleasure to themselves or advantage to the nation, withdraw from the scene, and leave their successors to tread the same idle round. In absolute monarchies the whole weight of business civil and military lies on the King; the children of Israel in their request for a king urged this plea, “that he may judge us, and

go out before us and fight our battles." But in countries where he is neither a Judge nor a General, as in England, a man would be puzzled to know what *is* his business.

假如我们考察一下国王的事务，我们就会发现，在有些国家他们什么事务都没有；在悠闲地度过自己了无乐趣、对国家没有任何作为的一生以后，他们退出舞台，让继承者同样重蹈碌碌无为的覆辙。在君主专制国家：民政和军事的全副重担置于国王一身；以色列的子民在要求立一个国王的时候曾经提出申请，希望“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但像在英格兰这样的国家中，王既非士师，又非元帅，委实叫人很难了解他的事务究竟是什么。

The nearer any government approaches to a Republic, the less business there is for a King. It is somewhat difficult to find a proper name for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 Sir William Meredith calls it a Republic; but in its present state it is unworthy of the name, because the corrupt influence of the Crown, by having all the places in its disposal, hath so effectually swallowed up the power, and eaten out the virtu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the Republican part in the constitu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 is nearly as monarchical as that of France or Spain. Men fall out with names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m. For 'tis the Republican and not the Monarchical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England which Englishmen glory in, viz. the liberty of choosing an House of Commons from out of their own body—and it is easy to see that when Republican virtues fail, slavery ensues. Why is the constitution of England sickly, but because monarchy hath poisoned the Republic; the Crown hath engrossed the Commons.

任何政体愈接近共和，国王的事务就愈少。要给英国的政体想一个适当的名称，多少有些困难。威廉·梅瑞狄斯爵士称它为共和国；可是凭它当前的状态，还配不上这个名头，由于王室的腐败影响，所有的职位由其分配，已全然耗尽了权力，也完全抹杀了下议院（政体中共和的部分）的优点，英格兰政府几乎和法国或西班牙一样专制。因为英国人的荣耀在英格兰政体中共和的部分而不是专制的部分，即他们在自己的全体中选举众议院的自由—不难看出，如果共和制的优点不在，奴隶制必行。为什么英格兰的政体让人作呕呢，只是因为专制已经流毒共和；王权垄断了下议院。

In England a King hath little more to do than to make war and giveaway places; which, in plain terms, is to empoverish the nation and set it together by the ears. A pretty business indeed for a man to be allowed eight hundred thousand sterling a year for, and worshipped into the bargain! Of more worth is one honest man to society, and in the sight of God, than all the crowned ruffians that ever lived.

在英格兰，国王不外乎征战和鬻爵；用白话说，就是使国家陷于贫困和纷争。对于一个一年拿80万先令的人来说，这是个相当不错的职位，更不必说还受着仰慕呢！在上帝眼中，一个忠厚的人对社稷的价值比所有加冕过的恶棍们都要多。

THOUGHT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AMERICAN AFFAIRS

美国境况现状思考

In the following pages I offer nothing more than simple facts, plain arguments, and common sense: and have no other preliminaries to settle with the reader, than that he will divest himself of prejudice and prepossession, and suffer his reason and his feelings to determine for themselves that he will put on, or rather that he will not put off, the true character of a man, and generously enlarge his views beyond the present day.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只陈述简单的事实，朴素的说理，和常识：对于读者，只要读者摒弃偏见和成见，用理性和情感做出本真的判断，尽量超越时代，开阔视野，我没有其他先决条件了。

Volumes have been written on the subject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England and America. Men of all ranks have embarked in the controversy, from different motives, and with various designs; but all have been ineffectual, and the period of debate is closed. Arms as the last resource decide the contest; the appeal was the choice of the King, and the Continent has accepted the challenge.

就英格兰和美国之间斗争的主题，已经写了很多篇幅。各阶层人士出于不同的动机，带着不同的意图，参与了争辩；然而辩论期结束，一切都是徒劳。武力作为最后的手段决定这场竞争的结果；这是国王的选择，北美大陆已然迎战。

It hath been reported of the late Mr. Pelham (who tho' an able minister was not without his faults) that on his being attacked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the score that his measures were only of a temporary kind, replied, “*they will last my time* .” Should a thought so fatal and unmanly possess the Colonies in the present contest, the name of ancestors will be remembered by future generations with detestation.

据报道，已故的佩勒姆先生（他虽然是个能干的首相，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曾在下议院遭到指责，因为他在英美关系问题上采取的措施只是临时的，他对此回应，“在我的任期内会一直这样实行。”如果各殖民地在目前的争夺中有这种致命的、懦弱的想法，祖先的名字将永远被后人所唾弃。

The Sun never shined on a cause of greater worth. 'Tis not the affair of a City, a County, a Province, or a Kingdom; but of a Continent—of at least one-eighth part of the habitable Globe. 'Tis not the concern of a day, a year, or an age; posterity are virtually involved in the contest, and will be more or less affected even to the end of time, by the proceedings now. Now is the seed-time of Continental union, faith and honour. The least fracture now will be like a name engraved with the point of a pin on the tender rind of a young oak; the wound would enlarge with the tree, and posterity read in it full grown characters.

在这之前从未有过如此伟大的事业。“这不只是关系到一个城市、一个乡镇、一个省或者一个国家的事；而是关系到一个大陆——关系到全球宜居面积的至少八分之一。“这不是一天、一年、或一生

就能完成的事业；我们的子孙后代实际上也牵涉其中，并且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当前事情的影响，甚至会一直影响下去。目前是美洲大陆团结一致、充满信心和荣耀的萌芽时期。如今看来最微小的裂痕，都会像在橡树幼苗上用针刻下的名字；裂口会随着橡树苗的成长而放大，而后代会看到完整的大字。

By referring the matter from argument to arms, a new era for politics is struck—a new method of thinking hath arisen. All plans, proposals, &c. prior to the nineteenth of April, i. e. to the commencement of hostilities, are like the almanacks of the last year; which tho' proper then, are superceded and useless now. Whatever was advanced by the advocates on either side of the question then, terminated in one and the same point, viz a union with Great Britain;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the method of effecting it; the one proposing force, the other friendship; but it hath so far happened that the first hath failed, and the second hath withdrawn her influence.

当事情由争辩转为武力的时候，一个新的政治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诞生了。大约四月十九日之前，也就是敌对开始之前的所有方案和提议就像过期的年历一样；尽管当时有用，现在却已经毫无用处并且被取代了。不管问题双方的倡导者当时提倡的是什么，最后都归结同样一个问题，即与大不列颠联合的问题，；双方的唯一分歧在于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一方主张用武力；另一方则建议友好；然而目前第一种提议已经失败，第二种也不再有影响力。

As much hath been said of the advantages of reconciliation, which, like an agreeable dream, hath passed away and left us as we were, it is but right that we should examine the contrary side of the

argument, and enquire into some of the many material injuries which these Colonies sustain, and always will sustain, by being connected with and dependanton Great Britain. To examine that connection and dependance, on the principles of nature and common sense, to see what we have to trust to, if separated, and what we are to expect, if dependant.

关于和解的好处已经说了很多，但它如黄粱一梦，已经离我们而去，而我们仍在原地，审视争议相反的一面才是我们该做的，且应该对与英国联合或者依靠英国的殖民地过去和将来遭受的诸多实际损害了解一二。我们在遵循自然和常识的原则下，来审视这种关联性和依赖性，以明确离开英国的话我们要依靠什么，如果依靠英国我们又能得到什么。

I have heard it asserted by some, that as America has flourished under her former connection with Great Britain, the same connection is necessary towards her future happiness, and will always have the same effect. Nothing can be more fallacious than this kind of argument. We may as well assert that because a child has thrived upon milk, that it is never to have meat, or that the first twenty years of our lives is to become a precedent for the next twenty. But even this is admitting more than is true; for I answer roundly that America would have flourished as much, and probably much more, had no European power taken any notice of her. The commerce by which she hath enriched herself are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and will always have a market while eating is the custom of Europe.

我听到有人断言，既然美国以前与大不列颠有关联时获得了繁

荣，那这种关联对保障未来的幸福是必需的，而且效果一直会是这样。这种论调再荒谬不过。要是这样，我们就也可以断言，一个孩子因为是吃奶长大的，那他就永远不要吃肉，或者说，我们生命中前二十年怎么过的，那后二十年还得怎么过。但这都言过其实了；我要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与欧洲势力断绝了联系，美国会同样繁荣，甚至有可能会更好。美国借以繁荣自身的贸易属于生活必需品，只要欧洲人要吃饭，它就永远有市场。

But she has protected us, say some. That she hath engrossed us is true, and defended the Continent at our expense as well as her own, is admitted; and she would have defended Turkey from the same motive, vizfor the sake of trade and dominion.

但有人说，她保护过我们。她曾经让我们迷恋，这是事实，她耗我们的，也耗她自己的财力来保卫美洲大陆，这我们也是认可的；出于同样的动机，她也会保卫土耳其，即是为了贸易以及统治权。

Alas! we have been long led away by ancient prejudices and made large sacrifices to superstition. We have boasted the protection of Great Britain, without considering, that her motive was *interest* not *attachment* ; and that she did not protect us from *our enemies* on *our account* ; but from *her enemies* on *her own account* , from those who had no quarrel with us on any *other account* , and who will always be our enemies on the *same account* . Let Britain waive her pretensions to the Continent, or the Continent throw off the dependance, and we should be at peace with France and Spain, were they at war with Britain. The miseries of Hanover last war ought to warn us against connections.

唉！我们早就被古老的偏见带偏了，因为迷信损失巨大。我们吹嘘大不列颠的保护，却不考虑，她的动机是利益而不是情感；她并没有从保护我们的利益出发来帮助我们御敌；而是从她自身的利益出发，使她自己免受纷争的伤害，那些敌人从没因为任何其他事情与我们有过争执，而因为这同一件事将与我们永远为敌。倘使英国放弃她对美洲大陆的保护，或者美洲大陆摆脱对她的依赖，那就算法国和西班牙与英国交战，我们之间也是可以和平相处的。汉诺威最后一仗的痛苦应该警戒了我们不要保持这种联系。

It hath lately been asserted in parliament, that the Colonies have no relation to each other but through the Parent Country, i. e. that Pennsylvania and the Jerseys and so on for the rest, are sister Colonies by the way of England; this is certainly a very roundabout way of proving relationship, but it is the nearest and only true way of proving enmity (or enemyship, if I may so call it.) France and Spain never were, nor perhaps ever will be, our enemies as *Americans* , but as our being the *subjects of Great Britain* .

最近有人在议会中断言，如果不是有相同的母国，殖民地间不会有任何联系，就是说宾夕法尼亚和泽西等其他殖民地，因为英格兰才成了姊妹殖民地；这无疑是一个非常迂回的证明关系的方式，但它是最近的且是唯一的能证明敌意的说法（或者是敌意关系，如果可以这样叫的话。）法国和西班牙从来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我们美国人的敌人，而是我们作为大英帝国臣民的敌人。

But Britain is the parent country, say some. Then the more shame upon her conduct. Even brutes do not devour their young, nor savagesmake war upon their families. Wherefore, the assertion, if true, turns to her reproach; but it happens not to be true, or only

partly so, and the phrase *parent or mother country* hath been jesuitically adopted by the King and his parasites, with a low papistical design of gaining an unfair bias on the credulous weakness of our minds. Europe, and not England, is the parent country of America. This new World hath been the asylum for the persecuted lovers of civil and religious liberty from *every part* of Europe. Hither have they fled, not from the tender embraces of the mother, but from the cruelty of the monster; and it is so far true of England, that the same tyranny which drove the first emigrants from home, pursues their descendants still.

有人说，但英国是母国啊。那么她的行为更可耻。虎毒且不食子，野人也不会和家人打仗。因此，如果这个说法成立，英国就应受到责备；但这不成立，或者只是部分成立，祖国或者母国这个说法已经由国王和他的寄生虫们阴险地利用，利用我们思想中轻信的弱点，实现低级的天主教制造不公平的偏见的意图。欧洲，而不是英国，是美国的母国。这个新的世界是欧洲各地民权和宗教自由受到迫害者的避难所。他们逃到这，不是逃离母亲深情的拥抱，而是逃离恶魔般的残酷待遇；到目前为止这就是真正的英国，同样的暴政迫使第一批移民背井离乡，也没有放过他们的后代。

In this extensive quarter of the globe, we forget the narrow limits of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miles (the extent of England) and carry our friendship on a larger scale; we claim brotherhood with every European Christian, and triumph in the generosity of the sentiment.

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我们突破三百六十英里狭小面积的局促（英格兰的幅员）在更广阔的幅员发展我们的友谊；我们称每个欧洲

基督教徒兄弟，并为这种广阔的胸怀欢欣鼓舞。

It is pleasant to observe by what regular gradations we surmount the force of local prejudices, as we enlarge our acquaintance with the World. A man born in any town in England divided into parishes, will naturally associate most with his fellow parishioners (because their interests in many cases will be common) and distinguish him by the name of *neighbor* ; if he meet him but a few miles from home, he drops the narrow idea of a street, and salutes him by the name of *townsman* ; if he travel out of the county and meet him in any other, he forgets the minor divisions of street and town, and calls him *countryman* , i. e. *countyman* ; but if in their foreign excursions they should associate in France, or any other part of *Europe* , their local remembrance would be enlarged into that of *Englishmen* . And by a just parity of reasoning, all Europeans meeting in America, or any other quarter of the globe, are *countrymen* ; for England, Holland, Germany, or Sweden, when compared with the whole, stand in the same places on the larger scale, which the divisions of street, town, and county do on the smaller ones; Distinctions too limited for Continental minds. Not one third of the inhabitants, even of this province,[Pennsylvania], are of English descent. Wherefore, I reprobate the phrase of Parent or Mother Country applied to England only, as being false, selfish, narrow and ungenerous.

非常高兴看到，随着我们对世界认识的增加，我们逐渐克服了地方成见。英国划成了教区，在英国任何一个小镇出生的人，会自然而然地结交同教区居民（因为他们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并以邻里相称；如果是在离家几英里外遇到的人，他会摒弃街道的狭隘想法，以同乡相称；如果是出了郡县在别的郡县遇到的人，他会摒弃城镇和街道这

种小区划 ，以同胞相称，也就是同乡；如果在国外旅行，倘若在法国或者欧洲的其他任何地方遇到，他的地区观念将会扩大到英国人。按照他们一贯的推理，所有在美洲或者地球上任何地方相聚的欧洲人都是同胞；从整体来看，像英格兰，荷兰，德国或者是瑞典都在同一个地方，只是按照比街道、城镇以及郡县更广一些的区划罢了；这样的划分 也限制了美洲大陆思维。英国人后裔在居民中，哪怕只是本省（宾夕法尼亚）居民中，占不到三分之一的比例。因此我不同意只把英国视为母国或祖国的说法，因为它是虚伪的、自私的、狭隘的，也是小肚鸡肠的。

But, admitting that we were all of English descent, what does it amount to? Nothing. Britain, being now an open enemy, extinguishes every other name and title: and to say that reconciliation is our duty, is truly farcical. The first king of England, of the present line (William the Conqueror) was a Frenchman, and half the peers of England are descendants from the same country; wherefore, by the same method of reasoning, England ought to be governed by France.

但是，如果承认我们都是英国后裔，有什么意味呢？没有任何意义。英国现在既然成为我们公开的敌人，也就失去了一切名分：说什么和解是我们的责任，简直是可笑。现王室的第一任国王（威廉一世）是法国人，而且英国贵族中有半数是法国人的后裔；如此说来，用同样的办法推理，英格兰应该受法国的统治。

Much hath been said of the united strength of Britain and the Colonies, that in conjunction they might bid defiance to the world. But this is mere presumption; the fate of war is uncertain, neither do the expressions mean anything; for this continent would never

suffer itself to be drained of inhabitants, to support the British arms in either Asia, Africa, or Europe.

关于英国和殖民地的联合力量已经谈论了很多，说双方联手可以挑战世界。然而这仅仅是设想；战争的命运莫测，那些话本身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大陆将永远不会调光它的居民去支持在亚洲、非洲或者是欧洲的英军。

Besides, what have we to do with setting the world at defiance? Our plan is commerce, and that, well attended to, will secure us the peace and friendship of all Europe; because it is the interest of all Europe to have America a free port. Her trade will always be a protection, and her barrenness of gold and silver secure her from invaders.

此外，同世界抗争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规划是贸易，致力于此，可以确保我们的和平并赢得整个欧洲的友谊；因为拥有美国这样一个自由港符合整个欧洲的利益。贸易是她永远的保护，而金银矿藏的缺乏使他免遭侵略。

I challenge the warmest advocate for reconciliation to show a single advantage that this continent can reap by being connected with Great Britain. I repeat the challenge; not a single advantage is derived. Our corn will fetch its price in any market in Europe, and our imported goods must be paid for buy them where we will.

我要求那些最热衷于和解的拥护者们指出美洲大陆与不列颠结盟

的有利之处，哪怕一条也行。我重申这一点；美国根本得不到任何一丁点好处。我们的玉米将会在欧洲的任何市场上卖出合理的价钱，而我们无论从哪儿进口商品都得付钱。

But the injuries and disadvantages which we sustain by that connection, are without number; and our duty to mankind at large, as well as to ourselves, instruct us to renounce the alliance: because, any submission to, or dependance on, Great Britain, tends directly to involve this Continent in European wars and quarrels, and set us at variance with nations who would otherwise seek our friendship, and against whom we have neither anger nor complaint. As Europe is our market for trade, we ought to form no partial connection with any part of it. It is the true interest of America to steer clear of European contentions, which she never can do, while, by her dependance on Britain, she is made the makeweight in the scale of British politics.

但是，结盟所带给我们的伤害和弊端是数不胜数的；无论是出于我们对于整个人类的职责，还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我们都必须要摒弃这种结盟：因为任何对英国的臣服，或者依赖，都会将这片大陆直接牵涉到欧洲的战争和争端中，并且会让我们与那些本想与我们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产生分歧，哪怕本来对于这些国家我们并没有任何愤怒和不满。既然欧洲是我们的贸易市场，我们就不应该只与其中的一部分建立联系。对于美国来说真正的利益是避开欧洲的争端，但是，出于对英国的依赖，她无法置身纷争之外，只能沦为英国政治天平上的一枚小小的砝码。

Europe is too thickly planted with Kingdoms to be long at peace, and whenever a war breaks out between England and any

foreign power, the trade of America goes to ruin, *because of her connection with Britain* . The next war may not turn out like the last, and should it not, the advocates for reconciliation now will be wishing for separation then, because neutrality in that case would be a safer convoy than a man of war. Every thing that is right or reasonable pleads for separation. The blood of the slain, the weeping voice of nature cries, '*tis time to part* . Even the distance at which the Almighty hath placed England and America is a strong and natural proof that the authority of the one over the other, was never the design of Heaven. The time likewise at which the Continent was discovered, adds weight to the argument,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it was peopled, encreases the force of it. The Reformation was preceded by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As if the Almighty graciously meant to open a sanctuary to the persecuted in future years, when home should afford neither friendship nor safety.

欧洲由于国家林立，无法保持长久的和平，而由于美国与英国的关系，无论什么时候英格兰和其他任何一个外国势力爆发战争，美国的贸易就完蛋。下一场战争的结果也许不会同上一场一样，如果真是这样，鼓吹结盟的人到时候会祈盼分离，因为到那时，中立比让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力量护卫更安全。每一个正确和理性的理由都在呼唤独立。被杀戮者的鲜血和自然的呜咽在呼喊，独立的时候到了。甚至上帝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安排的距离都成为一个强有力且自然的证据，说明其中一方统治另外一方从不是上天的安排。同理，发现美洲大陆的时间佐证了这个说法，而人们的分布方式也强化了这个论点。发现美洲新大陆先于欧洲宗教改革：就好像当接下来的日子里，当家园不能再继续提供友爱和安全，上帝会仁慈地为受迫害的人建立了一个避难所。

The authority of Great Britain over this continent, is a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sooner or later must have an end: And a serious mind can draw no true pleasure by looking forward, under the painful and positive conviction that what he calls “the present constitution” is merely temporary. As parents, we can have no joy, knowing that this government is not sufficiently lasting to ensure any thing which we may bequeath to posterity: And by a plain method of argument, as we are running the next generation into debt, we ought to do the work of it, otherwise we use them meanly and pitifully.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line of our duty rightly, we should take our children in our hand, and fix our station a few years farther into life; that eminence will present a prospect which a few present fears and prejudices conceal from our sight.

大不列颠对美洲大陆的权威，作为一种统治形式，是迟早要终结的：严肃的人会痛苦地坚信，他称之为“现行政体”的体制只是临时性的，因而瞻望前途，决无快意。身为父母，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政权不会有延续，不会保障我们可能传给后代的任何东西，心里也决不会高兴：用简单的论证方法来说，既然我们将使下一代陷入债务，我们就应该自己担当起来，否则我们就是在卑鄙而可怜地利用他们了。为了明确我们的责任范围，我们应当对我们的子孙负责并把自己置身于未来；那样高的位置将使我们看到为当前的一些恐惧和偏见所掩蔽的未来前景。

Though I would carefully avoid giving unnecessary offence, yet I am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all those who espouse the doctrine of reconciliation, may be included within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s.

虽然我小心地避免作不必要的攻击，可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凡是拥

护和解论调的人都可以归入下列几类。

Interested men, who are not to be trusted, weak men who *cannot* see, prejudiced men who will not see, and a certain set of moderate men who think better of the European world than it deserves; and this last class, by an ill-judged deliberation, will be the cause of more calamities to this Continent than all the other three.

私心很重而不可靠的人，愚钝而不能明鉴的人，抱有偏见而不愿去理解的人，还有一批言过其实地美化欧洲世界的中庸的人；而这最后一类，由于考虑欠妥，将对北美大陆造成比其他三类都多的灾难。

It is the good fortune of many to live distant from the scene of present sorrow; the evil is not sufficiently brought to their doors to make them feel the precariousness with which all American property is possessed. But let our imaginations transport us a few moments to Boston; that seat of wretchedness will teach us wisdom, and instruct us for ever to renounce a power in whom we can have no trust. The inhabitants of that unfortunate city who but a few months ago were in ease and affluence, have now no other alternative than to stay and starve, or turn out to beg. Endangered by the fire of their friends if they continue within the city and plundered by the soldiery if they leave it, in their present situation they are prisoners without the hope of redemption, and in a general attack for their relief they would be exposed to the fury of both armies.

很多人住得离当前的不幸的现场很远，这是他们的运气；祸害并没有危及他们的家门使他们切身感受到美国全部财产的岌岌可危。且让我们的思绪带我们去一趟波士顿；那个悲惨的地方会教我们学得聪明一些，并叮嘱我们千万要与我们不能信任的政权决裂。那个不幸城市的居民们几个月以前还在过着安乐和富裕的生活，现在却除待在那里挨饿或出外求乞而外没有任何出路。他们如果继续留在城里，就有遭受朋友们炮火轰击的危险，如果离开，就会被军队洗劫，当前他们已沦落为救赎无望的囚徒，在救援总攻的时候他们将暴露在双方军队的猛烈炮火之中。

Men of passive tempers look somewhat lightly over the offences of Great Britain, and, still hoping for the best, are apt to call out, “Come, come, we shall be friends again for all this.” But examine the passions and feelings of mankind: bring the doctrine of reconciliation to the touchstone of nature, and then tell me whether you can hereafter love, honour, and faithfully serve the power that hath carried fire and sword into your land? If you cannot do all these, then are you only deceiving yourselves, and by your delay bringing ruin upon posterity. Your future connection with Britain, whom you can neither love nor honour, will be forced and unnatural, and being formed only on the plan of present convenience, will in a little time fall into a relapse more wretched than the first. But if you say, you can still pass the violations over, then I ask, hath your house been burnt? Hath your property been destroyed before your face? Are your wife and children destitute of a bed to lie on, or bread to live on? Have you lost a parent or a child by their hands, and yourself the ruined and wretched survivor? If you have not, then are you not a judge of those who have. But if you have, and can still shake hands with the murderers, then are you unworthy the name of husband, father, friend or lover, and whatever may be your rank or title in life, you have the heart

of a coward, and the spirit of a sycophant.

顺从的人们对英国的罪行多少不当回事，甚至还抱着乐观的态度，动辄喊道，“来吧，来吧，尽管有这么多过往，我们还是应该再做朋友。”然而审视一下人类的热切和情感：把和解的信条用自然的标准来衡量一下，然后告诉我你们今后是否可以热爱、尊重并忠诚地服务于这个把刀光剑影带到你们的家园的政权？如果你们做不到这些，那你们是否只在自欺欺人，而你们的拖延会毁了子孙后代。未来你们和英国的联系会又牵强又不自然，因为你们既不能爱英国，也无法去尊重她，而只是现在的权宜之计，很快会陷入比第一次更悲惨的境界。但是如果你们说，你们可以不计较暴力，那我要问了，你们的房子被烧毁了吗？你们的财产是否在你们的眼前毁于一旦？是否你们的妻儿居无定所，食物短缺？你们的父母儿女是否命丧他们之手，而你们自己堕落而痛苦的苟且？如果你们没有遭遇这些，那你们就不能替那些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作出评判。但如果你们遭遇过，还能同凶手握手言欢，那么你们就不配成为丈夫，父亲，朋友或者爱人，不论你们在生活中的等级或头衔是什么，你们都是懦夫，和马屁精如出一辙。

This is not inflaming or exaggerating matters, but trying them by those feelings and affections which nature justifies, and without which we should be incapable of discharging the social duties of life, or enjoying the felicities of it. I mean not to exhibit horror for the purpose of provoking revenge, but to awaken us from fatal and unmanly slumbers, that we may pursue determinately some fixed object. 'Tis not in the power of Britain or of Europe to conquer America, if she doth not conquer herself by delay and timidity. The present winter is worth an age if rightly employed, but if lost or neglected the whole Continent will partake of the misfortune; and there is no punishment which that man doth not deserve, be he

who, or what, or where he will, that may be the means of sacrificing a season so precious and useful.

这不是煽风点火或者夸大其辞，而是用自然认可的情感和感情来检验这些问题，如果缺少这种情感和感情，我们就不能尽我们的社会责任，也不能享受生活的幸福。我的意思不是要为了复仇而展现恐怖性，而是将我们从致命的怯懦中唤醒，而坚定地去追求某个确定的目标。如果美国不克服不了自己的拖延和胆怯，英国或者欧洲是无法征服她的。如果正确地利用这个冬天可以抵得上一个时代，但如果错失良机或疏忽的话，整个大陆将遭到不幸；如果有人真浪费了这么一个宝贵且有效的时节，不管他是谁，或者是什么，或者他会在哪里，任何惩罚都是罪有应得的。

'Tis repugnant to reason, to the universal order of things, to all examples from former ages, to suppose that this Continent can long remain subject to any external power. The most sanguine in Britain doth not think so. The utmost stretch of human wisdom cannot, at this time, compass a plan, short of separation, which can promise the continent even a year's security. Reconciliation is *now* a fallacious dream. Nature hath deserted the connection, and art cannot supply her place. For, as Milton wisely expresses, “never can true reconcilement grow where wounds of deadly hate have pierced so deep.”

认为美洲大陆能够长期受外力的支配，是违背理性的，是违反事物常规的，也是不合之前时代的所有先例的。即便是英国最乐观的人也不这么认为。在这时，人们即使竭尽智慧，也不能制定出一个不谈独立而确保大陆哪怕一年安全的方案。此刻和解是最荒谬的梦。自然已然放弃了联系，技艺没有用武之地。因为，就如弥尔顿英明地指出

的，“恨之入骨的伤口这么深的地方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

Every quiet method for peace hath been ineffectual. Our prayers have been rejected with disdain; and hath tended to convince us that nothing flatters vanity or confirms obstinacy in Kings more than repeated petitioning—and nothing hath contributed more than that very measure to make the Kings of Europe absolute. Witness Denmark and Sweden. Wherefore, since nothing but blows will do, for God's sake let us come to a final separation, and not leave the next generation to be cutting throats under the violated unmeaning names of parent and child.

每一种温和的争取和平的方法都徒劳无益。我们的祈祷都被鄙夷地拒绝了；并终于让我们意识到反复请愿只是奉承了国王的虚荣心或让他们更固执了——没有哪个方式比这样更让欧洲国王专制。看看丹麦和瑞典。因此，既然抵抗才有效果，就让我们以上帝之名实现最终的独立，不让下一代人在已被亵渎的毫无意义的父子之名下你死我活吧。

To say they will never attempt it again is idle and visionary; we thought so at the repeal of the stamp act, yet a year or two undeceived us; as well may we suppose that nations which have been once defeated will never renew the quarrel.

要说他们不会再想那样干是没有根据的空想；在废除印花税法案时我们是这么想的，可一两年后我们不再抱有幻想；同样我们会想一个被打败过的国民将不再挑起纷争。

As to government matters, 'tis not in the power of Britain to do this continent justice: the business of it will soon be too weighty and intricate to be managed with any tolerable degree of convenience, by a power so distant from us, and so very ignorant of us; for if they cannot conquer us, they cannot govern us. To be always running three or four thousand miles with a tale or petition, waiting for four or five months for an answer, which, when obtained, requires five or six more to explain it in, will in a few years be looked upon as folly and childishness. There was a time when it was proper, and there is a proper time for it to cease.

就统治问题而言，美洲大陆的公平不是英国该管的事：政府的事务将很快变得太繁复，不可能再由一个离我们这么遥远、对我们这么无知的政权轻而易举地应付；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征服我们，就不能统治我们。要一直为了什么事和诉求奔走三四千里，再花上四五个月等答复，得到答复后又需要五六个月来解释，过不几年就会被看作是愚蠢且幼稚的。过去有一段时间它曾是适宜的，而现在是它终结的适当时刻。

Small islands not capable of protecting themselves are the proper objects for government to take under their care; but there is something absurd, in supposing a Continent to be perpetually governed by an island. In no instance hath nature made the satellite larger than its primary planet; and as England and America, with respect to each other, reverse the common order of nature, it is evident that they belong to different systems—England to Europe: America to itself.

无法保护自己的小岛是政府纳入保护之下的合适对象；但假想一

个大陆永远受一个岛屿的统治却有些荒谬。自然中从没有创造一个比行星还大的卫星的先例；至于英美两国，在彼此关系上违背自然规律，正是他们属于不同体系的证据——英国属于欧洲：而美国属于它自己。

I am not induced by motives of pride, party, or resentment to espouse the doctrine of separation and independance; I am clearly, positively, and conscientiously persuaded that it is the true interest of this Continent to be so; that every thing short of *that* is mere patchwork, that it can afford no lasting felicity,—that it is leaving the sword to our children, and shrinking back at a time when a little more, a little further, would have rendered this Continent the glory of the earth.

我并不是出于骄傲、党派关系或憎恨的动机而支持脱离和独立的主张；我非常清楚、十分肯定地、由衷地相信这么做最符合这个大陆的真正利益；每件与之背离事情都仅仅是一种补缀，没法长治久安，——这是让我们的后代陷于战争和杀戮、在需要多一点力量、多一点进步就能让这个大陆成为全世界的荣誉的时候退缩的行为。

As Britain hath not manifested the least inclination towards a compromise, we may be assured that no terms can be obtained worthy the acceptance of the Continent, or any ways equal to the expense of blood and treasure we have been already put to.

既然英国丝毫没有显示出要妥协的意思，我们可以确信能争取到的条件没一个是值得让美洲大陆接受的，或者任何方式能与我们已经付出的生命和财产相匹配的。

The object contended for, ought always to bear some just proportion to the expense. The removal of North, or the whole detestable junto, is a matter unworthy the millions we have expended. A temporary stoppage of trade was an inconvenience, which would have sufficiently balanced the repeal of all the acts complained of, had such repeals been obtained; but if the whole Continent must take up arms, if every man must be a soldier, 'tis scarcely worth our while to fight against a contemptible ministry only. Dearly, dearly do we pay for the repeal of the acts, if that is all we fight for; for, in a just estimation 'tis as great a folly to pay a Bunker-hill price for law as for land. As I have always considered the independancy of this Continent, as an event which sooner or later must arrive, so from the late rapid progress of the Continent to maturity, the event cannot be far off. Wherefore, on the breaking out of hostilities, it was not worth the while to have disputed a matter which time would have finally redressed, unless we meant to be in earnest: otherwise it is like wasting an estate on a suit at law, to regulate the tresspasses of a tenant whose lease is just expiring. No man was a warmer wisher for a reconciliation than myself, before the fatal nineteenth of April, 1775 [3_1] , but the moment the event of that day was made known, I rejected the hardened, sullen-tempered Pharaoh of England for ever; and disdain the wretch, that with the pretended title of *father of his people* can unfeelingly hear of their slaughter, and composedly sleep with their blood upon his soul.

竞争的标的应该总是与开销成公正的比例。诺斯的撤职，或整个令人厌恶的政治集团的解散，是与我们数以百万的付出不相称的。贸易的暂时终止很是不便，但如果我们所反对的所有法案都能废除的话，这不便能充分得平衡这些废除；但是如果整个大陆必须拿起武

器，每个人必须从戎，这就几乎不值得我们仅对抗一个卑鄙的政权了。如果我们所有争取的只是这些法案的废除，那么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公平的估计，为了法律像为了土地一样付出班克山那样的代价，是件大傻事。我一直认为这个大陆的独立是一件迟早会发生的事情，那么从这个大陆近期快速的进步到趋于成熟的情况来看，这件事已经指日可待。因此，在敌对爆发的时候，不值得花时间争论一个时间终将纠正的问题，除非我们想要较真：否则这就像是在用浪费一套房产来诉讼一个租约期满的租户，去制止他侵犯产权。在毁灭性的1775年4月19日 [4_1] 之前，没有人比我更热切地渴望和解了，但是一获悉那天所发生的事，我便永久地否定了冷酷、乖戾的英国法老；我鄙视那坏蛋，因为他徒有人民之父之名，却可以冷酷地听闻屠杀的消息，灵魂上沾满人们的鲜血并安然入眠。

But admitting that matters were now made up, what would be the event? I answer, the ruin of the Continent. And that for several reasons.

但如果承认这些问题已经解决，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认为，将会导致北美大陆的毁灭。原因如下。

First.—The powers of governing still remaining in the hands of the King, he will have a negative over the whole legislation of this Continent. And as he hath shown himself such an inveterate enemy to liberty, and discovered such a thirst for arbitrary powers, is he, or is he not, a proper person to say to these colonies, *you shall make no laws but what I please* !? And is there any inhabitant of America so ignorant as not to know, that according to what is called the *present constitution* , this Continent can make no laws but what the king gives leave to; and is there any man so unwise as not to see,

that (considering what has happened) he will suffer no law to be made here but such as suits *his* purpose? We may be as effectually enslaved by the want of laws in America, as by submitting to laws made for us in England. After matters are made up (as it is called) can there be any doubt, but the whole power of the crown will be exerted to keep this continent as low and humble as possible? Instead of going forward we shall go backward, or be perpetually quarrelling, or ridiculously petitioning. We are already greater than the King wishes us to be, and will he not hereafter endeavor to make us less? To bring the matter to one point, Is the power who is jealous of our prosperity, a proper power to govern us? Whoever says *no* , to this question, is an Independant for independancy means no more than this, whether we shall make our own laws, or, whether the King, the greatest enemy this continent hath, or can have, shall tell us *there shall be no laws but such as I like* .

首先，统治权依旧掌控在国王的手里，他将对大陆的整个法规拥有否决权。既然他已经表现出自己是自由的顽敌，并发现自己对于专制权力是如此渴望，该由他，还是不该由他，来告诉殖民地，你们只能制定顺我意的法律！？根据所谓的现行宪法，大陆不能制定国王许可之外的任何法律，北美有居民无知到不知道此事的吗；国王不能容忍与他的意图不和的法律，有人愚钝到连这也看不出来吗（考虑到已经发生的种种）？如果我们臣服于英国为我们制定的法律，我们会受奴役，就和美国没有法律我们所受的奴役一样。问题已经解决（宣称是这样）以后，还用怀疑国王会运用全部权力来让这个大陆卑微抬不起头吗？如此我们不会进步反而会倒退，或者永在争论，或可笑地请愿。我们已经比国王想让我们达到的程度强大了，他能不竭力削弱我们吗？总之一句话，这种忌妒我们繁荣的政权真的适合来统治我们吗？对这个问题表示反对的任何人都是独立人士，因为独立不外乎意味着我们是该制定自己的法律，还是由国王——这个大陆目前或是可能遭遇的最大的敌人——来告诉我们除非是我喜欢的，这个大陆不应

当有任何法律。

But the King, you will say, has a negative in England; the people there can make no laws without his consent. In point of right and good order, it is something very ridiculous that a youth of twenty-one (which hath often happened) shall say to several millions of people older and wiser than himself, “I forbid this or that act of yours to be law.” But in this place I decline this sort of reply, though I will never cease to expose the absurdity of it, and only answer that England being the King's residence, and America not so, makes quite another case. The King's negative here is ten times more dangerous and fatal than it can be in England; for there he will scarcely refuse his consent to a bill for putting England into as strong a state of defense as possible, and in America he would never suffer such a bill to be passed.

但是你会说，这个国王在英国拥有否决权；那儿的人们未经他的允许不能制定任何法律。按正当和合乎情理的道理来讲，一个21岁的年轻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对几百万比他更加年长以及睿智的人说“我禁止你们提出的这项或那项议案立为法律”是十分可笑的。尽管我不会停止揭露它的荒唐，但在这里，我不想做这种答复，而只说既然英国是英王的驻地而美国不是，情况则全然不同。国王在这里的否决权比其在英国危险和严重上十倍；因为在那里，他几乎不会否决一个尽力增强英国国防的议案，但在美国他就决不会让这样的议案通过。

America is only a secondary object in the system of British politics. England consults the good of this country no further than it answers her own purpose. Wherefore, her own interest leads her to

suppress the growth of ours in every case which doth not promote her advantage, or in the least interferes with it. A pretty state we should soon be in under such a second hand government, considering what has happened. Men do not change from enemies to friends by the alteration of a name: And in order to show that reconciliation now is a dangerous doctrine, I affirm, *that it would be policy in the King at this time to repeal the acts, for the sake of reinstating himself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ovinces* ; In order that *he may accomplish by craft and subtlety, in the long run, what he cannot do by force and violence in the short run* . Reconciliation and ruin are nearly related.

美国只是英国政治体制中的次要目标。英国只有在符合她自己的利益的情况下才会顾及这个国家的利益。因此，但凡不能助长她的利益，她就会出于自身的利益事事压制我们的发展，或最大程度减少我们对她利益的干扰。鉴于已经发生的情况，在这样一个间接的政府之下，不久我们的处境就会不错了。人们不会因为名字的变化，化敌为友：为了说明和解的主张当前是危险的，我断言，国王由于想恢复他在各个领地的统治，现在所采取的政策会是废除那些法令；其目的在于通过阴谋诡计，最终完成他在短期内通过武力和暴力所无法达成的目的。和解和毁灭息息相关。

Secondly.—That as even the best terms which we can expect to obtain can amount to no more than a temporary expedient, or a kind of government by guardianship, which can last no longer than till the Colonies come of age, so the general face and state of things in the interim will be unsettled and unpromising. Emigrants of property will not choose to come to a country whose form of government hangs but by a thread, and who is every day tottering on the brink of commotion and disturbance; and numbers of the

present inhabitants would lay hold of the interval to dispose of their effects, and quit the Continent.

第二，我们所能预期的哪怕是最好的条件，也不过是权宜之计，或者是一种守护政权，等殖民地成熟就不会再延续了，因此，这种过渡时期的总体局势和状态将会是不安定的、没有希望的。移民们将不会选择到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权形式岌岌可危，每天在动乱和骚乱中摇摇欲坠；这里诸多的居民会忙不迭地处置他们的产业，离开这个国家。

But the most powerful of all arguments is, that nothing but independance, i. e. a Continental form of government, can keep the peace of the Continent and preserve it inviolate from civil wars. I dread the event of a reconciliation with Britain now, as it is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it will be followed by a revolt some where or other, the consequences of which may be far more fatal than all the malice of Britain.

但最有力的论据是，除了独立，也就是殖民地联合形式的政府，没什么能维持大陆和平，使其免收内战之害了。我害怕现在与英国和解的话，其结果可能远比英国的所有恶意预谋更具毁灭性，因为很有可能某处的起义会随之发生。

Thousands are already ruined by British barbarity; (thousands more will probably suffer the same fate.) Those men have other feelings than us who have nothing suffered. All they now possess is liberty; what they before enjoyed is sacrificed to its service, and having nothing more to lose they disdain submission. Besides, the

general temper of the Colonies, towards a British government will be like that of a youth who is nearly out of his time; they will care very little about her: And a government which cannot preserve the peace is no government at all, and in that case we pay our money for nothing; and pray what is it that Britain can do whose power will be wholly on paper, should a civil tumult break out the very day after reconciliation? I have heard men say, many of whom I believe spoke without thinking, that they dreaded an Independance, fearing that it would produce civil wars: It is but seldom that our first thoughts are truly correct, and that is the case here; for there is ten times more to dread from a patched up connection than from Independance. I make the sufferer's case my own, and I protest, that were I driven from house and home, my property destroyed, and my circumstances ruined, that as a man, sensible of injuries, I could never relish the doctrine of reconciliation, or consider myself bound thereby.

英国的野蛮残暴已经毁了成千上万人；（更多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会遭受相同的命运。）他们跟我们这些没有受什么难的人的情感是不一样的。他们现在只有自由；他们之前所享有的已在服役中丧失，他们鄙弃服从，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除此之外，殖民地对英国政府的一般情绪就像一个青春不再的少年；他们不会怎么关心她：一个不能维持和平的政府，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付出了金钱却无所收获；也只能祈祷，一旦和解之后发生内乱，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英国能做点什么吧？我听到有人说，他们害怕独立，害怕内战会因此而产生，我相信他们中许多人说话没过脑子：我们第一个想法很少是真正正确的，这次也不例外；因为修补关系比独立可怕十倍。对于受害者，我设身处地，断言如果我被从房子和家里赶出来，我的财产遭受破坏，我所处的环境被毁，作为一个人，既察觉到了伤害，我绝不会盼望和解，或认为自己会赞同这个主张。

The Colonies have manifested such a spirit of good order and obedience to Continental government, as is sufficient to make every reasonable person easy and happy on that head. No man can assign the least pretence for his fears, on any other grounds, than such as are truly childish and ridiculous, viz. , that one colony will be striving for superiority over another.

各殖民地对殖民地联合政府已经表现出了如此有序和服从的精神，这足以使每个理性的人对其感到舒适快乐。如果有人怕一个殖民地比另一个殖民更具优势，那没什么比这更幼稚可笑了，只有这才能作其恐惧的借口。

Where there are no distinctions there can be no superiority; perfect equality affords no temptation. The Republics of Europe are all (and we may say always) in peace. Holland and Switzerland are without wars, foreign or domestic: Monarchial governments, it is true are never long at rest: the crown itself is a temptation to enterprising ruffians at home; and that degree of pride and insolence ever attendant on regal authority, swells into a rupture with foreign powers in instances where a republican government, by being formed on more natural principles, would negotiate the mistake.

没有差别就没有优劣；完美的平等就不存在诱惑。欧洲共和国整体都（或者我们可以说一直）处在和平的状态下。荷兰和瑞士两个国家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没有征战：是真的，君主专制统治从来没有长久安稳过：因为王权本身于内就是滋生暴徒的诱惑；并且曾经伴随帝王权威的荣耀和傲慢会膨胀，终至与外国势力决裂，在共和政府

中，因其更多建立在自然准则之上，会商讨过失。

If there is any true cause of fear respecting Independance, it is because no plan is yet laid down. Men do not see their way out. Wherefore, as an opening into that business I offer the following hints; at the same time modestly affirming, that I have no other opinion of them myself, than that they may be the means of giving rise to something better. Could the straggling thoughts of individuals be collected, they would frequently form materials for wise and able men to improve into useful matter.

如果关于独立真有理由恐惧的话，就是因为计划还没有制定出来。人们看不到他们的出路。因此，作为事业的开端，我提出以下建议；同时适度证实我只是想为事态好转建树，此外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任何其他想法。如果把个人的凌乱思想收集起来，经常能为聪明能干的人改进出有用的东西提供素材。

Let the assemblies be annual, with a president only. The representation more equal, their business wholly domestic, and subject to the authority of a Continental Congress.

让集会每年召开，只是得有个负责人。代表应更平等，他们所处理的应该完全是国内问题，并受大陆会议的节制。

Let each Colony be divided into six, eight, or ten, convenient districts, each district to send a proper number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 so that each Colony send at least thirty. The whole

number in Congress will be at least 390. Each congress to sit and to choose a President by the following method. When the Delegates are met, let a Colony be taken from the whole thirteen Colonies by lot, after which let the Congress choose (by ballot) a president from out of the Delegates of that Province. In the next Congress, let a Colony be taken by lot from twelve only, omitting that Colony from which the president was taken in the former Congress, and so proceeding on till the whole thirteen shall have had their proper rotation.

每一殖民地分成六个、八个或十个大小适当的区，每区都推出适当数量的会议代表，这样每一殖民地派出至少三十人。大陆会议的全体代表将至少达到390人。每届会议应该坐下用下列方法选举出一个议长。当代表开会时，由全部十三个殖民地中抽签抽出一个殖民地，然后由会议从该州代表中票选（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一人为议长。下届大陆会议时，排除上届已产生议长的那个殖民地，仅从十二个殖民地中抽出一个，以后依此程序，直至十三个殖民地都轮一遍。

And in order that nothing may pass into a law but what is satisfactorily just, not less than three fifths of the Congress to be called a majority. He that will promote discord, under a government so equally formed as this, would have joined Lucifer in his revolt.

为了保证所通过的法律都完全正当，不少于会议人数的五分之三才能称为多数。在这样公正组成的政权之下，谁要想挑唆不和，要造反只能去见鬼了。

But as there is a peculiar delicacy from whom, or in what manner, this business must first arise, and as it seems most agreeable and consistent that it should come from some intermediate body between the governed and the governors, that is, between the Congress and the People, let a Continental Conference be held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and for the following purpose.

但是，既然这件事情首先由谁来起头，又或怎样做法，是有特别讲究的，而且既然看来由介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某个中间团体，即介于大陆会议和民众之间的团体来着手是最合适最顺理成章的，那就按下列方式、下列宗旨召开大陆会议吧。

A Committee of twenty-six members of congress, viz. Two for each Colony. Two Members from each House of Assembly, or Provincial Convention; and fiv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 at large, to be chosen in the capital city or town of each Province, for, in behalf of the whole Province, by as many qualified voters as shall think proper to attend from all parts of the Province for that purpose; or, if more convenient, the Representatives may be chosen in two or three of the most populous parts thereof. In this conference, thus assembled, will be united the two grand principles of business, *knowledge* and *power* . The Members of Congress, Assemblies, or Conventions, by having had experience in national concerns, will be able and useful counsellors, and the whole, being impowered by the people, will have a truly legal authority.

委员会由大陆会议推出的26位成员组成，即每一殖民地2人。每个议院或者省委会产生委员2人；每个首府或者州由全体民众选出代表五人，代表全省并对全省负责，这些代表应由省内各地尽量多的有

资格选民选出；或者，更便捷的是，由其中两三处人口最多的部分产生代表。在这样召开的会议中，将统一起这项事业的两个最重大原则，知识和力量。大陆会议、议院或制宪会议的成员们，对国家事务都已有经验，将成为干练而有用的议员，而整个会议既然是人民授权的，会具有真正的法定的权力。

The conferring members being met, let their business be to frame a Continental Charter, or Charter of the United Colonies; (answering what is called the Magna Charta of England) fixing the number and manner of choosing Members of Congress, Members of Assembly, with their date of sitting; and drawing the line of business and jurisdiction between them: Always remembering, that our strength is Continental, not provincial. Securing freedom and property to all men, and above all things,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according to the dictates of conscience; with such other matter as it is necessary for a charter to contain. Immediately after which, the said conference to dissolve, and the bodies which shall be chosen conformable to the said charter, to be the Legislators and Governors of this Continent for the time being: Whose peace and happiness, may *God* preserve. *Amen* .

议员们既聚集，就让他们构架大陆宪章，或联合殖民地宪章；（以回应所谓英国大宪章）确定议会议员的人数、选举议会议员的方式，以及各自开会的日期；划定它们之间行政和司法的界线：永远记牢，我们的力量源于大陆，不是地方。要按照良心的指示，确保所有人的自由与财产，最主要的，宗教的自由；以及其他宪章所必需规定的事项。随后，上述会议应立即解散，并暂时委任依据上述宪章选出的人做美洲大陆的立法委员和地方长官：愿上帝保佑他们的平安和幸福。阿门。

Should any body of men be hereafter delegated for this or some similar purpose, I offer them the following extracts from that wise observer on Governments, Dragonetti. “The science,” says he, “of the Politician consists in fixing the true point of happiness and freedom. Those men would deserve the gratitude of ages, who should discover a mode of government that contained the greatest sum of individual happiness, with the least national expense.” (Dragonetti on “Virtues and Reward.“)

如果此后为了这个或类似目的委任一些人的话，我要把下面一段出自贤明的政治学家德拉戈内蒂的摘录奉送给他们。“政治家的科学，”他说，“在于确定幸福与自由的真谛。那些能发现一种以国家最小付出谋得个体最大幸福的政体的人们，配得上世代感恩戴德。”（德拉戈内蒂：《论德行与回报》。）

But where, say some, is the King of America? I'll tell you, friend, he reigns above, and doth not make havoc of mankind like the Royal Brute of Great Britain. Yet that we may not appear to be defective even in earthly honours, let a day be solemnly set apart for proclaiming the Charter; let it be brought forth placed on the Divine Law, the Word of God; let a crown be placed thereon, by which the world may know, that so far as we approve of monarchy, that in America the law is king. For as in absolute governments the King is law, so in free countries the law ought to be king; and there ought to be no other. But lest any ill use should afterwards arise, let the Crown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eremony be demolished, and scattered among the people whose right it is.

有人说，可是美国的国王在哪儿呢？告诉你，朋友，他在上头统

治，不像大不列颠的皇家牲畜那样祸害百姓。但要是有一天庄重地留出来宣布宪章，我们也不要在世俗荣誉方面露怯；就把宪章在神圣法则——《圣经》之前呈现出来；就为宪章加冕，借此告知天下，我们到底多赞同君主制，告知天下在美国，法治为王。因为在专制政府，国王就是法律，因此在自由国度，法律就该是王；而且不该有别的王。但是出于对日后滥用的顾虑，还是在仪式结束时废除王权吧，让权力回归于民，分散于民。

A government of our own is our natural right: and when a man seriously reflects on the precariousness of human affairs, he will become convinced, that it is infinitely wiser and safer, to form a constitution of our own in a cool deliberate manner, while we have it in our power, than to trust such an interesting event to time and chance. If we omit it now, some Massanello [3_2] may hereafter arise, who, laying hold of popular disquietudes, may collect together the desperate and the discontented, and by assuming to themselves the powers of government, finally sweep away the liberties of the Continent like a deluge. Should the government of America return again into the hands of Britain, the tottering situation of things will be a temptation for some desperate adventurer to try his fortune; and in such a case, what relief can Britain give? Ere she could hear the news, the fatal business might be done; and ourselves suffering like the wretched Britons under the oppression of the Conqueror. Ye that oppose Independance now, ye know not what ye do: ye are opening a door to eternal tyranny, by keeping vacant the seat of government. There are thousands and tens of thousands, who would think it glorious to expel from the Continent, that barbarous and hellish power, which hath stirred up the Indians and the Negroes to destroy us; the cruelty hath a double guilt, it is dealing brutally by us, and treacherously by them.

组建我们自己的政府是我们天然的权力：当严肃地反思人事动荡时，他就会深信，我们可以掌控的时候，以冷静审慎的态度来组建我们自己的政体，绝对比把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交给时间和机遇要聪明和安全得多。如果我们现在不这么做，以后也许会出现某个马萨涅洛[4_2]，在了解了大众的不安之后，也许纠集亡命之徒和不满之人，通过自己攫取政权，最后像洪水一样把美洲大陆的自由席卷一空。如果美国的政权又落到英国的手里，动摇的局势也会诱使某个铤而走险的冒险家来撞大运；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能够给我们什么救济呢？不等它得到消息，毁灭事件可能都结束了；而我们自己就会像处于征服者压迫下的可怜的不列颠人一样地受苦了。你们这些现在反对独立的人，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们空置政府的位子，正是为无尽的专制统治敞开了大门。把煽动印第安人和黑人来消灭我们的那种野蛮凶恶势力逐出大陆，被千千万万的人当作荣耀；这种残酷的行为有双重罪恶，一则它残忍地对待我们，二则背信弃义地对待他们。

To talk of friendship with those in whom our reason forbids us to have faith, and our affections wounded thro' a thousand pores instruct us to detest, is madness and folly. Every day wears out the little remains of kindred between us and them; and can there be any reason to hope, that as the relationship expires, the affection will encrease, or that we shall agree better when we have ten times more and greater concerns to quarrel over than ever?

有些人，我们的理智阻止我们信任他们，我们伤到千疮百孔的感情命令我们憎恶他们，同这些人奢谈友谊疯狂又愚蠢。每天我们和他们之间残存的一点因缘都在消耗；难道有理由去希望，在关系结束时，感情反会增加，或者当我们有比过去更大更多十倍的事情要争论的时候，我们反倒更赞同彼此吗？

Ye that tell us of harmony and reconciliation, can ye restore to us the time that is past? Can ye give to prostitution its former innocence? Neither can ye reconcile Britain and America. The last cord now is broken, the people of England are presenting addresses against us. There are injuries which nature cannot forgive; she would cease to be nature if she did. As well can the lover forgive the ravisher of his mistress, as the Continent forgive the murders of Britain. The Almighty hath implanted in us these unextinguishable feelings for good and wise purposes. They are the Guardians of his Image in our hearts. They distinguish us from the herd of common animals. The social compact would dissolve, and justice be extirpated from the earth, or have only a casual existence were we callous to the touches of affection. The robber and the murderer would often escape unpunished, did not the injuries which our tempers sustain, provoke us into justice.

你们这些劝告我们要和谐要和解的人，你们能把已经消逝的时间复原吗？你们能把从前的贞洁还给娼妓吗？你们要使英国与美国和解，也是办不到的。最后的一根纽带现在已经断了，英国人正发表言论反对我们。那是一种天理都不容的伤害；如果天理能容的话，它就不成其为天理了。既然一个爱人不能宽恕强奸他妻子的人，北美大陆也就不能宽恕英国的那些杀人凶手。上帝已经赋予我们对有益而明智的目标的不可遏制的向往之情。这种向往是我们心中的上帝形象的护卫者。它们使我们不同于一群普通的动物。假如我们对情感触动麻木不仁，社会契约就会解体，公道就会在世上绝迹，或者变成一种偶然的存在。假如伤害不能激怒我们起来要求伸张正义，盗贼和杀人凶手将多半逍遥法外。

O! ye that love mankind! Ye that dare oppose not only the tyranny but the tyrant, stand forth! Every spot of the old world is

overrun with oppression. Freedom hath been hunted round the Globe. Asia and Africa have long expelled her. Europe regards her like a stranger, and England hath given her warning to depart. O! receive the fugitive, and prepare in time an asylum for mankind.

哦！热爱人类的人！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站出来！旧世界压迫遍地成灾。自由到处遭到追逐。亚洲和非洲早就逐了她出去。欧洲视她为陌路，而英国已经对她下了逐客令。哦！接收这个逃亡者，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3_1].Massacre at Lexington.

[3_2].Thomas Anello, otherwise Massanello, a fisherman of Naples, who after spiriting up his countrymen in the public market place, against the oppression of the Spaniards, to whom the place was then subject, prompted them to revolt, and in the space of a day became king.

[4_1].莱克星顿大屠杀。

[4_2].托马斯·阿尼罗，又名马萨涅洛，那不勒斯的渔民，在集市煽动民众反抗当时所臣服的意大利人的压迫，鼓励他们造反，并在一日之内加冕成王。

OF THE PRESENT ABILITY OF AMERICA: WITH SOME MISCELLANEOUS REFLECTIONS

关于美国当前的能力：及一些沉思

I have never met with a man, either in England or America, who hath not confessed his opinion, that a sepa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would take place one time or other: And there is no instance in which we have shown less judgment, than in endeavoring to describe, what we call, the ripeness or fitness of the continent for independance.

但凡我在英国或美国遇见人，没有谁不坦白承认美国脱离英国是早晚的事：我们在力图叙说独立的成熟时机或适宜时机这件事上面我们却表现出比任何时候都差的判断力。

As all men allow the measure, and vary only in their opinion of the time, let us, in order to remove mistakes, take a general survey of things, and endeavor if possible to find out the *very* time. But I need not go far, the inquiry ceases at once, for the *time hath found us* . The general concurrence, the glorious union of all things, proves the fact.

既然我们所有人都认可这个方案，仅在实行时间上意见相左，那么为了避免错误，让我们看看整体情况，尽一切可能找出那个特定的时间。但是我不必深入，探究就结束了，因为时机已经来到了我们眼前。总体上的一致性，就是所有事的极好的统一，证明了这个事实。

'Tis not in numbers but in unity that our great strength lies: yet our present numbers are sufficient to repel the force of all the world. The Continent hath at this time the largest body of armed and disciplined men of any power under Heaven: and is just arrived at that pitch of strength, in which no single colony is able to support itself, and the whole, when united, is able to do any thing. Our land force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and as to Naval affairs, we cannot be insensible that Britain would never suffer an American man of war to be built, while the Continent remained in her hands. Wherefore, we should be no forwarder an hundred years hence in that branch than we are now; but the truth is, we should be less so, because the timber of the Country is every day diminishing, and that which will remain at last, will be far off or difficult to procure.

我们伟大的力量源于团结而不是数量：虽然我们现在在数量上足以抗衡全世界。大陆现在拥有天下最大的武装齐备而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刚好到了一个节点，此时单独一个殖民地无法自保，但联合起来的整体却无坚不摧。我们的陆军力量游刃有余，至于海军事务，我们不能不意识到，只要这片大陆仍在英国的掌控之中，她就不会容忍美国建造一艘军舰。因此，今后100年间，我们在这个方面都不会向前发展；事实上，情况可能还不如现在，因为国家的木材每天在减少，而剩下的，要不太远，要不太难得到。

Were the Continent crowded with inhabitants, her sufferings under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would be intolerable. The more seaport-towns we had, the more should we have both to defend and to lose. Our present numbers are so happily proportioned to our wants, that no man need be idle. The diminution of trade affords an army, and the necessities of an army create a new trade.

在当前的环境下，如果居民过于拥挤，那大陆将会不堪重负。我们拥有的港口城镇越多，我们就有越多要防守和失去。目前我们的人数比例幸而符合我们的需求，每个人都有事情做。贸易的减少供养了一支军队，然后军队的必需品又催生了新的贸易。

Debts we have none: and whatever we may contract on this account will serve as a glorious memento of our virtue. Can we but leave posterity with a settled form of government, an independant constitution of its own, the purchase at any price will be cheap. But to expend millions for the sake of getting a few vile acts repealed, and routing the present ministry only, is unworthy the charge, and is using posterity with the utmost cruelty; because it is leaving them the great work to do, and a debt upon their backs from which they derive no advantage. Such a thought's unworthy a man of honour, and is the true characteristic of a narrow heart and a piddling politician.

我们没有债务：我们由于这个缘故可能订立的任何合同，将成为我们德行的光荣纪念。只要我们能够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固定的政府形式，一部独立的宪法，那么我们花费多少都是值得的。但为了废除几项过分的法律条文，给现在的政府部门规划路线，斥资百万就不值得了，而这是在用极度的残忍利用我们的后代；因为这给他们留下艰巨的任务，同时他们还要背负巨大的且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债务。有尊严的人不应该存这样的想法，这是心胸狭窄和无用政客的本色。

The debt we may contract doth not deserve our regard if the work be but accomplished. No nation ought to be without a debt. A national debt is a national bond; and when it bears no interest, is in

no case a grievance. Britain is oppressed with a debt of upwards of one hundred and forty millions sterling, for which she pays upwards of four millions interest. And as a compensation for her debt, she has a large navy; America is without a debt, and without a navy; yet for the twentieth part of the English national debt, could have a navy as large again. The navy of England is not worth at this time more than three millions and a half sterling.

只要事业完成，背负部分债务也不足为虑。没有任何国家是没有债务的；就算没有利息，也不是什么大事。英国背负超过1亿4000万先令的债务，光利息就超过400万。但是反过来，作为补偿，她有一支强大的海军；美国没有债务可也没有海军；然而只要能有英国的债务二十分之一那么多，就能再次拥有一支一样强大的海军了。这个时期英国的海军还值不到350万的英镑。

The first and second editions of this pamphlet were published without the following calculations, which are now given as a proof that the above estimation of the navy is a just one. See Entic's “Naval History,” Intro. , p. 56.

这本册子的第一版和第二版没有包括下列计算，这里列出来，以证明上述对海军的评估是有充分根据的。请参考恩蒂克的《军舰史》，绪论第56页。

The charge of building a ship of each rate, and furnishing her with masts, yards, sails, and rigging, together with a proportion of eight months boatswain's and carpenter's sea-stores, as calculated by Mr. Burchett, Secretary to the navy.

每种等级的船舰的造价，配备船桅、场地、船帆以及索具，以及水手长和木匠八个月的食粮，海军部长波彻特这么算的。

For a ship of 100	guns,	35,553 £
90	″	29,886
80	″	23,638
70	″	17,785
60	″	14,197
50	″	10,606
40	″	7,558
30	″	5,846
20	″	3,710

一艘装有 100 尊炮的船舰.....35，5053 镑

90 尊炮的船舰.....23，8865

80 尊炮的船舰.....23，6535

70 尊炮的船舰.....17，7815

60 尊炮的船舰.....14，137

50 尊炮的船舰.....10，6065

40 尊炮的船舰.....7，5158

30 尊炮的船舰.....5，8456

20 尊炮的船舰.....3，710

And from hence it is easy to sum up the value, or cost rather, of the whole British navy, which in the year 1757, when it was as its greatest glory consisted of the following ships and guns:

这样，很容易算出英国整个海军的价值，或者说成本，在1757年极盛时代，它拥有下列的船舰数和火炮数：

Ships	Guns	Cost of One	Cost of All
6	100	35,553 £	213,318 £
12	90	29,886	358,632
12	80	23,638	283,656
43	70	17,785	764,755
35	60	14,197	496,895
40	50	10,605	424,240
45	40	7,558	340,110
58	20	3,710	215,180
85 sloops, bombs, and fireships, one with another at		2,000	170,000

Cost,	3,266,786 £
Remains for guns,	233,214
Total,	3,500,000 £

船舰数	火炮数	单价	总价
6.	100.	35, 553.	213, 318 英镑
12.	90.	29, 886.	358, 632
12.	80.	23, 638.	283, 656
43.	70.	17, 785.	764, 755
35.	60.	14, 197.	496, 895
40.	50.	10, 606.	424, 240
45.	40.	7, 558.	340, 110
58.	20.	3, 710.	215, 180

85 单桅纵帆船，炸药以及消防船，

联起来. . . . . 2, 000. . . . . .

170, 000

. . . . . .

开销，. . . . . .3, 266, 786 英镑

用于火炮的结余，. 233, 214

. . . . . .

共计. . . . . 3, 500, 000 英镑

No country on the globe is so happily situated, or so internally capable of raising a fleet as America. Tar, timber, iron, and cordage are her natural produce. We need go abroad for nothing. Whereas the Dutch, who make large profits by hiring out their ships of war to the Spaniards and Portuguese, are obliged to import most of the materials they use. We ought to view the building a fleet as an article of commerce, it being the natural manufactory of this country. 'Tis the best money we can lay out. A navy when finished is worth more than it cost: And is that nice point in national policy, in which commerce and protection are united. Let us build; if we want them not, we can sell; and by that means replace our paper

currency with ready gold and silver.

世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占着地利，内部就有能力建造一支舰队。柏油、木材、铁和绳索都是她自然的产物。我们用不着从国外买任何东西。荷兰则不然，她把军舰租给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但他们所用的大部分原材料都不得不进口。既然建舰队是我们国家的天然营生，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一宗贸易。这是我们所能安排的最有利的投资。海军建成后比建它的成本值钱：这是国家政策中的亮点，由此贸易和国防统一起来。我们建吧；如果我们要出手，可以卖掉；这样我们可以用现金和现银来取代纸币。

In point of manning a fleet, people in general run into great errors;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one-fourth part should be sailors. The Terrible privateer, captain Death, stood the hottest engagement of any ship last war, yet had not twenty sailors on board, though her complement of men was upwards of two hundred. A few able and social sailors will soon instruct a sufficient number of active landsmen in the common work of a ship. Wherefore we never can be more capable of beginning on maritime matters than now, while our timber is standing, our fisheries blocked up, and our sailors and shipwrights out of employ. Men of war, of seventy and eighty guns, were built forty years ago in New England, and why not the same now? Ship building is America's greatest pride, and in which she will, in time, excel the whole world. The great empires of the east are mainly inland, and consequently excluded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rivalling her. Africa is in a state of barbarism; and no power in Europe hath either such an extent of coast, or such an internal supply of materials. Where nature hath given the one, she hath withheld the other; to America only hath she been liberal to both. The vast empire of Russia is almost shut out from the sea;

wherefore her boundless forests, her tar, iron and cordage are only articles of commerce.

至于舰队的人员配置，一般人都有很大的错误认识；没有必要四分之一的人都是水手。可怕的私掠船长，“死神”船长，在上次战争中参与了最激烈的战斗，虽然她编制中的人数在二百以上，但是船上的士兵不到二十人。只要有几个能干并善于交际的水兵就可以指导很多同船积极的水手快速学会船上的普通工作。所以，现在既然我们的木材供应充沛，我们的渔场遭到封闭，我们的水手和船匠陷于失业，那么在这个时候来开创我们的海上事业就是最佳时机。勇士们四十年前曾经在新英格兰造过几艘装有七、八十尊火炮的战舰，为什么现在不采取同样的行动呢？造船是美国的最大荣耀，总有一天它将在这方面领先全世界。东方的老牌帝国大多都地处内陆，因此就不可能同与我们匹敌。非洲处于野蛮状态；而欧洲的国家既没有这样绵延的海岸，又没有这样的国内原料供应。自然界如果赋予了我们一个方面，往往扣留下另一方面；只有对美国她在两个方面都大方。疆域辽阔的俄罗斯帝国几乎没有出海的道路；因此她广袤的森林，她的柏油、铁和绳索只是商品。

In point of safety, ought we to be without a fleet? We are not the little people now which we were sixty years ago; at that time we might have trusted our property in the streets, or fields rather, and slept securely without locks or bolts to our doors and windows. The case is now altered, and our methods of defence ought to improve with our increase of property. A common pirate, twelve months ago, might have come up the Delaware, and laid the city of Philadelphia under contribution for what sum he pleased; and the same might have happened to other places. Nay, any daring fellow, in a brig of fourteen or sixteen guns, might have robbed the whole Continent, and carried off half a million of money. These are

circumstances which demand our attention, and point out the necessity of naval protection.

至于安全，我们该没有舰队吗？我们不是60年前那个小民族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曾放心地把财务放在街上，或者说地里，夜里门户也不闭。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的防御手段应该随着财产的增加而增强。一年前，一个普通的海盗可能上溯特拉华河，向费城的居民随心勒索巨款；其他的地方也可能有同样的遭遇。不仅如此，任何大胆的家伙借助一艘有十四或十六门火炮的双桅船，也许就可以洗劫整个大陆，抢走50万钱财。这些情况都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也指明了海军保护的必要性。

Some perhaps will say, that after we have made it up with Britain, she will protect us. Can they be so unwise as to mean that she will keep a navy in our harbors for that purpose? Common sense will tell us that the power which hath endeavoured to subdue us, is of all others the most improper to defend us. Conquest may be effected under the pretence of friendship; and ourselves, after a long and brave resistance, be at last cheated into slavery. And if her ships are not to be admitted into our harbours, I would ask, how is she going to protect us? A navy three or four thousand miles off can be of little use, and on sudden emergencies, none at all. Wherefore if we must hereafter protect ourselves, why not do it for ourselves? Why do it for another?

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同英国讲和以后，她会保护我们。难道他们这样愚钝，竟认为她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在我们的海港里常驻一支海军吗？常识告诉我们，一向致力于镇压我们的国家是所有国家中最不合适来保卫我们的。征服可能借着友谊的名义就实现了；而我们自

己，在长期英勇的抵抗之后，最终被骗得做奴隶。如果我们不容许她的军舰驻在我们的港口，我就问，她怎么来保护我们呢？远在三四千英里之外的海军毫无用处，在突发紧急状况时，根本就没用。因此，如果我们今后必须自卫，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呢？何必舍近求远呢？

The English list of ships of war is long and formidable, but not a tenth part of them are at any time fit for service, numbers of them are not in being; yet their names are pompously continued in the list; if only a plank be left of the ship; and not a fifth part of such as are fit for service can be spared on any one station at one time.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Mediterranean, Africa, and other parts, over which Britain extends her claim, make large demands upon her navy. From a mixture of prejudice and inattention we have contracted a false notion respecting the navy of England, and have talked as if we should have the whole of it to encounter at once, and for that reason supposed that we must have one as large; which not being instantly practicable, has been made use of by a set of disguised Tories to discourage our beginning thereon. Nothing can be further from truth than this; for if America had only a twentieth part of the naval force of Britain, she would be by far an over-match for her; because, as we neither have, nor claim any foreign dominion, our whole force would be employed on our own coast, where we should, in the long run, have two to one the advantage of those who had three or four thousand miles to sail over before they could attack us, and the same distance to return in order to refit and recruit. And although Britain, by her fleet, hath a check over our trade to Europe, we have as large a one over her trade to the West Indies, which, by laying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Continent, lies entirely at its mercy.

英国军舰的名单又长又多，但其中随时可以派上用场的船只还不到十分之一，有很多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它们的名字还是大摇大摆地在名单里；但凡船舰还有一条木板在；在状况还可以使用的船只中，能同时停泊在任何军港里备用的，不到五分之一。东西印度群岛、地中海、非洲以及英国势力所及的其他地区，都对它的海军有很大的需求。我们出于偏见和疏忽，对于英国的海军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谈起来好像我们得要同时和它全部的海军对抗似的，因此觉得我们必须得有一支同样庞大的才行；这种不能立刻实现的想法，被一伙伪装了的托利党人利用，以此来阻止我们开始行动。这种想法最谬误不过了；因为只要美国拥有英国海军的二十分之一，她就可以远超英国；因为，既然我们没有并且也不宣称对任何国外的统治权，我们全部的海军就可以布在我们自己的海岸，这样长期来讲，我们将比对方有双倍的优势，因为对方在来进攻我们之前，得航行三、四千英里，要回去整修船只和补充兵力，又得跋涉同样的距离。虽然英国靠它的舰队阻碍我们对欧洲的贸易，但我们也同样可以截断英国对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因为西印度群岛就在美洲大陆附近，完全受它摆布。

Some method might be fallen on to keep up a naval force in time of peace, if we should judge it necessary to support a constant navy. If premiums were to be given to merchants to build and employ in their service ships mounted with twenty, thirty, forty, or fifty guns (the premiums to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loss of bulk to the merchant), fifty or sixty of those ships, with a few guardships on constant duty, would keep up a sufficient navy, and that without burdening ourselves with the evil so loudly complained of in England, of suffering their fleet in time of peace to lie rotting in the docks. To unite the sinews of commerce and defence is sound policy; for when our strength and our riches play into each other's hand, we need fear no external enemy.

如果我们断定有必要维持一支常备海军，那倒也可以想出一种在和平时期保持海军兵力的办法。如果奖励商人们建造或者使用装配着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尊火炮的船只（奖金的多寡以对商人在载货容积方面造成的损失比例决定），那么五、六十艘这样的船只，再加上几艘常备的警备舰，就可以保持一支力量充足的海军，这样我们就不会有舰队于和平时期停在船坞里烂掉的负担了，这是英国怨声极高的问题。把商业同国防的力量结合起来是良策；因为当我们的兵力和财富联合起来时，我们就不惧外来的敌人了。

In almost every article of defence we abound. Hemp flourishes even to rankness so that we need not want cordage. Our iron is superior to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Our small arms equal to any in the world. Cannon we can cast at pleasure. Saltpetre and gunpowder we are every day producing. Our knowledge is hourly improving. Resolution is our inherent character, and courage hath never yet forsaken us. Wherefore, what is it that we want? Why is it that we hesitate? From Britain we can expect nothing but ruin. If she is once ad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of America again, this Continent will not be worth living in. Jealousies will be always arising; insurrections will be constantly happening; and who will go forth to quell them? Who will venture his life to reduce his own countrymen to a foreign obedie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nnsylvania and Connecticut, respecting some unlocated lands, shows the insignificance of a British government, and fully proves that nothing but Continental authority can regulate Continental matters.

国防用品我们几乎样样富足。大麻茂密到长疯的程度，所以我们不缺索具。我们的铁质量比其他各国的都好。我们的轻武器和世界上任何轻武器媲美。大炮我们能够随意铸造。硝石和火药我们每天都在

生产。我们的知识无时无刻不在增进。意志坚定是我们固有的品质，而勇气也从没离开过我们。因此，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们为什么犹豫不决呢？指望英国，除了毁灭什么也得不到。如果她再度获得美国政府的认可，那这个大陆就不值得再待下去了。猜忌纷起；暴动不断；那谁会挺身而出消弭它们呢？谁会冒着生命危险以牺牲同胞为代价来服从外国的统治呢？宾夕法尼亚和康涅狄格关于一些没有划定的土地的分歧，表明了英国政府的微不足道，还充分证明了只有大陆政权才能管理大陆事务。

Another reason why the present time is preferable to all others is, that the fewer our numbers are, the more land there is yet unoccupied, which, instead of being lavished by the king on his worthless dependents, may be hereafter applied, not only to the discharge of the present debt, but to the constant support of government. No nation under Heaven hath such an advantage as this.

现在就是最好时机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的人数愈少，还没被人占有的地方就愈多，这些地方与其让国王胡乱送给他不足轻重的仆从们，不如今后拿来用，不仅偿还目前的债务，而且不断支援政府的开支。天下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优势。

The infant state of the Colonies, as it is called, so far from being against, is an argument in favour of independance. We are sufficiently numerous, and were we more so we might be less united. 'Tis a matter worthy of observation that the more a country is peopled, the smaller their armies are. In military numbers, the ancients far exceeded the moderns; and the reason is evident, for trade being the consequence of population, men became too much

absorbed thereby to attend to anything else. Commerce diminishes the spirit both of patriotism and military defence. And history sufficiently informs us that the bravest achievements were always accomplished in the non-age of a na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commerce England hath lost its spirit. The city of London, notwithstanding its numbers, submits to continued insults with the patience of a coward. The more men have to lose, the less willing are they to venture. The rich are in general slaves to fear, and submit to courtly power with the trembling duplicity of a spaniel.

所谓的殖民地的初期，非但不是反对独立的论据，反而是对获得独立有利的。我们的人数已经相当众多，如果人数再多，可能在团结方面就要差一些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一个国家人口愈多，他们的军队愈少。在军队的人数方面，古人远远超过今人；这里面的道理很明显，既然贸易是人口众多的结果，人们便专心致志从商，无暇去做其他任何事情了。商业削弱了爱国主义和军事防御的精神。历史充分预示我们，一个国家最英勇的业绩总是在其成熟的时期完成的。随着商业的发达，英国已经丧失了它的精神。伦敦城固然人口众多，却用一种懦夫的耐性忍受着接二连三的侮辱。人们拥有的可能会失去的东西越多，他们越是不愿意冒险。有钱的人一般说来都是恐惧的奴隶，装出獒狗摇尾乞怜的模样屈从于宫廷的势力。

Youth is the seed-time of good habits as well in nations as in individuals. It might be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form the Continent into one government half a century hence. The vast variety of interests, occasioned by an increase of trade and population, would create confusion. Colony would be against colony. Each being able would scorn each other's assistance; and while the proud and foolish gloried in their little distinctions the wise would lament that the union had not been formed before.

Wherefore the present time is the true time for establishing it. The intimacy which is contracted in infancy, and the friendship which is formed in misfortune, are of all others the most lasting and unalterable. Our present union is marked with both these characters; we are young, and we have been distressed; but our concord hath withstood our troubles, and fixes a memorable era for posterity to glory in.

青年时代是播种良好习惯的季节，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五十年之后，要把美洲大陆组成一个政府，即使不是不可能的，兴许也是困难的。由贸易和人口的增加所引起的利益关系的多样，会引出混乱来。殖民地会反对另一个殖民地。每个殖民羽翼既丰，对彼此的帮助不屑一顾；在傲慢愚蠢的人们因其微不足道的成就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有识之士会因联合之前没有建成而痛心疾首。所以，现在建立联盟正当时。在襁褓之时形成的亲密感情，和在患难之中缔结的友谊，是一切情谊中最为经久不变的。我们目前的联盟带着这两种特性：我们年纪尚有，却已曾遭受不幸；但是我们的团结一致抗拒了灾难，正在开创一个子孙为引以为自豪的难忘的世纪。

The present time, likewise, is that peculiar time which never happens to a nation but once, viz. , the time of forming itself into a government. Most nations have let slip the opportunity, and by that means have been compelled to receive laws from their conquerors, instead of making laws for themselves. First, they had a king, and then a form of government; whereas the articles or charter of government should be formed first, and men delegated to execute them afterwards; but from the errors of other nations let us learn wisdom, and lay hold of the present opportunity—*to begin government at the right end* .

同样，目前这个特定时期是一个国家千载难逢的把自身组成一个政府的机遇期。大多数的国家错过了这个机会，因此被迫接受征服者的法律，而不是自主制定法律。首先，它们有一个国王，其次是有一个政体；所以会先制定统治的条款或宪章，后来才委派人来执行；但我们不妨从别的国家错误中学点乖，抓住现在的机遇——开始正确地处理政权问题。

When William the Conqueror subdued England, he gave them law at the point of the sword; and, until we consent that the seat of government in America be legally and authoritatively occupied, we shall be in danger of having it filled by some fortunate ruffian, who may treat us in the same manner, and then, where will be our freedom? where our property?

当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的时候，他武力胁迫他们接受法律；同样的，在我们认可美国政府的席位合法可信地占据之前，我们就会因让统治权落到某个幸运的恶棍手里而他可能会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而使我们落入危险境地，到那时候我们的自由何在？我们的财产何在？

As to religion, I hold it to be the indispensable duty of government to protect all conscientious professors thereof, and I know of no other business which government hath to do therewith. Let a man throw aside that narrowness of soul, that selfishness of principle, which the niggards of all professions are so unwilling to part with, and he will be at once delivered of his fears on that head. Suspicion is the companion of mean souls, and the bane of all good society. For myself, I fully and conscientiously believe that it is the will of the Almighty that there should be a diversity of religious

opinions among us. It affords a larger field for our Christian kindness; were we all of one way of thinking, our religious dispositions would want matter for probation; and on this liberal principle I look on the various denominations among us to be like children of the same family, differing only in what is called their Christian names.

至于宗教，我认为政府对保护所有光明正大的宣称自己信教的人责无旁贷，并且我想不出政府在这方面还有别的什么事可做。如果抛开各行各业的小气鬼所不愿舍弃的那种精神上的狭隘和原则上的自私，在这个问题上会立刻摆脱各种恐惧。猜疑是刻薄的人的伙伴，是一切健全社会的祸根。就我自己而言，我完全真诚地相信，在我们中间要存在多种多样的宗教信仰，那是上帝的意志。这给我们基督教徒的仁爱精神提供更广阔的园地；如果我们的思想方法相同，我们的宗教倾向就缺少检验的根据；根据这个自由主义的原则，我把我们中多样的教派看作一个家庭的孩子，他们只是所谓教名不同罢了。

In page[97] I threw out a few thoughts on the propriety of a Continental Charter (for I only presume to offer hints, not plans) and in this place I take the liberty of re-mentioning the subject, by observing that a charter is to be understood as a bond of solemn obligation, which the whole enters into, to support the right of every separate part, whether of religion, professional freedom, or property. A firm bargain and a right reckoning make long friends.

在原文第97页，我曾对大陆宪章的正当性提出了一些看法（因为我只认为是提供线索，不是计划），这里我自作主张地再度提起这个议题，我觉得一个宪章应该被理解为全体都要参加的履行神圣义务的契约，借以维护各个独立的部分在宗教、职业自由或财产方面的权

利。牢靠的契约和合理的对待可以使友谊持久。

I have heretofore likewise mentioned the necessity of a large and equ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re is no political matter which more deserves our attention. A small number of electors, or a small number of representatives, are equally dangerous. But if the number of the representatives be not only small, but unequal, the danger is increased. As an instance of this, I mention the following: when the petition of the associators was before the House of Assembly of Pennsylvania, twenty-eight members only were present; all the Bucks county members, being eight, voted against it, and had seven of the Chester members done the same, this whole province had been governed by two counties only; and this danger it is always exposed to.

此前我也曾提到过有建立广泛和平等的代表制的必要性；没有其他的政治问题比这更值得我们关注了。选民人数少和代表人数少，同样是危险的。但如果代表的人数不但少，而且不均，危险性就更大了。我举出下面一件事作为例证：当参加联合运动的人们的请愿书提交到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众议院时，到会的只有28个议员；全部8名勃克斯县的议员均投票反对，如果7名契斯特县的议员也步了他们的后尘，这整个一州就由区区两个县所操纵；这种危险经常有可能发生。

The unwarrantable stretch likewise, which that house made in their last sitting, to gain an undue authority over the delegates of that province, ought to warn the people at large how they trust power out of their own hands. A set of instructions for their delegates were put together, which in point of sense and business

would have dishonoured a school-boy, and after being approved by a few, a very few, without doors, were carried into the house, and there passed *in behalf of the whole colony* ; whereas, did the whole colony know with what ill will that house had entered on some necessary public measures, they would not hesitate a moment to think them unworthy of such a trust.

类似不合法的僭越是上次众议院开会的时候，那个省的代表取得了过度的权力，这应当警戒全体人民他们是怎样把手中的权力交托出去的。给他们的代表的一套指示是拼凑起来的，小学生都会对其常识和业务方面的指令感到耻辱，而它们经过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在外面赞成以后，被带到议会，由议员们代表全体予以通过了；在另一方面，如果全体人民知道这个议会在着手拟定必要的公共措施时存有什么恶意，他们就会不假思索地认为那些议员辜负了这样的托付。

Immediate necessity makes many things convenient, which if continued would grow into oppressions. Expedience and right are different things. When the calamities of America required a consultation, there was no method so ready, or at that time so proper, as to appoint persons from the several houses of assembly for that purpose; and the wisdom with which they have proceeded hath preserved this Continent from ruin. But as it is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we shall never be without a *congress* , every well wisher to good order must own that the mode for choosing members of that body deserves consideration. And I put it as a question to those who make a study of mankind, whether representation and election is not too great a power for one and the same body of men to possess? When we are planning for posterity, we ought to remember that virtue is not hereditary.

迫切的需要使许多事情带有权宜之计的性质，这些权宜之计如果延续会变成苦难。权宜手段和正当行为是两回事。当美国的灾难需要协商解决的时候，由几个州议会的众议院为此目的指派一些人出来，乃是最简便的或者可以说在当时是最适当的办法；他们在此事中所表现的智慧曾使这个大陆免于毁灭。可是，既然我们不可能永远没有一个国会，每一个对良好秩序抱有怀有愿望的人都得承认，此次选举议员的方式是值得商榷的。我要对研究人类的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同一群人具有代表权和选举权，这种权力是不是太大了？当我们为后代作打算时，我们应该记住德行是不遗传的。

It is from our enemies that we often gain excellent maxims, and are frequently surprised into reason by their mistakes. Mr. Cornwall (one of the Lords of the Treasury) treated the petition of the New York Assembly with contempt, because *that* house, he said, consisted but of twenty-six members, which trifling number, he argued, could not with decency be put for the whole. We thank him for his involuntary honesty [4_1] .

我们往往从敌人那里获得卓越的箴言，时常被他们的错误所惊觉，开始理性思考。康沃尔先生（财政委员之一）对纽约众议院的请愿书不屑一顾，因为他说那个众议院只有区区26位议员，他强调这样一点人数不能像样地代表全体。我们感谢他这种不由自主的诚实 [5_1] 。

To *conclude* , however strange it may appear to some, or however unwilling they may be to think so, matters not, but many strong and striking reasons may be given to show that nothing can settle our affairs so expeditiously as an open and determined declaration for independance. Some of which are,

总的起来说，不管有些人觉得多么奇怪，或者他们多不情愿这样想，都没有什么关系，但许多有力的和显著的理由表明，除了公开断然地宣布独立，没有什么能迅速地解决我们的问题。其中有：

First.—It is the custom of Nations, when any two are at war, for some other powers, not engaged in the quarrel, to step in as mediators, and bring about the preliminaries of a peace; But while America calls herself the subject of Great Britain, no power, however well disposed she may be, can offer her mediation. Wherefore, in our present state we may quarrel on for ever.

第一，按照国际惯例，任何两国交战，由不参加争端的其他一些国家出面调停，提出缔结和约的预备条款；但只要美国还臣服于大不列颠，任何国家不论她对我们报着多大好意，都不能介入调停。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永远争执不休。

Secondly.—It is unreasonable to suppose that France or Spain will give us any kind of assistance, if we mean only to make use of that assistance for the purpose of repairing the breach,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Britain and America; because, those powers would be sufferers by the consequences.

第二，指望法国或西班牙会帮助我们是荒唐的，如果我们只打算借助帮助来弥补嫌隙，巩固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因为所产生的后果会使那些国家蒙受损失。

Thirdly.—While we profess ourselves the subjects of Britain, we must, in the eyes of foreign nations, be considered as Rebels. The precedent is somewhat dangerous to their peace, for men to be in arms under the name of subjects; we, on the spot, can solve the paradox; but to unite resistance and subjection requires an idea much too refined for common understanding.

第三，只要我们还自称为英国的臣民，我们在外国看来就必然是造反者 。以臣民的名分揭竿而起，他们遇到这种先例的时候，安定多多少少会受到威胁；我们此刻就可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要把抵抗和臣服连在一起，却需要运用精妙得多的思想，才能达成共识。

Fourthly.—Were a manifesto to be published, and despatched to foreign Courts, setting forth the miseries we have endured, and the peaceful methods which we have ineffectually used for redress; declaring at the same time that not being able longer to live happily or safely under the cruel disposition of the British Court, we had been driven to the necessity of breaking off all connections with her; at the same time, assuring all such Courts of our peaceable disposition towards them, and of our desire of entering into trade with them; such a memorial would produce more good effects to this Continent than if a ship were freighted with petitions to Britain.

第四，要是我们发表一个宣言，并分送给各外国宫廷，列陈我们所受的苦，以及我们的和平的补救办法如何不奏效；同时宣布，由于我们不能再在英廷的残酷统治下过幸福的或安全的生活，我们被迫必须断绝一切同她的联系；同时向所有这些宫廷保证我们对它们的和平意愿，同它们进行贸易的渴望；这样一个备忘录，比运载一船请愿书去英国，更能让这个大陆有好结果。

Under our present denomination of British subjects, we can neither be received nor heard abroad; the custom of all Courts is against us, and will be so, until by an independance we take rank with other nations.

我们目前的名称是英国的臣民，在国外既不能被接纳，也不能被听说：各国朝廷的惯例是反对我们，并将永远这样，直到我们通过独立而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

These proceedings may at first seem strange and difficult, but like all other steps which we have already passed over, will in a little time become familiar and agreeable; and until an independance is declared, the Continent will feel itself like a man who continues putting off some unpleasant business from day to day, yet knows it must be done, hates to set about it, wishes it over, and is continually haunted with the thoughts of its necessity.

这些过程乍看起来或许是奇特和困难的，但像我们已经迈过的所有其他步骤一样，不久就会变得熟悉且合宜了；在宣布独立以前，美洲大陆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把不开心的事情一天天地向后推脱的人，然而他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办不可，只是不愿动手，希望它已经结束，同时又念念不忘它的必要性。

[4_1].Those who would fully understand of what great consequence a large and equal representation is to a state, should read Burgh's political Disquisitions.

[5_1].参阅伯德的政治专题论文以充分理解广泛和平等代表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

Appendix

附录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this pamphlet, or rather, on the same day on which it came out, the King's Speech made its appearance in this city. Had the spirit of prophecy directed the birth of this production, it could not have brought it forth, at a more seasonable juncture, or a more necessary time. The bloody mindedness of the one, shew the necessity of pursuing the doctrine of the other. Men read by way of revenge. And the Speech instead of terrifying, prepared a way for the manly principles of Independance.

自从这本册子的第一版出版的那一天，或者说，在作品问世的同一天，国王的演讲 也在城里出现了。假使这部作品是在预言书的指引下诞生的，那它也不会在一个更合宜的节点，或者更必要的时候问世了。后者的嗜血心理表明了寻求前者道义的必要性。人们当作复仇来读。国王的演讲 吓不倒人，反而为独立的果断原则铺平了道路。

Ceremony, and even, silence, from whatever motive they may arise, have a hurtful tendency, when they give the least degree of countenance to base and wicked performances; wherefore, if this maxim be admitted, it naturally follows, that the King's Speech, as being a piece of finished villany, deserved, and still deserves, a general execration both by the Congress and the people. Yet, as the domestic tranquillity of a nation, depends greatly, on the *chastity* of what may properly be called NATIONAL MANNERS, it is often

better, to pass some things over in silent disdain, than to make use of such new methods of dislike, as might introduce the least innovation, on that guardian of our peace and safety. And, perhaps, it is chiefly owing to this prudent delicacy, that the King's Speech, hath not, before now, suffered a public execution. The Speech if it may be called on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a wilful audacious libel against the truth, the common good, and the existence of mankind; and is a formal and pompous method of offering up human sacrifices to the pride of tyrants. But this general massacre of mankind, is one of the privileges, and the certain consequence of Kings; for as nature knows them *not,* they know *not her,* and although they are beings of our *own* creating, they know not *us,* and are become the gods of their creators. The Speech hath one good quality, which is, that it is not calculated to deceive, neither can we, even if we would, be deceived by it. Brutality and tyranny appear on the face of it. It leaves us at no loss: And every line convinces, even in the moment of reading, that He, who hunts the woods for prey, the naked and untutored Indian, is less a Savage than the King of Britain.

仪式，甚或沉默，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对卑鄙和邪恶的行为有一丁点儿认同，都可能造成危害；因此，如果认可这种标准的话，那自然而然地，国王的演讲，作为既定恶行，过去该、现在也仍然该受到国会和民众普遍的普遍憎恶。然而，由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种坚贞，而这种坚贞被称作民族素养更为合适。当我们想要逃避和忽视一些事情时，默默地表达蔑视与不屑会比用这样新的方法来表达厌恶通常要好很多，后者会对维持我们的和平与安全的守护者的改革产生不利的影响。也许，这主要是由于利害关系的微妙性，国王的演讲并未曾在公开场合收到过裁决。如果这能被称之为演讲，也至多只是对真理、公共幸福和人类生存的肆无忌惮的蓄意诽谤；是向暴君的自负供奉人类牺牲的正式的、自以为是的方法。但

是，这种对人类的集体屠杀，是君王们的一项特权和必然的结果；因为既然造化不熟悉他们，他们也不了解造化，虽然他们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他们并不了解我们，还成为了他们的创造者的上帝。那篇演讲有一个好处——它并没有处心积虑来欺骗我们，而我们即便乐意，也不可能受它的欺骗。残酷与暴政赫然现于纸上。它不容我们困惑：一读之下，字里行间都在证实，哪怕是在树林里赤身露体捕猎的粗野印第安人，也不像英国国王那样野蛮。

Sir John Dalrymple, the putative father of a whining jesuitical piece, fallaciously called, *"The Address of the people of* ENGLAND *to the inhabitants of* AMERICA," hath, perhaps, from a vain supposition, that the people *here* were to be frightened at the pomp and description of a king, given, (though very unwisely on his part) the real character of the present one: "But," says this writer, "if you are inclined to pay compliments to an administration, which we do not complain of," (meaning the Marquis of Rockingham's at the repeal of the Stamp Act) "it is very unfair in you to withhold them from that prince, *by whose* NOD ALONE *they were permitted to do any thing."* This is Toryism with a witness! Here is idolatry even without a mask: And he who can so calmly hear, and digest such doctrine, hath forfeited his claim to rationality—an apostate from the order of manhood; and ought to be considered—as one, who hath, not only given up the proper dignity of a man, but sunk himself beneath the rank of animals, and contemptibly crawls through the world like a worm.

约翰·达尔林普尔爵士，一部戚戚哀哀的虚伪作品《英国人民致北美居民书》的虚妄的作者，大概是想当然地，认为这里的人民可以被他对一个国王的吹嘘和描述所吓倒，在谈及在位国王的真实的性格的时候（虽然从他的角度讲是很不明智的），这个作者说："可是，如

果你想赞扬一个我们对它并无不满的政府（指撤销印花税法案的罗金哈姆侯爵的内阁），而不去歌颂那位君王，那从你们的角度讲是不公正的，因为唯有经过他的首肯，他们才获准做任何事情。”这是十足的保王主义！这是毫不掩饰的盲目崇拜：谁要是能够淡定地听取和容忍这样的主张，他就是已经丧失了理性——对人格的背弃；应当被认为是不仅抛弃了人类的应有的尊严，而且已经自降地位于动物之下，像一条毛虫在世间低贱地爬行。

However, it matters very little now, what the king of England either says or does; he hath wickedly broken through every moral and human obligation, trampled nature and conscience beneath his feet; and by a steady and constitutional spirit of insolence and cruelty, procured for himself an universal hatred. It is *now*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to provide for herself. She hath already a large and young family, whom it is more her duty to take care of, than to be granting away her property, to support a power who is become a reproach to the names of men and Christians, YE, whose office it is to watch over the morals of a nation, of whatsoever sect or denomination ye are of, as well as ye, who, are more immediately the guardians of the public liberty, if ye wish to preserve your native country uncontaminated by European corruption, ye must in secret wish a separation. But leaving the moral part to private reflection, I shall chiefly confine my farther remarks to the following heads.

然而，现在英王的所言所行都无关紧要了；他已经罪恶地破坏了每一个道德和人性的责任，将天性和良知践踏于脚下；他以一贯固有的傲慢与残酷，为自己招来了普遍的憎恨。美国的当务之急是为自身寻找出路。它已经拥有一个年轻的大家庭，它的责任是照顾这个家庭，而不是拿出财产去支持一个辱没人类和基督教徒的名声的政权，

你们，不论你属于哪个教派或者归属谁的统治，捍卫国家的道德原则都是你们的职责，同时，你们更是公共自由的直接捍卫者，如果你们想要保全自己的国家不受欧洲腐败的污染，你们必须暗中渴求独立。但是，且把道德部分留给各人去思索，我将主要就下列问题再作几点说明。

First. That it is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to be separated from Britain.

第一，脱离英国独立，是美国的利益所在。

Secondly. Which is the easiest and most practicable plan, RECONCILIATION or INDEPENDANCE? with some occasional remarks.

第二，和解或者独立，究竟哪种是最容易、最切合实际的方案？附加一些说明。

In support of the first, I could, if I judged it proper, produce the opinion of some of the ablest and most experienced men on this continent; and whose sentiments, on that head, are not yet publicly known. It is in reality a self-evident position: For no nation in a state of foreign dependance, limited in its commerce, and cramped and fettered in its legislative powers, can ever arrive at any material eminence. America doth not yet know what opulence is; and although the progress which she hath made stands unparalleled in the history of other nations, it is but childhood, compared with

what she would be capable of arriving at, had she, as she ought to have, the legislative powers in her own hands. England is, at this time, proudly coveting what would do her no good, were she to accomplish it; and the Continent hesitating on a matter, which will be her final ruin if neglected. It is the commerce and not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by which England is to be benefited, and that would in a great measure continue, were the countries as Independant of each other as France and Spain; because in many articles, neither can go to a better market. But it is the Independance of this country of Britain or any other, which is now the main and only object worthy of contention, and which, like all other truths discovered by necessity, will appear clearer and stronger every day.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在支持和解一方，我可以说出这个大陆上一些最有能力以及最有经验的人的意见；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主张尚未被广泛了解。实际上这个见解是不证自明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处于从属外国的地位，商业受到限制，立法权力受到束缚，它是永远不能跻于重要的地位的。北美大陆还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富裕，虽然它已有的发展在其他各国的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但它同它所能达到的成就比起来，还不过是幼年时代，而如果它像应有的那样掌握了立法权力，那种成就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英国现今正洋洋得意地觊觎的，即便实现，也对她无益；而北美大陆则正在对一个如果忽视则致其毁灭的问题犹豫不决。英国是从北美的商业中，而不是从征服北美中获益，如果两个国家能像法国和西班牙一样独立于彼此，这种商业关系多半是会继续下去的；因为就许多方面来说，任何一方都不会有更好的市场。目前值得争辩的主要的且唯一的问题，唯有这个国家独立于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这和其他一切必然要被发现的真理一样，将日益清晰而有力。

First. Because it will come to that one time or other.

第一，因为它迟早会独立。

Secondly. Because, the longer it is delayed the harder it will be to accomplish.

第二，因为拖延得越久，实现起来就越难。

I have frequently amused myself both in public and private companies, with silently remarking, the specious errors of those who speak without reflecting. And among the many which I have heard, the following seems most general, viz. that had this rupture happened forty or fifty years hence, instead of *now,* the Continent would have been more able to have shaken off the dependance. To which I reply, that our military ability *at this time,* arises from the experience gained in the last war, and which in forty or fifty years time, would have been totally extinct. The Continent, would not, by that time, have had a General, or even a military officer left; and we, or those who may succeed us, would have been as ignorant of martial matters as the ancient Indians: And this single position, closely attended to, will unanswerably prove, that the present time is preferable to all others. The argument turns thus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last war, we had experience, but wanted numbers; and forty or fifty years hence, we should have numbers, without experience; wherefore, the proper point of time, must be some particular point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in which a sufficiency of the former remains, and a proper increase of the latter is obtained:

And that point of time is the present time.

我常常喜欢参加公共集会和私人聚会，静静地点评那些不经思考便高谈阔论的人的貌似有理的谬误。在我所听到的许许多多谬论中，下面这个似乎是最普遍的，即：假如这种决裂不是现在 ，而是四五十年以后再发生，北美大陆会更能摆脱其从属地位。对此，我可以回答说，我们目前的 军事实力源自上次战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再过四、五十年，将会不复存在。到那个时候，北美大陆将不会有一个将军甚至是一个军官留下来；而我们，或者我们的继承人，在军事方面将像古老的印第安人一样无知：单是这个境况，密切关注的话，将无可争辩地证明，现在这个时候比其他一切时候都更为有利。于是论证就变成这样：在上次战争结束时，我们有了经验，但人数不够；四、五十年之后，我们应该会有足够的人数而没有经验；因此，适当的时机应该是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个特定的点，此时既保留着充足的经验，人数上又有合理的增长。而这一时机就是现在。

The reader will pardon this digression, as it does not properly come under the head I first set out with, and to which I again return by the following position, viz.

请读者原谅我说这些题外话，因为这并不属于我最初开始讨论的议题之下，但现在我又通过下列主张回归主题，即：

Should affairs be patched up with Britain, and she to remain the governing and sovereign power of America, (which, as matters are now circumstanced, is giving up the point intirely) we shall deprive ourselves of the very means of sinking the debt we have, or may contract. The value of the back lands which some of the

provinces are clandestinely deprived of, by the unjust extension of the limits of Canada, valued only at five pounds sterling per hundred acres, amount to upwards of twenty-five millions, Pennsylvania currency; and the quit-rents at one penny sterling per acre, to two millions yearly.

假使我们同英国的关系弥合，她仍旧保留对北美的统治权和主权，（随着现在形势的发展，这个论点正彻底遭到摒弃）我们就会使自己丧失那种偿还我们所欠的、或可能会产生的债款的手段。有些省份的未开发土地已经由于加拿大疆域的无理扩展被暗中剥夺了，这些土地的价值按每一百英亩五镑计算，达到宾夕法尼亚币2500万以上；免役税按每英亩一便士计算，年达200万。

It is by the sale of those lands that the debt may be sunk, without burthen to any, and the quit-rent reserved thereon, will always lessen, and in time, will wholly support the yearly expence of government. It matters not how long the debt is in paying, so that the lands when sold be applied to the discharge of it, and for the execution of which, the Congress for the time being, will be the continental trustees.

债务通过出卖这些土地可以解决，而不致使任何人受累，对土地所保留的免役税将经常性减轻，并迟早完全供给政府每年的开支。债要还多长时间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出卖土地是用以还债就行，国会将暂时担任大陆的受托方，负责具体的执行。

I proceed now to the second head, viz. Which is the easiest and most practicable plan, RECONCILIATION or INDEPENDANCE; with

some occasional remarks.

现在我开始谈第二个问题，即：到底和解 或者独立 ，哪一种方案是最简便、最切合实际的；并附带作一些说明。

He who takes nature for his guide is not easily beaten out of his argument, and on that ground, I answer *generallyThat* INDEPENDANCE *being a* SINGLE SIMPLE LINE, *contained within ourselves; and reconciliation, a matter exceedingly perplexed and complicated, and in which, a treacherous capricious court is to interfere, gives the answer without a doubt.*

凡是以自然作为行动指南的人，其主张皆不易被驳倒，据此，我大体回复作独立 作为一个单一的简单的立场 ，取决于我们内部；而和解则是背信弃义的、反复无常的宫廷一定要插手的，十分错综复杂，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The present state of America is truly alarming to every man who is capable of reflexion. Without law, without government, without any other mode of power than what is founded on, and granted by courtesy. Held together by an unexampled concurrence of sentiment, which, is nevertheless subject to change, and which, every secret enemy is endeavouring to dissolve. Our present condition, is, Legislation without law; wisdom without a plan; constitution without a name; and, what is strangely astonishing, perfect Independance contending for dependance. The instance is without a precedent; the case never existed before; and who can tell what may be the event? The property of no man is secure in the

present unbraced system of things. The mind of the multitude is left at random, and seeing no fixed object before them, they pursue such as fancy or opinion starts. Nothing is criminal;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reason; wherefore, every one thinks himself at liberty to act as he pleases. The Tories dared not have assembled offensively, had they known that their lives, by that act, were forfeited to the laws of the state. A line of distinction should be drawn, between, English soldiers taken in battle, and inhabitants of America taken in arms. The first are prisoners, but the latter traitors. The one forfeits his liberty, the other his head.

北美的现状在每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看来都是非常严峻的。没有法律，没有政府，除了建立在礼节基础上，也是由礼节赋予的权力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形式的权力。它是由史无前例的情感统一团结起来的，然而这种情感容易改变，每一个隐藏的敌人都力图瓦解它。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有立法却没有法律；有智慧却没有方案；有政体却没有名分；而特别叫人吃惊的，是争取依附关系的完全独立。这个状况无先例可循；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过；谁能判别它的结果怎样呢？在目前这种松松垮垮的制度下，任何人的财产都没有保障。大众是顺其自然的心理，但由于他们看不到前方有确定的目标，他们追求诸如幻想或是一群人的主张盛起。没有什么事情算是犯罪的；没有叛逆这回事；因此每一个人都自认为可以随心所欲。托利党人倘使知道他们的行为会让他们在国法面前丧了命，他们是不敢那样冒犯地集会的。在战斗中俘获的英国士兵和所获捕的持武器的北美居民之间，应该划出区分的界线。前者是阶下囚，而后者是叛徒。一个丧失自由，另一个要掉脑袋。

Notwithstanding our wisdom, there is a visible feebleness in some of our proceedings which gives encouragement to dissentions. The Continental Belt is too loosely buckled. And if something is not

done in time, it will be too late to do any thing, and we shall fall into a state, in which, neither *Reconciliation* nor *Independance* will be practicable. The king and his worthless adherents are got at their old game of dividing the Continent, and there are not wanting among us, Printers, who will be busy spreading specious falsehoods. The artful and hypocritical letter which appeared a few months ago in two of the New-York papers, and likewise in two others, is an evidence that there are men who want either judgment or honesty.

尽管我们明智，但在一些事上依然表现出明显的无能为力，而这就助长了分歧的产生。大陆的皮带扣得太松了。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那一切都将来不及，那时我们将陷入一种和解和独立均不可为的境地。国王和他的微不足道的附庸们再一次玩起了分裂大陆的老把戏，我们中间也不乏愿意为散布似是而非的谎言而奔忙的印刷商。几个月以前刊发在纽约两家和另外两家报纸上的那封取巧而又伪善的信，证明有些人是既没有判别力又没有诚信的。

It is easy getting into holes and corners and talking of reconciliation: But do such men seriously consider, how difficult the task is, and how dangerous it may prove, should the Continent divide thereon. Do they take within their view, all the various orders of men whose situation and circumstances, as well as their own, are to be considered therein. Do they put themselves in the place of the sufferer whose *all* is *already* gone, and of the soldier, who hath quitted *all* for the defence of his country. If their ill judged moderation be suited to their own private situations *only,* regardless of others, the event will convince them, that “they are reckoning without their Host.”

蜷在洞里和角落谈和解何其容易：可是这些人是否认真考虑过这项任务多么艰难，如果大陆因此而分裂的话会证明这有多么危险。他们是否想过应当在这个方面考虑到各种各类的人的情况和处境，以及他们自己的情况和处境。他们是否曾设身处地想到那些已经一无所有的受难者，想到那些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放弃一切的士兵。如果他们错误判断的稳健只适合于他们自己的个人的情形，而不考虑别人的情况，结果会使他们相信，“他们算计的时候没有考虑他们的主人”。

Put us, say some, on the footing we were on in sixty-three: To which I answer, the request is not *now* in the power of Britain to comply with, neither will she propose it; but if it were, and even should be granted, I ask, as a reasonable question, By what means is such a corrupt and faithless court to be kept to its engagements? Another parliament, nay, even the present, may hereafter repeal the obligation, on the pretence, of its being violently obtained, or unwisely granted; and in that case, Where is our redress? No going to law with nations; cannon are the barristers of Crowns; and the sword, not of justice, but of war, decides the suit. To be on the footing of sixty-three, it is not sufficient, that the laws only be put on the same state, but, that our circumstances, likewise, be put on the same state; Our burnt and destroyed towns repaired or built up, our private losses made good, our public debts (contracted for defence) discharged; otherwise, we shall be millions worse than we were at that enviable period. Such a request, had it been complied with a year ago, would have won the heart and soul of the Continent, but now it is too late, “The Rubicon is passed.”

有些人说，把我们放回到我们在1763年的情形去吧：对此我回应说，这个要求现在不是英国所能够同意的，她也不会提出这个要求来；但是，如果要求就是这样，甚至也应该给予满足，请问，一个很

自然的问题，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这样一个腐败的且毫不可信的宫廷履行义务呢？另一个议会，不，甚至当今议会，可能会在将来废除这项义务，伪称这种义务是靠暴力获取的，或者说当初同意是不明智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办法矫正呢？不能与各国打官司：大炮是国王们的律师；判决诉讼的是武力，不是司法权，而是战争。要回到1763年的状况，只是把法律放设定在同样的状态是不够的，而要把我们的处境也同样地放在一样的状态；我们被烧毁和破坏的城镇修缮或者重建起来，我们的私人损失得以补偿，我们（为了防御而举借）的公债予以勾销；否则的话，我们的处境会是比那个令人羡慕的时期差上千万倍。这样一个要求，如果是在一年以前满足了的话，应该是能赢得大陆民心的，但是现在太晚了。“事已至此，不可挽回。”

Besides, the taking up arms, merely to enforce the repeal of a pecuniary law, seems as unwarrantable by the divine law, and as repugnant to human feelings, as the taking up arms to enforce obedience thereto. The object, on either side, doth not justify the means; for the lives of men are too valuable to be cast away on such trifles. It is the violence which is done and threatened to our persons; the destruction of our property by an armed force; the invasion of our country by fire and sword, which conscientiously qualifies the use of arms: And the instant, in which such a mode of defence became necessary, all subjection to Britain ought to have ceased; and the independancy of America, sh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dating its æra from, and published by, *the first musket that was fired against her.* This line is a line of consistency; neither drawn by caprice, nor extended by ambition; but produced by a chain of events, of which the colonies were not the authors.

此外，只是为了坚持废止一条金钱方面的法令而诉诸武力，正如用武力来强迫遵守这样的法令一样，似乎是为神法所不容的，并且人

的情感上也无法接受。目标，从这两者的任何一方面，都无法为这手段找到合理理由；因为生命太可贵，不能消磨在这样细枝末节的事情上。对我们是以暴力相加并以暴力相挟；对我们的财产是以武装力量对加以破坏；对我们的国家，以杀人放火加以入侵，从良心上讲，使用武力属于正当权利：一旦如此，这样的自卫方式成为了必要，我们对英国的一切顺从就该停止；美国的独立应该在第一发子弹射向她的时代就被考虑和宣告了。这条线是前后一贯的；它既不是突发奇想划出来的，也不是野心膨胀而延长的；而是一连串事件所产生的后果，各殖民地却不是这些事件的始作俑者。

I shall conclude these remarks, with the following timely and well intended hints. We ought to reflect, that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ways, by which an independancy may hereafter be effected; and that *one* of those *three,* will one day or other, be the fate of America, viz. By the legal voice of the people in Congress; by a military power; or by a mob: It may not always happen that our soldiers are citizens, and the multitude a body of reasonable men; virtue, as I have already remarked, is not hereditary, neither is it perpetual. Should an independancy be brought about by the first of those means, we have every opportunity and every encouragement before us, to form the noblest purest constitution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We have it in our power to begin the world over again. A situation, similar to the present, hath not happened since the days of Noah until now. The birthday of a new world is at hand, and a race of men, perhaps as numerous as all Europe contains, are to receive their portion of freedom from the event of a few months. The Reflexion is awful and in this point of view, How trifling, how ridiculous, do the little, paltry cavellings, of a few weak or interested men appear, when weighed against the business of a world.

我将用以下这些适时和饱含善意的意见来结束我的评论。我们应当深思，三种不同的方法影响到今后的独立；而三者之中的一种迟早将成为美国的命运，即是依靠议会中的人民的合法呼声；依靠一支军事力量；或者依靠平民的起义：可是我们的兵士未必一定是公民，而一众人群也未必总是有理智的人；德性不是遗传的，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就像我已经说明过的那样。假如国家的独立是由上述三种方法中的第一种实现的话，我们就会有各种机会和各方面的鼓励来建立世界上最高尚、最纯洁的政体。我们有能力开始重新建设世界。和目前这样相似的情况，自从创世以来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过。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即将来临，和欧洲差不多的人口将从几个月后的事件中获得他们的一份自由。这种思量让人敬畏，依此观点看来，一些懦怯或偏私的人的微不足道的无端指责，同这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业相比，看起来是多么 微不足道，多么可笑啊。

Should we neglect the present favorable and inviting period, and an Independance be hereafter effected by any other means, we must charge the consequence to ourselves, or to those rather, whose narrow and prejudiced souls, are habitually opposing the measure, without either inquiring or reflecting. There are reasons to be given in support of Independance, which men should rather privately think of, than be publicly told of. We ought not now to be debating whether we shall be Independant or not, but, anxious to accomplish it on a firm, secure, and honorable basis, and uneasy rather that it is not yet began upon. Every day convinces us of its necessity. Even the Tories (if such beings yet remain among us) should, of all men, be the most solicitous to promote it; for, as the appointment of committees at first, protected them from popular rage, so, a wise and well established form of government, will be the only certain means of continuing it securely to them. *Wherefore,* if they have not virtue enough to be WHIGS, they ought to have prudence enough to wish for Independance.

假使我们无视当前有利的诱人的时期，而以后用任何其他的方法来实现独立，那么我们自己将必须承担后果，或者宁可说是由那些常常不加探究或思考便习惯性反对这个措施的狭隘偏颇之辈承担。支持独立的理由能给出来，然而人们应该私底想到而不是公开地被告知。我们现在不应该来辩论我们是否应该独立的问题，而是应该操心在稳固的、有把握的和可敬的基础上来实现独立，并且因为还没有着手实施而感到不安。每天都使我们确信独立的必要性。甚至托利党（如果我们中间还有这样一些人的话）应该是所有人中最热切地推动此事的；因为，最初委员会的设立保护他们不致为民众所愤恨，同样的，一个英明和完善的政体，将是继续安然保护他们的唯一的可靠方法。因此，如果他们的德行还不够使他们成为辉格党人，他们就该精明些，期望独立。

In short, Independance is the only BOND that can tye and keep us together. We shall then see our object, and our ears will be legally shut against the schemes of an intriguing, as well, as a cruel enemy. We shall then too, be on a proper footing, to treat with Britain; for there is reason to conclude, that the pride of that court, will be less hurt by treating with the American states for terms of peace, than with those, whom she denominates, “rebellious subjects,” for terms of accommodation. It is our delaying it that encourages her to hope for conquest, and our backwardness tends only to prolong the war. As we have, without any good effect therefrom, withheld our trade to obtain a redress of our grievances, let us *now* try the alternative, by *independantly* redressing them ourselves, and then offering to open the trade. The mercantile and reasonable part in England, will be still with us; because, peace *with* trade, is preferable to war *without* it. And if this offer be not accepted, other courts may be applied to.

总之，独立是维系和团结我们的唯一纽带。那样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耳朵也就会拒绝听信一个搞阴谋诡计且残暴的敌人的各种阴谋了。并且，那时我们将会在恰当的情形中来对待英国；因为我们有理由可以断言，同美国各州谈判和平条款，比她同她称为“叛民”的那些人谈判和解条件，会让英国宫廷的自尊心少受一些伤害。正是我们在独立问题上的拖延时日助长了它征服我们的念想，而我们的退缩不前，只会拖长战争。既然我们曾经停止我们的贸易来发泄我们的不满，却毫无成效，现在让我们试试另一种方案，我们自己独立来缓解不满，然后主动开放贸易。英国的商人和理智的人士是还会和我们在一起的；因为，和平环境下进行贸易，比没有贸易的战争更可取。假如这个建议不被接受的话，可以向其他的宫廷提出。

On these grounds I rest the matter. And as no offer hath yet been made to refute the doctrine contained in the former editions of this pamphlet, it is a negative proof, that either the doctrine cannot be refuted, or, that the party in favour of it are too numerous to be opposed. WHEREFORE, instead of gazing at each other with suspicious or doubtful curiosity, let each of us, hold out to his neighbour the hearty hand of friendship, and unite in drawing a line, which, like an act of oblivion, shall bury in forgetfulness every former dissention. Let the names of Whig and Tory be extinct; and let none other be heard among us, than those of *a good citizen, an open and resolute friend, and a virtuous supporter of the* RIGHTS *of* MANKIND *and of the* FREE AND INDEPENDANT STATES OF AMERICA.

据这些理由我讲完了这件事。既然还没有人提出来反驳这本小册子的以前版本中所提出的主张，那么这从反面证明，这个主张是驳不倒的，或者是赞同这个主张的人为数太多，无法加以反对。因此 ，不要怀着猜疑的或疑惑的心理互相观望，让我们每人向邻里伸出真挚的

友谊之手，团结一致划出一条线，将从前的种种纷争一笔勾销，永远遗忘。让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名头不再；让我们中间只听到好公民、坦率且坚定的朋友、人权的高尚支持者及自由和独立的美国联邦的崇高拥护者，而其他的一概不再闻说。

Epistle to Quakers

致辉格党人书

To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eligious Society of the People called Quakers, or to so many of them as were concerned in publishing a late piece, entitled “The ANCIENT TESTIMONY AND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called QUAKERS renewed, with Respect to the KING and GOVERNMENT, and touching the COMMOTIONS now prevailing in these and other parts of AMERICA, addressed to the PEOPLE IN GENERAL.”

致称为辉格党人的人民宗教团体代表，或者最近出版的作品中所涉及的一众人士。作品名为《辉格党人的原始主张与原则：更新版，礼献国王及政府，触及美国各地盛行的混乱，广昭普罗大众》。

THE Writer of this, is one of those few, who never dishonors religion either by ridiculing, or cavilling at any denomination whatsoever. To God, and not to man, are all men accountable on the score of religion. Wherefore, this epistle is not so properly addressed to you as a religious, but as a political body, dabbling in matters, which the professed Quietude of your Principles instruct you not to meddle with.

本文作者，是为数不多的从不以嘲笑或者无端指责任何教派而使宗教蒙羞的人之一。在宗教问题上，所有人是向上帝，而不是对人尽责。因此这封信不宜代表宗教团体，而是代表涉及政事的政治实体写

给大众，而这与你们公开宣称的自己与世无争、不管政事的原则相悖。

As you have, without a proper authority for so doing, put yourselves in the place of the whole body of the Quakers, so, the writer of this, in order to be on an equal rank with yourselves, is under the necessity, of putting himself in the place of all those, who, approve the very writings and principles, against which, your testimony is directed: And he hath chosen their singular situation, in order, that you might discover in him that presumption of character which you cannot see in yourselves. For neither he nor you can have any claim or title to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尽管没有权力这样做，由于你们已然将自己置身于辉格党人全体之中，因此，文书作者为了和你们平起平坐，出于必要，将他自己置身于赞同这些文字和原则的人之中，而反对你们的主张所指引的方向：他已经选择了他们独到的处境，这样你们大概会在他身上发现你们在自己身上所看不到的推定的个性。因为不管是他还是你们都不能号称或者冠名政治代表。

When men have departed from the right way, it is no wonder that they stumble and fall. And it is evident from the manner in which ye have managed your testimony, that politics, (as a religious body of men) is not your proper Walk; for however well adapted it might appear to you, it is, nevertheless, a jumble of good and bad put unwisely together, and the conclusion drawn therefrom, both unnatural and unjust.

人一旦偏离正途，蹒跚及跌倒就都不奇怪了。由你们对自己的主张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政治（作为一个宗教团体）不是你们的正途；因为不管政治看起来如何因时制宜，然而，它还是好与坏不谨慎地混杂在一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政治既反常，也不公正。

The two first pages, (and the whole doth not make four) we give you credit for, and expect the same civility from you, because the love and desire for peace is not confined to Quakerism, it is the *natural,* as well as the religious wish of all denominations of men. And on this ground, as men laboring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ant Constitution of our own, do we exceed all others in our hope, end, and aim. *Our plan is peace for ever.* We are tired of contention with Britain, and can see no real end to it but in a final separation. We act consistently, because for the sake of introducing an endless and uninterrupted peace, do we bear the evils and burdens of the present day. We are endeavoring, and will steadily continue to endeavor, to separate and dissolve a connexion which hath already filled our land with blood; and which, while the name of it remains, will be the fatal cause of future mischiefs to both countries.

在最初两页（总共不过四页），我们姑且信任你，希望你们对我们同样客气，因为对和平的热爱和渴望不只仅限于辉格主义，这是本能的，也是所有教派成员一致的虔诚愿望。在此基础上，既然我们在努力建立自己独立体制，我们就在希望、结局和目标上超越其他国家。我们的规划是永久和平。我们厌倦了和英国的争执，除了与之彻底分离也看不到真正的结束。因为为了实现永久不间断的和平，我们始终如一，忍受着当今的欺压和重负。我们正在努力，并将持续不断地努力去割裂和瓦解这种已使我们的土地沾满鲜血的和英国之间的联系；这种关系，只要名分还在，就会是两国未来不幸的致命原因。

We fight neither for revenge nor conquest; neither from pride nor passion; we are not insulting the world with our fleets and armies, nor ravaging the globe for plunder. Beneath the shade of our own vines are we attacked; in our own houses, and on our own lands, is the violence committed against us. We view our enemies in the character of Highwaymen and Housebreakers, and having no defence for ourselves in the civil law, are obliged to punish them by the military one, and apply the sword, in the very case, where you have before now, applied the halter. Perhaps we feel for the ruined and insulted sufferers in all and every part of the continent, with a degree of tenderness which hath not yet made it's way into some of your bosoms. But be ye sure that ye mistake not the cause and ground of your Testimony. Call not coldness of soul, religion; nor put the *Bigot* in the place of the *Christian*.

我们反抗既不是为了复仇，也不是为了征服；不是出于自尊心，也不是出于激愤；我们不是用舰队和军队来侵犯这个世界，也不是为了掠夺而毁灭世界。我们在自家的葡萄藤下被袭；在自己的家中，自己的土地上遭到施暴。我们拦路劫匪和入市盗贼身上看到了我们的敌人的影子，却无法从民法中为自己获得庇护，只能用军事手段诉诸武力去惩罚他们，从前这种情况，我们悬崖勒马了。或许我们对这个大陆每一寸土地上的受难者遭受的迫害和凌辱感知甚微，你们中的一些人尚不能从内心中对其感同身受。但是要确保你们的主张不是出于你们的错误，也不是据以主张的依据。不要冷酷的灵魂和宗教；也不要让宗教偏执之人进入基督教。

O ye partial ministers of your own acknowledged principles. If the bearing arms be sinful, the first going to war must be more so, by a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ilful attack and unavoidable defence. Wherefore, if ye really preach from conscience, and mean

not to make a political hobby-horse of your religion, convince the world thereof, by proclaiming your doctrine to your enemies, *for they likewise bear* ARMS. Give us proof of your sincerity by publishing it at St. James's, to the commanders in chief at Boston, to the Admirals and Captains who are practically ravaging our coasts, and to all the murdering miscreants who are acting in authority under HIM whom ye profess to serve. Had ye the honest soul of *Barclay* [6_1] *ye would preach repentance to your king; Ye would tell the Royal Wretch his sins, and warn him of eternal ruin. Ye would not spend your partial invectives against the injured and the insulted only, but, like faithful ministers, would cry aloud and spare none. Say not that ye are persecuted, neither endeavour to make us the authors of that reproach, which, ye are bringing upon yourselves; for we testify unto all men, that we do not complain against you because ye are Quakers, but because ye pretend to be and are NOT Quakers.*

哦，你们这些自己所认可的原则的偏颇的公使啊。鉴于蓄意袭击和被动防御之间的差别，如果持械是有罪的，那么首先发起战争的就更加罪孽深重。因此，如果你们真的是本着良心去宣扬，而非意在就你们的信仰做政治上的老生常谈，那就通过向你们的敌人宣告自己的信条让全世界相信，因为他们同样配备着武器 。把它发表在圣詹姆斯上来向我们证明你们的真诚，给在波士顿的首席指挥官看，给那些几乎在摧毁我们海岸的海军上将和首领看，给那些在你们声称要辅佐的上帝 的许可之下作歹罪大恶极的杀人犯看。如果你们有巴克利 [7_1] 一样诚实的灵魂，就会向国王宣讲悔改；你们就会告诉皇家的混蛋 他们的罪孽，并警告他们彻底毁灭的下场。你们就不会仅仅不公地谩骂受害者和受辱者，而是会像忠诚的官员一样，大声呼叫，不会拉下一个。不要说你们自己受了迫害吧，也不要说奋力让我们发起讨伐，你们这是自找的；因为我们向所有人证实，我们不会因为你们是辉格党人而控诉你们，而是因为你们明明不是，却伪装成辉格党人。

Alas! it seems by the particular tendency of some part of your testimony, and other parts of your conduct, as if, all sin was reduced to, and comprehended in, *the act of bearing arms,* and that by the *people only*. Ye appear to us, to have mistaken party for conscience; because, the general tenor of your actions wants uniformity: And it is exceedingly difficult to us to give credit to many of your pretended scruples; because, we see them made by the same men, who, in the very instant that they are exclaiming against the mammon of this world, are nevertheless, hunting after it with a step as steady as Time, and an appetite as keen as Death.

哎呀，从你们某部分主张的特定倾向，以及行为的其他部分看起来，好像所有的罪恶都归结于也包含在持械的行为中了，且仅限于人民持械。在我们看来，你们误把党派当成了道德；因为，你们行为的主旨只要求一致：然而让我们相信你们假意的良心不安实在是困难；因为，我们看到同样是这些人，在呼唤反对拜金主义的同时，却在以时光 般坚定的步伐在猎金，渴求如死亡 般强烈。

The quotation which ye have made from Proverbs, in the third page of your testimony, that, “when a man's ways please the Lord, he maketh even his enemies to be at peace with him”; is very unwisely chosen on your part; because, it amounts to a proof, that the king's ways (whom ye are so desirous of supporting) do *not* please the Lord, otherwise, his reign would be in peace.

你们在宣言第三页所援引的格言称，“当一个人的行事为主所悦，即使他的敌人也会与之相安”；对你们而言，这是不明智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国王（你们渴望支持的人）的行事不为主所悦，否则的话，他的统治该是国泰民安的。

I now proceed to the latter part of your testimony, and that, for which all the foregoing seems only an introduction, viz. “It hath ever been our judgment and principle, since we were called to profess the light of Christ Jesus, manifested in our consciences unto this day, that the setting up and putting down kings and governments, is God's peculiar prerogative; for causes best known to himself: And that it is not our business to have any hand or contrivance therein; nor to be busy bodies above our station, much less to plot and contrive the ruin, or overturn of any of them, but to pray for the king, and safety of our nation, and good of all men: That we may live a peaceable and quiet life, in all goodliness and honesty; *under the government which God is pleased to set over us.“* If these are *really* your principles why do ye not abide by them? Why do ye not leave that, which ye call God's Work, to be managed by himself? These very principles instruct you to wait with patience and humility, for the event of all public measures, and to receive *that event* as the divine will towards you. *Wherefore,* what occasion is there for your *political testimony* if you fully believe what it contains: And the very publishing it proves, that either, ye do not believe what ye profess, or have not virtue enough to practise what ye believe.

我现在继续你们宣言的后半部分，相对这部分，前面所有内容仅像是个导言，即“自我们受召信奉耶稣以来，我们都设立和废止国王和政府，这是上帝的特有权力，也是我们所尊奉的原则，时至今日都体现在我们的良知上；因他最明白缘由：从中插手或者献策也不是我们的事；也不该僭越我们的职位，成为忙碌不堪的群体，更不用说去谋划和策动毁灭或者推翻他们中任何一个，而应该为国王祈祷，为国家求安全，为所有人祈福：这样我们可能会过上平和安宁的生活，生活在美好和真诚之中；接受上帝悦然为我们设立的政府的统治。”如

果这些真的是你们的准则，你们为什么不遵守呢？为什么你们不将上帝的工作留给上帝去处置呢？就是这些准则指示你们耐心而谦卑地等待所有公共手段的结果，然后像圣人一样接受呈现给你们的结果。因此，如果你们全然相信它所包含的一切，那你们的政治宣言还有什么需要呢：它的发表本身证实，要么你们是不相信你们所声称的，要么是没有足够的德行去践行你们所信仰的。

The principles of Quakerism have a direct tendency to make a man the quiet and inoffensive subject of any, and every government *which is set over him.* And if the setting up and putting down of kings and governments is God's peculiar prerogative, he most certainly will not be robbed thereof by us; wherefore, the principle itself leads you to approve of every thing, which ever happened, or may happen to kings as being his work. OLIVER CROMWELL thanks you. CHARLES, then, died not by the hands of man; and should the present Proud Imitator of him, come to the same untimely end, the writers and publishers of the Testimony, are bound, by the doctrine it contains, to applaud the fact. Kings are not taken away by miracles, neither are changes in governments brought about by any other means than such as are common and human; and such as we are now using. Even the dispersing of the Jews, though foretold by our Saviour, was effected by arms. Wherefore, as ye refuse to be the means on one side, ye ought not to be meddlers on the other; but to wait the issue in silence; and unless you can produce divine authority, to prove, that the Almighty who hath created and placed this *new* world, at the greatest distance it could possibly stand, east and west, from every part of the old, doth, nevertheless, disapprove of its being independant of the corrupt and abandoned court of Britain, unless I say, ye can shew this, how can ye on the ground of your principles, justify the exciting and stirring up the people “firmly to unite in the *abhorrence* of all such *writings,* and *measures,*

as evidence of desire and design to break off the *happy* connexion we have hitherto enjoyed, with the kingdom of Great-Britain, and our just and necessary subordination to the king, and those who are lawfully placed in authority under him." What a slap of the face is here! the men, who in the very paragraph before, have quietly and passively resigned up the ordering, altering, and disposal of kings and governments, into the hands of God, are now, recalling their principles, and putting in for a share of the business. Is it possible, that the conclusion, which is here justly quoted, can any ways follow from the doctrine laid down? The inconsistency is too glaring not to be seen; the absurdity too great not to be laughed at; and such as could only have been made by those, whose understandings were darkened by the narrow and crabby spirit of a dispairing political party; for ye are not to be considered as the whole body of the Quakers but only as a factional and fractional part thereof.

辉格主义的准则有让一个人安静和顺服地臣服于凌驾于其上的任何一个、每一个政府明确的倾向。而且假使国王及政府的设立和废除是上帝的特定权力，他当然不会在这方面被我们剥夺；因此，原则本身引导你们，只要是国王的作为，你们就赞成曾发生的或者会发生的一切。奥利佛·克伦威尔感谢你们。那么查理并不是死在人们的手里；如果现在他的自负的模仿者有同样早亡的下场，那么宣言的作者和发表者们，定要据它所包含的信条，为之欢呼了。国王不是被奇迹废除的，也不是由任何普通的或人性的手段带来的政府的变化招致的；我们现今采取的是这些手段。犹太人的散布尽管受到了救世主的预示，但还是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因此，既然你们拒绝为一方而战，那你们也不应该去另一方干涉；而应静观其变；除非你们能展示神圣的权威，据之证实，已经创造和设置了这个新的世界的万能的主，远在东方抑或西方，却于旧世界中反对美国从英国腐朽并且遭到唾弃的宫廷独立出来，否则我会说，你们来说明一下，如何在你们原则的基础

上，举证群情激愤的人民“出于对这样的文书、这样的方式的极度仇恨而紧紧团结在一起，足以证明，人们渴望和决意割断我们迄今为止同大不列颠的快乐联系，不再正当且必要地服从国王，以及那些合法的在他手下任职的人们。”多么响亮的一记耳光！之前就在这段出现的这些人，已悄然地把任命、变更和废除国王以及政府的权力让渡到了上帝手里，现在想起了他们的主张，插手进来要分事业一杯羹。那么此处援引的结论是否可能与既定的教义一致呢？期间的矛盾明显到让人无法视而不见；谬误离谱到让人忍俊不禁；这样的事只有那些阴郁的政治党派才干得出来，他们出于狭隘和执拗的思维，理解不清；你们不会被认为是辉格党人全体，而只是一个派系，因此只是一个部分。

Here ends the examination of your testimony; (which I call upon no man to abhor, as ye have done, but only to read and judge of fairly;) to which I subjoin the following remark; “That the setting up and putting down of kings,” most certainly mean, the making him a king, who is yet not so, and the making him no king who is already one. And pray what hath this to do in the present case? We neither mean to *set up* nor to *put down,* neither to *make* nor to *unmake,* but t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m. Wherefore, your testimony in whatever light it is viewed serves only to dishonor your judgement, and for many other reasons had better been let alone than published.

对你们宣言的审视就到这里结束吧；（我呼吁大家不要像你们那样去憎恨，而是解读和公正地评判；）对此我附加上下面的评论；“国王的设立和废除”，非常确定地意味着，将一个尚不是王的人立为国王，和使一个已经在王位的人不再是王。请问这与现在说的事情有什么关系？我们既不旨在设立也不废除，既非立也非不立，而是旨在与之毫无牵连。因此，你们的宣言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只是

让你们的判断不实，加之其他诸多原因，最好束之高阁而不是发表。

First, Because it tends to the decrease and reproach of all religion whatever, and is of the utmost danger to society, to make it a party in political disputes.

首先，因为 它会引起所有宗教信仰的减少和宗教的体面受损，对社会具有最大的危险，让其陷入政治纷争。

Secondly, Because it exhibits a body of men, numbers of whom disavow the publishing political testimonies, as being concerned therein and approvers thereof.

第二，因为 它呈现出这么一个团体，其成员虽然牵涉其中也是其拥护者，却不承认其公开发表的政治宣言。

Thirdly, Because it hath a tendency to undo that continental harmony and friendship which yourselves by your late liberal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hath lent a hand to establish;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which, is of the utmost consequence to us all.

第三，因为 它可能会瓦解你们自己之前通过慷慨解囊助力其建立起来的大陆和谐和友谊；其维持和保留才是对我们所有人最好的结果。

And here without anger or resentment I bid you farewell. Sincerely wishing, that as men and christians, ye may always fully and uninterruptedly enjoy every civil and religious right; and be, in your turn, the means of securing it to others; but that the example which ye have unwisely set, of mingling religion with politics, *may be disavowed and reprobated by every inhabitant of* AMERICA.

因而在此，我不带任何愤怒或仇恨地与你们作别。真诚希望，作为人，作为基督徒，你们能充分、坚定地享受每一项公民和宗教权利；反过来，你们来确保他人享有这一权利；但是你们极为不明智地将宗教与政治混为一谈的例子，可能会遭到每个美国居民的抗拒和遗弃。

[6_1]."Thou hast tasted of prosperity and adversity: thou knowest what it is to be banished thy native country, to be over-ruled as well as to rule, and set upon the throne; and being oppressed thou hast reason to know how hateful the oppressor is both to God and man: If after all these warnings and advertisements, thou dost not turn unto the Lord with all thy heart, but forget him who remembered thee in thy distress, and give up thyself to follow lust and vanity, surely great will be thy condemnation. Against which snare, as well as the temptation of those who may or do feed thee, and prompt thee to evil, the most excellent and prevalent remedy will be, to apply thyself to that light of Christ which shineth in thy conscience, and which neither can, nor will flatter thee, nor suffer thee to be at ease in thy sins." Barclay's Address to Charles II.

[7_1].“你们已经尝过繁荣和灾难的滋味：你们最懂被祖国抛弃的感受，受治于人以及登上王位治于人；受过压迫，你们应该知道被压迫者心怀对上帝和人君怎样的仇恨：如果经受过所有这些磨难和警告，你们却不一心皈依我主，却将挂怀你们苦难的主抛在脑后，任由自己沉迷于诱惑和虚荣，你们的罪定不轻。为抵制那些可能或者切实给养你，却把你推向罪恶的人的诱惑和引诱，最优最普遍的对策会是让自己接受耶稣的感召，开启你的良知，带罪之身既不能，也不会让你喜悦，亦不会让你通过磨难获得自在心安。”巴克利的《致查理二世书》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Meditations

沉思录

Marcus Aurelius

马可·奥勒留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沉思录

The Meditations

马可·奥勒留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Book One 卷一
- Book Two 卷二
- Book Three 卷三
- Book Four 卷四
- Book Five 卷五
- Book Six 卷六
- Book Seven 卷七
- Book Eight 卷八
- Book Nine 卷九
- Book Ten 卷十
- Book Eleven 卷十一
- Book Twelve 卷十二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Book One

卷一

From my grandfather Verus I learned good morals and the government of my temper.

从我的祖父韦鲁斯身上，我学到了待人之道和克制情感。

From the reputation and remembrance of my father, modesty and a manly character.

通过父亲的声望和对他的追忆，我学会了谦逊和男子气概。

From my mother, piety and beneficence, and abstinence, not only from evil deeds, but even from evil thoughts; and further simplicity in my way of living, far removed from the habits of the rich.

从母亲身上，我明白了虔诚和仁爱；不仅要避免恶行，而且不能存有恶念；要安于简单生活，避免纨绔子弟的奢华习气。

From my great-grandfather, not to have frequented public schools, and to have had good teachers at home, and to know that

on such things a man should spend liberally.

从我的曾祖父那里，我懂得了不要执著于公共学校，而是要请高明的老师到家里，懂得了在这些方面要不吝惜金钱。

From my governor, to be neither of the green nor of the blue party at the games in the Circus, nor a partizan either of the Parmularius or the Scutarius at the gladiators' fights; from him too I learned endurance of labour, and to want little, and to work with my own hands, and not to meddle with other people's affairs, and not to be ready to listen to slander.

从我的老师那里，我懂得了不要拥护竞技场上的任何一派，无论是绿派还是蓝派；也不要偏向角斗场上的任何武士和剑客，无论是圆盾武士还是轻装武士。也是从他身上，我学会了吃苦耐劳，克制物欲；凡事自己动手；不管闲事，不轻信流言。

From Diognetus, not to busy myself about trifling things, and not to give credit to what was said by miracle-workers and jugglers about incantations and the driving away of daemons and such things; and not to breed quails for fighting, nor to give myself up passionately to such things; and to endure freedom of speech; and to have become intimate with philosophy; and to have been a hearer, first of Bacchius, then of Tandasis and Marcianus; and to have written dialogues in my youth; and to have desired a plank bed and skin, and whatever else of the kind belongs to the Grecian discipline.

从戴奥格内特斯身上，我学会不要忙于琐事，不要轻信巫师术士和江湖骗子的咒语以及驱魔降妖之类的法术；不要养鹌鹑，也不要对类似的事情投入过多；要允许别人直抒己见；要亲近哲学；我先是倾听了巴克斯的哲学，而后倾听了坦德西斯和马西阿努斯；我年轻时就写过对话；向往硬榻粗皮，以及所有属于希腊学问的东西。

From Rusticus I received the impression that my character required improvement and discipline; and from him I learned not to be led astray to sophistic emulation, nor to writing on speculative matters, nor to delivering little hortatory orations, nor to showing myself off as a man who practises much discipline, or does benevolent acts in order to make a display; and to abstain from rhetoric, and poetry, and fine writing; and not to walk about in the house in my outdoor dress, nor to do other things of the kind; and to write my letters with simplicity, like the letter which Rusticus wrote from Sinuessa to my mother; and with respect to those who have offended me by words, or done me wrong, to be easily disposed to be pacified and reconciled, as soon as they have shown a readiness to be reconciled, and to read carefully, and not to be satisfied with a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of a book; nor hastily to give my assent to those who talk overmuch; and I am indebted to him for being acquainted with *the Discourses of Epictetus* , which he communicated to me out of his own collection.

多亏了鲁斯蒂克斯，他让我领悟到我的品格需要改进和磨炼；懂得了不要误入诡辩竞赛的歧途，不要撰写猜想性的文字，不发表规劝的演说，不炫耀自己训练有素，或者行善以图显摆；学会了避免辞藻华丽、构思精巧的写作；不穿着户外长袍在家里走来走去，或者做其他类似的事情；我还学会了写信应该朴实无华，就像他从锡纽萨写给我母亲的信一样；如果有人以言语冒犯我，或对我做了错事，一旦他

们表示出和解的意愿，就随时乐于与他们和好；仔细阅读，不满足于对书本的表面意思；也不草率赞同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感谢他让我读了《爱比克泰德的语录》，这可是他从自己的藏书中提供给我的。

From Apollonius I learned freedom of will and undeviating steadiness of purpose; and to look to nothing else, not even for a moment, except to reason; and to be always the same in sharp pain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loss of a child, and in long illness; and to see clearly in a living example that the same man can be both most resolute and yielding, and not peevish in giving his instruction; and to have had before my eyes a man who clearly considered his experience and his skill in expounding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as the smallest of his merits; and from him I learned how to receive from friends what are esteemed favours, without being either humbled by them or letting them pass unnoticed.

从阿波罗尼奥斯那里，我懂得了意志要自由，目标要坚定；懂得了无论何时都要依靠理性，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不管是身体剧痛，丧子，抑或久病缠身，都要镇定如常；从他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一个人可以既坚定又灵活，教导人时脾气不暴躁；他明确地把他阐述哲学原则的经验和技巧看作自己最小的优点；也是从他身上，我学会了如何不卑不亢地接受朋友的恩德，又或对它们置若罔闻。

From Sextus, a benevolent disposition, and the example of a family governed in a fatherly manner, and the idea of living conformably to nature; and gravity without affectation, and to look carefully after the interests of friends, and to tolerate ignorant persons, and those who form opinions without consideration: he

had the power of readily accommodating himself to all, so that intercourse with him was more agreeable than any flattery; and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most highly venerated by those who associated with him; and he had the faculty both of discovering and ordering, in an intelligent and methodical way, the principles necessary for life; and he never showed anger or any other passion, but was entirely free from passion, and also most affectionate; and he could express approbation without noisy display, and he possessed much knowledge without ostentation.

从塞克斯特斯那里，我看到了仁爱气质、慈爱持家的榜样与合乎自然的生活观念，庄重而不造作，细心照顾朋友利益，容忍无知者和那些不假思索就发表意见的人：他有能力使自己和所有人欣然相处，因此和他交往比听任何奉承话更让人愉快；同时他受到和他交往的人的高度尊重；他也有能力以明智和有条不紊的方式发现和整理生活的必要原则；他喜怒从不形于色，感情不外露，但又慈爱无比；表示赞许，却为人低调；知识渊博，却从不炫耀。

From Alexander, the grammarian, to refrain from fault-finding, and not in a reproachful way to chide those who uttered any barbarous or solecistic or strange-sounding expression; but dexterously to introduce the very expression which ought to have been used, and in the way of answer or giving confirmation, or joining in an inquiry about the thing itself, not about the word, or by some other fit suggestion.

从文法学家亚历山大那里，我学会了不挑剔别人，不苛求责备他人语言粗俗、文法不通、言辞古怪，而是灵巧地通过回答、认可或探讨事物本身而非词语的方式，或者是通过其他一些合适的暗示，巧妙

地引出那本来应该使用的正确表达方式。

From Fronto, I learned to observe what envy and duplicity and hypocrisy are in a tyrant, and that generally those among us who are called Patricians are rather deficient in paternal affection.

从弗朗托那里，我学会了观察暴君身上所特有的猜忌、欺诈和虚伪，知道了我们中那些被称作贵族阶级的人一般都缺乏慈爱之心。

From Alexander the Platonic, not frequently nor without necessity to say to any one, or to write in a letter, that I have no leisure; nor continually to excuse the neglect of duties required by our relation to those with whom we live, by alleging urgent occupations.

从柏拉图学派的亚历山大那里，我懂得了不要经常在信中或对别人直接抱怨，说自己没有空闲时间，但也并不是说这么做没有必要；不要总是以有急事为借口，来推卸对和自己一起生活的人应尽的义务。

From Catulus, not to be indifferent when a friend finds fault, even if he should find fault without reason, but to try to restore him to his usual disposition; and to be ready to speak well of teachers, as it is reported of Domitius and Athenodotus; and to love my children truly.

从卡图卢斯那里，我学会了即使你的朋友毫无理由地挑剔你你也不可冷漠视之，而是要尽力帮他恢复冷静；提起师长，要怀有敬意，就像多米蒂厄斯当年提起雅典诺多图斯那样；从他身上我也懂得了真诚地爱我的孩子。

From my brother Severus, to love my kin, and to love truth, and to love justice; and through him I learned to know Thrasea, Helvidius, Cato, Dion, Brutus; and from him I received the idea of a polity in which there is the same law for all, a polity administered with regard to equal rights and equal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idea of a kingly government which respects most of all the freedom of the governed; I learned from him also consistency and undeviating steadiness in my regard for philosophy, and a disposition to do good, and to give to others readily, and to cherish good hopes, and to believe that I am loved by my friends; and in him I observed no concealment of his opinions with respect to those whom he condemned, and that his friends had no need to conjecture what he wished or did not wish, but it was quite plain.

从我兄弟塞维鲁那里，我学会了爱亲人，爱真理，爱正义；通过他，我知道了特拉塞亚、黑尔维迪厄斯、加图、迪翁、布鲁图；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所谓政体，是指要有人人平等的法律，政体的治理要考虑权利平等和言论自由平等，君王统治要尊重被统治者的全部自由；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在对待哲学的态度上，要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养成行善之品质，乐善好施，珍惜美好的希望，相信自己为朋友所爱；在他身上，我观察到，对于自己批评和谴责的人，他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对于他的好恶，他的朋友无需猜测，这些都显而易见。

From Maximus I learned self-government, and not to be led

aside by anything; and cheerfulness in all circumstances, as well as in illness; and a just admixture in the moral character of sweetness and dignity, and to do what was set before me without complaining. I observed that everybody believed that he thought as he spoke, and that in all that he did he never had any bad intention; and he never showed amazement and surprise, and was never in a hurry, and never put off doing a thing, nor was perplexed nor dejected, nor did he ever laugh to disguise his vexation, nor, on the other hand, was he ever passionate or suspicious. He was accustomed to do acts of beneficence and was ready to forgive, and was free from all falsehood; and he presented the appearance of a man who could not be diverted from right rather than of a man who had been improved. I observed, too, that no man could ever think that he was despised by Maximus, or ever venture to think himself a better man. He had also the art of being humorous in an agreeable way.

从马克西默斯那里我学会了自制，不因任何诱惑而误入歧途；在病痛以及其他任何环境下都保持心境愉快；要培养亲切和严肃恰当结合的道德品格，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要口出怨言。我观察到，每个人都相信他所说即所想，做事从来不会不怀好意，从来不会一惊一乍，匆匆忙忙，或是做事拖拖拉拉，也不会手足无措或是灰心丧气，不会强颜欢笑来掩饰焦虑，也不会激动或者猜疑。他习惯于行善事，常怀宽恕之心，避免一切错误；他给人的印象是不会被引入歧途，而不是已经经过改造。我还注意到，在他面前没有人会觉得自己被轻视，或认为自己比他强。他懂得以一种令人愉悦的方式展现幽默。

In my father I observed mildness of temper, and unchangeable resolution in the things which he had determined after due deliberation; and no vainglory in those things which men call

honours; and a love of labour and perseverance; and a readiness to listen to those who had anything to propose for the common weal; and undeviating firmness in giving to every man according to his deserts; and a knowledge derived from experience of the occasions for vigorous action and for remission. And I observed that he had overcome all passion for joys; and he considered himself no more than any other citizen, and he released his friends from all obligation to sup with him or to attend him of a necessity when he went abroad, and those who failed to accompany him by reason of any urgent circumstances, always found him the same. I observed, too, his habit of careful inquiry in all matters of deliberation, and his persistency, and that he never stopped his investigation through being satisfied with appearances which first present themselves; and that his disposition was to keep his friends, and not to be soon tired of them, nor yet to be extravagant in his affection; and to be satisfied on all occasions, and cheerful; and to foresee things a long way off, and to provide for the smallest without display; and to check immediately popular applause and all flattery, and to be ever watchful over the things which were necessary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mpire, and to be a good manager of the expenditure, and patiently to endure the blame which he got for such conduct; and he was neither superstitious with respect to the gods, nor did he court men by gifts or by trying to please them, or by flattering the populace; but he showed sobriety in all things and firmness, and never any mean thoughts or action, nor love of novelty. And the things which conduce in any way to the commodity of life, and of which fortune gives an abundant supply, he used without arrogance and without excusing himself; so that when he had them, he enjoyed them without affectation, and when he had them not he did not want them. No one could ever say of him that he was either a sophist or a home-bred flippant slave or a pedant; but every one acknowledged him to be a man ripe, perfect,

above flattery, able to manage his own and other men's affairs. Besides this, he honoured those who were true philosophers, and he did not reproach those who pretended to be philosophers, nor yet was he easily led by them. He was also easy in conversation, and he made himself agreeable without any offensive affectation. He took a reasonable care of his body's health, not as one who was greatly attached to life, nor out of regard to personal appearance, nor yet in a careless way, but so that, through his own attention, he very seldom stood in need of the physician's art or of medicine or external applications. He was most ready to give way without envy to those who possessed any particular faculty, such as that of eloquence or knowledge of the law or of morals, or of anything else; and he gave them his help, that each might enjoy reputation according to his deserts; and he always acted conformably to the institutions of his country, without showing any affectation of doing so. Further, he was not fond of change, nor unsteady, but he loved to stay in the same places, and to employ himself about the same things; and after his paroxysms of headache he came immediately fresh and vigorous to his usual occupations. His secrets were not many, but very few and very rare, and these only about public matters; and he showed prudence and economy in the exhibition of the public spectacl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buildings, his donations to the people, and in such things, for he was a man who looked to what ought to be done, not to the reputation which is got by a man's act. He did not take the bath at unseasonable hours; he was not fond of building houses, nor curious about what he eat, nor about the texture and colour of his clothes, nor about the beauty of his slaves. His dress came from Lorium, his villa on the coast, and from Lanuvium generally. We know how he behaved to the toll-collector at Tusculum who asked his pardon; and such was all his behaviour. There was in him nothing harsh, nor implacable, nor violent, nor, as one may say, anything carried to the sweating point;

but he examined all things severally as if he had abundance of time, and without confusion, in an orderly way, vigorously and consistently. And that might be applied to him which is recorded of Socrates, that he was able both to abstain from, and to enjoy, those things which many are too weak to abstain from, and cannot enjoy without excess. But to be strong enough both to bear the one and to be sober in the other is the mark of a man who has a perfect and invincible soul, such as he showed in the illness of Maximus.

从我的父亲身上，我发现了一种温和的性情，对于经过仔细考虑决定要做的事，他有着不可改变的决心；对于世人称之为荣耀的东西，他毫无骄矜之心；热爱工作，持之以恒；他乐于倾听人们为公共利益提出的任何建议；坚定不移地根据每一个人的功过进行赏罚；他懂得何时该强硬，何时该让步，并从这种经验中获取知识。我注意到，他克服了所有追逐享乐的狂热；他不认为自己比别的市民重要，他不会强邀朋友陪他喝茶，或者在他出国时必须参见他，而且那些由于紧急情况不能前来陪伴的人，也会发现父亲待他们一如往常。我也观察到，他有着凡事都仔细体察的习惯，并且坚持不懈，从不满足于事物最初的表象而停止探究；他的秉性是保持友谊，不会很快厌倦朋友，或是放纵他的情感；在任何情况下他都那么满足、快乐；见微知著，富有远见；他会即刻阻止流行的赞颂和一切谄媚，他对于治理帝国所必需的事务总是保持警醒，善于管理公务花销，为此蒙受指责他也耐心容忍；他不迷信神灵，与人交往他不重视小恩小惠，也不千方百计取悦别人，奉承大众；凡事都保持清醒和坚定，没有任何小家子气的想法和行为，也不喜欢新奇。幸运赐予他荣华富贵，他泰然接受，既不炫耀，也不推辞；所以拥有时，他毫不造作地享受，失去时，也不会渴求。没有人说他是一个诡辩家，一个油嘴滑舌的家奴，或是一个卖弄学问的人；每一个人都承认他是个成熟、完美、不受奉承的人，能管理好自己和他人的事情。此外，他尊重真正的哲学家，而对于那些伪哲学家，他既不会责备他们，也不会轻易被他们影响。他谈吐随和，令人愉快而毫无冒犯人的做作。他对身体健康的关心恰

到好处，既不极度依恋生命，也不是全然不顾个人形象、生活随随便便，由于他关心自己的身体，所以很少需要看医生、吃药或使用外用药。对于那些有着特殊才能的人，比如擅长雄辩、通晓法律或伦理之类的人才，他总是乐于让贤，没有丝毫嫉妒；他给予他们帮助，从而使每一个人的优点都获得相应的美誉；他的行为总是与国家制度相吻合，而又不显得做作。而且，他不喜欢变化，不会摇摆不定，喜欢待在同样的地方，专心做同样的事情；在剧烈头痛发作之后，他又马上焕然一新，精力充沛地投入到日常工作中去。他的秘密不多，可谓极少、极罕见，即便有秘密，也只是跟公众事务有关；他在公众景观布置和公共建筑的建设方面，或对人民的捐赠以及类似的事情上，表现出严谨和节约，因为他看重的是该做什么事情，而不是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名誉。他不在不合时宜的时刻沐浴；也不喜欢大兴土木修建房屋，不过分讲究饮食，不在意衣服的质地和颜色，也不理会奴隶美貌与否。他的衣服来自他的海滨别墅洛里厄姆，通常来自拉努维厄姆。我们知道在图斯库卢姆他是怎样对待请求他宽恕的收税员的，他平常就是如此行事的。他身上没有那种严厉、无情、暴力的感觉，可以说，也没有任何让人紧张流汗的东西；但他凡事都要分别检查，好像有很多时间一样，从不慌乱，而是有条不紊，精力充沛，连贯一致。人们对于苏格拉底的记录同样可以适用于他，很多东西他可以禁绝也可以享受，而很多人要么意志太薄弱不能禁绝，要么享受起来就没有节制。一方面既能足够坚强地承受，另一方面也能保持清醒，这是拥有完美的、不可战胜的心灵的人的标志，正如他在马克西默斯病痛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

To the gods I am indebted for having good grandfathers, good parents, a good sister, good teachers, good associates, good kinsmen and friends, nearly everything good. Further, I owe it to the gods that I was not hurried into any offence against any of them, though I had a disposition which, if opportunity had offered, might have led me to do something of this kind; but, through their favour, there never was such a concurrence of circumstances as put me to the

trial. Further, I am thankful to the gods that I was not longer brought up with my grandfather's concubine, and that I preserved the flower of my youth, and that I did not make proof of my virility before the proper season, but even deferred the time; that I was subjected to a ruler and a father who was able to take away all pride from me, and to bring me to the knowledge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a man to live in a palace without wanting either guards or embroidered dresses, or torches and statues, and suchlike show; but it is in such a man's power to bring himself very near to the fashion of a private person, without being for this reason either meaner in thought, or more remiss in a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things which must be done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in a manner that befits a ruler. I thank the gods for giving me such a brother, who was able by his moral character to rouse me to vigilance over myself, and who, at the same time, pleased me by his respect and affection; that my children have not been stupid nor deformed in body; that I did not make more proficiency in rhetoric, poetry, and the other studies, in which I should perhaps have been completely engaged, if I had seen that I was making progress in them; that I made haste to place those who brought me up in the station of honour which they seemed to desire without putting them off with hope of my doing it some time after, because they were then still young; that I knew Apollonius, Rusticus, Maximus; that I received clear and frequent impressions about living according to nature, and what kind of a life that is, so that, so far as depended on the gods, and their gifts and help, and inspirations, nothing hindered me from forthwith living according to nature, though I still fall short of it through my own fault, and though not observing the admonitions of the gods, and, I may almost say, their direct instructions; that my body has held out so long in such a kind of life; that I never touched either Benedicta or Theodotus, and that, after having fallen into amatory passions, I was cured; and, though I was often out of humour with Rusticus, I

never did anything of which I had occasion to repent; that, though it was my mother's fate to die young, she spent the last years of her life with me; that, whenever I wished to help any man in his need, or on any other occasion, I was never told that I had not the means of doing it; and that to myself the same necessity never happened, to receive anything from another; that I have such a wife, so obedient, and so affectionate, and so simple; that I had abundance of good masters for my children; and that remedies have been shown to me by dreams, both others, and against blood-spitting and giddiness;… and that, when I had an inclination to philosophy, I did not fall into the hands of any sophist, and that I did not waste my time on writers (of histories), or in the resolution of syllogisms, or occupy myself about the investigation of appearances in the heavens; for all these things require the help of the gods and fortune.

感谢神灵，让我有这么好的祖辈、父母、姐妹、老师、同伴、亲人、朋友，和几乎一切美好的东西。我还感谢神灵，我没有鲁莽得罪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尽管以我的脾气，在某些情形下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然而由于神灵的眷顾，还没有这样的机会让我经受考验。我还得感谢神灵，祖父之妾抚养我时间不算太长，我保持了青春的节操，在适当的时间之前，我没有近过女色，甚至这个时间还推后了；我受一个统治者、一个严父的监管，让我远离骄虚，并且让我知道，住在宫殿里，也可以不需要卫士和华美的服饰，或者是火炬和雕像之类奢华的东西；在以有益于统治者的方式为公众谋利益方面，一个统治者可以接近和向平民生活看齐，但丝毫不会因此变得思想狭隘，行动迟缓。感谢神灵赐予我这样一个兄弟，他的道德品质足以提醒我注意自我检点，与此同时，他对我敬爱有加，对此我感到甚为愉悦；感谢神灵，我的孩子们没有智力愚钝，也没有身体残缺；在修辞、诗歌和其他学问中，我没有太大成就，如果在这些领域里有所进步，我可能早就会沉溺其中；感谢神灵，我迅速地为那些培养我的人提供了荣

誉，没有因为他们那时年纪尚轻就加以推脱，让他们空怀希望；感谢神灵，我有幸认识阿波罗尼奥斯、鲁斯蒂克斯、马克西默斯；感谢神灵使我常常得到这样清晰的领悟，那便是合乎自然地生活，依照神灵及他们的恩赐、帮助和启发而过的生活，之后没有什么能阻止我过自然的生活，我如今仍不能完全这样生活，是我个人的缺点所致，也是没有听取神灵的告诫甚至可以说是直接指示所致；然而我的身体竟然能够在这样的生活中维持这么久；我还从来没有达到贝内迪克特和狄奥多图斯的高度，但在陷入情欲之后，我还是被治愈了；我和鲁斯蒂克斯常有些小矛盾，但我没做过什么让我悔恨的事情；尽管母亲早逝，她最后的几年是我和她一起过的；每当我想要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时，或在其他场合，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缺乏这样做的手段；我自己还没有碰上需要别人伸出援手给予帮助的时候；我有一个温顺、深情、单纯的妻子；我的孩子有很多很好的老师；通过梦境和其他方式，我得到了治愈吐血和头晕的秘方……当我想要亲近哲学的时候，我没有落在诡辩者的手里，我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历史作家身上或是三段论方法上，或忙于研究天体现象；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神灵和幸运的眷顾和帮助。

Among the Quadi at the Granua.

写于格拉努瓦，与夸地族人征战中。

Book Two

卷二

Begin the morning by saying to thyself, I shall meet with the busybody, the ungrateful, arrogant, deceitful, envious, unsocial. All these things happen to them by reason of their ignorance of what is good and evil. But I who have seen the nature of the good that it is beautiful and of the bad that it is ugly, and the nature of him who does wrong, that it is akin to me, not only of the same blood or seed, but that it participates in the same intelligence and the same portion of the divinity, I can neither be injured by any of them, for no one can fix on me what is ugly, nor can I be angry with my kinsman, nor hate him. For we are made for co-operation, like feet, like hands, like eyelids, like the rows of the upper and lower teeth. To act against one another then is contrary to nature; and it is acting against one another to be vexed and to turn away.

每天早晨对自己说，我将要遇到好管闲事的人、忘恩负义的人、傲慢无礼的人、欺诈的人、妒忌的人、性格孤僻的人。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不知何为善、何为恶。但是我，已经悟出了善的本质是美，恶的本质是丑，以及为恶者的本质和我相似——他们不仅与我有着相同的血脉和家系，而且具有同样的智商和神性，我不会被他们任何一个人伤害，因为没人能把丑的事物强加于我，我也不会对同胞亲人动怒或憎恨他们。因为我们生来是要合作的，就像双脚、双手、上下眼皮和上下排牙齿。所以相互冲突是违背本性的，就是自寻烦恼和自我排斥。

Whatever this is that I am, it is a little flesh and breath, and the ruling part. Throw away thy books; no longer distract thyself: it is not allowed; but as if thou wast now dying, despise the flesh, it is blood and bones and a network, a contexture of nerves, veins and arteries. See the breath also, what kind of a thing it is; air, and not always the same, but every moment sent out and again sucked in. The third then is the ruling part: consider thus: Thou art an old man; no longer let this be a slave, no longer be pulled by the strings like a puppet to unsocial movements, no longer be either dissatisfied with thy present lot, or shrink from the future.

我之所以为我，不过是一些血肉，一口气，加上主宰一切的头脑。抛开你的书本；不要再让自己分心：这是不可以的；要把自己想象成垂死之人，轻视这肉体，这不过是一团血肉，一堆骨骼，一个网状的结构，一种由神经、血管和动静脉构成的组织。再看看这一口气吧，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过是空气，但不总是同样的空气，却时时刻刻在呼出吸入。第三则是主宰一切的部分，这么想吧：你是一个老人；不要再让它成为奴隶，不要再像玩偶一样让绳子牵引着，做出一些不合时宜的举动，不要再对现状不满，也不要再逃避未来。

All that is from the gods is full of providence. That which is from fortune is not separated from nature or without an interweaving and involution with the things which are ordered by Providence. From thence all things flow; and there is besides necessity, and that which is for the advantage of the whole universe, of which thou art a part. But that is good for every part of nature which the nature of the whole brings, and what serves to maintain this nature. Now the universe is preserved, as by the changes of the elements, so by the changes of things compounded of the elements. Let these principles be enough for thee; let them

always be fixed opinions. But cast away the thirst after books, that thou mayest not die murmuring, but cheerfully, truly, and from thy heart thankful to the gods.

神灵所赐皆是天道。幸运所赐予本性不可分离，或者说与天道的旨意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天道衍生万物；除了必然性，还为着整个宇宙的福祉，而你就是这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整体的本性带来的，对本性的每一部分都有好处，并有助于维持这种本性。如今宇宙得以维系，是由于有了元素的变化，而元素的变化是由元素组成的物质发生了变化。让这些原则成为你生活的指引，让它们成为不变的真理。丢开你对书本的渴求，这样在临死之前你不会喃喃抱怨，而是愉快、真诚、发自内心地感激神灵。

Remember how long thou hast been putting off these things, and how often thou hast received an opportunity from the gods, and yet dost not use it. Thou must now at last perceive of what universe thou art a part, and of what administrator of the universe thy existence is an efflux, and that a limit of time is fixed for thee, which if thou dost not use for clearing away the clouds from thy mind, it will go and thou wilt go, and it will never return.

记住你推迟做这些事情有多久了，记住你有多少次得到了天赐良机却没有好好利用。最终你得明白那个将你包含在内的宇宙究竟是什么，那个将你流逝的生命包含在内的宇宙由谁来掌管，你在人间的时数有限，假使你不用这段时间来清除你头脑中的疑团，它就会流逝，而你也要逝去，时间一去不返。

Every moment think steadily as a Roman and a man to do what

thou hast in hand with perfect and simple dignity, and feeling of affection, and freedom, and justice; and to give thyself relief from all other thoughts. And thou wilt give thyself relief, if thou doest every act of thy life as if it were the last, laying aside all carelessness and passionate aversion from the commands of reason, and all hypocrisy, and self-love, and discontent with the portion which has been given to thee. Thou seest how few the things are, the which if a man lays hold of, he is able to live a life which flows in quiet, and is like the existence of the gods; for the gods on their part will require nothing more from him who observes these things.

每时每刻都要像罗马人那样不断地思考，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由衷热爱的心情，自由开放的思想和公正无私的品格来做手头的事情；把自己从其他一切杂念中解脱出来。如果你把生活中每一件事，都当成是最后一件事来做，抛开疏忽大意、抛开对理性命令的过度偏离，以及虚伪、自恋和对命运分配给你的部分的不满，这样，你就会感到释然。你要知道，一个人只需要拥有很少的东西就能平静地度过一生，像神一般地生活；如果人们谨遵这些，神也不会要求他什么了。

Do wrong to thyself, do wrong to thyself, my soul; but thou wilt no longer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honouring thyself. Every man's life is sufficient. But thine is nearly finished, though thy soul reverences not itself, but places thy felicity in the souls of others.

你错待了自己，错待了自己，我的心灵；而你将不再有机会光耀自己。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足够的，然而你的生命已近尾声，但是你的心灵没有尊重自身，而是把幸福寄予他人的心灵。

Do the things external which fall upon thee distract thee? Give thyself time to learn something new and good, and cease to be whirled around. But then thou must also avoid being carried about the other way. For those too are triflers who have wearied themselves in life by their activity, and yet have no object to which to direct every movement, and, in a word, all their thoughts.

你遭遇的身外之事让你分心了吗？给自己时间去学习新鲜有用的知识吧，不要被外物引得团团转。但同时也要避免走另一个极端。因为那些整日疲于奔命的人也是在虚度光阴，全然不知道自己行动的目标，总之，他们的思想漫无目的。

Through not observing what is in the mind of another a man has seldom been seen to be unhappy; but those who do not observe the movements of their own minds must of necessity be unhappy.

一个人不理会他人的想法，很少会不快乐；但如果不理会自己的思想，必然会不快乐。

This thou must always bear in mind,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whole, and what is my nature, and how this is related to that, and what kind of a part it is of what kind of a whole; and that there is no one who hinders thee from always doing and saying the things which are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which thou art a part.

这一点你必须牢记在心，何为整体的本性，何为我的本性，二者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如

果你说或者做合乎本性（你是其中的一部分）的事，那么没人会阻止你。

Theophrastus, in his comparison of bad acts—such a comparison as one would mak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mon notions of mankind—says, like a true philosopher, that the offences which are committed through desire are more blamable than those which are committed through anger. For he who is excited by anger seems to turn away from reason with a certain pain and unconscious contraction; but he who offends through desire, being overpowered by pleasure, seems to be in a manner more intemperate and more womanish in his offences. Rightly then, and in a way worthy of philosophy, he said that the offence which is committed with pleasure is more blamable than that which is committed with pain; and on the whole the one is more like a person who has been first wronged and through pain is compelled to be angry; but the other is moved by his own impulse to do wrong, being carried toward doing something by desire.

特奥夫拉斯图斯在他对恶行的比较中——这是根据人类共同观念所作的比较——就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出于欲望的冒犯与出于愤怒的冒犯相比，前者更应受到指责。因为由于愤怒而激动的人之所以会背离理性，是因为一种痛苦和无意识的于心不安而失去了理智；而出于欲望而冒犯他人的人，是被快感所控制，他的冒犯似乎更放纵、更懦弱。同理，他又富于哲学意味地说：因快感而冒犯他人与因痛苦而冒犯他人相比，前者更应受到指责。整体而言，后者更像是错待在先，由于痛苦而愤怒；而前者则是由于自己的冲动而冒犯他人，被欲望所牵引而做下错事。

Since it is possible that thou mayest depart from life this very moment, regulate every act and thought accordingly. But to go away from among men, if there are gods, is not a thing to be afraid of, for the gods will not involve thee in evil; but if indeed they do not exist, or if they have no concern about human affairs, what is it to me to live in a universe devoid of gods or devoid of providence? But in truth they do exist, and they do care for human things, and they have put all the means in man's power to enable him not to fall into real evils. And as to the rest, if there was anything evil, they would have provided for this also, that it should be altogether in a man's power not to fall into it. Now, that which does not make a man worse, how can it make a man's life worse? But neither through ignorance, nor having the knowledge, but not the power to guard against or correct these things, is it possible tha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has overlooked them; nor is it possible that it has made so great a mistake, either through want of power or want of skill, that good and evil should happen indiscriminately to the good and the bad. But death certainly, and life, honour and dishonour, pain and pleasure, all these things equally happen to good men and bad, being things which make us neither better nor worse. Therefore they are neither good nor evil.

既然生命有可能随时会离你而去，那么就要把该做的做好，该想的想好。假使有神灵，离开世人又有什么好惧怕的呢？因为神灵不会把你卷入邪恶；如果神灵确实不存在，或者他们对人间之事并不关心，那么活在一个没有神灵和天道的宇宙中于我又有何意义呢？而事实上他们确实存在，并且关心人间之事，他们尽其所能给人类以力量，使得人类免于坠入真正的邪恶。至于其他，如果真有什么邪恶，神灵也会给予人类力量，使得他们完全有能力免于邪恶。使自己不至于陷入邪恶完全是在人类的能力范围之内。这样，不会使人变坏的东西，怎么会使人的生活变坏呢？宇宙本性不会因为无知，或者有知，

或者没有能力预防或纠正这些事情而产生疏忽；也不是因为缺乏力量或技巧而造成如此大错，以至于善报和恶报都毫无分别地落在好人和坏人身上。但肯定的是，死亡与生存，荣耀与耻辱，痛苦和快乐，所有这些都同样地发生在好人和坏人身上，它们不能使我们变好或变坏。因而这些事物没有善恶之分。

How quickly all these things disappear, in the universe the bodies themselves, but in time the remembrance of them; what is the nature of all sensible things, and particularly those which attract with the bait of pleasure or terrify by pain, or are noised about by vapoury fame; how worthless, and contemptible, and sordid, and perishable, and dead they are—all this it is the part of the intellectual faculty to observe. To observe, too, who these are whose opinions and voices give reputation; what death is, and the fact that, if a man looks at it in itself, and by the abstractive power of reflection resolves into their parts all the things which present themselves to the imagination in it, he will then consider it to be nothing else than an operation of nature; and if any one is afraid of an operation of nature he is a child. This, however, is not only an operation of nature, but it is also a thing which conduces to the purposes of nature. To observe, too, how man comes near to the Deity, and by what part of him, and when this part of man is so disposed.

宇宙中的形体，以及时光中对形体的记忆，这一切消逝得多么快。一切有感觉的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尤其是那些用快感来诱惑我们，用痛苦来恐吓我们，用虚名来使我们声名远播的事物。它们是多么没有价值、可鄙、肮脏、易朽和呆滞，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运用理智来体察。同时还要观察那些靠着高谈阔论博得声誉的人。死亡是什么？如果探究一下死亡，运用我们抽象思考的力量仔细分析所有事物

在我们的想象中所呈现的各个部分，就会觉得这不过是自然的一个运作而已。如果有谁害怕自然的运作，那么他还是个孩童。然而，死亡不仅是自然的运作，也有益于自然达到其目的。还须知道，人如何与神祇接触，用身体的哪一部分、何时运用这一部分才能与神接近。

Nothing is more wretched than a man who traverses everything in a round, and pries into things beneath the earth, as the poet says, and seeks by conjecture what is in the minds of his neighbours, without perceiving that it is sufficient to attend to the daemon within him, and to reverence it sincerely. And reverence of the daemon consists in keeping it pure from passion and thoughtlessness,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what comes from gods and men. For the things from the gods merit veneration for their excellence; and the things from men should be dear to us by reason of kinship; and sometimes even, in a manner, they move our pity by reason of men's ignorance of good and bad; this defect being not less than that which deprives us of the power of distinguishing things that are white and black.

世上最可怜的莫过于这种人，他凡事都要过问，如诗人所说，连地底下的东西都要刨出来研究，甚至邻居心里在想什么也要猜度，却不明白，他所要做的，只需关照和敬畏内心的神明。虔诚地敬畏神明包括要避免狂热和轻率，不要对神灵所赐和他人给予表示不满。因为神灵所赐必是无上佳品，值得我们去尊重；他人给予是同胞亲情的表现，值得我们去珍惜；有时候，甚至于某种方式上，人们值得我们同情，因为他们不辨善恶；这是和黑白不分一样严重的缺陷。

Though thou shouldest be going to live three thousand years, and as many times ten thousand years, still remember that no man

loses any other life than this which he now lives, nor lives any other than this which he now loses. The longest and shortest are thus brought to the same. For the present is the same to all, though that which perishes is not the same: and so that which is lost appears to be a mere moment. For a man cannot lose either the past or the future: for what a man has not, how can any one take this from him? These two things then thou must bear in mind: the one, that all things from eternity are of like forms and come round in a circle, and that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ether a man shall see the same things during a hundred years or two hundred, or an infinite time; and the second, that the longest liver and he who will die soonest lose just the same. For the present is the only thing of which a man can be deprived, if it is true that this is the only thing which he has, and that a man cannot lose a thing if he has it not.

尽管你的生命可以延续三千年，甚至长达数万年，仍然要记住人失去的就是自己正在过的生活，而不是别的生活；人所过的就是现在失去的生活，而不是别的生活。这样，最长的生命和最短的生命就变得一样了。现在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尽管失去的并不相同；所以看来我们失去的只是片刻而已。因为一个人不会失去过去或未来：一个人没有的东西，其他人又怎能夺走呢？这两点你必须牢记心头：第一，一切来自永恒的东西犹如形式都像圆圈一样周而复始，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说，在一百年或两百年，甚至无限的时间内，是不是看到一样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区别；第二，寿命最长者和濒临死亡之人所失去的是一样的。因为人唯一可以被剥夺的只有现在——假如这真的是人唯一拥有的东西，那么一个人所没有的东西，也不可能失去。

Remember that all is opinion. For what was said by the Cynic Monimus is manifest: and manifest too is the use of what was said, if a man receives what may be got out of it as far as it is true.

记住，一切都是意见。犬儒派的莫尼穆斯说的话意义是很明显的，这些话的用处也是显然的，只要人能在这真实的话中汲取其精华。

The soul of man does violence to itself, first of all, when it becomes as abscess and, as it were, a tumour on the universe, so far as it can. For to be vexed at anything which happens is a separation of ourselves from nature, in some part of which the natures of all other things are contained. In the next place, the soul does violence to itself when it turns away from any man, or even moves towards him with the intention of injuring, such as are the souls of those who are angry. In the third place, the soul does violence to itself when it is overpowered by pleasure or by pain. Fourthly, when it plays a part, and does or says anything insincerely and untruly. Fifthly, when it allows any act of its own and any movement to be without an aim, and does anything thoughtlessly and without considering what it is, being right that even the smallest things be done with reference to an end; and the end of rational animals is to follow the reason and the law of the most ancient city and polity.

人的灵魂之所以摧残自身，是因为它尽力将自己的心灵变成了宇宙的赘瘤。对发生之事感到烦恼，便是使自己与本性相分离，其他一切事物的本性不过是这本性的一部分而已。其次，灵魂的自我摧残见于疏离他人，或甚至带着加害于人的念头接近他人时，那些怒火中烧的人的灵魂往往如此。其三，灵魂的自我摧残见于被快感或痛苦控制的时候。其四，灵魂的自我摧残见于在承担某个角色，说话做事缺乏真心实意之时。其五，还见于允许自己的行为与行动漫无目的，做事掉以轻心不经思考的时候，因为正确的做法是，即使做最微小的事情也要考虑结果；理性动物的目的，就是要遵循理性，遵循最古老城

市、政体的法律。

Of human life the time is a point, and the substance is in a flux, and the perception dull,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whole body subject to putrefaction, and the soul of a whirl, and fortune hard to divine, and fame a thing devoid of judgment. And, to say all in a word, everything which belongs to the body is a stream, and what belongs to the soul is a dream and vapour, and life is a warfare and a stranger's sojourn, and after-fame is oblivion. What, then, is that which is able to conduct a man? One thing, and only one—philosophy. But this consists in keeping the daemon within a man free from violence and unharmed, superior to pains and pleasures, doing nothing without a purpose, nor yet falsely and with hypocrisy, not feeling the need of another man's doing or not doing anything; and besides, accepting all that happens, and all that is allotted, as coming from thence, wherever it is, from whence he himself came; and, finally, waiting for death with a cheerful mind, as being nothing else than a dissolution of the elements of which every living being is compounded. But if there is no harm to the elements themselves in each continually changing into another, why should a man have any apprehension about the change and dissolution of all the elements? For it is according to nature, and nothing is evil which is according to nature.

在人的生命中，时间只是一个点，物质在变动之中，知觉是迟钝的，身体躯干会腐烂，灵魂是一个漩涡，命运不可预测，名誉并非源于明断。一言以概之，属于身体的一切都是一条河流，属于灵魂的是梦幻、是雾气，生命是一场战斗，是过客的短暂逗留，身后之名终将成为过眼云烟。那么，什么可以指引人的行为呢？有且只有一种东西，那便是哲学。这包括保持人内心的神明，使其免受摧残和损害，

超脱痛苦和快感，做事不要漫无目标或者虚情假意，不感到需要他人做或不做任何事情；除此之外，接受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所有分配的事情，不管它们来自何处，就当它们是从那里、从它们的本源来的；最后，要以愉快的心情等待死亡，把它当作不过是构成一切生命的元素在分解。如果一种事物的元素不断变化成另外一种事物，而本身没有什么害处，那么人为什么要害怕所有这些元素的变化与分解呢？因为死是合乎自然的，合乎自然的事物都不是恶。

This in Carnuntum.

作于卡农图姆。

Book Three

卷三

We ought to consider not only that our life is daily wasting away and a smaller part of it is left, but another thing also must be taken into the account, that if a man should live longer it is quite uncertain whether the understanding will still continue sufficient for the comprehension of things, and retain the power of contemplation which strives to acquire the knowledge of the divine and the human. For if he shall begin to fall into dotage, perspiration and nutrition and imagination and appetite, and whatever else there is of the kind, will not fail; but the power of making use of ourselves, and filling up the measure of our duty, and clearly separating all appearances, and considering whether a man should now depart from life, and whatever else of the kind absolutely requires a disciplined reason, all this is already extinguished. We must make haste then, not only because we are daily nearer to death, but also because the conception of thing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m cease first.

我们不应只是考虑我们的生命在一天天耗费，所剩时日越来越少，还要考虑另外一件事情——假如人能活得更长久，我们并不能确定理解力是否仍然能继续足以明白事物，还能否保持努力获得对神和人的认识的思考能力。因为如果一个人老之将至，汗腺分泌、营养吸收、想象力以及食欲之类的身体机能是不会丧失的；然而挖掘自身潜力的能力、忠实履行职责的能力、清晰地分辨一切表象的能力、对生命何时终结的判断能力，以及此类任何别的能力绝对需要训练有素的理性，而这理性全都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不仅仅是

因为我们每日都在接近死亡，而且是因为我们对事物的概念和理解会先一步消亡。

We ought to observe also that even the things which follow after the things which are produced according to nature contain something pleasing and attractive. For instance, when bread is baked some parts are split at the surface, and these parts which thus open, and have a certain fashion contrary to the purpose of the baker's art, are beautiful in a manner, and in a peculiar way excite a desire for eating. And again, figs, when they are quite ripe, gape open, and in the ripe olives the very circumstance of their being near to rottenness adds a peculiar beauty to the fruit. And the ears of corn bending down, and the lion's eyebrows, and the foam which flows from the mouth of wild boars, and many other things—though they are far from being beautiful, if a man should examine them severally—still, because they are consequent upon the things which are formed by nature, help to adorn them, and they please the mind; so that if a man should have a feeling and deeper insight with respect to the things which are produced in the universe, there is hardly one of those which follow by way of consequence which will not seem to him to be in a manner disposed so as to give pleasure. And so he will see even the real gaping jaws of wild beasts with no less pleasure than those which painters and sculptors show by imitation; and in an old woman and an old man he will be able to see a certain maturity and comeliness; and the attractive loveliness of young persons he will be able to look on with chaste eyes; and many such things will present themselves, not pleasing to every man, but to him only who has become truly familiar with nature and her works.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甚至那些合乎自然而产生的事物所附带而来的东西也有种美妙迷人的魅力。比如，面包烤好之后，表皮某些地方会裂开，这些裂开的部分某种程度上违背了面包师的目的，然而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美的，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激起食欲。再如无花果，当它们熟透的时候也会开裂，成熟的橄榄接近腐烂的样子给果实增加了一种独特的美。还有低垂的麦穗、狮子的眉头、野猪嘴边流出的泡沫，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如果单独对他们进行观察，它们远远谈不上美，不过由于它们是自然形成的事物所附带的结果，所以还是有助于修饰这些事物，使人心情愉悦。所以，如果一个人对宇宙产生的事物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则在他看来那些附带而来的每一个事物也几乎都是以一种给人带来愉悦的方式来安排的。所以，他看真实的野兽张着大嘴，并不比看画家、雕塑家模仿的作品所得到的乐趣要少；在年长的女人和男人身上，他能看到一种成熟和妥帖；他能以纯洁的目光看到年轻人的迷人可爱之处；有很多此类的事物，它们不见得能使每个人愉悦，只是对于那些真正熟悉自然及其作品的人来说却是愉悦的。

Hippocrates after curing many diseases himself fell sick and died. The Chaldaei foretold the deaths of many, and then fate caught them too. Alexander, and Pompeius, and Caius Caesar, after so often completely destroying whole cities, and in battle cutting to pieces many ten thousands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themselves too at last departed from life. Heraclitus, after so many speculations on the conflagration of the universe, was filled with water internally and died smeared all over with mud. And lice destroyed Democritus; and other lice killed Socrates. What means all this? Thou hast embarked, thou hast made the voyage, thou art come to shore; get out. If indeed to another life, there is no want of gods, not even there. But it to a state without sensation, thou wilt cease to be held by pains and pleasures, and to be a slave to the vessel which is as much inferior as that which serves it is superior; for the one is intelligence and deity; the other is earth and corruption.

希波克拉底在治愈了许多人的疾病之后自己却生病而死。星相家曾预言很多人的死亡，而后命运也把他们带走了。亚历山大、庞培与恺撒多次彻底毁灭一座座城池，在战斗中斩杀数万骑兵步兵之后，但最后也还是离开了人世。赫拉克利特在多次推测宇宙因一场大火而消亡之后，他死时体内积满了水，浑身满是烂泥。虱子毁了德谟克利特；别的虱子害死了苏格拉底。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你已登船，你已起航，你已靠岸；登陆吧。如果的确是去往另一个生命，那里不缺神灵，根本就不缺。然而如果是去往一个没有知觉的境地，你就不再为痛苦和快乐所困，不再是肉体的奴仆，肉体有多低贱，它所侍奉的对象就有多优越；因为一个是理智和神性；而另一个是泥土和腐朽。

Do not waste the remainder of thy life in thoughts about others, when thou dost not refer thy thoughts to some object of common utility. For thou losest the opportunity of doing something else when thou hast such thoughts as these, What is such a person doing, and why, and what is he saying, and what is he thinking of, and what is he contriving, and whatever else of the kind makes us wander away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our own ruling power. We ought then to check in the series of our thoughts everything that is without a purpose and useless, but most of all the overcurious feeling and the malignant; and a man should use himself to think of those things only about which if one should suddenly ask, What hast thou now in thy thoughts? with perfect openness thou mightest immediately answer, This or That; so that from thy words it should be plain that everything in thee is simple and benevolent, and such as befits a social animal, one that cares not for thoughts about pleasure or sensual enjoyments at all, nor has any rivalry or envy and suspicion, or anything else for which thou wouldst blush if thou shouldst say that thou hadst it in thy mind. For the man who is such and no longer delays being among the number of the best, is like a

priest and minister of the gods, using too the deity which is planted within him, which makes the man uncontaminated by pleasure, unharmed by any pain, untouched by any insult, feeling no wrong, a fighter in the noblest fight, one who cannot be overpowered by any passion, dyed deep with justice, accepting with all his soul everything which happens and is assigned to him as his portion; and not often, nor yet without great necessity and for the general interest, imagining what another says, or does, or thinks. For it is only what belongs to himself that he makes the matter for his activity; and he constantly thinks of that which is allotted to himself out of the sum total of things, and he makes his own act fair, and he is persuaded that his own portion is good. For the lot which is assigned to each man is carried along with him and carries him along with it. And he remembers also that every rational animal is his kinsman, and that to care for all men is according to man's nature; and a man should hold on to the opinion not of all but of those only who confessedly live according to nature. But as to those who live not so, he always bears in mind what kind of men they are both at home and from home, both by night and by day, and what they are, and with what men they live an impure life. Accordingly, he does not value at all the praise which comes from such men, since they are not even satisfied with themselves.

当你没有把思想指向共同福祉的某个目标，就不要把余生浪费在揣测别人的事情上。因为当你有这样的思想时，你就失去了做其他事情的机会。这个人在做什么，为什么做，他在说什么，想什么，谋划什么——诸如此类的想法使我们注意力分散，不再注意我们自己的支配能力。所以我们应该抑制自己一连串的思想中一切没有目标、没有用处的东西，但更为重要的是抑制过于好奇和邪恶的念头。一个人想的应该仅仅是这样的东西，那就是，如果有人突然问起："你在想什么？"你能立即完全坦诚地回答："是这个或那个"；从你的话中，能明

显地看出你心中一切都是单纯和仁爱的，就像一个社会动物的所为，是一个完全不在乎享受和感官快乐的人，没有任何敌意、妒忌和猜疑，或是任何别的你说出来会脸红的东西。因为像这样一个毫不拖延立刻回答的人属于最好的人的行列，就像神灵的祭司，他也运用根植于他内心的神性，这使他不会被快感腐蚀，不会被痛苦伤害，不会被羞辱烦扰，也不会感受任何恶的东西，是最高贵战斗中的斗士，他不被激情所控制，有着很强的正义感，全心全意接受发生的一切和命运分配给他的那一部分；如无大必要，如果不是为了公众利益，他很少去揣摩其他人说什么，做什么或想什么。因为他只是基于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来制定、安排他的活动；他总是想着从总体事物分配给自己的那一部分，他使自己的行为公正，他使自己相信自己的那一部分是好的。因为分配给每一个人的命运是与他相伴而来的，并且影响着他的一生。他知道，每个理性动物都是他的同类，关爱众生符合人类本性；一个人不能听从所有人的意见，而只是听从那些明白地依照本性生活的人的意见。然而对于那些不是这样生活的人，他会在心里记着，他们在家如何，离家怎样，白天如何，晚上怎样，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和什么人一起过着一种非纯洁的生活。因此，他完全不会看重这样的人给出的赞美，因为他们甚至对自身都不满足。

Labour not unwillingly, nor without regard to the common interest, nor without due consideration, nor with distraction; nor let studied ornament set off thy thoughts, and be not either a man of many words, or busy about too many things. And further, let the deity which is in thee be the guardian of a living being, manly and of ripe age, and engaged in matter political, and a Roman, and a ruler, who has taken his post like a man waiting for the signal which summons him from life, and ready to go, having need neither of oath nor of any man's testimony. Be cheerful also, and seek not external help nor the tranquility which others give. A man then must stand erect, not be kept erect by others.

不要不情愿地工作，不要无视公众的利益，也不要不加相应的考虑，不要分心；不要用精心的装饰衬托你的思想，不要做一个话多的人，也不要忙于太多事情。而且，让你内心的神明守护这样一个有生命的存在：有男子气，年龄成熟，从事政治，一个罗马人，一位统治者，等待生命召唤的信号，去接受岗位，履职尽责，无需誓言，也不用别人的证言。也要保持愉悦，不寻求外部的帮助，也不需要他人给予的安宁。这样的个人一定会昂首站立，而不是靠他人保持直立。

If thou findest in human life anything better than justice, truth, temperance, fortitude, and, in a word, anything better than thy own mind's self-satisfaction in the things which it enables thee to do according to right reason, and in the condition that is assigned to thee without thy own choice; if, I say, thou seest anything better than this, turn to it with all thy soul, and enjoy that which thou hast found to be the best. But if nothing appears to be better than the deity which is planted in thee, which has subjected to itself all thy appetites, and carefully examines all the impressions, and, as Socrates said, has detached itself from the persuasions of sense, and has submitted itself to the gods, and cares for mankind; if thou findest everything else smaller and of less value than this, give place to nothing else, for if thou dost once diverge and incline to it, thou wilt no longer without distraction be able to give the preference to that good thing which is thy proper possession and thy own; for it is not right that anything of any other kind, such as praise from the many, or power, or enjoyment of pleasure, should come into competition with that which is rationally and politically or, practically good. All these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may seem to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better things in a small degree, obtain the superiority all at once, and carry us away. But do thou, I say, simply and freely choose the better, and hold to it.—But that which is useful is the better.—Well then, if it is only useful to thee as a

rational being, keep to it; but if it is only useful to thee as an animal, say so, and maintain thy judgment without arrogance; only take care that thou makest the inquiry by a sure method.

如果你发现人生有什么比正义、真理、节制、坚韧更好的东西，或者说，超过使你能按照理性行事的那种内心对事物的自我满足，并且符合分配于你而非自我选择的条件；我是说，如果你看见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那么就全心全意地迎向它，享受你所发现的最好的东西。假如没有什么好过你内心的神性，这种神性能使你克制欲望，仔细检查各种表象，如苏格拉底所说，已经能抵制感官的诱惑，顺从神明，关爱人类；如果你发现其他一切都比这渺小，没那么有价值，就不要让它们占据你的内心。因为你一旦分心或是倾向于它，你就不能专心致志地致力于那些善的事物，而这些才是适合并属于你的东西。因为让任何别的东西，比如众人的赞美、权力、纵乐来和理性、政治或实践方面善的事物相竞争，都是不正确的。所有这些东西，尽管它们看来可能会在小小的程度上调整自己以适应更好的事物，但它们会很快占据优势，使我们失去自制力。因此我说，你只要简单自由地选择更好的，并且坚持就行。有人会说，有用的是更好的，那么好，如果它对作为理性存在的你是有用的，就坚持它；然而如果它对作为动物的你有用，那么就拒绝它，不要自傲地坚持你的判断力；只是要注意，要用确切的方法进行探究。

Never value anything as profitable to thyself which shall compel thee to break thy promise, to lose thy self-respect, to hate any man, to suspect, to curse, to act the hypocrite, to desire anything which needs walls and curtains: for he who has preferred to everything else his own intelligence and daemon and the worship of its excellence, acts no tragic part, does not groan, will not need either solitude or much company; and, what is chief of all, he will live without either pursuing or flying from death; but whether for a

longer or a shorter time he shall have the soul inclosed in the body, he cares not at all; for even if he must depart immediately, he will go as readily as if he were going to do anything else which can be done with decency and order; taking care of this only all through life, that his thoughts turn not away from anything which belongs to an intelligent animal and a member of a civil community.

不要把这样的东西看成是对你有益的：那些让你失守承诺、失去自尊、憎恨他人、多疑、诅咒、虚伪、渴望见不得人的东西，因为一个把自己的智慧和神明看得比其他都重，并崇拜其卓越性的人，不会成为悲剧人物，不会痛苦呻吟，既不需要独处也不需要经常陪伴；更主要的是，他不求死也不怕死；他毫不在意灵魂在躯体里驻留时间的长短；因为即使他现在必须马上离开人世，他也会很乐意，并且像是做其他任何事那样得体、有序地完成；他一生只照管好一件事，那就是思想不要偏离属于理性的人和一个社会团体成员的一切。

In the mind of one who is chastened and purified thou will find no corrupt matter, not impurity, nor any sore skinned over. Nor is his life incomplete when fate overtakes him, as one may say of an actor who leaves the stage before ending and finishing the play. Besides, there is in him nothing servile, nor affected, nor too closely bound to other things, nor yet detached from other things, nothing worthy of blame, nothing which seeks a hiding-place.

人心经过净化和洗礼，你就看不到腐化、肮脏，也没有任何愈合的伤口。当命运突然把他掳走，就像人们所说的演员没有结束表演就离开了舞台一样，他的生命也不会因此不完整。此外，他身上没有一点奴性、矫情，不过于紧紧受缚于其他事物，也不与其他事物分离，没有什么可以指责，也没有什么无需逃避。

Reverence the faculty which produces opinion. On this faculty it entirely depends whether there shall exist in thy ruling part any opinion inconsistent with natur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ational animal. And this faculty promises freedom from hasty judgment, and friendship towards men, and obedience to the gods.

尊重形成意见的能力。在你支配的部分中是否有与理性动物本性和法则不一致的意见，完全取决于这一能力。这一能力使你免于匆忙决断，使你对人友善，对神敬伏。

Throwing away then all things, hold to these only which are few; and besides bear in mind that every man lives only this present time, which is an indivisible point, and that all the rest of his life is either past or it is uncertain. Short then is the time which every man lives, and small the nook of the earth where he lives; and short too the longest posthumous fame, and even this only continued by a succession of poor human beings, who will very soon die, and who know not even themselves, much less him who died long ago.

那么抛开一切，只把握这少数的事物吧；此外要记住，每个人只能活在现在，一个不可分割的点，而他生命的剩余部分不是成为过去就是无法确定。每个人生存的时间太短暂，他所居住的地方也不过是一片小小的土地；人们死后哪怕再长久的名声其实也是短暂的，而甚至这也要靠可怜的人们数代相传。这些人很快也要死去，他们甚至连自己都不了解，又何谈了解那些早已作古的人呢？

To the aids which have been mentioned let this one still be

added:— Make for thyself a definition or description of the thing which is presented to thee, so as to see distinctly what kind of a thing it is in its substance, in its nudity, in its complete entirety, and tell thyself its proper name, and the names of the things of which it has been compounded, and into which it will be resolved. For nothing is so productive of elevation of mind as to be able to examine methodically and truly every object which is presented to thee in life, and always to look at things so as to see at the same time what kind of universe this is, and what kind of use everything performs in it, and what value everything has with reference to the whole, and what with reference to man, who is a citizen of the highest city, of which all other cities are like families; what each thing is, and of what it is composed, and how long it is the nature of this thing to endure which now makes an impression on me, and what virtue I have need of with respect to it, such as gentleness, manliness, truth, fidelity, simplicity, contentment, and the rest. Wherefore, on every occasion a man should say: This comes from God; and this is according to the apportionment and spinning of the thread of destiny, and suchlike coincidence and chance; and this is from one of the same stock and a kinsman and partner, one who knows not however what is according to his nature. But I know; for this reason I behave towards him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law of fellowship with benevolence and justice.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n things indifferent I attempt to ascertain the value of each.

为加强上述箴言，再加上这一条——给呈现于你的事物下个定义或是做个描述，以便从它的实体、它的袒露、它的全部来看清它是什么，然后告诉你自己它恰当的名称，构成它的物质的名称，将来要分解成的事物的名称。最富有创造力的莫过于提升内在心灵，因为它会真是而有条理地检查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件事物，观察它们以便同时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宇宙，每样事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每样

东西对于整体而言价值是什么，对于人而言又是什么，人是这最高城市中的公民，所有其他城市都像是家庭成员；每一事物是什么，它由什么构成，目前给我印象的东西能存在多久，我需要以何种美德对待它，比如谦和、勇敢、真实、忠诚、单纯、知足等等。因此，不论何种情况下人都应该说：这来自神；这是按照命运之线的分配和纺织，或者类似的机缘巧合安排的；这是来自同族、亲人、伙伴，然而却不知道其本性的人。但是我知道；因此我要按照同伴关系的自然法则和善公正地对待他们。同时，对于我漠不关心的事物，我要试着确定每一个的价值。

If thou workest at that which is before thee, following right reason seriously, vigorously, calmly, without allowing anything else to distract thee, but keeping thy divine part pure, as if thou shouldst be bound to give it back immediately; if thou holdest to this, expecting nothing, fearing nothing, but satisfied with thy present activity according to nature, and with heroic truth in every word and sound which thou utterest, thou wilt live happy. And there is no man who is able to prevent this.

如果在做眼前的事，你需要认真、积极、从容地遵从正确的理性，不要让任何别的东西干扰你，保持你神性的纯洁，就好像你立刻就要把它奉还一样；如果你坚持这一点，无所希求，无所畏惧，只是依据本性满足于你现在从事的活动，满足于你说出的每个词、发出的每个音节中具有英雄气概般的真实，你就会过得快乐。没有人能阻止这一点。

As physicians have always their instruments and knives ready for cases which suddenly require their skill, so do thou have principles ready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ngs divine and human,

and doing everything, even the smallest, with a recollection of the bond which unites the divine and human to one another. For neither wilt thou do anything well which pertains to man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having a reference to things divine; nor the contrary.

如同医生总是随时备好工具和手术刀，以防突然出现需要他们技艺的情况，你也需要备有一些准则来领悟神和人的事物，还有，人在做每一件事情，哪怕是最小的事情，也要认清神人之间的联系。因为你在做有关人的事情的同时不去参考神的事物，你什么事也做不好，反之亦然。

No longer wander at hazard; for neither wilt thou read thy own memoirs, nor the acts of the ancient Romans and Hellenes, and the selections from books which thou wastreserving for thy old age. Hasten then to the end which thou hast before thee, and, throwing away idle hopes, come to thy own aid, if thou carest at all for thyself, while it is in thy power.

不要再随意地游荡了；因为你既不会读自己的回忆录，也不会读古希腊罗马事迹，还有你留着老年阅读的书本节选。那么赶快朝你面前的目标奔去，如果你还珍惜自己，趁着还有能力之时，抛开一切虚妄的希望，救救自己吧。

They know not how many things are signified by the words stealing, sowing, buying, keeping quiet, seeing what ought to be done; for this is not effected by the eyes, but by another kind of vision.

他们不知道这些词语指出了多少意义：偷窃、播种、购买、保持沉默、发现该做的事情；因为这不是肉眼所能见，而是需要另一种视觉。

Body, soul, intelligence: to the body belong sensations, to the soul appetites, to the intelligence principles. To receive the impressions of forms by means of appearances belongs even to animals; to be pulled by the strings of desire belongs both to wild beasts and to men who have made themselves into women, and to a Phalaris and a Nero: and to have the intelligence that guides to the things which appear suitable belongs also to those who do not believe in the gods, and who betray their country, and do their impure deeds when they have shut the doors. If then everything else is common to all that I have mentioned, there remains that which is peculiar to the good man, to be pleased and content with what happens, and with the thread which is spun for him; and not to defile the divinity which is planted in his breast, nor disturb it by a crowd of images, but to preserve it tranquil, following it obediently as a god, neither saying anything contrary to the truth, nor doing anything contrary to justice. And if all men refuse to believe that he lives a simple, modest, and contented life, he is neither angry with any of them, nor does he deviate from the way which leads to the end of life, to which a man ought to come pure, tranquil, ready to depart, and without any compulsion perfectly reconciled to his lot.

身体、灵魂、理智：感觉属于身体，欲望属于灵魂，原则属于理智。通过表象获得形式的印象，这种能力甚至也为动物所拥有；受到欲望的牵引属于野兽和变为女性的男子，也属于法拉里斯和尼禄这样

的人：拥有指导看来合适的事物的理智也属于那些不信神灵的人、背叛国家的人、关起门来做坏事的人。那么，即使其他一切事情对于我提到的所有人来说都是共通的，还有一样专属于好人所有：愉悦和满足于所发生之事和为他编织的命运之线；好人不会玷污植入他心中的神性，不用繁杂的意象干扰它，而会保持它的宁静平和，把它当作神一样顺从地跟随，不说违背真理的话，不做有违正义之事。即使所有人都不相信他过的是一种简单、朴素、满足的生活，他也不会和他们任何人生气，也不会偏离引向生命终点的路，一个人应该是纯洁而宁静地走这条路，随时准备离去，没有丝毫勉强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Book Four

卷四

That which rules within, when it is according to nature, is so affected with respect to the events which happen, that it always easily adapts itself to that which is possible and is presented to it. For it requires no definite material, but it moves towards its purpose,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however; and it makes a material for itself out of that which opposes it, as fire lays hold of what falls into it, by which a small light would have been extinguished: but when the fire is strong, it soon appropriates to itself the matter which is heaped on it, and consumes it, and rises higher by means of this very material.

我们内心的主宰之物，依据其本性，会受到所发生的外在事件的影响，而且它总是易于自我调整，以适应那可能发生和展示给它的事物。它不需要什么特定的工具，而是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朝着自己的目标走去。它用与它对立的事物为自己创造工具，如同火焰吞噬落物一样。若是小火苗可能早就熄灭了。但当火势迅猛的时候，很快它就会蔓延到堆在它上面的东西，将它吞噬，并借助这工具让火焰蹿得更高。

Let no act be done without a purpose, nor otherwise than according to the perfect principles of art.

做事不能没有目标，也不要做不符合完美艺术准则的事情。

Men seek retreats for themselves, houses in the country, seashores, and mountains; and thou too art wont to desire such things very much. But this is altogether a mark of the most common sort of men, for it is in thy power whenever thou shalt choose to retire into thyself. For nowhere, either with more quiet or more freedom from trouble, does a man retire than into his own soul, particularly when he has within him such thoughts that by looking into them he is immediately in perfect tranquility; and I affirm that tranquility is nothing else than the good ordering of the mind. Constantly then give to thyself this retreat, and renew thyself; and let thy principles be brief and fundamental, which, as soon as thou shalt recur to them, will be sufficient to cleanse the soul completely, and to send thee back free from all discontent with the things to which thou returnest. For with what art thou discontented? With the badness of men? Recall to thy mind this conclusion, that rational animals exist for one another, and that to endure is a part of justice, and that men do wrong involuntarily; and consider how many already, after mutual enmity, suspicion, hatred, and fighting, have been stretched dead, reduced to ashes; and be quiet at last.—But perhaps thou art dissatisfied with that which is assigned to thee out of the universe. —Recall to thy recollection this alternative; either there is providence or atoms, fortuitous concurrence of things; or remember the arguments by which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world is a kind of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be quiet at last. —But perhaps corporeal things will still fasten upon thee. —Consider then further that the mind mingles not with the breath, whether moving gently or violently, when it has once drawn itself apart and discovered its own power, and think also of all that thou hast heard and assented to about pain and pleasure, and be quiet at last. —But perhaps the desire of the thing called fame will torment thee.—See how soon everything is forgotten, and look at the chaos

of infinite time on each side of the present, and the emptiness of applause, and the changeableness and want of judgment in those who pretend to give praise, and the narrowness of the space within which it is circumscribed, and be quiet at last. For the whole earth is a point, and how small a nook in it is this thy dwelling, and how few are there in it, and what kind of people are they who will praise thee. This then remains: Remember to retire into this little territory of thy own, and, above all, do not distract or strain thyself, but be free, and look at things as a man, as a human being, as a citizen, as a mortal. But among the things readiest to thy hand to which thou shalt turn, let there be these, which are two. One is that things do not touch the soul, for they are external and remain immovable; but our perturbations come only from the opinion which is within. The other is that all these things, which thou seest, change immediately and will no longer be; and constantly bear in mind how many of these changes thou hast already witnessed. The universe is transformation; life is opinion.

人们为自己寻找隐退的地方，乡间小舍、海边、山里。你也非常渴望这些吧。但这完全是最为普通的那一类人的标志，因为你随时可以退隐到你自己心里去。没有什么地方比隐退到自身的灵魂更安静、更远离纷扰，尤其是当他心里有一些想法，只要一想到这些想法，他就能立即获得彻底的安宁；我敢肯定，安宁不过是心灵的良好秩序。那么，不断地给自己这样的隐退，更新自己，让你的原则简明扼要，一旦拿来运用，就能足以完全清洁你的心灵，在你返回现实时消除了对事物的所有不满。你为什么不满？是因为人的恶吗？在心里好好想想这条结论：理性动物为彼此而存在，容忍是正义的一部分，人做错事情并非出于自愿；想想有多少人已经在相互为敌、相互猜疑、相互仇恨、相互争斗之后，都死去了，化为灰烬，最后无声无息了。你还有可能对宇宙分配给你的表示不满，想想这种选择：要么有神，要么有原子（物质偶然的会合）；或是想想这些论点，它证明了这世界是

一种政治团体，最终会使你平静。然而可能肉体方面的东西仍然会抓住你不放。那么进一步考虑：当心灵一旦使自己与肉体分开并发现了自身的力量，不管是轻微或是剧烈地活动，思想都不会与呼吸相混；也想想你听到的和同意的所有痛苦和快乐，最终你就平静了。然而对名声的渴望可能会折磨你。看看，一切是多么快地被人遗忘，看看过去和未来无尽时间的混沌，掌声的空洞，那些假装赞美之人的善变和对判断的缺乏，还有赞扬被限定的空间的狭隘，最终你就平静了。整个大地是一个点，你的住处是多么小的角落，其间的人有多么少，那些赞美你的人又是怎样的人。因此还是要注意这一点：要记住退回到你自己的方寸之地，更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分心或紧张，而是保持自由，在看待事物时要像一个男人、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凡人。你触手可及的东西无非就是以下的两种：一种是不触及灵魂的事物，它们是外在的，不动的，而我们的烦恼只源于内心的意见；另一样是你见到的这些东西，瞬间改变且消失不见。要时刻想着你已经见证过多少这种变化。宇宙即变化，生命即意见。

If our intellectual part is common, the reason also, in respect of which we are rational beings, is common: if this is so, common also is the reason which commands us 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 if this is so, there is a common law also; if this is so, we are fellow-citizens; if this is so, we are members of some political community; if this is so, the world is in a manner a state. For of what other common political community will any one say that the whole human race are members? And from thence, from this common political community comes also our very intellectual faculty and reasoning faculty and our capacity for law; or whence do they come? For as my earthly part is a portion given to me from certain earth, and that which is watery from another element, and that which is hot and fiery from some peculiar source (for nothing comes out of that which is nothing, as nothing also returns to nonexistence), so also the intellectual part comes from some source.

如果我们的理智部分是共有的，理性也是如此，就我们是理性生命而言，这也是共通的。如果是这样，指挥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的理性也是共通的；如果是这样，世界就有普遍的法则；如果是这样，我们都是同胞公民；如果是这样，我们都是某种政治团体的成员；如果是这样，世界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国家。有什么人会说整个人类是别的共同政治团体的成员呢？从此，我们从这个政治团体中获得了智力、推理和遵纪守法的能力。否则这些能力又从何而来呢？我身体中属土的部分来自于某种土地，水的部分来自于另一种元素，热和火的那部分也有某种特定的来源。没有什么来自虚无，如同没有什么会归为虚无，所以我们智力的部分也有某种来源。

Death is such as generation is, a mystery of nature; a composition out of the same elements, and a decomposition into the same; and altogether not a thing of which any man should be ashamed, for it is not contrary to the nature of a reasonable animal, and not contrary to the reason of our constitution.

死亡和生殖一样，是自然的奥秘：一个是同一元素的组合和分解。这都不是应该感到羞愧的事，因为它没有违背理性动物的本质，也没有违背人类结构之理。

It is natural that these things should be done by such persons, it is a matter of necessity; and if a man will not have it so, he will not allow the fig-tree to have juice. But by all means bear this in mind, that within a very short time both thou and he will be dead; and soon not even your names will be left behind.

自然，这样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这是必然的。如果不这样做，就如同不让无花果树产生汁液一样。无论如何要记住，你和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都会死去，甚至很快连名字都会被遗忘。

Take away thy opinion, and then there is taken away the complaint, “I have been harmed..” Take away the complaint, “I have been harmed,” and the harm is taken away.

抛却你的意见，那“我被伤害了”这样的抱怨就没有了。抛却“我被伤害了”这样的抱怨，伤害也就消失了。

That which does not make a man worse than he was, also does not make his life worse, nor does it harm him either from without or from within.

那些不让人变坏的东西，也不会让他的生活更糟糕，不会从内部或外部伤害他。

The nature of that which is universally useful has been compelled to do this.

那些有益于全人类的事物，它们的本质要求它们这样做。

Consider that everything which happens, happens justly, and if thou observest carefully, thou wilt find it to be so. I do not say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 continuity of the series of things, but with respect to what is just, and as if it were done by one who assigns to each thing its value. Observe then as thou hast begun; and whatever thou doest, do it in conjunction with this, the being good, and in the sense in which a man is properly understood to be good. Keep to this in every action.

想想凡发生之事皆为正当之事，如果你观察仔细，就会发现是这样的。我这么说不仅是考虑事物发展的延续性，也是考虑公正性，就像是一个给予万物存在价值的人所做的。既然你已开始，就要注意观察；不管做什么，都要参照为善这一点，你所做的事应该被人理解为是善意的。一举一动都要记住这一点。

Do not have such an opinion of things as he has who does thee wrong, or such as he wishes thee to have, but look at them as they are in truth.

不要像那些对你使坏的人那样看待事物，也不要像他期待的那样，而是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去看待它。

A man should always have these two rules in readiness; the one, to do only whatever the reason of the ruling and legislating faculty may suggest for the use of men; the other, to change thy opinion, if there is any one at hand who sets thee right and moves thee from any opinion. But this change of opinion must proceed only from a certain persuasion, as of what is just or of common advantage, and the like, not because it appears pleasant or brings reputation.

人应该时刻想着这两条规则：其一，只做主宰的理性和立法的能力建议的对人们有用的事；其二，如果有人纠正你，使你免于偏见，你应该改变你的意见。然而这种意见的变化必须来自一定的劝服，比如何为正义，何为对公益有利之事，诸如此类，而不是因为看来令人愉快或是能带来名誉。

Hast thou reason? I have. —Why then dost not thou use it? For if this does its own work, what else dost thou wish?

你有理性吗？我有。那为什么你不使用理性呢？是因为即使理性发挥作用，你却还有别的企求吗？

Thou hast existed as a part. Thou shalt disappear in that which produced thee; but rather thou shalt be received back into its seminal principle by transmutation.

你作为宇宙的一部分而存在。你终将消失在你产生的地方；更确切地说，在经历一番变化后又回归到生殖的原则。

Many grains of frankincense on the same altar: one falls before, another falls after; but it makes no difference.

香灰都落在同一祭坛上：一粒落得早，另一粒落得晚。但并无不同。

Within ten days thou wilt seem a god to those to whom thou art now a beast and an ape, if thou wilt return to thy principles and to worship of reason.

如果你能回归准则并尊崇理性，十天之内，那些现在把你看成野兽和猿猴的人，会视你若神灵。

Do not act as if thou wert going to live ten thousand years. Death hangs over thee. While thou livest, while it is in thy power, be good.

不要像自己可以活一万年那样行动。死神随时会降临。活着的时候，还有能力的时候，要好好行善。

How much trouble he avoids who does not look to see what his neighbour says or does or thinks, but only to what he does himself, that it may be just and pure; or, as Agathon says, look not round at the depraved morals of others, but run straight along the line without deviating from it.

不去管邻居说什么、做什么或想什么，只关注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正当而纯洁；或者，如阿加顿所说，不要去环顾周围别人道德的堕落，而是沿着路线直奔，不要偏离，这样的人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He who has a vehement desire for posthumous fame does not consider that every one of those who remember him will himself

also die very soon; then again also they who have succeeded them, until the whole remembrance shall have been extinguished as it is transmitted through men who foolishly admire and perish. But suppose that those who will remember are even immortal, and that the remembrance will be immortal, what then is this to thee? And I say not, what is it to the dead? but, what is it to the living? What is praise, except indeed so far as it has a certain utility? For thou now rejectest unseasonably the gift of nature, clinging to something else…

强烈渴望身后之名的人，没有想到那些记住他的人也会很快离开人世；然后他们的后人也会相继离去，直到所有的记忆都随着那些愚蠢的崇拜者的死去而湮灭。假设那些崇拜者可以永生，他们的记忆可以永存，这对你有什么意义呢？我不说这对死者的意义何在，但我想说这对生者的意义何在？赞誉，除了目前确有一定实用性，它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呢？因为你现在不合时宜地拒绝了自然的恩赐，却紧紧地拥抱别的东西……

Everything which is in any way beautiful is beautiful in itself, and terminates in itself, not having praise as part of itself. Neither worse then nor better is a thing made by being praised. I affirm this also of the things which are called beautiful by the vulgar; for example, material things and works of art. That which is really beautiful has no need of anything; not more than law, not more than truth, not more than benevolence or modesty. Which of these things is beautiful because it is praised, or spoiled by being blamed? Is such a thing as an emerald made worse than it was, if it is not praised? Or gold, ivory, purple, a lyre, a little knife, a flower, a shrub?

各方面都美的事物自身就是美的，无关其他，赞美并非其中一部分。事物不会因为赞美变得更糟或更好。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世俗所谓美的事物，比如物质方面的东西和艺术品。真正的美除了法则、真理、仁慈和谦逊，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有哪些因为赞誉而变美，哪些又因为指责而变坏呢？像翡翠或者金子、象牙、紫袍、竖琴、短剑、花朵和灌木这样的东西，若没有得到赞美，它会因此变坏吗？

If souls continue to exist, how does the air contain them from eternity? —But how does the earth contain the bodies of those who have been buried from time so remote? For as here the mutation of these bodies after a certain continuance, whatever it may be, and their dissolution make room for other dead bodies; so the souls which are removed into the air after subsisting for some time are transmuted and diffused, and assume a fiery nature by being received into the seminal intelligence of the universe, and in this way make room for the fresh souls which come to dwell there. And this is the answer which a man might give on the hypothesis of souls continuing to exist. But we must not only think of the number of bodies which are thus buried, but also of the number of animals which are daily eaten by us and the other animals. For what a number is consumed, and thus in a manner buried in the bodies of those who feed on them! And nevertheless this earth receives them by reason of the changes of these bodies into blood,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into the aerial or the fiery element. What is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ruth in this matter? The division into that which is material and that which is the cause of form, the formal.

如果灵魂继续存在，空气怎会永久地将它包容？而大地又如何容纳那些早已埋葬的尸体呢？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尸体腐化，不管怎

样，它们分解后为其他的死尸腾出空间。所以飘飞到空中之后的灵魂也一样，过了一段时间，它们就会变化、解体，通过融入宇宙的开创性的智慧而获得火的性质，让位于新来居住的灵魂。这就是提出灵魂不灭论的人可能给出的答案。但我们不能只考虑以这种方式埋葬的尸体的数量，还要考虑我们每天吃掉的动物以及其他动物吞食的动物数量。这消耗的数量是多么大，某种方式上它们就被埋葬在吞食者的身体里了！大地通过把尸体变成血，变成气，或变成火的元素接受它们。这件事体现了什么探求真理的方法呢？那便是把物质的和形式的分开。

Do not be whirled about, but in every movement have respect to justice, and on the occasion of every impression maintain the faculty of comprehension or understanding.

不要思绪混乱，一举一动都要合乎正义，对每一印象都要保持理解力。

Everything harmonizes with me which is harmonious to thee, O Universe. Nothing for me is too early nor too late, which is in due time for thee. Everything is fruit to me which thy seasons bring, O Nature: from thee are all things, in thee are all things, to thee all things return. The poet says, Dear city of Cecrops; and wilt not thou say, Dear city of Zeus?

啊，宇宙，凡与你和谐的东西，也与我和谐。凡对于你时间刚刚好的，于我也不会太早或太迟。啊，自然，你的季节所带给我的，都是果实：你带来了一切，你拥有一切，一切又回归于你。诗人说，亲爱的刻克洛普斯之城，你不是也要说，亲爱的宙斯之城？

Occupy thyself with few things, says the philosopher, if thou wouldst be tranquil.—But consider if it would not be better to say, Do what is necessary, and whatever the reason of the animal which is naturally social requires, and as it requires. For this brings not only the tranquility which comes from doing well, but also that which comes from doing few things. For the greatest part of what we say and do being unnecessary, if a man takes this away, he will have more leisure and less uneasiness. Accordingly on every occasion a man should ask himself, Is this one of the unnecessary things? Now a man should take away not only unnecessary acts but also unnecessary thoughts, for thus superfluous acts will not follow after.

哲人说，如果想要宁静，就少做事情。但是想一想这样说是否更好：做必要的事情，只做本性合群的动物的理性要求的事情，并且像其所要求的那样做。因为这不仅会带来做好事情的宁静，也会带来少做事情的宁静。我们所说所做的大部分都是没必要的，如果一个人不做不必要的事，他会多一些闲暇，少一些不适。所以，每做一件事情，人都要问问自己，这有没有必要做？不仅要取消不必要的行动，而且要去除不必要的想法，如此，多余的事就不会随之而来了。

Try how the life of the good man suits thee, the life of him who is satisfied with his portion out of the whole, and satisfied with his own just acts and benevolent disposition.

试着如何使好人的生活适合于你。在他的生活中，他满足于从整体得到的一部分，满足于自己的正当行为和仁爱品质。

Hast thou seen those things? Look also at these. Do not disturb thyself. Make thyself all simplicity. Does any one do wrong? It is to himself that he does the wrong. Has anything happened to thee? Well, out of the universe from the beginning everything which happens has been apportioned and spun out to thee. In a word, thy life is short. Thou must turn to profit the present by the aid of reason and justice. Be sober in thy relaxation.

你见过那些事情了吗？也要看看这些事情：不要自寻烦恼。要使自己完全单纯。有人对你行恶了吗？那只是他对自己行恶。你遭遇什么事情了吗？好，宇宙之中从一开始，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已为你分配、准备好了。一句话，人生苦短。你必须借助理性和正义，好好把握和利用现在。放松的时候要保持清醒。

Either it is a well arranged universe or a chaos huddled together, but still a universe. But can a certain order subsist in thee, and disorder in the All? And this, too, when all things are so separated and diffused and sympathetic.

这要么是一个安排有序的宇宙，要么是一个杂乱混沌的结合体，但仍然是一个宇宙。如果万物没有秩序，你心中能有秩序吗？同样，如果万物都独立而分离，但又和谐并存时，你的心中又怎能存有秩序呢？

A black character, a womanish character, a stubborn character, bestial, childish, animal, stupid, counterfeit, scurrilous, fraudulent, tyrannical.

一种凶恶的性格、一种懦弱的性格、一种顽固的性格、残忍的、幼稚的、兽性的、愚蠢的、虚伪的、诽谤的、奸诈的、残暴的。

If he is a stranger to the universe who does not know what is in it, no less is he a stranger who does not know what is going on in it. He is a runaway, who flies from social reason; he is blind, who shuts the eyes of the understanding; he is poor, who has need of another, and has not from himself all things which are useful for life. He is an abscess on the universe, who withdraws and separates himself from the reason of our common nature through being displeased with the things which happen, for the same nature produces this, and has produced thee too; he is a piece rent asunder from the state, who tears his own soul from that of reasonable animals, which is one.

不知宇宙中有何物的人，对于宇宙来说就是个陌生人；不知宇宙里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同样是个陌生人。逃避社会理性的人，是个逃亡者；观察事物却不去理解的人，是个瞎子；需要从别人身上而不是从自己身上获得对生活有用的东西的，是个可怜人。他是宇宙的赘物，因不满于发生之事而退避和脱离作为我们共同本性的理性，因为是同样的本性产生了现实，也产生了你。把自己的灵魂从那浑然一体的理性动物的灵魂中分离出来，就好像他是从国家裂出的一块碎片。

The one is a philosopher without a tunic, and the other without a book: here is another half naked: Bread I have not, he says, and I abide by reason. And I do not get the means of living out of my learning, and I abide by my reason.

一个是没有外衣的哲学家，另一个是没有书本的人；后一种人也是半裸的，他说：“我没有面包，但我遵循理性。我不靠我的学识谋生，我遵循我的理性。”

Love the art, poor as it may be, which thou hast learned, and be content with it; and pass through the rest of life like one who has intrusted to the gods with his whole soul all that he has, making thyself neither the tyrant nor the slave of any man.

爱你学到的技艺吧，尽管它可能卑微，要对它表示满足。要像一个全心把自己的所有托付给神灵的人那样去度过余生，既不施暴于人也不受人奴役。

Consider, for example, the times of Vespasian. Thou wilt see all these things, people marrying, bringing up children, sick, dying, warring, feasting, trafficking, cultivating the ground, flattering, obstinately arrogant, suspecting, plotting, wishing for some to die, grumbling about the present, loving, heaping up treasure, desiring consulship, kingly power. Well, then, that life of these people no longer exists at all. Again, remove to the times of Trajan. Again, all is the same. Their life, too, is gone. In like manner view also the other epochs of time and of whole nations, and see how many after great efforts soon fell and were resolved into the elements. But chiefly thou shouldst think of those whom thou hast thyself known distracting themselves about idle things, neglecting to do what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proper constitution, and to hold firmly to this and to be content with it. And herein it is necessary to remember that the attention given to everything has its proper value and proportion. For thus thou wilt not be dissatisfied, if thou

appliest thyself to smaller matters no further than is fit.

想想维斯佩申的时代。你会看到这一切：人们结婚、育儿、生病、死亡、打仗、欢宴、经商、耕种、奉承、自大、怀疑、阴谋、诅咒、抱怨、恋爱、聚财、渴求执政官和君王的权力。可是，最后他们的生活不复存在。再回想图拉真的时代。情况也是如此。斯人已逝。同样可以回想历史上其他时代、所有民族的情况，有多少人在做出巨大努力之后倒下了，分解为元素。你主要得想想你认识的那些分心于无聊的事情的人，他们忽略了要做合乎自身构成的事情，而且要坚持于此，满足于此。在此有必要记住：给予每一样东西的注意力都有其恰当的价值和比例。因为这样你就不会不满，只要你不过度地关注琐碎之事。

The words which were formerly familiar are now antiquated; so also the names of those who were famed of old, are now in a manner antiquated: Camillus, Caeso, Volesus, Leonnatus, and a little after also Scipio and Cato, then Augustus, then also Hadrian and Antoninus. For all things soon pass away and become a mere tale, and complete oblivion soon buries them. And I say this of those who have shone in a wondrous way. For the rest, as soon as they have breathed out their breath, they are gone, and no man speaks of them. And, to conclude the matter, what is even an eternal remembrance? A mere nothing. What, then, is that about which we ought to employ our serious pains? This one thing, thoughts just, and acts social, and words which never lie, and a disposition which gladly accepts all that happens, as necessary, as usual, as flowing from a principle and source of the same kind.

之前熟悉的词语现已被淘汰。同样，历史上名人的名字也可以说

是作废了：卡米勒斯、恺撒、沃勒塞斯、利奥纳图斯，还有稍后的西庇阿、加图，然后是奥古斯都，再后是哈德良和安东尼。一切都会很快消失，仅仅成为传说，很快被彻底遗忘。我说的这些人都是曾经大放异彩的人。至于其余的人，一旦他们呼出了最后一口气，他们就离去了，没有人提起他们。作为结论，永久的记忆是什么呢？不过是虚无。那么，什么是我们应该付出认真和努力的呢？只有一样：思想公正、行为合群、从不撒谎，培养这样一种性情，快乐地接受所发生之事，认为这是必然、正常的，来自同一原则和根源。

Willingly give thyself up to Clotho, one of the fates, allowing her to spin thy thread into whatever things she pleases.

心甘情愿把自己交给命运三女神之一的克洛索，让她把你的生命之线编织成她喜欢的任何东西。

Everything is only for a day, both that which remembers and that which is remembered.

一切都只能存在一天，记忆的人和被记忆的皆如此。

Observe constantly that all things take place by change, and accustom thyself to consider tha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loves nothing so much as to change the things which are and to make new things like them. For everything that exists is in a manner the seed of that which will be. But thou art thinking only of seeds which are cast into the earth or into a womb: but this is a very vulgar notion.

不断观察，所有事情都是由变化而产生，要习惯于这样想：宇宙本性就是喜欢改变现在的事物，并且制造类似于它们的新事物。因为一切现存之物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未来的种子。然而你只想到播种到土里的种子或是子宫里的种子，这是非常庸俗的观念。

Thou wilt soon die, and thou art not yet simple, not free from perturbations, nor without suspicion of being hurt by external things, nor kindly disposed towards all; nor dost thou yet place wisdom only in acting justly.

你不久就会死去，但你还没有达到朴素单纯、无忧无虑，还没能摆脱被外界事物伤害的怀疑，还没有养成善待一切的性情，还没有使你的智慧专注于做正当的事情。

Examine men's ruling principles, even those of the wise, what kind of things they avoid, and what kind they pursue.

考察一下人们心中主宰的原则，包括那些智者的，看他们在避免什么，追求什么。

What is evil to thee does not subsist in the ruling principle of another; nor yet in any turning and mutation of thy corporeal covering. Where is it then? It is in that part of thee in which subsists the power of forming opinions about evils. Let this power then not form such opinions, and all is well. And if that which is nearest to it, the poor body, is cut, burnt, filled with matter and

rottenness, nevertheless let the part which forms opinions about these things be quiet, that is, let it judge that nothing is either bad or good which can happen equally to the bad man and the good. For that which happens equally to him who lives contrary to nature and to him who lives according to nature, is neither according to nature nor contrary to nature.

对你而言是恶的东西，不会存在于另一人的主宰原则中，也不存在于你肉体的变化和变形中。那么它在哪里呢？它就在你身上用来判断什么是恶的地方。不要让你身上那一部分作这样的判断，那么一切都好。即使那最接近于它的可怜的身体被割破、被烧伤、化脓、腐烂，也要让做出这些判断的地方保持安静，也就是让它清楚，那些会同样发生在坏人和好人身上的事情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同样发生在违背自然而生活的人和符合自然而生活的人身上的事情，既不符合自然也不违背自然。

Constantly regard the universe as one living being, having one substance and one soul; and observe how all things have reference to one perception, the perception of this one living being; and how all things act with one movement; and how all things are the cooperating causes of all things which exist; observe too the continuous spinning of the thread and the contexture of the web.

永远把宇宙看成一个活的存在，具有一个实体和一个灵魂；观察万物如何与一种知觉相关联，这种活的存在的知觉；万物如何以一种运动方式在运行，还有万物如何相互作用成为存在事物的起因；也要观察那持续不断的纺线和网的编织构成。

Thou art a little soul bearing about a corpse, as Epictetus used to say.

正如爱比克泰德曾经所说，你是一个负载着躯体的小小灵魂。

It is no evil for things to undergo change, and no good for things to subsist in consequence of change.

事物经历变化不是坏事，而事物靠变化的结果而维持其存在，也不是好事。

Time is like a river made up of the events which happen, and a violent stream; for as soon as a thing has been seen, it is carried away, and another comes in its place, and this will be carried away too.

时间就像一条由所发生之事构成的河流，而且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因为东西一旦露面，就被带走，另一样东西取而代之，但也会被带走。

Everything which happens is as familiar and well known as the rose in spring and the fruit in summer; for such is disease, and death, and calumny, and treachery, and whatever else delights fools or vexes them.

每一件发生的事都如同春天的玫瑰和夏天的果实一样为人所熟悉、熟知。同样，疾病、死亡、毁谤、背叛还有任何让蠢人快乐和烦恼的东西，都是如此。

In the series of things those which follow are always aptly fitted to those which have gone before; for this series is not like a mere enumeration of disjointed things, which has only a necessary sequence, but it is a rational connection: and as all existing things are arranged together harmoniously, so the things which come into existence exhibit no mere succession, but a certain wonderful relationship.

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总是与前面发生的事情相配合。这一连串不像只是不相关联的事物的列举，仅有必然的先后顺序，而是一个理性的联系：如同所有存在之物都被和谐地安排在一起，所以新出现的事物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延续性，而是一种奇妙的关系。

Always remember the saying of Heraclitus, that the death of earth is to become water, and the death of water is to become air, and the death of air is to become fire, and reversely. And think too of him who forgets whither the way leads, and that men quarrel with that with which they are most constantly in communion, the reason which governs the universe; and the things which they daily meet with seem to them strange: and consider that we ought not to act and speak as if we were asleep, for even in sleep we seem to act and speak; and that we ought not, like children who learn from their parents, simply to act and speak as we have been taught.

永远要记住赫拉克利特的话，土亡成水，水亡成气，气亡成火，反之亦然。也要想想那个忘了路向何处去的人，想想他们与最常接触到的，控制宇宙的理性争吵；还有他们日常接触遇到的事情似乎于他们很陌生。思考我们不应该像睡着了一样做事说话，因为甚至在睡梦中我们似乎也有言行。我们不应该像儿童学习父母一样，如此只会照着别人教我们的去做事说话。

If any god told thee that thou shalt die to-morrow, or certainly on the day after to-morrow, thou wouldst not care much whether it was on the third day or on the morrow, unless thou wast in the highest degree mean- spirited—for how small is the difference—so think it no great thing to die after as many years as thou canst name rather than to-morrow.

如果神告诉你，你明天将要死去，或者确定是后天死去，你不会在乎是后天或是明天，除非你在精神上极度的小气，因为这是多么微小的差别。所以，无论你是多少年之后死去还是明天死去，并不要把这看成是什么大事。

Think continually how many physicians are dead after often contracting their eyebrows over the sick; and how many astrologers after predicting with great pretensions the deaths of others; and how many philosophers after endless discourses on death or immortality; how many heroes after killing thousands; and how many tyrants who have used their power over men's lives with terrible insolence as if they were immortal; and how many cities are entirely dead, so to speak, Helice and Pompeii and Herculaneum, and others innumerable. Add to the reckoning all whom thou hast known, one after another. One man after burying another has been

laid out dead, and another buries him; and all this in a short time. To conclude, always observe how ephemeral and worthless human things are, and what was yesterday a little mucus, to-morrow will be a mummy or ashes. Pass then through this little space of time conformably to nature, and end thy journey in content, just as an olive falls off when it is ripe, blessing nature who produced it, and thanking the tree on which it grew.

不断地去想想：有多少医生在常常对病人紧锁眉头之后死去了；有多少星相家在煞有介事地预测别人的死亡之后死去了；有多少哲学家在无休止地讨论死亡和不朽之后死去了；有多少英雄杀了成千上万的人之后死去了；有多少仿佛可以永生的暴君在傲慢地行使他们对于别人生命的权力之后死去了；有多少城池彻底毁灭了，比如赫利斯、庞贝和赫库莱尼恩和其他无数地方。再把你所认识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加上去。一个人在埋葬了别人之后死去了，另一个人来埋葬他。一切都发生在瞬间。总之，人的事情是短暂和没有价值的，昨天是一点点黏液，明天就是木乃伊或灰烬。安然度过这一小段时间而回归自然，满足地结束人生旅程，就如同橄榄成熟后掉落一样，感谢产生它的自然，感谢它寄生的树木。

Be like the promontory against which the waves continually break, but it stands firm and tames the fury of the water around it.

要像礁石一样，任凭海浪不断拍打，它自岿然不动，驯服周围狂暴的海水。

Unhappy am I, because this has happened to me.—Not so, but happy am I, though this has happened to me, because I continue

free from pain, neither crushed by the present nor fearing the future. For such a thing as this might have happened to every man; but every man would not have continued free from pain on such an occasion. Why, then, is that rather a misfortune than this a good fortune? And dost thou in all cases call that a man's misfortune, which is not a deviation from man's nature? And does a thing seem to thee to be a deviation from man's nature, when it is not contrary to the will of man's nature? Well, thou knowest the will of nature. Will then this which has happened prevent thee from being just, magnanimous, temperate, prudent, secure against inconsiderate opinions and falsehood; will it prevent thee from having modesty, freedom, and everything else, by the presence of which man's nature obtains all that is its own? Remember, too, on every occasion which leads thee to vexation to apply this principle: not that this is a misfortune, but that to bear it nobly is good fortune.

我真不幸，因为这事发生在我身上了。不是这样的，而是想我真幸运，尽管这事发生在我身上了，那是因为我能继续摆脱痛苦，不会被现实碾碎也不惧怕未来。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但不是每个人在这种时候都能摆脱痛苦。那为什么是一种不幸而不是一种幸运呢？你在所有情况下都把那并没有偏离人类本性的东西称之为不幸吗？当一样东西没有违背人类本性的意志时，你会认为它偏离了人类本性吗？好，你知道什么是本性的意志。那这发生的事情会妨碍你成为公正、高尚、节制、谨慎、不受轻率意见和错误影响的人吗？它会妨碍你拥有谦虚、自由和其他一切品质吗？正是有了这些，人类本性获得了所有属于它自己的东西。也要记住，在任何使你烦恼的场合都运用这一原则：这不是不幸，高贵地去承受它就是幸运。

It is a vulgar but still a useful help towards contempt of death, to pass in review those who have tenaciously stuck to life. What

more then have they gained than those who have died early? Certainly they lie in their tombs somewhere at last, Cadicianus, Fabius, Julianus, Lepidus, or any one else like them, who have carried out many to be buried, and then were carried out themselves. Altogether the interval is small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and consider with how much trouble, and in company with what sort of people, and in what a feeble body this interval is laboriously passed. Do not then consider life a thing of any value. For look to the immensity of time behind thee, and to the time which is before thee, another boundless space. In this infinity then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m who lives three days and him who lives three generations?

回顾那些顽强抓住生命的人，对于蔑视死亡来说是一个庸俗却有用的办法。他们比那些早死的人获得了更多的东西吗？当然最后他们都躺在了某处的坟墓里。卡迪西亚努斯、法比尤斯、尤利奥努什、李必达，或任何像他们那样的人，曾经埋葬了多少人，最后自己也被埋葬了。生与死的间隔是短暂的。想想这期间有多少苦恼，伴随着什么样的人，寄寓于怎样的弱小之躯去艰辛度日？不要把生命看成是有什么价值的东西，看看在你之后那无限的时间吧，看看在你之前那无限的时间吧，那是另一个无尽的空间。在这无限之中，活三天和活三代又有什么区别呢？

Always run to the short way; and the short way is the natural: accordingly say and do everything in conformity with the soundest reason. For such a purpose frees a man from trouble, and warfare, and all artifice and ostentatious display.

要走最短的路，最短的路是自然的：相应地，言行举止要合乎健

全理性。如此，人就可以免于烦恼、战争和一切诡计与显摆。

Book Five

卷五

In the morning when thou risest unwillingly, let this thought be present—I am rising to the work of a human being. Why then am I dissatisfied if I am going to do the things for which I exist and for which I was brought into the world? Or have I been made for this, to lie in the bedclothes and keep myself warm?—But this is more pleasant. —Dost thou exist then to take thy pleasure, and not at all for action or exertion? Dost thou not see the little plants, the little birds, the ants, the spiders, the bees working together to put in order their several parts of the universe? And art thou unwilling to do the work of a human being, and dost thou not make haste to do that which is according to thy nature? —But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rest also. —It is necessary: however nature has fixed bounds to this too: she has fixed bounds both to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yet thou goest beyond these bounds, beyond what is sufficient; yet in thy acts it is not so, but thou stoppest short of what thou canst do. So thou lovest not thyself, for if thou didst, thou wouldst love thy nature and her will. But those who love their several arts exhaust themselves in working at them unwashed and without food; but thou valuest thy own nature less than the turner values the turning art, or the dancer the dancing art, or the lover of money values his money, or the vainglorious man his little glory. And such men, when they have a violent affection to a thing, choose neither to eat nor to sleep rather than to perfect the things which they care for. But are the acts which concern society more vile in thy eyes and less worthy of thy labour?

早晨你不愿起床的时候，让这个想法出现吧：我起床去做一个人的工作。如果我是去做我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的事情，我为什么会不满足呢？难道我生来就是躺在被窝里取暖的吗？——但是这更舒服呀。——那么你存在是为了享乐，而不是为了行动或努力吗？你没有看见那小小的植物、小鸟、蚂蚁、蜘蛛和蜜蜂在合力工作，有序地尽它们在宇宙中的职责吗？难道你不愿意去做一个人的工作，难道你不抓紧时间做符合你本性的事情？——但是休息也是必要的呀。——是有必要。但自然也给它划定了界限：她给吃喝都划定了界限，而你超越了这些界限，超出了足够的界限；而你的行动却不是这样，你早早就停止做你能做的事情。所以你不爱自己，因为如果你爱自己，你会爱你的本性及其意志。那些热爱他们技艺的人为此辛勤劳作，忘记了洗浴和进食。你对自己本性的尊重还不如杂耍艺人尊重杂耍技艺、舞者尊崇舞蹈技艺、守财奴爱他们的钱财，或者是爱好虚名的人看重荣耀。这样的人，当他们强烈地热爱一样东西的时候，宁愿选择不吃不睡，也要把他们在乎的事情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在你眼中，关乎社会的行为更为卑下而不值得你劳动吗？

How easy it is to repel and to wipe away every impression which is troublesome or unsuitable, and immediately to be in all tranquility.

抵制和拂去每一恼人和不适的印象，立即进入完全的宁静，这是多么容易啊。

Judge every word and deed which are according to nature to be fit for thee, and be not diverted by the blame which follows from any people, nor by their words, but if a thing is good to be done or said, do not consider it unworthy of thee. For those persons have their peculiar leading principle and follow their peculiar movement;

which things do not thou regard, but go straight on, following thy own nature and the common nature; and the way of both is one.

凡符合本性的言行，都判断为适合于你，不要被别人的指责所左右，也不受他们的话语影响。如果说或做一样事情是好的，就不要把它看成对你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那些人有他们独特的指导原则，遵循他们独特的活动，你不要理会那些事情，而是径直向前，遵循你的本性和共同本性，以及两者合而为一的道路。

I go through the things which happen according to nature until I shall fall and rest, breathing out my breath into that element out of which I daily draw it in, and falling upon that earth out of which my father collected the seed, and my mother the blood, and my nurse the milk; out of which during so many years I have been supplied with food and drink; which bears me when I tread on it and abuse it for so many purposes.

我依照本性经历发生的事情，直到我倒下休息，呼出的气融入到那我每日吸入的元素之中，倒在我父亲从中收集种子、母亲获得血液、奶妈获得乳汁的土地上。多年来它供我饮食，容我践踏，任我为了多种目的而滥用它。

Thou sayest, men cannot admire the sharpness of thy wits.—Be it so; but there are many other things of which thou canst not say, I am not formed for them by nature. Show those qualities then which are altogether in thy power: sincerity, gravity, endurance of labour, aversion to pleasure, contentment with thy portion and with few things, benevolence, frankness, no love of superfluity, freedom from

trifling magnanimity. Dost thou not see how many qualities thou art immediately able to exhibit, in which there is no excuse of natural incapacity and unfitness, and yet thou still remainest voluntarily below the mark? Or art thou compelled through being defectively furnished by nature to murmur, and to be stingy, and to flatter, and to find fault with thy poor body, and to try to please men, and to make great display, and to be restless in thy mind? No, by the gods: but thou mightest have been delivered from these things long ago. Only if in truth thou canst be charged with being rather slow and dull of comprehension, thou must exert thyself about this also, not neglecting it nor yet taking pleasure in thy dullness.

你说，人们不能欣赏你的机智。就算是这样，但有许多别的事情你不能这样说，本质上我不是为他们而造就的。展示你力量范围内的品质：真诚、庄重、吃苦耐劳、厌恶享乐、满足于你的份额和少量的事物、仁慈、坦率、不铺张浪费、不做轻浮的慷慨之举。难道你没有看到有多少品质是你可以立即展示的吗？那些品质并不能以任何先天无能或不适合作为借口，然而你却自愿停留在标准之下。或者你是由于先天缺陷而被迫去诉苦、吝啬、奉承、挑剔你可怜的身体、讨好别人、大出风头和内心不安吗？天啊，不是的：你本来早就可以摆脱这些事情了。除非你真的迟钝和理解力低下。你必须在这方面锻炼自己，而不是忽略它或是以愚钝为乐。

One man, when he has done a service to another, is ready to set it down to his account as a favour conferred. Another is not ready to do this, but still in his own mind he thinks of the man as his debtor, and he knows what he has done. A third in a manner does not even know what he has done, but he is like a vine which has produced grapes, and seeks for nothing more after it has once produced its proper fruit. As a horse when he has run, a dog when

he has tracked the game, a bee when it has made the honey, so a man when he has done a good act, does not call out for others to come and see, but he goes on to another act, as a vine goes on to produce again the grapes in season. —Must a man then be one of these, who in a manner act thus without observing it? —Yes. —But this very thing is necessary, the observation of what a man is doing; for it may be said,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social animal to perceive that he is working in a social manner, and indeed to wish that his social partner also should perceive it. —It is true what thou sayest, but thou dost not rightly understand what is now said; and for this reason thou wilt become one of those of whom I spoke before, for even they are misled by a certain show of reason. But if thou wilt choose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what is said, do not fear that for this reason thou wilt omit any social act.

有一种人，当他为别人做了一件事，就把它作为施舍的恩惠记录下来。另一种人，不会这样做，但是他心里把这个人看作是负债者，记着自己做的事情。第三种人，在某种方式上甚至不知道自己做了好事，他就像葡萄藤一样会结出葡萄，在结出了果实之后并无所求。就像一匹马奔跑过后，一只狗追猎之后，蜜蜂酿蜜完后，所以一个人做了好事以后也应是这样，不会叫别人来看，而是继续去做另一件事，如同葡萄藤继续在适当的时节结出果实一样。一个人必须要像这样做事而不去注意所做之事吗？是的。但有一点是必要的，即观察一个人在做什么。因为，可以说，社会性动物的特征是明察他是以一种社会性的方式在工作，并的确希望他的社会伙伴也能够明察这一点。你说得对，但你不明白现在所说的：因此你会变成我前面说到的人之一，因为甚至他们都被理性的展示所误导。如果你选择理解我所说的含义，就不要害怕你会因此而忽略任何有益于社会的行为。

A prayer of the Athenians: Rain, rain, O dear Zeus, down on the

plowed fields of the Athenians and on the plains. —In truth we ought not to pray at all, or we ought to pray in this simple and noble fashion.

雅典人的祈祷：下雨吧，下雨吧，啊，亲爱的宙斯，下到雅典人的耕地上和平原上。说实在的，我们根本不应祈祷，要么就以这种简单高贵的方式祈祷。

Just as we must understand when it is said, That Aesculapius prescribed to this man horse-exercise, or bathing in cold water, or going without shoes, so we must understand it when it is said, Tha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prescribed to this man disease or mutilation or loss or anything else of the kind. For in the first case prescribed means something like this: he prescribed this for this man as a thing adapted to procure health; and in the second case it means, That which happens to (or suits) every man is fixed in a manner for him suitably to his destiny. For this is what we mean when we say that things are suitable to us, as the workmen say of squared stones in walls or the pyramids, that they are suitable, when they fit them to one another in some kind of connection. For there is altogether one fitness, harmony. And as the universe is made up out of all bodies to be such a body as it is, so out of all existing causes necessity (destiny) is made up to be such a cause as it is. And even those who are completely ignorant understand what I mean, for they say, It (necessity, destiny) brought this to such a person. —This then was brought and this was prescribed to him. Let us then receive these things, as well as those which Aesculapius prescribes. Many, as a matter of course, even among his prescriptions, are disagreeable, but we accept them in the hope of health. Let the perfecting and accomplishment of the things, which

the common nature judges to be good, be judged by thee to be of the same kind as thy health. And so accept everything which happens, even if it seem disagreeable, because it leads to this, to the health of the universe and to the prosperity and felicity of Zeus (the universe). For he would not have brought on any man what he has brought, if it were not useful for the whole. Neither does the nature of anything, whatever it may be, cause anything which is not suitable to that which is directed by it. For two reasons, then, it is right to be content with that which happens to thee; the one, because it was done for thee and prescribed for thee, and in a manner had reference to thee, originally from the most ancient causes spun with thy destiny; and the other, because even that which comes severally to every man is to the power which administers the universe a cause of felicity and perfection, nay even of its very continuance.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whole is mutilated, if thou cuttest off anything whatever from the conjunction and the continuity either of the parts or of the causes. And thou dost cut off, as far as it is in thy power, when thou art dissatisfied, and in a manner triest to put anything out of the way.

正如我们一定理解这样的话，埃斯科拉庇俄斯曾给这个人开处方，让他练习骑马、洗冷水澡、或赤脚走路。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这样的话，宇宙之本性给这个人开处方，让他生病、或肢体不全，遭受损失或是别的类似的东西。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开处方的意思是：他给这个人开的东西适合于促进健康；就第二种情况而言，发生于或适合于每个人的事情是注定的，从而让他某种方式上适合于他的命运。因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事物适合于我们，就如同泥水匠评价墙上或金字塔上的方石，当它们彼此以某种联系相互契合的时候，它们就是合适的。因为这整个就是一种合适、和谐。如同宇宙是由所有的物体组成一样，必然性（命运）是由所有存在的原因构成的。甚至那些完全无知的人都理解我的意思，因为他们说，它（必然、命运）把这样的

事情带给了这个人。这样，这件事发生了，这件事是给他开的处方。那么让我们接受这些事情吧，还有那些埃斯科拉庇俄斯开的处方。事实上，他处方里的许多东西是令人讨厌的，但是我们接受这些方子，以期健康。事物的完满与成就——这些共同本性判断为好的东西，你也视之为类似你健康的东西吧。所以，接受发生的每一件事，甚至看起来不好的事，因为它带来宇宙的健康和宙斯（宇宙）的繁荣与福祉。若非对整体有用，宙斯就不会把东西带给人类了。任何事物的本质都不会对受其支配的事物产生任何不合适的东西。因此，你有两个理由应该满足于你自己的境遇。其一，这是为你而发生的，是为你开的处方，某种方式上与你有关联，最初是来自与你命运交织的最古老的原因。其二，即使是个别地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对于掌管宇宙的力量而言也是福祉和完美的原因，甚至就是它得以维系的原因。如果你割裂了任何部分或原因的联系和持续性，整体的完整性就会受损。当你不满时，你就是在尽力割裂它，某种形式上是破坏了它。

Be not disgusted, nor discouraged, nor dissatisfied, if thou dost not succeed in doing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right principles; but when thou hast failed, return back again, and be content if the greater part of what thou doest is consistent with man's nature, and love this to which thou returnest; and do not return to philosophy as if she were a master, but act like those who have sore eyes and apply a bit of sponge and egg, or as another applies a plaster, or drenching with water. For thus thou wilt not fail to obey reason and thou wilt repose in it. And remember that philosophy requires only the things which thy nature requires; but thou wouldst have something else which is not according to nature. It may be objected, Why, what is more agreeable than this which I am doing? But is not this the very reason why pleasure deceives us? And consider if magnanimity, freedom, simplicity, equanimity, piety are not more agreeable. For what is more agreeable than wisdom itself, when thou thinkest of the security and the happy course of all things

which depend on the faculty of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如果你按照正确的原则做事而一事无成，不要厌恶，不要灰心，也不要不满。而应该在失败的时候，再重新开始，如果你做的大部分是符合人类本性的，就满足吧，热爱你重新开始的地方。不要回归哲学，好像她是主人似的，而是要像那些眼痛的人用一点海绵和蛋清，或像另一个人那样用膏药，或用水敷洗一样。因为这样你就会遵从理性从而获得安宁。要记住，哲学只要求你的本性所要求的东西，但你却有一些别的不符合本性的东西。可能这会遭到反对，有什么比我正在做的事情更令人愉悦呢？这不正是快感欺骗我们的原因吗？想一想气度、自由、朴素、沉着、虔诚是否更令人愉悦。因为当你想到所有事物的保障与快乐之道是依赖于理解和知识的能力，又有什么比智慧本身更令人愉悦呢？

Things are in such a kind of envelopment that they have seemed to philosophers, not a few nor those common philosophers, altogether unintelligible; nay even to the Stoics themselves they seem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nd all our assent is changeable; for where is the man who never changes? Carry thy thoughts then to the objects themselves, and consider how short-lived they are and worthless, and that they may be in the possession of a filthy wretch or a whore or a robber. Then turn to the morals of those who live with thee, and it is hardly possible to endure even the most agreeable of them, to say nothing of a man being hardly able to endure himself. In such darkness, then, and dirt, and in so constant a flux, both of substance and of time, and of motion, and of things moved, what there is worth being highly prized, or even an object of serious pursuit, I cannot imagine. But on the contrary it is a man's duty to comfort himself, and to wait for the natural dissolution and not to be vexed at the delay, but to rest in these

principles only: the one, that nothing will happen to me which is not conformable to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other, that it is in my power never to act contrary to my god and daemon: for there is no man who will compel me to this.

事物处在这样的一种包围之中，它们对于哲学家——不是少数的也不是普通的哲学家来说——是完全无法理解的，甚至对于斯多亚派学者本身来说也很难理解。我们所有的同意都在变动之中；哪里有一成不变的人呢？那就想想物体本身吧，并考虑它们是多么短暂、多么没有价值，它们可能属于一个下流的无赖、娼妓或强盗。再看看和你一起生活的人们的道德，容忍他们之中最讨人喜欢的人几乎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容忍一个自己都很难容忍自己的人了。在这样的黑暗、肮脏之中，在这不断变化的物质、时间、运动和被推动的物体的急流之中，有什么是值得我们高度赞扬的，或是值得认真去追求的？我无法想象。反之，一个人的责任是顺应自己，等待自然的分解，不为延迟而烦恼，只安于这些原则：其一，违背宇宙本性的东西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再者，我必须做到做事永不违背上帝和我的守护神：因为没有人会逼我这样。

About what am I now employing my own soul? On every occasion I must ask myself this question, and inquire, what have I now in this part of me which they call the ruling principle? And whose soul have I now? That of a child, or of a young man, or of a feeble woman, or of a tyrant, or of a domestic animal, or of a wild beast?

我现在用我的灵魂来做什么呢？每个场合我都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并且这样询问：在他们所说的主宰原则中，这我又有什么部分呢？我现在有的是谁的灵魂？这个灵魂究竟是一个孩童的、一位年轻

人的、一个弱女子的、一个暴君的、家畜的还是野兽的呢？

What kind of things those are which appear good to the many, we may learn even from this. For if any man should conceive certain things as being really good, such as prudence, temperance, justice, fortitude, he would not after having first conceived these endure to listen to anything which should not be in harmony with what is really good. But if a man has first conceived as good the things which appear to the many to be good, he will listen and readily receive as very applicable that which was said by the comic writer. Thus even the many perceive the difference. For were it not so, this saying would not offend and would not be rejected in the first case, while we receive it when it is said of wealth, and of the means which further luxury and fame, as said fitly and wittily. Go on then and ask if we should value and think those things to be good, to which after their first conception in the mind the words of the comic writer might be aptly applied—that he who has them, through pure abundance has not a place to ease himself in.

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个问题中学习——即那些对于很多人来说看起来好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人认为某些东西真正好，比如慎重、节制、正义、勇敢，先有此观念之后，他就无法容忍去听那些与真正好的不相一致的东西了。而如果一个人首先认为那些大多数人认为好的东西就是好的，他就会倾听并乐于接受那些喜剧作家所说的话，认为那很适用。这样甚至大多数人都能看清分别。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在听到关于财富和获得更多享受名利的手段的巧妙机智说法时，就会接受它们而不会觉得刺耳，也不会从一开始就加以拒绝了。那么接下来，问问我们是否应该看重这些东西并认为这些东西是好的，这样的东西在头脑中有了最初的概念之后，还可以恰当地印证了喜剧作家的话——拥有它们的人，富足却无处安生。

I am composed of the formal and the material; and neither of them will perish into non-existence, as neither of them came into existence out of non-existence. Every part of me then will be reduced by change into some part of the universe, and that again will change into another part of the universe, and so on forever. And by consequence of such a change I too exist, and those who begot me, and so on forever in the other direction. For nothing hinders us from saying so, even if the universe is administered according to definite periods of revolution.

我由形式和物质组成。它们都不会消亡至非存在，正如它们不会从非存在变成存在一样。那么，我的每一部分都会变成宇宙的某一部分，同样那也会转化成宇宙的其他部分，以此以至无穷。我的存在也是这变化的结果，还有那些给我生命的人，如此向后追溯以至无穷。没有什么阻止我们这样说，就算宇宙也是根据确定的变革时代来安排的。

Reason and the reasoning art (philosophy) are powers which are sufficient for themselves and for their own works. They move then from a first principle which is their own, and they make their way to the end which is proposed to them;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such acts are named Catorthoseis or right acts, which word signifies that they proceed by the right road.

理性和理性的艺术（哲学）对于它们自己和它们的作品是一种自足的力量。它们从自己的第一原则出发，然后走出自己的路，到达那规定给它们的终点。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叫做正确的行为，这个词表示它们按照正确的道路行进。

None of these things ought to be called a man's which do not belong to a man, as man. They are not required of a man, nor does man's nature promise them, nor are they the means of man's nature attaining its end. Neither then does the end of man lie in these things, nor yet that which aids to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is end, and that which aids toward this end is that which is good. Besides, if any of these things did belong to man, it would not be right for a man to despise them and to set himself against them; nor would a man be worthy of praise who showed that he did not want these things, nor would he who stinted himself in any of them be good, if indeed these things were good. But now the more of these things a man deprives himself of, or of other things like them, or even when he is deprived of any of them, the more patiently he endures the loss, just in the same degree he is a better man.

这些事物不属于作为人的人，就不可以说是属于人的。它们不是人所需要的，人的本性也不允诺它们的产生，它们也不是人性达到其目标的手段。人的目标不在于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也无助于目标的达成，有助于达到目标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此外，如果任何这些东西的确属于人，那么鄙视它们、反对它们则是不对的。一个人若是表示出不想要这些东西，他也不值得表扬，如果这些东西的确好而他却不介入那也是不好的。然而，人抛却这些东西或其他类似的东西越多，甚至当他抛却它们任何一个时，他就越是能耐心忍受失去，在同等程度上来说他就越是一个好人。

Such as are thy habitual thoughts, such also will be the character of thy mind; for the soul is dyed by the thoughts. Dye it then with a continuous series of such thoughts as these: for instance, that where a man can live, there he can also live well. But

he must live in a palace— well then, he can also live well in a palace. And again, consider that for whatever purpose each thing has been constituted, for this it has been constituted, and toward this it is carried; and its end is in that toward which it is carried; and where the end is, there also is the advantage and the good of each thing. Now the good for the reasonable animal is society; for that we are made for society has been shown above. Is it not plain that the inferior exist for the sake of the superior? but the things which have life are superior to those which have not life, and of those which have life the superior are those which have reason.

这若是你习惯的想法，也会成为你思想的特征，因为灵魂受思想的浸染。那就不断地用这些想法来浸染它吧：比如，在一个人能生活的地方，人就能生活得好。但是如果他必须生活在宫殿里，那么好吧，他在宫殿里也能生活得好。再如，考虑一下，每一事物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构成，为此它被构造出来了，又被带到那个目的去；它的终点就是要被带去的地方；终点在哪里，哪里就有每样事物的优与善。理性动物的善就是社会，因为我们是为社会而产生，这一点已经在上面说明了。低级的是为高级的而存在，这不是很明显吗？但是有生命的东西要比没有生命的东西高级，而在有生命的东西当中，那些有理性的是更高级的。

To seek what is impossible is madness: and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 bad should not do something of this kind.

寻求不可能的事物是疯狂的，而坏人不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

Nothing happens to any man which he is not formed by nature

to bear. The same things happen to another, and either because he does not see that they have happened or because he would show a great spirit he is firm and remains unharmed. It is a shame then that ignorance and conceit should be stronger than wisdom.

生来不适合他承担的事，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别人身上：也许因为他没有看到它们已经发生，也许因为他表现出一种伟大的精神，所以他是坚强的，并且没有受到伤害。无知和欺骗强过智慧，这是一种耻辱。

Things themselves touch not the soul, not in the least degree; nor have they admission to the soul, nor can they turn or move the soul: but the soul turns and moves itself alone, and whatever judgments it may think proper to make, such it makes for itself the things which present themselves to it.

事物本身不触及灵魂，在最低程度上也不触及。它们不能进入灵魂，也不能扭转或推动灵魂。灵魂独自扭转和推动自己，做出一切它认为适合的判断，这些判断都是基于事物所呈现给自己的样子。

In one respect man is the nearest thing to me, so far as I must do good to men and endure them. But so far as some men make themselves obstacles to my proper acts, man becomes to me one of the things which are indifferent, no less than the sun or wind or a wild beast. Now it is true that these may impede my action, but they are no impediments to my affects and disposition, which have the power of acting conditionally and changing: for the mind converts and changes every hindrance to its activity into an aid; and

so that which is a hindrance is made a furtherance to an act; and that which is an obstacle on the road helps us on this road.

一方面，就我必须行善并容忍他们而言，人是最接近于我的。至于有的人把他们自己变成我正当行为的障碍时，人对我则是中性的事物之一，和太阳、风或野兽相当。这些人确实可能阻碍我的行动，但他们不是我情感和性格的障碍，情感和性格具有限定和改变行为的力量。因为思想把每一阻碍转化变成它活动的助手，所以阻碍就成为行动的垫脚石，而路上的障碍物则帮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行进。

Reverence that which is best in the universe; and this is that which makes use of all things and directs all things. And in like manner also reverence that which is best in thyself; and this is of the same kind as that. For in thyself also, that which makes use of everything else, is this, and thy life is directed by this.

尊敬宇宙中最好的事物，它就是利用万物和指引万物的东西。同样也尊敬你身上最好的东西，它是与前者同类的。因为在你身上也存在那利用其他一切的东西，你的生活就是由它来指引。

That which does no harm to the state, does no harm to the citizen. In the case of every appearance of harm apply this rule: if the state is not harmed by this, neither am I harmed. But if the state is harmed, thou must not be angry with him who does harm to the state. Show him where his error is.

对于国家无害的，对于公民也无害。每一害处的出现都适用这条

规律：如果国家没有因此受到伤害，我也不会受到伤害。但若是国家受到了伤害，你不要对伤害国家的人生气，而要向他展示他错在哪里。

Often think of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things pass by and disappear, both the things which are and the things which are produced. For substance is like a river in a continual flow, and the activities of things are in constant change, and the causes work in infinite varieties; and there is hardly anything which stands still. And consider this which is near to thee, this boundless abyss of the past and of the future in which all things disappear. How then is he not a fool who is puffed up with such things or plagued about them or makes himself miserable? for they vex him only for a time, and a short time.

经常想想事物变化和消失地多么迅速，包括存在的事物还有那被产生的事物。因为物质就像一条不息的河流，事物的活动在不断变化之中，起因以无限多样性在起作用，几乎没有什么静止的东西。想想那些靠近你的东西，最终都会消失于过去和未来的无限深渊之中。那么一个人若是为这些事物感到自得或是为它们发愁，把自己弄得惨兮兮，这个人不是傻子吗？因为它们只让他烦恼一段时间，一段短暂的时间。

Think of the universal substance, of which thou hast a very small portion; and of universal time, of which a short and indivisible interval has been assigned to thee; and of that which is fixed by destiny, and how small a part of it thou art.

想想宇宙的物质，你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想想宇宙的时间，其中只有一个短暂和不可分割的间隙分配给了你；想想那命运注定的东西，你是其中多小的一部分啊。

Does another do me wrong? Let him look to it. He has his own disposition, his own activity. I now have what the universal nature wills me to have; and I do what my nature now wills me to do.

有人做了对不住我的事情了吗？让他做去吧。他有他自己的脾气、他自己的活动。我现在拥有宇宙本性要我有的东西，我在做我的本性要我做的事情。

Let the part of thy soul which leads and governs be undisturbed by the movements in the flesh, whether of pleasure or of pain; and let it not unite with them, but let it circumscribe itself and limit those affects to their parts. But when these affects rise up to the mind by virtue of that other sympathy that naturally exists in a body which is all one, then thou must not strive to resist the sensation, for it is natural: but let not the ruling part of itself add to the sensation the opinion that it is either good or bad.

让主宰和引导你的心灵不受肉体运动的干扰，不管是快乐或是痛苦；让它不要和肉体结合，让它自己限定自己，把欲念局限于它们自身。但如果借助其他自然存在于我们灵肉合一的身体里的同情，这些欲念上升到心灵中来，你就不要强烈抵触那感觉，因为它是自然的。只是不要让主宰的理性对感觉做出好或者坏的判断。

Live with the gods. And he does live with the gods who constantly shows to them that his own soul is satisfied with that which is assigned to him, and that it does all that the daemon wishes, which Zeus hath given to every man for his guardian and guide, a portion of himself. And this is every man's understanding and reason.

与神灵同在吧。一个人若是常常向神灵表示他的灵魂满足于分配给他的事物，他的灵魂做所有内心神明（这是宙斯赋予每一个人用来做护卫和向导的，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期望的事情，他就与神灵同在了。这就是每一个人的理解力和理性。

Art thou angry with him whose arm-pits stink? Art thou angry with him whose mouth smells foul? What good will this anger dothee? He has such a mouth, he has such arm-pits: it is necessary that such an emanation must come from such things—but the man has reason, it will be said, and he is able, if he takes pains, to discover wherein he offends—I wish thee well of thy discovery. Well then, and thou hast reason: by thy rational faculty stir up his rational faculty; show him his error, admonish him. For if he listens, thou wilt cure him, and there is no need of anger. Neither tragic actor nor whore.

你会对有狐臭的人生气吗？你会对有口臭的人生气吗？生气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他有这样的一张嘴，他有这样的腋窝，这样的气味来自这样的地方是必然的。但你可能要说，这个人有理性，如果他多加注意，他能发现他因何遭人厌恶。我希望你满意你的发现。可是，你也有理性，你的理性能力可以激发他的理性能力，指明他的错处，劝导他。如果他听你的话，你就会治好他，没有必要生气，你既不是悲

剧演员也不是妓女。

As thou intendest to live when thou are gone out,…so it is in thy power to live here. But if men do not permit thee, then get away out of life, yet so as if thou wert suffering no harm. The house is smoky, and I quit it. Why dost thou think that this is any trouble? But so long as nothing of the kind drives me out, I remain, am free, and no man shall hinder me from doing what I choose; and I choose to do what is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rational and social animal.

正如你要离开人世的时候想要活下去……所以在此生活是在你的力量范围之内。但如果人们不允许你，那就离开这里的生活吧，但要表现得像你没有受到伤害那样。房子冒烟了，我弃它而去。为什么你认为那是麻烦呢？但是只要没有什么要赶我出去，我就留下，自由自在，无人阻止我做我选择的事情。我选择做合乎理性和社会性动物本性的事情。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universe is social. Accordingly it has made the inferior things for the sake of the superior, and it has fitted the superior to one another. Thou seest how it has subordinated, co-ordinated and assigned to everything its proper portion, and has brought together into concord with one another the things which are the best.

宇宙的智慧是社会性的。因此，它为高级的制造低级的，又让高级的相互适应。你看到它是如何确定从属关系、相互合作，如何分配给每一事物恰当的份额，使得最好的事物能够彼此和谐。

How hast thou behaved hitherto to the gods, thy parents, brethren, children, teachers, to those who looked after thy infancy, to thy friends, kinsfolk, to thy slaves? Consider if thou hast hitherto behaved to all in such a way that this may be said of thee:

你一向是怎么对待神灵、父母、兄弟、孩子、老师、儿时照顾你的人、朋友、亲人以及你的奴隶的？想想你是否从此一直要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他们，以至于别人会这样评说你：

Never has wronged a man in deed or word.

从不在言行上冒犯一个人。

And call to recollection both how many things thou hast passed through, and how many things thou hast been able to endure: and that the history of thy life is now complete, and thy service is ended: and how many beautiful things thou hast seen: and how many pleasures and pains thou hast despised; and how many things called honourable thou hast spurned; and to how many ill-minded folks thou hast shown a kind disposition.

回想一下，你经历了多少事情，你忍耐了多少事情，你人生的历史已经完成，你的服务结束了。你见过了多少美好的事物，你蔑视了多少快乐和痛苦，你鄙弃了多少所谓的荣耀，你向多少坏心肠的人表示了善意。

Why do unskilled and ignorant souls disturb him who has skill and knowledge? What soul then has skill and knowledge? That which knows beginning and end, and knows the reason which pervades all substance and through all time by fixed periods (revolutions) administers the universe.

为什么没本领没知识的灵魂会烦扰有本领有知识的人呢？那么，什么样的灵魂有本领有知识？这样的灵魂知道开始和结束，知道遍布一切物质的，在所有时间中的某个确定的时间段（革命）管理着宇宙万物的理性。

Soon, very soon, thou wilt be ashes, or a skeleton, and either a name or not even a name; but name is sound and echo, and the things which are much valued in life are empty and rotten and trifling, and like little dogs biting one another, and little children quarrelling, laughing, and then straightway weeping. But fidelity and modesty and justice and truth are fled up to Olympus from the wide-spread earth.

快了，很快，你就会化为灰烬，成为骷髅，或是成为一个名字，或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但名字是声音和回响，生命中倍加珍惜的东西已是空洞、腐朽、琐屑，像小狗彼此撕咬、小孩吵架、欢笑、放声哭泣。但忠诚、谦虚、正义和真理正从宽广的大地飞向奥林匹斯山。

What then is there which still detains thee here? if the objects of sense are easily changed and never stand still, and the organs of perception are dull and easily receive false impressions; and the poor soul itself is an exhalation from blood. But to have good repute

amid such a world as this is an empty thing. Why then dost thou not wait in tranquility for thy end, whether it is extinction or removal to another state? And until that time comes, what is sufficient? Why, what else than to venerate the gods and bless them, and to do good to men, and to practise tolerance and self-restraint; but as to everything which is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 poor flesh and breath, to remember that this is neither thine nor in thy power.

如果物体的感觉是易变的，从不会静止；观察的器官是迟钝的而容易接受错误的印象；可怜的灵魂本身是血液发出的气体，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你滞留于此呢？只是为了在这样一个空洞的世界上留下一个好名声。那为什么你不在平静中等待你的结局呢，不论是灭亡或是迁移到另一种状态？直到那一刻来临，什么才是足够的呢？除了崇敬神灵、赞美神灵、对人行善、实行宽容和自制，还有什么别的呢？至于超出你可怜的肉体和呼吸限制之外的东西，记住这不是你的也不在你的力量范围内。

Thou canst pass thy life in an equable flow of happiness, if thou canst go by the right way, and think and act in the right way. These two things are common both to the soul of God and to the soul of man, and to the soul of every rational being, not to be hindered by another; and to hold good to consist in the disposition to justice and the practice of it, and in this to let thy desire find its termination.

若是你走了正确的路，以正确的方式思考和行事，你就能在幸福的平和流动中度过你的一生。这两样事情对于神的灵魂和人的灵魂，还有每一个理性生命的灵魂是共同的。不要被其他事情干扰，好好坚持正义并付诸实践，这样你的欲望就会终止。

If this is neither my own badness, nor an effect of my own badness, and the common weal is not injured, why am I troubled about it? and what is the harm to the common weal?

如果这不是我的恶，也不是我自己的恶引起的结果，公众福利也没有受到损害，为什么我会感到不安呢？什么是对公众福利的损害呢？

Do not be carried along inconsiderately by the appearance of things, but give help to all according to thy ability and their fitness; and if they should have sustained loss in matters which are indifferent, do not imagine this to be a damage. For it is a bad habit. But as the old man, when he went away, asked back his foster-child's top, remembering that it was a top, so do thou in this case also.

不要不加思考地被事物的表象所左右，要根据你的能力和对他们是否合适来给予所有人帮助。如果他们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遭受了损失，就不要把它看成是损害。这是一个坏习惯。但一位老人即将辞世时，问起他抚育的孩子的巅峰时期，并铭记这一时期，你在这个情况下也要这样做。

When thou art calling out on the Rostra, hast thou forgotten, man, what these things are? Yes; but they are objects of great concern to these people—wilt thou too then be made a fool for these things? I was once a fortunate man, but I lost it, I know not how. But fortunate means that a man has assigned to himself a good

fortune; and a good fortune is good disposition of the soul, good emotions, good actions.

当你在讲坛上大声呼唤时，人啊，你忘记了这些东西是什么吗？是的，它们是这些人非常关心的对象。你也会为了这些东西变成一个傻子吗？我曾经是个幸运的人，但我失去了它，我不知道是怎么失去的。幸运的意思是人给自己分配好运，好运就是灵魂的好性情，好的情感，好的行为。

Book Six

卷六

The substance of the universe is obedient and compliant; and the reason which governs it has in itself no cause for doing evil, for it has no malice, nor does it do evil to anything, nor is anything harmed by it. But all things are made and perfected according to this reason.

宇宙的本质是顺服的，控制宇宙的理性本身并没有为恶的理由，因为它没有恶，也不为恶，没有事物会受它伤害。万物皆依此理性而造就并臻于完善。

Let it make no difference to thee whether thou art cold or warm, if thou art doing thy duty; and whether thou art drowsy or satisfied with sleep; and whether ill-spoken of or praised; and whether dying or doing something else. For it is one of the acts of this life, this act by which we die; it is sufficient then in this act also to do well what we have in hand.

无论你感到寒冷还是温暖，无论你感到困倦还是睡眠充足，无论你遭人诽谤还是被赞美，无论你生命垂危还是在做别的事情，都要同样尽责，不区别对待。因为尽责是人生的行为之一，我们死前都要尽责。尽责就是把手头的事情做好，这就足够了。

Look within. Let neither the peculiar quality of anything nor its value escape thee.

审视内心，不要错过任何事物的特质和价值。

All existing things soon change, and they will either be reduced to vapour, if indeed all substance is one, or they will be dispersed.

一切存在的事物很快都会改变，如果确实万物合一，它们要么化为雾气，要么就被分解。

The reason which governs knows what its own disposition is, and what it does, and on what material it works.

作为主宰的理性知道自己的意向，自己的作为，以及作为的对象。

The best way of avenging thyself is not to become likethe wrong doer.

报复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效法肇事者。

Take pleasure in one thing and rest in it, in passing from one social act to another social act, thinking of God.

在一件事中获得快乐并安然其中，在从一个社会行为到另一个社会行为中，心中要有神。

The ruling principle is that which rouses and turns itself, and while it makes itself such as it is and such as it wills to be, it also makes everything which happens appear to itself to be such as it wills.

主宰的原则就是自我唤醒、自我运转，它在使自己成为现在的样子和想要变成的样子时，也使得万物的发生皆为其所愿的。

In conformity to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every single thing is accomplished, for certainly it is not in conformity to any other nature that each thing is accomplished, either a nature which externally comprehends this, or a nature which is comprehended within this nature, or a nature external and independent of this.

每一单个事物的完成，都是按照宇宙的本性来进行，因为事物肯定不是按照别的本性来完成，这既不是从外部包含它的本性，也不是被它包含的本性，或是任何独立于它之外的其他本性。

The universe is either a confusion, and a mutual involution of things, and a dispersion; or it is unity and order and providence. If then it is the former, why do I desire to tarry in a fortuitous combination of things and such a disorder? And why do I care about anything else than how I shall at last become earth? And why

am I disturbed, for the dispersion of my elements will happen whatever I do. But if the other supposition is true, I venerate, and I am firm, and I trust in him who governs.

宇宙要么是一团混沌，是事物的相互卷绕和离散，要么是一个统一体，有秩序，有天道。如果是前者，为什么我愿意混迹于事物偶然的结合和这样的无序之中呢？为什么我要关心自己终将归于尘埃之外的其他的事情呢？无论我做什么，生命都会个体分解走向幻灭，那么我为什么要烦恼呢？如果后一种假设为真，我会崇拜并且坚定地相信那主宰者。

When thou hast been compelled by circumstances to be disturbed in a manner, quickly return to thyself and do not continue out of tune longer than the compulsion lasts; for thou wilt have more mastery over the harmony by continually recurring to it.

当环境迫使你某种程度上焦躁烦恼时，赶快回归自己，不要在压力过后继续感到不安。通过不断地反省、回归自己，你将达到更大的和谐。

If thou hadst a step-mother and a mother at the same time, thou wouldst be dutiful to thy step-mother, but still thou wouldst constantly return to thy mother. Let the court and philosophy now be to thee step-mother and mother; return to philosophy frequently and repose in her, through whom what thou meetest with in the court appears to thee tolerable, and thou appearest tolerable in the court.

如果你同时有一个继母和亲娘，你会对你的继母尽责，但你仍然会时常回到你的亲娘身边。现在让宫廷和哲学分别作你的继母和亲娘。经常回到哲学身边，在她那里获得安宁，这样你便可以容忍你的朝廷生活，你就会在宫廷里表现出宽容。

When we have meat before us and such eatables, we recei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is is the dead body of a fish, and this is the dead body of a bird or of a pig; and again, that this Falernian is only a little grape juice, and this purple robe some sheep's wool dyed with the blood of a shell-fish: such then are these impressions, and they reach the things themselves and penetrate them, and so we see what kind of things they are. Just in the same way ought we to act all through life, and where there are things which appear most worthy of our approbation, we ought to lay them bare and look at their worthlessness, and strip them of all the words by which they are exalted. For outward show is a wonderful perverter of the reason, and when thou art most sure that thou art employed about things worth thy pains, it is then that it cheats thee most. Consider then what Crates says of Xenocrates himself.

当我们面前摆着肉和类似食物时，我们不免会想，这是一条鱼的尸体，这是一只鸟或一头猪的尸体。还有，这种法兰娜酒不过是葡萄的汁液，这件紫袍是浸染了贝类血的某种羊毛。这就是我们的印象。印象抵达事物本身并穿透它，我们就看到了它们的真面目。我们在生活中就应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哪里有最值得我们嘉许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剥开它们的外表，看到它们毫无价值，剥去使它们得到赞美的所有言辞。外表最善于误导理性，当你自以为在做值得去努力的事情时，就是最受到欺骗的时候。想想克拉泰斯是怎么评论色诺克拉底的吧。

Most of the things which the multitude admire are referred to objects of the most general kind, those which are held together by cohesion or natural organization, such as stones, wood, fig-trees, vines, olives. But those which are admired by men who are a little more reasonable are referred to the things which are held together by a living principle, as flocks, herds. Those which are admired by men who are still more instructed are the things which are held together by a rational soul, not however a universal soul, but rational so far as it is a soul skilled in some art, or expert in some other way, or simply rational so far as it possesses a number of slaves. But he who values a rational soul, a soul universal and fitted for political life, regards nothing else except this; and above all things he keeps his soul in a condition and in an activity conformable to reason and social life, and he co-operates to this end with those who are of the same kind as himself.

大众赞许的多数东西其实是最普通不过的物体了，它们是通过凝聚力或自然的组织组合在一起的，比如石头、木头、无花果树、葡萄藤和橄榄。但具有更多理性的人赞许的那些东西，则是由生命的原则组合在一起，比如羊群、兽群。那些更有教养的人赞许的事物，是由理性的灵魂组合在一起，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灵魂，其灵魂受过某些技能的训练、在某些方面是专业的，或仅仅就其拥有不少奴隶而言是理性的。一个看重理性灵魂、拥有一个普遍且适合政治生活的灵魂的人，他只会考虑以下一点：他超越于所有事物之上，并将自己的灵魂保持在一种符合理性和社会生活的活动与状态中，为达到这一目标，他与他的同类合作。

Some things are hurrying into existence, and others are hurrying out of it; and of that which is coming into existence part is already extinguished. Motions and changes are continually

renewing the world, just as the uninterrupted course of time is always renewing the infinite duration of ages. In this flowing stream then, on which there is no abiding, what is there of the things which hurry by on which a man would set a high price? It would be just as if a man should fall in love with one of the sparrows which fly by, but it has already passed out of sight. Something of this kind is the very life of every man, like the exhalation of the blood and the respiration of the air. For such as it is to have once drawn in the air and to have given it back, which we do every moment, just the same is it with the whole respiratory power, which thou didst receive at thy birth yesterday and the day before, to give it back to the element from which thou didst first draw it.

有些东西忙着生，有些东西忙着死。在那将要出生的东西中，其中有些部分已经灭亡。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着这个世界，正如永不间断的时间之流总是在更新着无限延伸的岁月。在这川流不息中，没有什么是亘古不变的。在这白驹过隙、匆匆而过的事物中，有什么值得人给予高度评价的呢？就好比一个人爱上了身边飞过的一只麻雀，转瞬间它已飞得无影无踪了。这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好比血液蒸发和呼吸空气一样。我们吸入空气又呼出，时时刻刻这样做。人生亦然，正如整个呼吸能力一样，你昨天或前天出生得到的东西，有一天你又把它放回到原来的地方。

Neither is transpiration, as in plants, a thing to be valued, nor respiration, as in domesticated animals and wild beasts, nor the receiving of impressions by the appearances of things, nor being moved by desires as puppets by strings, nor assembling in herds, nor being nourished by food; for this is just like the act of separating and parting with the useless part of our food. What then

is worth being valued? To be received with clapping of hands? No. Neither must we value the clapping of tongues, for the praise which comes from the many is a clapping of tongues. Suppose then that thou hast given up this worthless thing called fame, what remains that is worth valuing? This, in my opinion, to move thyself and to restrain thyself in conformity to thy proper constitution, to which end both all employments and arts lead. For every art aims at this, that the thing which has been made should be adapted to the work for which it has been made; and both the vine-planter who looks after the vine, and the horse-breaker, and he who trains the dog, seek this end. But the education and the teaching of youth aim at something. In this then is the value of the education and the teaching. And if this is well, thou wilt not seek anything else. Wilt thou not cease to value many other things too? Then thou wilt be neither free, nor sufficient for thy own happiness, nor without passion. For of necessity thou must be envious, jealous, and suspicious of those who can take away those things, and plot against those who have that which is valued by thee. Of necessity a man must be altogether in a state of perturbation who wants any of these things; and besides, he must often find fault with the gods. But to reverence and honour thy own mind will make thee content with thyself, and in harmony with society, and in agreement with the gods, that is, praising all that they give and have ordered.

值得看重的，不是植物的蒸腾作用，不是家畜和野兽的呼吸，不是根据表象获得印象，不是像玩偶一样被绳子牵引行动，不是像牛羊那样成群结队，不是食物的滋养，因为这些就像是把我们食物中无用的部分给分离和排除出去一样。那什么是值得珍视的呢？被人们鼓掌欢迎吗？不。我们也不该看重口头上的赞美，很多人的赞美不过是口舌赞美。假设你放弃了那所谓名声的毫无价值的东西，还剩下什么值得珍视呢？在我看来，这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动静举止限制在符合你的

构成范围内，一切工作和技艺都应以此为目标。因为每一种技艺的目的是：已完成的东西必须适应它为之服务的工作。种葡萄的照顾葡萄藤，驯马人、驯狗人亦是如此。但是对年轻人的教育和教学，自有其目标。教育和训练的价值也就在于此。如果这是好的，你就不会寻求别的。你还会看重其他很多东西吗？如果是那样，你既不会获得自由，也不会知足，不能不被欲念打动。你必然会羡慕、嫉妒，怀疑那些能夺去你这些东西的人，别人要是拥有你看重的东西，你就会对他动阴谋邪念。人若是想要任何这些东西，必然会处于烦恼不安的状态之中，而且他会时常抱怨神灵。然而，敬仰和尊重你自己的心灵，会使你怡然自得，与社会保持和谐，与神灵保持一致，也就是说，感谢上天的一切给予和安排。

Above, below, all around are the movements of the elements. But the motion of virtue is in none of these: it is something more divine, and advancing by a way hardly observed it goes happily on its road.

环宇之内皆是元素的运动。但是美德的运动却不在其中：它更为神圣，以一种浑然不觉的方式，在自己的道路上，愉快前行。

How strangely men act. They will not praise those who are living at the same time and living with themselves; but to be themselves praised by posterity, by those whom they have never seen or ever will see, this they set much value on. But this is very much the same as if thou shouldst be grieved because those who have lived before thee did not praise thee.

人的行为是多么奇怪。他们吝于赞美那些和他们同时代的、和他

们生活在一起的人，却很注意后人对自己的赞扬，或在意被他们从未见过或永远见不到的人赞扬。这和因前人没有赞美你而感到悲伤，并无二致。

If a thing is difficult to be accomplished by thyself, do not think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an; but if anything is possible for man and conformable to his nature, think that this can be attained by thyself too.

你自己觉得某件事很棘手、难以完成，不要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完成。如果某件事对于别人是可能的，也合乎他的本性，那么你要认为自己也可以做到。

In the gymnastic exercises suppose that a man has torn thee with his nails, and by dashing against thy head has inflicted a wound. Well, we neither show any signs of vexation, nor are we offended, nor do we suspect him afterward as a treacherous fellow; and yet we are on our guard against him, not however as an enemy, nor yet with suspicion, but we quietly get out of his way. Something like this let thy behaviour be in all the other parts of life; let us overlook many things in those who are like antagonists in the gymnasium. For it is in our power, as I said, to get out of the way, and to have no suspicion nor hatred.

假设在体育竞技中一个人用指甲抓伤了你，并且在冲撞中你头部也受伤了，你不要表示出任何恼怒和生气，过后也不要怀疑他是个奸诈之徒。虽然我们还是要要警惕他，但不是把他当成敌人，不是带有猜疑，而是悄悄地避开他。在生活的其他场合里，你也要这样做。让

我们忽略像竞技场上的对手一样的诸多东西吧，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像我所说的，避开他，不猜疑，也不记仇。

If any man is able to convince me and show me that I do not think or act right, I will gladly change; for I seek the truth by which no man was ever injured. But he is injured who abides in his error and ignorance.

如果有人能够说服我并指出，我没有正确地思考和行动，我会乐于改变。因为我寻求的是真理，没人能被真理所伤害。只有执迷不悟和无知的人，才会受到伤害。

I do my duty: other things trouble me not; for they are either things without life, or things without reason, or things that have rambled and know not the way.

我尽我的责任，不受其他事情的烦扰。因为它们要么没有生命，要么没有理性，要么闲逛漫游，不知前路。

As to the animals which have no reason, and generally all things and objects, do thou, since thou hast reason and they have none, make use of them with a generous and liberal spirit. But toward human beings, as they have reason, behave in a social spirit. And on all occasions call on the gods, and do not perplex thyself about the length of time in which thou shalt do this; for even three hours so spent are sufficient.

对于没有理性的动物，还有一般事物和物体，因为你有理性而它们没有，你要以慷慨自由的精神来使用它们。但是人是有理性的，你要以友善的态度对待他们。任何情况下都要向神灵祷告，不要为自己这么做要花多长时间而烦恼，因为即使三小时就足够了。

Alexander the Macedonian and his groom by death were brought to the same state; for either they were received among the same seminal principles of the universe, or they were alike dispersed among the atoms.

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和他的马夫被死亡送到了同一境地，因为他们要么是归于宇宙的最初原则，要么是同样分散到原子当中了。

Consider how many things in the same indivisible time take place in each of us, things which concern the body and things which concern the soul; and so thou wilt not wonder if many more things, or rather all things which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at which is the one and all, which we call Cosmos, exist in it at the same time.

想想在同样不可分割的时间当中，有多少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或与我们的身体有关，或与我们的灵魂有关。因此对于更多的事情，或者所有事情都产生并存在于是唯一也是全部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宇宙之中，不要感到奇怪。

If any man should propose to thee the question, how the name Antoninus is written, wouldst thou with a straining of the voice

utter each letter? What then if they grow angry, wilt thou be angry too? Wilt thou not go on with composure and number every letter? Just so then in this life also remember that every duty is made up of certain parts. These it is thy duty to observe and without being disturbed or showing anger toward those who are angry with thee to go on thy way and finish that which is set before thee.

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安东尼这个名字怎么写？你会用力地说出每一个字母吗？如果他们开始生气，你也会生气吗？你还会继续和气地一个个说出每个字母吗？人生也是如此，每一义务都是由某些部分组成。你的职责就是去遵循它们，不受烦扰或对那些生你气的人表示愤怒，继续走你的路，完成摆在你面前的事情。

How cruel it is not to allow men to strive after the things which appear to them to be suitable to their nature and profitable! And yet in a manner thou dost not allow them to do this, when thou art vexed because they do wrong. For they are certainly moved toward things because they suppose them to be suitable to their nature and profitable to them. But it is not so. Teach them then, and show them without being angry.

不让人们去努力追求他们觉得适合自己本性且有益的事情，是多么残忍啊！然而，当你感到恼怒，因为他们做错了事时，在某种形式上你会不允许他们去做。当然他们被这些事情所牵引，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事情是适合他们本性而又有益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就教导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而不要生气。

Death is a cessation of the impressions through the senses, and

of the pulling of the strings which move the appetites, and of the discursive movements of the thoughts, and of the service to the flesh.

死亡是感官印象的停止，是牵引欲望之绳的断裂，是思想散漫运动的结束，是对肉体服务的终止。

It is a shame for the soul to be first to give way in this life, when thy body does not give way.

在生活中，肉体尚未放弃而灵魂首先屈服，那是一种耻辱。

Take care that thou art not made into a Caesar, that thou art not dyed with this dye; for such things happen. Keep thyself then simple, good, pure, serious, free from affectation, a friend of justice, a worshiper of the gods, kind, affectionate, strenuous in all proper acts. Strive to continue to be such as philosophy wished to make thee. Reverence the gods, and help men. Short is life. There is only one fruit of this terrene life, a pious disposition and social acts. Do everything as a disciple of Antoninus. Remember his constancy in every act which was conformable to reason, and his evenness in all things, and his piety, and the serenity of his countenance, and his sweetness, and his disregard of empty fame, and his efforts to understand things; and how he would never let anything pass without having first most carefully examined it and clearly understood it; and how he bore with those who blamed him unjustly without blaming them in return; how he did nothing in a hurry; and how he listened not to calumnies, and how exact an

examiner of manners and actions he was; and not given to reproach people, nor timid, nor suspicious, nor a sophist; and with how little he was satisfied, such as lodging, bed, dress, food, servants; and how laborious and patient; and how he was able on account of his sparing diet to hold out to the evening, not even requiring to relieve himself by any evacuations except at the usual hour; and his firmness and uniformity in his friendships; and how he tolerated freedom of speech in those who opposed his opinions; and the pleasure that he had when any man showed him anything better; and how religious he was without superstition. Imitate all this that thou mayest have as good a conscience, when thy last hour comes, as he had.

小心不要把自己变成恺撒，不要浸染这样的色彩，因为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让自己单纯、善良、纯洁、认真，不做作，爱正义，敬畏神灵，和善、深情，勤于做事，勇于负责。努力成为哲学希望你成为的样子吧。敬重神灵，帮助众生。人生苦短。在这尘世的生活中，只有一样果实——虔诚的性格和合群的行为。要像安东尼的信徒那样做事。记住他每做一件事情都坚持符合理性，公平对待所有事情。他虔诚、表情安宁，他体贴，不图虚名，努力了解事物；做什么事情，他都要先仔细检查并了解清楚，对那些不公指责，他保持容忍的态度，并不反唇相讥。他做事不慌不忙，不听信诽谤，为人审慎周密，举止得当；他从不责怪别人，不胆怯，不猜疑，也不诡辩；在住处、床铺、衣服、食物、仆人等方面很容易满足；他勤奋耐心；靠简朴的餐食就能坚持到晚上，除了正常的时间不需要任何休息；对友谊忠贞不渝；他容忍那些反对他观点的人，主张言论自由，有人向他指出更好的见解，他会很高兴；他虔诚但不迷信。学习他所有这一切，在弥留之际，你就会像他一样成为一个有良心的好人。

Return to thy sober senses and call thyself back; and when thou

hast roused thyself from sleep and hast perceived that they were only dreams which troubled thee, now in thy waking hours look at these (the things about thee) as thou didst look at those (the dreams).

唤回自己，重找清醒的感觉。当你从睡梦中醒来，发觉烦扰你的不过是梦境，现在你清醒了，面对现实，就像你曾面对梦境一样。

I consist of a little body and soul. Now to this little body all things are indifferent, for it is not able to perceive differences. But to the understanding those things only are indifferent, which are not the works of its own activity. But whatever things are the works of its own activity, all these are in its power. And of these however only those which are done with reference to the present; for as to the future and the past activities of the mind, even these are for the present indifferent.

我由小小的躯体和灵魂组成。对于这小小的躯体，一切事物都是不相干的，因为它不能觉察差异。但对于理解来说，那些不是由其活动产生的事物才是不相干的。但凡是自身活动产生的结果，都在其本身的支配之下。只有那些与现在有关的事情是属于这些东西的，因为对于未来和过去的心灵活动，对于现在来说也是不相干的。

Neither the labour which the hand does nor that of the foot is contrary to nature, so long as the foot does the foot's work and the hand the hand's. So then neither to a man as a man is his labour contrary to nature, so long as it does the things of a man. But if the labour is not contrary to his nature, neither is it an evil to him.

只要手、脚各司其职，手和脚的劳动并不违背本性。所以对于人来说，只要他做的事和人有关，人的劳动就没有违背本性。如果劳动没有违背他的本性，那么对他而言这也就不是邪恶的。

How many pleasures have been enjoyed by robbers, patricides, tyrants.

抢劫犯、弑父者和暴君享受了多少快乐啊！

Dost thou not see how the handicraftsmen accommodate themselves up to a certain point to those who are not skilled in their craft-nevertheless they cling to the reason (the principles) of their art and do not endure to depart from it? Is it not strange if the architect and the physician shall have more respect to the reason (the principles) of their own arts than man to his own reason, which is common to him and the gods?

你是否注意过，一个技艺在身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对“外行人”妥协让步的，但他对技艺的理性（基本原则）是一定要坚持的，从不会离开它？如果建筑师和医生对他们技艺的理性（原则）的尊重，甚于人对自己理性（这对人和神共通）的尊重，这不是很奇怪吗？

Asia, Europe are corners of the universe; all the sea a drop in the universe; Athos a little clod of the universe; all the present time is a point in eternity. All things are little, changeable, perishable.

All things come from thence, from that universal ruling power either directly proceeding or by way of sequence. And accordingly the lion's gaping jaws, and that which is poisonous, and every harmful thing, as a thorn, as mud, are after-products of the grand and beautiful. Do not then imagine that they are of another kind from that which thou dost venerate, but form a just opinion of the source of all.

亚洲、欧洲是宇宙的角落；所有的海洋不过是宇宙的一滴水；阿陀斯山也只是宇宙的一小块；所有的现在只是永恒的一点。一切都是渺小、易变、易逝的。万物都来源于此——那宇宙的主宰力量，要么直接产生，要么后继出现。所以，狮子张开的大嘴，有毒的东西，一切有害的东西比如荆棘、烂泥，都是伟大、美好事物的副产品。不要把它们想象成与你尊崇的东西截然不同的东西，而要形成对万物起源的公正观点。

He who has seen present things has seen all, both everything which has taken place from all eternity and everything which will be for time without end; for all things are of one kin and of one form.

一个人看到现在的一切，就看到了亘古以来的一切，以及那永恒将来的一切，万物皆同源同类。

Frequently consider the connection of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and their relation to one another. For in a manner all things are implicated with one another, and all in this way are friendly to one another; for one thing comes in order after another, and this is by

virtue of the active movement and mutual conspiration and the unity of the substance.

经常想想宇宙间万物的联系和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因为在某种方式上万物是相互牵连的，所以彼此友好。事物依次按序出现，这是物质的积极运动、相互协作以及物质的统一性造成的。

Adapt thyself to the things with which thy lot has been cast; and the men among whom thou hast received thy portion, love them, but do it truly,sincerely.

让自己适应命运安排的东西，还有命中注定要遇到的人，爱他们，而且要真正地、真诚地去爱。

Every instrument, too, vessel, if it does that for which it has been made, is well, and yet he who made it is not there. But in the things which are held together by nature there is within and there abides in them the power which made them; wherefore the more is it fit to reverence this power, and to think that, if thou dost live and act according to its will, everything in thee is in conformity to intelligence. And thus also in the universe the things which belong to it are in conformity to intelligence.

每一样工具、器皿，如果完成了它的使命，就是好的，虽然那个创造它的人已经离它而去了。但在由自然组合的物体里面，创造他们的力量依然留驻其间；所以应该格外尊崇它，并且要想，如果你确实按照它的意愿来生活和行动，那么你的一切都与理性相符。同样，宇

宙万物也就与理性相符。

Whatever of the things which are not within thy power thou shalt suppose to be good for thee or evil, it must of necessity be that, if such a bad thing befall thee or the loss of such a good thing, thou wilt blame the gods, and hate men too, those who are the cause of the misfortune or the loss, or those who are suspected of being likely to be the cause; and indeed we do much injustice, because we make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hings. But if we judge only those things which are in our power to be good or bad, there remains no reason either for finding fault with God or standing in a hostile attitude to man.

对于你无法支配、无从选择的事物，不管是什么，假设它对你是好的或是坏的，如果坏事落在你头上，或是好事错过了，你必然会责怪神灵，憎恨那些造成不幸或损失的人，或那些你怀疑有可能是起因的人。我们确实做了很多不公的事情，因为我们区别对待这些事物。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能支配的东西分成好的和坏的，那就没有理由挑剔神灵，或对人持有敌意了。

We are all working together to one end, some with knowledge and design, and others without knowing what they do; as men also when they are asleep, of whom it is Heraclitus, I think, who says that they are labourers and co-operators in the things which take place in the universe. But men co-operate after different fashions: and even those co-operate abundantly, who find fault with what happens and those who try to oppose it and to hinder it; for the universe had need even of such men as these. It remains then for thee to understand among what kind of workmen thou placest

thyself; for he who rules all things will certainly make a right use of thee, and he will receive thee among some part of the co-operators and of those whose labours conduce to one end. But be not thou such a part as the mean and ridiculous verse in the play, which Chrysippus speaks of.

我们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工作，有些人有知识和计划，另一些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像赫拉克利特说过，好像人在睡眠中一样，他们也是宇宙间发生之事的劳动者和合作者。人以不同方式合作：甚至那些经常合作的人也会对发生的事、试图反对或阻止的人表示不满。因为宇宙也需要这样的人。因此你要明白自己属于哪一种工作者，因为万物的主宰会正确使用你，会把你接收为合作者的某一部分，接收为为目标工作的劳动者的一员。但不要成为克里西波斯所说的那种猥琐而滑稽的剧中角色。

Does the sun undertake to do the work of the rain, or Aesculapius the work of the Fruit-bearer (the earth)? And how is it with respect to each of the stars, are they not different, and yet they work together to the same end?

太阳承担了雨的工作，或者埃斯科拉庇俄斯承担了果树（大地）的工作吗？就每颗星星而言，它们是不同的，然而它们不也是为一个目标而工作吗？

If the gods have determined about me and about the things which must happen to me, they have determined well, for it is not easy even to imagine a deity without forethought; and as to doing me harm, why should they have any desire towards that? for what

advantage would result to them from this or to the whole, which is the special object of their providence? But if they have not determined about me individually, they have certainly determined about the whole at least, and the things which happen by way of sequence in this general arrangement I ought to accept with pleasure and to be content with them. But if they determine about nothing—which it is wicked to believe, or if we do believe it, let us neither sacrifice nor pray nor swear by them, nor do anything else which we do as if the gods were present and lived with us—but if however the gods determine about none of the things which concern us, I am able to determine about myself, and I can inquire about that which is useful; and that is useful to every man which is conformable to his own constitution and nature. But my nature is rational and social; and my city and country, so far as I am Antoninus, is Rome, but so far as I am a man, it is the world. The things then which are useful to these cities are also useful to me.

如果神灵决定了我和必须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他们的决定便是好的，因为是神灵而没有先见之明，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至于说神灵要加害于我，他们为什么要有那样的想法呢？因为那样做对于他们，或对于整体——他们特殊眷顾的对象——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他们没有对我这个个体做出决定，至少他们肯定对整体做出了决定，还有在这总体安排中依次出现的事情，我应该欣然接受并乐于满足。如果他们什么也没有决定——这么想是邪恶的，或者如果我们确实相信这一点，那就让我们既不祭祀，也不祈祷，也不对他们起誓，不做任何神灵出现或和我们同在的事情——但如果神灵没有决定任何与我们有关的事情，我能够自己决定，我能询问什么是有用的。对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是适合他自己的构成和本性的。不过我的本性是理性的、合群的；如果我是安东尼，我的城市、我的国家就是罗马，但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我的城市、我的国家就是全世界。那么，于这些城市有用的东西，于我也是有用的。

Whatever happens to every man, this is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universal: this might be sufficient. But further thou wilt observe this also as a general truth, if thou dost observe, that whatever is profitable to any man is profitable also to other men. But let the word profitable be taken here in the common sense as said of things of the middle kind, neither good nor bad.

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都是为了宇宙的利益，这可能就足够了。但更进一步，你就会发现这也是一个普遍真理，如果你确实观察到了，对于任何一个人有益的也对其他人有益。以普通的意义来理解“有益的”这个词，就像说中性的东西，没有好坏之分。

As it happens to thee in the amphitheatre and such places, that the continual sigh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the uniformity make the spectacle wearisome, so it is in the whole of life; for all things above, below, are the same and from the same. How long then?

在圆形剧场之类的地方不断上演同样的场景和同样的节目，会使人厌倦。人生也是如此。因为所有天上、地下的事物都是一样的，并且来源一样，还要看多久呢？

Think continually that all kinds of men and of all kinds of pursuits and of all nations are dead, so that thy thoughts come down even to Philistion and Phoebus and Origanion. Now turn thy thoughts to the other kinds of men. To that place then we must remove, where there are so many great orators, and so many noble philosophers, Heraclitus, Pythagoras, Socrates; so many heroes of

former days, and so many generals after them, and tyrants; besides these, Eudoxus, Hipparchus, Archimedes, and other men of acute natural talents, great minds, lovers of labour, versatile, confident, mockers even of the perishable and ephemeral life of man, as Menippusand such as are like him. As to all these consider that they have long been in the dust. What harm then is this to them; and what to those whose names are altogether unknown? One thing here is worth a great deal, to pass thy life in truth and justice, with a benevolent disposition even to liars and unjust men.

常常想一想，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追求，来自各个国家，他们都死了，这使你回想到菲利斯蒂翁、福玻斯和奥里加农。现在再想想其他类型的人。这样我们必须去到那个地方，那儿有如此多的雄辩家，如此多高贵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如此多的古代英雄，之后又有如此多的将军和暴君。此外还有尤多克索斯、喜帕恰斯、阿基米德和其他天赋敏锐、思想伟大、热爱劳动、多才多艺、自信、嘲笑生命易朽和短暂的人，比如门尼帕斯和其他与他相似的人。想想所有这些人早已归于尘土，这对他们还有什么伤害呢？对于那些完全不知姓名的人又有什么伤害呢？在此只有一件事颇有价值，就是在真理和正义中度过你的一生，对于骗子和不义之人都持仁爱之心。

When thou wishest to delight thyself, think of the virtues of those who live with thee; for instance, the activity of one, and the modesty of another, and the liberality of a third, and some other good quality of a fourth. For nothing delights so much as the examples of the virtues, when they are exhibited in the morals of those who live with us and present themselves in abundance, as far as is possible. Wherefore we must keep them before us.

当你想要使自己开心，就想想那些和你一起生活的人的美德，比如，这个人积极，另一个人谦逊，第三个人大方，第四个人有其他的好品质。因为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当他们的道德以美德的形式尽可能地充分展现出来，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开心的了。我们必须要把它们留在眼前。

Thou art not dissatisfied, I suppose, because thou weighest only so many litrae and not three hundred. Be not dissatisfied then that thou must live only so many years and not more; for as thou art satisfied with the amount of substance which has been assigned to thee, so be content with the time.

我想，你不会因为自己的体重只有这么重而不是三百磅而感到不满意吧？不要为你只能活这些年而不是更长而不满，就像你满足于分配给你的身体重量，你也要满足于分配给你的时间限度。

Let us try to persuade them (men). But act even against their will, when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lead that way. If, however, any man using force stands in thy way, betake thyself to contentment and tranqui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employ the hindrance toward the exercise of some other virtue; and remember that thy attempt was with a reservation, that thou didst not desire to do impossibilities. What then didst thou desire? Some such effort as this. But thou attainest thy object, if the things to which thou wast moved are accomplished.

让我们试着劝说人们。当正义的原则指向那条路时，即便是违背他们的意愿，也要循着那个方向去做。如果有人用武力阻挡你的去

路，你也要保持自足和宁静，同时利用这阻碍去练习其他的美德，记住你的尝试是有保留的，你并不想做不可能的事。你想做什么？一些像这样的努力。如果你被推着去做的事情完成了，你就达到了你的目标。

He who loves fame considers another man's activity to be his own good; and he who loves pleasure, his own sensations; but he who has understanding, considers his own acts to be his own good.

爱好虚名的人把别人的行动看作是对自己有利；贪图享乐的人则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感官享受；有智慧的人把自己的行动看成是对自己有利。

It is in our power to have no opinion about a thing, and not to be disturbed in our soul, for things themselves have no natural power to form our judgments.

我们可以决定的是，不要对事物抱有看法，不要打扰我们的灵魂。因为事物本身没有自然能力形成我们的判断。

Accustom thyself to attend carefully to what is said by another, and as much as it is possible, be in the speaker's mind.

让自己习惯于倾听别人说话吧，尽可能地进入说话者的内心。

That which is not good for the swarm, neither is it good for the bee.

对于蜂群不好的事，对于一只蜜蜂也是不好的。

If sailors abused the helmsman or the sick the doctor, would they listen to anybody else; or how could the helmsman secure the safety of those in the ship or the doctor the health of those whom he attends?

如果水手辱骂舵手，病人辱骂医生，他们会听别人的话吗？舵手怎能保证船上人员的安全，医生怎能保证他的病人的健康？

How many together with whom I came into the world are already gone out of it.

多少和我一起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已经离世而去了。

To the jaundiced honey tastes bitter, and to those bitten by mad dogs water causes fear; and to little children the ball is a fine thing. Why then am I angry? Dost thou think that a false opinion has less power than the bile in the jaundiced or the poison in him who is bitten by a mad dog?

对于黄疸病患者来说，蜜尝起来是苦的；对于被疯狗咬过的人来

说，水会引起恐惧；对于小孩来说，球是个好东西。那我为什么要生气呢？比起黄疸病患者的胆汁或被疯狗咬过的人的毒液，你认为难道错误的意见力量会更小吗？

No man will hinder thee from living according to the reason of thy own nature: nothing will happen to thee contrary to the reason of the universal nature.

没人会阻止你按照自己本性的理性来生活，没有什么违背宇宙本性之理性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

What kind of people are those whom men wish to please, and for what objects, and by what kind of acts? How soon will time cover all things, and how many it has covered already.

人们想要讨好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为了什么目的，用什么手段呢？时间会多么迅速地淹没一切，而它已经淹没了多少东西啊！

Book Seven

卷七

What is badness? It is that which thou hast often seen. And on the occasion of everything which happens keep this in mind, that it is that which thou hast often seen. Everywhere up and down thou wilt find the same things, with which the old histories are filled, those of the middle ages and those of our own day; with which cities and houses are filled now. There is nothing new; all things are both familiar and short-lived.

什么是恶？它是你司空见惯的东西。在发生一切事情的时候，都要把这牢记在心：恶是你司空见惯的。你会在从上到下每个地方发现同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填充了古代的历史、中古的历史和我们当今的历史，现在也充斥着城市和家庭。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一切都是熟悉而短暂的。

How can our principles become dead, unless the impressions (thoughts) which correspond to them are extinguished? But it is in thy power continuously to fan these thoughts into a flame. I can have that opinion about anything, which I ought to have. If I can, why am I disturbed? The things which are external to my mind have no relation at all to my mind. Let this be the state of thy affects, and thou standest erect. To recover thy life is in thy power. Look at things again as thou didst use to look at them; for in this consists the recovery of thy life.

我们的原则怎会死亡？除非和它们相应的印象（思想）已灭亡。你完全有能力不断地把这些思想扇成旺盛的火焰。对任何事物我都能有自己该有的看法。如果我能，为什么我要烦恼呢？心灵之外的东西与我的心灵毫无关系。让这成为你情感的状态吧，你就能昂然挺立。恢复你的生命在你力量范围之内。用你过去看待事物的方式再去审视它们，因为生命的恢复就在于此。

The idle business of show, plays on the stage, flocks of sheep, herds, exercises with spears, a bone to cast to little dogs, a bit of bread into fish-ponds, labourings of ants and burden-carrying, runnings about of frightened little mice, puppets pulled by strings—all alike. It is thy duty then in the midst of such things to show good humour and not a proud air; to understand, however, that every man is worth just so much as the things are worth about which he busies himself.

无聊的展示、舞台上的表演、羊群兽群、刀枪练习、扔给小狗的骨头、投入鱼池的面包屑、蚂蚁的劳作和搬运、受惊的小老鼠四散奔逃、绳子牵引的木偶等等都是一样的。那么，身处其中，你有责任保持心平气和而不是盛气凌人；要知道，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就如同他所忙碌的事情有价值一样。

In discourse thou must attend to what is said, and in every movement thou must observe what is doing. And in the one thou shouldst see immediately to what end it refers, but in the other watch carefully what is the thing signified.

交谈中你要注意倾听，行动中你要注意观察。在倾听中你要马上

看出它的目标指向，在观察中要看出它的内涵意味。

Is my understanding sufficient for this or not? If it is sufficient I use it for the work as an instrument given by the universal nature. But if it is not sufficient, then either I retire from the work and give way to him who is able to do it better, unless there be some reason why I ought not to do so; or I do it as well as I can, taking to help me the man who with the aid of my ruling principle can do what is now fit and useful for the general good. For whatsoever either by myself or with another I can do, ought to be directed to this only, to that which is useful and well suited to society.

我的理解是否足够胜任这一工作？如果足够，我就把它作为宇宙本性赋予的工具应用到工作中去。如果不够，要么我退出这项工作，让给那些能做得更好的人（除非有某个理由让我不这样做）；要么我尽力而为，接受这样的人的帮助，他能借助于我的原则，做对公共福祉合适并有用的事情。因为不管做什么，是由我独自去做还是与人合作，都应该仅仅指向那对社会有用、合适的事情。

How many after being celebrated by fame have been given up to oblivion; and how many who have celebrated the fame of others have long been dead.

有多少声名显赫的人被遗忘了，又有多少为别人歌功颂德的人早已死去。

Be not ashamed to be helped; for it is thy business to do thy

duty like a soldier in the assault on a town. How then, if being lame thou canst not mount up on the battlements alone, but with the help of another it is possible?

不要耻于受助，因为你的任务就是像一名攻城士兵那样去履行职责。那么，如果你因为跛足无法独自爬上城垛，而在别人的帮助下却可以时，你会怎么办呢？

Let not future things disturb thee, for thou wilt come to them, if it shall be necessary, having with thee the same reason which now thou usest for present things.

不要让未来的事烦扰你，因为如果必要的话，你会带着应对当下所使用的理性去面对未来。

All things are implicated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bond is holy; and there is hardly anything unconnected with any other thing. For things have been co-ordinated, and they combine to form the same universe (order). For there is one universe made up of all things, and one god who pervades all things, and one substance, and one law, one common reason in all intelligent animals, and one truth; if indeed there is also one perfection for all animals which are of the same stock and participate in the same reason.

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联系是神圣的。几乎没有什么事物互不关联。事物经过协调，组合成同一个宇宙（秩序）。万物组成宇宙，有一个存在于万物的神，一种物质，一种法则，一种所有理智

动物都有的共同理性，一个真理。如果所有动物来自同一根源，分享同样的理性，那就真的是至善至美了。

Everything material soon disappears in the substance of the whole; and everything formal (causal) is very soon taken back into the universal reason; and the memory of everything is very soon overwhelmed in time.

一切物质的东西很快就会消失在整体的实体之中，一切形式的（形式因）东西很快就会被带回宇宙的理性中去，一切的记忆很快就会被时间吞没。

To the rational animal the same act is according to nature and according to reason.

对于理性动物而言，依据本性和理性是一回事。

Be thou erect, or be made erect.

你自己要直立，否则就会被扶直。

Just as it is with the members in those bodies which are united in one, so it is with rational beings which exist separate, for they have been constituted for one co-oper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is will be more apparent to thee, if thou often sayest to thyself

that I am a member (melos) of the system of rational beings. But if (using the letter r) thou sayest that thou art a part (meros), thou dost not yet love men from thy heart; beneficence does not yet delight thee for its own sake; thou still doest it barely as a thing of propriety, and not yet as doing good to thyself.

正如身体各部位统一于一身，同样的，各自分离的理性生命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是为了一种合作而构成的。如果你经常对自己说，我是理性生命体系中的一员，你就会更清楚地觉察这一点。但如果你说你只是其中一部分，说明你并没有发自内心地热爱人类，你还没有从善行本身中得到快乐，你只是把它当成适宜的事情来做，没有把它看成是对你自己行善。

Let there fall externally what will on the parts which can feel the effects of this fall. For those parts which have felt will complain, if they choose. But I, unless I think that what has happened is an evil, am not injured. And it is in my power not to think so.

让那些外部降临的东西落在可以感觉到这降临效果的部分上去吧。如果那些感觉得到的部分要选择的话，它们会抱怨的。但是，除非我认为发生的事情是一种邪恶，我不会受到伤害。我完全有能力不这么去想。

Whatever any one does or says, I must be good, just as if the gold, or the emerald, or the purple were always saying this: Whatever any one does or says, I must be emerald and keep my colour.

不管别人做什么或说什么，我必须是善的，正如黄金、绿宝石或帝王的紫袍那么说：不管别人做什么说什么，我必须是一块绿宝石，保持我的颜色。

The ruling faculty does not disturb itself; I mean, does not frighten itself or cause itself pain. But if any one else can frighten or pain it, let him do so. For the faculty itself will not by its own opinion turn into such ways. Let the body itself take care, if it can, that it suffer nothing, and let it speak, if it suffers. But the soul itself, that which is subject to fear, to pain, which has completely the power of forming an opinion about these things, will suffer nothing, for it will never deviate into such a judgment. The leading principle in itself wants nothing, unless it makes a want for itself; and therefore it is both free from perturbation and unimpeded, if it does not disturb and impede itself.

支配、主宰的能力不会打扰自身，我的意思是，不会吓唬自己或让自己痛苦。但如果有人能吓唬它或使它痛苦，那就让他这样做吧。因为这一能力本身并不会被自己的意见所改变。如果可以，就让身体本身照料它自己吧，不要让它受苦；如果受苦了，那就让它说出来。但是受制于恐惧和痛苦的灵魂本身，完全有能力对这些事情形成一种看法，却是不会受苦的，因为它不会偏向这样的判断。指引的原则除了为自己创造一种需求之外，其本身无所需求。这样，如果它不去打扰和妨碍自己，它是不受烦扰和阻碍的。

Eudaemonia(happiness) is a good daemon, or a good thing. What then art thou doing here, O imagination? Go away, I entreat thee by the gods, as thou didst come, for I want thee not. But thou art come according to thy old fashion. I am not angry with thee:

only go away.

尤达摩尼亚（幸福）是一个好的神明，一个好东西。啊，幻想，那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就像你来的那样，走开吧，我以神的名义恳请你。因为我并不需要你。但是你还是按老套路来了，我不生你的气，只是请你离开。

Is any man afraid of change? Why, what can take place without change? What then is more pleasing or more suitable to the universal nature? And canst thou take a bath unless the wood undergoes a change? And canst thou be nourished unless the food undergoes a change? And can anything else that is useful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change? Dost thou not see then that for thyself also to change is just the same, and equally necessary for the universal nature?

有人害怕变化吗？啊，要是没有变化，什么事情能发生呢？什么东西使宇宙的本性更愉悦、对其更适合呢？木柴不经历变化，你能洗澡吗？食物不经历变化，你能得到营养吗？如果没有变化，其他有用的东西能够形成吗？你没有看到对于你自己，对于变化，甚至对于宇宙本性来说，都是必要的吗？

Through the universal substance as through a furious torrent all bodies are carried, being by their nature united with and cooperating with the whole, as the parts of our body with one another. How many a Chrysippus, how many a Socrates, how many an Epictetus has time already swallowed up? And let the same thought occur to thee with reference to every man and thing.

所有的物体都被带着通过宇宙的实体，就像通过一条湍急的河流，它们本质上与整体统一协作，就像我们身体的各部分相互统一协作一样。时间吞没了多少个克里西波斯，多少个苏格拉底，多少个爱比克泰德？以同样的想法来看待每个人、每件事吧。

One thing only troubles me, lest I should do something which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does not allow, or in the way which it does not allow, or what it does not allow now.

只有一件事情烦扰我，那就是唯恐我会做出人的体格不允许的事，或是以它不允许的方式来做，或是做出它现在不允许的事情。

Near is thy forgetfulness of all things; and near the forgetfulness of thee by all.

你忘记所有事物的时刻临近了，你被所有人遗忘的时刻也已临近。

It is peculiar to man to love even those who do wrong. And this happens, if when they do wrong it occurs to thee that they are kinsmen, and that they do wrong through ignorance and unintentionally, and that soon both of you will die; and above all, that the wrong-doer has done thee no harm, for he has not made thy ruling faculty worse than it was before.

爱那些做错事的人，是人的特性。他们做错事了，你如果想到他们是你的亲人同胞，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他们做错是由于无知和不自觉而不是出于故意。不久你们都会死去。最重要的是，做错事的人没有对你造成伤害，因为他没有让你的自我支配能力比以前更糟糕。

The universal nature out of the universal substance, as if it were wax, now moulds a horse, and when it has broken this up, it uses the material for a tree, then for a man, then for something else; and each of these things subsists for a very short time. But it is no hardship for the vessel to be broken up, just as there was none in its being fastened together.

来自于宇宙实体之外的宇宙本性，就如同蜡一样，现在用来塑造一匹马，当把马打碎后，再用这材料做一棵树，然后做一个人，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些个东西只能存在很短的时间。但对于容器来说，被打碎并不是什么艰难的事，正如它被组装起来也并不是什么艰难的事一样。

A scowling look is altogether unnatural; when it is often assumed, the result is that all comeliness dies away, and at last is so completely extinguished that it cannot be again lighted up at all. Try to conclude from this very fact that it is contrary to reason. For if even the perception of doing wrong shall depart, what reason is there for living any longer?

皱眉的样子是不自然的，如果经常这样，其结果就是所有的秀丽都会消失，最后消失殆尽，以至于根本无法再恢复。试着从这一事实得出结论：它是违背理性的。因为如果连对做错事的感知甚至都消失

了，那还有什么理性会继续存在呢？

Nature which governs the whole will soon change all things which thou seest, and out of their substance will make other things, and again other things from the substance of them, in order that the world may be ever new.

主宰宇宙的理性不久将会改变你所见的所有事物，并从它们的实体中当中创造出其他事物，然后又从这些事物中创造出别的事物，这样一来，世界就会常换常新。

When a man has done thee any wrong, immediately consider with what opinion about good or evil he has done wrong. For when thou hast seen this, thou wilt pity him, and wilt neither wonder nor be angry. For either thou thyself thinkest the same thing to be good that he does, or another thing of the same kind. It is thy duty then to pardon him. But if thou dost not think such things to be good or evil, thou wilt more readily be well-disposed to him who is in error.

当一个人对你做错了什么，马上想想他是以什么样的善恶观做错事的。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可怜他，就不会感到奇怪或是生气。因为要么你自己认为他在做的同一件事情是善的，要么是另一件同类的事情是善的。因此你的任务就是原谅他。但如果你不认为这样的事情是善的或是恶的，你将更愿意好好地对待身处错误中的人。

Think not so much of what thou hast not as of what thou hast: but of the things which thou hast select the best, and then reflect

how eagerly they would have been sought, if thou hadst them not.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ake care that thou dost not through being so pleased with them accustom thyself to overvalue them, so as to be disturbed if ever thou shouldst not have them.

不要老是把你没有的东西想成是你有的，而要想着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然后反思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它们，你会多么渴望追求它们。同时无论如何要注意，你没有因为太喜欢而让自己习惯于过分高估它们，以至于一旦不再拥有，你就会烦躁不安。

Retire into thyself. The rational principle which rules has this nature, that it is content with itself when it does what is just, and so secures tranquility.

回归自身吧。主宰的理性原则有这一本性，当它做了正当的事情就会自我满足，也就获得了安宁。

Wipe out the imagination. Stop the pulling of the strings. Confine thyself to the present. Understand well what happens either to thee or to another. Divide and distribute every object into the causal (formal) and the material. Think of thy last hour. Let the wrong which is done by a man stay there where the wrong was done.

摒弃幻想。不要受它们的牵引。把自己限制在当下。好好理解发生在你或是别人身上的事情。把每一事物划归为原因的（形式的）部分和物质的部分。想想你的最后时刻。让一个人做错的事情停留在做

错事情的地方。

Direct thy attention to what is said. Let thy understanding enter into the things that are doing and the things which do them.

你要注意所说的话。让理解力进入到正在做的事情和做这些事情的主体当中去。

Adorn thyself with simplicity and modesty and with indifference towards the things which lie between virtue and vice. Love mankind. Follow God. The poet says that Law rules all. And it is enough to remember that law rules all.

用简单、谦虚和对介乎善恶之间的事物的中立态度来装饰你自己。热爱人类，追随神明。诗人说："法治万物。"记住法治万物就足够了。

About death: whether it is a dispersion, or a resolution into atoms, or annihilation, it is either extinction or change.

关于死亡：不管它是一种消散，还是分解为原子，抑或是虚无，它都是毁灭，或者变化。

About pain: the pain which is intolerable carries us off; but that which lasts a long time is tolerable; and the mind maintains its own

tranquility by retiring into itself, and the ruling faculty is not made worse. But the parts which are harmed by pain, let them, if they can, give their opinion about it.

关于痛苦：那不可忍受的痛苦把我们的生命夺去，而那长期持续的痛苦是可以忍受的。心灵通过隐退到自身，可以维持自己的宁静，主宰的能力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差。但是对于被痛苦损害的身体部位，可以的话，就让它们表达意见吧。

About fame: look at the minds of those who seek fame, observe what they are, and what kind of things they avoid, and what kind of things they pursue. And consider that as the heaps of sand piled on one another hide the former sands, so in life the events which go before are soon covered by those which come after.

关于名声：看看那些追求名声的人的内心，观察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在避免什么，他们在追求什么。想想那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沙堆，掩埋了之前的沙子，生活也是如此，先前发生的事情很快会被之后发生的事情所覆盖。

From Plato: the man who has an elevated mind and takes a view of all time and of all substance, dost thou suppose it possible for him to think that human life is anything great? It is not possible, he said. Such a man then will think that death also is no evil. Certainly not.

柏拉图说：一个有着高尚心灵并且仔细观察所有时间和物质的

人，你想他会认为人的生命是什么伟大的东西吗？不可能，他说。这样的人也不会把死亡看作是恶。当然不会。

From Antisthenes: It is royal to do good and to be abused.

安提西尼说：行善事而遭毁誉是高贵的。

It is a base thing for the countenance to be obedient and to regulate and compose itself as the mind commands, and for the mind not to be regulated and composed by itself.

当心灵发出命令，面容顺从而且调节自己，使自己镇静；但心灵却不能自我调节、自我镇静，这是件坏事。

It is not right to vex ourselves at things, For they care nought about it.

因事物而自我烦恼是不对的，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在乎。

To the immortal gods and us give joy.

将欢乐献给不朽的神明和我们自己吧。

Life must be reaped like the ripe ears of corn:

生命须像成熟的麦穗一样收割：

One man is born; another dies.

一人出生；另一人死亡。

If gods care not for me and for my children, There is a reason for it.

如果神灵不关心我和我的孩子，其中必有缘由。

For the good is with me, and the just.

因为善与我同在，正义亦与我同在。

No joining others in their wailing, no violent emotion.

不要加入别人的哭泣，不要有太强烈的感情。

From Plato: But I would make this man a sufficient answer,

which is this: Thou sayest not well, if thou thinkest that a man who is good for anything at all ought to compute the hazard of life or death, and should not rather look to this only in all that he does, whether he is doing what is just or unjust, and the works of a good or a bad man.

柏拉图说，但是我会给这个人一个满意的答案，这就是：如果你认为一个凡事都擅长的人应该推算生或死的可能性，而不是关注他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是好人还是坏人的工作，这是一种不好的想法。

For thus it is, men of Athens, in truth: wherever a man has placed himself thinking it the best place for him, or has been placed by a commander, there in my opinion he ought to stay and to abide the hazard, taking nothing into the reckoning, either death or anything else, before the baseness of deserting his post.

雅典人啊，因为这确实如此：不管一个人置身何处，是他自己安排的，还是主宰者安排的，都认为这是对他最好的地方，在我看来，他不应放弃卑微的职位，应该留在那里，顺从这偶然安排，不考虑死亡或任何别的东西。

But, my good friend, reflect whether that which is noble and good is not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saving and being saved; for as to a man living such or such a time, at least one who is really a man, consider if this is not a thing to be dismissed from the thoughts: and there must be no love of life: but as to these matters a man must intrust them to the deity and believe what the women

say, that no man can escape his destiny, the next inquiry being how he may best live the time that he has to live.

但是，我的好朋友，想想那高尚、善良的事情是不是某种与拯救和被拯救相同的事情；对于一个生活这么长或那么长一段时间的人，至少是一个真正的人来说，想想这是不是一件不该脱离这种思想的事情：这儿肯定没有对生活的热爱，而一个人必须把这些事情交给神，并且相信命运女神说的，没人能逃脱他的命运。接着要探究的则是，如何最好地度过他必须度过的时间。

Look round at the courses of the stars, as if thou wert going along with them; and constantly consider the changes of the elements into one another; for such thoughts purge away the filth of the terrene life.

环视星体运行的轨道，好像你与它们一同转动一样，不断地考虑元素之间的相互变化，这样想，你将涤荡尘世生命的污秽。

This is a fine saying of Plato: That he who is discoursing about men should look also at earthly things as if he viewed them from some higher place; should look at them in their assemblies, armies, agricultural labours, marriages, treaties, births, deaths, noise of the courts of justice, desert places, various nations of barbarians, feasts, lamentations, markets, a mixture of all things and an orderly combination of contraries.

柏拉图这句话说得好：谈论人类的时候，应该像站在更高处俯视

一样来观察世事，应从聚集的人群、军队、农业劳作、婚嫁、条约、出生、死亡、法庭的喧闹、沙漠地带、野蛮民族、盛宴、哀伤、集市、各种事物的混合，以及矛盾事物有序的组合来看待他们。

Consider the past; such great changes of political supremacies. Thou mayest foresee also the things which will be. For they will certainly be of like form, and it is not possible that they should deviate from the order of the things which take place now: accordingly to have contemplated human life for forty years is the same as to have contemplated it for ten thousand years. For what more wilt thou see?

想想过去：政治霸权变化如此巨大。你也可以预见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们肯定会有着相同的形式，而且它们不可能偏离现在发生的事情的秩序，所以思考四十年的人类生活和思考一万年的人类生活一样。你还会看到更多什么东西呢？

That which has grown from the earth to the earth, but that which has sprung from heavenly seed, back to the heavenly realms returns.

地里长出的东西要回到地里去，而那从天国的种子诞生的，也将回到天国。

This is either a dissolution of the mutual involution of the atoms, or a similar dispersion of the insentient elements.

这要么是原子相互结合的分解，要么是无知觉元素的类似的消散。

With food and drinks and cunning magic arts.

带着食物、酒和狡猾的魔术，

Turning the channel's course to 'scape from death.

扭转狭道的轨迹以逃脱一死；

The breeze which heaven has sent

天国吹来的微风，

We must endure, and toil without complaining.

我们必须忍受，辛勤劳作而不抱怨。

Another may be more expert in casting his opponent; but he is not more social, nor more modest, nor better disciplined to meet all that happens, nor more considerate with respect to the faults of his neighbours.

一个人可能更善于摔倒他的对手，但他不是更友善，更谦虚，也不是更训练有素以应付所有发生的事情，抑或没有更体谅邻居的过错。

Where any work can be done conformably to the reason which is common to gods and men, there we have nothing to fear; for where we are able to get profit by means of the activity which is successful and proceeds according to our constitution, there no harm is to be suspected.

在任何工作都能按照人神共有的理性来做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在我们能从成功的并按我们体质进行的活动中得益的地方，不必怀疑有什么伤害。

Everywhere and at all times it is in thy power piously to acquiesce in thy present condition, and to behave justly to those who are about thee, and to exert thy skill upon thy present thoughts, that nothing shall steal into them without being well examined.

无论何时何地，这都是你力所能及的：虔诚地默默接受你现在的条件，公正地对待周围的人，把你的技艺融入思想，未经仔细检查不要让任何东西潜入思想当中。

Do not look around thee to discover other men's ruling principles, but look straight to this, to what nature leads thee, both

the universal nature through the things which happen to thee, and thy own nature through the acts which must be done by thee. But every being ought to do that which is according to its constitution; and all other things have been constituted for the sake of rational beings, just as among irrational things the inferior for the sake of the superior, but the rational for the sake of one another. The prime principle then in man's constitution is the social. And the second is not to yield to the persuasions of the body, for it is the peculiar office of the rational and intelligent motion to circumscribe itself, and never to be overpowered either by the motion of the senses or of the appetites, for both are animal; but the intelligent motion claims superiority and does not permit itself to be overpowered by the others. And with good reason, for it is formed by nature to use all of them. The third thing in the rational constitution is freedom from error and from deception. Let then the ruling principle holding fast to these things go straight on, and it has what is its own.

不要环顾四周去寻找别人的主宰原则，而是直视引导你的本性，包括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体现的宇宙本性，还有必须由你做的事情体现出来的你自己的本性。每一个生命都应该做符合其结构的事情，所有别的事物都是为了理性生命而构成的，正如在非理性生命中，低等生命为了高等生命而存在，但理性生命为了彼此而存在。因此，人类结构中的首要原则就是友善原则。第二是不要屈服于肉体的诱导，因为肉体只是理性生命和理智活动限定自身的特殊场所，决不能屈服于感官或欲望，因为这两者都是动物性的。但是理智活动需要一种至高无上性，并且不会允许其他事物凌驾其上。要有健全的理性，因为它天生是为了运用所有事物而形成。理性生命结构的第三点是摆脱错误和欺骗。那么，就让紧紧把握这些东西的主宰原则径直往前走，它就能得到属于它自己的东西。

Consider thyself to be dead, and to have completed thy life up to the present time; and live according to nature the remainder which is allowed thee.

想想你是会死的，到当前的某个时刻你已经完成了生命旅程，那么按照本性度过留给你的时日吧。

Love that only which happens to thee and is spun with the thread of thy destiny. For what is more suitable?

只爱那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为你纺的命运之线，有什么比这更合适的呢？

In everything which happens keep before thy eyes those to whom the same things happened, and how they were vexed, and treated them as strange things, and found fault with them: and now where are they? Nowhere. Why then dost thou too choose to act in the same way? And why dost thou not leave these agitations which are foreign to nature, to those who cause them and those who are moved by them? And why art thou not altogether intent upon the right way of making use of the things which happen to thee? For then thou wilt use them well, and they will be a material for thee to work on. Only attend to thyself, and resolve to be a good man in every act which thou doest; and remember…

对于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回顾那些有着同样经历的人，他们曾多么烦恼，把这些事情当成怪事，并对此不满。现在他们在哪里呢？无

处寻觅。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呢？为什么你不把这些与本性相异的焦虑留给那些引起焦虑的人和被焦虑推动的人呢？为什么你不专注于正确地利用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呢？因为那样你就会好好地利用它们，它们也会成为你工作的质料。只关注自己，在做每一件事时下决心做一个好人，并且记住……

Look within. Within is the fountain of good, and it will ever bubble up, if thou wilt ever dig.

审视内心。内心是善的源泉，如果你去挖掘，它会汩汩涌出。

The body ought to be compact, and to show no irregularity either in motion or attitude. For what the mind shows in the face by maintaining in it the expression of intelligence and propriety, that ought to be required also in the whole body. But all these things should be observed without affectation.

身体应当是简洁的，在行动或态度上都不会表现出杂乱无章。心灵通过面容表现出来的理智和恰当，也应体现在整个身体当中。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毫无矫饰地去遵守。

The art of life is more like the wrestler's art than the dancer's, in respect of this, that it should stand ready and firm to meet onsets which are sudden and unexpected.

生活的艺术更像是摔跤之术而非舞蹈之术，就此而言，它应该是

坚定站立，随时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攻击。

Constantly observe who those are whose approbation thou wishest to have, and what ruling principles they possess. For then thou wilt neither blame those who offend involuntarily, nor wilt thou want their approbation, if thou lookest to the sources of their opinions and appetites.

时常观察那些你希望得到他们赞许的人，看看他们拥有的主宰原则是什么。只要你看到了他们意见和欲望的根源，你就不会责怪那些出于无心而得罪你的人，也不会希望得到他们的赞许。

Every soul, the philosopher says, is involuntarily deprived of truth; consequently in the same way it is deprived of justice and temperance and benevolence and everything of the kind. It is most necessary to bear this constantly in mind, for thus thou wilt be more gentle towards all.

哲人说，每一灵魂都不由自主地脱离真理，因而同样也脱离了正义、节制、仁爱和其他美德。很有必要牢记这一点，因为这样你会更和气地对待所有人。

In every pain let this thought be present, that there is no dishonour in it, nor does it make the governing intelligence worse, for it does not damage the intelligence either so far as the intelligence is rational or so far as it is social. Indeed in the case of most pains let this remark of Epicurus aid thee, that pain is neither

intolerable nor everlasting, if thou bearest in mind that it has its limits, and if thou addest nothing to it in imagination: and remember this too, that we do not perceive that many things which are disagreeable to us are the same as pain, such as excessive drowsiness, and the being scorched by heat, and the having no appetite. When then thou art discontented about any of these things, say to thyself that thou art yielding to pain.

在任何痛苦中都要想到：痛苦并不可耻，也不会使得支配的理智变坏，因为它不会损害理智，只要理智是理性的、合群的。的确，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让伊壁鸠鲁的这句话来帮助你：痛苦不是难以忍受或是持续永久的，只要你记住它有自己的期限，只要你不在想象中给它增加什么，也要记住，我们没有觉察到，我们把我们看着不舒服的东西也看作是痛苦，比如过度困倦、高温炙烤、没有胃口。当你不满于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对自己说你是在屈服于痛苦。

Take care not to feel towards the inhuman as they feel towards men.

注意，对于冷酷无情的人，不要像他们感觉别人那样感觉他们。

How do we know if Telauges was not superior in character to Socrates? for it is not enough that Socrates dies a more noble death, and disputed more skilfully with the sophists, and passed the night in the cold with more endurance, and that when he was bid to arrest Leon of Salamis, he considered it more noble to refuse, and that he walked in a swaggering way in the streets—though as to this fact one may have great doubts if it was true. But we ought to

inquire, what kind of a soul it was that Socrates possessed, and if he was able to be content with being just towards men and pious towards the gods, neither idly vexed on account of men's villainy, nor yet making himself a slave to any man's ignorance, nor receiving as strange anything that fell to his share out of the universal, nor enduring it as intolerable, nor allowing his understanding to sympathize with the affects of the miserable flesh.

我们怎么知道泰劳格斯在品格方面就不如苏格拉底呢？因为仅有这些理由是不够的：苏格拉底死得更高贵，与诡辩家的辩论更有技巧，在寒冷中过夜更有忍耐力，当他受命去逮捕萨拉米斯的莱昂时，他认为拒绝执行更为高尚，他还昂首阔步在街上走过。虽然人们可能对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深表怀疑。但是我们应当探究苏格拉底有着怎样的一种灵魂，他是否能满足于待人公正、对神虔诚，不因为人们的恶行而无谓烦恼，也不屈服于任何人的无知，不把任何从宇宙降临到他身上的东西看成是奇怪的，不把它看成是无法忍受的东西，不让他的理解力支持可怜肉体的喜好。

Nature has not so mingled the intelligence with the composition of the body, as not to have allowed thee the power of circumscribing thyself and of bringing under subjection to thyself all that is thy own; for it is very possible to be a divine man and to be recognized as such by no one. Always bear this in mind; and another thing too, that very little indeed is necessary for living a happy life. And because thou hast despaired of becoming a dialectician and skilled in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do not for this reason renounce the hope of being both free and modest and social and obedient to God.

自然并没有如此混合你的理智与身体结构，以致不容许你有确定自身的力量和使你自己的一切服从你支配的力量；因为成为一个神圣的人却得不到任何人的承认是很有可能的。时刻牢记这一点。另外还要牢记一点：幸福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不要因为你已无望成为一位辩证家和有着丰富自然知识的人，就放弃成为一个自由、谦逊、友善和对神顺从的人的希望。

It is in thy power to live free from all compulsion in the greatest tranquility of mind, even if all the world cry out against thee as much as they choose, and even if wild beasts tear in pieces the members of this kneaded matter which has grown around thee. For what hinders the mind in the midst of all this from maintaining itself in tranquility, and in a just judgment of all surrounding things, and in a ready use of the objects which are presented to it, so that the judgment may say to the thing which falls under its observation: This thou art in substance (reality), though in men's opinion thou mayest appear to be of a different kind; and the use shall say to that which falls under the hand: Thou art the thing that I was seeking; for to me that which presents itself is always a material for virtue, both rational and political, and, in a word, for the exercise of art, which belongs to man or God. For everything which happens has a relationship either to God or man, and is neither new nor difficult to handle, but usual and apt matter to work on.

在心灵的极大宁静中摆脱所有的重压是你力所能及的，即使全世界都尽其所能地呼喊着反对你，即使野兽把你这揉捏成的身体各部位撕成碎片。因为处于所有这一切阻碍中的心灵保持自身的宁静，保持对周围事物的正确判断，保持随时运用呈现于它面前的物体，以至于这判断可以对落入它观察范围的事物说：你确实存在（是一实体），

尽管在人们看来你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类别。这运用也将对落入它手的事物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呈现出来的事物总是美德的质料，包括理性和政治方面的，一句话，是可以用于那属于人或神的艺术训练的。因为一切发生的事物都与神或人有某种联系，既不新也不难解决，而是常见的、容易处理的。

The perfection of moral character consists in this, in passing every day as the last, and in being neither violently excited, nor torpid, nor playing the hypocrite.

道德品格的完善即在于此——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过，不过度兴奋，不麻木不仁，也不表现虚伪。

The gods who are immortal are not vexed because during so long a time they must tolerate continually men such as they are and so many of them bad; and besides this, they also take care of them in all ways. But thou, who art destined to end so soon, art thou wearied of enduring the bad, and this too when thou art one of them?

不朽的神灵不会烦恼，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必须不断容忍这样的人，其中还有那么多恶人。此外，神灵还要从各个方面去照顾他们。但是你是一个注定很快就要死去的人，当你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的时候，你就对忍受恶人感到厌倦了吗？

It is a ridiculous thing for a man not to fly from his own badness, which is indeed possible, but to fly from other men's

badness, which is impossible.

一个人不去摆脱他自己的恶（这的确可能）却要摆脱他人的恶（这是不可能的），是件荒唐的事情。

Whatever the rational and political (social) faculty finds to be neither intelligent nor social, it properly judges to be inferior to itself.

任何理性和政治的（社会的）能力认为既不理智也不合群的东西，它就会恰当地判断为是比它自己低级的东西。

When thou hast done a good act and another has received it, why dost thou still look for a third thing besides these, as fools do, either to have the reputation of having done a good act or to obtain a return?

当你做了一件好事，别人接受了，为什么你还要去寻找除此之外的第三样东西，就像蠢人那样，非要有做好事的名声或要得到回报？

No man is tired of receiving what is useful. But it is useful to act according to nature. Do not then be tired of receiving what is useful by doing it to others.

没有人会厌倦接受有用的东西。但是依据本性去做是有用的。那

么，就不要厌倦通过对别人这样做而得到有用的东西。

The nature of the Anmoved to make the universe. But now either everything that takes place comes by way of consequence or continuity; or even the chief things towards which the ruling power of the universe directs its own movement are governed by no rational principle. If this is remembered it will make thee more tranquil in many things.

万物的本性运动造就了宇宙。而现在发生的一切要么作为结果，要么作为连续出现，又或者是那宇宙主宰力量本身的活动所指向的主要事物也不受理性原则的控制。记住了这一点，就会使你在很多事情中更为宁静。

Book Eight

卷八

This reflection also tends to the removal of the desire of empty fame, that it is no longer in thy power to have lived the whole of thy life, or at least thy life from thy youth upwards, like a philosopher; but both to many others and to thyself it is plain that thou art far from philosophy. Thou hast fallen into disorder then, so that it is no longer easy for thee to get the reputation of a philosopher; and thy plan of life also opposes it. If then thou hast truly seen where the matter lies, throw away the thought, How thou shalt seem to others, and be content if thou shalt live the rest of thy life in such wise as thy nature wills. Observe then what it wills, and let nothing else distract thee; for thou hast had experience of many wanderings without having found happiness anywhere, not in syllogisms, nor in wealth, nor in reputation, nor in enjoyment, nor anywhere. Where is it then? In doing what man's nature requires. How then shall a man do this? If he has principles from which come his affects and his acts. What principles? Those which relate to good and bad: the belief that there is nothing good for man, which does not make him just, temperate, manly, free; and that there is nothing bad, which does not do the contrary to what has been mentioned.

这一反思也可消除对虚名的欲望，像一个哲学家那样度过你整个人生，或至少度过从你青年时期开始的那一段时间，已经不在你的力量范围内了。但是许多其他人和你自己都很明白，你是远离哲学的。而后你落入了无序，所以你要获得哲学家的名声不再容易，你生活的计划也与它背道而驰。因此，如果你真的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就把别

人会如何看你这一想法抛开；如果你能以你的本性希望的这种方式度过你的余生，就感到满足吧。观察你的本性希望什么吧，不要让任何别的东西使你分心，因为你有很多迷途的经历却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幸福，在三段论中没有，在财富中没有，在名声中没有，在享受中没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那么它在哪里呢？在于做人的本性需要的事情。那么一个人应该如何做呢？如果他有产生他的情感和行动的原则。什么原则？那些关乎善恶的原则：相信没有什么对人是善的，如果它不会使人变得正义、节制、勇敢、自由；没有什么是恶的，如果不是拥有与上面提到的相反的品质的话。

On the occasion of every act ask thyself, How is this with respect to me? Shall I repent of it? A little time and I am dead, and all is gone. What more do I seek, if what I am doing now is the work of an intelligent living being, and a social being, and one who is under the same law with God?

开始每一行动时都要问问自己，这与我的联系是怎样的？我会对此后悔吗？还有一点时间我就死了，一切都会消逝。如果我现在做的是一个有理智的人的工作，一个社会人的工作，一个与神灵处于同样法则之下的人的工作，那我还寻找什么呢？

Alexander and Caius and Pompeius, what are they in comparison with Diogenes and Heraclitus and Socrates? For they were acquainted with things, and their causes (forms), and their matter, and the ruling principles of these men were the same. But as to the others, how many things had they to care for, and to how many things were they slaves.

跟第欧根尼、赫拉克利特和苏格拉底相较，亚历山大、盖耶斯和庞培算得了什么呢？因为他们熟悉事物，熟悉它们的起因（形式）和它们的质料，这些人的主宰原则是相同的。但是在前者看来，他们在乎多少事情，是多少事情的奴隶啊。

Consider that men will do the same things nevertheless, even though thou shouldst burst.

想想不管怎样人们都要做同样的事情，尽管你都要大发雷霆了。

This is the chief thing: Be not perturbed, for all things are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al; and in a little time thou wilt be nobody and nowhere, like Hadrian and Augustus. In the next place having fixed thy eyes steadily on thy business look at it, and at the same time remembering that it is thy duty to be a good man, and what man's nature demands, do that without turning aside; and speak as it seems to thee most just, only let it be with a good disposition and with modesty and without hypocrisy.

这是主要的事情：不要被打扰，因为一切事物都是合乎宇宙本性的，很快你就会化为乌有，无处可寻，就像哈德良、奥古斯都那样。其次，全神贯注于你的事情，同时记住做一个好人是你的义务，去做人的本性要求的事情而不是搁置一边。说你看来最恰当的话，说话的时候要有一种好的脾气，要谦虚而不要虚伪。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al has this work to do, to remove to that place the things which are in this, to change them, to take

them away hence, and to carry them there. All things are change, yet we need not fear anything new. All things are familiarto us; bu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m still remains the same.

宇宙本性要做这件事，把这个地方的东西搬到那边去，改变它们，把它们从这里带到那里。所有事物都是变化的，然而我们不必害怕任何新的东西。所有事物对于我们都是熟悉的，而对它们的分配依然不变。

Every nature is contented with itself when it goes on its way well; and a rational nature goes on its way well, when in its thoughts it assents to nothing false or uncertain, and when it directs its movements to social acts only, and when it confines its desires and aversions to the things which are in its power, and when it is satisfied with everything that is assigned to it by the common nature. For of this common nature every particular nature is a part, as the nature of the leaf is a part of the nature of the plant; except that in the plant the nature of the leaf is part of a nature which has not perception or reason, and is subject to be impeded; but the nature of man is part of a nature which is not subject to impediments, and is intelligent and just, since it gives to everything in equal portions and according to its worth, times, substance, cause (form), activity, and incident. But examine, not to discover that any one thing compared with any other single thing is equal in all respects, but by taking all the parts together of one thing and comparing them with all the parts together of another.

每一本性在自己的路上进展顺利时都会对自己满足；一个理性的本性在自己的思想中不同意任何错误或不确定的东西时，在把自己的

活动仅仅导向有益社会的行为时，在把自身的欲望和厌恶限制在自己的力量范围内的事物时，在满足于共同本性分配于它的一切事物时，也会进展顺利。因为在这共同本性中，每一特殊本性都是它的一部分，如同叶子的本性是植物本性的一部分。但在植物之中，叶子的本性属于一个没有知觉或理性、易受阻碍的本性的一部分。但是人的本性是属于一个不受阻碍、理智和正义的本性，因为它平等地根据每一事物的价值给予一切事物以时间、实体、起因（形式）、活动和事件。但是检查不是为了发现任何一件事和任何个别事物相比较在所有方面都是平等的，而是把一件事物的所有部分与另一事物所有部分合起来相比较。

Thou hast not leisure or ability to read. But thou hast leisure or ability to check arrogance: thou hast leisure to be superior to pleasure and pain: thou hast leisure to be superior to love of fame, and not to be vexed at stupid and ungrateful people, nay even to care for them.

你没有闲暇或能力阅读。但是你有闲暇或能力克制傲慢：你有闲暇超越欢乐和痛苦，你有闲暇超越对虚名的热爱，不去为愚蠢、忘恩负义的人烦恼，甚至不去理会他们。

Let no man any longer hear thee finding fault with the court life or with thy own.

不要让任何人听到你对宫廷生活或你自己生活的抱怨。

Repentance is a kind of self-reproof for having neglected

something useful; but that which is good must be something useful, and the perfect good man should look after it. But no such man would ever repent of having refused any sensual pleasure. Pleasure then is neither good nor useful.

后悔是一种因为忽略了某些有用的东西而做出的自责，而善的东西必定是有用的，至善的人应该追寻它。这样的人不会后悔拒绝任何感官的享乐。可见，享乐既不善也没有用处。

This thing, what is it in itself, in its own constitution? What is its substance and material? And what its causal nature (or form)? And what is it doing in the world? And how long does it subsist?

一个事物，它自身是什么，自身的结构是什么？它的实体和材料是什么？它起因的本性（或形式）是什么？它在这世界上做什么？它会存在多久？

When thou risest from sleep with reluctance, remember that it is according to thy constitution and according to human nature to perform social acts, but sleeping is common also to irrational animals. But that which is according to each individual's nature is also more peculiarly its own, and more suitable to its nature, and indeed also more agreeable.

当你不情愿地从睡梦中醒来，记住从事社会活动符合你的体质和人类本性，而睡觉对于非理性动物也是同样的。然而那符合个体的本性的东西，也更特殊地属于个体自身，更适合它自己的本性，确实也

更令人愉悦。

Constantly and, if it be possible, on the occasion of every impression on the soul, apply to it the principles of Physic, of Ethic, and of Dialectic.

如果可能的话，不断地对灵魂得到的每一印象运用物理学、伦理和辨证的原则。

Whatever man thou meetest with, immediately say to thyself: What opinions has this man about good and bad? For it with respect to pleasure and pain and the causes of each, and with respect to fame and ignominy, death and life, he has such and such opinions, it will seem nothing wonderful or strange to me, if he does such and such things; and I shall bear in mind that he is compelled to do so.

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人，立即对自己说：这个人有着什么样的善恶观？因为，如果关于欢乐与痛苦及其原因，关于声名和耻辱、死亡和生命，他有着这样那样的观点，那么他做这样或那样的事，在我看来就没有什么神奇或怪异的了。我要牢记他不得不这样做。

Remember that as it is a shame to be surprised if the fig-tree produces figs, so it is to be surprised if the world produces such and such things of which it is productive; and for the physician and the helmsman it is a shame to be surprised, if a man has a fever, or if the wind is unfavourable.

记住，就像对无花果树结出无花果感到吃惊是一种羞耻一样，对于这个世界产生这样那样本来就是它的产物的东西感到吃惊，也是一种羞耻。如果医生对一个人发烧了感到吃惊，或者舵手对风向不尽如人意感到吃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羞耻。

Remember that to change thy opinion and to follow him who corrects thy error is as consistent with freedom as it is to persist in thy error. For it is thy own, the activity which is exerted according to thy own movement and judgment, and indeed according to thy own understanding too.

记住，改变你的观点，追随改正你错误的人，这跟要坚持你的错误一样，是和自由一致的。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活动，根据你自己的行动和判断，确实也是根据你自己的理解进行的。

If a thing is in thy own power, why dost thou do it? But if it is in the power of another, whom dost thou blame? The atoms (chance) or the gods? Both are foolish. Thou must blame nobody. For if thou canst, correct that which is the cause; but if thou canst not do this, correct at least the thing itself; but if thou canst not do even this, of what use is it to thee to find fault? for nothing should be done without a purpose.

如果一件事在你的力量范围内，为什么你不做这件事呢？但如果它是在另一个人的力量范围内，你会责怪谁呢？是原子（偶然）还是神灵？不论怪谁都是愚蠢的。你不要责怪任何人。因为如果你能，就去纠正那起因；但如果你不能，至少纠正这件事本身；但如果你甚至

连这也做不到，你抱怨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没有目的什么也做不成。

That which has died falls not out of the universe. If it stays here, it also changes here, and is dissolved into its proper parts, which are elements of the universe and of thyself. And these too change, and they murmur not.

那死去的东西不是落到宇宙之外了。如果它呆在这里，它也会在这里改变，并分解为恰当的部分，这是宇宙和你自己的元素。这些也会改变，而且不会抱怨。

Everything exists for some end, a horse, a vine. Why dost thou wonder? Even the sun will say, I am for some purpose, and the rest of the gods will say the same. For what purpose then art thou? to enjoy pleasure? See if common sense allows this.

凡事都为着某个目的而存在，如一匹马、一棵葡萄树。你为什么感到奇怪呢？甚至太阳也会说，我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存在的，其余的神灵也会说同样的话。那么你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的？为了享受快乐吗？看看常识是否允许这样说。

Nature has had regard in everything no less to the end than to the beginning and the continuance, just like the man who throws up a ball. What good is it then for the ball to be thrown up, or harm for it to come down, or even to have fallen? and what good is it to the bubble while it holds together, or what harm when it is burst?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a light also.

自然对每一件事物的结局的关心不亚于对开头和过程的关心，就像向上抛球的人一样。那么对球而言，被往上抛有什么好处呢？而下落、甚至落地对它又有什么坏处呢？对于气泡来说，形成的时候有什么好处，爆裂的时候又有什么坏处？同样的话也可以用于闪电。

Turn it (the body) inside out, and see what kind of thing it is; and when it has grown old, what kind of thing it becomes, and when it is diseased. Short-lived are both the praised and the praised, and the remembered and the remembered: and all this in a nook of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nd not even here do all agree, no, not any one with himself: and the whole earth too is a point.

深入地审视身体，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事物；当它老了，会变成什么样的事物，还有生病的时候，又会变成什么样的事物。赞美者与被赞美者，铭记者和被铭记者生命都是短暂的，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这世界的一个小角落里；甚至在这个小角落里也不是每个人的意见都一致，不，不是任何人都与他自己一起的。整个地球也只是一个点。

Attend to the matter which is before thee, whether it is an opinion or an act or a word.

专注于你眼前的事物，不管它是一种观点，或是一种行为，或是一句话。

Thou sufferest this justly: for thou choosest rather to become good to-morrow than to be good to-day.

你受苦是应当的：因为你选择明天变好而不是今天变好。

Am I doing anything? I do it with reference to the good of mankind. Does anything happen to me? I receive it and refer it to the gods, and the source of all things, from which all that happens is derived.

我正在做什么吗？我做的事情是为了人类利益。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吗？我接受它，把它交给神灵——万物的源泉，一切发生的事都从这里起源。

Such as bathing appears to thee—oil, sweat, dirt, filthy water, all things disgusting—so is every part of life and everything.

比如洗澡时你看到油、汗、泥、脏水、所有恶心的东西，生活的每一部分和一切事物都是如此。

Lucilla saw Verus die, and then Lucilla died. Secunda saw Maximus die, and then Secunda died. Epitynchanus saw Diotimus die, and then Epitynchanus died. Antoninus saw Faustina die, and then Antoninus died. Such is everything. Celer saw Hadrian die, and then Celer died. And those sharp-witted men, either seers or men inflated with pride, where are they? For instance, the sharp-witted men, Charax and Demetrius the Platonist and Eudaemon, and any one else like them.All ephemeral, dead long ago. Some indeed have not been remembered even for a short time, and others have

become the heroes of fables, and again others have disappeared even from fables. Remember this, then, that this little compound, thyself, must either be dissolved, or thy poor breath must be extinguished, or be removed and placed elsewhere.

露西拉拉看见韦鲁斯死了，而后露西拉拉死了。希空达看见马克西默斯死了，而后希空达死了。埃皮丁查努斯看见戴奥蒂穆斯死了，而后埃皮丁查努斯死了。安东尼看见福斯蒂娜死了，而后安东尼死了。这就是一切。凯勒看见哈德良死了，而后凯勒死了。那些机智的人，不管是预言家还是高傲自负的人，他们在哪里？比如，智者查拉克斯与柏拉图主义者德米特里厄斯和尤达蒙，还有任何类似他们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匆匆过客，早已作古。有些人的确甚至连一小段时间也没有被人铭记，有些人成为了寓言中的英雄，而有些人甚至已经从寓言中消失了。那么记住这一点，你——这小小的组合物，要么是必须要分解的，要么你可怜的呼吸必须要停止，要么是被转移和放置到别处。

It is satisfaction to a man to do the proper works of a man. Now it is a proper work of a man to be benevolent to his own kind, to despise the movements of the senses, to form a just judgment of plausible appearances, and to take a survey of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and of the things which happen in it.

一个人能做适合自己的工作是一种满足。适合一个人的工作就是要对他的同类仁慈，轻视感官的活动，形成对似是而非的表象的正确判断，研究宇宙的本性和其间发生的事情。

There are three relations between thee and other things: the

one to the body which surrounds thee; the second to the divine cause from which all things come to all; and the third to those who live with thee.

你和其他事物有三种关系：第一是与包围你的躯壳的关系；第二是与产生一切事物的神圣起因的关系；第三是与你共同生活的人的关系。

Pain is either an evil to the body—then let the body say what it thinks of it—or to the soul; but it is in the power of the soul to maintain its own serenity and tranquility, and not to think that pain is an evil. For every judgment and movement and desire and aversion is within, and no evil ascends so high.

痛苦要么对身体是一种恶——那就让身体说出它的想法吧，要么对灵魂是一种恶。但是灵魂维持它自己的平静安宁，不去把痛苦看成是恶，这在它的力量范围内。因为每一判断、活动、欲望和厌恶都是内在的，任何恶都不能上升到这么高。

Wipe out thy imaginations by often saying to thyself: now it is in my power to let no badness be in this soul, nor desire, nor any perturbation at all; but looking at all things I see what is their nature, and I use each according to its value. —Remember this power which thou hast from nature.

经常这样对你自己说以清除幻想：不让恶、不让欲望或任何纷扰存在于这种灵魂，这在我的力量范围内。而通过观察所有事物，我看

到了他们的本性是什么，我根据其价值来使用每一事物。记住你有这一来自本性的力量。

Speak both in the senate and to every man, whoever he may be, appropriately, not with any affectation: use plain discourse.

无论在元老院中说话还是对每一个人说话，不管他是什么人，都要恰如其分，不要矫揉造作：要使用平实的话语。

Augustus' court, wife, daughter, descendants, ancestors, sister, Agrippa, kinsmen, intimates, friends, Areius, Maecenas, physicians and sacrificing priests—the whole court is dead. Then turn to the rest, not considering the death of a single man, but of a whole race, as of the Pompeii; and that which is inscribed on the tombs—the last of his race. Then consider what trouble those before them have had that they might leave a successor; and then, that of necessity some one must be the last. Again here consider the death of a whole race.

奥古斯都的宫廷、妻子、女儿、后代、祖先、姐妹、阿格里帕、族人、亲信、朋友、阿瑞伊乌斯、米西纳斯、医生和祭司，整个宫廷的人都死了。然后再看其他的，不去考虑个体的死亡，而是整个家族，就像庞培的家族；还有那铭刻在坟墓上的文字——他家族的最后一个。然后想想他们之前的人对他们可能撇下的后代有着什么烦恼，而后，总有一个必然成为最后一个。再想想整个家族的灭亡。

It is thy duty to order thy life well in every single act; and if

every act does its duty, as far as is possible, be content; and no one is able to hinder thee so that each act shall not do its duty. —But something external will stand in the way. —Nothing will stand in the way of thy acting justly and soberly and considerately, but perhaps some other active power will be hindered. Well, but by acquiescing in the hindrance and by being content to transfer thy efforts to that which is allowed, another opportunity of action is immediately put before thee in place of that which was hindered, and one which will adapt itself to this ordering of which we are speaking.

你的责任是在每一行为中都要安排好你的生活，如果每一行为都尽可能地尽自己的责任，那就知足吧；没有人能妨碍你，使你的每一行为不尽其责任。但某些外来的东西会阻挡道路。没有什么会阻挡你做正当、清醒和慎重的事，然而可能别的积极力量会受到阻碍。好，但是通过默认阻碍和满足于把你的努力转移到允许的事情上来，另一行动的机会就立即摆在你的面前，替代了那受阻碍的事情，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个调整自己到这个秩序上来的机会。

Receive wealth or prosperity without arrogance; and be ready to let it go.

接受富贵荣华而不傲慢，但随时准备放弃。

If thou didst ever see a hand cut off, or a foot, or a head, lying anywhere apart from the rest of the body, such does a man make himself, as far as he can, who is not content with what happens, and separates himself from others, or does anything unsocial.

Suppose that thou hast detached thyself from the natural unity—for thou wast made by nature a part, but now thou hast cut thyself off—yet here there is this beautiful provision, that it is in thy power again to unite thyself. God has allowed this to no other part, after it has been separated and cut asunder, to come together again. But consider the kindness by which he has distinguished man, for he has put it in his power not to be separated at all from the universal; and when he has been separated, he has allowed him to return and to be united and to resume his place as a part.

如果你曾见过一只被砍掉的手，或一只脚、一颗人头，躺在与身体其他部位分离其他的地方，那么，一个人不满足于所发生的事情，就会尽其所能地与其他人相分离，或做任何不合群的事情。假设你已经使自己与这自然的统一体相分离，因为你生而被造就成自然的一部分，而现在你要使自己与之相分离，但是这里有一个好办法，即再统一起来同样在你力量范围之内。神没有把这一能力赋予其他动物，即在被分离和切开之后又重新合成一体。但想想神区分人类与动物的善意吧，因为他把这一点放置到人类的能力范围内：不与宇宙相分离，而是相统一，一旦分离又能重新回到他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位置。

As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al has given to every rational being all the other powers that it has, so we have received from it this power also. For as the universal nature converts and fixes in its predestined place everything which stands in the way and opposes it, and makes such things a part of itself, so also the rational animal is able to make every hindrance its own material, and to use it for such purposes as it may have designed.

正如宇宙的本性已经把所有别的力量给予了一切理性生命，所以

我们也就从宇宙获得了这一力量。因为如同宇宙本性在预定之地转化和解决每一阻碍和反对它的事物，并且把这样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一样，理性动物也能使每一阻碍变成自己的质料，并利用它达到它可能已经设计好的目的。

Do not disturb thyself by thinking of the whole of thy life. Let not thy thoughts at once embrace all the various troubles which thou mayest expect to befall thee: but on every occasion ask thyself, What is there in this which is intolerable and past bearing? for thou wilt be ashamed to confess. In the next place remember that neither the future nor the past pains thee, but only the present. But this is reduced to a very little, if thou only circumscribest it, and chidest thy mind, if it is unable to hold out against even this.

不要总是想你的一生，以此来烦扰自己。不要让你的思想一下子就涵盖各种你预计可能会降临到你头上的烦恼。但是每一场合都要问自己，在这场合里究竟有什么无法忍受和过不去的东西呢？因为你会羞于承认。其次要记住将来和过去都不会使你痛苦，只有现在使你痛苦。然而如果你只是限制它，它会缩小到一点点，如果甚至连这一点也不能抵制，那就斥责你的心灵吧。

Does Panthea or Pergamus now sit by the tomb of Verus? Does Chaurias or Diotimus sit by the tomb of Hadrian? That would be ridiculous. Well, suppose they did sit there, would the dead be conscious of it? And if the dead were conscious, would they be pleased? and if they were pleased, would that make them immortal? Was it not in the order of destiny that these persons too should first become old women and old men and then die? What then would those do after these were dead? All this is foul smell

and blood in a bag.

潘瑟、帕加穆斯如今还坐在韦鲁斯的陵墓之旁吗？乔里亚丝、戴奥蒂穆丝还坐在哈德良的陵墓之旁吗？要是那样，就太荒唐了。好吧，就假设他们确实坐在那里，死者会意识到吗？如果死者意识得到，他们会高兴吗？如果他们高兴，那会使他们永远不死吗？这些人也要先变成老妪、老翁，然后死去，这不也是在命运的安排之中吗？那么在这些人死后的后人又做什么呢？所有这一切只是袋子里的臭味和污血。

If thou canst see sharp, look and judge wisely, says the philosopher.

哲人说，如果你视觉敏锐，那就要明智地查看和判断。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ational animal I see no virtue which is opposed to justice; but I see a virtue which is opposed to love of pleasure, and that is temperance.

在理性动物的结构中，我没有看到与正义相悖的美德；但是我看到了与纵情享乐相悖的美德，那就是节制。

If thou takest away thy opinion about that which appears to give thee pain, thou thyself standest in perfect security. Who is this self? The reason. But I am not reason. Be it so. Let then the reason itself not trouble itself. But if any other part of thee suffers, let it

have its own opinion about itself.

如果你抛弃看起来会给你痛苦的观点，你的自我将处于完全的保障之中。这一自我是谁？是理性。但我不是理性。就算是这样吧。让理性自身不要烦扰自身。但如果你的其他任何部分受苦，就让它自己表达意见。

Hindrance to the perceptions of sense is an evil to the animal nature. Hindrance to the movements (desires) is equally an evil to the animal nature. And something else also is equally an impediment and evil to the constitution of plants. So then that which is a hindrance to the intelligence is an evil to the intelligent nature. Apply all these things then to thyself. Does pain or sensuous pleasure affect thee? The senses will look to that. Has any obstacle opposed thee in thy efforts towards an object? if indeed thou wast making this effort absolutely (unconditionally, or without any reservation), certainly this obstacle is an evil to thee considered as a rational animal. But if thou takest into consideration the usual course of things, thou hast not yet been injured nor even impeded. The things however which are proper to the understanding no other man is used to impede, for neither fire, nor iron, nor tyrant, nor abuse, touches it in any way. When it has been made a sphere, it continues a sphere.

感官知觉的障碍对于动物本性是一种恶。运动（欲望）的障碍对于动物本性同样是一种恶。某些别的东西对于植物的结构同样也是一种障碍和恶。所以，理智的障碍是理智本性的一种恶。那就把所有这些道理都运用到你自身吧。痛苦或感官的快乐影响你了吗？感官会关照它的。在你努力追求一个目标时有什么东西阻碍你了吗？如果确实

你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或是没有任何保留地）在付出努力，当然这一障碍对于被认为是理性动物的你而言是一种恶。但如果你把事物通常的过程考虑进去，你还没有被伤害，甚至没有被阻碍。然而，对于理解力来说合适的东西，是任何其他人都不能阻碍的，因为火、铁、暴君或是辱骂都不能接触到它。当它被做成一个球体时，它就继续是一个球体。

It is not fit that I should give myself pain, for I have never intentionally given pain even to another.

给我自己痛苦是不合适的，因为我甚至从未故意给别人痛苦。

Different things delight different people. But it is my delight to keep the ruling faculty sound without turning away either from any man or from any of the things which happen to men, but looking at and receiving all with welcome eyes and using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its value.

不同的东西让不同的人快乐。但我的快乐是保持主宰能力良好，使其不脱离任何人或是任何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情，而是以欢迎的眼光看待和接受所有的事物，根据每一事物的价值来使用它。

See that thou secure this present time to thyself; for those who rather pursue posthumous fame do not consider that the men of after-time will be exactly such as these whom they cannot bear now; and both are mortal. And what is it in any way to thee if these men of after-time utter this or that sound, or have this or that

opinion about thee?

注意你要确保现在这一刻属于你，因为那些宁愿追求死后之名的人不会想到：以后的人们和那些他们现在不记得的人完全一样，两者都是会死的。那么以后的人说这样或那样的话，或是对你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Take me and cast me where thou wilt; for there I shall keep my divine part tranquil, that is, content, if it can feel and act conformably to its proper constitution. Is this change of place sufficient reason why my soul should be unhappy and worse than it was, depressed, expanded, shrinking, affrighted? And what wilt thou find which is sufficient reason for this?

带我去你将要去的地方吧，因为在那里我会让我神性的部分保持宁静，也就是说，如果它能够按照自己恰当的结构感觉和行动，它就是满足的。这地方的改变是我的心灵变得不快乐并比过去糟糕、变得低落、自大、自卑、害怕的充分理由吗？你能找到这一改变的充分理由吗？

Nothing can happen to any man which is not human accident, nor to an ox which is not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an ox, nor to a vine which is not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a vine, nor to a stone which is not proper to a stone. If then there happens to each thing both what is usual and natural, why shouldst thou complain? For the common nature brings nothing which may not be borne by thee.

没有什么不属于人的事情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不符合公牛本性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在公牛身上，不符合葡萄树本性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在葡萄树上，不适合石头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在石头上。因此，如果对于每一事物发生的事情都是正常和自然的，你为什么要抱怨呢？因为共同本性不会带来任何你不能忍受的事情。

If thou art pained by any external thing, it is not this that disturbs thee, but thy own judgment about it. And it is in thy power to wipe out this judgment now. But if anything in thy own disposition gives thee pain, who hinders thee from correcting thy opinion? And even if thou art pained because thou art not doing some particular thing which seems to thee to be right, why dost thou not rather act than complain? But some insuperable obstacle is in the way? Do not be grieved then, for the cause of its not being done depends not on thee. But it is not worth while to live, if this cannot be done. Take thy departure then from life contentedly, just as he dies who is in full activity, and well pleased too with the things which are obstacles.

如果你由于任何外物痛苦，烦扰你的不是这一外物，而是你自己对于它的判断。而现在清除这种判断是在你力量范围内的。但如果你性情中的任何东西给你痛苦，谁阻碍你纠正你的意见呢？甚至如果你因为没有正在做某件你认为正确的事情而痛苦，为什么你不去行动而是抱怨呢？是某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挡住去路吗？那么不要悲伤，因为不能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不取决于你。但是如果这件事不能做，活着便没有价值。那么就满足地放弃你的生命吧，就像在充分活动中死去的人一样，也对障碍的事物感到欢喜。

Remember that the ruling faculty is invincible, when self-

collected it is satisfied with itself, if it does nothing which it does not choose to do, even if it resist from mere obstinacy. What then will it be when it forms a judgment about anything aided by reason and deliberately? Therefore the mind which is free from passions is a citadel, for man has nothing more secure to which he can fly for refuge and for the future be inexpugnable. He then who has not seen this is an ignorant man; but he who has seen it and does not fly to this refuge is unhappy.

记住主宰的能力是无可战胜的，如果它不做任何它不愿意的事情，甚至如果它仅仅出于固执而抵抗，那么当它镇定的时候就是满足于自身的。那么，当它在理性的帮助下慎重地形成了一个对于任何事物的判断会怎样呢？因此，摆脱了激情的心灵是一座堡垒，因为人没有什么比这儿更安全的地方了，在这儿他可以得到庇护，守候不可摧毁的未来。因此，没有看到这一点的人是无知的人；而看到了这一点却没有飞向这一庇护所的人则是不快乐的。

Say nothing more to thyself than what the first appearances report. Suppose that it has been reported to thee that a certain person speaks ill of thee. This has been reported; but that thou hast been injured, that has not been reported. I see that my child is sick. I do see; but that he is in danger, I do not see. Thus then always abide by the first appearances, and add nothing thyself from within, and then nothing happens to thee. Or rather add something, like a man who knows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in the world.

除了第一印象所报告的，不要对自己说更多。假设有人向你报告，某人说你坏话。这一点被报告了，但是并没有你受到损害的报告。我看到我的孩子生病了。我确实看见了，但是我没有看见他处于

危险之中。这样，总是遵从第一印象，不要自己从内心添加任何东西，那么就没有什么发生在你身上了。或者宁可添加某些东西，就像一个知道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的人一样。

A cucumber is bitter. —Throw it away. —There are briars in the road. —Turn aside from them. —This is enough. Do not add, And why were such things made in the world? For thou wilt be ridiculed by a man who is acquainted with nature, as thou wouldst be ridiculed by a carpenter and shoemaker if thou didst find fault because thou seest in their workshop shavings and cuttings from the things which they make. And yet they have places into which they can throw these shavings and cuttings, and the universal nature has no external space; but the wondrous part of her art is that though she has circumscribed herself, everything within her which appears to decay and to grow old and to be useless she changes into herself, and again makes other new things from these very same, so that she requires neither substance from without nor wants a place into which she may cast that which decays. She is content then with her own space, and her own matter, and her own art.

这黄瓜是苦的，把它扔了吧；路上有荆棘，绕开它们吧。这就足够了。不要再追问：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被创造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你会被一个知晓自然的人嘲笑，就像如果你因为在木匠和鞋匠的作坊里看见他们所做东西落下的刨花和碎料而挑错，会被他们嘲笑一样。而他们有投放这些刨花和碎料的地方，而宇宙本性没有外在的空间。但宇宙的艺术中最精妙部分在于她限制了自己，在她之中的每一样看起来都会腐化、变老，变成没用的东西，而她会把这些东西变成她自己，再从这些当中创造出其他新的非常相似的东西，所以她不需要外部的实体，也不需要一个她可以扔掉腐烂东西的地方。这样她满足于她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物质，自己的艺术。

Neither in thy actions be sluggish, nor in thy conversation without method, nor wandering in thy thoughts, nor let there be in thy soul inward contention nor external effusion, nor in life be so busy as to have no leisure.

行动不要迟缓，交谈不要缺乏方法，思想不要漫无目的，不要让你的灵魂产生内部的争论和外部的倾泻，也不要让生活如此忙碌以至于没有闲暇。

Suppose that men kill thee, cut thee in pieces, curse thee. What then can these things do to prevent thy mind from remaining pure, wise, sober, just? For instance, if a man should stand by a limpid pure spring, and curse it, the spring never ceases sending up potable water; and if he should cast clay into it or filth, it will speedily disperse them and wash them out, and will not be at all polluted. How then shalt thou possess a perpetual fountain and not a mere well? By forming thyself hourly to freedom conjoined with contentment, simplicity and modesty.

假设人们杀了你，把你切成碎片，诅咒你。那这些事怎能阻止你的心灵保持纯洁、明智、清醒、正义呢？比如，如果一个人站在一个清澈纯净的泉边，咒骂它，清泉不会停止冒出适宜饮用的水。如果他把泥土或垃圾扔到里面，泉水很快就会把它们冲散、洗掉，而不会受到污染。那么你如何才能拥有永久的清泉而不是仅仅一口井呢？时时刻刻塑造你自己，达到融满足、简单和谦逊于一体的自由状态。

He who does not know what the world is, does not know where

he is. And he who does not know for what purpose the world exists, does not know who he is, nor what the world is. But he who has failed in any one of these things could not even say for what purpose he exists himself. What then dost thou think of him who avoids or seeks the praise of those who applaud, of men who know not either where they are or who they are?

不知道世界是什么的人就不知道他自己在哪里。不知道世界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的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世界是什么。但是在任何这些事情上都一无所知的人甚至连自己为什么而存在都不知道。那么你怎样看待那些避免或寻求喝彩者赞美的人呢？怎样看待那些既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呢？

Dost thou wish to be praised by a man who curses himself thrice every hour? Wouldst thou wish to please a man who does not please himself? Does a man please himself who repents of nearly everything that he does?

你希望得到每小时诅咒他自己三次的人的赞美吗？你希望取悦一个连自己都感觉自己一无是处的人吗？一个几乎后悔自己做的每件事的人会对自己感到愉悦吗？

No longer let thy breathing only act in concert with the air which surrounds thee, but let thy intelligence also now be in harmony with the intelligence which embraces all things. For the intelligent power is no less diffused in all parts and pervades all things for him who is willing to draw it to him than the aerial power for him who is able to respire it.

不要再仅仅让你的呼吸与包围你的空气相配合，还要让你的理智与包容万物的理智相和谐。因为理智的力量对于愿意利用它的人来说，就像大气对于能够呼吸它的人一样，是散播于所有的部分，弥漫于所有的事物的。

Generally, wickedness does no harm at all to the universe; and particularly, the wickedness of one man does no harm to another. It is only harmful to him who has it in his power to be released from it, as soon as he shall choose.

邪恶通常并不损害宇宙。具体而言，一个人的邪恶不损害另一个人。它只是对这样的人有害：只要他愿意，就有能力摆脱它的人。

To my own free will the free will of my neighbour is just as indifferent as his poor breath and flesh. For though we are made especially for the sake of one another, still the ruling power of each of us has its own office, for otherwise my neighbour's wickedness would be my harm, which God has not willed in order that my unhappiness may not.

对于我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说，我邻居的自由意志就像他可怜的呼吸和肉体一样与我毫不相关。因为尽管我们是为了彼此而专门造就，我们每一个人的主宰力量仍然有着自己的活动空间，因为如果不是如此，我邻居的邪恶会有损于我，而神灵并不希望我会因另一个人的影响而变得不快乐。

The sun appears to be poured down, and in all directions indeed it is diffused, yet it is not effused. For this diffusion is extension: Accordingly its rays are called Extensions [aktines] because they are extended [apotouekteinesthai]. But one may judge what kind of a thing a ray is, if he looks at the sun's light passing through a narrow opening into a darkened room, for it is extended in a right line, and, as it were, is divided when it meets with any solid body which stands in the way and intercepts the air beyond; but there the light remains fixed and does not glide or fall off. Such then ought to be the outpouring and diffus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it should in no way be an effusion, but an extension, and it should make no violent or impetuous collision with the obstacles which are in its way; nor yet fall down, but be fixed and enlighten that which receives it. For a body will deprive itself of the illumination, if it does not admit it.

阳光看起来是倾泻下来，向每一个方向撒播，然而它不是流溢。因为这种撒播是延伸性的。所以，它的光线叫做伸展，因为它们是被延伸了。但是如果一个人看着阳光穿过一个狭窄的开口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他就能判断出光线是什么事物，因为它是以直线延伸，当它遇到挡住去路和切断空气的固体时，它可以说是被隔断了。但是光线仍然保持不动，不会滑动或落下。那么理解力也应当如此照射和撒播，它不应是一种流溢，而应是一种延伸，它不应与途中的任何障碍发生激烈或鲁莽的碰撞；它也不会落下，而是固定的，照耀接受它的东西。因为如果一个物体不接受它，就得不到光亮。

He who fears death either fears the loss of sensation or a different kind of sensation. But if thou shalt have no sensation, neither wilt thou feel any harm; and if thou shalt acquire another kind of sensation, thou wilt be a different kind of living being, and

thou wilt not cease to live.

害怕死亡的人要么害怕失去感觉，要么是害怕一种不同的感觉。但如果你没有了感觉，你也不会感到任何损害。如果你得到了另一种感觉，你就是一种不同的生命存在，你的生命就不会停止。

Men exist for the sake of one another. Teach them then or bear with them.

人们是为了彼此而存在；那么教导他们吧，要么就容忍他们。

In one way an arrow moves, in another way the mind. The mind, indeed, both when it exercises caution and when it is employed about inquiry, moves straight onward not the less, and to its object.

箭以一种方式运动，心灵以另一种方式运动。确实，当心灵谨慎地活动或致力于探究的时候，它也是沿着直线，朝着它的目标前进。

Enter into every man's ruling faculty; and also let every other man enter into thine.

洞察每个人的主宰能力，也让其他人洞察你的主宰能力。

Book Nine

卷九

He who acts unjustly acts impiously. For since the universal nature has made rational animals for the sake of one another to help one another according to their deserts, but in no way to injure one another, he who transgresses her will, is clearly guilty of impiety towards the highest divinity. And he too who lies is guilty of impiety to the same divinity; for the universal nature is the nature of things that are; and things that are have a relation to all things that come into existence. And further, this universal nature is named truth, and is the prime cause of all things that are true. He then who lies intentionally is guilty of impiety inasmuch as he acts unjustly be deceiving; and he also who lies unintentionally, inasmuch as he is at variance with the universal nature, and inasmuch as he disturbs the order by fighting against the nature of the world; for he fights against it, who is moved of himself to that which is contrary to truth, for he had received powers from nature through the neglect of which he is not able now to distinguish falsehood from truth. And indeed he who pursues pleasure as good, and avoids pain as evil, is guilty of impiety. For of necessity such a man must often find fault with the universal nature, alleging that it assigns things to the bad and the good contrary to their deserts, because frequently the bad are in the enjoyment of pleasure and possess the things which procure pleasure, but the good have pain for their share and the things which cause pain. And further, he who is afraid of pain will sometimes also be afraid of some of the things which will happen in the world, and even this is impiety. And he who pursues pleasure will not abstain from injustice, and

this is plainly impiety. Now with respect to the things towards which the universal nature is equally affected—for it would not have made both, unless it was equally affected towards both—towards these they who wish to follow nature should be of the same mind with it, and equally affected. With respect to pain, then, and pleasure, or death and life, or honour and dishonour, which the universal nature employs equally, whoever is not equally affected is manifestly acting impiously. And I say that the universal nature employs them equally, instead of saying that they happen alike to those who are produced in continuous series and to those who come after them by virtue of a certain original movement of Providence, according to which it moved from a certain beginning to this ordering of things, having conceived certain principles of the things which were to be, and having determined powers productive of beings and of changes and of suchlike successions.

一个人若举止不正，行为也不会虔诚。因为宇宙本性造就理性动物，是为了他们根据各自的优点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伤害，所以违背最高之神意志的人，显然是对她犯了不敬之罪。撒谎的人对同样的神也有不敬之罪，因为宇宙本性是存在事物之本性，存在之事物与所有进入存在的事物有着一种联系。而且，这宇宙本性又名真理，是一切真实事物的首要起因。所以，故意说谎的人犯了不敬之罪，因为他行为不正就是欺骗；不自觉说谎的人也有不敬之罪，因为他偏离了宇宙本性，反对世界本性而扰乱了宇宙的秩序。因为他反对世界本性，就把自己推到了与真理相悖的地位。因为他是从本性那里获得力量，一旦忽视本性，也就不能辨别真伪。的确，一个人把享乐作为善来追求，把痛苦作为恶来避免，也有不敬之罪。因为这样的人必然经常挑剔宇宙本性，硬说宇宙本性给恶人和善人分配事物时违背了他们应得的份额，因为恶人常常享受快乐，拥有能带来快乐的东西，而善人要承受那份属于自己的痛苦，还有引起痛苦的东西。更有甚者，害怕痛苦的人有时也会害怕世界上会发生的某些事情，这种害怕也是一种不

敬。追求享乐的人将不会戒绝不义，这显然也是不敬。因为宇宙本性对两者（享乐与痛苦）若非一视同仁，就不会把它们创造出来。而对于宇宙本性一视同仁的事物，那些想要遵循本性的人应该与它想法一致，并对它们一视同仁。那么，对于痛苦与快乐，死亡与生命，荣誉与耻辱，这些都是宇宙本性同等利用的，无论是谁，如果不同等对待它们，那就明显是行为不敬了。我是说宇宙本性同等地利用它们，而不是说它们同样地发生在那些产生于持续系列运动的人和那些在他们之后通过神意的某种初始运动到来的人，这种运动根据神意从某个初始向着这事物的系列运动，孕育着某些将要存在的事物原则，决定了产生存在、变化及此类承继的力量。

It would be a man's happiest lot to depart from mankind without having had any taste of lying and hypocrisy and luxury and pride. However to breathe out one's life when a man has had enough of these things is the next best voyage, as the saying is. Hast thou determined to abide with vice, and has not experience yet induced thee to fly from this pestilence?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is a pestilence, much more indeed than any such corruption and change of this atmosphere which surrounds us. For this corruption is a pestilence of animals so far as they are animals; but the other is a pestilence of men so far as they are men.

一个人最幸福的命运，就是在离开人世时从没有过撒谎、虚伪、奢侈和骄傲的体验。然而，如俗语所说：当一个人享受够了这些事情时，立即结束生命仅次于最完美的旅行。你已决定顺从恶了吗？还没有经验引导你逃离这瘟疫吗？因为理解力的毁坏是一场瘟疫，比包围我们的大气层腐化和改变更甚。因为就动物而言这腐化是动物的瘟疫；就人而言是人的瘟疫。

Do not despise death, but be well content with it, since this too is one of those things which nature wills. For such as it is to be young and to grow old, and to increase and to reach maturity, and to have teeth and beard and gray hairs, and to beget, and to be pregnant, and to bring forth, and all the other natural operations which the seasons of thy life bring, such also is dissolution. This the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 of a reflecting man, to be neither careless nor impatient nor contemptuous with respect to death, but to wait for it as one of the operations of nature. As thou now waitest for the time when the child shall come out of thy wife's womb, so be ready for the time when thy soul shall fall out of this envelope. But if thou requirest also a vulgar kind of comfort which shall reach thy heart, thou wilt be made best reconciled to death by observing the objects from which thou art going to be removed, and the morals of those with whom thy soul will no longer be mingled. For it is no way right to be offended with men, but it is thy duty to care for them and to bear with them gently; and yet to remember that thy departure will be not from men who have the same principles as thyself. For this is the only thing, if there be any, which could draw us the contrary way and attach us to life, to be permitted to live with those who have the same principles as ourselves. But now thou seest how great is the trouble arising from the discordance of those who live together, so that thou mayest say, Come quick, O death, lest perchance I, too, should forget myself.

不要蔑视死亡，要坦然接受，因为这也是本性所愿望的事之一。因为像年轻，变老，成长和达到成熟，长牙齿、胡子还有白发，为人父，怀孕，生小孩，以及生命季节带来的所有其他自然活动，都是这样的事物，分解亦是如此。那么，这与反思者的性格一致：对于死亡，不要轻率、也不要不耐烦或是蔑视，而要把它作为本性的活动来等待。就像你在等待孩子从妻子的子宫里分娩出来的那一刻，也要准

备好你的灵魂从这皮囊中脱落的那一刻。但若是你也要求一种会触到你心灵的庸俗安慰，那么通过观察你要与之分离的物体，观察你的灵魂不再与之混合的人的道德，你就会和死亡取得最好的和解。为别人的过错生气当然是不对的，你的责任是关心他们，温和地容忍他们。要记住你不会从和你有相同原则的人们那里离去。因为如果有什么事情能使我们转变并使我们依恋生命的话，这是唯一的一种可能：允许我们跟那些有着和我们一样原则的人一起生活。而现在你看到，从那些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的矛盾中产生的苦恼是多么大啊，以至于你可能会说：啊，快来吧，死亡，以免我会迷失自己。

He who does wrong does wrong against himself. He who acts unjustly acts unjustly to himself, because he makes himself bad.

作恶者是对自己作恶。行为不义者是对自己行为不义，因为他使自己变坏。

He often acts unjustly who does not do a certain thing; not only he who does a certain thing.

不仅做某样事的人是行为不义，不做某样事的人也常常是行为不义的。

Thy present opinion founded on understanding, and thy present conduct directed to social good, and thy present disposition of contentment with everything which happens—that is enough.

你目前的观点是基于理解力的，你目前的行为是为了社会利益的，你目前的性情满足于发生的一切事物——这就足够了。

Wipe out imagination: check desire: extinguish appetite: keep the ruling faculty in its own power.

消除幻想，克制欲望，消除嗜好，把主宰能力保持在它自己的力量范围内。

Among the animals which have not reason one life is distributed; but among reasonable animals one intelligent soul is distributed: just as there is one earth of all things which are of an earthy nature, and we see by one light, and breathe one air, all of us that have the faculty of vision and all that have life.

非理性动物享有一种生命；理性动物享有一种理智的灵魂。正如大地万物都有着一种泥土的本性，所有有视力、有生命的人，都凭借一种光来看东西，呼吸同样的空气。

All things which participate in anything which is common to them all move towards that which is of the same kind with themselves. Everything which is earthy turns towards the earth, everything which is liquid flows together, and everything which is of an aerial kind does the same, so that they require something to keep them asunder, and the application of force. Fire indeed moves upwards on account of the elemental fire, but it is so ready to be kindled together with all the fire which is here, that even every

substance which is somewhat dry, is easily ignited, because there is less mingled with it of that which is a hindrance to ignition. Accordingly then everything also which participates in the common intelligent nature moves in like manner towards that which is of the same kind with itself, or moves even more. For so much as it is superior in comparison with all other things, in the same degree also is it more ready to mingle with and to be fused with that which is akin to it. Accordingly among animals devoid of reason we find swarms of bees, and herds of cattle, and the nurture of young birds, and in a manner, loves; for even in animals there are souls, and that power which brings them together is seen to exert itself in the superior degree, and in such a way as never has been observed in plants nor in stones nor in trees. But in rational animals there are political communities and friendships, and families and meetings of people; and in wars, treaties and armistices. But in the things which are still superior, even though they are separated from one another, unity in a manner exists, as in the stars. Thus the ascent to the higher degree is able to produce a sympathy even in things which are separated. See then what now takes place. For only intelligent animals have now forgotten this mutual desire and inclination, and in them alone the property of flowing together is not seen. But still, though men strive to avoid this union, they are caught and held by it, for their nature is too strong for them; and thou wilt see what I say, if thou only observest. Sooner then will one find anything earthy which comes in contact with no earthy thing than a man altogether separated from other men.

所有分享一种共同东西的事物都朝着它们同类的事物运动。每一土性的事物都朝向大地，每一液态的事物都流到一起，每一气态的事物也同样，所以需要某种力量才能把它们分开。火向上运动的确是由于火这一元素，但它准备与这里的火一起燃烧，以至于每一个干燥的

物体都很容易被点着，因为这些物体中含有较少阻止点燃的东西。所以相应地，每一共享共同理智本性的事物都以同样的方式朝着自己同类的事物运动，甚至运动得更多。因为它比其他事物要高级，它也同样多地愿意与类似的事物混合、融合。因此，在非理性动物中，我们可以发现蜂群、畜群、对幼鸟的喂养、还有某种意义上的爱。因为甚至在动物中也有灵魂，把它们带到一起的力量看来是在更高的程度上起作用，这在植物、石头或树木中是看不到的。但在理性动物中，有政治团体、友谊、家庭和公众集会，还有战争、条约和休战。但在更高级的事物中，尽管他们彼此相互分离，在某种方式上依然存在统一性，如同繁星。这样，上升到更高程度的甚至能够在分离的事物中产生同情。那么看看现在发生的事情吧。因为目前只有理智动物忘记了这相互的欲望和倾向，在他们之中看不到一起流动的特征。但是，尽管人们努力避免这一联合，他们还是被这一联合吸引和控制，因为他们的本性太强烈了，只要你去观察，你就会明白我所说的。所以，一个人会发现土性事物和非土性事物相联系，比发现一个人完全与其他人相分离来得更快。

Both man and God and the universe produce fruit; at the proper seasons each produces it. But if usage has especially fixed these terms to the vine and like things, this is nothing. Reason produces fruit both for all and for itself, and there are produced from it other things of the same kind as reason itself.

人、神和宇宙都生产果实，他们各自在合适的季节生产果实。但如果按例把这些词的用法仅固定于葡萄树和类似的东西，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理性为一切也为自己生产果实，还生产其他和理性类似的东西。

If thou art able, correct by teaching those who do wrong; but if

thou canst not, remember that indulgence is given to thee for this purpose. And the gods, too, are indulgent to such persons; and for some purposes they even help them to get health, wealth, reputation; so kind they are. And it is in thy power also; or say, who hinders thee?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通过教导纠正那些做错事情的人；但如果你不能，记住采取为了这个目的而赋予你的任其自然的态度。神灵对这样的人也是任其自然的，为了某些目的神灵甚至帮助他们得到健康、财富、名誉；他们是如此善良。这也是在你力量范围内的；或者说，谁阻碍了你这样做呢？

Labour not as one who is wretched, nor yet as one who would be pitied or admired; but direct thy will to one thing only, to put thyself in motion and to check thyself, as the social reason requires.

不要像一个不幸的人那样劳作，也不要像一个会被人可怜或赞扬的人那样劳作，而是把你的意志导向唯一的一件事：按照社会理性的要求去运作和控制自己。

To-day I have got out of all trouble, or rather I have cast out all trouble, for it was not outside, but within and in my opinions.

今天我摆脱了一切烦恼，更确切地说，我抛弃了一切烦恼，因为烦恼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存在于我的意见之中。

All things are the same, familiar in experience, and ephemeral in time, and worthless in the matter. Everything now is just as it was in the time of those whom we have buried.

一切都是相同的，都是经验所熟悉的，时间上是短暂的，物质上是没有价值的。现在的一切事物和我们埋葬了的人们的时代一模一样。

Things stand outside of us, themselves by themselves, neither knowing aught of themselves, nor expressing any judgment. What is it, then, which does judge about them? The ruling faculty.

事物独立于我们之外，一个个挨着，既不认识自己，也不表示任何判断。那么判断他们的是什么呢？是主宰的能力。

Not in passivity, but in activity, lie the evil and the good of the rational social animal, just as his virtue and his vice lie not in passivity, but in activity.

有理性的社会动物的善恶，不在于消极的活动中，而在于积极的活动中，正如他的德行与恶行，不在于消极活动中，而在于积极活动中。

For the stone which has been thrown up it is no evil to come down, nor indeed any good to have been carried up.

往上扔的石头掉下来不是恶，被拿起来也并非什么善。

Penetrate inwards into men's leading principles, and thou wilt see what judges thou art afraid of, and what kind of judges they are of themselves.

深入到人们的指导原则之中，你会看到你害怕什么判断，他们自身又是什么样的判断。

All things are changing; and thou thyself art in continuous mutation and in a manner in continuous destruction, and the whole universe too.

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你自己也处在不断变化中，某种程度上说是在不断的毁灭中，整个宇宙也是如此。

It is thy duty to leave another man's wrongful act there where it is.

你的责任是把别人错误的行为留在原地。

Termination of activity, cessation from movement and opinion, and in a sense their death, is no evil. Turn thy thoughts now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y life, thy life as a child, as a youth, thy manhood, thy old age, for in these also every change was a death. Is

this anything to fear? Turn thy thoughts now to thy life under thy grandfather, then to thy life under thy mother, then to thy life under thy father; and as thou findest many other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and terminations, ask thyself, Is this anything to fear? In like manner, then, neither are the termination and cessation and change of thy whole life a thing to be afraid of.

活动的终止，运动和意见的停止，它们在某种意义上的死亡，都不是恶。现在转而考虑你的生命，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你的生命在这些阶段中的每一变化都是一种死亡。这令人害怕吗？现在转而想想你在祖父膝下的生活，再想想在你母亲膝下的生活，再想想在父亲膝下的生活，你会发现许多其他的不同、变化和终止，问问你自己，这令人害怕吗？那么同样，你整个生命的终止、停止和变化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Hasten to examine thy own ruling faculty and that of the universe and that of thy neighbour: thy own, that thou mayest make it just; and that of the universe, that thou mayest remember of what thou art a part; and that of thy neighbour, that thou mayest know whether he has acted ignorantly or with knowledge, and that thou mayest also consider that his ruling faculty is akin to thine.

抓紧时间去考察你自己的主宰能力、宇宙的以及你邻居的主宰能力吧。对于你自己的主宰能力，你可以使它公正；对于宇宙的主宰能力，你可以记住你是其中的一部分；对于你邻居的主宰能力，你可以了解他的行为是出于无知或有知，你也可以想想他的主宰能力是和你相似的。

As thou thyself art a component part of a social system, so let every act of thine be a component part of social life. Whatever act of thine then has no reference, either immediately or remotely, to a social end, this tears asunder thy life, and does not allow it to be one, and it is of the nature of a mutiny, just as when in a popular assembly a man acting by himself stands apart from the general agreement.

既然你是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就让你的每次一行为都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无论什么行为与社会目的没有直接或间接相关，这都会分裂你的生命，打破它的统一，都有叛逆的性质，正如在一个公共集会中，一个人脱离普遍共识而我行我素。

Quarrels of little children and their sports, and poor spirits carrying about dead bodies such is everything; and so what is exhibited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mansions of the dead strikes our eyes more clearly.

小孩的争吵和运动，还有负载着尸体的可怜的灵魂，凡事都是如此。所以在对死者宅邸的描绘中所展现出来的东西，更清楚地映入我们的眼帘。

Examine into the quality of the form of an object, and detach it altogether from its material part, and then contemplate it; then determine the time, the longest which a thing of this peculiar form is naturally made to endure.

考察一个物体形式的性质，把它与其质料部分完全分开，然后进行一番沉思。接下来判断时间，即这种特殊形式的事物自然能持续的最长时间。

Thou hast endured infinite troubles through not being contented with thy ruling faculty, when it does the things which it is constituted by nature to do. But enough of this.

当你的主宰能力做出天生要做的事情，你却不满足，为此你承受了无尽的烦恼，但这已经够了。

When another blames thee or hates thee, or when men say about thee anything injurious, approach their poor souls, penetrate within, and see what kind of men they are. Thou wilt discover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to take any trouble that these men may have this or that opinion about thee. However thou must be well-disposed towards them, for by nature they are friends. And the gods too aid them in all ways, by dreams, by signs, towards the attainment of those things on which they set a value.

当别人责备你或憎恨你，或当人们谈论伤害你的事情时，靠近他们可怜的灵魂，深入其中，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会发现没有理由为这些人可能对你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而烦恼。无论如何你必须善待他们，因为他们天生是你的朋友。神灵也在各方面通过梦境、征兆帮助他们获得他们所重视的事物。

The periodic movements of the universe are the same, up and

down from age to age. And either the universal intelligence puts itself in motion for every separate effect, and if this is so, be thou content with that which is the result of its activity; or it puts itself in motion once, and everything else comes by way of sequence in a manner; or indivisible elements are the origin of all things. In a word, if there is a god, all is well; and if chance rules, do not thou also be governed by it.

宇宙的周期性运动也是如此，年复一年地来回往复。要么宇宙理智通过自身运动产生各种各样的效果，如果是这样，你就满足于它的活动产生的结果；要么宇宙理智自己运动一下，然后其他一切事物都连贯地随之而来；要么不可分割的元素是万物的起源。总之，如果有神，一切都会好；如果是偶然在主宰，你也不要受它控制。

Soon will the earth cover us all: then the earth, too, will change, and the things also which result from change will continue to change forever, and these again forever. For if a man reflects on the changes and transformations which follow one another like wave after wave and their rapidity, he will despise everything which is perishable.

很快泥土就会把我们所有人掩埋，然后泥土也会改变，还有那由变化带来的事物也会继续永远地改变，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如果一个人思考那像波浪一样一浪接一浪的变化和变形，思考那变化和变形的速度，它会蔑视一切会衰亡的东西。

The universal cause is like a winter torrent: it carries everything along with it. But how worthless are all these poor

people who are engaged in matters political, and, as they suppose, are playing the philosopher! All drivellers. Well then, man: do what nature now requires. Set thyself in motion, if it is in thy power, and do not look about thee to see if any one will observe it; nor yet expect Plato's Republic: but be content if the smallest thing goes on well, and consider such an event to be no small matter. For who can change men's opinions? And without a change of opinions what else is there than the slavery of men who groan while they pretend to obey? Come now and tell me of Alexander and Philip and Demetrius and Phalerum. They themselves shall judge whether they discovered what the common nature required, and trained themselves accordingly. But if they acted like tragedy heroes, no one has condemned me to imitate them. Simple and modest is the work of philosophy. Draw me not aside to insolence and pride.

宇宙的起因就像冬天的激流：它把一切带走。所有那些从事政治的可怜的人们是多么的没有价值，而他们还自以为在扮演哲学家的角色。满嘴胡说的人啊！那么好吧，人啊，做本性所要求的事吧。如果可以的话，让你自己动起来吧，不要左顾右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也不要期待柏拉图的理想国，要满足于把最小的一件事进展好，不要把这样的事看作是小事。谁能改变人们的意见呢？不改变意见又怎么能摆脱那种在装作服从时又发出呻吟的奴隶状态呢？现在来给我讲讲亚历山大、菲利普、菲勒容姆和德米特里厄斯。他们自己应该判断是否发现了共同本性要求的东西，而后相应地训练自己。但如果他们像悲剧英雄那样行动，没有人会谴责我去模仿他们。朴素和谦虚是哲学的工作。不要让我偏离到傲慢和自大。

Look down from above on the countless herds of men and their countless solemnities, and the infinitely varied voyagings in storms and calms, a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ose who are born, who live

together, and die. And consider, too, the life lived by others in olden time, and the life of those who will live after thee, and the life now lived among barbarous nations, and how many know not even thy name, and how many will soon forget it, and how they who perhaps now are praising thee will very soon blame thee, and that neither a posthumous name is of any value, nor reputation, nor anything else.

俯瞰那数不清的人群，他们数不清的庄严仪式、在风暴和宁静中无限变化的航行，还有那些出生、一起生活，而后死亡的人们之间的差异。再想想那些过去时代人们的生命，还有那些在你之后的人的生命，还有现在野蛮民族中的人们的生命，有多少人甚至不知道你的名字，有多少人很快会忘记你的名字，那些现在可能赞美你的人很快会责备你，可见身后之名并没有任何价值。名声如此，其他亦然。

Let there be freedom from perturb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things which come from the external cause; and let there be justice in the things done by virtue of the internal cause, that is, let there be movement and action terminating in this, in social acts, for this is according to thy nature.

不要受到来自外部原因的事物烦扰，在出于内部原因做出的事情中保持正义，也就是说，让你的活动和行为限制在这里，限制在社会行为中，因为这符合你的本性。

Thou canst remove out of the way many useless things among those which disturb thee, for they lie entirely in thy opinion; and thou wilt then gain for thyself ample space by comprehending the

whole universe in thy mind, and by contemplating the eternity of time, and observing the rapid change of every several thing, how short is the time from birth to dissolution, and the illimitable time before birth as well as the equally boundless time after dissolution.

你能把许多无用的东西从那些烦扰你的事物中清除出去，因为它们完全在于你的意见，这样你会为自己得到广阔的空间，即通过在头脑中思考整个宇宙，沉思时间的永恒，观察事物的瞬息万变，从出生到分解（死亡）是多么短暂，还有出生之前和分解之后同样无限的时间。

All that thou seest will quickly perish, and those who have been spectators of its dissolution will very soon perish too. And he who dies at the extremest old age will be brought into the same condition with him who died prematurely.

你看到的一切都会很快灭亡，那些曾经目击其灭亡的人们也会很快灭亡。活得最长的人和早逝者将被带到同样的境地。

What are these men's leading principles, and about what kind of things are they busy, and for what kind of reasons do they love and honour? Imagine that thou seest their poor souls laid bare. When they think that they do harm by their blame or good by their praise, what an idea!

这些人的指导原则是什么，他们忙于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喜爱和尊重这些事情？想象你看到了他们裸露着的可怜的

灵魂。他们认为通过他们的责备造成了损害或通过他们的赞扬带来了好处，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想法！

Loss is nothing else than change. But the universal nature delights in change, and in obedience to her all things are now done well, and from eternity have been done in like form, and will be such to time without end. What then dost thou say? That all things have been and all things always will be bad, and that no power has ever been found in so many gods to rectify these things, but the world has been condemned to be bound in never-ceasing evil?

损失不过是一种变化。而宇宙本性喜欢变化，顺从于她，一切事物现在都进行得很好，从亘古以来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也会这样进行到无尽的将来。那么你说什么呢？所有事物从来都是坏的、将来也总是坏的，在众多的神灵中尚未发现有什么力量可以纠正这些事物，难道这世界已注定要受到无休止的恶的束缚吗？

The rottenness of the matter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everything! water, dust, bones, filth; or again, marble rocks, the callosities of the earth; and gold and silver, the sediments; and garments, only bits of hair; and purple dye, blood; and everything else is of the same kind. And that which is of the nature of breath, is also another thing of the same kind, changing from this to that.

物质的腐烂是一切的基础！水、灰尘、骨头只是垃圾；大理石形成的原因是土的硬化；金子和银子是一种沉淀物；服装只是一些毛皮；染织的紫袍不过是血渍，其他一切都是一样的。还有那拥有呼吸本质的事物，也是拥有同类属性的另一事物，不过是从这样变成那样

而已。

Enough of this wretched life and murmuring and apish tricks. Why art thou disturbed? What is there new in this? What unsettles thee? Is it the form of the thing? Look at it. Or is it the matter? Look at it. But besides these there is nothing. Towards the gods, then, now become at last more simple and better. It is the same whether we examine these things for a hundred years or three.

够了，这悲惨的生命、呻吟和愚蠢的诡计。你为何烦恼呢？这里面有什么新鲜的？什么使你不安？是事物的形式吗？考察它。或者是质料吗？考察它。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了。那么面对神灵，现在终于变得更简单、更好了。不论我们考察这些事物一百年或三百年，结论都一样。

If any man has done wrong, the harm is his own. But perhaps he has not done wrong.

如果有人做错事情，损害的是他自己。但可能他并没有做错。

Either all things proceed from one intelligent source and come together as in one body, and the part ought not to find fault with what is don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hole; or there are only atoms, and nothing else than mixture and dispersion. Why, then, art thou disturbed? Say to the ruling faculty, Art thou dead, art thou corrupted, art thou playing the hypocrite, art thou become a beast, dost thou herd and feed with the rest?

要么所有事物来自一个理智本源而集合为一个整体，部分不应不满于为了整体利益而做的事情；要么只有原子，除了原子的混合与分散，别的什么也没有。那么，你为何烦恼呢？要对主宰能力说：你死了吗？你腐烂了吗？你是在扮演伪善者的角色吗？你变成一头野兽了吗？你和其他人吃住在一起吗？

Either the gods have no power or they have power. If, then, they have no power, why dost thou pray to them? But if they have power, why dost thou not pray for them to give thee the faculty of not fearing any of the things which thou fearest, or of not desiring any of the things which thou desirest, or not being pained at anything, rather than pray that any of these things should not happen or happen? for certainly if they can co-operate with men, they can co-operate for these purposes. But perhaps thou wilt say, the gods have placed them in thy power. Well, then, is it not better to use what is in thy power like a free man than to desire in a slavish and abject way what is not in thy power? And who has told thee that the gods do not aid us even in the things which are in our power? Begin, then, to pray for such things, and thou wilt see. One man prays thus: How shall I be able to lie with that woman? Do thou prays thus: How shall I not desire to lie with her? Another prays thus: How shall I be released from this? Another prays: How shall I not desire to be released? Another thus: How shall I not lose my little son? Thou thus: How shall I not be afraid to lose him? In fine, turn thy prayers this way, and see what comes.

要么神灵没有力量，要么他们有。那么，如果他们没有力量，你为什么对他们祈祷呢？但如果他们有力量，为什么你不向他们祈祷，以给你能力而使你不惧怕任何你惧怕的事物，让你不渴望你所渴望的

东西，或不为任何事物而痛苦，而要祈求这些事情发生或不发生呢？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能与人类合作，他们也能为了这些目的而合作。但可能你会说，神灵已经赋予你了这些能力。那么好，像一个自由人一样使用你力量范围内的事物，不是比以一种奴性和下贱的方式渴望不在你力量范围内的事物更好吗？谁告诉你，即使对于在我们力量范围内的事物，神灵都不帮我们？那么，开始为这样的事物祈祷，你就会看见，一个男人这样祈祷：我怎样才能和那个女人同床共枕呢？你却这样祈祷：我如何才能不渴望和她同床共枕呢？另一个人这样祈祷：我如何才能从中解脱呢？你要这样祈祷：我如何才能不渴望解脱？另一个人这样祈祷：我如何才能不失去我的幼子？你这样祈祷：我如何才能不害怕失去他？总之，你要这样祈祷，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Epicurus says, In my sickness my conversation was not about my bodily sufferings, nor, says he, did I talk on such subjects to those who visited me; but I continued to discourse on the nature of things as before, keeping to this main point, how the mind, while participating in such movements as go on in the poor flesh, shall be free from perturbations and maintain its proper good. Nor did I, he says, give the physicians an opportunity of putting on solemn looks, as if they were doing something great, but my life went on well and happily. Do, then, the same that he did both in sickness, if thou art sick, and in any other circumstances; for never to desert philosophy in any events that may befall us, nor to hold trifling talk either with an ignorant man or with one unacquainted with nature, is a principle of all schools of philosophy; but to be intent only on that which thou art now doing and on the instrument by which thou doest it.

伊壁鸠鲁说，在病痛中，我的谈话不是关于我身体的痛苦，也不

对那些看望我的人谈论这样的话题，而是继续像以往一样谈论事物的本质，保持这个主题：心灵如何在参与可怜的肉体进行的运动时，免于烦恼并保持它恰当的善。他说，我也不会给医生表情凝重的机会，仿佛他们做着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一样，而我的生命在健康快乐地运行。所以，如果你病了，病痛中要像在任何其他情形中那样做事，因为所有哲学流派的一个原则是：在任何可能降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中永不抛弃哲学，不要与无知者或不谙自然的人做无谓的交谈，而只专注于你现在做的事情和你做这件事情所使用的手段。

When thou art offended with any man's shameless conduct, immediately ask thyself, Is it possible, then, that shameless men should not be in the world? It is not possible. Do not, then, require what is impossible. For this man also is one of those shameless men who must of necessity be in the world. Let the same considerations be present to thy mind in the case of the knave, and the faithless man, and of every man who does wrong in any way. For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ou dost remind thyself that it is impossible that such kind of men should not exist, thou wilt become more kindly disposed towards every one individually. It is useful to perceive this, too, immediately when the occasion arises, what virtue nature has given to man to oppose to every wrongful act. For she has given to man, as an antidote against the stupid man, mildness, and against another kind of man some other power. And in all cases it is possible for thee to correct by teaching the man who is gone astray; for every man who errs misses his object and is gone astray. Besides wherein hast thou been injured? For thou wilt find that no one among those against whom thou art irritated has done anything by which thy mind could be made worse; but that which is evil to thee and harmful has its foundation only in the mind. And what harm is done or what is there strange, if the man who has not been instructed does the acts of an uninstructed man? Consider whether

thou shouldst not rather blame thyself, because thou didst not expect such a man to err in such a way. For thou hadst means given thee by thy reason to suppose that it was likely that he would commit this error, and yet thou hast forgotten and art amazed that he has erred. But most of all when thou blamest a man as faithless or ungrateful, turn to thyself. For the fault is manifestly thy own, whether thou didst trust that a man who had such a disposition would keep his promise, or when conferring thy kindness thou didst not confer it absolutely, nor yet in such way as to have received from thy very act all the profit. For what more dost thou want when thou hast done a man a service? Art thou not content that thou hast done something conformable to thy nature, and dost thou seek to be paid for it? Just as if the eye demanded a recompense for seeing, or the feet for walking. For as these members are formed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by working according to their several constitutions obtain what is their own; so also as man is formed by nature to acts of benevolence, when he has done anything benevolent or in any other way conducive to the common interest, he has acted conformably to his constitution, and he gets what is his own.

当你被某个人的无耻行为所冒犯，立即问你自己，那无耻的人有可能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吗？不可能。那么，不要要求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人也是那些必然要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无耻之人中的一个。面对无赖、背信弃义之徒以及一切以某种方式行恶的人，要让同样的想法出现在你的头脑之中。因为当你提醒自己这样的人不存在于这个世界是不可能之事时，你对每一个人的态度会变得更加和善。在这种情况出现时，了解这一点也是有用的：自然赋予人类什么美德来应对每一种错误的行为。因为她把和善赐予人类，作为解毒剂来对付蠢人，而对付另一种人又有一些其他的力量。在所有情况下，你都有可能通过教导误入歧途的人来纠正他们，因为每一个犯错的人都是迷失

目标而走入歧途的人。此外你还有什么地方受到伤害了呢？因为你会发现在那些惹恼你的人当中，没人做了什么使你心灵变得更坏的事，而那对你是恶的、有害的东西只在心灵里才有基础。如果没有受教育的人做出了没有教养的行为，那造成了什么伤害呢？或者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想想你是否还不如责备自己，因为你事先没有预料到这样的人会以这样的方式犯错。因为你本来拥有理性给你的方法去假设他可能犯的错误，而你却忘了使用，并且对他犯了错误感到吃惊。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你责备一个人背信弃义或忘恩负义时，想想你自己。因为这个错误明显是你自己的，你或者相信一个有着这样性情的人会信守承诺，或者你在给予善良时没有绝对付出，也没有以一种在你的所作所为中获得所有利益的方式付出。你为一个人服务后，你还想要什么更多的东西吗？难道你还不满足你已经做了一些适合你本性的事吗？你还在寻求相应的回报吗？就像眼睛看东西要得到回报，脚走路要得到回报一样。因为这些身体部位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而形成，通过合乎它们各自的结构工作而获得属于它们自己的东西，同样的，人是天生为了仁爱行为而造就，当他做了任何善行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有助于共同利益时，他就做了适合他结构的事，得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Book Ten

卷十

Wilt thou then, my soul, never be good and simple and one and naked, more manifest than the body which surrounds thee? Wilt thou never enjoy an affectionate and contented disposition? Wilt thou never be full and without a want of any kind, longing for nothing more, nor desiring anything, either animate or inanimate, for the enjoyment of pleasures? Nor yet desiring time wherein thou shalt have longer enjoyment, or place, or pleasant climate, or society of men with whom thou mayest live in harmony? but wilt thou be satisfied with thy present condition, and pleased with all that is about thee, and wilt thou convince thyself that thou hast everything and that it comes from the gods, that everything is well for thee, and will be well whatever shall please them, and whatever they shall giv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perfect living being, the good and just and beautiful, which generates and holds together all things, and contains and embraces all things which are dissolv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other like things? Wilt thou never be such that thou shalt so dwell in community with gods and men as neither to find fault with them at all, nor to be condemned by them?

我的灵魂，你不愿善良、简单、统一和赤裸，使它们比包围你的躯体更显而易见吗？你不愿享受一种慈爱和满足的性情吗？你不愿充实、自足、无它求、无所欲，无论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以达到快乐的享受吗？你也不会渴望有更长久的享受，不渴望宜人的地方或气候，不渴望和谐相处的一群人吗？你会满足于你目前的条件，对关于你的一切感到高兴吗？你会让自己相信你拥有一切，而这些都来自于

神灵吗？你相信一切对于你来说都是好的，愉悦神灵的一切都会是好的吗？你相信他们为了保存完美的生命存在而给予的一切善、正义和美好的事物，一切产生和结合万物，包含和囊括了所有为其他类似事物的产生而分解的事物都是好的吗？你将与神灵、人类同在，既不对他们不满，也不被他们谴责，你不愿这样吗？

Observe what thy nature requires, so far as thou art governed by nature only; then do it and accept it, if thy nature, so far as thou art a living being, shall not be made worse by it. And next thou must observe what thy nature requires so far as thou art a living being. And all this thou mayest allow thyself, if thy nature, so far as thou art a rational animal, shall not be made worse by it. But the rational animal is consequently also a political (social) animal. Use these rules, then, and trouble thyself about nothing else.

在你只受控于本性的情况下，观察一下本性要求什么，然后去做，去接受它，只要你是一个生命存在，你的本性不会因此变得更坏。接下来，就你是一个生命存在而言，你必须观察你的本性要求什么。所有这些你都可以允许自己去做，只要你是一个理性动物，而且你的本性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坏。但理性动物也因此是一种政治（社会）动物。那么，运用这些规则，不让别的东西烦扰你自己。

Everything which happens either happens in such wise as thou art formed by nature to bear it, or as thou art not formed by nature to bear it. If then it happens to thee in such way as thou art formed by nature to bear it, do not complain, but bear it as thou art formed by nature to bear it. But if it happens in such wise as thou art not formed by nature to bear it, do not complain, for it will perish after it has consumed thee. Remember, however, that thou art formed by

nature to bear everything, with respect to which it depends on thy own opinion to make it endurable and tolerable, by thinking that it is either thy interest or thy duty to do this.

每一件发生的事情，或以你天生造就来容忍它的方式发生，或以你不是天生造就来容忍它的方式发生。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以你天生造就来容忍它的方式发生，不要抱怨，而要容忍，因为你是天生造就来容忍它的。但如果以你并非天生造就来容忍它的方式发生，不要抱怨，因为它在消耗完你之后就会灭亡。然而，记住你是天生造就来容忍一切的，你要依靠你的想法使它变得可以忍受、可以宽容，要想着是你的利益和责任让你这样做。

If a man is mistaken, instruct him kindly and show him his error. But if thou art not able, blame thyself, or blame not even thyself.

如果一个人犯了错，那就善意地教导他，指出他的错误。但如果你不能，那就责怪你自己吧，或者就连自己也不要责备。

Whatever may happen to thee, it was prepared for thee from all eternity; and the implication of causes was from eternity spinning the thread of thy being, and of that which is incident to it.

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都是整个永恒（宇宙）为你准备好的，因果的织机在永恒中编织着你的生命和相关事件之线。

Whether the universe is a concourse of atoms, or nature is a system, let this first be established, that I am a part of the whole which is governed by nature; next, I am in a manner intimately related to the parts which are of the same kind with myself. For remembering this, inasmuch as I am a part, I shall be discontented with none of the things which are assigned to me out of the whole; for nothing is injurious to the part, if it is for the advantage of the whole. For the whole contains nothing which is not for its advantage; and all natures indeed have this common principle, bu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has this principle besides, that it cannot be compelled even by any external cause to generate anything harmful to itself. By remembering then that I am a part of such a whole, I shall be content with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无论宇宙是一团原子，或自然是一个体系，首先要确立这一点：我是本性所控制的整体的一部分；其次，我在某种方式上与和我同类的部分密切相关。记住这一点，既然我只是一个部分，我就不应该对整体分配给我的任何事物不满。因为如果是对整体有益的，就不会对部分有害。因为整体不会包括任何对它不利的东西。一切本性确实都有这种共同的原则，除此之外宇宙的本性还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它不受任何外因的逼迫而产生任何对它自身有害的东西。记住我是这样的整体的一部分，我就会满足于发生的一切。

And inasmuch as I am in a manner intimately related to the parts which are of the same kind with myself, I shall do nothing unsocial, but I shall rather direct myself to the things which are of the same kind with myself, and I shall turn all my efforts to the common interest, and divert them from the contrary. Now, if these things are done so, life must flow on happily, just as thou mayest observe that the life of a citizen is happy, who continues a course of

action which is advantageous to his fellow-citizens, and is content with whatever the state may assign to him.

因为我在某种方式上与和我同类的部分密切相关，我不应做任何不友善的事情，而应该把自己导向与我同类的事情，应该把我所有的努力转向共同利益，与之相悖的事情则要排斥。现在，如果你这样做了，生活一定会过得愉快，正如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市民的生活是快乐的：他不断地做对其他市民有益的事情，满足于国家分配给他的任何事情。

The parts of the whole, everything, I mean, which is naturally comprehended in the universe, must of necessity perish; but let this be understood in this sense, that they must undergo change. But if this is naturally both an evil and a necessity for the parts, the whole would not continue to exist in a good condition, the parts being subject to change and constituted so as to perish in various ways. For whether did nature herself design to do evil to the things which are parts of herself, and to make them subject to evil and of necessity fall into evil, or have such results happened without her knowing it? Both these suppositions, indeed, are incredible. But if a man should even drop the term Nature (as an efficient power), and should speak of these things as natural, even then it would be ridiculous to affirm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parts of the whole are in their natu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be surprised or vexed as if something were happening contrary to nature, particularly as the dissolution of things is into those things of which each thing is composed. For there is either a dispersion of the elements out of which everything has been compounded, or a change from the solid to the earthy and from the airy to the aerial, so that these parts are taken back into the universal reason, whether

this at certain periods is consumed by fire or renewed by eternal changes. And do not imagine that the solid and the airy part belong to thee from the time of generation. For all this received its accretion only yesterday, and the day before, as one may say, from the food and the air which is inspired. This, then, which has received the accretion, changes, not that which thy mother brought forth. But suppose that this which thy mother brought forth implicates thee very much with that other part, which has the peculiar quality of change, this is nothing in fact in the way of objection to what is said.

整体的部分，我是说，宇宙包括的一切东西，都必然会灭亡。但要这样来理解，那就是它们（在灭亡前）必须经历变化。如果这变化对于部分来说既是一种恶又是一种必然，整体就不会继续以一种好的状态存在，因为部分都要经历变化，而且它们的构成使得它们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灭亡。究竟是自然本身计划要对属于她的部分作恶，使部分从属于恶且必然陷入恶，还是这样的结果发生了而自然并不知道呢？确实，这两种假设都不可信。但如果一个人甚至不用“自然”这个词（作为一种有效力量），而把这些事情说成是自然的，甚至在肯定整体的部分在本性上从属于变化的同时，又感到吃惊或烦恼，好像一些与自然相悖的事情在发生，尤其是在事物分解为每一事物得以组成的元素时，这样做就荒唐了。因为要么是组合成一切事物的元素的分解，要么是一种从固体的到泥土的、从气体的到气的变化，使这些部分被带回到宇宙的理性当中，在某个时期被火吞噬，或被永恒的变化所更新。不要认为固体的和气体的部分从它们产生时就属于你了，它们所得到的生长，可以说都只是从昨天和前天的食物和吸入的空气而来。那么，这得到生长和变化的，并不是你母体带来的。假设由你母体产生的东西使你和其他有着变化特性的部分密切相关，事实上这也不违背前面所说的。

When thou hast assumed these names, good, modest, true, rational, a man of equanimity, and magnanimous, take care thou dost not change these names; and if thou shouldst lose them, quickly return to them. And remember that the term Rational was intended to signify a discriminating attention to every several thing and freedom from negligence; and that Equanimity is the voluntary acceptance of the things which are assigned to thee by the common nature; and that Magnanimity is the elevation of the intelligent part above the pleasurable or painful sensations of the flesh, and above that poor thing called fame, and death, and all such things. If, then, thou maintainest thyself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se names, without desiring to be called by these names by others, thou wilt be another person and wilt enter on another life. For to continue to be such as thou hast hitherto been, and to be torn in pieces and defiled in such a life, is the character of a very stupid man and one overfond of his life, and like those half- devoured fighters with wild beasts, who, though covered with wounds and gore, still entreat to be kept to the following day, though they will be exposed in the same state to the same claws and bites. Therefore fix thyself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se few names: and if thou art able to abide in them, abide as if thou wast removed to certain islands of the Happy. But if thou shalt perceive that thou fallest out of them and dost not maintain thy hold, go courageously into some nook where thou shalt maintain them, or even depart at once from life, not in passion, but with simplicity and freedom and modesty, after doing this one laudable thing at least in thy life, to have gone out of it thus. In order, however, to the remembrance of these names, it will greatly help thee, if thou rememberest the gods, and that they wish not to be flattered, but wish all reasonable beings to be made like themselves; and if thou rememberest that what does the work of a fig-tree is a fig-tree, and that what does the work of a dog is a dog, and that what does the work of a bee is a bee, and that what does the work

of a man is a man.

当你得到了这些名称：善良、谦虚、真诚、理性、泰然、豁达，注意不要改变它们。如果你失去这些名称，要赶快回到它们那里。记住，“理性”这个词是用来表示明辨每一个体和摆脱疏忽的；“泰然”是自愿接受共同本性分配给你的事物；“豁达”是理智部分超乎肉体的感官享乐和痛苦，超乎那叫做名声、死亡的可怜东西，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如果你一直拥有这些名称，而不想别人用这些名称称呼你，你会变成另一个人，进入另一种生活。如果继续像你原来那样，在那样的生活中被撕成碎片、被玷污，那是非常愚蠢的人和过分爱惜自己生命的人的特征，像那些被野兽咬得伤痕累累的角斗士一样，尽管浑身是伤口和血块，仍然祈求性命能够延续到第二天，尽管（第二天）他们还会以同样的状态来面对野兽同样的爪子和撕咬。因此，你要使自己保有这几个名称，如果你能住在其间，那就好比你住到了幸福之岛一样。但如果你发觉你脱离了这些名称，没有抓住它们，那就勇敢地走进你会保有它们的角落，即使是立即离开生命，不要带着激情，而是带着单纯、自由和谦逊，在你生命中至少做了这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之后，再离开生命。然而，为了记住这些名称，这对你会大有帮助：如果你记住神，记住他们不希望被奉承，但是希望所有的理性生命都造得和他们相似；记住无花果树做的是无花果树的工作，狗做的是狗的工作，蜜蜂做蜜蜂的工作，人做人的工作。

Mimi, war, astonishment, torpor, slavery, will daily wipe out those holy principles of thine. How many things without studying nature dost thou imagine, and how many dost thou neglect? But it is thy duty so to look on and so to do everything, that at the same time the power of dealing with circumstances is perfect, and the contemplative faculty is exercised, and the confidence which comes from the knowledge of each several thing is maintained without showing it, but yet not concealed.

滑稽剧、战争、惊讶、麻木、奴役将一天天抹掉你那些神圣的原则。你在没有研究自然的情况下想象了多少事物，又忽视了多少事物？但你的责任是先观察而后做事，同时完善你应对环境、处理情况的能力，训练思辨能力，通过学习每样事物的知识而获得自信，并保持这份自信而不炫耀，但也不隐藏。

For when wilt thou enjoy simplicity, when gravity, and when the knowledge of every several thing, both what it is in substance, and what place it has in the universe, and how long it is formed to exist, and of what things it is compounded, and to whom it can belong, and who are able both to give it and take it away?

你何时才会享受简朴？何时会享受庄重？何时会享受对每一个别事物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它的实质，它在宇宙中的位置，它形成后会存在多久，它由什么东西组成，它可以属于谁，谁能既给予它又带走它？

A spider is proud when it has caught a fly, and another when he has caught a poor hare, and another when he has taken the little fish in a net, and another when he has taken wild boars, and another when he has taken bears, and another when he has taken Sarmatians. Are not these robbers, if thou examinest their opinions?

蜘蛛捉到了一只苍蝇是骄傲的，有的动物骄傲的是捉到了一只可怜的兔子，从网里抓住小鱼捕获野猪或熊，还有的骄傲的是征服萨尔玛提亚人。如果你审视他们的观点，这些不是强盗吗？

Acquire the contemplative way of seeing how all things change into one another, and constantly attend to it, and exercise thyself about this part of philosophy. For nothing is so much adapted to produce magnanimity. Such a man has put off the body, and as he sees that he must, no one knows how soon, go away from among men and leave everything here, he gives himself up entirely to just doing in all his actions, and in everything else that happens he resigns himself to the universal nature. But as to what any man shall say or think about him, or do against him, he never even thinks of it, being himself contented with these two things, with acting justly in what he now does, and being satisfied with what is now assigned to him; and he lays aside all distracting and busy pursuits, and desires nothing else than to accomplish the straight course through the law, and by accomplishing the straight course to follow God.

掌握这种思辨的方法：观察万物如何相互变化，不断地关注它，训练自己在哲学方面的能力。因为没有什么更适合产生豁达。这样的人撇开了他的躯体，因为他知道他必定会离开人世（没人知道有多快），把一切留在这里，他把自己完全投入到所有的行动中，去做正义的事情，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他都让自己顺应宇宙本性。至于别人会怎么说他或怎么想他，或是反对他，他从不考虑，只满足于两件事：一是他现在所做的是正义的事，二是满足于现在分配于他的事物。他把所有分心的和忙碌的追求放在一边，按照法则走完笔直的路，通过走笔直的路去追随神，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What need is there of suspicious fear, since it is in thy power to inquire what ought to be done? And if thou seest clear, go by this way content, without turning back: but if thou dost not see clear, stop and take the best advisers. But if any other things oppose thee,

go on according to thy powers with due consideration, keeping to that which appears to be just. For it is best to reach this object, and if thou dost fail, let thy failure be in attempting this. He who follows reason in all things is both tranquil and active at the same time, and also cheerful and collected.

既然探寻应该做什么在你的力量范围之内，疑惧又有何必要呢？如果你看得清楚，就满意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要回头；但如果你看不清楚，那就停下来咨询最好的顾问吧。如果有别的东西挡了你，经过相应的考虑后就按照你的力量继续前行吧，坚持那看来是正当的东西。达到这一目标是最好的，如果你确实失败了，让你的失败作为尝试这一目标的失败。在所有事情上遵循理性的人，是既安宁又积极的，也是愉悦和镇定的。

Inquire of thyself as soon as thou wakest from sleep whether it will make any difference to thee, if another does what is just and right. It will make no difference.

一旦你从睡梦中醒来，就问问自己：如果别人做了正义、正确的事，对你是否会有什么影响？不会有什么影响。

Thou hast not forgotten, I suppose, that those who assume arrogant airs in bestowing their praise or blame on others, are such as they are at bed and at board, and thou hast not forgotten what they do, and what they avoid and what they pursue, and how they steal and how they rob, not with hands and feet, but with their most valuable part, by means of which there is produced, when a man chooses, fidelity, modesty, truth, law, a good daemon

(happiness)?

我想，你没有忘记那些在赞美或责备他人时态度傲慢的人，他们在床上、在甲板上也是这样的吧？我想你也没有忘记他们做什么，避免什么和追求什么，他们是如何偷窃，如何抢劫，不是用手和脚，而是用他们最宝贵的部分，如果一个人愿意，他们本可以用这一部分可以做到忠诚、谦逊、真诚、守法并成为好的神灵（幸福）吧？

To her who gives and takes back all, to nature, the man who is instructed and modest says, Give what thou wilt; take back what thou wilt. And he says this not proudly, but obediently and well pleased with her.

自然给予一切，收回一切。谦逊和有教养的人会这样对自然说，按你的意愿给予吧，按你的意愿收回吧。他不是骄傲地这么说，而是顺从、欣悦地对自然说出来。

Short is the little which remains to thee of life. Live as on a mountain. For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ether a man lives there or here, if he live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as in a state (political community).Let men see, let them know a real man who lives according to nature. If they cannot endure him, let them kill him. For that is better than to live thus as men do.

你生命中残留的小部分是短暂的。像在一座山上那样生活吧。因为如果一个人住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像住在一个国家（政治团体）中一样，他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什么不同。让人们看到，让他们认

识一个真正按照本性生活的人。如果他们不能容忍，就让他们杀了他，因为那要比人们这样生活好些。

No longer talk at all about the kind of man that a good man ought to be, but be such.

不要再谈论一个好人应该是怎样的人，而是要做这样的人。

Constantly contemplate the whole of time and the whole of substance, and consider that all individual things as to substance are a grain of a fig, and as to time the turning of a gimlet.

不断地思考时间和物质的整体，要知道所有的个体对整体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对时间而言就像螺丝锥那么一转。

Look at everything that exists, and observe that it is already in dissolution and in change, and as it were putrefaction or dispersion, or that everything is so constituted by nature as to die.

看看存在的每一事物，观察它已经处于分解和变化中，就像它是在腐败和消散，或者一切就是这样被自然造就以至于灭亡。

Consider what men are when they are eating, sleeping, generating, easing themselves and so forth. Then what kind of men they are when they are imperious and arrogant, or angry and

scolding from their elevated place. But a short time ago to how many they were slaves and for what things: and after a little time consider in what a condition they will be.

想想人们在吃饭、睡觉、生产、放松等时候是什么样的。再想想人们在专横、傲慢、生气、居高临下和训斥他人时又是什么样的。但就在不久前他们还曾是多少人的奴隶，是为了什么事情受人奴役，再想想他们过不了多久会处于什么状态。

That is for the good of each thing, which the universal nature brings to each. And it is for its good at the time when nature brings it.

宇宙本性带给每一事物的东西都是有益于它们的。当本性带给它的时候，是对它有益的。

“The earth loves the shower”; and “the solemn aether loves”: and the universe loves to make whatever is about to be. I say then to the universe, that I love as thou lovest. And is not this too said, that “this or that loves (is wont) to be produced”?

“大地喜爱阵雨”，“喜爱庄严的以太”：宇宙喜爱创造新事物。那么我对宇宙说，我爱你所爱。这不也是说，事物喜欢（愿意）被创造？

Either thou livest here and hast already accustomed thyself to

it, or thou art going away, and this was thy own will; or thou art dying and hast discharged thy duty. But besides these things there is nothing. Be of good cheer, then.

或者你住在这里，已经习惯了这个地方；或者你要离开，这是你自己的意志；或者你即将死亡，已经履行了你的责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那就好好地快乐生活吧。

Let this always be plain to thee, that this piece of land is like any other; and that all things here are the same with things on the top of a mountain, or on the sea-shore, or wherever thou choosest to be. For thou wilt find just what Plato says, Dwelling within the walls of a city as in a shepherd's fold on a mountain.

你要清楚这一点：这片土地像其他任何土地一样，这里所有的事物与山顶、海边或任何你愿意去的地方的事物一样。因为你会发现正如柏拉图所说，居住在一个城市城墙内就像住在牧羊人山上的羊圈里一样。

What is my ruling faculty now to me? And of what nature am I now making it? And for what purpose am I now using it? Is it void of understanding? is it loosed and rent asunder from social life? Is it melted into and mixed with the poor flesh so as to move together with it?

我的主宰能力现在对我来说是什么？我把它变成了什么性质？我现在用它是为了什么目的？它是否没有理解力？是否松散并与社会生

活相脱离？是否与可怜的肉体相融合和混合，并与它一起行动？

He who flies from his master is a runaway; but the law is master, and he who breaks the law is a runaway. And he also who is grieved or angry or afraid, is dissatisfied because something has been or is or shall be of the things which are appointed by him who rules all things, and he is Law, and assigns to every man what is fit. He then who fears or is grieved or is angry is a runaway.

从主人那里逃走的人是逃亡者；而法则是主人，破坏法则的人就是逃亡者。悲哀、生气或害怕的人也是逃亡者，他因为某些曾经或现在或将来由统治万物的人指派的东西而不满，这个统治的人就是法则，他把适合的东西分配给每一个人。那么，害怕、悲哀或生气的人就是逃亡者。

A man deposits seed in a womb and goes away, and then another cause takes it, and labours on it and makes a child. What a thing from such a material! Again, the child passes food down through the throat, and then another cause takes it and makes perception and motion, and in fine life and strength and other things; how many and how strange! Observe then the things which are produced in such a hidden way, and see the power just as we see the power which carries things downwards and upwards, not with the eyes, but still no less plainly.

男人把种子撒播在子宫里，而后走开了，另一个机缘接过它，作用于它，把它变成婴儿。这样的质料产生的东西是多么神奇！然后，这孩子通过喉咙吃下食物，另一个机缘接过它，造出知觉和运动、健

康的生命、力量和其他东西。多少人这样出生成长，这是多么奇妙！所以，观察以这样隐蔽的方式产生的事物，观察这种力量就像我们观察使事物上下运动的力量一样，不是用眼睛，但仍然很明显。

Constantly consider how all things such as they now are, in time past also were; and consider that they will be the same again. And place before thy eyes entire dramas and stages of the same form, whatever thou hast learned from thy experience or from older history; for example, the whole court of Hadrian, and the whole court of Antoninus, and the whole court of Philip, Alexander, Croesus; for all those were such dramas as we see now, only with different actors.

经常想想，万物如何在过去也是现在的这个样子，想想他们在将来也是一样。把同样形式的整个戏剧和舞台，以及从你的经验或是过去的历史中学到的东西放在你眼前。比如，哈德良的整个宫廷，安东尼的整个宫廷，菲利普的整个宫廷，亚历山大、克罗伊斯的整个宫廷。所有过去的那些都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戏剧，只是演员不同。

Imagine every man who is grieved at anything or discontented to be like a pig which is sacrificed and kicks and screams.

想象一下，对任何事都悲叹或不满的人，就像一头被当作供品祭祀，在那里不停挣扎和嚎叫的猪。

Like this pig also is he who on his bed in silence laments the bonds in which we are held. And consider that only to the rational

animal is it given to follow voluntarily what happens; but simply to follow is a necessity imposed on all.

躺在床上默默哀叹束缚着我们的枷锁的人，也像这头猪。想一想，自愿地顺应发生的事情只是赋予理性动物的一种品质，而简单地顺应是加给万物的一种必然。

Severally on the occasion of everything that thou doest, pause and ask thyself, if death is a dreadful thing because it deprives thee of this.

做每一件事情时，都要停下来问问自己，是否因为死亡剥夺你做这件事的机会，所以它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When thou art offended at any man's fault, forthwith turn to thyself and reflect in what like manner thou dost err thyself; for example, in thinking that money is a good thing, or pleasure, or a bit of reputation, and the like. For by attending to this thou wilt quickly forget thy anger, if this consideration also is added, that the man is compelled; for what else could he do? or, if thou art able, take away from him the compulsion.

当你因为别人的错误而生气，立即问一问自己，反思一下是否也犯过类似的错误，比如，是否想过钱是个好东西，或想过享乐，或想得到一点名声等等。如果你这样想了，就会很快忘掉愤怒，如果再加上这点考虑：这个人（犯错误）是被迫的，他还能怎么办呢？或者如果你可以的话，把他做这件事所受到的压迫带走吧。

When thou hast seen Satyron the Socratic, think of either Eutyches or Hymen, and when thou hast seen Euphrates, think of Eutychion or Silvanus, and when thou hast seen Alciphron, think of Tropaeophorus, and when thou hast seen Xenophon, think of Crito of Severus, and when thou hast looked on thyself, think of any other Caesar, and in the case of every one do in like manner. Then let this thought be in thy mind, Where then are those men? Nowhere, or nobody knows where. For thus continuously thou wilt look at human things as smoke and nothing at all; especially if thou reflectest at the same time that what has once changed will never exist again in the infinite duration of time. But thou, in what a brief space of time is thy existence? And why art thou not content to pass through this short time in an orderly way? What matter and opportunity for thy activity art thou avoiding? For what else are all these things, except exercises for the reason, when it has viewed carefully and by examination into their nature the things which happen in life? Persevere then until thou shalt have made these things thy own, as the stomach which is strengthened makes all things its own, as the blazing fire makes flame and brightness out of everything that is thrown into it.

当你看到苏格拉底派学者萨提隆时，想想尤提切斯或海门；当你看到尤弗拉蒂斯时，想想尤提切翁或西凡努斯；当你看到阿尔西弗龙，想想特洛帕奥佛鲁斯；当你看到色诺芬时，想想塞维鲁的克里托；当你看到你自己时，想想任何别的恺撒。看每一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去处理。然后你在心里再想一想：这些人如今在哪里呢？无处可寻，无人可知。因为这样想你会觉得人间的一切如过眼云烟，虚无缥缈，特别是你想到，事物一经变化将不会再存在于无尽延续的时间之中。而你，你的存在是多么短暂的一段时间啊！为什么你不满足于有序度过这短暂的时间呢？你在躲避什么事情和机会呢？所有这些事

物，细查并探究生活中发生的事物的本性，除了是对理性的锻炼之外，还是别的什么呢？那么，坚持吧，直到你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就像强健的胃把所有的食物变成它自己的，就像熊熊大火把投入其中的一切变成火焰和光明。

Let it not be in any man's power to say truly of thee that thou art not simple or that thou art not good; but let him be a liar whoever shall think anything of this kind about thee; and this is altogether in thy power. For who is he that shall hinder thee from being good and simple? Do thou only determine to live no longer, unless thou shalt be such. For neither does reason allow thee to live, if thou art not such.

让任何人都不能如实地说你不纯朴或不善良，让对你有这种想法的人变成一个说谎的人，这完全在你的力量范围内。谁能阻止你成为一个善良纯朴的人呢？除非你成为这样的人，否则就下决心不要活下去了。因为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理性也不会允许你活下去。

What is that which as to this material (our life) can be done or said in the way most conformable to reason? For whatever this may be, it is in thy power to do it or to say it, and do not make excuses that thou art hindered. Thou wilt not cease to lament till thy mind is in such a condition that, what luxury is to those who enjoy pleasure, such shall be to thee, in the matter which is subjected and presented to thee, the doing of the things which are conformable to man's constitution; for a man ought to consider as an enjoyment everything which it is in his power to do according to his own nature. And it is in his power everywhere. Now, it is not given to a cylinder to move everywhere by its own motion, nor yet to water

nor to fire nor to anything else which is governed by nature of an irrational soul, for the things which check them and stand in the way are many. But intelligence and reason are able to go through everything that opposes them, and in such manner as they are formed by nature and as they choose. Place before thy eyes this facility with which the reason will be carried through all things, as fire upwards, as a stone downwards, as a cylinder down an inclined surface, and seek for nothing further. For all other obstacles either affect the body only which is a dead thing; or, except through opinion and the yielding of the reason itself, they do not crush nor do any harm of any kind; for if they did, he who felt it would immediately become bad. Now, in the case of all things which have a certain constitution, whatever harm may happen to any of them, that which is so affected becomes consequently worse; but in the like case, a man becomes both better, if one may say so, and more worthy of praise by making a right use of these accidents. And finally remember that nothing harms him who is really a citizen, which does not harm the state; nor yet does anything harm the state which does not harm law (order); and of these things which are called misfortunes not one harms law. What then does not harm law does not harm either state or citizen.

对于这个质料（我们的生命），如何能以最合乎理性的方式去做或说呢？不管是什么，这么做或说都在你的力量范围内，别找借口说你受到了阻碍。你的心灵处于这样的状态才会停止悲叹：在从属和呈现于你的质料中，做符合人的结构的事情，就如同享乐之人纵情于奢华。因为一个人应该把每一件他能够按照他本性做的事看作是一种享受。无论在哪里，这都在他的力量范围内。圆筒没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运动到处移动，水、火以及任何别的由非理性灵魂的本性控制的东西都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有很多牵制和阻止它们的事物。但是智力和理性却能够在一切对抗它们的事物中畅通无阻，它们先天就是这样被造

就的，也是它们愿意的。把理性通过一切事物的这种天赋放在你眼前，就像火向上蹿，石头往下落，圆筒沿着倾斜的平面滚下去，不要再找别的东西了。因为所有其他障碍要么只影响死去的躯体，要么只有通过意见和理性自身的让步，才会产生压迫或产生任何损害。因为如果它们产生了损害，感受到它的人会立即遭殃。现在，在一切有某种结构的事物中，不管发生了什么损害，受到影响的事物结果会变得更坏；而在同样的情况下，可以说，一个人通过正确运用这些事件会变得更好，更值得赞扬。最后要记住，任何不损害国家的事情也不会损害真正的公民，任何不损害法则（秩序）的事情，也不会损害国家；在这些称之为不幸的事物中，没有一个会损害到法则。那么，不损害法则的事情也不会损害国家或者公民。

To him who is penetrated by true principles even the briefest precept is sufficient, and any common precept, to remind him that he should be free from grief and fear. For example:

对于完全理解了真正原则的人，即使是最简单的箴言也就足够了，任何普遍的箴言都是要提醒他应该摆脱悲伤和恐惧。比如：

Leaves, some the wind scatters on the ground—

叶子，一些被风吹散在地——

So is the race of men.

人类也是如此。

Leaves, also, are thy children; and leaves, too, are they who cry out as if they were worthy of credit and bestow their praise, or on the contrary curse, or secretly blame and sneer; and leaves, in like manner, are those who shall receive and transmit a man's fame to aftertimes. For all such things as these “are produced in the season of spring,” as the poet says; then the wind casts them down; then the forest produces other leaves in their places. But a brief existence is common to all things, and yet thou avoidest and pursuest all things as if they would be eternal. A little time, and thou shalt close thy eyes; and him who has attended thee to thy grave another soon will lament.

叶子，也是你的孩子；叶子，也是那些大声喊叫仿佛他们值得称赞和表扬的人，或是相反的诅咒、暗中责备和表示轻蔑的人；同样，叶子是那些将得到名声并把它传到来世的人。正如诗人所说，所有这些东西“产生于春天”，然后风把它们吹落；然后树木长出别的叶子来代替它们。一切都是短暂的存在，而你却想逃避或追求事物，好像它们会永恒似的。过一会儿，你就会闭上眼睛，为你送葬的人不久就会被另一个人哀悼。

The healthy eye ought to see all visible things and not to say, I wish for green things; for this is the condition of a diseased eye. And the healthy hearing and smelling ought to be ready to perceive all that can be heard and smelled. And the healthy stomach ought to be with respect to all food just as the mill with respect to all things which it is formed to grind. And accordingly the healthy understanding ought to be prepared for everything which happens; but that which says, Let my dear children live, and let all men praise whatever I may do, is an eye which seeks for green things, or

teeth which seek for soft things.

健全的眼睛应该看见所有可见之物，而不要说，我希望看见绿色的事物，因为这是病眼才有的状况。健全的听觉和嗅觉应该准备好去察觉所有能听到和嗅到的事物。健全的胃应该像碾磨对待所有要磨的东西那样对待所有的食物。因此，健全的理解力应该为所有发生的事物做好准备，而这种说法：让我亲爱的孩子们活着，让所有的人都赞美我所做的一切，则像是寻找绿色事物的病眼，或是寻找柔软食物的牙齿。

There is no man so fortunate that there shall not be by him when he is dying some who are pleased with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Suppose that he was a good and wise man, will there not be at last some one to say to himself, Let us at last breathe freely, being relieved from this schoolmaster? It is true that he was harsh to none of us, but I perceived that he tacitly condemns us. —This is what is said of a good man. But in our own case how many other things are there for which there are many who wish to get rid of us. Thou wilt consider this then when thou art dying, and thou wilt depart more contentedly by reflecting thus: I am going away from such a life, in which even my associates in behalf of whom I have striven so much, prayed, and cared, themselves wish me to depart, hoping perchance to get some little advantage by it. Why then, should a man cling to a longer stay here? Do not, however, for this reason go away less kindly disposed to them, but preserving thy own character, and friendly and benevolent and mild, and on the other hand not as if thou wast torn away; but as when a man dies a quiet death, the poor soul is easily separated from the body, such also ought thy departure from men to be, for nature united thee to them and associated thee. But does she now dissolve the union?

Well, I am separated as from kinsmen, not, however, dragged resisting, but without compulsion; for this too is one of the things according to nature.

没有人会如此幸运，即在他临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人会对即将发生的事（他的死）表示高兴。假设他是一个善良智慧的人，最后不也有人这样说吗：摆脱了这位老师，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他对我们任何人都不严厉，但我觉得他是默默地谴责我们。这是对一个好人的评论。但就我们而言，有多少其他的事情使得很多人希望摆脱我们啊！你在临死的时候会考虑这一点，作如下想你会更加满足地离开：我将要离开这样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我如此努力地为我的同伴操劳、为他们祈祷、关心他们，而他们希望我离开，想着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好处。那么，人为什么想要在这尘世逗留更久呢？然而，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在离开的时候对他们态度不那么和善，要保持你自己的个性，友好、仁慈、温和。另外，不要像你被拖走似的。一个人安详死去时，可怜的灵魂很容易与躯体分离，这也应该是你离开人们的样子，因为自然把你和他们结合、联系了起来。但她现在溶解了这一结合吗？好，我像是离开了同胞亲人一样，但不是被拖拽、而反抗着，而是表现得没有心甘情愿，因为这也是合乎本性的事情之一。

Accustom thyself as much as possible on the occasion of anything being done by any person to inquire with thyself, For what object is this man doing this? but begin with thyself, and examine thyself first.

在别人做事的时候，尽可能使你自己习惯于这样问自己，这个人做这件事有什么目的？从自己开始，先审视你自己。

Remember that this which pulls the strings is the thing which is hidden within: this is the power of persuasion, this is life; this, if one may so say, is man. In contemplating thyself never include the vessel which surrounds thee, and these instruments which are attached about it. For they are like to an ax, differing only in this, that they grow to the body. For indeed there is no more use in these parts without the cause which moves and checks them than in the weaver's shuttle, and the writer's pen, and the driver's whip.

记住，牵拉命运之线的东西隐藏于内心：这是信念的力量，这是生命，可以说，这就是人。沉思的时候，不要想着包围你的躯壳，还有那些附属于它的器官。因为它们就像斧头，差别仅在于它们长在身体上。因为没有推动和制约它们的起因，这些部分确实不比织工的梭子、作家的笔和车夫的鞭子有更多的用处。

Book Eleven

卷十一

These are the properties of the rational soul: it sees itself, analyzes itself, and makes itself such as it chooses; the fruit which it bears itself enjoys—for the fruits of plants and that in animals which corresponds to fruits others enjoy—it obtains its own end, wherever the limit of life may be fixed. Not as in a dance and in a play and in suchlike things, where the whole action is incomplete, if anything cuts it short; but in every part and wherever it may be stopped, it makes what has been set before it full and complete, so that it can say, I have what is my own. And further it traverses the whole universe, and the surrounding vacuum, and surveys its form, and it extends itself into the infinity of time, and embraces and comprehends the periodical renovation of all things, and it comprehends that those who come after us will see nothing new, nor have those before us seen anything more, but in a manner he who is forty years old, if he has any understanding at all, has seen by virtue of the uniformity that prevails all things which have been and all that will be. This too is a property of the rational soul, love of one's neighbour, and truth and modesty, and to value nothing more than itself, which is also the property of Law. Thus then right reason differs not at all from the reason of justice.

理性灵魂的特征是：它观察自己、分析自己，把自己塑造成它意愿的样子，享受自己结出的果实，而植物的果实和动物中类似于果实的东西由他人享受，不管生命的界限定在什么地方，它总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它不像舞蹈、戏剧和类似事物，一有东西打断，整个演出就

不完整了。但是在每一部分和任何它可能停留的地方，它都会让放在面前的事物充分和完整，以至于它可以说：我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且，它穿过整个宇宙和环绕着的虚空，研究它的形式，把自己延伸到无尽的时间，去拥抱和领会一切事物的周期性更新，它知道我们的后人不会看见任何新的东西，我们的前人也不会看见更多的东西，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四十岁的人，如果他还有理解力的话，已经通过那普遍存在于一切的统一性看到了所有曾经存在和将要存在的事物。这也是理性灵魂的特征之一：爱邻居、爱真理、爱谦逊，不把任何事物看得比理性自身更重要，这也是法则的特征。这样一来，正确的理性与正义的理性就没有不同了。

Thou wilt set little value on pleasing song and dancing and the pancratium, if thou wilt distribute the melody of the voice into its several sounds, and ask thyself as to each, if thou art mastered by this; for thou wilt be prevented by shame from confessing it: and in the matter of dancing, if at each movement and attitude thou wilt do the same; and the like also in the matter of the pancratium. In all things, then, except virtue and the acts of virtue, remember to apply thyself to their several parts, and by this division to come to value them little: and apply this rule also to thy whole life.

如果你把乐曲分成一个个的单音，然后就每一个单音问自己是否为之动容，你就不会看重愉悦的歌曲、舞蹈和角斗。因为你会羞于承认：在舞蹈中，你所做的每个动作和神态是否会一样，同样，在角斗中也是如此。那么，在所有的事情中，除了美德和有关美德的行为，你记住要注意它们的各个部分，通过这种分割而轻视它们。也要把这一规则运用到你的整个人生。

What a soul that is which is ready, if at any moment it must be

separated from the body, and ready to be extinguished or dispersed or continue to exist; but so that this readiness comes from a man's own judgment, not from mere obstinacy, as with the Christians, but considerately and with dignity and in a way to persuade another, without tragic show.

如果一个灵魂随时准备好从身体分离，准备灭亡，或消散，或继续存在，这是怎样的一个灵魂啊！这种准备来自一个人自己的判断，不是像基督徒那样仅仅出于顽固，而是慎重而有尊严，以一种使他人信服的方式进行，没有任何悲剧性的表现。

Have I done something for the general interest? Well, then, I have had my reward. Let this always be present to thy mind, and never stop doing such good.

我为公众福祉做了什么事吗？那么我得到了回报。你的头脑中总要有这种想法：不要停止做这样的好事。

What is thy art? To be good. And how is this accomplished well except by general principles, some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and others about the proper constitution of man?

你有什么技艺？行善。除了通过一些关于宇宙本性和另一些关于人的恰当结构的普遍原则，还有别的办法能很好地完成此事吗？

At first tragedies were brought on the stage as means of

reminding men of the things which happen to them, and that it is according to nature for things to happen so, and that, if you are delighted with what is shown on the stage, you should not be troubled with that which takes place on the larger stage. For you see that these things must be accomplished thus, and that even they bear them who cry out, “O Cithaeron.” And, indeed, some things are said well by the dramatic writers, of which kind is the following especially:

悲剧最初被带到舞台是作为一种手段来提醒人类注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而事情这样发生是符合本性的，如果你能欣然接受舞台上的表演，你就不会被更大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所烦恼。因为你知道这些事情必须这样完成，甚至那些喊出“噢，西载隆”的人们也接受了它们。而确实，有些事情剧作家们说得很好，尤其是下面这些话——

Me and my children if the gods neglect, This has its reason too.

如果神灵忽略我和我的孩子们，这也是有原因的。

And again—

再有——

We must not chafe and fret at that which happens.

我们不应该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气恼和焦躁。

And—

还有——

Life's harvest reap like the wheat's fruitful ear. And other things of the same kind.

生命的果实收割起来就像丰硕的麦穗。以及其他类似的说法。

After tragedy the old comedy was introduced, which had a magisterial freedom of speech, and by its very plainness of speaking was useful in reminding men to beware of insolence; and for this purpose too Diogenes used to take from these writers.

古老的喜剧诞生在悲剧之后，喜剧的言辞放荡不羁，正是这种语言的直白有助于提醒人们提防傲慢；也是出于这个目的第欧根尼过去常常引用这些作家的话。

But as to the middle comedy which came next, observe what it was, and again, for what object the new comedy was introduced, which gradually sunk down into a mere mimic artifice. That some good things are said even by these writers, everybody knows: but the whole plan of such poetry and dramaturgy, to what end does it

look!

至于随之而来的中期喜剧，要观察它是什么，再看看这种新喜剧是为了什么目的出现的，它后来逐渐沉沦为一种仅仅是模仿的技巧。大家都知道：这些作家也说了一些有益的话，但是这类诗歌和剧作都以什么为目的啊！

How plain does it appear that there is not another condition of life so well suited for philosophizing as this in which thou now happenest to be.

这看起来是多么明显：你现在拥有的生命条件比其他任何一种都更适合于哲学思考。

A branch cut off from the adjacent branch must of necessity be cut off from the whole tree also. So too a man when he is separated from another man has fallen off from the whole social community. Now as to a branch, another cuts it off, but a man by his own act separates himself from his neighbour when he hates him and turns away from him, and he does not know that he has at the same time cut himself off from the whole social system. Yet he has this privilege certainly from Zeus who framed society, for it is in our power to grow again to that which is near to us, and again to become a part which helps to make up the whole. However, if it often happens, this kind of separation, it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at which detaches itself to be brought to unity and to be restored to its former condition. Finally, the branch, which from the first grew together with the tree, and has continued to have one life with it, is

not like that which after being cut off is then ingrafted, for this is something like what the gardeners mean when they say that it grows with the rest of the tree, but that it has not the same mind with it.

从邻近枝条上砍下来的树枝，也必定是从整棵树上砍下来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分离开来，即意味着他和整个社会群体分离开来。对于树枝来说，是别人把它砍下来的，而一个人在憎恨、不理睬他的邻居时，却是他自己采取行动把自己与邻居分开，他不知道他这样做的同时把自己和整个社会系统相分离了。然而他肯定拥有一种来自构造社会的宙斯的特权——我们有能力再次生长回到那接近我们的枝条，再次变成有助于组成整体的部分。然而，如果这种分离经常发生，会使得那分离的部分很难回归整体并恢复到它先前的状态。最后，这最初就与树木一起成长、一同分享一个生命的枝条，不像那砍下来之后再嫁接上去的枝条，这就有点像园丁说的“虽然它（嫁接枝条）和树的其他部分一起生长，但并没有与树同心”。

As those who try to stand in thy way when thou art proceeding according to right reason, will not be able to turn thee aside from thy proper action, so neither let them drive thee from thy benevolent feelings towards them, but be on thy guard equally in both matters, not only in the matter of steady judgment and action, but also in the matter of gentleness towards those who try to hinder or otherwise trouble thee. For this also is a weakness, to be vexed at them, as well as to be diverted from thy course of action and to give way through fear; for both are equally deserters from their post, the man who does it through fear, and the man who is alienated from him who is by nature a kinsman and a friend.

正如你在按照正确的理性行事时，那些试图阻挡你的人并不能使你从适当的行动中偏离一样，你也不能让他们驱散你对他们的仁爱感情，而是要在两件事上保持同样的警惕：不仅要保持稳定的判断和行为，而且要对那些想要阻止你或是烦扰你的人的态度和善。为他们而烦恼是一种软弱，出于恐惧而放弃或偏离你的行动路线也是软弱。因为不管是出于恐惧这么做，还是那与天生是同胞是朋友的人疏离，两者同样都是放弃了自己的立场。

There is no nature which is inferior to art, for the arts imitate the natures of things. But if this is so, that nature which is the most perfect and the most comprehensive of all natures, cannot fall short of the skill of art. Now all arts do the inferior things for the sake of the superior; therefore the universal nature does so too. And, indeed, hence is the origin of justice, and in justice the other virtues have their foundation: for justice will not be observed, if we either care for middle things (things indifferent), or are easily deceived and careless and changeable.

没有低于技艺的本性，因为技艺模仿事物的本性。但如果是这样，那最为完美和最为普遍的本性就不会缺少技艺。现在所有的技艺都在为高级的技艺做低级的事情，所以宇宙本性也这么做。确实，这就是正义的本源，其他美德在正义中也有它们的基础：如果我们只关心中间事物（中性的事物），或轻易受骗、粗心或易变，正义就不能得到遵循。

If the things do not come to thee, the pursuits and avoidances of which disturb thee, still in a manner thou goest to them. Let then thy judgment about them be at rest, and they will remain quiet, and thou wilt not be seen either pursuing or avoiding.

如果事物没有走向你，对事物的追求和逃避烦扰你，你仍然要以某种方式走向它们。你不要对事物做出判断，它们会保持安静，你追求或逃避事物也就不会被看到。

The spherical form of the soul maintains its figure, when it is neither extended towards any object, nor contracted inwards, nor dispersed nor sinks down, but is illuminated by light, by which it sees the truth, the truth of all things and the truth that is in itself.

球状的灵魂保持它自己的形状：在它既不向任何物体延伸，也不向内心收缩，不消散也不下沉的时候。它受到光的照亮，通过光它看到真理、看到万物和存在于它自身的真理。

Suppose any man shall despise me. Let him look to that himself. But I will look to this, that I be not discovered doing or saying anything deserving of contempt. Shall any man hate me? Let him look to it. But I will be mild and benevolent towards every man, and ready to show even him his mistake, not reproachfully, nor yet as making a display of my endurance, but nobly and honestly, like the great Phocion, unless indeed he only assumed it. For the interior parts ought to be such, and a man ought to be seen by the gods neither dissatisfied with anything nor complaining. For what evil is it to thee, if thou art now doing what is agreeable to thy own nature, and art satisfied with that which at this moment is suitable to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since thou art a human being placed at thy post in order that what is for the common advantage may be done in some way?

假如有人鄙视我。让他自己去注意那鄙视吧。而我会注意这一点：我不会做或说任何值得鄙视的事情。有人会恨我吗？让他去注意这憎恨吧。而我会温和、慈爱地对待每一个人，随时准备好甚至向他指明他的错误，不是责备的口气，也不是展示我的宽宏大量，而是高尚而诚实地，像伟大的福基翁那样，除非他确实冥顽不化。因为内心的部分应该如此，一个人在神灵看来应该既不会不满足于任何事也不怨天尤人。因为，既然你被放在了这位置，以便可以在某种方式上做促进共同利益的事，如果你现在做的事符合你的本性且满足于此刻适合于宇宙本性的事物，这对你有什么坏处呢？

Men despise one another and flatter one another; and men wish to raise themselves above one another, and crouch before one another.

人类相互鄙视，又彼此奉承；人总是想高人一等，却又匍匐在别人面前。

How unsound and insincere is he who says, I have determined to deal with thee in a fair way.—What art thou doing, man? There is no occasion to give this notice. It will soon show itself by acts. The voice ought to be plainly written on the forehead. Such as a man's character is, he immediately shows it in his eyes, just as he who is beloved forthwith reads everything in the eyes of lovers. The man who is honest and good ought to be exactly like a man who smells strong, so that the bystander as soon as he comes near him must smell whether he choose or not. But the affectation of simplicity is like a crooked stick. Nothing is more disgraceful than a wolfish friendship (false friendship). Avoid this most of all. The good and simple and benevolent show all these things in the eyes,

and there is no mistaking.

一个人说“我决定以公正的方式对待你”，这是多么不可信、不真诚啊！人啊，你在做什么？没有必要发出这个通知。很快它就会通过行动来表示。心声应该清楚地写在额头上。一个人的品格也是如此，他立即把它表现在眼神里，正如恋人立即从对方的眼睛里读懂一切一样。诚实善良的人应该就像一个有着强烈体味的人，以至于旁人一接近他，就能嗅出他的意愿。假装纯朴好比一根弯曲的棍子。没有什么比豺狼似的友谊（虚假的友谊）更可耻了。尽最大努力避免这样。善良、单纯和仁慈会表现在眼睛里，明白无误。

As to living in the best way, this power is in the soul, if it be indifferent to things which are indifferent. And it will be indifferent, if it looks on each of these things separately and all together, and if it remembers that not one of them produces in us an opinion about itself, nor comes to us; but these things remain immovable, and it is we ourselves who produce the judgments about them, and, as we may say, write them in ourselves, it being in our power not to write them, and it being in our power, if perchance these judgments have imperceptibly got admission to our minds, to wipe them out; and if we remember also that such attention will only be for a short time, and then life will be at an end. Besides, what trouble is there at all in doing this? For if these things are according to nature, rejoice in them, and they will be easy to thee: but if contrary to nature, seek what is conformable to thy own nature, and strive towards this, even if it bring no reputation; for every man is allowed to seek his own good.

至于以最善的方式生活，这种力量在于灵魂，只要它对无关紧要

的东西保持漠然的态度。它会是漠然的，如果它把这些事情分开来看，然后再整体来看；如果它记得它们中没有一个能使我们对它产生意见，也不接近我们；而这些事物保持不动，是我们自身产生对它们的判断，比方说，我们可把它们写进心里，我们也可以决定不写它们的，如果这些判断不知不觉进入我们的头脑，我们也能够把它们清除；如果我们还记得这样的注意力只能持续短暂的时间，然后生命就会到达终点。此外，这么做有什么麻烦呢？因为如果这些事情符合本性，为它们高兴吧，它们能让你快乐；但如果违背本性，那就去寻找适合你本性的东西，然后为之努力，哪怕它不会带来名誉。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去追求他自己的善。

Consider whence each thing is come, and of what it consists, and into what it changes, and what kind of a thing it will be when it has changed, and that it will sustain no harm.

想想每一事物从何处来，它包括什么，会变成什么，变化之后又会是什么，这样它将不会蒙受损害。

If any have offended against thee, consider first: What is my relation to men, and that we are made for one another; and in another respect, I was made to be set over them, as a ram over the flock or a bull over the herd. But examine the matter from first principles, from this: If all things are not mere atoms, it is nature which orders all things: if this is so, the inferior things exist for the sake of the superior, and these for the sake of one another.

如果有人冒犯了你，先想想：我和别人是什么关系？我们是为彼此而造就的；在另一个层面，我是被造就出来居于他们之上的，就像

公羊在羊群之上，公牛在牛群之上。但是要从第一原则来考察这个事物，要从这一点来考察：如果万物不仅仅是原子，那就是自然在安排万物。如果是这样，低等的事物就为高等的事物而存在，这些高等的事物为了彼此而存在。

Second, consider what kind of men they are at table, in bed, and so forth; and particularly, under what compulsions in respect of opinions they are; and as to their acts, consider with what pride they do what they do.

第二，想想他们在饭桌旁、在卧榻上以及其他地方是什么样的人；尤其是，他们的意见是在什么样的压力下形成的；至于他们的行为，要想想他们带着何种骄傲做他们所做的事。

Third, that if men do rightly what they do, we ought not to be displeased; but if they do not right, it is plain that they do so involuntarily and in ignorance. For as every soul is unwillingly deprived of the truth, so also is it unwillingly deprived of the power of behaving to each man according to his deserts. Accordingly men are pained when they are called unjust, ungrateful, and greedy, and in a word wrong-doers to their neighbours.

第三，如果人们正确地做他们所做的事，我们不应感到不悦；但如果他们做得不对，显然他们并非自愿，而是出于无知。因为就像每一个灵魂都不愿意被剥夺真理一样，它也不愿意被剥夺它依据功过对待每一个人的权力。所以，当人们被称作不公正、忘恩负义、贪得无厌时，简言之，当他们对邻居行恶时，他们是痛苦的。

Fourth, consider that thou also doest many things wrong, and that thou art a man like others; and even if thou dost abstain from certain faults, still thou hast the disposition to commit them, though either through cowardice, or concern about reputation or some such mean motive, thou dost abstain from such faults.

第四，想想你也做了很多错事，就像其他人一样；即使你避免了某些错误，也仍然有犯这些错误的倾向，尽管或是出于怯懦，或是关心名誉，或是有其他此类的不纯动机，你避免了这些错误。

Fifth, consider that thou dost not even understand whether men are doing wrong or not, for many things are done with a certain reference to circumstances. And, in short, a man must learn a great deal to enable him to pass a correct judgment on another man's acts.

第五，想想你甚至不明白人们是否在做错事，因为许多事情都是在特定环境下做的。总之，一个人必须学习很多东西，才能对别人的行为做出正确的判断。

Sixth, consider when thou art much vexed or grieved, that man's life is only a moment, and after a short time we are all laid out dead.

第六，在你非常烦恼或悲伤时想想，人的生命只是一瞬间，不久之后我们都要死去。

Seventh, that it is not men's acts which disturb us, for those acts have their foundation in men's ruling principles, but it is our own opinions which disturb us. Take away these opinions then, and resolve to dismiss thy judgment about an act as if it were something grievous, and thy anger is gone. How then shall I take away these opinions? By reflecting that no wrongful act of another brings shame on thee: for unless that which is shameful is alone bad, thou also must of necessity do many things wrong, and become a robber and everything else.

第七，烦扰我们的不是人们的行为，因为那些行为的基础是人们的主宰原则，烦扰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想法。那么，把这些想法带走吧，下定决心消除你对一个行为的判断，就好像它是让人悲伤的事情，这样你的怒气也就消了。那么我该怎么带走这些想法呢？通过反思别人的错误行为不会给你带来羞耻，除非那羞耻本身就是恶，你也必定做了很多错事，变成了一个强盗或其他什么。

Eighth, consider how much more pain is brought on us by the anger and vexation caused by such acts than by the acts themselves, at which we are angry and vexed.

第八，想一想，这样的行为引发的生气和恼怒，比起我们为之生气和恼怒的行为本身，给我们带来的痛苦要多多少啊。

Ninth, consider that a good disposition is invincible, if it be genuine, and not an affected smile and acting a part. For what will the most violent man do to thee, if thou continuest to be of a kind disposition towards him, and if, as opportunity offers, thou gently

admonishest him and calmly correctest his errors at the very time when he is trying to do thee harm, saying, Not so, my child: we are constituted by nature for something else: I shall certainly not be injured, but thou art injuring thyself, my child.—And show him with gentle tact and by general principles that this is so, and that even bees do not do as he does, nor any animals which are formed by nature to be gregarious. And thou must do this neither with any double meaning nor in the way of reproach, but affectionately and without any rancour in thy soul; and not as if thou wert lecturing him, nor yet that any bystander may admire, but either when he is alone, and if others are present.

第九，好的性情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是真诚的，而不是假装微笑和扮演角色。想想如果你一直以一种友善的性情来对待一个人，并且条件允许的话，你温和地规劝他，在他试图要对你做出损害时平静地纠正他的错误说：不要这样，我的孩子。那么，即使是（性情）最凶暴的人，会对你怎样呢？我们生来是为了别的事情：我当然不会受到伤害，你是在伤害你自己，我的孩子。这样温和机智地通过普遍的原则向他说明事情，甚至蜜蜂也不会像他那样做，任何天生合群的动物也不会。你这么做的时候，注意不要语义双关，也不要以责备的方式，而是情深意切，心里没有任何怨恨。如果有别的人在场，不要像是在给他讲课，或像是让任何旁观者赞美你，而是要在他一个人的时候。

Remember these nine rules, as if thou hadst received them as a gift from the Muses, and begin at last to be a man while thou livest. But thou must equally avoid flattering men and being vexed at them, for both are unsocial and lead to harm. And let this truth be present to thee in the excitement of anger, that to be moved by passion is not manly, but that mildness and gentleness, as they are

more agreeable to human nature, so also are they more manly; and he who possesses these qualities possesses strength, nerves and courage, and not the man who is subject to fits of passion and discontent. For in the same degree in which a man's mind is nearer to freedom from all passion, in the same degree also is it nearer to strength: and as the sense of pain is a characteristic of weakness, so also is anger. For he who yields to pain and he who yields to anger, both are wounded and both submit.

记住这九条规则，就像是你从缪斯那里得到的礼物，趁你活着的时候开始成为一个人。你必须同样地避免奉承人们，或为他们烦恼，因为两者都违背社会性并导致损害。盛怒之时，让这真理呈现在你的面前：为激情所动是缺乏男子气概的，温和慈祥更符合人性，因此它们也更有男子气概。拥有这些品质的人拥有力量、胆量和勇气，而受制于激情和不满的人则没有这些品质。一个人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激情，就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力量。正如痛苦是软弱的特征一样，愤怒也是软弱的一大特征，因为屈服于痛苦和怒气的人，都会受到伤害，这两者都是屈从。

But if thou wilt, receive also a tenth present from the leader of the Muses (Apollo), and it is this—that to expect bad men not to do wrong is madness, for he who expects this desires an impossibility. But to allow men to behave so to others, and to expect them not to do thee any wrong, is irrational and tyrannical.

如果你愿意，也请接收缪斯们的首领阿波罗的第十项礼物吧，这就是：期待坏人不做恶事是疯狂，因为这种期待就是欲求一件不可能的事。允许人们这样对待他人，而期待他们不要对你做任何恶事，是没有理性而残暴的。

There are four principal aberrations of the superior faculty against which thou shouldst be constantly on thy guard, and when thou hast detected them, thou shouldst wipe them out and say on each occasion thus: this thought is not necessary: this tends to destroy social union: this which thou art going to say comes not from the real thoughts; for thou shouldst consider it among the most absurd of things for a man not to speak from his real thoughts. But the fourth is when thou shalt reproach thyself for anything, for this is an evidence of the diviner part within thee being overpowered and yielding to the less honourable and to the perishable part, the body, and to its gross pleasures.

你要不断提防高级能力的四种主要偏离现象，当你发现这些偏离时，就应该消除它们，并在每一情形下都这样说：这种想法不必要，这会毁掉社会联合，你要说的并非来自于真正的想法；你应该认为，一个人不说出他真正的想法，是一件最荒唐的事。而第四种情况是你为任何事责备自己的时候，因为这是一种证据，证明你内心更神性的部分屈服和让位于低俗和易朽的部分——身体，以及身体粗俗的快感。

Thy aerial part and all the fiery parts which are mingled in thee, though by nature they have an upward tendency, still in obedience to the disposition of the universe they are overpowered here in the compound mass (the body). And also the whole of the earthy part in thee and the watery, though their tendency is downwards, still are raised up and occupy a position which is not their natural one. In this manner then the elemental parts obey the universal, for when they have been fixed in any place perforce they remain there until again the universal shall sound the signal for

dissolution. Is it not then strange that thy intelligent part only should be disobedient and discontented with its own place? And yet no force is imposed on it, but only those things which are conformable to its nature: still it does not submit, but is carrie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or the movement towards injustice and intemperance and to anger and grief and fear is nothing else than the act of one who deviates from nature. And also when the ruling faculty is discontented with anything that happens, then too it deserts its post: for it is constituted for piety and reverence towards the gods no less than for justice. For these qualities also are comprehended under the generic term of contentment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ings, and indeed they are prior to acts of justice.

你身体中气和火混合的部分，尽管它们天生有一种向上升的趋势，但还是遵从宇宙的部署，被压迫在这混合体（身体）之中。你身体所有土和水的部分，尽管他们的趋势是向下沉的，仍然被提升从而占据了一个它们不该占据的位置。如此，部分就以这种方式服从整体，因为一旦它们被固定在什么位置，它们就必须停留在那里直到整体再次发出分解的信号。那么只有你的理智部分不顺从不满足于它自己的位置，这不是很奇怪吗？没有外力强加于它，只有那些符合它本性的东西，它却仍然没有顺从，而是被带到相反的方向去了。朝着不义与放任、愤怒、悲伤与恐惧的运动，无异于偏离本性的行为。当主宰能力不满于任何所发生的事情时，它也是抛弃了自己的职责，因为它是为了虔诚和对神灵、正义的敬畏而被造就的。这些品质也是包括在满足于事物结构的总称之下的，它们确实先于正义的行为而存在。

He who has not one and always the same object in life, cannot be one and the same all through his life. But what I have said is not enough, unless this also is added, what this object ought to be. For as there is not the same opinion about all the things which in some

way or other are considered by the majority to be good, but only about some certain things, that is, things which concern the common interest; so also ought we to propose to ourselves an object which shall be of a common kind (social) and political. For he who directs all his own efforts to this object, will make all his acts alike, and thus will always be the same.

一个人在生活中没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目标，就不能在整个人生中始终不渝。但我所说得还不够，除非加上这一点：这个目标应该是怎样的。因为在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多数人视为善的事物上，并没有相同的意见，而只是在某些事物，亦即有关大众利益的事物上才有相同的意见，所以我们也应该对自己提出一个有关共同性（社会性）和政治性的目标。因为一个人把所有的努力都投入这个目标，会使他所有的行为相似，这样就会做到始终不渝了。

Think of the country mouse and of the town mouse, and of the alarm and trepidation of the town mouse.

想想乡下老鼠和城里老鼠，还有城里老鼠的焦急与不安。

Socrates used to call the opinions of the many by the name of Lamiae, bugbears to frighten children.

苏格拉底曾把许多人的观点称为“拉弥亚”，意即吓唬小孩的怪物。

The Lacedaemonians at their public spectacles used to set seats in the shade for strangers, but themselves sat down anywhere.

古代斯巴达人在举行公共仪式时总是为陌生人在阴凉处设座位，而他们自己则随处坐下。

Socrates excused himself to Perdiccas for not going to him, saying, it is because I would not perish by the worst of all ends, that is, I would not receive a favour and then be unable to return it.

苏格拉底向帕迪卡斯解释没有到他那里去的原因时说，那是因为我不想以最坏的结局死去，也就是说，我不想得到帮助却不能回报。

In the writings of the Ephesians there was this precept, constantly to think of some one of the men of former times who practised virtue.

在以弗索人的作品中，有这样一条箴言：要常常想到过去的有德之人。

The Pythagoreans bid us in the morning look to the heavens that we may be reminded of those bodies which continually do the same things and in the same manner perform their work, and also be reminded of their purity and nudity. For there is no veil over a star.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者嘱咐我们，要在清晨仰望天空，这会提醒我们想起那些以同样的方式不断做着同样事情的物体，也会使我们想起它们的纯洁与袒露。因为星星没有面纱笼罩。

Consider what a man Socrates was when he dressed himself in a skin, after Xanthippe had taken his cloak and gone out, and what Socrates said to his friends who were ashamed of him and drew back from him when they saw him dressed thus.

想想苏格拉底在赞西佩拿了他的斗篷离去之后，他就为自己披上了一件毛皮时，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想想他的朋友看到他这样穿着为他感到羞惭而纷纷离开他时，他对他们所说的话。

Neither in writing nor in reading wilt thou be able to lay down rules for others before thou shalt have first learned to obey rules thyself. Much more is this so in life.

在你学会遵守规则之前，无论在写作还是阅读中，你都不能为他人定下规则。生活中就更是如此。

A slave thou art: free speech is not for thee.

你是一个奴隶：言论自由不是对你而言的。

—And my heart laughed within.

——我的心里在欢笑。

And virtue they will curse speaking harsh words.

他们会诅咒美德，说出难听的话。

To look for the fig in winter is a madman's act: such is he who looks for his child when it is no longer allowed.

在冬天寻找无花果是疯子的行为：在不再被允许的时候寻求孩子的人也是如此。

When a man kisses his child, said Epictetus, he should whisper to himself, “To-morrow perchance thou wilt die.” But those are words of bad omen. “No word is a word of bad omen,” said Epictetus, “which expresses any work of nature; or if it is so, it is also a word of bad omen to speak of the ears of corn being reaped”.

爱比克泰德说，一个人亲吻他孩子的时候，应该轻声对自己说：“明天你可能就会死了。”而这些话是有不祥之兆的。“表达自然活动的话，没有什么是有不祥之兆的，”爱比克泰德说，“或者如果是这样，说谷穗被收割也是有不祥之兆的话了。”

The unripe grape, the ripe bunch, the dried grape all are

changes, not into nothing, but into something which exists not yet.

未熟的葡萄、成熟的和干枯了的葡萄，一切都是变化，不是变成无，而是变成某种尚未存在的东西。

No man can rob us of our free will.

没人能抢走我们自由的意志。

Epictetus also said, a man must discover an art (or rules) with respect to giving his assent; and in respect to his movements he must be careful that they be made with regard to circumstances, that they be consistent with social interests, that they have regard to the value of the object; and as to sensual desire, he should altogether keep away from it; and as to avoidance (aversion), he should not show it with respect to any of the things which are not in our power.

爱比克泰德还说，一个人必须找到一门技艺（或规则）来表示他的同意态度，在行动方面，他必须注意行动要与情境相联系，要与社会利益一致，与目标价值相关。至于感官欲望，他应该完全摒弃。至于回避（厌恶）的态度，他不应该在任何不是我们力量范围内的事上表现出来。

The dispute then, he said, is not about any common matter; but about being mad or not.

他说，既然如此，争论就不是为了什么共同的事物，而是关于疯了还是没疯的问题。

Socrates used to say, What do you want? Souls of rational men or irrational?—Souls of rational men. —Of what rational men? Sound or unsound?—Sound. —Why then do you not seek for them? —Because we have them. —Why then do you fight and quarrel?

苏格拉底曾说过，你想要什么？是理性人的灵魂还是非理性人的灵魂？理性人的灵魂。什么样的理性人的灵魂呢？健全的还是不健全的？健全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寻找他们呢？因为我们拥有他们。那为什么还要打斗争吵呢？

Book Twelve

卷十二

All those things at which thou wishest to arrive by a circuitous road, thou canst have now, if thou dost not refuse them to thyself. And this means, if thou wilt take no notice of all the past, and trust the future to providence, and direct the present only conformably to piety and justice. Conformably to piety, that thou mayest be content with the lot which is assigned to thee, for nature designed it for thee and thee for it. Conformably to justice, that thou mayest always speak the truth freely and without disguise, and do the things which are agreeable to law and according to the worth of each. And let neither another man's wickedness hinder thee, nor opinion nor voice, nor yet the sensations of the poor flesh which has grown about thee; for the passive part will look to this. If then, whatever the time may be when thou shalt be near to thy departure, neglecting everything else thou shalt respect only thy ruling faculty and the divinity within thee, and if thou shalt be afraid not because thou must sometime cease to live, but if thou shalt fear never to have begun to live according to nature—then thou wilt be a man worthy of the universe which has produced thee, and thou wilt cease to be a stranger in thy native land, and to wonder at things which happen daily as if they were something unexpected, and to be dependent on this or that.

所有那些你希望通过迂回道路得到的东西，如果你不拒绝的话，你现在就能得到。这意味着，你完全不用再留意过去，信任地把未来交给上苍，而现在仅仅专注于虔诚和正义。安于虔诚，你就会满足于

安排给你的命运，因为自然为你安排了它，为它安排了你。安于正义，你就总会自由地说出真理而没有掩饰，做符合法则和每个人价值的事情。既不要让别人的恶阻碍你，不要让意见或声音阻挠你，也不要让生在你身上的可怜的肉体感官妨碍你，因为消极的部分会照看这一点。不管你何时濒临死亡，忽略所有的一切，你应该尊敬的只有你的主宰能力和内心的神明。如果你害怕不是因为你某刻要停止生命，而是因为还没有开始按照本性生活，那么你就配得上产生你的宇宙了，你将不再是家国故乡的陌生人，不再对日常发生的事感到惊奇，好像它们不可预料，也不会依赖这或依赖那了。

God sees the minds (ruling principles) of all men bared of the material vesture and rind and impurities. For with his intellectual part alone he touches the intelligence only which has flowed and been derived from himself into these bodies. And if thou also usest thyself to do this, thou wilt rid thyself of thy much trouble. For he who regards not the poor flesh which envelops him, surely will not trouble himself by looking after raiment and dwelling and fame and suchlike externals and show.

神能看见去除了物质外罩、厚皮和杂质的人的心灵（主宰原则）。因为神只需用他的理智部分就能触摸到那来自于他并流入这些身体的理智。如果你自己也这么做，你就会摆脱很多烦恼。因为一个不考虑包裹自己可怜肉体的人，肯定不会为了关注服装、居室、名声之类外在和炫耀的东西而烦扰自己。

The things are three of which thou art composed, a little body, a little breath (life), intelligence. Of these the first two are thine, so far as it is thy duty to take care of them; but the third alone is properly thine. Therefore, if thou shalt separate from thyself, that

is, from thy understanding, whatever others do or say, and whatever thou hast done or said thyself, and whatever future things trouble thee because they may happen, and whatever in the body which envelops thee, or in the breath (life), which is by nature associated with the body, is attached to thee independent of thy will, and whatever the external circumfluent vortex whirls round, so that the intellectual power exempt from the things of fate can live pure and free by itself, doing what is just and accepting what happens and saying the truth: if thou wilt separate, I say, from this ruling faculty the things which are attached to it by the impressions of sense, and the things of time to come and of time that is past, and wilt make thyself like Empedocles' sphere,— All round, and in its joyous rest reposing; and if thou shalt strive to live only what is really thy life, that is, the present, then thou wilt be able to pass that portion of life which remains for thee up to the time of thy death, free from perturbations, nobly, and obedient to thy own daemon (to the god that is within thee) .

你由三样东西组成，一个小小的躯体，一点点呼吸（生命），还有理智。在这三样中，前两样属于你，是就你有责任照顾它们而言，而只有第三样才真正属于你。因此，如果你使自己，也就是使你的理性分离开来，不管其他人说什么或做什么，不管你做过或说过什么，不管未来有什么事情烦扰你（因为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不管包裹你的躯体中，或者天生与身体相连的呼吸（生命）中，有什么东西独立于你的意志却依附于你，不管外部环绕的涡旋如何旋转，那么理智力量就能不受命运安排，能够自己过着纯洁和自由的生活，做正义的事，接受所发生的事，说真话：我说，如果你从主宰能力中分离出通过感官印象依附于它的事物，分离出未来和过去之物，你就会使自己像恩培多克勒的球体一样浑圆无缺，在欢乐的休憩中养神。如果你努力只去过那种真正属于你的生活，也就是现在，那么你将会这样度过你的余生直到去世，没有烦扰，高贵，顺从你自己的神灵（你心中的

神）。

I have often wondered how it is that every man loves himself more than all the rest of men, but yet sets less value on his own opinion of himself than on the opinion of others. If then a god or a wise teacher should present himself to a man and bid him to think of nothing and to design nothing which he would not express as soon as he conceived it, he could not endure it even for a single day. So much more respect have we to what our neighbours shall think of us than to what we shall think of ourselves.

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人爱自己胜过爱别人，而他重视别人关于他自己的意见，却甚于重视自己关于自己的意见。如果一个神或一个明智的老师来到一个人面前，吩咐他不要去思考和计划那些他想到却表达不了的东西，那他就连一天也不能忍受。我们在乎邻居对我们的意见，远远甚过在乎我们自己在乎自己的意见。

How can it be that the gods, after having arranged all things well and benevolently for mankind, have overlooked this alone, that some men and very good men, and men who, as we may say, have had most communion with the divinity, and through pious acts and religious observances have been most intimate with the divinity, when they have once died should never exist again, but should be completely extinguished?

神灵为人类妥善而慈爱地安排好所有的事情之后，唯独忽视了这一点：一些很好的人，我们可以说，是与神性最为相通的人，通过虔诚的行为和宗教仪式与神性最为亲密，可他们一旦死去就永不再生，

而是完全地消失。怎么能这样呢？

But if this is so, be assured that if it ought to have been otherwise, the gods would have done it. For if it were just, it would also be possible; and if it were according to nature, nature would have had it so. But because it is not so, if in fact it is not so, be thou convinced that it ought not to have been so:—for thou seest even of thyself that in this inquiry thou art disputing with the deity; and we should not thus dispute with the gods, unless they were most excellent and most just;—but if this is so, they would not have allowed anything in the ordering of the universe to be neglected unjustly and irrationally.

但就算是这样，要确信假如原来应该是另一种情况，神灵早就会这样做了。因为如果它是正当的，它也是可能的；如果它是符合自然的，自然也就会产生它。但因为它并非如此，如果事实上也确非如此，你就要相信它本来不应当是这样的了。因为甚至你自己也看到了，在这样的探究中你是在与神争论，而我们不应这样与神争论，除非他们最优秀、最正义。但如果是这样，他们不会允许宇宙秩序之中有任何事情被不公平和无道理地忽视。

Practise thyself even in the things which thou despairest of accomplishing. For even the left hand, which is ineffectual for all other things for want of practice, holds the bridle more vigorously than the right hand; for it has been practised in this.

即使在做你无望完成的事情时也要训练自己。因为即使左手由于缺乏练习，在所有别的事情上不太有效，但抓起缰绳来却比右手有

力，这是因为它一直得到这方面的锻炼。

Consider in what condition, both in body and soul, a man should be when he is overtaken by death; and consider the shortness of life, the boundless abyss of time, past and future, the feebleness of all matter.

想想一个人被死亡追上时身体和灵魂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想想生命的短暂，过去和未来时间的无尽深渊，所有物质的脆弱。

Contemplate the formative principles (forms) of things bare of their coverings; the purposes of actions; consider what pain is, what pleasure is, and death, and fame; who is to himself the cause of his uneasiness; how no man is hindered by another; that everything is opinion.

剥去事物的外壳去思考它们的形成原则（形式），行动目的；想想痛苦是什么，快乐是什么，死亡是什么，名声是什么。对于他自己而言，是谁引起了他的不安？为什么没有人会被别人阻碍？一切都是意见。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y principles thou must be like the pancratiast, not like the gladiator; for the gladiator lets fall the sword which he uses and is killed; but the other always has his hand, and needs to do nothing else than use it.

在运用原则时，你必须像拳击手而非角斗士，因为角斗士使用的剑一旦脱手就会被杀，而拳击手总是用他的手，除了用手不需要用别的。

See what things are in themselves, dividing them into matter, form and purpose.

明察事物本身，把它们分成质料、形式和目的。

What a power man has to do nothing except what God will approve, and to accept all that God may give him.

只做神同意之事，接受神可能给予他的一切，这样的人力量是多么大啊！

With respect to that which happens conformably to nature, we ought to blame neither gods, for they do nothing wrong either voluntarily or involuntarily, nor men, for they do nothing wrong except involuntarily. Consequently we should blame nobody

对于那合乎自然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去责备神灵，因为无论自觉还是被迫他们都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也不要去责备人，因为他们没有故意做错什么事情。因此，我们不应责备任何人。

How ridiculous and what a stranger he is who is surprised at

anything which happens in life.

对于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大惊小怪的人是多么荒唐和奇怪啊！

Either there is a fatal necessity and invincible order, or a kind providence, or a confusion without a purpose and without a director. If then there is an invincible necessity, why dost thou resist? But if there is a providence which allows itself to be propitiated, make thyself worthy of the help of the divinity. But if there is a confusion without a governor, be content that in such a tempest thou hast in thyself a certain ruling intelligence. And even if the tempest carry thee away, let it carry away the poor flesh, the poor breath, everything else; for the intelligence at least it will not carry away.

要么有一种命运的必然和不可改变的秩序，要么有一种仁慈的神意，要么有一个没有目的、没有指导的混沌。如果命运具有不可改变的必然性，你为何要抗拒？如果有一种神意允许自己接受好意，那就让自己配得上神灵的帮助。但如果是一种没有指导的混沌，要感到满足，在这样的暴风雨之中你心里有一种主宰的理智。即使这暴风雨把你卷走，那就让它带走可怜的肉体、可怜的呼吸和其他一切，因为至少它是不会卷走理智的。

Does the light of the lamp shine without losing its splendour until it is extinguished; and shall the truth which is in thee and justice and temperance be extinguished before thy death?

灯光照耀着，直到熄灭才失去它的光芒，而你心中的真理、正义和节制，在你死亡之前就消失了吗？

When a man has presented the appearance of having done wrong, say, How then do I know if this is a wrongful act? And even if he has done wrong, how do I know that he has not condemned himself? and so this is like tearing his own face. Consider that he who would not have the bad man do wrong, is like the man who would not have the fig-tree to bear juice in the figs and infants to cry and the horse to neigh, and whatever else must of necessity be. For what must a man do who has such a character? If then thou art irritable, cure this man's disposition.

当一个人表现出做错事的样子时，我又怎么知道它是错的呢？即使他做了错事，我怎么知道他没有谴责自己呢？所以这就像他在撕破自己的脸。想想一个人如果不让坏人做坏事，就好比不让无花果树在无花果里长出汁水，不让婴儿啼哭，不让马嘶鸣，以及其他必然的事情。有这样性格的人该做什么呢？如果你容易发怒，那就去纠正一下性格吧。

If it is not right, do not do it: if it is not true, do not say it. For let thy efforts be. —

不做不对之事；不说不真之言。你就要这样去努力。

In everything always observe what the thing is which produces for thee an appearance, and resolve it by dividing it into the formal,

the material, the purpose, and the time within which it must end.

在每一件事中总要观察为你产生表象的事物是什么，把它分解为形式、质料和目的，以及它必须结束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

Perceive at last that thou hast in thee something better and more divine than the things which cause the various effects, and as it were pull thee by the strings. What is there now in my mind? Is it fear, or suspicion, or desire, or anything of the kind? First, do nothing inconsiderately, nor without a purpose. Second, make thy acts refer to nothing else than to a social end.

最后还要察觉你心中的某种东西，它比引起各种效果、用绳子牵引着你走的东西更好、更具神性。现在我的心里有什么呢？是恐惧？是怀疑？是欲望？还是任何类似的东西？首先，做事不要不加考虑，也不要漫无目的。第二，让你的行为只以社会利益为指向。

Consider that before long thou wilt be nobody and nowhere, nor will any of the things exist which thou now seest, nor any of those who are now living. For all things are formed by nature to change and be turned and to perish in order that other things in continuous succession may exist.

想想不久你就会不复存在，无可寻觅，你现在看见的事物也不会存在，现在活着的人也不会存在。万物由自然而生，经历变化、扭转和消亡，如此，其他不断接替、更新的事物才可以存在。

Consider that everything is opinion, and opinion is in thy power. Take away then, when thou choosest, thy opinion, and like a mariner, who has doubled the promontory, thou wilt find calm, everything stable, and a waveless bay.

想想一切都是意见，而意见是在你力量范围内的。那么，如果你愿意，就把这些意见抛开，像是一位绕过岬角的水手，你将找到平静、安宁和一个没有风浪的海湾。

Any one activity, whatever it may be, when it has ceased at its proper time, suffers no evil because it has ceased; nor he who has done this act, does he suffer any evil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 act has ceased. In like manner then the whole which consists of all the acts, which is our life, if it cease at its proper time, suffers no evil for this reason that it has ceased; nor he who has terminated this series at the proper time, has he been ill dealt with. But the proper time and the limit nature fixes, sometimes as in old age the peculiar nature of man, but always the universal nature, by the change of whose parts the whole universe continues ever young and perfect. And everything which is useful to the universal is always good and in season. Therefore the termination of life for every man is no evil, because neither is it shameful, since it is both independent of the will and not opposed to the general interest, but it is good, since it is seasonable and profitable to and congruent with the universal. For thus too he is moved by the deity who is moved in the same manner with the deity and moved towards the same things in his mind.

任何一个活动，不管是什么，当它在恰当的时间停止时，不会因

停止而遭受任何恶，因为它已经停止了；做这件事的人也一样，他也不会因为这件事停止而遭受任何恶。同样的，包含所有事件的整体，即我们的人生，如果在它恰当的时间停止，不会因它停止而遭受任何恶；如果一个人受到了虐待，在恰当的时间终止这一切也没有任何恶。然而恰当的时间和限制是本性决定的，有时候就像年迈之时是由人的特殊本性决定一样，但宇宙本性总是在起作用，通过改变它的部分使得整个宇宙保持年轻和完美。一切对宇宙有用的东西总是好的、合乎时宜的。这样，每一个人生命的终结就不是恶，因为它不是可耻的，这是由于它独立于意志并且不违背公共福祉。而它是善的，这是由于它合乎时宜且对宇宙有益，跟宇宙一致。在心里和神以相同方式运动，朝着相同目标的人，也是被神所推动的。

These three principles thou must have in readiness. In the things which thou doest do nothing either inconsiderately or otherwise than as justice herself would act; but with respect to what may happen to thee from without, consider that it happens either by chance or according to providence, and thou must neither blame chance nor accuse providence. Second, consider what every being is from the seed to the time of its receiving a soul, and from the reception of a soul to the giving back of the same, and of what things every being is compounded and into what things it is resolved. Third, if thou shouldst suddenly be raised up above the earth, and shouldst look down on human beings, and observe the variety of them how great it is, and at the same time also shouldst see at a glance how great is the number of beings who dwell all around in the air and the aether, consider that as often as thou shouldst be raised up, thou wouldst see the same things, sameness of form and shortness of duration. Are these things to be proud of?

这三条原则你必须随时预备。第一，在你做的事情中，不要做任

何不加考虑或非正义的事，对于可能从外部对你发生的事，想想它是出于偶然还是根据神意而为，你不要谴责偶然或指责神意。第二，想想每一生命从种子到获得灵魂期间是什么，从获得灵魂到交还灵魂期间是什么，每一生命由什么组成然后又会分解成什么。第三，如果你突然被升到大地之上，俯视芸芸众生，要观察他们的差别是多么大，同时也瞥一眼居于周围空气和以太中的生命有多少。经常像你被升起来那样思考，你会看见同样的东西、相同的形式和逗留的短暂。这些东西值得骄傲吗？

Cast away opinion: thou art saved. Who then hinders thee from casting it away?

抛却意见，你就得到拯救。那么会是谁阻止你抛却它呢？

When thou art troubled about anything, thou hast forgotten this, that all things happen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al nature; and forgotten this, that a man's wrongful act is nothing to thee; and further thou hast forgotten this, that everything which happens, always happened so and will happen so, and now happens so everywhere; forgotten this too, how close is the kinship between a man and the whole human race, for it is a community, not of a little blood or seed, but of intelligence. And thou hast forgotten this too, that every man's intelligence is a god, and is an efflux of the deity; and forgotten this, that nothing is a man's own, but that his child and his body and his very soul came from the deity; forgotten this, that everything is opinion; and lastly thou hast forgotten that every man lives the present time only, and loses only this.

当你为什么事烦恼时，你忘了所有的事物都是根据普遍的本性发生的；你忘了一个人错误的行为对你而言什么都不是；你忘了每一件发生的事情，总是这样发生，将来也会这样发生，现在到处都是这样发生；你也忘了，一个人与整个人类的亲属关系是多么密切，因为它是一种共有，不是一点血液或种子的共有，而是理智的共有。你还忘了这一点：每个人的理智都是一个神，是一种神性的流出；你忘了没有什么是人自己的，他的孩子、他的身体，甚至于他的灵魂都来自于神；你忘了一切都是意见；最后你还忘了，每一个人都只能活在现在，失去的也只是现在。

Constantly bring to thy recollection those who have complained greatly about anything, those who have been most conspicuous by the greatest fame or misfortunes or enmities or fortunes of any kind: then think where are they all now? Smoke and ash and a tale, or not even a tale. And let there be present to thy mind also everything of this sort, how Fabius Catullinus lived in the country, and Lucius Lupus in his gardens, and Stertinius at Baiae, and Tiberius at Capreae, and Velius Rufus (or Rufus at Velia); and in fine think of the eager pursuit of anything conjoined with pride; and how worthless everything is after which men violently strain; and how much more philosophical it is for a man in th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to him to show himself just, temperate, obedient to the gods, and to do this with all simplicity: for the pride which is proud of its want of pride is the most intolerable of all.

要经常想一想那些凡事都大发牢骚的人，想想那些因极大的名声、不幸、仇恨或幸运而极度引人注目的人，他们现在在哪里呢？只剩下烟尘、灰烬和传说，甚至连传说也没有了。让这一类的事情在你心里驻留吧。曾住在乡间的非比阿斯•卡特利卢斯怎样了，住在花园里的卢修斯•卢帕斯怎样了，在拜艾的斯特丁尼阿斯，在卡普里的提比

略，维留斯•鲁弗斯（或在维利亚的鲁弗斯）又怎样了呢。最后想想对令人骄傲的所有事物热切的追求。人们竭力追求的一切是多么没有价值啊。一个人在面对机会时显示出正义、节制、对神的顺从、并且非常淳朴地这么做，是多么达观啊！因为，为不值得骄傲的事情而骄傲，这样的骄傲是所有事情中最难以忍受的。

To those who ask, Where hast thou seen the gods or how dost thou comprehend that they exist and so worshipest them? I answer, in the first place, they may be seen even with the eyes; in the second place, neither have I seen even my own soul and yet I honour it. Thus then with respect to the gods, from what I constantly experience of their power, from this I comprehend that they exist and I venerate them.

有些人会问：你在哪里见过神？你怎么知道他们确实存在并如此膜拜他们呢？我的回答是：首先，他们甚至可以为肉眼所见；第二，我虽然没有见过我的灵魂但我敬重它。那么，我是从我在神那里不断体验到的力量中知道他们的存在并且敬重他们。

The safety of life is this, to examine everything all through, what it is itself, what is its material, what the formal part; with all thy soul to do justice and to say the truth. What remains except to enjoy life by joining one good thing to another so as not to leave even the smallest intervals between?

人生的保障就在于此：彻底地考察一切事物，它自身是什么，它的质料是什么，它的形式部分是什么，全心全意去做正当的事，说真实的话。我们除了把一件好事和另一件好事相联结，使中间甚至不留

最小的空隙来享受人生，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There is one light of the sun, though it is interrupted by walls, mountains, and other things infinite. There is one common substance, though it is distributed among countless bodies which have their several qualities. There is one soul, though it is distributed among infinite natures and individual circumscriptions or individuals. There is one intelligent soul, though it seems to be divided. Now in the things which have been mentioned all the other parts, such as those which are air and matter, are without sensation and have no fellowship: and yet even these parts the intelligent principle holds together, and the gravitation towards the same. But intellect in a peculiar manner tends to that which is of the same kin, and combines with it, and the feeling for communion is not interrupted.

虽然会被墙壁、高山和其他无数东西隔断，仍会有一缕阳光。尽管分布在无数具有各自特点的物体当中，但仍然存在一种共同的物质。尽管分布在无数的本性和各个限制物（个体）中，但仍然存在一个灵魂。尽管看起来被分开了，但仍然存在一个理智的灵魂。现在，在前面提到的事物中，所有其他部分，比如那些气体的和物质的部分，是没有感觉、没有友谊的，理智原则甚至把这些部分也聚集起来，合而为一。理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趋向于它的同类，与它结合，这种相通的感觉是无法割断的。

What dost thou wish? to continue to exist? Well, dost thou wish to have sensation? movement? growth? and then again to cease to grow? to use thy speech? to think? What is there of all these things which seems to thee worth desiring? But if it is easy to set little

value on all these things, turn to that which remains, which is to follow reason and god. But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honouring reason and god to be troubled because by death a man will be deprived of the other things.

你希望什么？继续存在？好，你希望有感觉？运动？成长？然后停止成长？使用语言？思考？所有这些东西中有什么在你看来值得期待呢？但如果看轻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容易的，那就转向余下的东西：去追随理性和神灵。死亡会剥夺一个人许多其他东西，如果因此而烦恼，那就与尊敬理性和神灵不一致了。

How small a part of the boundless and unfathomable time is assigned to every man! For it is very soon swallowed up in the eternal. And how small a part of the whole substance! and how small a part of the universal soul; and on what a small clod of the whole earth thou creepest! Reflecting on all this, consider nothing to be great, except to act as thy nature leads thee, and to endure that which the common nature brings.

每一个人分配到的是无尽的、不可测的时间中多么小的一部分！很快这部分就要被吞没在永恒之中。在整个物质中这是多么小的一部分！在宇宙灵魂中是多么小的一部分！你爬行在整个大地多么小的一个泥块上啊！反思所有这一切，想想除了按照本性行事，接受共同本性带给你的，就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了。

How does the ruling faculty make use of itself? for all lies in this. But everything else, whether it is in the power of thy will or not, is only lifeless ashes and smoke.

主宰能力是如何运用自己的呢？一切都在于此。其他一切，不管是否在你意志的力量范围内，都不过是没有生命的灰烬和烟尘。

This reflection is most adapted to move us to contempt of death, that even those who think pleasure to be a good and pain an evil still have despised it.

这一反思最适合于让我们蔑视死亡，甚至那些认为快乐是善、痛苦是恶的人也曾鄙视它。

The man to whom that only is good which comes in due season, and to whom it is the same thing whether he has done more or fewer acts conformable to right reason, and to whom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ether he contemplates the world for a longer or a shorter time—for this man neither is death a terrible thing.

对他来说，只有在合适时间到来的才是善的；只要合乎正确理性，做多做少都是一样的；花更长或更短时间去思考这个世界，也无不同。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

Man, thou hast been a citizen in this great state the world: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to thee whether for five years (or three)? for that which is conformable to the laws is just for all. Where is the hardship then, if no tyrant nor yet an unjust judge sends thee away from the state, but nature who brought thee into it? The same as if a praetor who has employed an actor dismisses

him from the stage. “But I have not finished the five acts, but only three of them.” —Thou sayest well, but in life the three acts are the whole drama; for what shall be a complete drama is determined by him who was once the cause of its composition, and now of its dissolution: but thou art the cause of neither. Depart then satisfied, for he also who releases thee is satisfied.

人啊，你已经是这个伟大国家（世界）的一位公民：是五年（或是三年）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吗？因为合乎法则就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暴君或不公正的法官把你从这个国家赶走，而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的自然驱使你离开，那么苦难在哪里呢？就像一位长官雇佣了一个演员，之后把他赶下了舞台。“可是我还没有演完五幕戏，只演了其中的三幕呢。”你说得对，但人生之中这三幕就是整个戏剧，因为完整的戏剧取决于曾经创作它、现在解散它的人：而你两者都不是。那就满意地离开吧，因为那让你离开的人也是满意的。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大学的理念

（上）

大学教育

John Henry Newman

约翰·亨利·纽曼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大学的理念（上）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约翰·亨利·纽曼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reface 前言
- Discourse 1. Introductory 第一讲：导语
- Discourse 2. Theology a Branch of Knowledge 第二讲：神学乃知识分支
- Discourse 3. Bearing of Theology on Other Branches of Knowledge 第三讲：神学对其他学问门类的影响
- Discourse 4. Bearing of Other Branches of Knowledge on Theology 第四讲：其他知识分支对神学的影响
- Discourse 5. Knowledge Its Own End 第五讲：知识乃自身目标
- Discourse 6. Knowledge Viewed in Relation to Learning 第六讲：从与学习的关系看知识
- Discourse 7. Knowledge Viewed in Relation to Professional Skill 第七讲：从与职业技能的关系看知识
- Discourse 8. Knowledge Viewed in Relation to Religion 第八讲：从与宗教的关系看知识
- Discourse 9. Duties of the Church Towards Knowledge 第九讲：教会对知识的责任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reface

前言

The view taken of a University in these Discourses is the following: That it is a place of *teaching* universal *knowledge* . This implies that its object is, on the one hand, intellectual, not moral; and, on the other, that it is the diffusion and extension of knowledge rather than the advancement. If its object were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discovery, I do not see why a University should have students; if religious training, I do not see how it can be the seat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

本系列讲座中，我对大学的看法如下：大学乃传授 普遍知识 的场所。这里隐含的意思是，一方面，大学的目标是培养智力而非德性，另一方面，大学要扩散和传播知识，而非提升知识。假如大学以科学与哲学新发现为目标，那我就看不出大学为何要招收学生。假如大学以宗教训练为目标，我同样也看不出为何大学能成为文学与科学的中心。

Such is a University in its *essence* , and independently of its relation to the Church. But, practically speaking, it cannot fulfil its object duly, such as I have described it, without the Church's assistance; or, to use the theological term, the Church is necessary for its *integrity* . Not that its main characters are changed by this incorporation: it still has the office of intellectual education; but the Church steadies it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at office.

大学的本质 就在于此，而且这一本质无关乎它与教会的关系。然而从现实的角度看，如若没有教会襄助，大学便无法充分实现我刚刚说过的那个目标。用一个神学词语来形容，教会对“完整 ”大学的作用不可或缺。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两者的结合会改变大学的主要特征——大学终归还是有智性教育的职责，但如此一来，教会能使大学更稳定可靠地行使其职责。

Such are the main principles of the Discourses which follow; though it would be unreasonable for me to expect that I have treated so large and important a field of thought with the fulness and precision necessary to secure me from incidental misconceptions of my meaning on the part of the reader. It is true, there is nothing novel or singular in the argument which I have been pursuing, but this does not protect me from such misconceptions; for the very circumstance that the views I have been delineating are not original with me may lead to false notions as to my relations in opinion towards those from whom I happen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to learn them, and may cause me to be interpreted by the objects or sentiments of schools to which I should be simply opposed.

下面的演讲就基于上述几条主要原则。鉴于所探讨的思想领域如此庞杂又至关重要，我如若自以为已经全面准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从而使读者决不可能偶尔误解我的意思，那无疑是非分之想。我一直以来孜孜求索的论证确无新奇超凡之处，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能避免遭受此类误解。因为我试图诠解的这些观点并非己出，这种情况可能导致错误的观念，那就是误解我与最先向我传达这些观点之人在思想上的关系，从而按照我完全反对的那些学派的目标或观点来解释我的想法。

For instance, some persons may be tempted to complain, that I have servilely followed the English idea of a University, to the disparagement of that Knowledge which I profess to be so strenuously upholding; and they may anticipate that an academical system, formed upon my model, will result in nothing better or higher than in the production of that antiquated variety of human nature and remnant of feudalism, as they consider it, called "a gentleman." [1_1] Now, I have anticipated this charge in various parts of my discussion; if, however, any Catholic is found to prefer it (and to Catholics of course this Volume is primarily addressed), I would have him first of all ask himself the previous question, *what* he conceives to be the reason contemplated by the Holy See in recommending just now to the Irish Hierarch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atholic University? Has the Supreme Pontiff recommended it for the sake of the Sciences, which are to be the matter, and not rather of the Students, who are to be the subjects, of its teaching? Has he any obligation or duty at all towards secular knowledge as such? Would it become his Apostolical Ministry, and his descent from the Fisherman, to have a zeal for the Baconian or other philosophy of man for its own sake? Is the Vicar of Christ bound by office or by vow to be the preacher of the theory of gravitation, or a martyr for electro-magnetism? Would he be acquitting himself of the dispensation committed to him if he were smitten with an abstract love of these matters, however true, or beautiful, or ingenious, or useful? Or rather, does he not contemplate such achievements of the intellect, as far as he contemplates them, solely and simply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Revealed Truth? Surely, what he does he does for the sake of Religion; if he looks with satisfaction on strong temporal governments, which promise perpetuity, it is for the sake of Religion; and if he encourages and patronizes art and science, it is for the sake of Religion. He rejoices in the widest and most philosophical systems of intellectual education, from an

intimate conviction that Truth is his real ally, as it is his profession; and that Knowledge and Reason are sure ministers to Faith.

譬如说，有人禁不住想要指责，我不过是在奴颜媚骨地奉英格兰人的大学理念为圭臬，而我对自己向来奋力维护的那种知识弃如敝履。他们或许会推想，若是照我的这个模式建造起一个教育机构，必然教出一班有旧式人格和封建残余思想的人，即他们所称的“绅士”[2_1]。对于这项指责，我在讨论过程的各个部分都曾预见到。可假如还是有哪位天主教徒（这本书主要就是为他们写的）非得进行这样的指责，那我就得请他先自问我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即圣座此时力荐爱尔兰教区建一所天主教大学，到底是出于何种 考虑？各门学科是大学要讲授的内容，但大学生却是大学教学的对象，教宗的这一建议，难道仅只为了那些学科而不是为那些学生着想？教宗对传授诸如此类的世俗知识到底有无义务或职责？教宗的身份及渔人的血统，适合纯粹地热衷于培根的学说或其他类别的哲学吗？教宗莫不是为其职责或誓言所迫，非得成为地心引力学说的鼓吹者或电磁理论的殉道士不成？无论这些学说多么真实美好，多么奇妙或多么有用，如果他因抽象地喜欢这些事物而困扰，岂不是试图脱卸交托给他的责任吗？毋宁说，他在思考这些智力成果时，考虑的仅仅是它们与启示真理所关注的事务的关系？毫无疑问，教宗的所作所为全然出自宗教的利益。假如他乐见号称永立不败的现世强权，那是为了宗教；假如他鼓励并赞助艺术与科学，那也是为了宗教。他欣赏最广博和最有哲理的智性教育体系，因为他深信真理才是他真正的盟友，这也是其职责所系，而知识与理性绝对是信仰的牧者。

This being undeniable, it is plain that, when he suggests to the Irish Hierarch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versity, his first and chief and direct object is, not science, art, professional skill, literature, the discovery of knowledge, but some benefit or other, to accrue, by means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 to his own children; not indeed

their formation on any narrow or fantastic type, as, for instance, that of an “English Gentleman” may be called, but their exercise and growth in certain habits, moral or intellectual. Nothing short of this can be his aim, if, as becomes the Successor of the Apostles, he is to be able to say with St. Paul, “Non judicavi me scire aliquid inter vos, nisi Jesum Christum, et hunc crucifixum.” Just as a commander wishes to have tall and well-formed and vigorous soldiers, not from any abstract devotion to the military standard of height or age, but for the purposes of war, and no one thinks it anything but natural and praiseworthy in him to be contemplating, not abstract qualities, but his own living and breathing men; so, in like manner, when the Church founds a University, she is not cherishing talent, genius, or knowledge, for their own sake, but for the sake of her children, with a view to their spiritual welfare and their religious influence and usefulness, with the object of training them to fill their respective posts in life better, and of making them more intelligent, capable, active members of society.

既然这一点无可争辩，显然就可以看出，当圣座提议爱尔兰教区开办一所天主教大学时，他的首要和直接目标并不是培养科学、艺术、职业技能，修习文学或知识，而是通过文学与科学为他的教民增加种种益处。不是为了让教民成为所谓“英国绅士”的那一类思想狭隘或耽于空想的人，而是要他们在学习中养成道德或智性方面的某些习惯。作为使徒的承继者，假如他能且应该同意圣保罗说过的话，“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他眼里就不会有别的任何目标。将军希望自己的士兵高大威猛、体格强壮，并非是执意满足身高、年龄等抽象的军事标准，而是出于实现作战目标的实际考虑。他这样不考虑抽象的品质而专注手下生机勃勃的活人，大家都会觉得合情合理，值得称赞。同样，当教会开办一所大学时，最关心的并非天赋、才干、或知识本身，而是教会看护的教民，要为他们提供精神的安宁，以及宗教影响和作用，

训练他们更好地践行各自的人生职责，成为更聪明能干、积极向上的社会成员。

Nor can it justly be said that in thus acting she sacrifices Science, and, under a pretence of fulfilling the duties of her mission, perverts a University to ends not its own, as soon as it is taken into account that there are other institutions far more suited to act as instruments of stimulating philosophical inquiry, and extending the boundaries of our knowledge, than a University. Such, for instance, are the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Academies,” which are so celebrated in Italy and France, and which have frequently been connected with Universities, as committees, or, as it were, congregations or delegacies subordinate to them. Thus the present Royal Society originated in Charles the Second's time, in Oxford; such just now are the Ashmolean and Architectural Societies in the same seat of learning, which have risen in our own time. Such, too, is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a migratory body, which at least at times is found in the halls of the Protestant Universiti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faults of which lie, not in its exclusive devotion to science, but in graver matters which it is irrelevant here to enter upon. Such again is the Antiquarian Society, the Royal Academy for the Fine Arts, and others which might be mentioned. This, then, is the sort of institution, which primarily contemplates Science itself, and not students; and, in thus speaking, I am saying nothing of my own, being supported by no less an authority than Cardinal Gerdil. “*Ce n'est pas* ,” he says, “*qu'il y ait aucune véritable opposition entre l'esprit des Académies et celui des Universités; ce sont seulement des vues différentes. Les Universités sont établies pour enseigner les sciences aux élèves qui veulent s'y former; les Académies se proposent de nouvelles recherches à faire dans la carrière des sciences. Les Universités d'Italie ont fourni des sujets qui ont fait honneur aux Académies; et celles-ci ont*

donné aux Universités des Professeurs, qui ont rempli les chaires avec la plus grande distinction .“ [1_2]

假如考虑到有其他机构比大学更合适作为激发哲理探索和扩大知识范围的工具，我们也不能据此就说，教会的上述做法牺牲了科学，也不能说教会打着完成其使命的旗号，行颠覆大学使命之实。比如，在意大利与法国声名卓著的那些文学与科学“研究院”就是这样的，这些机构经常与大学联系在一起，作为所谓的委员会或所从属的团体和代表团。同样，发轫于查理二世时代，现存于牛津的皇家学会也是如此，阿什莫尔博物馆与建筑协会也是同类学术中心，而且就是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兴起的。无固定场所的大英协会也是这样一个机构，至少某些时候，我们在英国一些新教大学的厅堂里也会看到这么一个机构，其弊病并不在于专门研究科学，而在于其他更严重的事务，在此不便详论。古文物研究协会、皇家美术研究院和其他一些也许值得一提的机构亦是如此。这样的机构主要关心的是科学本身而非学生。这并非我一人之见，像红衣主教热尔迪这样的权威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说：“并不是说，研究机构的精神与大学的精神之间存在真实的对立，只不过彼此视角不同而已。大学的设立，是为愿意在这里接受自身改造的学生讲授各门学科，而研究机构是在各门学科中进行新的研究。意大利的大学向来都为研究机构提供称职的研究人员，而研究机构也为大学提供教学卓著的教师。”

The nature of the case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combine to recommend to us this division of intellectual labour between Academies and Universities. To discover and to teach are distinct functions; they are also distinct gifts, and are not commonly found united in the same person. He, too, who spends his day in dispensing his existing knowledge to all comers is unlikely to have either leisure or energy to acquire new. The common sense of mankind has associated the search after truth with seclusion and

quiet. The greatest thinkers have been too intent on their subject to admit of interruption; they have been men of absent minds and idiosyncratic habits, and have, more or less, shunned the lecture room and the public school. Pythagoras, the light of Magna Græcia, lived for a time in a cave. Thales, the light of Ionia, lived unmarried and in private, and refused the invitations of princes. Plato withdrew from Athens to the groves of Academus. Aristotle gave twenty years to a studious discipleship under him. Friar Bacon lived in his tower upon the Isis. Newton indulged in an intense severity of meditation which almost shook his reason. The great discoveries in chemistry and electricity were not made in Universities. Observatories are more frequently out of Universities than in them, and even when within their bounds need have no moral connexion with them. Porson had no classes; Elmsley lived a good part of his life in the country. I do not say that there are not great examples the other way, perhaps Socrates, certainly Lord Bacon; still I think it must be allowed on the whole that, while teaching involves external engagements, the natural home for experiment and speculation is retirement.

这件事情的性质和哲学史共同向我们揭示出，研究机构与大学在智力劳动上的区分。发现知识与教授知识是两种不同的技能，也是两种不同的天赋，很少有人能集这两种天赋于一身。一个人若整天忙于将所掌握的知识传授给所有求学问者，他不太可能有闲暇与精力再去获取新的知识。人类的常识已经将对真理的追求与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最伟大的思想家总是太执着于他们的研究课题，因而容不得任何打扰。这些人看上去时常心不在焉，性情古怪，像讲堂与公立学校这类地方，他们能躲则躲。毕达哥拉斯的光辉曾照亮意大利南端，但他本人却曾在山洞里生活。泰勒斯是爱奥尼亚之光，却终生不娶，过着隐居生活，哪怕王公贵族的邀请也不予理会。柏拉图远离雅典，跑到学园的小树林里过日子。亚里士多德在作为柏拉图弟子的

二十年时间里勤奋好学。贝根修士一个人栖居于伊西斯城的一处城堡里。牛顿潜心于沉思默想，竟至于几乎失去理智。化学与电学最伟大的发现都不是在大学里实现的。天文台更多是在大学之外，即使建在大学里面，也不一定与大学有精神联系。波森并不上课，埃尔姆斯利大部分时期生活在乡下。我并不是说，就不存在相反的伟大人物的例子。苏格拉底也许就是反例，而培根爵士则肯定是。但整体而论，我们必须承认，教学需要与外界接触，而实验与思考的天然寓所却应当是退隐之地。

Returning, then,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question, from which I may seem to have digressed, thus much I think I have made good,—that, whether or no a Catholic University should put before it, as its great object, to make its students "gentlemen," still to make them something or other *is* its great object, and not simply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and advance the dominion of Science. If, then, this may be taken for granted, as I think it may, the only point which remains to be settled is, whether I have formed a probable conception of the *sort of benefit* which the Holy See has intended to confer on Catholics who speak the English tongue by recommending to the Irish Hierarch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versity; and this I now proceed to consider.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考虑刚才谈到的那个问题吧。虽然似乎已经离了题，但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一所天主教大学是否应当将其重大的目标设立为 对学生的培养，无论是培养为“绅士”还是其他人，而不仅仅是保护科学的利益和扩大科学的范围。假若如我所想，这个问题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圣座建议爱尔兰教区开办一所大学，其用意就是要给予讲英语的天主教徒某种益处 。那么，唯一尚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我是否就这种益处形成了可实现的构想。下面我将就此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Here, then, it is natural to ask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question, whether any bett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Holy See can be given than that which I have suggested in this Volume. Certainly it does not seem to me rash to pronounce that, whereas Protestants have great advantages of education in the School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ur ecclesiastical rulers have it in purpose that Catholics should enjoy the like advantages, whatever they are, to the full. I conceive they view it as prejudicial to the interests of Religion that there should be any cultivation of mind bestowed upon Protestants which is not given to their own youth also. As they wish their schools for the poorer and middle classes to be at least on a par with those of Protestants, they contemplate the same object also as regards that higher education which is given to comparatively the few. Protestant youths, who can spare the time, continue their studies till the age of twenty-one or twenty-two; thus they employ a time of life all-important and especially favourable to mental culture. I conceive that our Prelates are impressed with the fact and its consequences, that a youth who ends his education at seventeen is no match (*cæteris paribus*) for one who ends it at twenty-two.

既然如此，我们自然而然要问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那些人：除开我在本书里所提供的以外，对圣座的这一建议还有没有更好的解释？假如我断言，鉴于新教徒在英国的中小学、学院和大学里都享有极大的教育优势，教会领袖就有意保证天主教徒也能充分享受相同的任何优势，我这么说应当不属轻率鲁莽之举吧。我揣测，教会领袖觉得，让新教徒得到思想的培育而又不给天主教的青年以相同的机会，那是有损宗教利益的。因为他们希望，天主教为社会中下层开办的学校至少应当与新教徒开办的学校处在同等水平，而对于为相对少数的人建设的高等教育，他们也有同样的打算。新教的青年如若有时间，往往

可以一直学到二十一、二岁，以此来度过人生中这段极其重要，且对思想教育尤其有益的时期。我设想，我们的高级神职人员们一定都注意到了下面这样的事实及其后果：假定其他方面的条件相同，十七岁便结束教育的青年，一定比不上继续学业到二十二岁的青年。

All classes indeed of the community are impressed with a fact so obvious as this.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Catholics who aspire to be on a level with Protestants in discipline and refinement of intellect have recourse to Protestant Universities to obtain what they cannot find at home. Assuming (as the Rescripts from Propaganda allow me to do) that Protestant education is inexpedient for our youth,—we see here an additional reason why those advantages, whatever they are, which Protestant communities dispense through the medium of Protestantism should be accessible to Catholics in a Catholic form.

的确，社会各阶层都深知这一明显的事实。后果是，渴望在学科以及智性的精进上与新教徒处在同一水平的天主教徒，只得去新教大学才能学到他们在自家学不到的东西。假定（在传信部法令所允许的范围内）新教教育不适合天主教的青年，那我们在此又看到另一条理由，说明无论新教团体通过新教媒介给予了何种优势，天主教也应当以天主教的形式给予其教徒同等的优势。

What are these advantages? I repeat, they are in one word the culture of the intellect. Robbed, oppressed, and thrust aside, Catholics in these islands have not been in a condition for centuries to attempt the sort of education which is necessary for the man of the world, the statesman, the landholder, or the opulent gentleman. Their legitimate stations, duties, employments, have been taken

from them, and the qualifications withal,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which are necessary both for reversing the forfeiture and for availing themselves of the reversal. The time has come when this moral disability must be removed. Our desideratum is, not the manners and habits of gentlemen;—these can be, and are, acquired in various other ways, by good society, by foreign travel, by the innate grace and dignity of the Catholic mind;—but the force, the steadiness, the comprehensiveness and the versatility of intellect, the command over our own powers, the instinctive just estimate of things as they pass before us, which sometimes indeed is a natural gift, but commonly is not gained without much effort and the exercise of years.

到底都有哪些优势呢？我再说一遍，这些优势简而言之就是指才智的培养。多少世纪以来，英伦诸岛的天主教徒都在遭受剥夺、压迫和排斥，失去了接受必要教育从而进入上流社会，成为政治家、地主或富绅的机会。他们的合法地位、职务和就业机会遭受剥夺，他们的社会条件及智力条件也未幸免，而这些都是扭转其被剥夺状态且实现人生转变所必需的。现在是消除这种精神上的不利条件的时候了。当前迫切需要培养的并非绅士般的举止和习性，因为这些品质能够并且实际上正是通过其他诸般途径养成的，比如善结良友、出国旅行，以及通过天主教徒思想中固有的优雅与尊严来养成。我们需要的是精神力量、坚定不移的态度、无所不包的人类精神及智力的全方位发展，需要对我们自身力量的把握，对所遇之事本能地形成恰当的判断。的确，这种能力有时是一种天赋，然而多数情况下，不费很大力气或经历多年锤炼往往无法获得。

This is real cultivation of mind; and I do not deny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excellences of a gentleman are included in it. Nor need we be ashamed that they should be, since the poet long ago

wrote, that “Ingenuas didicisse fideliter artes Emollit mores.” Certainly a liberal education does manifest itself in a courtesy, propriety, and polish of word and action, which is beautiful in itself, and acceptable to others; but it does much more. It brings the mind into form,—for the mind is like the body. Boys outgrow their shape and their strength; their limbs have to be knit together, and their constitution needs tone. Mistaking animal spirits for vigour, and over-confident in their health, ignorant what they can bear and how to manage themselves, they are immoderate and extravagant; and fall into sharp sicknesses. This is an emblem of their minds; at first they have no principles laid down within them as a foundation for the intellect to build upon: they have no discriminating convictions, and no grasp of consequences. And therefore they talk at random, if they talk much, and cannot help being flippant, or what is emphatically called “*young* .” They are merely dazzled by phenomena, instead of perceiving things as they are.

这是真正的心智培育，而且我也不否认，代表绅士身份的优雅举止就包含于其中。将绅士美德包含其中，我们也不必感到难堪，因为很久以前就有诗人曾言：“博学多艺，必使人言行中矩，优雅非凡。”通识教育必然在举止礼貌、言行得体中体现出来，这种教育本身就是美好的，他人也易于接受。但通识教育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使心智进入成熟状态，因心智与身体是相似的。小男孩的心智总是比体形和体力成长更快，但他们的四肢五体需彼此配合，体格需要变得强健。假如错把一时的精力当强壮的体能，对自己的健康抱过大信心，不知自己能够承受什么，也不知如何自我管理，那他们就会有失节制，放纵无度，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这是他们心智的象征。一开始，他们内心缺乏可以发展为才智的原则，没有辨别事物的信念，也没有判断言行后果的能力。这样一来，他们若是喜欢说话就会信口开河、口无遮拦，就是人们一看便知的“楞头青”。他们只会看到事物的外表，而不深想事情本身的性质。

It were well if none remained boys all their lives; but what is more common than the sight of grown men, talking on political or moral or religious subjects, in that offhand, idle way, which we signify by the word *unreal* ? “That they simply do not know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is the spontaneous silent remark of any man of sense who hears them. Hence such persons have no difficulty in contradicting themselves in successive sentences, without being conscious of it. Hence others, whose defect in intellectual training is more latent, have their most unfortunate crotchets, as they are called, or hobbies, which deprive them of the influence which their estimable qualities would otherwise secure. Hence others can never look straight before them, never see the point, and have no difficulties in the most difficult subjects. Others are hopelessly obstinate and prejudiced, and, after they have been driven from their opinions, return to them the next moment without even an attempt to explain why. Others are so intemperate and intractable that there is no greater calamity for a good cause than that they should get hold of it. It is very plain from the very particulars I have mentioned that, in this delineation of intellectual infirmities, I am drawing, not from Catholics, but from the world at large; I am referring to an evil which is forced upon us in every railway carriage, in every coffee-room or *table-d'hôte* , in every mixed company, an evil, however, to which Catholics are not less exposed than the rest of mankind.

假如没有人是一辈子也长不大的孩子，那自然是好的。可面对一些成年人在谈起政治、道德或宗教时信口胡诌，一副闲极无聊的样子，我们只好用“不可思议”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们，这样的情景，我们不是见得太多了吗？稍具常识的人听到他们的言谈后，莫不在心里不由自主地说：“他们可真是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所以这样一些人

说起话来总是前言不搭后语，而且还不自知。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在智性培育方面的欠缺并不那么明显，却很不幸整天琢磨一些人们常说的不着边际的怪念头，或者玩物丧志、不务正业，本当有所作为的种种潜质全都浪费了。再有一些人，他们从来都无法直视问题，弄不清关键所在，哪怕最麻烦的话题，他们谈起来也轻松自如。还有一些人顽固和偏执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此时被人驳倒的观点，过一会儿又重申一次，根本都不想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还有一些人太过放纵和倔强，任何伟大的事业一旦被他们掌控便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从我列举出的众多特别情形中可以轻易看出，谈到智力残缺时，我举的例子并非仅仅来自天主教徒，而是整个世界的芸芸众生。我所指的这种罪过，无论是在火车车厢里，咖啡室中或餐桌上，还是在众人汇聚的任何地方，都让人无法躲闪。世人如此，天主教徒同样也难以避免。

When the intellect has once been properly trained and formed to have a connected view or grasp of things, it will display its powers with more or less effect according to its particular quality and capacity in the individual. In the case of most men it makes itself felt in the good sense, sobriety of thought, reasonableness, candour, self-command, and steadiness of view, which characterize it. In some it will have developed habits of business, power of influencing others, and sagacity. In others it will elicit the talent of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and lead the mind forward to eminence in this or that intellectual department. In all it will be a faculty of entering with comparative ease into any subject of thought, and of taking up with aptitude any science or profession. All this it will be and will do in a measure, even when the mental formation be made after a model but partially true; for, as far as effectiveness goes, even false views of things have more influence and inspire more respect than no views at all. Men who fancy they see what is not are more energetic, and make their way better, than those who see

nothing; and so the undoubting infidel, the fanatic, the heresiarch, are able to do much, while the mere hereditary Christian, who has never realized the truths which he holds, is unable to do anything. But, if consistency of view can add so much strength even to error, what may it not be expected to furnish to the dignity, the energy, and the influence of Truth!

才智一旦得到合适训练并塑造成型，以至于能够对事物产生彼此关联的认识和把握，它就会根据个人的天资和能力展现出才智的力量，并且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才智体现在良好的判断力、清晰的思路、通情达理、坦诚直率、自我节制、意见前后一致等方面，这些品格往往就是才智的特征。在某些人身上，成熟的才智会养成行事的习惯，影响他人的能力和远见卓识。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它会激发起哲理思辨的天赋，使人在某个思维领域中卓尔不群。在所有人身上，这种训练过的才智会成为一种能力，使人轻松思考任何话题，适合投身任何一门学科或从事任何一种职业。上述这些，才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达到或者实现，哪怕心智的形成是以部分真实的模式构造出来的亦是如此。因为就其有效性而言，即使是对事物的错误观点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赢得更多的尊重，好过什么观点也没有。自以为看到不存在的事物的人，比什么都看不到的人更有活力，也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那些自信的异教徒、狂热者、邪教首领，往往更容易有所成就，相反，只因世代相传而有信仰的基督徒，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掌握的真相，因此一事无成。可是，假如观点的前后一致甚至可为谬误增添如此强大的力量，那么无论它对真理的尊严、力量和影响力有何增益，我们都不会感到意外！

Someone, however, will perhaps object that I am but advocating that spurious philosophism, which shows itself in what, for want of a word, I may call “viewiness,” when I speak so much of the formation, and consequent grasp, of the intellect.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theory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which I have been delineating, if acted upon, would teach youths nothing soundly or thoroughly, and would dismiss them with nothing better than brilliant general views about all things whatever.

可是，我在这里大谈才智的塑造以及紧随其后对才智的把握，有人或许会反驳，认为我只不过是在鼓吹那种虚伪哲学，当一个人“炫耀卖弄”（由于缺乏合适词汇，我暂且用以代之）的时候，这种虚伪哲学便露出马脚。可以这么说，我所阐述的大学教育学说一旦付诸实施，并不能以任何稳健或彻底的方法教授给年轻人任何东西。学生从这样的大学毕业后，最多不过是对一切事物有了看似才华横溢的笼统之见。

This indeed, if well founded, would be a most serious objection to what I have advanced in this Volume, and would demand my immediate attention, had I any reason to think that I could not remove it at once, by a simple explanation of what I consider the true *mode* of educating, were this the place to do so. But these Discourses are directed simply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aims* and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Suffice it, then, to say here, that I hold very strongly that the first step in intellectual training is to impress upon a boy's mind the idea of science, method, order, principle, and system; of rule and exception, of richness and harmony. This is commonly and excellently done by making him begin with Grammar; nor can too great accuracy, or minuteness and subtlety of teaching be used towards him, as his faculties expand, with this simple purpose. Hence it is that critical scholarship is so important a discipline for him when he is leaving school for the University. A second science is the Mathematics; this should follow Grammar, still with the same object, viz., to give him a conception of development

and arrangement from and around a common centre. Hence it is that Chronology and Geography are so necessary for him, when he reads History, which is otherwise little better than a storybook. Hence, too, Metrical Composition, when he reads Poetry; in order to stimulate his powers into action in every practicable way, and to prevent a merely passive reception of images and ideas which in that case are likely to pass out of the mind as soon as they have entered it. Let him once gain this habit of method, of starting from fixed points, of making his ground good as he goes, of distinguishing what he knows from what he does not know, and I conceive he will be gradually initiated into the largest and truest philosophical views, and will feel nothing but impatience and disgust at the random theories and imposing sophistries and dashing paradoxes, which carry away half-formed and superficial intellects.

假如理由充足，这样的质问定会是对我在这本书里倡导的思想最有力的反驳，因此我必须立即认真对待。可是我有理由认为，假如此地就是适当的辩解场所，我只需要简单地解释一下我心目中真正的教育模式 ，即可驳倒此异议。然而这些演讲所针对的，只不过是关于教育目标 及原则 的一些考虑。有鉴于此，只需这样说便足够了：我坚信，智性培育的第一步就是要让孩子牢记科学、方法、次序、原则和体系的观念，还有规律与例外，丰富与和谐的概念。要达到这一点，有效的方法通常是让他们从学习文法开始。有了这个简明的目标，当他们的大脑能力增强时，对他们施行再精准仔细的教学方法也不为过。正因如此，在他离开中学准备上大学的时候，养成批判性的眼光才是对他极其重要的训练。另一门学科是数学。数学应当紧接着文法课开设，但目标与文法课一样，即让他由一个普遍的中心出发，形成相关的发展与排列的概念。同理，编年史和地理也是他阅读史书时必不可少的，否则历史就不过是一本小说。音韵之学在他读诗时亦不可或缺，可激励他以任何实际可行的方式将力量变成行动，防止被动接

受图像与观念。如若不然，这些图像与观念往往刚被记住便被抛之脑后。一旦让他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凡事讲方法，从固定的观点出发，坚守自己的立场，区分所知与不所知，我相信他一定会慢慢地了解宏大确切的哲理观，会厌烦和蔑视杂乱无章的学说、强人所难的诡辩以及花言巧语的悖论，而未成熟或思想肤浅的读书人往往就深受这些弊端之害。

Such parti-coloured ingenuities are indeed one of the chief evils of the day, and men of real talent are not slow to minister to them. An intellectual man, as the world now conceives of him, is one who is full of “views” on all subjects of philosophy, on all matters of the day. It is almost thought a disgrace not to have a view at a moment's notice on any question from the Personal Advent to the Cholera or Mesmerism. This is owing in great measure to the necessities of periodical literature, now so much in request. Every quarter of a year, every month, every day, there must be a supply, for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 public, of new and luminous theories on the subjects of religion, foreign politics, home politics, civil economy, finance, trade, agriculture, emigration, and the colonies. Slavery, the gold fields, German philosophy, the French Empire, Wellington, Peel, Ireland, must all be practised on, day after day, by what are called original thinkers. As the great man's guest must produce his good stories or songs at the evening banquet, as the platform orator exhibits his telling facts at midday, so the journalist lies under the stern obligation of extemporizing his lucid views, leading ideas, and nutshell truths for the breakfast table. The very nature of periodical literature, broken into small wholes, and demanded punctually to an hour, involves the habit of this extempore philosophy. “Almost all *the Ramblers* ,” says Boswell of Johnson, “were written just as they were wanted for the press; he sent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copy of an essay, and wrote the

remainder while the former part of it was printing." Few men have the gifts of Johnson, who to great vigour and resource of intellect, when it was fairly roused, united a rare common-sense and a conscientious regard for veracity, which preserved him from flippancy or extravagance in writing. Few men are Johnsons; yet how many men at this day are assailed by incessant demands on their mental powers, which only a productiveness like his could suitably supply! There is a demand for a reckless originality of thought, and a sparkling plausibility of argument, which he would have despised, even if he could have displayed; a demand for crude theory and unsound philosophy, rather than none at all. It is a sort of repetition of the "Quid novi?" of the Areopagus and it must have an answer. Men must be found who can treat, where it is necessary, like the Athenian sophist, *de omni scibili* ,

这些杂七杂八的智巧之举，的确就是当今社会的首恶之一，一些不乏真才实干的人也趋之若鹜。现如今，人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就是对所有哲学话题和当今社会的一切问题都“见解甚多”之人。无论是基督降临、霍乱还是梅斯梅尔催眠术，若是听说某个问题后不能立即发表震惊四座的宏论，那可真是丢脸之事。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当前甚为流行的期刊杂志需要。为满足公众需求，每季、每月、每天都必须有新奇炫目的材料，话题涉及宗教、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国民经济、金融、贸易、农业、移民和殖民地等。奴隶制、金矿、德国哲学、法兰西帝国、惠灵顿、皮尔、爱尔兰等话题，都是所谓的原创思想家们必须日日反复演练的。名人的访客总得在晚宴上讲生动的故事或唱动听的歌，讲坛上的演说家总是在正午揭示他所知道的惊人秘密。同理，新闻记者也肩负重大责任，必须为丰富人们的餐桌上的谈资而临时拼凑出浅显易懂的观点、领先的思想观念和概括性的事实。期刊杂志的内容都分成一个个小版块，有的必须按小时送达订户。这种读物的性质必然产生这种即兴哲学的习惯。博斯韦尔在《塞缪尔·约翰逊传》中说：“《漫步者》里面差不多所有内容都是按

照报纸需要写的。他把文章的一部分寄过去付印，趁这部分印刷的时候写余下的部分。”很少有人拥有约翰逊这样的天赋。他将一种少有的常识和对真实性的谨慎态度，与适当燃起的活力与智谋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免于文笔轻率放肆的恶名。约翰逊这样的人没有几个，但是当今有多少能人正因为对其心智能力的不断需求而苦恼啊！毕竟，这种巨大的需求，只有具备约翰逊那种效率的人才可适当满足。市场上需要匠心独具的创意，需要震撼人心的雄辩论证，而这是约翰逊所不齿的，即使他能够展示这样的能力。人们还需要粗浅的学说和并不可靠的哲学，这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这差不多是重复了古代雅典的最高法院阿雷奥帕古斯的“是何新道？”这一问题，而且必须有一个答案。必须找出与雅典学者一样的人来，能在必要的场合探讨所有可知事物：

> *Grammaticus, Rhetor, Geometres, Pictor, Aliptes, Augur, Schœnobates, Medicus, Magus, omnia novit.*

> “文法家、演说家、几何学者、画家、体操教练、医生、算命先生、走钢索的艺人、魔术师——他什么都知道。”

I am speaking of such writers with a feeling of real sympathy for men who are under the rod of a cruel slavery. I have never indeed been in such circumstances myself, nor in the temptations which they involve; but most men who have had to do with composition must know the distress which at times it occasions them to have to write—a distress sometimes so keen and so specific that it resembles nothing else than bodily pain. That pain is the token of the wear and tear of mind; and, if works done comparatively at leisure involve such mental fatigue and

exhaustion, what must be the toil of those whose intellects are to be flaunted daily before the public in full dress, and that dress ever new and varied, and spun, like the silkworm's, out of themselves! Still, whatever true sympathy we may feel for the ministers of this dearly purchased luxury, and whatever sense we may have of the great intellectual power which the literature in question displays, we cannot honestly close our eyes to its direct evil.

我谈到的这类作家，他们真正地同情生活在奴隶制的残酷铁棒之下的人。我本人从来都不曾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也没有受到他们经历的种种诱惑。可是，但凡动笔杆子的人大都明白，人在不得不写作的情况下也会很痛苦，这样的痛苦真切而具体，几乎跟生理的痛苦不相上下。这痛苦便是精神劳损的象征。假如相对轻松地完成的作品都如此劳神费力、殚精竭虑，那么，日日劳作，才智日复一日地受到公众大力称赞的人，就像结茧自缚的蚕虫一样必须经常更换新衣，这该是何等疲于奔命的情形啊！尽管如此，无论对为大家提供如此昂贵的奢侈品的人抱有什么样的同情，也无论对所说的作品展现出来的精神伟力持有什么样的看法，对于其中无庸讳言的罪过，我们无法诚实地视而不见。

One other remark suggests itself, which is the last I shall think it necessary to make. The authority, which in former times was lodged in Universities, now resides in very great measure in that literary world, as it is called, to which I have been referring. This is not satisfactory, if, as no one can deny, its teaching be so offhand, so ambitious, so changeable. It increases the seriousness of the mischief, that so very large a portion of its writers are anonymous, for irresponsible power never can be anything but a great evil; and, moreover, that, even when they are known, they can give no better guarantee for the philosophical truth of their principles than their

popularity at the moment, and their happy conformity in ethical character to the age which admires them. Protestants, however, may do as they will: it is a matter for their own consideration; but at least it concerns us that our own literary tribunals and oracles of moral duty should bear a graver character. At least it is a matter of deep solicitude to Catholic Prelates that their people should be taught a wisdom, safe from the excesses and vagaries of individuals, embodied in institutions which have stood the trial and received the sanction of ages, and administered by men who have no need to be anonymous, as being supported by their consistency with their predecessors and with each other.

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句话，也是我觉得有必要说出来的最后一句话。过去寓居于大学之内的权威，现在大多归于我一直在谈论的所谓文学世界了。假如它的说教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太过随意，又野心勃勃、朝三暮四，那就实在无法让人满意了。这只会加剧危害，因为如此多的作家都是匿名写作的，而不负责任的强权从来都只有大罪大恶可言。此外，就算这些作家的名字为人所知，他们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原则有什么哲理上的真实性，至多不过是获得一时的声名，而在伦理特征方面，他们也乐意去附和赞扬他们的那个时代。但是，新教徒却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行事，这是一件必须由他们自己来考虑的事情。可是，至少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我们的文字审裁处与道德职责上的神谕应当更庄重。至少，天主教的主教们必然深虑，认为应当为其教众传授这样一种智慧：它不会受个人的奇思怪想与荒诞行为的不利影响，体现在一些久经考验并得到各个时代核准的体制之中，颁布执行者也必须是那些并无匿名必要的人；这些人坚守前辈观念，彼此也相互尊重，因此受人拥戴。

November 21. 1852.

1852年11月21日

[1_1].Vid. Huber's *English Universities* , London, 1843, vol. ii., part I., pp. 321, etc.

[1_2].Opere, t. iii., p. 353.

[2_1].休伯：《英国的大学》第二卷，1843年版。

Discourse 1. Introductory

第一讲：导语

1．

1．

In addressing myself, Gentlemen,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a question which has excited so much interest, and elicited so much discussion at the present day, as tha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 feel some explanation is due from me for supposing, after such high ability and wide experience have been brought to bear upon it, that any field remains for the additional labours either of a disputant or of an inquirer. If, nevertheless, I still venture to ask permission to continue the discussion, already so protracted, it is because the subject of Liberal Education, and of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it must be conducted, has ever had a hold upon my own mind; and because I have lived the greater part of my life in a place which has all that time been occupied in a series of controversies both domestic and with strangers, and of measures, experimental or definitive, bearing upon it. About fifty years since, the English University, of which I was so long a member, after a century of inactivity, at length was roused, at a time when (as I may say) it was giving no education at all to the youth committed to its keeping, to a sense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which its profession and its station involved, and it presents to us the singular example of a heterogeneous and an independent body of men, setting about a work of self-reformation,

not from any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 but because it was fitting and right to undertake it. Its initial efforts, begun and carried on amid many obstacles, were met from without, as often happens in such cases, by ungenerous and jealous criticisms, which, at the very moment that they were urged, were beginning to be unjust. Controversy did but bring out more clearly to its own apprehension the views on which its reformation was proceeding, and throw them into a philosophical form. The course of beneficial change made progress, and what was at first but the result of individual energy and an act of the academical corporation, gradually became popular, and was taken up and carried out by the separate collegiate bodies, of which the University is composed. This was the first stage of the controversy. Years passed away, and then political adversaries arose against it, and the system of education which it had established was a second time assailed; but still, since that contest was conducted for the most part through the medium, not of political acts, but of treatises and pamphlets, it happened as before that the threatened danger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repulse, did but afford fuller development and more exact delinea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which the University was the representative.

当今，大学教育这个话题已然激起极大兴趣，引发热烈讨论。尽管人们已用高超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讨论了该问题，但我仍然认为，无论是有意争辩还是爱寻根问底之人，都有必要在任何领域再多费些力气，对此我自觉必须做出解释。可是，假如我还是斗胆请求继续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那是因为通识教育及其实施原则一直以来都是我无法释怀的一个话题，也因为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向来就遭受着来自业内业外的一系列相关争议，经历过施加于其上的诸多实验性或确定性的有关措施。自此约五十年以后，我长期供职的那所英国大学，历经一个世纪的沉寂之后终于苏醒过来，意识到其职责和地位所包含的责任，而醒来之前，（我可以说）它根本就没有为将自身托付

给大学的年轻人提供教育。它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是这样一个特别的例子：一群品性各异、特立独行的人着手一项自我革新事业，他们这么做并非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而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值得一做，也应当去做。当他们克服重重障碍终于着手行事的时候，却像此类事情一般会遇到的情况一样，因外部的猜忌而遭到种种刻薄的批评。正当人们敦促他们勉力而行时，这种批评却开始变得不公正了。围绕大学改革的争议，不仅使改革所依据的种种观点更清晰地显现出来，更使这些观点披上了哲学的外衣，从而加深了这些争议背后的忧虑。有益的变革之路得到延伸，最初只不过是个人能力的结果和学术团体的行动，逐渐也推广开来，且被大学的各个学院采纳并贯彻执行。这是那场争议的第一个阶段。许多年又过去了，政治上的对手又起而抗争，改革业已确立的教育制度再次受到攻击。尽管如此，由于那场争论绝大部分通过媒体进行，不是采取政治行动，而是以专著与小册子为媒介，结果像以前一样，在击退这些让人担惊受怕的危险的过程中，反倒使大学所代表的那些原则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和更准确的描述。

In the former of these two controversies the charge brought against its studies was their remoteness from the occupations and duties of life, to which they are the formal introduction, or, in other words, their *inutility* ; in the latter, it was their connexion with a particular form of belief, or, in other words, their *religious exclusiveness* .

在这两种争议中，前者指责这类研究跟日常生活和人生义务风马牛不相及，只是在形式上做了介绍，或换句话说，这些研究毫无实用性 。后一种争议则指责这种研究与某种特定形式的信仰之间存在联系，换句话说就是具有宗教排他性 。

Living then so long as a witness, though hardly as an actor, in

these scenes of intellectual conflict, I am able to bear witness to view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without authority indeed in themselves, but not without value to a Catholic, and less familiar to him, as I conceive, than they deserve to be. And, while an argument originating in the controversies to which I have referred, may be serviceable at this season to that great cause in which we are here so especially interested, to me personally it will afford satisfaction of a peculiar kind; for, though it has been my lot for many years to take a prominent, sometimes a presumptuous, part in theological discussions, yet the natural turn of my mind carries me off to trains of thought like those which I am now about to open, which, important though they be for Catholic objects, and admitting of a Catholic treatment, are sheltered from the extreme delicacy and peril which attach to disputations directly bearing on the subject-matter of Divine Revelation.

我虽未参与到那场学术冲突中，却长期做了目击者，因此能够充当大学教育种种观点的见证人。那些观点自身的确不具备权威性，但对于天主教徒却并非没有价值，故值得重视，但在我看来，天主教徒对这些观点的认识是不够的。由我前文提到的争议发展而来的论证，此时兴许对我们在此有特别兴趣的那个伟大事业有所益处，然而在我看来，它还会提供一种特别的满足感。因为多年以来，我有幸参与了一些神学辩论，有时还扮演了自高自大的显耀角色，然而，我思想的自然转变却使我有了即将谈到的另外一组想法，尽管这些想法对天主教的目标来说很重要，并且可以用天主教的方法加以表述，却不会因为直接触及神圣启示这一主题而引发争辩，也可避免这种争辩中的高度敏感性和危险。

2．

2 .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why I should open the discussion with a reference to the lessons with which past years have supplied me. One reason is this: It would concern me, Gentlemen, were I supposed to have got up my opinions for the occasion. This, indeed, would have been no reflection on me personally, supposing I were persuaded of their truth, when at length addressing myself to the inquiry; but it would have destroyed, of course, the force of my testimony, and deprived such arguments, as I might adduce, of that moral persuasiveness which attends on tried and sustained conviction. It would have made me seem the advocate, rather than the cordial and deliberate maintainer and witness, of the doctrines which I was to support; and, though it might be said to evidence the faith I reposed in the practical judgment of the Church, and the intimate concurrence of my own reason with the course she had authoritatively sanctioned, and the devotion with which I could promptly put myself at her disposal, it would have cast suspicion on the validity of reasonings and conclusions which rested on no independent inquiry, and appealed to no past experience. In that case it might have been plausibly objected by opponents that I was the serviceable expedient of an emergency, and never, after all, could be more than ingenious and adroit in the management of an argument which was not my own, and which I was sure to forget again as readily as I had mastered it. But this is not so. The views to which I have referred have grown into my whole system of thought, and are, as it were, part of myself. Many changes has my mind gone through; here it has known no variation or vacillation of opinion, and though this by itself is no proof of the truth of my principles, it puts a seal upon conviction, and is a justification of earnestness and zeal. Those principles, which I am now to set forth under the

sanc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ere my profession at that early period of my life, when religion was to me more a matter of feeling and experience than of faith. They did but take greater hold upon me, as I was introduced to the records of Christian Antiquity, and approached in sentiment and desire to Catholicism; and my sense of their correctness has been increased with the events of every year since I have been brought within its pale.

出于若干原因，我应以过去几年中所得的教训来开始这次讨论。其中一个原因是，假如有人认为我只是为了这次讨论而临时摆出几条意见，那我会为此忧心忡忡。当我终于决定谈一谈这个话题时，假定我已经信服这些意见的真实性，那就不只是关乎个人的私事了。可是这样却一定会削弱我的证言的力度，也会使我即将引证的那些论证缺乏久经考验且存续长久的信念所需的道德说服力。这会让我看起来像是我即将支持的那些学说的倡导者，而非热心和深思熟虑的维持者和见证人。何况，也许可以说它证实了我对教会做出实际判断时的虔诚之心，也说明我的推论与教会权威许可的事业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及我随时可以听候其安排的决心，却会对推论的有效性及其结论投上一层疑云，因为这两项并不取决于独立研究，也不求诸过往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反对者可能会振振有词地提出异议，说我不过是紧急情况下供人役使的权宜工具，顶多是熟练地掌握了并不属于我自己的一个论证，当初学来容易，最终必定也很快忘记。但事情却并非如此，我提及的那些见解已然进入我的整个思考体系，从始至终都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的思想虽历经诸多转变，可在这方面却并不曾有过意见的变化或摇摆，尽管这本身并不能证明我所坚持的原则正确无误，却给坚定的信念贴上封条，成为诚挚与热情的理由。我在天主教的许可下即将陈述的这些原则，是我早期生活的表白，那时，宗教对我更多是一种情感与经验而非信仰。当我接触到基督教的古代遗物纪录，并在情感和欲求两个方面都趋向天主教的时候，这些原则便对我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自从皈依天主教，我对这些原则正确性的认知随每年发生的事件而增强。

And here I am brought to a second and more important reason for referring, on this occasion, to the conclusions at which Protestants have arrived on the subject of Liberal Education; and it is as follows: Let it be observed, then, that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I would conduct the inquiry are attainable, as I have already implied, by the mere experience of life. They do not come simply of theology; they imply no supernatural discernment; they have no special connexion with Revelation; they almost arise out of the nature of the case; they are dictated even by human prudence and wisdom, though a divine illumination be absent, and they are recognized by common sense, even where self-interest is not present to quicken it; and, therefore, though true, and just, and good in themselves, they imply nothing whatever as to the religious profession of those who maintain them. They may be held by Protestants as well as by Catholics; nay, there is reason to anticipate that in certain times and places they will be more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and better understood, and held more firmly by Protestants than by ourselves.

对于为何要提及新教徒在通识教育上得出的结论，在此我要谈一谈第二条，也是更重要的理由，简述如下：诸位有目共睹，我已暗示过，我从事研究所依据的原则都是可实现的，仅凭人生经验足矣。这些原则并非仅来自神学，并不隐含超自然的辨别力，与天启也没有特别联系，而几乎源自这件事情的本质。就算没有神圣启示，单凭人类的审慎与智慧也能通达这些原则，即使没有个人利益的驱使，也能以常识来对其加以辨认。所以尽管这些原则真实且公正，有着自身的优良特质，却与坚持原则之人的宗教表白没有任何关系。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可认定这些原则，不仅如此，有理由坚信，在某时某地，新教徒甚至会比我们天主教徒更彻底地研究这些原则，从而更好地理解并且更坚定地遵守这些原则。

It is natural to expect this from the very circumstance that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s founded on truths in the natural order. Where the sun shines bright, in the warm climate of the south, the natives of the place know little of safeguards against cold and wet. They have, indeed, bleak and piercing blasts; they have chill and pouring rain, but only now and then, for a day or a week; they bear the inconvenience as they best may, but they have not made it an art to repel it; it is not worth their while; the science of calefaction and ventilation is reserved for the north. It is in this way that Catholics stand relatively to Protestants in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 Protestants depending on human means mainly, are led to make the most of them: their sole resource is to use what they have; "Knowledge is" their "power" and nothing else; they are the anxious cultivators of a rugged soil. It is otherwise with us; "*funes ceciderunt mihi in præclaris.* " We have a goodly inheritance. This is apt to cause us (I do not mean) to rely too much on prayer, and the Divine Blessing, for that is impossible; but we sometimes forget that we shall please Him best, and get most from Him, when, according to the Fable, we "put our shoulder to the wheel," when we use what we have by nature to the utmost, at the same time that we look out for what is beyond nature in the confidence of faith and hope. However, we are sometimes tempted to let things take their course, as if they would in one way or another turn up right at last for certain; and so we go on, living from hand to mouth, getting into difficulties and getting out of them, succeeding certainly on the whole, but with failure in detail which might be avoided, and with much of imperfection or inferiority in our appointments and plans, and much disappointment, discouragement, and collision of opinion in consequence. If this be in any measure the state of the case, there is certainly so far a reason for availing ourselves of the investigations and experience of those who are not Catholics, when

we have to address ourselves to the subject of Liberal Education.

教育的哲学是基于自然秩序中的真理，若了解这个情形，很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预期。南方气候温暖，阳光灿烂，所以当地人根本不了解防寒祛湿的措施。他们的确会遇到阴冷刺骨的阵阵寒风，也会有倾盆冷雨，但这些不过偶有出现，持续时间也不过一天或一个星期。他们会尽力忍受诸多不便，却没有把抵挡风雨看作一门技艺，因为这根本就不值得他们去做，采暖通风的技巧是北方人独有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在教育科学上的差别正在于此。新教徒主要依靠人类的方法，勉力而为。他们唯一的资源便是利用已有的一切，“知识就是”他们的“力量”，舍此无他。他们怀着热望在贫瘠之地辛苦耕耘。我们却不然，“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们继承了美好的遗产，这易于使人过多依靠祷告和神赐（可这并不是我的意思，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有时候会忘记，应当尽全力取悦于天主，获取最大助益。此时，正如寓言所说，我们“全力以赴”，把天赋的一切能力发挥到极致，同时还要抱着对信仰与希望的信心，寻找自然天成之外的东西。但有时候，我们不免喜欢任其自然，就好像事情最终肯定会以某种方式步入正途。我们就这样放任下去，得过且过，在麻烦中来来去去，大体上当然还是不错。但在一些细节上就会犯下本可避免的错误，本该很好完成的任务和实现的计划都不尽人意或是屡现瑕疵，结果导致失望、气馁和意见相左。果真如此，目前我们当然就有理由利用非天主教徒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因为我们要谈论的正是通识教育这个话题。

Nor is there surely anything derogatory to the position of a Catholic in such a proceeding. The Church has ever appealed and deferred to witnesses and authorities external to herself, in those matters in which she thought they had means of forming a judgment; and that on the principle, *Cuique in arte sua credendum* . She has even used unbelievers and pagans in evidence of her truth,

as far as their testimony went. She avails herself of scholars, critics, and antiquarians, who are not of her communion. She has worded her theological teaching in the phraseology of Aristotle; Aquila, Symmachus, Theodotion, Origen, Eusebius, and Apollinaris, all more or less heterodox, have supplied materials for primitive exegetics. St. Cyprian called Tertullian his master; St. Augustine referred to Ticonius; Bossuet, in modern times, complimented the labours of the Anglican Bull; the Benedictine editors of *the Fathers* were familiar with the labours of Fell, Ussher, Pearson, and Beveridge. Pope Benedict XIV cited according to the occasion the works of Protestants without reserve, and the late French collection of *Christian Apologists* contains the writings of Locke, Burnet, Tillotson, and Paley. If, then, I come forward in any degree as borrowing the views of certain Protestant schools on the point which is to be discussed, I do so, Gentlemen, as believing, first, that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ever, in the plenitude of her divine illumination, made use of whatever truth or wisdom she has found in their teaching or their measures; and next, that in particular places or times her children are likely to profit from external suggestions or lessons, which have not been provided for them by herself.

在这件事情当中，天主教徒采取这样一个立场当然也没有什么降格自贬可言。一直以来，教会都请求并尊重教会之外的见证者和权威，在这类事情中，教会认为这些见证者和权威自有形成一个判断的方法，原则是："专家内行之言，不妨置信"。天主教甚至曾拿不信者和异教徒的证言当作天主教真理的证据。对于不信天主教的学者、批评者和古物研究者，教会也会加以利用。教会曾用亚里士多德的用语来阐明教会神学，阿奎那、圣西马库斯、狄奥多田、奥利金、尤西比厄斯和阿波里奈多少都带有异端色彩，但他们都为最初的解经学提供了材料。圣西普里安曾拜德尔图良为师，圣奥古斯丁引述过提科纽的

话，而在现代，波舒哀还称赞了安立甘宗的布尔所做的工作。本笃会的《教父史》编辑都熟悉费尔、厄谢尔、皮尔逊和贝弗里奇的研究成果。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依据情况毫无保留地引述清教徒的观点。刚刚出版的法文本《基督教护教者》一书就包含有洛克、伯内特、蒂洛森和佩利的作品。假如我在接下来谈及的问题上某种程度地借用一些新教派别的观点，那么，诸位，我这么做是因为相信，其一，天主教尽管有用之不竭的神圣启示，却一直都在那些新教派别的说教或措施中发现真理或智慧，并全部加以利用；其次，在特定时间或地点，天主教的教徒有可能从她自身没有提供的外部建议或教训中获益。

3．

3．

And here I may mention a third reason for appealing at the outset to the proceedings of Protestant bodies in regard to Liberal Education. It will serve to intimate the mode in which I propose to handle my subject altogether. Observe then, Gentlemen, I have no intention, in any thing I shall say, of bringing into the argument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or any authority at all; but I shall consider the question simply on the grounds of human reason and human wisdom. I am investigating in the abstract, and am determining what is in itself right and true. For the moment I know nothing, so to say, of history. I take things as I find them; I have no concern with the past; I find myself here; I set myself to the duties I find here; I set myself to further, by every means in my power, doctrines and views, true in themselves, recognized by Catholics as such, familiar to my own mind; and to do this quite apart from the consideration of questions which have been determined without me

and before me. I am here the advocate and the minister of a certain great principle; yet not merely advocate and minister, else had I not been here at all. It has been my previous keen sense and hearty reception of that principle, that has been at once the reason, as I must suppose, of my being selected for this office, and is the cause of my accepting it. I am told on authority that a principle is expedient, which I have ever felt to be true. And I argue in its behalf on its own merits, the authority, which brings me here, being my opportunity for arguing, but not the ground of my argument itself.

在此，我不妨再提第三条理由，说明为何一开始就要提及新教团体在通识教育方面的做法。这有助于各位熟悉我提议的全面讨论该主题的方式。在此请各位见证，无论接下来会说什么，我都无意把教会或其他任何权威引到论题的论证上来。相反，我只会以人类理性和智慧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只做理论探讨，只想确定哪些东西自身是正确和真实的。目前可以说，我对历史一无所知。我照实际看到的样子理解事物，对过往并不在意；我身处于此，就让自己尽在此的职责。对于我所熟悉的，并被天主教会认可为正确的学说与观点，我要求自己尽一切可能予以推进，并且不会考虑那些我未曾参与解答，或在我之前便已有了答案的问题。我想在此倡导和传播某种重要原则，但并非全然意义上的倡导者或传播者，否则我就不会来此说话了。我自以为，我之所以能够当选这个职位，并且接受这个职位，都是因为以往对这条原则的强烈感觉和真心接受。有人郑重相告，说我向来信以为真的原则不过是权宜之计。尽管是权威让我有机会来此参与辩论，但我只就权威自身的是非曲直说事，不会拿它当作论证本身的基础。

And a fourth reason is here suggested for consulting 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 institutions, when I am going to speak of the object and natur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t will serve to remind you,

Gentlemen, that I am concerned with questions, not simply of immutable truth, but of practice and expedience. It would ill have become me to undertake a subject, on which points of dispute have arisen among persons so far above me in authority and name, in relation to a state of society, about which I have so much to learn, if it involved an appeal to sacred truths, 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ome imperative rule of conduct. It would have been presumptuous in me so to have acted, nor am I so acting. Even the question of the union of Theology with the secular Sciences, which is its religious side, simple as it is of solution in the abstract, has, according to difference of circumstances, been at different times differently decided. Necessity has no law, and expedience is often one form of necessity. It is no principle with sensible men, of whatever cast of opinion, to do always what is abstractedly best. Where no direct duty forbids, we may be obliged to do, as being best under circumstances, what we murmur and rise against, while we do it. We see that to attempt more is to effect less; that we must accept so much, or gain nothing; and so perforce we reconcile ourselves to what we would have far otherwise, if we could. Thus a system of what is called secular Education, in which Theology and the Sciences are taught separately, may, in a particular place or time, be the least of evils; it may be of long standing; it may be dangerous to meddle with; it may be professedly a temporary arrangement; it may be under a process of improvement; its disadvantages may be neutralized by the persons by whom, or the provisions under which, it is administered.

当我谈起大学教育的目标和性质时，就出现了第四条理由，说明为何要参照新教的教育体系史。它会提醒各位，我关心这些问题，并非只是简单地谈及亘古不变的真理，而是要讲求实际，便利实行。我想谈及的话题，其争议要点源自其权威和声名远在我之上的人，且与

我知之甚少的社会状态有关。假如此事涉及对神圣真理的诉求，或需要确定某种强制的行为规范，那我可真是自不量力。无论是我以前这么做过，还是现在准备这么做，都会是自高自大之举。此事的宗教层面是神学与世俗学科的联合，即使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很容易找到答案，在不同情境之下，人们也曾做过不同的决定。必要性没有法则可言，权宜之计也往往是必要性的一种形式。无论持何种意见，只要是明智之人就知道，不可能总是把做理论上最好的事情当作行事原则。在没有明确责任禁止的情况下，人有时也会被迫做自己抱怨和反对的事，但特定情况下，这件事情往往就是行事时最好的。我们明白，期望太高所得反少，要么接受这么多，要么一无所获。这样，我们必然甘心接受，尽管在其他情况下本可以得到更多。在被称为世俗教育的体系中，神学与各门学科分开讲授。这一体系在特定时间或地点也许就是弊病最少的，也许会存在很长时间，不可随意更改，也许它是众所周知的权宜之策，正在改进当中。其不利之处往往会被实施该制度的人或制度中的种种规定所抵消。

Hence it was, that in the early ages the Church allowed her children to attend the heathen school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secular accomplishments, where, as no one can doubt, evils existed, at least as great as can attend on Mixed Education now. The gravest Fathers recommended for Christian youth the use of Pagan masters; the most saintly Bishops and most authoritative Doctors had been sent in their adolescence by Christian parents to Pagan lecture halls [2_1] . And, not to take other instances, at this very time, and in this very country, as regards at least the poorer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whose secular acquirements ever must be limited, it has seemed best to the Irish Bishop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o suffer the introduction into the country of a system of Mixed Education in the schools called National. Such a state of things, however, is passing away; as regards University Education at least, the highest authority has now decided that the plan, which is abstractedly best, is in this

time and country also most expedient.

正是如此，教会在初期曾允许天主教徒去异教学校获取世俗知识，而那里存在的种种弊端，毫无疑问至少不亚于当前混合教育存在的弊病。最严厉的教父们也曾推荐青年基督徒去拜异教老师，最圣洁的主教和最有权威的教会博士，青少年时期都曾被身为基督徒的父母送往异教徒开办的学堂[3_1]。 而且，并不需要再举其他例子，就在此时，就在我们国家，至少在考虑到世俗才学必然大受限制的贫穷阶层时，因条件所限而忍痛引入国立学校所实施的混合教育制度，在爱尔兰的主教们眼里一定是最好的办法了。然而，这样的事情毕竟时过境迁，至少在大学教育这件事情上，最高当局已经决定，理论上最好的方案，也是此时此地最便利可行的。

4．

4．

And here I have an opportunity of recognizing once for all that higher view of approaching the subject of these Discourses, which, after this formal recognition, I mean to dispense with.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not argument, is the supreme rule and the appropriate guide for Catholics in matters of religion. It has always the right to interpose, and sometimes, in the conflict of parties and opinions, it is called on to exercise that right. It has lately exercised it in our own instance: it has interposed in favour of a pure University system for Catholic youth, forbidding compromise or accommodation of any kind. Of course its decision must be heartily accepted and obeyed, and that the more, because the decision

proceeds, not simply from the Bishops of Ireland, great as their authority is, but the highest authority on earth, from the Chair of St. Peter.

在此我有机会一劳永逸地说明，这些演讲中涉及的该话题的更高见解，经本次正式确认后再不打算提及。在宗教事务上，教会的权威而非论证，才是天主教徒在宗教问题上的最高原则和正确指南。教会永远都有干预的权利，发生派别之争或意见相左时，也会请教会行使这份干预权。教会最近就在内部事务中行使了这份权利，支持为青年天主教徒确立一个纯粹的大学体制，禁止任何妥协或调适。当然，教会的决定必须真心接受和遵守，再怎样也不为过，因为这裁决不是简单地出自权威极大的爱尔兰主教，而是出自世间最高的权威，即圣彼得的宝座。

Moreover, such a decision not only demands our submission, but has a claim upon our trust. It not only acts as a prohibition of any measures, but as an *ipso facto* confutation of any reasonings, inconsistent with it. It carries with it an earnest and an augury of its own expediency. For instance, I can fancy, Gentlemen, there may be some, among those who hear me, disposed to say that they are ready to acquit th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which I am to advocate, of all fault whatever, except that of being impracticable. I can fancy them granting to me, that those principles are most correct and most obvious, simply irresistible on paper, but maintaining, nevertheless, that after all, they are nothing more than the dreams of men who live out of the world, and who do not see the difficulty of keeping Catholicism anyhow afloat on the bosom of this wonderful nineteenth century. Proved, indeed, those principles are, to demonstration, but they will not work. Nay, it was my own admission just now, that, in a particular instance, it might easily

happen, that what is only second best is best practically, because what is actually best is out of the question.

另外，这项裁决不仅要求我们服从，而且也值得我们信赖。对任何与之不符的措施，它都是一道禁令；对任何与之不符的推论，它还是事实上的驳斥。它自身带有符合教会考量的一种真切感与预兆。譬如，我可以想象，听到我这番话的诸位先生中可能有人想说，他们可以免除我准备宣传推广的教育原则中的所有过错，唯独不能容忍其不切实际之处。我猜他们会对我说，就算这些原则正确无比且显而易见，理论上看起来诱人之极，他们还是觉得，毕竟这些不过是世外高人的梦想，这些方外人士看不到，在令人称奇的十九世纪，要使天主教贴近人心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些原则的确论证充分，但就是难于实施。不过我自己刚刚都承认过了，在特殊情况下，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本非最好的东西，从实际角度看却是最好的，因为根本都谈不上有实际上最好的东西。

This, I hear you say to yourselves, is the state of things at present. You recount in detail the numberless impediments, great and small, formidable or only vexatious, which at every step embarrass the attempt to carry out ever so poorly a principle in itself so true and ecclesiastical. You appeal in your defence to wise and sagacious intellects, who are far from enemies to Catholicism, or to the Irish Hierarchy, and you have no hope, or rather you absolutely disbelieve, that Education can possibly be conducted, here and now, on a theological principle, or that youths of different religions can,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ountry, be educated apart from each other. The more you think over the state of politics, the position of parties, the feelings of classes,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the more chimerical does it seem to you to aim at a University, of which Catholicity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Nay,

even if the attempt could accidentally succeed, would not the mischief exceed the benefit of it? How great the sacrifices, in how many ways, by which it would be preceded and followed! How many wounds, open and secret, would it inflict upon the body politic! And, if it fails, which is to be expected, then a double mischief will ensue from its recognition of evils which it has been unable to remedy. These are your deep misgivings; 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force with which they come to you, is the concern and anxiety which you feel, that there should be those whom you love, whom you revere, who from one cause or other refuse to enter into them.

我明白诸位在想，这一定就是当前的现状了。你细数那些或令人生畏或叫人烦恼的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障碍，正是它们使得本身真切无比、又符合教会精神的一条原则，在实践起来步履维艰、不尽人意。在自我辩护中，你诉诸天主教或爱尔兰教会并无嫌隙的睿智之士和聪明贤达，但你并不抱希望，或者说你绝对不相信，教育竟能在此时此地以一条神学原则得以实施，也不相信在当前的国家境况下，不同宗教的青年人竟然能够在彼此隔断的情况下接受教育。就政治现状、各方立场、各阶层的感觉以及过往经验来看，思考得越多，你越会觉得，建立以天主教信仰为基本原则的大学纯属虚妄。不仅如此，就算侥幸成功，其危害难道就不会超过益处？事前事后会以多少方式造成多大损失？又会对政体造成或明或暗的多大伤害？假如按照预期的那样失败了，由于认识到它未能消除掉的弊端，随后会造成双重危害。这就是你们内心的疑虑，疑虑越大，你就越感觉担忧和焦虑，因为你热爱和尊敬的那些人，竟然出于各种原因而不愿深究。

5．

5 .

This, I repeat, is what some good Catholics will say to me, and more than this. They will express themselves better than I can speak for them in their behalf,—with more earnestness and point, with more force of argument and fulness of detail; and I will frankly and at once acknowledge, that I shall insist on the high theological view of a University without attempting to give a direct answer to their arguments against its present practicability. I do not say an answer cannot be given; on the contrary, I have a confident expectation that, in proportion as those objections are looked in the face, they will fade away. But, however this may be, it would not become me to argue the matter with those who underst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problem so much better than myself. What do I know of the state of things in Ireland, that I should presume to put ideas of mine, which could not be right except by accident, by the side of theirs, who speak in the country of their birth and their home? No, Gentlemen, you are natural judges of the difficulties which beset us, and they are doubtless greater than I can even fancy or forbode. Let me, for the sake of argument, admit all you say against our enterprise, and a great deal more. Your proof of its intrinsic impossibility shall be to me as cogent as my own of its theological advisableness. Why, then, should I be so rash and perverse as to involve myself in trouble not properly mine? Why go out of my own place? Why so headstrong and reckless as to lay up for myself miscarriage and disappointment, as though I were not sure to have enough of personal trial anyhow without going about to seek for it?

我再次申明，这就是一些善良的天主教徒想对我说的话，且不止如此。我想站在他们的角度说话，但他们比我说得更好——更诚挚，

也更切中要点，论证起来更充分，细节更完备。我会立即坦率承认，我将坚持从神学高度看待大学的观点，不会直接回应他们针对当前是否切实可行提出的论证。我并不是说现在就拿不出一个答案。相反我自信地认为，只要直面这些异议，它们就会消退。尽管事情极可能如此，但我若与远比我更明白个中原委的人起争执，那我可就太不自知了。我对爱尔兰的现状所知甚少，万一在某些方面说对了也不过是巧合，而他们却生于斯长于斯，我怎敢拿一己之见与他们的高见相提并论？不会的，先生们，困扰我们的种种难题无疑比我能想象或预见的大得多，对此，你们才是天然判官。为方便论证，容我先承认诸位对我们的事业所说的一切反对之言，和其他许多未说的话。在我看来，你们为这一事业的内在的不可能性所做的证言，与我为它在神学上可取而做的证言一样有说服力。那我为何如此轻率倔强，非得卷入本与我无关的麻烦之中？为何要越俎代庖？为何要刚愎自用，不顾后果，自寻失败和沮丧，就好像不惹麻烦，我自己就没有难办的事？

Reflections such as these would be decisive even with the boldest and most capable minds, but for one consideration. In the midst of our difficulties I have one ground of hope, just one stay, but, as I think, a sufficient one, which serves me in the stead of all other argument whatever, which hardens me against criticism, which supports me if I begin to despond, and to which I ever come round, when the question of the possible and the expedient is brought into discussion. It is the decision of the Holy See; St. Peter has spoken, it is he who has enjoined that which seems to us so unpromising. He has spoken, and has a claim on us to trust him. He is no recluse, no solitary student, no dreamer about the past, no doter upon the dead and gone, no projector of the visionary. He for eighteen hundred years has lived in the world; he has seen all fortunes, he has encountered all adversaries, he has shaped himself for all emergencies. If ever there was a power on earth who had an eye for the times, who has confined himself to the practicable, and

has been happy in his anticipations, whose words have been facts, and whose commands prophecies, such is he in the history of ages, who sit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n the Chair of the Apostles, as the Vicar of Christ, and the Doctor of His Church.

要不是另有一重考虑，这类反省一定会让最有胆识和见解的人无话可说。虽然困难重重，我仍有理由抱一丝希望，仅只一条，但有这一条便足够了。它让我排斥其他一切论证，敢于面对一切批评。沮丧时它会支持我，讨论可行之事与权宜之事时，我也会想到它。这是圣座的裁决。圣彼得有言，在我们看来了无希望的事情，他却吩咐我们去做。他曾发话，也值得我们对他予以信赖。他非隐士，亦非不问世事的学究，不沉湎往事，亦不偏爱逝者与不复存在者，更不耽于幻想。一千八百余年里，他一直活在世间，有过种种机遇，也遭逢各式劲敌，并塑造自我以应对一切不测。假如人世确有一股力量关注时代变迁，将自身限制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满足于预期；假如他说的话全都成为事实，诫命都成为预言，那他在各个时代的历史中即是如此：一代接一代，他都端坐于使徒宝座，是教宗，也是教会博士。

6．

6．

These are not the words of rhetoric, Gentlemen, but of history. All who take part with the Apostle, are on the winning side. He has long since given warrants for the confidence which he claims. From the first he has looked through the wide world, of which he has the burden; and, according to the need of the day, and the inspirations of his Lord, he has set himself now to one thing, now to another;

but to all in season, and to nothing in vain. He came first upon an age of refinement and luxury like our own, and, in spite of the persecutor, fertile in the resources of his cruelty, he soon gathered, out of all classes of society, the slave, the soldier, the high-born lady, and the sophist, materials enough to form a people to his Master's honour. The savage hordes came down in torrents from the north, and Peter went out to meet them, and by his very eye he sobered them, and backed them in their full career. They turned aside and flooded the whole earth, but only to be more surely civilized by him, and to be made ten times more his children even than the older populations which they had overwhelmed. Lawless kings arose, sagacious as the Roman, passionate as the Hun, yet in him they found their match, and were shattered, and he lived on. The gates of the earth were opened to the east and west, and men poured out to take possession; but he went with them by his missionaries, to China, to Mexico, carried along by zeal and charity, as far as those children of men were led by enterprise, covetousness, or ambition. Has he failed in his successes up to this hour? Did he, in our fathers' day, fail in his struggle with Joseph of Germany and his confederates, with Napoleon, a greater name, and his dependent kings, that, though in another kind of fight, he should fail in ours? What grey hairs are on the head of Judah, whose youth is renewed like the eagle's, whose feet are like the feet of harts, and underneath the Everlasting arms?

各位，这些可不是华丽辞藻，而是历史记载。所有支持圣彼得的人，都属于获胜的一方。他要人怀有信心，并且长期以来都给予了人们信心。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他所肩负的广大世界，根据时代需要和天主的启示，相继投身于诸多事务之中，但总是及时而行，且从来不做徒劳无益之事。他初逢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的文雅与奢华之世，尽管迫害者有百般酷刑可用，圣保罗却能很快从社会各阶层那

里，包括奴隶、武士、贵妇和智者，聚集起大量人才，这些人才足以构成让其主人荣耀的信仰之众。北方的野蛮部落汹涌而至，圣彼得却前往面对，他仅用坚定的眼神就让敌人警醒，喝退甚嚣尘上的野蛮人。他们改变方向，涌向世界各地，最终却更牢实地为他所教化，成为甚至比他们掠夺过的文明人坚定十倍的天主教徒。无法无天的君王纷至沓来，聪慧的罗马人和狂热的匈奴人，最终却遇到他这位劲敌。王朝纷纷毁灭，他却生生不息。世间的大门东西洞开，人如潮水四处抢掠，而他却派传教士一同起往，到中国，到墨西哥。只要为人儿女者还在受功名、贪婪与野心的驱使，传教士的热情与慈爱便不会稍有减少。直到此时此刻，能说他少有成功吗？在我们父辈的时代，在与日耳曼的约瑟夫及其同盟的斗争中，在与拿破仑这位声名显赫的英雄及所从属的国王的战斗中，他失败过吗？虽属不同斗争，他为何竟然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失败呢？犹大的青春复原如老鹰，脚快如雄鹿的蹄，身在“永久的膀臂以下”，那他头上的银发会是怎样的呢？

In the first centuries of the Church all this practical sagacity of Holy Church was mere matter of faith, but every age, as it has come, has confirmed faith by actual sight; and shame on us, if, with the accumulated testimony of eighteen centuries, our eyes are too gross to see those victories which the Saints have ever seen by anticipation. Least of all can we, the Catholics of islands which have in the cultivation and diffusion of Knowledge heretofore been so singularly unit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postolic See, least of all can we be the men to distrust its wisdom and to predict its failure, when it sends us on a similar mission now. I cannot forget that, at a time when Celt and Saxon were alike savage, it was the See of Peter that gave both of them, first faith, then civilization; and then again bound them together in one by the seal of a joint commission to convert and illuminate in their turn the pagan continent. I cannot forget how it was from Rome that the glorious St. Patrick was sent to Ireland, and did a work so great that he could not have a

successor in it, the sanctity and learning and zeal and charity which followed on his death being but the result of the one impulse which he gave. I cannot forget how, in no long time, under the fostering breath of the Vicar of Christ, a country of heathen superstitions became the very wonder and asylum of all people,—the wonder by reason of its knowledge, sacred and profane, and the asylum of religio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when chased away from the continent by the barbarian invaders. I recollect its hospitality, freely accorded to the pilgrim; its volumes munificently presented to the foreign student; and the prayers, the blessings, the holy rites, the solemn chants, which sanctified the while both giver and receiver.

头几个世纪，圣会所有这些睿智之举都仅被视为信仰之事，然而，后来的每一个时代都通过现实见证确认了信仰。既然有了十八个世纪累积起来的证言，假如我们还是慧眼难开，看不到圣徒凭预见的胜利，我们真当引以为耻。在宗徒之座的支持下，英伦三岛的天主教徒在知识的耕耘与传播上向来都保持着惊人的团结。现在，当罗马教会派遣我们完成类似使命时，我们是最不应当怀疑教廷智慧并预期其失败的人。我无法忘记，当凯尔特人和撒克逊人同为蛮族之时，是圣座先后给予他们信仰及文明，之后又再次通过共同委任的保证使其结为一体，任其依次转化和启迪一个异教大陆。我无法忘怀，声名显赫的圣帕特里克由罗马派往爱尔兰，他成就的伟业空前绝后，他去世之后涌现出来的圣洁与学识、热忱与仁爱，只能是他生前大力推动的结果。我无法忘记，就在不久之后，正是在圣座的呵护下，一个野蛮迷信之国，竟然成为万民惊讶的庇护所，圣俗两方面的知识令人称奇。而当宗教、文学和科学被蛮族入侵者赶出大陆的时候，这里却成为它们的庇护所。我回忆起宗座给予朝圣者的免费款待，慷慨给予外来学者的大量卷册，还有祷告及祝福，圣仪与圣歌，这些同时圣化了施予者和领受者。

Nor can I forget either, how my own England had meanwhile become the solicitude of the same unwearied eye; how Augustine was sent to us by Gregory; how he fainted in the way at the tidings of our fierceness, and, but for the Pope, would have shrunk as from an impossible expedition; how he was forced on “in weakness and in fear and in much trembling,” until he had achieved the conquest of the island to Christ. Nor, again, how it came to pass that, when Augustine died and his work slackened, another Pope, unwearied still, sent three saints from Rome, to ennoble and refine the people Augustine had converted. Three holy men set out for England together, of different nations: Theodore, an Asiatic Greek, from Tarsus; Adrian, an African; Bennett alone a Saxon, for Peter knows no distinction of races in his ecumenical work. They came with theology and science in their train; with relics, with pictures, with manuscripts of the Holy Fathers and the Greek classics; and Theodore and Adrian founded schools, secular and monastic, all over England, while Bennett brought to the north the large library he had collected in foreign parts, and, with plans and ornamental work from France, erected a church of stone, under the invocation of St. Peter, after the Roman fashion, “which,” says the historian, [2_2] “he most affected.” I call to mind how St. Wilfrid, St. John of Beverley, St. Bede, and other saintly men, carried on the good work in the following generations, and how from that time forth the two islands, England and Ireland, in a dark and dreary age, were the two lights of Christendom, and had no claims on each other, and no thought of self, save in the interchange of kind offices and the rivalry of love.

我同样不能忘记，我的家乡英格兰同时也成为不知疲倦的圣座忧心的对象。圣奥古斯丁领受格列高利一世的派遣来到我们这里，听闻我们的野性而大惊失色。假如不是教皇鼓励，他一定会退出那不可能

完成的远征。他在“疲弱、担忧与不停的颤抖”中勉力前行，直到最终征服英格兰岛，将它交到基督手中。我也不能忘记，到后来，圣奥古斯丁过世，他生前的事业一时间松懈荒废，另一位同样孜孜不倦的教皇从罗马派出三名圣徒，去坚定圣奥古斯丁已劝化的那个民族的信心，巩固他们的信仰。三位来自不同民族的圣徒一同前往英格兰：西奥多是亚细亚的希腊人，来自塔尔苏斯；阿德里安是非洲人；只有本内特是撒克逊人。彼得在普世教会的事业中并不区分民族。他们一行人带来了神学与科学、圣物与图画、教父手稿和希腊古典著作。西奥多和阿德里安在英格兰各地创办世俗学校和修道院，本内特将大量从外地收集来的图书带到北方，在圣彼得召唤下，利用从法国带来的图纸与装饰图案建造起罗马风格的石制教堂，正如史学家所言，“那是他最喜爱的样式”。我想起圣威尔弗雷德、贝弗利的圣约翰、圣比德和其他圣徒在接下来的世代里继续他们的善行。从那以后，在一个黑暗沉寂的时代，英格兰和爱尔兰这两大岛屿竟然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两盏明灯，彼此不起争执，不计私利，有的只是善举的交换与慈爱的竞赛。

7．

7

O memorable time, when St. Aidan and the Irish monks went up to Lindisfarne and Melrose, and taught the Saxon youth, and when a St. Cuthbert and a St. Eata repaid their charitable toil! O blessed days of peace and confidence, when the Celtic Mailduf penetrated to Malmesbury in the south, which has inherited his name, and founded there the famous school which gave birth to the great St. Aldhelm! O precious seal and testimony of Gospel unity, when, as Aldhelm in turn tells us, the English went to Ireland “numerous as bees;” when the Saxon St. Egbert and St. Willibrod,

preachers to the heathen Frisons, made the voyage to Ireland to prepare themselves for their work; and when from Ireland went forth to Germany the two noble Ewalds, Saxons also, to earn the crown of martyrdom! Such a period, indeed, so rich in grace, in peace, in love, and in good works, could only last for a season; but, even when the light was to pass away from them, the sister islands were destined, not to forfeit, but to transmit it together. The time came when the neighbouring continental country was in turn to hold the mission which they had exercised so long and well; and when to it they made over their honourable office, faithful to the alliance of two hundred years, they made it a joint act. Alcuin was the pupil both of the English and of the Irish schools; and when Charlemagne would revive science and letters in his own France, it was Alcuin, the representative both of the Saxon and the Celt, who was the chief of those who went forth to supply the need of the great Emperor. Such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chool of Paris, from which, in the course of centuries, sprang the famous University, the glory of the middle ages.

啊，多么值得怀念的时光！那时候，圣艾登和爱尔兰的修士北上林第斯法恩岛和梅尔罗斯修道院，教导那里的撒克逊青年，而圣卡斯伯特和圣伊塔也报偿了他们的慈爱劳作。呵，那是多么安详自信的圣福日子！凯尔特的马尔达夫深入南方的马姆斯伯里地区（当地继承了他的名字），在那里开办了著名的学校，培育出圣奥尔德赫姆这样伟大的圣徒。当奥尔德赫姆告诉我们说，英国人像“不计其数的蜜蜂”般奔赴爱尔兰；当来自撒克逊的圣爱格伯特和圣韦利布洛德为不信教的弗里西亚人传教，并渡海来到爱尔兰准备行善；当另外两位同为撒克逊人的高贵的埃瓦尔德从爱尔兰前往日耳曼，在那里赢得殉道士的荣称——啊，这些都是福音合一的珍贵标志与见证！那是充满神恩、安详、爱与善行的时代，只可惜为时不长。尽管光芒从此远去，这对姐妹岛却注定绝不放弃，一同传递那曾有的光辉。此时该轮到相邻的大

陆国家肩负起这对姐妹岛长期以来出色完成的使命，是时候让它传承这光荣的职责，保持二百年来的联合，使其成为一项共同的行动。阿尔昆是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学校培育出来的精英。当查理曼大帝在法兰西复兴科学与文化的时候，阿尔昆，这位撒克逊和凯尔特人的代表，正是为法兰西皇帝效力的众多精英的首领。巴黎的那所学校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若干世纪之后，它发展成了一所著名的大学，成为中世纪的骄傲。

The past never returns; the course of events, old in its texture, is ever new in its colouring and fashion. England and Ireland are not what they once were, but Rome is where it was, and St. Peter is the same: his zeal, his charity, his mission, his gifts are all the same. He of old made the two islands one by giving them joint work of teaching; and now surely he is giving us a like mission, and we shall become one again, while we zealously and lovingly fulfil it.

过去了的，永远不会再来。时世变迁，其内在特征不变，但色彩和风格却不断更新。英格兰和爱尔兰再不是当初的模样，可罗马还在原地，圣彼得也未改变，他的热忱、慈爱、使命、天赋，永远如初。他过去曾让这两个岛屿做联合教化之工，合为一体。现在，圣座又给予我们同样的使命。我们必须再次联合起来，怀抱热忱与爱心践行这一使命。

[2_1].Vid. M. L'Abbé Lalanne's recent work.

[2_2].Cressy.

[3_1].参见M. L'Abbé Lalanne的最近作品

Discourse 2. Theology a Branch of Knowledge

第二讲：神学乃知识分支

There were two questions, to which I drew your attention, Gentlemen, in the beginning of my first Discourse, as being of especial importance and interest at this time: first, whether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dea of University teaching to exclude Theology from a place among the sciences which it embraces; next, whether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idea to make the useful arts and sciences its direct and principal concern, to the neglect of those liberal studies and exercises of mind, in which it has heretofore been considered mainly to consist.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which will form the subject of what I have to lay before you, and I shall now enter upon the former of the two.

第一讲刚开始，我便提醒各位注意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如今看来特别重要，且关乎利害得失：其一，大学教学涵盖所有学科，若将神学排斥在各门学科之外，是否符合大学的教学理念；其二，把实用文理学科作为大学直接与主要的考虑对象，因而忽略向来被看作大学理念中流砥柱的人文学科及思维训练，这样做是否有违大学的教学理念。我接下来就想跟大家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这两个问题。让我先从第一个问题说起吧。

1．

1．

It is the fashion just now, as you very well know, to erect so-called Universities, without making any provision in them at all for Theological chairs. Institutions of this kind exist both here and in England. Such a procedure, though defended by writers of the generation just passed with much plausible argument and not a little wit, seems to me an intellectual absurdity; and my reason for saying so runs, with whatever abruptness, into the form of a syllogism:—a University, I should lay down, by its very name professes to teach universal knowledge; Theology is surely a branch of knowledge; how then is it possible for it to profess all branches of knowledge, and yet to exclude from the subjects of its teaching one which, to say the least, is as important and as large as any of them? I do not see that either premiss of this argument is open to exception.

各位非常清楚，时下的风潮是，开办所谓的大学，而又根本不为这样的学校预备神学教席。这一类的机构，爱尔兰有，英格兰也有。这种做法固然有上一代文人墨客为之辩护，他们言之凿凿，机智过人，然而在我看来，终归难脱智性的荒诞。我这话听起来虽然唐突刺耳，理由却也无非是这么一个三段论：既以大学为名，想必就当传授普遍万有的学问；既然神学肯定是一门学问，那大学又如何能够一方面宣称讲授各门学问，同时又把神学排斥在所讲授的学科之外呢？毕竟，神学与其他各门学科同等重要和广博。本论证中的两个前提，我不认为哪一个可以有所例外。

As to the range of University teaching, certainly the very name of University is inconsistent with restrictions of any kind. Whatever was the original reason of the adoption of that term, which is unknown [3_1] , I am only putting on it its popular, its recognized

sense, when I say that a University should teach universal knowledge. That there is a real necessity for this universal teaching in the highest schools of intellect, I will show by-and-by; here it is sufficient to say that such universality is considered by writers on the subject to be the very characteristic of a University, as contrasted with other seats of learning. Thus Johnson, in his *Dictionary* , defines it to be “a school where all arts and faculties are taught;” and Mosheim, writing as an historian, says that, before the rise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for instance, at Padua, or Salamanca, or Cologne,—“the whole circle of sciences then known was not taught;” but that the school of Paris, “which exceeded all others in various respects, as well as in the number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was the first to embrace all the arts and sciences, and therefore first became a University.“ [3_2]

至于大学教学的范围，任何一种限制肯定都与大学这个名称不相符。当初采纳大学这个名称，其确切因由已无从知晓 [4_1] 。但无论是什么理由，当我说大学应当传授普遍知识的时候，取的是它通俗和公认的意思。在最高级别的才智培育场所，确实有传授普遍知识的需求，这一点容我稍后一一道来。眼下只说以下这一点便足矣：就此问题发表高见的人士认为，无所不包正是大学的特征所在，它与其他性质的学堂毕竟不同。因此，约翰逊博士才在《英语词典》中将大学定义为“传授所有技艺与才能的学校”。史学家莫斯海姆也有著述说，在巴黎大学兴起之前，“当时已知的各门学科都不在学校里传授”，比如帕多瓦、萨拉曼卡或科隆等地的学校，唯独巴黎的学校“不仅教师和学生数量，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都超越其他学校。它最早涵盖文理全科，因此而成为第一所大学。”

If, with other authors, we consider the word to be derived from the invitation which is held out by a University to students of every

kind, the result is the same; for, if certain branches of knowledge were excluded, those students of course would be excluded also, who desired to pursue them.

根据其他学者的看法，大学这个词也许源于一所学校对各类学生发出的邀请。即便如此，结果还是一样。因为，假使某些学科被大学排除在外，热衷于这些学科的学生当然也会被排除在外。

Is it, then, logically consistent in a seat of learning to call itself a University, and to exclude Theology from the number of its studies? And again, is it wonderful that Catholics, even in the view of reason, putting aside faith or religious duty, should be dissatisfied with existing institutions, which profess to be Universities, and refuse to teach Theology; and that they should in consequence desire to possess seats of learning, which are, not only more Christian, but more philosophical in their construction, and larger and deeper in their provisions?

如此说来，一所学校若自称大学，又把神学排除在研究科目之外，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再者，哪怕从理性角度看，把信仰或宗教责任先放在一边，竟然还会有天主教徒不满意自称为大学而又不肯讲授神学的现存机构，反倒想另开一种学堂，使其不仅更具基督教特色，而且在构造上有更强的哲理意味，有更深更广的学科准备，这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吗？

But this, of course, is to assume that Theology *is* a science, and an important one: so I will throw my argument into a more exact form. I say, then, that if a University be,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ase, a place of instruction, where universal knowledge is professed, and if in a certain University, so called, the subject of Religion is excluded, one of two conclusions is inevitable,—either, on the one hand, that the province of Religion is very barren of real knowledge, or, on the other hand, that in such University one special and important branch of knowledge is omitted. I say, the advocate of such an institution must say *this* , or he must say *that* ; he must own, either that little or nothing is known about the Supreme Being, or that his seat of learning calls itself what it is not. This is the thesis which I lay down, and on which I shall insist as the subject of this Discourse. I repeat, such a compromise between religious parties, as is involv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versity which makes no religious profession, implies that those parties severally consider,—not indeed that their own respective opinions are trifles in a moral and practical point of view—of course not; but certainly as much as this, that they are not knowledge. Did they in their hearts believe that their private views of religion, whatever they are, were absolutely and objectively true,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they would so insult them as to consent to their omission in an Institution which is bound,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ase—from its very idea and its name—to make a profession of all sorts of knowledge whatever.

当然，这么说就要假定：神学的确就是一门学科，且是一门重要学科。既如此，就让我把这个论证的形式整理得更严密一些吧。就性质而言，假如大学乃传道授业之所，世间万般学问都在此讲授，又假如在某个所谓的大学，宗教学科又被排除在外，那么，两个结论当中必然有一个不可避免：要么宗教领域是毫无知识可言的不毛之地，要么这所大学忽略了一门独特且重要的学问。照我看，或此或彼，这样一个机构的倡导者必须有所取舍。他要么承认对上帝所知甚少或全然不知，不然就得坦言，他这个学堂名不副实。这就是我提出的论点，

在本讲里我还会继续加以论述。我再说一次，创办并不表明宗教派别的大学，实则涉及宗教派别间的妥协，意味着各派各有各的想法。这并不是说，从道德或实用角度看，他们各自的意见当真可有可无——当然不是如此；他们的意见肯定举足轻重，然而却并非学问。无论他们对于宗教有何一己私见，假如他们从内心里相信这些想法是绝对客观正确的，那就无法想像，他们竟然能容忍一个机构忽视这些思想从而加以辱没。因为，就此事的性质而言，就其理念和名称来看，这样一个机构本当为各类知识开设专业课程。

2．

2．

I think this will be found to be no matter of words. I allow then fully, that, when men combine together for any common object, they are obliged, as a matter of course, in order to secure the advantages accruing from united action, to sacrifice many of their private opinions and wishes, and to drop the minor differences, as they are commonly called, which exist between man and man. No two persons perhaps are to be found, however intimate, however congenial in tastes and judgments, however eager to have one heart and one soul, but must deny themselves, for the sake of each other, much which they like or desire, if they are to live together happily. Compromise, in a large sense of the word, i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combination; and anyone who insists on enjoying his rights to the full, and his opinions without toleration for his neighbour's, and his own way in all things, will soon have all things altogether to himself, and no one to share them with him. But most true as this confessedly is, still there is an obvious limit, on the other hand, to

these compromises, however necessary they be; and this is found in the *proviso* , that the differences surrendered should be *but* “minor,” or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sacrifice of the main object of the combination, in the concessions which are mutually made. Any sacrifice which compromises that object is destructive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combination, and no one who would be consistent can be a party to it.

我认为这决非措辞问题。我完全明白，当人们为实现一个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为了确保能够通过联手行动获益，当然会被迫牺牲自己的想法和意愿，人跟人彼此存在的细小差异，往往也存而不论。两个人走到一起，无论关系多么密切，无论如何意气相投、见识相当，也不管多么期望身心合一、亲密无间，只要是为对方着想，都必然放弃很多自己喜欢或欲求的东西，这样才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妥协谦让，就这个词语的广义来说，是和睦相处的第一原则。若有人尽行私权，尽抒己意，毫不顾及他人权利和看法，凡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到最后必然什么都往自己口袋里塞，容不得他人分享其成。这个道理千真万确，人人都明白。然而，另外一方面，谦让妥协无论多么必不可少，显然也有一个限度，要有这么一个条件：虽然要求大同存小异，但 必须是“小异”，换句话说，彼此谦和忍让，但断不可牺牲和睦相处的主要目标。有损这个目标的任何牺牲，对于和睦相处的原则来说都会起破坏作用，但凡言行一致的人，都决不会参与其中。

Thus, for instance, if men of various religious denominations join together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what are called “evangelical” tracts, it is under the belief, that, the object of their uniting, as recognized on all hands, being the spiritual benefit of their neighbours, no religious exhortations, whatever be their character, can essentially interfere with that benefit, which faithfully insist upon the Lutheran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If, again, they agree

together in printing and circulating the Protestant Bible, it is because they, one and all, hold to the principle, that, however serious be their differences of religious sentiment, such differences fade away before the one great principle, which that circulation symbolizes—that the Bible, the whole Bible, and nothing but the Bible, is the religion of Protestants. On the contrary, if the committee of some such association inserted tracts into the copies of the said Bible which they sold, and tracts in recommendation of the Athanasian Creed or the merit of good works, I conceive any subscribing member would have a just right to complain of a proceeding, which compromised the principle of Private Judgment as the one true interpreter of Scripture. These instances are sufficient to illustrate my general position, that coalitions and comprehensions for an object, have their life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at object, and cease to have any meaning as soon as that object is compromised or disparaged.

打个比方说，假如有来自不同宗教派别的人士联合起来，准备分发称为“福音派”小册子的宣传品。不管哪方都会相信，他们携手的目标在于为邻里提供精神助益。此时，忠实坚守路德教派因信称义教义的无论哪些宗教劝诫，也无论什么性质的劝诫，都不可从根本上妨碍所要提供的这一种助益。假如他们又就印刷和发行新教《圣经》达成一致意见，那是因为他们全体都坚守这一原则：无论在宗教情感上存在多大歧见，发行新教《圣经》的象征意义是，《圣经》，完整的《圣经》，舍此无他的《圣经》，就是新教徒的宗教；在这一象征面前，一切分歧都会消失。反过来，假如类似性质的某团体的委员会在所销售的上述《圣经》里夹带宣传册子，而这些小册子又在劝信亚他那修信经或善功之益，那我相信，该团体的任何参与者都有正当权利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因为这是拿私见损害原则，以为只有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解经者。上述例子足以说明我的基本立场，基于共同目标的联合与相互理解，只在实现这个目标时才有效，目标打了折扣或受

到贬损便失去意义。

When, then, a number of persons come forward, not as politicians, not as diplomatists, lawyers, traders, or speculators, but with the one object of advancing Universal Knowledge, much we may allow them to sacrifice,—ambition, reputation, leisure, comfort, party-interests, gold; one thing they may not sacrifice,—Knowledge itself. Knowledge being their object, they need not of course insist on their own private views about ancient or modern history, or national prosperity, or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y need not of course shrink from the co-operation of those who hold the opposite views; but stipulate they must that Knowledge itself is not compromised;—and as to those views, of whatever kind, which they do allow to be dropped, it is plain they consider such to be opinions, and nothing more, however dear, however important to themselves personally; opinions ingenious, admirable, pleasurable, beneficial, expedient, but not worthy the name of Knowledge or Science. Thus no one would insist on the Malthusian teaching being a *sine quâ non* in a seat of learning, who did not think it simply ignorance not to be a Malthusian; and no one would consent to drop the Newtonian theory, who thought it to have been proved true, in the same sense as the existence of the sun and moon is true. If, then, in an Institution which professes all knowledge, nothing is professed, nothing is taught about the Supreme Being, it is fair to infer that every individual in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advocate that Institution, supposing him consistent, distinctly holds that nothing is known for certain about the Supreme Being; nothing such, as to have any claim to be regarded as a material addition to the stock of general knowledge existing in the world. If on the other hand it turns out that something considerable *is* known about the Supreme Being, whether from Reason or Revelation, then the

Institution in question professes every science, and yet leaves out the foremost of them. In a word, strong as may appear the assertion, I do not see how I can avoid making it, and bear with me, Gentlemen, while I do so, viz., such an Institution cannot be what it professes, if there be a God. I do not wish to declaim; but, by the very force of the terms, it is very plain, that a Divine Being and a University so circumstanced cannot co-exist.

当一群人因推广普遍知识这个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而不是作为政客、外交家、律师、贸易商或投机者相聚，可以预期他们会做出很大牺牲，比如雄心、声名、闲暇、舒适、政党利益、黄金等等。然而有一样东西是他们决不肯牺牲的，那就是知识本身。既然知识才是目标，那么古代史也好，现代史也好，国家富强也好，权力平衡也罢，他们没有必要在这些方面固执己见。他们当然不必拒绝与其他持有异见之人合作，但必然有约在先，即知识本身不可打折扣。至于对其他无论何种事物的不同看法，他们都同意束之高阁。很明显，无论这些一己之见多么珍贵，对个人有多重要，他们都觉得只不过是些见解而已。这些见解兴许独具创意、值得赞扬、逗人愉快、百益无害、便利行事，但都配不上知识或科学的大名。假如有人认为，不赞同马尔萨斯的观点并不就是无知之人，这个人就不会坚持非得在学堂里讲授马尔萨斯学说不可；假如有人认为牛顿学说已经证实为真，就像太阳和月亮的存在已证实为真，那这个人也不会同意放弃牛顿学说。假如宣称讲授所有知识的机构却并不宣称，也不传授关于上帝的知识，那么就可合理地推断：拥护这类机构的众多人士如果言行一致，就会明确地坚持，对于无上的天主并没有任何确切知识，没有任何这一类的知识值得用来为这世界现存的普遍知识库添砖加瓦。反过来说，假如我们通过理性或者启示发现，对无上的天主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认识，那么这类机构就是一边声称传道授业、无所不包，一边却将最重要的一门学科弃之不顾。总而言之，我要说的话听起来可能刺耳，可我又不能隐忍不发，恭请各位原谅：假如上帝存在，这样一类机构的性质就不可能是它所宣称的那样。我并不想慷慨陈词，但很明显，名不正则

言不顺，神圣存在者与如此状况下的大学不可共存。

3．

3．

Still, however, this may seem to many an abrupt conclusion, and will not be acquiesced in; what answer, Gentlemen, will be made to it? Perhaps this:—it will be sai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r spheres of Knowledge, human, divine, sensible, intellectual, and the like; and that a University certainly takes in all varieties of Knowledge in its own line, but still that it has a line of its own. It contemplates, it occupies a certain order, a certain platform, of Knowledge. I understand the remark; but I own to you, I do not understand how it can be made to apply to the matter in hand. I cannot so construct my defini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of University Knowledge, and so draw my boundary lines around it, as to include therein the other sciences commonly studied at Universities, and to exclude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For instance, are we to limit our idea of University Knowledge by the evidence of our senses? then we exclude ethics; by intuition? we exclude history; by testimony? we exclude metaphysics; by abstract reasoning? we exclude physics. Is not the being of a God reported to us by testimony, handed down by history, inferred by an inductive process, brought home to us by metaphysical necessity, urged on us by the suggestions of our conscience? It is a truth in the natural order, as well as in the supernatural. So much for its origin; and, when obtained, what is it worth? Is it a great truth or a small one? Is it a comprehensive truth? Say that no other religious idea

whatever were given but it, and you have enough to fill the mind; you have at once a whole dogmatic system. The word “God” is a Theology in itself, indivisibly one, inexhaustibly various, from the vastness and the simplicity of its meaning. Admit a God, and you introduce among the subjects of your knowledge, a fact encompassing, closing in upon, absorbing, every other fact conceivable. How can we investigate any part of any order of Knowledge, and stop short of that which enters into every order? All true principles run over with it, all phenomena converge to it; it is truly the First and the Last. In word indeed, and in idea, it is easy enough to divide Knowledge into human and divine, secular and religious, and to lay down that we will address ourselves to the one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the other; but it is impossible in fact. Granting that divine truth differs in kind from human, so do human truths differ in kind one from another. If the knowledge of the Creator is in a different order from knowledge of the creature, so, in like manner, metaphysical science is in a different order from physical, physics from history, history from ethics. You will soon break up into fragments the whole circle of secular knowledge, if you begin the mutilation with divine.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一结论兴许仍旧唐突，并不会赢得默许。那么，各位先生，到底应该如何回应此事呢？也许是这个样子：有人会说，知识划分成许多种类或范畴，有人文的，有神性的，有感官的，也有智性的，如此等等。大学固然应当将所有学科门类都囊括进来，但它仍然有自己的专长。大学会思考，它占有一定等级的知识和一定的知识平台。这话我当然听得懂，可还请诸位原谅，我不明白的是，这说法如何能够应对我们正在讨论的事情。我就大学知识这个主题下一个定义，并围绕它划上我认为的边界线，总不能把其他大学通常研究的许多学科包括在内，而又把宗教学科排除在外。比方说，我们能根据感官证据而限制关于大学知识的概念吗？能听任直觉的呼

唤，将伦理学排除在外吗？能因为证言而将史学排除在外吗？能因为抽象推理而排除形而上学吗？如此就得排除物理学。上帝的存在，难道不是通过证言报告给我们，通过历史传承下来，以归纳法推演出来，因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而为我们所接受，通过良知的暗示而敦促我们相信的吗？它即是超自然秩序中的真理，也是自然秩序中的真理。关于它的起源，我们只说这么多。真理一旦获得，到底有什么价值呢？这是一条伟大的真理，还是微不足道的真相？它是一条包罗万象的真理吗？假如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宗教观念，假如我们有足够多的问题可以思考，那我们立即就会拥有全套教义。“上帝”这个词本身即是一门神学，不可分割，也不可穷尽，它蕴含无限，又简朴至真。只需要承认神存在，便能在知识的各门学科中引入这个事实，它无所不包，又能包围和吸收其他任何可以想象的事实。假如在深入各个等级的知识前犹豫不决，我们如何能够钻研任何一个等级的任何一部分知识呢？一切真正的原理都充溢着这样一种知识，大千世界汇集于此，实乃原初，更是终结。在言辞和观念上，很容易将知识细分成人文的和神性的、世俗的和宗教的，也很容易说我们将钻研其中一种知识而不妨碍另一种知识。然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假如承认神性的真理与人文的真理不同，则不同类别的人文真相之间也各有不同。假如关于造物主的知识与关于被造物的知识分属不同等级，同理，形而上学与物理，物理与史学，史学与伦理学也都相互分属不同等级。一旦开始分解神性的知识，我们很快就会把整个世俗知识系统肢解得七零八落。

I have been speaking simply of Natural Theology; my argument of course is stronger when I go on to Revelation. Let the doctrine of the Incarnation be true: is it not at once of the nature of an historical fact, and of a metaphysical? Let it be true that there are Angels: how is not this a point of knowledge in the same sense as the naturalist's asseveration, that myriads of living things might co-exist on the point of a needle? That the Earth is to be burned by fire, is, if true, as large a fact as that huge monsters once played

amid its depths; that Antichrist is to come, is as categorical a heading to a chapter of history, as that Nero or Julian was Emperor of Rome; that a divine influence moves the will, is a subject of thought not more mysterious than the result of volition on our muscles, which we admit as a fact in metaphysics.

上述说到的一直都还是自然神学，谈到启示时，我的论证当然还会有力得多。假设道成肉身的教义为真，它难道不是既讲一个历史事实的本质，也说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吗？假设真有天使，那么关于天使的知识点，跟博物学家认为万千生物可在针尖大小的地方同时生存的断言究竟有何不同呢？大地将毁于大火的说法万一为真，那就跟巨型怪兽曾在海洋深处生存同为一大事实。敌基督将到来，会是历史不可略过的章节，就如同尼禄或尤里安曾是罗马皇帝。神性的影响力可动摇意志，这也是一个思考主题，并不比意识作用于人的肌肉的结果更神秘，而我们都承认后者是形而上学的事实。

I do not see how it is possible for a philosophical mind, first, to believe these religious facts to be true; next, to consent to ignore them; and thirdly, in spite of this, to go on to profess to be teaching all the while *de omni scibili* . No; if a man thinks in his heart that these religious facts are short of truth, that they are not true in the sense in which the general fact and the law of the fall of a stone to the earth is true, I understand his excluding Religion from his University, though he professes other reasons for its exclusion. In that case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opinion under which he shelters his conduct, are not only his apology for publicly disowning Religion, but a cause of his privately disbelieving it. He does not think that anything is known or can be known for certain,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or the end of man.

一个进行哲理思考的人，如果首先相信这些宗教事实为真，随后又同意忽略这些事实，然后又说自己一直在传授“天下可知事物”，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这不可能做到。如果有人内心里觉得这些宗教事实并非真理，不像石头落地那种一般意义上的事实或法则那样为真，那我明白他为何要将宗教排除在大学之外，尽管他声称的是别的理由。如是这种情况，他借助宗教观点的多样性来遮盖其行为，就不仅仅是他公开否认宗教的辩护之辞，还是他私底下不信教的原因。无论是世界的起源还是人的终结，他并不觉得任何与之相关的事物是可知或可确切知道的。

4．

4．

This, I fear, is the conclusion to which intellects, clear, logical, and consistent, have come, or are coming,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ase; and, alas! in addition to this *primâ-facie* suspicion, there are actual tendenci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in Protestantism, viewed whether in its original idea, or again in the so-called Evangelical movement in these islands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The religious world, as it is styled, holds, generally speaking, that Religion consists, not in knowledge, but in feeling or sentiment. The old Catholic notion, which still lingers in the Established Church, was, that Faith was an intellectual act, its object truth, and its result knowledge. Thus if you look into the *Anglican Prayer Book* , you will find definite *credenda* , as well as definite *agenda* ; but in proportion as the Lutheran leaven spread, it became fashionable to say that Faith was, not an acceptance of revealed doctrine, not an act of the intellect, but a feeling, an emotion, an affection, an appetency; and,

as this view of Faith obtained, so was the connexion of Faith with Truth and Knowledge more and more either forgotten or denied. At length the identity of this (so-called) spirituality of heart and the virtue of Faith was acknowledged on all hands. Some men indeed disapproved the pietism in question, others admired it; but whether they admired or disapproved, both the one party and the other found themselves in agreement on the main point, viz.—in considering that this really was in substance Religion, and nothing else; that Religion was based, not on argument, but on taste and sentiment, that nothing was objective, everything subjective, in doctrine. I say, even those who saw through the affectation in which the religious school of which I am speaking clad itself, still came to think that Religion, as such, consisted in something short of intellectual exercises, viz., in the affections, in the imagination, in inward persuasions and consolations, in pleasurable sensations, sudden changes, and sublime fancies. They learned to believe and to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Religion was nothing beyond a *supply* of the wants of human nature, not an external fact and a work of God. There was, it appeared, a demand for Religion, and therefore there was a supply; human nature could not do without Religion, any more than it could do without bread; a supply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good or bad, and, as in the case of the articles of daily sustenance, an article which was really inferior was better than none at all. Thus Religion was useful, venerable, beautiful, the sanction of order, the stay of government, the curb of self-will and self-indulgence, which the laws cannot reach: but, after all, on what was it based? Why, that was a question delicate to ask, and imprudent to answer; but, if the truth must be spoken, however reluctantly, the long and the short of the matter was this, that Religion was based on custom, on prejudice, on law, on education, on habit, on loyalty, on feudalism, on enlightened expedience, on many, many things, but not at all on reason; reason was neither its

warrant, nor its instrument, and science had as little connexion with it as with the fashions of the season, or the state of the weather.

我担心，根据此事的性质，一些头脑清晰、逻辑性强、言行一致的才智之士，可能已经或正在形成这个结论。岂止如此，除开这一望便知的疑虑外，新教还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实际倾向，这可以从它的原初想法中看出来，也可以从英伦三岛在上世纪的所谓福音运动中看出来。一般而言，通常所说的宗教界会认为宗教并不由知识构成，而是由情感或情操构成。在圣公会里，人们仍然保持旧有的天主教观念，认为信仰是一种智性行为，其目标是真理，其结果是知识。因此，如果仔细研究《圣公会祈祷书》，会发现确定的程序 及信条 。但随着路德教派影响的扩大，开始流行起一种说法，即信仰是一种情感，一种情绪，一种情感偏好，一种渴望，而非对启示教义的接受，也不是才智行为。这种信仰观流行的同时，信仰与真理及知识的关系也越来越为人所遗忘或否认。时间一长，这种（所谓的）心之灵性与信仰之德便被广泛认可为相同的东西。有些人当真反对所说的这种虔敬主义，其他人却大加赞赏。但无论反对还是赞赏，各方在要点上还是一致的，认为这就是本质上的宗教，舍此无他。他们认为宗教并非基于论证，而是基于品味和情操，认为教义中并无客观内容，一切都是主观的。我要说，就算有人看出我所说的那个宗教派别借造作之举来掩盖自己，他们后来还是认为，这样的宗教存在于某些缺乏智性锤炼的东西之中，也就是说，由感情、想象力、内在信念及安慰构成，由愉快的感受、突然的变迁和崇高的奇想构成。他们逐渐相信且想当然地认为，宗教不过是在满足 人的本性需求，不是外在于人的事实，亦非神的作为。似乎是有对宗教的需求，才有这种满足需求的宗教。人的本性没有宗教便无法满足，就如同没有面包就无法过活。无论好的或坏的，对需求的满足总是绝对必要的，就如同日用杂物，再差总比没有要好。宗教因此而有用，值得尊敬，美丽动人，是对秩序的支持，是政府的支柱，是对法律无法管束的任性与放纵的制约。但是，到底什么才是宗教的基础呢？瞧，这是个麻烦问题，问起来和答起来都不容易。可是，假如再勉强也必须讲真话，事情其实也很简单：宗

教基于习俗、偏见、法律、教育、习惯、忠诚、封建思想、开明得宜的举措，以及其他诸多事物，但就是跟理性无关。理性不是它的根据，也不是它的手段，科学与它的联系也不多于科学与时尚或天气状况的联系。

You see, Gentlemen, how a theory or philosophy, which began with the religious change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has led to conclusions, which the authors of those changes would be the first to denounce, and has been taken up by that large and influential body which goes by the name of Liberal or Latitudinarian; and how, where it prevails, it is as unreasonable of course to demand for Religion a chair in a University, as to demand one for fine feeling, sense of honour, patriotism, gratitude, maternal affection, or good companionship, proposals which would be simply unmeaning.

各位请看，随十六世纪宗教变化而起的一种学说或哲学导致的种种结论，本来那些发起变化的学者要最先站出来谴责的，却为那个打着自由主义或不拘教义旗号的富有影响力的庞大团体所接纳。在这种学说流行之处，想在大学里为宗教谋一教席，就如同要求为细腻情感、荣誉感、爱国主义、感恩之心、母爱或良友谋一处教席一样荒唐，是一些显然毫无意义的提议。

5．

5．

Now, in illustration of what I have been saying, I will appeal,

in the first place, to a statesman, but not merely so, to no mere politician, no trader in places, or in votes, or in the stock market, but to a philosopher, to an orator, to one whose profession, whose aim, has ever been to cultivate the fair, the noble, and the generous. I cannot forget the celebrated discourse of the celebrated man to whom I am referring; a man who is first in his peculiar walk; and who, moreover (which is much to my purpose), has had a share, as much as anyone alive, in effecting the public recognition in these Islands of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ng secular and religious knowledge. This brilliant thinker, during the years in which he was exerting himself in behalf of this principle, made a speech or discourse, on occasion of a public solemnity; and in reference to the bearing of general knowledge upon religious belief, he spoke as follows:

为把我一直在说的意思表达清楚，我首先要求助一位政治家，但不仅如此。我不会求助纯粹的政客，或在选票或证券市场上翻云覆雨的买卖人，而是一位哲学家，一位演说家，一位以培育公正之心、高贵气质和慷慨气度为职业和宗旨的人。我无法忘记马上要提到的一位名人的著名论说。在他从事的那个特别行当里，他是佼佼者。不仅如此（正合我的目的），他比在世的任何人都更热衷于让英伦三岛的公众认识到这样一条原则：世俗与宗教的知识要彼此分开。在不遗余力地宣传这条原则的若干年里，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曾在一个正式的公共场合发表演讲或谈话。提到普遍知识对宗教信仰的影响时，他是这么说的：

“As men,” he said, “will no longer suffer themselves to be led blindfold in ignorance, so will they no more yield to the vile principle of judging and treating their fellow-creatures, not according to the intrinsic merit of their actions, but according to the

accidental and involuntary coincidence of their opinions. The great truth has finally gone forth to all the ends of the earth," and he prints it in capital letters, "that man shall no more render account to man for his belief, over which he has himself no control. henceforward, nothing shall prevail upon us to praise or to blame anyone for that which he can no more change, than he can the hue of his skin or the height of his stature." [3_3] You see, Gentlemen, if this philosopher is to decide the matter, religious ideas are just as far from being real, or representing anything beyond themselves, are as truly peculiarities, idiosyncracies, accidents of the individual, as his having the stature of a Patagonian, or the features of a Negro.

"人们再不想因无知而受人误导，因此再也不想屈服于这样的恶劣标准：在评判和对待他人时不依据其行为内在的价值，而依据其意见上偶尔且无意的巧合。真理昭然若揭，传遍天涯海角。"之后他慎重强调说："人再不会以信仰看待他人，因为人无法控制信仰。因此，再没有任何东西能诱使我们因一个人无法改变的东西而去赞扬或批评他，正如一个人无法改变自己的肤色或身高。" [4_2] 各位请看，若让这位哲学家来决定此事，宗教思想就一定远非真实，也不代表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而一定只是奇特怪异之物，是个人的偶然兴趣，正如他身高如巴塔哥尼亚人，或面容如黑人。

But perhaps this was the rhetoric of an excited moment. Far from it, Gentlemen, or I should not have fastened on the words of a fertile mind, uttered so long ago. What Mr. Brougham laid down as a principle in 1825, resounds on all sides of us, with ever-growing confidence and success, in 1852. I open the Minutes of the Committee of Council on Education for the years 1848-50,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and I find one of Her Majesty's Inspectors of Schools, at p.

467 of the second volume, dividing “the topics usually embraced in the better class of primary schools” into four:—the knowledge of *signs* , as reading and writing; of *facts* , as geography and astronomy; of *relations and laws* , as mathematics; and lastly *sentiment* , such as poetry and music. Now, on first catching sight of this division, it occurred to me to ask myself, before ascertaining the writer's own resolution of the matter, under which of these four heads would fall Religion, or whether it fell under any of them. Did he put it aside as a thing too delicate and sacred to be enumerated with earthly studies? Or did he distinctly contemplate it when he made his division? Anyhow, I could really find a place for it under the first head, or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for it has to do with facts, since it tells of the Self-subsisting; it has to do with relations, for it tells of the Creator; it has to do with signs, for it tells of the due manner of speaking of Him. There was just one head of the division to which I could not refer it, viz., to *sentiment* ; for, I suppose, music and poetry, which are the writer's own examples of sentiment, have not much to do with Truth, which is the main object of Religion. Judge then my surprise, Gentlemen, when I found the fourth was the very head selected by the writer of the Report in question, as the special receptacle of religious topics. “The inculcation of *sentiment* ,” he says, “embraces reading in its higher sense, poetry, music, together with moral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I am far from introducing this writer for his own sake, because I have no wish to hurt the feelings of a gentleman, who is but exerting himself zealously in the discharge of anxious duties; but, taking him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wide-spreading school of thought to which he belongs, I ask what can more clearly prove than a candid avowal like this, that, in the view of his school, Religion is not knowledge, has nothing whatever to do with knowledge, and is excluded from a University course of instruction, not simply because the exclusion cannot be helped, from political or social obstacles, but because it

has no business there at all, because it is to be considered a taste, sentiment, opinion, and nothing more?

但是，他这话兴许只是激动之时的夸张之言而已。而事实远非如此，不然的话，各位想想，他这样思想丰富的人，我为何单只录下他很久以前所说的那番话呢？布鲁厄姆先生在1825年确定下来的一条原则，到了1852年仍然在我们耳际回响，且信任度日增、信者如云。教育理事委员会1848到1850年的会议记录，应女王之命呈送给了议会两院。翻开会议录，我在第二卷第四百六十七页看到钦定学校视察员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将“优等小学通常开设的课程”分成四类：关于符号 的知识，比如阅读和写作；关于事实 的知识，如地理和天文学；关于关系 和法则 的知识，如数学；最后是关于情操 的知识，比如诗歌与音乐。一看到这个分类，我马上就想到，在了解那位执笔者的答案前，先自问这个问题：宗教应当放在上述四类的哪一类之下，或者根本哪一类都不合适。他是否觉得宗教太过精美与神圣，不宜与世俗学问放在一起，因而将它搁置一边？或者他进行课程分类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宗教？不管怎样，我还是可以将它放在第一类，或第二类，或第三类名目下。毕竟，宗教与事实相关，因为它讲到自存；它与诸多关系相关，因为它讲到了造物主；它与符号相关，因为它谈到言说上帝的恰当方式。只有一个名目是我无法将宗教置于其下的，就是情操。我假定，那位笔者引为情操 范例的诗歌与音乐，与真理本身并无太大关系，而真理却是宗教的主要对象。结果，该报告的作者竟然选择了第四类，认为这个名目才是容纳宗教主题的特别场所。各位想想，我当时惊讶到了何等程度。他说：“情操 的培育包括更高意义上的阅读、诗歌、音乐，还有道德与宗教教育。”提起这位报告的作者，远非由于他本人的缘故，因为我无意伤害一位绅士的情感，他只不过是在充满热情地、迫切地恪尽职守。我拿他当例子，来阐明他所从属的那一派传播甚广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宗教并非知识，与知识没有任何关系，之所以被排除在大学课程之外，并非仅仅迫于政治或社会障碍，而是因为大学与宗教毫不相干，因为宗教被看作是一种品味、情操、意见，仅此而已。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份坦率的陈述更能清

晰地说明这一派思想吗？

The writer avows this conclusion himself, in the explanation into which he presently enters, in which he says: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proposed, the *essential idea* of all religious Education will consist in the direct cultivation of the *feelings* .” What we contemplate, then, what we aim at, when we give a religious Education, is, it seems, not to impart any knowledge whatever, but to satisfy anyhow desires after the Unseen which will arise in our minds in spite of ourselves, to provide the mind with a means of self-command, to impress on it the beautiful ideas which saints and sages have struck out, to embellish it with the bright hues of a celestial piety, to teach it the poetry of devotion, the music of well-ordered affections, and the luxury of doing good. As for the intellect, its exercise happens to be unavoidable, whenever moral impressions are made, from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uman mind, but it varies in the results of that exercise, in the conclusions which it draws from our impressions, according to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individual.

该作者在接下来的解释中亲自阐述了上面的结论。他说：“根据所提议的分类，所有宗教教育的基本思想 ，就在于对情感 的直接培育。”这么看来，当我们实施宗教教育时，我们所思所想并非意在传授任何一种知识，而是以某种方式满足人们对那看不见的存在的好奇心。这看不见的存在却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要为人的思想提供自制的手段，要在人的脑海里灌输圣人与贤能勾划出来的美好思想，让天国虔诚明亮的色调装点人的精神。要教它明白无私奉献的诗歌、秩序井然的情感音乐及救苦行善的愉快感受。至于才智，由于人脑的特别构造，每当形成道德印象时，才智的锻炼碰巧是不可避免的，但锻炼的结果却各有不同。人从道德印象中得出的结论也虽个

人性格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Something like this seems to be the writer's meaning, but we need not pry into its finer issues in order to gain a distinct view of its general bearing; and taking it, as I think we fairly may take it, as a specimen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day, as adopted by those who are not conscious unbelievers, or open scoffers, I consider it amply explains how it comes to pass that this day's philosophy sets up a system of universal knowledge, and teaches of plants, and earths, and creeping things, and beasts, and gases, about the crust of the earth and the changes of the atmosphere, about sun, moon, and stars, about man and his doings,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bout sensation, memory, and the passions, about duty, about cause and effect, about all things imaginable, except one—and that is, about Him that made all these things, about God. I say the reason is plain because they consider knowledge, as regards the creature, is illimitable, but impossible or hopeless as regards the being and attributes and works of the Creator.

报告的作者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但我们不用追究细节也可以就其总体思路形成一个明确观点。我们完全可以拿这个思路作为当下人生观的一个范本，那种人生哲学为并非有意的不信者或公开的嘲笑者所采纳。我认为它足以说明当下哲学如何建立起一个普遍知识的系统，讲授植物、土地、爬行动物、野兽、气体，讲授地表和大气的变化，还有太阳、月球和恒星，还有人及其行为，还有世界历史。有感觉、记忆与激情，有职责，有因果关系，有一切可以想象出来的事物。但除开一项，也就是创造了这一切的神，也就是天主。要说这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涉及所造物的知识无边无际，而涉及造物主的存在及其属性和善功的知识却不可能或无望获得。

6 .

6 .

Here, however, it may be objected to me that this representation is certainly extreme, for the school in question does, in fact, lay great stress on the evidence afforded by the creation, to the Being and Attributes of the Creator. I may be referred, for instance, to the words of one of the speakers on a memorable occasion. At the very time of laying the first stone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I confess it, a learned person, since elevated to the Protestant See of Durham, which he still fills, opened the proceedings with prayer. He addressed the Deity, as the authoritative Report informs us, “the whole surrounding assembly standing uncovered in solemn silence.” “Thou,” he said, in the name of all present, “thou hast constructed the vast fabric of the universe in so wonderful a manner, so arranged its motions, and so formed its productions, that the contemplation and study of thy works exercise at once the mind in the pursuit of human science, and lead it onwards to *Divine Truth* .” Here is apparently a distinct recognition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Truth in the province of Religion; and, did the passage stand by itself, and were it the only means we possessed of ascertaining the sentiments of the powerful body whom this distinguished person there represented, it would, as far as it goes, be satisfactory. I admit it; and I admit also the recognition of the Being and certain Attributes of the Deity, contained in the writings of the gifted person whom I have already quoted, whose genius, versatile and multiform as it is, in nothing has been so constant, as in its devotion to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scientific and literary. He then certainly, in his

“Discourse of the objects, advantages, and pleasures of science,” after variously illustrating what he terms its “gratifying treats,” crowns the catalogue with mention of “the *highest* of all our gratifications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science,” which he proceeds to explain thus:

但是，也许能对我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即我这份陈述太过极端，因为所说的那所学校，事实上十分强调创造物为创造主的存在及其属性提供的证据。比如说，也许还会有人让我去看其中一位讲演者在一个值得纪念的场合说的话。我承认，为伦敦大学铺设第一块基石的时候，一位学识渊博之士就是以祷告开始奠基仪式的。他后来提升为达勒姆的新教主教，目前仍然在任。据权威报告，当他称呼上帝时，“围在现场的所有人都在庄严的沉寂中脱帽致敬”。他以所有在场者的名义说：“您以令人惊叹的方式织就纵横宇宙的经纬，设定宇宙的运动，赋予宇宙万物以外形。沉思与研究您的造化之功，必然激发人类对科学的孜孜追求，引领人的思想通达神圣的真理 。”这里明确宣称，宗教领域里存在真理这么一个东西。假如只有这段话，假如我们只有借此才可以确定这位杰出人士所代表的那个强大的团体的观点，那么，这话本身听起来让人满意。我承认这话，也承认刚刚引述过的那位才智之士的作品中对神的存在及某些属性的确认。他多才多艺的天资一以贯之，体现在他促进科学与文学知识的奉献之中。接下来，他以不同方式说明他所说的科学“令人满意的慰藉”。之后，在“论科学的对象、优势及快乐”中，他提到“思考科学时给予我们的最大满足”，将它放在所列益处的最顶端 ，并做了如下解释。

“We are raised by them,” says he,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inite wisdom and goodness which the Creator has displayed in all His works. Not a step can be taken in any direction,” he continues, “without perceiving the most extraordinary traces of design; and the skill, everywhere conspicuous, is calculated in so vast a

proportion of instances to promote the happiness of living creatures, and especially of ourselves, that we can feel no hesitation in concluding, that, if we knew the whole scheme of Providence, every part would be in harmony with a plan of absolute benevolence. Independent, however, of this most consoling inference, the delight is inexpressible, of being able to follow, as it were, with our eyes, the marvellous works of the Great Architect of Nature, to trace the unbounded power and exquisite skill which are exhibited in the most minute, as well as the mightiest parts of His system. The pleasure derived from this study is unceasing, and so various, that it never tires the appetite. But it is unlike the low gratifications of sense in another respect: it elevates and refines our nature, while those hurt the health, debase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rrupt the feelings; it teaches us to look upon all earthly objects as insignificant and below our notice, except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e, that is to say, the strict performance of our duty in every relation of society; and it gives a dignity and importance to the enjoyment of life, which the frivolous and the grovelling cannot even comprehend."

他说："科学的满足感滋润了我们，让我们明白造物主在全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无限智慧与仁慈。"他继续说，"看不到神的设计中极精妙的痕迹，我们便无法朝任何方向迈出一步。彰显于各处的技法历历在目，在如此宏大的尺度上显出精巧的算计，旨在促进万物尤其是人类的幸福。可以毫不迟疑地决断：假如知晓神意的全部谋划，定然会发现每个部分都契合绝对仁善的方案。我们竟能一一目睹自然界的伟大设计师的惊人作品，探查神创宇宙中展现出的最宏大与最精细的各个部分的无边伟力与精妙技能。可是，没有上述令人宽慰的推论，便无法表述我们的这份快乐。源自这种探究的快乐永不间断，多姿多彩，从没有餍足的时候。这与另一种低级的感官享受不一样，它提升并锤炼我们的本性，而一般的满足感却有损健康，降低领悟力，败坏

情感。它教人轻视和看低世间俗物，重视知识的追求和德行的培育，就是说，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严格地恪尽职守。它给予人生乐趣的尊严与价值感，是琐屑与低贱的满足感甚至都无法理解的。”

Such are the words of this prominent champion of Mixed Education. If logical inference be, as it undoubtedly is, an instrument of truth, surely, it may be answered to me, in admitting the possibility of inferring the Divine Being and Attributes *from*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he distinctly admits a basis of truth for the doctrines of Religion.

力挺混合教育的那位知名人士就是这么说的。逻辑推论肯定是探寻真理的工具，假如是这样，人们一定会对我说，人若承认从 自然现象中能推导出神的存在及其属性，就一定会承认宗教教义为真理的基础。

7．

7．

I wish, Gentlemen, to give these representations their full weight, both from the gravity of the question, and the consideration due to the persons whom I am arraigning; but, before I can feel sure I understand them, I must ask an abrupt question. When I am told, then, by the partisans of Universities without Theological teaching, that human science leads to belief in a Supreme Being, without denying the fact, nay, as a Catholic, with full conviction of it,

nevertheless I am obliged to ask what the statement means in *their* mouths, what they, the speakers, understand by the word "God." Let me not be thought offensive, if I question, whether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controversy. With us Catholics, as with the first race of Protestants, as with Mahometans, and all Theists, the word contains, as I have already said, a theology in itself. At the risk of anticipating what I shall have occasion to insist upon in my next Discourse, let me say that,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of Monotheism, God is an Individual, Self-dependent, All-perfect, Unchangeable Being; intelligent, living, personal, and present; almighty, all-seeing, all-remembering; between whom and His creatures there is an infinite gulf; who has no origin, who is all-sufficient for Himself; who created and upholds the universe; who will judge every one of us, sooner or later, according to that Law of right and wrong which He has written on our hearts. He is One who is sovereign over, operative amidst, independent of, the appointments which He has made; One in whose hands are all things, who has a purpose in every event, and a standard for every deed, and thus has relations of His own towards the subject-matter of each particular science which the book of knowledge unfolds; who has with an adorable, never-ceasing energy implicated Himself in all the history of creation, the constitution of nature, the course of the world, the origin of society, the fortunes of nations, the action of the human mind; and who thereby necessarily becomes the subject-matter of a science, far wider and more noble than any of those which are included in the circle of secular Education.

诸位，鉴于所说问题关系重大，也出于对我一直在责难的几位人士的考虑，我希望能够强调这些表述的重要性。可是，在确信真正理解这些想法之前，我必须先提一个唐突的问题。认为大学不应当包括神学教学的那派人士对我说，人文科学可导致对无上天主的信仰。我

作为一位天主教徒对此深信不疑，根本不想否认这一事实。可是，我不得不问一问，他们 嘴里说出这句话时到底表达什么意思，这些言论者对所说的“上帝”又是如何理解的。假如我质疑这个词在争议双方所指是否相同，但愿不属冒犯之举。在我们天主教徒眼里，就如同在第一批新教徒，以及伊斯兰教徒和所有有神论者眼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一样，这个词都自含有一种神学。我在接下来的论说里将寻机表述的意思，此时不妨先行透露，也就是说，根据一神论的教义，神是一位个体，是自立、至善、不变的存在，他有智慧、有生命、有人格且随时在场，他是全能的，无所不知、记得一切。在他与创造物之间存在无限鸿沟。他没有起源，完全自足。他创造并维护宇宙。他迟早会根据他刻印在我们心上的善恶法则评判我们每一个人。在他与人类达成的约定中，他是主宰，运作其中却独立其外。在他手中，握有掌控一切的权柄，凡事无不有他的目的，每一种行为无不有他的标准，知识之书展开的每一门具体学科的主题，无不与他存在种种的关系。他以可敬和永无止歇的能量使自身牵涉在全部创造史、自然的构造、世界的进程、社会的起源、诸国的命运、人脑的作用中。他因此而必然成为一门学科的主题，这学科比世俗教育容纳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更广泛，更高深。

This is the doctrine which belief in a God implies in the mind of a Catholic; if it means anything, it means all this, and cannot keep from meaning all this, and a great deal more; and, even though there were nothing in the religious tenets of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to disparage dogmatic truth, still, even then, I should have difficulty in believing that a doctrine so mysterious, so peremptory, approved itself as a matter of course to educated men of this day, who gave their minds attentively to consider it. Rather, in a state of society such as ours, in which authority, prescription, tradition, habit, moral instinct, and the divine influences go for nothing, in which patience of thought, and depth and consistency of view, are scorned as subtle and scholastic, in which free discussion and

fallible judgment are prized as the birthright of each individual, I must be excused if I exercise towards this age, as regards its belief in this doctrine, some portion of that scepticism which it exercises itself towards every received but unscrutinized assertion whatever. I cannot take it for granted, I must have it brought home to me by tangible evidence, that the spirit of the age means by the Supreme Being what Catholics mean. Nay, it would be a relief to my mind to gain some ground of assurance, that the parties influenced by that spirit had, I will not say, a true apprehension of God, but even so much as the idea of what a true apprehension is.

天主教徒心目中对上帝的信仰，就暗含这样一个教义。假如这教义有何意味，那它就完全是这层意思，不可能不是这层意思，而只可能更多。尽管过去三个世纪的宗教信条中并没有任何东西毁损教义的真理，可是哪怕在当时，我还是很难相信，如此神秘，如此决断的教义，在当日专注地思考它的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眼里，竟然能得到想当然的认可。在我们如今这个社会里，权威、对策、传统、习惯、道德本性和神性的影响力皆徒有虚名。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思想的容忍度、观点的深度及一致性被嘲讽为无病呻吟或有学究气，不受约束的讨论和不可靠的判断被当作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受到青睐。我们的时代对每一种被普遍认可却未经审查的论断都采取了怀疑主义的态度。假如关于这个时代对此教义的信仰，我也部分地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还请诸位原谅。我不能想当然，必须有切实证据让我明白，我们的时代精神用无上天主这个词所表达的，当真就是天主教徒所说的那层意思。不仅如此，假如能找到某种确信的理由，说明受这种时代精神影响的各方，哪怕只是对什么是真正的理解有一个观念，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安慰。我决不敢期盼他们对神有真正的理解。

Nothing is easier than to use the word, and mean nothing by it. The heathens used to say, “God wills,” when they meant “Fate;”

“God provides,” when they meant “Chance;” “God acts,” when they meant “Instinct” or “Sense;” and “God is everywhere,” when they meant “the Soul of Nature.” The Almighty is something infinitely different from a principle, or a centre of action, or a quality, or a generalization of phenomena. If, then, by the word, you do but mean a Being who keeps the world in order, who acts in it, but only in the way of general Providence, who acts towards us but only through what are called laws of Nature, who is more certain not to act at all than to act independent of those laws, who is known and approached indeed, but only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ose laws; such a God it is not difficult for anyone to conceive, not difficult for anyone to endure. If, I say, as you would revolutionize society, so you would revolutionize heaven, if you have changed the divine sovereignty into a sort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which the Throne has honour and ceremonial enough, but cannot issue the most ordinary command except through legal forms and precedents, and with the counter-signature of a minister, then belief in a God is no more than an acknowledgment of existing, sensible powers and phenomena, which none but an idiot can deny. If the Supreme Being is powerful or skilful, just so far forth as the telescope shows power, and the microscope shows skill, if His moral law is to be ascertained simply by the physical processes of the animal frame, or His will gathered from the immediate issues of human affairs, if His Essence is just as high and deep and broad and long as the universe, and no more; if this be the fact, then will I confess that there is no specific science about God, that theology is but a name, and a protest in its behalf an hypocrisy. Then is He but coincident with the laws of the universe; then is He but a function, or correlative, or subjective reflection and mental impression, of each phenomenon of the material or moral world, as it flits before us. Then, pious as it is to think of Him, while the pageant of experiment or abstract reasoning passes by, still, such piety is nothing more than a poetry

of thought or an ornament of language, and has not even an infinitesimal influence upon philosophy or science, of which it is rather the parasitical production.

使用这个词却无任何所指，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情了。异教徒过去常说“神的意愿”，但他们的意思是“命运”；说“神的赐予”时意思是“机会”；“神的作为”意思是“本能”或“感觉”；说“神无处不在”，意思是“自然之魂”。全能的上帝与一条原则，或作用中心，或一种品质，或对现象的概括隔着无限距离。假如仅只用这个词表示这样一位存在者，他使世界保持秩序，运作于这个世界，但只是以普遍神意的方式运行其中；他对我们产生影响，但只是通过我们称为自然法则的形式；与其脱离这些法则而产生影响，他更可能根本就不产生任何影响；他为人所知，的确也不断为人所接近，但只能通过这些法则的媒介做到。这样一位上帝，谁构想起来都很容易，谁都不觉得难于容忍。我要说，人会进行社会革命，因此也敢倒转乾坤，假如人将神权变成某种形式的君主立宪制，据此，君主拥有足够的荣誉和礼仪，但哪怕最普通的命令也要通过法律形式和先例才能下达，且必须有大臣的副签。那么，对神的信仰也就等同于对现存和明显的强权及现象的承认，而这是除白痴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假如无上的天主能力强大或富有技巧，正如望远镜显示能力，显微镜显示技巧；假如他的道德法则仅只凭动物层面的实际作用便可确认，或他的意志仅凭人事的直接后果便可判定；假如他的本质与这宇宙同高同深，同宽同长，而并不越过；假如这些都是事实，那我乐于承认，并不存在关于神的特别学科，神学也不过是一个名号，而以神学名义所下的断言亦不过虚伪之言。这样的话，他不过是宇宙法则的重合，不过是一种功能，或一个相关物，或是对掠过我们眼前的物质或精神世界的每一种现象的主观反思及心理印象。当实验或抽象推理的游行队伍经过时，想到神便十分虔诚了，但尽管如此，这样的虔诚不过是思想的诗意或语言的装点，对哲学或科学不会产生丝毫影响，因这虔诚不过是哲学或科学的寄生物。

I understand, in that case, why Theology should require no specific teaching, for there is nothing to mistake about; why it is powerless against scientific anticipations, for it merely is one of them; why it is simply absurd in its denunciations of heresy, for heresy does not lie in the region of fact and experiment. I understand, in that case, how it is that the religious sense is but a "sentiment," and its exercise a "gratifying treat," for it is like the sense of the beautiful or the sublime. I understand how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universe "leads onwards to *divine* truth," for divine truth is not something separate from Nature, but it is Nature with a divine glow upon it. I understand the zeal expressed for Physical Theology, for this study is but a mode of looking at Physical Nature, a certain view taken of Nature, private and personal, which one man has, and another has not, which gifted minds strike out, which others see to be admirable and ingenious, and which all would be the better for adopting. It is but the theology of Nature, just as we talk of the *philosophy* or the *romance* of history, or the *poetry* of childhood, or the picturesque, or the sentimental, or the humorous, or any other abstract quality, which the genius or the caprice of the individual, or the fashion of the day, or the consent of the world, recognizes in any set of objects which are subjected to its contemplation.

我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神学并不需要专门教学，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会弄错。为什么神学放在科学的种种预期面前那么无力呢？因为它不过是这些预期中的一种。神学斥责异端时之所以那么荒唐，因为异端并不在事实和实验的领域内。我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宗教意识只不过是一种"情操"，为何情操的锤炼是"令人满意的慰藉"，因为它如同美感或崇高感。我明白对宇宙的思考为何会"导向神圣的真理"，因为神圣　的真理并非某种与自然不同的东西，而是罩上了一层神圣光环的自然。我明白人们对物理神学表现出来的热情，

因为这种研究只不过是看待物理的自然世界的一种方式，是对自然的某种私密的、个人的看法。这看法这个人有，那个人可能没有，有天赋的智者领悟出来，其他人听起来也值得称赞，极有创意，能更好地为人接受。这只不过是关于自然的神学，正如我们谈到关于历史的哲学 或传奇故事 ，关于儿童的诗歌 ，或生动别致，或多愁善感，或幽默好笑，或其他任何抽象品质。个人的才智或奇想、某时某地的时尚或世人的一致赞成，在进入人的思考领域的任何一组事物中，都可轻易辨别出这种品质。

8．

8.

Such ideas of religion seem to me short of Monotheism; I do not impute them to this or that individual who belongs to the school which gives them currency; but what I read about the “gratification” of keeping pace in our scientific researches with “the Architect of Nature;” about the said gratification “giving a dignity and importance to the enjoyment of life,” and teaching us that knowledge and our duties to society are the only earthly objects worth our notice, all this, I own it, Gentlemen, frightens me; nor is Dr. Maltby's address to the Deity sufficient to reassure me. I do not see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avowing that there is no God, and implying that nothing definite can for certain be known about Him; and when I find Religious Education treated as the cultivation of sentiment, and Religious Belief as the accidental hue or posture of the mind, I am reluctantly but forcibly reminded of a very unpleasant page of Metaphysics, viz.,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God and Nature insinuated by such philosophers as Hume. This acute, though most low-minded of speculators, in his inquiry concerning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introduces, as is well known, Epicurus, that is, a teacher of atheism, delivering an harangue to the Athenian people, not indeed in defence, but in extenuation of that opinion. His object is to show that, whereas the atheistic view is nothing else than the repudiation of theory, and an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of phenomenon and fact, it cannot be dangerous, unless phenomenon and fact be dangerous. Epicurus is made to say, that the paralogism of philosophy has ever been that of arguing from Nature in behalf of something beyond Nature, greater than Nature; whereas, God, as he maintains, being known only through the visible world, our knowledge of Him is absolutely commensurate with our knowledge of it,—is nothing distinct from it,—is but a mode of viewing it. Hence it follows that, provided we admit, as we cannot help admitting,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and the world, it is only a question of words whether or not we go on to the hypothesis of a second Being, not visible but immaterial, parallel and coincident with Nature, to whom we give the name of God.

在我看来，这样的宗教观念并非一神论。我并不想把这些观念归咎为使其流行起来的那个派别的任何个体，可是，我看到在科学研究中与“自然的建筑师”保持一致节奏的“满足感”，看到这种所谓的满足感“给人生乐趣以尊严和价值”，并告诫我们说，知识和对社会的责任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唯一世俗目标。我承认，各位，所有这些话都让我深忧，而莫尔特比博士对神说的话也不足以让我宽心。公开宣称上帝并不存在，与暗示对神不可能有任何确切了解，我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何差别。当我发现宗教教育被当作情操培养来处理，宗教信仰被看作偶然的心情或心态时，我虽极不情愿，但还是禁不住想起形而上学史上令人极不愉快的一页，即休谟这类哲学家所暗示过的神与自然的关系。这位心地卑劣但观察敏锐的思想家在涉及人类理解力的研究中，像众所周知的那样搬出伊壁鸠鲁这位无神论先师。伊壁鸠鲁曾在雅典人面前高谈阔论，与其说是捍卫无神论，不如说是为无神论开

脱。休谟的目的是要说明，尽管无神论观点只不过是对理论的弃绝，并且也只是对现象与事实的准确表达，但只要现象与事实没有危险，无神论也就不存在危险。他借伊壁鸠鲁之口说，哲学的逻辑悖论向来都是从自然出发，却代表超出自然、大于自然的事物进行辩论。照他看来，由于只能通过可见世界了解神，我们关于神的知识，与我们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绝对是相通的，这两者没有什么不同，关于神的知识只不过是看待可见世界的一种模式。由于我们无法不承认自然现象和世界的存在，因此，是否继续进展到另一种存在假设，就只是一个用词问题了。这另一种存在不可见且无形，它与自然平行并重合，我们称其为上帝。他说：

"Allowing," he says, "the gods to be the authors of the existence or order of the universe, it follows that they possess that precise degree of power, intelligence, and benevolence, which appears in their workmanship; but nothing farther can be proved, except we call in the assistance of exaggeration and flattery to supply the defects of argument and reasoning. So far as the traces of any attributes, at present, appear, so far may we conclude these attributes to exist. The supposition of farther attributes is mere hypothesis; much more the supposition that, in distant periods of place and time, there has been, or will be, a more magnificent display of these attributes, and a scheme of administration more suitable to such imaginary virtues."

> "设若神灵是宇宙存在或宇宙秩序的创造者，则必然具备在其创造技艺中显现出来的相应程度的能力、智慧与仁善。但是，除了可以借助夸张和谄媚以弥补论证及推理之不足以外，再不能从中推导出别的任何东西了。目前出现的任何属性的痕迹有多少，我们就只能在此范围内推导这些属性的存在。要推导出

进一步的属性，纯粹就只是假设了。认为这些属性在遥远过去曾经有过，或在遥远的未来将有更壮观的展示，并且会有更适合这类想象之德的管理方案，那就更是假设了。”

Here is a reasoner, who would not hesitate to deny that there is any distinct science or philosophy possible concerning the Supreme Being; since every single thing we know of Him is this or that or the other phenomenon, material or moral, which already falls under this or that natural science. In him then it would be only consistent to drop Theology in a cours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but how is it consistent in anyone who shrinks from his companionship? I am glad to see that the author, several times mentioned, is in opposition to Hume, in one sentence of the quotation I have made from his Discourse upon Science, deciding, as he does, that the phenomena of the material world are insufficient for the full exhibition of the Divine Attributes, and implying that they require a supplemental process to complete and harmonize their evidence. But is not this supplemental process a science? and if so, why not acknowledge its existence? If God is more than Nature, Theology claims a place among the scienc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if you are not sure of as much as this, how do you differ from Hume or Epicurus?

就因为我们就神所知的万事万物都是各种物质或精神的现象，而这些现象都已经归于不同的自然科学，这样一位推论者竟然就毫不犹豫地否认，关于无上天主是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一种学科或哲学的。在他心里，大学教育必然要放弃神学学科才能说得通。可是，对不愿与其为伍的任何人来说，这怎么可能说得通呢？我很高兴地看到，已经多次提及的那位作者，他与休谟持相反观点，我已经从他关于科学

的论说中抽出体现这一点的那句话来。他认为，有形世界的现象并不足以全面展现神圣属性，并暗示说，它们还需要一个补充过程才能完成其证据并使证据和谐一致。但是，这个补充过程难道就不是一门学科？若如此，为何不承认这门学科的存在？假如神大于自然，神学就在众多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反过来，假如就连这一点你也不能肯定，那你与休谟或伊壁鸠鲁有何差别？

9．

9．

I end then as I began: religious doctrine is knowledge. This is the important truth, little entered into at this day, which I wish that all who have honoured me with their presence here would allow me to beg them to take away with them. I am not catching at sharp arguments, but laying down grave principles. Religious doctrine is knowledge, in as full a sense as Newton's doctrine is knowledge. University Teaching without Theology is simply unphilosophical. Theology has at least as good a right to claim a place there as Astronomy.

亦如最初所说的那样，我的结论是：宗教教义是知识。这是事关重大的真理，尽管当下并不为人所重视。容我请求今天前来捧场的各位临走时记住这样一个真理。我并不奢望确立严格的论证，而只是摆出一些重大原则。宗教教义是知识，其完整意义与说牛顿的学说是真理一样。不设神学的大学教学完全不具备哲理性。神学至少与天文学一样，应当在大学教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In my next Discourse it will be my object to show that its omission from the list of recognised sciences is not only indefensible in itself, but prejudicial to all the rest.

在下一讲中，我的目标是要说明，把神学排除在确认的学科表单之外，不仅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对其他所有学科有害。

[3_1].In Roman law it means a Corporation. Vid. Keuffel, *De Scholis* .

[3_2].Hist. vol. ii. p. 529. London, 1841.

[3_3].Mr. Brougham's Glasgow Discourse.

[4_1].在罗马法中意为社团。

[4_2].参见布鲁厄姆的格拉斯哥演说。

Discourse 3. Bearing of Theology on Other Branches of Knowledge

第三讲：神学对其他学问门类的影响

1．

1．

When men of great intellect, who have long and intently and exclusively given themselves to the study or investigation of some one particular branch of secular knowledge, whose mental life is concentrated and hidden in their chosen pursuit, and who have neither eyes nor ears for anything which does not immediately bear upon it, when such men are at length made to realize that there is a clamour all around them, which must be heard, for what they have been so little accustomed to place in the category of knowledge as Religion, and that they themselves are accused of disaffection to it, they are impatient at the interruption; they call the demand tyrannical, and the requisitionists bigots or fanatics. They are tempted to say, that their only wish is to be let alone; for themselves, they are not dreaming of offending anyone, or interfering with anyone; they are pursuing their own particular line, they have never spoken a word against anyone's religion, whoever he may be, and never mean to do so.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y deny the existence of a God, because they are not found talking of it, when the topic would be utterly irrelevant. All they say is, that there are other beings in the world besides the Supreme Being; their business is with them. After all, the creation is not the Creator, nor

things secular religious. Theology and human science are two things, not one, and have their respective provinces, contiguous it may be and cognate to each other, but not identical. When we are contemplating earth, we are not contemplating heaven; and when we are contemplating heaven, we are not contemplating earth. Separate subjects should be treated separately. As division of labour, so division of thought is the only means of successful application. “Let us go our own way,” they say, “and you go yours. We do not pretend to lecture on Theology, and you have no claim to pronounce upon Science.”

才智超群、长久以来只专心致志地钻研某一门特定世俗学问的人，他们的精神生活就集中并潜藏于这一选定的事业，非此勿视，非此勿听。然而他们终于被迫意识到自己被一种喧闹之音包围，要求他们必须注重自己向来都未列入知识范畴之内的课题，比如宗教，并指责他们自己对这类课题有不满情绪。对于这样的干扰，他们极不耐烦，称这样的要求是蛮不讲理，并称提出如此要求的人是冥顽不灵者或狂热份子。他们禁不住想说，他们唯一的愿望是不受打扰。对他们自身来说，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要冒犯任何人，亦不想干扰任何人。他们只做自己想干的事情，从没说过一句冲撞任何人的宗教信仰的话，也无意这么做。在上帝的存在跟他们的研究完全无关时，没有人会听到他们谈起这个话题，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就否定上帝的存在。他们所说的一切不过是，除了无上的天主之外，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存在者，而他们关心的正是这些存在者。毕竟，创造物并非造物主，世俗事物亦非归属宗教。神学与人类的科学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并非一体，且各自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两者可能有交叉和类似之处，但并不是彼此对等的。我们思考地，就不可能同时思考天；我们思考天，就不能同时思考地。不同的课题当分门别类地加以对待。知识的成功应用，唯一的途径在于思想的分工，这与劳动分工是同样道理。他们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不想装模做样地讲授神学，你们也不要就科学乱发议论。”

With this feeling they attempt a sort of compromise, between their opponents who claim for Theology a free introduction into the Schools of Science, and themselves who would exclude it altogether, and it is this: viz., that it should remain indeed excluded from the public schools, but that it should be permitted in private, wherever a sufficient number of persons is found to desire it. Such persons, they seem to say, may have it all their own way, when they are by themselves, so that they do not attempt to disturb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instruction, acceptable and useful to all, by the intrusion of opinions peculiar to their own minds.

他们认为应当将神学完全排斥在校门之外，而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神学应当不受限制地进入讲授科学的学府。怀着上述那种愿望，他们希望与持相反观点的人达成某种妥协，也就是说，神学应当继续排除在公立学校之外，但应当允许它在私立学校中存在，只要有足够数量的人渴望研习神学即可。他们的意思似乎是说，当渴望研习神学之人不妨碍他人的时候，可任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研习神学，这样，这些人就不会试着把自己特有的观念塞进为所有人所接受并对所有人有益的教学方法中去，从而避免他们干扰现存的综合教育制度。

I am now going to attempt a philosophical answer to this representation, that is, to the project of teaching secular knowledge in the University Lecture Room, and remanding religious knowledge to the parish priest, the catechism, and the parlour; and in doing so, you must pardon me, Gentlemen, if my subject should oblige me to pursue a lengthy and careful course of thought, which may be wearisome to the hearer:—I begin then thus:—

这样一种表述，意思就是计划在大学讲堂里讲授世俗知识，而把宗教知识留给教区牧师、教义问答和客厅闲谈。我现在就来为这样一个表述做一个哲理性的答复。由于这个话题要求我从头仔细道来，若我的答复听上去冗长乏味，还请诸位原谅。

2．

2．

Truth is the object of Knowledge of whatever kind; and when we inquire what is meant by Truth, I suppose it is right to answer that Truth means facts and their relations, which stand towards each other pretty much as subjects and predicates in logic. All that exists, as contemplated by the human mind, forms one large system or complex fact, and this of course resolves itself into an indefinite number of particular facts, which, as being portions of a whole, have countless relations of every kind, one towards another. Knowledge is the apprehension of these facts, whether in themselves, or in their mutual positions and bearings. And, as all taken together form one integral subject for contemplation, so there are no natural or real limits between part and part; one is ever running into another; all, as viewed by the mind, are combined together, and possess a correlative character one with another, from the internal mysteries of the Divine Essence down to our own sensations and consciousness, from the most solemn appointments of the Lord of all down to what may be called the accident of the hour, from the most glorious seraph down to the vilest and most noxious of reptiles.

无论何种学问，真理都是其研究的对象。当我们探究真理的意义时，我觉得这样回答是合适的，即真理意味着事实及事实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很像逻辑中所说的主词与谓词的关系。人类头脑所思考的一切存在，都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或复杂的事实，并且当然会细分成数目无限的具体事实。由于这些事实是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它们彼此之间就会构成数不清的各类关系。知识就是对这些事实的理解，无论是就这些事实本身而言，还是就它们相互的位置和影响而言。鉴于所有的东西集中起来以后，会构成供人思考的一个完整主题，同样，部分与部分之间也没有天然或现实的界限。一个部分总是与另一个部分相混合，而在人的意识看来，所有的部分都汇集在一起，各个部分之间构成相互关联的特征，从神圣本质的内在奥秘，一直到我们的感觉与意识，从万物的主宰最庄严的约定，到所谓的一时的意外事件，从最荣耀的六翼天使，到最卑贱邪恶的爬虫动物，莫不如此。

Now, it is not wonderful that, with all its capabilities, the human mind cannot take in this whole vast fact at a single glance, or gain possession of it at once. Like a short-sighted reader, its eye pores closely, and travels slowly, over the awful volume which lies open for its inspection. Or again, as we deal with some huge structure of many parts and sides, the mind goes round about it, noting down, first one thing, then another, as it best may, and viewing it under different aspects, by way of making progress towards mastering the whole. So by degrees and by circuitous advances does it rise aloft and subject to itself a knowledge of that universe into which it has been born.

所以毫不奇怪，人的意识哪怕拼尽全力，也决不可能在一瞥之间将这庞杂无边的事实全都囊括进来，亦无法一次性地占尽一切。这就如同一名近视的读者，眼睛凑得近近地，慢慢钻研一本厚书。再或者说，就如同我们面对由许多部分和侧面构成的一个庞大结构，人的意

识会竭尽全力地前后打量，先后记下所有事情，从不同侧面去探究它，希望能够对这个结构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人的意识就这样一步步，迂回曲折地抵达高处，虽然源自宇宙，却将关于这个宇宙的知识尽数掌握。

These various partial views or abstractions, by means of which the mind looks out upon its object, are called sciences, and embrace respectively larger or smaller portions of the field of knowledge; sometimes extending far and wide, but superficially, sometimes with exactness over particular departments, sometimes occupied together on one and the same portion, sometimes holding one part in common, and then ranging on this side or that in absolute divergence one from the other. Thus Optics has for its subject the whole visible creation, so far forth as it is simply visible; Mental Philosophy has a narrower province, but a richer one. Astronomy, plane and physical, each has the same subject-matter, but views it or treats it differently; lastly, Geology and Comparative Anatomy have subject-matters partly the same, partly distinct. Now these views or sciences, as being abstractions, have far more to do with the relations of things than with things themselves. They tell us what things are, only or principally by telling us their relations, or assigning predicates to subjects; and therefore they never tell us all that can be said about a thing, even when they tell something, nor do they bring it before us, as the senses do. They arrange and classify facts; they reduce separate phenomena under a common law; they trace effects to a cause. Thus they serve to transfer our knowledge from the custody of memory to the surer and more abiding protection of philosophy, thereby providing both for its spread and its advance:—for, inasmuch as sciences are forms of knowledge, they enable the intellect to master and increase it; and, inasmuch as they are instruments, to communicate it readily to

others. Still after all, they proceed on the principle of a division of labour, even though that division is an abstraction, not a literal separation into parts; and, as the maker of a bridle or an epaulet has not, on that account, any idea of the science of tactics or strategy, so in a parallel way, it is not every science which equally, nor anyone which fully, enlightens the mind in the knowledge of things, as they are, or brings home to it the external object on which it wishes to gaze. Thus they differ in importance; and according to their importance will be their influence, not only on the mass of knowledge to which they all converge and contribute, but on each other.

这些五花八门的部分观念或抽象概念就称为学科，意识通过这些学科观察其对象。这些学科涵盖知识领域或大或小的各个部分，有时候延伸广泛，但不免流于粗浅，另外一些时候又在某些特别门类上孜孜以求，再有些时候完全沉迷于相同的某个部分，还有些时候把握着一个共同部分，之后又对准彼此完全不同的部分。所以，光学就把一切可见的造物视为自己的研究科目，只要可见，多么遥远的事物都没关系。心灵哲学的研究范围相对狭窄，但内容却更丰富。无论是研究轨道平面的天文学还是天体力学，两者面对的是相同的研究课题，但观察或处理的方法却不一样。最后，地理学与比较解剖学的研究对象，部分相似，部分不同。由于这些观念或学科都是抽象概念，因此更多涉及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非事物本身。这些学科告诉我们事物是什么，仅仅或主要是将事物的相互关系告诉我们，或就是给主词配上谓词。因此，就算科学能就一个事物说些什么，也永远不可能将所能说的一切都告诉我们。科学更无法像感官感知事物那样将事物呈现在我们面前。各门学科对事实进行整理与分类，将千差万别的现象化简为一条共同法则，将结果归诸原因。因此，各门学科的作用，就是要把知识从记忆的临时看管中转换出来，置于哲学更确切和更有约束力的保护之下，从而为知识的传播和进步提供便利。就科学为知识的形式而言，它便于才智对知识的掌握与增进，就科学为知识的工具而

言，它便于随时将知识传播给他人。说到底，科学基于劳动分工的原则，哪怕这种分工是抽象的，而非实际将其分隔成不同部分。正如制作马勒或肩章的人并不懂战术或战略，并非每一门学科都在实际事物的知识上给人的意识以相同的启迪，或使人的意识对希望加以审视的外部对象有清楚的理解。根本就没有哪一门科学能以完整的方式做到这些。因此，各门学科有不同的重要性，由于重要性不同，其影响力也不同，不仅对各门学科全都聚合其上且有所贡献的知识体来说如此，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也有不同。

Since then sciences are the results of mental processes about one and the same subject-matter, viewed under its various aspects, and are true results, as far as they go, yet at the same time separate and partial, it follow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y need external assistance, one by one, by reason of their incompleteness, and on the other that they are able to afford it to each other, by reason, first, of their independence in themselves, and then of their connexion in their subject-matter. Viewed altogether, they approximate to a representation or subjective reflection of the objective truth, as nearly as is possible to the human mind, which advances towards the accurate apprehension of that object,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sciences which it has mastered; and which, when certain sciences are away, in such a case has but a defective apprehension, in proportion to the value of the sciences which are thus wanting,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field on which they are employed.

由于科学是就同一个主题进行多角度观察的精神活动的结果，并且在科学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是真实的，然而同时却是彼此分隔且不完全的，因此，一方面，由于各门学科自身并不完整，必然需要外部的支持；另外一方面，由于各学科自身独立，并在研究主题上相互联

系，因此又能够彼此支持。总体看来，这些学科是人类意识所能达到的对客观真理的一种表达或主观反思。人的意识掌握的学科数量越多，对这个对象的理解就越准确。但当某些学科尚未建立时，人的意识得到的不过是有缺陷的理解，缺陷的程度与所缺乏的这些学科的价值相关联，也与借用这些学科的研究领域的重要性相关联。

3．

3．

Let us take, for instance, man himself as our object of contemplation; then at once we shall find we can view him in a variety of relations; and according to those relations are the sciences of which he is the subject-matter, and according to our acquaintance with them is our possession of a true knowledge of him. We may view him in relation to the material elements of his body, or to his mental constitution, or to his household and family, or to the community in which he lives, or to the Being who made him; and in consequence we treat of him respectively as physiologists, or as moral philosophers, or as writers of economics, or of politics, or as theologians. When we think of him in all these relations together, or as the subject at once of all the sciences I have named, then we may be said to reach unto and rest in the idea of man as an object or external fact, similar to that which the eye takes of his outward form. On the other hand, according as we are only physiologists, or only politicians, or only moralists, so is our idea of man more or less unreal; we do not take in the whole of him, and the defect is greater or less, in proportion as the relation is, or is not, important, which is omitted, whether his relation to

God, or to his king, or to his children, or to his own component parts. And if there be one relation, about which we know nothing at all except that it exists, then is our knowledge of him, confessedly and to our own consciousness, deficient and partial, and that, I repeat, in propor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lation.

譬如说，如果拿人本身当作思考对象，我们会立即发现，可以从多重关系来看待他。以人作为研究主题的那些学科，所根据的就是这些关系，而我们对人的真正了解，根据的也是我们对这些关系的熟悉程度。我们可以从人与人体物质元素的关系来观察，也可以根据人与其心理构成的关系，或根据他与家庭及成员的关系，或根据他与所在社会的关系，或根据他与造物主的关系。这样，我们就会从生理学家或道德哲学家、经济学家或政治家以及神学家的角度分别看待他。当我们从所有这些关系来思考他，或拿他当作我提到过的所有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时，可以说我们接近或依赖的这个人的观念，就是一个对象或外部事实，类似于人眼看到的人的外部形态。另外一方面，鉴于我们不过是生理学家，或政客，或只是道德学家，我们对人的观念多少会不那么真实。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人的全貌。缺陷的大小与关系是否重要成比例，而无论在他与上帝，与国王，与其后代，或是与他自己的各个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中，这个缺陷都被忽略。假如存在一种关系，除开知道这关系存在之外，其他的我们一无所知，那么，我们对人的理解，里里外外也存在缺陷，而且是局部性的。我再说一次，它跟关系的重要性也是成比例的。

That therefore is true of sciences in general which we are apt to think applies only to pure mathematics, though to pure mathematics it applies especially, viz., that they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simple representations or informants of things as they are. We are accustomed to say, and say truly, that the conclusions of pure mathematics are applied, corrected, and adapted, by mixed;

but so too the conclusions of Anatomy, Chemistry, Dynamics, and other sciences, are revised and completed by each other. Those several conclusions do not represent whole and substantive things, but views, true, so far as they go; and in order to ascertain how far they do go, that is, how far they correspond to the object to which they belong, we must compare them with the views taken out of that object by other sciences. Did we proceed upon the abstract theory of forces, we should assign a much more ample range to a projectile than in fact the resistance of the air allows it to accomplish. Let, however, that resistance be made the subject of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then we shall have a new science, assisting, and to a certain point completing, for the benefit of questions of fact, the science of proje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cience of projection itself, considered as belonging to the forces it contemplates, is not more perfect, as such, by this supplementary investigation. And in like manner, as regards the whole circle of sciences, one corrects another for purposes of fact, and one without the other cannot dogmatize, except hypothetically and upon its own abstract principles. For instance, the Newtonian philosophy requires the admission of certain metaphysical postulates, if it is to be more than a theory or an hypothesis; as, for instance, that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will happen tomorrow;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matter, that our senses are trustworthy, that there is a logic of induction, and so on. Now to Newton metaphysicians grant all that he asks; but, if so be, they may not prove equally accommodating to another who asks something else, and then all his most logical conclusions in the science of physics would remain hopelessly on the stocks, though finished, and never could be launched into the sphere of fact.

因此，普遍意义上的科学也是这么一种情况。我们往往以为关系

仅仅应用于纯数学，尽管关系的确特别适合于纯数学，就是说，各门学科并不能自认为就是实际事物的简单表达或知情者。我们习惯于说，并真诚地说，纯数学的结论因各门学科的结合而得到应用、修正和适应，但解剖学、化学、力学和其他学科也相互得到修正和补充。那些结论并不代表全部实存事物，而是观点，就这些观点本身来说也是真实的。但要确认真实到什么程度，就是说，观点与所属对象符合到什么程度，却必须与其他学科从这个对象中获取的观点进行比对。假如从力的抽象理论上着手，我们给出的范围就必须远远超过空气阻力实际允许一个抛物体能完成的范围。假如让这个空气阻力成为科学分析的研究课题，那我们就会有一门新科学，有助于并在某种程度上完成投射学，以利于回答关于事实的一些问题。另外一方面，由于投射学本身被认为属于它所要思考的力，因此并不会因为这种补充性的研究而更加完善。同理，论及全部科学界，一门学科会出于事实的目的而纠正另外一门学科，一门学科缺乏另一门学科就无法下定论，除非只是提出假说或基于自身的抽象原理。例如，牛顿哲学要超出学说或假设的范围，就要求承认某些形而上的基本条件。比如，昨天发生的事情，明天有可能再次发生；又比如，存在物质这么一个东西，我们的感官值得信赖，存在归纳法这么一种逻辑，等等。现在，形而上学者承认牛顿要求的一切条件，就算如此，对提出别的要求的另外一位科学家，这些形而上学者就不一定同样包容了。这样，牛顿在物理学中最符合逻辑的所有结论虽然都建立起来，却会无望地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下，因而永远也无法进入事实领域。

Again, did I know nothing about the movement of bodies, except what the theory of gravitation supplies, were I simply absorbed in that theory so as to make it measure all motion on earth and in the sky, I should indeed come to many right conclusions, I should hit off many important facts, ascertain many existing relations, and correct many popular errors: I should scout and ridicule with great success the old notion, that light bodies flew up and heavy bodies fell down; but I should go on with equal

confidence to deny the phenomenon of capillary attraction. Here I should be wrong, but only because I carried out my science irrespectively of other sciences. In like manner, did I simply give myself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xternal action of body upon body, I might scoff at the very idea of chemical affinities and combinations, and reject it as simply unintelligible. Were I a mere chemist, I should deny the influence of mind upon bodily health; and so on, as regards the devotees of any science, or family of sciences, to the exclusion of others; they necessarily become bigots and quacks, scorning all principles and reported facts which do not belong to their own pursuit, and thinking to effect everything without aid from any other quarter. Thus, before now, chemistry has been substituted for medicine; and again, political economy, or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or the reading of the Scriptures, has been cried up as a panacea against vice, malevolence, and misery.

再者，假定除开引力学说所应用的东西之外，我对物体运动一无所知，假定我只是痴迷于这学说，并据以测量地下天上一切的运动，那我一定会得出许多正确结论，我会发掘出许多重要事实，确定许多现存关系，并纠正诸多流行的错误。我会嘲笑讥讽轻物飞升、重物下沉的老观念，而且屡试不爽。但我会怀着同样的自信否认毛细管引力现象。这我就错了，但错只错在研究这门科学时，我没有顾及其他的学科。同样，假定我只在意物体对物体的外部作用的研究，我可能会藐视化学亲和势与化合作用的观念，认为它晦涩难懂而予以弃绝。假定我只是化学家，就会否认心灵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如此等等。投身于任何一门或一类学科的人，一旦排斥其他学科，必然会成为盲信者和庸医，嘲笑一切不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的所有原理和报告的事实，以为可以不需要其他任何学科的帮助就可以知晓一切。因此，化学已经为医学所取代，政治经济学、精神启蒙或阅读《圣经》也备受推崇，成为应对罪恶、敌意和不幸的万灵药。

4 .

4 .

Summing up, Gentlemen, what I have said, I lay it down that all knowledge forms one whole, because its subject-matter is one; for the universe in its length and breadth is so intimately knit together, that we cannot separate off portion from portion, and operation from operation, except by a mental abstraction; and then again, as to its Creator, though He of course in His own Being is infinitely separate from it, and Theology has its departments towards which human knowledge has no relations, yet He has so implicated Himself with it, and taken it into His very bosom, by His presence in it, His providence over it, His impressions upon it, and His influences through it, that we cannot truly or fully contemplate it without in some main aspects contemplating Him. Next, sciences are the results of that mental abstraction, which I have spoken of, being the logical record of this or that aspect of the whole subject-matter of knowledge. As they all belong to one and the same circle of objects, they are one and all connected together; as they are but aspects of things, they are severally incomplete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 though complete in their own idea and for their own respective purposes; on both accounts they at once need and subserve each other. And further,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bearings of one science on another, and the use of each to each, and the location and limitation and adjustment and due appreciation of them all, one with another, this belongs, I conceive, to a sort of science distinct from all of them, and in some sense a science of sciences, which is my own conception of what is meant by Philosophy, 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word, and of a philosophical

habit of mind, and which in these Discourses I shall call by that name. This is what I have to say about knowledge and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generally; and now I proceed to apply it to the particular science, which has led me to draw it out.

诸位，说了这么多，概而言之就是，所有知识构成一个整体，因为其研究主题就是一个。宇宙深广无垠、盘根错节，除开运用精神上的抽象，我们根本无法将各个部分、各个活动绝然分开。至于宇宙的创造者，尽管他自身的存在与这个宇宙无限相隔，而且人类知识与神学研究的某些部分并无关系，但是，神与宇宙紧密相联，并将宇宙吞纳于怀中，他的临在就在宇宙里，神意遍布于宇宙，无处不留他的印痕，无所不见其影响。因此，如果不在某些重要的层面思考他，我们就无法真实完整地思考这宇宙。其次，我已经说过，科学是精神抽象活动的结果，是对知识全部研究主题的某些层面的逻辑记录。由于它们全都属于相同的对象域，因此也全都相互关联；由于它们只不过是事物的某些层面，与事物本身的关系也就各有各的不全面处，尽管各门学科自身的概念以及各自的目的是完整的。从这两个角度看，各门科学既相互需要，又相互促进。另外，我觉得，理解一门学科对另一门学科的影响、学科间的相互利用、学科的定位与局限以及调整，以及对所有学科的适当鉴别，就属于与所有这些学科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学科，从一种意义上说即是学科中的学科，这就是我认为哲学这个词和思维的哲理习惯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在接下来的演说中，我会一直使用哲学这个词来表达上述意思。这就是我就知识及哲理知识所要做的一般言论，我现在继续把这层意思运用到引导我得出上述结论的一门具体学科上来。

I say, then, that the systematic omission of anyone science from the catalogue prejudices the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our knowledge altogether, and that, in proportion to its importance. Not even Theology itself, though it comes from heaven, though its

truths were given once for all at the first, though they are more certain on account of the Giver than those of mathematics, not even Theology, so far as it is relative to us, or is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do I exclude from the law to which every mental exercise is subject, viz., from that imperfection, which ever must attend the abstract, when it would determine the concrete. Nor do I speak only of Natural Religion; for even the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ertain of its aspects, that is, its religious teaching, is variously influenced by the other sciences. Not to insist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ristotelic philosophy into its phraseology, its explanation of dogmas is influenced by ecclesiastical acts or events; its interpretations of prophecy are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issues of history; its comments upon Scripture by the conclusions of the astronomer and the geologist; and its casuistical decisions by the various experience, political,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with which times and places are ever supplying it.

因此我要说，在这个目录上系统性地遗漏任何一门学科，都会损害整体知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损害的程度与该学科的重要性成比例。神学源自上天，神学的真理最初就是一次性地给定的，就其给予者而言，神学的真理比数学的真理更加确切。但是，就其与我们的相关度来说，哪怕神学或宗教科学本身，我也不会将它从所有精神活动都必须服从的法则中排除出去，就是说，不能排除那种不完善。任何一门学问，若要确定具体事物，它就必然带有抽象层面的不完善。我也不会只谈自然宗教。从某些方面，也就是宗教教义上看，哪怕罗马天主教的学说也会受到其他学科的各种影响。它并不坚持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引入其措辞，因为它对教义的解释受到教会行动或事件的影响，对预言的诠释直接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它对《圣经》的评述直接受到天文学家和地质学家的结论的影响，其决疑论的决策受到政治、社会和心理学的不同经验的直接影响，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人们还在不断为它提供类似经验。

What Theology gives, it has a right to take; or rather, the interests of Truth oblige it to take. If we would not be beguiled by dreams, if we would ascertain facts as they are, then, granting Theology is a real science, we cannot exclude it, and still call ourselves philosophers. I have asserted nothing as yet as to the pre-eminent dignity of Religious Truth; I only say, if there be Religious Truth at all, we cannot shut our eyes to it without prejudice to truth of every kind, physical, metaphysical, historical, and moral; for it bears upon all truth. And thus I answer the objection with which I opened this Discourse. I supposed the question put to me by a philosopher of the day, “Why cannot you go your way, and let us go ours?” I answer, in the name of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When Newton can dispense with the metaphysician, then may you dispense with us.” So much at first sight; now I am going on to claim a little more for Theology, by classing it with branches of knowledge which may with greater decency be compared to it.

神学给予的，它有权利接纳；毋宁说，对真理的兴趣迫使它不得不接纳。假如我们不耽于迷梦，假如我们弄清事实的本来面目，那么，既然神学是一门真实的学科，我们就无法一边排斥它，一边自称为哲学家。宗教真理的威严昭然若揭，但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就此说上任何一句话。我只想说，假如存在宗教真理这么一个东西，我们若对它视而不见，必然损害其他各类真理，无论是物理的、形而上学的、历史的还是道德的真理。因为宗教真理会对所有真理产生影响。此时，我可以回答本演讲开始时提出的疑问了。我曾假定当今一位哲学家向我提出这样的疑问：“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这有何不可呢？”我这就以宗教科学的名义回答：“假如牛顿可以抛开形而上学者，那你们也可以抛开我们。”初步看来只能这样了。我现在就来为神学做进一步的宣称，我要把它与各门学问归为一类，并以更适当的方式与其他各门学问进行比较。

5 .

5 .

Let us see, then, how this supercilious treatment of so momentous a science, for momentous it must be, if there be a God, runs in a somewhat parallel case. The great philosopher of antiquity, when he would enumerate the causes of the things that take place in the world, after making mention of those which he considered to be physical and material, adds, “and the mind and everything which is by means of man.“ [4_1] Certainly; it would have been a preposterous course, when he would trace the effects he saw around him to their respective sources, had he directed his exclusive attention upon some one class or order of originating principles, and ascribed to these everything which happened anywhere. It would indeed have been unworthy a genius so curious, so penetrating, so fertile, so analytical as Aristotle's, to have laid it down that everything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could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material sciences, without the hypothesis of moral agents. It is incredible that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physical results he could ignore so influential a being as man, or forget that, not only brute force and elemental movement, but knowledge also is power. And this so much the more, inasmuch as moral and spiritual agents belong to another, not to say a higher, order than physical; so that the omission supposed would not have been merely an oversight in matters of detail, but a philosophical error, and a fault in division.

假如上帝存在，神学就一定是极其重要的一门学科。那么我们来

看看，傲慢地对待如此至关重要的一门学科，在相当类似的情形下是如何发生的。古代那位伟大的哲学家，在他列举世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原因时，常常首先提及他所认为的物理及物质的原因，之后增列“意识及人为的一切” [5_1] 原因。如果他把身边见到的一切结果全都追根溯源，如果他专注于某一类或某一个层级的起始原则，而把任何一地发生的一切全都归于这些原则，那一定会是荒谬可笑的做法。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天才，有很强的求知欲，明察秋毫，思想丰富，且善于分析。设若他断言地上万事万物皆可由物质科学加以解释，而不用假设道德主体的存在，那他的天赋一定名不副实。研究有形世界的结果时，假如他忽略像人这样有重大影响力的一个存在，或者只认为强力和基本运动才是力量，而忘记知识也是力量，那可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道德和精神动因即使不高于物理世界，至少也与后者处于不同的层级，因而就更是如此了。所以，刚刚说到的遗漏就不仅仅是细节上的疏忽，而是一种哲理的谬误，一种划分上的缺陷。

However, we live in an age of the world when the career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 is little affected by what was done, or would have been done, by this venerable authority; so, we will suppose, in England or Irel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et of persons of name and celebrity to meet together, in spite of Aristotle, in order to adopt a line of proceeding which they conceive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 render imperative. We will suppose that a difficulty just now besets the enunciation and discussion of all matters of science, in consequence of the extreme sensitiveness of large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clergy and laymen, on the subjects of necessity, responsibility, the standard of morals, and the nature of virtue. Parties run so high, that the only way of avoiding constant quarrelling in defence of this or that side of the question is, in the judgment of the persons I am supposing, to shut up the subject of anthropology altogether. This is accordingly done. Henceforth man is to be as if he were not, in the general course of

Education; the moral and mental sciences are to have no professorial chairs, and the treatment of them is to be simply left as a matter of private judgment, which each individual may carry out as he will. I can just fancy such a prohibition abstractedly possible; but one thing I cannot fancy possible, viz., that the parties in question, after this sweeping act of exclusion, should forthwith send out proposals on the basis of such exclusion for publishing an Encyclopaedia, or erecting a National University.

可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和世界，科学与文学事业已经不受这位可敬权威的所行之事影响了。因此我们料想，尽管有亚里士多德的那些观点，在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或爱尔兰，却会选定一批名人贤达坐下来商定一套行事办法，因为依当时的形势，他们认为这是非做不可的紧要之事。我们推测，当下的困难会让人无法就科学的所有事务进行解释或讨论，因为规模庞大的圣俗各界人士在必要性、责任、道德标准和德行的本性等话题上意见不一，十分敏感。各方情绪甚是激动，根据我所假定的那些人士的看法，想要避免各方为捍卫自身观点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唯一办法就是干脆拿掉人类学这个学科。还真的这么做了。自此以后，在普遍的教育科目中，人的存在就好像根本没这回事，道德与精神学科再不会设专门的教授席位，这些学科仅被当作私人之见而弃之不管，谁有兴趣谁就自己去研究。我只能想象，这样一种禁令理论上有可能。然而，有一样事情我却认为不可能，那就是，在断然排斥了所说的各方之后，还能基于这种排斥行为提出出版百科全书或开办全国性大学的建议。

It is necessary, however, Gentlemen, for the sake of the illustration which I am setting before you, to imagine what cannot be. I say, let us imagine a project for organizing a system of scientific teaching, in which the agency of man in the material world cannot allowably be recognized, and may allowably be

denied.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causes are exclusively to be treated of; volition is a forbidden subject. A prospectus is put out, with a list of sciences, we will say, Astronomy, Optics, Hydrostatics, Galvanism, Pneumatics, Statics, Dynamics, Pure Mathematics, Geology, Botany, Physiology, Anatomy, and so forth; but not a word about the mind and its powers, except what is said in explanation of the omission. That explanation is to the effect that the parties concerned in the undertaking have given long and anxious thought to the subject, and have been reluctantly driven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 is simply impracticable to include in the list of University Lectures the Philosophy of Mind. What relieves, however, their regret is the reflection, that domestic feelings and polished manners are best cultivated in the family circle and in good society, in the observance of the sacred ties which unite father, mother, and child, in the correlative claims and duties of citizenship, in the exercise of disinterested loyalty and enlightened patriotism. With this apology, such as it is, they pass ove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human mind and its powers and works, “in solemn silence,” in their schem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然而诸位，为使我的阐述更清楚，有必要想象一下什么是不可能做的事情。让我们来想象编制一个科学教学体系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人在物质世界里的力量不易确认，却可以否认。它只专注研究物理的与机械的原因，意志力为禁止讲授的课程。然后发出列有各学科的章程，比如天文学、光学、流体静力学、流电学、气体力学、静力学、动力学、纯数学、地质学、植物学、生理学、解剖学等等，但关于意识与意志力却只字不提，只是解释了为什么不开设这些课程。这个解释的大意不过是，参与制订此计划的各方人士已经就此进行长时间的细致思考，最后不得不勉强得出这个结论，即把心灵哲学囊括在大学课程里很不实际。可以令他们的遗憾稍有减轻的是这么一个想法：家庭情感和优雅举止最好在家庭氛围与优良社会中进行熏陶，通

过谨守父母、子女之间的神圣亲情，遵循公民社会的相关权责，保持无私忠诚与激昂的爱国情操便可以做到。有了这样的辩护，他们便以“庄严沉默”的方式，在他们的大学教育计划中，不考虑人类意识及其力量与成就。

Let a charter be obtained for it; let professors be appointed, lectures given, examinations passed, degrees awarded:—what sort of exactness or trustworthiness, what philosophical largeness, will attach to views formed in an intellectual atmosphere thus deprived of some of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daylight? What judgment will foreign countries and future times pass on the labours of the most acute and accomplished of the philosophers who have been parties to so portentous an unreality? Here are professors gravely lecturing on medicine, or history, or political economy, who, so far from being bound to acknowledge, are free to scoff at the action of mind upon matter, or of mind upon mind, or the claims of mutual justice and charity. Common sense indeed and public opinion set bounds at first to so intolerable a licence; yet, as time goes on, an omission which was originally but a matter of expedience, commends itself to the reason; and at length a professor is found, more hardy than his brethren, still however, as he himself maintains, with sincere respect for domestic feelings and good manners, who takes on him to deny psychology *in toto* , to pronounce the influence of mind in the visible world a superstition, and to account for every effect which is found in the world by the operation of physical causes. Hitherto intelligence and volition were accounted real powers; the muscles act, and their action cannot be represented by any scientific expression; a stone flies out of the hand and the propulsive force of the muscle resides in the will; but there has been a revolution, or at least a new theory in philosophy, and our Professor, I say, after speaking with the highest admiration

of the human intellect, limits its independent action to the region of speculation, and denies that it can be a motive principle, or can exercise a special interference, in the material world. He ascribes every work, every external act of man, to the innate force or soul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 He observes that spiritual agents are so mysterious and unintelligible, so uncertain in their laws, so vague in their operation, so sheltered from experience, that a wise man will have nothing to say to them. They belong to a different order of causes, which he leaves to those whose profession it is to investigate them, and he confines himself to the tangible and sure. Human exploits, human devices, human deeds, human productions, all that comes under the scholastic terms of “genius” and “art,” and the metaphysical ideas of “duty,” “right,” and “heroism,” it is his office to contemplate all these merely in their place in the eternal system of physical cause and effect. At length he undertakes to show how the whole fabric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has arisen from the constructive powers of physical elements and physical laws. He descants upon palaces, castles, temples, exchanges, bridges, causeways, and shows that they never could have grown into the imposing dimensions which they present to us, but for the laws of gravitation and the cohesion of part with part. The pillar would come down, the loftier the more speedily, did not the centre of gravity fall within its base; and the most admired dome of Palladio or of Sir Christopher would give way, were it not for the happy principle of the arch. He surveys the complicated machinery of a single day's arrangements in a private family: our dress, our furniture, our hospitable board; what would become of them, he asks, but for the laws of physical nature? Those laws are the causes of our carpets, our furniture, our travelling, and our social intercourse. Firm stitches have a natural power, in proportion to the toughness of the material adopted, to keep together separate portions of cloth; sofas and chairs could not turn upside down, even

if they would; and it is a property of caloric to relax the fibres of animal matter acting through water in one way, through oil in another, and this is the whole mystery of the most elaborate *cuisine* :—but I should be tedious if I continued the illustration.

然后再形成章程，委派教授，安排讲座，布置考试，颁发学位。在如此缺乏光明的智力氛围中形成的观点，会有什么样的严谨，什么样的可信度，什么样的哲理深度可言？对于参与如此怪异的虚幻之物的那些眼光敏锐、成就斐然的哲学家们的劳动成果，其他国家或后世的人们会作何感想？教授们面容严肃地在这里讲授医学、历史或政治经济学，尽管他们自己绝不会承认，却一定会讥笑精神对物质或精神对精神的作用，或嘲笑互利互义、彼此仁爱的宣称。常识与民意一开始会限制如此无法忍受的特权。忽略意志力课程最初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但时间长了就会给理性留下好印象。最后，在众多教授中会出现一位异常强硬之人，虽然他仍然承认对家庭情感和优雅举止抱有真诚的敬意，却自认为有责任全盘否认心理学，并宣布精神对可见世界的影响纯属迷信，并以物理成因的运作来解释在这个世界里发现的一切结果。到目前为止，智力与意志一直被当作真实的力量。肌肉会起作用，这种作用不可以任何科学表达来呈现；石头从手中飞出，肌肉的推进力就在意志当中。但是，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或至少有了一种新的哲学理论，而我们这位教授，在对人类智力怀着最大敬意发表了一番讲话后，却把智力的独立作用限制在思辨的范围内，并否认它能够成为一个动力原则，亦无法在有形世界里施加特别的扰动。人的一切作为，人的每一个外在行为，这位教授都归因于物理宇宙的内在力量或灵魂。他认为，精神主体如此神秘难解，其法则如此不确定，其运作如此模糊，如此难于体验，但凡明智之人都不会就此乱说话。他认为它们属于不同层级的原因，应当由专业人士去了解，而他则将自己限制在可感触的确切事物之内。人类的壮举、发明的器具、成就、制造出来的产品，所有归在“天赋”和“艺术”等学术名词和“职责”、“权利”及“英雄主义”等形而上学概念下的东西，他都有责任将其归并于物理因果律这一永恒法则之中再加以思考。最终，他决心要说明，物质

文明的全部经纬都源自物理要素与物理法则的建构力量。他谈到宫殿、古堡、圣殿、市场、桥梁、堤道，说如果不是引力和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凝聚法则，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可能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如此壮观的模样。假如没有引力中心为基础，则支柱越高就垮得越快。如果不是拱门的巧妙原理，则帕拉迪奥或克里斯朵夫爵士设计的穹顶也会崩塌。他研究普通人家一天的日常安排中涉及的种种复杂工具，包括我们的服装、家具、可口的膳食。他问，假如没有物质自然界的种种法则，这些个东西会是什么样子呢？那些法则就是我们的地毯、家具、旅行和社会交往的原因。结实的针法中蕴含与所用材料的硬度呈比例的自然力量，因此能将几块布料缝合起来。沙发与椅子哪怕愿意也不能自己翻个底朝天。动物材料的纤维以一种方式通过水的作用发生松解，以另一种方式通过油的作用松解，这是热量的一种性质，极精美的烹饪中就隐藏着这样的秘密。例子再举下去，就显得我啰嗦了。

6．

6．

Now, Gentlemen, pray understand how it is to be here applied. I am not supposing that the principles of Theology and Psychology are the same, or arguing from the works of man to the works of God, which Paley has done, which Hume has protested against. I am not busying myself to prove the existence and attributes of God, by means of the Argument from design. I am not proving anything at all about the Supreme Being. On the contrary, I am assuming His existence, and I do but say this:—that, man existing, no University Professor, who had suppressed in physical lectures the idea of volition, who did not take volition for granted, could escape a one-sided, a radically false view of the things which he discussed; not

indeed that his own definitions, principles, and laws would be wrong, or his abstract statements, but his considering his own study to be the key of everything that takes place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and his passing over anthropology, this would be his error. I say, it would not be his science which was untrue, but his so-called knowledge which was unreal. He would be deciding on facts by means of theories. The various busy world, spread out before our eyes, is physical, but it is more than physical; and, in making its actual system identical with his scientific analysis, formed on a particular aspect, such a Professor as I have imagined was betraying a want of philosophical depth, and an ignorance of what an University Teaching ought to be. He was no longer a teacher of liberal knowledge, but a narrow-minded bigot. While his doctrines professed to be conclusions formed upon an hypothesis or partial truth, they were undeniable; not so if they professed to give results in facts which he could grasp and take possession of. Granting, indeed, that a man's arm is moved by a simple physical cause, then of course we may dispute about the various external influences which, when it changes its position, sway it to and fro, like a scarecrow in a garden; but to assert that the motive cause *is* physical, this is an assumption in a case, when our question is about a matter of fact, not about the logical consequences of an assumed premiss. And, in like manner, if a people prays, and the wind changes, the rain ceases, the sun shines, and the harvest is safely housed, when no one expected it, our Professor may, if he will, consult the barometer, discourse about the atmosphere, and throw what has happened into an equation, ingenious, even though it be not true; but, should he proceed to rest the phenomenon, in matter of fact, simply upon a physical cause, to the exclusion of a divine, and to say that the given case actually belongs to his science because other like cases do, I must tell him, *Ne sutor ultra crepidam* : he is making his particular craft usurp and occupy the universe.

This then is the drift of my illustration. If the creature is ever setting in motion an endless series of physical causes and effects, much more is the Creator; and as our excluding volition from our range of ideas is a denial of the soul, so our ignoring Divine Agency is a virtual denial of God. Moreover, supposing man can will and act of himself in spite of physics, to shut up this great truth, though one, is to put our whole encyclopædia of knowledge out of joint; and supposing God can will and act of Himself in this world which He has made, and we deny or slur it over, then we are throwing the circle of universal science into a like, or a far worse confusion.

希望诸位能理解这事与我们的话题有何关联。我并非假定神学与心理学的原理是一样的，也没有根据人的作为推断上帝的作为，这件事帕雷神父做过，休谟曾予以反驳。我无意借助设计论证来证明神的存在和属性。关于这个终极存在，我根本不打算做任何证明。反过来，我假定上帝的存在，且只说这句话：只要人存在，哪怕那位大学教授曾在物理课堂上压制意志的理念，哪怕他并不以为意志一定存在，他都无法逃避对他所说之事的片面和极端错误的观点。并不是说他自己的定义、原理和法则就一定有错，也不是说他的抽象表述是错的，但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地球表面一切事物发生的关键，并且回避人类学，这才是错误所在。我要说，并不是他的学科不正确，而是他的所谓学识不真实。他只是根据理论来判定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它是物质的，但又不仅如此。为使这个世界实际的系统符合他基于某个特定层面的科学分析，我想象中的那位教授就暴露出他在哲理上的肤浅和对大学教育应当如何的无知。他不再是讲授通识知识的师者，而是沦为心胸狭隘的偏执狂。一旦他的学说被认同为基于一个假说或部分真理而形成的结论，那就无可辩驳；假如这些学说被证明能为他可以把握并控制的事实提供结论，那就不是如此了。的确，假定一个人的胳膊由一个简单的物理原因促动，那么，当这胳膊像菜园里的稻草人一样来回晃动时，我们当然会就各种各样的外部影响力进行争论。但是，要确定动因是物理的，那就是一例假

定了，此时我们的问题有关于事实，而非假定前提的逻辑结果。同样，假如一个民族祷告，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风向变了，雨停了，太阳出来了，收割的庄稼也顺利归仓，此时，我们这位教授有可能去看看气压计，发表一通大气理论，将上述发生的事情归入一个方程，尽管这方程可能不正确，但仍然极有创意。但假如他继续把这个现象简单地归于某一物理原因而排除属神的因素，而且说上例实际符合他的科学，因为其他类似案例亦是如此，那我就必须告诉他，他这是在以一己之长篡夺与占有全宇宙。这就是我所试图说明的。如果造物都可以启动无穷无尽的物理的因果系列，那造物主就更能如此了；正如将意志排除在概念范围之外就是对灵魂存在的否认，那么忽略神圣代理几乎就是对上帝的否认。再者，假定人可违背物理学的原理而产生自我意志并行动，禁闭这条伟大的真理，哪怕只有一例，也会使知识的百科全书全盘散架；而假定上帝能够在他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里自行其是，而我们对此进行否认或态度模糊，那会使普遍的科学界堕入类似的、甚至更糟糕的混乱之中。

Worse incomparably, for the idea of God, if there be a God, is infinitely higher than the idea of man, if there be man. If to blot out man's agency is to deface the book of knowledge, on the supposition of that agency existing, what must it be, supposing it exists, to blot out the agency of God? I have hitherto been engaged in showing that all the sciences come to us as one, that they all relate to one and the same integral subject-matter, that each separately is more or less an abstraction, wholly true as an hypothesis, but not wholly trustworthy in the concrete, conversant with relations more than with facts, with principles more than with agents, needing the support and guarantee of its sister sciences, and giving in turn while it takes:—from which it follows, that none can safely be omitted, if we would obtain the exactest knowledge possible of things as they are, and that the omission is more or less important, in proportion to the field which each covers, and the depth to which it penetrates,

and the order to which it belongs; for its loss is a positive privation of an influence which exerts itself in the correction and completion of the rest. This is a general statement; but now as to Theology in particular, what, in matter of fact, are its pretensions, what its importance, what its influence upon other branches of knowledge, supposing there be a God, which it would not become me to set about proving? Has it vast dimensions, or does it lie in a nutshell? Will its omission be imperceptible, or will it destroy the equilibrium of the whole system of Knowledge? This is the inquiry to which I proceed.

假如存在上帝，假如存在人，上帝的观念比人的观念高到无限，这混乱糟糕到不堪比拟的程度。假如推定人的代理存在而又抹去这代理，是在污损知识之书的话，那么，假定神的代理存在又抹去这代理，会是什么样的情境呢？我一直在说明，所有的学科都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们都与一个相同的、不可分割的主题相关。单独来看，每门学科或多或少显得抽象，作为一种假说是完全真实的，但在具体事物中却并非完全可靠，因为此时需精熟于关系而非事实，通晓原则而非代理，各自都需要并存学科的支持与保证，有所取也有所舍：据此可以说，假如要获取可能获得的事物本身最为精确的知识，那对任何一门学科的忽略都不安全，这种忽略的重要程度，与各门学科涵盖的领域、研究的深度和所属的层级成正比。少了任何一门学科，就肯定缺少了会修正和完善其余学科的一股积极的影响力。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说法，至于具体的神学，神存在与否自不适合我来证明。但假定神存在，就事实而言，神学都有哪些主张，有何等重要性，对其他知识分支又有何种影响呢？神学是领域深广，还是一目了然？忽略神学是无关痛痒，还是会破坏整个知识体系的平衡？这就是我接下来要探究的问题。

7．

7 .

Now what is Theology? First, I will tell you what it is not. And here, in the first place (though of course I speak on the subject as a Catholic), observe that, strictly speaking, I am not assuming that Catholicism is true, while I make myself the champion of Theology. Catholicism has not formally entered into my argument hitherto, nor shall I just now assume any principle peculiar to it, for reasons which will appear in the sequel, though of course I shall use Catholic language. Neither, secondly, will I fall into the fashion of the day, of identifying Natural Theology with Physical Theology; which said Physical Theology is a most jejune study, considered as a science, and really is no science at all, for it is ordinarily nothing more than a series of pious or polemical remarks upon the physical world viewed religiously, whereas the word "Natural" properly comprehends man and society, and all that is involved therein, as the great Protestant writer, Dr. Butler, shows us. Nor, in the third place, do I mean by Theology polemics of any kind; for instance, what are called "the Evidences of Religion," or "the Christian Evidences;" for, though these constitute a science supplemental to Theology and are necessary in their place, they are not Theology itself, unless an army is synonymous with the body politic. Nor, fourthly, do I mean by Theology that vague thing called "Christianity," or "our common Christianity," or "Christianity the law of the land," if there is any man alive who can tell what it is. I discard it, for the very reason that it cannot throw itself into a proposition. Lastly, I do not understand by Theology, acquaintance with the Scriptures; for, though no person of religious feelings can read Scripture but he will find those feelings roused, and gain much knowledge of history into the bargain, yet historical reading and

religious feeling are not science. I mean none of these things by Theology, I simply mean the Science of God, or the truths we know about God put into system; just as we have a science of the stars, and call it astronomy, or of the crust of the earth, and call it geology.

那到底什么是神学呢？首先，我要说什么不是神学。在此，首先（我当然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来说这番话的）请注意，严格来说，尽管我在此为神学辩护，却并没有假定天主教的教义就一定是正确的。迄今为止，天主教教义还没有正式进入我的论证，我目前也没有打算假定任何仅适用于它的原则，其中原因随后自会表明。不过，我会采用天主教的用语。其次，我也不会跟随当今潮流而把自然神学等同于物理神学。当今盛行的观点是物理神学是最无聊的一种研究，虽被看作一门学科，实际根本不是，因为从宗教视角看，它通常不过就是对物理世界做出的一堆虔诚或强辞夺理的评价罢了。而“自然”这个词，正如伟大的新教作家巴特勒博士所言，应当包括人和社会及其所涉及的一切。第三，我所说的神学并非任何意义上的辩论术，比如不是所谓的“宗教证据”或“基督徒的证据”。尽管这些内容构成一门可补充神学的学科，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必要的，可它们并非神学本身，除非我们说军队与政体同义。第四，我所说的神学亦非被称为“基督教”或“我们共同的基督教”或“作为国家大法的基督教”这样的模糊概念，因为在世的任何人都说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摒弃这种概念，就是因为它不符合任何一个命题。最后，我并不认为神学就是对《圣经》的熟知。尽管怀有宗教情感的人读《圣经》时都会发现这样的情感愈发浓烈，并因此而获取更多历史知识，但历史解读和宗教情感并不是科学。所有这些，都不是我所认为的神学。神学就是关于神的科学，是将我们所知关于上帝的真理归纳成的体系，正如我们把关于恒星的科学称为天文学，或把关于地壳的一门科学称为地质学一样。

For instance, I mean, for this is the main point, that, as in the

human frame there is a living principle, acting upon it and through it by means of volition, so, behind the veil of the visible universe, there is an invisible, intelligent Being, acting on and through it, as and when He will. Further, I mean that this invisible Agent is in no sense a soul of the world, after the analogy of human nature, but, on the contrary, is absolutely distinct from the world, as being its Creator, Upholder, Governor, and Sovereign Lord. Here we are at once brought into the circle of doctrines which the idea of God embodies. I mean then by the Supreme Being, one who is simply self-dependent, and the only Being who is such; moreover, that He is without beginning or Eternal, and the only Eternal; that in consequence He has lived a whole eternity by Himself; and hence that He is all-sufficient, sufficient for His own blessedness, and all-blessed, and ever-blessed. Further, I mean a Being, who, having these prerogatives, has the Supreme Good, or rather is the Supreme Good, or has all the attributes of Good in infinite intenseness; all wisdom, all truth, all justice, all love, all holiness, all beautifulness; who is omnipotent, omniscient, omnipresent; ineffably one, absolutely perfect; and such, that what we do not know and cannot even imagine of Him, is far more wonderful than what we do and can. I mean One who is sovereign over His own will and actions, though always according to the eternal Rule of right and wrong, which is Himself. I mean, moreover, that He created all things out of nothing, and preserves them every moment, and could destroy them as easily as He made them; and that, in consequence, He is separated from them by an abyss, and is incommunicable in all His attributes. And further, He has stamped upon all things, in the hour of their creation, their respective natures, and has given them their work and mission and their length of days, greater or less, in their appointed place. I mean, too, that He is ever present with His works, one by one, and confronts every thing He has made by His particular and most loving Providence, and manifests Himself to

each according to its needs: and has on rational beings imprinted the moral law, and given them power to obey it, imposing on them the duty of worship and service, searching and scanning them through and through with His omniscient eye, and putting before them a present trial and a judgment to come.

鉴于这是重点所在，让我来打个比方。正如在人体中存在一种生存原则，它可以通过意志力经人体产生作用，在可见宇宙的帷幕背后，也有一种看不见的、智慧的存在，它对宇宙产生作用，通过并任由它自己的意志作用于这宇宙。进一步说，我的意思是，这位看不见的代理者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宇宙之魂，不能拿人性打比方，正好相反，它与这宇宙绝对不同，因为它是宇宙的创造者、维系者、治理者和至高无上的主宰。在此，我们立即进入上帝观念所形成的教义圈子。因此我所说的终极存在的意思，就是指这位完全自立而且只有他才是如此的一种存在。另外还指，他并不存在开始，或者说他是永恒的，且是唯一的永恒，因此一直都活在自有的永恒里。所以，他是完全自足的，足以为他自身和所有造物提供至福。再进一步，我指的是这样一种存在，拥有这些特权，它就拥有至善，或不如说它就是至善，或说它拥有无限深远的善的属性。它有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真理，全部的公义，全部的爱，全部的神圣性，全部的美好。它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是难以言喻的“一”，绝对的完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了解他，甚至也无法想象他，他远比我们能够了解和想象的更加令人惊奇。我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可主宰其自身意旨与行为的“一”，尽管他的依据总是善恶的永恒法则，即他自身。我还指，他从无中生成万物，时刻护持，且可以像当初造就万物一样轻易就毁掉所有。正是这个原因，他与万物隔着无尽鸿沟，他的全部属性也无法得以表述。再者，他在创造万物时又刻下烙印，规定万物的本性，确定其功用与使命，以及在指定的位置存在的时间，或长或短。我还指，他永远驻存于一切造物，一一相随，使他造就的万物直面其独特的、最具爱心的神意，照造物所需显现其自身。他在理性造物那里刻下道德法则的印记，赋予其能力遵循这法则，并把崇拜与侍奉的职责

施加于他们，以无所不知的姿态不断捡选与看顾众人，使其面对当前的考验与来世的审判。

Such is what Theology teaches about God, a doctrine, as the very idea of its subject-matter presupposes, so mysterious as in its fulness to lie beyond any system, and in particular aspects to be simply external to nature, and to seem in parts even to be irreconcileable with itself, the imagination being unable to embrace what the reason determines. It teaches of a Being infinite, yet personal; all-blessed, yet ever operative; absolutely separate from the creature, yet in every part of the creation at every moment; above all things, yet under everything. It teaches of a Being who, though the highest, yet in the work of creation, conservation, government, retribution, makes Himself, as it were, the minister and servant of all; who, though inhabiting eternity, allows Himself to take an interest, and to have a sympathy, in the matters of space and time. His are all beings, visible and invisible, the noblest and the vilest of them. His are the substance, and the operation, and the results of that system of physical nature into which we are born. His too are the power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intellectual essences, on which He has bestowed an independent action and the gift of origination. The laws of the universe, the principles of truth, the relation of one thing to another, their qualities and virtues, the order and harmony of the whole, all that exists, is from Him; and, if evil is not from Him, as assuredly it is not, this is because evil has no substance of its own, but is only the defect, excess, perversion, or corruption of that which has substance. All we see, hear, and touch, the remote sidereal firmament, as well as our own sea and land, and the elements which compose them, and the ordinances they obey, are His. The primary atoms of matter, their properties, their mutual action, their disposition and collocation, electricity,

magnetism, gravitation, light, and whatever other subtle principles or operations the wit of man is detecting or shall detect, are the work of His hands. From Him has been every movement which has convulsed and re-fashioned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The most insignificant or unsightly insect is from Him, and good in its kind; the ever-teeming, inexhaustible swarms of animalculæ, the myriads of living motes in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the restless ever-spreading vegetation which creeps like a garment over the whole earth, the lofty cedar, the umbrageous banana, are His. His are the tribes and families of birds and beasts, their graceful forms, their wild gestures, and their passionate cries.

这就是神学讲授的神，正如这个研究主题的观念本身所假定的，这样一个教义就整体而言如此神秘，使之超出任何一个体系，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它完全外在于自然，在某些部分它甚至无法与自身达成一致，因想象力无法包含理性所确定的一切。神学讲授的是一种无限存在，但他又具备人格；他享有至福，但又运作于人世；他与造物相隔无限，但时时刻刻又在其中；他在一切之上，又支撑一切。神学讲授的是这样一位存在者，尽管至高无上，却在造物、护持、治理、报应之功里，可以说，他是万民的指引与仆从。尽管居于永恒之中，却又能让自己对时空中的事务产生兴趣并抱有同情。可见与不可见的万物都是他的造物，最高贵与最低贱的莫不如此。一切有形的实体及其运行，以及由此形成的这个我们诞生其中的宇宙都是他的造物。他赋予智性造物独立作为与创造天赋的能力，由此产生的力量与成就也是他的造物。宇宙的法则、真理的原则、事物的联系、万物的特性与德行、宇宙整体的秩序与和谐、存在着的一切，皆源自于他。如果说恶并非来自于他，的确也不是源自于他，是因为恶本身并非实存，而是其缺陷、泛滥、误用或堕落具备实质。我们所见、所听、所接触的一切、遥远的星空及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海洋与陆地，还有构成这一切的元素及它们遵循的法则，皆是他的造物。物质的基本原子、其特性、其相互作用、其调配与安置、电能、磁力、万有引力、光及人的智慧

正在或将要检测到的其他任何微妙原理或运作，都是他的杰作。震撼或重塑地表的一切运动，莫不源自于他。最不起眼或难看的昆虫也源自于他，且自有它的益处。丰富多产、层出不穷的成群生物，肉眼看不见的万千微小活物，一刻不停地四处蔓延、无边无际、像衣服一样盖住大地的植被，高耸入云的雪松和多荫的香蕉树，都是他的造物。鸟群与兽类，或体态优美，或动作狂野，或鸣声奔放，都是他的造物。

And so in the intellectual, mo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world. Man, with his motives and works, his languages, his propagation, his diffusion, is from Him. Agriculture, medicine, and the arts of life, are His gifts. Society, laws, government, He is their sanction. The pageant of earthly royalty has the semblance and the benediction of the Eternal King. Peace and civilization, commerce and adventure, wars when just, conquest when humane and necessary, have His cooperation, and His blessing upon them. The course of events, the revolution of empires,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s, the periods and eras, the progresses and the retrogressions of the world's history, not indeed the incidental sin, over-abundant as it is, but the great outlines and the results of human affairs, are from His disposition. The elements and types and seminal principles and constructive powers of the moral world, in ruins though it be, are to be referred to Him. He “enlighteneth every man that cometh into this world.” His are the dictates of the moral sense, and the retributive reproaches of conscience. To Him must be ascribed the rich endowments of the intellect, the irradiation of genius,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oet, the sagacity of the politician, the wisdom (as Scripture calls it), which now rears and decorates the Temple, now manifests itself in proverb or in parable. The old saws of nations, the majestic precepts of philosophy, the luminous maxims of law, the oracles of individual wisdom, the traditionary rules of

truth, justice, and religion, even though imbedded in the corruption, or alloyed with the pride, of the world, betoken His original agency, and His long-suffering presence. Even where there is habitual rebellion against Him, or profound far-spreading social depravity, still the undercurrent, or the heroic outburst, of natural virtue, as well as the yearnings of the heart after what it has not, and its presentiment of its true remedies, are to be ascribed to the Author of all good. Anticipations or reminiscences of His glory haunt the mind of the self-sufficient sage, and of the pagan devotee; His writing is upon the wall, whether of the Indian fane, or of the porticoes of Greece. He introduces Himself, He all but concurs, according to His good pleasure, and in His selected season, in the issues of unbelief, superstition, and false worship, and He changes the character of acts by His overruling operation. He condescends, though He gives no sanction, to the altars and shrines of imposture, and He makes His own fiat the substitute for its sorceries. He speaks amid the incantations of Balaam, raises Samuel's spirit in the witch's cavern, prophesies of the Messias by the tongue of the Sibyl, forces Python to recognize His ministers, and baptizes by the hand of the misbeliever. He is with the heathen dramatist in his denunciations of injustice and tyranny, and his auguries of divine vengeance upon crime. Even on the unseemly legends of a popular mythology He casts His shadow, and is dimly discerned in the ode or the epic, as in troubled water or in fantastic dreams. All that is good, all that is true, all that is beautiful, all that is beneficent, be it great or small, be it perfect or fragmentary, natural as well as supernatural, moral as well as material, comes from Him.

智性、道德、社会与政治世界，都莫不如此。人类，连同其动机与作为、他的语言、他的繁殖及扩散，皆源自于上帝。农业、医学及生活的艺术，皆是上帝的恩赐。社会、法律、政府，这一切的核准都

是上帝。尘世王权的显耀，仅是那位永恒之王的造物与恩赐。和平与文明、商业与探险、正义的战争与人道和必要的征服，都有上帝的帮助和祝福。世事的变迁、帝国的轮转、城邦的兴亡、朝代的更替与世界历史的进退，偶然的过错确实十分严重，但是人类事务中的宏大轮廓与结果都出自上帝的部署。道德世界的要素与类型及基本原则和构造力，尽管会遭到严重破坏，都要向他报告。“开导一切世人”道德观念的指令和良知惩罚性的责备，是他的造物。智力的丰富天赋、才智的发挥、诗人的想象力、政客的睿智、支撑与装点圣殿并反映在谚语或寓言中的智慧之言（圣经所说的），全都归功于他。各国流传的谚语、哲学中的庄严警句、律法中的闪光箴言、智者的预言、真理、公义与宗教的传统规则，即便掺进了世人堕落的成分，或混杂了世人的傲慢，也象征着上帝原始的意愿，还有他坚忍不弃的临在。哪怕在惯于背叛他的地方，或在社会性堕落深远而广泛的处所，自然美德的潜流或猛然爆发，心灵对所缺乏的事物怀有的渴望，以及对于真正补救措施的预知，都要归功于上帝。自信的圣哲和异教的信徒，他们的脑海里时常萦绕着对上帝荣耀的期盼与回忆，他的话语刻在墙壁上，不论是在印度的神庙，还是希腊的柱廊。他推介自身，他根据自己的美意，在选定的时日对不信、迷信和错误崇拜的事情听之任之，他通过推翻一切的运作改变行为的性质。他听任骗人的祭坛与神龛存在，即使从未予以核准。他自己颁行的律令被骗子玩弄的法术替代。他在巴兰的咒语里发声，将撒母耳的魂从交鬼女巫的洞穴里召唤起来，借女巫之口预言梅西亚斯的到来，迫使巨蟒辨认他的牧者，借异教徒的手施行洗礼。他与异教的剧作家一样谴责不公与暴政，并预言会有对罪行的神圣复仇。他的身影甚至出现在流行神话很不得体的传奇中，在颂诗或史诗中也依稀可见，如同在怒海或奇异的梦中。一切的善，一切的真，一切的美，一切的善行，无论大小，无论完满或是零碎，无论自然还是超自然，无论精神或是物质，全都来自于他。

8．

8．

If this be a sketch, accurate in substance and as far as it goes, of the doctrines proper to Theology, and especially of the doctrine of a particular Providence, which is the portion of it most on a level with human sciences, I cannot understand at all how, supposing it to be true, it can fail, considered as knowledge, to exert a powerful influence on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every intellectual creation or discovery whatever. I cannot understand how it is possible, as the phrase goes, to blink the question of its truth or falsehood. It meets us with a profession and a proffer of the highest truths of which the human mind is capable; it embraces a range of subjects the most diversified and distant from each other. What science will not find one part or other of its province traversed by its path? What results of philosophic speculation are unquestionable, if they have been gained without inquiry as to what Theology had to say to them? Does it cast no light upon history? has it no influence upon the principles of ethics? is it without any sort of bearing on physics, metaphys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Can we drop it out of the circle of knowledge, without allowing, either that that circle is thereby mutilated, or on the other hand, that Theology is really no science?

假如这些作为一种简述，在其内容和范围内保持准确，适用于神学的那些教义，尤其是那种最适合人类科学的特别神意，那我就完全无法理解，假定神学是真切的，被视作知识，又怎么没能对哲学、文学及每一项智力创造和发现施加有力的影响呢？我无法明白，正如常说的那样，怎么能对其真伪问题闪烁其辞呢？神学以宣称为我们提供人类意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真理，它所包含的广泛学科种类繁多且相互远隔。哪有一门学科不会发现其某一部分被神学的轨迹所掠过？如果哲理思辨的结果是在罔顾神学在其中的作用下获得的，这些结果难道

不值得怀疑？难道它不能对史学有所启示？它对伦理学的原理没有丝毫影响吗？它对物理学、形而上学和政治学没有任何影响吗？假如我们将它排斥在知识界之外，那我们能否一方面不承认知识界因此遭到肢解，而另一方面又不承认神学是真正的学科？

And this dilemma is the more inevitable, because Theology is so precise and consistent in its intellectual structure. When I speak of Theism or Monotheism, I am not throwing together discordant doctrines; I am not merging belief, opinion, persuasion, of whatever kind, into a shapeless aggregate, by the help of ambiguous words, and dignifying this medley by the name of Theology. I speak of one idea unfolded in its just proportions, carried out upon an intelligible method, and issuing in necessary and immutable results; understood indeed at one time and place better than at another, held here and there with more or less of inconsistency, but still, after all, in all times and places, where it is found, the evolution, not of half-a-dozen ideas, but of one.

这个两难困局更加不可避免，因为神学的知识结构与其如此之精准一致。当我说起有神论或一神论时，并没有把彼此不合的一些教义拼凑在一起，并没有借助模棱两可的词语将任一信仰、意见和信念杂合起来汇成一个不成形的整体，并以神学的名义为这个大杂烩增添威严。我谈到的这个观念，它以恰当的比例得以展开，以明了的方式得以贯彻，并导致必然和不变的结果。虽然此时此地比彼时彼地更易于理解，这里那里多少有些理解上的不一致，但毕竟，在发现这观念的每时每地，得到演化的就只有这一个观念，而非五、六个。

9．

9 .

And here I am led to another and most important point in the argument in its behalf,—I mean its wide reception. Theology, as I have described it, is no accident of particular minds, as are certain systems, for instance, of prophetical interpretation. It is not the sudden birth of a crisis, as the Lutheran or Wesleyan doctrine. It is not the splendid development of some uprising philosophy, as the Cartesian or Platonic. It is not the fashion of a season, as certain medical treatments may be considered. It has had a place, if not possession, in the intellectual world from time immemorial; it has been received by minds the most various, and in systems of religion the most hostile to each other. It has *primâ facie* claims upon us, so imposing, that it can only be rejected on the ground of those claims being nothing more than imposing, that is, being false. As to our own countries, it occupies our language, it meets us at every turn in our literature, it is the secret assumption, too axiomatic to be distinctly professed, of all our writers; nor can we help assuming it ourselves, except by the most unnatural vigilance. Whoever philosophizes, starts with it, and introduces it, when he will, without any apology. Bacon, Hooker, Taylor, Cudworth, Locke, Newton, Clarke, Berkeley, and Butler, and it would be as easy to find more, as difficult to find greater names among English authors, inculcate or comment upon it. Men the most opposed, in creed or cast of mind, Addison and Johnson, Shakespeare and Milton, Lord Herbert and Baxter, herald it forth. Nor is it an English or a Protestant notion only; you track it across the Continent, you pursue it into former ages. When was the world without it? Have the systems of Atheism or Pantheism, as sciences, prevailed in the literature of nations, or received a formation or attained a completeness such as Monotheism? We find it in old Greece, and

even in Rome, as well as in Judea and the East. We find it in popular literature, in philosophy, in poetry, as a positive and settled teaching, differing not at all in the appearance it presents, whether in Protestant England, or in schismatical Russia, or in the Mahometan populations, or in the Catholic Church. If ever there was a subject of thought, which had earned by prescription to be received among the studies of a University, and which could not be rejected except on the score of convicted imposture, as astrology or alchemy; if there be a science anywhere, which at least could claim not to be ignored, but to be entertained, and either distinctly accepted or distinctly reprobated, or rather, which cannot be passed over in a scheme of universal instruction, without involving a positive denial of its truth, it is this ancient, this far-spreading philosophy.

在此，我想到代表它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指对它的广泛接受。如我之前描述过的，神学并非某些特定思想的偶然产物，它跟比如预言诠释等系统学问不一样。它并不像路德或卫斯理教义一样，是危机的意外产物。它也不像笛卡尔哲学或柏拉图哲学，是某种突起的哲学炫目的新发展。它不像那些医学治疗，是一时的风尚。它自远古以来就在智力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哪怕并非盘踞不让。它为最为广泛不同的思想、彼此仇视的宗教制度所接受。它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有初始证据的支持，如此之确切，除非能说明证据是假的，否则根本无法拒绝。至于说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它占据了我们的语言，充斥于我们的文学，是我们所有作家的秘密设想，作为公理而无须专门表述。除非出自一种不自然的警觉性，否则我们也禁不住引为当然。凡是进行哲理思考的人，都由它开始，并在愿意的时候介绍它，无须指明理由。培根、胡克、泰勒、卡德沃思、洛克、牛顿、克拉克、贝克莱和巴特勒都讲授或评论过神学，找出更多这样的英国作家之容易，就如发现比他们更伟大的英国作家之困难。无论从信条还是性情来说遭反对最多的人，如艾狄森和约翰逊、莎士比亚和弥米顿、赫伯特伯爵和

巴克斯特，都曾预告神学的到来。神学也不只是一个英国概念，其可以追溯至欧洲大陆；它也不是一个新教观念，其可以追溯至更前面的时代。什么时候这个世界是没有神学的？作为科学，无神论或泛神论体系可曾盛行于各国文学，获得类似一神论的构造或同样的完备水平？我们在古希腊甚至罗马发现它，在犹地亚（地区）和东方也发现它。在流行文学、哲学与诗歌中，我们发现它是作为一门固定与常备的学问，无论在信新教的英格兰还是在分裂的俄国，无论在伊斯兰教徒中还是在罗马天主教内，它的外在表现丝毫不差。只要存在有关思想的课题，它由于惯例而被接纳为大学的研究对象，且除了占星术或炼金术这样确定无疑的骗术以外无法排斥；假如任何地方存在一门科学，至少可以要求不被忽视，而应认真对待，无论是确实予以接受还是坚拒不纳，或者说它决不能为通识教育所忽略，除非对其真理性进行确认的否定。这就是古老的、传播久远的哲学。

10．

10．

And now, Gentlemen, I may bring a somewhat tedious discussion to a close. It will not take many words to sum up what I have been urging. I say then, if the various branches of knowledge, which are the matter of teaching in a University, so hang together, that none can be neglecte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rest, and if Theology be a branch of knowledge, of wide reception, of philosophical structure, of unutterable importance, and of supreme influence, to what conclusion are we brought from these two premisses but this? that to withdraw Theology from the public schools is to impair the completeness and to invalidate the trustworthiness of all that is actually taught in them.

现在，请诸位让我对这多少有些冗长的讨论作结。我一直想要说明的意思，总结起来仅只需要几句话。这样说吧，知识的各个分支在大学里属于教学事务，假如它们彼此这样联结在一起，忽略其中之一便会危害其余分支的完善。假如神学是知识的一个分支，它被广为接受，有自己的哲理结构，具备说不尽的重要性，形成极大的影响力。那么在这两个前提之下，我们除了以下还能得出别的什么结论呢：从公立学校里排除神学，就是损害学校教育的完整性，并使其失去可信性。

But I have been insisting simply on Natural Theology, and that, because I wished to carry along with me those who were not Catholics, and, again, as being confident, that no one can really set himself to master and to teach the doctrine of an intelligent Creator in its fulness, without going on a great deal farther than he at present dreams. I say, then, secondly:—if this Science, even as human reason may attain to it, has such claims on the regard, and enters so variously into the objects, of the Professor of Universal Knowledge, how can any Catholic imagine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him to cultivate Philosophy and Science with due attention to their ultimate end, which is Truth, supposing that system of revealed facts and principles, which constitutes the Catholic Faith, which goes so far beyond nature, and which he knows to be most true, be omitted from among the subjects of his teaching?

可是，我一直只是在坚持自然神学，之所以如此，是希望并非天主教徒的人也听我说下去，且坚信，除非超越目前能够梦想的境地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否则谁也无法真正掌握和讲授关于智慧造物者的学说。 其次， 就算人类理性能够达到神学的高度，这门学科要求得到讲授普遍知识的教授的重视， 并且成为教授们研究的对象， 那么，

如果被揭示的事实和原理构成的这样一个体系，就是构成天主教信仰、远远超出自然之上且天主教徒认为真实无比的东西，被他讲授的各个学科剔除，他怎么会异想天开地以为他能去耕耘哲学与科学，同时又对其终极目标，即真理，予以恰当关注呢？

In a word, Religious Truth is not only a portion, but a condition of general knowledge. To blot it out is nothing short, if I may so speak, of unravelling the web of University Teaching. It is, according to the Greek proverb, to take the Spring from out of the year; it is to imitate the preposterous proceeding of those tragedians who represented a drama with the omission of its principal part.

总之，宗教真理不仅是普遍知识的一部分，而且是其条件。可以说，剔除神学就是在拆散大学教育之网。根据希腊谚语，这无异于把春季从一年四季中拿掉，就如同一些悲剧作家的荒唐之举，把戏剧的主要部分删除了。

[4_1].Arist. Ethic. Nicom., iii. 3.

[5_1].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赫伦理学》第三章，第三页。

Discourse 4. Bearing of Other Branches of Knowledge on Theology

第四讲：其他知识分支对神学的影响

1．

1．

Nothing is more common in the world at large than to consider the resistance, made on the part of religious men, especially Catholics, to the separation of Secular Education from Religion, as a plain token that there is some real contrariety between human science and Revelation. To the multitude who draw this inference, it matters not whether the protesting parties avow their belief in this contrariety or not; it is borne in upon the many, as if it were self-evident, that religious men would not thus be jealous and alarmed about Science, did they not feel instinctively, though they may not recognize it, that knowledge is their born enemy, and that its progress, if it is not arrested, will be certain to destroy all that they hold venerable and dear. It looks to the world like a misgiving on our part similar to that which is imputed to our refusal to educate by means of the Bible only; why should you dread the sacred text, men say, if it be not against you? And in like manner, why should you dread secular education, except that it is against you? Why impede the circulation of books which take religious views opposite to your own? Why forbid your children and scholars the free perusal of poems or tales or essays or other light literature which you fear would unsettle their minds? Why oblige them to

know these persons and to shun those, if you think that your friends have reason on their side as fully as your opponents? Truth is bold and unsuspicious; want of self-reliance is the mark of falsehood.

有宗教信仰的人士，尤其是天主教徒，抵制世俗教育与宗教的分离。而世人视此抵制为明显标志，说明人类科学与启示真理之间存在某种真实矛盾，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对得出此推断的多数人而言，表示抗议的团体是否公开宣称相信这一矛盾并不重要。他们相信，这就是明摆着的事情：尽管有宗教信仰的人士可能并不承认，但如果他们不是本能地拿知识当天敌，不认为科学不受遏制的进步就一定会摧毁他们敬畏和珍视的一切，也许就不会对科学产生如许的嫉妒与惊慌。在世人看来，这就像是我们这一方的不安，类似于我们拒绝仅仅通过圣经来进行教育时转嫁到我们头上的那种疑虑。人们说，假如神圣文本并无对你不利之处，为何要害怕它呢？同样，世俗教育并无对你不利之处，为何要害怕它呢？有些书籍包含与你相反的宗教观点，为何要阻碍其发行呢？你担心诗歌、寓言、散文或其他通俗文学读物会动摇孩子和学者的心智，为什么要阻止他们由地阅读这些读物呢？假如你认为友人跟自己的对手一样完全各有各的理由，为什么迫使他们认识其中一些人而回避另外一些人呢？真理是无需畏惧，无需怀疑的。缺乏自立是谬误的标志。

Now, as far as this objection relates to any supposed opposition between secular science and divine, which is the subject on which I am at present engaged, I made a sufficient answer to it in my foregoing Discourse. In it I said, that, in order to have possession of truth at all, we must have the whole truth; and no one science, no two sciences, no one family of sciences, nay, not even all secular science, is the whole truth; that revealed truth enters to a very great extent into the province of science,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and that to put it on one side, in compliment to secular science, is

simply, under colour of a compliment, to do science a great damage. I do not say that every science will be equally affected by the omission; pure mathematics will not suffer at all; chemistry will suffer less than politics, politics than history, ethics, or metaphysics; still, that the various branches of science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and form one whole, which whole is impaired, and to an extent which it is difficult to limit, by any considerable omission of knowledge, of whatever kind, and that revealed knowledge is very far indeed from an inconsiderable department of knowledge, this I consider undeniable. As the written and unwritten word of God make up Revelation as a whole, and the written, taken by itself, is but a part of that whole, so in turn Revelation itself may be viewed as one of the constituent parts of human knowledge, considered as a whole, and its omission is the omission of one of those constituent parts. Revealed Religion furnishes facts to the other sciences, which those sciences, left to themselves, would never reach; and it invalidates apparent facts, which, left to themselves, they would imagine. Thus, in the science of history, the preservation of our race in Noah's ark is an historical fact, which history never would arrive at without Revelation; and, in the province of physiology and moral philosophy, our race's progress and perfectibility is a dream, because Revelation contradicts it, whatever may be plausibly argued in its behalf by scientific inquirers. It is not then that Catholics are afraid of human knowledge, but that they are proud of divine knowledge, and that they think the omission of any kind of knowledge whatever, human or divine, to be, as far as it goes, not knowledge, but ignorance.

这种反对意见关系到世俗学科与属神学科之间所谓的对立，我目前想要厘清的正是这个问题。就此而言，我已经在前面的论述里提供了充足的答案。我说过，为了据有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真理，我们都必

须拥有全部真理，但是，任何一门学科，两门学科，一类学科，甚至所有世俗学科，都不可能是全部真理。启示的真理在很大范围内进入了科学、哲学和文学领域。为了迎合世俗科学而将启示真理搁置一边，看起来像是恭维，实则是在极大地损害科学。并不是说由于忽略启示真理，所有学科都会受到同样影响。纯数学根本就不会受影响，化学比政治学受到的影响小，政治学比史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受到的影响小。尽管如此，不同的科学分支都彼此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无论在何种程度上忽略何种知识，这个整体都会受到不可限量的影响。启示知识远非可以忽略不计的知识门类，这一点我相信无可否认。正如书写和非书写的上帝之道构成作为一个整体的启示，书写的部分单独来看，只不过是这个整体当中的一部分，同样，启示本身整体看来也是人类知识整体的一个构成部分，忽略它就是忽略一个构成部分。启示宗教为其他学科提供的事实，是仅凭这些学科本身永远无法触及的，而启示宗教废弃的表象，是这些学科自身乐于想象的。因此在史学中，人类种族在诺亚方舟里得以继存是史实，没有启示宗教，史学永远也无法触及于此。在生理学和伦理学的领域，人类种族的进步及完善是一个天方夜谭，因为启示宗教与其相悖，无论科学探索者为它作何种辩护。因此，并不是说天主教徒惧怕人类的知识，而是说，他们为属神的知识而自豪。他们认为，不管属人的还是属神的，无论忽略何种知识，都不再是知识，反倒是无知。

2．

2．

Thus I anticipated the objection in question last week; now I am going to make it the introduction to a further view of the relation of secular knowledge to divine. I observe, then, that, if you drop any science out of the circle of knowledge, you cannot keep its

place vacant for it; that science is forgotten; the other sciences close up, or, in other words, they exceed their proper bounds, and intrude where they have no right. For instance, I suppose, if ethics were sent into banishment, its territory would soon disappear, under a treaty of partition, as it may be called, between law, political economy, and physiology; what, again, would become of the province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if made over to the Antiquarian Society; or of history, if surrendered out and out to Metaphysicians? The case is the same with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ology; it would be the prey of a dozen various sciences, if Theology were put out of possession; and not only so, but those sciences would be plainly exceeding their rights and their capacities in seizing upon it. They would be sure to teach wrongly, where they had no mission to teach at all. The enemies of Catholicism ought to be the last to deny this:—for they have never been blind to a like usurpation, as they have called it, on the part of theologians; those who accuse us of wishing, in accordance with Scripture language, to make the sun go round the earth, are not the men to deny that a science which exceeds its limits falls into error.

上个星期，我预见到了所说的这条反对意见。我现在借它引入世俗知识与属神知识相互关系上的另一个观点。我看到，假如将任何一个学科从知识领域里删除，并不能因此而为它保留一个空位，那么这门学科会被遗忘，其他学科会合拢。换句话说，这些学科会越出恰当界限，侵入自己无权的领域。例如，假如伦理学被放逐，根据法律、政治经济学和生理学达成的所谓分割条约，它的领地很快就会消失。如果实验科学被移交到古文物学会会怎么样呢？或如果历史学让位于形而上学家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在神学这个科目上，情形亦是一样。如果神学被赶出去，那么其领地会成为十多种不同学科的猎物。不仅如此，那些学科为占领这领地会直接越出自身权力和学术能力范围。在根本没有教学使命的地方，它们讲授的方式必然是错误的。天主教

的敌人应当是最不愿意否认这一点的，他们称此为神学家的篡夺，对类似的行为他们向来看得清楚明白。那些人依据圣经语言责怪我们奢望太阳围绕地球转动，并没有否认越出其界限的学科实则堕入谬误。

I neither then am able nor care to deny, rather I assert the fact, and today I am going on to account for it, that any secular science, cultivated exclusively, may become dangerous to Religion; and I account for it on this broad principle, that no science whatever, however comprehensive it may be, but will fall largely into error, if it be constituted the sole exponent of all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and that,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it is encroaching on territory not its own, and undertaking problems which it has no instruments to solve. And I set off thus:

我不能，也不屑否认事实，反过来，我强调这事实。今天我就来为它辩护，任何一门世俗学科，假如以排他形式发展，都会对宗教构成威胁。我的解释基于这样一条广泛原则，即无论何种科学，无论多么包罗万象，假如自命为天地万物的唯一解释，那就难免堕入谬误。理由很简单，它侵入了不属于自己的领域，试图解决自己能力之外的问题。我下面接着就此说明。

3．

3．

One of the first acts of the human mind is to take hold of and appropriate what meets the senses, and herein lies a chief

distinction between man's and a brute's use of them. Brutes gaze on sights, they are arrested by sounds; and what they see and what they hear are mainly sights and sounds only. The intellect of man, on the contrary, energizes as well as his eye or ear, and perceives in sights and sounds something beyond them. It seizes and unites what the senses present to it; it grasps and forms what need not have been seen or heard except in its constituent parts. It discerns in lines and colours, or in tones, what is beautiful and what is not. It gives them a meaning, and invests them with an idea. It gathers up a succession of notes into the expression of a whole, and calls it a melody; it has a keen sensibility towards angles and curves, lights and shadows, tints and contours. It distinguishes between rule and exception, between accident and design. It assigns phenomena to a general law, qualities to a subject, acts to a principle, and effects to a cause. In a word, it philosophizes; for I suppos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their elementary idea, are nothing else but this habit of *viewing* , as it may be called, the objects which sense conveys to the mind, of throwing them into system, and uniting and stamping them with one form.

人类意识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捕捉并处置感官接纳的刺激，这是人与动物利用意识的主要差别所在。动物会注视景象，它们为声音所吸引，它们看到和听到的，主要也只是景象与声音。反过来，人的智力会同眼睛和耳朵一样激发起来，并在景象与声音当中感知除此以外东西。智力会捕捉并整合感官呈现的内容，能理解并构想除其构成部分之外不一定能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它通过线条和颜色或声调辨别哪些是美的，哪些不是。它赋予事物意义，使其具备概念。它把一连串音符收集起来，用作整体表达，并称之为旋律。它对角度与曲线、光与影、色调与轮廓有敏锐的辨识力。它能区分规律与例外、意外与设计。它能将现象归入普适法则，将特性归入主题，将行为归入原理，将效果归入原因。总之，它能进行哲理思考。我认为，科学和哲

学就其基本概念而言，不过是这种被称作惯性的东西 ，感官将其所看之物传递给意识，将他们归入系统，然后整合起来，为它们盖上统一的图章。

This method is so natural to us, as I have said, as to be almost spontaneous; and we are impatient when we cannot exercise it, and in consequence we do not always wait to have the means of exercising it aright, but we often put up with insufficient or absurd views or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we meet with, rather than have none at all. We refer the various matters which are brought home to us, material or moral, to causes which we happen to know of, or to such as are simply imaginary, sooner than refer them to nothing; and according to the activity of our intellect do we feel a pain and begin to fret, if we are not able to do so. Here we have an explanation of the multitude of off-hand sayings, flippant judgments, and shallow generalizations, with which the world abounds. Not from self-will only, nor from malevolence, but from the irritation which suspense occasions, is the mind forced on to pronounce, without sufficient data for pronouncing. Who does not form some view or other, for instance, of any public man, or any public event, nay, even so far in some cases as to reach the mental delineation of his appearance or of its scene? yet how few have a right to form any view. Hence the misconceptions of character, hence the false impressions and reports of words or deeds, which are the rule, rather than the exception, in the world at large; hence the extravagances of undisciplined talent, and the narrowness of conceited ignorance; because, though it is no easy matter to view things correctly, nevertheless the busy mind will ever be viewing. We cannot do without a view, and we put up with an illusion, when we cannot get a truth.

这方法在我们看来自然而然，如我说过的，就好像自发行为。无法使用这方法时，我们会变得不耐烦，结果我们并不总是等待有正确行使这方法的手段，而是经常容忍对所遇事物不充分或荒唐的看法或阐释，认为这样总比没有好。我们将自己深刻认知的各样事物，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都归于我们碰巧知道的一些原因，甚至归于纯粹想象的原因，认为总比没有任何原因要好。假如找不到原因，根据各人智力活跃的程度，我们会感到相应的痛苦，并开始烦躁不安。此时我们就找到一个解释，为何满世界都充斥着不假思索的说法、轻率的判断和浅陋的概括。意识被迫在没有足够支持的资料时发出断言，并非仅仅出自任性，亦非出于恶意，而是因为悬而不决引发的恼怒。谁不会就比如一位公众人物或一个公共事件形成这种那种看法呢？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对人物的外表或事件的内幕进行一番心理刻画，然而，极少有人有资格形成任何看法。因此才有对性格的错误看法，才有关于一些言行的错误印象或报道，此乃世人的常态而非例外。因此散漫的人才言行放肆，自负的无知者的心胸偏狭，因为，尽管正确看待事物确属不易，然而心里很难停止形成看法。我们遇事不可能没有看法，因此，得不到真相我们就只能忍受错觉。

4．

4．

Now, observe how this impatience acts in matters of research and speculation. What happens to the ignorant and hotheaded, will take place in the case of every person whose education or pursuits are contracted, whether they be merely professional, merely scientific, or of whatever other peculiar complexion. Men, whose life li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one science, or the exercise of one method of thought, have no more right, though they have often

more ambition, to generalize upon the basis of their own pursuit but beyond its range, than the schoolboy or the ploughman to judge of a Prime Minister. But they must have something to say on every subject; habit, fashion, the public require it of them; and, if so, they can only give sentence according to their knowledge. You might think this ought to make such a person modest in his enunciations; not so: too often it happens that, in proportion to the narrowness of his knowledge, is, not his distrust of it, but the deep hold it has upon him, his absolute conviction of his own conclusions, and his positiveness in maintaining them. He has the obstinacy of the bigot, whom he scorns, without the bigot's apology, that he has been taught, as he thinks, his doctrine from heaven. Thus he becomes, what is commonly called, a man of one idea; which properly means a man of one science, and of the view, partly true, but subordinate, partly false, which is all that can proceed out of any thing so partial. Hence it is that we have the principles of utility, of combination, of progress, of philanthropy, or, in material sciences, comparative anatomy, phrenology, electricity, exalted into leading ideas, and keys, if not of all knowledge, at least of many things more than belong to them,—principles, all of them true to a certain point, yet all degenerating into error and quackery, because they are carried to excess, viz. at the point where they require interpretation and restraint from other quarters, and because they are employed to do what is simply too much for them, inasmuch as a little science is not deep philosophy.

现在看看，这种急躁在研究与思辨过程中是何等情形。无知者与性急者身上发生的事情，在每一个所受教育或追求偏狭的人身上都会发生，这指的不仅仅是职业上的，科学上的，或是其他特殊情况。任何人，假如只懂一门学科，或只会运用一种思想方法，哪怕志向高远，他基于自身追求但又超出这范围之外进行概括的权利，并不会大

于一名小学生或一位庄稼汉评判首相的权利。可是，无论什么话题，他们总得说些什么。习惯、风尚和公众都要求他们发表看法。若是如此，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知识说点什么。你们或许认为，这可能会让一个人说话留有余地，可实际并非如此。常有的情况是，这样的人所知越是偏狭，他们越是不会产生疑问，反而越是对此深信不疑，越是对自己的结论有绝对把握，越是坚守不改。他有着自己蔑视的冥顽不化者的固执，却没有那些人的理由，他还像被教导的一样，认为自己的理论来自天意。他就这样成为人们常说的“一根筋”，意思是这种人只认准一门学科、一种观念，其观点尽管部分真实但处于从属地位，且部分又是错误的，正如偏狭的东西，大抵不过如此。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效用、组合、进步、博爱的原则，或者在物质科学中，我们才有比较解剖学、颅相学、电学，他们被拔高，成为即便不是所有知识、至少也是超出其应有范围的众多事物的主导观念和关键。这些原则在某些地方确实正确，但都会质变为谬误或骗术，因为他们超额了，换句话说越过了界限后，他们就需要别的学科加以解释或限制，因为他们被人们要拿去做超出其能力以外的事情，而一门小小的科学并不就是深刻的哲学。

Lord Bacon has set down the abuse, of which I am speaking, among the impediments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 Sciences, when he observes that

我所提及的这些弊端，被培根勋爵列在阻挡科学进展的众多障碍之中。他说：

> men have used to infect their meditations, opinions, and doctrines, with some conceits which they have most admired, or some Sciences which they have most applied; and give all things else a

tincture according to them utterly untrue and improper… So have the alchemists made a philosophy out of a few experiments of the furnace; and Gilbertus, our countryman, hath made a philosophy out of the observations of a lodestone. So Cicero, when, reciting the several opinions of the nature of the soul, he found a musician that held the soul was but a harmony, saith pleasantly, “hic ab arte suâ non recessit,” “he was true to his art.” But of these conceits Aristotle speaketh seriously and wisely when he saith, “Qui respiciunt ad pauca, de facili pronunciant,” “they who contemplate a few things have no difficulty in deciding.”

“一些人的沉思、意见与说教总是脱不了他们最喜欢的那种狂妄之气，或者以他们应用最多的学科来解释，而别的所有事物，他们全都据此打上全然不真实或不适当的印记……炼金术士炼过几炉丹后，就自命为一门哲学。国人吉尔伯特观察过一块磁石后，也造出了一门哲学。所以西塞罗列举了有关灵魂本性的一些意见，当他发现一位音乐家认为灵魂不过是和音后，愉快地说：‘他才是忠于音乐艺术的人’。但是，对于这样的自负之言，亚里士多德提出过严肃而又智巧的批评：‘有些人略作思考便能决断万事’。”

5．

5．

And now I have said enough to explain the inconvenience which I conceive necessarily to result from a refusal to recognize theological truth in a course of Universal Knowledge;—it is not only the loss of Theology, it is the perversion of other sciences. What it unjustly forfeits, others unjustly seize. They have their own department, and, in going out of it, attempt to do what they really cannot do; and that the more mischievously, because they do teach what in its place is true, though when out of its place, perverted or carried to excess, it is not true. And, as every man has not the capacity of separating truth from falsehood, they persuade the world of what is false by urging upon it what is true. Nor is it open enemies alone who encounter us here, sometimes it is friends, sometimes persons who, if not friends, at least have no wish to oppose Religion, and are not conscious they are doing so; and it will carry out my meaning more fully if I give some illustrations of it.

在一门大学知识课程中拒绝承认神学真理必然导致的不便，我已经给出足够多的解释。那不光是神学的损失，而且还会导致其他学科的堕落。神学因不公正而失去的东西，被其他学科不公正地攫取。那些学科各有自己的领域，超出这些领域，它们就会尝试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更大的害处是，它们在各自领域里讲授的正确内容，一旦被扭曲或是超出这一范围，反倒成为了谬误。由于并非人人都有能力区分真理与谬误，他们会强调正确的东西，以此避免世人接受错误的东西。我们在此面对的还不只是公开的敌人，有时候还有朋友，有时候还有这样一些人，虽谈不上是朋友，却也无意与宗教为敌，或与宗教为敌而不自知。容我稍作说明，以充分表述这层意思。

As to friends, I may take as an instance the cultivation of the Fine Arts, Painting, Sculpture, Architecture, to which I may add

Music. These high ministers of the Beautiful and the Noble are, it is plain, special attendants and handmaids of Religion; but it is equally plain that they are apt to forget their place, and, unless restrained with a firm hand, instead of being servants, will aim at becoming principals. Here lies the advantage, in an ecclesiastical point of view, of their more rudimental state, I mean of the ancient style of architecture, of Gothic sculpture and painting, and of what is called Gregorian music, that these inchoate sciences have so little innate vigour and life in them, that they are in no danger of going out of their place, and giving the law to Religion. But the case is very different when genius has breathed upon their natural elements, and has developed them into what I may call intellectual powers. When Painting, for example, grows into the fulness of its function as a simply imitative art, it at once ceases to be a dependant on the Church. It has an end of its own, and that of earth: Nature is its pattern, and the object it pursues is the beauty of Nature, even till it becomes an ideal beauty, but a natural beauty still. It cannot imitate that beauty of Angels and Saints which it has never seen. At first, indeed, by outlines and emblems it shadowed out the Invisible, and its want of skill became the instrument of reverence and modesty; but as time went on and it attained its full dimensions as an art, it rather subjected Religion to its own ends than ministered to the ends of Religion, and in its long galleries and stately chambers, did but mingle adorable figures and sacred histories with a multitude of earthly, not to say unseemly forms, which the Art had created, borrowing withal a colouring and a character from that bad company. Not content with neutral ground for its development, it was attracted by the sublimity of divine subjects to ambitious and hazardous essays. Without my saying a word more, you will clearly understand, Gentlemen, tha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Religion was bound to exert itself, that the world might not gain an advantage over it. Put out of sight the

severe teaching of Catholicism in the schools of Painting, as men now would put it aside in their philosophical studies, and in no long time you would have the hierarchy of the Church, the Anchorite and Virgin-martyr, the Confessor and the Doctor, the Angelic Hosts, the Mother of God, the Crucifix, the Eternal Trinity, supplanted by a sort of pagan mythology in the guise of sacred names, by a creation indeed of high genius, of intense, and dazzling, and soul-absorbing beauty, in which, however, there was nothing which subserved the cause of Religion, nothing on the other hand which did no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minister to corrupt nature and the powers of darkness.

至于朋友，我不妨拿美术、绘画、雕塑、建筑的培育作比，也许还可以加上音乐的培育。很明显，这些课程都是美善与高贵的优秀臣仆，是宗教特别的侍从。但同样明显的是，除非有一双坚定的手加以约束，否则它们很容易忘记自己的身份，僭越仆从界限，想要成为主人。从教会的观点看，这就是其更原始状态的优势所在，我是指建筑、哥特式雕塑及绘画和称为格利高里音乐的古老风格所具备的优势。这些早期学科自身并没有什么内在的活力与生命力，因此并无越出自身范围而对宗教发号施令的危险。可是一旦才智之士往这些学科的天资上吹上一口灵气，将它们发展成我称作智力的东西，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例如，绘画，作为一种简单的模仿艺术，功能发展至圆满状态时，立即就不再依靠教会了。它有了自己的目标，而且是世俗的目标：自然是它的模版，自然之美是它追求的目标，哪怕它有朝一日成为理想之美，却仍然保持自然之美。它从未见过天使与圣人，因此就无法模仿它们的美。的确，起初它曾通过轮廓与象征勾勒出隐身者的暗影，技法不足倒是崇敬与质朴的因由。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成长为一门完善的艺术，结果反将宗教纳入自身目标，而不是服务于宗教的目标。在其长长的画廊与堂皇的展室里，可敬的人物及圣史与俗世的，更不必说不得体的场景乱成一团，他们被艺术创造出来，却也因为这种混乱而沾染了不良的色彩与品格。它不满足于发展过程中的守中立场，反倒被属神主题的崇高庄严吸引而投身于野心勃勃和有害

的尝试。不需要我再多说什么，诸位想必已经相当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注定要施加它的影响，世人不可能获得超过宗教的优势。在绘画学校里，如果将天主教义的严格教学搁置一边，就如同人们在哲学研究中也常常将它抛弃，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教会的层次结构，包括隐修者与圣女殉道者、告解神父与教会博士、天使会、圣母玛利亚、十字架、三位一体圣神都会被打着圣名的异教神话所代替，被一种充满才气、热烈眩目且震撼心灵的美的创造所代替。然而在这样的美中，并不存在任何服务于宗教事业的东西，另一方面，反倒会直接间接地有助于腐蚀本性和黑暗势力。

6．

6．

The art of Painting, however, is peculiar: Music and Architecture are more ideal, and their respective archetypes, even if not supernatural, at least are abstract and unearthly; and yet what I have been observing about Painting, holds, I think, analogously, in the marvellous development which Musical Science has undergone in the last century. Doubtless here too the highest genius may be made subservient to Religion; here too, still more simply than in the case of Painting, the Science has a field of its own, perfectly innocent, into which Religion does not and need not enter; on the other hand here also, in the case of Music as of Painting, it is certain that Religion must be alive and on the defensive, for, if its servants sleep, a potent enchantment will steal over it. Music, I suppose, though this is not the place to enlarge upon it, has an object of its own; as mathematical science also, it is the expression of ideas greater and more profound than any in the visible world,

ideas, which centre indeed in Him whom Catholicism manifests, who is the seat of all beauty, order, and perfection whatever, still ideas after all which are not those on which Revelation directly and principally fixes our gaze. If then a great master in this mysterious science (if I may speak of matters which seem to lie out of my own province) throws himself on his own gift, trusts its inspirations, and absorbs himself in those thoughts which, though they come to him in the way of nature, belong to things above nature, it is obvious he will neglect everything else. Rising in his strength, he will break through the trammels of words, he will scatter human voices, even the sweetest, to the winds; he will be borne upon nothing less than the fullest flood of sounds which art has enabled him to draw from mechanical contrivances; he will go forth as a giant, as far as ever his instruments can reach, starting from their secret depths fresh and fresh elements of beauty and grandeur as he goes, and pouring them together into still more marvellous and rapturous combinations;—and well indeed and lawfully, while he keeps to that line which is his own; but, should he happen to be attracted, as he well may, by the sublimity, so congenial to him, of the Catholic doctrine and ritual, should he engage in sacred themes, should he resolve by means of his art to do honour to the Mass, or the Divine Office,—(he cannot have a more pious, a better purpose, and Religion will gracefully accept what he gracefully offers; but)—is it not certain, from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that he will be carried on rather to use Religion than to minister to it, unless Religion is strong on its own ground, and reminds him that, if he would do honour to the highest of subjects, he must make himself its scholar, must humbly follow the thoughts given him, and must aim at the glory, not of his own gift, but of the Great Giver?

但是，绘画艺术尚属特例，音乐与建筑是更好的例子，其各自原

型哪怕不是超自然的，至少也是抽象和非世俗的。然而，我在绘画中观察到的情形，在音乐学过去百年来的惊人发展中也有类似之处。在这里毫无疑问，也可以让最高的才智服务于宗教，同样在这里，甚至比在绘画的情形中更简单，这门学科有它自己全然无害的领域，是宗教没有进入也不需进入的。另外一方面，就如同在绘画中一样，宗教也必然要在音乐展现其生命力，且有所防范。假如仆从睡着了，强大的魔法就可能悄悄来袭。尽管在此不便多谈音乐，但音乐有它自己的目标，就如同数学也有它的目标一样。它所要表达的观念，比视觉世界所有的观念更加深广。它们以天主教证明的上帝为中心，他就是一切美、秩序和完善的基础。但这些观念与启示宗教直接要我们首要关注的那些观念截然不同。在这门神秘学问（假如能就似乎在我的领域之外的事物发表一点看法的话）中，如果有一位大师发挥自己的天赋，信赖它给的的灵感，沉浸在那些以自然方式为他所见、实际是自然之上的思想中，很明显，他会忽略别的一切。从个人力量中崛起，他会突破言语的束缚，将人的声音，甚至是最甜美的声音播散在风中。除了从机械发明中抽取出来最圆润的声音之潮以外，他再不会关注别的东西。他会像巨人那样大步向前，乐器能带他走多远就走多远。他从乐器最隐秘的深处开始，一路传播最清新的美与庄严，再将这些音符组合成更不可思议和令人狂喜的杰作。的确，只要守在所属的领域内，他就能正当有效地成就这一切。可是，万一他被天主教教义与仪式那种与他志趣相投的崇高品质吸引，这是极有可能的，万一他开始思考神圣主题，万一他下决心通过艺术来为弥撒或每日祈祷表达敬意（这是他最为虔敬和美好的目的，宗教也乐得接受他的优雅奉献），但是照这样情况看来，不是可以肯定他会继而利用而不是服务于宗教吗？除非宗教自身足够强大，并提醒他注意：假如他要向最崇高的课题表达敬意，自己就得成为这方面的学者，他必须谦恭地遵从学到的思想，必须着眼于上帝而非他自己的荣耀。

7．

7 .

As to Architecture, it is a remark, if I recollect aright, both of Fénélon and Berkeley, men so different, that it carries more with it even than the names of those celebrated men, that the Gothic style is not as *simple* as befits ecclesiastical structures. I understand this to be a similar judgment to that which I have been pass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Painting and Music. For myself, certainly I think that that style which, whatever be its origin, is called Gothic, is endowed with a profound and a commanding beauty, such as no other style possesses with which we are acquainted, and which probably the Church will not see surpassed till it attain to the Celestial City. No other architecture, now used for sacred purposes, seems to be the growth of an idea, whereas the Gothic style is as harmonious and as intellectual as it is graceful. But this feeling should not blind us, rather it should awaken us, to the danger lest what is really a divine gift be incautiously used as an end rather than as a means. It is surely quite within the bounds of possibility, that, as the *renaissance* three centuries ago carried away its own day, in spite of the Church, into excess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so that revival of an almost forgotten architecture, which is at present taking place in our own countries, in France, and in Germany, may in some way or other run away with us into this or that error, unless we keep a watch over its course. I am not speaking of Ireland; but to English Catholics at least it would be a serious evil, if it came as the emblem and advocate of a past ceremonial or an extinct nationalism. We are not living in an age of wealth and loyalty, of pomp and stateliness, of time-honoured establishments, of pilgrimage and penance, of hermitages and convents in the wild, and of fervent populations supplying the want of education by love, and apprehending in form and symbol what they cannot read in

books. Our rules and our rubrics have been altered now to meet the times, and hence an obsolete discipline may be a present heresy.

至于建筑，如果我没记错，像费讷隆和贝克莱这样特立独行的学者就说过这样的话，说建筑学本身远远胜过一些名人的大名，说哥特式风格绝不仅仅是适合教会的结构。我认为，这话类似我前面说到绘画与音乐培育时作出的判断。在我看来，我当然觉得这种叫做哥特式建筑风格的东西，无论其起源如何，被赋予了如此深刻、睥睨众生之美，是我们熟悉的其他风格皆不具备的。在教会升往天国之前，也许再不会看到这风格被超越。目前投入神圣用途的其他建筑，并没有哪一座似乎出自一种观念的延伸，而哥特风格既雅致，又谐调而充满智性。可是，这样一种感觉不可使我们盲目，反倒应使人警醒，以防出现非凡天赐之物被不慎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危险。肯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如同三个世纪之前的文艺复兴就失控到忽视教会，在文学与艺术上大做文章。如今在我国、法国、德国正在兴起一种差不多被遗忘的建筑风格，也可能失控堕入这样那样的谬误，除非我们密切关注其进程。我不是在说爱尔兰，但至少对英国的天主教徒而言，假如这种复兴成为一种过往仪式或已经灭绝的民族主义象征或拥护，这将是大大的不幸。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富足和忠诚的时代，再没有那个时代的壮丽与威严、久经考验的社会制度、朝圣之旅与苦修、荒野里的隐修处与修道院。那个时代有大批热心民众以爱心代替教育的匮乏，根据外形与标志来理解无法从书本里读到的东西。我们的规定与准则已经发生改变以迎合时代要求，所以，一种过时的训诫可能在当今成为异端邪说。

8．

8．

I have been pointing out how the Fine Arts may prejudice Religion, by laying down the law in cases where they should be subservient. The illustration is analogous rather than strictly proper to my subject, yet I think it is to the point. If then the most loyal and dutiful children of the Church must deny themselves, and do deny themselves, when they would sanctify to a heavenly purpose sciences as sublime and as divine as any which are cultivated by fallen man, it is not wonderful, when we turn to sciences of a different character, of which the object is tangible and material, and the principles belong to the Reason, not to the Imagination, that we should find their disciples, if disinclined to the Catholic Faith, acting the part of opponents to it, and that, as may often happen, even against their will and intention. Many men there are, who, devoted to one particular subject of thought, and making its principle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become enemies to Revealed Religion before they know it, and, only as time proceeds, are aware of their own state of mind. These, if they are writers or lecturers, while in this state of unconscious or semi-conscious unbelief, scatter infidel principles under the garb and colour of Christianity; and this, simply because they have made their own science, whatever it is, Political Economy, or Geology, or Astronomy, to the neglect of Theology, the centre of all truth, and view every part or the chief parts of knowledge as if developed from it, and to be tested and determined by its principles. Others, though conscious to themselves of their anti-christian opinions, have too much good feeling and good taste to obtrude them upon the world. They neither wish to shock people, nor to earn for themselves a confessorship which brings with it no gain. They know the strength of prejudice, and the penalty of innovation; they wish to go through life quietly; they scorn polemics; they shrink, as from a real humiliation, from being mixed up in religious controversy; they are ashamed of the very name. However, they have had occasion at

some time to publish on some literary or scientific subject; they have wished to give no offence; but after all, to their great annoyance, they find when they least expect it, or when they have taken considerable pains to avoid it, that they have roused by their publication what they would style the bigoted and bitter hostility of a party. This misfortune is easily conceivable, and has befallen many a man. Before he knows where he is, a cry is raised on all sides of him; and so little does he know what we may call the *lie* of the land, that his attempts at apology perhaps only make matters worse. In other words, an exclusive line of study has led him, whether he will or no, to run counter to the principles of Religion; which principles he has never made his landmarks, and which, whatever might be their effect upon himself, at least would have warned him against practising upon the faith of others, had they been authoritatively held up before him.

我一直在指出，美术如果在应当屈从于宗教时反倒成为立法者，就可能会侵害宗教。所举的例子与我所说的话题类似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相合，但我觉得还是切中了要害的。假如教会最忠诚尽职的子民，出于神圣目的而将一些学科圣化为堕落的人有可能培育出来的任何学科那么崇高和神圣，从而否定且当真否定了他们自身，那么，当转向其目标可感和有形、其原则属于理性而非想象的不同性质的学科时，我们就会毫不奇怪地发现，他们的门徒一旦不再对天主教信仰有兴趣，就会站到敌人一边，而且常常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和意图的，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有很多人专心于某一特定思想对象，就把它的原则当作所有事物的尺度，结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便成为了启示宗教的敌人，过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思想状态。假如这些是著书立说者或是教书育人者，在这种无意识或半清醒的不信仰状态下，就会披着基督教外衣散布异教思想。之所以如此，就因为他们在创立自己的学科时，无论是哪一种学问，政治经济学、地质学或是天文学，忽略了作为一切真理中心的神学。他们都认为知识的每一个部分或主要部分都

源自这学问，而且应当由原理检验和决定。另外一些人虽然意识到自己反基督教的观点，但他们的自我好感和品味都不容许自己将这些意见强加世人。他们既不想惊骇他人，也不想赢得忏悔者的荣誉，因为这样并没有什么好处。他们明白偏见的力量和革新会遭受的处罚，他们只想安静地过一辈子，不想卷入争辩。他们就像躲避真正羞辱之事一样远离宗教纷争，连提到宗教这个名词他们都不乐意。但他们有时候也会就文学或科学话题发表一些文章，却并不想冒犯他人。可让他们沮丧之极的是，尽管他们最想逃脱或竭力回避这种局面，却发现这些文章引起某些人顽固或是苦涩的敌意。这样的不幸很容易发生，事实上也落在了很多人头上。还没等他明白怎么回事，四周已然一片讨伐之声。他根本就不明白当前的局势，结果他的道歉之举可能只会雪上加霜。换句话说，专注一行的学科研究，不管是否出自他的意愿，都会违背宗教原则，尽管他成为将其作为准则。无论这些原则会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如果在他面前经受住了考验得以保持权威，至少可以警示他不可转投其他信仰。

9．

9．

Instances of this kind are far from uncommon. Men who are old enough, will remember the trouble which came upon a person, eminent as a professional man in London even at that distant day, and still more eminent since, in consequence of his publishing a book in which he so treated the subject of Comparative Anatomy as to seem to deny the immateriality of the soul. I speak here neither as excusing nor reprobating sentiments about which I have not the means of forming a judgment; all indeed I have heard of him makes me mention him with interest and respect; anyhow of this I am

sure, that if there be a calling which feels its position and its dignity to lie in abstaining from controversy and in cultivating kindly feelings with men of all opinions, it is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nd I cannot believe that the person in question would purposely have raised the indignation and incurred the censure of the religious public. What then must have been his fault or mistake, but that he unsuspiciously threw himself upon his own particular science, which is of a material character, and allowed it to carry him forward into a subject-matter, where it had no right to give the law, viz., that of spiritual beings, which directly belongs to the science of Theology?

这一类的例子真是司空见惯。上了年岁的人都还记得一位名人惹上的麻烦，哪怕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他都算得上伦敦出名的专业人士。而且从那以后名气更大，因为他出版了一本著作，其中对比较解剖学的处理方式似乎要否认灵魂作为一种无形之物存在。我在此并不想就情绪进行辩解或责备，因为自己的能力尚不足以进行判断。关于此人，我听说的一切都让我提起他来就趣味盎然和尊敬有加。无论如何，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一种职业觉得其地位及尊严在于远离纷争，在于让意见不同的人心平气和，那一定就是医疗业了。所以我无法相信所说的这位名人会故意挑起教众的义愤而招致责备。他唯一的毛病或是过错就在于：他所钻研的那门学问是有形的，他毫不怀疑地一头扎进去，听任其将他引入神体这一题材，这是直接属于神学的，也是他的学科无权指东说西的。除此而外，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毛病或过错？

Another instance occurred at a later date. A living dignitary of the Established Church wrote *a History of the Jews* ; in which, with what I consider at least bad judgment, he took an external view of it, and hence was led to assimilate it as nearly as possible to secular

history. A great sensation was the consequence among the members of his own communion, from which he still suffers. Arguing from the dislike and contempt of polemical demonstrations which that accomplished writer has ever shown, I must conclude that he was simply betrayed into a false step by the treacherous fascination of what is call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which is good in its place, but can scarcely be applied in cases where the Almighty has superseded the natural law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From this he would have been saved, had he been a Catholic; but in the Establishment he knew of no teaching, to which he was bound to defer, which might rule that to be false which attracted him by its speciousness.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稍晚的年代。英国国教尚在人世的一位要人写过一本《犹太史》。在我看来，他至少是以一种错误的判断描述了外观上的犹太史，因而尽可能将它写成了一部世俗史。结果，国教内部人士一片哗然，他今天还在饱受其苦。这位成就卓然的作者显示出他对于争辩的厌恶与轻蔑，出于这重考虑，我可以断定，他只是被名为历史哲学的那种东西不可靠的魅力吸引，从而迈出错误的一步。历史哲学本身并无过错，然而决不可应用于全能上帝已经取代社会与历史的自然法则这种情形中。假如他是天主教徒，本可以避免如此的。可是他在国教里并没有学到必须听从的教诲，不然他就能明白吸引他的东西华而不实。

10．

10．

I will now take an instance from another science, and will use more words about it. Political Economy is the science, I suppose, of wealth,—a science simply lawful and useful, for it is no sin to make money, any more than it is a sin to seek honour; a science at the same time dangerous and leading to occasions of sin, as is the pursuit of honour too; and in consequence, if studied by itself, and apart from the control of Revealed Truth, sure to conduct a speculator to unchristian conclusions. Holy Scripture tells us distinctly, that "covetousness," or more literally 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s;" and that "they that would become rich fall into temptation;" and that "hardly shall they that have riches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and after drawing the picture of a wealthy and flourishing people, it adds, "They have called the people happy that hath these things; but happy is that people whose God is the Lord;"—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t says with equal distinctness, "If any will not work, neither let him eat;" and, "If any man have not care of his own, and especially of those of his house, he hath denied the faith, and is worse than an infidel." These opposite injunctions are summed up in the wise man's prayer, who says, "Give me neither beggary nor riches, give me only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With this most precise view of a Christian's duty, viz., to labour indeed, but to labour for a competency for himself and his, and to be jealous of wealth, whether personal or national, the holy Fathers are, as might be expected, in simple accordance. "Judas," says St. Chrysostom, "was with Him who knew not where to lay His head, yet could not restrain himself; and how canst thou hope to escape the contagion without anxious effort?" "It is ridiculous," says St. Jerome, "to call it idolatry to offer to the creature the grains of incense that are due to God, and not to call it so, to offer the whole service of one's life to the creature." "There is not a trace of justice in that heart," says St. Leo, "in which the love of gain has made itself a dwelling." The same thing is

emphatically taught us by the counsels of perfection, and by every holy monk and nun anywhere, who has ever embraced them; but it is needless to collect testimonies, when Scripture is so clear.

我再从另一类学科中取一个例子，这次要多说几句。政治经济学，我认为是一门讲财富的学问，完全是合法且有用的学问，逐利与追名一样，并不是什么罪过。但是，这门学问同时也是危险的，容易时不时的犯错，正如追求荣誉一样。所以单凭这学问自行发展，脱离启示真理的控制，就一定会引导一位思索者得出异教的的结论。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贪婪（或更直白地说就是爱钱）实乃万恶之源”，并说“想发财的人会陷入迷惑”，还说“有钱人就不该进入天国”。圣经描述了一个富有和繁荣的民族之后又说：“他们觉得有了这些便为有福。实际上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才是有福。”另一方面，圣经又同样明确地说：“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让他们吃饭”，“人若不看顾自己及其亲属，就是背离了信仰，比不信基督的人更为可恶”。因此，睿智的人在祷告中总结这些对立的劝告：“别赐予我贫穷，也别赐予我富足，赐予我生活必需品”。基督徒关于其职责最精确的教义，就是他们要劳作，但仅只为自己和亲属生活所需；他们要谨防财富，不论是个人或国家层面上的。可以预料的是，圣父也是如此。圣克里索斯托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不知道怎么躺下，犹大都与他在一起，然而犹大仍不知自我约束。人不孜孜克己，如何能指望躲避时弊的习染呢？”圣哲罗姆说，“乳香粒本是献给上帝的，拿来献祭凡人也无不可。可是，若将人一生的事功全都献给凡人，那才是真正的偶像崇拜。”圣利奥说：“若有人贪财成性，他的心里定然不存一丝公义”。劝人归善的箴言和在各地实践这些箴言的圣僧及修女，无不在强调同样的道理。由于圣经说得如此明白，就没有必要一一例证了。

Now, observe, Gentlemen, my drift in setting Scripture and the Fathers over against Political Economy. Of course if there is a science of wealth, it must give rules for gaining wealth and

disposing of wealth, and can do nothing more; it cannot itself declare that it is a subordinate science, that its end is not the ultimate end of all things, and that its conclusions are only hypothetical, depending on its premisses, and liable to be overruled by a higher teaching. I do not then blame the Political Economist for anything which follows from the very idea of his science, from the very moment that it is recognized as a science. He must of course direct his inquiries towards his end; but then at the same time it must be recollected, that so far he is not practical, but only pursues an abstract study, and is busy himself in establishing logical conclusions from indisputable premisses. Given that wealth is to be sought, this and that is the method of gaining it. This is the extent to which a Political Economist has a right to go; he has no right to determine that wealth is at any rate to be sought, or that it is the way to be virtuous and the price of happiness; I say, this is to pass the bounds of his science, independent of the question whether he be right or wrong in so determining, for he is only concerned with an hypothesis.

请诸位明白我拿圣经及早期教父来对照政治经济学的一番苦心。当然，既有一门讲财富的科学，那它必然是关于获得与处置财富的规则，并不能别有所为。它自己不能宣称自己是从属学科，不能宣称它的目标并非万物的终极目标，也不能宣称它的结论只是假说性质的、依赖于它的前提的、并可能被更高一级的学说推翻的。自从政治经济学被确认为一门学科以来，有许多观念就从这门学科中导出，但是我却不会将任何一种思想归于政治经济学家。他所进行的研究当然指向他的目标，可同时必须记住，他尚且没有进入实际层面，只不过是在进行抽象研究，且忙于根据不可争议的前提条件确立逻辑结论。鉴于财富必须追寻，这个那个是获得财富的方法。这是政治经济学者有权研究的范围，但他没有权力断言无论如何都要获取财富，也不能断言这是保持德行的方法和谋取幸福的代价。不然他就是在跨越学科界

限，而这无关于这些断言对错与否，因为他研究的不过是一个假设。

To take a parallel case:—a physician may tell you, that if you are to preserve your health, you must give up your employment and retire to the country. He distinctly says “if;” that is all in which he is concerned, he is no judge whether there are objects dearer to you, more urgent upon you, than the preservation of your health; he does not enter into your circumstances, your duties, your liabilities, the persons dependent on you; he knows nothing about what is advisable or what is not; he only says, “I speak *as* a physician; if you would be well, give up your profession, your trade, your office, whatever it is.” However he may wish it, it would be impertinent in him to say more, unless indeed he spoke, not as a physician but as a friend; and it would be extravagant, if he asserted that bodily health was the *summum bonum* , and that no one could be virtuous whose animal system was not in good order.

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医师有可能对你说，如果要保持身体健康，最好放弃工作去乡下生活。他明确地说“如果”，他关心的只是这一点。除开保持身体健康之外，他并不关心你有没有更珍视的目标、更紧急的事务。他不熟悉你的处境、职责、债务、依赖于你的人。他根本不知道哪些可取哪些不可取，只是说：“作为医生，我认为，假如你想要身体健康，应当放弃你的职业、行当、官职等等。”无论他愿望多么强烈，再多说一句便属失当，除非他以朋友而非医生的立场来说。假如他断言身体健康乃“至善”，说体魄欠佳便非有德之人，那就太过分了。

11 .

11 .

But now let us turn to the teaching of the actual Political Economist, in his present fashionable shape. I will take a very favourable instance of him: he shall be represented by a gentleman of high character, whose religious views are sufficiently guaranteed to us by his being the special choice, in this department of science, of a University removed more than any other Protestant body of the day from sordid or unchristian principles on the subject of money-making. I say, if there be a place where Political Economy would be kept in order, and would not be suffered to leave the high road and ride across the pastures and the gardens dedicated to other studies, it i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if a man could anywhere be found who would have too much good taste to offend the religious feeling of the place, or to say any thing which he would himself allow to be inconsistent with Revelation, I conceive it is the person whose temperate and well-considered composition, as it would be generally accounted, I am going to offer to your notice. Nor did it occasion any excitement whatever on the part of the academical or the religious public, as did the instances which I have hitherto been adducing. I am representing then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its independent or unbridled action, to great advantage, when I select, as its specimen, the Inaugural Lecture upon it,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in question, by its first Professor. Yet with all these circumstances in its favour, you will soon see, Gentlemen, into what extravagance, for so I must call it, a grave lawyer is led in praise of his chosen science, merely from the circumstance that he has fixed his mind upon it, till he has forgotten there are subjects of thought higher and more heavenly than it. You will find beyond mistake, that it is his object to recommend the science of wealth, by claiming for it an *ethical* quality, viz., by extolling it as the road to virtue and

happiness, whatever Scripture and holy men may say to the contrary.

现在我们来看看现实中的政治经济学家目前受欢迎的现状。我会举一个会使人们对他留下好印象的例子。将会有一位绅士作为这位政治经济学家的代表，这位绅士品格高尚，由于特别选定他来做这门特定学科的代表，所以他的宗教观点在我们面前是足够有保障的，他所从来的那种大学，相对当今任何其他新教团体而言，更远离关于赚钱这个话题的那些利欲熏心或与基督教不符的原则。我要说，假如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政治经济学保持秩序，且能够不偏离正轨而涉足本应留给其他研究的领域，那这地方就是牛津大学了。假如能在任何地方找到这么一种人，他品味极高，不屑于冒犯这地方的宗教情感，也不想说他自己都会觉得与上帝的启示不符的任何话，那么，我觉得，有这种气质和节制力的人——正像人们一般解释的那样——一定是本人乐于随时引荐的。这事也不值得引发学术界或信众的大惊小怪，正如我在上面引述的很多例子。我在此所引荐的政治经济学这门学问，在我选择它作为我们所谈论道德的那所大学的第一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所作的开课演讲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其独立且不受羁绊的作用。可是，尽管有这么多有利条件，诸位还是会看到，一位严肃的法学家在赞扬他选定的学问时会何等不羁（我非得用这词不可）。他的根据仅仅是他关注这门学说的情形，而根本就不记得，还有比它更高级和更神圣的思想体系。无疑，大家会发现他的目的是推介财富科学，声称它有一种伦理学的品质，也就是将它拔高到通往德行和幸福的道路的高度，而不管圣经或圣贤可能会说的那些相反的话。

He begins by predict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that in the course of a very few years, “it will rank in public estimation among the first of *moral* sciences in interest and in utility.” Then he explains most lucidly its objects and duties, considered as “the science which teaches in what wealth consists, by what agents it is produced, and

according to what laws it is distributed, and what are the institutions and customs by which production may be facilitated and distribution regulated, so as to give the largest possible amount of wealth to each individual." And he dwells upon the interest which attaches to the inquiry, "whether England has run her full career of wealth and improvement, but stands safe where she is, or whether to remain stationary is impossible." After this he notices a certain objection, which I shall set before you in his own words, as they will furnish me with the illustration I propose.

一开始他就对政治经济学做一个了预测，预测不出几年，“从兴趣和用途上说，它会在公众的评估中列在道德科学的首位”。之后他极为清晰地解释了它的目标与职责，认为“这门科学会清楚地解释财富由什么构成，通过什么代理得以产生，根据什么法则得以分配，财富生产又会得到哪些机构与习俗的协助，财富的分配由哪些机构与习俗；来调节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最大可能的财富总量。”之后他详细论述这门研究的利益所在：事关“英国是否已在财富与改进方面竭尽全力，能否高枕无忧，或是否有可能安于现状。”此后，他也提到一条反对意见，由于这反对意见很能说明我的意思，我接下来会将他的原话转引给各位。

This objection, he says, is, that, as the pursuit of wealth is one of the humblest of human occupations, far inferior to the pursuit of virtue, or of knowledge, or even of reputation, and as the possession of wealth is not necessarily joined,—perhaps it will be said, is not conducive,—to happiness, a science, of which the only subject is wealth, cannot claim to rank as the first, or nearly the first, of moral sciences." [5_1] Certainly, to an enthusiast in behalf of any science whatever, the temptation is great to meet an objection urged against its dignity and worth; however, from the very form of it,

such an objection cannot receive a satisfactory answer by means of the science itself. It is an objection external to the science, and reminds us of the truth of Lord Bacon's remark, “No perfect discovery can be made upon a flat or a level; neither is it possible to discover the more remote and deeper parts of any science, if you stand upon the level of the science, and ascend not to a higher science.“ [5_2] The objection that Political Economy is inferior to the science of virtue, or does not conduce to happiness, is an ethical or theological objection; the question of its “rank” belongs to that Architectonic Science or Philosophy, whatever it be, which is itself the arbiter of all truth, and which disposes of the claims and arranges the places of all the departments of knowledge which man is able to master. I say, when an opponent of a particular science asserts that it does not conduce to happiness, and much more when its champion contends in reply that it certainly does conduce to virtue, as this author proceeds to contend, the obvious question which occurs to one to ask is, what does Religion, what does Revelation, say on the point? Political Economy must not be allowed to give judgment in its own favour, but must come before a higher tribunal. The objection is an appeal to the Theologian; however, the Professor does not so view the matter; he does not consider it a question for Philosophy; nor indeed on the other hand a ques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not a question for Science at all; but for Private Judgment,—so he answers it himself, and as follows:

他认为，这条反对意见就是，“由于追求财富是人类日常活动中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之一，远不及人们对于德行、知识甚或名声的追求，且由于人们读财富的占有不一定与幸福相关——或者说不一定有益于幸福——一门以财富为唯一主题的学问，就不能将其列为道德科学的第一位，或近似第一位。” [6_1] 诚然，热心于任何一门学问的人，都忍不住会面对怀疑这门学问的尊严及价值的反对意见的挑战。

但是，仅根据其形式，这样一种反对意见不可能藉由这门学科自身而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条反对意见存在于这门学问之外，并让我们想起培根勋爵评论的那句话的真谛：“在平地或一般水平上不可能有完美发现，如果始终站在一门学科的水平上，而不是上升到更高学科的水平，也不可能发现任何一门学科更偏僻深远的部分。”[6_2] 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次于德性科学，或无益于幸福，这一反对意见是一条反对伦理的或神学的意见。涉及其“排序”的问题，都是属于体系论或哲学的问题，这样的学科本身即是所有真理的裁决者，并能够解决人类所能够掌握的各门知识的地位和要求的问题。我要说，当反对某一门学科的人宣称这学科无益于幸福，而倡导这学科的人反驳说它肯定有益于德行，就像我们这位教授进而所说的那样。人们不禁想到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对此宗教会说什么，上帝的启示又会作何评价？政治经济学不可作出对自身有利的判断，而是必须听从更高法庭的裁决。这条反对意见是向神学家提出的上诉，可是，这位教授却不是这么看。他并不认为这问题事关哲学，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其与政治经济学无关，甚至与任何一门科学都无关，而纯粹属于个人判断的。他就是这么按照自己的方法回答这问题的，其看法如下。

12．

12．

“My answer,” he says, “is, first, that the pursuit of wealth, that is, the endeavour to accumulate the means of future subsistence and enjoyment, is, to the mass of mankind, the great source of *moral* improvement.” Now observe, Gentlemen, how exactly this bears out what I have been saying. It is just so far true, as to be able to instil what is false, far as the author was from any such design. I grant, then, that, ordinarily, beggary is not the means of moral

improvement; and that the orderly habits which attend upon the hot pursuit of gain, not only may effect an external decency, but may at least shelter the soul from the temptations of vice. Moreover, these habits of good order guarantee regularity in a family or household, and thus are accidentally the means of good; moreover, they lead to the education of its younger branches, and they thus accidentally provide the rising generation with a virtue or a truth which the present has not; but without going into these considerations, further than to allow them generally, and under circumstances, let us rather contemplate what the author's direct assertion is. He says, “the endeavour to *accumulate* ,” the words should be weighed, and for what? “for *enjoyment* ;“—“to accumulate the means of future subsistence and enjoyment, is, to the mass of mankind, the great source,” not merely a source, but the *great* source, and of what?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gress?—such an answer would have been more within the limits of his art,—no, but of something individual and personal, “of *moral improvement* .” The soul, in the case of “the mass of mankind,” improves in moral excellence from this more than any thing else, viz., from heaping up the means of enjoying this world in time to come! I really should on every account be sorry, Gentlemen, to exaggerate, but indeed one is taken by surprise, one is startled, on meeting with so very categorical a contradiction of our Lord, St. Paul, St. Chrysostom, St. Leo, and all Saints.

他说：“我的回答是，首先，对财富的追求，即为未来的衣食与享乐积累财富的努力，对大多数人类来说，这是道德进步的丰富源泉。”诸位请注意，他这话恰好证明我一直想要表达的意思。要说他的这句话能慢慢灌输错误观念，那是不错，不过作者自己也远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承认，一般而论，乞讨并非道德进步的手段，狂热地追求财富时展现出来的有条不紊的习惯，不仅会使人在外表上看起来

礼貌端庄，而且至少会为灵魂躲避恶行的诱惑提供遮拦。另外，这些谨守次序的习惯可保证家人或家庭保持齐整和规范，因而碰巧成为了善的手段。再说了，这些习惯也使年轻一代接受教育，因而偶然地为新一代提供了这一代人所不具备的德行或真理。可是，对此不能考虑得太细太深，只要能在一般情况下或在具体情形中得到应用即可。我们还是来思考这位教授直接的断言吧。他说“努力去积累”，这话要仔细掂量，努力图个什么？“为享乐”，“为未来的衣食与享乐积累财富的努力，对人类大多数来说是丰富的源泉”。不仅仅是“源泉”而且还很“丰富”。那又是什么的丰富源泉呢？是社会与政治进步的源泉吗？（这一答案本当超出他那门学说的范围的）可并非如此，这一源泉并非某种个别和个人的东西，而是“道德进步的”源泉。对“大多数人类”来说，灵魂由此得到的东西比从别的任何东西中得到的道德之美还要多。也就是说，人们可从堆积财富以在余生里享受这世界的活动中获取道德至善！我若夸大其词，诸位，怎么说都应当抱歉。可是听闻跟我主、圣保罗、圣克里索斯托、圣利奥和所有圣徒绝对矛盾的这些话，我还是禁不住万分惊讶，方寸大乱。

“No institution,” he continues, “could be more beneficial to the morals of the lower orders, that is, to at least nine-tenths of the whole body of any people, than one which should increase their power and their wish to accumulate; none more mischievous than one which should diminish their motives and means to save.” No institution more beneficial than one which should increase the *wish to accumulate* ! then Christianity is not one of such beneficial institutions, for it expressly says, “*Lay not up* to yourselves *treasures* on earth… for where thy treasure is, there is thy heart also;“—no institution more mischievous than one which should diminish the *motives to save* ! then Christianity is one of such mischiefs, for the inspired text proceeds, “Lay up to yourselves treasures *in heaven* , *where* neither the rust nor the moth doth consume, and where thieves do not dig through, nor steal.”

他接着说，“没有什么惯例比增强底层民众——这些人占到任何一个民族全体的至少九成——的力量与增强其累计力量的意愿的惯例更有利于其品行的。也没有什么比会削弱这批人的节省动机与手段的东西害处更大。”没有什么惯例比可增强积累力量这一愿望的制度更加有益的！那么，基督教也不是这样一种有益的惯例，因为基督教明确地提到：“不要在俗世中为自己积攒财宝……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没有什么惯例比会削弱这批人的节省动机与手段的东西害处更大！那么，基督教也就是这样的有害之物了，因那神示的旨意接着启示人们：“人们要在天堂中积攒财宝，天堂中没有虫子咬，财宝不会锈坏，也不会有贼挖窟窿来偷走这些财宝。”

But it is not enough that morals and happiness are made to depend on gain and accumulation; the practice of Religion is ascribed to these causes also, and in the following way. Wealth depends upon the pursuit of wealth; education depends upon wealth; knowledge depends on education; and Religion depends on knowledge; therefore Religion depends on the pursuit of wealth. He says, after speaking of a poor and savage people, “Such a population must be grossly ignorant. The desire of knowledge is one of the last results of refinement; it requires in general to have been implanted in the mind during childhood; and it is absurd to suppose that persons thus situated would have the power or the will to devote much to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A further consequence is the *absence of all real religion* ; for the religion of the grossly ignorant, if they have any, scarcely ever amounts to more than a debasing superstition.“ [5_3]

认为品行与幸福依赖于财富与积累，这还不够；宗教实践也是人类获得品行与幸福的原因，归因方式如下：财富取决于人们对财富的

追求，教育取决于财富，知识取决于教育，宗教取决于知识。因此，宗教取决于对财富的追求。在谈及一个贫穷和野蛮的民族，他提到，“这样一群人，一定无知到极顶。对知识的渴望是文明精进的最终结果之一，一般应当在童年期间就培植在脑海里。而假定那些处在这样一种境遇中的人不遗余力地为儿童教育奉献的能力与意愿，真是荒谬之极。另一个后果就是所有真实宗教的缺乏。对于如此无知的民族，假定他们还有什么宗教的话，一定是某种低劣的迷信。” [6_3]

The pursuit of gain then is the basis of virtue, religion, happiness; though it is all the while, as a Christian knows, the “root of all evils,” and the “poor on the contrary are blessed,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God.”

因此，对财富的追求就是他们的德行、宗教和幸福的基础。不过，基督徒都知道，这一追求同时亦是“万恶之源”，而“相反，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As to the argument contained in the logical *Sorites* which I have been drawing out, I anticipated just now what I should say to it in reply. I repeat, doubtless “beggary,” as the wise man says, is not desirable; doubtless, if men will not work, they should not eat; there is doubtless a sense in which it may be said that mere social or political virtue tends to moral and religious excellence; but the sense needs to be defined and the statement to be kept within bounds. This is the very point on which I am all along insisting. I am not denying, I am granting, I am assuming, that there is reason and truth in the “leading ideas,” as they are called, and “large views” of scientific men; I only say that, though they speak truth, they do not speak the whole truth; that they speak a narrow truth,

and think it a broad truth; that their deductions must be compared with other truths, which are acknowledged to be truths, in order to verify, complete, and correct them. They say what is true, *exceptis excipiendis* ; what is true, but requires guarding; true, but must not be ridden too hard, or made what is called a *hobby* ; true, but not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true, but if thus inordinately, extravagantly, ruinously carried out, in spite of other sciences, in spite of Theology, sure to become but a great bubble, and to burst.

至于我描绘的那个复合三段论中所包含的逻辑推论，我在刚才就想到了应当如何回复。我要反复强调的是，如那位聪明人所说，“行乞”无疑是人们所厌弃的。人若不作工，无疑也不当食。更多的社会或政治德行倾向于道德和宗教之美，这么说无疑也不无道理。可是，我们必须给这一陈述进行定义，并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就是我一直所坚持的观点。我未加否认，并一直赞成和假定的是，那些钻研科学的人士提出的所谓“领先思想”和“宏大视野”，都有其合理性和真实的一面。我只是说，尽管他们谈及真理，却并非全部的真理；他们谈及的是一种偏狭的真理，却认为是一种广泛的真理；他们的推论必须与那些人们已确认为真理的其他真理相比较，才能得以证实、完成与修正。他们所谈及的真理，要去除一些例外情况。他们所谈及的真理，是需要保护的真理。理之为真，不能苛求，亦不可使之与爱好等同；理之为真，却不能将其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理之为真，假如不顾其他学科，不顾神学而滥用无度，则一定会变成一个大泡泡，迟早会破灭。

13．

13．

I am getting to the end of this Discourse, before I have noticed one tenth part of the instances with which I might illustrate the subject of it. Else I should have wished especially to have dwelt upon the not unfrequent perversion which occurs of antiquarian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to the prejudice of Theology.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records of former ages are of primary importance in determining Catholic doctrine; it is undeniable also that there is a silence or a contrariety abstractedly conceivable in those records, as to an alleged portion of that doctrine, which would be sufficient to invalidate its claims on our acceptance; but it is quite as undeniable that the existing documentary testimony to Catholicism and Christianity may be so unduly valued as to be made the absolute measure of Revelation, as if no part of theological teaching were true which cannot bring its express text, as it is called, from Scripture, and authorities from the Fathers or profane writers,—whereas there are numberless facts in past times which we cannot deny, for they are indisputable, though history is silent about them. I suppose, on this score, we ought to deny that the round towers of this country had any origin, because history does not disclose it; or that any individual came from Adam who cannot produce the table of his ancestry. Yet Gibbon argues against the darkness at the Passion, from the accident that it is not mentioned by Pagan historians:—as well might he argue against the existence of Christianity itself in the first century, because Seneca, Pliny, Plutarch, the Jewish Mishna, and other authorities are silent about it. Protestants argue in a parallel way against Transubstantiation, and Arians against our Lord's Divinity, viz., on the ground that extant writings of certain Fathers do not witness those doctrines to their satisfaction:—as well might they say that Christianity was not spread by the Twelve Apostles, because we know so little of their labours. The evidence of History, I say, is invaluable in its place; but, if it assumes to be the sole means of

gaining Religious Truth, it goes beyond its place. We are putting it to a larger office than it can undertake, if we countenance the usurpation; and we are turning a true guide and blessing into a source of inexplicable difficulty and interminable doubt.

为说明这个道理，我才举了十分之一的例子，但这次演讲也快结束了。如若不然，我本想特别指出那些经常发生于古文物研究和历史研究中且有害于神学的曲解。无可否认的是，关于之前时代的纪录在确定天主教教义上头等重要。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关于这教义中所提及的某个部分的历史记录，如果存在空白或可以抽象地构想出来的矛盾之处，那么将足以否决该说法的有效性而不为人们所接受。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天主教义和基督教现存的文件证据中存在评估失当的问题，以至于用作启示的绝对尺度，就同神学说教一样，如果不能从圣经中找到所谓的明确启示，也不能从早期教父或世俗作家那里找到凭据，就不是真实的说教。而在过往时代中，存在无数我们无可否认的事实，尽管历史并没有加以记载，但这些事实无可争议。如若不然，照这个说法，我们就否认了这个国家的起源，因为历史并没有公开其起源；如果有人拿不出自己的家谱，那我们就得否认他并非亚当的后代。可是，吉本反驳耶稣受难时曾发生遍地黑暗，原因是异教的史家碰巧没有记录此事。他不妨也否认基督教本身在一世纪的存在，因为塞涅卡、普林尼、普鲁塔克、犹太教的经卷以及其他权威都没有提及此事。新教徒以类似方式否认圣餐变体论，阿里乌信徒反对我主的神性，其理由是现存的教父纪录并没有给出一些让他们满意的证实那些教义存在的记录。他们不妨否认基督教是十二位门徒传播开来的，因为我们很少听说使徒艰辛传教的故事。所以我说，历史证据若保持在历史范围内，则价值无限，但如果有人认为它是获得宗教真理的唯一手段，那就越出了历史证据的能力范围。假如我们支持这样的僭越之举，那就是让它去完成超出其能力的任务。我们就会把真正的向导与护佑变成令人费解的困境与永无止境的疑惑之源。

And so of other sciences; just as Comparative Anatomy, Political Economy,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Science of Antiquities may be and are turned against Religion, by being taken by themselves, as I have been showing, so a like mistake may befall any other. Grammar, for instance, at first sight does not appear to admit of a perversion; yet Horne Tooke made it the vehicle of his peculiar scepticism. Law would seem to have enough to do with its own clients, and their affairs; and yet Mr. Bentham made a treatise on Judicial Proofs a covert attack upon the miracles of Revelation. And in like manner Physiology may deny moral evil and human responsibility; Geology may deny Moses; and Logic may deny the Holy Trinity [5_4] ; and other sciences, now rising into notice, are or will be victims of a similar abuse.

其他学科也是如此。正如比较解剖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哲学、古代史学这些学科，自以为是的时候可能会被且正在用来对抗宗教，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解释清楚了，同样的错误也可能出现在其他任何一门学科里。例如，初看文法时，我们可能认为它不可能发生任何误用，可是，霍恩·图克就利用它来传播他那种奇怪的怀疑主义思想。法律似乎跟它自己的委托方及其事务总是有许多事情要处理，然而，边沁先生却拿论司法证据的一篇论文隐蔽攻击启示神迹。同样，生理学亦可否认道德之恶与人的责任。地质学可否认摩西，逻辑学可否认圣三位一体。 [6_4] 而当前兴起的其他学科也正在或将会成为类似的滥用的受害者。

14 .

14 .

And now to sum up what I have been saying in a few words. My object, it is plain, has been—not to show that Secular Science in its various departments may take up a position hostile to Theology;—this is rather the basis of the objection with which I opened this Discourse;—but to point out the cause of an hostility to which all parties will bear witness. I have been insisting then on this, that the hostility in question, when it occurs, is coincident with an evident deflection or exorbitance of Science from its proper course; and that this exorbitance is sure to take place, almost from the necessity of the case, if Theology be not present to defend its own boundaries and to hinder the encroachment. The human mind cannot keep from speculating and systematizing; and if Theology is not allowed to occupy its own territory, adjacent sciences, nay, sciences which are quite foreign to Theology, will take possession of it. And this occupation is proved to be a usurpation by this circumstance, that these foreign sciences will assume certain principles as true, and act upon them, which they neither have authority to lay down themselves, nor appeal to any other higher science to lay down for them. For example, it is a mere unwarranted assumption if the Antiquarian says, “Nothing has ever taken place but is to be found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or if the Philosophic Historian says, “There is nothing in Judaism different from othe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r if the Anatomist, “There is no soul beyond the brain;” or if the Political Economist, “Easy circumstances make men virtuous.” These are enunciations, not of Science, but of Private Judgment; and it is Private Judgment that infects every science which it touches with a hostility to Theology, a hostility which properly attaches to no science in itself whatever.

下面用几句话总结上述我所提及的内容的含义。很明显，我的目标并不是要说明各个门类的世俗学科会采取与神学敌对的立场，我在

演讲之初所抱的反对意见就基于这一点。我努力实现的，不过是要指出那种以至于各方可以作证的敌意所产生的原因。我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我们所说的敌意的产生，恰好与某一门学科与自身适当进程的明显的偏差或远离一致。如果神学不能捍卫其边界并阻遏其他学科的入侵，则上述情形肯定会出现，几乎可谓必然发生。人类意识禁不住要思辨和系统化，假如不让神学占据它自己的领地，邻近的学科，甚至与神学不搭界的学科就会来占领它。若果发生下面的情况，这种占领就会被证明是一种篡夺，即这些不相关的学科会假定某些原则为真并实施这些原则，但它们一来没有确定这些原则的权威，再者也不求助于更高层次的任何学科来为它们确定这些原则。例如，假如古文物研究者说“除非可在历史文献中找到证据，否则一切都不曾发生”，或如果哲学史家说“犹太教里不存在不同于其他政治体制的东西”，或如果解剖学家说“大脑之外无灵魂”，或如果政治经济学家说“丰衣足食才有德行可言”，那这些就都是毫无根据的假定。这些都不是科学观点，而是个人意见。当个人意见对神学怀有敌意时，它染指的任何一门学科都会受到影响，而这样的敌意与任何一种科学自身都沾不上边。

If then, Gentlemen, I now resist such a course of acting as unphilosophical, what is this but to do as men of Science do when the interests of their own respective pursuits are at stake? If they certainly would resist the divine who determined the orbit of Jupiter by the Pentateuch, why am I to be accused of cowardice or illiberality, because I will not tolerate their attempt in turn to theologize by means of astronomy? And if experimentalists would be sure to cry out, did I attempt to install the Thomist philosophy in the schools of astronomy and medicine, why may not I, when Divine Science is ostracized, and La Place, or Buffon, or Humboldt, sits down in its chair, why may not I fairly protest against their exclusiveness, and demand the emancipation of Theology?

所以，请诸位评判，假如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非哲学的而对此加以抵制，这与爱好科学的人在各自的追求遭遇利害相关的危局时的所做所为有何差别？假如他们因为神学家根据摩西五经确定木星轨道而肯定加以反对，那么我也不会容忍他们以天文学手段进行神学思辨的行为，为何我因此就要承担怯懦或狭隘之责？如果我尝试在讲授天文学和医学的学校里设置托马斯哲学，那些实验主义者肯定会大呼小叫。当神学遭到放逐，而拉普拉斯、布丰或洪堡坐在神学教席上替而代之时，我为何就不能公平地抗议他们的排他行为，并要求将神学解放出来呢？

15．

15．

And now I consider I have said enough in proof of the first point, which I undertook to maintain, viz., the claim of Theology to be represented among the Chairs of a University. I have shown, I think, that exclusiveness really attaches, not to those who support that claim, but to those who dispute it. I have argued in its behalf, first, from the consideration that, whereas it is the very profession of a University to teach all sciences, on this account it cannot exclude Theology without being untrue to its profession. Next, I have said that, all sciences being connected together, and having bearings one on another, it is impossible to teach them all thoroughly, unless they all ar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Theology among them. Moreover, I have insisted on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which Theology in matter of fact does and must exercise over a great variety of sciences, completing and correcting them; so that, granting it to be a real science occupied upon truth, it cannot be

omitted without great prejudice to the teaching of the rest. And lastly, I have urged that, supposing Theology be not taught, its province will not simply be neglected, but will be actually usurped by other sciences, which will teach, without warrant, conclusions of their own in a subject-matter which needs its own proper principles for its due formation and disposition.

为了证明我一直坚持的第一个观点，我相信已经说得够多了，即神学的主张应当在大学教席中有一定席位。我觉得已经说明白了，正是对排他行为有争议，而非支持排他行为的人才坚持排他要求。我首先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来为神学辩护：既然大学的本职在于讲授所有学科，那么排斥神学就不可能不违背其本职。其次我说过，由于所有学科都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除非将包括神学在内的所有学科都考虑在内，否则就不可能透彻地讲授任何学科。再者，我坚持认为，神学在与事实有关的事情上对许多学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完成并修正着许多学科，也必须如此。这样，既然人们认为它是基于真理的一门真实学科，对它的忽略就必然会对其它学科的教学带来严重损害。最后，我反复说明，假定不讲授神学，其研究领域不只是简单的被忽视，而且还会造成对其他学科实际性的篡夺，这些学科会在无根据的情况下传播它们自己的结论，要知道这些主题的结论的形成和处置，本需要该主题自身的适当原则方可形成。

Abstract statements are always unsatisfactory; these, as I have already observed, could be illustrated at far greater length than the time allotted to me for the purpose has allowed. Let me hope that I have said enough upon the subject to suggest thoughts, which those who take an interest in it may pursue for themselves.

抽象的陈述总是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如前所述，这些看法本可在

更长时间里一一举例说明，但由于时间有限，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但愿今天就此话题所说的话能对大家有所提示，有兴趣的人不妨自行深究。

[5_1].Introd. Lecture on Pol. Econ. pp. 11, 12.

[5_2].Advancement of Learning.

[5_3].Intr. Lect., p. 16.

[5_4].Vid. Abelard, for instance.

[6_1].《政治经济学导论》，第十一、十二页。

[6_2].《广学论》。

[6_3].《政治经济学导论》，第十六页。

[6_4].参见阿伯拉尔的著作。

Discourse 5. Knowledge Its Own End

第五讲：知识乃自身目标

A University may be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either to its Students or to its Studies; and the principle, that all Knowledge is a whole and the separate Sciences parts of one, which I have hitherto been using in behalf of its studies, is equally important when we direct our attention to its students. Now then I turn to the students, and shall consider the education which, by virtue of this principle, a University will give them; and thus I shall be introduced, Gentlemen, to the second question, which I proposed to discuss, viz., whether and in what sense its teaching, viewed relatively to the taught, carries the attribute of Utility along with it.

看一所大学，可以看它的学生，也可以看它的研究项目。但是，我在论说大学研究项目时始终坚持原则——所有知识都是一个整体，不同学科都是整体的各个部分——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学生时也同样重要。我现在就将注意力转向学生，并根据上述原则来思考大学给予学生的教育。这样的话，诸位，我就可以转向我提议进行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即从与学生相关的角度看，大学教育是否以及在哪重意义上贯彻其效用属性。

1．

1．

I have said that all branches of knowledge are connected together, because the subject-matter of knowledge is intimately united in itself, as being the acts and the work of the Creator. Hence it is that the Sciences, into which our knowledge may be said to be cast, have multiplied bearings one on another, and an internal sympathy, and admit, or rather demand, comparison and adjustment. They complete, correct, balance each other. This consideration, if well-founded,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not only as regards the attainment of truth, which is their common end, but as regards the influence which they exercise upon those whose education consists in the study of them. I have said already, that to give undue prominence to one is to be unjust to another; to neglect or supersede these is to divert those from their proper object. It is to unsettle the boundary lines between science and science, to disturb their action, to destroy the harmony which binds them together. Such a proceeding will have a corresponding effect when introduced into a place of education. There is no science but tells a different tale, when viewed as a portion of a whole, from what it is likely to suggest when taken by itself, without the safeguard, as I may call it, of others.

我说过，所有知识分支都联系在一起，因为知识这一主题自身存在内在关联，即都是造物主的作为与成果。所以可以说，我们的知识倾注到了学科上，这些学科彼此产生多重影响，并有内在的交感，因此才能够或必须进行比较和判断。各学科彼此成就，相互修正并彼此平衡。这样一种考虑，假如根据充分，不仅在涉及真理的获得时要将其包括进去，因为这是所有学科的共同目标，而且在涉及它们对学生产生的影响时也要将其包括进去，因为教育学生就在于研究这些学科。我已经说过，过度突出某一门学科则会对另一门学科不公平。假如怠慢或取代掉这些学科，就会使别的学科偏离正轨。也就是会搅乱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线，干扰其作用，破坏使它们彼此联结的和谐因

子。假如将这种做法引入教育领域，就会产生相应的影响。任何一门学科，假如只从这学科本身看问题，而得不到别的学科的保护（我姑且先这样称呼它），那它可能提议的内容，一定与该学科被看作整体的一部分时不同，那么存在的就不是一门科学了，而只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Let me make use of an illustration. In the combination of colours, very different effects are produced by a difference in their selection and juxta-position; red, green, and white, change their shades, according to the contrast to which they are submitted. And, in like manner, the drift and meaning of a branch of knowledge varies with the company in which it is introduced to the student. If his reading is confined simply to one subject, however such division of labour may favour the advancement of a particular pursuit, a point into which I do not here enter, certainly it has a tendency to contract his mind. If it is incorporated with others, it depends on those others as to the kind of influence which it exerts upon him. Thus the Classics, which in England are the means of refining the taste, have in France subserved the spread of revolutionary and deistical doctrines. In Metaphysics, again, Butler's *Analogy of Religion* , which has had so much to do with the conversion to the Catholic faith of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ppeared to Pitt and others, who had received a different training, to operate only in the direction of infidelity. And so again, Watson, Bishop of Llandaff, as I think he tells us in the narrative of his life, felt the science of Mathematics to indispose the mind to religious belief, while others see in its investigations the best parallel, and thereby defence, of the Christian Mysteries. In like manner, I suppose, Arcesilas would not have handled logic as Aristotle, nor Aristotle have criticized poets as Plato; yet reasoning and poetry are subject to scientific rules.

容我举例说明。人们在组合颜色时，颜色选择与放置上的差别可造成极不相同的效果。以红色、绿色和白色为例，可根据要形成的对比效果改变其色调。同样，知识分支的要旨与意义，也因是否有其他知识分支而一并被传授给学生而发生变化。假如学生的阅读仅限于一个学科，则无论这样的分工合作多么有益于某一特定学科的进步，都一定会倾向于限制该学生的思想，这一点我暂时先存而不论。假如这一学科不与其他知识分支相结合，要它对该学生施加的影响就取决于其他分支对他产生的影响。因此，在英国被用作提升品味的手段的古典著作，在法国却促进了革命思想及自然神论的传播。再比如形而上学，巴特勒的《宗教类比》曾促使牛津大学的信徒转信天主教，然而在受过不同教育的皮特及其他人那里，该书似乎反倒将他们推上了不信神的道路。还举一例，兰达夫的主教沃特森，当我看他的自传时，以为他觉得数学这门学问会使人不太喜欢宗教信仰，可别人却在他的人生叙述中看出，数学是基督教奥秘的最佳类似物，因而也是最好的辩护。同样，我以为阿塞西拉斯处理逻辑的方式一定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亚里士多德也不会像柏拉图那样批评诗人，可是，推理与诗歌都要受科学规则的支配。

It is a great point then to enlarge the range of studies which a University professes, even for the sake of the students; and, though they cannot pursue every subject which is open to them, they will be the gainers by living among those and under those who represent the whole circle. This I conceive to be the advantage of a seat of universal learning, considered as a place of education. An assemblage of learned men, zealous for their own sciences, and rivals of each other, are brought, by familiar intercourse and for the sake of intellectual peace, to adjust together the claims and relat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s of investigation. They learn to respect, to consult, to aid each other. Thus is created a pure and clear atmosphere of thought, which the student also breathes,

though in his own case he only pursues a few sciences out of the multitude. He profits by 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particular teachers, which guides him in his choice of subjects, and duly interprets for him those which he chooses. He apprehends the great outlines of knowledge,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it rests, the scale of its parts, its lights and its shades, its great points and its little, as he otherwise cannot apprehend them. Hence it is that his education is called “Liberal.” A habit of mind is formed which lasts through life, of which the attributes are, freedom, equitableness, calmness, moderation, and wisdom; or what in a former Discourse I have ventured to call a philosophical habit. This then I would assign as the special fruit of the education furnished at a University, as contrasted with other places of teaching or modes of teaching. This is the main purpose of a University in its treatment of its students.

因此，扩大学术研究范围，对一所大学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哪怕只是出于对学生的考虑。尽管学生不可能专心钻研大学向他们开放的每一门学问，可是，在钻研其他学问的同学中间生活，并有研究众多学问的教师来指导，他们会受益不尽。我觉得，这就是拥有宣讲普遍知识的场所并将其视为教育基地的场所的优势所在。饱学之士聚在一起，对各自学科充满热情，彼此进行学术竞争，既能密切交往，又能实现精神上的安宁，并能修正各自研究中提出的主张和调整学术间的相互关系。他们学会如何彼此尊重，相互学习和互相帮助。学生也能感受到其所形成的纯净思想氛围，尽管学生只能从众多学问中挑出几项来钻研。一种智力传统独立于特定的教师而存在，这传统使学生受益，又指导他选择自己的学科，并为选定的学科作出适当解释。学生会弄清楚知识的庞大轮廓、知识所赖以存在的原理、知识各部分的尺度、知识的明暗处、知识的要点与微不足道之处，这些都是学生在其他条件下无法了解的。正是这个原因，其教育才能被称之为通识教育。如此养成的思维习惯会持续终身，其属性为自由、公平、安宁、

节制与智慧，亦可称为我在前面的论说中所提到的哲理习惯。这正是我认为大学教育能够结出的特别成果，以区别于其他的教学场所或其他教学模式。这也正是大学教育学生的主要目的。

And now the question is asked me, What is the *use* of it? and my answer will constitute the main subject of the Discourses which are to follow.

现在假如有人来问我，这有什么用处 呢？下面几个论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对此问题的回答。

2．

2．

Cautious and practical thinkers, I say, will ask of me, what, after all, is the gain of this Philosophy, of which I make such account, and from which I promise so much. Even supposing it to enable us to exercise the degree of trust exactly due to every science respectively, and to estimate precisely the value of every truth which is anywhere to be found, how are we better for this master view of things, which I have been extolling? Does it not reverse the principl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will practical objects be obtained better or worse by its cultivation? to what then does it lead? where does it end? what does it do? how does it profit? what does it promise? Particular sciences are respectively the basis of definite arts, which carry on to results tangible and beneficial the

truths which are the subjects of the knowledge attained; what is the Art of this science of sciences? what is the fruit of such a Philosophy? what are we proposing to effect, what inducements do we hold out to the Catholic community, when we set about the enterprise of founding a University?

我想，谨慎而讲求实际的思想者会问我，我在这里解释并以其名义大加许诺的这种哲学，到底都有什么益处呢？哪怕假定这样可使我们对各门学科产生应有程度的信赖，并准确评估在随处可见的一切真理的价值，那么这种我一直在赞颂的对待事物的宏观视角，到底怎么就让我们过得更好呢？它不会调到劳动分工的原则吗？实际的目标会不会因为这种视野的培植而变得更好或更差吗？它之后又会指向哪里？最后在哪里结束？它能干什么？它如何带来益处？它可做出什么样的承诺？具体学科分别都是特定技艺之基础，它们将作为所获知识主题的真理推向有形与有益之结果。这种科学中的科学又是一种什么技艺呢？这样一种哲学又会产生什么成果？当我们着手开办一所大学时，我们期待得出什么结果，我们能够为天主教团体提供什么样的益处呢？

I am asked what is the end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of the Liberal or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which I conceive it to impart: I answer, that what I have already said has been sufficient to show that it has a very tangible, real, and sufficient end, though the end cannot be divided from that knowledge itself. Knowledge is capable of being its own end. Such i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uman mind, that any kind of knowledge, if it be really such, is its own reward. And if this is true of all knowledge, it is true also of that special Philosophy, which I have made to consist in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ruth in all its branches, of the relations of science to science, of their mutual bearings, and their respective values. What the worth

of such an acquirement is, compared with other objects which we seek,—wealth or power or honour or the conveniences and comforts of life, I do not profess here to discuss; but I would maintain, and mean to show, that it is an object, in its own nature so really and undeniably good, as to be the compensation of a great deal of thought in the compassing, and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in the attaining.

有人问我大学教育的目的，以及它所能传授的通识或哲理知识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上述所提到的内容，足以表明这样的教育有一个切实、真实和充分的目的，不过，这目的不可与知识本身相分离。知识可成为它自身的目的。人的意识构造即是如此，无论何种知识，只要真正称得上知识的东西都是对自身的回报。假如所有知识皆是如此，那么这种特别的哲学亦是如此，我认为这种特别的哲学就在于从其各个分支全面地看待真理，全面地看待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关系，全面地看待其彼此之间的影响及其各自价值。同我们所追求的其他目标比起来，比如财富、权力、荣誉或生活的便利与舒适，我们所产生这样一种认识的价值，我不打算在此讨论。但是，我坚持认为并想在此表明，这一目标就其自身本质而言实际上是好的，而且无可否认，值得我们为此大费脑筋，也能弥补我们在获取这一认识时所遇到的种种麻烦。

Now, when I say that Knowledge is, not merely a means to something beyond it, or the preliminary of certain arts into which it naturally resolves, but an end sufficient to rest in and to pursue for its own sake, surely I am uttering no paradox, for I am stating what is both intelligible in itself, and has ever been the common judgment of philosophers and the ordinary feeling of mankind. I am saying what at least the public opinion of this day ought to be slow to deny, considering how much we have heard of late years, in

opposition to Religion, of entertaining, curious, and various knowledge. I am but saying what whole volumes have been written to illustrate, viz., by a “selection from the records of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Art, in all ages and countries, of a body of examples, to show how the most unpropitious circumstances have been unable to conquer an ardent desir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6_1] That further advantages accrue to us and redound to others by its possession, over and above what it is in itself, I am very far indeed from denying; but, independent of these, we are satisfying a direct need of our nature in its very acquisition; and, whereas our nature, unlike that of the inferior creation, does not at once reach its perfection, but depends, in order to it, on a number of external aids and appliances, Knowledge, as one of the principal of these, is valuable for what its very presence in us does for us after the manner of a habit, even though it be turned to no further account, nor subserve any direct end.

知识不仅仅是通晓知识之外的某种东西的手段，亦不是知识最终自然会演化而成的某种技能的预备措施，其自身即为目的，自成一端，自备价值。我这样并非刻意要说似是而非的话，因为这层意思自身就十分清楚，同时也是研究哲理的人所共有的判断和人类的日常感受。近些年来，我们听说了很多与令人愉快、好奇和多样的知识相关却不利宗教的话。鉴于这一点，我所说的话，至少当前舆论不会急于否认。我在此要表达的意思，已经有汗牛充栋的卷册加以说明，也就是说，“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众多的哲学、文学和艺术范例中挑选记录，来说明种种逆境都没有能够磨灭人们获取知识的热望。” [7_1] 获取知识以及对我们自己和可转移至他人的、超出知识自身的更深层次的利益，我实在无法否认。但是，除此之外，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在直接满足自身本性的需求。人的本性与次等造物的本性不同，并不能一次就进入完美状态，要实现此目的取决于许多外部援助和手段。虽然如此，知识作为这些外部因素中最主要的一种，它

的价值就在于，人有知识就会产生不同的行事习惯，哪怕再无别的理由，哪怕无益于任何直接目的。

3．

3．

Hence it is that Cicero, in enumerating the various heads of mental excellence, lays down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for its own sake, as the first of them. “This pertains most of all to human nature,” he says, “for we are all of us drawn to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in which to excel we consider excellent, whereas to mistake, to err, to be ignorant, to be deceived, is both an evil and a disgrace.“ [6_2] And he considers Knowledge the very first object to which we are attracted, after the supply of our physical wants. After the calls and duties of our animal existence, as they may be termed, as regards ourselves, our family, and our neighbours, follows, he tells us, “the search after truth. Accordingly, as soon as we escape from the pressure of necessary cares, forthwith we desire to see, to hear, and to learn; and consider the knowledge of what is hidden or is wonderful a condition of our happiness.”

正是这原因，西塞罗才在列举智力卓越的不同名头时，把对知识自身的追求放在第一位。他说：“首先，这符合人的天性，因为我们所有人生来便喜好追求知识。假如人擅长追求知识，我们就认为其优秀，而犯错误，出差错，无知，被骗既是过错，亦是耻辱。” [7_2] 他还认为，得到物质需求的满足后，知识成为吸引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人的生存不妨称之为动物性生存，他告诉我们说，满足其基本要求并

承担起对我们自己、家人和邻居的相应责任后，紧接着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因此，一旦解脱操持生计的束缚，我们马上就想去看、去听、去了解。我们认为，了解隐藏的或令人惊奇的事物是幸福的条件。”

This passage, though it is but one of many similar passages in a multitude of authors, I take for the very reason that it is so familiarly known to us; and I wish you to observe, Gentlemen, how distinctly it separates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from those ulterior objects to which certainly it can be made to conduce, and which are, I suppose, solely contemplated by the persons who would ask of me the use of a University or Liberal Education. So far from dreaming of the cultivation of Knowledge directly and mainly in order to our physical comfort and enjoyment, for the sake of life and person, of health, of the conjugal and family union, of the social tie and civil security, the great Orator implies, that it is only after our physical and political needs are supplied, and when we are “free from necessary duties and cares,” that we are in a condition for “desiring to see, to hear, and to learn.” Nor does he contemplate in the least degree the reflex or subsequent action of Knowledge, when acquired, upon those material goods which we set out by securing before we seek it; on the contrary, he expressly denies its bearing upon social life altogether, strange as such a procedure is to those who live after the rise of the Baconian philosophy, and he cautions us against such a cultivation of it as will interfere with our duties to our fellow-creatures. “All these methods,” he says, “are engaged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ruth; by the pursuit of which to be carried off from public occupations is a transgression of duty. For the praise of virtue lies altogether in action; yet intermissions often occur, and then we recur to such pursuits; not to say that the incessant activity of the mind is vigorous enough to carry us on in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even without any exertion of our own." The idea of benefiting society by means of "the pursuit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did not enter at all into the motives which he would assign for their cultivation.

虽然众多著书立说者都说过许多类似的话，但我引述这段话，正是因为大家对此十分熟悉。我希望诸位注意到，这话是如何清晰地将对知识的追求与对更隐蔽目标的追求区别开来的，而追求知识肯定可以服务于对其他目标的追求。那些想问我大学教育或通识教育有何用途这类问题的人，想必也只是在思考那些隐蔽目标吧。那位伟大的雄辩家远不是在构想如何让知识的培育直接和主要地服务于我们肉体的舒适与享乐——为生活或个人计，为健康计，为婚姻或家庭和睦计，为社会纽带或民事保障计。他所暗含的意思是，人们只有当物质与政治需求得到满足后，只有"摆脱操持生计的束缚与责任"后，才有条件"去看、去听、去了解。"他丝毫也没有考虑在获取知识之后，其对物质财富产生的反响或后续作用，这些东西是我们寻找知识之前就已经准备妥当的。反过来，他明确否认知识对社会生活会产生任何影响，生活在培根哲学兴起以后的时代里的人，也许觉得这种做法十分奇怪。他提醒我们不要以这种方式培育知识，不然会与我们相对于其他造物的责任相抵触。他说："所有这些方法都用于对真理的求索，假如对真理的求索超出公共事业的范围，那就是违反职责。因为德行的荣耀全在于人的行动，可是也经常会有中断的时候，之后我们会再次提到这种求索。更不用说，人的意识不间断的活动总是足够活跃的，能使我们不懈地追求知识，以至于并不需要额外费多大劲"。通过"求索科学与知识"的手段来助益社会的想法，根本就没有被他列在为科学与知识的培育而指定的目的之中。

This was the ground of the opposition which the elder Cato mad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Greek Philosophy among his countrymen, when Carneades and his companions, on occasion of

their embassy, were charming the Roman youth with their eloquent expositions of it. The fit representative of a practical people, Cato estimated every thing by what it produced; whereas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promised nothing beyond Knowledge itself. He despised that refinement or enlargement of mind of which he had no experience.

这就是老加图反对在国人中引介希腊哲学的立场，当时，卡尼阿德斯及同伴趁出使罗马的机会鼓吹这种思想，使罗马的年轻人十分着迷。加图是一个务实民族的恰当代表，他根据事物所产生的结果来评估一切事物，但是，知识的求索除去知识本身以外，并不能意味着任何其他的东西。他鄙视心智的精进或扩充，因他对此并无体验。

4．

4．

Things, which can bear to be cut off from every thing else and yet persist in living, must have life in themselves; pursuits, which issue in nothing, and still maintain their ground for ages, which are regarded as admirable, though they have not as yet proved themselves to be useful, must have their sufficient end in themselves, whatever it turn out to be. And we are brought to the same conclusion by considering the force of the epithet, by which the knowledge under consideration is popularly designated. It is common to speak of "*liberal* knowledge," of the "*liberal* arts and studies," and of a "*liberal* education," as the especial characteristic or property of a University and of a gentleman; what is really meant

by the word? Now, first, in its grammatical sense it is opposed to *servile* ; and by “servile work” is understood, as our catechisms inform us, bodily labour, mechanical employment, and the like, in which the mind has little or no part. Parallel to such servile works are those arts, if they deserve the name, of which the poet speaks [6_3] , which owe their origin and their method to hazard, not to skill; as, for instance, the practice and operations of an empiric. As far as this contrast may be considered as a guide into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liberal education and liberal pursuits are exercises of mind, of reason, of reflection.

但凡能够经受住切断与其他一切事物的联系并还能活下去的事物，必定自有一种生命力；尽管并不出产任何东西，却能世代保留一份领地，这样的求索尽管还没有证明其自身有用，却也令人钦佩，那它们自身必定有充分的目的——无论这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知识，通俗而言就是求索这一别名。思考其力量，我们就会得出同样结论。常听人说到“无限制的知识”、“无限制的技能与研究”和“通识教育 ”，并以为这就是大学或绅士的特征或性质，但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从其语法意义上说，它与“屈从”这个词相对，而我们说“屈从性的劳务”，如教理问答告诉我们的，我们对它的理解就是体力劳动、机械性的雇佣等等，这与人的心智关系甚疏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关系。与这些屈从性的劳务相对的就是那些技艺，如果这些技艺名副其实，那这就是诗人所赞颂的。 [7_3] 将这些技艺的起源及方法归功于运气而非技能，经验主义者的行事即是如此。只要这样的对照可用作理解词义的指南，则通识教育及无限制的求索就是心智、理性与反省能力的运用。

But we want something more for its explanation, for there are bodily exercises which are liberal, and mental exercises which are not so. For instance, in ancient times the practitioners in medicine

were commonly slaves; yet it was an art as intellectual in its nature, in spite of the pretence, fraud, and quackery with which it might then, as now, be debased, as it was heavenly in its aim. And so in like manner, we contrast a liberal education with a commercial education or a professional; yet no one can deny that commerce and the professions afford scope for the highest and most diversified powers of mind. There is then a great variety of intellectual exercises, which are not technically called “liberal;” on the other hand, I say, there are exercises of the body which do receive that appellation. Such, for instance, was the palæstra, in ancient times; such the Olympic games, in which strength and dexterity of body as well as of mind gained the prize. In Xenophon we read of the young Persian nobility being taught to ride on horseback and to speak the truth; both being among the accomplishments of a gentleman. War, too, however rough a profession, has ever been accounted liberal, unless in cases when it becomes heroic, which would introduce us to another subject.

可是，要解释清楚这个词，我们还需要更多材料，因为有些体力的运用也是无限制的，而有些心智的运用却不是无限制的。譬如，古代的行医者往往都是奴隶。尽管当时同今天一样，这个行当里的造假、欺诈和江湖庸习使人嗤之以鼻，但这门技艺的本性是智性的，它的目的也是神圣的。同样，我们可以拿通识教育与一种商业教育或一位专业人士进行对照，但没人能够否认，商业和各门专业能为最高与最多样化的心智能力提供展现的余地。智性的运用层面各异，从技术上说，这些都不能称作“不受限制”；另一方面，我要说的是，体力的运用反倒可以这样称呼。古时候的健身房就是如此，奥林匹克运动会亦是如此，得奖者依靠的是心智与身体的健全与灵巧。我们在色诺芬的著作中看到，年轻的波斯贵族都必须学习如何骑马及讲真话，因为这两项都在绅士的品行之列。从军作战虽然是粗鄙行当，但人们也一直认为这是通识技能，除非人们将其视为表现勇武之气的机会。当

然，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Now comparing these instances together, we shall have no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the principle of this apparent vari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rm which I am examining. Manly games, or games of skill, or military prowess, though bodily, are, it seems, accounted liberal; on the other hand, what is merely professional, though highly intellectual, nay, though liberal in comparison of trade and manual labour, is not simply called liberal, and mercantile occupations are not liberal at all. Why this distinction? because that alone is liberal knowledge, which stands on its own pretensions,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sequel, expects no complement, refuses to be *informed* (as it is called) by any end, or absorbed into any art, in order duly to present itself to our contemplation. The most ordinary pursuits have this specific character, if they are self-sufficient and complete; the highest lose it, when they minister to something beyond them. It is absurd to balance, in point of worth and importance, a treatise on reducing fractures with a game of cricket or a fox-chase; yet of the two the bodily exercise has that quality which we call “liberal,” and the intellectual has it not. And so of the learned professions altogether, considered merely as professions; although one of them be the most popularly beneficial, and another the most politically important, and the third the most intimately divine of all human pursuits, yet the very greatness of their end, the health of the body, or of the commonwealth, or of the soul, diminishes, not increases, their claim to the appellation “liberal,” and that still more, if they are cut down to the strict exigencies of that end. If, for instance, Theology, instead of being cultivated as a contemplation, be limited to the purposes of the pulpit or be represented by the catechism, it loses, —not its usefulness, not its divine character, not its meritoriousness

(rather it gains a claim upon these titles by such charitable condescension),—but it does lose the particular attribute which I am illustrating; just as a face worn by tears and fasting loses its beauty, or a labourer's hand loses its delicateness;—for Theology thus exercised is not simple knowledge, but rather is an art or a business making use of Theology. And thus it appears that even what is supernatural need not be liberal, nor need a hero be a gentleman, for the plain reason that one idea is not another idea. And in like manner the Baconian Philosophy, by using its physical sciences in the service of man, does thereby transfer them from the order of Liberal Pursuits to, I do not say the inferior, but the distinct class of the Useful. And, to take a different instance, hence again, as is evident, whenever personal gain is the motive, still more distinctive an effect has it upon the character of a given pursuit; thus racing, which was a liberal exercise in Greece, forfeits its rank in times like these, so far as it is made the occasion of gambling.

我们把这些例子放在一起比较，现在，要确定我一直所省查的这个呈现出不同变化的词语所应用的原则，应当不是什么难事了。尽管好像展示男子气概、技能或作战能力的比赛看起来都是体力上的，但也都被认为是通识知识。另一方面，尽管一些纯粹职业性的东西对智力要求极高，甚至哪怕与贸易及体力劳动比较起来是通识知识，却并不简单地被称作是通识，而一些商业性的职业则完全不被认为是通识知识。为何这样区分呢？因为只有具有以下特征的事物才称为通识知识：它自有主张，不依赖后续结果，不需要任何补充，拒绝通过别的任何目的来提供资料（如所说的），或不需要被吸纳进任何一种技能就能适当地进行自我呈现，供我们思考。只要自足和完整，哪怕最普通的求索也具备上述特征；而极高雅的求索，假如只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反倒会失去这特征。从价值与重要性来看，若将一篇减少骨折的论文同板球比赛或猎狐游戏相比，显然是荒唐的，可是在这两类活动中，体能锻炼具备我们称为通识的那种特质，而那种智力活动却

不然。假如将所有有学识的职业仅看作是职业，那么也是如此。尽管其中一种普遍有益，另一种具有最重要的政治性，第三种是在人所有的求索中最具内在神性的。然而正如由于其目的极其崇高，即身体、国民和灵魂的安康，才使得它们不太配受而非理应获得“通识”这一名称。假如将它们视作达到目的的非有不可的手段，那就更是如此了。例如，不把神学，培育成一种沉思，而将其限制在布道这一目标上，或仅只通过教理问答来表现，那它失去的就不是它的有用性，不是它的神圣品格，不是它的美善（它反倒因为如此善意的屈尊府就而配受这些头衔），而是我一直在此说明的特别属性。正如经常流泪或斋戒会使面容失色，体力活儿干多了，起老茧的手就不再敏感。神学若作如此运用，就不再是简单的知识了，而是利用神学的一门技艺或营生。由此看来，哪怕超自然的东西也未见得是通识知识，英雄好汉不一定就得是绅士。道理很简单：此观念非彼观念。同样，培根式哲学将自然科学应用于人的服务，实则是将这些学科从通识性的求索转向了说不上是次等的求索，但肯定是明显的实用类的求索。可以再举不同的一个例子。显而易见的是，每当私利成为动机，便会对某种既定求索的品格产生更明显的影响。因此，赛马本来是希腊的一项通识性锻炼，但在某些类似的情况下就会丧失其等级——比如拿赛马会当赌博场的时候。

All that I have been now saying is summed up in a few characteristic words of the great Philosopher. “Of possessions,” he says, “those rather are useful, which bear fruit; those *liberal* , *which* tend to enjoyment. By fruitful, I mean, which yield revenue; by enjoyable, where *nothing accrues of consequence beyond the using* .“ [6_4]

我一直在谈论的这些内容，不妨用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极具特色的话加以总结。“说到财物，”他说，“能产出结果的那些，都属于有用之物；能供人享乐的，才称得上洒脱之物 。能产出结果，我指的是能给

人带来收益；能供人享乐，是说除了可拿来使用之外，再不会增加别的任何重要的东西 。” [7_4]

5 .

5 .

Do not suppose, that in thus appealing to the ancients, I am throwing back the world two thousand years, and fettering Philosophy with the reasonings of paganism. While the world lasts, will Aristotle's doctrine on these matters last, for he is the oracle of nature and of truth. While we are men, we cannot help, to a great extent, being Aristotelians, for the great Master does but analyze the thoughts, feelings, views, and opinions of human kind. He has told us the meaning of our own words and ideas, before we were born. In many subject-matters, to think correctly, is to think like Aristotle, and we are his disciples whether we will or no, though we may not know it. Now, as to the particular instance before us, the word “liberal” as applied to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expresses a specific idea, which ever has been, and ever will be, while the nature of man is the same, just as the idea of the Beautiful is specific, or of the Sublime, or of the Ridiculous, or of the Sordid. It is in the world now, it was in the world then; and, as in the case of the dogmas of faith, it is illustrated by a continuous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never was out of the world, from the time it came into it. There have indeed been differences of opinion from time to time, as to what pursuits and what arts came under that idea, but such differences are but an additional evidence of its reality. That idea must have a substance in it, which has maintained its ground

amid these conflicts and changes, which has ever served as a standard to measure things withal, which has passed from mind to mind unchanged, when there was so much to colour, so much to influence any notion or thought whatever, which was not founded in our very nature. Were it a mere generalization, it would have varied with the subjects from which it was generalized; but though its subjects vary with the age, it varies not itself. The palæstra may seem a liberal exercise to Lycurgus, and illiberal to Seneca; coach-driving and prize-fighting may be recognized in Elis, and be condemned in England; music may be despicable in the eyes of certain moderns, and be in the highest place with Aristotle and Plato,—(and the case is the same in the particular application of the idea of Beauty, or of Goodness, or of Moral Virtue, there is a difference of tastes, a difference of judgments)—still these variations imply, instead of discrediting, the archetypal idea, which is but a previous hypothesis or condition, by means of which issue is joined between contending opinions, and without which there would be nothing to dispute about.

不要以为，我这样搬出古人，就是把世人扔回到两千年前，并用异教徒的一套理论给哲学套上枷锁。只要这个世界还在，亚里士多德在这些方面的学说就还在，因为他是论述自然与真理的圣人。只要我们还是人，在很大程度上就禁不住会成为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因为这位伟大的导师所分析的，正是人的思想、情感、观点与意见。他将我们自己所说之话与想法的意思告诉我们的时候，远在我们出生之前。在许多话题上，要正确思考，就是要学习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思考。无论是否愿意，我们都是他的信徒，尽管我们不一定意识得到。谈到我们眼前的这个具体例子，应用于知识与教育上的“通识”一词，表达的始终并将一直是一个明确的观念。人的本性若是一样，正如美的观念也是明确的，崇高、荒谬或肮脏的观念也是如此。在当前的世界如此，在以前的世界也是一样。正如在信仰中的教理这个例子中，这一

观念是由连续不断的历史传统说明的，打从进入这世界的那一刻起，它从来都没有脱离人的世界。到底应该将哪些求索与技能归类于这观念，人们时不时会有不同意见，但这些歧见正是其现实存在的额外证据。这观念中必有实体能够为其在诸多冲突与变迁中谋得一席之地，并充当衡量事物的尺度。但凡并非基于人之真实本性的任何见解或想法，都会受到那么多东西的渲染和影响，但是，通识的观念却历经贤达而不变。假如它只是一个概括，那它必定会随从中概括出来的那些主题而变动。尽管其主题会随时代变化，但其自身却并没有变化。体操锻炼，在来库古看来可能是通识性的操练，在塞涅卡看来则不是。赶四轮马车和为奖金而比武可能在伊利斯会得到认可，但在英格兰却会受到谴责。在某些现代人眼里，音乐可能是可鄙的，而其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心里却可能占据最高位置（在美、善、伦理德性等观念的具体应用上可能也是类似情形，这里存在一个品味之差、判断力之差）。可是，与其说这些差异败坏了那个原型观念，毋宁说是蕴含了它。因为这观念不过是先前一个假说或条件，相互竞争的意见只有借此才能讨论到同一个问题，而没有了这个观念，那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

I consider, then, that I am chargeable with no paradox, when I speak of a Knowledge which is its own end, when I call it liberal knowledge, or a gentleman's knowledge, when I educate for it, and make it the scope of a University. And still less am I incurring such a charge, when I make this acquisition consist, not in Knowledge in a vague and ordinary sense, but in that Knowledge which I have especially called Philosophy or, in an extended sense of the word, Science; for whatever claims Knowledge has to be considered as a good, these it has in a higher degree when it is viewed not vaguely, not popularly, but precisely and transcendently as Philosophy. Knowledge, I say, is then especially liberal, or sufficient for itself, apart from every external and ulterior object, when and so far as it is philosophical, and this I proceed to show.

所以，当我谈及一种作为自身目的的知识，当我称其为一种博雅知识或绅士的知识，当我为此执教，并将其确定在大学的教育范围内时，希望没有人说这是一种悖论。我认为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在于掌握模糊与普通意义上的知识，而在于掌握我特别将其称为哲学的知识，或在更广泛意义上是科学的知识。我这样说更无意挑起众人责难，因为不管知识是以何种名目被认为是良好的，当它不是被笼统、通俗，而是准确、超验地被视为哲学时，就在更高程度上拥有这些名目。因此我要说，当知识保持其哲理性质或者说只要知识保持其哲理性质，或则当其自身已经足够充分，无须任何外在与不相干的目的时，它就尤其适合修身这一点我接下来就会说明。

6．

6．

Now bear with me, Gentlemen, if what I am about to say, has at first sight a fanciful appearance. Philosophy, then, or Science, is related to Knowledge in this way:—Knowledge is called by the name of Science or Philosophy, when it is acted upon, informed, or if I may use a strong figure, impregnated by Reason. Reason is the principle of that intrinsic fecundity of Knowledge, which, to those who possess it, is its especial value, and which dispenses with the necessity of their looking abroad for any end to rest upon external to itself. Knowledge, indeed, when thus exalted into a scientific form, is also power; not only is it excellent in itself, but whatever such excellence may be, it is something more, it has a result beyond itself. Doubtless; but that is a further consideration, with which I am not concerned. I only say that, prior to its being a power, it is a

good; that it is, not only an instrument, but an end. I know well it may resolve itself into an art, and terminate in a mechanical process, and in tangible fruit; but it also may fall back upon that Reason which informs it, and resolve itself into Philosophy. In one case it is called Useful Knowledge, in the other Liberal. The same person may cultivate it in both ways at once; but this again is a matter foreign to my subject; here I do but say that there are two ways of using Knowledge, and in matter of fact those who use it in one way are not likely to use it in the other, or at least in a very limited measure. You see, then, here are two methods of Education; the end of the one is to be philosophical, of the other to be mechanical; the one rises towards general ideas, the other is exhausted upon what is particular and external. Let me not be thought to deny the necessity, or to decry the benefit, of such attention to what is particular and practical, as belongs to the useful or mechanical arts; life could not go on without them; we owe our daily welfare to them; their exercise is the duty of the many, and we owe to the many a debt of gratitude for fulfilling that duty. I only say that Knowledge, in proportion as it tends more and more to be particular, ceases to be Knowledge. It is a question whether Knowledge can in any proper sense be predicated of the brute creation; without pretending to metaphysical exactness of phraseology, which would be unsuitable to an occasion like this, I say, it seems to me improper to call that passive sensation, or perception of things, which brutes seem to possess, by the name of Knowledge. When I speak of Knowledge, I mean something intellectual, something which grasps what it perceives through the senses; something which takes a view of things; which sees more than the senses convey; which reasons upon what it sees, and while it sees; which invests it with an idea. It expresses itself, not in a mere enunciation, but by an enthymeme: it is of the nature of science from the first, and in this consists its dignity. The principle

of real dignity in Knowledge, its worth, its desirableness, considered irrespectively of its results, is this germ within it of a scientific or a philosophical process. This is how it comes to be an end in itself; this is why it admits of being called Liberal. Not to know the relative disposition of things is the state of slaves or children; to have mapped out the Universe is the boast, or at least the ambition, of Philosophy.

如果我接下来所说的话初听稀奇古怪，还请各位海涵。哲学或科学，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与知识产生联系的：当知识受到理性的影响、滋润和（我不妨用更强烈的一个比喻）孕育时，人们就称之为科学或哲学。理性是知识固有的繁殖力的本质，在拥有知识的人看来，这本质即知识的特别价值所在，有了它，人们就无须再去别的地方寻找外在于它自身的任何目的作为依靠。当知识被拔高到这样一种科学形式的时候，它也就成了力量。不仅知识本身是美好的，而且无论这美好所指为何，它都含有别的某种东西，它导致了其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的产生。这一点确凿无疑，但属于另一重考虑，在此按下不表。我只想说，在知识成为力量之前，它首先是一种善；它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是目的。我深知它最终可能归结为一门技艺，终结于机械过程，并结出可感触的果实；可是，它亦可能重返滋润它的理性，并终结于哲学。在一种情况下，它被称为有用的知识，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则会成为修身的知识。人可同时以两种方式培育这一知识，但这又是一个不相干的话题。在此我只想说，有两种利用知识的方式，在现实中，以一种方式利用知识的人，不太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利用知识，至少利用的尺度非常有限。现在大家就看出来了，有两种教育方法，其中之一的目的是要将其哲理化，另一个的目的是将其机器化；一种方法直奔普遍观念，另一种方法则会在具体与外在的事物上耗尽精力。有用的或机械性的技能，往往需要关注具体实用的东西。大家不要以为我会否认这种关注的必要性，或诋毁其益处。没有这些技能，生活便难以为继，日常生活的许多便利都归功于这些技能。这些技能的运用，正是很多人的职责。这些人尽职尽责，着实令我们感激不尽。但我要

说，知识越是靠近具体而微的东西，它离知识的距离就越远，最终就不再是知识了。这一问题关系到可否在任何适当意义上断言兽类也会拥有知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咬文嚼字地在形式上搬弄准确的字眼恐怕不合适，所以我要说，在我看来，将兽类所具备的那种被动的感觉或对事物的感知也称之为知识是不适当的。说到知识的时候，我指的是某种智性事物，指的是通过感官掌握它所感受到的事物的某种东西，某种能就事物做出观察的东西。这种知识所看到的远比感官传递的内容要多，而且能够就看到的事物进行推理，并在看到时就这么做，并赋予它一个观念。知识不仅仅靠表述来表达自身，而是通过修辞三段论来加以阐述：它从一开始便具备科学性质，它的尊贵也正在于此。真正尊贵的知识的本质、价值、美善，就在于其自身所蕴含的符合科学或哲理方法的胚芽，而不必考虑其引发的结果。这也正是它成为自身目的的方式，也是可称它为修身之学的原因。不明白事物的相对习性，说明人还处在奴隶或幼儿状态，而勾勒宇宙蓝图，则是哲学的自夸之处，至少是其雄心所在。

Moreover, such knowledge is not a mere extrinsic or accidental advantage, which is ours today and another's tomorrow, which may be got up from a book, and easily forgotten again, which we can command or communicate at our pleasure, which we can borrow for the occasion, carry about in our hand, and take into the market; it is an acquired illumination, it is a habit, a personal possession, and an inward endowment.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t is more correct, as well as more usual, to speak of a University as a place of education, than of instruction, though, when knowledge is concerned, instruction would at first sight have seemed the more appropriate word. We are instructed, for instance, in manual exercises, in the fine and useful arts, in trades, and in ways of business; for these are methods, which have little or no effect upon the mind itself, are contained in rules committed to memory, to tradition, or to use, and bear upon an end external to themselves.

But education is a higher word; it implies an action upon our mental na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haracter; it is something individual and permanent, and is commonly spoken of in connexion with religion and virtue. When, then, we speak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Knowledge as being Education, we thereby really imply that that Knowledge is a state or condition of mind; and since cultivation of mind is surely worth seeking for its own sake, we are thus brought once more to the conclusion, which the word “Liberal” and the word “Philosophy” have already suggested, that there is a Knowledge, which is desirable, though nothing come of it, as being of itself a treasure, and a sufficient remuneration of years of labour.

再者，这样的知识并非纯粹外在或偶发的益处，今天属于我们，明天又属于别人，可以从书本里挑捡，然后又轻易忘记，可以随意掌握或传播，可以临时借用，可以随身携带，还可以拿去销售。这样的知识是后天的启迪，是一种习惯，是私人财物和精神禀赋。正因如此，大学是教育之地而非授业之所这种说法，更常见也更恰当。不过，谈到知识，乍看一定觉得讲授一词必然更适合。例如，从事体力活动、学习精巧与有用的技艺、切磋商贸与经营之法等等，都是人教出来的，因为这些都是方法，对人的思维本身影响很小甚或没有影响。方法包含在交付于记忆、传统或运用的规则中，并影响其自身之外的某个目的。但是，教育却是更高级别的一个词，它暗含对我们的精神本质及性格的塑造所发挥的一种作用。教育是某种个别和永久性的东西，且一般总是从它与宗教及德行的关联中谈及的内容。因此当我们认为知识的传播才是教育，并这样谈及教育时，实际上我们指的是，知识是一种心智状态或状况。由于心智的培育本身肯定是值得追求的，我们就再一次回到“修身”和“哲学”这两个词已经暗示的同一个结论，即存在一种合意的知识，由于它自身即财富，因此尽管无物从中而出，却仍然是对我们多年辛苦的充足酬劳。

7．

7．

This, then, is the answe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give to the question with which I opened this Discourse. Before going on to speak of the object of the Church in taking up Philosophy, and the uses to which she puts it, I am prepared to maintain that Philosophy is its own end, and, as I conceive, I have now begun the proof of it. I am prepared to maintain that there is a knowledge worth possessing for what it is, and not merely for what it does; and what minutes remain to me today I shall devote to the removal of some portion of the indistinctness and confusion with which the subject may in some minds be surrounded.

本篇开讲时，我就带着一个问题来，以下就算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吧。在谈论教会采纳哲学的目的及其用途之前，我准备先进行说明，哲学就是它自身的目的，我觉得自己已经开始证明这一论断了。我准备好提出这样的意见，即存在一种本身就值得拥有的知识，而非仅仅因为它能发挥什么效用。在今天剩余的几分钟里，我要专门消除人脑海里的一些围绕这个话题而产生的模糊认识和困惑。

It may be objected then, that, when we profess to seek Knowledge for some end or other beyond itself, whatever it be, we speak intelligibly; but that, whatever men may have said, however obstinately the idea may have kept its ground from age to age, still it is simply unmeaning to say that we seek Knowledge for its own sake, and for nothing else; for that it ever leads to something

beyond itself, which therefore is its end, and the cause why it is desirable;—moreover, that this end is twofold, either of this world or of the next; that all knowledge is cultivated either for secular objects or for eternal; that if it is directed to secular objects, it is called Useful Knowledge, if to eternal, Religious or Christian Knowledge;—in consequence, that if, as I have allowed, this Liberal Knowledge does not benefit the body or estate, it ought to benefit the soul; but if the fact be really so, that it is neither a physical or a secular good on the one hand, nor a moral good on the other, it cannot be a good at all, and is not worth the trouble which is necessary for its acquisition.

不妨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即当我们宣称自己出于超出其自身的这种或者那种目的而追求无论何种意义的知识时，都还算明白易懂。但无论人们都说了些什么，无论这想法在不同时代多么顽固地占据着一席之地，当我们生成因为其自身而非别的任何目的而追求知识时，这话还是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总是会导向某个超出其自身的目的，并因此而合意的事物。再者说，这目的也是双重的，要么是此世的目的，要么是来世的目的；由于所有知识都要么处于世俗的目的，要么处于永恒的目的而培育，假如是朝向世俗目标的，那就称之为有用知识，如果是朝向永恒目标的，那就是宗教的或基督教的知识。结果，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假如这种修身知识并不能使身体或身份受益，它就应当会使灵魂受益。可是，假如事实确实如此，就是说，一方面不是自然或世俗意义上的善，另一方面亦非一种道德善，那它根本就不可能是善，因此也不值得我们费力获得。

And then I may be reminded that the professors of this Liberal or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have themselves, in every age, recognized this exposition of the matter, and have submitted to the issue in which it terminates; for they have ever been attempting to

make men virtuous; or, if not, at least have assumed that refinement of mind was virtue, and that they themselves were the virtuous portion of mankind. This they have professed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they have utterly failed in their professions, so as ever to make themselves a proverb among men, and a laughing-stock both to the grave and the dissipated portion of mankind, in consequence of them. Thus they have furnished against themselves both the ground and the means of their own exposure, without any trouble at all to any one else. In a word, from the time that Athens was the University of the world, what has Philosophy taught men, but to promise without practising, and to aspire without attaining? What has the deep and lofty thought of its disciples ended in but eloquent words? Nay, what has its teaching ever meditated, when it was boldest in its remedies for human ill, beyond charming us to sleep by its lessons, that we might feel nothing at all? like some melodious air, or rather like those strong and transporting perfumes, which at first spread their sweetness over every thing they touch, but in a little while do but offend in proportion as they once pleased us. Did Philosophy support Cicero under the disfavour of the fickle populace, or nerve Seneca to oppose an imperial tyrant? It abandoned Brutus, as he sorrowfully confessed, in his greatest need, and it forced Cato, as his panegyrist strangely boasts, into the false position of defying heaven. How few can be counted among its professors, who, like Polemo, were thereby converted from a profligate course, or like Anaxagoras, thought the world well lost in exchange for its possession? The philosopher in *Rasselas* taught a superhuman doctrine, and then succumbed without an effort to a trial of human affection.

此时当有人提醒我，各个时代传授这种修身或哲理性知识的教授，都意识到了要如何说明此事，并致力于终结此话题的问题。他们

一直希望自己能够使人具备德性，假如不是这样，至少他们曾假定，心智的提炼就是德行，而他们自己也就是拥有德行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一方面作出这样的宣称，但另外一方面却完全没有职业上的践行，如此一来虽然他们名闻遐迩，却也因这两方面的原因而成为圣人和俗人等各色人等的笑柄。这样，他们便违背自己的意愿，为暴露自身提供了前提与手段，然后根本又没有给别的任何人惹上麻烦。一言以蔽之，自从雅典成为世人的大学以来，哲学教导人们的，难道不就是不经实践就做出允诺吗？难道不是不努力以求，而是耽于幻想吗？这种哲学的门徒所怀的深沉与崇高思想，最终不都以夸夸其谈而收尾吗？不仅如此，虽然这种哲学说教夸口能疗治人性顽疾，可是，除了让我们入魔而跟着课程入睡，竟至什么也感觉不到之外，它还有过别的什么筹划呢？正如悦耳的曲调或初看能给所掩盖的事物点撒浓郁迷人的香甜之气的香水，当初令我们愉悦不已，但不久之后便会同样使人难受。是哲学不顾浮躁民众对西塞罗的厌恶而支持他，是哲学鼓起塞涅卡的勇气让他去反对一位暴戾皇帝的吗？哲学在布鲁图最需要的时候抛弃了他，这也是他悲伤地承认过的。十分奇怪的是，为加图写颂词的人，竟至连加图被哲学逼到藐视天庭的错误立场上的事情也当作荣耀之事的份上。那些算是在宣称这种哲学的人，如波列蒙，由此而脱离了挥霍者的生活轨迹，又如阿那克萨哥拉，他认为世人为占有这种哲学而迷失了方向，但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拉塞勒斯传》中的那位哲学家讲授一种超人学说，然而却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屈服于对人类情感的一次考验。

“He discoursed,” we are told, “with great energy 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assions. His look was venerable, his action graceful, his pronunciation clear, and his diction elegant.

我们得知，“他不遗余力地谈及情感的约束。”他的表情看上去严肃可敬，他的动作优雅别致，他的发音清晰可闻，他的用词高雅讲究。

He showed, with great strength of sentiment and variety of illustration, that human nature is degraded and debased, when the lower faculties predominate over the higher. He communicated the various precepts given, from time to time, for the conquest of passion, and displayed the happiness of those who had obtained the important victory, after which man is no longer the slave of fear, nor the fool of hope". He enumerated many examples of heroes immoveable by pain or pleasure, who looked with indifference on those modes or accidents to which the vulgar give the names of good and evil."

> "他充满激情，多方举证，说明了当低级官能支配高级官能后，人性便会堕落、沉沦这一道理。他不时提起已知的各种用于克服炽情的戒律，并展示赢得这场重大胜利的人士感受到的幸福。那些人不再成为恐惧的奴隶或希望的愚人……他列举了许多英雄人物，这些人生典范不为痛苦或快乐所动，他们冷眼看待凡夫俗子称为善或恶的那些生活方式或事件。"

Rasselas in a few days found the philosopher in a room half darkened, with his eyes misty, and his face pale. "Sir," said he, "you have come at a time when all human friendship is useless; what I suffer cannot be remedied, what I have lost cannot be supplied. My daughter, my only daughter, from whose tenderness I expected all the comforts of my age, died last night of a fever." "Sir," said the prince, "mortality is an event by which a wise man can never be surprised; we know that death is always near, and it should therefore always be expected." "Young man," answered the philosopher, "you speak like one who has never felt the pangs of

separation.” “Have you, then, forgot the precept,” said Rasselas, “which you so powerfully enforced?… consider that external things are naturally variable, but truth and reason are always the same.” “What comfort,” said the mourner, “can truth and reason afford me? Of what effect are they now, but to tell me that my daughter will not be restored?”

几天之后，拉塞勒斯发现这位哲学家在一个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双眼迷蒙，面色苍白。“阁下，”他说，“此时您来，可知人间一切友情已无济于事了。我的伤痛无以疗治，我的失丧无以弥补。我女儿，我唯一的女儿昨晚因热病离世。可知到了我这把年纪，有她问寒问暖才会快乐。”“先生，”拉塞勒斯王子说，“生死之事，聪明人当不意外才是。您知道，死神总在不远处，来了就不要奇怪。”“年轻人啊，”这位哲学家说，“听你这口气，八成从来都没有尝过生离死别之苦。”拉塞勒斯说，“这么说，莫不是忘了您一直都在特别强调的那道古训？……世事无常本属自然，真理和理性却永远不变。”这位伤心的人说：“真理和理性能带给我什么安慰呢？”“这两样东西只不过是说，我女儿再也回不来了，除此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呢？”

8．

8．

Better, far better, to make no professions, you will say, than to cheat others with what we are not, and to scandalize them with what we are. The sensualist, or the man of the world, at any rate is not the victim of fine words, but pursues a reality and gains it. The Philosophy of Utility, you will say, Gentlemen, has at least done its

work; and I grant it,—it aimed low, but it has fulfilled its aim. If that man of great intellect who has been its Prophet in the conduct of life played false to his own professions, he was not bound by his philosophy to be true to his friend or faithful in his trust. Moral virtue was not the line in which he undertook to instruct men; and though, as the poet calls him, he were the "meanest" of mankind, he was so in what may be called his private capacity and without any prejudice to the theory of induction. He had a right to be so, if he chose, for any thing that the Idols of the den or the theatre had to say to the contrary. His mission was the increase of physical enjoyment and social comfort [6_5] ; and most wonderfully, most awfully has he fulfilled his conception and his design. Almost day by day have we fresh and fresh shoots, and buds, and blossoms, which are to ripen into fruit, on that magical tree of Knowledge which he planted, and to which none of us perhaps, except the very poor, but owes, if not his present life, at least his daily food, his health, and general well-being. He was the divinely provided minister of temporal benefits to all of us so great, that, whatever I am forced to think of him as a man, I have not the heart, from mere gratitude, to speak of him severely. And, in spite of the tendencies of his philosophy, which are, as we see at this day, to depreciate, or to trample on Theology, he has himself, in his writings, gone out of his way, as if with a prophetic misgiving of those tendencies, to insist on it as the instrument of that beneficent Father [6_6] , who, when He came on earth in visible form, took on Him first and most prominently the office of assuaging the bodily wounds of human nature. And truly, like the old mediciner in the tale, "he sat diligently at his work, and hummed, with cheerful countenance, a pious song;" and then in turn "went out singing into the meadows so gaily, that those who had seen him from afar might well have thought it was a youth gathering flowers for his beloved, instead of an old physician gathering healing herbs in the morning dew." [6_7]

相信大家会说，以自己本所不是的样子来欺骗他人，又以我们本来的样子而惹人愤慨，远不如根本就不要表明自己是什么人。凭感觉行事的人，或称世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文雅措辞的受害者，他们只是追求一种现实，并要得到它。诸位会说，实用哲学至少说到做到了，我也承认这一点。虽然目标定得低，毕竟还是达到了。假如一直都是那位智慧的实用哲学的倡导者在实际生活中言行不一，那他就一定不会受其哲学的束缚而真诚待友或要对得起别人的信赖。他并非按伦理德性去教导人们，哪怕他就是那位诗人所说的“坏透顶的人”，这也只是就其个人品性所说的，而不会对归纳推理造成任何损害。只要选择了，他就有权这么做，而不管洞穴假相或剧场假相会与此如何对立。他的目标是加强物质享受和与人交往时的舒适，而他的确也实现了自己的构思和设想，这可真是让人惊讶和感叹。[7_5] 他栽下的那棵神奇的知识之树，我们日日见到新鲜嫩芽、蓓蕾与花朵生出，它们最终都会熟透结果。除去那可怜的少数人，也许我们所有人都对它有所亏欠。就算我们当前的生命可以不会如此，但至少每日的食粮、健康与总体的幸福都要归功于它。他是能力非凡的公使，把现世的益处给予所有人。如此了不起的工作，无论我是不是被迫认为他是这类人的，就冲着这一份感激之情，说起他来我都不忍太过严苛。再说了，目前看来，虽然他的哲学倾向于贬低或践踏神学，但他本人却在著述中竭尽全力地坚称，这种哲学实则是那位慈爱之父的工具，[7_6] 就好像对其哲学倾向有一种预见性的忧虑。在神以可见的外形来到人间时，肩负的首要使命就是要疗治人性的肉身伤痛。确实如此，正如故事中所描述的那位老医生，“他坐在那里勤奋地工作，面容和悦，哼着虔敬的歌曲”，接着又“唱着那么欢乐的歌来到草地上，远处看到他的人，并不知道这位老医生是在露珠间采撷草药，反倒极可能以为是一位年轻人在为情人摘花。”[7_7]

Alas, that men, in the action of life or in their heart of hearts, are not what they seem to be in their moments of excitement, or in their trances or intoxications of genius,—so good, so noble, so

serene! Alas, that Bacon too in his own way should after all be but the fellow of those heathen philosophers who in their disadvantages had some excuse for their inconsistency, and who surprise us rather in what they did say than in what they did not do! Alas, that he too, like Socrates or Seneca, must be stripped of his holy-day coat, which looks so fair, and should be but a mockery amid his most majestic gravity of phrase; and, for all his vast abilities, should, in the littleness of his own moral being, but typify the intellectual narrowness of his school! However, granting all this, heroism after all was not his philosophy:—I cannot deny he has abundantly achieved what he proposed. His is simply a Method whereby bodily discomforts and temporal wants are to be most effectually removed from the greatest number; and already, before it has shown any signs of exhaustion, the gifts of nature, in their most artificial shapes and luxurious profusion and diversity, from all quarters of the earth, are, it is undeniable, by its means brought even to our doors, and we rejoice in them.

的确如此，人忙于生计时，或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是那么纯良，那么高尚，那么安详宁静，与他激动、出神或陶醉于天赋的时候判然相异！你瞧，看培根自己的言行，他毕竟不过是那些异教哲学家中的一员，身处逆境时，他们能为自身矛盾找到一个借口。让人惊讶的，不是他们没有做什么，反倒是他们说过的那些话！可惜可叹，就跟苏格拉底或塞涅卡一样，他也必须脱掉那么好看的圣日的穿戴，并会因为用过的那些古板严肃的字眼而遗人笑柄。尽管能力超凡，然而因为人品太差，终不免成为说明他那一派学术眼光短浅的典型！可是，就算一切的确如此，他鼓吹的毕竟还不是英雄主义哲学。我无法否认，他自己所提出的那些事情，他多半都做到了。他的哲学不过是一套方法，绝大多数人借此有效地摆脱肉身的不适与现世的欠缺。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方法还没有显示出任何枯竭迹象的时候，形态各异、丰富多姿、取之不竭的自然赐予，便已从大地的各处将这方法带

到各家门前，人人乐得尽情享受。

9．

9．

Useful Knowledge then, I grant, has done its work; and Liberal Knowledge as certainly has not done its work,—that is, supposing, as the objectors assume, its direct end, like Religious Knowledge, is to make men better; but this I will not for an instant allow, and, unless I allow it, those objectors have said nothing to the purpose. I admit, rather I maintain, what they have been urging, for I consider Knowledge to have its end in itself. For all its friends, or its enemies, may say, I insist upon it, that it is as real a mistake to burden it with virtue or religion as with the mechanical arts. Its direct business is not to steel the soul against temptation or to console it in affliction, any more than to set the loom in motion, or to direct the steam carriage; be it ever so much the means or the condition of both material and moral advancement, still, taken by and in itself, it as little mends our hearts as it improves our temporal circumstances. And if its eulogists claim for it such a power, they commit the very same kind of encroachment on a province not their own as the political economist who should maintain that his science educated him for casuistry or diplomacy. Knowledge is one thing, virtue is another; good sense is not conscience, refinement is not humility, nor is largeness and justness of view faith. Philosophy, however enlightened, however profound, gives no command over the passions, no influential motives, no vivifying principles. Liberal Education makes not the Christian, not

the Catholic, but the gentleman. It is well to be a gentlemen, it is well to have a cultivated intellect, a delicate taste, a candid, equitable, dispassionate mind, a noble and courteous bearing in the conduct of life;—these are the connatural qualities of a large knowledge; they are the objects of a University; I am advocating, I shall illustrate and insist upon them; but still, I repeat, they are no guarantee for sanctity or even for conscientiousness, they may attach to the man of the world, to the profligate, to the heartless,—pleasant, alas, and attractive as he shows when decked out in them. Taken by themselves, they do but seem to be what they are not; they look like virtue at a distance, but they are detected by close observers, and on the long run; and hence it is that they are popularly accused of pretence and hypocrisy, not, I repeat, from their own fault, but because their professors and their admirers persist in taking them for what they are not, and are officious in arrogating for them a praise to which they have no claim. Quarry the granite rock with razors, or moor the vessel with a thread of silk; then may you hope with such keen and delicate instruments as human knowledge and human reason to contend against those giants, the passion and the pride of man.

我承认，实用知识派上了用场。至于修身知识，假定其直接目的同宗教知识累死，是反对者所想的那样要使人变得更好，那它肯定就还没有发挥其作用。可是，我一刻也不会同意这说法，我若不同意，反对者就等于没说一句中肯的话。他们一直在说服我，我承认，甚至坚持认为知识的目的就在其自身。无论知识的朋友或敌人会说什么，我都坚持认为，给知识增加德性或宗教的负担和给机械技能增加这样的负担一样，都是切实的错误。知识的直接作用，并非坚振灵魂以抵御诱惑，亦非在苦痛中安慰它，更不是启动织布机或引导蒸汽机车。尽管知识是物质与道德进步的重要手段或条件，但依靠或仅凭它自身，却并不能像改变我们现世的环境那样修补心灵的欠缺。若是颂扬

知识的人断言它有这份能力，这种越俎代庖的错误，毫不亚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以为政治经济学教会了他如何进行诡辩或从事外交活动。知识是一回事，德性是另一回事，良好的判断力并非良知，学养亦非谦卑，观察力的广博精确亦非信仰。无论多么高深的哲学，都不能掌控激情，提供有影响力的动机或活灵活现的信念。通识教育造就的不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而是绅士。做个绅士未尝不可，具备有学养的领悟力并无不妥，有雅致的品味，有率真、公平和无偏见的头脑，有高尚谦逊的处世之道也是一样，这些都是广博知识的固有属性，也是大学教育的目标。我在此倡导，我要举例说明并且会坚持的，就是这些品质。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反复说明，这些都不是保持圣洁甚或谨守良知的保障，因为凡夫俗子、放荡不羁和心如铁石的人也会受其吸引，他们披上这些伪装后，也招人喜爱、引人注目。仅看这些属性，它们就会呈现骗人的外表。远看像是德行，时间一长就逃不过心细者的法眼。正是这样，人们才说这些东西是假装与虚伪，我再说一遍，不是因为它们自身有何过错，而是因为宣称与赞扬这些品质的人，一心要为别种目的冒昧地占有它们，并十分在意能否借此赢得自己并不配受的称赞。或用剃刀采花岗岩，或以丝线拴船舶，诸位还不妨希望以像人类知识和人类理性这等锐利和精致的工具去抗争那些巨人，即人的炽情与傲慢。

Surely we are not driven to theories of this kind, in order to vindicate the value and dignity of Liberal Knowledge. Surely the real grounds on which its pretensions rest are not so very subtle or abstruse, so very strange or improbable. Surely it is very intelligible to say, and that is what I say here, that Liberal Education, viewed in itself, is simply the cultivation of the intellect, as such, and its object is nothing more or less than intellectual excellence. Every thing has its own perfection, be it higher or lower in the scale of things; and the perfection of one is not the perfection of another. Things animate, inanimate, visible, invisible, all are good in their kind, and have a *best* of themselves, which is an object of pursuit.

Why do you take such pains with your garden or your park? You see to your walks and turf and shrubberies; to your trees and drives; not as if you meant to make an orchard of the one, or corn or pasture land of the other, but because there is a special beauty in all that is goodly in wood, water, plain, and slope, brought all together by art into one shape, and grouped into one whole. Your cities are beautiful, your palaces, your public buildings, your territorial mansions, your churches; and their beauty leads to nothing beyond itself. There is a physical beauty and a moral: there is a beauty of person, there is a beauty of our moral being, which is natural virtue; and in like manner there is a beauty, there is a perfection, of the intellect. There is an ideal perfection in these various subject-matters, towards which individual instances are seen to rise, and which are the standards for all instances whatever. The Greek divinities and demigods, as the statuary has moulded them, with their symmetry of figure, and their high forehead and their regular features, are the perfection of physical beauty. The heroes, of whom history tells, Alexander, or Cæsar, or Scipio, or Saladin,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at magnanimity or self-mastery which is the greatness of human nature. Christianity too has its heroes, and in the supernatural order, and we call them Saints. The artist puts before him beauty of feature and form; the poet, beauty of mind; the preacher, the beauty of grace; then intellect too, I repeat, has its beauty, and it has those who aim at it. To open the mind, to correct it, to refine it, to enable it to know, and to digest, master, rule, and use its knowledge, to give it power over its own faculties, application, flexibility, method, critical exactness, sagacity, resource, address, eloquent expression, is an object as intelligible (for here we are inquiring, not what the object of a Liberal Education is worth, nor what use the Church makes of it, but what it is in itself), I say, an object as intelligible as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bsolutely distinct from it.

肯定地，要证明修身知识的价值与尊严，我们并不需要退守而求诸这一类型的学说。修身知识的多重主张所依据的真正基础，肯定也并没有那么隐晦艰涩，没有那么奇怪或难以确信。这样说，肯定且也正是我在此想表明的意思，一定明白易懂：通识教育，就其自身来看，不过是智力的培育。假若如此，它的目标正在于智力的发达，不多也不少。不论高低贵贱，万事万物都有它自身的完美之境。一种事物的完美，并非另一种事物的完美。有生命或无生命、可见或不可见的事物，在各自种类里都是好的，就它们自身来说还有一个最好，这个最好也就是它们各自的求索对象。各家的花园或园林，为何要费心修整？我们修整小径、草皮和灌木丛，修整树木和车道，并不是想把一部分变成果园，把另一部分变成玉米地或草场，而是因为树木、池塘、平地和斜坡这些美好的东西里面，各有一种别致的美，艺术使所有的这些事物聚拢成一个造型，归结为整体。我们的城市漂亮，宫殿、公共建筑、当地宅邸与教堂也很漂亮，但除去自身的美以外，它们的美并不引发别的任何东西。这世上有自然之美与道德之美，有人的外表之美和品行之美，这就是人的自然德性。同样，也有智性之美和有智性之完满。在上述各类的主题中，都存在一种理想中的完美，我们所见到各个实例都趋向这尽善尽美的状态，且无论何种实例都以各自的完美状态为标准。希腊的神灵或半人半神像，都按照当时的雕塑术制作成对称的形状，它们突出的前额与齐整的五官，构成自然之美的完满状态。历史讲述的那些英雄人物，如亚历山大、凯撒、西庇阿或萨拉丁，都是气势恢弘或自我掌控的典范，这也正是人性的崇高之处。基督教也有它自己的英雄，而且是超自然意义上的英雄，我们称之为圣徒。画家关注容貌与外形之美，诗人看重心灵之美，布道者称道慈悲之美，而智性，我再说一遍，也有它的美，且不乏追求者。打开思路、修正见解、陶冶心性、增长见识，消化、把握、支配和利用心智的学问，使人的大脑发挥自身功能，擅长应用、灵活多变、讲求方法、评判精准、常备远见、足智多谋、巧于辞令、表达流畅。我要说的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在此探寻的不是通识教育的目标有何价值，也不问教会拿这目标作何用途，而是问这目标自身是什么），同德行的培育同样易于理解，同事他们却却截然不同。

10 .

10 .

This indeed is but a temporal object, and a transitory possession; but so are other things in themselves which we make much of and pursue. The moralist will tell us that man, in all his functions, is but a flower which blossoms and fades, except so far as a higher principle breathes upon him, and makes him and what he is immortal. Body and mind are carried on into an eternal state of being by the gifts of Divine Munificence; but at first they do but fail in a failing world; and if the powers of intellect decay, the powers of the body have decayed before them, and, as an Hospital or an Almshouse, though its end be ephemeral, may be sanctified to the service of religion, so surely may a University, even were it nothing more than I have as yet described it. We attain to heaven by using this world well, though it is to pass away; we perfect our nature, not by undoing it, but by adding to it what is more than nature, and directing it towards aims higher than its own.

的确，这只不过是现世的目标，也只是暂时所拥有的事物。可是，我们十分看重并孜孜以求的其他许多东西，其自身也莫不如此。德育家会告诉我们说，人尽管无所不能，却只不过像开了又谢的花朵，非得有更高的本质吹他一口灵气，才能使他及他之所是永生不朽。灵肉由神恩的赐予而带入永恒的生存状态，但首先会在这不断败坏的世界里沉沦。如果智性的能力衰退，肉身的能力远在之前便已衰退。这就如同医院或养老院，虽然其目标十分短暂，却可因为服务于宗教而圣化，大学一定也是如此，哪怕这样的大学只不过是我还没有

描述完的那种样子。人上天堂，先要善用此世，哪怕这世界终会远离。我们完善自己的本性，不是要扰乱它，而是要在这本性之上加添它原本没有的东西，并引导它趋近高于自身的目标。

[6_1].Pursuit of Knowledge under Difficulties. Introd.

[6_2].Cicer. Offic. init.

[6_3].[Techne tuchen esterxe kai tuche technen.] Vid. Arist. Nic. Ethic. vi.

[6_4].Aristot. Rhet. i. 5.

[6_5].It will be seen that on the whole I agree with Lord Macaulay in his *Essay on Bacon's Philosophy* . I do not know whether he would agree with me.

[6_6].De Augment. iv. 2, Vid. Macaulay's Essay; Vid. also "In principio operis ad Deum Patrem, Deum Verbum, Deum Spiritum, preces fundimus humillimas et ardentissimas, ut humani generis ærumnarum memores, et peregrinationis istius vitæ, in quâ dies paucos et malos terimus, novis suis eleemosynis, per manus nostras, familiam humanam dotare dignentur. Atque illud insuper supplices rogamus, ne humana divinis officiant; neve ex reseratione viarum sensûs, et accensione majore luminis naturalis, aliquid incredulitatis et noctis, animis nostris erga divina mysteria oboriatur," etc. Præf. Instaur. Magn.

[6_7].Fouque's *Unknown Patient.*

[7_1].《在困难中追求知识》，引言部分

[7_2].西塞罗，《论责任》，引言。

[7_3].“技艺喜欢偶然，偶然喜欢技艺。”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四章。

[7_4].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一章，第五节。

[7_5].可见我总体上赞同麦考利勋爵在《培根哲学随笔》一书中的观点。至于他是否赞同我的看法，那就不得而知了。

[7_6].“论增长”，第四章，第二节。见《麦考利随笔》。亦见弗朗西斯·培根，《伟

大复兴》，前言。

[7_7].福切的《未知病人》。

Discourse 6. Knowledge Viewed in Relation to Learning

第六讲：从与学习的关系看知识

1 .

1 .

It were well if the English, like the Greek language, possessed some definite word to express, simply and generally, intellectual proficiency or perfection, such as “health,” as us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animal frame, and “virtue,” with reference to our moral nature. I am not able to find such a term;—talent, ability, genius, belong distinctly to the raw material, which is the subject-matter, not to that excellence which is the result of exercise and training. When we turn, indeed, to the particular kinds of intellectual perfection, words are forthcoming for our purpose, as, for instance, judgment, taste, and skill; yet even these belong, for the most part, to powers or habits bearing upon practice or upon art, and not to any perfect condition of the intellect, considered in itself. Wisdom, again, is certainly a more comprehensive word than any other, but it has a direct relation to conduct, and to human life. Knowledge, indeed, and Science express purely intellectual ideas, but still not a state or quality of the intellect; for knowledge, in its ordinary sense, is but one of its circumstances, denoting a possession or a habit; and science has been appropriated to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intellect, instead of belonging in English, as it ought to do, to the intellect itself.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on an occasion like this, many words

are necessary, in order, first, to bring out and convey what surely is no difficult idea in itself,—that of the cultivation of the intellect as an end; next, in order to recommend what surely is no unreasonable object; and lastly, to describe and make the mind realize the particular perfection in which that object consists. Every one knows practically what are the constituents of health or of virtue; and every one recognizes health and virtue as ends to be pursued; it is otherwise with intellectual excellence, and this must be my excuse, if I seem to any one to be bestowing a good deal of labour on a preliminary matter.

假如英语跟希腊语一样拥有某个确定的词语，用以简单和概括性地形容智力水平或智力的完善程度那就好了，比如“健康”这个词，使用的时候是以动物为参照系的，而“德性”这个词，指称的就是我们的道德本性。我的确是找不到这个词。“天资”、“能力”、“才气”，明显属于未经处理的材料，即素材，而不属于作为练习和训练结果的那种精品。的确，当我们转向智力完善的具体种类时，符合要求的词语就不请自来了，比如“判断力”、“品味”和“技能”等词。可即便是这些词，大多数情况下也属于受实践或技能影响的能力或习惯，而不属于从其自身来看的任何意义上的智力完善状态。“智慧”这个词的综合程度，肯定比其他那几个词要高得多，可它还是与行为和人类生活有直接关系。“知识”和“科学”这两个词，表达的的确是纯粹智性的概念，但仍然不是智力的某种状态或品质，因为普通意义上的“知识”，只不过是智力所处的情形之一，表示的是一种占有或习惯，而“科学”向来都适合表示智力的素材，而不宜在英语中用来表示智力本身。结果导致在遇到这样的情形时，就需要许多的词语。首先是为了揭示并传达本身肯定不是什么艰深概念的东西，即作为目的的智力培育概念；其次是为推荐某种肯定不是不合理目标的东西；最后，是要描述并让头脑意识到构成该目标的那种具体的完善水平。人人都明白，健康或德性实际由什么成分构成，人人都认为健康与德性是众人追求的目标。然而，智性的卓越却不是如此，而这正是一个借口，以防有人觉得我

不该在预备性的话题上大费口舌。

In default of a recognized term, I have called the perfection or virtue of the intellect by the name of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enlargement of mind, or illumination; terms which are not uncommonly given to it by writers of this day: but, whatever name we bestow on it, it is, I believe, as a matter of history, the business of a University to make this intellectual culture its direct scope, or to employ itself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intellect,—just as the work of a Hospital lies in healing the sick or wounded, of a Riding or Fencing School, or of a Gymnasium, in exercising the limbs, of an Almshouse, in aiding and solacing the old, of an Orphanage, in protecting innocence, of a Penitentiary, in restoring the guilty. I say, a University, taken in its bare idea, and before we view it as an instrument of the Church, has this object and this mission; it contemplates neither moral impression nor mechanical production; it professes to exercise the mind neither in art nor in duty; its function is intellectual culture; here it may leave its scholars, and it has done its work when it has done as much as this. It educates the intellect to reason well in all matters, to reach out towards truth, and to grasp it.

因缺乏公认的用语，我一直在用“哲学”、“哲理知识”、“心智扩展”或“启迪”等称呼智力的完善程度或智力的功效。这些用词，当日有不少的作者也这么用。可就来历而论，无论给它安置一个什么名目我都相信，把这种智性的培育直接纳入其教学范围或将自身贡献于智力的培育，正是一所大学的本职。同理，医院的工作就在于治疗伤病；马术或剑术学校，或健身房的功能在于锻炼四肢；养老院的责任在于扶助和安慰老年人；孤儿院的职能在于保护弱小；教养所的使命就在于教化戴罪之身。我想说的是，就大学最简朴的概念而言，它应当有

这样一个目标和使命，之后我们再谈它是教会的工具。大学并不思考道德的影响，亦不操心机械生产，它宣称既不用技能亦不以责任来磨炼思想，它的功能在于智性的培育。大学不妨把学者留在这里，能走到这一步，它也就算尽职了。大学要培育智力，教人在所有事务中恰当推论，追求真理，把握真理。

2．

2．

This, I said in my foregoing Discourse, was the object of a University, viewed in itself, and apart from the Catholic Church, or from the State, or from any other power which may use it; and I illustrated this in various ways. I said that the intellect must have an excellence of its own, for there was nothing which had not its specific good; that the word “educate” would not be used of intellectual culture, as it is used, had not the intellect had an end of its own; that, had it not such an end, there would be no meaning in calling certain intellectual exercises “liberal,” in contrast with “useful,” as is commonly done; that the very notion of a philosophical temper implied it, for it threw us back upon research and system as ends in themselves, distinct from effects and works of any kind; that a philosophical scheme of knowledge, or system of sciences, could not,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ase, issue in any one definite art or pursuit, as its end; and that,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scovery and contemplation of truth, to which research and systematizing led, were surely sufficient ends, though nothing beyond them were added, and that they had ever been accounted sufficient by mankind.

在前面的讲论中我已经申明，这就是大学的目标。这目标是从大学自身来看的，与罗马天主教无关，与国家无关，亦不涉及可能利用大学的其他任何一方，而且我已从多个方面说明这一点。我说过，智力必然具备自身的卓越性，因为不存在任何没有具体的自身之善的事物。假如不是因为智力已经有了自身的目的，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用“教育”这个词来指称智性的培育。假如智力没有这么一个目的，那么，像常见的那样，称呼某种智性的修炼为“修身”而非“有用”，那就毫无意义了。哲理性情这一观念本身就暗含着这个目的，因为它使我们又回到作为自身目的而与任何一种效果或功效截然不同的研究与方法。知识的某种哲理方案，抑或是某种学科体系，从这事情的本质来看，都不可能致使任何确定的技能或追求成为其目标。而从另一方面看，研究与系统化所引致的对真理的发现与思索，尽管除自身之外再没有添加别的任何东西，其本身肯定就是充分的目的，且人们一直都认为这些都是充分的目的。

Here then I take up the subject; and, having determined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the intellect is an end distinct and sufficient in itself, and that, so far as words go it is an enlargement or illumination, I proceed to inquire what this mental breadth, or power, or light, or philosophy consists in. A Hospital heals a broken limb or cures a fever: what does an Institution effect, which professes the health, not of the body, not of the soul, but of the intellect? What is this good, which in former times, as well as our own, has been found worth the notice,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在此，我要专门论述这些事。我已经断定，智力培育自身就是一个清晰明白和充分的目标，就这些用词的意思而言，它也可以是一种扩展或启迪。现在我要追究这种心智的宽泛，或能力，或光照，或哲

学到底指的什么意思。医院可使损坏的肢体康复，或是治愈一场热病，而一个担保智力健全，而非身体安康或心灵之妥适的机构又能做什么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和以前的时代，这种值得引起罗马天主教注意，并拔款支持的益处，到底是指什么呢？

I have then to investigate, in the Discourses which follow, those qual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llect in which its cultivation issues or rather consists; and, with a view of assisting myself in this undertaking, I shall recur to certain question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touched upon. These questions are three: viz. the relation of intellectual culture, first, to *mere knowledge* ; secondly, to *professional knowledge* ; and thirdly, to religious knowledge. In other words, are *acquirements* and *attainments* the scope of a University Education? or expertness in particular arts and pursuits? or *moral and religious proficiency* ? or something besides these three? These questions I shall examine in succession, with the purpose I have mentioned; and I hope to be excused, if, in this anxious undertaking, I am led to repeat what, either in these Discourses or elsewhere, I have already put upon paper. And first, of *Mere Knowledge* , or Learning, and its connexion with intellectual illumination or Philosophy.

因此，在余下的几讲里，我必须深究智力的品质或特征，因智力培育就从中产生，或不如说由此构成。出于帮助这次探究的考虑，我将重新提起前面已经谈到过的几个问题。一共有三个问题，即智力培育与纯粹知识 的关系，此乃其一；它与职业知识 的关系，此乃其二；它与宗教知识 的关系，此乃其三。换句话说，大学教育的范围是指“学识与造诣 ”吗？是“具体技能及爱好上的专精”吗？是“道德或宗教方面的熟练 ”吗？抑或是上述这三点之外的某种东西？我会怀着已经提到的那个目的逐个细看这些问题。我急于完成此事，假如因此重

复了我在前述几讲中或别处已经写下来的内容，还请诸位见谅。首先要看看“纯粹知识　”，或称学习，以及它与智性启迪或哲学之间的关系。

3．

3．

I suppose the *primâ-facie* view which the public at large would take of a University, considering it as a place of Education, is nothing more or less than a place for acquiring a great deal of knowledge on a great many subjects. Memory is one of the first developed of the mental faculties; a boy's business when he goes to school is to learn, that is, to store up things in his memory. For some years his intellect is little more than an instrument for taking in facts, or a receptacle for storing them: he welcomes them as fast as they come to him; he lives on what is without; he has his eyes ever about him; he has a lively susceptibility of impressions; he imbibes information of every kind; and little does he make his own in a true sense of the word, living rather upon his neighbours all around him. He has opinions,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literary, and, for a boy, is very positive in them and sure about them; but he gets them from his schoolfellows, or his masters, or his parents, as the case may be. Such as he is in his other relations, such also is he in his school exercises; his mind is observant, sharp, ready, retentive; he is almost passive in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I say this in no disparagement of the idea of a clever boy. Geography, chronology, history, language, natural history, he heaps up the matter of these studies as treasures for a future day. It is the seven years of plenty

with him: he gathers in by handfuls, like the Egyptians, without counting; and though, as time goes on, there is exercise for his argumentative powers in the Elements of Mathematics, and for his taste in the Poets and Orators, still, while at school, or at least, till quite the last years of his time, he acquires, and little more; and when he is leaving for the University, he is mainly the creature of foreign influences and circumstances, and made up of accidents, homogeneous or not, as the case may be. Moreover, the moral habits, which are a boy's praise, encourage and assist this result; that is, diligence, assiduity, regularity, despatch, persevering application; for these are the direct conditions of acquisition, and naturally lead to it. Acquirements, again, are emphatically producible, and at a moment; they are a something to show, both for master and scholar; an audience, even though ignorant themselves of the subjects of an examination, can comprehend when questions are answered and when they are not. Here again is a reason why mental culture is in the minds of men identified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我认为，普通公众心目中的大学，就是一个教育场所，这个场所或多或少指的是在众多学科中获取大量知识的场所。记忆力是大脑最早发育的功能之一，小学生上学就是去学习，也就是说，把一些东西存储在记忆里。在若干年里，他的智力只不过是吸纳事实的工具，或是存储这些事实的容器。事实一来，他立即照单全收。他靠外部的一切存活，他的眼睛永远盯着周围，他对外部印象十分敏感，他吸取各类信息，他从不作出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判断，反倒是依靠左邻右舍而存活。他有一些观点，宗教上的，政治上的和文学上的，哪怕还只是一个小孩子，他对这些观点也已十分肯定。可是，这些观点多半都是从同学、老师或家长那里得来的。他在跟其他人的关系中也是如此，他在学校的活动中也是如此。 他的心智惯于观察，高度敏捷，乐于接受，也勤于记忆。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他几乎全是被动的。我这样

说，完全没有蔑视聪慧好学的小学生的意思。地理、年代表、历史、语言、自然史，这些课程中的材料，他都当财宝一一收集起来供将来之用。在他那里，这七年是丰收的年份，就跟埃及人一样，他得到大把大把的收成，不用计数都收获了些什么。不过，再过一阵子，他就要在《数学基础》课里接受论证能力的培训，还有对诗人和演说家的鉴赏能力的培训。可是，在校期间，或至少直到在校的最后几年里，他一直都在获取知识，别无他事。到准备上大学时，他大体上就只是一个由五花八门和多半是偶然的外在因素和环境影响造就的产物。另外，小孩子最在意的道德习惯，如勤奋、刻苦、有规律、动作敏捷、专心致志，也鼓励和帮助他们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些品质是获取知识的必要条件，自然也有利于知识的获取。知识的获取，只要努力就肯定可以实现，而且马上就能实现。它是某种可显耀的东西，老师学生都看得见。哪怕对考试科目一无所知的旁观者，哪个学生答了题，哪个学生答不出题，他们总还是看得出来的。这里又是一条理由，说明人们为何会把心智的培育等同于知识的获取。

The same notion possesses the public mind, when it passes on from the thought of a school to that of a University; and with the best of reasons so far as this, that there is no true culture without acquirements, and that philosophy presupposes knowledge. It requires a great deal of reading, or a wide range of information, to warrant us in putting forth our opinions on any serious subject; and without such learning the most original mind may be able indeed to dazzle, to amuse, to refute, to perplex, but not to come to any useful result or any trustworthy conclusion. There are indeed persons who profess a different view of the matter, and even act upon it. Every now and then you will find a person of vigorous or fertile mind, who relies upon his own resources, despises all former authors, and gives the world, with the utmost fearlessness, his views upon religion, or history, or any other popular subject. And his works may sell for a while; he may get a name in his day; but this

will be all. His readers are sure to find on the long run that his doctrines are mere theories, and not the expression of facts, that they are chaff instead of bread, and then his popularity drops as suddenly as it rose.

在公众心目中，从中小学到大学，看法始终一样。目前算得上是最好的一条理由是，不获取知识，就谈不上真正的教养，哲学是以知识为先决条件的。想要就任何一个严肃话题发表意见，必定需要看很多书，或掌握广泛的信息，没有这样一个学习过程，极有创意的人也许照样能引人注目，能逗人发笑，能反驳他人，能难倒他人，但他毕竟无法得出任何有用的结果或可靠的结论。的确也有一些人抱有与此不同的看法，甚至还依此采取行动。我们时不时会发现，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精力旺盛，思想活跃，完全依赖自己的想法，鄙视以前所有的作者，极鲁莽地在世人面前发表针对宗教、历史或其他任何流行话题的看法。他们的作品可能畅销一时，他们的声名远近皆知，但是，只是如此而已。时间一长，读者肯定会发现，他们的原则不过是些说法而非事实的表达，他们不过是些谷壳而非面包。最终，声名如何鹊起，也就如何湮没。

Knowledge then is the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of expansion of mind, and the instrument of attaining to it; this cannot be denied, it is ever to be insisted on; I begin with it as a first principle; however, the very truth of it carries men too far, and confirms to them the notion that it is the whole of the matter. A narrow mind is thought to be that which contains little knowledge; and an enlarged mind, that which holds a great deal; and what seems to put the matter beyond dispute is, the fact of the great number of studies which are pursued in a University, by its very profession. Lectures are given on every kind of subject; examinations are held; prizes awarded. There are moral, metaphysical, physical Professors; Professors of

languages, of history, of mathematics,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Lists of questions are published, wonderful for their range and depth, variety and difficulty; treatises are written, which carry upon their very face the evidence of extensive reading or multifarious information; what then is wanting for mental culture to a person of large reading and scientific attainments? what is grasp of mind but acquirement? where shall philosophical repose be found, but in the consciousness and enjoyment of large intellectual possessions?

这样说来，知识是心智扩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实现心智扩展的工具，这一点不仅无法否认，反而还要坚持。我一开始就把它当作首要原则。但是，这一点固然不错，有些人却走得太远，误以为这就是事情的全部了。心胸狭窄，往往被认为是没有什么知识，而心胸开阔，往往表明学富五车。几乎使这个观点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大学里面众多的研究活动，就是根据这个说法展开的。每一种学科都会排课，会考试，还会颁奖。有讲道德学、形而上学、物理学的教授，有语言学教授，有历史学、数学和实验科学的教授。一系列的问题得以发表，其品类之繁多，内容之深广、艰涩令人称奇。论著写成了，光看外表就证明作者阅读广泛、信息全面。一位涉猎广泛、科学成就非凡的人，他的心智培育还会缺什么呢？心智的把握能力，除了学识还会是什么呢？一种哲人式的安详，除了在大笔智力财富的意识与享受中之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找到？

And yet this notion is, I conceive, a mistake, and my present business is to show that it is one, and that the end of a Liberal Education is not mere knowledge, or knowledge considered in its *matter* ; and I shall best attain my object, by actually setting down some cases, which will be generally granted to be instances of the process of enlightenment or enlargement of mind, and others which are not, and thus, by the comparison, you will be able to judge for

yourselves, Gentlemen, whether Knowledge, that is, acquirement, is after all the real principle of the enlargement, or whether that principle is not rather something beyond it.

可是，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要证明它的确是个错误的观点，并说明通识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或不是从其内容来看的知识。我会实际举例来充分表达我的意思，其中一些例子一般会被看作是心智启蒙或心智扩展的具体情形，另外一些则不是。这样，通过比较，诸位就能自己判断，知识，也就是学识，到底是不是这种扩展的真实本质，或那个本质是否真的就不是知识之外的任何东西。

4．

4．

For instance [7_1] , let a person, whose experience has hitherto been confined to the more calm and unpretending scenery of these islands, whether here or in England, go for the first time into parts where physical nature puts on her wilder and more awful forms, whether at home or abroad, as into mountainous districts; or let one, who has ever lived in a quiet village, go for the first time to a great metropolis,—then I suppose he will have a sensation which perhaps he never had before. He has a feeling not in addition or increase of former feelings, but of something different in its nature. He will perhaps be borne forward, and find for a time that he has lost his bearings. He has made a certain progress, and he has a consciousness of mental enlargement; he does not stand where he

did, he has a new centre, and a range of thoughts to which he was before a stranger.

例如，[8_1] 一个人迄今为止所经历过的若仅限于像爱尔兰或英格兰诸岛较宁静和质朴的风景，那么，假如他第一次去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不同地方，如山区，那里有形的自然界呈现更野性和更威严的风姿，或者让一直生活在宁静乡村的人第一次去往大都会，我猜想，这人也许会产生前所未有的感受。他那种感受不会只是比以前有过的那些感受更多或更强，而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某种感受。他可能被迫前行，有一阵子会感觉迷失了方向。现在他有了一些进步，有了心智扩展的意识。他已经不是站在原来的地方，而是有了一个新的中心，接触到以前十分陌生的许多新思想。

Again, the view of the heavens which the telescope opens upon us, if allowed to fill and possess the mind, may almost whirl it round and make it dizzy. It brings in a flood of ideas, and is rightly called an intellectual enlargement, whatever is meant by the term.

此外，望远镜为我们展现的天空图景，如果任由它充塞并占据我们的头脑，一定会让人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目眩。新思想会潮涌而入，因此可恰当地称为智性的扩展。

And so again, the sight of beasts of prey and other foreign animals, their strangeness, the originality (if I may use the term) of their forms and gestures and habits and their variety and independence of each other, throw us out of ourselves into another creation, and as if under another Creator, if I may so express the temptation which may come on the mind. We seem to have new

faculties, or a new exercise for our faculties, by this addition to our knowledge; like a prisoner, who, having been accustomed to wear manacles or fetters, suddenly finds his arms and legs free.

同样，看到食肉猛兽和其他异域动物、它们奇特的模样、它们的外形、姿态与习性中体现出来的创意（假如我可以用这个词的话）以及繁多的品类和彼此的依靠，不禁让我们惊讶万分，以为来到另一个造物主创造的另一个世界，假如我可以这么表述我们不由自主的感受的话。我们的知识里增添了这些新内容，因而大脑似乎就有了新的功能，或大脑功能又有了新的运用。这感觉跟囚犯几乎无异：已经习惯于脚镣手铐，却突然发现四肢无拘无束。

Hence Physical Science generally, in all its departments, as bringing before us the exuberant riches and resources, yet the orderly course, of the Universe, elevates and excites the student, and at first, I may say, almost takes away his breath, while in time it exercises a tranquilizing influence upon him.

被分成各门学科的自然科学，将这宇宙丰富的宝藏与财富及周行有序的进程摆在我们面前，因此一般会使学生振奋和激动，我不妨说一开始几乎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但过不久之后，就会让他们静下心来。

Again, the study of history is said to enlarge and enlighten the mind, and why? because, as I conceive, it gives it a power of judging of passing events, and of all events, and a conscious superiority over them, which before it did not possess.

再如，据说历史研究能扩展和启迪心灵，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能给人以判断当前和所有事件的能力，还有相对这些事件的明显优越感，这是心灵以前不曾有过的。

And in like manner, what is called seeing the world, entering into active life, going into society, travelling, gaining acquaintance with the various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modes of thought of various parties, interests, and races, their views, aims, habits and manners, their religious creeds and forms of worship,—gaining experience how various yet how alike men are, how low-minded, how bad, how opposed, yet how confident in their opinions; all this exerts a perceptible influence upon the mind,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mistake, be it good or be it bad, and is popularly called its enlargement.

同样，所谓见世面，开始职业生涯，踏上社会，旅行，结识三教九流，接触各类团体、利益阶层和种族的思想原则与思维方式，了解他们的观点、目标、习惯与礼节，他们的宗教信条与崇拜方式，即获得人跟人如何不同又如何相似的经验，了解他们的见解如何粗俗，如何低劣，如何针锋相对，又如何自信不疑，所有这些都会对心灵产生明显影响，而且或好或坏，人绝不会弄错。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心智扩展了。

And then again, the first time the mind comes across the arguments and speculations of unbelievers, and feels what a novel light they cast upon what he has hitherto accounted sacred; and still more, if it gives in to them and embraces them, and throws off as so much prejudice what it has hitherto held, and, as if waking from a dream, begins to realize to its imagination that there is now no such

thing as law and the transgression of law, that sin is a phantom, and punishment a bugbear, that it is free to sin, free to enjoy the world and the flesh; and still further, when it does enjoy them, and reflects that it may think and hold just what it will, that “the world is all before it where to choose,” and what system to build up as its own private persuasion; when this torrent of wilful thoughts rushes over and inundates it, who will deny that the fruit of the tree of knowledge, or what the mind takes for knowledge, has made it one of the gods, with a sense of expansion and elevation,—an intoxication in reality, still, so far as the subjective state of the mind goes, an illumination? Hence the fanaticism of individuals or nations, who suddenly cast off their Maker. Their eyes are opened; and, like the judgment-stricken king in the Tragedy, they see two suns, and a magic universe, out of which they look back upon their former state of faith and innocence with a sort of contempt and indignation, as if they were then but fools, and the dupes of imposture.

然后，当人初遇不信者的论证和思索时，以为这是对他迄今为止引为神圣的一切投下的多么新奇的一道光；更有甚者，假如他拱服并接受这些新观点，且把目前相信的一切当作纯粹的偏见加以抛弃，然后幡然醒悟，按照自己的想象意识到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法律以及违法之说。罪恶不过幻影，处罚不过是威吓，人可随意作恶，可惬意此生，可纵情声色；不仅如此，当他真的放开手脚，觉得人怎么想怎么信各随其便，以为“整个世界摆在面前供人选择”，可随意构筑一个系统用作私人信念时；当这些任性的念头奔涌而来并在脑海中泛滥时，谁又能否认，知识之树上的果实，或心智自认为的知识，已经使心智成为一位神灵，且不乏一种膨胀与崇高感。事实上，这是一种陶醉，而且就心智的主观状态来说，甚至还是一种启迪呢？突然间抛弃造物主的一些人或民族，其盲信就是这么来的。他们的眼睛睁开了，就像那部悲剧里遭了报应的国王一样，他们还看见两个太阳，一个魔法世

界。透过这魔法世界，他们回顾以前的信仰和天真状态，深感屈辱和义愤，就好像当初才是纯粹的傻子和愚弄对象。

On the other hand, Religion has its own enlargement, and an enlargement, not of tumult, but of peace. It is often remarked of uneducated persons, who have hitherto thought little of the unseen world, that, on their turning to God, looking into themselves, regulating their hearts, reforming their conduct, and meditating on death and judgment, heaven and hell, they seem to become, in point of intellect, different beings from what they were. Before, they took things as they came, and thought no more of one thing than another. But now every event has a meaning; they have their own estimate of whatever happens to them; they are mindful of times and seasons, and compare the present with the past; and the world, no longer dull, monotonous, unprofitable, and hopeless, is a various and complicated drama, with parts and an object, and an awful moral.

另外一方面，宗教也有它自身的扩展，不是出现了更多混乱，而是有了更多的和平。经常有人这么议论没受过教育的人们，他们迄今为止很少思考那看不见的世界，当他们求助于神，审查自我，调整心性，改进言行，沉思死亡与审判、天堂与地狱的时候，就智性而言，他们似乎变成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一种人。以前，他们对一切都处之泰然，从不细究一物与他物的差别。但现在，每样事情都有了意义，身边发生的无论何种事情，他们都有了自己的评判。他们留心时代与季节，比较当前与过去。这世界不再是一个枯燥无聊、单调乏味、一无是处和令人绝望的地方，而是一部变化多端和曲折复杂的戏剧，有它的角色和目的，还有极深刻的寓意。

5 .

5 .

Now from these instances, to which many more might be added, it is plain, first, that the communication of knowledge certainly is either a condition or the means of that sense of enlargement or enlightenment, of which at this day we hear so much in certain quarters: this cannot be denied; but next, it is equally plain, that such communication is not the whole of the process. The enlargement consists, not merely in the passive reception into the mind of a number of ideas hitherto unknown to it, but in the mind's energetic and simultaneous action upon and towards and among those new ideas, which are rushing in upon it. It is the action of a formative power, reducing to order and meaning the matter of our acquirements; it is a making the objects of our knowledge subjectively our own, or, to use a familiar word, it is a digestion of what we receive, into the substance of our previous state of thought; and without this no enlargement is said to follow. There is no enlargement, unless there be a comparison of ideas one with another, as they come before the mind, and a systematizing of them. We feel our minds to be growing and expanding *then* , when we not only learn, but refer what we learn to what we know already. It is not the mere addition to our knowledge that is the illumination; but the locomotion, the movement onwards, of that mental centre, to which both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are learning, the accumulating mass of our acquirements, gravitates. And therefore a truly great intellect, and recognized to be such by the common opinion of mankind, such as the intellect of Aristotle, or of St. Thomas, or of Newton, or of Goethe, (I purposely take

instances within and without the Catholic pale, when I would speak of the intellect as such,) is one which takes a connected view of old and new, past and present, far and near, and which has an insight into the influence of all these one on another; without which there is no whole, and no centre. It possesses the knowledge, not only of things, but also of their mutual and true relations; knowledge, not merely considered as acquirement, but as philosophy.

这一类的例子还可以补充很多。由此明显可见，首先，知识的传播，要么肯定是我们今日在某些地方经常听说的那种扩展或启迪意义的条件，要么是其手段，这一点无可否认。其次，这样的传播并非心智扩展的全部过程。心智的扩展，并不完全在于不为心智所知的大量概念在大脑中的被动吸收，而在于心智对不断涌入的这些新概念积极和同步的作用，心智趋向这些概念，并在这些概念中发挥作用。这是一种有构成力的作用，可将学识内容归纳为秩序及意义，是将知识对象主观地变成我们自己的知识的过程。或者，用一个熟悉的字眼说，这是消化吸收进来的东西，使其变成我们先前思想状态中的内容，否则就不会发生任何意义上的扩展。除非将出现在心智面前的新概念进行相互比较，并对其系统化，否则就谈不上心智的扩展。此时，我们才感觉自己的心智在不断成长与扩展，因为我们不仅在学习，而且用已经知道的东西参照所学材料。所谓启迪，并不仅仅指对现有知识的增加，还包括这个心智中心的运动即前进过程，而我们已经知道和正在学习的东西，也就是不断累积的学识，也为这个中心所吸引。因此，真正了不起的和人类公认的才智，比如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牛顿或歌德（我只谈才智本身，所以特意列举天主教圈子内外的范例）的才智，就是这种新旧参照、过去和现在结合、远事与近物皆备的关联视野的才智，且能洞察不同层面相互的影响。没有此等关联视野，就不会有整体，也谈不上中心。真正的才智所具备的，不仅仅是关于事物的知识，而且还有事物真实的相互关系的知识，是不仅仅作为学识，而且还是能够作为哲学来看待的知识。

Accordingly, when this analytical, distributive, harmonizing process is away, the mind experiences no enlargement, and is not reckoned as enlightened or comprehensive, whatever it may add to its knowledge. For instance, a great memory, as I have already said, does not make a philosopher, any more than a dictionary can be called a grammar. There are men who embrace in their minds a vast multitude of ideas, but with little sensibility about their real relations towards each other. These may be antiquarians, annalists, naturalists; they may be learned in the law; they may be versed in statistics; they are most useful in their own place; I should shrink from speaking disrespectfully of them; still, there is nothing in such attainments to guarantee the absence of narrowness of mind. If they are nothing more than well-read men, or men of information, they have not what specially deserves the name of culture of mind, or fulfils the type of Liberal Education.

相应地，离开这个分析、分配与协调过程，心智便体验不到任何扩展。无论增添了什么知识内容，这等心智都不能视为得蒙启迪或堪称广博。例如，如我说过的，记忆力再好，不一定就能成为哲学家，更不能把字典称为语法。有些人脑海里潜藏着万千的概念，然而却不甚明了这些概念彼此间的真实关系。这样的人可以是古文物研究者、编年史作者、博物学家，也可以是精熟法律的人，熟谙统计学的人，在各自专业领域里用处极大，我也尽量回避以不敬的口气谈起他们。可是，在这一类的成就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保证一个人不会变得思想狭隘。他们博览群书，或资讯周全，但如果仅此而已，那他们就不具备特别配受心智培育这个名称，或堪称通识教育典范的那种品格。

In like manner, we sometimes fall in with persons who have seen much of the world, and of the men who, in their day, have played a conspicuous part in it, but who generalize nothing, and

have no observation, 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word. They abound in information in detail, curious and entertaining, about men and things; and, having liv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o very clear or settled principles, religious or political, they speak of every one and every thing, only as so many phenomena, which are complete in themselves, and lead to nothing, not discussing them, or teaching any truth, or instructing the hearer, but simply talking. No one would say that these persons, well informed as they are, had attained to any great culture of intellect or to philosophy.

同样，我们有时会遇到见过大世面的人，一些当日风光显耀的名人，他们曾经沧海，却并无心得，亦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观察。关于人和事，他们掌握古怪有趣的诸多细节，他们的生活不受任何十分清晰或确定的宗教或政治信念的影响。他们谈及各样的人和事，仅只是作为现象看待，这些自身完整的现象并不导向别的任何事物。他们从不讨论这些现象，亦不传授任何真理，更不屑为听众提供指导，谈话而已。尽管这些人见多识广，可是，没有人会说他们已经获得了不起的智性教养或哲理培育。

The case is the same still more strikingly where the persons in question are beyond dispute men of inferior powers and deficient education. Perhaps they have been much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y receive, in a passive, otiose, unfruitful way, the various facts which are forced upon them there. Seafaring men, for example, range from one end of the earth to the other; but the multiplicity of external objects, which they have encountered, forms no symmetrical and consistent picture upon their imagination; they see the tapestry of human life, as it were on the wrong side, and it tells no story. They sleep, and they rise up, and they find themselves, now in Europe, now in Asia; they see visions of great cities and wild

regions; they are in the marts of commerce, or amid the islands of the South; they gaze on Pompey's Pillar, or on the Andes; and nothing which meets them carries them forward or backward, to any idea beyond itself. Nothing has a drift or relation; nothing has a history or a promise. Every thing stands by itself, and comes and goes in its turn, like the shifting scenes of a show, which leave the spectator where he was. Perhaps you are near such a man on a particular occasion, and expect him to be shocked or perplexed at something which occurs; but one thing is much the same to him as another, or, if he is perplexed, it is as not knowing what to say, whether it is right to admire, or to ridicule, or to disapprove, while conscious that some expression of opinion is expected from him; for in fact he has no standard of judgment at all, and no landmarks to guide him to a conclusion. Such is mere acquisition, and, I repeat, no one would dream of calling it philosophy.

假如我们所谈及的这些人无疑是能力欠缺和教育不足，情形则更是惊人的一致。他们也许在国外呆了很久，在那里被动、怠惰和徒然地了解到许多不得不接受的各样事实。例如，在海上谋生的人，往往从地球的一端漂到另一端，然而，他们遇到的众多外部对象，却无法在他们的想象中构成匀称一致的图景，他们似乎是从反面看人类生活的挂毯，因而看不出其中有什么意义。他们睡觉，他们起床，他们发现自己此时在欧洲，彼时在亚洲，他们见过大城市，也到过荒无人烟的地方，逛过商贸集市，也游历过南方诸岛。他们凝视庞贝柱，或仰望安第斯山脉。但所见的一切都不会增减他们对事物的见解，原来是什么，现在还是什么。没什么东西有意义或相互关联，没什么东西有来历或前途。一切事物不过是事物本身，到时候就来，到时候也走，就如同表演中的一幕幕场景，留下看客原地不动。我们或许在某个特别场合偶遇这种人，以为所发生的事情会让他震惊或迷惑。可在他看来，这事跟那事没什么差别，假如困惑，那也只是因为他明知别人等他发表意见，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不知道是该赞扬、嘲讽还是反对。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任何下判断的标准，没有地标引导他下结论。这就是纯粹的获取，所以我再说一遍，做梦都没有人会将这种获取称为哲学。

6．

6．

Instances, such as these, confirm, by the contrast, the conclusion I have already drawn from those which preceded them. That only is true enlargement of mind which is the power of viewing many things at once as one whole, of referring them severally to their true place in the universal system, of understanding their respective values, and determining their mutual dependence. Thus is that form of Universal Knowledge, of which I have on a former occasion spoken, set up in the individual intellect, and constitutes its perfection. Possessed of this real illumination, the mind never views any part of the extended subject-matter of Knowledge without recollecting that it is but a part, or without the associations which spring from this recollection. It makes every thing in some sort lead to every thing else; it would communicate the image of the whole to every separate portion, till that whole becomes in imagination like a spirit, every where pervading and penetrating its component parts, and giving them one definite meaning. Just as our bodily organs, when mentioned, recall their function in the body, as the word “creation” suggests the Creator, and “subjects” a sovereign, so, in the mind of the Philosopher, as we are abstractedly conceiving of him, the elements of the physical and moral world, sciences, arts, pursuits, ranks, offices, events,

opinions, individualities, are all viewed as one, with correlative functions, and as gradually by successive combinations converging, one and all, to the true centre.

这一类的例子，两相对照，就确证了我在以前的例子中得出的结论。即真正的心智扩展，只能是这样一种能力——它将众多的事物当作一个整体一并观察，它将这些事物分别置于其在普遍体系中的真实位置加以参照，它理解这些事物个别的价值，并确定这些事物相互的依存关系。我在以前的一次演讲中已经谈到过，这就是在个别的才智中建立起来的普遍知识形式，并构成才智的完善状态。有了这种真正的启迪后，心智看待延展的知识素材的任何一个部分时，就会想到这只不过是一个部分，并想起从这个回忆中产生的种种联想。心智会使无论何种事物都导向别的一切事物，它会把整体的图像传递至每一个单独的部分，直到这个整体在人的想象中变成某种精神，遍布并渗透各个构成部分，赋予其确定的意义。正如人的五脏六腑，提起来就会使人想到人体功能，“创造”这个词也就隐含着造世主的含义，“臣民”也就暗示着国君的含义，在哲学家的思想里，当我们抽象地构想他的时候，自然与道德世界里的一切元素、各门学科、技能、爱好、等级、公职、事件、意见、个性，都被看作一个整体，都有相关联的功能，并逐渐依次组合，最终全部收敛于真正的中心。

To have even a portion of this illuminative reason and true philosophy is the highest state to which nature can aspire, in the way of intellect; it puts the mind above the influences of chance and necessity, above anxiety, suspense, unsettlement, and superstition, which is the lot of the many. Men, whose minds are possessed with some one object, take exaggerated views of its importance, are feverish in the pursuit of it, make it the measure of things which are utterly foreign to it, and are startled and despond if it happens to fail them. They are ever in alarm or in transport. Those on the other

hand who have no object or principle whatever to hold by, lose their way, every step they take. They are thrown out, and do not know what to think or say, at every fresh juncture; they have no view of persons, or occurrences, or facts, which come suddenly upon them, and they hang upon the opinion of others, for want of internal resources. But the intellect, which has been disciplined to the perfection of its powers, which knows, and thinks while it knows, which has learned to leaven the dense mass of facts and events with the elastic force of reason, such an intellect cannot be partial, cannot be exclusive, cannot be impetuous, cannot be at a loss, cannot but be patient, collected, and majestically calm, because it discerns the end in every beginning, the origin in every end, the law in every interruption, the limit in each delay; because it ever knows where it stands, and how its path lies from one point to another. It is the τετράγωνος of the Peripatetic, and has the “nil admirari” of the Stoic,—

这种具有启蒙性的理性与真正的哲学，哪怕只是其一部分，也是人的天性以才智的形式所能企及的最高状态。这部分理性与哲学使人的心智超脱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影响，摆脱焦虑、悬疑、犹豫不决和许多人注定会产生的迷信。一门心思专注于某个目标的人，往往会夸大其重要性，追求这目标时头脑发热，并拿它来衡量毫不相干的事物，万一达不到目的便惊愕万分、垂头丧气。他们要么惊慌失措，要么喜不自胜。另外一方面，一些完全无目标或什么原则也不讲的人，每走一步都会迷失方向。一遇到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他们便没了主意，不知道该怎么想，怎么说。对人对事，或面临突然发生的事实拿不出意见，因缺乏内在的应变能力，他们只好人云亦云。然而，千锤百炼几至完美状态、有所知且边了解边思考的才智，知道利用理性的弹力让密实的事实与事件发酵，这样的才智就不可能是偏狭的，不可能是排他的，不可能是鲁莽的，不可能没了主见，而只会是耐心的、镇定的、极沉稳的，因为它在每一个开头处便看出了结尾，在每一个结局

中都看到了开端，在每一种干扰中看到了规律，在每一次延迟中都看到一个限度，就因为它明白自己的立场，也知道自己的轨迹如何从一点延伸至另一点。这也就是逍遥学派所强调的言行周正，并具备斯多葛派所说的“淡定”。

> *Felix qui potuit rerum cognoscere causas, Atque metus omnes, et inexorabile fatum Subjecit pedibus, strepitumque Acherontis avari.*

能了解事物因由的人是多么快乐，所有恐惧和无情的命运，甚至贪婪冥河的怒吼，都被他踩在脚下。

There are men who, when in difficulties, originate at the moment vast ideas or dazzling projects; who,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citement, are able to cast a light, almost as if from inspiration, on a subject or course of action which comes before them; who have a sudden presence of mind equal to any emergency, rising with the occasion, and an undaunted magnanimous bearing, and an energy and keenness which is but made intense by opposition. This is genius, this is heroism; it is the exhibition of a natural gift, which no culture can teach, at which no Institution can aim; here, on the contrary, we are concerned, not with mere nature, but with training and teaching. That perfection of the Intellect, which is the result of Education, and its *beau ideal* , to be imparted to individuals in their respective measures, is the clear, calm, accurate vis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all things, as far as the finite mind can embrace them, each in its place, and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upon it. It is almost prophetic from its knowledge of history; it is almost heart-searching from its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it has almost

supernatural charity from its freedom from littleness and prejudice; it has almost the repose of faith, because nothing can startle it; it has almost the beauty and harmony of heavenly contemplation, so intimate is it with the eternal order of things and the music of the spheres.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危难时刻往往奇思泉涌、出手不凡；他们在激发状态下突发灵感，往往能就眼前的问题或行动方案提出见解；无论面对何时何地的突发事件，他们都能迅速镇定下来，无所畏惧，临危不惊，反对声浪越高，他们意志和热望越是强烈。这就是天赋，是英雄气概，是天生才气的展现，什么形式的培育也教不来，什么样的机构也不应拿这种品格当作目标。正好相反，在教育机构里，我们关心的不是纯粹的天性，而是培训与教导。才智的完善是教育的结果，也是教育的最高目标，应当根据各个人具体的条件促其达到。才智的这种完善过程，即指在有限的心智可接受的范围内针对所有事物的清晰、沉着、准确的眼力及理解，每样事物各适其位，并在心智里留下自己的特征。才智的完善，因其历史知识而几乎有预见性，因其对人性的了解而几乎能促人自省，它因脱离了心胸狭隘和偏见而有几乎是超自然的宽容度，因为什么东西也不能使它惊慌，因此几乎就具备了信仰的安详。它几乎就有天国冥想时的美与和谐，因它如此精熟事物的永恒秩序与天体音乐。

7．

7．

And now, if I may take for granted that the true and adequate end of intellectual training and of a University is not Learning or

Acquirement, but rather, is Thought or Reason exercised upon Knowledge, or what may be called Philosophy, I shall be in a position to explain the various mistakes which at the present day beset the subjec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现在，假如我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智性培育以及大学教育真实和充足的目的并不在于学习或学识，而是基于知识的思维及理性锤炼，或可称为哲学的某种东西，那我就处在可解释困扰着当今大学教育的许多错误的位置上了。

I say then, if we would improve the intellect, first of all, we must ascend; we cannot gain real knowledge on a level; we must generalize, we must reduce to method, we must have a grasp of principles, and group and shape our acquisitions by means of them. It matters not whether our field of operation be wide or limited; in every case, to command it, is to mount above it. Who has not felt the irritation of mind and impatience created by a deep, rich country, visited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winding lanes, and high hedges, and green steeps, and tangled woods, and every thing smiling indeed, but in a maze? The same feeling comes upon us in a strange city, when we have no map of its streets. Hence you hear of practised travellers, when they first come into a place, mounting some high hill or church tower, by way of reconnoitring its neighbourhood. In like manner, you must be above your knowledge, not under it, or it will oppress you; and the more you have of it, the greater will be the load. The learning of a Salmasius or a Burman, unless you are its master, will be your tyrant. “Imperat aut servit;” if you can wield it with a strong arm, it is a great weapon; otherwise,

我想说，要改善才智，我们首先就必须攀登。在一般层面上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知识。我们要将其概念化，必须先归纳出方法，必须先掌握原理，并在这过程中整合并塑造习得内容。我们的运作范围的大小不是问题。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要获得控制权，首先得居高，居高方能临下。人若初次深入地形复杂的乡村，看到蜿蜒小道和高高的树篱，面对绿油油的陡坡和纠缠不清的林木，虽然一切看上去那么悦目，但又如同置身迷宫，谁心里不会发怵，不会有点急躁呢？人到一座陌生城市，手里若没有地图指示街道，也会产生类似的感觉。此时我们就会听从旅行老手的经验，他们每到一个新地方，首先就爬到一处高山上，或是到教堂的塔顶去，把四周的情形看个明白。同理，人必须要超越自身知识，而不是居于其下，否则便会感觉它的压迫。要不然，知识越多，负担越是重。萨尔马西乌斯或伯尔曼那些人的学识，除非我们能成为它的主人，否则它就是针对我们自己的暴君。“或主或仆，”这样的学识要成为强大武器，取决于我们能以铁腕支配它。否则，

Vis consili expers Mole ruit suâ.

勇而无谋，反伤自身。

You will be overwhelmed, like Tarpeia, by the heavy wealth which you have exacted from tributary generations.

我们会像塔皮娅一样，被世代搜刮来的沉重贡品所压倒。

Instances abound; there are authors who are as pointless as they are inexhaustible in their literary resources. They measure

knowledge by bulk, as it lies in the rude block, without symmetry, without design. How many commentators are there on the Classics, how many on Holy Scripture, from whom we rise up, wondering at the learning which has passed before us, and wondering why it passed! How many writers are there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such as Mosheim or Du Pin, who, breaking up their subject into details, destroy its life, and defraud us of the whole by their anxiety about the parts! The Sermons, again, of the English Divin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ow often are they mere repertories of miscellaneous and officious learning! Of course Catholics also may read without thinking; and in their case, equally as with Protestants, it holds good, that such knowledge is unworthy of the name, knowledge which they have not thought through, and thought out. Such readers are only possessed by their knowledge, not possessed of it; nay, in matter of fact they are often even carried away by it, without any volition of their own. Recollect, the Memory can tyrannize, as well as the Imagination. Derangement, I believe,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loss of control over the sequence of ideas. The mind, once set in motion, is henceforth deprived of the power of initiation, and becomes the victim of a train of associations, one thought suggesting another, in the way of cause and effect, as if by a mechanical process, or some physical necessity. No one, who has had experience of men of studious habits, but must recognize the existence of a parallel phenomenon in the case of those who have over-stimulated the Memory. In such persons Reason acts almost as feebly and as impotently as in the madman; once fairly started on any subject whatever, they have no power of self-control; they passively endure the succession of impulses which are evolved out of the original exciting cause; they are passed on from one idea to another and go steadily forward, plodding along one line of thought in spite of the amplest concessions of the hearer, or wandering from it in endless

digression in spite of his remonstrances. Now, if, as is very certain, no one would envy the madman the glow and originality of his conceptions, why must we extol the cultivation of that intellect, which is the prey, not indeed of barren fancies but of barren facts, of random intrusions from without, though not of morbid imaginations from within? And in thus speaking, I am not denying that a strong and ready memory is in itself a real treasure; I am not disparaging a well-stored mind, though it be nothing besides, provided it be sober, any more than I would despise a bookseller's shop:—it is of great value to others, even when not so to the owner. Nor am I banishing, far from it, the possessors of deep and multifarious learning from my ideal University; they adorn it in the eyes of men; I do but say that they constitute no type of the results at which it aims; that it is no great gain to the intellect to have enlarged the memory at the expense of faculties which are indisputably higher.

这一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有很多作者文采飞扬、取之不竭，然而写出来的东西却不得要领。他们按堆来衡量知识，好像知识是散乱弃置的杂货，没有对称，亦没有图案。有多少注释者评说过原典名作，又有多少《圣经》评注者，我们读着这些注释者的著作长大，惊奇于来到我们眼前的学问，也惊奇于这学问为何又会远去！有多少学者写过教会史，比如莫斯海姆或杜宾，却把主题拆得七零八落，毁坏其生命力，以他们自己对各个部分的焦虑症欺骗我们，使我们看不到事情的全貌！还有英国十七世纪的神职人员编写的布道词，里面往往充斥着一大堆杂七杂八的琐碎学问！当然，天主教徒可能在看书的时候也懒于思考，在这些天主教徒正如在清教徒的情况下，事情都是一样的，即那些知识根本配不上知识这个名目，就是他们并没有加以思考或没有想透的知识。这些读者只是为他们的知识所占有，而不是占有知识。不仅如此，他们事实上经常为这些事实所左右，全然没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要忘记，记忆和想象都可能奴役我们。我相信，慌乱向

来都被认为是在一系列的概念面前失去控制力。心智一旦活动起来，就不再有启动时的力量了，它会成为一长串联想的受害者，一个念头暗示另一个念头，那种因果联系就像是一个机械过程，又像是物理的必然性。但凡与有着狂热习性的人打过交道的人，一定会在过度刺激记忆力的那些人的情况下，看到类似现象的存在。在这些人那里，理性作用之微弱和无力，就如同在疯人那里一样，一旦喜欢上某个话题，他们就再没有自控能力了，被动地忍受从最初那个让人激动的原因中演化出来的连续冲动。他们跟着一个又一个的概念一路前行，哪怕倾听者竭力容忍，他们也只顺着一个思路说下去，或在倾听者多次规劝时，还是东扯西拉，离题万里。很明显，没有人会嫉羡疯人狂热、奇特的念头，既是这样，我们为何要赞颂下面这样一种才智的培育呢？它实则并非胡思乱想的牺牲品，反倒是空洞事实和来自外来肆意入侵知识的受害者，尽管也并不是内在的病态想像力的后果。所以说，我并不是在这里否认，强健和有准备的记忆力本身就是真实的宝贵财富。博闻强记的人，只要不太张狂，哪怕就只有这点本事，我也不想加以诋毁，正如我不会去鄙视一家书店。这等心智对其他人有巨大价值，哪怕对心智的所有者本人并非如此。我也不是在这里对我理想中的大学里那些知识渊博的饱学之士下逐客令，在世人眼里，这些人会使大学增光。我想说的只不过是，这些人并不能实现大学想要促成的那种效果。以牺牲无可争议的更高级功能为代价来扩展记忆，对于才智来说可谓得不偿失。

8．

8．

Nor indeed am I supposing that there is any great danger, at least in this day, of over-education; the danger is on the other side. I will tell you, Gentlemen, what has been the practical error of the

last twenty years,—not to load the memory of the student with a mass of undigested knowledge, but to force upon him so much that he has rejected all. It has been the error of distracting and enfeebling the mind by an unmeaning profusion of subjects; of implying that a smattering in a dozen branches of study is not shallowness, which it really is, but enlargement, which it is not; of considering an acquaintance with the learned names of things and persons, and the possession of clever duodecimos, and attendance on eloquent lecturers, and membership with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and the sight of the experiments of a platform and the specimens of a museum, that all this was not dissipation of mind, but progress. All things now are to be learned at once, not first one thing, then another, not one well, but many badly. Learning is to be without exertion, without attention, without toil; without grounding, without advance, without finishing. There is to be nothing individual in it; and this, forsooth, is the wonder of the age. What the steam engine does with matter, the printing press is to do with mind; it is to act mechanically, and the population is to be passively, almost unconsciously enlightened, by the mere multip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volumes. Whether it be the school boy, or the school girl, or the youth at college, or the mechanic in the town, or the politician in the senate, all have been the victims in one way or other of this most preposterous and pernicious of delusions. Wise men have lifted up their voices in vain; and at length, lest their own institutions should be outshone and should disappear in the folly of the hour, they have been obliged, as far as they could with a good conscience, to humour a spirit which they could not withstand, and make temporizing concessions at which they could not but inwardly smile.

我也无意危言耸听，说什么至少在当今，竟然存在过度教育的巨

大危险。危险在于另一面。我倒是想把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存在的一种实际错误告诉诸位，这错误不在于把一堆未经消化的知识塞进学生的记忆，而是强迫他们接受那么多已遭其拒绝的知识。这种错误在于，用无意义的大量科目使心智精力分散因而苍白无力，误以为略知十来种分支研究算不上学养肤浅——但至于是肤浅还是是涉猎广泛，这倒不一定。误以为熟悉学界知名的人与事，谋取几本投机取巧的小册子，听几次雄辩者讲的课，拿到科学机构的会员资格，看到在讲台上进行的实验和博物馆的标本，这些就称不上浪费精力，反倒以为学业精进。照这样，所有的东西都要同时学习，不是先这个后那个，不是先把一项学好，而是所有内容全都蜻蜓点水、一知半解。结果，学生学起来不下力，不专心，不用功，既没有一个基础，也没有进步，亦不总结。这样的求知并无任何个性特征，堪称时代奇迹。蒸汽机对物质的作用，就是印刷机将要对心智造成的影响。这就是要进行机械行动，而普通人口也会被动地、甚至是无意地受到启迪，仅仅只需要书册能大量复制和发行就能办到。无论是男女学童还是大学青年，无论是城里的机械工还是参议院里的政客，所有这些人都是这种最荒谬有害的错觉的受害者，只是受害的方式不同而已。明眼人曾奋力疾呼，但只是徒劳，最后，因担心自己所在的机构被其他机构胜过，并消失在时代的荒唐中，他们也被迫在尽量无亏于良心的情况下迁就一种无法忍受的时尚，并作出顺应时势的让步，对此，他们只能在内心里怀着一丝苦笑。

It must not be supposed that, because I so speak, therefore I have some sort of fear of 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on the contrary, the more education they have, the better, so that it is really education. Nor am I an enemy to the cheap publi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literary works, which is now in vogue: on the contrary, I consider it a great advantage, convenience, and gain; that is, to those to whom education has given a capacity for using them. Further, I consider such innocent recreations as science and literature are able to furnish will be a very fit occupation of the

thoughts and the leisure of young persons, and may be made the means of keeping them from bad employments and bad companions. Moreover, as to that superficial acquaintance with chemistry, and geology, and astronomy, and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history, and biography, and other branches of knowledge, which periodical literature and occasional lectures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diffuse through the community, I think it a graceful accomplishment, and a suitable, nay, in this day a necessary accomplishment, in the case of educated men. Nor, lastly, am I disparaging or discouraging the thorough acquisition of any one of these studies, or denying that, as far as it goes, such thorough acquisition is a real education of the mind. All I say is, call things by their right names, and do not confuse together ideas which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one science and a superficial acquaintance with many, are not the same thing; a smattering of a hundred things or a memory for detail, is not a philosophical or comprehensive view. Recreations are not education; accomplishments are not education. Do not say, the people must be educated, when, after all, you only mean, amused, refreshed, soothed, put into good spirits and good humour, or kept from vicious excesses. I do not say that such amusements, such occupations of mind, are not a great gain; but they are not education. You may as well call drawing and fencing education, as a general knowledge of botany or conchology. Stuffing birds or playing stringed instruments is an elegant pastime, and a resource to the idle, but it is not education; it does not form or cultivate the intellect. Education is a high word; it is the preparation for knowledge, and it is the imparting of knowledge in proportion to that preparation. We require intellectual eyes to know withal, as bodily eyes for sight. We need both objects and organs intellectual; we cannot gain them without setting about it; we cannot gain them in our sleep, or by haphazard. The best telescope does not dispense

with eyes; the printing press or the lecture room will assist us greatly, but we must be true to ourselves, we must be parties in the work. A University is, according to the usual designation, an Alma Mater, knowing her children one by one, not a foundry, or a mint, or a treadmill.

不要以为，我这样说话，就意味着我对大众教育怀有某种担忧：相反，民众得到的教育越多越好，这样才能称为真正的教育。我也不反对今日十分流行的廉价科学及文学著作的出版，相反，我认为这有很大的益处，这是便利，也是收获，就是说，对教育使其已经有能力利用这些出版物的人来说确实如此。再者，我觉得科学与文学能够为其提供内容的这些无害娱乐，对于年轻人的思想与闲暇来说，也是极合适的消遣，其中有许多可成为防止他们养成恶习或结交坏人的手段。至于文学期刊和不定期的讲座以及科学机构在社群中传播的，对于化学、地质学、天文学、政治经济学、现代史、传记及其他知识分支的肤浅了解，我觉得那是相当不错的成就，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它还是合适甚或是当日必要的成就。最后我要说，我也不是在轻视或阻碍人们透彻了解上述任何一门研究，也不想否认，就这层意义而论，透彻理解也构成心智的真正教育。我要表达的全部意思是，名不正则言不顺，本质上不同的事物，万不可彼此混同。对一门学科的全面知识与对多个学科的肤浅了解，它们并非同一个东西，对上百件事物的一知半解，或对细节的记忆能力，并非一种哲理性或全面的观点。娱乐并非教育，成就也并不是教育。假如说到底，我们所说的教育的意思只是指年轻人要有娱乐，要有提神的东西，要有所抚慰，要养成良好气质和脾性，或要防止他们堕入品行不端的深渊，那就不要说人们应当接受教育。我并不是说这样的娱乐，或者在这些方面操心就不是了不起的收获，而只是说这些东西并非教育。如果把植物学或贝类学方面的常识称为教育，那就不妨把绘画和击剑也称为教育。给禽类食品塞填料，或演奏弦乐也都是高雅的消遣，对闲来无事的人来说也是消磨时间的好办法，但这都不是教育，这些东西都不能养成或培育才智。教育是个高阶词，它是知识的准备，也是与这种准备相称

的知识的传授。人要具备肉眼才能有视力，同样，我们需要有智性之眼才能明了事物。我们既需要智性的对象，也需要智性的器官，不为此做好准备就无法获得它们。这两样都不可能在睡梦中或碰巧获得。再好的望远镜也需要人眼去看，印刷机或教室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可是，我们得真实待己，得参与这些工作。“根据通常的命名法，大学才是母校，母校认得自己的每一个学子。大学不是铸造厂，不是造币厂，更不是脚踏轧机。”

9．

9．

I protest to you, Gentlemen, that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a so-called University, which dispensed with residence and tutorial superintendence, and gave its degrees to any person who passed an examination in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and a University which had no professors or examinations at all, but merely brought a number of young men together for three or four years, and then sent them away a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s said to have done some sixty years since, if I were asked which of these two methods was the better discipline of the intellect,—mind, I do not say which is *morally* the better, for it is plain that compulsory study must be a good and idleness an intolerable mischief,—but if I must determine which of the two courses was the more successful in training, moulding, enlarging the mind, which sent out men the more fitted for their secular duties, which produced better public men, men of the world, men whose names would descend to posterity, I have no hesitation in giving the preference to that University which did nothing, over that which exacted of its members an acquaintance

with every science under the sun. And, paradox as this may seem, still if results be the test of systems, the influence of the public schools and colleges of England, in the course of the last century, at least will bear out one side of the contrast as I have drawn it. What would come, on the other hand, of the ideal systems of education which have fascinated the imagination of this age, could they ever take effect, and whether they would not produce a generation frivolous, narrow-minded, and resourceless, intellectually considered, is a fair subject for debate; but so far is certain, that the Universities and scholastic establishments, to which I refer, and which did little more than bring together first boys and then youths in large numbers, these institutions, with miserable deformities on the side of morals, with a hollow profession of Christianity, and a heathen code of ethics,—I say, at least they can boast of a succession of heroes and statesmen, of literary men and philosophers, of men conspicuous for great natural virtues, for habits of business, for knowledge of life, for practical judgment, for cultivated tastes, for accomplishments, who have made England what it is,—able to subdue the earth, able to domineer over Catholics.

我斗胆在各位面前断言，如果必须在这样两种大学当中选择一个，一种所谓的大学并不需要学生住校，不需要辅导老师，可以给任何能通过内容广泛的科目考试的人颁发学位；另一种大学根本就没有教授或考试，而只是召集一批年轻人来度过三、四年，之后将他们打发走，就像牛津大学据说自建校之后六十余年来所做的那样。假如有人问我这两种方法当中哪一种更适合于才智的训练（请注意，我不是指哪一种在道德上更好，因为十分明显的是，强制学习必然是好事，而游手好闲肯定是弊端），但假如我必须确定哪一种课程在培训、塑造、扩充心智方面更加成功，它培育出来的人更适合履行其世俗职责，能锻造出更优秀的公共服务人士，即精通世事的人，其声名会为

后代所铭记的人，那我毫不犹豫就会偏向这样一种什么事也不干的大学，而不是强逼学生略知太阳底下几乎每一门学科的大学。听起来这似乎是个悖论，但假如必须以结果来检验不同方法则更是如此。英国的公立中学和大学自上个世纪以来的影响，至少会支持我方才拿来对照的一方。但另外一方面，迷惑住这个时代的想象力的那些理想教育制度会有什么结果呢？它们到底会否起作用，会否造就一代言行轻浮、心胸狭隘且从智性角度看胸无方略的次品，这是可资辩论的好题材。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提及的那些大学与教育机构，它们只不过是先把一大批男孩子招进来，之后再招一大批年轻人进来。这些机构在品行教育方面畸形到了可悲的程度，在基督教信仰的宣称上空洞无力，还照搬异教徒的道德规范。我要说，至少这样的机构可自夸道，自己能造就一连串的英雄与政治家、文人墨客与哲学家，因自然美德、经营习惯、人生知识、实用判断力、有教养的品味和成就而声名显赫的人，就是造就了今日之英格兰的那些人，他们有能力征服全世界，有能力在天主教徒面前专横跋扈。

How is this to be explained? I suppose as follows: When a multitude of young men, keen, open-hearted, sympathetic, and observant, as young men are, come together and freely mix with each other, they are sure to learn one from another, even if there be no one to teach them; the conversation of all is a series of lectures to each, and they gain for themselves new ideas and views, fresh matter of thought, and distinct principles for judging and acting, day by day. An infant has to learn the meaning of the information which its senses convey to it, and this seems to be its employment. It fancies all that the eye presents to it to be close to it, till it actually learns the contrary, and thus by practice does it ascertain the relations and uses of those first elements of knowledge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its animal existence. A parallel teaching is necessary for our social being, and it is secured by a large school or a college; and this effect may be fairly called in its own department

an enlargement of mind. It is seeing the world on a small field with little trouble; for the pupils or students come from very different places, and with widely different notions, and there is much to generalize, much to adjust, much to eliminate, there are inter-relations to be defined, and conventional rules to be established, in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whole assemblage is moulded together, and gains one tone and one character.

这该怎么解释呢？我提出如下解释：年轻人往往都充满渴望、胸襟开阔、感受能力强且善于观察。当这样一批年轻人来到一起自由交往时，彼此一定会学到不少东西，哪怕并没有人来教课。光是彼此之间的交谈，就可以算得上是一连串的讲座，他们日复一日地分别从对方那里得到新思想和新观点、新的思考材料与指导判断和行动的明确原则。婴儿必须明白其感觉器官传递给他的信息的意义，而且这似乎就是婴儿要忙碌的事情。婴儿想象视力呈现在他面前的东西都离自己很近，之后才弄清楚实际的情形相反。这样一来，通过实践，他才查明作为其动物性生存所必需的最初的知识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用途。一种相同的教导，也是我们的社会性存在所必需的，且由较大的中学和大学来保障这种教学。而这个效果在各自的系别里也许都可恰当地称为心智的扩充。这是在一个较少麻烦的小范围内看世界。中学生或大学生来自不同地方，各自观念差别很大，在彼此相处的过程中，有很多需要总结，有很多需要调整，有很多要消除，有一些相互间的关系要确定，有一些成规要制定。通过这个过程，整体装配就浇铸成型了，并获得一种特色，一种性格。

Let it be clearly understood, I repeat it, that I am not taking into account moral or religious considerations; I am but saying that that youthful community will constitute a whole, it will embody a specific idea, it will represent a doctrine, it will administer a code of conduct, and it will furnish principles of thought and action. It will

give birth to a living teaching, which in course of time will take the shape of a self-perpetuating tradition, or a *genius loci* , as it is sometimes called; which haunts the home where it has been born, and which imbues and forms, more or less, and one by one, every individual who is successively brought under its shadow. Thus it is that, independent of direct instruction on the part of Superiors, there is a sort of self-education in the academic institutions of Protestant England; a characteristic tone of thought, a recognized standard of judgment is found in them, which, as developed in the individual who is submitted to it, becomes a twofold source of strength to him, both from the distinct stamp it impresses on his mind, and from the bond of union which it creates between him and others,—effects which are shar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the place, for they themselves have been educated in it, and at all times are exposed to the influence of its ethical atmosphere. Here then is a real teaching, whatever be its standards and principles, true or false; and it at least tends towards cultivation of the intellect; it at least recognizes that knowledge is something more than a sort of passive reception of scraps and details; it is a something, and it does a something, which never will issue from the most strenuous efforts of a set of teachers, with no mutual sympathies and no intercommunion, of a set of examiners with no opinions which they dare profess, and with no common principles, who are teaching or questioning a set of youths who do not know them, and do not know each other, on a large number of subjects, different in kind, and connected by no wide philosophy, three times a week, or three times a year, or once in three years, in chill lecture-rooms or on a pompous anniversary.

我再重复一遍，这一点一定要弄明白，即我在这里并没有把道德或宗教方面的考虑包括在内。我只是说，那样一个青年人的团体会构

成一个整体，会体现一个具体的概念，会代表一种信条，会实施一种道德规范，会提供思想和行动的原则。它会促成一种现实教育，这种现实教育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呈现出一种自存传统的外观，或可称为时常所说的场所精神。这场所精神会在其诞生的地方反复出现，会灌输和塑形，连续不断地影响来到这地方的每一个人。所以事情才会是这样的。在信新教的英格兰的学术机构里，存在一种并不依靠长上直接教诲的自我教育。在这里，可以发现一种有特征的思维模式，一种公认的判断标准，由于它是在投身这种自我教育的学生中养成的，因而对这学生来说就是双重的力量源泉，一方面来自于这种教育在他心智里刻上的清晰烙印，一方面来自这教育在他与其他同学之间形成的盟友约定。这样的效果是这地方的权威们共有的，因为他们自身也是在这样的模式中受教育的，而且在所有时候都在接受其道德氛围的影响。这就是一种真正的教导，无论它或真或假的标准或原则是什么。至少它是趋向才智培育的，至少它还会承认，知识远不是被动地接受零碎琐屑的东西，其所是所为的重要性，绝非出自工作极勤奋却没有师生双向的同情和彼此沟通的一批老师，也不会出自根本就不敢表达见解，与学生也没有共同原则的那批考官，因为这些人在忙着教导或查问一批根本就不认识自己、而且相互之间也不认识的青年人。他们提出的问题涉及许多科目，种类也不相同，也没有广泛的哲学使其产生联系。而且考试的频率或是一周三次，或是一年三次，或每三年一次，有时在冰冷的课堂，有时在浮夸的纪念日。

10．

10．

Nay, self-education in any shape, in the most restricted sense, is preferable to a system of teaching which, professing so much, really does so little for the mind. Shut your College gates against the

votary of knowledge, throw him back upon the searchings and the efforts of his own mind; he will gain by being spared an entrance into your Babel. Few indeed there are who can dispense with the stimulus and support of instructors, or will do any thing at all, if left to themselves. And fewer still (though such great minds are to be found), who will not, from such unassisted attempts, contract a self-reliance and a self-esteem, which are not only moral evils, but serious hindrances to the attainment of truth. And next to none, perhaps, or none, who will not be reminded from time to time of the disadvantage under which they lie, by their imperfect grounding, by the breaks, deficiencies, and irregularities of their knowledge, by the eccentricity of opinion and the confusion of principle which they exhibit. They will be too often ignorant of what every one knows and takes for granted, of that multitude of small truths which fall upon the mind like dust, impalpable and ever accumulating; they may be unable to converse, they may argue perversely, they may pride themselves on their worst paradoxes or their grossest truisms, they may be full of their own mode of viewing things, unwilling to be put out of their way, slow to enter into the minds of others;—but, with these and whatever other liabilities upon their heads, they are likely to have more thought, more mind, more philosophy, more true enlargement, than those earnest but ill-used persons, who are forced to load their minds with a score of subjects against an examination, who have too much on their hands to indulge themselves in thinking or investigation, who devour premiss and conclusion together with indiscriminate greediness, who hold whole sciences on faith, and commit demonstrations to memory, and who too often, as might be expected, when their period of education is passed, throw up all they have learned in disgust, having gained nothing really by their anxious labours, except perhaps the habit of application.

难道不是吗？限制任何形式的自我教育，都比在心智方面说得多做得少的教学方法更好。崇拜知识的人，大学的大门应当对其紧闭，要让他回头去探索和锤炼自己的心智。由于再不需要进入你们的巴别塔，他反倒会有所收获。很少有人离得开老师的激励和支持，或者说，没有了老师，他们干脆什么事也不想干。有人（尽管这些伟大的天才还有待发现）会从这些无外力协助的尝试中养成一种自强与自尊。若如此，这不仅是道德之恶，而且还是追求真理的严重阻碍。绝少有人，甚或根本就没有人不会因其不完善的基础，因其知识断层、缺欠和不齐整，因他们的奇特见解和混乱原则，而时不时地想起自己所处的不利境况。尽人皆知并信以为真的东西，那些尘土一样不知不觉地不断累积，并对心智产生影响的数不清的大小事情，他们时常并不知晓。他们也许不善交谈，也许会以离谱的方式进行争辩，他们或许因为自己最糟糕的悖论或最明显的老生常谈而自傲，他们或许总是依自己的性子看待事物，从来都不愿意换个角度，不情愿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可是，尽管头上顶着这样那样的罪责，他们却有可能思考得更多，心智更全，更有哲理性，有更真实的增益，胜过那些严肃认真却惨遭虐待的人，因后者被迫将应付考试的一、二十种科目内容塞进大脑，手头上有太多的事情而无法思考或探索，以不加区别的贪婪将前提与结论混在一起生吞活剥，将所有学科全都建立在信仰基础上，死记硬背演算过程，等到教育期过去以后，往往像预料的那样，将在厌恶中所学的吐出来还给老师。结果，也许除了现学现卖这点本事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没有换来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Yet such is the better specimen of the fruit of that ambitious system which has of late years been making way among us: for its result on ordinary minds, and on the common run of students, is less satisfactory still; they leave their place of education simply dissipated and relaxed by the multiplicity of subjects, which they have never really mastered, and so shallow as not even to know their shallowness. How much better, I say, is it for the active and thoughtful intellect, where such is to be found, to eschew the

College and the University altogether, than to submit to a drudgery so ignoble, a mockery so contumelious! How much more profitable for the independent mind, after the mere rudiments of education, to range through a library at random, taking down books as they meet him, and pursuing the trains of thought which his mother wit suggests! How much healthier to wander into the fields, and there with the exiled Prince to find “tongues in the trees, books in the running brooks!” How much more genuine an education is that of the poor boy in the Poem [7_2] —a Poem, whether in conception or in execution, one of the most touching in our language—who, not in the wide world, but ranging day by day around his widowed mother's home, “a dexterous gleaner” in a narrow field, and with only such slender outfit “as the village school and books a few Supplied,” contrived from the beach, and the quay, and the fisher's boat, and the inn's fireside, and the tradesman's shop, and the shepherd's walk, and the smuggler's hut, and the mossy moor, and the screaming gulls, and the restless waves, to fashion for himself a philosophy and a poetry of his own!

然而，这还是最近几年来我们这里相当流行的那种雄心勃勃的教育制度结出的成果中较好的样本，因为它在普通人及一般学生那里产生的后果更不合要求。这些人因为忙于他们从未真正掌握的太多科目，反而在离开教育场所时滋生一种荒废、松懈与肤浅之气，甚至肤浅到不自知的程度。我要说，学院和大学本该是发现积极主动与深思熟虑的才智的地方，若非如此，还不如干脆就逃离大学，比被迫在这里干这种卑贱的苦差和忍受这种劳而无功的羞辱不知要强多少！对于有独立精神的人来说，仅只需要接受最基本的教育，然后就去图书馆里随便逛，顺手取出书本，再按天赋智力的指引追逐自己一连串的思路，这样做的效果不知道要好多少！若去郊外漫步，并与流亡在野外的王子一起去寻找“树上的语言与奔溪中的书本”，那岂不是健康得多！诗中所说的那位贫儿的教育， [8_2] 不知道更真实到了什么程度。

在我们的语言里，那首诗无论从构思还是从写作过程看，都堪称最动人的。那位贫儿并没有混迹于广大的世界，而是一天到晚围着他的寡母转，是那一小块地里“灵巧的拾穗者”，虽然所受的教育，“仅是乡塾或几本书所提供，”却诗意无穷。他写到海滩、码头、渔船、客栈火炉、杂货店、牧羊人的小道、走私犯的棚屋、长满青苔的沼泽、尖叫的海鸥和翻腾的海浪，并把这一切改造成自己的哲学和诗歌！

But in a large subject, I am exceeding my necessary limits. Gentlemen, I must conclude abruptly; and postpone any summing up of my argument, should that be necessary, to another day.

但我们还有更宽泛的主题，因此我已经超出必要的限制。诸位，我必须匆忙作结了。假如必须总结我的观点，还请改天再说吧。

[7_1].The pages which follow are taken almost verbatim from the author's 14th *(Oxford) University Sermon* , which, 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is Discourse, he did not expect ever to reprint.

[7_2].Crabbe's *Tales of the Hall* . This Poem, let me say, I read on its first publication, above thirty years ago, with extreme delight, and have never lost my love of it; and on taking it up lately, found I was even more touched by it than heretofore. A work which can please in youth and age, seems to fulfil (in logical language) the accidental definition of a Classic. [A further course of twenty years has past, and I bear the same witness in favour of this Poem.]

[8_1].随后几页的内容，差不多是从该作者的（牛津）《大学讲道集》中原样摘录下来的，笔者写作本文论集时，那位作者尚无意再版。

[8_2].选自克莱布的《门廊故事集》。我想说，该诗集三十年前出第一版时，这首诗我读起来那么开心，从那以后就一直很喜欢。最近又找出来读，结果发现比以前更受感动。一件文学作品，让人年轻和年老时看起来都那么开心，似乎（按照符合逻辑的话来说）符合经典作品的次要定义。（又过了二十年，我还是能证实自己的确喜欢这首诗。）

Discourse 7. Knowledge Viewed in Relation to Professional Skill

第七讲：从与职业技能的关系看知识

1．

1．

I have been insisting, in my two preceding Discourses, first,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intellect, as an end which may reasonably be pursued for its own sake; and next, on the nature of that cultivation, or what that cultivation consists in. Truth of whatever kind is the proper object of the intellect; its cultivation then lies in fitting it to apprehend and contemplate truth. Now the intellect in its present state, with exceptions which need not here be specified, does not discern truth intuitively, or as a whole. We know, not by a direct and simple vision, not at a glance, but, as it were, by piecemeal and accumulation, by a mental process, by going round an object, by the comparison, the combination, the mutual correction, the continual adaptation, of many partial notions, by the employment, concentration, and joint action of many faculties and exercises of mind. Such a union and concert of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such an enlargement and development, such a comprehensiveness, is necessarily a matter of training. And again, such a training is a matter of rule; it is not mere application, however exemplary, which introduces the mind to truth, nor the reading many books, nor the getting up many subjects, nor the witnessing many experiments, nor the attending many lectures. All this is short of

enough; a man may have done it all, yet be lingering in the vestibule of knowledge:—he may not realize what his mouth utters; he may not see with his mental eye what confronts him; he may have no grasp of things as they are; or at least he may have no power at all of advancing one step forward of himself, in consequence of what he has already acquired, no power of discriminating between truth and falsehood, of sifting out the grains of truth from the mass, of arranging things according to their real value, and, if I may use the phrase, of building up ideas. Such a power is the result of a scientific formation of mind; it is an acquired faculty of judgment, of clear-sightedness, of sagacity, of wisdom, of philosophical reach of mind, and of intellectual self-possession and repose,— qualities which do not come of mere acquirement. The bodily eye, the organ for apprehending material objects, is provided by nature; the eye of the mind, of which the object is truth, is the work of discipline and habit.

正如我在前面两讲中所强调的两点。首先需要重视才智的培养，这里的才智，指的是出于自身原因合理地加以追求的目标；其次是这种培养的本质，或者说是构成这种培养的东西。不管是哪种类型的真理，都是培养这种才智所追求的合适目标，因此，培养才智的目的就在于使人运用才智来理解事物、思考真理。除开并不需要在此详述的例外情形，当前状态下的才智并不能直观或整体地辨别真理。我们认识事物，不是靠简单的直接眼力，不是一望便知，而是靠一点一滴的积累，靠思维过程，靠观察对象，靠比较、组合、相互校正，不断适应许多部分观念，靠运用多种心智能力并将其结合起来付诸实践。这样一种对心智能力的联合与协调，这样的扩充与发育，这样的综合，必然是一件需要通过训练来完成的事情。而且，这种训练与规则有关。这不仅仅是让心智能理解真理的纯粹应用，无论其可仿效性有多高，亦不是读很多书，不是研究许多科目，不是见证许多实验，亦不是听多少堂课的问题。所有这些都略显不足。一个人也许可以完成上

述所有事情，但还是徘徊在知识的大门外。他不一定意识得到嘴里说出来的话什么意思；摆在面前的事物，他不一定会用心智之眼去看待；他不一定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哪怕已经有所收获，至少他也根本无力去思考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完善自我；他无力分辨真假，无力从杂乱的事实中筛选真理的谷粒，无力根据事物真实的价值来安排它们。说得难听些，他都不知道如何形成概念。这样一种能力是科学地塑造心灵的结果，这是后天获取的判断力、清晰观察力、远见卓识、聪明才智、心智的哲理延伸以及一种智性的沉着与安详，单纯靠知识获取并不能培养这种品质。肉眼是捕捉有形物体的器官，乃自然天成；可是，心智之眼的对象却是真理，因此也就由律己和习惯所造就。

This process of training, by which the intellect, instead of being formed or sacrificed to some particular or accidental purpose, some specific trade or profession, or study or science, is disciplined for its own sake, for the perception of its own proper object, and for its own highest culture, is called Liberal Education; and though there is no one in whom it is carried as far as is conceivable, or whose intellect would be a pattern of what intellects should be made, yet there is scarcely any one but may gain an idea of what real training is, and at least look towards it, and make its true scope and result, not something else, his standard of excellence; and numbers there are who may submit themselves to it, and secure it to themselves in good measure. And to set forth the right standard, and to train according to it, and to help forward all students towards it according to their various capacities, this I conceive to be the business of a University.

这个培训过程就称为通识教育，才智是出于自身的缘故，为了感知自身的合适目标，并为自身的最高级培育，才借这过程来修炼自身

的，并不是因为某个具体或偶然的目标，某个特定的行当或职业，某种研究或学科才得以造就的。虽然这样的培训过程并没有在哪个人身上延伸到可以想像的尽头，也没有哪个人的才智可以成为塑造才智的模板，可是，很少有人难以获得真正的培训概念，至少难以对它有所期盼，难以使其真实范围及结果而非别的东西成为自己的卓越标准。也许就有一些人愿意投身其中，并充分地进行这种培训。确立正确的标准，根据这标准进行培训，并依学生不同的能力促使他们全都向这个标准靠拢。我想，这正是大学应当做的事情。

2．

2．

Now this is what some great men are very slow to allow; they insist that Education should be confined to some particular and narrow end, and should issue in some definite work, which can be weighed and measured. They argue as if every thing, as well as every person, had its price; and that where there has been a great outlay, they have a right to expect a return in kind. This they call making Education and Instruction “useful,” and “Utility” becomes their watchword. With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is nature, they very naturally go on to ask, what there is to show for the expense of a University; what is the real worth in the market of the article called “a Liberal Education,”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it does not teach us definitely how to advance our manufactures, or to improve our lands, or to better our civil economy; or again, if it does not at once make this man a lawyer, that an engineer, and that a surgeon; or at least if it does not lead to discoveries in chemistry, astronomy, geology, magnetism, and science of every kind.

可是，某些大人物却并不急着支持此事，他们强调说，教育应当局限于某个特别且有限的目标，应当产生可测量的明确成果。他们坚持如此的理由，就好像是说，凡人凡事都有个价目，大笔费用既然花出去了，他们就有理由得到相应回报。他们把这叫做使教育及教学“有用”，所以，“实用”就成了他们的口号。有了这种性质的基本原则，他们很自然就会进而提问，有什么可以摆出来的东西说明大学花对了钱？市场上这种称为“通识教育”的玩意儿，假定它并不能明确地指导我们如何提升制造品的水平，如何改良土壤，如何促进国民经济，或者说并不能使学生马上就成为律师、工程师、外科医生，甚或都不能激发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磁力学等多种学科的新发现，那么它究竟都有什么真实价值呢？

This question, as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has been keenly debated in the present age, and formed one main subject of the controversy, to which I referred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resent Discourses, as having been sustained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is century by a celebrated *Northern Review* on the one hand, and defend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the other. Hardly had the authorities of that ancient seat of learning, waking from their long neglect, set on foot a plan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th committed to them, tha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 in the city, which has sometimes been called the Northern Athens, remonstrated, with their gravest arguments and their most brilliant satire, against the direction and shape which the reform was taking. Nothing would content them, but that the University should be set to rights on the basis of the philosophy of Utility; a philosophy, as they seem to have thought, which needed but to be proclaimed in order to be embraced. In truth, they were little aware of the depth and force of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the academical authorities were proceeding, and, this being so, it was not to be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be allowed to walk at leisure over the field of controversy which they had selected. Accordingly, they were encountered i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by two men of great name and influence in their day, of very different minds, but united, as by Collegiate ties, so in the clear-sighted and large view which they took of the whole subject of Liberal Education; and the defence thus provided for the Oxford studies has kept its ground to this day.

果如所料，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在当下这个时代从未停歇，并构成我在本演讲集的引言中提及的一个主要争议内容。本世纪的头十年，这场争议还在继续，一方是著名的《北方评论》，另一方是牛津大学的辩护者。这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的权威部门觉察到自己长期的疏漏，因此着手一项针对报考该大学的青年人的教育计划，甫一开始，这座时常以“北方雅典”著称的大学城的科学与文学代表便表示异议，用他们极严肃的论证和极富才气的讽刺反对这项改革的方向及模式。他们认为，牛津大学应当基于实用哲学进行整顿，除此以外的任何主张都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似乎认为，为采纳实用哲学，只需要对其大加赞扬便足够。而事实上，他们根本都没有意识到校方正在实施的那些原则的深度与强度，既如此，在自己选定的这场争战中，他们就不该指望能够闲庭信步地轻松应对了。果不其然，他们遭遇到牛津大学极具代表性的两位人士的反对。这两人当时声名显赫、极具影响力，尽管思想完全不同，但他们是校友关系，因此在通识教育这整个事情上还是持清晰、明确、一致的看法。他们为牛津大学的研究活动提供的辩护，一直维持到了今天。

3．

3．

Let me be allowed to devote a few words to the memory of distinguished persons, under the shadow of whose name I once lived, and by whose doctrine I am now profiting. In the heart of Oxford there is a small plot of ground, hemmed in by public thoroughfares, which has been the possession and the home of one Society for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In the old time of Boniface the Eighth and John the Twenty-second, in the age of Scotus and Occam and Dante, before Wiclif or Huss had kindled those miserable fires which are still raging to the ruin of the highest interests of man, an unfortunate king of England, Edward the Second, flying from the field of Bannockburn, is said to have made a vow to the Blessed Virgin to found a religious house in her honour, if he got back in safety. Prompted and aided by his Almoner, he decided on placing this house in the city of Alfred; and the Image of our Lady, which is opposite its entrance-gate, is to this day the token of the vow and its fulfilment. King and Almoner have long been in the dust, and strangers have entered into their inheritance, and their creed has been forgotten, and their holy rites disowned; but day by day a memento is still made in the holy Sacrifice by at least one Catholic Priest, once a member of that College, for the souls of those Catholic benefactors who fed him there for so many years. The visitor, whose curiosity has been excited by its present fame, gazes perhaps with something of disappointment on a collection of buildings which have with them so few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dignity or wealth. Broad quadrangles, high halls and chambers, ornamented cloisters, stately walks, or umbrageous gardens, a throng of students, ample revenues, or a glorious history, none of these things were the portion of that old Catholic foundation; nothing in short which to the common eye sixty years ago would have given tokens of what it was to be. But it had at that time a spirit working within it, which enabled its inmates to do, amid its seeming insignificance, what no

other body in the place could equal; not a very abstruse gift or extraordinary boast, but a rare one, the honest purpose to administer the trust committed to them in such a way as their conscience pointed out as best. So, whereas the Colleges of Oxford are self-electing bodies, the fellows in each perpetually filling up for themselves the vacancies which occur in their number, the members of this foundation determined, at a time when, either from evil custom or from ancient statute, such a thing was not known elsewhere, to throw open their fellowships to the competition of all comers, and, in the choice of associates henceforth, to cast to the winds every personal motive and feeling, family connexion, and friendship, and patronage, and political interest, and local claim, and prejudice, and party jealousy, and to elect solely on public and patriotic grounds. Nay, with a remarkable independence of mind, they resolved that even the table of honours, awarded to literary merit by the University in its new system of examination for degrees, should not fetter their judgment as electors; but that at all risks, and whatever criticism it might cause, and whatever odium they might incur, they would select the men, whoever they were, to be children of their Founder, whom they thought in their consciences to be most likely from their intellectual and moral qualities to please him, if (as they expressed it) he were still upon earth, most likely to do honour to his College, most likely to promote the objects which they believed he had at heart. Such persons did not promise to be the disciples of a low Utilitarianism; and consequently, as their collegiate reform synchronized with that reform of the Academical body, in which they bore a principal part, it was not unnatural that, when the storm broke upon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North, their Alma Mater, whom they loved, should have found her first defenders within the walls of that small College, which had first put itself into a condition to be her champion.

请容我用几句话来回顾几位杰出人士，他们的声名曾令我深受鼓舞，他们的说教直到今天我仍然受益良多。在牛津大学的腹地，有一小片地方，四周都围有公用通道，一个历史逾五百年的社团一直占有这地方，并以此为家。在教宗波尼法八世和若望二十二世的旧时代，在司各脱、奥康姆和但丁的时代，在威克利夫或胡斯引燃延烧至今、一直还在损毁人类最高利益的那场可悲的野火之前，当英国一位不幸的国王——爱德华二世败走班诺克本战场时，据说曾对圣母马利亚发誓，若安全逃回，他将以她的名义修建一座隐修院。在施赈官的提议及协助下，他决定将这处隐修院建在阿尔弗雷德城。大门正对面矗立的圣母马利亚像，到今天还是许愿就还愿的表征。国王与施赈官早已过世，他们的职位为陌生人继承，他们的信条已被人遗忘，圣仪遭到否认。但日复一日，至少有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曾是那家学院的成员）仍然在那间作为献祭品的隐修院里诵读一篇祈祷文，安抚曾经供奉他多年的那些天主教捐赠人的灵魂。这所隐修院如今已声名鹊起，访客被这声名激发起好奇心，但是，看到这一排建筑时，或许会产生某种失望之情，因为这里已经看不出什么威严或奢华的气氛了。宽敞的四方院、高高的大厅和内庭、布满装饰的回廊、精美的走道、多荫的庭院、成群的学生、充足的收入或辉煌的历史，这些东西没有一样属于天主教的这块老基业的一部分，简言之，没有哪一样在六十年前的普通人看来足以代表它日后会有的模样。可在当时，支持它运作的是一股内在的精神力量，尽管外表看起来似乎不太起眼，却使住在里面的人去做这地方的其他人谁都不能比的事情。这股精神力量并非深奥难懂的天赋或是值得自夸的品质，而是一种罕见的东西，那种最诚实的决心，一定要追随良心的指引去兑现交托给自己的信赖。鉴于牛津的各个学院是一些自我推举的单位，各学院的教职工在人数出现空缺时，总是自行补缺的。所以，这个社团的成员就决定打破陋俗陈规，做一件当时不为人知的事情，他们决定把研究人员的职位拿出来供全部有意者竞争，并且在接下来选择副职人员时，完全不再考虑个人的动机和情感，家庭关系及友谊，赞助及政治利益，当地人的要求和偏袒和学派嫉妒等，仅基于公众利益及爱国立场进行选举。不仅如此，他们还以惊人的独立思想形成决断，哪怕是该大学按照其新的学

位考查方式为文学成就而特设的荣誉席位，也不能影响他们作为选举人的裁定。他们甘冒各种风险，不顾它可能引发的任何批评与可能招致的任何嫌恶，要选出这样一批人做为创始人的接班人，不管他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他们认为，假如（按照他们的说法）这创始人尚在人世，那么，选出来的这些人从良知上看最有可能从智力和道德品质上使他得到慰藉，最有可能让他的学院增光，他们最有可能相信创始人内心怀有的那些目标。这样的人定然不会成为功利主义的粗俗门徒，相应地，由于他们学院的改革与他们极力促成的整个学校的改革同步进行，因此当北方的那所大学爆发风暴时，他们所热爱的母校在那所小规模学院的院墙内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第一批拥趸者，因它早就做好了拥护改革的准备。

These defenders, I have said, were two, of whom the more distinguished was the late Dr. Copleston, then a Fellow of the College, successively its Provost, and Protestant Bishop of Llandaff. In that Society, which owes so much to him, his name lives, and ever will live, for the distinction which his talents bestowed on it, for the academical importance to which he raised it, for the generosity of spirit, the liberality of sentiment, and the kindness of heart, with which he adorned it, and which even those who had least sympathy with some aspects of his mind and character could not but admire and love. Men come to their meridian at various periods of their lives; the last years of the eminent person I am speaking of were given to duties which, I am told, have been the means of endearing him to numbers, but which afforded no scope for that peculiar vigour and keenness of mind which enabled him, when a young man, single-handed, with easy gallantry, to encounter and overthrow the charge of three giants of the *North* combined against him. I believe I am right in saying that, in the progress of the controversy, the most scientific, the most critical, and the wittiest, of that literary company, all of them now, as he

himself, removed from this visible scene, Professor Playfair, Lord Jeffrey, and the Rev. Sydney Smith, threw together their several efforts into one article of their Review, in order to crush and pound to dust the audacious controvertist who had come out against them in defence of his own Institutions. To have even contended with such men was a sufficient voucher for his ability, even before we open his pamphlets, and have actual evidence of the good sense, the spirit, the scholar-like taste, and the purity of style, by which they are distinguished.

如前所述，捍卫者共有两位，其中更知名的一位是已经过世的柯普斯登博士，当时他是该学院的研究员，连续多年担任教务长，也是兰达夫的新教主教。他为那个社团做出那么多的贡献，以致于人们今天还记得他的名字，以后也会记住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天赋使这个社团出类拔萃，它的学术重要性得以提升。他以宽宏大量、宽广胸怀以及仁慈心肠使之生色，这一点，就连对他思想与性格中的某些方面持有最少同情的人，也禁不住钦佩和爱慕。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到达其人生顶点。有人对我说，我一直在此提及的这位名人，他最后几年所从事的工作，虽然是他为众人喜爱的因由，却并没有让人看出其思想之奇特活力与敏锐的程度，而正是依靠这样的品质，他年纪轻轻就单枪匹马、从容应对并瓦解了北方的三位巨头针对他的联手发难。相信我下面这些话应当没什么错。随着争执的进展，那个文学团体中跟他本人一样已经淡出人们视线的三位极具科学头脑、批判精神且非常机智的杰出人士，即普雷费尔教授、杰弗雷勋爵和西德尼·史密斯牧师，联手发动了针对一篇发表在他们的《评论》上的文章的多次攻击，旨在击溃那位无畏的挑衅者并使之化为齑粉，因他竟然敢为捍卫他自己的那些机构而挑战他们的权威。他竟敢与上述几位作对，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的能力了，更何况我们打开他的论战手册后，还会实际看到这些论战文章之所以十分杰出的证据，包括其良好的判断力、精气神、学者似的品味及纯粹的写作风格。

He was supported in the controversy, on the same general principles, but with more of method and distinctness, and, I will add, with greater force and beauty and perfection, both of thought and of language, by the other distinguished writer, to whom I have already referred, Mr. Davison; who, though not so well known to the world in his day, has left more behind him than the Provost of Oriel, to make his name remembered by posterity. This thoughtful man, who was the admired and intimate friend of a very remarkable person, whom, whether he wish it or not, numbers revere and love as the first author of the subsequent movement in the Protestant Church towards Catholicism [8_1] , this grave and philosophical writer, whose works I can never look into without sighing that such a man was lost to the Catholic Church, as Dr. Butler before him, by some early bias or some fault of self-education—he, in a review of a work by Mr. Edgeworth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hich attracted a good deal of attention in its day, goes leisurely over the same ground, which had already been rapidly traversed by Dr. Copleston, and, though professedly employed upon Mr. Edgeworth, is really replying to the northern critic who had brought that writer's work into notice, and to a far greater author than either of them, who in a past age had argued on the same side.

在那场争议中，他得到我已经提到过的另一位杰出的作者——戴维森先生的声援，声援的是同样的一般原则，但更多是方法论及清晰度上面的支持，而且我想补充说，无论是思想还是语言，这种声援都展现出更大的力度、优美程度与完整度。戴维森先生虽然当时知名度相对较低，但比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的教务长留下了更多著作，因而使其声名为后人所铭记。这位考虑周全的人，是一位非凡人士仰慕的知己，而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许多人都极其尊敬和爱戴这位非凡人士，他是接下来新教开展的一项归顺天主教的运动的第一位著述者。

[9_1] 每每读其著作，这位严肃而富有哲理性的作者都令我忍不住喟然长叹，这样杰出的人士，正如在他之前的巴特勒博士，竟然因为某种早年的偏见或自我教育中的失误，为天主教所痛失。埃奇沃斯先生有一本论述职业教育的著作，当日引起很多人注意，在对该书的一篇评论中，他轻松地重温了柯普斯登博士早已一笔带过的同一个领域。尽管他表面上大谈埃奇沃斯的著作，实则是在回应北方那位使该作者的著作广受关注的评论家，还有另外一位比这两位更了不起的作者，他曾在过去为同一立场进行过辩护。

4．

4．

The author to whom I allude is no other than Locke. That celebrated philosopher has preceded *the Edinburgh Reviewers* in condemning the ordinary subjects in which boys are instructed at school, on the ground that they are not needed by them in after life; and before quoting what his disciples have said in the present century, I will refer to a few passages of the master.

我说了半天的那位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洛克。这位知名的哲学家，早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这几位作者之前便已经谴责过中小学里讲授的那些普通课程，其理由是，学生在毕业后的生活里根本就用不上那些东西。引述我们这个时代的洛克门徒的话之前，我先引用这位大师的几段话。他在论述教育的文章中说：

“'Tis matter of astonishment,” he says in his work on

Education, “that men of quality and parts should suffer themselves to be so far misled by custom and implicit faith. Reason, if consulted with, would advise, that their children's time should be spent in acquiring what might be useful to them, when they come to be men, rather than that their heads should be stuffed with a deal of trash, a great part whereof they usually never do ('tis certain they never need to) think on again as long as they live; and so much of it as does stick by them they are only the worse for.”

> “有素质和多才多艺的人居然能容忍习俗和盲信如此严重的误导，这可真是令人惊愕之事。如果听从理性的劝告，为人父母者就会明白，孩子的时间应当用于获取成年后可能有用的东西，而不应当像现在这样在他们的脑袋里塞满一堆垃圾，其中很大一部分他们在有生之年永远都不会（肯定也不需要）再加思考。因此，他们坚持不放的很多东西，实际对他们更加有害。”

And so again, speaking of verse-making, he says,

谈到吟诗填词的事情时，他又说：

“I know not what reason a father can have to wish his son a poet, who does not desire him to *bid defiance to all other callings and business* ; which is not yet the worst of the case; for, if he proves a successful rhymer, and gets once the reputation of a wit, I desire it to be considered, what company and places he is likely to spend his time in, nay, and estate too; for it is very seldom seen that any one

discovers *mines of gold or silver in Parnassus* . 'Tis a pleasant air, but a barren soil.”

> “为人父者，假如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轻视其他职业及行当，我就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奢望这孩子当诗人。当然，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部分，因为，万一他真的幸运当上打油诗人，并因此捞取文思智巧的声名，我倒是希望人们思考一下，看他以后会跟哪些人混在一起，在什么地方混，而且还要看他拿什么混日子。很少有人看到，竟然会有人在帕纳塞斯山上发现金矿或银矿。山上风光不错，却是寸草不生之地。”

In another passage he distinctly limits utility in education to its bearing on the future profession or trade of the pupil, that is, he scorns the idea of any education of the intellect, simply as such.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明确地将教育的实用性限制在教育对学生未来职业或行当的影响上，就是说，他鄙视简单地为才智而进行才智教育的观点。他问：

“Can there be any thing more ridiculous,” he asks, “than that a father should waste his own money, and his son's time, in setting him to *learn the Roman language* , when at the same time he *designs him for a trade* , wherein he, having no use of Latin, fails not to forget that little which he brought from school, and which 'tis ten to one he abhors for the ill-usage it procured him? Could it be believed, unless we have every where amongst us examples of it,

that a child should be forced to learn the rudiments of a language, which *he is never to use in the course of life that he is designed to* , and neglect all the while the writing a good hand, and casting accounts, which are of great advantage in al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to most trades indispensably necessary?”

> “为人父者，假如本打算让儿子学一门手艺，竟然浪费钱财和孩子的时间让他学习罗马人的语言，而他这个行当根本就用不上拉丁语。就算这孩子没有把学校里学来的那点拉丁语忘记掉，他十有八九也会憎恨这学无所用的东西。难道还有比这更荒唐可笑的事情？一个小孩子，假如被迫去学习一种语言的基本知识，而在原本打算让他去过的那种生活中他永远都不会用上这些语言知识，这期间却又忽略了写一手好字和算账这些在人生各种境况下都极其有利、对绝大多数行当而言也都必不可少的技能，除非我们身边到处都有这样的范例，否则我们能相信这样的事情吗？”

Nothing of course can be more absurd than to neglect in education those matters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a boy's future calling; but the tone of Locke's remarks evidently implies more than this, and is condemnatory of any teaching which tends to the general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当然，没有什么比在教育中忽略对一个孩子未来的职业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更荒唐的了，可洛克所言的语气明显暗含更多意思，即对任何旨在一般性心智培育的教学抱谴责态度。

Now to turn to his modern disciples.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s had been made the basis of the Oxford education, in the reforms which I have spoken of, and *the Edinburgh Reviewers* protested, after the manner of Locke, that no good could come of a system which was not based upon the principle of Utility.

现在我们来说说他的现代弟子。在我已经提及的改革当中，古典著作的学习已经成为牛津大学的教育基础，《爱丁堡评论》的撰稿人也沿袭洛克的方式抱怨说，不基于实用主义原则的教育系统，决不会产生良好的结果。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y said, “is the great object at Oxford. Many minds, so employed, have produced many works and much fame in that department; but if all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useful to human life* , had been taught there, if *some* had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chemistry* , *some* to *mathematics* , *some* to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 and if *every* attainment had been honoured in the mixt ratio of its difficulty and *utility* , the system of such a University would have been much more valuable, but the splendour of its name something less.”

他们说：“古典文学在牛津大学是学习的一大目标。在这方面展现才智的许多能人，已经有不少的杰作问世，并在这个领域崭露头角。但是，假如对人类生活有用的所有文理科都在牛津进行教学，假如某些人献身化学，某些人献身数学，再有些人献身实验哲学，又假如根据难度和用处混合搭配的比率各有相应的学识回报，那么，这样一所大学的体制一定更有价值，但是，它的光辉名声却可能比不上从前。”

Utility may be made the end of education, in two respects: either as regards the individual educated, or the community at large. In which light do these writers regard it? in the latter. So far they differ from Locke, for they conside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s the supreme and real end of a University. This is brought into view in the sentences which follow.

实用性可在两个层面成为教育目标，要么针对接受教育的单个的人，要么针对整个社会。这些作者是在哪个层面上看待实用性的意义呢？若指后者。就目前而论，他们与洛克有所不同，因为他们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大学的终极和真实目标。下列这段话会让大家看出他们到底持什么样的想法。

When a University has been doing useless things for a long time, it appears at first degrading to them to be *useful* . A set of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would be discouraged in Oxford, probably despised, probably not permitted. To discuss the inclosure of commons, and to dwell upon imports and exports, to come so near to common life, would seem to be undignified and contemptible. In the same manner, the Parr or the Bentley of the day would be scandalized, in a University, to be put on a level with the discoverer of a neutral salt; and yet, *what other measure is there of dignity in intellectual labour but usefulness* ? And what ought the term University to mean, but a place where every science is taught which is liberal, and at the same time useful to mankind? Nothing would so much tend to bring classical literature within proper bounds as a *steady and invariable* appeal to utility in our appreciation of all human knowledge… *Looking always to real utility as our guide* , we should see, with equal pleasure, a studious and

inquisitive mind arranging the productions of nature, investigating the qualities of bodies, or mastering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learned languages. We should not care whether he was chemist, naturalist, or scholar, because we know it to be as *necessary* that matter should be studied and subdued *to the use of* man, as that taste should be gratified, and imagination inflamed.

> “一所大学，如果长期都在从事无用的事情，那么一开始，他们便把‘有用’当做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在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讲座常常不受欢迎，也许遭人轻视，甚至有可能得不到许可。讨论圈地，深究进出口等过于靠近凡俗生活的话题，似乎又有失庄重，令人鄙视。同样，假如将当日的帕尔或本特力的名字与中性盐的发明者相提并论的话，他们一定感觉受到了侮辱。可是，在智力劳动上面，除了有用性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高贵尊严的尺度？大学这个词，除了指既是通识的，同时也对人类有用的每一学科都得以教学的一个地方之外，难道还应当有别的什么意思？品鉴人类所有知识时，没有什么比恒久不变地诉诸实用性更能使古典文学保持在适当范围之内……一如既往地把真正的实用性看作我们的指南，我们就会以同样的快乐看到热心与好奇心，它布置自然的出产，探究人体的特性，或掌控习得语言的难点。我们不该操心一个人是不是化学家、博物学家或学者，因为我们知道物质必须加以研究并为人所用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即如果想要满足口腹之欲，必定要先激发想象力。”

Such then is the enunciation, as far as words go, of the theory of Utility in Education; and both on its own account, and for the

sake of the able men who have advocated it, it has a claim on the attention of those whose principles I am here representing. Certainly it is specious to contend that nothing is worth pursuing but what is useful; and that life is not long enough to expend upon interesting, or curious, or brilliant trifles. Nay, in one sense, I will grant it is more than specious, it is true; but, if so, how do I propose directly to meet the objection? Why, Gentlemen, I have really met it already, viz., in laying down, that intellectual culture is its own end; for what has its *end* in itself, has its *use* in itself also. I say, if a Liberal Education consists in the culture of the intellect, and if that culture be in itself a good, here, without going further, is an answer to Locke's question; for if a healthy body is a good in itself, why is not a healthy intellect? and if a College of Physicians is a useful institution, because it contemplates bodily health, why is not an Academical Body, though it were simply and solely engaged in imparting vigour and beauty and grasp to the intellectual portion of our nature? And the Reviewers I am quoting seem to allow this in their better moments, in a passage which, putting aside the question of its justice in fact, is sound and true in the principles to which it appeals:—

就字面意义而论，这也算是对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学说的阐释了。出于其自身原因，也为了倡导该学说的那些人士的缘故，这学说要求其原则得到各位的注意。当然说除了有用性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是值得追求的，人生短得无法在任何有趣、令人好奇或闪光的琐事上荒废时光，这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不仅如此，一方面我得承认，这话岂止是有点道理，简直就是真理。但假如是这样，我又该如何直接提出以面对异议呢？可不是嘛。我说过，智性的培育就是其自身目的，因为有自身目的的东西，自身也就必定有用。各位，提出这主张时，我本人已经都遇到这样的异议了。假如通识教育由才智的培育构成，而这培育自身也是一项好处，那么就无须再想，仅在这里就可以

找到针对洛克问题的答案。假如健康的身体自身就是好处，健康的才智为何就不能是好处呢？如果培养医生的学院是有用的机构，因为它有利于身体健康，那么一所高等学府，尽管只是完全和纯粹地从事将活力、美与理解力传授给我们天性的智性部分，为何就不能也是这样一个有用机构呢？我方才引述过其观点的那几位评论家，在他们的光辉时刻也都曾承认这一点。先把这段话实质上是否公平的问题放在一边，这话就其原则而言是可靠且真实的。

"The present state of classical education," they say, "cultivates the *imagination* a great deal too much, and other *habits of mind* a great deal too little, and trains up many young men in a style of elegant imbecility, utterly unworthy of the talents with which nature has endowed them… The matter of fact is, that a classical scholar of twenty-three or twenty-four is a man principally conversant with works of imagination. His feelings are quick, his fancy lively, and his taste good. Talents for *speculation* and *original inquiry* he has none, nor has he formed the invaluable *habit of pushing things up to their first principles* , or of collecting dry and unamusing facts as the materials for reasoning. All the solid and masculine parts of his *understanding* are left wholly without *cultivation* ; he hates the pain of thinking, and suspects every man whose boldness and originality call upon him to defend his opinions and prove his assertions."

他们说："当前古典教育的状态，在想像力的培育上走得太远，而在其他思想习惯的培育上又很是不足，结果培养出太多外表光鲜而实则愚蠢的年青人，完全辜负了大自然赋予他们的天资……事实是，年龄在二十三、四岁的古典文学专业学生，就是一个主要只能谈谈想像之作的人。他的情感易于流露，想像力

十分活跃，品味也算不错。至于思辨　和创造性探究的能力，他一样也没有，也没有养成考虑推动事物发展首要原则的习惯　，或将收集到枯燥乏味的事实用作推理材料的良好习惯。他的领悟力中最核心的部分完全没有得到培养　。他不喜欢思考的痛苦，对任何胆略和创造力都让他想要捍卫自己的意见来证明其武断的人，他都会心生疑窦。”

5．

5．

Now, I am not at present concerned with the specific question of classical education; else, I might reasonably question the justice of calling an intellectual discipline, which embraces the study of Aristotle, Thucydides, and Tacitus, which involves Scholarship and Antiquities, imaginative; still so far I readily grant,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a “talent for speculation and original inquiry,” and of “the habit of pushing things up to their first principles,” is a principal portion of a good or liberal education. If then *the Reviewers* consider such cultivati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a useful education, as they seem to do in the foregoing passage, it follows, that what they mean by “useful” is just what I mean by “good” or “liberal:” and Locke's question becomes a verbal one. Whether youths are to be taught Latin or verse-making will depend on the fact, whether these studies tend to mental culture; but, however this is determined, so far is clear, that in that mental culture consists what I have called a liberal or non-professional, and what the Reviewers call a useful education.

眼下，我并不急于提出古典教育中的具体问题，既如此，我不妨合情合理地质疑把一种对智性的规训称为想象力的公平性，因为这种规训包括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和塔西陀的研究，隐含着学识和古代史知识。尽管如此，目前我还是乐于承认，对“领悟力”的培养，对“思辨与创造性探究能力的天资”的培养，对“考虑事物时关注首要原则”这一习惯的培养，是优良的或者说是通识教育的主要部分。假如《爱丁堡评论》的评论者们认为这样的培育就是一种有用教育的特征（他们在前面那个段落里想要阐述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们所说的“有用”这个词的意思，必须正好就是我用“优良的”或“修身养性的”这两个词所说的意思。这样一来，洛克的问题就变成一个用词不同的问题了。年青人是否应当学习拉丁文或吟诗填词，这取决于这些研究是否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心智，但无论怎样，目前有一点显然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所说的通识教育或非职业化的教育，以及上述评论家们称之为有用教育的东西，就在于在这种心智培育。

This is the obvious answer which may be made to those who urge upon us the claims of Utility in our plans of Education; but I am not going to leave the subject here: I mean to take a wider view of it. Let us take “useful,” as Locke takes it, in its proper and popular sense, and then we enter upon a large field of thought, to which I cannot do justice in one Discourse, though today's is all the space that I can give to it. I say, let us take “useful” to mean, not what is simply good, but what tends to good, or is the instrument of good; and in this sense also, Gentlemen, I will show you how a liberal education is truly and fully a useful, though it be not a professional, education. “Good” indeed means one thing, and “useful” means another; but I lay it down as a principle, which will save us a great deal of anxiety, that, though the useful is not always good, the good is always useful. Good is not only good, but reproductive of good; this is one of its attributes; nothing is

excellent, beautiful, perfect, desirable for its own sake, but it overflows, and spreads the likeness of itself all around it. Good is prolific; it is not only good to the eye, but to the taste; it not only attracts us, but it communicates itself; it excites first our admiration and love, then our desire and our gratitude, and that, in proportion to its intenseness and fullness in particular instances. A great good will impart great good. If then the intellect is so excellent a portion of us, and its cultivation so excellent, it is not only beautiful, perfect, admirable, and noble in itself, but in a true and high sense it must be useful to the possessor and to all around him; not useful in any low, mechanical, mercantile sense, but as diffusing good, or as a blessing, or a gift, or power, or a treasure, first to the owner, then through him to the world. I say then, if a liberal education be good, it must necessarily be useful too.

这是一个明显的答案，可用于答复力促我们在教育计划中考虑实用主义主张的那些人，但目前我还不打算丢下手头这个话题，我要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让我们像洛克一样，采纳“有用的”这个词的恰切的通俗意义，然后再进入更广泛的思想视野，尽管一章里可能说不清楚，但也只有今天才有时间专门谈及此事。我的意思是，可以让“有用的”这个词泛指趋于益处的东西，或是通向益处的工具，而不简单地只是有好处的东西。各位，从这个意义上我将让大家看出，尽管通识教育并非职业教育，却是真正和完全有用的教育。的确，“好的”指一件东西，而“有用的”却指另一件东西，可是，我立下这样一条原则，可以省掉我们不少的烦恼不安，即有用的并非总是有益的，而有益的却总是有用的。益处不仅仅是益处，它还能生发益处，这是其属性。从自身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本身就是卓越、美好、完善和值得渴求的，而是这个事物能使这些优良的品质四处传播。益处是丰富多产的，它不仅看起来好，而且在品味上也是如此。它不仅能吸引人，而且还能有效地进行自我传播。它首先激发人的赞赏与热爱之情，之后唤起我们的渴望与感恩之心，而且它在特定

情形中的强度与圆满程度成比例。极好的东西，传递出来的东西也极好。所以，假如才智是我们身上如此卓越的一部分，对它的培样也是如此出色，它自身不仅如此既美好又完善，既值得赞赏又高贵，而且从真实和崇高意义上来看，它对拥有才智者和他周围所有的人一定大有裨益。不这种益处不是低俗、机械和商业意义上的有用，而是因为它传播益处，或一种福分，或天分，或力量，或财富，这财富首先归于拥有它的人，然后归于通过这人传播出去的那个世界。这样我不妨说，如果通识教育是好的，那它一定也是有用的。

6．

6．

You will see what I mean by the parallel of bodily health. Health is a good in itself, though nothing came of it, and is especially worth seeking and cherishing; yet, after all, the blessings which attend its presence are so great, while they are so close to it and so redound back upon it and encircle it, that we never think of it except as useful as well as good, and praise and prize it for what it does, as well as for what it is, though at the same time we cannot point out any definite and distinct work or production which it can be said to effect. And so as regards intellectual culture, I am far from denying utility in this large sense as the end of Education, when I lay it down,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intellect is a good in itself and its own end; I do not exclude from the idea of intellectual culture what it cannot but be, from the very nature of things; I only deny that we must be able to point out, before we have any right to call it useful, some art, or business, or profession, or trade, or work, as resulting from it, and as its real and complete end. The parallel is

exact:—As the body may be sacrificed to some manual or other toil, whether moderate or oppressive, so may the intellect be devoted to some specific profession; and I do not call *this* the culture of the intellect. Again, as some member or organ of the body may be inordinately used and developed, so may memory, or imagination, or the reasoning faculty; and this again is not intellectual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body may be tended, cherished, and exercised with a simple view to its general health, so may the intellect also be generally exercised in order to its perfect state; and this is its cultivation.

拿身体健康打比方，大家就会明白我的意思。健康自身即是好处，尽管并没有什么东西出自健康，它还是尤值得人们追求和珍惜。可毕竟，伴随健康而来的福分如此之大，当这些福分离它如此之近，且包容并反归于它的时候，我们便总拿它当有用和好的东西，并因为健康本身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而赞扬它、表彰它，尽管同时我们并不能指出可谓由它引致的任何确定和明确的功用或成果。论及智性的培养，当我确认才智的培养乃本身就有其益处及目的时，根本都不想否认作为教育目的这层广泛意义上的实用性。根据事物的本质来看，我并没有将它从培养智性的观念中排除。我只是否认，在我们有理由称某种技艺、营生、职业、行当或工作为有用的东西之前，就必须要指出它是这种培养的结果，且这种结果得和完全的目的真正吻合。上述那个比方十分精当。正如身体可以拿出来从事劳动，或是一般性的劳动，或是难予忍受的体力活或其他辛苦劳动，人的才智也可奉献给某个具体职业，但我并不会称此为培养才智。又如，身体的某个肢体或器官可能因过度使用而异常发育，人的记忆力、想象力或推理能力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而这也不是培养才智。另外一方面，身体会得到保养、爱惜或锻炼，目的就是为维持其一般性的健康状态，才智也可进行一般性磨炼，以促其达到完美状态，而这就是培养才智。

Again, as health ought to precede labour of the body, and as a man in health can do what an unhealthy man cannot do, and as of this health the properties are strength, energy, agility, graceful carriage and action, manual dexterity, and endurance of fatigue, so in like manner general culture of mind is the best aid to professional and scientific study, and educated men can do what illiterate cannot; and the man who has learned to think and to reason and to compare and to discriminate and to analyze, who has refined his taste, and formed his judgment, and sharpened his mental vision, will not indeed at once be a lawyer, or a pleader, or an orator, or a statesman, or a physician, or a good landlord, or a man of business, or a soldier, or an engineer, or a chemist, or a geologist, or an antiquarian, but he will be placed in that state of intellect in which he can take up any one of the sciences or callings I have referred to, or any other for which he has a taste or special talent, with an ease, a grace, a versatility, and a success, to which another is a stranger. In this sense then, and as yet I have said but a very few words on a large subject, mental culture is emphatically *useful* .

再比如，正如先有健康才能劳动，只有健康的人才能做到病人难以办到的事情，这种健康指的就是像力气、能量、灵活性、适当举止和动作、手脚灵巧以及吃苦耐劳等能力。同样，对心智的一般性培养，就是对职业与科学研究的最佳辅助，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做文盲办不到的事情。学会思考及推理，比较、鉴别和分析的人，提升了鉴赏品味，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力且眼光十分敏锐的人，诚然并不会马上就成为律师、辩手、演说家、政治家、医生、精明的房东、实业家、武士、工程师、化学家、地质学家或是古文物研究者，可他的才智状态能够导致以下结果，那就是我方才提到的那些学科或职业，或他本身有鉴赏力或天资的其他行当，随便哪一种他都可信手拈来，他展现出来的那种轻松优雅、多才多艺和成功，别人是不了解的。虽然就这么

大的一个话题我还没展开来谈，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培养心智实在是大有裨益。

If then I am arguing, and shall argue, against Professional or Scientific knowledge as the sufficient end of a University Education, let me not be supposed, Gentlemen, to be disrespectful towards particular studies, or arts, or vocations, and those who are engaged in them. In saying that Law or Medicine is not the end of a University course, I do not mean to imply that the University does not teach Law or Medicine. What indeed can it teach at all, if it does not teach something particular? It teaches *all* knowledge by teaching all *branches* of knowledge, and in no other way. I do but say that there will be this distinction as regards a Professor of Law, or of Medicine, or of Geology, or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a University and out of it, that out of a University he is in danger of being absorbed and narrowed by his pursuit, and of giving Lectures which are the Lectures of nothing more than a lawyer, physician, geologist, or political economist; whereas in a University he will just know where he and his science stand, he has come to it, as it were, from a height, he has taken a survey of all knowledge, he is kept from extravagance by the very rivalry of other studies, he has gained from them a special illumination and largeness of mind and freedom and self-possession, and he treats his own in consequence with a philosophy and a resource, which belongs not to the study itself, but to his liberal education.

诸位，假如我现在和稍后反对将职业或学科知识当作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请不要以为我是在轻视特殊的研究项目、技艺、职业和从事这些研究的那些人。如果我说法律或医学不是大学课程的目的，我的意思并不是暗指大学就不教法律或医学。假如大学不讲授任何具体

的东西，那它到底都能教给人什么东西呢？它通过讲授所有 知识来传授所有 知识，而且并没有别的办法。我要说的只不过是，法学教授、医学教授、地质学教授、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们在大学内外是有不同的。出了大学，这类人就处在这样的危险中：他专注于所追求的狭窄领域，并仅能对局限在律师、医生、地质学家或政治经济学家知识范围内的东西进行描述。因为在大学里面，他只知道他自己或他研究的学科的发展情况，这一境况受他的思考高度所限。他曾考查过所有知识，因其它诸多学科的竞争而不至于表态过分张扬，在心智方面他还从他人的研究中获得了启迪、拓展了视野、掌握了自由、学会了泰然，而他会相应地以来自于通识教育的那种哲理和智慧来对待自己的研究领域，不必再局限于自身领域的研究方法。

This then is how I should solve the fallacy, for so I must call it, by which Locke and his disciples would frighten us from cultivating the intellect, under the notion that no education is useful which does not teach us some temporal calling, or some mechanical art, or some physical secret. I say that a cultivated intellect, because it is a good in itself, brings with it a power and a grace to every work and occupation which it undertakes, and enables us to be more useful, and to a greater number. There is a duty we owe to human society as such, to the state to which we belong, to the sphere in which we move, to the individuals towards whom we are variously related, and whom we successively encounter in life; and that philosophical or liberal education, as I have called it, which is the proper function of a University, if it refuses the foremost place to professional interests, does but postpone them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itizen, and, while it subserves the larger interests of philanthropy, prepares also for the successful prosecution of those merely personal objects, which at first sight it seems to disparage.

这就是我澄清这一谬误的方法，我必须称之为谬误，因洛克及其门徒正是借用这一谬误阻吓我们去培养才智的。他们的意思是说，任何一种教育，假如不能提供现世的职业教导、某种机械技能、某种物理奥秘，那就不能称之为有用。经过培育的才智，由于它本身即是益处，因此就会将一股力量，一种魅力带给它所参与的任何一种工作或职业，并使我们在更大范围内成为更加有用的人。我们对这样的人类社会，对我们所属的国家，对我们的活动范围，对我们以各种方式产生联系并不断在生活中相遇的其他人，都欠有一份责任。而我称为哲理教育或通识教育的东西，也正是大学的适当功能。假如大学拒绝将最显要的位置留给职业上的利益，而是将其延迟到公民的塑造方面，那么在它实现更大的利益时，也为成功实现这些纯粹的个人目标做好了准备，尽管起初看起来这么做不利于个人利益。

7．

7．

And now, Gentlemen, I wish to be allowed to enforce in detail what I have been saying, by some extracts from the writings to which I have already alluded, and to which I am so greatly indebted.

诸位，前面已提及的那些著述，我从中受惠良多，现在请容我详细引述其中一些字句，以充实我一直在说的内容。

“It is an undisputed maxim in Political Economy,” says Dr. Copleston, “that the separation of profession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end to the perfection of every art, to the wealth of nations, to the general comfort and well-being of the community. This principle of division is in some instances pursued so far as to excite the wonder of people to whose notice it is for the first time pointed out. There is no saying to what extent it may not be carried; and the more the powers of each individual are concentrated in one employment, the greater skill and quickness will he naturally display in performing it. But, while he thus contributes more effectually to the accumulation of national wealth, he becomes himself more and more degraded as a rational being. In proportion as his sphere of action is narrowed his mental powers and habits become contracted; and he resembles a subordinate part of some powerful machinery, useful in its place, but insignificant and worthless out of it. If it be necessary, as it is beyond all question necessary, that society should be split into divisions and subdivisions, in order that its several duties may be well performed, yet we must be careful not to yield up ourselves wholly and exclusively to the guidance of this system; we must observe what its evils are, and we should modify and restrain it, by bringing into action other principles, which may serve as a check and counterpoise to the main force.

柯普斯登博士说："政治经济学中有一条无可争议的准则，即行业划分与劳动分工有利于各种技艺的完善，有利于各国实现富裕，有利于社会整体的舒适与福利。这样的划分原则，在某些情况下竟然发展得如此深远，以至于为引起世人注意而第一次指出该原则的民族，也会因此惊愕不已。很难说超出什么范围这一原则就不再适用。单个人的能力越是集中于某个环节，在实践该环节时他自然就越能展现更高的技能和熟练程度。虽然他因此而更有效地为国民财富的积

累做出贡献，他本人作为一个理性存在却在不断地降格。随着他的活动范围变得狭小时，他的心智能力和习惯也相应变得狭隘，他就如同某种强大机械装置的零部件，附着仅在这个地方有用处，换个地方就微不足道，甚至一钱不值了。假如有必要，毫无疑问肯定有必要，一个社会应当细分成许多部分，从而使其很好地发挥其职能，可是，我们必须要小心，不可全然被这一制度所制，从而过度放弃自我。我们必须注意这个制度有何不妥之处，并通过其他原则的实践来改进并约束这一制度，从而平衡这一主要制度。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every art is improved by confining the professor of it to that single study. But, *although the art itself is advanced by this concentration of mind in its service, the individual who is confined to it goes back.* The advantage of the community is nearly in an inverse ratio with his own.

"毫无疑问，如果让传授独门特艺的人专事本业，那么所有技艺都会因此改进。可是，虽然专精于某一种技艺会使该技艺的水平提升，但局限此业的人却会退步 。社会利益与他的个人利益几乎成反比。

"Society itself requires some other contribution from each individual, besides the particular duties of his profession. And, if no such liberal intercourse be established, it is the common failing of human nature, to be engrossed with petty views and interests, to underrate the importance of all in which we are not concerned, and to carry our partial notions into cases where they are inapplicable, to act, in short, as so many unconnected units, displacing and

repelling one another.

> “除开各人职业上的特殊职责以外，社会本身还要求每个人作出其他贡献。假如我们无法建立这样的自由交往，那只能说是人性共同的缺失：我们总是太在意琐碎的看法与利益，对不关心的事情嗤之以鼻，在不适用的情形中照搬我们的短浅见解。简而言之，我们的行为方式使自己看起来像是彼此无关联的小单元，彼此取代，彼此抵制。

“In the cultivation of literature is found that common link, which, among the higher and middling departments of life, unites the jarring sects and subdivisions into one interest, which supplies common topics, and kindles common feelings, unmixed with those narrow prejudices with which all professions are more or less infected. The knowledge, too, which is thus acquired, expands and enlarges the mind, excites its faculties, and calls those limbs and muscles into freer exercise which, by too constant use in one direction, not only acquire an illiberal air, but are apt also to lose somewhat of their native play and energy. And thus, without directly qualifying a man for any of the employments of life, it enriches and ennobles all. Without teaching him the peculiar business of any one office or calling, it enables him to act his part in each of them with better grace and more elevated carriage; and, if happily planned and conducted, is a main ingredient in that complete and generous education which fits a man 'to perform justly, skilfully, and magnanimously, all the offices,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of peace and war.'“ [8_2]

“在培养文学素养时，我们就可以找到这条共同联系彼此的纽带，这根纽带可在人生更高层次和中程层次上将彼此冲突的派别和更小的单元统合成同一利益群体，从而为之提供共同的话题，激发共同的情感，以别于所有职业多少都会受其影响的狭隘偏见。如此获取的知识也是一样，它能扩展并丰富人的思想，激发心智的功能，使肢体与肌肉开始更自由的活动，不然的话，由于经常只朝一个方向活动，它不仅会显出一种不自由的样子，而且还易于失掉其一部分与生俱来的能力与活力。既如此，虽然它并不直接使一个人有资格从事某种营生，却会丰富、激励所有人。这样的知识并不告诉人们任何职能或职业上的具体事宜，而是激励人们以更大的魅力和更高尚的举止在各自的岗位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假如计划周全，实施得当，它就会成为那种完整和广博教育的主要成分，这种教育使人适于‘公正、娴熟和从容地行使所有职能，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众的，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中。’” [9_2]

8．

8．

The view of Liberal Education, advocated in these extracts, is expanded by Mr. Davison in the Essay to which I have already referred. He lays more stress on the “usefulness” of Liberal Education in the larger sense of the word than his predecessor in the controversy. Instead of arguing that the Utility of knowledge to the individual varies inversely with its Utility to the public, he

chiefly employs himself on the suggestions contained in Dr. Copleston's last sentences. He shows, first, that a Liberal Education is something far higher, even in the scale of Utility, than what is commonly called a Useful Education, and next, that it is necessary or useful for the purposes even of that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hich commonly engrosses the title of Useful. The former of these two theses he recommends to us in an argument from which the following passages are selected:—

摘录的那些字句所倡导的通识教育观，戴维森先生在他的那本文集里做了进一步的阐发，这本文集我在前面提到过。他更加强调了通识教育的“有用性”，但比起参与这场争议的前辈，他对这个词的使用的角度更广义。他并没有继续争辩说，知识对个人的实用性与知识对公众的实用性成反比，而是主要阐发柯普斯登博士最后几句话里包含的意思。他首先指出，哪怕是在实用性的尺度上，通识教育也比一般称为有用教育的那种东西更崇高；其次，哪怕对于通常特别注重“有用”这个名号的职业教育的目的来说，它也是必要或有用的。这两个论点中的前一种，他在一个论证中交付给我们，下面的段落就选自该论证。

“It is to take a very contracted view of life,” he says, “to think with great anxiety how persons may be educated to superior skill in their department, comparatively neglecting or excluding the more liberal and enlarged cultivation. In his (Mr. Edgeworth's) system, the value of every attainment is to be measured by its subserviency to a calling. The specific duties of that calling are exalted at the cost of those free and independent tastes and virtues which come in to sustain the common relations of society, and raise the individual in them. In short, a man is to be usurped by his profession. He is to be clothed in its garb from head to foot. His virtues, his science, and

his ideas are all to be put into a gown or uniform, and the whole man to be shaped, pressed, and stiffened, in the exact mould of his technical character. Any interloping accomplishments, or a faculty which cannot be taken into public pay, if they are to be indulged in him at all, must creep along under the cloak of his more serviceable privileged merits. Such is the state of perfection to which the spirit and general tendency of this system would lead us.

他说："忧心忡忡地思考如何教给人高超的营生技巧，从而相对忽略或摒弃更具通识色彩和更广泛的培育，就是以狭隘的眼光看人生。在他（埃奇沃斯先生）的体系里，每一种学识的价值，都要通过它对一种职业的好处来衡量。某一门职业特定的职责大受褒扬，这是以牺牲自由独立的品格及德行为代价的，这些品格及德行是支撑并提升社会共同关系中个性化元素之必需。简短地说，就是人被自己的职业所侵占。人从头到脚都要包上职业的外衣。人的德行、科学及思想都要塞进长袍或制服里，整个人都要按其技术特征的精确模具进行塑形、压铸与硬化。任何外来才艺或不能使公众受益的能力，就算人真有机会投身其中，也必须藏在更有利于其特长的斗篷下，万不可以真面目示人。这就是这种体系的精神与总体趋势引导我们到达的完美状态。

"But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 is not the only one which a person engaged in a profession has to support. He is not always upon duty. There are services he owes, which are neither parochial, nor forensic, nor military, nor to be described by any such epithet of civil regulation, and yet are in no wise inferior to those that bear these authoritative titles; inferior neither in their intrinsic value,

nor their moral import, nor their impression upon society. As a friend, as a companion, as a citizen at large; in the connections of domestic life; in the improvement and embellishment of his leisure, he has a sphere of action, revolving, if you please, within the sphere of his profession, but not clashing with it; in which if he can show n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whatever may be his skill or proficiency in the other, he is no more than an ill-educated man.

> “可是，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必须认同的职业特征，却并非仅有一种。毕竟他不一定总是在上班。他亏欠的其他服务，既不属于宗教和律法方面，也不是军事上的，甚至很难可以用类似公民的称呼加以描述，然而无论是从其固有价值、道德含义，还是从其对社会的影响来说，这所亏欠服务的重要性相比前面所述的那些方面都毫不逊色。作为朋友，作为同伴，作为广义上的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在其工作之余的休闲放松中，他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可以说，这个活动范围就在其职业范围内展开，但不会与之冲突。在这个职业范围内，无论他的技能或其他方面的熟练水平如何，假使他并不能体现出具有更高领悟力的优势，那他就与一位缺乏教育的人没什么两样。

“There is a certain faculty in which all nations of any refinement are great practitioners. It is not taught at school or college as a distinct science; though it deserves that what is taught there should be made to have some reference to it; nor is it endowed at all by the public; everybody being obliged to exercise it for himself in person, which he does to the best of his skill. But in nothing is there a greater difference than in the manner of doing it.

The advocates of professional learning will smile when we tell them that this same faculty which we would have encouraged, is simply that of speaking good sense in English, without fee or reward, in common conversation. They will smile when we lay some stress upon it; but in reality it is no such trifle as they imagine. Look into the huts of savages, and see, for there is nothing to listen to, the dismal blank of their stupid hours of silence; their professional avocations of war and hunting are over; and, having nothing to do, they have nothing to say. Turn to improved life, and you find conversation in all its forms the medium of something more than an idle pleasure; indeed, a very active agent in circulating and forming the opinions, tastes, and feelings of a whole people. It makes of itself a considerable affair. Its topics are the most promiscuous—all those which do not belong to any particular province. As for its power and influence, we may fairly say that it is of just the same consequence to a man's immediate society, how he talks, as how he acts. Now of all those who furnish their share to rational conversation, a mere adept in his own art is universally admitted to be the worst. The sterility and uninstructiveness of such a person's social hours are quite proverbial. Or if he escapes being dull, it is only by launching into ill-timed, learned loquacity. We do not desire of him lectures or speeches; and he has nothing else to give. Among benches he may be powerful; but seated on a chair he is quite another person. On the other hand, we may affirm, that one of the best companions is a man who, to the accuracy and research of a profession, has joined a free excursive acquaintance with various learning, and caught from it the spirit of general observation.

“某一种能力在粗通文墨的万国列邦都践行不爽。不过，这种能力并非在中小学或大学里以一门具体学科的方式加以传授。应有的情形是，学校里讲授

的内容都要以它为参考蓝本。这能力也决不是社会公众赋予的，任何人都有义务为自己的利益来亲身练习，尽最大努力完成它。然而实践起来，其方式却千差万别，数不胜数。当我们告诉职业教育的倡导者说，我们本当激励的这同一种能力，不过就是在普通的谈话中不用任何奖励就能有理有据地说话，他们听后往往付之一笑。我们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时，他们一笑置之，然而在现实中，这件事可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轻松。我们来看看生番的棚屋，由于没有什么可倾听的，就朝里看看吧。在他们乏味的沉闷中，只有一片令人心酸的空白。他们对战争与猎杀的职业嗜好已经过去，但由于没有什么可做的，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回头看看文明人的生活，我们发现各种形式的谈话都是远不止空闲之乐的某种东西的媒介，甚至是整个民族观点、品味和情感流通和组成的重要部分，这就使它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或缺的大事。谈话所涉的话题种类繁多，不一定要局限于某些特定领域。我们不妨公正地探讨一下谈话的威力和影响，就其对亲朋好友的影响而言，一个人谈话的方式，与他的行为方式起到一样的效果。在进行理性对话的所有人当中，那种专精独门的行家里手，被公认为是最差的。在社交活动中，这些人的枯燥乏味，了无新意，恐怕人尽皆知。若不想被人看作迟钝乏味之人，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搬出一堆不合时宜的行话来与人争辩。我们并不想听他开讲座或演说，他也就再拿不出别的任何东西来。在专业领域，他可能强大无比，一到社交场所，他就判若两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确认，最好的朋友莫过于这样一种人，他精通某一门职业，对五花八门的其他学问也都略知一二，并从中掌握统观全局、触类旁通的真诀。”

9．

9．

Having thus shown that a liberal education is a real benefit to the subjects of it, as members of society, in the various duties and circumstances and accidents of life, he goes on, in the next place, to show that, over and above those direct services which might fairly be expected of it, it actually subserves the discharge of those particular functions, and the pursuit of those particular advantages, which are connected with professional exertion, and to whic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s directed.

他首先如此说明，通识教育对于接受该种教育的社会成员来说有真正的益处，在人生的不同职业、境况和变故中都是如此。接着，他在文中继续指明，除了人们本当期望的那些直接服务之外，通识教育实际还有益于那些跟专业努力相关的、职业教育所针对的特别功能的发挥和特定利益的追求。

“We admit,” he observes, “that when a person makes a business of one pursuit, he is in the right way to eminence in it; and that divided attention will rarely give excellence in many. But our assent will go no further. For, to think that the way to prepare a person for excelling in any one pursuit (and that is the only point in hand), is to fetter his early studies, and cramp the first development of his mind, by a reference to the exigencies of that pursuit barely, is a very different notion, and one which, we apprehend, deserves to be exploded rather than received. Possibly a few of the abstract,

insulated kinds of learning might be approached in that way. The exceptions to be made are very few, and need not be recited. But for the acquisition of professional and practical ability such maxims are death to it. The main ingredients of that ability are requisite knowledge and cultivated faculties; but, of the two, the latter is by far the chief. A man of well improved faculties has the command of another's knowledge. A man without them, has not the command of his own.

> 他评论说："我们承认，当人拿一种追求当职业看待时，他在这一行当里出名应当是迟早的事情。注意力分散了，在许多方面都十分优秀的情形就十分罕见。但我们的一致看法也到此为止。因为，以为促成某人在一项特定追求中出类拔萃（这也是手头唯一有意义的一点）的方法，就是通过勉强指出这一追求的迫切需要来早早约束住他的研究活动，禁锢其心智最初的发展，这是相当个别的，在我们看来是应当破除而非接受的观念。也许只有少数一些深奥和孤立的学问能以这种方式学到。例外的情形少之又少，因此不需要在此列举。但是，对于职业与实用能力的获取而言，这样的准则就是对它宣判死刑。这种能力的主要成分是必备的知识和培养得来的能力，但在这两者当中，后者才是目前最主要的。能力大大长进的人，往往能掌握他人的知识。缺乏这种能力的人，连自己的知识也把握不住。

"Of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the judgment is that which takes the foremost lead in life. How to form it to the two habits it ought to possess, of exactness and vigour, is the problem. It would be ignorant presumption so much as to hint at any routine of method

by which these qualities may with certainty be imparted to every or any understanding. Still, however, we may safely lay it down that they are not to be got 'by a gatherer of simples,' but are the combined essence and extracts of many different things, drawn from much varied reading and discipline, first, and observation afterwards. For if there be a single intelligible point on this head, it is that a man who has been trained to think upon one subject or for one subject only, will never be a good judge even in that one; whereas the enlargement of his circle gives him increased knowledge and power in a rapidly increasing ratio. So much do ideas act, not as solitary units, but by grouping and combination; and so clearly do all the things that fall within the proper province of the same faculty of the mind, intertwine with and support each other. Judgment lives as it were by comparison and discrimination. Can it be doubted, then, whether the range and extent of that assemblage of things upon which it is practised in its first essays are of use to its power?

“论及人的诸般智性能力，辨别力才是引领人生最重要的能力。怎样在培养这种能力时使人相应地养成两种习惯，即凡事求精和多动脑筋的习惯，这才是问题。甚至于单是暗示凭借任何常规方法，就肯定能将这些素质传递给领悟力各个不同的人，都会是一种愚昧的假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放心地断言，这些素质决不能靠单纯的材料收集得到；只有先通过广泛的阅读和训练，之后通过观察，这样从许多不同事物中抽取的复合精华与萃取物，我们才能获取这些素质。因为，假如这个话头里面确有一点是明了无误的，那这一点就是，一个人若受训就一个主题或仅只就一个主题进行思考的人，哪怕是在他思考的这个主题上也永远不会成为良好的判官；但是，研究范围扩

大以后，他会获得更多的知识并能快速增强能力。观念并非作为孤立单元，而是通过分类和组合起作用的，而归属于同一种心智能力特有的范围内的所有事物，都如此明显地彼此纠缠，相互支撑。辨别力可以说是通过比较与鉴别获得生命力的。在其最初的尝试中，辨别力便在事物聚合的范围与程度上进行实践，这对辨别力的增强是否有用，难道还需要问？

“To open our way a little further on this matter, we will define what we mean by the power of judgment; and then try to ascertain among what kind of studies the improvement of it may be expected at all.

“为将此事略微推进一步，我们将确定所说的辨别力是什么意思，之后再尝试查明，假如辨别力确能增强，要进行哪些研究才能达到此目的。

“Judgment does not stand here for a certain homely, useful quality of intellect, that guards a person from committing mistakes to the injury of his fortunes or common reputation; but for that master-principle of business, literature, and talent, which gives him strength in any subject he chooses to grapple with, and enables him to *seize the strong point* in it. Whether this definition be metaphysically correct or not, it comes home to the substance of our inquiry. It describes the power that every one desires to possess when he comes to act in a profession, or elsewhere; and corresponds with our best idea of a cultivated mind.

“在这里，辨别力并不是指防止一个人犯错误，以免造成财产或名誉损失的那种一般的、有用的才干，而是指在事业、文学与天资上的主要方法，这方法会在他选择努力掌握的任何一个主题上给予他力量，并使他能够抓住其中的要领。无论这定义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是否正确，它都会使我们明白这次探索的实质。它描述了一种能力，一种在职业内外采取行动时，大家都想具备的一种能力，它也符合我们对有教养的心智的最佳期待。

“Next, it will not be denied, that in order to do any good to the judgment, the mind must be employed upon such subjects as come within the cognizance of that faculty, and give some real exercise to its perceptions. Here we have a rule of selection by which the different parts of learning may be classed for our purpose. Those which belong to the province of the judgment are religion (in its evidences and interpretation), ethics, history, eloquence, poetry, theories of general speculation, the fine arts, and works of wit. Great as the variety of these large divisions of learning may appear, they are all held in union by two capital principles of connexion. First, they are all quarried out of one and the same great subject of man's moral, social, and feeling nature. And secondly, they are all under the control (more or less strict) of the same power of moral reason.”

“其次，不会有人否认，为了对辨别力有所帮助，心智必须运用于在这种能力识别范围内的主题上，并能为它的认知提供某种真实练习。这里，我们就有了一条选择规则，借这规则，学识的不同部分就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分类。归属辨别力领域的那些部

分就是宗教（就其证据与解释而言）、伦理学、历史、雄辩术、诗歌、一般思辨学说、美术及才智之作。这些大的学识划分的种类看似很多，但却可以根据两条主要的关联原则达成一致。其一，它们都是从人道德的、社会的及情感的本性这同一个大主题中采掘而来。其二，它们都受同一种道德理性能力（多少比较严格的）控制。”

“If these studies,” he continues, “be such as give a direct play and exercise to the faculty of the judgment, then they are the true basis of education for the active and inventive powers, whether destined for a profession or any other use. Miscellaneous as the assemblage may appear, of history, eloquence, poetry, ethics, etc., blended together, they will all conspire in an union of effect. They are necessary mutually to explain and interpret each other. The knowledge derived from them all will amalgamate, and the habits of a mind versed and practised in them by turns will join to produce a richer vein of thought and of more general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an could be obtained of any single one, as the fusion of the metals into Corinthian brass gave the artist his most ductile and perfect material. Might we venture to imitate an author (whom indeed it is much safer to take as an authority than to attempt to copy), Lord Bacon, in some of his concise illustrations of the comparative utility of the different studies, we should say that history would give fulness, moral philosophy strength, and poetry eleva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Such in reality is the natural force and tendency of the studies; but there are few minds susceptible enough to derive from them any sort of virtue adequate to those high expressions. We must be contented therefore to lower our panegyric to this, that a person cannot avoid receiving some infusion and tincture, at least, of those several qualities, from that

course of diversified reading. One thing is unquestionable, that the elements of general reason are not to be found fully and truly expressed in any one kind of study; and that he who would wish to know her idiom, must read it in many books.

他继续说，“假如这些研究确实能给予辨别能力直接的表现和练习机会，那么，它们就可以构成培育积极的创造性能力的教育的真实基础，而无论这教育是面向一种职业还是其他用途。这样的聚合看似杂乱，有历史、雄辩术、诗歌、伦理学等等，但一旦协调起来，它们却会协力形成统一效果。要相互解释与诠释彼此，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从中得到的知识全都会产生合并作用，心智在精通各个学识后，养成的习惯也会一起在产生作用，如此形成的思想脉络和应用脉络比从其中任何一个当中得到的都更丰富，更普遍实际。正如多种金属熔成科林斯黄铜后，会使艺术家得到延展性最好的完美材料。假如我们斗胆仿效一位作者（的确，视此作者为权威，要比试图模仿他安全得多），培根勋爵，模仿其论述不同研究的比较效用的简练说明，那我们就应当说，历史令人充实，道德哲学给人力量，诗歌使领悟力提高。在现实中，这也就是各项研究的自然力量与倾向，但是，很少有人足够敏感，能够从这些研究中获得任何一种配得上那些豪言壮语的德行。所以说，我们应当知足，不可将这种做法鼓吹过头。一个人若涉猎各类书籍，就一定不可避免地同时习染上至少几种不同的品质。有一件事是无可置疑的，即普遍理性的要素并不能完全地在单独一项研究中找到并得到真实表达，希望得到普遍理性真谛的人，必须在许多书本里去寻找。

“If different studies are useful for aiding, they are still more useful for correcting each other; for as they have their particular merits severally, so they have their defects, and the most extensive acquaintance with one can produce only an intellect either too flashy or too jejune, or infected with some other fault of confined reading. History, for example, shows things as they are, that is, the morals and interests of men disfigured and perverted by all their imperfections of passion, folly, and ambition; philosophy strips the picture too much; poetry adorns it too much; the concentrated lights of the three correct the false peculiar colouring of each, and show us the truth. The right mode of thinking upon it is to be had from them taken all together, as every one must know who has seen their united contributions of thought and feeling expressed in the masculine sentiment of our immortal statesman, Mr. Burke, whose eloquence is inferior only to his more admirable wisdom. If any mind improved like his, is to be our instructor, we must go to the fountain head of things as he did, and study not his works but his method; by the one we may become feeble imitators, by the other arrive at some ability of our own. But, as all biography assures us, he, and every other able thinker, has been formed, not by a parsimonious admeasurement of studies to some definite future object (which is Mr. Edgeworth's maxim), but by taking a wide and liberal compass, and thinking a great deal on many subjects with no better end in view than because the exercise was one which made them more rational and intelligent beings.”

“如果不同的研究因相互补充而体现了一定的价值，那么，它们在彼此纠正时体现的价值更大。因为，正如它们各有各的长处，它们同样也有各自的缺陷，对其中之一再广泛的了解，也只能产生要么太俗丽，要么太幼稚的才智，而且这样的才智或者还带有

阅读不广造成的其他毛病。譬如，历史显示事物本来的面目，即被人的所有激情、愚蠢和野心等缺陷损毁和扭曲的品行及兴趣；哲学对这情形暴露太多，而诗歌又将它们装点过头。但这三个光源若合力照射，就能纠正各个光源错误着色导致的不实部分，为我们显示事物的真实模样。思考此事的正确方法，只能在将它们一并考虑时才能获得；它们的共同作用对思想与情感的提升，很好地体现在我们不朽的政治家伯克先生的阳刚气概之中，了解他的人一定都知道；而伯克先生的雄辩术仅次于他的更令人崇敬的智慧。要以心智提高到了如此水平的人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就必须像他那样直奔事物的源头，并且不是去研究他的著作，而是要学习他的方法。研究他的著作只会使我们成为苍白无力的模仿者，而学习他的方法却会增强我们的能力。但是，所有的传记都使我们确信，他和其他的伟大思想家一样，靠的并不是针对某个确定的未来对象而进行精打细算的琐碎研究（这正是埃奇沃斯先生的准则），而是通过广泛和宽大的尺度，就许多主题进行大量思考，而且他们的目标，也仅仅是成为更有理性和智慧的存在者。”

10．

10．

But I must bring these extracts to an end. Today I have confined myself to saying that that training of the intellect, which is best for the individual himself, best enables him to discharge his duties to society. The Philosopher, indeed, and the man of the

world differ in their very notion, but the methods, by which they are respectively formed, are pretty much the same. The Philosopher has the same command of matters of thought, which the true citizen and gentleman has of matters of business and conduct. If then a practical end must be assigned to a University course, I say it is that of training good members of society. Its art is the art of social life, and its end is fitness for the world. It neither confines its views to particular professions on the one hand, nor creates heroes or inspires genius on the other. Works indeed of genius fall under no art; heroic minds come under no rule; a University is not a birthplace of poets or of immortal authors, of founders of schools, leaders of colonies, or conquerors of nations. It does not promise a generation of Aristotles or Newtons, of Napoleons or Washingtons, of Raphaels or Shakespeares, though such miracles of nature it has before now contained within its precincts. Nor is it content on the other hand with forming the critic or the experimentalist, the economist or the engineer, though such too it includes within its scope. But a University training is the great ordinary means to a great but ordinary end; it aims at raising the intellectual tone of society, at cultivating the public mind, at purifying the national taste, at supplying true principles to popular enthusiasm and fixed aims to popular aspiration, at giving enlargement and sobriety to the ideas of the age, at facilitating the exercise of political power, and refining the intercourse of private life. It is the education which gives a man a clear conscious view of his own opinions and judgments, a truth in developing them, an eloquence in expressing them, and a force in urging them. It teaches him to see things as they are, to go right to the point, to disentangle a skein of thought, to detect what is sophistical, and to discard what is irrelevant. It prepares him to fill any post with credit, and to master any subject with facility. It shows him how to accommodate himself to others, how to throw himself into their state of mind, how to bring before

them his own, how to influence them, how to come to an understanding with them, how to bear with them. He is at home in any society, he has common ground with every class; he knows when to speak and when to be silent; he is able to converse, he is able to listen; he can ask a question pertinently, and gain a lesson seasonably, when he has nothing to impart himself; he is ever ready, yet never in the way; he is a pleasant companion, and a comrade you can depend upon; he knows when to be serious and when to trifle, and he has a sure tact which enables him to trifle with gracefulness and to be serious with effect. He has the repose of a mind which lives in itself, while it lives in the world, and which has resources for its happiness at home when it cannot go abroad. He has a gift which serves him in public, and supports him in retirement, without which good fortune is but vulgar, and with which failure and disappointment have a charm. The art which tends to make a man all this, is in the object which it pursues as useful as the art of wealth or the art of health, though it is less susceptible of method, and less tangible, less certain, less complete in its result.

但是，我得结束这些摘录了。今天我只说，对个人最为有利的那种才智培育，也最有利于他恪尽其社会职责。哲学家与阅历丰富的人是十分不同的两个概念，可分别造就这些人的方法却是大致一样的。真正的公民和绅士对经营之道和行事方式的把握，与哲学家对思想材料的把握相同。假如必须为大学事业定一个实际的目标，那我要说，这目标即是培养优秀的社会成员。它的艺术就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它的目标就是适应这世界。一方面，它并不把眼光局限在具体的职业上，另一方面，它也并不制造英雄或激励天才。真正的天才之作，并不受任何技艺的影响，浩然之气亦无规则可循。大学并不是诗人或不朽作家的诞生地，亦不是学校创始人、殖民地领袖或万邦列国征服者的摇篮。它并不允诺会培育出一代亚里士多德、牛顿、拿破仑，或是

华盛顿、拉斐尔、莎士比亚，尽管大学校园不乏这些如大自然奇迹般的人物。另外一方面，它也不满足于造就批评家或实验科学家，经济学家或工程师，尽管这样的人大学里比比皆是。但是，大学教育是一种旨在实现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目标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升一个社会的尚智风气，培育公众的心智，净化国民品格，为流行的狂热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追求提供确定的目标，拓宽并节制时代思想，促进政治权力的行使，并提高私人生活的交流水平。正是这样的教育，才能让人对自己的意见和判断力形成清晰和清醒的看法，并且明白如何培养，如何有力地表现，如何激发自己的意见和判断力。它教人看到事物的本质，抓住事情的要点，解开思想的线团，察觉诡辩与摒除琐屑小事。它让人在各行各业都表现优秀，对什么事情都能应付自如。它教人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明白他人所想，如何让他人明白自己所想，如何影响他人，如何与他人达成谅解，如何忍让他人。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在什么地方都如鱼得水，与什么阶层的人都能达成共识。他明白什么时候当开口说话，什么时候当闭嘴不言；既能侃侃而谈，又善于倾听。他能适当地提出问题；如果自己拿不出什么办法，也能适时吸取教训。他随时准备就绪，却从不妨碍他人；他是令人愉快的同伴，是人可以依靠的好友。他明白什么时候当严肃认真，什么时候要轻松玩笑，他的举止总是能恰到好处，能开得体的玩笑，也能板起脸来就达到效果。他有那种安然的心态，虽然身处凡俗，却能自保高洁，假如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赋闲在家也能怡然自得。他有这样一种天资，人前让他展现自我，独处时给他以支持。缺了这样的天资，财运只是粗鄙，有了这样的天资，失败与失意也自有一份魅力。造就这等人杰的艺术，就在于它所追求的目标，这目标与求财的艺术或保健的艺术同样有用，尽管其方法较不容易把握，其结果也较不容易感受，较不确定，不够完整。

[8_1].Mr. Keble, Vicar of Hursley, late Fellow of Oriel, and Professor of Poetry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8_2].Vid. Milton *on Education* .

[9_1].基布尔先生，赫斯里的教区牧师、奥里尔学院已故研究员和牛津大学讲授诗

歌的教授。

[9_2].参见弥尔顿《论教育》。

Discourse 8. Knowledge Viewed in Relation to Religion

第八讲：从与宗教的关系看知识

1．

1．

We shall be brought, Gentlemen, today, to the termin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which I commenced three Discourses back, and which, I was well aware, from its length, if for no other reason, would make demands upon the patience even of indulgent hearers.

诸位，我在三讲之前开始的这场探究，今天该收尾了。我深知，不谈别的，光是演讲的长度，恐怕早已让极其宽容的听众也难以忍受了。

First I employed myself in establishing the principle that Knowledge is its own reward; and I showed that, when considered in this light, it is called Liberal Knowledge, and is the scope of Academical Institutions.

首先，我着手确立了一项原则，即知识就是其自身的回报，接着我说明，如果这么考虑，那知识就可以称为通识知识，从而也就属于学术机构的研究范围。

Next, I examined what is meant by Knowledge, when it is said to be pursued for its own sake; and I showed that, in order satisfactorily to fulfil this idea, Philosophy must be its *form* ; or, in other words, that its matter must not be admitted into the mind passively, as so much acquirement, but must be mastered and appropriated as a system consisting of parts, related one to the other, and interpretative of one another in the unity of a whole.

其次，我考查了当我们说为其自身缘故而追求知识的时候，知识的含义何在。接着我说明，为圆满实践这样的知识概念，哲学必须是其形式，换句话说，哲学问题不能是以被动方式为心智所接收（很多学识的接收其实就很被动），而必须是作为一个体系为人所掌握并加以利用，这体系的各个部分必须相互联系，且能在整体的统一中相互诠释。

Further, I showed that such a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 of the field of Knowledge as a whole, leading, as it did, to an understanding of its separate departments, and an appreciation of them respectively, might in consequence be rightly called an illumination; also, it was rightly called an enlargement of mind, because it was a distinct location of things one with another, as if in space; while it was moreover its proper cultivation and its best condition, both because it secured to the intellect the sight of things as they are, or of truth, in opposition to fancy, opinion, and theory; and again, because it presupposed and involved the perfection of its various powers.

然后，我又说明，把知识领域看作一个整体，实际会导向对其各

个门类的领悟和分别的鉴别，这样的哲学思考也许因此就可以恰当地称为一种启迪。另外，这也可以恰当地称为心智的扩充，因为这是依据事物的彼此关系进行的明确定位，仿佛在空间中那样。然而，这更是对心智的适当培育和提供给心智的最佳条件，既因为它可以让才智看到事物或真理真实的样子，以别于幻想、见解和学说，也因为它预设并包含了才智的各种能力的完善。

Such, I said, was that Knowledge, which deserves to be sought for its own sake, even though it promised no ulterior advantage. But, when I had got as far as this, I went farther, and observed that,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ase, what was so good in itself could not but have a number of external uses, though it did not promise them, simply because it was good; and that it was necessarily the source of benefits to society, great and diversified in proportion to its own intrinsic excellence. Just as in morals,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as being profitable in a secular aspect, though such profit is not the measure of its worth, so too as regards what may be called the virtues of the Intellect, their very possession indeed is a substantial good, and is enough, yet still that substance has a shadow, inseparable from it, viz.,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usefulness. And this was the subject to which I devoted the preceding Discourse.

我所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知识，它值得人们为其本身的缘故而追求，哪怕它并不允诺任何其他的利益。然而，已经进行过这样的说明之后，我更进一步指出，就事情的性质来看，自身如此有益的东西，一定有若干外在用途，是的，仅仅因为自身有益，它就还会带来其他益处，哪怕它没有任何允诺。而且，它必然也是社会利益的源泉，利益的大小及形式，与它自身固有的卓越程度成比例。正如在各种品行中，诚实才是上策，因为从世俗层面看，诚实本身有利可图，但这等利益并非衡量其价值的尺度；所谓才智的益处也是一样，拥有才智本

身的确就是实在的好处，就已经足够了。还有真相的益处也是如影随形，也就是其在社会和政治上的用处。这就是我在前面的一讲中论述过的一个话题。

One portion of the subject remains:—this intellectual culture, which is so exalted in itself, not only has a bearing upon social and active duties, but upon Religion also. The educated mind may be said to be in a certain sense religious; that is, it has what may be considered a religion of its own, independent of Catholicism, partly co-operating with it, partly thwarting it; at once a defence yet a disturbance to the Church in Catholic countries,—and in countries beyond her pale, at one time in open warfare with her, at another in defensive alliance. The history of Schools and Academies, and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 generally, will, I think, justify me in thus speaking. Since, then, my aim in these Discourses is to ascertain the function and the action of a University, viewed in itself, and its relations to the various instruments of teaching and training which are round about it, my survey of it would not be complete unless I attempted, as I now propose to do, to exhibit its general bearings upon Religion.

这个话题还剩下一个部分没有说完，那就是智性的培育。智性的培育自身就值得称赞，它不仅对社会性的、现行的职责有影响，而且还会对宗教产生影响。经过教育的心智，可以说带有某种宗教意味，也就是说，它自身即可成为一种宗教。它不受天主教支配，一定程度上与之合作，一定程度上又对其加以妨碍。在天主教国家里，它既为教会提供防卫，同时又对其形成干扰。而在天主教以外的国家，它与之此时有公开冲突，彼时又结成防卫同盟。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想，总体而论，经院哲学家与学术机构的历史、文学与科学的历史，都会为我的话提供很好的佐证。我这些演讲的主旨在于确认大学的功

能与作用，不仅从大学本身看大学，而且还要从大学与为实现其目标所需的各种教学与培训工具之间的关系中看大学。因此，我对大学教育的调查研究，如果不像现在就准备做的一样展示其对宗教的影响，就称不上完整彻底。

2．

2．

Right Reason, that is, Reason rightly exercised, leads the mind to the Catholic Faith, and plants it there, and teaches it in all its religious speculations to act under its guidance. But Reason, considered as a real agent in the world, and as an operative principle in man's nature, with an historical course and with definite results, is far from taking so straight and satisfactory a direction. It considers itself from first to last independent and supreme; it requires no external authority; it makes a religion for itself. Even though it accepts Catholicism, it does not go to sleep; it has an a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ts own, as the passions have, or the moral sentiments, or the principle of self-interest. Divine grace, to use the language of Theology, does not by its presence supersede nature; nor is nature at once brought into simple concurrence and coalition with grace. Nature pursues its course, now coincident with that of grace, now parallel to it, now across, now divergent, now counter, in proportion to its own imperfection and to the attraction and influence which grace exerts over it. And what takes place as regards other principles of our nature and their developments is found also as regards the Reason. There is, we know, a Religion of enthusiasm, of superstitious ignorance, of statecraft; and each has

that in it which resembles Catholicism, and that again which contradicts Catholicism. There is the Religion of a warlike people, and of a pastoral people; there is a Religion of rude times, and in like manner there is a Religion of civilized times, of the cultivated intellect, of the philosopher, scholar, and gentleman. This is that Religion of Reason, of which I speak. Viewed in itself, however near it comes to Catholicism, it is of course simply distinct from it; for Catholicism is one whole, and admits of no compromise or modification. Yet this is to view it in the abstract; in matter of fact, and in reference to individuals, we can have no difficulty in conceiving this philosophical Religion present in a Catholic country, as a spirit influencing men to a certain extent, for good or for bad or for both,—a spirit of the age, which again may be found, as among Catholics, so with still greater sway and success in a country not Catholic, yet specifically the same in such a country as it exists in a Catholic community. The problem then before us today, is to set down some portions of the outline, if we can ascertain them, of the Religion of Civilization, and to determine how they lie relatively to those principles, doctrines, and rules, which Heaven has given us in the Catholic Church.

恰当的理性，也就是理性的恰当运用，会将心智引向天主教信仰，并使心智在这里驻留，以其所有的宗教思辨教导它按照天主教的指导行事。可是，理性虽然被视为人世间的真正动因，也被看作人性中的一项有效原则，有它自己的历史进程和确定结果，但是，理性发展趋势却绝非如此直接和令人满意。它认为自身从始至终都是独立和至高无上的，它并不要求任何外在权威，它自成一个宗教。哪怕它接受了天主教，也不会因此就永享安逸；它有它自己的行动与发展，就如激情、道德情操或利己主义原则一样。用神学的话来讲，神恩的存在并不会取代人性，也不能一下子就使人性与神恩进行简单的结合。人性要追求自身进程，时而与神恩一致，与之时而并行，时而交叉，

时而分开，又时而相反，这取决于人性自身有多大瑕疵，也要看神恩对它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有多大。人类本性的其他原则及这些原则的发展情况，也同样见诸理性。我们知道的宗教，有激情的宗教、迷信无知的宗教、关于治国之术的宗教，每一种宗教都有类似天主教的地方，也与之相冲突的地方。有好战民族的宗教，有放牧民族的宗教，有未开化时代的宗教；同样也有文明时代的宗教，有信奉教化才智的宗教，还有哲学家、学者和绅士的宗教。这就是我所说的理性宗教。从其自身看，无论离天主教有多相近，它就是与天主教不同，因为天主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容不得折衷或修改。然而，这是从抽象视角来看它的；在事实的层面，涉及单个人的时候，我们并不难设想，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存在这种哲理性的宗教，它作为一种精神可在某种程度上对人产生影响，无论是好的、坏的，或是好坏参半的影响。这样一种时代精神可以在天主教徒中发现，在不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也可能发现，而且还会产生更大影响，获得更大成功，但确切地说与它在天主教社会里的情况相同。因此，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在可以确定的情况下，明确文明宗教的某些要旨，并确定它们与天主教的原则、教义与规定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And here again, when I speak of Revealed Truth, it is scarcely necessary to say that I am not referring to the main articles and prominent points of faith, as contained in the Creed. Had I undertaken to delineate a philosophy, which directly interfered with the Creed, I could not have spoken of it as compatible with the profession of Catholicism. The philosophy I speak of, whether it be viewed within or outside the Church, does not necessarily take cognizance of the Creed. Where the country is Catholic, the educated mind takes its articles for granted, by a sort of implicit faith; where it is not, it simply ignores them and the whole subject-matter to which they relate, as not affec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Truths about God's Nature, about His dealings towards the human race, about the Economy of Redemption,—in the one case it

humbly accepts them, and passes on; in the other it passes them over, as matters of simple opinion, which never can be decided, and which can have no power over us to make us morally better or worse. I am not speaking then of belief in the great objects of faith, when I speak of Catholicism, but I am contemplating Catholicism chiefly as a system of pastoral instruction and moral duty; and I have to do with its doctrines mainly as they are subservient to its direction of the conscience and the conduct. I speak of it, for instance, as teaching the ruined state of man; his utter inability to gain Heaven by any thing he can do himself; the moral certainty of his losing his soul if left to himself; the simple absence of all rights and claims on the part of the creatur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Creator; the illimitable claims of the Creator on the service of the creature; the imperative and obligatory force of the voice of conscience; and the inconceivable evil of sensuality. I speak of it as teaching, that no one gains Heaven except by the free grace of God, or without a regeneration of nature; that no one can please Him without faith; that the heart is the seat both of sin and of obedience; that charity is the fulfilling of the Law; and that incorporation into the Catholic Church is the ordinary instrument of salvation. These are the lessons which distinguish Catholicism as a popular religion, and these are the subjects to which the cultivated intellect will practically be turned;—I have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not the doctrinal, but the moral and social teaching of Philosophy on the one hand, and Catholicism on the other.

同样，在这里，当我谈起启示真理时，根本就不需要说明，我并不是指信经中包含的主要信条及信仰要点。假如我描述的是一种曾与信经直接相抵触的哲学，我不可能说它与天主教的信条彼此共存。我所谈论的这种哲学，无论是不是从天主教会的角度来看，都不一定会对信经做一个评判。在天主教国家，受过教育的人因为某种绝对信仰

而拿信经中的教条当作理所当然的真理；而在不信天主教的国家，人们对这些教条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干脆置之不理，因为这些信仰条款并不影响社会及政治利益。关于神的本性，关于神对人的作为，关于救赎的天则等真理，在一种情况下，它对我所谈论的哲学会谦卑地接受，并传承下去；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会把它们当作简陋的见解而不予理会，这些见解永远不会有定论，且无力影响我们，从而也无法使我们的道德变好或变坏。这样，当我谈及天主教的时候，我在此所说的就不是对信仰的伟大目标的信奉，而是主要把它看作一个指导与道德责任体系来思考的。我必须大致谈及其教义，因这些教义对引领良知及行为有用。例如，我谈到，它让我们明白人的堕落状态；明白人完全无法依靠自己的任何作为进入天国；明白人若自行其是，他必然面临丢失灵魂这一道德后果，明白受造物在造物主面前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和权利主张；明白造物主可以无限制地要求受造物侍奉；明白良知之声的紧迫与强制力，明白纵情肉欲的大恶。我谈到，它给予我们教导，若不借助这白得的神恩，或者凭借本性的重生，没有人能进天国；人若不信神，就无法取悦于他；人心既是罪，也是顺从的所在；慈爱即是要践行律法；归顺天主教才是得救的正常途径。就是这些训诫使得天主教与众不同而成为广受欢迎的宗教的，这些也都是有教养的才智实际上要加以研究的主题。因此我必须要比较将天主教与哲学的说教进行对比——哲学的道德与社会说教，而不是教义上的说教。

3．

3．

Now, on opening the subject, we see at once a momentous benefit which the philosopher is likely to confer on the pastors of the Church. It is obvious that the first step which they have to effect

in the conversion of man and the renovation of his nature, is his rescue from that fearful subjection to sense which is his ordinary state. To be able to break through the meshes of that thraldom, and to disentangle and to disengage its ten thousand holds upon the heart, is to bring it, I might almost say, half way to Heaven. Here, even divine grace, to speak of things according to their appearances, is ordinarily baffled, and retires, without expedient or resource, before this giant fascination. Religion seems too high and unearthly to be able to exert a continued influence upon us: its effort to rouse the soul, and the soul's effort to co-operate, are too violent to last. It is like holding out the arm at full length, or supporting some great weight, which we manage to do for a time, but soon are exhausted and succumb. Nothing can act beyond its own nature; when then we are called to what is supernatural, though those extraordinary aids from Heaven are given us, with which obedience becomes possible, yet even with them it is of transcendent difficulty. We are drawn down to earth every moment with the ease and certainty of a natural gravitation, and it is only by sudden impulses and, as it were, forcible plunges that we attempt to mount upwards. Religion indeed enlightens, terrifies, subdues; it gives faith, it inflicts remorse, it inspires resolutions, it draws tears, it inflames devotion, but only for the occasion. I repeat, it imparts an inward power which ought to effect more than this; I am not forgetting either the real sufficiency of its aids, no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ose in whom they fail. I am not discussing theological questions at all, I am looking at phenomena as they lie before me, and I say that, in matter of fact, the sinful spirit repents, and protests it will never sin again, and for a while is protected by disgust and abhorrence from the malice of its foe. But that foe knows too well that such seasons of repentance are wont to have their end: he patiently waits, till nature faints with the effort of resistance, and lies passive and hopeless under the next access of

temptation. What we need then is some expedient or instrument, which at least will obstruct and stave off the approach of our spiritual enemy, and which is sufficiently congenial and level with our nature to maintain as firm a hold upon us as the inducements of sensual gratification. It will be our wisdom to employ nature against itself. Thus sorrow, sickness, and care are providential antagonists to our inward disorders; they come upon us as years pass on, and generally produce their natural effects on us, in proportion as we are subjected to their influence. These, however, are God's instruments, not ours; we need a similar remedy, which we can make our own, the object of some legitimate faculty, or the aim of some natural affection, which is capable of resting on the mind, and taking up its familiar lodging with it, and engrossing it, and which thus becomes a match for the besetting power of sensuality, and a sort of homœopathic medicine for the disease. Here then I think is the important aid which intellectual cultivation furnishes to us in rescuing the victims of passion and self-will. It does not supply religious motives; it is not the cause or proper antecedent of any thing supernatural; it is not meritorious of heavenly aid or reward; but it does a work, at least *materially* good (as theologians speak), whatever be its real and formal character. It expels the excitements of sense by the introduction of those of the intellect.

这话题一开始，我们立即就看出，哲学家有可能为教会牧师提供一项巨大利益。很明显，牧师在转化人并革新人的本性时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要将人从他习以为常的对于感官的畏惧与屈从中解救出来。如果能挣脱那张奴役人的罗网，解脱这罗网对人心的万千束缚，我都想说，那无异于将人心带到了通往天国的中途。此时，若就事物的外表而论，就连神恩一般也会因缺乏权宜之计或应对办法而困惑不已，只好在这强大的束缚面前告退。宗教似乎太过高尚和圣洁，无法对我

们施加持续的影响，它努力唤醒灵魂，而灵魂也尽力合作，但两厢的作用都太过猛烈，因此无法持续。这很像将胳膊完全伸出，或撑住极重的东西，短时间内可以想办法做到，但很快就耗尽力气，难以为继了。任何事物的言行都不可能越出其自身本性；而这时，我们就会接受超自然事物的召唤，对此天国给予我们特别的辅助，从而才可能让我们遵从这召唤，但即便是有了这些辅助，要遵从仍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人生在世，无时不刻不受自然引力的吸引，轻松确定地贴近大地，只有出于突然间的冲动或可以说被强制坠落时，我们才会尝试向上突破。宗教的确可以启迪人，让人害怕，使人屈服；宗教给人信仰，让人懊悔，激发起决心，催人流泪，燃起奉献精神。但这些只是一时的。我再重复一遍，宗教传递给人的一种内在力量，这种力量所能成就的事情远不止于此。我在此并没有遗忘宗教给予的充足帮助，也没有遗忘那些没能利用这些帮助取得成效的人的责任。我根本不是在这里探讨神学问题，而只是在这里分析在我面前发生的现象。我要说，就事实而论，有罪的心灵会忏悔，声称不会再次犯罪，这样，在短时期内，它就因反感和厌恶而免遭对手的恶意危害。可是，这对手深知，这种应时的悔罪总有结束的时候：他耐心等待，直到本性疲于抵抗，并在下一次诱惑面前陷入被动和绝望。此时，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某种权宜之计或工具，至少可借以阻挡和延缓我们的精神对手靠近。而且这权宜之计或工具与我们的本性也甚是契合，意气相投，可以让我们对自己保持十足的把控，足以抵制感官刺激的诱惑。让我们的本性与自己为敌，这就是我们的智慧所在。如此，悲伤、病患和忧虑恰好可充当解药，疗治我们内在的紊乱。随年代流逝，这些东西会来到我们身边，通常会依照我们受其影响的程度而在我们身上产生自然的效果。然而，这些都是神的手段，而非我们自己的。我们需要类似的、能化为己有的疗方——为某种合法能力找到对象，或为某种自然情感找到目标，并使其能够居留于我们的心智，占据其熟悉的寄宿处，全神贯注于其中，从而成为堪与令人烦乱的色欲魔力相抗衡的劲敌和治疗疾病的顺势良药。我觉得，这也是智力培育为我们提供的拯救激情与任性的受害者的重要援助。它并不提供宗教动机，它并不是任何超自然之物的成因或合理前身，它也并不是令人赞叹的天国的援助或奖励，可是，它的确有所成就，至少是一种物质上　的善

（照神学家的口吻说），无论它真实和外表上的特征是什么。它引入激发才智，借以排斥感官的刺激。

This then is the *primâ facie* advantage of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it is the drawing the mind off from things which will harm it to subjects which are worthy a rational being; and, though it does not raise it above nature, nor has any tendency to make us pleasing to our Maker, yet is it nothing to substitute what is in itself harmless for what is, to say the least, inexpressibly dangerous? Is it a little thing to exchange a circle of ideas which are certainly sinful, for others which are certainly not so? You will say, perhaps, in the words of the Apostle, “Knowledge puffeth up;” and doubtless this mental cultivation, even when it is successful for the purpose for which I am applying it, may be from the first nothing more than the substitution of pride for sensuality. I grant it, I think I shall have something to say on this point presently; but this is not a necessary result, it is but an incidental evil, a danger which may be realized or may be averted, whereas we may in most cases predicate guilt, and guilt of a heinous kind, where the mind is suffered to run wild and indulge its thoughts without training or law of any kind; and surely to turn away a soul from mortal sin is a good and a gain so far, whatever comes of it. And therefore, if a friend in need is twice a friend, I conceive that intellectual employments, though they do no more than occupy the mind with objects naturally noble or innocent, have a special claim upon our consideration and gratitude.

因此，这就是追求知识有益的初始 证据，这就是让人的心智远离有害之物，转而追求对理性存在者有价值的主题。虽然这并不能使心智脱离本性，也不倾向于使我们更能取悦造物主，可是，以本身无害

的东西替代再少说也是危险至极的东西，难道不值一提吗？拿肯定无罪的思想去替换肯定有罪的思想，这难道是微不足道的吗？也许，你会借用使徒保罗的话说，“知识会使人自高自大”。无疑，这种心智培育，哪怕可以成功地实现我正欲利用其实现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过是以傲慢替代纵情声色而已。我承认如此，而且我觉得自己会马上就这一点说些什么。可是，这并不是必然结果，而只不过是一种附带之恶，一种可能发生，但也可以避免的危险。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能断定罪行，那种十恶不赦的罪行，此时，心智会因这罪行而失控，会在没有任何训练或章法的情况下纵容其思绪。阻止灵魂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肯定是一件好事，目前来说也是一项增益，无论最终是什么结果。因此，如果说患难之交超越一般朋友，那我设想，智力的运用，哪怕只是让心智为天生高贵或无害的目标所占据，也特别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值得我们感激。

4．

4．

Nor is this all: Knowledge, the discipline by which it is gained, and the tastes which it forms, have a natural tendency to refine the mind, and to give it an indisposition, simply natural, yet real, nay, more than this, a disgust and abhorrence, towards excesses and enormities of evil, which are often or ordinarily reached at length by those who are not careful from the first to set themselves against what is vicious and criminal. It generates within the mind a fastidiousness, analogous to the delicacy or daintiness which good nurture or a sickly habit induces in respect of food; and this fastidiousness, though arguing no high principle, though no protection in the case of violent temptation, nor sure in its

operation, yet will often or generally be lively enough to create an absolute loathing of certain offences, or a detestation and scorn of them as ungentlemanlike, to which ruder natures, nay, such as have far more of real religion in them, are tempted, or even betrayed. Scarcely can we exaggerate the value, in its place, of a safeguard such as this, as regards those multitudes who are thrown upon the open field of the world, or are withdrawn from its eye and from the restraint of public opinion. In many cases, where it exists, sins, familiar to those who are otherwise circumstanced, will not even occur to the mind; in others, the sense of shame and the quickened apprehension of detection will act as a sufficient obstacle to them, when they do present themselves before it. Then, again, the fastidiousness I am speaking of will create a simple hatred of that miserable tone of conversation which, obtaining as it does in the world, is a constant fuel of evil, heaped up round about the soul; moreover, it will create an irresolution and indecision in doing wrong, which will act as a *remora* till the danger is past away. And though it has no tendency, I repeat, to mend the heart, or to secure it from the dominion in other shapes of those very evils which it repels in the particular modes of approach by which they prevail over others, yet cases may occur when it gives birth, after sins have been committed, to so keen a remorse and so intense a self-hatred, as are even sufficient to cure the particular moral disorder, and to prevent its accesses ever afterwards;—as the spendthrift in the story, who, after gazing on his lost acres from the summit of an eminence, came down a miser, and remained a miser to the end of his days.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知识、藉以获得知识的训练以及知识塑成的品味，都有一种锤炼心智的自然倾向，使心智对骄奢淫逸和极大之恶生出全然固有然而又非常真实的嫌恶，甚至厌恶之极和十分痛恨。

从一开始没有小心防备罪行与恶行的人，最终总不免落入罪与恶的魔掌。它会在心智里养成一种苛求心态，类似于良好教养或病态习惯在使人在食物方面精挑细捡或过分讲究。这种苛求心态虽然并不着意于争辩什么大道理，虽然并不能防范巨大的诱惑，对其实际作用也不能肯定，可是，却经常或通常总是充满活力，足以对某些不轨行为产生绝对的厌恶，或因并非君子之道而憎恶和蔑视。生性粗野的人，即便怀有极强的、真实的宗教感，也往往受其诱惑，甚或因此露出原形。许多人被抛入人世的公开战场，或远离防范措施的监督及公众舆论的约束，对这些人而言，这样一种防范措施的价值，无论怎样说都算不上夸大。很多情况下，只要有这种苛求心态，人的脑海都不会闪现罪恶的念头，而没有这种苛求心态，这些念头难免在人心里萌生；羞耻感和担心被人发觉的忧虑，又会在犯罪念头真的出现在脑海的时候，起到防范犯罪的作用。此时，我提到的那种苛求心态也会产生对粗鄙谈话口气的强烈憎恶，而粗鄙谈话口气流行于世，是堆积在灵魂周围的常存的罪恶燃料；再者，它会使人在要作恶时犹豫和迟疑不决，这就会起到防范 作用，直到危险过去。我再说一次，虽然这种苛求心态无意于修复人心，亦不能使其免于罪恶以其他形式对人心进行的主宰（苛求心态用特殊的方式抵制这些罪恶，这些罪恶甚于其他形式的罪恶的严重性也由此突显），可是，很多情况下，它会让人在犯下罪过后，产生强烈的懊悔和自责，足以疗治某种道德混乱，并能从此防止其侵袭。正如故事中所说的那个挥霍无度的人，最显赫时期获取大片良田，后来又失去。他凝望自己失去的田地，而后变成了一个守财奴，而且至死都没变。

And all this holds good in a special way, in an age such as ours, when, although pain of body and mind may be rife as heretofore, yet other counteractions of evil, of a penal character, which are present at other times, are away. In rude and semi-barbarous periods, at least in a climate such as our own, it is the daily, nay, the principal business of the senses, to convey feelings of discomfort to the mind, as far as they convey feelings at all. Exposure to the

elements, social disorder and lawlessness, the tyranny of the powerful, and the inroads of enemies, are a stern discipline, allowing brief intervals, or awarding a sharp penance, to sloth and sensuality. The rude food, the scanty clothing, the violent exercise, the vagrant life, the military constraint, the imperfect pharmacy, which now are the trials of only particular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were once the lot more or less of all. In the deep woods or the wild solitudes of the medieval era, feelings of religion or superstition were naturally present to the population, which in various ways co-operated with the missionary or pastor, in retaining it in a noble simplicity of manners. But, when in the advancement of society men congregate in towns, and multiply in contracted spaces, and law gives them security, and art gives them comforts, and good government robs them of courage and manliness, and monotony of life throws them back upon themselves, who does not see that diversion or protection from evil they have none, that vice is the mere reaction of unhealthy toil, and sensual excess the holyday of resourceless ignorance? This is so well understood by the practical benevolence of the day, that it has especially busied itself in plans for supplying the masses of our town population with intellectual and honourable recreations. Cheap literature, libraries of useful and entertaining knowledge, scientific lectureships, museums, zoological collections, buildings and gardens to please the eye and to give repose to the feelings, external objects of whatever kind, which may take the mind off itself, and expand and elevate it in liberal contemplations, these are the human means, wisely suggested, and good as far as they go, for at least parrying the assaults of moral evil, and keeping at bay the enemies, not onl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but of society at large.

所有这些，都特别适用于像我们这样的时代，尽管身心的痛苦在

我们的时代也许跟以前的时代一样无处不在，可是，在其他时代也存在过的、惩戒罪恶的其他招数，却都一去不复返了。在未开化与半野蛮时期，至少在我们自己这样的风气中，感官的日常作用，甚至是主要作用，就是向心智传达不快的情感，假如感官的确能传达任何情感的话。恶劣的天气、社会骚乱和无序、强权者的暴政和敌人的侵犯，人经受这些严酷的磨砺，就无法长期流于懒惰或纵欲，并会因懒惰和纵欲而深深愧疚。粗食陋衣、剧烈运动、漂泊不定的生活、军事管制、缺医少药，这些困难现在只是对社会特定阶层的考验，但当初却几乎是所有人的命运。在中世纪的密林深处或置身荒野的孤独中，宗教或迷信情感很自然就会在人们心中滋生，人们再与传教士或牧师以多种方式进行合作，共同将这种情感用高贵简朴的形式保留下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群集中到了城镇，并在狭小的空间范围内繁殖，法律会让人感到安全，技艺给人以舒适，良好的治理让人丧失了勇气与男子气概，千篇一律的生活使人重又依靠自己。但是，谁看不出来，此时他们并不能远离或防范罪恶，恶习只不过是由有害身心的苦劳所致，纵情声色是源自愚昧无知？这一点深为当今从事慈善事业的、讲求实际的人所理解，因此，他们就特别热心于制订计划，要为城镇人口提供益智和高尚的的消遣方式。廉价的文学、能提供有用及娱乐性知识的图书馆、科学知识讲座、博物馆、动物标本收集、用以赏心悦目的建筑及园林，各式各样的外在对象，都可以让人暂缓思虑，并使心智得以在自由的思考中得到扩充与提高。这些都是人想出来明智的做法，目前为止都还管用，至少可以抵挡道德之恶的侵蚀，并且不单可以牵制个人灵魂的敌人，还可以牵制整个社会的敌人。

Such are the instruments by which an age of advanced civilization combats those moral disorders, which Reason as well as Revelation denounces; and I have not been backward to express my sense of their serviceableness to Religion. Moreover, they are but the foremost of a series of influences, which intellectual culture exerts upon our moral nature, and all upon the type of Christianity, manifesting themselves in veracity, probity, equity, fairness,

gentleness, benevolence, and amiableness; so much so, that a character more noble to look at, more beautiful, more winning, in the various relations of life and in personal duties, is hardly conceivable, than may, or might be, its result, when that culture is bestowed upon a soil naturally adapted to virtue. If you would obtain a picture for contemplation which may seem to fulfil the ideal, which the Apostle has delineated under the name of charity, in its sweetness and harmony, its generosity, its courtesy to others, and its depreciation of self, you could not have recourse to a better furnished *studio* than to that of Philosophy, with the specimens of it, which with greater or less exactness are scattered through society in a civilized age. It is enough to refer you, Gentlemen, to the various Biographies and Remains of contemporaries and others, which from time to time issue from the press, to see how striking is the action of our intellectual upon our moral nature, where the moral material is rich, and the intellectual cast is perfect. Individuals will occur to all of us, who deservedly attract our love and admiration, and whom the world almost worships as the work of its own hands. Religious principle, indeed,—that is, faith,—is, to all appearance, simply away; the work is as certainly not supernatural as it is certainly noble and beautiful. This must be insisted on, that the Intellect may have its due; but it also must be insisted on for the sake of conclusions to which I wish to conduct our investigation. The radical difference indeed of this mental refinement from genuine religion, in spite of its seeming relationship, is the very cardinal point on which my present discussion turns; yet, on the other hand, such refinement may readily be assigned to a Christian origin by hasty or distant observers, or by those who view it in a particular light. And as this is the case, I think it advisable, before proceeding with the delineation of its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to point out to you distinctly the elementary principles on which its morality is based.

这些，就是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用以抵挡启示和理性所谴责的道德混乱的方式。而我一直都坚持我的看法，认为它们对宗教也是有益的。再说，这些还只是智性培育对我们的道德本性及此类型的基督教施加的一系列影响中最初的一部分——它们使人诚实、正直、公平、公正、亲切、仁爱与和蔼可亲。如此，当这样一种智性培育被施于天然适应德行的土壤上以后，人们在处理各种生活中的关系和个人职责时会体现出一种更高贵、更美好、更无往不胜的品格，这种品格的高贵、美好、优越甚至于超过它可能产生的结果，那真是难以想象的。假如我们想找到一幅似乎实现了这个理想的沉思图景，也就是那位使徒以仁爱的名义描绘的美好和谐、豁达大方、克己复礼的图景，那我们不可能找到一处比哲学更好的装备俱全的画室，这里面陈列的样本，精确度有高有低，四散于一个文明时代的社会的各处。诸位，要明白我们的智识本性对道德本性会产生多大的作用，请大家看看时不时刊载于媒体的当代及其他时代人的传记和遗稿便足够了，这些传记和遗稿里的道德材料丰富无比，才智完美无缺。我们身边永远都不乏这样的伟人，他们确实值得我们爱戴和敬仰，世人也把他们视作亲手创造的作品来崇拜。的确，宗教原则，也就是信仰，看似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留下的杰作却必定高贵和美好，同时也必定不是超自然的。应当坚持认为，才智有它应得之份，不过，同样为了我希望在这次探索中能够达成的结论，也必须坚持这一点。心智的修为与真正的宗教之间存在极大差别，尽管它们表面上有关联。我当前的讨论就是想转向这么一个要点。可是，另外一方面，这样的修为很容易就会被性急或冷漠的观察者，或者那些以特别眼光看待此事的观察者归到基督教的根源上。由于事实如此，我觉得，在继续展开对其特征的讲解之前，有必要先向各位明确指出其道德依据的的那些基本原则。

5．

5．

You will bear in mind then, Gentlemen, that I spoke just now of the scorn and hatred which a cultivated mind feels for some kinds of vice, and the utter disgust and profound humiliation which may come over it, if it should happen in any degree to be betrayed into them. Now this feeling may have its root in faith and love, but it may not; there is nothing really religious in it, considered by itself. Conscience indeed is implanted in the breast by nature, but it inflicts upon us fear as well as shame; when the mind is simply angry with itself and nothing more, surely the true import of the voice of nature and the depth of its intimations have been forgotten, and a false philosophy has misinterpreted emotions which ought to lead to God. Fear implies the transgression of a law, and a law implies a lawgiver and judge; but the tendency of intellectual culture is to swallow up the fear in the self-reproach, and self-reproach is directed and limited to our mere sense of what is fitting and becoming. Fear carries us out of ourselves, whereas shame may act upon us only within the round of our own thoughts. Such, I say, is the danger which awaits a civilized age; such is its besetting sin (not inevitable, God forbid! or we must abandon the use of God's own gifts), but still the ordinary sin of the Intellect; conscience tends to become what is called a moral sense; the command of duty is a sort of taste; sin is not an offence against God, but against human nature.

那么，诸位当记住，我刚刚提到有教养的心智因某种恶习感受到的轻蔑与自责，以及心智果真或多或少沾染上这些恶习时会产生的那种彻底的厌恶与深重的羞辱感。这样的情感也许有信仰及爱的根源，但也许不是如此。假如从情感自身来看，这里面就没有什么真正宗教上的东西。良知的确是自然注入人心的，但是，良知也使我们遭受羞耻感和恐惧感之苦。当心智只有对自我的愤怒，而不再追究其他原因

时，那么，自然之声的真正意义及其暗示深度必然都被忘记了，一种虚假的哲学就错误地解释了本当引领人们信奉上帝的情绪。恐惧感暗示违法，而法律则代表立法者及法官的意志。可是，才智培育的倾向是要在自责中吞没这样的恐惧，而自责是朝向且局限于我们对合适和适当的东西的纯粹感受的。恐惧令我们不能自已，而羞耻感对我们的作用仅限于自己的想法。我要说，这就是一个文明时代所面临的危险，这就是不断侵扰文明时代的罪过（这并非是不可避免的，愿上帝阻止这罪过！否则，我们就得放弃利用神亲自给予我们的天资），但这仍然只是才智寻常的罪过。良知倾向于成为我们所谓的道德感，对责任的把握是一种品格，而罪恶冒犯的不是神，而是人性。

The less amiable specimens of this spurious religion are those which we meet not unfrequently in my own country. I can use with all my heart the poet's words,

这种假宗教较不讨人喜欢的例子，在我自己的国家也经常见到。我完全赞同这位诗人所说的话：

England, with all thy faults, I love thee still;

“英格兰啊，你瑕疵甚多，但我仍然爱你。”

but to those faults no Catholic can be blind. We find there men possessed of many virtues, but proud, bashful, fastidious, and reserved. Why is this? it is because they think and act as if there were really nothing objective in their religion; it is because conscience to them is not the word of a lawgiver, as it ought to be,

but the dictate of their own minds and nothing more; it is because they do not look out of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do not look through and beyond their own minds to their Maker, but are engrossed in notions of what is due to themselves, to their own dignity and their own consistency. Their conscience has become a mere self-respect. Instead of doing one thing and then another, as each is called for, in faith and obedience, careless of what may be called the *keeping* of deed with deed, and leaving Him who gives the command to blend the portions of their conduct into a whole, their one object, however unconscious to themselves, is to paint a smooth and perfect surface, and to be able to say to themselves that they have done their duty. When they do wrong, they feel, not contrition, of which God is the object, but remorse, and a sense of degradation. They call themselves fools, not sinners; they are angry and impatient, not humble. They shut themselves up in themselves; it is misery to them to think or to speak of their own feelings; it is misery to suppose that others see them, and their shyness and sensitiveness often become morbid. As to confession, which is so natural to the Catholic, to them it is impossible; unless indeed, in cases where they have been guilty, an apology is due to their own character, is expected of them, and will be satisfactory to look back upon. They are victims of an intense self-contemplation.

可是，没有哪位天主教徒会对这样的瑕疵视而不见。我们发现这些人虽然具备许多美德，却自傲、羞怯、挑剔且缄默少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仿佛觉得他们的宗教里并没有任何客观的东西，因而才有此想法和行为；因为良知在他们看来并非是立法者的命令——尽管理当如此，而是他们自己的心智发出的命令，别无其他；是因为他们并不想跳出自身来看待事物，因为他们并不能透过自己的思想并超出这些思想而去看造物主，而只着迷于适合自己的，与自己的尊严和惯常的言行相符合的概念。他们的良知变成了纯粹的自尊。他们并

非按照要求的那样，虔诚顺服地一次做一件事情，并不在乎行为是否一致，并且背弃了命令他们将部分协调整合成一体的神。而他们唯一的目标，而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就是要打造出光鲜完美的外表，从而能对自己说已经尽到职责了。他们做错事时，并不觉得应该在上帝面前悔悟，而只感到懊恼，并有一种堕落感。他们称自己为傻子而非罪人；他们愤怒，十分不耐烦，没有谦卑感。他们封闭在自我之中，思考或谈及自己的情感，对他们来说都是痛苦；设想会被别人看穿也令他们痛苦，而他们更加羞怯和敏感经常以致成病态。对天主教徒来说十分自然的忏悔，在他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在他们确实有过错的情况下，他们才认错，并且是自身的性格使然，是他们本就该做的，而且回过头来看也相当令人满意。他们是极度自我审视的受害者。

There are, however, far more pleasing and interesting forms of this moral malady than that which I have been depicting: I have spoken of the effect of intellectual culture on proud natures; but it will show to greater advantage, yet with as little approximation to religious faith, in amiable and unaffected minds. Observe, Gentlemen, the heresy, as it may be called, of which I speak, is the substitution of a moral sense or taste for conscience in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word; now this error may be the foundation of a character of far more elasticity and grace than ever adorned the persons whom I have been describing. It is especially congenial to men of an imaginative and poetical cast of mind, who will readily accept the notion that virtue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graceful in conduct. Such persons, far from tolerating fear, as a principle, in their apprehension of religious and moral truth, will not be slow to call it simply gloom and superstition. Rather a philosopher's, a gentleman's religion, is of a liberal and generous character; it is based upon honour; vice is evil, because it is unworthy, despicable, and odious. This was the quarrel of the ancient heathen with

Christianity, that, instead of simply fixing the mind on the fair and the pleasant, it intermingled other ideas with them of a sad and painful nature; that it spoke of tears before joy, a cross before a crown; that it laid the foundation of heroism in penance; that it made the soul tremble with the news of Purgatory and Hell; that it insisted on views and a worship of the Deity, which to their minds was nothing else than mean, servile, and cowardly. The notion of an All-perfect, Ever-present God, in whose sight we are less than atoms, and who, while He deigns to visit us, can punish as well as bless, was abhorrent to them; they made their own minds their sanctuary, their own ideas their oracle, and conscience in morals was but parallel to genius in art, and wisdom in philosophy.

但是，还有比我刚刚描述过的这种道德弊病更让人发笑，也有趣得多的形式。我已经谈到过才智培育对生性傲慢者的影响，但是，在和蔼可亲和未受影响的人心里，它还会显示出更大的优势，但跟宗教信仰完全不沾边。诸位请注意，我谈到的这种不妨称为邪说的东西，就是拿一种道德感或道德品格来代替真正意义上的良知。这种谬误所形成的性格，也许比我描述的那种人的性格更具灵活性与魅力。这对富于想象力和诗人气质的人来说尤其合意。他们乐于接受这样的想法，即美德不过是行为举止的优雅适当而已。这样的人决不能容忍恐惧，根据对宗教与道德真理的理解，他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原则，会毫不迟疑地称其为幽冥与迷信。哲学家的宗教，绅士的宗教，反倒属于自由与大度性质的宗教，它们是基于荣誉的宗教。恶习之所以是罪过，就因为它是卑劣的，是可鄙和可憎的。这就是古代的异端与基督教之间的争吵：基督教不是让心智常驻美好愉快的事物，反倒将其他让人悲哀和痛苦的想法混杂其中；它重眼泪轻欢乐，重教权轻王威；把英雄行为建立在忏悔的基础上，传播炼狱与地狱消息，让灵魂闻之发抖；它坚持让人信奉神灵，崇拜神灵，而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可鄙、卑屈与胆怯的行为。这样的上帝观念让他们憎恶，即上帝至善至美、无所不在，我们在其眼中不过如草芥，虽然他屈尊来看望我们，

却既可以祝福，也可以惩罚我们。他们把自己的心智打造成至圣所，把自己的想法看成神谕，道德观念上的良知只不过相当于技艺中的才干和哲学中的智慧罢了。

6．

6．

Had I room for all that might be said upon the subject, I might illustrate this intellectual religion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Emperor Julian, the apostate from Christian Truth, the foe of Christian education. He, in whom every Catholic sees the shadow of the future Anti-Christ, was all but the pattern-man of philosophical virtue. Weak points in his character he had, it is true, even in a merely poetical standard; but, take him all in all, and I cannot but recognize in him a specious beauty and nobleness of moral deportment, which combines in it the rude greatness of Fabricius or Regulus with the accomplishments of Pliny or Antoninus. His simplicity of manners, his frugality, his austerity of life, his singular disdain of sensual pleasure, his military heroism, his application to business, his literary diligence, his modesty, his clemency, his accomplishments, as I view them, go to make him one of the most eminent specimens of pagan virtue which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9_1] . Yet how shallow, how meagre, nay, how unamiable is that virtue after all, when brought upon its critical trial by his sudden summons into the presence of his Judge! His last hours form a *unique* passage in history, both as illustrating the helplessness of philosophy under the stern realities of our being, and as being reported to us on the evidence of an eye-witness.

假如有机会把就这个话题能说的所有话都说完，那我就要用基督教真理的背叛者、基督宗教教育的反对者，尤里安皇帝的历史来说明这种智性宗教。他丝毫不具备哲学德行，每一位天主教徒都从他身上看到后来的反基督者的影子。的确，他的性格中不乏缺点，哪怕只是根据诗化标准也是如此。但是，整体上看，我却只能在他身上看到道德品行的华贵气质与美好，其中还融合了法布里修斯或雷古勒斯粗犷的崇高与普林尼或安东尼的成就。他秉持朴素的礼节，节俭又朴实，耻于肉欲之乐，作战勇猛无畏，兢兢业业，勤奋刻苦，为人谦和，宽宏大量，造诣非凡。就我看来，他的这些品质使他成为世人见到过的异教美德中最显赫的典范。[10_1] 可是，一旦他受到召唤，突然来到他的审判者面前接受决定性裁决时，他的这种德行毕竟会显得多么浅薄，多么贫乏，多么让人不悦啊！他最后的时刻构成一段独特的历史，因其说明了哲学在我们生存的严酷现实面前多么无助，也因其是通过目击证人的证据为我们所知的。为他撰写颂辞的作者，无论根据其文学品味还是对基督教的憎恨，都是担当此任的合适人选。根据这位作者的原话，朱利安皇帝是这么说的：

“Friends and fellow-soldiers,” he said, to use the words of a writer, well fitted, both from his literary tastes and from his hatred of Christianity, to be his panegyrist, “the seasonable period of my departure is now arrived, and I discharge, with the cheerfulness of a ready debtor, the demands of nature… I die without remorse, as I have lived without guilt. I am pleased to reflect on the innocence of my private life; and I can affirm with confidence that the supreme authority, that emanation of the divine Power, has been preserved in my hands pure and immaculate… I now offer my tribute of gratitude to the Eternal Being, who has not suffered me to perish by the cruelty of a tyrant, by the secret dagger of conspiracy, or by the slow tortures of lingering disease. He has given me, in the midst of an honourable career, a splendid and glorious departure from this

world, and I hold it equally absurd, equally base, to solicit, or to decline, the stroke of fate…

“朋友及战友们，本人告别的适宜时刻终于到来，我可以怀着一个早有准备的债主的欢快心情，抛下天命对我的追索……我死而无悔，正如我生之无愧。我可以满怀欣慰地回顾自己清白无辜的一生，我可以满怀自信地肯定，那至高的权威，天赐的权能，一直都完好无损地保留在我手里，依旧纯粹……我现在向那永恒的存在者致以谢意，感激他没有让我死于暴君之手，没有被密谋者的暗剑刺死，更没有被顽疾慢慢磨死。我投身一项正直的事业，在这事业的中途，他让我体面荣耀地离开这世界。假如我哀求，或试图拒绝命运的降临，我都会感到的荒谬，卑鄙……

“He reproved the immoderate grief of the spectators, and conjured them not to disgrace, by unmanly tears, the fate of a prince who in a few moments would be united with Heaven and with the stars. The spectators were silent; and Julian entered into a metaphysical argument with the philosophers Priscus and Maximus on the nature of the soul. The efforts which he made, of mind as well as body, most probably hastened his death. His wound began to bleed with great violence; his respiration was embarrassed by the swelling of the veins; he called for a draught of cold water, and as soon as he had drank it expired without pain, about the hour of midnight.“ [9_2] Such, Gentlemen, is the final exhibition of the Religion of Reason: in the insensibility of conscience, in the ignorance of the very idea of sin,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his own moral consistency, in the simple absence of fear, in the cloudless self-confidence, in the serene self-possession, in the cold self-satisfaction, we recognize the mere Philosopher.

“他责备送终者悲伤过度，请他们不要以怯懦的眼泪使一位君王的天命蒙羞，因他过不久就会与上苍及星辰结为一体。送终者沉默下来。朱利安开始与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莫斯这两位哲学家就灵魂的本性展开一场形而上学的辩论。他在身心两方面的挣扎，极可能加快了他的死亡。他的伤口开始大量出血，呼吸也因静脉肿胀而窘迫。约在夜半时分，他命人取来冷水，喝下后没有一点痛苦就去世了。” [10_2] 诸位，这就是理性宗教的最终展示：在良知的麻木中，在对罪恶这个观念的不觉中，在对自己的道德一致性的思考中，在全然彻底的无惧中，在没有一丝疑云的自信中，在安详的泰然自若中，在冷静的自足中，我们看到了一位纯粹的哲学家。

7．

7．

Gibbon paints with pleasure what, conformably with the sentiments of a godless intellectualism, was an historical fulfilment of his own idea of moral perfection; Lord Shaftesbury had already drawn out that idea in a theoretical form, in his celebrated collection of Treatises which he has called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views* ;” and it will be a further illustration of the subject before us, if you will allow me, Gentlemen, to make some extracts from this work.

吉本迎合一种无神论的理智主义，愉快地描述了可称为他自己的道德完善的历史成就，而沙夫茨伯里勋爵早就以一种理论形式在他称为《人、礼节、见解、观点的特征》的著名文论集中归纳过这一思想。假如诸位容许我引述其中部分内容，那我们可以就面前这个话题

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One of his first attacks is directed against the doctrine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as if it introduced a notion into religion inconsistent with the true apprehension of the beauty of virtue, and with the liberality and nobleness of spirit in which it should be pursued.

他最初的攻击之一是针对关于奖惩的教义的，好像这教义将一种与德行之美的真正内涵不一致的观念引入了宗教，而这种观念与追求教义时本应遵循的、精神的自由与高贵相抵触。他说：

“Men have not been content,” he says, “to show the natural advantages of honesty and virtue. They have rather lessened these, the better, as they thought, to advance another foundation. They have made virtue so mercenary a thing, and have talked so much of its rewards, that one can hardly tell what there is in it, after all, which can be worth rewarding. For to be *bribed* only or *terrified* into an honest practice, bespeaks little of real honesty or worth.” “If,” he says elsewhere, insinuating what he dare not speak out, “if through hope merely of reward, or fear of punishment, the creature be inclined to do the good he hates, or restrained from doing the ill to which he is not otherwise in the least degree averse, there is in this case no virtue or goodness whatever. There is no more of rectitude, piety, or sanctity, in a creature thus reformed, than there is meekness or gentleness in a tiger strongly chained, or innocence and sobriety in a monkey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the whip… While the will is neither gained, nor the inclination wrought upon, but awe alone prevails and forces obedience, the obedience is servile,

and all which is done through it merely servile.”

> “人向来并不满足于显示诚实与德行天然的优势。他们反倒削减了这些优势，以为这样更能夯实另外一个基础。他们把德行变成了如此功利的东西，不厌其烦地谈论它的回报，竟至于让人很难搞清楚德行里面到底都有什么东西值得回报的。因为，仅只靠贿赂或恐吓而产生的诚实行为，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诚实或价值。”在别处，他又暗示了并不敢公开说出来的话：“假如人仅仅因为对回报的期望或对惩罚的惧怕而倾向于行他并不愿意行的善，或不敢做他在其他情况下毫不厌恶的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德行或善可言了。如此造就的一个人所具备的诚实、虔敬或圣洁，与被牢牢锁住的老虎的懦弱温顺，或被皮鞭训导出来的猴子的清白或节制一样，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意志并没有形成，意愿也没有因此产生，只有敬畏盛行，并催逼出顺从，那么，这顺从就是奴性的，且所有因顺从而行的事情也就都是奴性的。”

That is, he says that Christianity is the enemy of moral virtue, as influencing the mind by fear of God, not by love of good.

这也就是说，他认为基督教是通过对神的惧怕而不是对善的热爱来影响人心的，因此它就是伦理德行的敌人。

The motives then of hope and fear being, to say the least, put far into the background, and nothing being morally good but what

springs simply or mainly from a love of virtue for its own sake, this love-inspiring quality in virtue is its beauty, while a bad conscience is not much more than the sort of feeling which makes us shrink from an instrument out of tune.

因此，往最轻里说，将希望与恐惧的动因远远搁置一边，除了直接或主要源自对德行本身的热爱的东西，其他的一切都算不上道德上的善，那么，德行中这种能唤起爱的品质，就是它自身的美，而内心的愧疚无异于使人在走调的乐器面前退却的那种情感。他说：

“Some by mere nature,” he says, “others by art and practice, are masters of an ear in music, an eye in painting, a fancy in the ordinary things of ornament and grace, a judgment in proportions of all kinds, and a general good taste in most of those subjects which make the amusement and delight of the ingenious people of the world. Let such gentlemen as these be as extravagant as they please, or as irregular in their morals, they must at the same time discover their *inconsistency* , live at *variance* with themselves, and in *contradiction* to that principle on which they ground their highest pleasure and entertainment. Of all other *beauties* which virtuosos pursue, poets celebrate, musicians sing, and architects or artists of whatever kind describe or form, the most delightful, the most engaging and pathetic, is that which is drawn from real life and from the passions. Nothing affects the heart like that which is purely from itself, and of its own nature: such as the beauty of sentiments, the grace of actions, the turn of characters, and the *proportions and features* of a human mind. This lesson of philosophy, even a romance, a poem, or a play may teach us…. Let poets or the men of harmony deny, if they can, this force of nature, or withstand this *moral magic* … Every one is a virtuoso of a higher or lower

degree; every one pursues a grace… of one kind or other. The *venustum* , the *honestum* , the *decorum* of things will force its way… The most natural beauty in the world is honesty and moral truth; for all beauty is truth.”

“有些人凭天资就是大师，另外一些人通过技艺或练习成为大师，他们或有倾听音乐的聪耳，或有鉴赏绘画的眼力，或能在凡俗的事物中想象出美饰与优雅，或有对各类比例的辨别力，或在能愉悦世上有智之人的大多数主题上都有普遍较高的品味。若让这样的绅士纵情挥霍，或道德有所败坏，他们同时一定会发现自己与以往相异，他们的生活不符合自身要求，并与自己在追求最高享受和最大娱乐时所遵循的原则相矛盾。在艺术大师追求的、诗人赞美的、音乐家歌唱的、建筑师或各类艺术家所描述或构成的其他所有美的事物中，最令人愉悦、最迷人和最令人感伤的，就是从现实生活和激情中抽取的那些。没有什么比纯粹源于自我，或源于自身本性的东西更能打动人心的了，譬如情感之美，譬如动作之优雅，譬如性格之转换，还有人类思维的比例和特征。这一次哲学教导，甚至是一个传奇故事，一首诗或一曲戏也都能教给我们……就让诗人或追求和谐的人去否认这种自然力量吧，假如他们能做到的话，或者抵抗这种道德魔法……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只是水平或高或低，人人都追求一种优美……这种或是那种。美好、极好与得体的事物迟早会表现出来……世上最自然的美是诚实与道德真理；因为所有的美都是真理。”

Accordingly, virtue being only one kind of beauty, the principle which determines what is virtuous is, not conscience, but *taste* .

相应地，由于美德只不过是一种美，所以，确定什么是符合德行的事物的原则就不是良知，而是品格。他说：

“Could we once convince ourselves,” he says, “of what is in itself so evident, viz., that in the very nature of things there must of necessity be the foundation of a right and wrong taste, as well in respect of inward character of features as of outward person, behaviour, and action, we should be far more ashamed of ignorance and wrong judgment in the former than in the latter of these subjects… One who aspires to the character of a man of breeding and politeness is careful to form his judgment of arts and sciences upon right models of *perfection* …He takes particular care to turn his eye from every thing which is gaudy, luscious, and of false taste. Nor is he less careful to turn his ear from every sort of music, besides that which is of the best manner and truest harmony. 'Twere to be wished we had the same regard to a *right taste in life and manners* … If civility and humanity be a taste; if brutality, insolence, riot, be in the same manner a taste, … who would not endeavour to force nature as well in this respect as in what relates to a taste or judgment in other arts and sciences?”

> “假使我们能让自己相信本身就十分明显的事物，也就是，就在事物的本性里，必然就存在着对与错的品格的基础，在容貌的内在特征与外在的人、行为和活动中也是一样。在这些主题上，我们应当更多为对前者而非后者的无知和错误判断而感到羞耻……一个人若希望成为有教养和懂礼貌的人，就会十分小心地形成他对建立在正确的完善模式基础上的技艺和学科的判断……他尤其要小心地避免看到那些俗丽、

诉诸感官和具有虚假品味的东西。他也要同样小心地让自己的耳朵远离各类的音乐，除非这种音乐属于最佳种类，具有最真实的和谐。但愿我们对生活与礼节的恰当品格也抱类似看法……假如文明和人道是一种品格，又假如残忍、傲慢、放纵也同样是一种品格……谁又不会努力在这一方面强制天性，就如同面对其他技艺和学科中与品格或判断相关的东西那样？”

Sometimes he distinctly contrasts this taste with principle and conscience, and gives it the preference over them.

有时候，他明显将原则及良知与这种品格相比照，并认为品格高于原则及良知。他说：

“After all,” he says, “*'tis not merely what we call principle* , but a *taste* , which governs men. They may think for certain, 'This is right,' or 'that wrong;' they may believe 'this is a virtue,' or 'that a sin;' 'this is punishable by man,' or 'that by God;' yet if the savour of things lies cross to honesty, if the fancy be florid, and the appetite high towards the subaltern beauties and lower orders of worldly symmetries and proportions, the conduct will infallibly turn this latter way.”

“毕竟，约束人的不完全是我们称为原则的东西，还有品格。他们也许会坚定不疑地认为，‘这是对的’，或‘那是错的’；他们也许会相信‘这是一项美德’，或‘那是一种罪过’；‘这是人可惩罚的’，或‘那是

上帝当处罚的’；可是，假如事物的特质与诚实对立，假如想象力丰富无比，又假如人对世俗的对称与比例的次等之美和较低层级很有兴趣，那么，行为就绝对会转向后者。”

Thus, somewhat like a Jansenist, he makes the superior pleasure infallibly conquer, and implies that, neglecting principle, we have but to train the taste to a kind of beauty higher than sensual. He adds: “*Even conscience* , I fear, such as is owing to religious discipline, will make but a slight figure, when this taste is set amiss.”

这样，他多少会像詹森派信徒一样，让较高级的快乐无往不胜。他还暗示说，先不考虑原则，我们只需要训练品格，让它欣赏一种比肉欲更高级的美。他补充说：“我担心，假如这种品格出了错乱，哪怕是良知，比如宗教训练所养成的那种，也不过只是微不足道的东西。”

And hence the well-known doctrine of this author, that ridicule is the test of truth; for truth and virtue being beauty, and falsehood and vice deformity, and the feeling inspired by deformity being that of derision, as that inspired by beauty is admiration, it follows that vice is not a thing to weep about, but to laugh at. “Nothing is ridiculous,” he says, “but what is deformed; nor is any thing proof against raillery but what is handsome and just. And therefore 'tis the hardest thing in the world to deny fair honesty the use of this weapon, which can never bear an edge against herself, and bears against every thing contrary.”

这就是这位著作者知名的学说，即笑柄就是真理的考验；因为既然真理和美德是美，虚伪和恶行是丑，由丑唤起的情感是嘲笑的对象，而由美唤起的情感是崇敬的目标，那恶行就不值得悲哀，而是应当嘲笑。他说："除开丑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是可笑的；除开美的与适当的东西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禁得住嘲弄的。因此，要禁止诚实利用这利器，那是世上最难办的事情，因为嘲弄从不伤害自身，却不利任何相反的东西。"

And hence again, conscience, which intimates a Law-giver, being superseded by a moral taste or sentiment, which has no sanction beyond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nature, it follows that our great rule is to contemplate ourselves, if we would gain a standard of life and morals. Thus he has entitled one of his Treatises a "Soliloquy," with the motto, "Nec te quæsiveris extra;" and he observes,

同样，在这里，由于象征着立法者的良知被一种道德品格或道德情操所取代，而这道德品格并不能越出我们天性这个宪法而进行任何制裁，那我们最要紧的规则就是去思考我们自身，假如我们想获得一种人生标准和品行标准的话。这样，他就给他的一个论文集标上"独白"的篇名，另附上一句名言："不可讨要他人见解。"接着他还说：

"The chief interest of ambition, avarice, corruption, and every sly insinuating vice, is to prevent this interview and familiarity of discourse, which is consequent upon close retirement and inward recess. 'Tis the grand artifice of villainy and lewdness, *as well as of superstition and bigotry* , to put us upon terms of greater distance and formality with ourselves, and evade our *proving* method of soliloquy… A passionate lover, whatever solitude he may affect, can

never be truly by himself… 'Tis the same reason which keeps the imaginary saint or mystic from being capable of this entertainment. Instead of looking narrowly into his own nature and mind, that he may be no longer a mystery to himself, he is taken up with *the contemplation of other mysterious natures* , which he never can explain or comprehend. "

> “野心、贪婪、堕落和各种诡异与曲意奉承的恶行，其主要的兴趣就在于防止人们接触或了解这样的演说，而这常发生在人们退隐或内心消沉时。这只不过是迷信、偏执以及邪恶与下流施加的阴谋诡计，让我们远离自我，对自己彬彬有礼，并使我们回避独白这一证明方法……一位充满激情的恋人，无论怎样做样子，都无法做到真正的独处……想象自己是圣贤或秘修者的人，也同样因为这个理由，无法享受独处的快乐。人若一门心思只关注自己的本性或思想，就会让自己失去神秘感，所以他并不想这样做，反倒更愿意深思其他的神秘本性，而这却是他永远也无法解释或理解的。”

8．

8．

Taking these passages as specimens of what I call the Religion of Philosophy, it is obvious to observe that there is no doctrine contained in them which is not in a certain sense true; yet, on the other hand, that almost every statement is perverted and made

false, because it is not the whole truth. They are exhibitions of truth under one aspect, and therefore insufficient; conscience is most certainly a moral sense, but it is more; vice again, is a deformity, but it is worse. Lord Shaftesbury may insist, if he will, that simple and solitary fear cannot effect a moral conversion, and we are not concerned to answer him; but he will have a difficulty in proving that any real conversion follows from a doctrine which makes virtue a mere point of good taste, and vice vulgar and ungentlemanlike.

上述段落可当作我所说的哲理宗教的样本，而明显就可以看出，这里面并不包含在某种意义上不真实的任何信条。但另外一方面，差不多每一个说法都是反常和虚假的，就因为单个说法并非是完整的真理。它们都是真理在一个方面的展现，因而是不充足的。良知肯定是一种道德感，但不只如此；恶行也是一种丑，但其实更甚。沙夫茨伯里勋爵如果愿意的话，可能会坚持认为，单凭忧惧并不能促成道德转化，而我们却无心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他也不太容易证明，若一个信条仅将一点优良品格当作美德，粗俗和低俗视为邪恶，那这信条能促成什么真正的转化。

Such a doctrine is essentially superficial, and such will be its effects. It has no better measure of right and wrong than that of visible beauty and tangible fitness. Conscience indeed inflicts an acute pang, but that pang, forsooth, is irrational, and to reverence it is an illiberal superstition. But, if we will make light of what is deepest within us, nothing is left but to pay homage to what is more upon the surface. To *seem* becomes to *be* ; what looks fair will be good, what causes offence will be evil; virtue will be what pleases, vice what pains. As well may we measure virtue by utility as by such a rule. Nor is this an imaginary apprehension; we all must recollect the celebrated sentiment into which a great and wise man

was betrayed, in the glowing eloquence of his valediction to the spirit of chivalry. “It is gone,” cries Mr. Burke; “that sensibility of principle, that chastity of honour which felt a stain like a wound; which inspired courage, while it mitigated ferocity; which ennobled whatever it touched, and under which *vice lost half its evil by losing all its grossness* .” In the last clause of this beautiful sentence we have too apt an illustration of the ethical temperament of a civilized age. It is detection, not the sin, which is the crime; private life is sacred, and inquiry into it is intolerable; and decency is virtue. Scandals, vulgarities, whatever shocks, whatever disgusts, are offences of the first order. Drinking and swearing, squalid poverty, improvidence, laziness, slovenly disorder, make up the idea of profligacy: poets may say any thing, however wicked, with impunity; works of genius may be read without danger or shame, whatever their principles; fashion, celebrity, the beautiful, the heroic, will suffice to force any evil upon the community. The splendours of a court, and the charms of good society, wit, imagination, taste, and high breeding, the *prestige* of rank, and the resources of wealth, are a screen, an instrument, and an apology for vice and irreligion. And thus at length we find, surprising as the change may be, that that very refinement of Intellectualism, which began by repelling sensuality, ends by excusing it. Under the shadow indeed of the Church, and in its due development, Philosophy does service to the cause of morality; but, when it is strong enough to have a will of its own, and is lifted up with an idea of its own importance, and attempts to form a theory, and to lay down a principle, and to carry out a system of ethics, and undertakes the moral education of the man, then it does but abet evils to which at first it seemed instinctively opposed. True Religion is slow in growth, and, when once planted, is difficult of dislodgement; but its intellectual counterfeit has no root in itself: it springs up suddenly, it suddenly withers. It appeals to what is in

nature, and it falls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old Adam. Then, like dethroned princes, it keeps up a state and majesty, when it has lost the real power. Deformity is its abhorrence; accordingly, since it cannot dissuade men from vice, therefore in order to escape the sight of its deformity, it embellishes it. It “skins and films the ulcerous place,” which it cannot probe or heal,

这样一个信条根本上是肤浅的，它产生的效果无疑也是如此。它并没有比可见之美和可感触的适当性更好的衡量是非尺度。良知的确会引起剧烈的精神痛苦，但是，这痛苦实在是不理性，人若敬畏良知，那就是一种粗鄙迷信。可是，假如我们轻视内心深处的东西，剩下来的就只能是礼敬更表面的东西。“看似”变成了“就是”；好看的就是善的，引发不快的就是恶的；德行使人愉悦，恶行使人痛苦。与其使用这样一条规则，我们还不如用实用性来衡量德行。而且这还不是虚构的忧虑。我们所有人一定都还记得，伟大而智慧的伯克先生，在他放弃骑士精神的激情澎湃的雄辩中表达了一个著名观点。他惊叹道：“一去不复返了，那种对于原则的重视，那种对于荣誉的坚守，使得一点瑕疵就好像伤口一样严重；它扼制暴行，却仍然能激发勇气；它使触及的一切变得高贵，在它的影响下，恶行因为失去了所有的粗俗而少了了一半的邪恶。”在这句漂亮话的最后一部分里，我们看到一个文明时代的伦理气质的极恰当例证。犯下罪行的，不是罪本身，反倒是罪行的发现；私人生活是神圣的，探究私人生活是不可容忍的；端庄体面就是德行。丑闻、粗野言行、任何让人震惊、让人恶心的事情，都是最严重的罪行。酗酒与咒骂、肮脏贫穷、挥霍浪费、懒惰、邋遢，都被视作是不检点的：诗人可说任何邪恶的话而不受惩罚；但凡有创意的作品，无论其原理是什么，都可以随便阅读而不招致危险，或不用感到羞耻。时尚、名望、漂亮的东西、壮观的行为，这些都足以将任何一种邪恶强加给一个社会。宫廷的高贵、良好交际圈魅力、智巧、想象力、品格、高贵的出身、社会地位的显赫以及财富资源，这些都是抵挡恶行和反宗教的屏障、手段及辩护。这样，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变化，尽管这个变化让人惊讶，理智主义从排斥感

官享受开始其升华，却以为它辩解而终结。的确，在教会的阴影之下，也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哲学的确也为道德事业做出过贡献。但是，当它足够强大——产生了自身的意志，因认识到自身的重要性而倍受鼓舞，试图建立一种学说，立下一条原则，贯彻某种伦理体系，展开对人的道德教育——此时，它绝不会教唆它一开始凭本能就觉得与自己相对立的那些罪恶。真正的宗教成长极慢，一旦植入人心，它就很难根除。但其智性上的冒牌货自身却缺乏根基，突然兴起，又突然凋亡。它诉诸人性本有，最终却落入本性之恶的主宰之下。之后，它就像被剥夺了王位的君王一样，虽然已经失去实权，却还保持着一种堂皇与尊严。丑即是它的可恶之处；相应地，由于它并不能劝阻人们远离恶行，因此，为了避免丑被人看见，它就想办法遮丑。当它无法探查，也不能治愈自身腐败之处的时候，它就“在溃疡的地方植皮覆膜”。

> *Whiles rank corruption, mining all within, Infects unseen.*

> “难闻的腐败在里面滋生，感染却在看不见的地方蔓延。”

And from this shallowness of philosophical Religion it comes to pass that its disciples seem able to fulfil certain precepts of Christianity more readily and exactly than Christians themselves. St. Paul, as I have said, gives us a pattern of evangelical perfection; he draws the Christian character in its most graceful form, and its most beautiful hues. He discourses of that charity which is patient and meek, humble and single-minded, disinterested, contented, and persevering. He tells us to prefer each the other before himself, to give way to each other, to abstain from rude words and evil speech,

to avoid self-conceit, to be calm and grave, to be cheerful and happy, to observe peace with all men, truth and justice, courtesy and gentleness, all that is modest, amiable, virtuous, and of good repute. Such is St. Paul's exemplar of the Christian in his external relations; and, I repeat, the school of the world seems to send out living copies of this typical excellence with greater success than the Church. At this day the “gentleman” is the creation, not of Christianity, but of civilization. But the reason is obvious. The world is content with setting right the surface of things; the Church aims at regenerating the very depths of the heart. She ever begins with the beginning; and, as regards the multitude of her children, is never able to get beyond the beginning, but is continually employed in laying the foundation. She is engaged with what is essential, as previous and as introductory to the ornamental and the attractive. She is curing men and keeping them clear of mortal sin; she is “treating of justice and chastity, and the judgment to come;” she is insisting on faith and hope, and devotion, and honesty, and the elements of charity; and has so much to do with precept, that she almost leaves it to inspirations from Heaven to suggest what is of counsel and perfection. She aims at what is necessary rather than at what is desirable. She is for the many as well as for the few. She is putting souls in the way of salvation, that they may then be in a condition, if they shall be called upon, to aspire to the heroic, and to attain the full proportions, as well as the rudiments, of the beautiful.

从哲理宗教的这种肤浅中可以看出，它的门徒看来竟然比基督徒自身更乐意和更严格地践行基督教的某些戒律。如我已经说过的，圣保罗给了我们一种传福音的完善模式。他以其最优美的形式和最漂亮的色调描绘过基督徒的品格。他谈及那种耐心及温顺、谦恭及执着、无私、安心及坚忍不屈的仁爱。他告诉我们应当爱他人先于爱自己，

要彼此谦让，避免出言不逊和话语狠毒，不可自命不凡，要镇定严谨，也要开心和快乐，为人友善，追求真理和公正，要礼貌端庄、温文尔雅，要追求一切谦恭的、可爱的、有德行和良好名声的东西。这就是圣保罗展示出来的处在外部关系中的基督徒模样。我重复一次，世俗学校看来比教会本身更出色地培养出具有这种典型卓越性的逼真范本。在今日，“绅士”是社会教化而非基督教的产物。但其原因十分明显。俗世满足于校正事物的外表，而教会旨在使人心自深处重生。教会总是从源头做起，至于对教会万千的儿女，她也从不忍更改初衷，总是一如继往地铺设基础。她从事的是最根本的事业，为赏心悦目的美好事物的做准备和先导。她救治人心，并使其远离重罪；她“讲论公正、贞洁和将来的审判”。她执着于信仰及希望，执着于奉献、诚实及仁爱的要素。她如此热心于训诫，竟至于希望来自天国的启示能向人们提供忠告并告诉人们什么是完美。她重在必不可少的东西而非只求顺遂人心。她为少数人服务，也为众人服务。她将灵魂安置在救赎的路上，这样，灵魂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一旦接到召唤，它们就能追求极壮美的事业，能进入美好事业的初始状态，也能通达其最佳境界。

9．

9．

Such is the method, or the policy (so to call it), of the Church; but Philosophy looks at the matter from a very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what have Philosophers to do with the terror of judgment or the saving of the soul? Lord Shaftesbury calls the former a sort of “panic fear.” Of the latter he scoffingly complains that “the saving of souls is now the heroic passion of exalted spirits.” Of course he is at liberty, on his principles, to pick and choose out of Christianity

what he will; he discards the theological, the mysterious, the spiritual; he makes selection of the morally or esthetically beautiful. To him it matters not at all that he begins his teaching where he should end it; it matters not that, instead of planting the tree, he merely crops its flowers for his banquet; he only aims at the present life, his philosophy dies with him; if his flowers do but last to the end of his revel, he has nothing more to seek. When night comes, the withered leaves may be mingled with his own ashes; he and they will have done their work, he and they will be no more. Certainly, it costs little to make men virtuous on conditions such as these; it is like teaching them a language or an accomplishment, to write Latin or to play on an instrument,—the profession of an artist, not the commission of an Apostle.

这就是教会的方法，或可称为其方针；但是，哲学却从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此事：哲学家与对审判的恐惧或对灵魂的拯救有何关系呢？沙夫茨伯里勋爵称前者为某种“惊恐”。至于后者，他抱以冷笑：“灵魂的拯救现在成为那些养尊处优者故呈英雄主义的激情之语。”当然，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原则在基督教里随便挑捡想要的东西。他抛弃神学的、神秘的、灵性的东西，他要选择道德上或美学上美好的事物。在他看来，说教于始本当结束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关系；不先栽树，而是直接采摘花朵摆上他的宴会，这也没有关系；他只关注现世，他死去，他的哲学也一同消亡；假如他的花朵当真撑持到了狂欢结束，那他就再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去追寻的了。当夜幕降临，枯萎的花瓣也许会与他自己的骨灰混在一起；他和花瓣都尽到了本份，因此，他和花瓣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肯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让人成为有德行的人并不费劲；这就好像教他们学一门语言或技艺，教他们用拉丁文写作，或教他们演奏一样乐器。这是艺术家的职业，而非使徒的重任。

This embellishment of the exterior is almos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philosophical morality. This is why it aims at being modest rather than humble; this is how it can be proud at the very time that it is unassuming. To humility indeed it does not even aspire; humility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of virtues both to attain and to ascertain. It lies close upon the heart itself, and its tests are exceedingly delicate and subtle. Its counterfeits abound; however, we are little concerned with them here, for, I repeat, it is hardly professed even by name in the code of ethics which we are reviewing. As has been often observed, ancient civilization had not the idea, and had no word to express it; or rather, it had the idea, and considered it a defect of mind, not a virtue, so that the word which denoted it conveyed a reproach. As to the modern world, you may gather its ignorance of it by its perversion of the somewhat parallel term "condescension." Humility or condescension, viewed as a virtue of conduct, may be said to consist, as in other things, so in our placing ourselves in our thoughts on a level with our inferiors; it is not only a voluntary relinquishment of the privileges of our own station, but an actual participation or assump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ose to whom we stoop. This is true humility, to feel and to behave as if we were low; not, to cherish a notion of our importance, while we affect a low position. Such was St. Paul's humility, when he called himself "the least of the saints;" such the humility of those many holy men who have considered themselves the greatest of sinners. It is an abdication, as far as their own thoughts are concerned, of those prerogatives or privileges to which others deem them entitled. Now it is not a little instructive to contrast with this idea, Gentlemen,—with this theological meaning of the word "condescension,"— its proper English sense; put them in juxta-position, and you will at once se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orld's humility and the humility of the Gospel. As the world uses the word, "condescension" is a stooping indeed of the person,

but a bending forward, unattended with any the slightest effort to leave by a single inch the seat in which it is so firmly established. It is the act of a superior, who protests to himself, while he commits it, that he is superior still, and that he is doing nothing else but an act of grace towards those on whose level, in theory, he is placing himself. And this is the nearest idea which the philosopher can form of the virtue of self-abasement; to do more than this is to his mind a meanness or an hypocrisy, and at once excites his suspicion and disgust. What the world is, such it has ever been; we know the contempt which the educated pagans had for the martyrs and confessors of the Church; and it is shared by the anti-Catholic bodies of this day.

这种外表的修饰差不多就是哲理道德观的开始和终结。正是这个原因，它才旨在谦虚而非谦逊；也正是这样，它才可以在并不出风头的时候也那么傲慢。它根本不想要谦逊，谦逊是美德中最难获得，也最难察觉的一种。它紧紧贴近人心本身，它的检验尤其微妙，尤其难于把握。谎称谦逊的冒牌货多不胜数；但是，我们此时并不在意这些赝品，因为，我再说一遍，依据我们正在此回顾的伦理规范，即使要找一个名称来表达这一概念也很难。人们经常会注意到，古代文明并没有谦逊这个概念，也没有词语来表达这概念；或者，古代文明有这个概念，但认为它是心智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美德，因此，用来表达这个概念的词传递的是一种责备的意味。至于现代世界，我们不妨通过“屈尊”这个与谦逊类似但被误用的词，来判断现代世界对此概念的无知。谦逊或屈尊如果看作一种行为美德，也许可谓就在于我们在内心坚持把自己与次一等的人或事物放在同等层面上，正如在别的方面亦是如此。我们不仅自愿让渡自己的身份所特有的特权，而且还实际深入我们俯就的那些人的境地或设想其境况。我们的感觉与行为方式就好像我们是卑贱者，这才是真正的谦逊；装出低姿态，同时又认为自己很重要，那就不是什么谦逊了。圣保罗自称“众圣徒中最微不足道的人”，这就是他的谦逊；自认为是最大罪人的众多圣人，也是这

种意义上的谦逊。就他们自己的想法而论，这就是对别人认可他们有资格享受的那些权力或特权的辞让。诸位，拿谦逊这个概念，与“屈尊”这个词在英语中的恰当意义，即这个词的神学意义进行对照，一定会有很大的启发性。将这两者并置在一起，大家一定会立即看出世人的谦逊与福音书所说的谦逊有什么差别。世人使用“屈尊”这个词，实则指的是人弯腰，但指的是身体向前一倾，根本无意离开原来那个牢靠的位置哪怕一丁点。当一个人虽屈尊俯就，但却对自己说，自己仍然是尊贵的，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施与那些只能在理论上和自己相提并论的人恩惠，那么，这种屈尊就是逢场作戏。哲学家心中谦卑的美德就仅限于此了，越出一步，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卑鄙或一种伪善，并立刻激起他的怀疑与厌恶。世人现在是这样，过去也一直如此。我们知道受过教育的异教徒过去蔑视教会的殉道者和忏悔者，而如今的反天主教团体也是如此。

Such are the ethics of Philosophy, when faithfully represented; but an age like this, not pagan, but professedly Christian, cannot venture to reprobate humility in set terms, or to make a boast of pride. Accordingly, it looks out for some expedient by which it may blind itself to the real state of the case. Humility, with its grave and self-denying attributes, it cannot love; but what is more beautiful, what more winning, than modesty? what virtue, at first sight, simulates humility so well? though what in fact is more radically distinct from it? In truth, great as is its charm, modesty is not the deepest or the most religious of virtues. Rather it is the advanced guard or sentinel of the soul militant, and watches continually over its nascent intercourse with the world about it. It goes the round of the senses; it mounts up into the countenance; it protects the eye and ear; it reigns in the voice and gesture. Its province is the outward deportment, as other virtues have relation to matters theological, others to society, and others to the mind itself. And being more superficial than other virtues, it is more easily disjoined

from their company; it admits of being associated with principles or qualities naturally foreign to it, and is often made the cloak of feelings or ends for which it was never given to us. So little is it the necessary index of humility, that it is even compatible with pride. The better for the purpose of Philosophy; humble it cannot be, so forthwith modesty becomes its humility.

这就是对哲学伦理学的忠实呈现；可是，这不是一个异教徒的时代，而公认是基督教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敢以明确的言辞拒绝谦逊，也不敢夸耀傲慢。相应地，它就设法找到一个权宜办法，藉此蒙蔽自己，以免正视事情的真实状态。带有严肃与克己特征的谦逊，这个时代无法喜爱；但是，有什么东西比谦虚更漂亮，更无往而不胜的呢？什么样的德行初一看与谦逊如此相像，尽管事实上它离真正的谦逊不止十万八千里呢？实际上，谦虚尽管有很大的魅力，却不是德行中最深刻或最富宗教意味的。其实，它是灵魂斗士的前卫或哨兵，持续监视着它与世人初起的交流。它传遍人的各样感官，体现在人的表情上，保护人的眼睛与耳朵，支配声音与手势。它负责人的外部举止，正如有的德行则与神的事务相关，有的德行与社会相关，再有一些德行与心智本身相关。由于跟其他德行比较起来更加肤浅，所以，它更容易脱离其他德行。谦虚允许自己与天然相异的原则或品质产生联系，因此经常被当作掩盖一些情感或目的的外衣，而给予我们这外衣，从来都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它根本就不是衡量谦逊的必要指标，反倒很容易与傲慢相配。对哲学的目的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了。它不可能做到谦逊，谦虚如此直接就成为它的谦逊。

Pride, under such training, instead of running to waste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mind, is turned to account; it gets a new name; it is called self-respect; and ceases to be the disagreeable, uncompanionable quality which it is in itself. Though it be the motive principle of the soul, it seldom comes to view; and when it

shows itself, then delicacy and gentleness are its attire, and good sense and sense of honour direct its motions. It is no longer a restless agent, without definite aim; it has a large field of exertion assigned to it, and it subserves those social interests which it would naturally trouble. It is directed into the channel of industry, frugality, honesty, and obedience; and it becomes the very staple of the religion and morality held in honour in a day like our own. It becomes the safeguard of chastity, the guarantee of veracity, in high and low; it is the very household god of society, as at present constituted, inspiring neatness and decency in the servant girl, propriety of carriage and refined manners in her mistress, uprightness, manliness, and generosity in the head of the family. It diffuses a light over town and country; it covers the soil with handsome edifices and smiling gardens; it tills the field, it stocks and embellishes the shop. It is the stimulating principle of providence on the one hand, and of free expenditure on the other; of an honourable ambition, and of elegant enjoyment. It breathes upon the face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hollow sepulchre is forthwith beautiful to look upon.

经过这样的训练，傲慢没有在心智的教育中被搁置一边，而是被加以利用。它得到一个新的名字，即自尊；从此不再是那种令人厌恶和难以交往的品质，但事实上这就是其本质。尽管它是灵魂的动机性原则，却很少为人所发现。当它显示自身时，就会披上精致与温和的外衣，良好判断力和荣誉感会引领它的行动。它不再是没有确定目的和躁动不安的因素，它有很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它原本不利于社会利益，但此时对其却能大力促进。它被引向勤奋、节俭、诚实和顺从的通道；它在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变成被人尊敬的重要的宗教与道德主题。它在社会各阶层成为贞洁的护卫者和诚实的保证。在目前这个社会结构中，它对家庭起到了主宰作用，它促使女仆保持整洁与体面，让女主人有得体的步态与优雅举止，让一家之长保持正直、勇

敢及慷慨的品质。它在城镇与乡村的上空撒下一道光芒；它用漂亮的楼房和绽放的花园覆盖大地；它使人们耕作田地，它充实并装点店铺。它一方面鼓励人们深谋远虑，另外一方面又刺激人们随意花费；它既激发雄心壮志，也倡导高雅享受。它的价值体现在维持社会美好的颜面上，空的墓穴因此看起来也十分美好。

Refined by the civilization which has brought it into activity, this self-respect infuses into the mind an intense horror of exposure, and a keen sensitiveness of notoriety and ridicule. It becomes the enemy of extravagances of any kind; it shrinks from what are called scenes; it has no mercy on the mock-heroic, on pretence or egotism, on verbosity in language, or what is called prosiness in conversation. It detests gross adulation; not that it tends at all to the eradication of the appetite to which the flatterer ministers, but it sees the absurdity of indulging it, it understands the annoyance thereby given to others, and if a tribute must be paid to the wealthy or the powerful, it demands greater subtlety and art in the preparation. Thus vanity is changed into a more dangerous self-conceit, as being checked in its natural eruption. It teaches men to suppress their feelings, and to control their tempers, and to mitigate both the severity and the tone of their judgments. As Lord Shaftesbury would desire, it prefers playful wit and satire in putting down what is objectionable, as a more refined and good-natured, as well as a more effectual method, than the expedient which is natural to uneducated minds. It is from this impatience of the tragic and the bombastic that it is now quietly but energetically opposing itself to the unchristian practice of duelling, which it brands as simply out of taste, and as the remnant of a barbarous age; and certainly it seems likely to effect what Religion has aimed at abolishing in vain.

这种自尊得到使它活跃起来的那种文明的提炼，它使人对抛头露面产生一种强烈的恐惧，对出丑与嘲讽极度敏感。它这就成了任何类型的过度言行的大敌；它回避当众出丑的事情，它对伪英雄主义，虚伪或自负，对冗长或单调的对话都毫不留情。它鄙视公然谄媚；并不是因为它根本有意根除谄媚者试图满足的那种贪欲，而是因为它看出这种做法的荒谬可笑。它明白这么做会给他人带来多大的厌恶感，假如非得给有钱有势的人贡奉礼物，那也必须做得十分巧妙，要做足功夫。这样，由于并不能随意爆发，虚荣就变成了更危险的一种自负。它教导人们压抑情感，控制脾气，说话留有分寸，不可武断地下结论。沙夫茨伯里勋爵可能很喜欢看到这种情形，它更喜欢以幽默性的智巧与讽刺迎击令人反感的东西，跟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自然会想出来的权宜之计相比，这是更文雅，更和善，也是更有效果的方法。正是因为对不幸事件与唱高调的行为不耐烦，它现在就开始悄悄地，但又十分积极地反对决斗这种粗野行为。它给决斗贴上缺少品位的标签，认为它是野蛮时代的残留物。当然，宗教一直想废除但没有废除掉的这一恶习，它觉得有可能废除掉。

10．

10．

Hence it is that it is almost a definition of a gentleman to say he is one who never inflicts pain. This description is both refined and, as far as it goes, accurate. He is mainly occupied in merely removing the obstacles which hinder the free and unembarrassed action of those about him; and he concurs with their movements rather than takes the initiative himself. His benefits may be considered as parallel to what are called comforts or conveniences in arrangements of a personal nature: like an easy chair or a good

fire, which do their part in dispelling cold and fatigue, though nature provides both means of rest and animal heat without them. The true gentleman in like manner carefully avoids whatever may cause a jar or a jolt in the minds of those with whom he is cast;—all clashing of opinion, or collision of feeling, all restraint, or suspicion, or gloom, or resentment; his great concern being to make every one at their ease and at home. He has his eyes on all his company; he is tender towards the bashful, gentle towards the distant, and merciful towards the absurd; he can recollect to whom he is speaking; he guards against unseasonable allusions, or topics which may irritate; he is seldom prominent in conversation, and never wearisome. He makes light of favours while he does them, and seems to be receiving when he is conferring. He never speaks of himself except when compelled, never defends himself by a mere retort, he has no ears for slander or gossip, is scrupulous in imputing motives to those who interfere with him, and interprets every thing for the best. He is never mean or little in his disputes, never takes unfair advantage, never mistakes personalities or sharp sayings for arguments, or insinuates evil which he dare not say out. From a long-sighted prudence, he observes the maxim of the ancient sage, that we should ever conduct ourselves towards our enemy as if he were one day to be our friend. He has too much good sense to be affronted at insults, he is too well employed to remember injuries, and too indolent to bear malice. He is patient, forbearing, and resigned, on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he submits to pain, because it is inevitable, to bereavement, because it is irreparable, and to death, because it is his destiny. If he engages in controversy of any kind, his disciplined intellect preserves him from the blundering discourtesy of better, perhaps, but less educated minds; who, like blunt weapons, tear and hack instead of cutting clean, who mistake the point in argument, waste their strength on trifles, misconceive their adversary, and leave the question more involved than they

find it. He may be right or wrong in his opinion, but he is too clear-headed to be unjust; he is as simple as he is forcible, and as brief as he is decisive. Nowhere shall we find greater candour, consideration, indulgence: he throws himself into the minds of his opponents, he accounts for their mistakes. He knows the weakness of human reason as well as its strength, its province and its limits. If he be an unbeliever, he will be too profound and large-minded to ridicule religion or to act against it; he is too wise to be a dogmatist or fanatic in his infidelity. He respects piety and devotion; he even supports institutions as venerable, beautiful, or useful, to which he does not assent; he honours the ministers of religion, and it contents him to decline its mysteries without assailing or denouncing them. He is a friend of religious toleration, and that, not only because his philosophy has taught him to look on all forms of faith with an impartial eye, but also from the gentleness and effeminacy of feeling, which is the attendant on civilization.

正是这样，一个从不给别人施加痛苦的人，几乎就可以定义为绅士。这样的描述不仅精炼，而且就现状而言还十分准确。他主要的职责仅仅是搬走阻挡周边人自由和体面行动的那些障碍物；他从不率先做任何事情，凡事随大流而动。他的益处也许等同于为私人提供舒适或便利的装置：像是一把安乐椅或是一堆炉火，炉火与椅子可去除寒冷和疲劳，因此尽到其本分。虽然即使没有这些东西，自然也会提供休息与保持体温的手段。同样，真君子会小心避免任何使身边人惊慌不安、心神不宁的事情，如意见的冲突、情感的碰撞、各种约束、阴郁、猜疑或愤恨。他最关心的是如何让大家太平无事、身心安康。他留心身边的同伴，对羞怯者温柔敦厚，对冷漠者礼貌温和，对荒谬可笑的人仁慈宽厚。他想得起来跟谁说过话，他小心避免不合时宜的暗示或可能刺激他人的话题。他在谈话中很少抢人话头，也从不显出疲态。他奉献时从不自吹自擂，甚至看起来像是在获取。除非万不得已，他从不谈及自己；从不反驳以为自己辩解；他听不惯诽谤或闲言

碎语，对于妨碍自己的人，他耐心地讲道理；他凡事总往好里想。万一遇上纠纷，他从不动用卑劣低贱的手段，从不占不公平的优势，从不错拿诽谤或刺耳言论当说理，不因为不敢公开声明就指桑骂槐。他眼光远大，因而行事审慎，他谨记古代贤哲的格言：纵使眼前之敌，宜视为明日之友。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因而不会一遭辱骂就顿觉受了冒犯；他终日忙于正事，因而无暇记恨伤害；宁可装聋作哑，不愿心怀恶意。他牢记哲学原则，耐心，克制，逆来顺受；他甘受痛苦，因为痛苦不可避免；他能忍受丧亲之苦，因为人死不能复生；他能接受死亡，因为这是人的命运。万一卷入某种争辩，他受过训练的才智会给予他保护，不会受到也许比自己更善辩、却缺乏教养者的粗鲁言行的伤害。因这样的人就如同钝器，只能撕裂劈砍而不会快刀斩乱麻，他们搞不清争论的焦点何在，在琐屑的事情上浪费精力，误解辩论对手，结果让事情比他们看上去的样子更复杂棘手。他的见解或对或错，但他头脑极清醒，不至于言行不公；他行事简单又有力，他坚决果断且简明扼要。我们不可能在别的任何地方发现更正直、更关心他人、更专心至致的人了：他站在对手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他说明对手错误的原因。他明白人类理性的长处和短处、范围和局限。就算不信神，他也是如此深沉和心胸开阔，不至于讥讽宗教或与宗教作对。他智慧过人，不至于成为教条主义者或狂热的不信教分子。他尊敬虔诚与奉献之人；哪怕并不赞成的习俗，他也将其当作可敬、美好或有用的事物加以支持；他尊重教会牧师，虽然否认宗教奥秘，但仅限于减少其神秘色彩，并不会因此而大加攻击和谴责。他是宗教宽容的朋友，之所以这样，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哲学教导他要以不偏不倚的眼光看待所有形式的信仰，而且还要对其抱有温和细腻的情感，而这正是文明的侍者。

Not that he may not hold a religion too, in his own way, even when he is not a Christian. In that case his religion is one of imagination and sentiment; it is the embodiment of those ideas of the sublime, majestic, and beautiful, without which there can be no large philosophy. Sometimes he acknowledges the being of God,

sometimes he invests an unknown principle or quality with the attributes of perfection. And this deduction of his reason, or creation of his fancy, he makes the occasion of such excellent thoughts, and the starting-point of so varied and systematic a teaching, that he even seems like a disciple of Christianity itself. From the very accuracy and steadiness of his logical powers, he is able to see what sentiments are consistent in those who hold any religious doctrine at all, and he appears to others to feel and to hold a whole circle of theological truths, which exist in his mind no otherwise than as a number of deductions.

哪怕并不是基督徒，也不见得他就不能以自己的方式拥有一门宗教。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宗教就是出自想象力与情操的宗教，这宗教是崇高、庄严与美的概念的体现，没有这样的概念，就不可能有广博的哲学。有时候他承认上帝存在，有时候他以完美的诸般属性注入一种未知的原则或品质。他利用自己理性推论的结果或想象力的创造物，去构建卓越的思想，去作为多变且系统化的说教的起点，结果他看起来很像是基督教自身的门徒。他的逻辑能力精确而稳健，他能据以明白，在真正持有任何宗教信条的人们当中，哪些情操是始终如一的，而且在他人看来，他能感觉到并坚守一整套的神学真理，这些神学真理在他的脑海中不过是若干逻辑推论结果。

Such are some of the lineaments of the ethical character, which the cultivated intellect will form, apart from religious principle. They are seen within the pale of the Church and without it, in holy men, and in profligate; they form the *beau-ideal* of the world; they partly assist and partly dist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tholic. They may subserve the education of a St. Francis de Sales or a Cardinal Pole; they may be the limits of the contemplation of a Shaftesbury or a Gibbon. Basil and Julian were fellow-students at

the schools of Athens; and one became the Saint and Doctor of the Church, the other her scoffing and relentless foe.

除宗教原则外，这些就是受过教育的才智会形成的伦理品格的特征。这些在教会内外，在圣贤者和在挥霍者当中都能看到。它们构成世人至善之美的概念；它们一方面促进，一方面扭曲天主教的发展。它们可能促进能培养出圣弗朗西斯德赛尔主教或蒲尔枢机主教的教育，它们也可能限制沙夫茨伯里勋爵或吉本之类哲学家的沉思。巴西勒和尤里安曾是雅典求学期间的同学，前者成为圣徒及教会神学家，后者却成为讥笑教会的大敌。

[9_1].I do not consider I have said above any thing inconsistent with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ardinal Gerdil, though I have enlarged on the favourable side of Julian's character. "Du génie, des connaissances, de l'habilité dans le métier de la guerre, du courage et du désintéressement dans le commandement des armées, des actions plutôt que des qualités estimables, mais le plus souvent gâtées par la vanité qui en était le principe, la superstition jointe à l'hypocrisie; un esprit fécond en ressources éclairé, mais susceptible de petitesse; des fautes essentielles dans le gouvernement; des innocens sacrifiés à la vengeance; une haîne envenimée contre le Christianisme, qu'il avait abandonné; un attachement passionné aux folies de la Théurgie; tels étaient les traits sous lesquels on nous preignait Julien." Op. t. x. p. 54.

[9_2].Gibbon, Hist., ch. xxiv.

[10_1].虽然我详述了朱利安性格中光彩的一面，但是，我并不觉得自己所说的话与下面引自枢机主教杰尔第的一段话有什么矛盾之处。“具有战争的才华、知识和能力，统帅军队勇猛而无私，值得称道的是其行为而非品质，但多沾染上作为战争原则的虚荣心，迷信与虚伪结伴；一种富于启蒙才智的精神，但易受细枝末节的影响；由于政府的根本错误，无辜者成了复仇的牺牲品；对它已经放弃的基督教怀着恶毒的仇恨；疯狂地着迷于巫术神力，人们用来描述朱里安的就是这些特征。”（该段引文原文为法文，转引自高师宁等译，《大学的理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二百八十四页。）

[10_2].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十四章。

Discourse 9. Duties of the Church Towards Knowledge

第九讲：教会对知识的责任

1．

1．

I have to congratulate myself, Gentlemen, that at length I have accomplished, with whatever success, the difficult and anxious undertaking to which I have been immediately addressing myself. Difficult and anxious it has been in truth, though the main subject of University Teaching has been so often and so ably discussed already; for I have attempted to follow out a line of thought more familiar to Protestants just now than to Catholics, upon Catholic grounds. I declared my intention, when I opened the subject, of treating it as a philosophical and practical, rather than as a theological question, with an appeal to common sense, not to ecclesiastical rules; and for this very reason, while my argument has been less ambitious, it has been deprived of the lights and supports which another mode of handling it would have secured.

诸位，我得向自己道贺了，眼前这件我一直全力以赴、难办又必须紧迫的事情，现在总算办好了，不管好到哪种程度。这的确是件难办又必须马上办妥的事情，尽管大学教育这个主题向来都有很多能干的人在讨论，因为我尝试着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却按照对新教徒而非天主教徒更熟悉的思路处理此事。从一开始，我便表明了自己的意

图，是要拿这主题当作哲理的、实际的，而非神学的问题来探讨。我着意于常识而非教会条例。正是这个原因，尽管我的论证并没有那么雄心勃勃，却还是不得不略去许多视角与论据，如果换成其他处理方式是本可放心使用的。

No anxiety, no effort of mind is more severe than his, who in a difficult matter has it seriously at heart to investigate without error and to instruct without obscurity; as to myself, if the past discussion has at any time tried the patience of the kind persons who have given it their attention, I can assure them that on no one can it have inflicted so great labour and fatigue as on myself. Happy they who are engaged in provinces of thought, so familiarly traversed and so thoroughly explored, that they see every where the footprints, the paths, the landmarks, and the remains of former travellers, and can never step wrong; but for myself, Gentlemen, I have felt like a navigator on a strange sea, who is out of sight of land, is surprised by night, and has to trust mainly to the rules and instruments of his science for reaching the port. The everlasting mountains, the high majestic cliffs, of the opposite coast, radiant in the sunlight, which are our ordinary guides, fail us in an excursion such as this; the lessons of antiquity, the determinations of authority, are here rather the needle, chart, and plummet, than great objects, with distinct and continuous outlines and completed details, which stand up and confront and occupy our gaze, and relieve us from the tension and suspense of our personal observation. And thus, in spite of the pains we may take to consult others and avoid mistakes, it is not till the morning comes and the shore greets us, and we see our vessel making straight for harbour, that we relax our jealous watch, and consider anxiety irrational. Such in a measure has been my feeling in the foregoing inquiry; in which indeed I have been in want neither of authoritative principles nor distinct precedents, but of

treatises *in extenso* on the subject on which I have written,—the finished work of writers, who, by their acknowledged judgment and erudition, might furnish me for my private guidance with a running instruction on each point which successively came under review.

处理麻烦事时，人若殚精竭虑，希望进行不出错漏的调查，作出清晰明确的说明，那他感受的焦虑、搜索枯肠的辛苦，恐非他人能比。至于我本人，假如过去的讨论曾让关心此事的善心人士颇不耐烦，那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他们，我为此付出的劳动和感受到的疲劳无人能比。思想领域从来不乏有人进入并进行彻底探索，进入该领域的那些人真是幸福，他们处处都可看到足迹、小道、地标和先前的旅行者留下的东西，因而总不会迈错步。但对我自己来说，先生们，我感觉像是陌生大海上的领航员，看不到陆地的影子，夜幕降临时担惊受怕，主要只有依靠航海学的规则和仪器去探寻港口。对面海岸延绵不断的山脉和高耸入云的峭壁，在阳光之下光芒四射，这些寻常的引路标志，在如今这次远足中都找不到踪影。古代遗下的教训、权威部门的测定数据，在这里不过是指针、航海图与铅锤，而不是任何高大物体，没有清晰明确和连续不断的轮廓以及完整的细节呈现出来直面我们，让我们凝视，借以消除我们个人观察中的紧张与焦虑。因此，我们虽然也费了力气去询问他人意见从而避免犯错，但直到早晨到来，海岸初现，我们发现自己的船只直奔港口，才放松了疑视疑鬼的警戒，觉得自己的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这就是本人在前述探索中的大致感受。的确，我既不缺权威性的原则，又不缺明显的先例，但缺少我已经动笔探索过的这个主题上的完整论著，就是一些著作者已经完成的作品，这样的话，他们就能以公认的判断力和博学多闻的见识充实我，充当我的私人导航，不停地为我指点沿途所见的点点滴滴。

I have spoken of the arduousness of my “immediate” undertaking, because what I have been attempting has been of a preliminary nature, not contemplating the duties of the Church

towards a University, n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University which is Catholic, but inquiring what a University is, what is its aim, what its nature, what its bearings. I have accordingly laid down first, that all branches of knowledge are, at least implicitly, the subject-matter of its teaching; that these branches are not isolated and independent one of another, but form together a whole or system; that they run into each other, and complete each other, and that, in proportion to our view of them as a whole, is the exactness and trustworthiness of the knowledge which they separately convey; that the process of imparting knowledge to the intellect in this philosophical way is its true culture; that such culture is a good in itself; that the knowledge which is both its instrument and result is called Liberal Knowledge; that such culture, together with the knowledge which effects it, may fitly be sought for its own sake; that it is, however, in addition, of great secular utility, as constituting the best and highest formation of the intellect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and lastly, that, considered in a religious aspect, it concurs with Christianity a certain way, and then diverges from it; and consequently proves in the event, sometimes its serviceable ally, sometimes, from its very resemblance to it, an insidious and dangerous foe.

我已经谈到“眼前”这件事情的艰辛，因为我一直在努力完成的这件事情，还只是初步性质的，此时还没有考虑教会对大学的责任，也没有涉及天主教大学的特征，而只是谈及什么是大学，其目标、性质及定位。我相应地作了如下说明。首先，知识的各个分支至少在隐性的层面上包含在大学教学的内容里。这些分支并非孤立和相互独立的，而是构成一个整体或体系。它们彼此交错，相互完善，并且我们越是将它们当作一个整体，它们分别传递的知识的精确度与可信赖程度就越高。以这种哲理方法向才智传授知识的过程，才是真正的大学教育。这教育本身即是一项益处。既是大学教育的工具又是其结果的知识，就称为通识知识。这种教育与实现这种教育效果的知识一起，

自身就可以成为适当的追求目标。但是，除此之外，它还具有极大的世俗用途，因它为社会和政治生活构成了最佳和最高形式的才智。最后，从宗教层面看，它与基督教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然后又偏离了基督教。结果证明，有时它是基督教有用的盟友，另外一些时候，由于彼此有太多相似之处，因而是基督教潜伏和危险的敌人。

Though, however, these Discourses have only professed to be preliminary, being directed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object and nature of the Education which a University professes to impart, at the same time I do not like to conclude without making some remarks upon the duties of the Church towards it, or rather on the ground of those duties. If the Catholic Faith is true, a University cannot exist externally to the Catholic pale, for it cannot teach Universal Knowledge if it does not teach Catholic theology. This is certain; but still, though it had ever so many theological Chairs, that would not suffice to make it a Catholic University; for theology would be included in its teaching only as a branch of knowledge, only as one out of many constituent portions, however important a one, of what I have called Philosophy. Hence a direct and active jurisdiction of the Church over it and in it is necessary, lest it should become the rival of the Church with the community at large in those theological matters which to the Church are exclusively committed,—acti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tellect, as the Church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ligious principle. The illustration of this proposition shall be the subject of my concluding Discourse.

我一直声称，这些讲论都只是初步性质的，研究针对的是大学宣称要传递的那种教育的目标及性质。但同时，要做出一个结论的话，我希望能就教会在大学教育中的责任，或就这些责任的立场说上几句

话。假如天主教信仰为真，大学就无法外在于天主教的影响而存在，如果大学不讲授天主教神学，它就无法传授普遍知识。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尽管大学已经有了如此之多的神学教席，那也不足以说明它就是一所天主教大学。因为在这样的大学里，神学仅只是作为一门知识分支，仅作为我称为哲学的许多构成部分之一包括在大学教学中，而无论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此，教会就有必要对大学内外的事务进行直接有效的管辖，不然的话，在专托于教会的神学事务上，在广义的社会里，大学会成为教会的竞争者。它会作为才智的代表而发挥作用，正如教会是宗教原则的代表。在最后作结的讲论里，我会详细说明这个主张。

2．

2．

I say then, that, even though the case could be so that the whole system of Catholicism was recognized and professed, without the direct presence of the Church, still this would not at once make such a University a Catholic Institution, nor be sufficient to secure the due weight of religious considerations in its philosophical studies. For it may easily happen that a particular bias or drift may characterize an Institution, which no rules can reach, nor officers remedy, nor professions or promises counteract. We have an instance of such a case in the Spanish Inquisition;—here was a purely Catholic establishment, devoted to the maintenance, or rather the ascendancy of Catholicism, keenly zealous for theological truth, the stern foe of every anti-Catholic idea, and administered by Catholic theologians; yet it in no proper sense belonged to the Church. It was simply and entirely a State institution, it was an

expression of that very Church-and-King spirit which has prevailed in these islands; nay, it was an instrument of the State, according to the confession of the acutest Protestant historians, in its warfare against the Holy See. Considered "*materially* ," it was nothing but Catholic; but its spirit and form were earthly and secular, in spite of whatever faith and zeal and sanctity and charity were to be found in the individuals who from time to time had a share in its administration. And in like manner, it is no sufficient security for the Catholicity of a University, even that the whole of Catholic theology should be professed in it, unless the Church breathes her own pure and unearthly spirit into it, and fashions and moulds its organization, and watches over its teaching, and knits together its pupils, and superintends its action.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came into collision with the supreme Catholic authority, and that, from the fact that its immediate end was of a secular character;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whereas Academical Institutions (as I have been so long engaged in showing) are in their very nature directed to social, national, temporal objects in the first instance, and since they are living and energizing bodies, if they deserve the name of University at all, and of necessity have some one formal and definite ethical character, good or bad, and do of a certainty imprint that character on the individuals who direct and who frequent them, it cannot but be that, if left to themselves, they will, in spite of their profession of Catholic Truth, work out results more or less prejudicial to its interests.

我要说，哪怕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没有教会的直接参与，整个天主教体系也会在大学得到公认，也会有人信仰，可是，这仍然不足以使这样一所大学立即变成天主教的机构，也不足以确保宗教学说在其哲理研究中的适当分量。因为极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即某种特别的偏见或偏差会使一个机构带上某种特征，一旦如此，则什

么规范也无法纠正，什么官员也无法救治，什么宣誓或许诺也无法挽回。西班牙宗教法庭就是这么一个实例。它原本是纯天主教的设施，专门从事护持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说保持天主教优势的工作，极其热心于神学真理，是任何反天主教思想的大敌，并且是由天主教的神学家来进行管理的。可是，从任何适当的意义来说，它都不属于天主教会，而完全就是一个国家机构，体现出了曾盛行于这个岛国的那种“教会与国王”的精神。不仅如此，根据最敏锐的新教史学家的坦白，它还曾在针对圣座发动的战争中充当国家工具。从“物质”上看，它不是别的，就是天主教的；但是，其精神与形式都是现世的，俗世的，无论从不时担任其管理工作的那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信念、热情、圣洁与慈爱。同样，即便全部的天主教神学在这样的大学里为人公开承认，也不是一所大学成为天主教大学的足够保障，除非教会将它自己纯净和非尘世的气息吹拂进这样的大学，改革并塑造其体制，监督其教学，将它的学生团结起来，并指挥其行动。西班牙宗教法庭后来与天主教的最高权威发生冲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直接目的是世俗的。同样，学术机构（我一直在尽心说明）就其本质而言，原本最初就是针对社会、民族和现世目标的，而且由于它们是有生命力的和活力的团体，如果他们大学的名称名副其实的话，就必然会具备某种正式和确定的、无论好坏的伦理特征，并一定会给指导办学及经常出入学校的那些人打上这种特征的烙印。出于这个原因，事情就一定会是这样的：假如放任不管，大学就会造成多少不利于天主教利益的结果，哪怕它们承认天主教的真理。

Nor is this all: such Institutions may become hostile to Revealed Truth, in consequence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teaching as well as of their end. They are employed in the pursuit of Liberal Knowledge, and Liberal Knowledge has a special tendency, not necessary or rightful, but a tendency in fact, when cultivated by beings such as we are, to impress us with a mer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life and conduct, in the place of Revelation. I have said much on this subject already. Truth has two attributes—beauty and

power; and while Useful Knowledge is the possession of truth as powerful, Liberal Knowledge is the apprehension of it as beautiful. Pursue it, either as beauty or as power, to its furthest extent and its true limit, and you are led by either road to the Eternal and Infinite, to the intimations of conscience and the announcements of the Church. Satisfy yourself with what is only visibly or intelligibly excellent, as you are likely to do, and you will make present utility and natural beauty the practical test of truth, and the sufficient object of the intellect. It is not that you will at once reject Catholicism, but you will measure and proportion it by an earthly standard. You will throw its highest and most momentous disclosures into the background, you will deny its principles, explain away its doctrines, re-arrange its precepts, and make light of its practices, even while you profess it. Knowledge, viewed as Knowledge, exerts a subtle influence in throwing us back on ourselves, and making us our own centre, and our mind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This then is the tendency of that Liberal Education, of which a University is the school, viz., to view Revealed Religion from an aspect of its own,—to fuse and recast it, —to tune it, as it were, to a different key, and to reset its harmonies,—to circumscribe it by a circle which unwarrantably amputates here, and unduly develops there; and all under the notion,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that the human intellect, self-educated and self-supported, is more true and perfect in its ideas and judgments than that of Prophets and Apostles, to whom the sights and sounds of Heaven were immediately conveyed. A sense of propriety, order, consistency, and completeness gives birth to a rebellious stirring against miracle and mystery, against the severe and the terrible.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这样的学业机构，可能受其目的和教学的

情况影响而对启示真理产生敌意。这些机构忙于追求通识知识，而如果这种通识知识是由我们这样的人来进行灌输的，则它会有一个特别趋向，虽然不必要，也不一定合理，但事实上毕竟就是一个趋向，即它会以纯粹的关于人生和行为的哲学理论来影响我们，以代替启示真理。关于这一话题，我已经说过很多了。真理有两个属性：美与力量。有用的知识利用真理，因此有力；而通识知识理解真理，因此为美。追求真理，或者作为美，或者作为力量来追求它，而且要追到尽头，追到极致，这样，随便哪一条路都会引领我们到达永恒与无限，到达良知的暗示与教会的昭告。满足于仅仅可见或易于理解的卓越事物，是我们最可能产生的心态，这样，我们实际上就会把当前的实用性和自然之美当作对真理的检验，并充分将其当作才智的目标。并不是说，我们因此就会立即排斥天主教，但是，我们会用尘世的标准来权衡和估量它。我们哪怕宣誓信奉天主教，却仍然会将它透露出来的最高和最重要的奥秘扔弃在一边，会否定它的原则，搪塞它的教义，调整它的戒律，看轻它的做法。作为知识看待的知识，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影响，使我们依靠自身，让自己成为中心，让我们的思想成为万物的尺度。这就是那种通识教育的倾向了，大学就是进行这种教育的学校，也就是说，从它自身的某个层面来看待启示宗教，就是要熔化和重铸它，可以说是要将它调整到一个不同的琴键上，并重置它的和音；是要在它周围划界线，使其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这里割掉一块，那里又不适当地长出一块。这些做法有意无意都出自同一个观念，即以为自我教育、自我支撑的人类才智，在其概念和辨别力上比先知和使徒更真实、完善，哪管天国的景象和声音都是直接传达给后者的。一种适当、有序、一致和完整的感觉，使人滋生出针对神迹和奥秘，针对严峻和可怕事物的逆反情绪。

This Intellectualism first and chiefly comes into collision with precept, then with doctrine, then with the very principle of dogmatism;—a perception of the Beautiful becomes the substitute for faith. In a country which does not profess the faith, it at once runs, if allowed, into scepticism or infidelity; but even within the

pale of the Church, and with the most unqualified profession of her Creed, it acts, if left to itself, as an element of corruption and debility. Catholicism, as it has come down to us from the first, seems to be mean and illiberal; it is a mere popular religion; it is the religion of illiterate ages or servile populations or barbarian warriors; it must be treated with discrimination and delicacy, corrected, softened, improved, if it is to satisfy an enlightened generation. It must be stereotyped as the patron of arts, or the pupil of speculation, or the protégé of science; it must play the literary academician, or the empirical philanthropist, or the political partisan; it must keep up with the age; some or other expedient it must devise, in order to explain away, or to hide, tenets under which the intellect labours and of which it is ashamed—its doctrine, for instance, of grace, its mystery of the Godhead, its preaching of the Cross, its devotion to the Queen of Saints, or its loyalty to the Apostolic See. Let this spirit be freely evolved out of that philosophical condition of mind, which in former Discourses I have so highly, so justly extolled, and it is impossible but, first indifference, then laxity of belief, then even heresy will be the successive results.

这种理智主义最初而且主要与教规发生冲突，之后与教义冲突，然后与独断论原则本身发生冲突。对美好事物的感知替代了信仰。在并不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它立马就会落入怀疑主义或无信仰状态。但是，哪怕在教会的范围之内，由于对教会信条最不合格的宣誓，假如任其发展，它就会起到腐败与削弱的作用。从最开始一直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天主教，似乎十分低劣和粗鄙；它仅仅是一门大众宗教；是一个不识字的时代、一个奴性人群或野蛮武士的宗教。如果希望满足受过启蒙的一代人，那就必须仔细认真地对待它、修正它、改进它，并使它变得温和。它必须要沿用旧式，做艺术赞助人，或善于思辨的学者，或科学的门徒；它必须要扮演精通文学的院士，或是以经

验为依据的慈善家，或从政的党派人士的角色；它必须跟上时代。它必须想出这样那样的权宜之计，以便搪塞或隐藏信条，才智必须本着这样的信条发挥效用；它还要搪塞和隐藏颇以为耻的东西，比如它关于神恩的教义，它关于神格的奥秘，它关于十字架的劝诫，它对众圣之女王圣母马利亚的热爱，或对罗马教会的忠诚。我在以前的演讲中已高度、恰当地赞扬过心智的哲学状态，就让这种精神从中自由地演化出来吧；随之而来的结果，首先是冷漠，其次是信仰的松弛，最后甚至是邪说的产生。

Here then are two injuries which Revelation is likely to sustain at the hands of the Masters of human reason unless the Church, as in duty bound, protects the sacred treasure which is in jeopardy. The first is a simple ignoring of Theological Truth altogether, under the pretence of not recognising differences of religious opinion,—which will only take place in countries or under governments which have abjured Catholicism. The second, which is of a more subtle character, is a recognition indeed of Catholicism, but (as if in pretended mercy to it) an adulteration of its spirit. I will now proceed to describe the dangers I speak of more distinctly, by a reference to the general subject-matter of instruction which a University undertakes.

在人类理性大师手里，启示有可能要遭受两种伤害，除非教会义不容辞地保护处在危险中的神圣宝藏。第一种伤害是，人们会借着弄不清宗教见解的差别的名义完全漠视神学真理；而弄不清宗教见解的差别的情形，只有在公然放弃天主教的国家或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之下才会发生。第二种伤害性质更微妙，虽然它当真承认天主教教义，但（好像对它装出一种仁慈）掺杂了天主教精神之外的东西。接下来，我要借用大学教学中的一般主题来更明确地描述我所说的这两种危险。

There are three great subjects on which Human Reason employs itself:—God, Nature, and Man; and theology being put aside in the present argument,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worlds remain. These, when respectively subjected to Human Reason, form two books: the book of nature is called Science, the book of man is called Literature. Literature and Science, thus considered, nearly constitute the subject-matter of Liberal Education; and, while Science is made to subserve the former of the two injuries, which Revealed Truth sustains,—its exclusion, Literature subserves the latter,—its corruption. Let us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each upon Religion separately.

人类理性忙于研究的共有三大主题，即上帝、自然与人。虽然在本论证中，神学已经放到一边，但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仍然保留了下来。这些主题一一进入人类理性的探索领域时，往往会构成两本书，自然之书称为科学，人之书称为文学。文学与科学，如果这么看待的话，差不多就构成了通识教育的主旨。一边是科学构成了对启示真理的两种伤害当中的前一种，也就是启示真理遭受的那一种，即对其排斥，而文学则助长了后一种，即其败坏。让我们思考这两种东西分别对宗教产生的影响。

3．

3．

(I.) As to Physical Science, of course there can be no real collision between it and Catholicism. Nature and Grace, Reason and

Revelation, come from the same Divine Author, whose works cannot contradict each other. Nevertheless,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in matter of fact, there always has been a sort of jealousy and hostility between Religion and physical philosophers. The name of Galileo reminds us of it at once. Not content with investigating and reasoning in his own province, it is said, he went out of his way directly to insult the received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theologians repelled an attack which was wanton and arrogant; and Science, affronted in her minister, has taken its full revenge upon Theology since. A vast multitude of its teachers, I fear it must be said, have been either unbelievers or sceptics, or at least have denied to Christianity any teaching, distinctive or special, over the Religion of Nature. There have indeed been most illustrious exceptions; some men protected by their greatness of mind, some by their religious profession, some by the fear of public opinion; but I suppose the run of experimentalists, external to the Catholic Church, have more or less inherited the positive or negative unbelief of Laplace, Buffon, Franklin, Priestley, Cuvier, and Humboldt. I do not of course mean to say that there need be in every case a resentful and virulent opposition made to Religion on the part of scientific men; but their emphatic silence or phlegmatic inadvertence as to its claims have implied, more eloquently than any words, that in their opinion it had no voice at all in the subject-matter, which they had appropriated to themselves. The same antagonism shows itself in the middle ages. Friar Bacon was popularly regarded with suspicion as a dealer in unlawful arts; Pope Sylvester the Second has been accused of magic for his knowledge of natural secrets; and the geographical ideas of St. Virgil, Bishop of Saltzburg, were regarded with anxiety by the great St. Boniface, the glory of England, the Martyr-Apostle of Germany. I suppose, in matter of fact, magical superstition and physical knowledge did commonly go together in those ages; however, the hostility between

experimental science and theology is far older than Christianity. Lord Bacon traces it to an era prior to Socrates; he tells us that, among the Greeks, the atheistic was the philosophy most favourable to physical discoveries, and he does not hesitate to imply that the rise of the religious schools was the ruin of science [10_1] .

（一）说到自然科学，当然它与天主教教义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冲突。自然与神恩、理性与启示，它们都来自神，神的作品不可能彼此矛盾。但也不能否认，在事实层面，宗教与自然哲学家之间总是存有某种猜忌与敌意。伽利略这个名字让我们立即意识到这一点。据说，他并不满足于探索和思考自然领域的事情，而是竭尽全力且毫无避讳地冒犯圣经广为接受的解读。神学家们击退了这种放肆和傲慢的攻击，而科学就觉得受了教会行为的冒犯，从此以后就不遗余力地报复神学。我觉得必须要说清楚的是，很多讲授自然科学的教师向来要么是不信神者，要么是怀疑主义者；至少他们在讲授自然宗教时，拒绝对基督教进行与众不同或特别的讲授。当然也有特别有名的例外，这些人得以受到保护。有的因为自身心灵伟大，有的因为自己对宗教宣誓，有的是担心公众舆论。但是，我认为，许多外在于天主教会的实验主义者一般多少继承了拉普拉斯、布丰、福兰克林、普利斯特利、居维叶和洪堡积极或消极的不信。我当然并不是想说，在这些追求科学的人士当中，每每一定会发生针对宗教的充满忿恨和恶意的对抗，但是，他们对宗教的宣言显示出的明显的沉默和冷淡的疏忽所暗示的意思，往往比说出来的话更有效果，即在他们看来，在只有他们自己才适合研究的主题中，宗教根本插不上话。这样的敌对情绪在中世纪十分显著。贝根修士被众人带有疑虑地认为曾参与不合法的秘技，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曾因掌握了自然奥秘方面的知识而被污蔑为行巫术，萨尔茨堡的主教圣维吉尔的关于地理学的观念引起了让英格兰引以为傲的德国圣徒圣博尼法斯的焦虑。我觉得，从事实上看，神秘的迷信和自然知识在那个时代常常彼此纠缠，但是，实验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敌意却比基督教还要古老。培根勋爵将这种敌意追溯至苏格拉底之前的时代。他告诉我们说，在希腊人看来，无神论的学说就是最有

利自然发现的哲学。他还毫不迟疑地暗示说，宗教学派兴起之日，就是科学毁灭之时。 [11_1]

Now, if we would investigate the reason of this opposition between Theology and Physics, I suppose we must first take into account Lord Bacon's own explanation of it. It is common in judicial inquiries to caution the parties on whom the verdict depends to put out of their minds whatever they have heard out of court on the subject to which their attention is to be directed. They are to judge by the evidence; and this is a rule which holds in other investigations as far as this, that nothing of an adventitious nature ought to be introduced into the process. In like manner, from religious investigations, as such, physics must be excluded, and from physical, as such, religion; and if we mix them, we shall spoil both. The theologian, speaking of Divine Omnipotence, for the time simply ignores the laws of nature as existing restraints upon its exercise; and the physical philosopher, on the other hand, in his experiments upon natural phenomena, is simply ascertaining those laws, putting aside the question of that Omnipotence. If the theologian, in tracing the ways of Providence, were stopped with objections grounded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physical miracles, he would justly protest against the interruption; and were the philosopher, who was determining the motion of the heavenly bodies, to be questioned about their Final or their First Cause, he too would suffer an illogical interruption. The latter asks the cause of volcanoes, and is impatient at being told it is “the divine vengeance;” the former asks the cause of the overthrow of the guilty cities, and is preposterously referred to the volcanic action still visible in their neighbourhood. The inquiry into final causes for the moment passes over the existence of established laws; the inquiry into physical, passes over for the moment the existence of God. In

other words, physical science is in a certain sense atheistic, for the very reason it is not theology.

现在，假如我们要探索神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对立的原因，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培根勋爵本人对它的解释。在司法调查当中，法官常常会警告与裁定相关的各方，要他们不要理会在法庭外面听说的跟案情相关的任何说法，而应当注意案情本身。他们要凭证据断案，这条规则在其他类似调查中也很适用，即偶然性的东西不可引入这样的裁定程序。同样，在宗教探索当中，自然科学也必须要排除出去，正如在自然科学的探求中，也必须排除宗教。如若混在一起，会把两者都弄糟。神学家谈起神的全能时，会暂时完全忽略作为神力运行的现存限制的自然法则；而另外一方面，自然哲学家会在自然现象的实验中确认那些法则，并将神的全能的问题搁置一边。假如神学家在追寻神意的路径时，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自然中不可能有如此神迹，那神学家会正当地反击这种干扰行为。假如希望确定天体运动的哲学家遭遇对天体运动的最终成因或第一因的质疑，他同样会遭遇非逻辑的干扰。后者探寻火山的成因，如果有人回答那是“神的报复”，那他们会很不耐烦。而前者探究的是为何有罪的城池会被倾覆，结果有人会十分荒唐地提及仍可在附近看到的火山活动。此时，对终极成因的探索回避了确定法则的存在，而对自然成因的探索暂时回避了上帝的存在。换句话说，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属无神论的，就是因为它不是神学。

This is Lord Bacon's justification, and an intelligible one, for considering that the fall of atheistic philosophy in ancient times was a blight upon the hopes of physical science.

这就是培根勋爵所进行的辩解，而且是相当明智的辩解，即他认为，古代无神论哲学的堕落，就是自然科学希望破灭的根源。他说：

“Aristotle,” he says, “Galen, and others frequently introduce such causes as these:—the hairs of the eyelids are for a fence to the sight; the bones for pillars whence to build the bodies of animals; the leaves of trees are to defend the fruit from the sun and wind; the clouds are designed for watering the earth. All which are properly alleged in metaphysics; but in physics, are impertinent, and as *remoras* to the ship, that hinder the sciences from holding on their course of improvement, and as introducing a neglect of searching after physical causes.“ [10_2]

> “亚里士多德、盖伦和其他一些人时常推出这样一些原因，即眼睑上的睫毛是保护视力的屏障，柱状骨骼是为支撑动物的躯体，树叶是为了替果实遮阳和挡风，云彩设计用来为大地浇水。所有这些都在形而上学里都是正当的论断，但是，在自然科学中，这些解释却是不适当的。它们阻碍各学科继续其完善过程，就如同对船只造成的障碍，并使人忽略对自然原因的探索。” [11_2]

Here then is one reason for the prejudice of physical philosophers against Theology:—on the one hand, their deep satisfaction in the laws of nature indisposes them towards the thought of a Moral Governor, and makes them sceptical of His interposi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occasional interference of religious criticism in a province not religious, has made them sore, suspicious, and resentful.

这里就可以看出自然哲学家对神学产生偏见的一个理由。一方

面，它们对自然法则的极度满意使其对上帝是道德统治者这个观念极其厌恶，并使他们对这位统治者的介入产生怀疑。另外一方面，宗教批评在并非宗教领域的偶尔干扰使他们很是恼火、疑心和怨恨。

4．

4．

Another reason of a kindred nature is to be found in the difference of method by which truths are gained in theology and in physical science. Induction is the instrument of Physics, and deduction only is the instrument of Theology. There the simple question is, what is revealed? all doctrinal knowledge flows from one fountain head. If we are able to enlarge our view and multiply our propositions, it must be merely by the comparison and adjustment of the original truths; if we would solve new questions, it must be by consulting old answers. The notion of doctrinal knowledge absolutely novel, and of simple addition from without, is intolerable to Catholic ears, and never was entertained by any one who was even approaching to an understanding of our creed. Revelation is all in all in doctrine; the Apostles its sole depository, the inferential method its sole instrument, and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its sole sanction. The Divine Voice has spoken once for all, and the only question is about its meaning. Now this process, as far as it was reasoning, was the very mode of reasoning which, as regards physical knowledge, the school of Bacon has superseded by the inductive method;—no wonder, then, that that school should be irritated and indignant to find that a subject-matter remains still, in which their favourite instrument has no office; no wonder that they

rise up against this memorial of an antiquated system, as an eyesore and an insult; and no wonder that the very force and dazzling success of their own method in its own departments should sway or bias unduly the religious sentiments of any persons who come under its influence. They assert that no new truth can be gained by deduction; Catholics assent, but add that, as regards religious truth, they have not to seek at all, for they have it already. Christian Truth is purely of revelation; that revelation we can but explain, we cannot increase, except relatively to our own apprehensions; without it we should have known nothing of its contents, with it we know just as much as its contents, and nothing more. And, as it was given by a divine act independent of man, so will it remain in spite of man. Niebuhr may revolutionize history, Lavoisier chemistry, Newton astronomy; but God Himself is the author as well as the subject of theology. When Truth can change, its Revelation can change; when human reason can outreason the Omniscient, then may it supersede His work.

另一条性质类似的理由，可以从神学与自然科学追求真理的方法的差异中找到。归纳法是自然科学工具，而神学仅以演绎法作为工具。在这里，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启示出来的是什么？所有学理上的知识都出自一个源泉。假如我们能够放大自己的观点，并增多我们的命题，那这一定只能通过对原来的真理的比较与调整才能做到。假如我们要解决新问题，那就一定只能参考原来的答案。认为教理知识绝对新奇，并可从外部进行简单添加的观念，对于信天主教的人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哪怕只是初通天主教信条的人，也不会予以接纳。启示是教义中的重中之重，使徒是这启示的唯一受托人，推论法是它唯一的工具，教会权威是其唯一的核准。神的呼召只此一次，唯一的问题就是其含义。这个过程，就其是推理而论，就是培根学派的人在考虑自然科学知识的时候以归纳法取代的那种推论法。因此，毫不奇怪，他那个学派的人会十分恼怒和愤愤不平地发现，竟然还剩下一个主题

是他们最喜欢的工具派不上用场的。毫不奇怪，他们起而反对纪念这个古老方法，把它看作眼中钉和一种侮辱。他们自己的方法在其自身的研究门类里的效力和耀眼的成功，竟然会不适当地使受其影响的许多人的宗教情操动摇或产生偏差，并使他们对之产生偏见，这也不奇怪。他们宣称，演绎法得不出任何新知识；天主教徒同意，但补充说，涉及宗教真理时，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去寻找，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它。基督教的真理纯属启示真理，那种启示我们仅只能够解释而不能加添任何东西，除非这增加只是针对我们自己的理解能力而言。没有启示，我们不可能知道真理的任何内容；而有了启示，我们也只能知道真理的那么多内容，而不可能更多。由于这启示是由独立于人的神的行为给予的，因此，这启示仍然会保持独立，与人的行为无关。也许尼布尔使历史学发生了革命，拉瓦锡使化学发生革命，牛顿使天文学发生革命，但是，上帝本身却既是神学的主题和也是其作者。如果真理可以变化，则它的启示也能变化；当人类理性超越上帝这无所不知者的理性时，那它也许就可以取代神的作为了。

Avowals such as these fall strange upon the ear of men whose first principle is the search after truth, and whose starting-points of search are things material and sensible. They scorn any process of inquiry not founded on experiment; the Mathematics indeed they endure, because that science deals with ideas, not with facts, and leads to conclusions hypothetical rather than real; “Metaphysics” they even use as a by-word of reproach; and Ethics they admit only on condition that it gives up conscience as its scientific ground, and bases itself on tangible utility; but as to Theology, they cannot deal with it, they cannot master it, and so they simply outlaw it and ignore it. Catholicism, forsooth, “confines the intellect,” because it holds that God's intellect is greater than theirs, and that what He has done, man cannot improve. And what in some sort justifies them to themselves in this extravagance is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re is a religion close at their doors which, discarding so severe a

tone, has actually adopted their own principle of inquiry. Protestantism treats Scripture just as they deal with Nature; it takes the sacred text as a large collection of phenomena, from which, by an inductive process, each individual Christian may arrive at just those religious conclusions which approve themselves to his own judgment. It considers faith a mere modification of reason, as being an acquiescence in certain probable conclusions till better are found. Sympathy, then, if no other reason, throws experimental philosophers into alliance with the enemies of Catholicism.

这一类的公开宣称，在其第一原则是追求真理、其研究工作的起点是有形与可感事物的人听来甚是奇怪。并非基于实验的任何研究过程，他们都报以嘲笑。数学他们只能说是忍受，因为数学科学仅只处理概念而非事实，并导向假设而非现实结论。“形而上学”这个词，他们只是用作耻辱的代名词。说到伦理学，他们只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予以承认，即它必须放弃将良知当作其科学基础，而以切实的实用性作为基础。至于神学，他们无法应付，也无法掌握，因此干脆就放逐它，无视它。可不是吗，天主教教义会“局限才智”，因为它坚持认为上帝的才智比人的才智高，上帝已成就的一切，人不能再加以改善。能够给予他们这种放肆言行以某种程度的辩解的，就是这么一种情形，即就在他们家门前不远处竟然存在这么一种宗教，它放弃了那么严厉的口吻，实际上已经采纳了他们自己的探索原则。新教处理圣经的方式与他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一样；它拿神圣文本当一大堆现象看待，而从这些现象出发，再利用归纳法，每一个基督教徒都可从中得出符合个人判断的宗教结论。它认为信仰仅仅只是对理性的修正，是在得出更好的结论之前对某些或然性结论的默认。因此，假如不是别的原因，同情就是使实验哲学家与天主教的敌人结成同盟的因由。

5．

5．

I have another consideration to add, not less important than any I have hitherto adduced. The physical sciences, Astronomy, Chemistry, and the rest, are doubtless engaged upon divine works, and cannot issue in untrue religious conclusion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must be recollected that Revelation has reference to circumstances which did not arise till after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ere made. They were made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moral evil into the world; whereas the Catholic Church is the instrument of a remedial dispensation to meet that introduction. No wonder then that her teaching is simply distinct, though not divergent, from the theology which Physical Science suggests to its followers. She sets before us a number of attributes and acts on the part of the Divine Being, for which the material and animal creation gives no scope; power, wisdom, goodness are the burden of the physical world, but it does not and could not speak of mercy, long-suffering, and the economy of human redemption, and but partially of the moral law and moral goodness.

我还有另外一层考虑要补充进来，它与我已经引证的那些观点同等重要。各门自然科学，天文学、化学以及其他学科，无疑都参与了神圣作品的研究，因此不可能得出不正确的宗教结论。但同时，我们应当想得起来，启示所指出的一些情况，是在有了天地之后才出现的。它们是在道德之恶被引入人世之前便造就的，而天主教会就是为应对恶之入世而准备的救治工具。正是这个原因，天主教会的说教虽然与自然科学向其追随者提示的那种神学并无根本分歧，却也有明显不同。她将神圣存在者的诸多属性和作为摆在我们面前，而神的属性和作为在物质与动物的创造中是看不到尽头的。力量、智慧、善是有形世界的重担，但这世界并没有，也无法述说仁慈、忍耐以及人类救

赎的天则，而且只不过是部分地言及道德律和道德善。培根勋爵说：

“Sacred Theology,” says Lord Bacon, “must be drawn from the words and the oracles of God: not from the light of nature or the dictates of reason. It is written, that 'the Heavens declare the glory of God;' but we nowhere find it that the Heavens declare the will of God; which is pronounced a law and a testimony, that men should do according to it. Nor does this hold only in the great mysteries of the Godhead, of the creation, of the redemption… We cannot doubt that a large part of the moral law is too sublime to be attained by the light of nature; though it is still certain that men, even with the light and law of nature, have some notions of virtue, vice, justice, wrong, good, and evil.“ [10_3]

> “宗教神学必须从神的话语和谕告中抽取，而不是从自然之光或理性的原则中获得。经上说：‘诸天宣告神的荣耀’，可是，我们在哪里也看不到诸天在宣告神的意志，而这意志是作为一项律法和一条证言被宣布的，人必须遵照执行。还不光是在神性、创世、救赎等的巨大奥秘中要照此理解……毋庸置疑，道德律的很大一部分都过于崇高，无法借着自然之光达到。不过，仍然十分确定的是，哪怕借着自然之光和自然法则，人还是拥有了德行、恶行、公正、恶、善和罪的某些观念。” [11_3]

That the new and further manifestations of the Almighty, made by Revelation, are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the teaching of the natural world, forms indeed one subject of the profound work of the Anglican Bishop Butler; but they cannot in any sense be gathered

from nature, and the silence of nature concerning them may easily seduce the imagination, though it has no force to persuade the reason, to revolt from doctrines which have not been authenticated by facts, but are enforced by authority. In a scientific age, then, there will naturally be a parade of what is called Natural Theology, a wide-spread profession of the Unitarian creed, an impatience of mystery, and a scepticism about miracles.

全能者通过启示而造成的新的和进一步的显现，与自然世界的说教处在完美和谐中，这个想法的确构成了圣公会的巴特勒主教深刻作品中的一个主题。可是，这些显现绝然不可能从自然当中得到，而自然在涉及这些显现时的沉默不语，很容易就会诱发人的想象力，尽管它无力劝说理性，也无力反对没有得到事实验证而仅通过权威强加给人的那些教义。所以，在科学时代，自然而然就会有形形色色的称为自然神学的东西，有对神体一位论信条的普遍信奉，对奥秘的不耐烦，对神迹的怀疑主义。

And to all this must be added the ample opportunity which physical science gives to the indulgence of those sentiments of beauty, order, and congruity, of which I have said so much, as the ensigns and colours (as they may be called) of a civilized age in its warfare against Catholicism.

说了这么多，还得要补上自然科学给予沉湎于我已经反复论述的美、秩序和一致等的情操的充足机会，它们是一个文明时代在针对天主教教义发动的战争中使用的徽章与旗帜（不妨这么称呼它们）。

It being considered, then, that Catholicism differs from physical

science, in drift, in method of proof, and in subject-matter, how can it fail to meet with unfair usage from the philosophers of any Institution in which there is no one to take its part? That Physical Science itself will be ultimately the loser by such ill treatment of Theology, I have insisted on at great length in some preceding Discourses; for to depress unduly, to encroach upon any science, and much more on an important one, is to do an injury to all. However, this is not the concern of the Church; the Church has no call to watch over and protect Science; but towards Theology she has a distinct duty: it is one of the special trusts committed to her keeping. Where Theology is, there she must be; and if a University cannot fulfil its name and office without the recognition of Revealed Truth, she must be there to see that it is a *bonâ fide* recognition, sincerely made and consistently acted on.

因此，假如认为天主教与自然科学在旨趣、论证方法和主题上不同，那它怎么可能不遭受哲学家们对它不当使用呢？要知道没有哪一个机构中有人站在它这一边。我已经在前述几讲中不厌其烦地坚持说明，由于对神学的这种不公对待，自然科学自身最终将成为失败者，因为，不正当的压制、蚕食任何一门学科，尤其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实则是在加害于所有学科。但是，这可并不是教会忧心的事情。教会并无责任照看和保护科学，但是，她对神学有明确的职责，因为神学是交托教会负责的特别事项之一。哪里有神学，哪里就必须有教会。假如一所大学不重视启示真理，因而无法配受其名称或履行其职责，教会就必须去到那里，以保证这所大学信实如初，果如其名，且言行一致。

6．

(II.) And if the interposition of the Church is necessary in the Schools of Science, still more imperatively is it demanded in the other main constituent por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of Liberal Education,—Literature. Literature stands related to Man as Science stands to Nature; it is his history. Man is composed of body and soul; he thinks and he acts; he has appetites, passions, affections, motives, designs; he has within him the lifelong struggle of duty with inclination; he has an intellect fertile and capacious; he is formed for society, and society multiplies and diversifies in endless combinations hi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moral and intellectual. All this constitutes his life; of all this Literature is the expression; so that Literature is to man in some sort what autobiography is to the individual; it is his Life and Remains. Moreover, he is this sentient, intelligent, creative, and operative being, quite independent of any extraordinary aid from Heaven, or any definite religious belief; and *as such* , as he is in himself, does Literature represent him; it is the Life and Remains of the *natural* man, innocent or guilty. I do not mean to say that it is impossible in its very notion that Literature should be tinctured by a religious spirit; Hebrew Literature, as far as it can be called Literature, certainly is simply theological, and has a character imprinted on it which is above nature; but I am speaking of what is to be expected without any extraordinary dispensation; and I say that, in matter of fact, as Science is the reflection of Nature, so is Literature also—the one, of Nature physical, the other, of Nature mor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such as locality, period, language, seem to make little or no difference in the character of Literature, as such; on the whole, all Literatures are one; they are the voices of the natural man.

（二）假如教会有必要介入讲授科学的学堂，那么，在通识教育这个主题的另一个主要构成部分，即文学当中，教会的介入就更属紧迫需要了。文学与人，就如同科学与自然的关系，它是人的历史。人由身心两部分构成，他有思想，也会行动。他有七情六欲、激情、情感、动机、计划。他的内心里进行着持续终生的责任与爱好之间的斗争。他有丰富宽广的才智。他为社会所造，而社会也以无穷的组合使他个人的道德及智性特征数量倍增并变得多样化。所有这些都构成他的生命，而文学则是这生命的表达。因此，在某些方面，文学之于人类，就如同自传之于个人。这是他的生命及遗迹。另外，他是这种有知觉，有才智，有创造力和行动能力的存在者，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来自天国的任何超凡辅助或确定的宗教信念。他在自己的内心里是如此，文学也是这样来表现他的。这是人天生的命运及遗迹，无论他是否有罪。我这并不是说文学就其观念本身而言就不可能带上宗教精神的色彩。假如能称其为文学，希伯来文学肯定带有神学特色，而且还刻有超自然的印记。可我现在要说的，是指在没有任何超凡天命的情况下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就事实而论，就如同科学是自然的反映，文学也是一样，一者是有形自然的反映，另一者是道德和社会自然的反映。地域、时期、语言等的具体情形，看来只会对文学特征本身产生极小影响，甚或没有影响。整体而论，所有文学都是同一个东西，它们都是人自然发出的声音。

I wish this were all that had to be said to the disadvantage of Literature; but while Nature physical remains fixed in its laws, Nature moral and social has a will of its own, is self-governed, and never remains any long while in that state from which it started into action. Man will never continue in a mere state of innocence; he is sure to sin, and his literature will be the expression of his sin, and this whether he be heathen or Christian. Christianity has thrown gleams of light on him and his literature; but as it has not converted him, but only certain choice specimens of him, so it has not changed the characters of his mind or of his history; his

literature is either what it was, or worse than what it was, in proportion as there has been an abuse of knowledge granted and a rejection of truth. On the whole, then, I think it will be found, and ever found, as a matter of course, that Literature, as such, no matter of what nation, is the science or history, partly and at best of the natural man, partly of man in rebellion.

但愿这是就不利文学的方面当说的所有的话。可是，虽然有形的自然的法则是固定不变，道德与社会的自然却有它自己的意志，它独立自治，它不会处在从中开始行动的那种状态下长久不变。人永远不会在纯粹的天真状态中持续下去，他一定会犯罪，人的文学将会是他的罪的表达，不管他是异教徒还是基督教徒，文学都会是如此。基督教为人和人的文学投下一线光芒，但是，由于基督教还没有劝化全人类，而是其中精选的一部分，所以它还没有改变人的思想或其历史的特征。人的文学要么是过去的老样子，要么比过去还糟糕，这取决于对给予人的知识的滥用程度或对真理的拒绝程度。因此，总体而论，我觉得我们会发现，而且毫无疑问一定会发现，无论是在哪个民族，文学本身都是部分地而且最多是天生斯人，部分是反叛中的人的科学或历史。

7．

7．

Here then, I say, you are involved in a difficulty greater than that which besets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ce; for, if Physical Science be dangerous, as I have said, it is dangerous, because it necessarily ignores the idea of moral evil; but Literature is open to the more

grievous imputation of recognizing and understanding it too well. Some one will say to me perhaps: “Our youth shall not be corrupted. We will dispense with all general or national Literature whatever, if it be so exceptionable; we will have a Christian Literature of our own, as pure, as true, as the Jewish.” You cannot have it:—I do not say you cannot form a select literature for the young, nay, even for the middle or lower classes; this is another matter altogether: I am speaking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which implies an extended range of reading, which has to deal with standard works of genius, or what are called the *classics* of a language; and I say,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ase, if Literature is to be made a study of human nature, you cannot have a Christian Literature. It is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to attempt a sinless Literature of sinful man. You may gather together something very great and high, something higher than any Literature ever was; and when you have done so, you will find that it is not Literature at all. You will have simply left the delineation of man, as such, and have substituted for it, as far as you have had any thing to substitute, that of man, as he is or might be, under certain special advantages. Give up the study of man, as such, if so it must be; but say you do so. Do not say you are studying him, his history, his mind and his heart, when you are studying something else. Man is a being of genius, passion, intellect, conscience, power. He exercises these various gifts in various ways, in great deeds, in great thoughts, in heroic acts, in hateful crimes. He founds states, he fights battles, he builds cities, he ploughs the forest, he subdues the elements, he rules his kind. He creates vast ideas, and influences many generations. He takes a thousand shapes, and undergoes a thousand fortunes. Literature records them all to the life,

因此，在这里我要说，我们陷入的麻烦，比困扰科学培育的麻烦

更为棘手。因为，假如自然科学如我所说的存在危险，那是因为它总是忽略道德之恶的概念，但是，文学却面临在道德之恶上察觉和理解过头的更严重罪名。也许会有人对我说："我们的青年不容败坏。假如文学如此遭人反感，我们将废除一般意义上或无论何种意义上的民族文学。我们将拥有我们自己的基督教文学，如同犹太文学一样纯洁和真实。"但我们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文学。我并不是说人们就不能为青年，甚至为社会中下层的人民发展一种精选的文学，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码事。我说的是大学教育，它涉及广泛的阅读，因此必须包含标准的天才之作，或是可以称为一门语言的经典之作的读物。而且我还要说，根据事情的性质，假如文学要成为对人性的一种研究，那我们就不能拥有一种基督教文学。尝试拥有一种关于有罪之人的无罪的文学，这种用语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我们不妨收集某种高雅脱俗的东西，某种高于有史以来的一切文学水平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真这么做了，会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学了。我们会干脆放弃对人的描述，并且有什么东西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如人在某种特别优势之下呈现的面貌，或者可能呈现的面貌，我们就会用它们来代替这个描述。假如必须如此，还不如放弃对这种境况下的人的研究，但必须说清楚我们这么做了。假如我们实际是在研究别的某种东西时，就不要说我们是在研究人，人的历史，人和思想和人的心。人是有天赋、激情、才智、良知、能力的造物。他以不同方式施展他的这些天赋，会有他的壮举，会有他伟大的思想，会有英勇的行为，会有可恨的罪行。他创立国家，他行军作战，他建立城池，他在林中开路，他征服风雨，他统治同类。他想出惊人的点子，并影响许多代人。他有万千不同的面孔，也经历人生的起伏波折。文学将这一切都逼真地记录下来，

> *Quicquid agunt homines, votum, timor, ira, voluptas, Gaudia, discursus.*

众生所行的一切，他们的愿望、担忧、愤怒、快乐和愉悦，来来

去去的奔波，都汇集在我的书中。

He pours out his fervid soul in poetry; he sways to and fro, he soars, he dives, in his restless speculations; his lips drop eloquence; he touches the canvas, and it glows with beauty; he sweeps the strings, and they thrill with an ecstatic meaning. He looks back into himself, and he reads his own thoughts, and notes them down; he looks out into the universe, and tells over and celebrates the elements and principles of which it is the product.

他在诗歌里倾诉自己炽热的情怀；他在躁动不安的思绪里来回反复，一会儿直冲云霄，一会儿沉入谷底；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他泼墨挥毫，作品令四壁生辉；他拨弄琴弦，溢出高山流水之声。他回眸自顾，探究内心，把里面的想法一一记下。他抬头展望宇宙，反复述说与赞美构成宇宙的元素与原则。

Such is man: put him aside, keep him before you; but, whatever you do, do not take him for what he is not, for something more divine and sacred, for man regenerate. Nay, beware of showing God's grace and its work at such disadvantage as to make the few whom it has thoroughly influenced compete in intellect with the vast multitude who either have it not, or use it ill. The elect are few to choose out of, and the world is inexhaustible. From the first, Jabel and Tubalcain, Nimrod “the stout hunter,” the learning of the Pharaohs, and the wisdom of the East country, are of the world. Every now and then they are rivalled by a Solomon or a Beseleel, but the *habitat* of natural gifts is the natural man. The Church may use them, she cannot at her will originate them. Not till the whole human race is made new will its literature be pure

and true. Possible of course it is in idea, for nature, inspired by heavenly grace, to exhibit itself on a large scale, in an originality of thought or action, even far beyond what the world's literature has recorded or exemplified; but, if you would in fact have a literature of saints, first of all have a nation of them.

这就是人：你可以将他弃置一边，你可以将他摆在眼前，可是，无论做什么，不要拿他当他本不是的人，某种更有神性和更神圣的人，某种经历了重生的人。不仅如此，还要谨防在不利时刻显示神恩及其作工，以至于使深受其影响的那少数人去与未受神恩惠顾或者错领神恩的大多数人去竞争才智。人世无穷尽，而蒙挑选者总是少数。从一开始，雅八和土八该隐、“英勇的猎户”宁录、法老的学问以及东方人的智慧，全都归于世人。每隔一阵子，他们就会被拿出来与所罗门或比撒列这样的人角斗智力，可是，天赋才能的栖息所本在天生的人。教会不妨利用这些才智，却不能够随意创造它们。只有全人类改过自新，人类的文学才会纯洁与真实。当然，在概念上说，人性有可能在神恩激励之下大规模地展示自身，显出其思想与行动的创新性，甚至远超世界文学已然纪录和显示出来的那种水平。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拥有一种圣人的文学，首先就得有一个圣人的民族。

What is a clearer proof of the truth of all this than the structure of the Inspired Word itself? It is undeniably *not* the reflection or picture of the many, but of the few; it is no picture of life, but an anticipation of death and judgment. Human literature is about all things, grave or gay, painful or pleasant; but the Inspired Word views them only in one aspect, and as they tend to one scope. It gives us little insight into the fertile developments of mind; it has no terms in its vocabulary to express with exactness the intellect and its separate faculties; it knows nothing of genius, fancy, wit, invention, presence of mind, resource. It does not discourse of

empire, commerce, enterprise, learning, philosophy, or the fine arts. Slightly too does it touch on the more simple and innocent courses of nature and their reward. Little does it say [10_4] of those temporal blessings which rest upon our worldly occupations, and make them easy, of the blessings which we derive from the sunshine day and the serene night, from the succession of the seasons, and the produce of the earth. Little about our recreations and our daily domestic comforts; little about the ordinary occasions of festivity and mirth, which sweeten human life; and nothing at all about various pursuits or amusements, which it would be going too much into detail to mention. We read indeed of the feast when Isaac was weaned, and of Jacob's courtship, and of the religious merry-makings of holy Job; but exceptions, such as these, do but remind us of what might be in Scripture, and is not. If then by Literature is meant the manifestation of human nature in human language, you will seek for it in vain except in the world. Put up with it, as it is, or do not pretend to cultivate it; take things as they are, not as you could wish them.

对于所有这些真理，是否有比神示的道本身的结构更清晰明显的证据呢？显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定不是对许多人而是仅只对极少数人的思考或描绘；这不是一幅生活图景，而是对死亡与审判的预告。人类的文学涉及所有事物，或严肃，或开心，或痛苦或快乐，但是，神示的道只从一个视角看待这些事物，这些事物也趋向一个范围。它并不能让我们洞见心智丰富的发展，它本身并没有专用的词汇来准确地表述才智与其相应的功能，根本不懂天赋、幻想、机智、发明、心智的存在及人的智谋。它并不会论及帝国、商业、进取心、学问、哲学或美术。它也很少涉及本性更为简单和无害的进程及其回报。它也很少提及 [11_4] 取决于我们现世职业并使这些职业较为舒适的暂时的福份，很少提及我们从阳光明媚的日子和宁静的夜晚，四季的更替和大地的出产中得来的那些福份。很少提及我们的娱乐和平日

的居家之乐，很少提及我们时不时得到的使生活十分甜美的节庆与欢笑的日子。它甚至根本都不会提及人的各样追求或娱乐，凡此种种，太过琐碎，它当然不便一一提及。我们的确看到以撒断奶的盛宴，看到雅各求爱的故事，还有圣洁的约伯举行的宗教狂欢活动。可是，这一类的例外，仅会提醒我们哪些是圣经里面可能有，但实际却根本没有的。所以说，假如文学是指用人类语言表达人性，那么，除开在人世间，去别的任何地方寻找它都属徒劳。要么隐忍不发，照单全收，要么就不要作假来培育它。应当照事物本来的样子表现它，而不要一厢情愿。

8．

8．

Nay, I am obliged to go further still; even if we could, still we should be shrinking from our plain duty, Gentlemen, did we leave out Literature from Education. For why do we educate, except to prepare for the world? Why do we cultivate the intellect of the many beyond the first elements of knowledge, except for this world? Will it be much matter in the world to come whether our bodily health or whether our intellectual strength was more or less, except of course as this world is in all its circumstances a trial for the next? If then a University is a direct preparation for this world, let it be what it professes. It is not a Convent, it is not a Seminary; it is a place to fit men of the world for the world. We cannot possibly keep them from plunging into the world, with all its ways and principles and maxims, when their time comes; but we can prepare them against what is inevitable; and it is not the way to learn to swim in troubled waters, never to have gone into them. Proscribe (I

do not merely say particular authors, particular works, particular passages) but Secular Literature as such; cut out from your class books all broad manifestations of the natural man; and those manifestations are waiting for your pupil's benefit at the very doors of your lecture room in living and breathing substance. They will meet him there in all the charm of novelty, and all the fascination of genius or of amiableness. Today a pupil, tomorrow a member of the great world; today confined to *the Lives of the Saints* , tomorrow thrown upon Babel;—thrown on Babel, without the honest indulgence of wit and humour and imagination having ever been permitted to him, without any fastidiousness of taste wrought into him, without any rule given him for discriminating “the precious from the vile,” beauty from sin, the truth from the sophistry of nature, what is innocent from what is poison. You have refused him the masters of human thought, who would in some sense have educated him, because of their incidental corruption; you have shut up from him those whose thoughts strike home to our hearts, whose words are proverbs, whose names are indigenous to all the world, who are the standard of their mother tongue, and the pride and boast of their countrymen, Homer, Ariosto, Cervantes, Shakespeare, because the old Adam smelt rank in them; and for what have you reserved him? You have given him “a liberty unto” the multitudinous blasphemy of his day; you have made him free of its newspapers, its reviews, its magazines, its novels, its controversial pamphlets, of its Parliamentary debates, its law proceedings, its platform speeches, its songs, its drama, its theatre, of its enveloping, stifling atmosphere of death. You have succeeded but in this,—in making the world his University.

这还不行，我得再进一步。诸位，就算我们能够将文学遗弃在教育之外，那也是我们在自己明确的职责面前的退缩。假如不是为这世

界准备人才，那教育又是为何目的呢？假如不是为这世界准备人才，那我们在最初的知识元素之外又对许多人进行才智培育又是为了什么呢？这世界上的一切当然不过是为来世所准备的形形色色的考验，假如不是这样，那我们身体健康的好坏或智性能力的大小，对于来世而言又有何关系呢？这样，假如大学是为此世所做的直接准备，那就应当让它成为它所宣称的那个样子。大学不是女修道院，大学不是神学院，大学是使世人适合此世的一处场所。我们不可能阻止世人到时便一头扎进有其自身方式、原则与准则的世界，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为不可避免的一切做好准备。不入急流，也可学会游泳，而且根本不必进入激流。仅只禁止世俗文学本身（我并不只是说某些具体的作者、具体的作品、具体的段落），并把对天生之人粗泛的表达从课本中删除，那这些表达就会在课堂门外活灵活现地等待学童们的惠顾。它们会以新奇事物的全部魅力和天赋或平易近人的全部吸引力来迎接他们。他今天是学童，明天就会成为广大世界的一员。他今天的学习只限于《圣徒传》，明天就会如同置身于巴别塔建成之后的世界，通习各类作品。他会经历言语的变乱，却不会真心实意地沉浸于已经允诺给他的机智、幽默与想象力，不会表现出培养出来的严谨品格，也不会利用给予他的任何规则从而能“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区分出来”，将美与丑、真理与关于自然的诡辩、无害的与有毒的区分出来。我们这样就会剥夺他接触人类思想大师的机会，而这些大师正是因为其偶尔的堕落而能在某种意义上教育他的。他因此会被挡在门外，见不到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思想会深深感动我们的内心，他们说出来的话就是箴言，他们的名字为世上各族人民所熟悉，他们树立了自己母语的标准，是其同胞的自豪与骄傲。荷马、阿里奥斯托、塞万提斯、莎士比亚都是这样的人，因为人性的痼疾在他们的作品里发出恶臭。而我们又给他们准备了什么呢？我们给了他接触当今众多亵渎神明之举的“自由”，我们让他看不到当今的报纸、评论、杂志、小说、有争议的宣传册子、议会辩论、法律程序、讲坛演说、歌曲、戏剧、剧场以及笼罩一切并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我们仅止在这一方面大功告成：让世界成为他的大学。

Difficult then as the question may be, and much as it may try the judgments and even divide the opinions of zealous and religious Catholics, I cannot feel any doubt myself, Gentlemen, that the Church's true policy is not to aim at the exclusion of Literature from Secular Schools, but at her own admission into them. Let her do for Literature in one way what she does for Science in another; each has its imperfection, and she has her remedy for each. She fears no knowledge, but she purifies all; she represses no element of our nature, but cultivates the whole. Science is grave, methodical, logical; with Science then she argues, and opposes reason to reason. Literature does not argue, but declaims and insinuates; it is multiform and versatile; it persuades instead of convincing, it seduces, it carries captive; it appeals to the sense of honour, or to the imagination, or to the stimulus of curiosity; it makes its way by means of gaiety, satire, romance, the beautiful, the pleasurable. Is it wonderful that with an agent like this the Church should claim to deal with a vigour corresponding to its restlessness, to interfere in its proceedings with a higher hand, and to wield an authority in the choice of its studies and of its books which would be tyrannical, if reason and fact were the only instruments of its conclusions? But, any how, her principle is one and the same throughout: not to prohibit truth of any kind, but to see that no doctrines pass under the name of Truth but those which claim it rightfully.

这问题兴许很难，而且它还很可能考验热心与虔诚的天主教徒的辨别力，甚至使他们发生意见分歧。但是，诸位，我自己却并没有感到任何疑惑，我相信教会真正的政策并非旨在将文学从世俗学校里排除出去，而是希望让教会自身融入世俗学校。教会为科学所做的事情，就让她以另一种方式为文学来做吧。文学与科学各有瑕疵，但教会对两者却都有良方。教会并不害怕知识，却会净化一切。她并不压抑我们天性中的任何元素，却会培育完整的人性。科学是严肃的，讲

求方法与逻辑，而教会则与科学辩论，并以理性对抗理性。文学并不争辩，却会慷慨陈词或含沙射影。它形式多样，手法各异。它会劝戒而不是要说服人，它怂恿人，它俘获人心，它诉诸人的荣誉感、想象力或好奇心。它借助快乐、讽刺、浪漫的手段，以及美好和令人愉快的事物大行其道。教会借助这样一位助手而要求应对与文学的躁动不安相对应的一种活力，要以更高超的手段来干涉文学活动，要对文学研究及其书籍的选择施加权威，而假如理性及事实是其结论的唯一工具，则这种权威极可能是暴虐的，这难道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可是，无论如何，她的原则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即不禁止任何一类真理，但要保证不能容忍以真理的名义鼓吹的说教，而又要保证正当宣称的说教。

9．

9．

Such at least is the lesson which I am taught by all the thought which I have been able to bestow upon the subject; such is the lesson which I have gained from the history of my own special Father and Patron, St. Philip Neri. He lived in an age as traitorous to the interests of Catholicism as any that preceded it, or can follow it. He lived at a time when pride mounted high, and the senses held rule; a time when kings and nobles never had more of state and homage, and never less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peril; when medieval winter was receding, and the summer sun of civilization was bringing into leaf and flower a thousand forms of luxurious enjoyment; when a new world of thought and beauty had opened upon the human mind, in the discovery of the treasures of classic literature and art. He saw the great and the gifted, dazzled by the

Enchantress, and drinking in the magic of her song; he saw the high and the wise, the student and the artist, painting, and poetry, and sculpture, and music, and architecture, drawn within her range, and circling round the abyss; he saw heathen forms mounting thence, and forming in the thick air:—all this he saw, and he perceived that the mischief was to be met, not with argument, not with science, not with protests and warnings, not by the recluse or the preacher, but by means of the great counter-fascination of purity and truth. He was raised up to do a work almost peculiar in the Church,—not to be a Jerome Savonarola, though Philip had a true devotion towards him and a tender memory of his Florentine house; not to be a St. Charles, though in his beaming countenance Philip had recognized the aureole of a saint; not to be a St. Ignatius, wrestling with the foe, though Philip was termed the Society's bell of call, so many subjects did he send to it; not to be a St. Francis Xavier, though Philip had longed to shed his blood for Christ in India with him; not to be a St. Caietan, or hunter, of souls, for Philip preferred, as he expressed it, tranquilly to cast in his net to gain them; he preferred to yield to the stream, and direct the current, which he could not stop, of science, literature, art, and fashion, and to sweeten and to sanctify what God had made very good and man had spoilt.

我已经尽己所能在这个话题上费了一番脑筋，至少这也就是这些想法给予我的一个教训，也是从我特别敬重的神甫及主保圣人圣菲利普·奈利的历史中得来的教诲。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对天主教利益的背叛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傲慢横行，感官控制了规则；在那个时代，王公贵族得到从未有过的威风和效忠，而个人责任和风险却是小之又小；那时，中世纪的严冬正在消退，而文明的夏日阳光正在给树叶和花朵带来万千奢华与欢乐；那时，在探索古典文学与艺术的宝藏时，一个新的思想与美的世界在人类面前打

开。他看见伟人和天才为那女巫所迷惑，并在她歌声的魔法里畅饮；他见过身居高位和智慧过人者，见过学者和艺术家，还有绘画、诗歌、雕塑、音乐与建筑，这一切都来自她的魔法阵，都围绕着那个深渊盘旋。他看见异教徒由此上马，在浓雾中结队。所有这些他都看见了，他感觉到，这样的恶作剧不能以辩论相对，不能用科学应付，不能用抗议和警告来阻止，不能靠隐士或讲道者来劝勉，而只能用纯洁与真理这抵抗魔力的手段予以对抗。培养他的目标，就是让他去为教会做一件独特的事情。当然不是要他去做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那样的人，尽管菲利普真心热爱此人，也十分怀念他在佛罗伦萨的修道所；不是去做圣查尔斯那样的人，尽管在他容光焕发的面容上，菲利普看到了圣徒光环；不是去做圣依纳爵那样去应对教会大敌的人，尽管菲利普被称为他那个修会的警钟，并为修会引来那么多修士；不是去做圣弗朗西斯·沙勿略那样的人，尽管菲利普曾渴望与他一起去印度，为基督一洒热血；也不是去做圣卡耶坦或灵魂猎手那样的人，因为，按照菲利普自己的话说，他更喜欢默不出声地撒网收获人心。假如无法阻挡，则他喜欢顺流行事，喜欢引导科学、文学、艺术和时尚潮流，喜欢使神原本完善造就、人却肆意毁坏的东西更甜美，更圣洁。

And so he contemplated as the idea of his mission, not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nor the exposition of doctrine, nor the catechetical schools; whatever was exact and systematic pleased him not; he put from him monastic rule and authoritative speech, as David refused the armour of his king. No; he would be but an ordinary individual priest as others; and his weapons should be but unaffected humility and unpretending love. All he did was to be done by the light, and fervour, and convincing eloquence of his personal character and his easy conversation. He came to the Eternal City and he sat himself down there, and his home and his family gradually grew up around him, by the spontaneous accession of materials from without. He did not so much seek his own as draw them to him. He sat in his small room, and they in their gay worldly

dresses, the rich and the wellborn, as well as the simple and the illiterate, crowded into it. In the mid-heats of summer, in the frosts of winter, still was he in that low and narrow cell at San Girolamo, reading the hearts of those who came to him, and curing their souls' maladies by the very touch of his hand. It was a vision of the Magi worshipping the infant Saviour, so pure and innocent, so sweet and beautiful was he; and so loyal and so dear to the gracious Virgin Mother. And they who came remained gazing and listening, till at length, first one and then another threw off their bravery, and took his poor cassock and girdle instead; or, if they kept it, it was to put haircloth under it, or to take on them a rule of life, while to the world they looked as before.

他就是这样思考他的宣教概念的。不是去传播信仰，不是去阐述教条，不是设立教义学校。任何严格与体制化的东西都不能使他满意。他将修道院的规矩和权威性的演讲搁置一边，就如同大卫拒绝使用国王给他的盔甲。是啊，他只愿意做和其他神甫一样的人，他的武器只能是毫不做作的谦卑与并不装模作样的爱。他所行的一切，都必须光明正大地去做，满腔热情地做，用富于个人特征和令人信服的口吻及轻松谈话来做到这些。他去到永恒之城，在那里扎下根来，来自城外的物资自发地增多了，他的家园和修会随之围绕他慢慢成长起来。与其说他吸引那些人到自己身边，还不如说他是在追求自己的目标。他坐在自己的斗室里，而那些身着艳服的富贵之人，以及出身低微和不识字的人也都挤了进来。在盛夏的炎热，在严冬的酷寒中，他总还在圣热罗尼莫那处低矮狭窄的陋室里，为前来寻求帮助的人排忧解难，亲手治疗他们心灵的痼疾。这是东方三博士朝拜救主圣婴的异象，他是那么纯洁无瑕，那么甜蜜美妙。而在亲切的圣母眼里，他们又是那么忠实可爱。前来这里的人们一直望着他，听他述说，之后终于一个接一个地抛弃身上华丽的衣服，披挂上他那种破烂的法衣和腰带。或者，假如他们还留着原来的衣服，那也要在衣服下面塞上麻布衣，或拿节俭当成生活规则，尽管在世人看来，他们还是原来的样

子。

In the words of his biographer,

按照他的传记作者的话说：

“he was all things to all men. He suited himself to noble and ignoble, young and old, subjects and prelates, learned and ignorant; and received those who were strangers to him with singular benignity, and embraced them with as much love and charity as if he had been a long while expecting them. When he was called upon to be merry he was so; if there was a demand upon his sympathy he was equally ready. He gave the same welcome to all: caressing the poor equally with the rich, and wearying himself to assist all to the utmost limits of his power. In consequence of his being so accessible and willing to receive all comers, many went to him every day, and some continued for the space of thirty, nay forty years, to visit him very often both morning and evening, so that his room went by the agreeable nickname of the Home of Christian Mirth. Nay, people came to him, not only from all parts of Italy, but from France, Spain, Germany, and all Christendom; and even the infidels and Jews, who had ever any communication with him, revered him as a holy man.“ [10_5]

“他在所有人眼里是所有。他让自己适应高贵与卑贱者，年轻与年老者，普通民众与高级教士，有学问与无知的人。他态度温和地接待陌生人，怀着爱心与仁爱拥抱他们，就像期盼已久的老友。需要愉快的

时候，他立即就能愉快起来，需要显示同情的时候，他同样立即就能做到。他以相同的热忱对待所有人，安慰富户一如抚慰穷人，并不厌其烦地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帮助所有人。由于他平易近人，愿意接纳所有人，结果，许多人天天去他那里，有的人在三、四十年时间里持续不断地早晚拜访，这样，他那间陋室竟然得到‘基督徒欢笑之家’的美名。不仅如此。前来拜访的人不仅来自意大利各地，还来自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所有基督教国家。哪怕异教徒和犹太人，只要与他有过一点交往，都尊他为圣人。” [11_5]

The first families of Rome, the Massimi, the Aldobrandini, the Colonnas, the Altieri, the Vitelleschi, were his friends and his penitents. Nobles of Poland, Grandees of Spain, Knights of Malta, could not leave Rome without coming to him. Cardinals, Archbishops, and Bishops were his intimates; Federigo Borromeo haunted his room and got the name of “Father Philip's soul.” The Cardinal-Archbishops of Verona and Bologna wrote books in his honour. Pope Pius the Fourth died in his arms. Lawyers, painters, musicians, physicians, it was the same too with them. Baronius, Zazzara, and Ricci, left the law at his bidding, and joined his congregation, to do its work, to write the annals of the Church, and to die in the odour of sanctity. Palestrina had Father Philip's ministrations in his last moments. Animuccia hung about him during life, sent him a message after death, and was conducted by him through Purgatory to Heaven. And who was he, I say, all the while, but an humble priest, a stranger in Rome, with no distinction of family or letters, no claim of station or of office, great simply in the attraction with which a Divine Power had gifted him? and yet thus humble, thus unennobled, thus empty-handed, he has achieved the glorious title of Apostle of Rome.

罗马城的望族，如马希米、阿尔多布兰迪尼、柯洛纳斯、奥尔提埃里、韦特尔斯奇等家族，都是他的友人与前来悔罪的人。波兰的贵族、西班牙的大公、马耳他的骑士离开罗马之前，都一定要来拜见他。枢机主教、大主教和主教都是他的座上宾。费德里戈·博罗梅奥经常光顾他的住所，因此得到“菲利普神甫的影子”的美名。维罗纳和博洛尼亚的枢机主教和大主教都有题献给他的著作。教皇庇护四世在他的怀抱里去世。律师、画家、音乐家、医生，他对这些人一视同仁。巴罗尼乌斯、查查拉和利奇都听从他的劝告放弃法律，加入了他的公会，为公会出力，编写《教会年鉴》，死后都有圣人之誉。帕莱斯特里那在临终时刻，得到菲利普神甫的照料。阿尼玛其亚生前与他过从甚密，死时给他留下遗嘱，菲利普神甫亲自将他从炼狱送上天堂。我要说，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位出身卑微的神甫，罗马的陌生人，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没有惊人的著作，没有崇高的地位或官职。他之所以伟大，莫过于神力给予他的那种吸引力。如此卑微、生前没有得到任何荣誉、两手空空的一个人，竟然得到“罗马的使徒”这等光荣称号。

10．

10．

Well were it for his clients and children, Gentlemen, if they could promise themselves the very shadow of his special power, or could hope to do a miserable fraction of the sort of work in which he was pre-eminently skilled. But so far at least they may attempt,—to take his position, and to use his method, and to cultivate the arts of which he was so bright a pattern. For me, if it be God's blessed will that in the years now coming I am to have a share in

the great undertaking, which has been the occasion and the subject of these Discourses, so far I can say for certain that, whether or not I can do any thing at all in St. Philip's way, at least I can do nothing in any other. Neither by my habits of life, nor by vigour of age, am I fitted for the task of authority, or of rule, or of initiation. I do but aspire, if strength is given me, to be your minister in a work which must employ younger minds and stronger lives than mine. I am but fit to bear my witness, to proffer my suggestions, to express my sentiments, as has in fact been my occupation in these discussions; to throw such light upon general questions, upon the choice of objects, upon the import of principles, upon the tendency of measures, as past reflection and experience enable me to contribute. I shall have to make appeals to your consideration, your friendliness, your confidence, of which I have had so many instances, on which I so tranquilly repose; and after all, neither you nor I must ever be surprised, should it so happen that the Hand of Him, with whom are the springs of life and death, weighs heavy on me, and makes me unequal to anticipations in which you have been too kind, and to hopes in which I may have been too sanguine.

诸位，假如他的救济对象与儿女能够保证成为他那种特别魅力的影子本身，假如他们能希望做他特别擅长的那种工作的极小一部分，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但他们至少可以做出这样的尝试：采取他的立场，运用他的方法，并培育以他为光辉榜样的那些技艺。对我而言，假如上帝的神圣意旨是要我在未来的年份里参与这项伟大的事业，也就是这些演讲的缘起和主题，那么，就目前而言我可以肯定地说，按照圣菲利普的方法能否成就任何事业我不好说，但按照其他方法我肯定会一事无成。无论就生活习惯，还是年龄所限的气力而言，我都不适合完成权威、规则或启蒙的工作。我只能渴望，假以外力，我能够辅助完成需要比我思想更活跃，身体更强壮的年轻人才能完成的工作。我只适合于做见证者，根据过往的反思和经验给予我的能力来就

对象的选择、原则的输入、举措的倾向提出建议，表达情感，事实上我在上述讨论中一直都是这么想的。诸位的慎重、友好与信心我已领教甚多，我寄望于它们，并会因此心安无忧。毕竟，假如发生这样的事情，即掌管生死的上帝之手重重压在我的肩头，使我无法满足你们极友善的预期，也无法兑现我一直狂热于其中的种种希望，我们都还不至于过度惊讶吧。

[10_1].Vid. Hallam's *Literature of Europe* , Macaulay's *Essay* , and the Author's *Oxford University Sermons, IX* .

[10_2].*In Augment* ., 5.

[10_3].De Augm., §28.

[10_4].Vid. the Author's *Parochial Sermons* , vol. i. 25.

[10_5].Bacci, vol. i., p. 192, ii., p. 98.

[11_1].参见哈勒姆的《欧洲文学》、麦考雷的《文集》及笔者的《牛津大学讲道集》第九讲。

[11_2].《广学论》，第五章。

[11_3].《广学论》，第二十八节。

[11_4].参见笔者的《教区讲道集》，第一卷，二十五篇。

[11_5].巴奇，第一卷，第一百九十二页，第二卷，第九十八页。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大学的理念

（下）

在讲座和文章中临时讨论的大学科目

John Henry Newman

约翰·亨利·纽曼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大学的理念（下）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约翰·亨利·纽曼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Introductory Letter 自荐信
- Advertisement 广告
- Lecture 1. Christianity and Letters. A Lecture in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Letters 第一讲：基督教与文学，在哲学与文学学院的演讲
- Lecture 2. Literature. A Lecture in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Letters 第二讲：文学——在哲学与文学院的演讲
- Lecture 3. English Catholic Literature 第三讲：英语中的天主教文学
- Lecture 4. Elementary Studies 第四讲：初级教育
- Lecture 5. A Form of Infidelity of the Day 第五讲：今日一种形式的背信
- Lecture 6. University Preaching 第六讲：论大学布道
- Lecture 7. Christianity and Physical Science. A Lecture in the School of Medicine 第七讲：基督教与自然科学，在医学院的演讲
- Lecture 8. Christianity and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 Lecture Written for the School of Science 第八讲：基督教与科学探索，为理学院写的演说词
- Lecture 9. Discipline of Mind. An Address to the Evening Classes 第九讲：思维训练，在夜校的演讲
- Lecture 10. Christianity and Medical Science. An Address to the Students of Medicine 第十讲：基督教与医学科学，对医学院学生的演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Introductory Letter

自荐信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WILLIAM MONSELL, M.P., ETC., ETC.

致下院荣誉议员长威廉·蒙赛尔

My Dear Monsell,

亲爱的蒙赛尔先生：

I seem to have some claim for asking leave of you to prefix your name to the following small Volume, since it is a memorial of work done in a country which you so dearly love, and in behalf of an undertaking in which you feel so deep an interest.

我似乎得提出把您的名字加在以下这一卷前面这个不情之请，因为它是为您深爱的国家所做的一项纪念工作，从事这项工作也是您的兴趣之所在。

Nor do I venture on the step without some hope that it is worthy of your acceptance, at least on account of those portions of

it which have already received the approbation of the learned men to whom they were addressed, and which have been printed at their desire.

我对于这一唐突的举动并不全然愧疚，因为这个请求值得您接受，至少它是已经得到了为人熟知的学者的批准，并且按照他们的愿望印刷的那些部分。

But, even though there were nothing to recommend it except that it came from me, I know well that you would kindly welcome it as a token of the truth and constancy with which I am,

但即使除了我之外没人可推荐它，我知道，您也会将它作为一个象征的真相和我的立场保持一致，对它欣然接受。

My dear Monsell,

您真诚的朋友，

Yours very affectionately,

约翰·H·纽曼

[November 1858.] JOHN H. NEWMAN.

1858年11月

Advertisement

广告

It has been the fortune of the author through life, that the Volumes which he has published have grown for the most part out of the duties which lay upon him, or out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moment. Rarely has he been master of his own studies.

这是作者从生活中汲取的财富，他出版的大部分卷都来自于他承担的职责，或是当前的情状。很少有他自己研究的领域。

The present collection of Lectures and Essays, written by him while Rector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reland, is certainly not an exception to this remark. Rather, it requires the above consideration to be kept in view, as an apology for the want of keeping which is apparent between its separate portions, some of them being written for public delivery, others with the privileged freedom of anonymous compositions.

目前由他撰写的讲座和散文合集，自然包括关于爱尔兰天主教大学校长的议论。相反，它要求持续关注上述考虑，以表歉意，这个合集的单独部分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其中一些是为公开递送而写的，而另一些享有匿名作品的自由豁免权。

However, whatever be the inconvenience which such varieties

in tone and character may involve, the author cannot affect any compunction for having pursued the illustration of one and the same important subject-matter, with which he had been put in charge, by such methods, graver or lighter, so that they were lawful, as successively came to his hand.

然而，任何可能涉及到关于人物或事件的不便之处，都不能影响作者通过这种方法对他所负责的同一重要主题进行说明。这就类似于剃须刀和打火机，使用得当就是合法的。

November, 1858.

1858年11月

Lecture 1. Christianity and Letters. A Lecture in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Letters

第一讲：基督教与文学，在哲学与文学学院的演讲

1．

1．

It seems but natural, Gentlemen, now that we are opening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Letters, or, as it was formerly called, of Arts, in this new University, that we should direct our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what are the subjects generally included under that name, and what place they hold, and how they come to hold that place, in a University, and in the education which a University provides. This would be natural on such an occasion, even though the Faculty of Arts held but a secondary place in the academical system; but it seems to be even imperative on us, considering that the studies which that Faculty embraces are almost the direct subject-matter and the staple of the mental exercises proper to a University.

诸位，如今在这所新大学已经在开设哲学与文学学院了（以前称为文艺学院），既然如此，我们自然应当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么一个问题上来，即这个学院在上述名目下一般应当包括哪些学科，在一所大学及其提供的教育当中，这些学科应当占据什么地位，以及它们如何保持这样的地位。尽管文学院在学科体系中仅居次要地位，当前这样

做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考虑到文学院包含的那些研究几乎就是适合于一所大学锤炼心智的直接主题和主要内容，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更加紧迫了。

It is indeed not a little remarkable that, in spite of the special historical connexion of University Institutions with the Sciences of Theology, Law, and Medicine, a University, after all, should be formally based on (as it really is), and should emphatically live in, the Faculty of Arts; but such is the deliberate decision of those who have most deeply and impartially considered the subject [3_1] . Arts existed before other Faculties; the Masters of Arts were the ruling and directing body; the success and popularity of the Faculties of Law and Medicine were considered to be in no slight measure an encroachment and a usurpation, and were met with jealousy and resistance. When Colleges arose and became the medium and instrument of University action, they did but confirm the ascendency of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thus, even down to this day, in those academical corporations which have more than others retained the traces of their medieval origin,—I mean the Universities of Oxford and Cambridge,—we hear little of Theology, Medicine, or Law, and almost exclusively of Arts.

尽管大学学府与神学、法学和医学诸学科存在特别的历史联系，但一所大学终究应该（而且实际也是）在形式上基于文学院且特别依赖文学院，这可真是值得我们额外注意的事情。但是，这是就这个课题进行过极深刻和无私研究的人们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 [4_1] 文学院系先于别的院系存在，人文硕士是大学里居支配地位和说得上话的团体。法学院和医学院的成功及大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入侵和篡夺，并受人嫉妒和抵制。各个学院兴起并成为大学教育的媒介及工具后，着实确认了文学院的优势。因此，甚至一直到今天，

在那些更多保留了中世纪起源遗迹的学术机构里，我指的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我们都很少听说什么神学、医学或法学，差不多只听得到文学的声音。

Now, considering the reasonable association, to which I have already referred, which exists in our mind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the three learned professions, here is a phenomenon which has to be contemplated for its own sake and accounted for, as well as a circumstance enhanc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ortance of the act in which we have been for some weeks engaged; and I consider that I shall not be employing our time unprofitably, if I am able to make a suggestion, which, while it illustrates the fact, is able to explain the difficulty.

现在，鉴于我们脑海里存在我所提到的大学与三门学术的专业之间的合理联系，这里就存在这么一个情形，它强调了我们过去几个星期来一直参与其中的那个行动的重要性与价值，还存在一个需要就其自身缘故进行思考并加以解释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假如我能够提出一个建议，一方面可以说明该事实，另一方面又能解释困难所在，那岂不是巧用时间。

2．

2．

Here I must go back, Gentlemen, a very great way, and ask you to review the course of Civiliz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When we survey the stream of human affairs for the last three thousand years, we find it to run thus:—At first sight there is so much fluctuation, agitation, ebbing and flowing, that we may despair to discern any law in its movements, taking the earth as its bed, and mankind as its contents; but, on looking more closely and attentively, we shall discern, in spite of the heterogeneous materials and the various histories and fortunes which are found in the race of man during the long period I have mentioned, a certain formation amid the chaos,—one and one only,—and extending, though not over the whole earth, yet through a very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it. Man is a social being and can hardly exist without society, and in matter of fact societies have ever existed all over the habitable earth. The greater parts of these associations have been political or religious, and have been comparatively limited in extent, and temporary. They have been formed and dissolved by the force of accidents or by inevitable circumstances; and, when we have enumerated them one by one, we have made of them all that can be made. But there is one remarkable association which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the philosopher, not political nor religious, or at least only partially and not essentially such, which began in the earliest times and grew with each succeeding age, till it reached its complete development, and then continued on, vigorous and unwearied, and which still remains as definite and as firm as ever it was. Its bond is a common civilization; and, though there are other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as there are other societies, yet this civilization, together with the society which is its creation and its home, is so distinctive and luminous in its character, so imperial in its extent, so imposing in its duration, and so utterly without rival up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that the association may fitly assume to itself the title of “Human Society,” and its civilization the abstract term “Civilization.”

诸位，在此我必须回到一开始谈的内容，并请大家回顾有史以来的文明进程。纵览过去三千年来人类活动的潮流，我们会发现它如下的奔涌势头：一眼望去，会看到那么多波动、回旋、潮涨潮落，假如以大地为河床，以人类为河水，我们兴许因根本都看不出任何运动规律而绝望。但是，更仔细认真地观察后，我们会发现，尽管在我提及的那个漫长时期里的人类竞赛中，会有杂七杂八的东西和各式各样的历史及命运，但混乱之中存在某种规则结构——有且只有这一个。而且这结构还一直在延伸，虽然没有铺满大地，却也覆盖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人乃群居动物，离开社会便难以生存。就事实而言，凡能住人的地方，人类社会就一直存在。人类社会中的联系绝大部分因政治和宗教原因而结成，就其范围而言都比较有限，且为时不长。联系的形成与解散，或迫于偶然事件，或为不可避免的情势所逼。如若一一细数，会发现凡能结成联系的全都结了。但是，有一个了不起的联系吸引了哲学家的注意，它既不是政治的，亦不是宗教的，或至少只是部分地而非实质上带有政治或宗教性质。它极早就开始，在随后的每一个时代不断成长，之后臻于完善，再后继续充满活力和不知疲倦地发展，直到今天还像当初一样明确和牢靠。它的凝聚力就在于一个共同的文明。尽管这世上还有其他文明，就如同还有其他社会，可是，这种文明，加上作为这种文明的诞生地及其家园的那个社会，其特征如此与众不同、如此灿烂辉煌，其范围如此广泛，其持存如此之壮观，其在世上如此无可匹敌，竟至于很合适使该组织自称为“人类社会”，并可以自身文明担当起“文明”这个抽象用语。

There are indeed great outlying portions of mankind which are not, perhaps never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is Human Society; still they are outlying portions and nothing else, fragmentary, unsociable, solitary, and unmeaning, protesting and revolting against the grand central formation of which I am speaking, but not uniting with each other into a second whole. I am not denying of course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for instance, though it be not our civilization; but it is a huge, stationary, unattractive, morose

civilization. Nor do I deny a civilization to the Hindoos, nor to the ancient Mexicans, nor to the Saracens, nor (in a certain sense) to the Turks; but each of these races has its own civilization, as separate from one another as from ours. I do not see how they can be all brought under one idea. Each stands by itself, as if the other were not; each is local; many of them are temporary; none of them will bear a comparison with the Society and the Civilization which I have described as alone having a claim to those names, and on which I am going to dwell.

的确，人类有很大一些边远部分并未、或许从来都没有包括在这个“人类社会”中，尽管如此，那仍然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它们零零碎碎、难以为伍、喜好独处、索然无味，对我说到的那个宏大的中心结构恶语相向、十分厌恶，但其自身又无法彼此团结，无法形成另一个整体。当然，以中华文明为例，我不是在否认它，尽管它并不属于我们；可是，那是一个庞杂、死寂、枯燥和阴郁的文明。我也不会否认印度人的文明、古代墨西哥人的文明、撒拉逊人的文明以及（某种程度上）不会否认土耳其人的文明。可是，这些民族分别都只有它们自己的文明，不仅与我们的文明不同，而且相互之间也彼此远隔。我无法想象它们如何能够统一在一个概念之下。它们各自为阵，好像其他文明根本就不存在。各个文明都是局部的，其中许多文明都是暂时存在的，且其中没有一个文明堪与我刚刚说到的那种社会与文明比肩，因为那种社会与文明凭一己之身便有权占有那些名号，就这些名号我还会进一步发挥。

Gentlemen, let me here observe that I am not entering upon the question of races, or upon their history. 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ethnology. I take things as I find them on the surface of history, and am but classing phenomena. Looking, then, at the countries which surround the Mediterranean Sea as a whole, I see them to be, from

time immemorial, the seat of an association of intellect and mind, such as to deserve to be called the Intellect and the Mind of the Human Kind. Starting as it does and advancing from certain centres, till their respective influences intersect and conflict, and then at length intermingle and combine, a common Thought has been generated, and a common Civilization defined and established. Egypt is one such starting point, Syria another, Greece a third, Italy a fourth, and North Africa a fifth,—afterwards France and Spain. As time goes on, and as colonization and conquest work their changes, we see a great association of nations formed, of which the Roman Empire is the maturity and the most intelligible expression; an association, however, not political, but mental, based on the same intellectual ideas, and advancing by common intellectual methods. And this association or social commonwealth, with whatever reverses, changes, and momentary dissolutions, continues down to this day; not, indeed, precisely on the same territory, but with such only partial and local disturbanc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with so combined and harmonious a movement, and such a visible continuity, that it would be utterly unreasonable to deny that it is throughout all that interval but one and the same.

在座诸位请明白，我可不想在这里谈论各种族及其历史的问题。我与人种学毫不搭界。我只是根据历史的外貌来描述事物，只是对看到的现象进行分类而已。整体来看环地中海国家，我发现，自远古以来，这些国家就是才智与心智联系的所在地，只有这样的才智与心智，才配称为人类的才智与心智。源自多个中心，并由此向前发展，直到各个中心的影响力彼此交叉并发生冲突，之后终于彼此掺杂与合并，从而形成共同思想，共同文明也得以确立。埃及就是这样一个起源地，叙利亚也是，希腊也是，然后是意大利，北非也是，再后就是法兰西与西班牙了。随着时间流逝，随着殖民和远征活动造成的变迁，我们看到由多个民族构成的庞大联合体，并由罗马帝国作为其成

熟的标志和最容易识别的表现。但这并不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而是一个精神联合体，基于相同的智性概念，并以共同的智性方法向前扩展。这样一个联合体或社会共同体，无论它曾经历何等的逆转、变迁和短暂解体，还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确，这个联合体并不处于严格意义上的同一片领土，但只会发生部分和局部的动荡；另外一方面，它的发展如此契合与协调，连续性如此明显，以至于在历经世事变迁之后仍然保持为同一个共同体，假如否认这一点就太不合情理了。

In its earliest age it included far more of the eastern world than it has since; in these later times it has taken into its compass a new hemisphere; in the Middle Ages it lost Africa, Egypt, and Syria, and extended itself to Germany, Scandinavia, and the British Isles. At one time its territory was flooded by strange and barbarous races, but the existing civilization was vigorous enough to vivify what threatened to stifle it, and to assimilate to the old social forms what came to expel them; and thus the civilization of modern times remains what it was of old, not Chinese, or Hindoo, or Mexican, or Saracenic, or of any new description hitherto unknown, but the lineal descendant, or rather the continuation, *mutatis mutandis* , of the civilization which began in Palestine and Greece.

它在最初那个世纪所包括的东方世界，远多于在后世所包括的，而在后来的这些时代，它已经将一个新的半球收纳进来。在中世纪，它失去了非洲、埃及和叙利亚，却延伸到了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群岛。曾几何时，它的领地为陌生和野蛮的民族所淹没，但是，已有的文明充满活力，足以让受到窒息威胁的一切生机勃勃，并将这些威胁者纳入它们本来想要驱赶走的古老的社会形态中。因此，现代文明还是保有其古老的形态，不是中华文明，不是印度文明，不是墨西哥文明，不是撒拉逊人的文明，也不是当前还不知道的其他任

何新描述的文明形态，而是起始于巴勒斯坦和希腊的那个文明的嫡传，或称经“必要变更之后”的延续。

Considering, 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great civilized Society, which I have already insisted on, I think it has a claim to be consider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of the human race, as its perfect result and limit, in fact;—those portions of the race which do not coalesce with it being left to stand by themselves as anomalies, unaccountable indeed, but for that very reason not interfering with what on the contrary has been turned to account and has grown into a whole. I call then this commonwealth pre-eminently and emphatically Human Society, and its intellect the Human Mind, and its decisions the sense of mankind, and its disciplined and cultivated state Civilization in the abstract, and the territory on which it lies the *orbis terrarum* , or the World. For, unless the illustration be fanciful, the object which I am contemplating is like the impression of a seal upon the wax; which rounds off and gives form to the greater portion of the soft material, and presents something definite to the eye, and preoccupies the space against any second figure, so that we overlook and leave out of our thoughts the jagged outline or unmeaning lumps outside of it, intent upon the harmonious circle which fills the imagination within it.

因此，考虑到这个伟大的文明社会所具备的那些我一直坚持的特征，我认为它有权被视为人类代表性的社会与文明，事实上可以视作人类的完美结果与极限。而人类并因不与它产生联合的那些部分就应当视为异常和的确是不可解释的现象而搁置一边，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们也不会干扰已经相反被加以利用并发展为一个整体的东西。因此我才称这个共同体为卓越和特别的人类社会，称其才智为人

类心智，称其决策为人类的意识，称其纪律严明和深受教化的状态为抽象意义上的文明，并称其坐落其上的疆域为全世界。除非所说的这些话纯属想入非非，否则，我一直在思考的这个对象就如同刻在蜡上的印章印记。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塑造那堆软材料的更大部分使之圆满，让人眼看到更加确切的部分，全神贯注于这一部分而排除其他的外形，使我们能够忽略和无视参差不齐的轮廓或这轮廓之外无所谓的包块，专心于这个充塞人的想象力的和谐的圆圈。

3．

3．

Now, before going on to speak of the education, and the standards of education, which the Civilized World, as I may now call it, has enjoined and requires, I wish to draw your attention, Gentlemen, to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is same *orbis terrarum* , which has been the seat of Civilization, will be found, on the whole, to be the seat also of that supernatural society and system which our Maker has given us directly from Himself, the Christian Polity. The natural and divine associations are not indeed exactly coincident, nor ever have been. As the territory of Civilization has varied with itself in different ages, while on the whole it has been the same, so, in like manner, Christianity has fallen partly outside Civil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partly outside Christianity; but, on the whole, the two have occupied one and the same *orbis terrarum* . Often indeed they have even moved *pari passu* , and at all times there has been found the most intimate connexion between them. Christianity waited till the orbis terrarum attained its most perfect form before it appeared; and it soon coalesced, and has ever since

co-operated, and often seemed identical, with the Civilization which is its companion.

在继续谈及文明世界（姑且现在这样称呼）向来支持、目前也这么要求的教育及教育标准之前，我希望各位注意到，我们终会发现，向来就是文明基座的这同一个世界，整体而言也就是上帝直接从他自身给予我们的那个超自然的社会与制度，即基督教政体的基座。这些自然与神圣的结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致，从来都不是如此。文明的领地在不同时代有所变化，但总体而言规模未变。同样，基督教曾部分地落在文明之外，文明也曾部分地落在基督教之外。但是，整体而言，这两者占据的是同一个世界。的确，它们经常同步迁移，但在所有时候都可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极密切的联系。基督教一直等到这世界到达其最完美形态才出现，之后很快就与这个作为同伴的文明达成联盟，而且从那以后就相互合作，难分彼此。

There are certain analogies, too, which hold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Christianity. As Civilization does not cover the whole earth, neither does Christianity; but there is nothing else like the one, and nothing else like the other. Each is the only thing of its kind. Again, there are, as I have already said, large outlying portions of the world in a certain sense cultivated and educated, which, if they could exist together in one, would go far to constitute a second *orbis terrarum* , the home of a second distinct civilization; but every one of these is civilized on its own principle and idea, or at least they ar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and have not run together, while th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 which I have been describing is one organized whole. And, in like manner, Christianity coalesces into one vast body, based upon common ideas; yet there are large outlying organizations of religion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and of it. Moreover, Christianity, as is the case in the parallel

instance of Civilization, continues on in the world without interruption from the date of its rise, while other religious bodies, huge, local, and isolated, are rising and falling, or are helplessly stationary, from age to age, on all sides of it.

这个文明与基督教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这个文明并没有覆盖全世界，基督教也没有，但是，这世上却并不存在与其中一者相像，也不存在与其中另一者想相像的事物。这个文明与这个宗教都是自身类别中的唯一。但是，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个世界还有很大的外围部分也是受过某种教化和教育的，假如这些外围部分联合成一个整体而存在，则可能走得很远并构成第二个世界，成为第二个不同文明的家园。可是，这些外围的部分却都以自身的原则与概念走向文明，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们都是彼此远隔的，并没有形成一体，而我描述的这个文明和社会却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同样，基督教自身也基于共同的观念而合并成很大的一个体系，但是，也有很大的外围宗教组织不仅彼此独立，而且也独立于这个宗教体系。另外，基督教跟这个文明一样，从它兴起的那时起就不间断地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发展，而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组织却因组织庞杂、地域局限或彼此隔绝而起起落落，要么世世代代无望地保持死寂状态。

There is another remarkable analogy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ivilization, and the mention of it will introduce my proper subject, to which what I have hitherto said is merely a preparation. We know that Christianity is built upon definite ideas, principles, doctrines, and writings, which were given at the time of its first introduction, and have never been superseded, and admit of no addition. I am not going to parallel any thing which is the work of man, and in the natural order, with what is from heaven, and in consequence infallible, and irreversible, and obligatory; but, after making this reserve, lest I should possibly be misunderstood, still I

would remark that, in matter of fact, looking at the state of the case historically, Civilization too has its common principles, and views, and teaching, and especially its books, which have more or less been give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and are, in fact, in equal esteem and respect, in equal use now, as they were when they were received in the beginning. In a word, the Classics, and the subjects of thought and the studies to which they give rise, or, to use the term most to our present purpose, the Arts, have ever, on the whole, been the instruments of education which the civilized *orbis terrarum* has adopted; just as inspired works, and the lives of saints, and the articles of faith, and the catechism, have ever been the instru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case of Christianity. And this consideration, you see, Gentlemen (to drop down at once upon the subject proper to the occasion which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invests the opening of the School in Arts with a solemnity and moment of a peculiar kind, for we are but reiterating an old tradition, and carrying on those august methods of enlarging the mind, and cultivating the intellect, and refining the feelings, in which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has ever consisted.

基督教与这个文明还有另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提及这一点就会引出我今天的正题，如上所述，只不过是为目前这个话题所做的铺垫。我们知道，基督教基于确定的观念、原则、教义和著述而建立，这些在创立之初就有，而且从那以后就不曾被废弃，也不容任何添加。我不会在这里把任何属于人的作为或出于自然秩序的东西，与来自上苍、因而是绝对可靠、不可逆转以及有约束力的东西相提并论。可是，说了这番留有余地的话之后，为防有人误解我的意思，我还是应当说明，从事实出发，并且依照历史的眼光看待当前这件事情的状态，文明也是有它自己的共同原则、观点和学说的，尤其是文明的著述，这些著述多少也是从最初就给予文明的，而且事实上如今跟它们最初给予这个文明时一样值得尊敬和爱护，并且得到同样的运

用。一句话，古典著作以及它们促发的思想及研究主题，或按照这个词最适合我们当前目的的那层意思来说，就是文艺，整体来说向来都是这个文明化的世界所采纳的教育手段，正如神启经卷、圣徒传、信仰文章和教义问答向来都是基督教所采纳的劝化手段。各位可以看出，这样一层考虑（让我们立即顺着适合我们聚集于此的话题往下谈），就为文学院的开设注入一股特别的庄严与郑重气氛，因为我们不过是在重申一个古老的传统，不过是在贯彻扩展心智、培育才智、陶冶情操的严谨方法，而文明的进程也正在于此。

4．

4．

In the country which has been the fountain head of intellectual gifts, in the age which preceded or introduced the first formations of Human Society, in an era scarcely historical, we may dimly discern an almost mythical personage, who, putting out of consideration the actors in Old Testament history, may be called the first Apostle of Civilization. Like an Apostle in a higher order of things, he was poor and a wanderer, and feeble in the flesh, though he was to do such great things, and to live in the mouths of a hundred generations and a thousand tribes. A blind old man; whose wanderings were such that, when he became famous, his birth-place could not be ascertained, so that it was said,—

在向来都是智性天赋源头的那个国家，在领先或开启了人类社会最初形成过程的那个时代，在差不多还没有历史记载的那个年代，我们也许就能依稀分辨出一位差不多是神秘人物的身影。假如将旧约历

史中的那些角色忽略不记，这个人也许就可以称为第一位“文明使徒”。就如同更高秩序的事务中的一位使徒，尽管他后来成就那么伟大的事业，千秋万代为世上各族人民所传唱，当日他却十分贫穷，四处流浪，且身体羸弱不堪。一位失明的老者，由于四处游历，竟然在出名之后，无人能确定他的出生地，因此才有这样的说法：

> *Seven famous towns contend for Homer dead,*
> *Through which the living Homer begged his bread.*

> “七座著名的城镇争抢已死的荷马，因诗人活着的时候曾在这里行乞。”

Yet he had a name in his day; and, little guessing in what vast measures his wish would be answered, he supplicated, with a tender human sentiment, as he wandered over the islands of the Aegean and the Asian coasts, that those who had known and loved him would cherish his memory when he was away. Unlike the proud boast of the Roman poet, if he spoke it in earnest, “*Exegi monumentum ære perennius* ,” he did but indulge the hope that one, whose coming had been expected with pleasure, might excite regret when he had departed, and be rewarded by the sympathy and praise of his friends even in the presence of other minstrels. A set of verses remains, which is ascribed to him, in which he addresses the Delian women in the tone of feeling which I have described. “Farewell to you all,” he says, “and remember me in time to come, and when any one of men on earth, a stranger from far, shall inquire of you, O maidens, who is the sweetest of minstrels here about, and in whom do you most delight? Then make answer modestly, it is a blind man, and he lives in steep Chios.”

然而，他活着的时候也曾享有声名。当他在爱琴海诸岛和亚洲的海岸流浪，曾怀着极温柔的情感发出恳求，希望认识和爱戴他的那些人，在他去世之后都能珍视对他的回忆，尽管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愿望会在多大程度上兑现。与罗马诗人傲慢的自夸不同的是，假如他诚挚地说："我已竖起比青铜还耐久的一座纪念碑"，他寄予的仅这么一个愿望，即众人满怀热情期盼他到来的这么一个人，在他离开人世之后也会引发人们的遗憾，并因使他的友人感到难过和当着其他吟游诗人的面大加赞扬他而感到没有枉活一世。归在他名下的一组诗歌留存下来，他在诗中以我刚刚描述过的口吻恳请得罗洛斯岛上的女人。他说："别了，亲爱的姑娘们。以后也别忘了我。假如世上还有哪一个人，哪怕是来自远方的人问起你们来，说这方圆之地歌声最甜美的诗人是谁，问哪一位吟咏者使你们最为开心，请一定适当地回答他。说就是那一位盲人，他生活在陡峭的希俄斯岛。"

The great poet remained unknown for some centuries,—that is, unknown to what we call fame. His verses were cherished by his countrymen, they might be the secret delight of thousands, but they were not collected into a volume, nor viewed as a whole, nor made a subject of criticism. At length an Athenian Prince took upon him the task of gathering together the scattered fragments of a genius which had not aspired to immortality, of reducing them to writing, and of fitting them to be the text-book of ancient education. Henceforth the vagrant ballad-singer, as he might be thought, was submitted, to his surprise, to a sort of literary canonization, and was invested with the office of forming the young mind of Greece to noble thoughts and bold deeds. To be read in Homer soon became the education of a gentleman; and a rule, recognized in her free age, remained as a tradition even in the times of her degradation. Xenophon introduces to us a youth who knew both *Iliad* and *Odyssey* by heart; Dio witnesses that they were some of the first

books put into the hands of boys; and Horace decided that they taught the science of life better than Stoic or Academic. Alexander the Great nourished his imagination by the scenes of the *Iliad* . As time went on, other poets were associated with Homer in the work of education, such as Hesiod and the Tragedians. The majestic lessons concerning duty and religion, justice and providence, which occur in Aeschylus and Sophocles, belong to a higher school than that of Homer; and the verses of Euripides, even in his lifetime, were so familiar to Athenian lips and so dear to foreign ears, that, as is reported, the captives of Syracuse gained their freedom at the price of reciting them to their conquerors.

这位伟大的诗人在几个世纪里一直默默无闻，就是说，没有我们所说的声名。他的同胞珍视他的诗文，这些诗行可能是数以千计者隐秘的欢乐，却并没有收集成册，也不是当一个整体看待的，没有成为文学批评的主题。终于有一位雅典王子自担重任，决定收集这位从没指望名垂青史的天才散乱的残章，将它们整理成册，使其成为古代教育的教科书。从此以后，这位不妨看作一位漂泊的民谣歌手的人，在出乎他意料的情况下被追封为文学圣人，并被委以培养希腊青年的高贵情操和英勇行为的重任。熟读荷马很快便成为绅士教育方法，成为在希腊保持自由的年代里确定下来的一条规则，甚至在希腊衰败的年代也保持为一个传统。色诺芬让我们知道了这位能背诵《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青年；狄奥作证说，这两本书是儿童最早开始读的一批书；贺拉斯坚持认为，这些诗篇给予儿童的人生科学教育，远胜于斯多葛或柏拉图的哲学；亚历山大大帝通过《伊利亚特》中的场景丰富自己的想象力。随着时间推移，其他的诗人也因教化之工而与荷马产生联系，如赫西奥德和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提供的那些事关责任与宗教、公义与天意的深刻教训，属于较荷马史诗更高级别的教育。欧里庇得斯的诗文，在他尚在人世时便已经为雅典人所吟诵，甚至在外邦人听起来都那么悦耳。据说，叙拉古的囚徒可以通过为征服者朗诵欧里庇得斯的诗文来获得自由。

Such poetry may be considered oratory also, since it has so great a power of persuasion; and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se two gifts had existed from the time that the verses of Orpheus had, according to the fable, made woods and streams and wild animals to follow him about. Soon, however, Oratory became the subject of a separate art, which was called Rhetoric, and of which the Sophists were the chief masters. Moreover, as Rhetoric was especially political in its nature, it presupposed or introduced the cultivation of History; and thus the pages of Thucydides became one of the special studies by which Demosthenes rose to be the first orator of Greece.

这些诗文亦不妨看作雄辩术，因为其中饱含强大的说服力。而且，这两种天赋之间的联系自远古便已存在，那个时候，据寓言所传，俄耳甫斯的诗文曾令树木和溪流及野兽追随他。可是，不久之后，雄辩术成为一门不同技艺的主题，改称为修辞学，诡辩家是这方面的大师。另外，由于修辞学本质上特别具有政治意味，它预设或引入了史学的培育，因此，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卷成为一种特别研究，而德摩斯梯尼借此成为希腊第一位演说家。

But it is needless to trace out further the formation of the course of liberal education; it is sufficient to have given some specimens in illustration of it. The studies, which it was found to involve, were four principal ones, Grammar, Rhetoric, Logic, and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 of Mathematics, again, was divided into four, Geometry, Arithmetic, Astronomy, and Music; making in all seven, which are known by the name of the Seven Liberal Arts. And thus a definite school of intellect was formed, founded on ideas and methods of a distinctive character, and (as we may say) of the

highest and truest character, as far as they went, and which gradually associated in one, and assimilated, and took possession of, that multitude of nations which I have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mankind, and to possess the *orbis terrarum* .

可是，再往前继续追踪通识教育进程的形成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已经举出足够多的样本来说明它。这里涉及的一些研究，主要就是四大项：文法、修辞、逻辑与数学。数学本身又分为四个小的部分：几何、算术、天文及音乐。加起来一共七门，总称为“自由人七艺”。此时，一种确定的才智教育方才形成。它基于特征完全不同的一些观念和方法，而且（我们不妨说）也算是基于最高和最真实的特征，并且将我认为可代表人类且占据着世界的众多国家慢慢联结成一个整体，予以同化和占领。

When we pass from Greece to Rome, we are met with the common remark, that Rome produced little that was original, but borrowed from Greece. It is true; Terence copied from Menander, Virgil from Homer, Hesiod, and Theocritus; and Cicero professed merely to reproduce the philosophy of Greece. But, granting its truth ever so far, I do but take it as a proof of the sort of instinct which has guided the course of Civilization. The world was to have certain intellectual teachers, and no others; Homer and Aristotle, with the poets and philosophers who circle round them, were to be the schoolmasters of all generations, and therefore the Latins, falling into the law on which the world's education was to be carried on, so added to the classical library as not to reverse or interfere with what had already been determined. And there was the more meaning in this arrangement, when it is considered that Greek was to be forgotten during many centuries, and the tradition of intellectual training to be conveyed through Latin; for thus the

world was secured against the consequences of a loss which would have changed the character of its civilization. I think it very remarkable, too, how soon the Latin writers became text-books in the boys' schools. Even to this day Shakespeare and Milton are not studied in our course of education; but the poems of Virgil and Horace, as those of Homer and the Greek authors in an earlier age, were in schoolboys' satchels not much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fter they were written.

当我们从希腊转向罗马，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老生常谈，说罗马根本都没有什么新奇创造，一切都是从希腊借来的。此话不假。特伦斯照搬米南德，维吉尔仿效荷马、赫西奥德和忒俄克里托斯，西塞罗宣称自己只不过是复制了希腊哲学。可是，就算目前的这些都是真实的，我却只能拿它当成引导了文明进程的那种本能的证据。这世界总得拥有某些智性导师，而不是另外一些人。荷马和亚里士多德以及围绕他们的诗人和哲学家，将要成为世世代代的教导者，因此，拉丁人落入这世界上的教育得以进行下去的法则，并如此增添进古典文库，从而使已经确定的一切不发生倒转或受到干扰。假如考虑到希腊将在许多世纪里被遗忘，而心智培育的传统会通过拉丁语得以传承，这样一种安排就更有意思了。因为这样一来，世界就得到保证，免于因这个文明的特征发生改变造成损失。我还认为，拉丁语作家的作品成为小校教科书的迅速程度也是相当惊人的。直到今天，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还没有在我们的教育进程中得到研究，可是，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诗歌，就如同荷马史诗和希腊作家的作品在更早年代时一样，全都在他们作品创作的百年左右就被塞进了学童的小书包。

I need not go on to show at length that they have preserved their place in the system of education in the *orbis terrarum* , and the Greek writers with them or through them, down to this day. The induction of centuries has often been made. Even in the lowest state

of learning the tradition was kept up. St. Gregory the Great, whose era, not to say whose influence, is often considered especially unfavourable to the old literature, was himself well versed in it, encouraged purity of Latinity in his court, and is said figuratively by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an of his life to have supported the hall of the Apostolic See upon the columns of the Seven Liberal Arts. In the ninth century, when the dark age was close at hand, we still hear of the cultivation, with whatever success (according of course to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times, but I am speak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studies, not of the proficiency of the students), the cultivation of Music, Dialectics, Rhetoric, Grammar, Mathematics, Astronomy, Physics, and Geometry; of the supremacy of Horace in the schools, “and the great Virgil, Sallust, and Statius.” In the thirteenth or following centuries, of “Virgil, Lucian, Statius, Ovid, Livy, Sallust, Cicero, and Quintilian;” and after the revival of literature in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modern era, we find St. Carlo Borromeo enjoining the use of works of Cicero, Ovid, Virgil, and Horace [3_2] .

我并不需要继续长篇累牍地说明他们如何保持了自己在那个世界的教育系统中的地位，而希腊作家也随同或通过他们流传至今。存在长达数百年的感应现象经常是已经形成。哪怕在最低的学问状态，这个传统也得以保存下来。圣格利高里一世的时代（姑且不论这个时代的影响力）向来被认为是特别不利于古典文学的。他本人熟暗文学，在教廷里，他鼓励拉丁文的纯粹化，同时代的史家经常形象地说，是他以刻有“自由人七艺”的石柱支撑起罗马教会的。到了九世纪，黑暗世纪快要到来前，我们仍然可以听到这种培育的声音，无论那种培育有多么成功（当然要根据时代提供的机会，可是，我谈的是各项研究的本质，而不是学生的学习水平），包括音乐、辩证法、修辞、文法、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几何学。我还谈到贺拉斯在学校的崇高地位，“以及伟大的维吉尔、萨卢斯特和斯达迪乌斯。”在十三世纪和接下来的诸世纪，我们还听到“维吉尔、路西安、斯达迪乌斯、奥维

德、利维、萨卢斯特、西塞罗和昆体良”的声音。在近代开始的文学复兴中，我们还发现圣卡洛·博罗梅奥在兴高采烈地使用西塞罗、奥维德、维吉尔和贺拉斯的作品。[4_2]

5．

5．

I pass thus cursorily over the series of informations which history gives us on the subject, merely with a view of recalling to your memory, Gentlemen, and impressing upon you the fact, that the literature of Greece, continued into, and enriched by, the literature of Rome, together with the studies which it involves, has been the instru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food of civilization, from the first times of the world down to this day;—and now we are in a condition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ich thereupon arises, when we turn to consider, by way of contrast, the teaching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Universities. How has it come to pass that, although the genius of Universities is s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schools which preceded them, nevertheless the course of study pursued in those schools was not superseded in the middle ages by those more brilliant sciences which Universities introduced? It might have seemed as if Scholastic Theology, Law, and Medicine would have thrown the Seven Liberal Arts into the shade, but in the event they failed to do so. I consider the reason to be, that the authority and function of the monastic and secular schools, as supplying to the young the means of education, lay deeper than in any appointment of Charlemagne, who was their nominal founder, and were based in the special character of that civilization which is

so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Christianity, that it may even be called the soil out of which Christianity grew. The medieval sciences, great as is their dignity and utility, were never intended to supersede that more real and proper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which is effected by the study of the liberal Arts; and, when certain of these sciences did in fact go out of their province and did attempt to prejudice the traditional course of education, the encroachment was in matter of fact resisted. There were those in the middle age, as John of Salisbury, who vigorously protested against the extravagances and usurpations which ever attend the introduction of any great good whatever, and which attended the rise of the peculiar sciences of which Universities were the seat; and, though there were times when the old traditions seemed to be on the point of failing, somehow it has happened that they have never failed; for the instinct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common sense of Society prevailed, and the danger passed away, and the studies which seemed to be going out gained their ancient place, and were acknowledged, as before, to be the best instruments of mental cultivation, and the best guarantees for intellectual progress.

我这样粗略地检阅在这个主题上历史给予我们的一系列信息，仅仅只是为了唤醒诸位的回忆，让大家对这个事实留下印象：希腊人的文学不仅持续到了罗马文学，而且还为罗马文学所丰富，连同它所涉及的其他研究一起，向来都是教育的手段和文明的基础，从世界最开始一直到今天。现在，当我们利用对照方法转而思考作为大学特色的那种教学时，我们就处在可以回答由之而起的这个问题的状态下了。虽然大学的精神与此前的中小学的精神如此之不同，但是，事情怎么会变成了这么一个样子，即那些中小学所开设的课程为什么没有在中世纪被大学所引入的那些好得多的学科所取代呢？看起来，经院神学、法律和医学似乎极可能使“自由人七艺”相形见绌，但结果却没有能够做到如此。我觉得原因可能是，修道院与世俗学校的权威及功

能，由于是要为年轻一代提供教育手段，因此比作为名义上的创始人的查理曼大帝确定的任何一个规定基础更深，并基于与基督教有如此紧密联系的那种文明特性，以至于甚至可以被称为基督教生长的土壤。中世纪科学尽管就其尊贵地位与用途来说十分伟大，却从来都无意于取代更真实和更适当的心智培育，这种心智培育是研究自由艺术所造成的。而且，当某些学科事实上真的越出自身领域并尝试干涉传统教育方式时，这些侵蚀行为却在事实上遭到抵制。在中世纪，曾出现像萨利斯伯里的约翰这样的人物，他猛烈抨击伴随会带来任何巨大利益的，伴随以大学为基础的特别学科的兴起而来的过度言行和篡夺行为。有时候，当旧传统看来就快要分崩离析的时候，可不知怎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些传统就是没有湮灭。因为文明的本能以及社会的常识总是盛行不衰，危险总会过去，当各项研究似乎就要熄灭之时，却又占据了它们古老的地盘，会像以前一样被确认为心智培育的最佳工具，并成为精神进步的最佳保障。

And this experience of the past we may apply to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at present; for, as there was a movement against the Classics in the middle age, so has there been now. The truth of the Baconian method for the purposes for which it was created, and its inestimable services and inexhaustible applications in the interests of our material well-being, have dazzled the imaginations of men, somewhat in the same way as certain new sciences carried them away in the age of Abelard; and since that method does such wonders in its own province, it is not infrequently supposed that it can do as much in any other province also. Now, Bacon himself never would have so argued; he would not have needed to be reminded that to advance the useful arts is one thing, and to cultivate the mind another. The simple question to be considered is, how best to strengthen, refine, and enrich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the perusal of the poets,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of Greece and Rome will accomplish this purpose, as

long experience has shown; but that the study of the experimental sciences will do the like, is proved to us as yet by no experience whatever.

这种过往经验也许可以应用于我们当前所在的境况。中世纪时存在针对古典著作的一种运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培根归纳法相对于创造这种方法的目的而言的真理，以及它对于我们的物质福利之利益无可估量的价值及用之不竭的应用，向来都使人的想象力应接不暇，这跟某种新科学曾在阿伯拉尔的时代使人陶醉有相同之处。由于这种归纳法在其自身领域创造了如许奇迹，所以经常就有人提议说，它在别的领域里也能够创造同样的奇迹。然而，培根本人却从来都不肯这么看。并不需要有人提醒他说，有用艺术的进步是一回事，培育心智却是另外一码事。需要考虑的一个简单问题就是，如何使强化、提炼和丰富智性的力量做到最好。熟读希腊罗马诗人、史家和哲学家的著作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长久的历史已经证明的。可是，实验科学的研究是否同样能达到这个目的，目前尚没有任何一类经验可以证明给我们看。

Far indeed am I from denying the extreme attractiveness,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benefit to the world at large, of the sciences of Chemistry, Electricity, and Geology; but the question is not what department of study contains the more wonderful facts, or promises the more brilliant discoveries, and which is in the higher and which in an inferior rank; but simply which out of all provides the most robust and invigorating discipline for the unformed mind. And I conceive it is as little disrespectful to Lord Bacon to prefer the Classics in this point of view to the sciences which have grown out of his philosophy as it would be disrespectful to St. Thomas in the Middle Ages to have hindered the study of *the Summa* from doing prejudice to the Faculty of Arts. Accordingly, I anticipate that, as in

the Middle Ages both the teaching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versity remained in the Faculty of Arts, in spite of the genius which created or illustrated Theology and Law, so now too, whatever be the splendour of the modern philosophy, the marvellousness of its disclosures, the utility of its acquisitions, and the talent of its masters, still it will not avail in the event, to detrud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the studies connected with it from the place which they have held in all ages in education.

化学、电学和地质学等学科给广义的世界带来的实际益处和极大吸引力，也远不是我想否认的。可是，问题并不在于哪个研究部门包含更令人惊奇的事实，或许诺更惊人的发现，也不在于哪一个部门级别更高或更低。问题非常简单，那就是在所有部门中，看哪个部门能够为未成熟的心智提供最强健和最有活力的训导。我觉得，假如在这个方面更倾向古典著作而不是从培根哲学中成长起来的各门科学，应当不会对培根勋爵构成任何不敬，而如果阻挡《神学大全》研究对人文系造成的损害，则是对中世纪的圣托马斯的不敬。相应地，我可以预测，正如在中世纪大学教学与管理都保持在人文系里，哪怕存在着创造或示范神学与法律的天赋。同样，在我们的时代，无论现代哲学都有哪些光辉灿烂的地方，哲学发现有何等惊人之处，其知识的用途如何了得，以及哲学大师有什么样的天赋，在这里都不起作用，不能将古典文学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各项研究赶出它们世世代代在教育中盘踞的地方。

Such, then, is the course of reflection obviously suggested by the act in which we have been lately engaged, and which we are now celebrat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a country which looks out upon a new world, and anticipates a coming age, we have been engaged in opening the Schools dedicated to the studies of polite literature and liberal science, or what are called the Arts, as a

first step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n Catholic ground of a Catholic University. And while we thus recur to Greece and Athens with pleasure and affection, and recognize in that famous land the source and the school of intellectual culture, it would be strange indeed if we forgot to look further south also, and there to bow before a more glorious luminary, and a more sacred oracle of truth, and the source of another sort of knowledge, high and supernatural, which is seated in Palestine. Jerusalem is the fountain-head of religious knowledge, as Athens is of secular. In the ancient world we see two centres of illumination, acting independently of each other, each with its own movement, and at first apparently without any promise of convergence. Greek civilization spreads over the East, conquering in the conquests of Alexander, and, when carried captive into the West, subdues the conquerors who brought it thither. Religion, on the other hand, is driven from its own aboriginal home to the North and West by reason of the sins of the people who were in charge of it, in a long course of judgments and plagues and persecutions. Each by itself pursues its career and fulfils its mission; neither of them recognizes, nor is recognized by the other. At length the Temple of Jerusalem is rooted up by the armies of Titus, and the effete schools of Athens are stifled by the edict of Justinian. So pass away the ancient Voices of religion and learning; but they are silenced only to revive more gloriously and perfectly elsewhere. Hitherto they came from separate sources, and performed separate works. Each leaves an heir and successor in the West, and that heir and successor is one and the same. The grace stored in Jerusalem, and the gifts which radiate from Athens, are made over and concentrated in Rome. This is true as a matter of history. Rome has inherited both sacred and profane learning; she has perpetuated and dispensed the traditions of Moses and David in the supernatural order, and of Homer and Aristotle in the natural. To separate those distinct teachings, human and divine, which meet

in Rome, is to retrograde; it is to rebuild the Jewish Temple and to plant anew the groves of Academus.

这，就是我们最近参与其中、当前也在大加庆贺的这一行动明确启示的反省路径。十九世纪，在一个展望新世界并预期就要来临的新世纪的国家里，我们已经着手开办一些专事风雅文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学院，或可称为文艺学院，这是朝着在天主教立场上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学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在这里怀着愉快的心情和情感重新提起希腊和雅典，并确认那一片著名土地上的智性培育根源和学校。假如我们忘记再朝南边看一眼，忘记在那里的一处更光辉灿烂的发光体、更神圣的真理神谕处、坐落于巴勒斯坦的另一种更高和超自然的知识的来源跟前鞠躬致敬，那可真是太奇怪了。耶路撒冷是宗教知识的源泉，正如雅典是世俗知识的源泉。在古代世界，我们看到两处各自闪出自己的光芒的中心，各自有着自己的活动，初一看明显并不存在汇聚的迹象。希腊文明朝东边传播，在亚历山大的远征中征服其他文明。但是，沦为西方的囚徒后，反倒征服了将它带回西方的征服者。另外一方面，宗教却因掌管宗教的人在长时期的审判、灾祸及迫害中的罪恶而从自己的诞生之地被驱赶到北边和西边。它们各自追求自己的事业，完成自己的使命，两者都没有认可对方，也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耶路撒冷的圣殿终于被提图斯的大军连根拔起，雅典衰老的学园被查士丁尼的法令所扼杀。古代的宗教之声及其学问也随之远去，但是，这些被扼杀的声音却在别处得到更风光和更完美的复活。到目前为止，它们都来自不同来源，并成就了各自的事业。两者都在西方留下了继承人和继位者，而且这位继承人和继位者还是同一个人。存留于耶路撒冷的神恩和从雅典生发出来的天赋转移到了罗马，并在那里生根。这是一种历史的真实。罗马继承了神圣和世俗两方面的学问，她保持并传播了超自然秩序中摩西和大卫的传统，也保持并传播了自然世界里荷马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如果要分开在罗马相遇的这种属人和属神的不同说教，那就是一种食古倒退，也就是重建犹太人的圣殿和重新栽种阿卡德摩学园的小树林。

6 .

6 .

On this large subject, however, on which I might say much, time does not allow me to enter. To show how sacred learning and profane are dependent on each other, correlative and mutually complementary, how faith operates by means of reason, and reason is directed and corrected by faith, is really the subject of a distinct lecture. I would conclude, then, with merely congratulating you, Gentlemen, on the great undertaking which we have so auspiciously commenced. Whatever be its fortunes, whatever its difficulties, whatever its delays, I cannot doubt at all that the encouragement which it has already received, and the measure of success which it has been allotted, are but a presage and an anticipation of a gradual advance towards its completion, in such times and such manner as Providence shall appoint. For myself, I have never had any misgiving about it, because I had never known anything of it before the time when the Holy See had definitely decided upon its prosecution. It is my happiness to have no cognizance of the anxieties and perplexities of venerable and holy prelates, or the discussions of experienced and prudent men, which preceded its definitive recognition on the part of the highest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It is my happiness to have no experience of the time when good Catholics despaired of its success, distrusted its expediency, or even felt an obligation to oppose it. It has been my happiness that I have never been in controversy with persons in this country external to the Catholic Church, nor have been forced into any direct collision with institutions or measures which rest on a foundation hostile to Catholicism. No one can accuse me of any

disrespect towards those whose principles or whose policy I disapprove; nor am I conscious of any other aim than that of working in my own place, without going out of my way to offend others. If I have taken part in the undertaking which has now brought us together, it has been because I believed it was a great work, great in its conception, great in its promise, and great in the authority from which it proceeds. I felt it to be so great that I did not dare to incur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fusing to take part in it.

但这是很大的一个话题，本来有很多话想说，但时间不允许我这么做。要说明圣俗学问如何彼此依靠、相互关联和补充，信仰如何通过理性的手段起作用，理性如何受到信仰的引导与纠正，的确是另一个演讲的主题。所以我这么作结，我谨恭祝各位，为我们已经如此顺利开局的一项伟大事业而开心。无论最终是什么样的机遇，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遭到何等的延误，我都根本无法怀疑，这项事业已经得到的鼓励和已经给予它的成功手段都是一个吉兆和预期，说明它会在神意如此约定的时代与确定的方式下慢慢接近成功。至于我自己，从来都没有为此感到任何程度的忧虑，因为在圣座明确地决定完成此事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在教会最高权威就此表示明确认可之前，一些可敬与神圣的高级教士曾为此感到焦虑和困惑，一些经验丰富和言行谨慎的人士为此进行过讨论，我对此一无所知，这实为一件幸事。当善心的天主教徒因看不到成功希望而绝望，怀疑其便利之处甚或觉得有责任加以反对的时候，我为当时并不知情而感到高兴。我向来感到高兴的事情是，从来都没有与这个国家天主教会以外的任何人发生争执，也不曾被迫与依赖于一个对罗马天主教怀有敌意的基础的某些制度或措施发生任何正面冲突。一些人的原则或政策是我所不同意的，但没有人能说我曾对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表示过任何程度的不敬，我对坚持本职工作以外的其他任何目的也不明了，因此无须无事生非地冲撞他人。如果说我已经参与使我们大家走到一起的这项事业，那是因为我向来都相信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不仅其构思如此，其前途如此，它所源自的权威也是如此。我觉得这是如此伟大的一项

事业，根本都不敢承担拒绝参与其中而引发的责任。

How far indeed, and how long, I am to be connected with it, is another matter altogether. It is enough for one man to lay only one stone of so noble and grand an edifice; it is enough,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if I do so much as merely begin, what others may more hopefully continue. One only among the sons of men has carried out a perfect work, and satisfied and exhausted the mission on which He came. One alone has with His last breath said "Consummatum est." But all who set about their duties in faith and hope and love, with a resolute heart and a devoted will, are able, weak though they be, to do what, though incomplete, is imperishable. Even their failures become successes, as being necessary steps in a course, and as terms (so to say) in a long series, which will at length fulfill the object which they propose. And they will unite themselves in spirit, in their humble degree, with those real heroes of Holy Writ and ecclesiastical history, Moses, Elias, and David, Basil, Athanasius, and Chrysostom, Gregory the Seventh, St. Thomas of Canterbury, and many others, who did most when they fancied themselves least prosperous, and died without being permitted to see the fruit of their labours.

我与此事有多大联系，多长时间的联系，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如此尊贵、如此宏伟的一座大厦，一个人能为它铺下一块石头也很不错了。在别人也许更有希望地继续下去的一项事业上，哪怕我只不过是起了个头，那也足够了，对我来说还远不止足够。上帝的子民中，仅有一位成就了一份完美的工作，并完成与穷尽了他为此而来的使命。只有他一人以最后的一口气说："成了。"以决断之心和献身愿望思考其信、望、爱职责的所有人，哪怕身体羸弱，也能成就即使不完全也会是不朽的事业。由于失败是一项事业中必要的步骤，也是一个

长长系列中（可谓）必要的项目，因此，哪怕失败也会变为成功，最终会实现他们提出的目标。虽然出身卑微，他们却能在精神上与圣经和教会史上真正的英雄结成一体，包括摩西、以利亚和大卫、巴西略、阿塔那修、克里索斯托姆、格利高里七世、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和其他许多人。这些人在认为自己最不顺意的时候反倒成就最大，去世的时候也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

[3_1].Vid. Huber.

[3_2].Vid. the treatises of P. Daniel and Mgr. Landriot, referred to in *Historical Sketches* , vol. ii., p. 460, note.

[4_1].参见胡贝尔。

[4_2].参见《历史掠记》第二卷第四百六十页注释中提到的P•丹尼尔及兰迪奥特阁下的文章。

Lecture 2. Literature. A Lecture in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Letters

第二讲：文学——在哲学与文学院的演讲

1 .

1 .

Wishing to address you, Gentlemen, at the commencement of a new Session, I tried to find a subject for discussion, which might be at once suitable to the occasion, yet neither too large for your time, nor too minute or abstruse for your attention. I think I see one for my purpose in the very title of your Faculty. It is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 and Letters. Now the question may arise as to what is meant by “Philosophy,” and what is meant by “Letters.” As to the other Faculties, the subject-matter which they profess is intelligible, as soon as named, and beyond all dispute. We know what Science is, what Medicine, what Law, and what Theology; but we have not so much ease in determining what is meant by Philosophy and Letters. Each department of that twofold province needs explanation: it will be sufficient, on an occasion like this, to investigate one of them. Accordingly I shall select for remark the latter of the two, and attempt to determine what we are to understand by Letters or Literature, in what Literature consists, and how it stands relatively to Science. We speak, for instance, of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the literature of the day, sacred literature, light literature; and our lectures in this place are devoted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re Letters, then, synonymous with books? This cannot be, or they would include in their range Philosophy, Law, and, in short, the teaching of all the other Faculties. Far from confusing these various studies, we view the works of Plato or Cicero sometimes as philosophy, sometimes as literature; on the other hand, no one would ever be tempted to speak of Euclid as literature, or of Matthiæ's *Greek Grammar* . Is, then, literature synonymous with composition? With books written with an attention to style? Is literature fine writing? Again, is it studied and artificial writing?

诸位，新学期伊始，为给大家作这个演讲，我就想找一个适合的讨论话题。它既不能太大，不然大家没时间听完，也不能太细小太深奥，不然可能大家不想听。我想，在贵院的名称上，可以找到切合我目的的话题，也就是哲学与文学院这个名称。问题就可能从“哲学”这个词的意思，或者“文学”这个词的意思当中牵出来。至于其他的一些学院，他们宣称的研究主题，一说出学院名称来就相当清楚明白了，且毫无争议。我们知道科学是什么，知道医学、法学和神学是什么，但是，要确定哲学和文学的含义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两个领域里的每一个部分门都需要单独解释：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只需要深究其中一个便足矣。我会相应地选择两者当中的后者进行评论，并尝试确定我们所说的“文字”或“文学”的含义，文学的意义何在，以及它与科学的相对关系。例如，我们谈到古代和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宗教文学和通俗文学，而我们在这里的演讲，针对的是古典文学和英语文学。那么，文字与书籍是相同的意思吗？不可能是这样的，否则，文字就会将哲学、法学或直接说是其他所有学院的学科都包括进来了。我们真不是要混淆这些研究，我们把柏拉图或西塞罗的著作，有时候视为哲学，有时视为文学。另外一方面，没有人会拿欧几里得几何学或马蒂埃的《希腊语语法》当文学作品。那么，文学与作文同义吗？与论述写作风格的著作同义吗？文学就是精细写作吗？文学是慎重和虚饰的写作吗？

There are excellent persons who seem to adopt this last account of Literature as their own idea of it. They depreciate it, as if it were the result of a mere art or trick of words. Professedly indeed, they are aiming at the Greek and Roman classics, but their criticisms have quite as great force against all literature as against any. I think I shall be best able to bring out what I have to say on the subject by examining the statements which they make in defence of their own view of it. They contend then, 1. that fine writing, as exemplified in the Classics, is mainly a matter of conceits, fancies, and prettinesses, decked out in choice words; 2. that this is the proof of it, that the classics will not bear translating;—(and this is why I have said that the real attack is upon literature altogether, not the classical only; for, to speak generally, all literature, modern as well as ancient, lies under this disadvantage. This, however, they will not allow; for they maintain,) 3. that Holy Scripture presents a remarkable contrast to secular writings on this very point, viz., in that Scripture does easily admit of translation, though it is the most sublime and beautiful of all writings.

有一些杰出人士，似乎就是拿对文学的这最后一种解释作为他们自己的文学概念。他们轻视文学，似乎把它当作纯粹的文字花招或把戏。从表面上看，他们针对的确实是古希腊与罗马经典，可是，他们对一种文学的批判，同样针对所有文学。我想，通过审视他们为捍卫自己观点所进行的论述，最有利于提出我对此话题的观点。他们的主张如下：第一，古典著作所示范的精细写作，主要就是以精挑细选的文字在表现自负、想象和华美；第二，作为以上论点的证据是，古典著作一般不好翻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说真正的攻击不仅仅针对古典文学，而是针对所有文学。因为，总的来说，所有文学，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都有这种通病。可是他们并不允许这一点，因为他们坚持第三点）；第三，正是在这一点上，圣经与世俗作品形成惊人

对照，就是说，圣经就译起来很容易，尽管它是所有作品中最崇高和最优美的。

2．

2．

Now I will begin by stating these three positions in the words of a writer, who is cited by the estimable Catholics in question as a witness, or rather as an advocate, in their behalf, though he is far from being able in his own person to challenge the respect which is inspired by themselves.

下面，我就按照一位作家的话来申明这三个立场，他被可敬的天主教徒作为证人或代表他们一方的倡导者引述出来，尽管这位作者本人远不能够挑战他们自己激发起来的敬意。

“There are two sorts of eloquence,” says this writer, “the one indeed scarce deserves the name of it, which consists chiefly in laboured and polished periods, an over-curious and artificial arrangement of figures, tinselled over with a gaudy embellishment of words, which glitter, but convey little or no light to the understanding. This kind of writing is for the most part much affected and admired by the people of weak judgment and vicious taste; but it is a piece of affectation and formality the sacred writers are utter strangers to. It is a vain and boyish eloquence; and, as it has always been esteemed below the great geniuses of all ages, so

much more so with respect to those writers who were actuated by the spirit of Infinite Wisdom, and therefore wrote with that force and majesty with which never man writ. The other sort of eloquence is quite the reverse to this, and which may be said to be the true characteristic of the Holy Scriptures; where the excellence does not arise from a laboured and far-fetched elocution, but from a surprising mixture of simplicity and majesty, which is a double character, so difficult to be united that it is seldom to be met with in compositions merely human. We see nothing in Holy Writ of affectation and superfluous ornament… Now, it is observable that the most excellent profane authors, whether Greek or Latin, lose most of their graces whenever we find them literally translated. Homer's famed representation of Jupiter—his cried-up description of a tempest, his relation of Neptune's shaking the earth and opening it to its centre, his description of Pallas's horses, with numbers of other long-since admired passages, flag, and almost vanish away, in the vulgar Latin translation.

这位作者说："一共有两种文采，其中一种根本都配不上文这个名称，因为它主要就是一些刻意拼凑和打磨的复合句、一些稀奇古怪和虚饰的比喻，再包上一层华而不实的文字修饰，虽然闪闪发光，对理解却带来极少或毫无助益。这一类的写作，大多数是得到一些判断力差、品位恶俗的人的喜爱与追捧，是宗教作家所不耻的娇饰与俗套之作。它是一种虚荣和孩子气的文采，向来被归为各个时代的伟大天才之下，与那些被无限智慧之灵气激励、而能以凡人从未具备的才气与威严写作的作家们相比，就更是如此了。另一种文采正如与此相反，也被视为圣经本色。这种文采的卓越并非源自做作和牵强附会的演说，而是来自简朴与庄重的奇妙融合，这种双重性极难融合，很少能在纯粹的凡世之作中见到。在圣经里，我们根本就看不到娇柔造作与浮饰之气……我们可以观察到，哪怕人间最优秀的作家，无论是希腊还是拉丁作家，作品一旦被直译，都失去了大部分的魅力。在荷马

对朱庇特著名的再现中，有他对暴风雨令人叫绝的描述，有他对海神把大地震开一条直通地心的口子场景的描述，有他对雅典娜之马的描述，还有其他众多流芳千古的章节。可是，翻译成通俗拉丁语后，这些精彩之处就大为褪色，差不多不见踪影了。

“Let any one but take the pains to read the common Latin interpretations of Virgil, Theocritus, or even of Pindar, and one may venture to affirm he will be able to trace out but few remains of the graces which charmed him so much in the original. The natural conclusion from hence is, that in the classical authors, the expression, the sweetness of the numbers, occasioned by a musical placing of words, constitute a great part of their beauties; whereas, in the sacred writings, they consist more in the greatness of the things themselves than in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The ideas and conceptions are so great and lofty in their own nature that they necessarily appear magnificent in the most artless dress. Look but into the Bible, and we see them shine through the most simpl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s. That glorious description which Moses gives of the creation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hich Longinus… was so greatly taken with, has not lost the least whit of its intrinsic worth, and though it has undergone so many translations, yet triumphs over all, and breaks forth with as much force and vehemence as in the original… In the history of Joseph, where Joseph makes himself known, and weeps aloud upon the neck of his dear brother Benjamin, that all the house of Pharaoh heard him, at that instant none of his brethren are introduced as uttering aught, either to express their present joy or palliate their former injuries to him. On all sides there immediately ensues a deep and solemn silence; a silence infinitely more eloquent and expressive than anything else that could have been substituted in its place. Had Thucydides, Herodotus, Livy, or any of the celebrated classical historians, been

employed in writing this history, when they came to this point they would doubtless have exhausted all their fund of eloquence in furnishing Joseph's brethren with laboured and studied harangues, which, however fine they might have been in themselves, would nevertheless have been unnatural, and altogether improper on the occasion.“ [4_1]

无论什么人，只要费心读一读维吉尔、忒俄克里托斯甚或品达作品的通俗拉丁语译本，如果他断言还能找到原作中令他着迷的些微痕迹，那他一定是在睁眼说瞎话。由此自然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在古典作家的作品中，表达技巧、文字按照音节的排列方式形成的数量之妙，构成很大一部分文学魅力。而在宗教作品中，文学魅力更多在于所描述事物本身的崇高，而非文字与表达技巧。这些概念和观点自身就足够伟大和崇高，即便用最平凡的文字装饰，必然还是如此宏伟壮观。只需看看《圣经》，我们就能发现它们透过最简朴的直译闪出光芒。摩西关于神造天地的描述是那么精彩，令朗吉努斯……崇敬万分，至今都没有失去一丁点内在价值，尽管经过那么多次翻译，到今天仍然威镇天下词章，仍然喷发着原著中同样的笔力与激情……讲约瑟的来历时，说约瑟与兄弟相认，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大哭，所有的法老都听到了他的哭声。那时候，他的兄弟们都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不安，不知道如何表达当前的喜悦，也不知道宽释以前对这弟兄的伤害。随即各方都出现深沉严肃的沉默，这沉默比任何其它描写都更有文采和表现力。就算请修西得底斯、希罗多德、李维或其他任何一位著名的古典史学家来重写这段历史，写到这一段时，毫无疑问他们会搜肠刮肚，用一大段深思熟虑而又做作的话描写约瑟的兄弟们，哪怕这些描写本身十分精细，听起来却一定极不自然，且完全不适合当时的情景。” [5_1]

This is eloquently written, but it contains, I consider, a mixture of truth and falsehood, which it will be my business to discriminate

from each other. Far be it from me to deny the unapproachable grandeur and simplicity of Holy Scripture; but I shall maintain that the classics are, as human compositions, simple and majestic and natural too. I grant that Scripture is concerned with things, but I will not grant that classical literature is simply concerned with words. I grant that human literature is often elaborate, but I will maintain that elaborate composition is not unknown to the writers of Scripture. I grant that human literature cannot easily be translated out of the particular language to which it belongs; but it is not at all the rule that Scripture can easily be translated either;—and now I address myself to my task:—

这段的确写得有文采，然而我认为，这是真理与谬误的混合产物，我的任务是要将它们分辨开来。我决不会否认圣经无与伦比的宏大与简朴，可我坚持认为，作为人的作品，古典著作也是简朴、庄严和自然的。我承认，圣经关乎万事万物，但我不认为古典文学完全只关乎文字。我承认人类的文学作品经常是煞费苦心的，可我还是坚持认为，煞费苦心的章法也并不是不为圣经作者所知。我承认，想把人类的文学作品从它所属的一种特定语言中翻译出来并不容易，可圣经也并非总是容易翻译的。我现在就来谈谈我所说的任务。

3．

3．

Here, then, in the first place, I observe, Gentlemen, that Literature, from the derivation of the word, implies writing, not speaking; this, however, arises from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copiousness, variety, and public circulation of the matters of which it consists. What is spoken cannot outrun the range of the speaker's voice, and perishes in the uttering. When words are in demand to express a long course of thought, when they have to be conveye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or perpetuated for the benefit of posterity, they must be written down, that is, reduced to the shape of literature; still, properly speaking, the terms, by which we denote this characteristic gift of man, belong to its exhibition by means of the voice, not of handwriting. It addresses itself in its primary idea, to the ear, not to the eye. We call it the power of speech, we call it language, that is, the use of the tongue; and, even when we write, we still keep in mind what was its original instrument, for we use freely such terms in our books as “saying,” “speaking,” “telling,” “talking,” “calling;” we use the terms “phraseology” and “diction;” as if we were still addressing ourselves to the ear.

各位，我在此首先得说清楚，根据文学这个词的词源，它意味着写作而非说话。但是，这种情形又源自构成文学的那些事物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公众传播等具体情形。说出来的话不可能越出说话者的声音所能传播的范围，话说完了，随后就消失无踪。当需要文字来表达较复杂的思想时，当需要文字传递到世界各地的时候，或需要将文字固定下来助益后人时，那就必须把它们写下来，也就是说，要变成文学的样式。尽管如此，严格说来，我们借以表示人类特有天赋的词语，是借用声音而非手写来进行展示的。它向耳朵而非眼睛彰显其主要的概念。我们称此为言语的力量，并命名为语言，即舌头的用处。哪怕在我们写作的时候，心里也会记住是其最原始的工具，因为我们在书中自由地运用像“说”、“讲”、“告诉”、“谈论”、“召唤”等词语。我们用“措辞”和“用语”等术语，就好像仍然在对着我们自己的耳朵说话。

Now I insist on this, because it shows that speech, and therefore literature, which is its permanent record, is essentially a personal work, It is not some production or result, attained by the partnership of several persons, or by machinery, or by any natural process, but in its very idea it proceeds, and must proceed, from some one given individual. Two persons cannot be the authors of the sounds which strike our ear; and, as they cannot be speaking one and the same speech, neither can they be writing one and the same lecture or discourse,—which must certainly belong to some one person or other, and is the expression of that one person's ideas and feelings,—ideas and feelings personal to himself, though others may have parallel and similar ones,—proper to himself, in the same sense as his voice, his air, his countenance, his carriage, and his action, are personal. In other words, Literature expresses, not objective truth, as it is called, but subjective; not things, but thoughts.

我之所以坚持这么说，是因为它表明，言语和作为言语永久纪录的文学，基本上就是一种个人的作品，它不是由多人合作、通过机械制或是其他自然过程形成的某种产品或结果。根据其本身的概念，它是而且必须是从某个特定的人出发的。传播到我们耳朵里的声音，不可能由两个人发出，而且，由于这两个人不可能发出同一言语，他们也不可能写下同一演讲或文论。它们必定属于某一个人，是这个人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尽管别人也可能产生相同或类似的思想及情感，但这些思想和情感是他一人独有的。同样地，这些演讲或文论也是他自己独有的，正如他的声音、神态、面容、举止和行为一样。换句话说，文学要表达的不是所谓的客观真理，而是主观真理；不是事物，而是思想。

Now this doctrine will become clearer by considering another

use of words, which does relate to objective truth, or to things; which relates to matters, not personal, not subjective to the individual, but which, even were there no individual man in the whole world to know them or to talk about them, would exist still. Such objects become the matter of Science, and words indeed are used to express them, but such words are rather symbols than language, and however many we use, and however we may perpetuate them by writing, we never could make any kind of literature out of them, or call them by that name. Such, for instance, would be Euclid's Elements; they relate to truths universal and eternal; they are not mere thoughts, but things: they exist in themselves, not by virtue of our understanding them, not in dependence upon our will, but in what is called the *nature* of things, or at least on conditions external to us. The words, then, in which they are set forth are not language, speech, literature, but rather, as I have said, symbols. And, as a proof of it, you will recollect that it is possible, nay usual, to set forth the propositions of Euclid in algebraical notation, which, as all would adm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iterature. What is true of mathematics is true also of every study, so far forth as it is scientific; it makes use of words as the mere vehicle of things, and is thereby withdrawn from the province of literature. Thus metaphysics, ethics, law, political economy, chemistry, theology, cease to be literature in the same degree as they are capable of a severe scientific treatment. And hence it is that Aristotle's works on the one hand, though at first sight literature, approach in character, at least a great number of them, to mere science; for even though the things which he treats of and exhibits may not always be real and true, yet he treats them as if they were, not as if they were the thoughts of his own mind; that is, he treats them scientifically. On the other hand, Law or Natural History has before now been treated by an author with so much of colouring derived from his own mind as to become a sort of

literature; this is especially seen in the instance of Theology, when it takes the shape of Pulpit Eloquence. It is seen too in historical composition, which becomes a mere specimen of chronology, or a chronicle, when divested of the philosophy, the skill, or the party and personal feelings of the particular writer. Science, then, has to do with things, literature with thoughts; science is universal, literature is personal; science uses words merely as symbols, but literature uses language in its full compass, as including phraseology, idiom, style, composition, rhythm, eloquence, and whatever other properties are included in it.

考虑文字的另外一个用法，这个说法就会更加明白，它与客观真理或事物确实有关。它与事物相关，但不是个别或个人主观的事物，即使世界上再没有人了解或谈论它们，这种事物仍然存在。这样的事物成为科学的对象，文字当然会被用来表达它们，但这样的文字更多是作为符号而非语言。无论我们使用多少这样的符号，即便我们通过书写使其长存不灭，也依旧无法以此产生任何一类文学，也不能以文学来称呼它们。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即是如此。里面的内容讲述的是普遍的永恒真理，谈到的不是纯粹的思想，而是事物。这些事物借自身存在，不依靠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存在，也不依靠我们的意志存在，而是凭借可以被称为事物本性的东西存在，或至少可以说它们依赖人类以外的条件而存在。所以，这些描述它们的文字就不是语言、言语、文学，而如我刚刚提到的那样，是符号。为证明这一点，你们不妨回顾一下，我们可以用代数符号来表示欧几里德命题，尽管不是经常这样。大家也都承认，这与文学毫不相干。在数学里面证明为真的东西，在其他任何具备科学性质的学科里也是如此。它拿文字当作纯粹的事物媒介，所以就远离了文学领域。因此，形而上学、伦理学、法学、政治经济学、化学以及神学，其文学属性与严密处理科学问题的能力成反比。因此才会有这样的情形：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乍一看是文学，但从其本质来看，至少其中一大部分却接近纯科学；哪怕他探究和展示的事物并非总是现实和真实的，可他处理这些

事物的方式却好像它们就是现实和真实的，而不会让人觉得它们是他自己大脑里的思想，就是说，他用科学方法来处理这些事物。另外一方面，法学或自然史以前被一位作家根据他自己的想法大加渲染，结果成为某种性质的文学。这种情形在神学中尤其常见，特别是很多神学研究都披上了讲坛文采的外衣。在历史编纂中也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形，去除某一位作家的哲思、技巧或党派及个人情感后，历史编写就成了纯粹的年代表或编年史标本。所以说，科学与事物相关，而文学却与思想相关。科学是一般的，文学是特殊的。科学仅仅把文字当符号使用，而文学却充分利用语言，包括其措辞、习语、风格、结构、韵律、文采和任何其他所有特性。

Let us then put aside the scientific use of words, when we are to speak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terature is the personal use or exercise of language. That this is so is further proved from the fact that one author uses it so differently from another. Language itself in its very origination would seem to be traceable to individuals. Their peculiarities have given it its character. We are often able in fact to trace particular phrases or idioms to individuals; we know the history of their rise. Slang surely, as it is called, comes of, and breathes of the personal.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force of words in particular languages and the habits and sentiments of the nations speaking them has often been pointed out. And, while the many use language as they find it, the man of genius uses it indeed, but subjects it withal to his own purposes, and moulds it according to his own peculiarities. The throng and succession of ideas, thoughts, feelings, imaginations, aspirations, which pass within him, the abstractions, the juxtapositions, the comparisons, the discriminations, the conceptions, which are so original in him, his views of external things, his judgments upon life, manners, and history, the exercises of his wit, of his humour, of his depth, of his sagacity, all these innumerable and incessant creations, the very

pulsation and throbbing of his intellect, does he image forth, to all does he give utterance, in a corresponding language, which is as multiform as this inward mental action itself and analogous to it, the faithful expression of his intense personality, attending on his own inward world of thought as its very shadow: so that we might as well say that one man's shadow is another's as that the style of a really gifted mind can belong to any but himself. It follows him about *as* a shadow. His thought and feeling are personal, and so his language is personal.

我们马上就要谈起语言和文学，现在就可以把文字的科学用途搁置一边了。文学是语言的个别运用或锤炼。一位作家与另一位作家利用语言的方法如此不同，这一事实可作为进一步的证据。语言起源本身似乎也可以追溯到单个的人。个人的独特性赋予语言以特征。我们事实上经常能够将某些特别的短语或成语追溯到一些单个的人，我们了解这些词语出现的历史。肯定地，俚语之所以被称为俚语，就是因为来自个别人，且带有明显的个人特征。文字在某些特别语言中的力度，与讲这些语言的民族的习惯与情操之间的联系，经常有人指出来。然而，尽管那些人按照他们眼中的语言的样子使用它，有天赋的人使用时却会使它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并根据自己的特性对它加以塑造。观点、念头、情感、想象、渴望不断涌出，在他的脑海里一一浮现；抽象、并置、比较、鉴别、构思都出自他的独创；他对外部事务的看法、他对生活、礼仪、历史的判断；他的机智、幽默、深度、睿智的运用；所有这些数不清和一刻不停的创造活动、才智的脉动和激跳，他都会用相应的语言一一描绘，逐个表达。这种语言形式多样，与他内在的精神活动本身相适应、相类似，这是对他强烈个性的忠实描绘，把自己内在的思想世界看作个性的影子。这样，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影子就是另一个人的影子，就如同说真正有天赋的头脑展现出的写作风格，可属于除他之外的任何人。这风格如影子一般追随着他。他的思想与情感是个人的，正如其语言也是个人的。

4．

4．

Thought and speech are inseparable from each other. Matter and expression are parts of one: style is a thinking out into language. This is what I have been laying down, and this is literature; not *things* , not the verbal symbols of things; not on the other hand mere *words* ; but thoughts expressed in language. Call to mind, Gentlemen, the meaning of the Greek word which expresses this special prerogative of man over the feeble intelligence of the inferior animals. It is called Logos: what does Logos mean? It stands both for *reason* and for *speech* , and it is difficult to say which it means more properly. It means both at once: why? because really they cannot be divided,—because they are in a true sense one. When we can separate light and illumination, life and motion, the convex and the concave of a curve, then will it be possible for thought to tread speech under foot, and to hope to do without it—then will it be conceivable that the vigorous and fertile intellect should renounce its own double, its instrument of expression, and the channel of its speculations and emotions.

思想与言语彼此难分。事物与表现是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风格是融入语言中的一种思维方式。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东西，而且这就是文学。不是事物，不是事物的声音符号；另外一方面，它也不是纯粹的文字，而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诸位请回想一个希腊词汇，它指的是人类相对次等动物的微弱智能而言的特权，被称为“Logos”。可是，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既指理性，也指言语，很难说这两层意思里面哪一层更适当。它同时表示这两层意思。为什么

呢？因为这两层意思实在无法分开，因为它们在真实意义上就是一个整体。只有当我们能分开光与光明、生命与运动、曲线的凹凸时，思想才有可能将言语踩在脚下，在没有言语的情况下也有所作为。也只有此时，才可以设想活力充沛的丰富才智能够否认它的双重才能，即作为表达手段以及表达思辨及情感的通道。

Critics should consider this view of the subject before they lay down such canons of taste as the writer whose pages I have quoted. Such men as he is consider fine writing to be *an addition from without* to the matter treated of,—a sort of ornament superinduced, or a luxury indulged in, by those who have time and inclination for such vanities. They speak as if *one* man could do the thought, and *another* the style. We read in Persian travels of the way in which young gentlemen go to work in the East, when they would engage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ose who inspire them with hope or fear. They cannot write one sentence themselves; so they betake themselves to the professional letter-writer. They confide to him the object they have in view. They have a point to gain from a superior, a favour to ask, an evil to deprecate; they have to approach a man in power, or to make court to some beautiful lady. The professional man manufactures words for them, as they are wanted, as a stationer sells them paper, or a schoolmaster might cut their pens. Thought and word are, in their conception, two things, and thus there is a division of labour. The man of thought comes to the man of words; and the man of words, duly instructed in the thought, dips the pen of desire into the ink of devotedness, and proceeds to spread it over the page of desolation. Then the nightingale of affection is heard to warble to the rose of loveliness, while the breeze of anxiety plays around the brow of expectation. This is what the Easterns are said to consider fine writing; and it seems pretty much the idea of the school of critics to whom I have been

referring.

评论家应当在考虑这个主题的这一观点之后，才能像我刚刚引述过其篇章的那位作者一样确定其审美标准。像他这样的人认为，优秀的作品是源自所处置事物之外的某种添加，也就是由有时间且热衷这些虚荣的人添加上去的装饰，或令他们沉溺其中的奢华。他们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是说，可以由一个人来处理思想，另一个人来处理风格。我们在波斯人的游记里了解到年轻士绅去往东方工作的情形，他们常常与那些以希望或担忧激发他们的人保持通信联系。他们自己一个句子也写不出，因此就请职业写信人代笔，将自己的心思透露给他。他们希望从更出众的人那里得到好处，寻求帮助，驱散罪恶。他们必须接近有权势的人，或是追求美女。代笔人按照他们的吩咐为其搬弄文字，正如文具商向他们出售纸张，或教师帮他们削笔一样。在他们的概念里，思想与文字是两个东西，这样才会有劳动分工。有思想的人来找动笔杆子的人，经过适当的思想培训后，动笔杆子的人就能把欲望之笔伸进奉献之墨，进而在荒芜之页上挥洒开来。之后，当焦虑的清风便能在期盼之眉上来回拂动时，人们就能听到深情款款的夜莺对着可爱玫瑰鸣唱。据说这就是东方人所认为的佳作，看起来很像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一派评论家的观点。

We have an instance in literary history of this very proceeding nearer home, in a great University, in the latter years of the last century. I have referred to it before now in a public lecture elsewhere; [4_2] but it is too much in point here to be omitted. A learned Arabic scholar had to deliver a set of lectures before its doctors and professors on an historical subject in which his reading had lain. A linguist is conversant with science rather than with literature; but this gentleman felt that his lectures must not be without a style. Being of the opinion of the Orientals, with whose writings he was familiar, he determined to buy a style. He took the

step of engaging a person, at a price, to turn the matter which he had got together into ornamental English. Observe, he did not wish for mere grammatical English, but for an elaborate, pretentious style. An artist was found in the person of a country curate, and the job was carried out. His lectures remain to this day, in their own place in the protracted series of annual Discourses to which they belong, distinguished amid a number of heavyish compositions by the rhetorical and ambitious diction for which he went into the market. This learned divine, indeed, and the author I have quoted,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the estimate they respectively form of literary composition; but they agree together in this,—in considering such composition a trick and a trade; they put it on a par with the gold plate and the flowers and the music of a banquet, which do not make the viands better, but the entertainment more pleasurable; as if language were the hired servant, the mere mistress of the reason, and not the lawful wife in her own house.

上世纪后半叶，在文学史上，在离家不远的一所著名大学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不久前在别处进行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曾提到这一点 [5_2] ，可是，因为十分切合今天的话题，所以决不可略而不论。一位学识渊博的阿拉伯学者，要给众多的博士与教授开一系列历史方面的讲座，他平时的阅读就在这方面。语言学家往往熟悉科学而非文学，可是，这位绅士觉得，他的讲座不能缺少风格。他赞同东方人的主张，也比较熟悉东方人的作品，因此决定花钱购买一种风格。于是就采取行动，出价请人将他准备好的材料改编成华丽的英语。请大家注意，他要的不仅是符合语法规范的英语，而是一种精致、矫饰的风格。一位乡村助理牧师被找出来承担此事。他的演讲稿留存至今，在所属的年度演讲集的长长系列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得以进入市场的夸张与雄心勃勃的措辞在若干冗长的作品集中特别显眼。这位颇有学识的神职人员，以及我引述过其作品的那位作者，从他们就文学写作分别形成的看法来说彼此不同，但有一点两个人却是一样的，即他

们都认为这样的写作就是一种把戏，一个行当。他们像看待宴会上摆放的金盘子和鲜花以及播放的音乐一样看待写作，那些东西并不会使食物更加可口，却会使宴会更加赏心悦目。语言就好像是请来的一名仆人，是理性纯粹的情人，而不是作家合法的妻子。

But can they really think that Homer, or Pindar, or Shakespeare, or Dryden, or Walter Scott, were accustomed to aim at diction for its own sake, instead of being inspired with their subject, and pouring forth beautiful words because they had beautiful thoughts? This is surely too great a paradox to be borne. Rather, it is the fire within the author's breast which overflows in the torrent of his burning, irresistible eloquence; it is the poetry of his inner soul, which relieves itself in the Ode or the Elegy; and his mental attitude and bearing, the beauty of his moral countenance, the force and keenness of his logic, are imaged in the tenderness, or energy, or richness of his language. Nay, according to the well-known line, “facit indignatio *versus* ;” not the words alone, but even the rhythm, the metre, the verse, will be the contemporaneous offspring of the emotion or imagination which possesses him. “Poeta nascitur, non fit,” says the proverb; and this is in numerous instances true of his poems, as well as of himself. They are born, not framed; they are a strain rather than a composition; and their perfection is the monument, not so much of his skill as of his power. And this is true of prose as well as of verse in its degree: who will not recognize in the vision of Mirza a delicacy and beauty of style which is very difficult to describe, but which is felt to be in exact correspondence to the ideas of which it is the expression?

可是，他们当真以为荷马、品达、莎士比亚、德莱顿或沃尔特·司各特都习惯于为了措辞本身而措辞，而不是因为受到主题的激发，不

是因为拥有美妙的想法才挥毫写下美妙的语言？这必然是一个极明显的悖论，着实无法令人相信。反之，他们的作品是胸中的激情之火，与他喷涌出来的炽热而不可阻挡的文采一同燃烧，是他内在灵魂的诗意，在颂诗和挽歌中得以抒发。而且，他的精神状态及心理活动、道德风貌之美、逻辑力量及严谨，全都在他用语的柔情、能量或丰富中体现出来。不仅如此。正如“义愤给予诗歌以灵感”这句名言所揭示的，不仅仅是文字本身，甚至还包括节奏、韵律、诗节，都是作者情感或想象力的即时产物。谚语说得好，“诗人乃天生，非后天所成”，无数诗人及其诗作都证明这是真理。它们是天生的而非人为的，它们是一种天性而非构成物。它们的完美与其说是作者的技巧娴熟，还不如说是他的能力高超。在诗歌和散文中情况是一样的。在米尔扎的异象里，真有谁领略不到风格的纤细与美妙吗？虽然很难描述，但人们可以感受得到，它正好符合这种风格所要表述的观念。

5．

5．

And, since the thoughts and reasonings of an author have, as I have said, a personal character, no wonder that his style is not only the image of his subject, but of his mind. That pomp of language, that full and tuneful diction, that felicitousness in the choice and exquisiteness in the collocation of words, which to prosaic writers seem artificial, is nothing else but the mere habit and way of a lofty intellect. Aristotle, in his sketch of the magnanimous man, tells us that his voice is deep, his motions slow, and his stature commanding. In like manner, the elocution of a great intellect is great. His language expresses, not only his great thoughts, but his great self. Certainly he might use fewer words than he uses; but he

fertilizes his simplest ideas, and germinates into a multitude of details, and prolongs the march of his sentences, and sweeps round to the full diapason of his harmony, as if κύδεϊ γαίων, rejoicing in his own vigour and richness of resource. I say, a narrow critic will call it verbiage, when really it is a sort of fulness of heart, parallel to that which makes the merry boy whistle as he walks, or the strong man, like the smith in the novel, flourish his club when there is no one to fight with.

而且正如我所说过的，由于一位作者的思想与推论具备一种个人特征，所以毫不奇怪的是，他的写作风格不仅是其主题，还是其思想的反映。华美的语言、丰富与悦耳的措辞、恰当的用词以及优美的搭配，在散文作家那里看来像是虚饰，但对于高级文人来说，这些纯粹其习惯与做法。亚里士多德在勾画雅量之人的形象时说，这样的人声音低沉，动作和缓，仪态威严。同样，但凡才智之士，其雄辩术也是一流的。他的语言不仅表达他的非凡思想，也表达他非凡的自我。当然，他也许可以使用更少的词，可他却丰富了最简朴的想法，并使之生发大量的细节，使得句子越来越长，奏出和声的最强音，就好像因其活力和丰富的手段而欣喜。我要说，一个心胸狭窄的评家会称此为冗词，可实际上这却是心灵的充盈，就像是快乐的男孩边走边吹口哨，又如同身强力壮的男子，像小说中的铁匠一样，在身边并无人可与之一战的情时候抡起大棒。

Shakespeare furnishes us with frequent instances of this peculiarity, and all so beautiful,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select for quotation. For instance, in Macbeth:—

莎士比亚经常为我们提供这类独树一帜的写作案例，而且是那么优美，让人难以从中挑选。比如，在《麦克白》中：

Canst thou not minister to a mind diseased,

“你难道不能诊治那种病态的心理，

Pluck from the memory a rooted sorrow,

从记忆中拔去一桩根深蒂固的忧郁，

Raze out the written troubles of the brain,

拭掉那写在脑筋上的烦恼，

And, with some sweet oblivious antidote,

用一种使人忘却一切的甘美的药剂，

Cleanse the foul bosom of that perilous stuff,

把那堆满在胸间、重压在心头的积毒

Which weighs upon the heart?

扫除干净吗？”

Here a simple idea, by a process which belongs to the orator rather than to the poet, but still comes from the native vigour of genius, is expanded into a many-membered period.

在这里，一个简单的概念，经过演说者而非诗人，但还是从诗人自身的活力中，被扩充为多个不同部分组成的复合句。

The following from Hamlet is of the same kind:—

《哈姆雷特》中的这段话同样如此：

Tis not alone my inky cloak, good mother,

“娘啊，儿的忧伤无以言表，

Nor customary suits of solemn black,

即便这如墨披肩加身，

Nor windy suspiration of forced breath,

即便这黑色孝服如常。

No, nor the fruitful river in the eye,

即便我如风的叹息强掩悲愤，

Nor the dejected haviour of the visage,

即便我流淌的眼泪几成河水，

Together with all forms, modes, shows of grief,

如灰的面容和沮丧的心情也莫能倾诉，

That can denote me truly.

一如悲伤的外表、行事与表演。”

Now, if such declamation, for declamation it is, however noble, be allowable in a poet, whose genius is so far removed from pompousness or pretence, much more is it allowable in an orator, whose very province it is to put forth words to the best advantage

he can. Cicero has nothing more redundant in any part of his writings than these passages from Shakespeare. No lover then at least of Shakespeare may fairly accuse Cicero of gorgeousness of phraseology or diffuseness of style. Nor will any sound critic be tempted to do so. As a certain unaffected neatness and propriety and grace of diction may be required of any author who lays claim to be a classic,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a certain attention to dress is expected of every gentleman, so to Cicero may be allowed the privilege of the "os magna sonaturum," of which the ancient critic speaks. His copious, majestic, musical flow of language, even if sometimes beyond what the subject-matter demands, is never out of keeping with the occasion or with the speaker. It is the expression of lofty sentiments in lofty sentences, the "mens magna in corpore magno." It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ner man. Cicero vividly realised the *status* of a Roman senator and statesman, and the "pride of place" of Rome, in all the grace and grandeur which attached to her; and he imbibed, and became what he admired. As the exploits of Scipio or Pompey are the expression of this greatness in deed, so the language of Cicero is the expression of it in word. And, as the acts of the Roman ruler or soldier represent to us, in a manner special to themselves, the characteristic magnanimity of the lords of the earth, so do the speeches or treatises of her accomplished orator bring it home to our imaginations as no other writing could do. Neither Livy, nor Tacitus, nor Terence, nor Seneca, nor Pliny, nor Quintilian, is an adequate spokesman for the Imperial City. They write Latin; Cicero writes Roman.

这当然是极好的吟诵，而一位诗人的才气往往容不得这样的浮夸与虚饰。无论它多么高贵，如果可以为诗人所用，那演说家肯定更可以用了，因为演说家所做的就是尽力把每个字眼用足。在西塞罗的任何作品里，都不存在比选自莎士比亚作品的这些段落更加累赘的部

分。至少在喜欢莎士比亚的人中，没有谁能理直气壮地指责西塞罗用词华丽或风格散漫。有头脑的评论家也决不会这样做。任何想写出经典杰作的作者都必须用词简洁、得体、优美而不做作，正如人们对绅士要注意着装的要求一样。因此，西塞罗就能够享受“言辞崇高而华丽”的特权，而这正是古代评论家所强调的。他滔滔不绝，用语宏伟而悦耳，哪怕有时候超出主题之要求，却从来都不会与当时的情景或讲话人脱节。这就是所谓的以优雅的句式表达崇高的情操，即“伟岸的身躯孕育伟大的精神”。这是人内在的成长。西塞罗体会到了罗马元老院议员及政客的地位，还有罗马的“首要地位”，及附着其上的优雅与庄严。他吸收这一切，并成为自己崇拜之物的同类。正如西庇阿或庞培的功绩说明了古罗马的伟大之处，西塞罗的用语就是对其伟大的文字说明。罗马统治者或武士以特有的方式用其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人间俊杰特有的崇高，杰出的演说家用其言语或论述也让我们得以想象这种崇高感，这不是其他写作可以实现的。同样，利维、塔西陀、特伦斯、塞涅卡、普林尼或昆体良也不足以成为罗马帝国的代言人。他们的写作具有拉丁特色，而西塞罗写的体现罗马特色。

6．

6．

You will say that Cicero's language is undeniably studied, but that Shakespeare's is as undeniably natural and spontaneous; and that this is what is meant, when the Classics are accused of being mere artists of words. Here we are introduced to a further large question, which gives me the opportunity of anticipating a misapprehension of my meaning. I observe, then, that, not only is that lavish richness of style, which I have noticed in Shakespeare, justifiable on the principles which I have been laying down, but,

what is less easy to receive, even elaborateness in composition is no mark of trick or artifice in an author. Undoubtedly the works of the Classics, particularly the Latin, *are* elaborate; they have cost a great deal of time, care, and trouble. They have had many rough copies; I grant it. I grant also that there are writers of name, ancient and modern, who really are guilty of the absurdity of making sentences, as the very end of their literary labour. Such was Isocrates; such were some of the sophists; they were set on words, to the neglect of thoughts or things; I cannot defend them. If I must give an English instance of this fault, much as I love and revere the personal character and intellectual vigour of Dr. Johnson, I cannot deny that his style often outruns the sense and the occasion, and is wanting in that simplicity which is the attribute of genius. Still, granting all this, I cannot grant, notwithstanding, that genius never need take pains,—that genius may not improve by practice,—that it never incurs failures, and succeeds the second time,—that it never finishes off at leisure what it has thrown off in the outline at a stroke.

你会说，西塞罗的用语无可否认是精挑细选的，而莎士比亚的语言却也无可否认是自然与自发的，因此人们认为古典作家仅仅就是文字艺术家而已。在此，我们就被牵扯进更大的一个问题，我正好从中预见到自己的意思很可能被人误解。我注意到，我提到的莎士比亚著作中华丽的写作风格不仅没有与我所说的原则相抵触，而且，哪怕是绞尽脑汁的遣词造句，也不一定就是作者在玩鬼把戏或哄骗世人，即使这一点更难让人接受。无庸置疑，古典著作，尤其是拉丁文著作，都是精雕细刻出来的，花费了很长时间，投入了很大精力，费尽了千般周折。我得说，它们都曾几易其稿。我还得承认，古今都有这样一些知名作家，他们的确对于自己把遣词造句当成笔墨辛劳的目的这一行为感到内疚。伊苏克拉底是这样，某些诡辩家也是如此。他们专心于文字而置思想或事物于不顾。我不可能为这些作家辩护。假如必须举出一位犯了同样错误的英国作家，那么，尽管十分喜爱和尊敬约翰

逊博士的个性与思想活力，我还是无法否认，他的写作风格经常超出写作的意义及情景的需要，也缺乏作为才气之作必要的简朴。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认同，天才就永远也不需要花费力气，永远不能经过练习而进步，永远也不会遭受失败，永远第一次就成功。我也不认同，往往在提纲里被一笔勾销的东西，最后能够轻轻松松地得以完成。

Take the instance of the painter or the sculptor; he has a conception in his mind which he wishes to represent in the medium of his art;—the Madonna and Child, or Innocence, or Fortitude, or some historical character or event. Do you mean to say he does not study his subject? Does he not make sketches? Does he not even call them “studies”? Does he not call his workroom a *studio* ? Is he not ever designing, rejecting, adopting, correcting, perfecting? Are not the first attempts of Michael Angelo and Raffaelle extant, in the case of some of their most celebrated compositions? Will any one say that the Apollo Belvidere is not a conception patiently elaborated into its proper perfection? These departments of taste are, according to the received notions of the world, the very province of genius, and yet we call them *arts* ; they are the “Fine Arts.” Why may not that be true of literary composition which is true of painting, sculpture, architecture, and music? Why may not language be wrought as well as the clay of the modeller? Why may not words be worked up as well as colours? Why should not skill in diction be simply subservient and instrumental to the great prototypal ideas which are the contemplation of a Plato or a Virgil? Our greatest poet tells us,

我们拿画家或雕刻家打比。他们先在头脑里构思希望通过艺术媒介表现出来的作品，比如圣母圣婴画、圣婴画、坚忍画或是历史人物

和事件。你们的意思是说，他并不研究自己的主题？他并不画草图？他并不称这些草图为“研究”？他并不称自己的工作场所为“画室”？他并没有一而再地设计、否决、采纳、修正和完善？在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最知名的一些作品中，他们最初的尝试不都是如此吗？有没有哪个人会说，望楼上的阿波罗不是从一个构思起头，然后耐心打磨至完美状态的？根据世人的标准观念，这一类的品味正是天才的领域，因而我们称其为艺术。它们被归为“美术”。在绘画、雕塑、建筑和音乐创作中是这样，为何在文学创作中就不是如此了呢？语言为何不能像塑像者手中的黏土那样被揣摸把玩？为什么文字不能像色彩那样由一笔一笔添加而成？柏拉图或维吉尔思索出来的伟大思想为何不能作为原型，让措辞技巧服务帮助其表达？我们最伟大的诗人告诉我们说：

The poet's eye, in a fine frenzy rolling,

“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狂放的一转中，

Doth glance from heaven to earth, from earth to heaven,

便能从天上看到地下，从地下看到天上。

And, as imagination bodies forth

想象会把虚无的东西，

The forms of things unknown, the poet's pen

用一种形式呈现出来，

Turns them to shapes, and gives to airy nothing

诗人的妙笔再使它们具有如实的形象，

A local habitation and a name.

虚无缥缈也会有了住处和名字。”

Now, is it wonderful that that pen of his should sometimes be at fault for a while,—that it should pause, write, erase, re-write, amend, complete, before he satisfies himself that his language has done justice to the conceptions which his mind's eye contemplated?

可见，他的那支笔若时不时出点差错：停下来，又写，擦除，重新写，修改，完成，直到他觉得用语已经彻底表达了心中所思，这难道不是很奇妙吗？

In this point of view, doubtless, many or most writers are elaborate; and those certainly not the least whose style is furthest removed from ornament, being simple and natural, or vehement, or

severely business-like and practical. Who so energetic and manly as Demosthenes? Yet he is said to have transcribed Thucydides many times over in the formation of his style. Who so gracefully natural as Herodotus? Yet his very dialect is not his own, but chosen for the sake of the perfection of his narrative. Who exhibits such happy negligence as our own Addison? Yet artistic fastidiousness was so notorious in his instance that the report has got abroad, truly or not, that he was too late in his issue of an important state-paper, from his habit of revision and recomposition. Such great authors were working by a model which was before the eyes of their intellect, and they were labouring to say what they had to say, in such a way as would most exactly and suitably express it. It is not wonderful that other authors, whose style is not simple, should be instances of a similar literary diligence. Virgil wished his Æneid to be burned, elaborate as is its composition, because he felt it needed more labour still, in order to make it perfect. The historian Gibbon in the last century is another instance in point. You must not suppose I am going to recommend his style for imitation, any more than his principles; but I refer to him as the example of a writer feeling the task which lay before him, feeling that he had to bring out into words for the comprehension of his readers a great and complicated scene, and wishing that those words should be adequate to his undertaking. I think he wrote the first chapter of his History three times over; it was not that he corrected or improved the first copy; but he put his first essay, and then his second, aside—he recast his matter, till he had hit the precise exhibition of it which he thought demanded by his subject.

照这么看，许多或大多数作家毫无疑问都是精心写作的。其写作风格或是简朴自然，或是热烈威猛，或是纯粹就事论事，远远不是矫揉造作的。有谁能像德摩斯梯尼那样充满活力、气概十足呢？据说，

为了磨练自己的风格，他曾反复抄录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有谁能像希罗多德更那样优雅自然呢？可是，他的用语却并非自己的，而是为使叙述完美而精挑细选的。有谁能展示像我们的同胞阿迪森那种心态轻松的渎职精神呢？可是，严谨的艺术追求在他的例子中如此突出，国外也有报道，不管是不是真的，他竟然延误了一份全国发行的重要报纸的发行，只是因为其反复修改和重新写作的习惯。这样伟大的作家，他们依照自己才智体会到的模式进行写作，费力气以最严格、最合适的方式把自己真正想说的话说出来。因此，毫不奇怪，其他的一些作家，其写作风格并不简朴，就应当是一种类似文学勤奋的例子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构思精妙，但他却希望烧掉它，因为他觉得这部史诗还需多费功夫完善。上个世纪的史学家吉本也是十分切题的一个例子。诸位不要以为，我会推荐他的创作原则甚至写作风格供模仿之用，我拿他举例是想说明一位作家是如何看待摆在眼前的使命的。他知道必须要把一个宏大复杂的场景付诸文字供读者领悟，并希望这些文字足以达成他的目标。我认为，他那本《历史》的第一章写了三稿。并不是说他修正或改进了第一稿，而是说，他将第一稿和第二稿放搁置一边，彻底重写，直到认为自己准确体现了主题的要求。

Now in all these instances, I wish you to observe, that what I have admitted about literary workmanship differs from the doctrine which I am opposing in this,—that the mere dealer in words cares little or nothing for the subject which he is embellishing, but can paint and gild anything whatever to order; whereas the artist, whom I am acknowledging, has his great or rich visions before him, and his only aim is to bring out what he thinks or what he feels in a way adequate to the thing spoken of, and appropriate to the speaker.

在上述所有这些例子里，我都希望大家能够看出，我在文学技巧

方面所认同的观点，与我在这里反对的那种教条是有所不同的，即是说，纯粹的文字搬弄者很少或根本就不关心他正在表现的主题，却仍然可以把任何东西粉饰一新并涂上金灿灿的外表，而我在此认可的真正艺术家们，眼前会浮现宏大丰富的场景，而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将思考或感觉到的东西表现出来，使其与所言及的事物相符合，并切合说话人的身份。

7．

7．

The illustration which I have been borrowing from the Fine Arts will enable me to go a step further. I have been showing the connection of the thought with the language in literary composition; and in doing so I have exposed the unphilosophical notion, that the language was an extra which could be dispensed with, and provided to order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But I have not yet brought out, what immediately follows from this, and which was the second point which I had to show, viz., that to be capable of easy translation is no test of the excellence of a composition. If I must say what I think, I should lay down, with little hesitation, that the truth was almost the reverse of this doctrine. Nor are many words required to show it. Such a doctrine, as is contained in the passage of the author whom I quoted when I began, goes upon the assumption that one language is just like another language,—that every language has all the ideas, turns of thought, delicacies of expression, figures, associations, abstractions, points of view, which every other language has. Now, as far as regards Science, it is true that all languages are pretty much alike for the purposes of Science;

but even in this respect some are more suitable than others, which have to coin words, or to borrow them, in order to express scientific ideas. But if languages are not all equally adapted even to furnish symbols for those universal and eternal truths in which Science consists, how can they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be all equally rich, equally forcible, equally musical, equally exact, equally happy in expressing the idiosyncratic peculiarities of thought of some original and fertile mind, who has availed himself of one of them? A great author takes his native language, masters it, partly throws himself into it, partly moulds and adapts it, and pours out his multitude of ideas through the variously ramified and delicately minute channels of expression which he has found or framed:—does it follow that this his personal presence (as it may be called) can forthwith be transferred to every other language under the sun? Then may we reasonably maintain that Beethoven's *piano* music is not really beautiful, because it cannot be played on the hurdy-gurdy. Were not this astonishing doctrine maintained by persons far superior to the writer whom I have selected for animadversion, I should find it difficult to be patient under a gratuitous extravagance. It seems that a really great author must admit of translation, and that we have a test of his excellence when he reads to advantage in a foreign language as well as in his own. Then Shakespeare *is* a genius because he can be translated into German, and *not* a genius because he cannot be translated into French. Then the multiplication-table is the most gifted of all conceivable compositions, because it loses nothing by translation, and can hardly be said to belong to any one language whatever. Whereas I should rather have conceived that, in proportion as ideas are novel and recondite, they would be difficult to put into words, and that the very fact of their having insinuated themselves into one language would diminish the chance of that happy accident being repeated in another. In the language of savages you can hardly

express any idea or act of the intellect at all: is the tongue of the Hottentot or Esquimaux to be made the measure of the genius of Plato, Pindar, Tacitus, St. Jerome, Dante, or Cervantes?

从美术界选取的一些例子，可以让我的讨论更进一步。我已经将文学创作中思想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展示过了，在此过程中，我已经将一种不符合哲理的观念揭示出来，即认为语言是额外之物，根据需求不同，它可以被搁置一旁，也可以被拿来使用。但是，从这里面直接引发出来的，也是我想说明的第二点，却还没有讲清楚，即易于翻译并不是检验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假如必须挑明我的意思，那我就要毫不迟疑地说，事实差不多正好与此相反。这一点说起来也并不费口舌。这样的观点，在我刚开始引述的作家作品中也有体现，是以这种假设为基础的，即所有语言完全相像，每种语言都有其他语言所具备的概念、思想的转变、精妙的表述、修辞手段、联想、缩略语和观点。就科学而言，所有语言都能为其所用，很好地服务于科学的目的。尽管如此，有些语言也较别的语言更加合适，因为有的语言必须造词或借助外来词才能表达科学观念。可是，假如所有语言不能得到同样调适，无法为构成科学的普遍、永恒的真理提供符号，那如何预期创造力旺盛、思想活跃的人使用其中一种语言表述其特有观点时能一样地丰富，一样地有说服力，一样地有乐感，一样地严谨呢？伟大的作家会学习母语，掌握它，一部分自由地运用，一部分进行塑造与调适，并通过他学到或构造的各种复杂精妙的表现方式倾诉其众多的观点。因此，可不可以说，他的个人表现（或许可以这样称呼）立刻就能移植到其他任何语言上呢？若是如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并不是真正动听，因为它并不能够在手摇风琴上演奏。要不是比我挑选出来进行批判的作家优秀得多的人认同这一令人震惊的理论，我是不会在此耐心地多费口舌的。看来，真正伟大的作家必须让自己的作品能够翻译，如果他的作品在外语里读起来也像在母语里顺口，他的卓越水平便得以验证了。如此说来，莎士比亚是个天才，因为他的作品能够翻译成德语；他也不是天才，因为他的作品无法翻译成法语。那么，乘法口诀表是不是能够想到的所有作品中最

伟大的？因为它经过翻译之后几无损失，而且很难说它到底属于某一特定语言。虽然我早应该想得出来，观念越是新奇深奥，便越是难以用文字表达。它们悄悄地潜入一门语言，就会使其在另一种语言中得以复现的机会大大降低。在野蛮人的语言里，文明人根本都无法表达任何思想或行为。霍屯督人或爱斯基摩人的语言，怎么能够成为衡量柏拉图、品达、塔西陀、圣哲罗姆、但丁或塞万提斯等人天赋的尺度？

Let us recur, I say, to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Fine Arts. I suppose you can express ideas in painting which you cannot express in sculpture; and the more an artist is of a painter, the less he is likely to be of a sculptor. The more he commits his genius to the methods and conditions of his own art, the less he will be able to throw himself into the circumstances of another. Is the genius of Fra Angelico, of Francia, or of Raffaelle disparaged by the fact that he was able to do that in colours which no man that ever lived, which no Angel, could achieve in wood? Each of the Fine Arts has its own subject-matter;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ase you can do in one what you cannot do in another; you can do in painting what you cannot do in carving; you can do in oils what you cannot do in fresco; you can do in marble what you cannot do in ivory; you can do in wax what you cannot do in bronze. Then, I repeat, applying this to the case of languages, why should not genius be able to do in Greek what it cannot do in Latin? and why are its Greek and Latin works defective because they will not turn into English? That genius, of which we are speaking, did not make English; it did not make all languages,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it did not make the laws of *any* language: why is it to be judged of by that in which it had no part, over which it has no control?

让我们再以美术示例。我猜想，我们无法用雕塑表现出来的东西，应当可以在绘画中表现出来，而且越杰出的画家越不可能成为雕塑家，越是将才气投入自身艺术的方法与环境中，他就越不可能全身心沉浸于另一门艺术中。弗拉·安吉利科、弗朗西斯科或拉菲尔的天才作品，会因为再没有任何人或是天使用木头达到他用色彩所能实现的成就，而受到损毁吗？各门美术都有自己的素材，从事情的本质来看，人们可以在一门艺术中做到的在另一门艺术中未必能做到。在绘画中，我们可以做到在雕刻中做不到的事情；在油画中，我们可以做到在壁画中做不到的事情；在大理石上，我们可以做到在象牙上做不到的事情；在蜡块上，我们可以做到在青铜上不能做到的事情。因此，我再说一次，假如将这一点应用在语言当中，为何天才不能在希腊语中做到在拉丁语中无法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希腊和拉丁语著作不能翻译成英语就一定存在缺陷呢？我们所说的这样一种才气，并不能造就英语，它不能造就任何语言，无论是当前的、过去的还是未来的语言。它也不能制定任何语言规则。我们为何要用与它无关而且是它无法控制的东西来评判它呢？

8．

8．

And now we are naturally brought on to our third point, which 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ly Scripture as compared with profane literature. Hitherto we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doctrine of these writers, viz., that style is an *extra* , that it is a mere artifice, and that hence it cannot be translated; now we come to their fact, viz., that Scripture has no such artificial style, and that Scripture can easily be translated. Surely their fact is as untenable as their doctrine.

这样，我们就自然过渡到了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与世俗文学特色相较而言的《圣经》特色。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是在谈这些作家的理论问题，就是说，风格是一种外在之物，纯粹只是一种人为之术，因此也就无法翻译出来。现在，我们谈到了客观事实，即《圣经》并不存在这类矫揉造作的风格，因此可以轻易翻译出来。很显然，他们所说的事实跟前面的理论一样站不住脚。

Scripture easy of translation! then why have there been so few good translators? Why is it that there has been such great difficulty in combining the two necessary qualities, fidelity to the original and purity in the adopted vernacular? Why is it that the authorized versions of the Church are often so inferior to the original as compositions, except that the Church is bound above all things to see that the version is doctrinally correct, and in a difficult problem is obliged to put up with defects in what is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provided she secure what is of first? If it were so easy to transfer the beauty of the original to the copy, she would not have been content with her received version in various languages which could be named.

《圣经》易于翻译？那为什么杰出译者那么少？为什么保持两种必要的品质，即保持对原作的忠实及纯净，那么困难？为什么教会授权的钦定版本比原版差得那么远？只是教会必须要尽力保证教义正确，在遇到麻烦问题时，只要能够保证头等重要的东西，就要忍受次等重要方面存在瑕疵。如果把原版之美可以轻易转移到译本之中，教会就不可能满足于其可以列举的各种语言的标准译本了。

And then in the next place, Scripture not elaborate! Scripture

not ornamented in diction, and musical in cadence! Why, consider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where is there in the classics any composition more carefully, more artificially written? Consider the book of Job—is it not a sacred drama, as artistic, as perfect, as any Greek tragedy of Sophocles or Euripides? Consider the Psalter—are there no ornaments, no rhythm, no studied cadences, no responsive members, in that divinely beautiful book? And is it not hard to understand? Are not the Prophets hard to understand? Is not St. Paul hard to understand? Who can say that these are popular compositions? Who can say that they are level at first reading with 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 multitude?

其次，《圣经》不是精心刻画之作？《圣经》的用词并无文饰，也没有节奏上的乐感？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想一想《使徒信书》和《希伯来书》吧！古典著作中，哪一篇比它更为谨慎、更显出人为技巧的？看看《约伯记》吧！那难道不是一出与索福克勒斯或欧里庇得斯的希腊悲剧同样精彩、同样完美的宗教戏剧？再看看《诗篇》这部有神性之美的经卷吧！里面难道就没有修饰，没有韵律，没有精心设计的节奏，没有彼此应答的成分？难道不难懂？《先知书》不难懂？《保罗书信》不也是很难懂？谁能说这些都是流行之作？谁能说这些经卷普通民众一看就能理解？

That there are portions indeed of the inspired volume more simple both in style and in meaning, and that these are the more sacred and sublime passages, as, for instance, parts of the Gospels, I grant at once; but this does not militate against the doctrine I have been laying down. Recollect, Gentlemen, my distinction when I began. I have said Literature is one thing, and that Science is another; that Literature has to do with ideas, and Science with realities; that Literature is of a personal character, that Science

treats of what is universal and eternal. In proportion, then, as Scripture excludes the personal colouring of its writers, and rises into the region of pure and mere inspiration, when it ceases in any sense to be the writing of man, of St. Paul or St. John, of Moses or Isaias, then it comes to belong to Science, not Literature. Then it conveys the things of heaven, unseen verities, divine manifestations, and them alone—not the ideas, the feelings, the aspirations, of its human instruments, who, for all that they were inspired and infallible, did not cease to be men. St. Paul's epistles, then, I consider to be literature in a real and true sense, *as* personal, *as* rich in reflection and emotion, as Demosthenes or Euripides; and, without ceasing to be revelations of objective truth, they are expressions of the subjective notwithstanding. On the other hand, portions of the Gospels, of the book of Genesis, and other passages of the Sacred Volume, are of the nature of Science. Such is the beginning of St. John's Gospel, which we read at the end of Mass. Such is the Creed. I mean, passages such as these are the mere enunciation of eternal things, without (so to say) the medium of any human mind transmitting them to us. The words used have the grandeur, the majesty, the calm, unimpassioned beauty of Science; they are in no sense Literature, they are in no sense personal; and therefore they are easy to apprehend, and easy to translate.

的确，《圣经》里有许多部分的风格和含义都更简单，而且这些都是更具神性和更为崇高的篇章，比如我立即就可以举出《福音书》的几个篇章。可这不会对我刚才提出的说法构成不利影响。请诸位回顾一下我在开始的时候所进行的区分。我说过，文学是一回事，科学是另一回事，文学与理念相关，而科学处理现实；文学是属于个人特性的东西，而科学只管普遍和永恒的事物。《圣经》在多大程度上排斥作者的个人色彩，并上升至纯洁、纯粹的神性阶段，此时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再是人的写作，比如圣保罗，或圣约翰，或摩西或以赛亚

的写作，那它就在同样程度上归属于科学而非文学。此时，它讲述的是天上的事物，是看不见的现实，是神圣的显灵，而且就只是这些内容，而不是关于人类特性的观念、情感、渴望等。因为，尽管人类接到神示后变得真实可靠，却不会因此脱离人类。因此，圣保罗的《使徒信书》，我认为从真正切实意义上来说就是文学，它像德摩斯梯尼或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一样富有个人色彩，富于反省与情感。尽管它们并不会因此就放弃揭示客观真理，却是在表达主观思想。另一方面，《福音书》的很多部分，《创世记》的许多章节，《圣经》的其他许多段落，都具备科学的本质。圣约翰的《福音书》开头就是如此，我们常常在《弥撒曲》的结尾念到这一段。《信经》亦是如此。我是说，上述段落纯粹就是对永恒事物的解释，可以说并不需要任何人类思想的媒介将它们传递给我们。所使用的那些字眼，具备科学宏大、庄严、镇定和平静之美。它们并非任何意义上的文学，它们并非任何意义上的个人事物，因此很容易理解，也容易翻译。

Did time admit I could show you parallel instances of what I am speaking of in the Classics, inferior to the inspired word in proportion as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classical authors is immensely inferior to the subjects treated of in Scripture—but parallel, inasmuch as the classical author or speaker ceases for the moment to have to do with Literature, as speaking of things objectively, and rises to the serene sublimity of Science. But I should be carried too far if I began.

假如时间允许，我很想从古典著作里再抽出类似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它们远远比不上《圣经》里的用语，正如古典著作家们所处理的素材远远比不上圣经所应对的主题一样。可是，两者又有类似之处，因为古典作家或演说家在客观地谈论事物的那一刻已经不再与文学相关，而是会上升至科学的宁静与庄严高度。可是这么谈下去，可能就会离题太远了。

9 .

9 .

I shall then merely sum up what I have said, and come to a conclusion. Reverting, then, to my original question,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etters, as contained, Gentlemen, in the designation of your Faculty, I have answered, that by Letters or Literature is meant the expression of thought in language, where by “thought” I mean the ideas, feelings, views, reasonings, and other operations of the human mind. And the Art of Letters is the method by which a speaker or writer brings out in words, worthy of his subject, and sufficient for his audience or readers, the thoughts which impress him. Literature, then, is of a personal character; it consists in the enunciations and teachings of those who have a right to speak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ir kind, and in whose words their brethren fin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own sentiments, a record of their own experience, and a suggestion for their own judgments. A great author, Gentlemen, is not one who merely has a *copia verborum* , whether in prose or verse, and can, as it were, turn on at his will any number of splendid phrases and swelling sentences; but he is one who has something to say and knows how to say it. I do not claim for him, as such, any great depth of thought, or breadth of view, or philosophy, or sagacity, or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or experience of human life, though these additional gifts he may have, and the more he has of them the greater he is; but I ascribe to him, as his characteristic gift, in a large sense the faculty of Expression. He is master of the two-fold Logos, the thought and the word, distinct, but inseparable from each other. He may, if so be,

elaborate his compositions, or he may pour out his improvisations, but in either case he has but one aim, which he keeps steadily before him, and is conscientious and single-minded in fulfilling. That aim is to give forth what he has within him; and from his very earnestness it comes to pass that, whatever be the splendour of his diction or the harmony of his periods, he has with him the charm of an incommunicable simplicity. Whatever be his subject, high or low, he treats it suitably and for its own sake. If he is a poet, “nil molitur *ineptè* .” If he is an orator, then too he speaks, not only “distinctè” and “splendidè,” but also *“aptè.“* His page is the lucid mirror of his mind and life—

因此我准备简单地总结一下上面所说的，然后下一个结论。现在回到我最初的问题，即文学是什么，这在贵学院的名称上就有。我已经给出的回答是：所谓文学，就是用语言表达思想。这里所说的“思想”是指观念、情感、意见、推论及人类心智的其他活动。所谓文学艺术，就是演说家或作家使用文字表达思想的方法。这方法必须匹配得上他的主题，并足以让听众或读者明白他的意思。因此，文学就具备某种个人特色。文学存在于有权作为人类代表发言的人的解释与教导之中，而在他们的语言中，他们的同胞可以找到其情感的阐释、经验的记录以及对他们自我判断的建议。诸位，伟大的作家，无论行文还是作诗，并非仅仅只靠长篇大论，也不只是可以信手拈来任意数目的精美措辞和复杂句式，而是他的确有话要说，而且知道怎么说。我不苛求他有什么思想深度，视野宽阔，有哲思，具备远见卓识，懂得人性知识，人生经验丰富，尽管他可能具备这些额外的天赋，而且具备的越多，他也就越是伟大。可我认为他特有的天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他的表达能力，决定了他的成就。他是思想和语言这双重概念的主人，这两者彼此有别，却无法相互分开。他也许会按需要把文章写得十分精美，他也许会即兴挥毫、滔滔不绝。可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只有一个目标，他始终把这个目标摆在眼前，为实现这目标，他谨小慎微、心无旁骛。这个目标就是表达心中的所思所想。无论他遣

词造句有多么光彩夺目，无论他的复合句用得多么和谐，有了他的这份诚挚，他都有无法言表的简朴之美。无论他的主题是什么，高尚也好，低俗也罢，他都能按照这个主题进行适当的处理。如果他是诗人，便“不犯愚蠢的错误”。如果他是演说家，那么，他说话时不仅“清晰”、“流畅”，而且还“得体”。他的作品即他思想与生活的清晰写照：

Quo fit, ut omnis

“这位（伟大的）老人全部的一生

Votivâ pateat veluti descripta tabellâ

就写在这里

Vita senis.

就如同刻在还愿碑上。”

He writes passionately, because he feels keenly; forcibly, because he conceives vividly; he sees too clearly to be vague; he is too serious to be otiose; he can analyze his subject, and therefore he is rich; he embraces it as a whole and in its parts, and therefore he is consistent; he has a firm hold of it, and therefore he is luminous. When his imagination wells up, it overflows in ornament; when his heart is touched, it thrills along his verse. He always has the right

word for the right idea, and never a word too much. If he is brief, it is because few words suffice; when he is lavish of them, still each word has its mark, and aids, not embarrasses, the vigorous march of his elocution. He expresses what all feel, but all cannot say; and his sayings pass into proverbs among his people, and his phrases become household words and idioms of their daily speech, which is tesselated with the rich fragments of his language, as we see in foreign lands the marbles of Roman grandeur worked into the walls and pavements of modern palaces.

他怀着激情写作，因为他有强烈的感觉；他力透纸背，因为他有生动的构想；他看得十分清楚，因而想法并不模糊；他神情严肃，因而没有多余的话可说。他能分析主题，因此他思想丰富；他拿主题当一个整体看待，也从各个部分把握，因此他前后连贯。他对主题有牢靠的把握，因而作品清晰易懂。当他的想象力喷发起来，就会以万千种文饰表现出来。当他的心灵受到感动，就会与他的诗行一起震颤。他总有合适的词语用来恰当地表达思想，永远都不会过犹不及。假如他用词简洁，那是因为几个词便足够了。假如他大量用词，那是因为每个字都有其用途，这些词会帮助而不是阻碍他泉涌的文思。他表达的是所有人都感觉到、却又无法说清楚的东西；他说的话会成为谚语，他用的词成为千家万户耳熟能详的字眼和成语，被编织成丰富的语段，就如同我们在国外也会看到华美的罗马大理石出现在现代宫殿的墙壁与人行道上一样。

Such pre-eminently is Shakespeare among ourselves; such pre-eminently Virgil among the Latins; such in their degree are all those writers who in every nation go by the name of Classics. To particular nations they are necessarily attached from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variety of tongues, and the peculiarities of each; but so far they have a catholic and ecumenical character, that what

they express is common to the whole race of man, and they alone are able to express it.

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特别突出的一个例子是莎士比亚；在拉丁文化中，特别突出的例子是维吉尔。那些在世界各国都被称作古典作家的人也都是这样的。根据语言的种类和特征，他们必然归属于特定的国家，但是，他们具备大公和普世的特征，他们表达的便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东西，也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去表达。

10．

10．

If then the power of speech is a gift as great as any that can be named,—if the origin of language is by many philosophers even considered to be nothing short of divine,—if by means of words the secrets of the heart are brought to light, pain of soul is relieved, hidden grief is carried off, sympathy conveyed, counsel imparted, experience recorded, and wisdom perpetuated,—if by great authors the many are drawn up into unity, national character is fixed, a people speaks,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the East and the West are brought into communication with each other,—if such men are, in a word, the spokesmen and prophets of the human family,—it will not answer to make light of Literature or to neglect its study; rather we may be sure that, in proportion as we master it in whatever language, and imbibe its spirit, we shall ourselves become in our own measure the ministers of like benefits to others, be they many or few, be they in the obscurer or the more distinguished walks of

life,—who are united to us by social ties, and are within the sphere of our personal influence.

假如言语力量能跟其他列举出来的任何天赋同样了不起，假如语言果真起源于许多被认为不亚于上帝的哲学家，假如通过文字的手段而能昭示内心的奥秘，舒缓心灵的痛苦，宣泄隐秘的悲伤，传递同情心，领会忠告，记录经验，留存智慧，假如通过一些伟大的作家能使众人团结起来，国民性得以确定，民族畅所欲言，过去和未来、东方和西方可以彼此交流，总之，假如这些人就是人类大家族的代言人和预言家，那么，轻视文学或文学研究就太不合适了。相反，我们可以确信，无论对何种语言，我们都应是它的主人，吸收它的精髓，相应地，我们应当按照自己的标准成为向他人传递类似益处的乐善好施者，无论这些人是多是少，是不知名的小人物，还是地位显赫的人，他们都通过社会纽带与我们联系起来，并处在我们的个人影响范围之内。

[4_1].Sterne, Sermon xlii.

[4_2]."Position of Catholics in England," pp. 101-2.

[5_1].参见圣经中Sterne布道

[5_2].参见《英国天主教的地位》第101页到102页。

Lecture 3. English Catholic Literature

第三讲：英语中的天主教文学

One of the special objects which a Catholic University would promote is that of the formation of a Catholic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t is an object, however, which must be understood before it can be suitably prosecuted; and which will not be understood without some discussion and investigation. First ideas on the subject must almost necessarily be crude. The real state of the case, what is desirable, what is possible, has to be ascertained; and then what has to be done, and what is to be expected. We have seen in public matters, for half a year past, [5_1] to what mistakes, and to what disappointments, the country has been exposed, from not having been able distinctly to put before it what was to be aimed at by its fleets and armies, what was practicable, what was probable, in operations of war: and so, too,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we are sure of falling into a parallel perplexity and dissatisfaction, if we start with a vague notion of doing something or other important by means of a Catholic University, without having the caution to examine what is feasible, and what is unnecessary or hopeless. Accordingly, it is natural I should wish to direct attention to this subject, even though it be too difficult to handle in any exact or complete way, and though my attempt must be left for others to bring into a more perfect shape, who are more fitted for the task.

一所天主教大学应当倡导的特别目标之一，便是要在英语语言中促成一种天主教文学。可是，只有理解这个概念之后才能恰当对其进

行实施。不经些讨论与探索，是无法很好理解这目标的。关于这一主题最初的一些想法，几乎必然是粗略的。真实的情况、什么是要提倡的以及什么是可能的，这些都必须一一落实，之后才能确定必做之事以及预期如何。刚刚过去的半年里[36]，我们在公共事务中发现，这个国家错误迭出，让人连连失望。它没有将海军和陆军在战争行动中追求的实际和可行的目标明确地列在面前；而在文学领域，假如在借助天主教大学实施重要举措时一开始就抱有模糊观念，不小心谨慎地考察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必要或毫无希望实现的事情的话，那我们一定也会感到类似困惑与不满。相应地，尽管这个话题很难完整确切地加以处理，我今天还是抛砖引石，希望借此促使其他人来进行完善，使它更有利于目标的实现。

Here I shall chiefly employ myself in investigating what the object is *not* .

在此，我主要是想先说明这个目标不是什么。

1. In Its Relation to Religious Literature

第一节：它与宗教文学的关系

When a “Catholic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 tongue” is spoken of as a *desideratum* , no reasonable person will mean by “Catholic works” much more than the “works of Catholics.” The phrase does not mean a *religious* literature. “Religious Literature” indeed would mean much more than “the Literature of religious men;” it means over and above this, that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Literature is religious; but by “Catholic Literature” is not to be understood a literature which treats exclusively or primarily of Catholic matters,

of Catholic doctrine, controversy, history, persons, or politics; but it includes all subjects of literature whatever, treated as a Catholic would treat them, and as he only can treat them. Why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them treated by Catholics hardly need be explained here, though something will be incidentally said on the point as we proceed: meanwhile I am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phrases in order to avoid a serious misapprehension. For it is evident that, if by a Catholic Literature were meant nothing more or less than a religious literature, its writers would be mainly ecclesiastics; just as writers on Law are mainly lawyers, and writers on Medicine are mainly physicians or surgeons. And if this be so, a Catholic Literature is no object special to a University, unless a University is to be considered identical with a Seminary or a Theological School.

当我们谈起“英语语言中的天主教文学”，就好像它是一种迫切需要时，没有哪个有理性的人会认为，“天主教著作”的含义远远大于“天主教徒的著作”。这个词组并不是指一种宗教文学。的确，“宗教文学”的含义肯定大于“宗教人士的文学”，它不仅仅指的是素材带有宗教性质的文学。但“天主教文学”却不能理解为仅仅或主要处理天主教事务、天主教教条、争议、历史、人物或政治的一种文学，它还包括各种文学中的所有主题，对待它们的处理方式就是一位天主教徒处理它们的方式，而且只有天主教徒才能这样处理它们。为何让天主教徒来处理这些主题十分重要，这一点并不需要在此解释，不过，我们在叙述过程中，会时不时提到这一点。此时，我想让大家注意这两个用语的区别，以免出现严重误解。显而易见的是，假如说天主教文学指的正是一种宗教文学，那它的作者将主要是教会人员。正如法律书籍的作者主要都是律师，医学书籍的作者主要都是内外科医生一样。若果真如此，天主教文学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便不是什么特别的目标，除非把这所大学看作与神学院同等的场所。

I am not denying that a University might prove of the greatest benefit even to our religious literature; doubtless it would, and in various ways; still it is concerned with Theology only as one great subject of thought, as the greatest indeed which can occupy the human mind, yet not as the adequate or direct scope of its institution. Yet I suppose it is not impossible for a literary layman to wince at the idea, and to shrink from the proposal, of taking part in a scheme for the formation of a Catholic Literature, under the apprehension that in some way or another he will be entangling himself in a semi-clerical occupation. It is not uncommon, on expressing an anticipation that the Professors of a Catholic University will promote a Catholic Literature, to have to encounter a vague notion that a lecturer or writer so employed must have something polemical about him, must moralize or preach, must (in Protestant language) *improve the occasion* , though his subject is not at all a religious one; in short, that he must do something else besides fairly and boldly go right on, and be a Catholic speaking as a Catholic spontaneously will speak, on the Classics, or Fine Arts, or Poetry, or whatever he has taken in hand. Men think that he cannot give a lecture on Comparative Anatomy without being bound to digress into the Argument from Final Causes; that he cannot recount the present geological theories without forcing them into an interpretation *seriatim* of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Genesis. Many, indeed, seem to go further still, and actually pronounce that, since our own University has been recommended by the Holy See, and is established by the Hierarchy, it cannot but be engaged in teaching religion and nothing else, and must and will have the discipline of a Seminary; which is about as sensible and logical a view of the matter as it would be to maintain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pso facto* holds an ecclesiastical office, since he is always a Protestant; or that the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must necessarily have been occupied in clerical duties, as long as they took an oath about

Transubstantiation. Catholic Literature is not synonymous with Theology, nor does it supersede or interfere with the work of catechists, divines, preachers, or schoolmen.

我不是在否认，哪怕对宗教文学来说，大学也可对其有最大益处。毫无疑问，它能做到，而且有各种各样的途径。但是，它仍然只是拿神学当作极重要的一个思想主题，当作占据人类心智的最大主题，而不是大学制度充足或直接的范围。可是，我认为，对于参与建设天主教文学的想法和主张，文学门外汉会心生畏惧并予以回避，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他担心自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纠缠在一种半教士式的职业中。人们表达这种预感并不罕见，即天主教大学的教授们必然促进天主教文学，必然被迫面对这么一个模糊观念：从事这一工作的讲师或作家必然性好争论，必然满口道德观念或喜欢讲道，按照新教的话说，必然因势利导，尽管他的主题根本就不是宗教性质的。简短地说，除了光明正大的言行之外，他还得像一个天主教徒那样，在论述古典著作、美术、诗歌或手头上的无论何种话题时，必须依照天主教徒的身份说话。许多人认为，他们在讲授比较解剖学的时候无法避免离题，开始讲终极因论证，在论述当前的地质学理论时无法不强行将这些理论一一变成《创世记》前两章中的解释。还有许多人看来更进一步，实际是在宣称：由于我们自己的大学已经被圣座推荐，也是由教会建立的，那它就只能进行宗教教学，且一定会有神学院的训导办法。这种看法大概像认为首相事实上担任着教会职位，因为他向来都是新教徒或是下议院议员必然肩负着教会职责，因为他在变体论上发过誓的观点一样，有意义和符合逻辑。天主教文学与神学并不是一个意思，它也不会取代或干扰传道师、牧师、传教士或经院学者的工作。

2. In Its Relation to Science

第二节：它与科学的关系

1 .

1 .

And next, it must be borne in mind, that when we aim at providing a Catholic Literature for Catholics, in place of an existing literature which is of a marked Protestant character, we do not, strictly speaking, include the pure sciences in our desideratum. Not that we should not feel pleased and proud to find Catholics distinguish themselves in publications on abstract or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n account of the honour it does to our religion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not that we are insensible to the congruity and respectability of depending in these matters on ourselves, and not on others, at least as regards our text-books;—not that we do not confidently anticipate that Catholics of these countries will in time to come be able to point to authorities and discoverers in science of their own, equal to those of Protestant England, Germany, or Sweden;—but because, as regards mathematics, chemistry, astronomy, and similar subjects, one man will not, on the score of his religion, treat of them better than another, and because the works of even an unbeliever or idolator, while he kept within the strict range of such studies, might be safely admitted into Catholic lecture-rooms, and put without scruple into the hands of Catholic youths. There is no crying demand, no imperative necessity, for our acquisition of a Catholic Euclid or a Catholic Newton. The object of all science is truth;—the pure sciences proceed to their enunciations from principles which the intellect discerns by a natural light, and by a process recognized by natural reason; and the experimental sciences investigate facts by methods of analysis or by ingenious expedients, ultimately resolvable into instruments of thought

equally native to the human mind. If then we may assume that there is an objective truth, and tha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uman mind is in correspondence with it, and acts truly when it acts according to its own laws; if we may assume that God made us, and that what He made is good, and that no action from and according to nature can in itself be evil; it will follow that, so long as it is man who is the geometrician, or natural philosopher, or mechanic, or critic, no matter what man he be, Hindoo, Mahometan, or infidel, his conclusions within his own scienc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at science, are unquestionable, and not to be suspected by Catholics, unless Catholics may legitimately be jealous of fact and truth, of divine principles and divine creations.

接下来，我们得记住，当我们决心为天主教徒提供天主教文学以代替明显具有新教特征的现存文学时，严格说来，我们并不会将纯粹的科学包括在我们的所愿之物中。并不是说我们发现天主教徒在抽象或实验哲学上的著作突出，不应该感到高兴和自豪，因为它在世人面前对我们的宗教表示了敬意；也不是说，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对依靠自身而不是他人是否适当和值得尊敬就全无半点意识，至少在涉及教科书的事情上是如此；也不是说，我们不能满怀信心地期待，这些国家的天主教徒终有一天能够成为他们自己学科中的权威和发现者，就如同在信新教的英格兰、德国或瑞典的那些权威和发现者一样。而是因为，在数学、化学、天文学和类似学科中，一个人在自己所信仰的宗教范围内并不能比另外一个人更好地处置这些学科，哪怕一位不信教的人或偶像崇拜者的著作，只要他严守在这些学科的范围之内，也不妨放心接纳进天主教讲堂，且可毫无顾忌地交付天主教青年手中。我们实在并不需要立即获得信天主教的欧几里德或信天主教的牛顿，这并非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所有学科的目标都是真理。纯粹的科学是由才智之士借用自然之光并通过自然理性辨别出来的，而实验科学则通过分析方法或独创的权宜之计来探索事实，最终分解为同样属于人类心智的思想工具。因此，如果我们假定的确存在客观真理，且人类心

智的构造与之相通，在它根据自身法则运行时，人类心智也产生实际效果；如果我们可以假定是上帝创造了人类，并假定神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且源于自然和符合自然的一切行动自身不可能是邪恶的，那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无论几何学者还是自然哲学家，无论是机械师还是评论家，只要他是人，也不管他是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还是异教徒，他在自己那个学科内根据那其法则得出的结论，就是无可争议的，不应当受到天主教徒的怀疑，除非他们能合理地忌妒事实与真理、神的原则和创造。

I have been speaking of the scientific treatises or investigations of those who are not Catholics, to which the subject of Literature leads me; but I might even go on to speak of them in their persons as well as in their books. Were it not for the scandal which they would create; were it not for the example they would set; were it not for the certain tendency of the human mind involuntarily to outleap the strict boundaries of an abstract science, and to teach it upon extraneous principles, to embody it in concrete examples, and to carry it on to practical conclusions; above all, were it not for the indirect influence, and living energetic presence, and collateral duties, which accompany a Professor in a great school of learning, I do not see (abstracting from him, I repeat, in hypothesis, what never could possibly be abstracted from him in fact), why the chair of Astronomy in a Catholic University should not be filled by a La Place, or that of Physics by a Humboldt. Whatever they might wish to say, still, while they kept to their own science, they would be unable, like the heathen Prophet in Scripture, to “go beyond the word of the Lord, to utter any thing of their own head.”

我一直在谈论的是自身并非天主教徒的那些人的科学著作或探索，文学的主题引导我转向这些人。但是，我不妨进而既谈论他们的

著作，也谈论他们作为人的一面。假如不是他们有可能制造的丑闻，假如不是他们可能竖立的榜样，假如不是人类心智总有一种倾向会无心跨越一门抽象学科的严格界线，根据附加的原则来讲授这门学科，并以具体的例子来体现它，将它推进到实际的结论，总体而论，假如不是那种直接的影响，以及它充满活力的存在，和在一所了不起的学校里一位教授的所有附属职责，我就不明白（我重复说一次，这是假设从他那里抽取永远不可能真的抽取的东西），一所天主教大学里的天文学教席，为什么就不能由拉普拉斯一样的科学家来担当，或物理学的教席为何就不能由洪堡一样的科学家来担当。无论他们可能想说的是什么，只要他们严守自己的学科，他们就不可能像圣经里的那位异教的先知那样“越过耶和华的话，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

2．

2．

So far the arguments hold good of certain celebrated writers in a Northern Review, who, in their hostility to the principle of dogmatic teaching, seem obliged to maintain, because subject-matters are distinct, that living opinions are distinct too, and that men are abstractions as well as their respective sciences. “On the morning of the thirteenth of August, in the year 1704,” says a justly celebrated author, in illustration and defence of the anti-dogmatic principle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matters, “two great captains, equal in authority, united by close private and public ties, but of different creeds, prepared for battle, on the event of which were staked the liberties of Europe…Marlborough gave orders for public prayers; the English chaplains read the service at the head of the English regiments; the Calvinistic chaplains of the Dutch army, with heads

on which hand of Bishop had never been laid, poured forth their supplications in front of their countrymen. In the meantime the Danes might listen to the Lutheran ministers; and Capuchins might encourage the Austrian squadrons, and pray to the Virgin for a blessing on the arms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battle commences; these men of various religions all act like members of one body: the Catholic and the Protestant generals exert themselves to assist and to surpass each other; before sunset the Empire is saved; France has lost in a day the fruits of eight years of intrigue and of victory; and the allies, after conquering together, return thanks to God separately, each after his own form of worship.“ [5_2]

到目前为止，《北方评论》的一些著名作家的论点仍然有效，这些作家虽然对教条主义教学原则心怀敌意，却也被迫承认：因为素材是不一样的，现存的意见也各个不同，人从事各个不同学科，抽象结果也不相同。一位配得其名的著名作家，在说明和辩护政治与社会事务中的反教条主义原则时说：“1704年8月13日早晨，两位权力相当、公私两方面皆有密切往来、却有不同信仰的了不起的指挥官准备对决，此役将决定欧洲之自由……马尔博罗下令进行公开祈祷，英方的牧师在英国军团的最前面宣读祷文，荷兰军队一方信奉加尔文教的牧师也当着国人的面念诵祷文，尽管他们的头是主教从没有按立过的。这期间，丹麦人有可能在听路德宗牧师讲道，圣方济会的托钵僧也可能在鼓励奥地利的骑兵中队，并为祝福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军而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战斗开始了。这些来自不同宗教的人表现得全都像一个躯体上的四肢。天主教和新教的将军尽全力彼此帮助和争先作战，太阳下山之前，帝国得以挽救；法国在一天之内损失了八年谋划和胜利的果实；而联军在一同征战得胜后，各自向上帝表达了谢意，但都有自己的崇拜形式。” [6_1]

The writer of this lively passage would be doubtless unwilling

himself to carry out the principle which it insinuates to those extreme conclusions to which it is often pushed by others, in matters of education. Viewed in itself, viewed in the abstract, that principle is simply, undeniably true; and is only sophistical when it is carried out in practical matters at all. A religious opinion, though not formally recognized, cannot fail of influencing in fact the school, or society, or polity in which it is found; though in the abstract that opinion is one thing, and the school, society, or polity, another. Here were Episcopalians, Lutherans, Calvinists, and Catholics found all fighting on one side, it is true, without any prejudice to their respective religious tenets: and, certainly, I never heard that in a battle soldiers did do any thing else but fight. I did not know they had time for going beyond the matter in hand; yet, even as regards this very illustration which he has chosen, if we were bound to decide by it the controversy, it does so happen that that danger of interference and collision between opposite religionists actually does occur upon a campaign, which could not be incurred in a battle: and at this very time some jealousy or disgust has been shown in English popular publications, when they have had to record that our ally, the Emperor of the French, has sent his troops, who are serving with the British against the Russians, to attend High Mass, or has presented his sailors with a picture of the Madonna.

毫无疑问，这段生动描述的作者自己并不愿意在教育事务上贯彻暗示极端结论的这条原则，这些结论反倒是由别人强行归结的。从它本身看，概括地说，那条原则无疑是不可否认的；假如贯彻在实际事务中，却根本只属于强词夺理。一种宗教意见，尽管并没有得到正式认可，却并不一定就不能在事实上影响学校、社会或根据这意见所建立的一个政体。尽管抽象地说，这样的意见是一件事情，而学校、社会或政体是另一件事情。这里有圣公会教徒、路德宗教徒、加尔文教

徒和天主教徒，他们都站在一边作战，彼此并不对各方的宗教信条抱有偏见，这的确是真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士兵在战场上除了作战之外还会干别的任何事情。我并不知道他们还有时间去干手头事情之外的事情。可是，哪怕是他挑选出来的这段说明，假如我们注定要据此确定争议何在，事情却会是这样的，即相互对立的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干扰和冲撞危险，实际上的确曾在一场战役中发生，而这不可能由一场战斗引发。就在此时，某种嫉妒或厌恶已经在英国的流行出版物中显现出来，这些出版物必须纪录下来的是，我们的盟友，也就是法国皇帝，已经派出他联合英国对抗俄国的军队去参加大弥撒，或将圣母像拿给他的水手们看。

If, then, we could have Professors who were mere abstractions and phantoms, marrowless in their bones, and without speculation in their eyes; or if they could only open their mouths on their own special subject, and in their scientific pedantry were dead to the world; if they resembled the well-known character in the Romance, who was so imprisoned or fossilized in his erudition, that, though “he stirred the fire with some address,” nevertheless, on attempting to snuff the candles, he “was unsuccessful, and relinquished that ambitious post of courtesy, after having twice reduced the parlour to total darkness,” then indeed Voltaire himself might be admitted, not without scandal, but without risk, to lecture on astronomy or galvanism in Catholic, or Protestant, or Presbyterian Colleges, or in all of them at once; and we should have no practical controversy with philosophers who, after the fashion of the author I have been quoting, are so smart in proving that we, who differ from them, must needs be so bigotted and puzzle-headed.

这样，假如我们能拥有这样一些教授，他们都是纯粹的抽象物和幻影，骨头里面再没有骨髓，眼睛里面也看不出思索的痕迹；如果他

们只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才开口说话，而他们的科学卖弄在世人看来形同死人；假如他们很像浪漫小说中的那位知名人物，为自己的学识所囚禁或石化，虽然“通过喊话而摇动了烛火”，却在试图灭掉烛光时“难于成功，因此在两次让客厅陷入完全的黑暗后，才放弃那个雄心勃勃的礼貌之举”，那么，伏尔泰本人也许就可以得到允许，让他到天主教、新教或长老会的大学，或同时在所有这些学校里讲授天文学或流电学，这样虽属丑闻，却没什么风险。如此一来，我们再不会与哲学家发生实际的争论了，因为这些哲学家就像我刚刚引述过的那位作者一样精明，他们可以证明，我们这些与他们不同的人，一定是冥顽不化和愚鲁罔救之人。

And in strict conformity with these obvious distinctions, it will be found that, so far as we *are* able to reduce scientific men of anti-Catholic opinions to the type of the imaginary bookworm to whom I have been alluding, we do actually use them in our schools. We allow our Catholic student to use them, so far as he can surprise them (if I may use the expression), in their formal treatises, and can keep them close prisoners there.

如果完全遵照这种明显的区分，我们就可以发现，只要能将这些持有反天主教意见的科学人士简化为我一直在指称的想象中的书虫类型的人，我们的确就能够在我们的学校里利用这些人。我们允许信天主教的学生利用他们，只要学生能够在正式的论文中让这些人惊讶（假如我能这样说），并让他们牢牢囚禁在那里就行。

> *Vix defessa senem passus componere membra,*
> *Cum clamore ruit magno, manicisque jacentem*
> *Occupat.*

他根本不让那位老人放松一下疲惫的四肢，而是对他大吼大叫，就在他躺下的地方，给他套上了枷锁。

The fisherman, in the Arabian tale, took no harm from the genius, till he let him out from the brass bottle in which he was confined. “He examined the vessel and shook it, to see if what was within made any noise, but he heard nothing.” All was safe till he had succeeded in opening it, and “then came out a very thick smoke, which, ascending to the clouds and extending itself along the sea shore in a thick mist, astonished him very much. After a time the smoke collected, and it was converted into a genius of enormous height. At the sight of this monster, whose head appeared to reach the clouds, the fisherman trembled with fear.” Such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unbelieving or heretical philosopher in person, and in the mere disquisitions proper to his science. Porson was no edifying companion for young men of eighteen, nor are his letters on the text of the Three Heavenly Witnesses to be recommended; but that does not hinder his being admitted into Catholic schools, while he is confined within the limits of his Preface to the Hecuba. Franklin certainly would have been intolerable in person, if he began to talk freely, and throw out, as I think he did in private, that each solar system had its own god; but such extravagances of so able a man do not interfere with the honour we justly pay his name in the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Nay, the great Newton himself would have been silenced in a Catholic University, when he got upon the Apocalypse; yet is that any reason why we should not study his Principia, or avail ourselves of the wonderful analysis which he, Protestant as he was, originated, and which French infidels have developed? We are glad, for their own sakes, that anti-Catholic writers should, in their posthumous influence, do as much real service to the human race as

ever they can, and we have no wish to interfere with it.

在那个阿拉伯故事中，那位打渔人一直到将那精灵从囚禁的铜瓶中放出来时才受到伤害。“他查看瓶子，然后摇晃一下，听听里面的东西会不会发声，但他什么都没有听到。”看起来平安无事，直到他成功打开瓶子。“之后，一股浓烟冒出，一直飘上云端，在海滩上伸展成很长一条浓雾，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过不久之后，浓烟又收拢了，变成一个身材极高大的精灵。看到这高耸入云的怪物后，打渔人吓得发抖。”这就是一位无信仰或信异教的哲学家作为一个人和他写的仅仅适合其学科的学术论文之间的差别。波尔森并非十八岁青年的益友，他就三见证文本写的作品也不值得推荐。可是，只要他被限制在“赫卡柏序”的范围内，这就不足以阻止他为天主教的学校所接纳。假如福兰克林开始口无遮拦地发话，说什么每个太阳系都有它自己的神灵（我觉得他私下里是说过这话的），那他一定是个令人难以忍受的人。可是，能力如此出众的一位人士，就算有这些过分言论，也不妨碍我们对他抱以敬意，他毕竟在实验科学中名垂青史。不仅如此，如果让伟大的牛顿本人来讲《启示录》，天主教大学也会让他闭嘴。可是，这难道是我们不应当去研究他的《数学原理》的理由？或者说，尽管他是一位新教徒，尽管他开创的惊人分析后来为法国不信教的人所发扬，这难道是我们不应当利用他这一成果的理由？那些反天主教的作者们，生前死后的影响都在尽可能地为人类提供真正的服务，就看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深感幸运，且无意干涉。

3．

3．

Returning, then, to the point from which we set out, I observe

that, this being the state of the case as regards abstract science, viz., that we have no quarrel with its anti-Catholic commentators, till they thrust their persons into our Chairs, or their popular writings into our reading-rooms, it follows that, when we contemplate the formation of a Catholic Literature, we do not consider scientific works as among our most prominent *desiderata* . They are to be looked for, not so much for their own sake, as because they are indications that we have able scientific men in our communion; for if we have such, they will be certain to write, and in proportion as they increase in number will there be the chance of really profound, original, and standard books issuing from our Lecture-rooms and Libraries. But, after all,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se should be better than those which we have already received from Protestants; though it is at once more becoming and more agreeable to our feelings to use books of our own, instead of being indebted to the books of others.

现在，我们回到原点。我看到，在抽象科学里就是这么一种情景了，即我们与反天主教的评论者并无争吵，除非他们本人想要挤占我们的教席，或除非他们的流行著作想要进入我们的阅览室。既如此，事情就应当是这样的：当我们思考如何形成一种天主教文学时，并不会将科学著作也放在我们最急迫的所愿之物中。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与其说是因为他们自身的缘故，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都是标志物，说明我们的团体内有非常能干的科学人士。因为，假如我们拥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就一定会写作，他们的人数在多大程度上增多，真正深刻、原创和标准的著作从我们的讲堂和图书室里诞生的机会也在相应程度上增大。尽管使用我们自己的书本，而不是由于使用别人的书本而欠下人情会更适当，更容易为我们的感情所接受，但是，毕竟，并没有什么理由说明出自我们自己的著作就一定比我们已经从新教徒那里得到的更好。

Literature, then, is not synonymous with Science; nor does Catholic education imply the exclusion of works of abstract reasoning, or of physical experiment, or the like, though written by persons of another or of no communion.

所以说，文学与科学不是同义词，天主教的教育也并不意味着要排除抽象推理或物理实验等的类似著作，哪怕是由其他信众或根本就没有信仰团体的人写的。

There is another consideration in point here, or rather prior to what I have been saying; and that is, that, considering certain scientific works, those on Criticism, for instance, are so often written in a technical phraseology, and since others, as mathematical, deal so largely in signs, symbols, and figures, which belong to all languages, these abstract studies cannot properly be said to fall under English *Literature* at all;—for by Literature I understand Thought, conveyed under the forms of some particular language. And this brings me to speak of Literature in its highest and most genuine sense, viz., as an historical and national fact; and I fear, in this sense of the word also, it is altogether beside or beyond any object which a Catholic University can reasonably contemplate, at least in any moderate term of years; but so large a subject here opens upon us that I must postpone it to another Section.

这里还有另外一层值得关切的考虑，或者说，在我说这番话之前就有这层考虑。也就是说，考虑到某些科学著作，比如论述批判的著作，经常是用专业术语写成的，而另外一些比如谈论数学的著作主要处理属于所有语言的符号、标记和数字，这些抽象研究内容就不适合

归于英语“文学”的名下了。这是因为，我说的“文学”二字，指的是以某种特定的语言形式传递出来的思想。这样，我就必须以最高和最真实的意义来谈论“文学”，就是说，要拿它当作一件历史和民族的事实。我觉得，在这层意义上说，“文学”一词就远在一所天主教大学至少在未来若干年里所能合理思考的任何一个目标之上和之外了。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话题如此之大，非得推迟至下一讲不成。

3. In Its Relat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第三节：它与古典文学的关系

1．

1．

I have been directing the reader's attention, first to what we do not, and next to what we need not contemplate, when we turn our thoughts to the formation of an English Catholic Literature. I said that our object was neither a library of theological nor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ough theology in its literary aspect, and abstract science as an exercise of intellect, have both of course a place in the Catholic encyclopædia. One undertaking, however, there is, which not merely does not, and need not, but unhappily cannot, come into the reasonable contemplation of any set of persons, whether members of a University or not, who are desirous of Catholiciz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as is very evident; and that is simply the creation of an *English Classical Literature* , for that has been done long ago, and would be a work beyond the powers of any body of men, even if it had still to be done. If I insist on this point here, no

one must suppose I do not consider it to be self-evident; for I shall not be aiming at proving it, so much as at bringing it home distinctly to the mind, that we may, one and all, have a clearer perception of the state of things with which we have to deal. There is many an undeniable truth which is not practically felt and appreciated; and, unless we master our position in the matter before us, we may be led off into various wild imaginations or impossible schemes, which will, as a matter of course, end in disappointment.

当我们转而思考形成一种用英语表达的天主教文学时，我先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到了我们还没有思考的东西上，之后又引到我们并不需要思考的东西上。我说过，我们的目标并非建立一座神学或科学知识的图书馆，尽管文学层面的神学和作为才智训练的抽象科学这两者，在天主教的百科全书里当然都有一席之地。但是，有一样事情，它不仅不会，而且不需要，更让人遗憾的是也不能够被纳入无论是否大学成员、但希望让英语语言天主教化的任何人的合理思考范围内，而且这一点是相当明显的。这件事情指的正是形成一种英语语言的古典文学，因为这已经是很久以前干过的事情，哪怕还得做这样的事情，也是再多的人参与也无法实现的。假如我在这里固守己见，应当不会有人认为我自己没有看出这是不证自明的。我并不打算加以证明，而只不过想让大家清楚明白地看出这一点，即我们大家都必须对自己必需应对的事情的现状有更清醒的认识。有许多不可否认的真理并非为人实际感受到或领会的，除非我们明白自己在眼前这件事情当中所处的立场，否则就可能走上歧途，胡思乱想或拿出根本不可能兑现的招数，结果一定会以失望告终。

Were the Catholic Church acknowledged from this moment through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ese islands, and the English tongue henceforth baptized into the Catholic faith, and sealed and consecrated to Catholic objects, and were the present intellectual

activity of the nation to continue, as of course it would continue, we should at once have an abundance of Catholic works, which would be English, and purely English, literature and high literature; but still all these would not constitute “English Literature,” as the words are commonly understood, nor even then could we say that the “English Literature” was Catholic. Much less can we ever aspire to affirm it, while we are but a portion of the vast English-speaking world-wide race, and are but striving to create a current in the direction of Catholic truth, when the waters are rapidly flowing the other way. In no case can we, strictly speaking, form an English Literature; for by the Literature of a Nation is meant its Classics, and its Classics have been given to England, and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such, long since.

假如天主教会从此刻起就在岛国的各处得以确认，假如英语语言从今以后加入到天主教的信仰，专属并奉献给天主教的目标；又假如本国当前的智力活动能够像应然状态那样发展下去，那我们应该立即就拥有大量的天主教著作，应当是英语著作，且是纯粹的英语著作，是文学且是高档的文学。可是，所有这些仍然都无法构成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英语文学”，而且就算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仍然也不能说那种“英语文学”就是天主教的文学。我们更不可寄望于确认这一点。我们只不过是幅员广大的英语语言世界的一个部分，我们只不过在努力营造顺应天主教真理的一个潮流，而此时，世界大潮却在朝相反的方向涌动。严格说来，我们根本都无法开创一种英语文学。因为，当我们说某一个民族的文学时，我们指的是其古典著作，而其古典著作已经给予了英格兰，并且在很久以来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确认。

2．

2 .

A Literature, when it is formed, is a national and historical fact; it is a matter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can be as little ignored as the present, as little undone as the past. We can deny, supersede, or change it, then only, when we can do the same towards the race or language which it represents. Every great people has a character of its own, which it manifests and perpetuates in a variety of ways. It develops into a monarchy or republic;—by means of commerce or in war, in agriculture or in manufactures, or in all of these at once; in its cities, its public edifices and works, bridges, canals, and harbours; in its laws, traditions, customs, and manners; in its songs and its proverbs; in its religion; in its line of policy, its bearing, its action towards foreign nations; in its alliances, fortunes, and the whole course of its history. All these are peculiar, and parts of a whole, and betoke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savour of each other; and the case is the same with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y are what they are, and cannot be any thing else, whether they be good or bad or of a mixed nature; before they are formed, we cannot prescribe them, and afterwards, we cannot reverse them. We may feel great repugnance to Milton or Gibbon as men; we may most seriously protest against the spirit which ever lives, and the tendency which ever operates, in every page of their writings; but there they are, an integral por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we cannot extinguish them; we cannot deny their power; we cannot write a new Milton or a new Gibbon; we cannot expurgate what needs to be exorcised. They are great English authors, each breathing hatred to the Catholic Church in his own way, each a proud and rebellious creature of God, each gifted with incomparable gifts.

一种文学，一旦形成，便成为民族和历史的事实，事关古往今来。就像过去不能抹杀，今天也不能视而不见。要否认、取代或改变它，就只能在我们可以对它所代表的民族或语言做同样的事情时才行。但凡伟大的民族，必有属于它自己的特征，这民族会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表现这特征，并使之进入永恒。它会发展成一种君主制或共和国，可以通过商业或战争的方式、农业或制造业的方式，或者同时以所有这些方式实现这种发展。可以在它的城市里，在它的公共建筑或工厂，在桥梁、运河和港口里发展。在它的法律、传统、习俗和礼仪中发展；可体现在它的歌曲和谚语里，在它的宗教里，在它的政策路线里，在它针对异国的关系及行动中，在它的同盟、财富和全部历史进程中。所有这些都是独特的，都是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是国民特性的象征，也是国民彼此的特点。在民族语言和文学中，事情亦是如此。语言和文学就是其所是，不可能再是别的任何东西，无论它们是好是坏，或是两者兼有。在它们得以造就之前，我们无法加以规定，之后，我们又无法使其逆转。作为人，米尔顿或吉本也许让人厌恶，我们也许十分讨厌他们作品当中的每一页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或引发的倾向，可是，他们还是就在那里，仍然是英语文学的组成部分。我们无法消灭他们，我们无法否认他们的力量，我们不能够写出新的弥尔顿作品或吉本作品，哪怕是需要去除的东西，我们也无法一笔勾销。他们都是伟大的英语作家，每一位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向天主教会吹进仇恨的气息，每一位都是傲慢和反叛的上帝造物，每一位都身怀无与伦比的绝技。

We must take things as they are, if we take them at all. We may refuse to say a word to English literature, if we will; we may have recourse to French or to Italian instead, if we think either of these less exceptionable than our own; we may fall back upon the Classics of Greece and Rome; we may have nothing whatever to do with literature, as such, of any kind, and confine ourselves to purely amorphous or monstrous specimens of language; but if we do once profess in our Universities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f we

think it allowable to know the state of things we live in, and that national character which we share, if we think it desirable to have a chance of writing what may be read after our day, and praiseworthy to aim at providing for Catholics who speak English a Catholic Literature then—I do not say that we must at once throw open every sort of book to the young, the weak, or the untrained,—I do not say that we may dispense with our ecclesiastical indexes and emendations, but—we must not fancy ourselves creating what is already created in spite of us, and which never could at a moment be created by means of us, and we must recognize that historical literature, which is in occupation of the language, both as a fact, nay, and as a standard for ourselves.

要么就不要接受什么东西，要么就照原样全收。假如愿意，我们可以不对英语文学说一句话。我们可以转而依赖法国或意大利文学，假如我们觉得这两种文学当中的任何一种较我们自己的文学少些让人反感的东西。我们还可以回头去看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我们还可以什么种类的文学都不要，让自己专心于纯粹无定形或怪诞的语言样本。可是，我们一旦在大学里讲授英语语言和文学，假如我们认为应当了解我们生活其中的一些事物的状况，以及我们分享的这种国民特征，假如我们认为最好有机会书写供后人阅读的东西，并且认为值得为讲英语的天主教徒提供一种天主教文学，那么，我们就不能幻想自己去创造没有我们也有人业已创造，且我们永远也不能在短期内创造出来的东西。而且我们还必须承认也要用到这种语言的历史文献，作为一个事实，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标准都是如此。此时，我并没有说我们必须立即就对年轻人，对思想软弱的人或未经训练的人开放所有类型的书，我也并没有说我们可以抛弃教会书目和订正录。

There is surely nothing either “temerarious” or paradoxical in a statement like this. The growth of a nation is like that of an

individual; its tone of voice and subjects for speech vary with its age. Each age has its own propriety and charm; as a boy's beauty is not a man's, and the sweetness of a treble differs from the richness of a bass, so it is with a whole people. The same period does not produce its most popular poet, its most effective orator, and its most philosophic historian. Language changes with the progress of thought and the events of history, and style changes with it; and while in successive generations it passes through a series of separate excellences, the respective deficiencies of all are supplied alternately by each. Thu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y be considered as dependent on a process of nature, and admitting of subjection to her laws. Father Hardouin indeed, who maintained th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Pliny, Cicero, Virgil's Georgics, and Horace's Satires and Epistles, Latin literature was the work of the medieval monks, had the conception of a literature neither national nor historical; b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be apt to consider time and place as necessary conditions in its formation, and will be unable to conceive of classical authors, except as either the elaboration of centuries, or the rare and fitful accident of genius.

这样一句话里，肯定没有任何“鲁莽”或吊诡的意思。一个民族的成长，与个人的成长很相似，它的语调与言语内容总是随年代一起变化的。什么是得体，什么是魅力，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定义。正如一个小男孩的美不同于成人之美，高音的甜美不同于低音的丰富，整个民族也是类似情景。一个时代并不会同时诞生最受欢迎的诗人、最有影响力的演说家和最有哲理思想的历史家。语言随思想进步和历史事件而变化，语言风格也随之变化。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语言会进入一系列各个不同的卓越状态，但整体中存在的各方面缺陷，却是逐个一一产生的。这样，语言和文学就可以被认为是依赖于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且必须从属于自然法则。阿杜恩神甫倒也另有一种既不属于民族也不属于历史的文学的构思，他认为，除开普林尼、西塞罗、维吉

尔的《农事诗》和贺拉斯的《讽刺集》及《书信集》之外，拉丁语文学就是中世纪僧侣的成果。但是，世界上其他的人都倾向于认为，时间和空间是拉丁文学形成的必要条件，除非认为那是许多世纪逐步完善的结果，或者是人的天赋罕见和意外的发挥，否则就无法构想古典作家的概念了。

First-rate excellence in literature, as in other matters, is either an accident or the outcome of a process; and in either case demands a course of years to secure. We cannot reckon on a Plato, we cannot force an Aristotle, any more than we can command a fine harvest, or create a coal field. If a literature be, as I have said, the voice of a particular nation, it requires a territory and a period, as large as that nation's extent and history, to mature in. It is broader and deeper than the capacity of any body of men, however gifted, or any system of teaching, however true. It is the exponent, not of truth, but of nature, which is true only in its elements.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mutual action of a hundred simultaneous influences and operations, and the issue of a hundred strange accidents in independent places and times; it is the scanty compensating produce of the wild discipline of the world and of life, so fruitful in failures; and it is the concentration of those rare manifestations of intellectual power, which no one can account for. It is made up, in the particular language here under consideration, of human beings as heterogeneous as Burns and Bunyan, De Foe and Johnson, Goldsmith and Cowper, Law and Fielding, Scott and Byron. The remark has been made that the history of an author is the history of his works; it is far more exact to say that, at least in the case of great writers, the history of their works is the history of their fortunes or their times. Each is, in his turn, the man of his age, the type of a generation, or the interpreter of a crisis. He is made for his day, and his day for him. Hooker would not have been, but for the

existence of Catholics and Puritans, the defeat of the former and the rise of the latter; Clarendon would not have been without the Great Rebellion; Hobbes is the prophet of the reaction to scoffing infidelity; and Addison is the child of the Revolution and its attendant changes. If there be any of our classical authors, who might at first sight have been pronounced a University man, with the exception of Johnson, Addison is he; yet even Addison, the son and brother of clergymen, the fellow of an Oxford Society, the resident of a College which still points to the walk which he planted, must be something more, in order to take his place among the Classics of the language, and owed the variety of his matter to his experience of life, and to the call made on his resources by the exigencies of his day. The world he lived in made him and used him. While his writings educated his own generation, they have delineated it for all posterity after him.

就如同在其他许多事情中一样，一流的卓越文学要么是偶然事件，要么就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求有若干年的时间加以保障。我们不能指望会出现某一位柏拉图，我们不能强迫某人成为亚里士多德，就像我们并不能命令老天给予我们一个大丰收，也不能创造一处煤田。如我所言，假如一种文学就是一个特定民族的声音，那它就要求有与该民族疆土与历史相当的一片领土和时期，让文学在其中成熟。它比任何一个无论多么有天赋的人的团体的能力，或无论多么正确的教学体制的范围更大、程度更深。它是自然而非真理的指示物，而自然只有在它的元素中才是真实的。它是上百种即时影响力与运作相互影响的结果，也是彼此独立的地方与时间中上百种奇特事件的结果，它是从不乏失败例证的世界与生活的粗野惩戒中罕有的补偿性成果，它是无人能加以解释的才智能力罕见表现的浓缩。在我们目前考虑的这门特定语言的情况下，它由彼此相异的人类构成，包括彭斯和班扬、笛福和约翰逊、哥尔德史密斯和库柏、洛尔及菲尔丁、司各特和拜伦。曾有人说过，一位作家的历史就是其作品的

历史。不过，至少在一些伟大作家的例子中，如果说他们的作品的历史就是他们的命运或其时代的历史，那就严谨得多了。每个人分别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人，是一代人的典型，或是一次危机的解释者。他为时代所造，时代也为他所造。假如不是天主教徒和清教徒的存在，假如不是前者的失败和后者的兴起，就不可能有胡克；如果没有大反叛，也就不会有克拉兰敦伯爵；霍布斯是先知，他预见到嘲弄不信者会引起的反应；阿迪森是那场革命及伴随革命的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在我们的古典作家中，假如有任何哪一位初一看便可以宣称是一位大学人士，那么，除开约翰逊以外，那就是阿迪森了。可是，哪怕是阿迪森这位教士之子和教士之兄弟、一家牛津协会的成员、一所学院的学生（这学院仍然面向他为其栽种过树木的一条人行道），也一定是超出这概念的人，这样才能在英语古典著作的作家行列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的很大一部分成果也归功于他的人生经验，归功于因紧急状态而逼得他非调用自身资源不可的时代召唤。他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造就了他，也利用了他。虽然他的著作教育了他自己那代人，但这些著作也描述了那一代人，可供子孙后代教育之用。

3．

3．

I have been speaking of the authors of a literature,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people and course of events to which they belong; but a prior consideration, at which I have already glanced, is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 language itself, which has been their organ. If they are in great measure the creatures of their times, they are on the other hand in a far higher sense the creators of their language. It is indeed commonly called their mother tongue, but virtually it did not exist till they gave it life and form. All greater matters are

carried on and perfected by a succession of individual minds; what is true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and of action is true of language also. Certain masters of composition, as Shakespeare, Milton, and Pope, the writers of the Protestant Bible and Prayer Book, Hooker and Addison, Swift, Hume, and Goldsmith, have bee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as that language is a fact, so is the literature a fact, by which it is formed, and in which it lives. Men of great ability have taken it in hand, each in his own day, and have done for it what the master of a gymnasium does for the bodily frame. They have formed its limbs, and developed its strength; they have endowed it with vigour, exercised it in suppleness and dexterity, and taught it grace. They have made it rich, harmonious, various, and precise. They have furnished it with a variety of styles, which from their individuality may almost be called dialects, and are monuments both of the powers of the language and the genius of its cultivators.

我一直在谈论一种文学中的作家，谈他们与所属的那个民族及一系列事件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已经粗略思忖了一番的一个事先考虑，就是他们与向来就是其发声器官的语言本身的联系。假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就在高得多的一层意义上是其语言的产物。的确，这语言就被称为他们的母语，但在他们给予它以生命和形式以前，这母语几乎都不存在。所有更重大的事情都被一连串的能人贯彻下去并趋于完美，在思想史和行动史上真实的东西，在语言史上也是一样。一些做文章的大师，如莎士比亚、弥尔顿和蒲柏、新教圣经和公祷书的作者、胡克和阿迪森、斯威夫特、休谟和哥尔德史密斯，他们向来都是英语语言的塑造者。正如这语言是一个事实，同样，英语的文学也是事实，这语言就靠文学形成，也活在文学中。各个时代能力卓著的人士总是掌握着机会，他们对语言的把握，就好像健身房的主人对于身体结构的把握。他们锻造了它的四肢，培育了它的力量，他们为它提供了活力，为它提供柔顺

与灵巧度，教它懂得美惠。他们使它丰富、和谐、多样和精准。他们赋予它多种风格，由于他们各自都有独特之处，因此，这风格亦不妨称为方言，从而成为语言的力量及其培育者的才气的纪念碑。

How real a creation, how *sui generis* , is the style of Shakespeare, or of the Protestant Bible and Prayer Book, or of Swift, or of Pope, or of Gibbon, or of Johnson! Even were the subject-matter without meaning, though in truth the style cannot really be abstracted from the sense, still the style would, on that supposition, remain as perfect and original a work as Euclid's elements or a symphony of Beethoven. And, like music, it has seized upon the public mind; and the literature of England is no longer a mere letter, printed in books, and shut up in libraries, but it is a living voice, which has gone forth in its expressions and its sentiments into the world of men, which daily thrills upon our ears and syllables our thoughts, which speaks to us through our correspondents, and dictates when we put pen to paper. Whether we will or no, the phraseology and diction of Shakespeare, of the Protestant formularies, of Milton, of Pope, of Johnson's Tabletalk, and of Walter Scott, have become a portion of the vernacular tongue, the household words, of which perhaps we little guess the origin, and the very idioms of our familiar conversation. The man in the comedy spoke prose without knowing it; and we Catholics, without consciousness and without offence, are ever repeating the half sentences of dissolute playwrights and heretical partizans and preachers. So tyrannous is the literature of a nation; it is too much for us. We cannot destroy or reverse it; we may confront and encounter it, but we cannot make it over again. It is a great work of man, when it is no work of God's.

莎士比亚的风格是一种多么真实的创造，是那么自成一格，新教圣经和公祷书、斯威夫特、蒲柏、吉本或约翰逊的作品莫不是如此！哪怕素材并无意义，哪怕事实上风格并不能真正从意义里提取出来，就此假定而言，这风格仍然会保持完美和原创性，就像欧几里德几何学或贝多芬的交响乐。而且，就像音乐一样，它抓住了民心。英格兰的文学不再只是以书籍形式印刷出来，然后放进图书馆的纯粹文字，而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声音，这声音以它的表达式和它的情操直面人的世界，每日在我们的耳边震响，让我们的思想一字一句地表达出来，通过我们的记者对我们谈话，当我们提笔写作时，它就会对我们发话。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莎士比亚、新教礼仪集、弥尔顿、蒲柏、约翰逊的席间漫谈以及沃尔特·司各特等人和作品中的措辞和用语，都已经成为本国俗语的一部分，成为家喻户晓的话语。我们猜不出这些话语的来源，也不明白熟悉的对话中那些成语的出处。喜剧中的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但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而我们天主教徒也跟在那些放荡的剧作家、异端邪说的党人及布道者后面鹦鹉学舌，尽管我们并没有意识这一点，而且见怪不怪。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此之暴虐，简直让我们无法忍受。我们无法毁灭它，亦不可使其逆转。我们可以直面它，可以与它相遇，却无法倒转乾坤。如果它不是神的作为，那就是人的伟大作品。

I repeat, then, whatever we be able or unable to effect in the great problem which lies before us, any how we cannot undo the past. English Literature will ever *have been* Protestant. Swift and Addison, the most native and natural of our writers, Hooker and Milton, the most elaborate, never can become our co-religionists; and, though this is but the enunciation of a truism, it is not on that account an unprofitable enunciation.

因此我要重申，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大问题，无论我们能够或不能够做什么，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我们无法一笔勾销。英语文学还

将一直保持新教特征。斯威夫特和阿迪森是我们的作家中最地道和最自然的，胡克和弥尔顿是最讲究的，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同教；尽管这只不过是对一种老生常谈的解释，就此而言，却也并非毫无益处的解释。

4．

4．

I trust we are not the men to give up an undertaking because it is perplexed or arduous; and to do nothing because we cannot do everything. Much may be attempted, much attained, even granting English Literature is not Catholic. Something indeed may be said even in alleviation of the misfortune itself, on which I have been insisting; and with two remarks bearing upon this latter point I will bring this Section to an end.

我深信，我们这些人并不会因为一件事情太复杂或太费力就放弃，也不会因为我们并不能做到所有事情就干脆什么也不做。哪怕我们承认英语文学并不具备天主教特征，还是有许多事情可以尝试，有许多事业可以成就。哪怕是为了舒缓我一直在强调的这种不幸本身，也是有些话可以说的。我想就后面的一点再说两句，然后就结束本节。

1．First, then, it is to be considered that, whether we look to countries Christian or heathen, we find the state of literature there as little satisfactory as it is in these islands; so that, whatever are

our difficulties here, they are not worse than those of Catholics all over the world. I would not indeed say a word to extenuate the calamity, under which we lie, of having a literature formed in Protestantism; still, other literatures have disadvantages of their own; and, though in such matters comparisons are impossible, I doubt whether we should be better pleased if our English Classics were tainted with licentiousness, or defaced by infidelity or scepticism. I conceive we should not much mend matters if we were to exchange literatures with the French, Italians, or Germans. About Germany, however, I will not speak; as to France, it has great and religious authors; its classical drama, even in comedy, compared with that of other literatures, is singularly unexceptionable; but who is there that holds a place among its writers so historical and important, who is so copious, so versatile, so brilliant, as that Voltaire who is an open scoffer at every thing sacred, venerable, or high-minded? Nor can Rousseau, though he has not the pretensions of Voltaire, be excluded from the classical writers of France. Again, the gifted Pascal, in the work on which his literary fame is mainly founded, does not approve himself to a Catholic judgment; and Descartes, the first of French philosophers, was too independent in his inquiries to be always correct in his conclusions. The witty Rabelais is said, by a recent critic, [5_3] to show covertly in his former publications, and openly in his latter, his "dislike to the Church of Rome." La Fontaine was with difficulty brought, on his death-bed, to make public satisfaction for the scandal which he had done to religion by his immoral *Contes* , though at length he threw into the fire a piece which he had just finished for the stage. Montaigne, whose Essays "make an epoch in literature," by "their influence upon the tastes and opinions of Europe;" whose "school embraces a large proportion of French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nd of whose "brightness and felicity of genius there can be but one opinion," is disgraced, as the same writer tells us, by "a sceptical

bias and great indifference of temperament;” and “has led the way” as an habitual offender, “to the indecency too characteristic of French literature.”

首先，必须要考虑到，无论我们观察基督教国家还是信异教的国家，都会发现那里的文学状态跟这里的情形一样叫人无法满意。因此，无论我们到底在这里遇到的是哪些困难，决不会比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遇到的困难更糟糕。对于处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新教教义中形成的一种文学的不幸，我的确不会说任何一句减轻这不幸程度的话。不过，其他的文学也有它们自身的种种不利，尽管无法在这样的事情中进行比较，我还是心存怀疑，不知道如果我们的英语古典著作沾染上一种放肆气息，或因无信仰及怀疑主义而受到损害，我们是否应当更开心一点。我猜想，假如我们与法国、意大利或德国交换文学，应当也是于事无补。可是，我不会就德国说什么。至于法国，它有伟大的作家和信教的作家。它的古典戏剧，哪怕是在喜剧中，与其他文学中的戏剧比较而言，也是堪称完美的。可是，在法国作家当中，哪一位占有的地位像伏尔泰那样具备历史意义和重要性，哪一位像他那样丰富多产，多才多艺，光彩夺目呢？而他却是一位对一切神圣、可敬与高尚的东西公开嘲讽的人。卢梭尽管不像伏尔泰那般自负，却也不能从法国的古典作家中排除出去。同样，才华横溢的帕斯卡，在其文学名声主要基于其上的那部作品里，却没有证明他自己具备天主教徒的判断力。还有笛卡尔，也就是法国最大的一位哲学家，在他的探索中却太过独立，因此他的结论不可能永不出错。根据一位评论家最近的说法，机智过人的拉伯雷表示了他对“罗马的那家教会的不满”，在以前的出版物中他是偷偷这么说的，而在后来的出版物中，他公开宣称这一点[6_2]。拉封丹的《故事诗》是一部不道德的作品，对宗教造成了诽谤，临死之前，他还是艰难地在公开场所宣称自己对此满意，尽管最后他还是在刚刚完成这部供舞台使用的剧本后，将它付之一炬。蒙田《随笔集》因为“其对欧洲品味与意见的影响”而成为“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他那个“流派包含大量法国及英国文学”，关于他的“聪明与精神快乐，只存在一种看法”。同一位作家告诉我们说，蒙田

因“怀疑主义偏见和气质的冷漠”而蒙羞，并作为一名惯犯“开创了极富法国文学特征的不雅言行”的先河。

Nor does Italy present a more encouraging picture. Ariosto, one of the few names, ancient or modern, who is allowed on all hands to occupy the first rank of Literature, is, I suppose, rightly arraigned by the author I have above quoted, of “coarse sensuality.” Pulci, “by his sceptical insinuations, seems clearly to display an intention of exposing religion to contempt.” Boccaccio, the first of Italian prose-writers, had in his old age touchingly to lament the corrupting tendency of his popular compositions; and Bellarmine has to vindicate him, Dante, and Petrarch, from the charge of virulent abuse of the Holy See. Dante certainly does not scruple to place in his *Inferno* a Pope, whom the Church has since canonized, and his work on *Monarchia* is on the Index. Another great Florentine, Macchiavel, is on the Index also; and Giannone, as great in political history at Naples as Macchiavel at Florence, is notorious for his disaffec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Roman Pontiff.

意大利也不能提供更鼓舞人心的图景。阿里奥斯托是古往今来少数几位被各方认为是占据一流文学地位的作家，但是，我刚刚引述过的那位作家却责备他“粗俗淫荡”，而且我认为这样的批评并无不妥。帕尔契因其“怀疑主义暗示而似乎明确地显露出诋毁宗教的倾向”。薄伽丘是意大利最早的散文体作家，他到了老年曾动人地为其流行作品中的败坏倾向而哀叹。贝拉明曾为他、但丁和彼德拉克辩护，解脱他们恶毒攻击圣座的罪名。但丁将一位教皇安置在他的《炼狱》里时肯定没有丝毫犹豫，这位教皇在那之后受封为圣徒，而但丁的《帝制论》却列入了教会禁书目录。另一位著名的佛罗伦萨人马基雅维利，他的著作也列入了教会禁书目录。詹农尽管像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一样闻名于那不勒斯政治史，却因对罗马教宗的利益置若罔闻而声名

狼藉。

These are but specimens of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secular literature, whatever be the people to whom it belongs. One literature may be better than another, but bad will be the best, when weighed in the balance of truth and morality. It cannot be otherwise; human nature is in all ages and all countries the same; and its literature, therefore, will ever and everywhere be one and the same also. Man's work will savour of man; in his elements and powers excellent and admirable, but prone to disorder and excess, to error and to sin. Such too will be his literature; it will have the beauty and the fierceness, the sweetness and the rankness, of the natural man, and, with all its richness and greatness, will necessarily offend the senses of those who, in the Apostle's words, are really “exercised to discern between good and evil.” “It is said of the holy Sturme,” says an Oxford writer, “that, in passing a horde of unconverted Germans, as they were bathing and gambolling in the stream, he was so overpowered by the intolerable scent which arose from them that he nearly fainted away.” National Literature is, in a parallel way, the untutored movements of the reason, imagination, passions, and affections of the natural man, the leapings and the friskings, the plungings and the snortings, the sportings and the buffoonings, the clumsy play and the aimless toil, of the noble, lawless savage of God's intellectual creation.

无论这种文学特征到底都属于哪些人，这些只不过是世俗文学总体特征的几个实例而已。一种文学可能比另一种文学要好，可是，如果放在真理与道德的天平上加以称量，则坏的可能是最好的。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人性总是一样的，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因此，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人的文学总是同样的。人的作为就会发出人

的气味，从他的本原与力量来看，那是极好和值得赞叹的，但很容易导致失序与过度、谬误与罪过。人的文学亦是一样。会有自然人的美与凶猛、香甜与恶臭，尽管内容丰富、伟大崇高，却必然会冒犯一些人的感觉，按照那位使徒说的话："这些人，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牛津的一位作者说："曾有人这样形容圣斯特恩，说他有天碰到一群在河里洗澡嬉戏、还没有被劝化的日耳曼人，那些人身上发出的难忍气味如此之强烈，几乎让他当场晕倒。"民族文学，从类似的角度看，就是自然人的理性、想象力、激情和各种情感粗野的流露，是上帝智慧造物中这等既高贵又无法无天的生番的跳跃和嬉戏、冲撞和鼻喷、打闹与滑稽表演、笨拙的玩耍与无目的的辛劳。

It is well that we should clearly apprehend a truth so simple and elementary as this, and not expect from the nature of man, or the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what they never held out to us. Certainly, I did not know that the world was to be regarded as favourable to Christian faith or practice, or that it would be breaking any engagement with us, if it took a line divergent from our own. I have never fancied that we should have reasonable ground for surprise or complaint, though man's intellect *puris naturalibus* did prefer, of the two, liberty to truth, or though his heart cherished a leaning towards licence of thought and speech in comparison with restraint.

假如我们能清楚明白地理解如此简单和基本的真理，并不指望从人性或世人的文学中得到它们从来都不曾给予我们的东西，那可真是太好了。当然，我并不知道这世界应当被视为对基督教信仰或实践有利，也不知道假如这世界走了一条与我们不同的道路的话，它是否不再兑现给予我们的诺言。我从来都不曾梦想过我们应当拥有感到惊喜或心存抱怨的适当理由，不过，人的智力在纯粹自然的状态下情愿在自由与真理这两者之间选择自由，或说与禁锢比较而言，人心珍视朝

向思想与言论权利的一种倾向。

5 .

5 .

2 . If we do but resign ourselves to facts, we shall soon be led on to the second reflection which I have promised—viz., that, not only are things not better abroad, but they might be worse at home. We have, it is true, a Protestant literature; but then it is neither atheistical nor immoral; and, in the case of at least half a dozen of its high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departments, and of the most popular of its authors, it comes to us with very considerable alleviations. For instance, there surely is a call on us for thankfulness that the most illustrious amongst English writers has so little of a Protestant about him that Catholics have been able, without extravagance, to claim him as their own, and that enemies to our creed have allowed that he is only not a Catholic, because, and as far as, his times forbade it. It is an additional satisfaction to be able to boast that he offends in neither of those two respects, which reflect so seriously upon the reputation of great authors abroad. Whatever passages may be gleaned from his dramas disrespectful to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still these are but passage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in Shakespeare neither contempt of religion nor scepticism, and he upholds the broad laws of moral and divine truth with the consistency and severity of an Æschylus, Sophocles, or Pindar. There is no mistaking in his works on which side lies the right; Satan is not made a hero, nor Cain a victim, but pride is pride, and vice is vice, and, whatever indulgence he may

allow himself in light thoughts or unseemly words, yet his admiration is reserved for sanctity and truth. From the second chief fault of Literature, as indeed my last words imply, he is not so free; but, often as he may offend against modesty, he is clear of a worse charge, sensuality, and hardly a passage can be instanced in all that he has written to seduce the imagination or to excite the passions.

第二，假如我们果真遵从事实，那我们很快就会被这些事实引导到我已经答应大家的第二点思考，即不仅事情在国外不一定更好，而且在国内还可能更糟糕。不错，我们是有一种新教文学。可是，这种文学既不是无神论文学，亦非不道德的文学，就其最高尚和最有影响力的至少五、六个分支来看，就其最受欢迎的几位作者来看，这种文学倒让我们感到十分宽慰。比如，在英语作家当中，最杰出的那位作家身上就极少有新教徒气息，竟至于天主教徒在毫不过分的情况下宣称这位作家为自己的作家，对我们的信经抱有敌意的人已经承认，他仅仅不是天主教徒而已，因为他的时代禁止他这么做，而且也只有这一个原因。这种情况显然就应当让我们心存感激了。假如可以自豪地说，他在上述两个层面上都没有冒犯之举，那应当是额外让人满意的地方，因为这两个层面如此严肃地反映在海外那些伟大作家的声望上。无论从他的戏剧里搜集到什么样的对教会权威不敬的段落，它们也只不过是一些段落。另外一方面，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既没有对宗教的蔑视，也没有对它的怀疑主义，他像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或品达一样一贯和严谨地支持道德与属神真理的广泛法则。在他的作品里，正义的一方处在哪边，从来都不会弄错。撒旦从来都没有被写成英雄，该隐也没有被描述成受害者，但是，傲慢就是傲慢，罪恶就是罪恶，而且，无论他允许自己在轻浮念头或不得体的字句中放纵到哪一步，他的赞美之辞却总是为圣洁和真理留下的。从文学的第二个主要缺陷来看，这的确也是我最后几句话所暗示的，他并没有那么自由。可是，尽管他经常也会违背谦逊之礼，却也不用背上更糟糕的恶名，即行文淫荡，在他创作的所有作品中，很少能够找出一个段落的例子来说明他想诱导人的想象力或煽动人们的炽情。

A rival to Shakespeare, if not in genius, at least in copiousness and variety, is found in Pope; and *he* was actually a Catholic, though personally an unsatisfactory one. His freedom indeed from Protestantism is but a poor compensation for a false theory of religion in one of his poems; but taking his works as a whole, we may surely acquit them of being dangerous to the reader, whether on the score of morals or of faith.

假如不是从才气看，至少从作品数量的繁多和品类的变化多端上看，能够与莎士比亚匹敌的一位作家就是蒲柏了。他实际上是一位天主教徒，尽管我认为他并不是让人满意的天主教徒。他虽然脱离了新教教义，但这远不足以弥补他在其中一首诗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错误的宗教理论。但是，拿他的作品当一个整体看待，我们也许可以放心地免除其对读者造成无论道德上还是信仰上的危险的可能性。

Again, the special title of moralist in English Literature is accorded by the public voice to Johnson, whose bias towards Catholicity is well known.

英语文学中的道德家这个特别名号，根据公众的声音又应当归在约翰逊名下了，而他对大公教会的偏见却是人所尽知的。

If we were to ask for a report of our philosophers, the investigation would not be so agreeable; for we have three of evil, and one of unsatisfactory repute. Locke is scarcely an honour to us in the standard of truth, grave and manly as he is; and Hobbes, Hume, and Bentham, in spite of their abilities, are simply a

disgrace. Yet, even in this department, we find some compensation in the names of Clarke, Berkeley, Butler, and Reid, and in a name more famous than them all. Bacon was too intellectually great to hate or to contemn the Catholic faith; and he deserves by his writings to be called the most orthodox of Protestant philosophers.

假如我们请求拿出关于我们的哲学家的一份报告，那这样的调查一定不会让人那么愉快，因为我们有三位哲学家背有恶名，有一位哲学家名声又不太响亮。按照真理的标准，洛克根本算不上值得我们荣耀的哲学家，尽管他为人严肃，也有男子气概。而霍布斯、休谟与边沁这几位，虽然能力超凡，却根本就让人丢脸。可是，哪怕在这个领域，我们也可以在很多哲学家那里找到些许安慰，如克拉克、贝克莱、巴特勒和里德，还有一位比他们所有人名气更大的哲学家。培根是如此智慧的一位伟大人物，他不可能仇恨或蔑视天主教信仰，根据他的著作，他值得被称为最正统的新教哲学家。

4. In Its Rela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Day

第四节：它与当今文学的关系

1．

1．

The past cannot be undone. That our English Classical Literature is not Catholic is a plain fact, which we cannot deny, to which we must reconcile ourselves, as best we may, and which, as I have shown above, has after all its compensations. When, then, I

speak of the desirableness of forming a Catholic Literature, I am contemplating no such vain enterprise as that of reversing history; no, nor of redeeming the past by the future. I have no dream of Catholic Classics as still reserved for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ruth, classical authors not only are national, but belong to a particular age of a nation's life; and I should not wonder if, as regards ourselves, that age is passing away. Moreover, they perform a particular office towards its language, which is not likely to be called for beyond a definite time. And further, though analogies or parallels cannot be taken to decide a question of this nature, such is the fact, that the series of our classical writers has already extended through a longer period than was granted to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either of Greece or of Rome; and thus the English language also may have a long course of literature still to come through many centuries, without that Literature being classical.

历史不能一笔勾销。英语古典文学并非天主教的文学，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无法否认，我们非得尽最大努力接受这事实不可，而且正如我上述所言，这事实也并非没有任何补偿可言。因此，当谈及形成一种天主教文学的益处时，我并没有盘算倒转历史这等无望之举。不，而且我也没准备用未来的期盼挽回过去的损失。我不曾梦想仍然为英语语言保留着形成天主教古典著作的机会。说真的，古典作家不仅仅是民族性的，而且还属于一个民族生活中的特定时代。至于我们自己，假如这个时代正在逝去，我不会感到任何诧异。再说了，古典作家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履行一种特别的职责，过了一定的时间，这职责便不太可能重新提起。更进一步说，虽然这类性质的问题不可依靠类比或相似的东西予以决定，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即我们的古典作家系列业已延伸了很长一个时期，应当已经超出希腊或罗马古典文学所经历的时期，所以，英语语言也应当在即将到来的许多世纪里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种文学不必一定就是经典。

Latin, for instance, was a living language for many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date of the writers who brought it to its perfection; and then it continued for a second long period to be the medium of European correspondence. Greek was a living language to a date not very far short of that of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ten centuries after the date of St. Basil, and seventeen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period commonly called classical. And thus, as the year has its spring and summer, so even for those celebrated languages there was but a season of splendour, and, compared with the whole course of their duration, but a brief season. Since, then, English has had its great writers for a term of about three hundred years,—as long, that is, as the period from Sappho to Demosthenes, or from Pisistratus to Arcesilas, or from Æschylus and Pindar to Carneades, or from Ennius to Pliny,—we should have no right to be disappointed if the classical period be close upon its termination.

例如，在那些作家使拉丁语到达完美状态之后的好几百年里，拉丁语一直都是一门活语言；之后，它又进入第二个漫长的发展期，继续成为欧洲通信用的媒介。在君士坦丁堡还没有占领太久的时候，希腊语都还是一门活的语言，此时离圣巴西略的时代已经隔着十个世纪，并且是在通常所称的古典时期的十七个世纪之后。因此，正如每年都有春夏，哪怕对于那些知名的语言来说，也只有那么一个灿烂的季节，与这些语言的全部周期比较而言，那也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季节。由英语拥有其伟大作家的历史已经有了约三百多年，就是差不多从萨福到德摩斯梯尼，从皮西斯特拉妥到阿尔塞色拉斯，从埃斯库罗斯和品达到卡尔尼亚德斯，或从恩尼乌斯到普林尼的时代同样长的一个时期，因此，假如古典时期快要结束，那我们也没有失望的权利。

By the Classics of a national Literature I mean those authors who have the foremost place in exemplifying the powers and

condu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ts language. The language of a nation is at first rude and clumsy; and it demands a succession of skilful artists to make it malleable and ductile, and to work it up to its proper perfection. It improves by use, but it is not every one who can use it while as yet it is unformed. To do this is an effort of genius; and so men of a peculiar talent arise, one after another,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s, and accomplish it. One gives it flexibility, that is, shows how it can be used without difficulty to express adequately a variety of thoughts and feelings in their nicety or intricacy; another makes it perspicuous or forcible; a third adds to its vocabulary; and a fourth gives it grace and harmony. The style of each of such eminent masters becomes henceforth in some sort a property of the language itself; words, phrases, collocations, and structure, which hitherto did not exist, gradually passing into the conversation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ducated classes.

我所说的一个民族文学的古典之作，是指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在示范其语言的魅力，引导其语言的发展方面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一个民族的语言起初往往十分粗糙和笨拙，它要求有接连不断的高超的艺术家来使它具有韧性及可塑性，并促使它发展到适当的完美状态。它在使用中不断完善，可是，在这门语言成型之前，并非每个人都能使用它。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具备天赋的人。一些具备特别天赋的人就会根据时代需要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并成就这门完善语言的事业。有人会给予语言以灵活性，就是说，他可以显示这门语言如何可以在不妨碍充足地表达各种精细复杂的思想和情感的情况下加以利用。另有人会使它清晰明白或有表现力。还有人可使其词汇量增大，更有人会让这门语言优美动听。这些杰出的语言大师，每个人的风格都会从此成为某种形式的语言财富本身，当时并不存在的一些文字、词组、搭配及结构，慢慢就会进入受过教育的人士的对话和文章。

2 .

2 .

Now I will attempt to show how this process of improvement is effected, and what is its limit. I conceive then that these gifted writers act upon the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by means of the particular schools which form about them respectively. Their style, using the word in a large sense, forcibly arrests the reader, and draws him on to imitate it, by virtue of what is excellent in it, in spite of such defects as, in common with all human works, it may contain. I suppose all of us will recognize this fascination. For myself when I was fourteen or fifteen, I imitated Addison; when I was seventeen, I wrote in the style of Johnson; about the same time I fell in with the twelfth volume of Gibbon, and my ears rang with the cadence of his sentences, and I dreamed of it for a night or two. Then I began to make an analysis of Thucydides in Gibbon's style. In like manner, most Oxford undergraduates, forty years ago, when they would write poetry, adopted the versification of Pope Darwin, and the Pleasures of Hope, which had been made popular by Heber and Milman. The literary schools, indeed, which I am speaking of, as resulting from the attractions of some original, or at least novel artist, consist for the most part of mannerists, none of whom rise much above mediocrity; but they are not the less serviceable as channels, by means of which the achievements of genius may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language itself, or become the common property of the nation. Henceforth, the most ordinary composer, the very student in the lecture-room, is able to write with a precision, a grace, or a copiousness, as the case may be, unknown before the date of the authors whom he imitates, and he wonders at, if he does

not rather pride himself on, his *novas frondes, et non sua poma* .

接下来，我想说明语言的改进过程是如何实现的，以及该过程都存在哪些局限。我猜想，这些有天赋的作家对口头与书面语言所施加的影响，是借助于分别在他们身边形成的特别流派的力量来实现的。他们的风格（取风格这个词的宽泛意义而言）强有力地吸引住读者，因这风格中的优秀成分而促使读者模仿这风格，哪怕这风格像所有人类作品中常见的那样也存在某些瑕疵。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会看出，这一点确实迷人。就我自己而言，才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就模仿阿迪森。到了十七岁，我就开始照约翰逊的风格写作。约在同时，我偶尔碰见吉本史书的第十二卷，耳边响起他的那些句子中的节奏，有一两个晚上，我甚至都梦到它。之后，我开始按照吉本的风格分析修昔底德的作品。四十年前，牛津的大部分学生都写诗，他们以类似方式采纳了蒲柏、达尔文和“希望的乐趣”那种作诗法，这种诗法因希伯和米尔曼的宣传而十分流行。我所谈及的文学流派，的确就源自某些原创性的、至少是十分新奇的艺术家的吸引力，它们多半由一些讲求格调的作家组成，其中没有哪一位真正超脱了平庸之气。可是，它们作为渠道的作用却也不是一无用处，只有经过这些渠道，天才的成就才可能融入语言本身，或成为该民族的共同财富。从这里开始，最普通的作者，也就是课堂里面的那些学生，也能够以他们所模仿的那些作家之前的时代不曾有过的一种精确、优美或丰富性写作了。假如他们并不为此自豪，至少也会惊叹于自己不知名的叶子，钦佩不属于自己的苹果。

If there is any one who illustrates this remark, it is Gibbon; I seem to trace his vigorous condensation and peculiar rhythm at every turn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present day. Pope, again, is said to have tuned our versification. Since his time, any one, who has an ear and turn for poetry, can with little pains throw off a copy of verses equal or superior to the poet's own, and with far less of study

and patient correction than would have been demanded of the poet himself for their production. Compare the choruses of the Samson Agonistes with any stanza taken at random in Thalaba: how much had the language gained in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m! Without denying the high merits of Southey's beautiful romance, we surely shall not be wrong in saying, that in its unembarrassed eloquent flow, i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at speaks, as much as the author himself.

假如有谁能示范这句话，那就是吉本了。在当今文学的每一个地方，我似乎都能看出他那种高度浓缩与特别节奏。据说，蒲柏也曾为我们的诗法进行过调音。从他的时代以后，任何听得懂诗歌或对诗歌有兴趣的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写上几行与这位诗人相同或更好的诗歌，这些诗歌的发表，并不需要这位诗人自己那个时代所要求的那种仔细耐心的修正。拿“力士参孙”中的合唱与“撒拉巴”中随意抽出的任何一段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英语语言在这期间获取了多么丰富的营养！我们并不想否认骚塞漂亮的传奇诗中的种种精妙之处，但如果说，在其并无矫饰的流畅诗行中，十九世纪的英语语言在与这位诗人一同讲话，显然也不会错。

I will give an instance of what I mean: let us take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chorus in the Samson:—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我们拿“力士参孙”第一个合唱中的最开始打比：

Just are the ways of God.

上帝行事凭公义，

And justifiable to men;

可见于世间万民心。

Unless there be who think not God at all;

除非有人根本不信上帝，

If any be, they walk obscure,

可万一有，那也只是些晦涩难解的人。

For of such doctrine never was there school,

从来不曾有学校教人这样的道理，

But the heart of the fool,

哪怕愚人的内心也能感受到神，

And no man therein doctor but himself.

除开自己，谁也治不好这不信的病。

But men there be, who doubt His ways not just,

一定有人会怀疑神的行事是否公正，

As to His own edicts found contradicting,

因他们在神自己的法令里看出矛盾，

Then give the reins to wandering thought,

他们因此自我放任，胡思乱想，

Regardless of His glory's diminution;

肆意贬损神的荣耀和威严。

Till, by their own perplexities involved,

他们困在自己编织的混乱之网里，

They ravel more, still less resolved,

越是拼命挣扎，这网缠得越是紧，

But never find self-satisfying solution.

可到头来还是找不到自我满意的途径。

And now take the opening stanza of Thalaba:—

我们再来看看“撒拉巴”开头的一段：

How beautiful is night

夜色多么美好！

A dewy freshness fills the silent air;

露珠般的新鲜感充满宁谧的空气；

No mist obscures, nor cloud, nor speck, nor stain,

薄雾并不遮掩，云彩、灰尘和污渍

Breaks the serene of heaven.

也不会打破天空的宁静。

In full-orb'd glory yonder Moon divine

远处浑圆的月亮透出圣洁银辉

Rolls through the dark blue depths.

穿过天际暗蓝色的深处。

Beneath her steady ray

在不停流泻的月光之下

The desert circle spreads,

沙漠的圆圈不断扩大，

Like the round ocean girdled with the sky.

像圆圆的海洋扎上天空的腰带。

How beautiful is night!

夜色多么美好！

Does not Southey show to advantage here? yet the voice of the world proclaims Milton pre-eminently a poet; and no one can affect a doubt of the delicacy and exactness of his ear. Yet, much as he did for the language in verse and in prose, he left much for other artists to do after him, which they have successfully accomplished. We see the fruit of the literary labours of Pope, Thomson, Gray, Goldsmith, and other poet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he musical eloquence of Southey.

在这里，骚塞的诗不是显得更美吗？可是，世人总觉得弥尔顿是杰出诗人，没有谁能对弥尔顿听力的精妙与严谨假装怀疑。但是，尽管他对英语语言的散文和诗歌都做出很大贡献，还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其他艺术家接力完成，而且事实上他们确实成功做到了这些。我们在骚塞充满音乐感的流畅诗文里，看到蒲柏、汤姆森、格雷、哥尔德史密斯和十八世纪其他诗人辛勤的文学劳动的成果。

3．

3．

So much for the process; now for its termination. I think it is brought about in some such way as the following:—

关于其过程就说这么多了。现在来谈谈它的终结。我觉得，它的终结多少是以下面这个样子发生的。

The influence of a great classic upon the nation which he represents is twofold; on the one hand he advances his native language towards its perfect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he discourages in some measure any advance beyond his own. Thus, in the parallel case of science, it is commonly said on the continent, that the very marvellousness of Newton's powers was the bane of English mathematics: inasmuch as those who succeeded him were content with his discoveries, bigoted to his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and averse to those new instruments which have carried on the French to such brilliant and successful results. In Literature, also, there is something oppressive in the authority of a great writer, and something of tyranny in the use to which his admirers put his name. The school which he forms would fain monopolize the language, draws up canons of criticism from his writings, and is intolerant of innovation. Those who come under its influence are dissuaded or deterred from striking out a path of their own. Thus Virgil's transcendent excellence fixed the character of the hexameter in subsequent poetry, and took away the chances, if not

of improvement, at least of variety. Even Juvenal has much of Virgil in the structure of his verse. I have known those who prefer the rhythm of Catullus.

一部伟大的经典著作对作者所代表的那个民族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作者使他的母语趋向完美，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挫败超出他本人的任何进步。因此，在科学的类似情形中，欧洲大陆常有人说，牛顿惊人的伟大之处，正好也就是英国数学的一剂毒药。牛顿之后的数学家满足于牛顿的发现，因牛顿的科学研究方法而变得心胸狭窄，对新的研究工具产生厌恶，结果使法国人创造出如此灿烂辉煌的成就。在文学中也是一样，一位伟大作家的权威会形成压迫性的东西，让他的崇拜者在他认可的语言应用上感受到某种专断。他形成的那个流派会乐于垄断这门语言，会根据他的作品拟定批评标准，从而无法忍受革新。受其影响的那些人会畏葸不前，或前怕狼后怕虎，因而不敢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正是这个原因，维吉尔超凡的卓越诗歌，就使后来的六步格诗特征固定下来，剥夺了改进六步格诗、至少是使其花样翻新的机会。哪怕是尤维纳利斯，其诗歌中也有许多维吉尔诗歌的成分。我还知道很多诗人更喜欢采纳卡图卢斯的诗歌节奏。

However, so summary a result is not of necessary occurrence. The splendour of an author may excite a generous emulation, or the tyrannous formalism of his followers a re-action; and thus other authors and other schools arise. We read of Thucydides, on hearing Herodotus read his history at Olympia, being incited to attempt a similar work, though of an entirely different and of an original structure. Gibbon, in like manner, writing of Hume and Robertson, says: “The perfect composition, the nervous language, the well-turned periods of Dr. Robertson, inflamed me to the ambitious hope that I might one day tread in his footsteps; the calm philosophy, the

careless inimitable beauties of his friend and rival, often forced me to close the volume with a mixed sensation of delight and despair.“ [5_4]

但是，如此简明扼要的一个结果，并非必然如此。一位作家的显赫成就，也许会激起众人仿效，或者说，他的崇拜者严重拘泥于形式的言行会造成一种逆反心理，从而促使其他作家和流派出现。我们借助阅读发现，修昔底德听到希罗多德在奥林匹亚朗读历史著作后大受鼓舞，就进行类似尝试，结果摸索出一套完全不同但具有创意的历史著述结构。同样，吉本写到休谟和罗伯逊时说：“罗伯逊博士完美的行文、强健有力的语言和措辞巧妙的复句，点燃了我胸中的激情，让我产生了有朝一日步其后尘的雄心壮志。既是他的友人又是其论敌的那位，他那种冷静哲理、难予模仿的淡泊之美，常常迫使我合上书本，心中泛起既开心又绝望的复杂情感。” [6_3]

As to re-actions, I suppose there has been something of the kind against the supremacy of Pope, since the time that his successors, Campbell especially, have developed his peculiarities and even defects into extravagance. Crabbe, for instance, turned back to a versification having much more of Dryden in it; and Byron, in spite of his high opinion of Pope, threw into his lines the rhythm of blank verse. Still, on the whole, the influence of a Classic acts in the way of discouraging any thing new, rather than in that of exciting rivalry or provoking re-action.

至于逆反心理，我想，自从蒲柏的后继者尤其是坎贝尔，将他的独特性甚至是缺陷发展到过分程度以后，针对蒲柏的至高权威一直以来也存在类似情绪。例如克拉布，他就转向拥有更多德莱顿成分的诗法。还有拜伦，尽管他对蒲柏敬畏有加，却在诗行里融进了很多无韵

体的成分。可是，整体而论，古典著作的影响，多半会挫败新事物而不是激发竞争或挑起逆反心理。

And another consideration i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a language has been cultivated in any particular department of thought, and so far as it has been generally perfected, an existing want has been supplied, and there is no need for further workmen. In its earlier times, while it is yet unformed, to write in it at all is almost a work of genius. It is like crossing a country before roads are made communicating between place and place. The authors of that age deserve to be Classics, both because of what they do and because they can do it. It requires the courage or the force of great talent to compose in the language at all; and the composition, when effected, makes a permanent impression on it. In those early times, too, the licence of speech unfettered by precedents, the novelty of the work, the state of society, and the absence of criticism, enable an author to write with spirit and freshness. But, as centuries pass on, this stimulus is taken away; the language by this time has become manageable for its various purposes, and is ready at command. Ideas have found their corresponding expressions; and one word will often convey what once required half a dozen. Roots have been expanded, derivations multiplied, terms invented or adopted. A variety of phrases has been provided, which form a sort of compound words. Separate professions, pursuits, and provinces of literature have gained their conventional terminology. There is an historical, political, social, commercial style. The ear of the nation has become accustomed to useful expressions or combinations of words, which otherwise would sound harsh. Strange metaphors have been naturalized in the ordinary prose, yet cannot be taken as precedents for a similar liberty. Criticism has become an art, and exercises a continual and jealous watch over the

free genius of new writers.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be original in the use of their mother tongue without being singular.

还有另一层考虑也必须纳入进来。当一门语言在思想的任一特定部门得到培育，并且总体上已经得到某种程度的完善后，一种现存的需求就得到满足，因而就再不需要有人来狗尾续貂了。在语言形成的早期，能够用这门语言写作都已经是天才之举。这就像还没有修好连接各处的道路时在乡间穿行一样。那个时代的作家们值得称为古典作家，既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还因为他们有能力做那些事。哪怕只是提笔用那门语言写作，都需要一股勇气，或一股巨大的天赋力量。文章写成之后，它就会在语言里留下永久印象。另外，也是在语言形成的初期，不受先例约束的言论权利、作品的新颖、社会状态以及文学批评的缺乏，都使一位作家能怀着激情、精神饱满地写作。可是，多少世纪以后，这样的刺激因素没有了，此时，语言已经被人操纵，投入各种各样的用途，并可自由支配。思想已经找到相应的表达方法，一个词常常能够表达以前需要五、六个词才能说清楚的意思。词根扩充了，派生词成倍增多，各种用语被人发明出来，或者被人接纳。已经提供了各式各样的短语，结果可构成某种复合词。各个不同的职业、爱好以及文学的各个领域，都已经获得了成为惯例的专业用语。出现了历史、政治、社会和商业风格。国人的耳朵已经习惯于听到本来会十分刺耳、却表明非常有用的表达方式或复合词。一些奇怪的比喻已经在普通的散文中习以为常，然而还不能当作可随便使用的先例。文学批评已经成为一门艺术，新起之秀——自由发挥的天才——会受到这种批评持续不断和充满嫉妒的监视。如果不独辟蹊径，他们就很难在母语中表现出创新。

Thus the language has become in a great measure stereotype; as in the case of the human frame, it has expanded to the loss of its elasticity, and can expand no more. Then the general style of educated men, formed by the accumulated improvements of

centuries, is far superior perhaps in perfectness to that of any one of those national Classics, who have taught their countrymen to write more clearly, or more elegantly, or more forcibly than themselves. And literary men submit themselves to what they find so well provided for them; or, if impatient of conventionalities, and resolved to shake off a yoke which tames them down to the loss of individuality, they adopt no half measures, but indulge in novelties which offend against the genius of the language, and the true canons of taste. Political causes may co-operate in a revolt of this kind; and, as a nation declines in patriotism, so does its language in purity. It seems to me as if the sententious, epigrammatic style of writing, which set in with Seneca, and is seen at least as late as in the writings of St. Ambrose, is an attempt to escape from the simplicity of Cæsar and the majestic elocution of Cicero; while Tertullian, with more of genius than good sense, relieves himself in the harsh originality of his provincial Latin.

如此一来，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便成为一种陈规旧套。就如同人体骨架一样，长到一定时候便失去弹性了，再没有地方可以发展。一些受过教育的人通常的写作风格，往往是经数世纪改进而积累起来的，在其完善程度上来说，也许比任何一种民族古典作家的风格更优秀，因为那些作家致力于教导其国民如何比他们自己更清晰，更优雅或更有表现力地写作。而且，以文为生的人往往乐于接受已经得到的一切。要么，假如他们无法忍受平庸，决心抛弃使他们驯服从而失去个性的桎梏，那他们就不会采取小修小补的策略，而是会大刀阔斧地标新立异，与这门语言的才气之士以及纯粹的正统品味对着干。政治原因也许会与这类反叛同流合污，当一个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下降的时候，其语言的纯洁性也随之下滑。在我看来，从塞涅卡开始流行，且至少晚到圣安布罗斯的作品中还能看到的那种简洁精炼、充满警句的写作风格，就好像是为了逃避恺撒的简朴和西塞罗的宏伟雄辩的一种尝试，而才气比判断力更突出的德尔图良，却以其地方特色的拉丁语

豪放的原创性来减轻自己的压力。

There is another impediment, as time goes on, to the rise of fresh classics in any nation; and that is the effect which foreigners, or foreign literature, will exert upon it. It may happen that a certain language, like Greek, is adopted and used familiarly by educated men in other countries; or again, that educated men, to whom it is native, may abandon it for some other language, as the Roman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centuries wrote in Greek instead of Latin. The consequence will be, that the language in question will tend to lose its nationality—that is,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 it will cease to be idiomatic in the sense in which it once was so; and whatever grace or propriety it may retain, it will be comparatively tame and spiritless; or, on the other hand, it will be corrupted by the admixture of foreign elements.

随着时代的变化，还有另一层因素会阻碍一个民族的新经典的兴起，这就是外国人或外国文学会对它造成的影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即某种像希腊语一样的语言，被别国受过教育的人所采纳，并驾轻就熟地予以运用。另外，这些有良好教养的人士，也许会抛弃自己的母语而改用外国语写作，如二世纪和三世纪的罗马人就喜欢用希腊语而非拉丁语写作。结果是，所说的语言往往会丢失其民族性，就是说，它的明显特征没有了。它不再是过去那种符合民族语言习惯的东西了，无论它仍然保留有哪些适当性或优美之处，比较而言它已经相当乏味和没有精气神了。或者，另外一方面，它会因外国语元素的混入而败坏。

4．

4．

Such, as I consider, being the fortunes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viewed generally, I should never b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as regards this hemisphere, for I can prophesy nothing of America, we have well nigh seen the end of English Classics. Certainly, it is in no expectation of Catholics continuing the series here that I speak of the duty and necessity of their cultivating English literature. When I speak of the formation of a Catholic school of writers, I have respect principally to the matter of what is written, and to composition only so far forth as style is necessary to convey and to recommend the matter. I mean a literature which resembles the literature of the day. This is not a day for great writers, but for good writing, and a great deal of it. There never was a time when men wrote so much and so well, and that, without being of any great account themselves. While our literature in this day, especially the periodical, is rich and various, its language is elaborated to a perfection far beyond that of our Classics, by the jealous rivalry, the incessant practice,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its many writers. In point of mere style, I suppose, many an article in the *Times* newspaper, or Edinburgh Review, is superior to a preface of Dryden's, or a Spectator, or a pamphlet of Swift's, or one of South's sermons.

从一般意义上看，这也就是我所认为的古典文学的命运了，看看我们西半球（美洲的事情我不好说），假如说我们差不多已经看到英语经典之作的尽头了，那我丝毫也不会惊诧。当然，正是因为不希望天主教徒重走老路，我才会在这里谈到他们在培育英语文学方面的责任与必要性。谈及形成一个天主教作家流派时，我关注的主要是已经写成的内容，及仅限于传递与推荐这内容时必需有写作风格的那种作

文方法。我是指与当今文学相似的那种文学。这不是一个产生伟大作家的时代，而是需要良好写作，并且是很多好作品的时代。人们从来没有在任何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写这么多，还写得这么好，而且并不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自我。一方面，我们当今的文学，尤其是期刊杂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它的语言也精巧到了远远超出古典水平的完善程度，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众多的作家妒忌性的竞争、一刻不停的实践和相互影响的结果。仅仅从风格而论，我以为，《泰晤士报》或《爱丁堡评论》上的许多文章，就比德莱顿的序言、《旁观者》上的文章、斯威夫特的小册子或骚塞讲道集中的文章水平高得多。

Our writers write so well that there is little to choose between them. What they lack is that individuality, that earnestness, most personal yet most unconscious of self, which is the greatest charm of an author. The very form of the compositions of the day suggests to us their main deficiency. They are anonymous. So was it not in the literature of those nations which we consider the special standard of classical writing; so is it not with our own Classics. The Epic was sung by the voice of the living, present poet. The drama, in its very idea, is poetry in persons. Historians begin, “Herodotus, of Halicarnassus, publishes his researches;” or, “Thucydides, the Athenian, has composed an account of the war.” Pindar is all through his odes a speaker. Plato, Xenophon, and Cicero, throw their philosophical dissertations into the form of a dialogue. Orators and preachers are by their very profession known persons, and the personal is laid down by the Philosopher of antiquity as the source of their greatest persuasiveness. Virgil and Horace are ever bringing into their poetry their own characters and tastes. Dante's poems furnish a series of events for the chronology of his times. Milton is frequent in allusions to his own history and circumstances. Even when Addison writes anonymously, he writes under a professed

character, and that in a great measure his own; he writes in the first person. The “I”, of the Spectator, and the “we” of the modern Review or Newspaper, are the respective symbols of the two ages in our literature. Catholics must do as their neighbours; they must be content to serve their generation, to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religion, to recommend truth, and to edify their brethren today, though their names are to have little weight, and their works are not to last much beyond themselves.

我们的作家都写得这么好，几乎让人无从选择。他们缺少的就是那种独创性，那种诚挚精神，极著个人特色却又在深沉的忘我状态，而这恰巧就是一位作家最迷人的东西。当今做文章的形式本身，正好就为我们指明其主要的缺陷所在。他们都是无个性特征的匿名作家。在我们认为是经典写作之特别标准的那些民族的文学当中，事情并非如此，在我们自己的经典著作中，情况也不是这样的。史诗是由尚在人世的诗人们当场吟唱出来的。而戏剧这个概念本身，指的就是由真实的人表现出来的诗歌。史家的著作，往往这样开头：“哈利卡尔那索斯的希罗多德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或“雅典人修昔底德刚刚写成一部战争史”。在品达所有的颂歌集里，他本人都是说话者。柏拉图、色诺芬和西塞罗都以对话形式表达他们的哲理思考成果。演说家和布道者因职业原因而全都是有名有姓的真人，古代的哲学家都认为，实名实姓正是其强大说服力的源泉。维吉尔和贺拉斯甚至将他们自己的性格和品味带入其诗歌中。但丁的诗歌可为人们提供记述其时代编年史的一系列事件。弥尔顿经常在作品中暗示自身历史和个人情况。阿迪森哪怕在匿名写作时，也是以一位公开的角色来写的，而这角色通常就是他本人。他总是用第一人称写作。《旁观者》中的“我”和现代所谓评论或报纸中的“我们”，正好就是我们文学中的两个时代各自的象征。天主教徒也得像别的教徒一样行事，必须满足于为自己一代人服务，提升人们的宗教兴趣，引荐真理，并启发他们今天的兄弟姐妹，不过，他们的声名会无足轻重，他们的作品也不会比自己的生命更久长。

5．

5．

And now having shown what it is that a Catholic University does not think of doing, what it need not do, and what it cannot do, I might go on to trace out in detail what it is that it really might and will encourage and create. But, as such an investigation would neither be difficult to pursue, nor easy to terminate, I prefer to leave the subject at the preliminary point to which I have brought it.

天主教大学并不想做，不需要去做和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已经说清楚了，现在就可以进一步详细探讨一下，这样的大学当真应该和必将去支持和创造的东西是什么。可是，由于这样一种探索动起手来并不费事，但结束的时候也不会容易，我情愿就此打住，仅留下这个话头。

[5_1].August, 1854.

[5_2].Macaulay's Essays.

[5_3].Hallam.

[5_4].Misc. Works, p. 55.

[6_1].参见麦考雷著作

[6_2].参见哈勒姆文章

[6_3].参见作品第55页。

Lecture 4. Elementary Studies

第四讲：初级教育

It has often been observed that, when the eyes of the infant first open upon the world, the reflected rays of light which strike them from the myriad of surrounding objects present to him no image, but a medley of colours and shadows. They do not form into a whole; they do not rise into foregrounds and melt into distances; they do not divide into groups; they do not coalesce into unities; they do not combine into persons; but each particular hue and tint stands by itself, wedged in amid a thousand others upon the vast and flat mosaic, having no intelligence, and conveying no story, any more than the wrong side of some rich tapestry. The little babe stretches out his arms and fingers, as if to grasp or to fathom the many-coloured vision; and thus he gradually learns the connexion of part with part, separates what moves from what is stationary, watches the coming and going of figures, masters the idea of shape and of perspective, calls in the information conveyed through the other senses to assist him in his mental process, and thus gradually converts a calidoscope into a picture. The first view was the more splendid, the second the more real; the former more poetical, the latter more philosophical. Alas! what are we doing all through life, both as a necessity and as a duty, but unlearning the world's poetry, and attaining to its prose! This is our education, as boys and as men, in the action of life, and in the closet or library; in our affections, in our aims, in our hopes, and in our memories. And in like manner it is the education of our intellect; I say, that one main portion of intellectual education, of the labours of both school and university, is to remove the original dimness of the mind's eye; to

strengthen and perfect its vision; to enable it to look out into the world right forward, steadily and truly; to give the mind clearness, accuracy, precision; to enable it to use words aright, to understand what it says, to conceive justly what it thinks about, to abstract, compare, analyze, divide, define, and reason, correctly. There is a particular science which takes these matters in hand, and it is called logic; but it is not by logic, certainly not by logic alone, that the faculty I speak of is acquired. The infant does not learn to spell and read the hues upon his retina by any scientific rule; nor does the student learn accuracy of thought by any manual or treatise. The instruction given him, of whatever kind, if it be really instruction, is mainly, or at least pre-eminently, this,—a discipline in accuracy of mind.

经常有人注意到，婴儿第一次睁眼看世界时，从周围的万千对象里反射到他眼睛里的光线，并不能为他提供任何图像，而只是杂乱的颜色与阴影而已。这些颜色与阴影并不能形成一个整体，它们并不能凑到跟前，也不能消散在远处。它们并不能分成组别，它们无法联合成小单元。它们并不能组合起来构成人的形象。各种特别的色彩和色调都各个分立，并插在数以千计的其他色彩与色调中，构成一块巨大的平面马赛克。这些色彩和色调并不含特别信息，也不能讲述任何故事，就如同色彩丰富的一张挂毯挂反了面。小宝宝会伸展开胳膊和手指，好像要抓什么东西，或者想探探色彩斑斓的视象到底有多深。这样一来，他慢慢就明白了一个部分与另一个部分之间的联系，把活动的东西与静止的东西区分开来，看到影像来来去去，掌握形状与透视的概念，集合通过其他感官传递的信息，帮助他完成心智过程，从而逐渐将万花筒景色转换成一个画面。最初的视图色彩斑斓，更加好看，第二个视图更真实；前者更有诗意，后者更有哲理性。唉，我们活在世上，一辈子既为一种必然性，也为一种责任行事，就是忘记了人世的诗歌，所得的不过是生活的单调乏味！我们作为儿童和成人的教育也是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在密室或图书馆里都是如此。在我们

的情感中，在我们的目标中，在我们的希望中，在我们的记忆里都是如此。同样，我们的才智教育也是如此。我要说，智性教育的一个主要部分，大学与中小学校的一部分辛苦劳动，全都是要把心智之眼最初的微暗去掉，要强化并完善其视力，使其能够稳定和真实地看透眼前的世界，让心智得到清晰度、准确度、精确度，使其能够正确地利用词汇，理解心智所言，恰当地构想心智思考的内容，正确地进行抽象、比较、分析、划分、定义和推理。有一个专门学科来处理此事，就称为逻辑学。可是，我所说的那种能力，却不是，或并非仅只是依靠逻辑获得的。婴儿并不是依靠任何科学规则学会如何拼写和阅读视网膜上的种种色调的，学生也不是依靠任何手册或论文来获得思维的精确度的。给予学生的无论何种教导，假如称得上真正的教导的话，主要就在于，或至少明显在于这一点：思维精确性的训练。

Boys are always more or less inaccurate, and too many, or rather the majority, remain boys all their lives. When, for instance, I hear speakers at public meetings declaiming about “large and enlightened views,” or about “freedom of conscience,” or about “the Gospel,” or any other popular subject of the day, I am far from denying that some among them know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but it would be satisfactory, in a particular case, to be sure of the fact; for it seems to me that those household words may stand in a man's mind for a something or other, very glorious indeed, but very misty, pretty much like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which floats before the mental vision of a Turk,—that is, if, when he interrupts his smoking to utter the word, he condescends to reflect whether it has any meaning at all. Again, a critic in a periodical dashes off, perhaps, his praises of a new work, as “talented, original, replete with intense interest, irresistible in argument, and, in the best sense of the word, a very readable book;“—can we really believe that he cares to attach any definite sense to the words of which he is so lavish? nay, that, if he had a habit of attaching sense to them, he

could ever bring himself to so prodigal and wholesale an expenditure of them?

儿童总是多多少少不那么精益求精，很多人，或者说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是长不大的孩子。比如，当我在公开会议上听到一些演讲的人宣称“宏大与开明的视野”时，或大谈“良知的自由”时，或谈到“福音”及当今流行的其他任何话题时，我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人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我根本就不想否认这一点。可是，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要是能够确定这一事实，那就太让人满意了。因为在我看来，那些家喻户晓的用语，在一个人的心智里代表的这个或那个意思，可能听上去不错，结果却十分模糊，比如像“文明”的概念，因这概念不断浮现在一个土耳其人的脑海里，就是说，当他抽烟时停下来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会很谦逊地思考这个词是否有什么具体含义。一份期刊的评论家也许匆匆写完一篇赞美某部新作的文章，说这作品“有天赋，有创意，妙趣横生，论证严谨，的的确确就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著作”。可是，我们当真能相信，他如此慷慨大方地给予作者的溢美之辞，果真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况且，就算他有用词严谨的习惯，那他会纵容自己如此挥霍，如此大批量地滥用词汇吗？

To a short-sighted person, colours run together and intermix, outlines disappear, blues and reds and yellows become russets or browns, the lamps or candles of an illumination spread into an unmeaning glare, or dissolve into a milky way. He takes up an eye-glass, and the mist clears up; every image stands out distinct, and the rays of light fall back upon their centres. It is this haziness of intellectual vision which is the malady of all classes of men by nature, of those who read and write and compose, quite as well as of those who cannot,—of all who have not had a really good education. Those who cannot either read or write may, nevertheless, be in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have remedied and got

rid of it; those who can, are too often still under its power. It is an acquisition quite separate from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or knowledge of books. This is a large subject, which might be pursued at great length, and of which here I shall but attempt one or two illustrations.

对一位视力不好的人来说，颜色会挤成一堆，混杂不清，轮廓会消失，蓝色、红色及黄色会变成赤褐色或棕色，照明用的灯盏或蜡烛会扩散成无意义的眩光，或隐入银河。他戴上眼镜，模糊不清的东西清晰起来，每一种图像都会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光线也会落在光源中心上去。智性视野里的模糊，正是各个阶层的人天生的弊病，能读能写会作文章的人、不会这些的人、没有接受过真正良好教育的人，全都如此。可是，既不会读也不能写的人，却有可能医好这弊病并彻底摆脱它，而能写会算的人，反倒经常处在其影响之下。这是一种与杂七杂八的信息或书本知识不同的一种获得。这是很大的一个话题，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说清楚，我仅只能在此略提一二。

1. Grammar

第一节：语法

1．

1．

One of the subjects especially interesting to all persons who, from any point of view, as officials or as students, are regarding a University course, is that of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Now a

principal subject introduced into this examination will be “the elements of Latin and Greek Grammar.” “Grammar” in the middle ages was often used as almost synonymous with “literature,” and a Grammarian was a “Professor literarum.” This is the sense of the word in which a youth of an inaccurate mind delights. He rejoices to profess all the classics, and to learn none of them. On the other hand, by “Grammar” is now more commonly meant, as Johnson defines it, “the art of using *words* properly,” and it “comprises four parts—Orthography, Etymology, Syntax, and Prosody.” Grammar, in this sense, is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of language, and to be conversant with it, as regards a particular language, is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force of that language when thrown into sentences and paragraphs.

能引起所有人——无论官员还是学生——思考大学课程的的兴趣，且无论从哪个观点来看问题都会产生兴趣的一个话题，便是大学的入学考试。这种入学考试中的一门主科，便是“拉丁语及希腊语语法基础”。中世纪所谓的“语法”，经常用来指与“文学”相当的内容，因此，语法学家，通常也就是一位“文法教师”。这个词的这层意思，往往受到头脑不清楚的青年人喜欢。他喜欢谈及所有古典著作，其实一本都没有认真看过。另外一方面，“语法”一词现在的通常用法，更多是指约翰逊所定义的“适当应用词汇　的艺术，“它”由四部分构成：正字法、词源学、句法和韵律学。从这层意思看，语法就是对语言的科学分析，要熟悉某一门特定语言的语法，就必须能够理解从句子和段落中看出的语言的意义与力量。

Thus the word is used when the “elements of Latin and Greek Grammar” are spoken of as subjects of our Entrance Examination; not, that is, the elements of Latin and Greek literature, as if a youth were intended to have a smattering of the classical writers in

general, and were to be able to give an opinion about the eloquence of Demosthenes and Cicero, the value of Livy, or the existence of Homer; or need have read half a dozen Greek and Latin authors, and portions of a dozen others:—though of course it would be much to his credit if he had done so; only, such proficiency is not to be expected, and cannot be required, of him:—but we mean th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languages, or an examination of his scholarship. That is, an examination in order to ascertain whether he knows Etymology and Syntax, the two principal departments of the science of language,—whether he understands how the separate portions of a sentence hang together, how they form a whole, how each has its own place in the government of it, what are the peculiarities of construction or the idiomatic expressions in it proper to the language in which it is written, what is the precise meaning of its terms, and what the history of their formation.

英国大学入学考试所列“拉丁语及希腊语语法基础”科目，其中的语法二字，指的就是这层意思。并不是指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文学基础，就好像要让年轻人去一知半解地遍览一番古典作家，然后就有能力发表对于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的雄辩术、利维的价值以及是否存在荷马这个人的意见。或一定要看上五六部希腊罗马名著，再加上五六部其他人的著作，尽管果真如此的话，那一定对他有益无害。人们并不指望，也不要求他到达这样的水平。它的意思是指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结构及特征，或检验其学术水平的一种考查。就是说，这种考试是要确认他是否了解词源学和句法，这是语言科学最基础的部分。看他是否明白一个句子各个单独的部分如何归拢在一起，它们如何构成一个整体，在句子的构成中，这各个单独的部分是如何占据相应地位的，适合于该门语言的那些特别结构或习惯表达法都有哪些，这门语言的术语准确的含义是什么，以及形成的历史过程是怎样的。

All this will be best arrived at by trying how far he can frame a possible, or analyze a given sentence. To translate an English sentence into Latin is to *frame* a sentence, and is the best test whether or not a student knows the difference of Latin from English construction; to construe and parse is to *analyze* a sentence, and is an evidence of the easier attainment of knowing what Latin construction is in itself. And this is the sense of the word "Grammar" which our inaccurate student detests, and this is the sense of the word which every sensible tutor will maintain. His maxim is, "a little, but well;" that is, really know what you say you know: know what you know and what you do not know; get one thing well before you go on to a second; try to ascertain what your words mean; when you read a sentence, picture it before your mind as a whole, take in the truth or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it, express it in your own words, and, if it be important, commit it to the faithful memory. Again, compare one idea with another; adjust truths and facts; form them into one whole, or notice the obstacles which occur in doing so. This is the way to make progress; this is the way to arrive at results; not to swallow knowledge, but (according to the figure sometimes used) to masticate and digest it.

试试他能在多大范围里组成一个可能的句子，或分析一个既定的句子，上述一切目的就能圆满地达到。把一个英语句子翻译成拉丁语，实际就是所谓的造句，学生是否了解拉丁语跟英语结构的不同，这是最好的检验。翻译与分析，就是指解析 一个句子，它是了解拉丁语结构自身是何等样子这种较容易获得的知识的一个明证。可是，我们那位头脑不清楚的学生所厌恶的，正是“语法”一词的这一层意思，而且是每一位明智的教师都会坚持的意思。他的格言是，“宁缺毋滥”，就是说，要明白所说的意思，知之为知之，不知则说不知。先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再谈别的事情。要确认自己的用语都是什么意思。看到一个句子时，应当在头脑里构成一个整体图画，获取里面真

实或有用的信息，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假如是重要的信息，还得老老实实地背诵下来。还有，必须将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比较对照。哪些是真理，哪些是事实，必须弄准确。将这些真理与事实放进一个整体，或者要注意无法做到这一步的障碍何在。这就是取得进步的方法，这就是学有所成的办法。不要囫囵吞枣，而是要（按照通常的形象说法）咀嚼和消化。

2．

2．

To illustrate what I mean, I proceed to take an instance. I will draw the sketch of a candidate for entrance, deficient to a great extent. I shall put him below *par* , and not such as it is likely that a respectable school would turn out, with a view of clearly bringing before the reader, by the contrast, what a student ought *not* to be, or what is meant by *inaccuracy* . And, in order to simplify the case to the utmost, I shall take, as he will perceive as I proceed, one *single word* as a sort of text, and show how that one word, even by itself, affords matter for a sufficient examination of a youth in grammar, history, and geography. I set off thus:—

为了说清楚我的意思，接下来就拿一个实例来说话。我来描绘一位准备入学考试的考生的情况，而且属于很差的那种学生。我将他列在低于平均水平 的范围内，而不是一所值得尊敬的学校会培养出来的那种学生，目的是要通过对比的方法让读者明白地看出，一个学生不应当 成为哪种人，或有失精准 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为了最大程度地简化这个说明，我只挑一个词作为某种文本，当我这样做的时

候，这名学生会明白这个意思的。然后我会说明，仅凭一个词 ，也可以对一个青年人的语法、历史和地理知识进行充足检验。下面我就开始这么做。

Tutor. Mr. Brown, I believe? Sit down. Candidate. Yes.

老师。我想，你应该是布朗先生吧？请坐。考生。是。

T.What are the Latin and Greek books you propose to be examined in? C. Homer, Lucian, Demosthenes, Xenophon, Virgil, Horace, Statius, Juvenal, Cicero, Analecta, and Matthiæ.

老师：你推荐哪些拉丁语和希腊语著作供我们此次考试之用？考生：荷马、卢西恩、德摩斯梯尼、色诺芬、维吉尔、贺拉斯、斯塔提乌斯、尤维纳利斯、西塞罗、《文选》和马蒂亚。

T.No; I mean what are the books I am to examine you in? C. *is silent* .

老师：不。我指的是拿来考你的那些著作有哪些。（考生沉默。）

T.The two books, one Latin and one Greek: don't flurry yourself. C. Oh,…Xenophon and Virgil.

老师：两种著作，一种是拉丁语，另一种是希腊语。别着急。考生：呵……色诺芬和维吉尔。

T.Xenophon and Virgil. Very well; what part of Xenophon? C. *is silent* .

老师：色诺芬和维吉尔。很好。色诺芬的哪一部分？（考生沉默。）

T.What work of Xenophon? C. Xenophon.

老师：色诺芬的什么著作？考生：色诺芬。

T.Xenophon wrote many works. Do you know the names of any of them? C. I…Xenophon…Xenophon.

老师：色诺芬写了很多书。你知道其中一些书的书名吗？考生：我……色诺芬……色诺芬。

T.Is it the *Anabasis* you take up? C. (*with surprise*) O yes; the *Anabasis* .

老师：你读的是《远征记》吗？考生：（很惊讶）啊就是。就是《远征记》。

T.Well, Xenophon's *Anabasis* ; now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anabasis* ? C. *is silent* .

老师：嗯，是色诺芬的《远征记》。‘Anabasis’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考生沉默。）

T.You know very well; take your time, and don't be alarmed. *Anabasis* means… C. An ascent.

老师：你其实很清楚的。别着急，不要慌张。考生：‘Anabasis’的意思是……上行。

T.Very right; it means an ascent. Now how comes it to mean an ascent? What is it derived from? *C* . It comes from…(*a pause*). *Anabasis* …it *is* the nominative.

老师：很好。是有上行的意思。可是，这个词最后为何能够用来指上行呢？它是从哪里派生出这个意思来的？考生：是从……（暂停）。上行……它是主格词。

T.Quite right: but what part of speech is it? C. A noun,—a noun substantive.

老师：正确。是什么词性呢？考生：名词。古代说的名词。

T.Very well; a noun substantive, now what is the verb that *anabasis* is derived from? C. *is silent* .

老师：很好。是古名词。远征这个名词从中派生出来的那个动词是什么？（考生沉默 。 ）

T.From the verb ἀν*αβαί*ν*ω* isn't it? from ἀν*αβαί*ν*ω* … C. Yes.

老师：是从动词‘anabaino’出来的，不是吗？考生：是的。

T.Just so. Now, what does ἀν*αβαί*ν*ω* mean? C. To go up, to ascend.

老师：就是啊。那么，‘anabaino’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考生：往上走，上行。

T.Very well; and which part of the word means *to go* , and which part *up* ? C. ἀν*α* is *up* , and *βαί*ν*ω go* .

老师：很好。哪一部分指往上走 ，哪一部分指上行 呢？考生：‘Ana’指上行 ，‘baino’指往上走 。

T.*βαί*ν*ω* to go, yes; now *βά*σ*ι*ς ? What does *βά*σ*ι*ς mean? C. A

going.

老师：‘Baino’指往上走，对的。‘Basis’是什么意思呢？‘Basis’指什么？考生：一种往上走的动作。

T.That is right; and ἀνά-*βασις* ? C. A going up.

老师：对的。那么，‘ana-basis’呢？考生：往上走的动作。

T.Now what is a going *down* ? C. *is silent* .

老师：那么，往下降 呢？（考生沉默 。 ）

T.What is down?...K*ατά* …don't you recollect? K*ατά* C. K*ατά*.

老师：什么是降 ？‘Kata’……你想不起来了吗？考生：‘Kata’。

T.Well, then, what is a going *down* ? *Cat* …*cat* …C. *Cat* …

老师：这样的话，什么是下降 呢？考生：‘Cat’…‘cat’…是‘Cat’。

T.*Cata* … C. *Cata* …

老师：‘Cata’…考生：‘Cata’…

T.*Catabasis* . C. Oh, of course, *catabasis* .

老师：‘Catabasis’。考生：呵，当然，是‘catabasis’。

T.Now tell me what is the future of *βαίνω* ? C. (*thinks*) *βανῶ* .

老师：现在请告诉我，‘Baino’的未来时态是怎样的？考生：（思考 ）‘Bano’。

T.No, no; think again; you know better than that. C. (*objects*) *Φαίνω* , *Φανῶ* ?

老师：不，不。再想想。你一定知道的。考生：（拒绝 ）。‘Phaino’,‘phano’?

T.Certainly, *Φαίνω* is the future of *Φανῶ* ; but *βαίνω* is, you know, an irregular verb. C. Oh, I recollect, *βήσω* .

老师：当然，‘phano’是‘phaino’的未来时，可是，你知道，‘baino’是不规则动词。考生：呵，想起来了，是‘beso’。

T.Well, that is much better; but you are not quite right yet; *βήσομαι* … C. Oh, of course, *βήσομαι* …

老师：嗯，强多了。可是，还不是那么正确。是‘besomai’。考生：呵，当然，是‘besomai’。

T.*βήσομαι* .. Now do you mean to say that *βήσομαι* . *comes from βαίνω* ? C. *is silent* .

老师：‘Besomai’。可你意思是说，‘besomai’这个词来自‘baino’吗？（考生沉默。）

T.For instance: τύψω comes from τύπτω by a change of letters; does *βήσομαιin* in any similar way come from *βαίνω* ? C. It is an irregular verb.

老师：比如，‘tupso’来自‘tupto’，只不过换了一个字母。‘Besomai’是以类似方式来自‘baino’吗？考生：这是个不规则动词。

T.What do you mean by an irregular verb? does it form tenses anyhow and by caprice? C. It does not go according to the paradigm.

老师：你说的不规则动词是什么意思？它不管怎样一定能构成时

态，而且是随意变成这样的吗？考生：是指并不按照词形变化表上的说明发生变化的动词。

T.Yes, but how do you account for this? C. *is silent* .

老师：那是啊，可是，你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考生沉默。）

T.Are its tenses formed from several roots? C. *is silent* .

老师：它的时态是根据多个词根形成的吗？（考生沉默。）

T.*is silent; then he changes the subject* .

老师：（不出声，然后换了一个话题。）

T.Well, now you say *Anabasis* means an *ascent* . Who ascended? C. The Greeks, Xenophon.

老师：嗯，刚才你说，‘anabasis’意思指上行　　。谁上行呢？考生：希腊人，色诺芬。

T.Very well: Xenophon and the Greeks; the Greeks ascended. To what did they ascend? C. Against the Persian king: they

ascended to fight the Persian king.

老师：很好。色诺芬和那些希腊人。希腊人上行。他们为何目的上行？考生：抵抗那个波斯国王。他们上行抗击波斯王。

T.That is right…an ascent; but I thought we called it a *de* scent when a foreign army carried war into a country? C. *is silent* .

老师：正确……是上行。可是，我以为，当一支外国来的大军对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时，我们称它为降临。（考生沉默 。 ）

T.Don't we talk of a descent of barbarians? C. Yes.

老师：我们不是经常谈起蛮族入侵吗？考生：是啊。

T.Why then are the Greeks said to go *up* ? C. They went up to fight the Persian king.

老师：那为什么希腊人说要上行 ？考生：他们起而抗击波斯王。

T.Yes; but why *up* …why not *down* ? C. They came down afterwards, when they retreated back to Greece.

老师：不错，可是，为什么是上行　呢？为什么不是下行　？考生：他们后来下行了，就是当他们撤回希腊的时候。

T.Perfectly right; they did…but could you give no reason why they are said to go *up* to Persia, not *down* ? C. They went *up* to Persia.

老师：说得太好了，他们的确是那样做了……可是，当你说他们应对波斯人的时候是上行　而不是下行　，你难道没有什么理由吗？考生：他们起而抗击波斯人。

T.Why do you not say they went *down* ? C. *pauses* , *then* ,… They went *down* to Persia.

老师：你为什么不说他们下而 抗击？考生：停顿，之后说……他们下而 抗击波斯人。

T.You have misunderstood me.

老师：你会错我的意思了。

A silence .

（双方沉默。）

T.*Why* do you not say down? C. I do…*down* .

老师：你为什么不说下 ？考生：我说了。是下 。

T.You have got confused; you know very well. C. I understood you to ask why I did not say “they went down”.

老师：你已经乱套了。你本来是知道的。考生：我刚才理解的意思是，您是问我为什么不说“他们下来。”

A silence on both sides .

（双方都无语 。 ）

T.Have you come up to Dublin or down? C. I came up.

老师：你是上都柏林还是下都柏林？考生：我是上都柏林。

T.Why do you call it coming *up* ? C. *thinks, then smiles, then*… We *always* call it coming up to Dublin.

老师：你为何要说上 呢？考生：（思考，之后微笑 ）之后……

我们向来 都说上都柏林的。

T.Well, but you always have a *reason* for what you do…what is your reason here? C. *is silent* .

老师：可是，人做什么事情，总是有这么做的理由 的。你这么说有什么理由呢？（考生沉默 。 ）

T.Come, come, Mr. Brown, I won't believe you don't know; I am sure you have a very good reason for saying you go up to Dublin, not down. C. *thinks, then* …It is the capital.

老师：再想想，再想一想，布朗先生。我不相信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你说上都柏林，而不说下都柏林，肯定是有个好理由的。考生：（思考，之后 ）……那是都城。

T.Very well; now was Persia the capital? C. Yes.

老师：很好。可是，波斯是都城吗？考生：是。

T.Well…no…not exactly…explain yourself; was Persia a city? C. A country.

老师：嗯，不，并不是，你得解释一下。波斯是一座城市吗？考

生：是一个国家。

T.That is right; well, but did you ever hear of Susa? *Now* , why did they speak of going *up* to Persia? C. *is silent* .

老师：对了。可是，你听说过苏萨吗？听我说，他们为何要说上波斯？（考生沉默 。 ）

T.Because it was the seat of government; that was one reason. Persia was the seat of government; they went up because it was the seat of government. C. Because it was the seat of government.

老师：是因为那是政府所在地。但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波斯是政府所在地。他们要上是因为那是政府所在地。考生：因为那是政府所在地。

T.Now where did they go up from? C. From Greece.

老师：他们从哪里开始上？考生：从希腊。

T.But where did this army assemble? whence did it set out? C. *is silent* .

老师：可是，这支军队在哪里集结？军队从哪里出发？（考生沉

默。）

T.It is mentioned in the first book; where did the troops *rendezvous* ? C. *is silent* .

老师：在第一册里已经提及此事。部队在哪里会合 的？（考生沉默。）

T.Open your book; now turn to Book I., chapter ii.; now tell me. C. Oh, at Sardis.

老师：打开书本。请翻到第一册，第二章，然后告诉我。考生：呵，是在萨迪斯集结的。

T.Very right: at Sardis; now where was Sardis? C. In Asia Minor?…no…It's an island…*a pause, then*… Sardinia.

老师：很好。是在萨迪斯。可是，萨迪斯在哪儿？考生：在小亚细亚吗？呵，不是……那是一座岛屿……停顿，之后……是萨丁尼亚。

T.In Asia Minor; the army set out from Asia Minor, and went on towards Persia; and therefore it is said to go *up* —because… C. *is silent* .

老师：在小亚细亚。军队是从小亚细亚出发的，之后继续前进，到了波斯。因此，人们说那是上。因为……（考生沉默 。 ）

T.Because…Persia… C. Because Persia.

老师：因为……波斯……考生：因为波斯。

T.Of course; because Persia held a sovereignty over Asia Minor. C. Yes.

老师：当然。因为波斯在亚细亚占有一块领土。考生：是啊。

T.Now do you know how and when Persia came to conquer and gain possession of Asia Minor? C. *is silent* .

老师：你是否知道波斯如何以及什么时候攻伐并占领了小亚细亚的呢？（考生沉默 。 ）

T.Was Persia in possession of many countries? C. *is silent* .

老师：波斯占领了很多国家吗？（考生沉默 。 ）

T.Was Persia at the head of an empire? C. *is silent* .

老师：波斯处在一个帝国的最顶端吗？（考生沉默。）

T.Who was Xerxes? C. Oh, Xerxes…yes…Xerxes; he invaded Greece; he flogged the sea.

老师：薛西斯是谁？考生：呵，薛西斯……是啊，……薛西斯。他入侵希腊，他鞭打海洋。

T.Right; he flogged the sea: what sea? C. *is silent* .

老师：对了。他鞭打海洋。哪座海洋？（考生沉默。）

T.Have you read any history of Persia?…what history? C. Grote and Mitford.

老师：你读过波斯史吗？……谁写的历史？考生：是格罗特和米福德。

T.Well, now, Mr. Brown, you can name some other reason why the Greeks spoke of going up to Persia? Do we talk of going *up* or *down* from the sea-coast? C. Up.

老师：嗯。现在，布朗先生，你能不能说出一些理由，为什么希

腊人谈到要上到波斯去？如果从海岸出发，我们是说上还是下？考生：上。

T.That is right; well, going from Asia Minor, would you go from the sea, or towards it? C. From.

老师：正确。嗯，从小亚细亚出发，我们是从海边出发呢还是朝向大海？考生：从海边出发。

T.What countries would you pass, going from the coast of Asia Minor to Persia?…mention any of them. C. *is silent* .

老师：从小亚细亚的海岸出发到达波斯，我们会经过哪些国家呢？……随便提一个国家。（考生沉默 。 ）

T.What do you mean by Asia *Minor* ?…why called Minor?…how does it lie? C. *is silent* .

老师：你说的小亚细亚指什么？……为什么叫小亚细亚？它在什么位置？（考生沉默 。 ）

Etc., etc.

如此等等。

3 .

3 .

I have drawn out this specimen at the risk of wearying the reader; but I have wished to bring out clearly what it really is which an Entrance Examination should aim at and require in its students. This young man had read the Anabasis, and had some general idea what the word meant; but he had no accurate knowledge how the word came to have its meaning, or of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implied in it. This being the case, it was useless, or rather hurtful, for a boy like him to amuse himself with running through Grote's many volumes, or to cast his eye over Matthiæ's minute criticisms. Indeed, this seems to have been Mr. Brown's stumbling-block; he began by saying that he had read Demosthenes, Virgil, Juvenal, and I do not know how many other authors. Nothing is more common in an age like this, when books abound, than to fancy that the gratification of a love of reading is real study. Of course there are youths who shrink even from story books, and cannot be coaxed into getting through a tale of romance. Such Mr. Brown was not; but there are others, and I suppose he was in their number, who certainly have a taste for reading, but in whom it is little more than the result of mental restlessness and curiosity. Such minds cannot fix their gaze on one object for two seconds together; the very impulse which leads them to read at all, leads them to read on, and never to stay or hang over any one idea. The pleasurable excitement of reading what is new is their motive principle; and the imagination that they are doing something, and the boyish vanity which accompanies it, are their reward. Such youths often profess

to like poetry, or to like history or biography; they are fond of lectures on certain of the physical sciences; or they may possibly have a real and true taste for natural history or other cognate subjects;—and so far they may be regarded with satisfact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profess that they do not like logic, they do not like algebra, they have no taste for mathematics; which only means that they do not like application, they do not like attention, they shrink from the effort and labour of thinking, and the process of true intellectual gymnastics. The consequence will be that, when they grow up, they may, if it so happen, be agreeable in conversation, they may be well informed in this or that department of knowledge, they may be what is called literary; but they will have no consistency, steadiness, or perseverance;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make a telling speech, or to write a good letter, or to fling in debate a smart antagonist, unless so far as, now and then, mother-wit supplies a sudden capacity, which cannot be ordinarily counted on. They cannot state an argument or a question, or take a clear survey of a whole transaction, or give sensible and appropriate advice under difficulties, or do any of those things which inspire confidence and gain influence, which raise a man in life, and make him useful to his religion or his country.

我拿出这个样本来，是冒了使读者困倦的风险的。可是，我原本的意思是想清晰说明，大学入学考试到底应当有什么样的目标，并要求学生做到什么。这位年轻人已经看过《远征记》，也明白这个词大致是什么意思。可是，这个词为何有现在这层意思，他并没有准确的知识，他也不知道里面包括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既然是这么一种情况，如果让类似的孩子们去遍览格罗特的那么多卷历史著作找乐子，或者让他们去仔细研究马蒂亚无微不至的批评，那是没有用处的，甚至是有害的。的确，这看来正是布朗先生的绊脚石。开始的时候，他说曾读过德摩斯梯尼、维吉尔、尤维纳利斯，我还不知道他都看过其

他哪些人的著作。在我们这个时代，书籍这么多，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比想象阅读之乐即真正的研究更常见的了。当然，甚至有些年轻人连故事书都懒得去读了，谁也无法哄他们去读完一本传奇故事。布朗先生并非这样的人，可是，还有其他一些人会是这样的。我假定，他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有一些阅读品味，但那只不过是心情烦燥或好奇心的结果而已。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一个对象的关注不会超过两秒钟，引导他们阅读的那种冲动，同样会引导他们继续读下去，他们不会在任何一个概念上停留很长时间。阅读新奇的东西是很让人愉快的，这就是他们愿意看书的主要原因。他们得到的回报，就是他们正在忙于某些事情的想象，以及伴随这想象的孩子气般的虚荣。这样的年轻人常常号称喜爱诗歌，或者喜爱历史及自传。他们喜欢听某一类物理科学讲座。他们也可能对自然史或其他同类学科产生真实而非虚假的兴趣，就此而言，他们还是可以被看作令人满意的一代人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宣称自己并不喜欢逻辑，他们不喜欢代数，他们对数学全无兴趣。可是，这只能表明他们并不喜欢应用科学，他们不喜欢专注于什么东西，他们面对思考的麻烦和艰辛时会退缩，根本不喜欢真正的智性锤炼。后果可能是这样的：等他们长大以后，可能在谈话中逗人喜爱，他们在知识的这一那一门类里相当娴熟，也许可以称作精通文学。可是，他们缺乏的却是始终一贯、稳定可靠或坚持不懈的精神。他们无法进行真才实学的演讲，写不好一封信，在辩论中无法驳倒聪明的对手，除非他们有天赋智力可使人急中生智，但这样的天赋智力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们无法说清楚一个论证或一个问题，也无法把整个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遇到困难也拿不出明智或适当的办法。但凡能激发人的自信心并获得影响力的事情，他们都做不好，而这恰巧就是在生活中培育一个人并使他成为对宗教或国家有用的人的良机。

And now, having instanced what I mean by the *want* of accuracy, and stated the results in which I think it issues, I proceed to sketch, by way of contrast, an examination which displays a student, who, whatever may be his proficiency, at least knows what

he is about, and has tried to master what he has read. I am far from saying that every candidate for admission must come up to its standard:—

我刚才把缺乏精确性的意思举例说明清楚了，并说明我觉得这样可能导致的后果，现在，我想通过对照方法进而描述另外一种考试，它能检验一位学生的能力。无论他处在何种水平上，至少他知道自己准备干什么，并且尝试过要掌握已经阅读过的东西就行。我根本不想说，所有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达到这个标准。

T.I think you have named Cicero's Letters ad Familiares, Mr. Black? Open, if you please, at Book xi., Epistle 29, and begin reading.

老师：你刚刚提到过西塞罗的“书信集，”是吗，布莱克先生？请打开第十四册，第二十九封信，并开始阅读。

C.reads.

考生：阅读。

Cicero Appio salutem.

‘Cicero Appio salutem.

Dubitanti mihi (quod scit Atticus noster), de hoc toto consilio profectionis, quod in utramque partem in mentem multa veniebant, magnum pondus accessit ad tollendam dubitationem, judicium et consilium tuum.

Dubitanti mihi (quod scit Atticus noster), de hoc toto consilio profectionis, quod in utramque partem in mentem multa veniebant, magnum pondus accessit ad tollendam dubitationem, judicium et consilium tuum.

Nam et scripsisti aperte, quid tibi videretur; et Atticus ad me sermonem tuum pertulit.

Nam et scripsisti aperte, quid tibi videretur; et Atticus ad me sermonem tuum pertulit.

Semper judicavi, in te, et in capiendo consilio prudentiam summam esse, et in dando fidem; maximeque sum expertus, cùm, initio civilis belli, per literas te consuluissem quid mihi faciendum esse censeres; eundumne ad Pompeium an manendum in Italiâ.

Semper judicavi, in te, et in capiendo consilio prudentiam summam esse, et in dando fidem; maximeque sum expertus, cum, initio civilis belli, per literas te consuluissem quid mihi faciendum esse censeres; eundumne ad Pompeium an manendum in Italiâ.’

T.Very well, stop there; Now construe. C. *Cicero Appio salutem* …Cicero greets Appius.

老师：很好，请停下来。现在，请翻译。考生：‘Cicero Appio salutem…’西塞罗跟阿庇乌斯打招呼。

T.“Greets Appius.” True; but it sounds stiff in English, doesn't it? What is the real English of it? C. “My dear Appius?“…

老师：“跟阿庇乌斯打招呼。”是的，但在英语里面听起来十分生硬，不是吗？地道的英语应当怎么说？考生：“亲爱的阿庇乌斯？”

T.That will do; go on. C. *Dubitanti mihi, quod scit Atticus noster* , While I was hesitating, as our friend Atticus knows…

老师：算是这样吧。请继续。考生：‘Dubitanti mihi, quod scit Atticus noster,’虽然我有些犹豫，正如我们的朋友阿庇乌斯所了解的……

T. That is right. C. *De hoc toto consilio profectionis* , about the whole plan…entire project…*de hoc toto consilio profectionis* …on the subject of my proposed journey…on my proposed journey altogether.

老师：不错。考生：‘De hoc toto consilio profectionis,’关于这整

个计划……完整的计划……‘de hoc toto consilio profectionis’……就我所提议的这个旅行的话题……就我所说的一起旅行的事情。

T. Never mind; go on; any of them will do. C. *Quod in utramque partem in mentem multa veniebant,* in as much as many considerations both for and against it came into my mind, *magnum pondus accessit ad tollendam dubitationem,* it came with great force to remove my hesitation.

老师：没关系。请继续。随便哪一个说法都行。考生：‘Quod in utramque partem in mentem multa veniebant’，此事有利和不利的诸多方面的考虑进入我的脑海，‘magnum pondus accessit ad tollendam dubitationem,’结果让我鼓起极大勇气打消了犹豫。

T. What do you mean by *accessit* ? C. It means it contributed to turn the scale; *accessit* , it was an addition to one side.

老师：你说的‘accessit’是什么意思？考生：意思是指它有助于扭转形势；‘accessit’，它是往一边加上了某种东西。

T. Well, it may mean so, but the words run, *ad tollendam dubitationem* . C. It was a great…it was a powerful help toward removing my hesitation…no…this was a powerful help, viz., your judgment and advice.

老师：嗯，可以是这意思，但是，后面还有其他的词。‘ad

tollendam dubitationem’。考生：它是很大的一股力量……它是极大的帮助，使我放弃了犹豫……不……这是相当大的帮助，即您的判断和建议。

T . Well, wha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pondus* and *judicium* ? *C* . Your advice came as a great weight.

老师：嗯，‘pondus’和‘judicium’怎样造成句子的？考生：您的建议很有份量。

T.Very well, go on. C. *Nam et scripsisti aperte quid tibi videretur;* for you distinctly wrote your opinion.

老师：很好，请继续。考生：‘Nam et scripsisti aperte quid tibi videretur；’因为您把意思写得非常清楚了。

T.Now, what is the force of *nam* ? C. pauses; then, It refers to *accessit* …it is an explanation of the fact, that Appius's opinion was a help.

老师：‘nam’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考生：停顿。之后，它指‘accessit’……是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即阿庇乌斯的意见帮助极大。

T.*Et* ; you omitted *et* …*et scripsisti.* C. It is one of two *ets* ; *et scripsisti, et Atticus.*

老师：还有‘et’，你忽略了‘et…… et scripsisti’。考生：它是两个‘et’当中的一个。‘et scripsisti’，‘et Atticus’。

T.Well, but why don't you construe it? C. *Et scripsisti,* you both distinctly…

老师：是啊，但你为什么没有翻译这个词？考生：‘Et scripsisti’，你们两位都明确地……

T.No; tell me, why did you leave it out? had you a reason? C. I thought it was only the Latin style, to dress the sentence, to make it antithetical; and was not English.

老师：不。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留下它不译呢？有什么原因吗？考生：我觉得那只不过是拉丁语的风格而已，为了强调句子，让它更地道一些，但并非英语中的风格。

T.Very good, still, you can express it; try. C. Also, with the second clause?

老师：很好，但你仍然可以表达出来的，试一试。考生：另外，是第二个从句吗？

T.That is right, go on. C. *Nam et,* for you distinctly stated in

writing your opinion, *et Atticus ad me sermonem tuum pertulit,* and Atticus too sent me word of what you said…of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conversation.

老师：的是，请继续。考生：‘Nam et，’因为您在信中明确地表达了您的意见，‘et Atticus ad me sermonem tuum pertulit，’而阿迪卡斯也将您所说的意思告诉我了，也就是您跟他谈话时表达的意思。

T.*Pertulit.* C. It means that Atticus conveyed on to Cicero the conversation he had with Appius.

老师：‘Pertulit’。考生：这意思是说，阿迪卡斯将他与阿庇乌斯谈话的内容告诉西塞罗了。

T.Who was Atticus? C. is silent.

老师：阿迪卡斯是谁？（考生沉默。）

T.Who was Atticus? C. I didn't think it came into the examination…

老师：谁是阿迪卡斯？考生：我没有想到这也会考试……

T.Well, I didn't say it did: but still you can tell me who Atticus

was. C. A great friend of Cicero's.

老师：嗯，我并没有说这是考试内容。可是，你不妨告诉我阿迪卡斯是谁。考生：是西塞罗的挚友。

T.Did he take much part in politics? C. No.

老师：他很热衷于政治活动吗？考生：不。

T.What were his opinions? C. He was an Epicurean.

老师：他都有哪些观点？考生：他是伊壁鸠鲁派。

T.What was an Epicurean? C. is silent, then, Epicureans lived for themselves.

老师：什么叫伊壁鸠鲁派？（考生沉默。）之后说：伊壁鸠鲁派的人为自己而活。

T.You are answering very well, sir; proceed. C. *Semper judicavi,* I have ever considered, *in te, et in capiendo consilio prudentiam summam esse, et in dando fidem;* that your wisdom was of the highest order…that you had the greatest wisdom…that nothing could exceed the wisdom of your resolves, or the honesty of your advice.

老师：回答得很好，先生。请继续。考生：‘Semper judicavi，’我曾考虑过，‘in te, et in capiendo consilio prudentiam summam esse, et in dando fidem；’您的智慧属于一流……您有最高的智慧……您的决定，或您的建议中的诚信，什么东西都无法超越。

T.*Fidem* . C. It means faithfulness to the person asking… *maximeque sum expertus,* and I had a great proof of it…

老师：‘Fidem’。考生：意思是指对提问者的诚实……‘maximeque sum expertus’，而且我有证明此事的极好证据……

T.Great; why don't you say *greatest* ? *maxime* is superlative. C. The Latins use the superlative, when they only mean the positive.

老师：很好。你为何要说“极好”？‘maxime’可是最高级。考生：拉丁语是用了最高级，但其实际意思不过是指肯定。

T. You mean, when English uses the positive; can you give me an instance of what you mean? C. Cicero always speaks of others as *amplissimi, optimi, doctissimi, clarissimi* .

老师：你意思是说，当英语用肯定句的时候。你能举例说明你的意思吗？考生：西塞罗提到别人时，总是用‘amplissimi’，‘ optimi’，‘ doctissimi’，‘ clarissimi’。

T.Do they ever use the comparative for the positive? C. thinks, then, *Certior factus sum* .

老师：他们会用比较级来代替肯定句吗？考生先进行了思考，之后说：‘Certior factus sum’。

T.Well, perhaps; however, here, *maxime* may mean *special* , may it not? C. And I had a special proof of it, *cùm, initio civilis belli, per literas te consuluissem,* when, on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ivil war, I had written to ask your advice, *quid mihi faciendum esse censeres,* what you thought I ought to do, *eundumne ad Pompeium, an manendum in Italiâ,* to go to Pompey, or to remain in Italy.

老师：嗯，也许吧。但是，在这里，‘maxime’也许意指特别，不是吗？考生：对此我有特别的证据，‘cum, initio civilis belli, per literas te consuluissem，’内战开始的时候，当我必须要写信征求您的意见，‘quid mihi faciendum esse censeres，’想知道您觉得我应当做什么事情，‘undumne ad Pompeium, an manendum in Italiâ，’到底应当去庞培还是留在意大利。

T.Very well, now stop. *Dubitanti mihi, quod scit Atticus noster.* You construed *quod* , as. C. I meant the relative as.

老师：很好，现在请停下来。‘Dubitanti mihi, quod scit Atticus noster.’你将‘quod’翻译成了as。考生：我指的是关系词as。

T.Is as a relative? C. As is used in English for the relative, as when we say *such as* for *those who* .

老师：as是关系词吗？考生：在英语里，as可用作关系词，比如当我们用such as来表示those who（那些……的人）。

T.Well, but why do you use it here? What is the antecedent to *quod* ? C. The sentence *Dubitanti mihi* , etc.

老师：嗯，但你为何在这里用这个词呢？‘quod’这个词的先导成分是什么？考生：就是‘Dubitanti mihi’等的那个句子。

T.Still, construe *quod* literally. C. A thing which.

老师：好吧，你照‘quod’的字面意思翻译一下。考生：某种……的东西。

T.Where is a thing? C. It is understood.

老师：“东西”在哪儿？考生：是理解出来的意思。

T.Well, but put it in. C. *Illud quod.*

老师：嗯，你还是加进去吧。考生：‘Illud quod’。

T.Is that right? what is the common phrase? C. is silent.

老师：这样对吗？常用的词语是哪一个？（考生沉默。）

T.Did you ever see *illud quod* in that position? is it the phrase? C. is silent.

老师：你见过‘illud quod’会放在这个位置的吗？是这个词语吗？（考生沉默。）

T.It is commonly *id quod,* isn't it? id quod. C. Oh, I recollect, *id quod.*

老师：一般是用‘id quod’，不是吗？‘id quod’。考生：呵，我想起来了，是‘id quod’。

T.Well, which is more common, *quod,* or *id quod,* when the sentence is the antecedent? C. I think *id quod.*

老师：嗯，当一个句子起先导作用的时候，哪个词更常见？‘Quod’还是‘id quod’？考生：我觉得是‘id quod’。

T.At least it is far more distinct; yes, I think it is more common. What could you put instead of it? C. *Quod quidem.*

老师：至少这会明确得多。是的，我也觉得这个词语更常见。要是不用这个词语，你可以用哪一个代替？考生：‘Quod quidem’。

T.Now, *dubitanti mihi* ; what is *mihi* governed by? C. *Accessit* .

老师：现在，‘dubitanti mihi, mihi’受哪个词支配？考生：‘Accessit’。

T.No; hardly. C. is silent.

老师：不，根本不是。（考生沉默。）

T.Does *accessit* govern the dative? C. I thought it did.

老师：‘accessit’会支配与格词吗？考生：我以为它会。

T.Well, it may; but would Cicero use the dative after it? what is the more common practice with words of motion? Do you say, *Venit mihi* , he came to me? C. No, *Venit ad* me;—I recollect.

老师：嗯，有时候可以，但是，西塞罗会在这个词后面使用与格吗？对于表示动作的词，更常见的做法是什么？你会说‘Venit mihi’，他到我这里来吗？考生：不，应当是‘Venit ad me’；我想起来了。

T.That is right; *venit ad me* . Now, for instance, *incumbo:* what case does *incumbo* govern? C. *Incumbite remis* ?

老师：对了，应当是‘Venit ad me’。举个例子，‘incumbo’，这个词支配的是什么格？考生：是‘Incumbite remis’吗？

T.Where is that? in Cicero? C. No, in Virgil. Cicero uses “in”; I recollect, *incumbere in opus…ad opus* .

老师：这是哪里来的一句话，是西塞罗著作里面的吗？考生：不，是维吉尔作品里面的。西塞罗用的是‘in’，我想起来了，应当是‘incumbere in opus… ad opus’。

T.Well, then, is this *mihi* governed by *accessit* ? what comes after *accessit* ? C. I see; it is, *accessit ad tollendam dubitationem* .

老师：嗯，这个‘mihi’是受‘accessit’支配吗？‘accessit’后面应当接什么？考生：我明白了。应当是‘accessit ad tollendam dubitationem’。

T.That is right; but then, what after all do you do with *mihi* ?

how is it governed? C. is silent.

老师：正确。可是，‘mihi’到底应当怎么用呢？到底如何支配它？（考生沉默。）

T.How is *mihi* governed, if it does not come after *accessit* ? C. pauses, then, *Mihi…mihi* is often used so; and *tibi* and *sibi* : I mean *suo sibi gladio hunc jugulo* ;…*venit mihi in mentem* ; that is, it came into my mind; and so, *accessit mihi ad tollendam* , etc.

老师：假如‘mihi’并不跟在‘accessit’后面，那它应当受到怎样的支配呢？考生停顿了一会儿，之后说：‘Mihi……mihi’经常就是这么用的，而‘tibi，sibi’也是这样，我意思是说，‘suo sibi gladio hunc jugulo，’就是说，它进入了我的脑海，因此，‘accessit mihi ad tollendam,’等等。

T.That is very right. C. I recollect somewhere in Horace, *vellunt tibi barbam* .

老师：很好。考生：我想起来了，在贺拉斯著作的某个地方，就有‘vellunt tibi barbam’一说。

Etc., etc.

如此等等。

4．

4．

And now, my patient reader, I suspect you have had enough of me on this subject; and the best I can expect from you is, that you will say: “His first pages had some amusement in them, but he is dullish towards the end.” Perhaps so; but then you must kindly bear in mind that the latter part is about a steady careful youth, and the earlier part is not; and that goodness, exactness, and diligence, and the correct and the unexceptionable, though vastly more desirable than their contraries in fact, are not near so entertaining in fiction.

谢谢各位在这个话题上的耐心，相信大家已经受够了。我能从诸位那里得到的最佳期盼，莫过于听到大家说：“他刚开始的几页还比较好笑，到后来就十分枯燥了。”也许如此吧。可是，恭请各位记住，后面那一部分说的是一位从头到尾都比较细心的青年人，而开始的那部分却不是。可在虚构作品中，这种美德、精准和勤勉，以及虽然较之相反之物事实上更令人满意的正确和无懈可击的东西，却十分罕见。

2. Composition

第二节：作文

1．

1．

I am able to present the reader by anticipation with the correspondence which will pass between Mr. Brown's father and Mr. White, the tutor, on the subject of Mr. Brown's examination for entrance at the University. And, in doing so, let me state the reason why I dwell on what many will think an extreme case, or even a caricature. I do so, because what may be called exaggeration is often the best means of bringing out certain faults of the mind which do indeed exist commonly, if not in that degree. If a master in carriage and deportment wishes to carry home to one of his boys that he slouches, he will caricature the boy himself by way of impressing on the boy's intellect a sort of abstract and typ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ungraceful habit which he wishes corrected. When we once have the simple and perfect ideas of things in our minds, we refer the particular and partial manifestations of them to these types; we recognize what they are, good or bad, as we never did before, and we have a guide set up within us to direct our course by. So it is with principles of taste, good breeding, or of conventional fashion; so it is in the fine arts, in painting, or in music. We cannot even understand the criticism passed on these subjects until we have set up for ourselves the ideal standard of what is admirable and what is absurd.

我可以将布朗先生的父亲与他的老师怀特先生之间，就布朗的大学入学考试这件事情发生的信件往来提供给读者。在这么做的时候，让我把理由说清楚，为什么我反复不断地述说许多人也许会觉得过份，甚至像是讽刺画的这件事情。我这么做，是因为不妨称作夸大其事的东西，经常就是揭示某种思想缺陷的最佳方法，这些缺陷虽然并没有到达那种严重程度，却的确是经常存在的。如果一位老师想通过

自己的步态和举止让一名学生明白他是个懒散的学生，他会在这个孩子的头脑里留下印象，将其希望予以纠正的不雅习惯抽象和典型地表现出来，从而为这个孩子本身描绘出一幅讽刺漫画。当我们在脑海里形成关于事物的简单和完善的概念之后，就会将这些事物特别和部分的表现指称为这些类型。我们辨别出它们是什么，是好还是坏，而我们以前从来都没有这么做过，我们内心里会竖起一个路标，借以指引我们的前进道路。在品味、良好教养或传统时尚的原则上也是如此，在美术、绘画或音乐中也是如此。除非我们已经在内心里竖立起什么是值得崇敬的，什么是荒唐可笑的事物的理想标准，否则，我们根本都不会明白就这些主题产生的批评。

So is it with the cultivation and discipline of the mind, as it should be conducted at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nd as it manifests itself afterwards in life. Clearness of head, accuracy, scholar like precision, method, and the like, are ideas obvious to point out, and easy to grasp; yet they do not suggest themselves to youths at once, and have to be urged and inflicted upon them. And this is done best by a caricature of their opposites.

心智的培育和训导也是这样的，这是大专院校里应当进行的活动，而且会在学生毕业以后的生活中体现出来。头脑的清晰度、准确性与学者型的精益求精方法等等，都是明显必须指出的概念，也是易于掌握的概念。可年轻人并非一下子就能明白这些道理，因此必须催促他们，给他们灌输这些概念。做到这一点的最佳办法，就是将相反的东西用漫画形式表现出来。

And, as I am now going to continue the caricature by bringing in Mr. Brown's father as well as himself, I have to make a fresh explanation, lest I should seem to imply there are fathers altogether

such as he will prove to be. I do not mean to say there are; yet it may easily happen that many excellent fathers, many even able and thoughtful men, may be found, who in a certain measure are under the bias of that error of which Mr. Brown senior is the typical instance, and who may be led possibly to reconsider some of their views, and in a measure to modify them, if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an exhibition of them in their full dimensions;—and that, in consequence of their being forced to master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on, though the error is never found thus pure and complete in fact, but only in degrees and portions, so that, when represented pure, it is called, and may fairly be called, a caricature. With this explanation of my meaning, and this apology in anticipation, I hope to be able without misconstruction to put before the reader the correspondence of which I have spoken.

鉴于我马上就要介绍布朗先生的父亲及他本人，从而继续画完这幅漫画，因此必须重新解释，以防有人以为我在暗示，真的存在下面将要显示的这类父亲。我并没有说存在这样的父亲；可是，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发生，即许多优秀的父亲，其中许多甚至是有本事和有思想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被发现存在偏见，就是在老布朗先生这个典型的例子中表现出的那种由谬误造成的偏见。假如这些观点是被全盘无遗地展示给他们，这样的父亲会因此而重新思考他们的某些观点，并在某种程度上修正这些观点。由于他们是被迫掌握这种典型表现法的，虽然这种谬误在事实上从来都不是那么纯粹和完全，因而只存在程度与份量上的差别，因此，它在被纯粹地表现出来以后，就被甚至恰当地称为一幅漫画。把我的这层意思解释清楚，并做了预先的辩护以后，我希望能够在不存在误解的情况下，将所说的书信摆在读者面前。

2．

2．

Mr. Brown, junr., to his father.

小布朗先生致其父亲的信：

My dear father,

“敬爱的爸爸，

It seems odd I never was in Dublin before, though we have been now some time in Ireland. Well, I find it a handsomer place than I thought for—really a respectable town. But it is sadly behind the world in many things. Think of its having no Social Science, not even a National Gallery or British Museum! Nor have they any high art here: some good public buildings, but very pagan. The bay is a fine thing.

尽管我们在爱尔兰已经逗留不短的时间了，可是以前从来都没有到过都柏林，这事可真有些奇怪。嗯，我发现都柏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可爱，是一座真正值得尊敬的城市。可是，它在许多方面却可悲地落后于世界。想一想吧，这里竟然没有社会科学，甚至

都没有国家美术馆或大英博物馆！也没有任何高等艺术。虽然有一些很好的公共建筑，但都是异教的建筑。海湾倒是不错的一个地方。

I called with your letter on Mr. Black, who introduced me to the professors, some of whom, judging by their skulls, are clever men.

“我拿着您的信去拜访布莱克先生，他介绍我认识了很多老师，其中一些人，根据他们脑袋的大小，应当是相当聪明的人。

There is a lot here for examination, and an Exhibition is to be given to the best. I should like to get it. Young Black,—you saw him once,—is one of them; I knew him at school; he is a large fellow now, though younger than I am. If he be the best of them, I shall not be much afraid.

“这里有很多东西需要慢慢观察，而且还将有一个极好的展览。这些东西，我乐得一见。小布莱克，您曾见过一次的，他就包括在里面。我在学校里见过他，他现在长得人高马大的了，比我年纪小。假如他是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位，那我就不用太担心了。

Well—in I went yesterday, and was examined. It was such a queer concern. One of the junior

Tutors had me up, and he must be a new hand, he was so uneasy. He gave me the slowest examination! I don't know to this minute what he was at. He first said a word or two, and then was silent. He then asked me why we came up to Dublin, and did not go down; and put some absurd little questions about *Baino* . I was tolerably satisfied with myself, but he gave me no opportunity to show off. He asked me literally nothing; he did not even give me a passage to construe for a long time, and then gave me nothing more than two or three easy sentences. And he kept playing with his paper knife, and saying: 'How are you now, Mr. Brown? Don't be alarmed, Mr. Brown; take your time, Mr. Brown; you know very well, Mr. Brown;' so that I could hardly help laughing. I never was less afraid in my life. It would be wonderful if such an examination could put me out of countenance.

“好吧，言归正传。昨天，我去参加了考试。真是件怪怪的麻烦事。是其中一位较年轻的老师叫我去的，他一定是个新手，看上去很不自然。他考我的时间最长！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一开始他说了几句话，之后就不出声了。接着他问我为什么是上都柏林，而不是下都柏林，然后就‘Baino’这个词问了一堆荒唐的小问题。我对自己相当满意，因此强忍下去，可他没有给我表现的机会。他差不多没有问我任何实际的问题。他甚至都没有让我有时间翻译很长的原话，之后就给了我两三个很容易的句子。他不停地玩弄着裁纸刀，说：‘您现在感觉如何，布朗

先生？不要惊慌，布朗先生。慢慢来，布朗先生。你了解不少东西，布朗先生。’如此等等，我都忍不住想笑。我以前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无所畏惧。如果这样的考试让人脸色大变，那可真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

There's a lot of things which I know very well, which the Examiner said not a word about. Indeed, I think I have been getting up a great many things for nothing;—provoking enough. I had read a good deal of Grote; but though I told him so, he did not ask me one question in it; and there's Whewell, Macaulay, and Schlegel, all thrown away.

“有很多事情我十分熟悉，可那位考官却一个字也没有提。的确，我觉得不花什么代价就得到了好多东西——这可真是让人气恼的事情啊。我看了很多格罗特的书，不过，虽然我对他说了，他却没有就此提出任何问题。还有休厄尔、麦考雷和施莱格尔，这些人都被他抛到一边去了。

He has not said a word yet where I am to be lodged. He looked quite confused when I asked him. He is, I suspect, a *character* .

“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要将我安排到什么地方去。我问他的时候，他好像十分困惑。我觉得，他可真是个人物。

Your dutiful son, etc.,

您的儿子，

ROBERT.

罗伯特。”

Mr. White to Mr. Brown, sen.

怀特先生致老布朗先生的信：

My dear sir,

“尊敬的先生，

I have to acknowledge the kind letter you sent me by your son, and I am much pleased to find the confidence you express in us. Your son seems an amiable young man, of studious habits, and there is every hope, when he joins us, of his passing his academical career with respectability, and his examination with credit. This is what I should have

expected from his telling me that he had been educated at home under your own paternal eye; indeed, if I do not mistake, you have undertaken the interesting office of instructor yourself.

我得谢谢您托付贵子转来我处的信件，并为您对本校教师给予的信任深表欣慰。贵子似乎是一位可爱的年轻人，学习刻苦，如果能来本校，极有希望以可敬之言行完成学业，并取得优良的学习成绩。我听他说，曾在家里承蒙父亲监督，接受过家庭教育，因此，他有上述表现也不足奇怪。的确，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您本人曾担任过这种有趣的家庭指导的角色。

I hardly know what best to recommend to him at the moment: his reading has been desultory; he knows something about a great many things, of which youths of his age commonly know nothing. Of course we could take him into residence now, if you urge it; but my advice is that he should first direct his efforts to distinct preparation for our examination, and to study its particular character. Our rule is to recommend youths to do a little well, instead of throwing themselves upon a large field of study. I conceive it to be your son's fault of mind not to see exactly the point of things, nor to be so well grounded as he might be. Young men are indeed always wanting in *accuracy* ; this kind of deficiency is not peculiar to him, and he will doubtless soon overcome it when he sets about it.

“目前，我根本不清楚应当给予他怎样的推荐，他的阅读断断续续，他对很多事情都有所了解，但不是很深，其中有很多是他这个年龄段的人通常一无所知的。当然，如果您有迫切要求，我们可以允许他现在就住校入学，但我的建议是，他应当先行努力准备好参加入学考试，并研究入学考试的具体特色。我校惯例是推荐青年学生略有专精，而非投身大型研究领域。我觉得，贵子的思考缺陷是，他没有准确地看到问题的关键，即基础不是很牢固。年轻人当然总是缺乏准确性的，这一类的缺陷并非他独有，如果他着手准备克服这一缺陷，相信一定很快就能成功。

On the whole, then, if you will kindly send him up six months hence he will be more able to profit by our lectures. I will tell him what to read in the meanwhile. Did it depend on me, I should send him for that time to a good school or college, or I could find you a private Tutor for him.

“整体而论，如果烦劳您六个月后再送他来本校听课，他一定会受益不浅。这期间，我会告诉他应当看哪些书。假如事情由我决定，我会送他去一所很好的中学或学院度过这段时期，我还可以为他找一位私人辅导教师。

I am, etc.

此致敬礼。”

Mr. Brown, sen., to Mr. White.

老布朗先生致怀特先生的信：

Sir,

“怀特先生好，

Your letter, which I have received by this morning's post, is gratifying to a parent's feelings, so far as it bears witness to the impression which my son's amiableness and steadiness have made on you. He is indeed a most exemplary lad: fathers are partial, and their word about their children is commonly not to be taken; but I flatter myself that the present case is an exception to the rule; for, if ever there was a well-conducted youth, it is my dear son. He is certainly very clever; and a closer student, and, for his age, of more extensive reading and sounder judgment, does not exist.

今天一早接到您的来信，令一位家长的情感需求得到些许满足，因为您证明我儿子确实给您留下活泼可爱及言行可靠的印象。他的确是一个值得仿效的好

孩子。当父亲的总是偏爱自己的孩子，他们关于孩子的话一般并不可全信。但是，让我深感欣慰的是，当前这个例子恰好是个例外，不适用于上述规则。因为，假如哪里有一个言行中规中矩的青年人，那就是我亲爱的儿子。他当然十分聪明，以他这个年龄，要论更广泛的阅读和更牢靠的判断力，没有哪个比他更像好学生。

With this conviction, you will excuse me if I say that there were portions of your letter which I could not reconcile with that part of it to which I have been alluding. You say he is 'a young man of *studious habits* ,' having '*every hope* of passing his academical career with respectability, and *his examination with credit* ;' you allow that 'he knows something about a *great many things* , of which youths of his age commonly *know nothing* :' no common commendation, I consider; yet, in spite of this, you recommend, though you do not exact, as a complete disarrangement of my plans (for I do not know how long my duties will keep me in Ireland), a postponement of his coming into residence for six months.

“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假如我说您来信中的某些内容，与我刚刚提到的关于我儿子的某些品质有所不符，还请您多多原谅。您说他是一个‘学习刻苦’的年轻人，‘极有希望以可敬之言行完成学业，并取得优良的学习成绩。’您还说‘他对很多事情都有所了解，但不是很深，其中有很多是他这个年龄段的人

通常一无所知的。’就我所知，这可不是一般的赞扬。可是，尽管如此，哪怕您没有明说，却还是推荐让他推迟六个月再入学，这就使我的计划完全乱套了（因为我并不知道自己在爱尔兰的公事会持续多久）。

Will you allow me to suggest an explanation of this inconsistency? It is found in your confession that the examination is of a 'particular character.' Of course it is very right in the governors of a great Institution to be 'particular,' and it is not for me to argue with them. Nevertheless, I cannot help saying, that at this day nothing is so much wanted in education as *general* knowledge. This alone will fit a youth *for the world* . In a less stirring time, it may be well enough to delay in particularities, and to trifle over minutiæ; but the world will not stand still for us, and, unless we are up to its requisitions, we shall find ourselves thrown out of the contest. A man must have *something in him* now, to make his way; and the sooner we understand this, the better.

“这样一种矛盾之处，能否允许我本人略加解释？现在发现，在您这门职业中，对能力的考查强调某种‘具体特色’。一所极好的学术机构的管理者强调‘特色’固然不错，我也不便与之争论。可是，我还是禁不住想说，当今社会，人们迫切需要的正是普遍知识的教育。光是这一条便会使年轻人适合于未来世界。在一个较少动荡的时代，因特性培育而延迟并在细微末节之处多费些时间本无大碍，但这个世界并不

会因为我们而停顿下来，而且，除非我们满足这个世界的需求，不然就会发现自己在这场竞赛中被淘汰。如今，一个人肚子里总得装点什么东西，这样才能有所成就，这一点，我们越早明白越好。

It mortified me, I confess, to hear from my son, that you did not try him in a greater number of subjects, in handling which he would probably have changed your opinion of him. He has a good memory, and a great talent for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especially constitutional and parliamentary; another favourite study with him is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He has read Pritchard's Physical History, Cardinal Wiseman's Lectures on Science, Bacon's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Macaulay, and Hallam: I never met with a faster reader. I have let him attend, in England, some of the most talented lecturers in chemistry, geology, and comparative anatomy, and he sees the Quarterly Reviews and the best Magazines, as a matter of course. Yet on these matters not a word of examination!

“根据我儿子的说法，你们并没有在许多科目上对他进行考试，不然的话，他本可能会改变您对他的看法的，对此，我承认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记忆力很好，在古代和现代史的研究上特别有天赋，尤其是宪政史和议会史。另一项他很喜欢的研究就是历史的哲学。他读过普里查德的《自然史》、怀斯曼枢机主教的《科学演讲集》、培根的《广学论》、麦考雷和哈

勒姆的著作。我从来没有见过阅读速度更快的人。我让他去听过英国一些最有天赋的学者的演讲，涉及化学、地理学和比较解剖学，他以各类季刊评论和最优秀的一批杂志为日常阅读材料。可是，在这些事情上面，学校竟然没有考查过一个字！

I have forgotten to mention, he has a very pretty idea of poetical composition: I enclose a fragment which I have found on his table, as well as one of his prose Essays.

“我还忘了提及，他对诗歌创作也有相当清晰的概念。特将在他书桌上找到的一小段诗歌和一篇散文附于信后。

Allow me, as a warm friend of your undertaking, to suggest, that the *substance* of knowledge is far more valuable than its *technicalities* ; and that the vigour of the youthful mind is but *wasted* on *barren* learning, and its ardour is *quenched* in *dry* disquisition.

“作为您所从事的事业的一名热心友人，请允许我提出这样一条建议：知识的实质远较其术语更有价值，年轻人的活力会浪费于空洞的学问，其热情会被枯燥无味的研究所扑灭。

I have the honour to be, etc.

此致敬礼。”

On the receipt of this letter, Mr. White will find, to his dissatisfaction, that he has not advanced one hair's breadth in bringing home to Mr. Brown's father the real state of the case, and has done no more than present himself as a mark for certain commonplaces, very true, but very inappropriate to the matter in hand. Filled with this disappointing thought, for a while he will not inspect the enclosures of Mr. Brown's letter, being his son's attempts at composition. At length he opens them, and reads as follows:

接到这封信后，怀特先生十分不快地发现，他本想让布朗先生的父亲意识到事情的真实状态，结果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进展，反倒是让自己看上去像典型的平庸之人，事情的确如此，可对于手头这件事情却非常不合适。由于内心里有了这么一个不开心的念头，因此有一阵子，他连布朗先生的附件都懒得翻开看，而那附件是他儿子写诗作赋的成果。他终于还是翻开了那个附件，并看到下面的内容。

Mr. Brown's poetry.

布朗先生写的诗。

THE TAKING OF SEBASTOPOL [6_1]

攻占塞巴斯托波城 [7_1]

Oh, might I flee to Araby the blest,

呵，但愿我能逃往阿拉比那福地，

The world forgetting, but its gifts possessed,

世人健忘，却迷醉于它的天赐厚礼，

Where fair-eyed peace holds sway from shore to shore,

魅眼的和平从东岸铺展至西岸，

And war's shrill clarion frights the air no more.

战争的尖锐号角不再惊骇人寰。

Heard ye the cloud-compelling blast [6_2] awake

尔等可曾听到那催云的爆炸轰隆 [7_2]

The slumbers of the inhospitable lake? [6_3]

惊扰那荒凉的沉湖美妙的睡梦？ [7_3]

Saw ye the banner in its pride unfold

尔等可看见那高傲的旗帜迎风招展，

The blush of crimson and the blaze of gold?

恰似深红的娇羞还有那金色的火焰？

Raglan and St. Arnaud, in high command,

拉格兰和圣阿诺尔德指挥千军万马，

Have steamed from old Byzantium's hoary strand;

离开拜占廷古旧破落之地前来争霸；

The famed Cyanean rocks presaged their fight,

那闻名遐迩的库阿涅山岩早有预见，

Twin giants, with the astonished Muscovite.

两位巨人要来对阵惊愕的莫斯科人。

So the loved maid, in Syria's balmy noon,

而在叙利亚香熏的正午那可爱的女仆，

Forebodes the coming of the hot simoon,

隐约感知那火热的西蒙风已踏上征途，

And sighs… And longs…

就叹气……就渴望……

And dimly traces…

就模糊地回忆……

Mr. Brown's prose.

布朗先生的散文：

FORTES FORTUNA ADJUVAT.

运气惠顾勇敢者

Of all the uncertain and capricious powers which rule our earthly destiny, fortune is the chief. Who has not heard of the poor being raised up, and the rich being laid low? Alexander the Great said he envied Diogenes in his tub, because Diogenes could have nothing less. We need not go far for an instance of fortune. Who was so great as Nicholas, the Czar of all the Russias, a year ago, and now he is 'fallen, fallen from his high estate, without a friend to grace his obsequies.' [6_4] The Turks are the finest specimen of the human race, yet they, too, have experienced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Horace says that we should wrap ourselves in our virtue, when fortune changes. Napoleon, too, shows us how little we can rely on fortune; but his faults, great as they were, are being redeemed by his nephew, Louis Napoleon, who has shown himself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expected, though he has never explained how he came to swear to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n mounted the imperial throne.

“主宰人世天命的诸多不确定和反复无常的强力中，运气处在首位。谁没听说过赤贫者却荣耀风光，富贵者最终流落街头的故事？亚历山大一世曾说，他很是羡慕浴盆里的第欧根尼，因为第欧根尼除此之外身无分文。要找出运气捉弄人的例子，我们并不需要走得太远。一年之前，有谁的能耐大得过尼古拉斯呢？他是俄国最了不起的沙皇。可如今，他‘从权力宝座上跌落，死后竟然没有一位友人出席葬礼。’[7_4] 土耳其人是人类种族中的优秀榜样，可是，他们同样也经历了命运的沉浮。贺拉斯说，命运改变了，我们还是应当以德行武装自己。拿破仑也是一样，他让我们明白，人决不可依赖运气。可是，尽管他也有很多缺陷，但这些缺陷却因为他的侄子路易·拿破仑而得以弥补。路易·拿破仑证明自己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尽管他从来都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对着宪章起誓，然后又坐上了皇帝御座。

From all this it appears, that we should rely on fortune only while it remains,—recollecting the words of the thesis, 'Fortes fortuna adjuvat;' and that, above all, we should ever cultivate those virtues which will never fail us, and which are a sure basis of respectability, and will profit us here and hereafter.

“根据这些例子似乎可以看出，只有运气尚在时，我们才应当依赖它，这让我们想起‘运气惠顾勇敢者’的论点。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应当培养出永远不会让我们失败的美德，而美德才是言行可敬的真

正基础，并且会令我们在此生和来世都受益不尽。”

On reading these compositions over, Mr. White will take to musing; then he will reflect that he may as well spare himself the trouble of arguing with a correspondent, whose principle and standard of judgment is so different from his own; and so he will write a civil letter back to Mr. Brown, enclosing the two papers.

看完这些诗作和文章后，怀特先生陷入沉思。之后，他想到自己不妨省却与一位信件来往者起争执的麻烦，因为这人的判断原则和标准与自己的不同。因此，他决定写一封有礼貌的回信给布朗先生，并将那两篇文章也随附在信里。

3．

3．

Mr. Brown, however, has not the resignation of Mr. White; and, on his Dublin friend, Mr. Black, paying him a visit, he will open his mind to him; and I am going to tell the reader all that will pass between the two.

可是，布朗先生却没有怀特先生那种退避三舍的意思。他要造访他的都柏林友人布莱克先生，并在见面时向他开诚布公地谈及此事。我会将两人见面后发生的事情告知各位。

Mr. Black is a man of education and of judgment. He know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how and substance; he is penetrated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 that buildings will not stand without foundations, and that, if boys are to be taught well, they must be taught slowly, and step by step. Moreover, he thinks in his secret heart that his own son Harry, whose acquaintance we have already formed, is worth a dozen young Browns. To him, then, not quite an impartial judge, Mr. Brown unbosoms his dissatisfaction, presenting to him his son's Theme as an *experimentum crucis* between him and Mr. White. Mr. Black reads it through once, and then a second time; and then he observes—

布莱克先生是受过教育的人，判断能力也不错。他明白表演与实质之间的差别。他深信罗马不是一天之内建起来的，高楼大厦没有基础便建不起来。他相信，要好好教育儿童，就是要一步一步慢慢地教。另外，他内心里也相信，他自己的儿子哈里（我们已经彼此认识了）比小布朗要强上十几倍。这样，布朗先生就向他这位并非完全公正无私的裁判倾诉了心中的不满，并将他儿子的那篇文章当作他与怀特先生之间的决定性实验。布莱克先生看了一遍，然后再看一遍，之后才发话。

“Well, it is only the sort of thing which any boy would write, neither better nor worse. I speak candidly.”

“恕我直言，这只不过是任何一个男孩子都可能会写到的一件事情，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

On Mr. Brown expressing disappointment, inasmuch as the said

Theme is *not* the sort of thing which any boy could write, Mr. Black continues—

布朗先生当然会表示失望，因为那个主题并非任何一个男孩子都会写到的。之后，布莱克先生继续说——

“There's not one word of it upon the thesis; but all boys write in this way.”

“这里面并没有哪一个字提及这个主题，但是，所有男孩子都是这么写的。”

Mr. Brown directs his friend's attention to the knowledge of ancient history which the composition displays, of Alexander and Diogenes; of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to the evident interest which the young author tak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his prompt application of passing events to his purpose; moreover, to the apposite quotation from Dryden, and the reference to Horace;—all proofs of a sharp wit and a literary mind.

布朗先生引导他的友人注意里面提到的古代史知识，比如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比如关于拿破仑的历史知识，还提到这位年轻作者对现代史的明显兴趣，以及他将过往事件即刻应用于写作目的的能力。另外还提到他儿子对德莱顿的恰当引用，以及引用贺拉斯名言的能力。这些都是敏锐智慧和文学天赋的明证。

But Mr. Black is more relentlessly critical than the occasion needs, and more pertinacious than any father can comfortably bear. He proceeds to break the butterfly on the wheel in the following oration:—

但是，布莱克先生无情批评的程度，远远超出这种场合下的必要性，而且他固执己见的态度，远远超出任何一位父亲所能大度容忍的范围。结果他小题大做，发表了下面这通演说。

“Now look here,” he says, “the subject is 'Fortes fortuna adjuvat'; now this is a *proposition* ; it states a certain general principle, and this is just what an ordinary boy would be sure to miss, and Robert does miss it. He goes off at once on the word 'fortuna.' 'Fortuna' was not his subject; the thesis was intended to *guide* him, for his own good; he refuses to be put into leading-strings; he breaks loose, and runs off in his own fashion on the broad field and in wild chase of 'fortune,' instead of closing with a subject, which, as being definite, would have supported him.

> “那就请您看看这儿，”他说。“题目是‘运气惠顾勇敢者’，就是说，这是一个命题。它说的是某种普遍原则，而这正好就是普通男孩子一定会看走眼的地方，可巧罗伯特也看走眼了。”他立即又对“fortuna”这个词开火。“‘Fortuna’并非他的主题，整篇文章意在为他自身利益而引导他。他并不想套上学步带，他挣脱了，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狂奔至空阔处，胡乱地追逐着所谓的‘运气’，而没有扣紧主题，不然的话，由于这主题是意义确定的，他肯定答得很好。

“It would have been very cruel to have told a boy to write on 'fortune'; it would have been like asking him his opinion 'of things in general.' Fortune is 'good,' 'bad,' 'capricious,' 'unexpected,' ten thousand things all at once (you see them all in the Gradus), and one of them as much as the other. Ten thousand things may be said of it: give me *one* of them, and I will write upon it; I cannot write on more than one; Robert prefers to write upon all.

“让一个小孩子以‘运气’为题作文，本来就属狠心之举，因为这无异于请他‘就普遍事物’发表一通看法。运气可以是‘好的’，‘不好的’，‘反复无常的’，‘无法预料的’，这等于是一次谈一万件事情（《词汇进阶》里满是这些词汇），其中一件与另一件差不多。上万件事情都可以说成这样的。给我其中一个，我就可以拿来作文。我不可能就以上的某个主题来写作。罗伯特喜欢一次写很多主题。

“'Fortune favours the bold;' here is a very definite subject: take hold of it, and it will steady and lead you on: you will know in what direction to look. Not one boy in a hundred does avail himself of this assistance; your boy is not solitary in his inaccuracy; all boys are more or less inaccurate, *because* they are boys; boyishness of mind means inaccuracy. Boys cannot deliver a message, or execute an order, or relate an occurrence, without a blunder. They do not rouse up their attention and reflect: they do not like the trouble of it: they cannot look at anything steadily; and, when they attempt to write, off they go in a rigmarole of words, which does them no good, and never would, though they scribbled themes till they wrote their fingers off.

“‘运气惠顾勇敢者。’这本来是相当确定的一个主题，应当抓住它，主题会支撑我们的思路，引导我们思考下去。我们会明白应当朝哪里看。一百名孩子中都很少有一个会利用这个辅助物，你的孩子表现出这种思考的不精确性也绝非偶然，所有孩子多少都有思考不专精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孩子。思想上的孩子气指的就是不专精。孩子们表达一层意思，执行一个命令，或讲述一件事情时，常常会犯错。他们并不愿意唤醒注意力而进行思考，根本都不想费这力气，他们无法专注于某一件具体的事情。当他们决定写什么的时候，直接就搬出一堆冗长的废话来，而这通废话往往并不能帮他们什么忙，永远也不会，尽管他们可以胡写一通，直到手指发酸。

“A really clever youth, especially as his mind opens, is impatient of this defect of mind, even though, as being a youth, he be partially under its influence. He shrinks from a vague subject, as spontaneously as a slovenly mind takes to it; and he will often show at disadvantage, and seem ignorant and stupid, from seeing more and knowing more, and having a clearer perception of things than another has. I recollect once hearing such a young man, in the course of an examination, asked very absurdly what 'his opinion' was of Lord Chatham. Well, this was like asking him his view of 'things in general.' The poor youth stuck, and looked like a fool, though it was not *he* . The examiner, blind to his own absurdity, went on to ask him 'what we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history.' Another silence, and the poor fellow seemed to lookers-on to be done for, when his only fault was that he had better sense than his interrogator.

“一个真正聪明的青年人，尤其是当他的心智打开后，往往不能忍受这种思想缺陷，哪怕作为一个年轻人，他也会部分地受到这缺陷的影响。他回避模糊的主题，不像懒散的人那样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由于他想多看多了解，并对事物有较他人更清晰的感受，因此往往处在不利地位，看起来很无知，很愚蠢。我记得曾听说过这样一位年轻人的故事，就在考试期间，考官突然荒唐地问及他对查塔姆伯爵的‘看法’。可不是嘛，这就相当于问他对‘普遍事物’的看法。这可怜的年轻人卡住了，看上去像个傻瓜，而他实际却不是。那位考官根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一个提问的荒唐，进而又请那个年轻人谈谈‘英国历史的特征’。又没声音了，那可怜的青年人看上去像是在遭人戏弄，而他唯一的错误是，他比那位考官更有头脑而已。

“When I hear such questions put, I admire the tact of the worthy Milnwood in *Old Mortality* , when in a similar predicament. Sergeant Bothwell broke into his house and dining-room in the king's name, and asked him what he thought of the murder of the Archbishop of St. Andrew's; the old man was far too prudent to hazard any opinion of his own, even on a precept of the Decalogue, when a trooper called for it; so he glanced his eye down the Royal Proclamation in the Sergeant's hand, and appropriated its sentiments as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before him. Thereby he was enabled to pronounce the said assassination to be 'savage,' 'treacherous,' 'diabolical,' and 'contrary to the king's peace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subject;' to the edification of all present,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military inquisitor. It was in some such way my young friend got off. His guardian angel reminded him in a whisper that Mr. Grey, his examiner, had himself written a book on Lord

Chatham and his times. This set him up at once; he drew boldly on his knowledge of his man for the political views advanced in it; was at no loss for definite propositions to suit his purpose; recovered his ground, and came off triumphantly."

> "听到所说的这些问题后，我真是佩服《莫顿造反记》所说的那位处在类似窘境中的可敬的米尔恩伍德的机智。军士博斯威尔打着国王的旗号破门而入，径直来到他家厨房，并问他对圣安德鲁斯主教谋杀案有何想法。这位老人相当谨慎，哪怕有摩西十诫的箴言，哪怕有兵士要他讲实话，他也不肯冒险和盘端出自己的意见。因此，他低头瞥了一眼军士手中的皇家通告，并挪用通告里的观点，作为对摆在眼前的这个问题的回答。这样一来，他便能够宣布所谓的暗杀行为是'野蛮的'，'叛国的'，'恶毒的'，'有损国王的秩序及臣民的安宁'，这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深受教诲，前来质询的军士也十分满意。我的这位年轻朋友最后也是以类似方法脱身的。他的守护天使悄悄提醒他说，这位考官格雷先生自己写过一本书，讲的就是查塔姆伯爵及其时代。这就让他立即警觉起来，他大胆利用自己对这个人的了解，陈述了此人的政治见解，拿出一系列确定的主张以达到他的目的，夺回自己的地盘，之后得胜而归。"

Here Mr. Black stops; and Mr. Brown takes advantage of the pause to insinuate that Mr. Black is not himself a disciple of his own philosophy, having travelled some way from his subject;—his friend stands corrected, and retraces his steps.

在这里，布莱克先生停了下来。布朗先生利用这空当暗示说，布莱克先生自身并非他信奉的哲学主张的信徒，因为他自己已经偏离主题。他这位朋友立即认错，之后回到原题。

“The thesis,” he begins again, “is 'Fortune favours the brave;' Robert has gone off with the nominative without waiting for verb and accusative. He might as easily have gone off upon 'brave,' or upon 'favour,' except that 'fortune' comes first. He does not merely ramble from his subject, but he starts from a false point. Nothing could go right after this beginning, for having never gone off his subject (as I did off mine), he never could come back to it. However, at least he might have kept to some subject or other; he might have shown some exactness or consecutiveness in detail; but just the contrary;—observe. He begins by calling fortune 'a power'; let that pass. Next, it is one of the powers 'which rule our earthly destiny,' that is, *fortune* rules *destiny* . Why, where there is fortune, there is no destiny; where there is destiny, there is no fortune. Next, after stating generally that fortune raises or depresses, he proceeds to exemplify: there's Alexander, for instance, and Diogenes,—instances, that is, of what fortune did *not* do, for they died, as they lived, in their respective states of life. Then comes the Emperor Nicholas *hic et nunc* ; with the Turks on the other hand, place and time and case not stated. Then examples are dropped, and we are turned over to poetry, and what we ought to do, according to Horace, when fortune changes. Next, we are brought back to our examples, in order to commence a series of rambles, beginning with Napoleon the First. *Apropos* of Napoleon the First comes in Napoleon the Third; this leads us to observe that the latter has acted 'very differently from what we expected;' and this again to the further remark, that no explanation has yet been given of his getting rid of the Constitution. He then ends by boldly quoting the

thesis, in proof that we may rely on fortune, when we cannot help it; and by giving us advice, sound, but unexpected, to cultivate virtue.”

“作文题目”，他重新开始说，“本来是‘运气惠顾勇敢者，’罗伯特看到主词就跑题了，根本没有等到动词和宾词出场。他本来极可能去大谈‘勇敢’或‘惠顾’的，只不过‘运气’一词刚好在前面而已。他不仅只是跑了题，而且还从一个错误的起点展开议论。开头错，后面便不可能对了，由于始终都没有谈及那个主题（就像我刚才也跑了题一样），他就永远也找不到回头路了。但是，他本来至少还可以保持在这个或那个主题上的，他本来可以详细说明某些细节或保持连续性的，但事实恰好相反，大家看嘛。他一开始就称运气为‘一股力量’，这且不说。接下来，他又说这其中的一股力量‘主宰人世天命’，即是说，运气主宰天命。哎呀，哪里有运气，哪里就不会有天命；哪里有天命，哪里就不会有运气。接下来，在一般性地说明运气会抬人也会压人的话以后，他就着手举例了：例如有亚历山大，还有第欧根尼，就是说，这些都是运气不能够成就事业的例子，因为他们都死掉了，正如他们曾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活过一样。之后就是此时此地的尼古拉斯皇帝的事情了，另外一方面是土耳其人的事，在哪里，什么时代，什么情况下，都没有说明。之后，例子就扔到一边去了，他又带我们去看诗歌，以及当运气改变时，根据贺拉斯的意见我们应当做什么。之后，话题又回到了例子上，目的是开始一系列闲谈，由拿破仑一世开始。说的是拿破仑一世，话题却转向了拿破仑三世，这就引导我们看到，后者的行为‘远超我们的预料’，这又让我们转向另一个话头，而又没有解释他为什么最终放弃宪章。之后

他以冒失地引述那个论点作结，以图证明，假如实在没有办法，我们也许可以依赖运气，并为我们提出合理却未曾预料到忠告：要培育美德。”

“O! Black, it is quite ludicrous”… breaks in Mr. Brown;—this Mr. Brown must be a very good-tempered man, or he would not bear so much:—this is my remark, not Mr. Black's, who will not be interrupted, but only raises his voice: “Now, I know how this Theme was written,” he says, “first one sentence, and then your boy sat thinking, and devouring the end of his pen; presently down went the second, and so on. The rule is, first think, and then write: don't write when you have nothing to say; or, if you do, you will make a mess of it. A thoughtful youth may deliver himself clumsily, he may set down little; but depend upon it, his half sentences will be worth more than the folio sheet of another boy, and an experienced examiner will see it.

“哎呀呀！布莱克，这可真是荒唐……”布朗先生插话了。这位布朗先生一定是位性情温顺的人，不然他不会忍受这么多——但这是我说的话，而不是布朗先生说的，他不喜欢别人打断他的话头，但也只是提高了嗓门。“听我说，我明白这个主题是怎么写的”，他说，“首先是一句话，之后你那孩子便坐下来思考，一边还咬着笔头；之后就下了第二句，然后依次往下写。规则是，先想好，之后才开始写。如果没有什么好说的，那就不要动笔。否则的话，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一团糟。一个头脑清晰的青年也许会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十分笨拙，可能什么也说不清楚；可是，如果依靠清晰的头脑，半句话也可能比另外一个孩子满纸的废话更有价值，而有经验的考官应当看得出来。

“Now, I will prophesy one thing of Robert, unless this fault is

knocked out of him," continues merciless Mr. Black. "When he grows up, and has to make a speech, or write a letter for the papers, he will look out for flowers, full-blown flowers, figures, smart expressions, trite quotations, hackneyed beginnings and endings, pompous circumlocutions, and so on: but the meaning, the sense, the solid sense, the foundation, you may hunt the slipper long enough before you catch it."

"说了半天，除非罗伯特能把这个毛病改掉，否则，我可以就他的未来先说一句话摆在这里，"口无遮拦的布莱克先生继续说，"等他长大以后，如果必须要发表演讲，或者必须要动笔为报纸写文章，他会找来一些鲜花，一些盛开的鲜花、一些比喻、时髦的说法、平庸的引言、陈腐的开头与结尾、浮夸的遁词等等。但是，对于意义、道理、确实的道理、基础，你可能得玩很久的找拖鞋游戏才能真正找到它。"

"Well," says Mr. Brown, a little chafed, "you are a great deal worse than Mr. White; you have missed your vocation: you ought to have been a schoolmaster." Yet he goes home somewhat struck by what his friend has said, and turns it in his mind for some time to come, when he gets there. He is a sensible man at bottom, as well as good-tempered, this Mr. Brown.

"嗯"，已经有点被激怒的布朗先生说，"你比怀特先生糟糕得多。你可真是选错了职业，你本应当去当小学校长的。"可是，回家的路上，他那位朋友说的话还是让他若有所思，回到家后又思索良久。这位布朗先生，他骨子里还是个有理智的人，脾气也不错。

3. Latin Writing

第三节：拉丁文写作

1．

1．

Mr. White, the Tutor, is more and more pleased with young Mr. Black; and, when the latter asks him for some hints for writing Latin, Mr. White takes him into his confidence and lends him a number of his own papers. Among others he puts the following into Mr. Black's hands.

怀特先生，就是那位指导老师，对小布莱克先生越来越喜欢了。当后者请求他给予一些拉丁文写作方面的提示时，怀特先生给予他很大信心，并把自己的几篇文章借给他看。除开别的以外，下面这篇，他交到了布莱克先生手中。

Mr. White's view of Latin translation.

怀特先生对拉丁文翻译的看法：

> There are four requisites of good Composition, —correctness of vocabulary, or diction, syntax, idiom, and elegance. Of these, the two first need no

explanation, and are likely to be displayed by every candidate. The last is desirable indeed, but not essential. The point which requires especial attention is *idiomatic propriety* .

“好文章有四个必备条件，词汇、句法、习语正确，还有行文高雅。这几个条件中，头两个无须解释，每个考生都能展示出这方面的能力。最后一条有是最好，但并非必不可少的。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习语的适当使用。

By *idiom* is meant that *use* of words which is peculiar to a particular language. Two nations may have corresponding words for the same ideas, yet differ altogether in their *mode of using* those words. For instance, 'et' *means* 'and,' yet it does not always admit of being used in Latin, where 'and' is used in English. 'Faire' may be French for 'do'; yet in a particular phrase, for 'How do you *do* ?' 'faire' is not *used* , but 'se porter,' *viz.* , 'Comment vous *portez-vous* ?' An Englishman or a Frenchman would be almost unintelligible and altogether ridiculous to each other, who used the French or English *words* , with the idioms or *peculiar uses* of his own language. Hence, the most complete and exact acquaintance with dictionary and grammar will utterly fail to teach a student to write or compose. Something more is wanted, *viz.* , the knowledge of the *use* of words and constructions, or the knowledge of *idiom* .

“所谓习语，指的是一门语言特有的文字用法。两门语言可能使用相应的字眼表达相同概念，可是，使用这些字眼的方式可能完全不同。比如，‘et’的意思是‘和’，但是，在拉丁语中，这个词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像英语里的‘和’那样用。法语‘faire’可能指英语里面的‘做’，可是，在一些特别的句子里，比如‘你好’这句话里，就不能用‘faire’，而要用法语里面的‘se porter’，如‘Comment vous portez-vous?’一位英国人，或是一位法国人，假如用其自己的语言特有的习语夹在对方语言的词汇里，彼此几乎就无法理解，而且相互的交流会十分荒唐可笑。在这里，对字典和语法再完整和准确的熟知，在教学生如何写作方面也一定会全然失效。这里还需要别的什么东西，就是说，那些词语和结构的用法方面的知识，也就是关于习语的知识。

Take the following English of a modern writer:

“我们看看下面这段由现代人写的英语：

This is a serious consideration:—'Among men, as among wild beasts, the taste of blood creates the appetite for it, and the appetite for it is strengthened by indulgence.'

“‘这是相当认真的一层考虑——其中，就如同在众多的野兽中一样，对于血的口味形成嗜血的欲望，

而嗜血的欲望又因放纵而被强化。’

Translate it word for word literally into Latin, thus:—

“把这段话逐字逐句翻译成拉丁语，就会出现这样的内容：

'Hæc est seria consideratio. Inter homines, ut inter feras, gustus sanguinis creat ejus appetitum, et ejus appetitus indulgentiâ roboratur.'

“‘Hæc est seria consideratio.Inter homines, ut inter feras, gustus sanguinis creat ejus appetitum, et ejus appetitus indulgentiâ roboratur.’

Purer Latin, as far as *diction* is concerned, more correct, as far as *syntax* , cannot be desired. Every word is classical, every construction grammatical: yet Latinity it simply has none. From beginning to end it follows the English *mode* of speaking, or English idiom, not the Latin.

“就其词汇而言，不可能要求有比这段拉丁文更纯粹的了，而就其句法而言，也不可要求更正确的了。每个单词都是古典的，每一处结构也都是符合语

法的，可是，它就是没有什么拉丁文气息。它从头到尾都是一套英语讲话的方法，或者套用的是英语习语而非拉丁语的习语。

In proportion, then, as a candidate advances from this Anglicism into Latinity, so far does he write good Latin.

“那么相应地，当一名考生从这种英语的表达法进展到拉丁文的表达法时，他会写出很好的拉丁语文章。

We might make the following remarks upon the above literal version.

“对上面那段直译，我们不妨提出下面的建议。

1 . 'Consideratio' is not '*a* consideration;' the Latins, having no article, are driven to expedients to supply its place, *e.g.* , *quidam* is sometimes used for *a* .

“1.‘Consideratio’并非‘一层考虑’。拉丁语并无冠词，因此被迫以变通手法代替冠词，例如，有时候会用‘quidam’代替不定冠词a。

2 . 'Consideratio' is not 'a consideration,' *i.e.* , a *thing* considered, or a subject; but the *act* of considering.

“2.‘Consideratio’并非‘一层考虑’，就是说，并非一件被考虑的东西，也不是一个主题，而是考虑这个动作。

3 . It must never be forgotten, that such words as 'consideratio' are generally metaphorical,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used *simply* , and without limitation or explanation, in the English sense, according to which the *mental* act is primarily conveyed by the word. 'Consideratio,' it is true, can be used absolutely, with greater propriety than most words of the kind; but if we take a parallel case, for instance, 'agitatio,' we could not use it at once in the mental sense for 'agitation,' but we should be obliged to say 'agitatio *mentis* , *animi* ,' etc., though even then it would not answer to 'agitation.'

“3.永远都不能忘记，像‘consideratio’这样的词一般总是作比喻用法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照字面使用，不能不加限制或解释，而在英语的意义里，这个词主要传达一种精神活动。不错，‘Consideratio’可在绝对意义上使用，比同类其他词语用起来更适当。可是，假如我们再拿类似的一个例子来对比，比如‘agitatio’，我们就不可立即拿来用于表示‘激动’的

这层精神意义，可是，我们却被迫说‘agitatio mentis, animi’等，尽管哪怕在这样的时候，它也并不适合用于表示‘激动。’

4．'Inter homines, gustus,' etc. Here the English, as is not uncommon, throws two ideas together. It means, first, that something *occurs* among men, and *occurs* among wild beasts, and that it is the same thing which occurs among both; and secondly that this something is, that the taste of blood has a certain particular effect. In other words, it means, (1) '*this* occurs among beasts and men,' (2) *viz.* , that the 'taste of blood,' etc. Therefore, 'inter homines, etc., gustus creat, etc.,' does not express the English *meaning* , it only translates its *expression* .

“4.‘Inter homines, gustus,’等。在英语里面，这样的说法也不是没有，却会同时表达两层意思。首先，它的意思是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在野兽中发生了，在这两者当中发生的是同一件事情；其次，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是存在的，对于血的口味会产生某种特别的效果。换句话说，它的意思是，⑴此事在野兽和人类当中发生，⑵这事即是‘对于血的口味’。因此，‘inter hominess…gustus creat…’，在这里并不是表达英语的意义，而只是翻译其表达式。

5．'Inter homines' is not the Latin phrase for 'among.' 'Inter' generally involves some sense of

division , *viz.* , interruption, contrast, rivalry, etc. Thus, with a singular noun, 'inter cœnam hoc accidit,' *i.e.* , this *interrupted* the supper. And so with two nouns, 'inter me et Brundusium Cæsar est.' And so with a plural noun, 'hoc *inter homines* ambigitur,' *i.e.* , man with man. 'Micat *inter omnes* Julium sidus,' *i.e.* , in the rivalry of star against star. 'Inter tot annos unus (vir) inventus est,' *i.e.* , though all those years, one by one, put in their claim, yet only one of them can produce a man, etc. 'Inter se diligunt,' they love each other. On the contrary, the Latin word for 'among,' simply understood, is 'in.'

“5.‘Inter homines’并不是表示‘在……中’的拉丁语短语。‘Inter’一般涉及某种分割的意思，如中断、对照、竞争等。这样，如果是单独一个名词，那就是‘inter cœnam hoc accidit’，如这就中断了晚餐。如果是两个名词，就会是‘inter me et Brundusium Cæsar est.’在复数名词时也是如此，‘hoc inter homines ambigitur’，即人与人。‘Micat inter omnes Julium sidus’，即是说星与星的竞争。‘Inter tot annos unus (vir) inventus est’是说尽管那么多年，一年接一年都在他们的主宰之下，然而只有其中一年才能产生一个人。‘Inter se diligunt’，他们彼此相爱。反过来，简单理解的话，拉丁语里表示‘在……中’的词就是‘in’。

6．As a general rule, indicatives active followed by accusatives, are foreign to the main structure of a Latin sentence.

“6.一般而论，主动陈述句后面接宾格词，这在拉丁语主句里是少有的。

7 . 'Et;' here two clauses are *connected* ; having *different* subjects or nominatives; in the former 'appetitus' is in the nominative, and in the latter in the accusative. It is usual in Latin to carry on the *same* subject, in *connected* clauses.

“7.‘Et，’在这里，两个从句连接起来了，它们有两个主题或主格，在前者，‘appetitus’是主格，在后者，它就是宾格。在拉丁语里，连接起来的从句里使用同一个主语是常有的事。

8 . 'Et' here connects two *distinct* clauses. 'Autem' is more common.

“8.‘Et’在这里将两个不同的从句连接起来。但‘Autem’是更常用的一个连接词。

These being some of the faults of the literal version, I transcribe the translations sent in to me by six of my pupils respectively, who, however deficient in elegance of composition, and though more or less deficient in hitting the Latin idiom, yet evidently know what idiom is.

“在上述翻译中，存在这些缺陷，我将分别由我的6名学生交到我这里来的翻译抄录下来，这些学生虽然在作文的优雅方面有所欠缺，在使用拉丁语的习语方面也不是没有问题，可是，他们明显懂得习语是什么。

The first wrote:—*Videte rem graviorem; quod feris, id hominibus quoque accidit,—sanguinis sitim semel gustantibus intus concipi, plenè potantibus maturari.*

“第1名学生是这么写的：‘Videte rem graviorem; quod feris, id hominibus quoque accidit,—sanguinis sitim semel gustantibus intus concipi, plenè potantibus maturari.’

The second wrote:—*Res seria agitur; nam quod in feris, illud in hominibus quoque cernitur, sanguinis appetitionem et suscitari lambendo et epulando inflammari.*

“第2名学生写道：‘Res seria agitur; nam quod in feris, illud in hominibus quoque cernitur, sanguinis appetitionem et suscitari lambendo et epulando inflammari.’

The third:—*Ecce res summâ consideratione digna; et in feris et in hominibus, sanguinis semel delibati sitis est, sæpius hausti libido.*

“第3名：‘Ecce res summâ consideratione digna; et in feris et in hominibus, sanguinis semel delibati sitis est, sæpius hausti libido.’

The fourth:—*Sollicitè animadvertendum est, cum in feris tum in hominibus fieri, ut guttæ pariant appetitum sanguinis, frequentiores potus ingluviem.*

“第4名：‘Sollicitè animadvertendum est, cum in feris tum in hominibus fieri, ut guttæ pariant appetitum sanguinis, frequentiores potus ingluviem.’

And the fifth:—*Perpende sedulo, gustum sanguinis tam in hominibus quam in feris primò appetitionem sui tandem cupidinem inferre.*

“第5名：‘Perpende sedulo, gustum sanguinis tam in hominibus quam in feris primò appetitionem sui tandem cupidinem inferre.’

And the sixth:—*Hoc grave est, quod hominibus*

cum feris videmus commune, gustasse est appetere sanguinem, hausisse in deliciis habere.

“第6名：‘Hoc grave est, quod hominibus cum feris videmus commune, gustasse est appetere sanguinem, hausisse in deliciis habere.’”

Mr. Black, junr., studies this paper, and considers that he has gained something from it. Accordingly, when he sees his father, he mentions to him Mr. White, his kindness, his papers, and especially the above, of which he has taken a copy. His father begs to see it; and, being a bit of a critic, forthwith delivers his judgment on it, and condescends to praise it; but he says that it fails in this, *viz* ., in overlooking the subject of *structure* . He maintains that the turning-point of good or bad Latinity is, not idiom, as Mr. White says, but structure. Then Mr. Black, the father, is led on to speak of himself, and of his youthful studies; and he ends by giving Harry a history of his own search after the knack of writing Latin. I do not see quite how this is to the point of Mr. White's paper, which cannot be said to contradict Mr. Black's narrative; but for this very reason, I may consistently quote it, for from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it may throw light on the subject treated in common by both these literary authorities.

小布莱克先生仔细看过这篇文章后认为，他已经从中掌握不少东西。相应地，见到父亲后，他就跟他说起怀特先生、他的善意、他的文章，特别是上述内容，他已经复制了一份。他父亲想看一看这篇文章，由于他向来都有批评家的气质，因此就此发表了一通看法，也屈尊大加一番赞扬。但他说，这文章也有一个缺陷，就是说，它忽略了

结构这个主题。他认为，拉丁文法的好坏，其关键并不在于怀特先生所说的习语，而在于结构。因此，作为父亲的布莱克先生就谈起自己来，也谈到他年轻时候的学习。最后，他就自己研究拉丁文写作技巧的事情给哈里上了一堂历史课。我不是很清楚这与怀特先生的那篇文章有何直接联系，因为这篇文章与布莱克先生的说法并不矛盾。可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应当原文照录，因为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对这两位文学专家都加以处理的这一题材提供全新的看法。

2．

2．

Old Mr. Black's Confession of his search after a Latin style.

老布莱克先生就其对拉丁文风格的研究发表的告白：

> The attempts and the failures and the successes of those who have gone before, my dear son, are the direction-posts of those who come after; and, as I am only speaking to you, it strikes me that I may, without egotism or ostentation, suggest views or cautions, which might indeed be useful to the University Student generally, by a relation of some of my own endeavours to improve my own mind, and to increase my own knowledge in my early life. I am no great admirer of self-taught geniuses; to be

self-taught is a misfortune, except in the case of those extraordinary minds, to whom the title of genius justly belongs; for in most cases, to be self-taught is to be badly grounded, to be slovenly finished, and to be preposterously conceited. Nor, again, was that misfortune I speak of really mine; but I have been left at times just so much to myself, as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young students to gain hints from the history of my mind, which will be useful to themselves. And now for my subject.

“儿子啊，以前进行过尝试，有失败也有成功的那些人，就是后来再尝试者的方向标。由于我只是在与你说话，因此我就想到，在并不自负也不卖弄的情况下，我可以讲一讲自己早年改善思想方法、扩大知识面的一些故事，也许能提出一些建议或警告，可以在一般意义上对大学生们有所帮助。我对自学成才的人并不十分赞赏，自学成才本身就属于不幸，除非是那些有超凡思想的人，因为才干这个称号理应属于他们。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自学就是指立于错误立场，结果会形成一种懒散，人会自高自大至荒唐程度。我说的那种不幸，其实并非我自己的经历，但是，有很多时候，我只能靠自己，因此而有可能使青年学生能从我自己的思想过程当中获得一些提示，而这对他们的将来是有用的。我现在就来谈一谈这个话题。

At school I was reckoned a sharp boy; I ran through its classes rapidly; and by the time I was fifteen, my masters had nothing more to teach me,

and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me. I might have gone to a public school, or to a private tutor for three or four years; but there were reasons against either plan, and at the unusual age I speak of, with some inexact acquaintance with Homer, Sophocles, Herodotus, and Xenophon, Horace, Virgil, and Cicero, I was matriculated at the University. I had from a child been very fond of composition, verse and prose, English and Latin, and took especial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of style; and one of the wishes nearest my heart was to write Latin well. I had some idea of the style of Addison, Hume, and Johnson, in English; but I had no idea what was meant by good Latin style. I had read Cicero without learning what it was; the books said, 'This is neat Ciceronian language,' 'this is pure and elegant Latinity,' but they did not tell me why. Some persons told me to go by my ear; to get Cicero by heart; and then I should know how to turn my thoughts and marshal my words, nay, more, where to put subjunctive moods and where to put indicative. In consequence I had a vague, unsatisfied feeling on the subject, and kept grasping shadows, and had upon me something of the unpleasant sensation of a bad dream.

“中小学时代，我被认为是个机灵的孩子，几年便修完了课程，到十五岁时，老师们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我了，因此不知道拿我怎么办。我本可以去上公立学校，或找一位私人教师学三、四年的，可是，由于某些原因，这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因此，在我所

说的那个极不平常的年龄，由于稍通荷马、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和色诺芬、贺拉斯、维吉尔和西塞罗，结果就被大学录取了。我从儿童时代起便爱好作文，有诗歌有散文，有英语的，也有拉丁文的，并对写作风格特别有兴趣。我内心里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写一手漂亮的拉丁语文章。我对阿迪森、休谟和约翰逊的英语写作风格略有所知，但对良好的拉丁文风格的概念却不甚了了。我读过西塞罗的作品，却不是很清楚里面都说了些什么。书上说：‘这就是优雅的西塞罗式语言’，‘这就是纯粹和漂亮的拉丁语法’，但那些书本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如此。有人曾对我说，应当凭自己的耳朵去听，应当用自己的心去听西塞罗，之后，我就会明白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如何指挥词汇。不仅如此，我还会明白哪里该用虚拟语气，哪里该用陈述语气。结果，我对这个话题有了一个模糊但无法令人满意的感觉，而且不断地抓瞎，并产生了好像做了一场恶梦的感觉。

When I was sixteen, I fell upon an article in the *Quarterly* , which reviewed a Latin history of (I think) the Rebellion of 1715; perhaps by Dr. Whitaker. Years afterwards I learned that the critique was the writing of a celebrated Oxford scholar; but at the time, it was the subject itself, not the writer, that took hold of me. I read it carefully, and made extracts which, I believe, I have to this day. Had I known more of Latin writing, it would have been of real use to me; but as it was concerned of necessity in verbal criticisms, it did but lead me deeper into the mistake to which I had already been introduced,—

that Latinity consisted in using good phrases. Accordingly I began noting down, and using in my exercises, idiomatic or peculiar expressions: such as 'oleum perdidi,' 'haud scio an non,' 'cogitanti mihi,' 'verum enimvero,' 'equidem,' 'dixerim,' and the like; and I made a great point of putting the verb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What took me in the same direction was Dumesnil's Synonymes, a good book, but one which does not even profess to teach Latin writing. I was aiming to be an architect by learning to make bricks.

“到十六岁的时候，我在《评论季刊》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讲到一个拉丁语故事，（我认为）是1715年叛乱的故事，也许是惠特克博士写的一篇文章。多年之后，我得知，那篇评论文章是一位知名的牛津学者写的，但那个时候，引起我兴趣的是那篇文章的主题而非作者本人。我认真阅读那篇文章，还做了摘录，相信这份摘录我今天还保留着。假如当时更了解拉丁语写作，那一定对我有很大益处。但是，由于它必然关系到文字批评，却会引导我犯下越来越严重的错误，而我当时已经被误导且犯下这样的错误了，即拉丁语法就在于选用好的短语。相应地，我开始记笔记，并在练习当中经常使用习语或特有的表达形式，比如‘oleum perdidi’，‘haud scio an non’，‘cogitanti mihi’，‘verum enimvero’，‘equidem’，‘dixerim’如此等等。而且我还特别注意，每次都把动词放在句子最后。引导我朝同一方向继续下去的，还有杜默斯尼尔的《拉丁语同义词典》，那是相当不错的一本书，但是，这本书根本就不谈如何进行拉丁文写作。当时，我是在尝试先

学会如何制砖，再学习如何当上建筑师。

Then I fell in with the *Germania* and *Agricola* of Tacitus, and was very much taken by his style. Its peculiarities were much easier to understand, and to copy, than Cicero's; '*decipit exemplar vitiis imitabile;*' and thus, without any advance whatever in understanding the genius of the language, 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tin sentence, I added to my fine words and cut-and-dried idioms, phrases smacking of Tacitus. The Dialogues of Erasmus, which I studied, carried me in the same direction; for dialogues,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ase, consist of words and clauses, and smart, pregnant, or colloquial expressions, rather than of sentences with an adequate structure.

“之后就碰到塔西陀的《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被他的写作风格深深吸引住。其写作风格的特异之处，理解和模仿起来都比西塞罗的风格容易得多（‘decipit exemplar vitiis imitabile’），因此，由于在理解语言天赋或拉丁语句子的构造上没有任何进展，我就将塔西陀风格的大量俗套的习语和短语补进了我的优良词汇表。我还研究过伊拉斯谟的《对话录》，该书也引导我走向同样的方向。根据问题的实质，对话主要在于单词和从句，还有时髦、有寓意或通俗的表达方法，而不是有充足结构的句子。”

Mr. Black takes breath, and then continues:

布莱克先生歇一口气，之后接着说：

> The labour, then, of years came to nothing, and when I was twenty I knew no more of Latin composition than I had known at fifteen. It was then that circumstances turned my attention to a volume of Latin Lectures, which had been published by the accomplished scholar of whose critique in the *Quarterly Review* I have already spoken. The Lectures in question had been delivered terminally while he held the Professorship of Poetry, and were afterwards collected into a volume; and various circumstances combined to give them a peculiar character. Delivered one by one at intervals, to a large, cultivated, and critical audience, they both demanded and admitted of special elaboration of the style. As coming from a person of his high reputation for Latinity, they were displays of art; and, as addressed to persons who had to follow *ex tempore* the course of a discussion delivered in a foreign tongue, they needed a style as neat, pointed, lucid, and perspicuous as it was ornamental. Moreover, as expressing modern ideas in an ancient language, they involved a new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ts powers. The result of these united conditions was a style less simple, less natural and fresh, than Cicero's; more

studied, more ambitious, more sparkling; heaping together in a page the flowers which Cicero scatters over a treatise; but still on that very account more fitted for the purpose of inflicting upon the inquiring student what Latinity was. Any how, such was its effect upon me; it was like the 'Open Sesam' of the tale; and I quickly found that I had a new sense, as regards composition, that I understood beyond mistake what a Latin sentence should be, and saw how an English sentence must be fused and remoulded in order to make it Latin. Henceforth Cicero, as an artist, had a meaning, when I read him, which he never had had to me before; the bad dream of seeking and never finding was over; and, whether I ever wrote Latin or not, at least I knew what good Latin was.

“所以说，多年的辛苦努力付之东流了，到了二十岁时，我了解的拉丁语作文知识，与十五岁时无异。就在那个时候，各种机缘让我注意到了一本《拉丁语讲座集》，是我刚刚提到过的那本《评论季刊》的评论家——一位成就斐然的学者出版的。所说的那本《拉丁语讲座集》，是他担任诗歌教授期间定期讲授的内容，后来才收集成卷。种种原因使这些讲座具有一种奇异特色。他的这些讲座是隔一段时间分开讲的，听众是很大一群受过教育和有评判能力的人，他们一方面要求，另外一方面也能容忍极精致的写作风格。由于讲座人在拉丁文写作方面有极高声望，因此，这些讲座也是艺术展示。由于针对的是必须在用外语讲授的讨论中即时跟上课程节奏的学生，因此，每次讲座都必须有这样一种风格：整洁、突出、易

懂、清晰明白和富有装饰性。另外，由于是用一门古老的语言表达现代概念，它们还涉及拉丁语的一种新发展和新应用。这些联合条件的结果，就是比西塞罗的风格较少简朴，较不自然，较少新鲜感的一种风格。这风格更为讲究、更炫耀、更加光彩夺目。它在一页纸里就堆满了西塞罗在一整篇文章里散落的鲜花。但尽管如此，正出于这个原因，它才更适合目的，好把拉丁文风到底为何的概念强加给这些爱追根究底的学生。无论怎么说，这就是那本书对我造成的影响，就好像‘芝麻开门’故事里的开门咒。我很快便发现，在作文方面，我有了一种新感觉，认为自己明白了什么是恰当的拉丁语句子，这一点绝不会出错。我也明白了英语句子应当如何融合在一起，如何加以重铸，以使其变成拉丁文。从那以后，在我看西塞罗的著作时，他作为一位艺术家就产生了意义，而这一意义在从前从未出现。一直在寻找却总也找不到，这样的恶梦过去了。而且，无论今后写不写拉丁文，至少我明白好的拉丁文应当是什么样子的。

“I had now learned that good Latinity lies in structure; that every word of a sentence may be Latin, yet the whole sentence remain English; and that dictionaries do not teach composition. Exulting in my discovery, I next proceeded to analyze and to throw into the shape of science that idea of Latinity to which I had attained. Rules and remarks, such as are contained in works on composition, had not led me to master the idea; and now that I really had gained it, it led me to form from it rules and remarks for myself. I could now turn Cicero to account, and I proceeded to make his writings the

materials of an induction, from which I drew out and threw into form what I have called a science of Latinity,—with its principles and peculiarities, their connection and their consequences,—or at least considerable specimens of such a science, the like of which I have not happened to see in print. Considering, however, how much has been done for scholarship since the time I speak of, and especially how many German boo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 doubt not I should now find my own poor investigations and discoveries anticipated and superseded by works which are in the hands of every school-boy. At the same time, I am quite sure that I gained a very great deal in the way of precision of thought, delicacy of judgment, and refinement of taste, by the processes of induction to which I am referring. I kept blank books, in which every peculiarity in every sentence of Cicero was minutely noted down, as I went on reading. The force of words, their combination into phrases, their collocation—the carrying on of one subject or nominative through a sentence, the breaking up of a sentence into clauses, the evasion of its categorical form, the resolution of abstract nouns into verbs and participles;—what is possible in Latin composition and what is not, how to compensate for want of brevity by elegance, and to secure perspicuity by the use of figures, these, and a hundred similar points of art, I illustrated with a diligence which even bordered on subtlety. Cicero became a mere magazine of instances, and the main use of the river was to feed the canal. I am

unable to say whether these elaborate inductions would profit any one else, but I have a vivid recollection of the great utility they were at that time to my own mind.

“我现在明白，好的拉丁文就在于其结构，一个句子里的每一个词也许都是拉丁词，可是，整个句子可能仍然是英语句子，而字典并不能教人如何作文。这样的发现让我欣喜若狂，所以，接下来，我就进而分析自己所掌握的拉丁语概念，并使其具备一门科学的外表。规则与注释，就是论述作文的著作里包含的那些内容，并没有引导我去掌握这要领，可现在，我真正掌握了这个概念，它引导我从中形成为自己所用的规则和附注。现在可以充分利用西塞罗了，因此我进而将他的写作变成一种归纳法的材料。我可以吸收这些材料，利用它们构成我所说的拉丁文法的学科，有它自己的原理和特征，有它们的联系与结果。至少，在这样一门学科里，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范例，是我目前还没有在印刷出版物中看到的。但是，考虑到自我所说的那个时代以来已经有了许多学术上的成就，尤其是已经有了大量德语著作的翻译出版，我并不怀疑会发现自己有限的研究工作及发现，已经为一些著作所预料和代替，而这些著作，现在的学童差不多都是人手一册了。同时，我也相当肯定，在思维的准确性、判断力的精密和品味的修炼上，我着实所得不少，这些都得益于我所指的那个归纳方法。我准备了好多空白笔记本，一边读一边记，西塞罗的每一个奇特句子我都详细地记在里面。词语的力量、词语组合成句子、词语的搭配，一个主题或主语在一个句子中的穿插，一个句子打散成多个从句，对于其绝对形式的回避，抽象名词向动词及其分词的解析，哪些在

拉丁语作文中是允许的，哪些不允许，如何通过优雅的行文来补偿简洁性的缺乏，如何通过比喻的应用而确保句子简明易懂，这些以及上百种类似鉴赏要点，我都不厌其烦地详加说明。西塞罗成为一本提供纯粹例证的杂志，而现在，河流的主要用途就是去注满运河。我不能说这些精巧的归纳一定会使他人受益，可是，对于它们在那个时候给予我的巨大帮助，我仍然保持鲜活的记忆。

The general subject of Latin composition, my dear son, has ever interested me much, and you see only one point in it has made me speak for a quarter of an hour; but now that I have had my say about it, what is its upshot? The great moral I would impress upon you is this, that in learning to write Latin, as in all learning, you must not trust to books, but only make use of them; not hang like a dead weight upon your teacher, but catch some of his life; handle what is given you, not as a formula, but as a pattern to copy and as a capital to improve; throw your heart and mind into what you are about, and thus unite the separate advantages of being tutored and of being self-taught,—self-taught, yet without oddities, and tutorized, yet without conventionalities.

“亲爱的儿子，拉丁语写作这个一般性话题，向来都让我兴趣盎然。你也看得出来，仅仅是当中的一小点便让我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可是，既然我已就此话题开了头，那结果到底是怎样的呢？我想让你记

住的重要教训是，学习拉丁语写作的时候，就如同在所有学习过程中一样，可不能完全依靠书本，仅只能利用一下。不能像块死铁一样靠在老师身上，而是要学习里面活的东西。要处理好给予我们的东西，不能照本宣科，而是要看作可以模仿的一块模板，像一笔本金一样拿去利滚利。既然是喜欢的东西，就一定要全身心投入，因此而将有人教和自学这两种不同的益处结合起来。自学成才，但不要作怪；接受指导，但不要墨守成规。”

“Why, my dear father,” says young Mr. Black, “you speak like a book. You must let me ask you to write down for me what you have been giving out in conversation.”

“哎，我亲爱的父亲”，小布莱克先生说，“您谈起话来滔滔不绝。您得允许我请求您把刚刚在谈话中说出来的东西全都写下来。”

I have had the advantage of the written copy.

我有幸已经得到了那份手稿。

4. General Religious Knowledge

第四节：普遍宗教知识

1．

1 .

It has been the custom in the English Universities to introduce religious instruction into the School of Arts; and a very right custom it is, which every University may well imitate. I have certainly felt it ought to have a place in that School; yet the subject is not without its difficulty, and I intend to say a few words upon it here. That place, if it has one, should of course be determined on some intelligible principle, which, while it justifies the introduction of Religion into a secular Faculty, will preserve it from becoming an intrusion, by fixing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is to be admitted. There are many who would make over the subject of Religion to the theologian exclusively; there are others who allow it almost unlimited extension in the province of Letters. The latter of these two classes, if not large, at least is serious and earnest; it seems to consider that the Classics should be superseded by the Scriptures and the Fathers, and that Theology proper should be taught to the youthful aspirant for University honours. I am not here concerned with opinions of this character, which I respect, but cannot follow. Nor am I concerned with that large class, on the other hand, who, in their exclusion of Religion from the lecture-rooms of Philosophy and Letters (or of Arts, as it used to be called), are actuated by scepticism or indifference; but there are other persons, much to be consulted, who arrive at the same practical conclusion as the sceptic and unbeliever, from real reverence and pure zeal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ology, which they consider sure to suffer from the superficial treatment of lay-professors, and the superficial reception of young minds, as soon as, and in whatever degree, it is associated with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and as very many persons of great consideration seem to be of this opinion, I will set down the reasons why I follow the English tradition instead, and in

what sense I follow it.

在英国大学的艺术院系里介绍宗教内容已经是习俗了，而且是个不错的习俗，这是所有大学都应当仿效的。我当然感觉它应当在那样的院系里占有一席之地，可是，这个话题谈起来也不那么容易，我也想在这里就此说几句话。假如它确实能占有那样的一席之地的话，这地位当然应根据某种明确的原则来确定，这原则一方面说明将宗教引入世俗学院的必要性，同时也约束它，使其不会成为一种侵入行为，那就是要确定允许引入这个科目的条件。有许多人喜欢将宗教主题专门交给神学家，另外有些人允许它几乎无限制地在文学领域内延伸。这两类人当中的后者，如果说不上人数众多，至少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这批人似乎认为，古典著作应当被圣经或教父文学所代替，而神学本身却应当为热心于大学荣誉的学生们讲授。我在此关心的并不是这后一种意见，虽然这后一种意见值得尊重，我却不敢苟同。另外一方面，我也不想关心人数较多的那一群人，这批人希望将宗教排除在哲学与文学院（或按以前的说法叫艺术学院）的课堂之外，实际是由他们的怀疑主义思想或冷漠造成的。但是还有其他一些人，这些人的意见完全应当予以考虑。他们之所以与怀疑主义者和无信仰的人得出了同样的实用主义结论，是出自对于神学兴趣真实的尊敬与纯粹的热情，因为他们认为，无论在哪种程度上说，神学一旦与古典的、哲学的和历史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就一定会遭受不信神的教授们肤浅的对待，也会为年轻人不屑一顾地轻视。由于有很多深思熟虑的人也都是这样一个意见，我就想说明一下，为什么我反倒要尊重英国传统，以及我在哪重意义上尊重这传统。

I might appeal, I conceive, to authority in my favour, but I pass it over, because mere authority, however sufficient for my own guidance, is not sufficient for the definite direction of those who have to carry out the matter of it in practice.

本不妨求助有利本人的权威，可我还是打消这个念头的好，因为纯粹的权威，哪怕足可以充当我的指南，却不足以为必须在实践中处理这件事情的那些人提供确切的指导。

2．

2．

In the first place, then, it is congruous certainly that youths who are prepared in a Catholic University for the general duties of a secular life, or for the secular professions, should not leave it without some knowledge of their relig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does, in matter of fact, act to the disadvantage of a Christian place of education, in the world and in the judgment of men of the world, and is a reproach to its conductors, and even a scandal, if it sends out its pupils accomplished in all knowledge except Christian knowledge; and hence, even though it were impossible to rest the introduction of religious teaching into the secular lecture-room upon any logical principle, the imperative necessity of its introduction would remain, and the only question would be, what matter was to be introduced, and how much.

首先，在一所天主教大学里为在世俗生活里的一般职责或世俗职业而做好准备的年轻人，他们离校之前应当具备关于这门宗教的某些知识，那是完全合适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假如天主教大学输送的学生完成了各个门类的学业而只是没有基督教的知识，那么在世界上，以世人的判断力看来，肯定会在事实上对一个从事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场所产生不利影响，这对其教育者是一种责备，甚至还是一件丑

闻。因此，哪怕根据任何一种逻辑原则而将宗教教育的引入放进世俗课堂是不可能的，引入宗教的迫切必要性仍然存在，而唯一的问题就会是，应当引入哪些材料以及引入多少。

And next, considering that, as the mind is enlarged and cultivated generally, it is capable, or rather is desirous and has need, of fuller religious inform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at that knowledge of Christianity which is sufficient for entrance at the University is all that is incumbent on students who have been submitted to the academical course. So that we are unavoidably led on to the further question, viz., shall we sharpen and refine the youthful intellect, and then leave it to exercise its new powers upon the most sacred of subjects, as it will, and with the chance of its exercising them wrongly; or shall we proceed to feed it with divine truth, as it gains an appetite for knowledge?

接下来，由于思想一般会得到扩充和培育，考虑到人可以，或者不如说最好获得，而且也需要更圆满的宗教信息，那就很难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对于大学入学考试来说已经有充足理由的基督教的知识，竟然就成为已经忙于学术课程的那些学生唯一义不容辞的东西。因此，我们无可避免地必须面对下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应当使年轻人的头脑极其敏锐和成熟，之后任由它在最神圣的主题上演练其新的能力，哪怕存在以错误方法演练这能力的可能，或是说我们是否应当在他们的头脑产生对于知识的渴望时，进而用属神的真理加以武装？

Religious teaching, then, is urged upon us in the cas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first, by its evident propriety; secondly, by the force of public opinion; thirdly, from the great inconveniences of neglecting it. And, if the subject of Religion is to have a real place

in their course of study, it must enter into the examinations in which that course results; for nothing will be found to impress and occupy their minds but such matters as they have to present to their Examiners.

因此，在大学学生这方面，宗教教学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由其明显的适当性决定的；其次，这是由公共舆论的力量所决定的；第三，忽略这一点会造成极大不便。如果宗教科目的确在课程中占有真正地位，它就必须要排进检测课程结果的考试项目中，因为除了必须要向考官提交的东西外，没有任何东西更能占据大学生的头脑并留下深刻印象。

Such, then, are the considerations which actually oblige us to introduce the subject of Religion into our secular schools, whether it be logical or not to do so; but next, I think that we can do so without any sacrifice of principle or of consistency; and this, I trust, will appear, if I proceed to explain the mode which I should propose to adopt for the purpose:—

这些，也就是实际上迫使我们必须要将宗教科目引入世俗学校的考虑，无论这样做是不是符合逻辑。但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这一步而不必牺牲任何原则或一致性，假如我们进而解释我主张为此目的而采纳的那种方式，则我相信这一点就会出现。

I would treat the subject of Religion in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Letters simply as a branch of knowledge. If the University student is bound to have a knowledge of History generally, he is bound to have inclusively a knowledge of sacred

history as well as profane; if he ought to be well instructed in Ancient Literature, Biblical Literature comes under that general description as well as Classical; if he knows the Philosophy of men, he will not be extravagating from his general subject, if he cultivate also that Philosophy which is divine. And as a student is not necessarily superficial, though he has not studied all the classical poets, or all Aristotle's philosophy, so he need not be dangerously superficial, if he has but a parallel knowledge of Religion.

我将简单地把在哲学和文学院里讲解的宗教科目当作知识分支来处理。假如大学生注定要拥有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知识，那他就一定会包容性地拥有世俗和神圣历史两方面的知识。假如他应当接受古代文学的良好教育，那么，圣经文学就会列在与古典文学类似的一般性描述当中。假如他了解人的哲学，那么，如果他同时也了解属神的哲学，那一定不会离普遍主题太远。正如一名大学生不一定必然是肤浅的，尽管他并没有研究所有古典诗人，或全部亚里士多德哲学；同样，假如他拥有类似的一般性宗教知识，他不一定就会肤浅到危险的程度。

3．

3．

However,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risk of theological error is so serious, and the effects of theological conceit are so mischievous, that it is better for a youth to know nothing of the sacred subject, than to have a slender knowledge which he can use freely and recklessly, for the very reason that it is slender. And here we have

the maxim in corroboration: “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

但是，不妨这样说，神学的谬误实在严重，神学上的自负产生的后果也如此有害，青年人与其去了解任何属神的知识，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的好，远胜于获得一知半解的皮毛知识而去随便和鲁莽地运用，其原因正在于皮毛知识害人。在此，正好就可以用上这样一句百试不爽的格言：“一知半解，害己误人。”

This objection is of too anxious a character to be disregarded. I should answer it thus:—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obvious to remark, that one great portion of the knowledge here advocated is, as I have just said, historical knowledge, which has little or nothing to do with doctrine. If a Catholic youth mixes with educated Protestants of his own age, he will find them conversant with the outlin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acred and ecclesiastical history as well as profane: it is desirable that he should be on a par with them, and able to keep up a conversation with them. It is desirable, if he has left our University with honours or prizes, that he should know as well as they about the great primitive divisions of Christianity, its polity, its luminaries, its acts, and its fortunes; its great eras, and its course down to this day. He should have some idea of its propagation, and of the order in which the nations, which have submitted to it, entered its pale; and of the list of its Fathers, and of its writers generally, and of the subjects of their works. He should know who St. Justin Martyr was, and when he lived; what language St. Ephraim wrote in; on what St. Chrysostom's literary fame is founded; who was Celsus, or Ammonius, or Porphyry, or Ulphilas, or Symmachus, or Theodoric. Who were the Nestorians; what was the religion of the barbarian nations who took possession of the Roman Empire: who was Eutyches, or Berengarius, who the

Albigenses. He should know something about the Benedictines, Dominicans, or Franciscans, about the Crusades, and the chief movers in them. He should be able to say what the Holy See has done for learning and science; the place which these islands hold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dark age; what part the Church had, and how her highest interests fared, in the revival of letters; who Bessarion was, or Ximenes, or William of Wykeham, or Cardinal Allen. I do not say that we can insure all this knowledge in every accomplished student who goes from us, but at least we can admit such knowledge, we can encourage it, in our lecture-rooms and examination-halls.

这条反对意见性质急迫，容不得弃而不论。我只能这么回答：首先，很明显，在这里倡导的很大一部分知识，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仅仅是历史知识，而历史知识与教义关系极小，甚至没有关系。如果一位天主教的青年与他那个时代里受过教育的新教徒经常相处，他会发现这些新教徒对凡俗和属神及教会历史的轮廓和特征都十分熟悉，他最好与他们和平相处，并保持与他们谈话的能力。最好是这么一种情形，假如他已经以优异成绩离开了我们开办的大学，他应当跟他们一样了解基督教原初的大规模裂变，包括其政体、杰出人物、其行动及其变故，它曾有过的伟大时代以及它一直发展到今天的全部进程。他应当对其传播，对臣服于它的国家及这些国家进入基督教世界的顺序有所了解；熟悉早期教父的名单，大致了解其作家及其著作的主题。他应当知晓殉道者圣尤斯丁是谁以及他在世的时代，圣伊法莲以什么语言写作，圣克里索斯托姆的文学名声基于什么，谁是塞尔苏斯、阿蒙尼乌、波菲利、乌尔菲拉、西马库斯或西奥多里克。应该知道聂斯脱利派是些什么人，攻占罗马帝国的野蛮民族信什么教，谁是尤提克，谁是贝朗瑞，阿尔比教派是些什么人。他应当知道一点本笃会修士、多明我修士或方济会修士的情况，十字军东征的情况，以及这些运动的主要推动者的情况。他应当了解圣座为世俗学问和科学做了哪些工作，英伦三岛在黑暗时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教会起了什么作

用，在文艺复兴过程中，教会的最高利益是如何保存下来的，谁是贝萨里翁，谁是西梅内斯，谁是威克姆，谁是艾伦枢机主教。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保证从这所大学毕业的所有优秀学生都能掌握这些知识，但至少我们可以容纳这些知识，我们可以鼓励这些知识，让它们进入课堂，进入考场。

And so in like manner, as regards Biblical knowledge, it is desirable that, while our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pursue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y should also be invited to acquaint themselves with some general facts about the canon of Holy Scripture, its history, the Jewish canon, St. Jerome, the Protestant Bible; again, about the languages of Scripture, the contents of its separate books, their authors, and their versions. In all such knowledge I conceive no great harm can lie in being superficial.

同样，涉及圣经知识的时候，最好是在鼓励学生学习古典文学史的同时，要求他们熟悉圣经正典的基本事实，了解圣经历史、犹太正典、圣哲罗姆、新教圣经。还有圣经的语言知识，圣经各书的内容，其作者及版本情况。在所有这些知识当中，我想象不出仅仅略知一二会造成什么大碍。

But now as to Theology itself. To meet the apprehended danger, I would exclude the teaching *in extense* of pure dogma from the secular schools, and content myself with enforcing such a broad knowledge of doctrinal subjects as is contained in the catechisms of the Church, or the actual writings of her laity. I would have students apply their minds to such religious topics as laymen actually do treat, and are thought praiseworthy in treating.

Certainly I admit that, when a lawyer or physician, or statesman, or merchant, or soldier sets about discussing theological points, he is likely to succeed as ill as an ecclesiastic who meddles with law, or medicine, or the exchange. But I am professing to contemplate Christian knowledge in what may be called its secular aspect, as it is practically useful in the intercourse of life and in general conversation; and I would encourage it so far as it bears upon the history, the literature, and the philosophy of Christianity.

现在，我们谈谈神学本身。为消除人们所担忧的危险，我认为应当将纯粹教义未经删节的教学内容排除在世俗学校之外。能够将教会的教义问答中包含的教义主题这样一般的知识，或平信徒的实际作品灌输给学生，就应当满足了。我倒愿意让学生像平信徒实际上做的那样花时间思考，且思考值得赞扬的宗教话题。当然，我承认，当一位律师、医生、政治家、商人或军人准备讨论神学要点时，他有可能像一位牧师瞎搞法律、医学或交易一样胡说八道。可是，我在此强调的，是要按照不妨称作其世俗层面的方法来思考基督教的知识，就好像它在人生交往和一般谈话中实际有用那样。只要它与历史、文学以及基督教哲学产生某种联系，我就会鼓励它。

It is to be considered that our students are to go out into the world, and a world not of professed Catholics, but of inveterate, often bitter, commonly contemptuous, Protestants; nay, of Protestants who, so far as they come from Protestant Universities and public schools, do know their own system, do know, in proportion to their general attainments, the doctrines and arguments of Protestantism. I should desire, then, to encourage in our students an intelligent apprehension of the relations, as I may call them, between the Church and Society at large; for insta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urch and a religious sect; the

respective prerogatives of the Church and the civil power; what the Church claims of necessity, what it cannot dispense with, what it can; what it can grant, what it cannot. A Catholic hears the celibacy of the clergy discussed in general society; is that usage a matter of faith, or is it not of faith? He hears the Pope accused of interfering with the prerogatives of her Majesty, because he appoints an hierarchy. What is he to answer? What principle is to guide him in the remarks which he cannot escape from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He fills a station of importance, and he is addressed by some friend who has political reasons for wishing to know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anon and Civil Law, whether the Council of Trent has been received in France, whether a Priest cannot in certain cases absolve prospectively, what is meant by his *intention* , what by the *opus operatum* ; whether, and in what sense, we consider Protestants to be heretics; whether any one can be saved without sacramental confession; whether we deny the reality of natural virtue, or what worth we assign to it?

不妨这样考虑一下，我们的学生就要踏上社会了，而这个世界并不全都是天主教徒，反而到处都是积习已深、经常十分尖刻，一般总是充满轻蔑的新教徒。不仅如此，这些新教徒很多都是新教大学和公立学校毕业的，他们清楚自己那个信仰系统，根据他们一般的造诣水平，他们还的确都相应明白新教教义和论证。因此，我倒是愿意鼓励我们的学生对教会与广义的社会之间的（我不妨称为）关系有相当明智的理解。比如，教会与一种宗教派别之间的差别、教会自己的特权与相应的公民权利、教会必然要求的东西、它能和不能放弃的东西、哪些是它可以给予的，哪些是它不能给予的。一位天主教徒听到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中谈论僧侣阶层的独身问题，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出自信仰呢？他听到人们责怪教皇干涉君主特权，因为教皇自己任命了主教。他应当怎样应答呢？听到人们必然会说、因此无法回避的许多言论时，他应当依照什么原则来应对？他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某位友

人求教于他。这友人出于政治原因而希望了解教规与民法之间的差别，特利腾大公会议是否在法国被接受，一位神甫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可望得赦免，他的意图如何理解，事效是何意思，我们是否以及在哪种意义上认为新教徒是异端，没有圣事忏悔，人到底能否得救，我们可否否认自然美德的现实性，或我们可赋予它什么价值等。

Questions may be multiplied without limit, which occur in conversation between friends, in social intercourse, or in the business of life, when no argument is needed, no subtle and delicate disquisition, but a few direct words stating the fact, and when perhaps a few words may even hinder most serious inconveniences to the Catholic body. Half the controversies which go on in the world arise from ignorance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half the prejudices against Catholicity lie in the misinformation of the prejudiced parties. Candid persons are set right, and enemies silenced, by the mere statement of what it is that we believe. It will not answer the purpose for a Catholic to say, “I leave it to theologians,” “I will ask my priest;” but it will commonly give him a triumph, as easy as it is complete, if he can then and there lay down the law. I say “lay down the law;” for remarkable it is that even those who speak against Catholicism like to hear about it, and will excuse its advocate from alleging arguments if he can gratify their curiosity by giving them inform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however, as I have said, what is given as information will really be an argument as well as information. I recollect, some twenty-five years ago, three friends of my own, as they then were, clergymen of the Establishment, making a tour through Ireland. In the West or South they had occasion to become pedestrians for the day; and they took a boy of thirteen to be their guide. They amused themselves with putting questions to him on the subject of his religion; and one of them confessed to me on his return that that poor child put them all

to silence. How? Not, of course, by any train of arguments, or refined theological disquisition, but merely by know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answers in his catechism.

问题可能成倍增长而没有止境，这些问题可在朋友间的谈话中出现，在社会交往中出现，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出现，此时，并不需要争辩，也不需要细致入微的探讨，只不过是说明事实的几句直截了当的话。这样的时候，也许几句话甚至都能构成妨碍天主教的最严重的麻烦。世上发生的半数的争论，皆因对所涉事实的无知而起，针对大公教会的一半偏见，就在于对被看错的团体形成了错误的看法。仅只需要说明我们相信的东西是什么，公正无私的人就会改变错误看法，而敌人也不会再出声了。对于一位天主教徒而言，仅仅说“这事留给神学家”，“我去问问我的牧师”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他当时当地就立下规矩，这样说会让他产生一种胜利感，轻松和完全的胜利感。我说“立下规矩”，因为令人称奇的是，哪怕是那些对天主教义说三道四的人，也喜欢听听天主教义方面的事情。假如倡导天主教教义的人能为他们提供信息，使其好奇心得到满足，则他们也愿意原谅他们武断的论证。但是，一般而言，如我已经说过的一样，作为信息提供的东西，除了是信息之外，往往真的就是一种论证。我还记得，约在二十五年前，我有三位朋友，当时是国教圣公会的牧师，他们一行三人去爱尔兰旅游。在爱尔兰西部或南部，他们有机会在白天步行旅游，因此就请了一位十三岁的男孩当导游。他们边玩边就这个男孩子的宗教提些问题，并以此为乐。其中一位回来以后对我说，那个小男孩曾让他们三个人集体无语。怎么回事呢？当然，不是因为一系列论辩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什么高深的神学探索，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并明白了对他的教理问答的答案。

4．

Nor will argument itself be out of place in the hands of laymen mixing with the world. As secular power, influence, or resources are never more suitably placed than when they are in the hands of Catholics, so secular knowledge and secular gifts are then best employed when they minister to Divine Revelation. Theologians inculcate the matter, and determine the details of that Revelation; they view it from within; philosophers view it from without, and this external view may be called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nd the office of delineating it externally is most gracefully performed by laymen. In the first age laymen were most commonly the Apologists. Such were Justin, Tatian, Athenagoras, Aristides, Hermias, Minucius Felix, Arnobius, and Lactantius. In like manner in this age some of the most prominent defences of the Church are from laymen: as De Maistre, Chateaubriand, Nicolas, Montalembert, and others. If laymen may write, lay students may read; they surely may read what their fathers may have written. They might surely study other works too, ancient and modern, written whether by ecclesiastics or laymen, which, although they do contain theology, nevertheless, in their structure and drift, are polemical. Such is Origen's great work against Celsus; and Tertullian's Apology; such some of the controversial treatises of Eusebius and Theodoret; or St. Augustine's City of God; or the tract of Vincentius Lirinensis. And I confess that I should not even object to portions of Bellarmine's Controversies, or to the work of Suarez on laws, or to Melchior Canus's treatises on the Loci Theologici. On these questions in detail, however,—which are, I readily acknowledge, very delicate, —opinions may differ, even where the general principle is admitted; but, even if we confine ourselves strictly to the Philosophy, that is, the external contemplation, of Religion, we shall have a range of

reading sufficiently wide, and as valuable in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s it is liberal in its character. In it will be included what are commonly called the Evidences; and what is a subject of special interest at this day, the Notes of the Church.

并不是说，如果落在与世人生活在一起的平信徒手中，论证本身就一定会乱套。世俗的权力、影响力或资源如果放在天主教徒手中，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世俗知识和天赋如果服务于神圣启示，也会得到最佳的利用。神学家将这启示的内容灌输给人们，并确定启示的细节，他们是从内部来看待启示的。而哲学家却是从外部来看待启示，而且他们外在的观点也许可以称为宗教哲学，而且，从外部描绘启示的职责，可以由平信徒极完美地履行。在最初的时代，平信徒一般就称为护教学者。尤斯丁、塔提安、亚他那哥拉、阿里司提戴斯、赫尔玛斯、米努修、阿诺比乌和拉克唐修都是这样的人。同样也是在这个时代，基督教会最知名的一些辩护还来自其他平信徒，如德麦斯迪尔、夏多勃里昂、尼古拉斯、蒙塔龙贝和其他一些人。如果平信徒可以写作，平信徒学生也可以阅读；他们一定有能力阅读他们的父辈所写的东西。他们一定也会研究其他著作，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为教会还是为平信徒写的。这些著作尽管含有神学内容，就其结构和含义来说，仍然还是具有争辩性质。奥里根反驳塞尔苏斯的伟大著作、德尔图良的护教论、尤西比乌和西奥多雷有争议的论著，或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或文森迪乌·利汉伦西斯的小品文。我还得承认，我甚至都不会反对贝拉明争议文集中的部分内容，也不会反对苏亚雷斯论述法律的著作，更不用提梅尔基奥·卡努斯论述神学要义的那些文章。但是，就这些问题的细节而言，如我已经承认的，它们的确是相当棘手的，人们对此会持不同意见，哪怕总体的原则都是大家所一致接受的。可是，哪怕我们只是严格限制在哲学范围内，即从外部进行的宗教思考，我们仍然会有很多范围甚广的著述，实际运用起来也十分有价值，而其特征也是自由派的。这里面可以找到通常称为证据的东西，还有可构成当今特别兴趣的那些材料，即教会的附注。

But I have said enough in general illustration of the rule which I am recommending. One more remark I make, though it is implied in what I have been saying:—Whatever students read in the province of Religion, they read, and would read from the very nature of the case, under the superintendence, and with the explanations, of those who are older and more experienced than themselves.

可是，关于我推荐的那条准则，我已经说了很多解释性的话。虽然我前面一直在说的话里面已经隐含了这层意思，但我还是想再补上这么一句：无论学生在宗教领域看些什么材料，他们终归是要看的，而且他们会根据事情的本质进行阅读，是在监督之下阅读的，并得到解释，监督与解释者就是比他们年长也更有经验的那些人。

[6_1].This was written in June, 1854, before the siege began.

[6_2].Bombarding

[6_3].The Black Sea

[6_4].Here again Mr. Brown prophesies. He wrote in June, 1854.

[7_1].这部分是1854年六月写的，当时围攻尚未开始。

[7_2].炮击声

[7_3].黑海

[7_4].在这里，布朗先生又一次预言。他是1854年六月间写下这篇文章的。

Lecture 5. A Form of Infidelity of the Day

第五讲：今日一种形式的背信

1. Its Sentiments

第一节：背信者的态度

Though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at the present day, in consequence of the close juxtaposition and intercourse of men of all religions,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danger of the subtle, silent, unconscious perversion and corruption of Catholic intellects, who as yet profess, and sincerely profess, their submission to the authority of Revelation, still that danger is far inferior to what it was in one portion of the middle ages. Nay, contrasting the two periods together, we may even say, that in this very point they differ, that, in the medieval, since Catholicism was then the sole religion recognized in Christendom, unbelief necessarily made its advances under the language and the guise of faith; whereas in the present, when universal toleration prevails, and it is open to assail revealed truth (whether Scripture or Tradition, the Fathers or the “Sense of the faithful”), unbelief in consequence throws off the mask, and takes up a position over against us in citadels of its own, and confronts us in the broad light and with a direct assault. And I have no hesitation in saying (apart of course from moral and ecclesias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under correction of the command and policy of the Church), that I prefer to live in an age when the fight is in the day, not in the twilight; and think it a gain to be speared by a foe, rather than to be stabbed by a friend.

不可否认的是，当今，由于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士密切相处、交往频繁，至今仍然承认且真诚表白顺从启示权威的天主教知识分子，面临相当大的隐晦、沉默、潜在的反常与堕落危险，可是，这种危险相对中世纪某一时期而言仍然小得多。不仅如此，如果将这两个时期放在一起加以对照，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们彼此有所不同，即在中世纪，由于天主教当时是基督教世界唯一认可的宗教，不信的行为必然要使用信仰的语言并打着信仰的旗号才能行得通。而当今，由于盛行普遍宽容，人们可以公开攻击启示真理（无论是圣经还是传统，教父或“信仰者的感觉”），结果，不信者就可以扔掉面罩，在他们自己的要塞里摆出攻击我们的态势，并在光天化日之下直面我们，直接对我们发起攻击。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当然，要除开道德和教会方面的考虑，而且还有待教会教令及政策的纠正），我情愿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其时，战斗是在白天而不是黄昏进行，并且我认为被敌人的长矛刺中是一件幸事，远胜于挨朋友背后一刀。

I do not, then, repine at all at the open development of unbelief in Germany, supposing unbelief is to be, or at its growing audacity in England; not as if I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state of things, considered positively, but because, in the unavoidable alternative of avowed unbelief and secret, my own personal leaning is in favour of the former. I hold that unbelief is in some shape unavoidable in an age of intellect and in a world like this, considering that faith requires an act of the will, and presupposes the due exercise of religious advantages. You may persist in calling Europe Catholic, though it is not; you may enforce an outward acceptance of Catholic dogma, and an outward obedience to Catholic precept; and your enactments may be, so far, not only pious in themselves, but even merciful towards the teachers of false doctrine, as well as just towards their victims; but this is all that you can do; you cannot bespeak conclusions which, in spite of yourselves, you are leaving free to the human will. There will be, I say, in spite of you, unbelief

and immorality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you must be prepared for immorality more odious, and unbelief more astute, more subtle, more bitter, and more resentful, in proportion as it is obliged to dissemble.

假如不信是一件非有不可的事情，那么，我并不会抱怨其在德国公开的发展，也不会抱怨其在英国越来越厚颜无耻的进展。这并不是说，从肯定的意义上看，我满足于事情的现状，而是因为，假如公开声明不信还是秘密是无法避免的两难抉择，我个人的倾向是宁愿选择前者。我觉得，在一个才智时代和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发生某种形式的不信是无法避免的，这是因为必须考虑到，信仰要求一种意志的行动，并预设了宗教优势的及时体现。欧洲已经不再是天主教的天下了，尽管我们不妨坚持这么认为；人们也许可以被迫从外表上接受天主教教义，在外表上顺从天主教的训诫；就目前而言，这种做法也许不仅自身是尽责的，而且除了对虚假教条的受害者是公正的以外，甚至对这些虚假教条的教唆者而言还是仁慈的；可是，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我们并不能预先作出结论，哪怕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却还是将它们留给了人类意志去自由发挥。我要说，尽管我们不情愿，一直到世界末日到来，都还会有不信和不道德存在，而且我们还必须做好准备，因为还会有更可憎的不道德行为，根据不信被迫隐蔽的程度，还会有更狡黠，更微妙，更尖刻和更加充满忿恨的不信。

It is one great advantage of an age in which unbelief speaks out, that Faith can speak out too; that, if falsehood assails Truth, Truth can assail falsehood. In such an age it is possible to found a University more emphatically Catholic than could be set up in the middle age, because Truth can entrench itself carefully, and define its own profession severely, and display its colours unequivocally, by occasion of that very unbelief which so shamelessly vaunts itself. And a kindred advantage to this is the confidence which, in such an

age, we can place in all who are around us, so that we need look for no foes but those who are in the enemy's camp.

现在，不信能够公开声言，信仰也能公开声言，这是时代的极大优势，即如果谬误攻击真理，真理也可以回击谬误。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可能建立起这样一所大学，比较起中世纪来，它更加强调天主教特色，因为面对无耻自吹的不信时，真理能谨慎地掘沟自卫，能严格界定自己的专业，并确定无疑地展示自己的特色。与此类似的另一个优势是，在目前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对自己周围的所有人寄予信心，因此，除开身处敌营的那些人之外，我们并不需要到处寻找敌人。

2．

2．

The medieval schools were the *arena* of as critical a struggle between truth and error as Christianity has ever endured; and the philosophy which bears their name carried its supremacy by means of a succession of victories in the cause of the Church. Scarcely had Universities risen into popularity, when they were found to be infected with the most subtle and fatal forms of unbelief; and the heresies of the East germinated in the West of Europe and in Catholic lecture-rooms, with a mysterious vigour upon which history throws little light. The questions agitated were as deep as any in theology; the being and essence of the Almighty were the main subjects of the disputation, and Aristotle was introduced to the ecclesiastical youth as a teacher of Pantheism. Saracenic

expositions of the great philosopher were in vogue; and, when a fresh treatise was imported from Constantinople, the curious and impatient student threw himself upon it, regardless of the Church's warnings, and reckless of the effect upon his own mind. The acutest intellects became sceptics and misbelievers; and the head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Cæsar Frederick the Second, to say nothing of our miserable king John, had the reputation of meditating a profession of Mahometanism. It is said that, in the community at large, men had a vague suspicion and mistrust of each other's belief in Revelation. A secret society was discovered in the Universities of Lombardy, Tuscany, and France, organized for the propagation of infidel opinions; it was bound together by oaths, and sent its missionaries among the people in the disguise of pedlars and vagrants.

中世纪的学校，是基督教所承受过的真理与谬误之间最严酷的一场斗争的舞台，打着学校旗号的哲学，通过获得的一系列与教会相关的胜利而保住了霸权。大学刚一流行起来，就发现受到最微妙和最致命形式的不信的危害，东部的异端邪说在西欧和天主教的讲堂里萌芽，历史还没有揭示那种神秘的劲头。所激发起来的问题都是神学里面最深层的，争论的主题是无所不能者的存在与本质，亚里士多德也作为泛神论的导师而被介绍给青年人。对这位伟大哲学家进行的撒拉逊人风格的阐述流行起来，君士坦丁堡一有新文章出笼，好奇与没有耐心的学生就会扑上去阅读，全然不顾教会的警告，也不管这些文章对他们自己的思想会造成何等影响。结果，头脑最敏锐的知识分子也成为怀疑主义者和信奉异端的人。且不说我们可怜的约翰王，就连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也落下了默思伊斯兰教的名声。据说，在广义的基督教世界里，人们都有一种模糊的疑惑，对彼此在启示方面的信念都产生了一种不信任。在伦巴第、托斯卡纳和法兰西的大学里，都发现有秘密社团存在，这些社团的建立，都是为了组织起来宣传背信思想。秘密社团都有誓言约束，并派出传教士装扮成小贩和流

民深入民众。

The success of such efforts was attes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by the great extension of the Albigenses, and the prevalence of Manichean doctrine.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was obliged to limit the number of its doctors in theology to as few as eight, from misgivings about the orthodoxy of its divines generally. The narrative of Simon of Tournay, struck dead for crying out after lecture, “Ah! good Jesus, I could disprove Thee, did I please, as easily as I have proved,” whatever be its authenticity, at least may be taken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frightful peril to which Christianity was exposed. Amaury of Chartres was the author of a school of Pantheism, and has given his name to a sect; Abelard, Roscelin, Gilbert, and David de Dinant, Tanquelin, and Eon, and others who might be named, show the extraordinary influence of anti-Catholic doctrines on high and low. Ten ecclesiastics and several of the populace of Paris were condemned for maintaining that our Lord's reign was past, that the Holy Ghost was to be incarnate, or for parallel heresies.

这些叛教之举获得成功，可从法国南方阿尔比教派信徒人数大增和摩尼教的流行略见一斑。巴黎大学因对其神学家一般意义上的正统性产生忧虑，被迫将其神学博士名额限制到仅只八名。陶奈的西蒙的叙述，因他在课后的惊呼产生巨大影响：“啊，好心的耶稣，只要我愿意，就可以证明你并不存在，对我来说，这根本不费吹灰之力。”无论这事是否真实，但足以充当基督教当时所感受到的可怕危险的代表。班那的阿马力是泛神论派作家，有一个宗派就以他的名字命名。阿伯拉尔、洛色林、吉尔伯特和迪南的大卫、坦克林和伊恩及其他可以列出来的人名，都曾对各种各样反天主教教义的活动产生过影响。因为坚持认为我主统治已经过去，认为圣灵将肉身化或类似邪

说，巴黎共有十名教会人员和多名普通民众被定罪。

Frederick the Second established a University at Naples with a view to the propagation of the infidelity which was so dear to him. It gave birth to the great St. Thomas, the champion of revealed truth. So intimate was the intermixture, so close the grapple, between faith and unbelief. It was the conspiracy of traitors, it was a civil strife, of which the medieval seats of learning were the scene.

腓特烈二世在那不勒斯建了一所大学，旨在传播他珍视的背信思想。这就导致了伟大的圣托马斯的诞生，他是启示真理的拥护者。信与不信者之间的混杂如此密切难分，相互的格斗如此贴近。那是叛教者的密谋，是一场内乱，而中世纪的学堂就是骚乱的根源。

In this day, on the contrary, Truth and Error lie over against each other with a valley between them, and David goes forward in the sight of all men, and from his own camp, to engage with the Philistine. Such is the providential overruling of that principle of toleration, which was conceived in the spirit of unbelief, in order to the destruction of Catholicity. The sway of the Church is contracted; but she gains in intensity what she loses in extent. She has now a direct command and a reliable influence over her own institutions, which was wanting in the middle ages. A University is her possession in these times, as well as her creation: nor has she the need, which once was so urgent, to expel heresies from her pale, which have now their own centres of attraction elsewhere, and spontaneously take their departure. Secular advantages no longer present an inducement to hypocrisy, and her members in consequence have the consolation of being able to be sure of each

other. How much better is it, for us at least, whatever it may be for themselves (to take a case before our eyes in Ireland), that those persons, who have left the Church to become ministers in 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should be in their proper place, as they are, than that they should have perforce continued in her communion! I repeat it, I would rather fight with unbelief as we find i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an as it existed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今天，情形却恰恰相反，真理与谬误彼此对峙，相互却如隔水火，大卫当着众人的面走上前去，出营面对非利士人。这就是神意对那种宽容原则的否决，而宽容原则是在不信者的思想里构想出来的，目的是要毁灭天主教信仰。教会的影响缩小了，但是，在范围上的损失，她却在强度上收了回来。现在，她对自己的机构中下达直接的命令并产生可靠的影响，而这在中世纪是没有的。大学是教会的创造物，也是她在这个时代的财产。虽然在过去是那么紧迫，但教会现在并不需要在教会范围内清除异端邪说，因这些邪说现在已经在别处有了它们自己的引力中心，并自行离开了。世俗的优势再不能为虚伪提供一种诱惑了，结果，教会成员可得到彼此确信的安慰。（在爱尔兰，就拿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例子打比方）离开罗马教会，到信新教的圣公会去当牧师的那些人，如果这样做适得其所，那就比让他们继续留在罗马教会内好得多，对他们而言，至少对我们自己，这岂非美事！我重复说一次，宁可与我们在十九世纪发现的不信作战，也不愿见到十二和十三世纪的那种不信。

3．

3．

I look out, then, into the enemy's camp, and I try to trace the outlines of the hostile movements and the preparations for assault which are there in agitation against us. The arming and the manoeuvring, the earth-works and the mines, go on incessantly; and one cannot of course tell, without the gift of prophecy, which of his projects will be carried into effect and attain its purpose, and which will eventually fail or be abandoned. Threatening demonstrations may come to nothing; and those who are to be our most formidable foes, may before the attack elude our observation. All these uncertainties, we know, are the lot of the soldier in the field: and they are parallel to those which befall the warriors of the Temple. Fully feeling the force of such considerations, and under their correction, nevertheless I make my anticipations according to the signs of the times; and such must be my *proviso* , when I proceed to describe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one particular form of infidelity, which is coming into existence and activity over against us, in the intellectual citadels of England.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敌营。我尽量勾勒出充满敌意的调动轮廓，描述一下蠢蠢欲动、就要对我们发动攻击的备战活动。装备与调动、修筑工事与布雷，这些活动一刻不停地进行着。如果没有预言的天赋，人们当然无法看出，敌人的哪一项行动最终会生效并实现其目标，哪些行动最终会失败或放弃。恐吓活动也许根本就不奏效。那些准备成为我们不共戴天之死敌的人，在发动攻击之前也许会躲避我们的侦察。我们知道，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都是战场上的士兵的命运，而且这些不确定性与落在圣殿武士头上的命运相类似。我完全能够感觉到，这些考虑深重难测，也必须等待其纠正，可是，我还是要根据时代的迹象拿出我的预言。当我继续描述英国的智力城堡里即将到来且即将对我们采取行动的某一特定形式的背信特征时，这一预见就是我的附带条件。

It must not be supposed that I attribute, what I am going to speak of as a form of infidelity of the day, to any given individual or individuals; nor is it necessary to my purpose to suppose that any one man as yet consciously holds, or sees the drift, of that portion of the theory to which he has given assent. I am to describe a set of opinions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true explanation of many floating views, and the converging point of a multitude of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minds; and, as of old Arius or Nestorius not only was spoken of in his own person, but was viewed as the abstract and typical teacher of the heresy which he introduced, and thus his name denoted a heretic more complete and explicit, even though not more formal, than the heresiarch himself, so here too, in like manner, I may be describing a school of thought in its fully developed proportions, which at present every one, to whom membership with it is imputed, will at once begin to disown, and I may be pointing to teachers whom no one will be able to descry. Still, it is not less true that I may be speaking of tendencies and elements which exist, and he may come in person at last, who comes at first to us merely in his spirit and in his power.

我准备当作当今一种形式的不信而谈起的东西，不能假定为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从我的目的来说，也不需要假定有哪个人目前有意持有这种观点，不需要明白他所同意的那个学说之某一部分的含义。我即将描述的一组意见，也许可看作对许多流行看法的准确解释，也是各个不同和彼此独立的众多人的交汇点。而且，就如同古老的阿里乌或聂斯脱利不仅仅被人谈及他们本人，而且还被人看作是他们推出的那种邪说的抽象和典型的教师，因此，他们的名字本身就表明一种异端，比异端首领自身还要彻底和明显，虽然并没有更具形式意义。同样，在这里，我也许只是在完整全面地描述一个思想流派，而当前属于这个流派成员的任何人可能立即开始否认，而且我也许只是在指认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看出来的那些思想导师。尽管如此，却

不能说我谈到的一些倾向和要素就不存在。一些最初纯粹在精神上和权力上信服我们的人，最终可能亲自来到我们这一边。

The teacher, then, whom I speak of, will discourse thus in his secret heart:—He will begin, as many so far have done before him, by laying it down as if a position which approves itself to the reason, immediately that it is fairly examined, which is of so axiomatic a character as to have a claim to be treated as a first principle, and is firm and steady enough to bear a large superstructure upon it,—that Religion is not the subject-matter of a science. “You may have opinions in religion, you may have theories, you may have arguments, you may have probabilities; you may have anything but demonstration, and therefore you cannot have science. In mechanics you advance from sure premisses to sure conclusions; in optics you form your undeniable facts into system, arrive at general principles, and then again infallibly apply them: here you have Sci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t present no real science of the weather, because you cannot get hold of facts and truths on which it depends; there is no science of the coming and going of epidemics; no science of the breaking out and the cessation of wars; no science of popular likings and dislikings, or of the fashions. It is not that these subject-matters are themselves incapable of science, but that, under existing circumstances, *we* are incapable of subjecting them to it. And so, in like manner,” says the philosopher in question, “without denying that in the matter of religion some things are true and some things false, still we certainly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determine the one or the other. And, as it would be absurd to dogmatize about the weather, and say that 1860 will be a wet season or a dry season, a time of peace or war, so it is absurd for men in our present state to teach anything positively about the next world, that there is a heaven, or a hell, or

a last judgment, or that the soul is immortal, or that there is a God. It is not that you have not a right to your own opinion, as you have a right to place implicit trust in your own banker, or in your own physician; but undeniably such persuasions are not knowledge, they are not scientific, they cannot become public property,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your allowing your friend to entertain the opposite opinion; and, if you are tempted to be violent in the defence of your own view of the case in this matter of religion, then it is well to lay seriously to heart whether sensitiveness on the subject of your banker or your doctor, when he is handled sceptically by another, would not be taken to argue a secret misgiving in your mind about him, in spite of your confident profession, an absence of clear, unruffled certainty in his honesty or in his skill."

所以，我所说的那种教师，可能会在心里悄悄地说：宗教并非一门学科的素材。就如同在他前面的许多人已经做过的一样，他首先会将上面那个观点摆出来，就好像这个立场自身就是理性的明证，当人们对它进行公平的评判时，立即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其特征如此明显，本应当视作第一原则的，并且确定和牢靠到可以在上面附加上层建筑。“你不妨形成宗教方面的意见，不妨拥有一些学说，不妨拥有一些论证，不妨拥有或然性，但你就是无法演示出来，因此，你就无法拥有一门科学。在力学中，人们从确定的前提进展到确定的结论；在光学中，人们从无可否认的事实进展到方法，得出一般原理，之后准确无误地运用这些原理。在这里，人们得到的就是科学。另外一方面，目前并不存在关于气候的真正科学，因为无法找到它所依赖的事实与真相。还不存在关于流行病来来去去的科学。关于战争爆发与结束的科学也不存在。人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也就是时尚的科学也不存在。并不是说，这些素材自身就无法构成科学，而是说在现存条件下，我们无法使这些素材归入科学名下。“同样”，所说的这位哲学家说，“我们并不否认，在宗教事务中，也有某些东西是真实的，某些东西是虚假的，但我们肯定并不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以至于可以确

定孰真孰假。由于就天气提出武断意见，预测来年会是湿季或干季，是和平或战争年代是荒唐之举，同样，依照我们当前的状态妄言来世，认为有天堂有地狱，或有最后审判，或认为灵魂不死，或认为存在上帝，也都属荒唐之举。并不是说，人就无权产生某种看法，就像人有权对自己的银行家或医生保持绝对信任的那种权利。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样的信念并不是知识，它们不是科学性质的东西，他们不能成为公共财产，他们与允许自己的朋友保持不同意见是类似的。而且，假如在宗教事务中，人为辩护自己的观点而想动粗，那么，我们就得在心里认真想一想，当别人对自己的银行家或医生抱有怀疑，对这个话题的敏感度会否让你在心里对他产生某种隐忧，即尽管你对其诚实或技能有信任一说，却缺乏清晰明确的肯定性。”

Such is our philosopher's primary position. He does not prove it; he does but distinctly state it; but he thinks it self-evident when it is distinctly stated. And there he leaves it.

这就是我们那位哲学家的初始立场。他并没有证明它。他只是明确地说出了这个立场。但是，当他这么明确说明的时候，他认为那就是不证自明的了。之后，他就不再管它。

4．

4．

Taking his primary position henceforth for granted, he will proceed as follows:—“Well, then, if Religion is just one of those subjects about which we can know nothing, what can be so absurd

as to spend time upon it? What so absurd as to quarrel with others about it? Let us all keep to our own religious opinions respectively, and be content; but so far from it, upon no subject whatever has the intellect of man been fastened so intensely as upon Religion. And the misery is, that, if once we allow it to engage our attention, we are in a circle from which we never shall be able to extricate ourselves. Our mistake reproduces and corroborates itself. A small insect, a wasp or a fly, is unable to make his way through the pane of glass; and his very failure is the occasion of greater violence in his struggle than before. He is as heroically obstinate in his resolution to succeed as the assailant or defender of some critical battlefield; he is unflagging and fierce in an effort which cannot lead to anything beyond itself. When, then, in like manner, you have once resolved that certain religious doctrines shall be indisputably true, and that all men ought to perceive their truth, you have engaged in an undertaking which, though continued on to eternity, will never reach its aim; and, since you are convinced it ought to do so, the more you have failed hitherto, the more violent and pertinacious will be your attempt in time to come. And further still, since you are not the only man in the world who is in this error, but one of ten thousand, all hold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 that Religion is scientific, and yet all differing as to the truths and facts and conclusions of this science, it follows that the misery of social disputation and disunion is added to the misery of a hopeless investigation, and life is not only wasted in fruitless speculation, but embittered by bigoted sectarianism.

假定他的这个初始立场从此以后是可信的，那他会照下面这样继续下去："嗯，假如宗教就是我们无法知道任何事情的主题之一，那么，在这上面花时间不是荒唐透顶吗？就此与别人发生争论不也是荒唐的事情吗？让我们各自保持自己的宗教观点，并满足于此吧。可是

远非如此，人的才智如此密切地固着于宗教之上，远远超出别的任何话题。而且可悲的事情就在于，我们的注意力一旦关注起这个话题来，从此就会落入一个圈套，无望也无法从中爬出来。我们的错误会复制，并不断巩固自身。一只小昆虫，一个蜘蛛或一只苍蝇是无法穿透窗玻璃的，但它越是不能穿透玻璃，它便越是会花费比以前更大的力气想穿过去。它决心获得成功，从而显示出惊人的倔强，就如同关键战场上作战的攻击者或防御者。尽管不过是一场根本不会成功的争斗，却仍然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同样，我们一旦死认某些宗教教条是不可争辩的真理，认为所有人都应当感受到他们看到的真理，那我们实际上就参与了这样一项事业，尽管它会持续到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到达其目标。由于我们认定事情会是如此，因此，我们目前失败越是多，我们在余生里继续努力的劲头就越是大，越是执拗顽固。再者，由于世上犯这种错误的人很多，我们自己不过是其中万分之一，而所有人都坚持这样一条总体原则，即认为宗教就是科学性质的，但是，它又与这门科学的真理及事实和结论完全不同，因此就必然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社会性的争执和分裂的不幸会增添到一种无望探究的悲哀之上，因此不仅生命在无结果的思索中浪费，而且还由于顽固的宗派意识而苦上加苦。

“Such is the state in which the world has laid,” it will be said, “ever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Christianity has been the bane of true knowledge, for it has turned the intellect away from what it can know, and occupied it in what it cannot. Differences of opinion crop up and multiply themselves, in proportion to the difficulty of deciding them; and the unfruitfulness of Theology has been, in matter of fact, the very reason, not for seeking better food, but for feeding on nothing else. Truth has been sought in the wrong direction, and the attainable has been put aside for the visionary.”

人们会说："自从有了基督教之后，整个世界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了。基督教一直都是真正知识的祸害，因为它使人的才智远离它能够了解的东西，而去研究它根本无法了解的东西。根据决定意见分歧的难度，意见分歧本身会不断出现和成倍增长，而神学这种无结果的研究，事实上向来都是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即人们不是去寻找更好的食物，反倒是别的什么都不吃。人们沿着错误的方向寻找真理，可能得到的东西已经被搁置一边，反倒去寻找虚幻不实的东西。"

Now, there is no call on me here to refute these arguments, but merely to state them. I need not refute what has not yet been proved. It is sufficient for me to repeat what I have already said, that they are founded upon a mere assumption. *Supposing* , indeed, religious truth cannot be ascertained, *then* , of course, it is not only idle, but mischievous, to attempt to do so; *then* , of course, argument does but increase the mistake of attempting it. But surely both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 have written solid defences of Revel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of dogma, as such, and these are not simply to be put aside without saying why. It has not yet been shown by our philosopher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religious truth is really incapable of attainm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t least been powerfully argued by a number of profound minds that it *can* be attained; and the *onus probandi* plainly lies with those who are introducing into the world what the whole world feels to be a paradox.

我并不需要在此驳斥这些论点，仅只需要加以说明。目前未加证明的东西，我并不需要驳斥。把我已经说过的话重复一次便足矣，即它们基于纯粹的假定。的确，假定宗教真理无法确定，那么，当然，想这么做就不仅仅是无益的，而且还是有害的。当然，此时进行论证，就只会加重尝试这么做的错误。可是，天主教和新教肯定也都有

了为启示，为基督教，为所说的教义而写的内容实在的辩护著作，不可简单地弃置一边而不加任何解释。我们的哲学家们目前还没有证明，宗教真理真的无法企及这个说法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另外一方面，至少已经有很多深思熟虑的人进行过有力的论证，说明宗教真理是有可能获得的，而举证责任却明显在那些把世人觉得纯属吊诡之论的东西引入世界的人那边。

5．

5．

However, where men really are persuaded of all this, however unreasonable, what will follow? A feeling, not merely of contempt, but of absolute hatred, towards the Catholic theologian and the dogmatic teacher. The patriot abhors and loathes the partizans who have degraded and injured his country; and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the advocate of the human race, feels bitter indignation at those whom he holds to have been its misleaders and tyrants for two thousand years.

然而，无论怎么不合道理，假如人们当真被劝信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形呢？就会有一种感觉，不仅仅是轻蔑，而且是绝对的憎恨，对天主教的神学家和教义问答老师来说都是如此。爱国者憎恨和讨厌贬低和祸害国家的党人，而世界公民，也就是人类种族的拥护者，却会对他认为就是过去两千年来的误导者和暴君的那些人义愤填膺。

“The world has lost two thousand years. It is pretty much where it was in the days of Augustus. This is what has come of priests.” There are those who are actuated by a benevolent liberalism, and condescend to say that Catholics are not worse than other maintainers of dogmatic theology. There are those, again, who are good enough to grant that the Catholic Church fostered knowledge and science up to the days of Galileo, and that she has only retrograded for the last several centuries. But the new teacher, whom I am contemplating in the light of that nebula out of which he will be concentrated, echoes the words of the early persecutor of Christians, that they are the “enemies of the human race.” “But for Athanasius, but for Augustine, but for Aquinas, the world would have had its Bacons and its Newtons, its Lavoisiers, its Cuviers, its Watts, and its Adam Smiths, centuries upon centuries ago. And now, when at length the true philosophy has struggled into existence, and is making its way, what is left for its champion but to make an eager desperate attack upon Christian theology, the scabbard flung away, and no quarter given? and what will be the issue but the triumph of the stronger,—the overthrow of an old error and an odious tyranny, and a reign of the beautiful Truth?”

“世界损失了两千年。现在还停留在奥古斯丁的时代。这些都是僧侣造成的。”还有一些人受到一种仁慈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屈尊发话，说天主教徒较之其他坚守教义神学的人来说还不算太糟糕。另还有一些人，他们的心肠足够好，因此承认，天主教会一直到伽利略的时代都还在激励知识与科学，只不过在最后的几个世纪里才走上倒退的道路。可是，那位我借助那道星云之光进行思考的新教师，也是借助这星云之光来集中谈论他的，他在回应基督徒的早期迫教者的话时说，他们都是“人类的敌人。”“可是，要不是阿塔那修，不是奥古斯丁，不是阿奎那，这世界可能不知道多少世纪之前便已经有了有它的培根与牛顿，它的拉瓦锡与居维叶，瓦特和亚当·史密

斯。”而现在，当真正的哲学终于诞生，正在努力成长，对它的拥护者来说，除了对基督教神学进行热切的致命攻击，夺去它的枪套，剥夺其生存空间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的？而且，除开强者获胜，即颠覆旧有的谬误，推翻可憎的暴政并让美好的真理代行统治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好说的吗？”

Thus he thinks, and he sits dreaming over the inspiring thought, and longs for that approaching, that inevitable day.

他就是这么想的，而且他坐在那里梦想那些极富启迪性的念头，并渴望这一天，那不可避免的日子早点到来。

There let us leave him for the present, dreaming and longing in his impotent hatred of a Power which Julian and Frederic, Shaftesbury and Voltaire, and a thousand other great sovereigns and subtle thinkers, have assailed in vain.

此时，让我们允许他坐在那里继续想，继续做梦和渴望，并对一股强大力量充满无益的憎恨，就是朱利安和腓特烈、莎夫次伯里和伏尔泰，以及其他上千位统治者和狡黠的思想家们大加攻击却无济于事的那股力量。

2. Its Policy

第二节：背信者的方针

1．

1．

It is a miserable time when a man's Catholic profession is no voucher for his orthodoxy, and when a teacher of religion may be within the Church's pale, yet external to her faith. Such has been for a season the trial of her children at various eras of her history. It was the state of things during the dreadful Arian ascendancy, when the flock had to keep aloof from the shepherd, and the unsuspicious Fathers of the Western Councils trusted and followed some consecrated sophist from Greece or Syria. It was the case in those passages of medieval history when simony resisted the Supreme Pontiff, or when heresy lurked in Universities. It was a longer and more tedious trial, while the controversies lasted with the Monophysites of old, and with the Jansenists in modern times. A great scandal it is and a perplexity to the little ones of Christ, to have to choose between rival claimants upon their allegiance, or to find a condemnation at length pronounced upon one whom in their simplicity they have admired. We, too, in this age have our scandals, for scandals must be; but they are not what they were once; and if it be the just complaint of pious men now, that never was infidelity so rampant, it is their boast and conso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at never was the Church less troubled with false teachers, never more united.

当一位天主教徒对其信仰的剖白不再是其正统性的保证，当一位宗教教师可能居于教会的范围之内，却不再信仰天主教时，这个时代就很可悲了。由于某种原因，这就是教会史上不同时代对天主教的儿女的试炼。当可怕的阿里乌教派处在统治地位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当时，羊群离开牧羊人的照管，粗心大意的西部教会教父们信赖

那些来自希腊或叙利亚的已成圣徒的智者，并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中世纪的某些时期，买卖圣职的行为曾抵制了罗马教皇，异端邪说也隐藏在大学的各个角落。那是更长时期和更枯燥乏味的考验。其时，自古就有之的一性论派和现代的詹森派的争议持续不断。对于初信仰基督教的人来说，被迫在竞争的原告之间选择效忠对象，或被迫为他们因头脑简单而曾经崇拜过、但最终却被断定为有罪的人找到一条谴责的理由，真是莫大的丑闻和困惑。我们这个时代也有自己的丑闻，毕竟丑闻总是必不可少的。可是，这些丑闻的性质和之前大不相同。假如这些丑闻只是一些虔信者正当的抱怨，那便算不上是很猖獗的背信，而是他们的自夸和安慰。换句话说，那就意味着教会将永远都不再受虚假教师的困扰，且达成了空前的团结。

False teachers do not remain within her pale now, because they can easily leave it, and because there are seats of error external to her to which they are attracted. “They went out from us,” says the Apostle, “but they were not of us; for if they had been of us, they would no doubt have continued with us: but that they might be made manifest that they are not all of us.” It is a great gain when error becomes manifest, for it then ceases to deceive the simple. With these thoughts I began to describe by anticipation the formation of a school of unbelief external to the Church, which perhaps as yet only exists, as I then expressed it, in a nebula. In the middle ages it might have managed, by means of subterfuges, to maintain itself for a while within the sacred limits,—now of course it is outside of it; yet still, from the intermixture of Catholics with the world, and the present immature condition of the false doctrine, it may at first exert an influence even upon those who would shrink from it if they recognized it as it really is and as it will ultimately show itself. Moreover, it is natural, and not unprofitable, for persons under our circumstances to speculate on the forms of error with which a University of this age will have to contend, as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 had their own special antagonists. And for both reasons I am hazarding some remarks on a set of opinions and a line of action which seems to be at present, at least in its rudiments, in the seats of English intellect, whether the danger dies away of itself or not.

假教师已经不在教会的范围之内了，因为他们很容易就离开教会，也因为教会之外还有其他容纳谬误的地方吸引着他们。“他们从我们这里出去”，那位使徒说，“却与我们不是一类人。假如他们与我们是一类人，他们无疑会与我们继续待在一起，这可以清楚地证明，他们并非与我们完全一样的人。”谬误变得十分清楚时，反倒是件好事，因为这个时候，谬误就无法再去蒙骗头脑简单的人了。本着这些想法，我开始通过预测来描述教会外一个不信教的流派，就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那样，这个流派的存在目前可能仅仅是云山雾罩而已。在中世纪，借着种种托辞，它兴许能在宗教的范围内维持一段时期。现在，它当然已经处在宗教范围之外，由于天主教徒与世人生活在一处，也因为那种错误的教义目前尚不成熟，一开始，它也许会对这样一些人产生影响，如果他们认清了它的真相，当然最终它也会自我暴露，他们也会避之不及。另外，对于处在我们所说情形之下的那些人来说，如果推断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必须像中世纪的大学一样，和他们自己特别的对手就谬误进行争辩，那是相当自然，而且也不是没有益处的。由于上述两重原因，我大胆地揣测，当前看来存在、至少在英国才智之所，就其在基础阶段存在着的一些意见和一系列行动发表某些意见，无论这危险是不是自行消退的。

I have already said that its fundamental dogma is, that nothing can be known for certain about the unseen world. This being taken for granted as a self-evident point, undeniable as soon as stated, it goes on, or will go on, to argue that, in consequence, the immense outlay which has been made of time, anxiety, and toil, of health,

bodily and mental, upon theological researches, has been simply thrown away; nay, has been, not useless merely, but even mischievous, in as much as it has indirectly thwarte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ies of far greater promise and of an evident utility. This is the main position of the School I am contemplating; and the result, in the minds of its members, is a deep hatred and a bitter resentment against the Power which has managed, as they consider, to stunt the world's knowledge and the intellect of man for so many hundred years. Thus much I have already said, and now I am going to state the line of policy which these people will adopt, and the course of thought which that policy of theirs will make necessary to them or natural.

我已经说过，其基本的信条就是，关于无形的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确定的。假如把这理所当然地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观点，只要说出来便无可否认，那么结果是，已经在神学研究中投入的时间、焦虑、劳动及身心两方面的健康等的巨大花费可能将会荡然无存。不仅如此，这花费不仅仅是一无用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间接地阻碍了其他学科的培育，而发展这些学科有着大得多的希望和明显的用处。这是我所考虑的那个学派最主要的立场，在其成员的脑海中，对那种阻碍力量怀着深深的怨恨和极度的厌恶，因为在他们看来，那股力量在过去数百年里尽其所能地阻碍了世上知识和人类才智的发展。已经说了这么多，现在我准备阐明这些人愿意采纳的方针及使这方针成为必然或自然的思想轨迹。

2．

2．

Supposing, then, it is the main tenet of the School in question, that the study of Religion as a science has been the bane of philosophy and knowledge, what remedy will its masters apply for the evils they deplore? Should they profess themselves the antagonists of theology, and engage in argumentative exercises with theologians? This evidently would be to increase, to perpetuate the calamity. Nothing, they will say to themselves, do religious men desire so ardently, nothing would so surely advance the cause of Religion, as Controversy. The very policy of religious men, they will argue, is to get the world to fix its attention steadily upon the subject of Religion, and Controversy is the most effectual means of doing this. And their own game, they will consider, is, on the contrary, to be elaborately silent about it. Should they not then go on to shut up the theological schools, and exclude Religion from the subjects scientifically treated in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This indeed has been, and is, a favourite mode of proceeding with very many of the enemies of Theology; but still it cannot be said to have been justified by any greater success than the policy of Controvers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ndon University only gave immediate occas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King's College, founded on the dogmatic principle; and the liberalism of the Dutch government led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Louvain. It is a well-known story how the very absence of the statues of Brutus and Cassius brought them more vividly into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Roman people. When, then, in a comprehensive scheme of education, Religion alone is excluded, that exclusion pleads in its behalf. Whatever be the real value of Religion, say these philosophers to themselves, it has a name in the world, and must not be ill-treated, lest men should rally round it from a feeling of generosity. They will decide, in consequence, that the exclusive method, though it has met with favour in this generation, is quite as much a mistake as the controversial.

假如所说的这个流派的基本信条是，宗教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向来都是哲学和知识的祸害，那么，针对他们谴责的这些邪恶，他们的大师有何疗治的妙方呢？他们会声称自己是神学的大敌，并参与针对神学家的辩论吗？若果如此，那明显就会加重这场灾难，并使其长存下去。根本不会，他们会对自己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争辩更让信教的人求之若渴，且更能推进宗教事业的。他们会主张说，信教者的策略本身，就是想让世人的注意力固定在宗教主题上，而争辩就是这么做的最好办法。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游戏却与此相反，是要对此保持巧妙的沉默。他们难道不会进而让神学派别闭嘴，并将宗教排斥在哲学教育中以科学方法进行处置的那些主题之外？这向来都是，现在也是，对付神学的许多敌人的最有利方法，但是，我们还不能够说它的证明已经取得任何程度上的成功，仅仅只是争议的策略而已。伦敦大学的建立，正是基于教义原理的国王学院成立的直接原因，而荷兰政府的自由主义思想却导致了鲁汶大学的恢复。罗马并没有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雕像，而这样反倒使他们更生动地活在罗马人民的记忆里，这是极其著名的一个故事。因此，单独将宗教排斥在一个综合教育计划之外时，这种排斥行为本身都是一种申诉。这些哲学家对他们自己说，无论宗教真正的价值何在，它在这世上已经有了一个名称，因此也不可胡乱处置，以防人们出自一种宽宏大量的情感而聚拢在它周围。结果他们就必须决定，尽管在这一代人当中曾风靡一时，这种排斥宗教的方法，却会是与争辩犯同样的错误。

Turning, then, to the Universities of England, they will pronounce that the true policy to be observed there would be simply to let the schools of Theology alone. Most unfortunate it is that they have been roused from the state of decadence and torpor in which they lay some twenty or thirty years ago. Up to that time, a routine lecture, delivered once to successive batches of young men destined for the Protestant Ministry, not during their residence, but when they were leaving or had already left the University,—and

not about dogmatics, history, ecclesiastical law, or casuistry, but about the list of authors to be selected and works to be read by those who had neither curiosity to read them nor money to purchase;—and again a periodical advertisement of a lecture on the Thirty-nine Articles, which was never delivered because it was never attended,—these two demonstrations, one undertaken by one theological Professor, the other by another, comprised the theological teaching of a seat of learning which had been the home of Duns Scotus and Alexander Hales. What envious mischance put an end to those halcyon days, and revived the *odium theologicum* in the years which followed? Let us do justice to the authoritative rulers of the University; they have their failings; but not to them is the revolution to be ascribed. It was nobody's fault among all the guardians of education and trustees of the intellect in that celebrated place. However, the mischief has been done; and now the wisest course for the interests of infidelity is to leave it to itself, and let the fever gradually subside; treatment would but irritate it. Not to interfere with Theology, not to raise a little finger against it, is the only means of superseding it. The more bitter is the hatred which such men bear it, the less they must show it.

我们现在转向英国的大学。他们会说，在那里真正实行的政策很简单，不过就是让神学派别自行其是而已。然而最不幸的事情是，他们已经从约二、三十年前的颓废与麻木中苏醒过来。此前，每次都会为准备充当新教牧师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举办一场例行讲座，这讲座并非当学生在校时进行，而是在学生正要离校或已经离校后举办。而且这讲座并非关于教义，而是关于要选择进来的一批权威名单和学生必读的书目，所列之书，学生既没有兴趣读，也没钱去购买。这还是一种就三十九条信纲进行定期讲座的广告，三十九条信纲从没被宣达过，由于从来都没有人去听讲座。这两种演示，一种是由讲神学的教授做的，另一种则由另外一个人演示，它们构成了一个学府的神学教

学，而这个学府曾是邓司·司各脱和亚历山大·哈尔斯的故乡。是哪些因妒嫉而起的不幸终结了太平日子，并使随后而至的神学家之间的反感得以复活？我们应当对大学的权威统治者公平一些，虽然他们不乏过错，但是，却不能把革命归咎到他们头上。在那所著名的大学里，无论是教育保护者还是才智的受托人，根本就不是他们中间任何人的错。可是，伤害已经造成，现在，对于不信者而言，最聪明的办法是把整个事件留给自己来处理，让高烧慢慢消退。此时采取任何措施，反倒会适得其反。不要干扰神学，不要对神学竖小指头，这是代替它的唯一办法。人们为此所怀的苦涩越是深，他们就越是应当较少显露出来。

3．

3．

What, then, is the line of action which they must pursue? They think, and rightly think, that, in all contests, the wisest and largest policy is to conduct a positive, not a negative opposition, not to prevent but to anticipate, to obstruct by constructing, and to exterminate by supplanting. To cast any slight upon Theology, whether in its Protestant or its Catholic schools, would be to elicit an inexhaustible stream of polemics, and a phalanx of dogmatic doctors and confessors.

他们接下来会采取哪一条行动路线呢？他们认为，而且觉得这想法不无道理：在所有的竞赛中，最聪明和最宽宏大量的政策，都是要摆出积极而非消极的对抗姿势，不是要阻止，而是要期盼，通过建造来阻挡，通过代替来消除。无论是在新教的学校还是在天主教的学

校，只要稍微触及神学，就会激发一种无止境的争辩，进而涌现大批量的研究教义的博士与教授。

Let alone Camarina, for 'tis best let alone.

“放手吧，卡玛林纳，因为最好还是放手。”

The proper procedure, then, is, not to oppose Theology, but to rival it. Leave its teachers to themselves; merely aim at the introduction of other studies, which, while they have the accidental charm of novelty, possess a surpassing interest, richness, and practical value of their own. Get possession of these studies, and appropriate them, and monopolize the use of them, to the exclusion of the votaries of Religion. Take it for granted, and protest, for the future, that Religi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tudies to which I am alluding, nor those studies with Religion. Exclaim and cry out, if the Catholic Church presumes herself to handle what you mean to use as a weapon against her. The range of the Experimental Sciences, viz.,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many departments of physics, various both in their subject-matter and their method of research; the great Sciences which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era, and which become the more marvellous, the more thoroughly they are understood,—astronomy, magnetism, chemistry, geology, comparative anatomy, natural history, ethnology, languages, political geography, antiquities,—these be your indirect but effectual means of overturning Religion! They do but need to be seen in order to be pursued; you will put an end, in the Schools of learning, to the long reign of the unseen shadowy world, by the mere exhibition of the visible. This was

impossible heretofore, for the visible world was so little known itself; but now, thanks to the New Philosophy, sight is able to contest the field with faith. The medieval philosopher had no weapon against Revelation but Metaphysics; Physical Science has a better temper, if not a keener edge, for the purpose.

所以，最合适的办法就是不要反对神学，而是要与它竞争。让神学教师们自行其是，仅只注意其他学科的引入，这些学科既有新奇性的附属魅力，又具备非凡的趣味性、丰富性和自身的实用价值。占有这些学科，为其拨款，垄断其利用，借以摒除那些宗教的热心支持者。自此理所当然地断言，宗教与我所指的那些学科研究毫无关系，那些研究与宗教也没有任何关系。假如天主教会擅自动用你准备用来对付她的武器，那就要惊叫，要大声呼喊。实验科学的范围，也就是包括心理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物理学在内的许多部门，彼此之间的素材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作为这个时代的特征的那些伟大学科，就是越来越神奇、理解得越来越透彻的那些学科，如天文学、电磁学、化学、地质学、比较解剖学、自然史、民族学、语言学、政治地理学、古代史研究等，这些都是我们颠覆宗教的间接手段，也是何其有效的手段！这些学科只需要现身便会有人来追求，在各个学院里，只需要展示可见的世界，就可以终结看不见的影子世界的统治。此前，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可见世界自身都鲜有人知。但现在，由于新哲学的出现，人们的见解能够相当自信地争夺地盘了。中世纪的哲学家，除了形而上学以外并无别种武器攻击启示，而自然科学却是实现这目标的有利武器，假如不是因为有更大优势，起码也因为有更大的耐心。

Now here I interrupt the course of thought I am tracing, to introduce a *caveat* , lest I should be thought to cherish any secret disrespect towards the sciences I have enumerated, or apprehension of their legitimate tendencies; whereas my very object is to protest

against a monopoly of them by others. And it is not surely a heavy imputation on them to say that they, as other divine gifts, may be used to wrong purposes, with which they have no natural connection, and for which they were never intended; and that, as in Greece the element of beauty, with which the universe is flooded, and the poetical faculty, which is its truest interpreter, were made to minister to sensuality; as, in the middle ages, abstract speculation, another great instrument of truth, was often frittered away in sophistical exercises; so now, too, the department of fact, and the method of research and experiment which is proper to it, may for the moment eclipse the light of faith i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student, and be degraded into the accidental tool, *hic et nunc* , of infidelity. I am as little hostile to physical science as I am to poetry or metaphysics; but I wish for studies of every kind a legitimate application: nor do I grudge them to anti-Catholics, so that anti-Catholics will not claim to monopolize them, cry out when we profess them, or direct them against Revelation.

在此，我想暂时中断一直以来的思路，先行提出一个警告，以防有人误以为我对所列举的那些学科暗中怀有不敬，或对其正当的倾向心怀忧惧，而我实际的目标，正好就是反对任何人垄断这些学科。下面这些话，并不一定就会给科学扣上沉重的污名。就象其他的天赐能力一样，科学也许会被人用作不当目的，即与它们并不存在天然联系的那些目的，就是科学从未为其设定的那些目的。如在希腊，充溢宇宙的美的元素以及作为最真实解释者的诗意能力，都被用于声色之乐的满足。又如在中世纪，追求真理的另一种了不起的工具——抽象思辨能力，经常会在诡辩练习中消磨殆尽。又如今天，研究事实的部门以及与之适应的研究与实验方法，可在一时之间使学生想象中的信念之光黯然失色，并被贬低为背信者一时一地的附属工具。我对诗歌或形而上学不怀歹心，对自然科学也不存任何敌意，我只不过希望每一门学科都可得到合理的应用。我也不会因为厌恶这些学科而把它们交

给反天主教的人，一旦如此，反天主教的人就不会宣称要垄断它们，当我们承认它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惊叫，或利用它们来反启示。

I wish, indeed, I could think that these studies were not intended by a certain school of philosophers to bear directly against its authority. There are those who hope, there are those who are sure, that in the incessant investigation of facts, physical, political, and moral, something or other, or many things, will sooner or later turn up, and stubborn facts too, simply contradictory of revealed declarations. A vision comes before them of some physical or historical proof that mankind is not descended from a common origin, or that the hopes of the world were never consigned to a wooden ark floating on the waters, or that the manifestations on Mount Sinai were the work of man or nature, or that the Hebrew patriarchs or the judges of Israel are mythical personages, or that St. Peter had no connection with Rome, or that the doctrine of the Holy Trinity or of the Real Presence was foreign to primitive belief. An anticipation possesses them that the ultimate truths embodied in mesmerism will certainly solve all the Gospel miracles; or that to Niebuhrize the Gospels or the Fathers is a simple expedient for stultifying the whole Catholic system. They imagine that the eternal, immutable word of God is to quail and come to nought before the penetrating intellect of man. And, where this feeling exists, there will be a still stronger motive for letting Theology alone. That party, with whom success is but a matter of time, can afford to wait patiently; and if an inevitable train is laid for blowing up the fortress, why need we be anxious that the catastrophe should take place today, rather than tomorrow?

的确，我但愿能够这样思考：这些研究并不会被某些派别的哲学

家用来直接否认启示的权威。有些人希望，有些人确信：在对自然、政治和道德事实无止境的探索中，这件事或那件事，或许多事物迟早会出现，一些难以理解的事实也会出现，这些事实的结果与已显现的宣称完全矛盾。此前曾有一种具备某种自然或历史证据的看法，认为人类并非出自一个共同起源，要么认为世界的希望从来都不曾交付给浮在洪水之上的一条木船，要么认为西奈山上的显灵是人或自然的杰作，或许希伯来的族长和以色列的士师都是虚构人物，或许圣彼得与罗马没有关系，又或许说圣三位一体和圣体实在论的教义在最初的信仰体系中并不存在。一种预期迷住了他们，认为体现在催眠术中的终极真理定能解读《福音书》中的所有奇迹；或认为按照尼布尔的方法来解读《福音书》或神父，就是一种能使整个天主教系统失效的捷径。他们想象，永恒不变的上帝之道会在人类明察秋毫的才智面前退缩，并化为乌有。有这种感觉的地方，让神学自行其是的动机更强烈。对这伙人来说，成功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他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下去。假如一列火车无可避免地要为炸掉一处堡垒而停驶，那我们为何要着急，以为这场灾难一定会在今天而非明天发生？

4．

4．

But, without making too much of their own anticipations on this point, which may or may not be in part fulfilled, these men have secure grounds for knowing that the sciences, as they would pursue them, will at least be prejudicial to the religious sentiment. Any one study, of whatever kind, exclusively pursued, deadens in the mind the interest, nay, the perception of any other. Thus, Cicero says that Plato and Demosthenes, Aristotle and Isocrates, might have respectively excelled in each other's province, but that each

was absorbed in his own; his words are emphatic; “quorum uterque, suo studio delectatus, *contemsit* alterum.” Specimens of this peculiarity occur every day. You can hardly persuade some men to talk about any thing but their own pursuit; they refer the whole world to their own centre, and measure all matters by their own rule, like the fisherman in the drama, whose eulogy on his deceased lord was, that “he was so fond of fish.” The saints illustrate this on the other hand; St. Bernard had no eye for architecture; St. Basil had no nose for flowers; St. Aloysius had no palate for meat and drink; St. Paula or St. Jane Frances could spurn or could step over her own child;—not that natural faculties were wanting to those great servants of God, but that a higher gift outshone and obscured every lower attribute of man, as human features may remain in heaven, yet the beauty of them be killed by the surpassing light of glory. And in like manner it is clear that the tendency of science is to make men indifferentists or sceptics, merely by being exclusively pursued. The party, then, of whom I speak, understanding this well, would suffer disputations in the theological schools every day in the year, provided they can manage to keep the students of science at a distance from them.

可是，由于他们自己的预期会否部分兑现都还是个问题，他们就不想过分吹嘘。这些人有确切的根据可以知晓：在他们追求科学事业的过程中，这些学科至少会对人们的宗教情感产生不利影响。任何一种研究，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研究，只要专心钻研下去，就会削弱人的思想对别的任何研究的兴趣甚至感知能力。故此，西塞罗才说，柏拉图和德摩斯梯尼、亚里士多德和伊苏克拉底本可能在彼此的领域里取得卓越成就，但他们还是被各自的自我兴趣所吸引。他的这句话是加了着重号的：“quorum uterque, suo studio delectatus, contemsit alterum.”这类奇怪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很难劝说一些人去谈论他们兴趣之外的任何东西，他们会认为整个世界起源于他们自己的中

心，并用他们自己的规则来衡量一切事物，就如同那部戏里的渔夫，他为自己过世的主人所唱的挽歌里就有这么一句："他活着的时候那么喜欢鱼。"圣徒们从另外一个角度阐释了这一现象。圣伯纳德对建筑一窍不通，圣巴西不懂花草，圣阿洛伊修斯对肉食和饮品是外行，圣保娜或圣简·弗朗西斯可能不小心踢倒自己的孩子甚至踩到他身上。并不是说，上帝的这些伟大的仆从天生就能力不足，而是说，更高的天赋往往胜过或遮盖了人较差的特质，正如人的容貌可能在天国也得以保持，但容貌之美却可能被非凡的荣耀之光所遮挡。同样，科学的趋向显然是要使人成为信仰无差别论者或怀疑主义者，仅仅只需要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宗教以外的地方就行了。所以，我所说的那伙人，就他们如此圆满的盘算而言，一定会在神学院里天天受到驳斥，除非他们能想办法让学习科学的人与神学院保持距离。

Nor is this all; they trust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modern sciences on what may be called the Imagination. When any thing, which comes before us, is very unlike what we commonly experience, we consider it on that account untrue; not because it really shocks our reason as improbable, but because it startles our imagination as strange. Now, Revelation presents to us a perfectly different aspect of the universe from that presented by the Sciences. The two informations are like the distinct subjects represented by the lines of the same drawing, which, accordingly as they are read on their concave or convex side, exhibit to us now a group of trees with branches and leaves, and now human faces hid amid the leaves, or some majestic figures standing out from the branches. Thus is faith opposed to sight: it is parallel to the contrast afforded by plane astronomy and physical; plane, in accordance with our senses, discourses of the sun's rising and setting, while physical, in accordance with our reason, asserts, on the contrary, that the sun is all but stationary, and that it is the earth that moves. This is what is meant by saying that truth lies in a well; phenomena are no

measure of fact; *primâ facie* representations, which we receive from without, do not reach to the real state of things, or put them before us simply as they are.

光这一点还不够。在所谓想象力方面，他们也受制于现代科学的影响。来到我们眼前的任何东西，假如跟我们一般体验到的东西相去甚远，我们就会因此而认为它不是真的。并不是因为它当真让我们的理性觉得这是假的，而是因为它使我们的想像力感到震惊，以为这是奇怪的事物。可现在，启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幅宇宙图景，跟科学表达的那种完全不一样。这两种信息很像同一幅画的线条表现出来的不同主题，根据这些线条从其凸面或凹面观察的角度，它们一会儿让我们看到一丛带有枝叶的树木，一会儿又让我们看到隐藏于树叶中的人脸，又或是从树枝间伸出来的某些宏伟图案。信仰与见解之对立也是如此光景，它类似于观察天文学与理论天文学之间的差异。观察天文学以我们的感觉为依据，它谈及太阳的升落，而理论天文学则以人的理性为根据，因此强调的是相反的东西，即太阳不过是静止的恒星，移动的只是地球。所谓的坐井观天就是这层意思。现象并非事实的尺度，我们从外表看出的原始表现，并不会深入事物的真实状态，也不会简单地将其实质摆在我们眼前。

While, then, Reason and Revelation are consistent in fact, they often are inconsistent in appearance; and this seeming discordance acts most keenly and alarmingly on the Imagination, and may suddenly expose a man to the temptation, and even hurry him on to the commission, of definite acts of unbelief, in which reason itself really does not come into exercise at all. I mean, let a person devote himself to the studies of the day; let him be taught by the astronomer that our sun is but one of a million central luminaries, and our earth but one of ten million globes moving in space; let him learn from the geologist that on that globe of ours enormous

revolutions have been in progress through innumerable ages; let him be told by the comparative anatomist of the minutely arranged system of organized nature; by the chemist and physicist, of the peremptory yet intricate laws to which nature, organized and inorganic, is subjected; by the ethnologist, of the originals, and ramifications, and varieties, and fortunes of nations; by the antiquarian, of old cities disinterred, and primitive countries laid bare, with the specific forms of human society once existing; by the linguist, of the slow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s; by the psychologist, the physiologist, and the economist, of the subtle, complicated structure of the breathing, energetic, restless world of men; I say, let him take in and master the vastness of the view thus afforded him of Nature, its infinite complexity, its awful comprehensiveness, and its diversified yet harmonious colouring; and then, when he has for years drank in and fed upon this vision, let him turn round to peruse the inspired records, or listen to the authoritative teaching of Revelation, the book of Genesis, or the warnings and prophecies of the Gospels, or the Symbolum *Quicumque* or the Life of St. Antony or St. Hilarion, and he may certainly experience a most distressing revulsion of feeling, [7_1] — not that his reason really deduces any thing from his much loved studies contrary to the faith, but that his imagination is bewildered, and swims with the sense of the ineffable distance of that faith from the view of things which is familiar to him, with its strangeness, and then again its rude simplicity, as he considers it, and its apparent poverty contrasted with the exuberant life and reality of his own world. All this, the school I am speaking of understands well; it comprehends that, if it can but exclude the professors of Religion from the lecture-halls of science, it may safely allow them full play in their own; for it will be able to rear up infidels, without speaking a word, merely by the terrible influence of that faculty against which both Bacon and Butler so solemnly warn us.

所以，虽然从实质上来看理性与启示是彼此相容的，表面上这二者却并非总是一致。这种外表上的不一致，会对人的想象力产生强烈和令人震惊的效果，甚至有可能让人突然间感到一股诱惑，甚至催促他产生不信的确定行为，而此时，理性本身倒是一点作用也不起了。我意思是说，让人投身于当今的研究活动，让天文学家来告诉他，我们的太阳只不过是数以百万计的重要发光体当中的一个，而我们的地球只不过在太空里运动着的上千万球体之一。让地质学家告诉他，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无数个世世代代，地表运动都在剧烈地进行着。让比较解剖学家告诉他，在这个有机的自然里，存在着极精细安排的系统。让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告诉他，有机和无机的自然世界都遵从于强制性但又十分复杂的法则。让民族学家告诉他，世上各族都有起源，有分支，有变种，有命运。让古文物研究学家告诉他，古老的城镇会发掘出来，原始的国家也会揭示出来，这些地方都有人类社会存在过的具体形态。让语言学家告诉他，语言是慢慢形成和发展的。让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告诉他，这个能呼吸、有活力和躁动不安的人的世界，也有微妙复杂的结构。我要说，让他明白和掌握自然赋予他的这个广阔视角、自然无尽的复杂性、惊人的包容性和多样化却又和谐的外貌。之后，当他花许多年磨砺好眼光后，再让他回头精读那启示出来的纪录，或倾听启示的权威说教，就是《创世记》，或《福音书》里的警告和预言，或亚大纳西信经，或圣安东尼及圣希拉里翁的传记，他一定会体验到极痛苦的情感变化。[8_1] 并不是说他的理性当真能从他极喜爱的研究中推导出任何与信仰相反的东西，而是说，他的想象力会感到困惑，会游离在信仰与他所熟悉的事物的外表之间无法描述的距离感、陌生感。之后，当他思考此事时，又会惊异于它全然的简单性，以及与自己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丰富的生活与实在性相比，这是多么贫乏。所有这些，我正在谈论的那所学校都十分清楚。它的理解是，假如它将讲授宗教的教授排除在科学的讲堂之外，那就可以让他们放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游戏中，因为它会不著一字地培养起一批不信者，仅只通过那种能力的可能影响就能做到，而这正是培根和巴特勒警告过我们的。

I say, it leaves the theologian the full and free possession of his own schools, for it thinks he will have no chance of arresting the opposite teaching or of rivalling the fascination of modern science. Knowing little, and caring less for the depth and largeness of that heavenly Wisdom, on which the Apostle delights to expatiate, or the variety of those sciences, dogmatic or ethical, mystical or hagiological, historical or exegetical, which Revelation has created, these philosophers know perfectly well that, in matter of fact, to beings, constituted as we are, sciences which concern this world and this state of existence are worth far more, are more arresting and attractive, than those which relate to a system of things which they do not see and cannot master by their natural powers. Sciences which deal with tangible facts, practical results, evergrowing discoveries, and perpetual novelties, which feed curiosity, sustain attention, and stimulate expectation, require, they consider, but a fair stage and no favour to distance that Ancient Truth, which never changes and but cautiously advances, in the race for popularity and power. And therefore they look out for the day when they shall have put down Religion, not by shutting its schools, but by emptying them; not by disputing its tenets, but by the superior worth and persuasiveness of their own.

我要说，这就会让神学家完全和自由地沉迷于他自己的流派，因为神学家能吸引住相反学科教学的机会并不太多，也没有机会与现代科学的吸引力竞争。这些哲学家并不知道，也很少关心那种天启智慧的深度与广度，而这种智慧却是那位使徒极愉快地详述过的；他们也不关心那些学科的种类，无论是教义的还是伦理的，神秘主义的还是圣徒录性质的，历史的还是由启示创造出来的解经学的。他们完全明白，从事实上看，对于像我们这种结构的存在物来说，与这个世界和这种生存状态相关的科学，其价值比与他们看不到、也无法通过自然能力加以把握的那种事物的系统大得多，也有趣得多。处理可感触的

事实、实际的结果、不断增多的发现和有永恒新奇性的科学，不仅可以满足人的好奇心，保持人的注意力，刺激人的期望，而且在他们看来，仅只需要一个公平的舞台，不需要额外的恩惠就可以与那种古老的真理保持距离，在为流行程度和能力而进行的竞争中，它永远不会改变，却会小心地进展下去。因此，他们就盼望着打倒宗教那一天的到来。不用关掉宗教学校的大门，而是将学校清空，不用与其争辩他们的信条，而是通过赋予他们自己的信条更大的价值和说服力来做到。

5．

5．

Such is the tactic which a new school of philosophers adopt against Christian Theology. They have this characteristic, compared with former schools of infidelity, viz., the union of intense hatred with a large toleration of Theology. They are professedly civil to it, and run a race with it. They rely, not on any logical disproof of it, but on three considerations; first, on the effects of studies of whatever kind to indispose the mind towards other studies; next, on the special effect of modern sciences upon the imagination, prejudicial to revealed truth; and lastly, on the absorbing interest attached to those sciences from their marvellous results. This line of action will be forced upon these persons by the peculiar character and position of Religion in England.

这就是一个新的哲学家流派针对基督教神学采取的策略。与以前的不信者的流派比较而言，他们具备这样的特点，将强烈的憎恨与对

神学极大的宽容结合起来。表面上，他们对它彬彬有礼，实际却与它竞争。他们并不依靠神学的任何一种逻辑进行反证，而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虑。首先，依靠各种类型的研究效果来使人的头脑厌恶其他研究；其次，依靠现代科学对想象力的特别影响来忤逆启示真理；最后，依靠附在这些惊人的科学结果之上的极具吸引力的兴趣。这种行动方针将通过英国宗教的特色和地位而强加到这些人头上。

And here I have arrived at the limits of my paper before I have finished the discussion upon which I have entered; and I must be content with having made some suggestions which, if worth anything, others may use.

说到这里，还没有完成我已经提及的那个讨论，但已经到达这篇文章的极限了。我必须满足于已经提出的一些建议，以供他人参考。

[7_1].*Vid.* University Sermons, vii., 14.

[8_1].参见《大学讲道集》，第七章，十四节。

Lecture 6. University Preaching

第六讲：论大学布道

1．

1．

When I obtained from various distinguished persons the acceptable promise that they would give me the advantage of their countenance and assistance by appearing from time to time in the pulpit of our new University, some of them accompanied that promise with the natural request that I, who had asked for it, should offer them my own views of the mode and form in which the duty would be most satisfactorily accomplished.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quite as natural that I on my part should be disinclined to take on myself an office which belongs to a higher station and authority in the Church than my own; and the more so, because, on the definite subject about which the inquiry is made, I should have far less direct aid from the writings of holy men and great divines than I could desire. Were it indeed my sole business to put into shape the scattered precepts which saints and doctors have delivered upon it, I might have ventured on such a task with comparatively little misg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great teachers of the pastoral office I might have been content to speak, without looking out for any living authority to prompt me. But this unfortunately is not the case; such venerable guidance does not extend beyond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rules of preaching, and

these require both expansion and adaptation when they are to be made to bear on compositions addressed in the name of a University to University men. They define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 preaching, which is one and the same in all cases; but not the subject-matter or the method, which vary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Still, after all, the points to which they do reach ar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an those which they fall short of. I therefore, though with a good deal of anxiety, have attempted to perform a task which seemed naturally to fall to me; and I am thankful to say that, though I must in some measure go beyond the range of the simple direction to which I have referred, the greater part of my remarks will lie within it.

我接到多个领域杰出人士合意的承诺，说他们会时不时在我们这所新大学的布道坛上现身，为我提供支持和协助。其中一些人在给予承诺的同时，还向我提出相当自然的请求，即我作为提出要求的人，应当将自己能履行该项职责的最佳方式及形式告知他们。另外一方面，同样十分自然的是，在我这方面，也不想把一项属于教会里面比我的身份和权威更高的人才能决定的一项职责揽在自己头上来。另外，就所提及的那项问询的确定主题而言，从神职人员和伟大的神学家的著作中所能得到的直接援助，比我希望得到的少得多，因而就更是如此了。假如我只有这么一件要务在身，即整理圣徒和教会博士就此议题发表见解而遗留下来的断简残篇，我也许乐得一试，而不会有很大忧虑。立于教牧职责的伟大导师的荫庇之下，我也许满足于站出来讲话，而不用寻找在世的权威来给予我鼓励。但不幸的是，事情并非如此。如此珍贵的指南并没有超过布道的一般原则和规定，如果要让这些东西与以大学名义与大学人士发布的作品集发生任何联系，就必须予以增补和调适。它们决定基督教布道的本质，而这一本质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一模一样的，除了素材或方法，素材或方法总会随具体情形而变动。但毕竟，它们触及的要点比没有提到的东西重要得多。因此，虽然焦虑万分，我还是尝试着完成一项看来非我莫属的工作。

我要充满感激地说，虽然非得在某种程度上越出我所指的简单说明的范围，但绝大部分言论还是在这个范围以内的。

2．

2．

So far is clear at once, that the preacher's object is the spiritual good of his hearers. “Finis prædicanti sit,” says St. Francis de Sales; “ut *vitam* (justitiæ) *habeant homines,* et abundantius habeant.” And St. Charles: “Considerandum, ad Dei omnipotentis gloriam, ad animarumque salutem, referri omnem concionandi vim ac rationem.” Moreover, “Prædicatorem esse ministrum Dei, per quem verbum Dei à spiritûs fonte ducitur ad fidelium animas irrigandas.” As a marksman aims at the target and its bull's-eye, and at nothing else, so the preacher must have a definite point before him, which he has to hit. So much is contained for his direction in this simple maxim, that duly to enter into it and use it is half the battle; and if he mastered nothing else, still if he really mastered as much as this, he would know all that was imperative for the due discharge of his office.

仅就此而言，一切就马上清楚了，布道者的目标就是听道者的灵命安康。“Finis prædicanti sit,”圣方济各·沙雷氏说。“ut vitam (justitiæ) habeant homines, et abundantius habeant.”圣嘉禄说：“Considerandum, ad Dei omnipotentis gloriam, ad animarumque salutem, referri omnem concionandi vim ac rationem.”还有，“Prædicatorem esse ministrum Dei, per quem

verbum Dei à spiritûs fonte ducitur ad fidelium animas irrigandas.”神枪手瞄准的是靶子和靶心，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同样，布道者面前也必须有一个确定的要点，是他必须要击中的。这句简单的格言，包含有那么多对布道者有指导作用的信息，及早进入并加以利用才只是战役的一半。就算别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掌握，仅只真正掌握了这一点，他也会了解适当履行其职责所必需的所有内容。

1 . For what is the conduct of men who have one object definitely before them, and one only? Why, that, whatever be their skill, whatever their resources, greater or less, to its attainment all their efforts are simply, spontaneously, visibly, directed. This cuts off a number of questions sometimes asked about preaching, and extinguishes a number of anxieties. “Sollicita es, et turbaris,” says our Lord to St. Martha; “erga plurima; porro unum est necessarium.” We ask questions perhaps about diction, elocution, rhetorical power; but does the commander of a besieging force dream of holiday displays, reviews, mock engagements, feats of strength, or trials of skill, such as would be graceful and suitable on a parade ground when a foreigner of rank was to be received and *fêted* ; or does he aim at one and one thing only, *viz.* , to take the strong place? Display dissipates the energy, which for the object in view needs to be concentrated and condensed. We have no reason to suppose that the Divine blessing follows the lead of human accomplishments. Indeed, St. Paul, writing to the Corinthians, who made much of such advantages of nature, contrasts the persuasive words of human wisdom “with the showing of the Spirit,” and tells us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in speech, but in power.”

假如有一个目标确切地摆在眼前，而且就只这一个目标，那么，人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还会有别的什么样子呢？无论他们的技术

水平如何，无论他们的资源多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会倾尽全力，心无旁骛，自发自觉且明显可见。就凭这一点，许多关于布道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各种隐忧也会烟消云散。“Sollicita es, et turbaris,”我主对圣马大说，“erga plurima; porro unum est necessarium.”我们也许会问用词、朗诵法、修辞力量等方面的问题，可是，一支围城大军的统帅，会梦想节庆表演、温习、模拟演练、特技表演、技能展示，种种在接待和宴请外国要人时，在阅兵场上看起来十分优美及适当的那些活动吗？他会一门心思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攻克要塞。炫耀会耗费精力，而针对眼前的目标，本应当养精蓄锐、全力以赴的。我们没有理由假定，神赐真福也要效仿人的造诣。的确，哥林多人看重天生优势，圣保罗就写信给他们，将属于人类智慧的劝说话语与“圣灵显现”相对照，并告诉我们：“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

But, not to go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divine influences, which is beyond my subject, the very presence of simple earnestness is even in itself a powerful natural instrument to effect that toward which it is directed. Earnestness creates earnestness in others by sympathy; and the more a preacher loses and is lost to himself, the more does he gain his brethren. Nor is it without some logical force also; for what is powerful enough to absorb and possess a preacher has at least a *primâ facie* claim of attention on the part of his hearers. On the other hand, any thing which interferes with this earnestness, or which argues its absence, is still more certain to blunt the force of the most cogent argument conveyed in the most eloquent language. Hence it is that the great philosopher of antiquity, in speaking, in his Treatise on Rhetoric, of the various kinds of persuasives, which are available in the Art, consider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of these to be that which is drawn from personal traits of an ethical nature evident in the orator; for such matters are cognizable by all men, and the common sense of the world decides

that it is safer, where it is possible, to commit oneself to the judgment of men of character than to any considerations addressed merely to the feelings or to the reason.

神祇的影响力，并非当前考虑的主题，目前这种最简朴的诚挚本身，就是极有力的天然工具，可用于达到我们的目的。诚挚行事，本身就会因同感而在其他人身上引发诚意，一位讲道者失败越多，越是输给自己，他获得的兄弟姐妹就越是多。而且这里面也并不是没有某种逻辑力量的。强大到能够吸引和迷住一位讲道人的东西，至少在他的听众那一边来说，都有某种要求大家注意的原始能力。另外一方面，任何会干扰或缺乏这份诚意的东西，哪怕是以最雄辩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最有说服力的论证，相比之下也定会黯然失色。如此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亘古以来最伟大的那位哲学家，在其《修辞》著作中谈及这门艺术可以提供的各式各样的说服力时认为，最权威的说服力应当从伦理性质的个性特色中剥离出来，而是演讲者身上最明显的那种个性特色。这是所有人都易于辨别的东西，世人的常识可判定，将自己交给有个性的人的判断，比仅仅将诸种考虑诉诸情感或理性要可靠得多。

On these grounds I would go on to lay down a precept, which I trust is not extravagant, when allowance is made for the preciseness and the point which are unavoidable in all categorical statements upon matters of conduct. It is, that preachers should neglect everything whatever besides devotion to their one object, and earnestness in pursuing it, till they in some good measure attain to these requisites. Talent, logic, learning, words, manner, voice, action, all are required for the perfection of a preacher; but “one thing is necessary,“—an intense percep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end for which he preaches, and that is, to be the minister of some definite spiritual good to those who hear him. Who could wish to be

more eloquent, more powerful, more successful than the Teacher of the Nations? yet who more earnest, who more natural, who more unstudied, who more self-forgetting than he?

在这样的立场上，我想进而立下这么一条规则，如果针对涉事行为的所有绝对声明都不能避免准确性和要点的误差，那么，如果已经留下了余地，我相信这么一条规则就不会那么过分。这规则是，除开对于目标的奉献，除开追求这目标过程中的诚意之外，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达到这些必要条件之前，他应当忽略别的所有东西。天赋、逻辑、学问、词汇、仪态、嗓音、动作，这些都是完美的讲道人所必须有的，但是，只有“一样是必要的”，对他传道目的强烈感受和鉴别，这也就是说，他要把某种确定的精神裨益传递给前来听他讲道的人。有谁能指望比万国的教师更善雄辩、更强有力、更成功的呢？可是，有谁比他更诚挚、更自然、更不做作、更忘我的呢？

3．

3．

(1.) And here, in order to prevent misconception, two remarks must be made, which will lead us further into the subject we are engaged upon. The first is, that, in what I have been saying, I do not mean that a preacher must aim at *earnestness* , but that he must aim at his *object* , which is to do some spiritual good to his hearers, and which will at once *make* him earnest. It is said that, when a man has to cross an abyss by a narrow plank thrown over it, it is his wisdom, not to look at the plank, along which lies his path, but to fix his eyes steadily on the point in the opposite precipice at which the

plank ends. It is by gazing at the object which he must reach, and ruling himself by it, that he secures to himself the power of walking to it straight and steadily. The case is the same in moral matters; no one will become really earnest by aiming directly at earnestness; any one may become earnest by meditating on the motives, and by drinking at the sources, of earnestness. We may of course work ourselves up into a pretence, nay, into a paroxysm, of earnestness; as we may chafe our cold hands till they are warm. But when we cease chafing, we lose the warmth again; on the contrary, let the sun come out and strike us with his beams, and we need no artificial chafing to be warm. The hot words, then, and energetic gestures of a preacher, taken by themselves, are just as much signs of earnestness as rubbing the hands or flapping the arms together are signs of warmth; though they are natural where earnestness already exists, and pleasing as being its spontaneous concomitants. To sit down to compose for the pulpit with a resolution to be eloquent is one impediment to persuasion; but to be determined to be earnest is absolutely fatal to it.

这里，为避免误解，必须先说两句话，好让我们继续深入已经展开的这个话题。第一句是，在我刚才说过的那些话里，并没有说讲道者必须瞄准诚挚这个目标的意思，我只是说，他必须瞄准他的目的，即为听道者提供灵命的益处，而这必然会使讲道者充满诚挚。据说，当人非得从横在深渊之上的一块窄小木板上跨过去时，最聪明的办法是不要盯着必须沿着它跨过去的那块木板，而是要将目光稳定地固着于悬崖对岸的那个木板落点。盯着必须要达到的目标看，并据此控制自己，这样，他才能让自己产生直接稳妥地走过去的力量。在道德事务中，情形也大致相当。直接拿诚挚当目标，鲜有人能真正成为诚挚之人，思考诚挚的动机，品尝诚挚的来源，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诚挚之人。当然，我们也可以慢慢装出诚挚的样子来，不仅如此，也可以突然之间显得诚挚可亲，就像搓冷手也可以把手弄热一样。但是，如

果不搓手了，温度会再次降下去。反过来，如果让太阳照射下来，让它的光线照射下来，我们就不再需要人为搓手让它们发热了。因此，一位讲道者火热的话语及充满能量的手势，就其自身来说不过是一种诚挚的标志，就像搓手或挥动胳膊也是取暖的标志。不过，在诚挚已经存在的时候，它们会显得十分自然，而且由于是诚挚自发的伴随物而令人开心。怀着要口若悬河的决心而坐下来为讲道词搜索枯肠，这种做法会影响传道的说服力，但决意装得诚挚可亲却绝对是说服力的致命大忌。

He who has before his mental eye the Four Last Things will have the true earnestness, the horror or the rapture, of one who witnesses a conflagration, or discerns some rich and sublime prospect of natural scenery. His countenance, his manner, his voice, speak for him, in proportion as his view has been vivid and minute. The great English poet has described this sort of eloquence when a calamity had be fallen:—

在心智之眼前摆上最后四件事的人，就一定有见证过一场大火或在自然风光里看出丰富和崇高前景的人所具备的那种诚挚，那种狂喜、惊慌或神魂颠倒。他的观点有多么生动、多么详细，他的面容、他的仪态、他的嗓音，就会为他说什么样的话。有位伟大的英国诗人在一场灾难发生时是这么描述这种口才的：

Yea, this man's brow, like to a title page,

“是啊，这人的表情如同封面，

Foretells the nature of a tragic volume.

预示着满篇悲惨的内容。

Thou tremblest, and the whiteness in thy cheek is apter than thy tongue to tell thy errand.

你在发抖，你一脸的惨白比舌头更快说明了你的来意。”

It is this earnestness, in the supernatural order, which is the eloquence of saints; and not of saints only, but of all Christian preachers,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their faith and love. As the case would be with one who has actually seen what he relates, the herald of tidings of the invisible world also will be,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ase, whether vehement or calm, sad or exulting, always simple, grave, emphatic, and peremptory; and all this, not because he has proposed to himself to be so, but because certain intellectual convictions involve certain external manifestations. St. Francis de Sales is full and clear upon this point. It is necessary, he says, “ut ipsemet penitus hauseris, ut persuasissimam tibi habeas, doctrinam quam aliis persuasam cupis. Artificium summum erit, nullum habere artificium. Inflammata sint verba, non clamoribus gesticulationibusve immodicis, sed interiore affectione. De corde plus quàm de ore proficiscantur. Quantumvis ore dixerimus, sanè cor cordi loquitur, lingua non nisi aures pulsat.” St. Augustine had said to the same purpose long before: “Sonus verborum nostrorum aures percutit; magister intus est.”

正是这种超出自然秩序的诚挚，才使得圣徒们成为了雄辩者。不仅仅是圣徒，还包括所有基督教的布道者，雄辩的水平与他们的信仰及博爱的程度相当。一位实际见到过所讲述的一切的人就会是这种情况，根据事情的性质，那看不见的世界的消息预报也是如此，无论是猛烈的还是镇静的，悲伤的还是令人欣喜的，它总是那么简单、严肃、显著、断然。而所有这些，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是这么假定的，而是因为某些确切的思想信念总会涉及某些外部的证明。圣方济各·沙雷氏完全明白这一点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完全必要的，“ut ipsemet penitus hauseris, ut persuasissimam tibi habeas, doctrinam quam aliis persuasam cupis.Artificium summum erit, nullum habere artificium.Inflammata sint verba, non clamoribus gesticulationibusve immodicis, sed interiore affectione.De corde plus quàm de ore proficiscantur.Quantumvis ore dixerimus, sanè cor cordi loquitur, lingua non nisi aures pulsat.”圣奥古斯丁很久以前也为同一个目的说过：“Sonus verborum nostrorum aures percutit; magister intus est.”

(2.) My second remark is, that it is the preacher's duty to aim at imparting to others, not any fortuitous, unpremeditated benefit, but some *definite* spiritual good. It is here that design and study find their place; the more exact and precise is the subject which he treats, the more impressive and practical will he be; whereas no one will carry off much from a discourse which is on the general subject of virtue, or vaguely and feebly entertains the question of the desirableness of attaining Heaven, or the rashness of incurring eternal ruin. As a distinct image before the mind makes the preacher earnest, so it will give him something which it is worth while to communicate to others. Mere sympathy, it is true, is able, as I have said, to transfer an emotion or sentiment from mind to mind, but it is not able to fix it there. He must aim at imprinting on

the heart what will never leave it, and this he cannot do unless he employ himself on some definite subject, which he has to handle and weigh, and then, as it were, to hand over from himself to others.

我的第二句话是，布道者有责任把与听众分享某些确定的精神进益当作自己的目标，而不能是偶然和无法预料的益处。正是在这里，设计与研究才适得其所。布道者所宣讲的话题越是精准，就越是会感人和务实。一次演讲如果只是关于德行这个一般性话题的，或者只是模糊无力地谈及天国的美好或招致永恒堕落的轻率鲁莽，听众往往收获甚微。脑海里的明晰图像会使讲道者诚挚可亲，它同样还会给予他某种值得与他人分享的东西。的确，如我已经说过的，纯粹的同情也可以使一种情绪或情感在人们的脑海之间传递，但无法使其固定在脑海里。他的目标必须是在人心里印上某种永远也不会再离开的东西，只有他去钻研、处置、掂量某个确定的主题，之后才可以说从他能将这个主题从自己手中传给他人，否则他便做不到这一点。

Hence it is that the Saints insist so expressly on the necessity of his addressing himself to the intellect of men, and of convincing as well as persuading. “Necesse est ut *doceat* et moveat,” says St. Francis; and St. Antoninus still more distinctly: “Debet prædicator clare loqui, ut *instruat intellectum* auditoris, et doceat.” Hence, moreover, in St. Ignatius's Exercises, the act of the intellect precedes that of the affections. Father Lohner seems to me to be giving an instance in point when he tells us of a court-preacher, who delivered what would be commonly considered eloquent sermons, and attracted no one; and next took to simple explanations of the Mass and similar subjects, and then found the church thronged. So necessary is it to have something to say, if we desire any one to listen.

因此事情才会是这样的，即圣徒坚持明确表达这样一种必要性：他要诉诸人的才智，一边说服一边使人相信，“Necesse est ut doceat et moveat,”圣方济各说。而圣安东尼则说得更明确：“Debet prædicator clare loqui, ut instruat intellectum auditoris, et doceat.”此外，在圣依纳爵的《神操》里，才智的行为先于情感的行为。洛纳神甫曾对我讲过一位宫廷布道人的故事，似乎是要举一个恰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位布道人的布道一般被认为是相当生动流畅的，却没有吸引多少人。接下来他就弥撒和类似主题做一些解释性的布道，结果发现讲堂里人头攒动。所以说，假如真想有人来听，我们必须要言之有物。

Nay, I would go the length of recommending a preacher to place a distinct categorical proposition before him, such as he can write down in a form of words, and to guide and limit his preparation by it, and to aim in all he says to bring it out, and nothing else. This seems to be implied or suggested in St. Charles's direction: “Id omnino studebit, ut quod in concione dicturus est antea *bene cognitum* habeat.” Nay, is it not expressly conveyed in the Scripture phrase of “preaching the *word* “? for what is meant by “the word” but a proposition addressed to the intellect? nor will a preacher's earnestness show itself in anything more unequivocally than in his rejecting, whatever be the temptation to admit it, every remark, however original, every period, however eloquent, which does not in some way or other tend to bring out this one distinct proposition which he has chosen. Nothing is so fatal to the effect of a sermon as the habit of preaching on three or four subjects at once. I acknowledge I am advancing a step beyond the practice of great Catholic preachers when I add that, even though we preach on only one at a time, finishing and dismissing the first before we go to the second, and the second before we go to the third, still, after all, a

practice like this, though not open to the inconvenience which the confusing of one subject with another involves, is in matter of fact nothing short of the delivery of three sermons in succession without break between them.

不仅如此，我愿不厌其烦地推荐布道者将明确的直言命题摆在自己眼前，就是能用文字写下来的那种命题，借以指导和限制讲道词的准备工作。他说的所有话，其目的都是要将这个命题带出来，而不能东扯西拉。圣嘉禄的指导看来就暗含有这一层意思："Id omnino studebit, ut quod in concione dicturus est antea bene cognitum habeat."不仅如此，圣经里面的用语"传主的道"不也明确传递了这一层意思吗？这里所说的"道"，除了是针对人的才智所说的一个命题外，还会是别的什么呢？无论想将其接纳进来的诱惑是什么，无论是多么有创意的一句话，无论是多么具有雄辩力的一个复合句，只要不是倾向于以多种方式将布道者选定的那个明确命题引出来，布道者就应当予以抛弃。哪里有比这种弃绝更能无疑地显示一个布道者的诚挚的呢？布道时，一次讲解三四个讲题，没有比这习惯更能对布道效果产生致命伤害的。当我补充下面一段话时，我承认这已经越过了天主教一流的布道者惯常的做法，即哪怕我们一次只讲一个主题，结束第一个主题后再讲第二个，结束第二个再讲第三个，以此类推，但是，这样的做法虽然不会因一个主题与另一个主题混杂在一起而造成不便，事实上不过是指连续三次布道中间不停顿而已。

Summing up, then, what I have been saying, I observe that, if I have understood the doctrine of St. Charles, St. Francis, and other saints aright, *definiteness of object* is in various ways the one virtue of the preacher;—and this means that he should set out with the intention of conveying to others some spiritual benefit; that, with a view to this, and as the only ordinary way to it, he should select some distinct fact or scene, some passage in history, some truth,

simple or profound, some doctrine, some principle, or some sentiment, and should study it well and thoroughly, and first make it his own, or else have already dwelt on it and mastered it, so as to be able to use it for the occasion from an habitual understanding of it; and that then he should employ himself, as the one business of his discourse, to bring home to others, and to leave deep within them, what he has, before he began to speak to them, brought home to himself. What he feels himself, and feels deeply, he has to make others feel deeply; and in proportion as he comprehends this, he will rise above the temptation of introducing collateral matters, and will have no taste, no heart for going aside after flowers of oratory, fine figures, tuneful periods, which are worth nothing, unless they come to him spontaneously, and are spoken “out of the abundance of the heart.” Our Lord said on one occasion: “I am come to send fire on the earth, and what will I but that it be kindled?” He had one work, and He accomplished it. “The words,” He says, “which Thou gave st Me, I have *given* to them, and they have *received* them, and *now* I come to Thee.” And the Apostles, again, as they had received, so were they to give. “That which *we* have seen and have heard,” says one of them, “we declare unto *you* , that you may have *fellowship* with us.” If, then, a preacher's subject only be some portion of the Divine message, however elementary it may be, however trite, it will have a dignity such as to possess him, and a virtue to kindle him, and an influence to subdue and convert those to whom it goes forth from him, according to the words of the promise, “My word, which shall go forth from My mouth, shall not return to Me void, but it shall do whatsoever I please, and shall prosper in the things for which I sent it.”

把我刚刚说过的那些话总结起来，我就发现，假如我正确理解了圣嘉禄、圣方济各和其他圣徒的说教，那么，确定一个目标就是布道

者的一个美德，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他就要有意将某种灵命的益处传递给他人，有了这么一种观点，也作为达到这目的的唯一普通办法，他就应当选择某个明确的事实或场景，历史上的某件事情，某个或简单或复杂的真相，某个教条，某条原则或某种情操，并对它进行仔细彻底的研究，首先将它变成自己的话，或者以其他方式多加熟悉和掌握，这样就可以利用人们对它的习惯性理解而借题发挥。之后，就应当在讲道中专注于一件事情，即把自己在开始这次讲道之前已经产生的感悟讲述给他人听，使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布道者自己感觉到的，而且有深刻感悟的东西，一定要让他人也有深刻的感悟，根据他自己对此的理解深度，他就会抵制东扯西拉的诱惑，再没有口味和心情去跑题，不想去寻找花枝招展的雄辩术，精美的修辞和悦耳的复句等一钱不值的东西，除非这些修辞手段不请自来。“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主曾择机而言：“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他要做一件事，他做成了。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现在我往你们那里去。”几位使徒也领受了，因此他们也会给予。其中一位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倘若讲道者的主题只是神所说的某一部分，无论那一部分多么简单，多么老套，都应当有一种使他专注的尊严，可点着他的德性，可征服并劝化那些人的影响力，因神这话是说给他们听的。根据的是已经有了的诺言：“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遣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4．

4．

2．And now having got as far as this, we shall see without difficulty what a University Sermon ought to be just so far as it is

distinct from other sermons; for, if all preaching is directed towards a hearer, such as is the hearer will be the preaching, and, as a University auditory differs from other auditories, so will a sermon addressed to it differ from other sermons. This, indeed, is a broad maxim which holy men lay down on the subject of preaching. Thus, St. Gregory Theologus, as quoted by the Pope his namesake, says: “The self-same exhortation is not suitable for all hearers; for all have not the same disposition of mind, and what profits these is hurtful to those.” The holy Pope himself throws the maxim into another form, still more precise: “Debet prædicator,” he says, “perspicere, ne plus prædicet, quàm ab audiente capi possit.” And St. Charles expounds it, referring to Pope St. Gregory: “Pro audientium genere locos doctrinarum, ex quibus concionem conficiat, non modo distinctos, sed optimè explicatos habebit. Atque in hoc quidem multiplici genere concionator videbit, ne quæcumque, ut S. Gregorius scitè monet, legerit, aut scientiâ comprehenderit, omnia enunciet atque effundat; sed delectum habebit, ita ut documenta alia exponat, alia tacitè relinquat, prout locus, ordo, conditioque auditorum deposcat.” And, by way of obviating the chance of such a rule being considered a human artifice inconsistent with the simplicity of the Gospel, he had said shortly before: “Ad Dei gloriam, ad cœlestis regni propagationem, et ad animarum salutem, plurimum interest, non solum quales sint prædicatores, sed quâ viâ, quâ ratione prædicent.”

现在，已经谈了这么多了，应该不费力就可以看出，与其他性质的讲道有所不同的大学讲道应当是个什么样子的。由于所有讲道都是针对某个单一的听众的，而这个听众也是针对某个讲道而去的，同样，由于大学的听众与其他地方的听众不太一样，为这里提供的讲道也应当与其他场所的讲道有所不同。这的确也是圣贤们在讲道这个主题上提供的大致准则。所以，与格利高里教皇同名的神学家圣格利高

里曾说："完全相同的讲道词不可能适合所有听众，因为各人的思想倾向并不相同，对一部分人有利的，对另一部分人却是有害。"这位教皇本人也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了这句格言的意思，但说得更明确："Debet prædicator, perspicere, ne plus prædicet, quàm ab audiente capi possit."谈到教皇圣格利高里这段话时，圣嘉禄进行了详细解释："Pro audientium genere locos doctrinarum, ex quibus concionem conficiat, non modo distinctos, sed optimè explicatos habebit.Atque in hoc quidem multiplici genere concionator videbit, ne quæcumque, ut S. Gregorius scitè monet, legerit, aut scientiâ comprehenderit, oninia enunciet atque effundat; sed delectum habebit, ita ut documenta alia exponat, alia tacitè relinquat, prout locus, ordo, conditioque auditorum deposcat."为防止这条规定被误认为是与福音的简洁性不相容的人的雕虫小技，他稍早前还另有说明："Ad Dei gloriam, ad cœlestis regni propagationem, et ad animarum salutem, plurimum interest, non solum quales sint prædicatores, sed quâ viâ, quâ ratione prædicent."

It is true,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the Art of Rhetoric; but it is no scandal that a saintly Bishop should in this matter borrow a maxim from secular, nay, from pagan schools. For divine grace does not overpower nor supersede the action of the human mind according to its proper nature; and if heathen writers have analyzed that nature well, so far let them be used to the greater glory of the Author and Source of all Truth. Aristotle, then, in his celebrated treatise on Rhetoric, makes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Art lie in the precise recognition of a hearer. It is a relative art, and in that respect differs from Logic, which simply teaches the right use of reason, whereas Rhetoric is the art of persuasion, which implies a person who is to be persuaded. As, then, the Christian Preacher aims at the Divine Glory, not in any vague and general way, but definitely by the enunciation of some article or passage of

the Revealed Word, so further, he enunciates it, not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whole world, but directly for the sake of those very persons who are before him. He is, when in the pulpit, instructing, enlightening, informing, advancing, sanctifying, not all nations, nor all classes, nor all callings, but those particular ranks, professions, states, ages, characters, which have gathered around him. Proof indeed is the same all over the earth; but he has not only to prove, but to persuade;—*Whom* ? A hearer, then, is included in the very idea of preaching; and we cannot determine how in detail we ought to preach, till we know whom we are to address.

诚然，这也是修辞艺术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但是，在这样的事情上，一位圣洁的主教竟然从世俗的甚至是异教的学校借用一句格言，却并非什么丑闻。因为，神恩既不会压倒也不会替代人心发挥其适当本性的作用，如果异教的作家将这种本性分析得十分准确，那就应当让它们在这范围内得到利用，以光大一切真理的作者及来源的荣耀。亚里士多德在其论述修辞的著名论述里表示，艺术的本质，正在于听众的准确理解。这是一种相对的艺术，因此在这方面它有别与逻辑，因为逻辑只不过是简单地讲解理性的适当运用。对照而言，修辞却是一门劝诫的艺术，它隐含着一个需要被说服的人。由于基督教的讲道者旨在传扬神的荣耀，不是用任何模糊和概述性的方法，而是通过启示之道的具体条款或段落的阐述来明确地做到；同样，布道者阐述启示之道不是为了指导广大世界，而是直接地为了眼前的这批听道者。一旦站上讲坛，他要指导、启迪、告知、提高、圣化的，并非世上万民，并非所有社会阶层，并非所有职业的人，而是他聚拢在他身边的那些具体阶层、职业、状况、年龄、性格的人。大地各处提供的证据都是同样的，可是，他不仅仅要证明，而且还必须劝化，劝化谁呢？所以，听道的人就包含在讲道这个概念自身里面，除非我们清楚自己讲话的对象是谁，否则，我们就无法详细明白到底应当如何讲道。

In all the most important respects, indeed, all hearers are the same, and what is suitable for one audience is suitable for another. All hearers are children of Adam, all, too, are children of the Christian adoption and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great topics which suit the multitude, which attract the poor, which sway the unlearned, which warn, arrest, recall, the wayward and wandering, are in place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a University as elsewhere. A *Studium Generale* is not a cloister, or noviciate, or seminary, or boarding-school; it is an assemblage of the young, the inexperienced, the lay and the secular; and not even the simplest of religious truths, or the most elementary articl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can be unseasonable from its pulpit. A sermon on the Divine Omnipresence, on the future judgment, on the satisfaction of Christ, on the intercession of saints, will be not less, perhaps more, suitable there than if it were addressed to a parish congregation. Let no one suppose that any thing recondite is essential to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sermon. The most obvious truths are often the most profitable. Seldom does an opportunity occur for a subject there which might not under circumstances be treated before any other auditory whatever. Nay, further; an academical auditory might be well content if it never heard any subject treated at all but what would be suitable to any general congregation.

的确，在所有最重要的方面，所有听众都是一样的，适合于一个听众的，往往也适合另一个听众。所有听众都是亚当的后代，所有人也都是基督的儿女，是天主教堂的儿女。适合许多人的大主题，就是能吸引穷人，影响没有学问的人，警醒、阻止、召回任性与流浪者的主题，在大学里面如同在别的地方一样恰当。大学并非修道院、见习所、神学院或寄宿学校，它是年轻人、没有经验的人、平信徒和世俗平民的聚集之所。哪怕最简单的宗教真理，哪怕是信仰基督最基本的条款，也不能说就不适合大学的布道坛。就神的遍在、来世审判、基

督的赎罪、圣徒代祷等教义而在大学进行的讲道，跟在教区圣会上的讲道是一样的，甚至更加合适。请任何人都不要以为，只有深奥难解的东西才是大学讲道的必需品。最浅显的道理，往往也就是益处最大的。大学里很少会出现这样一种机会，此时，一个在别的任何一种听众面前讲过的主题，会因为种种原因而不适合在这里讲解。不仅如此，如果学术听众在任何一个一般性的圣会上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讲题竟然在这里得到讲解，那他们就会很满足。

However, after all, a University has a character of its own; it has some traits of human nature more prominently developed than others, and its members are brought together under circumstances which impart to the auditory a peculiar colour and expression, even where it does not substantially differ from another. It is composed of men, not women; of the young rather than the old; and of persons either highly educated or under education. These are the points which the preacher will bear in mind, and which will direct him both in his choice of subject, and in his mode of treating it.

但是，毕竟，大学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它具备某些较其他人而言发展得更显著的人性特质，而且它的成员是在一定条件下聚拢在一起的，从而使这个听众具备一种特别的色彩和表态方式，哪怕他们与其他听众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大学是由男性而非女性构成的，是由年轻人而非老年人构成的，是由要么受过高等教育，要么正在受教育的人构成的。这是布道者必须要记在心里的要点，这也会在布道者选择讲道主题和处理这些主题时也会给予他们一定指导。

5．

(1.) And first as to his *matter* or subject. Here I would remark upon the circumstance, that courses of sermons upon theological points, polemical discussions, treatises *in extenso* , and the like, are often included i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Sermon, and are considered to be legitimately entitled to occupy the attention of a University audience; the object of such compositions being, not directly and mainly the edification of the hearers, but the defence or advantage of Catholicism at large, and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a volume suitable for publication. Without absolutely discountenancing such important works, it is not necessary to say more of them than that they rather belong to the divinity school, and fall under the idea of Lectures, than have a claim to be viewed as University Sermons. Anyhow, I do not feel called upon to speak of such discourses here. And I say the same of panegyrical orations, discourses on special occasions, funeral sermons, and the like. Putting such exceptional compositions aside, I will confine myself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what may be called Sermons proper. And here, I repeat, any general subject will be seasonable in the University pulpit which would be seasonable elsewhere; but, if we look for subjects especially suitable, they will be of two kinds. The temptations which ordinarily assail the young and the intellectual are two: those which are directed against their virtue, and those which are directed against their faith. All divine gifts are exposed to misuse and perversion; youth and intellect are both of them goods, and involve in them certain duties respectively, and can be used to the glory of the Giver; but, as youth becomes the occasion of excess and sensuality, so does intellect give accidental opportunity to religious error, rash speculation, doubt, and infidelity. That these are in fact the peculiar evils to which large Academical Bodies are

liable is shown from the history of Universities; and if a preacher would have a subject which has especial significancy in such a place, he must select one which bears upon one or other of these two classes of sin. I mean, he would be treating on some such subject with the same sort of appositeness as he would discourse upon almsgiving when addressing the rich, or on patience, resignation, and industry, when he was addressing the poor, or on forgiveness of injuries when he was addressing the oppressed or persecuted.

首先谈他的素材或主题。在这里，我想借机说明，就神学要义、辩论事宜、无删节的论述等开设的讲道课程，经常也包括在大学讲道的概念中，而且也被认为是应该能引起大学听众的注意的内容。这一类的作品并非是直接和主要服务于听众的教诲，而是为广义的天主教进行辩护或宣传其优势的内容，并逐渐集结成适合出版的一本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我并不想绝对地否认其价值。但是，最多只能说它们属于神学院的工作，应当归在学术讲座的范畴之下，而不是非常适合看作大学讲道。无论如何，我并不觉得非在这里谈及这一类论述不可。关于赞美类的演说、特别场合下的演讲、葬礼布道等，我也只能说同样的话。将这些例外的创作放到一边以后，我将关注所谓布道本身。在这里，我再重复一次，在别的讲坛上适合的任何普遍主题，也都适合在大学布道坛上讲解。可是，假如我们寻找特别适合的主题，一般不外两类。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经常面临的诱惑有两种：一种是针对其德行的诱惑，一种是针对其信念的诱惑。所有天赐才能皆有遭到滥用和误用的可能，青春和才智两者是好东西，包含相应的责任，且用来荣耀其给予者。但是，正如青春会成为放纵和好色的理由，才智偶尔也会导致宗教上的谬误，鲁莽的思辨，怀疑和不信。事实上，这些正是大型学术机构负有责任的特有害处，大学的发展历史可证明这一点。如果讲道人希望找到在这样的地方有特别意义的主题，他应当挑选与上述两类过失相关的题材。我意思是说，当他处理这类题材时，所具备的适当贴切性应当与为富人讲述救苦扶贫时相

同，或与为穷人讲述忍耐、退避和勤奋时相同，或与为受压迫者和受迫害者讲述宽恕之道相同。

To this suggestion I append two cautions. First, I need hardly say, that a preacher should be quite sure that he understands the persons he is addressing before he ventures to aim at what he considers to be their ethical condition; for, if he mistakes, he will probably be doing harm rather than good. I have known consequences to occur very far from edifying, when strangers have fancied they knew an auditory when they did not, and have by implication imputed to them habits or motives which were not theirs. Better far would it be for a preacher to select one of those more general subjects which are safe than risk what is evidently ambitious, if it is not successful.

我再补充两条注意事项在这条建议后面。首先，讲道人应当确保自己明白听讲的都是些什么人，之后才可大胆根据自己设想的听众的道德立场来发话。假如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那他做的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反倒可能伤害他人。我了解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后果，那远远谈不上什么教诲，有些人根本不明白自己的听众是谁，却自以为十分了解，结果以暗示的方式将别人根本都没有的习惯或动机转嫁到别人头上。对一个讲道人来说，选择一个安全而普适的话题，远胜于选择一个一旦失败便会明显属于野心太大的话题。

My other caution is this:—that, even when he addresses himself to some special danger or probable deficiency or need of his hearers, he should do so covertly, not showing on the surface of his discourse what he is aiming at. I see no advantage in a preacher professing to treat of infidelity, orthodoxy, or virtue, or the pride of

reason, or riot, or sensual indulgence. To say nothing else, commonplaces are but blunt weapons; whereas it is particular topics that penetrate and reach their mark. Such subjects rather are, for instance, the improvement of time, avoiding the occasions of sin, frequenting the Sacraments, divine warnings, the inspirations of grace, the mysteries of the Rosary, natural virtue, beauty of the rites of the Church, consistency of the Catholic faith, relation of Scripture to the Church, the philosophy of tradition, and any others, which may touch the heart and conscience, or may suggest trains of thought to the intellect, without proclaiming the main reason why they have been chosen.

我的另一个警告是这样的：哪怕一位讲道者准备针对听众的某种特别危险、可能的缺陷或不足进行讲解，他也应当含蓄行事，而不能溢于言表，不能在演讲中透露自己的目标。讲道者公开宣称要消除不信、维护正统或德行，或论述理性的全盛，或暴乱，或肉欲的放纵，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别的不说，老生常谈无关痛痒。只有特定的话题才能产生洞察效果，并达到他们的要求。这些特殊的话题不妨是，比如改善时间效率，避免容易犯错的场所，经常参加圣事活动，神的警告，神恩的灵感，玫瑰经的奥秘，自然美德，教会仪式之美，天主教信仰的一贯原则以及其他许多类似话题。这些主题会触及人心及良知，甚至会在人的脑海里激发一连串思绪，而不用讲解选择这些话题的主要原因。

(2.) Next, as to the *mode of treating* its subject, which a University discourse requires. It is this respect, after all, I think, in which it especially differs from other kinds of preaching. As translation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as expressing the same idea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so in the case of sermons, each may undertake the same subject, yet treat it in its own way, as contemplating its

own hearers. This is well exemplified in the speeches of St. Paul, as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Acts. To the Jews he quotes the Old Testament; on the Areopagus, addressing the philosophers of Athens, he insists,—not indeed upon any recondite doctrine, contrariwise, upon the most elementary, the being and unity of God;—but he treats it with a learning and depth of thought, which the presence of that celebrated city naturally suggested. And in like manner, while the most simple subjects are apposite in a University pulpit, they certainly would there require a treatment more exact than is necessary in merely popular exhortations. It is not asking much to demand for academical discourses a more careful study beforehand, a more accurate conception of the idea which they are to enforce, a more cautious use of words, a more anxious consultation of writers of authority, and somewhat more of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knowledge.

接下来，谈一谈大学布道所要求的主题处理方法。正是在这一方面，我想，大学讲道与其他类型的讲道毕竟有所不同。由于各种翻译彼此不同，相同的思想是用不同语言表达出来的，在讲道时也是一样，很多人可能都讲同一个主题，但讲道的方法却有不同，因为每个人思考听众的方式不一样。圣保罗的演讲就可以为大家提供很好的范例，正如《使徒行传》里所记载的那样。对犹太人讲话时，他就引述《旧约》里的话，谈及亚略巴古时，他就坚持提及雅典的哲学家。的确，他并不深究深奥的教义，相反，他总是详述最基本的东西，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同一。可是，处理这些话题时，他是本着学问和思想深度严肃对待的，这一点，那座著名的城市众多的听众自然可以证明。同样，虽然最简洁的主题在大学讲坛里也是合适的，但处理主题的方式，当然会有比纯粹大众型训导严格得多的要求。进行学术性讲座前，要进行更仔细的研究工作，对这些讲座要灌输的概念的构思要更加准确，用词更多加小心，与权威作家进行更迫切的商议，彰显更多哲学及神学知识，这些根本算不得过分要求。

But here again, as before, I would insist on the necessity of such compositions being unpretending.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a preacher to quote the Holy Fathers, or to show erudition, or to construct an original argument, or to be ambitious in style and profuse of ornamen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audience is a University: it is only necessary so to keep the character and necessities of his hearers before him as to avoid what may offend them, or mislead, or disappoint, or fail to profit.

另外，就像前面提到过的，我坚持认为，这些文稿绝不可显得装模作样。讲道者并不需要引述古代教父的话，也不一定非得显出博学的样子或构思原创性论证，风格不需要那么张扬，文饰也不必那么繁多，不要以为听众是大学的人就非如此不可。有必要做到的，倒是要记住听众的特色及需求，这样可避免冒犯他们，或误导他们，或让他们失望，或一无所获。

6．

6．

3．But here a distinct question opens upon us, on which I must say a few words in conclusion, viz., whether or not the preacher should preach without book.

但是，在这里，又有一个不同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对此我必须总结几句，就是讲道者布道时拿不拿书。

This is a delicate question to enter upon, considering that the Irish practice of preaching without book,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as it would appear, with the tradition of the Church from the first, is not universally adopted in England, nor, as I believe, in Scotland; and it might seem unreasonable or presumptuous to abridge a liberty at present granted to the preacher. I will simply set down what occurs to me to say on each side of the question.

这是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因为爱尔兰向来都有布道不用书的惯例，外国很多地方也是如此，而且教会从最开始的布道传统看来也是如此。但是，在英国，这并不是被普遍采用的做法，而且我相信，在苏格兰也不是这样的。而且，把当前给予布道者的这份自由生生拿走，似乎既不合理，也不近人情。我就拿亲历的一件事来说明这问题的两个方面。

First of all, looking at the matter on the side of usage, I have always understood that it was the rule in Catholic countries, as I have just said, both in this and in former times, to preach without book; and, if the rule be really so, it carries extreme weight with it. I do not speak as if I had consulted a library, and made my ground sure; but at first sight it would appear impossible, even from the number of homilies and commentaries which are assigned to certain Fathers, as to St. Augustine or to St. Chrysostom, that they could have delivered them from formally-written compositions. On the other hand, St. Leo's sermons certainly are,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word, compositions; nay, passages of them are carefully dogmatic; nay, further still, they have sometimes the character of a symbol, and, in consequence, are found repeated in other parts of his works;

and again, though I do not profess to be well read in the works of St. Chrysostom, there is generally in such portions of them as are known to those of us who are in Holy Orders, a peculiarity, an identity of style, which enables one to recognize the author at a glance, even in the latin version of the Breviary, and which would seem to be quite beyond the mere fidelity of reporters. It would seem, then, he must after all have written them; and if he did write at all, it is more likely that he wrote with the stimulus of preaching before him, than that he had time and inducement to correct and enlarge them afterwards from notes, for what is now called “publication,” which at that time could hardly be said to exist at all. To this consideration we must add the remarkable fact (which, though in classical history, throws light upon our inquiry) that, not to produce other instances, the greater part of Cicero's powerful and brilliant orations against Verres were never delivered at all. Nor must it be forgotten that Cicero specifies memory in his enumeration of the distinct talents necessary for a great orator. And then we have in corroboration the French practice of writing sermons and learning them by heart.

首先，从用不用书布道这事说起。我向来的理解是，在天主教国家，不拿书布道向来都是惯例，正如我刚才说过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和以前的时代都是如此。假如果真是惯例，那它就一定有它很大的道理在里面。我这么说，并不是指我就已经翻遍了整个图书馆，好像自己的根据确切无疑。可是，乍一看，哪怕是根据据说是某些初期布道的教父，比如圣奥古斯丁或圣克里索斯托姆写的布道词或评注也可以看出，那些布道不可能是拿着正式撰写的讲稿进行的。另外一方面，圣利奥的布道肯定是一字一句严格照讲稿进行的，不仅如此，其中的部分段落还刻意写得十分教条。再说了，它们还有一些标志性的特色，结果，在他的其他著作里也会找到相同的段落。另外，虽然我不能说自己熟读了圣克里索斯托姆的著作，但一般来说，在我们作为圣

职人员十分熟悉的某些段落里，有一种奇特性，一种风格的标记，使人一眼便可以看出作者是谁，哪怕是在《每日祈祷书》的拉丁文版本里，而且这似乎远远超出纯粹的报告者忠实度所能解释的。这样看起来应当是他亲自撰写了这些布道文，假如真是他撰写了全部讲稿，那么，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写作的时候就怀着拿着这些讲稿进行布道，而不太可能有时间和动机在布道完毕之后，根据笔记进行修改和扩充，以供我们现在所称的“出版”之用，所谓出版在当时应当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对于这样一重考虑，我们必须补充一个惊人事实（尽管是在古代历史里，它却仍然能够为我们的探索提供某种洞见），即我们不提别的例子，光是西塞罗反驳威勒斯的大部分充满才气的精彩演说词，是从来都没有在哪里真正宣读过的。我们还不能忘记，西塞罗在列举伟大演说家必需具备的过人天赋时，特别指出了记忆力的重要。另外我们还确知，在法兰西，人们有写好布道辞然后牢记在心的做法。

These remarks, as far as they go, lead us to lay great stress on the *preparation* of a sermon, as amounting in fact to composition, even in writing, and *in extenso*. Now consider St. Carlo's direction, as quoted above: “Id omnino studebit, ut quod in concione dicturus est, antea bene cognitum habeat.” Now a parish priest has neither time nor occasion for any but elementary and ordinary topics; and any such subject he has habitually made his own, “cognitum habet,” already; but when the matter is of a more select and occasional character, as in the case of a University Sermon, then the preacher has to study it well and thoroughly, and master it beforehand. Study and meditation being imperative, can it be denied that one of the most effectual means by which we are able to ascertain our understanding of a subject, to bring out our thoughts upon it, to clear our meaning, to enlarge our views of its relations to other subjects, and to develop it generally, is to write down carefully all we have to say about it? People indeed differ in matters of this

kind, but I think that writing is a stimulus to the mental faculties, to the logical talent, to originality, to the power of illustration, to the arrangement of topics, second to none. Till a man begins to put down his thoughts about a subject on paper he will not ascertain what he knows and what he does not know; and still less will he be able to express what he does know. Such a formal preparation of course cannot be required of a parish priest, burdened, as he may be, with other duties, and preaching on elementary subjects, and supported by the systematic order and the suggestions of the Catechism; but in occasional sermons the case is otherwise. In these it is both possible and generally necessary; and the fuller the sketch, and the more clear and continuous the thread of the discourse, the more the preacher will find himself at home when the time of delivery arrives. I have said "generally necessary," for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exceptional cases, in which such a mode of preparation does not answer, whether from some mistake in carrying it out, or from some special gift superseding it.

我说的这些话，就其意义而言，会引导我们特别强调布道中的准备活动，准备活动的重要性。事实上，准备活动的重要性决不次于创作，甚至不次于书写，无删节的书写。我们现在来听听前面引述过的圣嘉禄的教导："Id omnino studebit, ut quod in concione dicturus est, antea bene cognitum habeat."一般来说，教区牧师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谈论基本和普遍的话题之外的论题，这一类的主题，他都习惯性地化为自己的观点了，即所谓"cognitum habet"。但如果这事比较有挑战性或是应付特殊场合的，比如在大学布道这种情况下，布道者就会去仔细彻底地研究，并予以事先的掌握。既然研究和深思即如此必要，那我们能不能否认：我们借以确定自己对一个主题的理解，将我们对它产生的想法表达出来，清晰地说明自己的意思，扩充我们对它与其他主题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并对它进行一般性发挥的最有效办法之一，就是把我们准备说出来的一切仔细地抄写下来？在这

类事情上，人们的观点的确是见仁见智。但我认为，写作是对思想能力、逻辑天赋、创造力、示范能力、话题安排的一种刺激，绝不次于别的东西。一个人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往往要等关于一个主题的想法写到纸上时才能肯定，他已经有所了解却还没有能够表达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当然，不可能要求教区牧师去进行如此正式的准备工作，因为他往往还担负着其他许多职责。他只讲解基本的主题，并得到教义问答的系统化方法和建议的支持，但是，在特别的布道活动中，情形却不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形里，事先的书面准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一般来说也是必要的。草稿越是完整，演讲的思路越是清晰和连续，等到实际布道到来时，他就越是感觉游刃有余。我在上面说“一般来说是必要的”。因为意外情况总会出现，此时，一种模式的准备工作并不能解决问题，或因为该模式在实施时出现问题，或因为出现某种能替代它的另外模式。

To many preachers there will be another advantage besides;—such a practice will secure them against venturing upon really *extempore* matter. The more ardent a man is, and the greater power he has of affecting his hearers, so much the more will he need self-control and sustained recollection, and feel the advantage of committing himself, as it were, to the custody of his previous intentions, instead of yielding to any chance current of thought which rushes upon him in the midst of his preaching. His very gifts may need the counterpoise of more ordinary and homely accessories, such as the drudgery of composition.

对许多布道者而言，总还会有除此以外的其他益处。这样一种做法，可使他在遇到真正需要即时发挥的事情时不至于惊慌失措。一个人越是炽情万丈，影响听众的能力越是强大，他就越是需要自我控制和持久的记忆，越是要感觉到坚守以前的诸多意图的益处，而不能屈服于布道中途突然想到的新奇点子。他的天赋本身也许就需要得到更

普通和更一般的附属活动的磨炼，比如一字一句写文章的苦差。

It must be borne in mind too, that, since a University Sermon will commonly have more pains than ordinary bestowed on it, it will be considered in the number of those which the author would especially wish to preserve. Some record of it then will be natural, or even is involved in its composition; and, while the least elaborate will be as much as a sketch or abstract, even the most minute, exact, and copious assemblage of notes will not be found too long hereafter, supposing, as time goes on, any reason occurs for wishing to commit it to the press.

还必须记住，由于大学布道一般比普通人认为的更辛苦，因此，笔者尤其希望保留住的那些人应当予以特别考虑。留下某些相关的档案应当是自然的，甚至写作过程也该包含在内。哪怕最乏精致的文章，也可和草稿或提要起到同样作用，哪怕是最细微，最精确和最丰富的笔记，假定随时间推移而出现任何付诸出版的理由，也不可能是距离事件发生时间过长的。

Here are various reasons, which are likely to lead, or to oblige, a preacher to have recourse to his pen in preparation for his special office. A further reason might be suggested, which would be more intimate than any we have given, going indeed so far as to justify the introduction of a manuscript into the pulpit itself, if the case supposed fell for certain under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Sermon. It may be urged with great cogency that a process of argument, or a logical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cannot at all be conducted with suitable accuracy of wording, completeness of statement, or succession of ideas, if the composition is to be prompted at the

moment, and breathed out, as it were, from the intellect together with the very words which are its vehicle. There are indeed a few persons in a generation, such as Pitt, who are able to converse like a book, and to speak a pamphlet; but others must be content to write and to read their writing. This is true; but I have already found reason to question whether such delicate and complicated organizations of thought have a right to the name of Sermons at all. In truth, a discourse, which, from its fineness and precision of ideas, is too difficult for a preacher to deliver without such extraneous assistance, is too difficult for a hearer to follow; and, if a book be imperative for teaching, it is imperative for learning. Both parties ought to read, if they are to be on equal terms;—and this remark furnishes me with a principle which has an application wider than the particular case which has suggested it.

这些就是有可能引导或迫使布道者必须拿起笔来，进行特别布道的准备工作的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妨提出进一步的理由，这条理由比我们上述所列的更不容易为他人所见，假如想象中的情形肯定落在大学布道的概念之内的话，它甚至为将底稿拿到讲道坛本身去用的行为找到了理由。可以十分中肯地提出这样的警示，即假如文章是因事临时而起，又依靠才智和作为才智传递工具的那些用词随口而出，则论辩步骤或逻辑分析以及调查研究，就无法体现用词的适当精确性、陈述的完整性或概念的连续性。当然，江山代有人才出，比如皮特这样的天才，他们与人交谈起来像在背书，说话的时候也像在写小册子。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要满足于书写下来，然后宣读自己的底稿。的确是这种情况。可是，我已经找到理由来质疑，如此精巧和复杂的思想组织，到底还没有权利自称为布道。说真的，一个演讲，假如概念如此之精细和准确，没有这些外在的辅助物就非常难以实施，那么，听众听起来也会是相当费力的。假如教学非得有一本书不可，那么学习起来也得有一本书才行。假如要使双方处在同等条件下，那双方都要阅读。而这句话为我提供了这么一条原则，它的应用范围远远大于所

说的这件特别案例。

While, then, a preacher will find it becoming and advisable to put into writing any important discourse beforehand, he will find it equally a point of propriety and expedience not to read it in the pulpit. I am not of course denying his right to use a manuscript, if he wishes; but he will do well to conceal it, as far as he can, unless, which is the most effectual concealment, whatever be its counterbalancing disadvantages, he prefers, mainly not verbally, to get it by heart. To conceal it, indeed, in one way or other, will be his natural impulse; and this very circumstance seems to show us that to read a sermon needs an apology. For, why should he commit it to memory, or conceal his use of it, unless he felt that it was more natural, more decorous, to do without it? And so again, if he employs a manuscript, the more he appears to dispense with it, the more he looks off from it, and directly addresses his audience, the more will he be considered to preach;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re will he be judged to come short of preaching the more sedulous he is in following his manuscript line after line, and by the tone of his voice makes it clear that he has got it safely before him. What is this but a popular testimony to the fact that preaching is not reading, and reading is not preaching?

所以说，虽然一位布道者会发现事前将重要的内容写下来比较合适和明智，但是，到了讲坛上却并不照着稿子念，同样也是得体之举和权宜之计。假如他愿意，我当然不会在这里否认讲道者利用底稿的这份权利，尽量把底稿藏起来应当好一些，除非他情愿将底稿背下来，事实上，这也是最好的隐藏方式，哪怕这样做也有许多不利之处。要把底稿以这种那种方式藏起来，那会是一个讲道人自然的冲动。这种特别的情形看来是想让我们看到，照着稿子念讲道辞，本身

就需要道歉。如果不是因为觉得把底稿藏起来更自然、更礼貌，那他为何要背下来，或者掩盖这一事实呢？因此布道者假如要使用底稿，他看起来越是可以脱稿，越是可以根本不看它，越是直面听众，他看起来就越是像在布道。另外一方面，他越是被人看作不适合布道，他就越是一字不离地一行一行照着底稿念，而人们从他说话的声音就可以明确地判断出，他已经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底稿了。事实是，讲道不是宣读，宣读也不是讲道，这难道不是对这一事实最普通的证明？

There is, as I have said, a principle involved in this decision. It is a common answer made by the Protestant poor to their clergy or other superiors, when asked why they do not go to church, that “they can read their book at home quite as well.” It is quite true, they *can* read their book at home, and it is difficult what to rejoin, and it is a problem, which has employed before now the more thoughtful of their communion, to make out *what* is got by going to public service. The prayers are from a printed book, the sermon is from a manuscript. The printed prayers they have already; and, as to the manuscript sermon, why should it be in any respects better than the volume of sermons which they have at home? Why should not an approved author be as good as one who has not yet submitted himself to criticism? And again, if it is to be read in the church, why may not one person read it quite as well as another? Good advice is good advice, all the world over. There is something more, then, than composition in a sermon; there is something personal in preaching; people are drawn and moved, not simply by what is said, but by how it is said, and who says it. The same things said by one man are not the same as when said by another. The same things when read are not the same as when they are preached.

我已经说过，这个决定里面涉及一条原则。信新教的穷人对自己

的牧师或其他尊长给出的为何不去教堂的通常答案是：“他们在家里看书也挺好的。”的确，他们是可以在家看书，也很难对此再说什么。有一个问题刚刚引起教区里面很多有思想的人的深思：去公共崇拜场所到底都有什么收获？祷告辞都印在出版物里，讲道辞也都是照底稿念出来的。印刷好的祷告辞，他们已经有了，至于照底稿念的讲道，为什么它就一定比能够在家里读到的布道辞更好呢？一位得到众人认可的作家，为什么就一定不如一位尚且没有得到批评认可的布道人？假如讲道辞是在教堂里念的，这个人念与那个人念到底有何不同呢？金玉良言就是金玉良言，哪里都一样。在构思讲道辞的这件事情上面，还有更多的东西牵扯在内。讲道的时候，总有某种个性的东西。人们有兴趣和受感动的往往不光是所说的话，而且还有这些话如何说出来，由谁说出来。一个人说出来的话，由另一个人说出来可能就不一样。同样的事情，念出来和讲出来就很不一样。

7．

7．

In this respect the preacher differs from the minister of the sacraments, that he comes to his hearers, in some sense or other, with antecedents. Clad in his sacerdotal vestments, he sinks what is individual in himself altogether, and is but the representative of Him from whom he derives his commission. His words, his tones, his actions, his presence, lose their personality; one bishop, one priest, is like another; they all chant the same notes, and observe the same genuflexions, as they give one peace and one blessing, as they offer one and the same sacrifice. The Mass must not be said without a Missal under the priest's eye; nor in any language but that in which it has come down to us from the early hierarchs of the

Western Church. But, when it is over, and the celebrant has resigned the vestments proper to it, then he resumes himself, and comes to us in the gifts and associations which attach to his person. He knows his sheep, and they know him; and it is this direct bearing of the teacher on the taught, of his mind upon their minds, and the mutual sympathy which exists between them, which is his strength and influence when he addresses them. They hang upon his lips as they cannot hang upon the pages of his book. Definiteness is the life of preaching. A definite hearer, not the whole world; a definite topic, not the whole evangelical tradition; and, in like manner, a definite speaker. Nothing that is anonymous will preach; nothing that is dead and gone; nothing even which is of yesterday, however religious in itself and useful. Thought and word are one in the Eternal Logos, and must not be separate in those who are His shadows on earth. They must issue fresh and fresh, as from the preacher's mouth, so from his breast, if they are to be “spirit and life” to the hearts of his hearers. And what is true of a parish priest applies, *mutatis mutandis* , to a University preacher; who, even more, perhaps, than the ordinary *parochus* , comes to his audience with a name and a history, and excites a personal interest, and persuades by what he is, as well as by what he delivers.

在这方面，讲道人与实施圣礼的人不同，因为讲道人在一种或另一种意义上，总是在有前因后果的情况下面对听众。行圣礼的时候，他穿着僧侣服装，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完全隐藏起来，他只不过是神的代言人，因为他的职责也来自于神。他的用词、口气，动作和仪态，都会失去个人特色。主教跟主教之间，牧师跟牧师之间，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念唱同样的诵辞，行同样的跪拜礼，他们给予同样的和平与安康祝愿，行同样的奉献礼。牧师必须手持弥撒经书才能念弥撒，所用的语言，也必须是从西部教会早期的大主教一直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那种语言。可是，当弥撒结束，司仪神父脱去恰当的服饰以

后，他才会恢复本来的模样，他会以与他个人相关的天赋或联系方式接近我们。他认识自己的羔羊，那些羔羊也认识他。正是因为老师与学生的这种关系，正是他的思想对他们的思想的影响，还有彼此之间存在的双向的同情心，才是他与他们讲话时的力量与影响力的所在。听众很依赖从他嘴里讲出来的的东西，因为他们无法对牧师书上的东西做判断。确定性是讲道的生命。一群确定的听众，而不是全世界。一个确定的主题，而非全部福音传统。同样，也必须有一位确定的演讲者。任何不确定的东西都称不上讲道。死气沉沉，一去不复返的东西也不是。哪怕是昨天的事情，无论其宗教意义多么浓厚，也多么有用，都行不通。在永恒的理性中，思想与文字是同一的，在作为神在世上的影子的人那里，它们不应当分开。假如讲道辞对于听道者的心来说是“灵与命”，那它们就必须鲜活地表现出来，鲜活地出自讲道者的口，出自他的肺腑。对一位教区牧师是适用的东西，予以必要修改后，对一位大学讲道人来说也是适用的。因为大学教师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讲授者，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身份和经历，并激发起个人的兴趣，根据他所说的话与根据他活生生的本人来劝化。

I am far from forgetting that every one has his own talent, and that one has not what another has. Eloquence is a divine gift, which to a certain point supersedes rules, and is to be used, like other gifts, to the glory of the Giver, and then only to be discountenanced when it forgets its place, when it throws into the shade and embarrasses the essential functions of the Christian preacher, and claims to be cultivated for its own sake instead of being made subordinate and subservient to a higher work and to sacred objects. And how to make eloquence subservient to the evangelical office is not more difficult than how to use learning or intellect for a supernatural end; but it does not come into consideration here.

我不会忘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天份，一个人拥有的，另一个

人就不一定拥有。雄辩术是天赐才干，它在某种程度上会替代惯例，就跟其他天赋一样，也应当用于荣耀其给予者，当它忘记自己的地位，当它使基督教牧师最基本的功能蒙羞并陷入尴尬，并宣称为其自身目的进行培育，而不是屈服和顺从更高极的工作并服务于神圣目标时，就应当予以中止。如何使雄辩术服务于福音目的，并不比如何利用学问或才智实现超自然的目标更加困难。但是，目前还不是考虑此事的时机。

In the case of particular preachers, circumstances may constantly arise which render the use of a manuscript the more advisable course; but I have been considering how the case stands in itself, and attempting to set down what is to be aimed at as best. If religious men once ascertain what is abstractedly desirable, and acquiesce in it with their hearts, they will be in the way to get over many difficulties which otherwise will be insurmountable. For myself, I think it no extravagance to say that a very inferior sermon, delivered without book, answers the purposes for which all sermons are delivered more perfectly than one of great merit, if it be written and read. Of course, all men will not speak without book equally well, just as their voices are not equally clear and loud, or their manner equally impressive. Eloquence, I repeat, is a gift; but most men, unless they have passed the age for learning, may with practice attain such fluency in expressing their thoughts as will enable them to convey and manifest to their audience that earnestness and devotion to their object, which is the life of preaching,—which both covers, in the preacher's own consciousness, the sense of his own deficiencies, and makes up for them over and over again in the judgment of his hearers.

谈及具体的讲道人，不同的情形会随时出现，从而使底稿的利用

更值得推荐。可是，我一直都在考虑，到底各样的情形自身当如何处理，并希望立下一条原则，以期获得最佳效果。信教的人一旦确定什么东西是抽象来说最好的东西，并在内心里默许它，他们就会想出一切办法来解决在其他情况下无法解决的那些困难。至于我自己，我觉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没有书本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相当次等的讲道，如果能够写下来并予以宣读，往往能比极其成功的讲道更完美地满足所有讲道都要达到的目的。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能在没有书本的情况下讲得一样好，正如每个人的声音不是同样清晰和宏亮，或他们的仪态也不是同样吸引人。我重复一次，雄辩术是一种天赋，但是，除非他们已经超过了学习的年龄段，否则，大多数人经过练习之后，都能够达到某种流畅水平，完全可以表达他们的思想，并使他们能够在听众面前传达和表述他们的诚挚和对目标的奉献精神，而这种诚挚与奉献精神正是讲道的生命力之所在，它可在讲道者自己的意识里掩盖住那种自身之不足，同时也在听众的判断中反复不断地弥补这种不足。

Lecture 7. Christianity and Physical Science. A Lecture in the School of Medicine

第七讲：基督教与自然科学，在医学院的演讲

1．

1．

Now that we have just commenced our second Academical Year, it is natural, Gentlemen, that, as in November last, when we were entering upon our great undertaking, I offered to you some remarks suggested by the occasion, so now again I should not suffer the first weeks of the Session to pass away without addressing to you a few words on one of those subjects which are at the moment especially interesting to us. And when I apply myself to think what topic I shall in consequence submit to your consideration, I seem to be directed what to select by the principle of selection which I followed on that former occasion to which I have been referring. Then [9_1] we were opening the Schools of Philosophy and Letters, as now we are opening those of Medicine; and, as I then attempted some brief investigation of the mutual bearings of Revelation and Literature, so at the present time I shall not, I trust, be unprofitably engaging your attention, if I make one or two parallel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 existing between Revelation and Physical Science.

既然我们的第二个学年已经开始，那么，诸位先生，就如同在刚

刚过去的十一月份里我们着手那项伟大事业时，我曾给大家讲过几句即兴的话一样，现在，如果不在新学年的头几个星期就当前对我们特别有意思的主题之一跟大家说上几句，我会觉得心有不甘。这样，当我认真思考，想找一个提请大家注意的话题时，在如何选择的问题上，我似乎是被引向了在上次借机发言时那个场所所依重的那个挑选原则，就是我一直在谈论的那个场合。当时 [10_1] ，我们正在举行哲学与文学院的开院典礼活动，而现在，我们是在进行医学院的开院活动。当时，我简要地谈到了启示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次，我相信，如果还是就启示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做一点类似思考，应该不会枉费大家的注意力。

This subject, indeed, viewed in its just dimensions, is far too large for an occasion such as this; still I may be able to select some one point out of the many which it offers for discussion, and, while elucidating it, to throw light even on others which at the moment I do not formally undertake. I propose, then, to discuss the antagonism which is popularly supposed to exist between Physics and Theology; and to show, first, that such antagonism does not really exist, and, next, to account for the circumstance that so groundless an imagination should have got abroad.

这个话题，就其自身的真实尺度而言，的确是太大了，不适合在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来议论。但是，我不妨从适合谈论的几个话题里挑选三两个出来，一边阐述，一边还不妨对目前并没有时间正式论及的其他几个要点略谈浅见。我想还是先谈谈一般认为存在于自然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对立情况。我首先想说明，这种对立实际并不存在，其次，我要解释一下，这种无根据的想象到底是如何传开的。

I think I am not mistaken in the fact that there exists, both in

the educated and half-educated portions of the community, something of a surmise or misgiving, that there really is at bottom a certain contrariety between the declarations of religion and the results of physical inquiry; a suspicion such, that, while it encourages those persons who are not over-religious to anticipate a coming day, when at length the difference will break out into open conflict, to the disadvantage of Revelation, it leads religious minds, on the other hand, who have not had the opportunity of considering accurately the state of the case, to be jealous of the researches, and prejudiced against the discoveries, of Science. The consequence is, on the one side, a certain contempt of Theology; on the other, a disposition to undervalue, to deny, to ridicule, to discourage, and almost to denounce, the labours of the physiological, astronomical, or geological investigator.

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弄错这么一个事实，即在社会受过全面教育和部分教育的人群中，都存在某种臆测或隐忧，认为在宗教宣称与自然探索的结果之间，当真存在某种实质性的矛盾之处。这样的猜疑一方面会鼓励那些并非过于严谨的人去期盼这么一天的到来，即这种差异最终爆发成公开的冲突，从而对启示造成不利。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导致一些有宗教信仰、却又没有机会准确思考事情的真实状况的人士对科学研究结果满怀嫉妒，并对科学发现心存偏见。结果，一方面是对神学的某种蔑视，另外一方面是低估、否认、嘲笑、打击、甚至谴责生理学家、天文学家或地质学家辛勤劳动的倾向。

I do not suppose that any of those gentlemen who are now honouring me with their presence are exposed to the temptation either of the religious or of the scientific prejudice; but that is no reason why some notice of it may not have its use even in this place. It may lead us to consider the subject itself more carefully

and exactly; it may assist us in attaining clearer ideas than before how Physics and Theology stand relatively to each other.

今天前来为我捧场的各位先生当中，我不相信有哪位会屈从于宗教偏见或科学偏见的诱惑，可是，也不能因此就说，甚至在今天这个场合稍微提及此事也全无益处。这就可能提醒我们更仔细和更严谨地思考这个主题本身，它应当有助于我们在自然科学与神学彼此的相对关系上，获得较以前更清晰的概念。

2．

2．

Let us begin with a first approximation to the real state of the case, or a broad view, which, though it may require corrections, will serve at once to illustrate and to start the subject. We may divide knowledge, then, into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Some knowledge, of course, is both at once; for the moment let us put this circumstance aside, and view these two fields of knowledge in themselves, and as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in idea. By nature is meant, I suppose, that vast system of things, taken as a whole, of which we are cognizant by means of our natural powers. By the supernatural world is meant that still more marvellous and awful universe, of which the Creator Himself is the fulness, and which becomes known to us, not through our natural faculties, but by superadded and direct communication from Him. These two great circles of knowledge, as I have said, intersect; first, as far as supernatural knowledge includes truths and facts of the natural

world, and secondly, as far as truths and facts of the natural world are on the other hand data for inferences about the supernatural. Still, allowing this interference to the full, it will be found, on the whole, that the two worlds and the two kinds of knowledge respectively are separated off from each other; and that, therefore, as being separate, they cannot on the whole contradict each other. That is, in other words, a person who has the fullest knowledge of one of these worlds, may be nevertheless, on the whole, as ignorant as the rest of mankind, as unequal to form a judgment, of the facts and truths of the other. He who knows all that can possibly be known about physics, about politics, about geography, ethnology, and ethics, will have made no approximation whatever to decide the question whether or not there are angels, and how many are their order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st learned of dogmatic and mystical divines,—St. Augustine, St. Thomas,—will not on that score know more than a peasant about the laws of motion, or the wealth of nations. I do not mean that there may not be speculations and guesses on this side and that, but I speak of any conclusion which merits to be called, I will not say knowledge, but even opinion. If, then, Theology be the philosophy of the supernatural world, and Science the philosophy of the natural, Theology and Science, whether in their respective ideas, or again in their own actual fields, on the whole, are incommunicable, incapable of collision, and needing, at most to be connected, never to be reconciled.

我们从真实情形的粗略状况或大致看法开始，这种看法虽然可能需要修正，却可以很容易让我们开始并说明这个主题。我们不妨将知识划分成自然知识和超自然知识两类。当然，某些知识同时属于这两类。目前，让我们暂时搁置这一特别情形，只看这两个知识领域本身，把它们当作在概念上彼此不同的东西。我认为，所谓自然，指的

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事物的庞大体系，我们通过自然能力的方法认识这个体系。所谓超自然的世界，指的是更令人称奇和敬畏的宇宙，造物主本身即是这宇宙的充盈。它之为我们所知，不是通过我们的固有能力，而是通过神给予我们的直接的交流实现的。如我所说的，知识的这两大领域彼此贯穿。首先，超自然的知识包含自然世界的真理与事实，其次，自然世界的真理与事实另外一方面又是关于超自然世界的推论数据。不过，将这种推论推向极端的话，人们就会发现，总体而言，这两个世界和两种知识领域分别都是彼此隔绝的，因此，由于相互隔断，它们整体而言就不可能相互矛盾。这意思是，换句话说，对其中一个世界拥有充足知识的人，整体而言，却有可能像人类其余的人一样无知，对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实与真理无法形成判断。关于自然科学、政治学、地质学、民族学和伦理学所能够知道的，他全都知道了，却不一定能够就是否存在天使，天使有多少等级等问题作出决定。而另外一方面，研究教义与奥秘的最有学问的神学家，如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等，在这一点上，却不一定比一个农民更了解运动法则或国民财富。我并不是指就不能就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思索或猜测，可我谈的是值得称为公平意见而非知识的任何结论。这么说来，假如神学就是关于超自然世界的哲学，而科学就是关于自然世界的哲学，那么，无论就各自的概念，还是根据各自实际的研究领域而言，整体来看，神学与科学都是彼此隔绝的，不可能相互碰撞，最多需要相互联系，却永远都不需要彼此调解。

Now this broad general view of our subject is found to be so far true in fact, in spite of such deductions from it that have to be made in detail, that the recent French editors of one of the works of St. Thomas are able to give it as one of their reasons why that great theologian made an alliance, not with Plato, but with Aristotle, because Aristotle (they say), unlike Plato, confined himself to human science, and therefore was secured from coming into collision with divine.

对我们这一主题粗略的一般看法，到目前为止事实上发现是正确的，尽管从中得出的推论尚需详细进行，尽管最近编辑圣托马斯的一部著作的法国编辑们以此作为一条理由，说明那位伟大的神学家为何不与柏拉图，而要与亚里士多德结成联盟，因为他们说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不一样，他将自己限制在人类科学的范围内，因此避免了与属神的科学发生碰撞。

“Not without reason,” they say, “did St. Thomas acknowledge Aristotle as if the Master of human philosophy; for, inasmuch as Aristotle was not a Theologian, he had only treated of logical,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metaphysical theses, to the exclusion of those which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supernatural relations of man to God, that is, religion; which, on the other hand, had been the source of the worst errors of other philosophers, and especially of Plato.”

他们说：“圣托马斯以亚里士多德为人类哲学的大师并非没有道理，因为，由于亚里士多德并非神学家，他只研究逻辑学、自然科学、心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命题，因而排除了关于人与上帝之间的超自然关系的那些命题，也就是宗教命题。这一点，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也就是其他哲学家，尤其是柏拉图铸成大错的根源。”

3．

3．

But if there be so substantial a truth even in this very broad

statement concerning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fields of Theology and general Science severally, and the consequent impossibility of collision between them, how much more true is that statement, from the very nature of the case, when we contrast Theology, not with Science generally, but definitely with Physics! In Physics is comprised that family of sciences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sensible world, with the phenomena which we see, hear, and handle, or, in other words, with matter. It is the philosophy of matter. Its basis of operations, what it starts from, what it falls back upon, is the phenomena which meet the senses. Those phenomena it ascertains, catalogues, compares, combines, arranges, and then uses for determining something beyond themselves, viz., the order to which they are subservient, or what we commonly call the laws of nature. It never travels beyond the examin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Its object is to resolve the complexity of phenomena into simple elements and principles; but when it has reached those first elements, principles, and laws, its mission is at an end; it keeps within that material system with which it began, and never ventures beyond the "flammantia mœnia mundi." It may, indeed, if it chooses, feel a doubt of the completeness of its analysis hitherto, and for that reason endeavour to arrive at more simple laws and fewer principles. It may be dissatisfied with its own combinations, hypotheses, systems; and leave Ptolemy for Newton, the alchemists for Lavoisier and Davy;—that is, it may decide that it has not yet touched the bottom of its own subject; but still its aim will be to get to the bottom, and nothing more. With matter it began, with matter it will end; it will never trespass into the province of mind. The Hindoo notion is said to be that the earth stands upon a tortoise; but the physicist, as such, will never ask himself by what influence, external to the universe, the universe is sustained; simply because he is a physicist.

可是，假如涉及神学与普通科学领域各自独立性的这一泛泛之论中还有什么切实真理可言，且因此而导致两者之间不可能发生碰撞的话，那么，根据事情的性质本身，当我们将神学与自然科学，而非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进行确定的对照时，这个说法不是更显正确吗？自然科学由一系列学科构成，主要关心可感知的世界，涉及我们可看到，听到，摸到的现象，换句话说，涉及物质。这是关于物质的哲学。它的运行基础，即它的启始点、它的回归点，就是与感官接触的那些现象。它查明、登录、比较、合并、编排，然后用于确定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的现象，也就是它们服从的秩序，或我们通常称为自然法则的东西。它从来都没有越出因果关系的检验范围。它的目标是要将复杂的现象分解成简单的要素与原理，但是，等它触及所谓的第一要素，第一原则和法则后，它的使命就到达了尽头。它保持在由之出发的那个有形系统的范围之内，从来都不肯超出“燃烧的世界城堡”。假如它愿意，当然也会对目前为止的分析的完整性感到某种程度的疑惑，由于这个原因，它也可以努力得出更简单的法则和更少的原理。它也许不满足于自己的组合、假设、体系。它可以抛弃托勒密的世界观而采用牛顿世界观，可以抛弃炼金术士而转向拉瓦锡和戴维。就是说，它也许觉得目前还没有触及自身学科的底部，但它的目标仍然是要到达底部，再无别的目的。它由物质开始，也在物质里结束。它永远也无法越出这个范围而进入精神领域。印度的观念据说认为大地落在一只乌龟背上，可是，上述自然科学家从来都不会自问，这宇宙是靠何样外在于宇宙的影响力来支撑自身的，就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位自然科学家而已。

If indeed he be a religious man, he will of course have a very definite view of the subject; but that view of his is private, not professional,—the view, not of a physicist, but of a religious man; and this, not because physical science says any thing different, but simply because it says nothing at all on the subject, nor can do so by the very undertaking with which it set out. The question is simply *extra artem* . The physical philosopher has nothing whatever

to do with final causes, and will get into inextricable confusion, if he introduces them into his investigations. He has to look in one definite direction, not in any other. It is said that in some countries, when a stranger asks his way, he is at once questioned in turn what place he came from: something like this would be the unseasonableness of a physicist, who inquired how the phenomena and laws of the material world primarily came to be, when his simple task is that of ascertaining what they are. Within the limits of those phenomena he may speculate and prove; he may trace the operation of the laws of matter through periods of time; he may penetrate into the past, and anticipate the future; he may recount the changes which they have effected upon matter, and the rise, growth, and decay of phenomena; and so in a certain sense he may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material world, as far as he can; still he will always advance from phenomena, and conclude upon the internal evidence which they supply. He will not come near the questions, what that ultimate element is, which we call matter, how it came to be, whether it can cease to be, whether it ever was not, whether it will ever come to nought, in what its laws really consist, whether they can cease to be, whether they can be suspended, what causation is, what time is, what the relations of time to cause and effect, and a hundred other questions of a similar character.

确实，假如他是一位信教的人士，当然就会对这个话题有相当确定的观点，但他的这个观点只是私人的，而非专业的，即不是一位物理学家的观点，而是一位信教的人士的观点。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物理科学说了什么不同的东西，而只是简单地因为它在这个主题上什么都没有说，由于它所从出发的那件事情本身，它也无法做到这样。这问题很简单，就是“超出学科所能”。自然哲学家与终极因素不存在任何一种关系，假如他把终极因引入自己的研究范围，那就会造成无法逃脱的混乱。他只能朝一个确定的方向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方向

看。据说在某些国家，陌生人问路时，他会马上被反过来问及他从哪里来。像这一类的事情，在一位自然科学家那里是相当反常的，他的任务只不过是要确定自然现象到底是什么，而人们却要问他有形世界的现象与法则到底如何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在这些现象的范围之内，他也许可以推测和证明，他可以跟踪物质法则在不同时期的运行情况，他也许可以深入过去，可以预测未来。他也许会解释这些法则给物质带来的变化，以及现象的产生、成长与衰亡。因此，在一种意义上说，他尽可以书写一部物质世界史。但是，他还是只能从现象出发，并就现象提供的内在证据作出结论。可是，有许多问题他不会接近，如我们称为物质的那种终极元素是什么，它如何产生，它是否不再存在，它有没有不存在的时候，它最终是否能够归于零，它的法则到底在于什么，它们是否能够停止存在，它们能否被取代；因果关系是什么，时间是什么，时间与因果律是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以及上百种性质类似的其他问题。

Such is Physical Science, and Theology, as is obvious, is just what such Science is not. Theology begins, as its name denotes, not with any sensible facts, phenomena, or results, not with nature at all, but with the Author of nature,—with the one invisible, unapproachable Cause and Source of all things. It begins at the other end of knowledge, and is occupied, not with the finite, but the Infinite. It unfolds and systematizes what He Himself has told us of Himself; of His nature, His attributes, His will, and His acts. As far as it approaches towards Physics, it takes just the counterpart of the questions which occupy the Physical Philosopher. He contemplates facts before him; the Theologian gives the reasons of those facts. The Physicist treats of efficient causes; the Theologian of final. The Physicist tells us of laws; the Theologian of the Author, Maintainer, and Controller of them; of their scope, of their suspension, if so be; of their beginning and their end. This is how the two schools stand related to each other, at that point where they approach the

nearest; but for the most part they are absolutely divergent. What Physical Science is engaged in I have already said; as to Theology, it contemplates the world, not of matter, but of mind; the Supreme Intelligence; souls and their destiny; conscience and dut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ealings of the Creator with the creature.

这就是自然科学，而神学很显然正好就是这类科学所不是的东西。如其名称所示，神学并不从可感的事实、现象或结果开始，根本就不从自然开始，而是从自然的作者开始，从所有事物看不见和无法趋近的起因和来源开始。它从知识的另一端开始，它关心的不是有限事物，而是无限。它将神亲自告诉我们的关于他自身、他的本性、他的属性、他的意旨及他的作为的一切显露给我们，并使其系统化。就它接近自然科学的范围而言，它所思索的，却与困惑自然哲学家的那些问题相反。自然哲学家思考眼前的事实，神学家拿出这些事实的理由。自然科学家研究动力因，神学家探索终极因。自然科学家告诉我们关于法则的事情，神学家告诉我们关于这些法则的立法者、维持者和控制者的事情，也讲这些法则的范围（假如有的话），还有这些法则暂时失效的事情，还有其起始和终结的事情。这正是这两派思想彼此发生联系的地方，在这里，它们才算彼此靠得最近。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它们绝对是彼此分歧的。自然科学研究什么，我已经说过了；至于神学，它思索这个世界，但不是物质的世界，而是精神的世界。它研究最高智力、灵魂及其命运、良知及职责、神在过去、当前及未来与造物的交往。

4．

4．

So far, then, as these remarks have gone, Theology and Physics cannot touch each other, have no intercommunion, have no ground of difference or agreement, of jealousy or of sympathy. As well may musical truths be said to interfere with the doctrines of architectural science; as well may there be a collision between the mechanist and the geologist, the engineer and the grammarian; as well might the British Parliament or the French nation be jealous of some possible belligerent power upon the surface of the moon, as Physics pick a quarrel with Theology. And it may be well,—before I proceed to fill up in detail this outline, and to explain what has to be explained in this statement,—to corroborate it, as it stands, by the remarkable words upon the subject of a writer of the day: [9_2]
—

就目前已经说过的这些话而言，神学及自然科学彼此无法接触，无法相互往来，没有分歧或一致、嫉妒或同情的理由。兴许可以说音乐的事实会干扰建筑科学的学说，一位机械师兴许可能与地质学家发生冲突，兴许一位工程师会与文法教师有冲突，英国的议会或法兰西民族兴许会嫉妒月球表面可能存在的某支好战的大军，只有这样，自然科学才有可能与神学发生争执。在我一步步详细填充这个轮廓，并试图解释这句话里必须要予以解释的东西之前，借用当今一位作家就此所说的一些惊人的话来确证这一点，也许是不错的一件事情。 [10_2]

“We often hear it said,” he observes, writing as a Protestant (and here let me assure you, Gentlemen, that though his words have a controversial tone with them, I do not quote them in that aspect, or as wishing here to urge any thing against Protestants, but merely in pursuance of my own point, that Revelation and Physical Science cannot really come into collision),

作为一位新教徒（诸位，容我因此向各位保证，尽管他的话颇值得商榷，我却不会引述他这方面的内容，也不想在这里勉强为难新教徒，我只是依自己的观点说话，即启示与自然科学并不可能真正冲突），这位作家注意到：

> we often hear it said that the world is constantly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nlightened, and that this enlightenment must be favourable to Protestantism, and unfavourable to Catholicism. We wish that we could think so. But we see great reason to doubt whether this is a well-founded expectation. We see that during the last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the human mind has been in the highest degree active; that it has made great advances in every branch of natural philosophy; that it has produced innumerable inventions tending to promote the convenience of life; that medicine, surgery, chemistry, engineering, have been very greatly improved, that government, police, and law have been improved, though not to so great an extent as the physical sciences. Yet we see that, during these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Protestantism has made no conquests worth speaking of. Nay, we believe that, as far as there has been change, that change has, on the whole, been in favour of the Church of Rome. We cannot, therefore, feel confident that the progress of knowledge will necessarily be fatal to a system which has, to say the least, stood its ground in spite of the immense progress made by the human race in knowledge since the days of Queen Elizabeth.

“我们经常听人说，这世界一刻不停地越来越开明，这种开明一定对新教有利而对天主教不利。但愿我们可以这样想。可是，我们有极充足的理由怀疑，这种预期是否有合理依据。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二百五十年间，人类的思想一直保持最高程度的活跃性，它在自然哲学的每一个分支里都有了长足进步，它有了数不清的发明创造，旨在促进生活的便利，医学、外科学、化学、工程学都得到极大改善，政府、治安和法治水平不断提高，尽管改进的水平不如各自然学科那么高。可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二百五十年间，新教并没有创造出值得一谈的征服成果。不仅如此，我们还相信，在已经发生的变化范围内，整体而言一直有利于罗马天主教会。因此，我们并不能感觉自信，以为知识的进步必然会对这样一个体系产生致命影响，往最轻里说，这个体系一直屹立不动，尽管人类从伊丽莎白女王以来在知识上取得了惊人进步。

Indeed, the argument which we are considering seems to us to be founded on an entire mistake. There are branches of knowledge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law of the human mind is progress. In mathematics, when once a proposition has been demonstrated, it is never afterwards contested. Every fresh storey is as solid a basis for a new superstructure as the original foundation was. Here, therefore, there is a constant addition to the stock of truth. In the inductive sciences, again, the law is progress…

“的确，我们正在考虑的这一论证，在我们看来似乎基于一个彻底的错误。对知识分支的某些方面而言，人类思想的法则就是进步。在数学里，一个命题一旦得到证明，以后就永远不再起争议。每层新建的楼房，都可以成为一个坚固的基础，就像原来的基础那样用于新的上层建筑。因此，在这里，真理的仓库也在不断添加新内容。在归纳科学中，同样，它的法则也是进步……

But with theology the case is very different. As respects natural religion (Revelation being for the present altogether left out of the question), it is not easy to see that a philosopher of the present day is more favourably situated than Thales or Simonides. He has before him just the same evidences of design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which the early Greeks had…As to the other great question, the question what becomes of man after death, we do not see that a highly educated European, left to his unassisted reason, is more likely to be in the right than a Blackfoot Indian. Not a single one of the many sciences, in which we surpass the Blackfoot Indians, throws the smallest light on the state of the soul after the animal life is extinct…

“但是，在神学中，事情就很不一样了。就自然宗教（目前，启示已经被摆到一边去了）而言，不太容易看出，当前的一位哲学家就比泰勒斯或西蒙尼戴斯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他眼前摆放着的宇宙结构设计论证据，与早期希腊人拥有的证据相同……至于另外

一个大问题，即人死后的去向问题，我们看不出，一位受过高级教育的欧洲人，假如全凭无指导的理性，他怎么就可能比黑脚族印第安人更容易站在真理一边。我们的确在许多学科里胜过黑脚族印第安人，可是，却没有哪一个学科会给予我们哪怕一丁点洞见，让我们明白动物生命灭绝之后，灵魂会处于什么状态……

Natural Theology, then, is not a progressive science. That knowledge of our origin and of our destiny which we derive from Revelation is indeed of very different clearness, and of very different importance. But neither is Revealed Religion of the nature of a progressive science…In divinity there cannot be a progress analogous to that which is constantly taking place in pharmacy, geology, and navigation. A Christian of the fifth century with a Bible is neither better nor worse situated than a Christia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ith a Bible, candour and natural acuteness being of course supposed equal. It matters not at all that the compass, printing, gunpowder, steam, gas, vaccination, and a thousand other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 which were unknown in the fifth century, are familiar to the nineteenth. None of these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 has the smallest bearing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man is justified by faith alone, or whether the invocation of saints is an orthodox practice…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world will never go back to the solar system of Ptolemy; nor is our confidence in the least shaken

by the circumstance that so great a man as Bacon rejected the theory of Galileo with scorn; for Bacon had not all the means of arriving at a sound conclusion… But when we reflect that Sir Thomas More was ready to die for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we cannot but feel some doubt whether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may not triumph over all opposition. More was a man of eminent talents. He had all the information on the subject that we have, or *that, while the world lasts, any human being will have …No progress that science has made, or will make* , can add to what seems to us the overwhelming force of the argument against the Real Presence. We are therefore unable to understand why what Sir Thomas More believed respecting Transubstantiation may not be believed to the end of time by men equal in abilities and honesty to Sir Thomas More. But Sir Thomas More is one of the choice specimens of human wisdom and virtue; and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is a kind of proof charge. The faith which stands that test will stand any test…

“因此，自然神学不是一种进步的科学。我们从启示得来的关于我们的起源和命运的知识，有着相当不同的清晰度和相当不同的重要性。可是，启示宗教也不是进步科学性质的……在神学中，不可能存在与不停地在制药学、地质学和航海学里发生的事情相类似的那种进步。五世纪的基督徒如果手头有一本《圣经》，他与十九世纪手拿《圣经》的基督徒相比并没有处境的优劣之别，当然，假定他们的正直及天生的

敏锐程度差不多的话。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蒸汽、气体、种痘以及上千种其他发现和发明都是五世纪所不知的，到十九世纪却尽人皆知，但这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些发现和发明，对人是否能仅凭信仰而称义，或求圣徒代祷是否正统做法这个问题，没有一丁点的关系……我们确信，这世界再不会回到托勒密的太阳系，我们的信心似乎不会因为像培根这样伟大的人物，竟然以嘲讽的口气拒斥伽利略的学说而受到丝毫影响，因为培根并不具备得出确实结论所需的全部手段……可是，如果我们回顾这个史实，即托马斯·莫尔爵士乐于为圣餐变体论教义赴死，我们只会感觉到某种疑虑，不知道圣餐变体论的教义会否顶住所有的反对意见而大获全胜。莫尔是一位有着卓越才干的人士。关于这个主题，我们今天拥有的信息，他全都有了，或者说，只要这世界存续下去，任何人都将拥有这信息……科学已经或将要取得的任何进步，都不能为在我们看来是针对圣体实在论的论证中那股强大力量的东西再增添什么。因此，我们无法明白，在圣餐变体论的事情上，为什么托马斯·莫尔爵士信以为真的东西，就不能为能力和正直与他相当的人所坚信，一直到时间的结束。但是，托马斯·莫尔爵士是人类智慧与美德精选的范例之一，而圣餐变体论的教义也是一种火力证明。能经受住那种考验的信念，也将经受住任何考验……

The history of Catholicism strikingly illustrates these observations. During the last seven centuries the public mind of Europe has made constant progress in every department of secular knowledge; but in religion we can trace no constant progress… Four times since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of

Rome was established in Western Christendom has the human intellect risen up against her yoke. Twice that Church remained completely victorious. Twice she came forth from the conflict bearing the marks of cruel wounds, but with the principle of life still strong within her. When we reflect on the tremendous assaults she has survived, we find it difficult to conceive in what way she is to perish.

“天主教的历史可令人惊奇地说明这些观察。过去七个世纪里，欧洲的民智在世俗知识的每个部分都在获得不断进步，可是，在宗教里，我们却看不到任何进步痕迹……自罗马教会的权威在西部基督教世界确立以来，人类的才智曾四次起而抗争教会的管束。有两次，教会获得了完全的胜利。有两次，她遍体鳞伤地挣脱了冲突，但体内仍然充满强劲的生命力。当我们回顾教会所承受的巨大攻击，会发现很难设想它将以哪种方式消失。”

You see, Gentlemen, if you trust the judgment of a sagacious mind, deeply read in history, Catholic Theology has nothing to fear from the progress of Physical Science, even independently of the divinity of its doctrines. It speaks of things supernatural; and these, by the very force of the words, research into nature cannot touch.

诸位请看，假如我们信任一位博览史书的睿智之士的判断力，那么，天主教神学对自然科学的进步就没有什么好惧怕的，甚至与其教义的神性无关。它言及超自然的事物，而根据这些词语自身的力量，这些超自然的事物，靠探索自然是无法触及的。

5 .

5 .

It is true that the author in question, while saying all this, and much more to the same purpose, also makes mention of one exception to his general statement, though he mentions it in order to put it aside. I, too, have to notice the same exception here; and you will see at once, Gentlemen, as soon as it is named, how little it interferes really with the broad view which I have been drawing out. It is true, then, that Revelation has in one or two instances advanced beyond its chosen territory, which is the invisible world, in order to throw light upon the history of the material universe. Holy Scripture, it is perfectly true, does declare a few momentous facts, so few that they may be counted, of a physical character. It speaks of a process of formation out of chaos which occupied six days; it speaks of the firmament; of the sun and moon being created for the sake of the earth; of the earth being immovable; of a great deluge; and of several other similar facts and events. It is true; nor is there any reason why we should anticipate any difficulty in accepting these statements as they stand, whenever their meaning and drift are authoritatively determined; for, it must be recollected, their meaning has not yet engaged the formal attention of the Church, or received any interpretation which, as Catholics, we are bound to accept, and in the absence of such definite interpretation, there is perhaps some presumption in saying that it means this, and does not mean that. And this being the case, it is not at all probable that any discoveries ever should be made by physical inquiries incompatible at the same time with one and all of those senses

which the letter admits, and which are still open. As to certain popula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exts in question, I shall have something to say of them presently; here I am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letter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tself, as far as it bears upon the history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nd I say that we may wait in peace and tranquillity till there is some real collision between Scripture authoritatively interpreted, and results of science clearly ascertained, before we consider how we are to deal with a difficulty which we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thinking will never really occur.

的确，所说的这位作者，尽管说了这么多，而且还说了更多出于同一目的的话，却也提及他总体陈述中的一个例外，尽管提及此例外的目的是要将它搁置一边。我自己也必须在此注意那同一个例外。一提及这个例外，各位马上就会明白，它根本不会影响到我刚刚描述的那个粗略观点。的确，启示在一两个例子中确实越出了它原来选定的领域，也就是那个看不见的世界，目的是要澄清有形宇宙的历史。绝对真实的情形是，《圣经》的确宣布过几件物理性质的重大事实，但数量少得无法计算。它谈到六日内从混沌中开天辟地的事情，它谈到天空，谈到为大地之故而创造太阳与月亮的事情，谈到大地不动，谈到大洪水，也谈到类似性质的其他事实与事件。这是真的，也不存在任何理由让我们接受这些陈述本来的样子，并在其意义和内涵得到权威性的确定时，必须预料会出现什么困难。因为，我们应当记住，它们的意义尚没有得到教会正式的关注，也没有得到我们作为天主教徒注定要接受的任何解释。由于缺乏这种确定的解释，所以，如果我们说它的意思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似乎就有某种放肆的成分。既然事情是这样的，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下面的情形，即物理的探索所获得的任何发现，同时与词语所能容忍的、以及尚处于开放状态的一个及所有词义不相容。至于对所说的文本进行的某些通俗解释，我马上就会有所说明，目前，我只关心圣经有关天空与大地历史的那部分经文的字面意义本身。而且我要说，我们不妨平心静气地等待下

去，直到得到权威解释的圣经与明确肯定的科学成就之间出现某种真实的矛盾，之后再思考如何应对我们有合理根据认为永远也不会实际产生的那种困难。

And, after noticing this exception, I really have made the utmost admission that has to be made about the existence of any common ground upon which Theology and Physical Science may fight a battle. On the whole, the two studies do most surely occupy distinct fields, in which each may teach without expecting any interposition from the other. It might indeed have pleased the Almighty to have superseded physical inquiry by revealing the truths which are its object, though He has not done so: but whether it had pleased Him to do so or not, anyhow Theology and Physics would be distinct sciences; and nothing which the one says of the material world ever can contradict what the other says of the immaterial. Here, then, is the end of the question; and here I might come to an end also, were it not incumbent on me to explain how it is that, though Theology and Physics cannot quarrel, nevertheless, Physical Philosophers and Theologians have quarrelled in fact, and quarrel still. To the solution of this difficulty I shall devote the remainder of my Lecture.

而且，注意到这一例外之后，我实际上就已经表示了最大可能的认可，这是就神学和自然科学有可能爆发一场战斗的任何共同立场的存在而必须有的认可。整体而论，这两种研究的确占据相当不同的领域，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里，它们分别都能说些什么而不用预期对方会有任何一种干预。尽管万能的神并没有这么做，可是，如果他将作为自然探索目的的真理启示出来，从而取代自然探索，那自然一定会使他十分开心。可是，无论这样做会否使他开心，神学与自然科学终归还是不同的学科，一个学科就有形世界所说的任何话，都不会与另一

个学科就无形世界所说的话相矛盾。因此，问题就在这里结束了，假如并无做如下解释的责任，那我自己的话也该收尾了。然而，尽管神学和自然科学并不会争吵，但自然哲学家和神学家事实上却向来不和，而且现在还在争吵。我这次演讲余下的时间，就专门用于找到化解这一困难的办法。

6．

6．

I observe, then, that the elementary methods of reasoning and inquiring used in Theology and Physics are contrary the one to the other; each of them has a method of its own; and in this, I think, has lain the point of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viz., that neither of them has been quite content to remain on its own homestead, but that, whereas each has its own method, which is the best for its own science, each has considered it the best for all purposes whatever, and has at different times thought to impose it upon the other science, to the disparagement or rejection of that opposite method which legitimately belongs to it.

我观察到，神学与自然科学利用的推理与探索方法正好相反，各自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我觉得，这就是这两派学者发生争议的焦点所在，即是说，它们双方都不满足于各人自扫门前雪。虽然各自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就其自身学科来说也是最好的方法，可是，各自都以为那是达到所有目的的最佳方法，在不同的时期，甚至还想将自己的方法强加在对方本来十分合理的科学方法的头上，结果遭到对方的轻视或拒斥。

The argumentative method of Theology is that of a strict science, such as Geometry, or deductive; the method of Physics, at least on starting, is that of an empirical pursuit, or inductive. This peculiarity on either side arises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ase. In Physics a vast and omnigenous mass of information lies before the inquirer, all in a confused litter, and needing arrangement and analysis. In Theology such varied phenomena are wanting, and Revelation presents itself instead. What is known in Christianity is just that which is revealed, and nothing more; certain truths, communicated directly from above, are committed to the keeping of the faithful, and to the very last nothing can really be added to those truths. From the time of the Apostles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strictly new truth can be added to the theological information which the Apostles were inspired to deliver. It is possible of course to make numberless deductions from the original doctrines; but, as the conclusion is ever in its premisses, such deductions are not, strictly speaking, an addition; and, though experience may variously guide and modify those deductions, still, on the whole, Theology retains the severe character of a science, advancing syllogistically from premisses to conclusion.

神学的论证方法，用的是类似几何学的一种严谨科学的方法，或称演绎法；而自然科学的方法，至少在起始阶段，是那种经验探求的方法，或称归纳法。双方方法上的这种奇特性，源自这件事情的本质。在自然科学家这里，庞大和芜杂的大量信息摆在探索者面前，全都混乱地堆在一处，总是需要整理和分析。而在神学里，这类各式各样不同的现象是没有的，启示直接表现了自身。在基督教里，已经知道的就是已经启示出来的，没有再多的东西。某些直接源自上天的真理，传达给了忠信者去保管，且一直到最后一刻都不能真正添加别的任何东西进去。从使徒时代一直到世界末日，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新

的真理可以添加到使徒受启示后发送出来的神学信息里去。当然，有可能根据原初教义演绎出无数内容，可是，由于结论就在其前提中，这样的演绎严格来说就不是什么添加。由于经验可以各种方式引导并修正那些演绎，因此，整体而论，神学仍然保持着一门学科的严格特征，可以根据三段论法从前提推进至结论。

The method of Physics is just the reverse of this: it has hardly any principles or truths to start with, externally delivered and already ascertained. It has to commence with sight and touch; it has to handle, weigh, and measure its own exuberant *sylva* of phenomena, and from these to advance to new truths,—truths, that is, which are beyond and distinct from the phenomena from which they originate. Thus Physical Science is experimental, Theology traditional; Physical Science is the richer, Theology the more exact; Physics the bolder, Theology the surer; Physics progressive, Theology, in comparison, stationary; Theology is loyal to the past, Physics has visions of the future. Such they are, I repeat, and such their respective methods of inquiry,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ase.

自然科学的方法正好与此相反：它很少有什么从外面给定且已经得到确证的启始原理或真理。它必须从视觉和触觉开始，它必须触摸、衡量和测量其茂密森林般的现象，并从中进展到新的真理，就是说，这些真理超出所从起源的那些现象，并与那些现象不同。自然科学是实验性质的，而神学则是传统性质的。自然科学更加丰富，而神学更加严格。自然科学是更大胆的学问，而神学则是更确切的学问。自然科学是进步的学问，而神学比较而言则是静止不动的学问。神学忠实于过去，自然科学憧憬未来。我重复一次，它们的本质即是这样的，它们各自的探究方法也是这样的，这是各自的本质所决定的。

But minds habituated to either of these two methods can hardly help extending it beyond its due limits, unless they are put upon their guard, and have great command of themselves.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divines have from time to time been much inclined to give a traditional, logical shape to sciences which do not admit of any such treatment. Nor can it be denie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men of science often show a special irritation at theologians for going by antiquity, precedent, authority, and logic, and for declining to introduce Bacon or Niebuhr into their own school, or to apply some new experimental and critical proces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at which has been given once for all from above. Hence the mutual jealousy of the two parties; and I shall now attempt to give instances of it.

但是，习惯于这些方法的人很少有不强行拓展至其适当界限之外的，除非他们自设警戒，高度自律。不可否认，神职人员时不时倾向于给并不容忍任何类似处置办法的学科披上传统和逻辑的外表。也不能否认，另外一方面，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经常对从古物、先例、权威和逻辑开始研究的神学家表现出特别的激怒状态，而且神学家并不将培根或尼布尔纳入自己的流派，也不应用新的实验性和批判性方法改善一次性从上天给予的东西。由此便产生了两派人的相互嫉妒，下面，我就来为大家提供一些实例。

7．

7．

First, then, let me refer to those interpretations of Scripture,

popular and of long standing, though not authoritative, to which I have already had occasion to allude. Scripture, we know, is to be interpreted according to the unanimous consent of the Fathers; but, besides this consent, which is of authority, carrying with it the evidence of its truth, there have ever been in Christendom a number of floating opinions, more or less appended to the divine tradition; opinions which have a certain probability of being more than human, or of having a basis or admixture of truth, but which admit of no test, whence they came, or how far they are true, besides the course of events, and which meanwhile are to be received at least with attention and deference. Sometimes they are comments on Scripture prophecy, sometimes on other obscurities or mysteries. It was once an opinion, for instance, drawn from the sacred text, that the Christian Dispensation was to last a thousand years, and no more; the event disproved it. A still more exact and plausible tradition, derived from Scripture, was that which asserted that, when the Roman Empire should fall to pieces, Antichrist should appear, who should be followed at once by the Second Coming. Various Fathers thus interpret St. Paul, and Bellarmine receives the interpretation as late as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event alone can decide if, under any aspect of Christian history, it is true; but at present we are at least able to say that it is not true in that broad plain sense in which it was once received.

首先，让我来说一说对圣经的那些通俗和由来已久的解释，尽管不是权威解释，这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我们知道，圣经的解释，应当根据早期教父一致赞同的东西来进行，但是，除了这种根据权威且带有其真理性的证据的赞同之外，在基督教世界，向来还有许多流动不居的观点，这些观点多多少少都依附于预言传统。这些观点有高于人类知识的某种或然性，或具备真理的基础或混合物的性质。除开一系列事件之外，又经受不住检验，不知其从何而来，在多大范围内是正

确的，但同时至少要作为值得注意和尊重的东西予以接受。有时候，它们是对圣经预言的评注，有时候论及其他隐晦不清或神秘莫测的事物。例如，曾有这么一种观点，是从圣经文本中抽取的，认为基督时代将持续一千年，并不会更长，但为历史事件所否证。还从圣经里导出一种更准确更有可能的传统，即认为当罗马帝国崩溃时，敌基督就会出现，之后马上就会发生基督的再次降临。不同的的教父都这么解释圣保罗，而贝拉明迟至十六世纪才得到这样的解释。在基督教史的任何一个方面，假如事件是真实的，则仅凭这事件便可决定。但目前，我们至少可以说，在该事件为人们所接受的那种宽泛的简单意义上说，这事不是真实的。

Passing from comments on prophetical passages of Scripture to those on cosmological, it was, I suppose, the common belief of ages, sustained by receive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acred text, that the earth was immovable. Hence, I suppose, it was that the Irish Bishop who asserted the existence of the Antipodes alarmed his contemporaries; though it is well to observe that, even in the dark age in which he lived, the Holy See, to which reference was made, did not commit itself to any condemnation of the unusual opinion. The same alarm again occupied the public mind when the Copernican System was first advocated: nor were the received traditions, which were the ground of that alarm, hastily to be rejected; yet rejected they ultimately have been. If in any quarter these human traditions were enforced, and, as it were, enacted, to the prejudice and detrimen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and this was never done by the Church herself), this was a case of undue interference on the part of the Theological schools in the province of Physics.

从对圣经的预言段落进行评论，过渡到对于其宇宙论的评论，我

相信，为对神圣文本进行的广为认可的解释标准所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共同信念，即大地是不动的。因此，我假定，是爱尔兰的那位宣称存在相对极的主教震撼了他的同时代人，不过，我们很容易就看出，哪怕在圣座生活其中的黑暗时代，如果有异常观点提交给他，他并不会随意大加谴责。哥白尼体系第一次得到支持时，人们又一次感到惊慌，而作为这种惊慌的理由的原有传统却也没有匆忙抛弃，但最终还是被抛弃了。假如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强制推行这种属人的传统，并且似乎是以对科学调查有偏见和有害的方式予以实施（而这样的事情从来都不是由教会自己去做的），那就属于神学流派这一方对自然科学领域过分干扰的事例。

So much may be said as regards interpretations of Scripture; but it is easy to see that other received opinions, not resting on the sacred volume, might with less claim and greater inconvenience be put forward to harass the physical inquirer, to challenge his submission, and to preclude that process of examination which is proper to his own peculiar pursuit. Such are the dictatorial formula against which Bacon inveighs, and the effect of which was to change Physics into a deductive science, and to oblige the student to assume implicitly, as first principles, enunciations and maxims, which were venerable, only because no one could tell whence they came, and authoritative, only because no one could say what arguments there were in their favour. In proportion as these encroachments were made upon his own field of inquiry would be the indignation of the physical philosopher; and he would exercise a scepticism which relieved his feelings, while it approved itself to his reason, if he was called on ever to keep in mind that light bodies went up, and heavy bodies fell down, and other similar maxims, which had no pretensions to a divine origin, or to be considered self-evident principles, or intuitive truths.

在圣经的诠释上，可以说的话有那么多，可是，很容易就看出，其他广为接受的观点，虽然并非基于宗教文本，却也有可能困扰自然科学的探索者，这些观点提出的主张较少，却可能造成更大不便，强迫这位探索者顺从，并阻碍适合其特定追求的那种检验过程。这些，就是培根予以猛烈抨击的专横跋扈之举，其结果将使自然科学变成一种演绎科学，并迫使其研究者含蓄地以阐述和格言为首要原则，而这些阐述和格言之所以可敬，就是因为没有人说得清楚它们来自何处，之所以有权威性，仅只是因为没有人能说到底哪些论证能够支持它们。这些侵犯在多大程度上闯入他自己的研究领域，自然哲学家就会产生多大程度的愤怒。他会运用一种怀疑主义来舒缓自己的情绪。假如他被迫记住轻者上升浊者下沉以及其他类似格言，这种怀疑主义会得到其理性的认可，因为上述格言既缺乏神圣来源的借口，又不能被认为是自理的原则，也不是直观真理。

And in like manner, if a philosopher with a true genius for physical research found the Physical Schools of his day occupied with the discussion of final causes, and solving difficulties in material nature by means of them; if he found it decided, for instance, that the roots of trees make for the river, *because* they need moisture, or that the axis of the earth lies at a certain angle to the plane of its motion by *reason* of certain advantages thence accruing to its inhabitants, I should not wonder at his exerting himself for a great reform in the process of inquiry, preaching the method of Induction, and, if he fancied that theologians were indirectly or in any respect the occasion of the blunder, getting provoked for a time, however unreasonably, with Theology itself.

同样，假如一位真才实学的自然哲学家发现他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流派执迷于终极因素的讨论，并以这些方法来解决有形自然界的困难；例如，假如他发现有人认定树根有利于河流，因为树根需要湿

气，或认定地轴与地球运动的那个平面形成某一确定的角度，就因为这样会对地上的居民带来某些益处，那我就不会奇怪，他为何要求对探索方法进行更大改革，大肆宣传归纳法，也不会奇怪他为何有段时间对神学本身无缘无故地产生，假如他想象就是神学家间接和以其他任何方式铸成了这种大错的话。

I wish the experimental school of Philosophers had gone no further in its opposition to Theology than indulging in some indignation at it for the fault of its disciples; but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it has run into excesses on its own side for which the school of high Deductive Science has afforded no precedent; and that, if it once for a time suffered from the tyranny of the logical method of inquiry, it has encouraged, by way of reprisals, encroachments and usurpations on the province of Theology far more serious than that unintentional and long obsolete interference with its own province, on the part of Theologians, which has been its excuse. And to these unjustifiable and mischievous intrusions made by the Experimentalists into the department of Theology I have now, Gentlemen, to call your attention.

但愿实验派的自然哲学家们在反对神学时，并没有越出因神学的门徒所犯下的错误而沉迷于对神学的愤怒这个范围，可是，我们得承认，这个实验流派在其自身那一边也走向了极端，是那派高级演绎科学尚没有任何先例可援的。而且，假如实验流派曾不时遭受过逻辑研究方法的专横之苦，那它同时也通过报复手段怂恿对神学领域的侵入和篡夺，其程度远远超过神学家这一边对其自身领域无意和早已放弃的干扰，而这种干扰正是实验流派这么做的借口。诸位，我此时就必须提醒各位注意实验科学家们对神学这个部门无理由和有害的入侵。

8．

8．

You will let me repeat, then, what I have already said, that, taking things as they are, the very idea of Revelation is that of a direct interference from abov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ruths otherwise unknown; moreover, as such a communication implies recipients, an authoritative depositary of the things revealed will be found practically to be involved in that idea. Knowledge, then, of these revealed truths, is gained, not by any research into facts, but simply by appealing to the authoritative keepers of them, as every Catholic knows, by learning what is a matter of teaching, and by dwelling upon, and drawing out into detail, the doctrines which are delivered; according to the text, “Faith cometh by hearing.” I do not prove what, after all, does not need proof, because I speak to Catholics; I am stating what we Catholics know, and ever will maintain to be the method proper to Theology, as it has ever been recognized. Such, I say, is the theological method, deductive; however, the history of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is only one long course of attempts, on the part of the partisans of the Baconian Philosophy, to get rid of the method proper to Theology and to make it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请大家容我把已经说过的话重复一次，即依照事物的实际情形而论，启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指来自上天的直接干预，目的是要引入以其他方法无法知晓的真理。另外，由于这样一种交流暗含着接受者，因此，所启示出来的事物的权威受托人实际上也必然涉及这个概念。因此，关于这些启示真理的知识，其获得并非通过对事实的研究，而

是通过诉求这些知识的权威受托者，这是任何一位天主教徒都明白的，也就是学习某种通过教诲得来的东西，并思考所讲解的教义，将它们描绘成细节，并且要根据圣经文本所说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行事。毕竟，并不需要证明的东西，我不会在这里证明，因为我是在对天主教徒说话。我说的话，全是天主教徒知道的，而且还会保持是对神学合适的方法，它向来都被我们大家所认可。我要说，这就是神学研究的方法，即演绎法。但是，过去三世纪的历史，在培根哲学的党徒那里只不过是很长的一段挣扎史，他们想要抛弃适合神学的方法，并使其变成一种实验科学。

But, I say, for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we must have a large collection of phenomena or facts: where, then, are those which are to be adopted as a basis for an inductive theology? Three principal stores have been used, Gentlemen: the first, the text of Holy Scripture; the second, the events and transactions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he third, the phenomena of the visible world. This triple subject-matter,—Scripture, Antiquity, Nature,—has been taken as a foundation, on which the inductive method may be exercised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ascertainment of that theological truth, which to a Catholic is a matter of teaching, transmission, and deduction.

可是，我要说，对于一门实验科学而言，我们就必须采集足够量的现象或事实，那么，可被采纳为一种归纳神学的基础的那些现象或事实在哪里呢？诸位，曾经使用过三种主要的备用品，首先是圣经文本，其次是教会历史上的事件与事务，第三是可见世界的现象。这个三重素材，即圣经、古物和自然，向来都被当作一个基础，在此之上，可运用归纳方法进行神学真理的探索与确定，而神学真理在天主教徒看来只能通过听道、传播和演绎获得。

Now let us pause for a moment and make a reflection before going into any detail. Truth cannot be contrary to truth; if these three subject-matters were able,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inductive method, to yield respectively theological conclusions in unison and in concord with each other, and also contrary to the doctrines of Theology as a deductive science, then that Theology would not indeed at once be overthrown (for still the question would remain for discussion, which of the two doctrinal systems was the truth, and which the apparent truth), but certainly the received deductive theological science would be in an anxious position, and would be on its trial.

现在，让我们暂停一下，进行一次回顾，之后再谈细节。真理不可能与真理形成矛盾。假如在归纳方法的压力下，这三种素材都能够分别导出彼此一致和相互协调的神学结论，而且能够与作为一种归纳科学的神学的教育构成矛盾，那么，这种神学的确就不能被立即推翻了（因为，这两种教义体系中哪一个是真理，哪一个是表面真理的问题仍然需要讨论下去），但是很显然，广为接受的归纳性的神学科学就会处在令人担忧的地位，并且要接受考验。

Again, truth cannot be contrary to truth;—if then,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three subject-matters,—Scripture, Antiquity, and Nature,—worked through three centuries by men of great abilities, with the method or instrument of Bacon in their hands, have respectively issued in conclusions contradictory of each other, nay, have even issued, this or that taken by itself, Scripture or Antiquity, in various systems of doctrine, so that on the whole, instead of all three resulting in one set of conclusions, they have yielded a good score of them; then and in that case—it does not at once follow that no one of this score of conclusions may happen to be the true one,

and all the rest false; but at least such a catastrophe will throw a very grave shade of doubt upon them all, and bears out the antecedent declaration, or rather prophecy, of theologians, before these experimentalists started, that it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huge mistake to introduce the method of research and of induction into the study of Theology at all.

再说一次，真理不可与真理形成矛盾。另外一方面，假如这三种素材，即圣经、古物和自然，在过去三个世纪里由一些能力超凡的人士借用其掌握的培根方法或手段分别得出了彼此矛盾的结论，不仅如此，甚至还在不同的教义体系里得出了依其自身即圣经或古物的这种或那种结论，从而在整体来看，不是全部三种素材都导致一套结论，而是它们都得出了很多结论。此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马上出现这种情形，即这许多结论当中没有一个碰巧就是真实的，而其他所有结论都是错误的。但是，这一灾难至少会对它们所有的结论投下灰暗的怀疑阴影，并会在这些实验科学家们开始之前支持神学家们先前的宣言，或称为他们的预言，即将归纳研究方法引入神学研究，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Now I think you will allow me to say, Gentlemen, as a matter of historical fact, that the latter supposition has been actually fulfilled, and that the former has not. I mean that, so far from a scientific proof of some one system of doctrine, and that antagonistic to the old Theology, having been constructed by the experimental party, by a triple convergence, from the several bases of Scripture, Antiquity, and Nature, on the contrary, that empirical method, which has done such wonderful things in physics and other human sciences, has sustained a most emphatic and eloquent reverse in its usurped territory,—has come to no one conclusion,—has illuminated no definite view,—has brought its glasses to no

focus,—has shown not even a tendency towards prospective success; nay, further still, has already confessed its own absolute failure, and has closed the inquiry itself, not indeed by giving place to the legitimate method which it dispossessed, but by announcing that nothing can be known on the subject at all,—that religion is not a science, and that in religion scepticism is the only true philosophy; or again, by a still more remarkable avowal, that the decision lies *between* the old Theology and none at all, and that, certain though it be that religious truth is nowhere, yet that, *if* anywhere it is, it undoubtedly is not in the new empirical schools, but in that old teaching, founded on the deductive method, which was in honour and in possession at the time when Experiment and Induction commenced their brilliant career. What a singular break-down of a noble instrument, when used for the arrogant and tyrannical invasion of a sacred territory! What can be more sacred than Theology? What can be more noble than the Baconian method? But the two do not correspond; they are mismatched. The age has mistaken lock and key. It has broken the key in a lock which does not belong to it; it has ruined the wards by a key which never will fit into them. Let us hope that its present disgust and despair at the result are the preliminaries of a generous and great repentance.

现在，诸位可能容我这样说了，作为历史事实，后面一种假定已经实际兑现了，而前者却还没有。我意思是说，在自然科学和其他属人的科学中成就非凡的经验方法，远不是某一教义体系或对抗古代神学的科学证明，因它是由实验流派根据三重的集合，即根据圣经、古物和自然等多个基础构建起来的；反过来，这方法在其篡夺来的领域里一直保持为一种极明显和逼真的倒退，一个结论也没有得出，并没有提出任何一种洞见，其眼镜并没有对上焦点，甚至都没有导致预期成功的趋向。更有甚者，它已经承认了绝对的失败，并且中断了自身

探索，并不是为了给被它逐出的那种合理的方法让出地盘，而是自我宣告说，关于这个话题，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知晓的。它宣称，宗教并不是一门科学，说在宗教里，怀疑主义是唯一真实的哲学。或者干脆就拿出更惊人的声明，说最终的决定要么就在于古老的神学，要么根本就没有。尽管非常肯定地说宗教真理在哪里也找不到，但是，假如哪个地方有，那一定也不会在新的实验流派里，而是在那个古老的说教里，这古老说教基于演绎方法，而在当时，这个方法正是实验与归纳方法开始其如日中天的事业的高峰，声名远扬，迷倒众人。一件极宝贵的工具，用在对一个神圣领域傲慢与专横的入侵时，那是多么惊人的一场溃败啊！哪还有什么比神学更神圣的学科呢？哪还有比培根方法更可宝贵的东西呢？可是，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符，它们根本都不能相互比较。时代将钥匙和锁搞错了。这个时代在并不属于它的一个锁孔里弄断了钥匙，一把本来就打不开这把锁的钥匙，毁坏了监禁的措施。我们只能希望，当前对这一结果的厌恶与绝望，只是更普遍和更彻底的忏悔的一场预演。

I have thought, Gentlemen, that you would allow me to draw this moral in the first place; and now I will say a few words on one specimen of this error in detail.

诸位，我已经思考过，大家一定会容许我首先总结这里面的寓意，现在，我只想拿一个具体范例来就这一类的谬误说上几句。

9．

9．

It seems, then, that instead of having recourse to the tradition and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t has been the philosophy of the modern school to attempt to determine the doctrines of Theology by means of Holy Scripture, or of ecclesiastical antiquity, or of physical phenomena. And the question may arise, *why* , after all, should not such informations, scriptural, historical, or physical, be used? and if used, why should they not lead to true results? Various answers may be given to this question: I shall confine myself to one; and again, for the sake of brevity, I shall apply it mainly to one out of the three expedients, to which the opponents to Theology have had recourse. Passing over, then, what might be said respecting what is called Scriptural Religion, and Historical Religion, I propose to direct your attention, in conclusion, to the real character of Physical Religion, or Natural Theology, as being mo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main subject of this Lecture.

看来，与其依靠天主教会的传统与说教，反倒不如尝试通过圣经、教会的古物或自然现象来确定神学教义，这已经成为现代神学流派的哲学。这就可能出现这个问题，这些圣经的、历史的或自然的信息为什么就不能拿来利用呢？假如拿来利用，它们为何就不能导致正确的结果？对这个问题，可以拿出不同的答案。我只限制在一个答案上。为了简洁的缘故，我将主要集中在三个权宜办法当中的一个上面，因为神学的反对者曾依赖这一点。这样，我们把涉及不妨称为依据圣经的宗教、历史的宗教的东西可以说的话先放在一边，作为一个总结，请大家把注意力放在物理宗教或称自然宗教的真实本性上，因为自然宗教与本演讲中涉及的主题有更密切的联系。

The school of Physics, from its very drift and method of reasoning, has, as I have said, nothing to do with Religion. However, there is a science which avails itself of the phenomena

and laws of the material universe, as exhibited by that school, as a means of establishing the existence of Design in their construction, and thereby the fact of a Creator and Preserver. This science has, in these modern times, at least in England, taken the name of Natural Theology; [9_3] and, though absolutely distinct from Physics, yet Physical Philosophers, having furnished its most curious and interesting data, are apt to claim it as their own, and to pride themselves upon it accordingly.

自然科学的这一个流派，从其内涵和推理方法上看，如我已经说过的，本来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有一门科学利用有形宇宙的现象与法则，就如这一流派的人所展示出来的一样，拿它们当作确立其构造中的设计之存在的手段，从而借以确立造物主及保护者的事实。在现代，至少在英国，这门科学已经有了自然神学这个名号 [10_3]，尽管它与自然科学绝对不同，可是，已经为它提供了最令人好奇和最有趣的资料的那些自然哲学家却乐于宣称它是自己的学问，并且相应地引以为自豪。

I have no wish to speak lightly of the merits of this so-called Natural or, more properly, Physical Theology. There are a great many minds so constituted that, when they turn their thoughts to the ques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a Supreme Being, they feel a comfort in resting the proof mainly or solely on the Argument of Design which the Universe furnishes. To them this science of Physical Theology is of high importance. Again, this science exhibits, in great prominence and distinctness, three of the more elementary notions which the human reason attaches to the idea of a Supreme Being, that is, three of His simplest attributes, Power, Wisdom, and Goodness.

这种所谓自然神学，或更恰当地说是物理神学的是非曲直，我可不想掉以轻心。有很多人的思想结构是这个样子的，当他们专注于终极存在者的存在问题时，就会主要地或完全地满足于宇宙本身提供的设计论论证的证据。在他们看来，物理神学这门学科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另外，这门学科突出和明确地展示出人类理智附着于终极存在者的概念之上的更基本观念中的三个观念，也就是他的三重最简单的属性，即神的能力、智慧与善。

These are great services rendered to faith by Physical Theology, and I acknowledge them as such. Whether, however, Faith on that account owes any great deal to Physics or Physicists, is another matter. The Argument from Design is really in no sense due to the philosophy of Bacon. The author I quoted just now has a striking passage on this point, of which I have already read to you a part.

这些都是物理神学为信仰 提供的了不起的服务，而且我也乐得这样承认。但是，由于这个缘故产生的信仰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家，却是另外一码事。设计论论证其实与培根哲学没有任何关系。我刚刚引述过的那位作家，在这一点上有一段惊人的话，其中一部分我刚刚念给大家听过。

“As respects Natural Religion,” he says, “it is not easy to see that the philosopher of the present day is more favourably situated than Thales or Simonides. He has before him just the same evidences of design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which the early Greeks had. We say, just the same; for the discoveries of modern astronomers and anatomists *have really added nothing* to the force of that argument which a reflecting mind finds in every beast, bird, insect, fish, leaf, flower, and shell. The reasoning by which Socrates,

in Xenophon's hearing, confuted the little atheist, Aristodemus, is exactly the reasoning of Paley's Natural Theology. Socrates makes precisely the same use of the statues of Polycletus and the pictures of Zeuxis, which Paley makes of the watch.”

“至于自然宗教，”他说，“不太容易看出，今日的哲学家就处在比泰勒斯或西蒙尼戴斯更优越的地位。他眼前摆放着的宇宙结构设计论证据，与早期希腊人拥有的证据相同。我们说，应当是一模一样的。因为现代天文学家和解剖学家的发现，并没有添加任何东西来增强这一论证的力度，因为这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在野兽、鸟儿、昆虫、鱼类、树叶、花朵和贝壳上都能看到的。根据色诺芬的听讯录，苏格拉底借以反驳那位小小的无神论者阿里斯托得摩斯的推论，正好就是帕雷自然神学中的推论。苏格拉底对波利克利塔斯的雕塑和宙克西斯的绘画的利用，正好与帕雷对钟表的利用相同。”

Physical Theology, then, is pretty much what it was two thousand years ago, and has not received much help from modern science: but now, on the contrary, I think it has received from it a positive disadvantage,—I mean, it has been taken out of its place, has been put too prominently forward, and thereby has almost been used as an instrument against Christianity,—as I will attempt in a few words to explain.

因此，自然神学跟两千年前的样子完全相同，也没有从现代科学中得到任何助益。但现在，反过来，我觉得它已经从中得到一种相当肯定的不利之处，我意思是指，它已经被拖离了原位，已经被推到了

太靠前的一个地方，因此差不多被用作了针对基督教的一件工具，我只需要几句话便能解释清楚这一点。

10．

10．

I observe, then, that there are many investigations in every subject-matter which only lead us a certain way towards truth, and not the whole way: either leading us, for instance, to a strong probability, not to a certainty, or again, proving only some things out of the whole number which are true. And it is plain that if such investigations as these are taken as the measure of the whole truth, and are erected into substantive sciences, instead of being understood to be, what they really are, inchoate and subordinate processes, they will, accidentally indeed, but seriously, mislead us.

因此我看到，每一种素材都有很多种探索方法，它们只会以某一种方法而非所有方法引导我们通达真理。比如，要么引导我们到达一种极大的或然性，而不是一种确定性，要么只是在真实的整体当中证明某些部分的事物。很显然的是，如果这样的调查被当作全部的真理的措施，并架设到实质性的科学上，而不是被理解为早期及次级的进程，一不小心它们就会在事实上严重地误导我们。

1．Let us recur for a moment, in illustration, to the instances which I have put aside. Consider what is called Scriptural Religion, or the Religion of the Bible. The fault which the theologian, over

and above the question of private judgment, will find with a religion logically drawn from Scripture only, is, not that it is not true, as far as it goes, but that it is not the whole truth; that it consists of only some out of the whole circle of theological doctrines, and that, even in the case of those which it includes, it does not always invest them with certainty, but only with probability. If, indeed, the Religion of the Bible is made subservient to Theology, it is but a specimen of useful induction; but if it is set up, as something complete in itself, against Theology, it is turned into a mischievous paralogism. And if such a paralogism has taken place, and that in consequenc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Baconian philosophy, it shows us what comes of the intrusion of that philosophy into a province with which it had no concern.

第一，我们暂时重新提起我刚刚放到一边去的那些例子，以便说明问题。我们来考虑一下，什么是依据圣经的宗教，或《圣经》宗教。除开私人判断这个问题以外，神学家能够在仅仅从圣经里进行逻辑抽取而得到的一门宗教里找出来的毛病，并不在于它就其本身来说就因此不真，而是说它并非全部真理。它只是神学教义的完整圆圈里的某些部分构成的，而且，哪怕在它包括的那些部分的情况下，它也不能为这些真理提供确切性，而只有或然性。的确，假如让《圣经》宗教屈从于神学，那不过是一种有用归纳的范例。但如果将它作为自身完整且可与神学对抗的东西建立起来，那它就被变成了一种有害的逻辑谬论。如果这样的逻辑谬论确已发生，且作为培根哲学影响力的后果，那它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哲学侵入与它无关的一个领域的后果。

2 . And so, again, as to Historical Religion, or what is often called Antiquity. A research into the records of the early Church no Catholic can view with jealousy: truth cannot be contrary to truth;

we are confident that what is there found will, when maturely weighed, be nothing else than an illustra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our own Theology. But it is another thing altogether whether the results will go to the full lengths of our Theology; they will indeed concur with it, but only as far as they go.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 data for investigation supplied by the extant documents of Antiquity should be sufficient for all that was included in the Divine Revelation delivered by the Apostles; and to expect that they will is like expecting that one witness in a trial is to prove the whole case, and that his testimony actually contradicts it, unless it does. While, then, this research into ecclesiastical history and the writings of the Fathers keeps its proper place, as subordinate to the magisterial sovereignty of the Theological Tradition and the voice of the Church, it deserves the acknowledgments of theologians; but when it (so to say) sets up for itself, when it professes to fulfil an office for which it was never intended, when it claims to issue in a true and full teaching, derived by a scientific process of induction, then it is but another instance of the encroachment of the Baconian empirical method in a department not its own.

其二，谈到历史宗教，或经常称为古物的东西，情形亦是类似。没有哪位天主教徒会带着嫉妒去看待深入早期教会纪录的研究：真理不会与真理产生矛盾。我们自信，在那些纪录里找到的东西，如果以成熟的方法进行权衡，除开是对我们的神学的一种例证和确认之外，不会是别的任何东西。可是，那些结果是否会涵盖我们这门神学的全部内容，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件事情。它们的确会与这神学达成一致，但也只是在其纪录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任何理由说明，现存的古代文档提供的探索资料，对于包括在使徒提供的神圣启示的一切来说就是充足的，且期盼他们意愿的东西，就好像期盼一次审判中的一位证人来证明整个案件，而他的证词就算能够做到这样，实际上也是与证据相反的。所以说，虽然对教会史和早期教父著作的研究保持了它

的适当地位，即从属于神学传统和教会之声的权威性的主宰，但是，这种研究还是值得神学家们承认的。然而，当它声称要履行一项从来都没有打算去履行的义务，当他要求发布从一种科学归纳法中导出的真实完整的说教，而实际上却（可以说）准备自立时，那这就不过是另一个实例，说明培根经验方法侵入了不属于它自己的一个领域。

3．And now we come to the case of Physical Theology, which is directly before us. I confess, in spite of whatever may be said in its favour, I have ever viewed it with the greatest suspicion. As one class of thinkers has substituted what is called a Scriptural Religion, and another a Patristical or Primitive Religion, for the theological teaching of Catholicism, so a Physical Religion or Theology is the very gospel of many persons of the Physical School, and therefore, true as it may be in itself, still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s a false gospel. Half of the truth is a falsehood:—consider, Gentlemen, what this so-called Theology teaches, and then say whether what I have asserted is extravagant.

第三，我们再来谈就摆在我们眼前的物理神学的情况。我承认，尽管无论对它可以说什么有利的话，我却从来都没有带着更大的怀疑看待过它。鉴于一批思想家已经替代了称为一种圣经宗教的东西，另一批思想家又替代了一种不妨称为教父宗教或原始宗教的东西，代之以天主教的神学说教，因此，一种物理宗教或物理神学就成为自然学派中的许多人的福音。所以，尽管其自身也许是真理，在许多情形之下仍然还是一种虚假的福音。一半的真理是谬误。诸位请先考虑一下这种所谓的神学都在讲些什么东西，之后再说我反复强调的这些是否过分。任何一个神圣属性，当然也差不多包含了所有属性，同样，假如一位牧师总是坚持神义论，那他实际上可能就会阻挡住神爱，而且假如他只坚持非创造的本质与造物之间无法交流的现实与距离，那他就会倾向于把一种特别神意的教义投入晦暗之中。那么，各位请注

意，物理神学讲授的是神的三重属性，我不妨说，它只讲这三重。而且在这三重属性之中，它讲神的大能最多，讲神的至善最少。

Any one divine attribute of course virtually includes all; still if a preacher always insisted on the Divine Justice, he would practically be obscuring the Divine Mercy, and if he insisted only on the incommunicableness and distance from the creature of the Uncreated Essence, he would tend to throw into the shade the doctrine of a Particular Providence. Observe, then, Gentlemen, that Physical Theology teaches three Divine Attributes, I may say, exclusively; and of these, most of Power, and least of Goodness. And in the next place, what, on the contrary, are those special Attributes, which are the immediate correlatives of religious sentiment? Sanctity, omniscience, justice, mercy, faithfulness. What does Physical Theology, what does the Argument from Design, what do fine disquisitions about final causes, teach us, except very indirectly, faintly, enigmatically, of these transcendently important, these essential portions of the idea of Religion? Religion is more than Theology; it is something relative to us; and it includes our relation towards the Object of it. What does Physical Theology tell us of duty and conscience? of a particular providence? and, coming at length to Christianity, what does it teach us even of the four last things, death, judgment, heaven, and hell, the mere elements of Christianity? It cannot tell us anything of Christianity at all. Gentlemen, let me press this point upon your earnest attention. I say Physical Theology cannot,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ase, tell us one word about Christianity proper; it cannot be Christian, in any true sense, at all:—and from this plain reason, because it is derived from informations which existed just as they are now, before man was created, and Adam fell. How can that be a real substantive Theology, though it takes the name, which is but an abstraction, a

particular aspect of the whole truth, and is dumb almost as regards the moral attributes of the Creator, and utterly so as regards the evangelical? Nay, more than this; I do not hesitate to say that, taking men as they are, this so-called science tends, if it occupies the mind, to dispose it against Christianity. And for this plain reason, because it speaks only of laws; and cannot contemplate their suspension, that is, miracles, which are of the essence of the idea of a Revelation. Thus, the God of Physical Theology may very easily become a mere idol; for He comes to the inductive mind in the medium of fixed appointments, so excellent, so skilful, so beneficent, that, when it has for a long time gazed upon them, it will think them too beautiful to be broken, and will at length so contract its notion of Him as to conclude that He never could have the heart (if I may dare use such a term) to undo or mar His own work; and this conclusion will be the first step towards its degrading its idea of God a second time, and identifying Him with His works. Indeed, a Being of Power, Wisdom, and Goodness, and nothing else, is not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God of the Pantheist. In thus speaking of the Theology of the modern Physical School, I have said but a few words on a large subject; yet, though few words, I trust they are clear enough not to hazard the risk of being taken in a sense which I do not intend. Graft the science, if it is so to be called, on Theology proper, and it will be in its right place, and will be a religious science. Then it will illustrate the awful, incomprehensible, adorable Fertility of the Divine Omnipotence; it will serve to prove the real miraculousness of the Revelation in its various parts, by impressing on the mind vividly what are the laws of nature, and how immutable they are in their own order; and it will in other ways subserve theological truth. Separate it from the supernatural teaching, and make it stand on its own base, and (though of course it is better for the individual philosopher himself), yet, as regards his influence on the world and the interests

of Religion, I really doubt whether I should not prefer that he should be an Atheist at once than such a naturalistic, pantheistic religionist. His profession of Theology deceives others, perhaps deceives himself.

接下来，反过来说，人的宗教情怀的直接关联物，那些特别属性又在哪里呢？圣洁、无所不知、公义、仁善、信实。物理神学、设计论论证、关于终极因的细心研究，除开十分间接、模糊、神秘地告诉我们这些具有超验重要性和宗教观念的这些基本部分之外，还能够告诉我们别的什么东西吗？宗教不只是神学，它对我们来说是某种相对的东西，它包括我们与它的对象之间的联系。物理神学在义务与良知上面告诉了我们哪些东西？在特别神意上呢？最终，在谈及基督教的时候，它在最后四件事，即死亡、审判、天堂与地狱，即基督教的纯粹要素方面，都告诉了我们哪些东西？它无法告诉我们关于基督教的任何东西。各位先生，让我再次强调这一点以引起各位注意。我要说，根据事情的性质，物理神学并不能告诉我们关于基督教自身的任何事情，它不可能是基督教的东西，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根本都不可能如此。由于这个简单的理由：它源自的信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远在人类还没有创造之前，远在亚当堕落之前。假如它只是一种抽象，是全部真理的某一个特别部分，而且在造物主的道德属性上几乎是麻木不仁，在福音的传播上完全如此的一种东西，它怎么可能是一种真实和实体的神学呢？不，远不止如此。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按照人的本性而言，这种所谓的科学，假如它占据人的头脑的话，往往倾向于使人的思想对抗基督教。而且仅只是出于这一个简单的原因，因为它只是谈及法则。它无法思考它们的悬停，也就是奇迹，而奇迹从本质而论正是启示概念的本质。因此，自然神学的上帝，极容易就变成了纯粹的偶像，因为他经由固定约定的媒介进入归纳思维的头脑，那么卓越，那么熟巧，那么仁慈，当这颗头脑盯着他的这些属性长时间打量时，就会觉得它们太美妙了，完全不可能被打破，最终就会收缩它的上帝观念，认为上帝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心肠（请允许我斗胆使用这个表述法）去取消或损毁他自己的作品，而这样一个结

论将会成为它第二次降低其上帝观念的第一步，最好将他与他的作品等同起来。的确，一个充满大能、智慧和至善而非别的任何东西的存在，实则与泛神论者的上帝相去不远。这样言及现代自然科学派的神学时，我还只是就很大一个话题说了几句话，但是，虽然只有这么几句话，我相信这些话还是足够清楚明白，而不会遗留下被人误解的风险。假如可以称它为科学，那么，将它嫁接在适当的神学上面，它马上就会回归其所，并成为一门宗教科学。这样，它就会阐明神的全能中那种庄严、无法理解和可敬的丰饶，它会在人的头脑里生动地刻印上自然的法则是什么，它们在其自身的秩序里是如何不变的，从而有助于证明启示在各个部分真实的奇特性，并以其他方式有益于神学的真理。如果将它与超自然的说教分开，让它立于自身基础之上，然而（尽管这样当然对个别的哲学家本人会更好），至于他对世人以及宗教兴趣的影响，我当真不知道我是否宁愿让他立即成为一位无神论者，而不情愿看到这样一位从自然出发的泛神论性质的宗教家。他的神学告白会欺骗他人，也许还会欺骗他自己。

Do not for an instant suppose, Gentlemen, that I would identify the great mind of Bacon with so serious a delusion: he has expressly warned us against it; but I cannot deny that many of his school have from time to time in this way turned physical research against Christianity. But I have detained you far longer than I had intended; and now I can only thank you for the patience which has enabled you to sustain a discussion which cannot be complete, upon a subject which, however momentous, cannot be popular.

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我会将培根的伟大思想与如此严重的错觉混为一团，培根本人曾明白地警告我们加以防范。但是，我也不能否认，他那个流派的很多人都曾时不时拿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来对抗基督教。可是，我已经耽误大家太久了，远远超出了我原本的意图。这样一种性质的讨论不可能是完整的，而且这话题尽管如此重要，却不可

能是广受欢迎的，因此我现在只能谢谢大家的耐心了。

[9_1].*Vid* . Article I.

[9_2].Macaulay's Essays.

[9_3].I use the word, not in the sense of "Naturalis Theologia," but in the sense in which Paley uses it in the work which he has so entitled.

[10_1].参见第一篇。

[10_2].麦考雷文集。

[10_3].我使用这个词，并不是指（探索神的本性的）“本性神学”的意思，而是帕雷在其《自然神学》一书中使用该词的意思。

Lecture 8. Christianity and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 Lecture Written for the School of Science

第八讲：基督教与科学探索，为理学院写的演说词

1．

1．

This is a time, Gentlemen, when not only the Classics, but much more the Sciences, in the largest sense of the word, are looked upon with anxiety, not altogether ungrounded, by religious men; and, whereas a University such as ours professes to embrace all departments and exercises of the intellect, and since I for my part wish to stand on good terms with all kinds of knowledge, and have no intention of quarrelling with any, and would open my heart, if not my intellect (for that is beyond me), to the whole circle of truth, and would tender at least a recognition and hospitality even to those studies which are strangers to me, and would speed them on their way,—therefore, as I have already been making overtures of reconciliation, first between Polit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and next between Physics and Theology, so I would now say a word by way of deprecating and protesting against the needless antagonism, which sometimes exists in fact, between divines and the cultivators of the Sciences generally.

各位先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信教的人士不仅对古典著作，而且

尤其还对最广泛意义上的各门科学心怀焦虑，而且这样的焦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虽然像我们这样的一所大学宣称要开设各个系别，进行才智的各种训练，也由于我本人也希望能够乐于接受各种知识，而且在我这方面也无意与任何一门学科过不去，并愿意对所有的真理敞开怀抱，假如不能敞开理解力的话（因为这超出本人能力）。甚至对于完全不熟悉的那些陌生研究，至少我也愿意表达我的认可与好感，并希望能加快它们的发展。所以说，由于我已经在不停地演奏和解序曲，首先是在纯文学与宗教之间，其次是在自然科学与神学之间，因此，我现在想说一句话，表达我对那种毫无必要的敌意的不以为然和抗议，因为这种敌意有时候的确存在于神职人员与普遍意义上的科学的培育者之间。

2．

2．

Here I am led at once to expatiate on the grandeur of an Institution which is comprehensive enough to admit the discussion of a subject such as this. Among the objects of human enterprise,—I may say it surely without extravagance, Gentlemen,—none higher or nobler can be named than that which is contemplated in the erection of a University. To set on foot and to maintain in life and vigour a real University, is confessedly, as soon as the word “University” is understood, one of those greatest works, great in their difficulty and their importance, on which are deservedly expended the rarest intellects and the most varied endowments. For, first of all, it professes to teach whatever has to be taught in any whatever department of human knowledge, and it embraces in its scope the loftiest subjects of human thought, and the richest

fields of human inquiry. Nothing is too vast, nothing too subtle, nothing too distant, nothing too minute, nothing too discursive, nothing too exact, to engage its attention.

在此，我禁不住立即要对这样一个机构的宏大规模发表看法，它包罗万象，足以让我们就这样一个话题讨论一番。在人类努力攻坚的众多项目中（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一项比大学创立过程中思考的问题更崇高和更高贵。坦白说，让一所真正的大学立足并且维持它的生机与活力，正如“大学”一词所揭示的那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因为难度很大而且十分重要，需要投入最稀有的人才和多种多样的才能才行。因为，首先，一所大学宣称要讲授应当传授的所有门类的知识，无论人类知识的哪个具体的分支，而且它会将人类思想最高尚的主题和人类探索最丰富的领域全都纳入自身范围之内。就值得大学关注的对象而言，没有任何东西因为太庞杂、太棘手、太遥远、太细小、太散乱或者太差强人意而不能被关注到。

This, however, is not the reason why I claim for it so sovereign a position; for, to bring schools of all knowledge under one name, and call them a University, may be fairly said to be a mere generalization; and to proclaim that the prosecution of all kinds of knowledge to their utmost limits demands the fullest reach and range of our intellectual faculties is but a truism. My reason for speaking of a University in the terms on which I have ventured is, not that it occupies the whole territory of knowledge merely, but that it is the very realm; that it professes much more than to take in and to lodge as in a caravanserai all art and science, all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n truth, it professes to assign to each study, which it receives, its own proper place and its just boundaries; to define the rights, to establish the mutual relations, and to effect the intercommunion of one and all; to keep in check the ambitious and

encroaching, and to succour and maintain those which from time to time are succumbing under the more popular or the more fortunately circumstanced; to keep the peace between them all, and to convert their mutual differences and contrarieties into the common good. This, Gentlemen, is why I say that to erect a University is at once so arduous and beneficial an undertaking, viz., because it is pledged to admit, without fear, without prejudice, without compromise, all comers, if they come in the name of Truth; to adjust views, and experiences, and habits of mind the most independent and dissimilar; an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ought and erudition in their most original forms, and their most intense expressions, and in their most ample circuit. Thus to draw many things into one, is its special function; and it learns to do it, not by rules reducible to writing, but by sagacity, wisdom, and forbearance, acting upon a profound insight into the subject-matter of knowledge, and by a vigilant repression of aggression or bigotry in any quarter.

然而，这却不是我主张它应当拥有如此至高无上的一个地位的理由，因为，要将所有知识门类归并于一个名称之下，并称其为大学，公平而论，这只不过是纯粹的一般化；而宣称将各类知识运用到极致，就要求心智官能延伸与扩展到最大可能，也只不过是老生常谈。我斗胆用这样的词语谈及大学，其理由并不仅仅因为它包括了全部知识领域，而是因为它自身即是这个知识王国。它所传授的技艺与科学、全部历史与哲学，远远多于像在商队旅馆里那样吸纳与寄存的。的确，它声称要为所接纳的每一种学问确定合适的地位与恰当的界线，规定其权利，确定双向的关系，实现一与多的相互交流，约束住野心勃勃的和不断侵蚀的行为，救援与维护时不时为更流行或更走运的时尚所逼迫的东西维持它们彼此的和平，将它们相互的差异与矛盾之处转化为共同的利益。诸位，正是这个原因，我才说，创建一所大学既是如此费力，又是功德无量的事业，即是说，因为下面这些已经

得到允诺：不怀恐惧，不怀偏见和毫不妥协地接纳所有以真理的名义到来的一切，修正见解和经验，以及最不受约束和彼此不同的思想习惯，以最有创意的形式，最强烈的表达方式及最博大的胸怀任由思想与学识充分表演。因此，将许许多多庞杂的事务融为一体，正是它的特别功能所在。它之所以学会做到这一切，并非借着可化简为文字的种种规定，而是借由作用于对知识素材的深刻洞察的远见、智慧与宽容，也借着对任何一个角落可能发生的侵犯或偏执保持防犯性的抑制。

We count it a great thing, and justly so, to plan and carry out a wid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To bring under one yoke, after the manner of old Rome, a hundred discordant peoples; to maintain each of them in its own privileges within its legitimate range of action; to allow them severally the indulgence of national feelings, and the stimulus of rival interests; and yet withal to blend them into one great social establishment, and to pledge them to the perpetuity of the one imperial power;—this is an achievement which carries with it the unequivocal token of genius in the race which effects it.

筹划与建立一个受众广泛的行政组织，我们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不无道理。按照古罗马方式将上百个不一致的民族收归于一只牛轭之下，使其中的每一个都能在其合理活动范围之内维持自身特权，让他们各自沉溺于民族情感和彼此敌对的刺激中，但同时又将它们混合进一个庞大的社会制度里，并保障给予他们一个至高无上的永恒的保障。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在最终形成这一格局的竞争中彰显出明确的天才表征。

Tu regere imperio populos, Romane, memento.

“罗马啊，要记住用强力治理世上万民。”

This was the special boast, as the poet considered it, of the Roman; a boast as high in its own line as that other boast, proper to the Greek nation, of literary pre-eminence, of exuberance of thought, and of skill and refinement in expressing it.

在这位诗人看来，这是罗马人特有的自夸，与对应希腊人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思想上的丰富多彩及表述其卓越所用的技能及精致水平达到同样高度。

What an empire is in political history, such is a University in the sphere of philosophy and research. It is, as I have said, the high protecting power of all knowledge and science, of fact and principle, of inquiry and discovery, of experiment and speculation; it maps out the territory of the intellect, and sees that the boundaries of each province are religiously respected, and that there is neither encroachment nor surrender on any side. It acts as umpire between truth and truth,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ature and importance of each, assigns to all their due order of precedence. It maintains no one department of thought exclusively, however ample and noble; and it sacrifices none. It is deferential and loyal,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weight, to the claims of literature, of physical research, of history, of metaphysics, of theological science. It is impartial towards them all, and promotes each in its own place and for its own object. It is ancillary certainly, and of necessity, to the Catholic Church; but in the same way that one of the Queen's judges is an officer of the Queen's, and nevertheless determines certain legal proceedings between the

Queen and her subjects. It is ministrative to the Catholic Church, first, because truth of any kind can but minister to truth; and next, still more, because Nature ever will pay homage to Grace, and Reason cannot but illustrate and defend Revelation; and thirdly, because the Church has a sovereign authority, and, when she speaks *ex cathedra* , must be obeyed. But this is the remote end of a University; its immediate end (with which alone we have here to do) is to secure the due disposition, according to one sovereign order, and the cultivation in that order, of all the provinces and methods of thought which the human intellect has created.

一个帝国在政治史中是什么样子的，在哲学与研究范围内，一所大学就是什么样子的。如我已经说过的，这是一股强大的保护力量，保护所有知识与科学，保护事实与原理、探索与发现、实验与推测。它将才智的领地描绘出来，并保证每一个领域的边界都得到虔诚的尊敬，每一方都既不受入侵，也不甘屈服。他在真理与真理之间起仲裁人的作用，考虑各自的本性及重要性之后，为它们所有的部分确定适当的优先顺序。无论多么丰富和崇高的思想领域，它不会专一维护其地位而牺牲其他任何一个思想领域。它根据各自份量而顺从并忠实于文学、自然科学研究、史学、形而上学和神学科学的主张。它对所有这些学科都公正不偏，并在各自的范围之内促进学科的发展与目标的实现。它当然且必然从属于天主教会，正如女王的一名法官也是女王的一名官员，因此也会在女王与其臣民之间履行某些法律程序。它服从于天主教会，首先是因为任何一种真理只会为真理服务，其次，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自然总是向神恩表达敬意，而理性也只会证明与捍卫启示。第三，是因为天主教会具备至高无尚的权威，当她以最终权威发话时，所说的一切都必须得到遵守。但这是一所大学最遥远的目标，它最直接的目标（我们在此仅只关心这一目标），还是根据一个至高无尚的秩序和依靠这秩序进行的培育而适当部署人类才智已经创建起来的所有思想领域及方法。

In this point of view, its several professors are like the ministers of various political powers at one court or conference. They represent their respective sciences, and attend to the private interests of those sciences respectively; and, should dispute arise between those sciences, they are the persons to talk over and arrange it, without risk of extravagant pretensions on any side, of angry collision, or of popular commotion. A liberal philosophy becomes the habit of minds thus exercised; a breadth and spaciousness of thought, in which lines, seemingly parallel, may converge at leisure, and principles, recognized as incommensurable, may be safely antagonistic.

从这个角度看，大学的不同教授，就如同一个朝庭或一个联盟中代表不同政治力量的大臣。他们代表各自的学科，并关注这些学科各自的利益。假如这些学科之间发生争执，他们还会居中调停，协商处理，从而避免任何一方虚张声势，避免严重冲突或普遍混乱的风险。自由哲学便成为以如此方法培育起来的思维习惯，思想保持一定的宽度与广度，这样，看似平行的思想路线便可轻松交汇，认为彼此不可比较的原则也可以形成对抗而相安无事。

3．

3．

And here, Gentlemen, we recognize the special character of the Philosophy I am speaking of, if Philosophy it is to be called, in contrast with the method of a strict science or system. Its teaching is not founded on one idea, or reducible to certain formulae.

Newton might discover the great law of motion in the physical world, and the key to ten thousand phenomena; and a similar resolution of complex facts into simple principles may be possible in other departments of nature; but the great Universe itself, moral and material, sensible and supernatural, cannot be gauged and meted by even the greatest of human intellects, and its constituent parts admit indeed of comparison and adjustment, but not of fusion. This is the point which bears directly on the subject which I set before me when I began, and towards which I am moving in all I have said or shall be saying.

在这里，诸位，假如可以称此为一种哲学，那我们就确认了我所说的这种哲学的特征，它与一种严格的学科或体系的方法形成对照。它的说教并非基于一种观念，也不可简化为某些公式。牛顿也许可以发现有形世界宏大的运动法则，也可以找到大千世界现象的关键；在自然的其他领域，将复杂事实归并为几条简要原理的类似解决方案也可以找到。可是，这庞大的宇宙本身，无论是道德的还是有形的，可感的还是超自然的，哪怕用最伟大的人类才智，都无法被揣测或量度出来，而这宇宙的各个构成部分虽然可以比较与理算，却容不得胡子眉毛一把抓。正是这一点与我开始的时候摆在自己眼前的那个主题相关，我已经说过和准备说的，都是针对这个主题的。

I observe, then, and ask you, Gentlemen, to bear in mind, that the philosophy of an imperial intellect, for such I am considering a University to be, is based, not so much on simplification as on discrimination. Its true representative defines, rather than analyzes. He aims at no complete catalogue, 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bjects of knowledge, but a following out, as far as man can, what in its fulness is mysterious and unfathomable. Taking into his charge all sciences, methods, collections of facts, principles, doctrines, truths,

which are the reflexions of the universe upon the human intellect, he admits them all, he disregards none, and, as disregarding none, he allows none to exceed or encroach. His watchword is, Live and let live. He takes things as they are; he submits to them all, as far as they go; he recognizes the insuperable lines of demarcation which run between subject and subject; he observes how separate truths lie relatively to each other, where they concur, where they part company, and where, being carried too far, they cease to be truths at all. It is his office to determine how much can be known in each province of thought; when we must be contented not to know; in what direction inquiry is hopeless, or on the other hand full of promise; where it gathers into coils insoluble by reason, where it is absorbed in mysteries, or runs into the abyss. It will be his care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signs of real and apparent difficulties, with the methods proper to particular subject-matters, what in each particular case are the limits of a rational scepticism, and what the claims of a peremptory faith. If he has one cardinal maxim in his philosophy, it is, that truth cannot be contrary to truth; if he has a second, it is, that truth often *seems* contrary to truth; and, if a third, it is the practical conclusion, that we must be patient with such appearances, and not be hasty to pronounce them to be really of a more formidable character.

在我看来，同时也请各位思考一下，大学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才智哲学，与其说它基于简单化，倒不如说是基于识别力。它真正的代表性在于规定事物，而非分析事物。他并非要为知识的各个学科编一份完整目录或注释，而是尽人力所能地追踪，看知识最圆满的时候都还有哪些神秘和深不可测的事物。宇宙在人类才智上反映的所有学科、方法、事实、原理、理论和真相的收集，都在他的管辖之下，并全盘接收，一个也不忽略。由于一个也不忽略，他也容不得任何一个超越自己的领域而侵入他人的地盘。他的口号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他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接受事物，并在事物的范围以内服从所有的事物。他认识到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着的分隔线，他观察不同真理相对之间的关系，他观察它们在哪里是一致的，在哪里远离了同伴，当走得太远的时候，它们又是哪里开始不再是真理了。他有责任确定每一个思想领域可能知晓多少，我们什么时候应当满足于不再了解，朝哪个方向的探索是无希望的，或另外一方面，朝哪个方向的探求是前途无量的，它在哪里会变成理性无可奈何的困局，在哪里会被吸入神秘，或一头跌入深渊。他得注意熟悉真实的困难与表面困难的迹象，熟悉适合于特定素材的方法，在每种特别情形中哪些是一类理性怀疑主义的极限，哪些是绝对信仰的要求。假如他的哲学里有一条基本准则，那这准则就是，真理不可能与真理相冲突；假如他还另有一条准则，那这准则就是，真理似乎经常与真理相冲突。假如还有第三条准则，那就是这一条实际的结论，即我们必须对这些表象保持耐心，切不可太快就宣布它们真的是某种更可怕的东西。

It is the very immensity of the system of things, the human record of which he has in charge, which is the reason of this patience and caution; for that immensity suggests to him that the contrarieties and mysteries, which meet him in the various sciences, may be simply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necessarily defective comprehension. There is but one thought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universe, and that is the thought of its Maker. If, Gentlemen, for one single instant, leaving my proper train of thought, I allude to our knowledge of the Supreme Being, it is in order to deduce from it an illustration bearing upon my subject. He, though One, is a sort of world of worlds in Himself, giving birth in our minds to an indefinite number of distinct truths, each ineffably more mysterious than any thing that is found in this universe of space and time. Any one of His attributes, considered by itself, is the object of an inexhaustible science: and the attempt to reconcile any two or three of them together,—love, power, justice, sanctity, truth, wisdom,—

affords matter for an everlasting controversy. We are able to apprehend and receive each divine attribute in its elementary form, but still we are not able to accept them in their infinity, either in themselves or in union with each other. Yet we do not deny the first because it cannot be perfectly reconciled with the second, nor the second because it is in apparent contrariety with the first and the third. The case is the same in its degree with His creation material and moral. It is the highest wisdom to accept truth of whatever kind, wherever it is clearly ascertained to be such, though there be difficulty in adjusting it with other known truth.

事物（他又管理着人类对这些事情的记录）体系的这种硕大无边性才是这种耐心与谨慎的理由。因为这硕大无边性向他表明，他在不同学科中遇到的种种矛盾与神秘之处，也许只不过是我们必然存在缺陷的理解力带来的后果。仅有一个念头比这宇宙的念头还大，那便是其创造者的思考。各位，假如我打断目前的思路稍作停顿，然后提起我们对终极存在者的知识，那是为了从中推出与我的主题有关的一个演证。他尽管只有一位，自身却是世界中的世界，他在我们的头脑里营造出无穷尽的不同真相，每一层真相都比在我们这个时空的宇宙里能够找到的其他任何事物更加神秘，且难以言喻。他诸般属性中的任意一个，若从其自身来看，都是一门无止境的学科的对象，而要将任意两个或三个属性调解成一个整体的尝试，即把爱、大能、公义、圣洁、真理、智慧调解到一起，都会为永无止境的争议提供材料。每个基本形式的神的属性，我们都能理解和接受，但我们仍然不能够接受全部无限的属性，无论是单个属性，还是与其他属性一同看待的属性。可是，我们不会因为与第二个属性难于调解就否认第一个属性，也不会因为第二个属性与第一个和第三个属性难予协调就加以否认。在程度上而言，这与论及神创有形及道德世界时一样。只要能清晰明白地确认为真理的东西，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应当予以接受，这才是最高的智慧，哪怕将这一条真理与其他已知真理进行协调时会觉得很困难。

Instances are easily producible of that extreme contrariety of ideas, one with another, which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Universe forces upon our acceptance, making it clear to us that there is nothing irrational in submitting to undeniable incompatibilities, which we call apparent, only because, if they were not apparent but real, they could not co-exist. Such, for instance, is the contemplation of Space; the existence of which we cannot deny, though its idea is capable, in no sort of posture, of seating itself (if I may so speak) in our minds;—for we find it impossible to say that it comes to a limit anywhere; and it is incomprehensible to say that it runs out infinitely; and it seems to be unmeaning if we say that it does not exist till bodies come into it, and thus is enlarged according to an accident.

概念之间彼此严重冲突的例子不胜枚举，而我们对宇宙的思考迫使我们必须接受这些矛盾，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屈服于不可否认的不一致并没有什么非理性的地方，我们称为表面上的不一致，只是因为，假如不是表面上的而是真实存在的，那它们就不可能同时存在。我们思考空间时便是这种情况。空间的存在我们无法否认，不过，它的概念无论以“何种姿态”都无法在我们的脑海里“就座”（请容我这样打比方）。我们发现，不可能说它在任何一个地方会到达尽头，而如果说它会无限延伸下去，又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假如我们说在物体进入空间之前它根本就不存在，因此是由于一个意外而被扩充，那又似乎是无意义的。

And so again in the instance of Time. We cannot place a beginning to it without asking ourselves what was before that beginning; yet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beginning at all, put it as far back as we will, is simply incomprehensible. Here again, as in the

case of Space, we never dream of denying the existence of what we have no means of understanding.

论起时间来也是一样。我们在不自问这东西开始之前有什么，不可以赋予它一个开端，而如果说就我们的能力所及而将它推回到无论什么时候也不可能有一个开端，那又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在这里，就如同在空间观念上一样，我们永远都无法想到否认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东西的存在。

And, passing from this high region of thought (which, high as it may be, is the subject even of a child's contemplations), when we come to consider the mutual action of soul and body, we are specially perplexed by incompatibilities which we can neither reject nor explain. How it is that the will can act on the muscles, is a question of which even a child may feel the force, but which no experimentalist can answer.

这是思维的高端领域（高是高，但这是连小孩子也会思考到的一个问题），当我们思考灵肉的相互作用时，我们尤其会被自己既不能拒绝也无法解释的种种不一致所困惑。为什么意志能够作用于肌肉，这个问题，可能连小孩子也有所感觉，然而，任何一位实验科学家也无法回答。

Further, when we contrast the physical with the social laws under which man finds himself here below, we must grant that Phys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are in collision. Man is both a physical and a social being; yet he cannot at once pursue to the full his physical end and his social end, his physical duties (if I may so

speak) and his social duties, but is forced to sacrifice in part one or the other. If we were wild enough to fancy that there were two creators, one of whom was the author of our animal frames, the other of society, then indeed we might understand how it comes to pass that labour of mind and body, the useful arts, the duties of a statesman, government, and the like, which are required by the social system, are so destructive of health, enjoyment, and life. That is, in other words, we cannot adequately account for existing and undeniable truths except on the hypothesis of what we feel to be an absurdity.

另外，当我们对照人在此生服从的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时，就必须承认，生理学与社会科学处在冲突中。人同时是自然与社会的存在物，可是，他又不能同时全力追求自己的自然与社会目标，无法同时履行自然义务（假如我能这样说的话）和社会义务，而只是被迫牺牲其中的这一个或另一个。假如我们胡思乱想一通，以为有两个创造者，其中一位是我们动物结构的创造者，另一位是我们的社会秩序的创造者，那么，的确，我们就有可能理解，为什么身心两重的操劳、有用的技艺、政治家的职责、政府等为社会制度所需要的东西，却对人的健康、欢乐和生命如此有害。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充分地解释现存的与不可否认的真理，除非假设我们感觉到的东西是一种荒诞不经。

And so in Mathematical Science, as has been often insisted on, the philosopher has patiently to endure the presence of truths, which are not the less true for being irreconcileable with each other. He is told of the existence of an infinite number of curves, which are able to divide a space, into which no straight line, though it be length without breadth, can even enter. He is told, too, of certain lines, which approach to each other continually, with a

finite distance between them, yet never meet; and these apparent contrarieties he must bear as he best can, without attempting to deny the existence of the truths which constitute them in the Science in question.

因此，在数学科学中，正如人们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哲学家必须耐心地忍受这样一些真理的在场，它们并不会因为彼此无法调解便不再是真理。他被告知，存在无限数量的曲线，这些曲线能够分割空间，而哪怕是有长度无宽度的任何直线，也都无法进入这个空间。他还得知，某些直线虽然可以持续不断地接近彼此，而且彼此之间隔着有限的距离，却有可能永远无法相交。诸如此类的表面矛盾，他必须尽力容忍，而不可试图否认在所说的这门学科里构成这些矛盾的真理的存在。

4．

4．

Now, let me call your attention, Gentlemen, to what I would infer from these familiar facts. It is, to urge you with an argument *à fortiori* : viz., that, as you exercise so much exemplary patience in the case of the inexplicable truths which surround so many departments of knowledge, human and divine, viewed in themselves; as you are not at once indignant, censorious, suspicious, difficult of belief, on finding that in the secular sciences one truth is incompatible (according to our human intellect) with another or inconsistent with itself; so you should not think it very hard to be told that there exists, here and there, not an inextricable difficulty,

not an astounding contrariety, not (much less) a contradiction as to clear facts, between Revelation and Nature; but a hitch, an obscurity, a divergence of tendency, a temporary antagonism, a difference of tone, between the two,—that is, between Catholic opinion on the one hand, and astronomy, or geology, or physiology, or ethnology, or political economy, or history, or antiquities, on the other. I say that, as we admit, because we are Catholics, that the Divine Unity contains in it attributes, which, to our finite minds, appear in partial contrariety with each other; as we admit that, in His revealed Nature are things, which, though not opposed to Reason, are infinitely strange to the Imagination; as in His works we can neither reject nor admit the ideas of space, and of time, and the necessary properties of lines, without intellectual distress, or even torture; really, Gentlemen, I am making no outrageous request, when, in the name of a University, I ask religious writers, jurists, economists, physiologists, chemists, geologists, and historians, to go on quietly, and in a neighbourly way, in their own respective lines of speculation, research, and experiment, with full faith in the consistency of that multiform truth, which they share between them, in a generous confidence that they will be ultimately consistent, one and all, in their combined results, though there may be momentary collisions, awkward appearances, and many forebodings and prophecies of contrariety, and at all times things hard to the Imagination, though not, I repeat, to the Reason. It surely is not asking them a great deal to beg of them,—since they are forced to admit mysteries in the truths of Revelation, taken by themselves, and in the truths of Reason, taken by themselves,—to beg of them, I say, to keep the peace, to live in good will, and to exercise equanimity, if, when Nature and Revelation are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there be, as I have said, discrepancies,—not in the issue, but in the reasonings, the circumstances, the associations, the anticipations, the accidents, proper to their respective teachings.

诸位，现在请大家注意我通过推导这些熟悉的事实而得出的东西。我将以更充足理由力劝各位，即，正如当我们在围绕着属人和属神的、从其自身着眼的各个知识部门无法解释的真理的情况下，展示出如此值得仿效的耐心；正如当我们发现，在世俗学科里，（根据我们属人的才智）一个真理与另一个真理不一致或与自身相互抵触时，我们并不会同时对信仰感到愤愤不平、吹毛求疵、多疑和难以理解，同样，当别人告诉我们说，并不存在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并不存在什么惊人的矛盾，（更不用说）在启示与自然之间也不存在相对于明显事实的矛盾，而只不过是在这两者，即一方面是天主教的意见，另一方面是天文学，或地质学，或生理学，或病理学，或政治经济学，或史学，或古代史，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障碍，一种隐晦，一种倾向的背离，一种暂时的敌意，一种色调的差异时，我们也并不会觉得有什么很难理解的。我要说，由于我们是天主教徒，因此承认神的统一将神的属性包含其中，在我们有限的头脑看来，这些属性部分地彼此矛盾；我们承认，在他启示给我们的本性中，许多事物虽然不与理性对立，在想象力看来却是无限陌生的；而在他的作为里，不经历智力的痛苦甚或折磨，我们便既无法拒绝，也无法承认空间、时间和线条的必然特性。说实话，诸位，当我以一所大学的名义请求宗教作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生理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默默地继续下去，彼此像邻居一样在各自的思辨范围内研究和实验时，这可并不是在提出过分请求。我希望他们对彼此分享的多重形式的真理之一致性保持充分信念，怀有这样一种心胸宽广的自信，即在他们共同达至的结果中，这些真理最终将彼此达成一致，尽管仍然可能出现暂时的冲突、令人尴尬的表象以及许多矛盾的预兆和征象，而且在所有时候还会有（我重复说一次）虽然在理性看来并不矛盾，然而仍然是想象力难于理解的地方。假如，当自然与启示相互比较时，会出现如我所说的种种差异，不是结果的差异，而是适合各自说教的推理过程、具体情形、各种联想、期盼、偶然事件中的差异，此时，如果我请求他们维持秩序，保持善意，遇事不惊，这也并不是对他们提出过分要求，因为他们不得不认可自身接受的启示真理中的奥秘，还有自身接受的理性真理中的奥秘。

It is most necessary to insist seriously and energetically on this point, for the sake of Protestants, for they have very strange notions about us. In spite of the testimony of history the other way, they think that the Church has no other method of putting down error than the arm of force, or the prohibition of inquiry. They defy us to set up and carry on a School of Science. For their sake, then, I am led to enlarge upon the subject here. I say, then, he who believes Revelation with that absolute faith which is the prerogative of a Catholic, is not the nervous creature who startles at every sudden sound, and is fluttered by every strange or novel appearance which meets his eyes. He has no sort of apprehension, he laughs at the idea, that any thing can be discovered by any other scientific method, which can contradict any one of the dogmas of his religion. He knows full well there is no science whatever, but, in the course of its extension, runs the risk of infringing, without any meaning of offence on its own part, the path of other sciences: and he knows also that, if there be any one science which, from its sovereign and unassailable position can calmly bear such unintentional collisions on the part of the children of earth, it is Theology. He is sure, and nothing shall make him doubt, that, if anything seems to be proved by astronomer, or geologist, or chronologist, or antiquarian, or ethnologist, in contradiction to the dogmas of faith, that point will eventually turn out, first, *not* to be proved, or, secondly, not *contradictory* , or thirdly, not contradictory to any thing *really revealed* , but to something which has been confused with revelation. And if, at the moment, it appears to be contradictory, then he is content to wait, knowing that error is like other delinquents; give it rope enough, and it will be found to have a strong suicidal propensity. I do not mean to say he will not take his part in encouraging, in helping forward the prospective suicide; he will not only give the error rope enough, but show it how to handle

and adjust the rope;—he will commit the matter to reason, reflection, sober judgment, common sense; to Time, the great interpreter of so many secrets. Instead of being irritated at the momentary triumph of the foes of Revelation, if such a feeling of triumph there be, and of hurrying on a forcible solution of the difficulty, which may in the event only reduce the inquiry to an inextricable tangle, he will recollect that, in the order of Providence, our seeming dangers are often our greatest gains; that in the words of the Protestant poet,

极有必要严肃认真和精力充沛地坚持这一点，这是因为新教徒的缘故，因为他们对我们怀有很奇怪的看法。尽管历史提供了相反的证据，他们却认为，除了利用武力或禁止探索以外，天主教会并没有其他办法纠正这样的谬误。他们公然反对我们建立并开办理科学院。所以，我在此是出于为他们的考虑而就这个话题进行扩展。我要说，无论是谁，只要他带着作为天主教徒权利的绝对信仰坚信启示，他就不可能是如此神经过敏的一个造物，以至于听到任何突然的响声都会惊吓不已，看到任何奇怪或新奇的东西都会忧心忡忡。如果说其他任何一种科学方法都可能找到与自己的宗教教条发生矛盾的东西，对这样的想法，他不会忧虑，而只会报之一笑。他完全明白，无论是哪一种学科，都只不过在其扩充过程中无意地发生阻挡其他学科发展道路的风险；他还知道，假如存在任何一门学科，尽管自身处在至高无上和无懈可击的地位，却能镇定地忍受来自大地之子的这等无意的冲撞，那就是神学了。他确信，而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他：假如有什么东西似乎得到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年表学家、古文物研究家或民族学家的证实，从而与信仰的教条相冲突，那么，最终一定会发现，这一点首先根本就没有得到证实，其次，它并不矛盾，第三，它与真正启示出来的任何东西并不矛盾，而只不过是与那些与启示混杂在一起的东西形成矛盾。假如眼前看起来是个矛盾，那么，他会满足于等待下去，因为他明白，谬误就像其他违法者，给它一条够用的绳索，最终会发现，它将产生强烈的自杀倾向。我意思并不是说，他就不会怂

恿和协助这种预期的自杀，他不仅会给予谬误够用的绳索，而且还会说明如何使用，如何调节这根绳索。他会将此事交托给理性、反思、冷静的判断和常识，交托给时间，而时间才是那么多秘密最伟大的解释者。假如启示的敌人会产生一种得胜感，还有匆忙推出一种强制办法来解决这个困难的感觉，最终只不过是将这种探索归并为无法解开的一团乱麻，那么，与其因为他们暂时的得胜而怒气冲冲，他反倒会思考，在神意的层面，我们表面上的危险经常只不过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换成那位新教诗人的话说就是：

The clouds you so much dread Are big with mercy, and shall break In blessings on your head.

你那么害怕的云团孕育着极大的幸运，必将为你带来无比的福分。

5．

5．

To one notorious instance indeed it is obvious to allude here. When the Copernican system first made progress, what religious man would not have been tempted to uneasiness, or at least fear of scandal, from the seeming contradiction which it involved to some authoritative tradit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 declaration of Scripture? It was generally received, as if the Apostles had expressly delivered it both orally and in writing, as a truth of Revelation, that the earth was stationary, and that the sun, fixed in a solid

firmament, whirled round the earth. After a little time, however, and on full considera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Church had decided next to nothing on questions such as these, and that Physical Science might range in this sphere of thought almost at will, without fear of encountering the decisions of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Now, besides the relief which it afforded to Catholics to find that they were to be spared this addition, on the side of Cosmology, to their many controversies already existing, there is something of an argument in this very circumstance in behalf of the divinity of their Religion. For it surely is a very remarkable fact, considering how widely and how long one certain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physical statements in Scripture had been received by Catholics, that the Church should not have formally acknowledged it. Looking at the matter in a human point of view, it was inevitable that she should have made that opinion her own. But now we find, on ascertaining where we stand, in the face of the new sciences of these latter times, that in spite of the bountiful comments which from the first she has ever been making on the sacred text, as it is her duty and her right to do, nevertheless, she has never been led formally to explain the texts in question, or to give them an authoritative sense which modern science may question.

在这里，它显然指向一个臭名昭著的实例。哥白尼体系刚刚开始有所进展的时候，由于该体系会与权威的教会传统及圣经宣言形成表面上的矛盾，哪有宗教人士不会因此而局促不安，或至少不会担心将发生一件丑闻的呢？一般认为，好像使徒曾明确地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把下面的内容当作启示真理传达给了众人：地球静止不动，固定在某一结实苍天处的太阳就围绕地球转动。但是，过了不久，且经过全盘考虑之后，人们发现，教会从没有在这样的事情上做出过任何决定，而自然科学可能在这一思想领域自由活动，根本不用担心教会权威会有不同看法。天主教徒发现，宇宙论这一方在现存的许多争议上所添

加的东西，跟他们自身毫无关系，这使他们得以大松一口气，除此以外，在这一特别情形之下，还存在就其宗教的神性所产生的某种争论。考虑到对圣经里就这些自然现象的陈述的某种确切解释，已经在多大范围和多长时间里为天主教徒所接受，而教会却并没有对这种解释予以正式确认，这当然就是相当惊人的事实了。从人的角度看待此事，不可避免就会是这样的情况：教会本应当让这种解释成为她自己的解释的。一旦确定了我们现在所处的立场，面临较晚的时代所出现的这些新科学时，我们现在就发现，尽管教会从一开始就对神圣文本进行了多不胜数的评述，而且教会也有责任和权利这么做，却从没有正式地解释过所说的这些文本，也没有赋予这些文本以现代科学也许能质疑的那重权威意义。

Nor was this escape a mere accident, but rather the result of a providential superintendence; as would appear from a passage of history in the dark age itself. When the glorious St. Boniface, Apostle of Germany, great in sanctity, though not in secular knowledge, complained to the Holy See that St. Virgilius taught the existence of the Antipodes, the Holy See was guided what to do; it did not indeed side with the Irish philosopher, which would have been going out of its place, but it passed over, in a matter not revealed, a philosophical opinion.

这次逃脱也绝非偶然，而是一种神助监督的结果，这一点可从黑暗时代自身的一段历史中看出来。日耳曼的传道人、光荣的圣波尼法斯，尽管并没有多少世俗知识，却是高洁无比的圣徒。他曾对圣座抱怨说，圣维吉利斯倡导相对极理论，并建议教皇采取措施。教皇并没有站在这位爱尔兰哲学家的一边，不然就属于教皇越矩的行为了。教皇忽略此事，拿它当一种哲学意见，而非启示真理。

Time went on; a new state of things,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came in; the Church was girt with temporal power; the preachers of St. Dominic were in the ascendant: now at length we may ask with curious interest, did the Church alter her ancient rule of action, and proscribe intellectual activity? Just the contrary; this is the very age of Universities; it is the classical period of the schoolmen; it is the splendid and palmary instance of the wise policy and large liberality of the Church, as regards philosophical inquiry. If there ever was a time when the intellect went wild, and had a licentious revel, it was at the date I speak of. When was there ever a more curious, more meddling, bolder, keener, more penetrating, more rationalistic exercise of the reason than at that time? What class of questions did that subtle, metaphysical spirit not scrutinize? What premiss was allowed without examination? What principle was not traced to its first origin, and exhibited in its most naked shape? What whole was not analyzed? What complex idea was not elaborately traced out, and, as it were, finely painted for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mind, till it was spread out in all its minutest portions as perfectly and delicately as a frog's foot shows under the intense scrutiny of the microscope? Well, I repeat, here was something which came somewhat nearer to Theology than physical research comes; Aristotle was a somewhat more serious foe then, beyond all mistake, than Bacon has been since. Did the Church take a high hand with philosophy then? No, not though that philosophy was metaphysical. It was a time when she had temporal power, and could have exterminated the spirit of inquiry with fire and sword; but she determined to put it down by *argument* , she said: “Two can play at that, and my argument is the better.” She sent her controversialists into the philosophical arena. It was the Dominican and Franciscan doctors, the greatest of them being St. Thomas, who in those medieval Universities fought the battle of Revelation with the weapons of heathenism. It was no matter whose the weapon

was; truth was truth all the world over. With the jawbone of an ass, with the skeleton philosophy of pagan Greece, did the Samson of the schools put to flight his thousand Philistines.

又过了许久，才智与社会方面的新事物层出不穷。教会有了很大的俗权。圣多明我的传道士方兴未艾。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好奇地提出这个问题了：教会是否改变了远古的行为规则，着手禁止智力活动了？恰恰相反，那是大学兴起的时代，是经院学者的经典时期，是教会在哲学探索上执行明智和宽松自由的方针政策的光辉灿烂的卓越典范。假如有哪个时期是才智发狂、行为放纵的时代，那就是我所说的那个时期。哪还有比那个时期更加让理性充满求知欲，更无所不入，更大胆，更敏锐，更有穿透性，让理性主义有更多的运用的呢？有哪一类的问题是那种微妙的形而上学精神所没有仔细打探的呢？有哪一种前提是在没有检验的情况下就得到认可的呢？有哪一种原则不是被追踪到了最初的起源，并以其最赤裸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呢？有哪一种整体是没有经过分析的呢？有哪一种复杂的概念不是被人不厌其烦地反复翻检，且可以说是没有被精巧地涂上色彩以供心智思考，直到它展现全部细微之处的呢？就好像蛙足在显微镜的打量之下完美与纤巧地显露出来的那些印迹。我重复一次，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比自然科学研究更接近神学的某种东西。那个时候，亚里士多德是绝不会弄错的大敌，比培根以后的敌人可怕得多。面对哲学，当时的教会有否显得盛气凌人？没有，尽管那种哲学是形而上学性质的。那个时候，教会尚拥有俗权，本可以用刀剑烈火来根除探索精神，但是，教会选择用论证来做到这一切。她说："双方可以争执，但我的论证更好。"她派出专事论证的学者登上哲学舞台。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博士拿起异教的武器，在中世纪的大学里展开了捍卫启示的战斗，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位是圣托马斯。那些武器是谁的并没有关系，真理就是真理，走遍天下都一样。各个流派的参孙拿起驴腮骨，拿起信异教的希腊人的骨架哲学，使上千的非利士人溃不成军。

Here, Gentlemen, observe the contrast exhibited between the Church herself, who has the gift of wisdom, and even the ablest, or wisest, or holiest of her children. As St. Boniface had been jealous of physical speculations, so had the early Fathers shown an extreme aversion to the great heathen philosopher whom I just now named, Aristotle. I do not know who of them could endure him; and when there arose those in the middle age who would take his part, especially since their intentions were of a suspicious character, a strenuous effort was made to banish him out of Christendom. The Church the while had kept silence; she had as little denounced heathen philosophy in the mass as she had pronounced upon the meaning of certain texts of Scripture of a cosmological character. From Tertullian and Caius to the two Gregories of Cappadocia, from them to Anastasius Sinaita, from him to the school of Paris, Aristotle was a word of offence; at length St. Thomas made him a hewer of wood and drawer of water to the Church. A strong slave he is; and the Church herself has given her sanction to the use in Theology of the ideas and terms of his philosophy.

在这里，请诸位注意拥有智慧天赋的教会自身，与她甚至是最能干、最聪明、最圣洁的儿女两者之间的差别。圣波尼法斯曾嫉妒自然科学方面的推测，早期教父也曾对我刚刚提到的那位伟大的异教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产生极大厌恶。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有谁能够容忍他。到了中世纪，当他们当中出现了可代替他的角色的人，尤其是由于他们的意图可疑，竟然有人不遗余力地要将他赶出基督教世界。那个时候，教会保持了沉默，对于圣经的某些宇宙论性质的文本的意义，她很少发表意见，她更没有谴责总体上的异教哲学。从德尔图良和凯厄斯到卡帕多西亚的两位格利高里，再到西奈山的阿纳斯塔修斯，再到巴黎的学校，提及亚里士多德的名字都属冒犯之举。最终，圣托马斯使他成为为教会砍柴担水的人。他是身强力壮的苦工，教会亲自给予核准，允许人们在神学中使用他的哲学观念与术语。

6．

6．

Now, while this free discussion is, to say the least, so safe for Religion, or rather so expedient, it is on the other hand simply necessary for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I shall now go on to insist on this side of the subject. I say, then, that it is a matter of primary importance in the cultivation of those sciences, in which truth is discoverable by the human intellect, that the investigator should be free, independent, unshackled in his movements; that he should be allowed and enabled, without impediment, to fix his mind intently, nay, exclusively, on his special object, without the risk of being distracted every other minute in the process and progress of his inquiry, by charges of temerariousness, or by warnings against extravagance or scandal. But in thus speaking, I must premise several explanations, lest I be misunderstood.

这样的自由讨论，往最轻里说，对宗教也是如此安全或有利，另外一方面，这对科学的进步也是十分必要的。下面，我就后面这一点多说几句。我要说，让研究者保持自由、独立、无拘无束，这对那些学科的培育是极其重要的，真理就在这些学科中通过人类才智发现。我还要说，应当允许和支持他专心研究，且只研究自己的特别对象，不受任何妨碍，也没有因轻率的指控或言行放肆或发生丑闻的警告而时不时打断其研究活动的风险。可是，这样说的时候，我必须预先做一些解释，以防有人曲解我的意思。

First, then, Gentlemen, as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religion and morals, and again as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hristianity, or what are called the dogmas of faith,—as to this double creed, natural and revealed,—we, none of us, should say that it is any shackle at all upon the intellect to maintain these inviolate. Indeed, a Catholic cannot put off his thought of them; and they as little impede the movements of his intellect as the laws of physics impede his bodily movements. The habitual apprehension of them has become a second nature with him, as the laws of optics, hydrostatics, dynamics, are latent conditions which he takes for granted in the use of his corporeal organs. I am not supposing any collision with dogma, I am but speaking of opinions of divines, or of the multitude, parallel to those in former times of the sun going round the earth, or of the last day being close at hand, or of St.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being the author of the works which bear his name.

那么，首先就是宗教与道德的基本原则，其次还有基督教的基本原则，或称为信仰教条的东西，比如源于自然与启示双方面的教义，在此，诸位，我们没有哪一位会说，保持这些原则不受侵犯就一定是对才智的任何约束。的确，一位天主教徒不可能不思考这些原则，这些原则不会妨碍才智的活动，正如物理学的法则并不会妨碍他的身体活动一样。对这些原则惯常的理解，已经成为他的第二天性，正如光学、流体静力学和动力学的法则都是潜伏的条件，他在利用自己的有形器官时，会视这些条件为理所当然。我并不是说与教义存在什么冲突，而只是谈及牧师或其他许多人所持的意见，类似于以前的时代里说太阳围绕地球转动，或最后的日子已经近在咫尺，或说亚略巴古的圣丢尼修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本书的作者等观点。

Nor, secondly, even as regards such opinions, am I supposing

any direct intrusion into the province of religion, or of a teacher of Science actually laying down the law *in a matter of Religion* ; but of such unintentional collisions as are incidental to a discussion pursued on some subject of his own. It would be a great mistake in such a one to propose his philosophical or historical conclusions as the form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acred text, as Galileo is said to have done, instead of being content to hold his doctrine of the motion of the earth as a scientific conclusion, and leaving it to those whom it really concerned to compare it with Scripture. And, it must be confessed, Gentlemen, not a few instances occur of this mistake at the present day, on the part, not indeed of men of science, but of religious men, who, from a nervous impatience lest Scripture should for one moment seem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of some speculation of the hour, are ever proposing geological or ethnological comments upon it, which they have to alter or obliterate before the ink is well dry, from changes in the progressive science, which they have so officiously brought to its aid.

其次，哪怕是谈及这些观点，我也不是在主张直接侵入宗教领域，或侵入在某个宗教事务上实际确定法则的某位讲授理科的教师的领域。我只是在谈讨论他自己的某个主题时偶尔发生的那些无意间的冲突。对于这样一种人，如果他主张将自己的哲学或历史学的结论当作对神圣文本的正式解释，那会铸成大错，而伽利略据说就曾犯过这样的错误。他们本当满足于将地球运动的理论看作是科学结论的，至于拿这个结论去比较圣经，本当留给专心此事的人去做的。因此，诸位，我们必须承认，当前发生的这一类错误还不止少数几例，错误不在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那一边，反倒是在信教的人这一边。一些信教的人神经紧张，因而失去耐心，生怕圣经会在哪一刻与眼前的某些思辨结果不相符，因此不断提出地质学或民族学的评论，结果墨迹未干就得更正或涂抹掉这些评论，因为科学总在不断进步和变化，而他们试图拿这些变化徒劳地援助圣经。

And thirdly, I observe that, when I advocate the independence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 I am not speaking of any *formal teaching* at all, but of investigations, speculations, and discussions. I am far indeed from allowing, in any matter which even borders on Religion, what an eminent Protestant divine has advocated on the most sacred subjects,—I mean “the liberty of Prophesying”. I have no wish to degrade the professors of Science, who ought to be Prophets of the Truth, into mere advertisers of crude fancies or notorious absurdities. I am not pleading that they should at random shower down upon their hearers ingenuities and novelties; or that they should teach even what has a basis of truth in it, in a brilliant, off-hand way, to a collection of youths, who may not perhaps hear them for six consecutive lectures, and who will carry away with them into the country a misty idea of the half-created theories of some ambitious intellect.

第三，我观察到，当我倡导哲学思想的独立性时，我根本就没有提及任何正式的教学，而只是说到探索研究、思辨和讨论。在哪怕只是接近宗教的任何事情上，我从来都不会容忍一位著名新教牧师就最神圣的主题所倡导的做法，我指的是“预言的自由。”讲授科学的教授们本当是真理的先知，我无意将他们贬低为粗鄙幻想或明显荒谬之谈的纯粹的广告户。我并不是在请求他们随意地在听众面前就创意和新奇事物信口开河，也不是在请求他们以某种极富才气和信手拈来的方式，为一群青年讲授哪怕具备某种真理基础的东西，因为这些青年也许根本都不会连续听完6次讲座，他们极可能把某位野心勃勃的才智之士一星半点的创意学说的模糊概念带入自己的研究领域。

Once more, as the last sentence suggests, there must be great care taken to avoid scandal, or shocking the popular mind, or

unsettling the weak;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ruth and error being so strong in particular mind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weed them of the error without rooting up the wheat with it. If, then, there is the chance of any current religious opinion being in any way compromised in the course of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this would be a reason for conducting it, not in light ephemeral publications, which come into the hands of the careless or ignorant, but in works of a grave and business-like character, answering to the medieval schools of philosophical disputation, which, removed as they were from the region of popular thought and feeling, have, by their vigorous restlessness of inquiry, in spite of their extravagances, done so much for theological precision.

再说了，就如最后一句话所暗示的，必须极小心地避免丑闻，避免让大众的思想发生混乱，避免让心智不全的人动摇不定。真理与谬误之间的联系，在某些人的头脑里如此紧密，因此很难在不将小麦也连根拔起的情况下，去除他们头脑里的谬误之草。因此，假如当前任何一种宗教观点有机会以任何方式妥协于科学研究，那这就是传播这种宗教观点的一个理由。不是以那种没有分量、朝生暮死的出版物的形式，因为这些出版物会落在一些漫不经心或无知者的手中，而是要以严肃及商业模式的著作的形式进行，以回应中世纪哲学争辩流派。那些流派虽然远离大众思想和情感，但由于具备充满活力和躁动不安的探索，尽管存在夸张的地方，却为神学的精义贡献甚多。

7．

7．

I am not, then, supposing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or (1) to be *coming into collision with dogma* ; nor (2) venturing, by means of his investigations, upon any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 or upon other conclusion *in the matter of religion* ; nor (3) of his teaching, even in his own science, religious parodoxes, when he should be investigating and proposing; nor (4) of his recklessly *scandalizing the weak* ; but, these explanations being made, I still say that a scientific speculator or inquirer is not bound, in conducting his researches, to be every moment adjusting his course by the maxims of the schools or by popular traditions, or by those of any other science distinct from his own, or to be ever narrowly watching what those external sciences have to say to him, or to be determined to be edifying, or to be ever answering heretics and unbelievers; being confident, from the impulse of a generous faith, that, however his line of investigation may swerve now and then, and vary to and fro in its course, or threaten momentary collision or embarrassment with any other department of knowledge, theological or not, yet, if he lets it alone, it will be sure to come home, because truth never can really be contrary to truth, and because often what at first sight is an “exceptio”, in the event most emphatically “probat regulam”.

我并非假设科学研究者会，（1）与教义发生矛盾；（2）通过其研究手段斗胆解释圣经，或对宗教事务作出其他判断；（3）哪怕在其自身学科范围内，本当进行调查研究和提出假设的时候却在进行宗教悖论的说教，（4）鲁莽地使弱者愤怒。可是，做了上述解释之后，我仍然要说，一位从事科学推测或研究的人，在从事其研究工作时，并非每时每刻一定都要根据其流派的标准或大众传统，或与其研究领域完全不同的那些领域里的标准来调整自己的研究线路，或小心翼翼地关注那些外部学科有什么要对他说的，或一定要有所教化，或者总得回答异端邪说及不信教的人的提问。他借助一种宏大信仰的冲动而产生自信，认为他自己的研究线路可能时不时走偏，在行进过程

中产生一些反复，或可能与其他无论是不是神学的知识分支发生暂时的冲突或遭遇窘境，但是，假如他置之不理，他的研究一定会成功，因为真理不可能与真理形成矛盾，也因为一开始看似“例外”的东西，结果往往证明“存在规律。”

This is a point of serious importance to him. Unless he is at liberty to investigate on the basis, and according to the peculiarities, of his science, he cannot investigate at all. It is the very law of the human mind in its inquiry after and acquisition of truth to make its advances by a process which consists of many stages, and is circuitous. There are no short cuts to knowledge; nor does the road to it always lie in the direction in which it terminates, nor are we able to see the end on starting. It may often seem to be diverging from a goal into which it will soon run without effort, if we are but patient and resolute in following it out; and, as we are told in Ethics to gain the mean merely by receding from both extremes, so in scientific researches error may be said, without a paradox, to be in some instances the way to truth, and the only way. Moreover, it is not often the fortune of any one man to live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the process is one of not only many stages, but of many minds. What one begins another finishes; and a true conclusion is at length worked out by the co-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schools and the perseverance of successive generations. This being the case, we are obliged, under circumstances, to bear for a while with what we feel to be error,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truth in which it is eventually to issue.

这是对他极其重要的一点。除非能够自由地基于他的学科并根据学科特性进行研究，否则他根本就无法进行研究。人的思想在探索与获取真理时，会通过由许多阶段构成的一个过程不断取得进步，而且

是迂回曲折的，这正是人脑的规律。获取知识并没有捷径可走，通往知识的道路也并非总在道路尽头的方向上，我们一开始也无法看到道路的尽头。人的思想经常似乎与一个目标背道而驰，而假如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决心追求下去，很快就会毫不费力地奔向这个目标。在伦理学里，只需要我们远离极端，便可走上中庸之道，同样，在科学研究中，就某些例子而言，谬误可以说就是通向真理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这里面并不存在悖论。另外，一个人能从头到尾完成一项研究，并非这一个人的幸运，这个研究过程不仅仅是许多研究阶段的一部分，而且也是许多人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一个人开始的事情，往往由另一个人完成，一个真正的结论，是许多独立流派合作和连续几代人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的结果。既然如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暂时忍耐自己感觉是谬误的东西，指望真理最终会从中产生。

The analogy of locomotion is most pertinent here. No one can go straight up a mountain; no sailing vessel makes for its port without tacking. And so, applying the illustration, we can indeed, if we will, refuse to allow of investigation or research altogether; but, if we invite reason to take its place in our schools, we must let reason have fair and full play. If we reason, we must submit to the conditions of reason. We cannot use it by halves; we must use it as proceeding from Him who has also given us Revelation; and to be ever interrupting its processes, and diverting its attention by objections brought from a higher knowledge, is parallel to a landsman's dismay at the changes in the course of a vessel on which he has deliberately embarked, and argues surely some distrust either in the powers of Reason on the one hand, or the certainty of Revealed Truth on the other. The passenger should not have embarked at all, if he did not reckon on the chance of a rough sea, of currents, of wind and tide, of rocks and shoals; and we should act more wisely in discountenancing altogether the exercise of Reason than in being alarmed and impatient under the suspense, delay, and

anxiety which,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ase, may be found to attach to it. Let us eschew secular history, and science, and philosophy for good and all, if we are not allowed to be sure that Revelation is so true that the altercations and perplexities of human opinion cannot really or eventually injure its authority. That is no intellectual triumph of any truth of Religion, which has not been preceded by a full statement of what can be said against it; it is but the ego vapulando, ille verberando, of the Comedy.

运动的类比，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没有人能够径直到达山顶，没有哪条帆船能够不转向直接到达目的港。因此，应用这个例子的话，我们可以在愿意的时候完全拒绝进行调查或研究，但如果我们邀请理性在学校里占有一个地位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让理性公平和完全地表现自己。假如我们推理，那我们就必须服从理性的条件。我们不能一半一半地利用理性，而应当视它为源自上帝的东西，而上帝同时又给予我们以启示。假如用源自更高知识的反对意见不断地妨碍它的进程，转移其注意力，那无异于新水手小心翼翼地登上一条船，发现船的航向发生变化后感到惊恐，并一定一方面对理性的能力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对启示真理的确定性产生不信任。如果没有估量海上的惊涛骇浪、潮流、狂风与潮汐、岩石与暗礁的风险，乘客根本就不应该上船。我们应当有更明智的举动，不可完全否认理性的运用，而根据理性运用的性质，人们往往会发现附着其上的那种疑惑、延迟和焦虑，不可因此而惊慌失措或十分不耐烦。假如我们无法确信启示是如此真切，以至于人类观点的争执与混乱并不能真正地或最终损害其权威性，那就让我们一劳永逸地回避世俗历史、科学和哲学吧。这并非任何宗教真理在智慧上的胜利，因为能够反对它的完整陈述并没有写在前面，它只是喜剧中的那种“张三挨打李四痛”的闹剧。

Great minds need elbow-room, not indeed in the domain of faith, but of thought. And so indeed do lesser minds, and all minds.

There are many persons in the world who are called, and with a great deal of truth, geniuses. They had been gifted by nature with some particular faculty or capacity; and, while vehemently excited and imperiously ruled by it, they are blind to everything else. They are enthusiasts in their own line, and are simply dead to the beauty of any line *except* their own. Accordingly, they think their own line the only line in the whole world worth pursuing, and they feel a sort of contempt for such studies as move upon any other line. Now, these men may be, and often are, very good Catholics, and have not a dream of any thing but affection and deference towards Catholicity, nay, perhaps are zealous in its interests. Yet, if you insist that in their speculations, researches, or conclusions in their particular science, it is not enough that they should submit to the Church generally, and acknowledge its dogmas, but that they must get up all that divines have said or the multitude believed upon religious matters, you simply crush and stamp out the flame within them, and they can do nothing at all.

伟大人物需要活动空间，并非在信仰领域，而是在思想领域。一般的人，实际上所有人也都如此。世上有很多人被称为天才，他们的确也是天才。自然赋予他们以某种特别能力或功能，假如受这种能力巨大的刺激并为其所专横地控制，那他们就会对别的一切视而不见。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是充满热情的人，而对这世界之外的一切美好事物不闻不问。相应地，他们认为自己的那条线路才是天下唯一值得追求的，对其他领域的任何事情都持轻蔑态度。这些人也许是，而且经常就是很好的天主教徒，除了对天主教充满感情和表示顺从，甚至是狂热于天主教的利益之外，他们再没有别的梦想。可是，假如你坚持认为，在他们的思辨、研究或他们那一特别学科里的结论中，他们光是在普遍意义上服从教会，并承认教会的教条还不够，而且还必须接受牧师说过的所有话，或大众在宗教事务上所相信的一切，那你完全就是扑灭了他们的内心之火，他们会因此什么也干不成。

This is the case of men of genius: now one word on the contrary in behalf of master minds, gifted with a broad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ings, and a creative power, and a versatility capable of accommodating itself to various provinces of thought. These persons perhaps, like those I have already spoken of, take up some idea and are intent upon it;—some deep, prolific, eventful idea, which grows upon them, till they develop it into a great system. Now, if any such thinker starts from radically unsound principles, or aims at directly false conclusions, if he be a Hobbes, or a Shaftesbury, or a Hume, or a Bentham, then, of course, there is an end of the whole matter. He is an opponent of Revealed Truth, and he means to be so;—nothing more need be said. But perhaps it is not so; perhaps his errors are those which are inseparable accidents of his system or of his mind, and are spontaneously evolved, not pertinaciously defended. Every human system, every human writer, is open to just criticism. Make him shut up his portfolio; good! And then perhaps you lose what, on the whole and in spite of incidental mistakes, would have been one of the ablest defences of Revealed Truth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ccording to his subject) ever given to the world.

这是有天赋的人的情况。现在说说伟大人物反面的话。这些有天赋的伟大人物，都有着对事物的广博哲学观，还有创造能力，以及一种能够使自己融入不同思想领域的应变能力。这些人，就像我刚刚谈到过的那些人一样，也许会接受某种观点，然后执着于这个观念，可能是某种深沉、丰富和多变故的观点，这观点会在他们的思想里不断成长，最后发展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假如这样一种思想家从一个极不可靠的原则开始，或旨在形成一些完全错误的结论，假如这样一种人是霍布斯，或是沙夫茨伯里，或是休谟，或是边沁，那么，当然，整个事情就必定会有一个结果。他是启示真理的对手，而且他本意如

此，再不需要多说什么了。但事情也许并非如此，也许他的谬误只不过是与他的体系或他的思想不可分离的偶然事件，自发地卷入其中，却得不到顽强的捍卫。每一个人类的体系，每一位属人的作家，都必须接受批评。如果让他合上自己的作品夹，那好，接着，从整体上说，并且尽管他偶有闪失，我们却可能会（根据他的研究主题而直接或间接地）失去这个世界或许本已获得了的关于启示真理的最坚固的一个堡垒。

This is how I should account for a circumstance, which has sometimes caused surprise, that so many great Catholic thinkers have in some points or other incurred the criticism or animadversion of theologians or of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It must be so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there is indeed an animadversion which implies a condemnation of the author; but there is another which means not much more than the “piè legendum” written against passages in the Fathers. The author may not be to blame; yet the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would be to blame, if it did not give notice of his imperfections. I do not know what Catholic would not hold the name of Malebranche in veneration; [10_1] but he may have accidentally come into collision with theologians, or made temerarious assertions, notwithstanding.

正是这个原因，我才想要为一种情形做出解释，它有时候已经引发人们的惊奇，即，有这么多伟大的天主教思想家曾在这点那点上招致神学家或教会权威的批评或责难。根据事情的性质，可能必须如此。的确存在一种责难，它暗示着对作者的谴责。可是，还有另外一种责备，它的意义只不过类似于针对早期教父的某些段落而写的“随文注”。作者兴许并不值得责怪，可是，教会权威如果不指出其瑕疵所在，那就得受责备了。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天主教徒听闻马勒伯朗士的名字时会不肃然起敬的， [11_1] 尽管如此，他有时候也会偶然地与

一些神学家起冲突，或者发出鲁莽的断言。

The practical question is, whether he had not much better have written as he has written, than not have written at all. And so fully is the Holy See accustomed to enter into this view of the matter, that it has allowed of its application, not only to philosophical, but even to theological and ecclesiastical authors, who do not come within the range of these remarks. I believe I am right in saying that, in the case of three great names, in various departments of learning, Cardinal Noris, Bossuet, and Muratori, [10_2] while not concealing its sense of their having propounded each what might have been said better, nevertheless it has considered, that their services to Religion were on the whole far too important to allow of their being molested by critical observation in detail.

实际的问题是，到底是他没有过去写得好，还是根本就不曾写得好。圣座对参与对这类事情的看法已经相当习惯，他曾允许不仅仅是哲学家，而且还包括神学家和教会作家应用他的观点，而这些人并不包括在所说的这些话的范围里面。例如三位伟大人物：枢机主教诺里斯、博絮埃和穆拉托里 [11_2] ，在不同的学问分支里，我相信自己上述那番话是正确的。圣座虽然并不曾隐藏他们各自都曾建议本可以说得更好的这层意思，但是，圣座还是认为，他们对宗教的服务整体来说太过重要，不可任由一些批评性的详细观察横加干扰。

I think it worthwhile, in illustration of what I have said above at the page specified, to append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Grandorgaeus's catalogue of Muratori's works.

注释为说明我在上述页码中陈述的观点，我觉得将格兰多格斯为穆拉托里著作编辑的概览附在后面不无裨益。

“Sanctissimus D.N. Benedictus xiv. Pont. Max. Epistolam sapientiae ac roboris plenam dederat…ad Episcopum Terulensem Hispaniae Inquisitionis Majorem Inquisitorem, quâ illum hortabatur, ut 'Historiam Pelagianam et dissertationem, etc.,' editas à claræ memoriae Henrico Cardinali Norisio, in Indicem Expurgatorium Hispanum nuper ingestas, perinde ac si aliquid Baianismi aut Jansenismi redolerent, prout auctor 'Bibiothecae Jansenisticae' immerito autumavit, quamprimum expungendas curaret. Eoque nomine Sapientissimus Pontifex plura in medium attulit prudentis oeconomiae exempla, qua semper usum, supremum S. R. Congr. Indicis Tribunal, à proscribendis virorum doctissimorum operibus aliquando temperavit.

“Sanctissimus D.N. Benedictus xiv. Pont. Max. Epistolam sapientiae ac roboris plenam dederat… ad Episcopum Terulensem Hispaniae Inquisitionis Majorem Inquisitorem, quâ illum hortabatur, ut ‘Historiam Pelagianam et dissertationem, etc.,’ editas à claræ memoriae Henrico Cardinali Norisio, in Indicem Expurgatorium Hispanum nuper ingestas, perinde ac si aliquid Baianismi aut Jansenismi redolerent, prout auctor ‘Bibiothecae Jansenisticae’ immerito autumavit, quamprimum expungendas curaret. Eoque nomine Sapientissimus Pontifex plura in medium attulit prudentis oeconomiae exempla, qua semper usum, supremum S. R. Congr. Indicis Tribunal, à proscribendis virorum doctissimorum operibus aliquando temperavit.

“Quum autem summus Pontifex, ea inter nomina illustria Tillemontii, Bollandistarum, Bosoueti Ep. Meld., et illud recensuerit L. A. Muratorii, his ad Auctorem nostrum delatis, quam maximè indoluit, veritus ne in tantâ operum copiâ ab se editorum, aliquid Fidei aut Religioni minùs consonum sibi excidisset…

“Quum autem summus Pontifex, ea inter nomina illustria Tillemontii, Bollandistarum, Bosoueti Ep. Meld., et illud recensuerit L. A. Muratorii, his ad Auctorem nostrum delatis, quam maximè indoluit, veritus ne in tantâ operum copiâ ab se editorum, aliquid Fidei aut Religioni minùs consonum sibi excidisset…

“Verùm clementissimus Pontifex ne animum desponderet doctus et humilis filius, pernumaniter ad ipsum rescripsit…eumque paternè consolatus, inter alia haec habet: 'Quanto si era detto nella nostra Lettera all' Inquisitore di Spagna in ordine alle di Lei Opere, non aveva che fare con la materia delle Feste, nè con verun dogma o disciplina. Il contenuto delle Opere chi qui non è piaciuto (nè che Ella poteva mai lusingarsi che fosse per piacere), riguarda la Giurisdizione Temporale del Romano Pontifice nè suoi stati,'” etc. (pp. lx., lxi).

“Verùm clementissimus Pontifex ne animum desponderet doctus et humilis filius, pernumaniter ad ipsum rescripsit… eumque paternè consolatus, inter alia haec habet: ‘Quanto si era detto nella nostra Lettera all’ Inquisitore di Spagna in ordine alle di Lei Opere, non aveva che fare con la materia delle Feste, nè con verun dogma o disciplina. Il contenuto delle Opere chi qui non è piaciuto (nè che Ella poteva mai lusingarsi che fosse per piacere), riguarda la

Giurisdizione Temporale del Romano Pontifice nè suoi stati,'"etc. (pp. lx., lxi).

8 .

8 .

And now, Gentlemen, I bring these remarks to a conclusion. What I would urge upon every one, whatever may be his particular line of research,—what I would urge upon men of Science in their thoughts of Theology,—what I would venture to recommend to theologians, when their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 subjec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is a great and firm belief in the sovereignty of Truth. Error may flourish for a time, but Truth will prevail in the end. The only effect of error ultimately is to promote Truth. Theories, speculations, hypotheses, are started; perhaps they are to die, still not before they have suggested ideas better than themselves. These better ideas are taken up in turn by other men, and, if they do not yet lead to truth, nevertheless they lead to what is still nearer to truth than themselves; and thus knowledge on the whole makes progress. The errors of some minds in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re more fruitful than the truths of others. A Science seems making no progress, but to abound in failures, yet imperceptibly all the time it is advancing, and it is of course a gain to truth even to have learned what is not true, if nothing more.

各位，我所说的一些话得做一个总结了。我准备向无论从事何种特别研究的任何人提出的敦促，我准备向正在思考神学问题的科学界

人士提出的敦促，我准备向其注意力被科学研究的主题所吸引的神学家斗胆提出的建议，无非就是：对真理的主权要保有决不动摇的坚定信念。谬误可能风光一阵子，但真理却会最终取胜。谬误最终的唯一效果，不过是促进真理。理论、推测、假说都有一个开端，它们也许还会消亡，但不会在它们暗示出比自身更好的主意前就消亡。这些更好的主意到时会被其他人接收，假如它们一时没有导向真理，但仍然还是会导向比其自身更接近真理的东西，因此，整体而言，知识就是在进步。科学研究中某些人犯下的错误，会比另外一些人发现的真理更富有成效。一门学科看上去兴许并没有什么进展，反倒是屡屡犯错，可是，它却在无时不刻地取得不易察觉的进步。就算没有获得别的东西，只是知道了什么东西不是真理，那当然也是有益真理的收获。

On the other hand, it must be of course remembered, Gentlemen, that I am supposing all along good faith, honest intentions, a loyal Catholic spirit, and a deep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 am supposing, in the scientific inquirer, a due fear of giving scandal, of seeming to countenance views which he does not really countenance, and of siding with parties from whom he heartily differs. I am supposing that he is fully alive to the existence and the power of the infidelity of the age; that he keeps in mind the moral weakness and the intellectual confusion of the majority of men; and that he has no wish at all that any one soul should get harm from certain speculations to-day, though he may have the satisfaction of being sure that those speculations will, as far as they are erroneous or misunderstood, be corrected in the course of the next half-century.

另外一方面，当然应当记住，各位，我所提出的这些假设都本着善意，本着诚实的愿望，本着一种忠诚的天主教精神，还有强烈的责

任感。我假定，在科学探索者那里，会有一种适当的忧虑，唯恐制造丑闻，唯恐让人觉得自己厌恶实则根本不厌恶的观点，唯恐与他强烈反对的某些团体站在一边。我假定他完全意识得到这个时代的不忠的存在与力量，假定他在心里记住了绝大多数人的道德脆弱与智力混乱，假定他根本不愿有任何人会因为今天的某种推测而受害，哪怕他也许会因为确信那些可能是谬误或被误解的推测会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得到纠正而感到满足。

[10_1].Cardinal Gerdil speaks of his "Metaphysique," as "brillante à la verité, mais non moins solide" (p. 9.), and that "la liaison qui enchaine toutes les parties du système philosophique du Père Malebranche,...pourra servir d'apologie à la noble assurance, avec laquelle il propose ses sentiments." (p. 12, Œuvres, t. iv.)

[10_2].Muratori's work was not directly theological. *Vid* . note at the end of the Volume. [Below,—NR]

[11_1].热迪尔枢机主教谈及其“形而上学”时，称其为“在真实性上堪称上品，然而并不因此而缺少可信度”（第9页）。还说，“使马勒伯朗士神父哲学体系的各个部分结为一体的那种关联，将有利于为其提供确信，借以推广其思想体系。”（第12页，见其作品集。）

[11_2].穆拉托里的作品并不具备直接的神学意义。参见其卷末注释。

Lecture 9. Discipline of Mind. An Address to the Evening Classes

第九讲：思维训练，在夜校的演讲

1．

1．

When I found that it was in my power to be present here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ew Session, one of the first thoughts, Gentlemen, which thereupon occurred to me, was this, that I should in consequence have the great satisfaction of meeting you, of whom I had thought and heard so much, and the opportunity of addressing you, as 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I can truly say that I thought of you before you thought of the University; perhaps I may say, long before;—for it was previously to our commencing that great work, which is now so fully before the public, it was when I first came over here to make preparations for it, that I had to encounter the serious objection of wise and good men, who said to me, “There is no class of persons in Ireland who *need* a University;” and again, “Whom will you get to belong to it? who will fill its lecture-rooms?” This was said to me, and then, without denying their knowledge of the state of Ireland, or their sagacity, I made answer, “We will give lectures in the evening, we will fill our classes with the young men of Dublin.”

各位，新学期开始，当我发现自己终于来到这里时，我首先感到

十分开心，在无数次想象和听说各位的事情之后，我终于能够有机会作为校长，见到大家并对大家讲几句话。我可以说，在你们考虑我们的大学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在揣度你们了，甚至可以说，我比你们要早得多，因为早在我们开始这项伟大的工程之前，我就在做这项工作了。如今我们的大学已经完全面向大众，但在我来到这里为此做准备时，我必须要面对许多聪明和怀有善意的人提出的严肃反对意见。他们对我说："爱尔兰没有任何一个阶层需要一所大学。"他们还说，"学生会是些什么人呢？有哪些人会到教室里去听课呢？"我没有否认他们对爱尔兰现状的了解，也没有否认他们的睿智，我做了这样的回答："我们将在晚间开课，教室里会坐满都柏林的青年人。"

And some persons here may recollect that the very first thing I did, when we opened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Letters, this time four years, was to institute a system of Evening Lectures, which were suspended after a while, only because the singularly inclement season which ensued, and the want of publicity and interest incident to a new undertaking, made them premature. And it is a satisfaction to me to reflect that the Statute, under which you will be able to pass examinations and take degrees, is one to which I specially obtained the consent of the Academical Senate, nearly two years ago, in addition to our original Regulations, and that you will be the first persons to avail yourselves of it.

今天在场的诸位也许还记得，哲学与文学院甫一开张（一晃4年过去了），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建立夜校制度。随后的险恶气候、新事物必然会面对的宣传和兴趣的不足，让办学条件不成熟，此事因此耽搁了一阵。我感觉满意的是规范大家考试及获取学位事宜的条例。除了原本的章程，条例两年前也通过了学院评议会的特别许可。在座各位将是第一批使用这一条例的学生。

Having thus prepared, as it were, the University for you, it wa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I received from a number of you, Gentlemen, last May year, a spontaneous request which showed that my original anticipations were not visionary. You suggested then what we have since acted upon,—acted upon, not so quickly as both you might hope and we might wish, because all important commencements have to be maturely considered—still acted on at length according to those anticipations of mine, to which I have referred; and, while I recur to them as an introduction to what I have to say, I might also dwell upon them as a sure presage that other and broader anticipations, too bold as they may seem now, will, if we are but patient, have their fulfilment in their season.

可以说，我为大家准备好了这样一所大学。去年5月，我非常开心地接到你们当中一些人要求入学的申请，这说明我原来的期盼并非空想。我们根据你们当时的建议开始采取行动，尽管并没有像你们希望和我们也期盼得那么快，因为一切重要的开始都必须经过成熟的思考，但最终，我所提到的、我的那些期盼都一一实现了。今天提及此事，既是作为我的开场白，也是把他们当作一个可信的预兆，寓意其他更大的期盼——现在看起来可能太过大胆的预期——只要有耐心，或终将实现。

2．

2．

For I should not be honest, Gentlemen, if I did not confess that, much as I desire that this University should be of service to the

young men of Dublin, I do not desire this benefit to you, simply for your own sakes. For your own sakes certainly I wish it, but not on your account only. Man is not born for himself alone, as the classical moralist tells us. *You* are born for Ireland; and, in your advancement, Ireland is advanced;—in your advancement in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true, in knowledge, in learning, in cultivation of mind, in enlightened attachment to your religion, in good name and respectability and social influence, I am contemplating the honour and renown, the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aggrandisement, the increase of political power, of the Island of the Saints.

尽管我极希望这所大学能够为都柏林的青年人提供服务，可是，我还是必须承认，这件事不仅仅是为了你们。如果不承认这一点，诸位，那我就不是在说老实话了。我当然希望大学是为了你们而建立，但不应该是仅仅为了你们。不像传统的道德家所说的那样，人并非是为一己之故才来到人世的。你们同样是为爱尔兰而生的，在你们成长的同时，爱尔兰也会进步。在你们获得真与善、知识学问，心智提高，对宗教变得忠而不愚，赢得良好名声、可敬人格和社会影响力的进步中，我看到的是圣徒之岛名誉与声望的提高、文学与科学的积累以及政治力量的增强。

I go further still. If I do homage to the many virtues and gifts of the Irish people, and am zealous for their full development, it is not simply for the sake of themselves, but because the name of Ireland ever has been, and, I believe, ever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the Catholic Faith, and because, in doing any service, however poor it may be, to Ireland, a man is ministering, in his own place and measure, to the cause of the Holy Roman Apostolic Church.

进一步说，我向爱尔兰人民的许多美德和天赋表达敬意，我热心于他们的全面发展，并非全是为了他们，而是因为爱尔兰这个名字向来——我相信也将一直——与天主教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不管我们能够为爱尔兰提供的服务多么微不足道，我们都是在自己的位置、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神圣的罗马使徒教会出力。

Gentlemen, I should consider it an impertinence in me thus to be speaking to you of myself, were it not that, in recounting to you the feelings with which I have witnes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se Evening Classes, I am in fact addressing to you at the same time words of encouragement and advice, such words as it becomes a Rector to use in speaking to those who are submitted to his care.

诸位，我在这里大谈我自己或显无理，但向大家提起开办夜校的过程中我所亲历的情感，其实是在向诸位传达鼓励与劝告，我想既然以后我作为校长要承担起照看各位的责任，这些话语应当是很适合的。

I say, then, that, had I been younger than I was when the high office which I at present hold was first offered to me, had I not had prior duties upon me of affection and devotion to the Oratory of St. Philip, and to my own dear country, no position whatever, in the whole range of administrations which are open to the ambition of those who wish to serve God in their generation, and to do some great work before they die, would have had more attractions for me than that of being at the head of a University like this. When I became a Catholic, one of my first questions was, “Why have not our Catholics a University?” and Ireland, and the metropolis of Ireland, was obviously the proper seat of such an institution.

我要说，假如我最早得到目前承担的这份要职时我更年轻一点、假如我认为我没有义务对圣菲律普圣会和我亲爱的祖国怀有感情和奉献精神，那么，任何一个雄心勃勃、期望在死前能为上帝服务并成就一番事业的人能够找到的任何管理职位，可能都比像如今一般成为一校之长更吸引我。在我成为天主教徒时，我最先问的问题里有一个就是："我们天主教徒为何就没有一所自己的大学呢？"而爱尔兰和爱尔兰的大都会，明显就是最适合出现这样一所大学的地方。

Ireland is the proper seat of a Catholic University, on account of its ancient hereditary Catholicity, and again of the future which is in store for it. It is impossible, Gentlemen, to doubt that a future is in store for Ireland, for more reasons than can here be enumerated. First, there is the circumstance, so highly suggestive, even if there was nothing else to be said, viz., that the Irish have been so miserably ill-treated and misused hitherto; for, in the times now opening upon us, nationalities are waking into life, and the remotest people can make themselves heard into all the quarters of the earth. The lately invented methods of travel and of intelligence have destroyed geographical obstacles; and the wrongs of the oppressed, in spite of oceans or of mountains, are brought under the public opinion of Europe,—not before kings and governments alone, but before the tribunal of the European populations, who are becoming ever more powerful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political questions. And thus retribution is demanded and exacted for past crime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heinousness and their duration.

爱尔兰是一所天主教大学的合适办学场所，不仅因为天主教的信仰在这里世代相传，还因为爱尔兰有着远大的未来。各位，爱尔兰的未来必将无比光辉，支持这一点的理由不胜枚举。，首先，一直以

来，爱尔兰人都饱受不当待遇，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上各民族纷纷崛起，哪怕最偏远的民族也能让自己的声音传遍全球。最新出现的交通方式和通信方式打破了地理的障碍，被压迫者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即使隔着千山万水，也能得到欧洲舆论的关注，其中关注的人不仅有国王和政府，更是受到广大欧洲人民的审视。这些欧洲人民在许多政治问题的抉择上都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过去的罪恶必将根据其情节轻重和持续时间得到应有的惩戒。

And in the next place, it is plain that, according as intercommunion grows between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Ireland that must grow with it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ortance. For Ireland is the high road by which that intercourse is carried on; and the traffic between hemispheres must be to her a source of material as well as social benefit,—as of old time, though on the minute geographical scale of Greece, Corinth, as being the thoroughfare of commerce by sea and land, became and was called “the rich”.

其次，很明显，随着欧洲与美洲相互往来增多，爱尔兰的社会与政治地位也必将一同进步。因为，爱尔兰是欧美交流路上的交通要道，两个半球之间的交往在不仅能为爱尔兰带来物质上的收获，更能带来重要的社会收益。就如同在远古时代一样，虽然希腊只是那么一块微不足道的小地方，但科林斯作为海陆商贸的要道，却成为名副其实的“富饶”之地。

And then, again, we must consider the material resources of Ireland, so insufficiently explored, so poorly developed,—of which it belongs to them rather to speak, who by profession and attainments are masters of the subject.

另外，我们当然也要考虑到爱尔兰的物质资源。目前爱尔兰境内资源探索不足，开发不力，不用说，爱尔兰人凭借其职业和成就，在这一点上应当是最有发言权。

That this momentous future, thus foreshadowed, will be as glorious for Catholicity as for Ireland we cannot doubt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but, as Providence works by means of human agencies, that natural anticipation has no tendency to diminish the anxiety and earnestness of all zealous Catholics to do their part in securing its fulfilment. And the wise and diligent cultivation of the intellect is one principal means, under the Divine blessing, of the desired result.

过去的经验已经预示了天主教和爱尔兰必将拥有的光明未来。但谋事在天成事在人，就算有这种理所当然的期盼，热心的天主教徒也仍然会在焦虑与渴望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确保这一天的到来。其中实现我们期盼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培育我们的人才，让他们获得智慧、变得勤奋。

3．

3．

Gentlemen, the seat of this intellectual progress must necessarily be the great towns of Ireland; and those great towns have a remarkable and happy characteristic, as contrasted with the cities of Catholic Europe. Abroad, even in Catholic countries, if

there be in any part of their territory scepticism and insubordination in religion, cities are the seat of the mischief. Even Rome itself has its insubordinate population, and its concealed free-thinkers; even Belgium, that nobly Catholic country, cannot boast of the religious loyalty of its great towns. Such a calamity is unknown to the Catholicism of Dublin, Cork, Belfast, and the other cities of Ireland; for, to say nothing of higher and more religious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 the very presence of a rival religion is a perpetual incentive to faith and devotion in men who, from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would be in danger of becoming worse than lax Catholics, unless they resolved on being zealous ones.

在座各位，这种智力进步的基础，必然就在爱尔兰的伟大城镇里，而这些伟大城镇都有一个了不起的、令人开心的特色，与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城镇大为不同。在英伦三岛之外，甚至是在天主教的国家里，假如在他们的领土上有任何一个地方存在宗教上的怀疑主义与不服从，城镇就会成为不安定的场所。哪怕在罗马，也有不顺从的人存在，还有一些不露真面目的自由思想者。就连比利时这样一个高贵的天主教国家，其大城市也不敢说自己对宗教绝对忠诚。这样的不幸，在都柏林、科克、贝尔法斯特等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城镇中是闻所未闻的。因为，且不说这种差异背后更高层次和宗教上的原因，仅仅有一个敌对宗教，就能一直刺激人们保持忠诚和奉献。在这种情形下，除非他们下定决心做充满热情的天主教徒，否则还不如变成不那么恪守教义的教徒。

Here, then, is one remarkable ground of promise in the future of Ireland, that that large and important class, members of which I am now addressing,—that the middle classes in its cities, which will be the depositaries of its increasing political power, and which elsewhere are opposed in their hearts to the Catholicism which they

profess,—are here so sound in faith, and so exemplary in devotional exercises, and in works of piety.

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让爱尔兰的未来充满希望的一个坚实基础，即我在这里对话的这个庞大而重要的阶层，他们坚定的信仰和在奉献虔诚上起的表率作用；还有在爱尔兰各个城镇里的中等阶级，他们是爱尔兰政治力量不断强大的一个能量存储所，而在别处，中等阶级却在内心里反对他们宣称信奉的天主教。

And next I would observe, that, while thus distinguished for religious earnestness, the Catholic population is in no respect degenerate from the ancient fame of Ireland as regards its intellectual endowments. It too often happens that the religiously disposed are in the same degree intellectually deficient; but the Irish ever have been, as their worst enemies must grant, not only a Catholic people, but a people of great natural abilities, keen-witted, original, and subtle. This has bee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nation from the very early times, and was especially prominent in the middle ages. As Rome was the centre of authority, so, I may say, Ireland was the native home of speculation. In this respect they were as remarkably contrasted to the English as they are now, though, in those ages, England was as devoted to the Holy See as it is now hostile. The Englishman was hard-working, plodding, bold, determined, persevering, practical, obedient to law and precedent, and, if he cultivated his mind, he was literary and classical rather than scientific, for Literature involves in it the idea of authority and prescription. On the other hand, in Ireland, the intellect seems rather to have taken the line of Science, and we have various instances to show how fully this was recognized in those times, and with what success it was carried out. “Philosopher,” is in those

times almost the name for an Irish monk. Both in Paris and Oxford, the two great schools of medieval thought, we find the boldest and most subtle of their disputants an Irishman,—the monk John Scotus Erigena, at Paris, and Duns Scotus, the Franciscan friar, at Oxford.

接下来，我还会提出，爱尔兰的天主教信徒除了在虔诚方面出类拔萃，在智慧方面也完全没有辱没爱尔兰的古老名声。内心虔敬的人往往在智力也出现同等程度的欠缺，可是，哪怕最凶恶的敌人也必须承认，爱尔兰人向来不仅仅是天主教信徒，爱尔兰民族还是一个有着极强天赋能力的民族，他们机敏、有创造力，而且十分细致。这个民族从远古时代起便具有这些特征，在中世纪尤其突出。正如罗马是权威的中心，我不妨说，爱尔兰也是思辨者之乡。在这个方面，爱尔兰人与英格兰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曾经对梵蒂冈忠心耿耿的英格兰人现在对其充满敌意。英格兰人是一个勤奋、刻苦、大胆、坚决、坚忍、实际、守法、守旧的民族，他们培育心智时注重的是文学与古典领域，而非科学领域，因为文学当中包含权威和约定俗成的概念。而在爱尔兰，才智似乎主要体现在科学方面，我们有大量不同的例子可以佐证在过去这一点的正确性，以及注重科学的人会取得的成功。在那些时代，谈起爱尔兰的僧侣，人们总会想起“哲学家”这个词。巴黎和牛津是中世纪思想的两大流派，在这里，我们发现，争辩者当中最大胆和最敏感的，往往都是爱尔兰人，比如巴黎的僧侣约翰·司各脱·艾里金纳和牛津方济各会的修士邓斯·司各脱。

Now, it is my belief, Gentlemen, that this character of mind remains in you still. I think I rightly recognize in the Irishman now, as formerly, the curious, inquisitive observer, the acute reasoner, the subtle speculator. I recognize in you talents which are fearfully mischievous, when used on the side of error, but which, when wielded by Catholic devotion, such as I am sure will ever be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Irish disputant, are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to

Catholic interests, and especially at this day, when a subtle logic is used against the Church, and demands a logic still more subtle on the part of her defenders to expose it.

各位，我相信，这种思想特色也一定会在你们这里保留下去。我觉得我现在仍可以在爱尔兰看到好奇、探寻的观察者，审慎的推理者和缜密的思辨者。我在你们这里看到的天赋，如果用在不当的地方，将会产生可怕的害处，但是，如果跟天主教的信仰结合在一起，将对天主教有最重要的意义，而我相信，这一点爱尔兰的辩论者将会一直传承下去。尤其在今天，精巧逻辑被人用来反对教会，我们需要其捍卫者使用更加精妙的逻辑来揭露反对者的谬误。

Gentlemen, I do not expect those who, like you, are employed in your secular callings, who are not monks or friars, not priests, not theologians, not philosophers, to come forward as champions of the faith; but I think that incalculable benefit may ensue to the Catholic cause, greater almost than that which even singularly gifted theologians or controversialists could effect, if a body of men in your station of life shall be found in the great towns of Ireland, not disputatious, contentious, loquacious, presumptuous (of course I am not advocating inquiry for mere argument's sake), but gravely and solidly educated in Catholic knowledge, intelligent, acute, versed in their religion, sensitive of its beauty and majesty, alive to the arguments in its behalf and aware both of its difficulties and of the mode of treating them. And the first step in attaining this desirable end is that you should submit yourselves to a curriculum of studies, such as that which brings you with such praiseworthy diligence within these walls evening after evening; and, though you may not be giving attention to them with this view, but from the laudable love of knowledge, or for the advantages which will accrue

to you personally from its pursuit, yet my own reason for rejoicing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your classes is the same as that which led me to take par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versity itself, viz., the wish, by increasing the intellectual force of Ireland, to strengthen the defences, in a day of great danger,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诸位，你们都将是从事世俗职业的人，不是僧侣，不是修道士，不是牧师，不是神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我并不是希望你们将来会成为信仰的战士。但是，假如处在当前人生阶段的你们能散布在爱尔兰的城镇中，不爱争辩，不惹争议，不喋喋不休，不妄自尊大（当然，我并不是在倡导仅仅为了争论而争论），而是作为认真接受过正规天主教教育的人，对天主教的美与庄严十分敏感，敢于发声作出捍卫天主教的论证，并意识到论证的困难、理解处理论证的正确方式，那就可能为天主教带来莫大的益处，甚至大过极有天赋的神学家或辩论者。这是令人渴望的一个目标，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就是专心学习课程表上的课程，比如能够让你们夜复一夜地留在院墙之内勤奋学习的那些课程。也许你们并不是因为上述想法才重视那些课程的，而是出于对于知识值得称赞的热爱；或者是因为学习这些课程以后，你们个人能得到很多好处，但我十分开心看到你们这些课程得以开设的原因，与让我参与这所大学自身建设的原因是相同的，即，我希望通过提升爱尔兰人的智力水平，让基督教如今在更大的威胁面前，也有更强的防御。

4．

4．

Gentlemen, with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there has been, as you

know, a great movement in behalf of the extension of knowledge among those classes in society whom you represent. This movement has issu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what have been called Mechanics' Institutes through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 new species of literature has been brought into existence, with a view, among its objects, of furnishing the members of these institutions with interesting and instructive reading. I never will deny to that literature its due praise. It has been the production of men of the highest ability and the most distinguished station, who have not grudged, moreover, the trouble, and, I may say in a certain sense, the condescension, of presenting themselves before the classes for whose intellectual advancement they were showing so laudable a zeal; who have not grudged, in the cause of Literature, History, or Science, to make a display, in the lecture room or the public hall, of that eloquence, which was, strictly speaking, the property, as I may call it, of Parliament, or of the august tribunals of the Law. Nor will I deny to the speaking and writing, to which I am referring, the merit of success, as well as that of talent and good intention, so far as this,—that it has provided a fund of innocent amusement and information for the leisure hours of those who might otherwise have been exposed to the temptation of corrupt reading or bad company.

先生们，在过去的30年里，如各位所知，在你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中，有一个知识普及的伟大运动。这个运动的成果，就是在英国各地建立了许多称为技工研究所的机构，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别，旨在为这些机构的成员提供有趣和有教育意义的读物。不可否认，这些文学作品值得表扬。这些作品的创造者是能力非凡、职位显赫的人士。另外，他们并不回避向求知若渴的学生亲自讲课（必须说，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是一种屈尊）；也不避讳在文学、历史或科学的课堂或公众讲堂上展示自己的雄辩水平——严格来说，这种

雄辩丝毫不亚于议会或威严的法院里进行的那种雄辩。我也不会否认我说的这种演讲与写作在成功、天赋和意图上的价值。它为人们在闲暇时间提供了大量无害的娱乐及信息，不然的话，人们极可能受到诱惑而去看不良读物或结交坏人。

So much may be granted,—and must be granted in candour: but, when I go on to ask myself the question, what *permanent* advantage the mind gets by such desultory reading and hearing, as this literary movement encourages, then I find myself altogether in a new field of thought, and am obliged to return an answer less favourable than I could wish to those who are the advocates of it. We must carefully distinguish, Gentlemen, between the mere diversion of the mind and its real education. Supposing, for instance, I am tempted to go into some society which will do me harm, and supposing, instead, I fall asleep in my chair, and so let the time pass by, in that case certainly I escape the danger, but it is as if by accident, and my going to sleep has not had any real effect upon me, or made me more able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on some future occasion. I wake, and I am what I was before. The opportune sleep has but removed the temptation for this once. It has not made me better; for I have not been shielded from temptation by any act of my own, but I was passive under an accident, for such I may call sleep. And so in like manner, if I hear a lecture indolently and passively, I cannot indeed be elsewhere *while* I am here hearing it,—but it produces no positive effect on my mind,—it does not tend to create any power in my breast capable of resisting temptation by its own vigour, should temptation come a second time.

可说的赞扬话很多，也应当坦率地承认，可是，当我继而问自己，在这一广学运动所鼓励下进行的断断续续的阅读和聆听，到底能

给予心智什么永久性的好处时，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思考领域，并觉得一定要给倡导这项运动的那些人作一个回复，尽管这个回复可能不像我希望的那么受欢迎。各位，我们必须严格区分心智的纯粹消遣和心智的真正教育。例如，假设我因诱惑而加入了某个对我有害的团体，但我在自己的椅子里睡着了，这样度过了在团体中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是逃避了危险，但是这只是像一种巧合，我的入睡并没有对我产生任何影响，也没有让我更有能力抵御将来会发生的某种诱惑。我醒来后还是从前那个自己。恰好发生的这次睡眠，只不过消除了这一次诱惑。这次睡眠并没有使我成为更好的一个人，因为我并不是由于自己的某一种行为才逃避了这一次诱惑，我只不过是被动地经历了一次意外。同样，假如我懒懒散散地听了一场讲座，这也是被动的：尽管我人在那里，但这次讲座并没有对我的心智产生任何积极影响，它并不会在我心里唤起一种活力，使我在诱惑再次到来时得以抵御。

Now this is no fault, Gentlemen, of the books or the lectures of the Mechanics' Institute. They could not do more than they do, from their very nature. They do their part, but their part is not enough. A man may hear a thousand lectures, and read a thousand volumes, and be at the end of the process very much where he was, as regards knowledge. Something more than merely *admitting* it in a negative way into the mind is necessary, if it is to remain there. It must not be passively received, but actually and actively entered into, embraced, mastered. The mind must go half-way to meet what comes to it from without.

各位，这并不是说技工研究所的那些书籍或讲座有什么错。它们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起更多的作用。它们尽了自己的责任，但光靠它们还不行。一个人就算听了上千场讲座，读了上千卷书，就知识而言，他最终可能还是在原地踏步。仅仅靠被动地接收是不行的，知

识要留在心智里，还必须做别的工作。不能仅仅被动地接收知识，还要真正主动地走近它、接受它并掌握它。外面的东西要真正被心智所接纳，心智自己也要主动地走出一半的路。

This, then, is the point in which the institutions I am speaking of fail; here, on the contrary, is the advantage of such lectures as you are attending, Gentlemen, in our University. You have come, not merely to be taught, but to learn. You have come to exert your minds. You have come to make what you hear your own, by putting out your hand, as it were, to grasp it and appropriate it. You do not come merely to hear a lecture, or to read a book, but you come for that catechetical instruction, which consists in a sort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your lecturer and you. He tells you a thing, and he asks you to repeat it after him. He questions you, he examines you, he will not let you go till he has proof, not only that you have heard, but that you know.

这就是为何我谈到的那些研究所会失败，同样也是诸位参与的我们讲座的优势所在。你们来到这里，不光是要来接受教育的，还是来主动学习的。你们来到这里，是来施展你们的才华的。你们来到这里，是要把听到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可以说，你们是自己伸出双手抓住它并吸纳它的。你们不只是来到这里听讲座，也不只是来看书，而是希望这里能为你们授业解惑，而解惑的过程就是你和演讲者之间的对话。讲课的人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他会请你们照着重复一次。他会提问，他会考查，除非你们向他证明你不仅听到了他的话，更是理解了他的话，否则他是不会轻易罢休的。

5．

5．

Gentlemen, I am induced to quote here some remarks of my own, which I put into print on occasion of those Evening Lectures, already referred to, with which we introduced the first terms of the University. The attendance upon them was not large, and in consequence we discontinued them for a time, but I attempted to explain in print what the object of them had been; and while what I then said is pertinent to the subject I am now pursuing, it will be an evidence too, in addition to my opening remarks, of the hold which the idea of these Evening Lectures has had upon me.

各位，我想在此引述我自己说过的一些话，这些话是我之前在大学最初几个学期的开学典礼上说过的，也收纳在了此次出版的《夜校演讲集》中。最初入学的学生并不多，所以我们暂停了一段时间，但我仍然在出版的书册中解释了夜校的办学目的。今天旧话重提，一是当时所说的那些话对于今天的话题也十分适合；另外，除了作为我的开学致辞以外，它同时也是一个证明，说明“夜校讲座”一直是我心头挥之不去的牵挂。

“I will venture to give you my thoughts,” I then said, writing to a friend, [11_1] “on the *object* of the Evening Public Lectures lately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House, which, I think, has been misunderstood.

当时，我在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 [12_1] ，“关于最近在‘校园之家’开设夜间公共演讲的目的，我想斗胆谈一谈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引起误解了。

“I can bear witness, not only to their remarkable merit as lectures, but also to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very satisfactorily attended. Many, however, attach a vague or unreasonable idea to the word 'satisfactory', and maintain that no lectures can be called satisfactory which do not make a great deal of noise in the place, and they are disappointed otherwise. This is what I mean by misconceiving their object; for such an expectation, and consequent regret, arise from confusing the ordinary with the extraordinary object of a lecture,—upon which point we ought to have clear and definite ideas.

“我能证明的，不仅仅是其作为讲座拥有非凡价值，听课的学生也很让人满意。但是，许多人对‘满意’这个词抱有很模糊或不合理的想法，认为讲座若没爆场，则称不上什么满意；达不到现场轰动效果，他们便会失望。这就是我所说的误解。怀有如此之高的期望，随后又感到遗憾，这是因为将讲座的一般目的与特殊目的混为一谈了，对此，我们必须有清晰明确的区分。

“The *ordinary* object of lectures is *to teach* ; but there *is* an object, sometimes demanding attention, and not incongruous, which, nevertheless, cannot be said properly to belong to them, or to be more than occasional. As there are kinds of eloquence which do not aim at any thing beyond their own exhibition, and are content with being eloquent, and with the sensation which eloquence creates; so i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there are seasons, festive or solemn, anyhow extraordinary, when academical acts are not directed towards their proper ends, so much as intended to amuse, to astonish, and to attract, and thus to have an effect upon public opinion. Such are the exhibition days of Colleges; such the

annual Commemoration of Benefactors at one of the English Universities, when Doctors put on their gayest gowns, and Public Orators make Latin Speeches. Such, too, are the Terminal Lectures, at which divines of the greatest reputation for intellect and learning have before now poured forth sentences of burning eloquence into the ears of an audience brought together for the very sake of the display. The object of all such Lectures and Orations is to excite or to keep up an interest and reverence in the public mind for the Institutions from which the exhibition proceeds.“—I might have added, such are the lectures delivered by celebrated persons in Mechanics' Institutes.

“讲座的一般目的是教学，但有时我们还会注意到另外一个目的，其与教学这一目的不甚一致，更多地应当算是一种特殊的目的。这就像有很多种雄辩术，除了展示人的雄辩能力之外并无别的功能，只要表现出了口才、引得满堂彩就足以令人满意了。再比如学校包括大学中存在的节庆，这种跑偏的学术活动，不管气氛是欢庆的还是肃穆的，都只是通过与众不同来达到娱乐、惊人、吸引眼球的效果，以此来影响舆论对学校的看法。各个学院的展示日就是这一类的，英国某所大学里的年度捐赠人纪念会也是如此。每逢这样的节日，博士们会穿上极灰暗的博士服，公众演说家会用拉丁语发表演讲。学期神学讲座亦是如此——拥有学问极高又谦虚好学美名的神职人员，对着只为了捧场而出席的听众，在讲台上口若悬河、语惊四座，其目的就是要让公众对举行这些展览的机构产生或保持兴趣和敬畏。”我本来还要加上一句：技工研究所里那些名人举办的演讲也属于这一类。

I continue: “Such we have suitably had in the new University;—such were the Inaugural Lectures. Displays of strength and skill of this kind, in order to succeed, *should* attract attention, and if they do not attract attention, they have failed. They do not invite an

audience, but an attendance; and perhaps it is hardly too much to say that they are intended for seeing rather than for hearing.

我接着说："在这所新大学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我们的开学典礼就是这么办的。这一类意在显示力量与技能的演说，要成功就应当能够吸引人；假如不能吸引人，那它们就算是失败了。这类演讲不需要专心的听众，只需要高上座率。假如我们说这些演讲为的是给人看，而不是给人听，倒也不算言过其实。

"Such celebrations, however,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ase, must be rare. It is the novelty which brings, it is the excitement which recompenses, the assemblage. The academical body which attempts to make such extraordinary acts the normal condition of its proceedings, is putting itself and its Professors in a false position.

"然而，其性质决定了这样的庆祝会必须是偶一为之。这样的集会带来的是新奇的感受，带给参与者的是激动的心情。把这种特殊的表演变为运转常态的学术机构，实则将自身和其教授放在了一个不当的地位上。

"It is, then, a simple misconception to suppose that those to whom the government of our University is confided have aimed at an object, which could not be contemplated at all without a confusion or inadvertence, such as no considerate person will impute to them. Public lectures, delivered with such an object, could not be successful; and, in consequence, our late lectures have, I cannot doubt (for it could not be otherwise), ended unsatisfactorily in the judgment of any zealous person who has

assumed for them an office with which their projectors never invested them.

“因此，认为我们这所大学的治理人员怀着这样的目的就错了，只有混乱和不在意的人才会这样想，尽管体贴的人都不会去怪罪他们。怀有这样的目的来开办公共讲座是不可能成功的。热心的人认为讲座应该具有其在设计之初就不具有的功能，结果自然会对我们近期的讲座感到不满意，这一点毋庸置疑。

“What their object really was the very meaning of academical institutions suggests to us. It is, as I said when I began, *to teach* . Lectures are, properly speaking, not exhibitions or exercises of art, but matters of business; they profess to impart something definite to those who attend them, and those who attend them profess on their part to receive what the lecturer has to offer. It is a case of contract:—'I will speak, if you will listen'—'I will come here to learn, if you have any thing worth teaching me.' In an oratorical display, all the effort is on one side; in a lecture, it is shared between two parties, who co-operate towards a common end.

“学术机构的本质已经告诉我们它们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了。就如同我一开始已经说明的一样，那就是教学。确切地说，讲座并不是展览或表演实践，而是事务性的工作。讲座承诺为参与者提供某些确切的东西，而听讲的人则是来收获这些东西的。这是一种契约。‘你们愿意听，我就讲。’‘你讲的如果是有用的，我就来听。’在一场演说表演中，所有的努力全落在一方；而在讲座中，两方都要努力，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合作。

“There should be ever something, on the face of the arrangements, to act as a memento that those who come, come to gain something, and not from mere curiosity. And in matters of fact, such were the persons who did attend, in the course of last term, and such as those, and no others, will attend. Those came who wished to gain information on a subject new to them, from informants whom they held in consideration, and regarded as authorities. It was impossible to survey the audience which occupied the lecture-room without seeing that they came on what may be called business. And this is why I said, when I began, that the attendance was satisfactory. That attendance is satisfactory,—not which is numerous, but—which is steady and persevering. But it is plain, that to a mere by-stander, who came merely from general interest or good will to see how things were going on, and who did not catch the object of advertising the Lectures, it would not occur to look into the faces of the audience; he would think it enough to be counting their heads; he would do little more than observe whether the staircase and landing were full of loungers, and whether there was such a noise and bustle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hear a word; and if he could get in and out of the room without an effort, if he could sit at his ease, and actually hear the lecturer, he would think he had sufficient grounds for considering the attendance unsatisfactory.

“在安排讲座的过程中，应该确保讲座能为参与者提供某种纪念品，因为参与者是为了有所得才来参与的，而不是单纯出于好奇。事实上，会来参加讲座的人，还是已经来过的那些人。那些前来听讲的人，是希望从他们认为权威的人士那里，了解一个他们之前不了解的学科。假如不明白坐满教室的听众是为了公事而来，那就不可能了解坐满演讲厅的听众。也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在一开始就说，听课的学生令人满意。听课的学生令人满意，并不是指人数，而是指听众稳定

且坚持不懈。很显然，对仅仅拥有一般兴趣或良好愿望、想了解事情如何进展，也不理解讲座目的的纯粹旁观者来说，他是绝对不会想知道听众都是些什么人的。他觉得仅仅数一下人头便足够了。他只会看看楼梯或平台上是否站着一些闲人，是否有叽叽叽喳喳的声音让人根本听不清演讲者的声音。假如他轻轻松松就能进出报告厅，轻轻松松就能找到座位坐下来，而且轻轻松松就能听清演讲者的声音，那他马上就会有足够的理由判定这个讲座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The stimulating system may easily be overdone, and does not answer on the long run. A blaze among the stubble, and then all is dark. I have seen in my time various instances of the way in which Lectures really gain upon the public; and I must express my opinion that, even were it the sole object of our great undertaking to make a general impression upon public opinion, instead of that of doing definite good to definite persons, I should reject that method, which the University indeed itself has *not* taken, but which young and ardent minds may have thought the more promising. Even did I wish merely to get the intellect of all Dublin into our rooms, I should not dream of doing it all at once, but at length. I should not rely on sudden, startling effects, but on the slow, silent, penetrating, overpowering effects of patience, steadiness, routine, and perseverance. I have known individuals set themselves down in a neighbourhood where they had no advantages, and in a place which had no pretensions, and upon a work which had little or nothing of authoritative sanction; and they have gone on steadily lecturing week after week, with little encouragement, but much resolution. For months they were ill attended, and overlooked in the bustle of the world around them. But there was a secret, gradual movement going on, and a specific force of attraction, and a drifting and accumulation of hearers, which at length made itself felt, and could not be mistaken. In this stage of things, a friend said in conversation

to me, when at the moment I knew nothing of the parties: 'By-the-bye,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such and such a subject, go by all means, and hear such a one. So and so does, and says there is no one like him. I looked in myself the other night, and was very much struck. Do go, you can't mistake; he lectures every Tuesday night, or Wednesday, or Thursday,' as it might be. An influence thus gradually acquired endures; sudden popularity dies away as suddenly.”

“刺激听众的体制很容易过火，长期而言并不能解决问题。在残株上点一把火，就会把一切变黑。我这一生见过许多讲座用来吸引听众的方法。但我必须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就算我们这项伟大事业不是为给人们带来切实的好处，而仅仅是在公众心里留下一个总体的印象，我也要反对我们大学没有采取的那种方法，不管年轻而充满激情的人是不是觉得那种方法更有用。就算我希望将都柏林的人才全都吸纳到我们的教室里来，我也不会妄想能一次做到，我知道要花时间慢慢来。我不会寄希望于在短期内一鸣惊人，我信奉耐心、稳健、稳定和毅力，因为它们缓慢低调、拥有润物细无声的强大力量。我见到很多人，他们甘心身处劣势，在朴实无华的岗位上从事很少或从不可能得到权威认可的工作。可是，他们却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讲课，没人鼓励他们，但他们意志坚定。一连几个月，来听他们讲课的学生很少；在纷繁的世界中，没有人认得他们。可是，有一种隐密和缓慢的变化正在发生，一种吸引人的特别力量让听众人数悄无声息地慢慢增多。终于，人们注意到了这种毋庸置疑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位朋友在谈话时对我说过一句话——当时，我对各个团体的情况所知甚少——他说：‘说实话，假如你对某个话题有兴趣，那就一定要去听一次那个讲座。谁谁谁去了，说那里没有像他一样的人。那天晚上，我亲自去看了一下，结果就有了惊人发现。一定要去，肯定没错。他每个星期二晚上讲课，有时候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如此这般逐渐积累起来的影响力会持续很久，突起的名声消褪起来也很快。”

As regards ourselves, the time is passed now, Gentlemen, for such modesty of expectation, and such caution in encouragement, as these last sentences exhibit. The few, but diligent, attendants upon the Professors' lectures, with whom we began, have grown into the diligent and zealous many; and the speedy fulfilment of anticipations, which then seemed to be hazardous, surely is a call on us to cherish bolder hopes and to form more extended plans for the years which are to follow.

至于我们自己，诸位，最后这几句话说明不敢奢求、小心鼓励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最开始听我们那几位教授讲座的，只有少数几位勤奋的同学；现在，勤奋和热情的同学已经成为多数了。期盼能否尽快实现，当时还是未定之事，现在却在呼唤我们作出更大胆的期望，并为未来几年制定范围更广的计划。

6．

6．

You will ask me, perhaps, after these general remarks, to suggest to you the particular intellectual benefit which I conceive students have a right to require of us, and which we engage by means of our evening classes to provide for them. And, in order to this, you must allow me to make use of an illustration, which I have heretofore employed, [11_2] and which I repeat here, because it is the best that I can find to convey what I wish to impress upon you. It is an illustration which includes in its application all of us, teachers as

well as taught, though it applies of course to some more than to others, and to those especially who come for instruction.

泛泛地说了一通，大家也许会要求我说一说我觉得学生在学校中，到底有权要求心智上得到怎样的提高，也即我们通过夜校可以提供大家的有哪些进益。为说明这一点，我必须打个比方，这个例子我方才也用过 [12_2]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重复，是因为我觉得这是能够传达我的意思的最好方法。这个例子对老师学生都适用，尽管它对某些人可能比对另外一些人更加适用，尤其是对前来这里听课的人。

I consider, then, that the position of our minds, as far as they are uncultivated, towards intellectual objects,—I mean of our minds, before they have been disciplined and formed by the action of our reason upon them,—is analogous to that of a blind man towards the objects of vision, at the moment when eyes are for the first time given to him by the skill of the operator. Then the multitude of things, which present themselves to the sight under a multiplicity of shapes and hues, pour in upon him from the external world all at once, and are at first nothing else but lines and colours, without mutual connection, dependence, or contrast, without order or principle, without drift or meaning, and like the wrong side of a piece of tapestry or carpet. By degrees, by the sense of touch, by reaching out the hands, by walking into this maze of colours, by turning round in it, by accepting the principle of perspective, by the various slow teaching of experience, the first information of the sight is corrected, and what was an unintelligible wilderness becomes a landscape or a scene, and is understood to consist of space, and of bodies variously located in space, with such consequences as thence necessarily follow. The knowledge is at length gained of things or objects, and of their relation to each

other; and it is a kind of knowledge, as is plain, which is forced upon us all from infancy, as to the blind on their first seeing, by the testimony of our other senses, and by the very necessity of supporting life; so that even the brute animals have been gifted with the faculty of acquiring it.

我认为，在我们用理性对心智进行开化之前，其就像盲人和视力一样，开化的过程就是通过技巧把眼睛赋予给他的过程。之后万千事物的万千形状和颜色出现了，它们一次性从外面的世界被他看到，最开始不过是些线条和颜色，并没有相互的联系、关系或对照，没有秩序或规则，没有主题或意义，就如同挂毯或地毯的反面。但慢慢地，通过触觉、通过伸出双手、通过在颜色的迷宫中漫步、通过在其中反复来回、通过习知透视的原理、通过各种各样缓慢的经验教学，视力最初的接收的信息得到了纠正。令人费解的一片荒原变成了大好河山，盲人理解了其中的空间、布局和因果。知识最终的获得是通过事物和相互间的联系。这种知识从婴儿时期我们就已经获得，但此时不过是如盲人第一次获得视力，还要通过其他感官的佐证、通过生存的必要，才最终算得上真正的获得。因此，哪怕是最凶残的野兽，也会有这样做的天赋。

Such is the case as regards material objects; and it is much the same as regards intellectual. I mean that there is a vast host of matters of all kinds, which address themselves, not to the eye, but to our mental sense; viz., all those matters of thought which, in the course of life and the intercourse of society, are brought before us, which we hear of in conversation, which we read of in books; matters political, social, ecclesiastical, literary, domestic; persons, and their doings or their writings; events, and works, and undertakings, and laws, and institutions. These make up a much more subtle and intricate world than that visible universe of which I

was just now speaking. It is much more difficult in this world than in the material to separate things off from each other, and to find out how they stand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to learn how to class them, and where to locate them respectively. Still, it is not less true that, as the various figures and forms in a landscape have each its own place, and stand in this or that direction towards each other, so all the various objects which address the intellect have severally a substance of their own, and have fixed relations each of them with everything else,—relations which our minds have no power of creating, but which we are obliged to ascertain before we have a right to boast that we really know any thing about them. Yet, when the mind looks out for the first time into this manifold spiritual world, it is just as much confused and dazzled and distracted as are the eyes of the blind when they first begin to see; and it is by a long process, and with much effort and anxiety, that we begin hardly and partially to apprehend its various contents and to put each in its proper place.

这是有形对象，在才智上，情形也大致相同。我是说，世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庞杂事物，它们表现自身，并非诉诸人眼，而是诉诸我们的精神感官——即所有的思想——它们在生命的过程和社会交往中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在谈话中听到，在阅读时看到——有政治、社会、教会、文学和家庭事务，有人、他们的行为或著作，有事件与作品，有事业，有法律，有机构。这些东西构成更微妙和复杂的一个世界，远非我刚刚谈到的那个可见宇宙可以相提并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要将不同的事物彼此分开、要明白这些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掌握如何为它们分类、分别将它们安排在什么位置，都比在有形世界里要困难得多。尽管如此，正如一处风景里的不同图形各得其所、相对位置固定，诉诸才智的事物也各有各的实体并与别的事物存在固定关系，这些关系不是思维可以建立的，但只有我们真正了解这些关系，才有权夸口说我们当真对它们有所了解。可是，当思维第一次打

探这个多样的精神世界时，它所感受到的混乱、眩目和困扰，丝毫不亚于盲人睁眼那一刻的感受。要经过很长的一个过程、花费很大力气、克服内心的焦虑，我们才能开始艰难地理解其部分内容，并将其归入各自恰当的位置。

We grow up from boyhood; our minds open; we go into the world; we hear what men say, or read what they put in print; and thus a profusion of matters of all kinds is discharged upon us. Some sort of an idea we have of most of them, from hearing what others say; but it is a very vague idea, probably a very mistaken idea. Young people, especially, because they are young, colour the assemblage of persons and things which they encounter with the freshness and grace of their own springtide, look for all good from the reflection of their own hopefulness, and worship what they have created. Men of ambition, again, look upon the world as a theatre for fame and glory, and make it that magnificent scene of high enterprise and august recompence which Pindar or Cicero has delineated. Poets, too, after their wont, put their ideal interpretation upon all things, material as well as moral, and substitute the noble for the true. Here are various obvious instances, suggestive of the discipline which is imperative, if the mind is to grasp things as they are, and to discriminate substances from shadows. For I am not concerned merely with youth, ambition, or poetry, but with our mental condition generally. It is the fault of all of us, till we have duly practised our minds, to be unreal in our sentiments and crude in our judgments, and to be carried off by fancies, instead of being at the trouble of acquiring sound knowledge.

我们从童年开始长大，我们的心智逐渐开阔、步入世界，我们听

到人们说话，或读到书中的东西。万千不同事物就是这样一齐涌向我们的。对于其中的大部分事物，我们之所以能形成一个概念，主要是因为听别人说起它们，但那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也许还是极其错误的概念。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因年轻，遇到人和事时都按照自己春天般的心绪涂上新鲜美好的感情色彩，依照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什么都只看美好的一面，然后就崇拜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然还有雄心勃勃的人，他们把整个世界看作搏取声名与荣耀的舞台，当作品达或西塞罗笔下壮志得酬、善恶有报的宏大背景板。诗人也是一样，他们习惯性地将有形事物与道德事物全都涂上理想色彩，以高贵代替真实。这里有众多明显的实例，说明假如心智要掌握真实的事物，要将事物的实体与其影子区分开来，就必须经过训练。因为我考虑的不光是青春、理想或诗歌，而且还有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智力状况。在我们能够正确运用我们的才智之前，我们所有人都会犯错误，产生虚幻的情感、作出鲁莽的判断，而不是去费心获得真正的知识。

In consequence, when we hear opinions put forth on any new subject, we have no principle to guide us in balancing them; we do not know what to make of them; we turn them to and fro, and over, and back again, as if to pronounce upon them, if we could, but with no means of pronouncing. It is the same when we attempt to speak upon them: we make some random venture; or we take up the opinion of some one else, which strikes our fancy; or perhaps, with the vaguest enunciation possible of any opinion at all, we are satisfied with ourselves if we are merely able to throw off some rounded sentences, to make some pointed remarks on some other subject, or to introduce some figure of speech, or flowers of rhetoric, which, instead of being the vehicle, are the mere substitute of meaning. We wish to take a part in politics, and then nothing is open to us but to follow some person, or some party, and to learn the commonplaces and the watchwords which belong to it. We hear about landed interests, and mercantile interests, and trade, and

higher and lower classes, and their rights, duties, and prerogatives; and we attempt to transmit what we have received; and soon our minds become loaded and perplexed by the incumbrance of ideas which we have not mastered and cannot use. We have some vague idea, for instance, that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slavery are in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that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private judgment and democracy,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ivilization; we attempt to find arguments in proof, and our arguments are the most plain demonstration that we simply do not understand the things themselves of which we are professedly treating.

结果，当我们听到关于某个新话题的意见时，我们没有任何原则指导我们综合平衡这些意见。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意见。我们反复把玩这些意见，好像自己也想就这些意见发表看法，然而却缺乏表达手段。谈论这些意见时也是一样，我们胡乱发表一些随意的看法、借用别人让我们浮想联翩的观点，以最模糊的解释应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意见。只要能够抛出几句圆熟的话，对别的某个主题发表敏锐的议论，或显摆几个修辞或华丽辞藻就心满意足了，尽管这些东西不过是表达的工具而非意义本身。我们有意参与政治，但除了跟在某个人或党派后面学几句政客和党派人士常用的陈词滥调或空喊几句口号外，并没有其他机会。我们听别人讲地主的利益，商业利益，贸易，社会上层和下层及其权利、职责和特权。我们试图传达我们接收的这些东西。很快，我们的大脑就塞满了自己并没有真正掌握、因而也无法利用的概念，并因这累赘而感到困惑。比如，我们模糊地知道，宪政与奴隶制无法相互协调，个人判断与民主、基督教与文明之间有联系；我们试图找到可以证明的论据，但我们的论证却成为最显明的实证，说明对于我们宣称自己正在论述的东西，我们根本都不明白。

7．

7 .

Reflect, Gentlemen, how many disputes you must have listened to, which were interminable, because neither party understood either his opponent or himself. Consider the fortunes of an argument in a debating society, and the need there so frequently is, not simply of some clear thinker to disentangle the perplexities of thought, but of capacity in the combatants to do justice to the clearest explanations which are set before them,—so much so, that the luminous arbitration only gives rise, perhaps, to more hopeless altercation. “Is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better for a population than an absolute rule?” What a number of points have to be clearly apprehended before we are in a position to say one word on such a question! What is meant by “constitution”? by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by “better”? by “a population”? and by “absolutism”? The ideas represented by these various words ought, I do not say, to be as perfectly defined and located in the minds of the speakers as objects of sight in a landscape, but to be sufficiently, even though incompletely, apprehended, before they have a right to speak. “How is it that democracy can admit of slavery, as in ancient Greece?” “How can Catholicism flourish in a republic?” Now, a person who knows his ignorance will say, “These questions are beyond me”; and he tries to gain a clear notion and a firm hold of them; and, if he speaks, it is as investigating, not as deciding. On the other hand, let him never have tried to throw things together, or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m, or to denote their peculiarities, in that case he has no hesitation in undertaking any subject, and perhaps has most to say upon those questions which are most new to him. This is why so many men are one-sided, narrow-minded, prejudiced, crotchety. This is why able men have to change their minds and their line of

action in middle age, and to begin life again, because they have followed their party, instead of having secured that faculty of true perception as regards intellectual objects which has accrued to them, without their knowing how, as regards the objects of sight.

现在请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曾听到过多少争执，没完没了，因为争执的双方都不理解对手，也不理解自己。想想辩论社里论证的命运吧。在那里，所需要的往往不是一位清晰的思考者来解开思想的乱麻，而是辩论双方能够公平对待他们面前清晰无比的解释，以至于再清楚不过的裁决，也许反倒促成更无希望的争执。“宪政比专制对人民更有利吗？”要让自己处在可以对这样一个问题说出哪怕一个字的地位，我们必须事先清楚地理解多少要点啊！“宪法”是什么意思？“立宪政府”呢？“更有利”呢？“人民”呢？“专制”呢？我并不是说，说话者对这些词的定义和定位，必须要像风景画里一样精确完美，但必须对它们有充足的、哪怕是不完全的理解，之后我们才有权发话。“古希腊是民主社会，为何又能容许奴隶制呢？”“天主教怎么可能在一个共和制国家里繁荣发达呢？”如果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会说：“这些问题我根本搞不清楚，”他试图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并切实理解它们。假如他确实有话想说，也只是探究的口气，而不会那么斩钉截铁。另外一方面，假如他从没有尝试过综合看待事物、没有尝试过区别事物、也没有指明过事物的特性，他会毫不犹豫地讨论各种话题，对他越不了解的话题越说得天花乱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人看问题片面、视野狭隘、怀有偏见、反复无常。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许多能干的人到了中年都会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行事，重新开始生活。因为他们以前都是人云亦云，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积累得来的知识并没有像获得视力一样，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理解力。

But this defect will never be corrected,—on the contrary, it will be aggravated,—by those popular institutions to which I referred just now. The displays of eloquence, or the interesting matter

contained in their lectures, the variety of useful or entertaining knowledge contained in their libraries, though admirable in themselves, and advantageous to the student at a later stage of his course, never can serve as a substitute for methodical and laborious teaching. A young man of sharp and active intellect, who has had no other training, has little to show for it besides a litter of ideas heaped up into his mind anyhow. He can utter a number of truths or sophisms, as the case may be, and one is as good to him as another. He is up with a number of doctrines and a number of facts, but they are all loose and straggling, for he has no principles set up in his mind round which to aggregate and locate them. He can say a word or two on half a dozen sciences, but not a dozen words on any one. He says one thing now, and another thing presently; and when he attempts to write down distinctly what he holds upon a point in dispute, or what he understands by its terms, he breaks down, and is surprised at his failure. He sees objections more clearly than truths, and can ask a thousand questions which the wisest of men cannot answer; and withal, he has a very good opinion of himself, and is well satisfied with his attainments, and he declares against others, as opposed to the spread of knowledge altogether, who do not happen to adopt his ways of furthering it, or the opinions in which he considers it to result.

可是，在我刚刚提到的那些流行的研究机构里，这个缺陷永远也无法纠正过来，只会愈加严重。雄辩术的展示、讲座中有趣的内容、图书馆里各种有用或有趣的知识，虽然自身是好的，对处在高级学习阶段的学生也不无益处，却并不能替代系统和勤奋的学习。才智敏锐和积极活跃的年轻人，假如没有接受过其他的训练，脑子里除了一堆概念之外，并没有别的任何东西可以展示。他遇事可摆出一大堆事实与诡辩，在他看来事实和诡辩都一样有用。他可以罗列一套学说与事实，但都是散漫无条理的，他的头脑里并没有任何原则将它们结合起

来并予以定位。五、六门学科他都可以说出一两个字眼，但就单独一个学科来说，十几个词也说不出来。他一会说这个，过一会又说那个。当他尝试把他在争论中的点或者他仅仅知道术语的东西写下来时，他就崩溃了，并对自己的失败甚是惊讶。他对反对意见比对事实要看得清楚得多，他能提出上千个就连最聪明的人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他因此而自视甚高，对自己的学识相当满意，但凡有人碰巧不像他那样增进知识，或并不接受他的知识造就了他的观点，他便公开反对，但他这样做完全不是为了传播知识。

This is that barren mockery of knowledge which comes of attending on great Lecturers, or of mere acquaintance with reviews, magazines, newspapers, and other literature of the day, which, however able and valuable in itself, is not the instrument of intellectual education. If this is all the training a man has, the chance is that, when a few years have passed over his head, and he has talked to the full, he wearies of talking, and of the subjects on which he talked. He gives up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and forgets what he knew, whatever it was; and, taking things at their best, his mind is in no very different condition from what it was when he first began to improve it, as he hoped, though perhaps he never thought of more than of amusing himself. I say, “at the best,” for perhaps he will suffer from exhaustion and a distaste of the subjects which once pleased him; or perhaps he has suffered some real intellectual mischief; perhaps he has contracted some serious disorder, he has admitted some taint of scepticism, which he will never get rid of.

这就是拙劣模仿带来的无益后果，因为他那样的知识仅仅源自一些著名演讲人的演讲，或者仅仅来自于对一些观点、杂志和其他流行文学的略知。那些演讲人自身虽然很能干，那些读物也很有价值，却

不是才智教育的途径。假如这就是一个人获得的全部培育，那事情多半会是这样的：过不几年以后，他就再没什么可谈的了，他会厌倦于谈话，厌倦于以前谈过的那些话题。他会放弃对于知识的追求，他会忘记以前知道的东西，无论他都知道些什么。他会凑合过活，他的思想和他最初开始希望改善它的时候没什么差别。不过，他当初所想的，也许不过是为自己找点乐子罢了。我之所以说“凑合过活”，是因为他也许会因为再无话可说而痛苦，而最初使他开心的那些话题现在却会使他厌恶。也许，他深受这种思维恶作剧之害。也许他会出现严重的紊乱，他接纳某种程度的怀疑主义，并从此以后都无法摆脱。

And here we see what is meant by the poet's maxim, “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 Not that knowledge, little or much, if it be real knowledge, is dangerous; but that many a man considers a mere hazy view of many things to be real knowledge, whereas it does but mislead, just as a short-sighted man sees only so far as to be led by his uncertain sight over the precipice.

如此，我们就能知道那位诗人的格言到底什么意思了：“一知半解，害己误人。”假如是真正的知识，无论多少，都不能说是害己误人。但是，有很多人认为，只要对许多事物一知半解，就可以算作有知识了。这样的看法会真的给人以误导，正如短视的人在悬崖上任由自己并不确信的视力引导自己。

Such, then, being true cultivation of mind, and such the literary institutions which do not tend to it, I might proceed to show you, Gentlemen, did time admit, how, on the other hand, that kind of instruction of which our Evening Classes are a specimen, is especially suited to effect what they propose. Consider, for instance, what a discipline in accuracy of thought it is to have to construe a

foreign language into your own; what a still severer and more improving exercise it is to translate from your own into a foreign language. Consider, again, what a lesson in memory and discrimination it is to get up, as it is called, any one chapter of history. Consider what a trial of acuteness, caution, and exactness, it is to master, and still more to prove, a number of definitions. Again, what an exercise in logic is classification, what an exercise in logical precision it is to understand and enunciate the proof of any of the more difficult propositions of Euclid, or to master any one of the great arguments for Christianity so thoroughly as to bear examination upon it; or, again, to analyze sufficiently, yet in as few words as possible, a speech, or to draw up a critique upon a poem. And so of any other science,—chemistry, or comparative anatomy, or natural history; it does not matter what it is, if it be really studied and mastered, as far as it is taken up. The result is a formation of mind,—that is, a habit of order and system, a habit of referring every accession of knowledge to what we already know, and of adjusting the one with the other; and, moreover, as such a habit implies, the actual acceptance and use of certain principles as centres of thought, around which our knowledge grows and is located. Where this critical faculty exists, history is no longer a mere story-book, or biography a romance; orators and publications of the day are no longer infallible authorities; eloquent diction is no longer a substitute for matter, nor bold statements, or lively descriptions, a substitute for proof. This is that faculty of perception in intellectual matters, which, as I have said so often, is analogous to the capacity we all have of mastering the multitude of lines and colours which pour in upon our eyes, and of deciding what every one of them is worth.

各位，假如时间允许，我会进而为大家显示，哪些是真正的心智

培育，哪些是那种并不在意心智培育的文学机构；以及我们夜校视作范例的教学方式为何尤其能达到其目的。例如，请考虑一下，将一种外语翻译成自己的语言，需要多么精确的思维训练，而要将自己的语言翻译成外语，却需要更多更好的锻炼。我们再考虑一下，比如仅仅要看懂历史的一章，都需要什么样的记忆力与辨别力训练；要掌握并证明若干定义，思想的敏锐度、谨慎度与精确度需要经过怎样的考验。还有，分类是何等的逻辑锤炼，理解并阐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任何一个较困难的证明过程、掌握基督教的任何一个伟大论证熟练到足以经受检验、或者尽可能简短地充分分析一篇演讲或批评一首诗歌，对思维的精确性又是怎样巨大的锤炼。在别的任何一门学科里也都是如此，如化学、比较解剖学或自然史。到底是哪一门学科无关紧要，一旦选择了某一学科，就应当认真学习并加以掌握。其结果必将是思维的形成，即形成秩序与体系的习惯，把每一种我们接触到的知识与我们实际知道的东西联系起来的习惯，并使两者能够相互调整。这种习惯也意味着，我们已经真正把一些原则当做了思维的中心，并围绕这一中心建立和定位我们的知识。有了这样的批判能力，历史就不再只是纯粹的故事；书籍或传记不再是浪漫小说；演讲者和今日的出版物不再是永不出错的权威；能言善辩不再是物质的替代品；鲁莽的断言或生动的描述也不再是证据的替代物。这就是在知识上的感知能力，正如我经常说的，这就像我们大家都有的一项能力——掌握我们看到的诸多线条和色彩，并确定其各自的价值。

8．

8．

But I should be transgressing the limits assigned to an address of this nature were I to proceed. I have not said any thing, Gentlemen, on the religious duties which become the members of a

Catholic University, because we are directly concerned here with your studies only. It is my consolation to know that so many of you belong to a Society or Association, which the zeal of some excellent priests, one especially, has been so instrumental in establishing in your great towns. You do not come to us to have the foundation laid in your breasts of that knowledge which is highest of all: it has been laid already. You have begun your mental training with faith and devotion; and then you come to us to add the education of the intellect to the education of the heart. Go on as you have begun, and you will be one of the proudest achievements of our great undertaking. We shall be able to point to you in proof that zeal for knowledge may thrive even under the pressure of secular callings; that mother-w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ake a man idle, nor inquisitiveness of mind irreverent; that shrewdness and cleverness are not incompatible with firm faith in the mysteries of Revelation; that attainment i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need not make men conceited, nor above their station, nor restless, nor self-willed. We shall be able to point to you in proof of the power of Catholicism to make out of the staple of great towns exemplary and enlightened Christians, of those classes which, external to Ireland, are the problem and perplexity of patriotic statesmen, and the natural opponents of the teachers of every kind of religion.

假如我这样继续下去，那就超越了这类性质讲话的界限了。各位，我还没有就一所天主教大学学生应有的宗教责任发表任何意见，因为我们今天直接讨论的，仅仅是大家的学业。我很宽慰地得知，你们当中已经有许多人归属于某个团体，某些杰出的牧师——尤其是其中的一位——他们的热情对于在你们了不起的城镇中办学起到了很大作用。你们来到我们这里，并不是要在你们心中建立起最崇高知识的基础，因为这个基础已经在你们心里了。你们已经怀着信仰和奉献精神开始了心智的训练，此后，你们来到我们这里，是为了在心灵的教

育后再接受才智的教育。请像你们已经开始的那样继续下去吧，你们将成为我们这项伟大事业最值得骄傲的成果。我们将以各位为证，说明对于知识的热情，哪怕在世俗的召唤下也会有所成就；一个人的天资并不一定会让他游手好闲，心智的求知欲也不一定会让人粗俗无礼；为人精明机灵，并非与对《启示录》奥秘的坚定信仰水火不容；文学与科学上的成就，并不一定会让人傲慢无礼、不安本份、躁动不安或刚愎自用。我们将以各位为证，说明天主教有能力把模范和开明的天主教徒变为我们伟大城镇的中流砥柱；还有那些在爱尔兰之外的地方，给爱国政治家带来麻烦和混乱、对所有宗教的教师来说都是天敌的阶层，也一并会被我们变为城镇的支柱。

As to myself, I wish I could by actual service and hard work of my own respond to your zeal, as so many of my dear and excellent friends, the Professors of the University, have done and do. They have a merit, they have a claim on you, Gentlemen, in which I have no part. If I admire the energy and bravery with which you have undertaken the work of self-improvement, be sure I do not forget their public spirit and noble free devotion to the University any more than you do. I know I should not satisfy you with any praise of this supplement of our academical arrangements which did not include those who give to it its life. It is a very pleasant and encouraging sight to see both parties, the teachers and the taught, co-operating with a pure *esprit-de-corps* thus voluntarily,—they as fully as you can do—for a great object; and I offer up my earnest prayers to the Author of all good, that He will ever bestow on you all, on Professors and on Students, as I feel sure He will bestow, Rulers and Superiors, who, by their zeal and diligence in their own place, shall prove themselves worthy both of your cause and of yourselves.

至于我自己，但愿能通过实际的服务和艰苦努力回应各位的热情，就像我那么多可爱和优秀的朋友们——这所大学的教授们——一直和正在做的那样。各位，他们有一个我没有的优点，他们有权对你们提出要求。假如我赞赏你们自我提高的这种能量和勇气，请相信，我跟你们一样不会忘记他们的公益精神和对这所大学高尚的无私奉献。我知道，如果不赞扬给我们这一额外学术安排赋予生命的人，你们是不会满意的。看到教师和学生双方自发地本着这种纯粹的团体精神为一个伟大目标而彼此合作，真是一件让人让人愉快且深受鼓舞的事情。我真诚地向主祈祷，祈祷（我相信他也一定会保佑）你们一切都好，保佑位高权重的领导者也会在其岗位上发光发热，证明你们的事业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11_1].University Gazette, No. 42, p. 420.

[11_2].Vid. supr. p. 231.

[12_1].《学报》，第42期，第420页。

[12_2].参见上述第231页。

Lecture 10. Christianity and Medical Science. An Address to the Students of Medicine

第十讲：基督教与医学科学，对医学院学生的演

1．

1．

I have had so few opportunities, Gentlemen, of addressing you, and our present meeting is of so interesting and pleasing a character, by reason of the object which occasions it, that I am encouraged to speak freely to you, though I do not know you personally, on a subject which, as you may conceive, is often before my own mind: I mean, the exact relation in which your noble profession stands towards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itself and towards Catholicism generally. Considering my own most responsible office as Rector, my vocation as an ecclesiastic, and then again my years, which increase my present claim, and diminish my future chances, of speaking to you, I need make no apology, I am sure, for a step, which will be recommended to you by my good intentions, even though it deserves no consideration on the score of the ref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themselves which I shall bring before you. If indeed this University, and its Faculty of Medicine inclusively, were set up for the promotion of any merely secular object,—in the spirit of religious rivalry, as a measure of party politics, or as a commercial speculation,—then indeed I should be out of place, not only in addressing you in the tone of advice, but in being here at all; for

what reason could I in that case have had for having now given some of the most valuable years of my life to this University, for having placed it foremost in my thoughts and anxieties,—(I had well nigh said) to the prejudice of prior, dearer, and more sacred ties,—except that I felt that the highest and most special religious interests were bound up in its establishment and in its success? Suffer me, then, Gentlemen, if with these views and feelings I conform my observations to the sacred building in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and if I speak to you for a few minutes as if I were rather addressing you authoritatively from the pulpit than in the Rector's chair.

诸位，我向来少有机会跟你们讲话，但这一次的见面愉悦有趣，我受到这一机会的鼓励，想要和大家随便聊上两句。尽管我不认识大家，但你们应该想的到，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那就是你们这门高贵的职业与这所天主教大学本身，以及与一般意义上的天主教之间的相互关系。考虑到校长的巨大责任、我神职人员的职业和我的年龄——这让我更有资格进行这个讲话，但同时也意味着我未来和你们对话的机会可能比较少了——我认为无需感到抱歉，我相信我的话是出于良好的意图，尽管不能确定其在让你们反思和对你们提出建议上有多少价值。假如这所大学，以及医学院的建立，只为促进世俗利益——根据宗教竞争的精神、作为政党政治的手段、或作为一种商业投机手段，那么，的确，我就是一个处在不当位置的人了。这不仅指我以这种劝告的口气讲话不合适，还指我今天根本就不该到这里来。因为，假如是上述那种情况，而不是因为我觉得最高和最特别的宗教利益就包含在这所大学的建立及其成功运作上，我有什么理由把自己一辈子最有价值的年华奉献给这所大学，把它放在我的思考与忧虑的最重要位置，（不妨说）置更紧要、更宝贵和更神圣的事情于不顾呢？因此，各位，假如我在这个神圣的场所讲到我自己的观察，并更多地作为一个宗教上的权威人士而非校长跟大家说上几句，还请各位海涵。

Now I am going to set before you, in as few words as I can, what I conceive to be the principal duty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towards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 difficulties which are found in the observance of that duty: and in speaking on the subject I am conscious how little qualified I am to handle it in such a way as will come home to your minds, from that want of acquaintance with you personally, to which I have alluded, and from my necessary ignorance of the influences of whatever kind which actually surround you, and the points of detail which are likely to be your religious embarrassments. I can but lay down principles and maxims, which you must apply for yourselves, and which in some respects or cases you may feel have no true application at all.

接下来，我将用尽可能少的字眼，谈一谈在我的观念中，医学这一职业对宗教首要的义务，以及履行这一义务时遇到的一些困难。你们可能很快就会反应过来，我根本就没有资格这样谈起这个问题，因为就像我说的，我既不熟悉你们，完全不知道各位身边实际存在的有何种影响，也不知道大家在宗教问题上具体碰到过怎样的尴尬。我只能重申一些原则和准则，供大家具体应用到自己的情况中，虽然也许在一些情况下它们完全用不上。

2．

2．

All professions have their dangers, all general truths have their fallacies, all spheres of action have their limits, and are liable to

improper extension or alteration. Every professional man has rightly a zeal for his profession, and he would not do his duty towards it without that zeal. And that zeal soon becomes exclusive, or rather necessarily involves a sort of exclusiveness. A zealous professional man soon comes to think that his profession is all in all, and that the world would not go on without it. We have heard, for instance, a great deal lately in regard to the war in India, of *political* views suggesting one plan of campaign, and *military* views suggesting another. How hard it must be for the military man to forego his own strategical dispositions, not on the ground that they are not the best,—not that they are not acknowledged by those who nevertheless put them aside to be the best *for* the object of military success,—but because military success is not the highest of objects, and the end of ends,—because it is not the sovereign science, but must ever be subordinate to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or maxims of government, which is a higher science with higher objects,—and that therefore his sure success on the field must be relinquished because the interests of the council and the cabinet require the sacrifice, that the war must yield to the statesman's craft, the commander-in-chief to the governor-general. Yet what the soldier feels is natural, and what the statesman does is just. This collision, this desire on the part of every profession to be supreme,—this necessary, though reluctant, subordination of the one to the other, —is a process ever going on, ever acted out before our eyes. The civilian is in rivalry with the soldier, the soldier with the civilian. The diplomatist, the lawyer, the political economist, the merchant, each wishes to usurp the powers of the state, and to mould society upon the principles of his own pursuit.

所有职业都有自己的危险，所有的普遍真理都有自身的谬误，所有作用范围都存在局限，都容易发生不当延伸或变更。每一位职业人

士都有正当权利热心于自己的职业，缺乏这种热情，便谈不上恪尽职守。这样的热情就会变得专一，或者带上了一点排他性。很快，热心的职业人士会觉得，他那门职业是重中之重；少了它，世界便会停止运转。例如，最近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印度战争的事情。政治上有一个行动计划，军事上又有另一个行动计划。对于一位军人来说，要是他的战略部署不是最好的、他的计划没有得到认可、为了更有利于军事行动的成功而被弃置一边等原因，放弃自己作出的军事部署还情有可原；但要是因为军事成功不是最崇高的目的、不是一切的终点、不是至高无上的、而必须要屈从于政治考虑或政府的吩咐——相较之下政府和政治才更加崇高——要是为了政府的利益或者内阁要求作出牺牲、要是因为战争必须要屈从于政治家的权力斗争、总司令必须要屈从于总督，军人是很难让步的。但军人的感受是十分自然的，政治家所做的事情也是合理的。这样的冲突——每一位职业人士希望自己的职业处在最重要位置的欲望——这种一者对另一者不情不愿但实属必要的屈从，一直都在我们眼前发生。平民总在与军人竞争，军人也在与平民竞争。外交家、律师、政治经济学家、商人，大家都希望夺取国家权力，都希望根据自己所追求的原则来改造社会。

Nor do they confine themselves to the mere province of secular matters. They intrude into the province of Religion. In England, in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lawyers got hold of religion, and never have let it go. Abroad, bureaucracy keeps hold of Religion with a more or less firm grasp. The circles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 have in like manner before now made Religion a mere province of their universal empire.

他们不会将自己局限在纯粹的世俗事务里。他们也会侵入宗教领域。英格兰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律师控制了宗教，从此以后便不肯松手。在海外，官僚集团也严密地掌控了宗教。文学界和科学界以类似方式的加入，使宗教成为他们无所不包的帝国的一个方面。

I remark, moreover, that these various usurpations are frequently made in perfectly good faith. There is no intention of encroachment on the part of the encroachers. The commander recommends what with all his heart and soul he thinks best for his country when he presses on Government a certain plan of campaign. The political economist has the most honest intentions of improving the Christian system of social duty by his reforms. The statesman may have the best and most loyal dispositions towards the Holy See, at the time that he is urging changes in 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 which would be seriously detrimental to the Church.

我还要说，这些各式各样的侵权行为，本意往往是很好的。入侵者一方其实全无入侵之心。司令官催促政府采取某项行动计划时，他全心全意的推荐完全是因为他认为那是对祖国最好的。政治经济学家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善基督教的社会责任，其意图也是完全正直的。政治家敦促教会变革惩戒制度，尽管会对教会造成严重不利，却也是出自其对梵蒂冈最美好和最忠诚的心。

And now I will say how this applies to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nd what is its special danger, viewed in relation to Catholicity.

我现在要说，这一点是如何和医学联系起来的，以及从其与天主教的关系来看，医学职业会面临怎样的特别危险。

3．

3．

Its province is the physical nature of man, and its object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at physical nature in its proper state, and its restoration when it has lost it. It limits itself, by its very profession, to the health of the body; it ascertains the conditions of that health; it analyzes the causes of its interruption or failure; it seeks about for the means of cure. But, after all, bodily health is not the only end of man, and the medical science is not the highest science of which he is the subject. Man has a moral and a religious nature, as well as a physical. He has a mind and a soul; and the mind and soul have a legitimate sovereignty over the body, and the sciences relating to them have in consequence the precedence of those sciences which relate to the body. And as the soldier must yield to the statesman, when they come into collision with each other, so must the medical man to the priest; not that the medical man may not be enunciating what is absolutely certain, in a medical point of view, as the commander may be perfectly right in what he enunciates strategically, but that his action is suspended in the given case by the interests and duty of a superior science, and he retires not confuted but superseded.

医学的领域是人的自然属性，它的目标就是使自然属性保持在正常状态下，并在人体失去这种状态时予以恢复。医学的职业特性决定了它关注的是人的健康——清楚健康的状态是怎样的，并能够分析人体紊乱或失去健康的原因并努力寻找治疗方法。但是，身体的健康毕竟不是人的唯一目的，医学科学也不是以人为主题的最高学科。人除了自然属性之外，还有道德及宗教属性。人有思想和灵魂，思想和灵魂对肉体有合法的统治权，因此，这些部分相对应的学科要优先于与肉体有联系的学科。正如军人与政治家发生冲突时，前者必须让位于

后者，同样，从事医学的人必须让位于牧师。并不是说，从事医学的人就无法在医学的视角上解释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司令官在进行战略解释时也可能是绝对正确的；而是说，在既定的情况下，他的作用会被更高学科的利益和责任所取代，因此，他之所以退后，并非因为被驳倒，而是因为被取代。

Now this general principle thus stated, all will admit: who will deny that health must give way to duty? So far there is no perplexity: supposing a fever to break out in a certain place, and the medical practitioner said to a Sister of Charity who was visiting the sick there, “You will die to a certainty if you remain there,” and her ecclesiastical superiors on the contrary said, “You have devoted your life to such services, and there you must stay;” and supposing she stayed and was taken off; the medical adviser would be right, but who would say that the Religious Sister was wrong? She did not doubt his word, but she denied the importance of that word, compared with the word of her religious superiors. The medical man was right, yet he could not gain his point. He was right in what he said, he said what was true, yet he had to give way.

这一条总体的原则得到这样的解释后，所有人都会承认：谁会否认健康必须要给义务让路呢？到目前为止，还不存在任何让人困惑的地方。假定某地爆发热病，医生对正在当地探望病人的修女会修女说：“假如留在这里，您肯定会死。”而她的教会上司却反过来说：“您已为慈善事业奉献了一辈子，您得留在那里。”又假定她真的留了下来，然后去世，那么，提供医学建议的那位便是对的。但是，谁又能说修女会的那位修女就错了呢？她并不怀疑医生的话，她只是认为医生的话不重要，尤其是和她教会里上级的话比起来。那位医学人士的话是正确的，却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就他所说的话而言，他是对的，他说了实情，但是，他必须让步。

Here we are approaching what I conceive to be the especial temptation and danger to which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s exposed: it is a certain sophism of the intellect, founded on this maxim, implied, but not spoken or even recognized—“What is true is lawful.” Not so. Observe, here is the fallacy,—What is true in one science is dictated to us indeed according to that science, but not according to another science, or in another department. What is certain in the military art has force in the military art, but not in statesmanship; and if statesmanship be a higher department of action than war, and enjoins the contrary, it has no claim on our reception and obedience at all. And so what is true in medical science might in all cases be carried out, were man a mere animal or brute without a soul; but since he is a rational, responsible being, a thing may be ever so true in medicine, yet may be unlawful in fact, in consequence of the *higher* law of morals and religion having come to some different conclusion. Now I must be allowed some few words to express, or rather to suggest, more fully what I mean.

现在我们已经接近我认为医学界所面临的特别诱惑与危险是什么了：那就是一种才智的诡辩，尽管这种诡辩所基于的准则从来没有被明明白白地说出来甚至被肯定，但它的确在暗中起作用，这条准则就是“真实的才是合法的”。并非如此。请注意，这里面的谬误就在于：在一门学科里为真的东西，在那门学科里的确如此，但在其他学科或专业中就不一定了。在军事中是确定的东西，只在军事上有效，在国家治理上就并非如此了。如果国家治理是比战争更高的行动部门，却又发出相反的命令，那军事就无权要求我们接受，也不能要求我们遵照执行。因此，假如人是纯粹的动物或没有灵魂的野兽，那么，医学科学也许能在所有情况下得到遵守执行。可是，由于人是理性和有责任心的存在，在医学中万分真切的东西，在现实中却可能不合法，这是因为更高的道德和宗教法则得出了不同结论。现在，请大家容我多

说几句，好把刚才的意思说得更清楚，或不如说提出一些建议吧。

The whole universe comes from the good God. It is His creation; *it* is good; it is all good, as being the work of the Good, though good only in its degree, and not after His Infinite Perfection. The physical nature of man is good; nor can there be any thing sinful in itself in acting according to that nature. Every natural appetite or function is lawful, speaking abstractedly. No natural feeling or act is in itself sinful. There can be no doubt of all this; and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science can determine what is natural, what tends to the preservation of a healthy state of nature, and what on the contrary is injurious to nature. Thus the medical student has a vast field of knowledge spread out before him, true, because knowledge, and innocent, because true.

整个宇宙都源自至善的上帝。这宇宙是他的创造物，这宇宙是善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善的，因为它就是至善的作为。不过，它只是某个级别的善，不能与神无限的完美相提并论。人的自然本性是善，人若根据这一本性行事，就不会作出任何有罪的行为。抽象地说，每一种自然欲望或功能都是合法的。没有哪一种自然情感或行为本身是有罪的。这一切都无可怀疑。科学能确定什么是我们的本性，什么有利于保持这种本性的正常，什么又对这种本性是有害的。因此，医学院的学生面前有一个广阔的知识领域。其真实，是因为其是知识；其无害，是因为其真实。

So much in the abstract—but when we come to *fact* , it may easily happen that what is in itself innocent may not be innocent to this or that person, or in this or that mode or degree. Again, it may easily happen that the impressions made on a man's mind by his

own science may be indefinitely more vivid and operative than the enunciations of truths belonging to some other branch of knowledge, which strike indeed his ear, but do not come home to him, are not fixed in his memory, are not imprinted on his imagination. And in the profession before us, a medical student may realize far more powerfully and habitually that certain acts are *advisable in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physical nature, than the fact that they are forbidden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some higher science, as theology; or again, that they are accidentally wrong, as being, though lawful in themselves, wrong in this or that individual, or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抽象的部分到此为止。但在现实中，自身无害的东西，会对某些人，或以某种方式下，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另外，一个人从自己的学科那里获得的印象，可能比其他学科中清晰无比的真理要更加生动有效。其他学科的真理进入了他的耳朵，但却并不为他所理解，也没有被他记住，印在脑海中。就我们眼前的这个职业而言，医学院的学生也许能更明确和习惯性地意识到，根据自然本性的法则，某些行为本身更明智；尽管事实上，根据比如神学等更高学科的法则，这些行为却是被禁止的；或者某些行为出乎意外的是错的，因为尽管其本身是合法的，对某些人或在不同情形之下却可能是错误的。

Now to recur to the instance I have already given: it is supposable that that Sister of Charity, who, for the sake of her soul, would not obey the law of self-preservation as regards her body, might cause her medical adviser great irritation and disgust. His own particular profession might have so engrossed his mind, and the truth of its maxims have so penetrated it, that he could not understand or admit any other or any higher system. He might in process of time have become simply dead to all religious truths,

because such truths were not present to him, and those of his own science were ever present. And observe, his fault would be, not that of taking error for truth, for what he relied on was truth—but in not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 were other truths, and those higher than his own.

现在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例子。假设，修女会的那位修女为了自己的灵魂，违背了保持肉体健康的法则，结果可能让提出医学建议的那人十分恼怒和反感。他的头脑可能全部为自己那门特定职业所占据，而职业的教诲对他的影响如此之深，他无法明白或不愿承认，还存在其他体系或更高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许对所有宗教真理都毫无反应了，因为这些真理并不在他眼前，而他自己那门学科的真理却无时无刻摆在他眼前。请注意，他的错不在拿谬误当真理，因他依据的也是真理；他错在不明白还存在其他真理，高于自己职业的真理。

Take another case, in which there will often in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be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mong really religious men, but which does not cease on that account to illustrate the point I am insisting on. A patient is dying: the priest wishes to be introduced, lest he should die without due preparation: the medical man says that the thought of religion will disturb his mind and imperil his recovery. Now in the particular case, the one party or the other may be right in urging his own view of what ought to be done. I am merely directing attention to the *principle* involved in it. Here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wo great sciences, Religion and Medicine. Each says what is true in his own science, each will think he has a right to insist on seeing that the truth which he himself is maintaining is carried out in action; whereas, one of the two sciences is above the other, and the end of Religion is indefinitely

higher than the end of Medicine. And, however the decision ought to go, in the particular case, as to introducing the subject of religion or not, I think the priest ought to have that decision; just as a Governor-General, not a Commander-in-Chief, would have the ultimate decision, were politics and strategics to come into collision.

另举一例，在特定情形下，这个例子在真正的宗教人士中也会引起分歧，但就我们所说的这一点，这个例子同样能够说明我所坚持的观点。有个病人就快死了，牧师希望去看他，担心他没有合适准备就离世。但医生却说，宗教思想可能刺激此人的精神，从而危及其康复。在那个情况下，双方坚持自己的意见都是有道理的。我在此只不过是想让大家关注这其中涉及的原则。在这个例子中有两门伟大学科的代表：一是宗教，一是医学。两方都阐述了在他自己那门学科里正确的观点，双方都认为自己有权坚持己见，来保证他自己持护的真理付诸实施。可是，这两个学科中，有一个高于另外一个——宗教的目的是无限高于医学的目的。无论最终决定应当是什么，无论要不要让牧师去看病人，我认为做决定的都应该是牧师，正如政治和战略发生冲突时，做出最终决定的应当是总督而非总司令。

You will easily understand, Gentlemen, that I dare not pursue my subject into those details, which are of the greater importance for the very reason that they cannot be spoken of. A medical philosopher, who has so simply fixed his intellect on his own science as to have forgotten the existence of any other, will view man, who is the subject of his contemplation, as a being who has little more to do than to be born, to grow, to eat, to drink, to walk, to reproduce his kind, and to die. He sees him born as other animals are born; he sees life leave him, with all those phenomena of annihilation which accompany the death of a brute. He compares

his structure, his organs, his functions, with those of other animals, and his own range of science leads to the discovery of no facts which are sufficient to convince him that there is any difference in kind between the human animal and them. His practice, then, is according to his facts and his theory. Such a person will think himself free to give advice, and to insist upon rules, which are quite insufferable to any religious mind, and simply antagonistic to faith and morals. It is not, I repeat, that he says what is untrue, supposing that man were an animal and nothing else: but he thinks that whatever is true in his own science is at once lawful in practice—as if there were not a number of rival sciences in the great circle of philosophy, as if there were not a number of conflicting views and objects in human nature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reconciled, or as if it were his duty to forget all but his own; whereas

各位，大家很容易就会明白，我并不敢就这个话题谈得太细，但正因为此，其才更加重要。一位医学思想家为他自己这门学科倾注了全部才智，因而就忘记了还存在其他学科。他会觉得，作为其思考对象的人，不外就是生、长、吃、喝、行、繁殖与死亡这些事。他看人出生，就如同看到动物出生；他看到生命离人而去，和看到野兽死亡的情景没什么差别。他比较人和动物的结构、器官与功能，那些足以证明人和动物存在区别的事实，因为他自己学科范围的关系，他全都视而不见。因此，他的实践依据的是他看到的事实和他的理论。这样一个人，他会觉得自己可以随意提出意见并坚持自己的原则，但这在任何宗教思想看来都是无法忍受的，并且与信仰和道德背道而驰。我重复一次，并不是说他说的话不对——假设人果真只是一种动物而非别的任何东西；他错的地方在于，觉得在自己的学科里面正确的东西，在实践中马上也变得合法，就像在广大的思想界里再不存在其他竞争学科一样，就像许多涉及人性、相互冲突的观点和目的并不需要予以考虑和彼此协调，就像他有义务忘记除自己的学科以外的其他所

有学科。但是，

There are more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Horatio,

霍拉旭，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

Than are dreamt of in your philosophy.

是人类的哲学里所没有梦想到的呢。

I have known in England the most detestable advice given to young persons by eminent physicians, in consequence of this contracted view of man and his destinies. God forbid that I should measure the professional habits of Catholics by the rules of practice of those who were not! but it is plain that what is actually carried out where religion is not known, exists as a temptation and a danger in the Science of Medicine itself, where religion is known ever so well.

在英格兰，我曾听到一些著名医生基于这种对人及其命运的偏狭看法，为青年人提供了最可憎的建议。上帝绝不容许我拿这些非天主教徒的行为规范，当做天主教徒的职业习惯标准！但是，很明显，在没有信仰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在诱惑和威胁虔诚地信仰着宗教的地方。

4．

4．

And now, having suggested, as far as I dare, what I consider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radical sophism to which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s exposed, let me go on to say in what way it is corrected by the action of Catholicism upon it.

我之前斗胆跟大家提出了在我看来当前医学界那种激进诡辩的后果。现在，让我进而说一说，天主教能怎样纠正它。

You will observe, then, Gentlemen, that those higher sciences of which I have spoken, Morals and Religion, are not represented to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world by intimations and notices strong and obvious, such as those which are the foundation of Physical Science. The physical nature lies before us, patent to the sight, ready to the touch, appealing to the senses in so unequivocal a way that the science which is founded upon it is as real to us as the fact of our personal existence. But the phenomena, which are the basis of morals and Religion, have nothing of this luminous evidence. Instead of being obtruded upon our notice, so that we cannot possibly overlook them, they are the dictates either of Conscience or of Faith. They are faint shadows and tracings, certain indeed, but delicate, fragile, and almost evanescent, which the mind recognizes at one time, not at another,—discerns when it is calm, loses when it is in agitation. The reflection of sky and mountains in the lake is a proof that sky and mountains are around it, but the twilight, or the

mist, or the sudden storm hurries away the beautiful image, which leaves behind it no memorial of what it was. Something like this are the Moral Law and the informations of Faith, as they present themselves to individual minds. Who can deny the existence of Conscience? who does not feel the force of its injunctions? but how dim is the illumination in which it is invested, and how feeble its influence, compared with that evidence of sight and touch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Physical Science! How easily can we be talked out of our clearest views of duty! how does this or that moral precept crumble into nothing when we rudely handle it! how does the fear of sin pass off from us, as quickly as the glow of modesty dies away from the countenance! and then we say, "It is all superstition." However, after a time we look round, and then to our surprise we see, as before, the same law of duty, the same moral precepts, the same protests against sin, appearing over against us, in their old places, as if they never had been brushed away, like the divine handwriting upon the wall at the banquet. Then perhaps we approach them rudely, and inspect them irreverently, and accost them sceptically, and away they go again, like so many spectres,—shining in their cold beauty, but not presenting themselves bodily to us, for our inspection, so to say, of their hands and their feet. And thus these awful, supernatural, bright, majestic, delicate apparitions, much as we may in our hearts acknowledge their sovereignty, are no match as a foundation of Science for the hard, palpable, material facts which make up the province of Physics. Recurring to my original illustration, it is as if the India Commander-in-Chief, instead of being under the control of a local seat of government at Calcutta, were governed simply from London, or from the moon. In that case, he would be under a strong temptation to neglect the home government, which nevertheless in theory he acknowledged. Such, I say, is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mankind:—we depend upon a seat of government which is in

another world; we are directed and governed by intimations from above; we need a local government on earth.

各位可以看到，自然科学的基础是强烈而明显的暗示及现象，但我谈到过的那些较高的学科，比如道德及宗教，却并不是以这种方式成为人们的智慧的。自然本性就摆在我们眼前，看得到摸得到，每个人的感受也都是一致的，基于自然本性的科学因此在我们看来就如我们存在本身一样真实。但是，作为道德与宗教基础的那些现象，却没有这类清楚明白证据的支持。这些现象虽然并不会直接闯入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无法视而不见，却是良知或信仰的诫命。它们是些暗淡的影子和痕迹，确凿无疑，但不易发现、脆弱、转瞬既逝，心智此时可以认出，过一刻便看不到了。镇定的时候看得清楚，躁动起来便烟消云散。湖中的天空及山岚倒影，是附近有天空和山岚的证明。但是，黄昏、薄雾或突然骤雨却会使眼前美景突然消失，不留下一丝曾经存在的证据。这一类的东西便是道德法则和信仰的告知，因为它们只在个别人的脑海里呈现自身。谁能否认良知的存在呢？谁又能忽视良知发出的禁令的力量呢？可是，比起自然科学基础的视觉及触觉证据，良知的光照是何等昏暗，它的影响力又是何等微弱啊！我们多么容易被人哄骗，别人几句话就让我们忘记自己对义务最清楚的认知！当我们粗暴地对待道德准则时，它们多么容易就分崩离析！对于罪恶的恐惧多么容易就被抛之脑后，就如同质朴之光从我们的面容上消失一样！然后，我们就说："这一切全都是迷信。"但过不久之后，我们就会四处打探，然后我们会惊讶地看到，就像以前一样，同样的义务法则，同样的道德命令，对于罪恶同样的抗议，在我们眼前出现。它们还在原来的老地方，就好像盛筵墙上留下的神圣字迹一样，从未消失。之后，我们也许粗鲁地靠近它们，以不敬的态度审视它们，以怀疑的态度与它们搭讪，然后它们像幽灵一样再次消失。它们散发着冰冷的光芒，但却从不会现出真身，让我们检视它的手脚。因此，这些可敬、超验、明亮、庄严和精美的幻影，尽管我们在心里会承认它们的至尊地位，但作为科学的基础，它们却无法与构成自然科学的切实、可感和有形事实相比。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例子，就好像印

度的总司令并不在加尔各答当地政府的控制之下，反倒直接为伦敦或者月球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因极大诱惑而忽视祖国政府；但从理论上说，那的确也是他认可的政府。我要说，这就是人类的自然状态。我们依赖于处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政府。我们接受的指令和受到的管理来自上苍，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个在大地上的政府。

That great institution, then,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been set up by Divine Mercy, as a present, visible antagonist, and the only possible antagonist, to sight and sense. Conscience, reason, good feeling, the instincts of our moral nature, the traditions of Faith, the conclusions and deductions of philosophical Religion, are no match at all for the stubborn facts (for they *are* facts, though there are other facts besides them), for the facts, which are the foundation of physical, and in particular of medical, science. Gentlemen, if you feel, as you must feel, the whisper of a law of moral truth within you, and the impulse to believe, be sure there is nothing whatever on earth which can be the sufficient champion of these sovereign authorities of your soul, which can vindicate and preserve them to you, and make you loyal to them, but the Catholic Church. You fear they will go, you see with dismay that they are going, under the continual impression created on your mind by the details of the material science to which you have devoted your lives. It is so—I do not deny it; except under rare and happy circumstances, go they will, unless you have Catholicism to back you up in keeping faithful to them. The world is a rough antagonist of spiritual truth: sometimes with mailed hand, sometimes with pertinacious logic, sometimes with a storm of irresistible facts, it presses on against you. What it says is true perhaps as far as it goes, but it is not the whole truth, or the most important truth. These more important truths, which the natural heart admits in their substance, though it cannot maintain,—the being of a God, the certainty of future

retribution, the claims of the moral law, the reality of sin, the hope of supernatural help,—of these the Church is in matter of fact the undaunted and the only defender.

这个伟大的机构就是天主教会。神圣慈悲的主建立起来的教会，就是我们现在对视觉及感官有形也是唯一的对抗途径。良知、理性、愉悦的感受、道德本能、信仰的传统、哲理宗教的结论和推论，根本不是不可磨灭的事实的对手（因为它们都是事实，尽管除开这些事实之外还有其他事实），也完全无法对抗自然科学的基础。各位，假如你们感觉到（你们也一定会感觉到）内心里响起道德真理法则的细语并产生一种相信它们冲动，请确信，除了天主教会以外，这地上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守护你灵魂的至高权威、为你们维护和保存这样的权威、让你们对其保持忠诚。你们担心它们会离开，你们沮丧地看到，它们正在离开，这是因为你们为之奉献了生命的有形科学，正在你们头脑里形成连续不断的印象。的确如此，我不能否认这一点。除非是在罕见和幸运的情境中，否则它们一定会走开，因此我们需要天主教的支持，让我们保持对它们的忠诚。世界与精神上的真理针锋相对，它有时用利爪、有时用坚持不懈的逻辑、有时以确凿事实的风暴，不论何种方式，它总在不断地逼迫我们。有时候，这世界的真理在一定范围内的确是真理，但其并非全部的真理，或不是最重要的真理。更重要的真理，自然之心所接纳但无法维持的真理——上帝的存在、善恶有报、道德法则的主张、真实的罪恶、超自然帮助的可能——教会事实上是这些真理无畏和唯一的捍卫者。

Even those who do not look on her as divine must grant as much as this. I do not ask you for more here than to contemplate and recognize her as a fact,—as other things are facts. She has been eighteen hundred years in the world, and all that time she has been doing battle in the boldest, most obstinate way in the cause of the human race, in maintenance of the undeniable but comparatively

obscure truths of Religion. She is always alive, always on the alert, when any enemy whatever attacks them. She has brought them through a thousand perils. Sometimes preaching, sometimes pleading, sometimes arguing,—sometimes exposing her ministers to death, and sometimes though rarely, inflicting blows herself,—by peremptory deeds, by patient concessions,—she has fought on and fulfilled her trust. No wonder so many speak against her, for she deserves it; she has earned the hatred and obloquy of her opponents by her success in opposing them. Those even who speak against her in this day, own that she was of use in a former day. The historians in fashion with us just now, much as they may disown her in their own country, where she is an actual, present, unpleasant, inconvenient monitor, acknowledge that, in the middle ages which are gone, in her were lodged, by her were saved, the fortunes and the hopes of the human race. The very characteristics of her discipline, the very maxims of her policy, which they reprobate now, they perceive to have been of service then. They understand, and candidly avow, that once she was the patron of the arts, the home and sanctuary of letters, the basis of law, the principle of order and government, and the saviour of Christianity itself. They judge clearly enough in the case of others, though they are slow to see the fact in their own age and country; and, while they do not like to be regulated by her, and kept in order by her, themselves, they are very well satisfied that the populations of those former centuries should have been so ruled, and tamed, and taught by her resolute and wise teaching. And be sure of this, that as the generation now alive admits these benefits to have arisen from her presence in a state of society now gone by, so in turn, when the interests and passions of this day are passed away, will future generations ascribe to her a like special beneficial action upon this nineteenth century in which we live. For she is ever the same,—ever young and vigorous, and ever overcoming new errors with the

old weapons.

哪怕并不认为罗马教会神圣的人，也必须承认这一点。在这里，我只是希望大家在思考教会时，承认她是事实，就像其他事物一样。教会已经存在18多个世纪了，她一直在为人类的事业进行艰苦卓绝和顽强不屈的战斗，以维护宗教不可否认但相对模糊的真理。她总是充满活力，每当有任何敌人对她发动攻击时，她总是保持警醒。她带领人类挺过了上千次的危难。她时而布道，时而恳请，时而争辩，时而让自己的牧师面临死亡的考验，时而自我鞭笞——尽管这样的时候很少。她会颁布强制教令，会作出耐心的让步，她一直在战斗，她值得万民信任。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反对她。她压制了敌手，因而才招致他们的仇恨与漫骂。在今日，哪怕反对教会的人，也承认她曾经是起过巨大作用的。如今风行的一些历史学家，尽管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会否认教会——因为教会切实的监督让他们感到了不快和不便——也必须承认，在已经过去的中世纪，教会寄托并拯救了人类的命运。他们虽然如今对教会的自律和准则大加斥责，但也都承认其在当时用处极大。他们明白，也坦率地承认，教会曾是艺术的保护者、文学的家园和庇护所、法律的基础、秩序与治理的标准以及基督教自身的救星。这些人在别的事情上看得很清楚，却不明白自己的时代和国家。尽管他们不愿受教会约束，不希望因教会而遵守秩序，但他们却并不介意，以前几个世纪的人也是那样被管治、被驯化并接受教会那种果断而智慧的教育的。请一定要相信这一点，正如当前一代人所承认的，她能够带来益处的那种社会状态已经成为过去，但同样，当今日人们的兴趣与激情过去之后，未来的几代人是否也会将把我们19世纪类似和特别有益的影响归功于她？毕竟，她永远都是不变的，永远年轻，充满活力，总在以传统的武器修正新出现的谬误。

5．

5．

And now I have explained, Gentlemen, why it has been so highly expedient and desirable in a country like this to bring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 say “in a country like this”; for, if there be any country which deserves that Science should not run wild, like a planet broken loose from its celestial system, it is a country which can boast of such hereditary faith, of such a persevering confessorship, of such an accumulation of good works, of such a glorious name, as Ireland. Far be it from this country, far be it from the counsels of Divine Mercy, that it should grow in knowledge and not grow in religion! and Catholicism is the strength of Religion, as Science and System are the strength of Knowledge.

各位，我已经解释清楚了，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国家，将医学院引入天主教的荫庇之下是如此有利、如此令人渴望的一件事情。我说“在我们这个国家”，因为假如有哪个国家配得这份幸运，让科学不会像脱离星系的行星一样出岔子，这个国家一定是像爱尔兰这样有代代相传的信仰、坚持不懈的信仰自白，不断累积的善举和光荣的名声。仅有知识的增长而无宗教上的进步，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在这个国家，绝不会是神圣慈悲的主劝告的结果！宗教的力量就在于天主教义，正如知识的力量在于科学和体系。

Aspirations such as these are met, Gentlemen, I am well aware, by a responsive feeling in your own hearts; but by my putting them into words, thoughts which already exist within you are brought into livelier exercise, and sentiments which exist in many breasts hold intercommunion with each other. Gentlemen, it will be your

high office to be the links in your gener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Return thanks to the Author of all good that He has chosen you for this work. Trust the Church of God implicitly, even when your natural judgment would take a different course from hers, and would induce you to question her prudence or her correctness. Recollect what a hard task she has; how she is sure to be criticized and spoken against, whatever she does;—recollect how much she needs your loyal and tender devotion. Recollect, too, how long is the experience gained in eighteen hundred years, and what a right she has to claim your assent to principles which have had so extended and so triumphant a trial. Thank her that she has kept the faith safe for so many generations, and do your part in helping her to transmit it to generations after you.

各位，我非常清楚要实现诸如此类的抱负，你们一定要响应内心的声音。我今天的话，只不过是把早已存在你们内心的声音变为更鲜活的存在，让许多人心中共有的情感实现了交流共通。各位，在你们这一代人当中充当宗教与科学的联系人，这将是你们的重要职责。主选择你们从事这项工作，让我们把这份感激奉献给他吧。哪怕你们本能的判断力和教会背道而驰，并诱使你们质疑她是否审慎，是否正确，也要在内心里信赖上帝的教会。回想一下她承担的艰巨使命，回想一下她不管做什么都遭人批判谴责的命运。回想一下，她多么需要你们忠诚和年轻的奉献。还请回想一下，18个世纪能够积累多少经验，她又是多么有权要求你们认同那些在漫长时间里经历过考验的原则。谢谢她在这么多世纪里让信仰保持安全，你们应当尽力帮助她将这信仰传递至你们身后的世世代代。

For me, if it has been given me to have any share in so great a work, I shall rejoice with a joy, not such indeed as I should feel were I myself a native of this generous land, but with a joy of my

own, not the less pure, because I have exerted myself for that which concerns others more nearly than myself. I have had no other motive, as far as I know myself, than to attempt, according to my strength, some service to the cause of Religion, and to be the servant of those to whom as a nation the whole of Christendom is so deeply indebted; and though this University, and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which belongs to it, are as yet only in the commencement of their long career of usefulness, yet while I live, and (I trust) after life, it will ever be a theme of thankfulness for my heart and my lips, that I have been allowed to do even a little, and to witness so much, of the arduous, pleasant, and hopeful toil which has attended on their establishment.

至于我自己，我有机会参与如此伟大的一项事业，我应当感到万分开心。我的开心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就出生在这片慷慨国土，这份欢乐是属于我自己的、纯粹的快乐，是因为我为之施展我自己的事业，更多地是为了旁人而不是我自己。就我对自己的了解而言，我并无别的动机，只不过希望能尽一己之力，为宗教事业有所贡献，并成为这个伟大民族的仆人，因为整个基督教世界都亏欠这个民族如此之多。尽管这所大学及其下的医学院，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开始投入真正有用的服务，可是，只要我还在世，且在我过世以后（我坚信来世的存在），我在语言上和心中将永存感激，感激我有幸得允做了这一点微小的事情、见证了其建立过程中如此之多的艰辛却又令人愉快且充满希望的劳动。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Letters on the English

关于英吉利国的书信

Voltaire

伏尔泰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关于英吉利国的书信

Letters on the English

伏尔泰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Introductory Note 序言
- Letter I—On the Quakers 第一封信　谈贵格会信徒
- Letter II—On the Quakers 第二封信　谈贵格会信徒
- Letter III—On the Quakers 第三封信　谈贵格会信徒
- Letter IV—On the Quakers 第四封信　谈贵格会信徒
- Letter V—On the Church of England 第五封信　谈英格兰圣公会
- Letter VI—On the Presbyterians 第六封信　谈长老会信徒
- Letter VII—On the Socinians, or Arians, or Antitrinitarians　第七封信　谈索齐尼主义者或阿里乌主义者或反三位一体主义者
- Letter VIII—On the Parliament 第八封信　谈议会
- Letter IX—On the Government 第九封信　谈政府
- Letter X—On Trade 第十封信　谈商业
- Letter XI—On Inoculation 第十一封信　谈接种
- Letter XII—On the Lord Bacon 第十二封信　谈培根勋爵
- Letter XIII—On Mr. Locke 第十三封信　谈洛克先生
- Letter XIV—On Descartes and Sir Isaac Newton 第十四封信　谈笛卡尔和艾萨克·牛顿爵士
- Letter XV—On Attraction 第十五封信　谈引力
- Letter XVI—On Sir Isaac Newton's Optics 第十六封信　谈牛顿光学
- Letter XVII—On Infinites in Geometry, and Sir Isaac Newton's Chronology 第十七封信　谈无限与纪年
- Letter XVIII—On Tragedy 第十八封信　谈悲剧

- Letter XIX—On Comedy 第十九封信　谈喜剧
- Letter XX—On Such of the Nobility as Cultivate the Belles Letters 第二十封信　谈研究纯文学的贵族
- Letter XXI—On the Earl of Rochester and Mr. Waller 第二十一封信　谈罗切斯特伯爵和沃勒先生
- Letter XXII—On Mr. Pope and Some Other Famous Poets 第二十二封信　谈波普先生及其他几位著名诗人
- Letter XXIII—On the Regard That Ought to be Shown to Men of Letters 第二十三封信　谈文人应受的尊敬
- Letter XXIV—On the Royal Society and Other Academies 第二十四封信　谈皇家学会和其他学院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Introductory Note

序言

FRANÇOIS-MARIEAROUET, known by his assumed name of Voltaire, was born at Paris, November 21, 1694. His father was a well-to-do notary, and François was educated under the Jesuits in the Collège Louis-le-Grand. He began writing verse early, and was noted for his freedom of speech, a tendency which led to his being twice exiled from Paris and twice imprisoned in the Bastile. In 1726 he took refuge in England, and the two years spent there had great influence upon his later development. Some years after his return he became historiographer of France, and gentleman of the king's bedchamber; from 1750 to 1753 he lived at the court of Frederick the Great, with whom he ultimately quarreled; and he spent the last period of his life, from 1758 to 1778, on his estate of Ferney, near Geneva, where he produced much of his best work. He died at Paris, May 30, 1778.

伏尔泰于1694年11月21日出生在巴黎，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父亲是位法律公证人。伏尔泰家境富裕，曾就读于由耶稣会创办的路易大帝学校。从小他就展现出诗歌创作的才华，并以其不羁的言论备受关注。也正因此，他曾两度被逐出巴黎，两次被囚于巴士底狱。1726年，他辗转英国，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流亡生涯，此番经历对他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回国几年后，他被委任法兰西史官，并成为国王路易十五的侍臣。1750到1753年间，他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庇护下，任职柏林宫廷，但两人最终因起口角，不欢而散。1758年起，他在离日内瓦不远的费内庄园里定居，并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里，完成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部著作。1778年5月30日，他在巴黎

与世长辞。

It will be seen that Voltaire's active life covers nearly the whole eighteenth century, of which he was the dominant and typical literary figure. Every department of letters then in vogue was cultivated by him; in all he showed brilliant powers; and in several he reached all but the highest rank. Apart from his “Henriade,” an epic on the classical model, and the burlesque “La Pucelle,” most of his verse belongs to the class of satire, epigram, and vers de société. Of real poetical quality it has little, but abundant technical cleverness. For the stage he was the most prominent writer of the time, his most successful dramas including “Zaïre,” “Oedipe,” “La Mort de César,” “Alzire,” and “Merope.” His chief contribution in this field w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dactic and philosophic element. In prose fiction he wrote “Zadig,” “Candide,” and many admirable short stories; in history, his “Age of Louis XIV” is only the best known of four or five considerable works; in criticism, his commentary on Corneille is notable. His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 interests are to some extent indicated in the following “Letters,” which also show his admiration for the tolerance and freedom of speech in England, which it was his greatest service to strive to introduce into his own country.

纵观伏尔泰激越的一生，几乎见证了整个18世纪的更迭，他无疑是该时期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学人物。主流文学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他极大的影响。每一片文学天地，都闪耀着他出众的才华。在某些方面，他的造诣甚至已达登峰造极的境界。除了以维吉尔《埃涅阿斯记》为范本所作的史诗《亨利亚特》，以及诙谐史诗《奥尔良少女》之外，他的诗作多为讽刺诗、格言诗和讽刺社会陋习的幽默小诗。他的诗歌作品并不以诗意见长，而在于技法高超。他也是当时最

为杰出的剧作家，最成功的剧目包括《扎伊尔》、《俄狄浦斯王》、《恺撒之死》、《阿尔齐尔》和《墨洛珀》。他对这一领域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升了戏剧的教诲意义和哲理涵义。散文小说方面，代表作有《查第格》《老实人》，以及许多颇受欢迎的短篇故事。伏尔泰也曾写过四、五部历史巨著，其中《路易十四时代》最为人熟知。文学批评方面，为人称道的当数其对高乃依的评论。在你即将阅读的这些“信”中，洋溢着他对科学和哲学的兴趣；同样，你也能看出，他对英国的宽容精神以及对人人享有言论自由权利的赞美。这也正是他毕生孜孜以求，为自己的祖国所推动的事业。

Letter I—On the Quakers

第一封信　谈贵格会信徒

I WAS of opinion that the doctrine and history of so extraordinary a people were worthy the attention of the curious. To acquaint myself with them I made a visit to one of the most eminent Quakers in England, who, after having traded thirty years, had the wisdom to prescribe limits to his fortune and to his desires, and was settled in a little solitude not far from London. Being come into it, I perceived a small but regularly built house, vastly neat, but without the least pomp of furniture. The Quaker who owned it was a hale, ruddy complexioned old man, who had never been afflicted with sickness because he had always been insensible to passions, and a perfect stranger to intemperance. I never in my life saw a more noble or a more engaging aspect than his. He was dressed like those of his persuasion, in a plain coat without pleats in the sides, or buttons on the pockets and sleeves; and had on a beaver, the brims of which were horizontal like those of our clergy. He did not uncover himself when I appeared, and advanced towards me without once stooping his body; but there appeared more politeness in the open, humane air of his countenance, than in the custom of drawing one leg behind the other, and taking that from the head which is made to cover it. “Friend,” says he to me, “I perceive thou art a stranger, but if I can do any thing for thee, only tell me.” “Sir,” said I to him, bending forwards and advancing, as is usual with us, one leg towards him, “I flatter myself that my just curiosity will not give you the least offense, and that you'll do me the honour to inform me of the particulars of your religion.” “The people of thy country,” replied the Quaker, “are too full of their bows and

compliments, but I never yet met with one of them who had so much curiosity as thy self. Come in, and let us first dine together." I still continued to make some very unreasonable ceremonies, it not being easy to disengage one's self at once from habits we have been long used to; and after taking part in a frugal meal, which began and ended with a prayer to God, I began to question my courteous host. I opened with that which good Catholics have more than once made to Huguenots. "My dear sir," said I, "were you ever baptized?" "I never was," replied the Quaker, "nor any of my brethren." "Zounds!" said I to him, "you are not Christians, then." "Friend," replies the old man in a soft tone of voice, "swear not; we are Christians, and endeavour to be good Christians, but we are not of opinion that the sprinkling water on a child's head makes him a Christian." "Heavens!" said I, shocked at his impiety, "you have then forgot that Christ was baptised by St. John." "Friend," replies the mild Quaker once again, "swear not; Christ indeed was baptised by John, by He himself never baptised anyone. We are the disciples of Christ, not of John." I pitied very much the sincerity of my worthy Quaker, and was absolutely for forcing him to get himself christened. "Were that all," replied he very gravely, "we would submit cheerfully to baptism, purely in compliance with thy weakness, for we don't condemn any person who uses it; but then we think that those who profess a religion of so holy, so spiritual a nature as that of Christ, ought to abstain to the utmost of their power from the Jewish ceremonies." "O unaccountable!" said I: "what! baptism a Jewish ceremony?" "Yes, my friend," says he, "so truly Jewish, that a great many Jews use the baptism of John to this day. Look into ancient authors, and thou wilt find that John only revived this practice; and that it had been used by the Hebrews, long before his time, in like manner as the Mahometans imitated the Ishmaelites in their pilgrimages to Mecca. Jesus indeed submitted to the baptism of John, as He had suffered Himself to be

circumcised; but circumcision and the washing with water ought to be abolished by the baptism of Christ, that baptism of the Spirit, that ablution of the soul, which is the salvation of mankind. Thus the forerunner said, 'I indeed baptise you with water unto repentance; but He that cometh after me is mightier that I, whose shoes I am not worthy to bear: He shall baptise you with the Holy Ghost and with fire.' Likewise Paul, the great apostle of the Gentiles, writes as follows to the Corinthians, 'Christ sent me not to baptise, but to preach the Gospel;' and indeed Paul never baptised but two persons with water, and that very much against his inclinations. He circumcised his disciple Timothy, and the other disciples likewise all who were willing to submit to that carnal ordinance. “But art thou circumcised?” added he. “I have not the honour to be so,” said I. “Well, friend,” continued the Quaker, “thou art a Christian without being circumcised, and I am one without being baptised.” Thus did this pious man make a wrong, but very specious application of four or five texts of Scripture which seemed to favour the tenets of his sect; but at the same time forgot very sincerely a hundred texts which made directly against them. I had more sense than to contest with him, since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convincing an enthusiast. A man should never pretend to inform a lover of his mistress' faults, no more than one who is at law of the badness of his cause; nor attempt to win over a fanatic by strength of reasoning. Accordingly I waived the subject.

在我看来，贵格会信徒有其非凡之处，他们的教义和历史，值得求知之人去探究一番。为了深入地了解他们，我曾拜访了一位英国赫赫有名的贵格会信徒，他在经商三十年后，对财富和欲望已颇为知足，便在离伦敦不远的地方过起了隐居生活。当我来到他的住处，映入眼帘的是座小房子，但建造得十分规整。屋里虽然收拾得非常干净，却连件像样的摆设都没有。这位信徒是个精神矍铄、面色红润的

老人。他从没得过病，全因他无甚嗜好，也不曾有任何放纵行为。我平生从未见过比他更为高尚、更富魅力的人。同会里的其他信徒一样，他穿着一件两边没有褶裥的普通外套，衣袋和袖口上也没有纽扣。他头戴海狸帽，帽檐扁平，与我国的神职人员几无二致。当我进门时，他并未脱帽致意；走到我跟前，也不曾欠身施礼。要是按惯常的礼节，我们准会单腿退后一步，摘下头顶上戴的那玩意儿。但相比之下，他脸上那爽朗和悦的神情，反倒显得更有礼貌了。“朋友，”他对我说，“想必你定是从异邦来，若需帮忙，但说无妨。”“先生，”我照我们的习俗，躬身向前迈步，朝他单腿屈膝，说道：“但愿我仅有的好奇心，不会令您感到有点不快。如您愿意将贵教的情况详述于我，在下不胜荣幸。”他回答我说：“贵国百姓太爱躬身行礼，好说恭维话，但像你这般满心好奇者，我倒是不曾见。进来吧，先一同来吃饭。”这时，我又毫无道理地客气了一番，要知道旧习惯不是一下子改得了的。我们吃了顿便饭，前后都对主做了祷告。随后，我便与这位好客的主人攀谈起来。我先问他：“尊敬的先生，您曾受过洗礼吗？”——虔诚的天主教徒常常问胡格诺派信徒这个问题。“没有，且我同道弟兄也从不受洗礼。”这位信徒如实作答。“见鬼了！”我叫道，“那您并不是基督徒啊。”“朋友，”老人轻轻地对我说，“不要咒骂。我们皆为耶稣基督之信徒，且都要做善良的基督徒，但我们并不以为将水洒在孩童头上，就能使其成为基督徒。”“天哪”，我对他的忤逆之说大感惊讶，“难道您忘记基督是受了圣约翰的洗吗？”“朋友，”他再次用和善的语气答道，“不要咒骂。的确，基督曾受了约翰的洗，可他自己从未给任何人施洗礼。我们是耶稣基督之信徒，而非约翰之信徒。”他诚恳的态度不由让我心生怜悯，于是我极力劝服这位我仰慕的贵格会信徒受洗。他义正词严地说：“凡受洗的，我们并无谴责之意，若使为迁就你的偏好，必须如此，我们尽可乐而为之。但我们以为，那些如此虔诚又圣洁、完全笃信基督并视之为唯一的人，应竭力弃绝犹太教的礼仪。”“啊，胡说！”我叫了起来，“什么！施洗礼是犹太教的礼仪？”“正是，我的朋友，”他解释道，“那是地地道道的犹太教，时至今日，千千万万的犹太人仍沿用约翰的洗礼仪式。你且翻一下历史，必不难看出，早在约翰之前，希伯来人已有此种仪式，约翰仅是将其重新恢复罢了，就和穆罕默德的信徒仿效以实

玛利人前往麦加朝觐一样。耶稣确实甘愿受约翰的洗，如同他容许自己接受割礼。但行割礼与施洗礼应被基督的洗礼所废除，后者乃是灵之洗礼，魂之净化，人类灵魂之救赎。先知约翰曾这样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礼。’同样，伟大的外邦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时，也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礼，乃是为传福音。’保罗仅给两个人施过洗礼，且并非出自其本意。他为门徒圣提摩太行过割礼，其余门徒也都照做，甘愿顺服这种肉体仪式。”“你可曾受过割礼？”他补充说。“未曾有此荣幸。”我回答。“那么，朋友，”这位贵格会信徒继续说，“你乃未行割礼之基督徒，我乃未受洗礼之基督徒。”这位虔诚之徒竟如此似是而非地引述《圣经》中仿佛有利于其教派的几段话，却又执意忘记《圣经》中尚有百来段经文可以直接驳斥他。我并无意反驳，因为我深知，要想劝服一位宗教狂热者，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要假装对一个男人道出他情妇的缺点，也不该向一个告状之人指出他诉讼的弊端，对执迷不悟者讲道论理更是无济于事。因此，我转移了话题。

“Well”, said I to him, “what sort of a communion have you?” “We have none like that thou hintest at among us,” replied he. “How!no communion?” said I. “Only that spiritual one,” replied he, “of hearts.” He then began again to throw out his texts of Scripture; and preached a most eloquent sermon against that ordinance. He harangued in a tone as though he had been inspired, to prove that the sacraments were merely of human invention, and that the word “sacrament” was not once mentioned in the Gospel. “Excuse,” said he, “my ignorance, for I have not employed a hundredth part of the arguments which might be brought to prove the truth of our religion, but these thou thyself mayest peruse in the Exposition of our Faith written by Robert Barclay. It is one of the best pieces that ever was penned by man; and as our adversaries confess it to be of dangerous tendency, the arguments in it must necessarily be very

convincing." I promised to peruse this piece, and my Quaker imagined he had already made a convert of me. He afterwards gave me an account in few words of some singularities which make this sect the contempt of others. "Confess," said he, "that it was very difficult for thee to refrain from laughter, when I answered all thy civilities without uncovering my head, and at the same time said 'thee' and 'thou' to thee. However, thou appearest to me too well read not to know that in Christ's time no nation was so ridiculous as to put the plural number for the singular. Augustus Caesar himself was spoken to in such phrases as these: 'I love thee,' 'I beseech thee,' 'I thank thee;' but he did not allow any person to call him 'Domine,' sir. It was not till many ages after that men would have the word 'you,' as though they were double, instead of 'thou' employed in speaking to them; and usurped the flattering titles of lordship, of eminence, and of holiness, which mere worms bestow on other worms by assuring them that they are with a most profound respect, and an infamous falsehood, their most obedient humble servants. It is to secure ourselves more strongly from such a shameless traffic of lies and flattery, that we 'thee' and 'thou' a king with the same freedom as we do a beggar, and salute no person; we owing nothing to mankind but charity, and to the laws respect and obedience."

"那……，"我说，"你们领受什么样的圣餐呢？""和你不同，我们从不领圣餐。"他答道。"什么！不领圣餐？"我问。他如实说："那属灵的，只领在心里。"于是，他又一次引述《圣经》经文，滔滔不绝地向我说教一通，为自己反对领圣餐仪式进行辩护。他以一种像是受了感召般的音调，在那里高谈阔论，证明一切圣礼都是人为臆造的，甚至"圣礼"一词在福音书中也从未提及。"恕我无知"，他说，"我尚未尽百分之一的论据，以证明我们宗教信实。然而不少证据，你可在罗伯特·巴克利讲解有关我们信仰的著述中寻到。那是人类所著最好的作

品之一，连我们不同教派的敌手都承认有被其论证说服的危险，这证明此书中的论据必是极难被驳的。”我答应这位贵格会信徒，将去研读此书，他便以为我已皈依他的宗派了。然后他言辞简洁，将其教派的不同之处说给我听，对其他教派的藐视之意也尽释其中。他说：“本该是礼尚往来的，可我并没脱去帽子，甚至还‘你’来‘你’去地叫着你，这恐怕让你见笑了吧。然而，像你这样见多识广的人，不应不知道，在基督那个时代，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会把‘你’说成‘您’的。比如，与奥古斯都·恺撒交谈时，尽可以说‘我爱你’、‘我求你’、‘我谢你’，但他是绝不让人称其为‘上主’的。那是在千百年以后，人们才用‘您’代替‘你’来称呼对方，但两者是如出一辙的。非但如此，还冠之以伟大、卓越、神圣之类的尊号，就好像一群蚯蚓毕恭毕敬、不知廉耻地臣服于另一群蚯蚓之下，并誓言是其最顺从、最卑微的仆人。正是为使我们不要沦为满口谎言、一味奉承的无耻之徒，所以，无论君王或乞丐，我们都同样称呼‘你’，绝不向任何人致敬。凡事都不亏欠人，唯有彼此之爱；凡事都不亏欠律法，唯有敬从之行。”

“Our apparel is also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s, and this purely, that it may be a perpetual warning to us not to imitate them. Others wear the badges and marks of their several dignities, and we those of Christian humility. We fly from all assemblies of pleasure, from diversions of every kind, and from places where gaming is practised; and, indeed, our case would be very deplorable, should we fill with such levities as those I have mentioned the heart which ought to be the habitation of God. We never swear, not even in a court of justice, being of opinion that the most holy name of God ought not to be prostituted in the miserable contests betwixt man and man. When we are obliged to appear before a magistrate upon other people's account (for lawsuits are unknown among the Friends), we give evidence to the truth by sealing it with our yea or nay; and the judges believe us on our bare affirmation, whilst so many other Christians forswear themselves on

the holy Gospels. We never war or fight in any case; but it is not that we are afraid, for so far from shuddering at the thoughts of death, we on the contrary bless the moment which unites us with the Being of Beings; but the reason of our not using the outward sword is, that we are neither wolves, tigers, nor mastiffs, but men and Christians. Our God, who has commanded us to love our enemies, and to suffer without repining, would certainly not permit us to cross the seas, merely because murderers clothed in scarlet, and wearing caps two foot high, enlist citizens by a noise made with two little sticks on an ass' skin extended. And when, after a victory is gained, the whole city of London is illuminated; when the sky is in a blaze with fireworks, and a noise is heard in the air, of thanksgivings, of bells, of organs, and of the cannon, we groan in silence, and are deeply affected with sadness of spirit and brokenness of heart, for the sad havoc which is the occasion of those public rejoicings.”

“我们的着装也有些与众不同，这或许是永远叫我们不要同流合污的警告。别人居功自傲，而我们谨存基督徒的谦逊。我们弃绝一切娱乐消遣、赌博游艺。我们的心灵乃是神之居所，若满是此般轻薄种种，于我们必是可悲的。我们从不起誓，即便在庭堂之上，也是如此。因我们以为，神的圣洁之名，不应滥用在人间无谓的争执上。万不得已，要为别人的事出庭作证时（贵格会成员从不辞讼），我们只对真相答‘是’答‘否’，而法官对我们的确凿之言也深信不疑。要知道，许多别派的基督徒，虽手执圣洁的福音书，却尽说违心的话。我们从不征战，这绝非畏惧死亡——相反，我们赞美使世间万物团结在一起的那一刻。我们之所以不动干戈，是因为我们既非恶狼，又非猛虎，亦非烈犬；我们是人，我们是基督徒。神教导我们，要热爱我们的敌人，虽苦而犹不怨，故神必不许我们渡海杀敌。因为那杀人的，穿着血红衣服，戴着两尺高帽，手执两根木棒，在一块绷紧的驴皮上敲打，为的是征募平民。当战火平息，凯旋而归，整座伦敦城灯火辉

煌。焰火照亮天际，炮声响彻云霄，感恩声、撞钟声、风琴声纷纷从耳畔传来；而我们，面对欢庆背后的杀戮浩劫，灵魂为之悲恸，心也为之破碎，只得在静默中呻吟，深深战栗。”

Letter II—On the Quakers

第二封信　谈贵格会信徒

SUCH was the substance of the conversation I had with this very singular person; but I was greatly surprised to see him come the Sunday following and take me with him to the Quakers'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of these in London, but that which he carried me to stands near the famous pillar called The Monument. The brethren were already assembled at my entering it with my guide. There might be about four hundred men and three hundred women in the meeting. The women hid their faces behind their fans, and the men were covered with their broad-brimmed hats. All were seated, and the silence was universal. I passed through them, but did not perceive so much as one lift up his eyes to look at me. This silence lasted a quarter of an hour, when at last one of them rose up, took off his hat, and, after making a variety of wry faces and groaning in a most lamentable manner, he, partly from his nose and partly from his mouth, threw out a strange, confused jumble of words (borrowed, as he imagined, from the Gospel) which neither himself nor any of his hearers understood. When this distorter had ended his beautiful soliloquy, and that the stupid, but greatly edified, congregation were separated, I asked my friend how it was possible for the judicious part of their assembly to suffer such a babbling? “We are obliged,” said he, “to suffer it, because no one knows when a man rises up to hold forth whether he will be moved by the Spirit or by folly. In this doubt and uncertainty we listen patiently to everyone; we even allow our women to hold forth. Two or three of these are often inspired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and it is then that a most charming noise is heard in the Lord's house.”

“You have, then, no priests?” said I to him. “No, no, friend,” replies the Quaker, “to our great happiness.” Then opening one of the Friends' books, as he called it, he read the following words in an emphatic tone:—” 'God forbid we should presume to ordain anyone to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on the Lord's Day to the prejudice of the rest of the brethren.' Thanks to the Almighty, we are the only people upon earth that have no priests. Wouldst thou deprive us of so happy a distinction? Why should we abandon our babe to mercenary nurses, when we ourselves have milk enough for it? These mercenary creatures would soon domineer in our houses and destroy both the mother and the babe. God has said, 'Freely you have received, freely give.' Shall we, after these words, cheapen, as it were, the Gospel, sell the Holy Ghost, and make of an assembly of Christians a mere shop of traders? We don't pay a set of men clothed in black to assist our poor, to bury our dead, or to preach to the brethren; These offices are all of too tender a nature, for us ever to entrust them to others.” “But how it is possible for you,” said I, with some warmth, “to know whether your discourse is really inspired by the Almighty?” “Whosoever,” says he, “shall implore Christ to enlighten him, and shall publish the Gospel truths, he may feel inwardly, such a one may be assured that he is inspired by the Lord.” He then poured forth a numberless multitude of Scripture texts which proved, as he imagined,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Christianity without an immediate revelation, and added these remarkable words: “When thou movest one of thy limbs, is it moved by thy own power? Certainly not; for this limb is often sensible to involuntary motions. Consequently He who created thy body gives motion to this earthly tabernacle. And are the several ideas of which thy soul receives the impression formed by thyself? Much less are they, since these pour in upon thy mind whether thou wilt or no; consequently thou receivest thy ideas from Him who created thy soul. But as He leaves thy affections at full liberty, He gives thy

mind such ideas as thy affections may deserve; if thou livest in God, thou actest, thou thinkest in God. After this thou needest only but open thine eyes to that light which enlightens all mankind, and it is then thou wilt perceive the truth, and make others perceive it." "Why, this," said I, "is Malebranche's doctrine to a tittle." "I am acquainted with thy Malebranche," said he; "he had something of the Friend in him, but was not enough so." These are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iculars I learned concerning the doctrine of the Quakers. In my next letter I shall acquaint you with their history, which you will find more singular than their opinions.

以上这些便是我与此奇人谈话的大致内容；然而，让我颇感意外的是，接下来的礼拜日，他竟来找我，并带我去参加了贵格会信徒们的集会。他们在伦敦有好几处集会场所，而他带我去的这座教堂，位于那座闻名遐迩、被称为“纪念碑”的石柱附近。当我的向导带我进入会场时，信徒们已聚集一堂。在场的约有四百名男子和三百名妇女。妇女们都用扇子遮住了脸，男人们则戴着宽边帽子。大家都坐着，全场鸦雀无声。我从他们中间穿过，却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哪怕只是抬眼看看我也没有。这样的沉寂持续了一刻钟。终于，有个人站起身来，脱去帽子，摆出各种扭曲的表情，又万分悲切地叹息一番；随后，不知是从鼻子还是嘴里，吐出一些稀奇古怪、含混不清而又杂乱无章的词句（他自以为皆摘自福音书），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在场听众，都不知其意。这位丑态百出的演说者结束了他那美妙的独白之后，饱受教化的信徒们都呆头呆脑地各自散去。我便问我的朋友，他们中那些贤明之士为何也能忍受如此胡言乱语？“我们必须这么做，”他说，“要去忍受，因为当一个人站起来滔滔不绝之时，没人知道他是受了圣灵的点化，还是愚昧使然。在这种犹疑未决之下，我们耐心地聆听每个人的话；我们甚至允许妇女们发言。时常有两三位女信徒不约而同地受到感召，也正是在此刻，圣堂之中便会响起一阵最令人陶醉的喧哗。”“这么说，你们没有牧师？”我问他。“没有，朋友。没有。”这位信徒答道，“这是我们的福分。”他随即翻开了一本他

所谓的“教友之书”，带着强调的语气念出下面的话：“‘我们断不敢擅自授命任何人于主日接受圣灵，以免损害其余教众的权利。’感谢万能的神，世上仅我们是没有牧师的。这一分别对我们是有福的，你打算要我们丧失它吗？倘若我们自己的奶水足以喂养孩子，为何还要将他丢给花钱雇来的乳母呢？这些唯利是图的家伙很快就会在我们家里专横跋扈，母亲也好，孩子也罢，都将受到伤害。神说：‘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在这样的教诲下，难道我们还要贬低福音、出卖圣灵、把基督徒的集会变成一个商贾云集的铺子吗？我们是绝不会付钱给一群黑袍加身之辈，让其来扶贫葬逝、布道传教的。这些事皆应慈悲为怀，因而我们从不托付于他人。”“但是，”我有些激动地追问道，“你们又如何辨别你们的言语确实是受到万能的神的启示呢？”“无论是谁，”他说，“祈求基督用灵光照亮他，宣扬福音书传达的真理，他都会在内心有所感悟。主定能给这样的人以灵感。”随后，他接二连三地引述了一大堆经文，在他看来，这些可以证明，所有的基督教义都源自神的直接启示。接着，他又补充了下面这番值得注意的话：“当你让肢体移动时，是不是你本身的力量推动它的呢？当然不是。因为这肢体往往会有一些不由自主的动作。所以，正是那创造了你身体的人，赋予了这身尘世皮囊以动力。那么，那些融入你灵魂中的思想，是不是你自发创造的呢？更加不是。因为无论你愿意与否，它们都会在你的脑海涌现。所以，正是那创造了你灵魂的人，赋予了你这些思想。但他既然使你的情感享有充分自由，他就会赐予你情感应得的思想。你若活在神的灵光之中，那么，你的行为和思想都将受到神的感召。这样一来，只需睁开双眼看看那道照耀全人类的灵光，你就能感悟真理，同时也让他人有所感知。”“哎呀！”我叫道：“这根本就是马勒伯朗士神父主张的信条。”“我知道你所说的马勒伯朗士，”他说：“他是有点儿贵格会的色彩，但还不够多。”关于贵格会的教义，以上这些就是我了解的最重要的情况。在下一封信里，我将与你们谈谈贵格会的历史，你们会发现这比他们的教义更为奇特。

Letter III—On the Quakers

第三封信　谈贵格会信徒

YOU have already heard that the Quakers date from Christ, who, according to them, was the first Quaker. Religion, say these, was corrupted a little after His death, and remained in that state of corruption about sixteen hundred years. But there were always a few Quakers concealed in the world, who carefully preserved the sacred fire, which was extinguished in all but themselves, until at last this light spread itself in England in 1642.

相信你们已有所耳闻，贵格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基督诞生。照他们的说法，耶稣基督本人就是第一位贵格会信徒。这些人认为，耶稣死后，贵格会便略有式微，并在之后约一千六百年里一直处于这种衰颓状态。然而，总有那么些贵格会信徒，他们隐迹于世，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心中那团在别处已然熄灭的圣火。直到一六四二年，这圣火才终于得以在英格兰重放光芒。

It was at the time when Great Britain was torn to pieces by the intestine wars which three or four sects had raised in the name of God, that one George Fox, born in Leicestershire, and son to a silk weaver,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preach, and, as he pretended, with all the requisites of a true apostle—that is, without being able either to read or write. He was about twenty-five years of age, irreproachable in his life and conduct, and a holy madman. He was equipped in leather from head to foot, and travelled from one village to another, exclaiming against war and the clergy. Had his

invectives been levelled against the soldiery only he would have been safe enough, but he inveighed against ecclesiastics. Fox was seized at Derby, and being carried before a justice of peace, he did not once offer to pull off his leathern hat, upon which an officer gave him a great box of the ear, and cried to him, “Don't you know you are to appear uncovered before his worship?” Fox presented his other cheek to the officer, and begged him to give him another box for God's sake. The justice would have had him sworn before he asked him any questions. “Know, friend,” says Fox to him, “that I never swear.” The justice, observing he “thee'd” and “thou'd” him, sent him to the House of Correction, in Derby, with orders that he should be whipped there. Fox praised the Lord all the way he went to the House of Correction, where the justice's order was executed with the utmost severity. The men who whipped this enthusiast were greatly surprised to hear him beseech them to give him a few more lashes for the good of his soul. There was no need of entreating these people; the lashes were repeated, for which Fox thanked them very cordially, and began to preach. At first the spectators fell a-laughing, but they afterwards listened to him; and as enthusiasm is an epidemical distemper, many were persuaded, and those who scourged him became his first disciples. Being set at liberty, he ran up and down the country with a dozen proselytes at his heels, still declaiming against the clergy, and was whipped from time to time. Being one day set in the pillory, he harangued the crowd in so strong and moving a manner, that fifty of the auditors became his converts, and he won the rest so much in his favour that, his head being freed tumultuously from the hole where it was fastened, the populace went and searched for the Church of England clergyman who had been chiefly instrumental in bringing him to this punishment, and set him on the same pillory where Fox had stood.

那时候，三四个教派屡次以上帝之名挑起内战。正当大不列颠处于四分五裂之际，莱斯特郡出了个名叫乔治·福克斯的人。他是个丝织工人的儿子，却动起了传教的念头，还一心要以真正基督使徒的身份来讲道——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应当既不识字、也不会写。这位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品行端方，还是个狂热的教徒。他从头到脚一身皮装，游走于村庄之间，高声叫嚷着反对战争与牧师。倘若他只对参战士兵恶言相向，也不至于身处险境，但要命的是，他还对神职人员进行了猛烈抨击。不久，福克斯就在德比郡被捕。他被带到治安法官面前，可始终没有主动摘下头上的那顶皮帽，为此，一名长官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朝他吼道："难道你不知道在法官大人面前要脱帽吗？"然而，福克斯又将另外半边脸凑上前去，恳请那名长官看在上帝的份上，再给他一记耳光。审问之前，治安法官要求福克斯先起誓。福克斯回答道："朋友，'你'要知道，我从不起誓。"法官听到这人居然用"你"来称呼自己，便把他送进德比郡的感化院，并下令对他处以鞭刑。一路上，福克斯不停地在颂赞上帝。到了感化院，那里的人以最严格的方式执行了法官的命令。当这位狂热的教徒央求着再多抽几鞭子，好让自己的灵魂受益时，那班执行鞭刑的人都感到无比震惊。其实，这压根就无需乞求。福克斯后来又被抽了一顿，但他却为此千恩万谢，接着还开始给他们布道。起初，他们只是觉得好笑，但后来便静静聆听。宗教狂热犹如传染病一般，许多人都被他说服。于是，那些鞭打他的人成为了他的第一批信徒。获释以后，他带领十几名追随他的新信徒，奔走全国各地，继续宣扬反对牧师，当然也不时遭到鞭打。有一天，正受着枷刑的福克斯，在众人面前慷慨陈词。他那激情饱满的演说令在场的人无比动容，有五十位听众当即改变信仰，成为其信徒。同时，他还赢得了其余民众的大力支持：在一阵骚动中，人们把福克斯从枷锁中放了出来，又揪出了英格兰圣公会那位陷害他受罚的牧师，把原本折磨着福克斯的枷锁，套在了这罪魁祸首的脖子上。

Fox was bold enough to convert some of Oliver Cromwell's soldiers, who thereupon quitted the service and refused to take the

oaths. Oliver, having as great a contempt for a sect which would not allow its members to fight, as Sixtus Quintus had for another sect, Dove non sichiavava, [4_1] began to persecute these new converts. The prisons were crowded with them, but persecution seldom has any other effect than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roselytes. These came, therefore, from their confinement more strongly confirmed in the principles they had imbibed, and followed by their gaolers, whom they had brought over to their belief. But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contributed chiefly to the spreading of this sect were as follows:—Fox thought himself inspired, and consequently was of opinion that he must speak in a manner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of mankind. He thereupon began to writhe his body, to screw up his face, to hold in his breath, and to exhale it in a forcible manner, insomuch that the priestess of the Pythian god at Delphos could not have acted her part to better advantage. Inspiration soon became so habitual to him that he could scarce deliver himself in any other manner. This was the first gift he communicated to his disciples. These aped very sincerely their master's several grimaces, and shook in every limb the instant the fit of inspiration came upon them, whence they were called Quakers. The vulgar attempted to mimic them; they trembled, they spake through the nose, they quaked and fancied themselves inspired by the Holy Ghost. The only thing now wanting was a few miracles, and accordingly they wrought some.

福克斯甚至敢说服奥利弗·克伦威尔麾下的一些士兵改变信仰，他们为此退出军队，并拒绝起誓。正如教宗西克斯图斯五世对待甚不检点 [5_1] 的异教派一样，奥利弗对禁止成员征战的教派很是鄙夷，便开始大肆迫害这些新信徒。士兵们纷纷获罪入狱，然而迫害并未奏效，反而使改变信仰的追随者与日俱增。饱受牢狱之灾后，这些信徒更加坚定了本已渗入身心的种种信条。连那些看守他们的狱卒也被说服，

紧随其后皈依了他们的教派。然而，对这一教派的传播起到关键作用的却是下面这个情况：福克斯自觉受到神的启示，因而认为自己的说话方式必须有别于他人。于是，他说起话来，时而扭动身体，时而紧绷着脸，时而屏息无声，时而大喘粗气，即便是德尔菲神庙的女祭司皮媞娅在传达神谕时的模样，也难以与之相提并论。这种受到启示的说话方式很快就养成习惯，他几乎无法再用别的办法表达自己了。这便是他传授给信徒们的第一份恩赐。这些信徒极为虔诚地模仿着他们师傅那些古怪的举止，一旦获得感召就浑身颤抖，他们因此被称为“贵格会信徒”，意即“震颤者”。乡村百姓们也试着模仿他们：全身战栗、用鼻音说话，一边抖动身体，一边沉浸于受到圣灵启示的幻想之中。万事俱备，只欠神迹，于是他们便制造了一些迹象。

Fox, this modern patriarch, spoke thus to a justice of peace before a large assembly of people: “Friend, take care what thou dost; God will soon punish thee for persecuting His saints.” This magistrate, being one who besotted himself every day with bad beer and brandy, died of an apoplexy two days after, the moment he had signed a mittimus for imprisoning some Quakers. The sudden death with which this justice was seized was not ascribed to his intemperance, but was universally looked upon as the effect of the holy man's predictions; so that this accident made more converts to Quakerism than a thousand sermons and as many shaking fits could have done. Oliver, finding them increase daily, was desirous of bringing them over to his party, and for that purpose attempted to bribe them by money. However, they were incorruptible, which made him one day declared that this religion was the only one he had ever met with that had resisted the charms of gold.

福克斯，这位现代贵格会的创始者，当着一大群人的面，对一名治安法官如是说道：“朋友，‘你’要留心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久神就会

惩罚‘你’迫害圣徒的罪行。”这位治安法官本就嗜酒成性，又是劣质啤酒，又是白兰地，整日喝得酩酊大醉。两天后，就在他签署命令要把几名贵格会信徒送进监狱时，突然中风而亡了。人们并未把这位治安法官的猝死归结为酗酒所致，反而一致认为是圣人的预言显灵。因此，这场突发事件令更多人决心改变信仰，加入贵格会，其影响之大远甚于千百回的布道说教和一次次的浑身颤抖。克伦威尔看到贵格会信徒的人数与日俱增，就很想把他们招揽到自己手下效力。为此，他试图用钱财贿赂他们。然而，这些人是绝不会被收买的。终于有一天，克伦威尔感叹道，这是他所见过的唯一不为金钱所动的教派。

The Quakers were several times persecuted under Charles II.; not upon a religious account, but for refusing to pay the tithes, for “theeing” and “thouing” the magistrates, and for refusing to take the oaths enacted by the laws.

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贵格会信徒也曾屡遭迫害，但并非出于什么宗教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不仅拒绝缴纳什一税，又用“你”来称呼地方官，还拒绝依法起誓。

At last Robert Barclay, a native of Scotland, presented to the King, in 1675, his “Apology for the Quakers,” a work as well drawn up as the subject could possibly admit. The dedication to Charles II. is not filled with mean, flattering encomiums, but abounds with bold touches in favour of truth and with the wisest counsels. “Thou hast tasted,” said he to the King at the close of his epistle dedicatory, “of prosperity and adversity; thou knowest what it is to be banished thy native country; to be overruled as well as to rule and sit upon the throne; and, being oppressed, thou hast reason to know how hateful the oppressor is both to God and man. If, after all

these warnings and advertisements, thou dost not turn unto the Lord with all thy heart, but forget Him who remembered thee in thy distress, and give up thyself to follow lust and vanity, surely great will be thy condemnation.

最后，一位名叫罗伯特·巴克利的苏格兰人，于一六七五年写了一封“贵格会信徒辩护书”献给国王，这是一部被公认为尽善尽美的作品。这封呈给查理二世的书信绝非鄙俗的奉承之辞，而是大胆陈述实情，字里行间满是睿智的劝谏。在信的结尾，他对国王说：“你已知兴盛，也识苦难；既经历过号令天下的风光无限，亦饱尝了流亡放逐的屈辱痛苦。曾领教过压迫者淫威的你，就该明白上帝和人民对压迫者的憎恶之情。倘若此番劝谏，仍不能使您全心全意追随于主，反把在危难之中心系于你的祂抛于脑后，终日沉湎于骄奢淫逸之中，那么，你必将受到重罚。”

“Against which snare, as well as the temptation of those that may or do feed thee and prompt thee to evil, the most excellent and prevalent remedy will be, to apply thyself to that light of Christ which shineth in thy conscience, which neither can nor will flatter thee nor suffer thee to be at ease in thy sins, but doth and will deal plainly and faithfully with thee, as those that are followers thereof have plainly done. —Thy faithful friend and subject, Robert Barclay.”

“要想防范他人所设圈套，抵制诸多或可将你拖入厄运的诱惑，那就应当虔心感受你内心的基督圣光，这才是最佳补救之道。它既不曲意逢迎，也不容你执迷不悟在罪孽中受难，却定会如同你那些追随者一样，对你开诚布公、忠心耿耿。——你忠实的朋友和臣民，罗伯特·巴克利。”

A more surprising circumstance is, that this epistle, written by a private man of no figure, was so happy in its effects, as to put a stop to the persecution.

更让人意外而欣喜的是，这封由一位无名小卒写给国王的书信居然果真奏效，对贵格会信徒的迫害也至此终结。

[4_1]."Where there were no clandestine doings."

[5_1].（原文为意大利语）“从不行苟且之事（指通奸）。”

Letter IV—On the Quakers

第四封信　谈贵格会信徒

ABOUT this time arose the illustrious William Penn, who established the power of the Quakers in America, and would have made them appear venerable in the eyes of the Europeans, were it possible for mankind to respect virtue when revealed in a ridiculous light. He was the only son of Vice-Admiral Penn, favourite of the Duke of York, afterwards King James II.

大约在这个时期，赫赫有名的威廉·佩恩出世了，正是他奠定了贵格会在美洲的影响力。倘若欧洲人能对看似荒诞不经的美德予以尊重，那么他也同样能让贵格会在欧洲受人敬仰。他的父亲是海军中将佩恩爵士，曾是约克公爵——也就是后来的英王詹姆斯二世——的宠臣。威廉是他唯一的儿子。

William Penn, at twenty years of age, happening to meet with a Quaker [5_1] in Cork, whom he had known at Oxford, this man made a proselyte of him; and William being a sprightly youth, and naturally eloquent, having a winning aspect, and a very engaging carriage, he soon gained over some of his intimates. He carried matters so far, that he formed by insensible degrees a society of young Quakers, who met at his house; so that he was at the head of a sect when a little above twenty.

二十岁那年，威廉·佩恩在科克巧遇一位早在牛津大学就已熟识的

贵格会信徒 [6_1] ，并被他说服入会。当时，威廉是个颇为活跃的青年，天生雄辩好胜，举止富有魅力，很快便把一些密友也拉拢了过来。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不知不觉地，他就成立了一个由青年贵格会信徒组成的社团，并在他家里举行集会。于是，才刚二十岁出头的他，就已成为了这一教派的领袖。

Being returned, after his leaving Cork, to the Vice-Admiral his father, instead of falling upon his knees to ask his blessing, he went up to him with his hat on, and said, “Friend, I am very glad to see thee in good health.” The Vice-Admiral imagined his son to be crazy, but soon finding he was turned Quaker, he employed all the methods that prudence could suggest to engage him to behave and act like other people. The youth made no other answer to his father, than by exhorting him to turn Quaker also. At last his father confined himself to this single request, viz., “that he should wait upon the King and the Duke of York with his hat under his arm, and should not 'thee' and 'thou' them.” William answered, “that he could not do these things, for conscience' sake,” which exasperated his father to such a degree, that he turned him out of doors. Young Penn gave God thanks for permitting him so suffer to early in His cause, after which he went into the city, where he held forth, and made a great number of converts.

离开科克后，他便回到身任海军中将的父亲家里。见面后，他非但没有下跪请求赐福，反而连帽子都没脱下，就对父亲说道：“朋友，看你身体健康，我心里真高兴。”起初，这位海军中将以为自己的儿子疯了，但很快便发现，他原来已改信贵格会。于是，他便小心翼翼地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儿子的行为举止能和其他人一样。年轻的威廉对此并不理会，反而极力劝说他父亲也加入贵格会。最后，父亲只对他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在面见国王和约克公爵时，要把帽

子夹在臂弯里，不准用‘你’称呼他们。”然而，他却表示“良心不允许自己这样做”，这让父亲勃然大怒，最终把他逐出家门。看来上帝早早地就要让他在传教事业上经受磨难，年轻的威廉·佩恩对此心存感激。此后，他就进城讲道，并招揽了大批新信徒。

The Church of England clergy found their congregations dwindle away, daily; and Penn being young, handsome, and of a graceful stature, the court as well as the city ladies flocked very devoutly to his meeting. The patriarch, George Fox, hearing of his great reputation, came to London (though the journey was very long) purely to see and converse with him. Both resolved to go upon missions into foreign countries, and accordingly they embarked for Holland, after having left labourers sufficient to take care of the London vineyard.

圣公会的牧师们发现，他们的会众数量日渐减少。而年轻英俊、举止优雅的威廉·佩恩，则吸引了众多宫廷和城里的淑女小姐，她们都虔诚地赶来参加他的集会。贵格会的创立者乔治·福克斯，也慕名不远万里来到伦敦，只为和他见上一面，交谈一番。两人当下便决定要去国外传教，于是，他们留下足够的人手照看伦敦的葡萄园，随后便一同乘船前往荷兰。

Their labours were crowned with success in Amsterdam, but a circumstance which reflected the greatest honour on them, and at the same time put their humility to the greatest trial, was the reception they met with from Elizabeth, the Princess Palatine, aunt to George I. of Great Britain, a lady conspicuous for her genius and knowledge, and to whom Descartes had dedicated his Philosophical Romance.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努力大获成功。然而，使他们享有至高荣耀，同时也令谦逊之心经受最大考验的，当数帕拉坦公主、英王乔治一世的姑母伊丽莎白的接见了。这位女士才华出众、学识渊博，笛卡尔的《哲学原理》正是为她而作。

She was then retired to The Hague, where she received these Friends, for so the Quakers were at that time called in Holland. This princess had several conferences with them in her palace, and she at last entertained so favourable an opinion of Quakerism, that they confessed she was not far from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 Friends sowed likewise the good seed in Germany, but reaped very little fruit; for the mode of “theeing” and “thouing” was not approved of in a country where a man is perpetually obliged to employ the titles of “highness” and “excellency.” William Penn returned soon to England upon hearing of his father's sickness, in order to see him before he died. The Vice-Admiral was reconciled to his son, and though of a different persuasion, embraced him tenderly. William made a fruitless exhortation to his father not to receive the sacrament, but to die a Quaker, and the good old man entreated his son William to wear buttons on his sleeves, and a crape hatband in his beaver, but all to no purpose.

她那时正好退隐海牙，就在那儿接待了这两位“朋友”——当时在荷兰都这么称呼贵格会信徒。这位公主在自己的宫殿里和他们会谈了几次，最后她对贵格会教义大为赞同，以至于他们都坦言，她离天国已经不远。同样的，这两位“朋友”还将善意的种子播撒到德国，不过收效甚微。因为，在一个人们永远把“殿下”、“阁下”挂在嘴边的国度里，用“你”来称呼别人是行不通的。不久，威廉·佩恩接到父亲患病的消息，便立马回到英国，赶在父亲临终前见他最后一面。这位海军中

将最终和儿子重归于好，虽然信仰不同，但还是轻轻地拥抱了他。威廉极力劝说父亲不要接受圣礼，临终做个贵格会信徒。这位善良的老人则恳求儿子给衣袖钉上纽扣，给海狸皮帽缠上黑纱缎带。然而，双方都未能如愿。

William Penn inherited very large possessions, part of which consisted in Crown debts due to the Vice-Admiral for sums he had advanced for the sea service. No moneys were at that time more insecure than those owing from the king. Penn was obliged to go more than once, and “thee” and “thou” King Charles and his Ministers, in order to recover the debt, and at last, instead of specie, the Government, invested him with the right and sovereignty of a province of America, to the south of Maryland. Thus was a Quaker raised to sovereign power. Penn set sail for his new dominions with two ships freighted with Quakers, who followed his fortune. The country was then called Pennsylvania from William Penn, who there founded Philadelphia, now the most flourishing city in that country. The first step he took was to enter into an alliance with his American neighbours, and this is the only treaty between those people and the Christians that was not ratified by an oath, and was never infringed. The new sovereign was at the same time the legislator of Pennsylvania, and enacted very wise and prudent laws, none of which have ever been changed since his time. The first is, to injure no person upon a religious account, and to consider as brethren all those who believe in one God.

威廉·佩恩继承了大笔遗产，其中包括王室欠款，这是他父亲在海上征战期间垫付的资金。在那个年代，再没有什么比王室欠款更不可靠的了。为了追讨债务，他只好不止一次地去找英王查理和诸位大臣谈判，并用“你”来称呼他们。最终，政府同意把美洲马里兰殖民地以

南一个行省的产权和主权赋予他，以代替现金。就这样，一位贵格会信徒从此拥有了领地统治权。威廉·佩恩率领着两艘载满贵格会信徒的帆船，驶往新的领土，这些信徒们将随他命运与共。从那时起，人们便以威廉·佩恩的名字把那片土地命名为“宾夕法尼亚”。他在那里建立了费城，如今已是当地最为繁华的城市。自一开始，威廉就和他的美洲邻友结盟，这是印第安人与基督徒之间达成的唯一一项未经起誓生效、却从未受到侵犯的条约。这位宾夕法尼亚的新统治者，同时也身兼立法者，他制定了一系列开明而审慎的法律，且从他之后，没有一条再被修改过。法律的第一条便规定，不准以宗教名义伤害任何人，且将所有信奉上帝的人都视同手足。

He had no sooner settled his government, but several American merchants came and peopled this colony. The natives of the country, instead of flying into the woods, cultivated by insensible degrees a friendship with the peaceable Quakers. They loved these foreigners as much as they detested the other Christians who had conquered and laid waste America. In a little time a great number of these savages (falsely so called), charmed with the mild and gentle disposition of their neighbours, came in crowds to William Penn, and besought him to admit them into the number of his vassals. It was very rare and uncommon for a sovereign to be “thee'd” and “thou'd” by the meanest of his subjects, who never took their hats off when they came into his presence; and as singular for a Government to be without one priest in it, and for a people to be without arms, either offensive or defensive; for a body of citizens to be absolutely undistinguished but by the public employments, and for neighbours not to entertain the least jealousy one against the other.

他的政府才刚成立，就有不少美洲商人移居到这块殖民地来。当

地的印第安土著并没有因外人的到来而退避山林，反而不知不觉地和这些热爱和平的贵格会信徒成为了朋友。他们对于其他那些征服并破坏美洲的基督徒有多么憎恨，就有多么喜爱这些新来的贵格会信徒。不久之后，许多如此这般的野蛮人（这样称呼有失偏颇）被他们邻友那温文尔雅的性情所打动，成群结队地来找威廉·佩恩，恳请他接纳他们成为其子民。这里的情况颇为新奇而罕见：统治者在场时，即使是地位最低的民众，也不用脱帽致意，还可以用“你”来称呼他。同样特别的是：一个政府没有牧师；一个民族没有武器，既不求进攻、也不为防守；公民之间，除职业岗位有别以外，人人享有绝对平等；邻友之间从不怀有丝毫妒忌之心。

William Penn might glory in having brought down upon earth the so much boasted golden age, which in all probability never existed but in Pennsylvania. He returned to England to settle some affairs relating to his new dominions. After the death of King Charles II., King James, who had loved the father, indulged the same affection to the son, and no longer considered him as an obscure sectary, but as a very great man. The king's politics on this occasion agreed with his inclinations. He was desirous of pleasing the Quakers by annulling the laws made against Nonconformists, in order to have an opportunity, by this universal toleration, of establishing the Romish religion. All the sectarists in England saw the snare that was laid for them, but did not give into it; they never failing to unite when the Romish religion, their common enemy, is to be opposed. But Penn did not think himself bound in any manner to renounce his principles, merely to favour Protestants to whom he was odious, in opposition to a king who loved him. He had established a universal toleration with regard to conscience in America, and would not have it thought that he intended to destroy it in Europe, for which reason he adhered so inviolably to King James, that a report prevailed universally of his being a Jesuit. This

calumny affected him very strongly, and he was obliged to justify himself in print. However, the unfortunate King James II., in whom, as in most princes of the Stuart family, grandeur and weakness were equally blended, and who, like them, as much overdid some things as he was short in others, lost his kingdom in a manner that is hardly to be accounted for.

能给世界带来如此值得称道的黄金时代，威廉·佩恩或许该引以为荣，这是唯有在宾夕法尼亚才真正有过的黄金时代。后来他又回到英格兰，以处理一些和新领地有关的事务。查理二世死后，曾经宠信他父亲的詹姆斯二世，对于查理二世的这个儿子也同样喜爱有加，并且不再把他看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宗派教徒，而是将他视作一位伟大的人物。这一回，国王的政治主张和威廉·佩恩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渴望通过废除为反对不信奉国教者而订立的法律，来取悦贵格会信徒，以便能利用这种普遍自由，来谋求天主教在英格兰的地位。英格兰的各个教派都看出这其实是个圈套，因而并未上当。他们总能团结一致，反对天主教这个共同的宿敌。然而，威廉·佩恩觉得没有任何义务放弃自己的原则，更何况是为了迎合那些憎恶他的新教徒去反对宠爱他的国王。他曾经在美洲奠定了普遍的信仰自由，并不想让人觉得他要在欧洲摧毁它。正因如此，他竭力效忠詹姆斯二世，以至于流言四起，诬陷他是耶稣会会士。他深受诽谤之扰，不得不发表书面声明为自己辩护。可是，和众多斯图亚特王朝的王子们一样，不幸的詹姆斯二世，既伟大又弱小，行事不是太过火就是不到位，结果不知怎么地就丢掉了自己的王国。

All the English sectarists accepted from William III. and his Parliament the toleration and indulgence which they had refused when offered by King James. It was then the Quakers began to enjoy, by virtue of the laws, the several privileges they possess at this time. Penn having at last seen Quakerism firmly established in

his native country, went back to Pennsylvania. His own people and the Americans received him with tears of joy, as though he had been a father who was returned to visit his children. All the laws had been religiously observed in his absence, a circumstance in which no legislator had ever been happy but himself. After having resided some years in Pennsylvania he left it, but with great reluctance, in order to return to England, there to solicit some matters in favour of the commerce of Pennsylvania. But he never saw it again, he dying in Ruscombe, in Berkshire, in 1718.

英格兰各个教派的全体信徒在威廉三世和他的议会那里接受了宗教宽容与信仰自由，而这是他们曾经在詹姆斯二世时代所拒绝的。也正是从那时起，贵格会信徒开始依法享有几项他们在今天仍然拥有的特权。威廉·佩恩终于看到贵格会教义在自己的故乡稳固发展起来，便回到了宾夕法尼亚。他自己的子民和美洲当地人都热泪盈眶地来迎接他，仿佛他是一位回家看望孩子的父亲。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人们都虔诚地遵守着他先前制定的各项法律。对此，从没有一个立法者能像他这般感到欣慰。在宾夕法尼亚居住几年之后，他又离开了那里。但这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他得返回英格兰为宾夕法尼亚的商业发展谋求一些权益。可是，他从此再也没能回到宾夕法尼亚看一看。一七一八年，他在伯克郡的洛思康比与世长辞。

I am not able to guess what fate Quakerism may have in America, but I perceive it dwindles away daily in England. In all countries where liberty of conscience is allowed, the established religion will at last swallow up all the rest. Quakers are disqualified from being members of Parliament; nor can they enjoy any post or preferment, because an oath must always be taken on these occasions, and they never swear. They are therefore reduced to the necessity of subsisting upon traffic. Their children, whom the

industry of their parents has enriched, are desirous of enjoying honours, of wearing buttons and ruffles; and quite ashamed of being called Quakers they become converts to the Church of England, merely to be in the fashion.

我无法猜测贵格会在美洲的命运如何，但我察觉出它在英格兰正日渐没落。在任何允许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度，即已设立的国教最终都会吞并一切其他的教派。贵格会信徒既没有资格成为议会的议员，也不能担任任何职务，或获得晋升机会，因为做这些事都需要起誓，而他们则从不会这么做。因此，他们最终沦落到需要靠经商维持生计的地步。他们的后代依靠长辈创下的基业变得富足，却贪图荣耀，渴望穿戴纽扣和褶饰。他们甚至羞于被称为“贵格会信徒”，还改变信仰加入了英格兰圣公会，仅仅是为了赶时髦。

[5_1].Thomas Loe.

[6_1].托马斯·洛（一位四处游历的传教士）。

Letter V—On the Church of England

第五封信　谈英格兰圣公会

ENGLAND is properly the country of sectarists. *Multaesuntmansiones in domo patrismei* (in my Father's house are many mansions). An Englishman, as one to whom liberty is natural, may go to heaven his own way.

可以说，英格兰是一个教派林立的国度。“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对一个英格兰人而言，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他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去往天堂。

Nevertheless, though every one is permitted to serve God in whatever mode or fashion he thinks proper, yet their true religion, that in which a man makes his fortune, is the sect of Episcopalians or Churchmen, called the Church of England, or simply the Church, by way of eminence. No person can possess an employment either in England or Ireland unless he be ranked among the faithful, that is, professes himself a membe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This reason (which carries mathematical evidence with it) has converted such numbers of Dissenters of all persuasions, that not a twentieth part of the nation is out of the pale of the Established Church. The English clergy have retained a great number of the Romish ceremonies, and especially that of receiving, with a most scrupulous attention, their tithes. They also have the pious ambition to aim at superiority.

然而，虽说人人都能以自认为合适的方式侍奉上帝，但他们正统的宗教——可以使人财运亨通的那个信仰所在，却是一个主教制或牧师制教派，名为“英格兰圣公会”，亦可简称“国教会”，以突显其地位显赫。无论是在英格兰还是爱尔兰，要想谋得一份职业，就必须跻身“虔诚者”之列，换言之，得让自己成为英格兰圣公会的一员。这个理由（有数据为证）促使大批非圣公会教徒改变信仰，以至全国只剩不及二十分之一的人口不在国教教区之内。英格兰的神职人员承袭了许多天主教的惯例，尤其是在征收什一税方面，简直是一丝不苟。同时，他们怀着虔诚的野心，企图掌控国家权力。

Moreover, they inspire very religiously their flock with a holy zeal against Dissenters of all denominations. This zeal was pretty violent under the Tories in the four last years of Queen Anne; but was productive of no greater mischief than the breaking the windows of some meeting-houses and the demolishing of a few of them. For religious rage ceased in England with the civil wars, and was no more under Queen Anne than the hollow noise of a sea whose billows still heaved, though so long after the storm when the Whigs and Tories laid waste their native country,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Guelphs and Ghibellines formerly did theirs.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both parties to call in religion on this occasion; the Tories declared for Episcopacy, and the Whigs, as some imagined, were for abolishing it; however, after these had got the upper hand, they contented themselves with only abridging it.

此外，他们还尽其所能地在其信徒中唤起一股神圣的宗教热情，以反对一切非圣公会教徒。安妮女王在位的最后四年里，正值托利党执政时期，这股热情近乎癫狂，但造成的危害并不大，不外乎是拆除几个异教派的集会场所，砸掉一些玻璃罢了。随着内战结束，英格兰的宗教狂热也至此告终。因而，到了安妮女王时代，这只不过是那场

狂风骤雨后长久未息的浪涛声，沉闷而无力。回首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那段暴风般的斗争时期，双方如同过去的归尔甫党（教宗党）和基伯林党（皇帝党）那样，把自己的祖国拖入了祸乱平生的境地。这种情况下，借助宗教力量对于两党而言都极为必要。托利党坚决拥护主教制；而辉格党则如人所料地主张取消主教制，但他们执政后，只是削弱了主教的地位，并满足于此。

At the time when the Earl of Oxford and the Lord Bolingbroke used to drink healths to the Tories, the Church of England considered these noblemen as the defenders of its holy privileges. The lower House of Convocation (kind of House of Commons) composed wholly of the clergy, was in some credit at that time; at least the members of it had the liberty to meet, to dispute on ecclesiastical matters, to sentence impious books from time to time to the flames, that is, books written against themselves. The Ministry which is now composed of Whigs does not so much as allow those gentlemen to assemble, so that they are at this time reduced (in the obscurity of their respective parishes) to the melancholy occupation of praying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Government whose tranquility they would willingly disturb. With regard to the bishops, who are twenty-six in all, they still have seats in the House of Lords in spite of the Whigs, because the ancient abuse of considering them as barons subsists to this day. There is a clause, however, in the oath which the Government requires from these gentlemen, that puts their Christian patience to a very great trial, viz., that they shall b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as by law established. There are few bishops, deans, or other dignitaries, but imagine they are so jure divino; it is consequently a great mortification to them to be obliged to confess that they owe their dignity to a pitiful law enacted by a set of profane laymen. A learned monk (Father Courayer) wrote a book lately to prove the

validity and succession of English ordinations. This book was forbid in France, but do you believe that the English Ministry were pleased with it? Far from it. Those damned Whigs don't care a straw whether the episcopal succession among them hath been interrupted or not, or whether Bishop Parker was consecrated (as it is pretended) in a tavern or a church; for these Whigs are much better pleased that the Bishops should derive their authority from the Parliament than from the Apostles. The Lord Bolingbroke observed that this notion of divine right would only make so many tyrants in lawn sleeves, but that the laws made so many citizens.

过去，牛津伯爵和博林布罗克勋爵经常为托利党人的健康而祝酒，于是在那段时间里，英格兰圣公会将这两位贵族视为其神圣特权的保护者。教会下议院（类似于议会下议院）全部由牧师组成，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威望。成员们至少可以自由集会、就教会事务进行自由辩论，时而还可焚烧渎神书籍，也就是那些矛头指向自己的著作。而现今的内阁由辉格党人组成，不但不允许那些先生们集会，还把他们束缚在（各自教区那些不起眼的）倒霉职位上，专为政府祈祷繁荣，其实他们内心倒希望这个政府不得安宁。至于主教，总共有二十六位。无论辉格党人赞成与否，他们都在议会上议院占有席位。因为时至今日，把灵职奉为贵族的古老陋习依然存在。然而，在政府要求这些灵职议员起誓的内容里，有一条誓词极大地考验了其作为基督徒的忍耐力，那就是必须依法成为英格兰圣公会信徒。几乎所有主教、教长及其他高级神职人员都自觉受命于神；所以，对他们而言，必须承认其尊贵来自一项可悲法律的恩赐，简直是莫大的屈辱，更何况制定法律的是一群平信徒。近来，一位博学的修士（库拉耶神父）写了一本书来证明英格兰圣职任命的合法性与传承性。这本书在法国禁止出版，但你认为英格兰政府就喜欢它吗？一点也不。那些该死的辉格党人根本不在乎主教的传承是否中断过，也不关心帕克主教是在酒馆里（如传说中那样）还是在教堂里被奉为圣贤。因为这些辉格党人更乐意看到主教的权利由议会授予，而非使徒。博林布罗克勋爵如是评论

道：神权思想只会造就大量披着主教外衣的暴君，而法律却能培养不少公民。

With regard to the morals of the English clergy, they are more regular than those of France, and for this reason. All the clergy (a very few excepted) are educated in the Universities of Oxford or Cambridge, far from the depravity and corruption which reign in the capital. They are not called to dignities till very late, at a time of life when men are sensible of no other passion but avarice, that is, when their ambition craves a supply. Employments are here bestowed both in the Church and the army, as a reward for long services; and we never see youngsters made bishops or colonels immediately upon their laying aside the academical gown; and besides most of the clergy are married. The stiff and awkward air contracted by them at the University, and the little familiarity the men of this country have with the ladies, commonly oblige a bishop to confine himself to, and rest contented with, his own. Clergymen sometimes take a glass at the tavern, custom giving them a sanction on this occasion; and if they fuddle themselves it is in a very serious manner, and without giving the least scandal.

在品行风纪方面，英格兰的神职人员要比法国的规矩得多，原因如下：所有的神职人员（极个别除外）都是牛津、剑桥大学出身，远离盛行于首都的腐化堕落风气。他们很晚才被招任圣职。人到了这个年龄已经很理智了，除了贪婪已没有了其他欲望，他们的野心也渴望得到满足。这些职位正是作为对他们在教会和军队多年来服务的回报。刚出校园的年轻人，从来就不会立马被任命为主教或上校。此外，大多数神职人员都是已婚人士。大学里养成的拘谨木讷的习气，加之该国男女间交往甚少，通常使一名主教不得不满意自己的妻子，并从一而终。神职人员有时也会在酒馆里喝上一杯，这是风俗所许可

的；即便喝得酩酊大醉，也做出严肃的风范，丝毫不会惹人非议。

That fable-mixed kind of mortal (not to be defined), who is neither of the clergy nor of the laity; in a word, the thing called Abbé in France; is a species quite unknown in England. All the clergy here are very much upon the reserve, and most of them pedants. When these are told that in France young fellows famous for their dissoluteness, and raised to the highest dignities of the Church by female intrigues, address the fair publicly in an amorous way, amuse themselves in writing tender love songs, entertain their friends very splendidly every night at their own houses, and after the banquet is ended withdraw to invoke the assistance of the Holy Ghost, and call themselves boldly the successors of the Apostles, they bless God for their being Protestants. But these are shameless heretics, who deserve to be blown hence through the flames to old Nick, as Rabelais says, and for this reason I don't trouble myself about them.

那种难以定义的神话般的人物——既非圣职，也非平信徒——也就是那些在法国被称为“神父”的人，在英格兰却是极为鲜见的。这里的所有神职人员都十分矜持，而且几乎都是些学究。而在法国，那些年轻的神职人员却是出了名地放荡：利用女人耍阴谋来获取教会高位，公开跟情人谈情说爱，写温柔恋歌来自娱自乐，每晚在家中款待狐朋狗友，宴会结束后还祈求圣灵保佑，并大胆地自诩为使徒的继承人。当英格兰的神职人员听说这些后，都感谢上帝，庆幸自己做了新教徒。不过，借用拉伯雷的话来说，那些浪荡子都是些无耻的异教徒，应该把他们葬身于撒旦的烈焰之中。因此，我绝不会管他们的闲事。

Letter VI—On the Presbyterians

第六封信　谈长老会信徒

THE CHURCH OF ENGLAND is confined almost to the kingdom whence it received its name, and to Ireland, for Presbyterianism is the established religion in Scotland. This Presbyterianism is directly the same with Calvinism, as it was established in France, and is now professed at Geneva. As the priests of this sect receive but very inconsiderable stipends from their churches, and consequently cannot emulate the splendid luxury of bishops, they exclaim very naturally against honours which they can never attain to. Figure to yourself the haughty Diogenes trampling under foot the pride of Plato. The Scotch Presbyterians are not very unlike that proud though tattered reasoner. Diogenes did not use Alexander half so impertinently as these treated King Charles II.; for when they took up arms in his cause in opposition to Oliver, who had deceived them, they forced that poor monarch to undergo the hearing of three or four sermons every day, would not suffer him to play, reduced him to a state of penitence and mortification, so that Charles soon grew sick of these pedants, and accordingly eloped from them with as much joy as a youth does from school.

英格兰圣公会承名于英格兰，其势力范围除爱尔兰外，也仅止于此；而在苏格兰，长老会才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教派。这种长老会的教政体制肇始于法国，而今在日内瓦城得到广泛信奉，与加尔文主义一脉相承。这个教派的牧师从教堂领到的薪俸少得可怜，绝不可能像主教们那样一生极尽奢华，因而他们自然便叫嚣着反对那些自己永远无法企及的荣耀。你想一想那妄自尊大的第欧根尼，甚至把柏拉图的骄

傲踩在脚下：苏格兰长老会的信徒绝不亚于那位衣衫褴褛却骄傲自负的理论家。他们对待国王查理二世的态度，要比第欧根尼对待亚历山大大帝粗鲁无礼得多：当这些人为帮助查理二世复辟而拿起武器反抗曾经欺骗过他们的克伦威尔时，不仅迫使那位可怜的君王每天接受三四次布道，还禁止他玩乐，使其陷入忏悔和屈辱之中。所以，查理很快便对这些学究产生厌恶，从他们手中溜了出来，欣喜之情犹如学生逃课一般。

A Church of England minister appears as another Cato in presence of a juvenile, sprightly French graduate, who bawls for a whole morning together in the divinity schools, and hums a song in chorus with ladies in the evening; but this Cato is a very spark when before a Scotch Presbyterian. The latter affects a serious gait, puts on a sour look, wears a vastly broad-brimmed hat and a long cloak over a very short coat, preaches through the nose, and gives the name of the whore of Babylon to all churches where the ministers are so fortunate as to enjoy an annual revenue of five or six thousand pounds, and where the people are weak enough to suffer this, and to give them the titles of my lord, your lordship, or your eminence.

年轻活泼的法国神学毕业生，每天清晨都会在神学院里与众人一同高声叫嚷，晚上又和女士们一起吟唱圣歌。相形之下，英格兰圣公会的牧师俨然是一个“加图”式的人物。然而，这样一个“加图”在苏格兰长老会信徒面前，却可谓小巫见大巫。长老会信徒往往佯装步态庄重，脸上表情乖戾，头戴硕大的宽沿帽子，身穿短衣长斗篷，哼着鼻音说教，还称一些教堂是“巴比伦妓女”——就因为那里的牧师相当幸运，每年能享有五六千英镑的收入，而且百姓们非常软弱，一边容忍着，一边还尊称其为“大人”、“主教大人”或者“阁下”。

These gentlemen, who have also some churches in England, introduced there the mode of grave and severe exhortations. To them is owing the sanctification of Sunday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ople are there forbidden to work or take any recreation on that day, in which the severity is twice as great as that of the Romish Church. No operas, plays, or concerts are allowed in London on Sundays, and even cards are so expressly forbidden that none but persons of quality, and those we call the genteel, play on that day; the rest of the nation go either to church, to the tavern, or to see their mistresses.

这些先生们在英格兰也有一些教堂，这种庄重严肃的布道模式也被推行到了那里。英伦三岛的礼拜日正是由他们创设的。那一天，人们不准工作或娱乐，禁令的严格程度堪比罗马天主教会的两倍。礼拜日那天，伦敦禁演任何歌剧、戏剧或音乐会；甚至连纸牌都被明令禁止，只有那些有身份的人以及我们所谓的上流人士才可以玩牌；国内其余的人要么在教堂，要么去酒馆，要么就是与情人幽会。

Though the Episcopal and Presbyterian sects are the two prevailing ones in Great Britain, yet all others are very welcome to come and settle in it, and live very sociably together, though most of their preachers hate one another almost as cordially as a Jansenist damns a Jesuit.

在大不列颠，虽然国教会和长老会是两个占统治地位的教派，但其他来此立足的教派也同样受到欢迎，并得以和睦共处。尽管各派传道者们大多对彼此心怀怨恨，正如詹森派信徒咒骂耶稣会会士那样愤懑不平，却倒也不失友善。

Take a view of the Royal Exchange in London, a place more venerable than many courts of justice, whe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ll nations meet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 There the Jew, the Mahometan, and the Christian transact together, as though they all professed the same religion, and give the name of infidel to none but bankrupts. There thee Presbyterian confides in the Anabaptist, and the Churchman depends on the Quaker's word. At the breaking up of this pacific and free assembly, some withdraw to the synagogue, and others to take a glass. This man goes and is baptized in a great tub,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that man has his son's foreskin cut off, whilst a set of Hebrew words (quite unintelligible to him) are mumbled over his child. Others retire to their churches, and there wait for the inspiration of heaven with their hats on, and all are satisfied.

看看伦敦的皇家交易所吧，这是比许多法院都更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在那里，各民族的代表们为了人类利益而聚集一堂。在那里，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相互开展交易，仿佛他们信奉着同一宗教似的，而异教徒的名号只送给那些破产的人。在那里，你们长老会信徒对再洗礼派信徒坚信无疑，国教会信徒有赖于贵格会信徒的承诺。当这平和而自由的集会解散之后，一些人便离开转赴犹太教堂，其他人则去喝上一杯。这个人以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在大盆里受洗礼；那个人为儿子举行割礼，牧师在他儿子头顶念念有词，说着一连串他听不懂的希伯来语。另一些人则回到他们的教堂，在那儿戴着帽子等待上帝的启示，所有人都心满意足。

If one religion only were allowed in England, the Government would very possibly become arbitrary; if there were but two, the people would cut one another's throats; but as there are such a multitude, they all live happy and in peace.

要是在英格兰只允许信奉一种宗教，那么政府很有可能变得专制；要是只有两种，教派之间大概会斗得你死我活；而现在，那里的教派是如此之多，因而他们都能愉快而和平地相处。

Letter VII—On the Socinians, or Arians, or Antitrinitarians

第七封信　谈索齐尼主义者或阿里乌主义者或反三位一体主义者

THERE is a little sect here composed of clergymen, and of a few very learned person among the laity, who, though they don't call themselves Arians or Socinians, do yet dissent entirely from St. Athanasius with regard to their notions of the Trinity, and declare very frankly that the Father is greater than the Son.

这里有个由神职人员和少数博学之士组成的小教派。他们既不自称阿里乌主义者，也不自称索齐尼主义者，却在“三位一体”这一问题上与圣亚他那修的看法完全不同，还明确宣称圣父比圣子更伟大。

Do you remember what is related of a certain orthodox bishop, who in order to convince an emperor of the reality of consubstantiation, put his hand under the chin of the monarch's son, and took him by the nose in presence of his sacred majesty? The emperor was going to order his attendants to throw the bishop out of the window, when the good old man gave him this handsome and convincing reason: “Since your majesty,” said he, “is angry when your son has not due respect shown him, what punishment do you think will God the Father inflict on those who refuse His Son Jesus the titles due to Him?” The persons I just now mentioned declare that the holy bishop took a very wrong step, that his argument was inconclusive, and that the emperor should have answered him thus: “Know that there are two ways by which men may be wanting in respect to me—first, in not doing honour

sufficient to my son; and, secondly, in paying him the same honour as to me.”

你可记得有那么一位东正教牧首吗？为了使一个君王相信圣体共在论的真实性，他竟然当着神圣君王的面，摸摸王子的下巴，捏捏王子的鼻子。君王正要令其侍从将牧首扔出窗外，这位和善的老人给出了如下绝妙而令人信服的辩词：“陛下”，他说道，“既然您会因为自己的儿子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勃然大怒，那么您认为，如果人们拒绝给予圣子耶稣应有的尊称，圣父上帝会如何惩罚他们呢？”我上文提及的那些人认为，这位神圣的牧首犯了大错，他的论据模棱两可，那位君王尽可以这样回答：“要知道，对我不敬有两种方式，一是对我的儿子不够尊敬，二是对我和我的儿子同等尊敬。”

Be this as it will, the principles of Arius begin to revive, not only in England, but in Holland and Poland. The celebrated Sir Isaac Newton honoured this opinion so far as to countenance it. This philosopher thought that the Unitarians argued more mathematically than we do. But the most sanguine stickler for Arianism is the illustrious Dr. Clark. This man is rigidly virtuous, and of a mild disposition, is more fond of his tenets than desirous of propagating them, and absorbed so entirely in problems and calculations that he is a mere reasoning machine.

不管怎样，阿里乌派的教义不仅在英格兰，也在荷兰和波兰开始复兴起来。伟大的艾萨克·牛顿爵士就十分尊重甚至赞同他们的观点。这位哲学家认为，神体一位论者的推论比我们的更加合乎逻辑。不过，阿里乌主义最为乐观的信奉者当属声名显赫的克拉克博士。这位先生德行严谨，性情温和，笃守自己的信条，而不急于将其四处宣扬。他始终潜心于研究问题和推演计算，简直是一部推理机器。

It is he who wrote a book which is much esteemed and little understood, on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another, more intelligible, but pretty much contemned, on the truth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He never engaged in scholastic disputes, which our friend calls venerable trifles. He only published a work containing all the testimonies of the primitive ages for and against the Unitarians, and leaves to the reader the counting of the voices and the liberty of forming a judgment. This book won the doctor a great number of partisans, and lost him the See of Canterbury but, in my humble opinion, he was out in his calculation, and had better have been Primate of all England than merely an Arian parson.

正是他写了一本关于上帝存在论的书，大受推崇却鲜有人懂。他还著有另一本关于基督教真理的书，更易读懂却备受轻视。他从不卷入学术纷争——我们的朋友称之为“可敬的废话”。他仅仅出版了一部著作，收录了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支持和反对“神体一位”学说的所有证据，让读者自己去权衡各种观点，从而作出判断。这本书为克拉克博士赢得了大量拥护者，但也使他错失坎特伯雷圣座之位。但依我拙见，这回他可打错了算盘，与其做阿里乌派的牧师，倒不如成为整个英格兰的首席主教。

You see that opinions are subject to revolutions as well as empires. Arianism, after having triumphed during three centuries, and been forgot twelve, rises at last out of its own ashes; but it has chosen a very improper season to make its appearance in, the present age being quite cloyed with disputes and sects. The members of this sect are, besides, too few to be indulged the liberty of holding public assemblies, which, however, they will, doubtless, be permitted to do in case they spread considerably. But people are

now so very cold with respect to all things of this kind, that there is little probability any new religion, or old one, that may be revived, will meet with favour. Is it not whimsical enough that Luther, Calvin, and Zuinglius, all of' em wretched authors, should have founded sects which are now spread over a great part of Europe, that Mahomet, though so ignorant, should have given a religion to Asia and Africa, and that Sir Isaac Newton, Dr. Clark, Mr. Locke, Mr. Le Clerc, etc., the greatest philosophers, as well as the ablest writers of their ages, should scarce have been able to raise a little flock, which even decreases daily.

你要知道，舆论不仅受制于革命，也受制于君权。在盛行了三个世纪、又被遗忘了十二个世纪之后，阿里乌派终于死灰复燃。无奈时机挑得不好，偏偏选择在如今这个充斥着不同争端和宗派的年代出现。此外，这个教派的成员实在太少，无法享有举行公众集会的自由。但倘若他们发展壮大起来，必定能获得这种自由。不过，如今人们对所有这类事情都非常冷漠，无论是新兴的宗教还是复兴的宗教，都少有机会受到青睐。像路德、加尔文、茨温利都是著作遭到抵制的可怜作家，他们创立的教派现今却遍及欧洲大部分地区；穆罕默德承传的宗教也成为亚非两洲的普遍信仰；然而，艾萨克·牛顿爵士、克拉克博士、洛克先生、勒·克莱先生等人，都是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最出色的作家，却只能勉强建立起一个小团体，人数还日趋减少，这一切难道不够奇怪吗？

This it is to be born at a proper period of time. Were Cardinal de Retz to return again into the world neither his eloquence nor his intrigues would draw together ten women in Paris. Were Oliver Cromwell, he who beheaded his sovereign, and seized upon the kingly dignity, to rise from the dead, he would be a wealthy City trader, and no more.

这就是所谓的要“生逢其时”啊！如果红衣主教雷兹德·雷兹枢机重回现世，即便他再怎么能说会道、足智多谋，在巴黎恐怕连十个妇女都难以聚集起来。如果弑君夺权的奥利弗·克伦威尔死而复生，恐怕也只是个富有的城市商人，仅此而已。

Letter VIII—On the Parliament

第八封信　谈议会

THE MEMBERS of the English Parliament are fond of comparing themselves to the old Romans.

英国议会的议员们常喜欢把自己比作古罗马人。

Not long since Mr. Shippen opened a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with these words, “The majesty of the people of England would be wounded.” The singularity of the expression occasioned a loud laugh; but this gentleman, so far from being disconcerted, repeated the same words with a resolute tone of voice, and the laugh ceased. In my opinion, the majesty of the people of England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that of the people of Rome, much less is there any affinity between their Governments. There is in London a senate, some of the members whereof are accused (doubtless very unjustly) of selling their voices on certain occasions, as was done in Rome; this is the only resemblance. Besides, the two nations appear to me quite opposite in character, with regard both to good and evil. The Romans never knew the dreadful folly of religious wars, an abomination reserved for devout preachers of patience and humility. Marious and Sylla, Caesar and Pompey, Anthony and Augustus, did not draw their swords and set the world in a blaze merel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flamen should wear his shirt over his robe, or his robe over his shirt, or whether the sacred chickens should eat and drink, or eat only, in order to take the augury. The

English have hanged one another by law, and cut one another to pieces in pitched battles, for quarrels of as trifling nature. The sects of the Episcopalians and Presbyterians quite distracted these very serious heads for a time. But I fancy they will hardly ever be so silly again, they seeming to be grown wiser at their own expense; and I do not perceive the least inclination in them to murder one another merely about syllogisms, as some zealots among them once did.

不久前，希彭先生在下议院发表演讲，一开场就如是说道："英国人民的尊严将会受到损害"。这一古怪的措辞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可这位绅士非但没有仓皇失措，反而语气坚定地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笑声才就此止住。在我看来，英国人民的尊严和古罗马人民的尊严毫无共同之处，要说两个政府之间有何关联，就更无从谈起。伦敦上议院的若干议员被指控在某些场合出卖自己的表决权（也许是错怪他们了），这样的事在古罗马也发生过，这恐怕就是两者仅有的相同点。除此之外，在我眼里，这两个国家在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简直截然不同。古罗马从来就没有那些可怕而荒唐的宗教战争，但这可恶的事情却偏偏发生在既谦逊又耐心的虔诚传道者身上。祭司应该把衬衣穿在长袍外面，还是把长袍套在衬衣外面？占卜时，拿来献祭的雏鸡应该喂食喂水，还是只喂食不喂水？马略和西拉、恺撒和庞培、安东尼和奥古斯都并没有因为这些区区琐事而自相残杀，把世界置于战火之中。反倒是英国人仅仅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争执，便以法律的名义绞死了一个又一个同伴，还在激战中自相残杀。国教会和长老会之间的教派矛盾，也曾一度把正襟危坐的大人物们搅得心烦意乱。不过，我想这类蠢事不会再发生了。他们似乎已经接受教训，变得更加明智。我看他们丝毫不像之前某些狂热者那样，会仅仅为了几个三段论式的争辩而杀死对方。

But here follows a mor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Rome and England, which gives the advantage entirely to the later—viz., that

the civil wars of Rome ended in slavery, and those of the English in liberty. The English are the only people upon earth who have been able to prescribe limits to the power of kings by resisting them; and who, by a series of struggles, have at last established that wise Government where the Prince is all powerful to do good, and, at the same time, is restrained from committing evil; where the nobles are great without insolence, though there are no vassals; and where the people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without confusion.

接下来要谈的是古罗马和英国之间更为本质的区别，这一点让英国占有绝对优势，即：古罗马的内战均以奴隶交易而告终，而英国内战的结果却是赢得自由。英国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反抗君主来限制王权的民族。他们通过不懈的斗争，最终建立起一个开明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君主可以尽其所能来做好事，同时也受到束缚无法为非作歹；贵族们没有家臣，他们地位虽高却毫不傲慢；人们有条不紊地分担国事。

The House of Lords and that of the Commons divide the legislative power under the king, but the Romans had no such balance. The patricians and plebeians in Rome were perpetually at variance, and there was no intermediate power to reconcile them. The Roman senate, who were so unjustly, so criminally proud as not to suffer the plebeians to share with them in anything, could find no other artifice to keep the latter out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an by employing them in foreign wars. They considered the plebeians as a wild beast, whom it behoved them to let loose upon their neighbours, for fear they should devour their masters. Thus the greatest defect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omans raised them to be conquerors. By being unhappy at home, they triumphed over and possessed themselves of the world, till at last their divisions sunk

them to slavery.

在英国，上议院和下议院划分了国王手下的立法权，而古罗马人却没有这样的制衡。在古罗马，贵族和平民总是存在分歧，没有中间势力来使双方达成和解。古罗马元老院有着那种不仁不义、近乎罪恶的傲慢，这使他们无法容忍和平民分享任何权利。为了不让平民参与政事，他们只会使用一条诡计，那就是把百姓招募到对外战争中去。他们把平民当作一头野兽，认为理应把它放逐到邻居那里，唯恐它吞噬主人。因此，古罗马政府最大的缺陷就是把人民培养成了征服者。正由于在国内无法安享幸福，他们便远征国外，将世界占为己有，直到最终四分五裂、沦为奴隶。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 will never rise to so exalted a pitch of glory, nor will its end be so fatal. The English are not fired with the splendid folly of making conquests, but would only prevent their neighbours from conquering. They are not only jealous of their own liberty, but even of that of other nations. The English were exasperated against Louis XIV. for no other reason but because he was ambitious, and declared war against him merely out of levity, not from any interested motives.

英国政府永远不会高攀如此光辉的荣耀，也不会落得这么悲惨的下场。英国人从不被对外征服这种风光却荒唐的举动冲昏头脑，他们所做的只是阻止邻国入侵。他们不但精心守护本国的自由，甚至还十分珍视他国的自由。英国人竭力反对法国路易十四政权，不为别的，只因后者野心太大。他们继而一心向其宣战，并无任何不纯动机。

The English have doubtless purchased their liberties at a very

high price, and waded through seas of blood to drown the idol of arbitrary power.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involved in as great calamities, and have shed as much blood; but then the blood they split in defence of their liberties only enslaved them the more.

毫无疑问，英国人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付出了很大代价，也正是在这片血海中，他们推翻了专制政权。别的国家遭受的灾难、牺牲的鲜血并不亚于英国，然而，他们为了保卫自由而洒下的热血，结果却换来了更为严酷的奴役。

That which rises to a revolution in England is no more than a sedition in other countries. A city in Spain, in Barbary, or in Turkey, takes up arms in defence of its privileges, when immediately it is stormed by mercenary troops, it is punished by executioners, and the rest of the nation kiss the chains they are loaded with. The French are of opinion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is island is more tempestuous than the sea which surrounds it, which indeed is true; but then it is never so but when the king raises the storm—when he attempts to seize the ship of which he is only the chief pilot. The civil wars of France lasted longer, were more cruel, and productive of greater evils than those of England; but none of these civil wars had a wise and prudent liberty for their object.

同样一件事，在英国演变成一场革命，在别的国家却不过是一次叛乱。比如在西班牙、巴巴里或土耳其，倘若一个城市的民众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权利，就会立即遭到雇佣兵团的镇压，饱受刽子手的蹂躏。于是，国内其他地区的民众也就不得不欣然接受束缚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在法国人看来，不列颠岛上的这个政府，比这座岛四周的汪洋大海更狂暴激进。事实的确如此，也并非总是如此——只有当国王

企图将英国这艘大船居为己有（他只是总舵手而已）而不惜掀起风暴时，政府才显示出它的威力。与英国相比，法国爆发的几次内战更漫长、更残酷，犯下的罪孽也更多；但是，在这些战役中，从没有一次是以赢得明智而审慎的自由为获胜目标的。

In the detestable reigns of Charles IX. and Henry III. the whole affair was only whether the people should be slaves to the Guises. With regard to the last war of Paris, it deserves only to be hooted at. Methinks I see a crowd of schoolboys rising up in arms against their master, and afterwards whipped for it. Cardinal de Retz, who was witty and brave (but to no purpose), rebellious without a cause, factious without design, and head of a defenseless party, caballed for caballing's sake, and seemed to foment the civil war merely out of diversion. The parliament did not know what he intended, nor what he did not intend. He levied troops by Act of Parliament, and the next moment cashiered them. He threatened, he begged pardon; he set a price upon Cardinal Mazarin's head, and afterwards congratulated him in a public manner. Our civil wars under Charles VI. were bloody and cruel, those of the League execrable, and that of the Frondeurs [9_1] ridiculous.

在可恶的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统治时期，人们所关心的一切就是会否成为吉斯家族的奴隶。至于最后一次巴黎之战，也只配喝倒彩。在我看来，那无非就是一群学童武装起来对抗他们的老师，事后遭到鞭打作为惩戒罢了。德·莱兹枢机纵然机智勇敢，却徒劳无益：他好反叛却无目标，好内讧却无计划，身为一党之首却无防御之力；他为阴谋而阴谋，仿佛挑起内战只是为了消遣。议会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也不知道他不想要什么。他通过议会法案招募军队，旋即又将他们遣散。他威胁别人，又向人家求饶；他曾悬赏要取马萨林枢机的脑袋，之后又公开对他表示祝贺。在查理六世时期，我们的内战是血腥残酷

的；神圣联盟的内战是可恨的；而投石党 [10_1] 的内战是荒谬的。

That for which the French chiefly reproach the English nation is the murder of King Charles I., whom his subjects treated exactly as he would have treated them had his reign been prosperous. After all, consider on one side Charles I., defeated in a pitched battle, imprisoned, tried, sentenced to die in Westminster Hall, and then beheaded. And on the other, the Emperor Henry VII., poisoned by his chaplain at his receiving the Sacrament; Henry III. stabbed by a monk; thirty assassinations projected against Henry IV., several of them put in execution, and the last bereaving that great monarch of his life. Weigh, I say, all these wicked attempts and then judge.

法国人指责英国人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绞死了查理一世。但倘若查理一世有幸获胜的话，也势必会用臣民处置他的方法来对待他的臣民。毕竟，从英国方面来看，查理一世是在激战中被打败，成为阶下囚并遭审讯，最后在威斯敏斯特大厅被判处死刑，自此身首异处。而法国方面，亨利七世则是在领受圣礼时被牧师毒死；亨利三世被一个修道士所刺；针对亨利四世的暗杀计划有三十次，其中几次已付诸实践，而最后一次终于夺去了那位伟大君王的生命。我觉得，权衡所有这些阴谋后再下定论为好。

[9_1].Frondeurs, in its proper sense Slingers, and figuratively Cavillers, or lovers of contradiction, was a name given to a league or party that opposed the French Ministry;i. e., Cardinal Mazarin, in 1648.

[10_1].福隆德（投石党），本意为“投石者”，比喻吹毛求疵、喜欢反驳的人，这里是指创立于1648年、旨在反对以马萨林枢机为首的法国政府的政治团体。

Letter IX—On the Government

第九封信　谈政府

THAT mixture in the English Government, that harmony between King, Lords, and Commons, did not always subsist. England was enslaved for a long series of years by the Romans, the Saxons, the Danes, and the French successively. William the Conqueror particularly, ruled them with a rod of iron. He disposed as absolutely of the lives and fortunes of his conquered subjects as an eastern monarch; and forbade, upon pain of death, the English either fire or candle in their houses after eight o'clock; whether he did this to prevent their nocturnal meetings, or only to try, by this odd and whimsical prohibition, how far it was possible for one man to extend his power over his fellow-creatures. It is true, indeed, that the English had Parliaments before and after William the Conqueror, and they boast of them, as though these assemblies then called Parliaments, composed of ecclesiastical tyrants and of plunderers entitled barons, had been the guardians of the public liberty and happiness.

英国政府中的那种融洽，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之间那种协调，并非自古存在。英格兰曾先后被罗马人、撒克逊人、丹麦人和法国人长期占领。尤其是征服者威廉，对英国人实行了铁血统治。他就像东方的君主那样，对征服而来的臣民的生命和财产拥有绝对支配权；而且，他还禁止英国人在晚上八点之后生火或点蜡烛，违者处死。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防止他们举行夜会，抑或只是想通过这个稀奇古怪的禁令，来尝试看看一个人的权力在同类身上可以施展到何种地步。诚然，英国人在征服者威廉统治前后的确一直都设有议会，并以此为

傲，仿佛这些由教会专制者和受封贵族的掠夺者组成的集会——当时就被冠名为“议会”——是公众自由和福祉的保卫者。

The barbarians who came from the shores of the Baltic, and settled in the rest of Europe, brought with them the form of government called States or Parliaments, about which so much noise is made, and which are so little understood. Kings, indeed, were not absolute in those days; but then the people were more wretched upon that very account, and more completely enslaved. The chiefs of these savages, who had laid waste France, Italy, Spain, and England, made themselves monarchs. Their generals divided among themselves the several countries they had conquered, whence sprung those margraves, those peers, those barons, those petty tyrants, who often contested with their sovereigns for the spoils of whole nations. These were birds of prey fighting with an eagle for doves whose blood the victorious was to suck. Every nation, instead of being governed by one master, was trampled upon by a hundred tyrants. The priests soon played a part among them. Before this it had been the fate of the Gauls, the Germans, and the Britons, to be always governed by their Druids and the chiefs of their villages, an ancient kind of barons, not so tyrannical as their successors. These Druids pretended to be mediators between God and man. They enacted laws, they fulminated their excommunications, and sentenced to death. The bishops succeeded, by insensible degrees, to their temporal authority in the Goth and Vandal government. The popes set themselves at their head, and armed with their briefs, their bulls, and reinforced by monks, they made even kings tremble, deposed and assassinated them at pleasure, and employed every artifice to draw into their own purses moneys from all parts of Europe. The weak Ina, one of the tyrants of the Saxon Heptarchy in England, was the first monarch who

submitted, in his pilgrimage to Rome, to pay St. Peter's penny (equivalent very near to a French crown) for every house in his dominions. The whole island soon followed his example; England became insensibly one of the Pope's provinces, and the Holy Father used to send from time to time his legates thither to levy exorbitant taxes. At last King John delivered up by a public instrument the kingdom of England to the Pope, who had excommunicated him; but the barons, not finding their account in this resignation, dethroned the wretched King John and seated Louis, father to St. Louis, King of France, in his place. However, they were soon weary of their new monarch, and accordingly obliged him to return to France.

那些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蛮族，在迁入欧洲其他地方时，曾带来了被称作“国家”或“议会”的政府形式，虽轰动一时却鲜有人懂。当时，国王的确并不专制，可正因如此，人们更加不幸，受到的奴役也更为彻底。这些蛮族的首领们，在蹂躏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之后，便自立为王。他们的将军相互瓜分被他们征服的那几个国家，由此产生了那些边疆侯爵、那些贵族、那些男爵和那些小暴君，经常和他们的君主争夺各国的战利品。这些人就像是一群猛禽，在和一只老鹰搏斗，胜者将可以吸榨鸽子的鲜血。一个国家，不是被一个君主统治，而是同时被一百个暴君践踏。很快，牧师也参与其中。在此之前，高卢人、日耳曼人和不列颠的命运一直掌握在德鲁伊教士和酋长手中——他们就是贵族的前身，却没有那么专横。这些德鲁伊教士自诩为上帝和凡人之间的斡旋者。他们颁布法令，将教徒逐出教会、判处死刑。在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政府里，主教们逐渐继承了他们的世俗权力。教宗使自己成为主教们的首领，通过教谕、诏书和修道士武装自己，甚至让国王们也不寒而栗，随心所欲地废黜和暗杀他们，还使用各种诡计把欧洲各地的钱财摄入自己囊中。软弱的艾那是英格兰撒克逊七国时代的暴君之一，也是第一个屈服于教宗的君主。在去罗马朝拜时，他按照自己领土内的户数进贡，每户一个圣彼得便

士（几乎相当于一个法国埃居）。很快，整个岛都开始效仿他。英国逐渐变为教宗下属一省，而教宗则时常派遣使节去那里征收高额税款。最终，约翰王一纸文书昭告天下，将英格兰王国拱手让给那位曾经把他逐出教会的教宗。而贵族们发现这种退位让他们无利可图，便废黜了不幸的约翰王，把法国国王圣路易的父亲扶上王位。然而，他们很快便对这位新国王感到厌烦，于是强迫他返回法国。

Whilst that the barons, the bishops, and the popes, all laid waste England, where all were for ruling; the most numerous, the most useful, even the most virtuous, and consequently the most venerable part of mankind, consisting of those who study the laws and the sciences, of traders, of artificers, in a word, of all who were not tyrants—that is, those who are called the people: these, I say, were by them looked upon as so many animals beneath the dignity of the human species. The Commons in those ages were far from sharing in the government, they being villains or peasants, whose labour, whose blood, we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masters who entitled themselves the nobility. The major part of men in Europe were at that time what they are to this day in several parts of the world—they were villains or bondsmen of lords—that is, a kind of cattle bought and sold with the land. Many ages passed away before justice could be done to human nature—before mankind were conscious that it was abominable for many to sow, and but few reap. And was not France very happy, when the power and authority of those petty robbers was abolished by the lawful authority of kings and of the people?

就在贵族、主教和教宗为了获得统治权而纷纷蹂躏英国的时候，还存在一群数量最多、最有用，甚至是最善良，因而也是最可敬的人，包括法律和科学研究者、商人、工匠——总之，就是一切不残暴

的人，即那些被称为人民的人。我要说，这些人在那些统治者眼里，无非就是各种牲畜，毫无人的尊严。在那些年代，下议院议员远非政府中的参权者，他们还只是贱民和农夫，他们的劳力和血肉都归那些自封为贵族的主人所有。当时，欧洲绝大多数人都是贱民，或是贵族的奴隶，就像随着土地一同买卖的牲口——这种现象至今还存在于世界上部分地区。多年之后，人性才开始受到公平对待，人类才开始意识到大多数人播种、极少数人收获是如此可恨。当这些小强盗的势力和权威被国王和人民以合法力量推翻时，法国难道不欣喜万分吗？

Happily, in the violent shocks which the divisions between kings and the nobles gave to empires, the chains of nations were more or less heavy. Liberty in England sprang from the quarrels of tyrants. The barons forced King John and King Henry III. to grant the famous Magna Charta, the chief design of which was indeed to make kings dependent on the Lords; but then the rest of the nation were a little favoured in it,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join on proper occasions with their pretended masters. This great Charter, which is considered as the sacred origin of the English liberties, shows in itself how little liberty was known.

所幸的是，在国王和贵族的纷争给帝国带来的猛烈冲击下，国民身上的枷锁也或多或少有所减轻。在英国，自由从暴君们的争执中诞生了。贵族们迫使约翰王和亨利三世同意颁布著名的《大宪章》。虽然制定大宪章的主要意图的确是要让国王依赖于贵族，但也给予了其他国民些许恩惠，目的是要让他们在适当场合能与他们所谓的主人为伍。这个伟大的宪章虽被视为英国各项自由的神圣起源，本身却显示出对自由的狭隘定义。

The title alone proves that the king thought he had a just right

to be absolute; and that the barons, and even the clergy, forced him to give up the pretended right, for no other reason but because they were the most powerful.

单凭标题就证明了国王认为自己理应享有专制权利，而贵族们甚至是神职人员却迫使他放弃这所谓的“权利”，只因为他们才是最高当权者。

Magna Charta begins in this style: “We grant, of our own free will, the following privileges to the archbishops, bishops, priors, and barons of our kingdom,” etc.

《大宪章》是这样起笔的：“余等自愿将下述特权授予王国内之大主教、主教、修道院副院长及男爵”，不一而足。

The House of Commons is not once mentioned in the articles of this Charter—a proof that it did not yet exist, or that it existed without power. Mention is therein made, by name, of the freemen of England—a melancholy proof that some were not so. It appears, by Article XXXII., that these pretended freemen owed service to their lords. Such a liberty as this was not many removes from slavery.

在《大宪章》的各项条款中，“下议院”只字未提——这证明当时它可能尚未存在，即便存在也无实权。其中提到“英格兰之自由民”这样一个名称——也证明有些人还不是自由民，这着实令人沮丧。在第三十二条中，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自由民”还得为他们的主人服务。

看来这种自由还包含着许多奴役的成分。

By Article XXI., the king ordains that his officers shall not henceforward seize upon, unless they pay for them, the horses and carts of freemen. The people considered this ordinance as a real liberty, though it was a greater tyranny. Henry VII., that happy usurper and great politician, who pretended to love the barons, though he in reality hated and feared them, got their lands alienated. By this means the villains, afterwards acquiring riches by their industry, purchased the estates and country seats of the illustrious peers who had ruined themselves by their folly and extravagance, and all the lands got by insensible degrees into other hands.

在第二十一条中，国王规定官员们从此不得强征自由民的马匹和车乘，除非他们为此支付费用。人们把这项法令视为真正的自由，因为它废除了一项暴政。亨利七世，这位幸运的篡位者和大政客，表面上装作喜欢贵族，骨子里却对他们又恨又怕，想尽办法要他们出让土地。于是，贱民们就这样在工作中积累财富，收买名门望族的地产和乡间宅邸；而贵族们却由于自身的愚蠢和挥霍，最终导致破产，所有的土地不知不觉就易主他人了。

The pow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increased every day. The families of the ancient peers were at last extinct; and as peers only are properly noble in England, there would be no such thing in strictness of law as nobility in that island, had not the kings created new barons from time to time, and preserved the body of peers, once a terror to them, to oppose them to the Commons, since become so formidable.

下议院的权势日益增长。旧贵族世家最终消亡。在英国，拥有爵位才算真正的贵族，所以，若非国王们时常册封一些新贵族，维护其爵位勋级（这些人曾令他们生畏），去对抗变得如此强势的下议院议员，那么以英国的严格律法，就不会再有贵族阶级了。

All these new peers who compose the Higher House receive nothing but their titles from the king, and very few of them have estates in those places whence they take their titles. One shall be Duke of D—, though he has not a foot of land in Dorsetshire; and another is Earl of a village, though he scarce knows where it is situated. The peers have power, but it is only in the Parliament House.

所有这些组成上议院的新贵族，除了头衔之外，从国王那里一无所得，几乎没人获得与头衔相称的地产。其中一位便是多塞特公爵，却没有获得多塞特郡任何一寸的土地；另外一位是某个村庄的伯爵，但他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村庄位于哪里。只有在议会里，这些贵族才有权力。

There is no such thing here as haute, moyenne, and basse justice—that is, a power to judge in all matters civil and criminal; nor a right or privilege of hunting in the grounds of a citizen, who at the same time is not permitted to fire a gun in his own field.

这里既没有高级、中级和初级审判——用于审判各种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权力；也没有在一个公民的土地上打猎的权利或特权——同时，这个公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无权开枪。

No one is exempted in this country from paying certain taxes because he is a nobleman or a priest. All duties and taxes are settl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whose power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Peers, though inferior to it in dignity. The spiritual as well as temporal Lords have the liberty to reject a Money Bill brought in by the Commons; but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alter anything in it, and must either pass or throw it out without restriction. When the Bill has passed the Lords and is signed by the king, then the whole nation pays, every man in proportion to his revenue or estate, not according to his title, which would be absur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n arbitrary subsidy or poll-tax, but a real tax on the lands, of all which an estimate was made in the reign of the famous King William III.

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贵族或牧师身份免交某些税款。所有的税捐都由下议院决定，尽管他们的地位低于贵族，论权力却恰恰相反。上议院的灵职和俗职议员有权拒绝下议院提出的财政法案，却无权改变其中的任何内容。他们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彻底否决。如果上议院通过该法案，国王也签字同意，那么所有国民都要依法上缴与其收入和地产相符的税额，而非荒谬地根据头衔纳税。这里没有专横的补贴和人头税，却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税。在著名的威廉三世统治时期，所有土地都被估过价。

The land-tax continues still upon the same foot, though the revenue of the lands is increased. Thus no one is tyrannised over, and every one is easy. The feet of the peasants are not bruised by wooden shoes; they eat white bread, are well clothed, and are not afraid of increasing their stock of cattle, nor of tiling their houses from any apprehension that their taxes will be raised the year

following. The annual income of the estates of a great many commoners in England amounts to two hundred thousand livres, and yet these do not think it beneath them to plough the lands which enrich them, and on which they enjoy their liberty.

虽然土地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土地税仍然按照以前的税率征收。因此，没有人受到欺压，百姓安居乐业。农民的双脚不再被木鞋磨伤，他们吃上白面包，穿戴整齐，既不怕增加牲口，也不怕给房子添砖加瓦，因为他们丝毫不用担心来年的赋税会增加。在英国，许多平民每年都从地产上获得相当于二十万法郎的收益，而且并不认为耕种土地有失身份。他们依靠土地致富，也乐于在这片土地上享受自由。

Letter X—On Trade

第十封信　谈商业

AS trade enriched the citizens in England, so it contributed to their freedom, and this freedom on the other side extended their commerce, whence arose the grandeur of the State. Trade raised by insensible degrees the naval power, which gives the English a superiority over the seas, and they now are masters of very near two hundred ships of war. Posterity will very probably be surprised to hear that an island whose only produce is a little lead, tin, fuller's-earth, and coarse wool, should become so powerful by its commerce, as to be able to send, in 1723, three fleets at the same time to three different and far distanced parts of the globe. One before Gibraltar, conquered and still possessed by the English; a second to Porto Bello, to dispossess the King of Spain of the treasures of the West Indies; and a third into the Baltic, to prevent the Northern Powers from coming to an engagement.

商业不仅使英国公民富裕起来，还促成他们获得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反过来又扩大了贸易，由此提升了国家的威望。不知不觉地，商业促进了海军力量的增强，从而使英国成为海上霸主，如今他们已拥有将近两百艘战舰。后人很可能会感到惊讶：作为仅出产一点铅、锡、漂白土和粗羊毛的岛国，英国竟能凭借商业变得如此强大，居然还在1723年同时派三支舰队分赴世界上三个遥远的地方：一支前往已被英国征服并占领的直布罗陀；第二支远赴波托韦洛，以夺取西班牙国王在西印度群岛的财富；第三支则被派至波罗的海，去阻止北方强国的交战。

At the time when Louis XIV. made all Italy tremble, and that his armies, which had already possessed themselves of Savoy and Piedmont, were upon the point of taking Turin; Prince Eugene was obliged to march from the middle of Germany in order to succour Savoy. Having no money, without which cities cannot be either taken or defended, he addressed himself to some English merchants. These, at an hour and a half's warning, lent him five millions, whereby he was enabled to deliver Turin, and to beat the French; after which he wrote the following short letter to the persons who had disbursed him the above-mentioned sums: “Gentlemen, I received your money, and flatter myself that I have laid it out to your satisfaction.” Such a circumstance as this raises a just pride in an English merchant, and makes him presume (not without some reason) to compare himself to a Roman citizen; and, indeed, a peer's brother does not think traffic beneath him. When the Lord Townshend was Minister of State, a brother of his was content to be a City merchant; and at the time that the Earl of Oxford governed Great Britain, his younger brother was no more than a factor in Aleppo, where he chose to live, and where he died. This custom, which begins, however, to be laid aside, appears monstrous to Germans, vainly puffed up with their extraction. These think it morally impossible that the son of an English peer should be no more than a rich and powerful citizen, for all are princes in Germany. There have been thirty highnesses of the same name, all whose patrimony consisted only in their escutcheons and their pride. In France the title of marquis is given gratis to any one who will accept of it; and whosoever arrives at Paris from the midst of the most remote provinces with money in his purse, and a name terminating in ac or ille, may strut about, and cry, “Such a man as I! A man of my rank and figure!” and may look down upon a trader with sovereign contempt; whilst the trader on the other side, by thus often hearing his profession treated so disdainfully, is fool

enough to blush at it. However, I need not say which is most useful to a nation; a lord, powdered in the tip of the mode, who knows exactly at what o'clock the king rises and goes to bed, and who gives himself airs of grandeur and state, at the same time that he is acting the slave in the ante-chamber of a prime minister; or a merchant, who enriches his country, despatches orders from his counting-house to Surat and Grand Cairo, and contributes to the felicity of the world.

眼看路易十四的军队已经占领萨沃伊和皮埃蒙特，即将攻打都灵，把整个意大利吓得心惊胆战，欧根亲王不得不从德国中部出兵去援助萨伏依。不名一文的他，既夺取不了城市，也无法进行防守，便同一些英国商人进行洽谈。在一个半小时的劝诫之后，这些商人们借给他五百万英镑，使他得以解放都灵、击退法军。事后，欧根亲王给那些曾向他支付上述款项的商人们写了封短信，内容如下："先生们，我已悉收你们的借款，并自觉我的花费方式能令你们满意。"这一切让英国商人的骄傲之情油然而生，并让他们敢于将自己和古罗马公民相提并论（这样做也不无道理）；而事实上，英国贵族的弟兄并不看轻商业。当汤曾德勋爵担任国务大臣时，他的一个兄弟却乐于成为一名城市商人；当牛津伯爵统治大不列颠时，他的弟弟却只是阿勒颇的一位代理商，在那里生活终老。但这种风俗已开始被抛弃，在那些以血统为傲的德国人眼里，它显得怪诞可怕。他们觉得，一个英国贵族的后代只是一名有钱有势的公民，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要是在德国，他们都会是亲王。曾有过三十位同名的殿下，除了纹章盾牌和一身傲气之外，他们一无所有。在法国，侯爵的头衔可以免费赐予任何人，只要他愿意接受；而且任何一个从边远省区来到巴黎的人，只要兜里有钱，名字又以"ac"或"ille"结尾，就可以趾高气扬、大声叫嚷："像我这样的人！我这种地位和身份的人！"还可以彻头彻尾地瞧不起商人；商人也常常听到蔑视自己职业的言论，但要为此脸红未免太傻。然而，无须我说哪一种人对国家最有用：是一位在假发上扑粉的贵族？还是一位商人？贵族对国王起床和就寝的时间一清二楚，他

们装腔作势地表现自己的威严，同时又在大臣候见厅里奴颜婢膝；而商人呢，则让自己的国家变得富足，在账房里向苏拉特和大开罗发号施令，为全世界的福祉作出贡献。

Letter XI—On Inoculation

第十一封信　谈接种

IT is inadvertently affirmed in the Christian countries of Europe that the English are fools and madmen. Fools, because they give their children the small-pox to prevent their catching it; and madmen, because they wantonly communicate a certain and dreadful distemper to their children, merely to prevent an uncertain evil. The English, on the other side, call the rest of the Europeans cowardly and unnatural. Cowardly, because they are afraid of putting their children to a little pain; unnatural, because they expose them to die one time or other of the small-pox. But that the reader may be able to judge whether the English or those who differ from them in opinion are in the right, here follows the history of the famed innoculation, which is mentioned with so much dread in France.

在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人们不经意间提起英国人时，总说他们既愚蠢又疯狂。说其愚蠢，是因为他们给孩子接种天花来预防感染天花；说其疯狂，是因为他们恣意给孩子传播一种一定发作的恶疾，仅仅是为了预防未必发作的病魔。而英国人则认为，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不仅胆小懦弱而且丧尽天良。说其胆小懦弱，是因为他们害怕让孩子吃一点苦；说其丧尽天良，是因为他们让孩子冒着有一天会命丧天花的危险。然而，究竟是英国人言之成理，还是与其观点相反的欧洲人持之有故，恐怕读者自能决断。下面就来谈谈著名的天花接种史，法国人往往谈之色变。

The Circassian women have, from time immemorial, communicated the small-pox to their children when not above six months old by making an incision in the arm, and by putting into this incision a pustule, taken carefully from the body of another child. This pustule produces the same effect in the arm it is laid in as yeast in a piece of dough; it ferments, and diffuses through the whole mass of blood the qualities with which it is impregnated. The pustules of the child in whom the artificial small-pox has been thus inoculated are employed to communicate the same distemper to others. There is an almost perpetual circulation of it in Circassia; and when unhappily the small-pox has quite left the country, the inhabitants of it are in as great trouble and perplexity as other nations when their harvest has fallen short.

自古以来，切尔卡西亚妇女就有给未满六个月的孩子接种天花的习惯。她们在孩子胳膊上划一道切口，然后注入自己小心翼翼地从别的孩子身上取来的痘浆。这种痘浆，就如同酵母在面团里发酵一样，在手臂里产生同种效应：它先发酵，然后在血液里散播着接种而来的痘浆的性能。就这样，当这个孩子接种了人工天花后，他身上产生的痘浆，又可以用来把同种病症传播给其他孩子。这一切在切尔卡西亚几乎处于一种循环往复的状态。如果不幸在当地没有了天花痘浆，居民们就会像其他民族面对收成欠佳一样，陷入困境，手足无措。

The circumstance that introduced a custom in Circassia, which appears so singular to others, is nevertheless a cause common to all nations, I mean maternal tenderness and interest.

尽管这个风俗在其他民族看来颇为另类，但它在切尔卡西亚普遍被践行的缘由，却是全世界所共通的，那就是母爱和利益。

The Circassians are poor, and their daughters are beautiful, and indeed, it is in them they chiefly trade. They furnish with beauties the seraglios of the Turkish Sultan, of the Persian Sophy, and of all those who are wealthy enough to purchase and maintain such precious merchandise. These maidens are very honourably and virtuously instructed to fondle and caress men; are taught dances of a very polite and effeminate kind; and how to heighten by the most voluptuous artifices the pleasures of their disdainful masters for whom they are designed. These unhappy creatures repeat their lesson to their mothers, in the same manner as little girls among us repeat their catechism without understanding one word they say.

切尔卡西亚人生活贫苦，可姑娘们很漂亮，因而父母们在女儿身上最有利可图。他们向土耳其苏丹王、波斯国索菲以及所有那些买得起也供得起这些贵重商品的富人输送美女，供其金屋藏娇。他们全心全意教导这些少女如何爱抚和拥抱男人，教她们跳一种非常高雅娇柔的舞蹈，教她们用最性感的技巧去挑逗她们倨傲的主人的兴致。这些不幸的姑娘们一遍又一遍地向母亲们温习这类课程，就像我们身边的小女孩们背诵教义问答一样，根本不知其意。

Now it often happened that, after a father and mother had taken the utmost care of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they were frustrated of all their hopes in an instant. The small-pox getting into the family, one daughter died of it, another lost an eye, a third had a great nose at her recovery, and the unhappy parents were completely ruined. Even, frequently, when the small-pox became epidemical, trade was suspended for several years, which thinned very considerably the seraglios of Persia and Turkey.

但是，往往在父母悉心调教好他们的孩子之后，所有的希望却在顷刻间化为泡影。天花在这个家庭蔓延开来：一个女儿出天花死了，另一个瞎了一只眼，还有一个康复后成了大鼻子，于是，这对不幸的父母彻底破产。甚至还屡次出现这种状况：天花流行，使贸易中断好几年，导致波斯和土耳其宫殿里的美女锐减。

A trading nation is always watchful over its own interests, and grasps at every discovery that may be of advantage to its commerce. The Circassians observed that scarce one person in a thousand was ever attacked by a small-pox of a violent kind. That some, indeed, had this distemper very favourably three or four times, but never twice so as to prove fatal; in a word, that no one ever had it in a violent degree twice in his life. They observed farther, that when the small-pox is of the milder sort, and the pustules have only a tender, delicate skin to break through, they never leave the least scar in the face. From these natural observations they concluded, that in case an infant of six months or a year old should have a milder sort of small-pox, he would not die of it, would not be marked, nor be ever afflicted with it again.

一个经商的民族总是密切关注自身利益，不放过任何可能有益于贸易的发现。切尔卡西亚人发现，千人之中几乎无一人得过严重的天花。的确有些人患上三四次轻微的天花，但从没有两次都是致命的；总之，人一生不会感染两次严重的天花。他们进一步发现，如果天花较为轻微、痘浆只是穿破一层柔嫩的皮肤，脸上就不会留下丝毫疤痕。从这些自然观察中，他们得出结论：倘若一个六个月大或一岁大的婴儿轻微感染天花，他不会因此丧命，也不会留下疤痕，却可从此与天花绝缘。

In order, therefore, to preserve the life and beauty of their children, the only thing remaining was to give them the small-pox in their infant years. This they did by inoculating in the body of a child a pustule taken from the most regular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most favourable sort of small-pox that could be procured.

因此，为了保全孩子的性命和美貌，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在婴儿时期就出点天花。为此，他们就从那些最为常见、最易康复又便于获取的天花里提取痘浆，给孩子接种。

The experiment could not possibly fail. The Turks, who are people of good sense, soon adopted this custom, insomuch that at this time there is not a bassa in Constantinople but communicates the small-pox to his children of both sexes immediately upon their being weaned.

这样的试验百试百灵。聪明的土耳其人很快也接纳了这一习俗，以至于现如今在君士坦丁堡没有哪一个帕夏不在子女断奶后就立即给他们接种天花的。

Some pretend that the Circassians borrowed this custom anciently from the Arabians; but we shall leave the clearing up of this point of history to some learned Benedictine, who will not fail to compile a great many folios on this subject, with the several proofs or authorities. All I have to say upon it is tha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King George I., the Lady Wortley Montague, a woman of as fine a genius, and endued with as great a strength of mind, as any of her sex in the British Kingdoms, being

with her husband, who was ambassador at the Porte, made no scruple to communicate the small-pox to an infant of which she was delivered in Constantinople.

有些人声称切尔卡西亚人的这种风俗是很早以前从阿拉伯人那里借鉴而来的，但我们还是把这个历史问题留给某位博学的本笃会会士去理清吧，他必然会就此引经据典地编撰出许多对开本的著作来。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在乔治一世统治初期，有位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和大不列颠王国的其他女性一样，她天资聪慧、智勇双全。随丈夫出使土耳其的她，毫不犹豫地给她在君士坦丁堡诞下的孩子接种天花。

The chaplain represented to his lady, but to no purpose, that this was an un-Christian operation, and therefore that it could succeed with none but infidels. However, it had the most happy effect upon the son of the Lady Wortley Montague, who, at her return to England, communicated the experiment to the Princess of Wales, now Queen of England.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is princess, abstracted from her crown and titles, was born to encourage the whole circle of arts, and to do good to mankind. She appears as an amiable philosopher on the throne, having never let slip one opportunity of improving the great talents she received from Nature, nor of exerting her beneficence. It is she who, being informed that a daughter of Milton was living, but in miserable circumstances, immediately sent her a considerable present. It is she who protects the learned Father Courayer. It is she who condenscended to attempt a reconciliation between Dr. Clark and Mr. Leibnitz. The moment this princess heard of inoculation, she caused an experiment of it to be made on four criminals sentenced to die, and by that means preserved their lives doubly; for she not

only saved them from the gallows, but by means of this artificial small-pox prevented their ever having that distemper in a natural way, with which they would very probably have been attacked one time on other, and might have died of in a more advanced age.

牧师曾告诉她这是一种非基督徒的行为，因此只能在异教徒身上产生效力，对她而言只是徒劳。可是，这种办法在她儿子身上却收到了最佳效果。沃特利·蒙塔古女士回国后把相关经验传授给了威尔士王妃，也就是现在的英格兰王后。必须承认，撇开王位和头衔不说，这位王妃生来就鼓励各种艺术的发展，为人类谋取幸福。她和蔼可亲，是坐在王位上的哲学家。她不遗余力地拓展与生俱来的出众才华，也从不错过任何行善积德的机会。在得知米尔顿的一个女儿依然在世却处境困难后，是她立即派人送去一份厚礼。是她保护了那位博学的库拉耶神父。是她屈尊俯就，努力调和了克拉克博士和莱布尼茨先生之间的矛盾。王妃一听说接种这事，就命人在四个死刑犯身上做实验。这样一来，便救了他们两次命，因为她不仅使他们免于绞刑，而且还通过人工接种的方式，使他们从此不再感染天花。否则，有一天他们很可能还会遭受天花之苦，年纪大些恐怕会因此丧命。

The princess being assured of the usefulness of this operation, caused her own children to be inoculated. A great part of the kingdom followed her example, and since that time ten thousand children, at least, of persons of condition owe in this manner their lives to her Majesty and to the Lady Wortley Montague; and as many of the fair sex are obliged to them for their beauty.

在确认这个实验的功效之后，王妃便让人给她自己的孩子们接种。大部分英国人都开始效仿她，而且从那以后，托这位王妃和沃特利·蒙塔古夫人的福，至少有一万名儿童得以活命，许多女孩也因此得

以保全美貌。

Upon a general calculation, threescore persons in every hundred have the small-pox. Of these threescore, twenty die of it in the most favourable season of life, and as many more wear the disagreeable remains of it in their faces so long as they live. Thus, a fifth part of mankind either die or are disfigured by this distemper. But it does not prove fatal to so much as one among those who are inoculated in Turkey or in England, unless the patient be infirm, or would have died had not the experiment been made upon him. Besides, no one is disfigured, no one had the small-pox a second time, if the inoculation was perfect. It is therefore certain, that had the lady of some French ambassador brought this secret from Constantinople to Paris, the nation would have been for ever obliged to her. Then the Duke de Villequier, father to the Duke d'Aumont, who enjoys the most vigorous constitution, and is the healthiest man in France, would not have been cut off in the flower of his age.

大致算来，每一百人中有六十人会感染天花。在这六十人中，有二十人在人生的鼎盛时期死去；还有二十多人要终生带着脸上那令人不快的疤痕。因此，人类中有五分之一不是死于天花，就是被天花毁容。不过，对于在土耳其或英格兰接种过的人而言，天花并不致命，除非病人身体虚弱，或者即使不接种也会丧命。此外，如果接种理想，没人会因此毁容，也没人会再次染上天花。由此可以肯定，倘若某位法国大使夫人把这个诀窍从君士坦丁堡带回巴黎，那么整个法国将永远感激她。这样的话，奥蒙特公爵的父亲维勒基埃公爵——当时法国体格最强壮、身体最健康的人，就不会在盛年之际撒手人寰。

The Prince of Soubise, happy in the finest flush of health, would not have been snatched away at five-and-twenty, nor the Dauphin, grandfather to Louis XV., have been laid in his grave in his fiftieth year. Twenty thousand persons whom the small-pox swept away at Paris in 1723 would have been alive at this time. But are not the French fond of life, and is beauty so inconsiderable an advantage as to be disregarded by the ladies?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we are an odd kind of people. Perhaps our nation will imitate ten years hence this practice of the English, if the clergy and the physicians will but give them leave to do it; or possibly our countrymen may introduce inoculation three months hence in France out of mere whim, in case the English should discontinue it through fickleness.

风华正茂的苏比斯王子就不会在二十五岁就英年早逝；法国王太子——路易十五的祖父，也不会年过半百就命丧黄泉。1723年在巴黎死于天花的那两万人现在或许还活着。难道法国人不爱惜生命？还是女士们根本不在乎美貌，因此对它不屑一顾？老实说，我们真是个奇怪的民族。倘若牧师和医生许可，我们国家或许就能在十年之内效仿英国人的做法；又假如英国人由于变幻无常而停止接种，我们同胞倒可能仅仅因为一时兴起，不出三个月就引进这一疗法。

I am informed that the Chinese have practised inoculation these hundred years, a circumstance that argues very much in its favour, since they are thought to be the wisest and best governed people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indeed, do not communicate this distemper by inoculation, but at the nose, in the same manner as we take snuff. This is a more agreeable way, but then it produces the like effects; and prov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had inoculation been practised in France it would have saved the lives of thousands.

据我所知，这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接种的习惯。这有力地证明了接种的好处，因为中国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智慧、最有教养的民族。事实上，中国人并不是通过接种来感染天花，而是像我们吸鼻烟一样，通过鼻子吸入痘浆。这种方式更为舒适，产生的效果却是一样的。这同时也证明，如果法国也实行接种，将会挽救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Letter XII—On the Lord Bacon

第十二封信　谈培根勋爵

NOT long since the trite and frivolous question following was debated in a very polite and learned company, viz., Who was the greatest man, Caesar, Alexander, Tamerlane, Cromwell, &c. ?

不久前，在一个颇为高雅的学术聚会上，众人因为这样一个老套又无聊的问题而争论不休，那就是：究竟谁才是最伟大的人物？是恺撒？亚历山大？帖木儿？还是克伦威尔？

Somebody answered that Sir Isaac Newton excelled them all. The gentleman's assertion was very just; for if true greatness consists in having received from heaven a mighty genius, and in having employed it to enlighten our own mind and that of others, a man like Sir Isaac Newton, whose equal is hardly found in a thousand years, is the truly great man. And those politicians and conquerors (and all ages produce some) were generally so many illustrious wicked men. That man claims our respect who commands over the minds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the force of truth, not those who enslave their fellow-creatures: he who is acquainted with the universe, not they who deface it.

有人说，艾萨克·牛顿爵士比他们还要伟大。这位先生的回答极有道理。因为倘若真正的伟大是指天资超群和明理诲人的话，那么像艾萨克·牛顿爵士这样千年难遇的精英，才是真正的伟人。至于那些政客

和征服者（每个时代都会出现几位），不过是些臭名昭著的恶人罢了。值得我们尊敬的，应是凭借真理的力量去征服人心的人，而非奴役同类的人，是了解宇宙的人，而非曲解宇宙的人。

Since, therefore, you desire me to give you an account of the famous personages whom England has given birth to, I shall begin with Lord Bacon, Mr. Locke, Sir Isaac Newton, &c. Afterwards the warriors and Ministers of State shall come in their order.

因此，既然你要我介绍一下英国当地的名人，那我就从培根勋爵、洛克先生以及艾萨克·牛顿爵士谈起吧。之后我还会依次谈到武士和大臣们。

I must begin with the celebrated Viscount Verulam, known in Europe by the name of Bacon, which was that of his family. His father had been Lord Keeper, and himself was a great many years Lord Chancellor under King James I. Nevertheless, amidst the intrigues of a Court, and the affairs of his exalted employment, which alone were enough to engross his whole time, he yet found so much leisure for study as to make himself a great philosopher, a good historian, and an elegant writer; and a still more surprising circumstance is that he lived in an age in which the art of writing justly and elegantly was little known, much less true philosophy. Lord Bacon, as is the fate of man, was more esteemed after his death than in his lifetime. His enemies were in the British Court, and his admirers were foreigners.

我得先从著名的韦鲁勒姆子爵说起。他在欧洲以“培根”这个名字

而广为人知，那其实是他的姓。他的父亲曾是掌玺大臣，而他自己则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多年担任大法官一职。然而，置身于宫廷的种种阴谋和他那尊贵职位所需面对的繁杂事务中（光是这些就足以占据一个人的全部精力），他居然还能找出闲暇时光来读书，使自己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出色的史学家和高雅的作家。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对于正确优雅的写作艺术知之甚少，更别说真正的哲学了。同大人物普遍的命运一样，他身后比生前更受人敬仰。他的敌人都在不列颠的宫廷里，而仰慕者却遍布世界各地。

When the Marquis d'Effiat attended in England upon the Princess Henrietta Maria, daughter to Henry IV., whom King Charles I, had married, that Minister went and visited the Lord Bacon, who, being at that time sick in his bed, received him with the curtains shut close. “You resemble the angels,” said the Marquis to him; “we hear those beings spoken of perpetually, and we believe them superior to men, but are never allowed the consolation to see them.”

当埃菲亚侯爵在英国侍奉亨利四世的女儿亨丽埃塔·玛丽亚王妃（后成为查理一世的王后）时，曾去拜访过培根勋爵。当时，培根正卧病在床，便隔着帘子接待了他。这位侯爵对培根说道：“您就像是天使。我们总是听人说起天使，也笃信它们超越人类，却从未有幸见其真身。”

You know that this great man was accused of a crime very unbecoming a philosopher: I mean bribery and extortion. You know that he was sentenced by the House of Lords to pay a fine of about four hundred thousand French livres, to lose his peerage and his dignity of Chancellor; but in the present age the English revere his

memory to such a degree, that they will scarce allow him to have been guilty. In case you should ask what are my thoughts on this head, I shall answer you in the words which I heard the Lord Bolingbroke use on another occasion. Several gentlemen were speaking, in his company, of the avarice with which the late Duke of Marlborough had been charged, some examples whereof being given, the Lord Bolingbroke was appealed to (who, having been in the opposite party, might perhaps, without the imputation of indecency, have been allowed to clear up that matter): “He was so great a man,” replied his lordship, “that I have forgot his vices.”

你一定知道，这位伟人曾被人指控犯了一桩和哲学家身份毫不相称的罪状：受贿和勒索。如你所知，他被上议院判处约合四十万法郎的罚款，并被革除贵族爵位和大法官之职。可现如今，英国人是如此敬仰培根，几乎没人愿意承认他有罪。要是你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我会引用我在另一场合从博林布罗克勋爵那儿听到的话来回答。有几位先生曾在博林布罗克勋爵面前说起已故的马尔伯勒公爵遭到所谓贪婪的指控，还举出几桩事例向勋爵求证。博林布罗克与马尔伯勒分属对立的党派，他本可直陈事实，而不必介怀任何非议。可这位大人却回答道：“他是这么伟大，我简直忘了他的缺点。”

I shall therefore confine myself to those things which so justly gained Lord Bacon the esteem of all Europe.

既然如此，我就来谈谈培根勋爵之所以赢得整个欧洲尊敬的原因。

The most singular and the best of all his pieces is that which, at

this time, is the most useless and the least read, I mean his Novum Scientiarum Organum. This is the scaffold with which the new philosophy was raised; and when the edifice was built, part of it at least, the scaffold was no longer of service.

在他的所有著作中，最出众最精彩的一本如今却成了最没用的书，鲜有人读。我要说的正是他的《新工具论》。这是新哲学得以建立的支架；而等到大厦建成、至少是部分建成后，这支架便不再发挥作用了。

The Lord Bacon was not yet acquainted with Nature, but then he knew, and pointed out, the several paths that lead to it. He had despised in his younger years the thing called philosophy in the Universities, and did all that lay in his power to prevent those societies of men instituted to improve human reason from depraving it by their quiddities, their horrors of the vacuum, their substantial forms, and all those impertinent terms which not only ignorance had rendered venerable, but which had been made sacred by their being rediculously blended with religion.

那时，培根勋爵还不了解自然，却知道并指出了几条通往自然的道路。年轻的时候，他就对大学里讲授的“哲学”嗤之以鼻，并竭尽所能去阻止那些旨在健全人类理性的团体用他们所谓的“本质”“对空虚的恐惧”“实体形式”等一切不恰当的术语来糟践理性。这些术语不仅让无知变得可敬起来，还荒谬地与宗教混为一谈，冠上神圣的光环。

He is the father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It must, indeed, be confessed that very surprising secrets had been found out before his

time—the sea-compass, printing, engraving on copper plates, oil-painting, looking-glasses; the art of restoring, in some measure, old men to their sight by spectacles; gunpowder, &c., had been discovered. A new world has been sought for, found, and conquered. Would not one suppose that these sublime discoveries had been made by the greatest philosophers, and in ages much more enlightened than the present? But it was far otherwise; all these great changes happened in the most stupid and barbarous times. Chance only gave birth to most of those inventions; and it is very probable that what is called chance contributed very much to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at least, it has been always thought that Christopher Columbus undertook his voyage merely on the relation of a captain of a ship which a storm had driven as far westward as the Caribbean Islands. Be this as it will, men had sailed round the world, and could destroy cities by an artificial thunder more dreadful than the real one; but, then, they were not acquainted with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the weight of the air, the laws of motion, light, the number of our planets, &c. And a man who maintained a thesis on Aristotle's “Categories,” on the universals a parte rei, or such-like nonsense, was looked upon as a prodigy.

培根是实验哲学之父。诚然，早在他那个时代之前，人类就已经发现了不少惊人的奥秘，从而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铜板雕刻、油画、镜子，还有用眼镜让老年人多少恢复些视力的技术以及火药等。人们探索、发现并征服了一个新世界。谁不认为这些卓越的发现是由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远比现在更开明的时代完成的呢？但事实远非如此：所有这些巨变都发生在最愚昧野蛮的时代。上述那些发明，大多不过是偶然罢了。至于美洲大陆的发现，也极可能要归功于所谓的“运气”。至少人们一直都认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只是以一名船长的身份开始了那次航行，途中是被风暴一路向西吹到了加勒比群岛。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开始乘船环游世界，并能用一种比真的雷电更可

怕的人造雷电摧毁城市。不过那时候，他们还不了解血液循环、空气质量、运动规律、光以及星球数量等。如果有人就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共相实在”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奥义提出论题，那么他会被视为天才。

The most astonishing, the most useful inventions, are not those which reflect the greatest honour on the human mind. It is to a mechanical instinct, which is found in many men, and not to true philosophy, that most arts owe their origin.

最不可思议、也最大有裨益的发明，并非那些最大程度上反映人类智慧的发明。大多数技艺都来自于一种普通人都具备的机械本能，而非源于真正的哲学。

The discovery of fire, the art of making bread, of melting and preparing metals, of building houses,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shuttle, are infinitely more beneficial to mankind than printing or the sea-compass: and yet these arts were invented by uncultivated, savage men.

火的发现，制作面包、冶炼金属、建造房屋的技艺，以及梭子的发明，都远比印刷术或指南针带给人类的益处更大。然而，这些技艺都肇始于未开化的野蛮人之手。

What a prodigious use the Greeks and Romans made afterwards of mechanics! Nevertheless, they believed that there were crystal heavens, that the stars were small lamps which sometimes fell into

the sea, and one of their greatest philosophers, after long researches, found that the stars were so many flints which had been detached from the earth.

在此之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是多么广泛地应用了力学原理啊！可是，他们却还认为天空是水晶组成的，认为繁星是盏盏小灯，有时会坠入大海；他们中的一位大哲学家经过长期研究之后，认定繁星是从地球掉落出来的燧石。

In a word, no one before the Lord Bacon was acquainted with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nor with the several physical experiments which have been made since his time. Scarce one of them but is hinted at in his work, and he himself had made several. He made a kind of pneumatic engine, by which he guessed the elasticity of the air. He approached, on all sides as it were, to the discovery of its weight, and had very near attained it, but some time after Torricelli seized upon his truth. In a little time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began to be cultivated on a sudden in most parts of Europe. It was a hidden treasure which the Lord Bacon had some notion of, and which all the philosophers, encouraged by his promises, endeavoured to dig up.

总之，在培根勋爵之前，无人了解实验哲学，也没人知道自他以后的那几个物理实验。这几个实验在他的著作中已有论及，而他自己也曾尝试过一些。他曾制造了一种气动发动机，并由此猜到空气具有弹性。他想尽一切办法去计算空气质量，并一度就要得到答案，但还是被托里拆利捷足先登。不久以后，实验哲学便突然开始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发展起来。这是座隐秘的宝藏，培根勋爵对其已略论一二，后来的哲学家们都被他的预言所鼓舞，致力于挖掘这座宝藏。

But that which surprised me most was to read in his work, in express terms, the new attraction, the invention of which is ascribed to Sir Isaac Newton.

但最让我惊讶的是，在读他作品的时候，我竟发现他早已清楚表述了艾萨克·牛顿爵士提出的新引力论。

We must search, says Lord Bacon, whether there may not be a kind of magnetic power which operates between the earth and heavy bodies, between the moon and the ocean, between the planets, &c. In another place he says, either heavy bodies must be carried towards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or must be reciprocally attracted by it; and in the latter cas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nearer bodies, in their falling, draw towards the earth, the stronger they will attract one another. We must, says he, make an experiment to see whether the same clock will of faster on the top of a mountain or at the bottom of a mine; whether the strength of the weights decreases on the mountain and increases in the mine.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earth has a true attractive power.

培根说，我们必须去研究地球和各天体之间、月球和海洋之间以及星球彼此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磁力。他在别处又说道：要么天体被引向地心，要么两者之间相互吸引；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天体下坠时，离地球越近，相互之间的引力显然就越大。他说，我们必须做个试验，看看同一座钟是在山顶上还是在矿井下走得更快？重力是否在山上减小、在矿底增大？地球可能真的有一种引力。

This forerunner in philosophy was also an elegant writers, an historian, and a wit.

这位哲学先驱同时还是一位文笔优雅的作家、一位史学家和智者。

His moral essays are greatly esteemed, but they were drawn up in the view of instructing rather than of pleasing; and, as they are not a satire upon mankind, like Rochefoucauld's “Maxims,” nor written upon a sceptical plan, Like Montaigne's “Essays,” they are not so much read as those two ingenious authors.

他的有关道德的散文备受推崇，而创作那些文章的初衷本是教导世人，而非取悦他人。它们既不像拉罗什福柯的《箴言集》那样嘲讽人类，也不像蒙田的《随笔集》那样为怀疑主义立论，因此培根的读者比那两位富有独创精神的作家要少。

His History of Henry VII. was looked upon as a masterpiece, but how is it possible that some persons can presume to compare so little a work with the history of our illustrious Thuanus?

他那部《亨利七世本纪》尽管被视为杰作，但怎会有人胆敢拿这么无足轻重的作品来与赫赫有名的德·图先生的历史著作相提并论呢？

Speaking about the famous impostor Perkin, son to a converted Jew, who assumed boldly the name and title of Richard IV., King of

England, at the instigation of the Duchess of Burgundy, and who disputed the crown with Henry VII., the Lord Bacon writes as follows:—

谈及那个著名的骗子珀金——一个改变信仰的犹太人的儿子，曾在勃艮第公爵夫人的唆使下，大胆冒用英王理查德四世这个名号，与亨利七世争夺王位，培根勋爵这样写道：

“At this time the King began again to be haunted with sprites, by the magic and curious arts of the Lady Margaret, who raised up the ghost of Richard, Duke of York, second to King Edward IV., to walk and vex the King.

“此时，国王再次被玛格丽特夫人的魔法和巫术所迷惑。她召唤地位仅次于爱德华四世的约克公爵理查德的鬼魂，令其出没并扰乱国王的心绪。

“After such time as she (Margaret of Burgundy) thought he (Perkin Warbeck) was perfect in his lesson, she began to cast with herself from what coast this blazing star should first appear, and at what time it must be upon the horizon of Ireland; for there had the like meteor strong influence before.”

在她（勃艮第的玛格丽特）认为他（珀金·沃贝克）表现完美后，便开始考虑这颗炽星该首先出现在哪片海岸，又要在何时到达爱尔兰的地平线上方；因为那儿曾出现过类似有着强大力量的流星。”

Methinks our sagacious Thuanus does not give in to such fustian, which formerly was looked upon as sublime, but in this age is justly called nonsense.

在我看来，我们睿智的德·图先生不会屈服于这种浮夸之词。过去人们认为这种文笔令人赞叹，而今就算把它称作胡说八道也不为过。

Letter XIII—On Mr. Locke

第十三封信　谈洛克先生

PERHAPS no man ever had a more judicious or more methodical genius, or was a more acute logician than Mr. Locke, and yet he was not deeply skilled in the mathematics. This great man could never subject himself to the tedious fatigue of calculations, nor to the dry pursuit of mathematical truths, which do not at first present any sensible objects to the mind; and no one has given better proofs than he,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a man to have a geometrical head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geometry. Before his time, several great philosophers had declared, in the most positive terms, what the soul of man is; but as these absolutely knew nothing about it, they might very well be allowed to differ entirely in opinion from one another.

洛克先生的明智审慎和有条不紊恐怕永远无人能及，也没有哪位逻辑学家比他更为敏锐。不过，他的数学造诣却不高。这位伟人从不甘心忍受单调无味、令人疲倦的计算，也从不沉迷于对数学真理的枯燥追求。这些数学真理乍看之下，并不给思维带来任何可感知的事物。没人比他更能证明：即使没有几何学的帮助，人也可能拥有几何思维的头脑。在他之前，已有几位大哲学家斩钉截铁地表明人的灵魂为何。但由于这些人对此全然一无所知，因此彼此的意见大相径庭便也理所当然了。

In Greece, the infant seat of arts and of errors, and where the grandeur as well as folly of the human mind went such prodigious

lengths, the people used to reason about the soul in the very same manner as we do.

在艺术和谬误的摇篮——希腊，人类思想的伟大和愚昧都发展到极致，那儿的人们和我们现在一样，用同种方式思考灵魂。

The divine Anaxagoras, in whose honour an altar was erected for his having taught mankind that the sun was greater than Peloponnesus, that snow was black, and that the heavens were of stone, affirmed that the soul was an aërial spirit, but at the same time immortal. Diogenes (not he who was a cynical philosopher after having coined base money) declared that the soul was a portion of the substance of God: an idea which we must confess was very sublime. Epicurus maintained that it was composed of parts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body.

人们曾为圣人阿那克萨哥拉设立祭坛，因为他教导人们，太阳比伯罗奔尼撒半岛还大，雪是黑色的，天堂由石头堆砌而成。这位圣人断言，灵魂是一种空气般的精灵，同时也是永生的。第欧根尼（不是那位铸造伪币后成为犬儒派哲学家的第欧根尼）宣称，灵魂是上帝实体的一部分。必须承认，这个观点在当时很了不起。伊壁鸠鲁则认为，灵魂和肉体一样，是由各个部分组合而成的。

Aristotle, who has been explained a thousand ways, because he is unintelligible, was of opinion, according to some of his disciples, that the understanding in all men is one and the same substance.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晦涩难懂，曾被人们千般解读。据他的一些弟子表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一切理解源自同一且唯一的实体。

The divine Plato, master of the divine Aristotle, —and the divine Socrates, master of the divine Plato, —used to say that the soul was corporeal and eternal. No doubt but the demon of Socrates had instructed him in the nature of it. Some people, indeed, pretend that a man who boasted his being attended by a familiar genius must infallibly be either a knave or a madman, but this kind of people are seldom satisfied with anything but reason.

先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和先贤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老师）都说灵魂是物质的、永恒的。毫无疑问，司命神曾向苏格拉底指出了灵魂的本质。诚然，有些人认为，如果一个人自称有司命神相伴，那么他不是骗子就是疯子。但对于这些人来说，除了所谓理性，就没有什么能令他们满意的。

With regard to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several in the primitive ages believed that the soul was human, and the angels and God corporeal. Men naturally improve upon every system. St. Bernard, as Father Mabillon confesses, taught that the soul after death does not see God in the celestial regions, but converses with Christ's human nature only. However, he was not believed this time on his bare word; the adventure of the crusade having a little sunk the credit of his oracles. Afterwards a thousand schoolmen arose, such as the Irrefragable Doctor, the Subtile Doctor, the Angelic Doctor, the Seraphic Doctor, and the Cherubic Doctor, who were all sure that they had a very clear and distinct idea of the soul, and yet wrote in such a manner, that one would conclude they were

resolved no one should understand a word in their writings. Our Descartes, born to discover the errors of antiqu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substitute his own; and hurried away by that systematic spirit which throws a cloud over the minds of the greatest men, thought he had demonstrated that the soul is the same thing as thought, in the same manner as matter, in his opinion, is the same as extension. He asserted, that man thinks eternally, and that the soul, at its coming into the body, is informed with the whole series of metaphysical notions: knowing God, infinite space, possessing all abstract ideas—in a word, completely endued with the most sublime lights, which it unhappily forgets at its issuing from the womb.

在古代，教父们都相信灵魂有人性，天使与上帝皆有化身。世人在构建观念体系时，本能地不断精益求精。据马比荣神父说，圣伯纳德曾指出：人死后灵魂在天国看不到上帝，只能与耶稣的化身交谈。然而，这一回没人相信他的一面之词了。十字军东征使其神谕威信略失。随之涌现的是数以千计的经院哲学家们，分别冠以“无可辩驳大师”、“微语大师”、“天使大师”、“圣洁大师”和“无邪大师”这般的大名。他们都确信自己对灵魂有清晰而独到的认识，可落笔时却是艰难晦涩，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让大家一个字也别读懂。我们的笛卡尔，天生善于发现古人的谬误，但同时又用自己的谬误取而代之，还被那令最伟大的人物也困惑的“体系精神”所牵绊。他自以为已证明：灵魂即思想，正如在他看来，物质与广袤别无二致。他断言，人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灵魂附体时拥有全套形而上学的概念：认识上帝与空间之无限，掌握一切抽象观念——总之，被完整赋予了最为崇高的启示。遗憾的是，灵魂一出娘胎，这一切便被统统遗忘。

Father Malebranche, in his sublime illusions, not only admitted innate ideas, but did not doubt of our living wholly in God, and that

God is, as it were, our soul.

马勒伯朗士神父沉浸于他的崇高幻想，不仅认可天赋观念，还坚信我们完全活在上帝之中，上帝就是我们的灵魂。

Such a multitude of reasoners having written the romance of the soul, a sage at last arose, who gave, with an air of the greatest modesty, the history of it. Mr. Locke has displayed the human soul in the same manner as an excellent anatomist explains the springs of the human body. He everywhere takes the light of physics for his guide. He sometimes presumes to speak affirmatively, but then he presumes also to doubt. Instead of concluding at once what we know not, he examines gradually what we would know. He takes an infant at the instant of his birth; he traces, step by step, the progress of his understanding; examines what things he has in common with beasts, and what he possesses above them. Above all, he consults himself; the being conscious that he himself thinks.

多少理论家曾谱写关于灵魂的传奇故事，最终一位圣人横空出世，他以最为谨慎的姿态，写就了灵魂之史。洛克先生阐述人类灵魂的方式，就如同一位出色的解剖学家解释人体的构成一样。他处处借鉴物理学知识作为导向。他有时敢于断然论定，但也敢于提出质疑。他循序渐进地检验新知，从不对未知事物妄下定论。从一个婴儿诞生那刻起，他就开始研究它，逐步跟进它的认知发展过程，探究婴儿与动物的共同之处和优于动物之处。最重要的是，他会自我反思，心存自我思考的意识。

“I shall leave,” says he, “to those who know more of this matter

than myself, the examining whether the soul exists before or after the organisation of our bodies. But I confess that it is my lot to be animated with one of those heavy souls which do not think always; and I am even so unhappy as not to conceive that it is more necessary the soul should think perpetually than that bodies should be for ever in motion.”

他说：“至于灵魂是先于肉体而存在，还是在肉体形成后才出现，这个问题我要留给那些比我更清楚的人去探究。但我承认，我命中注定要被赋予一个笨拙的灵魂，它并非时刻在思考。灵魂应该永远思考，这比让身体始终处于运动状态更有必要，我为自己没有悟出这个真理而沮丧不已。”

With regard to myself, I shall boast that I have the honour to be as stupid in this particular as Mr. Locke. No one shall ever make me believe that I think always: and I am as little inclined as he could be to fancy that some weeks after I was conceived I was a very learned soul; knowing at that time a thousand things which I forgot at my birth; and possessing when in the womb (though to no manner of purpose) knowledge which I lost the instant I had occasion for it; and which I have never since been able to recover perfectly.

就我而言，在这一问题上有幸和洛克先生一样愚昧，让我引以为荣。永远没人能让我相信我一直处于思考状态：和洛克先生一样，我也不会去幻想自己在母体中形成数周之后便学富五车；幻想在那个时候就知晓千万事物，却在出生之时统统遗忘；幻想曾在子宫里就掌握知识（虽然毫无用处），却在需要之时不翼而飞，从此再也无法完全恢复。

Mr. Locke, after having destroyed innate ideas; after having fully renounced the vanity of believing that we think always; after having laid down, from the most solid principles, that ideas enter the mind through the senses; having examined our simple and complex ideas; having traced the human mind through its several operations; having shown that all the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re imperfect, and the great abuse that is made of words every moment, he at last comes to consider the extent or rather the narrow limits of human knowledge. It was in this chapter he presumed to advance, but very modestly, the following words: “We shall, perhaps, never be capable of knowing whether a being, purely material, thinks or not.” This sage assertion was, by more divines than one, looked upon as a scandalous declaration that the soul is material and mortal. Some Englishmen, devout after their way, sounded an alarm. The superstitious are the same in society as cowards in an army; they themselves are seized with a panic fear, and communicate it to others. It was loudly exclaimed that Mr. Locke intended to destroy religion; nevertheless, religion had nothing to do in the affair, it being a question purely philosophical, altogether independent of faith and revelation. Mr. Locke's opponents needed but to examine, calmly and impartially, whether the declaring that matter can think, implies a contradiction; and whether God is able to communicate thought to matter. But divines are too apt to begin their declarations with saying that God is offended when people differ from them in opinion; in which they too much resemble the bad poets, who used to declare publicly that Boileauspake irreverently of Louis XIV., because he ridiculed their stupid productions. Bishop Stillingfleet got the reputation of a calm and unprejudiced divine because he did not expressly make use of injurious terms in his dispute with Mr. Locke. That divine entered the lists against him, but was defeated; for he argued as a schoolman, and Locke as a philosopher, who was perfectly

acquainted with the strong as well as the weak side of the human mind, and who fought with weapons whose temper he knew. If I might presume to give my opinion on so delicate a subject after Mr. Locke, I would say, that men have long disputed on the nature and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With regard to its immortality, it is impossible to give a demonstration of it, since its nature is still the subject of controversy; which, however, must be thoroughly understood before a person can be a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be immortal or not. Human reason is so little able, merely by its own strength, to demonstrate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that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religion should reveal it to us. It is of advantage to society in general, that mankind should believe the soul to be immortal; faith commands us to do this; nothing more is required, and the matter is cleared up at once. But it is otherwise with respect to its nature; it is of little importance to religion, which only requires the soul to be virtuous, whatever substance it may be made of. It is a clock which is given us to regulate, but the artist has not told us of what materials the spring of this clock is composed.

洛克打破了天赋观念，彻底摒弃了人时刻在思考的空洞想法，继而以最可靠的原理来阐明，观念来自感觉。他通过探究我们简单与复杂的观念，观察人类思维活动的各个过程，指出世上一切语言都有缺陷，且每时每刻都遭到严重滥用。最后，他着手研究人类知识的范围，更确切地说，是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一章里，他大胆而又极为谦逊地提出以下观点："我们恐怕永远无从知晓，一个纯粹物质的东西是否也能思考。"而在许多神学家看来，这一睿智的论断却是在无耻地宣扬灵魂是物质的、不能永生的。一些（照他们的方式来说是虔诚的）英国人，便敲起了警钟。社会上的迷信之徒就像军队里的懦弱之辈一样：不但自己无端惊恐起来，还要把这种情绪散播给他人。有人大声疾呼，声称洛克意欲败坏宗教。然而，此事与宗教毫无关系，它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与信仰和天启风马牛不相及。洛克

先生的反对者们只需冷静而公正地思考一下："物质能思考"这一论断是否暗含矛盾，上帝能否赋予物质以思想的能力？但是神学家们动不动就开口说，如果人们与其观点不同，就是冒犯上帝。这行为像极了那些糟糕的诗人，他们曾公开宣称布瓦洛对路易十四言辞不敬，因为他嘲笑他们蹩脚的作品。斯蒂林弗利特主教在与洛克的论争中，从不故意恶语相向，因而被誉为冷静而不带偏见的神学家。这位神学家加入到反对洛克的行列中，却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以经院哲学家的身份辩论，而洛克却是一位洞悉人类思维优缺点的哲学家，等于带着武器和一个他深谙其脾性的人作战。倘若我敢追随洛克先生发表对这一微妙话题的看法，我会这样说：长久以来，人类对灵魂之本质及其永生始终争论不休。关于灵魂的永生，我们无从证明，因为它的本质尚且充满争议；然而，在人们能够确定灵魂是否永生之前，首先得深入了解灵魂的本质。仅凭一己之力，人类的理性难以证明灵魂的永生，因而不得不通过宗教来向我们揭示它。相信灵魂永生有利于大众福祉。信仰使然，无需其他，一切瞬间明了。但说到灵魂的本质，却应另当别论：它与宗教关系不大。宗教不管灵魂的实体为何，但求它品德端正。这就像是交由我们校准的时钟，可工匠并未告诉我们其发条由什么质料制作而成。

I am a body, and, I think, that's all I know of the matter. Shall I ascribe to an unknown cause, what I can so easily impute to the only second cause I am acquainted with? Here all the school philosophers interrupt me with their arguments, and declare that there is only extension and solidity in bodies, and that there they can have nothing but motion and figure. Now motion, figure, extension and solidity cannot form a thought, and consequently the soul cannot be matter. All this so often repeated mighty series of reasoning, amounts to no more than this: I am absolutely ignorant what matter is; I guess, but imperfectly, some properties of it; now I absolutely cannot tell whether these properties may be joined to thought. As I therefore know nothing, I maintain positively that

matter cannot think. In this manner do the schools reason.

我有身体，我会思考，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既然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归咎于我所熟悉的唯一次因，还要把它归于一个未知缘由吗？说到这里，经院哲学家们便用他们的推论来打断我。他们说，身体中只存在广袤和固性，只能产生运动和形象。既然运动、形象、广袤和固性都无法形成思想，那么灵魂就不可能是物质的。所有这些经常被重复的强大推论，总结起来无非就是：我全然不知什么是物质；我只能不完全地猜出它的若干属性；现在我确实说不上来这些属性是否和思想有所联系。既然我一无所知，我就断定物质不能思考。这就是经院哲学家们的逻辑。

Mr. Locke addressed these gentlemen in the candid, sincere manner following: At least confess yourselves to be as ignorant as I. Neither your imaginations nor mine are able to comprehend in what manner a body is susceptible of ideas; and do you conceive better in what manner a substance, of what kind soever, is susceptible of them? As you cannot comprehend either matter or spirit, why will you presume to assert anything?

洛克坦率而真诚地对这些绅士们说：至少，诸位得承认自己和我一样无知。你们的想象力也好，我的想象力也罢，都无法理解身体如何能够思考。难道你们更清楚一种实体（无论是何种类）是怎样能思考的吗？既然你们不能理解物质，亦无法理解精神，为何还要妄下定论呢？

The superstitious man comes afterwards and declares, that all those must be burnt for the good of their souls, who so much as

suspect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the body to think without any foreign assistance. But what would these people say should they themselves be proved irreligious? And indeed, what man can presume to assert, without being guilty at the same time of the greatest impiety,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Creator to form matter with thought and sensation? Consider only, I beg you, what a dilemma you bring yourselves into, you who confine in this manner the power of the Creator. Beasts have the same organs, the same sensations, the same perceptions as we; they have memory, and combine certain ideas. In case it was not in the power of God to animate matter, and inform it with sensation, the consequence would be, either that beasts are mere machines, or that they have a spiritual soul.

迷信之徒后来又宣称，为了他们的灵魂，必须烧死那些甚至还怀疑身体不借助任何外力就能思考的人。但倘若这些人自己就犯了反宗教的罪过，那么他们又会作何解释呢？事实上，有谁胆敢断定造物主不会将思想和感觉赋予物质，并且此人还不因忤逆之言而感到有罪？请想一想，你们竟这样限制造物主的权能，让自己陷入如此进退两难的境地。动物和我们拥有同样的器官、同样的感觉和同样的认知；它们有记忆，也能进行一些思考。若不是上帝的力量赋予物质以生命和感觉，那么只可能有两种情况：要么动物仅仅是机器，要么它们就有灵魂。

Methinks it is clearly evident that beasts cannot be mere machines, which I prove thus. God has given to them the very same organs of sensation as to us: if therefore they have no sensation, God has created a useless thing; now according to your own confession God does nothing in vain; He therefore did not create so many organs of sensation, merely for them to be uninformed with this faculty; consequently beasts are not mere machines. Beasts,

according to your assertion, cannot be animated with a spiritual soul; you will, therefore, in spite of yourself, be reduced to this only assertion, viz., that God has endued the organs of beasts, who are mere matter, with the faculties of sensation and perception, which you call instinct in them. But why may not God, if He pleases, communicate to our more delicate organs, that faculty of feeling, perceiving, and thinking, which we call human reason? To whatever side you turn, you are forced to acknowledge your own ignorance, and the boundless power of the Creator. Exclaim therefore no more against the sage, the modest philosophy of Mr. Locke, which so far from interfering with religion, would of be use to demonstrate the truth of it, in case religion wanted any such support. For what philosophy can be of a more religious nature than that, which affirming nothing but what it conceives clearly, and conscious of its own weakness, declares that we must always have recourse to God in our examining of the first principles?

我认为，动物不可能仅仅是机器，这点再明显不过。我的推论如下：上帝赋予它们的感觉器官与我们的完全一样，如果它们没有感觉，那么上帝就是创造了一件废品；而你们自己也承认，上帝从不做徒劳之事，所以他绝不会创造出这么多感觉器官却仅让它们毫无知觉。因此，动物不仅仅是机器。照你们的说法，动物不可能有精神上的灵魂。因此，不管你们愿意与否，最终只能归结为这一论断，即：上帝将感觉和认知的能力赋予纯粹物质的动物器官，你们把这种能力称为本能。但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他为何不把感觉、认知和思考的能力——我们称之为人类理性——传递给更为精巧的器官呢？无论你们支持哪种观点，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以及造物主的神通广大。因此，别再竭力反对洛克先生那贤明而谦逊的哲学了。它远不会妨害宗教，倘若宗教需要任何诸如此类的支持，它还会帮助其揭示真理。因为这种哲学只肯定它清楚理解的东西，懂得承认自己的弱点，认为在探究第一原理时必须求助于上帝。还有什么哲学比它更具宗教性

呢？

Besides, we must not be apprehensive that any philosophical opinion will ever prejudice the religion of a country. Though our demonstrations clash directly with our mysteries, that is nothing to the purpose, for the latter are not less revered upon that account by our Christian philosophers, who know very well that the objects of reason and those of faith are of a very different nature. Philosophers will never form a religious sect, the reason of which is, their writings are not calculated for the vulgar, and they themselves are free from enthusiasm. If we divide mankind into twenty parts, it will be found that nineteen of these consist of persons employed in manual labour, who will never know that such a man as Mr. Locke existed. In the remaining twentieth part how few are readers? And among such as are so, twenty amuse themselves with romances to one who studies philosophy. The thinking part of mankind is confined to a very small number, and these will never disturb the peace and tranquillity of the world.

此外，我们永远不必担心任何哲学观点会有损一国的宗教。尽管我们的种种推论与宗教奥义产生直接冲突，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基督哲学家们并不会因此减少对宗教奥义的尊敬之情，他们深知理性的对象和信仰的对象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哲学家们永远不会形成一个宗派，因为他们的作品不是为普通民众而著，何况他们本身也没有这么狂热。如果我们把人类分成二十份，便会发现其中有十九份由体力劳动者组成，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有洛克这么一个人存在。在剩下二十分之一的人群中，又有多少人读书呢？在这些读书人之中，有二十人是读小说来自娱自乐，只有一人研究哲学。世间会思考的人数量极为有限，而且这些人永远不会破坏世界的和平与宁静。

Neither Montaigne, Locke, Bayle, Spinoza, Hobbes, the Lord Shaftesbury, Collins, nor Toland lighted up the firebrand of discord in their countries; this has generally been the work of divines, who being at first puffed up with the ambition of becoming chiefs of a sect, soon grew very desirous of being at the head of a party. But what do I say? All the works of the modern philosophers put together will never make so much noise as even the dispute which arose among the Franciscans, merely about the fashion of their sleeves and of their cowls.

无论是蒙田、洛克、贝尔、斯宾诺莎、霍布斯、沙夫茨伯里勋爵、科林斯还是托兰，都不曾在自己的国家挑起争端；肇事者往往是那些神学家们，他们一开始趾高气扬地怀有成为一教之首的野心，很快又渴望当一个政党的领袖。而我该作何评论呢？把所有现代哲学家的作品加在一起，也不如方济各会修士关于衣袖和风帽的时尚之争那样喧嚣。

Letter XIV—On Descartes and Sir Isaac Newton

第十四封信　谈笛卡尔和艾萨克·牛顿爵士

A FRENCHMAN who arrives in London, will find philosophy, like everything else, very much changed there. He had left the world a plenum, and he now finds it a vacuum. At Paris the universe is seen composed of vortices of subtile matter; but nothing like it is seen in London. In France, it is the pressure of the moon that causes the tides; but in England it is the sea that gravitates towards the moon; so that when you think that the moon should make it flood with us, those gentlemen fancy it should be ebb, which very unluckily cannot be proved. For to be able to do this, it is necessary the moon and the tides should have been inquired into at the very instant of the creation.

法国人到了伦敦会发现，在那儿哲学同其他东西一道，都大变样了。他去的时候还觉得宇宙是充实的，到了那儿却发现宇宙是虚空的了。在巴黎，我们相信宇宙是由旋涡状的微妙物质组成的；但在伦敦，人们并不这么看。法国人认为是月球压力导致潮汐，而英国人却认为涨潮是月球引力造成的。以至于当你们觉得月球该带来涨潮的时候，那些英国绅士们倒认为该退潮了，偏偏这点很难被证实。要弄清楚这一点，就该在开天辟地那一刻，对月球和潮汐探究一番。

You will observe farther, that the sun, which in France is said to have nothing to do in the affair, comes in here for very near a quarter of its assistance. According to your Cartesians, everything is performed by an impulsion, of which we have very little notion;

and according to Sir Isaac Newton, it is by an attraction, the cause of which is as much unknown to us. At Paris you imagine that the earth is shaped like a melon, or of an oblique figure; at London it has an oblate one. A Cartesian declares that light exists in the air; but a Newtonian asserts that it comes from the sun in six minutes and a half. The several operations of your chemistry are performed by acids, alkalies and subtile matter; but attraction prevails even in chemistry among the English.

诸位还会发现，在法国，太阳和潮汐毫无关联，但在英国，它却有四分之一的功劳。照你们笛卡尔派的说法，一切都由原动力造成，可我们对其毫无概念；而艾萨克·牛顿爵士却认为，一切皆由引力造成，其来源我们也无从知晓。在巴黎，你们把地球想象成一个西瓜，歪斜不匀；但在伦敦，人们却认为它是扁圆的。笛卡尔派声称，光存在于空气中；而牛顿派则坚信，光经过六分半钟才从太阳照到地球上。你们用酸性、碱性和精细的物质做各种化学实验；而在英国却一直是引力支配着化学研究。

The very essence of things is totally changed. You neither are agreed up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soul, nor on that of matter. Descartes, as I observed in my last, maintains that the soul is the same thing with thought, and Mr. Locke has given a pretty good proof of the contrary.

在这里，事物的本质可谓截然不同。你们对灵魂的定义不同，对物质的定义也各异。我在上一封信中说过，笛卡尔认为灵魂与思想本为一物，而洛克先生却充分有力地驳倒了这一观点。

Descartes asserts farther, that extension alone constitutes matter, but Sir Isaac adds solidity to it.

笛卡尔还坚称，广袤本身就构成物质，但牛顿爵士认为还有固性这一因素。

How furiously contradictory are these opinions!

这些矛盾的观点真是天壤之别！

“Non nostrum inter vos tantas componere lites.”

“我无法决定你们谁劣谁优。”

VIRGIL, Eclog. III.

维吉尔《牧歌》第三首

“'Tis not for us to end such great disputes.”

“解决这些尖锐的论争并不是我们的事。”

This famous Newton, this destroyer of the Cartesian system, died in March, anno 1727. His countrymen honoured him in his lifetime, and interred him as though he had been a king who had made his people happy.

这位大名鼎鼎的牛顿——笛卡尔学说的终结者，于公元1727年3月辞世。他生前广受同胞尊重，身后被隆重安葬，俨然是位造福百姓的国王。

The English read with the highest satisfaction, and translated into their tongue, the Elogium of Sir Isaac Newton, which M. de Fontenelle spoke in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M. de Fontenelle presides as judge over philosophers; and the English expected his decision, as a solemn declaration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 English philosophy over that of the French. But when it was found that this gentleman had compared Descartes to Sir Isaac, the whole Royal Society in London rose up in arms. So far from acquiescing with M. Fontenelle's judgment, they criticised his discourse. And even several (who, however, were not the ablest philosophers in that body) were offended at the comparison, and for no other reason but because Descartes was a Frenchman.

丰特内勒先生曾在科学院发表过一篇赞颂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演讲，英国人民读罢此文，颇感称心，并将其译成英语。丰特内勒作为评判哲学家的仲裁，英国人民原本很期待他的判词，来庄重宣告英国哲学优于法国哲学。但当人们发现这位先生将笛卡尔和牛顿相提并论时，伦敦皇家学会上上下下皆拍案而起。他们非但不能默许丰特内勒的论断，对他的演说也颇有微词。还有些哲学家，虽然造诣不深，却也对这种类比感到不满，只因笛卡尔是个法国人。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ese two great men differed very much in conduct, in fortune, and in philosophy.

必须承认，这两位伟人无论在品行、命运还是哲学立场上都大相径庭。

Nature had indulged Descartes with a shining and strong imagination, whence he became a very singular person both in private life and in his manner of reasoning. This imagination could not conceal itself even in his philosophical works, which are everywhere adorned with very shining, ingenious metaphors and figures. Nature had almost made him a poet; and indeed he wrote a piece of poetry for the entertainment of Christina, Queen of Sweden, which however was suppressed in honour to his memory.

上天赐予笛卡尔以卓越丰富的想象力，因而他在私生活和思维方式上都独树一帜。即便在他的哲学作品中，这种想象力也自然而然流露出来，随处皆是出彩而精妙的隐喻与修辞，无不令人赞叹。他天赋异禀，几乎可成诗人。他也的确曾为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作诗一篇以供幕间余兴，但出于对女王的尊重，该诗只能封存记忆之中，未能发表。

He embraced a military life for some time, and afterwards becoming a complete philosopher, he did not think the passion of love derogatory to his character. He had by his mistress a daughter called Froncine, who died young, and was very much regretted by him. Thus the experienced every passion incident to mankind.

他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军旅生涯，之后成了不折不扣的哲学家，他还认为炽热的爱情无损于人格。他与情妇有过一个私生女，名叫弗朗西娜，但不幸夭折，令他极为痛惜。他也因此饱尽人间甘苦沧桑。

He was a long time of opinion that it would be necessary for him to fly from the society of his fellow creatures, and especially from his native country, in order to enjoy the happiness of cultivating his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full liberty.

他曾一度认为必须远离世俗凡尘，尤其要远离祖国，以全心投入哲学研究，享受其中乐趣。

Descartes was very right, for his contemporaries were not knowing enough to improve had enlighten his understanding, and were capable of little else than of giving him uneasiness.

他的想法是对的，因为他的同代人见识短浅，难有助于激发他的思想，且能力微薄，只会让他不自在。

He left France purely to go in search of truth, which was then persecuted by the wretched philosophy of the schools. However, he found that reason was as much disguised and depraved in the universities of Holland, into which he withdrew, as in his own country. For at the time that the French condemned the only propositions of his philosophy which were true, he was persecuted by the pretended philosophers of Holland, who understood him no

better; and who, having a nearer view of his glory, hated his person the more, so that he was obliged to leave Utrecht. Descartes was injuriously accused of being an atheist, the last refuge of religious scandal: and he who had employed all the sagacity and penetration of his genius, in searching for new proofs of the existence of a God, was suspected to believe there was no such Being.

他离开法国，只为寻求真理，因为真理在法国已遭到拙劣的经院哲学所迫害。然而，当他隐居荷兰时却发现，同法国一样，真理在大学里也被虚伪蚕食，早已变了味。当法国人向他哲学中仅有的真命题发起非难时，荷兰的伪哲学家们也迫害着他。这些伪哲学家同样不了解他，越是见识他的光环，越是嫉恨他，因此他只得离开乌得勒支。他被诬告成无神论者，这是宗教诽谤的最后招数了。笛卡尔曾用尽自己的敏锐才智以寻求上帝存在的新证据，但却遭人怀疑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Such a persecution from all sides, must necessarily suppose a most exalted merit as well as a very distinguished reputation, and indeed he possessed both. Reason at that time darted a ray upon the world through the gloom of the schools, and the prejudices of popular superstition. At last his name spread so universally, that the French were desirous of bringing him back into his native country by rewards, and accordingly offered him an annual pension of a thousand crowns. Upon these hopes Descartes returned to France; paid the fees of his patent, which was sold at that time, but no pension was settled upon him. Thus disappointed, he returned to his solitude in North Holland, where he again pursued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whilst the great Galileo, fourscore years of age, was groaning in the prisons of the Inquisition, only for having demonstrated the earth's motion.

既然招致多方迫害，必有其丰功盛誉，的确笛卡尔两者俱全。就在此时，一束理性的曙光，透过经院的阴霾和俗世的迷信偏见，投向大地。最终，笛卡尔名扬四海。法国不惜重金，极力请他回国，并开出每年一千埃居的津贴。他满怀期望回到法国，交了特权证的费用——这种特权证当时可以出售——却从未得到任何津贴回报。失望之余，笛卡尔回到荷兰北部隐居起来，继续他的哲学探索。而此时，年届八旬的伟人伽利略，因证实地球运动，正遭受罗马宗教裁判所的牢狱之灾。

At last Descartes was snatched from the world in the flower of his age at Stockholm. His death was owing to a bad regimen, and he expired in the midst of some literati who were his enemies, and under the hands of a physician to whom he was odious.

最终，笛卡尔在斯德哥尔摩英年早逝。由于休养无道，他死在了一个令他憎恶的医生手里，周围还有与他敌对的学者目睹着他断气。

The progress of Sir Isaac Newton's life was quite different. He lived happy, and very much honoured in his native country, to the age of fourscore and five years.

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命运轨迹则截然不同了。他一生快乐幸福，享年八十有五，深受国人敬仰。

It was his peculiar felicity, not only to be born in a country of liberty, but in an age when all scholastic impertinences were

banished from the world. Reason alone was cultivated, and mankind could only be his pupil, not his enemy.

牛顿的幸福恰恰因为他不仅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而且活在经院空谈荡然无存的时代。那是一个独尚理性的时代，世人只能从而师之，不可与之为敌。

One very singular difference in the lives of these two great men is, that Sir Isaac, during the long course of years he enjoyed, was never sensible to any passion, was not subject to the common frailties of mankind, nor ever had any commerce with women—a circumstance which was assured me by the physician and surgeon who attended him in his last moments.

两位哲人一生最大的不同在于，牛顿爵士在其悠长的一生中，既不纵欲，又鲜有常人的弱点，从未和女人有过交往——这些都是他临终前照顾他的内外科医生向我证实的。

We may admire Sir Isaac Newton on this occasion, but then we must not censure Descartes.

对此，我们应颂扬艾萨克·牛顿爵士，但绝不可责难笛卡尔。

The opinion that generally prevails in England with regard to these new philosophers is, that the latter was a dreamer, and the former a sage.

对于这两位划时代的哲人，英国人普遍认为，笛卡尔是个空想家，而牛顿则是位圣贤。

Very few people in England read Descartes, whose works indeed are now useless. On the other side, but a small number peruse those of Sir Isaac, because to do this the student must be deeply skilled in the mathematics, otherwise those works will be unintelligible to him. But notwithstanding this, these great men are the subject of everyone's discourse. Sir Isaac Newton is allowed every advantage, whilst Descartes is not indulged a single one. According to some, it is to the former that we owe the discovery of a vacuum, that the air is a heavy body, and the invention of telescopes. In a word, Sir Isaac Newton is here as the Hercules of fabulous story, to whom the ignorant ascribed all the feats of ancient heroes.

英国人很少读笛卡尔，他的作品如今已一无是处。而牛顿的作品，也鲜有人研读，因为学生若要拜读其作品，必须精通数学，否则根本无法读懂。尽管如此，两位大师仍是大家的谈资。牛顿处处饱受眷顾，而笛卡尔则得不到一句褒奖。有人说，牛顿发现了真空，发现了空气具有重量，还发明了望远镜，我们应该感激他。总之，艾萨克·牛顿爵士就像是神话中的赫尔克里士，无知者将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都归功于他。

In a critique that was made in London on M. de Fontenelle's discourse, the writer presumed to assert that Descartes was not a great geometrician. Those who make such a declaration may justly be reproached with flying in their master's face. Descartes extended

the limits of geometry as far beyond the place where he found them, as Sir Isaac did after him. The former first taught the method of expressing curves by equations. This geometry which, thanks to him for it, is now grown common, was so abstruse in his time, that not so much as one professor would undertake to explain it; and Schotten in Holland, and Fermat in France, were the only men who understood it.

在伦敦，有人发表了一篇针对丰特内勒演说的批判文章，作者妄下断论称笛卡尔并非伟大的几何学家。如此断言的人理应受责备，这是悍然拂逆大师的行径。笛卡尔拓宽了几何学的领域，远远超越他最初所见，这丝毫不逊于牛顿此后的突破。而且，笛卡尔首次提出如何用代数方程表达几何曲线。多亏其发现，几何学如今才得以普及。而当时，由于几何学晦涩深奥，没有一个教授愿费劲去阐释。只有荷兰的凡司顿和法国的费马两人能理解他的观点。

He applied this geometrical and inventive genius to dioptrics, which, when treated of by him, became a new art. And if he was mistaken in some things, the reason of that is, a man who discovers a new tract of land cannot at once know all the properties of the soil. Those who come after him, and make these lands fruitful, are at least obliged to him for the discovery. I will not deny but that there are innumerable errors in the rest of Descartes' works.

他将几何学上的天分及创见应用于屈光学上。屈光学一经他的论述，便成了一门崭新的艺术。要是他在某些事上出了差错，也是情有可原，因为刚发现新大陆的人不见得能即刻看透土壤的分寸毫厘。让这片土地开花结果的后来人至少会感谢他的发现。我并不否认，笛卡尔的其他作品中存在着不可细数的谬误。

Geometry was a guide he himself had in some measure fashioned, which would have conducted him safely through the several paths of natural philosophy. Nevertheless, he at last abandoned this guide, and gave entirely into the humour of forming hypotheses; and then philosophy was no more than an ingenious romance, fit only to amuse the ignorant. He was mistaken in the nature of the soul, in the proofs of the existence of a God, in matter, in the laws of motion, and in the nature of light. He admitted innate ideas, he invented new elements, he created a world; he made man according to his own fancy; and it is justly said, that the man of Descartes is, in fact, that of Descartes only,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real one.

几何学或多或少是笛卡尔一手塑造的向导，引导他安然通过自然哲学的条条小径。不过，他最终抛弃了这个向导，孜孜不倦地推演着各种命题，由此改变了哲学的命运。而在此之前，哲学不过是聪明人的虚想罢了，其影响也无非是满足愚笨之人的猎奇心理。在灵魂的本质问题上，他理解有误；在证明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上，他存有偏见；对于物质、运动定律和光的本源问题上，他亦怀误解。他承认那些先天观念，也提出了若干新原理，甚至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他照着自己的想象创造其中的人。笛卡尔脑中的人，其实是那种纯粹笛卡尔式的人物，他们与现实中人迥然不同，这么说不无道理。

He pushed his metaphysical errors so far, as to declare that two and two make four for no other reason by because God would have it so. However, it will not be making him too great a compliment if we affirm that he was valuable even in his mistakes. He deceived himself, but then it was at least in a methodical way. He destroyed all the absurd chimeras with which youth had been infatuated for

two thousand years. He taught his contemporaries how to reason, and enabled them to employ his own weapons against himself. If Descartes did not pay in good money, he however did great service in crying down that of a base alloy.

他一直坚持自己形而上的错误，宣称“二二得四”只因上帝使然，没有其他理由。不过，若我们相信他的错误亦有价值，也算是一大褒奖。他尽管自欺欺人，但至少看起来有条有理。他摧毁了所有荒谬的幻想，那些让年轻人为之痴迷两千多年的幻想。他教导同代人如何思考，让他们拿起他的武器去推翻他自己。如果说笛卡尔自身投入不多，他却为轰走了哲学中的劣质品，做了很大贡献。

I indeed believe that very few will presume to compare his philosophy in any respect with that of Sir Isaac Newton. The former is an essay, the latter a masterpiece. But then the man who first brought us to the path of truth, was perhaps as great a genius as he who afterwards conducted us through it.

说实话，我想人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擅自将笛卡尔的哲学观与牛顿相比。因为前者只是尝试，后者却是杰作。但那将我们引向真理之路的第一人，也许同后来指引我们通过这条路的人一样，都是伟大的天才。

Descartes gave sight to the blind. These saw the errors of antiquity and of the sciences. The path he struck out is since become boundless. Rohault's little work was, during some years, a complete system of physics; but now all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several academies in Europe put together do not form so much as

the beginning of a system. In fathoming this abyss no bottom has been found. We are now to examine what discoveries Sir Isaac Newton has made in it.

笛卡尔赐予蒙昧的世人以光明。让他们看到了古典与科学的种种缺陷。他开辟的道路从此广阔无垠。在好几个年头里，笛卡尔学生罗奥写的那本小书囊括了整个物理学体系。可如今欧洲各大学会的公报加起来甚至还不及这个体系的开头。要探寻物理学这道深渊之谜，实在是深无穷尽。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艾萨克·牛顿爵士在深渊中的探索发现。

Letter XV—On Attraction

第十五封信　谈引力

THE DISCOVERIES which gained Sir Isaac Newton so universal a reputation, relate to the system of the world, to light, to geometrical infinities; and, lastly, to chronology, with which he used to amuse himself after the fatigue of his severer studies.

艾萨克·牛顿爵士之所以享誉世界，有赖于他在宇宙体系、光学和几何无限问题上的巨大发现，最后还有纪年学上的研究——那是他搁下更为艰难的研究，用来缓解疲劳的一种消遣。

I will now acquaint you (without prolixity if possible) with the few things I have been able to comprehend of all these sublime ideas. With regard to the system of our world disputes were a long time maintained, on the cause that turns the planets, and keeps them in their orbits; and on those causes which make all bodies here below descend towards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他的超凡创见不可胜数，我不过略知皮毛，这就尽量简要地向你们谈谈我的拙见。关于宇宙体系的问题，一直以来都争论不休，究竟是什么让行星转动，将他们维系在轨道上，又是什么让一切物体落向地面。

The system of Descartes, explained and improved since his

time, seemed to give a plausible reason for all those phenomena; and this reason seemed more just, as it is simple and intelligible to all capacities. But in philosophy, a student ought to doubt of the things he fancies he understands too easily, as much as of those he does not understand.

笛卡尔学说自诞生起便历经阐释和改良，似乎为种种现象提供了貌似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简单明了，所有人都能明白，所以显得更有道理。但在哲学上，一个学生对自己觉得能轻易明白的事，要同对待不明白的事一样，持怀疑态度。

Gravity, the falling of accelerated bodies on the earth, the revolution of the planets in their orbits, their rotations round their axis, all this is mere motion. Now motion cannot perhaps be conceived any otherwise than by impulsion; therefore all those bodies must be impelled. But by what are they impelled? All space is full, it therefore is filled with a very subtile matter, since this is imperceptible to us; this matter goes from west to east, since all the planets are carried from west to east. Thus from hypothesis to hypothesis, from one appearance to another, philosophers have imagined a vast whirlpool of subtile matter, in which the planets are carried round the sun: they also have created another particular vortex which floats in the great one, and which turns daily round the planets. When all this is done, it is pretended that gravity depends on this diurnal motion; for, say these, the velocity of the subtile matter that turns round our little vortex, must be seventeen times more rapid than that of the earth; or, in case its velocity is seventeen time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earth, its centrifugal force must be vastly greater, and consequently impel all bodies towards the earth. This is the cause of gravity, according to the Cartesian

system. But the theorist, before he calculated the centrifugal force and velocity of the subtile matter, should first have been certain that it existed.

重力、物体落地时的加速下坠、行星环绕轨道的公转，以及围绕各自轴心的自转，这些都不过是运动。这样说来，或许运动只能由外力所致，因此所有下落的物体定是被外力推动。可究竟是什么在推动它们呢？所有的空间都是充实的，其中一定充满着某种微妙的物质，我们看不到摸不着。这种物质从西向东运动，因为所有行星都自西向东公转。因此，哲学家由一种假设到另一种假设，从一个现象到另一个现象，想象出了一个由微妙物质形成的巨大旋涡，带动行星绕太阳公转：他们还设想出一个漂在大旋涡里的小旋涡，每天绕着行星运转。做出这些设想后，哲学家假想重力依赖于周日运动。比如说，因为微妙物质绕着小旋涡旋转的速度一定比地球转动的速度快十七倍；换言之，如果它的速度比地球转动速度快十七倍，它一定就拥有更巨大的离心力，由此推动一切物体坠向地面。照笛卡尔学说所述，这就是重力的成因。但他这位理论家，在计算该微妙物质的离心力和速度之前，本应先确定它的存在。

Sir Isaac Newton seems to have destroyed all these great and little vortices, both that which carries the planets round the sun, as well as the other which supposes every planet to turn on its own axis.

一切大小旋涡之说，不论是运载着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的大旋涡，还是让所有行星绕轴心自转的小旋涡，似乎都已被牛顿推翻了。

First, with regard to the pretended little vortex of the earth,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it must lose its motion by insensible degrees;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if the earth swims in a fluid, its density must be equal to that of the earth; and in case its density be the same, all the bodies we endeavour to move must meet with an insuperable resistance.

首先，就所谓的绕地球转的小旋涡之说，已证实它必定会以微乎其微的速度逐渐停止运动。还经证实，如果地球在流体中漂浮，流体的密度一定和地球相当；假若它们的密度一致，我们要移动的一切物体必然受到一种无法克服的阻力。

With regard to the great vortices, they are still more chimerical,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them agree with Kepler's law, the truth of which has been demonstrated. Sir Isaac shows, that the revolution of the fluid in which Jupiter is supposed to be carried, is not the same with regard to the revolution of the fluid of the earth, as the revolution of Jupiter with respect to that of the earth. He proves, that as the planets make their revolutions in ellipses, and consequently being at a much greater distance one from the other in their Aphelia, and a little nearer in their Perihelia; the earth's velocity, for instance, ought to be greater when it is nearer Venus and Mars, because the fluid that carries it along, being then more pressed, ought to have a greater motion; and yet it is even then that the earth's motion is slower.

大旋涡之说更是荒诞的猜想，而且与开普勒定律这一公认的真理相悖。牛顿指出，带动木星的流体和地球周围流体的关系，与木星运转和地球运转的关系毫不相同。据他证明，行星以椭圆轨道公转，因此在远日点时彼此距离更远些，在近日点时彼此距离更近些。例如，

地球在离金星和火星较近时，其运转更快，因为带动它的流体，那时受到更强的压力，应该转速更快；然而恰恰在那时，地球的运动却变慢了。

He proves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celestial matter which goes from west to east since the comets traverse those spaces, sometimes from east to west, and at other times from north to south.

牛顿证明，根本不存在从西向东运动的太空物质，因为彗星横穿太空，时而自东向西，时而自北向南。

In fine, the better to resolve, if possible, every difficulty, he proves, and even by experiment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here should be a plenum; and brings back the vacuum, which Aristotle and Descartes had banished from the world.

总之，为了更好地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可能的话），他甚至还通过实验证明，宇宙不可能是充实的。他再次证实，宇宙其实是虚空的，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所否定的。

Having by these and several other arguments destroyed the Cartesian vortices, he despaired of ever being able to discover whether there is a secret principle in nature which, at the same time, is the cause of the motion of all celestial bodies, and that of gravity on the earth. But being retired in 1666, upon account of the Plague, to a solitude near Cambridge; as he was walking one day in

his garden, and saw some fruits fall from a tree, he fell into a profound meditation on that gravity, the cause of which had so long been sought, but in vain, by all the philosophers, whilst the vulgar think there is nothing mysterious in it. He said to himself, that from what height soever in our hemisphere, those bodies might descend, their fall would certainly be in the progression discovered by Galileo; and the spaces they run through would be as the square of the times. Why may not this power which causes heavy bodies to descend, and is the same without any sensible diminution at the remotest distance from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or on the summits of the highest mountains, why, said Sir Isaac, may not this power extend as high as the moon? And in case its influence reaches so far, is it not very probable that this power retains it in its orbit, and determines its motion? But in case the moon obeys this principle (whatever it be) may we not conclude very naturally that the rest of the planets are equally subject to it? In case this power exists (which besides is proved) it must increase in an inverse ratio of the squares of the distances. All, therefore, that remains is, to examine how far a heavy body, which should fall upon the earth from a moderate height, would go; and how far in the same time, a body which should fall from the orbit of the moon, would descend. To find this, nothing is wanted but the measure of the earth, and the distance of the moon from it.

通过以上及其他种种论据，牛顿彻底推翻了笛卡尔的旋涡说。与此同时，他又为自己无法发现大自然中是否存在某种神秘法则，以促使天体运转及产生地心引力，而倍感绝望。就在1666年，牛顿为了躲避伦敦大瘟疫，搬到剑桥附近隐居起来。一天，他在花园中散步，看到几颗果子从树上落下来，这引发了他对重力的沉思。重力的成因是所有哲学家长久以来所探求的问题，却一直徒劳无获，而在乡野村夫看来，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牛顿自言自语道，物质无论处于北半球的

哪个高度，都会下落，这无疑符合伽利略发现的级数概念；它们所经过的距离应该是时间的平方。牛顿说，为什么这种引发重物落体的力量，在离地心最远处与在山顶最高处是一致的，丝毫未曾减弱？为什么这种力量不会延伸到月球？如果月球上存在这种力量，那么它让月球维持在轨道上运行，并决定它的运动，不也是很可能的吗？但如果月球运动遵循该法则（无论是什么法则），我们不就能自然推断出其他行星也受该法则制约吗？如果这种力量存在（且已证实），它的增长一定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么剩下要做的，就是验证重物从适当高度降落到地面需要保持多大距离。同时，也要验证物体从月球的轨道下落需要保持多少距离。要找到答案，只需测量地球的大小，以及地月之间的距离。

Thus Sir Isaac Newton reasoned. But at that time the English had but a very imperfect measure of our globe, and depended on the uncertain supposition of mariners, who computed a degree to contain but sixty English miles, whereas it consists in reality of near seventy. As this false computation did not agree with the conclusions which Sir Isaac intended to draw from them, he laid aside this pursuit. A half-learned philosopher, remarkable only for his vanity, would have made the measure of the earth agree, anyhow, with his system. Sir Isaac, however, chose rather to quit the researches he was then engaged in. But after Mr. Picard had measured the earth exactly, by tracing that meridian which redounds so much to the honour of the French, Sir Isaac Newton resumed is former reflections, and found his account in Mr. Picard's calculation.

这就是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推论。但当时英国人测量地球的方法很不周密，依赖海员们不确切的猜测：他们以六十英里为一度，而实际上应以近七十英里为一度来计算。由于牛顿的推论与这种错误的计算

方法并不相符，他只能暂时搁下这项工作。若是个一知半解的哲学家，只追求表面虚荣，总会想办法让地球的测量结果自圆其说。然而，牛顿宁可选择放弃这项致力已久的研究。后来，法国天文学家皮卡尔通过追踪子午线的方法精确测量出地球尺寸，为法国增添了光彩。牛顿这才继续先前的思索，并在皮卡尔的测算中找到了解释。

A circumstance which has always appeared wonderful to me, is that such sublime discoveries should have been made by the sole assistance of a quadrant and a little arithmetic.

我始终认为这是件了不起的事，竟然单凭一架象限仪和几步算术便能成就如此伟大的发现。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earth is 123, 249, 600 feet. This, among other things, is necessary to prove the system of attraction.

地球的周长是123,249,600法尺。这是论证引力学说的关键之一。

The instant we know the earth's circumference, and the distance of the moon, we know that of the moon's orbit, and the diameter of this orbit. The moon performs its revolution in that orbit in twenty-seven days, seven hours, forty-three minutes.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moon in its mean motion makes an hundred and fourscore and seven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sixty feet (of Paris) in a minute. It is likewise demonstrated, by a known theorem, that the central force which should make a body fall from

the height of the moon, would make its velocity no more than fifteen Paris feet in a minute of time. Now if the law by which bodies gravitate and attract one another in an inverse ratio to the squares of the distances be true, if the same power acts according to that law throughout all nature, it is evident that as the earth is sixty semi-diameters distant from the moon, a heavy body must necessarily fall (on the earth) fifteen feet in the first second, and fifty-four thousand feet in the first minute. Now a heavy body falls, in reality, fifteen feet in the first second, and goes in the first minute fifty-four thousand feet, which number is the square of sixty multiplied by fifteen. Bodies, therefore, gravitate in an inverse ratio of the squares of the distances; consequently, what causes gravity on earth, and keeps the moon in its orbit, is one and the same power; it being demonstrated that the moon gravitates on the earth, which is the centre of its particular motion,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earth and the moon gravitate on the sun which is the centre of their annual motion.

知道了地球的周长以及它和月球的距离，就知道了月球轨道的周长和直径。月球绕轨道公转的周期为27天7小时43分。由此可证，月球平均运动速度是每分钟187,960法尺。从已知定理同样可证，使物体从月球的高度下落的中心力，让它在第1分钟保持最多15法尺的下落速度。如果物体间的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定律是正确的，且这种引力在自然界均遵循该定律的话，那么当地球在距离月球60个半径远时，（地球上的）重物必然在第1秒下落15法尺，在第1分钟下落54,000法尺。实际上，重物在第1秒下落15法尺，在第1分钟降落54,000法尺，也就是60的平方乘以15。所以，物体的引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因此，地球上产生重力的起因，和维持月球在轨道运行的起因，是同一种力量。既已证明，月球受地球引力作用，地球处于其特定运动的中心，也就证明，地球和月球亦受太阳引力作用，太阳是它们周年运动的中心。

The rest of the planets must be subject to this general law; and if this law exists, these planets must follow the laws which Kepler discovered. All these laws, all these relations are indeed observed by the planets with the utmost exactness; therefore, the power of attraction causes all the planets to gravitate towards the sun, in like manner as the moon gravitates towards our globe.

其他行星也一定遵守这条普遍定律；如果这条定律存在，这些行星的运动必然遵循开普勒定律。所有这些定律、所有这些关系确实是行星运动严格遵守的。因此，引力作用使所有行星受到太阳吸引，如同月球受到地球的吸引一样。

Finally as in all bodies re-action is equal to action, it is certain that the earth gravitates also towards the moon; and that the sun gravitates towards both. That every one of the satellites of Saturn gravitates towards the other four, and the other four towards it; all five towards Saturn, and Saturn towards all. That it is the same with regard to Jupiter; and that all these globes are attracted by the sun, which is reciprocally attracted by them.

最后，由于物体的反作用力与作用力相等，所以地球也被月球所吸引，太阳也同时被地球和月球所吸引。土星的每一颗卫星都被其他四颗卫星所吸引，而其他四颗卫星也反向受到吸引；所有五颗卫星都被土星吸引，同时土星亦受五颗卫星吸引。木星也是如此。所有天体均受太阳吸引，反之亦然。

This power of gravitation acts proportionably to the quantity of

matter in bodies, a truth, which Sir Isaac has demonstrated by experiments. This new discovery has been of use to show that the sun (the centre of the planetary system) attracts them all in a direct ratio of their quantity of matter combined with their nearness. From hence Sir Isaac, rising by degrees to discoveries which seemed not to be formed for the human mind, is bold enough to compute the quantity of matter contained in the sun and in every planet; and in this manner shows, from the simple laws of mechanics, that every celestial globe ought necessarily to be where it is placed.

这种引力同物体所含物质的量成比例，这是牛顿通过实验证明的真理。这项新发现业已证明，太阳作为行星系的中心，对所有行星起吸引作用，引力与行星的质量及其与太阳的距离成正比。此后，牛顿逐渐发现人类思想中从未有过的概念。他甚至大胆估算太阳和所有行星的质量，并以此表明，从力学的基本定律看来，每个天体都必然在它如今所处的位置。

His bare principle of the laws of gravitation accounts for all the apparent inequalities in the course of the celestial globes. The variations of the moon are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those laws. Moreover, the reason is evidently seen why the nodes of the moon perform their revolutions in nineteen years, and those of the earth in about twenty-six thousand. The several appearances observed in the tides are also a very simple effect of this attraction. The proximity of the moon, when at the full, and when it is new, and its distance in the quadratures or quarters, combined with the action of the sun, exhibit a sensible reason why the ocean swells and sinks.

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最基本原理解释了天体运行时的所有不规则

现象。月球运动的二均差便是这些定律的必然结果。此外，月球交点的进动周期为19年，而地球交点的进动周期约为26,000年，其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潮汐观测中的种种现象也纯粹是引力作用的结果。满月与新月之时，月球离地球近，上下弦月时，月球则离地球远，加上太阳的作用，使海洋的潮起潮落有了合理的缘由。

After having shown by his sublime theory the course and inequalities of the planets, he subjects comets to the same law. The orbit of these fires (unknown for so great a series of years), which was the terror of mankind and the rock against which philosophy split, placed by Aristotle below the moon, and sent back by Descartes above the sphere of Saturn, is at last placed in its proper seat by Sir Isaac Newton.

他用其超凡的理论解释了行星运行轨迹和不规则特征之后，又将同样的定律套用在彗星上。这些“火球”（多年来始终不为人知）的轨道，是人类的恐惧所在，亦是哲学道路上的挡路石。彗星最初被亚里士多德排在月球之下，后被笛卡尔排在土星之上，最后才被艾萨克·牛顿爵士摆在正确的位置上。

He proves that comets are solid bodies which move in the sphere of the sun's activity, and that they describe an ellipsis so very eccentric, and so near to parabolas, that certain comets must take up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in their revolution.

他证明彗星是实心的天体，在太阳活动范围内运行，其运动轨迹是不规则的椭圆，近似于抛物线，因而某些彗星的公转周期甚至超过五百年。

The learned Dr. Halley is of opinion that the comet seen in 1680 is the same which appeared in Julius Caesar's time. This shows more than any other that comets are hard, opaque bodies; for it descended so near to the sun, as to come within a sixth part of the diameter of this planet from it, and consequently might have contracted a degree of heat two thousand times stronger than that of red-hot iron; and would have been soon dispersed in vapour, had it not been a firm, dense body. The guessing the course of comets began then to be very much in vogue. The celebrated Bernoulli concluded by his system than the famous comet of 1680 would appear again the 17th of May, 1719. Not a single astronomer in Europe went to bed that night. However, they needed not to have broke their rest, for the famous comet never appeared. There is at least more cunning, if not more certainty, in fixing its return to so remote a distance as five hundred and seventy-five years. As to Mr. Whiston, he affirmed very seriously that in the time of the Deluge a comet overflowed the terrestrial globe. And he was so unreasonable as to wonder that people laughed at him for making such an assertion. The ancients were almost in the same way of thinking with Mr. Whiston, and fancied that comets were always the forerunners of some great calamity which was to befall mankind. Sir Isaac Newton, on the contrary, suspected that they are very beneficent, and that vapours exhale from them merely to nourish and vivify the planets, which imbibe in their course the several particles the sun has detached from the comets, an opinion which, at least, is more probable than the former. But this is not all. If this power of gravitation or attraction acts on all the celestial globes, it acts undoubtedly on the several parts of these globes. For in case bodies attract one another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f matter contained in them, it can only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f their parts; and if this power is found in the whole, it is

undoubtedly in the half, in the quarter, in the eighth part, and so on in infinitum.

博学的哈雷博士认为1680年出现的那颗彗星就是恺撒时代出现的那颗。这无疑表明，彗星是坚硬而不透明的天体。因为它降落时离太阳非常接近，仅有太阳直径的六分之一那么远，所以恐怕吸收了比滚热的铁还要高出两千倍的热量。如果它不是坚硬又密实的天体，很快就会化为蒸汽。接着，对彗星运行轨道的探测开始风行一时。著名数学家贝尔努利根据其学说推断，在1680年出现的那颗有名的彗星将会在1719年5月17日再次出现。就在那天，欧洲所有的天文学家都彻夜未眠。其实，他们根本不必打乱作息时间，因为那颗有名的彗星根本没出现。要是将彗星的回归时间设定在575年后这么久远，即便不算太有把握，至少也算比较聪明。至于那位几何学家惠斯顿先生，他十分严肃地断言在大洪水时代，彗星的到来会淹没整个陆地。他真是异想天开，人们对他如此断言，嗤之以鼻。古人差不多都与惠斯顿先生的想法一致，他们认为彗星是巨大天灾降临的凶兆。相反，牛顿则推断彗星大有益处，彗星散发的蒸汽只会滋养行星，使其富有生机；同时，行星又吸收了太阳从彗星上分解出的微粒。这种观点，起码要比前一种观点来得可信。但也并不尽然。如果重力（引力）作用于一切天体，那它也无疑作用于这些天体的各个部分。倘若物体间的引力与其所含物质的量成正比，它只能是与各部分的质量成正比。假如这种力量存在于整个天体之中，毫无疑问在半个天体、四分之一天体、八分之一天体，甚至无穷小的天体上都能够找到它。

This is attraction, the great spring by which all Nature is moved. Sir Isaac Newton, after having demonstrated the existence of this principle, plainly foresaw that its very name would offend; and, therefore, this philosopher, in more places than one of his books, gives the reader some caution about it. He bids him beware of confounding this name with what the ancients called occult

qualities, but to be satisfied with knowing that there is in all bodies a central force, which acts to the utmost limits of the universe, according to the invariable laws of mechanics.

这就是引力，推动大自然演进的伟大源泉。牛顿在证实了这项定律的存在之后，便清楚预见引力这个名字会引发反感。于是这位谨慎的哲学家，在自己的书中不止一次告诫读者须加以注意。他告诫读者不可将该词与古人口中的玄奥力量相混淆，只需要知道所有物体都存在着一种中心力量，根据力学守恒定律，其作用范围可达宇宙之极限。

It is surprising, after the solemn protestations Sir Isaac made, that such eminent men as Mr. Sorin and M. de Fontenelle should have imputed to this great philosopher the verbal and chimerical way of reasoning of the Aristotelians; Mr. Sorin in the Memoirs of the Academy of 1709, and M. de Fontenelle in the very eulogium of Sir Isaac Newton.

出人意料的是，在牛顿发表郑重声明后，索兰先生和丰特内勒先生这样极富声望的人物竟指责牛顿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犯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空谈和幻想的错误。索兰先生在法兰西科学院1709年回忆录中提出这一看法，丰特内勒先生则恰是在其牛顿颂词中做出这一批评。

Most of the French (the learned and others) have repeated this reproach. These are for ever crying out, “Why did he not employ the word impulsion, which is so well understood, rather than that of attraction, which is unintelligible?”

几乎所有法国人（无论学问高低）都这么反复指责他。他们一直大声疾呼：“为什么他不用明白易懂的‘驱动力’这个词，却偏要用‘引力’这么令人费解的字眼？”

Sir Isaac might have answered these critics thus:—“First, you have as imperfect an idea of the word impulsion as of that of attraction; and in case you cannot conceive how one body tends towards the centre of another body, neither can you conceive by what power one body can impel another.

牛顿或许可以这样回答这些批评家：“首先，和‘引力’这个词一样，你们对‘驱动力’这个词也不见得熟悉；假如你们想不出一个物体如何接近另一个物体中心的话，那你也想象不出一个物体凭借什么力量推动另一个物体。”

“Secondly, I could not admit of impulsion; for to do this I must have known that a celestial matter was the agent. But so far from knowing that there is any such matter, I have proved it to be merely imaginary.

“其次，我无法承认‘驱动力’的存在，要是承认的话，就必须确认有种太空物质作为原动力。可是我非但不知晓它的存在，还证实它只是幻想。”

“Thirdly, I use the word attraction for no other reason but to express an effect which I discovered in Nature—a certain and indisputable effect of an unknown principle—a quality inherent in

matter, the cause of which persons of greater abilities that I can pretend to may, if they can, find out.”

“第三，我用‘引力’这个词不过是要表达我在自然界中发现的一种效果，一种由未知定律引起的特定且不容置疑的效果。它是物质的固有特性，其起因只有那些才识过人之辈方能探知，我也算是妄称其一。”

“What have you, then, taught us?” will these people say further; “and to what purpose are so many calculations to tell us what you yourself do not comprehend?”

“那么，你究竟教会了我们什么？”这些人会逼问，“告诉我们这么多推论有何作用，连你自己都弄不明白。”

“I have taught you,” may Sir Isaac rejoin, “that all bodies gravitate towards one another in proportion to their quantity of matter; that these central forces alone keep the planets and comets in their orbits, and cause them to move in the proportion before set down. I demonstrate to you that it is impossible there should be any other cause which keeps the planets in their orbits than that general phenomenon of gravity. For heavy bodies fall on the earth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 demonstrated of central forces; and the planets finishing their course according to these same proportions, in case there were another power that acted upon all those bodies, it would either increase their velocity or change their direction. Now, not one of those bodies ever has a single degree of motion or velocity, or has any direction but what is demonstrated to be the

effect of the central forces. Consequently it is impossible there should be any other principle.”

牛顿也许会反驳，“我所教给你们的是，一切物体彼此作用的引力与其质量成正比，这些中心力维持着行星与彗星在其轨道运行，使它们在落地之前成比例运行。我可以向你们证明，除了普遍的引力现象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维持行星在其轨道运行。因为重物是按照中心力已证明的比例而落到地上，而行星也是按照相同比例来完成运行轨迹。如果有另一种力量作用于这些物体上，它要么增加它们的速度，要么改变它们的方向。目前，没有任何一个物体产生丝毫位移和加速，抑或出现朝向已被证明的中心力影响之外的方向移动。因此，不可能存在其他任何定律。”

Give me leave once more to introduce Sir Isaac speaking. Shall he not be allowed to say, “My case and that of the ancients is very different. These saw, for instance, water ascend in pumps, and said, “the water rises because it abhors a vacuum.” But with regard to myself, I am in the case of a man who should have first observed that water ascends in pumps, but should leave others to explain the cause of this effect. The anatomist, who first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of the arm is owing to the contraction of the muscles, taught mankind an indisputable truth. But are they less obliged to him because he did not know the reason why the muscles contract? The cause of the elasticity of the air is unknown, but he who first discovered this spring performed a very signal service to natural philosophy. The spring that I discovered was more hidden and more universal, and for that very reason mankind ought to thank me the more. I have discovered a new property of matter-one of the secrets of the Creator-and have calculated and discovered the effects of it. After this, shall people quarrel with me about the name I give it?”

请允许我再介绍几句牛顿说的话。别人不会让他这样说："我的情况与古人的截然不同。比如，古人看到水在泵中上升时，便会说，'水喷出来是因为它讨厌真空。'可就我而言，我会是那个最先观察到水在泵中上升的人，但这一现象将留给他人去解释。解剖学家首次宣称手臂能动是因为肌肉收缩的缘故，教给了人们这个不容置疑的真理。但他却不知道肌肉收缩的原因，人们会不会因此不那么感激涕零呢？没人知道空气弹力的起因，但第一个发现这种弹力的人无疑是对自然哲学做出了显著贡献。我发现的这种原动力来得更神秘、更普遍，所以人们更应该感谢我。我发现了物质的一种全新属性——它是造物者的奥秘之一——我还测算并发现了它的作用。既然如此，人们还会因为我起的名字再去挑刺吗？"

Vortices may be called an occult quality because their existence was never proved. Attraction, on the contrary, is a real thing because its effects are demonstrated, and the proportions of it are calculated. The cause of this cause is among the Arcana of the Almighty.

大小旋涡或许只能称作是一种玄妙的特质，因为它们的存在从未经过证实。与之相反，引力却是真真切切的存在，因为它的作用已然展现，我们也推算了它的影响范围。这种因由正是上帝的奥秘所在。

"*Procedeshuc, et non amplius* ." (Thus far shalt thou go, and no farther.)

（拉丁语）"到此止住，不再往前。"

Letter XVI—On Sir Isaac Newton's Optics

第十六封信　谈牛顿光学

THE PHILOSOPHERS of the last age found out a new universe; and a circumstance which made its discovery more difficult was that no one had so much as suspected its existence. The most sage and judicious were of opinion that it was a frantic rashness to dare so much as to imagine that it was possible to guess the laws by which the celestial bodies move and the manner how light acts. Galileo, by his astronomical discoveries, Kepler, by his calculation, Descartes (at least, in his dioptrics), and Sir Isaac Newton, in all his works, severally saw the mechanism of the springs of the world. The geometricians have subjected infinity to the laws of calculatio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in animals, and of the sap in vegetables, have changed the face of Nature with regard to us. A new kind of existence has been given to bodies in the air-pump. By the assistance of telescopes bodies have been brought nearer to one another. Finally, the several discoveries which Sir Isaac Newton has made on light are equal to the boldest things which the curiosity of man could expect after so many philosophical novelties.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宇宙。然而，这个新宇宙的存在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这让进一步的探索变得举步维艰。在那些最为英明的圣哲看来，胆敢认为可以推算出天体运动和光作用的规律，简直是既狂妄又鲁莽。伽利略的天文发现、开普勒的伟大推算、笛卡尔（至少是他的折光学），以及牛顿爵士的所有著作，分别都论及了宇宙原动力的作用机制。几何学家则将无穷数纳入了运算法则中。动物体内血液的循环、植物体内汁液的流动已然改变了我们眼中

大自然的面貌。抽气泵里的物体呈现出全新的存在形式。通过望远镜，人们眼中物体彼此间的距离缩短了。最后，牛顿的几项光学发现堪称空前绝后，是在诸多哲学新发现之后，最能满足人类好奇心的大胆设想。

Till Antonio de Dominis the rainbow was considered as an inexplicable miracle. This philosopher guessed that it was a necessary effect of the sun and rain. Descartes gained immortal fame by his mathematical explication of this so natural a phenomenon. He calculated the reflections and refractions of light in drops of rain. And his sagacity on this occasion was at that time looked upon as next to divine.

在安托尼沃·德·多米尼斯的发现之前，彩虹从来是一大不解之谜。而这位哲人认为，彩虹是阳光和雨水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笛卡尔则用数学方法解释了这个再自然不过的现象，因而流芳百世。他计算出了光在雨滴中的反射率和折射率。因此在当时，他的远见卓识受人景仰，成就之高，仅次于神明。

But what would he have said had it been proved to him that he was mistaken in the nature of light; that he had not the least reason to maintain that it is a globular body? That it is false to assert that this matter, spreading itself through the whole, waits only to be projected forward by the sun, in order to be put in action, in like manner as a long staff acts at one end when pushed forward by the other. That light is certainly darted by the sun; in fine, that light is transmitted from the sun to the earth in about seven minutes through a cannon-ball, which were not to lose any of its velocity, could not go that distance in less than twenty-five years. How great

would have been his astonishment had he been told that light does not reflect directly by impinging against the solid parts of bodies, that bodies are not transparent when they have large pores, and that a man should arise who would demonstrate all these paradoxes, and anatomise a single ray of light with more dexterity than the ablest artist dissects a human body. This man is come. Sir Isaac Newton has demonstrated to the eye, by the bare assistance of the prism, that light is a composition of coloured rays, which, being united, form white colour. A single ray is by him divided into seven, which all fall upon a piece of linen, or a sheet of white paper, in their order, one above the other, and at unequal distances. The first is red, the second orange, the third yellow, the fourth green, the fifth blue, the sixth indigo, the seventh a violet-purple. Each of these rays, transmitted afterwards by a hundred other prisms, will never change the colour it bears; in like manner, as gold, when completely purged from its dross, will never change afterwards in the crucible. As a superabundant proof that each of these elementary rays has inherently in itself that which forms its colour to the eye, take a small piece of yellow wood, for instance, and set it in the ray of a red colour; this wood will instantly be tinged red. But set it in the ray of a green colour, it assumes a green colour, and so of all the rest.

但倘若有人向他证明他对光的本质的看法是错误的，光是球状体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他将何言以对？在笛卡尔看来，光弥漫于整个宇宙，只需太阳往前投射，光就可以运动，就像推动长棍的一端，另一端就会动起来一样。可要是这种论断也是错误的，他将如何作答？光线无疑是太阳投射出的。简而言之，光线大约经过七分钟到达地球，而一发炮弹，即使全速前进，至少需要二十五年才能飞那么远，他将怎样解释？如果说光反射并不是因为碰撞到物体的坚硬部分，如果说孔隙大的物体不会是透明的，如果说会出现这样一个人，他能证

明所有这些似非而是的说法，他能高明地解析一束光线，技艺之精湛，更胜剖析人体构造的能工巧匠，笛卡尔将何等震惊？此人已经出世了。牛顿仅借助于三棱镜，就让世人亲眼目睹，光是由各色光线组成的，它们浑然一体时便呈白色。他将一条光线分为七道光，映射在一块麻布或一张白纸上，七道光线依次排列，从高到低，宽窄不等。第一道是红色，第二道橙色，第三道黄色，第四道绿色，第五道蓝色，第六道靛色，第七道紫色。每道光即便再经一百个棱镜折射，也绝不再改变自身的颜色，如同去除了一切杂质的黄金，在坩埚里灼烧后永不变质。这些单色光中的任何一条，其呈现给人眼的颜色是其自身固有的。为了有力证明这一点，可以取一小块黄木，将其置于红色光线中，它将立刻呈现红色。若将其置于绿光中，它又会呈现绿色，以此类推，皆是如此。

From what cause, therefore, do colours arise in Nature? It is nothing but the disposition of bodies to reflect the rays of a certain order and to absorb all the rest.

那么，自然界中的各种颜色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不外乎是因为物体不同的构造，它们反射了某种单色光，而吸收了其余颜色的光。

What, then, is this secret disposition? Sir Isaac Newton demonstrates that it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density of the small constituent particles of which a body is composed. And how is this reflection performed? It was supposed to arise from the rebounding of the rays, in the same manner as a ball on the surface of a solid body. But this is a mistake, for Sir Isaac taught the astonished philosophers that bodies are opaque for no other reason but because their pores are large, that light reflects on our eyes from the very bosom of those pores, that the smaller the pores of a body are the

more such a body is transparent. Thus paper, which reflects the light when dry, transmits it when oiled, because the oil, by filling its pores, makes them much smaller.

那么，物体构造的奥秘何在？牛顿证明，物体结构的不同无非是因为构成物体的细小颗粒的密度不同。那么反射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人们原本以为，反射是由于光线遇到障碍物弹回形成的，就像球体撞到坚硬物体表面后反弹一样。但牛顿证明这是错误的，这让其他哲学家震惊不已。他说物体不透明正是因为它们孔隙较大，光从这些孔隙的正中心反射回去；物体孔隙越小，越显得透明。因此，干燥的纸反光，上了油的纸透光，因为油填充了纸的孔隙，使其大为缩小了。

It is there that examining the vast porosity of bodies, every particle having its pores, and every particle of those particles having its own, he shows we are not certain that there is a cubic inch of solid matter in the universe, so far are we from conceiving what matter is. Having thus divided, as it were, light into its elements, and carried the sagacity of his discoveries so far as to prove the method of distinguishing compound colours from such as are primitive, he shows that these elementary rays, separated by the prism, are ranged in their order for no other reason but because they are refracted in that very order; and it is this property (unknown till he discovered it) of breaking or splitting in this proportion; it is this unequal refraction of rays, this power of refracting the red less than the orange colour, &c., which he calls the different refrangibility. The most reflexible rays are the most refrangible, and from hence he evinces that the same power is the cause both of the reflection and refraction of light.

牛顿仔细观察了各种物体中的大量孔隙，每颗微粒都有许多孔隙，构成那些微粒的微粒又有自身的孔隙。他由此表明，我们无法确定宇宙中是否存在一立方英寸的密实物质，要了解物质的本源，还差得很远。牛顿如是将光分解成单色光线，并进一步发挥他的远见卓识，以验证如何区分合成色与自然色。他证明，经棱镜分离而出的单色光线，其排列之所以有一定的顺序，就是因为光是按照这一顺序发生折射的，光的这种按一定比例分离的性质为前人所未知。牛顿将光线的不均等折射，这种红色光的折射能力弱于橙色光等特征，称为“折光度”。反射能力最强的光，其折射能力也最强。他由此证实，造成光反射和折射的来源是同一股力量。

But all these wonders are merely but the opening of his discoveries. He found out the secret to see the vibrations or fits of light which come and go incessantly, and which either transmit light or reflect it, according to the density of the parts they meet with. He has presumed to calculate the density of the particles of air necessary between two glasses, the one flat, the other convex on one side, set one upon the other, in order to operate such a transmission or reflection, or to form such and such a colour.

以上种种奇思妙想不过是牛顿探索之旅的开端。他找到了观察光振动和波动的秘诀。这种振动和波动循环往复，并根据照射介质密度，透射或折射光线。他甚至还计算，为了实现光的透射和反射，或显现某种颜色的光，一块平面镜和一块凸面镜相叠合后，两者之间的空气颗粒密度需达到多少。

From all these combinations he discovers the proportion in which light acts on bodies and bodies act on light.

牛顿通过上述种种实验，发现了光与物体相互间的影响程度。

He saw light so perfectly, that he has determined to what degree of perfection the art of increasing it, and of assisting our eyes by telescopes, can be carried.

他对光的了解极其透彻，并认识到望远镜在增强光线、辅助观察方面，应进行何种程度的完善。

Descartes, from a noble confidence that was very excusable, considering how strongly he was fired at the first discoveries he made in an art which he almost first found out; Descartes, I say, hoped to discover in the stars, by the assistance of telescopes, objects as small as those we discern upon the earth.

笛卡尔在光学上自命清高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项研究几乎是他最早建立的，其开山创见使他颇受鼓舞。我认为，笛卡尔是想借助望远镜发现群星中极其微小的物质，就像能在地球上分辨的一样小。

But Sir Isaac has shown that dioptric telescopes cannot be brought to a greater perfection, because of that refraction, and of that very refrangibility, which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y bring objects nearer to us, scatter too much the elementary rays. He has calculated in these glasses the proportion of the scattering of the red and of the blue rays; and proceeding so far as to demonstrate things which were not supposed even to exist, he examines the inequalities which arise from the shape or figure of the glass, and

that which arises from the refrangibility. He finds that the object glass of the telescope being convex on one side and flat on the other, in case the flat side be turned towards the object, the error which arises from the construction and position of the glass is above five thousand times less than the error which arises from the refrangibility; and, therefore, that the shape or figure of the glasses is not the cause why telescopes cannot be carried to a greater perfection, but arises wholly from the nature of light.

但牛顿已证明，折射望远镜已不能更臻完善了。因为折射与折光度的缘故，这种望远镜在让我们看清物体的同时，也分散了过多单色光线。他计算了红光和蓝光在镜片中的散射率，甚至向我们证明了一些我们本以为不存在的事物。他还仔细考察了因镜片形状或轮廓产生的光线不均，以及因折射度导致的光线不均。他发现，望远镜的物镜一面凸一面平，如果平面对准物体时，由镜片的结构和位置造成的误差尚不足折光度造成的误差的五千分之一。因此，我们无法完善望远镜精确度的原因，并不在于镜片的形状或轮廓，而完全取决于光的性质。

For this reason he invented a telescope, which discovers objects by reflection, and not by refraction. Telescopes of this new kind are very hard to make, and their use is not easy; but, according to the English, a reflective telescope of but five feet has the same effect as another of a hundred feet in length.

因此，牛顿发明了反射望远镜，通过反射原理而不是折射原理来观测物体。这种新型的望远镜制造困难，操作不便，但是英国人声称，五英尺长的反射望远镜效果足以堪比一百英尺长的折射望远镜。

Letter XVII—On Infinites in Geometry, and Sir Isaac Newton's Chronology

第十七封信　谈无限与纪年

THE LABYRINTH and abyss of infinity is also a new course Sir Isaac Newton has gone through, and we are obliged to him for the clue, by whose assistance we are enabled to trace its various windings.

牛顿也钻研过错综复杂、艰深晦涩的无限问题，从中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多谢他为我们指点迷津，在其帮助下，我们得以追根溯源，一窥全貌。

Descartes got the start of him also in this astonishing invention. He advanced with mighty steps in his geometry, and was arrived at the very borders of infinity, but went not farther. Dr. Wallis,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was the first who reduced a fraction by a perpetual division to an infinite series.

在这一惊世创见上，笛卡尔依然是牛顿的先驱。在几何学领域，笛卡尔阔步前行，及至无限，却难以突破，止步不前。约上世纪中叶，有位沃利斯博士，他是用循环除法把分数化为无穷级数的第一人。

The Lord Brouncker employed this series to square the

hyperbola.

继其之后，数学家布龙克尔爵士用这一无穷级数求得双曲线的平方。

Mercator published a demonstration of this quadrature; much about which time Sir Isaac Newton, being then twenty-three years of age, had invented a general method, to perform on all geometrical curves what had just before been tried on the hyperbola.

墨卡托则公布了求积法的证明式。也就在同一时期，年方二十三岁的牛顿，创造出一条通用法则，将刚试用于双曲线上的求积法应用于各种几何曲线上。

It is to this method of subjecting everywhere infinity to algebraical calculations, that the name is given of differential calculations or of fluxions and integral calculation. It is the art of numbering and measuring exactly a thing whose existence cannot be conceived.

所谓微分运算，或曰流数和积分运算，就是将代数式处处以无穷数代入。这是用来精确计算和度量一种数量的技术，这种数量的存在超乎想象。

And, indeed, would you not imagine that a man laughed at you

who should declare that there are lines infinitely great which form an angle infinitely little?

的确，如有人断言，存在能形成无限小角之无限长线，你会否认为他在开玩笑？

That a right line, which is a right line so long as it is finite, by changing infinitely little its direction, becomes an infinite curve; and that a curve may become infinitely less than another curve?

他说，存在一条直线，其有限时，称之为直线，若无限地微调其方向，得无限曲线；而一条曲线，若无限延伸，又得直线，你会否觉得他在闹着玩？

That there are infinite squares, infinite cubes, and infinites of infinites, all greater than one another, and the last but one of which is nothing in comparison of the last?

他说，存在无限之平方，无限之立方，无限之无限次方，一个比一个大，且无限立方比无限之无限次方即得零，你会否以为他在捉弄你？

All these things, which at first appear to be the utmost excess of frenzy, are in reality an effort of the subtlety and extent of the human mind, and the art of finding truths which till then had been unknown.

上述种种乍看之下似荒谬之极，实则为世代学者研精究微、集思广益之所得，亦是求索未知真理的方法。

This so bold edifice is even founded on simple ideas. The business is to measure the diagonal of a square, to give the area of a curve, to find the square root of a number, which has none in common arithmetic. After all, the imagination ought not to be startled any more at so many orders of infinites than at the so well-known proposition, viz., that curve lines may always be made to pass between a circle and a tangent, or at that other, namely, that matter is divisible in infinitum. These two truths have been demonstrated many years, and are no less incomprehensible than the things we have been speaking of.

这一大胆的理论体系仅是基于几个简单观念。它旨在测量矩形对角线、求得曲线面积、运算数值在常规算术中不存在的平方根。毕竟，这些有关无限问题的创想——相较于那久负盛名的命题，即圆与其切线间始终存在曲线，或另一命题，即物质无限可分——不会更令人诧异。上述两条真理已得证多年，同前文所论的一样晦涩难懂。

For many years the invention of this famous calculation was denied to Sir Isaac Newton. In Germany Mr. Leibnitz was considered as the inventor of the differences or moments, called fluxions, and Mr. Bernoulli claimed the integral calculus. However, Sir Isaac is now thought to have first made the discovery, and the other two have the glory of having once made the world doubt whether it was to be ascribed to him or them. Thus some contested with Dr. Harvey the invention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as

others disputed with Mr. Perrault that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sap.

多少年来，微积分这一闻名于世的发明一直未有牛顿的名分。在德国，莱布尼茨被视为流数（微分或“瞬”）的创始人，而贝尔努利则以积分的首创者自居。而现如今，欲论微积分学的鼻祖，当首推牛顿，另两位同仁，恐怕只有与其争光的殊荣了吧。同样，有人也曾否认过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现象，有人质疑过佩罗发现植物汁液流动现象。

Hartsocher and Leuwenhoek disputed with each other the honour of having first seen the vermiculi of which mankind are formed. This Hartsocher also contested with Huygens the invention of a new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distance of a fixed star. It is not yet known to what philosopher we owe the invention of the cycloid.

哈特索科为争夺发现精虫的殊荣，与列文虎克争论不休。无独有偶，他还坚称自己是恒星距离测算法的创始者，为此与惠更斯纷争不断。时至今日，究竟是哪位哲人发现了摆线，犹未可知。

Be this as it will, it is by the help of this geometry of infinites that Sir Isaac Newton attained to the most sublime discoveries. I am now to speak of another work, which, though more adapted to the capacity of the human mind, does nevertheless display some marks of that creative genius with which Sir Isaac Newton was informed in all his researches. The work I mean is a chronology of a new kind, for what province soever he undertook he was sure to change the ideas and opinions received by the rest of men.

无论如何，正是凭借几何学中的无限问题，牛顿勇攀探索的巅峰。接下来，我将谈及他的另一项成就。尽管它更容易理解，但牛顿在各项研究中展现出的非凡创见，在此依然清晰可辨。我所指的成就是一门崭新的年代学，说它崭新，是因为牛顿无论从事何种研究，其想法势必有别于成见。

Accustomed to unravel and disentangle chaos, he was resolved to convey at least some light into that of the fables of antiquity which are blended and confounded with history, and fix an uncertain chronology. It is true that there is no family, city, or nation, but endeavours to remove its original as far backward as possible. Besides, the first historians were the most negligent in setting down the eras: books were infinitely less common than they are at this time, and, consequently, authors being not so obnoxious to censure, they therefore imposed upon the world with greater impunity; and, as it is evident that these have related a great number of fictitious particulars, it is probable enough that they also gave us several false eras.

因惯于化繁为简、破解谜题，他决意至少要基本弄清古代的轶事奇闻，厘清史实以确立明确的纪年。的确，任何家族、任何城市、任何民族，对于追根溯源一事，都乐此不疲，无不期望其起源越早越好。除此之外，在年代记述方面，最初的历史学家往往最为疏忽大意：和现在相比，书在古时甚为少见，所以作者们鲜受指责批评，因而他们便无所顾忌地愚弄世人。显然，他们虚构了诸多史实细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对有些时代描述不实。

It appeared in general to Sir Isaac that the world was five hundred years younger than chronologers declare it to be. He

grounds his opinion o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Nature, and on the observations which astronomers have made.

大体而言，牛顿认为世界历史要比史学家认定的时间晚五百年。这是牛顿根据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以及天文学家的观察而得出的看法。

By the course of Nature we here understand the time that every generation of men lives upon the earth. The Egyptians first employed this vague and uncertain method of calculating when they began to write the beginning of their history. These computed three hundred and forty-one generations from Menes to Sethon; and, having no fixed era, they supposed three generations to consist of a hundred years. In this manner they computed eleven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forty years from Menes' reign to that of Sethon.

我们这里所谓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即指人类世代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时间。当埃及人记述早期历史之时，他们最先使用的是模糊不清的纪年法。从美尼斯到示撒，他们计算为三百四十一代，加之又无明确纪年，便假定每经三代即为一百年。这样的话，他们估算从美尼斯王朝到示撒王朝历经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年。

The Greeks before they counted by Olympiads followed the method of the Egyptians, and even gave a little more extent to generations, making each to consist of forty years.

希腊人在使用奥林匹亚纪年法之前，沿用着埃及人的纪年法，甚

至在其基础上加长年限，将每代的年限定为四十年。

Now, here, both the Egyptians and the Greeks made an errenous computation. It is true, inde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usual course of Nature, three generations last about a hundred and twenty years; but three reigns are far from taking up so many. It is very evident that mankind in general live longer than kings are found to reign, so that an author who should write a history in which there were no dates fixed, and should know that nine kings had reigned over a nation; such a historian would commit a great error should he allow three hundred years to these nine monarchs. Every generation takes about thirty-six years; every reign is, one with the other, about twenty. Thirty kings of England have swayed the sceptre from William the Conqueror to George I., the years of whose reigns added together amount to six hundred and forty-eight years; which, being divided equally among the thirty kings, give to every one a reign of twenty-one years and a half very near. Sixty-three kings of France have sat upon the throne; these have, one with another, reigned about twenty years each. This is the usual course of Nature. The ancients, therefore, were mistaken when they supposed the durations in general of reigns to equal that of generations. They, therefore, allowed too great a number of years, and consequently some years must be subtracted from their computation.

然而，在这点上，埃及人和希腊人都估算错了。确实，依照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三代约合一百二十年，然而三代王朝的年限远不及此。显然，百姓在世时间通常要比国王在位时间长，史学家若要记述没有明确日期的历史，且已知有九位国王统治过这个国家，那么，若还将九位国王在位时间算为三百年，就大错特错了。每代人约合三十

六岁，而朝代更迭交替，每个朝代则约合二十年。在英格兰，从征服者威廉到乔治一世，历经三十次王权交替，共计六百四十八年。平均来看，每位国王在位二十一年半。法国共有六十三位国王，代代相传，每位掌权约二十年。这就是自然界普遍规律之所在。因此，古人错了，错在将朝代更迭的大致时间与每代人的在世时间比量齐观了。所以说，他们将年代计算得过于长久，应当从中减去几年才可。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seem to have lent a still greater assistance to our philosopher. He appears to us stronger when he fights upon his own ground.

天文观测似乎给予我们这位哲学家以莫大的帮助。他在自己的领域中奋战，无往不胜、无坚不摧。

You know that the earth, besides its annual motion which carries it round the sun from west to east in the space of a year, has also a singular revolution which was quite unknown till within these late years. Its poles have a very slow retrograde motion from east to west, whence it happens that their position every day does not correspond exactly with the same point of the heavens. This difference which is so insensible in a year, becomes pretty considerable in time; and in threescore and twelve years the difference is found to be of one degree, that is to say, the three hundred and sixtieth part of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whole heaven. Thus after seventy-two years the colure of the vernal equinox which passed through a fixed star, corresponds with another fixed star. Hence it is that the sun, instead of being in that part of the heavens in which the Ram was situated in the time of Hipparchus, is found to correspond with that part of the heavens in which the Bull was

situated; and the Twins are placed where the Bull then stood. All the signs have changed their situation, and yet we still retain the same manner of speaking as the ancients did. In this age we say that the sun is in the Ram in the spring, from the principle of condescension that we say that the sun turns round.

要知道，地球每年除了绕太阳自西向东做周年运动以外，还进行着一种特殊的运转，这一点近年来才为人所知。地球两极自东向西缓慢逆行，因而其每天的方位都无法对准天际上的同一点。这种变化，在一年之内难以察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则日趋明显。每七十二年即偏移一度，相当于整个天体圆周的三百六十分之一。如此一来，原本与某颗恒星遥相呼应的春分点，在七十二年后将指向另一颗恒星。于是，在喜帕恰斯时代，太阳位于白羊宫方位，如今却身处金牛宫。双子宫则移位到金牛宫原先的位置。然斗转星移，众宫移位，我们却仍固守古人之言，不能识时通变。现在，我们说太阳在春季位于白羊宫方位，就同说中太阳东升西落一样，不过是迁就习惯罢了。

Hipparchus was the first among the Greeks who observed some change in the constell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equinoxes, or rather who learnt it from the Egyptians. Philosophers ascribed this motion to the stars; for in those ages people were far from imagining such a revolution in the earth, which was supposed to be immovable in every respect. They therefore created a heaven in which they fixed the several stars, and gave this heaven a particular motion by which it was carried towards the east, whilst that all the stars seemed to perform their diurnal revolution from east to west. To this error they added a second of much greater consequence, by imagining that the pretended heaven of the fixed stars advanced one degree eastward every hundred years. In this manner they were no less mistaken in their astronomical calculation than in their system of

natural philosophy. As for instance, an astronomer in that age would have said that the vernal equinox was in the time of such and such an observation, in such a sign, and in such a star. It has advanced two degrees of each since the time that observation was made to the present. Now two degrees are equivalent to two hundred years; consequently the astronomer who made that observation lived just so many years before me. It is certain that an astronomer who had argued in this manner would have mistook just fifty-four years; hence it is that the ancients, who were doubly deceived, made their great year of the world, that is, the revolution of the whole heavens, to consist of thirty-six thousand years. But the moderns are sensible that this imaginary revolution of the heaven of the stars is nothing else than the revolution of the poles of the earth, which is performed in twenty-five thousand nine hundred years. It may be proper to observe transiently in this place, that Sir Isaac, by determining the figure of the earth, has very happily explained the cause of this revolution.

喜帕恰斯是首个观测到星相变化与春秋二分点之间关联的希腊人，或更准确地说，其见解源于埃及人。哲学家们认为该运动现象归因于恒星。因为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地球转动是不可想象的，地球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位移。因此，他们便臆想出一个星空，设定了几颗恒星，并认为该星空以一种特殊的运动方式向东运转，同时所有恒星都进行自西向东的周日运动。一错未平，一错又生，他们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认为这个假想的星空每百年东移一度。如此一来，无论是从天文演算来看，还是从物理学说而言，他们都是错上加错。例如，当时有位天文学家称，在某时段经某种观测，春分点位于某星座的某方位上。自观测之时起至今，春分点移动了两度。既然两度相当于两百年，这么说那位天文学家生活的时代距我们仅二百年。毫无疑问，提出这一论断的天文学家误算了整整五十四年。由此可见，古人是错上加错，错将宇宙的漫长历程，即星空运转的总时间，推算为三

万六千年。但现代人意识到，这一臆想中的星空运转不过是地球两极的转动罢了，历经两万五千九百年。读至此处，我们也许应驻足片刻予以留意：牛顿在明确地球形状的同时，还有幸找出了地球自转的成因。

All this being laid down, the only thing remaining to settle chronology is to see through what star the colure of the equinoxes passes, and where it intersects at this time the ecliptic in the spring; and to discover whether some ancient writer does not tell us in what point the ecliptic was intersected in his time, by the same colure of the equinoxes.

一切皆已就绪，欲确定纪年，我们只需找出春秋二分点经过哪颗恒星，找出春季时它在何处与黄道相切，以及是否有古人交代过，那时的春秋二分点与黄道在哪一点相切。

Clemens Alexandrinus informs us, that Chiron, who went with the Argonauts, observed the constellations at the time of that famous expedition, and fixed the vernal equinox to the middle of the Ram; the autumnal equinox to the middle of Libra; our summer solstice to the middle of Cancer, and our winter solstice to the middle of Capricorn.

革利免告诉我们，跟随阿尔戈英雄远征的喀戎，在途中曾夜观星象，将春分、秋分、夏至与冬至分别定于白羊宫、天秤宫、巨蟹宫和魔蝎宫的中央。

A long time after the expedition of the Argonauts, and a year before the Peloponnesian war, Methon observed that the point of the summer solstice passed through the eighth degree of Cancer.

阿尔戈英雄远征之后很久，就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一年，梅索恩观察到夏至点经过巨蟹宫的第八度。

Now every sign of the zodiac contains thirty degrees. In Chiron's time, the solstice was arrived at the middle of the sign, that is to say to the fifteenth degree. A year before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 was at the eighth, and therefore it had retarded seven degrees. A degree is equivalent to seventy-two years; consequentl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o the expedition of the Argonauts, there is no more than an interval of seven times seventy-two years, which make five hundred and four years, and not seven hundred years, as the Greeks computed. Thus in comparing the position of the heavens at this time with their position in that age, we find that the expedition of the Argonauts ought to be placed about nine hundred years before Christ, and not about fourteen hundred; and consequently that the world is not so old by five hundred years as it was generally supposed to be. By this calculation all the eras are drawn nearer, and the several events are found to have happened later than is computed. I don't know whether this ingenious system will be favourably received; and whether these notions will prevail so far with the learned, as to prompt them to reform the chronology of the world. Perhaps these gentlemen would think it too great a condescension to allow one and the same man the glory of having improved natural philosophy, geometry, and history. This would be a kind of universal monarchy, with which the principle of self-love that is in man will scarce suffer

him to indulge his fellow-creature; and, indeed, at the same time that some very great philosophers attacked Sir Isaac Newton's attractive principle, others fell upon his chronological system. Time, that should discover to which of these the victory is due, may perhaps only leave the dispute still more undetermined.

那么，黄道十二宫每宫分三十度。在喀戎时代，至点位于黄道宫的中心，即十五度的位置上。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一年，至点位于第八度，其间延迟了七度。一度相当于七十二年，因而，我们可以推算，从伯罗奔尼撒战争打响到阿尔戈船远征伊始，仅为七个七十二年，共计五百零四年，而非希腊人所说的七百年。所以，对比现在和当时的星空位置，我们发现，阿格诺远征应发生在约公元前九百年，并非约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因而世界比通常所言要年轻五百年。如此算来，各个时代都向后推延，诸多大事件的发生晚于原本认定的时间。我不知道这精妙的学说能否为人们欣然接受，也不知晓这些看法能否说服学者进行世界纪年法之改革。或许众学者认为，同时将开拓物理学、发展几何学，深化历史学这三项殊荣加诸牛顿一人之身，未免推崇过甚。这被视为另一种绝对权威，人多自恋，同类难容。因而，许多在当时鼎鼎有名的哲学家也攻击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亦有人指摘他的纪年学说。时间啊时间，你本应裁定胜败得失，却令纷争愈演愈烈。

Letter XVIII—On Tragedy

第十八封信　谈悲剧

THE ENGLISH as well as the Spaniards were possessed of theatres at a time when the French had no more than moving, itinerant stages. Shakespeare, who was considered as the Corneille of the first-mentioned nation, was pretty nearly contemporary with Lope de Vega, and he created, as it were, the English theatre. Shakespeare boasted a strong fruitful genius. He was natural and sublime, but had not so much as a single spark of good taste, or knew one rule of the drama. I will now hazard a random, but, at the same time, true reflection, which is, that the great merit of this dramatic poet has been the ruin of the English stage. There are such beautiful, such noble, such dreadful scenes in this writer's monstrous farces, to which the name of tragedy is given, that they have always been exhibited with great success. Time, which alone gives reputation to writers, at last makes their very faults venerable. Most of the whimsical gigantic images of this poet, have, through length of time (it being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since they were first drawn) acquired a right of passing for sublime. Most of the modern dramatic writers have copied him: but the touches and descriptions which are applauded in Shakespeare. are hissed at in these writers; and you will easily believe that the veneration in which this author is held, increases in proportion to the contempt which is shown to the moderns. Dramatic writers don't consider that they should not imitate him; and the ill-success of Shakespeare's imitators produces no other effect, than to make him be considered as inimitable. You remember that in the tragedy of Othello, Moor of Venice, a most tender piece, a man strangles his

wife on the stage; and that the poor woman, whilst she is strangling, cries aloud that she dies very unjustly. You know that in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 two grave-diggers make a grave, and are all the time drinking, singing ballads, and making humorous reflections (natural indeed enough to persons of their profession) on the several skulls they throw up with their spades; but a circumstance which will surprise you is, that this ridiculous incident has been imitated. In the reign of King Charles II., which was that of politeness, and the Golden Age of the liberal arts; Otway, in his Venice Preserved, introduces Antonio the senator, and Naki, his courtesan, in the midst of the horrors of the Marquis of Bedemar's conspiracy. Antonio, the super-annuated senator plays, in his mistress' presence, all the apish tricks of a lewd, impotent debauchee, who is quite frantic and out of his senses. He mimics a bull and a dog, and bites his mistress' legs, who kicks and whips him. However, the players have struck these buffooneries (which indeed were calculated merely for the dregs of the people) out of Otway's tragedy; but they have still left in Shakespeare's Julius Caesar the jokes of the Roman shoemakers and cobblers, who are introduced in the same scene with Brutus and Cassius. You will undoubtedly complain, that those who have hitherto discoursed with you on the English stage, and especially on the celebrated Shakespeare, have taken notice only of his errors; and that on one has translated any of those strong, those forcible passages which atone for all his faults. But to this I will answer, that nothing is easier than to exhibit in prose all the silly impertinences which a poet may have thrown out; but that it is a very difficult task to translate his fine verses. All your junior academicalsophs, who set up for censors of the eminent writers, compile whole volumes; but methinks two pages which display some of the beauties of great geniuses, are of infinitely more value than all the idle rhapsodies of those commentators; and I will join in opinion with all persons of

good taste in declaring, that greater advantage may be reaped from a dozen verses of Homer or Virgil, than from all the critiques put together which have been made on those two great poets.

当法国人还只有巡回露天剧场的时候，英国人已和西班牙人一样，拥有了剧院。莎士比亚被奉为英国的高乃依，他与洛佩·德·维加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可以说，正是莎翁开启了英国的剧院艺术。莎翁才华横溢，著作等身。他文笔自然流畅，气势蓬勃，但其本人却是连半点儿品味都没有，也不懂戏剧行规。行文至此，容我斗胆一言，虽是随想，却句句属实。我认为，这位戏剧诗人对英国戏剧最大的贡献便是将它彻底毁了。这位作家数部惊世骇俗的闹剧中（常被冠以“悲剧”之名），有若干或华美、或高贵、或可怖的场景，往往一经演出，便在舞台上大放异彩。时间，这位裁决作家声望的唯一判官，最终却偏让作家笔下的纰漏备受推崇。而这位诗人绝大部分异想天开的宏大场面（自创作之日算起，已过了一百五十个年头），终于也在时间的漫漫长河里，够格成为雄篇伟作。几乎所有近代戏剧作家都对他效而仿之：可是莎翁曾借之博得掌声的笔触和描写，一旦移接到他们的作品中反而招致嘘声一片；于是诸位也不难相信，这位文豪越受尊敬，当代作家便越遭鄙夷。剧作家们并不觉得模仿莎翁有何不妥，而效仿者的拙劣模仿所产生的唯一效果，就是让莎翁显得更加无法效仿。想必诸位还记得，在《奥赛罗》这部令人心碎的悲剧中，奥赛罗在舞台上勒死了他的妻子。而这个可怜的女人，垂死挣扎之际还大喊冤枉。诸位一定知道《哈姆雷特》中的两个掘墓人吧。他们挖坟时，一边啜着小酒，一边哼着小调，还对着用铲子挖出的骷髅一通妙语连珠（这对他们这个行当的人来说再正常不过了）。但让人吃惊的是，这般荒唐的场景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竟还被人模仿。要知道那是个“以礼治邦”的朝代，也是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剧作家奥特韦在其诗剧《威尼斯得免于难》中，将议员安东尼奥和娼妓纳基两人的登场，放在佩特迈尔侯爵的阴谋笼罩下人心惶惶的时刻。安东尼奥，这位迂腐守旧的议员，竟然当着他情妇的面，装模作样地耍起一个下流猥琐的阳痿色鬼的把戏来，看上去简直疯疯癫癫、神志不清。他时而

仿牛时而效狗，还咬他情妇的大腿，惹得她踢他踹他，还拿鞭子抽他。不过，该剧的演员们把这些插科打诨（实则只为迎合那些下流观众）的情节剔出了奥特韦的悲剧；但他们仍保留了莎士比亚《尤利乌斯·恺撒》里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出场时讲的几个关于罗马造鞋匠和修鞋匠的笑话。诸位自然要发牢骚了：有些人直到现在还在和你们高谈阔论英国戏剧，尤其是谈鼎鼎有名的莎翁，却只注意到了他的拙笔，还没有谁翻译过他那些深刻动人、足以抵消他所有不足的篇章呢。对此我的回应是，要把一位诗人可能暴露出的谬误用散文写出来是再容易不过了，但要翻译出他的妙言佳句却难之又难。你们的那些学界小辈，自以为能对大文豪评头论足，还编撰一套套厚书；但在我看来，哪怕拿两页能展露这些天才文字之美的篇章，其包含的价值都比这些评论家不着边际的溢美奉承要多得多。我还要与所有高品位的读者站在一起，严正宣告：把所有对于荷马或维吉尔作品的评论叠在一起，都还不如这两位诗杰寥寥数行的诗句更让我们开卷有益。

I have ventured to translate some passages of the most celebrated English poets, and shall now give you one from Shakespeare. Pardon the blemishes of the translation for the sake of the original; and remember always that when you see a version, you see merely a faint print of a beautiful picture. I have made choice of part of the celebrated soliloquy in Hamlet, which you may remember is as follows:—

我冒昧翻译了几位最负盛名的英国诗人的诗篇，现谨奉上一段莎士比亚的作品节选。看在原作的份上，还请包涵我译本中的瑕疵；也望诸位切记，你们所读到的各种译本，不过是一幅美丽画卷的朦胧缩影罢了。我摘选了《哈姆雷特》中这段家喻户晓的独白，诸位或还记得，原文如下：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Whether'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默然忍受

The St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命运的暴虐的毒箭，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To dye! to sleep!

死了！睡着了！

No more! and by a Sleep to say we end

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

The Heart-ach,

我们心头的创痛，

and the thousand natural Shocks

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

That Flesh is Heir to!' Tis a Consummation

都可以从此消失，

Devoutly to be wish'd.

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

To die! to sleep!

死了！睡着了！

To sleep, perchance to dream!

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

Oy, there's the Rub;

嗯，阻碍就在这儿：

For in that Sleep of Deaths what Dreams may come

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

When we have shuffled off this, mortal Coyle,

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

Must give us Pause.

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

There's the respect

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

That makes Calamity of so long Life:

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For whowou'd bear the Whips and Scorns of Time,

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

Th' Oppressor's Wrong, the poor Man's contumely,

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

The Pangs of despis'd Love, the Laws Delay,

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

The Insolence of Office, and the Spurns

官吏的横暴

That patient Merit of th' unworthy takes,

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

When he himself might his Quietus make

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

With a bare Bodkin?

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

Who would these Fardlesbear

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

To groan and sweat under a weary Life,

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

But that the Dread of something after Death,

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

Th'undiscover'd Country, from whose Bourn

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

No Traveller returns, puzzles the Will,

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

And makes us rather bear those Ills we have,

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磨折，

Than fly to others that we know not of?

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

Thus Conscience does make Cowards of us all;

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

And thus the native Hue of Resolution

决心的赤热的光彩，

Is sickled o'er with the pale Cast of Thought:

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

And Enterprises of great Weight and Moment

伟大的事业

With this Regard their Currents turn away,

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

And lose the Name of Action——

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My version of it runs thus:—

我的译文如下：

Demeure, ilfautchoisir& passer à l'instant

“且住！时不我待，得作出抉择：

De la vie, à la mort, ou de l'Etre au neant.

从生存到死灭，从存在到乌有。

Dieuxcruels, s'ilenest, éclairez mon courage.

残酷的神啊，你若在，就请赐我勇气。

Faut-ilvieillircourbé sous la main qui m'outrage,

忍辱负重的我，该如何度过漫漫人生路？

Supporter, oufinirmonmalheur& mon sort?

该承受抑或了结我的厄运与苦痛？

Qui suis je?

我是谁？

Qui m'arrete! &qu'est-ce que la Mort?

谁阻我？死亡又复何？

C'est la fin de nosmaux, c'estmon unique Azile

这是不幸的终结，也是我仅有的归宿。

Après de long transports,

c'estunsommeiltranquile.

历经痛苦波折，终可安然入梦。

On s'endort, & tout meurt, maisunaffreuxreveil

世人已长眠，周遭皆沉沉死气，但可怖的惊醒

Doitsuccederpeutetre aux douceurs du sommeil!

或将成为甜美酣睡的接替！

On nous menace, on dit que cettecourte Vie,

有人恐吓道，生命本就转瞬即逝，

De tourmenséternelsestaussi-tôtsuivie.

随之而来的折磨却将无休无止。

O Mort! moment fatal! affreuseEternité!

啊，死亡！致命的瞬息！可怕的终局！

Tout cœur à ton seul nom se glace épouvanté.

你的名字让世人深深战栗。

Eh! quipourroit sans Toi supporter cette vie,

唉！若没有你，人生又何堪承受？

De nosPrêtresmenteursbenirl'hypocrisie;

谁能笃信伪善神父的满口谎言？

D'uneindigneMaitresseencenser les erreurs,

谁能奉承无耻情妇的荒淫之举？

Ramper sous unMinistre, adorer seshauteurs;

谁能委身权贵脚下，对其卑躬屈膝？

Etmontrer les langueurs de son ameabattüe,

谁能面对背信弃义的朋友，

A des Amis ingrats qui detournent la vüe?

从颓唐的灵魂深处流露绝望？

La Mort seroit trop douceencesextrémitez,

身处诸种凄惨境遇，死亡又何其甜美，

Mais le scrupule park, & nous crie, Arrêtez;

然而踌躇之心此刻大喝一声：‘且慢！’

Il defend à nos mains cetheureux homicide

它阻挡了我举起屠刀的决心和快意，

Et d'un Herosguerrier, fait un Chrétien timide,

&c.

也让原本好战的勇士变得怯懦无比……”

Do not imagine that I have translated Shakespeare in a servile manner. Woe to the writer who gives a literal version; who by rendering every word of his original, by that very means enervates the sense, and extinguishes all the fire of it. It is on such an occasion one may justly affirm, that the letter kills, but the Spirit quickens.

别以为我翻译时会对莎士比亚的原文亦步亦趋。那些直译者真是哀哉，他们只会逐字逐句的翻译，从而削弱了原有的意味，抹去了所有的亮点。因此，就我的译文而言，可以恰如其分地肯定，形式虽灭，神韵犹存。

Here follows another passage copied from a celebrated tragic writer among the English. It is Dryden, a poet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a writer whose genius was too exuberant, and not accompanied with judgment enough. Had he written only a tenth part of the works he left behind him, his character would have been conspicuous in every part; but his great fault is his having endeavoured to be universal.

下面这段选自一位出名的英国悲剧作家。他便是德莱顿，查理二世时代的诗人，此人才华横溢，锋芒毕露，可惜不明事理。倘若他当初的作品只有如今身后的十分之一，其才望必可远播八方；可他犯了

大错，企图证明自己无所不能。

The passage in question is as follows:—

我说的选段如下：

When I consider Life, 'tis all a Cheat,

“回首往事，人生事事有欺，

Yet fool'd by Hope, Men favour the Deceit;

遭受希望愚弄，依旧乐此不疲；

Trust on and think, to Morrow will repay;

人们深信，明日会有所回馈；

To Morrow's falser than the former Day;

不曾料，明日比今朝更加虚伪；

Lies more; and whilst it says we shall be blest

谎言无穷多；说我们会受庇佑

With some new Joy cuts off what we possest;

有新的欢愉，却夺去我们所有；

Strange Cozenage! nonewou'd live past Tears again,

多怪的骗局！谁能倒回这光年，

Yet all hope Pleasure in what yet remain,

却都盼着从残年中寻觅甘甜，

And from the Dregs of Life think to receive

还想从人生的糟粕中，去获得

What the first sprightly Running could not

give.

初次欢跑时所得不到的欢乐。

I'm tir'd with waiting for this chymic Gold,

苦等黄金中，我已然身心俱乏，

Which fools us young, and beggars us when old.

少时受它愚弄；老来受它压榨。”

I shall now give you my translation:—

以下是我的译文：

De desseinsen, regrets &d'erreursendesirs

“从热盼到懊丧，从谬误到欲望，

Les MortelsinsenséspromenentleurFolie.

愚昧的世人总是在徘徊中忘我。

Dans des malheurs presents, dansl'espoir des plaisirs

面对现时的不幸，怀抱对幸福的祈望，

Nous ne vivonsjamais, nous attendons la vie.

在人生中迷失，我们期待生活。

Demain, demain, dit-on, vacomblertousnosvœux.

人们说，明天，明天，将会如愿以偿；

Demainvient, & nous laisse encore plus malheureux.

可明天一到，我们徒增苦恼悲伤。

Qu'elleestl'erreur, helas! dusoin qui nous

dévore,

唉！这是何等荒谬，我们被忧虑所困？

Nul de nous ne voudroitrecommencer son cours.

无人甘愿重新起程：

De nospremiersmomens nous maudissonsl' aurore,

我们诅咒年少时的拂晓清晨，

Et de la nuit qui vient, nous attendons encore

黑夜将至，我们却期待更甚，

Ce qu'onten vain promis les plus beaux de nosjours, &c.

唯愿韶光空许的诺言终能成真……”

It is in these detached passages that the English have hitherto excelled. Their dramatic pieces, most of which are barbarous and without decorum, order, or verisimilitude, dart such resplendent flashes through this gleam, as amaze and astonish. The style is too much inflated, too unnatural, too closely copied from the Hebrew writers, who abound so much with the Asiatic fustian. But then it must be also confessed that the stilts of the figurative style, on which the English tongue is lifted up, raises the genius at the same time very far aloft, though with an irregular pace. The first English writer who composed a regular tragedy, and infused a spirit of elegance through every part of it, was the illustrious Mr. Addison. His “Cato” is a masterpiece, both with regard to the diction and to the beauty and harmony of the numbers. The character of Cato is, in my opinion, vastly superior to that of Cornelia in the “Pompey” of Corneille, for Cato is great without anything like fustian, and Cornelia, who besides is not a necessary character, tends sometimes to bombast. Mr. Addison's Cato appears to me the greatest character that was ever brought upon any stage, but then the rest of them do not correspond to the dignity of it, and this dramatic piece, so excellently well writ, is disfigured by a dull love plot, which spreads a certain languor over the whole, that quite murders it.

正是在这些选段中，英国作家们才体现了过人之处。他们的戏剧作品大多野蛮粗俗，缺乏礼教，条理混乱，有失逼真，但却熠熠生辉，给人以惊世骇俗之感。其文风也华而不实，夸张做作，太过承袭了希伯来作家亚洲式的浮夸。但必须承认，使英语得以提升的这种修辞风格，同时将时代精神提至难以企及的高度，虽说其发展速度时快时慢。英国作家中首位写出合乎规范的悲剧，且作品自始至终流露出优雅气息的作家，便是著名的阿迪松先生。他的名作《卡托》，措辞优美、词句精妙、韵律和谐，堪称杰作。在我看来，卡托这个人物，比起高乃依《庞培之死》中的科妮莉亚确实要高明得多。卡托伟大却

不浮夸，而科妮莉亚这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则常常夸大其词。我认为，阿迪松先生所塑造的卡托是所有舞台剧中最伟大的角色，但其余的角色却不能与之辉映，致使这部优秀的作品，由于一个无聊落俗的爱情故事，变得拖沓无力，生生被毁了。

The custom of introducing love at random and at any rate in the drama passed from Paris to London about 1660, with our ribbons and our perruques. The ladies who adorn the theatrical circle there, in like manner as in this city will suffer love only to be the theme of every conversation. The judicious Mr. Addison had the effeminate complaisance to soften the severity of his dramatic character, so as to adapt it to the manners of the age, and, from an endeavour to please, quite ruined a masterpiece in its kind. Since is time the drama is become more regular, the audience more difficult to be leased, and writers more correct and less bold. I have seen some new pieces hat were written with great regularity, but which, at the same time, were very flat and insipid. One would think that the English had been hitherto formed to produce irregular beauties only. The shining monsters of Shakespeare give infinite more delight than the judicious images of the moderns. Hitherto the poetical genius of the English resembles a tufted tree planted by the hand of Nature, that throws out a thousand branches at random, and spreads unequally, but with great vigour. It dies if you attempt to force its nature, and to lop and dress it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trees of the Garden of Marli.

大约在1660年，在剧中随便插入爱情戏的套路，从巴黎传到了伦敦，同时传入的还有缎带和假发。女人在那儿是剧院的装饰品，在这儿也一样，她们只愿意聊爱情。拥有远见卓识的阿迪松先生颇有些女子的柔顺气质，这让他的戏剧显得不那么严肃，能迎合时代的风气，

但极力取悦的同时，恰恰毁了原本的杰作。自他之后戏剧创作变得更为规范了，观众也愈发难以取悦，剧作家囿于成规，变得畏首畏尾。我看过一些新作品，都非常合乎规范，但同时也平淡无奇，读起来味如嚼蜡。也许有人觉得，英国人一直以来只在创造另类的美。较之现代作品中循规蹈矩的角色，莎翁笔下那些大放异彩的怪人，要更千百倍地讨人喜爱。迄今为止，英国人的诗歌禀赋就像大自然栽种的一棵浓荫匝地的巨树，千百条枝桠旁逸斜出，枝干随性蔓生，却生机勃勃。若悖其天性，硬要修剪成马利花园中的树木一般，那么它将必死无疑。

Letter XIX—On Comedy

第十九封信　谈喜剧

I AM surprised that the judicious and ingenious Mr. de Muralt, who has published some letters on the English and French nations, should have confined himself, in treating of comedy, merely to censure Shadwell the comic writer. This author was had in pretty great contempt in Mr. de Muralt's time, and was not the poet of the polite part of the nation. His dramatic pieces, which pleased some time in acting, were despised by all persons of taste, and might be compared to many plays which I have seen France, that drew crowds to the play-house,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y were intolerable to read; and of which it might be said, that the whole city of Paris exploded them, and yet all flocked to see them represented on the stage. Methinks Mr. de Muralt should have mentioned an excellent comic writer (living when he was in England), I mean Mr. Wycherley, who was a long time known publicly to be happy in the good graces of the most celebrated mistress of King Charles II. This gentleman, who passed his life among persons of the highest distinction, was perfectly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ir lives and their follies, and painted them with the strongest pencil, and in the truest colours. He has drawn a misanthrope or man-hater, in imitation of that of Molière. All Wycherley's strokes are stronger and bolder than those of our misanthrope, but then they are less delicate, and the rules of decorum are not so well observed in this play. The English writer has corrected the only defect that is in Molière's comedy, the thinness of the plot, which also is so disposed that the characters in it do not enough raise our concern. The English comedy affects us,

and the contrivance of the plot is very ingeniou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too bold for the French manners. The fable is this:—A captain of a man-of-war, who is very brave, open-hearted, and inflamed with a spirit of contempt for all mankind, has a prudent, sincere friend, whom he yet is suspicious of, and a mistress that loves him with the utmost excess of passion. The captain so far from returning her love, will not even condescend to look upon her, but confides entirely in a false friend, who is the most worthless wretch living. At the same time he has given his heart to a creature, who is the greatest coquette and the most perfidious of her sex, and he is so credulous as to be confident she is Penelope, and his false friend a Cato. He embarks on board his ship in order to go and fight the Dutch, having left all his money, his jewels, and everything he had in the world to this virtuous creature, whom at the same time he recommends to the care of his supposed faithful friend. Nevertheless the real man of honour, whom he suspects so unaccountably, goes on board the ship with him, and the mistress, on whom he would not bestow so much as one glance, disguises herself in the habit of a page, and is with him the whole voyage, without his once knowing that she is of a sex different from that she attempts to pass for, which, by the way, is not over natural.

德·缪拉尔持先生曾写过一些有关英国和法国的书简，但让我惊讶的是，像他这样一位卓有见地的聪明人，在谈喜剧时，竟然只对一位名叫沙德韦尔的喜剧作家评头论足。在德·缪拉尔持那个年代，沙德韦尔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算不得上流社会的诗人。他的戏剧曾在舞台上风靡一时，却屡遭高雅之士白眼相向。这与我在法国看过的许多剧作颇为相似，剧场内人潮涌动，但剧本却难以卒读。可以说，全巴黎上下都批评他的戏，却又都趋之若鹜去看公演。在我看来，缪拉尔持先生本应该谈到当时还健在的出色喜剧作家威彻利先生。他早就为人所熟知，因为他有幸受到查理二世最出名情妇的恩宠。这位绅士

一生都在和声名显赫的人打交道，所以对他们的生活和丑态都了若指掌，他用最锐利的笔锋和最真实的笔调使其跃然纸上。他效仿莫里哀，也刻画了一个愤世者的形象。威彻利的笔法比莫里哀的原型来得更饱满、更大胆，因而略失细腻，稍欠得体。这位英国作家弥补了莫里哀喜剧中的唯一不足，即情节单薄，这导致剧中人物不能充分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威彻利先生的喜剧打动了我们，其情节渲染自然巧妙，但就法国的风俗而言，无疑是过于大胆了。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舰长，他英勇无畏，为人坦诚，却又内心狂傲，睥睨群雄。他有位忠诚的诤友，凡事深谋远虑，他却对其怀有戒心。还有位淑女对他倾心相与。他非但没回应她的爱意，甚至不屑一顾。但这位舰长却对另一个虚伪的朋友信赖有加，不料那人竟是世上最卑鄙龌龊的小人。同时，他还爱上了一个放荡至极、背信弃义的负心女子，天真地相信她如珀涅罗珀般忠贞不渝，相信那伪善的朋友有着加图般的正直和义气。有一天，他要动身起航去与荷兰交战，他把所有的财物、珠宝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交托给那貌似忠贞的女人，又把她托付给那个他自以为忠诚的朋友。而那位真正的君子，那位遭到莫名猜疑的朋友，跟他上了船，还有那位他没瞧过一眼的淑女，扮成随员，一路上陪在他身边。她装得很自然，这位舰长从未发觉“他”是女扮男装。

The captain having blown up his own ship in an engagement, returns to England abandoned and undone, accompanied by his page and his friend, without knowing the friendship of the one or the tender passion of the other. Immediately he goes to the jewel among women, how he expected had preserved her fidelity to him and the treasure he had left in her hands. He meets with her indeed, but married to the honest knave in whom he had reposed so much confidence, and finds she had acted as treacherously with regard to the casket he had entrusted her with. The captain can scarce think it possible that a woman of virtue and honour can act so vile a part; but to convince him still more of the reality of it, this very worthy lady falls in love with the little page, and will force him to her

embraces. But as it is requisite justice should be done, and that in a dramatic piece virtue ought to be rewarded and vice punished, it is at last found that the captain takes his page's place and lies with his faithless mistress, cuckolds his treacherous friend, thrusts his sword through his body, recovers his casket, and marries his page. You will observe that this play is also larded with a petulant, litigious old woman (a relation of the captain), who is the most comical character that was ever brought upon the stage.

在一场交战中，战舰被炸毁了，在随员和朋友的陪伴下，他落魄地回到了英国，却依然对身边两人的忠诚友谊和柔情爱意浑然不觉。一回到英国，他马上去找他心爱的女子，盼望着能够人财两得。他见到了她，哪知这贱妇早已背叛了自己，嫁给了那个他曾笃信不疑的伪君子，还霸占了他交托的财宝。这位舰长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她这般贞风亮节的女子，竟干出如此下流的勾当。似乎是为了要让舰长更看清了她的嘴脸，这个所谓的妇道人家，竟还爱上了那位年轻的随员，还硬要拥“他”入怀。但既然正义必须得到伸张，在戏中也理应扬善弃恶。因而最后，舰长假扮成随员，同那个负心女上了床，给背信弃义的朋友戴上绿帽，并一剑刺死了他。财宝就此物归原主，舰长同那女扮男装的随员终结连理。你会注意到剧中还穿插了好几场戏，有个脾气暴躁、颇爱斗嘴的老妇人，是舰长的某个亲戚，她可谓是戏剧史上最滑稽的角色。

Wycherley has also copied from Molière another play, of as singular and bold a cast, which is a kind of Ecole des Femmes, or, School for Married Women.

威彻利还借鉴了莫里哀的另一部剧作《妇人学堂》，塑造了同样特立独行、大胆创新的人物角色。

The principal character in this comedy is one Horner, a sly fortune hunter, and the terror of all the City husbands. This fellow, in order to play a surer game, causes a report to be spread, that in his last illness, the surgeons had found it necessary to have him made a eunuch. Upon his appearing in this noble character, all the husbands in town flocked to him with their wives, and now poor Horner is only puzzled about his choice. However, he gives the preference particularly to a little female peasant, a very harmless, innocent creature, who enjoys a fine flush of health, and cuckolds her husband with a simplicity that has infinitely more merit than the witty malice of the most experienced ladies. This play cannot indeed be called the school of good morals, but it is certainly the school of wit and true humour.

这部喜剧的男主角叫霍纳，为人诡计多端，专寻富家女以求发家，是伦敦有妇之夫的梦魇。这个家伙为达目的，故意放风说，最近一次生病时，外科医生决定对他施行阉割手术。此后当他粉墨登场时，城里的男人们都带着自己的妻子蜂拥而至。这回唯一令可怜的霍纳头疼的，就是不知选哪个才好。不料他最青睐一个善良天真的小农妇，脸蛋红扑扑的。她不经意间就给丈夫戴了绿帽，比起那些狡猾世故的太太们，要大方得多。这部戏虽然算不上歌功颂德，却无疑是机智风趣，率真俏皮。

Sir John Vanbrugh has written several comedies, which are more humorous than those of Mr. Wycherley, but not so ingenious. Sir John was a man of pleasure, and likewise a poet and an architect. The general opinion is, that he is as sprightly in his writings as he is heavy in his buildings. It is he who raised the famous Castle of Blenheim, a ponderous and lasting monument of

our unfortunate Battle of Hochstet. Were the apartments but as spacious as the walls are thick, this castle would be commodious enough. Some wag, in an epitaph he made on Sir John Vanbrugh, has these lines:—

约翰·范布勒爵士也写过几部喜剧，比起威彻利的作品，他的喜剧幽默有余，但新意不足。约翰是一个浪子，也是诗人和建筑师。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创作风格轻松活泼，而他的建筑风格则沉稳扎实。正是他设计了著名的布莱尼姆宫，来纪念那场法国吃了败仗的霍赫施塔特战役。它呆板笨重，矗立不倒。此外，这座府邸墙壁厚实，房间却有欠宽敞，否则倒是个舒适的好地方。有人打趣地在范布勒的墓碑上写道：

“Lie heavy on him, Earth! For he

“愿大地让你深受负荷！因为

Laid many heavy loads on thee.”

你曾给大地太多压力。”

Sir John having taken a tour into France before the glorious war that broke out in 1701, was thrown into the Bastille, and detained there for some time, without being ever able to discover the motive which had prompted our ministry to indulge him with this mark of their distinction. He wrote a comedy during his

confinement; and a circumstance which appears to me very extraordinary is, that we don't meet with so much as a single satirical stroke against the country in which he had been so injuriously treated.

1701年，正值那场光荣的战争爆发前，约翰去法国游玩，其间被关进巴士底监狱拘留了一段时间，也不知政府为何给了他这种特殊待遇。在押期间，他写了一部喜剧；让我匪夷所思的是，法国让他吃了这种苦头，剧中却找不到对法国的半句讥讽之辞。

The late Mr. Congreve raised the glory of comedy to a greater height than any English writer before or since his time. He wrote only a few plays, but they are all excellent in their kind. The laws of the drama are strictly observed in them; they abound with characters all which are shadowed with the utmost delicacy, and we don't meet with so much as one low or coarse jest. The language is everywhere that of men of honour, but their actions are those of knaves—a proof that he was perfectly well acquainted with human nature, and frequented what we call polite company. He was infirm and come to the verge of life when I knew him. Mr. Congreve had one defect, which was his entertaining too mean an idea of his first profession (that of a writer), though it was to this he owed his fame and fortune. He spoke of his works as of trifles that were beneath him; and hinted to me, in our first conversation, that I should visit him upon no other footing than that of a gentleman who led a life of plainness and simplicity. I answered, that had he been so unfortunate as to be a mere gentleman, I should never have come to see him; and I was very much disgusted at so unseasonable a piece of vanity.

令英国喜剧的光彩空前绝后的，是已故的剧作家康格里夫先生。他所写剧目不多，却皆为上乘之作。他的作品都严守戏剧的套路，人物角色饱满，刻画细致入微，全剧不见半句低俗的俏皮话。剧中的人物说着正派的话，却干着无赖的勾当，这恰好证明康格里夫对人性了如指掌，还常和所谓的上流社会打交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体弱多病，奄奄一息。康格里夫先生有个缺点，作家是他的首份职业，他却毫不放在眼里，虽说正是这一身份让他名利双收。他谈起自己的作品，就像在说有失身份的琐事而已。第一次跟他交谈时，他指点我说，我这次前来看他，要把他当一个再平凡不过的绅士看待。我回答说，要是很不幸他只是个绅士，我绝不会去探访。他的这种虚荣真是莫名其妙，让我颇为反感。

Mr. Congreve's comedies are the most witty and regular, those of Sir John Vanbrugh most gay and humorous, and those of Mr. Wycherley have the greatest force and spirit. It may be proper to observe that these fine geniuses never spoke disadvantageously of Molière; and that none but the contemptible writers among the English have endeavoured to lessen the character of that great comic poet. Such Italian musicians as despise Lully are themselves persons of no character or ability; but a Buononcini esteems that great artist, and does justice to his merit.

康格里夫先生的喜剧非常机智风趣，且有章可循；约翰·范布勒爵士的剧本是最轻快愉悦、滑稽幽默的；而威彻利先生的剧作则最气势磅礴、神韵十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色的天才从不对莫里哀妄加非议，只有某些卑鄙的英国作家才会企图诋毁这位喜剧作家的伟大人格。那些贬低吕利的意大利音乐家自身便无德无能。连博农奇尼这样出名的作曲家都对吕利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敬重有加，还为他主持公道。

The English have some other good comic writers living, such as Sir Richard Steele and Mr. Cibber, who is an excellent player, and also Poet Laureate—a title which, how ridiculous soever it may be thought, is yet worth a thousand crowns a year (besides some considerable privileges) to the person who enjoys it. Our illustrious Corneille had not so much.

英国如今还有一些优秀的喜剧作家，如理查德·斯蒂尔和西伯先生。西伯先生还是位优秀的演员兼桂冠诗人。尽管桂冠诗人这头衔听上去多么滑稽，但每年能领到一千埃居，还有许多优厚待遇。我们赫赫有名的高乃依先生还没那么多福利呢。

To conclude. Don't desire me to descend to particulars with regard to these English comedies, which I am so fond of applauding; nor to give you a single smart saying or humorous stroke from Wycherley or Congreve. We don't laugh in reading a translation. If you have a mind to understand the English comedy, the only way to do this will be for you to go to England, to spend three years in London, to make yourself master of the English tongue, and to frequent the playhouse every night. I receive but little pleasure from the perusal of Aristophanes and Plautus, and for this reason because I am neither a Greek nor a Roman. The delicacy of the humour, the allusion, the à propos—all these are lost to a foreigner.

总之，诸位可别指望我详细探讨英国喜剧，虽说我对其赞赏有加；也不会列出半句威彻利或康格里夫作品中的警言妙语。翻译过来的喜剧作品可不能让我们发笑。要是你一心想看懂英国喜剧，只有亲自去趟英国，在伦敦呆上三年，把英语学精，晚上还得常跑戏院。我每每细读阿里斯托芬和普劳图斯的喜剧时，并不能从中得到多少乐

趣，因为我既非希腊人也非罗马人。剧中幽默的微妙之处、各种典故和隽语，对于外国人而言，都会失去其意义。

But it is different with respect to tragedy, this treating only of exalted passions and heroical follies, which the antiquated errors of fable or history have made sacred. Oedipus, Electra, and such-like characters, may with as much propriety be treated of by the Spaniards, the English, or us, as by the Greeks. But true comedy is the speaking picture of the follies and ridiculous foibles of a nation; so that he only is able to judge of the painting who is perfectly acquainted with the people it represents.

悲剧则不同，它所写的是高尚的激情和英雄的鲁莽，不过是迂腐荒谬的寓言和历史将其变得神圣。对于俄狄浦斯、伊莱克特拉这般神话人物，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与希腊人的理解都是一样的。而真正的喜剧，是一个国家的丑态和可笑缺点的生动写照。因此，只有熟谙那个国家的人，方能鉴赏这幅人间百态图。

Letter XX—On Such of the Nobility as Cultivate the Belles Letters

第二十封信　谈研究纯文学的贵族

THERE once was a time in France when the polite arts were cultivated by persons of the highest rank in the state. The courtiers particularly were conversant in them, although indolence, a taste for trifles, and a passion for intrigue, were the divinities of the country. The Court methinks at this time seems to have given into a taste quite opposite to that of polite literature, but perhaps the mode of thinking may be revived in a little time. The French are of so flexible a disposition, may be moulded into such a variety of shapes, that the monarch needs but command and he is immediately obeyed. The English generally think, and learning is had in greater honour among them than in our country—an advantage that results naturally from the form of their government. There are about eight hundred persons in England who have a right to speak in public, and to support the interest of the kingdom and near five or six thousand may in their turns aspire to the same honour. The whole nation set themselves up as judges over these, and every man has the liberty of publishing his thoughts with regard to public affairs, which shows that all the people in general are indispensably obliged to cultivate their understandings. In England the governments of Greece and Rome are the subject of every conversation, so that every man is under a necessity of perusing such authors as treat of them, how disagreeable soever it may be to him; and this study leads naturally to that of polite literature. Mankind in general speak well in their respective professions. What is the reason why our magistrates, our lawyers, our physicians, and a great number of the clergy, are abler scholars,

have a finer taste, and more wit, than persons of all other professions? The reason is, because their condition of life requires a cultivated and enlightened mind, in the same manner as a merchant is obliged to be acquainted with his traffic. Not long since an English nobleman, who was very young, came to see me at Paris on his return from Italy. He had written a poetical description of that country, which, for delicacy and politeness, may vie with anything we meet with in the Earl of Rochester, or in our Chaulieu, our Sarrasin, or Chapelle. The translation I have given of it is so inexpressive of the strength and delicate humour of the original, that I am obliged seriously to ask pardon of the author and of all who understand English. However, as this is the only method I have to make his lordship's verses known, I shall here present you with them in our tongue:—

在法国，曾一度只有位高权重之人，方可研究高雅艺术。尤其是廷臣们，对文学艺术研究可谓驾轻就熟。虽说好逸恶劳、无所事事、玩弄权术仍是宫廷的主旋律。以我之见，如今宫中品味，已与高雅文学趣味相去甚远。但或许不消多久，昔日的思潮又会得以复苏。法国人性情善变，可塑性极高，君王只需一声令下，臣民自会唯命是从。英国人普遍认为，他们比法国人更尊崇学问修养，这一优点是英国政府体制的必然结果。在英国，约有八百人有权公开演说，来维护国家利益，近五、六千人只需等待一段时间，便可获此殊荣。所有国民都能评判他们的演说，都有权就公共事务发表感想，并付梓成文。这说明所有人都自愿自主地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英国人谈起话来总免不了议论一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政府。因此，再怎么讨厌这个话题的人，谈起政府来，也得先好好诵读相关著作。这样一来，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读起了文学作品。总体而言，人们在各自的行业内都能言善辩。我国的行政官、律师、医生以及多数神职人员，相比其他行业的人员，学问更精深，品位更高雅，才思更敏锐，原因何在？因为他们迫于生活环境，必须趣味高雅，思想开明，正如商人必须对往来生意

了然于胸。不久前，一位非常年轻的英国贵公子从意大利返乡，途中到巴黎来看我。他写了一首诗来描绘意大利，该诗精妙绝伦、高雅脱俗，定然可以和罗切斯特伯爵、肖利厄、萨拉赞和沙佩勒所写的诗媲美。我的译文远不及原文那样充满力道、幽默自现，我在此真诚地向原作者和所有懂得英语的人致歉。但是，为了让法国人民一睹公子阁下的诗作，我唯有将它译成法语了，译文如下：

Qu'ay je donc vu dansl'Italie?

“我在意大利所见为何？

Orgueil, Astuce, &Pauvreté,

傲慢、贫穷与诡计，

Grands Complimens, peu de Bonté

恭维漫天，善行难觅，

Et beaucoup de Ceremonie.

处处繁文缛节相行。

L'extravaganteComedie,

正是一部荒诞不经的闹剧，

Que souventl' Inquisition

宗教裁判所往往

Veutqu'onnomme Religion;

欲令世人唤此为信仰，

Maisqu'ici nous nommonsFolie.

但我们却称其为荒唐。

La Nature en vain bienfaisante

大自然徒怀善意，

Veut enricher sesLieuxcharmans,

要将这迷人之地装点得更美丽，

Des Prêtres la main desolante

岂料教士们伸出毒手，

Etouffeses plus beaux présens.

摧残了它最美的献礼。

Les Monsignors, soy disant Grands,

那些老爷贵族，所谓的大人物，

SeulsdansleursPalaismagnifiques

独自幽居华宫美殿，

Y sontd'illustres faineants,

终日游手好闲，

Sans argent, & sans domestiques.

钱财既空，仆从亦无。

Pour les Petits, sans liberté,

那些小人物，身不由己，

Martyrs du joug qui les domine,

受尽迫害奴役，

Ilsont fait vœu de pauvreté,

他们誓言清苦一生，

PriantDieu par oisiveté

百无聊赖，唯有对主虔诚，

Ettoûjoursjeunant par famine.

因粮荒而守斋，被迫挨饿忍饥。

Ces beaux lieux du Pape benis

教皇降福的美好净土，

Semblenthabitez par les Diables;

似被魔鬼侵巢而居；

Et les Habitansmiserables

不幸的民众啊！

Sontdamnezdans le Paradis.

在天堂受地狱之苦。”

Letter XXI—On the Earl of Rochester and Mr. Waller

第二十一封信　谈罗切斯特伯爵和沃勒先生

THE EARL OF ROCHESTER's name is universally known. Mr. de St. Évremond has made very frequent mention of him, but then he has represented this famous nobleman in no other light than as the man of pleasure, as one who was the idol of the fair; but, with regard to myself, I would willingly describe in him the man of genius, the great poet. Among other pieces which display the shining imagination his lordship only could boast, he wrote some satires on the same subjects as those our celebrated Boileau made choice of. I do not know any better method of improving the taste than to compare the productions of such great geniuses as have exercised their talent on the same subject. Boileau declaims as follows against human reason in his “Satire on Man”:

罗切斯特伯爵的鼎鼎大名人尽皆知。圣·艾弗蒙先生常常提到他，可他只把这位显赫的贵公子说成是艳福不浅的风流浪子。但就我而言，宁愿说他是位天赋异禀的杰出诗人。他曾写过诸多诗篇，展现了这位爵爷熠熠生辉的想象力。此外，他还写过一些讽刺诗，和法国著名诗人布瓦洛所涉猎的主题相同。两位天才诗人在同一主题上展现了各自的才华。要想提高鉴赏品位，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进行比较。布瓦洛在诗作《讽刺人类》中，对人类的理智作了如下批评：

Cependant à le voirplein de vapeurslégeres,

“但他脑中尽是幻觉，不着边际，

Soi-même se bercer de sespropreschimeres,

伴随诸种妄想，他思绪游移，

Luiseul de la nature est la baze&l'appui,

自以为是大自然唯一的根基，

Et le dixiemeciel ne tourne que pour lui.

第十重天的旋转只为他自己。

De tous les Animauxilestici le Maître;

他是世间万物的主宰。

Qui pourroit le nier, poursuistu?

对此，谁又能否认？你追问。

Moipeut-être.

我啊，也许能。

Ce maître prétendu qui leurdonne des loix,

他自诩主宰，为一切生灵制定律章。

Ce Roi des Animaux, combien à-t'il de Rois?

既为万物之王，可手中王牌有几张？”

Yet, pleas'd with idle Whimsies of his Brain,

“但他洋洋自得，无聊的念头古怪离奇，

And puff'd with Pride, this haughty Thing wou'd fain

这傲慢的家伙心高气傲，自鸣得意，

Be thought himself the only Stay and Prop

以为自己是世界唯一的支柱，

That holds the mighty Frame of Nature up.

撑起这辽阔黄土和宇宙万物。

The Skies and Stars his Properties must seem,

仿佛苍穹和群星是囊中之物，

. . .

……

Of all the Creatures he's the Lord, he cries.

吾乃万物之王！他如此叫嚷。

. . .

……

And who is there, say you, that dares deny

你说，有谁胆敢抵抗，

So own'd a Truth?

这自说自话的真相？

That may be, Sir, do I.

大王，让我来讲。

. . .

……

This boasted Monarch of the World who awes

这自吹自擂的大王让万物敬畏，

The Creatures here, and with his Nod gives

Laws;

只要他一点头，便造就了法规。

This self-nam'd King, who thus pretends to be

他自封霸主，自诩万物之王，

The Lord of all, how many Lords has he?

但手里的王牌又有几张？”

OLDHAM, a little altered.

（英文版由奥尔德姆翻译，略有改动）

The Lord Rochester expresses himself, in his “Satire against Man,” in pretty near the following manner. But I must first desire you always to remember that the versions I give you from the English poets are written with freedom and latitude, and that the restraint of our versification, and the delicacies of the French tongue, will not allow a translator to convey into it the licentious impetuosity and fire of the English numbers:—

在《对人类的讽刺》一诗中，罗切斯特伯爵的态度几乎如出一辙。但我首先希望各位明白，我的译本是对原作的意译。而且由于法语诗律的约束，以及法语自身精微严谨，难以通过译文充分传达英语原文不拘一格、满腔激情的风格：

Cet Esprit que jehaïs, cet Esprit pleind'erreur,

“这种精神一派荒谬，令我憎恨，

Ce n'est pas ms raison, c'est la tienneDocteur.

它并非我的推想，是你的，学究大人。

C'est la raison frivôle, inquiete, orgeuilleuse

这推想轻佻浅薄、令人不安，且倨傲无比。

Des sages Animaux, rivaledédaigneuse,

它是一切智慧生灵所鄙夷的劲敌，

Qui croitentr'eux&l'Ange, occuper le milieu,

自认为能在万物与天使间占据一席之地，

Etpenseêtreici bas l'image de son Dieu.

妄图在这尘世化身上帝。

Vilatômeimparfait, qui croit, doute, dispute

那些微言琐事，他相信，怀疑，或辩白；

Rampe, s'eleve, tombe, &nie encore sachûte.

他趴下，站起，又跌倒，却始终不言败。

Qui nous dit je suislibre, en nous montrantsesfers,

他对我们说，我自由，却露出镣铐，

Etdontl'œil trouble & faux, croitpercerl'univers.

那朦胧的双眼自以为看穿寰宇奥妙。

Allez, reverends Fous, bienheureuxFanatiques,

走吧，可敬的狂人，福佑的迷徒，

Compilezbienl'Amas de vosRiensscholastiques,

好好去编纂你那些无用的哲学书。

Peres de Visions, &d'Enigmessacrez,

幻想和神圣谜语的祖先，

Auteurs du Labirinthe, ouvousvouségarez.

迷宫的缔造者，自己却迷失其间。

Allezobscurementéclaircirvosmisteres,

去晦涩地解说你的神秘，

Etcourezdansl'école adorer voschimeres.

步入学堂膜拜你的幻臆。

Ilestd'autreserreurs, ilest de cesdévots

同其他错误一样，这些虔诚的信徒，

Condamné par euxmêmes à l'ennui du repos.

他们自寻清净无谓的烦恼。

Ce mystique encloîtré, fier de son Indolence

这神秘而故步自封的人，以麻木不仁为傲。

Tranquille, au sein de Dieu.

安静地，在上帝的怀抱。

Que peutil faire?

他能做什么？

Ilpense.

他在想。

Non, tu ne penses point, misérable, tudors:

不，你绝非在想，可悲的人儿，你在沉睡：

Inutile à la terre, &mis au rang des Morts.

对凡世毫无用处，不如入逝者的行列。

Ton esprit énervécroupitdans la Molesse.

你软弱的精神被懒惰重重围困。

Reveille toi, sois hommes, &sors de ton Yvresse.

醒来吧！人啊，走出你的醉意。

L'hommeest né pour agir, &tupretenspenser? &c.

人生来就应行动，而你为何假装思考？……”

The Original runs thus:

原文如下：

Hold, mighty Man, I cry all this we know,

“且慢，万能的人类，我要喊出真相，

And'tis this very Reason I despise,

正是因此我鄙夷这神奇的推想，

This supernatural Gift, that makes a Mite

它让微不足道的蝼蚁之躯，

Think he's the Image of the Infinite;

自以为象征着无穷的寰宇。

Comparing his short Life, void of all rest,

将他短暂而空洞的生命，

To the eternal and the ever blest.

比作幸福又长生的精灵。

This busy, puzzling Stirrer up of Doubt,

心中疑虑让他忙碌又困惑，

That frames deep Mysteries, then finds'em out,

编造谜团接着又自行揭破。

Filling, with frantic Crowds of thinking Fools,

发狂的人群里个个是沉思的智障，

Those reverend Bedlams, Colleges and Schools;

被塞进神圣的病院、大学和学堂。

Borne on whose Wings, each heavy Sot can pierce

烂醉的酒鬼乘着神圣的翅膀，

The Limits of the boundless Universe.

都能在广袤的宇宙自由徜徉。

So charming Ointments make an old Witch fly,

神奇的药膏让女巫直上云霄，

And bear a crippled Carcass through the Sky.

载着那残缺的躯体自在逍遥。

'Tis this exalted Power, whose Business lies

这无上之伟力的本源，

In Nonsense and Impossibilities.

正是荒唐之极的胡言。

This made a whimsical Philosopher,

它让那些异想天开的哲人，

Before the spacious World his Tub prefer;

在偌大世界面前摆上浴盆。

And we have modern cloyster'd Coxcombs, who

如今还有悄然遁世的花花公子，

Retire to think,'cause they have nought to do:

退隐沉思，只因实在无所事事，

But thoughts are giv'n for Action's Government,

但思想服务于行动，

Where Action ceases, Thought's impertinent.

没行动则思想无用。”

Whether these ideas are true or false, it is certain they are expressed with an energy and fire which form the poet. I shall be very far from attempting to examine philosophically into these verses, to lay down the pencil, and take up the rule and compass on this occasion; my only design in this letter being to display the genius of the English poets, and therefore I shall continue in the same view.

不论以上观点是对是错，可以肯定的是，诗人用生命的能量和热情抒写了这些诗篇。我绝不会就此搁笔，拿起尺规，试图从哲学角度去剖析这些诗句。我写这封信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展现英国诗人的卓越才华。因此，我将秉持初衷继续书写。

The celebrated Mr. Waller has been very much talked of in

France, and Mr. de la Fontaine, St. Évremond, and Bayle have written his eulogium, but still his name only is known. He had much the same reputation in London as Voiture had in Paris, and in my opinion deserved it better. Voiture was born in an age that was just emerging from barbarity; an age that was still rude and ignorant, the people of which aimed at wit, though they had not the least pretensions to it, and sought for points and conceits instead of sentiments. Bristol stones are more easily found than diamonds. Voiture, born with an easy and frivolous genius, was the first who shone in this aurora of French literature. Had he come into the world after those great geniuses who spread such a glory over the age of Louis XIV., he would either have been unknown, would have been despised, or would have corrected his style. Boileau applauded him, but it was in his first satires, at a time when the taste of that great poet was not yet formed. He was young, and in an age when persons form a judgment of men from their reputation, and not from their writings. Besides, Boileau was very partial both in his encomiums and his censures. He applauded Segrais, whose works nobody reads; he abused Quinault, whose poetical pieces every one has got by heart; and is wholly silent upon La Fontaine. Waller, though a better poet than Voiture, was not yet a finished poet. The graces breathe in such of Waller's works as are writ in a tender strain; but then they are languid through negligence, and often disfigured with false thoughts. The English had not in his time attained the art of correct writing. But his serious compositions exhibit a strength and vigour which could not have been expected from the softness and effeminacy of his other pieces. He wrote an elegy on Oliver Cromwell, which, with all its faults, is nevertheless looked upon as a masterpiece. To understand this copy of verses you are to know that the day Oliver died was remarkable for a great storm. His poem begins in this manner:—

沃勒先生鼎鼎有名，法国人常常谈到他。拉·方丹先生、圣·艾弗蒙，以及贝尔先生都为他写过颂文，不过人们只是听说他名气大。他在伦敦的名声就同瓦蒂尔在巴黎的名声一样响，而我觉得，沃勒更配得上这显赫的声誉。瓦蒂尔出生于一个刚脱离蛮荒的时代，一个仍旧蒙昧无知的时代。那时人们觊觎智慧，但毫无资格获取。他们所追寻的不是思想感情，而是辞藻堆砌。就像石英石比金刚石要好找得多。瓦蒂尔生来就是个不拘小节、轻佻浮夸的天才，可谓法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道曙光。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有许多大文豪为国家增光添彩，倘若沃勒迟一步出世，他也许就会沦为无名小辈，遭人鄙夷，不然就得一改文风。布瓦洛曾褒奖过沃勒，但那只是在他初期的讽刺作品中，当时大诗人布瓦洛的文学品位尚未成形。那时他尚年轻，而且那个时代的人们评价文人，要看他的名气，而非他的作品。再者，布瓦洛对别人的赞美和批评往往有失偏颇。他赞颂过塞格雷，而塞格雷的作品无人问津；他贬损过基诺，但基诺的诗篇深得人心；他对拉·方丹却是只字不提。沃勒虽说比瓦蒂尔来得高明，却也并非十全十美。沃勒的诗作笔触轻柔，读来如微风拂面；但由于作品不修边幅，显得苍白无力，还常因错误的想法而大失风采。当时的英国人尚未掌握得体的写作规范。然而，他还有些笔调严肃的诗篇，倒尽显刚强活力，这在他其余温文尔雅的作品中是无法想见的。他曾为奥利弗·克伦威尔写过一首挽诗，该诗尽管存有缺憾，但仍被奉为杰作。要看懂这首挽诗，你得先知道克伦威尔辞世之日，风雨大作，异乎寻常。该诗开篇如下：

“Il n'est plus, s'enestfait, soumettons nous au sort,

“他走了，就这么完了，我们应顺从命运。

Le ciel a signaléce jour par des tempêtes,

这天，上帝以暴风骤雨令我们警醒，

Et la voix des tonnerreséclatant sur nostêtes

雷声在我们头顶阵阵轰鸣，

Vientd'annoncersa mort.

宣告他的死讯。

Par sesdernierssoupirsilébranlecetîle;

这最后一声叹息震撼这座岛。

Cetîle que son bras fit trembler tant de fois,

无数次，他的臂膀使全岛战栗，

Quanddans le cours de ses Exploits,

当其战功卓著之时，

Ilbrisoit la tête des Rois,

他击碎了君王的首级，

Etsoumettoit un peuple à son jougseul docile.

令整个民族臣服于他的镣铐。

Mertut'enéstroublé; O Mertesflotsémus

海啊，你为此不安；海啊，你汹涌奔流，

Semblent dire engrondant aux plus lointainsrivages

仿佛向着最遥远的海岸诉说，

Que l'effroi de la terre& ton Maître n'est plus.

你的主人，那大地的恐惧，已寿终正寝。

Tel au ciel autrefois s'envola Romulus,

当时，罗穆卢斯就这样飞上天去，

Tel ilquita la Terre, au milieu des orages,

就这样离开大地，冒着狂风暴雨，

Tel d'un peupleguerrierilreçut les homages;

就这样受到一个好战民族的效忠；

Obéïdanssa vie, à sa mort adoré,

生前对其服从，死后向其膜拜，

Son palaisfutun Temple, &c.

他的宫殿变成了圣坛……”

We must resign! Heav'n his great Soul does claim

“我们必须屈服！上天伟大的灵魂在召唤，

In Storms as loud as his immortal Fame:

暴风雨如同他的不朽之名令人胆战。

His dying Groans, his last Breath shakes our Isle,

他垂死的呻吟与叹息让小岛震颤醒来，

And Trees uncut fall for his fun'ral Pile:

参天大树纷纷倒落竞相作火葬的木柴。

About his Palace their broad Roots are tost

宫殿周遭的大树连根拔起抛向空中，

Into the Air; so Romulus was lost!

失去伟大的战神罗穆卢斯我们心痛！

New Rome in such a Tempest miss'd her King,

罗马帝国随着风暴遗失了她的皇帝，

And from obeying fell to worshipping:

我们原本唯命是从，如今只能五体投地：

On Œta's Top thus Hercules lay dead,

这位大力神在埃特纳山峰上溘然长逝，

With ruin'd Oaks and Pines about him spread.

遗体周围散落着残败的橡木松木树枝。

Nature herself took Notice of his Death,

自然之母也来送他最后一程，

And, sighing, swell'd the Sea with such a

Breath,

她长叹一声，大海随之翻腾，

That to remotest Shores the Billows roul'd,

汹涌的波涛拍打海岸的远处，

Th'approaching Fate of his great Ruler told.”

宣告这位霸主那迫近的命数。”

WALLER.

（沃勒作）

It was this eulogium that gave occasion to the reply (taken notice of in Bayle's Dictionary), which Waller made to King Charles II. This king, to whom Waller had a little before (as is usual with bards and monarchs) presented a copy of verses embroidered with praises, reproached the poet for not writing with so much energy and fire as when he had applauded the Usurper (meaning Oliver). “Sir,” replied Waller to the king, “we poets succeed better in fiction than in truth.” This answer was not so sincere as that which a Dutch

Ambassador made, who, when the same monarch complained that his masters paid less regard to him than they had done to Cromwell: “Ah, sir!” says the Ambassador, “Oliver was quite another man—.” It is not my intent to give a commentary on Waller's character, nor on that of any other person; for I consider men after their death in no other light than as they were writers, and wholly disregard everything else. I shall only observe that Waller, though born in a Court, and to an estate of five or six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a year, was never so proud or so indolent as to lay aside the happy talent which Nature had indulged him. The Earls of Dorset and Roscommon, the two Dukes of Buckingham, the Lord Halifax, and so many other noblemen, did not think the reputation they obtained of very great poets and illustrious writers, any way derogatory to their quality. They are more glorious for their works than for their titles. These cultivated the polite arts with as much assiduity as though they had been their whole dependence. They also have made learning appear venerable in the eyes of the vulgar, who have need to be led in all things by the great; and who, nevertheless, fashion their manners less after those of the nobility (in England I mean) than i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正是这首赞美诗引发了沃勒与国王查理二世之间的对答（见皮埃尔·培尔的《历史与批评词典》）。照君主和诗人之间的惯例，沃勒前不久刚给国王写过一首赞美诗。查理二世却因此斥责沃勒，颂扬篡位者（指克伦威尔）时倒是满腔热情。“陛下，”沃勒答道，“我们诗人擅长杜撰，而非写实。”这个回答稍显违心，而一位荷兰大使的回答则显得更真诚。当时，查理二世抱怨说，大臣们不如对待克伦威尔那般敬重他。这位大使随即答道：“陛下啊，您和奥利弗可不同——”我无意评论沃勒或其他人的品格。因为我只把已故文人当纯粹的作家看待，其他方面我不予理会。我只能说，沃勒虽生于官宦之家，一年能有五六千英镑的收入，但从未因自负或懒惰而摈弃上天赐予他的优越

才华。多赛特伯爵、罗斯康芒伯爵、两位白金汉公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以及许多贵族人士，都觉得辛苦得来的大诗人或大作家的名声，不论如何也无损于他们的贵族品质。他们的作品远比他们的头衔更值得称道。这些文人墨客孜孜不倦，将高雅艺术发扬光大，仿佛这是他们全部的寄托。同时，他们让平民对学问肃然起敬，觉得万事都得由伟人引路；但尽管如此，比起其他国家，英国百姓却不怎么效仿贵族的举止言行。

Letter XXII—On Mr. Pope and Some Other Famous Poets

第二十二封信　谈波普先生及其他几位著名诗人

I INTENDED to treat of Mr. Prior, one of the most amiable English poets, whom you saw Plenipotentiary and Envoy Extraordinary at Paris in 1712. I also designed to have given you some idea of the Lord Roscommon's and the Lord Dorset's muse; but I find that to do this I should be obliged to write a large volume, and that, after much pains and trouble, you would have but an imperfect idea of all those works. Poetry is a kind of music in which a man should have some knowledge before he pretends to judge of it. When I give you a translation of some passages from those foreign poets, I only prick down, and that imperfectly, their music; but then I cannot express the taste of their harmony.

我本想谈谈普里奥尔先生，他是全英吉利脾气最好的诗人，曾于1712年担任英国驻巴黎特命全权公使。我还打算写到罗斯康芒伯爵和多塞特伯爵，说说他们的创作灵感，但这样一来我得写上厚厚的一卷才行，而费尽周折之后，各位也只能略见一斑。诗歌犹如音乐，在品评之前，需对其略知一二。当我翻译外国诗歌选段时，只能不甚完美地向您呈现它们的音律，但无法传达其中的和谐韵味。

There is one English poem especially which I should despair of ever making you understand, the title whereof is “Hudibras.” The subject of it is the Civil War in the time of the grand rebellion, and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he Puritans are therein ridiculed. It is Don Quixote, it is our “Satire Menippée” blended together. I never

found so much wit in one single book as in that, which at the same time is the most difficult to be translated. Who would believe that a work which paints in such lively and natural colours the several foibles and follies of mankind, and where we meet with more sentiments than words, should baffle the endeavours of the ablest translator? But the reason of this is, almost every part of it alludes to particular incidents. The clergy are there made the principal object of ridicule, which is understood but by few among the laity. To explain this a commentary would be requisite, and humour when explained is no longer humour. Whoever sets up for a commentator of smart sayings and repartees is himself a blockhea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works of the ingenious Dean Swift, who has been called the English Rabelais, will never be well understood in France. This gentleman has the honour (in common with Rabelais) of being a priest, and, like him, laughs at everything; but, in my humble opinion, the title of the English Rabelais which is given the dean is highly derogatory to his genius. The former has interspersed his unaccountably fantastic and unitelligible book with the most gay strokes of humour; but which at the same time, has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impertinence. He has been vastly lavish of erudition, of smut, and insipid raillery. An agreeable tale of two pages is purchased at the expense of whole volumes of nonsense. There are but few persons, and those of a grotesque taste, who pretend to understand and to esteem this work; for, as to the rest of the nation, they laugh at the pleasant and diverting touches which are found in Rabelais and despise his book. He is looked upon as the prince of buffoons. The readers are vexed to think that a man who was master of so much wit should have made so wretched a use of it; he is an intoxicated philosopher who never wrote but when he was in liquor.

特别是有首英文诗，要翻译过来让诸位看懂，我是绞尽脑汁也无法做到，这首诗叫做《胡迪布拉斯》。该诗以英国大叛乱时期的内战为主题，嘲讽了清教徒的宗教信条和行事风格。它完美融合了《堂吉诃德》与《梅尼普讽刺》两部大作的精髓。这是我读过的最精辟、最风趣，同时也是最难翻译的作品。它将人类的弱点和丑态刻画得如此生动自然，字里行间饱含情感，溢于言表，谁会想到这竟让最有本事的译者都束手无策？原因就在于全篇几乎每个部分都有其背后的典故。文中嘲讽的主角是教士，因而令凡夫俗子难以理解。所以，必须加以注解才行，但幽默一经阐释，就不成其为幽默了。凡是自以为能评注妙语之人都不过是个傻瓜。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天才教长斯威夫特，虽人称“英国拉伯雷”，但其作品在法国却难觅知音。和拉伯雷一样，这位先生有幸成为一位牧师，也同样能傲视万物。但以我拙见，“英国拉伯雷”的称号实在是大大贬低了他的超凡才华。拉伯雷的作品荒诞无稽、晦涩难懂，书中尽是俗丽的幽默之笔，且粗俗之词用得更多。他浪费大量的笔墨来卖弄他的学识，还滥用下流无聊的笑话。两张纸就能写完的精彩故事，他偏要胡言乱语，连篇累牍。只有少数奇嗜怪癖者会装作看得懂他的作品，还对其敬佩有加；而多数人对书中有趣之处一笑了之，随后便不屑一顾。人人都把拉伯雷视为小丑大王。一位如此睿智之士居然把才华用得那么糟糕，这令人颇为懊恼。他可谓是个醉酒哲人，只在醉意正浓时乘兴而作。

Dean Swift is Rabelais in his senses, and frequently the politest company. The former, indeed, is not so gay as the latter, but then he possesses all the delicacy, the justness, the choice, the good taste, in all which particulars our giggling rural Vicar Rabelais is wanting. The poetical numbers of Dean Swift are of a singular and almost inimitable taste; true humour, whether in prose or verse, seems to be his peculiar talent; but whoever is desirous of understanding him perfectly must visit the island in which he was born.

斯威夫特则是理智状态下的“拉伯雷”，他常与上流社会打交道。斯威夫特的确不如拉伯雷那么乐天，但他才思敏锐、公道正派、行不苟合、品位高雅，这些特点正是乡村牧师拉伯雷所欠缺的。他的诗作别开生面，不可仿效；其散文和韵文所流露的诙谐幽默则似乎是他得天独厚的才华。然而，谁想要彻底了解他，就得到他出生的岛国英吉利走一趟。

It will be much easier for you to form an idea of Mr. Pope's works. He is, in my opinion, the most elegant, the most correct poe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most harmonious (a circumstance which redounds very much to the honour of this muse) that England ever gave birth to. He has mellowed the harsh sounds of the English trumpet to the soft accents of the flute. His compositions may be easily translated, because they are vastly clear and perspicuous; besides, most of his subjects are general, and relative to all nations.

相较之下，要了解波普的作品就容易多了。依我之见，他是英国所孕育的格调最高雅、举止最得体，也是最顺势而生的诗人，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他将英语从嘈杂刺耳的喇叭声化作悠扬悦耳的笛音。他的作品表达清晰明了，因而翻译起来毫不费力。其主题也颇具普世性，与每个国家都息息相关。

His “Essay on Criticism” will soon be known in France by the translation which l'Abbé du Resnel has made of it.

他的《批评论》很快就会在法国出版译本，雷斯纳尔修道院院长已经完成了翻译工作。

Here is an extract from his poem entitled the “Rape of the Lock,” which I just now translated with the latitude I usually take on these occasions; for, once again, nothing can be more ridiculous than to translate a poet literally:—

下文选自他的史诗作品《夺发记》，是我信笔翻译的，我的态度一贯如此。我还得重申，没有什么比逐字逐句翻译来得更荒唐了：

“Umbriel, à l'instant, vieil Gnome rechigné,

“顷刻间，乌姆柏里厄尔，年迈而忧郁的地精，

Vad'uneaîlepesante& d'un air renfrogné

拖着沉重的羽翼，愁眉不展，向下而行，

Chercherenmurmurant la Caverneprofonde,

他喃喃自语，欲找寻深不可测的洞府

Où loin des douxraïons que répandl'œil du monde

太阳和煦的光芒未曾将那里光顾，

La Déesse aux vapeurs a choisi son séjour,

而雾岚女神却长居于此。

Les tristes Aquilons y siflent à l'entour,

凛冽的北风在四周呼啸穿驰，

Et le soufle mal sain de leuraridehaleine

阴风阵阵，凄冷而刺骨

Y porte aux environs la fievre& la migraine.

令周遭饱尝寒热与头痛的病苦。

Sur un riche Sofa derriere un Paravent

屏风之后，一张华贵沙发上，

Loin des flambeaux, du bruit, des parleurs& du vent,

没有人语与风声，没有喧嚣与光亮，

La quinteuseDéesseincessamment repose,

那喜怒无常的女神在此停歇长驻，

La cœurgros de chagrin, sans en savoir la cause.

满怀哀愁，而从不知何故，

N'aiantpenséjamais, l'esprittoûjourstroublé,

虽不曾臆想，却饱受困扰，

L'œil chargé, le teintpâle, &l'hypocondreenflé.

她双目低垂，神色黯然，凄怨之情溢于言表。

La medisanteEnvie, estassiseauprèsd'elle,

恶念之神正端坐其身旁，

Vieilspectreféminin, décrépitepucell,

这是诡谲的巫婆，衰颓的处女，

Avec un air devotdéchirant son prochain,

面带忠厚，而对邻舍恶言相向，

Etchansonnant les Gens l'Evangile à la main.

虽手执圣经，却将世人中伤。

Sur un lit plein de fleursnegligemmentpanchée

在她不远处有张鲜花装点的床榻，

UnejeuneBeauté non loin d'elleestcouchée,

一位妙龄少女漫不经心地躺下，

C'estl'Affectation qui grassaïeenparlant,

那是造作之神，说话捏着喉咙发声，

Ecoute sans entendre, &lorgneenregardant.

她听而不闻，睥睨众生，

Qui rougit sans pudeur, &rit de tout sans joïe,

不知羞耻却会面红耳赤，笑逐颜开实则毫无笑意，

De cent mauxdifférens, prétendqu'elleest la proïe;

她乔装自身百病丛集，

Etpleine de santé sous le rouge & le fard,

可脂粉之下，却健康无异，

Se plaint avec molesse, & se pame avec Art.”

她娇弱地自怨自艾，娴熟地翩然倒地。”

“Umbriel, a dusky, melancholy Sprite

“乌姆柏里厄尔，郁郁寡欢的精灵

As ever sullied the fair Face of Light,

在明亮的脸庞上留下斑驳的烙印，

Down to the central Earth, his proper Scene,

他一如既往，走向地底深处，

Repairs to search the gloomy Cave of Spleen.

前去寻找深不可测的幽冥洞府。

Swift on his sooty Pinions flits the Gnome,

雨燕拍动乌黑的翅膀，轻盈地掠过大地，

And in a Vapour reached the dismal Dome.

穿过云雾，飞上沉闷的天际。

No chearful Breeze this sullen Region knows,

这片阴郁的地界，未曾拂过一丝沁人的微风，

The dreaded East is all the Wind that blows.

呼啸而过的，尽是可怖的西风。

Here, in a Grotto, shelter'd close from Air,

这洞穴，与外界隔绝

And screen'd in Shades from Day's detested Glare,

即便骄阳炙烤，洞内也只见日光隐约，

She sighs for ever on her pensive Bed,

在忧思中，她长长叹息。

Pain at her Side, and Megrim at her Head,

苦痛萦绕身边，忧郁挥之不离，

Two Handmaids wait the Throne:

宝座两侧侍立着两位婢女：

Alike in Place,

尽管同处一室，

But diff'ring far in Figure and in Face,

两者却毫不相似，

Here stood Ill-nature like an ancient Maid,

居一边者乃恶念之神，貌如年迈的女仆，

Her wrinkled Form in black and white array'd;

脸上布满深浅不一的纹路；

With Store of Prayers for Mornings, Nights, and Noons,

祷告者络绎不绝，夜以继日向她悔忏，

Her Hand is fill'd; her Bosom with Lampoons.

她虽手执圣经，却满腹讥讪。

There Affectation, with a sickly Mein,

居另一边者乃造作之神，面青唇白，

Shows in her Cheek the Roses of eighteen,

脸颊却泛着红晕，是少女才有的神采，

Practis'd to lisp, and hang the Head aside,

她故意将头歪向一边，口齿不清地嘟囔，

Faints into Airs, and languishes with Pride;

那是矫饰的羸弱，颓唐中语带狂妄；

On the Rich Quilt sinks with becoming Woe,

一袭锦衣之上，苦痛渐次滋长，

Wrapt in a Gown, for Sickness and for Show.”

长袍裹身，既为掩饰病容，也为自我标榜。”

This extract, in the original (not in the faint translation I have given you of it), may be compared to the description of La Mollesse

(softness or effeminacy), in Boileau's “Lutrin.”

这篇诗作选段的英语原文（而非我的拙译）堪比布瓦洛在《经台吟》中对于“柔媚”的刻画。

Methinks I now have given you specimens enough from the English poets. I have made some transient mention of their philosophers, but as for good historians among them, I don't know of any; and, indeed, a Frenchman was forced to write their history. Possibly the English genius, which is either languid or impetuous, has not yet acquired that unaffected eloquence, that plain but majestic air which history requires. Possibly too, the spirit of party which exhibits objects in a dim and confused light may have sunk the credit of their historians. One half of the nation is always at variance with the other half. I have met with people who assured me that the Duke of Marlborough was a coward, and that Mr. Pope was a fool; just as some Jesuits in France declare Pascal to have been a man of little or no genius, and some Jansenists affirm Father Bourdaloue to have been a mere babbler. The Jacobites consider Mary Queen of Scots as a pious heroine, but those of an opposite party look upon her as a prostitute, an adulteress, a murderer. Thus the English have memorials of the several reigns, but no such thing as a history. There is, indeed, now living, one Mr. Gordon (the public are obliged to him for a translation of Tacitus), who is very capable of writing the history of his own country, but Rapin de Thoyras got the start of him. To conclude, in my opinion the English have not such good historians as the French, have no such thing as a real tragedy, have several delightful comedies, some wonderful passages in certain of their poems, and boast of philosophers that are worthy writers of our nation, and therefore

we ought (since they have not scrupled to be in our debt) to borrow from them. Both the English and we came after the Italians, who have been our instructors in all the arts, and whom we have surpassed in some. I cannot determine which of the three nations ought to be honoured with the palm; but happy the writer who could display their various merits.

我想英国诗人的范例我已经举得够多了。至于英国哲学家，我只是一笔带过。但英国出色的历史学家，我倒未曾见过。所以他们的故事得让我这个法国人来记录才行。英国人的禀赋，不是懒散倦怠，就是冲动鲁莽，可能他们尚未习得天然不造作的雄辩之术，以及朴实又不乏威严的气度，这都是历史叙述中必备的素质。又或许是因为门户之见干扰了民众的看法，以致英国历史学家的威信一再降低。这个国家有一半人永远与另一半人意见相左。我见过一些人，他们相信马尔伯勒公爵生性懦弱，波普先生愚昧无知。正如在法国，某些耶稣会士认为帕斯卡尔资质平平，而在某些詹森派信徒眼中，布尔达卢神父只会胡言乱语。詹姆斯二世党人认为苏格兰玛丽女王是位虔诚的女英雄，而反对党人则斥其为荡妇，是个杀人凶手。因而，在英国，只有历代各朝事实的记载，却无历史可言。如今这个国家出了位戈登先生，擅长记录该国历史（人们感激他翻译塔西佗的作品），但还是落后拉潘·德·图瓦拉先生一步。总之，我认为英国人没有我们法国人那样优秀的历史学家，这个国家也没有名副其实的悲剧。不过英国倒是涌现出不少讨人喜欢的喜剧、令人赞赏的诗章，还有许多杰出的哲人，值得我国作家学习借鉴（既然他们不担心亏欠我们什么）。我们两国都跟随意大利的步伐前进。他们在一切艺术领域引导着我们，而我们则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他们。我无法判定三个国家谁应尊享至高荣誉，但作家能明辨各自所长，当属幸事了。

Letter XXIII—On the Regard That Ought to be Shown to Men of Letters

第二十三封信　谈文人应受的尊敬

NEITHER the English nor any other people have foundations established in favour of the polite arts like those in France. There are Universities in most countries, but it is in France only that we meet with so beneficial an encouragement for astronomy and all parts of the mathematics, for physic, for researches into antiquity, for painting,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e. Louis XIV. hasimmortalised his name by these several foundations, and this immortality did not cost him two hundred thousand livres a year.

无论是英国抑或其他国家，对于高雅艺术的支持，都不如法国那样拥有坚实的基础。尽管多数国家都建有大学，但唯有法国的大学才会如此积极地鼓励天文学和数学各领域的探索，鼓励物理学和考古学的研究，鼓励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的发展。路易十四因奠定这些基业而名垂千古，而换来这不朽之名，每年也花不了二十万法郎。

I must confess that one of the things I very much wonder at is, that as the Parliament of Great Britain have promised a reward of 20, 000 sterling to any person who may discover the longitude, they should never have once thought to imitate Louis XIV. in his munificence with regard to the arts and sciences.

必须承认，有件事令我惊讶不已：英国议会竟然愿意悬赏两万英

镑给成功测量海上经度的人，却从未想过效仿路易十四，慷慨资助文理学科的建设。

Merit, indeed, meets in England with rewards of another kind, which redound more to the honour of the nation. The English have so great a veneration for exalted talents, that a man of merit in their country is always sure of making his fortune. Mr. Addison in France would have been elected a member of one of the academies, and, by the credit of some women, might have obtained a yearly pension of twelve hundred livres, or else might have been imprisoned in the Bastile, upon pretence that certain strokes in his tragedy of Cato had been discovered which glanced at the porter of some man in power. Mr. Addison was raised to the post of Secretary of State in England. Sir Isaac Newton was made Warden of the Royal Mint. Mr. Congreve has a considerable employment. Mr. Prior was Plenipotentiary. Dr. Swift is Dean of St. Patrick in Dublin, and is more revered in Ireland than the Primate himself. The religion which Mr. Pope professes excludes him, indeed from preferments of every kind, but then it did not prevent his gaining two hundred thousand livres by his excellent translation of Homer. I myself saw a long time in France the author of Rhadamistus ready to perish for hunger. And the son of one of the greatest men our country ever gave birth to, and who was beginning to run the noble career which his father had set him, would have been reduced to the extremes of misery had he not been patronised by Monsieur Fagon.

事实上，在英国，功勋卓著者有着另一种更为光荣的回报：那就是英国人对贤才俊士的崇高敬意。但凡对国家有所贡献的人必然财运亨通。若是在法国，阿迪松先生会被选为院士，凭借几位贵妇名媛的声望，还能获得每年一千两百法郎的津贴。但他也有可能被关入巴士

底狱，宣称是他的悲剧《卡托》中有几句话影射了某位当权者的跟班。但在英国，阿迪松被提拔为国务大臣。艾萨克·牛顿爵士曾任皇家铸币厂督办。康格里夫先生也曾担当要职。普里奥尔先生曾任特命全权大使。斯威夫特博士是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教长。在爱尔兰，他甚至比大主教更受人爱戴。波普先生所信奉的教义让他无法获得任何美差，但这并不妨碍他因出色翻译荷马史诗而拿下二十万法郎。在法国，我早就亲眼目睹戏剧《拉达米斯托》的作者到了快饿死的地步。而我们某个大人物的儿子，在准备子承父业时，若不是法贡先生的关照，恐怕早就困苦不堪了。

But the circumstance which mostly encourages the arts in England is the great veneration which is paid them. The picture of the Prime Minister hangs over the chimney of his own closet, but I have seen that of Mr. Pope in twenty noblemen's houses. Sir Isaac Newton was revered in his lifetime, and had a due respect paid to him after his death; the greatest men in the nation disputing who should have the honour of holding up his pall. Go into Westminster Abbey, and you will find that what raises the admiration of the spectator is not the mausoleums of the English kings, but the monuments which the gratitude of the nation has erected to perpetuate the memory of those illustrious men who contributed to its glory. We view their statues in that abbey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ose of Sophocles, Plato, and other immortal personages were viewed in Athens; and I am persuaded that the bare sight of those glorious monuments has fired more than one breast, and been the occasion of their becoming great men.

然而，在英国，最鼓舞艺术创作的动力就源自国人对艺术的推崇备至。首相的画像只有在他自家官邸的壁炉上才能看到。而我却在二十位贵族的家宅中，都看到了波普先生的画像。艾萨克·牛顿爵士生前

备受尊崇，身后也广受敬仰。举国上下的杰出人士都竞相为他执绋。走进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你会发现，让人惊叹的并非历代君王的陵寝，而是那些为国争光的伟人纪念碑。一座座纪念碑矗立在那里，展现着国家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令他们光辉形象的永垂不朽。我们在大教堂里瞻仰这些雕像，犹如人们在雅典瞻仰索福克莱斯、柏拉图等不朽伟人的雕像一样。我确信，光是看到这些辉煌的丰碑，就不止一人会燃起满腔斗志，也正是此刻造就了众多杰出英才。

The English have even been reproached with paying too extravagant honours to mere merit, and censured for interring the celebrated actress Mrs. Oldfield in Westminster Abbey with almost the same pomp as Sir Isaac Newton. Some pretend that the English had paid her these great funeral honours, purposely to make us more strongly sensible of the barbarity and injustice which they object to in us, for having buried Mademoiselle Le Couvreur ignominiously in the fields.

有人甚至责备英国人过分推崇有一技之长者，还批评他们将演员奥德菲尔德女士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其规模之隆重，不亚于牛顿的葬礼。有人宣称英国人之所以将她隆重下葬，是故意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残忍行为和不义之举，因为我们将演员勒库弗勒小姐草草葬于荒冢野地，这一直受到英国人的谴责。

But be assured from me, that the English were prompted by no other principle in burying Mrs. Oldfield in Westminster Abbey than their good sense. They are far from being so ridiculous as to brand with infamy an art which has immortalised a Euripides and a Sophocles; or to exclude from the body of their citizens a set of people whose business is to set off with the utmost grace of speech

and action those pieces which the nation is proud of.

但请相信我，英国人之所以将奥德菲尔德女士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无非是理智使然。他们还没有荒唐到去亵渎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莱斯的不朽艺术，或是将戏剧演员排斥于公民行列之外，正是他们将英国引以为傲的经典作品优雅传神地再现于舞台上。

Under the reign of Charles I. an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civil wars raised by a number of rigid fanatics, who at last were the victims to it; a great many pieces were published against theatrical and other shows, which were attacked with the greater virulence because that monarch and his queen, daughter to Henry IV. of France, were passionately fond of them.

查理一世统治时期的内战（这场内战由一群顽劣的狂徒掀起，最终自食其果）伊始，人们发表了许多文章批评戏剧演出。由于国王和王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之女）痴迷于戏剧表演，这种批评也愈加毒辣。

One Mr. Prynne, a man of most furiously scrupulous principles, who would have thought himself damned had he worn a cassock instead of a short cloak, and have been glad to see one-half of mankind cut the other to pieces for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Propaganda Fide;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write a most wretched satire against some pretty good comedies, which were exhibited very innocently every night before their majesties. He quoted the authority of the Rabbis, and some passages from St. Bonaventure, to prove that the Oedipus of Sophocles was the work of the evil spirit;

that Terence was excommunicated ipso facto; and added, that doubtless Brutus, who was a very severe Jansenist, assassinated Julius Caesar for no other reason but because he, who was Pontifex Maximus, presumed to write a tragedy the subject of which was Oedipus. Lastly, he declared that all who frequented the theatre were excommunicated, as they thereby renounced their baptism. This was casting the highest insult on the king and all the royal family; and as the English loved their prince at that time, they could not bear to hear a writer talk of excommunicating him, though they themselves afterwards cut his head off. Prynne was summoned to appear before the Star Chamber; his wonderful book, from which Father Le Brun stole his, was sentenced to be burnt by the common hangman, and himself to lose his ears. His trial is now extant.

有一位名叫普林的先生，行事异常谨慎，要是他脱下短斗篷穿上教士的长袍，他会觉得自己罪该万死。他还希望半数人为了上帝和传信部的荣耀而将另半数人碎尸万段。于是，他心血来潮写了一篇拙文讥讽某些出色的喜剧。这些喜剧每晚都会演给国王和王后看，且其本身亦无可指摘。他援引犹太教祭司的权威话语和圣波拿文都拉的文章段落，来证明索福克莱斯的《俄狄浦斯》充满邪念，并证明泰伦提乌斯确实被判绝罚。他还肯定地指出布鲁图是位严守教规的詹森主义者，而他之所以暗杀恺撒，正是由于他认为恺撒在担任最高祭司时擅自写了一出悲剧，其主题正是俄狄浦斯。他最后宣称，那些经常光顾戏院的人都应被判绝罚，因为他们背叛了当初领受的入教洗礼。这是对国王以及全体皇室的莫大侮辱。当时英国人民非常爱戴查理一世，因而无法容忍一个作家居然叫嚣着要将国王逐出教会，虽说后来他们亲自将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普林最终被传唤至星室法庭，并当庭宣判由刽子手焚烧他的一切卓著（后遭勒·布兰神父剽窃），他也被判割去双耳。他的审判材料至今记录在案。

The Italians are far from attempting to cast a blemish on the opera, or to excommunicate Signor Senesino or Signora Cuzzoni. With regard to myself, I could presume top wish that the magistrates would suppress I know not what contemptible pieces written against the stage. For when the English and Italians hear that we brand with the greatest mark of infamy an art in which we excel; that we excommunicate persons who receive salaries from the king; that we condemn as impious a spectacle exhibited in convents and monasteries; that we dishonour sports in which Louis XIV. and Louis XV. performed as actors; that we give the title of the devil's works to pieces which are received by magistrates of the most severe character, and represented before a virtuous queen; when, I say, foreigners are told of this insolent conduct, this contempt for the royal authority, and this Gothic rusticity which some presume to call Christian severity, what an idea must they entertain of our nation? And how will it be possible for them to conceive, either that our laws give a sanction to an art which is declared infamous, or that some persons dare to stamp with infamy an art which receives a sanction from the laws, is rewarded by kings, cultivated and encouraged by the greatest men, and admired by whole nations? And that Father Le Brun's impertinent libel against the stage is seen in a bookseller's shop' standing the very next to the immortal labours of Racine, of Corneille, of Molière, &c.

在意大利，人们绝不会亵渎戏剧，也不会将演员塞内西诺先生和库佐尼女士逐出教会。在我看来，我强烈希望执法官能够查禁那些蔑视戏剧的不良作品。如果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听说，我们将自己擅长的艺术冠以恶名，将领取官俸的人逐出教会，将修道院的戏剧演出视为亵渎之举，将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参演过的戏剧横加诽谤，将威严的地方法官所认可、圣明的女王所欣赏的剧目视为邪恶之作——如果外国人听闻这种猖狂的举动，这种对皇权的蔑视，这种哥特式的蛮荒行

径（有人竟称之为严守基督戒律），他们会对我们这个国家作何感想？如果他们知道我国法律认可一种艺术，而这种艺术却又臭名昭著；或者说有人胆敢将一种既受法律认可，又屡受国王嘉奖、饱受名流雅士扶持和推崇、更广受万民敬仰的艺术冠以恶名，他们如何接受这番悖论？如果他们看见勒·布朗神父对戏剧的无礼诽谤之作竟然在书店销售，还紧挨着拉辛、高乃依和莫里哀的不朽杰作，他们又怎能理解呢？

Letter XXIV—On the Royal Society and Other Academies

第二十四封信　谈皇家学会和其他学院

THE ENGLISH had an Academy of Sciences many years before us, but then it is not under such prudent regulations as ours, the only reason of which very possibly is, because it was founded before the Academy of Paris; for had it been founded after, it would very probably have adopted some of the sage laws of the former and improved upon others.

英国人很早就创建了一所科学院，比我们法兰西科学院要早得多。但其当时的规章不如后者严谨，唯一的解释也许是：它因成立在前，故无先例可循。倘若它在我们之后建成，就很可能借鉴我们的优越制度，并在其他方面有所进益。

Two things, and those the most essential to man, are wanting in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I mean rewards and laws. A seat in the Academy at Paris is a small but secure fortune to a geometrician or a chemist; but this is so far from being the case at London, that the several members of the Royal Society are at a continual, though indeed small expense. Any man in England who declares himself a lover of the mathematics and natural philosophy, and expresses an inclination to be a member of the Royal Society, is immediately elected into it. But in France it is not enough that a man who aspires to the honour of being a member of the Academy, and of receiving the royal stipend, has a love for the sciences; he must at the same time be deeply skilled in them; and is obliged to dispute

the seat with competitors who are so much the more formidable as they are fired by a principle of glory, by interest, by the difficulty itself, and by that inflexibility of mind which is generally found in those wh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at pertinacious study, the mathematics.

有两样东西，对人类至关重要，却是英国皇家学会所缺乏的，那就是奖励和制度。一位几何学家或是一位化学家要是能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定能获得一小笔稳定的收入。然而，英国皇家学会的情况远非如此，学会中有不少院士还得不断自掏腰包，尽管数额并不大。在英国，任何人只要宣称自己热爱数学或自然科学，并表达加入皇家学会的意愿，便可立即成为院士。但在法国，若想冠以院士的头衔，并享受国家俸禄，仅有一腔对科学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申请者得在科学上有深厚的造诣，还得同时和一众佼佼者争夺一席之位。这些人重视荣誉，酷爱科学，凡事迎难直上，并且永不言弃，此种精神只有毕生锲而不舍地致力于数学研究的人方可具备。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is prudently confined to the study of Nature, and, indeed, this is a field spacious enough for fifty or three-score persons to range in. That of London mixes indiscriminately literature with physics; but methinks the founding an academy merely for the polite arts is more judicious, as it prevents confusion, and the joining, in some measure, of heterogeneals, such as a dissertation on the head-dresses of the Roman ladies with a hundred or more new curves.

法兰西科学院仅限于研究自然科学，这种做法非常高明，而且确实能让五六十位学者大展拳脚。但英国皇家学会却不加区分地文理并置。依我之见，建立专门的文艺学院更为妥当，这样才能避免混淆，

不至于显得不伦不类。人们也就不会在一篇谈论古罗马女性头饰的论文边上看到百来条新型数学曲线了。

As there is very little order and regularity in the Royal Society, and not the least encouragement; and that the Academy of Paris is on a quite different foot, it is no wonder that our transactions are drawn up in a more just and beautiful manner than those of the English. Soldiers who are under a regular discipline, and besides well paid, must necessarily at last perform more glorious achievements than others who are mere volunteers. It must indeed be confessed that the Royal Society boast their Newton, but then he did not owe his knowledge and discoveries to that body; so far from it, that the latter were intelligible to very few of his fellow members. A genius like that of Sir Isaac belonged to all the academies in the world, because all had a thousand things to learn of him.

英国皇家学会并未设立多少规章制度，也缺乏相应的奖励机制，而法兰西科学院则恰恰相反。难怪我们的学报要比他们的读起来更有理有据，并出彩得多。与那些纯粹的志愿军相比，正规军一旦有了严明纪律和丰厚报酬，必定会取得更光辉的战绩。必须承认，英国皇家学会出了牛顿这位大家，并引以为豪，但牛顿并没有将自己的学识和发现归功于那个学会。不仅如此，学会中也鲜有人真正懂得牛顿的智慧所在。像牛顿爵士这样的旷世奇才，理应属于全世界的一切学会，因为他拥有无数值得众人学习的地方。

The celebrated Dean Swift formed a design, in the latter end of the late Queen's reign, to found an academy for the English tongue upon the model of that of the French. This project was promoted by

the late Earl of Oxford, Lord High Treasurer, and much more by the Lord Bolingbroke, Secretary of State, who had the happy talent of speaking without premeditation in the Parliament House with as much purity as Dean Swift wrote in his closet, and who would have been the ornament and protector of that academy. Those only would have been chosen members of it whose works will last as long as the English tongue, such as Dean Swift, Mr. Prior, whom we saw here invested with a public character, and whose fame in England is equal to that of La Fontaine in France; Mr. Pope, the English Boileau, Mr. Congreve, who may be called their Molière, and several other eminent persons whose names I have forgot; all these would have raised the glory of that body to a great height even in its infancy. But Queen Anne being snatched suddenly from the world, the Whigs were resolved to ruin the protectors of the intended academy, a circumstance that was of the most fatal consequence to polite literature. The members of this academy would have had a very great advantage over those who first formed that of the French, for Swift, Prior, Congreve, Dryden, Pope, Addison, &c. had fixed the English tongue by their writings; whereas Chapelain, Colletet, Cassaigne, Faret, Perrin, Cotin, our first academicians, were a disgrace to their country; and so much ridicule is now attached to their very names, that if an author of some genius in this age had the misfortune to be called Chapelain or Cotin, he would be under a necessity of changing his name.

安妮女王在位后期，大名鼎鼎的斯威夫特教长拟定了一份提案，意图仿照法兰西学术院建立一所英语语言学会。这份提案获得了财政大臣牛津伯爵的赞同，更得到了国务大臣博林布罗克勋爵的鼎力支持。博林布罗克在议会发言时往往出口成章，措辞纯正地道，不亚于斯威夫特在书房中写就的美文。若当初提案得以落实，他本人就可作为这所学会的金字招牌和镇会之宝。凡能入列这所学会者，必有不朽

著作同英语语言一道流芳百世，比如斯威夫特教长和普里奥尔先生。他们皆为公众人物，在英国的声名同拉·方丹在法国一样显赫。还有波普先生，堪称“英国的布瓦洛”，康格里夫先生则可谓“英国的莫里哀”。另有好几位杰出人士，名字我一时记不起。他们都能令学会在诞生之初就大放异彩。然而，正值学会酝酿筹办之际，安妮女王猝然驾崩，执政的辉格党决定除掉学会的担保人，这给高雅文学发展带来了致命打击。英语语言学会的成员原本应比法兰西学术院的元老们胜出好几筹，因为像斯威夫特、普里奥尔、康格里夫、德莱顿、波普和阿迪松等人通过写作确立了英语语言的体系，而沙普兰、科勒泰、卡赛涅、法雷、佩兰和科坦这些元老们却是法国的耻辱。现如今这些名字更是备受嘲讽，要是哪位有些才华的作家不幸与沙普兰或科坦同名，就很有必要改名换姓了。

One circumstance, to which the English Academy should especially have attended, is to have prescribed to themselves occupations of a quite different kind from those with which our academicians amuse themselves. A wit of this country asked me for the memoirs of the French Academy. I answered, they have no memoirs, but have printed threescore or fourscore volumes in quarto of compliments. The gentleman perused one or two of them, but without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the style in which they were written; though he understood all our good authors perfectly. “All,” says he, “I see in these elegant discourses is, that the member elect having assured the audience that his predecessor was a great man, that Cardinal Richelieu was a very great man, that the Chancellor Seguier was a pretty great man, that Louis XIV. was a more than great man, the director answers in the very same strain, and adds, that the member elect may also be a sort of great man, and that himself, in quality of director, must also have some share in this greatness.”

皇家学会的院士们本该特别注意的情况是，他们应制定与法国学者截然不同的工作计划。本国某位学究曾找我要法兰西学术院的学报。我告诉他，法兰西学术院没有什么学报，只有六七十卷四开本的颂文。尽管这位先生对法国一切杰出作家都知之甚详，但在细读一两卷学报后，却完全看不透这些文章的风格。“只有一点，”他这样总结道，“我在这些美文中看到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当选的院士再三强调他的前任是个伟人，黎塞留红衣主教是个十足的伟人，塞吉埃大法官是个绝对的伟人，路易十四是伟人中的伟人。而院长的态度也一样，还说当选的院士也算得上是伟人，说自己出任院长，也多少具备伟人的品质。”

The cause why all these academical discourses have unhappily done so little honour to this body is evident enough. Vitiumesttemporispotiùs quam hominis (the fault is owing to the age rather than to particular persons). It grew up insensibly into a custom for every academician to repeat these eulogiums at his reception; it was laid down as a kind of law that the public should be indulged from time to time in the sullen satisfaction of yawning over these productions. If the reason should afterwards be sought, why the greatest geniuses who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at body have sometimes made the worst speeches, I answer, that it is wholly owing to a strong propension, the gentlemen in question had to shine, and to display a thread-bare, worn-out subject in a new and uncommon light. The necessity of saying something, the perplexity of having nothing to say, and a desire of being witty, are three circumstances which alone are capable of making even the greatest writer ridiculous. These gentlemen, not being able to strike out any new thoughts, hunted after a new play of words, and delivered themselves without thinking at all: in like manner as people who should seem to chew with great eagerness, and make as though they were eating,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y were just

starved.

很不幸，这些论文并没有给学院增添什么光彩，原因显而易见：错不在人，而在时代。于是，不知不觉便有了这种惯例：每批院士在入院仪式上都要歌功颂德，重演旧戏。还形成了一个定律：公众也得时不时地捧着这些文章打哈欠，虽然不痛不痒，心里也算过得去。倘若之后偏要刨根问底：为何学会里的精英才子们在演讲时却总是一塌糊涂？我认为，这纯粹是由于某种根深蒂固的嗜好作怪：他们得想办法表现自己，必须给陈词滥调套上新颖独特的外衣。他们一方面不得不说，另一方面又无话可说，还想着卖弄才学。这三点放一块儿就足以把文豪变成草包。这些先生们没什么独到创见，却又总喜欢玩弄辞藻，因而说话毫无思想内涵。就像在拼命空嚼食物，饿得要命却得装出吃饭的模样。

It is a law in the French Academy, to publish all those discourses by which only they are known, but they should rather make a law never to print any of them.

法兰西学术院有条规定：只发表能增添学院声名的论文。不过，他们倒不如规定这种稿件绝不付梓出版。

But the Academy of the Belles Lettres have a more prudent and more useful object, which is, to present the public with a collection of transactions that abound with curious researches and critiques. These transactions are already esteemed by foreigners; and it were only to be wished that some subjects in them had been more thoroughly examined, and that others had not been treated at all. As, for instance, we should have been very well satisfied, had they

omitted I know not what dissertation on the prerogative of the right hand over the left; and some others, which, though not published under so ridiculous a title, are yet written on subjects that are almost as frivolous and silly.

而法兰西文学院却有个更高明更实际的目标，那就是向公众提供一套学报文集，其中收录大量稀奇古怪的研究和评论文章。这些学报早已深受国外人士好评，而人们唯独希望的是，其中的某些问题能得到进一步研究，另一些问题则最好别去讨论。例如，要是能删掉叫什么论右手优于左手之类的论文，还有那些题目虽不怎么可笑，但主题内容却荒唐离谱的文章——这样的话，我们也算称心了。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such of their researches as are of a more difficult kind and a more sensible use, embrace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improvements of the arts. We may presume that such profound, such uninterrupted pursuits as these, such exact calculations, such refined discoveries, such extensive and exalted views, will, at last, produce something that may prove of advantage to the universe. Hitherto, as we have observed together, the most useful discoveri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most barbarous times. One would conclude that the business of the most enlightened ages and the most learned bodies, is, to argue and debate on things which were invented by ignorant people. We know exactly the angle which the sail of a ship is to make with the keel in order to make its sailing better; and yet Columbus discovered America without having the least idea of the property of this angle: however, I am far from inferring from hence that we are to confine ourselves merely to a blind practice, but happy it were, would naturalists and geometricians unit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practice with the theory.

法兰西科学院的研究更为艰苦也更加实用，从而能深化对自然的认识，推进艺术的发展。我们坚信，像这般意义深远又锲而不舍的追求，这般一丝不苟的计算，这般去伪存真的发现，这般高明的远见卓识，终将惠及千秋万代，造福宇宙苍生。古往今来，最野蛮的时代孕育出最伟大的发现，对此我们有目共睹。反而在最文明的时代，最杰出的学术团体也只会对愚人发起的问题争论不休。我们非常清楚龙骨与船帆在航行中的最佳夹角，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对角度根本毫无概念。但我绝不是说我们只需盲目实践即可，倘若物理学家和几何学家尽可能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便再好不过了。

Strange, but so it is, that those things which reflect the greatest honour on the human mind are frequently of the least benefit to it! A man who understands the four fundamental rules of arithmetic, aided by a little good sense, shall amass prodigious wealth in trade, shall become a Sir Peter Delmé, a Sir Richard Hopkins, a Sir Gilbert Heathcote, whilst a poor algebraist spends his whole life in searching for astonishing properties and relations in numbers, which at the same time are of no manner of use, and will not acquaint him with the nature of exchanges. This is very nearly the case with most of the arts: there is a certain point beyond which all researches serve to no other purpose than merely to delight an inquisitive mind. Those ingenious and useless truths may be compared to stars which, by being placed at too great a distance, cannot afford us the least light.

奇怪的是，人类最引以为荣的才识却往往是最无用的，但事实就是如此。只要你掌握运算的四项基本法则，再加上一点聪明才智，就能在商界招财进宝，财运亨通，就能成为彼得·德尔梅，理查德·霍普金斯，吉尔贝·希思科特这样的风云人物。而可怜的代数学家，穷尽一

生探求数字的惊人特性和相互联系，却根本一无是处，也不能使他明白何为买卖。文艺研究者的境遇，大凡如此。如果超过某个限度，所有研究就只是用来满足好奇心罢了。那些卓越不凡却毫无用处的真理就好比天上的星辰，因为距离我们太遥远，所以无法带来一丝光明。

With regard to the French Academy, how great a service would they do to literature, to the language, and the nation, if, instead of publishing a set of compliments annually, they would give us new editions of the valuable works written in the age of Louis XIV., purged from the several errors of diction which are crept into them. There are many of these errors in Corneille and Molière, but those in La Fontaine are very numerous. Such as could not be corrected might at least be pointed out. By this means, as all the Europeans read those works, they would teach them our language in its utmost purity—which, by that means, would be fixed to a lasting standard; and valuable French books being then printed at the King's expense, would prove one of the most glorious monuments the nation could boast. I have been told that Boileau formerly made this proposal, and that it has since been revived by a gentleman eminent for his genius, his fine sense and just taste for criticism; but this thought has met with the fate of many useful projects, of being applauded and neglected.

就法兰西学术院而言，要是能重新出版路易十四时期写就的珍贵作品，并纠正其中的不当措辞，而非年年发表长卷颂词，那么学院将对文学、对语言、对国家做出多大的贡献啊！高乃依和莫里哀的作品中就有不少错误，而拉·方丹作品中的谬误更是不胜枚举。这些错误，即使不能修改，也应予以指出。如此一来，每个欧洲人在阅读作品时，就能学会最纯正地道的法语，而法语的语言体系亦将由此奠定。由国王出资付印的珍贵杰作也会成为法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丰碑。我听

说，布瓦洛曾提过这一建议，后来也有位先生再次提及，那人才华横溢、见解独到、公道正派，因而声名显赫。但这项提议和许多有益的提案一样，皆是命数已定：起先备受称道，此后则无人问津。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

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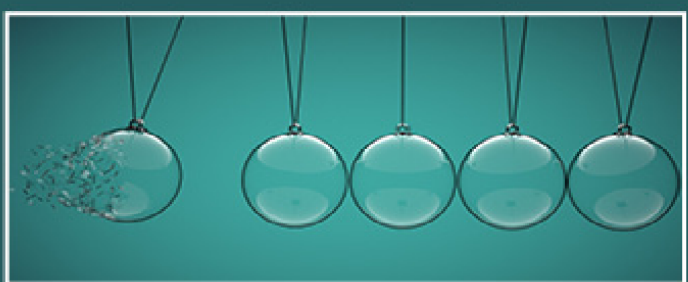

Herbert Spencer
赫伯特·斯宾塞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教育论

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

赫伯特·斯宾塞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Chapter 1 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 第一章 什么知识最具价值
- Chapter 2 Intellectual Education 第二章　智育
- Chapter 3 Moral Education 第三章　德育
- Chapter 4 Physical Education 第四章　体育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Chapter 1 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

第一章　什么知识最具价值

It has been truly remarked that, in order of time, decoration precedes dress. Among people who submit to great physical suffering that they may have themselves handsomely tattooed, extremes of temperature are borne with but little attempt at mitigation. Humboldt tells us that an Orinoco Indian, though quite regardless of bodily comfort, will yet labour for a fortnight to purchase pigment wherewith to make himself admired; and that the same woman who would not hesitate to leave her hut without a fragment of clothing on, would not dare to commit such a breach of decorum as to go out unpainted. Voyagers uniformly find that coloured beads and trinkets are much more prized by wild tribes than are calicoes or broadcloths. And the anecdotes we have of the ways in which, when shirts and coats are given, they turn them to some ludicrous display, show how completely the idea of ornament predominates over that of use. Nay, there are still more extreme illustrations: witness the fact narrated by Capt. Speke of his African attendants, who strutted about in their goat-skin mantles when the weather was fine, but when it was wet, took them off, folded them up, and went about naked, shivering in the rain! Indeed, the facts of aboriginal life seem to indicate that dress is developed out of decorations. And when we remember that even among ourselves most think more about the fineness of the fabric than its warmth, and more about the cut than the convenience—when we see that the function is still in great measure subordinated to the appearance—we have further reason for inferring such an origin.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注意到，人类对身体的装饰早于衣着的出现。例如有人愿意忍着肉体的剧痛刺漂亮的文身，却不愿试着减轻他们遭受的严寒酷热之苦。探险家洪堡告诉我们，在奥里诺科河流域，不太在乎身体舒适的印第安人愿意劳动两个星期只为买涂抹后让自己能看上去光鲜亮丽的颜料；同样，当地的妇女会毫不犹豫地裸体走出茅屋，却不敢有违礼节不涂颜料就出门。航行者们也都发现了另外一个现象：对原始部落而言，彩色的串珠和其他小饰物比白棉布和横罗纹布更珍贵。衬衫和外套一旦被交到了这些原始部落的人手中，总能以各种方式变成滑稽的展示品。这些轶闻趣事表明，相比实用观念而言，他们的装饰观念完全占了上风。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更加极端的例证。例如，像斯皮克船长说的那样，他的非洲随从们在天气晴朗时穿着他们的山羊皮斗篷大模大样地走路，但在下雨天时却把斗篷脱下来叠好，然后光着身子到处走，宁愿在雨中冻得发抖！土著居民的这些生活实例似乎表明，衣服是由装饰物发展而来的。对于衣服，我们大多数人也更看重布料是否美观而非其保暖性，更看重它的样式而非舒适性。想想这点，再想想比起实用性而言，人们依然更重视外观，我们就有更充分的理由做出上述推断。

It is not a little curious that the like relations hold with the mind. Among mental as among bodily acquisitions, the ornamental comes before the useful. Not only in times past, but almost as much in our own era, that knowledge which conduces to personal well-being has been postponed to that which brings applause. In the Greek schools, music, poetry, rhetoric, and a philosophy which, until Socrates taught, had but little bearing upon action, were the dominant subjects; while knowledge aiding the arts of life had a very subordinate place. And in our own universities and schools at the present moment, the like antithesis holds. We are guilty of something like a platitude when we say that throughout his after-career, a boy, in nine cases out of ten, applies his Latin and Greek to no practical purposes. The remark is trite that in his shop, or his

office, in managing his estate or his family, in playing his part as director of a bank or a railway, he is very little aided by this knowledge he took so many years to acquire—so little, that generally the greater part of it drops out of his memory; and if he occasionally vents a Latin quotation, or alludes to some Greek myth, it is less to throw light on the topic in hand than for the sake of effect. If we inquire what is the real motive for giving boys a classical education, we find it to be simply conformity to public opinion. Men dress their children's minds as they do their bodies, in the prevailing fashion. As the Orinoco Indian puts on his paint before leaving his hut, not with a view to any direct benefit, but because he would be ashamed to be seen without it; so, a boy's drilling in Latin and Greek is insisted on, not because of their intrinsic value, but that he may not be disgraced by being found ignorant of them—that he may have “the education of a gentleman”—the badge marking a certain social position, and bringing a consequent respect.

十分奇怪的是，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心智方面。同身体方面一样，在心智方面，装饰性也优先于实用性。这不仅存在于过去，还存在于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有益于个人幸福的知识总是被置于那些能为我们赢得称赞的知识之后。在希腊学校中，主要的学习科目包括音乐、诗歌、修辞以及直到苏格拉底时才和实践有联系的哲学，而那些对提高生活技能大有益处的知识却严重被边缘化。甚至直到现在，我们的大学和普通学校里也依然存在着类似的本末倒置现象。我们总是在说这样老掉牙的事情，一个男孩在他的未来职业生涯中，十之八九是用不上所学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这个男孩将来无论在商店工作，还是在办公室做文职，无论是管理他的财产还是居家过日子，无论是在银行还是在铁路做负责人，他多年来学到的知识对他的帮助微乎其微。这个男孩会忘掉其中的大部分，即便偶尔引用一句拉丁语或者提到某个希腊神话，多数场合也只是为了炫耀，并不能用以阐释眼前的

问题。如果我们去究问让男孩们接受古典教育的真实动机，就会发现这么做仅仅是为了顺应大众舆论。正如给孩子们打扮一样，人们在培养孩子们的心智时也随大溜。就像奥里诺科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出门前在身上涂颜料一样，他们这么做不是为追求任何直接利益，而是因为如果被人发现不涂颜料，他们就会觉得羞耻。同样，男孩坚持练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并非因为这些知识的内在价值，而是为了不因对这些知识一无所知而丢脸——接受这种“绅士教育”，标志着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会因此受人尊重。

This parallel is still more clearly displayed in the case of the other sex. In the treatment of both mind and body, the decorative element has continued to predominate in a greater degree among women than among men. Originally, personal adornment occupied the attention of both sexes equally. In these latter days of civilization, however, we see that in the dress of men the regard for appearance has in a considerable degree yielded to the regard for comfort; while in their education the useful has of late been trenching on the ornamental. In neither direction has this change gone so far with women. The wearing of earrings, finger-rings, bracelets; the elaborate dressings of the hair; the still occasional use of paint; the immense labour bestowed in making habiliments sufficiently attractive; and the great discomfort that will be submitted to for the sake of conformity; show how greatly, in the attiring of women, the desire of approbation overrides the desire for warmth and convenience. And similarly in their education, the immense preponderance of “accomplishments” proves how here, too, use is subordinated to display. Dancing, deportment, the piano, singing, drawing—what a large space do these occupy! If you ask why Italian and German are learnt, you will find that, under all the sham reasons given, the real reason is, that a knowledge of those tongues is thought ladylike. It is not that the books written in them

may be utilized, which they scarcely ever are; but that Italian and German songs may be sung, and that the extent of attainment may bring whispered admiration. The births, deaths, and marriages of kings, and other like historic trivialities, are committed to memory, not because of any direct benefits that can possibly result from knowing them: but because society considers them parts of a good education—because the absence of such knowledge may bring the contempt of others. When we have named reading, writing, spelling, grammar, arithmetic, and sewing, we have named about all the things a girl is taught with a view to their actual uses in life; and even some of these have more reference to the good opinion of others than to immediate personal welfare.

类似的情况在女性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对于身心两个方面而言，装饰因素在女性中仍比在男性中占据更强的主导地位。男人和女人原本同样注重个人装饰。然而，在后来的文明历程中，我们发现在着装方面，男性对舒适性的重视明显超过了对外表的重视；同时，现在在男性的教育方面，实用性知识的地位也渐渐超越装饰性知识。而女性在这两个方面的关注重心均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女人们佩戴耳环、戒指、手镯和各种精美的头饰，偶尔还要涂脂抹粉，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衣服引人瞩目，为了顺应潮流而甘心忍受不适。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衣着方面，女性对获得赞许的欲望远远超过了对温暖与舒适的追求。对女性的教育也是如此，对“才艺”教育的极大重视表明，实用性仍屈从于展示性。舞蹈、仪态、钢琴、声乐和绘画教育占了多么大的比重！如果你问为什么要学习意大利语和德语，你会发现，在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掌握这些语言会使女人显得淑女。她们学习这些语言也并非因为这些语种的书籍有多少实用之处，而是为了唱意大利语和德语的歌曲，因为多才多艺而被啧啧称赞。她们牢记国王的生卒年月、婚姻状况以及其他类似的琐事，不是为了获得任何切身利益，而是因为社会公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知道这些知识，不然会招致他人的轻视。阅读、写作、拼写、语法、算

术以及缝纫这些科目是教授给女孩子的、与实用生活直接相关的全部内容，但不可否认其中仍有一些更适合用于博取他人好评而非获取直接的个人福利。

Thoroughly to realise the truth that with the mind as with the body the ornamental precedes the useful, it is needful to glance at its rationale. This lies in the fact that, from the far past down even to the present, social needs have subordinated individual needs, and that the chief social need has been the control of individuals. It is not, as we commonly suppose, that there are no governments but those of monarchs, and parliaments, and constituted authorities. These acknowledged governments are supplemented by other unacknowledged ones, that grow up in all circles, in which every man or woman strives to be king or queen or lesser dignitary. To get above some and be reverenced by them, and to propitiate those who are above us, is the universal struggle in which the chief energies of life are expend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by style of living, by beauty of dress, by display of knowledge or intellect, each tries to subjugate others; and so aids in weaving that ramified network of restraints by which society is kept in order. It is not the savage chief only, who, in formidable war-paint, with scalps at his belt, aims to strike awe into his inferiors; it is not only the belle who, by elaborate toilet, polished manners, and numerous accomplishments, strives to “make conquests”; but the scholar, the historian, the philosopher, use their acquirements to the same end. We are none of us content with quietly unfolding our own individualities to the full in all directions; but have a restless craving to impress our individualities upon others, and in some way subordinate them. And this it is which determines the character of our education. Not 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real worth, is the consideration; but what will bring most applause, honour, respect—

what will most conduce to social position and influence—what will be most imposing. As, throughout life, not what we are, but what we shall be thought, is the question; so in education, the question is, not the intrinsic value of knowledge, so much as its extrinsic effects on others. And this being our dominant idea, direct utility is scarcely more regarded than by the barbarian when filing his teeth and staining his nails.

为了彻底弄清装饰性观念在身心两方面都优先于实用性观念这一事实，我们有必要一窥它存在的根本原因。它其实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从古至今，社会需求优先于个体需求，首要的社会需求一直制约着个体需求。通常认为，除了君主、议会和法定的管理机构，统治我们的再无其他，但事实并非如此。在那些公认的管理机构之外还充斥着各种非公认的管理机构，它们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人人都力争在其中成为“君王”或“王后”，或者略逊一筹的重要人士。出人头地，受人敬仰以及逢迎上级，这种普遍的任务消耗着人生的主要精力。每个人都试图通过积累财富、优雅生活、精心装扮、展示学识或发挥才智来压制别人。由此，人们便编织出了一张可以维持社会秩序的控制网。并不是只有野蛮酋长用令人生畏的作战彩绘和腰带上敌人的头皮来震慑下属；也不是只有美女们用精致的妆容、优雅的举止、丰富的才艺来“征服别人”；同样，学者、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也在用他们的成就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们都不满足于默默地全面展现自己的个性；相反，我们焦急地渴望他人欣赏我们的个性，然后以某种方式使他们臣服。正是这一事实决定了我们教育的性质。我们考虑的不是什么知识最具真正的价值，而是哪些知识可以赢得最多的掌声、荣耀以及尊敬，哪些知识可以提高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哪些知识是最光鲜的。纵观一生，我们在意的并非自己是怎样的人，而是别人如何看待我们。同样，在教育问题上我们也不考虑知识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只在乎对他人的外在影响。这就是我们的主导观念。我们对直接实用性的重视程度比磨牙齿和染指甲的原始人强不了多少。

If there needs any further evidence of the rude, undeveloped character of our education, we have it in the fact that the comparative worth of different kinds of knowledge have been as yet scarcely even discussed—much less discussed in a methodic way with definite results. Not only is it that no standard of relative values has yet been agreed upon; but the existence of any such standard has not been conceived in any clear manner. And not only is it that the existence of any such standard has not been clearly conceived; but the need for it seems to have been scarcely even felt. Men read books on this topic, and attend lectures on that; decide that their children shall be instructed in these branches of knowledge, and shall not be instructed in those; and all under the guidance of mere custom, or liking, or prejudice; without ever considering the enormous importance of determining in some rational way what things are really most worth learning. It is true that in all circles we have occasional remark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is or the other order of information. But whether the degree of its importance justifies the expenditure of the time needed to acquire it; and whether there are not things of more importance to which the time might be better devoted; are queries which, if raised at all, are disposed of quite summarily, according to personal predilections. It is true also, that from time to time, we hear revived the standing controversy respecting the comparative merits of classics and mathematics. Not only, however, is this controversy carried on in an empirical manner, with no reference to an ascertained criterion; but the question at issue is totally insignificant when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question of which it is part. To suppose that deciding whether a mathematical or a classical education is the best, is deciding what is the proper *curriculum* , is much the same thing as to suppose that the whole of dietetics lie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or not bread is more nutritive than potatoes!

如果需要进一步论证我们教育的粗糙和不成熟，那么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即我们很少讨论各种知识的相对价值，更没有通过系统讨论得出明确的结果。这不仅是因为没有关于相对价值的统一标准，也因为没有任何对这种标准的清晰建构，甚至更是因为我们尚未意识到建构这种标准的必要性。人们阅读这类书籍，参加那类讲座，决定子女学习某些学科而不学另一些学科，影响所有这些决定的因素只是习俗、喜好或偏见。人们从未思考过用理性的方式来决定真正具有学习价值的内容是多么重要。的确，在所有领域中，我们都会偶尔提到这类或那类知识的重要性。但是，它的重要程度与学习它所需的时间是否相称？这些时间是否可以更好地被利用在那些更重要的事情上？然而，即便这些问题被摆出来，人们也还是会依据个人偏好敷衍了事。同样，我们也会不时听到关于古典学科与数学学科价值比较的无休无止的争论。但这种争论只是依据经验展开，既无任何确定的标准，同时与争论所属的整体问题相比也毫无意义。通过比较数学学科和古典学科哪个更好来决定合适的课程 ，这种做法就好比通过比较面包和土豆哪个更具营养来决定营养学的全部内容！

The question which we contend is of such transcendent moment, is, not whether such or such knowledge is of worth, but what is its *relative* worth? When they have named certain advantages which a given course of study has secured them, persons are apt to assume that they have justified themselves: quite forgetting that the adequateness of the advantages is the point to be judged. There is, perhaps, not a subject to which men devote attention that has not some *value* . A year diligently spent in getting up heraldry, would very possibly give a little further insight into ancient manners and morals, and into the origin of names. Any one who should learn the distances between all the towns in England, might, in the course of his life, find one or two of the thousand facts he had acquired of some slight service when arranging a journey.

Gathering together all the small gossip of a county, profitless occupation as it would be, might yet occasionally help to establish some useful fact—say, a good example of hereditary transmission. But in these cases, everyone would admit that there was no proportion between the required labour and the probable benefit. No one would tolerate the proposal to devote some years of a boy's time to getting such information, at the cost of much more valuable information which he might else have got. And if here the test of relative value is appealed to and held conclusive, then should it be appealed to and held conclusive throughout. Had we time to master all subjects we need not be particular. To quote the old song:—

我们目前要探讨的关键问题不是某物或者某类知识是否具有价值，而是它的相对 价值如何。人们一旦提出某门课程的学习具有一些益处，往往就认为自己已经证明了该课程的价值，但经常忘了，这些所谓的益处是否充分才是有待评估的关键。人们关注的学科恐怕没有哪个是毫无价值 的吧。如果一个人勤勤恳恳花一年时间研究纹章学，那么他很有可能会比较深入地了解古代礼仪、道德以及名字的起源。如果一个人知道英格兰所有城镇之间的距离，那么在其一生中，这诸多信息中总会有一两条在他安排旅程时派上点用场。收集一个郡里的街谈巷议也许看起来无甚益处，但有时也可能有助于组织出一些有用的事实，比如家产的继承。然而，在这些情况下，每个人都承认付出的劳动与所获的收益并不相称。如果让一个男孩花上数年时间，以牺牲获取更有价值的知识为代价，去获得上述知识，大概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建议。如果在此可以衡量相对价值并得出结论，那就应该进行全面衡量并得出结论。假如有足够的时间掌握所有的学科，我们就无须如此挑剔了。有一首老歌唱到：

Could a man be secure, That his days would endure?

倘若谁能获得青春永驻，

As of old, for a thousand long years,

千年长寿，

What things might he know! What deeds might he do!

多少世事他将通晓！多少功绩他能成就！

And all without hurry or care.

当无匆匆当无忧。

“But we that have but span-long lives” must ever bear in mind our limited time for acquisition. And remembering how narrowly this time is limited, not only by the shortness of life, but also still more by the business of life, we ought to be especially solicitous to employ what time we have to the greatest advantage. Before devoting years to some subject which fashion or fancy suggests, it is surely wise to weigh with great care the worth of the results, as compared with the worth of various alternative results which the same years might bring if otherwise applied.

“无奈人生苦短”，我们必须谨记，用以学习的时间毕竟有限。而且这种有限不仅在于生命的短暂，更在于人生碌碌，我们应该更好地利用时间去做最有意义的事。与其耗费数年光阴去学习一些时尚或幻想所追捧的科目，不如预先比较一下，如果同样的时间用在其他科目的学习上会取得什么不同的结果，进而再明智而谨慎地权衡这些结果的价值。

In education, then, this is the question of questions, which it is high time we discussed in some methodic way. The first in importance, though the last to be considered, is the problem—how to decide among the conflicting claims of various subjects on our attention. Before there can be a rational *curriculum* , we must settle which things it most concerns us to know; or, to use a word of Bacon's, now unfortunately obsolete—we must determine the relative values of knowledges.

在教育上，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我们是时候系统而有条理地认真讨论一下了。在价值取向相互抵触的诸多不同学科中，我们应当如何判断哪个最有价值？虽然被放在最后考虑，但这却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制定合理的课程体系 之前，我们必须先确定最需要关注的知识是什么。借用培根的一句不幸过时了的名言：我们必须弄清知识的相对价值。

To this end, a measure of value is the first requisite. And happily, respecting the true measure of value, as expressed in general terms, there can be no dispute. Every one in contending for the worth of any particular order of information does so by showing its bearing upon some part of life. In reply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use is it?" the mathematician, linguist, naturalist, or philosopher, explains the way in which his learning beneficially influences action—saves from evil or secures good—conduces to happiness. When the teacher of writing has pointed out how great an aid writing is to success in business—that is, to the obtainment of sustenance—that is, to satisfactory living; he is held to have proved his case. And when the collector of dead facts (say a numismatist) fails to make clear any appreciable effects which these facts can produce on human welfare, he is obliged to admit that they are comparatively valueless. All then, either directly or by implication, appeal to this as the ultimate test.

为此，我们应当优先考虑价值的尺度。庆幸的是，价值测量的一般标准不存在任何争议。任何人在争论某种知识的价值时，总是会指出其与生活某部分之间的关联。在回答“它是做什么用的”问题上，数学家、语言学家、自然主义者或是哲学家都阐述了各自的研究如何对行为产生有益的影响，怎样趋吉避凶，收获幸福。写作老师会指出，写作非常有助于事业成功，也就是有助于获取生计，有助于过上满意的生活。我们认为他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一位古董收藏家（比如一位钱币奖章收藏家）不能清楚表明这些古董对人类福祉有多么重要的影响，他就不得不承认那些古董相对无用。所有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以此作为最终检验方式。

How to live?—that is the essential question for us. Not how to live in the mere material sense only, but in the widest sense. The general problem which comprehends every special problem is—the right ruling of conduct in all directions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In what way to treat the body; in what way to treat the mind; in what way to manage our affairs; in what way to bring up a family; in what way to behave as a citizen; in what way to utilize all those

sources of happiness which nature supplies—how to use all our faculties to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ourselves and others—how to live completely? And this being the great thing needful for us to learn, is, by consequence, the great thing which education has to teach. To prepare us for complete living is the function which education has to discharge; and the only rational mode of judging of any educational course is, to judge in what degree it discharges such function.

如何生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问题，不能仅仅从物质角度考虑，而要从最广泛的角度去考虑如何生活。普遍问题包含一切特殊问题，指的是在各种情况下对各方面行为进行正确的指导。我们如何看待身体，如何培养心智，如何处理事务，如何经营一个家庭，如何承担公民职责，如何利用大自然提供的那些资源幸福地生活？总之，如何以我们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及他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如何完满地生活？这些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头等大事，当然也是教育应当教给我们的头等大事。教育应尽的职责是为我们的完满生活做好准备。而唯一可以理性评判一门教育课程的方式，就是看它多大程度上履行了这项职责。

This test, never used in its entirety, but rarely even partially used, and used then in a vague, half conscious way, has to be applied consciously, methodically, and throughout all cases. It behoves us to set before ourselves, and ever to keep clearly in view, complete living as the end to be achieved; so that in bringing up our children we may choose subjects and methods of instruction, with deliberate reference to this end. Not only ought we to cease from the mere unthinking adoption of the current fashion in education, which has no better warrant than any other fashion; but we must also rise above that rude, empirical style of judging

displayed by those more intelligent people who do bestow some care in overseeing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children's minds. It must not suffice simply to *think* that such or such information will be useful in after life, or that this kind of knowledge is of more practical value than that; but we must seek out some process of estimating their respective values, so that as far as possible we may positively *know* which are most deserving of attention.

过去从未完整使用过这种评判方式，甚至连部分运用都很少见，后来也是模糊地不自觉地使用的。现在应该将这种评判方式自觉地按步骤应用于一切情况。我们理应将完满生活视为要达到的目标，且保持目标明确，以便我们在培养儿童时能根据目标慎重地选择施教的科目和方法。在教育方面，由于无法保证当下的方式比其他方式更为有用，我们非但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当下的方式，反而必须提高我们的评判标准。我们必须超越那些关心子女心智培养的智者所提出的原始的、单凭经验的评判办法。仅仅简单揣测 哪种知识在将来生活中会有用或者有实际价值仍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找到某些办法来估计它们各自的价值，使我们尽可能确切地知道 哪些最值得关注。

Doubtless the task is difficult—perhaps never to be more than approximately achieved. But, considering the vastness of the interests at stake, its difficulty is no reason for pusillanimously passing it by; but rather for devoting every energy to its mastery. And if we only proceed systematically, we may very soon get at results of no small moment.

这个任务无疑是艰巨的，或许永远只能得到一个大概的结果。但是，考虑到它所关切的重大利益，就不能因为任务艰巨而怯懦地搁置不管，而应当竭尽全力去掌握它。只要我们有条不紊地进行，可能很

快就会有重大发现。

Our first step must obviously be to classify, in the order of their importance, the leading kinds of activity which constitute human life. They may be naturally arranged into:—1. those activities which directly minister to self-preservation; 2. those activities which, by securing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indirectly minister to self-preservation; 3. those activities which have for their end the rearing and discipline of offspring; 4. those activities which are involved in the maintenance of proper soci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5. those miscellaneous activities which make up the leisure part of life, devoted to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 tastes and feelings.

很显然，第一步我们要根据其重要程度，对构成人类生活的几种主要活动加以分类。这种分类排序的结果通常可能是：第一类，对保全自己有直接帮助的活动；第二类，通过获取生活必需品而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第三类，旨在抚养教育子女的活动；第四类，与维持正常社会政治关系有关的活动；第五类，在生活中的闲暇时间满足爱好和感情的各种活动。

That these stand in something like their true order of subordination, it needs no long consideration to show. The actions and precautions by which, from moment to moment, we secure personal safety, must clearly take precedence of all others. Could there be a man, ignorant as an infant of all surrounding objects and movements, or how to guide himself among them, he would pretty certainly lose his life the first time he went into the street: notwithstanding any amount of learning he might have on other matters. And as entire ignorance in all other directions would be

less promptly fatal than entire ignorance in this direction,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knowledge immediately conducive to self-preservation is of primary importance.

不用太多考虑就能看出，这一排序大致符合活动的真实主从关系。居于首位的显然必须是那些能时刻保证我们个人安全的活动和预防措施。如果有人像婴儿一样，对周围的事物和活动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身处其中该如何应对，那么不管其在其他方面有多大的学问，一走上街头必然就会丧命。在这方面一无所知会即刻丧命，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无所知不会立即丧命，那就必须承认头等重要的知识是直接有利于保全自己的知识。

That next after direct self-preservation comes the indirect self-preservation which consists in acquiring the means of living, none will question. That a man's industrial functions must be considered before his parental ones, is manifest from the fact that, speaking generally, the discharge of the parental functions is made possible only by the previous discharge of the industrial ones. The power of self-maintenance necessarily preceding the power of maintaining offspring, it follows that knowledge needful for self-maintenance has stronger claims than knowledge needful for family welfare—is second in value to none save knowledge needful for immediate self-preservation.

在直接保全自己之后，就要学习生存手段来间接保全自己，这一点毋庸置疑。一个人应该首先考虑履行工作职责，而后考虑为人父母的职责。因为通常来说，只有先履行了工作职责，才有可能履行为人父母的职责。要具备养活子女的能力，先要具备养活自己的能力。因此，与家庭幸福所需要的知识相比，养活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显得更加

迫切，在价值上仅次于直接保全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As the family comes before the State in order of time—as the bringing up of children is possible before the State exists, or when it has ceased to be, whereas the State is rendered possible only by the bringing up of children; it follows that the duties of the parent demand closer attention than those of the citizen. Or, to use a further argument—since the goodness of a society ultimately depends on the nature of its citizens; and since the nature of its citizens is more modifiable by early training than by anything else; we must conclude that the welfare of the family underlies the welfare of society. And hence knowledge directly conducing to the first, must take precedence of knowledge directly conducing to the last.

从时间顺序上看，家庭先于国家产生。养育子女可能存在于国家出现之前或国家消失之后。但是没有对孩子们的养育就不会有国家的未来，所以相比公民的职责而言，需要更加关注父母的职责。或从更深层讲，由于良好的社会最终还是要靠其公民的品质，早期训练最易于改变公民的品质。因此，我们必然得出结论：家庭幸福是社会幸福的基础。所以必须先掌握使家庭幸福的知识，后学习成就社会幸福的知识。

Those various forms of pleasurable occupation which fill up the leisure left by graver occupations—the enjoyments of music, poetry, painting, etc.—manifestly imply a pre-existing society. Not only is a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of them impossible without a long-established social union; but their very subject-matter consists in great part of social sentiments and sympathies. Not only does

society supply the conditions to their growth; but also the ideas and sentiments they express. And, consequently, that part of human conduct which constitutes good citizenship is of more moment than that which goes out in accomplishments or exercise of the tastes; and, in education, preparation for the one must rank before preparation for the other.

欣赏音乐、诗歌和绘画等各种形式的娱乐消遣点缀了严肃活动之外的闲暇时间，这显然是以一个既有的社会存在为前提的。不仅这些娱乐消遣的大规模发展离不开早先建立的社会基础，而且其内容本身也大部分来源于社会情感和同情。社会不只为它们提供了发展条件，也为它们提供了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因此，相比成就人类各种艺术品位的行为，培养良好公民素质的那部分行为才更为重要。教育因而应先为培养良好的公民素质做准备，而后才是培养艺术品位。

Such then, we repeat, is something like the rational order of subordination:—that education which prepares for direct self-preservation; that which prepares for indirect self-preservation; that which prepares for parenthood; that which prepares for citizenship; that which prepares for the miscellaneous refinements of life. We do not mean to say that these divisions are definitely separable. We do not deny that they are intricately entangled with each other in such way that there can be no training for any that is not in some measure a training for all. Nor do we question that of each division there are portions more important than certain portions of the preceding divisions: that, for instance, a man of much skill in business but little other faculty, may fall further below the standard of complete living than one of but moderate power of acquiring money but great judgment as a parent; or that exhaustive information bearing on right social action, joined with entire want

of general culture in literature and the fine arts, is less desirable than a more moderate share of the one joined with some of the other. But, after making all qualifications, there still remain these broadly-marked divisions; and it still continues substantially true that these divisions subordinate one another in the foregoing order, because the corresponding divisions of life make one another *possible* in that order.

因此，我们重申，教育中一个合理的主次顺序应该是：为直接保全自己做准备的教育，为间接保全自己做准备的教育，为当父母做准备的教育，为做公民做准备的教育，为提高生活品质做准备的教育。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划分是绝对割裂的。我们并不否认它们之间有错综复杂的联系，任何单项的训练都或多或少地对其他方面有所裨益。我们也不怀疑，各个分项的某些部分比前一分项的某些部分更重要。例如，按照完满生活这一标准，一个擅长经商而不擅长其他的人会远远落后于一个赚钱一般但在为人父母上更具判断力的人；或者一个对社会行为了解详尽却缺乏一般文学艺术修养的人就不如一个对各方面都适度了解的人。但是，在做了所有这些限定之后，上述大致分类仍是存在的，而且这些分类也基本上符合上述主次顺序，因为生活中相应领域的主次顺序与此相符，彼此相辅相成 。

Of course the ideal of education is—complete preparation in all these divisions. But failing this ideal, as in our phase of civilization every one must do more or less, the aim should be to maintain *a du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degrees of preparation in each. Not exhaustive cultivation in any one, supremely important though it may be—not even an exclusive attention to the two, three, or four divisions of greatest importance; but an attention to all,—greatest where the value is greatest, less where the value is less, least where the value is least. For the average man (not to forget the cases in

which peculiar aptitude for some one department of knowledge rightly makes pursuit of that one the bread-winning occupation)—for the average man, we say, the desideratum is, a training that approaches nearest to perfection in the things which most subserve complete living, and falls more and more below perfection in the things that have more and more remote bearings on complete living.

当然，教育的理想是对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完全的准备。但是，正如每个人在文明进程中贡献有多有少，在达不到这个理想的时候，教育目标应该是在每个方面都达到应有的程度 。不是在任何一方面都要造诣很深，尽管某个方面至关重要；也不是只关注最重要的两个、三个或四个方面，而是关注所有方面。最有价值的给予最大关注，价值小些的就关注少些，价值最小的就给予最少关注。对普通人来说（也不排除某些在某类知识方面有专长并以此谋生的人），我们要做的是，在那些非常有益于完满生活的事情上，对其进行接近完美的训练，而在那些与完满生活联系较小的事情上，训练要求则可以尽量降低。

In regulating education by this standard, there are some general considerations that should be ever present to us. The worth of any kind of culture, as aiding complete living, may be either necessary or more or less contingent. There is knowledge of intrinsic value; knowledge of quasi-intrinsic value; and knowledge of conventional value. Such facts as that sensations of numbness and tingling commonly precede paralysis, that the resistance of water to a body moving through it varies as the square of the velocity, that chlorine is a disinfectant—these, and the truths of Science in general, are of intrinsic value: they will bear on human conduct ten thousand years hence as they do now. The extra

knowledge of our own language, which is given by an acquaintance with Latin and Greek may be considered to have a value that is quasi intrinsic: it must exist for us and for other races whose languages owe much to these sources; but will last only as long as our languages last. While that kind of information which, in our schools, usurps the name History—the mere tissue of names and dates and dead unmeaning events—has a conventional value only: it has not the remotest bearing upon any of our actions; and is of use only for the avoidance of those unpleasant criticisms which current opinion passes upon its absence. Of course, as those facts which concern all mankind throughout all time must be held of greater moment than those which concern only a portion of them during a limited era, and of far greater moment than those which concern only a portion of them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a fashion; it follows that in a rational estimate, knowledge of intrinsic worth must, other things equal, take precedence of knowledge that is of quasi-intrinsic or conventional worth.

以此标准来安排教育，我们应该经常考虑一些一般性的问题。从对完满生活的帮助来看，任何一种教育的价值要么是必然的，要么或多或少是有条件的。有的知识有内在价值，有的有准内在价值，有的有传统价值。比如说，人在瘫痪前通常有麻木和刺痛的感觉，游泳时水对身体的阻力同运动速度的平方成比例，氯气是一种消毒剂。这些以及一般的科学真理都有内在价值，即使在一万年后还会和今天一样对人类行为有影响。熟悉拉丁文和希腊文使我们拥有了国语以外的知识，可算作具有准内在价值：对我们以及那些在语源上对这两种文字有所继承的其他民族来说，其价值一定是存在的，但只能以我们这些语言的存在为前提。我们学校中那些所谓历史的知识，比如一些人名、年代以及陈旧而无意义的事件，就只具有传统的价值。这些知识对我们的任何行动没有任何影响，仅仅是为了避免因不知道这些信息而受到当前舆论的恼人的指责。当然，必须承认，与整个人类始终都

有关的事实最重要，只在有限的年代中关系到一部分人的事实次之，那些只在一时流行的、关系到一部分人的知识再次之。因此合理的看法是：在其他情况相同时，先学习有内在价值的知识，后学习具有准内在价值或传统价值的知识。

One further preliminary. Acquirement of every kind has two values—value as *knowledge* and value as *discipline* . Besides its use for guidance in conduct, the acquisition of each order of facts has also its use as mental exercise; and its effects as a preparative for complete living have to be considered under both these heads.

先声明一点，任何一种技艺的习得都有两项价值，即作为知识 的价值和作为训练 的价值。获得的每类知识不仅可以指导行为，还可用来训练心智，因而应该从这两方面来考虑它在为完满生活做准备时的效果。

These, then, are the general ideas with which we must set out in discussing a *curriculum* : —Life as divided into several kinds of activity of successively decreasing importance; the worth of each order of facts as regulating these several kinds of activity, intrinsically, quasi-intrinsically, and conventionally; and their regulative influences estimated both as knowledge and discipline.

这些就是我们在开始讨论课程 时必须具有的一般观念，即生活可以分成重要性依次递减的几种活动；规定这些活动重要性的每类事实都具有内在的、准内在的和传统的价值；重要性的规定取决于作为知识的价值和作为训练的价值。

Happily, that all-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which goes to secure direct self-preservation, is in great part already provided for. Too momentous to be left to our blundering, Nature takes it into her own hands. While yet in its nurse's arms, the infant, by hiding its face and crying at the sight of a stranger, shows the dawning instinct to attain safety by flying from that which is unknown and may be dangerous; and when it can walk, the terror it manifests if an unfamiliar dog comes near, or the screams with which it runs to its mother after any startling sight or sound, shows this instinct further developed. Moreover, knowledge subserving direct self-preservation is that which it is chiefly busied in acquiring from hour to hour. How to balance its body; how to control its movements so as to avoid collisions; what objects are hard, and will hurt if struck; what objects are heavy, and injure if they fall on the limbs; which things will bear the weight of the body, and which not; the pains inflicted by fire, by missiles, by sharp instruments—these, and various other pieces of information needful for the avoidance of death or accident, it is ever learning. And when, a few years later, the energies go out in running, climbing, and jumping, in games of strength and games of skill, we see in all these actions by which the muscles are developed, the perceptions sharpened, and the judgment quickened, a preparation for the safe conduct of the body among surrounding objects and movements; and for meeting those greater dangers that occasionally occur in the lives of all. Being thus, as we say, so well cared for by Nature, this fundamental education needs comparatively little care from us. What we are chiefly called upon to see, is, that there shall be free scope for gaining this experience, and receiving this discipline—that there shall be no such thwarting of Nature as that by which stupid schoolmistresses commonly prevent the girls in their charge from the spontaneous physical activities they would indulge in; and so render them comparatively incapable of taking care of themselves

in circumstances of peril.

庆幸的是，作为教育最重要的一部分，关于直接自我保全的教育很大程度上都已被安排妥当了。这部分太过重要，所以大自然就亲自操办了，免得我们胡乱安排。婴儿尚在乳母怀抱时，一看到生人就躲起来哭，这表现出他正在觉醒的本能，即为了安全会逃避未知事物和潜在危险。在他学会走路后，如果遇到陌生的狗靠近，或是看到听到可怕的事物就惊慌地叫喊着跑向母亲，这都表现出那种本能在进一步发展。此外，他时时刻刻都在忙着获取的主要都是关于直接自我保全的知识。怎样平衡身体，怎样控制他的动作避免碰撞，什么样的硬物碰了会痛，什么样的重物打在肢体上会受伤。哪些东西能承受身体的重量而哪些不行，火、投掷物以及利器是否会造成疼痛。他一直在学习这些，以及其他各种为避免死亡或事故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几年以后，他在跑、爬、跳和体力及技巧的游戏中释放了他的活力。我们看出，这些活动使肌肉发达，知觉敏锐，判断敏捷，使他的身体做着准备，以在四周物体和运动中安全地行动；并且使他准备着应对生活中偶发的更大的危险。因此，我们认为，大自然在这方面的教育上照顾周全，无需我们太多关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给这类经验和这项训练留下发展的自由空间，而不要去妨碍大自然。不要像某些愚笨的女教师那样，经常禁止女学生去参加一些她们喜好的体育活动，致使她们在危险情境下多少会束手无策。

This, however, is by no means all that is comprehended in the education that prepares for direct self-preservation. Besides guarding the body against mechanical damage or destruction, it has to be guarded against injury from other causes—against the disease and death that follow breaches of physiologic law. For complete living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hat sudden annihilations of life shall be warded off; but also that there shall be escaped the incapacities and the slow annihilation which unwise habits entail. As, without

health and energy, the industrial, the parental, the social, and all other activities become more or less impossible; it is clear that this secondary kind of direct self-preservation is only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primary kind; and that knowledge tending to secure it should rank very high.

然而，这并不是为直接自我保全做准备的教育所包含的全部内容。除了保护身体不受机械损伤或破坏以外，还要保护它不受因其他原因造成的损伤，例如由于违反生理规律而导致的疾病和死亡。这对完满生活是必要的，不只需要防止突然死亡，还需要避免不良习惯所引起的能力丧失和慢性死亡。没有健康和活力，就或多或少地无法胜任生产活动、为人父母的活动以及其他社会活动。显然，就重要性而言，这种次要的直接自我保全仅次于首要的直接自我保全。而有助于实现自我保全的知识应该排在前面。

It is true that here, too, guidance is in some measure ready supplied. By our various physical sensations and desires, Nature has insured a tolerable conformity to the chief requirements. Fortunately for us, want of food, great heat, extreme cold, produce promptings too peremptory to be disregarded. And would men habitually obey these and all like promptings when less strong, comparatively few evils would arise. If fatigue of body or brain were in every case followed by desistance; if the oppression produced by a close atmosphere always led to ventilation; if there were no eating without hunger, or drinking without thirst; then would the system be but seldom out of working order. But so profound an ignorance is there of the laws of life, that men do not even know that their sensations are their natural guides, and (when not rendered morbid by long-continued disobedience) their trustworthy guides. So that though, to speak ideologically, Nature

has provided efficient safeguards to health, lack of knowledge makes them in a great measure useless.

的确，这方面多少已经有了些现成的指导。通过各种身体感觉和欲望，大自然已经确保我们大致符合一些主要要求。幸运的是，食物短缺和酷热严寒带来的强烈刺激是不容忽视的。对于一些不那么强烈的类似刺激，如果人们也依然习惯于顺从，就会少招致一些恶果。比如，身体或大脑疲乏时，人们就停止工作；空气不流通，房间憋闷，人们就去通风；不饿不食，不渴不饮；这样机体才会少出毛病。但是人们严重忽视了生活规律，全然不懂感觉是自然对他们的指导，而且是可靠的指导，长期忽视感觉会导致病态。因此，虽然理论上大自然已经为我们的健康提供了有效防护，但防护知识的缺乏很大程度上使其不能发挥作用。

If any one doubts the importance of an acquaintance with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physiology, as a means to complete living, let him look around and see how many men and women he can find in middle or later life who are thoroughly well. Only occasionally do we meet with an example of vigorous health continued to old age; hourly do we meet with examples of acute disorder, chronic ailment, general debility, premature decrepitude. Scarcely is there one to whom you put the question, who has not, in the course of his life, brought upon himself illnesses which a little knowledge would have saved him from. Here is a case of heart disease consequent on a rheumatic fever that followed reckless exposure. There is a case of eyes spoiled for life by overstudy. Yesterday the account was of one whose long-enduring lameness was brought on by continuing, spite of the pain, to use a knee after it had been slightly injured. And today we are told of another who has had to lie by for years, because he did not know that the

palpitation he suffered from resulted from overtaxed brain. Now we hear of an irremediable injury that followed some silly feat of strength; and, again, of a constitution that has never recovered from the effects of excessive work needlessly undertaken. While on all sides we see the perpetual minor ailments which accompany feebleness. Not to dwell on the natural pain, the weariness, the gloom, the waste of time and money thus entailed, only consider how greatly ill-health hinders the discharge of all duties—makes business often impossible, and always more difficult; produces an irritability fatal to the right management of children; puts the functions of citizenship out of the question; and makes amusement a bore. Is it not clear that the physical sins—partly our forefathers' and partly our own—which produce this ill-health, deduct more from complete living than anything else, and to a great extent make life a failure and a burden instead of a benefaction and a pleasure?

熟悉生理学原理是完满生活的重要手段，如果有人质疑，请他看看周围能找到多少完全健康的中年人或是老年人。人到老年还健壮的例子很少，急性病、慢性病、身体虚弱、未老先衰的例子却时常可见。在你问到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一生中没得过病，而些许常识就可使他远离疾病。这儿有一例：一个人大意着凉得了风湿症，因此导致了心脏病。另有一例：一个人由于过度学习使眼睛终身受损。昨天听说一个人轻伤后忍着膝盖痛勉强走路，而造成长期跛脚。而今天又听说另一个人要长年休养，因为他不知道用脑过度会使他得心悸症。我们先是听说愚蠢地耗费力气导致了无法挽救的损伤，后又听说一个人毫无必要地过度劳累，使体质始终不能复原。我们从各方面都能看出虚弱所带来的各种永久性小毛病。且不提那些由此引起的痛苦、烦躁、愁闷和时间金钱的浪费，只考虑一下健康不良会多么误事——使工作总是比较困难，甚至无法进行；会使人产生一种对管教儿童最不利的急躁情绪；使公民无法履行职责；厌烦娱乐。引起这种健康不良的身体痛苦一部分来自遗传，另一部分得归咎于我们自己，这

难道还不清楚吗？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生活成为失败和负担，而不是幸福和愉快，这难道不是对我们完满生活的最大影响吗？

To all which add the fact, that life, besides being thus immensely deteriorated, is also cut short. It is not true, as we commonly suppose, that a disorder or disease from which we have recovered leaves us as before. No disturbance of the normal course of the functions can pass away and leave things exactly as they were. In all cases a permanent damage is done—not immediately appreciable, it may be, but still there; and along with other such items which Nature in her strict account-keeping never drops, it will tell against us to the inevitable shortening of our days.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small injuries it is that constitutions are commonly undermined, and break down, long before their time. And if we call to mind how far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life falls below the possible duration, we see how immense the loss is. When, to the numerous partial deductions which bad health entails, we add this great final deduction, it results that ordinarily more than one half of life is thrown away.

不仅如此，健康受损不只使我们的生活严重恶化，还会缩短我们的寿命，并不像我们通常所想的那样，痊愈后就能一切如前。正常的生理功能受到扰乱后，是无法完全恢复的。总是有永久的伤害，也许不会立刻被感知，但总是存在。大自然在严格的记账中从不漏掉任何一项，最后做总清算时就不免要缩短我们的寿命。轻伤的积累通常会慢慢地侵蚀健康，以致体质提前崩溃。一想到人们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可能达到的寿命，我们就看出损失之巨大。不良健康所引起的数不清的局部消耗，再加上这个最后的大损耗，通常导致寿命折半。

Hence, knowledge which subserves direct self-preservation by preventing this loss of health, is of primary importance. We do not contend that possession of such knowledge would by any means wholly remedy the evil, for it is clear that in our present phase of civilization men's necessities often compel them to transgress. And it is further clear that, even in the absence of such compulsion, their inclinations would frequently lead them, spite of their knowledge, to sacrifice future good to present gratification. But we *do* contend that the right knowledge impressed in the right way would effect much; and we further contend that as the laws of health must be recognised before they can be fully conformed to, the imparting of such knowledge must precede a more rational living—come when that may. We infer that as vigorous health and its accompanying high spirits are larger elements of happiness than any other things whatever, the teaching how to maintain them is a teaching that yields in moment to no other whatever. And therefore we assert that such a course of physiology as is needful for the comprehension of its general truths, and their bearings on daily conduct, is an all-essential part of a rational education.

所以通过防止健康丧失来直接保全自己的知识是首要的。我们不是说有了这些知识就可以补救一切不良行为。显然，在目前的文明阶段，人们的需要时常迫使他们越轨。进而更明显的是，即使没有这种强迫，他们的天性倾向也往往使其明知故犯，为了贪图眼前的快活而牺牲将来的利益。但是我们仍然 坚持，以正确的方法灌输正确的知识会收效显著。先认清健康的规律后才能充分执行，我们进一步主张，无论更合理的生活何时实现，都必须事先传授这种知识。由此，我们做出推论，既然精力充沛和它带来的饱满情绪在幸福中比任何其他事情所占的地位都高，那么教人保持良好健康和饱满情绪就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肯定地说，这样一门生理学科目，是为了解其中的普遍真理以及它们与日常行为的关系所必需的，是合理的教育中最重要的

一部分。

Strange that the assertion should need making! Stranger still that it should need defending! Yet are there not a few by whom such a proposition will be received with something approaching to derision. Men who would blush if caught saying *Iphigénia* instead of *Iphigenía* , or would resent as an insult any imputation of ignorance respecting the fabled labours of a fabled demigod, show not the slightest shame in confessing that they do not know where the Eustachian tubes are, what are the actions of the spinal cord, what is the normal rate of pulsation, or how the lungs are inflated. While anxious that their sons should be well up in the superstitions of two thousand years ago, they care not that they should be taught anything about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ir own bodies—nay, would even disapprove such instruction. So overwhelming is the influence of established routine! So terribly in our education does the ornamental override the useful!

很奇怪，这个主张居然还需要提出！更奇怪的是它还需要辩护！可是很多人会以近乎嘲笑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主张。有的人，读错了希腊文学里的人名伊菲几尼亚中“伊”的重音，一旦被指出就面红耳赤，或是因被指不知道一个半神话人物的传说事迹就觉得被侮辱，但其却能毫不羞愧地承认不知道欧氏管在哪里，脊椎神经有什么作用，正常脉搏是多少次，或肺是怎样充满空气的。他们渴望自己的儿子熟悉两千年前的迷信，却对能教给儿子自身身体构造和机能的知识毫不关心，甚至还反对这样的教育。陈规旧制就是这么势不可当！在我们的教育中，装饰就是这样可怕地战胜了实用！

We need not insist on the value of that knowledge which aids

indirect self-preservation by facilitating the gaining of a livelihood. This is admitted by all; and, indeed, by the mass is perhaps too exclusively regarded as the end of education. But while every one is ready to endorse the abstract proposition that instruction fitting youths for the business of life is of high importance, or even to consider it of supreme importance; yet scarcely any inquire what instruction will so fit them. It is true that reading, writing, and arithmetic are taught with an intelligent appreciation of their uses; but when we have said this we have said nearly all. While the great bulk of what else is acquired has no bearing on the industrial activities, an immensity of information that has a direct bearing on the industrial activities is entirely passed over.

我们用不着强调有助于谋生进而可以间接保全自己的那类知识的价值。这一点毋庸置疑，实际上，大家甚至可能把它过分看成教育的唯一目标了。但是虽然每个人都能够同意这种抽象的提法，认为为青年人谋生做准备的教育很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可是很少有人去探究做好这项准备要教授些什么才能。当然，教读、写、算的时候是从智力发展上承认了它们有用，但是此外就差不多无甚可说的了。所学的其他东西大部分都同生产活动无关，而同生产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大量知识又完全被忽略掉了。

For, leaving out only some very small classes, what are all men employed in? They are employed in the production, prepa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ommodities. And on what does efficiency in the production, prepa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ommodities depend? It depends on the use of methods fitted to the respective natures of these commodities; it depends on an adequate knowledge of their physical, chemical, or vital properties, as the case may be; that is, it depends on Science. This order of knowledge, which is in great part

ignored in our school courses, is the order of knowledge underlying the right performance of all those processes by which civilised life is made possible. Undeniable as is this truth, and thrust upon us as it is at every turn, there seems to be no living consciousness of it: its very familiarity makes it unregarded. To give due weight to our argument, we must, therefore, realise this truth to the reader by a rapid review of the facts.

除了人数很少的某些阶级以外，其他所有人在做什么？他们都在从事商品的生产、加工和分配。而商品的生产、加工和分配的效率又靠什么？就靠运用适合这些商品各种性质的方法，靠在不同情况下相当熟悉它们的物理学的、化学的或生命的特性，也就是依靠科学。大部分这方面的知识都没有列入我们学校科目中，但它却是上述那些使文明生活成为可能的活动能够正确进行的基础。尽管这个真理不可否认，可是似乎也没有人对其留意，因为人们对司空见惯的东西往往熟视无睹。为了增强论点的说服力，我们一起来快速回顾一些事实，以使读者明白这个真理。

Passing over the most abstract science, Logic, on the due guidance by which, however, the large producer or distributor depends,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for success in his business-forecasts, we come first to Mathematics. Of this, the most general division, dealing with number, guides all industrial activities; be they those by which processes are adjusted, or estimates framed, or commodities bought and sold, or accounts kept. No one needs to have the value of this division of abstract science insisted upon.

撇开最抽象的科学——逻辑学不谈（虽然大生产者或分配者也在有意无意中要多少靠它的指导来预测商情），我们首先来谈数学。其

中，有关数目的最普通部分就指导着一切生产活动，不论是调节工序、进行估价、商品买卖或记账，都需要用到它。没有必要对任何人强调这部分抽象科学的价值。

For all the higher arts of construction, some acquaintance with Mathematics is indispensable. The village carpenter, who, lacking rational instruction, lays out his work by empirical rules learnt in his apprenticeship, equally with the builder of a Britannia Bridge, makes hourly reference to the laws of quantitative relations. The surveyor on whose survey the land is purchased; the architect in designing a mansion to be built on it; the builder in preparing his estimates; his foreman in laying out the foundations; the masons in cutting the stones; and the various artisans who put up the fittings; are all guided by geometrical truths. Railway-making is regulated from beginning to end by geometry: alike in the preparation of plans and sections; in staking out the line; in the mensuration of cuttings and embankments; in the designing and building of bridges, culverts, viaducts, tunnels, stations. And similarly with the harbours, docks, piers, and various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al works that fringe the coasts and overspread the face of the country; as well as the mines that run underneath it. Out of geometry, too, as applied to astronomy, the art of navigation has grown; and so, by this science, has been made possible that enormous foreign commerce which supports a large part of our population, and supplies us with many necessities and most of our luxuries. And nowadays even the farmer, for the correct laying out of his drains, has recourse to the level—that is, to geometrical principles.

在高级的建筑艺术中，对数学知识一定程度上的掌握是不可或缺的。同布列坦尼亚桥的建造者一样，在缺乏理性指令时，村里的木匠

用其学徒时期学到的实践规则来安排工作，随时都在参考定量关系的法则。测绘员在测量所购土地时，建筑师在设计大厦时，建筑工人在打地基时，石工在切石块时，其他工匠在进行装配时，全都受到了几何学原理的指导。铁道的修建从头到尾都要用到几何学，在准备平面图和剖面图、打桩定线、量度路堑路堤中，在设计和建造桥梁、涵洞、拱桥、隧道和车站中，都是一样。在建设沿海或散布各地的港口、船坞、码头等各种工程以及地下的煤矿坑道时，情况也大抵如此。随着几何学被应用于天文学，航海技术也得到了发展，进而又使对外贸易成为可能，从而为很大一部分人口提供了许多必需品和大多数奢侈品。如今，就连农民在规划沟道时都要用到水平仪，也就是要运用几何学的原理。

When from those divisions of mathematics which deal with *spac* e, and *number* , some small smattering of which is given in schools, we turn to that other division which deals with *force* , of which even a smattering is scarcely ever given, we meet with another large class of activities which this science presides over. On the application of rational mechanics depends the success of nearly all modern manufacturers. The properties of the lever, the wheel and axle, etc., are involved in every machine—every machine is a solidified mechanical theorem; and to machinery in these times we owe nearly all production. Trace the history of the breakfast-roll. The soil out of which it came was drained with machine-made tiles; the surface was turned over by a machine; the seed was put in by a machine; the wheat was reaped, thrashed, and winnowed by machines; by machinery it was ground and bolted; and had the flour been sent to Gosport, it might have been made into biscuits by a machine. Look round the room in which you sit. If modern, probably the bricks in its walls were machine-made; by machinery the flooring was sawn and planed, the mantelshelf sawn and polished, the paper-hangings made and printed; the veneer on the

table, the turned legs of the chairs, the carpet, the curtains, are all products of machinery. And your clothing—plain, figured, or printed—is it not wholly woven, nay, perhaps even sewed, by machinery? And the volume you are reading—are not its leaves fabricated by one machine and covered with these words by another? Add to which that for the means of distribution over both land and sea, we are similarly indebted. And then let it be remembered that according as the principles of mechanics are well or ill used to these ends, comes success or failure—individual and national. The engineer, who misapplies his formulae for the strength of materials, builds a bridge that breaks down. The manufacturer, whose apparatus is badly devised, cannot compete with another whose apparatus wastes less in friction and inertia. The ship-builder adhering to the old model, is out-sailed by one who builds on the mechanically-justified wave-line principle. And as the ability of a nation to hold its own against other nations depends on the skilled activity of its units, we see that on such knowledge may turn the national fate.

学校里只大概教授了些数学中关于空间 和数字 的知识，而对于有关作用力的那部分数学几乎没有涉及。当我们从前者转向后者时，就会遇到另一类由自然科学主导的活动。几乎所有现代制造业的成功都依赖于理论力学的应用。每件机械的制造都要依据杠杆、轮轴等的特性，也就是说每件机械都产生于力学定理的具体应用，而我们现时差不多一切生产都依靠机械。我们来追溯一下早餐面包的来源：小麦生长的土壤要靠机械造的砖铺就的水道进行灌溉；地面是用机械来翻的；种子是用机械播的；麦子是用机械收割，脱粒，去皮的，磨成粉装成袋也靠机械，而如果要运送面粉到戈斯波特，可能就用机械做成了饼干。看看你所在的房间四周。如果是新式的房间，墙上的砖多半是机械造的，地板和壁炉架的锯割抛光、墙纸的制作和印色、桌面的薄片镶饰、可折叠的椅子腿、地毯、窗帘等等都是用机械完成的。你

的衣服，素色的、描花的、或印花的，不都是用机械织出或者甚至缝好的吗？你所看的书，每一页不都是用一个机械制成又用另一机械印上这些字的吗？除此以外，我们应该感谢的还有水陆运输工具。再要注意，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国家而言，机械原理运用得好坏，影响着随之而来的是成功还是失败。工程师建桥时如果在材料强度方面计算错了，桥就会塌。设备糟糕的制造商肯定难以与设备精良的对手匹敌。墨守成规的造船商肯定会落后于一个根据力学上的流线原理来造船的人。由于一个国家对抗另一个国家的实力在于其各单位活动中的技术水平，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些知识很可能改变国家的命运。

Pass next to Physics. Joined with mathematics, it has given us the steam-engine, which does the work of millions of labourers. That section of physics which deals with the laws of heat, has taught us how to economise fuel in our various industries; how to increase the produce of our smelting furnaces by substituting the hot for the cold blast; how to ventilate our mines; how to prevent explosions by using the safety-lamp; and, through the thermometer, how to regulate innumerable processes. That division which has the phenomena of light for its subject, gives eyes to the old and the myopic; aids through the microscope in detecting diseases and adulterations; and by improved lighthouses prevents shipwrecks. Researches in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have saved incalculable life and property by the compass; have subserved sundry arts by the electrotype; and now, in the telegraph, have supplied us with the agency by which for the future all mercantile transactions will be regulated, political intercourse carried on, and perhaps national quarrels often avoided. While in the details of indoor life, from the improved kitchen-range up to the stereoscope on the drawing-room table, the applications of advanced physics underlie our comforts and gratifications.

接着是物理学。物理学与数学相结合，为我们造就了蒸汽机，从而代替了几百万劳动者的工作。在物理学中，关于热学定律的部分告诉我们在许多生产部门中怎样节约燃料，怎样用热风取代冷风以增加炼铁炉的产量，怎样在矿井中通风，怎样用安全灯防止爆炸，以及怎样通过温度计调节无数的程序过程。以光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可以使老年人和近视的人恢复视力，可以借助显微镜发现疾病和污染的问题，可以改进灯塔来防止航行事故。由于有了对电磁学的研究，人们用罗盘针拯救了不可胜数的生命和财产，电铸版的应用帮助改进了很多技艺，而现在电报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媒介，规范调节了日后的一切商业来往，也可以进行政治联系，或许也因此能常常避免国际争端。在室内生活的细节上，从改良的炉灶到客厅桌上的立体镜，都说明先进的物理学使我们获得了舒适和满足。

Still more numerous are the bearings Chemistry on those activities by which men obtain the means of living. The bleacher, the dyer, the calico-printer, are severally occupied in processes that are well or ill done according as they do or do not conform to chemical laws. The economical reduction from their ores of copper, tin, zinc, lead, silver, iron, are in a great measure questions of chemistry. Sugar-refining, gas-making, soap-boiling, gunpowder manufacture, are operations all partly chemical; as are also those by which are produced glass and porcelain. Whether the distiller's wort stops at the alcoholic fermentation or passes into the acetous, is a chemical question on which hangs his profit or loss; and the brewer, if his business is sufficiently large, finds it pay to keep a chemist on his premises. Glance through a work on technology, and it becomes at once apparent that there is now scarcely any process in the arts or manufactures over some part of which chemistry does not preside. And then, lastly, we come to the fact that in these times, agriculture, to be profitably carried on, must have like guidance. The analysis of manures and soils; their adaptations to each other;

the use of gypsum or other substance for fixing ammonia; the utilization of coprolites; the production of artificial manures—all these are boons of chemistry which it behoves the farmer to acquaint himself with. Be it in the lucifer match, or in disinfected sewage, or in photographs—in bread made without fermentation, or perfumes extracted from refuse, we may perceive that chemistry affects all our industries; and that, by consequence, knowledge of it concerns everyone who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nected with our industries.

化学对人类生存活动的影响就更多了。漂白、染色、印花的过程做得好不好，就要看做这些工作的人是否遵守了化学定律。熔炼铜、锡、锌、铅、银、铁，必须有化学的指导。炼糖、造气、制肥皂、造火药，都是部分地根据化学原理来操作，玻璃和陶瓷的生产也是一样。蒸馏酒者的麦芽汁是停止在酒精发酵阶段，还是进入产生醋酸阶段，就是一个关系到他盈亏的化学问题，而一个大酒商就会觉得聘请一个化学家是合算的。显而易见，现在任何一个工艺或是制造产业的某些部分都有化学的参与。最后，我们还发现，现在就是农业要经营得利也需要化学的指导。肥料和土壤的分析，二者彼此的配合，用石膏或其他东西去固定氨，粪便化合物的利用，人造肥料的生产，这一切都是化学的贡献，是农民应当熟悉的。不论是摩擦生火的火柴，或是消了毒的下水道，或是摄影作品，或是不经发酵的面包，或是由废物中提出的香料，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出化学对我们各种生产活动的影响。因此这方面的知识，是每个直接或间接与生产活动有关的人都应该关注的。

Of the Concrete sciences, we come first to Astronomy. Out of this has grown that art of navigation which has made possible the enormous foreign commerce that supports a large part of our population, while supplying us with many necessaries and most of

our luxuries.

关于具体的科学，我们首先谈到的是天文学。航海术正是由天文学发展而来。航海术使得养活了我们大部分人口的大规模对外贸易成为可能，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生活必需品和大部分奢侈品。

Geology, again, is a science knowledge of which greatly aids industrial success. Now that iron ores are so large a source of wealth; now that the duration of our coal-supply has become a question of great interest; now that we have a College of Mines and a Geological Survey; it is scarcely needful to enlarge on the truth that the study of the Earth's crust is important to our material welfare.

地质学也是对工业发展有极大帮助的科学知识。铁矿石是一大财富来源，煤炭供给时长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我们建立了矿业学院和地质调查局。既然如此，就无需再赘述这一事实：研究地壳对我们的物质福利十分重要。

And then the science of life—Biology: does not this, too, bear fundamentally upon these processes of indirect self-preservation? With what we ordinarily call manufactures, it has, indeed, little connection; but with the all-essential manufacture—that of food—it is inseparably connected. As agriculture must conform its methods to the phenomena of vegetable and animal life, it follows necessarily that the science of these phenomena is the rational basis of agriculture. Various biological truths have indeed been empirically established and acted upon by farmers while yet there

has been no conception of them as science: such as that particular manures are suited to particular plants; that crops of certain kinds unfit the soil for other crops; that horses cannot do good work on poor food; that such and such diseases of cattle and sheep are caused by such and such conditions. These, and the everyday knowledge which the agriculturist gains by experi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 management of plants and animals, constitute his stock of biological facts; on the largeness of which greatly depends his success. And as these biological facts, scanty, indefinite, rudimentary, though they are, aid him so essentially; judge what must be the value to him of such facts when they become positive, definite, and exhaustive. Indeed, even now we may see the benefits that rational biology is conferring on him. The truth that the production of animal heat implies waste of substance, and that, therefore, preventing loss of heat prevents the need for extra food—a purely theoretical conclusion—now guides the fattening of cattle: it is found that by keeping cattle warm, fodder is saved. Similarly with respect to variety of food. The experiments of physiologists have shown that not only is change of diet beneficial, but that digestion is facilitated by a mixture of ingredients in each meal: both which truths are now influencing cattle-feeding. The discovery that a disorder known as "the staggers," of which many thousands of sheep have died annually, is caused by an entozoon which presses on the brain; and that if the creature is extracted through the softened place in the skull which marks its position, the sheep usually recovers; is another debt which agriculture owes to biology. When we observe the marked contrast between our farming and farming on the Continent, and remember that this contrast is mainly due to the far greater influence science has had upon farming here and there; and when we see how, daily, competition is making the adop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s more general and necessary; we shall rightly infer that very soon, agricultural success

in England will be impossible without a competent knowledge of animal and vegetable physiology.

再者，生命科学，即生物学，不也是对这些程序起着间接自我保存的影响吗？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制造业确实没有多大关联，但是与最主要的制造业——食品加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农业上的方法顺应并遵循动植物生活的现象，所以关于这些现象的科学就是农业的合理依据。在许多生物学的真理还没有成为科学的时候，它们早已在农民的经验中有了证实和应用，比如某种特殊肥料只适用于某种特定的植物，某种农作物会使土壤不适合种植别的农作物，要想马儿工作好就得给马儿喂好料，某种环境容易导致牛羊得某种病，等等。这些知识以及源自农民经验的关于如何正确管理动植物的常识为农民积累了很多生物学常识，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些知识的丰富积累。既然这些显得匮乏、模糊、浅显的生物学知识都具有实质上的裨益，那么设想当这些生物学知识变得确定、确切、详尽时，该有多大的价值啊！实际上，即使现在我们也能看出理论生物学给予农民的收益。动物热能的产生意味着食物的消耗，因此防止了热的散失就避免了额外食物的需求。这一纯粹理论上的结论现在正指导着我们养肥家畜，人们发现只要给家畜保暖就能节省饲料。在饲料多样化方面有类似结论。生理学家的实验表明不但饮食的变化有益于消化吸收，而且每一餐食材的混合也会促进消化。这些真理现在正影响着家畜的养殖。每年都会有数千头羊死于一种被称作“眩晕症”的病症。研究发现，这种病症是由羊脑内的寄生虫引起，如果通过头骨软处的穿刺治疗将这种寄生虫去除，羊的病症一般就会痊愈。这是生物学对农业的另一贡献。当注意到我们的农业与欧洲大陆的农业之间的显著差异，并且这差异主要是归功于科学经常对农业产生的巨大影响时，当我们意识到竞争是如何一天天地使科学方法的采用变得越来越普遍和必要时，我们能够很快准确地得出一个推论，即如果没有掌握动植物方面足够的知识，英格兰农业的成功将是不可能的。

Yet one more science have we to note as bearing directly on industrial success—the Science of Society. Without knowing it, men who daily look at the state of the money-market, glance over prices current, discuss the probable crops of corn, cotton, sugar, wool, silk, weigh the chances of war, and from all those data decide on their mercantile operations, are students of social science: empirical and blundering students it may be; but still, students who gain the prizes or are plucked of their profits, according as they do or do not reach the right conclusion. Not only the manufacturer and the merchant must guide their transactions by calculations of supply and demand, based on numerous facts, and tacitly recognising sundry general principles of social action; but even the retailer must do the like: his prosperity very greatly depending upon the correctness of his judgments respecting the future wholesale prices and the future rates of consumption. Manifestly, all who take part in the entangled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a community, are vitally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the laws according to which those activities vary.

我们还应注意到与工业成就直接相关的另一门科学——社会科学。有些人每天关注金融市场，浏览当日行情，讨论谷物、棉花、糖、羊毛、蚕丝的大致收成，权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然后基于这些信息来决定他们的商业运作，他们都可以算作社会科学的学生。尽管他们可能会因习惯于经验而犯愚蠢的错误，但总归有人盈利有人亏损，这取决于他们是否做出正确的判断。生产商和批发商的生意决策通常要以大量事实为基础估算供求关系，同时还必须要考虑各种社会行为的一般原则。不仅是他们，就连零售商也必须这么做，因为他的生意兴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未来批发价和消费水平的正确判断。显然，任何参与到某个地区复杂商业活动的人都非常关注该地区的法规，因为商业活动需要根据法规做出调整。

Thus, to all such as are occupied in the production, exchange, or distribution of commodities, acquaintance with science in some of its departments, i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Whoever is immediately or remotely implicated in any form of industry (and few are not) has a direct interest in understanding something of the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ings; perhaps, also, has a direct interest in biology; and certainly has in sociology. Whether he does or does not succeed well in that indirect self-preservation which we call getting a good livelihood, depends in a great degree on his knowledge of one or more of these sciences: not, it may be, a rational knowledge; but still a knowledge, though empirical. For what we call learning a business, really implies learning the science involved in it; though not perhaps; under the name of science. And hence a grounding in scienc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both because it prepares for all this, and because rational knowledge has an immense superiority over empirical knowledge. Moreover, not only is it that scientific culture is requisite for each, that he may understand the *how* and the *why* of the things and processes with which he is concerned as maker or distributor; but it is often of much moment that he should understand the *how* and the *why* of various other things and processes. In this age of joint-stock undertakings, nearly every man above the labourer is interested as capitalist in some other occupation than his own; and, as thus interested, his profit or loss often depends on his knowledge of the sciences bearing on this other occupation. Here is a mine, in the sinking of which many shareholders ruined themselves, from not knowing that a certain fossil belonged to the old red sandstone, below which no coal is found. Not many years ago, 20,000L was lost in the prosecution of a scheme for collecting the alcohol that distils from bread in baking: all which would have been saved to the subscribers, had they known that less than a hundredth part by weight of the flour is

changed in fermentation. Numerous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construct electromagnetic engines, in the hope of superseding steam; but had those who supplied the money, understood the general law of the correlation and equivalence of forces, they might have had better balances at their bankers. Daily are men induced to aid in carrying out inventions which a mere tyro in science could show to be futile. Scarcely a locality but has its history of fortunes thrown away over some impossible project.

因此，对于所有从事商品生产、交换或分配的人们来说，熟知自己所在部门的科学知识是至关重要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涉及某种生产的人（很少例外）必须有直接兴趣去了解产品在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特性。有的或许还要对生物学感兴趣。而对社会学的兴趣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能否成功地间接保全自己，或者说在我们称作谋生的方面取得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一门或几门这种科学上的知识，可能不见得是理性知识，但仍是知识，尽管是经验性的。所谓学一门生意，实际是指学习其中所蕴含的科学，尽管可能不用科学这个名称。因此，科学方面的根底尤为重要，不仅因为它为这一切做准备，而且因为理性知识远高于从经验中获取的知识。此外，每个人必须具备科学的修养，不仅要了解与其生产或分配相关的过程及事物的因果缘由，还要经常了解其他事物的发展过程及其缘由。在这个股份经营的时代，除了工人以外，几乎每个人都像资本家一样，除了关注本行业，还关注某些其他行业。而赚钱或是赔本通常就取决于他对于所关注行业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比如说有一个煤矿在挖掘开始后使很多股东都破产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某种化石属于老红砂岩，在它下面是找不着煤的。前几年，有人通过蒸馏烘焙的面包收集酒精，结果浪费了20,000升面粉。如果当事人明白面粉发酵过程中重量的减轻不会超过百分之一，他就不会这么干了。曾经许多人尝试制造电磁发动机去代替蒸汽机，但是如果投资商懂得能量转化与守恒这一普遍规律，他们的银行存款或许会更多。每天，都有人被说服去资助一些发明，而略懂科学的人就能看出哪些发明是行不通的。过去，几乎每个

地方都曾有人因从事一些不可能的项目而败家。

And if already the loss from want of science is so frequent and so great, still greater and more frequent will it be to those who hereafter lack science. Just as fast as productive processes become more scientific, which competition will inevitably make them do; and just as fast as joint-stock undertakings spread, which they certainly will; so fast will scientific knowledge grow necessary to everyone.

人类的科学知识本身就很贫乏，由此引起的损失已经非常频繁而巨大了，而有些人对这些本已贫乏的科学知识的无知则会进一步加剧这样的损失。正如竞争必然使生产工序快速科学化，股份经营必然会快速得到推广一样，科学知识也会同样地快速成为人们的必需品。

That which our school courses leave almost entirely out, we thus find to be that which most nearly concerns the business of life. All our industries would cease, were it not for that information which men begin to acquire as they best may after their education is said to be finished. And were it not for this information, that has been from age to age accumulated and spread by unofficial means, these industries would never have existed. Had there been no teaching but such as is given in our public schools, England would now be what it was in feudal times. That increasing acquaintance with the laws of phenomena which has through successive ages enabled us to subjugate Nature to our needs, and in these days gives the common labourer comforts which a few centuries ago kings could not purchase, is scarcely in any degree owed to the appointed means of instructing our youth. The vital knowledge—that by

which we have grown as a nation to what we are, and which now underlies our whole existence, is a knowledge that has got itself taught in nooks and corners; while the ordained agencies for teaching have been mumbling little else but dead formulas.

因此我们发现，学校课程中近乎完全遗漏的那些知识，却几乎都与生活紧密相关。在完成所谓的学业教育之后，人们开始尽自己最大努力掌握一些知识。若非如此，我们所有的生产就会停顿。正是由于这些多年累积的和在私下传播的知识，这些生产才会存在。如果公学教育之外再无任何的教学，英国现在会停留在封建时代。正是由于日益掌握了那些现象的规律，我们才能在随后的日子里征服自然，使它顺从我们的需要。如今，这些知识使得一个普通工人能够得到几百年前帝王都得不到的享受，但这无论如何都不能归功到我们对年轻人开展的那套指定的教育。我们在街头巷尾就能学到很多重要的知识，这些知识使我们的民族发展壮大，构成了我们整个生存的基础，而那些指定的教育机构念叨的却几乎全是一些陈腐公式。

We now come to the third great division of human activities—a division for which no preparation whatever is made. If by some strange chance not a vestige of us descended to the remote future save a pile of our school-books or some college examination papers, we may imagine how puzzled an antiquary of the period would be on finding in them no indication that the learners were ever likely to be parents. “This must have been the *curriculum* for their celibates,” we may fancy him concluding, “I perceive here an elaborate preparation for many things: especially for reading the books of extinct nations and of coexisting nations (from which indeed it seems clear that these people had very little worth reading in their own tongue); but I find no reference whatever to the bringing up of children. They could not have been so absurd as to

omit all training for this gravest of responsibilities. Evidently then, this was the school course of one of their monastic orders.”

现在我们来谈人类活动的第三大部分。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的部分。如果源于某种偶然，我们除了一堆学校教科书和一些大学考卷之外，什么也没留给那遥远的未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考古学者会有多么困惑，他所发现的物品里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学习者有可能会为人父母。我们可以想象他会得出如下结论：“这一定是给那些独身者所设置的课程 。从这些课程中我意识到他们对许多事情进行了详尽的准备，尤其是阅读一些关于已经消亡的国家或同时代的国家的书籍（由此看出，很明显地，似乎他们的母语书籍中只有极少部分值得阅读），但是我找不到任何与养育孩子有关的资料。他们不可能荒唐到完全遗漏了这一责任重大的训练。显然，这是他们某个僧院的学校课程。”

Seriously, is it not an astonishing fact, that though on the treatment of offspring depend their lives or deaths, and their moral welfare or ruin; yet not one word of instruc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offspring is ever given to those who will hereafter be parents? Is it not monstrous that the fate of a new generation should be left to the chances of unreasoning custom, impulse, fancy—joined with the suggestions of ignorant nurses and the prejudiced counsel of grandmothers? If a merchant commenced business without any knowledge of arithmetic and book-keeping, we should exclaim at his folly, and look for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Or if, before studying anatomy, a man set up as a surgical operator, we should wonder at his audacity and pity his patients. But those parents should begin the difficult task of rearing children without ever having given a thought to the principles—physical, moral, or intellectual—which ought to guide them, excites neither surprise at

the actors nor pity for their victims.

严肃地说，子女的生与死、善与恶，都取决于父母的培养。然而，对于那些日后要做父母的人们，却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们关于教育子女的只言片语，这难道不是一件让人吃惊的事吗？让新一代的命运由非理性的习俗、冲动和幻想来决定，外加一些愚昧的乳母的建议和奶奶们的存有偏见的劝告，这难道不是荒谬至极吗？一个商人如果毫无算术和记账的知识就开始经商，我们会说他很愚蠢，并预料他会得到惨痛教训。或者一个人没有学过解剖学就开业做外科手术，我们不仅会为他的胆大包天感到惊讶，而且会可怜他的病人。然而，对于在孩子的体育、德育、智育等方面毫无准备、一知半解的父母承担养育孩子的艰巨任务，我们却一点儿都不感到惊讶，也没人替孩子惋惜。

To tens of thousands that are killed, add hundreds of thousands that survive with feeble constitutions, and millions that grow up with constitutions not so strong as they should be; and you will have some idea of the curse inflicted on their offspring by parents ignorant of the laws of life. Do but consider for a moment that the regimen to which children are subject is hourly telling upon them to their life-long injury or benefit; and that there are twenty ways of going wrong to one way of going right; and you will get some idea of the enormous mischief that is almost everywhere inflicted by the thoughtless, haphazard system in common use. Is it decided that a boy shall be clothed in some flimsy short dress, and be allowed to go playing about with limbs reddened by cold? The decision will tell on his whole future existence—either in illnesses; or in stunted growth; or in deficient energy; or in a maturity less vigorous than it ought to have been, and in consequent hindrances to success and happiness. Are children doomed to a monotonous dietary, or a dietary that is deficient in nutritiveness? Their ultimate physical

power and their efficiency as men and women, will inevitably be more or less diminished by it. Are they forbidden vociferous play, or (being too ill-clothed to bear exposure) are they kept indoors in cold weather? They are certain to fall below that measure of health and strength to which they would else have attained. When sons and daughters grow up sickly and feeble, parents commonly regard the event as a misfortune—as a visitation of Providence. Thinking after the prevalent chaotic fashion, they assume that these evils come without causes; or that the causes are supernatural. Nothing of the kind. In some cases, the causes are doubtless inherited; but in most cases foolish regulations are the causes. Very generally parents themselves are responsible for all this pain, this debility, this depression, this misery. They have undertaken to control the lives of their offspring from hour to hour; with cruel carelessness they have neglected to learn anything about these vital processes which they are unceasingly affecting by their commands and prohibitions; in utter ignorance of the simplest physiologic laws, they have been year by year undermining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ir children; and have so inflicted disease and premature death, not only on them but on their descendants.

想一想那些数以万计夭折的人，以及数以十万计存活下来但体质羸弱的人，再加上数以百万计虽已成人但体质本应更强壮的人，你就会明白父母对生命规律的无知会让子女承受多大的灾难。只要想一想，育儿方法时刻都在影响着儿童，会给他们带来终身的损伤或是益处，而生活中错误的育儿法在数量上是正确方法的二十倍之多，那么你就可以想象，日常使用的那些轻率的、随意的方法，会给儿童造成多么巨大的危害。一定要给男孩穿着轻薄的短衫，允许他出去玩耍而冻得四肢通红吗？那样产生的影响会在他整个未来生活中显现出来，或是生病，或是发育迟缓，或是精力不足，或是虽已长大却缺乏应有的活力，进而阻碍他的成就和幸福。一定要给儿童吃一成不变的饮食

或是缺乏营养的饮食吗？那样做必然会使他们成年后的最终体能和体质多少被降低。是否应该禁止他们玩耍时大声吵闹，或是在天气寒冷时因担心衣着单薄而不让他们去室外？因为如果那样做，他们一定也达不到原本可以达到的健康和体力水平。若子女长大后体弱多病，父母们通常认为这是一种不幸、一种天灾。这种糊涂想法盛行于世，他们认为这些灾祸都是无缘无故的，或者是由于超自然的原因。事情全然不是这样。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有遗传方面的原因，但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于一些愚笨的规定。一般来说，父母本人应该对这一切疼痛、虚弱、沮丧、苦闷等负责。他们时刻照看着子女的生活，但由于粗心大意，他们只会不断地通过命令和禁止来影响儿女的成长过程，而疏于对其进行研究。他们甚至全然不懂最简单的生物学规律，经年累月地损害儿童的体质，使他们及后代都遭受疾病和夭折的威胁。

Equally great are the ignorance and the consequent injury, when we turn from physical training to moral training. Consider the young mother and her nursery legislation. But a few years ago she was at school, where her memory was crammed with words, and names, and dates, and her reflective faculties scarcely in the slightest degree exercised—where not one idea was given her respecting the methods of dealing with the opening mind of childhood; and where her discipline did not in the least fit her for thinking out methods of her own. The intervening years have been passed in practising music, in fancy-work, in novel-reading, and in party-going: no thought having yet been given to the grave responsibilities of maternity; and scarcely any of that solid intellectual culture obtained which would be some preparation for such responsibilities. And now see her with an unfolding human character committed to her charge—see her profoundly ignorant of the phenomena with which she has to deal, undertaking to do that which can be done but imperfectly even with the aid of the profoundest knowledge. She knows nothing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emotions, their order of evolution, their functions, or where use ends and abuse begins. She is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some of the feelings are wholly bad, which is not true of any one of them; and that others are good, however far they may be carried, which is also not true of any one of them. And then, ignorant as she is of that with which she has to deal, she is equally ignorant of the effects that will be produced on it by this or that treatment. What can be more inevitable than the disastrous results we see hourly arising? Lacking knowledge of mental phenomena, with their cause and consequences, her interference is frequently more mischievous than absolute passivity would have been. This and that kind of action, which are quite normal and beneficial, she perpetually thwarts; and so diminishes the child's happiness and profit, injures its temper and her own, and produces estrangement. Deeds which she thinks it desirable to encourage, she gets performed by threats and bribes, or by exciting a desire for applause: considering little what the inward motive may be, so long as the outward conduct conforms; and thus cultivating hypocrisy, and fear, and selfishness, in place of good feeling. While insisting on truthfulness, she constantly sets an example of untruth, by threatening penalties which she does not inflict. While inculcating self-control, she hourly visits on her little ones angry scoldings for acts that do not call for them. She has not the remotest idea that in the nursery, as in the world, that alone is the truly salutary discipline which visits on all conduct, good and bad,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the consequences, pleasurable or painful, which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such conduct tends to bring. Being thus without theoretic guidance, and quite incapable of guiding herself by tracing the mental processes going on in her children, her rule is impulsive, inconsistent, mischievous, often, in the highest degree; and would indeed be generally ruinous, were it not that the overwhelming tendency of the growing mind to assume the moral type of the race, usually subordinates all minor

influences.

从身体训练到道德训练，我们同样无知愚昧，由此造成的损害是同样巨大的。想想年轻母亲及她的育儿方法。仅仅几年之前，她还在学校，脑子里记满了单词、人名、年代，却没有经过思维能力的点滴训练，她丝毫不知道如何应对儿童正在开启的心智，在学校所受到的训练也丝毫不能使她自己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她在练习音乐、刺绣缝纫、阅读小说、参加宴会中又度过了几年时间，却从未想过为人母的巨大责任，也几乎没有得到过为这类责任做准备的任何实质性的智力培养。现在她要监护一个正在发育的人，而对于这项任务，即使拥有最广博的知识也会出现纰漏，她却全然不知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她对情感的性质、演变顺序、作用、在什么情境下有害无益等等都一无所知。在她的印象中，某种情感要么是全然有害的、要么是绝对有益的，但事实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她既不知道自己应对的是什么问题，也同样不会明白这样或那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时常看到这些糟糕的结果，它们都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由于缺乏关于心理现象及其因果方面的知识，与对孩子的完全放任不管相比，母亲的干涉往往害处更大。她总是阻止一些本来很正常的有益活动，从而减少了儿童的快乐和收获，伤害了彼此的感情而引起母子疏离。对于她认为值得提倡的行为，她就威逼利诱，或是激发儿童想要获取赞美的欲望，由此去实现她的目的。她很少考虑儿童的内部动机是什么，只要儿童的外在行为符合她的要求就行。因此，她培养孩子获得的感受不是美好的，而是虚伪、怯懦和自私的。她总是口头强调诚实，却做出不诚实的榜样；用惩罚来吓唬孩子，又不执行。她一方面给孩子反复灌输自控能力，另一方面却为了不值一提的小事对他们大动肝火。她一点儿都不明白，在育儿室如同在社会上一样，顺其自然才是唯一真正有益的训练。行为无论是好是坏，都会产生真实而自然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无论令人痛苦还是愉悦，都是行为将必然导致的。在既无理论引导，又不能够根据孩子的心智成长过程来进行自我指导的情况下，母亲的管教是冲动的、前后矛盾的、有害的，并且通常程度极其严重。如果心智在成长过程中缺乏这个种族道德原型的强大引导，无法藉以

压倒一切次要的影响，就会造成普遍性的灾难。

And then the culture of the intellect—is not this, too, mismanaged in a similar manner? Grant that the phenomena of intelligence conform to laws; grant that the evolution of intelligence in a child also conforms to laws; and it follows inevitably that education can (not) be rightly guided only by a knowledge of these laws. To suppose that you can properly regulate this process of forming and accumulating ideas,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the process, is absurd. How widely, then, must teaching as it is differ from teaching as it should be; when hardly any parents, and but few teachers, know anything about psychology. As might be expected, the system is grievously at fault, alike in matter and in manner. While the right class of facts is withheld, the wrong class is forcibly administered in the wrong way and in the wrong order. With that common limited idea of education which confines it to knowledge gained from books, parents thrust primers into the hands of their little ones years too soon, to their great injury. Not recognising the truth that the function of books is supplementary—that they form an indirect means to knowledge when direct means fail—a means of seeing through other men what you cannot see for yourself; they are eager to give second-hand facts in place of first-hand facts. Not perceiving the enormous value of that spontaneous education which goes on in early years—not perceiving that a child's restless observation, instead of being ignored or checked, should be diligently administered to, and made as accurate and complete as possible; they insist on occupying its eyes and thoughts with things that are, for the time being, incomprehensible and repugnant. Possessed by a superstition which worships the symbols of knowledge instead of the knowledge itself, they do not see that only when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objects and processes of the

household, the streets, and the fields, is becoming tolerably exhaustive—only then should a child be introduced to the new sources of information which books supply: and this, not only because immediate cognition is of far greater value than mediate cognition; but also, because the words contained in books can be rightly interpreted into ideas, only in proportion to the antecedent experience of things. Observe next, that this formal instruction, far too soon commenced, is carried on with but little reference to the laws of mental development. Intellectual progress is of necessity from the concrete to the abstract. But regardless of this, highly abstract subjects, such as grammar, which should come quite late, are begun quite early. Political geography, dead and uninteresting to a child, and which should be an appendage of sociological studies, is commenced betimes; while physical geography, comprehensible and comparatively attractive to a child, is in great part passed over. Nearly every subject dealt with is arranged in abnormal order: definitions, and rules, and principles being put first, instead of being disclosed, as they are in the order of nature, through the study of cases. And then, pervading the whole, is the vicious system, of rote learning—a system of sacrificing the spirit to the letter. See the results! What with perceptions unnaturally dulled by early thwarting, and a coerced attention to books—what with the mental confusion produced by teaching subjects before they can be understood, and in each of them giving generalisations before the facts of which these are the generalisations—what with making the pupil a mere passive recipient of other's ideas, and not in the least leading him to be an active inquirer or self-instructor—and what with taxing the faculties to excess; there are very few minds that become as efficient as they might be. Examinations being once passed, books are laid aside; the greater part of what has been acquired, being unorganised, soon drops out of recollection; what remains is mostly inert—the art of applying knowledge not having

been cultivated; and there is but little power either of accurate observation or independent thinking. To all which add, that while much of the information gained is of relatively small value, an immense mass of information of transcendent value is entirely passed over.

对儿童智力的培养不也是同样处理不当吗？既然承认了智力的发展现象应该符合客观规律，承认了儿童的智力发展应该按规律进行，那么就必须承认，只有掌握了关于这些规律的知识，教育才能正确进行。对于形成和积累经验的过程，如果认为不用了解其性质就能进行适当的调整，这一想法才真是荒谬。如果父母几乎都不了解心理学知识，老师当中也只有少数人了解，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所进行的教学与其应该达到的水平之间会有多大差距。正如可以预料到的那样，现有的制度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存在着重大缺陷。一方面，正确的知识没有教给学生，另一方面，错误的知识却在以错误的次序和方法被强行灌输给学生。家长们对教育的理解通常很狭隘，认为教育只局限于书本知识，以致过早就开始让孩子学习初级课本，从而给孩子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没有认识到，书籍只起补充的作用，只有在不能通过直接方式获取知识时才采用间接方式，才需要这种通过别人的眼睛去观察自己看不到的事物的方式。而家长们却急切地用第二手的信息来替代第一手的信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发教育在儿童幼年时代的巨大价值，没有意识到不应忽视或限制儿童孜孜不倦的观察，反而应当大力提倡，使它尽量准确和完备。相反，他们坚持要给儿童眼中脑中灌输一些超出其理解范围并使其讨厌的东西。他们迷信知识符号，而不去探求知识本身，他们不明白只有当儿童对家庭、街市、田野的事物和过程有了相当的接触和熟悉后，才可以给他介绍书籍中所提供的那个新的知识源泉。这不只是因为直接认识的价值远大于间接认识的价值，同时也因为只有与之前对事物已经有的经验相融合，书中的字句才能正确地转化为观念。其次，要注意，过早地开始正式教育也不太遵循心智发展的规律。智力的发展必然是从具体到抽象。但是一些做法却不顾这一规律，本应很晚才涉及的一些高度抽象的科目，比如

语法，却早早开设。儿童们认为死板无趣的政治地理也教得很早，而这些本应附在社会学学习后面。儿童能理解并且比较感兴趣的自然地理，大部分却被略过去了。要学的每门科目几乎都是先学定义、规则、原理，而不是按正常的次序，在自然中通过研究个别实例去揭示。而且，那害人的死记硬背法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中，往往为了记住字句而牺牲内容。来看看这些做法的结果吧。由于早年受挫和注意力被迫转向书本，儿童的知觉反常地迟钝。由于在学生还听不懂的时候就教一些科目，并且把归纳好的结论放在其基础事实之前，结果引起了儿童心智上的混乱，学生被动地接受他人的观念，不能进行积极的质疑或自我指导。同时，学习负担过重，智力机能难以得到充分开发。考试刚过，书本就会被扔到一边。由于知识没有系统化，学生很快就忘掉了刚学到的大部分知识。而且，由于没有培养他们运用知识的技能，所遗留下的知识多半也是死板的东西。孩子们既没有准确观察的能力，也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此外，即便最终得到了一些知识，其价值相对来说也很小，而大量极有价值的知识却完全被忽略过去了。

Thus we find the facts to be such as might have been inferred a priori. The training of children—physical, moral, and intellectual—is dreadfully defective. And in great measure it is so, because parents are devoid of that knowledge by which this training can alone be rightly guided. What is to be expected when one of the most intricate of problems is undertaken by those who have given scarcely a thought to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its solution depends? For shoe-making or house-building, for the management of a ship or a locomotive-engine, a long apprenticeship is needful. Is it, then, that the unfolding of a human being in body and mind, is so comparatively simple a process, that any one may superintend and regulate it with no preparation whatever? If not—if the process is with one exception more complex than any in Nature, and the task of administering to it one of surpassing difficulty; is it not madness

to make no provision for such a task? Better sacrifice accomplishments than omit this all-essential instruction. When a father, acting on false dogmas adopted without examination, has alienated his sons, driven them into rebellion by his harsh treatment, ruined them, and made himself miserable; he might reflect that the study of Ethology would have been worth pursuing, even at the cost of knowing nothing about Æschylus. When a mother is mourning over a first-born that has sunk under the sequela of scarlet-fever—when perhaps a candid medical man has confirmed her suspicion that her child would have recovered had not its system been enfeebled by overstudy—when she is prostrate under the pangs of combined grief and remorse; it is but a small consolation that she can read Dante in the original.

由此，我们发现事实一如我们推断的那样，儿童的体育、德育和智育都存在着严重缺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父母们缺乏关于教育的正确知识。他们将要解决一个最为错综复杂的问题，却对所要依据的原理一无所知，那结果不是可想而知吗？制鞋、建屋、行船、驾驶机车都需经过长时间的学徒期。相比较而言，难道说人类身心的发育过程就简单到任何人无需准备就可以去监督调控吗？如果不是那样简单，假如除去一个例外情况，这过程比自然界中任何过程都要复杂，实施起来困难重重，那么对这一任务毫无准备不就很疯狂吗？宁可牺牲一些其他成就，也不能遗漏这一最基本的教育。如果一个父亲在没有检查的情况下，采用了错误的教条来指导其行动，结果可能会使他的儿子们疏远他，甚至他粗暴的管教可能会逼得他们反抗，以至于既毁掉了儿子们，也给自己带来痛苦。他这时很可能会想到，哪怕代价是放弃关于埃斯库罗斯的全部知识，道德体系学也值得去学习。当一个母亲痛悼她的因猩红热后遗症病逝的头一胎孩子时，医生的坦言证实了她的怀疑——孩子若不是因为过度学习而变得体质羸弱，就很可能复原。当她悲悔交加痛不欲生的时候，能够诵读但丁的原著对她也只能是很小的安慰。

Thus we see that for regulating the third great division of human activities, a knowledge of the laws of life is the one thing needful. Some acquaintance with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physiology and the elementary truths of psychology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right bringing up of children. We doubt not that this assertion will by many be read with a smile. That parents in general should be expected to acquire a knowledge of subjects so abstruse, will seem to them an absurdity. And if we proposed that an exhaustive knowledge of these subjects should be obtained by all fathers and mothers, the absurdity would indeed be glaring enough. But we do not. General principles only, accompanied by such detailed illustrations as may be needed to make them understood, would suffice. And these might be readily taught—if not rationally, then dogmatically. Be this as it may, however, here are the indisputable fact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mind and body rigorously obeys certain laws; that unless these laws are in some degree conformed to by parents, death is inevitable; that unless they are in a great degree conformed to, there must result serious physical and mental defects; and that only when they are completely conformed to, can a perfect maturity be reached. Judge, then, whether all who may one day be parents, should not strive with some anxiety to learn what these laws are.

至此，我们会发现，为了调节人类活动的第三大部分，掌握一些关于生命规律的知识是必需的。多少熟悉一些生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心理学的初步知识，对于教育好孩子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并不怀疑许多人听到这种意见会觉得好笑。在他们看来，期望父母们普遍掌握这些深奥科目的知识是个荒谬的想法。当然，如果我们主张所有父母都应当精通这些科目，那确实会显得很荒谬。但是我们没有那样要求。他们只需要了解其中的一般原理，以及一些能帮助他们理解这些原理的

具体例证就足够了。这些都是容易教授的，甚至如果教的时候不能阐明道理，也可以教条式地教。但是无论怎样，儿童的身心发育严格遵循一定的规律，这是无可争辩的。父母只有在一定程度上遵守这些规律，才可以避免儿童夭折；只有在很大程度上遵守这些规律，才可以避免给儿童的身心发展带来严重缺陷；只有完全遵守这些规律，才能使儿童健康地成长起来。所以，请大家自己判断一下，所有日后要做父母的人是否应该积极努力地学习这些规律。

From the parental functions let us pass now to the functions of the citizen. We have here to inquire what knowledge best fits a man for the discharge of these functions. It cannot be alleged, as in the last case, that the need for knowledge fitting him for these functions is wholly overlooked; for our school courses contain certain studies which, nominally at least, bear upon political and social duties. Of these the only one that occupies a prominent place is History.

现在，让我们从讨论父母的职责转到讨论公民的职责。这里我们要问，一个人要履行这些职责，最应该具备什么知识。我们当然不能说人们履行这些职责所需的知识完全都被忽视了，因为至少在名义上，我们的学校课程至少包含了一些对政治职责和社会职责的学习。而其中历史又独自占据了主导地位。

But, as already more than once hinted, the historic information commonly given is almost valueless for purposes of guidance. Scarcely any of the facts set down in our school-histories, and very few even of those contained in the more elaborate works written for adults, give any clue to the righ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action. The biographies of monarchs (and our children commonly learn little else) throw scarcely any light upo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Familiarity with court intrigues, plots, usurpations, or the like, and with all the personalities accompanying them, aids very little in elucidating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national welfare depends. We read of some squabble for power, that it led to a pitched battle; that such and such were the names of the generals and their leading subordinates; that they had each so many thousand infantry and cavalry, and so many cannon; that they arranged their forces in this and that order; that they manœuvred, attacked, and fell back in certain ways; that at this part of the day such disasters were sustained, and at that such advantages gained; that in one particular movement some leading officer fell, while in another a certain regiment was decimated; that after all the changing fortunes of the fight, the victory was gained by this or that army; and that so many were killed and wounded on each side, and so many captured by the conquerors. And now, out of the accumulated details which make up the narrative, say which it is that helps you in deciding on your conduct as a citizen. Supposing even that you had diligently read, not only *The Fifteen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orld* , but accounts of all other battles that history mentions; how much more judicious would your vote be at the next election? “But these are facts—interesting facts,” you say. Without doubt they are facts (such, at least, as are not wholly or partially fictions); and to many they may be interesting facts. But this by no means implies that they are valuable. Factitious or morbid opinion often gives seeming value to things that have scarcely any. A tulipomaniac will not part with a choice bulb for its weight in gold. To another man an ugly piece of cracked old china seems his most desirable possession.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give high prices for the relics of celebrated murderers. Will it be contended that these tastes are any measures of value in the things that gratify them? If not, then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 liking felt for certain classes of historical facts is no proof of their worth; and that we must test their worth as we test

the worth of other facts, by asking to what uses they are applicable. Were someone to tell you that your neighbour's cat kittened yesterday, you would say the information was worthless. Fact though it might be, you would say it was an utterly useless fact—a fact that could in no way influence your actions in life—a fact that would not help you in learning how to live completely. Well, apply the same test to the great mass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you will get the same result. They are facts from which no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unorganisable* facts; and therefore facts which can be of no service in establishing principles of conduct, which is the chief use of facts. Read them, if you like, for amusement; but do not flatter yourself they are instructive.

但是，正如前面已经不止一次提到的，通常提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信息几乎完全没有指导价值。学校历史课本中所有的史料很少能指出政治行动的正确原则，甚至为成年人写的较详细的著作也是如此。君王的传记是儿童通常主要学习的内容，但这对于了解社会科学几乎毫无裨益。熟悉宫廷的阴谋诡计、明争暗斗、篡政夺权等事件以及其中有关的人物，基本无助于弄清国家繁荣所依托的原则。我们读到的只是争权而引起的某场激战，以及当时的将军和副官的名字；他们每人拥有上千步兵、装甲兵和大炮；他们如何部署军队，如何调动，进攻，后退；他们在哪一天承受失败的痛苦，又在哪一天迎来胜利的喜悦；某次作战中某个主将阵亡，而另一次作战中又消灭了某一个团；所有这些战役之后，哪一方军队得胜，双方伤亡人数多少，战胜者俘虏了多少人等等。可是在这些细枝末节的叙述中，没有一条有助于你决定自己的公民行为。即便你不只认真读了《世界的十五次决定性战役》，还读了历史记载的其他战争，你在下一次选举投票时又能明智多少呢？你会说“可这都是事实，有趣的事实”。毫无疑问，这都是事实（至少不是全部虚构或部分虚构的），而且很多人也会认为这些事实很有意思。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具有价值。虚假的观念和病态的想法往往会使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具有某种似是而非的价值。一个爱好

郁金香成癖的人不会为了等重量的金子而舍弃精选的郁金香球茎。有人又觉得他最宝贵的财富是一件丑陋并有裂缝的旧瓷器。还有人出高价收藏著名杀人犯的遗物。难道这些嗜好能够衡量他们所珍视的物品的价值吗？如果不能的话，就必须承认，对某类历史事实的偏爱并不能证明这些史实具有价值。我们需要像检验其他事物价值一样，来检验这些史实的价值，看看它们究竟有何作用。如果有人告诉你邻居的猫昨天生了小猫，你会说那消息毫无价值。尽管那可能是事实，你会说那个事实完全无用，因为它既不能影响你的生活行为，也不能帮助你学习怎样生活得完满。用同样的方法去检验那一大堆的历史事实，你也会得到同一结果。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得不出任何结论，它们只是些无组织的 、散乱的 事实，因此它们对建立行为准则毫无裨益，而建立行为准则才是事实的主要用途。当然，如果你喜欢，可以把这些当消遣看，但是不要自以为它们具有教育意义。

That which constitutes History, properly so called, is in great part omitted from works on the subject. Only of late years have historians commenced giving us, in any considerable quantity, the truly valuable information. As in past ages the king was everything and the people nothing; so, in past histories the doings of the king fill the entire picture, to which the national life forms but an obscure background. While only now, when the welfare of nations rather than of rulers is becoming the dominant idea, are historians beginning to occupy themselves with the phenomena of social progress. That which it really concerns us to know, i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ociety. We want all facts which help us to understand how a nation has grown and organised itself. Among these, let us of course have an account of its government; with as little as may be of gossip about the men who officered it, and as much as possible about the structure, principles, methods, prejudices, corruptions, etc., which it exhibited: and let this account include not only the nature and action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t also those of local

governments, down to their minutest ramifications. Let us of course also have a parallel descrip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government—its organisation, its conduct, its power, its relations to the State: and accompanying this, the ceremonial, creed, and religious ideas—not only those nominally believed, but those really believed and acted upon. Let us at the same time be informed of the control exercised by class over class, as displayed in all social observances—in titles, salutations, and forms of address. Let us know, too, what were all the other customs which regulated the popular life out of doors and indoors: including those which concern the relations of the sexes, and the relations of parents to children. The superstitions, also, from the more important myths down to the charms in common use, should be indicated. Next should come a deline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showing to what extent the division of labour was carried; how trades were regulated, whether by caste, guilds, or otherwise, what w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mployers and employed; what were the agencies for distributing commodities, what were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what was the circulating medium. Accompanying all which should come an account of the industrial arts technically considered: stating the processes in use, and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Further, the intellectual condition of the nation in its various grades should be depicted: no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 kind and amount of education, but with respect to the progress made in science, and the prevailing manner of thinking. The degree of aesthetic culture, as displayed in architecture, sculpture, painting, dress, music, poetry, and fiction, should be described. Nor should there be omitted a sketch of the daily lives of the people—their food, their homes, and their amusements. And lastly, to connect the whole, should be exhibited the moral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of all classes: as indicated in their laws, habits, proverbs, deeds. All these facts, given with as much brevity as consists with clearness and accuracy, should be so grouped and

arranged that they may be comprehended in their *ensemble* ; and thus may be contemplated as mutually dependent parts of one great whole. The aim should be so to present them that we may readily trace the consensus subsisting among them; with the view of learning what social phenomena coexist with what others. And then the corresponding delineations of succeeding ages should be so managed as to show us, as clearly as may be, how each belief, institution, custom, and arrangement was modified; and how the *consensus* of preceding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was developed into the *consensus* of succeeding ones. Such alone is the kind of information respecting past times, which can be of service to the citizen for the regulation of his conduct. The only history that is of practical value, is what may be called Descriptive Sociology. And the highest office which the historian can discharge, is that of narrating the lives of nations, as to furnish materials for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and for the subsequent determination of the ultimate laws to which social phenomena conform.

在历史这门科目中，真正可以称为历史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删除了。也就是最近几年，历史学家才开始为我们提供数量可观的具有真正价值的信息。过去，君王是主宰，臣民如草芥，君王的行为占据了整个历史的画面，而民众生活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只有到了现在，当主导理念由统治者利益转到国家利益时，历史学家才开始注意到社会进步的一些现象。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社会的自然历史。我们需要一切有助于了解一个国家是如何成长并被组织起来的知识。在这些知识中，我们当然需要了解国家的政权，但应尽量少地提及执掌政权的人，多详细地介绍政权呈现出的组织结构、组织原则、组织方法、偏见以及腐败等等。这种叙述不仅包括中央政权的性质和活动，也应该包括地方政权，直到它们的最小组成部分。当然，我们也应同时描述宗教政权的组织、行为、权力以及它与国家间的关系，还要加上它的礼节、信条和宗教思想。不仅包括那些名义上被信仰的宗教思

想，还包括真正被相信并遵从的思想。同时我们还需要知道，在任何社会习俗中，头衔、礼仪和称谓形式都反映了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控制。我们也需要了解调节大众家庭内外生活的其他风俗，包括两性关系及亲子关系。还有迷信，上至重要的神话，下到常用的符咒，都应该被指出。接下来还应该对生产制度进行描述。社会分工发展到何种程度？如何调配贸易？是由阶层、行会还是用其他方法？雇主和被雇佣者有什么关系？何种机构分配商品？通信手段是什么？交换媒介是什么，等等。同时，应该从技术角度说明其生产工艺、生产过程及产品质量。进而，应当描述国家各个阶层的文化水平，不仅包括教育的种类和年限，还应包括科学的进步及主导思想。应当介绍建筑、雕塑、油画、服饰、音乐、诗歌、小说等表现形式的审美文化发展水平。对民众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和娱乐方式的概述也不应该遗漏。最后，为了将整体联系起来，还应该从法律、习俗、格言、行为方面，展现各阶级的道德、理论以及实践生活。这些知识的呈现应该简洁、清晰、准确，并且分类排列，以便能从整体 上被理解，被视为一个大整体中相互依存的部分。通过介绍这些知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中的共同点，明白哪些社会现象可以彼此共存。关于各个时代的相应描述都应尽可能清楚地向我们展示那时的信仰、制度、习俗和协议是如何被继承和修订的，以及前一社会结构与功能上的一致性 是如何发展成为后继社会结构与功能上的一致性 。只有关于过去时代的这类知识才有助于规范公民行为。唯一有实际价值的历史，就是被称为描述社会学的那部分。而历史学家能履行的最高职责就在于能叙述一些国家的生活，给比较社会学提供资料，为日后发现社会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提供资料。

But now mark, that even supposing an adequate stock of this truly valuable historical knowledge has been acquired, it is of comparatively little use without the key. And the key is to be found only in Science. Without an acquaintance with the general truths of biology and psychology,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phenomena is impossible. Only in proportion as men obtain a

certain rude, empirical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are they enabled to understand even the simplest facts of social life: as, for instance, the rela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if not even the most elementary truths of sociology can be reached until some knowledge is obtained of how men generally think, feel, and act under given circumstances; then it is manifest that there can be nothing like a wide comprehension of sociology, unless through a competent knowledge of man in all his faculties, bodily and mental. Consider the matter in the abstract, and this conclusion is self-evident. Thus:—Society is made up of individuals; all that is done in society is done by the combined actions of individuals; and therefore, in individual actions only can be found the solutions of social phenomena. But the actions of individuals depend on the laws of their natures; and their actions cannot be understood until these laws are understood. These laws, however, when reduced to their simplest expression, are found to depend on the laws of body and mind in general. Hence it necessarily follows, that biology and psychology are indispensable as interpreters of sociology. Or, to state the conclusions still more simply:—all social phenomena are phenomena of life—are the most complex manifestations of life—are ultimately dependent on the laws of life—and can be understood only when the laws of life are understood. Thus, then, we see that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is fourth division of human activities, we are, as before, dependent on Science. Of the knowledge commonly imparted in educational courses, very little is of any service in guiding a man in his conduct as a citizen.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history he reads is of practical value; and of this small part he is not prepared to make proper use. He commonly lacks not only the materials for, but the very conception of, descriptive sociology; and he also lacks that knowledge of the organic sciences, without which even descriptive sociology can give him but little aid.

但是要注意，即使获取了相当数量的具有价值的历史知识宝藏，没有钥匙还是用处不大。而这把钥匙只能在科学中找到。如果不熟悉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普遍真理，就不可能合理地解释社会现象。人们只有从经验中对人性有了初级的了解后，他们才能理解社会生活中最简单的事实，例如供求关系。只有懂得人们在某些情况下如何思考，感知和行动，才能获取社会学最基本的真理。很显然，如果没有获得关于人的身心机能的丰富知识，就难以将社会学理解透彻。如果从抽象的层面思考，结论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由个人组成，个人行动的总和构成了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因此，只有在个人活动中才能找到社会现象的解决方案。但是个人的活动以他们本性的规律为转移，所以，要理解他们的活动，就必须理解人性的规律。一言以蔽之，这些规律通常都依赖于人的一般身心规律。所以就必然得出如下结论：在社会学解释中，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必不可少。或者简而言之，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生活现象，是生活的最复杂的表现形式，并且都符合生活的规律，只有了解生活规律，才能了解社会现象。因此，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必须依靠科学才能调整人类活动的第四部分。教学科目中通常所讲授的知识，只有极少部分有助于指导一个人的公民行为。他所读到的历史中，只有一小部分有实际价值，而他甚至也没有做好恰当使用这一小部分的准备。他通常不仅缺乏描述社会学方面的资料，甚至对其概念也不甚了解。同时，他也缺乏生命科学方面的知识，不懂这些知识，即便描述性社会学也对他没有什么帮助。

And now we come to that remaining division of human life which includes the relaxations, pleasures, and amusements filling leisure hours. After considering what training best fits for self-preservation, for the obtainment of sustenance, for the discharge of parental duties, and for the regulation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duct; we have now to consider what training best fits for the miscellaneous ends not included in these—for the enjoyment of Nature, of Literature, and of the Fine Arts, in all their forms.

Postponing them as we do to things that bear more vitally upon human welfare; and bringing everything, as we have, to the test of actual value; it will perhaps be inferred that we are inclined to slight these less essential things. No greater mistake could be made, however. We yield to none in the value we attach to aesthetic culture and its pleasures. Without painting, sculpture, music, poetry, and the emotions produced by natural beauty of every kind, life would lose half its charm. So far from thinking that the training and gratification of the tastes are unimportant, we believe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they will occupy a much larger share of human life than now. When the forces of Nature have been fully conquered to man's use—when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have been brought to perfection—when labour has been economised to the highest degree—when education has been so systematised that a preparation for the more essential activities may be made with comparative rapidity—and when, consequently, there is a great increase of spare time; then will the poetry, both in Art and Nature, rightly fill a large space in the minds of all.

现在我们谈谈人类生活中剩下的一个部分，它包括打发空闲时间的消遣和文娱活动。在考虑了何种训练最适合自我保护、谋生、履行父母的职责和调节社会行为与政治行为后，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下何种训练最适合这些以外的各项目的，或者说何种训练最适合欣赏自然、文学及艺术的各种形式。如果按我们现在的做法，将这些繁杂项置于那些与人类福祉紧密相关的事情之后，并且检验它们的实际价值，或许有人会推论出我们在有意忽略这些次要的事情。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对审美文化及其乐趣的珍视并不输给任何人。没有油画、雕塑、音乐、诗歌以及各种自然美所引起的情感，人生的乐趣就会失掉一半。所以我们非但不认为这些品味的训练和满足无关紧要，反而相信它们日后在人类生活中占的比重会超过现在。当人们已经完全征服自然，使自然力量为人所用时，当生产方式已经尽善尽美，劳动力已经

节省至最大程度时，当教育已经系统化，并可以相对快捷地为必要活动做好准备时，人们的闲暇时间将会大大增加，艺术和自然中美的东西就会很合理地在人们心中占据很高的地位。

But it is one thing to admit that aesthetic culture is in a high degree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and another thing to admit that it is a fundamental requisite to human happiness. However important it may be, it must yield precedence to those kinds of culture which bear more directly upon the duties of life. As before hinted, literature and the fine arts are made possible by those activities which make individual and social life possible; and manifestly, that which is made possible, must be postponed to that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A florist cultivates a plant for the sake of its flower; and regards the roots and leaves as of value, chiefly because they are instrumental in producing the flower. But while, as an ultimate product, the flower is the thing to which everything else is subordinate, the florist very well knows that the root and leaves are intrinsically of greater importance; because on them the evolution of the flower depends. He bestows every care in rearing a healthy plant; and knows it would be folly if, in his anxiety to obtain the flower, he were to neglect the plant. Similarly in the case before us. Architecture, sculpture, painting, music, poetry, etc., may be truly called the efflorescence of civilised life. But even supposing them to be of such transcendent worth as to subordinate the civilised life out of which they grow (which can hardly be asserted), it will still be admitted that the production of a healthy civilised life must be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and that the knowledge conducing to this must occupy the highest place.

但是，认为审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有益于人类幸福是一回事，承

认它是人类幸福的根本必需品又是另一回事。无论审美文化有多么重要，与那些和生活职责紧密相连的文化相比，它一定不应该居于首位。如前所示，造就了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那些活动的存在，使得文学艺术的创作成为可能。显然，被造就的事物应放在造就它的事物之后。就像种花人栽培一株植物虽然是为了开花，但他很重视根和叶的价值，原因主要就在于根和叶成就了花开。虽然作为最终结果，花是最首要的，但是种花人却清楚地知道，根和叶实质上更重要，因为没有它们就没有花。他无微不至地培育一株长势很好的植物，因为他明白，只着急要花开而忽略植物的做法是愚蠢的。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与此类似。建筑、雕塑、油画、音乐、诗歌等等，的确可以说是文化生活中的花朵。但即便认为它们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甚至超越了造就它们的文明生活（其实很难这样说），仍有一点不能否认，即首先要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健全文明的生活；而有利于此的知识必须占据最高地位。

And here we see most distinctly the vice of our educational system. It neglects the plant for the sake of the flower. In anxiety for elegance, it forgets substance. While it gives no knowledge conducive to self-preservation—while of knowledge that facilitates gaining a livelihood it gives but the rudiments, and leaves the greater part to be picked up any how in after life—while for the discharge of parental functions it makes not the slightest provision—and while for the duties of citizenship it prepares by imparting a mass of facts, most of which are irrelevant, and the rest without a key; it is diligent in teaching everything that adds to refinement, polish, éclat. However fully we may admit that extensive acquaintance with modern languages is a valuable accomplishment, which, through reading, conversation, and travel, aids in giving a certain finish; it by no means follows that this result is rightly purchased at the cost of that vitally important knowledge sacrificed to it. Supposing it true that classical education conduces to elegance

and correctness of style; it cannot be said that elegance and correctness of style are comparable in importance to a familiarity with the principles that should guide the rearing of children. Grant that the taste may be greatly improved by reading all the poetry written in extinct languages; yet it is not to be inferred that such improvement of taste is equivalent in value to an acquaintance with the laws of health. Accomplishments, the fine arts, *belles-lettres* , and all those things which, as we say, constitute the efflorescence of civilisation, should be wholly subordinate to that knowledge and discipline in which civilisation rests. *As they occupy the leisure part of life, so should they occupy the leisure part of education* .

我们教育制度的缺点在此展露无遗。它因为花而忽略了植物，渴望美丽却遗忘了物质基础。这个制度没有教授任何有助于保全自己的知识；关于如何谋生的知识，它只粗略提供了一些只言片语，大部分都留待我们在日后生活中逐渐寻觅；关于履行为人父母职责的知识，它完全没有提及；关于公民职责方面的知识，它倒是教授了一大堆，但多数与公民职责没什么关系，余下的也缺乏要领。总之，它在勤勤恳恳地教授一切虚文华饰的东西。尽管我们完全承认精通现代语言是一项有价值的成就，这项成就可以通过阅读、谈话、旅行使我们回味，但绝不意味着应该以牺牲更加重要的知识为代价来获取它们。即便古典教育真能使文辞优美得体，也无法与精通育儿原则的重要性相媲美。尽管我们承认阅读古典诗歌可以大幅提高一个人的品位，但还是不能表明这类品位的提高与通晓健康规律具有同等价值。才艺、艺术、纯文学 以及一切组成我们所谓文化之花的东西都应该退居作为文明基础的教育和训练之后。既然它们在生活中仅占据闲暇部分，那么这方面的教育在整个教育中也只应占据闲暇的部分 。

Recognising thus the true position of aesthetics, and holding that while the cultivation of them should form a part of education

from its commencement, such cultivation should be subsidiary; we have now to inquire 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use to this end—what knowledge best fits for this remaining sphere of activity. To this question the answer is still the same as heretofore. Unexpected as the assertion may be, it is nevertheless true, that the highest Art of every kind is based upon Science—that without Science there can be neither perfect production nor full appreciation. Science, in that limited technical acceptation current in society, may not have been possessed by many artists of high repute; but acute observers as they have been, they have always possessed a stock of those empirical generalisations which constitute science in its lowest phase; and they have habitually fallen far below perfection, partly because their generalisations were comparatively few and inaccurate. That science necessarily underlies the fine arts, becomes manifest, a priori, when we remember that art-products are all more or less representative of objective or subjective phenomena; that they can be true only in proportion as they conform to the laws of these phenomena; and that before they can thus conform the artist must know what these laws are. That this a priori conclusion tallies with experience we shall soon see.

因此我们认清了审美的真实地位，也认为审美能力的培养虽然一开始就应该是教育的一部分，但应该居于次要地位。我们现在就要问，究竟什么知识最有用，什么知识最适合余下的这一活动范围。此问题的答案还是和从前的一样。这一说法可能出人意料。然而，确实每类艺术的最高层面都以科学为依据。没有科学，既不会有完美的创作，也不会有充分的欣赏。许多著名的艺术家可能没有掌握目前社会上所谓的那种狭义的科学，但他们是敏锐的观察者，而且掌握了构成科学初级阶段的许多经验性总结。他们的造诣经常远远达不到尽善尽美，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这些经验性的总结相对较少，也不够精准。我们明白艺术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代表客观或主观现象，只有符合这些现

象规律才是好作品。要想让作品与规律相符合，艺术家就必须了解规律的内涵。如此演绎推理，科学必然是艺术的基础。我们很快就可看出这个演绎推理的结论是与经验相吻合的。

Youths preparing for the practice of sculpture, have to acquaint themselves with the bones and muscles of the human frame in their distribution, attachments, and movements. This is a portion of science; and it has been found needful to impart it for the prevention of those many errors which sculptors who do not possess it commit. For the prevention of other mistakes, a knowledge of mechanical principles is requisite; and such knowledge not being usually possessed, grave mechanical mistakes are frequently made. Take an instance. For the stability of a figure it is needful that the perpendicular from the centre of gravity—“the line of direction,” as it is called—should fall within the base of support; and hence it happens, that when a man assumes the attitude known as “standing at ease,” in which one leg is straightened and the other relaxed, the line of direction falls within the foot of the straightened leg. But sculptors unfamiliar with the theory of equilibrium, not uncommonly so represent this attitude, that the line of direction falls midway between the feet. Ignorance of the laws of momentum leads to analogous errors: as witness the admired Discobolus, which, as it is posed, must inevitably fall forward the moment the quoit is delivered.

准备从事雕塑实践的年轻人一定要先熟悉人体骨骼和肌肉的分布、联结和运动。这是科学的一部分，他需要学习这些东西，以避免犯那些不懂科学的雕塑家所犯的许多错误。为了避免其他错误，力学原理的知识也是必备的，因为没有掌握这类知识，就经常会犯一些严重的力学错误。例如，为了稳固一座塑像，从重心向下的垂直线，即

所谓的“方向线”，必须落在支座以内。因此，一个人“稍息”时，即一腿直立一腿松弛的时候，方向线是落在直立着的腿上。但是如果雕塑家不熟悉平衡理论，在表现“稍息”这一姿势时，就经常会使方向线落在两只脚中间。不知道运动量定律也会引起类似的错误。例如著名的掷铁饼者的雕塑，按照那样的姿势，只要把铁饼抛出，人就非朝前栽倒不可。

In painting, the necessity for scientific knowledge, empirical if not rational, is still more conspicuous. In what consists the grotesqueness of Chinese pictures, unless in their utter disregard of the laws of appearances—in their absurd linear perspective, and their want of aerial perspective? In what are the drawings of a child so faulty, if not in a similar absence of truth—an absence arising, in great part, from ignorance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aspects of things vary with the conditions? Do but remember the books and lectures by which students are instructed; or consider the criticisms of Ruskin; or look at the doings of the Pre-Raffaelites; and you will see that progress in painting implies increasing knowledge of how effects in Nature are produced, The most diligent observation, if not aided by science, fails to preserve from error. Every painter will indorse the assertion that unless it is known what appearances must exist under given circumstances, they often will not be perceived; and to know what appearances must exist, is, in so far, to understand the science of appearances. From want of science Mr. J. Lewis, careful painter as he is, casts the shadow of a lattice-window in sharply-defined lines upon an opposite wall; which he would not have done, had he been familiar with the phenomena of penumbræ. From want of science, Mr. Rosetti, catching sight of a peculiar iridescence displayed by certain hairy surfaces under particular lights (an iridescence caused by the diffraction of light in passing the hairs), commits the error of showing this iridescence on surfaces

and in positions where it could not occur.

在绘画中，不管是理论性的还是经验性的科学知识，其必要性更加显而易见。中国画显得古怪难道不是由于完全忽视成像规律、不合理地使用直线透视而缺乏空间透视造成的吗？儿童的绘画之所以错误百出，不同样也是由于缺乏真实性吗？他们几乎不懂得事物的面貌会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回想一下教育学生的那些书本和演讲，或考虑一下罗斯金的评论，或看看前拉斐尔画派的作品，你会发现油画的进步中就暗含着关于如何表现自然效果那方面知识的增长。如果没有科学的帮助，最认真的观察也难免出错。每位画家都明白，如果不知道在特定环境下会出现何种影像，那么要画出来就很难了。而如果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关于成像的科学道理。尽管约翰·路易斯先生是一个认真细致的画家，但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他竟然用清晰的线条把一个格子窗的影子画在了对面墙上。但倘若他熟悉半影现象就不会这样做了。罗塞蒂先生曾瞥见某种毛绒表面有奇特的虹彩现象（光线经过毛发衍射引起的），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科学知识，他就错误地在不可能产生这种虹彩的物体表面和相应位置也都画上了。

To say that music, too, has need of scientific aid will seem still more surprising. Yet it is demonstrable that music is but an idealisation of the natural language of emotion; and that consequently, music must be good or bad according as it conforms to the laws of this natural language. The various inflections of voice which accompany feelings of different kinds and intensities, have been shown to be the germs out of which music is developed. It has been further shown, that these inflections and cadences are not accidental or arbitrary; but that they are determined by certain general principles of vital action; and that their expressiveness depends on this. Whence it follows that musical phrases and the melodies built of them, can be effective only when they are in

harmony with these general principles. It is difficult here properly to illustrate this position. But perhaps it will suffice to instance the swarms of worthless ballads that infest drawing-rooms, as compositions which science would forbid. They sin against science by setting to music ideas that are not emotional enough to prompt musical expression; and they also sin against science by using musical phrases that have no natural relation to the ideas expressed: even where these are emotional. They are bad because they are untrue. And to say they are untrue is to say they are unscientific.

如果说音乐也需要科学的帮助，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惊讶。但我们可以指出，音乐只不过是把情绪的自然语言理想化。因此，其优劣一定要看是否符合这种自然语言的规律。音乐的发展起源于不同感情及其强弱引起的声调的抑扬顿挫。进一步说，这些抑扬顿挫也不是偶然或随意的，而是由某些重要活动的一般原则所决定的，并以此为声音的表达提供基础。因此，只有当歌词和旋律与这些一般原则相协调时，才能产生效果。很难在这儿恰当地举例说明这种情况。或许那些涌进客厅来的毫无价值且违背科学的民谣就是一个例子。它们之于科学所犯的错误在于用音乐写下一些观念，而这些观念中的情绪并没达到需要用音乐来表达的程度，而且所用的音乐短句也与所表达的情绪并无自然联系，尽管其中有些也表达了一些情绪。它们的不好就在于不真实，而说它们不真实就是说它们不科学。

Even in poetry the same thing holds. Like music, poetry has its root in those natural modes of expression which accompany deep feeling. Its rhythm, its strong and numerous metaphors, its hyperboles, its violent inversions, are simply exaggerations of the traits of excited speech. To be good, therefore, poetry must pay respect to those laws of nervous action which excited speech obeys. In intensifying and combining the traits of excited speech, it must

have due regard to proportion—must not use its appliances without restriction; but, where the ideas are least emotional, must use the forms of poetical expression sparingly; must use them more freely as the emotion rises; and must carry them all to their greatest extent only where the emotion reaches a climax. The entire contravention of these principles results in bombast or doggerel. The insufficient respect for them is seen in didactic poetry. And it is because they are rarely fully obeyed, that we have so much poetry that is inartistic.

即使在诗歌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像音乐一样，诗歌的根源就在那些深厚感情的自然表达模式。它的节奏，它的无数有力的比喻，它的夸张，它的明显倒装，都只是把激动的语言的特点加以夸张而已。因此，好的诗歌必须要考虑那些激动的语言所要遵循的神经活动规律。在加强和组合这些激动的语言时，必须要有适当的比例，不能不加限制地使用。在思想的感情色彩较少的时候应该相应地少用诗歌语言，而在感情色彩增强时又应该多使用，在感情达到顶峰时，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如果完全违反了这些原则，不是夸夸其谈就是变成了顺口溜。说教式的诗歌就很不尊重这些原则。正是由于人们很少完全遵守这些原则，所以才有了这么多艺术性很差的诗歌。

Not only is it that the artist, of whatever kind, cannot produce a truthful work without he understands the laws of the phenomena he represents; but it is that he must also understand how the minds of spectators or listeners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several peculiarities of his work—a question in psychology. What impression any given art-product generates, manifestly depends upon the mental natures of those to whom it is presented; and as all mental natures have certain general principles in common, there must result certain corresponding general principles on which alone art-products can

be successfully framed. These general principles cannot be fully understood and applied, unless the artist sees how they follow from the laws of mind. To ask whether the composition of a picture is good is really to ask how the perceptions and feelings of observers will be affected by it. To ask whether a drama is well constructed, is to ask whether its situations are so arranged as duly to consult the power of attention of an audience, and duly to avoid overtaxing any one class of feelings. Equally in arranging the leading divisions of a poem or fiction, and in combining the words of a single sentence, the goodness of the effect depends upon the skill with which the mental energies and susceptibilities of the reader are economised. Every artist, in the course of his education and after-life, accumulates a stock of maxims by which his practice is regulated. Trace such maxims to their roots, and you find they inevitably lead you down to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And only when the artist rationally understands thes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and their various corollaries, can he work in harmony with them.

任何一种艺术家，不了解他所表现的现象的规律就创作不出真实的作品。不仅如此，他还必须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自己作品的各个特点是怎样影响观众和听众的。任何艺术品能给人带来的感受显然取决于接触到它的人的心理特点，而所有的心理特点都有一些共同的一般原则。因此，艺术品创作只有相应地遵循这些一般原则才能成功。除非这些艺术家能够看出这些一般原理是怎样从心智的规律中产生的，否则他不可能充分理解和应用这些一般原理。我们问某一幅画创作得好不好，实际上是在问看画人的看法和情绪受到了怎样的影响。问一出戏剧的结构好不好，就是问其中的情节安排是否恰当地照顾到观众的注意力，恰当地避免了过度刺激任何一种情绪。同样，在安排一首诗或者一部小说的主要部分时，在遣词造句时，效果的好坏取决于有无技巧使读者读起来比较流畅易懂。每个艺术家在其受教育过程及随后的生活中都形成了一整套准则来调节规范自己的实践。追根溯源，

我们会发现这些准则必然都归结到心理学原理上。只有当艺术家理性地理解这些心理学原理及其各种推论时，他才能在创作中得心应手。

We do not for a moment believe that science will make an artist. While we contend that the leading laws both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phenomena must be understood by him, we by no means contend that knowledge of such laws will serve in place of natural perception. Not only the poet, but also the artist of every type, is born, not made. What we assert is, that innate faculty alone will not suffice; but must have the aid of organised knowledge. Intuition will do much, but it will not do all. Only when Genius is married to Science can the highest results be produced.

我们从不相信科学会培养出一个艺术家。虽然我们认为艺术家必须了解关于客观和主观现象的主要规律，但是我们绝不认为对这些规律的了解可以替代自然知觉。不仅是诗人，包括各种艺术家，都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造就的。我们要说的是，仅靠天生的能力是不够的，还要借助于系统的知识。直觉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它不是万能的。只有当天才和科学结合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

As we have above asserted, Science is necessary not only for the most successful production, but also for the full appreciation of the fine arts. In what consists the greater ability of a man than of a child to perceive the beauties of a picture; unless it is in his more extended knowledge of those truths in nature or life which the picture renders? How happens the cultivated gentleman to enjoy a fine poem so much more than a boor does; if it is not because his wider acquaintance with objects and actions enables him to see in the poem much that the boor cannot see? And if, as is here so

obvious, there must be some familiarity with the things represented, before the representation can be appreciated; then the representation can be completely appreciated, only in proportion as the things represented are completely understood. The fact is, that every additional truth which a work of art expresses, gives an additional pleasure to the percipient mind—a pleasure that is missed by those ignorant of this truth. The more realities an artist indicates in any given amount of work, the more faculties does he appeal to; the more numerous associated ideas does he suggest; the more gratification does he afford. But to receive this gratification the spectator, listener, or reader, must know the realities which the artist has indicated; and to know these realities is to know so much science.

我们在上面已提到，科学不仅对于最成功的艺术创作是必要的，对于充分的艺术欣赏也是必不可少。为什么一个成年人比儿童更能够看出一幅画中的美？难道不是因为他更了解这幅画所表现出的那些自然或者生活中的真理？为什么一位受了教育的绅士要比一个莽汉懂得欣赏一首好诗？难道不是因为他对事物和活动有比较广泛的认识，可以看出许多莽汉看不到的东西？如果必须熟悉所表现的事物才能欣赏它的表现形式（从这儿来看是很显然的），那么若想充分欣赏它的表现形式只有充分了解它所表现的内容才行。事实是，一件艺术品所表达的真理多一些，欣赏艺术品的人内心就多一分愉快，而不懂得这个真理的人就体会不到这种愉快。在任何一个作品中，一个艺术家越想展现更多的现实，就越得多调动一些官能，多启发一些想法，多给人们一些满足。但同时，观众、听众或者读者要想感受到这种满足，就必须知道艺术家所展现的现实，而要知道这些现实就得要了解许多科学。

And now let us not overlook the further great fact that not only

does science underlie sculpture, painting, music, poetry, but that science is itself poetic. The current opinion that science and poetry are opposed is a delusion. It is doubtless true that as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cognition and emotion tend to exclude each other! And it is doubtless also true that an extreme activity of the reflective powers tends to deaden the feelings; while an extreme activity of the feelings tends to deaden the reflective powers: in which sense, indeed, all orders of activity are antagonistic to each other. But it is not true that the facts of science are unpoetical; or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ce is necessarily unfriendly to the exercise of imagination or the love of the beautiful. On the contrary science opens up realms of poetry where to the unscientific all is a blank. Those engaged in scientific researches constantly show us that they realise not less vividly, but more vividly, than others, the poetry of their subjects. Whoever will dip into Hugh Miller's works on geology or read Mr. Lewes's *Seaside Studies* , will perceive that science excites poetry rather than extinguishes it. And whoever will contemplate the life of Goethe will see that the poet and the man of science can coexist in equal activity. Is it not, indeed, an absurd and almost a sacrilegious belief that the more a man studies Nature the less he reveres it? Think you that a drop of water, which to the vulgar eye is but a drop of water, loses anything in the eye of the physicist who knows that its elements are held together by a force which, if suddenly liberated, would produce a flash of lightning? Think you that what is carelessly looked upon by the uninitiated as a mere snow-flake, does not suggest higher associations to one who has seen through a microscope the wondrously varied and elegant forms of snow-crystals? Think you that the rounded rock marked with parallel scratches calls up as much poetry in an ignorant mind as in the mind of a geologist, who knows that over this rock a glacier slid a million years ago? The truth is, that those who have never entered upon scientific pursuits know not a tithe of the poetry

by which they are surrounded. Whoever has not in youth collected plants and insects, knows not half the halo of interest which lanes and hedgerows can assume. Whoever has not sought for fossils has little idea of the poetical associations that surround the places where imbedded treasures were found. Whoever at the seaside has not had a microscope and aquarium has yet to learn what the highest pleasures of the seaside are. Sad, indeed, is it to see how men occupy themselves with trivialities, and are indifferent to the grandest phenomena—care not to underst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Heavens, but are deeply interested in some contemptible controversy about the intrigues of Mary Queen of Scots!—are learnedly critical over a Greek ode, and pass by without a glance that grand epic written by the finger of God upon the strata of the Earth!

我们不要忽略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科学不但是雕塑、绘画、音乐和诗歌的基础，而且科学本身就是有诗意的。当前认为科学与诗歌相互对立的看法是个谬误。无疑，认知和感情作为不同的心理状态是互相排斥的。我们也不可否认，思考力的极端活动容易使感情迟钝，感情的极端活动容易使思考力迟钝。从这种意义来说，所有活动确实都是互相对立的。但是如果认为科学事实毫无诗意，或者科学知识和精神的培养一定不利于想象的运用或者对美的热爱，就不对了。相反，科学开辟了一些对于不懂科学的人来说一片空白的诗歌领域。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经常告诉我们，他们从研究对象中体会到的诗意并不比别人体会到的欠缺生动，反而更加生动。任何浏览过休·米勒的地质学著作或者读过刘易斯的《海滨研究》的人都会发觉，科学是在激发诗意而不是扑灭它。每一个深刻思考过歌德生平的人都会发现，诗人和科学家可以在同类活动中共存。如果说一个人对自然研究得越多，就越不尊重它，难道不是很荒谬、很无礼吗？设想一滴水，在普通人眼中看来就是一滴水，而一个物理学家就懂得水是元素的结合体，瞬间解体时会产生闪电。如此，物理学家眼中那滴水会失掉什

么吗？设想在普通人不经意地看来不过是雪花的东西，对一个曾经在显微镜中见过奇妙多样的雪的结晶的人会不会引起更多的联想呢？设想一块带有平行线痕迹的圆形岩石，对一个无知的人和一个知道一百万年前冰川曾经在这岩石上划过的地质学家，能激起同样多的诗意吗？事实上，那些从未进行过科学探索的人对于他们周围的诗意大多是茫然无知的。一个在青年时代未曾采集过植物和昆虫的人，多半不会理解乡间小道和灌木丛带来的莫大乐趣。一个从来没有寻找过化石的人就不大可能对宝藏埋藏地的附近有什么诗意的联想。一个住在海边却没有显微镜和鱼缸的人不太可能发现海边的最大乐趣是什么。看到许多人忙于琐事而对宏大的现象漠不关心，真是让人伤心。他们不在意宇宙的结构，却对关于苏格兰玛丽女王私生活的无聊争辩十分感兴趣！他们会就一首希腊颂歌争辩不休，可是对上帝在地球岩层上写下的伟大史诗却不屑一顾！

We find, then, that even for this remaining division of human activities, scientific culture is the proper preparation. We find that aesthetics in general are necessarily based upon scientific principles; and can be pursued with complete success only through an acquaintance with these principles. We find that for the criticism and due appreciation of works of art, a knowledg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ings, or in other words, a knowledge of science, is requisite. And we not only find that science is the handmaid to all forms of art and poetry, but that, rightly regarded, science is itself poetic.

所以我们发现，即使对于这最后一部分人类活动而言，合适的准备工作还是要靠科学文化。我们发现，美学一般必须依据科学原理，而且只有熟悉这些原理才能实现完全的成功。我们发现，对艺术作品的批评和正确欣赏也需要懂得事物的构成，换句话说，科学知识是必要的。我们不仅发现科学有利于一切形式的艺术和诗歌的发展，而且

从某种角度说，科学本身就富有诗意。

Thus far our question has been, the worth of knowledge of this or that kind for purposes of guidance. We have now to judge the relative values of different kinds of knowledge for purposes of discipline. This division of our subject we are obliged to treat with comparative brevity; and happily, no very lengthened treatment of it is needed. Having found what is best for the one end, we have by implication found what is best for the other. We may be quite sure that the acquirement of those classes of facts which are most useful for regulating conduct, involves a mental exercise best fitted for strengthening the faculties. It would be utterly contrary to the beautiful economy of Nature, if one kind of culture were needed for the gaining of information and another kind were needed as a mental gymnastic. Everywhere throughout creation we find faculties developed through the performance of those functions which it is their office to perform; not through the performance of artificial exercises devised to fit them for these functions. The Red Indian acquires the swiftness and agility which make him a successful hunter, by the actual pursuit of animals; and by the miscellaneous activities of his life, he gains a better balance of physical powers than gymnastics ever give. That skill in tracking enemies and prey which he has reached by long practice, implies a subtlety of perception far exceeding anything produced by artificial training. And similarly throughout. From the Bushman, whose eye, which being habitually employed in identifying distant objects that are to be pursued or fled from, has acquired a quite telescopic range, to the accountant whose daily practice enables him to add up several columns of figures simultaneously, we find that the highest power of a faculty results from the discharge of those duties which the conditions of life require it to discharge. And we may be

certain, a priori, that the same law holds throughout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of most value for guidance, must at the same time be the education of most value for discipline. Let us consider the evidence.

到此为止，我们一直在从有利于指导人类活动的角度来看待各种知识的价值。接下来，我们有必要从有利于心智训练的角度来评判不同知识的相对价值。关于这部分的讨论要相对简单些，不过好在也不需要长篇大论。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最有利于指导人类活动，那么也可以将此推论到什么最有利于心智训练。我们可以肯定，那些规范人们行为最有用的各类知识就包含了最适宜于增强能力的心智训练。如果获得知识需要一项专门的培养，而心智训练又需要另外一项专门的培养，那就明显违背了大自然精妙的节约原则。在整个生物界中，我们随处可见，能力的发展是在实际发挥自身功能过程中实现的，而不是通过一些专门设计的人工练习实现的。北美印第安人在实际追捕动物的过程中就可以获得作为一名成功猎人的敏捷性和灵活性，而他从生活中各项活动所得到的身体平衡性，要胜过任何体操训练所能给予的。他从追踪敌人或者野兽的长期实践中得到的敏锐直觉，也远胜过任何人为训练所能给予的。其他情况也与此类似。从布希曼人到会计师——前者由于需要经常辨认远处的猎物或者危险事物而获得了远视眼力，后者由于日常工作而练成了一目数行的能力——我们都可以看出，高超的技能来自于生活条件所要求的职责。我们可以肯定地推理，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整个教育。在指导生活方面最有价值的教育必然同时在心智训练上也最有价值。让我们来看看例证。

One advantage claimed for that devotion to language-learning which forms so prominent a feature in the ordinary *curriculum* , is, that the memory is thereby strengthened. And it is apparently assumed that this is an advantage peculiar to the study of words. But the truth is, that the sciences afford far wider fields for the exercise of memory. It is no slight task to remember all the facts

ascertained respecting our solar system; much more to remember all that is known concerning the structure of our galaxy. The new compounds which chemistry daily accumulates, are so numerous that few, save professors, know the names of them all; and to recollect the atomic constitutions and affinities of all these compounds, is scarcely possible without making chemistry the occupation of life. In the enormous mass of phenomena presented by the Earth's crust, and in the still more enormous mass of phenomena presented by the fossils it contains, there is matter which it takes the geological student years of application to master. In each leading division of physics—sound, heat, light, electricity—the facts are numerous enough to alarm any one proposing to learn them all. And when we pass to the organic sciences, the effort of memory required becomes still greater. In human anatomy alone, the quantity of detail is so great, that the young surgeon has commonly to get it up half-a-dozen times before he can permanently retain it. The number of species of plants which botanists distinguish, amounts to some 320,000; while the varied forms of animal life with which the zoologist deals, are estimated at some two millions. So vast is the accumulation of facts which men of science have before them, that only by dividing and subdividing their labours can they deal with it. To a complete knowledge of his own division, each adds but a general knowledge of the rest. Surely, then, science, cultivated even to a very moderate extent, affords adequate exercise for memory. To say the very least, it involves quite as good a training for this faculty as language does.

在普通课程 中占显著地位的语文学习据说有个优点，就是能够增强记忆力。显然大家认为，这是文字学习所特有的优点。但是事实是，科学能够提供更广阔的天地去练习记忆力。要记住关于太阳系的一切已经不是个小任务了，还要记住已知的关于我们所在银河系结构

的一切就更难。化学中日益增加的新化合物，多得除了教授之外很少有人能数得清，而如果还要记住所有这些化合物的原子结构和化学性质，那么就只有以化学为终身职业的人才可能办到。地壳及地球内部化石所呈现的现象数量之多，就是地质专业的学生也需要多年才能掌握。声学、热学、光学、电学等物理学每个主要部分的内容都多得让想要全部通晓的人感到害怕。当我们谈及生命科学的时候，对记忆力的要求更大。仅在人体解剖领域，细节的数量就已如此之多，使得青年外科医生通常要记五六遍才能牢牢记住。植物学家能够辨认出来的植物种类高达三十二万种，而动物学家所研究的动物种类大概有两百万种左右。科学家要面对的过去积累起来的知识如此繁多，因此只有详细分工才能进行研究。每个人除了完全掌握自己领域的知识之外，只能泛泛地了解一下其他方面的一般知识。当然，即便只是大致学了些科学知识，记忆力就已能受到不少训练了。至少可以说，科学和语言一样，为记忆力提供了非常好的训练。

But now mark that while for the training of mere memory, science is as good as, if not better than, language; it has an immense superiority in the kind of memory it cultivates. In the acquirement of a language, the connections of ideas to be established in the mind correspond to facts that are in great measure accidental; whereas, in the acquirement of science, the connections of ideas to be established in the mind correspond to facts that are mostly necessary. It is true that the relations of words to their meanings are in one sense natural, and that the genesis of these relations may be traced back a certain distance, though very rarely to the beginning; (to which let us add the remark that the laws of this genesis form a branch of mental science—the science of philology.) But since it will not be contended that in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s, as ordinarily carried on, these natural relations between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are habitually traced, and the laws regulating them explained;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y are commonly learned as

fortuitous re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lations which science presents are casual relations; and, when properly taught, are understood as such. Instead of being practically accidental, they are necessary; and as such, give exercise to the reasoning faculties. While language familiarises with non-rational relations, science familiarises with rational relations. While the one exercises memory only, the other exercises both memory and understanding.

但是现在要注意，就纯粹记忆的训练而言，科学与语言相比，如果不是更好的话，至少是一样好；但就另一种记忆的训练而言，科学则有着巨大优势。在语言学习中，大脑里要建立的概念联系与很多事实相对应，但这些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性的；而在科学学习中，相应事实大多是必然的。在某种意义上，词语及其含义的关系是自然形成的；而且这些关系可以进行一定的历史追溯，尽管很少能追到起点；（正是这个起源的规律组成了心理科学的一个分支——语言科学）。但是，既然没有人会主张在语言学习中要像通常的做法那样习惯于追溯词语及其含义之间的自然关系，并且解释其中的规律，那么就等于说明，这些关系通常都是当作偶然关系来学的。而另一方面，科学所呈现的关系是因果关系，通过正确的教学，学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关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此能够锻炼人的理性官能。语言处理的是非理性的关系，而科学处理的是理性关系。一个只锻炼了记忆力，而另一个既锻炼了记忆力又锻炼了理解力。

Observe next that a great superiority of science over language as a means of discipline, is, that it cultivates the judgment. As, in a lecture on mental education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Professor Faraday well remarks, the most common intellectual fault is deficiency of judgment. He contends that “society, speaking generally, is not only ignorant as respects education of the judgment, but it is also ignorant of its ignorance.” And the cause to

which he ascribes this state is want of scientific culture. The truth of his conclusion is obvious. Correct judgment with regard to all surrounding things, events, and consequences, becomes possible only through knowledge of the way in which surrounding phenomena depend on each other. No extent of acquaintance with the meanings of words, can give the power of forming correct inferences respecting causes and effects. The constant habit of drawing conclusions from data, and then of verifying those conclusions by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 can alone give the power of judging correctly. And that it necessitates this habit is one of the immense advantages of science.

其次要注意，作为一种训练的手段，科学相对于语言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它能培养判断力。法拉第教授在皇家学院所作的关于心智教育的演讲可谓一语中的，指出了智力上面最常见的缺陷就是缺乏判断力。他认为："社会通常不仅忽视了判断力的培养，而且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忽视。"他认为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缺乏科学教育。他的结论显然是正确的。只有清楚周围现象是怎样相互依存时，才可能对周围一切事物、事件和后果做出正确判断。而无论多么熟悉词语的含义都不能保证做出正确的因果推论。只有习惯于从数据中得到结论，然后通过观察和实验验证这些结论，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科学的巨大优点之一就在于它使这种习惯成为必需。

Not only, however, for intellectual discipline is science the best; but also for *moral* discipline. The learning of languages tends, if anything, further to increase the already undue respect for authority. Such and such are the meanings of these words, says the teacher or the dictionary. So and so is the rule in this case, says the grammar. By the pupil these dicta are received as unquestionable. His constant attitude of mind is that of submission to dogmatic

teaching. And a necessary result is a tendency to accept without inquiry whatever is established. Quite opposite is the attitude of mind generated by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ce. By science, constant appeal is made to individual reason. Its truths are not accepted upon authority alone; but all are at liberty to test them—nay, in many cases, the pupil is required to think out his own conclusions. Every step in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is submitted to his judgment. He is not asked to admit it without seeing it to be true. And the trust in his own powers thus produced, is further increased by the constancy with which Nature justifies his conclusions when they are correctly drawn. From all which there flows that independence which is a most valuable element in character. Nor is this the only moral benefit bequeathed by scientific culture. When carried on, as it should always be, as much as possible under the form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it exercises perseverance and sincerity. As says Professor Tyndall of inductive inquiry, “It requires patient industry, and a humble and conscientious acceptance of what Nature reveals. The first condition of success is an honest receptivity and a willingness to abandon all preconceived notions, however cherished, if they be found to contradict the truth. Believe me, a self-renunciation which has something noble in it, and of which the world never hears, is often enacted in the private experience of the true votary of science.”

实际上，科学不止在智力训练上是最好的，在道德 训练上也是最好的。语言学习相对更容易使对权威已然过分的尊敬进一步加剧。教师或字典总是告诉你，这些字就是这个意思。语法总是说，这种情况下的规则就是那样。学生只能将这些当作毫无疑问的定论来接受。他的思想态度经常屈从于这些教条式的教学。如此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学生会习惯于不加质疑地接受所有定论。而科学培养会造就完全相反的思想态度。科学经常要求用个人理智去作出判断。不是人

们单纯从权威那里接受科学的真理，而是所有的人都可自由地去检验真理。不但如此，学生们通常被要求自己思考得出结论。科学研究的每一步都要经过学生自己的判断。在没让他亲眼看到之前，不能要求他确认什么。如果他的正确推论总是能在自然中得到支持验证，那么他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就会进一步增强。从这一切之中，他会获得独立性，而这正是最有价值的品质之一。科学教育在道德上带来的益处还不止这一点。当科学教育按照正确的方式，即尽可能以独立的研究方式进行的时候，人的毅力和诚实也会得到锻炼。廷德尔教授曾说过："归纳研究需要耐心苦干，并且虚心诚恳地接受自然所展示的东西。成功的第一个条件是诚实地接受，并且对于自己所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只要发现违背了真理，就愿意摈弃。相信我吧，一种前所未闻的、相当高贵的自我牺牲精神，常常能在真实的科学信徒的个人经验中体现出来的。"

Lastly we have to assert—and the assertion will, we doubt not, cause extreme surprise—that the discipline of science is superior to that of our ordinary education, because of the *religious* culture that it gives. Of course we do not here use the words scientific and religious in their ordinary limited acceptations; but in their widest and highest acceptations. Doubtless, to the superstitions that pass under the name of religion, science is antagonistic; but not to the essential religion which these superstitions merely hide. Doubtless, too, in much of the science that is current, there is a pervading spirit of irreligion; but not in that true science which has passed beyond the superficial into the profound.

最后我们还要说一个肯定会让人非常惊讶的论断，即科学训练相比我们普通教育训练的优越性还在于它提供了宗教 修养。当然，我们这里不是从通常狭义上的科学和宗教，而是从最广和最高的涵义来理解。毫无疑问，对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迷信，科学是反对的；但是科

学并不反对本质意义上的宗教，即便有一些被迷信的东西藏身其中。当然，反宗教在当前的很多科学中是一种盛行的精神，但是那些透过表面进入到精髓的真正科学并不这样。

“True science and true religion,” says Professor Huxley at the close of a recent course of lectures, “are twin-sisters, and the separation of either from the other is sure to prove the death of both. Science prospers exactly in proportion as it is religious; and religion flourishes in exact proportion to the scientific depth and firmness of its basis. The great deeds of philosophers have been less the fruit of their intellect than of the direction of that intellect by an eminently religious tone of mind. Truth has yielded herself rather to their patience, their love, their single-heartedness, and their self-denial, than to their logical acumen.”

赫胥黎教授在最近一系列讲座结束时说过：“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宗教是一对孪生姐妹，将任何一个与另外一个分开，一定会使双方死亡。科学的繁荣与其宗教性完全成正比例，而宗教的兴盛也与科学的深度和基础坚实性成正比例。哲学家的伟大成就更多地来自于其宗教思想智慧的引导，而非其个人智慧的成果。真理的出现是由于他们的耐心，他们的热爱，他们的专心和忘我，而他们的逻辑敏锐性倒在其次。”

So far from science being irreligious, as many think, it is the neglect of science that is irreligious—it is the refusal to study the surrounding creation that is irreligious. Take a humble simile. Suppose a writer were daily saluted with praises couched in superlative language. Suppose the wisdom, the grandeur, the beauty of his works, were the constant topics of the eulogies addressed to

him. Suppose those who unceasingly uttered these eulogies on his works were content with looking at the outsides of them; and had never opened them, much less tried to understand them. What value should we put upon their praises? What should we think of their sincerity? Yet, comparing small things to great, such is the conduct of mankind in general, in reference to the Universe and its Cause. Nay, it is worse. Not only do they pass by without study, these things which they daily proclaim to be so wonderful; but very frequently they condemn as mere triflers those who give time to the observation of Nature—they actually scorn those, who show any active interest in these marvels. We repeat, then, that not science, but the neglect of science, is irreligious. Devotion to science, is a tacit worship—a tacit recognition of worth in the things studied; and by implication in their Cause. It is not a mere lip-homage, but a homage expressed in actions—not a mere professed respect, but a respect proved by the sacrifice of time, thought, and labour.

许多人都认为科学是反宗教的，其实对科学的忽视才是反宗教的，不去研究周围万物生灵才是反宗教的。打个一般的比喻。假如一位作家每天都会听到一些阿谀奉承的话，假如经常有人称赞他的作品是多么智慧、伟大和美妙，假如这些不断称赞他作品的人都满足于只看他作品的外表，而从不打开他的作品，更不想去看懂它们，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赞美的价值？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的真诚？然而，以小见大，这就是一般人对待宇宙及其起源的做法。不仅如此，还有更糟糕的。他们不仅不研究自己每日宣称之美妙的东西，而且时常骂那些下工夫去观察自然的人，说他们只不过是不务正业的人。他们实际上轻视对这些奇妙事迹表现任何积极兴趣的人。所以我们要重申，反宗教的并非科学，而是对科学的忽视。献身科学的精神就是一种无言的崇拜，一种对所研究事物价值的默认，暗含对万物起源的崇敬。这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崇敬，而是体现在行动中的崇敬；不只是自我宣称的崇敬，而是能通过时间、思考和劳动力来证明的崇敬。

Nor is it thus only that true science is essentially religious. It is religious, too, inasmuch as it generates a profound respect for, and an implicit faith in, those uniform laws which underlie all things. By accumulated experiences the man of science acquires a thorough belief in the unchanging relations of phenomena—in the invariable connexion of cause and consequence—in the necessity of good or evil results. Instead of th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of traditional belief, which men vaguely hope they may gain, or escape, spite of their disobedience; he finds that there ar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in the ordained constitution of things, and that the evil results of disobedience are inevitable. He sees that the laws to which we must submit are not only inexorable but beneficent. He sees that in virtue of these laws, the process of things is ever towards a greater perfection and a higher happiness. Hence he is led constantly to insist on these laws, and is indignant when men disregard them. And thus does he, by asserting the eternal principles of things and the necessity of conforming to them, prove himself intrinsically religious.

真正的科学的宗教性不仅体现在本质上，而且体现在它对万事万物统一规律的高度尊重和绝对信仰。通过经验的积累，科学家完全相信现象之中存在永恒的联系——永恒的因果联系，必然的善恶结果。这不同于传统信仰中人们的观念，即妄想尽管违反规律还能获得奖赏或者逃避惩罚。他会明白，事物构成中先天就包含了奖赏和惩罚，违反规律的恶果是无可避免的。他明白，我们必须服从的规律不仅是不可动摇的，而且是有益的。他明白，如果遵从这些规律，事物的过程总会更完美，并且使人们更幸福。因此，他就经常坚守这些规律，而且当人们漠视这些规律的时候，他就会感到愤怒。这样，通过坚守事物原则的永恒性和遵守原则的必要性，他从本质上证明了他的宗教性。

To all which add the further religious aspect of science, that it alone can give us true conceptions of ourselves and our relation to the mysteries of existence.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 shows us all which can be known, it shows us the limits beyond which we can know nothing. Not by dogmatic assertion does it teach the impossibility of comprehending the ultimate cause of things; but it leads us clearly to recognise this impossibility by bringing us in every direction to boundaries we cannot cross. It realises to us in a way which nothing else can, the littleness of human intelligence in the face of that which transcends human intelligence. While towards the traditions and authorities of men its attitude may be proud, before the impenetrable veil which hides the Absolute its attitude is humble—a true pride and a true humility. Only the sincere man of science (and by this title we do not mean the mere calculator of distances, or analyser of compounds, or labeller of species; but him who through lower truths seeks higher, and eventually the highest)—only the genuine man of science, we say, can truly know how utterly beyond, not only human knowledge, but human conception, is the Universal Power of which Nature, and Life, and Thought are manifestations.

最后，再进一步谈一下科学另一方面的宗教性，即科学本身可以使我们真正了解自身的观念以及与自然万物中那些奥秘的关系。与此同时，科学向我们展示了一切可知的东西，还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可知的极限，超过这个极限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不是通过教条式的断言告诉我们万物的终极起源在认知上的不可能性，而是在各个方面把我们带到不可能跨越的边界面前，从而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不可能性。它通过一种其他事情都达不到的方式，让我们意识到在超越人类智慧的事物面前，人类的智慧是多么渺小。对于人们的传统和权威，它的态度可能是骄傲的，而对于隐藏于神秘面纱之后的绝对真

理，它的态度又是谦逊的。这是一种真正的骄傲和一种真正的谦逊。只有真诚的科学家（我们指的不是只去计算距离，分析化合物和标记物种的人，而是那些借助低级真理追求更高真理，并最终追求最高真理的科学家），只有真正的科学家，才能真正了解孕育自然、生命和思想的宇宙力量是如何完全超越人类知识和观念的。

We conclude then, that for discipline, as well as for guidance, science is of chiefest value. In all its effects, learning the meanings of things, is better than learning the meanings of words. Whether for intellectual, moral, or religious training, the study of surrounding phenomena is immensely superior to the study of grammars and lexicons.

至此，我们可以做结论了。为了心智训练，也为了指导人类活动，科学有最重要的价值。从科学的各方面效果来看，学习事物的意义比学习字词的意义要好得多。不论是为了智力的、道德的，或者宗教的训练，研究周围的现象要比研究语法和词汇有价值得多。

Thus to the question with which we set out—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the uniform reply is—Science. This is the verdict on all the counts. For direct self-preservation, or the maintenance of life and health, the all-important knowledge is—Science. For that indirect self-preservation which we call gaining a livelihood, the knowledge of greatest value is—Science. For the due discharge of parental functions, the proper guidance is to be found only in—Science. For that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life, past and present, without which the citizen cannot rightly regulate his conduct, the indispensable key is—Science. Alike for the most perfect production and highest enjoyment of art in all its forms, the needful

preparation is still—Science. And for purposes of discipline—intellectual, moral, religious—the most efficient study is, once more—Science. The question which at first seemed so perplexed, has become, in the course of our inquiry, comparatively simple. We have not to estimate the degrees of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orders of human activity, and different studies as severally fitting us for them; since we find that the study of Science, in its most comprehensive meaning, is the best preparation for all these orders of activity. We have not to decide between the claims of knowledge of great though conventional value, and knowledge of less though intrinsic value; seeing that the knowledge which we find to be of most value in all other respects, is intrinsically most valuable: its worth is not dependent upon opinion, but is as fixed as is the relation of man to the surrounding world. Necessary and eternal as are its truths, all Science concerns all mankind for all time. Equally at present, and in the remotest future, must it be of incalculable importance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eir conduct, that men should understand the science of lif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and that they should understand all other science as a key to the science of life.

因此，对于我们开始提出的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统一的答案就是——科学。这是各个方面的一致裁定。不管是为了直接的自我保护，还是维持生命与健康，最重要的知识都是科学。为了间接的我们称之为谋生的自我保护，最大价值的知识是科学。为了妥善地履行父母的职责，最合适的指导只有科学。为了解释过去和现在的公民生活，必不可少的关键是科学。没有科学，公民就不能正确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样，为了各种形式的最完美的艺术创作和最完美的艺术欣赏，需要准备的依然是科学。而且，为了智力的、道德的、宗教的训练目的，最有效的学习还是科学。起初看起来很困惑的问题，在我们追问探索的过程中，已经变得比较简单。我们不必估计各种人类活

动的重要性和各种适合他们的不同学科，因为我们发现从最全面的意义来看，对科学的学习是所有这些活动的最好准备。对于那些声称有很大传统价值的知识和声称具有较少价值却是内在价值的知识，我们不再难以抉择了，因为我们发现值得尊重的最有价值的知识就是最具有内在价值的知识；这种价值不是基于舆论，而是基于人类与周围世界的固定关系。它包含的真理是必要和永恒的。科学是对全人类的永恒关怀。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遥远的未来，科学对规范人们的行为肯定有着无法估量的重要性。人们应该了解生命、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的科学，应该了解所有其他科学都是生命科学的关键因素。

And yet the knowledge which is of such transcendent value is that which, in our age of boasted education, receives the least attention. While this which we call civilisation could never have arisen had it not been for science; science forms scarcely an appreciable element in what men consider civilised training. Though to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we owe it, that millions find support where once there was food only for thousands; yet of these millions but a few thousands pay any respect to that which has made their existence possible. Though this increasing knowledge of the properties and relations of things has not only enabled wandering tribes to grow into populous nations, but has given to the countless members of those populous nations comforts and pleasures which their few naked ancestors never even conceived, or could have believed, yet is this kind of knowledge only now receiving a grudging recognition in our highes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the slowly growing acquaintance with the uniform coexistences and sequences of phenomena—to the establishment of invariable laws, we owe our emancipation from the grossest superstitions. But for science we should be still worshipping fetishes; or, with hecatombs of victims, propitiating diabolical deities. And yet this science, which, in place of the most degrading

conceptions of things, has given us some insight into the grandeurs of creation, is written against in our theologies and frowned upon from our pulpits.

然而，这种超越其他事物价值的知识，在我们这个时代自以为是的教育中，却最不受人关注。如果没有科学的话，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根本就不会出现，而在人类所谓的文明训练中，科学几乎算不上一个明显的因素。尽管科学的进步使原来只能养活几千人的地方现在可以养活几百万人，但在这几百万人中，却只有少数几千人在关心能够使他们得以存在的科学。尽管这种关于事物属性及其关系的知识的增加，不仅使游牧部落发展为人口大国，而且也给那些人口大国的无数人带来了他们茹毛饮血的祖先无法想象的或者难以置信的舒适和乐趣，然而在我们现在的最高教育机构中，这种知识却只得到勉强承认。因为逐渐了解了一些现象中的共存情况和先后次序，因为发现了一些永恒规律的存在，我们才从严重的迷信中得以解放。但是如果不是科学，我们大概还在拜物，或者当众牺牲人命来求神鬼保佑。然而，就是这个让我们脱离了对事物的低级认识，而得以领略一些造物主宏图大志的科学，却在我们的神学中被排斥，在讲坛上被鄙视。

Paraphrasing an Eastern fable, we may say that in the family of knowledges, Science is the household drudge, who, in obscurity, hides unrecognised perfections. To her has been committed all the works; by her skill, intelligence, and devotion, have all the conveniences and gratifications been obtained; and while ceaselessly occupied ministering to the rest, she has been kept in the background, that her haughty sisters might flaunt their fripperies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The parallel holds yet further. For we are fast coming to the *dénouement* , when the positions will be changed; and while these haughty sisters sink into merited neglect, Science, proclaimed as highest alike in worth and beauty,

will reign supreme.

套用一个东方寓言，我们可以说，在知识的家庭中，科学是家庭的苦力，默默无闻地隐藏着未被公认的美德。她致力于所有的工作，通过她的技能、智力和奉献提供一切便利和满足，而当她一直在后台不断地为其他人服务的同时，她高傲的姐妹们可能却在向外界炫耀着她们的俗艳。这个比喻还可以更进一步。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到这场戏的结局 了，到了变换位置的时候了。这些高傲的姐妹们将被冷落，而被宣布为最高贵和最美丽的科学将主宰一切。

Chapter 2 Intellectual Education

第二章　智育

There cannot fail to b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ccessive systems of education, and the successive social states with which they have coexisted. Having a common origin in the national mind, the institutions of each epoch, whatever be their special functions, must have a family likeness. When men received their creed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from an infallible authority deigning no explanations, it was natural that the teaching of children should be purely dogmatic. While “believe and ask no questions” was the maxim of the Church, it was fitly the maxim of the school. Conversely, now that Protestantism has gained for adults a right of private judgment and established the practice of appealing to reason, there is harmony in the change that has made juvenile instruction a process of exposition addressed to the understanding. Along with political despotism, stern in its commands, ruling by force of terror, visiting trifling crimes with death, and implacable in its vengeance on the disloyal, there necessarily grew up an academic discipline similarly harsh—a discipline of multiplied injunctions and blows for every breach of them—a discipline of unlimited autocracy upheld by rods, and ferules, and the black-ho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crease of political liberty, the abolition of laws restricting individual action, and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riminal code, have been accompanied by a kindred progress towards non-coercive education: the pupil is hampered by fewer restraints, and other means than punishments are used to govern him. In those ascetic days when men, acting on the greatest misery principle, held that the more gratifications they denied themselves

the more virtuous they were, they, as a matter of course, considered that the best education which most thwarted the wishes of their children, and cut short all spontaneous activity with—“You mustn't do so.” While on the contrary, now that happiness is coming to be regarded as a legitimate aim—now that hours of labour are being shortened and popular recreations provided, parents and teachers are beginning to see that most childish desires may rightly be gratified, that childish sports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that the tendencies of the growing mind are not altogether so diabolical as was supposed. The age in which all believed that trades must be established by bounties and prohibitions; that manufacturers needed their materials and qualities and prices to be prescribed; and that the value of money could be determined by law; was an age which unavoidably cherished the notions that a child's mind could be made to order; that its powers were to be imparted by the schoolmaster; that it was a receptacle into which knowledge was to be put and there built up after its teacher's ideal. In this free-trade era, however, when we are learning that there is much more self-regulation in things than was supposed; that labour, and commerce, and agriculture, and navigation can do better without management than with it; that political governments, to be efficient, must grow up from within and not be imposed from without; we are also beginning to see that there is a natural process of mental evolution which is not to be disturbed without injury; that we may not force on the unfolding mind our artificial forms; but that Psychology, also, discloses to us a law of supply and demand, to which, if we would not do harm, we must conform. Thus alike in its oracular dogmatism, in its harsh discipline, in its multiplied restrictions, in its professed asceticism, and in its faith in the devices of men, the old educational regime was akin to the social systems with which it was contemporaneous; and similarly, in the reverse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our modern modes of culture correspond to our more

liberal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历届的教育制度和与其共存的社会形态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关系。由于具有一脉相承的民族意识，不管每个时代的不同制度具有何种特殊职能，它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家族式的相似性。当人们从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处获取儿童教育方面的信条和诠释时，这种教育自然也就是纯粹教条化的。“信且不疑”在成为教会准则的同时，也恰好成为了学校的规矩。反之，既然新教教义使成年人获得了独立判断的权利，并在实践中诉诸理性，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变化也体现在青少年的教育上，使之成为一个致力于理解的阐释过程。在政治独裁统治下，命令严苛，统治以暴力威慑为手段，小罪即处死刑，不忠即受到无情的报复。因此，也必然产生同样粗暴的学校纪律，一种禁令繁琐、言出法随的纪律，用棍棒、戒尺、禁闭来维护的绝对专制纪律。另一方面，随着政治自由的增加，限制个体行为的法律被废除，刑事法规得到改善，非强制性教育也应运而生。管制约束学生们的措施变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非惩罚性的方式。在禁欲时代，人们奉行最大痛苦原则，认为越是拒绝愉悦越是拥有高尚的美德。自然而然地，他们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压制孩子的各种愿望，用“你千万不要这样做”来终止一切自发性的活动。然而现在恰恰相反，人们逐渐认可了快乐是一种合理的目标。于是，儿童的劳动时间被缩短，继而可以享受各种大众娱乐活动。家长和教师们也开始意识到儿童大多数单纯的愿望应该得到适当的满足，无邪烂漫的体育活动应该被鼓励。心智成长的整体趋势也并非之前想象的那般丑恶。过去，人们都认为贸易的创设依靠奖励金和禁令，生产商的产品的材料、质量和价格应该受到规定，法律决定货币的价值。在那个时代，人们不可避免地信守这样一种理念，即儿童的心智是可以规定的，由教师授予其能力，或者说心智是一种器皿，可以依照教师的意愿进行知识的存放与增进。然而，在目前的自由贸易时代，我们逐渐意识到，事物的自我调节比原来想象的要多得多。在没有管理操纵的情况下，劳动、商业、农业、航海远远好于被管理操纵的状态；政治机构若要高效运行，必须从内生成，而不是从外强加。我们同时也开始意识到，心智演变有其自然过程，人为的

干扰势必造成损伤，我们不应该以任何人为的形式强迫心智发展。而心理学也向我们揭示了一条供求法则，即如果我们不想对心智造成损伤，就必须遵循其发展规律。旧的教育体制与其同时代的社会制度类似，在神谕似的教条主义、严苛的纪律、繁琐的禁令、虚伪的禁欲主义及对人为设施的信仰等方面都十分相像。而同样的道理，与这些特征相反，现代的培养模式适用于更加自由的宗教政治制度。

But there remain further parallelisms to which we have not yet adverted: that, namely, between the processes by which these respective changes have been wrought out; and that between the several states of heterogeneous opinion to which they have led. Some centuries ago there was uniformity of belief—religious,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All men were Romanists, all were Monarchists, all were disciples of Aristotle, and no one thought of calling in question that grammar-school routine under which all were brought up. The same agency has in each case replaced this uniformity by a constantly increasing diversity. That tendency towards assertion of the individuality, which, after contributing to produce the great Protestant movement, has since gone on to produce an ever-increasing number of sects—that tendency which initiated political parties, and out of the two primary ones has, in these modern days, evolved a multiplicity to which every year adds—that tendency which led to the Baconian rebellion against the schools, and has since originated here and abroad sundry new systems of thought—is a tendency which, in education also, has caused division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methods. As external consequences of the same internal change, these processes have necessarily been more or less simultaneous. The decline of authority, whether papal, philosophic, kingly, or tutorial, is essentially one phenomenon; in each of its aspects a leaning towards free action is seen alike in the working out of the change

itself, and in the new form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o which the change has given birth.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我们尚未留意到的对应物，它们产生于独立发生的变革进程中，也来自由这些变革引发的不同观点的各种情形。几个世纪以前，宗教、政治、教育的信仰存在一致性。所有的人都是罗马天主教派、君主教派、亚里士多德的信徒，没有人质疑培育其成长的文法学校的常规。现在，教育机构在各个方面的单一性被日益多元化所取代。主张个性的倾向在促成新教运动后，又继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教派。正是这种倾向创建了不同的政党，最初的两大政党如今已经演变为多个政党，并且数量逐年增加。这种倾向导致培根哲学的信徒背叛了经院学派，并在国内外创立了各种新的思想体系。这一倾向同样在教育领域产生分歧，并积累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作为同一个内部变革所产生的外部结果，这些进程必然或多或少是同步的。不论是教皇权威的衰退、哲学权威的衰退、帝王权威的衰退或是教师权威的衰退，本质上是同一种现象。在权威衰退的各个方面，类似的自由行动的趋势都反映在变革本身的实现过程中以及因变革而应运产生的理论与实践的新形式中。

While many will regret this multiplication of schemes of juvenile culture, the catholic observer will discern in it a means of ensuring the final establishment of a rational system. Whatever may be thought of theological dissent, it is clear that dissent in education results in facilitating inquiry by the division in labour. Were we in possession of the true method, divergence from it would, of course, be prejudicial; but the true method having to be found, the efforts of numerous independent seekers carrying out their researches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constitute a better agency for finding it than any that could be devised. Each of them struck by some new thought which probably contains more or less of basis

in facts—each of them zealous on behalf of his plan, fertile in expedients to test its correctness, and untiring in his efforts to make known its success—each of them merciless in his criticism on the rest—there cannot fail, by composition of forces, to be a gradual approximation of all towards the right course. Whatever portion of the normal method any one of them has discovered, must, by the constant exhibition of its results, force itself into adoption; whatever wrong practices he has joined with it must, by repeated experiment and failure, be exploded. And by this aggregation of truths and elimination of errors, there must eventually be developed a correct and complete body of doctrine. Of the three phases through which human opinion passes—the unanimity of the ignorant, the disagreement of the inquiring, and the unanimity of the wise—it is manifest that the second is the parent of the third. They are not sequences in time only; they are sequences in causation. However impatiently, therefore, we may witness the present conflict of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however much we may regret its accompanying evils, we must recognise it as a transition stage needful to be passed through, and beneficent in its ultimate effects.

虽然许多人对青少年培养方案的增加会感到遗憾，但是全面观察者将从中领悟到如此能够确保最终建立一种合理的体制。不管我们如何看待神学上的分歧，教育方面的分歧无疑会因劳动分工而得到进一步探究。如果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偏离它当然是有害的，但是如果正确的方法还有待发现，许多独立探索者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的尝试形成了一个寻求正确方法的机构，这比所能想到的任何机构都要好。他们中的每个人会猛然发现一些新见解，这其中可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某些事实根据；人人都热衷于自己的方案，用丰富的手段去验证它的正确性，不知疲倦地去努力展示它的成效；每个人都毫不留情地评判其他人的方案；汇聚这些力量一定会引领大家渐渐接近正确的

方向。任何人发现的常规方法，哪怕只是一部分，也会因为结果重复出现而不得不被采纳。由于重复实验和失败的教训，方案中的任何错误做法也一定会被剔除。通过这种方式聚集真理并消除谬误，最终一定会发展成为一套正确并完整的学说。人类的观点经过三个阶段——愚昧者的统一意见，探讨者的相左意见，智者的统一意见。显然，第二阶段衍生了第三阶段。这种次序不仅是指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还表现在因果关系上。因此，无论我们看到教育制度中现有的争论时有多么不耐烦，无论我们对它们所带来的恶果感到多么遗憾，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最终结果一定大有裨益。

Meanwhile may we not advantageously take stock of our progress? After fifty years of discussion, experiment, and comparison of results, may we not expect a few steps towards the goal to be already made good? Some old methods must by this time have fallen out of use; some new ones must have become established; and many others must be in process of general abandonment or adoption. Probably we may see in these various changes, when put side by sid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may find in them a common tendency; and so, by inference, may get a clue to the direction in which experience is leading us, and gather hints how we may achieve yet further improvements. Let us then, as a preliminary to a deeper consideration of the matter, glance at the leading contrasts between the education of the past and that of the present.

与此同时，我们是否可以从反思我们的进步中得到益处呢？经过五十年的讨论、实验和结果比对，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已经向正确目标迈进几步了呢？如今，一定已经淘汰了一些陈旧的研究方法，认可了一些新方法，还有其他一些方法处于普遍摒弃或全面采纳的过程中。把这些变革并列在一起，或许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它们类似的特性，发

现它们存在一个共同趋向；然后通过推断，我们可以领悟到经验引领我们的方向，并且掌握指导我们如何做出进一步改进的窍门。在深入考虑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粗略看一下过去教育和当下教育的主要差别。

The suppression of every error is commonly followed by a temporary ascendency of the contrary one; and so it happened, that after the ages when physical development alone was aimed at, there came an age when culture of the mind was the sole solicitude—when children had lesson-books put before them at between two and three years old—when school-hours were protracted, and the getting of knowledge was thought the one thing needful. As, further, it usually happens, that after one of these reactions the next advance is achieved by coordinating the antagonist errors, and perceiving that they are opposite sides of one truth; so we are now coming to the conviction that body and mind must both be cared for, and the whole thing being unfolded. The forcing system has been in great measure given up, and precocity is discouraged.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see that the first requisite to success in life, is to be a good animal. The best brain is found of little service, if there be not enough vital energy to work it; and hence to obtain the one by sacrificing the source of the other, is now considered a folly—a folly which the eventual failure of juvenile prodigies constantly illustrates. Thus we are discovering the wisdom of the saying, that one secret in education is “to know how wisely to lose time.”

克服了某类错误，通常紧接着会使这类错误的对立面暂时占优势。因此在只关注身体发育的时代过后，必然会迎来仅仅渴求心智培养的时代。在心智培养时代，两三岁的儿童面前摆放着教科书，他们在校时间被延长，而获取知识是唯一需要做的事。进而会发生如下情

形：只要出现任何一种以上反应，人们必然是通过协调对立的两类错误而察觉出它们是真理的两个方面，从而取得下一步的进展。所以我们现在确信必须兼顾身心，从而看到事物的全局。很大程度上，已经摒弃了这种揠苗助长的体系，也不提倡孩子早熟。人们开始意识到强健的身体是一生中成功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做支撑，大脑再聪明也没用。因此，现在认为，以牺牲一项资源为代价换取另一项是愚蠢的行为。许多神童最终毫无建树的事例也不断说明了这点。因此我们发现，这种说法充满智慧，即教育的秘诀在于“懂得如何有效地利用时间”。

The once universal practice of learning by rote, is daily falling more into discredit. All modern authorities condemn the old mechanical way of teaching the alphabet. The multiplication table is now frequently taught experimentally. In the acquirement of languages, the grammar-school plan is being superseded by plans based on the spontaneous process followed by the child in gaining its mother tongue. Describing the methods there used, the “Reports on the Training School at Battersea” say:—“The instruction in the whole preparatory course is chiefly oral, and is illustrated as much as possible by appeals to nature.” And so throughout. The rote-system, like other systems of its age, made more of the forms and symbols than of the things symbolized. To repeat the words correctly was everything; to understand their meaning nothing: and thus the spirit was sacrificed to the letter. It is at length perceived, that in this case as in others, such a result is not accidental but necessary—that in proportion as there is attention to the signs, there must be inattention to the things signified; or that, as Montaigne long ago said—*Sçavoir par coeur n'est pas scçvoir* .

曾经风靡一时的死记硬背的做法正日益遭到质疑。近代的权威专

家一致谴责以陈腐、机械的方法进行的字母教学。现在，经常采用实验方法教给学生乘法表。在语言习得方面，基于儿童习得母语的自发过程渐渐取代了文法学校的计划。《巴特西师范学校报告》在介绍他们学校所使用的方法时说："在整个预备课程中，主要以口授方式进行教学，并且尽量多地从自然中举例说明。"这种方法一直贯穿于整个教学。像那时期的其他方法一样，死记硬背的方法注重学习事物的形式和符号，而不是学习符号所代表的事物本身。最重要的是正确地重复词句，理解它们的意义没有任何价值。因此，为了学习词句而牺牲了精髓。最终，在这个例子及其他类似情况中，人们认识到了这种方法过多地关注符号学习而导致忽略了符号所表示的意义。这一结果并非偶然。正如法国作家蒙田很久以前说过的那样，死记硬背的学习不是学习 。

Along with rote-teaching, is declining also the nearly allied teaching by rules. The particulars first, and then the generalisation, is the new method—a method, as the Battersea School Reports remark, which, though "the reverse of the method usually followed which consists in giving the pupil the rule first," is yet proved by experience to be the right one. Rule-teaching is now condemned as imparting a merely empirical knowledge—as producing an appearance of understanding without the reality. To give the net product of inquiry, without the inquiry that leads to it, is found to be both enervating and inefficient. General truths to be of due and permanent use, must be earned. "Easy come easy go," is a saying as applicable to knowledge as to wealth. While rules, lying isolated in the mind—not joined to its other contents as outgrowths from them—are continually forgotten, the principles which those rules express piecemeal, become, when once reached by the understanding, enduring possessions. While the rule-taught youth is at sea when beyond his rules, the youth instructed in principles solves a new case as readily as an old one. Between a mind of rules and a mind

of principles, there exists a difference such as that between a confused heap of materials, and the same materials organised into a complete whole, with all its parts bound together. Of which types this last has not only the advantage that its constituent parts are better retained, but the much greater advantage, that it forms an efficient agent for inquiry, for independent thought, for discovery—ends for which the first is useless. Nor let it be supposed that this is a simile only: it is the literal truth. The union of facts into generalisations *is* the organisation of knowledge, whether considered as an objective phenomenon, or a subjective one: and the mental grasp may be measured by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organisation is carried.

与死记硬背式方法一起渐渐消亡的，还有与之类似的规则式教学。如巴特西学校报告中所述，新方法是先教特殊，再归纳概括。虽然“新方法与先教给学生规则的传统方法背道而驰”，但是经验证明它是正确的。现在，大家谴责规则式教学，认为它只教授了基于经验的知识，表面上明白了，实质上却一知半解。人们发现，只有结果而没有探究过程的教学，让人感到乏味且效率低下。一定要获得有恰当和永久用处的普遍真理。“来得容易，去得也快”，这一说法不仅适用于财富积累，在知识学习方面也是如此。当规则孤立地存在于脑中，不与它们衍生的其他内容相连，就会经常被忘记，而规则零星传达出的原理一旦被学生理解了，就能成为学生永久的财富。一个只学到规则的年轻人全然不懂规则之外的事物，而掌握其原理的青年在应对新问题时，则会像解决老问题一样得心应手。牢记规则的大脑与掌握原理的大脑之间存在的差异，就像是同样的材料，前者杂乱堆砌，后者则是各部分紧密连接的一个整体。后者的优势不仅在于完整保存材料的各个组成部分，更大的优势在于它建构了调查研究、独立思维及探索发现的有效媒介，而前者在这点上毫无用处。这不仅仅是打了个比方，情况的确如此。不论把知识看作客观现象或是主观现象，其组织化都是 对事实的统一概括。对知识的组织程度也反映了心智对知识的

掌握情况。

From the substitution of principles for rules, and the necessarily coordinate practice of leaving abstractions untaught until the mind has been familiarised with the facts from which they are abstracted, has resulted the postponement of some once early studies to a late period. This is exemplified in the abandonment of that intensely stupid custom, the teaching of grammar to children. As M. Marcel says:—“It may without hesitation be affirmed that grammar is not the stepping stone, but the finishing instrument.” As Mr. Wyse argues:—

在教学中，要教给学生原理而不是规则，就要做必要的调整措施，即等心智完全熟悉事实以后，再教授抽象原理。这也就要求以前早早进行的课程要延期到以后再学。教授学生语法的愚蠢做法被废除，就是这样一个改革实例。如马塞尔先生所言：“毋庸置疑，语法不是垫脚石而是整理工具。”如怀斯先生所辩：

> Grammar and Syntax are a collection of laws and rules. Rules are gathered from practice; they are the results of induction to which we come by long observation and comparison of facts. It is, in fine, the science,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following the process of nature, neither individuals nor nations ever arrive at the science *first* . A language is spoken, and poetry written, many years before either a grammar or prosody is even thought of. Men did not wait till Aristotle had constructed his logic, to reason.

“语法和句法是规律和规则的集合。规则来自于实践，是我们通过对事实长期观察和比较进而归纳出的结果。总而言之，规则是语言的科学和哲学。按照自然的过程，个体和国家都不是先　　发现这个科学的。语言和诗歌存在了许多年后，人们才想到语法或韵律。人们也不是等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他的逻辑学之后才开始推理的。”

In short, as grammar was made after language, so ought it to be taught after language: an inference which all who recogni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the race and that of the individual, will see to be unavoidable.

简言之，既然语法产生于语言之后，那么就应该放在语言之后去教。所有了解种族进化与人类进化关系的人都必然会如此推断。

Of new practices that have grown up during the decline of these old one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systematic culture of the powers of observation. After long ages of blindness men are at last seeing that the spontaneous activity of the observing faculties in children has a meaning and a use. What was once thought mere purposeless action, or play, or mischief, as the case might be, is now recognised as the process of acquiring a knowledge on which all after-knowledge is based. Hence the well-conceived but ill-conducted system of *object-lessons* . The saying of Bacon, that physics is the mother of the sciences, has come to have a meaning in education. Without an accurate acquaintance with the visible and tangible properties of things, our conceptions must be erroneous,

our inferences fallacious, and our operations unsuccessful. “The education of the senses neglected, all after education partakes of a drowsiness, a haziness, an insufficiency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cure.” Indeed, if we consider it, we shall find that exhaustive observation is an element in all great success. It is not to artists, naturalists, and men of science only, that it is needful; it is not only that the skilful physician depends on it for the correctness of his diagnosis, and that to the good engineer it is so important that some years in the workshop are prescribed for him; but we may see that the philosopher also is fundamentally one who *observes* relationships of things which others had overlooked, and that the poet, too, is one who *sees* the fine facts in nature which all recognise when pointed out, but did not before remark. Nothing requires more to be insisted on than that vivid and complete impressions are all essential. No sound fabric of wisdom can be woven out of a rotten raw-material.

旧办法衰退期间，生成了新实践，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观察力的系统培养。在长期盲目的摸索以后，人们最终意识到儿童所进行的自发性观察活动是具有一定意义和用途的。它曾经只是被看成是无意义的活动、游戏或恶作剧（这点视情况而定），而现在则被看成是一个获得知识的过程，是后续知识的基础。因此，产生了设想很好但执行很差的实物教学 体系。培根说过：“物理学是科学之母。”此话在教育中也具有一定意义。如果对事物的可见性及有形性缺乏正确认识，必然会导致我们构思错误，推论谬误，行动失败。“忽视了感官教育，会导致后续教育令人倦怠、迷惑且感觉不完善，这一点无法补救。”事实上，只要我们细想一下，就能发现，详尽观察是一切伟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只是艺术家、自然学家和科学家需要仔细观察，不只是技术娴熟的医生为了诊断正确而需要认真观察，一个优秀的工程师也十分需要认真观察，所以他必须按规定到车间实习几年。我们还发现，哲学家本质上也是观察者，观察 别人所忽略的事物间的联系；而

诗人则是自然界美的发现者 ，这些不为人知的美好，一旦被展现，就能得到大家的认同。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些生动而又完整的感官印象至关重要。破损的素材织造不出智慧的华彩织物。

While the old method of presenting truths in the abstract has been falling out of use, there has been a corresponding adoption of the new method of presenting them in the concrete. The rudimentary facts of exact science are now being learnt by direct intuition, as textures, and tastes, and colours are learnt. Employing the ball-frame for the first lesson in arithmetic exemplifies this. It is well illustrated, too, in Professor De Morgan's mode of explaining the decimal notation. M. Marcel, rightly repudiating the old system of tables, teaches weights and measures by referring to the actual yard and foot, pound and ounce, gallon and quart; and lets the discovery of their relationships be experimental. The use of geographical models and models of the regular bodies, etc., as introductory to geography and geometry respectively, are facts of the same class. Manifestly a common trait of these methods is, that they carry each child's mind through a process like that which the mind of humanity at large has gone through. The truths of number, of form, of relationship in position, were all originally drawn from objects; and to present these truths to the child in the concrete is to let him learn them as the race learnt them. By and by, perhaps, it will be seen that he cannot possibly learn them in any other way; for that if he is made to repeat them as abstractions, the abstractions can have no meaning for him, until he finds that they are simply statements of what he intuitively discerns.

在逐渐摒弃以抽象方式呈现真理的陈旧方法的同时，以具体方式呈现真理的新办法就会被相应采用。像学习质地、味道和颜色一样，

现在学习精密科学的基础知识也需要直接感知。算数的入门课程中使用球形框架就是一个例子。德摩根教授的十进制计数法模式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马塞尔先生理所当然地否决了用表格教度量衡的旧体系，而参考实际生活中使用的码和英尺、英镑和盎司、加仑和夸脱，通过实证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地理和几何的入门课程一样，使用地理模型和几何模型也是这个道理。显然，这些方法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开发儿童心智经历的过程，与人类心智发展的过程大致吻合。数字、形状、位置关系的真理最初都是来自于实物，而以实物形式教授给儿童，就是让他像古人一样习得这些真理。逐渐地，我们或许会发现，他不可能以别的方式习得这些真理，因为如果强迫他以抽象形式复述，对他没有意义，直到他觉察到这些仅仅是对他直接感知的描述。

But of all the changes taking place, the most significant is the growing desire to make the acquirement of knowledge pleasurable rather than painful—a desire based on the more or less distinct perception that at each age the intellectual action which a child likes is a healthful one for it; and conversely. There is a spreading opinion that the rise of an appetite for any kind of knowledge implies that the unfolding mind has become fit to assimilate it, and needs it for the purposes of growth; and that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sgust felt towards any kind of knowledge is a sign either that it is prematurely presented, or that it is presented in an indigestible form. Hence the efforts to make early education amusing, and all education interesting. Hence the lectures on the value of play. Hence the defence of nursery rhymes, and fairy tales. Daily we more and more conform our plans to juvenile opinion. Does the child like this or that kind of teaching? Does he take to it? We constantly ask. “His natural desire of variety should be indulged,” says M. Marcel, “and the gratification of his curiosity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his improvement.” “Lessons,” he again remarks,

“should cease before the child evinces symptoms of weariness.” And so with later education. Short breaks during school-hours, excursions into the country, amusing lectures, choral songs—in these and many like traits, the change may be discerned. Asceticism is disappearing out of education as out of life; and the usual test of political legislation—its tendency to promote happiness—is beginning to be, in a great degree, the test of legislation for the school and the nursery.

但是在发生的所有改变中，最显著的改变是人们逐渐想愉快地获取知识而不是痛苦地获取。这个愿望基于人们多少意识到，儿童若是喜欢其年龄阶段的智力活动，此活动就对他有益，反之亦然。大家普遍认为，儿童若是产生学习某种知识的强烈愿望就意味着他成长的心智已经适合接受它，需要这种知识促进成长；而儿童若是对某类知识厌恶，就意味着这种知识呈现得过早或是呈现形式让儿童难以消化。因此人们努力使早教令人愉悦，使整个教育更具趣味性。因此就展开关于游戏价值的讨论。也因此就要维护儿歌和童话故事的价值。我们的计划一天天地变得更加符合儿童的意愿。我们经常问：儿童是喜欢这种还是那种教法？他能接受吗？马塞尔先生说：“应该满足儿童的各种愿望，应将满足他的好奇心与使他取得进步相结合。”他又强调：“功课应该在儿童呈现出疲劳状态以前停止。”后续的教育也应如此。从课间休息、郊外旅行、趣味演讲、合唱和其他类似的教育片段中，都可以看出这个变革。禁欲主义已经淡出了生活，也渐渐在教育中消失，而是否有利于增进幸福——检验政治立法的常见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也渐渐成为检验学校和育儿室立法的标准。

What now i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these several changes? Is it not an increasing conformity to the methods of Nature? The relinquishment of early forcing against which Nature ever rebels, and the leaving of the first years for exercise of the

limbs and senses, show this. The superseding of rote-learnt lessons by lessons orally and experimentally given, like those of the field and playground, shows this. The disuse of rule-teaching, and the adoption of teaching by principles—that is, the leaving of generalisations until there are particulars to base them on—show this. The system of object-lessons shows this. The teaching of the rudiments of science in the concrete instead of the abstract, shows this. And above all, this tendency is shown in the variously directed efforts to present knowledge in attractive forms, and so to make the acquirement of it pleasurable. For as it is the order of nature in all creatures that the gratification accompanying the fulfilment of needful functions serves as a stimulus to their fulfilment—as during the self-education of the young child, the delight taken in the biting of corals, and the pulling to pieces of toys, becomes the prompter to actions which teach it the properties of matter; it follows that, in choosing the succession of subjects and the modes of instruction which most interest the pupil, we are fulfilling nature's behests, and adjusting our proceedings to the laws of life.

现在，这些变革的共同点是什么？难道不是越来越顺应自然本身的方法吗？在儿童早期使用强迫的方法就因违反自然规律而被放弃了，在幼年就开始训练儿童四肢和感官的做法也被放弃了，这都是体现了对自然的顺应。同样的道理，死记硬背的办法被口述以及田野、游戏场中的实验所替代。规则式教学被摒弃了，而代之以原理式教学，也就是说要先教具体的事物，然后再以此概括一般规律进行说明。实物教学法也体现了这样的规律。在自然科学入门阶段，以具体化教学取代抽象化教学也体现了这样的规律。最重要的是，这种授课方法的趋向也体现在各种有目的性的努力上，即用引人入胜的形式去呈现知识并使获取知识变得令人愉悦。生物中都蕴含着自然的顺序，在履行某些必要职能时，它们会从成就感中得到满足，而这种满足会刺激它们获得更大的成就。正如在幼儿的自我教育中，抓咬珊瑚块和

拆卸玩具的乐趣推动其去了解物质的特性。于是我们逐渐迎合自然的需要，并根据生命的内在规律来调整我们的做法，选择一系列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科目和教学模式。

Thus, then, we are on the highway towards the doctrine long ago enunciated by Pestalozzi, that alike in its order and its methods, education must conform to the natural process of mental evolution—that there is a certain sequence in which the faculties spontaneously develop, and a certain kind of knowledge which each requires during its development; and that it is for us to ascertain this sequence, and supply this knowledge. All the improvements above alluded to are partial applications of this general principle. A nebulous perception of it now prevails among teachers; and it is daily more insisted on in educational works. “The method of nature is the archetype of all methods,” says M. Marcel. “The vital principle in the pursuit is to enable the pupil rightly to instruct himself,” writes Mr. Wyse. The more science familiarises us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ings the more do we see in them an inherent self-sufficingness. A higher knowledge tends continually to limit our interference with the processes of life. As in medicine the old “heroic treatment” has given place to mild treatment, and often no treatment save a normal regimen—as we have found that it is not needful to mould the bodies of babes by bandaging them in papoose fashion or otherwise—as in gaols it is being discovered that no cunningly devised discipline of ours is so efficient in producing reformation as the natural discipline, the making prisoners maintain themselves by productive labour; so in education we are finding that success is to be achieved only by rendering our measures subservient to that spontaneous unfolding which all minds go through in their progress to maturity.

如此，我们就走向了裴斯泰洛齐很久以前提出的理论，他主张教育必须在顺序和方法上符合心智演进的自然过程，能力的自然开发存在一定次序，每项能力的开发都要求一定种类的知识，而我们的责任是明确这一次序并提供这类知识。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有关教育的改善措施都是这一普遍原理的部分应用。现在，教师中盛行着对这一原理的模糊认识，教育著作也日益强调这一原理。马塞尔先生说："自然的方法是一切方法的原型。"怀斯先生写道："教育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使学生能够恰当地自我教育。"科学越使我们了解事物的构造，我们就越能看出它们内在的自给自足。认识的层次越高，我们就越倾向于减少对生命过程的干预。正如在医学中，温和疗法已经替代了旧的"冒险式疗法"，没有任何一种疗法可以与普通的养生疗法相媲美；正如我们知道不必像印第安人那样，用包裹或其他方法塑造婴儿的身体；也正如人们逐渐发现在监狱中改造囚犯时，让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养活自己比任何设计精妙的惩戒都行之有效；在教育中，我们也逐渐发现，只有当所采取的措施有助于心智成熟的自然发展时，我们才能取得成功。

Of course, this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uition, that the arrangement of matter and method must correspond with the order of evolution and mode of activity of the faculties—a principle so obviously true, that once stated it seems almost self-evident—has never been wholly disregarded. Teachers have unavoidably made their school-courses coincide with it in some degree,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education is possible only on that condition. Boys were never taught the rule-of-three until after they had learnt addition. They were not set to write exercises before they had got into their copybooks. Conic sections have always been preceded by Euclid. But the error of the old methods consists in this, that they do not recognise in detail what they are obliged to recognise in general. Yet the principle applies throughout. If from the time when a child is able to conceive two things as related in position, years must

elapse before it can form a true concept of the Earth, as a sphere made up of land and sea, covered with mountains, forests, rivers, and cities, revolving on its axis, and sweeping round the Sun—if it gets from the one concept to the other by degrees—if the intermediate concepts which it forms are consecutively larger and more complicated; is it not manifest that there is a general succession through which only it can pass; that each larger concept is made by the combination of smaller ones, and presupposes them; and that to present any of these compound concepts before the child is in possession of its constituent ones, is only less absurd than to present the final concept of the series before the initial one? In the mastering of every subject some course of increasingly complex ideas has to be gone through. The evolu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faculties consists in the assimilation of these; which, in any true sense, is impossible without they are put into the mind in the normal order. And when this order is not followed, the result is, that they are received with apathy or disgust; and that unless the pupil is intelligent enough to eventually fill up the gaps himself, they lie in his memory as dead facts, capable of being turned to little or no use.

当然，内容和方法的安排必须与能力的演进次序以及活动方式一致，这显然是正确的，几乎不证自明。这一施教的基本原则从未被完全忽视。在某种程度上，教师们已经不可避免地依照此原理安排学校课程，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那样，教育才可能实现。例如，男孩们从来都是先学加法再学比例运算法则；在学写作之前先做字帖练习；在学圆锥曲线之前，一定要先学欧几里得几何学。但是一些老方法的错误在于，学生们只是被动地从大体上认识到了事物，而缺乏对事物细节的认识。然而这一原理却是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假设从儿童能够想象出在位置上相互关联的两件事物算起，他必须经过许多年才能形成关于地球的真实概念，才能明白地球就像一个由陆地和海洋组

成的球体，上面有山脉、森林、河流和城市，它在围着自己的轴自转的同时，也在绕着太阳转。他要逐步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形成数量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大的中介概念。他必须经历这样一个又一个普遍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大的概念都是由若干小概念组合而成，并以小概念为前提的。所以，在儿童未掌握那些组成部分之前，就给他复合概念，其荒谬程度不就等于把一系列连续概念中的最终概念放到初始概念之前了吗？要掌握每门学科，必须经过由简单概念渐渐到复杂概念的过程。必须先消化这些概念，才能发展成为相应的能力，而要真正被吸收，这些概念就必须以正常次序输入心智。若没有遵从正常次序，会导致学生在接受概念的时候，不是漠不关心就是深感厌恶。除非学生足够聪明，最终能自己填补知识上的空白，否则这些概念在他的记忆中都是呆板的事实，用处有限，甚或全无用处。

“But why trouble ourselves about any *curriculum* at all?” it may be asked. “If it be true that the mind like the body has a predetermined course of evolution—if it unfolds spontaneously—if its successive desires for this or that kind of information arise when these are severally required for its nutrition—if there thus exists in itself a prompter to the right species of activity at the right time; why interfere in any way? Why not leave children *wholly* to the discipline of nature?—why not remain quite passive and let them get knowledge as they best can?—why not be consistent throughout?” This is an awkward-looking question. Plausibly implying as it does, that a system of complete *laissez-faire* is the logical outcome of the doctrines set forth, it seems to furnish a disproof of them by *reductio ad absurdum* . In truth, however, they do not, when rightly understood, commit us to any such untenable position. A glance at the physical analogies will clearly show this. It is a general law of all life that the more complex the organism to be produced, the longer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it is dependent on a parent organism for food and protec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inute, rapidly-formed, and self-moving spore of a conferva, and the slowly developed seed of a tree, with its multiplied envelopes and large stock of nutriment laid by to nourish the germ during its first stages of growth, illustrates this law in its application to the vegetal world. Among animal organisms we may trace it in a series of contrasts from the monad whose spontaneously-divided halves are as self-sufficing the moment after their separation as was the original whole; up to man, whose offspring not only passes through a protracted gestation, and subsequently long depends on the breast for sustenance; but after that must have its food artificially administered; must, when it has learned to feed itself, continue to have bread, clothing, and shelter provided; and does not acquire the power of complete self-support until a time varying from fifteen to twenty years after its birth. Now this law applies to the mind as to the body. For mental pabulum also, every higher creature, and especially man, is at first dependent on adult aid. Lacking the ability to move about, the babe is almost as powerless to get materials on which to exercise its perceptions as it is to get supplies for its stomach. Unable to prepare its own food, it is in like manner unable to reduce many kinds of knowledge to a fit form for assimilation. The language through which all higher truths are to be gained, it wholly derives from those surrounding it. And we see in such an example as the Wild Boy of Aveyron, the arrest of development that results when no help is received from parents and nurses. Thus, in providing from day to day the right kind of facts, prepared in the right manner, and giving them in due abundance at appropriate intervals, there is as much scope for active ministration to a child's mind as to its body. In either case it is the chief function of parents to see that the *conditions* requisite to growth are maintained. And, as in supplying aliment, and clothing, and shelter, they may fulfil this function without at all interfering with the spontaneous development of the limbs and viscera either in their

order or mode; so they may supply sounds for imitation, objects for examination, books for reading, problems for solution, and, if they use neither direct nor indirect coercion, may do this without in any way disturbing the normal process of mental evolution; or rather, may greatly facilitate that process. Hence the admission of the doctrines enunciated does not, as some might argue, involve the abandonment of all teaching; but leaves ample room for an active and elaborate course of culture.

或许有人会问："那我们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去定什么课程 呢？如果心智真同身体一样有着预定的发展过程，如果它能自发地展现，当心智需要这类或是那类知识的滋养时，学习这些知识的欲望就会此起彼伏，如果心智本身存在着推动力，在适当的时候推行适当的活动，为什么要以任何形式去干预？为什么不把儿童完全 交予自然去训练？为什么不一直放任，让他们自己去尽力学习知识？为什么不始终如一地坚持这样做？"这问题看起来很棘手。似乎可以推断，完全放任 的制度就是前述这些信条的逻辑结果，通过归谬法 也似乎就可以否定这些信条。然而实际上，只要正确理解这些信条，我们完全可以自圆其说，站稳脚跟。做一个事实类比，就可以很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一切生命的普遍规律是，所要产生的生物体越复杂，它依靠母体提供食物和保护的时间也就越长。丝状绿藻孢子同树木种子之间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规律在植物界的适用。前者微小、发育快速、并自行移动，后者具有多层膜和大量的营养，以为胚芽的早期发育作准备。在动物中，我们可以从一系列的对比中找到这一规律的踪迹。单细胞生物从自然分裂成两半开始，就同原来的整体一样完全自足。人的后代就不仅要经过漫长的孕育期，随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靠母乳维持生命，之后还要人给他喂东西，而在他学会自己饮食以后，还需要继续给他提供吃穿和庇护，直到出生后的十五到二十年间他还没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同身体发育一样，这一规律也适用于心智发展。每个高等动物，尤其是人，最初依赖成人来帮助获取精神食粮。就像无法自己获得食物来填饱肚子一样，由于无法四处探索，婴儿也无法获得材料来锻炼

发展他的知觉。就像他没法自己做饭一样，他也不能将很多类知识转化成适合自己吸收的形式。语言是他能获得一切较高真理的媒介，而语言的获取来自于他周围的环境。以阿韦龙野孩子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孩子不能从父母和保姆那里得到帮助，他的发育就会停顿。所以像照顾他身体一样，在积极地开发儿童心智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每天给儿童提供用正确方法整理的各种知识，并隔一段时间给予一定的分量。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智，家长的主要职责是保证生长所需的各项必要条件 。在父母给儿童提供吃穿和庇护时，他们可以履行此项职责并完全不干扰肢体和器官自然发育的模式和次序。所以，他们同样可以提供用来模仿的声音、用来检查的物品、供孩子读的书、让孩子解答的问题，只要他们不直接或者间接强迫孩子，就不会扰乱心智演进的正常过程，反而会极大地促进这个过程。所以并不像有些人所争辩的那样，承认之前所阐述的信条就意味着放弃所有的教学，而是给积极、仔细的培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Passing from generalities to special considerations it is to be remarked that in practice, the Pestalozzian system seems scarcely to have fulfilled the promise of its theory. We hear of children not at all interested in its lessons—disgusted with them rather; and, so far as we can gather, the Pestalozzian schools have not turned out any unusual proportion of distinguished men—if even they have reached the average. We are not surprised at this. The success of every appliance depends mainly upon the intelligence with which it is used. It is a trite remark, that, having the choicest tools, an unskilful artisan will botch his work; and bad teachers will fail even with the best methods. Indeed, the goodness of the method becomes in such case a cause of failure; as, to continue the simile, the perfection of the tool becomes in undisciplined hands a source of imperfection in results. A simple, unchanging, almost mechanical routine of tuition may be carried out by the commonest intellects, with such small beneficial effect as it is capable of producing; but a

complete system, —a system as heterogeneous in its appliances as the mind in its faculties, —a system proposing a special means for each special end, demands for its right employment powers such as few teachers possess. The mistress of a dame-school can hear spelling-lessons; and any hedge-schoolmaster can drill boys in the multiplication-table; but to teach spelling rightly by using the powers of the letters instead of their names, or to instruct in numerical combinations by experimental synthesis, a modicum of understanding is needful: and to pursue a like rational course throughout the entire range of studies, asks an amount of judgment, of invention, of intellectual sympathy, of analytical faculty, which we shall never see applied to it while the tutorial office is held in such small esteem. The true education is practicable only to the true philosopher. Judge, then, what prospect a philosophical method now has of being acted out! Knowing so little as we yet do of Psychology, and ignorant as our teachers are of that little, what chance has a system which requires Psychology for its basis?

从一般性的讨论转到具体探讨，我们会注意到裴斯泰洛齐的方法在实践中似乎并未达到其理论预期的效果。我们听说儿童对其功课全无兴趣，甚至到了厌恶的地步。而据我们所知，施行实物教学法的学校所培养的杰出人物，即使达到了平均水平，也并没有超出多少。我们对此并不觉得奇怪。任何一个方法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是否运用得聪明得当。常言说，蹩脚工匠即使有了最好的工具也还是会把活弄糟。再好的方法也会被糟糕的教师弄得很失败。确实，在这种情况下，好的方法沦为失败的原因。就像之前的比喻，工具再完美，到了未经培训的人手里，就成了糟糕结果的根源。让一个最普通的人使用一个简单不变的、几乎机械式的教学方法，也会产生它所能产生的微薄益处。但是一套心智发展的完善方法涉及各种官能，非常复杂，而且需要随机应变，灵活调整，所以只有少数教师才具备正确使用它的能力。一个家庭小学的教书婆婆就可以教拼写课程，任何一个露天学校

的教师都可以教学生练乘法表，但是不用字母的名称而用它的发音去正确地教拼音，或用合成实验去教数目的组合就需要有些许理解。而要想将追求理性的课程贯穿于整个学业范围，就需要一定的判断力、创造力和智力上的共鸣以及分析能力。如果教学职业不能得到足够的尊敬，这些能力就不可能被应用到理论课程中。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进行真正的教育。那么请评判，现在将哲学的方法付诸实践会有着怎样的前途呢？我们只掌握了小部分有关心理学的知识，而如果我们的教师连这一小部分也不了解，一套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方法还能有什么希望？

Further hindrance and discouragement has arisen from confounding the Pestalozzian principle with the forms in which it has been embodied. Because particular plans have not answered expectation, discredit has been cast upon the doctrine associated with them; no inquiry being made whether these plans truly conform to such doctrine. Judging as usual by the concrete rather than the abstract, men have blamed the theory for the bunglings of the practice. It is as though Papin's futile attempt to construct a steam-engine had been held to prove that steam could not be used as a motive power. Let it be constantly borne in mind that while right in his fundamental ideas, Pestalozzi was not therefore right in all his applications of them: and we believe the fact to be that he was often wrong. As described even by his admirers, Pestalozzi was a man of partial intuitions, a man who had occasional flashes of insight, rather than a man of systematic thought. His first great success at Stantz was achieved when he had no books or appliances of ordinary teaching, and when “the only object of his attention was to find out at each moment what instruction his children stood peculiarly in need of, and what was the best manner of connecting it with the knowledge they already possessed.” Much of his power was due, not to calmly reasoned-out plans of culture, but to his

profound sympathy, which gave him a quick perception of childish needs and difficulties. He lacked the ability logically to coordinate and develop the truths which he thus from time to time laid hold of; and had in great measure to leave this to his assistants, Kruesi, Tobler, Buss, Niederer, and Schmid. The result is that in their details his own plans, and those vicariously devised, contain numerous crudities and inconsistencies. His nursery-method, described in *The Mother's Manual* , beginning as it does with a nomenclature of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and proceeding next to specify their relative positions, and next their connections, may be proved not at a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itial stages of mental evolution. His process of teaching the mother tongue by formal exercises in the meanings of words a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entences, is quite needless, and must entail on the pupil loss of time, labour, and happiness. His proposed mode of teaching geography is utterly unpestalozzian. And often where his plans are essentially sound they are either incomplete or vitiated by some remnant of the old regime. While, therefore, we would defend in its entire extent the general doctrine which Pestalozzi inaugurated, we think great evil likely to result from an uncritical reception of his specific devices. That tendency which mankind constantly exhibit to canonise the forms and practices along with which any great truth has been bequeathed to them,—their liability to prostrate their intellects before the prophet and swear by his every word,—their proneness to mistake the clothing of the idea for the idea itself; renders it needful to insist strongly up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Pestalozzian system, and the set of expedients devised for its practice: and to suggest that while the one may be considered as established, the other is probably nothing but an adumbration of the normal course. Indeed, on looking at the state of our knowledge we may be quite sure that this is the case. Before our educational methods can be made to harmonise in

character and arrangement with the faculties in their mode and order of unfolding, it is first needful that we ascertain with some completeness how the faculties *do* unfold. At present our knowledge of the matter extends only to a few general notions. These general notions must be developed in detail,—must be transformed into a multitude of specific propositions, before we can be said to possess that *science* on which the *art* of education must be based. And then when we have definitely made out in what succession, and in what combinations the mental powers become active, it remains to choose out of the many possible ways of exercising each of them that which best conforms to its natural mode of action. Evidently, therefore, it is not to be supposed that even our most advanced modes of teaching are the right ones, or nearly the right ones.

裴斯泰洛齐的原理及其表现形式的混淆引起了进一步的障碍和沮丧情绪。由于某些方案不符期望，与它们相关的信条也就受到怀疑，但是我们却没有探究这些方案是否真正符合那一信条。人们总是习惯于根据具体情况而不是根据抽象分析作出判断，因而常把实践中的一些失误归咎于理论。这就好比用帕潘第一次试造蒸汽机的失败来证明蒸汽无法被用作动力一样。要时刻谨记，尽管裴斯泰洛齐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并不能说明其思想的所有应用都是正确的，我们也要相信他经常是错误的这个事实。就连他的仰慕者都说，裴斯泰洛齐是个偏爱直觉的人，偶尔会有深刻见解，但缺乏系统性思维。他第一次获得成功是在施坦斯，那时他没有书籍和一般的教具，“每时每刻，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找出儿童们特别需要的教育，用什么方法最有利于使这种教育与儿童们的已有知识结合起来。”他的大部分影响力不能归功于其冷静分析得出的培养计划，而要归功于他强烈的同情心。同情心让他靠直觉感知到孩子的需要和困难。他缺乏逻辑思维能力去整合和发展自己偶尔掌握的真理，因此，整合工作绝大部分由他的助手克鲁希、托布勒、巴斯、尼德勒、施密德等人去完成。这就导致了他自己的教学计划与助手们设计的教学计划，在细节上有许多粗糙和

矛盾之处。《母亲读物》中这样描述他的育儿方法：先教各个身体器官的名称，然后指出它们的相对部位，再到它们的联系。这已经被证明全然不符合心智演进的初始阶段。他用练习词义造句的呆板方法教授母语，这一过程就非常没有必要，必然导致学生费时耗力，索然寡味。他提出的地理教学模式也全然没有裴斯泰洛齐式的风格。他的一些教学计划基本上合理，但又常常不完整，或者由于一些旧制度的残余而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因此，就整体而言，我们极力拥护裴斯泰洛齐开创的信条，但是我们认为，若不加批判地采用他的具体手段，则可能会导致很大恶果。人类经常呈现一种倾向，即只要是伴随伟大真理流传下来的形式和实践，都会受到推崇。他们容易不经思考地拜倒在先知者面前，用先知们的话来宣誓，将理念的外衣误认为是理念本身，所以需要强调的是，裴斯泰洛齐方法的根本原理和他实践中所涉及的应急手段之间存在区别，前者已被大家认可为一个定论，而后者可能只是一个普通课程的轮廓。从我们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来看，事实的确如此。在使教育方法的性质和安排与能力的发展方式和次序相协调之前，我们首先需要非常明确地了解如何发展一些官能。目前我们仅仅掌握了一些一般性的理念。这些理念必须在细节上加以完善，转换成许多具体的方案，我们才能声称已经掌握了这门作为教育艺术基础的科学 。在我们明确地清楚了心智能力渐渐活跃的次序和组合后，我们仍然要从锻炼心智能力的众多方式中，选择与它的自然活动情况最符合的那一种。因此，显然不能作出推论说最先进的教学方式就是恰当的或是近似恰当的。

Bearing in mind then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rinciple and the practice of Pestalozzi, and inferring from the grounds assigned that the last must necessarily be very defective, the reader will rate at its true worth the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system which some have expressed; and will see that the due realisation of the Pestalozzian idea remains to be achieved. Should he argue, however, from what has just been said that no such realisation is at present practicable, and that all effort ought to be devoted to the

preliminary inquiry; we reply, that though it is not possible for a scheme of culture to be perfected either in matter or form until a rational Psychology has been established, it is possible, with the aid of certain guiding principles, to make empirical approximations towards a perfect scheme. To prepare the way for further research we will now specify these principles. Some of them have already been more or less distinctly implied in the foregoing pages; but it will be well here to state them all in logical order.

我们要牢记裴斯泰洛齐的原理与其实践之间的差别，而从提到的依据来看后者必然很有缺点，我们还要根据其实际价值判断一些人对此方法所表述的不满，进而也就会发现尚需进一步的努力才能够实现裴斯泰洛齐的思想。然而前面那个质疑者可能还会认为，既然根据如上所说目前不可能实施此套方法，就应该集中一切努力去做前期探询。那么我们的回应是，在未建立理性的心理学前，一套培养方案不可能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完美的境地，可是在某些指导原理的帮助下，还是可能在经验上接近完美方案的。为了给进一步的研究开辟道路，我们现在就来详述这些原理。前文中或多或少暗含了一些原理，但是此处最好还是依照逻辑顺序对它们逐一进行阐述。

1．That in education we should proceed from the simple to the complex is a truth which has always been to some extent acted upon; not professedly, indeed, nor by any means consistently. The mind grows. Like all things that grow it progresses from the homogeneous to the heterogeneous; and a normal training system being an objective counterpart of this subjective process, must exhibit the like progression. Moreover, regarding i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we may see that this formula has much wider applications than at first appears. For its *rationale* involves not only that we should proceed from the single to the combined in the teaching of

each branch of knowledge; but that we should do the like with knowledge as a whole. As the mind, consisting at first of but few active faculties; has its later-completed faculties successively awakened, and ultimately comes to have all its faculties in simultaneous action; it follows that our teaching should begin with but few subjects at once, and successively adding to these, should finally carry on all subjects abreast—that not only in its details should education proceed from the simple to the complex, but in its *ensemble* also.

1．教育过程中，我们应该由简入繁。这一真理虽未公然表述，也未见得被一贯实行，但在某种程度上一直被遵循着。心智会成长，像一切成长中的事物一样，从单一发展为多样。作为这一主观过程的客观映衬，一个正常的训练方法必须符合训练对象的发展进程。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这一准则的适用范围要比最初呈现的更为广泛。因为其基本原理 要求我们采取由单一到综合的进程，教授知识的各个分支时如此，教授整体知识时亦如此。在心智早期阶段，只有少数官能在活跃，其他官能在后期才能渐渐得到完善，最终是所有官能一起发挥功用。所以我们的教学一开始只教授少数科目，然后逐渐增加，最后所有科目并行发展。教育的由简入繁不仅体现在细节上，也体现在整体布局 上。

2．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d, as all other development, is an advance from the indefinite to the definite. In common with the rest of the organism, the brain reaches its finished structure only at maturity; and in proportion as its structure is unfinished, its actions are wanting in precision. Hence like the first movements and the first attempts at speech, the first perceptions and thoughts are extremely vague. As from a rudimentary eye, discerning on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ght and darkness, the progress is to an eye that

distinguishes kinds and gradations of colour, and details of form, with the greatest exactness; so, the intellect as a whole and in each faculty, beginning with the rudest discriminations among objects and actions, advances towards discriminations of increasing nicety and distinctness. To this general law our educational course and methods must conform. It is not practicable, nor would it be desirable if practicable, to put precise ideas into the undeveloped mind. We may indeed at an early age communicate the verbal forms in which such ideas are wrapped up; and teachers, who habitually do this, suppose that when the verbal forms have been correctly learnt, the ideas which should fill them have been acquired. But a brief cross-examination of the pupil proves the contrary. It turns out either that the words have been committed to memory with little or no thought about their meaning, or else that the perception of their meaning which has been gained is a very cloudy one. Only as the multiplication of experiences gives materials for definite conceptions—only as observation year by year discloses the less conspicuous attributes which distinguish things and processes previously confounded together—only as each class of co-existences and sequences becomes familiar through the recurrence of cases coming under it—only as the various classes of relations get accurately marked off from each other by mutual limitation, can the exact definitions of advanced knowledge become truly comprehensible. Thus in education we must be content to set out with crude notions. These we must aim to make gradually clearer by facilitating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iences such as will correct, first their greatest errors, and afterwards their successively less marked errors. And the scientific formula must be given only as fast as the conceptions are perfected.

2．心智的发展与其他的发展一样，是由不确定向确定的推进。

人的大脑与其他有机体一样，只有发育成熟时方可形成完整的构造。由于构造中存在未完成的部分，大脑运转时则会出现相应的偏差。因而，如同最初的动作和说话的尝试一样，人最初的感知和想法是极其模糊的。眼睛开始时只能察觉到光明和黑暗的区别，逐渐发展后就能最为精确地区分颜色的种类、深浅以及不同形式细节。同样，人的智力整体及各官能一开始只是对不同的物体和行为有粗浅的区分，通过发展，其区分的精确度和清晰度会越来越高。我们的教育课程和方法必须遵循这种一般规律。使尚不成熟的心智接受精确的思想，这是不可行的，即使可行也不可取。的确，我们可以在早年把蕴含这些思想的字句形式加以传授，老师们就习惯性地这样做，而且他们认为，正确地学会这些思想的文字形式就能获得其中的思想。但一项对学生的简短测试则证明事实恰好相反。结果显示，这些文字要么是很少或是几乎没有加以理解就存入记忆中，要么只获得十分模糊的理解。只有当积累的经验为确切的概念提供材料，当年复一年的观察揭示出不太显著的特征，使以往相互混淆的事物与过程得以区分，当每一种类型的共存和先后顺序通过各自事例的反复出现变得熟悉，当各种关系之间通过相互限制而得到精确的划分，高深学问的精确定义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因此，在教育中，我们必须满足于从粗糙的概念开始，并通过促进获得经验，首先来纠正这些概念中的大错，随后纠正一系列不太显著的小错，竭力使这些未成熟的概念逐渐变得更加清晰。并且，要按照概念完善的速度来制定科学方案。

3．To say that our lessons ought to start from the concrete and end in the abstract, may be considered as in part a repetition of the foregoing. Nevertheless it is a maxim that needs to be stated: if with no other view, then with the view of showing in certain cases what are truly the simple and the complex. For unfortunately there has been much misunderstanding on this point. General formulas which men have devised to express groups of details, and which have severally simplified their conceptions by uniting many facts into one fact, they have supposed must simplify the conceptions of the

child also; quite forgetting that a generalisation is simple onl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whole mass of particular truths it comprehends—that it is more complex than any one of these truths taken singly—that only after many of these single truths have been acquired does the generalisation ease the memory and help the reason—and that to the child not possessing these single truths it is necessarily a mystery. Thus confounding two kinds of simplification, teachers have constantly erred by setting out with "first principles": a proceeding essentially, though not apparently, at variance with the primary rule; which implies that the mind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principles through the medium of examples, and so should be led from the particular to the general—from the concrete to the abstract.

3．课程应该始于具体而止于抽象，这一说法重复了部分前述内容。尽管如此，这条准则还应指出，即使没有其他别的考虑，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要说明真正的简单和复杂指的是什么。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存在很多误解。人们设计了一些普通公式，用来表示众多细节，把许多事实综合成为一个事实来简化概念，他们以为这一定也会简化儿童的概念。他们完全忘记了，唯有与全部个别真理构成的整体相比，概括才相对简单，但它比这些真理中单独抽出的任何一个都要复杂得多。只有先获得了许多这些单一真理以后，概括才容易记住，才能有助于推理，而对于未掌握这些单一真理的孩童来说，概括必然是个难解之谜。因为混淆了这两种简单化，教师们经常犯的错误就在于总是先讲"第一原理"。这种做法表面上看着没有什么，但实质上并不符合基本原则，即讲授原理要通过事例，要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

4．The education of the child must accord both in mode and arrangement with the education of mankind as considered

historically; or in other words, the genesis of knowledge in the individual must follow the same course as the genesis of knowledge in the race. In strictness, this principle may be considered as already expressed by implication; since both, being processes of evolution, must conform to those same general laws of evolution above insisted on, and must therefore agree with each other. Nevertheless this particular parallelism is of value for the specific guidance it affords. To M. Comte we believe society owes the enunciation of this doctrine—a doctrine which we may accept without committing ourselves to his theory of the genesis of knowledge, either in its causes or its order. In support of this doctrine two reasons may be assigned, either of them sufficient to establish it. One is deducible from the law of hereditary transmission as considered in its wider consequences. For if it be true that men exhibit likeness to ancestry both in aspect and character—if it be true that certain mental manifestations, as insanity, will occur in successive members of the same family at the same age—if, passing from individual cases in which the traits of many dead ancestors mixing with those of a few living ones greatly obscure the law, we turn to national types, and remark how the contrasts between them are persistent from age to age—if we remember that these respective types came from a common stock, and that hence the present marke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must have arisen from the action of modifying circumstances upon successive generations who severally transmitted the accumulated effects to their descendants—if we find the differences to be now organic, so that a French child grows into a French man even when brought up among strangers—and if the general fact thus illustrated is true of the whole nature, intellect inclusive; then it follows that if there be an order in which the human race has mastered its various kinds of knowledge, there will arise in every child an aptitude to acquire these kinds of knowledge in the same order. So that even were the order intrinsically

indifferent, it would facilitate education to lead the individual mind through the steps traversed by the general mind. But the order is *not* intrinsically indifferent; and hence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education should be a repetition of civilisation in little. It is alike provable that the historical sequence was, in its main outlines, a necessary one; and that the causes which determined it apply to the child as to the race. Not to specify these causes in detail, it will suffice here to point out that as the mind of humanity placed in the midst of phenomena and striving to comprehend them, has, after endless comparisons, speculations, experiments, and theories, reached its present knowledge of each subject by a specific route; it may rationally be inferr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 and phenomena is such as to prevent this knowledge from being reached by any other route; and that as each child's mind stands in this same relationship to phenomena, they can be accessible to it only through the same route. Hence in deciding upon the right method of educ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method of civilisation will help to guide us.

4．儿童的教育必须在方式和安排上同历史上人类的教育一致。换言之，个人的知识起源必须与种族的知识起源遵循同一进程。严格说来，可以认为这一原理是上文已经提示过的。既然这二者都是演化过程，那必然遵循上文坚持的关于演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必须相互一致。然而，这一特殊的对照具有其价值，因为它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我们认为，人们应该感谢孔德先生提出这一看法。然而，我们在接受这一看法的同时不需要同意他的知识起源理论，包括知识的起源或顺序。有两大理由支持这一观点，而且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保证它的成立。第一条理由是对遗传规律进行广泛的考虑后推理出的。如果人们在外貌和性情方面都与其祖先相似；如果同一家族连续的几代人都在同一年龄心智上发生某种类似的表现，比如精神错乱；如果很多故去祖先的特征与生者特征相混合而使得从个体的角度难以看清遗传规

律，我们可以转而观察遗传规律在不同民族间的反映，并会发现民族间的差异是多么亘古不变、世代相承；如果我们记住这些民族原本都是同根同源的，只是环境的变化影响了连续几代人，每一代都把累积的影响遗传给了下一代，从而造成了他们之间的显著差异；如果我们发现差异现在主要存在于机体方面，法国儿童即使由外国人抚养，长大后依然是法国人；如果上面所阐述的普遍事实是人类整体本质的真实反映，而其中也包括了心智方面，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论，如果人类是按照一定顺序掌握各种知识的话，那么每个儿童都倾向于以相同的顺序获取这些知识。即使这顺序在本质上无关紧要，也会引导个体心智经历大众心智所经历的阶段，对教育起到促进作用。可是这顺序在本质上并非 无关紧要，这就是为什么教育是小规模的文化复演的根本理由。可以证明的是，就其主要轨迹而言，历史的顺序有着必然性，而决定其顺序的因素同样适用于儿童和种族的发展。不用具体列举这些因素，只需在这里指出整个人类心智存在于现象之中，并力图理解这些现象，借助无数的比较、思索、实验和理论，由特定的途径达到目前每门科目的知识。因此可以理性地推论，心智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使人们不能从其他任何途径得到知识，而由于每个儿童的心智与现象之间存在同样的关系，所以他们也就只能通过同样的途径去获取知识。因此，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探究有助于指导我们决定正确的教育方法。

5 . One of the conclusions to which such an inquiry leads, is, that in each branch of instruction we should proceed from the empirical to the rational. A leading fact in human progress is, that every science is evolved out of its corresponding art. It results from the necessity we are under, both individually and as a race, of reaching the abstract by way of the concrete, that there must be practice and an accruing experience with its empirical generalisation, before there can be science. Science is organised knowledge; and before knowledge can be organised, some of it must first be possessed. Every study, therefore, should have a purely

experimental introduction; and only after an ample fund of observations has been accumulated, should reasoning begin. As illustrative applications of this rule, we may instance the modern course of placing grammar, not before language, but after it; or the ordinary custom of prefacing perspective by practical drawing. By and by further applications of it will be indicated.

5．此探究引导我们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我们应该在各科教学中坚持从实验到推理的方法。人类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每门科学都是由其相应的技艺演化而来。这是因为作为个人或种族，我们必然是经过具体达到抽象，先实践并累积经验，进行经验总结，最后成为科学。科学是有条理的知识，而在把知识条理化之前，一定要先掌握足够多的知识。因此，每种学习都应该从纯粹实验入门，只有积累了足够的观察后才能开始推理。我们可以举例说明这一规则的应用，比如现代课程将语法置于语言之后学习，而不是在语言之前；又如在讲透视之前，通常作法是先进行实际绘画。进一步的应用实例将在后面指出。

6．A second corollary from the foregoing general principle, and one which cannot be too strenuously insisted upon, is, that in education the process of self-development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the fullest extent. Children should be led to make their own investigations, and to draw their own inferences. They should be *told* as little as possible, and induced to *discover* as much as possible. Humanity has progressed solely by self-instruction; and that to achieve the best results, each mind must progress somewhat after the same fashion, is continually proved by the marked success of self-made men. Those who have been brought up under the ordinary school-drill, and have carried away with them the idea that education is practicable only in that style, will think it hopeless

to make children their own teachers. If, however, they will call to mind that the all-important knowledge of surrounding objects which a child gets in its early years is got without help—if they will remember that the child is self-taught in the use of its mother tongue—if they will estimate the amount of that experience of life, that out-of-school wisdom, which every boy gathers for himself—if they will mark the unusual intelligence of the uncared-for London *gamin* , as shown in all directions in which his faculties have been tasked—if, further, they will think how many minds have struggled up unaided, not only through the mysteries of our irrationally-planned *curriculum* , but through hosts of other obstacles besides; they will find it a not unreasonable conclusion, that if the subjects be put before him in right order and right form, any pupil of ordinary capacity will surmount his successive difficulties with but little assistance. Who indeed can watch the ceaseless observation, and inquiry, and inference going on in a child's mind, or listen to its acute remarks on matters within the range of its faculties, without perceiving that these powers which it manifests, if brought to bear systematically upon any studies *within the same range* , would readily master them without help? This need for perpetual telling is the result of our stupidity, not of the child's. We drag it away from the facts in which it is interested, and which it is actively assimilating of itself; we put before it facts far too complex for it to understand, and therefore distasteful to it; finding that it will not voluntarily acquire these facts, we thrust them into its mind by force of threats and punishment; by thus denying the knowledge it craves, and cramming it with knowledge it cannot digest, we produce a morbid state of its faculties, and a consequent disgust for knowledge in general; and when, as a result partly of the stolid indolence we have brought on, and partly of still-continued unfitness in its studies, the child can understand nothing without explanation, and becomes a mere passive recipient of our

instruction, we infer that education must necessarily be carried on thus. Having by our method induced helplessness, we straightway make the helplessness a reason for our method. Clearly then, the experience of pedagogues cannot rationally be quoted against the doctrine we are defending. And whoever sees this will see that we may safely follow the method of nature throughout—may, by a skilful ministration, make the mind as self-developing in its later stages as it is in its earlier ones; and that only by doing this can we produce the highest power and activity.

6．上述普遍原理的第二个推论，是无论怎样极力坚持也不过分的，即在教育中应该充分鼓励自我发展的作用。应该引导儿童自己进行调查研究，并自己做出推论，应该尽可能少地给他们讲授 知识，而应该尽可能多地引导他们去探索 。人类完全是通过自我教育取得进步的，而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每个人的心智必须多少以同样方式取得进步，这一点在自己成就一番事业的人身上已经不断地得到印证。那些在学校里接受了常规教育的人，通常以为只有自己经历的那种模式才能实现教育，会觉得不能指望儿童自己给自己当老师。然而，如果他们回想一下就会发现，儿童早期在没有如何帮助的情况下就掌握了关于周围事物非常重要的知识；如果他们记得母语是儿童自己学会的；如果他们预计一下每个孩子自己收获了多少生活经验以及学校教育之外的才智；如果他们注意到无人照顾的伦敦流浪儿 在接受各方面考验时所展现出的特殊智慧；如果他们再想想，有多少人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不仅努力克服了不合理的课程计划 所带来的困惑，还克服了许多其他障碍而不断进步；他们就会得出合理的结论：如果科目的顺序和形式安排得当，普通资质的学生都可以在几乎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战胜一系列困难。在确实看到儿童头脑中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着观察、询问和推理，或听到他对认知范围以内事物的一些敏锐评论后，谁还会意识不到如果系统地将这些用于同一范围内 的功课上，会使其无需帮助就能很轻易地掌握学习它们？需要无休止地对儿童说教，不是因为他们愚蠢，而是因为我们愚蠢。我们不让他们学自己感兴趣

的、积极吸收的知识，却给他们一些复杂的、难以理解的知识，结果引起他们对这类知识的反感。然后，看到他们不会主动学习这些知识，我们便运用威胁和惩罚的手段把这些知识强行塞入他们的头脑。就这样，我们没有提供他们渴求的知识，却填鸭式地塞给他们一些消化不了的知识，我们使他们的能力处于病态，使他们对一切知识产生厌恶感。一方面是我们造成了他们的迟钝懒惰，另一方面是由于所学的东西仍然不适合。结果是，如果不加解释，儿童就什么都不懂，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教育。而我们就推断说教育还必须照这样进行。我们的方法导致了我们的无助，而我们又以无助为理由继续沿用我们的方法。显然，教师的经验不能用来反对我们所主张的信条。任何发现这点的人都会看出，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依照自然的办法去训练，通过适当的处理，使心智在后期阶段像在前期阶段一样自我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具有最高水平的才能和活力的人。

7．As a final test by which to judge any plan of culture, should come the question—Does it create a pleasurable excitement in the pupils? When in doubt whether a particular mode or arrangement is or is not more in harmony with the foregoing principles than some other, we may safely abide by this criterion. Even when, as considered theoretically, the proposed course seems the best, yet if it produces no interest, or less interest than another course, we should relinquish it; for a child's intellectual instincts are more trustworthy than our reasonings. In respect to the knowing-faculties, we may confidently trust in the general law, that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healthful action is pleasurable, while action which gives pain is not healthful. Though at present very incompletely conformed to by the emotional nature, yet by the intellectual nature, or at least by those parts of it which the child exhibits, this law is almost wholly conformed to. The repugnances to this and that study which vex the ordinary teacher, are not innate, but result from his unwise system. Fellenberg says,

“Experience has taught me that *indolence* in young persons is so directly opposite to their natural disposition to activity, that unless it is the consequence of bad education, it is almost invariably connected with some constitutional defect.” And the spontaneous activity to which children are thus prone, is simply the pursuit of those pleasures which the healthful exercise of the faculties gives. It is true that some of the higher mental powers, as yet but little developed in the race, and congenitally possessed in any considerable degree only by the most advanced, are indisposed to the amount of exertion required of them. But these, in virtue of their very complexity, will, in a normal course of culture, come last into exercise; and will therefore have no demands made upon them until the pupil has arrived at an age when ulterior motives can be brought into play, and an indirect pleasure made to counterbalance a direct displeasure. With all faculties lower than these, however, the direct gratification consequent on activity is the normal stimulus; and under good management the only needful stimulus. When we are obliged to fall back upon some other, we must take the fact as evidence that we are on the wrong track. Experience is daily showing with greater clearness, that there is always a method to be found productive of interest—even of delight; and it ever turns out that this is the method proved by all other tests to be the right one.

7．作为评判任何培养计划的终极考验，应该提出这一问题：这种培养计划是否给学生带来一种愉快、兴奋的体验？对于一个特定的培养方式或安排，如果不能判断它是更符合前述原理还是更符合其他原理，那么稳妥的办法就是遵循这个评判标准。有时候，尽管已设定好的课程从理论上看似乎是最好的，但如果儿童对它不感兴趣或其他课程更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它，因为儿童的智力本能比我们的推理更可靠。在获取知识的能力方面，我们对这一普

遍法则深信不疑，即在正常情况下，健康的活动是愉快的，而引起痛苦的活动是不健康的。目前，这一规律虽然在情感方面并不完全适用，但在智力特性上，至少是孩童展现的那一部分，却完全符合。学生们对这种或那种学习的抵触，通常让教师很恼火。其实那些抵触都不是天生的，而是教师们不明智的方式造成的。费伦伯格曾说过："经验使我明白，年轻人的怠惰　与他们喜好活动的自然倾向完全相反，所以这种怠惰若不是不良教育的后果，那么几乎常常是与身体缺陷相关。"儿童喜欢自发活动，仅仅是希望通过健康地使用自己的能力来获得乐趣。的确，到目前为止，某些高级的智力在人类身上还未得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有最优秀的人才天生具备；如今这种能力还未恰当地得到应有的发挥。但是，正由于其复杂性，在培养儿童的标准过程中，最后才训练这些高级智力。因此，直到学生已经到了一个外在动机可以发生作用的年龄，才可以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那时候间接的愉快就可以平衡直接的不愉快。然而，对于一些较低级的能力，活动后的直接满足是种常规刺激，而且只要活动组织得当，仅靠这个刺激就够了。如果我们不得不借助于其他刺激，我们就必须把这一事实作为证明，是我们走错了方向。经验日益明显地说明，总可以找到引起学生兴趣甚至快乐的方法，而且任何其他验证都能证明这一方法是正确的。

With most, these guiding principles will weigh but little if left in this abstract form. Partly, therefore, to exemplify their application, and partly with a view of making sundry specific suggestions, we propose now to pass from the theory of education to the practice of it.

对多数人来说，如果以这种抽象方式呈现，这些指导原理意义不大。因此，我们打算从教育理论转入教育实践，一方面为了举例说明它们的应用，一方面也为了提出各种具体的建议。

It was the opinion of Pestalozzi—an opinion which has ever since his day been gaining ground—that education of some kind should begin from the cradle. Whoever has watched, with any discernment, the wide-eyed gaze of the infant at surrounding objects, knows very well that education *does* begin thus early, whether we intend it or not; and that these fingerings and suckings of everything it can lay hold of, these open-mouthed listenings to every sound, are the first steps in the series which ends in the discovery of unseen planets, the invention of calculating engines, the production of great paintings, or the composition of symphonies and operas. This activity of the faculties from the very first, being spontaneous and inevitable,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shall supply in due variety the materials on which they may exercise themselves; and to the question so put, none but an affirmative answer can be given. As before said, however, agreement with Pestalozzi's theory does not involve agreement with his practice; and here occurs a case in point. Treating of instruction in spelling he says:—

裴斯泰洛齐认为某种教育应当从摇篮时期开始，这一主张自他那时起不断被发展壮大。任何人只要注意到婴儿在大张着眼睛注视着周围的事物，就会明白不管我们是否有意如此，教育的确 在很早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婴儿摸索吮吸能到手的每件东西，张口静听着每一个声音，这些就是一系列活动的开始，而最终他们可能会发现新的行星，发明计算机，创作伟大油画，或是创作交响乐和歌剧。既然能力的这些活动从一开始就是自发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提供各种类型的材料使他们得以练习。对于这样提出的问题，回答只能是肯定的。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说，赞同裴斯泰洛齐的理论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赞同他的实践。下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关于拼写的教学，他说过：

The spelling-book ought, therefore, to contain all the sounds of the language, and these ought to be taught in every family from the earliest infancy. The child who learns his spelling-book ought to repeat them to the infant in the cradle, before it is able to pronounce even one of them, so that they may be deeply impressed upon its mind by frequent repetition.

“拼写课本应该包括语言中所有的发音，这些发音每个家庭应该从最早的婴儿期起就开始教。学拼写课本的儿童应该在摇篮中的婴儿连一个声音都发不出的时候，对着他重复地念，使那些声音能够通过不断重复而深深地印入他的心中。”

Joining this with the suggestions for “a nursery method,” as set down in his *Mother's Manual* , in which he makes the names, positions, connections, numbers, properties, and uses of the limbs and body his first lessons, it becomes clear that Pestalozzi's notions on early mental development were too crude to enable him to devise judicious plans. Let us inquire into the course which Psychology dictates.

结合他在《母亲读物》中建议的“育儿方法”，即把身体四肢的名称、位置、联系、数目、特性和用途作为开始几节课的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出，裴斯泰洛齐对早期心智发展的想法非常粗糙，以至于他自己也无法设计出高明的计划。让我们探究一下心理学所指示的途径。

The earliest impressions which the mind can assimilate, are those given to it by the undecomposable sensations—resistance, light, sound, etc. Manifestly decomposable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cannot exist before the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out of which they are composed. There can be no idea of form until some familiarity with light in its gradations and qualities, or resistance in its different intensities, has been acquired; for, as has been long known, we recognise visible form by means of varieties of light, and tangible form by means of varieties of resistance. Similarly, no articulate sound is cognisable until the inarticulate sounds which go to make it up have been learned. And thus must it be in every other case. Following, therefore, the necessary law of progression from the simple to the complex, we should provide for the infant a sufficiency of objects presenting different degrees and kinds of resistance, a sufficiency of objects reflecting different amounts and qualities of light, and a sufficiency of sounds contrasted in their loudness, their pitch and their *timbre* . How fully this a priori conclusion is confirmed by infantile instincts, all will see on being reminded of the delight which every young child has in biting its toys, in feeling its brother's bright jacket-buttons, and pulling papa's whiskers—how absorbed it becomes in gazing at any gaudily-painted object, to which it applies the word “pretty,” when it can pronounce it, wholly in virtue of the bright colours—and how its face broadens into a laugh at the tattlings of its nurse, the snapping of a visitor's fingers, or any sound which it has not before heard. Fortunately, the ordinary practices of the nursery fulfil these early requirements of education 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Much, however, remains to be done; and it is of more importance that it should be done than at first appears. Every faculty during the period of its greatest activity—the period in which it is spontaneously evolving itself—is capable of receiving more vivid impressions than at any other period. Moreover, as these simplest

elements must eventually be mastered, and as the mastery of them whenever achieved must take time, it becomes an economy of time to occupy this first stage of childhood, during which no other intellectual action is possible, in gaining a complete familiarity with them in all their modifications. Nor let us omit the fact , that both temper and health will be improved by the continual gratification resulting from a due supply of these impressions which every child so greedily assimilates. Space, could it be spared, might here be well filled by some suggestions towards a more systematic ministration to these simplest of the perceptions. But it must suffice to point out that any such ministration ought to be based upon the general truth tha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very faculty, markedly contrasted impressions are the first to be distinguished; that hence sounds greatly differing in loudness and pitch, colours very remote from each other, and substances widely unlike in hardness or texture, should be the first supplied; and that in each case the progression must be by slow degrees to impressions more nearly allied.

心智所能接受的最早印象是那些不可分解的感觉，如阻力、光线和声音等带来的感觉。显然，可分解的意识状态不能先于组成它们的那些意识形态存在。不熟悉光的深浅、性质以及阻力的不同强度，就不可能形成形状的概念，因为我们早就知道，由于光线的差异我们才能够在视觉上认出形状，由于抵抗力的不同才能够在触觉上辨认形状。同样，也要先学会组成它的各个不连续的声音才能认出连续的声音。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也一定是这样。因此，按照由简到繁的必然规律，我们应该给婴儿提供足够的事物，这些事物应该具有不同程度和类型的抵抗力，能反射不同类型和强度的光线，具有大小、高低以及音色不同的声音。任何人只要想到幼儿在咬玩具时，在抚摸哥哥发亮的衣扣时，在拉爸爸胡须时所得到的乐趣，都会看出这个推理性的论断是多么符合婴儿的本能。他那么入神地看着周围五颜六色的事物，

会说话了就都称赞为“漂亮”；而在听到保姆逗他说话、客人弹指头或任何他未听过的声音时，他又会多么喜笑颜开。幸运的是，育儿室的普通活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教育的这些早期要求。然而还有许多事情有待完成，它们比最初应做的事情还要重要。每种天赋在其最活跃的时期，即其自我演化期间，都比其他任何时期更能接收生动的印象。此外，由于这些最简单的东西迟早都得掌握，而且任何时候掌握都需要花费时间，而儿童在早期阶段不可能进行其他智力活动，所以，若在此时让儿童全面熟悉它们的一切变化，就能提高时间的使用效率。而且，适当给儿童提供他们急于吸收的印象，他们就可以不断地得到满足，进而改善脾气，增进健康。如果这里还可以增加些篇幅，我们或许可以再补充一些建议，即如何更加系统地给儿童提供这样的最简单的感知机会。但是，必须指出一点，任何感知的提供都应该遵循一般的演进规律，即在天赋发展过程中，总是先区别一些有显著对比的表象。因此，应该最先提供的是大小高低悬殊的声音，色差较大的颜色，软硬和质地结构差别较大的东西，而在一切情形下，必须慢慢地从一种表象过渡到与之较为接近的另一种表象。

Passing on to object-lessons, which manifestly form a natural continuation of this primary culture of the senses, it is to be remarked, that the system commonly pursued is wholly at variance with the method of nature, as alike exhibited in infancy, in adult life, and in the course of civilisation. “The child,” says M. Marcel, “must be *shown* how all the parts of an object are connected, etc.;” and the various manuals of these object-lessons severally contain lists of the facts which the child is to be *told* respecting each of the things put before it. Now it needs but a glance at the daily life of the infant to see that all the knowledge of things which is gained before the acquirement of speech, is self-gained—that the qualities of hardness and weight associated with certain visual appearances, the possession of particular forms and colours by particular persons, the production of special sounds by animals of special aspects, are

phenomena which it observes for itself. In manhood too, when there are no longer teachers at hand, the observations and inferences required for daily guidance, must be made unhelped; and success in life depends upon the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with which they are made. Is it probable, then, that while the process displayed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ity at large, is repeated alike by the infant and the man, a reverse process must be followed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infancy and manhood? And that too, even in so simple a thing as learning the properties of objects? Is it not obvious, on the contrary, that one method must be pursued throughout? And is not nature perpetually thrusting this method upon us, if we had but the wit to see it, and the humility to adopt it? What can be more manifest than the desire of children for intellectual sympathy? Mark how the infant sitting on your knee thrusts into your face the toy it holds, that you too may look at it. See when it makes a creak with its wet finger on the table, how it turns and looks at you; does it again, and again looks at you; thus saying as clearly as it can—"Hear this new sound." Watch how the elder children coming into the room exclaiming—"Mamma, see what a curious thing," "Mamma, look at this," "Mamma, look at that;" and would continue the habit, did not the silly mamma tell them not to tease her. Observe how, when out with the nurse-maid, each little one runs up to her with the new flower it has gathered, to show her how pretty it is, and to get her also to say it is pretty. Listen to the eager volubility with which every urchin describes any novelty he has been to see, if only he can find some one who will attend with any interest. Does not the induction lie on the surface? Is it not clear that we must conform our course to these intellectual instincts—that we must just systematise the natural process—that we must listen to all the child has to tell us about each object, must induce it to say everything it can think of about such object, must occasionally draw its attention to facts it has not yet observed, with

the view of leading it to notice them itself whenever they recur, and must go on by and by to indicate or supply new series of things for a like exhaustive examination? See the way in which, on this method, the intelligent mother conducts her lessons. Step by step she familiarises her little boy with the names of the simpler attributes, hardness, softness, colour, taste, size, etc., in doing which she finds him eagerly help by bringing this to show her that it is red, and the other to make her feel that it is hard, as fast as she gives him words for these properties. Each additional property, as she draws his attention to it in some fresh thing which he brings her, she takes care to men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ose he already knows; so that by the natural tendency to imitate, he may get into the habit of repeating them one after another. Gradually as there occur cases in which he omits to name one or more of the properties he has become acquainted with, she introduces the practice of asking him whether there is not something more that he can tell her about the thing he has got. Probably he does not understand. After letting him puzzle awhile she tells him; perhaps laughing at him a little for his failure. A few recurrences of this and he perceives what is to be done. When next she says she knows something more about the object than he has told her, his pride is roused; he looks at it intently; he thinks over all that he has heard; and the problem being easy, presently finds it out. He is full of glee at his success, and she sympathises with him. In common with every child, he delights in the discovery of his powers. He wishes for more victories, and goes in quest of more things about which to tell her. As his faculties unfold she adds quality after quality to his list: progressing from hardness and softness to roughness and smoothness, from colour to polish, from simple bodies to composite ones—thus constantly complicating the problem as he gains competence, constantly taxing his attention and memory to a greater extent, constantly maintaining his interest by supplying him

with new impressions such as his mind can assimilate, and constantly gratifying him by conquests over such small difficulties as he can master. In doing this she is manifestly but following out that spontaneous process that was going on during a still earlier period—simply aiding self-evolution; and is aiding it in the mode suggested by the boy's instinctive behaviour to her. Manifestly, too, the course she is pursuing is the one best calculated to establish a habit of exhaustive observation; which is the professed aim of these lessons. To tell a child this and to show it the other, is not to teach it how to observe, but to make it a mere recipient of another's observations: a proceeding which weakens rather than strengthens its powers of self-instruction—which deprives it of the pleasures resulting from successful activity—which presents this all-attractive knowledge under the aspect of formal tuition—and which thus generates that indifference and even disgust with which these object-lessons are not unfrequently regarded. On the other hand, to pursue the course above described is simply to guide the intellect to its appropriate food; to join with the intellectual appetites their natural adjuncts—*amour propre* and the desire for sympathy; to induce by the union of all these an intensity of attention which insures perceptions alike vivid and complete; and to habituate the mind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at practice of self-help which it must ultimately follow.

显然，实物教学显然应该自然承接早期阶段的感知培养，但实物教学中，我们注意到，常采用的做法与在婴儿、成人生活以及文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自然方法大不相同。马塞尔说：“必须向儿童指出 一件物体的各部分是怎样联系的，等等。”不同的实物教学手册都有一个目录，列出了关于摆在儿童面前的每个物品，有多少内容要讲授 给他们听。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儿童的日常生活，就能发现，在获得语言之前，他们就靠自己得到了关于事物的所有知识：硬度和重量和一定

的视觉外形有联系，某些人具有某种体型和肤色，某种动物能发出某些特殊声音，这些都是他自己能观察到的现象。同样，到了成年时期，再没有教师在身边，他必须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自己进行观察和推论，以便时刻指导他的行为，而他一生的成就取决于他的观察是否准确完整。如果整个人类演进的过程在婴儿和成年人身上都在重复，那么在婴儿与成年之间的阶段，这一过程难道会颠倒过来吗？即使在学习事物特性这样简单的事情上难道也会颠倒吗？相反地，一种方法不是显然应该贯彻始终吗？如果我们不能明眼见到，谦虚采用，大自然会持久不断地把这个方法送到我们面前吗？还有什么比儿童渴望智慧上的共鸣更明显的呢？留意你怀抱中的婴儿是如何把他手中的玩具塞到你面前叫你看。再看他用湿手指在桌上一擦出声音就回头看你，擦一次看你一次，再擦一次再看一次。他是在用自己最清楚的方式对你说："听这个新的声音。"再看较大的儿童，进屋就嚷嚷"妈妈，看这个好玩的东西"，"妈妈，瞧这个"，"妈妈，瞧那个"。如果愚笨的妈妈没有叫他们少吵少闹，他们一定把这个习惯保留下去。再注意孩子们和保姆外出时，每人都跑来把所采的新花拿给她看，告诉她花多么漂亮，还要她也说花漂亮。再看看那些健谈的顽童，只要有人有兴趣听他们说，他们是多么热心地讲他所见到的一切新鲜事物。结论不是很明显吗？已经明确地指出：我们必须遵循这些智力本能来安排课程——仅仅需要把自然的过程加以系统化，我们必须听儿童说完每件事情，引导他们把对这些事物所能想到的一切都说出来，还要偶尔引导他们注意一些没有观察到的事实，使他们下次再见到时可以留意，并继续逐渐给他们指出或提供一系列新事物让他们照样去详尽观察。请看聪明的母亲是如何照这种方法教育孩子的。她先让儿子逐步熟悉较为简单的属性名称，比如硬、软、颜色、味道、大小等。在此过程中，她发现孩子积极配合，只要一教给他这些表示属性的单词，他就拿这个来给她看是红的，拿那个来让她摸是硬的。在引导他注意所拿新东西的新属性时，母亲总是特意提及一些他已经知道的属性，因为他有好模仿的自然倾向，他就会习惯于把新的旧的放在一起重复念。逐渐地，他有时会遗漏一两个他已经熟悉的属性，而此时母亲的方法是问他：关于手中的东西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告诉她的。或许他不懂，那就让他迷惑一阵，然后再告诉他，或许还可以笑笑他的失败。照这

样反复几次，他就会明白要干什么了。往后，等他讲完了这件东西的相关情况，母亲再做一些其他的补充，就会激发他的自尊心，他聚精会神地看，回想他所听到的一切。问题本来不难，他一会儿就解决了。取得成功，他十分高兴，母亲也分享着他的喜悦。他和每个儿童一样，享受发现自己拥有的本领的乐趣。他想取得更多的胜利，就去找寻更多的东西来告诉母亲。随着孩子能力的发展，母亲把性质一个个地往他的表上加，从软硬升级到光滑与粗糙，从颜色升级到光彩，从简单物体升级到复杂物体。就这样，在他增加本领的时候将问题不断复杂化，不断提高他对注意力和记忆的要求，不断地提供给他心智能吸收的新印象，以培养他的兴趣，不断地使他在对一些小困难克服中获得满足。照这样的做法，她显然只是继续那个早期就已经进行的自发过程，母亲只是采用了孩子的本能行为指给她的方法来帮助孩子发展。同样，她所采用的办法显然最适合于养成周密观察的习惯，而那习惯正是这些功课提出的目标。给儿童讲 这个，给他指 那个，这并不是在教他如何观察，仅仅是在教他接受别人的观察结果。这一方法以灌输的方式呈现有趣的知识，只会削弱而不能加强他的自我教育能力，更不能使他从成功的活动中得到乐趣。因此，这套方法常常引起儿童的冷淡甚至厌恶，这一点在实物教学中很常见。另一方面，上述过程不过是给智力提供合适的食粮，使求知欲与它的自然伴侣——自尊 和渴望赞同相结合，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引起密切关注，以保证知觉的鲜明完整，同时使心智一开始就习惯于它终究要进行的自我帮助的实践活动。

Object-lessons should not only be carried on after quite a different fashion from that commonly pursued, but should be extended to a range of things far wider, and continued to a period far later, than now. They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contents of the house; but should include those of the fields and the hedges, the quarry and the sea-shore. They should not cease with early childhood; but should be so kept up during youth, as insensibly to merge into the investigations of the naturalist and the man of

science. Here again we have but to follow nature's leadings. Where can be seen an intenser delight than that of children picking up new flowers and watching new insects, or hoarding pebbles and shells? And who is there but perceives that by sympathising with them they may be led on to any extent of inquiry into the qualities and structures of these things? Every botanist who has had children with him in the woods and the lanes must have noticed how eagerly they joined in his pursuits, how keenly they searched out plants for him, how intently they watched whilst he examined them, how they overwhelmed him with questions. The consistent follower of Bacon —the "servant and interpreter of nature," will see that we ought modestly to adopt the course of culture thus indicated. Having gained due familiarity with the simpler properties of inorganic objects, the child should by the same process be led on to a like exhaustive examination of the things it picks up in its daily walks—the less complex facts they present being alone noticed at first: in plants, colours, numbers, and forms of the petals, and shapes of the stalks and leaves; in insects, the numbers of the wings, legs, and antennæ, and their colours. As these become fully appreciated and invariably observed, further facts may be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in the one case, the numbers of stamens and pistils, the forms of the flowers, whether radial or bilateral in symmetry, the arrangement and character of the leaves, whether opposite or alternate, stalked or sessile, smooth or hairy, serrated, toothed, or crenate; in the other, the divisions of the body, the segments of the abdomen, the markings of the wings, the number of joints in the legs, and the forms of the smaller organs—the system pursued throughout being that of making it the child's ambition to say respecting everything it finds all that can be said. Then when a fit age has been reached, the means of preserving these plants, which have become so interesting in virtue of the knowledge obtained of them, may as a great favour be supplied; and eventually, as a still greater favour, may also be

supplied the apparatus needful for keeping the larvæ of our common butterflies and moths through their transformations—a practice which, as we can personally testify, yields the highest gratification; is continued with ardour for years; when join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an entomological collection, adds immense interest to Saturday-afternoon rambles; and forms an admirable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hysiology.

实物教学不仅应该采用有别于一般做法的形式，其应用范围也应该比现在更大，持续时间也应该比现在更长。不应该局限于室内的东西，也应该包括田野、树丛、山边以及海洋的事物。实物教学也不应该在儿童早期一完就结束，而应该持续到青年期，并不知不觉地转入博物学家和科学家的调查研究范围。在这里我们只需遵循自然的指引。在哪里还能体验到比儿童采集新鲜花卉、观看新奇昆虫，或收集石块贝壳更大的愉快？谁会觉察不到，仅仅认同并分享这种快乐，就能激发他们更大的兴趣来探讨这些事物的性质和构造？带着儿童去过树林和田野的植物学家，一定都注意到了他们是多么积极地加入他的搜寻，多么敏锐地帮他寻找植物，多么专心地看他进行检查，拿着那么多的问题围着问他。培根的坚定追随者，即所谓的“自然的仆人和解释者”，会看到我们应该虚心地采纳这里提出的培养方法。熟悉了无机物体的较为简单的特性之后，就应该以同样的方法去引导儿童去详尽查考他每天散步时采集来的东西。开始先注意到它们表现出的一些不太复杂的事实：植物花瓣的颜色、数目和形状以及茎叶的形状；昆虫的翅、肢、触角的数量和颜色。完全认清和反复观察了这些以后，就可以依次介绍进一步的事实：对植物来说，看它雌雄蕊的数目，看花的形状是辐射状还是左右对称状，看叶的特点和排列，是对生还是互生，是有柄还是无柄，是光滑的还是有毛的，是锯齿状的、有齿的、还是钝齿状的；对昆虫来说，看它的身体部分，腹部的环节数，翅上的记号，腿的关节数，小器官的形状等等。这里贯彻的方法就是使儿童有雄心，找到每一个物体后，说出他所能说出的一切。等他们到了适当年龄，就可以教授一些保存植物的方法，有了这些相关

知识，植物就变得非常有趣了，而且对他们十分有益。最后更进一步，可以给他们提供仪器来保存各个变化阶段中的蝴蝶、飞蛾的幼虫。我们的个人经验表明，这个办法可以使儿童获得最大满足，可以使他们的热情维持很多年，如果同采集昆虫结合，还可以极大地增加他们周末郊游的兴趣，从而成为研究生理学的一个良好入门。

We are quite prepared to hear from many that all this is throwing away time and energy; and that children would be much better occupied in writing their copies or learning their pence-tables, and so fitting themselves for the business of life. We regret that such crude ideas of what constitutes education, and such a narrow conception of utility, should still be generally prevalent. Saying nothing on the need for a systematic culture of the perceptions and the value of the practices above inculcated, as subserving that need, we are prepared to defend them even on the score of the knowledge gained. If men are to be mere cits, mere porers over ledgers, with no ideas beyond their trades—if it is well that they should be as the cockney whose conception of rural pleasures extends no further than sitting in a tea garden smoking pipes and drinking porter; or as the squire who thinks of woods as places for shooting in, of uncultivated plants as nothing but weeds, and who classifies animals into game, vermin, and stock—then indeed it is needless for men to learn anything that does not directly help to replenish the till and fill the larder. But if there is a more worthy aim for us than to be drudges—if there are other uses in the things around us than their power to bring money—if there are higher faculties to be exercised than acquisitive and sensual ones—if the pleasures which poetry and art and science and philosophy can bring are of any moment—then is it desirable that the instinctive inclination which every child shows to observe natural beauties and investigate natural phenomena, should be encouraged.

But this gross utilitarianism which is content to come into the world and quit it again without knowing what kind of a world it is or what it contains, may be met on its own ground. It will by and by be found that a knowledge of the laws of lif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other knowledge whatever—that the laws of life include not only all bodily and mental processes, but by implication all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house and the street, all commerce, all politics, all morals—and that therefore without a due acquaintance with them neither personal nor social conduct can be rightly regulated. It will eventually be seen too, that the laws of life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throughout the whole organic creation; and further, that they cannot be properly understood in their complex manifestations until they have been studied in their simpler ones. And when this is seen, it will be also seen that in aiding the child to acquire the out-of-door information for which it shows so great an avidity, and in encouraging the acquisition of such information throughout youth, we are simply inducing it to store up the raw material for future organisation—the facts that will one day bring home to it with due force, those great generalisations of science by which actions may be rightly guided.

我们早有准备，知道有许多人会说这一切都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不如让儿童抄写字句或背诵货币表，为将来谋生做准备。教育中竟然还流行如此浅薄的想法、如此狭隘的功利观念，我们深感遗憾。且不提我们需要系统地培养感知能力的必要性，也不提上述做法在满足那些需求中的价值，仅仅从所获知识的范围这点上，我们就能为这种做法辩护。如果人们只想成为普通人，只会看账本而不需要知道自己本行买卖以外的任何事情，如果他们像伦敦平民一样，认为除了在茶园抽烟喝酒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乡间乐趣，或是像个乡绅一样，认为树林只是个打猎的地方，野生植物全是蔓草，只会把动物分为狩猎对象、有害兽类和家畜三种，那的确没有必要学习那些与装满钱柜肉仓无关

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在忙于谋生外还有更高的目标，如果周围的事物除了能生利外还有其他用处，如果除了赚钱或其他世俗能力外，还有更多的高级能力需要发挥，如果诗歌、艺术、科学和哲学带来的乐趣是有价值的，那么就最好能对每个儿童在观察自然美妙和研究自然现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能倾向进行鼓励。极端功利主义只满足于来到世界又离开世界，却不关心这个世界是什么或这个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站不住脚的。我们很快就会认识到，关于生命规律的知识比任何其他知识都重要。生命规律不仅包括身心过程，还暗含了街头屋内一切来往、贸易、政治以及道德。因此，不懂得它们，就不能正确调节个人和社会的行为。我们最终还会发现，生命规律在整个有机界中的演进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有先研究它们较为简单的表现，才能正确理解那些较复杂的表现。注意到这点之后，也就可以看出，通过帮助儿童获得他们非常渴望的户外知识，并且鼓励他们在少年时期探索这类知识，我们所起的作用不过是引导他们积累素材以供日后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将来的某一天，在论证那些可以正确指导人们行为的伟大科学理论的过程中，人们会意识到它们的重要作用。

The spreading recognition of drawing as an element of education, is one amongst many signs of the more rational views on mental culture now beginning to prevail. Once more it may be remarked that teachers are at length adopting the course which nature has for ages been pressing upon their notice. The spontaneous efforts made by children to represent the men, houses, trees, and animals around them—on a slate if they can get nothing better, or with lead-pencil on paper, if they can beg them—are familiar to all. To be shown through a picture-book is one of their highest gratifications; and as usual, their strong imitative tendency presently generates in them the ambition to make pictures themselves also. This attempt to depict the striking things they see is a further instinctive exercise of the perceptions—a means

whereby still greater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observation is induced. And alike by seeking to interest us in their discoveries of the sensible properties of things, and by their endeavours to draw, they solicit from us just that kind of culture which they most need.

现在，对心智培养较理性的观点已经开始盛行，其标志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绘画是教育内容的一部分。这里需要再次强调，教师终究还是要采用那个大自然不断地迫使他们注意的方法。大家都知道儿童会自发地描绘周围的人物、房舍、树木和动物，有纸和笔更好，没有的话就在石板上画。给他们看画册，是最使他们满足的事情之一。他们那强烈的模仿倾向，照例很快就使得他们想自己作画。努力想描绘他们看见的引人注目的事物，就是进一步地对知觉进行本能训练，从而促使观察更加准确和完整。他们在努力作画的同时，同样需要我们关注他们所发现事物的感性特点，这就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正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

Had teachers been guided by nature's hints, not only in the making of drawing a part of education, but in the choice of their modes of teaching it, they would have done still better than they have done. What is it that the child first tries to represent? Things that are large, things that are attractive in colour, things round which its pleasurable associations most cluster—human beings from whom it has received so many emotions, cows and dogs which interest by the many phenomena they present, houses that are hourly visible and strike by their size and contrast of parts. And which of all the processes of representation gives it most delight? Colouring. Paper and pencil are good in default of something better; but a box of paints and a brush—these are the treasures. The drawing of outlines immediately becomes secondary to colouring—is gone through mainly with a view to the colouring; and if leave

can be got to colour a book of prints, how great is the favour! Now, ridiculous as such a position will seem to drawing-masters who postpone colouring and who teach form by a dreary discipline of copying lines, we believe that the course of culture thus indicated is the right one. That priority of colour to form, which, as already pointed out, has a psychological basis, and in virtue of which psychological basis arises this strong preference in the child, should he recognis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lso the things imitated should be real. That greater delight in colour which is not only conspicuous in children but persists in most persons throughout life, should be continuously employed as the natural stimulus to the mastery of the comparatively difficult and unattractive form—should be the prospective reward for the achievement of form. And these instinctive attempts to represent interesting actualities should be all along encouraged; in the conviction that as, by a widening experience, smaller and more practicable objects become interesting, they too will be attempted; and that so a gradual approximation will be made towards imitations having some resemblance to the realities. The extreme indefiniteness which, in conformity with the law of evolution, these first attempts exhibit, is anything but a reason for ignoring them. No matter how grotesque the shapes produced: no matter how daubed and glaring the colours.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the child is producing good drawings.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it is developing its faculties. It has first to gain some command over its fingers, some crude notions of likeness; and this practice is better than any other for these ends; seeing that it is the spontaneous and the interesting one. During these early years, be it remembered, no formal drawing-lessons are possible. Shall we therefore repress, or neglect to aid, these efforts at self-culture? or shall we encourage and guide them as normal exercises of the perceptions and the powers of manipulation? If by

the supply of cheap woodcuts to be coloured, and simple contour-maps to have their boundary-lines tinted, we can not only pleasurably draw out the faculty of colour, but can incidentally produce some familiarity with the outlines of things and countries, and some ability to move the brush steadily; and if by the supply of temptingly-painted objects we can keep up the instinctive practice of making representations, however rough, it must happen that by the time drawing is commonly commenced there will exist a facility that would else have been absent. Time will have been gained; and trouble, both to teacher and pupil, saved.

如果教师不只是遵照大自然的指示把绘画当成教育的一部分，同时也照它的指示选择教授绘画的方法，那么他们会比目前做得更好。儿童最初想描绘什么？大的事物，颜色吸引人的事物，引起他的愉快联想的一些事物，给了他许多情感体验的人，一些有趣的牛和狗，还有常见的、大小和各部分对比鲜明的房舍。在所有呈现过程中，他最喜欢什么？上色。如果条件有限，只要有纸和铅笔就够了，但是如果有一盒颜料和一支画笔，那就真得到宝贝了。与上色相比，画轮廓立马就成为次要的，因为主要是为了上色才画轮廓。要是准他给书上的图着色，那是多么大的乐趣！一些绘画教师会觉得这个主张有些可笑，他们通常先用繁杂的描线练习来教形状，之后才教上色。而我们却相信自己在这里主张的培养途径是正确的。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先涂颜色后绘形状是有其心理学基础的，而这可以引起儿童的强烈偏爱，从最开始这一点就应当得到承认，同时儿童刚开始所临摹的也应该是真实的东西。不光是儿童从色彩中获得极大乐趣，大多数人终身都是这样。色彩的极大乐趣，应该始终用作自然的刺激，去督促儿童掌握比较难懂或不大吸引人的图形，把他们期待的上色乐趣作为画好轮廓的奖励。应该不断鼓励儿童这种天生想要描绘有趣实物的努力，因为我们坚信，随着经验逐渐丰富，较小较实际的物体会变得有趣，儿童也一定更愿意去试着描绘它们。这样一来，儿童所临摹的东西就会越来越接近现实。刚开始的时候画得极不准确是符合演化规律的，

绝对不能作为理由去忽视它们。不要去在意他画出来的形状有多古怪，颜色有多么混乱和刺眼。问题不在于儿童是否作出了好画，而在于他是否发展了自己身体的能力。他首先要学会控制手指，对怎样才能画得像有些初步了解。为了这些目的，这种练习比其他任何练习都好，如果它是自发的、有趣的。儿童早期不能上正规的图画课，那么我们究竟是压制或忽视这些自我培养的努力，还是去鼓励和指导这些努力，使之成为知觉和技能的正常练习呢？如果让他在廉价木刻上着色，用颜色在简易的等高线图上画边界，我们不仅偷快地培养了他辨别颜色的能力，也顺便使他熟悉了一些物体和国家的大概轮廓，并且使他具备了平稳运笔的能力。如果我们提供给他一些着色精美的物件，使他继续本能的描绘练习，不论多么粗糙，等到上图画课的时候，他一定会具备某种其他途径获取不了的优势。这样不仅节约时间，而且给教师和学生两方面都省去了麻烦。

From all that has been said, it may be readily inferred that we wholly disapprove of the practice of drawing from copies; and still more so of that formal discipline in making straight lines and curved lines and compound lines, with which it is the fashion of some teachers to begin. We regret to find that the Society of Arts has recently, in its series of manuals on “Rudimentary Art Instruction,” given its countenance to an elementary drawing-book, which is the most vicious in principle that we have seen. We refer to the *Outline from Outline, or from the Flat* , by John Bell, sculptor. As expressed in the prefatory note, this publication proposes “to place before the student a simple, yet logical mode of instruction;” and to this end sets out with a number of definitions thus:

综上所述，可以作此推论：我们完全不赞成照样描图的做法，更谴责某些教师一开始就进行那些画直线、曲线和复合线的形式训练。我们很遗憾地发现，艺术学会最近在一套关于《初步艺术教学》的手

册中，鼓吹了一本初级绘画书，即雕塑家约翰·贝尔所作的《从轮廓或平面求轮廓》一书，这大概是我们目前见到的原则上偏离得最远的一本书。照其序言所说，这本书旨在“给学生提供简单却符合逻辑的教法”，为此他给出了一些定义：

A simple line in drawing is a thin mark drawn from one point to another.

“绘画中简单线条是从一点到另一点画的细小的标记。

Lines may be divided, as to their nature in drawing, into two classes:—

“根据在图画中的性质，线条可以被分成两类：

1．Straight, which are marks that go the shortest road between two points, as A B.

“1．直线，标记着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例如AB。

2．Or Curved, which are marks which do not go the shortest road between two points, as C D.

“2．曲线，标记着两点间并非最短的路径，例如CD。”

And so the introduction progresses to horizontal lines, perpendicular lines, oblique lines, angles of the several kinds, and the various figures which lines and angles make up. The work is, in short, a grammar of form, with exercises. And thus the system of commencing with a dry analysis of elements, which, in the teaching of language, has been exploded, is to be reinstituted in the teaching of drawing. We are to set out with the definite, instead of with the indefinite. The abstract is to be preliminary to the concrete. Scientific conceptions are to precede empirical experiences. That this is an inversion of the normal order, we need scarcely repeat. It has been well said concerning the custom of prefacing the art of speaking any tongue by a drilling in the parts of speech and their functions, that it is about as reasonable as prefacing the art of walking by a course of lessons on the bones, muscles, and nerves of the legs; and much the same thing may be said of the proposal to preface the art of representing objects, by a nomenclature and definitions of the lines which they yield on analysis. These technicalities are alike repulsive and needless. They render the study distasteful at the very outset; and all with the view of teaching that, which, in the course of practice, will be learnt unconsciously. Just as the child incidentally gathers the meanings of ordinary word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going on around it, without the help of dictionaries; so, from the remarks on objects, pictures, and its own drawings, will it presently acquire, not only without effort but even pleasurably, those same scientific terms, which, if presented at first, are a mystery and a weariness.

接着，书上照这样依次介绍了水平线、垂直线、斜线、几种夹角、线条与夹角构成的各种图形。简而言之，这本书就是用语法的形式来教授绘画，并辅之以练习。就这样，那个在语言教学中已经被打破了的、一开始就把组成部分加以枯燥分析的办法，又在绘画教学中重新建立起来了。我们从确定的东西开始着手，而非不确定的。抽象的概念被放在具体的事物之前，科学概念被置于实践经验之前，不用多说，这无疑颠倒了正常的顺序。习惯上，关于词的分类和功能的练习一般被作为学习任何语言的开端。有人很形象地批评了这个办法，说它的合理程度，好比要通过一套介绍腿部骨骼、肌肉和神经的课程来教会走路一样。其实，像刚刚提到的，把通过分析来定义、命名线条的方法作为学习绘画技巧的开始，也是一样的荒诞。这些术语不但使人反感，也毫无必要。它们使学习一开始就索然无味，目的是教一些通过练习就可以下意识掌握的东西。儿童无须借助字典即能够在不经意间从四周的谈话中获得普通词语的含义，从观察事物、图片和他自己的绘画中毫不费力甚至愉快地掌握一些科学术语，但如果一开始就教给他那些术语，他一定会觉得难以理解，感到厌倦。

If any dependence is to be placed up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that have been laid dow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o draw should be throughout continuous with those efforts of early childhood described above, as so worthy of encouragement. By the time that the voluntary practice thus initiated has given some steadiness of hand, and some tolerable ideas of proportion, there will have arisen a vague notion of body as presenting its three dimensions in perspective. And when, after sundry abortive, Chinese-like attempts to render this appearance on paper, there has grown up a pretty clear perception of the thing to be achieved, and a desire to achieve it, a first lesson in empirical perspective may be given by means of the apparatus occasionally used in explaining perspective as a science. This sounds formidable; but the experiment is both comprehensive and interesting to any boy or girl

of ordinary intelligence. A plate of glass so framed as to stand vertically on the table, being placed before the pupil, and a book, or like simple object laid on the other side of it, he is requested, whilst keeping the eye in one position, to make ink dots upon the glass, so that they may coincide with, or hide the corners of this object. He is then told to join these dots by lines; on doing which he perceives that the lines he makes hide, or coincide with, the outlines of the object. And then, on being asked to put a sheet of pap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glass, he discovers that the lines he has thus drawn represent the object as he saw it. They not only look like it, but he perceives that they must be like it, because he made them agree with its outlines; and by removing the paper he can repeatedly convince himself that they do agree with its outlines. The fact is new and striking; and serves him as an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that lines of certain lengths, placed in certain directions on a plane, can represent lines of other lengths, and having other directions in space. Subsequently, by gradually changing the position of the object, he may be led to observe how some lines shorten and disappear, whilst others come into sight and lengthen. The convergence of parallel lines, and, indeed, all the leading facts of perspective may, from time to time, be similarly illustrated to him. If he has been duly accustomed to self-help, he will gladly, when it is suggested, make the attempt to draw one of these outlines upon paper, by the eye only; and it may soon be made an exciting aim to produce, unassisted, a representation, as like as he can, to one subsequently sketched on the glass. Thus, without the unintelligent, mechanical practice of copying other drawings, but by a method at once simple and attractive—rational, yet not abstract, a familiarity with the linear appearances of things, and a faculty of rendering them, may be, step by step, acquired. To which advantages add these:—that even thus early the pupil learns, almost unconsciously, the true theory of a picture—namely, that it is a delineation of

objects as they appear when projected on a plane placed between them and the eye; and that when he reaches a fit age for commencing scientific perspective he is already thoroughly acquainted with the facts which form its logical basis.

只要稍微依据我们主张的那些一般性教育原则，儿童学画的过程就应该与前文所述的儿童早期学画的情况别无二致，是值得鼓励的。等到这些早期的自愿练习使他能够比较稳定地握笔，并多少有些比例的概念时，他就会对物体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能够用透视的方法使物体立体化。当他尝试像中国画似的把外貌画在纸上，并且经历几次失败后，他就已经比较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并且也很想去做。这时就可以借助经常用来解释透视科学的仪器，给他上实证透视画法的第一课。这个办法听起来有些难度，但是任何一个普通智力水平的男孩女孩都能理解这个实验，也会对此感兴趣。把一块玻璃安放在一个和桌面垂直的架子上，摆到学生前面，把一本书或其他类似的简单物件放在玻璃的另一边，然后叫他眼睛不要动，同时在玻璃上用墨水作一些点，使那些点和物件的一些角的端点重合或遮住那些角的端点。接下来，再让他用线把这些点连起来。照这样一画，他会看出所画的线遮住了物件的轮廓或与物体的轮廓重合。再把一张纸衬在玻璃后面，他发现自己所画的线条就描绘了他所看见的物体。不仅那些线条看起来像那个物体，而且他也认定一定会很像，因为他使那些线条和物体的轮廓贴合。只要把纸拿开，他就可以反复说服自己它们的确同那轮廓一致。这一事实是全新的、引人注目的，给了孩子一个实验证明，证明某种长度的线条，照不同的方向放在一个平面上，会出现不同的长度，在空间上方向也不同。接着，通过逐渐改变物件的位置，引导他观察一些线条如何缩短以至于消失，而其他线条又如何出现和延长。平行线的重合和透视中的一切主要事实都可照这样逐步说明。如果他已多少习惯于独立行事，当建议他仅靠目测在纸上画出这些轮廓时，他一定乐意这样尝试。然后不久就可以为他设定一个令人兴奋的目标，即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画出一个图形，并且尽可能接近事后在玻璃上画的图。这样，无须那个愚笨且机械的临摹办法，而通过一

个简单有趣的、既合理又不抽象的方法，就能使孩子逐渐熟悉事物的线性外观，获得把它们画出来的能力。除了这些优点，还有就是学生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几乎就已经不自觉地学会了图像的真正理论，即照着事物投射在眼睛和它之间的一个平面上的物体来画。而等他到了适当年龄，开始学习科学的透视现象时，他就已经非常熟悉构成其逻辑基础的事实了。

As exhibiting a rational mode of communicating primary conceptions in geometry, we cannot do better than quo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Mr. Wyse:—

如果要介绍关于几何基本概念的合理教法，最好莫过于引用怀斯先生下列这段话：

> A child has been in the habit of using cubes for arithmetic; let him use them also for the elements of geometry. I would begin with solids, the reverse of the usual plan. It saves all the difficulty of absurd definitions, and bad explanations on points, lines, and surfaces, which are nothing but abstractions…A cube presents many of the principal elements of geometry; it at once exhibits points, straight lines, parallel lines, angles, parallelograms, etc. These cubes are divisible into various parts. The pupil has already been familiarized with such divisions in numeration, and he now proceeds to a comparison of their several parts, and of the relation of these parts to each other…From thence he advances to globes, which

furnish him with elementary notions of the circle, of curves generally, etc.

“如果儿童已习惯于在算术中使用小方块儿，那就让他通过小方块儿来学习几何的初步知识。跟通常的办法相反，我打算从立体图形开始教。那样可以省去一些麻烦，不用给点、线、平面去下些不合理的定义，做些糟糕的解释，因为这些定义和解释都不过是些抽象说法……一个小方块儿表现了几何学的许多主要因素，一下子就展示了点、直线、平行线、角、平行四边形等等。这些小方块儿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这种组成学生在计算中既然已经熟悉了，那么现在就可以进一步去比较各个部分，比较各个部分彼此的关系……从此他就可以进入到球体的学习，从中概括得到圆形和曲线的基本概念等等。

Being tolerably familiar with solids, he may now substitute planes. The transition may be made very easy. Let the cube, for instance, be cut into thin divisions, and placed on paper; he will then see as many plane rectangles as he has divisions; so with all the others. Globes may be treated in the same manner; he will thus see how surfaces really are generated, and be enabled to abstract them with facility in every solid.

“基本熟悉立体图形之后，他就可用平面来取而代之。这个转变非常容易做到。例如，可以把小方块儿切成很薄的部分，放在纸上，然后他看到小方块儿

被分成几个部分，就出现几个平面矩形。其他立体图形也一样，球体也可以照这样处理。这样他就可以看出如何生成平面，并能够很容易地从每个立体中把它们抽象出来。

He has thus acquired the alphabet and reading of geometry. He now proceeds to write it.

“这样他就达到了几何的入门，学会了解读几何。接下来他就要着手画几何图形了。

The simplest operation, and therefore the first, is merely to place these planes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s the pencil round them. When this has been frequently done, the plane may be put at a little distance, and the child required copying it, and so on.

“最简单的动作，因此也是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些平面放在纸上用铅笔绕着画。照这样做了多次以后，就可把平面放在不远处，要求儿童去临摹等等。”

A stock of geometrical conceptions having been obtained, in some such manner as this recommended by Mr. Wyse, a further step may, in course of time, be taken, by introducing the practice of testing the correctness of all figures drawn by the eye; thus alike

exciting an ambition to make them exact, and continually illustrating the difficulty of fulfilling that ambition.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geometry had its origin (as, indeed, the word implies) in the methods discovered by artisans and others, of making accurate measurement for the foundations of buildings, areas of inclosures, and the like; and that its truths came to be treasured up, merely with a view to their immediate utility. They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the pupil under analogous relationships. In the cutting out of pieces for his card-houses, in the drawing of ornamental diagrams for colouring, and in those various instructive occupations which an inventive teacher will lead him into, he may be for a length of time advantageously left, like the primitive builder, to tentative processes; and will so gain an abundant experience of the difficulty of achieving his aims by the unaided senses. When, having meanwhile undergone a valuable discipline of the perceptions, he has reached a fit age for using a pair of compasses, he will, whilst duly appreciating these as enabling him to verify his ocular guesses, be still hindered by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approximative method. In this stage he may be left for a further period: partly as being yet too young for anything higher; partly because it is desirable that he should be made to feel still more strongly the want of systematic contrivances. If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is to be made continuously interesting; and if, in the early civilisation of the child, as in the early civilisation of the race, science becomes attractive only as ministering to art; it is manifest that the proper preliminary to geometry is a long-practice in those constructive processes which geometry will facilitate. Observe that here, too, nature points the way. Almost invariably, children show a strong propensity to cut out things in paper, to make, to build—a propensity which, if duly encouraged and directed, will not only prepare the way for scientific conceptions, but will develop those powers of manipulation in which most people are so deficient.

照怀斯先生推荐的这类办法，使学生掌握一些几何概念后，就可以逐渐进入到下一步——引入检验的练习，检验靠目测所画出的图形是否正确。这样一方面使他期望能够画得准确，一方面又不断使他明白那种期望不是轻易就能达到的。几何学产生于工人或其他人在准确丈量房屋地基大小、院落面积等时所发现的方法（一如这一名词暗示的那样），这一点很少有人怀疑。其中所包含的原理之所以被珍视，就在于它的直接功用。这些原理也要在类似的情境下介绍给学生。在他裁纸做纸房子时，在他画需要着色的装饰图形时，以及在由一个有创造力的教师引导他进行的各种有教育意义的工作中，都应该让他像原始的建筑工一样，在一段时间内有一个试验的过程，这对他会有益处。他会从大量的经验中体会到，单凭感觉去达到那些目的是有困难的。同时，等他受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知觉训练，到了能够使用圆规的年龄，尽管他此时已经可以适当检验自己目测的结果，但他仍会受到近似的方法有所缺陷的阻碍。我们可以让他在这个阶段多停留一段时间，一方面因为他年龄太小，不适合学习较高深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更深刻的感受到他需要系统的办法。如果要使儿童对获得知识始终保持兴趣，并且在儿童的早期教育中，正如人类的早期教化一样，科学只有满足技艺的需要才会变得有吸引力，那么显然，需要对几何学有长期的准备，才能用以推动建造过程。要注意，自然在这里也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孩子们都有着强烈的倾向去用纸剪东西，去制作，去建造。如果适当鼓励并引导，这种倾向就不只为科学概念铺平了道路，还有利于发展大多数人所缺乏的操作能力。

When the observing and inventive faculties have attained the requisite power, the pupil may be introduced to empirical geometry; that is—geometry dealing with methodical solutions, but not with the demonstrations of them. Like all other transitions in education, this should be made not formally but incidentally; and the relationship to constructive art should still be maintained. To make a tetrahedron in cardboard, like one given to him, is a

problem which will alike interest the pupil, and serve as a convenient starting-point. In attempting this, he finds it needful to draw four equilateral triangles arranged in special positions. Being unable in the absence of an exact method to do this accurately he discovers on putting the triangles into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s, that he cannot make their sides fit, and that their angles do not properly meet at the apex. He may now be shown how by describing a couple of circles, each of these triangles may be drawn with perfect correctness and without guessing; and after his failure he will duly value the information. Having thus helped him to the solution of his first problem, with the view of illustrating the nature of geometrical methods, he is in future to be left altogether to his own ingenuity in solving the questions put to him. To bisect a line, to erect a perpendicular, to describe a square, to bisect an angle, to draw a line parallel to a given line, to describe a hexagon, are problems which a little patience will enable him to find out. And from these he may be led on step by step to questions of a more complex kind; all of which, under judicious management, he will puzzle through unhelped. Doubtless, many of those brought up under the old regime, will look upon this assertion sceptically. We speak from facts, however, and those neither few nor special. We have seen a class of boys become so interested in making out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as to look forward to their geometry-lesson as a chief event of the week. Within the last month, we have been told of one girls' school, in which some of the young ladies voluntarily occupy themselves with geometrical questions out of school-hours; and of another, in which they not only do this, but in which one of them is begging for problems to find out during the holidays—both which facts we state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teacher. There could indeed be no stronger proofs than are thus afforded of the practicability and the immense advantage of self-development. A branch of knowledge which as commonly taught is dry and even

repulsive, may, by following the method of nature, be made extremely interesting and profoundly beneficial. We say profoundly beneficial, because the effects are not confined to the gaining of geometrical facts, but often revolutionise the whole state of mind. It has repeatedly occurred that those who have been stupefied by the ordinary school-drill—by its abstract formulas, by its wearisome tasks, by its cramming—have suddenly had their intellects roused, by thus ceasing to make them passive recipients, and inducing them to become active discoverers. The discouragement brought about by bad teaching having been diminished by a little sympathy and sufficient perseverance induced to achieve a first success, there arises a revulsion of feeling affecting the whole nature. They no longer find themselves incompetent; they too can do something. And gradually as success follows success, the incubus of despair disappears, and they attack the difficulties of their other studies with a courage that insures conquest.

当学生的观察力和创造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开始学习实验几何，即致力于有条不紊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去证明那些问题的结果。与教育中的其他转变一样，这个转变是偶然间的、非正式的，同时还应该与建构技艺保持联系。用硬纸板做一个与示例一样的四面体，既是一个使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也可充当一个合适的出发点。在试做中，他会发现有必要在特定位置上画四个等边三角形。由于缺少一个可以把这件事做得准确的精确方法，他发现把三角形放在各自的位置时，三角形的边对不上，角也不能在顶点重合。这时就可以给他演示，怎样通过画几个圆，就可以不用猜测而使每个三角形都画得精准。在经历了失败以后，他就会充分重视这项知识。照这样就帮他解决了他的第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明几何学方法的性质，以后就可让他自己设法解决所遇到的问题。等分一条线段，作一条垂直线，画一个正方形，等分一个角，画一条与已知直线平行的直线，作一个正六边形，都是一些多点耐心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从这些开始，就可以逐步

引导他去解决较复杂的问题。只要安排恰当，所有这些他都会无需帮助，仅仅靠自己钻研就能解决。当然，许多在旧体制下长大的人会以怀疑的态度看待这一论断。可是我们是根据事实说话，而且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并且也都不是特殊案例。我们见过有一个班的男孩子对解答这种问题很有兴趣，以至于他们把上几何课当作一周中的大事来盼望。就在上个月，我们听说在一女子学校的有些学生课余时间还自觉地思考几何题目。而另一所学校的学生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学生在假期都要求布置相关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所提到的这两件事都有教师为证。这些事例都强有力地证明，自我发展不仅实际可行，而且极具优势。灌输某类知识通常使人觉得枯燥甚至讨厌，但若遵循自然的方法，这类知识就会变得极其有趣，让人受益良多。我们说受益良多，是因为其效果不仅限于获得几何知识，而且经常使整个心智状态发生变化。我们经常见到一些人被学校日常的教学训练中的抽象公式、令人厌倦的作业、填鸭式的教学弄得昏昏沉沉。但是如果引导他们成为积极的发现者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消极的接受者，他们便会豁然贯通。少许的同情会减少不良教学所引起的失望，又激发他们坚持不懈地去获得初次成功，这样就会产生一种足以影响他整个天性的情感突变。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无用，而是觉得自己也能成事。在不断获得成功的时候，失望的梦魇就逐渐消失，他们就怀揣着胜利的勇气去克服其他学科学习中的困难。

A few weeks after the foregoing remarks were originally published, Professor Tyndall in a lecture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udy of Physics as a Branch of Education,” gave some conclusive evidence to the same effect. His testimony, based on personal observation, is of such great value that we cannot refrain from quoting it. Here it is.

在前述论点最初发表的几周后，廷德尔教授在皇家研究院所作的名为《物理学习作为教育的一个分支的重要性》的演讲中，针对这一

影响给出了一些总结性证据。他那个基于亲自观察得出的论证具有极大的价值，我们不得不引用，内容如下：

> One of the duties which fell to my share, during the period to which I have referred, was the instruction of a class in mathematics, and I usually found that Euclid and the ancient geometry generally, when addressed to the understanding, formed a very attractive study for youth. But it was my habitual practice to withdraw the boys from the routine of the book, and to appeal to their self-power in the treatment of questions not comprehended in that routine. At first, the change from the beaten track usually excited a little aversion: the youth felt like a child amid strangers; but in no single instance have I found this aversion to continue. When utterly disheartened, I have encouraged the boy by that anecdote of Newton, where he attribut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m and other men, mainly to his own patience; or of Mirabeau, when he ordered his servant, who had stated something to be impossible, never to use that stupid word again. Thus cheered, he has returned to his task with a smile, which perhaps had something of doubt in it, but which, nevertheless, evinced a resolution to try again. I have seen the boy's eye brighten, and at length, with a pleasure of which the ecstasy of Archimedes was but a simple expansion, heard him exclaim, 'I have it, sir.' The consciousness of self-power, thus awakened, was of immense value; and animated by it, the progress of

the class was truly astonishing. It was often my custom to give the boys their choice of pursuing their propositions in the book, or of trying their strength at others not to be found there. Never in a single instance have I known the book to be chosen. I was ever ready to assist when I deemed help needful, but my offers of assistance were habitually declined. The boys had tasted the sweets of intellectual conquest and demanded victories of their own. I have seen their diagrams scratched on the walls, cut into the beams upon the play ground, and numberless other illustrations of the living interest they took in the subject. For my own part, as far as experience in teaching goes, I was a mere fledgling: I knew nothing of the rules of pedagogics, as the Germans name it; but I adhered to the spirit indicated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discourse, and endeavoured to make geometry a *means* and not a *branch* of education. The experiment was successful, and some of the most delightful hours of my existence have been spent in marking the vigorous and cheerful expansion of mental power, when appealed to in the manner I have described.

“在我提到的那个时期里，我的责任之一就是教一个班的数学。我常常发现，当从理解入手时，欧几里得和古代普通几何学对青年人很有吸引力，但我的习惯是不让男孩子们照本宣科，而是处理一些书本之外的问题，以此来激发他们的能量。一开始，改变常规往往会引起不满，青年人觉得自己像孩子来到了陌

生人之间，但我发现这种不满并未持续下去。当男孩完全失去信心时，我就用牛顿的例子鼓励他，牛顿说他与别人的差别就在于自己有耐心。或是举米拉博的例子，当他听到仆人说一件事不可能的时候命令仆人不许再用这个愚蠢的字眼。男孩就这样受到了鼓舞，喜笑颜开地回去工作，笑容里或许还存留些许怀疑，但他毕竟有了再试一次的决心。我看到那个男孩眼神发亮，最后高兴地叫道‘老师，我做到了’，阿基米德的狂喜也不过是这份喜悦简单的放大而已。意识到自己具有某种力量是很有价值的，有了这个鼓舞，全班的进步十分惊人。我习惯让男孩子们自主选择，要么解答书上的命题，要么用书外的命题来检测他们的本领。我从没见过有男孩选择书上命题的。我会在他们确实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上一把，但照例他们都会拒绝。孩子们一旦尝到了智慧果实的甜头就会要求自己去取得成功。我见过他们在墙上画的或是在操场的木桩上刻的图解，和其他许许多多证明他们对这门学科很感兴趣的例子。就我而言，在教学经验上是名新手，对德国人那一套教育学规则全然不知。但我坚持在此次演讲一开始提出的精神，努力将几何学作为教育的一个方法 而不是分支 。这个试验是成功的，心智力量通过我所提的方式充满生机与活力地扩展开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之一。”

This empirical geometry which presents an endless series of problems, and should be continued along with other studies for years, may throughout be advantageously accompanied by those concrete applications of its principles which serve as its preliminary. After the cube, the octahedron, and the various forms of pyramid and prism have been mastered, may come the more complex regular bodies—the dodecahedron, and the icosahedron—

to construct which out of single pieces of cardboard requires considerable ingenuity. From these, the transition may naturally be made to such modified forms of the regular bodies as are met with in crystals—the truncated cube, the cube with its dihedral as well as its solid angles truncated, the octahedron and the various prisms as similarly modified; in imitating which numerous forms assumed by different metals and salts, an acquaintance with the leading facts of mineralogy will be incidentally gained. [2_1] After long continuance in exercises of this kind, rational geometry, as may be supposed, presents no obstacles. Constantly habituated to contemplate relationships of form and quantity, and vaguely perceiving from time to time the necessity of certain results as reached by certain means, the pupil comes to regard the demonstrations of Euclid as the missing supplements to his familiar problems. His well-disciplined faculties enable him easily to master its successive propositions, and to appreciate their value; and he has the occasional gratification of finding some of his own methods proved to be true. Thus he enjoys what is to the unprepared a dreary task. It only remains to add, that his mind will presently arrive at a fit condition for that most valuable of all exercises for the reflective faculties—the making of original demonstrations. Such theorems as those appended to the successive books of the Messrs. Chambers' Euclid, will soon become practicable to him; and in proving them the process of self-development will be not intellectual only, but moral.

实验几何可以不断地提出一系列问题，所以应该同其他科目一样继续学习多年，它的初步工作——原理的具体应用，使学生获得持久的好处。学生在掌握了立方体、八面体和各种锥体、柱体后，或许可以进到较复杂的规则形体——正十二面体和正二十面体，仅仅用一些硬纸板来做这些需要具备相当的聪明才智。从这些就可以自然地转到

晶体中那些常见的规则体的变形，包括被截开的立方体、二面角和立体角都截去的立方体，或同样变了形的八面体和各种柱体。在模拟各种金属和盐类晶体呈现的多种形状的过程中，学生也在不经意间熟悉了矿物学中的主要事实 [3_1] 。可以预料，在长期持续的这种练习之后，理论几何的学习将是毫不困难的。出于习惯，学生常会考虑形式和数量的关系，又时不时地隐约觉察到某些方法必然得到某些结果。于是，学生渐渐会将欧几里得定律的实证过程看作常见问题的有力补充。他的能力得到了有效训练，这使他易于掌握连续的命题并意识到它们的价值。他偶尔也会因为自己的某些方法经证明是正确的而感到满意。因此，准备不充分的人觉得枯燥的工作，他却乐在其中。现在只需补充一句，即他的心智不久就会适合于最有价值的反思能力的所有训练，或者说他适合做一些独创性的实证。对他来说，钱伯斯的欧几里得教科书各册附录的那些定理很快会变得实用，而在证明这些定理时，他不仅会在智力方面，还会在道德方面得到自我发展。

To continue these suggestions much further, would be to write a detailed treatise on education, which we do not purpose. The foregoing outlines of plans for exercising the perceptions in early childhood, for conducting object-lessons, for teaching drawing and geometry, must be considered as roughly-sketched illustrations of the method dictated by the general principles previously specified. We believe that on examination they will be found not only to progress from the simple to the complex, from the indefinite to the definite, from the concrete to the abstract, from the empirical to the rational; but to satisfy the further requirements that education shall be a repetition of civilisation in little, that it shall be as much as possible a process of self-evolution, and that it shall be pleasurable. That there should be one type of method capable of satisfying all these conditions, tends alike to verify the conditions, and to prove that type of method the right one. And when we add that this method is the logical outcome of the tendency, characterizing all

modern systems of instruction—that it is but an adoption in full of the method of nature which they adopt partially—that it displays this complete adoption of the method of nature, not only by conforming to the above principles, but by following the suggestions which the unfolding mind itself gives, facilitating its spontaneous activities, and so aiding the developments which nature is busy with—when we add this, there seems abundant reason to conclude, that the mode of procedure above exemplified, closely approximates to the true one.

进一步继续论述这些建议或许都可以写出一本详细的教育论著了，但那不是我们的目的。上面所概述的儿童早期的知觉练习计划、进行实物教学、绘画和几何教学等，都应该被看作是对前述一般原则指导下的教育方法的粗略概述。我们相信对此进行审视后会发现，它们不只是从简到繁、从具体到抽象、从经验到理性的进程，同时还满足了进一步的要求，即教育应该是人类文明缩影的再次出现，应该尽量是一个自我演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应该是令人愉悦的。应该有一种方法能够满足所有这些条件，这种方法往往可以验证这些条件，从而证明这种方法是正确的。还要注意，这个方法是合乎教育趋势的逻辑结果，是所有现代教学体系的特征。它完全采用了之前仅被部分采用的自然法。通过恪守上述原则并遵循心智本身的暗示，它展示了对自然法的完整应用，促进了心智的自发活动，也从而帮助了自然法着力做的儿童的发展。所以，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推断，上述例证的方式非常接近于正确的方式。

A few paragraphs must be appended in further inculcation of the two general principles, alik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least attended to: we mean the principle that throughout youth, as in early childhood and in maturity, the process shall be one of self-instruction; and the obverse principle, that the mental action

induced by this process shall be throughout intrinsically grateful. If progression from simple to complex, from indefinite to definite, and from concrete to abstract, be considered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as dictated by abstract psychology, then do these requirements that knowledge shall be self-mastered, and pleasurably mastered, become the tests by which we may judge whether the dictates of abstract psychology are being fulfilled. If the first embody the leading generalisations of the *science* of mental growth, the last are the chief canons of the *art* of fostering mental growth. For manifestly if the steps in our *curriculum* are so arranged that they can be successively ascended by the pupil himself with little or no help, they must correspond with the stages of evolution in his faculties; and manifestly if the successive achievements of these steps are intrinsically gratifying to him, it follows that they require no more than a normal exercise of his powers.

这里有必要再进一步强调两个至关重要而又最不受关注的一般原则，一是少年期同儿童早期与成年期一样，整个过程应该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与之对应的第二个原则是：这一过程中所引起的心智活动应该始终是让人内心愉快的。假如将由简到繁、由不确定到确定、由具体到抽象的进步看做是抽象心理学的本质要求，那么独立、愉快地掌握知识就可以作为检验标准来判断我们是否遵循了抽象心理学的指示。如果前者是心智成长科学 主要概括的体现，后者就是心智成长培养艺术 的首要标准。如果按照我们课程 的步骤安排，学生只要些许帮助或根本无须帮助就能自己逐步上升，那么就证明这些课程与他能力演进阶段相适应。如果他能从各个步骤中逐步取得的成就中获得内在的满足，那么就表明这些步骤已满足了他正常能力练习的需要。

But the making education a process of self-evolution has other advantages than this of keeping our lessons in the right order. In the

first place, it guarantees a vividness and permanency of impression which the usual methods can never produce. Any piece of knowledge which the pupil has himself acquired, any problem which he has himself solved, becomes by virtue of the conquest much more thoroughly his than it could else be. The preliminary activity of mind which his success implies, the concentration of thought necessary to it, and the excitement consequent on his triumph, conspire to register all the facts in his memory in a way that no mere information heard from a teacher, or read in a schoolbook, can be registered. Even if he fails, the tension to which his faculties have been wound up insures his remembrance of the solution when given to him, better than half a dozen repetitions would. Observe again, that this discipline necessitates a continuous organisation of the knowledge he aquires. It is in the very nature of facts and inferences, assimilated in this normal manner, that they successively become the premises of further conclusions,—the means of solving still further questions. The solution of yesterday's problem helps the pupil in mastering today's. Thus the knowledge is turned into faculty as soon as it is taken in, and forthwith aids in the general function of thinking—does not lie merely written in the pages of an internal library, as when rote-learnt. Mark further, the importance of the moral culture which this constant self-help involves. Courage in attacking difficulties, patient concentration of the attention, perseverance through failures—these are characteristics which afterlife specially requires; and these are characteristics which this system of making the mind work for its food specially produces. That it is thoroughly practicable to carry out instruction after this fashion we can ourselves testify; having been in youth thus led to successively solve the comparatively complex problems of Perspective. And that leading teachers have been gradually tending in this direction is indicated alike in the saying of Fellenberg, that “the individual, independent activity of

the pupil is of much greater importance than the ordinary busy officiousness of many who assume the office of educators;" in the opinion of Horace Mann, that "unfortunately education amongst us at present consists too much in *telling* , not in *training* ;" and in the remark of M. Marcel, that "what the learner discovers by mental exertion is better known than what is told to him."

将教育看作是一个自我演进的过程，不但能使我们的教学遵循正确的次序，还有其他的好处。首先，它确保了印象的生动性和永久性，这从普通方法中永远得不到。学生自己获取的任何一项知识、自己解决的任何一个问题，是靠他自己努力实现的，这比通过其他途径得来的更彻底地属于他。在此过程中，他那个成就所需要的心智准备活动、必要的思维集中、胜利后的兴奋，结合起来就使所有事实深深刻入他的记忆，而单凭从教师那里听到或从课本中读到的任何知识是不会有如此效果的。即使他失败了，他大脑机能的紧张状态也能确保他记住别人给的答案，这比多次机械重复的效果还要好。再来要注意的是，这种训练需要他对已获得的知识不断地加以组织。正是这个正常方式下吸收的事实和推论，在本质上会不断地成为进一步推论的前提和解决下一个问题的方法。昨天解答的问题有助于学生掌握今天所学知识。这样得来的知识，一旦被吸收会立刻转变成能力，马上就能对思维的通用功能有所帮助，而不像死记硬背的知识，只是停留在脑中书库的书页上。还要进一步注意到这种不断的自我发展所包含的道德培养的重要性。有勇气去克服困难，有耐心去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失败后还能坚持，这些都是日后生活中特别需要的性格特征，而这些性格正是这个使心智自给自足的办法所特别形成的。我们自己就足以证明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实际教学完全可行。青年时代，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指导来解决透视学中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许多知名教师也都逐渐倾向于认同这个看法，正如费伦伯格所说："学生个人的独立活动，比起许多所谓教育者的一般忙乱干扰要重要得多。"贺拉斯·曼认为："不幸的是，目前我们的教育是讲 得过多而没有训练 。"马塞尔也谈到："相比别人告诉的东西，学习者更能深刻理解自己通过心智

努力探索到的东西。”

Similarly with the correlative requirement, that the method of culture pursued shall be one productive of an intrinsically happy activity—an activity not happy in virtue of extrinsic rewards to be obtained, but in virtue of its own healthfulness. Conformity to this requirement not only guards us against thwarting the normal process of evolution, but incidentally secures positive benefits of importance. Unless we are to return to an ascetic morality, the maintenance of youthful happiness must be considered as in itself a worthy aim. Not to dwell upon this, however, we go on to remark that a pleasurable state of feeling is far more favourable to intellectual action than one of indifference or disgust. Every one knows that things read, heard, or seen with interest, are better remembered than those read, heard, or seen with apathy. In the one case the faculties appealed to are actively occupied with the subject presented; in the other they are inactively occupied with it; and the attention is continually drawn away after more attractive thoughts. Hence the impressions are respectively strong and weak. Moreover, the intellectual listlessness which a pupil's lack of interest in any study involves, is further complicated by his anxiety, by his fear of consequences, which distract his attention, and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he finds in bringing his faculties to bear upon these facts that are repugnant to them. Clearly, therefore, the efficiency of any intellectual action will, other things equal, be proportionates to the gratification with which it is performed.

与相关要求类似，培养方法追求的是一种能够引起内在快乐的活动。这种活动不是因为能够获得外在奖励而快乐，而是因为它本身有益于健康。遵照这个要求，就不仅不会阻挠发展的正常过程，同时还

可获得重要的积极好处。保持青年的快乐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除非我们要回归到禁欲主义的道德观念。但是且不详谈这个，我们还注意到，快乐的情感状态远比冷淡或厌恶的状态有利于智力活动。大家都知道，有兴趣时读的、听的、见的事物比漠不关心时所读、所听、所见的东西能更好地被记住。在一种情况下，注意力会主动贯注于当前的学习上，而有些情况下注意力是被动控制的，因为注意力经常被更有吸引力的想法引导到别处。这样，印象的强弱就有了不同。此外，学生对任何所学内容缺乏兴趣表现了他心智上的倦怠，而且焦虑和对结果的恐惧还会使心智上的倦怠更加复杂。这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更难以发挥自身能力去应对所讨厌的事物。因此，在同等情况下，智力活动的效率显然是与学生学习内容所得的满足感成正比。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also, that important moral consequences depend upon the habitual pleasure or pain which daily lessons produce. No one can compare the faces and manners of two boys—the one made happy by mastering interesting subjects, and the other made miserable by disgust with his studies, by consequent failure, by cold looks, by threats, by punishment—without seeing that the disposition of the one is being benefited, and that of the other greatly injured. Whoever has marked the effect of intellectual success upon the mind, and the power of the mind over the body, will see that in the one case both temper and health are favourably affected; whilst in the other there is danger of permanent moroseness, of permanent timidity, and even of permanent constitutional depression. To all which considerations we must add the further on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their pupils is, other things equal, rendered friendly and influential, or antagonistic and powerless, according as the system of culture produces happiness or misery. Human beings are at the mercy of their associated ideas. A daily minister of pain cannot fail

to be regarded with a secret dislike, and if he causes no emotions but painful ones, will inevitably be hated. Conversely, he who constantly aids children to their ends, hourly provides them with the satisfactions of conquest, hourly encourages them through their difficulties and sympathises in their successes, cannot fail to be liked; nay, if his behaviour is consistent throughout, must be loved. And when we remember how efficient and benign is the control of a master who is felt to be a friend,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of one who is looked upon with aversion, or at best indifference, we may infer that the indirect advantages of conducting education on the happiness principle do not fall far short of the direct ones. To all who question the possibility of acting out the system here advocated, we reply as before, that not only does theory point to it, but experience commends it. To the many verdicts of distinguished teachers who since Pestalozzi's time have testified this, may be here added that of Professor Pillans, who asserts that “where young people are taught as they ought to be, they are quite as happy in school as at play, seldom less delighted, nay, often more, with the well-directed exercise of their mental energies, than with that of their muscular powers.”

还要考虑到，日常功课惯常引起的愉快或痛苦有重要的道德后果。没有人能比较两个男孩子的面貌举止：一个男孩由于掌握了感兴趣的内容而快乐，另一个男孩为厌恶学习、不断失败、受到冷眼、威胁以及惩罚而苦，这看不出对一个人的性格是好还是坏。只要注意到心智成功对心理的影响，以及心理力量对生理的影响，我们都会发现在一种情况下脾气和健康都得到了好处，而另一种情况可能有产生永久的沮丧、胆怯，甚至永久的体质性抑郁的危险。所有的考虑中还应再增加一条，即在同样的情况下，如果培养制度能产生快乐，那么师生关系友好，教师对学生产生好的影响；如果培养制度产生痛苦，那么师生对立，教师对学生没有好的影响。人类是被自身的心理联想所

支配的。一个经常制造痛苦的牧师一定会招致人们内心的厌恶。如果他还只会制造痛苦而不能带来其他任何好的感受，那一定会变成人们仇视的对象。反过来，如果他经常帮助儿童实现心愿，让他们在征服中体验满足，在困难中感受鼓励，在成功时得到支持，就一定会被他们喜欢。而如果他的行为一直如此，就一定会受到爱戴。我们都还记得，相比来自于我们讨厌或至少不爱理睬的人的管教，朋友般的管教是多么的和善而有效。我们可以据此推出，以快乐原则进行教育的间接优势并不弱于其直接优势。对于所有怀疑这一方法有实行可能性的人，我们的回应和之前一样：该方法不止在理论上有充分根据，在经验上也有实践证明。自裴斯泰洛齐时期以来，许多知名教师的判断都证实了这一点。或许这里还可以加上皮兰斯教授的意见。他说："只要用正确的方法去教，青年人在上课中会像在玩耍中一样快乐。不仅如此，他们在的心智力量的指导练习中得到的乐趣往往在比肌肉练习中得到的乐趣多得多。"

As suggesting a final reason for making education a process of self-instruction, and by consequence a process of pleasurable instruction, we may advert to the fact that, in proportion as it is made so, is there a probability that education will not cease when schooldays end. As long as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is rendered habitually repugnant, so long will there be a prevailing tendency to discontinue it when free from the coercion of parents and masters. And when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has been rendered habitually gratifying, then will there be as prevailing a tendency to continue, without superintendence, that same self-culture previously carried on under superintendence. These results are inevitable. While the laws of mental association remain true—while men dislike the things and places that suggest painful recollections, and delight in those which call to mind bygone pleasures—painful lessons will make knowledge repulsive, and pleasurable lessons will make it attractive. The men to whom in boyhood information came

in dreary tasks along with threats of punishment, and who were never led into habits of independent inquiry, are unlikely to be students in after years; while those to whom it came in the natural forms, at the proper times, and who remember its facts as not only interesting in themselves, but as the occasions of a long series of gratifying successes, are likely to continue through life that self-instruction commenced in youth.

对于主张把教育看作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理由，那就是，教育过程是愉快的。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越是能做到这样，教育就越不会在学生离开学校后就停止。只要求知经常引起学生的反感厌恶，那么当他们摆脱家长和教师的强迫后，学习就有中断的倾向。如果求知通常带来的是满足，那么在督促下进行的自我培养就大有可能在没有督促时继续进行。这个结果是必然的。只要心理联想的规律依然存在，只要人们不喜欢那些引起痛苦回忆的事件和地点，而喜欢那些能引起以往欢乐的事件和地点，痛苦的功课就会使人们排斥知识，而愉快的功课会使人渴望知识。在孩童时期，伴随着惩罚的威胁，一些人从沉闷的功课中得到了一些知识，但他们从来没有养成独立探讨的习惯，日后多半不可能继续钻研。而如果在适当时期自然地获得了知识，他们记住某些知识不只是因为他们本身有趣，更是由于他们得到过许多满足感，人们就很可能终身继续他们在少年时代开始的自我教育。

[2_1].Those who seek aid in carrying out the system of culture above described, will find it in a little work entitled *Inventional Geometry* ; published by J. and C. Mozley, Paternoster Row, London.

[3_1].想找到帮助实施上述培养方法的人可以参照《创造性几何学》，伦敦主祷文广场莫兹利出版社出版。

Chapter 3 Moral Education

第三章　德育

Strangely enough, the most glaring defect in our programmes of education is entirely overlooked. While much is being done in the detailed improvement of our systems in respect both of matter and manner, the most pressing desideratum has not yet been even recognised as a desideratum. To prepare the young for the duties of life is tacitly admitted by all to be the end which parents and schoolmasters should have in view; and happily the value of the things taught, and the goodness of the method followed in teaching them, are now ostensibly judged by their fitness to this end. The propriety of substituting for an exclusively classical training, a training in which the modern languages shall have a share, is argued on this ground. The necessity of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science is urged for like reasons. But though some care is taken to fit youth of both sexes for society and citizenship, no care whatever is taken to fit them for the still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they will ultimately have to fill—the position of parents. While it is seen that for the purpose of gaining a livelihood, an elaborate preparation is needed, it appears to be thought that for the bringing up of children, no preparation whatever is needed. While many years are spent by a boy in gaining knowledge, of which the chief value is that it constitutes “the education of a gentleman;” and while many years are spent by a girl in those decorative acquirements which fit her for evening parties; not an hour is spent by either of them in preparation for that gravest of all responsibilities—the management of a family. Is it that this responsibility is but a remote contingency? On the contrary, it is certain to devolve on nine out of ten. Is it that

the discharge of it is easy? Certainly not: of all functions which the adult has to fulfil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Is it that each may be trusted by self-instruction to fit himself, or herself, for the office of parent? No: not only is the need for such self-instruction unrecognised, but the complexity of the subject renders it the one of all others in which self-instruction is least likely to succeed. No rational plea can be put forward for leaving the Art of Education out of our *curriculum*. Whether as bearing upon the happiness of parents themselves, or whether as affecting the characters and lives of their children and remote descendants, we must admit that a knowledge of the right methods of juvenile culture, physical, intellectual, and moral, is a knowledge second to none in importance. This topic should occupy the highest and last place in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passed through by each man and woman. As physical maturity is marked by the ability to produce offspring, so mental maturity is marked by the ability to train those offspring. *The subject which involves all other subjects, and therefore the subject in which the education of every one should culminate, i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非常奇怪，我们教育体系中最显眼的一个缺陷竟然被完全忽视了。当我们耗费大量精力详细改进我们教育体系的内容和形式时，人们却始终没有意识到什么是最迫切的。我们所有人都默认教育应该为青少年承担未来生活中的责任做好准备，这一目的应当为父母和学校教育者们所谨记。而且所教东西的价值以及教法的好坏，现在也从表面上看是否能符合这个目标。基于此，我们主张用包括多种现代语言训练在内的方式取代单纯的古典语言训练。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认为有必要增加科学教育的分量。然而，尽管我们对青少年适应社会和公民身份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我们却丝毫未关注他们最终要扮演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即为人父母。我们一方面认为维持生计需要提前做好精心的准备，另一方面似乎又认为抚养子女根本无需做任何

准备。男孩子们要花费数年光阴去获取那些“绅士教育”所包含的知识，而女孩子们也同样要花费数年时间去学习那些社交场合中关于“打扮”的学问。然而他们却都未曾花费哪怕一小时在管理家庭这一未来最重要的职责上。难道说这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份遥远而不大可能承担的责任？不！相反，他们十之八九都要承担这项责任。那么，难道这份责任承担起来很容易？当然也不是。在成年人必须承担的所有责任中，这一项是最为困难的。难道说是每一个人都具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可以保证做好父母？不！不但这种自我教育的必要性尚未被确认，而且其复杂性也使自我教育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更难成功。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把“教育的艺术”列入我们的课程体系 。无论是基于父母自身的幸福，还是基于对子女和后代性格和生活的影响，我们必须承认，关于青少年体育、智育和德育正确方法的知识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课题应该是每个男女所受教育中最重要的、最不容忽视的。正如能够生儿育女是人生理成熟的标志一样，培养后代的能力便是人心智成熟的标志。教育理论与实践这门学科包含其他一切学科，在每个人所受的教育中占据最高地位 。

In the absence of this preparation, the management of children, and more especially the moral management, is lamentably bad. Parents either never think about the matter at all, or else their conclusions are crude and inconsistent. In most cases, and especially on the part of mothers, the treatment adopted on every occasion is that which the impulse of the moment prompts: it springs not from any reasoned-out conviction as to what, will most conduce to the child's welfare, but merely expresses the passing parental feelings, whether good or ill; and varies from hour to hour as these feelings vary. Or if these blind dictates of passion are supplemented by any definite doctrines and methods, they are those that have been handed down from the past, or those suggested by the remembrances of childhood, or those adopted from nurses and servants—methods devised not by the enlightenment, but by the

ignorance of the time. Commenting on the chaotic state of opinion and practice relative to family government, Richter writes:—

在这方面准备的缺失，导致对儿童的管教，尤其是道德管教，糟糕得令人痛心。父母们要么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要么做出许多肤浅粗糙、前后矛盾的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作母亲的，每次采取的措施都是当时的冲动之举。也就是说，这些做法当时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得来的信念，认为怎样才能对儿童有益处，而仅仅是父母当时情绪好恶的表达，并且还会随着这种情感好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有什么明确主张和方法来补充这些感情冲动，那这些所谓的主张和方法也只是过去流传下来的，或者是来自父母们自己童年回忆的启示，又或者是来自愚昧时代保姆仆人们的经验习惯。那些办法是当时愚昧无知的结果，并非理性智慧的产物。关于家庭管理方面各种看法和做法的混乱状态，里希特在其作品中曾写道：

> If the secret variances of a large class of ordinary fathers were brought to light, and laid down as a plan of studies, and reading catalogued for a moral education, they would run somewhat after this fashion:—in the first hour 'pure morality must be read to the child, either by myself or the tutor;' in the second, 'mixed morality, or that which may be applied to one's own advantage;' in the third, 'do you not see that your father does so and so?' in the fourth, 'you are little, and this is only fit for grownup people;' in the fifth, 'the chief matter is that you should succeed in the world, and become something in the state;' in the sixth, 'not the temporary, but the eternal, determines the worth of a man;' in the seventh, 'therefore rather suffer

injustice, and be kind;' in the eighth, 'but defend yourself bravely if any one attack you;' in the ninth, 'do not make a noise, dear child;' in the tenth, 'a boy must not sit so quiet;' in the eleventh, 'you must obey your parents better;' in the twelfth, 'and educate yourself.' So by the hourly change of his principles, the father conceals their untenableness and onesidedness. As for his wife, she is neither like him, nor yet like that harlequin who came on to the stage with a bundle of papers under each arm, and answered to the inquiry, what he had under his right arm, 'orders,' and to what he had under his left arm, 'counter-orders.' But the mother might be much better compared to a giant Briareus, who had a hundred arms, and a bundle of papers under each.

“如果把大多数普通父亲们内心深处的分歧揭示出来，并整理成一份在道德教育上要学习和阅读的提纲，那么大致就是下面的样子：第一个小时，由父亲或家庭教师向孩子讲授纯理论的道德规范；第二个小时讲各种各样的道德或是有利于自己的道德；第三个小时又会讲，‘你没看到你的父亲是怎样做的吗？’第四个小时又讲到，‘你还小，这个是大人们才可以做的’；第五个小时又告诉孩子，‘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功成名就，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第六个小时讲，‘人的价值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证明’；第七个小时讲，‘宁肯遭遇不公正的对待，也要宽厚待人’；第八个小时又讲，‘受到他人攻击时要勇敢反抗’；第九个小时讲，‘好孩子不要制造噪音’；第十个小时又讲，‘男孩子不应该这样安静地坐着’；第十一

个小时说，‘你一定要更听父母的话’；第十二个小时又说，‘你必须学会自我教育’。如此一来，通过不断地改变原则，做父亲的掩盖了其中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和观点的片面性。至于母亲，她既不像父亲那样做，也不像舞台上双臂夹着纸捆的小丑，右手发出‘命令’，左手又‘收回成命’。但她也许更像一个百臂巨人，每只手臂下都夹着一捆‘命令’。”

This state of things is not to be readily changed. Generations must pass before any great amelioration of it can be expected. Like political constitutions, educational systems are not made, but grow; and within brief periods growth is insensible. Slow, however, as must be any improvement, even that improvement implies the use of means; and among the means is discussion.

这种情形是不太容易改善的。必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希望得到较大的改善。像政治制度一样，教育方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发展形成的，在较短的时期中无法察觉它的成长。任何改良即使借助了包括探讨在内的各种手段，仍然是缓慢的。

We are not among those who believe in Lord Palmerston's dogma, that “all children are born good.” On the whole, the opposite dogma, untenable as it is, seems to us less wide of the truth. Nor do we agree with those who think that, by skilful discipline, children may be made altogether what they should be. Contrariwise, we are satisfied that though imperfections of nature may be diminished by wise management, they cannot be removed by it. The notion that an ideal humanity might be forthwith produced by a perfect system of education, is near akin to that

shadowed forth in the poems of Shelley, that would mankind give up their old institutions, prejudices, and errors, all the evils in the world would at once disappear: neither notion being acceptable to such as have dispassionately studied human affairs.

我们并不同意帕默斯顿的观点——“所有的孩子都生而善良”。大体上说，与此相反的观点虽然也站不住脚，但可能更接近真理。有人认为，如果管教得法，儿童就可以被塑造成他们应该成为的样子。这一点我们也不能赞同。相比之下，我们倒愿意认为，通过明智的管理，先天的不足可得以弥补，但不能完全消除。还有一种观念认为，一个完美的教育体系可以很快地塑造出理想的人类社会。这种观念非常接近雪莱在诗中所暗示的：“只要人类放弃旧的制度、偏见和谬误，世上所有的邪恶就会立刻烟消云散。”但是，客观冷静地研究过社会生活的人对于这两种看法都不能接受。

Not that we are without sympathy with those who entertain these too sanguine hopes. Enthusiasm, pushed even to fanaticism, is a useful motive-power—perhaps an indispensable one. It is clear that the ardent politician would never undergo the labours and make the sacrifices he does, did he not believe that the reform he fights for is the one thing needful. But for his conviction that drunkenness is the root of almost all social evils, the teetotaller would agitate far less energetically. In philanthropy as in other things great advantage results from division of labour; and that there may be division of labour, each class of philanthropists must be more or less subordinated to its function—must have an exaggerated faith in its work. Hence, of those who regard education, intellectual or moral, as the panacea, we may say that their undue expectations are not without use; and that perhaps it is part of the beneficent order of things that their confidence cannot

be shaken.

这倒不是我们不赞同那些有过高希望的乐观派。热情，甚至狂热，是一种很有用的动力，或许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动力。显然，如果一位热忱的政治家认为自己争取的改革并不是特别必要，他就不会努力工作，不会做出那么多牺牲。同样，如果禁酒主义者认为醉酒不是所有社会罪恶之源，他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劲头鼓动大家禁酒。慈善事业和其他事情一样，明确的分工产生最好的结果。分工要求慈善工作中每一个级别的人都要多少履行自己的职责，都要对其工作有充分的信念。因此，对于那些将教育（智育或德育）看成是万能的人，我们可以说他们的过高期待也不是毫无用处，或者说他们不动摇的信心对于事情的良性发展还是大有裨益的。

Even were it true, however, that by some possible system of moral government children could be moulded into the desired form; and even could every parent be duly indoctrinated with this system; we should still be far from achieving the object in view. It is forgotten that the carrying out of any such system presupposes, on the part of adults, a degree of intelligence, of goodness, of self-control, possessed by no one. The great error made by those who discuss questions of juvenile discipline, lies in ascribing all the faults and difficulties to the children, and none to the parents. The current assumption respecting family government, as respecting national government, is, that the virtues are with the rulers and the vices with the ruled. Judging by educational theories, men and women are entirely transfigured in the domestic relation. The citizens we do business with, the people we meet in the world, we all know to be very imperfect creatures. In the daily scandals, in the quarrels of friends, in bankruptcy disclosures, in lawsuits, in police reports, we have constantly thrust before us the pervading

selfishness, dishonesty, brutality. Yet when we criticise nursery management, and canvass the misbehaviour of juveniles, we habitually take for granted that these culpable men and women are free from moral delinquency in the treatment of their offspring! So far is this from the truth, that we do not hesitate to say that to parental misconduct is traceable a great part of the domestic disorder commonly ascribed to the perversity of children. We do not assert this of the more sympathetic and self-restrained, among whom we hope most of our readers may be classed, but we assert it of the mass. What kind of moral discipline is to be expected of a mother who, time after time, angrily shakes her infant because it will not suckle her, which we once saw a mother do? How much love of justice and generosity is likely to be instilled by a father who, on having his attention drawn by his child's scream to the fact that its finger is jammed between the window sash and the sill, forthwith begins to beat the child instead of releasing it? Yet that there are such fathers is testified to us by an eyewitness. Or, to take a still stronger case, also vouched for by direct testimony—what, are the educational prospects of the boy who, on being taken home with a dislocated thigh, is saluted with a castigation? It is true that these are extreme instances—instances exhibiting in human beings that blind instinct which impels brutes to destroy the weakly and injured of their own race. But extreme though they are, they typify feelings and conduct daily observable in many families. Who has not repeatedly seen a child slapped by nurse or parent for a fretfulness probably resulting from bodily derangement? Who, when watching a mother snatch up a fallen little one, has not often traced, both in the rough manner and in the sharply-uttered exclamation—“You stupid little thing!“—an irascibility foretelling endless future squabbles? Is there not in the harsh tones in which a father bids his children be quiet, evidence of a deficient fellow-feeling with them? Are not the constant, and often quite needless,

thwartings that the young experience—the injunctions to sit still, which an active child cannot obey without suffering great nervous irritation, the commands not to look out of the window when travelling by railway, which on a child of any intelligence entails serious deprivation—are not these thwartings, we ask, signs of a terrible lack of sympathy? The truth is, that the difficulties of moral education are necessarily of dual origin—necessarily result from the combined faults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If hereditary transmission is a law of nature, as every naturalist knows it to be, and as our daily remarks and current proverbs admit it to be; then on the average of cases, the defects of children mirror the defects of their parents;—on the average of cases, we say, because, complicated as the results are by the transmitted traits of remoter ancestors, the correspondence is not special, but only general. And if, on the average of cases, this inheritance of defects exists, then the evil passions which parents have to check in their children imply like evil passions in themselves: hidden, it may be, from the public eye; or perhaps obscured by other feelings; but still there. Evidently, therefore, the general practice of any ideal system of discipline is hopeless: parents are not good enough.

然而，即便存在某种德育方法可以将孩子们塑造成我们期待的样子，即便这种方法可以灌输给每一位父母，我们要想达到心中的目标大概还差得很远。要知道，实行这样一个体系要求成人具备超人的智力、品德和自制的能力，可没有人具有这些能力。那些讨论青少年德育问题的人通常会犯一个很大的错误，即把所有的过错和困难都归咎到孩子们身上，却认为父母们没有责任。关于家庭的管理，同国家管理一样，目前都假定管理者与美德同行，而被管理者与罪恶相伴。根据一些教育理论，父母们在家庭关系中都是完美的化身。而我们都知道，那些我们平时交往的和认识的人事实上都是不完美的。在那些日常丑事、朋友争吵、破产的揭发、法律诉讼和警察报告中，我们发现

充斥着自私、虚伪和野蛮。然而，当我们对幼儿园管理进行批评时，当我们讨论青少年不良行为时，我们总是习惯性地、理所当然地回避了父母们在儿女教养上的道德过失，而他们本应受到责备的。这是如此的荒谬，所以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把大部分认为是由儿童顽劣行为引起的家庭混乱事件归为父母的不当行为。我们这里所指的是普通大众，并不是那些同情心和自制力较强的人，希望读者中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我们曾看到一个母亲每次在婴孩不吃奶时就生气地摇晃孩子。从她身上，我们还能够期待什么样的道德教育呢？当一个父亲听到孩子因为被窗户夹了手而尖叫时，他竟然会冲上去先把孩子打一顿而不是先帮孩子把手松开。这样的父亲又如何能教会孩子公平和宽容呢？我们周围确实就有这样一些父亲，曾经就有人亲眼目睹过。或者还可以举一个更令人痛心疾首的例子，也是有直接证据证明的。一个男孩大腿脱臼被送回家后首先受到的是一通责骂，试想这个孩子的教育前景又会是怎样呢？当然，这都是一些极端的例子，展示了人类的盲目本能促使人们粗鲁地摧残那些软弱和受伤的同类。但是，尽管极端，这些例子却是很多家庭中常见的行为和情感表现。谁不曾见过小孩因为焦躁吵闹而挨父母或保姆的打？要知道，这些焦躁吵闹很可能是身体上的不舒服引起的。看到一个母亲扶起摔倒的孩子时，我们经常发现伴随着的是诸如大喊“你个笨东西”的粗鲁行为，要知道母亲的这种急躁脾气可能会导致孩子今后和人无休止的争吵。父亲叫孩子停止吵闹时的刺耳呵斥不也是一个缺乏同情心的证据吗？青少年们常常受到一些相当没有必要的禁令。比如要求安静地坐着不动，一个活泼的孩子只有遭受极大的紧张和愤怒才能服从；再如坐火车旅行时不许孩子看窗外，这会让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孩子承受严重的剥夺感。我们要问，这些禁令难道不是同情心严重匮乏的表现吗？德育面临的困难必然有两方面的根源——肯定来自于父母和孩子两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才是事实。每一位自然主义者都认为，遗传性传递是一条自然规律。我们的日常谈话和格言警句也都承认这一点。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一般情况下，孩子的缺点就如同镜子一样反映了父母的缺点。我们之所以说是一般情况下，是因为这其中遗传的一致性不是特殊的而是普遍的，尽管其特性因远祖传递而变得比较复杂。如果一般情况下，缺点是可以遗传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父母在孩子身上发现的

坏情绪也存在于父母自身。只不过这一点经常被大家忽视了，或者说被其他的情感因素掩盖了，但无论如何它确实存在。因此很明显，任何理想中的品德训练方法普遍难以施行的原因就在于父母不够好。

Moreover, even were there methods by which the desired end could be at once effected, and even had fathers and mothers sufficient insight, sympathy, and self-command to employ these methods consistently, it might still be contended that it would be of no use to reform family discipline faster than other things are reformed. What is it that we aim to do? Is it not that education of whatever kind has for its proximate end to prepare a child for the business of life—to produce a citizen who, at the same time that he is well conducted, is also able to make his way in the world? And does not making his way in the world (by which we mean, not the acquirement of wealth, but of the means requisite for properly bringing up a family)—does not this imply a certain fitness for the world as it now is? And if by any system of culture an ideal human being could be produced, is it not doubtful whether he would be fit for the world as it now is? May we not, on the contrary, suspect that his too keen sense of rectitude, and too elevated standard of conduct, would make life alike intolerable and impossible? And however admirable the results might be, considered individually, would it not be self-defeating in so far as society and posterity are concerned? It may, we think, be argued with much reason, that as in a nation so in a family, the kind of government is, on the whole, about as good as the general state of human nature permits it to be. It may be said that in the one case, as in the other, the average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the control exercised. It may be inferred that in both cases amelioration of the average character leads to an amelioration of system; and further, that were it possible to ameliorate the system without the average

character being first ameliorated, evil, rather than good, would follow. It may be urged that such degree of harshness as children now experience from their parents and teachers, is but a preparation for that greater harshness which they will meet with on entering the world: and that were it possible for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behave towards them with perfect equity and entire sympathy, it would but intensify the sufferings which the selfishness of men must, in after life, inflict on them. [3_1]

此外，即便有一些方法可以很快实现我们所渴望的目标，即便父母们都有足够的洞察力、同情心和自制力去始终如一地运用这些方法，但家庭管教方面的改善若超前于社会其他相关方面的改善，结果也将是徒劳的。那么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任何一种教育的直接目标，不都是帮助儿童为社会生活做准备，培养一个品行端正，性格上进的公民吗？而上进（此处上进并非指占有财富，而是指具有恰当的齐家之术）不就意味着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社会现状吗？如果理想中完美的人可以通过某种方法来培养，我们难道就不会怀疑他可能会不适应社会生活吗？能不能反过来揣测，他过度敏锐的正直感和过高的行为标准，反而会使他觉得当前生活不顺眼，甚至无法继续生活。从个体角度考虑，这种培养的结果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可若站在社会和后代的角度来看，这难道不是自我挫败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对一国一家而言，教育应该大致使人性达到社会认可的普遍水平。人们的普遍品行决定着教育的质量，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如此。我们不妨推断，普遍品性的提升将引起德育方法的改进。相反，如果德育方法的改进不以普遍品性的提升为前提，那么结果有害无益。或许，目前儿童从家长和教师那里所受的严苛教育只不过是在为其进入社会后可能面对的更大严苛境况做准备——如果家长和教师现在完全公平且满怀同情地对待他们，那么在面对日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人性的自私自利时，他们势必会感到更加痛苦 [4_1] 。

“But does not this prove too much?” some one will ask, “If no system of moral culture can forthwith make children altogether what they should be; if, even were there a system that would do this, existing parents are too imperfect to carry it out; and if even could such a system be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its results would be disastrously incongruous with the present state of society; does it not follow that a reform in the system now in use is neither practicable nor desirable?” No. It merely follows that reform in domestic government must go on, *pari passu* , with other reforms. It merely follows that methods of discipline neither can be nor should be ameliorated, except by instalments. It merely follows that the dictates of abstract rectitude will, in practice, inevitably be subordinated by the present state of human nature—by the imperfections alike of children, of parents, and of society; and can only be better fulfilled as the general character becomes better.

有人可能会问：“这话是不是说过头了？既然没有制度化的德育方法来将孩子们直接塑造成他们应该成为的样子，或者说即便有这样的方法，但父母方面又存在太多不足条件使得该方法难以施行，又或者即便父母能成功施行，但其结果又遗憾地与社会现状不协调，那岂不是说目前改善的方式方法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不！我们不过是说，家庭管理方面的改善需同社会其他方面的改善齐头并进；我们不过是说，要想改善德育的方法，只能分期分段进行；我们不过是说，抽象正直的原则在实践中难免会受人性现状所限——受限于儿童、父母和社会通常都具有的不足和缺陷，这种缺陷只能随着人的普遍品性的提升而提升。

“At any rate, then,” may rejoin our critic, “it is clearly useless to set up any ideal standard of family discipline. There can be no advantage in elaborating and recommending methods that are in

advance of the time." Again we must contend for the contrary. Just as in the case of political government, though pure rectitude may be at present impracticable, it is requisite to know where the right lies, so that the changes we make may be *towards* the right instead of *away* from it; so in the case of domestic government, an ideal must be upheld, that there may be gradual approximations to it. We need fear no evil consequences from the maintenance of such an ideal. On the average the constitutional conservatism of mankind is always strong enough to prevent a too rapid change. So admirable are the arrangements of things that until men have grown up to the level of a higher belief, they cannot receive it: nominally, they may hold it, but not virtually. And even when the truth gets recognised, the obstacles to conformity with it are so persistent as to outlive the patience of philanthropists and even of philosophers. We may be quite sure, therefore, that the many difficulties standing in the way of a normal government of children, will always put an adequate check upon the efforts to realise it.

批评我们的人还会继续说："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建立任何家庭德育的理想标准显然毫无用处，阐述和推荐一些走在时代前面的德育方法也收效甚微。"我们的主张又恰恰与此相反。正如在政府治理领域，尽管纯粹的公正在当前实际上做不到，但我们仍须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是正向前进，而非倒行逆施。在家庭管理中也是同理，我们必须树立一个理想，然后才能逐渐趋近于理想。我们不必害怕树立这样的理想会有什么恶果。一般来说，人类固有的保守性总是具有足够大的力量去阻止过快的变革。事情的安排就是如此的巧妙，人们在未达到一个较高的信念水平之前不可能接受它，嘴上虽是这样说，但实际上却做不到。甚至当真理被发现之后，阻止其施行的力量也依然顽强，以致慈善家甚至哲学家们都无法忍受。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儿童日常管理中存在的困难，是对努力实现最终管理目标这一行为的充分考验。

With these preliminary explanations, let us go on to consider the true aims and methods of moral education—moral education, strictly so called, we mean; for we do not propose to enter upon the question of religious education as an aid to the education exclusively moral. This we admit as a topic better dealt with separately. After a few pages devoted to the settlement of general principles, during the perusal of which we bespeak the reader's patience, we shall aim by illustrations to make clear the right methods of parental behaviour in the hourly occurring difficulties of family government.

有了这些初步的说明后，让我们来继续考虑一下德育的正确目标和方法。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德育，并不打算涉及宗教教育问题，尽管它对纯粹的德育是有利的。我们认为宗教教育是一个更适合单独研究的话题。前面我们用几页篇幅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读者也耐心的研读了。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举例说明，当遇到家庭管理常见的困难时，父母的正确做法是什么。

When a child falls, or runs its head against the table, it suffers a pain, the remembrance of which tends to make it more careful for the future; and by an occasional repetition of like experiences, it is eventually disciplined into a proper guidance of its movements. If it lays hold of the fire-bars, thrusts its finger into the candle-flame, or spills boiling water on any part of its skin, the resulting burn or scald is a lesson not easily forgotten. So deep an impression is produced by one or two such events, that afterwards no persuasion will induce it again to disregard the laws of its constitution in these ways.

当一个小孩子跌倒或者头碰到桌子时，他一定会感到疼，而这种对疼痛感的记忆会使他在今后变得更加小心些。如果类似的经历再偶然发生几次，孩子最终一定会从教训中习得正确的行为动作。如果他伸手去抓炉条，或者用手指去戳烛焰，或者把开水弄到身上，烧伤或烫伤的结果都将是一个难忘的教训。一两件这样的事情给孩子造成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以致日后无论怎样劝说，他都不会忽视这些亲身体验过的法则。

Now in these and like cases, Nature illustrates to us in the simplest way, the tru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ral discipline—a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however much they may seem to the superficial like those commonly received, we shall find on examination to differ from them very widely.

在这些类似的事例中，自然界以最简单的方式向我们阐述了德育的正确理论和实践。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和大家通常的所见所闻很相似，然而加以检查，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大有不同。

Observe,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in bodily injuries and their penalties we have misconduct and its consequences reduced to their simplest forms. Though, according to their popular acceptations, *right* and *wrong* are words scarcely applicable to actions that have none but direct bodily effects; yet whoever considers the matter will see that such actions must be as much classifiable under these heads as any other actions. From whatever basis they start, all theories of morality agree in considering that conduct whose total results, immediate and remote, are beneficial, is good conduct; while conduct whose total results, immediate and remote, are injurious, is bad conduct. The happiness or misery caused by it are the *ultimate*

standards by which all men judge of behaviour. We consider drunkenness wrong because of the physical degeneracy and accompanying moral evils entailed on the transgressor and his dependents. Did theft uniformly give pleasure both to taker and loser, we should not find it in our catalogue of sins. Were it conceivable that benevolent actions multiplied human pains, we should condemn them—should not consider them benevolent. It needs but to read the first newspaper leader, or listen to any conversation touching social affairs, to see that acts of parliament, political movements, philanthropic agitations, in common with the doings of individuals, are judged by their anticipated results in multiplying the pleasures or pains of men. And if on looking on all secondary super-induced ideas, we find these to be our ultimate tests of right and wrong, we cannot refuse to class purely physical actions as right or wrong according to the beneficial or detrimental results they produce.

首先我们会发现，在身体损伤和它们所施加的惩罚中，错误行为及其结果被最简化到了最简形式。虽然按照大家的普遍看法，错误 和正确 两个词很少被用于仅对身体产生直接影响的行为上，但是不管是谁，对此认真考虑后都会发现，这些行为和其他行为一样都应该有正误之分。无论基于何种假设，所有的道德理论都会赞同以下说法：若一种行为当时和日后的全部结果都是有益的，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好的；相反，若其结果是有害的，则这个行为就是坏的。行为产生的快乐或痛苦是人们判断行为好坏的最终 标准。我们之所以认为醉酒是错误的，就是因为它导致了身体机能的衰退，并且使醉汉及其家人背负道德上的罪恶感。如果偷窃能给窃贼和失主带来同样的愉悦，我们也就不会把它划定为犯罪。如果善良的行为加剧了他们的痛苦，我们就不能认为这是善行，反而会去谴责它。只需看看报纸上的头条社论，或听听任何涉及社会事件的谈论，我们就会发现，判断议会法案、政治运动、慈善宣传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标准，在于其预想的结果是增

进了人们的福祉还是加深了人们的痛苦。而如果用一切第二性的派生观念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就是对错误与正确的最终检验，我们不能否认根据结果的好坏来给身体行为划分对错这一观点。

Note,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character of the punishments by which these physical transgressions are prevented. Punishments, we call them, in the absence of a better word; for they are not punishments in the literal sense. They are not artificial and unnecessary inflictions of pain; but are simply the beneficent checks to actions that are essentially at variance with bodily welfare—checks in the absence of which life would quickly be destroyed by bodily injuries. It is the peculiarity of these penalties, if we must so, call them, that they are nothing more than the *unavoidable consequences of the deeds* which they follow: they are nothing more than the *inevitable reactions* entailed by the child's actions.

其次，我们需要注意那些用以防止躯体受伤的“惩罚”的性质。我们在此使用“惩罚”这个词并非指它的字面意思，只不过目前还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词。这里的惩罚并非刻意地施加无必要的痛苦，仅指对那些本质上给身体造成伤害的行为的善意限制，没有了这些限制，人们会因身体伤害而很快丧命。这就是这些惩罚（如果我们非要用这个词）的特质。它们仅仅是之前行为不可避免的后果 ，是儿童行为所引起的必然反 应。

Let it be further borne in mind that these painful reactions are proportionate to the degree in which the organic laws have been transgressed. A slight accident brings a slight pain, a more serious one, a greater pain. When a child tumbles over the doorstep, it is not ordained that it shall suffer in excess of the amount necessary,

with the view of making it still more cautious than the necessary suffering will make it. But from its daily experience it is left to learn the greater or less penalties of greater or less errors; and to behave accordingly.

还要明白，这些痛苦的反应与违背有机法则的过失行为是成比例的。一个轻微的过失带来的是轻微的痛苦，而较为严重的过失则会带来较大的痛苦。当孩子在门阶上跌倒时，他所遭受的痛苦必定足以使他在下次变得更加小心，因此我们不必为了让他更小心而在必要的痛苦之外再给他增加痛苦。我们应该让儿童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明白“大错大惩，小错小罚”的道理，从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And then mark, lastly, that these natural reactions which follow the child's wrong actions, are constant, direct, unhesitating, and not to be escaped. No threats: but a silent, rigorous performance. If a child runs a pin into its finger, pain follows. If it does it again, there is again the same result: and so on perpetually. In all its dealings with surrounding inorganic nature it finds this unswerving persistence, which listens to no excuse, and from which there is no appeal; and very soon recognising this stern though beneficent discipline, it becomes extremely careful not to transgress.

最后，那些伴随儿童错误行为的自然反应具有连续性、直接性，是毫不迟疑和无法躲避的。无需恐吓，只有无声的严格执行。如果儿童把针扎进了手指，肯定会痛，再扎就再痛，永远如此。在与无机的自然环境打交道时，孩子会发现自然环境那么坚定，既不听你辩解，也不让你申诉，所以很快他就会非常谨慎地听从这个严肃而善良的管教，并且以后决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Still more significant will these general truths appear, when we remember that they hold throughout adult life as well as throughout infantine life. It is by an experimentally-gained knowledge of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that men and women are checked when they go wrong. After home education has ceased, and when there are no longer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forbid this or that kind of conduct, there comes into play a discipline like that by which the young child is taught its first lessons in self-guidance. If the youth entering upon the business of life idles away his time and fulfils slowly or unskilfully the duties entrusted to him, there by-and-by follows the natural penalty: he is discharged and left to suffer for a while the evils of relative poverty. On the unpunctual man, failing alike his appointments of business and pleasure, there continually fall the consequent inconveniences, losses, and deprivations. The avaricious tradesman who charges too high a rate of profit, loses his customers, and so is checked in his greediness. Diminishing practice teaches the inattentive doctor to bestow more trouble on his patients. The too credulous creditor and the over-sanguine speculator alike learn by the difficulties which rashness entails on them, the necessity of being more cautious in their engagements. And so throughout the life of every citizen. In the quotation so often made *apropos* of these cases—“The burnt child dreads the fire”—we see not only that the analogy between this social discipline and Nature's early discipline of infants is universally recognised; but we also see an implied conviction that this discipline is of the most efficient kind. Nay more, this conviction is not only implied, but distinctly stated. Every one has heard others confess that only by “dearly bought experience” had they been induced to give up some bad or foolish course of conduct formerly pursued. Every one has heard, in the criticisms passed on the doings of this spendthrift or the other speculator, the remark that advice was useless, and that nothing but “bitter experience”

would produce any effect: nothing, that is, but suffering the unavoidable consequences. And if further proof be needed that the penalty of the natural reaction is not only the most efficient, but that no humanly-devised penalty can replace it, we have such further proof in the notorious ill-success of our various penal systems. Out of the many methods of criminal discipline that have been proposed and legally enforced, none have answered the expectations of their advocates. Not only have artificial punishments failed to produce reformation, but they have in many cases increased the criminality. The only successful reformatories are those privately-established ones which have approximated their regime to the method of Nature—which have done little more than administer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of criminal conduct: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being, that by imprisonment or other restraint, the criminal shall have his liberty of action diminished as much as is needful for the safety of society; and that he shall be made to maintain himself while living under this restraint. Thus we see not only that the discipline by which the young child is so successfully taught to regulate its movements is also the discipline by which the great mass of adults are kept in order, and more or less improved; but that the discipline humanly devised for the worst adults, fails when it diverges from this divinely-ordained discipline, and begins to succeed when it approximates to it.

如果我们记得这些普遍真理在幼年生活和成年生活中都一贯如此，它们就会更有意义。成年人借助实验获取关于自然因果的知识，进而指导他们规避错误。人在成年之后，父母和老师便不再会禁止他的种种行为，而此时发挥作用的便是刚才提到的铁律，它会以自我引导的方式发挥着管教的作用。如果一个年轻人参加工作后虚度时间，办事拖拉，经常出错，那么他迟早必然受到自然惩罚；他会被解雇，随之而来的就是一段贫困的日子。一个经常不守时的人，总是误了事

务性或文娱性的约会，各种麻烦、损失和贻误就会不断来临。对于一个逐利的贪婪商人来说，失去顾客会使他的利润减少。对于一个粗心大意、总是给患者制造麻烦的医生来说，病人数量的减少就会给他以教训。对于容易轻信他人的放贷者和过于乐观的投机者来说，轻率所带来的困难会使他们明白谨慎的必要性。诸如此类，每个公民的生活都一样，生活中也基本上都是这个道理。人们经常引用的一句俗语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些例子，那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这种社会管教与自然对婴儿的早期管教的相似性，而且我们都相信这种方式是最有效的。非但如此，人们不只是心里有这种信念，还很明确地把它表述了出来。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谚语，“不撞南墙不回头”。人们往往只有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才会想到放弃之前坚持的一些不好的或者愚蠢的行为。大家也都听说过以前一些经常批评这个败家子或那个投机分子的话，总有人提到劝告没有用，只有“惨痛的经历”才会产生效果，他们一定要得到那些不可避免的教训。自然的惩罚效应不仅是最有效的，而且是任何惩罚都不能代替的。如果要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可以看看我们各种刑罚遭遇的那些声名狼藉的失败。在众多已经被立法并合法实施的惩戒犯罪的方法中，没有一个达到立法者的期望。人为的惩罚不仅未能改造犯罪分子，在很多情况下反而增加了犯罪。唯一成功的改造发生在那些私立机构，他们的方法大致接近自然的方法，即让犯罪行为得到自然的后果，根据社会安全的需要限制罪犯的行动自由，并且要求他们在这种约束下自谋生活。因此我们发现，能成功教会儿童调整行为的纪律同样能使大多数成年人遵守秩序，提高素养。同时，那些旨在改造坏人的人为纪律越偏离这种神圣的自然规训就越容易失败，而越是接近则越可能成功。

Have we not here, then,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moral education? Must we not infer that the system so beneficent in its effects, alike during infancy and maturity, will be equally beneficent throughout youth? Can anyone believe that the method which answers so well 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divisions of life will

not answer in the intermediate division? Is it not manifest that as “ministers and interpreters of Nature” it is the function of parents to see that their children habitually experience the true consequences of their conduct—the natural reactions: neither warding them off, nor intensifying them, nor putting artificial consequences in place of them? No unprejudiced reader will hesitate in his assent.

在此我们不就有了德育的指导原则了吗？我们难道不应该推测，一个对幼儿和成人同样有效的方式在青年时期也一样良好吗？难道会有人相信这样一个在生命前期和后期都能很好适用的方法不适用于中期？这还有什么不清楚吗？父母作为“自然规律的执行者和解释者”，其职责就是让孩子习惯性地体验自己行为产生的后果，即自然反应。既不回避，也不加重，更不用人为的后果去代替它。任何摒弃了偏见的读者都会毫不迟疑地对此表示赞同。

Probably, however, not a few will contend that already most parents do this—that the punishments they inflict are,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the true consequences of ill-conduct—that parental anger, venting itself in harsh words and deeds, is the result of a child's transgression—and that, in the suffering, physical or moral, which the child is subject to, it experiences the natural reaction of its misbehaviour. Along with much error this assertion, doubtless, contains some truth. It is unquestionable that the displeasure of fathers and mothers is a true consequence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that the manifestation of it is a normal check upon such delinquency. It is unquestionable that the scoldings, and threats, and blows, which a passionate parent visits on offending little ones, are effects actually produced in such a parent by their offences; and so are, in some sort, to be considered as among the natural reactions of their wrong actions. And we are by no means

prepared to say that these modes of treatment are not relatively right—right, that is, in relation to the uncontrollable children of ill-controlled adults; and right in relation to a state of society in which such ill-controlled adults make up the mass of the people. As already suggested, educational systems, like political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re generally as good as the state of human nature permits. The barbarous children of barbarous parents are probably only to be restrained by the barbarous methods which such parents spontaneously employ; while submission to these barbarous methods is perhaps the best preparation such children can have for the barbarous society in which they are presently to play a part. Conversely, the civilised members of a civilised society will spontaneously manifest their displeasure in less violent ways—will spontaneously use milder measures—measures strong enough for their better-natured children. Thus it is doubtless true that, in so far as the expression of parental feeling is concerned, the principle of the natural reaction is always more or less followed. The system of domestic government ever gravitates towards its right form.

然而，可能有不少人会认为大多数父母已经在按照这样的原则做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给孩子的那些惩罚都是不良行为产生的真实后果。愤怒的父母对孩子的粗暴言行都是孩子顽劣行为的结果。孩子受到了身心痛苦时，就体验了行为不当的自然反应。毫无疑问，这种说法尽管包含了一些谬误，但也还是包含了一些真理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必然导致父母的不悦，而把这种不悦表现出来通常可以阻止这些过失。情绪激动的父母会以责骂、恐吓、咆哮等方式对待犯错的小家伙们，毫无疑问，这都是他们的错误行为在家长那里导致的实际后果。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被视作错误行为的自然反应。我们也不能说这些对待儿童的方式是相对正确的，这种方式适用于那些不擅长控制孩子的家长以及他们无法控制的儿童，适用于其中的大多数成年人自控力都较差的社会状态。前面已经提到，教

育方法同政治制度及其他制度一样，一般只能改善到人性自然状态所容许的程度。野蛮父母的野蛮孩子也许只能靠其父母的野蛮方式来管教。对于这类人来说，使用这种野蛮方式也许可以为他们做最好的准备，因为这种方式可以教孩子如何在当前的野蛮社会中生存。相反，文明社会的文明成员则会自觉地以一些不那么暴力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不悦，或者说采取一些温和的措施，而这些温和的措施足以对他们有着良好教养的孩子产生管教的效果。因此毋庸置疑，从父母情绪表达的方面看，的确或多或少地符合自然反应这个原则。家庭管理方法一直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But now observe two important facts. In the first place, observe that, in states of rapid transition like ours, which witness a long-drawn battle between old and new theories and old and new practices, the educational methods in use are apt to be considerably out of harmony with the times. In deference to dogmas fit only for the ages that uttered them, many parents inflict punishments that do violence to their own feelings, and so visit on their children *un* natural reactions; while other parents, enthusiastic in their hopes of immediate perfection, rush to the opposite extreme. And then observe, in the second place, that the discipline on which we are insisting is not so much the experience of parental approbation or disapprobation, which, in most cases, is only a secondary consequence of a child's conduct; but it is the experience of those results which would naturally flow from the conduct in the absence of parental opinion or interference. The truly instructive and salutary consequences are not those inflicted by parents when they take upon themselves to be Nature's proxies; but they are those inflicted by Nature herself. We will endeavour to make this distinction clear by a few illustrations, which, while they show what we mean by natural reactions as contrasted with artificial ones, will afford some directly practical suggestions.

但是现在我们注意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个事实：在我们当前这种快速变革的情况下，新旧理论和实践之间在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们使用的教育方法很容易被认为是与时代脱节的。许多家长们墨守成规，只遵循适用于旧时代的教条，执行一些甚至对他自己来说情感上都难接受的惩罚，以使孩子的行为得到非 自然性的回应；其他一些家长渴望教育立即就能臻于完美，又冲向了另一个极端。第二件事实：在管教方面更重要的并不是要让孩子体验父母的肯定或斥责（肯定或斥责只是孩子行为的第二种结果），而是体验那些在没有父母参与或干涉时他自己的行为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真正有教育性和帮助性的后果并不是父母作为自然代理人所施加的，而是自然本身施加的。我们将借助一些例子来尽量对此进行区分。这些例子将为我们展示什么是自然的回应以及与之相对的人为的回应，我们还会直接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

In every family where there are young children there almost daily occur cases of what mothers and servants call “making a litter.” A child has had out its box of toys, and leaves them scattered about the floor. Or a handful of flowers, brought in from a morning walk, is presently seen dispersed over tables and chairs. Or a little girl, making doll's-clothes, disfigures the room with shreds. In most cases the trouble of rectifying this disorder falls anywhere but in the right place: if in the nursery, the nurse herself, with many grumblings about “tiresome little things,” undertakes the task; if below stairs, the task usually devolves either on one of the elder children or on the housemaid; the transgressor being visited with nothing more than a scolding. In this very simple case,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arents wise enough to follow out, more or less consistently, the normal course—that of making the child itself collect the toys or shreds. The labour of putting things in order is the true consequence of having put them in disorder. Every trader

in his office, every wife in her household, has daily experience of this fact. And if education be a preparation for the business of life, then every child should also, from the beginning, have daily experience of this fact. If the natural penalty be met by any refractory behaviour (which it may perhaps be where the general system of moral discipline previously pursued has been bad), then the proper course is to let the child feel the ulterior reaction consequent on its disobedience. Having refused or neglected to pick up and put away the things it has scattered about, and having thereby entailed the trouble of doing this on someone else, the child should, on subsequent occasions, be denied the means of giving this trouble. When next it petitions for its toy-box, the reply of its mamma should be—“The last time you had your toys you left them lying on the floor, and Jane had to pick them up. Jane is too busy to pick up every day the things you leave about; and I cannot do it myself. So that, as you will not put away your toys when you have done with them, I cannot let you have them.” This is obviously a natural consequence, neither increased nor lessened; and must be so recognised by a child. The penalty comes, too, at the moment when it is most keenly felt. A new-born desire is balked at the moment of anticipated gratification; and the strong impression so produced can scarcely fail to have an effect on the future conduct: an effect which, by consistent repetition, will do whatever can be done in curing the fault. Add to which, that, by this method, a child is early taught the lesson which cannot be learnt too soon, that in this world of ours pleasures are rightly to be obtained only by labour.

在每个有幼儿的家庭，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母亲和仆人称为“乱七八糟”的事情。比如孩子会搬出玩具箱，然后把玩具丢得满地都是。或者早晨去散步带了一把鲜花，然后撒得桌子椅子上到处都是。或者小女孩在给玩偶做衣服，然后弄得屋子里到处都是碎布头。

多数情况下，收拾残局的任务总是会落在孩子之外的人身上。比如，在育儿室就是保姆来收拾，她会边收拾边唠叨着“这些烦人的小东西”。而如果发生在楼下，则通常由某个年龄大一点儿的孩子或者女佣承担。而做错事的孩子要承担的只是些责骂而已。然而，在这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中，也有很多家长很明智，他们多少坚持了正常的做法，即让孩子自己收拾自己的烂摊子。东西乱摆乱放的行为带来的真正后果就是付出把东西放整齐的劳动。每一个商人在店里，每一个妻子在家里，每天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如果教育就是为生活做准备，那么每一个孩子从一开始就应该经历这些。如果自然的惩罚遭到反抗（之前通常采用的德育方法不当时也许会这样），那么适当的做法就是让孩子去进一步面对反抗带来的后果。只要他拒绝或忘了去收拾自己造成的乱摊子，而让别人替他干这些麻烦事，那么以后就得不到给别人造成麻烦的东西。比如，当他下一次再要玩具箱时，妈妈就应该这样回答他：“上次你玩玩具时扔得满地板都是，害得简不得不去收拾整理。但是简很忙，不可能每天都去收拾你乱丢乱放的玩具。我自己也没时间帮你收拾。所以，既然你玩够了之后不能自己收拾整理，我就不能让你再拿玩具了。”这显然就是一个自然的后果，既没有扩大也没有减小，孩子也一定会认可。惩罚在这时候出现，一定也会让孩子的感受非常深刻。一个刚刚诞生的愿望在初期就被抑制了，如此产生的强烈印象，怎能不对孩子以后的行为产生影响？通过多次的反复，这种影响就会彻底改掉孩子的毛病。此外，通过这种方法，孩子在很早的时候就会明白（越早明白越好），世界上获取快乐的正确方式是劳动。

Take another case. Not long since we had frequently to listen to the reprimands visited on a little girl who was scarcely ever ready in time for the daily walk. Of eager disposition, and apt to become thoroughly absorbed in the occupation of the moment, never thought of putting on her things until the rest were ready. The governess and the other children had almost invariably to wait; and from the mamma there almost invariably came the same scolding.

Utterly as this system failed it never occurred to the mamma to let Constance experience the natural penalty. Nor, indeed, would she try it when it was suggested to her. In the world the penalty of being behind time is the loss of some advantage that would else have been gained: the train is gone; or the steamboat is just leaving its moorings; or the best things in the market are sold; or all the good seats in the concert-room are filled. And every one, in cases perpetually occurring, may see that it is the prospective deprivations entailed by being too late which prevent people from being too late. Is not the inference obvious? Should not these prospective deprivations control the child's conduct also? If Constance is not ready at the appointed time, the natural result is that of being left behind, and losing her walk. And no one can, we think, doubt that after having once or twice remained at home while the rest were enjoying themselves in the fields, and after having felt that this loss of a much-prized gratification was solely due to want of promptitude, some amendment would take place. At any rate, the measure would be more effective than that perpetual scolding which ends only in producing callousness.

再举一个例子。不久前，我们听说一个小女孩多次受到责骂，因为她每天和大家一起散步时很少准时到场。这个小女孩名叫康斯坦斯，她性格热情开朗，做事总是全神贯注，以至于经常别人都准备就绪了，她才会想起穿衣戴帽。女家庭教师和其他孩子总是在等她，妈妈总是一味地责骂她。尽管这种责骂的办法已经完全没有作用了，这位妈妈也从没想过让康斯坦斯自己去经历一下自然的惩罚。事实上，即使都已经被提醒过，这位妈妈仍不愿意尝试自然惩罚的方法。在这个世界上，迟到就意味着要失去一些本应该得到的利益。火车出站了，轮船离岸了，或者市场上的好东西卖光了，再或者音乐厅的好座位也售完了。从这些每天都发生着的例子中，每个人都会发现迟到会让人失去本来很好的机会，因而也就不敢迟到了。这个结论还不明显

吗？本来很有希望获取的东西可能被剥夺，这难道不足以控制孩子的行为吗？如果康斯坦斯不能遵守约定的时间，自然的后果就是把她留在家里，让她不能去散步。当别人到田野游玩的时候，让她在家里呆上一两次，让她明白，她的渴望无法被满足是因为她不守时。这样她那毛病才可能被纠正，应该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吧。至少这个措施会比那些麻木不仁的长期责骂有效多了。

Again, when children, with more than usual carelessness, break or lose the things given to them, the natural penalty—the penalty which makes grownup persons more careful—is the consequent inconvenience. The want of the lost or damaged article, and the cost of supplying its place, are the experiences by which men and women are disciplined in these matters; and the experience of children should be as much as possible assimilated to theirs. We do not refer to that early period at which toys are pulled to piece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heir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at which the results of carelessness cannot be understood; but to a later period, when the meaning and advantages of property are perceived. When a boy, old enough to possess a penknife, uses it so roughly as to snap the blade, or leaves it in the grass by some hedge-side, where he was cutting a stick, a thoughtless parent, or some indulgent relative, will commonly forthwith buy him another; not seeing that, by doing this, a valuable lesson is lost. In such a case, a father may properly explain that penknives cost money, and that to get money requires labour; that he cannot afford to purchase new penknives for one who loses or breaks them; and that until he sees evidence of greater carefulness he must decline to make good the loss. A parallel discipline may be used as a means of checking extravagance.

再举一个例子。当孩子由于特别粗心大意，打碎或弄丢了别人给自己的东西，自然的惩罚（成人要多加注意这个惩罚）就是让他感受到由此带来的麻烦：不能使用那件丢失或毁坏了的东西，弥补这些东西的费用，这些方法都可以让大人们从中受到启示。同样，孩子们也有类似体验。我们所说的不包括儿童早期，因为在这一阶段孩子撕扯玩具其实是一种发现它物理性质的方式，他们还不能理解什么是粗心大意的后果。而到了儿童后期，孩子们就已经可以理解财物的意义和好处了。如果一个小男孩在合适的年龄能够拥有一把小刀，而他在使用时由于野蛮粗心折断了刀刃，或者在削完木棍后随便丢在了篱笆旁的草丛里，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一般都会不假思索或者纵容性地给他另买一把，而没有想过这样的做法让孩子失去了一次宝贵的教训。在这个例子中，父亲也许应该以适当的方式给孩子说明小刀是要花钱买的，钱是需要通过劳动挣的，自己没那么多钱总给弄丢或毁坏东西的人买新的，如果他还是不小心，他就不能再替他弥补这个损失。这样一来，孩子同时还会得到另一个教训，即不挥霍浪费。

These few familiar instances, here chosen because of the simplicity with which they illustrate our point, will make clear to every on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ose natural penalties which we contend are the truly efficient ones, and those artificial penalties which parents commonly substitute for them. Before going on to exhibit the higher and subtler applications of this principle, let us note its many and great superiorities over the principle, or rather the empirical practice, which prevails in most families.

这里选择这些熟悉的例子是因为它们可以简明地阐释我们的观点，让大家区分清楚哪些是我们推荐的、确实行之有效的自然惩罚，哪些是父母们经常用来代替自然惩罚的人为惩罚。在继续展示对这一原则更高级、更巧妙的运用之前，让我们看一下当前多数家庭中盛行的那些教养原则或经验实践，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所主张的这一

原则有很多好处和优势。

In the first place, right conceptions of cause and effect are early formed; and by frequent and consistent experience are eventually rendered definite and complete. Proper conduct in life is much better guaranteed when the good and evil consequences of actions are rationally understood, than when they are merely believed on authority. A child who finds that disorderliness entails the subsequent trouble of putting things in order, or who misses a gratification from dilatoriness, or whose want of care is followed by the loss or breakages of some much-prized possession, not only experiences a keenly-felt consequence, but gains a knowledge of causation: both the one and the other being just like those which adult life will bring. Whereas a child who in such cases receives some reprimand or some factitious penalty, not only experiences a consequence for which it often cares very little, but lacks that instruction respecting the essential natures of good and evil conduct, which it would else have gathered. It is a vice of the common system of artificial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long since noticed by the clear-sighted, that by substituting for the natural results of misbehaviour certain threatened tasks or castigations, it produces a radically wrong standard of moral guidance. Having throughout infancy and boyhood always regarded parental or tutorial displeasure as the result of a forbidden action, the youth has gained an established association of ideas between such action and such displeasure, as cause and effect; and consequently when parents and tutors have abdicated, and their displeasure is not to be feared, the restraint on a forbidden action is in great measure removed: the true restraints, the natural reactions having yet to be learnt by sad experience. As writes one who has had personal knowledge of this short-sighted system:—

首先的一个好处就是，照这样做就能够初步产生正确的因果观念，并且通过多次、一致的经验，这些观念最终会变得准确而完整。儿童学会在生活中做出恰当的行为是因为他可以理性地分辨不同行为带来的后果的好坏，而不仅仅是因为相信权威。孩子会发现，乱放东西的后果是费劲整理，拖延迟缓的后果是失去好处，粗心大意的后果是损失一些宝贵的东西。孩子不但会深切经历行为的后果，而且会获得关于因果关系的概念。这两点对成年人同样适用。相反，如果在这些例子中，孩子得到的惩罚是斥责性的或人为强加的，那么他对体验到的后果就不会太在意，而且还学不到自然惩罚所包含的好坏行为的本质。明眼人很早就发现，通常人为性的赏罚制度有一个缺陷，即用一定的体罚或责骂替代了不当行为的自然性之后，往往会产生一套极端错误的德育标准。由于在整个婴儿期和童年期总是把父母或教师的不悦当成自己某个被禁止的行为的主要后果，孩子就会把这些行动和这些不高兴形成一个固定的因果联系。到了没有父母或教师来管教的时候，也就不用再害怕他们不高兴了，原本受到禁止的大部分行为就解除了约束，而那些真正的约束，那些自然性的惩罚，还需要从惨痛经验中从头学习。一位曾亲身经历了这种缺乏远见的惩罚方法的人这样写道：

> Young men let loose from school, particularly those whose parents have neglected to exert their influence, plunge into every description of extravagance; they know no rule of action—they are ignorant of the reasons for moral conduct—they have no foundation to rest upon—and until they have been severely disciplined by the world are extremely dangerous members of society.

“离开了学校管束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缺乏父

母管束的年轻人，在进入社会后极其放纵自己。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行为准则，也就是说不明白依据道德行事的理由，或者说他们没有处事的原则和依据。他们在未经社会严加管教之前都是极其危险的社会成员。”

Another great advantage of this natural system of discipline is, that it is a system of pure justice; and will be recognised by every child as such. Whoso suffers nothing more than the evil which obviously follows naturally from his own misbehaviour, is much less likely to think himself wrongly treated than if he suffers an evil artificially inflicted on him; and this will be true of children as of men. Take the case of a boy who is habitually reckless of his clothes—scrambles through hedges without caution, or is utterly regardless of mud. If he is beaten, or sent to bed, he is apt to regard himself as ill-used; and his mind is more likely to be occupied by thinking over his injuries than repenting of his transgressions. But suppose he is required to rectify as far as he can the harm he has done—to clean off the mud with which he has covered himself, or to mend the tear as well as he can. Will he not feel that the evil is one of his own producing? Will he not while paying this penalty be continuously consciou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t and its cause? And will he not, spite his irritation, recognise more or less clearly the justice of the arrangement? If several lessons of this kind fail to produce amendment—if suits of clothes are prematurely spoiled—if pursuing this same system of discipline a father declines to spend money for new ones until the ordinary time has elapsed—and if meanwhile, there occur occasions on which, having no decent clothes to go in, the boy is debarred from joining the rest of the family on holiday excursions and fete days, it is manifest that while he will keenly feel the punishment, he can scarcely fail to trace the

chain of causation, and to perceive that his own carelessness is the origin of it; and seeing this, he will not have the same sense of injustice as when there is no obvious connexion between the transgression and its penalty.

这种自然管教的另一个好处就在于它的完全公正，每一个孩子都会认可这一点。任何人都不会对自己的不当行为给自己带来的自然苦果感到委屈，这完全不同于面对人为强加性惩罚时的态度，人为强加时他不太会认为自己是错的，大人小孩都是如此。拿一个惯于不爱护衣物的男孩来说，他经常会不小心在树篱上挂破衣服，或者弄得浑身泥泞。此时如果挨了打或者被罚去睡觉，他很容易认为自己受到了虐待，多半会因为受罚而伤心，但不会忏悔自己的过失。但是假如要求他尽量去弥补自己所造成的损失，即洗干净身上的衣服，或者把扯破的衣服勉强缝好，他难道不会觉得这个后果是自作自受？难道在受罚时不会一直意识到他做的事和它的原因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尽管他不高兴，但他多少会明白地认可这一安排的公正性？如果这样的教训没能改正孩子的行为，比如衣服很快又弄破了，父亲就应该继续采用这样的管教方法，先不给他买新衣服。在此期间，他就很可能没有体面的衣服穿，也就没法和家人一起参加假日郊游或出席宴会。显然，如此一来，他肯定能深切感受到惩罚，而且一定会找到其中的因果关系，最终发现根源在于自己的粗心大意。此时，他也就不会因为惩罚与过失行为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而感到不公正了。

Again, the tempers both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are much less liable to be ruffled under this system than under the ordinary system. Instead of letting children experience the painful results which naturally follow from wrong conduct, the usual course pursued by parents is to inflict themselves certain other painful results. A double mischief arises from this. Making, as they do, multiplied family laws; and identifying their own supremacy and

dignity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these laws; it happens that every transgression comes to be regarded as an offence against themselves, and a cause of anger on their part. Add to which the further irritations which result from taking upon themselves, in the shape of extra labour or cost, those evil consequences which should have been allowed to fall on the wrongdoers. Similarly with the children. Penalties which the necessary reaction of things brings around upon them—penalties which are inflicted by impersonal agency, produce an irritation that is comparatively slight and transient; whereas, penalties which are voluntarily inflicted by a parent, and are afterwards remembered as caused by him or her, produce an irritation both greater and more continued. Just consider how disastrous would be the result if this empirical method were pursued from the beginning. Suppose it were possible for parents to take upon themselves the physical sufferings entailed on their children by ignorance and awkwardness; and that while bearing these evil consequences they visited on their children certain other evil consequences, with the view of teaching them the impropriety of their conduct. Suppose that when a child, who had been forbidden to meddle with the kettle, spilt some boiling water on its foot, the mother vicariously assumed the scald and gave a blow in place of it; and similarly in all other cases. Would not the daily mishaps be sources of far more anger than now? Would there not be chronic ill-temper on both sides? Yet an exactly parallel policy is pursued in after years. A father who punishes his boy for carelessly or wilfully breaking a sister's toy, and then himself pays for a new toy, does substantially this same thing—inflicts an artificial penalty on the transgressor, and takes the natural penalty on himself: his own feelings and those of the transgressor being alike needlessly irritated. If he simply required restitution to be made, he would produce far less heartburning. If he told the boy that a new toy must be bought at his, the boy's cost, and that his

supply of pocket-money must be withheld to the needful extent, there would be much less cause for ebullition of temper on either side; while in the deprivation afterwards felt, the boy would experience the equitable and salutary consequence. In brief, the system of discipline by natural reactions is less injurious to temper, alike because it is perceived on both sides to be nothing more than pure justice, and because it more or less substitutes the impersonal agency of nature for the personal agency of parents.

再者，相较于通常的管教方法，这种方法有利于使孩子和父母都控制自己的脾气。父母们通常会人为地强加给孩子一定的惩罚性后果，而不是让孩子们去体验自身错误行为带来的自然性苦果。这样就会产生双重危害。父母们制定了多项家规，并且通过维护这些家规来树立自己的威严。每一个不良行为都被看成是对他们威严的侵犯，从而引起他们的恼怒。此外，这种方法还得让父母花费额外的精力和代价来替犯错者收拾烂摊子，这无疑会加重他们的恼怒。孩子们也同样会因此而更加委屈。非人为力量的自然性惩罚是孩子周围事物产生的必然反应，因而相对而言，他们对此感到的愤怒一定是轻微的，暂时的。相反，对于父母人为施加的惩罚，他们会一直记在心里，因此产生的愤怒就会更强烈、更持久。试想一下，如果从一开始就实行这种经验性的方法，那结果该是多么悲惨啊。假设父母们把孩子的无知和笨拙引起的生理痛苦都揽到自己身上，然后在自己忍受这些苦果的同时给与孩子一些其他的惩罚，以此让孩子明白他的行为是错误的。假设有个孩子无视禁令而不小心打翻了开水壶，这时母亲为了救他而自己的脚被烫伤，但是随后又给了孩子一巴掌。很多例子里大致也都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些日常的小意外会不会比现在引起的愤怒更多？双方的脾气会不会越来越坏？然而这样的做法往往还会持续好多年。儿子不小心或故意弄坏了妹妹的玩具，做父亲的在给儿子一些惩戒之后往往会自己再给女儿买个新玩具。这种做法本质上就是孩子承受了人为性的惩罚，父亲揽过自然性的惩罚，不用说，双方的情绪都被激怒了。如果父亲告诉儿子，必须要他自己花钱买一个新玩具，相应费

用要从他的零花钱中抵扣，那么双方的不悦情绪可能就会少很多，同时，孩子感受到损失之后，也就体验了那种公正且合理的后果。总之，借助自然反应进行管教的方法对人的情绪伤害很小，因为双方都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公正的，并且非人为性的自然惩罚取代了父母施加的惩罚。

Whence also follows the manifest corollary, that under this system the parental and filial relation will be more friendly, and therefore a more influential one. Whether in parent or child, anger, however caused, and to whomsoever directed, is more or less detrimental. But anger in a parent towards a child, and in a child towards a parent, is especially detrimental; because it weakens that bond of sympathy which is essential to a beneficent control. In virtue of the general law of association of ideas, it inevitably results, both in young and old, that dislike is contracted towards things which in our experience are habitually connected with disagreeable feelings. Or where attachment originally existed, it is weakened, or destroyed, or turned into repugnance,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y of painful impressions received. Parental wrath, with its accompanying reprimands and castigations, cannot fail, if often repeated, to produce filial alienation; while the resentment and sulkiness of children cannot fail to weaken the affection felt for them, and may even end in destroying it. Hence the numerous cases in which parents (and especially fathers, who are commonly deputed to express the anger and inflict the punishment) are regarded with indifference, if not with aversion; and hence the equally numerous cases in which children are looked upon as inflictions. Seeing, then, as all must do, that estrangement of this kind is fatal to a salutary moral culture, it follows that parents cannot be too solicitous in avoiding the occasions of direct antagonism with their children—occasions of personal resentment.

And therefore they cannot too anxiously avail themselves of this discipline of natural consequences—this system of letting the penalty be inflicted by the laws of things; which, by saving the parent from the function of a penal agent, prevents these mutual exasperations and estrangements.

在此还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推论，即用这种方法可以让亲子关系变得更加友好，也可以对孩子产生深刻的影响。无论对父母还是子女，为了任何原因对他人发怒都会多少对自身造成伤害。而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互愤怒，具有更严重的伤害性，因为这将削弱父母管教孩子时必需的感情联结。根据普遍联系的法则，年轻人和老年人肯定都不喜欢生活中那些经常让人不愉快的经历。随着痛苦印象的增加，原本存在的好感也会被削弱或摧毁，从而转变为厌恶。父母夹杂着斥责和惩罚的愤怒，如果经常反复，势必会让孩子产生疏离感。同时，孩子的愤恨和不悦也一定会减少父母对他的爱，甚至最终可能使他完全失去父母的爱。因此，在很多的例子中，即便孩子不讨厌父母（尤其是父亲，更爱发火、经常处罚孩子），也会认为他们特别冷漠无情。同样，在这些例子中有许多儿女也被父母当成冤家。我们大家一定会发现，这种疏离的关系非常不利于德育。因此父母一定要非常注意避免和孩子直接对抗，避免引起孩子的怨恨情绪。父母们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借助自然性后果——事物的规律法则来惩罚孩子、管教孩子。这样，父母不用处罚孩子就可以避免亲子之间的相互激怒和相互疏远。

Thus we see that this method of moral culture by experience of the normal reactions, which is the divinely-ordained method alike for infancy and for adult life, is equally applicable during the intermediate childhood and youth. And among the advantages of this method we see:—First: that it gives that rational comprehension of right and wrong conduct which results from actual experience of the good and bad consequences caused by

them.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旨在体验正常自然反应的德育方法，毫无疑问对幼儿和成人都非常有效，对童年和青年时期也同样适用。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方法的诸多优点。第一，儿童由于亲自体验了或好或坏的后果，从而得到了对正确和错误行为的理性认识。

Second: that the child, suffering nothing more than the painful effects brought upon it by its own wrong actions, must recognise more or less clearly the justice of the penalties. Third: that, recognising the justice of the penalties, and receiving those penalties through the working of things, rather than at the hands of an individual, its temper will be less disturbed; while the parent occupying the comparatively passive position of taking care that the natural penalties are felt, will preserve a comparative equanimity. And Fourth: that mutual exasperation being thus in great measure prevented, a much happier, and a more influential state of feeling, will exist between parent and child.

第二，儿童受到了自身错误行为的痛苦结果，必然多少会认识惩罚的公正。第三，既然认可了惩罚的公正性，并且接受的是事物本身而非某个人的惩罚，儿童的生气和愤怒也就少了，同时父母也会保持相对的平静，毕竟他们只是扮演一个相对被动的角色，只是让自然性的惩罚起作用。第四，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亲子之间的相互疏离，亲子之间出现的是一种令人更加愉悦、更加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情感氛围。

“But what is to be done with more serious misconduct?” some will ask, “How is this plan to be carried out when a petty theft has

been committed? Or when a lie has been told? Or when some younger brother or sister has been ill-used?”

有人也许会问，“但对于一些更加严重的错误行为该怎么办呢？小偷小摸怎么办？撒谎怎么办？欺负弟弟或妹妹又该怎么办？”

Before replying to these questions, let us consider the bearings of a few illustrative facts.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先考虑一下几件事情，以及这几件事情之间的关系。

Living in the family of his brother-in-law, a friend of ours had undertaken the education of his little nephew and niece. This he had conducted, more perhaps from natural sympathy than from reasoned out conclusions, in the spirit of the method above set forth. The two children were in doors his pupils and out of doors his companions. They daily joined him in walks and botanising excursions, eagerly sought out plants for him, looked on while he examined and identified them, and in this and other ways were ever gaining both pleasure and instruction in his society. In short, morally considered, he stood to them much more in the position of parent than either their father or mother did. Describing to us the results of this policy, he gave, among other instances, the following. One evening, having need for some article lying in another part of the house, he asked his nephew to fetch it for him. Deeply interested as the boy was in some amusement of the moment, he, contrary to his wont, either exhibited great reluctance or refused,

we forget which. His uncle, disapproving of a coercive course, fetched it himself; merely exhibiting by his manner the annoyance this ill-behaviour gave him. And when, later in the evening, the boy made overtures for the usual play, they were gravely repelled—the uncle manifested just that coldness of feeling naturally produced in him, and so let the boy experience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s of his conduct. Next morning at the usual time for rising, our friend heard a new voice outside the door, and in walked his little nephew with the hot water; and then the boy, peering about the room to see what else could be done, exclaimed, “Oh! You want your boots,” and forthwith rushed down stairs to fetch them. In this and other ways he showed a true penitence for his misconduct; he endeavoured by unusual services to make up for the service he had refused; his higher feelings had of themselves conquered his lower ones, and acquired strength by the conquest; and he valued more than before the friendship he thus regained.

我们的一个朋友住在她姐夫家，承担了教育外甥和外甥女的任务。他的做法可能更多地是出于自然情感而非理性结论，但却与我们上述所提做法的精髓是一致的。两个孩子在家里是他的学生，在外面是他的伙伴。他们每天一起散步，进行植物调查。两个孩子总是积极地给他找植物，看着他如何辨认。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孩子们不断获取快乐，得到教育。简而言之，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位舅舅相比孩子父母更多地承担了家长的角色。在给我们描述自己做法的效果时，他给我们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一天晚上，他叫外甥去另一个房间帮他取一个东西。但是小男孩当时正玩得入迷着呢，就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做。具体是很犹豫还是拒绝了，我们也记不清了。孩子舅舅是不赞成强迫孩子的，所以就自己去取了，只是也表现出了对孩子错误行为的不高兴。当天晚些时候，小男孩多次主动提出做一个经常做的游戏，但都遭到了拒绝。这位舅舅只是表现出了自然产生的冷淡，但却让孩子体验到了自己行为带来的必然后果。第二天

早上正常时间起床时，我们这位朋友听到门外有声音，紧接着外甥端着热水进来了。接着，孩子开始环顾屋里找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噢，你的靴子！”孩子赶紧下楼去取。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小男孩表达着对自己错误行为的真诚悔意。他努力用一些额外的服务补偿自己拒绝的那一件事。他的较高级的情感战胜了较低的，并从胜利中获取了力量，他既然已经体会到缺乏友谊时的滋味，就比以往更加珍惜重新获得的友谊。

This gentleman is now himself a father; acts on the same system; and finds it answer completely. He makes himself thoroughly his children's friend. The evening is longed for by them because he will be at home; and they especially enjoy the Sunday because he is with them all day. Thus possessing their perfect confidence and affection, he finds that the simple display of his approbation or disapprobation gives him abundant power of control. If, on his return home, he hears that one of his boys has been naughty, he behaves towards him with that comparative coldness which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boy's misconduct naturally produces; and he finds this a most efficient punishment. The mere withholding of the usual caresses, is a source of the keenest distress—produces a much more prolonged fit of crying than a beating would do. And the dread of this purely moral penalty is, he says, ever present during his absence: so much so, that frequently during the day his children inquire of their mamma how they have behaved, and whether the report will be good. Recently, the eldest, an active urchin of five, in one of those bursts of animal spirits common in healthy children, committed sundry extravagances during his mamma's absence—cut off part of his brother's hair and wounded himself with a razor taken from his father's dressing-case. Hearing of these occurrences on his return, the father did not speak to the boy either that night or next morning. Not only was the

tribulation great, but the subsequent effect was, that when, a few days after, the mamma was about to go out, she was earnestly entreated by the boy not to do so; and on inquiry, it appeared his fear was that he might again transgress in her absence.

这位先生自己现在也做父亲了，还是照这个方法办，且他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管用。通过这个方法，他完全成为了孩子们的朋友。孩子们总盼望着夜晚的到来，因为晚上他就回家了。孩子们更享受星期天，因为父亲可以陪他们一整天。如此一来，他就获得了孩子们全部的信任和爱戴。他发现他只要赞许或者批评孩子，就会对他们有巨大的管教作用。如果他回家后听说某个儿子很淘气，他就会对他表现得相对冷淡些。这冷淡就是儿子错误行为自然产生的，并且他发现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惩罚。仅仅不像平常一样去抚摸孩子都会成为一种强烈的惩罚，哭起来比挨一顿打都厉害。他说，这种纯粹的道德惩罚甚至在自己不在家时都会对孩子产生威慑，以至于孩子们一天之中会经常问妈妈自己的表现好不好，会不会告诉父亲。最近，那个大孩子，一个五岁的淘气鬼，趁妈妈不在家时做了一些越轨的事情，剪掉了弟弟一些头发，并且拿了父亲洗漱架上的剃须刀，结果还弄伤了自己。其实，这些也就是健康儿童常有的蛮性。这位父亲回家听说这些事情后，当晚和第二天早上都不理这个儿子。除了当时痛苦不说，几天以后妈妈要出去，那孩子硬要她别去，一问才知道孩子是怕母亲不在时自己会再次犯错。

We have introduced these facts before replying to the question—“What is to be done with the graver offences?” for the purpose of first exhibiting the relation that may and ought to be established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for on the existence of this relation depends the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these graver offences. And as a further preliminary, we must now point out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relation will result from adopting the system we advocate.

Already we have shown that by letting a child experience simply the painful reactions of its own wrong actions, a parent in great measure avoids assuming the attitude of an enemy, and escapes being regarded as one; but it still remains to be shown that where this course has been consistently pursued from the beginning, a strong feeling of active friendship will be generated.

在回答“面对较严重的过失该怎么办”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例子，目的是想首先说明亲子之间可以建立而且应该建立的关系。因为只有靠这种关系才能处理较严重的过失。我们还必须指出另一个前提，即通过我们所主张的方法来建立上述关系。我们已经讲过了，只须让孩子完全体验他自己错误行为的自然苦果，家长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避免被孩子看成敌对方。同时还说明了只要始终坚持这一方法，一种强烈的积极的友谊就可以形成。

At present, mothers and fathers are mostly considered by their offspring as friend-enemies. Determined as their impressions inevitably are by the treatment they receive; and oscillating as that treatment does between bribery and thwarting, between petting and scolding, between gentleness and castigation; children necessarily acquire conflicting beliefs respecting the parental character. A mother commonly thinks it quite sufficient to tell her little boy that she is his best friend; and assuming that he is in duty bound to believe her, concludes that he will forthwith do so. “It is all for your good;” “I know what is proper for you better than you do yourself;” “You are not old enough to understand it now, but when you grow up you will thank me for doing what I do;“—these, and like assertions, are daily reiterated. Meanwhile the boy is daily suffering positive penalties; and is hourly forbidden to do this, that, and the other, which he was anxious to do. By words he hears that his

happiness is the end in view; but from the accompanying deeds he habitually receives more or less pain. Utterly incompetent as he is to understand that future which his mother has in view, or how this treatment conduces to the happiness of that future, he judges by such results as he feels; and finding these results any tiling but pleasurable, he becomes sceptical respecting these professions of friendship. And is it not folly to expect any other issue? Must not the child judge by such evidence as he has got? And does not this evidence seem to warrant his conclusion? The mother would reason in just the same way if similarly placed. If, in the circle of her acquaintance, she found someone who was constantly thwarting her wishes, uttering sharp reprimands, and occasionally inflicting actual penalties on her, she would pay but little attention to any professions of anxiety for her welfare which accompanied these acts. Why, then, does she suppose that her boy will conclude otherwise?

目前，在大多数子女眼里，父母既是朋友又是敌人。父母在孩子心中的形象自然取决于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由于这种方式在贿赂和禁阻之间、爱抚和责骂之间、慈爱和惩罚之间摇摆，孩子们对于家长的脾气自然就形成了一些矛盾的看法。母亲通常认为，只要她告诉儿子自己是他最好的朋友就足够了，并且认为孩子有义务相信她并立即照她说的做。母亲每天都不厌其烦地说着像“我都是为了你好”，“我比你更清楚什么适合你”，“你还小，现在还不懂，等你长大了就会感谢我为你做的这些”类似的断言。而与此同时，孩子却每天都在遭受一些真正的惩罚，他想到的这件事不让做，那件事也不让做。他听到的话都说是为了他最终的幸福，但是随之而来的行为又总是多多少少让他感觉到痛苦。尽管他不能完全理解母亲所说的未来，也不理解现在对待他的方式与未来幸福的关系，但他会根据自己的感受到的结果进行判断。一旦他发现这些结果一点儿都不能让人愉快，他就会开始怀疑那些关于友谊的说法。对此我们还要愚蠢地再抱其他任何幻想吗？

孩子难道不应该根据他的直观感受进行判断吗？他的证据不足以支持他的结论吗？如果把这位母亲放在孩子的立场上，她一定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思考问题。如果她发现自己的熟人圈里有人不断地阻挠自己的愿望，大声责骂且不时惩罚自己，那么她也一定不太会去理会那些口头上说是为了她好的做法。这样的话，她凭什么认为孩子就应该完全听自己的呢？

But now observe how different will be the results if the system we contend for be consistently pursued—if the mother not only avoids becoming the instrument of punishment, but plays the part of a friend, by warning her boy of the punishments which Nature will inflict. Take a case; and that it may illustrate the mode in which this policy is to be early initiated, let it be one of the simplest cases. Suppose that, prompted by the experimental spirit so conspicuous in children, whose proceedings instinctively conform to the inductive method of inquiry—suppose that so prompted the child is amusing himself by lighting pieces of paper in the candle and watching them burn. If his mother is of the ordinary unreflective stamp, she will either, on the plea of keeping the child "out of mischief," or from fear that he will burn himself, command him to desist; and in case of non-compliance will snatch the paper from him. On the other hand, should he be so fortunate as to have a mother of sufficient rationality, who knows that this interest with which the child is watching the paper burn results from a healthy inquisitiveness, without which he would never have emerged out of infantine stupidity, and who is also wise enough to consider the moral results of interference, she will reason thus: —"If I put a stop to this I shall prevent the acquirement of a certain amount of knowledge. It is true that I may save the child from a burn; but what then? He is sure to burn himself sometime; and it is quite essential to his safety in life that he should learn by experience the

properties of flame. Moreover, if I forbid him from running this present risk, he is sure hereafter to run the same or a greater risk when no one is present to prevent him; whereas, if he should have any accident now that I am by, I can save him from any great injury; add to which the advantage that he will have in future some dread of fire, and will be less likely to burn himself to death, or set the house in a flame when others are absent. Furthermore, were I to make him desist, I should thwart him in the pursuit of what is in itself a purely harmless, and indeed, instructive gratification; and he would be sure to regard me with more or less ill-feeling. Ignorant as he is of the pain from which I would save him, and feeling only the pain of a balked desire, he could not fail to look upon me as the cause of that pain. To save him from a hurt, which he cannot conceive, and which has therefore no existence for him, I inflict upon him a hurt which he feels keenly enough; and so become, from his point of view, a minister of evil. My best course then, is simply to warn him of the danger, and to be ready to prevent any serious damage." And following out this conclusion, she says to the child—"I fear you will hurt yourself if you do that." Suppose, now, that the child perseveres, as he will very probably do; and suppose that he ends by burning himself. What are the results? In the first place he has gained an experience which he must gain eventually, and which, for his own safety he cannot gain too soon.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he has found that his mother's disapproval or warning was meant for his welfare: he has a further positive experience of her benevolence—a further reason for placing confidence in her judgment and her kindness—a further reason for loving her.

现在来看看，如果坚持采用我们所主张的方法，结果会有什么不同。这位母亲不再扮演惩罚工具的角色，而是会从一个朋友的立场出发，提醒自己的孩子会受到什么样的自然惩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

子，也许就能说明这一方法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孩子的天性中就有归纳的探寻逻辑以及与之一致的实验精神。假设他很好奇地想把纸在蜡烛上点着并且观察燃烧的过程，而他的母亲，作为一个普通的没有反思精神的人，不是不让他顽皮捣蛋，就是害怕烧伤他，如果孩子还不听话，母亲就会从他手中把纸夺过来。当然也会有另一种情况。如果这个小男孩很幸运，他的母亲是很有理性的人，她明白孩子想看纸张燃烧是一种健康的求知兴趣，这一行为可以帮助孩子走出幼儿的无知愚昧。而且她还很明智地考虑到了干涉行为的德育后果，那么她会这样想："如果我阻止了孩子的行为，也就阻止了孩子获取知识。如果我那样做，可能确实会让孩子免于烧伤，但是又能怎样呢？他以后肯定还会烧伤自己的。通过体验这个过程，他才会真正明白火焰的特性，这对他在生活中的安全非常重要。此外，如果我现在阻止他去冒这个险，那么以后没人阻止的时候他一定还会再去尝试，甚至冒更大的险。相反，如果他现在出现什么意外，我就在旁边，我还能保护他，从而让他免受更大的伤害。这样做会让他以后怕火，其他人不在时他点燃房子烧死自己的可能性就降低了。还有，如果阻止他做一件本身完全无害，甚至还确实有教育意义的事情，他也一定多少会对我产生反感情绪。因为他不能直接感受到我在使他免受痛苦，却能感受到愿望被抑制的痛苦，他一定认为这种愿望被抑制的痛苦是我造成的。为了让他免受到一个自己意识不到（因此对他而言也就不存在）的伤害，我却给他施加了一个很容易感受的伤害。如此，在他的眼里，我成了邪恶的化身。我最好的做法就是只警告一下他其中的危险，并且准备好预防更大的伤害。"于是根据这个结论，她对孩子说："我担心你那样做会伤到自己。"那么现在假设孩子很可能仍坚持那样做，而且最后他被烧到了。结果会怎样呢？首先，他得到了一个迟早要得到的经验，而从他的安全角度考虑，这个经验得到得越早越好。第二，他发现母亲的批评和警告是为了他好，从而进一步正面体验了母亲的好意，进一步相信母亲的判断和友善，最终觉得应该爱自己的母亲。

Of course, in those occasional hazards where there is a risk of

broken limbs or other serious bodily injury, forcible prevention is called for. But leaving out these extreme cases, the system pursued should be not that of guarding a child against the small dangers into which it daily runs, but that of advising and warning it against them. And by consistently pursuing this course, a much stronger filial affection will be generated than commonly exists. If here, as elsewhere, the discipline of the natural reactions is allowed to come into play—if in all those out-of-door scrambling and indoor experiments, by which children are liable to hurt themselves, they are allowed to persevere, subject only to dissuasion more or less earnest according to the risk, there cannot fail to arise an ever-increasing faith in the parental friendship and guidance. Not only, as before shown, does the adoption of this principle enable fathers and mothers to avoid the chief part of that odium which attaches to the infliction of positive punishment; but, as we here see, it enables them further to avoid the odium that attaches to constant thwartings; and even to turn each of those incidents which commonly cause squabbles, into a means of strengthening the mutual good feeling. Instead of being told in words, which deeds seem to contradict, that their parents are their best friends, children will learn this truth by a consistent daily experience; and so learning it, will acquire a degree of trust and attachment which nothing else can give.

当然在一些偶发的对身体有损伤或是在其他有重伤危险的情况下，孩子的危险行为是需要强力制止的。但是除了这些极端的情况，应该采取的方法不是保护儿童不受日常危险，而是劝告他、警告他不要去冒险。照这样做，就会和孩子建立起非常深厚的亲子关系。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采用自然反应的管教方法，孩子就会越来越信任父母的友情和指导。即便是在那些容易导致孩子受伤的户外攀爬和室内实验活动中，父母也只能根据风险的大小程度对他们进行认真严肃的

劝阻。前面已经讲过，采用这一原则不但能使父母避免孩子因承受正面惩罚而滋生对他们的反感，也可以避免孩子因受到责骂而产生对父母的怨恨，甚至还可以把这些平常会引起争吵的小事转变成巩固彼此之间良好感情的手段。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为告诉孩子，父母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孩子们会在不断重复的日常经验中认识到这条真理，由此产生的对父母的信任和依赖也是无法取代的。

And now having indicated the much more sympathetic relation which must result from the habitual use of this method, let us return to the question above put—How is this method to be applied to the graver offences?

既然已经讲清楚了经常使用这一方法可以增进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系，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之前的那个问题——在较严重的过失中如何应用这个方法？

Note,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these graver offences are likely to be both less frequent and less grave under the regime we have described than under the ordinary regime. The perpetual ill-behaviour of many children is itself the consequence of that chronic irritation in which they are kept by bad management. The state of isolation and antagonism produced by frequent punishment, necessarily deadens the sympathies; necessarily, therefore, opens the way to those transgressions which the sympathies should check. That harsh treatment which children of the same family inflict on each other is often, in great measure, a reflex of the harsh treatment they receive from adults—partly suggested by direct example, and partly generated by the ill-temper and the tendency to vicarious retaliation, which follow chastisements and scoldings. It cannot be

questioned that the greater activity of the affections and happier state of feeling, maintained in children by the discipline we have described, must prevent their sins against each other from being either so great or so frequent. Moreover, the still more reprehensible offences, as lies and petty thefts, will, by the same causes, be diminished. Domestic estrangement is a fruitful source of such transgressions. It is a law of human nature, visible enough to all who observe, that those who are debarred the higher gratifications fall back upon the lower; those who have no sympathetic pleasures seek selfish ones; and hence, conversely, the maintenance of happier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s calculated to diminish the number of those offences of which selfishness is the origin.

首先请注意，在我们所描述的管教方式下，那些比较严重的不良行为可能出现的频率本身较低，也没那么严重。许多儿童常见的不良行为本身就是父母长期管教不当而使他们感觉烦躁所引起的。反复惩罚所带来的疏离感和敌对感必然会摧毁亲子之间的感情联结，也因此为不良行为打开了原本由感情联结把守的通道。同一家庭中孩子之间的相互欺负虐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在大人那里所受虐待的反应，其中一部分来源于直接效仿，另一部分是受了惩罚责骂就发脾气想寻事报复。毋庸置疑，用我们介绍的管教方法能带给儿童更多的情感教育活动以及更为愉快的心理感受，从而会使他们之间的侵害行为更少。同理，诸如撒谎和偷盗之类的严重不良行为也会减少，因为这类不良行为起源于家庭的不和谐。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一条人性的法则，人们得不到较高的满足就去寻求较低的满足，没有同情的乐趣就去寻求自私的乐趣。反过来，亲子之间保持愉快的关系一定可以减少自私带来的不良行为。

When, however, such offences are committed, as they will

occasionally be even under the best system, the discipline of consequences may still be resorted to; and if there exist that bond of confidence and affection which we have described, this discipline will be found efficient. For what are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say, of a theft? They are of two kinds—direct and indirect. The direct consequence, as dictated by pure equity, is that of making restitution. An absolutely just ruler (and every parent should aim to be one) will demand that, wherever it is possible, a wrong act shall be undone by a right one: and in the case of theft this implies eithe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thing stolen, or, if it is consumed, then the giving of an equivalent: which, in the case of a child, may be effected out of its pocket-money. The indirect and more serious consequence is the grave displeasure of parents—a consequence which inevitably follows among all peoples sufficiently civilised to regard theft as a crime;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this displeasure is, in this instance, the most severe of the natural reactions produced by the wrong action, "But," it will be said, "the manifestations of parental displeasure, either in words or blows, is the ordinary course in these cases: the method leads here to nothing new." Very true. Already we have admitted that, in some directions, this method is spontaneously pursued. Already we have shown that there is a more or less manifest tendency for educational systems to gravitate towards the true system. And here we may remark, as before, that the intensity of this natural reaction will, in the beneficent order of things, adjust itself to the requirements—that this parental displeasure will vent itself in violent measures during comparatively barbarous times, when the children are also comparatively barbarous; and will express itself less cruelly in those more advanced social states in which, by implication, the children are amenable to milder treatment. But what it chiefly concerns us here to observe is, that the manifestation of strong parental displeasure, produced by one of these graver offences, will be

potent for good just in proportion to the warmth of the attachment existing between parent and child. Just in proportion as the discipline of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has been consistently pursued in other cases, will it be efficient in this case. Proof is within the experience of all, if they will look for it.

然而，即便是在最好的管教方法下，不良行为偶尔还会出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求助于后果管教的方法。只要我们前面讲到的信赖和感情联结存在，这种方法就会是有效的。那么就以偷盗为例，其自然的后果是什么呢？这里有两种后果：直接后果和间接后果。单纯从公道上要求，就是赔偿。一个公正的统治者（每个家长应该以这个为目标）会要求尽可能用正确的行为纠正错误的行为，而在偷盗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或者归还偷来的东西，或者东西已经被用掉了，还不出来，就照样赔一个，而且赔偿的钱应该从孩子的零花钱中扣除。间接的但是更严重的后果就是父母的冷淡和不悦，这对于任何具有文明素质、视偷盗为犯罪的人来说，都是必然的。在这个例子中，这种不悦的表达就是错误行为带来的最为严重的自然后果。有人会说："但是，这些例子中父母一般都会通过动口或者动手来表达他们的不悦，这没什么新鲜的。"很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在有些情况下父母会不自觉地就会这样做。我们也已经说明教育方法或多或少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此，我们的说法也许和之前一样，自然后果的强度会根据社会秩序的仁慈程度进行自我调节：在相对野蛮的时代，孩子们也相对野蛮，父母的不悦会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比较高级的社会状态下，孩子们比较服从温和的对待方式，因而父母的不悦就不会以那么暴力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在此我们应注意，严重不良行为导致父母强烈不悦，这种强烈不悦的表现能否产生好的效果，取决于亲子之间既有的感情关系的温暖程度。其他情况下越是一贯执行自然反应的管教方式，这种方式就越能奏效。

For does not every man know that when he has offended

another person, the amount of genuine regret he feels (of course, leaving worldly considerations out of the question) varies with the degree of sympathy he has for that person? Is he not conscious that when the person offended stands to him in the position of an enemy, the having given him annoyance is apt to be a source rather of secret satisfaction than of sorrow? Does he not remember that where umbrage has been taken by some total stranger, he has felt much less concern than he would have done had such umbrage been taken by one with whom he was intimate? While, conversely, has not the anger of an admired and cherished friend been regarded by him as a serious misfortune, long and keenly regretted? Clearly, then,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displeasure upon children must similarly depend upon the pre-existing relationship. Where there is an established alienation, the feeling of a child who has transgressed is a purely selfish fear of the evil consequences likely to fall upon it in the shape of physical penalties or deprivations; and after these evil consequences have been inflicted, there are aroused an antagonism and dislike which are morally injurious, and tend further to increase the alienation. On the contrary, where there exists a warm filial affection produced by a consistent parental friendship—a friendship not dogmatically asserted as an excuse for punishments and denials, but daily exhibited in ways that a child can comprehend—a friendship which avoids needless thwartings, which warns against impending evil consequences, and which sympathizes with juvenile pursuits—there the state of mind caused by parental displeasure will not only be salutary as a check to future misconduct of like kind, but will also be intrinsically salutary. The moral pain consequent upon having, for the time being, lost so loved a friend, will stand in place of the physical pain usually inflicted; and where this attachment exists, will prove equally, if not more, efficient. While instead of the fear and vindictiveness excited by the one course, there will be excited by

the other more or less of sympathy with parental sorrow, a genuine regret for having caused it, and a desire, by some atonement, to reestablish the habitual friendly relationship. Instead of bringing into play those purely egotistic feelings whose predominance is the cause of criminal acts, there will be brought into play those altruistic feelings which check criminal acts. Thus the discipline of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is applicable to grave as well as trivial faults; and the practice of it conduces not simply to the repression, but to the eradication of such faults.

当一个人伤害了他人时，他的愧疚程度（暂不讨论其他外界情况）取决于自己和被伤害者感情联结的深度。没有人会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吧？如果被伤害者本来就是敌对方，那么由此产生的烦恼就很容易变成窃喜而非悲伤。这难道不是一个人的真实心理吗？让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不高兴与让一个和自己关系很亲近的人不高兴，两者相比，人们会很在意前者的感受吗？相反，对于一个自己崇拜并珍惜的朋友，人们难道不是把他的生气看得更严重，并且长时间深深懊悔吗？很明显，父母的不悦对于孩子的影响也一定同样取决于他们之间既有的关系。当亲子关系疏远时，犯了错的孩子会自私性地害怕他会受到体罚或损失某些利益。当这些苦果真正降临后，他们就会产生对抗和厌恶等有害情绪，并且使亲子关系更加疏远。相反，如果父母与孩子温暖的亲子关系是由于一贯的友谊而产生——这种友谊本身不能被当作惩罚和批评的借口，而应该符合孩子日常生活中对友谊的理解；这种友谊不会无谓地责骂，只会警告孩子避免苦果，并且能理解孩子的需求——那么父母的不悦就不仅有利于预防儿童日后的不良行为，也更有利于其成长。暂时失去一个钟爱的朋友对孩子来说是一种道德情感上的痛苦，足以取代其通常遭受的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证明，只要这种感情依赖存在，即使不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也会产生同等的效果。之前的方法会激发孩子的恐惧和报复心理，而我们这种方法使他能够同情家长的忧愁，真正后悔这事的发生，希望通过某些补偿去重新建立友好的关系。这其中发挥作用的不是导致错误行为的纯粹自私

的想法，而是阻止错误行为的利他主义思想。因此，自然后果管教法对于严重的错误和轻微的错误都同样适用；照这种方法去做不只会制止这些过失，而且会把它根除。

In brief, the truth is that savageness begets savageness, and gentleness begets gentleness. Children who are unsympathetically treated become relatively unsympathetic; whereas treating them with due fellow-feeling is a means of cultivating their fellow-feeling. With family governments as with political ones, a harsh despotism itself generates a great part of the crimes it has to repress; while conversely a mild and liberal rule not only avoids many causes of dissension, but so ameliorates the tone of feeling as to diminish the tendency to transgression. As John Locke long since remarked, “Great severity of punishment does but very little good, nay, great harm, in education; and I believe it will be found that, *cœteris paribus* , those children who have been most chastised seldom make the best men.” In confirmation of which opinion we may cite the fact not long since made public by Mr. Rogers, Chaplain of the Pentonville Prison, that those juvenile criminals who have been whipped are those who most frequently return to prison. On the other hand, as exhibiting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a kinder treatment, we will instance the fact stated to us by a French lady, in whose house we recently stayed in Paris. Apologising for the disturbance daily caused by a little boy who was unmanageable both at home and at school, she expressed her fear that there was no remedy save that which had succeeded in the case of an elder brother; namely, sending him to an English school. She explained that at various schools in Paris this elder brother had proved utterly untractable; that in despair they had followed the advice to send him to England; and that on his return home he was as good as he had before been bad. And this remarkable change she ascribed

entirely to the comparative mildness of the English discipline.

简而言之，野蛮产生野蛮，仁爱产生仁爱，就是这个道理。冷漠无情地对待孩子会让孩子也变得冷漠无情；相反，以应有的友情对待他们就是一个培养他们友情的手段。家庭管理和政治治理是一样的道理。严酷的专制所要镇压的罪行大部分是由它本身引起的；相反，和善的、文明的统治不仅能避免引起很多的争吵，还能改善情感氛围，进而减少不良行为的产生。就像约翰·洛克很久以前说过的，“在教育上，非常严厉的惩罚不能带来多少好处，相反会带来很大的伤害。而且我认为，在同等条件下，那些受罚最重的孩子很少能成长为最优秀的人。”为了说明同样的道理，我们也许还可以引用本顿维尔监狱牧师罗杰斯先生不久前公布的一个事实——受过鞭打的青年罪犯经常进监狱。另外，我们最近在巴黎时，一位法国房东太太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也可以作为例子来说明友善对待孩子产生的良好效果。她有一个小男孩在家和学校都非常难以管教，平时常打扰我们，所以她为此向我们道歉。她说恐怕除了送孩子去英国学校就没别的办法了，因为这个孩子的哥哥也是这种情况。她解释说这位哥哥在巴黎的很多学校都不服管教。绝望之下，他们听从别人的建议把孩子送去了英国。而当孩子回来时，他竟然和之前判若两人，变成一个很好的孩子了。她把这一显著的转变都归功于相对温和的英国式管教。

After this exposition of principles, our remaining space may best be occupied by a few of the chief maxims and rules deducible from them; and with a view to brevity we will put these in a more or less hortatory form.

在说明了这书原则之后，我们接下来的篇幅要讨论一些由此推演出来的信条和规范．为了简略，我们的讨论将多少采用劝告的形式。

Do not expect from a child any great amount of moral goodness. During early years every civilised man passes through that phase of character exhibited by the barbarous race from which he is descended. As the child's features—flat nose, forward-opening nostrils, large lips, wide-apart eyes, absent frontal sinus, etc.—resemble for a time those of the savage, so, too, do his instincts. Hence the tendencies to cruelty, to thieving, to lying, so general among children—tendencies which, even without the aid of discipline, will become more or less modified just as the features do. The popular idea that children are “innocent” while it may be true in so far as it refers to evil *knowledge* , is totally false in so far as it refers to evil *impulses* , as half an hour's observation in the nursery will prove to any one. Boys when left to themselves, as at a public school, treat each other far more brutally than men do; and were they left to themselves at an earlier age their brutality would be still more conspicuous.

不要期望孩子先天具有多少美德。每一个文明人早年都会经过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他表现出的是从野蛮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特征。孩子的相貌特征——扁鼻子、超前开的鼻孔、大嘴唇、宽瞳距、凹脑门等——在某个时期像野蛮人，他的本能也是一样。因此，儿童普遍有残忍、偷盗和撒谎的倾向，但即便不加管教，这些倾向也会像外貌的逐渐发育一样多少会发生自然改变。一般都认为孩子是“天真无邪的”，如果这是指他们没有对恶的认知 ，那也许还是对的，但如果是说他们没有作恶的冲动 ，那就完全错了。这一点只要去幼儿园观察一小时就能证明。就像公学里一样，如果男孩子们被单独放在一起，他们彼此相待的野蛮程度绝不亚于成年人。这种情况在年龄小的时候更为突出。

Not only is it unwise to set up a high standard for juvenile good

conduct, but it is even unwise to use very urgent incitements to such good conduct. Already most people recognise the detrimental results of intellectual precocity; but there remains to be recognised the truth that there is a *moral precocity* which is also detrimental. Our higher moral faculties, like our higher intellectual ones, are comparatively complex. By consequence they are both comparatively late in their evolution. And with the one as with the other, a very early activity produced by stimulation will be at the expense of the future character. Hence the not uncommon fact that those who during childhood were instanced as models of juvenile goodness, by and by undergo some disastrous and seemingly inexplicable change, and end by being not above but below par; while relatively exemplary men are often the issue of a childhood by no means so promising.

给儿童提出较高的良好行为标准是不明智的，急于鼓动孩子做出那些良好行为也是不明智的。儿童智力早熟的危害大多数人都已经认识到了，但是儿童道德早熟 的危害还有待人们进一步认识。我们的高级道德能力与高级智力能力一样，都是比较复杂的。从结果看，二者的进化都是比较迟缓的。对二者的早期激发活动都会使日后的性格吃亏。因此，出现下面的情况也就一点儿都不奇怪了：有些童年是模范的好孩子却不知道为什么逐渐变坏，最终没有高人一头反而低人一等；与此同时，那些相对成功的人小时候看起来并没什么前途。

Be content, therefore, with moderate measures and moderate results. Constantly bear in mind the fact that a higher morality, like a higher intelligence, must be reached by a slow growth; and you will then have more patience with those imperfections of nature which your child hourly displays. You will be less prone to that constant scolding, and threatening, and forbidding, by which many

parents induce a chronic domestic irritation, in the foolish hope that they will thus make their children what they should be.

因此，我们要满足于适度的措施和适当的结果。要始终提醒自己，较高的道德水平和较高的智力水平一样，都必须逐步发展。这样我们也就会对孩子经常表现出来的缺点更有耐心，更少去责骂、恐吓和禁锢孩子。否则，家里机会经常出现矛盾和争吵，父母却还愚蠢地希望能把自己的孩子造就成材。

This comparatively liberal form of domestic government, which does not seek despotically to regulate all the details of a child's conduct, necessarily results from the system for which we have been contending. Satisfy yourself with seeing that your child always suffers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of his actions, and you will avoid that excess of control in which so many parents err. Leave him wherever you can to the discipline of experience, and you will so save him from that hothouse virtue which overregulation produces in yielding natures, or that demoralising antagonism which it produces in independent ones.

这种比较自由的家庭治理形式，也就是说，家长们不会用专制手段去管制儿童行为的方方面面，来源于我们所提倡的教育体系。看到孩子承担了自己行为的后果，你要由此满足，这样你就不会像很多家长犯的错误那样，给予孩子过多的管控。尽可能通过体验的方式管教孩子，不让他因屈服于过度管控而形成那种温室中的品德，也不让他因个性强硬而产生消极对抗。

By aiming in all cases to administer the natural reactions to

your child's actions, you will put an advantageous check upon your own temper. The method of moral education pursued by many, we fear by most, parents, is little else than that of venting their anger in the way that first suggests itself. The slaps, and rough shakings, and sharp words, with which a mother commonly visits her offspring's small offences (many of them not offences considered intrinsically), are very generally but the manifestations of her own ill-controlled feelings—result much more from the promptings of those feelings than from a wish to benefit the offenders. While they are injurious to her own character, these ebullitions tend, by alienating her children and by decreasing their respect for her, to diminish her influence over them. But by pausing in each case of transgression to consider what is the natural consequence, and how that natural consequence may best be brought home to the transgressor, some little time is necessarily obtained for the mastery of yourself; the mere blind anger first aroused in you settles down into a less vehement feeling, and one not so likely to mislead you.

在任何情况下都尽量控制好孩子行为之后的反应，这样我们就能积极地控制自己的脾气了。很多家长（恐怕是大多数）所采用的德育方法往往只是他们想到的第一个能发泄怒气的办法。对于孩子的小过失（其中很多本来就不应该被视为过失），母亲通常都会对他们乱打乱摇、疾言厉色，这通常就是母亲自己情感失控的表现，更多地是出于情绪的激动而不是为了犯错的孩子好。这种情绪爆发不但会使母亲与孩子疏远，减少孩子们对母亲的尊敬，也会对母亲自己的性格造成伤害。在每个过失发生的时候，父母只要能冷静地想想这种错误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自然后果，并且如何才能很好地让犯错者去体验这个自然后果，那么父母也必然就有时间控制自己的情绪，第一时间在心里燃起的怒火也会平息一些，也就不太可能误导自己。

Do not, however, seek to behave as an utterly passionless instrument. Remember that besides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of your child's conduct which the working of things tends to bring round on him, your own approbation or disapprobation is also a natural consequence, and one of the ordained agencies for guiding him. The error which we have been combating is that of *substituting* parental displeasure and its artificial penalties, for the penalties which nature has established. But while it should not be *substituted* for these natural penalties, it by no means follows that it should not, in some form, *accompany* them. The *secondary* kind of punishment should not usurp the place of the *primary* kind; but, in moderation, it may rightly supplement the primary kind. Such amount of disapproval, or sorrow, or indignation, as you feel, should be expressed in words or manner or otherwise; subject, of course, to the approval of your judgment. The degree and kind of feeling produced in you will necessarily depend upon your own character, and it is therefore useless to say it should be this or that. All that can be recommended is, that you should aim to modify the feeling into that which you believe ought to be entertained. Beware, however, of the two extremes; not only in respect of the intensity, but in respect of the duration of your displeasure. On the one hand, anxiously avoid that weak impulsiveness, so general among mothers, which scolds and forgives almost in the same breath. On the other hand, do not unduly continue to show estrangement of feeling, lest you accustom your child to do without your friendship, and so lose your influence over him. The moral reactions called forth from you by your child's actions, you should as much as possible assimilate to those which you conceive would be called forth from a parent of perfect nature.

尽管如此，也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冷酷绝情的工具。要记住，除

了孩子的行为在环境中自然而然得到的反馈，你自己的赞扬或者批评也是一种自然反馈，是一种引导孩子的必要手段。我们一直所批判的错误是，父母常常以自己的恼火及随之而来的人为惩罚去替代 自然界原本已有的惩罚。我们说人为惩罚不可代替 自然惩罚，但也绝不是说人为惩罚不能换一种形式与自然惩罚相辅相成 。次要 惩罚不能取代主要 惩罚的地位，但是可以适当补充主要惩罚。我们所感受到的反对、悲伤或者愤怒都是以语言、行为或者其他形式表达出来的。当然，这其中还需要自己的判断。我们自己的性格必然决定了我们会产生何种感受以及感受有多么强烈。因此，给感受规定一个范式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能建议的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感受调整到你舒服的方式。然而还要注意避免两个极端，不但要拿捏表达不悦的强度，还要考虑到这种不悦持续的时间。一方面，一定要避免很多母亲常表现出来的短时冲动，就是说责骂和原谅几乎同时出现。另一方面，不要过分持续地冷淡孩子，否则孩子会慢慢习惯了没有你的友谊，从而使你失去对他的影响力。你对孩子行为做出的道德情感上的反应，应该尽可能符合你所认为一个完美家长所应有的反应。

Be sparing of commands. Command only in those cases in which other means are inapplicable, or have failed. “In frequent orders the parents' advantage is more considered than the child's,” says Richter. As in primitive societies a breach of law is punished, not so much because it is intrinsically wrong as because it is a disregard of the king's authority—a rebellion against him; so in many families, the penalty visited on a transgressor proceeds less from reprobation of the offence than from anger at the disobedience. Listen to the ordinary speeches—“How d*are* you disobey me?” “I tell you I'll *make* you do it, sir.” “I'll soon teach you who is *master* “—and then consider what the words, the tone, and the manner imply. A determination to subjugate is much more conspicuous in them than an anxiety for the child's welfare. For the time being the attitude of mind differs but little from that of the

despot bent on punishing a recalcitrant subject. The right-feeling parent, however, like the philanthropic legislator, will not rejoice in coercion, but will rejoice in dispensing with coercion. He will do without law in all cases where other modes of regulating conduct can be successfully employed; and he will regret the having recourse to law when it is necessary. As Richter remarks—“The best rule in politics is said to be 'pas trop gouverner:' it is also true in education.” And in spontaneous conformity with this maxim, parents whose lust of dominion is restrained by a true sense of duty, will aim to make their children control themselves wherever it is possible, and will fall back upon absolutism only as a last resort.

慎用命令的方式。命令仅能用于其他办法都不适用、或者失败的情况下。里希特说，“一般情况下，命令更多考虑的是父母的权威，而非对孩子好。”这就像在古代社会，违法行为被惩罚不一定是因为它是错的，而是因为这种行为无视国王的权威，甚至背叛了国王。同样的，在很多家庭中，对犯错者的惩罚更多是由于不听话引起的愤怒，而非对错误行为本身的谴责。听听那些耳熟能详的话吧——“你竟敢　　不听我的话？”“我告诉你，先生，我非得　　让你这么做不可！”“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谁说了算　！”——这里的语言、语气和动作包含的意思可想而知了。其中强烈表现出一种征服的意志，而非对孩子幸福的关切。这其中的思想，与专制暴君惩罚一个倔强的叛逆者并使其屈服，没有多大区别。而一个情感表达适当的家长应该像一位慈善的立法者，不以强迫他人为乐，而以减少强迫为乐。在所有其他行为规范模式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他就不使用法律。即便是在必须诉诸法律时，他也会感到很遗憾。就像里希特评论的那样，“政治上最好的法则据说是‘无为而治’，教育上也应该是这样。”那些控制欲被真正的责任感抑制的父母会自发地践行这一格言。他们努力让孩子尽可能自我管理控制

But whenever you *do* command, command with decision and consistency. If the case is one which really cannot be otherwise dealt with, then issue your fiat, and having issued it, never afterwards swerve from it. Consider well beforehand what you are going to do; weigh all the consequences; think whether your firmness of purpose will be sufficient; and then, if you finally make the law, enforce it uniformly at whatever cost. Let your penalties be like the penalties inflicted by inanimate nature—inevitable. The hot cinder burns a child the first time he seizes it; it burns him the second time; it burns him the third time; it burns him every time; and he very soon learns not to touch the hot cinder. If you are equally consistent—if the consequences which you tell your child will follow certain acts, follow with like uniformity, he will soon come to respect your laws as he does those of Nature. And this respect once established will prevent endless domestic evils. Of errors in education one of the worst is that of inconsistency. As in a community, crimes multiply when there is no certai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so in a family, an immense increase of transgressions results from a hesitating or irregular infliction of penalties. A weak mother, who perpetually threatens and rarely performs—who makes rules in haste and repents of them at leisure—who treats the same offence now with severity and now with leniency, according as the passing humour dictates, is laying up miseries both for herself and her children. She is making herself contemptible in their eyes; she is setting them an example of uncontrolled feelings; she is encouraging them to transgress by the prospect of probable impunity; she is entailing endless squabbles and accompanying damage to her own temper and the tempers of her little ones; she is reducing their minds to a moral chaos, which after-years of bitter experience will with difficulty bring into order. Better even a barbarous form of domestic government carried out consistently, than a humane one inconsistently carried out. Again we say, avoid

coercive measures whenever it is possible to do so; but when you find despotism really necessary, be despotic in good earnest.

但是一旦你真要 下命令，就必须果断并且贯彻始终。如果实在别无他法，那么就下命令吧，下了命令就不要动摇或更改了。你需要提前做好打算，权衡各种可能的结果，想一想你的目标是否足够坚定。接下来，如果你规则已定，那么不管代价如何，都要始终如一地执行。要让你的惩罚和冰冷的自然惩罚一样不可避免。孩子第一次抓热炭渣时会被烫伤，第二次抓也会被烫伤，第三次还会被烫伤，每次都会被烫伤。如此，他会很快学会不再去摸那些热炭渣。如果你同样始终如一，让孩子的某个行为每次都毫无例外地得到你之前已经告诉过他的那个结果，那么他很快也就会像敬畏自然惩罚一样敬畏你制定的规则。一旦孩子的这种敬畏建立起来，他在家里就不会再没完没了地捣蛋了。教育中最严重的错误在于前后矛盾。一个社会如果司法不明确，则会犯罪猖獗。一个家庭也是这样，随意惩罚或惩罚不及时都会导致层出不穷的不良行为。一个无能的母亲会经常吓唬要惩罚孩子，但却很少实施惩罚。她总是匆匆忙忙地给孩子立下一个规矩，但随后又会随意更改。对于相同的错误行为这次可能会严厉惩罚，而下次又可能仁慈地宽恕了，这一切都要视她当时的心情而定了。这样的母亲给自己和孩子都在积攒着痛苦。她使自己在孩子们的眼中变得卑劣；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喜怒无常的形象；鼓励孩子们带着侥幸的想法去犯错。她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训斥责骂，同时在使自己和孩子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她在把孩子们的思想引向道德混乱，可能要经过多年的痛苦经历才能艰难地重建秩序。一个仁慈的家庭管理方式如果不能做到始终如一，那么甚至会不如一个粗暴但却总是一以贯之的家庭管理方式。我们再次强调，要尽可能避免使用强制手段，但如果强制手段是必要的，那么其执行就要始终如一。

Bear constantly in mind the truth that the aim of your discipline should be to produce a *self-governing* being; not to

produce a being to be *governed by others* . Were your children fated to pass their lives as slaves, you could not too much accustom them to slavery during their childhood; but as they are by and by to be free men, with no one to control their daily conduct, you cannot too much accustom them to self-control while they are still under your eye. This it is which makes the system of discipline by natural consequences, so especially appropriate to the social state which we in England have now reached. Under early, tyrannical forms of society, when one of the chief evils the citizen had to fear was the anger of his superiors, it was well that during childhood parental vengeance should be a predominant means of government. But now that the citizen has little to fear from any one—now that the good or evil which he experiences throughout life is mainly that which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results from his own conduct, it is desirable that from his first years he should begin to learn, experimentally, the good or evil consequences which naturally follow this or that conduct. Aim, therefore, to diminish the amount of parental government as fast as you can substitute for it in your child's mind that self-government arising from a foresight of results. In infancy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absolutism is necessary. A three-year old urchin playing with an open razor, cannot be allowed to learn by this discipline of consequences; for the consequences may, in such a case, be too serious. But as intelligence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calling for peremptory interference may be, and should be, diminished; with the view of gradually ending them as maturity is approached. All periods of transition are dangerous; and the most dangerous is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restraint of the family circle to the non-restraint of the world. Hence the importance of pursuing the policy we advocate; which, alike by cultivating a child's faculty of self-restraint, by continually increasing the degree in which it is left to its self-constraint, and by so bringing it, step by step, to a state of unaided self-restraint, obliterates the ordinary sudden and

hazardous change from externally-governed youth to internally-governed maturity. Let the history of your domestic rule typify, in little, the history of our political rule: at the outset, autocratic control, where control is really needful; by-and-by an incipient constitutionalism, in which the liberty of the subject gains some express recognition; successive extensions of this liberty of the subject; gradually ending in parental abdication.

要始终牢记，你的管教是为了培养一个可以自我管理 的人，而不是一个需要被他人管理 的人。如果你的孩子命中注定要过奴隶的生活，那么无论你怎么让他适应奴隶制度都不过分。但是，孩子们一定会逐步成长为自由人，没有人能控制他们的日常行为，那么当你在养育他们时应尽一切努力让他们适应自我管理。自然后果管教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特别适合我们英格兰现在的社会状态。在早期专制社会，民众惧怕的主要灾祸之一就是统治者的暴怒。因而在那时，父母的惩罚就成了一个最主要的儿童管教手段。但是现在民众已经不再那么惧怕任何人了，个人一生中经历的所有好与坏都是自身行为的自然后果，所以从一岁开始就应该学习哪些行为会带来好的自然后果，哪些会带来坏的。因此，努力减少父母的管教吧，尽快让孩子通过结果预见形成自我管理的意识。对婴幼期的儿童，父母一定的程度的专制也是必要的。当一个三岁的淘气鬼在玩一把打开着的剃刀时，我们是不能用后果管教法让他自己体验学习的，因为那样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随着智力水平的提高，就可以也应该减少横加干涉，从而到孩子成年时逐渐完全消失。所有的过渡期都是危险的，其中最危险的便是从家庭管束到社会的无约束。因此，采用我们主张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培养孩子的自我约束能力，不断增加这种自我约束的程度，并逐步达到无需外界帮助的完全自我约束，如此便可消除从少年时外部管控到成年后内部管控过渡时通常具有的突然性和危险性。儿童家庭管教的发展过程可以看成我们政治制度发展过程的缩影。在最开始时实行独裁控制，那时的控制也确实是必要的；然后逐步开始了早期的宪政阶段，这是被统治者的自由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这种自由继而不断扩大，最终使家长的角色逐步退位。

Do not regret the exhibition of considerable self-will on the part of your children. It is the correlative of that diminished coerciveness so conspicuous in modern education. The greater tendency to assert freedom of action on the one side, corresponds to the smaller tendency to tyrannise on the other. They both indicate an approach to the system of discipline we contend for, under which children will be more and more led to rule themselves by the experience of natural consequences; and they are both the accompaniments of our more advanced social state. The independent English boy is the father of the independent English man; and you cannot have the last without the first, German teachers say that they had rather manage a dozen German boys than one English one. Shall we, therefore, wish that our boys had the manageableness of the German ones, and with it the submissiveness and political serfdom of adult Germans? Or shall we not rather tolerate in our boys those feelings which make them free men, and modify our methods accordingly?

不要为儿童格外表现出的自我意志而苦恼。这是由现代教育中明显的强制力降低导致的。要求行动自由的趋势越强大，暴力专制的趋势就会相应越微弱。二者共同为我们所主张的管教方法指出了道路，孩子们将在这一管教方法下逐渐从自然后果的经验中学会自我管理。同时，二者也是我们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的伴生物。一个独立自主的英国公民是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孩子成长起来的，没有后者就不会有前者。德国教师常说他们宁愿管理一群德国男孩子也不愿管理一个英国男孩子。因此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男孩子们都和德国孩子一样温顺，长大后也和德国人一样具有服从意识和政治奴性？还是要容忍他们所具有的那些可以使其成为自由人的思想感情，并且相应修正我们的教养

方法？

Lastly, always remember that to educate rightly is not a simple and easy thing, but a complex and extremely difficult thing: the hardest task which devolves upon adult life. The rough and ready style of domestic government is indeed practicable by the meanest and most uncultivated intellects. Slaps and sharp words are penalties that suggest themselves alike to the least reclaimed barbarian and the stolidest peasant. Even brutes can use this method of discipline; as you may see in the growl and half-bite with which a bitch will check a too-exigeant puppy. But if you would carry out with success a rational and civilised system, you must be prepared for considerable mental exertion—for some study, some ingenuity, some patience, some self-control. You will have habitually to trace the consequences of conduct—to consider what are the results which in adult life follow certain kind of acts; and then you will have to devise methods by which parallel results shall be entailed on the parallel acts of your children. You will daily be called upon to analyse the motives of juvenile conduct: you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acts that are really good and those which, though externally simulating them, proceed from inferior impulses; while you must be ever on your guard against the cruel mistake not unfrequently made, of translating neutral acts into transgressions, or ascribing worse feelings than were entertained. You must more or less modify your method to suit the disposition of each child; and must be prepared to make further modifications as each child's disposition enters on a new phase. Your faith will often be taxed to maintain the requisite perseverance in a course which seems to produce little or no effect. Especially if you are dealing with children who have been wrongly treated, you must be prepared for a lengthened trial of patience before succeeding with better

methods; seeing that which is not easy even where a right state of feeling has been established from the beginning, becomes doubly difficult when a wrong state of feeling has to be set right. Not only will you have constantly to analyse the motives of your children, but you will have to analyse your own motives—to discriminate between those internal suggestions springing from a true parental solicitude, and those which spring from your own selfishness, from your love of ease, from your lust of dominion. And then, more trying still, you will have not only to detect, but to curb these baser impulses. In brief, you will have to carry on your higher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at you are educating your children. Intellectually you must cultivate to good purpose that most complex of subjects—human nature and its laws, as exhibited in your children, in yourself, and in the world. Morally, you must keep in constant exercise your higher feelings, and restrain your lower. It is a truth yet remaining to be recognised, that the last stage i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each man and woman is to be reached only through the proper discharge of the parental duties. And when this truth is recognised, it will be seen how admirable is the ordination in virtue of which human beings are led by their strongest affections to subject themselves to a discipline which they would else elude.

最后，要始终记着，正确进行教育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而是一件复杂且非常困难的事情，是成年人生活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粗暴轻率的家庭教养方式被那些最刻薄最不开化的知识分子奉为圭臬。最不可挽救的粗野之人和最冷漠农民常常使用抽打和斥责作为惩罚。甚至动物都会使用这种管教办法，比如你也许就曾看到过一条母狗会低声咆哮，露出凶牙来制止一条调皮的小狗。但是，如果你想理性文明地管教孩子，你就必须准备为此动一番脑筋，比如做一些研究，想一些点子，学会耐心和自制。你必须习惯探索行为的后果，去考虑一下成年人生活中哪些行为会有哪些结果，然后再去相应制定一

些办法使得孩子类似的行为能得到类似的结果。你必须经常要求自己去分析青少年行为的动机，必须能区分那些真正好的行为与看起来不错但却是由低级冲动引起行为。同时，你还必须时刻防止犯一些常见的粗鲁错误，例如把孩子的一些中性行为看成不良行为，或者拿他们的糟糕情绪取乐。你还须时不时修正你的方法，以适应每一个孩子的性格特点及其在不同阶段的特质。当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甚至毫无效果时，你还必须经常使自己保持必需的毅力。尤其是在对待那些曾被错误对待的孩子时，你必须做好准备迎接长时间的耐心考验，直到用一些好的办法取得成功。即便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心态，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如果心态不正确，这其中的难度可能就要加倍了。你不仅要不断分析孩子的动机，还要分析自己的动机，分清哪些是内心想法来自于为人父母对孩子的真正关怀，哪些是由于自己的自私，哪些是出于自己的好安逸，哪些是出于自己的控制欲。再进一步，你不但要发现，还要更好地克服这些卑下的冲动。总之，在教育孩子的同时，你必须对自己进行更高的教育。从知识方面说，你必须有效理解两个最复杂的对象，即展现在孩子、你自己以及整个世界中的人性及其规律。从道德方面说，你必须坚持践行自己的高尚情感，约束低级情感。还有一条真理有待确认，那就是每个人只有在较好承担了为人父母的责任之后，才能完成心智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如果承认了这条真理，你就会发现上天的安排是多么让人崇拜，它使人类受到自身最强烈感情的引导，使人类臣服于自己尚未理解的管教。

While some will probably regard this conception of education as it should be, with doubt and discouragement, others will, we think, perceive in the exalted ideal which it involves, evidence of its truth. That it cannot be realised by the impulsive, the unsympathetic, and the short-sighted, but demands the higher attributes of human nature, they will see to be evidence of its fitness for the more advanced states of humanity. Though it calls for much labour and self-sacrifice, they will see that it promises an abundant return of happiness, immediate and remote. They will see

that while in its injurious effects on both parent and child a bad system is twice cursed, a good system is twice blessed—it blesses him that trains and him that's trained.

有些人可能对这一教育理念持怀疑和悲观的态度，但我们认为同时也有另一些人在其崇高的理想中看到了包含的真理。那些易于冲动、冷漠和目光短浅的人是认识不到这一真理的，因为这需要具有高尚的人性。这也说明这一真理非常适合我们现在高水平的人性精神。尽管这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但是他们会发现它会在当前和未来回馈给我们巨大的幸福。他们还会发现，坏的方法会给父母和孩子带来双倍的伤害，而一个好的方法会给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带来双倍的福祉。

It will be seen that we have said nothing in this Chapter about the transcendental distinction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of which wise men know so little, and children nothing. Alll thinkers are agreed that we may find the criterion of right in the effect of actions, if we do not find the rule there; and that it is sufficient for the purpose we have had in view. Nor have we introduced the religious element. We have confined our inquiries to a nearer, and a much more neglected field, though a very important one. Our readers may supplement our thoughts in any way they please; we are only cocerned that they should be accepted as far as they go.

可以看到，在这一章，我们并没有讲对与错之间的超验性区别，而对于这一区别，有智之人知之甚少，儿童更是一无所知。所有思想者都赞同，如果在对与错的超验性区别中我们无法找到标尺的话，那么在行为的结果中，我们可以找到衡量是否正确的标准，而这一标准足可以使我们达成目的。我们也没有添加宗教元素。我们将探究局限

在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然而又极其重要的狭窄领域。读者可以任意补充我们的观点，我们只求这些观点能最大程度地被接受。

[3_1].Of this nature is the plea put in by some for the rough treatment experienced by boys at our public schools; where, as it is said, they are introduced to a miniature world whose hardships prepare them for those of the real world.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 plea has some force; but it is a very insufficient plea. For whereas domestic and school discipline, though they should not be much better than the discipline of adult life, should be somewhat better; the discipline which boys meet with at Eton, Winchester, Harrow, etc., is worse than that of adult life—more unjust and cruel. Instead of being an aid to human progress, which all culture should be, the culture of our public schools, by accustoming boys to a despotic form of government and an intercourse regulated by brute force, tends to fit them for a lower state of society than that which exists. And chiefly recruited as our legislature is from among those who are brought up at such schools, this barbarising influence becomes a hindrance to national progress.

[4_1].有人为公学男生所受的霸凌辩解，认为学校就是一个迷你社会，在学校受的磨炼可以为他们真正进入残酷的社会提前做好准备。必须承认这个论点有点儿道理，但经不起推敲。家庭和学校的管教虽然不应比社会的管教好很多，但起码得稍好一点。男生在伊顿、温彻斯特、哈乐等学校所受的管教实际比社会管教更糟糕、更不公平也更残酷。这样就不会对人类进步有所帮助了，而任何教育的目的都应该是有利人类进步的。如果我们公学的培养模式旨在让男生们习惯于专制的管理形式和基于暴力控制的相互关系，这似乎是在让他们适应一个比现在更落后野蛮的社会。既然我们的议会成员主要是从这些学校培养的人才中遴选出来的，这种野蛮所带来的影响就会阻碍国家进步。

Chapter 4 Physical Education

第四章　体育

Equally at the squire's table after the withdrawal of the ladies, at the farmers' market-ordinary, and at the village alehouse, the topic which, after the political question of the day, excites perhaps the most general interest, is the management of animals. Riding home from hunting, the conversation is pretty sure to gravitate towards horse-breeding and pedigrees, and comments on this or that “good point;” while a day on the moors is very unlikely to pass without something being said on the treatment of dogs. When crossing the fields together from church, the tenants of adjacent farms are apt to pass from criticisms on the sermon to criticisms on the weather, the crops, and the stock; and thence to slide into discussions on the various kinds of fodder and their feeding qualities. Hodge and Giles, after comparing notes over their respective pig-styes, show by their remarks that they have been more or less observant of their masters' beasts and sheep; and of the effects produced on them by this or that kind of treatment. Nor is it only among the rural population that the regulations of the kennel, the stable, the cowshed, and the sheep-pen, are favourite subjects. In towns, too, the numerous artisans who keep dogs, the young men who are rich enough to now and then indulge their sporting tendencies, and their more staid seniors who talk over agricultural progress or read Mr. Mechi's annual reports and Mr. Caird's letters to the *Times* , form, when added together, a large portion of the inhabitants. Take the adult males throughout the kingdom, and a great majority will be found to show some interest in the breeding, rearing, or training of animals, of one kind or other.

在宴会散席女士离场后的乡绅餐桌上，在农民的集市上和村里的小酒馆里，除了当天的政治话题，最能引起兴趣的话题恐怕就是动物饲养。打猎后策马归来，谈话肯定围绕着马的饲养、血统及其种种“优点”。同时，在野外一天，也不太可能不谈到养狗。当相邻农场的佃户们一块儿从教堂回来穿过田地的时候，谈论的话题很容易从牧师的布道转向天气、庄稼和家畜，转向各种各样的饲料及其喂养效果。从霍奇和贾尔斯比较各自猪圈状况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多少观察了东家的牲畜，观察了不同饲养方法所产生的不同效果。不仅是农村人喜欢谈论管理狗舍、马厩、牛棚和羊圈的话题，城里人也喜欢谈论这些话题，包括许多养狗的匠人，时常享受体育运动的富家公子哥，以及那些爱谈论农业进步或阅读梅吉先生的年度报告和《泰晤士报》上凯尔德先生来信的古板老人，所有这些人加起来就占了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以全国成年男子为例，大多数人都对饲养或者训练某种动物感兴趣。

But, during after-dinner conversations, or at other times of like intercourse, who hears anything said about the rearing of children? When the country gentleman has paid his daily visit to the stable, and personally inspected the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of his horses; when he has glanced at his minor live stock, and given directions about them; how often does he go up to the nursery and examine into its dietary, its hours, its ventilation? On his library shelves may be found White's *Farriery* , Stephens's *Book of the Farm* , Nimrod on *The Condition of Hunters* ; and with the contents of these he is more or less familiar; but how many books has he read on the management of infancy and childhood? The fattening properties of oil cake, the relative values of hay and chopped straw, the dangers of unlimited clover, are points on which every landlord, farmer, and peasant has some knowledge; but what proportion of them know much about the qualities of the food they give their children, and

its fitness to the constitutional needs of growing boys and girls? Perhaps the business interests of these classes will be assigned as accounting for this anomaly. The explanation is inadequate, however; seeing that the same contrast holds more or less among other classes. Of a score of townspeople few, if any, would prove ignorant of the fact that it is undesirable to work a horse soon after it has eaten; and yet, of this same score, supposing them all to be fathers, probably not one would be found who had considered whether the time elapsing between his children's dinner and their resumption of lessons was sufficient. Indeed, on cross-examination, nearly every man would disclose the latent opinion that the regimen of the nursery was no concern of his. “Oh, I leave all those things to the women,” would probably be the reply. And in most cases the tone and manner of this reply would convey the implication, that such cares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masculine dignity.

但是在茶余饭后或其他类似场合，谁听到过有人讨论抚养孩子的话题？一个乡绅每天都去马厩，亲自检查马厩情况和马匹饲养情况，看过小牲畜后还给饲养员一些喂养指示，而他又多久才去一次育婴室，检查孩子们的饮食、生活作息和房间通风等情况？他的书架上有怀特的《马医学》，史蒂文斯的《农场手册》，宁录的《猎人条件》，并且也多少熟悉书中的内容，但是他读过几本养育婴儿和儿童的书？每个地主、农场主和农民都知道油渣饼对牲畜的增肥功效、干草和剁碎的秸秆的区别、苜蓿喂食过多的害处，但是他们中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给孩子们的饮食如何，是否适合成长中的男孩和女孩的体质需要？或许这种反常现象是由于这些阶层对生意方面的事最为挂心。但是这种解释并不够令人信服，因为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阶层中。随便二十个城镇居民中，大都知道马刚吃饱不能立刻干活，可就是这些人，在做了父亲后，大概没有人考虑过孩子的晚餐和做功课之间的间隔是否足够。实际上，经过反复追问，几乎每个男人都会暴

露他们内心的想法——育儿问题与他们无关。他们多半会这样回答："哦，我把那些事情都交给女人了。"而且多数情况下，答复的语调和方式都在暗示——关心这种事情会有失男性尊严。

Consider the fact from any but the conventional point of view, and it will seem strange that while the raising of first-rate bullocks is an occupation on which men of education willingly bestow much time, inquiry, and thought, the bringing up of fine human beings is an occupation tacitly voted unworthy of their attention. Mammas who have been taught little but languages, music, and accomplishments, aided by nurses full of antiquated prejudices, are held competent regulators of the food, clothing, and exercise of children. Meanwhile the fathers read books and periodicals, attend agricultural meetings, try experiments, and engage in discussions, all with the view of discovering how to fatten prize pigs! Infinite pains will be taken to produce a racer that shall win the Derby: none to produce a modern athlete. Had Gulliver narrated of the Laputans that the men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learning how best to rear the offspring of other creatures, and were careless of learning how best to rear their own offspring, he would have paralleled any of the other absurdities he ascribes to them.

撇开传统不谈，这种现象看起来很奇怪。受过教育的人愿意花费大量时间请教、询问和考虑如何饲养出一流的小公牛，却心照不宣地认为，如何良好教养孩子这件事不值得他们去关注。大家都认为，在满脑子都是陈旧想法的保姆的帮助下，学过一点语言、音乐和其他才艺的妈妈们就足以胜任管理孩子们的饮食、衣着和锻炼的工作。而此时，父亲们阅读书籍和期刊，参加各种农业会议，做实验，参与讨论，所有这些竟都是为了发现如何将优质的小猪养得更肥！人们会费尽心机去饲养一匹能够在德比赛马会上获胜的马，却不会花费精力培

养一名现代田径运动员。在格利佛讲述的拉普他岛人奇事中，人们争先恐后地学习如何很好地养育其他物种的后代，却不关心怎样能够很好地抚养自己的后代，这样的做法简直荒诞得无与伦比。

The matter is a serious one, however. Ludicrous as is the antithesis, the fact it expresses is not less disastrous. As remarks a suggestive writer, the first requisite to success in life is “to be a good animal;” and to be a nation of good animals is the first condition to national prosperity. Not only is it that the event of a war turns on the strength and hardiness of soldiers; but it is that the contests of commerce are in part determined by the bodily endurance of producers. Thus far we have found no reason to fear trials of strength with other races in either of these fields. But there are not wanting signs that our powers will presently be taxed to the uttermost. Already under the keen competition of modern life, the application required of almost every one is such as few can bear without more or less injury. Already thousands break down under the high pressure they are subject to. If this pressure continues to increase, as it seems likely to do, it will try severely all but the soundest constitutions. Hence it is becoming of especial importance that the training of children should be so carried on, as not only to fit them mentally for the struggle before them, but also to make them physically fit to bear its excessive wear and tear.

然而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尽管这种对比十分可笑，但所揭示的事实却是非常可怕的。正如一位引人深思的作家所说，一个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要“成为一个好的动物”，而国家繁荣的首要条件，则是让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成为这样“好的动物”。不仅战争的胜利取决于战士的力量和强壮，而且商业竞争的结果也一定程度上由制造商的身体耐力决定。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理由惧怕在这两方面与其他种族进行

力量上的较量。但并非没有迹象表明我们已是强弩之末。现代生活的竞争已经如此激烈，很少有人能够承受压力而不受损伤。已经有成千上万人崩溃在所承受的高压之下。如果这种压力继续增加（情况有可能会如此），就连最健康的身体都会遭受严厉的考验。因此，训练儿童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不仅要使他们能够在心智方面适合他们所面临的竞争，还要使他们的身体适合承受竞争中的过度损耗。

Happily the matter is beginning to attract attention. The writings of Mr. Kingsley indicate a reaction against over-culture; carried, as reactions usually are, somewhat too far. Occasional letters and leaders in the newspapers have shown an awakening interest in physical train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 school, significantly nicknamed that of “muscular Christianity,” implies a growing opinion that our present methods of bringing up children do not sufficiently regard the welfare of the body. The topic is evidently ripe for discussion.

幸运的是，此事已经开始引起关注。金斯莱先生的著作就表明了他反对对儿童进行过度培养。但是反对意见通常都是过激的，他的也不例外。偶尔见诸报刊的通讯和评论表明，人们已经开始显示出对体育锻炼的兴趣。一所新建的学校得了个意味深长的绰号——“强健的基督教”，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目前抚养孩子的方法没有充分重视孩子的身体健康。讨论这个话题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了。

To conform the regimen of the nursery and the school to the established truths of modern science—this is the desideratum. It is time that the benefits which our sheep and oxen have for years past derived from the investigations of the laboratory, should be participated in by our children. Without calling in question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horse-training and pig-feeding, we would suggest that, as the rearing of well-grown men and women is also of some moment, the conclusions indicated by theory, and endorsed by practice, ought to be acted on in the last case as in the first. Probably not a few will be startled—perhaps offended—by this collocation of ideas. But it is a fact not to be disputed, and to which we had best reconcile ourselves, that man is subject to the same organic laws as inferior creatures. No anatomist, no physiologist, no chemist, will for a moment hesitate to assert, that the general principles which rule over the vital processes in animals equally rule over the vital processes in man. And a candid admission of this fact is not without its reward: namely, that the truths established by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 on brutes, become more or less available for human guidance. Rudimentary as is the Science of Life, it has already attained to certai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development of all organisms, the human included. That which has now to be done, and that which we shall endeavour in some measure to do, is to show the bearing of thes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upon the physical training of childhood and youth.

使育婴室和学校的规则符合公认的现代科学真理——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的实验室研究多年以来给牛羊带来了福利，我们的孩子也应这样得到福利。我们不会质疑驯马和养猪的重要性，但是培养健康的成年人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认为，那些由理论指导和实践论证了的成果，应该同样应用于两者。可能这些观点会使相当多的人感到震惊，或感到被冒犯。但是人类和低等动物都受到相同的有机规律支配，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不可否认的事实。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和化学家都会毫不迟疑地承认，主宰动物生命过程的普遍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的生命过程。坦率地承认这个事实并不是没有好处的，因为通过观察动物和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得到的真理多少可以用来指导人类。生命科学尽管刚刚起步，但已经获得了潜藏在所有生物（包括人

类）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基本原理。现在必须要做的，也是某种程度上我们努力要做的，就是揭示这些基本原理与儿童和少年体能训练的关系。

The rhythmical tendency which is traceable in all departments of social life—which is illustrated in the access of despotism after revolution, or, among ourselves, in the alternation of reforming epochs and conservative epochs—which, after a dissolute age, brings an age of asceticism, and conversely—which, in commerce, produces the regularly recurring inflations and panics—which carries the devotees of fashion from one absurd extreme to the opposite one; —this rhythmical tendency affects also our table-habits, and by implication, the dietary of the young. After a period distinguished by hard drinking and hard eating, has come a period of comparative sobriety, which, in teetotalism and vegetarianism, exhibits extreme forms of its protest against the riotous living of the past. And along with this change in the regimen of adults, has come a parallel change in the regimen for boys and girls. In past generations, the belief was, that the more a child could be induced to eat, the better; and even now, among farmers and in remote districts, where traditional ideas most linger, parents may be found who tempt their children to gorge themselves. But among the educated classes, who chiefly display this reaction towards abstemiousness, there may be seen a decided leaning to the underfeeding, rather than the overfeeding of children. Indeed their disgust for bygone animalism, is more clearly shown in the treatment of their offspring than in the treatment of themselves; seeing that while their disguised asceticism is, in so far as their personal conduct is concerned, kept in check by their appetites, it has full play in legislating for juveniles.

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部门都可以发现一种规律性的倾向。例如，革命之后会出现专制，或像我们社会中那样，改革时代和保守时代的轮流出现；比如一个放纵的时代过去后，一个禁欲时代随之出现，然后过段时间再返回去；又比如商业中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再如人们对时尚的追逐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规律性的倾向还影响了我们的餐桌习惯，也无形中影响了年轻人的饮食。以大吃大喝为特点的一段时期过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比较节制的时期，绝对戒酒主义和素食主义成为了反对过去放纵生活方式的极端方式。随着成年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孩子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过去，人们认为让孩子吃得越多越好，甚至在传统观念遗留较久的农村和偏远地区，我们至今也还能看到父母劝孩子多吃。但是现在，有教养的阶层在饮食上表现出节制的倾向。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让孩子少吃，而不是多吃。事实上，他们厌恶过去人身上的动物性，这点在他们对待后代的方式上比对待自身的方式上体现得更明显。就目前来看，他们虚伪的禁欲主义尽管在涉及自身行为时受食欲的牵制，却在管教孩子时得到了充分发挥。

That overfeeding and underfeeding are both bad, is a truism. Of the two, however, the last is the worst. As writes a high authority, “the effects of casual repletion are less prejudicial, and more easily corrected, than those of inanition.“ [4_1] Add to which, that where there has been no injudicious interference, repletion will seldom occur. “Excess is the vice rather of adults than of the young, who are rarely either gourmands or epicures, unless through the fault of those who rear them.“ [4_2] This system of restriction which many parents think so necessary, is based upon very inadequate observation, and very erroneous reasoning. There is an over-legislation in the nursery, as well as an over-legislation in the State; and one of the most injurious forms of it is this limitation in the quantity of food.

不言而喻，吃得过多和吃得过少都不好。然而，这两者中，吃得过少又是最糟糕的。一位相当有权威的人士就写道：“偶尔吃得过饱的损害比吃不饱的损害要小，而且更容易改正。”[5_1] 此外，在没有受到不明智干预的情况下，孩子们很少发生吃得过饱的情况。“饮食过量是成年人而不是少年儿童的恶习。如果不是那些养育他们的人的过错，年轻人很少贪吃或者挑食。”[5_2] 许多父母认为这种限制饮食的方法非常必要，但这种方法却是建立在极其不充分的观察和极为错误的推理的基础上的。就像国家的立法太多了一样，育儿室的规矩也太多了，其中损害最大的一条是限制食量。

“But are children to be allowed to surfeit themselves? Shall they be suffered to take their fill of dainties and make themselves ill, as they certainly will do?” As thus put, the question admits of but one reply. But as thus put, it assumes the point at issue. We contend that, as appetite is a good guide to all the lower creation—as it is a good guide to the infant—as it is a good guide to the invalid—as it is a good guide to the differently-placed races of men, and as it is a good guide for every adult who leads a healthful life; it may safely be inferred that it is a good guide for childhood. It would be strange indeed were it here alone untrustworthy.

“但是就应该允许孩子们饮食过量吗？应该让他们用美味的食物撑饱自己，让自己生病吗？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按照这种说法，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也就对所争论的问题预先有了假定。我们认为，既然食欲对所有的低等生物都是好的引导，对婴儿是好的引导，对病人是好的引导，对不同地方、不同种族的人是好的引导，对于每一个过着健康生活的成年人是好的引导，那么就可以推论出，食欲对于儿童也是好的引导。如果它唯独对儿童不是好的引导的话，就太奇怪了。

Probably not a few will read this reply with some impatience; being able, as they think, to cite facts totally at variance with it. It will appear absurd if we deny the relevancy of these facts; and yet the paradox is quite defensible. The truth is, that the instances of excess which such persons have in mind, are usually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restrictive system they seem to justify. They are the sensual reactions caused by a more or less ascetic regimen. They illustrate on a small scale that commonly remarked fact, that those who during youth have been subject to the most rigorous discipline, are apt afterwards to rush into the wildest extravagances. They are analogous to those frightful phenomena, once not uncommon in convents, where nuns suddenly lapsed from the extremest austerities into an almost demoniac wickedness. They simply exhibit the uncontrollable vehemence of long-denied desires. Consider the ordinary tastes and the ordinary treatment of children. The love of sweets is conspicuous and almost universal among them. Probably ninety-nine people in a hundred, presume that there is nothing more in this than gratification of the palate; and that, in common with other sensual desires, it should be discouraged. The physiologist, however, whose discoveries lead him to an ever-increasing reverence for the arrangements of things, will suspect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more in this love of sweets than the current hypothesis supposes; and a little inquiry confirms the suspicion. Any work on organic chemistry shows that sugar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vital processes. Both saccharine and fatty matters are eventually oxidised in the body; and there is an accompanying evolution of heat. Sugar is the form to which sundry other compounds have to be reduced before they are available as heat-making food; and this *formation* of sugar is carried on in the body. Not only is starch changed into sugar in the course of digestion, but it has been proved by M. Claude Bernard that the liver is a factory in which other constituents of food are transformed into sugar: the

need for sugar being so imperative that it is even thus produced from nitrogenous substances when no others are given. Now, when to the fact that children have a marked desire for this valuable heat-food, we join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usually a marked dislike to that food which gives out the greatest amount of heat during its oxidation (namely, fat), we shall see strong reason for thinking that excess of the one compensates for defect of the other—that the organism demands more sugar because it cannot deal with much fat. Again, children are usually very fond of vegetable acids. Fruits of all kinds are their delight; and, in the absence of anything better, they will devour unripe gooseberries and the sourest of crabs. Now, not only are vegetable acids, in common with mineral ones, very good tonics, and beneficial as such when taken in moderation; but they have, when administered in their natural forms, other advantages. “Ripe fruit,” says Dr. Andrew Combe, “is more freely given on the Continent than in this country; and, particularly when the bowels act imperfectly, it is often very useful.” See, then, the discord between the instinctive wants of children and their habitual treatment. Here are two dominant desires, which there is good reason to believe express certain needs of the juvenile constitution; and not only are they ignored in the nursery regimen, but there is a general tendency to forbid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m. Bread-and-milk in the morning, tea and bread-and-butter at night, or some dietary equally insipid, is rigidly adhered to; and any ministration to the palate is thought not only needless but wrong. What is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 When, on fête-days there is an unlimited access to good things—when a gift of pocket-money brings the contents of the confectioner's window within reach, or when by some accident the free run of a fruit-garden is obtained; then the long-denied, and therefore intense, desires lead to great excesses. There is an impromptu carnival, caused not only by the release from past restraints, but also by the consciousness that a long Lent

will begin on the morrow. And then, when the evils of repletion display themselves, it is argued that children must not be left to the guidance of their appetites! These disastrous results of artificial restrictions, are themselves cited as proving the need for further restrictions! We contend, therefore, that the reasoning commonly used to justify this system of interference is vicious. We contend that, were children allowed daily to partake of these more sapid edibles, for which there is a physiological requirement, they would rarely exceed, as they now mostly do when they have the opportunity: were fruit, as Dr. Combe recommends, “to constitute a part of the regular food” (given, as he advises, not between meals, but along with them), there would be none of that craving which prompts the devouring of such fruits as crabs and sloes. And similarly in other cases.

可能许多人看到这个回答会不耐烦，因为他们认为能够列举一些现实的反例。如果我们否认这些反例的合理性，就会很荒唐，但这种悖论实际上却相当有理据。事实是，这些人想到的饮食过量的例子通常都是由他们认为合理的饮食限制法导致 的，都是由近乎禁欲的饮食规则造成的生理反应。这些例子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个公认的事实，即那些年少时曾受到最严格约束的人，日后很容易流于极端的放纵。这就像那些曾经在修道院里常见的现象一样可怕——修道院里的修女突然从最极端的禁欲主义陷入一种几乎疯狂的邪恶。这说明，那些长期被压抑的欲望有着无法控制的力量。让我们细想一下那些寻常的味道与孩子们通常受到的待遇。孩子几乎普遍喜欢吃甜食。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这不过是为了满足味觉，就像满足其他感官欲望一样，所以应该加以限制。然而，生理学家们的很多发现却使其越来越敬畏大自然的精心安排，进而怀疑现在这个假设不是孩子喜欢吃甜食的唯一原因，而且稍微一研究就可以证实这个怀疑是合理的。所有有机化学的工作成果都显示，糖在生命进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糖精和脂肪性物质最终都会在人体内被氧化，同时产生热量。其

他各种化合物要产生热量，就必须在人体内转化 成糖的形式。消化过程中，不止淀粉被转化成了糖。克洛德·贝尔纳先生已经证实，食物中的其他成分也可以被肝脏这个工厂转化为糖。糖对身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当身体中没有其他物质可转化成糖时，糖甚至会由含氮物质转化生成。现在的事实是儿童偏爱高热量食物，他们通常不喜欢氧化过程中释放出最大热量的食物（即脂肪）。我们有理由认为，对一种食物的食用过量是为了补偿另一种食物的缺失——有机体需要更多的糖是因为它处理不了大量的脂肪。另外，儿童通常都非常喜欢植物酸。各种各样的水果都受到他们的青睐。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他们会狼吞虎咽地吃掉尚未成熟的醋栗和最酸的沙果。现在植物酸和矿物酸一样都是非常好的滋补品，合理摄入是对身体有益的，而且以自然形式摄入还有其他益处。安德鲁·库姆医生说："与我们相比，欧洲大陆上的人更加随意地让儿童吃成熟的水果。尤其是人们肠胃不舒服时，水果的益处很大。"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儿童通常得到的对待与其本能需求是不吻合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个突出的欲望表达了青少年身体的某种特定需要，可是我们不仅在育儿饮食上忽略这些，而且还倾向于防止他们这些欲望得到满足。早上总是面包和牛奶，晚上是一杯茶和面包黄油，或者是一些同样寡淡的食物。稍稍满足了孩子们的口味，就会被认为没有必要而且大错特错。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什么呢？过节期间面对无限美食时，有零花钱可以购买附近糖果店橱窗里的东西时，或者偶尔可以在果园里自由穿梭时，那些长期被压抑的强烈欲望会导致他们饮食过量。这种即兴狂欢，不仅是因为从过去的约束中得到解放，也是因为意识到第二天就要开始漫长的斋戒。尔后，当孩子们身上显现出饮食过量带来的恶果时，有人就会争辩说决不能任由儿童按照自己的胃口吃喝！这些人为限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却被他们当作进一步限制孩子饮食的理由。因此，我们认为，过去这套干涉法通常所依据的推理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如果允许孩子们每天吃些他们生理需要的更可口的食物，他们就不大可能会像现在这样一有机会就过量饮食。如果照库姆医生建议的那样，"让水果成为日常食物的一部分"（他建议不在两餐之间，而是在进餐时吃水果），孩子们就不会像吃沙果和黑刺李那样狼吞虎咽地吃水果。其他情况下也是如此。

Not only is it that the a priori reasons for trusting the appetites of children are so strong; and that the reasons assigned for distrusting them are invalid; but it is that no other guidance is worthy of any confidence. What is the value of this parental judgment, set up as an alternative regulator? When to “Oliver asking for more” the mamma or the governess replies in the negative, on what data does she proceed? She *thinks* he has had enough. But where are her grounds for so thinking? Has she some secret understanding with the boy's stomach—some *clairvoyant* power enabling her to discern the needs of his body? If not, how can she safely decide? Does she not know that the demand of the system for food is determined by numerous and involved causes—varies with the temperature, with the hygrometric state of the air, with the electric state of the air—varies also according to the exercise taken, according to the kind and quantity of food eaten at the last meal, and according to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the last meal was digested? How can she calculate the result of such a combination of causes? As we heard said by the father of a five-years-old boy, who stands a head taller than most of his age, and is proportionately robust, rosy, and active:—“I can see no artificial standard by which to mete out his food. If I say, 'this much is enough,' it is a mere guess; and the guess is as likely to be wrong as right. Consequently, having no faith in guesses, I let him eat his fill.” And certainly, any one judging of his policy by its effects, would be constrained to admit its wisdom. In truth, this confidence, with which most parents take upon themselves to legislate for the stomachs of their children, proves their unacquaint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physiology: if they knew more, they would be more modest. “The pride of science is humble when compared with the pride of ignorance.” If any one would learn how little faith is to be placed in human judgments, and how much in the pre-established

arrangements of things, let him compare the rashness of the inexperienced physician with the caution of the most advanced; or let him dip into Sir John Forbes' work, *On Nature and Art in the Cure of Disease* ; and he will then see that, in proportion as men gain a greater knowledge of the laws of life, they come to have less 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and more in Nature.

以儿童食欲为依据的理由才有说服力，不以其食欲为依据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不仅如此，这也是目前唯一值得信赖的指导原则。那么取代儿童食欲起监管作用的父母的判断，还有什么价值呢？当“奥利弗还要再吃”的时候，妈妈或女家庭教师会拒绝他的要求，那么她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呢？大概是她认为 奥利弗已经吃的足够多了。但是她凭什么这样想呢？难道她已经和这个男孩的胃达成了某种默契吗？还是她有某种透视 能力，能够洞察男孩身体的需求？如果没有，她在做出这个决定时何以能够如此确定？难道她不知道身体对食物的需求是由无数错综复杂的原因决定的？难道她不知道应该考虑天气冷热、空气湿度、空气静电情况、运动量、上一餐食物的种类、数量、消化速度等因素的变化对食物需求产生的影响吗？她是怎样综合计算出这些因素结果的？有一位五岁的男孩，比同龄的大多数孩子高出一头，身体强壮匀称，脸蛋红润，性格活泼。我们听到他父亲说：“我找不出任何人为标准可以作为给他食物的依据。我不想说‘这些就够了’，因为这只是一个猜测，可能猜对也可能猜错。所以，既然不相信猜测，那我就让他吃个够。”毫无疑问，用效果去衡量方法，所有人都会承认这是很明智的做法。事实上，大多数父母满怀信心地为孩子规定食量，恰恰证明他们对生理学原则知之甚少，因为如果他们知道的更多，他们会更谦虚。“与无知的骄傲相比，科学的骄傲还是谦逊的。”我们应该少相信人为的判断，而多相信事物的预设安排。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如果去比较一下新手医生的鲁莽和熟练医生的谨慎，或者去看看约翰·福布斯爵士的著作《治病的性质和艺术》，他就会明白，人们对生命规律了解得越多，就越少相信自己而越多相信科学。

Turning from the question of *quantity* of food to that of *quality* , we may discern the same ascetic tendency. Not simply a more or less restricted diet, but a comparatively low diet, is thought proper for children. The current opinion is, that they should have but little animal food. Among the less wealthy classes, economy seems to have dictated this opinion—the wish has been father to the thought. Parents not affording to buy much meat, and liking meat themselves, answer the petitions of juveniles with—“Meat is not good for little boys and girls;” and this, at first, probably nothing but a convenient excuse, has by repetition grown into an article of faith. While the classes with whom cost is not a consideration, have been swayed partly by the example of the majority, partly by the influence of nurses drawn from the lower classes, and in some measure by the reaction against past animalism.

不止在食物的数量 方面，在食物的质量 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的禁欲倾向。人们认为，适宜儿童的饮食不仅要或多或少地限制量，还要相对素淡。流行的观点是儿童可以吃肉食，但应该少量。对不太富裕的阶层，这种看法似乎是从节俭角度出发的。买不起太多肉的父母尽管自己喜欢吃肉，但对孩子要吃肉的答复却是——“肉对小孩的身体不好。”起初，这可能只是一个方便的托辞，但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观念。而对那些无需考虑买肉成本的阶层，他们的想法也动摇了，一部分原因是受大多数人做法的影响，另一部分原因是受底层保姆的影响，此外多少还出于对过去肉食主义的反感。

If, however, we inquire for the basis of this opinion, we find little or none. It is a dogma repeated and received without proof, like that which,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sisted on the necessity of swaddling-clothes. It may indeed be true that, to the young child's

stomach, not yet endowed with much muscular power, meat, which requires considerable trituration before it can be made into chyme, is an unfit aliment. But this objection does not tell against animal food from which the fibrous part has been extracted; nor does it apply when, after the lapse of two or three years, considerable muscular vigour has been acquired. And while the evidence in support of this dogma, partially valid in the case of very young children, is not valid in the case of older children, who are, nevertheless, ordinarily treate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dogma, the adverse evidence is abundant and conclusive. The verdict of science is exactly opposite to the popular opinion. We have put the question to two of our leading physicians, and to several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physiologists, and they uniformly agree in the conclusion, that children should have a diet not *less* nutritive, but, if anything, *more* nutritive than that of adults.

然而如果我们研究这一观点，就会发现它的依据很不充分，甚至没有任何依据。这是一个毫无根据就被接受并不断重复的说法，就像几千年来人们坚持襁褓的必要性一样。诚然，人们可能认为肉食在转化成食糜之前需要大量的碾磨，而对小孩子的胃来说，还没有足够强健的力量，因此肉食对孩子来说不是合适的食物。但是对于已经去除纤维的肉食来说，这个反对是不成立的，也不适用于两三岁具有咀嚼能力的孩子们。这一说法只适用于非常小的孩子，而按照这个说法对待年龄较大的孩子，通常不起作用，因为驳斥这个说法的证据丰富且确凿。科学的判断与流行的观点正好相反。我们已经请教过两名顶级医生和几位最优秀的生理学家，他们一致认为，儿童饮食的营养应该不低于成年人，而如果二者的营养有区别，儿童的营养应高于 而不是低于 成年人。

The grounds for this conclusion are obvious, and the reasoning

simple. It needs but to compare the vital processes of a man with those of a boy, to see at once that the demand for sustenance is relatively greater in the boy than in the man. What are the ends for which a man requires food? Each day his body undergoes more or less wear—wear through muscular exertion, wear of the nervous system through mental actions, wear of the viscera in carrying on the functions of life; and the tissue thus wasted has to be renewed. Each day, too, by perpetual radiation, his body loses a large amount of heat; and as, for the continuance of the vital actions, the temperature of the body must be maintained, this loss has to be compensated by a constant production of heat: to which end certain constituents of the food are unceasingly undergoing oxidation. To make up for the day's waste, and to supply fuel for the day's expenditure of heat, are, then, the sole purposes for which the adult requires food. Consider, now, the case of the boy. He, too, wastes the substance of his body by action; and it needs but to note his restless activity to see that, in proportion to his bulk, he probably wastes as much as a man. He, too, loses heat by radiation; and as his body exposes a greater surface in proportion to its mass than does that of a man, and therefore loses heat more rapidly, the quantity of heat-food he requires is, bulk for bulk, greater than that required by a man. So that even had the boy no other vital processes to carry on than the man has, he would need, relatively to his size, a somewhat larger supply of nutriment. But, besides repairing his body and maintaining its heat, the boy has to make new tissue—to grow. After waste and thermal loss have been provided for, such surplus of nutriment as remains, goes to the further building up of the frame; and only in virtue of this surplus is normal growth possible—the growth that sometimes takes place in the absence of such surplus, causing a manifest prostration consequent upon defective repair. It is true that because of a certain mechanical law which cannot be here explained, a small organism

has an advantage over a large one in the ratio between the sustaining and destroying forces—an advantage, indeed, to which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growth is owing. But this admission only makes it the more obvious that though much adverse treatment may be borne without this excess of vitality being quite out-balanced; yet any adverse treatment, by diminishing it, must diminish the size or structural perfection reached. How peremptory is the demand of the unfolding organism for materials, is seen alike in that “schoolboy hunger”, which afterlife rarely parallels in intensity, and in the comparatively quick return of appetite. And if there needs further evidence of this extra necessity for nutriment, we have it in the fact that, during the famines following shipwrecks and other disasters, the children are the first to die.

这个结论的根据很明显，而且推理过程很简单。只需要比较一个成年男人和一个男孩的活动量，就能够立刻看出男孩比男人需要更多的营养。“人类需要食物的目的是什么？”人的身体几乎每天都有消耗，包括肌肉运动的耗损、脑力活动造成的神经系统的耗损、内脏支持生命机能造成的耗损等等，而机体组织在损耗之后必须要更新。人的身体每天都在不断向外辐射掉很一大部分热量，因此，为了保证生命活动和维持一定体温，就必须持续产生热量来弥补这一损失，需要不断氧化食物的某些特定成分。成年人需要食物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弥补日常耗损以及为日常耗损提供燃料。接下来看看男孩的情况。他在活动中也要耗费身体物质。如果留意到男孩不停歇的活动，按体积比例他的消耗差不多和成人一样多。他也会因辐射而损失热量，而且按比例计算，他的身体暴露的面积比成年男子要大，热量损失也更快。同样再按照体积比计算，他所需的热能食物数量也多过一个成年男子。因此，即使这个男孩和男人进行同样的活动，按照他的个头大小，他也会需要更多的营养供应。然而，除了补充身体消耗和维持体温外，儿童的身体还需要生长新的组织。在补充完身体耗损和热量损失后，剩余的营养物质都用在继续生长上了。只有依靠这些剩余的营

养物质，他才能正常成长，而如果没有这些剩余营养物质他大概也能生长，但是营养不足会导致身体明显的虚弱。因为某种这里无法解释的医学规律，就存活和破坏力量之间的比率而言，一个小机体确实会比一个大的机体具有更大的优势—就是这一优势促成了成长。但承认这一点，只会使我们更明显地看出，尽管大量不利的待遇的产生不会导致过度的活力被压制，但任何一种不利待遇都会减少机体的活力，从而减小机体能达到的尺寸或结构上的完善。“学龄儿童的饥饿”总是比其他人强烈，食欲也总是比其他人恢复得快。从这两件事上看出，这个成长中的生物体对食物的要求是不容置疑的。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例子——例如在沉船和其他灾难后的饥荒中，先死亡的总是儿童——来证明这种额外营养需求的必要性。

This relatively greater need for nutriment being admitted, as it must perforce be, the question that remains is—shall we meet it by giving an excessive quantity of what may be called dilute food, or a more moderate quantity of concentrated food? The nutriment obtainable from a given weight of meat is obtainable only from a larger weight of bread, or from a still larger weight of potatoes, and so on. To fulfil the requirement, the quantity must be increased as the nutritiveness is diminished. Shall we, then, respond to the extra wants of the growing child by giving an adequate quantity of food as good as that of adults? Or, regardless of the fact that its stomach has to dispose of a relatively larger quantity even of this good food, shall we further tax it by giving an inferior food in still greater quantity?

承认儿童相对成年人需要更多的营养之后，剩下的问题是：在满足这个需求时，我们是给他们提供过量的稀释食物呢，还是适量的浓缩食物呢？比较既定重量食物中营养物质的含量，从大到小的次序是肉、面包、土豆……从营养需求满足的角度来说，食物的数量必须随

着营养的减少而增加。那么，对于成长中孩子的额外需求，我们是要像对待成人一样给他们提供充足的优质食物呢？还是要进一步增加他们的肠胃负担，给他们一些数量更多但质量较差的食物呢？（有人认为即使给儿童的食物优质上乘，他们的胃要消化的食物数量仍相对较大。）

The answer is tolerably obvious. The more the labour of digestion can be economised, the more energy is left for the purposes of growth and action. The functions of the stomach and intestines cannot be performed without a large supply of blood and nervous power; and in the comparative lassitude that follows a hearty meal, every adult has proof that this supply of blood and nervous power is at the expense of the system at large. If the requisite nutriment is furnished by a great quantity of innutritions food, more work is entailed on the viscera than when it is furnished by a moderate quantity of nutritious food. This extra work is so much sheer loss—a loss which in children shows itself either in diminished energy, or in smaller growth, or in both. The inference is, then, that they should have a diet which combines, as much as possible, nutritiveness and digestibility.

答案颇为明显。消化时省力越多，就越有多余的能量用来生长和活动。没有大量血液和神经能量的供应，肠胃就无法发挥它的功能。人们饱餐后会比较倦怠，就可以证明这些血液和神经能量的供应是以牺牲整个系统为代价的。如果必要的营养物质是由大量低营养食物提供的，那么相比适量的高营养食物，内脏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这个额外的工作会造成许多损失，表现在孩子身上，不是精力减少，就是生长变慢，或者两者都有。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孩子的饮食应该尽可能的富有营养又利于消化。

It is doubtless true that boys and girls may be brought up upon an exclusively, or almost exclusively, vegetable diet. Among the upper classes are to be found children to whom comparatively little meat is given; and who, nevertheless, grow and appear in good health. Animal food is scarcely tasted by the offspring of labouring people; and yet they reach a healthy maturity. But these seemingly adverse facts have by no means the weight commonly supposed. In the first place,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ose who in early years flourish on bread and potatoes, will eventually reach a fine development; and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s and the gentry, in England, or between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in France, is by no means in favour of vegetable feeders.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question is not only a question of *bulk,* but also a question of *quality* . A soft, flabby flesh makes as good a show as a firm one; but though to the careless eye, a child of full, flaccid tissue may appear the equal of one whose fibres are well toned, a trial of strength will prove the difference. Obesity in adults is often a sign of feebleness. Men lose weight in training. And hence the appearance of these low-fed children is by no means conclusive. In the third place, not only *size* , but *energy* has to be considered. Between children of the meat-eating classes and those of the bread-and-potato-eating classes, there is a marked contrast in this respect. Both in mental and physical vivacity the low-fed peasant-boy is greatly inferior to the better-fed son of a gentleman.

的确，有些男孩和女孩可能全吃蔬菜或者几乎全吃蔬菜长大。在上层社会中，有些孩子吃肉较少，长大了身体也很健康。劳动人民的孩子几乎很少吃到肉食，他们也都健康地长大了。但是这些似乎是反证的事实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那般有说服力。首先，那些早年靠吃面包和土豆长大的人并不一定最后都发育健全。比较一下英国农民和贵族，法国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可以发现素食者一点也不占优势。其

次，问题不仅在于个头的大小 ，还在于体质的优劣 。从外表上看，松弛的肌肉和结实的肌肉看起来一样好。乍一看，一个肥胖的、肌肉松软的孩子和肌肉结实的孩子可能差不多，但是一比力量就能看出不同来。成年人的肥胖通常是虚弱的表现。人们通过锻炼身体来减肥。因此，这些吃得不好的孩子的外表一点也不能让人信服。第三，不仅要考虑个头大小 ，还要考虑活力 。吃肉长大的孩子和吃面包土豆长大的孩子在这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不管是心智活力还是身体活力，吃得差的农民的儿子远不及吃得好的绅士的孩子。

If we compare different classes of animals, or different races of men, or the same animals or men when differently fed, we find still more distinct proof that *the degree of energy essentially depends on the nutritiveness of the food* .

如果我们比较不同种类的动物，或者不同种族的人，或者吃的东西不同的同一种动物和人，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更多明显的证据来证明孩子精力的旺盛程度基本上取决于食物的营养丰富程度 。

In a cow, subsisting on so innutritive a food as grass, we see that the immense quantity required to be eaten necessitates an enormous digestive system; that the limbs, small in comparison with the body, are burdened by its weight; that in carrying about this heavy body and digesting this excessive quantity of food, a great amount of force is expended; and that, having but little energy remaining, the creature is sluggish. Compare with the cow a horse—an animal of nearly allied structure, but adapted to a more concentrated food. Here we see that the body, and more especially its abdominal region, bears a much smaller ratio to the limbs; that the powers are not taxed by the support of such massive viscera,

nor the digestion of so bulky a food; and that, as a consequence, there is great locomotive energy and considerable vivacity. If, again, we contrast the stolid inactivity of the graminivorous sheep with the liveliness of the dog, subsisting upon flesh or farinaceous food, or a mixture of the two, we see a difference similar in kind, but still greater in degree. And after walking through the Zoological Gardens, and noting the restlessness with which the carnivorous animals pace up and down their cages, it needs but to remember that none of the herbivorous animals habitually display this superfluous energy, to see how clear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centration of food and degree of activity.

牛主要靠草一类的没有营养的食物为生，因此我们看到，牛需要大量的草，也需要一个巨大的消化系统，而且相比庞大的身体，它的四肢又很小。这样一来，承载沉重身躯以及消化过量食物就需要花费大量的能量，而剩下的能量也就比较少，其行动也就比较迟缓。马的身体结构与牛相似，但却以更浓缩的食物为食。我们可以看到，马的身体，尤其是腹部，与四肢相比要小得多，既不需要耗费能量支撑庞大的内脏，也不需要消化体积庞大的食物，因此马的动作更为有力，也比较活跃。如果再比较羊和狗，我们就可以看出，食草的羊行动迟缓懒动，而以肉食或淀粉或两者为食的狗活泼好动，虽然种类相似，但是程度差别很大。走进动物园后就会发现，食肉类动物在笼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而没有一头食草类动物会习惯性地表现出这种多余的精力。由此就可以看出食物的浓缩度与机体活跃程度之间有多么明显的关系。

That these differences are not directly consequent upon differences of constitution, as some may argue; but are directly consequent upon differences in the food which the creatures are constituted to subsist on; is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they are

observable between different divisions of the same species. The varieties of the horse furnish an illustration. Compare the big-bellied, inactive, spiritless cart-horse with a racer or hunter, small in the flanks and full of energy; and then call to mind how much less nutritive is the diet of the one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ake the case of mankind. The Australians, Bushmen, and others of the lowest savages who live on roots and berries, varied by larvae of insects and the like meagre fare, are comparatively puny in stature, have large abdomens, soft and undeveloped muscles, and are quite unable to cope with Europeans, either in a struggle or in prolonged exertion. Count up the wild races who are well grown, strong and active, as the Kaffirs, North-American Indians, and Patagonians, and you find them large consumers of flesh. The ill-fed Hindoo goes down before the Englishman fed on more nutritive food; to whom he is as inferior in mental as in physical energy. And generally, we think,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shows that the well-fed races have been the energetic and dominant races.

正如某些人所说，这些差异不能直接归咎于体质的不同，而应该归咎于这些动物吃的食物的不同。事实也证明，这种差异在同类生物的不同种科中就可以观察出来。马的品种众多，有助于我们进行解释。拉货车的马，大肚皮，死气沉沉，毫无生气，而赛马或者打猎时骑的马，肋腹紧收，充满力量。然后我们就会想到，前者的食物的营养是远不及后者的。以人类为例。以树根和浆果或昆虫和其他粗粮为食的澳大利亚人、丛林人和其他最低等的野蛮人，身材相对矮小，肚腹胀大，身体肌肉柔软、不发达，因此无论是战斗力还是持久力，都不能和欧洲人相比。而看看那些发育良好、身体强壮、有活力的野蛮种族，比如南非黑人，北美印第安人和巴塔哥尼亚人，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大量吃肉的种族。营养不良的印度人在以高营养食物为生的英国人面前倒下来了，因为他们无论在智力上还是体力上都不如英国人。世界历史向我们表明，一般来说，饮食营养丰富的民族都精力充沛，

且占据了主导支配地位。

Still stronger, however, becomes the argument, when we find that the same individual animal becomes capable of more or less exertion according as its food is more or less nutritious. This has been clearly demonstrated in the case of the horse. Though flesh may be gained by a grazing horse, strength is lost; as putting him to hard work proves. “The consequence of turning horses out to grass is relaxation of the muscular system.” “Grass is a very good preparation for a bullock for Smithfield market, but a very bad one for a hunter.” It was well known of old that, after passing the summer months in the fields, hunters required some months of stable-feeding before becoming able to follow the hounds; and that they did not get into good condition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spring. And the modern practice is that insisted on by Mr. Apperley —“Never to give a hunter what is called a 'summer's run at grass', and, except under particular and very 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never to turn him out at all.” That is to say, never give him poor food; great energy and endurance are to be obtained only by the continuous use of very nutritive food. So true is this that, as proved by Mr. Apperley, prolonged high-feeding will enable a middling horse to equal, in his performances, a first-rate horse fed in the ordinary way. To which various evidences add the familiar fact that, when a horse is required to do double duty, it is the practice to give him beans—a food containing a larger proportion of nitrogenous, or flesh-making material, than his habitual oats.

然后，当我们发现同一动物的活力情况也根据食物营养的多少而变化时，这种看法就更有说服力了。这一点已经很清晰地表现在马身上。放牧虽使马长膘，但是力量损失了，让它干重活的时候就看得出

来。“把马带出来吃草的结果是使它的肌肉系统松弛。”“对一头牛来说，青草是非常好的食物，可以让它长膘，然后这头牛就可以送到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上去卖，但是对一匹猎马来说，青草却是很糟糕的食物。”众所周知，猎马在田地里度过一个夏天后，猎人需要喂上几个月后才能追上猎狗。一直到第二年开春情况才能好转。阿珀利先生坚持的流行做法是“永远不要一整个夏天都把猎马放出去吃草，除了个别特殊的很有利的情况，否则绝不放它出去。”这也是说，绝不要喂它差的食物，因为良好的精力和忍耐力只有通过不断喂养非常有营养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这是真的，正如阿珀利先生所证明的，不断喂养高质量的食物，能够使一匹中等马的表现匹敌一匹喂养普通食物的一等马。再补充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事实，当需要马加倍工作时，通常的做法是给它大豆吃，因为大豆比它平常吃的燕麦含有更多的氮或是使马长肉的物质。

Once more, in the case of individual men the truth has been illustrated with equal, or still greater, clearness. We do not refer to men in training for feats of strength, whose regimen, however, thoroughly conforms to the doctrine. We refer to the experience of railway contractors and their labourers. It has been for years past a well-established fact that the English navvy, eating largely of flesh, is far more efficient than a Continental navvy living on a less nutritive food: so much more efficient, that English contractors for Continental railways have habitually taken their labourers with them. That difference of diet and not difference of race caused this superiority, has been of late distinctly shown. For it has turned out, that when the Continental navvies live in the same style as their English competitors, they presently rise, more or less nearly, to a par with them in efficiency. To which fact let us here add the converse one, to which we can give personal testimony based upon six months' experience of vegetarianism, that abstinence from meat entails diminished energy of both body and mind.

而且，这一真理在人类个体身上显现得更加清晰。我们所指的还不是那些为了身体特技而训练的人，尽管他们的饮食也完全符合这种主张。我们指的是铁路承包商和铁路工人的经历。多年以来的事实证明，以肉为食的英国工人远比食物营养较少的欧洲大陆上的工人高效。他们如此能干，以至于欧洲铁路的英国承包商已经习惯带他们出去工作。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优越性不是种族差异引起的，而是饮食差异造成的。我们也看到，当欧洲大陆上的工人生活方式和英国工人一样时，他们的效率马上就会上升到一个几乎和对手大致相同的水平。我们这儿还可以举一个反例，我根据亲身体验证明，六个月不吃肉的素食经历会使人的身心活力都降低。

Do not these various evidences distinctly endorse our argument respecting the feeding of children? Do they not imply that, even supposing the same stature and bulk to be attained on an innutritive as on a nutritive diet, the quality of tissue is greatly inferior? Do they not establish the position that, where energy as well as growth has to be maintained, it can only be done by high feeding? Do they not confirm the a priori conclusion that, though a child of whom little is expected in the way of bodily or mental activity, may thrive tolerably well on farinaceous substances, a child who is daily required, not only to form the due amount of new tissue, but to supply the waste consequent on great muscular action, and the further waste consequent on hard exercise of brain, must live on substances containing a larger ratio of nutritive matter? And is it not an obvious corollary, that denial of this better food will be at the expense either of growth, or of bodily activity, or of mental activity; as constitution and circumstances may determine? We believe no logical intellect will question it. To think otherwise is to entertain in a disguised form the old fallacy of the perpetual-motion schemers—that it is possible to get power out of nothing.

难道这些各种各样的证据不能清楚地支持我们关于喂养孩子的观点吗？难道这些证据不足以说明，一个孩子即使无论饮食有无营养都能有同样的身高和体重，但其体质却差很多吗？难道这些证据不足以说明，只有高质量的喂养才能既维持精力又保证生长吗？虽然孩子不需要从事很多体力劳动和脑力活动，可能只吃淀粉类的食物也能长得不错，但是孩子每天所需的能量，不仅要生成一定数量的新组织，而且还要补充大量肌肉活动造成的消耗和大量用脑造成的进一步消耗，所以孩子必须吃含有大量营养物质的食物。对此，难道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吗？如果不能得到好的食物，孩子们显然会由于体质和环境不同，成长和身心活动方面都会有所滞后，这难道不是一个必然的推论吗？我们相信明理的人不会质疑这一点。否则，就无异于相信永动机谬论，认为可以凭空得到动力。

Before leaving the question of food, a few words must be said on another requisite—*variety* . In this respect the dietary of the young is very faulty. If not, like our soldiers, condemned to “twenty years of boiled beef”, our children have mostly to bear a monotony which, though less extreme and less lasting, is quite as clearly at variance with the laws of health. At dinner, it is true, they usually have food that is more or less mixed, and that is changed day by day. But week after week, month after month, year after year, comes the same breakfast of bread-and-milk, or, it may be, oatmeal porridge. And with like persistence the day is closed, perhaps with a second edition of the bread-and-milk, perhaps with tea and bread-and-butter.

在结束食物的话题之前，必须要说说另外一个要素——多样化 。在多样化方面，年轻人的饮食存在很多缺陷。即使不像我们的士兵那样，被迫吃“二十年的水煮牛肉”，我们的孩子大多都得忍受尽管不那

么极端、不那么持久，但却明显不符合健康法则的单调饮食。当然，他们的午餐通常混合了几样食物，而且每天都有变化。但是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早餐都是一样的面包和牛奶，或者是燕麦粥。晚饭也总是面包牛奶，或者是茶和面包黄油。

This practice is opposed to the dictates of physiology. The satiety produced by an often-repeated dish, and the gratification caused by one long a stranger to the palate, are *not* meaningless, as many carelessly assume; but they are the incentives to a wholesome diversity of diet. It is a fact, established by numerous experiments, that there is scarcely any one food, however good, which supplies in due proportions or right forms all the elements required for carrying on the vital processes in a normal manner: from whence it is to be inferred that frequent change of food is desirable to balance the supply of all the elements. It is a further fact, well known to physiologists, that the enjoyment given by a much-liked food is a nervous stimulus, which, by increasing the action of the heart and so propelling the blood with increased vigour, aids in the subsequent digestion. And these truths are in harmony with the maxims of modern cattle-feeding, which dictate a rotation of diet.

这种做法违反了生理学规律。经常重复吃的食物引起的厌腻和许久没有尝到的食物带来的满足，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没有 意义，相反，他们是多样化有益饮食的诱因。无数的实验证明，无论多好的食物，几乎没有一种能够以适当的比例或者正确的形式提供正常生命过程中所需的全部元素。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经常变换食物有利于平衡人体所有成分的供应。而且生理学家都知道，吃到非常喜欢的食物产生的愉悦感可以刺激神经，增强心脏活动，增加血液活力，有助于随后的消化。这些真理符合现代养生方法中要求变换饮食的定理。

Not only, however, is periodic change of food very desirable; but, for the same reasons, it is very desirable that a mixture of food should be taken at each meal. The better balance of ingredients, and the greater nervous stimulation, are advantages which hold here as before. If facts are asked for, we may name as one, the comparative ease with which the stomach disposes of a French dinner, enormous in quantity but extremely varied in material. Few will contend that an equal weight of one kind of food, however well cooked, could be digested with as much facility. If any desire further facts, they may find them in every modern book on the management of animals. Animals thrive best when each meal is made up of several things. And indeed, among men of science the truth has been long ago established. The experiments of Goss and Stark “afford the most decisive proof of the advantage, or rather the necessity, of a mixture of substances, in order to produce the compound which is the best adapted for the action of the stomach.“ [4_3]

然而，不止需要定期变换食物，同理，每餐都有必要搭配好各种食物。越好地平衡各种营养成分，对神经的刺激就越大，这两种情况都是之前列举的有利情况。如果需要事实证明，我们可以举一顿法国晚餐的例子，虽然它分量大，但食材多样，所以相对易于胃的消化。很少人会认为，同等重量的一种食物无论如何烹饪都会一样容易消化。如果对此想有进一步的了解，可以查看任意一本现代管理动物的书籍。动物每顿吃多样化的食物时长的最好。实际上这个真理很早以前就被科学人士证实了。戈斯和斯塔克的实验“提供了最关键的有利证据，说明了把几种食物混合在一起制造最适合胃部活动的复合物是相当有必要的。” [5_3]

Should any object, as probably many will, that a rotating dietary for children, and one which also requires a mixture of food

at each meal, would entail too much trouble; we reply, that no trouble is thought too great which conduces to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that for their future welfare, good bodily development is equally important. Moreover, it seems alike sad and strange that a trouble which is cheerfully taken in the fattening of pigs, should be thought too great in the rearing of children.

或许会有很多人反对变换儿童的饮食，认为每餐还需要搭配不同食物实在是太麻烦。我们的回答是，只要有助于儿童的心智发展，什么都不算麻烦，而且为了他们将来的利益考虑，身体的良好发育同样重要。这看起来既令人伤心又奇怪，人们可以为了把猪养肥而愉快地接受这些麻烦，而对于抚养儿童却觉得太麻烦。

One more paragraph, with the view of warning those who may propose to adopt the regimen indicated. The change must not be made suddenly; for continued low-feeding so enfeebles the system, as to disable it from at once dealing with a high diet. Deficient nutrition is itself a cause of dyspepsia. This is true even of animals. “When calves are fed with skimmed milk, or whey, or other poor food, they are liable to indigestion.“ [4_4] Hence, therefore, where the energies are low, the transition to a generous diet must be gradual: each increment of strength gained, justifying a further increase of nutriment. Further, it should always be borne in mind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nutriment may be carried too far. A bulk sufficient to fill the stomach is one requisite of a proper meal; and this requisite negatives a diet deficient in those waste matters which give adequate mass. Though the size of the digestive organs is less in the well-fed civilised races than in the ill-fed savage ones; and, though their size may eventually diminish still further; yet, for the

time being, the bulk of the ingesta must be determined by the existing capacity. But, paying due regard to these two qualifications, our conclusions are—that the food of children should be highly nutritive; that it should be varied at each meal and at successive meals; and that it should be abundant.

对于那些可能打算采用上述饮食方法的人，我们在此还要提醒一下：坚决不要突然变换饮食，因为长期的低营养饮食导致消化系统变得虚弱，使它不能立刻消化高营养的饮食。营养不良本身就是消化不良的一个结果。动物甚至也是如此。“如果突然喂小牛脱脂牛奶，或者乳清，或者其他差的食物，它们很容易消化不良。”[5_4] 因此，从低能量的饮食过渡到营养丰富的饮食必须循序渐进，体力每增加一点，就可以进一步加强营养。而且应该永远记住，营养浓度也有可能实施过大。一顿适当的餐食应该有足够的分量填饱肚子，饮食中若是没能提供足够的食物，也是不合格的。与营养不良的野蛮种族相比，营养充足的文明种族拥有较小的消化器官，尽管他们的消化器官可能最终变得更小，然而必须由现有消化器官的容量决定目前摄取食物的分量。但是，考虑这两个方面后，我们得出结论，即儿童的饮食应该富有营养且丰盛，并且连续几餐之间要有变化。

With clothing as with food, the established tendency is towards an improper scantiness. Here, too, asceticism peeps out. There is a current theory, vaguely entertained, if not put into a definite formula, that the sensations are to be disregarded. They do not exist for our guidance, but to mislead us, seems to be the prevalent belief reduced to its naked form. It is a grave error: we are much more beneficently constituted. It is not obedience to the sensations, but disobedience to them, which is the habitual cause of bodily evils. It is not the eating when hungry, but the eating in the absence of appetite, which is bad. It is not the drinking when thirsty, but the

continuing to drink when thirst has ceased, that is the vice. Harm results not from breathing that fresh air which every healthy person enjoys; but from continuing to breathe foul air, spite of the protest of the lungs. Harm results not from taking that active exercise which, as every child shows us, nature strongly prompts; but from a persistent disregard of nature's promptings. Not that mental activity which is spontaneous and enjoyable does the mischief; but that which is persevered in after a hot or aching head commands desistance. Not that bodily exertion which is pleasant or indifferent, does injury; but that which is continued when exhaustion forbids Is. It is true that, in those who have long led unhealthy lives, the sensations are not trustworthy guides. People who have for years been almost constantly indoors, who have exercised their brains very much, and their bodies scarcely at all, who in eating have obeyed their clocks without consulting their stomachs, may very likely be misled by their vitiated feelings. But their abnormal state is itself the result of transgressing their feelings. Had they from childhood up never disobeyed what we may term the physical conscience, it would not have been seared, but would have remained a faithful monitor.

与饮食一样，衣着方面的趋势也是过于简单。禁欲主义也影响了衣着的趋势。目前有一套隐约存在却并未形成定论的理论，即不考虑感觉。大家普遍认为，就其本质而言，感觉的存在不是来引导我们，而是误导我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的身体深受感觉之惠。身体经常生病不是因为我们听从了感觉，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感觉。问题不在于饿的时候吃，而是没胃口的时候吃，这是很不好的。恶习不在于渴的时候喝水，而是不渴了还在喝水，这是有害处的。伤害不是因为呼吸了每个健康人都呼吸的新鲜空气，而是在肺抗议的情况下继续呼吸污浊的空气。伤害不是因为积极锻炼身体（每一个孩子天性就喜欢如此），而是由于持续忽略大自然的感召。自发的和令人心情

愉悦的智力活动不会造成损害，只有在发烧和头疼后还继续进行才会有危害。心情愉快或者一般的身体活动不会造成损害，只有身体疲惫时还继续活动才会损害身体。事实上，对于那些长期过着不健康生活的人，感觉不再是值得信任的向导。那些常年待在室内，经常用脑，但几乎不锻炼身体的人，他们只是按照生物钟吃饭而不管胃饿不饿，很有可能被他们受损的感觉误导。但是他们的不正常状态本身就是违背自己感觉的结果。如果他们从童年起就从没违背过我们所说的身体意识，那么它就不会麻木，而是会非常敏感。

Among the sensations serving for our guidance are those of heat and cold; and a clothing for children which does not carefully consult these sensations is to be condemned. The common notion about “hardening” is a grievous delusion. Children are not unfrequently “hardened” out of the world; and those who survive, permanently suffer either in growth or constitution. “Their delicate appearance furnishes ample indication of the mischief thus produced, and their frequent attacks of illness might prove a warning even to unreflecting parents,” says Dr. Combe. The reasoning on which this hardening theory rests is extremely superficial. Wealthy parents, seeing little peasant boys and girls playing about in the open air only half-clothed, and joining with this fact the general healthiness of labouring people, draw the unwarrantable conclusion that the healthiness is the result of the exposure, and resolve to keep their own offspring scantily covered! It is forgotten that these urchins who gambol upon village-greens are in many respects favourably circumstanced—that their days are spent in almost perpetual play; that they are always breathing fresh air; and that their systems are not disturbed by overtaxed brains. For aught that appears to the contrary, their good health may be maintained, not in consequence of, but in spite of, their deficient clothing. This alternative conclusion we believe to be the true one;

and that an inevitable detriment results from the needless loss of animal heat to which they are subject.

在指导我们的各类感觉中，有热和冷的感觉，所以不管冷热就给儿童加衣是不对的。关于“锻炼”的普遍看法是一个严重错觉。有的儿童因为“锻炼”离开人世了，而那些存活下来的孩子在生长方面或是体质方面则终生受苦。科姆医生说：“他们娇弱的外表就充分说明了由此造成的损害，而他们经常生病可能就是在提醒不反省的父母。”这个锻炼理论所依据的推理是非常肤浅的。有钱的父母看到农民的孩子光着半个身子在户外玩耍，就把这个事实同劳动人民的孩子普遍都健康联系在一起，然后就得出了这个毫无根据的结论，即健康是衣不蔽体的后果，然后决定让自己的孩子也少穿衣服。他们忘了这些在乡村绿地上玩耍的孩子在许多方面具备有利条件——他们几乎整天都在玩耍，他们总是呼吸新鲜空气，他们的身体不会因为过度用脑而负担太重。与表面情况相反，他们能够保持身体健康，不是因为穿得少，而是因为上面那些有利条件，即使衣服穿得少也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认为这个才是正确的结论，而他们无故损失热量则带来了必然的损害。

For when, the constitution being sound enough to bear it, exposure does produce hardness, it does so at the expense of growth. This truth is displayed alike in animals and in man. The Shetland pony bears greater inclemencies than the horses of the south, but is dwarfed. Highland sheep and cattle, living in a colder climate, are stunted in comparison with English breeds. In both the arctic and antarctic regions the human race falls much below its ordinary height: the Laplander and Esquimaux are very short; and the Terra del Fuegians, who go naked in a cold latitude, are described by Darwin as so stunted and hideous, that “one can hardly make one's self believe they are fellow-creatures.”

当体质健全能够承受寒冷时，衣着单薄确实使人结实耐寒，但却是以牺牲成长为代价。这点在动物和人身上的表现一样。设得兰矮种马比南部的马更能够承受严酷的环境，但是身材矮小。生活在更为寒冷的苏格兰高原地区的牛和羊，个头要比英格兰品种矮小。北极和南极地区的人在身高上也远低于正常人，例如拉普兰人、爱斯基摩人和火地群岛人，他们都非常矮小。尤其是火地群岛人，达尔文描述他们在严寒地区还赤身裸体，长得非常矮小丑陋，以致“几乎不敢相信，他们和我们竟是同类。”

Science clearly explains this dwarfishness produced by great abstraction of heat: showing that, food and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it unavoidably results. For, as before pointed out, to make up for that cooling by radiation which the body is constantly undergoing, there must be a constant oxidation of certain matters which form part of the food. And in proportion as the thermal loss is great, must the quantity of these matters required for oxidation be great. But the power of the digestive organs is limited. Hence it follows, that when they have to prepare a large quantity of this material needful for maintaining the temperature, they can prepare but a small quantity of the material which goes to build up the frame. Excessive expenditure for fuel entails diminished means for other purposes: wherefore there necessarily results a body small in size, or inferior in texture, or both.

科学清楚地解释了这种矮小是由于损失了大量的热量。在食物和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这种结果不可避免。因为，就像之前指出的，为了补偿身体由于不断辐射降温而产生的消耗，食物中部分特定物质必须被不断氧化。散热越多，氧化需要的这些物质的数量就越多，但消化器官的能力却是有限的。由于他们不得不准备大量的这种物质维持体温，所以就只能准备少量物质用以身体成长了。过度消耗

燃料就要减少其他用途的开支，因此必然导致身材矮小，或者体质较差，或者又矮又差。

Hence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clothing. As Liebig says:—“Our clothing is, in reference to the temperature of the body, merely an equivalent for a certain amount of food.” By diminishing the loss of heat, it diminishes the amount of fuel needful for maintaining the heat; and when the stomach has less to do in preparing fuel, it can do more in preparing other materials. This deduction is entirely confirmed by the experience of those who manage animals. Cold can be borne by animals only at an expense of fat, or muscle, or growth, as the case may be. “If fattening cattle are exposed to a low temperature, either their progress must be retarded, or a great additional expenditure of food incurred.“ [4_5] Mr. Apperley insists strongly that, to bring hunters into good condition,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stable should be kept warm. And among those who rear racers, it is an established doctrine that exposure is to be avoided.

因此，穿衣服非常重要。正如李比希所说：“从体温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衣服相当于一定数量的食物。”减少了热量的损失，就减少了保持热量所需的燃料数量，而当胃在准备燃料方面的工作减少时，它就可以多做些其他材料的准备工作。这个推论完全是从那些动物饲养者的经验中得来的。只有以牺牲脂肪、肌肉或者生长为代价，动物才能够忍受寒冷。“正在长膘的牛若暴露在低温环境下，不是生长变缓，就是需要消耗额外的食物。” [5_5] 要想使猎马保持良好状态，马厩保持温暖是很有必要的。阿珀利先生对此表示出强烈的坚持。那些养马的人也一致认为应该避免让赛马暴露在严寒中。

The scientific truth thus illustrated by ethnology, and

recognised by agriculturists and sportsmen, applies with double force to children.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mallness and the rapidity of their growth is the injury from cold great. In France, newborn infants often die in winter from being carried to the office of the *maire* for registration, “M. Quetelet has pointed out, that in Belgium two infants die in January for one that dies in July.” And in Russia the infant mortality is something enormous. Even when near maturity, the undeveloped frame is comparatively unable to bear exposure: as witness the quickness with which young soldiers succumb in a trying campaign. The *rationale* is obvious. We have already adverted to the fact that, in consequence of the varying relation between surface and bulk, a child loses a relatively larger amount of heat than an adult; and here we must point out that the disadvantage under which the child thus labours is very great. Lehmann says:—“If the carbonic acid excreted by children or young animals is calculated for an equal bodily weight, it results that children produce nearly twice as much acid as adults.” Now the quantity of carbonic acid given off varies with tolerable accuracy as the quantity of heat produced. And thus we see that in children the system, even when not placed at a disadvantage, is called upon to provide nearly double the proportion of material for generating heat.

这个科学真理在人种学中有解释，也被农学家和运动员认可，而且在儿童身上体现得更明显。他们身材矮小，生长迅速，因此寒冷造成的伤害更大。在法国，冬天新出生的婴儿常常在被带去政府 办公室注册时死亡。凯特勒先生指出，在比利时，儿童一月死亡数量要比七月多一倍。俄罗斯的婴儿死亡率也非常高。即使快成年时，发育不良者的耐寒能力也相对较差。我们就曾亲眼目睹年轻士兵在一次艰苦的战斗中迅速垮掉的例子。这道理 很明显。我们已经留意到，由于露在衣服外的面积和个头高低之间可变关系的缘故，孩子比成人损失的热

量相对更大。这里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指出，在非常糟糕的外界环境中劳动，儿童的热量损失尤其大。莱曼说："如果把儿童或年幼的动物产生的碳酸以相等的身体重量计算，儿童产生的碳酸几乎是成年人的两倍。"而碳酸的释放与热量的释放一定是成比例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没有处在糟糕的环境中，儿童的身体也需要几乎两倍的物质来产生热量。

See, then, the extreme folly of clothing the young scantily. What father, full-grown though he is, losing heat less rapidly as he does, and having no physiological necessity but to supply the waste of each day—what father, we ask, would think it salutary to go about with bare legs, bare arms, and bare neck? Yet this tax upon the system, from which he would shrink, he inflicts upon his little ones, who are so much less able to bear it! Or, if he does not inflict it, sees it inflicted without protest. Let him remember that every ounce of nutriment needlessly expend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emperature, is so much deducted from the nutriment going to build up the frame and maintain the energies; and that even when colds, congestions, or other consequent disorders are escaped, diminished growth or less perfect structure is inevitable.

看看让孩子衣着单薄是多么愚蠢。显然，父亲是发育健全的成年人，他流失热量的速度减缓，除了日常所需的消耗外，也再没有其他生理消耗。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哪个父亲会认为光着胳膊、腿以及脖子四处跑有益健康呢？他自己不愿忍受这些糟糕的待遇，却让更脆弱的孩子来忍受！即使没有亲手强加于孩子，他对别人这样做也毫无异议。父亲应该记住，花费在保持体温上的任何毫无必要的营养，是从本可用来长身体和维持活力的营养中扣除而来的。应该记住，即使孩子能幸免于感冒、消化不良或者是其他随之而来的身体失调，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生长迟缓或者身体结构缺陷的问题。

“The rule is, therefore, not to dress in an invariable way in all cases, but to put on clothing in kind and quantity *sufficient in the individual case to protect the body effectually from an abiding sensation of cold, however slight* .” This rule, the importance of which Dr. Combe indicates by the italics, is one in which men of science and practitioners agree. We have met with none competent to form a judgment on the matter, who do not strongly condemn the exposure of children's limbs. If there is one point above others in which “pestilent custom” should be ignored, it is this.

“因此正确的做法不是在所有情况下以不变的方式穿衣，而是穿衣的类型和数量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以有效保护身体不受任何寒冷的侵害，那怕轻微的寒冷 。”科姆医生给这些字加上着重号以标示这一规则的重要性，科学家和其他医务人员对此也都认同。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做出这样判断的人，无不强烈谴责那种让孩子四肢暴露在外的做法。在这里，类似这样的“致命的习俗”应该被坚决忽略。

Lamentable, indeed, is it to see mothers seriously damaging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ir children out of compliance with an irrational fashion. It is bad enough that they should themselves conform to every folly which our Gallic neighbours please to initiate; but that they should clothe their children in any mountebank dress which *Le petit Courrier des Dames* indicates, regardless of its insufficiency and unfitness, is monstrous. Discomfort, more or less great, is inflicted; frequent disorders are entailed; growth is checked or stamina undermined; premature death not uncommonly caused; and all because it is thought needful to make frocks of a size and material dictated by French caprice. Not only is it that for the sake of conformity, mothers thus punish and injure their little ones by

scantiness of covering; but it is that from an allied motive they impose a style of dress which forbids healthful activity. To please the eye, colours and fabrics are chosen totally unfit to bear that rough usage which unrestrained play involves; and then to prevent damage the unrestrained play is interdicted. “Get up this moment: you will soil your clean frock,” is the mandate issued to some urchin creeping about on the floor. “Come back: you will dirty your stockings,” calls out the governess to one of her charges, who has left the footpath to scramble up a bank. Thus is the evil doubled. That they may come up to their mamma's standard of prettiness, and be admired by her visitors, children must have habiliments deficient in quantity and unfit in texture; and that these easily-damaged habiliments may be kept clean and uninjured, the restless activity, so natural and needful for the young, is more or less restrained. The exercise which becomes doubly requisite when the clothing is insufficient, is cut short, lest it should deface the clothing. Would that the terrible cruelty of this system could be seen by those who maintain it. We do not hesitate to say that, through enfeebled health, defective energies, and consequent non-success in life, thousands are annually doomed to unhappiness by this unscrupulous regard for appearances even when they are not, by early death, literally sacrificed to the Moloch of maternal vanity. We are reluctant to counsel strong measures, but really the evils are so great as to justify, or even to demand, a peremptory interference on the part of fathers.

看到一些妈妈们因为不理性地去追赶潮流而严重伤害了自己孩子的身体，真是让人感到可悲。我们的法国邻居高兴地发起了一个个愚蠢的时尚，对此这些妈妈们自己模仿就已经够可怕了，竟然还让自己的孩子也穿上法国时装杂志推荐的奇装异服，而不管这些衣服对孩子来说是否足够和合适。这真是荒唐。这种做法给多少孩子造成了很大

的不舒服，常常他们导致身体紊乱，发育受阻或者是精力受损，以致夭折时有发生。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妈妈们认为有必要按照法国人反复无常的想法选择服装的尺寸和布料。为了迎合时尚，妈妈们不仅通过少穿衣服伤害了孩子，而且出于类似的原因，强加给孩子的装束也阻碍了孩子进行健康的活动。为了好看而选的颜色和衣料，当孩子无拘无束地玩耍时，都是完全不适用的。因为无拘无束的玩耍容易损坏这些衣服。小调皮们在地板上爬，大人们就命令他们“立刻起来，否则会弄脏你干净的衣服。”孩子们离开小路爬上河岸时，其中的一位女家庭教师就会依其职责喊道：“回来，会弄脏你袜子的。”因此坏处就加倍了。为了符合妈妈对漂亮的要求，为了受到客人的称赞，孩子们穿的衣服肯定单薄且面料不适合活动，为了使这些容易损坏的衣服保持整洁，孩子们原本一刻不停的活动受到了限制，而这些活动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如此自然，又如此必需。衣着单薄本来需要加倍运动，此时却因为担心损坏衣服而被生生禁止了。但愿主张这么做的人能够看到这种做法的残忍。我们斗胆断言，即使没有早逝成为母性虚荣的摩洛神祭品，但由于身体羸弱、精力不足和随后生活中的毫无建树，每年都有几千人因为家长盲目追求外表而断送了幸福。我们不愿意采取激烈的措施，但是这种做法的后果如此严重，所以父亲们有理由甚至必须加以断然的干涉。

Our conclusions are, then—that, while the clothing of children should never be in such excess as to create oppressive warmth, it should always be sufficient to prevent any general feeling of cold; [4_6] that, instead of the flimsy cotton, linen, or mixed fabrics commonly used, it should be made of some good nonconductor, such as coarse woollen cloth; that it should be so strong as to receive little damage from the hard wear and tear which childish sports will give it; and that its colours should be such as will not soon suffer from use and exposure.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儿童的衣服应该永远不要穿得过多以致暖和得难受，但是应该经常足够保暖使他们全身不至于感到寒冷 [5_6] ；衣服应该由一些好的保温材料制成，比如粗呢羊毛料，而不是薄棉布、亚麻或者常用的混纺；衣服应该足够结实以抵御儿童运动带来的磨损和撕裂；衣服的颜色不能因为穿着和暴晒而变色。

To the importance of bodily exercise most people are in some degree awake. Perhaps less needs saying on this requisi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an on most others: at any rate, in so far as boys are concerned. Public schools and private schools alike furnish tolerably adequate playgrounds; and there is usually a fair share of time for out-of-door games, and a recognition of them as needful. In this, if in no other direction, it seems admitted that the natural promptings of boyish instinct may advantageously be followed; and, indeed, in the modern practice of breaking the prolonged morning and afternoon's lessons by a few minutes' open-air recreation, we see an increasing tendency to conform school regulations to the bodily sensations of the pupils. Here, then, little needs to be said in the way of expostulation or suggestion.

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明白锻炼身体的重要性。对于体育教育的必要性也无需像对其他事情那样说太多。至少，目前为止对于男孩子来说是这样的。公学和其他私立学校通常都有足够大的操场和合理的户外游戏时间，同时也认为户外游戏是必要的。尽管可能在别的方面意见无法统一，但在这个方面似乎大家都承认遵循男孩子的自然本能是有益健康的。确实，我们看到学校现在的做法越来越符合学生的身体感觉了，上午和下午长时间上课之后，允许孩子有几分钟的户外游戏时间。因此这儿不需要劝告或者建议。

But we have been obliged to qualify this admission by inserting the clause “in so far as boys are concerned”. Unfortunately, the fact is quite otherwise in the case of girls. It chances, somewhat strangely, that we have daily opportunity of drawing a comparison. We have both a boy's and a girls' school within view; and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m is remarkable. In the one case, nearly the whole of a large garden is turned into an open, gravelled space, affording ample scope for games, and supplied with poles and horizontal bars for gymnastic exercises. Every day before breakfast, again towards eleven o'clock, again at midday, again in the afternoon, and once more after school is over, the neighbourhood is awakened by a chorus of shouts and laughter as the boys rush out to play; and for as long as they remain, both eyes and ears give proof that they are absorbed in that enjoyable activity which makes the pulse bound and ensures the healthful activity of every organ. How unlike is the picture offered by the “Establishment for Young Ladies”! Until the fact was pointed out, we actually did not know that we had a girls' school as close to us as the school for boys. The garden, equally large with the other, affords no sign whatever of any provision for juvenile recreation; but is entirely laid out with prim grass-plots, gravel-walks, shrubs and flowers, after the usual suburban style. During five months we have not once had our attention drawn to the premises by a shout or a laugh. Occasionally girls may be observed sauntering along the paths with their lesson-books in their hands, or else walking arm-in-arm. Once, indeed, we saw one chase another round the garden; but, with this exception, nothing like vigorous exertion has been visible.

但是，我们在承认上述事实时，必须加上“目前为止就男孩而言”。不幸的是，在女孩方面，情况大不相同。尽管有些奇怪，我们恰巧每天都有机会比较二者间的区别。我们注意到男校和女校之间存

在显著差异。在男校，整个大花园被改造成了开放的铺满砾石的院子，学校里有足够的空间做游戏，并且提供了杆和单杠，供体操锻炼使用。每天早饭前、接近十一点的时候、中午、下午和放学后，男孩子们冲出去玩耍的吵闹声和笑声，周围邻居都听得见。我们的所见所闻都可以证明，他们的玩耍是一项全神贯注投入的、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确保所有器官健康发展的愉快活动。然而，在“淑女学校”的景象却完全不同。在别人指出这所学校之前，我们竟然不知道旁边有一所女校，而且距离我们和男校一样近。这里的花园和男校的一样大，但没有任何青少年娱乐设备，而是像寻常郊区一样，全都是整洁的草地、砾石小路、灌木和花朵。在五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一声喊叫或者笑声引起我们对它的注意。偶尔可以看到女孩们沿着小径散步，手里拿着课本，或者手挽手地走路。我们确实只有一次看到过一个女孩绕着花园追着另一个女孩跑，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看见过任何有活力的活动。

Why this astonishing difference? Is it that the constitution of a girl differs so entirely from that of a boy as not to need these active exercises? Is it that a girl has none of the promptings to vociferous play by which boys are impelled? Or is it that, while in boys these promptings are to be regarded as securing that bodily activity without which there cannot be adequate development, to their sisters, nature has given them for no purpose whatever—unless it be for the vexation of schoolmistresses? Perhaps, however, we mistake the aim of those who train the gentler sex. We have a vague suspicion that to produce a robust *physique* is thought undesirable; that rude health and abundant vigour are considered somewhat plebeian; that a certain delicacy, a strength not competent to more than a mile or two's walk, an appetite fastidious and easily satisfied, joined with that timidity which commonly accompanies feebleness, are held more ladylike. We do not expect that any would distinctly avow this; but we fancy the governess-mind is haunted by an ideal

young lady bearing not a little resemblance to this type. If so,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 established system is admirably calculated to realise this ideal. But to suppose that such is the ideal of the opposite sex is a profound mistake. That men are not commonly drawn towards masculine women, is doubtless true. That such relative weakness as calls for the protection of superior strength is an element of attraction, we quite admit. But the difference to which the feelings thus respond is the natural, pre-established difference, which will assert itself without artificial appliances. And when, by artificial appliances, the degree of this difference is increased, it becomes an element of repulsion rather than attraction.

为什么会有这样惊人的差别？是因为女孩的体质和男孩的完全不同，不需要这些活泼的运动吗？是因为女孩对男孩吵吵嚷嚷的游戏不感兴趣吗？或者是因为这些游戏对男孩子而言是刺激身体充分发育的身体活动，而对他们的姐妹来说，自然没有赋予她们任何诸如此类的活动目的？除非是为了惹恼女教师？然而，我们也许弄错了这些负责训练温柔女性的人的目的。我们隐约怀疑，培养女孩拥有健壮的体格被认为是坏事，因为强健的身体和充足的活力被认为是粗鄙的，女孩应该体质娇弱，走路不能超过一两英里，应该胃口挑剔而且饭量很小，再加上娇娇滴滴、弱不禁风，这样才更具淑女风范。我们不指望任何人会明确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猜想，女教师心中理想的淑女应该很像这种类型。如果情况属实，我们必须承认现有的方法非常适合实现这一理想。但是将这种类型当作理想的异性，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男性化的女人通常不能吸引男人，这无疑是真实的。我们完全承认，女性吸引男人的一个因素在于她相对软弱，需要强壮有力的保护。但是，这种使男人产生不同感情反应的差别是早就存在的，是自然的，不需要人为刻意表现出来。当通过人为刻意的表现增加了这种差异的程度时，它就变成了令人讨厌的因素而不是吸引人的因素。

“Then girls should be allowed to run wild—to become as rude as boys, and grow up into romps and hoydens!” exclaims some defender of the proprieties. This, we presume, is the ever-present dread of schoolmistresses. It appears, on inquiry, that at “Establishments for Young Ladies” noisy play like that daily indulged in by boys, is a punishable offence; and it is to be inferred that this noisy play is forbidden, lest unlady-like habits should be formed. The fear is quite groundless, however. For if the sportive activity allowed to boys does not prevent them from growing up into gentlemen; why should a like sportive activity allowed to girls prevent them from growing up into ladies? Rough as may have been their accustomed playground frolics, youths who have left school do not indulge in leapfrog in the street, or marbles in the drawing-room. Abandoning their jackets, they abandon at the same time boyish games; and display an anxiety—often a ludicrous anxiety—to avoid whatever is not manly. If now, on arriving at the due age, this feeling of masculine dignity puts so efficient a restraint on the romping sports of boyhood, will not the feeling of feminine modesty, gradually strengthening as maturity is approached, put an efficient restraint on the like sports of girlhood? Have not women even a greater regard for appearances than men? And will there not consequently arise in them even a stronger check to whatever is rough or boisterous? How absurd is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womanly instincts would not assert themselves but for the rigorous discipline of schoolmistresses!

那些礼仪规矩的拥护者也许会说：“那就让女孩子们去跑，去变得和男孩子一样粗鲁，然后长大变成野丫头！”我们推测，这就是女教师最惧怕的事情。经调查，在“淑女学校”每天像男孩子一样沉迷于吵闹的游戏似乎是应该接受惩罚的行为。我们推测，之所以禁止这种吵闹的游戏，是因为生怕养成不属于大家闺秀的习惯。然而，这种担

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如果允许男孩子玩耍的体育活动不会阻止他们长成绅士的话，为什么相似的允许女孩子玩耍的体育活动会阻止她们长大变成淑女呢？尽管青年人在操场上惯常玩耍的游戏有些粗野，但他们离开学校后不会在街上还沉迷于跳蛙游戏或者在客厅里还玩弹珠游戏。脱掉了学校的校服，他们也会同时放弃那些孩子气的游戏，并且为了避免任何不男子气概的事情而表现出一种焦虑——通常是一种可笑的焦虑。如果到了合适的年龄，这种男性尊严感就能够有效地限制男孩子继续童年时乱蹦乱跳的游戏。那么同理，随着女孩子逐渐地成熟，她的女性矜持感难道不会有效地限制她继续童年时相同的游戏吗？女人不是比男人更注重外表吗？这难道不会更强烈地阻止她粗鲁或者喧闹的行为吗？如果没有女教师的严格管束，女性的本能就体现不出来，这是多么荒谬的假设啊！

In this, as in other cases, to remedy the evils of one artificiality, another artificiality has been introduced. The natural spontaneous exercise having been forbidden, and the bad consequences of no exercise having become conspicuous, there has been adopted a system of factitious exercise—gymnastics. That this is better than nothing we admit; but that it is an adequate substitute for play we deny. The defects ar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 the first place, these formal, muscular motions, necessarily much less varied than those accompanying juvenile sports, do not secure so equable a distribution of action to all parts of the body; whence it results that the exertion, falling on special parts, produces fatigue sooner than it would else have done: add to which, that, if constantly repeated, this exertion of special parts leads to a disproportionate development. Again, the quantity of exercise thus taken will be deficient, not only in consequence of uneven distribution, but it will be further deficient in consequence of lack of interest. Even when not made repulsive, as they sometimes are, by assuming the shape of appointed lessons, these monotonous movements are sure to

become wearisome, from the absence of amusement. Competition, it is true, serves as a stimulus; but it is not a lasting stimulus, like that enjoyment which accompanies varied play. Not only, however, are gymnastics inferior in respect of the *quantity* of muscular exertion which they secure; they are still more inferior in respect of the *quality* . This comparative want of enjoyment to which we have just referred as a cause of early desistance from artificial exercises, is also a cause of inferiority in the effects they produce on the system. The common assumption that so long as the amount of bodily action is the same, it matters not whether it be pleasurable or otherwise, is a grave mistake. An agreeable mental excitement has a highly invigorating influence. See the effect produced upon an invalid by good news, or by the visit of an old friend. Mark how careful medical men are to recommend lively society to debilitated patients. Remember how beneficial to the health is the gratification produced by change of scene. The truth is that happiness is the most powerful of tonics. By accelerating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it facilitates the performance of every function; and so tends alike to increase health when it exists, and to restore it when it has been lost. Hence the essential superiority of play to gymnastics. The extreme interest felt by children in their games, and the riotous glee with which they carry on their rougher frolics, are of as much importance as the accompanying exertion. And as not supplying these mental stimuli, gymnastics must he fundamentally defective.

在此，同其他情况一样，为了纠正一种人为行为产生的恶果而又造出另外一种人为的干涉。由于自然自发的运动被禁止，而不锻炼的恶果也已经变得明显，于是就开始采用一种人为制造的运动方法——体操。我们承认，这个比什么都没有好得多，但是我们不认为体操能够替代游戏。问题在于体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首先，这些正式的肌肉运动，必然没有儿童游戏中的动作多变，不能够平顺

地将动作分布到身体的所有部位，其结果是，某些特定部位会由于用力过多而比其他部位更快的引起疲乏，而且如果这些特殊部位重复用力还会导致发育不均衡。再者，不均匀的运动分配和兴趣缺失会导致孩子运动量不足。那些单调的动作，尽管不见得通过指定课程的塑造而使人反感，也一定会由于不好玩而使人疲倦。比赛诚然可以作为一个刺激手段，但它不能持久，不同于变化多样的游戏中具有的持久乐趣。退一步讲，从体操上获得的肌肉运动不仅在数量上较差，在质量上也更差。前面已经提到，乐趣相对较少会使人们较早停止这些人为可以设计的运动，这也是它对人体效果要差些的一个原因。一般人认为，只要身体的运动量一样，是否愉悦并不重要。这种想法严重错误。愉悦的精神状态可以使人精力充沛。从好消息或者老朋友来访对病人产生的效果就可以看出这个道理了。同理，医生也会非常小心地建议虚弱的病人参加活泼的社团。请记住，环境变换带来的满足感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事实上，幸福是最有效地滋补品。通过加速血液循环，促进每一项身体功能的运行，这往往会加强现有的健康，甚至恢复失去的健康。因此，相比体操，游戏有本质上的优越性。孩子们在游戏中会感受到极大的乐趣，在更粗鲁的游戏中体会到狂欢的快乐，这些与同时发生的身体运动一样重要。体操运动由于不能提供这些精神刺激，其从根本上就是有缺陷的。

Granting then, as we do, that formal exercises of the limbs are better than nothing—granting, further, that they may be used with advantage as supplementary aids; we yet contend that such formal exercises can never supply the place of the exercises prompted by nature. For girls, as well as boys, the sportive activities to which the instincts impel, are essential to bodily welfare. Whoever forbids them, forbids the divinely-appointed means to physical development.

尽管我们承认规规矩矩的肢体运动好过不运动，也进一步承认它

作为辅助手段使用的优势，然而我们坚持认为它永远不能代替自然运动。和男孩子一样，对女孩子来说，受本能驱动的运动对于身体健康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谁禁止这些运动，就是在禁止上天安排的身体发育方式。

A topic still remains—one perhaps more urgently demanding consideration than any of the foregoing. It is asserted by not a few, that among the educated classes the younger adults and those who are verging upon maturity are, on the average, neither so well grown nor so strong as their seniors. When first we heard this assertion, we were inclined to disregard it as one of the many manifestations of the old tendency to exalt the past at the expense of the present. Calling to mind the facts that, as measured by ancient armour, modern men are proved to be larger than ancient men, and that the tables of mortality show no diminution, but rather an increase in the duration of life, w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what seemed a groundless belief. Detailed observation, however, has greatly shaken our opinion. Omitting from the comparison the labouring classes, we have noticed a majority of cases in which the children do not reach the stature of their parents; and, in massiveness, making due allowance for difference of age, there seems a like inferiority. Medical men say that now-a-days people cannot bear nearly so much depletion as in times gone by. Premature baldness is far more common than it used to be. And an early decay of teeth occurs in the rising generation with startling frequency. In health, the contrast appears still greater. Men of past generations, living riotously as they did, could bear much more than men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who live soberly, can bear. Though they drank hard, kept irregular hours, were regardless of fresh air, and thought little of cleanliness, our recent ancestors were capable of prolonged application without injury, even to a ripe old

age: witness the annals of the bench and the bar. Yet we who think much about our bodily welfare; who eat with moderation, and do not drink to excess; who attend to ventilation, and use frequent ablutions; who make annual excursions, and have the benefit of greater medical knowledge;—we are continually breaking down under our work. Paying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o the laws of health, we seem to be weaker than our grandfathers who, in many respects, defied the laws of health. And, judging from the appearance and frequent ailments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 they are likely to be even less robust than ourselves.

还有一个主题需要讨论。这可能比前面提到的任何一个主题更迫切地需要我们考虑。许多人认为，在受教育的阶层中，一般而言，那些较年轻的成年人和接近成熟的人，既不如前辈发育得好，也不像前辈那么强壮。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我们会把它看成一种颂古非今的老习惯，进而会倾向于忽略它。我们很少注意这个看起来毫无根据的看法，因为我们想起用古代盔甲测量现代人的结果证实现代人比古代人高大，因为死亡率统计表显示人的寿命在增加而非减少。然而仔细观察之后，我们的看法会极大地动摇。先不谈劳动阶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大多数情况是，孩子的身高赶不上父母，而且适当扣除了年龄差距后体重也不如父母。医生们说如今人们所能承受的身体损耗远比不上过去的人，过早的谢顶也比以前常见多了，而且在正在成长的一代人中，牙齿的衰退也异常频繁。健康方面，似乎差别更大。过去的几代人，尽管生活放纵，可是比审慎生活的现代人更能经受折磨。尽管酗酒，生活不规律，不注意呼吸新鲜空气，不讲卫生，我们的祖先却能够长期工作，身体不受损伤，甚至到了耄耋之年仍然健康。而我们这些人尽管时常会考虑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注意吃饭适量，不过量饮酒，注意通风，经常洗澡，每年都出去旅行，并且受惠于更多的医学知识，但我们的身体却反而在工作压力下经常出毛病。我们重视养生之道，但相比在许多方面都违反养生之道的祖先，我们却更加虚弱。而从这些年轻人的外表和经常生病判断，他们很可能还

没有我们健康。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Is it that past overfeeding, alike of adults and juveniles, was less injurious than the underfeeding to which we have adverted as now so general? Is it that the deficient clothing which this delusive hardening theory has encouraged, is to blame? Is it that the greater or less discouragement of juvenile sports, in deference to a false refinement, is the cause? From our reasonings it may be inferred that each of these has probably had a share in producing the evil. [4_7] But there has been yet another detrimental influence at work, perhaps more potent than any of the others: we mean—excess of mental application.

这说明了什么？难道过去成年人和青年人吃得过多的伤害要小于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吃的过少的伤害？难道要责怪那个误导人的锻炼理论鼓励孩子少穿衣服？难道是由于追求虚假的优雅而多多少少阻止青少年运动的原因？从我们的推理可以看出，这些因素可能都对这个恶果的产生负有责任。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有害的影响在发挥作用，而且可能比其他因素的危害都大。我们指的是过度用脑。

On old and young, the pressure of modern life puts a still-increasing strain. In all businesses and professions, intenser competition taxes the energies and abilities of every adult; and, with the view of better fitting the young to hold their place under this intenser competition, they are subject to a more severe discipline than heretofore. The damage is thus doubled. Fathers, who find not only that they are run hard by their multiplying competitors, but that, while labouring under this disadvantage, they have to maintain a more expensive style of living, are all the year

round obliged to work early and late, taking little exercise and getting but short holidays. The constitutions, shaken by this long-continued over-application, they bequeath to their children. And then these comparatively feeble children, predisposed as they are to break down even under an ordinary strain upon their energies, are required to go through a *curriculum* much more extended than that prescribed for the unenfeebled children of past generations.

现代生活的压力使得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所有的企业和行业中，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在考验着每个人的精力和本领，而为了更好的配合年轻人在这种更加激烈的竞争中站得住脚，就得让他们受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训练。因此，伤害也就加倍了。父亲们发现，他们不仅被日益增多的竞争对手苦苦相逼，而且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还必须维持一种更昂贵的生活方式，不得不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地工作，锻炼又少，假期又很短。这种因为长期不断过度工作而受损的体质又遗传给了他们的孩子。那么，即使在普通的压力下，这些相对比较虚弱的孩子都容易崩溃，而他们需要学习的课程 比过去身体不虚弱的孩子还要多。

That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that must result from this cumulative transgression might be predicted with certainty; and that they do result, every observant persons knows. Go where you will, and before long there come under your notice cases of children, or youths, of either sex, more or less injured by undue study. Here, to recover from a state of debility thus produced, a year's rustication has been found necessary. There you find a chronic congestion of the brain, that has already lasted many months, and threatens to last much longer. Now you hear of a fever that resulted from the over-excitement in some way brought on at school. And, again, the instance is that of a youth who has already

had once to desist from his studies, and who, since he has returned to them, is frequently taken out of his class in a fainting fit. We state facts—facts that have not been sought for, but have been thrust upon our observation during the last two years: and that, too, within a very limited range. Nor have we by any means exhausted the list. Quite recently we had the opportunity of marking how the evil becomes hereditary: the case being that of a lady of robust parentage, whose system was so injured by the regime of a Scotch boarding-school, where she was underfed and overworked, that she invariably suffers from vertigo on rising in the morning; and whose children, inheriting this enfeebled brain, are several of them unable to bear even a moderate amount of study without headache or giddiness. At the present time we have daily under our eyes, a young lady whose system has been damaged for life by the college-course through which she has passed. Taxed as she wa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she had no energy left for exercise, she is, now that she has finished her education, a constant complainant. Appetite small and very capricious, mostly refusing meat; extremities perpetually cold, even when the weather is warm; a feebleness which forbids anything but the slowest walking, and that only for a short time; palpitation on going upstairs; greatly impaired vision—these, joined with checked growth and lax tissue, are among the results entailed. And to her case we may add that of her friend and fellow-student; who is similarly weak; who is liable to faint even under the excitement of a quiet party of friends; and who has at length been obliged by her medical attendant to desist from study entirely.

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一定产生于那些日积月累的侵害，而每一个有观察力的人都知道，这种后果是必然的。随便到哪里，很快都会注意到许多儿童或者青年，他们不分性别，多少都受到了过度学习带来的伤害。由此为了从虚弱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有必要过一年的乡村生

活。那儿，你发现一个人慢性脑充血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而且可能持续更长时间。现在你又听到有人在学校时因为某些方面过度兴奋而发烧。再有就是，曾经中断学业的一位青年，自从回到学校后经常因为晕倒而被抬出教室。我们所陈述的都是事实，不是主动找来的事实，而是在过去两年中看到的事实，并且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发生的。我们还没有全部列完。最近，我们有机会注意到这些恶果是怎样变成遗传性的侵害的。有一位父母健康的女士，她的身体在一家苏格兰寄宿学校受到了严重损害。在那儿她吃得太少，功课又多，以致在早上起床时她总是头晕，而她的孩子因为遗传了这种虚弱的大脑，其中几个甚至不能承受适量的学习而头疼或者头晕。目前，我们眼前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的身体已经被自己所接受的大学课程弄出终身损害了。她的负担如此之重，以至于她没有多余的精力锻炼身体。现在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教育，却经常生病。她胃口很小而且难以捉摸，最主要是不吃肉。即使天气暖和，她也经常四肢冰凉。她的身体如此虚弱，什么都干不了只能慢慢走一会路，而且一上楼就心悸，视力严重受损。这些连同发育不良和组织松弛，都是过度用脑带来的结果。除了她之外，还有她的一个朋友兼同学也同样虚弱，甚至在朋友间聚会时也容易兴奋得晕倒，最后她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建议退学。

If injuries so conspicuous are thus frequent, how very general must be the smaller and inconspicuous injuries. To one case where positive illness is directly traceable to over-application, there are probably at least half-a-dozen cases where the evil is unobtrusive and slowly accumulating—cases where there is frequent derangement of the functions, attributed to this or that special cause, or to constitutional delicacy: cases where there is retardation and premature arrest of bodily growth; cases where a latent tendency to consumption is brought out and established; cases where a predisposition is given to that now common cerebral disorder brought on by the hard work of adult life. How commonly

constitutions are thus undermined, will be clear to all who, after noting the frequent ailments of hard-worked professional and mercantile men, will reflect on the disastrous effects which undue application must produce upon the undeveloped systems of the young. The young are competent to bear neither as much hardship, nor as much physical exertion, nor as much mental exertion, as the full grown. Judge, then, if the full grown so manifestly suffer from the excessive mental exertion required of them, how great must be the damage which a mental exertion, often equally excessive, inflicts upon the young!

如果如此明显的伤害都这么频繁，那些较小的、不明显的伤害肯定就更普遍了。一个由于过度用功以致生病的例子背后，可能至少会有数个有毛病但却未表现出来而慢慢积累的例子——由于这个或那个特殊原因或者体质虚弱而功能失常的例子，身体发育迟缓或早期停顿的例子，潜伏的结核病发作的例子，或是可能发生在现在常见的由于成年辛苦劳动所引起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例子。大家都会明白，这样普遍地会损害健康。人们看到努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或者商务人员频繁地生病后，会想到用脑过度肯定会对未发育的年轻人的身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年轻人既不能像成年人那样能吃苦，也不能承受那样多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如果成年人过度用脑就已如此受苦，那么通常同样过度用脑对于年轻人造成的损害该有多大啊！

Indeed, when we examine the merciless school-drill to which many children are subjected, the wonder is, not that it does great injury, but that it can be borne at all. Take the instance given by Sir John Forbes from personal knowledge; and which he asserts, after much inquiry, to be an average sample of the middle-class girl's-school system throughout England. Omitting the detailed divisions of time, we quote the summary of the twenty-four hours.

实际上，当观察许多孩子面对残酷的学校作业时，我们奇怪地发现，它并未产生巨大的伤害，而居然被完全接受了。约翰·福布斯爵士在亲自做了大量调查之后认为，这是整个英格兰中产阶级女校的一个平均情况。省略掉具体的时间划分，我们现在引用一下这个二十四个小时里的大致安排。

In bed	9 hours (the younger 10)
In school, at their studies and tasks	9 hours
In school, or in the house, the elder at optional studies or work, the younger at play	3.5 hours (the younger 2.5)
At meals	1.5 hours
Exercise in the open air, in the shape of a formal walk, often with lesson books in hand, and even this only when the weather is fine at the appointed time.	1 hour

睡眠	9 小时（年纪小的 10 小时）
在学校学习或者完成任务	9 小时
在学校或者宿舍，年纪大的可以学习或者工作，年纪小的游戏	3.5 小时（年纪小的 2.5 小时）
吃饭	1.5 小时
散步形式的户外锻炼（经常手里拿着课本，即使这样也只在天气好时的指定时间）	1 小时

And what are the results of this “astounding regimen”, as Sir John Forbes terms it? Of course feebleness, pallor, want of spirits

general ill-health. But he describes something more. This utter disregard of physical welfare, out of extreme anxiety to cultivate the mind—this prolonged exercise of the brain and deficient exercise of the limbs,—he found to be habitually followed, not only by disordered functions but by malformation. He says:—“We lately visited, in a large town, a boarding-school containing forty girls; and we learnt, on close and accurate inquiry, that there was *not one* of the girls who had been at the school two years (and the majority had been as long) that was not more or less *crooked* !“ [4_8]

这个被约翰·福布斯爵士称为“惊人的作息安排”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是身体虚弱，面色苍白，没精打采，普遍的不健康。但是他描述的更多。这种完全不考虑身体健康的行为是由于对开发大脑的极度渴望。他发现随之而来的这种长时间用脑而缺乏四肢运动的状态，不仅会造成习惯性的身体功能失调而且可能造成身体畸形。他说：“我们最近拜访了一所位于大城镇的寄宿学校，学校里有40个女孩子。经过近距离的详细询问，我们得知，在校已经两年的女孩子中（大多数女孩已经待了这么长时间），不止一个　多少有点畸形　。” [5_7]

It may be that since 1833, when this was written, some improvement has taken place. We hope it has. But that the system is still common—nay, that it is in some cases carried even to a greater extreme than ever; we can personally testify. We recently went over a training college for young men: one of those instituted of late years for the purpose of supplying schools with well-disciplined teachers. Here, under official supervision, where something better than the judgment of private schoolmistresses might have been looked for, we found the daily routine to be as follows:—

可能自从1833年写下这些东西以来，情况已经有所改善。我们希望如此。但是这种方法仍然十分普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以往更加极端。对此，我们可以亲自证明。我们最近去了一所青年男子培训学院。这是一所近年来新建的院校之一，主要任务是为学校培养优秀的师资。这里有政府监督，可能会找到一些优于私立学校女教师判断力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日常作息时间如下：

At 6 o'clock the students are called; At 7 to 8 studies; At 8 to 9 scripture reading; prayers; and breakfast; At 9 to 12 studies; At 12 to 1 1/4 leisure; nominally devoted to walking or other exercise, but often spent in study. At 1 1/4 to 2 dinner, the meal commonly occupying twenty minutes; At 2 to 5 studies; At 5 to 6 tea and relaxation; At 6 to 8 1/2 studies; At 8 1/2 to 9 1/2 private studies in preparing lessons for the next day; At 10 to bed.

6点：叫学生起床；7点到8点：学习；8点到9点：读圣经，祷告，吃早餐；9点到12点：学习；12点到1点15分：休息（名义上是用来散步或者其他锻炼，但经常用来学习）；1点15分到2点：午饭（吃饭通常花费20分钟）；2点到5点：学习；5点到6点：喝茶和放松；6点到8点半：学习；8点半到9点半：自己预习第二天的课程；10点：睡觉。

Thus, out of the twenty-four hours, eight are devoted to sleep; four and a quarter are occupied in dressing, prayers, meals, and the brief periods of rest accompanying them; ten and a half are given to study; and one and a quarter to exercise, which is optional and often avoided. Not only, however, is it that the ten and a half hours of recognised study are frequently increased to eleven and a half by devoting to books the time set apart for exercise; but some of the

students who are not quick in learning, get up at four o'clock in the morning to prepare their lessons; and are actually encouraged by their teachers to do this! The course to be passed through in a given time is so extensive; the teachers, whose credit is at stake in getting their pupils well through the examinations, are so urgent; and the difficulty of satisfying the requirements is so great; that pupils are not uncommonly induced to spend twelve and thirteen hours a day in mental labour!

这样看来，二十四个小时中有八个小时用来睡觉，四个小时十五分钟用来穿衣、祷告、吃饭和附随的短暂休息，十个半小时用来学习，而用来锻炼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十五分钟，而且还是非强制的，常被省掉的。通过把留给锻炼的时间用来读书，原本规定的十个半小时学习时间更是常常被增加到十一个半小时。而且，有些学东西较慢的学生早上四点就起床预习功课了，教师也鼓励学生这样做。在指定的时间内要完成的课程如此之多，信用岌岌可危的教师想要学生考试考得好的心情是如此急迫，而满足这些要求的难度又是如此之大，所以学生每天被诱导要花费十二到十三个小时学习！

It needs no prophet to see that the bodily injury inflicted must be great. As we were told by one of the inmates, those who arrive with fresh complexions quickly become blanched. Illness is frequent: there are always some on the sick-list. Failure of appetite and indigestion are very common. Diarrhoea is a prevalent disorder: not uncommonly a third of the whole number of students suffering under it at the same time. Headache is generally complained of; and by some is borne almost daily for months. While a certain percentage break down entirely and go away.

不需要预言家就可以看出，这样过度用脑带来的身体伤害一定很大。我们听其中一个人说，那些刚来时脸色红润的人很快就会变得脸色煞白。生病是常事，食欲不振和消化不良非常普遍。腹泻也是很常见的，甚至三分之一的学生同时腹泻都不罕见。学生普遍抱怨头疼，有些人几个月来几乎每天都头疼。还有一部分人完全崩溃了，离开了学校。

That this should be the regimen of what is in some sort a model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and superintended by the embodied enlightenment of the age, is a startling fact. That the severe examinations, joined with the short period assigned for preparation, should practically compel recourse to a system which inevitably undermines the health of all who pass through it, is proof, if not of cruelty, then of woeful ignorance.

真令人吃惊，这居然是在文明时代建立和管理的模范学校制度。考试严苛，而且准备时间又短，实际上是在迫使学生采取必定会损害健康的方法去通过所有的考试。如果这种实际强迫的方法都算不上残忍，那么就只能认为这是可怜的无知了。

Doubtless the case is in a great degree exceptional—perhaps to be paralleled only in other institutions of the same class. But that cases so extreme should exist at all, indicates pretty clearly how great i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minds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 are over-tasked. Expressing as they do the ideas of the educated community, these training college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ll other evidence, would conclusively imply a prevailing tendency to an unduly urgent system of culture.

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个案，也许只在同类的其他院校有类似的现象。但是，这种极端现象的存在本身就足以非常清楚地说明成长中的一代人的心智负担有多么重。这些师范院校尽管只是在表达受过教育的群体的想法，但是，不需要其他证据就能推出一个结论，即这种揠苗助长的培养方法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倾向。

It seems strange that there should be so little consciousness of the dangers of over-education during youth, when there is so general a consciousness of the dangers of over-education during childhood. Most parents are more or less aware of the evil consequences that follow infant precocity. In every society may be heard reprobation of those who too early stimulate the minds of their little ones. And the dread of this early stimulation is great in proportion as there is adequate knowledge of the effects: witness the implied opinion of one of our most distinguished professors of physiology, who told us that he did not intend his little boy to learn any lessons until he was eight years old. But while to all it is a familiar truth that a force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hood entails disastrous results—either physical feebleness, or ultimate stupidity, or early death—it appears not to he perceived that throughout youth the same truth holds. Yet it is certain that it must do so. There is a given order in which, and a given rate at which, the faculties unfold. If the course of education conforms itself to that order and rate, well. If not—if the higher faculties are early taxed by presenting an order of knowledge more complex and abstract than can be readily assimilated; or if, by excess of culture, the intellect in general is developed to a degree beyond that which is natural to the age; the abnormal result so produced will inevitably be accompanied by some equivalent, or more than equivalent, evil.

这似乎很奇怪，一般人都普遍意识到儿童时期过度教育的危险，却很少人意识到青年时期过度教育的危害。大多数父母都多少会意识到婴儿早熟会伴随的恶果。每个社会都能听到人们对过早刺激儿童大脑做法的斥责。我们越了解这些恶果，对于过早刺激大脑的恐惧就越大。例如一位杰出的生理学教授就告诉我们，他不打算让他的小儿子在八岁之前学习任何东西。大家都知道，儿童时期强制开发智力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或者身体虚弱，或者最终头脑迟钝，或者早亡，但人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相同的道理在青年时期也适用。可以肯定的是必须这么做，能力的发展有一定的顺序和一定的速度。如果教育的进程符合这个顺序和速度就很好。而不符合所带来的不正常结果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相当的或者更大的恶果。比如通过呈现一些更复杂更抽象的、学生不能轻松吸收的知识，或者通过过度培养训练使他们的智力发展超出他们的年纪应该有的程度，都会过早增加他们的负担。

For Nature is a strict accountant; and if you demand of her in one direction more than she is prepared to lay out, she balances the account by making a deduction elsewhere. If you will let her follow her own course, taking care to supply, in right quantities and kinds, the raw materials of bodily and mental growth required at each age, she will eventually produce an individual more or less evenly developed. If, however, you insist on premature or undue growth of any one part, she will, with more or less protest, concede the point; but that she may do your extra work, she must leave some of her more important work undone. Let it never be forgotten that the amount of vital energy which the body at any moment possesses is limited; and that, being limited, it is impossible to get from it more than a fixed quantity of results. In a child or youth the demands upon this vital energy are various and urgent. As before pointed out, the waste consequent on the day's bodily exercise has to be repaired; the wear of brain entailed by the day's study has to be made good; a certain additional growth of body has to be provided

for; and also a certain additional growth of brain: add to which the amount of energy absorbed in the digestion of the large quantity of food required for meeting these many demands. Now, that to divert an excess of energy into any one of these channels is to abstract it from the others, is not only manifest a priori; but may be shown a posteriori from the experience of every one. Everyone knows, for instance, that the digestion of a heavy meal makes such a demand on the system as to produce lassitude of mind and body, frequently ending in sleep. Everyone knows, too, that excess of bodily exercise diminishes the power of thought—that the temporary prostration following any sudden exertion, or the fatigue produced by a thirty miles' walk, is accompanied by a disinclination to mental effort; that, after a month's pedestrian tour, the mental inertia is such that some days are required to overcome it; and that in peasants who spend their lives in muscular labour the activity of mind is very small. Again, it is a truth familiar to all that during those fits of extreme rapid growth which sometimes occur in childhood, the great abstraction of energy is shown in the attendant prostration, bodily and mental. Once more, the facts that violent muscular exertion after eating will stop digestion, and that children who are early put to hard labour become stunted, similarly exhibit the antagonism—similarly imply that excess of activity in one direction involves deficiency of it in another direction. Now, the law which is thus manifest in extreme cases holds in all cases. These injurious abstractions of energy as certainly take place when the undue demands are slight and constant, as when they are great and sudden. Hence, if in youth, the expenditure in mental labour exceeds that which nature had provided for; the expenditure for other purposes falls below what it should have been: and evils of one kind or other are inevitably entailed. Let us briefly consider these evils.

自然是一位严格的会计师，如果在一个方面你所需求的比她所准备的多了，她就在别处减一些来平衡账目。如果你让她按照自己的进程，以适当的数量和种类小心地供应每个年龄身体发育和智力发育所需的原材料，她会最终制造一个大致平衡发育的个体。然而，如果你坚持要让身体的任何一部分过早成熟或者过度发育，她会在或多或少的抗议后同意这么做，但是她要做额外的工作就必须搁置其他一些更加重要的工作。永远不要忘记，在任何时候身体的生命能量都是有限的。由于是有限的，就不可能从它那儿得到超过定额的结果。儿童和青少年对于这种生命能量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紧迫的。正如之前所指出的，每天身体锻炼造成的耗损必须修复，每天学习带来的大脑耗损必须补偿，必须为身体的进一步发育成长提供能量，而且消化如此多食物所需的能量也要补充。现在，把能量转移到这些用途中的任何一个上面，其他用途上所需的能量就会减少。这一点不仅在道理上很明显，而且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证明。每个人都知道，举例来说，消化一顿大餐对身体产生的要求以至于会使身心都疲乏，结果常常引起睡意。每个人也都知道，过度的身体锻炼使思考能力降低，比如突然用力后会短暂眩晕；步行30英里带来的疲劳都会使人不愿进行脑力劳动；徒步旅行了一个月后要花费好几天才能克服大脑的倦怠；终生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心智活动非常少。还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事实——儿童有时候在童年发育特别快，随后他们身体和心智困乏，就说明很多能量都消耗了。还有，吃完饭后进行剧烈体力运动会使消化停止，过早辛苦劳动的儿童会变得身材矮小。这些同样显示了这种对抗，同样说明一个方面过度劳累也会使另外一个方面活力不足。在极端情况下如此明显的规律适用于所有情况。这些有害的能量消耗肯定会发生，即使这些过度的需求是轻微的，不变的，和那些大的，突然的需求一样。因此，如果在青年时期脑力劳动消耗的能量超过了自然所提供的分量，那么其他方面消耗所需的能量就会被减少，最终不可避免地带来这种或者那种恶果。让我们简单地看看这些恶果。

Supposing the over-activity of brain not to be extreme, but to exceed the normal activity only in a moderate degree, there will be

nothing more than some slight rea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dy: the stature falling a little below that which it would else have reached; or the bulk being less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or the quality of tissue being not so good. One or more of these effects must necessarily occur. The extra quantity of blood supplied to the brain, not only during the period of mental exertion, but during the subsequent period in which the waste of cerebral substance is being made good, is blood that would else have been circulating through the limbs and viscera; and the amount of growth or repair for which that blood would have supplied materials, is lost. This physical reaction being certain,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gain resulting from the extra culture is equivalent to the loss? —whether defect of bodily growth, or the want of that structural perfection which gives high vigour and endurance, is compensated for by the additional knowledge gained?

假设大脑的过度活动并不极端，只是超出正常活动量一点儿，只会对身体发育产生轻微的影响，比如身高比本来可以达到的低一点，或者体重比应该可以达到的轻一点，或者是身体器官组织的质量不是那么好。产生一个或者更多这样的后果是必然的。不仅在用脑的时候，而且在随后补充大脑物质消耗的时期，大脑额外需要供给的血液本来要在四肢和内脏中循环流动，但前面发生的那些影响使得这些用来供应原料促进发育或者补充损耗的额外血液都没有了。这种身体反应是肯定的，问题是从过度训练中所得到是否和失去的相等？是否能够用额外获得的知识补偿身体发育缺陷或结构不健全带来的活力和耐力的不足？

When the excess of mental exertion is greater, there follow results far more serious; telling not only against bodily perfection, but against the perfection of the brain itself. It is a physiological

law, first pointed out by M. Isidore St. Hilaire, and to which attention has been drawn by Mr. Lewes in his essay on “Dwarfs and Giants”, that there is an antagonism betwe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 By growth, as used in this antithetical sense, is to be understood *increase of size* ; by development, *increase of structure* . And the law is, that great activity in either of these processes involves retardation or arrest of the other. A familiar illustration is furnished by the cases of the caterpillar and the chrysalis. In the caterpillar there is extremely rapid augmentation of bulk; but the structure is scarcely at all more complex when the caterpillar is full-grown than when it is small. In the chrysalis the bulk does not increase; on the contrary, weight is lost during this stage of the creature's life; but the elaboration of a more complex structure goes on with great activity. The antagonism, here so clear, is less traceable in higher creatures, because the two processes are carried on together. But we see it pretty well illustrated among ourselves by contrasting the sexes. A girl develops in body and mind rapidly, and ceases to grow comparatively early. A boy's bodily and mental development is slower, and his growth greater. At the age when the one is mature, finished, and having all faculties in full play, the other, whose vital energies have been more directed towards increase of size, is relatively incomplete in structure; and shows it in a comparative awkwardness, bodily and mental. Now this law is true not only of the organism as a whole, but of each separate part. The abnormally rapid advance of any part in respect of structure involves premature arrest of its growth; and this happens with the organ of the mind as certainly as with any other organ. The brain, which during early years is relatively large in mass but imperfect in structure, will, if required to perform its functions with undue activity, undergo a structural advance greater than is appropriate to the age; but the ultimate effect will be a falling short of the size and power that would else have been attained. And this is a part cause

—probably the chief cause—why precocious children, and youths who up to a certain time were carrying all before them, so often stop short and disappoint the high hopes of their parents.

当过度用脑更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不仅影响身体健全，而且影响大脑自身的健全。这是一个生理学规律，最先由伊西多尔·圣希莱尔先生指出。而刘易斯先生的《侏儒和巨人》一文又增加了人们对它的注意，即生长 和发育 之间是对立的。在这个对立意义上，生长是指身体尺寸的增加 ，而发育是指身体结构的发展 。这里的规律是，这两个过程中任何一个的大量活动，都会延缓或者抑制另一个。毛毛虫和蛹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毛毛虫的个头长的极快，但是当它完全成熟时，它的身体结构并不比小的时候更加复杂。蛹的个头并不会增加，相反其体重在动物阶段还会减轻，但是大量的活动使它形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身体结构。然而，这里看到的对立在高等动物身上不太明显，因为这两个过程在高等动物身上是同步进行的。但是通过男女两性之间的对比，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女孩子的身心发育很快，但是停止得较早。男孩子的身心发育较慢，但是时间更长。在前者成熟的年龄，即已经长大且所有的身体机能都得到充分展现时，后者的生命力多用在身高增长上，身体结构相对不完整，表现为身体和大脑相对笨拙。现在，这个规律不仅对机体整体而言是真的，对身体的各部分而言也是真的。身体结构任何一部分的不正常快速生长均会使身体早熟，停止发育，而且这种情况在智力器官上和任何其他器官都一样。人的大脑早年体积较大但是构造不完善，如果被要求过度活动并发挥功能，那么在构造上就会超越那个年龄应有的发展，但最终效果则会使它达不到本来应该达到的大小和力量。为什么早熟的儿童和在一定时期内所向披靡的青年常常突然停止发展，让父母十分失望？这就是部分原因，可能也是主要原因。

But these results of over-education, disastrous as they are, are perhaps less disastrous than the results produced upon the health—

the undermined constitution, the enfeebled energies, the morbid feelings. Recent discoveries in physiology have shown how immense is the influence of the brain over the functions of the body. The digestion of the food,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and through these all other organic processes, are profoundly affected by cerebral excitement. Whoever has seen repeated, as we have, the experiment first performed by Weber, showing the consequence of irritating the *vagus* nerve which connects the brain with the viscera —whoever has seen the action of the heart suddenly arrested by the irritation of this nerve; slowly recommencing when the irritation is suspended; and again arrested the moment it is renewed; will have a vivid conception of the depressing influence which an overwrought brain exercises on the body. The effects thus physiologically explained, are indeed exemplified in ordinary experience. There is no one but has felt the palpitation accompanying hope, fear, anger, joy—no one but has observed how laboured becomes the action of the heart when these feelings are very violent. And though there are many who have never themselves suffered that extreme emotional excitement which is followed by arrest of the heart's action and fainting; yet every one knows them to be cause and effect. It is a familiar fact, too, that disturbance of the stomach is entailed by mental excitement exceeding a certain intensity. Loss of appetite is a common result alike of very pleasurable and very painful states of mind. When the event producing a pleasurable or painful state of mind occurs shortly after a meal, it not unfrequently happens either that the stomach rejects what has been eaten, or digests it with great difficulty and under prolonged protest. And as everyone who taxes his brain much can testify, even purely intellectual action will, when excessive, produce analogous effects. Now the relation between brain and body which is so manifest in these extreme cases, holds equally in ordinary, less-marked cases. Just as these

violent but temporary cerebral excitements produce violent but temporary disturbances of the viscera; so do the less violent but chronic cerebral excitements, produce less violent but chronic visceral disturbances. This is not simply an inference—it is a truth to which every medical man can bear witness; and it is one to which a long and sad experience enables us to give personal testimony. Various degrees and forms of bodily derangement, often taking years of enforced idleness to set partially right, result from this prolonged overexertion of mind. Sometimes the heart is chiefly affected: habitual palpitations; a pulse much enfeebled; and very generally a diminution in the number of beats from seventy-two to sixty, or even fewer. Sometimes the conspicuous disorder is of the stomach: a dyspepsia which makes life a burden, and is amenable to no remedy but time. In many cases both heart and stomach are implicated. Mostly the sleep is short and broken. And very generally there is more or less mental depression.

过度教育的这些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是对健康造成的后果更加糟糕，会造成日渐衰弱的体质、虚弱的精力和变态的感情。生理学的最新发现表明，大脑对身体功能有非常大的影响。食物消化、血液循环以及所有与此相关的机体过程都受到大脑兴奋的深刻影响。韦伯首创的实验表明了刺激链接大脑和内脏的迷走神经的后果。通过刺激迷走神经，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停止刺激心脏跳动又会慢慢恢复，再刺激又会暂停。任何人反复看过这个实验后，都会对大脑过劳给身体造成的抑制影响有一个生动的概念。从生理学上解释的这些效果实际上在普通试验中也有例证。没有人在渴望、恐惧、愤怒、欢乐时不感到心跳加速，没有人注意不到当这些感情非常剧烈的时候，心脏的跳动会变得多么吃力。尽管许多人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伴随极端感情兴奋而来的心脏停止跳动和头晕，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大脑兴奋超过一定强度会干扰肠胃活动，这也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事实。精神极度愉快和极度痛苦的常见后果都是食欲不振。当饭后

不久就发生非常愉快或者非常痛苦的事情时，肠胃往往会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或者消化得非常困难和勉强。每一个用脑过度的人都能证明，即使是纯智力活动，如果过量的话，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大脑和身体的关系不但在这些极端情况下非常明显，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也一样。正如这些剧烈而短暂的大脑兴奋会对内脏产生剧烈并短暂的干扰，那些不太剧烈却长时间的大脑兴奋也会对内脏产生不太剧烈但却长期的干扰。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推论，这是一个每位医生都可以证明的真理，是一个我们能亲自证明的漫长而又伤心的经历。这种持续过度用脑会导致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身体紊乱，常常要好几年的强制休息才能部分恢复。有时主要是心脏受到影响，导致习惯性的心悸，而且脉搏非常虚弱，跳动的次数会从七十二降到六十甚至更少。有时是肠胃明显失调：给生活带来负担的消化不良，除了长时间疗养没有其他任何补救方法。在许多情况下，心脏和肠胃都有毛病，睡眠短暂而易醒，而且大多数人多少有点精神抑郁。

Consider, then, how great must be the damage inflicted by undue mental excitement on children and youths. More or less of this constitutional disturbance will inevitably follow an exertion of brain beyond that which nature had provided for; and when not so excessive as to produce absolute illness, is sure to entail a slowly accumulating degeneracy of physique. With a small and fastidious appetite, an imperfect digestion, and an enfeebled circulation, how can the developing body flourish? The due performance of 'every vital process depends on the adequate supply of good blood. Without enough good blood, no gland can secrete properly, no viscus can fully discharge its office. Without enough good blood, no nerve, muscle, membrane, or other tissue can be efficiently repaired. Without enough good blood, growth will neither be sound nor sufficient. Judge, then, how bad must be the consequences when to a growing body the weakened stomach supplies blood that is deficient in quantity and poor in quality; while the debilitated

heart propels this poor and scanty blood with unnatural slowness.

接下来想一想，大脑过度兴奋会给儿童和青年人造成多大的损害。超过自然提供的能量而过度用脑必然会多少给身体带来干扰，即便不足以产生疾病，也一定会使体质 慢慢退化。胃口小而且挑剔，消化不良，循环虚弱，这让一个发育中的身体如何茁壮成长呢？每个生命进程中的正常活动都依赖于优质血液的充足供应。没有足够的优质血液，腺体就不能正常分泌，内脏就不能充分地履行职能。没有足够的优质血液，神经、肌肉、薄膜或者其他组织器官就不能得到有效修复。没有足够的优质血液，成长既不能健康也不能充分。那么，判断一下，如果一个正在生长的身体是由一副虚弱的肠胃提供着数量不够、质量不好的血液，然后再由一颗虚弱的心脏非常缓慢地传送这种低劣稀少的血液，那么后果肯定很糟糕，

And if, as all who candidly investigate the matter must admit, physical degeneracy is a consequence of excessive study, how grave is the condemnation to be passed upon this cramming system above exemplified. It is a terrible mistake, from whatever point of view regarded. It is a mistake in so far as the mere acquirement of knowledge is concerned: for it is notorious that the mind, like the body, cannot assimilate beyond a certain rate; and if you ply it with facts faster than it can assimilate them, they are very soon rejected again; they do not become permanently built into the intellectual fabric; but fall out of recollection after the passing of the examination for which they were got up. It is a mistake, too; because it tends to make study distasteful. Either through the painful associations produced by ceaseless mental toil, or through the abnormal state of brain it leaves behind, it often generates an aversion to books; and, instead of that subsequent self-culture induced by a rational education, there comes a continued

retrogression. It is a mistake, also, inasmuch as it assumes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is everything; and forgets that a much more important matter is the organisation of knowledge, for which time and spontaneous thinking are requisite. Just as Humboldt remarks respecting the progress of intelligence in general,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is obscured when the description languishes under too great an accumulation of insulated facts;” so it may be remarked, respecting the progress of individual intelligence, that the mind is overburdened and hampered by an excess of ill-digested information. It is not the knowledge stored up as intellectual fat which is of value; but that which is turned into intellectual muscle. But the mistake is still deeper. Even were the system good as a system of intellectual training, which it is not, it would still be bad, because, as we have shown, it is fatal to that vigour of *physique* which is needful to make intellectual training available in the struggle of life. Those who, in eagerness to cultivate their pupils' minds, are reckless of their bodies, do not remember that success in the world depends much more upon energy than upon information; and that a policy which in cramming with information undermines energy, is self-defeating. The strong will and untiring activity which result from abundant animal vigour, go far to compensate even for great defects of education; and when joined with that quite adequate education which may be obtained without sacrificing health, they ensure an easy victory over competitors enfeebled by excessive study: prodigies of learning though they may be. A comparatively small and ill-made engine, worked at high-pressure, will do more than a larger and well-finished one worked at low-pressure. What folly is it, then, while finishing the engine, so to damage the boiler that it will not generate steam! Once more, the system is a mistake, as involving a false estimate of welfare in life. Even supposing it were a means to worldly success, instead of a means to worldly failure, yet, in the entailed ill-health, it would

inflict a more than equivalent curse. What boots it to have obtained wealth, if the wealth is accompanied by ceaseless ailments? What is the worth of distinction, if it has brought hypochondria with it? Surely none needs telling that a good digestion, a bounding pulse, and high spirits are elements of happiness which no external advantages can outbalance. Chronic bodily disorder casts a gloom over the brightest prospects; while the vivacity of strong health gilds even misfortune. We contend, then, that this over-education is vicious in every way—vicious, as giving knowledge that will soon be forgotten; vicious, as producing a disgust for knowledge; vicious, as neglecting that organisation of knowledge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its acquisition; vicious, as weakening or destroying that energy, without which a trained intellect is useless; vicious, as entailing that ill-health for which even success would not compensate, and which makes failure doubly bitter.

所有坦率地调查这件事情的人都必须承认，如果身体退化是过度学习的后果，上面列举的这种填鸭式的方法该受到多么严厉的谴责。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严重错误。仅仅从获得知识的层面来看，这就是一个错误。众所周知，心智像身体一样，超过一定的速度就不能吸收知识。如果知识供给的速度超越心智吸收的速度，它们很快就会再次被拒绝，也不会形成永久的知识结构，而会在应付完考试之后就从记忆里遗漏了。它还错在容易使学习变得令人反感。或者是由于不断的脑力劳动产生了痛苦的联想，或者是由于它在脑中留下了不正常状态，填鸭式的教育常常会引起人们对书籍的厌恶，而无法让人通过理性教育获得自学能力，反而会使这种能力不断倒退。它也错在假定获取知识就是一切，而忘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知识的组织结构化，而这需要时间和自主思考。正如洪堡在谈到一般智力过程时所说的："对大自然的解读如果陷于大量累积的零碎事实，这个解读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应该说，个人智力的过程需要得到尊重，过量的难以消化的信息会使大脑负担过重，阻碍大脑的发展。作为智力脂肪储

存起来的知识没有价值，只有变成智力肌肉的知识才有价值。但是，这里的错误可能还在于更深的一层。即使这个方法与智力训练方法一样好（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它很糟糕，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体力 充沛才能够使智力训练在生活奋斗中有用，而这个办法对体力充沛的影响却是致命的。那些渴望开发孩子智力而不顾他们身体的人，忘了在当今取得成功更多依靠的是一个人的精力而不是知识。实行填鸭式教育并且损害精力的方法就是弄巧成拙。充沛的动物活力带来的坚强意志和不懈活动，使得教育即使有大缺陷也能弥补。如果不必牺牲健康就可能获得足够的教育，他们就能够轻松战胜因为过度学习而身体虚弱的竞争对手，尽管这些对手可能在学习方面是个天才。一个较小的、制作粗糙的发动机在高压下工作，要比一个较大的、制作精良的发动机在低压工作下效率要高。这就像在制造发动机时，损坏锅炉使之不能产生蒸汽是多么愚蠢啊！再者，这个方法的错误还涉及对生活福利的虚假估计。即便它作为一种方法能让人取得世俗性的成功而非世俗性的失败，但是却引起了健康不良，造成了超过等量的恶果。如果随财富而来的是不断的生病，那么获得财富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优秀带来了抑郁症，那么优秀的价值是什么？不消说，人人都明白消化良好、脉搏有力、精神振奋是任何外部因素都比不过的幸福因素。最光明的前景也会被长期的身体失调蒙上了阴影，而身体的活力健康甚至会使不幸转变为成功的光芒。因此，我们认为这种过度教育在每个方面都是邪恶的，它会导致知识很快被遗忘，导致学生对知识产生厌恶，会使他们忽略了比获取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建立知识结构；它也削弱或者摧毁了人的精力，没有了精力，受过训练的大脑就是无用的；它给身体造成的不健康，是成功都不能弥补的，而失败了更会使痛苦加倍。

On women the effects of this forcing system are, if possible, even more injurious than on men. Being in great measure debarred from those vigorous and enjoyable exercises of body by which boys mitigate the evils of excessive study, girls feel these evils in their full intensity. Hence, the much smaller proportion of them who

grow up well made and healthy. In the pale, angular, flat-chested young ladies, so abundant in London drawing-rooms, we see the effect of merciless application, unrelieved by youthful sports; and this physical degeneracy exhibited by them, hinders their welfare far more than their many accomplishments aid it. Mammas anxious to make their daughters attractive, could scarcely choose a course more fatal than this, which sacrifices the body to the mind. Either they disregard the tastes of the opposite sex, or else their conception of those tastes is erroneous. Men care comparatively little for erudition in women; but very much for physical beauty, and good-nature, and sound sense. How many conquests does the bluestocking make through her extensive knowledge of history? What man ever fell in love with a woman because she understood Italian? Where is the Edwin who was brought to Angelina's feet by her German? But rosy cheeks and laughing eyes are great attractions. A finely rounded figure draws admiring glances. The liveliness and good humour that overflowing health produces, go a great way towards establishing attachments. Everyone knows cases where bodily perfections, in the absence of all other recommendations, have incited a passion that carried all before it; but scarcely any one can point to a case where mere intellectual acquirements, apart from moral or physical attributes, have aroused such a feeling. The truth is that, out of the many elements uniting in various proportions to produce in a man's breast that complex emotion which we call love, the strongest are those produced by physical attractions; the next in order of strength are those produced by moral attractions; the weakest are those produced by intellectual attractions; and even these are dependent much less upon acquired knowledge than on natural faculty—quickness, wit, insight. If any think the assertion a derogatory one, and inveigh against the masculine character for being thus swayed; we reply that they little know what they say when they thus call in question

the Divine ordinations. Even were there no obvious meaning in the arrangement, we might be sure that some important end was subserved. But the meaning is quite obvious to those who examine. It needs but to remember that one of Nature's ends, or rather her supreme end, is the welfare of posterity— it needs but to remember that, in so far as posterity are concerned, a cultivated intelligence based upon a bad *physique* is of little worth, seeing that its descendants will die out in a generation or two—it needs but to bear in mind that a good *physique* , however poor the accompanying mental endowments, is worth preserving, because, throughout future generations, the mental endowments may be indefinitely developed—it needs but to contemplate these truths, to see how important is the balance of instincts above described. But, purpose apart, the instincts being thus balanced, it is a fatal folly to persist in a system which undermines a girl's constitution that it may overload her memory. Educate as highly as possible—the higher the better—providing no bodily injury is entailed (and we may remark, in passing, that a high standard might be so reached were the parrot-faculty cultivated less, and the human faculty more, and were the discipline extended over that now wasted period between leaving school and being married). But to educate in such manner, or to such extent, as to produce physical degeneracy, is to defeat the chief end for which the toil and cost and anxiety are submitted to. By subjecting their daughters to this high-pressure system, parents frequently ruin their prospects in life. Not only do they inflict on them enfeebled health, with all its pains and disabilities and gloom; but very often they actually doom them to celibacy.

这种强迫的方法对女人产生的后果甚至比对男人产生的后果更为有害。因为女孩子还被剥夺了那些用来缓解过度学习的、充满活力的、令人愉快的身体锻炼，她们吞下了全部的恶果。因此，女孩子中

发育健康良好的比例更低。在伦敦的客厅里常会看到很多面色苍白、身材瘦削、胸部平坦的年轻女士，这让我们看到了没有运动放松只有残忍的过度学习的后果。她们表现出的这种身体退化对幸福生活的阻碍，远远超过了她们的成就带来的帮助。由于急于让女儿变得有吸引力，妈妈们往往采用了这种以身体换智力的致命方法。她们要么忽视了男性的审美，要么就是审美观念出错了。相对而言，男人不太在意女性的学识，而更在意女性美丽的身体、良好的性格和细腻的感情。有多少学识渊博的女人凭借广博的历史知识找到了丈夫？有哪个男人因为一个女人懂得意大利语而爱上她？去哪里找那个因为安吉丽娜懂得德语而拜倒在她裙下的埃德温？但是红润的脸颊和爱笑的眼睛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精致而丰满的身材会吸引艳羡的目光。健康散发出的活泼和良好的幽默感非常有利于建立感情。众所周知，一个人只要身体健美，即使缺乏所有其他的优点，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是似乎没人能举出一个例子说明，抛开了道德或者身体的因素，仅凭智力学识就能获得异性的感情。实际上，男人们称之为爱情的复杂情感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最强烈的因素来自于身体的吸引力，其次是来自道德的吸引力，而最没有吸引力的是智力因素。此外，这些因素也更多地与敏捷、机智、洞察力等自然能力相关，而较少依靠获得的知识。如果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有失体面而痛骂男人的性格不应该对这方面有偏好，那么我们的回答是他们质疑上天安排的时候，似乎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我们确信，即使这些安排没有明显的意义，也一定有助于达到某些重要目的。但是对于那些考察这个问题的人，这些就有相当明显的意义。需要记住，自然的目的之一，或者是它的最高目的，在于后代的幸福。也就是说，需要记住，从后代的角度考虑，若是其身体 不健康，智力的培养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其子孙只能延续一两代，而一个好的身体　　，无论伴随它的心智天赋多么贫乏，都是值得保存的，因为心智天赋在后代身上可能得到无限制地发展。所以，仔细思考过这些事实之后，就能看出上述的本能平衡是多么重要。但是，撇开目的不谈，既然本能该是如此平衡的，那么要是还坚持让女孩子记忆过多的东西而使她的体质受到损害，会是多么愚蠢啊。让她们接受尽可能高的教育，越高越好，只要不损害身体（我们顺便说下，只要少培养鹦鹉式的能力而多培养作为人的能力，并且

将训练延长，把从离开学校到结婚前那段现在被浪费掉的时间利用起来，还是可能达到高标准的）。但是如果教育的方式和程度使人身体退化，那就会使费力费钱迫切追求的主要目的落空。父母们把他们的女儿置于这种高压做法下，往往会毁掉她们将来的生活。不仅会导致她们身体虚弱，承受所有与之俱来的痛苦、残疾和忧郁，而且常常使她们承受独身的命运。

Our general conclusion is, then, that the ordinary treatment of children is, in various ways, seriously prejudicial. It errs in deficient feeding; in deficient clothing; in deficient exercise (among girls at least); and in excessive mental application. Considering the regime as a whole, its tendency is too exacting: it asks too much and gives too little. In the extent to which it taxes the vital energies, it makes the juvenile life much more like the adult life than it should be. It overlooks the truth that, as in the fœtus the entire vitality is expended in the direction of growth—as in the infant, the expenditure of vitality in growth is so great as to leave extremely little for either physical or mental action; so throughout childhood and youth, growth is the dominant requirement to which all others must be subordinated: a requirement which dictates the giving of much and the taking away of little—a requirement which, therefore, restricts the exertion of body and mind to a degree proportionate to the rapidity of growth—a requirement which permits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activities to increase only as fast as the rate of growth diminishes.

所以，我们总的结论是，一般的儿童教育在各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错误。错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缺乏锻炼（至少女孩是这样），而且过度用脑。整体来看，这个方法趋向要求太严格，要的太多，给的太少。就耗损精力的程度而言，它使青少年的生活变得更像成人的

生活——相比他本该过的生活。它忽略了一个真理，即胎儿所有的生命力都应该用于生长；婴儿用于生长的生命力也应该非常多，只需留下极少一部分用在身体或心智活动上；而在整个童年和青年期，生长也是其他一切需要都必须服从的最高需要，这就决定了给予的要多而索取的要少——要根据生长的速度限制身体和心智的活动，根据生长速度的减缓情况来增加身心活动。

Regarded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this high-pressure education manifestly results from our passing phase of civilisation. In primitive times, when aggression and defence were the leading social activities, bodily vigour with its accompanying courage were the desiderata; and then education was almost wholly physical: mental cultivation was little cared for, and indeed, as in our own feudal ages, was often treated with contempt. But now that our state is relatively peaceful—now that muscular power is of use for little else than manual labour, while social success of nearly every kind depends very much on mental power; our education has become almost exclusively mental. Instead of respecting the body and ignoring the mind, we now respect the mind and ignore the body. Both these attitudes are wrong. We do not yet sufficiently realise the truth that as, in this life of ours, the physical underlies the mental, the mental must not be develop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physical. The ancient and modern conceptions must be combined.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高压教育显然来自于我们的文明发展的必经阶段。在原始时代，侵略和防御是主要的社会活动，身体强健和与之伴随的勇气是必要的条件，因此那时的教育几乎全是身体方面的，很少在意智力的开发。在封建时代，人人确实经常轻视智力开发。但是，现在我们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由于肌肉力量除了体力劳动外用处不多，而几乎每种社会成功都非常依靠智力，我们教育就

几乎全是智力方面的了。我们现在不是重视身体忽略智力，而是重视智力忽略身体。这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我们还没有认清楚这个真理——既然在我们的生活中，身体是心智的基础，那就不能以牺牲身体为代价来发展心智。古代和现代的观念要结合起来。

Perhaps nothing will so much hasten the time when body and mind will both be adequately cared for, as a diffusion of the belief that the preservation of health is a *duty* . Few seem conscious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physical morality. Men's habitual words and acts imply the idea that they are at liberty to treat their bodies as they please. Disorders entailed by disobedience to Nature's dictates, they regard simply as grievances: not as the effects of a conduct more or less flagitious. Though the evil consequences inflicted on their dependents, and on future generations, are often as great as those caused by crime; yet they do not think themselves in any degree criminal. It is true, that, in the case of drunkenness, the viciousness of a purely bodily transgression is recognised; but none appear to infer that, if this bodily transgression is vicious, so too is every bodily transgression. The fact is, that all breaches of the laws of health are *physical sins* . When this is generally seen, then, and perhaps not till then, will the physical training of the young receive all the attention it deserves.

把保持健康是一个责任 这一信念传播开来，或许最能加速身体和心智都得到充分照顾的时刻的到来。似乎只有很少人意识到还有身体培育道德这一回事。人们的习惯性言行表明，他们可以自由随意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对于因为违反自然规律而导致的疾病，他们只是简单地视为不幸，而不认为是由或大或小的错误行为造成的后果。尽管这样给他们的亲属和后代造成的苦果与那些犯罪引起的后果同样严重，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样有罪。确实，人们已经承认醉酒对身体的伤害

是一种罪恶，但是似乎没有人由此推论，如果这种身体伤害是罪恶的，那么每一种身体伤害也都是罪恶的。事实是，所有违反健康规律的事都是对身体的犯罪 。或许当大家都意识到这一点时，青年人的身体锻炼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4_1].*Cyclopaedia of Practical Medicine* .

[4_2].*Cyclopaedia of Practical Medicine* .

[4_3].*Cyclopaedia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 .

[4_4].Morton's *Cyclopaedia of Agriculture* .

[4_5].Morton's *Cyclopaedia of Agricuiturt* .

[4_6].It is needful to remark that children whose legs and arms have been from the beginning habitually without covering, cease to be conscious that the exposed surfaces are cold; just as by use we have all ceased1 to be conscious that our faces are cold, even when out of doors. But though in such children the sensations no longer protest,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 system escapes injury: any more than it follows that the Fuegian is undamaged by exposure, because he bears with indifference the melting of the falling snow on his naked body.

[4_7].We are not certain that the propagation of subdued forms of constitutional disease through the agency of vaccination is not a part cause. Sundry facts in pathology suggest the inference, that when the system of a vaccinated child is excreting the vaccine virus by means of pustules, it will tend also to excrete through such pustules other morbific matters; especially if these morbific matters are of a kind ordinarily got rid of by the skin, as are some of the worst of them. Hence it is very possible—probable even—that a child with a constitutional taint, too slight to show itself in visible disease, may, through the medium of vitiated vaccine lymph taken from it, convey a like constitutional taint to other children, and these to others.

[4_8].*Cyclopaedia of Practical Medicine* , vol. i. pp. 697, 698.

[5_1].《实践临床医学全书》

[5_2].《实践临床医学全书》

[5_3].《生理解剖全书》

[5_4].莫顿《农学全书》

[5_5].莫顿《农学全书》

[5_6].需要说明，从小就习惯把腿和手臂露在外面的儿童不会觉得这些部位冷，这就好像我们在室外，也不会觉得自己的脸冷。尽管这些孩子不再感觉到寒冷，但是并不证明身体就不会受到伤害。这就像火地岛人一样，不在乎忍受雪花飘到他的裸体上融化并不说明他们不会因为寒冷而受伤害。

[5_7].《临床医学全书》第一卷，第697、698页。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教育漫话

John Locke

约翰·洛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教育漫话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约翰·洛克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Introductory Note 作者简介
- Dedication 题献
- Section 1-10 第1-10节
- Section 11-20 第11-20节
- Section 21-30 第21-30节
- Section 31-40 第31-40节
- Section 41-50 第41-50节
- Section 51-60 第51-60节
- Section 61-70 第61-70节
- Section 71-80 第71-80节
- Section 81-90 第81-90节
- Section 91-100 第91-100节
- Section 101-110 第101-110节
- Section 111-120 第111-120节
- Section 121-130 第121-130节
- Section 131-140 第131-140节
- Section 141-150 第141-150节
- Section 151-160 第151-160节
- Section 161-170 第161-170节
- Section 171-180 第171-180节
- Section 181-190 第181-190节
- Section 191-200 第191-200节
- Section 201-211 第201-210节
- Section 211-217 第211-217节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Introductory Note

作者简介

John Locke was born near Bristol, England, on August 29, 1632; and was educated at Westminster School, where Drydenwas his contemporary, and at Christ Church, Oxford. Of the discipline then in vogue in either institution, the future educational theorist had no high opinion, as may be gathered from allusions in the present treatise; yet, after taking his master's degree in 1658, he became tutor of his college, and lecturer in Greek and rhetoric. After a visit to the Continent in 1665, as secretary to an embassy, he returned to Oxford and took up the study of medicine. He became attached, as friend and physician, to Lord Ashley, afterward the first Earl of Shaftesbury; and while this nobleman was Lord Chancellor, Locke held the office of Secretary of Presentations.

约翰·洛克，1632年8月29日出生于英国布里斯托尔附近，曾就读于威斯敏斯特公学，与德莱顿同窗，后求学于牛津基督教堂学院。从他的著述中可以隐约看出，这位未来的教育理论家对两所学校当时热门的课程并不满意。不过，在1658年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洛克留校任教，在牛津大学讲授希腊语和修辞学。1665年，洛克作为使馆秘书从欧洲大陆访问归来后，又回到牛津开始从事医学研究。之后，他成为阿什利男爵（即后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一世）的好友兼私人医生，与之关系密切。在伯爵担任大法官时，洛克曾任外务秘书一职。

Shaftesbury went out of office in 1673, and two years later Locke went to France in search of health, supporting himself by

acting as tutor to the son of Sir John Banks, and as physician to the wife of the English Ambassador at Paris. In 1679, Shaftesbury, being again in power, recalled Locke to England. He reluctantly obeyed, and remained in attendance on his patron, assisting him in political matters and superintending the education of his grandson, the future author of *Characteristics* ,till Shaftesbury's political fortunes finally collapsed, and both men took refuge in Holland.

1673年，沙夫茨伯里伯爵下台。两年后，洛克赴法国求医，并通过担任约翰·班克斯爵士儿子的家庭教师及英国驻巴黎大使夫人的私人医生以维持生活。1679年，沙夫茨伯里伯爵重掌大权，将洛克召回英国。洛克勉强听命，继续辅佐伯爵，协助其处理政务并负责其孙子的教育（伯爵孙子后来著有《论特性》一书）。后来沙夫茨伯里伯爵的政治生涯最终破灭，两人一同逃往荷兰避难。

Locke's first two years in Holland were spent in traveling and in intercourse with scholars; but in 1685 the Dutch Government was asked to deliver him up to the English as a traitor, and he was forced to go into hiding till a pardon was granted by James II in 1686, though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his having been guilty of any crime beyond his friendship with Shaftesbury.

在荷兰的头两年，洛克四处旅行，广交学者。但在1685年，英国要求荷兰政府将他作为叛国者引渡回国，在詹姆斯二世于1686年发出赦令前，洛克被迫东躲西藏。事实上，除了与沙夫茨伯里伯爵交情深厚之外，从未有证据显示洛克有其他罪名。

It was not till now, at the age of fifty-four, that Locke began to

publish the results of a lifetime of study and thought. An epitome of his great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 was printed in his friend Le Clerc's *Bibliotheque Universelle* ,and the work was finally published in full in 1690. It was from Holland also that he wrote, as advice to a friend on the bringing up of his son, those letters which were later printed as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

此时，已经五十四岁的洛克才开始发表其毕生研究与思考的成果。在其朋友勒克莱尔主编的《世界和历史文库》中，收录了洛克《人类理智论》的摘要，而这部重要的著作到1690年才全文付梓。同样在荷兰，洛克在书信中为一个朋友提供教育儿子的建议，这些信件后来结集发表为《教育漫话》。

During his exile Locke had come into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his future sovereigns, William and Mary; and when the Revolution was accomplished he came back to England with the Princess in 1689. He was offered the Ambassadorship to Prussia, but declined on account of his weak health and because he thought he was not valiant enough in strong drink to be Ambassador at the court of the Elector of Brandenburg; so he stayed at home and published his *Essay* .

逃亡期间，洛克认识了后来登基的威廉和玛丽。光荣革命胜利后，他便和玛丽一起于1689年从荷兰回到了英国。虽然洛克得到了出任驻普鲁士大使的机会，但他以身体欠安为由回绝了。他认为自己不能够应对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宫廷烈酒，故而留在英国，整理发表《人类理智论》。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 was spent chiefly at the home of his friends, the Cudworths and Mashams, at Oates in Essex. He held the office of Commissioner of Appeals, and was for some years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 a position which led to his occupying himself with problems of economics. At Oates he had the opportunity of putting his educational theories into practise in the training of the grandson of his host, and the results confirmed his belief in his methods. He died at Oates, October 27, 1704.

此后大部分时间里，洛克都住在朋友马莎姆夫妇位于艾塞克斯郡欧茨的家中。他曾经掌管过上诉委员办公室，并多年担任贸易与种植委员会的一员。这样的工作使他专注于经济方面的问题。在欧茨生活期间，他得以将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对主人家孙子的培养中，取得的成果坚定了他对自己教育理论的信心。1704年10月27日，洛克在欧茨去世。

It has been noted that while at school and at the university Locke disapproved the educational methods employed; and this independence of judgment marked him through life. In medicine he denounced the scholasticism which still survived and which in various branches of learning had already been attacked by Bacon and Hobbes; and he advocated the experimental methods adopted by his friend Sydenham, the great physician of the day. I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method he held advanced opinions, insisting especially on the importance of guarding the formation of habits, and on training in wisdom and virtue rather than on information as the main object of education. Many of his ideas are still among the objects aimed at, rather than achieved, by educational reformers. It will be observed from the following *Thoughts* that they bear the

mark of their original purpose, the individual education of a gentleman's son, not the formation of a school system.

如前所述，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洛克就对当时的教育方法提出了异议，这种独立判断的习惯贯穿了他的一生。医学上，他公开批评虽然已被培根和霍布斯从多方面反对，却仍在苟延残喘的经院哲学；并推崇他的朋友、当时著名的内科医生西顿哈姆所采用的实验方法。教育上，洛克拥有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尤为注重习惯的逐步养成，以及智慧和美德的塑造，他认为获取知识并非教育的主要目的。时至今日，他的许多主张仍然是教育改革者向往却并未实现的目标。从这本《教育漫话》中，读者会看到，洛克的初衷是完善贵族青年的教育，而非建立学校教育体制。

But it is as a philosopher that Locke's fame is greatest. He was the ancestor of the English empirical school, and he exercis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philosophic thought throughout Europe. Almost all the main lines of the intellectual activit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England lead back to Locke, and the skepticism of Hume is the 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s laid down in the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

不过洛克最为著名的还是其哲学成就。他是英国经验主义学派的先驱，对整个欧洲的哲学思想都有深远的影响。不仅十八世纪英国的主要思想流派几乎都可以追溯到洛克，休谟的怀疑论也正是在洛克《人类理智论》中所讲到的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Dedication

题献

To Edward Clarke, of Chipley, Esq.

致奇普利的爱德华·克拉克先生

Sir:

先生：

Thes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which now come abroad into the world, do of right belong to you, being written several years since for your sake, and are no other than what you have already by you in my letters. I have so little vary'd anything, but only the order of what was sent you at different times, and on several occasions, that the reader will easily find, in the familiarity and fashion of the stile, that they were rather the private conversation of two friends, than a discourse design'd for publick view.

这些关于教育的随想如今付梓面世，但其归属权理应属于您。其内容正是几年前为您而写，并未超出信中所言。除了对信件来往次序及个别处有所调整外，几乎未作变动，从语气的随意和行文风格中，

读者很容易察觉，这些文字实际上是好友间的对谈，而非为公之于众所作的论文。

The importunity of friends is the common apology for publickations men are afraid to own themselves forward to. But you know I can truly say, that if some, who having heard of these papers of mine, had not press'd to see them, and afterwards to have them printed, they had lain dormant still in that privacy they were design'd for. But those, whose judgment I defer much to, telling me, that they were persuaded, that this rough draught of mine might be of some use, if made more publick, touch'd upon what will always be very prevalent with me: for I think it every man's indispensable duty, to do all the service he can to his country; and I see not what difference he puts between himself and his cattle, who lives without that thought. This subject is of so great concernment, and a right way of education is of so general advantage, that did I find my abilities answer my wishes, I should not have needed exhortations or importunities from others. However, the meanness of these papers, and my just distrust of them, shall not keep me, by the shame of doing so little, from contributing my mite, when there is no more requir'd of me than my throwing it into the publickreceptacle. And if there be any more of their size and notions, wholik'd them so well, that they thought them worth printing, I may flatter myself they will not be lost labour to everybody.

经常有人讲出版归咎于朋友的纠缠，其实往往是不敢承担责任所致。但您知道，我真是可以说，如果不是朋友们听说之后催着要看这些文章，并随后将其付梓，这些文字现在一定还像当初写作时一样，继续作为私人信件留存。但我向来尊重这些朋友的判断。他们告诉

我，这些草稿如能公开，定会有些益处。这恰好触及到我始终坚信的一点：那就是每个人都应责无旁贷地为其国家竭尽全力。而且我认为这正是人与无思想的牲口之间的区别。教育事关重大，正确的教育方法能带来极其广泛的益处。假如我自认为足以当此大任，那么就根本不用旁人敦促或怂恿。但是，虽自知文笔拙劣、乏善可陈，即使公布也微不足道，但我仍应献出拙见，因为我所求者不过如此。如果还有除了我的朋友们的读者持相同观点，并欣赏书中所言，认为的确值得出版，那么我将为这些文字不是全然无用而感到欣慰。

I myself have been consulted of late by so many, who profess themselves at a loss how to breed their children, and the early corruption of youth is now become so general a complaint, that he cannot be thought wholly impertinent, who brings the consideration of this matter on the stage, and offers something, if it be but to excite others, or afford matter of correction: for errors in education should be less indulg'd than any. These, like faults in the first concoction, that are never mended in the second or third, carry their afterwards incorrigible taint with them thro' all the parts and stations of life.

近来常有人向我询问，说他们对子女教育感到迷茫。也总是有人抱怨年轻人的堕落，但是抱怨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把问题拿上台面，不管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引起注意，还是进而提出改进方法，都是有贡献的。因为教育中的错误最不能放任自流。就像调配制剂一样，第一次弄错了，第二次第三次也就无法补救，教育上的错误将留下一生都难以去除的污点。

I am so far from being conceited of anything I have here offer'd, that I should not be sorry, even for your sake, if someone

abler and fitter for such a task would in a just treatise of education, suited to our English gentry, rectify the mistakes I have made in this; it being much more desirable to me, that young gentlemen should be put into (that which everyone ought to be solicitous about) the best way of being form'd and instructed, than that my opinion should be receiv'd concerning it. You will, however, in the meantime bear me witness, that the method here propos'd has had no ordinary effects upon a gentleman's son it was not design'd for. I will not say the good temper of the child did not very much contribute to it; but this I think you and the parents are satisfy'd of, that a contrary usage, according to the ordinary disciplining of children, would not have mended that temper, nor have brought him to be in love with his book, to take a pleasure in learning, and to desire, as he does, to be taught more than those about him think fit always to teach him.

我对自己提出的观点毫无自矜之意。如果将来有更能干和更合适的人写出一部适合我们英国绅士的教育论述，改正了我在这本书里犯的错误，考虑到您的原因，我也绝无遗憾。相比于我自己的观点得到认同，我更乐于见到年轻绅士们能够（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的事情）受到最好的培养和教育。当然，您要为我作证，这些建议曾经在一位绅士的儿子身上收到了超出预想的显著效果。我并不是说，您孩子本身的良好性情不是重要因素；但我认为您和各位家长一定会认同，如果与此相反，采取通常教育孩子的方法，绝不可能调节孩子的脾性，让他们热爱书本，乐于学习，并且像您的孩子一样，渴望在周围人为他安排的学习内容之外受到更多指教。

But my business is not to recommend this treatise to you, whose opinion of it I know already; nor it to the world, either by your opinion or patronage. The well educating of their children is

so much the duty and concern of parents, and the welfare and prosperity of the nation so much depends on it, that I would have every one lay it seriously to heart; and after having well examin'd and distinguish'd what fancy, custom, or reason advises in the case, set his helping hand to promote everywhere that way of training up youth, with regard to their several conditions, which is the easiest, shortest, and likeliest to produce virtuous, useful, and able men in their distinct callings; thoughthat most to be taken care of is the gentleman's calling. For if those of that rank are by their education once set right, they will quickly bring all the rest into order.

但我的任务不是向您推荐这本书，因为您的观点我已经知晓；也不是要通过您的认可或支持向世人推荐此书。给孩子良好的教育是家长的职责和愿望，国家的福祉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因此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发自内心地思考这个问题；在仔细地审视和甄别关于教育的种种想象、习俗或理由之后，针对具体情况，在培养青年的每一个方面出一分力，找到培养正直、有为和能干的人才所适用的最简单、最快捷和最适宜的方法。在这其中最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如何成为绅士。因为只要绅士阶层通过教育走上正途，他们就很快能将其他人引入正轨。

I know not whether I have done more than shewnmy good wishes towards it in this short discourse; such as it is, the world now has it, and if there be any thing in it worth their acceptance, they owe their thanks to you for it. My affection to you gave the first rise to it, and I am pleas'd, that I can leave to posterity this mark of the friendship that has been between us. For I know no greater pleasure in this life, nor a better remembrance to be left behind one, than a long continued friendship with an honest, useful, and worthy man, and lover of his country. I am, Sir,

我不知道在这短短的篇幅中，除了表达良好愿望以外，是否还有丝毫其他的贡献。本书已经面世，如果读者能有任何收获，都应归功于您。正是因为我对您的敬慕，才有了这些文字。我很高兴能将此书作为你我友谊的见证留存后世。因为我知道，能与一位忠诚可靠、才能出众、高贵贤达并深深热爱祖国的朋友结下深厚的友谊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也是留给后世最好的纪念。我坚信如此，先生，

Your most humble and most faithful servant,

您最卑微、最忠诚的仆人，

John Locke.

约翰·洛克

March 7, 1692.

1692年3月7日

Section 1-10

第1-10节

1．A sound mind in a sound body, is a short, but full description of a happy state in this world. He that has these two, has little more to wish for; and he that wants either of them, will be but little the better for anything else. Men's happiness or misery is most part of their own making. He, whose mind directs not wisely, will never take the right way; and he, whose body is crazy and feeble, will never be able to advance in it. I confess, there are some men's constitutions of body and mind so vigorous, and well fram'd by nature, that they need not much assistance from others; but by the strength of their natural genius, they are from their cradles carried towards what is excellent; and by the privilege of their happy constitutions, are able to do wonders. But examples of this kind are but few; and I think I may say, that of all the men we meet with, nine parts of ten are what they are, good or evil, useful or not, by their education. 'Tis that which makes the great difference in mankind.The little, or almost insensible impressions on our tender infancies, have very important and lasting consequences: and there 'tis, as in the fountains of some rivers, where a gentle application of the hand turns the flexible waters in channels, that make them take quite contrary courses; and by this direction given them at first in the source, they receive different tendencies, and arrive at last at very remote and distant places.

第1节．健全的心智寓于健康的身体，这句话虽然简短，却概括了人世间的一种幸福的状态。秉其二者，则别无他求；缺其一者，即

便拥有其他种种也是枉然。幸与不幸，多由人自取：一个人若心智不明，便永不会踏入正途；一个人若身体失常或孱弱，则无从取得进步。不可否认，有些人的体格与心智秉承自然造化之功，得天独厚，强健活泼，无须借助他人之力，其优越的禀赋便可引导他们自幼至长走向卓越，其超凡的体格亦能促使他们成就奇迹。不过此类特例少之又少，我敢说，我们日常接触的人中，无论是善是恶，是多才还是无能，十有其九乃教育所塑造。正是教育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霄壤之别。留存于我们柔弱幼年期的那些微小或难以察觉的印象会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教育，仿佛河流源头处的一只手，轻轻拨动，便将灵活的水流导入河道沟渠，引领它们奔上完全相反的道路。正因这源头上的引导，它们趋向各异，并最终到达千里相隔的地方。

2．I imagine the minds of children as easily turn'd this or that way, as water itself: and though this be the principal part, and our main care should be about the inside, yet the clay-cottage is not to be neglected. I shall therefore begin with the case, and consider first the health of the body, as that which perhaps you may rather expect from that study I have been thought more peculiarly to have apply'd myself to; and that also which will be soonest dispatch'd, as lying, if I guess not amiss, in a very little compass.

第2节．我想，儿童的心智正如流水，易于导向一方或另一方。尽管心智问题至关重要，且内心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但我们所栖身的躯壳同样不容忽视。因此，我将从此例开始，首先探讨有关身体健康的问题，这一点你大概能够从过去我做过的思考和实践中看出，且这一问题涉及面并不广，大概很快就能谈完。

3．How necessary health is to our business and happiness; and how requisite a strong constitution, able to endure hardships and

fatigue, is to one that will make any figure in the world, is too obvious to need any proof.

第3节．若要投入工作和幸福生活，健康的身体不可或缺；若想出人头地，同样必须拥有能够忍耐劳苦与艰辛的强健体魄，这个道理显而易见。

4．The consideration I shall here have of health, shall be, not what a physician ought to do with a sick and crazy child; but what the parents, without the help of physick, should do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a healthy, or at least not sickly constitution in their children. And this perhaps might be all dispatch'd in this one short rule, viz. Those gentlemen should use their children, as the honest farmers and substantial yeomen do theirs. But because the mothers possibly may think this a little too hard, and the fathers too short, I shall explain myself more particularly; only laying down this as a general and certain observation for the women to consider, viz. That most children's constitutions are either spoil'd, or at least harm'd, by cockering and tenderness.

第4节．我所要讨论的健康问题，不是说大夫应如何对付一个病弱的、歇斯底里的儿童；而是说在不诉诸医药的情况下，父母应如何抚育他们健康的或至少无病的孩子，并促进他们的成长。一条简短的规则便能将此说个明白：绅士应像正直而富足的农人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不过由于母亲们或许会认为此言过于苛刻，父亲们又会认为过于粗略，因此我不妨解释得更清楚一些。仅以一个平常而确定的现象为例，以供女士们参考，即大多数孩子的体质多少都因溺爱与娇养受到了损害。

5 . The first thing to be taken care of, is, that children be not too warmly clad or cover'd, winter or summer. The face when we are born, is no less tender than any other part of the body. 'Tis use alone hardens it, and makes it more able to endure the cold. And therefore the Scythianphilosopher gave a very significant answer to the Athenian, who wonder'd how he could go naked in frost and snow. How, said the Scythian, can you endure your face expos'd to the sharp winter air? My face is us'd to it, said the Athenian. Think me all face, reply'd the Scythian. Our bodies will endure anything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they are accustom'd to.

第5节．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冬夏，孩子穿衣盖被都不应过暖。我们出生时，脸部的娇嫩并不亚于身体的其他部分，但习惯磨炼了它，使它更能抵御寒冷。从前，有个雅典人看到一个锡西厄哲学家在冰天雪地中赤身行走，惊奇不已，而这个锡西厄哲学家的解释则意味深长。他说："将脸暴露在这凛冽的寒气中，你怎么就受得了呢？""我的脸早已习惯了，"雅典人答道。"那你就将我的全身都想象成脸好了，"哲学家回答。只要自幼养成习惯，我们的身体能经受住任何考验。

An eminent instance of this, though in the contrary excess of heat, being to our present purpose, to shew what use can do, I shall set down in the author's words, as I meet with it in a late ingenious voyage.

再举一个有名的事例以证明习惯的力量，尽管这次正好相反，说的是抵御炎热。这个故事出现于一本最近出版的颇具新意的游记，原文抄录如下：

“The heats, says he, are more violent in Malta, than in any part of Europe: they exceed those of Rome itself, and are perfectly stifling; and so much the more, because there are seldom any cooling breezes here. This makes the common people as black as gypsies: but yet the peasants defy the sun; they work on in the hottest part of the day, without intermission, or sheltering themselves from his scorching rays. This has convinc'd me, that nature can bring itself to many things, which seem impossible, provided we accustom ourselves from our infancy. The Malteses do so, who harden the bodies of their children, and reconcile them to the heat, by making them go stark naked, without shirt, drawers, or anything on their heads, from their cradles till they are ten years old.”

“他说，马耳他的酷热比欧洲任何地方的都更为猛烈：这里的热浪赛过罗马，实在是令人窒息；更糟的是，这里几乎没有凉风吹过。炎热使得百姓都黑得像吉普赛人，但农民们却对烈日满不在乎，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刻，他们仍毫不停歇地照常劳作，并不躲避灼人的日头。这使我相信，只要我们自幼养成习惯，许多看似不可能的境况，人出于本能最终都能承受。马耳他人便是这样做的，他们让自己的孩子成日赤裸着身体，从出生起直到十岁，无衣无裳，头顶亦无遮盖，以此磨砺他们的体格，使其适应炎炎烈日。”

Give me leave therefore to advise you not to fence too carefully

against the cold of this our climate. There are those in England, who wear the same clothes winter and summer, and that without any inconvenience, or more sense of cold than others find. But if the mother will needs have an allowance for frost and snow, for fear of harm, and the father, for fear of censure, be sure let not his winter clothing be too warm: And amongst other things, remember, that when nature has so well covered his head with hair, and strengthen'd it with a year or two's age, that he can run about by day without a cap, it is best that by night a child should also lie without one; there being nothing that more exposes to headaches, colds, catarrhs, coughs, and several other diseases, than keeping the head warm.

因此，请容我向您建议，莫要过于严密地防范我们这里的寒冷气候。在英国，有些人一年四季衣着相同，却丝毫不觉不便，也未比别人多感到几分寒意。不过，万一做母亲的害怕孩子受到伤害，做父亲的担心自己遭到指责，因而觉得需在严冬为子女添加衣物，但请切记勿使冬衣过于保暖。除此之外请勿忘记，孩子生来就长有头发，并在一两岁时渐趋浓密，那么他白天尽可以光着脑袋四处奔跑，晚间也最好不戴帽子入睡。严密保暖头部其实更容易让人患上头痛、风寒、黏膜炎、咳嗽以及其他种种疾病。

6．I have said he here, because the principal aim of my discourse is, how a young gentleman should be brought up from his infancy, which in all things will not so perfectly suit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 though where the difference of sex requires different treatment, 'twill be no hard matter to distinguish.

第6节．我一直用“他”作代词，是因为这番谈话的主要目的是讨

论如何从小将一个男孩子培养成一名年轻绅士，并非所有方法都完全适用于女孩的教育。当然，在需要根据性别采用不同方法时，差异之处应当也不难分辨。

7 . I will also advise his feet to be wash'd every day in cold water, and to have his shoes so thin, that they might leak and let in water, whenever he comes near it. Here, I fear I shall have the mistress and maids too against me. One will think it too filthy, and the other perhaps too much pains, to make clean his stockings. But yet truth will have it, that his health is much more worth than all such considerations, and ten times as much more. And he that considers how mischievous and mortal a thing taking wet in the feet is, to those who have been bred nicely, will wish he had, with the poor people's children, gone bare-foot, who, by that means, come to be so reconcil'd by custom to wet in their feet, that they take no more cold or harm by it, than if they were wet in their hands. And what is it, I pray, that makes this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ands and the feet in others, but only custom? I doubt not, but if a man from his cradle had been always us'd to go bare-foot, whilst his hands were constantly wrapt up in warm mittins, and cover'd with hand-shoes, as the Dutch call gloves; I doubt not, I say, but such a custom would make taking wet in his hands as dangerous to him, as now taking wet in their feet is to great many others. The way to prevent this, is, to have his shoes made so as to leak water, and his feet wash'd constantly every day in cold water. It is recommendable for its cleanliness; but that which I aim at in it, is health; and therefore I limit it not precisely to any time of the day. I have known it us'd every night with very good success, and that all the winter, without the omitting it so much as one night in extreme cold weather; when thick ice cover'd the water, the child bathed his legs and feet in it, though he was of an age not big

enough to rub and wipe them himself, and when he began this custom was puling and very tender. But the great end being to harden those parts by a frequent and familiar use of cold water, and thereby to prevent the mischiefs that usually attend accidental taking wet in the feet in those who are bred otherwise, I think it may be left to the prudence and convenience of the parents, to chose either night or morning. The time I deem indifferent, so the thing be effectually done. The health and hardiness procured by it would be a good purchase at a much dearer rate. To which if I add the preventing of corns that to some men would be a very valuable consideration. But begin first in the spring with luke-warm, and so colder and colder every time, till in a few days you come to perfectly cold water, and then continue it so winter and summer. For it is to be observed in this, as in all other alterations from our ordinary way of living, the changes must be made by gentle and insensible degrees; and so we may bring our bodies to anything, without pain, and without danger.

第7节．我还主张他每天用冷水洗脚，穿的鞋子也不妨单薄一些，使孩子在踩水时，水能渗进鞋子里去。说到这里，恐怕女主人和女仆得纷纷声讨我，一个想这未免太脏，另一个或许觉得这样要洗干净袜子未免太费劲。不过事实胜于雄辩，孩子的健康比所有这些顾虑都重要，且重要十倍。一个人假若想到，那些娇生惯养之人弄湿了脚有多么麻烦和要命，那他会情愿混迹于贫苦人家的孩子之间长大，他们赤足跑来跑去便逐渐习惯了脚上沾水，弄湿脚就像弄湿手那么平常，既不会因此伤风，也不会受到什么别的伤害。对许多人来说，手脚之间竟有如此大的差别，请问若不是习惯还能是什么造成的？我毫不怀疑，假如一个人自出生起便赤着脚，双手却暖暖地包裹起来，穿着“手鞋”（荷兰人便这样称呼手套），那么久而久之，对他而言弄湿手的危险就不亚于其他人眼中打湿脚的危险。为了防患于未然，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穿能够透水的鞋子，并且坚持每天用冷水洗脚。这有

助于保持清洁，但健康才是我更关注的，因此洗脚不必局限于一天中某个特定的时间。据我所知，有个孩子每晚用冷水洗脚，即使寒冬腊月也不曾间断过一次，颇有成效。在水面结起厚厚一层冰的时候，孩子依然用冷水浸泡腿脚，尽管那时他年纪还太小，不会自己揉搓擦拭，并且刚开始培养这一习惯时也娇嫩柔弱，啼哭不休。不过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使其不断接触和熟悉适应冷水以锻炼身体的这些部位，以免像那些娇养的孩子，一不当心弄湿双脚便生出许多病痛。至于洗脚的时间定在晚上还是早晨，父母可根据自己的方便斟酌选择。只要能有效施行，早晚亦无关紧要。以此收获的健康强壮，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去换取也是值得。如果我说用冷水洗脚还有能有效防止鸡眼，那么对有些人而言就更是一桩难得的好事。不过最好还是在春季以温水洗脚开始，每天逐渐调低水温，直到数天之后完全使用冷水，此后则无论冬夏都持之以恒。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变化都是如此，需要温和地过渡，令人难以察觉，照此我们就能无惊无险、毫无痛苦地使自己的身体适应任何情况。

How fond mothers are like to receive this doctrine is not hard to foresee. What can it be less, than to murder their tender babes, to use them thus? What! Put their feet in cold water in frost and snow, when all one can do is little enough to keep them warm? A little to remove their fears by examples, without which the plainest reason is seldom hearken'd to: Senecatells us of himself, Ep. 53, and 83, that he used to bathe himself in cold spring-water in the midst of winter. This, if he had not thought it not only tolerable, but healthy too, he would scarce have done, in an exorbitant fortune, that could well have borne the expense of a warm bath, and in an age (for he was then old) that would have excused greater indulgence. If we think his stoicalprinciples led him to this severity, let it be so, that this sect reconciled cold water to his sufferance. What made it agreeable to his health? For that was not impair'd by this hard usage. But what shall we say to Horace, who warm'd not himself

with the reputation of any sect, and least of all affected stoical austerities? yet he assures us, he was wont in the winter season to bathe himself in cold water. But, perhaps, Italy will be thought much warmer than England, and the chillness of their waters not to come near ours in winter. If the rivers of Italy are warmer, those of Germany and Poland are much colder, than any in this our country, and yet in these, the Jews, both men and women, bathe all over, at all seasons of the year, without any prejudice to their health. And every one is not apt to believe it is miracle, or any peculiar virtue of St. Winifred's well, that makes the cold waters of that famous spring do no harm to the tender bodies that bathe in it. Everyone is now full of the miracles done by cold baths on decay'd and weak constitutions, for the recovery of health and strength; and therefore they cannot be impracticable or intolerable for the improving and hardening the bodies of those who are in better circumstances.

不难预料溺爱孩子的母亲们会对这一主张做出什么反应：如此对待她们娇弱的宝宝，岂不等同谋害？这是什么道理！寒冬腊月，费劲气力使双脚保暖尚觉不足，这下竟要将脚泡在冷水里？若不举几个例子以驱散她们的恐惧，只怕最简单的道理也无人信服：塞内加在第五十三和八十三封书信中告诉我们，他已习惯于在隆冬时节用冷冽的泉水沐浴。若不是觉得这不仅能够忍受，而且有益健康，那他大可不必如此。以其巨大的财富，他尽可负担热水浴的花销，以其老迈的年纪，也尽可为更加奢侈的享受开脱。我们或许会想，是斯多葛派倡导禁欲与坚韧的信条促使其薄待自己，那么就算他对冷水的忍耐是信从了这教派的缘故，冷水浴又为何于他的健康有益呢？因为他的身体并未由于这种严酷的对待而受到损害。不过霍勒斯就不同了，他并不热衷于投身任何宗派，对斯多葛式的克己苦修更是毫无兴趣，但霍勒斯却告诉我们，他习惯在冬天洗冷水浴，这又怎么解释呢？或许人们会说，意大利的气候比英格兰温暖，因此冬天那里的冷水不见得有我们这里的凉。如果意大利的河水确实暖和一些，那么德国和波兰的河水

却比我国任何地方的都要冷冽，但就是在这些河水中，犹太男女一年四季沐浴全身，也未见其健康受到任何损害。并非所有人都相信这是个奇迹，抑或相信是因为圣温妮费德水井有什么神奇的力量，所以从这著名的泉眼中打出的冷水才不会危及沐浴者柔弱的身体。冷水浴能使体质衰弱之人恢复健康和体力，这一奇效现已人尽皆知；因此，身体较为健康之人靠冷水浴改善体质、强健体格也并非行不通或无法承受。

If these examples of grown men be not thought yet to reach the case of children, but that they may be judg'd still to be too tender, and unable to bear such usage, let them examine what the Germans of old, and the Irish now, do to them, and they will find, that infants too, as tender as they are thought, may, without any danger, endure bathing, not only of their feet, but of their whole bodies, in cold water. And there are, at this day, ladies in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who use this discipline to their children in the midst of winter, and find that cold water does them no harm, even when there is ice in it.

假如有人认为这些成人的例子并不适用于儿童，理由是儿童身体柔弱，难以承受这种锻炼，那就让他们看看古代的德国人以及今天的爱尔兰人是怎样对待儿童的，即使那些被认为幼小柔弱的婴儿，不仅能够完全适应冷水足浴，甚至全身冷水浴，而没有任何危险。时至今日，苏格兰高地的妇女仍在寒冬用这个方法锻炼她们的孩子，即使水中结冰，冷水浴也伤不到孩子。

8 . I shall not need here to mention swimming, when he is of an age able to learn, and has any one to teach him. 'Tis that saves many a man's life; and the Romans thought it so necessary, that

they rank'd it with letters; and it was the common phrase to mark one ill-educated, and good for nothing, that he had neither learnt to read nor to swim: *Nec literasdidicit nec natare* . But, besides the gaining a skill which may serve him at need, the advantages to health by often bathing in cold water during the heat of summer, are so many, that I think nothing need be said to encourage it; provided this one caution be us'd, that he never go into the water when exercise has at all warm'd him, or left any emotion in his blood or pulse.

第8节．当孩子到了能够学习游泳的年纪，并且有人教导，他就应当熟悉水性，这本不必我在此多言。游泳使许多人免于丧命，罗马人视其为基本技能，其重要性与学识相当。若要形容某人不学无术、一无是处，一种惯常的说法就是他既不懂阅读也不会游泳。不过，游泳除了是一项可在紧要关头发挥作用的技能，经常在炎炎夏日沐浴在凉水中对健康的益处也数不胜数，想必我亦无须多言为其鼓吹；只有一点应当注意，那就是运动后，通体发热或血脉勃兴之际切勿下水游泳。

9．Another thing that is of great advantage to every one's health, but especially children's, is to be much in the open air, and as little as may be by the fire, even in winter. By this he will accustom himself also to heat and cold, shine and rain; all which if a man's body will not endure, it will serve him to very little purpose in this world; and when he is grown up, it is too late to begin to use him to it. It must be got early, and by degrees. Thus the body may be brought to bear almost anything. If I should advise him to play in the wind and sun without a hat, I doubt whether it could be borne. There would a thousand objections be made against it, which at last would amount to no more, in truth, than being sun-burnt.

And if my young master is to be kept always in the shade, and never expos'd to the sun and wind for fear of his complexion, it may be a good way to make him a beau, but not a man of business. And although greater regard be to be had to beauty in the daughters; yet I will take the liberty to say, that the more they are in the air,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ir faces, the stronger and healthier they will be; and the nearer they come to the hardships of their brothers in their education, the greater advantage will they receive from it all the remaining part of their lives.

第9节．还有一点对每个人的健康都大有裨益，儿童更是会受益良多，那就是多在户外活动，并尽量减少待在火炉边的时间，即使冬季也应如此。如此一来，不论寒暑晴雨，他均会习以为常。假若一个人的身体无法承受这些，那他在这世上将无所作为，而等他长大成人再加以训练就太晚了。习惯养成定须早，且宜循序渐进。由此，身体就几乎经得起任何情况的考验。如果我建议在风里奔跑，在烈日下玩耍时不必戴着帽子，我真怀疑这一点能否被接受。针对它会有一千种反对的声音，而事实上，这样做的后果最多不过是晒黑一些。如果我们的小主人总被守护在树阴下，由于担心影响肤色而从不接受风吹日晒，这或许算得上养成纨绔子弟的良方，却无法培育出经世之才。尽管女孩会因为受到精心的呵护而成就美貌，但我仍要冒昧直言，若对相貌一视同仁，她们越是常在户外活动，就会越结实健康；她们所受教育的艰苦程度越接近她们的兄弟，则其一生中获得的益处就越可观。

10．Playing in the open air has but this one danger in it, that I know; and that is, that when he is hot with running up and down, he should sit or lie down on the cold or moist earth. This I grant; and drinking cold drink, when they are hot with labour or exercise, bring more people to the grave, or to the brink of it, by fevers, and

other diseases, than anything I know. These mischiefs are easily enough prevented whilst he is little, being then seldom out of sight. And if, during his childhood, he be constantly and rigorously kept form sitting on the ground, or drinking any cold liquor whilst he is hot, the custom of forbearing, grown into habit, will help much to preserve him, when he is no longer under his maid's or tutor's eye. This is all I think can be done in the case: for, as years increase, liberty must come with them; and in a great many things he must be trusted to his own conduct, since there cannot always be a guard upon him, except what you have put into his own mind by good principles, and establish'd habits, which is the best and surest, and therefore most to be taken care of. For, from repeated cautions and rules, never so often inculcated, you are not to expect anything either in this, or any other case, farther than practice has establish'd them into habits.

第10节．就我所知，在户外玩耍只有一种危险，这一点我也承认，那就是在往复奔跑之后在冰冷潮湿的地面上坐卧；以及在劳动或锻炼过后燥热难耐时灌下冰凉的饮料，由此引起的发烧及其他病症比我知道的任何一种都厉害，能轻易将人送入坟墓，或带到坟墓的边缘。在孩子年幼、很少离开大人视线的时候，此类伤害极容易防止发生。如果在幼年受到严格约束，不随地坐卧，在热的时候始终远离任何冷饮，这种忍耐就会变得习以为常，等到脱离了女仆和家庭教师监督之后，也能有效地帮助他保护自己。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所能做的无过于此：因为随着孩子年龄渐增，并拥有越来越大的自由；在许多事情上，应该相信他可以自己应对。监护人不可能永远相伴在侧，此时可以依靠的就只是头脑中已经牢记的原则和幼年养成的习惯，而这些也是最恰当可靠，因此最认真对待的事情。任何不厌其烦的警告和约束，不论怎样反复灌输，除非通过训练使得习惯成自然，否则全不管用，在这里如此，在其他情况下亦如此。

Section 11-20

第11-20节

11 . One thing the mention of the girls brings into my mind, which must not be forgot; and that is, that your son's clothes be never made strait, especially about the breast. Let nature have scope to fashion the body as she thinks best. She works of herself a great deal better and exacter than we can direct her. And if women were themselves to frame the bodies of their children in their wombs, as they often endeavour to mend their shapes when they are out, we should as certainly have no perfect children born, as we have few well-shap'd that are strait-lac'd, or much tamper'd with. This consideration should, methinks, keep busy people (I will not say ignorant nurses and bodice-makers) from meddling in a matter they understand not; and they should be afraid to put nature out of her way in fashioning the parts, when they know not how the least and meanest is made. And yet I have seen so many instances of children receiving great harm from strait-lacing, that I cannot but conclude there are other creatures as well as monkeys, who, little wiser than they, destroy their young ones by senseless fondness, and too much embracing.

第11节．提到女孩子，我又想起一件应当谨记之事，那就是令嫒的衣衫切不可裁得太贴身，尤其是胸口部位。要为自然留有余地，按照她认为最好的方式塑造体格。自然的施为更加精准合宜，远胜过我们能指导她的。如果孩子尚在子宫中时妇女便能自行塑造他们的躯体，就像孩子出生之后她们竭力为其塑型一样，那必定不会诞生完善的儿童，正如在经过一番衣衫捆缚、百般约束之后优美的形体便所剩

无几。据我看来，应当关注的是避免让那些无事忙（我就不用提到那些无知的保姆和紧身衣制造者）干预他们不明白之事，既然他们对于身体的形成一无所知，就应当对自然心怀畏惧，莫让她偏离自己的轨道。我已见过许多儿童由于衣衫束缚而深受其害的例子，由此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些生物并不比猴子聪明，他们像猴子一样用无知的溺爱和过度的关照生生毁掉了他们的后代。

12 . Narrow breasts, short and stinking breath, ill lungs, and crookedness, are natural and almost constant effects of hard bodice, and clothes that pinch. That way of making slender wastes, and fine shapes, serves but the more effectually to spoil them.Nor can there indeed but be disproportion in the parts, when the nourishment prepared in the several offices of the body cannot be distributed as nature designs. And therefore what wonder is it, if, it being laid where it can, on some part not so braced, it often makes a shoulder or hip higher or bigger than its just proportion? 'Tis generally known, that the women of China, (imagining I know not what kind of beauty in it) by bracing and binding them hard from their infancy, have very little feet. I saw lately a pair of China shoes, which I was told were for a grown woman: they were so exceedingly disproportion'd to the feet of one of the same age among us, that they would scarce have been big enough for one of our little girls. Besides this, 'tis observ'd, that their women are also very little, and short-liv'd; whereas the men are of the ordinary stature of other men, and live to a proportionable age. These defects in the female sex in that country, are by some imputed to the unreasonable binding of their feet, whereby the fre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is hinder'd, and the growth and health of the whole body suffers. And how often do we see, that some small part of the foot being injur'd by a wrench or a blow, the whole leg or thigh thereby lose their strength and nourishment, and dwindle away? How much

greater inconveniences may we expect, when the thorax, wherein is placed the heart and seat of life, is unnaturally compress'd, and hinder'd from its due expansion?

第12节．胸部狭窄，呼吸短促带有口臭，肺部虚弱，身型佝偻，这些都是硬质紧身衣和狭小的衣衫带来的必然而常见的结果。为了纤细的腰肢和苗条的身型，这种方式反而对他们造成了严重损害。当身体各个器官储备的养分无法按照自然的轨迹运送，身体各部分的发育便难免失衡。于是，在那些未受束缚的部位，养分易于堆积，常常造成不成比例的高肩或大臀，这又何足为奇？众所周知，中国妇女自幼紧紧缠裹双脚，使得其形态娇小（我无法想象这美在何处）。最近我见到一双据说是中国成年妇女穿的鞋子：与我们这个时代同龄妇女的双脚相比，它们极为不成比例，简直只够我们这儿的小女孩穿。除此之外，据观察，他们的妇女也同样非常矮小，而且短命；而男人的身材却和别处的男人相当，且能活到相应的岁数。有人把中国妇女的这些缺陷归咎于她们荒唐的缠足，导致血液无法正常流通，最终整个身体的成长与健康也受到损害。我们不是常常看到一个人因脚的一小部分扭伤或碰伤，就使得整条腿气力不济、营养丧失、直到萎缩吗？而胸口内部是心脏的居所、生命的根基，当它遭受违背自然的挤压而无法正常扩张的时候，会造成多大的麻烦不是可想而知吗？

13．As for his diet, it ought to be very plain and simple; and, if I might advise, flesh should be forborne as long as he is in coats, or at least till he is two or three years old. But whatever advantage this may be to his present and future health and strength, I fear it will hardly be consented to by parents, misled by the custom of eating too much flesh themselves, who will be apt to think their children, as they do themselves, in danger to be starv'd, if they have not flesh at least twice a-day. This I am sure, children would breed their teeth with much less danger, be freer from diseases whilst they

were little, and lay the foundations of an healthy and strong constitution much surer, if they were not cramm'd so much as they are by fond mothers and foolish servants, and were kept wholly from flesh the first three or four years of their lives. But if my young master must needs have flesh, let it be but once a day, and of one sort of a meal. Plain beef, mutton, veal, &c. without other sauce than hunger, is best; and great care should be used, that he eat bread plentifully, both alone and with everything else; and whatever he eats that is solid, make him chew it well. We English are often negligent herein; from whence follow indigestion, and other great inconveniences.

第13节．至于孩子的饮食，则应极为清淡简单，而且我主张，在他还是身着童装的小孩子时，或至少在他满两三岁之前，应当避免肉食。但是，暂且不论这在现在或将来能对他的健康和体力产生多大好处，我担心几乎没有父母会表示赞同。因为他们自己养成了过多食肉的错误习惯，便经常担心如果一天食肉少于两次，他们的孩子会和自己一样面临挨饿的风险。我敢保证，如果儿童不被溺爱的母亲及愚昧的佣人塞得过饱，并且在生命最初的三四年彻底远离肉食，那他们牙齿萌出时风险一定会更小，年幼时更少患病，为健康强健的体质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但如果我的小主人一定得吃肉，那也只能一天一次，并且限定于一种肉类。最好是简单烹制的牛肉、羊肉及小牛肉一类，因为他们是在饥饿的情况下吃的，所以不必用其他酱汁调味。还应特别关注，不论有无佐餐之物，他都应吃下足量的面包。并且不管食用何种固体食物，都应让他仔细嚼碎。我们英国人于此通常漠不关心，于是消化不良及其他种种大麻烦便随之而来。

14．For breakfast and supper, milk, milk-pottage, water-gruel, flummery, and twenty other things, that we are wont to make in England, are very fit for children; only, in all these, let care be

taken that they be plain, and without much mixture, and very sparingly season'd with sugar, or rather none at all; especially all spice, and other things that may heat the blood, are carefully to be avoided. Be sparing also of salt in the seasoning of all his victuals, and use him not to high-season'd meats. Our palates grow into a relish and liking of the seasoning and cookery which by custom they are set to; and an over-much use of salt, besides that it occasions thirst, and over-much drinking, has other ill effects upon the body. I should think that a good piece of well-made and well-bak'd brown bread, sometimes with, and sometimes without butter or cheese, would be often the best breakfast for my young master. I am sure. 'Tis as wholesome, and will make him as strong a man as greater delicacies; and if he be used to it, it will be as pleasant to him. If he at any time calls for victuals between meals, use him to nothing but dry bread. If he be hungry more than wanton, bread alone will down; and if he be not hungry, 'tis not fit he should eat. By this you will obtain two good effects: (1)That by custom he will come to be in love with bread; for, as I said, our palates and stomachs too are pleased with the things we are used to. (2)Another good you will gain hereby is, that you will not teach him to eat more nor oftener than nature requires. I do not think that all people's appetites are alike; some have naturally stronger, and some weaker stomachs. But this I think, that many are made gormands and gluttons by custom, that were not so by nature; and I see in some countries, men as lusty and strong, that eat but two meals a-day, as others that have set their stomachs by a constant usage, like larums, to call on them for four or five. The Romans usually fasted till supper, the only set meal even of those who eat more than once a-day; and those who us'd breakfast, as some did, at eight, some at ten, others at twelve of the clock, and some later, neither eat flesh, nor had anything made ready for them. Augustus, when the greatest monarch on the earth, tells us, he took a bit of dry bread in his

chariot. And Seneca, in his 83rd Epistle, giving an account how he managed himself, even when he was old, and his age permitted indulgence, says, that he used to eat a piece of dry bread for his dinner, without the formality of sitting to it, thoughhis estate would as well have paid for a better meal (had health requir'd it) as any subject's in England, were it doubled. The masters of the world were bred up with this spare diet; and the young gentlemen of Rome felt no want of strength or spirit, because they eat but once a day. Or if it happen'd by chance, that anyone could not fast so long as till supper, their only set meal, he took nothing but a bit of dry bread, or at most a few raisins, or some such slight thing with it, to stay his stomach. This part of temperance was found so necessary both for health and business, that the custom of only one meal a day held out against that prevailing luxury which their Eastern conquests and spoils had brought in amongst them; and those who had given up their old frugal eating, and made feasts, yet began them not till the evening. And more than one set meal a-day was thought so monstrous, that it was a reproach as low down as Caesar's time, to make an entertainment, or sit down to a full table, till towards sun-set; and therefore, if it would not be thought too severe, I should judge it most convenient that my young master should have nothing but bread too for breakfast. You cannot imagine of what force custom is; and I impute a great part of our diseases in England, to our eating too much flesh, and too little bread.

第14节．就早餐和晚餐而言，牛奶、奶糊、稀粥、麦片粥等二十余种我们英国人惯用的食物都非常适合于儿童，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它们应制作清淡，配料简单，糖以少加甚至不加为宜，而应极力避免所有辛辣味及一切活血之物。他的所有食物都应少盐，同时不要让他经常吃调味过重的肉食。我们的味觉经由习惯变得挑剔，喜好的调味

品及烹饪方式，过度用盐除了导致口渴及饮水过量之外，还会对身体造成其他种种伤害。我认为一块制作合宜、烘焙适度的谷物面包，间或涂上黄油或奶酪，通常最适合作为我们小主人的早餐。这无疑和美味佳肴一样有益健康，并同样使他长得结实健壮。而一旦养成习惯，他也会喜爱这种味道。如果他在两餐之间想吃东西，那么除干面包外，不要给他别的。如果他真的感到饿而非任性胡闹，那么单有面包便够了；而如果他并不饿，那压根就不该吃东西。这样做会产生令人满意的双重效果：（1）习惯之后他会爱吃面包，因为正如我所说的，我们的味觉和肠胃乐于接受我们习惯了的东西。（2）你从中得到的另一点好处就是，你不会让他吃得太多或太频繁，以至超出自然需要。我不认为所有人的胃口都大同小异，有些人天生食欲旺盛，而有些人则脾胃虚弱。但我觉得贪恋美食的饕餮之徒都是习惯造就的，他们天生并非如此。据我所见，有些国家的人民和别处一样身强力壮，而一天只吃两餐；在另一些国家，人们的胃却忙活得仿佛上了闹钟，一天四五次招呼他们吃饭。罗马人通常直到晚间才进食，即使他们一天进餐不止一次，也只有晚餐是固定的。对于那些用早餐的人，不论早餐是在八点、十点、十二点还是更晚，他们既不吃肉也没有现成的食物可以享用。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帝王奥古斯都告诉我们，他在自己的战车上只吃点干面包。塞内加在第八十三封书信中描述了他如何自控。即使上了岁数，尽可因年老而放纵一下的时候，他仍习惯以一块干面包充当正餐，甚至不按常规坐下用餐。要知道，凭他的财富，完全可以像任何一个英国人那样，享用更丰盛的食物（如果出于健康原因需要这样做），哪怕双份也绰绰有余。这些伟大的人物都严格控制了饮食，罗马的年轻绅士也并没有因为一天只吃一餐而感到体力下降或精力不济。如果偶然有人饿得撑不到晚餐时间，而那又是唯一固定的一餐，那也只会吃一点干面包，至多加上少许葡萄干之类的小食，聊以充饥。这种克己的精神无论对于健康还是事业都必不可少，在他们东征胜利，劫掠而来的货物使得奢靡享乐蔚然成风之时，一天一餐的习惯依然不改，即使有些人背弃了粗茶淡饭的旧习而大张盛宴，他们不到晚间也绝不会开席。每天固定用餐多于一次被视作骇人听闻之事，直到恺撒时代，黄昏之前开宴或赴宴仍会受到指责。因此，如果大家不认为这要求过于严苛的话，我主张我的小主人最好早

餐也只吃面包。你无法想象习惯的力量有多强大；而且我认为英国人的许多疾病是我们吃肉太多而吃面包太少造成的。

15 . As to his meals, I should think it best, that as much as it can be conveniently avoided, they should not be kept constantly to an hour: for when custom has fix'd his eating to certain stated periods, his stomach will expect victuals at the usual hour, and grow peevish if he passes it; either fretting itself into a troublesome excess, or flagging into a downright want of appetite. Therefore I would have no time kept constantly to for his breakfast, dinner and supper, but rather vary'd almost every day. And if betwixt these, which I call meals, he will eat, let him have, as often as he calls for it, good dry bread. If anyone think this too hard and sparing a diet for a child, let them know, that a child will never starve nor dwindle for want of nourishment, who, besides flesh at dinner, and spoon-meat, or some such other thing, at supper, may have good bread and beer as often as he has a stomach. For thus, upon second thoughts, I should judge it best for children to be order'd. The morning is generally design'd for study, to which a full stomach is but an ill preparation. Dry bread, though the best nourishment, has the least temptation; and nobody would have a child cramm'd at breakfast, who has any regard to his mind or body, and would not have him dull and unhealthy. Nor let anyone think this unsuitable to one of estate and condition. A gentleman in any age ought to be so bred, as to be fitted to bear arms, and be a soldier. But he that in this, breeds his son so, as if he design'd him to sleep over his life in the plenty and ease of a full fortune he intends to leave him, little considers the examples he has seen, or the age he lives in.

第15节．至于孩子的用餐的时间，我认为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最好不要始终固定不变，因为他如果养成了在规定时间进食的习惯，那么他的肠胃到点就会期盼食物，而一旦过了点就要闹脾气，不是烦躁不安，暴饮暴食，就是情绪低落，食欲不振。因此我不主张一日三餐钟点固定，不如每日变动为佳。此三餐我称之为正餐，如果三餐之间他想吃东西，不论次数多少，可随时给他制作得宜的干面包。如果有人认为这样的饮食对一个孩子来说过于简单刻薄，那他应当知道，只要保证孩子午餐有肉，晚餐有汤羹之类，饿的时候还随时有适于他的面包和啤酒，那么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挨饿或因营养不良而衰弱。因此三思之下，我认为这是对待儿童最好的办法。早晨通常是念书的时间，吃得过饱则对此大为不利。干面包营养最丰富，诱惑力却最小。任何人如果为孩子的头脑和身体着想，不希望他思维迟钝、健康不佳的话，就不会在早餐时将他塞得过饱。人们也不应当认为这一点对于有产业、有身份的人就不适用。一名绅士，不论年龄，都应如此养育，使他适宜从军，成为一个战士。而那种要将全部产业留给儿子，任其成为富足安逸而虚度岁月的绅士，既不懂得从以往见过的事例中吸取教训，也不虑及自己生活的时代。

16．His drink should be only small beer; and that too he should never be suffer'd to have between meals, but after he had eat a piece of bread. The reasons why I say this are these.

第16节．孩子的饮料应当仅限于淡啤酒，并且不能容许他在两餐之间饮用，除非在吃过一点面包之后。我这样说的理由如下：

17．(1)More fevers and surfeits are got by people's drinking when they are hot, than by any one thing I know. Therefore, if by play he be hot and dry, bread will ill go down; and so if he cannot have drink but upon that condition, he will be forced to forbear; for, if he be very hot, he should by no means drink; at least a good

piece of bread first to be eaten, will gain time to warm the beer blood-hot, which then he may drink safely. If he be very dry, it will go down so warm'd, and quench his thirst better; and if he will not drink it so warm'd, abstaining will not hurt him. Besides, this will teach him to forbear, which is a habit of greatest use for health of body and mind too.

第17节．（1）在感到燥热时喝淡啤酒比任何情况都更容易导致发热和积食。因此，假如他玩得又热又渴，面包便会难以下咽，而如果他只能在吃过面包的情况下喝饮料，那他只有被迫忍耐干渴，因为在他很热的时候，决不能喝酒，至少也要先吃下一大块面包，匀出时间将啤酒加热到体温，这样喝下去才于身体无害。如果他唇焦舌燥，喝下温热的啤酒能更好地解渴；而如果他不肯放至室温再喝，忍耐口渴也不会有什么害处。除此之外，这还能教会他自我克制，这一习惯对于身心健康均有极大好处。

18．(2)Not being permitted to drink without eating, will prevent the custom of having the cup often at his nose; a dangerous beginning, and preparation to good-fellowship. Men often bring habitual hunger and thirst on themselves by custom. And if you please to try, you may, though he be wean'd from it, bring him by use to such a necessity again of drinking in the night, that he will not be able to sleep without it. It being the lullaby used by nurses to still crying children, I believe mothers generally find some difficulty to wean their children from drinking in the night, when they first take them home. Believe it, custom prevails as much by day as by night; and you may, if you please, bring any one to be thirsty every hour.

第18节．（2）规定用餐以外的时间不许饮酒，可以防止滥饮成习；在友谊萌芽之际，滥饮成习是很危险的。习惯性的饥饿和口渴往往由自己一手造成。如果你愿意，可以尝试让一个晚上已不再喝奶的孩子重新养成这个习惯，那么他不喝就没法入睡。看护们常用这个法子让哭闹的小孩安静，所以母亲们刚把孩子带回家时，往往会感到让孩子在晚上断奶很困难。请注意，习惯的作用在白天和晚上一样重要。只要你愿意，就能让一个人随时都感到口渴。

I once liv'd in a house, where, to appease a forward child, they gave him drink as often as he cry'd; so that he was constantly bibbing. And though he could not speak, yet he drank more in twenty-four hours than I did. Try it when you please, you may with small, as well as with strong beer, drink yourself into a drought. The great thing to be minded in education is what habits you settle; and therefore in this, as all other things, do not begin to make anything customary, the practice whereof you would not have continue and increase. It is convenient for health and sobriety, to drink no more than natural thirst requires; and he that eats not salt meats, nor drinks strong drink, will seldom thirst between meals, unless he has been accustom'd to such unseasonable drinking.

有一回在借宿的人家，大人为了安抚淘气的孩子，只要一哭就给他喝奶，结果那孩子就不停地喝。他虽然还不会说话，但二十四小时下来喝的东西比我还多。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尝试不停地喝啤酒，不管浓度几何，非喝到口干舌燥不可。教育中一定要注意习惯的养成。因此，如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如果不想保持和强化某种行为，就不要任其习惯成自然。为了健康和节制起见，饮水不应超过所需。若非无节制地喝水，在没吃咸肉或喝烈酒的情况下，人极少会在餐间感到口渴。

19 . Above all, take great care that he seldom, if ever, taste any wine or strong drink. There is nothing so ordinarily given children in England, and nothing so destructive to them. They ought never to drink any strong liquor but when they need it as a cordial, and the doctor prescribes it. And in this case it is that servants are most narrowly to be watch'd and most severely to be reprehended when they transgress. Those mean sorts of people, placing a great part of their happiness in strong drink, are always forward to make court to my young master by offering him that which they love best themselves: and finding themselves made merry by it, they foolishly think 'twill do the child no harm. This you are carefully to have your eye upon, and restrain with all the skill and industry you can, there being nothing that lays a surer foundation of mischief, both to body and mind than children's being us'd to strong drink, especially to drink in private with the servants.

第19节．请特别注意，保证孩子极少或完全不接触葡萄酒或烈酒。在英国，这是孩子们最常接触到的东西，危害也最大。儿童不应饮用任何烈酒，除非由医生开处方，作为补品服用。在这方面，需要盯紧仆人，一旦违规则应受到最严厉的处罚。那些自己沉溺酒精的卑鄙之人，总想要拿自己的最爱来讨小主人欢心：他们沉溺其中，还愚蠢地认为酒对孩子没什么坏处。为此你必须多加小心，尽一切可能严厉制止，因为一旦养成了酗酒的恶习，尤其是偷偷和仆人一起喝酒，就会毁坏孩子的身心，埋下顽劣的祸根。

20 . Fruit make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hapters in the government of health, especially that of children. Our first parents ventur'd Paradise for it; and 'tis no wonder our children cannot stand the temptation, though it cost them their health. The regulation of this cannot come under any one general rule; for I am

by no means of their mind, who would keep children almost wholly from fruit, as a thing totally unwholesome for them; by which strict way, they make them but the more ravenous after it, and to eat good or bad, ripe or unripe, all that they can get, whenever they come at it. Melons, peaches, most sorts of plums, and all sorts of grapes in England, I think children should be wholly kept from, as having a very tempting taste, in a very unwholesome juice; so that if it were possible, they should never so much as see them, or know there were any such thing. But strawberries, cherries, goose-berries, or currants, when thorough ripe, I think may be very safely allow'd them, and that with a pretty liberal hand, if they be eaten with these cautions: (1) Not after meals, as we usually do, when the stomach is already full of other food: but I think they should be eaten rather before or between meals, and children should have them for their breakfast. (2)Bread eaten with them. (3)Perfectly ripe. If they are thus eaten, I imagine them rather conducing than hurtful to our health. Summer-fruits, being suited to the hot season of the year they come in, refresh our stomachs, languishing and fainting under it; and therefore I should not be altogether so strict in this point, as some are to their children; who being kept so very short, instead of a moderate quantity of well-chosen fruit, which being allow'd them would content them, whenever they can get loose, or bribe a servant to supply them, satisfy their longing with any trash they can get, and eat to a surfeit.

第20节．水果是健康管理中最难的部分，尤其是对于儿童而言。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为了苹果，甘冒失去天堂的危险，无怪乎孩子们也难敌诱惑，尽管那是以他们的健康为代价的。关于水果的规范不一而足。因为我绝不是那种认为水果一无是处，而要孩子们避而远之的人。过于严厉只会使他们更渴望水果，于是不论优劣，成熟与否，一旦到手就统统塞进肚里。我认为儿童最好完全不碰瓜、桃、大部分李

子，以及英国的各种葡萄，因为这些水果虽然味美，但汁液并不健康。因此尽量不要儿童看到，或者根本不要让他们知道有这些水果存在。但是草莓、樱桃、醋栗或黑加仑完全成熟以后，我认为可以放心地让孩子们吃。只要注意以下事项，多吃点也无碍：（1）不要像我们平时那样餐后吃水果，那时候胃里已经全是其他的食物。我认为应该在餐前或两餐之间吃，早餐也应该吃水果。（2）水果和面包一起吃。（3）确保水果完全成熟。做到这几点，我以为水果对身体有益无害。夏季水果适合在当季食用。天气炎热，脾胃虚弱，水果恰可以开胃，所以我不会像有些人那样严禁孩子们吃水果。孩子们能够得到少量的水果而不是精选的适量水果，那么提供给他们的水果足以让他们满足。相反，如果过度限制，一旦放松对他们的管制，或他们通过贿赂仆人弄到水果，就会顾不得挑选，且毫无节制。

Apples and pears too, which are thorough ripe, and have been gather'd some time, I think may be safely eaten at any time, and in pretty large quantities, especially apples; which never did anybody hurt, that I have heard, after October.

待苹果和梨完全成熟，采摘后放置一段时间，我认为可以随时安全食用，多吃点也无妨。尤其是苹果，据说十月以后完全无害。

Fruits also dry'd without sugar, I think very wholesome. But sweet-meats of all kinds are to be avoided; which whether they do more harm to the maker or eater, is not easy to tell. This I am sure, it is one of the most inconvenient ways of expense that vanity hath yet found out; and so I leave them to the ladies.

我认为水果不加糖晒干也很健康。但应避免食用各种果脯蜜饯，

很难说清对制作者还是食用者危害更大。可以确定的是，果脯蜜饯是虚荣心所致的最麻烦的花费之一，所以我还是把它们留给女士们去做这些事吧。

Section 21-30

第21-30节

21 . Of all that looks soft and effeminate, nothing is more to be indulg'd children, than sleep. In this alone they are to be permitted to have their full satisfaction; nothing contributing more to the growth and health of children, than sleep. All that is to be regulated in it, is, in what part of the twenty-four hours they should take it; which will easily be resolved, by only saying that it is of great use to accustom 'em to rise early in the morning. It is best so to do, for health; and he that, from his childhood, has, by a settled custom, made rising betimes easy and familiar to him, will not, when he is a man, waste the best and most useful part of his life in drowsiness, and lying a-bed. If children therefore are to be call'd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it will follow of course, that they must go to bed betimes; whereby they will be accustom'd to avoid the unhealthy and unsafe hours of debauchery, which are those of the evenings; and they who keep good hours, seldom are guilty of any great disorders. I do not say this, as if your son, when grown up, should never be in company past eight, nor ever chat over a glass of wine 'till midnight. You are now, by the accustoming of his tender years, to indispose him to those inconveniences as much as you can; and it will be no small advantage, that contrary practice having made sitting up uneasy to him, it will make him often avoid, and very seldom propose midnight-revels. But if it should not reach so far, but fashion and company should prevail, and make him live as others do above twenty, 'tis worth the while to accustom him to early rising and early going to bed, between this and that, for the present improvement of his health and other advantages.

第21节．在所有看来平缓柔和的事情中，没有什么比睡眠更应吸引孩子了。睡眠本身应该得到充分满足，因为睡眠最能促进儿童成长和身体健康。需要规定的是，二十四小时中哪段时间应该睡觉。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让儿童养成早起的习惯即可。这样对健康最为有益；从小养成按时起床习惯并习以为常的人，长大之后就不会把生活中最重要的时间浪费在瞌睡和赖床上。如果孩子要早早被叫醒，自然而然就必须按时上床睡觉。这样他就不会养成夜间鬼混的习惯，那样既不健康也不安全。按时作息的人很少为生活无序感到内疚。这并不表示，令郎长大以后，也不能和朋友呆到八点以后，或者彻夜把酒言欢。只不过尽可能让他在年少时，对熬夜一类的事情感到不便。这样做有极大的好处，因为不习惯熬夜，他就会尽量避免深夜的活动，并极少自己冒出这样的想法。即使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他在风气和朋友的压力下，二十岁以后变得像其他年轻人一样生活，那么仍然值得在此前让他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以调理身体，并带来其他方面的益处。

Though I have said, a large allowance of sleep, even as much as they will take, should be made to children when they are little; yet I do not mean, that it should always be continued to them in so large a proportion, and they suffer'd to indulge a drowsy laziness in their bed, as they grow up bigger. But whether they should begin to be restrained at seven or ten years old, or any other time, is impossible to be precisely determined. Their tempers, strength, and constitutions, must be consider'd. But sometime between seven and fourteen, if they are too great lovers of their beds, I think it may be seasonable to begin to reduce them by degrees to about eight hours, which is generally rest enough for healthy grown people. If you have accustom'd him, as you should do, to rise constantly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this fault of being too long in bed will easily be reform'd, and most children will be forward enough to shorten that

time themselves, by coveting to sit up with the company at night; though if they be not look'd after, they will be apt to take it out in the morning, which should by no means be permitted. They should constantly be call'd up and made to rise at their early hour; but great care should be taken in waking them, that it be not done hastily, nor with a loud or shrill voice, or any other sudden violent noise. This often affrights children, and does those great harm; and sound sleep thus broke off, with sudden alarms, is apt enough to discompose any one. When children are to be waken'd out of their sleep, be sure to begin with a low call, and some gentle motion, and so draw them out of it by degrees, and give them none but kind words and usage, 'till they are come perfectly to themselves, and being quite dress'd you are sure they are thoroughly awake. The being forc'd from their sleep, how gently so ever you do it, is pain enough to them; and care should be taken not to add any other uneasiness to it, especially such that may terrify them.

尽管刚才提到，小孩子应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甚至想睡多久都可以，但是并不应意味着长大后还保持如此长的睡眠时间，那样他们会慵懒倦怠、贪睡不起。但是究竟应该从七岁、十岁，或者其他时间开始约束，无法精确指定，当视其性情、力量和体质而定。在七岁到十四岁之间的某个年龄，如果发现儿童过于贪恋床褥，我想就可以开始逐渐将睡眠时间减少至八小时，这通常对于健康的成年人已经足够。你应该帮助孩子养成早期的习惯，如果做到的话，贪睡的问题会容易得到纠正。儿童多半愿意少睡一些，晚上多玩一会儿。但是如果大人不管，他们会试图在早上补回来，此时应严厉制止。每天早上都要叫孩子们早起，但在唤醒他们时须谨慎行事，不能匆忙，也不要大嚷或尖声叫嚷，或者用突如其来的粗暴声响把他们吵醒。因为这样会吓到孩子，对他们造成伤害。睡意正浓时突然惊醒，任何人都会感到烦躁。在叫孩子起床时，声音和动作要轻，逐渐地把他们带出梦境。话语一定要温柔，耐心等他们完全醒来穿好衣服，便知道他们彻底醒

了。如果强迫他们从睡眠中醒来，就算是再小心翼翼，他们也是痛苦的。所以要特别注意不要加重不安，尤其不能让他们受到惊吓。

22 . Let his bed be hard, and rather quilts than feathers. Hard lodging strengthens the parts; whereas being bury'd every night in feathers melts and dissolves the body, is often the cause of weakness, and forerunner of an early grave. And, besides the stone, which has often its rise from this warm wrapping of the reins, several other indispositions, and that which is the root of them all, a tender weakly constitution, is very much owing to down-beds. Besides, he that is used to hard lodging at home will not miss his sleep (where he has most need of it) in his travels abroad, for want of his soft bed, and his pillows laid in order. And therefore, I think it would not be amiss, to make his bed after different fashions, sometimes lay his head higher, sometimes lower, that he may not feel every little change he must be sure to meet with, who is not design'd to lie always in my young master's bed at home, and to have his maid lay all things in print, and tuck him in warm. The great cordial of nature is sleep. He that misses that will suffer by it; and he is very unfortunate, who can take his cordial only in his mother's fine gilt cup, and not in a wooden dish. He that can sleep soundly takes the cordial; and it matters not whether it be on a soft bed or the hard boards. 'Tis sleep only that is the thing necessary.

第22节．要让孩子睡硬床，盖棉被而不是羽绒被。硬床能够使人身体强健；而每晚软绵绵地缩在羽绒被里容易造成体质虚弱，甚至缩短寿命。结石就常因腰部包裹过暖而起，其他各种小毛病，以及体虚这一病症之源，都在很大程度上跟羽绒被褥有关。此外，睡惯硬床的人在出门旅行（正是最需要睡觉）时，也不会因为床铺不够软，或者枕头摆放不整齐而失眠。因此，我认为铺床方式有所变换并无不妥，

枕头可以有高有低，这样就算有微小变动他也不会察觉。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我的小主人不会永远睡在自己的床上，永远有女仆把事情打理得妥妥当当、掖好被子让他温暖入睡。自然赠予的甘露就是睡眠。失眠的人将痛苦不堪，而那些只能在母亲准备的纤巧金杯中享用甘露，却用不了木质餐具的人则非常不幸。睡眠踏实的人随时可以享用甘露，至于是在松软的床上还是在硬板上则无关紧要。所以说唯有睡眠必须保证。

23 . One thing more there is, which has a great influence upon the health, and that is, going to stool regularly; people that are very loose, have seldom strong thoughts, or strong bodies. But the cure of this, both by diet and medicine, being much more easy than the contrary evil, there needs not much to be said about it; for if it come to threaten, either by its violence or duration, it will soon enough, and sometimes too soon, make a physician be sent for; and if it be moderate or short, it is commonly best to leave it to nature. On the other side, costiveness has too its ill effects, and is much harder to be dealt with by physic; purging medicines, which seem to give relief, rather increasing them than removing the evil.

第23节．还有一件事对健康影响甚大，那就是定时排便。排便频繁的人很少有强健的心智和体魄。不过不管是控制饮食，还是依靠药物，治愈频繁排便倒是比治疗便秘要容易得多，这一点无需赘言。因为不管是急性还是慢性，人们都会早早求助医生，而这有时未免显得操之过急了。而如果症状和缓或持续时间较短，通常可以自我康复。相反地，便秘也有其不良作用，且更难用药物解决。泻药可以治标，缓解症状，但无法治本，反倒可能使问题更严重。

24 . It being an indisposition I had a particular reason to

enquire into, and not finding the cure of it in books, I set my thoughts on work, believing that greater changes than that might be made in our bodies, if we took the right course, and proceeded by rational steps.

第24节．便秘这个毛病我特别研究过，但书本里没有提供疗法。我开始想，如果方法得当、循序渐进，从身体内部入手或许会有更大的效果。

(1)Then I consider'd, that going to stool, was the effect of certain motions of the body; especially of the peristaltic motion of the guts.

（1）首先我知道排便是身体特定活动，特别是肠道蠕动的结果。

(2)I consider'd that several motions, that were not perfectly voluntary, might yet, by use and constant application, be brought to be habitual, if by an unintermitted custom they were at certain seasons endeavour'd to be constantly produced.

（2）有些动作开始并非出于主动，但是有意识地坚持，久而久之便可成为习惯，只需要固定时间，不间断地努力。

(3)I had observ'd some men, who by taking after supper a pipe of tobacco, never fail'd of a stool, and began to doubt with myself,

whether it were not more custom, than the tobacco, that gave them the benefit of nature; or at least, if the tobacco did it, it was rather by exciting a vigorous motion in the guts, than by any purging quality; for then it would have had other effects.

（3）我注意到，有些人晚餐后吸一斗烟，就从来不会排便困难。这点让我困惑不已，恐怕是习惯使他们如此自如，而并非烟草。即便是烟草发挥了作用，也只不过刺激了肠道活动，并无促进排泄之效，不然应该还会引起其他效果。

Having thus once got the opinion that it was possible to make it habitual, the next thing was to consider what way and means was the likeliest to obtain it.

既然知道可以将之养成习惯，下一步便是怎样做才最有可能形成这种习惯。

(4)Then I guess'd, that if a man, after his first eating in the morning, would presently solicit nature, and try whether he could strain himself so as to obtain a stool, he might in time, by constant application, bring it to be habitual.

（4）设想如果一个人，每天早餐后，就去召唤自然，尽力尝试有意识地解手，如此坚持一段时间，就有可能形成习惯。

25．The reasons that made me chose this time, were,

第25节．我选择早餐这个时间有以下原因：

(1)Because the stomach being then empty, if it receiv'd anything grateful to it (for I would never, but in case of necessity, have any one eat but what he likes, and when he has an appetite) it was apt to embrace it close by a strong constriction of its fibres; which constriction, I suppos'd, might probably be continu'd on in the guts, and so increase their peristaltic motion, as we see in the Ileus, that an inverted motion, being begun anywhere below, continues itself all the whole length, and makes even the stomach obey that irregular motion.

（1）因为早起腹中空虚，吃了对胃口的食物（因为除非万不得已，我从不会让任何人吃不对胃口的食物，或者在他没胃口的时候强迫用餐），肠胃就会强烈收缩，紧密包裹食物。我想这种收缩很可能还会引起肠道的连续反应，从而加快蠕动。正如肠道梗阻时的相反动作，不管是从肠道下面哪里开始，都会一路传导上来，甚至让胃部也发生这种非正常的运动。

(2)Because when men eat, they usually relax their thoughts, and the spirits then, free from other employments, are more vigorously distributed into the lower belly, which thereby contribute to the same effect.

（2）因为用餐时，大脑通常比较放松，关注力得以转移到腹部，从而达到相同的目的。

(3)Because, whenever men have leisure to eat, they have leisure enough also to make so much court to Madam Cloacina, as would be necessary to our present purpose; but else, in the variety of human affairs and accidents, it was impossible to affix it to any hour certain, whereby the custom would be interrupted. Whereas men in health seldom failing to eat once a day, though the hour chang'd, the custom might still be preserv'd.

（3）因为只要得闲进食，就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向排污女神克罗阿西娜求助，而留出时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除了早餐以外，由于琐事缠身，就难以固定时间，这样就会破坏习惯。健康人士一天至少一餐，即使时间略有变化，仍可以保持习惯。

26．Upon these grounds the experiment began to be try'd, and I have known none who have been steady in the prosecution of it, and taken care to go constantly to the necessary-house, after their first eating, whenever that happen'd, whether they found themselves call'd on or no, and there endeavoured to put nature upon her duty, but in a few months they obtain'd the desired success, and brought themselves to so regular an habit, that they seldom ever fail'd of a stool after their first eating, unless it were by their own neglect: for, whether they have any motion or no, if they go to the place, and do their part, they are sure to have nature very obedient.

第26节．基于这些原因，便要开始实验了。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过去曾经形成规律，在每日第一餐后，不管需不需要，不管发生何事，均努力召唤自然。仅仅经过几个月，他们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养成了习惯。除了偶尔疏忽，都可以在第一餐后顺利如厕。因为不管

本来是否有意，只要肯去厕所，并努力完成，就一定能让自然听从指挥。

27 . I would therefore advise, that this course should be taken with a child every day presently after he has eaten his breakfast. Let him be set upon the stool, as if disburdeningwere as much in his power as filling his belly; and let not him or his maid know anything to the contrary, but that it is so; and if he be forc'd to endeavour, by being hinder'd from his play or eating again 'till he has been effectually at stool, or at least done his utmost, I doubt not but in a little while it will become natural to him. For there is reason to suspect, that children being usually intent on their play, and very heedless of anything else, often let pass those motions of nature, when she calls them but gently; and so they, neglecting the seasonable offers, do by degrees bring themselves into a habitual costiveness. That by this method costiveness may be prevented, I do more than guess; having known by the constant practice of it for some time, a child brought to have a stool regularly after his breakfast every morning.

第27节．因此我建议，在孩子们每天早上用完早餐后，就应该马上督促他们完成排便。让孩子坐在马桶上，让他感到排泄和进食一样都是受自我掌控的。让他或女仆知道事实如此，而不要有什么相反的想法。如果完不成，就不允许游戏或再次进食。或者至少得让他尽力而为，我相信很快他就会习惯。因为有理由猜想，孩子们脑中所想多是玩乐之事，对其他事情不甚留意，不到感觉强烈时不如厕，往往错过解手；因此儿童容易忽视适合的时间，日积月累便形成了习惯性便秘。而上述办法可防止便秘，我认为这不光是猜想。我就知道一个孩子，照此进行一段时间后，每天早餐后便可以有规律地解手。

28 . How far any grown people will think fit to make trial of it, must be left to them; though I cannot but say, that considering the many evils that come from that defect, of a requisite easing of nature, I scarce know anything more conducing to the preservation of health, than this is. Once in four and twenty hours, I think is enough; and no body, I guess, will think it too much. And by this means it is to be obtain'd without physic, which commonly proves very ineffectual in the cure of a settled and habitual costiveness.

第28节．成年人在多大程度上参照这个办法应由其自己决定；依我拙见，鉴于排泄不通带来的诸多坏处，我想不出任何比这件事对健康更有益处的了。一天排便一次就足够；估计也没有人会认为一天一次太频繁。这一目的借助以上方法就可达成，无须医药介入，医药常常在顽固和习惯性便秘面前束手无策。

29 . This is all I have to trouble you with concerning his management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his health. Perhaps it will be expected from me, that I should give some directions of physic, to prevent diseases; for which I have only this one, very sacredly to be observ'd, never to give children any physic for prevention. The observation of what I have already advis'd, will, I suppose, do that better than the ladies' diet-drinks or apothecaries' medicines. Have a great care of tampering that way, lest, instead of preventing, you draw on diseases. Nor even upon every little indisposition is physic to be given, or the physician to be call'd to children, especially if he be a busy man, that will presently fill their windows with gally-pots, and their stomachs with drugs. It is safer to leave them wholly to nature, than to put 'eminto the hands of one forward to tamper, or that thinks children are to be cur'd, in ordinary distempers, by anything but diet, or by a method very little distant from it: it

seeming suitable both to my reason and experience, that the tender constitutions of children should have as little done to them as is possible, and as the absolute necessity of the case requires. A little cold-still'd red poppy-water, which is the true surfeit-water with ease, and abstinence from flesh, often puts an end to several distempers in the beginning, which, by too forward applications, might have been made lusty diseases. When such a gentle treatment will not stop the growing mischief, nor hinder it from turning into a form'd disease, it will be time to seek the advice of some sober and discreet physician. In this part, I hope, I shall find an easy belief; and nobody can have pretence to doubt the advice of one who has spent some time in the study of physic, when he counsels you not to be too forward in making use of physic and physicians.

第29节．关于一般健康事项，我还有一点需要烦请各位注意。或许有人希望我可以就预防用药给出建议。这里我只有一个建议，而且一定要做到，那就是永远别给孩子吃药预防疾病。如果依照我的建议，我想效果会比女性的药酒或药剂师的药物更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恐怕不但不能防病，还会招来病症。甚至在身体微恙时，也不要每次都吃药，或者每次都叫医生来探视孩子，尤其是如果医生是个多事之人，他很有可能在病患的窗口摆满药瓶，让孩子胃里塞满药。相比之下，让身体自行康复较为安全，而不是把孩子交到倾向于干预治疗，或认为孩子生了普通疾病，需要通过食物以外的各种手段或类似手法治疗的人手上：从我的思考和经验来看，儿童体质柔弱，除了万不得已必须处理时，应尽可能减少外界干预。在某些疾病的初期，服用少许冷却后的红罂粟水，帮助消食，同时远离肉食，就足矣。过度的治疗反而会带来严重的疾病。如果这种温和疗法无法遏制疾病的萌芽，或者阻止其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才需要求助一位冷静而慎重的医生。在此，我希望能得到一种简单的信任；如果一个从事医药研究多年的人给出建议，请诸位不要过度用药，滥请医生，那么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怀疑这一建议。

30 . And thus I have done with what concerns the body and health, which reduces itself to these few and easy observable rules: plenty of open air, exercise, and sleep, plain diet, no wine or strong drink, and very little or no physic, not too warm and strait clothing, especially the head and feet kept cold, and the feet often us'd to cold water, and expos'd to wet.

第30节．有关身体和健康的问题就是这些，简而言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很容易遵守的原则：充足的户外活动，保证锻炼和睡眠，简单饮食，远离红酒或烈酒，少用或不用药，不要穿过暖或过紧的衣服，尤其是头和脚不要保暖，常用凉水洗脚，并使其经常沾水。

Section 31-40

第31-40节

31 . Due care being had to keep the body in strength and vigour, so that it may be able to obey and execute the orders of the mind; the next and principal business is, to set the mind right, that on all occasions it may be dispos'd to consent to nothing but what may be suitable to the dignity and excellency of a rational creature.

第31节．必须足够重视身体的强健与活力，这样身体才可能遵从并执行头脑的指令。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端正思想，使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理性生物的尊严和卓越。

32 . If what I have said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discourse be true, as I do not doubt but it is, viz. That the difference to be found in the manners and abilities of men is owing more to their education than to anything else, we have reason to conclude, that great care is to be had of the forming children's minds, and giving them that seasoning early, which shall influence their lives always after: For when they do well or ill, the praise and blame will be laid there; and when anything is done awkwardly, the common saying will pass upon them, that it's suitable to their breeding.

第32节．正如我在开头所言，人们举止和能力上可见的差别多半来自于教育，而非其他。如果如我所想，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对儿童心智形成的过程应加以充分的重视，及早

将有益的东西教给他们，从而影响他们此后的生活。因为在他们做出有益或有害的事情时，人们会赞扬和责备其受到的教育。在有些事情做得不合情理时，通常人们也会归咎于其受到的养育。

33 . As the strength of the body lies chiefly in being able to endure hardships, so also does that of the mind. And the great principle and foundation of all virtue and worth is plac'd in this: that a man is able to deny himself his own desires, cross his own inclinations, and purely follow what reason directs as best, though the appetite lean the other way.

第33节．正如身体的强壮主要体现在吃苦耐劳的能力上，精神也是如此。一切美德和价值的重要原则和基础就在于：一个人能够否定自我欲望，突破个体的癖好，能完全遵循理性所要求的最好的道路，即便欲望指向另一条路。

34 . The great mistake I have observ'd in people's breeding their children, has been, that this has not been taken care enough of in its due season: that the mind has not been made obedient to discipline, and pliant to reason, when at first it was most tender, most easy to be bow'd. Parents being wisely ordain'd by nature to love their children, are very apt, if reason watch not that natural affection very warily, are apt, I say, to let it run into fondness. They love their little ones and it is their duty; but they often, with them, cherish their faults too. They must not be cross'd, forsooth; they must be permitted to have their wills in all things; and they being in their infancies not capable of great vices, their parents think they may safe enough indulge their irregularities, and make themselves sport with that pretty perverseness which they think well enough

becomes that innocent age. But to a fond parent, that would not have his child corrected for a perverse trick, but excus'd it, saying it was a small matter, Solon very well reply'd, aye, but custom is a great one.

第34节．我发现人们教育孩子有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就是没有适时地对以下这点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在精神最为纤柔最易塑造的早期，让其遵从原则，顺从理智。大自然让父母爱自己的孩子是很明智的。但如果这种自然的情感得不到理性的充分监督，就容易变成溺爱。父母爱孩子是职责所在，但常常连错误也一并包容。诚然，孩子的事情不可以横加干涉。孩子们应当在所有事情上遵循自己的愿望，而且既然他们还小，没有能力为非作歹。让父母认为即使任性也无伤大雅，可以放任自流，还认为天真的年纪本该如此。但是面对如此溺爱子女、对孩子的不当行为不但不予纠正，反而寻找借口、认为是小事一桩的父母，梭伦有句话说的得非常好：的确如此，但习惯可是件大事。

35．The fondling must be taught to strike and call names, must have what he cries for, and do what he pleases. Thus parents, by humouring and cockering them when little, corrupt the principles of nature in their children, and wonder afterwards to taste the bitter waters, when they themselves have poison'd the fountain. For when their children are grown up, and these ill habits with them; when they are now too big to be dandled, and their parents can no longer make use of them as play-things, then they complain that the brats are untoward and perverse; then they are offended to see them wilful, and are troubled with those ill humours which they themselves infus'd and fomented in them; and then, perhaps too late, would be glad to get out those weeds which their own hands have planted, and which now have taken too deep root to be easily

extirpated. For he that hath been us'd to have his will in everything, as long as he was in coats, why should we think it strange, that he should desire it, and contend for it still, when he is in breeches? Indeed, as he grows more towards a man, age shew shis faults the more; so that there be few parents then so blind as not to see them, few so insensible as not to feel the ill effects of their own indulgence. He had the will of his maid before he could speak or go; he had the mastery of his parents ever since he could prattle; and why, now he is grown up, is stronger and wiser than he was then, why now of a sudden must he be restrain'd and curb'd? Why must he at seven, fourteen, or twenty years old, lose the privilege, which the parents' indulgence 'till then so largely allow'd him? Try it in a dog or an horse or any other creature, and see whether the ill and resty tricks they have learn'd when young, are easily to be mended when they are knit; and yet none of those creatures are half so wilful and proud, or half so desirous to be masters of themselves and others, as man.

第35节．孩子受到溺爱，必然学会打架骂人，不满足要求不罢休，并且为所欲为。因此如果家长一味地迁就和宠爱，违背了孩子成长的自然原则，到头来猛然发现自己亲手破坏了源头，便只能自食苦果。因为等到孩子长大成人，这些坏习惯将相伴相随。而此时他们已经过了被娇宠逗弄的年纪，父母再也不能以此为乐，便开始抱怨孩子没礼貌、不听话。随后因为孩子任性而生气，又为那些自己纵容孩子而挑起的坏脾气而苦恼。之后，虽然他们想要拔下自己亲手种下的杂草，怎奈这些杂草扎根太深已经很难去除，一切都太晚了。因为如果一个人小时候穿短大衣的时候，习惯于每次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那么他现在长大了穿马裤的时候仍然希望如此，且不得手不罢休，我们有什么理由觉得奇怪呢？实际上，随着长大成人，他的缺陷会随着年龄愈发凸显。到这个阶段几乎没有家长能假装视而不见，也几乎没有谁能对自己溺爱孩子的后果熟视无睹。如果一个人在学会说话或走

路前，女仆听之任之，咿呀学语后，父母又言听计从。那么他成人以后，比过去更强健更明智，为什么要突然受到限制和约束呢？为什么他要在七岁、十四岁、或二十岁的时候，失去一直以来父母都尽力提供的特权呢？不妨用狗、马或其他动物做个实验，看看那些它们幼年学会的坏把戏能否在长大后轻易被改正。更何况跟人类的任性和骄傲相比，跟人类主宰一切的欲望相比，这些动物连一半都赶不上。

36 . We are generally wise enough to begin with them when they are very young, and discipline betimes those other creatures we would make useful and good for somewhat. They are only our own offspring that we neglect in this point; and having made them ill children, we foolishly expect they should be good men. For if the child must have grapes or sugar-plums when he has a mind to them, rather than make the poor baby cry or be out of humour; why, when, he is grown up, must he not be satisfy'd too, if his desires carry him to wine or women? They are objects as suitable to the longing of one of more years, as what he cry'd for, when little, was to the inclinations of a child. The having desires accommodated to the apprehensions and relish of those several ages, is not the fault; but the not having them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straints of reason: the difference lies not in having or not having appetites, but in the power to govern, and deny ourselves in them. He that is not us'd to submit his will to the reason of others when he is young, will scarce hearken to submit to his own reason when he is of an age to make use of it. And what kind of a man such a one is like to prove, is easy to foresee.

第36节．通常来说，我们尽早驯养动物的行为是非常明智的，为了未来有所用处，总是从小抓起，及早训练。反倒是对于自己的子孙，我们却忽视了这一点。放任他们学坏，却又愚蠢地奢望他们会自

己长成可造之才。因为如果在一个孩子想吃葡萄或蜜饯时便给他，生怕这可怜的小家伙啼哭或发怒。为什么在他长大以后对酒和女人产生兴趣的时候，却不能满足他呢？如果说小时候想要的东西符合小孩的愿望，那么大人的欲望也合乎他的年龄需求。根据不同年龄的好恶产生符合其特点的欲望并无过错；但如果这些欲望不受规则和理性制约，即为过错；区别并非在于有无渴求，而在于管理欲望和约束自我的能力。一个人如果年少时不习惯使自己的意愿服从于他人的理性，在到达一定年龄需要运用理性的时候，也极少能倾听自己的理性。这样的人最终会变成怎样不难预见。

37 . These are oversights usually committed by those who seem to take the greatest care of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But if we look into the common management of children, we shall have reason to wonder, in the great dissoluteness of manners which the world complains of, that there are any footsteps at all left of virtue. I desire to know what vice can be nam'd, which parents, and those about children, do not season them with, and drop into 'em the seeds of, as soon as they are capable to receive them? I do not mean by the examples they give, and the patterns they set before them, which is encouragement enough; but that which I would take notice of here is, the downright teaching them vice, and actual putting them out of the way of virtue. Before they can go, they principle 'emwith violence, revenge, and cruelty. Give me a blow that I may beat him, is a lesson which most children every day hear; and it is thought nothing, because their hands have not strength to do any mischief. But I ask, does not this corrupt their mind? Is not this the way of force and violence that they are set in? And if they have been taught when little, to strike and hurt others by proxy, and encourag'd to rejoice in the harm they have brought upon them, and see them suffer, are they not prepar'd to do it when they are strong enough to be felt themselves, and can strike to some

purpose?

第37节．这些往往是那些似乎对孩子教育倾尽心力的人容易忽视的。但是如果我们细细思量常见的教育方法，我们有理由怀疑，在那么多让人怨声载道的恶劣行为中，是否还能找到一丁点美德的残留。如果父母或孩子周围的人不曾灌输给孩子，不在孩子刚有接受能力的时候就给他们埋下恶念的种子，我真想知道孩子还能有什么恶行？我不是指父母在孩子面前做出的典范或榜样，这些都可以算是积极的影响。我这里要提出的是，父母明确地把恶习教给孩子，把他们从道德的正途上偏离出去。在孩子学会走路之前，大人就向他们灌输暴力、报复和残忍。谁给我一拳，那我就去打他，这是多数孩子每天听到的教导。并且大人不以为然，认为孩子的小手还没有力量可以造成真正的伤害。但我要问，这难道不是玷污了他们的心灵？难道这不是在铺设一条武力和暴行之路吗？如果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学会请别人帮忙来攻击和伤害他人，并且这种以带来伤痛为乐、看别人受苦的行为还得到了助长，那么在长大之后拥有足够的力量的时候，难道不会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攻击别人吗？

The coverings of our bodies which are for modesty, warmth and defence, are by the folly or vice of parents recommended to their children for other uses. They are made matters of vanity and emulation. A child is set a-longing after a new suit, for the finery of it; and when the little girl is trick'd up in her new gown and commode, how can her mother do less than teach her to admire herself, by calling her, her little queen and her princess? Thus the little ones are taught to be proud of their clothes before they can put them on. And why should they not continue to value themselves for their outside fashionableness of the taylor or tirewoman's making, when their parents have so early instructed them to do so? Lying and equivocations, and excuses little different from lying, are

put into the mouths of young people, and commended in apprentices and children, whilst they are for their master's or parents' advantage. And can it be thought, that he that finds the straining of truth dispens'd with, and encourag'd, whilst it is for his godly master's turn, will not make use of that privilege for himself, when it may be for his own profit?

穿上衣服是为了避体、保暖和抵御外界伤害，但由于父母的愚蠢或寡德，使这种用途变了味。于是衣着成了竞逐虚荣、争奇斗艳之物。小孩子学会了对新装的期待，只是为了表面的光鲜。小女孩从头到脚装扮一新，做母亲的在夸赞自己的小皇后、小公主时，怎么不是在教会她自我欣赏呢？因此小孩子在还没学会穿衣的时候就学会了炫耀。如果家长一早就已经教他们这样做，为什么他们不能继续用裁缝或缝纫女工制造出来的外在时髦彰显自己的价值呢？为了对自己有利，老师和家长教年轻人撒谎和说模棱两可的话，以及和假话几乎等同的托词，并鼓励学生和孩子这样做。是否可以认为，一个人发现既然为了神圣的师长，歪曲事实可以得到豁免和鼓励，那么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难道不也会去使用这种特权？

Those of the meaner sort are hinder'd, by the straitness of their fortunes, from encouraging intemperance in their children by the temptation of their diet, or invitations to eat or drink more than enough; but their own ill examples, whenever plenty comes in their way, shew, that 'tis not the dislike of drunkenness or gluttony, that keeps them from excess, but want of materials. But if we look into the houses of those who are a little warmer in their fortunes, their eating and drinking are made so much the great business and happiness of life, that children are thought neglected, if they have not their share of it.Sauces, and ragouts, and food disguis'd by all the arts of cookery, must tempt their palates, when their bellies are

full; and then, for fear the stomach should be overcharg'd, a pretence is found for t'other glass of wine to help digestion, though it only serves to increase the surfeit.

社会底层的人受到财富的限制，禁止孩子受到美食的诱惑或在吃喝时不加节制；但他们自己一旦过上了有富余的生活就成为了恶劣的榜样，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不喜欢喝醉或暴饮暴食而使他们有所克制，而是物质匮乏所致。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那些更富有的人家，他们的饮食被当作生活中的大事和快乐源泉，如果孩子不能与之分享，就会被认为受到忽视。即使吃饱了以后，还要用调味酱以及精心烹制的小食来刺激他们的味蕾。然后，担心肠胃负担过重，就喝下一杯酒帮助消化，殊不知这样做只会加重积食。

Is my young master a little out of order,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at will my dear eat? What shall I get for thee? Eating and drinking are instantly press'd; and every body's invention is set on work, to find out something luscious and delicate enough to prevail over that want of appetite, which nature has wisely order'd in the beginning of distempers, as a defence against their increase; that being freed from the ordinary labour of digesting any new load in the stomach, she may be at leisure to correct and master the peccant humours.

我的小主人不舒服了吗？第一个问题是，宝贝想要吃什么？我该为你准备些什么？吃喝立刻就被作为重点。尽管病症初现时，大自然明智地安排食欲减退，作为防止疾病发展的良方，但人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地找出美味可口的食物来。其实假若肠胃不必承担平常那样的负担，忙于消化新来的食物，原本有精力自行克服病症。

And where children are so happy in the care of their parents, as by their prudence to be kept from the excess of their tables, to the sobriety of a plain and simple diet, yet there too they are scarce to be preserv'd from the contagion that poisons the mind; though, by a discreet management whilst they are under tuition, their healths perhaps may be pretty well secure, yet their desires must needs yield to the lessons which everywhere will be read to them upon this part of epicurism. The commendation that eating well has everywhere, cannot fail to be a successful incentive to natural appetites, and bring them quickly to the liking and expence of a fashionable table. This shall have from everyone, even the reprovers of vice, the title of living well. And what shall sullen reason dare to say against the publick testimony? Or can it hope to be heard, if it should call that luxury, which is so much own'd and universally practis'd by those of the best quality?

有些孩子很幸福。在父母的悉心关爱下，他们谨慎地远离暴饮暴食，安于粗茶淡饭，但是他们仍不免受到外界的毒害。于是在小心管教之下，或许尚可以维持健康，但是享乐主义教条却无处不在地侵蚀着他们，最终使他们屈服。到处都在说要吃得好，这无疑会煽动起自然的欲望，使他们很快地爱上并享用丰盛的筵席。而这种习性即使在那些对恶习嗤之以鼻的人口中，也被冠以好好生活的名义。那么郁闷的理性还敢对公共意见说什么呢？或者如果理性将那些精英所承认和普遍遵循的生活方式称之为奢侈的话，这种声音是否有希望被听见呢？

This is now so grown a vice, and has so great supports, that I know not whether it do not put in for the name of virtue; and whether it will not be thought folly, or want of knowledge of the world, to open one's mouth against it? And truly I should suspect,

that what I have here said of it, might be censur'd as a little satire out of my way, did I not mention it with this view, that it might awaken the care and watchfulness of parents in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when they see how they are beset on every side, not only with temptations, but instructors to vice, and that, perhaps, in those they thought places of security.

这已经成为一种恶习，受到众人追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已经冠以美德的头衔，如果有人反对，会不会被当作傻瓜或不谙世事？我提出这一点，是为了提醒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更加小心和警觉，因为子女周围不光充满诱惑，甚至还有公然的教唆，甚至在那些看似安全的地方也一样。如果不表明这一看法，估计会有人指责我不过是讽刺罢了。

I shall not dwell any longer on this subject, much less run over all the particulars that would shew what pains are us'd to corrupt children, and instil principles of vice into them: but I desire parents soberly to consider, what irregularity or vice there is which children are not visibly taught, and whether it be not their duty and wisdom to provide them other instructions.

这一话题就点到为止了，至于怂恿儿童、灌输恶习的种种细节也不再讨论，但我希望家长们能清醒地检视孩子们在不经意间学到的不良行为或恶习。而运用理智来给孩子提供正确的教导正是父母的职责所在。

38 . It seems plain to me, that the principle of all virtue and excellency lies in a power of denying ourselves the satisfaction of

our own desires, where reason does not authorize them. This power is to be got and improv'd by custom, made easy and familiar by an early practice. If therefore I might be heard, I would advise, that, contrary to the ordinary way, children should be us'd to submit their desires, and go without their longings, even from their very cradles. The first thing they should learn to know, should be, that they were not to have anything because it pleas'd them, but because it was thought fit for them. If things suitable to their wants were supply'd to them, so that they were never suffer'd to have what they once cry'd for, they would learn to be content without it, would never, with bawling and peevishness, contend for mastery, nor be half so uneasy to themselves and others as they are, because from the first beginning they are not thus handled. If they were never suffer'd to obtain their desire by the impatience they express'd for it, they would no more cry for another thing, than they do for the moon.

第38节．一切美德和卓越的原则就在于克制理性所不允许的自身欲望的能力，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种克制能力通过习惯养成和提高，尽早实践则驾轻就熟，习以为常。因此，如果可以，我的建议是采取与常规相反的做法，从婴儿时期开始，让孩子们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养成习惯，不要提出种种要求。孩子们首先应当学会的就是，他们不会因为喜欢什么就得到什么，而只能获得家长认为适合他们的东西。如果从不允许他们一哭闹，就得到想要的东西，而只给予他们适合的东西，那么他们就学会了不要哭闹、发脾气、争上风，也不会因此搅得自己和他人心神不宁，因为一开始他们就不是这样被调教的。如果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发泄不耐烦而得到满足，就不会用哭闹的方式要求别的东西，正如他们不会哭着要月亮一样。

39 . I say not this, as if children were not to be indulg'd in

anything, or that I expected they should in hanging-sleeves have the reason and conduct of counsellors. I consider them as children, who must be tenderly us'd, who must play, and have play-things. That which I mean, is, that whenever they crav'd what was not fit for them to have or do, they should not be permitted it because they were little, and desir'd it: nay, whatever they were importunate for, they should be sure, for that very reason, to be deny'd. I have seen children at a table, who, whatever was there, never ask'd for anything, but contentedly took what was given them; and at another place, I have seen others cry for everything they saw; must be serv'd out of every dish, and that first too. What made this vast difference but this? That one was accustom'd to have what they call'd or cry'd for, the other to go without it. The younger they are, the less I think are their unruly and disorderly appetites to be comply'd with; and the less reason they have of their own, the more are they to be under the absolute power and restraint of those in whose hands they are. From which I confess it will follow, that none but discreet people should be about them. If the world commonly does otherwise, I cannot help that. I am saying what I think should be; which if it were already in fashion, I should not need to trouble the world with a discourse on this subject. But yet I doubt not, but when it is consider'd, there will be others of opinion with me, that the sooner this way is begun with children, the easier it will be for them and their governors too; and that this ought to be observ'd as an inviolable maxim, that whatever once is deny'd them, they are certainly not to obtain by crying or importunity, unless one has a mind to teach them to be impatient and troublesome, by rewarding them for it when they are so.

第39节．我并不是说，孩子们不可以得到任何满足，或者指望他们一边穿着垂吊带童装，一边具有议员一样的理智。我把他们当作必

须小心呵护、也必须玩耍和拥有玩具的孩子。我的意思是，在他们想要的东西或想做的事不适合他们时，不能因为他们年纪小而且想要就得到允许：不行就是不行，不管想要什么，只要胡搅蛮缠，就一定得不到。我曾见到有些儿童，不管餐桌上有什么，也不会主动要求任何东西，只是满足于自己得到的。在另一个场合，我看到其他孩子见什么要什么，每道菜都要品尝，而且第一个品尝。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大的差别呢？就是因为一个孩子习惯了获得他需要的或哭闹着要求的东西，另一个则没有。我认为，年纪越小，越不能任性和无法无天。儿童自己越缺乏理性，就越需要受到监护人的绝对管理和约束。基于此，我认为只有谨慎小心之人才可以伴其左右。如果这和通行的做法相反，我也无可奈何。我陈述的是我认为对的观点，如果这已经是普遍的风气，我也就没必要就此专门写篇文章了。但是我确信，在这一问题上一定有人认同我的观点，也就是越早对儿童进行约束，对儿童和管教者就越容易。这理应成为一条无可辩驳的准则来遵守。不管什么要求受到了拒绝，都不可能通过哭闹或强求得到。除非有人故意想教孩子变得不耐烦和惹人厌，恐怕只有出于这个目的才会在此时满足孩子的欲望。

40 . Those therefore that intend ever to govern their children, should begin it whilst they are very little, and look that they perfectly comply with the will of their parents. Would you have your son obedient to you when past a child; be sure then to establish the authority of a father as soon as he is capable of submission, and can understand in whose power he is. If you would have him stand in awe of you, imprint it in his infancy; and as he approaches more to a man, admit him nearer to your familiarity; so shall you have him your obedient subject (as is fit) whilst he is a child, and your affectionate friend when he is a man. For methinks they mightily misplace the treatment due to their children, who are indulgent and familiar when they are little, but severe to them, and keep them at a distance, when they are grown up: for liberty and

indulgence can do no good to children; their want of judgment makes them stand in need of restraint and discipline; and on the contrary, imperiousness and severity is but an ill way of treating men, who have reason of their own to guide them; unless you have a mind to make your children, when grown up, weary of you, and secretly to say within themselves, When will you die, father?

第40节．父母若有意管教儿童，都应及早开始，以确保其完全听从父母的意愿。如果你希望令郎长大后仍听命你，那么一旦他懂得屈服，明白自己在谁的掌控之下，你就必须树立起作为父亲的威信。如果你希望他对你敬畏有加，那么在孩提时代就要他把这一观念铭刻在其心头。在他逐渐长大时，则容许他与你更加亲近。这样，令郎小时候是个对你言听计从的小家伙，成年后则成为你情谊深厚的挚友。有些父母在孩子幼时放纵溺爱，在其长大之后却严加管束并与之保持距离，我想他们完全使用了错误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因为随意纵容对孩子没有丝毫益处，由于缺乏判断力，他们亟须约束和管教；而相反地，严厉与专横则是对待成年人糟糕的方式，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理智来做出判断。你这样做，只能让你的孩子长大后对你心生厌恶，并暗自在心里说，你什么时候死呢，父亲？

Section 41-50

第41-50节

41 . I imagine everyone will judge it reasonable, that their children, when little, should look upon their parents as their lords, their absolute governors, and as such stand in awe of them; and that when they come to riper years, they should look on them as their best, as their only sure friends, and as such love and reverence them. The way I have mention'd, if I mistake not, is the only one to obtain this. We must look upon our children, when grown up, to be like ourselves, with the same passions, the same desires. We would be thought rational creatures, and have our freedom; we love not to be uneasy under constant rebukes and brow-beatings, nor can we bear severe humours and great distance in those we converse with. Whoever has such treatment when he is a man, will look out other company, other friends, other conversation, with whom he can be at ease. If therefore a strict hand be kept over children from the beginning, they will in that age be tractable, and quietly submit to it, as never having known any other: and if, as they grow up to the use of reason, the rigour of government be, as they deserve it, gently relax'd, the father's brow more smooth'd to them, and the distance by degrees abated, his former restraints will increase their love, when they find it was only a kindness to them, and a care to make them capable to deserve the favour of their parents, and the esteem of everybody else.

第41节．我想每个人都会认为我的说法合情合理，那就是孩子小时应视父母为君主、为其绝对的统治者，并因此对他们心怀敬畏；而

当他们日渐成熟，则应将父母视作自己最好、最真正的、唯一值得信赖的朋友，并因此爱戴尊敬他们。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么我所提到的就是达成这一目的的唯一方式。孩子长大后，我们应将其视为与我们自己一样的人，拥有同样的热情与欲望。我们会视自己为理性的生物，并享有自由；我们不会喜欢在责难与威吓之下惴惴不安，我们同样无法忍受严厉的脾气以及与在与人交谈时被拒于千里之外。任何成年人在此境况下都会另寻伙伴，另找朋友，另觅可与之轻松相处的谈话对象。因此，如果从一开始就使孩子处于严格管教之下，他们就会在孩提时温顺驯良，安静地听从管束，因为他们除此之外不知有它；而当他们年龄渐增，能够运用理性时，就可逐渐放松严厉的管教，而这也是他们应得的，同时父亲可和蔼地对待他们，渐渐缩短彼此间的距离，他从前的管束将增进孩子对他的爱，因为他们会发现这只是慈爱的表现，使他们能够当之无愧地赢得父母的青睐及其他人的尊重。

42 . Thus much for the settling your authority over your children in general. Fear and awe ought to give you the first power over their minds, and love and friendship in riper years to hold it: for the time must come, when they will be past the rod and correction; and then, if the love of you make them not obedient and dutiful, if the love of virtue and reputation keep them not in laudable courses, I ask, what hold will you have upon them to turn them to it? Indeed, fear of having a scanty portion if they displease you, may make them slaves to your estate, but they will be nevertheless ill and wicked in private; and that restraint will not last always. Every man must some time or other be trusted to himself and his own conduct; and he that is a good, a virtuous, and able man, must be made so within. And therefore what he is to receive from education, what is to sway and influence his life, must be something put into him betimes; habits woven into the very principles of his nature, and not a counterfeit carriage, and dissembled outside, put on by fear, only to avoid the present anger

of a father who perhaps may disinherit him.

第42节．就在孩子心目中树立威信这一点而言我已说了不少。首先你借助畏惧的力量在他们的心灵上施加影响，而爱和友谊则在他们成熟后继续影响着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过了挨打受罚的年纪，到了那时，如果你的爱没法使他们温良孝顺，如果对德行与美誉的仰慕无法使他们走上光明的道路，那么我要问，你还能依凭什么使他们转向正途？固然，害怕因冒犯你而获得较少份额的遗产，会使他们成为你财富的奴仆，然而私下里他们仍会心怀恶意与歹念，而财产的约束不会永久存在。每个人迟早都要自立，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善良、正直、聪明能干之士一定是从内心培养起来的。因此，那些他能从教育中得到的教益，那些会影响改变他一生的观念，必须及早注入他的内心；这应当成为交织在他本性中习惯，而非虚假的仪态或伪善的外表，装模作样只因害怕当下触怒父亲，被剥夺继承权。

43 . This being laid down in general, as the course that ought to be taken, 'tis fit we now come to consider the parts of the discipline to be us'd, a little more particularly. I have spoken so much of carrying a strict hand over children, that perhaps I shall be suspected of not considering enough, what is due to their tender age and constitutions. But that opinion will vanish, when you have heard me a little farther: for I am very apt to think, that great severity of punishment does but very little good, nay, great harm in education; and I believe it will be found that, caeteris paribus, those children who have been most chastis'd, seldom make the best men. All that I have hitherto contended for, is, that whatsoever rigor is necessary, it is more to be us'd, the younger children are; and having by a due application wrought its effect, it is to be relax'd, and chang'd into a milder sort of government.

第43节．我已经大体阐明了所应遵循的规则，下面就该更加详细地考虑施行细则。我已说了许多要对孩子严加管教的话，或许有人会怀疑我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们幼小的年纪和柔弱的体格。但只要你继续听我说下去，这种疑虑就会打消：因为我很清楚，极其严厉的处罚没什么好处，恰恰相反，其在教育中危害甚巨；同时我相信你会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些最常遭受惩罚的孩子很少成为最优秀的人。到目前为止我所主张的是，不论必须采用何种严厉的手段，应当是孩子越小用得越频繁；而通过适当的使用产生效果之后，就应放松，转而施行较为温和的管教。

44．A compliance and suppleness of their wills, being by a steady hand introduc'd by parents, before children have memories to retain the beginnings of it, will seem natural to them, and work afterwards in them as if it were so, preventing all occasions of struggling or repining. The only care is, that it be begun early, and inflexibly kept to 'till awe and respect be grown familiar, and there appears not the least reluctancy in the submission, and ready obedience of their minds. When this reverence is once thus established, (which it must be early, or else it will cost pains and blows to recover it, and the more the longer it is deferr'd) 'tis by it, still mix'd with as much indulgence as they make not an ill use of, and not by beating, chiding, or other servile punishments, they are for the future to be govern'd as they grow up to more understanding.

第44节．在孩子记事之前，父母就坚持不懈地使他们的意志变得温柔和顺，他们无从记起这始于何时，于是就会将此种情况视为当然，如果是这样，他们会在今后照此而行，而不会心生怨怼，进行反抗。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这样做必须要趁早，并且坚定不移地施行，直到让他们敬畏父母成为常规惯例，听命没有丝毫勉强，心理上乐于

服从。一旦这种崇敬之情培养而成（这务必要早，否则难免多费辛苦、多加训斥才能予以纠正，而着手越迟麻烦越多），这样一来，即使孩子性格中仍有放纵的成分，只要他们不滥用，那么无须责打、斥骂或运用其他严厉的惩罚手段，未来他们在逐渐长大、理性成熟的过程中自然能够接受管教。

45 . That this is so, will be easily allow'd, when it is but consider'd, what is to be aim'd at in an ingenuous education; and upon what it turns.

第45节．只要考虑到真正的教育目标何在、针对何种情况，那么我的主张不难得到认同。

(1)He that has not a mastery over his inclinations, he that knows not how to resist the importunity of present pleasure or pain, for the sake of what reason tells him is fit to be done, wants the true principle of virtue and industry, and is in danger never to be good for anything. This temper therefore, so contrary to unguided nature, is to be got betimes; and this habit, as the true foundation of future ability and happiness, is to be wrought into the mind as early as may be, even from the first dawnings of knowledge or apprehension in children, and so to be confirm'd in them, by all the care and ways imaginable, by those who have the oversight of their education.

（1）如果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自然欲望，不懂得如何摆脱眼前苦乐的纠缠，不知听从理性的指导，那么他就缺乏一种真正促使他好德上进的原则，陷于一事无成的危险。因此，相对于未加引导的自然本性，自制的性情更要及早培养；作为今后才智与幸福的真正基

础，应尽可能早地使这一习惯融入心灵，甚至从知识与理解力的曙光最初降临于孩子时就开始，凡是对他们的教育负有责任之人，都应尽心竭力、运用一切可以想到的方法，在孩子身上巩固这一习惯。

46．(2)On the other side, if the mind be curb'd, and humbled too much in children; if their spirits be abas'd and broken much, by too strict an hand over them, they lose all their vigour and industry, and are in a worse state than the former. For extravagant young fellows, that have liveliness and spirit, come sometimes to be set right, and so make able and great men; but dejected minds, timorous and tame, and low spirits, are hardly ever to be rais'd, and very seldom attain to anything. To avoid the danger that is on either hand, is the great art; and he that has found a way how to keep up a child's spirit easy, active, and free,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to restrain him from many things he has a mind to, and to draw him to things that are uneasy to him; he, I say, that knows how to reconcile these seeming contradictions, has, in my opinion, got the true secret of education.

第46节．（2）另一方面，如果孩子的心灵受到过分的抑制与摧折；如果因为过于严厉的管教，精神变得过分谦卑颓废，他们就会失去勤勉与活力，陷入比前一种状况更糟的境地。因为纵情恣肆的年轻人充满活力、精神高涨，一旦走上正轨，就会成为卓越能干之士；而至于沮丧的心灵，畏怯、顺从且低落的精神，则很难振作，并极少取得成就。如何避免两方面的危险是一门非凡的艺术；如果有人找到一种方法，既保持了儿童轻松、活泼、自由的精神，又同时对他加以约束，使他抑制自己的欲望，趋向于他不那么喜好的事物，那么我要说，此人已经懂得了如何协调这些看似矛盾的原则，在我看来也掌握了教育的真正秘诀。

47 . The usual lazy and short way by chastisement and the rod, which is the only instrument of government that tutors generally know, or ever think of, is the most unfit of any to be us'd in education, because it tends to both those mischiefs; which, as we have shewn, are the Scylla and Charybdis, which on the one hand or the other ruin all that miscarry.

第47节．棍棒加斥责，作为常见的偷懒的教育捷径，是家庭教师通常了解或只能想到的唯一一种管教方法，但它是所有教育方法中最不合宜的一种，因为它往往会造成以上两种危害。正如我们说过的，这是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无论偏向哪个方面都会给错误的教育以毁灭性的打击。

48 . (1)This kind of punishment contributes not at all to the mastery of our natural propensity to indulge corporal and present pleasure, and to avoid pain at any rate, but rather encourages it, and thereby strengthens that in us, which is the root from whence spring all vicious actions, and the irregularities of life. For what other motive, but of sensual pleasure and pain, does a child act by, who drudges at his book against his inclination, or abstains from eating unwholesome fruit, that he takes pleasure in, only out of fear of whipping? He in this only prefers the greater corporal pleasure, or avoids the greater corporal pain. And what is it, to govern his actions, and direct his conduct by such motives as these? What is it, I say, but to cherish that principle in him, which it is our business to root out and destroy? And therefore I cannot think any correction useful to a child, where the shame of suffering for having done amiss, does not work more upon him than the pain.

第48节．（1）人类无论如何都有放纵身体、及时行乐、规避痛苦的自然天性，上面提到的惩罚不仅对克制这种天性丝毫没有帮助，反而刺激其发展，并因此使其在我们身上愈发强大，而这正是生活中所有恶行与罪愆的渊源。一个孩子只是因为害怕鞭笞而心不甘情不愿地埋头苦读，或强忍着不去碰他喜爱的却无益健康的水果，除了在感官上趋利避害，他的所作所为还有其他动机吗？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增加身体上快感，减少痛苦。以这样的动机约束其活动、指导其行为，结果会怎样？除了促使本应由我们根除的自然本性继续发展，还能有什么结果？因此我认为，如果孩子做错事后羞耻心带来的痛苦还不及皮肉之痛，那么这样的教导对他毫无作用。

49．(2)This sort of correction naturally breeds an aversion to that which 'tis the tutor's business to create a liking to. How obvious is it to observe, that children come to hate things which were at first acceptable to them, when they find themselves whipp'd, and chid, and teas'd about them? And it is not to be wonder'd at in them, when grown men would not be able to be reconcil'd to anything by such ways. Who is there that would not be disgusted with any innocent recreation, in itself indifferent to him, if he should with blows or ill language be haled to it, when he had no mind? Or be constantly so treated, for some circumstances in his application to it? This is natural to be so. Offensive circumstances ordinarily infect innocent things which they are join'd with; and the very sight of a cup wherein any one uses to take nauseous physic, turns his stomach, so that nothing will relish well out of it, though the cup be never so clean and well-shap'd, and of the richest materials.

第49节．（2）教师本有义务培养儿童对某些事物的兴趣，但这样的教导却自然而然会使儿童厌恶这些事物。有些事物儿童本能够接

受，但是当发现自己因此而受到鞭笞、责骂与嘲弄，他们就会开始憎恨此类事物，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这对他们而言不足为怪，即使成年人也无法通过这种方式接受任何事。不管何种正当无害的娱乐活动，如果一个人对它没多大兴趣也无心参与，却被拳头与恶语逼迫着参与其中；或者在他玩乐之时，却因为种种状况而常常遭到这样的对待，谁不会对这种娱乐心生厌恶呢？结果自然如此。令人不快的情况通常会将不快传染给他们所参与的、本身正当无害的活动。如果有一个杯子别人用来盛过令人作呕的药物，那么看一眼便中人欲呕，即使杯子本身纤尘不染、形体美观、用料考究地无以复加，但是用它盛着的任何东西也不会让人心生喜爱。

50．(3)Such a sort of slavish discipline makes a slavish temper. The child submits, and dissembles obedience, whilst the fear of the rod hangs over him; but when that is remov'd, and by being out of sight, he can promise himself impunity, he gives the greater scope to his natural inclination; which by this way is not at all alter'd, but, on the contrary, heighten'd and increas'd in him; and after such restraint, breaks out usually with the more violence; or,

第50节．（3）如此奴隶式的管教造就奴颜婢膝的性情。害怕悬于头顶的棍棒，孩子会唯命是从并假作恭顺；可一旦威胁解除，远离了他人的视线，他可以确信自己能够免于责罚，便给予自然本性更大的自由；通过这种方式，这种本性不但毫无改变，反倒在他身上越发滋生壮大；而且在经过压制之后，它通常会更加凶猛地爆发。

Section 51-60

第51-60节

51 . (4)If severity carry'd to the highest pitch does prevail, and works a cure upon the present unruly distemper, it often brings in the room of it a worse and more dangerous disease, by breaking the mind; and then, in the place of a disorderly young fellow, you have a low spirited moap'd creature, who, however with his unnatural sobriety he may please silly people, who commend tame inactive children, because they make no noise, nor give them any trouble; yet at last, will probably prove as uncomfortable a thing to his friends, as he will be all his life an useless thing to himself and others.

第51节．（4）如果极其严酷的教育手段广为运用，且一时治愈了刁蛮任性的坏毛病，但由于精神受到摧残，通常会导致更加棘手也更加危险的毛病。这样一来，原本无法无天的年轻人就变成了情绪低落的可怜虫，尽管违背自然的清醒克制或许会讨得愚夫愚妇的欢心，因为这些人喜爱那些驯顺、安静、既不吵闹也不惹麻烦的孩子。但最终，这样的人在他的朋友眼中极可能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家伙，而他终生对己对人都不会有什么用处。

52 . Beating them, and all other sorts of slavish and corporal punishments, are not the discipline fit to be used in the education of those we would have wise, good, and ingenuous men; and therefore very rarely to be apply'd, and that only in great occasions, and cases of extremity. On the other side, to flatter children by rewards of

things that are pleasant to them, is as carefully to be avoided. He that will give to his son apples or sugar-plumbs, or what else of this kind he is most delighted with, to make him learn his book, does but authorize his love of pleasure, and cocker up that dangerous propensity, which he ought by all means to subdue and stifle in him. You can never hope to teach him to master it, whilst you compound for the check you gave his inclination in one place, by the satisfaction you propose to it in another. To make a good, a wise, and a virtuous man, 'tis fit he should learn to cross his appetite, and deny his inclination to riches, finery, or pleasing his palate, &c. whenever his reason advises the contrary, and his duty requires it. But when you draw him to do anything that is fit by the offer of money, or reward the pains of learning his book by the pleasure of a luscious morsel; when you promise him a lace-cravat or a fine new suit, upon performance of some of his little tasks; what do you by proposing these as rewards, but allow them to be the good things he should aim at, and thereby encourage his longing for 'em, and accustom him to place his happiness in them? Thus people, to prevail with children to be industrious about their grammar, dancing, or some other such matter, of no great moment to the happiness or usefulness of their lives, by misapply'd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sacrifice their virtue, invert the order of their education, and teach them luxury, pride, or covetousness, &c. For in this way, flattering those wrong inclinations which they should restrain and suppress, they lay the foundations of those future vices, which cannot be avoided but by curbing our desires and accustoming them early to submit to reason.

第52节．要造就明智、善良、诚朴之人，责打以及所有奴隶式的体罚都不是教育中适用的原则；因此，只有在严重的场合和极端情况下才能偶尔使用。另一方面，应当小心避免用儿童喜爱的东西作为奖

励以取悦他们。凡是用苹果、蜜饯或此类孩子特别喜爱的东西为饵促使其读书的人，无非是认可了他对享乐的偏爱，并且放纵了这种危险的倾向，而这正是他应当千方百计在孩子身上加以控制及扼杀的。对于孩子的嗜好，如果你一方面加以遏制，另一方面又主动满足，那么两相混淆，你永远也不能如愿教会他将其驯服。若要成就一个善良、明智、德行高尚之人，应当让他学会超脱欲望，同时摒弃对财富以及华服美食之类的贪恋，正如理智所反对以及职责所要求的那样。但是假如你为了让他做一点分内之事就以钱财为酬劳，或以美味小点为奖掖补偿他读书的辛苦，或者许诺只要他完成了一点儿小差事就能得到花边领巾或漂亮的新装，你提出以这些东西为奖励，难道不是默认这就是他应当追求的目标吗？难道不是因此而鼓励他对此欣羡渴慕，使他习惯于将快乐寄托于此吗？因此，为了诱使儿童在语法、舞蹈以及此类课程上勤奋用功，尽管这些对于他们快乐而充实地生活并无大用，人们滥用奖励和惩罚，简直是牺牲美德，颠倒教育次序，教会他们奢侈、自负、贪婪及其他种种。这样一来，人们鼓励本应加以克制和遏止的不正当的自然欲望，从而为今后的丧德败行埋下祸根，除非限制自身欲望并尽早使它们惯于服从理性，否则这样的后果无可避免。

53 . I say not this, that I would have children kept from the conveniences or pleasures of life, that are not injurious to their health or virtue. On the contrary, I would have their lives made as pleasant and as agreeable to them as may be, in a plentiful enjoyment of whatsoever might innocently delight them; provided it be with this caution, that they have those enjoyments, only a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state of esteem and acceptation they are in with their parents and governors; but they should never be offer'd or bestow'd on them, as the rewards of this or that particular performance, that they shew an aversion to, or to which they would not have apply'd themselves without that temptation.

第53节．我并不是想说，儿童完全不能享受生活中无害于健康与美德的舒适与快乐。相反的，我希望让他们的生活尽可能惬意欣然，充分享受任何令他们愉悦又对他们无害的活动；但是需要注意，享受这些乐趣的前提是得到父母及教师的赞同与认可；但他们受到嘉奖的原因，绝不应当是完成了这样或那样他们本不愿履行的任务，或做了某件若无此奖励为诱饵就不会去做的事。

54．But if you take away the rod on one hand, and these little encouragements which they are taken with, on the other, how then (will you say) shall children be govern'd? Remove hope and fear, and there is an end of all discipline. I grant that good and evil, reward and punishment, are the only motives to a rational creature: these are the spur and reins whereby all mankind are set on work, and guided, and therefore they are to be made use of to children too. For I advise their parents and governors always to carry this in their minds, that children are to be treated as rational creatures.

第54节．但如果你一方面拿走了棍棒，另一方面又取消了这些儿童所喜欢的小小奖励，那么你会说如何才能管教他们呢？期待与畏惧一旦不存，一切纪律便化为泡影。我承认，善恶与奖罚相应是理性生物的唯一动机：正是这样的激励与约束才促使整个人类投入工作、接受引导，因此这样的原则同样也应运用到儿童身上。因为我希望他们的父母和教师都将这一点铭记在心，那就是儿童应被当作理性的生物加以对待。

55．Rewards, I grant, and punishments must be proposed to children, if we intend to work upon them. The mistake I imagine is, that those that are generally made use of, are ill chosen. The pains and pleasures of the body are, I think, of ill consequence, when

made th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whereby men would prevail on their children; for, as I said before, they serve but to increase and strengthen those inclinations, which 'tis our business to subdue and master. What principle of virtue do you lay in a child, if you will redeem his desires of one pleasure, by the proposal of another? This is but to enlarge his appetite, and instruct it to wander. If a child cries for an unwholesome and dangerous fruit, you purchase his quiet by giving him a less hurtful sweet-meat. This perhaps may preserve his health, but spoils his mind, and sets that farther out of order. For here you only change the object, but flatter still his appetite, and allow that must be satisfy'd, wherein, as I have shew'd, lies the root of the mischief; and till you bring him to be able to bear a denial of that satisfaction, the child may at present be quiet and orderly, but the disease is not cured. By this way of proceeding, you foment and cherish in him that which is the spring from whence all the evil flows, which will be sure on the next occasion to break out again with more violence, give him stronger longings, and you more trouble.

第55节．我承认，如果我们希望对他们加以管教，那么奖励与惩罚必须作用于儿童。我觉得错误在于，那些普遍使用的手段选择不当。我认为，当人们普遍将身体的快乐与痛苦作为标准，对儿童进行奖惩，这将造成恶劣的后果；因为，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它会导致自然本性的发展壮大，而这本是我们应当克制与掌控的。如果你希望打消儿童的一种欲望，却以满足另一种欲望作为补偿，你为他立下了何种关于美德的准则呢？这无非使他的胃口变得更大，并引他步入歧途。如果一个孩子哭喊着要吃一种不卫生且有害健康的水果，而你为了叫他安静下来，就给了他一块害处小些的蜜饯，这或许能使他的身体保持健康，却损害了他的精神，使他进一步离经叛道。在这里，你仅仅更换了他想要的东西，却依然满足了他的欲望，并承认这种欲望应当得到满足，正如我所说的，这便是祸根之所在；除非你让他能够

忍受得不到满足的欲望，否则他或许能一时安静听话，但病根却并未消除。在这一过程中，经由你的煽动与包庇助长了他内心一切罪恶的源泉，而下一次它必然会更为猛烈地爆发，给他带来更加炽烈的欲求，也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

56 . Th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then, whereby we should keep children in order, are quite of another kind, and of that force, that when we can get them once to work, the business, I think, is done, and the difficulty is over. Esteem and disgrace are, of all others, the most powerful incentives to the mind, when once it is brought to relish them. If you can once get into children a love of credit, and an apprehension of shame and disgrace, you have put into 'emthe true principle, which will constantly work and incline them to the right. But it will be ask'd, How shall this be done?

第56节．那么，我们用以使儿童遵守规矩的奖惩措施应当是另一种类型，它所产生的效力是，运用一次便大功告成，一切麻烦烟消云散。一旦儿童懂得自尊与耻辱的含义，此二者相较于其他一切感受会在心灵上造成最为强烈的刺激。如果你能让他们内心热爱赞誉与荣光，惧怕羞愧与耻辱，那么你已将真正的原则交给他们，这种原则会始终如一地发挥效力并将他们引入正途。但有人会问，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I confess it does not at first appearance want some difficulty; but yet I think it worth our while to seek the ways (and practise them when found) to attain this, which I look on as the great secret of education.

我承认，起初看来这并非没有困难；但我想它值得我们为之寻找方法（一旦找到就付诸实践）并最终取得成功，这在我看来是教育的最大秘诀。

57．First, children (earlier perhaps than we think) are very sensible of praise and commendation. They find a pleasure in being esteem'd and valu'd, especially by their parents and those whom they depend on. If therefore the father caress and commend them when they do well, shew a cold and neglectful countenance to them upon doing ill, and this accompany'd by a like carriage of the mother and all others that are about them, it will, in a little time, make them sensible of the difference; and this, if constantly observ'd, I doubt not but will of itself work more than threats or blows, which lose their force when once grown common, and are of no use when shame does not attend them; and therefore are to be forborne, and never to be us'd, but in the case hereafter-mention'd, when it is brought to extremity.

第57节．首先，或许比我们预想的还要早的时候，儿童就对称赞与表扬非常敏感了。他们会为受到重视与欣赏而欣喜，特别是当赞美来自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所信赖的人的时候。因此，如果一个父亲在孩子表现良好时称赞并爱抚他们，在其做错事时显出冷淡而不愿理睬他们的神气，而母亲及孩子周围的其他所有人也都做出同样的反应，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敏感地觉察到二者间的差别；如果时时照此而行，我毫不怀疑这会比威胁与责打更为行之有效，因为后者一旦成为常态就会失去威慑力，而如果不能带来羞恶之心责罚也就一无用处；因此，除了下面要提到的极端情形外，应当避免使用这些手段。

58．But secondly, to make the sense of esteem or disgrace sink

the deeper, and be of the more weight, other agreeable or disagreeable things should constantly accompany these different states; not as particular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of this or that particular action, but as necessarily belonging to, and constantly attending one, who by his carriage has brought himself into a state of disgrace or commendation. By which way of treating them, children may as much as possible be brought to conceive, that those that are commended, and in esteem for doing well, will necessarily be belov'd and cherish'd by everybody, and have all other good things as a consequence of it; and on the other side, when any one by miscarriage falls into disesteem, and cares not to preserve his credit, he will unavoidably fall under neglect and contempt; and in that state, the want of whatever might satisfy or delight him will follow. In this way the objects of their desires are made assisting to virtue, when a settled experience from the beginning teaches children that the things they delight in, belong to, and are to be enjoy'd by those only who are in a state of reputation. If by these means you can come once to shame them out of their faults, (for besides that, I would willingly have no punishment) and make them in love with the pleasure of being well thought on, you may turn them as you please, and they will be in love with all the ways of virtue.

第58节．其次，为了使自尊感与羞耻感更为深入、更有分量，其他可爱的或可厌的事物应常常伴随着赞誉与责备这些不同的状态；这并不是对特定的行为进行的特定奖励或惩罚，而是因为他的行为使他遭受耻辱或得到嘉许，从而使这些结果有必要并时时刻刻伴随着他。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就会让儿童尽可能地明白，那些表现良好从而受到称赞与重视的孩子必然受到所有人的疼爱与保护，最后还可以享有各式各样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孩子因行为不当而陷入耻辱，而他又对他的名声毫不在意，那么他就会无可避免地遭到轻

视，为人所不齿。这种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他所喜爱的东西一样也得不到。通过这种方式，一贯的经验从一开始就告诉儿童，只有得到美名的人才能享有他们心爱的东西，那么他们的欲望所在便有助于培养美德。如果你能以这样的方式使他们因羞耻心而避免犯错（除此之外，我希望不用任何惩罚），同时使他们乐于得到他人的好评并从中得到快乐，那么你就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引导他们，而他们也会热爱一切美德。

59 . The great difficulty here is, I imagine, from the folly and perverseness of servants, who are hardly to be hinder'd from crossing herein the design of the father and mother. Children discountenanc'd by their parents for any fault, find usually a refuge and relief in the caresses of those foolish flatterers, who thereby undo whatever the parents endeavour to establish. When the father or mother looks souron the child, everybody else should put on the same coldness to him, and nobody give him countenance, 'till forgiveness ask'd, and a reformation of his fault has set him right again, and restor'd him to his former credit. If this were constantly observ'd, I guess there would be little need of blows or chiding: their own ease and satisfaction would quickly teach children to court commendation, and avoid doing that which they found everybody condemn'd and they were sure to suffer for, without being chid or beaten. This would teach them modesty and shame; and they would quickly come to have a natural abhorrence for that which they found made them slighted and neglected by everybody. But how this inconvenience from servants is to be remedy'd, I must leave to parents' care and consideration. Only I think it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that they are very happy who can get discreet people about their children.

第59节．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仆人们的愚蠢和刚愎自用，我们很难让其不干涉父母制订的计划。因犯错而不受父母待见的儿童常常会到那些愚蠢的马屁精那儿寻求关怀，得到庇护与安慰，因此这些人将父母精心建立起来的一切毁于一旦。当父亲或母亲对孩子板起脸来，所有人都应当表现出同样的冷淡，没有一个人对他假以辞色，直到孩子自知悔改，请求原谅，并恢复自己的名誉。如果这一条能贯彻到底，我想就不再需要责打和训斥：孩子们自己的满足与心安会很快教会他们竭力争取得到赞扬，无需挨打受骂，他们就会避免做那些人人谴责、自己遭罪的事。这会使他们懂得谦逊与羞耻；对那些令他们遭到每个人轻视的行为，他们很快就会生出一种天然的厌恶。但至于如何补救仆人们造成的麻烦，我只能留待父母自己去关注与思考。我只是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得以让谨慎持重之人相伴孩子左右，那么他们就非常幸运了。

60 . Frequent beating or chiding is therefore carefully to be avoided: because this sort of correction never produces any good, farther than it serves to raise shame and abhorrence of the miscarriage that brought it on them. And if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trouble be not the sense that they have done amiss, and the apprehension that they have drawn on themselves the just displeasure of their best friends, the pain of whipping will work but an imperfect cure. It only patches up for the present, and skins it over, but reaches not to the bottom of the sore; ingenuous shame, and the apprehensions of displeasure, are the only true restraint. These alone ought to hold the reins, and keep the child in order. But corporal punishments must necessarily lose that effect, and wear out the sense of shame, where they frequently return. Shame in children has the same place that modesty has in women, which cannot be kept and often transgress'd against. And as to the apprehension of displeasure in the parents, that will come to be very insignificant, if the marks of that displeasure quickly cease,

and a few blows fully expiate. Parents should well consider what faults in their children are weighty enough to deserve the declaration of their anger: but when their displeasure is once declar'd to a degree that carries any punishment with it, they ought not presently to lay by the severity of their brows, but to restore their children to their former grace with some difficulty, and delay a full reconciliation, 'till their conformity and more than ordinary merit, make good their amendment. If this be not so order'd, punishment will, by familiarity, become a mere thing of course, and lose all its influence; offending, being chastised, and then forgiven, will be thought as natural and necessary, as noon, night, and morning following one another.

第60节．因此，应当谨慎避免频繁的责打和训斥：因为除了使孩子对令他们挨打受骂的错误行为产生羞耻和厌恶，这种教导方式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如果这样大动干戈的最终目的不是令他们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或者他们遭到挚友的厌恶完全是咎由自取，那么鞭打的疼痛可以稍微整治、但无法完全治好他们的坏毛病。这不过是对患处的匆忙包扎，使其暂时弥合，却没有深入痛处；发自内心的羞耻感以及对遭到厌恶的忧惧，才是真正的也是唯一的约束。只有这些应成为驾驭缰绳的双手，使儿童懂规矩、守纪律。但是如果频频体罚，它就必然会失去那样的效力，并使羞耻心很快耗尽。廉耻之心之于儿童，正如谦恭之情之于妇女，如果它们频频遭到践踏就没法再保持下去。如果父母的不悦很快就消散，捶打几下就赎回了孩子的过错，那么他们的不悦之情就会显得微不足道。父母应当充分考虑孩子犯下的哪些过错能严重到值得他们显示出怒火：不过，他们一旦生气并采取了惩罚措施，就不应该立刻放开紧锁的眉头，而应设法令孩子回复到从前的良好德行，一直等到孩子顺从了，表现比平日更好，并完全改正错误之后，才能彻底原谅他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惩罚用得太频繁就会变成家常便饭，从而失去它的效力；犯错，受罚，然后被原谅，这一过程会变得像日夜流转、晨昏交替一样自然而然、天经地义。

Section 61-70

第61-70节

61 . Concerning reputation, I shall only remark this one thing more of it, that though it be not the true principle and measure of virtue, (for that is the knowledge of a man's duty, and the satisfaction it is to obey his maker, in following the dictates of that light God has given him, with the hopes of acceptation and reward) yet it is that which comes nearest to it: and being the testimony and applause that other people's reason, as it were by a common consent, gives to virtuous and well-order'd actions, it is the proper guide and encouragement of children, 'till they grow able to judge for themselves, and to find what is right by their own reason.

第61节．关于名誉，我再多说一点，它虽然不是美德的真正原则与标准（因为真正的原则是明白一个人的职责所在，通过追随上帝所赋予的灵光而听从造物主之命，从而履行这样的职责，并期盼上帝的接纳与酬报），但它却最为接近这样的原则与标准：因为名誉是人们根据理性不约而同地对高尚有序的行为做出的证实与嘉奖，因此它是在儿童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判断是非、辨别黑白前的正当引导和鼓励。

62 . This consideration may direct parents how to manage themselves in reproving and commending their children. The rebukes and chiding, which their faults will sometimes make hardly to be avoided, should not only be in sober, grave, and unpassionate words, but also alone and in private: but the commendations

children deserve, they should receive before others. This doubles the reward, by spreading their praise; but the backwardness parents shew in divulging their faults, will make them set a greater value on their credit themselves, and teach them to be the more careful to preserve the good opinion of others, whilst they think they have it: but when being expos'd to shame by publishing their miscarriages, they give it up for lost, that check upon them is taken off, and they will be the less careful to preserve others' good thoughts of them, the more they suspect that their reputation with them is already blemish'd.

第62节．这样一种想法可以指导父母如何去责备和赞扬孩子。儿童时而犯错，责备和训斥难以避免，但父母不仅在批评时用词要冷静、严肃、不动感情，而且要在只有孩子一个人的时候私下执行；而当孩子做了值得称赞的事，则应当着众人的面给予表扬。通过对赞美的广为传播可以使奖励加倍；而父母在背人处揭露他们的错误则可以使他们更为看重自己的名誉，在意识到自己得到别人的好评时更加小心地去维护这种名誉。但他们如果因错误被公之于众而蒙羞，那么就会因失落而自暴自弃，约束一旦解除，他们就越发怀疑自己的名誉遭到玷污，便会对维持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愈加漫不经心。

63 . But if a right course be taken with children, there will not be so much need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mon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s we imagine, and as the general practice has establish'd. For all their innocent folly, playing and childish actions are to be left perfectly free and unrestrain'd, as far as they can consist with the respect due to those that are present; and that with the greatest allowance. If these faults of their age, rather than of the children themselves, were, as they should be, left only to time and imitation and riper years to cure, children would escape a great

deal of misapply'd and useless correction, which either fails to overpower the natural disposition of their childhood, and so by an ineffectual familiarity, makes correction in other necessary cases of less use; or else if it be of force to restrain the natural gaiety of that age, it serves only to spoil the temper both of body and mind. If the noise and bustle of their play prove at any time inconvenient, or unsuitable to the place or company they are in, (which can only be where their parents are) a look or a word from the father or mother, if they have establish'd the authority they should, will be enough either to remove or quiet them for that time. But this gamesome humour, which is wisely adapted by nature to their age and temper, should rather be encourag'd to keep up their spirits, and improve their strength and health, than curb'd and restrain'd; and the chief art is to make all that they have to do, sport and play too.

第63节．但如果对儿童教导得法，且这种做法已被普遍建立起来，那么我们所能想到的那些寻常的奖励和惩罚方法便无须多用。因为对他们做的天真的傻事、他们的贪玩淘气以及孩子气的行为完全可以放任自流、不加干预而给予他们最大的自由，只要他们对在场的人保持尊重。如果这些小缺点为他们的年纪所特有，并非孩子个人的错误，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些错误当作自然会发生的事，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模仿，等他们更成熟的时候去克服这些问题，这样能避免孩子受到许多滥用和无效的惩处，这种惩处要么没能压制孩童的天性，因频频使用而变得习以为常，以至在必要时效力减弱，要么就是强力压制了那个年岁特有的天真快乐，从而损害身心。如果他们玩耍中的奔忙吵闹在某些时候造成了不便，或者在某个地方、某些人在场时显得不合适（只能是父母所在的地方），那么只要父母建立起了应有的权威，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足以让他们在那个时候走开或安静下来。自然明智地赋予他们这种爱玩耍的脾气，使其与他们的年岁与性情相适应，应当鼓励保持这种精神，同时增强体格、促进健康，而不是约束与限制它；教育最大的艺术就是把一切他们该做的事都变成运动与玩

要。

64 . And here give me leave to take notice of one thing I think a fault in the ordinary method of education; and that is, the charging of children's memories, upon all occasions, with rules and precepts, which they often do not understand, and constantly as soon forget as given. It be some action you would have done, or done otherwise, whenever they forget, or do it awkwardly, make them do it over and over again, 'till they are perfect, whereby you will get these two advantages. First, to see whether it be an action they can do, or is fit to be expected of them: for sometimes children are bid to do things which upon trial they are found not able to do, and had need be taught and exercis'd in before they are requir'd to do them. But it is much easier for a tutor to command than to teach. Secondly, another thing got by it will be this, that by repeating the same action 'till it is grown habitual in them, the performance will not depend on memory or reflection, the concomitant of prudence and age, and not of childhood, but will be natural in them. Thus bowing to a gentleman, when he salutes him, and looking in his face, when he speaks to him, is by constant use as natural to a well-bred man, as breathing; it requires no thought, no reflection. Having this way cured in your child any fault, it is cured forever: and thus one by one you may weed them out all, and plant what habits you please.

第64节．这里，容许我再提一点教育方法上常常存在的错误，那就是一有机会就在儿童的记忆中塞入种种规条和戒律，他们常常并不理解其中的意思，也总是左耳进右耳出。如果你希望他们去做某件事，或希望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去做这件事，那么当他们将之抛诸脑后或不好好干的时候，就应让他们反复去做，直到做好为止，这样一来

有两重益处。首先，可以看出这件事是否在他们能力范围内，或是否适合应期望他们完成：有些时候，儿童会被要求去做一些经过尝试才知道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事，得先经过教导和练习才能要求他们去做。但对于教师而言，命令比教导简单得多。其次，从中得到的另一桩益处就是，通过重复同样的行动直到对此习以为常，儿童不必依靠记忆或反应，而能够自然而然地完成这件事，记忆与思考是伴随着年龄与智慧的增长而来的，本不属于孩童。因此，一位绅士向他问好，他就要鞠躬回礼，当这位绅士和他说话，他就要注视对方的面庞，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言，这些行为因反复的操练就像呼吸一样自然，用不着去思考或回忆。这种办法可以治愈孩子的所有毛病，且疗效是永久性的，因此你可以将坏毛病一一根除，并使他养成你所希望的任何习惯。

65 . I have seen parents so heap rules on their children,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poor little ones to remember a tenth part of them, much less to observe them. However, they were either by words or blows corrected for the breach of those multiply'd and often very impertinent precepts. Whence it naturally follow'd that the children minded not what was said to them, when it was evident to them that no attention they were capable of was sufficient to preserve them from transgression, and the rebukes which follow'd it.

第65节．我曾见过有些父母将一大堆规矩加在孩子头上，这些可怜的小家伙根本不可能记住其中的一成，更别说照此而行了。然而，一旦他们违反了这些纷繁的、常常不合情理的戒律，训斥和责打就接踵而来。由此而来的最自然不过的结果是，孩子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了什么，也不在乎随之而来的指责，因为对他们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不论他们怎样留神都不足以避免越轨。

Let therefore your rules to your son be as few as possible, and rather fewer than more than seem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if you burden him with many rules, one of these two things must necessarily follow; that either he must be very often punish'd, which will be of ill consequence, by making punishment too frequent and familiar; or else you must let the transgressions of some of your rules go unpunish'd, whereby they will of course grow contemptible, and your authority become cheap to him. Make but few laws, but see they be well observ'd when once made. Few years require but few laws, and as his age increases, when one rule is by practice well establish'd, you may add another.

因此，你给令郎定下的规矩应当越少越好，情愿少于也不要超过那些看来绝对必要的。因为如果你让他背负太多的规矩，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必然会出现：要么他会经常遭受惩罚，而惩罚过于频繁会带来糟糕的后果；要么你得放过他的一些越轨行为不加惩处，这样一来规矩当然就变得不值一提，而在他眼中你的威信也会变得廉价。少立规矩，而一旦立下规矩就要保证其得到绝对遵守。年岁越小规矩应当越少，随着他年龄渐增，一条规矩通过实践牢固树立起来之后，才能再加上一条。

66 . But pray remember, children are not to be taught by rules which will be always slipping out of their memories. What you think necessary for them to do, settle in them by an indispensable practice, as often as the occasion returns; and if it be possible, make occasions. This will beget habits in them which being once establish'd, operate of themselves easily and naturally,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the memory. But here let me give two cautions. (1)The one is, that you keep them to the practice of what you would have grown into a habit in them, by kind words, and gentle admonitions,

rather as minding them of what they forget, than by harsh rebukes and chiding, as if they were wilfully guilty. (2)Another thing you are to take care of is, not to endeavour to settle too many habits at once, lest by variety you confound them, and so perfect none. When constant custom has made any one thing easy and natural to'em, and they practise it without reflection, you may then go on to another.

第66节．不过有一点务必牢记，教好孩子不是借助于那些总是从他们记忆中溜走的规矩。不管你认为他们应当做什么，都应利用一切机会通过必不可少的实践让他们接受，如果可能，可以创造机会。这能培养他们的习惯，而习惯一旦扎根，就能轻易而自然地发挥效力，无需借助记忆。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两点：（1）首先，有些事你希望他们通过不断实践而形成习惯，那么最好和颜悦色地劝说，与其疾言厉色地斥责批评，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意犯错，倒不如这样提醒他们有什么事忘了做。（2）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试图一下子培养许多习惯，以免因过分繁杂而使他们头昏脑涨，结果一样也做不好。只有当一件事通过反复练习变得驾轻就熟，不假思索便能完成的时候，你才能继续去培养下一个习惯。

This method of teaching children by a repeated practice, and the same action done over and over again, under the eye and direction of the tutor, 'till they have got the habit of doing it well, and not by relying on rules trusted to their memories, has so many advantages, which way soever we consider it, that I cannot but wonder (if ill customs could be wondered at in anything) how it could possibly be so much neglected. I shall name one more that comes now in my way. By this method we shall see whether what is requir'd of him be adapted to his capacity, and any way suited to the child's natural genius and constitution; for that too much be

consider'd in a right education. We must not hope wholly to change their original tempers, nor make the gay pensive and grave, nor the melancholy sportive, without spoiling them. God has stamp'd certain characters upon men's minds, which like their shapes, may perhaps be a little mended, but can hardly be totally alter'd and transform'd into the contrary.

这种教育方法不依赖于儿童对条规的死记硬背，而是让他们反复地练习，在教师的指令之下不断重复同一个动作，直到养成习惯，将其做好，不论从哪个方面考虑这种方法都有许多好处，我不得不感到奇怪它怎么会如此遭到忽视（如果任何事情上的陈规陋习都值得让人感到奇怪的话）。我可以顺便再举出一点它的好处。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看出对孩子提出的要求是否与他的能力相适应，是否适合于他天生的才能与体质，因为教育如果要正确就需要常常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寄希望于彻底改变他们原有的性情，若让天性欢快的变得深沉严肃，天性忧郁的变得活泼好动，这只会毁了他们。上帝已在人的心灵中打下性格的烙印，这就如同他们的体型，只能稍加改进，却不可能彻底改观或变成相反的样子。

He therefore that is about children should well study their natures and aptitudes, and see by often trials what turn they easily take, and what becomes them; observe what their native stock is, how it may be improv'd, and what it is fit for: he should consider what they want, whether they be capable of having it wrought into them by industry, and incorporated there by practice; and whether it be worthwhile to endeavour it. For in many cases, all that we can do, or should aim at, is, to make the best of what nature has given, to prevent the vices and faults to which such a constitution is most inclin'd, and give it all the advantages it is capable of. Every one's natural genius should be carry'd as far as it could; but to attempt

the putting another upon him, will be but labour in vain; and what is so plaister'd on, will at best sit but untowardly, and have always hanging to it the ungracefulness of constraint and affectation. Affectation is not, I confess, an early fault of childhood, or the product of untaught nature. It is of that sort of weeds which grow not in the wild uncultivated waste, but in garden-plots, under the negligent hand or unskilful care of a gardener. Management and instruction, and some sense of the necessity of breeding, are requisite to make any one capable of affectation, which endeavours to correct natural defects, and has always the laudable aim of pleasing, though it always misses it; and the more it labours to put on gracefulness, the farther it is from it. For this reason, it is the more carefully to be watch'd, because it is the proper fault of education; a perverted education indeed, but such as young people often fall into, either by their own mistake, or the ill conduct of those about them.

因此在孩子身边的人应仔细了解他们的天性和资质，通过经常性的尝试看他们易于走上哪条道路，哪个方向更适合他们；观察他们天资如何，怎样才能进一步提高，适宜做什么。他应当考虑他们欠缺什么，欠缺的那一部分能否通过勤奋努力及不断修炼加以弥补，且是否值得尽力弥补。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全部所能做的或想要达成的目标就是充分利用自然赋予的一切，阻止这种天性易于犯下的恶行与错误，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促使其发挥自身优势。每个人的自然天赋都应尽可能得到发展；但如果试图将另一种禀赋强加诸于他，结果只能是徒劳；如果硬要加以粉饰，这些禀赋最多也只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存在，并总带着一种拘束不安、矫揉造作的笨拙姿态。我得说矫揉造作并不是孩子打小就有的毛病，也不是未经雕琢的天性的产物。它就像某些种类的杂草，不会生长于未经开垦的荒野之上，却会因为园丁的疏忽大意和不当照料而滋生在园圃之中。管理和教导，以及一些必不可少的培养，导致了一个人的矫揉造作，它试图改正天性中的缺点，

并常常怀有取悦他人的良好愿望，但这种愿望却总是落空。它越是努力装出优雅的风度，离这一目标就越远。正因如此，我们要特别保持警惕，因为它是教育所造成的缺陷；这无疑是一种畸形的教育，但年轻人却常常身陷其中，要么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要么是因为他周围的人行为不当。

He that will examine wherein that gracefulness lies, which always pleases, will find it arises from that natural coherence which appears between the thing done and such a temper of mind as cannot but be approv'd of as suitable to the occasion. We cannot but be pleas'd with a humane, friendly, civil temper wherever we meet with it. A mind free, and master of itself and all its actions, not low and narrow, not haughty and insolent, not blemish'd with any great defect, is what everyone is taken with. The actions which naturally flow from such a well-form'd mind, please us also, as the genuine marks of it; and being as it were natural emanations from the spirit and disposition within, cannot but be easy and unconstrain'd. This seems to me to be that beauty which shines through some men's actions, sets off all that they do, and takes all they come near; when by a constant practice, they have fashion'd their carriage, and made all those little expressions of civility and respect, which nature or custom has establish'd in conversation, so easy to themselves, that they seem not artificial or studied, but naturally to follow from a sweetness of mind and a well-turn'd disposition.

优雅总能得人欢心，那寻找优雅之所在的人会发现，它来自于一种天性的连贯一致，这体现为他所做的事以及做事时的心境之间的和谐，这种心境只有合于那时的情境才值得赞赏。无论在哪里，我们遇见一个性情仁慈友善、温文有礼之人，都必然会感到愉悦。自由自在的心灵，既能掌控自身也能掌控自己的行动，既不粗陋狭隘，也不傲

慢无礼，且未被任何重大缺点玷污，任何人都会为之着迷。从如此完善的心灵中自然流露出的举止就如同心灵的真实印记，同样令我们愉悦；因为它是从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中散发出来的，因此必然从容自在、无拘无束。在我眼中，有些人的一举一动都透出这样一种美，令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显得与众不同，使所有接近他们的人都为之倾倒；通过不断修炼，他们塑造出良好的仪态，出于天性或习惯，在与人交往时，微小的举动都流露出礼貌与尊敬，看上去毫不矫揉造作，而只是出于美好心灵和优雅性情的自然流露。

On the other side, affectation is an awkward and forc'd imitation of what should be genuine and easy, wanting the beauty that accompanies what is natural; because there is always a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outward action, and the mind within, one of these two ways: (1)Either when a man would outwardly put on a disposition of mind, which then he really has not, but endeavours by a forc'd carriage to make shew of; yet so, that the constraint he is under discovers itself: and thus men affect sometimes to appear sad, merry, or kind, when in truth they are not so.

另一方面，矫揉造作是对于应当真诚自如的言行的一种拙劣而勉强的模仿，缺乏与自然的言行相伴的那种美；外在的行动和内在的心灵常常不一致，出现以下两种情况：（1）有些情况下，一个人表面上装出自己心灵中并不具备的品质，并竭力依靠一种不自然的仪态展现这种品质；尽管如此，装腔作势难免自行败露：譬如有些时候有的人会装出悲伤、喜悦或仁慈的样子，而他们实际并非如此。

(2)The other is, when they do not endeavour to make shew of dispositions of mind, which they have not, but to express those they

have by a carriage not suited to them. And such in conversation are all constrain'd motions, actions, words, or looks, which, though design'd to shew either their respect or civility to the company, or their satisfaction and easiness in it, are not yet natural nor genuine marks of the one or the other, but rather of some defect or mistake within. Imitation of others, without discerning what is graceful in them, or what is peculiar to their characters, often makes a great part of this. But affectation of all kinds, whencesoever it proceeds, is always offensive; because we naturally hate whatever is counterfeit, and condemn those who have nothing better to recommend themselves by.

（2）另一种情况下，他们并不竭力展示自己内心并不具备的品质，却表现出与他们不相称的言行举止。在与人交往中，这往往体现为矫饰的动作、行为、言辞或表情，这原本是为了体现对于同伴的尊敬或礼遇，或者彰显自己乐于交往、善于言谈，但无论出于哪个目的，这都不是自然真诚的体现，反而暴露了内心的缺陷与错误。一位模仿他人而不考虑他们哪些方面是真正优雅的，哪些特点是他们性格中独有的，那么便常常造成以上情形。所有种类的矫揉造作，不论表现为何种方式，都令人厌恶；因为我们天生反感虚假的事物，厌恶那些若不装装门面便一无是处之人。

Plain and rough nature, left to itself, is much better than an artificial ungracefulness, and such study'd ways of being illfashion'd. The want of an accomplishment, or some defect in our behaviour, coming short of the utmost gracefulness, often escapes observation and censure. But affectation in any part of our carriage is lighting up a candle to our defects, and never fails to make us be taken notice of, either as wanting sense, or wanting sincerity. This governors ought the more diligently to look after, because, as I

above observ'd, 'tis an acquir'd ugliness, owing to mistaken education, few being guilty of it but those who pretend to breeding, and would not be thought ignorant of what is fashionable and becoming in conversation; and, if I mistake not, it has often its rise from the lazy admonitions of those who give rules, and propose examples, without joining practice with their instructions and making their pupils repeat the action in their sight, that they may correct what is indecent or constrain'd in it, till it be perfected into an habitual and becoming easiness.

简单、朴实的本性若任其自然，也远远胜过虚伪做作的笨拙风度，以及蓄意造成的丑陋姿态。对成就的渴求、行为上的瑕疵或达不到极致优雅的仪态，往往难以为人所察觉或指责。但言行举止中任何一方面的矫揉造作却给我们的缺点点亮了蜡烛，注定使我们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不是认为我们缺乏理智，就是觉得我们缺少诚意。教师应对这种情形特别留心，因为正如我之前说过的，这是一种后天习得的丑行，原因在于错误的教育，除了那些装作有良好教养、不愿被人认为在社交中对潮流与风尚一无所知的人，很少有人会犯这样的毛病；如果我没说错，这通常源于管教者的懒惰，他们定出规矩、设立榜样，却不懂得将规矩与实践相结合，令学生在他们面前重复应当习得的行为，以使他们纠正其中不当或做作的地方，直到这种行为越做越好，成为习惯，能够从容自如地运用。

67．Manners, as they call it, about which children are so often perplex'd, and have so many goodly exhortations made them by their wise maids and governesses, I think, are rather to be learnt by example than rules; and then children, if kept out of ill company, will take a pride to behave themselves prettily, after the fashion of others, perceiving themselves esteem'd and commended for it. But if by a little negligence in this part, the boy should not pull off his

hat, nor make legs very gracefully, a dancing-master will cure that defect, and wipe off all that plainness of nature, which the a-la-mode people call clownishness. And since nothing appears to me to give children so much becoming confidence and behaviour, and so to raise them to the conversation of those above their age, as dancing, I think they should be taught to dance as soon as they are capable of learning it. For,though this consist only in outward gracefulness of motion, yet, I know not how, it gives children manly thoughts and carriage, more than anything. But otherwise, I would not have little children much tormented about punctilio's or niceties of breeding.

第67节．所谓礼仪，常常让儿童感到困惑不解，而又总是被自作聪明的侍女和女家庭教师反复灌输。依我拙见，礼仪应当身教重于言传。这样如果身边没有坏榜样，那么儿童仿效其他人，就会为自己良好的言谈举止感到自豪，并感到自己因此而受到尊重和表扬。但是如果因为稍有疏忽，小男孩没有学会脱帽致礼，或优雅地走路，那么可以请舞蹈老师来弥补这一缺陷，消除天性中略显平庸，也就是那些时髦的人所说的乡土气息。鉴于我认为舞蹈最能带给孩子自信和优雅，使他们能与年长者交谈，因此只要到了能够学习舞蹈的年纪，就应当教会他们跳舞。因为舞蹈看上去只是外在的优美，却最能带给孩子们阳刚之气，虽然我不知道是如何做到的。否则我就不会因为拘泥于形式或教养的细枝末节而让小孩子受罪。

Never trouble yourself about those faults in them, which you know age will cure: and therefore want of well-fashion'd civility in the carriage, whilst civility is not wanting in the mind, (for there you must take care to plant it early) should be the parents' least care, whilst they are young. If his tender mind be fill'd with a veneration for his parents and teachers, which consists of love and

esteem, and a fear to offend them: and with respect and good will to all people; that respect will of itself teach those ways of expressing it, which he observes most acceptable. Be sure to keep up in him the principles of good nature and kindness; make them as habitual as you can, by credit and commendation, and the good things accompanying that state: and when they have taken root in his mind, and are settled there by a continued practice, fear not, the ornaments of conversation, and the outside of fashionable manners, will come in their due time: if when they are remov'd out of their maid's care, they are put into the hands of a well-bred man to be their governor.

对于孩子那些会随着长大而改掉的毛病，永远不必烦恼：因此只要他们心中懂得规矩（应当尽早让他们产生这种意识），小的时候行为礼仪有所缺失应当是父母最不必忧虑的。如果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充满对父母师长的崇拜之情，包含爱与敬重，担心冒犯长辈，并且对所有人心怀尊敬和善意，那么出于这种尊敬本身，他们就会找到最易被接受的表达这种感情的方法。一定要让他谨记温厚和仁慈的准则，并尽可能通过肯定和赞许使之形成习惯，并用他们喜爱的东西作为奖励。如能使其植根于孩子的心灵，并在行动中持之以恒地加以稳固，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因为如果儿童离开女仆照料时，能够交由一位有教养的绅士代为教导，那么文雅的谈吐和高贵的举止礼仪自会适时养成。

Whilst they are very young, any carelessness is to be borne with in children, that carries not with it the marks of pride or ill nature; but those, whenever they appear in any action, are to be corrected immediately by the ways above-mention'd. What I have said concerning manners, I would not have so understood, as if I meant that those who have the judgment to do it, should not gently

fashion the motions and carriage of children, when they are very young. It would be of great advantage, if they had people about them from their being first able to go, that had the skill, and would take the right way to do it. That which I complain of, is the wrong course that is usually taken in this matter. Children, who were never taught any such thing as behaviour, are often (especially when strangers are present) chid for having some way or other fail'd in good manners, and have thereupon reproofs and precepts heap'd upon them, concerning putting off their hats, or making of legs, &c. Though in this, those concern'd pretend to correct the child, yet in truth, for the most part, it is but to cover their own shame; and they lay the blame on the poor little ones, sometimes passionately enough, to divert it from themselves, for fear the by-standers should impute to their want of care and skill the child's ill behaviour.

对于很小的孩童，只要没有发现骄傲和恶意的迹象，一时之失是应当原谅的，但是如果这些迹象在行为中显露出来，就必须立即依照上述办法加以纠正。上述关于礼仪的讨论并非是说那些拥有判断力的人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不应当细心地调教他们的行为举止。如果从孩子蹒跚学步时起就能有贤人在身边以正确的方式加以调教，自然是件好事。我只对一些通常采用的错误做法心存疑虑。从未学习过行为规范的儿童常常（尤其是在生人面前）在脱帽致礼或是走路时，因为某种不够礼貌的表现而受到责备，之后还要受到更多的斥责和训诫。尽管此时，那些表面上纠正孩子的人，实际上大多数时候只不过是在为自己遮羞。他们归罪于可怜的孩子，甚或激烈地指责孩子，只是怕旁人议论孩子的不良行为是由于他们疏于管教或没有本事所致。

For, as for the children themselves, they are never one jot better'd by such occasional lectures. They at other times should be

shewnwhat to do, and by reiterated actions be fashion'd beforehand into the practice of what is fit and becoming, and not told and talk'd to do upon the spot, of what they have never been accustom'd nor know how to do as they should. To hare and rate them thus at every turn, is not to teach them, but to vex and torment them to no purpose. They should be let alone, rather than chid for a fault which is none of theirs, nor is in their power to mend for speaking to. And it were much better their natural childish negligence or plainness should be left to the care of riper years, than that they should frequently have rebukes misplac'd upon them, which neither do nor can give them graceful motions. If their minds are well-dispos'd, and principled with inward civility, a great part of the roughness which sticks to the outside for want of better teaching, time and observation will rub off, as they grow up, if they are bred in good company; but if in ill, all the rules in the world, all the correction imaginable, will not be able to polish them. For you must take this for a certain truth, that let them have what instructions you will, and ever so learned lectures of breeding daily inculcated into them, that which will most influence their carriage will be the company they converse with, and the fashion of those about them. Children (nay, and men too) do most by example. We are all a sort of chameleons, that still take a tincture from things near us; nor is it to be wonder'd at in children, who better understand what they see than what they hear.

至于儿童，也不可能从这些偶尔的教训中受益。相反，平时就应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并把反复强调的行为事先加以演练，转化成恰当和合适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在他们既没养成习惯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的情况下，当场告知和训斥。每次遇到问题就劈头盖脸一顿训斥不会起到教育的效果，只会无缘无故地给他们带来烦恼和折磨。如果错不在孩子，或者不是靠责备就能改正，那么最好顺其自然不予处置。

幼稚的疏忽或直率的表现是自然的，不必时时非难苛责，不如等到长大些时再行注意，因为斥责非但不会、并且不能使他们养成优雅的举止。如果儿童心地善良，且彬彬有礼，只要周围人素质较高，即使因缺少良好的指教而在外表上略显粗鲁，多半也会随着成长，在时间和经验的纠正下逐渐消除。相反，如果交友不慎，那么即使用尽世上法则，穷尽所能想到的惩戒，也无法完善其身。因为你应该相信，那就是你可以给孩子灌输各种道理，日日教导他们如何有教养，但最能影响其行为举止的仍将是他们每天交往的对象，和周遭人的行事风格。儿童（不仅儿童，成人亦然）的行为多由模仿而来。我们都像变色龙，颜色总会变得和周围事物一样。毫无疑问，儿童亦是如此，他们对亲眼所见的事物比听到的教导理解得更为透彻。

68．I mention'd above one great mischief that came by servants to children, when by their flatteries they take off the edge and force of the parents' rebukes, and so lessen their authority: and here is another great inconvenience which children receive from the ill examples which they meet with amongst the meaner servants.

第68节．上文提及仆人给儿童的造成的一个坏影响是他们的奉承会削弱父母训斥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威信，这里要说另一种麻烦就是遇上了心怀不轨的仆人，孩子就会跟着这些坏榜样有样学样。

They are wholly, if possible, to be kept from such conversation; for the contagion of these ill precedents, both in civility and virtue, horribly infects children, as often as they come within reach of it. They frequently learn from unbred or debauch'd servants such language, untowardly tricks and vices, as otherwise they possibly would be ignorant of all their lives.

要尽可能杜绝这些人与儿童交往，因为之前已有先例表明，一旦接触，就会在教养和德行上严重地污染儿童的心灵。儿童经常从无知或堕落的仆人那里学说话、玩把戏和做坏事，否则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些坏习性。

69．'Tis a hard matter wholly to prevent this mischief. You will have very good luck, if you never have a clownish or vicious servant, and if from them your children never get any infection: but yet as much must be done towards it as can be, and the children kept as much as may be1 in the company of their parents, and those to whose care they are committed. To this purpose, their being in their presence should be made easy to them; they should be allow'd the liberties and freedoms suitable to their ages, and not be held under unnecessary restraints, when in their parents' or governor's sight. If it be a prison to them, 'tis no wonder they should not like it. They must not be hinder'd from being children, or from playing, or doing as children, but from doing ill; all other liberty is to be allow'd them. Next, to make them in love with the company of their parents, they should receive all their good things there, and from their hands. The servants should be hinder'd from making court to them by giving them strong drink, wine, fruit, playthings, and other such matters, which may make them in love with their conversation.

第69节．要完全避免这种恶习其实不易。如果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蠢笨或恶毒的仆人，或者你的孩子们丝毫未受其影响，那得算是绝好的运气。但是不管怎样，都应当尽量留意，让儿童尽可能多地与父母或监护人为伴。为此，他们与长辈相处的时候应当感到轻松，应该给予他们这个年纪应有的自由和空间，在父母或监护人眼皮底下不必加以不必要的约束。如若儿童与长辈相处时如坐针毡，自然就不乐意

了。不应当限制儿童做自己，或者玩耍，抑或是行动幼稚，应当限制的是恶习，除此以外应当给予充分的自由。其次，为了让儿童喜欢父母相伴，所有好的东西都应当在这个过程中由父母之手交给他们。要防止仆人以烈酒、红酒、水果、玩具和其他类似的东西去讨好孩子，让孩子乐于与他们为伍。

70 . Having nam'd company, I am almost ready to throw away my pen, and trouble you no farther on this subject: for since that does more than all precepts, rules and instructions, methinks 'tis almost wholly in vain to make a long discourse of other things, and to talk of that almost to no purpose. For you will be ready to say, what shall I do with my son? If I keep him always at home, he will be in danger to be my young master; and if I send him abroad, how is it possible to keep him from the contagion of rudeness and vice, which is everywhere so in fashion? In my house he will perhaps be more innocent, but more ignorant too of the world; wanting there change of company, and being us'd constantly to the same faces, he will, when he comes abroad, be a sheepish or conceited creature.

第70节．说过儿童应与何人为伴之后，我很想就此搁笔，不再继续唠叨这一话题。因为既然相伴之人比所有戒律、规则和教导都重要，那么我认为高谈阔论其他种种就看似徒劳，几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因为你一定会问，我到底该怎么对待我的儿子？如果总把他留在家里，他就可能变成小少爷；如果送出去，又如何能保证他不受外面处处弥漫的鲁莽与恶习的污染？在家里他可能天真无邪，但可能对世界一无所知；留在家里总与相同的人为伴，见到的永远是那几张面孔，一旦出去，要么就变得懦弱，要么会不可一世。

I confess both sides have their inconveniences. Being abroad,

'tis true, will make him bolder, and better able to bustle and shift among boys of his own age; and the emulation of school-fellows often puts life and industry into young lads. But still you can find a school, wherein it is possible for the master to look after the manners of his scholars, and can shew as great effects of his care of forming their minds to virtue, and their carriage to good breeding, as of forming their tongues to the learned languages, you must confess, that you have a strange value for words, when preferring the languages of the ancientGreeks and Romans to that which made 'emsuch brave men, you think it worthwhile to hazard your son's innocence and virtue for a little Greek and Latin. For, as for that boldness and spirit which lads get amongst their play-fellows at school, it has ordinarily such a mixture of rudeness and ill-turn'd confidence, that those misbecoming and disingenuous ways of shifting in the world must be unlearnt, and all the tincture wash'd out again, to make way for better principles, and such manners as make a truly worthy man. He that considers how diametrically opposite the skill of living well, and managing, as a man should do, his affairs in the world, is to that mal-pertness, tricking, or violence learnt amongst schoolboys, will think the faults of a privater education infinitely to be preferr'd to such improvements, and will take care to preserve his child's innocence and modesty at home, as being nearer of kin, and more in the way of those qualities which make an useful and able man. Nor does anyone find, or so much as suspect, that that retirement and bashfulness which their daughters are brought up in, makes them less knowing, or less able women. Conversation, when they come into the world, soon gives them a becoming assurance; and whatsoever, beyond that, there is of rough and boisterous, may in men be very well spar'd too; for courage and steadiness, as I take it, lie not in roughness and ill breeding.

我承认两种做法各有弊端。的确，送出去能增加孩子的胆量，在同龄的男孩中间更加游刃有余，而同学间的竞争也能让这些小伙子们更有活力，更加努力。但是，你仍然可以找一间学校，让老师管教学生的礼仪，并且在教会他们语言的同时，在塑造品格和提高修养方面取得同样的成果。你得承认这都是出于对语言奇怪的偏爱，似乎学会古希腊语和罗马语比培养勇敢的品质要重要，甚至为了掌握一点希腊文和拉丁文，竟然认为有损孩子的天真和美德也值得。因为男孩子从学校的玩伴那里获得的胆量和气质总是混杂着鲁莽和扭曲的自信，而这些不当又虚伪的混世之道日后必须戒除，洗去所有的颜色，然后才能开始学习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人所应具备的良好准则及礼仪规范。一个人要想体面地生活，优雅地处世，所需的技能恰恰与学校中沾染上的傲慢、戏谑或暴力习气截然相反。明确这一点，就会倾向于私人化的教育。虽然这样的教育也有问题，但在家里学习能更好地保留孩子的天真和谦虚。孩子亲近家人，更容易养成良好品质，成为可造之才。也从来没有人认为或者怀疑，女孩子在退让和羞怯中成长会让她们的知识更少或能力更弱。一旦进入社会，与人交往便能建立自信，此外，还能很好地免除粗鲁与浮躁。因为我认为，勇气和坚定并不在于粗鲁和缺乏教养。

Virtue is harder to be got than knowledge of the world; and if lost in a young man, is seldom recover'd. Sheepishness and ignorance of the world, the faults imputed to a private education, are neither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s of being bred at home, nor if they were, are they incurable evils. Vice is the more stubborn, as well as the more dangerous evil of the two; and therefore in the first place to be fenced against. If that sheepish softness which often enervates those who are bred like fondlings at home, be carefully to be avoided, it is principally so for virtue's sake; for fear lest such a yielding temper should be too susceptible of vicious impressions, and expose the novice too easily to be corrupted. A young man before he leaves the shelter of his father's house, and the guard of a

tutor, should be fortify'd with resolution, and made acquainted with men, to secure his virtues, lest he should be led into some ruinous course, or fatal precipice, before he is sufficiently acquainted with the dangers of conversation, and has steadiness enough not to yield to every temptation. Were it not for this, a young man's bashfulness and ignorance in the world, would not so much need an early care. Conversation would cure it in a great measure; or if that will not do it early enough, it is only a stronger reason for a good tutor at home. For if pains be to be taken to give him a manly air and assurance betimes, it is chiefly as a fence to his virtue when he goes into the world under his own conduct.

美德比知识更难获得，因为如果年轻人失去了美德，日后就很少能够找回。家庭教育背负着造成儿童怯懦无能和不谙世事的罪名，但其实这并非家庭教育的必然后果，即使是也并非不可治愈的恶魔。恶习则更加顽固，也是两大恶魔中更加危险的，因此应当首先加以防范。如果说怯懦软弱会让那些在家庭溺爱中长大的人变得无能，应当小心避免，也主要是出于德行的考虑。唯恐如此柔弱的脾气太易受到恶习的影响，而容易堕落。男子在独立门户、离开导师的庇护之前，应当下定决心，了解人情世故，保持自己的德行，以免在充分了解交际的危险和稳重能够抵御诱惑之前，不至于误入歧途或陷入致命危险。若非如此，年轻人的腼腆与不谙世事就不必过早地加以注意。与他人交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纠正这个毛病；或者如果不能及早完成，那么更说明家中需要一名良师。因为如果你能费些心力帮孩子及时建立起男子气概和担当，那么在他独自进入社会时就有了一重德行的保障。

It is preposterous therefore to sacrifice his innocency to the attaining of confidence and some little skill of bustling for himself among others, by his conversation with ill-bred and vicious boys;

when the chief use of that sturdiness, and standing upon his own legs, is onl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his virtue. For if confidence or cunning come once to mix with vice, and support his miscarriages, he is only the surer lost; and you must undo again, and strip him of that he has got from his companions, or give him up to ruin. Boys will unavoidably be taught assurance by conversation with men, when they are brought into it; and that is time enough. Modesty and submission, till then, better fits them for instruction; and therefore there needs not any great care to stock them with confidence beforehand. That which requires most time, pains, and assiduity, is, to work into them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virtue and good breeding. This is the seasoning they should be prepar'd with, so as not easily to be got out again. This they had need to be well provided with, for conversation, when they come into the world, will add to their knowledge and assurance, but be too apt to take from their virtue; which therefore they ought to be plentifully stor'd with, and have that tincture sunk deep into them.

因此，为了让孩子换得自信和微不足道的社交能力而牺牲纯真，让他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小孩，就是荒谬的。坚定和自立的主要作用还是为了保持他的德行。原因在于，自信或精明一旦沾上恶习，使他误入歧途，他就注定要堕落了。此时你要么就必须重新来过，帮他消除同伴间学来的习气，要么就放任自流任其堕落。到了该把男孩子放到男人中间，让他们相互交往的时候，男孩子没有学不会自信的道理，这一定是来得及的。到那时，谦逊顺从会让他们更能听取教导，因而无需提前大费周章地为他们积累自信。而有必要付出最多时间、精力和努力的应该是让他们学会美德的原则和操守以及良好的教养。这是应当为他们准备的生活佐料，以免未来容易丢掉。这是应当为他们精心提供的。因为等到他们进入社会之后，社会交往会增加见识和自信，但也很容易削弱德行。因此需要充分积累美德，在他们身上深深地打上美德的印记。

How they should be fitted for conversation, and enter'd into the world, when they are ripe for it, we shall consider in another place. But how any one's being put into a mix'd herd of unruly boys, and there learning to wrangle at trap, or rook at span-farthing, fits him for civil conversation or business, I do not see. And what qualities are ordinarily to be got from such a troop of play-fellows as schools usually assemble together from parents of all kinds, that a father should so much covet, is hard to divine. I am sure, he who is able to be at the charge of a tutor at home, may there give his son a more genteel carriage, more manly thoughts, and a sense of what is worthy and becoming, with a greater proficiency in learning into the bargain, and ripen him up sooner into a man, than any at school can do. Not that I blame the schoolmaster in this, or think it to be laid to his charge. The difference is great between two or three pupils in the same house, and three or four score boys lodg'd up and down: for let the master's industry and skill be never so great, it is impossible he should have fifty or an hundred scholars under his eye, any longer than they are in the school together: Nor can it be expected, that he should instruct them successfully in anything but their books; the forming of their minds and manners requiring a constant attention, and particular application to every single boy, which is impossible in a numerous flock, and would be wholly in vain (could he have time to study and correct every one's particular defects and wrong inclinations) when the lad was to be left to himself, or the prevailing infection of his fellows,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four and twenty hours.

至于在孩子足够成熟后，如何与人交往、进入社会，留待别处讨论。但是，我看不出有谁可以混迹于顽童之间，从中既学会些招摇撞骗的伎俩，又学会交往或处事之道。学校的玩伴从良莠不齐的家长身

上沿袭种种秉性，要说一个父亲能指望孩子通常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真是很难预见。我确信，负担得起家教费用的人可以带给自己的儿子比任何学校所教授的更有教养的举止、更富男子气概的思想和恰当的价值观，使孩子获得更强的学习能力，并更加迅速地成长。我并非就此指责校方，或者认为应当由教师承担责任。家庭教育面对的两三个孩子和寄宿学校六十个或八十个男孩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教师不论多么努力或技艺多么高超，也永远无法保证课外时间还能照料五十或一百个学生。也不可能指望他在书本之外再对他们进行任何有效的指导。而思想和行为的塑造要求持续的关注，尤其是因材施教，这对于数量巨大的群体而言，是不可能的，也是徒劳的（即使有时间观察并纠正每个孩子的缺点和错误倾向）。因为一天二十四小时中的大部分时间，孩子都将独处，或处于伙伴的普遍影响之下。

But fathers, observing that fortune is often most successfully courted by bold and bustling men, are glad to see their sons pert and forward betimes; take it for an happy omen that they will be thriving men, and look on the tricks they play their school-fellows, or learn from them, as a proficiency in the art of living, and making their way through the world. But I must take the liberty to say, that he that lays the foundation of his son's fortune in virtue and good breeding, takes the only sure and warrantable way. And 'tis not the waggeries or cheats practis'd amongst school-boys, 'tis not their roughness one to another, nor the well-laid plots of robbing an orchard together, that make an able man; but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generosity, and sobriety, join'd with observation and industry, qualities which I judge school-boys do not learn much of one another. And if a young gentleman bred at home, be not taught more of them than he could learn at school, his father has made a very ill choice of a tutor. Take a boy from the top of a grammar-school, and one of the same age bred as he should be in his father's family, and bring them into good company together, and then see

which of the two will have the more manly carriage, and address himself with the more becoming assurance to strangers. Here I imagine the school-boy's confidence will either fail or discredit him; and if it be such as fits him only for the conversation of boys, he were better to be without it.

但是父亲则认为财富往往最青睐有胆识和四处奔忙之人，非常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大胆上进，认为这种个性是成为成功人士的吉兆，把孩子用在同学身上或者从他们那儿学来的把戏当作生活的本领和通向社会的道路。恕我冒昧直言，只有在德行和教养方面为儿子打好基础，才是唯一确定和有保障的成功之路。贤达之士的造就并非来自于同学间的恶作剧或玩笑把戏，或是争抢斗狠，抑或是精心谋划结伴扫荡一座果园，而是来自正义、慷慨和节制，加上知识经验和勤奋努力。而这些恰恰是我认为男孩子们很少从同学中学得的。如果一个年轻的绅士在家学到的反而不如他可能从学校获得的多，那么一定是他的父亲选错教师了。从语法学校找一个男孩子，再找一个在家上学的同龄男孩子，让他们彼此相伴，然后看哪一个男孩举手投足间会展露更多的男子气概，面对陌生人时会更有自信。我猜学校培养的那个孩子不是显得自卑就是显得自负，如果他的自信只能用来与其他男孩子周旋，那么还不如不要。

Vice, if we may believe the general complaint, ripens so fast now-a-days, and runs up to seed too early in young people,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keep a lad from the spreading contagion, if you will venture him abroad in the herd, and trust to chance or his own inclination for the choice of his company at school. By what fate Vice has so thriven amongst us these years past, and by what hands it has been nurs'd up into so uncontroul'd a dominion, I shall leave to others to enquire. I wish that those who complain of the great decay of Christian piety and virtue everywhere, and of learning and

acquir'd improvements in the gentry of this generation, would consider how to retrieve them in the next. This I am sure, that if the foundation of it be not laid in the education and principling of the youth, all other endeavours will be in vain. And if the innocence, sobriety, and industry of those who are coming up, be not taken care of and preserv'd, 'twill be ridiculous to expect, that those who are to succeed next on the stage, should abound in that virtue, ability, and learning, which has hitherto made England considerable in the world. I was going to add courage too, though it has been look'd on as the natural inheritance of Englishmen. What has been talk'd of some late actions at sea, of a kind unknown to our ancestors, gives me occasion to say, that debauchery sinks the courage of men; and when dissoluteness has eaten out the sense of true honour, bravery seldom stays long after it. And I think it impossible to find an instance of any nation, however renown'd for their valour, whoever kept their credit in arms, or made themselves redoubtable amongst their neighbours, after corruption had once broke through and dissolv'd the restraint of discipline, and vice was grown to such an head, that it durst shew itself barefac'd without being out of countenance.

就像很多人抱怨的那样，如今恶习四处滋生，在年轻人的身上早早播下了种子。如果你还敢让他在外厮混，心存侥幸或相信他自己在学校能够选择伙伴的话，那么几乎无法使其避免流毒侵害。至于过去这些年恶习为何愈演愈烈，又经由谁之手推波助澜导致局面失控，这个问题我想交由别人研究。我希望各地抱怨基督教虔诚和美德沦丧，以及这一代绅士的学识和所得极大退步的人，能思考如何才能使下一代人重获这些价值。我坚信，如果不从青年的教育和训诫入手打下良好的基础，一切其他的努力都将是枉然。如果我们不能用心照料和呵护下一代人的纯真、节制和勤奋，却还要期盼接下来登上舞台的人能够兼具美德、能力和学问，那真是可笑。而美德、能力和学问正是英

格兰傲立于世界的根源。我还想加上勇气，尽管通常认为勇气是英国子民素来拥有的天赋。近来海上发生了一些我们祖先闻所未闻的事情，让我有理由说，放荡摧毁勇气，一旦放荡蚕食了真正的荣耀感，那么勇气恐怕也将不复存在。我想不管哪个国家，无论如何骁勇善战，以武力闻名，或让邻国敬畏，一旦腐败打破和消解了纪律的约束，让恶习抬头，那么绝无可能厚颜无耻地公然展现自己而毫不心虚。

'Tis virtue then, direct virtue, which is the hard and valuable part to be aim'd at in education, and not a forward pertness, or any little arts of shifting. All other considerations and accomplishments should give way and be postpon'd to this. This is the solid and substantial good which tutors should not only read lectures, and talk of, but the labour and art of education should furnish the mind with, and fasten there, and never cease till the young man had a true relish of it, and plac'd his strength, his glory, and his pleasure in it.

因此德行，真正的德行才是教育最艰难和最可贵的目的，鲁莽冲撞或任何雕虫小技则不是。为此，其余所有的考虑和成就都应让位和暂时搁置。这才是稳固扎实的好处，教师不仅应当讲授和谈论，而且应当在教育上付出心力、施展艺术，用它来装备心灵并使其在心灵中扎根，并要常抓不懈，直到年轻人对其产生真正的热爱，并寄希望于此而获得力量、荣耀和快乐。

The more this advances, the easier way will be made for other accomplishments in their turns. For he that is brought to submit to virtue, will not be refractory, or resty, in anything that becomes him; and therefore I cannot but prefer breeding of a young

gentleman at home in his father's sight, under a good governor, as much the best and safest way to this great and main end of education, when it can be had, and is order'd as it should be. Gentlemen's houses are seldom without variety of company. They should use their sons to all the strange faces that come here, and engage them in conversation with men of parts and breeding, as soon as they are capable of it. And why those who live in the country should not take them with them, when they make visits of civility to their neighbours, I know not. This I am sure, a father that breeds his son at home, has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him more in his own company, and there give him what encouragement he thinks fit, and can keep him better from the taint of servants and the meaner sort of people, than is possible to be done abroad. But what shall be resolv'd in the case, must in great measure be left to the parents, to be determin'd by their circumstances and conveniences; only I think it the worst sort of good husbandry for a father not to strain himself a little for his son's breeding; which, let his condition be what it will, is the best portion he can leave him. But if, after all, it shall be thought by some, that the breeding at home has too little company, and that at ordinary schools, not such as it should be for a young gentleman, I think there might be ways found out to avoid the inconveniences on the one side and the other.

德行越高，也就越容易在适当的时候获得其他成就。尊崇德行的人，在任何适合他的事情上都不会逆反或者顽固不化，因此我倾向于让年轻的绅士在父亲眼皮底下受教育，邀请一位良师，切实采用最佳和最安全的方法，并按部就班地加以引导，从而实现教育中最主要的目的。绅士们的家里从不缺少各色人等陪伴儿童。他们应当让儿子接触所有来访的生人，到了孩子具备相应能力之时，还应让他们与才能出众、教养深厚的人交谈。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居于乡村的人，出门对乡邻进行礼节性拜访的时候不愿带上孩子。我相信，将孩子留在家

中培养与由外界培养相比，父亲会有更多的机会陪伴在孩子身边，给予他们他自己认为恰当的鼓励，让他远离仆人和心怀鬼胎者的污染。但是，究竟如何决断还是主要由父母视环境和便利程度而定。我只是认为如果父亲连丁点功夫都不愿花费在儿子身上，那真是最坏的一种持家方式，无论条件如何，亲自培养都是给予孩子的最好礼物。当然，也有人觉得在家接受教育缺乏伙伴，而普通学校又不一定适合年轻的绅士，对此我认为，应该可以找出一些方法来避免两种情形下的不便。

Section 71-80

第71-80节

71 . Having under consideration how great the influence of company is, and how prone we are all, especially children, to imitation, I must here take the liberty to mind parents of this one thing, viz. That he that will have his son have a respect for him and his orders, must himself have a great reverence for his son. *Maximadebeturpuerisreverentia* .You must do nothing before him, which you would not have him imitate. If anything escape you, which you would have pass for a fault in him, he will be sure to shelter himself under your example, and shelter himself so as that it will not be easy to come at him, to correct it in him the right way. If you punish him for what he sees you practise yourself, he will not think that severity to proceed from kindness in you, careful to amend a fault in him; but will be apt to interpret it the peevishness and arbitrary imperiousness of a father, who, without any ground for it, would deny his son the liberty and pleasures he takes himself. Or if you assume to yourself the liberty you have taken, as a privilege belonging to riper years, to which a child must not aspire, you do but add new force to your example, and recommend the action the more powerfully to him. For you must always remember, that children affect to be men earlier than is thought; and they love breeches, not for their cut or ease, but because the having them is a mark or step towards manhood. What I say of the father's carriage before his children, must extend itself to all those who have any authority over them, or for whom he would have them have any respect.

第71节．如前文所述，伙伴的影响很大，而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儿童又极爱模仿，我在这里必须再提醒父母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想要儿子尊重自己和自己的命令，那么做父亲的就必须充分尊重儿子。拉丁文有句谚语叫，必须尽可能地尊重孩子。不要在他跟前做任何你不希望他去模仿的事。某件事如若发生在孩子身上你认为是个过错，自己却不小心做了，那么孩子一定会以你的榜样为借口，这样你再想指责并纠正他的行为就不容易了。如果你自己做过某事，却因为孩子做了相同的事情惩罚他，那么孩子不会认为你是为他好，是为了小心地帮他改正错误，而会理解为父亲的暴戾和武断专横，是毫无理由地剥夺儿子的自由和快乐。或者如果你认为自己享受的自由是年长者的特权，儿童不应渴望，那么你的榜样就更增添了吸引力，让儿童更想要去模仿。因为你必须时刻谨记，儿童装作小大人比预想的还要早，他们喜欢穿马裤可不是为了剪裁或舒适，而是将穿马裤视作自己走向成熟的标志或手段。我所说的父亲以身作则应当推及所有在孩子眼里拥有权威的或者孩子应当尊重的人。

72 . But to return to the business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ll the actions of childishness, and unfashionable carriage, and whatever time and age will of itself be sure to reform, being (as I have said) exempt from the discipline of the rod, there will not be so much need of beating children as is generally made use of. To which if we add learning to read, write, dance, foreign language, &c. as under the same privilege, there will be but very rarely an occasion for blows or force in an ingenuous education. The right way to teach them those things is, to give them a liking and inclination to what you suppose to them to be learn'd, and that will engage their industry and application. This I think no hard matter to do, if children be handled as they should be, and th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bove-mention'd be carefully apply'd, and with them these few rules observ'd in the method of instructing them.

第72节．回到奖励与惩罚的问题。所有幼稚的举动，不合时宜的举止，以及岁月和年纪会自行修正的行为，其实无需棍棒来规约（如前所述），如此来看便不必像通常那样让孩子受那么多的皮肉之苦了。如果把学习阅读、书写、舞蹈和外语等等也列为同样的特权，那么在传统的教育中就没什么机会要拳打脚踢了。传授以上事项的正确方法是让他们喜爱并想要去做那些你认为应当学习的事情，这样他们就会努力付诸实践。我想如果能用正确的方法对待孩子，并如上所述小心做到赏罚分明，加上教导时注意以下几条规则，应该不难做到。

73．(1)None of the things they are to learn, should ever be made a burthen to them, or impos'd on them as a task. Whatever is so propos'd presently becomes irksome; the mind takes an aversion to it, though before it were a thing of delight or indifferency. Let a child but be order'd to whip his top at a certain time every day, whether he has or has not a mind to it; let this be but requir'd of him as a duty, wherein he must spend so many hours morning and afternoon, and see whether he will not soon be weary of any play at this rate. Is it not so with grown men? What they do cheerfully of themselves, do they not presently grow sick of, and can no more endure, as soon as they find it is expected of them as a duty? Children have as much a mind to shewthat they are free, that their own good actions come from themselves, that they are absolute and independent, as any of the proudest of you grown men, think of them as you please.

第73节．（1）任何要他们学会的东西都不应成为负担，或作为任务强加在他们身上。一旦如此便会让人生厌，思想上就会抗拒，尽管此前这原本是让人高兴或无可无不可的事情。比如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命令孩子不管他当时想不想，都要去玩陀螺，让这件事成为他的一个任务，必须早晚花好几个小时去做，看他照此进行会不会迅速厌

倦一切游戏。就算是大人不也如此吗？原本兴致勃勃做着某事，一旦发现它变成了被要求完成的任务，恐怕不用多久就会厌烦，难以承受了吧？孩子们跟任何自尊心最强的成年人一样，不管你怎么看，他们都要表现出自己是自由的，自身的好表现皆为自觉行为，是无条件且独立的。

74 . (2)As a consequence of this, they should seldom be put about doing even those things you have got an inclination in them to, but when they have a mind and disposition to it. He that loves reading, writing, music, &c. finds yet in himself certain seasons wherein those things have no relish to him; and if at that time he forces himself to it, he only pothers and wearies himself to no purpose. So it is with children. This change of temper should be carefully observ'd in them, and the favourable seasons of aptitude and inclination be heedfully laid hold of: and if they are not often enough forward of themselves, a good disposition should be talk'd into them, before they be set upon anything. This I think no hard matter for a discreet tutor to do, who has study'd his pupil's temper, and will be at a little pains to fill his head with suitable ideas, such as may make him in love with the present business. By this means a great deal of time and tiring would be sav'd: for a child will learn three times as much when he is in tune, as he will with double the time and pains when he goes awkwardly or is dragg'd unwillingly to it. If this were minded as it should, children might be permitted to weary themselves with play, and yet have time enough to learn what is suited to the capacity of each age. But no such thing is consider'd in the ordinary way of education, nor can it well be. That rough discipline of the rod is built upon other principles, has no attraction in it, regards not what humour children are in, nor looks after favourable seasons of inclination. And indeed it would be ridiculous, when compulsion and blows have rais'd an aversion in

the child to his task, to expect he should freely of his own accord leave his play, and with pleasure court the occasions of learning; whereas, were matters order'd right, learning anything they should be taught might be made as much a recreation to their play, as their play is to their learning. The pains are equal on both sides. Nor is it that which troubles them; for they love to be busy, and the change and variety is that which naturally delights them. The only odds is, in that which we call play they act at liberty, and employ their pains (whereof you may observe them never sparing) freely; but what they are to learn is forc'd upon them, they are call'd, compell'd, and driven to it. This is that, that at first entrance balks and cools them; they want their liberty. Get them but to ask their tutor to teach them, as they do often their play-fellows, instead of his calling upon them to learn, and they being satisfy'd that they act as freely in this as they do in other things, they will go on with as much pleasure in it, and it will not differ from their other sports and play. By these ways, carefully pursu'd, a child may be brought to desire to be taught anythingyou have a mind he should learn. The hardest part, I confess, is with the first or eldest; but when once he is set right, it is easy by him to lead the rest whither one will.

第74节．（2）基于此，尽量避免让他们去做那些你认为适合他们的事，而要等到他们自己期待和愿意的时候再说。一个人热衷阅读、写作、音乐等等，也可能在特定时候感到索然无味，如果这时候他逼迫自己非得去做，那就是无端地自寻烦恼、自讨苦吃。儿童亦然。这种性情的变化要观察仔细，对天资和倾向最有利的时机要牢牢把握。如若他们自身并不那么进取，就要悉心教导，直到他们找到一个立足点。我认为对于谨慎的导师这绝非难事，细查学生的秉性，小心地向其灌输些适当的观念，比如让他喜欢上眼下正在做的事。运用这一方法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既省时又省力，因为孩子用心则可以事半功倍，若是不情不愿则事倍功半。如果能恰当地记住这一点，那么就

可以允许孩子们尽情玩耍，同时还能有充足的时间学习符合其年龄的知识。不过普通的教育方法可没有考虑这方面内容，也无法实施到位。所谓棍棒下的严厉管教有据可循的说法既无内在的吸引力，也无视儿童的乐趣，而且也没有利用兴趣高涨的时机。如果在强制和体罚已经让孩子对任务心生厌恶的时候，还要期待孩子能自觉自愿地停止玩耍，高高兴兴地争取学习的机会，那真是滑稽可笑。而如果一切安排得当，学习本可以成为玩耍之外的休闲，就像玩耍之于学习一样。两方面所费的力气是相同的。而且这对儿童来说倒不是什么麻烦的事情，因为他们喜欢有事可做，而变换花样正是他们本来就乐意的事情。唯一的差别在于游戏他们是自愿去做的，而且自愿多花力气（你可以看到儿童玩耍总是不遗余力的），但是学习却是外界强加的，是被命令、逼迫和催促着去做的。这就是说从一开始积极性就受到了打击，当头泼了冷水，而儿童渴望自由。给他们自由，但是要他们像跟玩伴请教一样，主动向导师求教，而不是让导师来吩咐他们学习。若能像其他事情一样拥有足够自由，儿童便会满足，并且因为从中获得乐趣而继续去做，那么学习跟其他运动和游戏就没有什么差别了。通过小心地采用这些方法，儿童慢慢地就会渴望学习任何你觉得他应当学会的事情。我承认最难的就是教育第一个或者说最大的孩子，但是一旦教好了，让其他孩子以他为榜样去做任何事就会轻而易举。

75 . Though it be past doubt, that the fittest time for children to learn anything, is, when their minds are in tune, and well dispos'd to it; when neither flagging of spirit, nor intentness of thought upon something else, makes them awkward and averse; yet two things are to be taken care of: (1)That these seasons either not being warily observ'd, and laid hold on as often as they return, or else, not returning as often as they shoul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hild be not thereby neglected, and so he be let grow into an habitual idleness, and confirm'd in this disposition: (2)That though other things are ill learn'd, when the mind is either indispos'd, or otherwise taken up; yet it is of great moment, and worth our

endeavours, to teach the mind to get the mastery over itself, and to be able, upon choice, to take itself off from the hot pursuit of one thing, and set itself upon another with facility and delight, or at any time to shake off its sluggishness, and vigorously employ itself about what reason, or the advice of another shall direct. This is to be done in children, by trying them sometimes, when they are by laziness unbent, or by avocation bent another way, and endeavouring to make them buckle to the thing propos'd. If by this means the mind can get an habitual dominion over itself, lay by ideas or business as occasion requires, and betake itself to new and less acceptable employments without reluctancy or discomposure, it will be an advantage of more consequence than Latin or logic or most of those things children are usually requir'd to learn.

第75节．儿童学习的最佳时机是兴致盎然、精神饱满的时候，而情绪低落或者思想不集中的时候会让他们感到别扭和反感，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但仍有两件事需谨慎对待：（1）如果这些情绪高涨的时机没有紧密关注、不小心错过，或者没有如预料的一样出现，也不应当忽视孩子的进步，而让他陷入一种习惯性的懒惰，甚至因此定型。（2）尽管孩子在精力不集中，或者精力不够的时候可能别的东西没学好，仍值得我们付出努力，使他们学会掌控自己的精力，养成在适当的时候从热衷的事情中解脱出来，轻松愉快地进行下一件事情的能力，或者随时摆脱惰性，在理智的指导或他人建议之下精神饱满地去做一件事情。可以找个机会试探一下儿童，在他们因为惰性，或因为嗜好而难以转移注意力时，尝试让他们按照提议去做一件事情。如果通过这一方法，能够使意志习惯性地自我掌控，根据情况所需暂时搁下原有的想法或事务，转向新的和较难的事情，而不会不情愿或烦躁不安，那么其带来的好处会远胜于拉丁文或逻辑学，以及多数儿童通常需要学习的东西。

76 . Children being more active and busy in that age, than in any other part of their life, and being indifferent to anything they can do, so they may be but doing, dancing and Scotch-hoppers would be the same thing to them, were the encouragements and discouragements equal. But to things we would have them learn, the great and only discouragement I can observe, is, that they are call'd to it, 'tis made their business, they are teaz'd and chid about it, and do it with trembling and apprehension; or, when they come willingly to it, are kept too long at it, till they are quite tir'd: all which intrenches too much on that natural freedom they extremely affect. And it is that liberty alone which gives the true relish and delight to their ordinary play-games. Turn the tables, and you will find they will soon change their application; especially if they see the examples of others whom they esteem and think above themselves. And if the things which they observe others to do, be order'd so, that they insinuate themselves into them as the privilege of an age or condition above theirs; then ambition, and the desire still to get forward and higher, and to be like those above them, will set them on work, and make them go on with vigour and pleasure; pleasure in what they have begun by their own desire, in which way the enjoyment of their dearly beloved freedom will be no small encouragement to them. To all which, if there be added the satisfaction of credit and reputation, I am apt to think there will need no other spur to excite their application and assiduity, as much as is necessary. I confess, there needs patience and skill, gentleness and attention, and a prudent conduct to attain this at first. But why have you a tutor, if there needed no pains? But when this is once establish'd, all the rest will follow, more easily than in any more severe and imperious discipline. And I think it no hard matter to gain this point; I am sure it will not be where children have no ill examples set before them. The great danger therefore, I apprehend, is only from servants, and other ill-order'd children, or

such other vicious or foolish people, who spoil children both by the ill pattern they set before them in their own ill manners and by giving them together the two things they should never have at once; I mean vicious pleasures and commendation.

第76节．儿童所处的年龄比任何其他时间都更加活泼好动，至于做什么倒是并无特别意见，只是去做而已。因此如果鼓励和阻力相同，舞蹈和跳房子对他们来说便无差别。但是对于我们希望他们学习的事情，据我观察，最大也是唯一的阻力就是命令儿童当作任务去完成，还要因此受到嘲笑和责备，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或者他们本来乐意去做，但时间太长导致倦怠，这些做法都过度侵犯了儿童极度看重的与生俱来的自由。而孩子们平时做游戏之所以兴致盎然、轻松愉快，恰恰就是因为自由。一旦情况变化，尤其是在他们看到自己尊重或高于自己的人的榜样之时，你会发现他们马上转向别的事情。而如果儿童看到别人所做的事情，并得到暗示，以为是比他们年长或具备一定条件时才可以获得的特权，那么雄心、上进心和进取心，以及向高于自己的对象看齐的心理就会让他们也着手去做，并且满怀热情和愉悦地完成。做他们所渴望的事情，并从中获得他们珍视的自由，对于儿童来说是不小的鼓励。如果还能加上称赞和名誉所带来的满足，我认为就无需正常范围以外更多的刺激来强化这种行为和努力了。我承认，这需要耐心和技巧、温柔和关注，在最开始的时候要谨慎地推进。但是，如果没什么要做的，还请家庭教师做什么呢？但是一旦这方面办妥了，所以其他的事情便顺理成章，而且比任何更加严厉专横的约束都要来得容易。我认为做到这一点不是什么难事，我相信只要儿童身边没有坏榜样，也不会成为什么难事。因此我的理解是，大的危险只会来自仆人，以及其他没教养的孩子，或者是那些别有用心或愚蠢的人。后者会毁了孩子，不仅因为自己缺乏礼数做出坏榜样，而且还会给孩子两件他们永远不应同时得到的东西：即恶意的乐趣和表扬。

77．As children should very seldom be corrected by blows, so I think frequent, and especially passionate chiding of almost as ill consequence. It lessens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ents, and the respect of the child; for I bid you still remember, they distinguish early betwixt passion and reason: and as they cannot but have a reverence for what comes from the latter, so they quickly grow into a contempt of the former; or if it causes a present terror, yet it soon wears off, and natural inclination will easily learn to slight such scare-crows which make a noise, but are not animated by reason. Children being to be restrain'd by the parents only in vicious (which, in their tender years, are only a few) things, a look or nod only ought to correct them when they do amiss; or, if words are sometimes to be us'd, they ought to be grave, kind, and sober, representing the ill or unbecomingness of the faults, rather than a hasty rating of the child for it; which makes him not sufficiently distinguish, whether your dislike be not more directed to him than his fault. Passionate chiding usually carries rough and ill language with it, which has this further ill effect, that it teaches and justifies it in children: and the names that their parents or preceptors give them, they will not be asham'd or backward to bestow on others, having so good authority for the use of them.

第77节．正如应当尽量避免用体罚来纠正孩子一样，我认为经常性的尤其是厉声斥责也是有害的。家长的权威以及孩子对家长的尊重因此削弱。因为我相信您还记得，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区分情绪和理智，因为他们不得不尊重后者，因此他们很快便会对前者不屑一顾，或者即使情绪可以在当下造成恐惧，但也会迅速散去，天性会轻易使孩子对这种虚张声势又没什么道理支撑的稻草人产生怠慢之心。孩子只有在作恶（在很小的时候，几乎是没有的）之时，才需要父母加以管束，无心之过只需一个眼神或点头示意就可以纠正。如果要用到言语，措辞也应严肃、和蔼而冷静，指出错误的不当或不合适之

处，而不是草率地斥责了事。这会让孩子无从分辨，究竟你不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犯的错误。怒气冲冲的指责通常夹杂着粗鲁和不雅的语言，不但教坏孩子还让他们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是为更糟糕的影响。既然是从家长和老师身上学来的，那么儿童把同样的话语用到别人身上就不会感到羞愧或迟疑，因为他们在使用时有了权威的后盾。

78 . I foresee here it will be objected to me, what then, will you have children never beaten nor chid for any fault? This will be to let loose the reins to all kind of disorder. Not so much, as is imagin'd, if a right course has been taken in the first seasoning of their minds, and implanting that awe of their parents above mentioned. For beating, by constant observation, is found to do little good, where the smart of it is all the punishment is fear'd or felt in it; for the influence of that quickly wears out, with the memory of it. But yet there is one, and but one fault, for which, I think, children should be beaten, and that is, obstinacy or rebellion. And in this too, I would have it order'd so, if it can be, that the shame of the whipping, and not the pain,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punishment. Shame of doing amiss, and deserving chastisement, is the only true restraint belonging to virtue. The smart of the rod, if shame accompanies it not, soon ceases, and is forgotten, and will quickly by use lose its terror. I have known the children of a person of quality kept in awe by the fear of having their shoes pull'd off, as much as others by apprehensions of a rod hanging over them. Some such punishment I think better than beating; for 'tis shame of the fault, and the disgrace that attends it, that they should stand in fear of, rather than pain, if you would have them have a temper truly ingenuous. But stubbornness, and an obstinate disobedience, must be master'd with force and blows; for this there is no other remedy. Whatever particular action you bid him do, or forbear, you must be sure to see yourself obey'd; no

quarter in this case, no resistance: for when once it comes to be a trial of skill, a contest for mastery betwixt you, as it is if you command and he refuses, you must be sure to carry it, whatever blows it costs, if a nod or words will not prevail; unless, for ever after you intend to live in obedience to your son. A prudent and kind mother of my acquaintance was, on such an occasion, forc'd to whip her little daughter, at her first coming home from nurse, eight times successively the same morning, before she could master her stubbornness, and obtain a compliance in a very easy and indifferent matter. If she had left off sooner, and stopp'd at the seventh whipping, she had spoil'd the child forever, and, by her unprevailing blows, only confirm'd her refractoriness, very hardly afterwards to be cur'd: but wisely persisting till she had bent her mind, and suppled her will, the only end of correction and chastisement, she establish'd her authority thoroughly in the very first occasions, and had ever after a very ready compliance and obedience in all things from her daughter; for as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so I think it was the last too she ever struck her.

第78节．可以预料，必然有人会反对我说，那怎么办呢，你要让儿童犯了错误却从不受到打骂吗？这会让他们变成脱缰的野马，造成各种混乱。如果起初在对他们的心灵施加影响时就采取了正确的方式，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令其产生敬畏父母之心，那么事态就不会像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发现责打几乎没什么益处，它造成的痛苦全在于对惩罚的恐惧或接受惩罚时的感觉，而这种影响会随着记忆的淡漠而迅速消散。不过我认为，有一种错误，也是唯一的一种错误，儿童犯了就要挨打，那就是顽固或者说逆反。针对这一点，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定下规矩，要让鞭打的耻辱而非其带来的疼痛成为惩罚的重点。犯错即是蒙羞，受罚也应当，这是唯一一种属于美德的真正约束手段。棍棒带来的疼痛如果不与耻辱相伴，就会很快停止，遭到遗忘，并且因常常使用而失去威慑力。我知道一位地位

显赫之人的孩子，他们之所以始终怀有敬畏之心，就是因为害怕别人把他们的鞋脱掉，正如其他孩子惧怕悬于头顶的棍棒一样。我认为此类惩罚比责打要好，因为如果你希望他们拥有真正诚朴的品性，那么他们始终应当惧怕的不是肌肤之痛，而是因犯错而产生的羞愧之心，以及随之而来的耻辱。但执拗和顽固不从则必须用拳头及强力来制服，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纠正。不论你吩咐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你必须确切看到你的命令得到了执行，毫不通融，不得反抗。一旦你发出的命令被他拒绝，局面变成了你们之间的斗智斗勇以及对控制权的争夺，而点头示意或好言相劝也不能将其说服，那么不论怎样棍棒相加，都要确保你的命令得到执行，除非你想从此以后对你的孩子唯命是从。我认识一位审慎而慈爱的母亲，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她不得不一上午接连鞭打了她那头一次从保姆那儿回家的幼女八次，直到战胜她的顽固性情，从而以一种简单而毫不留情的方式使她顺从听话。如果她早一些放弃，在鞭打第七次的时候就住手，那么她就永久性地宠坏了这个孩子，而且她徒劳的鞭打只会强化她的顽固个性，以后很难再纠正。而通过明智的坚持不懈，直到使其精神屈服，意志软化，这也是惩罚与改造的唯一目的，这位母亲在首次出现这种情况时就彻底建立起自己的威信，并在今后的所有情况下都使女儿立刻服从听命。这是她第一次打孩子，我想这也会是最后一次。

The pain of the rod, the first occasion that requires it, continu'd and increas'd, without leaving off till it has throughly prevail'd, should first bend the mind, and settle the parent's authority; and then gravity, mix'd with kindness, should forever after keep it.

在第一次动用武力的场合，棍棒带来的痛楚应不断持续并增强，不到彻底获胜不能停止，它首先应当使精神屈服，并树立父母的威信，然后用夹杂着慈爱的严肃态度永久性地保持这种威信。

This, if well reflected on, would make people more wary in the use of the rod and the cudgel, and keep them from being so apt to think beating the safe and universal remedy to be apply'd at random on all occasions. This is certain, however, if it does no good, it does great harm; if it reaches not the mind, and makes not the will supple, it hardens the offender; and whatever pain he has suffer'd for it, does but endear him to his beloved stubbornness, which has got him this time the victory, and prepares him to contest, and hope for it for the future. This I doubt not but by ill-order'd correction many have been taught to be obstinate and refractory who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very pliant and tractable. For if you punish a child so, as if it were only to revenge the past fault, which has rais'd your choler, what operation can this have upon his mind, which is the part to be amended? If there were no sturdy humour or wilfulness mix'd with his fault, there was nothing in it that requir'd the severity of blows. A kind or grave admonition is enough to remedy the slips of frailty, forgetfulness, or inadvertency, and is as much as they will stand in need of. But if there were a perverseness in the will, if it were a design'd, resolv'd disobedience, the punishment is not to be measur'd by the greatness or smallness of the matter wherein it appear'd, but by the opposition it carries, and stands in, to that respect and submission is due to the father's orders; which must always be rigorously exacted, and the blows by pauses laid on, till they reach the mind, and you perceive the signs of a true sorrow, shame, and purpose of obedience.

如果认真思考，这会使人们在使用棍棒时更加小心谨慎，并使他们不再轻易相信责打是一种没有危险而普遍适用的纠正错误的手段，可以在任何场合任意使用。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责打没有带来满意的效果，那它就会造成极大的害处，如果它没能直抵人心，软化意志，那它就会使犯错者更为坚定。不论他因此遭受了怎样的痛苦，

这只会使他更为偏爱自己那可喜的顽固性情，因为这一次顽固为他赢得了胜利，并为今后的竞争做好了准备，同时期待它的到来。我毫不怀疑，正是由于不当的教导方式，许多本可以变得柔顺驯服的人被训导成顽固不化、桀骜不驯的人。如果你这样惩罚一个孩子，只是为了报复他刚犯下的叫你大动肝火错误，这对他的心灵能造成什么影响呢？而心灵才是应当纠正的部分。如果他犯下的错误并不体现出执拗的脾气或带有任性固执的成分，那么完全没有必要运用责打这么严厉的手段。温和而严肃的劝诫足够让他们改正诸如脆弱、健忘或漫不经心之类的小毛病，这种方式今后对他们来说也足够了。但如果这出于一种一意孤行的愿望，有意下定决心拒不听话，那么惩罚的程度不应依据错误的大小，而要判断他所进行的反抗在多大程度上违反了父亲所要求的尊敬与顺从。这些要求必须严格遵行，并不时叫他们受点皮肉之苦，直到这些原则深入其心，而你也看出真正懊悔、羞耻以及有心顺从的迹象。

This, I confess, requires something more than setting children a task, and whipping them without any more a-do if it be not done, and done to our fancy. This requires care, attention, observation, and a nice study of children's tempers, and weighing their faults well, before we come to this sort of punishment. But is not that better than always to have the rod in hand as the only instrument of government? And by frequent use of it on all occasions, misapply and render inefficacious this last and useful remedy, where there is need of it? For 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when it is promiscuously us'd upon every little slip? When a mistake in concordance, or a wrong position in verse, shall have the severity of the lash, in a well-temper'd and industrious lad, as surely as a wilful crime in an obstinate and perverse offender; how can such a way of correction be expected to do good on the mind, and set that right? Which is the only thing to be look'd after; and when set right, brings all the rest that you can desire along with it.

我想说，这不仅要求给孩子分派个任务，如果他们未能完成或未按我们的心愿完成，就将他们鞭打一顿。这还要求我们的爱护、关注、观察，以及充分了解孩子的性情，在实行此类惩罚之前，认真考虑他们的缺点。这和总是棍棒在手并将其视作唯一的管教方式相比，难道不是更好的方法吗？由于使用太过频繁，责打这一有效的手段遭到滥用并失去效力，那还有何必要去使用它呢？如果将它滥用于每个微小的过错，那还能指望得到什么别的结果吗？如果一个性情温顺、勤奋用功的孩子因为弄错了一条索引或在诗中写错了一个词的位置就要遭到严厉的鞭打，就和一个顽固不化、一意孤行的叛逆者有意犯错没有分别，那怎么能指望这样一种教导方法对心灵产生有利影响并使其步入正轨呢？而这正是唯一应当关注的事，当心灵走上正途，你所渴望的一切也会随之而来。

79 . Where a wrong bent of the will wants not amendment, there can be no need of blows. All other faults, where the mind is rightly dispos'd, and refuses not the government and authority of the father or tutor, are but mistakes, and may often be overlook'd; or when they are taken notice of, need no other but the gentle remedies of advice, direction, and reproof, till the repeated and wilful neglect of those, shewsthe fault to be in the mind, and that a manifest perverseness of the will lies at the root of their disobedience. But whenever obstinacy, which is an open defiance, appears, that cannot be wink'd at or neglected, but must, in the first instance, be subdu'd and master'd; only care must be had, that we mistake not and we must be sure it is obstinacy and nothing else.

第79节．如果意志的一种错误倾向无须纠正，就没必要动用棍棒。只要心灵并未走入歧途，并不拒斥父亲或教师的管教及权威，那么这类缺点不过是小过失，常常可以不加理会。即使注意到了这些缺

点，也无须其他种类的责罚，依靠劝告、指导、责备这样较为温和的方式加以纠正就可以，除非他们存心为之并反复对此充耳不闻，暴露出心灵中的缺陷，而且意志上明显的一意孤行正是他们抗命不从的根源。作为一种公开的反抗，不论顽固的言行何时出现，都不能对其视而不见或放任不理，而要在第一时间将其压倒制服。唯一需要当心的是，我们自己没有弄错，确定这是顽固性情的体现而非其他。

80 . But since the occasions of punishment, especially beating, are as much to be avoided as may be, I think it should not be often brought to this point. If the awe I spoke of be once got, a look will be sufficient in most cases. Nor indeed should the same carriage, seriousness, or application be expected from young children as from those of riper growth. They must be permitted, as I said, the foolish and childish actions suitable to their years, without taking notice of them. Inadvertency, carelessness, and gayety, is the character of that age. I think the severity I spoke of is not to extend itself to such unseasonable restraints. Nor is that hastily to be interpreted obstinacy or wilfulness, which is the natural product of their age or temper. In such miscarriages they are to be assisted, and help'd towards an amendment, as weak people under a natural infirmity; which, though they are warn'd of, yet every relapse must not be counted a perfect neglect, and they presently treated as obstinate. Faults of frailty, as they should never be neglected, or let pass without minding, so, unless the will mix with them, they should never be exaggerated, or very sharply reprov'd; but with a gentle hand set right, as time and age permit. By this means, children will come to see what 'tis in any miscarriage that is chiefly offensive, and so learn to avoid it. This will encourage them to keep their wills right; which is the great business, when they find that it preserves them from any great displeasure, and that in all their other failings they meet with the kind concern and help, rather than

the anger and passionate reproaches of their tutor and parents. Keep them from vice and vicious dispositions, and such a kind of behaviour in general will come with every degree of their age, as is suitable to that age and the company they ordinarily converse with; and as they grow in years, they will grow in attention and application. But that your words may always carry weight and authority with them, if it shall happen, upon any occasion, that you bid him leave off the doing of any even childish things, you must be sure to carry the point, and not let him have the mastery. But yet, I say, I would have the father seldom interpose his authority and command in these cases, or in any other, but such as have a tendency to vicious habits. I think there are better ways of prevailing with them: and a gentle persuasion in reasoning, (when the first point of submission to your will is got) will most times do much better.

第80节．不过由于最好尽可能地避免处罚尤其是责打，我想不应常常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一旦在孩子身上培养起我所提到的那种敬畏之情，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眼神就足够了。我们也不应要求年幼的孩子拥有像年长些的孩子那样的仪态举止以及严肃专注的态度。正如我所说的，应当允许那些与他们年纪相称的可笑而孩子气的举动，而无需特别注意。漫不经心、粗心大意以及兴高采烈正是那个年纪的特点。我想我提到的那种严厉方式不应扩大为对这些行为不合情理的管束。也不能将这些特性草率地理解为顽固和任性，它们正是孩子特定年龄与性情的自然产物。当他们言行失当，应当对他们提供帮助，以改正错误，就像对待天生体质虚弱的人那样。尽管我们要对顽固任性保持警惕，但不应将每一次故态复萌都视为百分百的故意犯错并立刻将其作为顽固处理。性格中的弱点所引起的过失从不应当受到忽视，或不加注意，轻易放过。不过，除非是有意而为，否则无须夸大罪行或严厉指责，而应视时机及年龄，以较为温和的方式使其改正错误。以这种方法，孩子就会逐渐明白什么样的错误最难以饶恕，

并因此学会避免再犯。这能够鼓励他们正确运用自己的意志，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发现这可以避免令别人动怒，而自己的其他弱点则能获得友好的关心与帮助，而不是引来父母或教师的怒气并遭到激烈的责备。要使孩子远离邪恶，防止其为恶的倾向，总体而言，每一年龄段都伴随着特定的行为，这些行为适合于孩子所处的年纪以及他们日常交往的伙伴。随着年纪渐长，他们会变得更加用心与专注。但你的命令必须具有分量与威信，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如果你要求他停止去做一些孩子气的事，你必须确保自己的命令得到执行，莫要让他占了上风。不过我建议，做父亲的最好少干预这类事，少施展威信，少下命令，除非孩子有养成恶习的倾向。我想有更好的方式能够制服他们，一边说理一边温和地劝说（首先要让孩子服从你的意愿）在很多时候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Section 81-90

第81-90节

81 . It will perhaps be wonder'd, that I mention reasoning with children; and yet I cannot but think that the true way of dealing with them. They understand it as early as they do language; and, if I mis-observe not, they love to be treated as rational creatures, sooner than is imagin'd. 'Tis a pride should be cherish'd in them, and, as much as can be, made the greatest instrument to turn them by.

第81节．我提到要和孩子说理，有人或许会觉得奇怪，但我仍然觉得这是对待他们的真正方法。孩子一掌握语言就懂得道理，如果我没看错，他们比料想得早得多就开始喜欢被当作理性的生物对待。我们应当珍惜他们身上的这种自豪感，并充分利用，使其成为教导儿童的最重要工具。

But when I talk of reasoning, I do not intend any other but such as is suited to the child's capacity and apprehension. Nobody can think a boy or three of seven years old should be argu'd with as a grown man. Long discourses, and philosophical reasonings, at best, amaze and confound, but do not instruct children. When I say, therefore, that they must be treated as rational creatures, I mean that you should make them sensible, by the mildness of your carriage, and the composure even in your correction of them, that what you do is reasonable in you, and useful and necessary for them; and that it is not out of caprice, passion or fancy, that you

command or forbid them anything. This they are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and there is no virtue they should be excited to, nor fault they should be kept from, which I do not think they may be convinced of; but it must be by such reasons as their age and understandings are capable of, and those propos'd always in very few and plain words. The foundations on which several duties are built, and the fountains of right and wrong from which they spring, are not perhaps easily to be let into the minds of grown men, not us'd to abstract their thoughts from common receiv'd opinions. Much less are children capable of reasonings from remote principles. They cannot conceive the force of long deductions. The reasons that move them must be obvious, and level to their thoughts, and such as may (if I may so say) be felt and touch'd. But yet, if their age, temper, and inclination be consider'd, there will never want such motives as may be sufficient to convince them. If there be no other more particular, yet these will always be intelligible, and of force, to deter them from any fault fit to be taken notice of in them, (viz.)That it will be a discredit and disgrace to them, and displease you.

不过当我谈到说理，我所指的只是那些在儿童的能力和理解力范围之内的道理。不会有人认为一个三岁或七岁的男孩应当和一个成人论辩。长篇大论的谈话以及哲学思辨充其量只会使孩子惊慌失措、摸不着头脑，而不能为其提供教益。因此，当我说应将孩子当成理性的生物来对待，我的意思是，你必须通过自己温和的举止及冷静的态度（甚至是在管教他们的时候）使他们变得通情达理，你的言行对你而言合情合理，对他们而言则行之有效且必不可少，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或空想就随心所欲地命令他们做什么事，或禁止他们做什么事。这些孩子完全能够理解，如果他们还未能明白某种美德或过错的意义，就不应激发他们对这种美德的热爱，或禁止他们犯下这种错误，不过和他们说理时必须采用与他们的年龄和理解力相称的方式，并运

用简短明了的语言。对于成年人而言，各种责任的基础以及他们赖以成长的是非的源泉或许并不能轻而易举地深入他们的心灵，因为他们并不惯于从平常接受的意见中总结出抽象观念。儿童就更没能力根据缥缈的原则进行思考，冗长的推理也没法作用到他们身上，打动他们的道理必须清晰明了，并接近他们的思维水平，而且（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最好能让他们体验并感知。如果考虑到了孩子的年龄、性情和爱好，就绝不会缺少充分劝服他们的动力。如果没有其他更特别的动机，下面这一点简单易懂并具有效力，能阻止他们犯下那些需要在他们身上加以注意的错误，即犯错会败坏他们的名誉，使他们蒙羞，并惹父母生气。

82 . But of all the ways whereby children are to be instructed, and their manners formed, the plainest, easiest, and most efficacious, is, to set before their eyes the examples of those thing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or avoid; which, when they are pointed out to them, in the practice of persons within their knowledge, with some reflections on their beauty and unbecomingness, are of more force to draw or deter their imitation, than any discourses which can be made to them. Virtues and vices can by no words be so plainly set before their understandings as the actions of other men will shewthem, when you direct their observation, and bid them view this or that good or bad quality in their practice. And the beauty or uncomeliness of many things, in good and ill breeding, will be better learnt, and make deeper impressions on them, in the examples of others, than from any rules or instructions can be given about them.

第82节．在所有那些用于指导儿童并培养他们礼貌举止的方法中，最简单易行也是最行之有效的一种就是通过他们眼前的事例让他们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让孩子观察他们所熟悉的人的一

言一行，并思考哪些言行是美的，哪些是不宜的，相比于长篇大论的说教，这能够更有效地吸引或阻止他们进行模仿。当你指导孩子观察，让他们亲眼看到别人在行动中展现出的种种善与恶，那么没有一种语言能像这些人的行动所展示的那样，清楚地让他们理解善恶的意义。通过他人的榜样，孩子能更好地理解好的和差的教养所体现出的种种的美与不美，并且印象更深，这比任何规矩或命令所能给予他们的都多。

This is a method to be us'd, not only whilst they are young, but to be continu'd even as long as they shall be under another's tuition or conduct; nay, I know not whether it be not the best way to be us'd by a father, as long as he shall think fit, on any occasion, to reform anything he wishes mended in his son; nothing sinking so gently, and so deep, into men's minds, as example. And what ill they either overlook or indulge in themselves, they cannot but dislike and be asham'd of, when it is set before them in another.

不仅要在孩子年幼时使用这种方法，只要他们仍处于别人的引领和教导之下，就可以一直使用下去。不仅如此，我想只要做父亲的认为合适，就可以把它当作最好的方法，随时随地用来让儿子改正任何他希望改正的事情。没有什么能像榜样那样温和地潜入人心深处。对于自身的缺点，孩子或忽视或纵容，而一旦他们看见这些缺点通过别人展现出来，那么就不可能不感到厌恶或羞愧。

83 . It may be doubted, concerning whipping, when as the last remedy, it comes to be necessary, at what times, and by whom it should be done; whether presently upon the committing the fault, whilst it is yet fresh and hot; and whether parents themselves should beat their children. As to the first, I think it should not be

done presently, lest passion mingle with it; and so, though it exceeds the just proportion, yet it lose of its due weight: for even children discern when we do things in passion. But, as I said before, that has most weight with them, that appears sedately to come from their parents' reason; and they are not without this distinction. Next, if you have any discreet servant capable of it, and has the place of governing your child (for if you have a tutor, there is no doubt) I think it is best the smart should come immediately from another's hand, though by the parent's order, who should see it done; whereby the parent's authority will be preserv'd, and the child's aversion, for the pain it suffers, rather to be turn'd on the person that immediately inflicts. For I would have a father seldom strike his child, but upon very urgent necessity, and as the last remedy; and then perhaps it will be fit to do it so that the child should not quickly forget it.

第83节．如果到头来必须以鞭打孩子作为最后一种纠正错误的手段，或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在何时由谁来执行？刚刚犯下错误的时候就趁热打铁吗？是由父母亲自动手责打孩子吗？就第一个问题，我认为不应当在犯错之初就执行，以免感情用事。如果这样做，即使责罚超过限度也会失去应有的分量，因为如果我们感情用事，就算是孩子也看得出来。不过，正如我前面说过的，父母根据理智沉着行事才最有分量，孩子不会分辨不出此间的区别。至于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有做事谨慎的仆人能担当此事，并且家中有教管孩子的场所（如果有家庭教师，就没有问题了），我认为最好借他人之手让孩子直接尝到痛楚，不过父母要亲自发出命令并在场监督。这样一来，父母的威信就得到了维护，而孩子因遭受痛苦而产生的怨恨则会转移到动手责打他们的人身上。我认为，做父亲的应当少打孩子，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诉诸这最后的手段。或许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出手才恰如其分，以免孩子迅速将之抛诸脑后。

84 . But, as I said before, beating is the worst, and therefore the last means to be us'd in the correction of children, and that only in cases of extremity, after all gentle ways have been try'd, and prov'd unsuccessful; which, if well observ'd, there will be very seldom any need of blows. For, it not being to be imagin'd that a child will often, if ever, dispute his father's present command in any particular instance, and the father not interposing his absolute authority, in peremptory rules, concerning either childish or indifferent actions, wherein his son is to have his liberty, or concerning his learning or improvement, wherein there is no compulsion to be us'd: there remains only the prohibition of some vicious actions, wherein a child is capable of obstinacy, and consequently can deserve beating; and so there will be but very few occasions of that discipline to be us'd by anyone who considers well and orders his child's education as it should be. For the first seven years, what vices can a child be guilty of, but lying or some ill-natur'd tricks; the repeated commission whereof, after his father's direct command against it, shall bring him into the condemnation of obstinacy, and the chastisement of the rod? If any vicious inclination in him be, in the first appearance and instances of it, treated as it should be, first with your wonder, and then, if returning again, a second time discountenanc'd with the severe brow of a father, tutor, and all about him, and a treatment suitable to the state of discredit before-mention'd; and this continu'd till he be made sensible and asham'd of his fault, I imagine there will be no need of any other correction, nor ever any occasion to come to blows. The necessity of such chastisement is usually the consequence only of former indulgences or neglects: If vicious inclinations were watch'd from the beginning, and the first irregularities which they cause, corrected by those gentler ways, we should seldom have to do with more than one disorder at once; which would be easily set right without any stir or noise, and not

require so harsh a discipline as beating. Thus one by one as they appear'd, they might all be weeded out, without any signs or memory that ever they had been there. But we letting their faults (by indulging and humouring our little ones) grow up, till they are sturdy and numerous, and the deformity of them makes us asham'd and uneasy, we are fain to come to the plough and the harrow; the spade and the pick-ax must go deep to come at the roots; and all the force, skill, and diligence we can use, is scarce enough to cleanse the vitiated seed-plat, overgrown with weeds, and restore us the hopes of fruits, to reward our pains in its season.

第84节．但是，正如我说过的，责打是最坏的情况，因此也是最后一种用来管教孩子的手段，只有在所有温和的方法通通用过一遍后却全不见效的时候，在极端情况下才能施行。如果温和的方法使用得当，那么很少需要动手。因为，一个孩子即使在某件事情上偶然违抗父亲的命令，他也不会常常如此，做父亲的也就无须凭借说一不二的规矩，以自己的权威干涉那些孩子气的或无关紧要的行为，在这些方面他的儿子应当享有自由，至于孩子的学习和进步，也不应强迫催逼。余下唯一需要禁止的就是恶意的行为，如果孩子冥顽不灵，最终就应当挨打。因此，任何一个人只要用心考虑，以适当的教育对孩子进行约束，那么就很少用得着皮鞭棍棒。在孩子七岁以前，除了说谎以及一些居心不良的恶作剧，还能干出什么坏事，竟会在父亲断然禁止之后，还要反复犯禁，以至被谴责为顽固不化而引来棍棒加身呢？如果孩子身上出现为恶的倾向，在第一时间就要以应有的方式进行处理，头一次你表现出惊讶，而后如果再犯第二次，父亲、家庭教师以及孩子身边的所有人都就应蹙起眉头给他以颜色，并用一种与这丢脸的情形相应的方式对待他，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照此而行，直到孩子变得明理，并为自己的错误感到羞愧，我想就不再需要任何别的管教方法，也不会再出现要对孩子动手的情况。只有之前的纵容与疏忽才会导致动不动就得以这种方式进行责罚。如果从一开始就留意孩子那些为恶的倾向，对由此引起的不当言行温和地加以纠正，就不会出

现我们一次要应对数种问题的局面，而能够无声无息地将错误改正过来，无需用到责打这严厉的手段。因此，随着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我们就可以将其全部根除，不留下任何它们曾经存在过的迹象或记忆。但我们却纵容、迁就小孩子，任由这些缺点自由生长，直到它们滋生壮大，其丑陋的情状令我们羞愧难当、忧虑不安，便不得不动用犁耙。铁锹与镐头要挖得够深才能触及根基，可我们用尽气力、搜尽良方、费尽功夫都不足以清理这毁坏的、杂草蔓生的苗圃，难以期盼复得果实，无法使我们的辛劳在收获时节得到酬报。

85 . This course, if observ'd, will spare both father and child the trouble of repeated injunctions, and multiply'd rules of doing and forbearing. For I am of opinion, that of those actions which tend to vicious habits, (which are those alone that a father should interpose his authority and commands in) none should be forbidden children till they are found guilty of them. For such untimely prohibitions, if they do nothing worse, do at least so much towards teaching and allowing 'em, that they suppose that children may be guilty of them, who would possibly be safer in the ignorance of any such faults. And the best remedy to stop them, is, as I have said, to shewwonder and amazement at any such action as hath a vicious tendency, when it is first taken notice of in a child. For example, when he is first found in a lie, or any ill-natur'd trick, the first remedy should be, to talk to him of it as a strange monstrous matter, that it could not be imagin'd he would have done, and so shame him out of it.

第85节．这种方法如果得到遵行，就可以使父子双方不再烦恼于那些三令五申的训诫和叠床架屋的规矩，以及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因为我认为，对于那些会导致恶习的行为（只有在这些事情上父亲才应当动用权威，发号施令，加以干涉），只要孩子还未曾犯过，

就无须禁止。因为此类不合时宜的禁令即使没有造成更坏的后果，至少也相当于默认并告诉孩子，他们可能会犯下这些错误，但如果孩子对这种种过失一无所知，或许倒更安全。而正如我所说的，最好的纠正错误的方法就是，对于任何此类带有作恶倾向的行为，当发现孩子初犯时就表现出一种惊愕的态度。例如，当孩子第一次说谎或居心不良地搞了恶作剧，为了纠正错误，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孩子将这些说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可怕事情，说你简直无法想象他居然做了这样的事，从而让他因羞愧而不再犯。

86 . It will be ('tis like) objected, that whatsoever I fancy of the tractableness of children, and the prevalency of those softer ways of shame and commendation; yet there are many who will never apply themselves to their books, and to what they ought to learn, unless they are scourg'd to it. This, I fear, is nothing but the language of ordinary schools and fashion, which have never suffer'd the other to be try'd as it should be, in places where it could be taken notice of. Why, else, does the learning of Latin and Greek need the rod, when French and Italian need it not? Children learn to dance and fence without whipping; nay, arithmetic, drawing, &c. they apply themselves well enough to without beating: which would make one suspect,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strange, unnatural, and disagreeable to that Age, in the things required in grammar-schools, or in the methods us'd there, that children cannot be brought to, without the severity of the lash, and hardly with that too; or else, that it is a mistake, that those tongues could not be taught them without beating.

第86节．或许会有人会这样反对道，无论我设想孩子如何驯顺，无论那些基于羞耻心与荣誉感的温和的管教方式如何行之有效，但仍有许多孩子，如果没有鞭子抽着，根本就不会专注于书本或任何他们

该学的东西。这恐怕不过是一般学校里常说的且广为流传的话罢了，在学校应当留心的那些方面，它从不允许尝试别种方法。为什么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时要用上棍棒，学习法语和意大利语时却不用？孩子在学跳舞和击剑时根本用不着鞭子驱策，不但如此，在数学、绘画等方面，他们不需挨打也做得很好。这不得不使人怀疑，就儿童的那个年纪而言，文法学校里教授的东西或运用的方法是不是有些令他们不习惯，是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并惹人生厌。因此，不加鞭打孩子就难以学好、甚至挨了打也没用，或者所谓这些语言孩子不挨打就学不会——这些说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87 . But let us suppose some so negligent or idle, that they will not be brought to learn by the gentle ways propos'd, (for we must grant, that there will be children found of all tempers,) yet it does not thence follow, that the rough discipline of the cudgel is to be us'd to all. Nor can anyone be concluded unmanageable by the milder methods of government, till they have been thoroughly try'd upon him; and if they will not prevail with him to use his endeavours, and do what is in his power to do, we make no excuses for the obstinate. Blows are the proper remedies for those; but blows laid on in a way different from the ordinary. He that wilfully neglects his book, and stubbornly refuses anything he can do, requir'd of him by his father, expressing himself in a positive serious command, should not be corrected with two or three angry lashes, for not performing his task, and the same punishment repeated again and again upon every the like default; but when it is brought to that pass, that wilfulness evidently shews itself, and makes blows necessary, I think the chastisement should be a little more sedate, and a little more severe, and the whipping (mingled with admonition between) so continu'd, till the impressions of it on the mind were found legible in the face, voice, and submission of the child, not so sensible of the smart as of the fault he has been guilty

of, and melting in true sorrow under it. If such a correction as this, try'd some few times at fit distances, and carry'd to the utmost severity, with the visible displeasure of the father all the while, will not work the effect, turn the mind, and produce a future compliance, what can be hop'd from blows, and to what purpose should they be any more us'd? Beating, when you can expect no good from it, will look more like the fury of an enrag'd enemy, than the good-will of a compassionate friend; and such chastisement carries with it only provocation, without any prospect of amendment. If it be any father's misfortune to have a son thus perverse and untractable, I know not what more he can do but pray for him. But, I imagine, if a right course be taken with children from the beginning, very few will be found to be such; and when there are any such instances, they are not to be the rule for the education of those who are better natur'd, and may be manag'd with better usage.

第87节．不过，让我们假设确实有些孩子粗心散漫或懒散怠惰，用我们提出的那些温和的方式没法让他学习（我们必须承认，什么样脾性的孩子都有），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对所有的孩子都得严酷到动用棍棒。并且在那些温和的方法都彻底使用过之前，我们不能妄下论断，说一个孩子难以管教。如果这些方法无法令他努力上进，去做他完全有能力去做的事，那我们就无法再为他的顽固不化找借口。对于这些孩子，责打是必要手段，但责打的方式要不同寻常。对于那些不肯读书，并且在父亲明确而严肃地发出指令后顽固拒绝去做任何力所能及之事的孩子，不能因为他没有完成任务而在气头上打他两下就完事，或者在类似的错误一再出现时不断重复这同样的惩罚。一旦到了这种地步，当故意的成分展露无遗而必须挨打的时候，我认为责罚应来得更为庄重严厉一些，并且鞭打（期间伴有训诫）应当持续下去，直到它在心灵中的烙印在孩子的面容、声音以及屈从的态度中表现出来，不仅因为疼痛，更因为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并且在真挚的

懊悔中软化下来。如果这样一种方法适当地间隔使用过数次，显示出最大程度的严厉，并一直伴随着父亲明显的不悦，却没有效果，无法扭转心灵、使孩子日后顺从听话，那么还能指望责打有什么用呢？继续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如果责打没能产生好的效果，那么它就更像是被激怒的敌人爆发出的怒火，而不是心怀同情的朋友表达的善意。这样的责罚只会激发孩子的反抗，而没有丝毫让他改正错误的可能。如果有父亲如此不幸，养了这样一个顽劣不驯的儿子，我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我也只能为他祈祷了。不过我想，如果从一开始就以正确的方法教育孩子，很少会出现这样的例子。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也不能把这些严厉的手段视为准则，通用于教育那些天性驯良、可以用更好的方法加以约束的孩子。

88 . If a tutor can be got, that, thinking himself in the father's place, charg'd with his care, and relishing these things, will at the beginning apply himself to put them in practice, he will afterwards find his work very easy; and you will, I guess, have your son in a little time a greater proficient in both learning and breeding than perhaps you imagine. But let him by no means beat him at any time without your consent and direction; at least till you have experience of his discretion and temper. But yet, to keep up his authority with his pupil, besides concealing that he has not the power of the rod, you must be sure to use him with great respect yourself, and cause all your family to do so too: for you cannot expect your son should have any regard for one whom he sees you, or his mother, or others slight. If you think him worthy of contempt, you have chosen amiss; and if you shewany contempt of him, he will hardly escape it from your son: and whenever that happens, whatever worth he may have in himself, and abilities for this employment, they are all lost to your child, and can afterwards never be made useful to him.

第88节．如果能请到一位家庭教师，他能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父亲的位置上，担当起他的职责，同时欣赏这些原则与方法，并能从一开始就将它们付诸实践，那么今后他就会发现自己的工作非常轻松。我想你也会发现，在很短的时间内，令郎在学习和礼仪方面都比你想象的取得了更为长足的进步。但如果没有你的批准或指令，不要让教师在任何时候责打你的孩子，至少也要先了解他的脾气以及处事是否谨慎。但是，为了保持家庭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威信，你不但不能让孩子知道教师没有动用棍棒的权力，还得确保你自己对教师极为尊重，并让家庭成员也这样做。因为如果令郎看见一个人遭到他的父母或别人的轻视，你就不能指望他自己对这个人表现出尊敬。如果你认为某个家庭教师不值一顾，那么是你选错了人；如果你对他表现出丝毫轻蔑，那么他也难逃令郎的藐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论他拥有怎样的长处，不论他的才能多么胜任教师的工作，他在孩子心目中已经毫无分量，今后对他们也不会再起任何作用。

89．As the father's example must teach the child respect for his tutor, so the tutor's example must lead the child into those actions he would have him do. His practice must by no means cross his precepts, unless he intend to set him wrong. It will be to no purpose for the tutor to talk of the restraint of the passions whilst any of his own are let loose; and he will in vain endeavour to reform any vice or indecency in his pupil, which he allows in himself. Ill patterns are sure to be follow'd more than good rules; and therefore he must always carefully preserve him from the influence of ill precedents, especially the most dangerous of all, the examples of the servants; from whose company he is to be kept, not by prohibitions, for that will but give him an itch after it, but by other ways I have mention'd.

第89节．正如父亲应当以身作则，教会孩子尊重教师，教师也应

当以身作则，引导孩子去做那些他希望其去做的事。教师的行为无论如何不能和他自己定下的规矩自相矛盾，除非他想将孩子引入歧途。如果教师嘴上说着要克制欲望，行动中却放任自我，那他的教导就毫无作用。他想要纠正弟子的恶劣言行或不当作为，却容许自己成为反面教材，那么一切努力也只会是徒劳。学坏容易学好难，因此教师要时时留意，防止孩子受到不良事例的影响，而其中特别危险的就是仆人的榜样。不可使孩子接近仆人，但不能明令禁止，因为这只会使他们更想去这样做，而要采用我所说过的别的办法。

90．In all the whole business of education, there is nothing like to be less hearken'd to, or harder to be well observ'd, than what I am now going to say; and that is, that children should, from their first beginning to talk, have some discreet, sober, nay, wise person about them, whose care it should be to fashion them aright, and keep them from all ill, especially the infection of bad company. I think this province requires great sobriety, temperance, tenderness, diligence, and discretion; qualities hardly to be found united in persons that are to be had for ordinary salaries, nor easily to be found anywhere. As to the charge of it, I think it will be the money best laid out that can be, about our children; and therefore, though it may be expensive more than is ordinary, yet it cannot be thought dear. He that at any rate procures his child a good mind, well-principled, temper'd to virtue and usefulness, and adorn'd with civility and good breeding, makes a better purchase for him that if he laid out the money for an addition of more earth to his former acres. Spare it in toys and play-games, in silk and ribbons, laces, and other useless expenses, as much as you please; but be not sparing in so necessary a part as this. 'Tis not good husbandry to make his fortune rich, and his mind poor.I have often with great admiration seen people lavish it profusely in tricking up their children in fine clothes, lodging and feeding them sumptuously,

allowing them more than enough of useless servants,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starve their minds, and not take sufficient care to cover that which is the most shameful nakedness, viz. their natural wrong inclinations and ignorance. This I can look on as no other than a sacrificing to their own vanity, it shewing more their pride than true care of the good of their children; whatsoever you employ to the advantage of your son's mind, will shew your true kindness, though it be to the lessening of his estate. A wise and good man can hardly want either the opinion or reality of being great and happy; but he that is foolish or vicious, can be neither great nor happy, what estate soever you leave him: and I ask you whether there be not men in the world, whom you had rather have your son be with five hundred pounds per annum, than some other you know with five thousand pounds.

第90节．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没有什么比现在我要说的这一点更少受到重视，更难得到遵行，这就是孩子从刚会说话起，就应当有谨慎、冷静、明智之人陪伴左右，他们的关心照料能使孩子走上正道，并使他们远离邪恶，特别是免受不良伙伴的影响。我认为这一职责要求极大的冷静、自制、温柔、勤勉以及谨慎，用普通的薪水很难请到集这些品质于一身的人，就是在其他任何地方这样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至于开销，我认为这是最值得为孩子花钱的地方，因此，尽管投入比正常情况下要多，但也不能算贵。一个人如果在这方面有所投入，使他的孩子心灵圆满、原则性强、才德兼备、温文守礼、具有良好的教养，那么相比于购置更多的土地增加产业而言，这会带来更大的收益。你尽可以俭省在玩具、丝绸、缎带、花边等无用之物上的花费，但不要节省这必不可少的花销。物质丰厚而心灵贫瘠可不是高尚育儿目标。我常常极为惊叹地发现，有些人毫无节制地挥霍金钱，用漂亮的衣服装扮孩子，使其饮食居所极尽奢华，令众多无用的仆从随侍左右，同时却叫他们的心灵忍饥挨饿，对于那最令人羞耻的赤裸裸的本性，即天性中的不良倾向与愚昧无知，却没有给予足够的

关怀加以遮盖。在我看来，这类父母无非是虚荣心的牺牲品，显示出自己的骄矜自傲，而非对子女美德的真正关怀。而不论你以何种方式使令郎心灵受益，这才展现出真正的慈爱，尽管这会使他的资产减少。无论是在他人心目中还是在事实上，一个明智、善良之人很少不是杰出而幸福的；而愚蠢、邪恶之人，不论你留给他多少资产，他既不会杰出也不会幸福。我且问你，这世上是不是没有宁愿儿子每年只赚五百英镑，而不是年入五千磅的另一类人？

Section 91-100

第91-100节

91 . The consideration of charge ought not therefore to deter those who are able. The great difficulty will be where to find a proper person: for those of small age, parts, and virtue, are unfit for this employment, and those that have greater, will hardly be got to undertake such a charge. You must therefore look out early, and enquire everywhere; for the world has people of all sorts. And I remember, Montaigne says in one of his essays, that the learned Castalio was fain to make trenchers at Basle, to keep himself from starving, when his father would have given any money for such a tutor for his son, and Castalio have willingly embrac'd such an employment upon very reasonable terms; but this was for want of intelligence.

第91节．因此，开销的问题不应成为那些经济宽裕之人的障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合适的人选：那些年纪轻、能力弱而寡德之人难以胜任这一职位，而那些年高德勋而能力强者，则很难请来担负这一职责。因此你必须早早开始四处寻觅，因为这世界上各种人才都有。我记得蒙田在其一篇散文中提到过，博学的卡斯塔里欧不得不在巴塞尔制作木盘维持生计，而蒙田的父亲则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为儿子聘请这样一位老师。最终卡斯塔里欧以非常普通的报酬欣然接受了这个职位，不过这完全是信息不通造成的。

92 . If you find it difficult to meet with such a tutor as we desire, you are not to wonder. I only can say, spare neither care nor

cost to get such a one. All things are to be had that way: and I dare assure you, that if you can get a good one, you will never repent the charge; but will always have the satisfaction to think it the money of all other the best laid out. But be sure taking no body upon friends, or charity, no, nor upon great commendations. Nay, if you will do as you ought, the reputation of a sober man, with a good stock of learning, (which is all usually requir'd in a tutor) will not be enough to serve your turn. In this choice be as curious as you would be in that of a wife for him; for you must not think of trial or changing afterwards: This will cause great inconvenience to you, and greater to your son. When I consider the scruples and cautions I here lay in your way, methinks it looks as if I advis'd you to something which I would have offer'd at, but in effect not done. But he that shall consider how much the business of a tutor, rightly employ'd, lies out of the road, and how remote it is from the thoughts of many, even of those who propose to themselves this employment, will perhaps be of my mind, that one fit to educate and form the mind of a young gentleman is not everywhere to be found, and that more than ordinary care is to be taken in the choice of him, or else you may fail of your end.

第92节．如果你发现很难找到一位我们所期望的教师，也不要感到疑惑。我只能说，要不遗余力、不计代价地去寻找这样一个人。以这样的方式无论什么事物都可以得到，而且我敢向你保证，如果请到了一位优秀的教师，你永远也不会为这笔开销感到后悔，而是怀着满意的心情想到，在所有花费中这笔钱花得最值。不过延请老师千万别依赖友情或别人的大力推荐，也别把它当作善举。而且，如果你像该做的那样去做，那么即使一个人因头脑冷静而名声在外，并且学识丰富（这通常就是对家庭教师的全部要求），他也未必能胜任这一职责。在选择教师的过程中，要像为孩子择偶那样刨根问底，因为你不能抱着姑且一试或者今后再换的心态，这只会给你带来极大的不便，

对令郎就更是如此。一想到我提出的那些顾虑及告诫会给你造成不便，我就觉得这看上去仿佛我正建议你去做一件我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但一个人只要想到有多少正式受雇的家庭教师其实并不称职，而许多人又远未认识到这一职责是什么，甚至许多谋求这一职位的人也不清楚，那他或许就会同意我的观点，即一个适合从事教育并塑造年轻绅士心灵的人并不是随处可见，因此在选择教师的时候要超乎寻常地谨慎小心，否则你最终的目的就无法达成。

93 . The character of a sober man and a scholar is, as I have above observ'd, what everyone expects in a tutor. This generally is thought enough, and is all that parents commonly look for: But when such an one has empty'd out into his pupil all the Latin and logic he has brought from the university, will that furniture make him a fine gentleman? Or can it be expected, that he should be better bred, better skill'd in the world, better principled in the grounds and foundations of true virtue and generosity, than his young tutor is?

第93节．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每个人都希望家庭教师拥有沉着冷静的性格和广博的学识。人们通常认为符合这些条件就足够了，而父母一般希望得到的也不过如此。但如果一位家庭教师已经将他从大学中学来的拉丁语和逻辑学知识对他的弟子倾囊相授，这些装点门面之物能使学生成为一位高雅的绅士吗？我们能够期盼学生比他年轻的教师更有教养，更洞明世事，更好地遵从真正的美德与宽宏大量的基本原则吗？

To form a young gentleman as he should be, 'tis fit his governor should himself be well-bred, understanding the ways of carriage and measures of civility in all the variety of persons, times, and

places; and keep his pupil, as much as his age requires, constantly to the observation of them. This is an art not to be learnt nor taught by books. Nothing can give it but good company and observation join'd together. The taylor may make his clothes modish, and the dancing-master give fashion to his motions; yet neither of these, though they set off well, make a well-bred gentleman: no, though he have learning to boot, which, if not well manag'd, makes him more impertinent and intolerable in conversation. Breeding is that which sets a gloss upon all his other good qualities, and renders them useful to him, in procuring him the esteem and good-will of all that he comes near. Without good breeding his other accomplishments make him pass but for proud, conceited, vain, or foolish.

要将一位年青绅士培养成他应当成为的样子，他的家庭教师自身就应教养良好，懂得如何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与场合做到举止有度，礼仪有分寸，同时能尽量根据学生年龄的需要，不断督促其照此而行。这样一种技巧不是通过学习或读书就能获得的。除了合适的陪伴之人及与此相配合的监管督促，没有别的办法能赋予他这一点。裁缝或许能使他衣着入时，舞蹈教师或许能使他举手投足合于风尚，尽管这些能显得表面光鲜，却没有一样能培养出一位教养良好的绅士。尽管除此之外他还有些学识，但如果学识被使用不当反而会使他在与人交往时更加莽撞无礼，叫人难以忍受。教养能给他的其他一切美好品质镀上一层光泽，使这些品质对他发挥益处，令他接近的所有人都对他产生尊敬与好感。而如果没有良好的教养，他的其余一切造诣都会被人视为傲慢、自负、虚荣与愚蠢。

Courage in an ill-bred man has the air and escapes not the opinion of brutality: Learning becomes pedantry; wit, buffoonery; plainness, rusticity; good nature, fawning. And there cannot be a

good quality in him, which want of breeding will not warp and disfigure to his disadvantage. Nay, virtue and parts, though they are allow'd their due commendation, yet are not enough to procure a man a good reception, and make him welcome wherever he comes. No body contents himself with rough diamonds, and wears them so, who would appear with advantage. When they are polish'd and set, then they give a lustre. Good qualities are the substantial riches of the mind, but 'tis good breeding sets them off: and he that will be acceptable, must give beauty, as well as strength, to his actions. Solidity, or even usefulness, is not enough: a graceful way and fashion in everything, is that which gives the ornament and liking. And in most cases, the manner of doing is of more consequence than the thing done; and upon that depends the satisfaction or disgust wherewith it is receiv'd. This therefore, which lies not in the putting off the hat, nor making of compliments, but in a due and free composure of language, looks, motion, posture, place, &c. suited to persons and occasions, and can be learn'd only by habit and use, though it be above the capacity of children, and little ones should not be perplex'd about it, yet it ought to be begun and in a good measure learn'd by a young gentleman whilst he is under a tutor, before he comes into the world upon his own legs: for then usually it is too late to hope to reform several habitual indecencies, which lie in little things. For the carriage is not as it should be, till it is become natural in every part, falling, as skilful musicians' fingers do, into harmonious order without care and without thought. If in conversation a man's mind be taken up with a solicitous watchfulness about any part of his behaviour; instead of being mended by it, it will be constrain'd, uneasy, and ungraceful.

勇气在一个没教养的人身上会变成装腔作势，别人不免将其评价为蛮横粗鲁，而学识就会变为迂腐，机智变为滑稽，简朴变为土气，

好性情变为阿谀谄媚。如果教养缺失，他身上没有一种优秀品质不会扭曲变形成其短处。不仅如此，美德与才能虽能赢得应有的赞誉，却不足以使一个人招人喜爱，处处受到欢迎。没有人会喜欢粗粝的钻石，即使将其佩戴在身上也不会有什么好处。而钻石一经琢磨镶嵌，则会放射出光芒。优秀品质就是心灵的宝藏，但使其放射出光芒的则是良好的教养。一个人若想受人欢迎，那么就不单要使他的行动具有优点，还要具有美。为人可靠甚至富有才能都还不够，无论做什么事都行止优雅、符合时宜才能增添光彩，招人喜爱。在大多数情况下，做事的举止风度比做成的事影响更为重大，人们感到满意还是厌恶就在于此。举止风度并不是见人要脱帽，或说些恭维话，而在于根据不同的人及场合，使语言、神情、动作、姿态等方面均从容得体，泰然自若，这些只能通过习惯与实践才能获得。尽管这超出了孩子的能力范围，而且年纪幼小的孩子会对此茫然无措，但还是应当及早学起，在一个年轻绅士尚未独立进入社会，仍在家庭教师管教之下时就应学到一定程度，否则要想纠正一些习惯性的不当言行常常就太迟了，而这些往往体现在小事情上。举止姿态若要达到理想的状态，必须在各个方面都显得自然，就像高明的音乐家挥动手指一样，无所用心，不假思索，随手一挥便是自成和谐的曲调。在与人交往时，如果一个人的精神时刻警惕，关注着自己的一举一动，那他非但不能纠正自己的言行，反而会显出勉为其难、心神不安的样子，且有失优雅。

Besides, this part is most necessary to be form'd by the hand and care of a governor, because, though the errors committed in breeding are the first that are taken notice of by others, yet they are the last that any one is told of; not but that the malice of the world is forward enough to tattle of them; but it is always out of his hearing, who should make profit of their judgment and reform himself by their censure. And indeed, this is so nice a point to be meddled with, that even those who are friends, and wish it were mended, scarce ever dare mention it, and tell those they love that they are guilty in such or such cases of ill breeding. Errors in other

things may often with civility be shewnanother; and 'tis no breach of good manners or friendship to set him right in other mistakes; but good breeding itself allows not a man to touch upon this, or to insinuate to another that he is guilty of want of breeding. Such information can come only from those who have authority over them; and from them too it comes very hardly and harshly to a grown man; and however soften'd, goes but ill down with any one who has liv'd ever so little in the world. W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hat this part should be the governor's principal care, that an habitual gracefulness, and politeness in all his carriage, may be settled in his charge, as much as may be, before he goes out of his hands; and that he may not need advice in this point when he has neither time nor disposition to receive it, nor has any body left to give it him. The tutor therefore ought in the first place to be well-bred: and a young gentleman, who gets this one qualification from his governor, sets out with great advantage, and will find that this one accomplishment will more open his way to him, get him more friends, and carry him farther in the world, than all the hard words or real knowledge he has got from the liberal arts, or his tutor's learned encyclopaedia: not that those should be neglected, but by no means preferr'd, or suffer'd to thrust out the other.

此外，家庭教师的关心与管教对于这种举止风度的形成最为必要，因为尽管一个人教养方面的失误会最先被别人注意到，但本人往往最后才得知这一点。因为世人不单不怀好意、肆无忌惮地对某人的缺点加以非议，而且往往是背着当事人说三道四，因此他无法听取别人的评价，并通过这些批评改正自己的言行。本来这些细微之处他人也很难加以干涉，即使作为朋友并希望这些方面得到改正，也很少敢于将问题挑明，告诉那些他们所爱之人，说他们在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显得缺乏教养。对于其他方面的过失，大家常常会客气地告诉别人，使其改正错误而无伤礼貌及友谊。但一个人的良好教养却不容许

他触及这一问题本身，也不容许他旁敲侧击地暗示另一个人，说他缺乏教养。只有有权管束他的人才能对其指出这些问题，但对于一个成年人，即使是管束他的人也很少会说这样的话，说出口也会叫人难堪。不论批评怎样委婉，涉世不深的人听了都很难接受。因此家庭教师必须对这个方面重点关注，在学生离开他之前，尽可能地使他养成习惯性的优雅得体，在言行举止的方方面面做到温文有礼，使学生在既没时间也没心情接受批评、同时也不再有人对其提出批评的时候，能够不再需要这方面的忠告。因此家庭教师自己必须首先具有良好的教养，而一个年轻的绅士如果从他的老师身上学到了这一品质，那他在起步时就有很大优势，并会发现这一才能会令他的前途更为广阔，结交更多的朋友，在这世上走得更远。而他从文科教育及百科全书般博学的老师那儿学来的难懂的词语及实际的知识则无法与此相比。并不是说后者不重要，只是不能将其看得比教养更重，甚至把教养挤到一边。

94 . Besides being well-bred, the tutor should know the world well; the ways, the humours, the follies, the cheats, the faults of the age he is fallen into, and particularly of the country he lives in. These he should be able to shewto his pupil, as he finds him capable; teach him skill in men, and their manners; pull off the mask which their several callings and pretences cover them with, and make his pupil discern what lies at the bottom under such appearances, that he may not, as unexperienc'd young men are apt to do if they are unwarn'd, take one thing for another, judge by the outside, and give himself up to shew, and the insinuation of a fair carriage, or an obliging application. A governor should teach his scholar to guess at and beware of the designs of men he hath to do with, neither with too much suspicion, nor too much confidence; but as the young man is by nature most inclin'd to either side, rectify him, and bend him the other way. He should accustom him to make, as much as is possible, a true judgment of men by those

marks which serve best to shewwhat they are, and give a prospect into their inside, which often shews itself in little things,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not in parade, and upon their guard. He should acquaint him with the true state of the world, and dispose him to think no man better or worse, wiser or foolisher, than he really is. Thus, by safe and insensible degrees, he will pass from a boy to a man; which is the most hazardous step in all the whole course of life. This therefore should be carefully watch'd, and a young man with great diligence handed over it; and not as now usually is done, be taken from a governor's conduct, and all at once thrown into the world under his own, not without manifest dangers of immediate spoiling; there being nothing more frequent than instances of the great looseness, extravagancy, and debauchery, which young men have run into as soon as they have been let loose from a severe and strict education: Which I think may be chiefly imputed to their wrong way of breeding, especially in this part; for having been bred up in a great ignorance of what the world truly is, and finding it a quite other thing, when they come into it, than what they were taught it should be, and so imagin'd it was, are easily persuaded, by other kind of tutors, which they are sure to meet with, that the discipline they were kept under, and the lectures read to them, were but the formalities of education and the restraints of childhood; that the freedom belonging to men is to take their swing in a full enjoyment of what was before forbidden them. They shewthe young novice the world full of fashionable and glittering examples of this everywhere, and he is presently dazzled with them. My young master failing not to be willing to shewhimself a man, as much as any of the sparks of his years, lets himself loose to all the irregularities he finds in the most debauch'd; and thus courts credit and manliness in the casting off the modesty and sobriety he has till then been kept in; and thinks it brave, at his first setting out, to signalize himself in running counter to all the rules of virtue which

have been preach'd to him by his tutor.

第94节．除了有良好的教养以外，教师还应该洞明世事，了解时局风气，尤其是所在国家的情况，还有一些诸如幽默癖性、愚蠢行径的行为方式的弊端和缺陷。一旦学生到了可以掌握的年纪，教师就应当把这些认识展现给学生，教会他为人处世，彬彬有礼；摘下各种职业与角色为人们戴上的假面，帮他认清这些表象之下的实质，以免他像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样，因为没有人从旁提醒，而易于混淆是非，被表面现象迷惑，只懂得装点门面。举止优雅只是为了谄媚求宠，被迫出力也只是出于应付。为师者要提醒学生揣度并留意他们交往之人的意图，不过分猜疑也不要刚愎自用。但年轻人本来就容易倾向极端，因此应当予以纠正，帮他扭转过来。教师应当尽可能培养学生从那些最能展现一个人真面目的迹象中对人们的行为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时去探寻他们的内心，这通常会在细微之处尤其是人们在不经意和不设防时的表现中显露出来。要让学生了解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会将一个人看得比他实际更好、更坏、更聪明或更愚蠢。如此，学生就可以不知不觉地安全长大成人，而这正是整个人生中最为艰险的一关。因此应当对此格外留意，青年人勤奋努力地度过这一关。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刚刚脱离导师的管束，就立刻被抛到社会上任其自生自灭，如此并非没有即刻堕落的明显危险。年轻人从严厉和严格的管教中解放出来后，立刻变得骄奢淫逸、放荡堕落的例子数不胜数。在我看来这主要应当归罪于错误的培养方法，尤其成长的时候对世界的本来面目一无所知，结果进入真实的世界以后，发现跟之前受到的教导和想象截然不同。而青年人此时一定会遇到新的导师，并且很容易被说服，认为他们从小遵守的规矩和受到的教育不过是教育的形式和童年的约束，如今作为大人，之前的禁忌便不复存在，大人有尽情享受的自由。一旦经人指点发现花花世界无奇不有，青年人很容易就在这绚丽的景象前迷失了。我的小主人就像和他一般大的所有孩子一样，不可避免地想要显示自己是一个大人了，过起了最放荡不羁的生活，把此前一贯保持的谦逊冷静抛在脑后，一味追求起了声望和男子气概。刚一踏入社会，便颠覆所有老师教过的道德法则，认为这才叫

勇敢。

The shewing him the world as really it is, before he comes wholly into it, is one of the best means, I think, to prevent this mischief. He should by degrees be informed of the vices in fashion, and warned of the applications and designs of those who will make it their business to corrupt him. He should be told the arts they use, and the trains they lay; and now and then have set before him the tragical or ridiculous examples of those who are ruining or ruin'd this way. The age is not like to want instances of this kind, which should be made land-marks to him, that by the disgraces, diseases, beggary, and shame of hopeful young men thus brought to ruin, he may be precaution'd, and be made see, how those join in the contempt and neglect of them that are undone, who, by pretences of friendship and respect, lead them to it, and help to prey upon them whilst they were undoing; that he may see, before he buys it by a too dear experience, that those who persuade him not to follow the sober advices he has receiv'd from his governors, and the counsel of his own reason, which they call being govern'd by others, do it only that they may have the government of him themselves; and make him believe, he goes like a man of himself, by his own conduct, and for his own pleasure, when in truth he is wholly as a child led by them into those vices which best serve their purposes. This is a knowledge which, upon all occasions, a tutor should endeavour to instil, and by all methods try to make him comprehend, and thoroughly relish.

我想，在完全走上社会之前就让孩子看到世界的真实状况，是防止这一问题出现的最好方法之一。应当一步步地让孩子知道常见的恶习有哪些，提醒他提防那些居心叵测之人，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要

告诉孩子坏人的手段和常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并经常给他讲那些正在因此而堕落或已经堕落的可悲或可笑的例子。现在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应当引为借鉴。看到那些大好青年就此沉沦，到了颜面尽失、疾病缠身、困顿不已、羞愧难当的境地，青年人就会警觉并发现，原来那些现在做尽嘲讽和漠视之事幸灾乐祸的人就是那些当初假意友好尊敬，将青年人引入歧途并在其堕落时落井下石的人。看清这一切，青年人就不必以身试法，付出惨痛的代价，就会看到那些以受制于他人为理由，劝说自己放弃导师谆谆教诲和自身理性的人，其实只是想要亲自控制他们。而且还要叫他相信，这样才叫一个自由的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找到自己的快乐，实际上却让青年人完全变成了不懂事的孩子，让他们中了圈套，染了恶习，只是为了实现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教师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尽力灌输这一认识，用各种方法使孩子理解并欣然接受。

I know it is often said, that to discover to a young man the vices of the age is to teach them him. That, I confess, is a good deal so, according as it is done; and therefore requires a discreet man of parts, who knows the world, and can judge of the temper, inclination, and weak side of his pupil. This farther is to be remember'd,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now (as perhaps formerly it was) to keep a young gentleman from vice by a total ignorance of it, unless you will all his life mew him up in a closet, and never let him go into company. The longer he is kept thus hoodwink'd, the less he will see when he comes abroad into open daylight, and be the more expos'd to be a prey to himself and others. And an old boy, at his first appearance, with all the gravity of his ivy-bush about him, is sure to draw on him the eyes and chirping of the whole town volery; amongst which there will not be wanting some birds of prey, that will presently be on the wing for him.

我知道常有一种说法，向青年人揭示当下的丑恶就是教他们学坏。我承认，要做到这一点是要花费很大力气的，因此需要一个谨慎的能人来担任导师。他必须明察世事，并且对学生的脾气、禀性和弱点有所判断。此外还要记住，如今不可能做到（或许过去有可能）只要绝口不提，就能让年轻的绅士远离恶习，除非把他的一生关进笼子，永远不让他与人接触。锁闭得越久，一旦重见天日就越难以明察，反倒越容易成为自己和他人的猎物。一个大男孩带着庄重的气质走上社会，一定会马上引起全城的注视和议论，其中少不了那些等候已久的猛禽，立刻振翅向他飞去。

The only fence against the world, is,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it, into which a young gentleman should be enter'd by degrees, as he can bear it; and the earlier the better, so he be in safe and skilful hands to guide him. The scene should be gently open'd, and his entrance made step by step, and the dangers pointed out that attend him from the several degrees, tempers, designs, and clubs of men. He should be prepar'd to be shock'd by some, and caress'd by others; warn'd who are like to oppose, who to mislead, who to undermine him, and who to serve him. He should be instructed how to know and distinguish them; where he should let them see, and when dissemble the knowledge of them and their aims and workings. And if he be too forward to venture upon his own strength and skill, the perplexity and trouble of a misadventure now and then, that reaches not his innocence, his health, or reputation, may not be an ill way to teach him more caution.

唯一的保护层就是全面的关于丑恶的知识，年轻人应当逐步积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加以吸收，越早越好，如此可确保对他的引导安全又有效。要向青年人逐步揭开世界的面貌，使其逐渐融入，并指出可能的危险，如此方能从容应对不同地位、性情、意图和来自不

同团体的人。要让他们准备好遭到一些人的冲撞，并蒙受另一些人的宠爱，提醒他们可能受到谁的反对、谁的误导、谁的干扰，以及得到谁的帮助。要教会他如何识人并明辨是非，知道表达自己的哪些部分，何时对他们的为人及其意图与谋划佯作不知。如果他盼着施展才华，冒险一试，偶尔犯了糊涂，遇到麻烦，只要不伤及道德、健康或名声，也不失为提醒他多加小心的一种好办法。

This, I confess, containing one great part of wisdom, is not the product of some superficial thoughts, or much reading; but the effect of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in a man who has liv'd in the world with his eyes open, and convers'd with men of all sorts. And therefore I think it of most value to be instill'd into a young man upon all occasions which offer themselves, that when he comes to launch into the deep himself, he may not be like one at sea without a line, compass or sea-chart; but may have some notice before-hand of the rocks and shoals, the currents and quick-sands, and know a little how to steer, that he sink not before he get experience. He that thinks not this of more moment to his son, and for which he more needs a governor, than the languages and learned sciences, forgets of how much more use it is to judge right of men, and manage his affairs wisely with them, than to speak Greek and Latin, or argue in mood and figure; or to have his head fill'd with the abstruse speculations of natural philosophy and metaphysics; nay, than to be well vers'd in Greek and Roman writers, though that be much better for a gentleman than to be a good Peripatetic or Cartesian, because those ancientauthors observ'd and painted mankind well, and give the best light into that kind of knowledge. He that goes into the eastern parts of Asia, will find able and acceptable men without any of these; but without virtu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and civility, an accomplish'd and valuable man can be found nowhere.

我承认，这里面包含着很大一部分智慧，并非简单思考或多多阅读就可以获得，而需要视野广阔的人，通过经常与各种人交往而积累经验和观察。因此我认为在任何可能的场合，向青年人灌输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样在他投身浊世的时候，就不会好像掉进了大海却没有绳索、罗盘或航海图图表可以依靠，而是对暗礁和浅滩、急流和流沙早已心中有数，对如何掌舵略知一二，从而不至于在经验积累起来之前就遭遇灭顶之灾。有人认为对于儿子来说，拥有这种认识以和一个导师，不会比学习语言和科学知识更加重要。这就忘记了其实对人的正确评判和与人交往共事才更有用，重要性远胜会说希腊和拉丁语、运用固定的格式来辩论、或者满脑子对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晦涩思考。甚至可以说，这比熟读希腊和罗马经典作家还要重要。尽管对于绅士来说，熟读经典又比信奉逍遥学派或笛卡尔的理论有益得多，因为这些作家至少对人类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绘，从而深入揭示了处世之道。去东亚的话就会看到很多能力卓著又和蔼可亲的人，他们并没有那些所谓的知识。但不管在哪里，都找不出一个道德缺失、不谙世事、不懂礼貌但却有成就、有价值的人来。

A great part of the learning now in fashion in the schools of Europe, and that goes ordinarily into the round of education, a gentleman may in a good measure be unfurnish'd with, without any great disparagement to himself or prejudice to his affairs. But prudence and good breeding are in all the stations and occurrences of life necessary; and most young men suffer in the want of them, and come rawer and more awkward into the world than they should, for this very reason, because these qualities, which are of all other the most necessary to be taught, and stand most in need of the assistance and help of a teacher, are generally neglected and thought but a slight or no part of a tutor's business. Latin and learning make all the noise; and the main stress is laid upon his proficiency in things a great part whereof belong not to a

gentleman's calling; which is to have the knowledge of a man of business, a carriage suitable to his rank, and to be eminent and useful in his country, according to his station. Whenever either spare hours from that, or an inclination to perfect himself in some parts of knowledge, which his tutor did but just enter him in, set him upon any study, the first rudiments of it, which he learn'd before, will open the way enough for his own industry to carry him as far as his fancy will prompt, or his parts enable him to go. Or, if he thinks it may save his time and pains to be help'd over some difficulties by the hand of a master, he may then take a man that is perfectly well skilled in it, or chuse such an one as he thinks fittest for his purpose. But to initiate his pupil in any part of learning, as far as is necessary for a young ma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his studies, an ordinary skill in the governor is enough. Nor is it requisite that he should be a thorough scholar, or possess in perfection all those sciences which 'tis convenient a young gentleman should have a taste of in some general view, or short system. A gentleman that would penetrate deeper must do it by his own genius and industry afterwards: For nobody ever went far in knowledge, or became eminent in any of the sciences, by the discipline and constraint of a master.

对一位绅士而言，目前盛行于欧洲学校并在教育体系中常见的学问，他大半可以弃之如敝屣，这既不会使他个人遭到蔑视，也无损于他的事业。而审慎的态度和良好的教养是任何身份的人在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必需的，大多数青年人正是因为这方面的不足而痛苦，并在踏入社会以后因此而暴露出更加严重的不成熟和笨拙。原因正是各种素质中间这些最为关键的部分最需要老师协助和帮助，但往往遭到忽视，认为只是导师职责中间无足轻重的内容。人们总是强调拉丁文和知识，把重点放在了本来并非绅士必需的能力培养上，而绅士应当具备的是经世之学、高雅之举，和符合身份的名望与对国家的贡献。此

外如果还有空余的时间，或者在导师引领入门，做了初步的研究之后还想提高某些方面的学识以完善自身，那么之前打下的基础，学到的知识足以打开一条道路，让他凭借自身的勤奋，达到满足自己求知欲的地步，或者达到他的才能可以企及的高度。或者，如果在遇到一些困难时，他认为借助老师指导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那么可以找一个精通于此的专家，或者选择一位适合自己的人。但就青年人通常的课程学习而言，要让学生初步了解任何一方面的知识，导师拥有平常的技能就足够了。也不必要求导师是全面的学者，或彻底地通晓所有只需要青年绅士提纲挈领、了解个大概的学科。想要深入研究，绅士必须在此后依靠自身的天赋和勤奋，因为所有曾经在知识领域有所钻研的人或在任何一个学科建立声望的人，没有一位是凭借老师的规则和约束取得成功的。

The great work of a governor, is to fashion the carriage, and form the mind; to settle in his pupil good habits and the principles of virtue and wisdom; to give him by little and little a view of mankind, and work him into a love and imitation of what is excellent and praise-worthy; and, in the prosecution of it, to give him vigour, activity, and industry. The studies which he sets him upon, are but as it were the exercises of his faculties, and employment of his time, to keep him from sauntering and idleness, to teach him application, and accustom him to take pains, and to give him some little taste of what his own industry must perfect. For who expects, that under a tutor a young gentleman should be an accomplish'd critic, orator, or logician? go to the bottom of metaphysics, natural philosophy, or mathematics? or be a master in history or chronology? though something of each of these is to be taught him: But it is only to open the door, that he may look in, and as it were begin an acquaintance, but not to dwell there: And a governor would be much blam'd that should keep his pupil too long, and lead him too far in most of them. But of good breeding,

knowledge of the world, virtue industry, and a love of reputation, he cannot have too much: And if he have these, he will not long want what he needs or desires of the other.

导师的主要职责就是要改善举止，完善心智，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习惯和美德与智慧的原则，一点一滴地建立起对人的认识，使其热爱并效仿优秀的和值得称赞的事物，并且在践行的过程中间，教给他热情、活力和勤奋。至于引领学生所作的功课，只是要锻炼他的禀赋，利用他的时间，以免他懒惰闲散，教他发奋努力并形成刻苦的习惯，并且让他尝一尝勤奋努力所取得的成绩。因为谁会指望导师能够教出成功的批评家、演说家或逻辑学家来呢？或者彻底钻到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或数学里头去呢？或者成为历史或年代学的大家呢？尽管其中一部分是可以传授的，但只是让其略窥门道而已，就如同开头只是登门造访并不作停留，导师若是叫学生在所有这些科目上逗留过久或钻研过深，倒是要受到责备。但是良好的教养、对世界的认识、美德、勤勉，以及珍惜名声对学生来说是怎么都不嫌多的。如果能够具备这些，那么其他方面所需所求的便指日可待了。

And since it cannot be hop'd he should have time and strength to learn all things, most pains should be taken about that which is most necessary; and that principally look'd after which will be of most and frequentest use to him in the world.

既然谁也无法奢望有时间和精力来学会全部的东西，就要有的放矢，专注于那些对安身立命最为重要和最常用到的方面。

Seneca complains of the contrary practice in his time; and yet the *Burgersdiciuses'* and the *Scheiblers* did not swarm in those days as

they do now in these. What would he have thought if he had liv'd now, when the tutors think it their great business to fill the studies and heads of their pupils with such authors as these? He would have had much more reason to say, as he does, non *vitae sed scholaediscimus* , we learn not to live, but to dispute; and our education fits us rather for the university than the world. But 'tis no wonder if those who make the fashion suit it to what they have, and not to what their pupils want. The fashion being once establish'd, who can think it strange, that in this, as well as in all other things, it should prevail? And that the greatest part of those, who find their account in an easy submission to it, should be ready to cry out, Heresy, when any one departs from it? 'Tis nevertheless matter of astonishment that men of quality and parts should suffer themselves to be so far misled by custom and implicit faith. Reason, if consulted with, would advise, that their children's time should be spent in acquiring what might be useful to them when they come to be men, rather than to have their heads stuff'd with a deal of trash, a great part whereof they usually never do ('Tis certain they never need to) think on again as long as they live: and so much of it as does stick by them they are only the worse for. This is so well known, that I appeal to parents themselves, who have been at cost to have their young heirs taught it, whether it be not ridiculous for their sons to have any tincture of that sort of learning, when they come abroad into the world? whether any appearance of it would not lessen and disgrace them in company? And that certainly must be an admirable acquisition, and deserves well to make a part in education, which men are asham'd of where they are most concern'd to shewtheir parts and breeding.

塞内加抱怨过当时与此相反的做法，但也还不像现在，到处都是那些经院哲学家。如果他得见今日，看到导师们拼命把这些作家塞进

学生的书房和头脑，并以此为重任，又会作何感想呢？他大概比当时更有理由说出，我们不是教他们生活，而是教他们学问。而我们今天却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辩论，教育教我们适应学校而非世界。不过倒也不奇怪，因为人们会让风气适应他们自己所掌握的，而不是学生们需要的。风气一旦形成，谁又敢说奇怪呢？就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风气不总是占先吗？而其中一大部分人发现自己的想法受制于此，于是只要有人离经叛道，就准备随时将之斥为“异端”。然而让人惊讶的是，高贵和多才的人们也会被习俗和潜在的观念误导得如此之深。如果诉诸理性，它会提出建议，孩子的时间应当花在他们长大后还能用得上的地方，而不是将他们的头脑填满垃圾，其中多半是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再次想到的东西（他们当然再也不用）。其中很大一部分保留下来只会更糟。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因此我要对那些特意花钱做这些无用功的父母说，在孩子长大进入社会以后，哪怕带着一丁点儿这类知识的印记，是否也是很可笑的呢？在交往中一旦露出这种痕迹，是否会影响和破坏他们的形象呢？人们在最急于展现才华和教养的时候感到惭愧的那些才是值得钦佩的才能，自然应当作为教育的一部分。

There is yet another reason why politeness of manners, and knowledge of the world should principally be look'd after in a tutor; and that is, because a man of parts and years may enter a lad far enough in any of those sciences, which he has no deep insight into himself. Books in these will be able to furnish him, and give him light and precedency enough to go before a young follower: but he will never be able to set another right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and above all in breeding, who is a novice in them himself.

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何礼仪举止和人情世故应当是导师所必备的，那就是一个多才多艺又上了年纪的人，自己或许并未深入钻研所有学问，但引领学生入门是足以胜任的。相关的著作可以帮助他，

给他启发，让他能够领先年轻的学生，而如果一个人自己就不会处世，又没有教养，那么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这两方面教导别人的。

This is a knowledge he must have about him, worn into him by use and conversation and a long forming himself by what he has observ'd to be practis'd and allow'd in the best company. This, if he has it not of his own, is nowhere to be borrowed for the use of his pupil; or if he could find pertinent treatises of it in books that would reach all the particulars of an English gentleman's behaviour, his own ill-fashion'd example, if he be not well-bred himself, would spoil all his lectures; it being impossible, that any one should come forth well-fashion'd out of unpolish'd, ill-bred company.

导师自己就必须具备这种知识，通过自我实践和与人交往，以及通过对上流社会行为和规则的观察来调整自己，使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如果导师自身不具备这一点的话，那么在教学生的时候，是哪里也借不来的。即使从书里面找到了关于英国绅士行为的详尽描述，如果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如果自己就缺乏教养，那么就会毁掉他对学生的所有的训诫。一个从未经教化的粗俗圈子里成长起来的人，是不可能拥有良好的风范的。

I say this, not that I think such a tutor is every day to be met with, or to be had at the ordinary rates; but that those who are able, may not be sparing of enquiry or cost in what is of so great moment; and that other parents, whose estates will not reach to greater salaries, may yet remember what they should principally have an eye to in the choice of one to whom they would commit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and what part they should chiefly look after themselves, whilst they are under their care, and as often as

they come within their observation; and not think that all lies in Latin and French or some dry systems of logic and philosophy.

我这么说，并不是说这样的导师每天都能遇到，或随便花点钱就可以请来，而是说有能力的人不会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介意多方打听或付出金钱。那些家产不足以支付更高薪水的父母，也要记住主要的着眼点要放在谁能给孩子带来真正的教育，哪些部分是孩子目前或在父母视野之内时应当多加留意的，而不会完全指望拉丁文或法文，又或是什么干巴巴的逻辑学和哲学体系。

95 . But to return to our method again. Though I have mention'd the severity of the father's brow, and the awe settled thereby in the mind of children when young, as one main instrument whereby their education is to be manag'd; yet I am far from being of an opinion that it should be continu'd all along to them, whilst they are under the discipline and government of pupilage; I think it should be relax'd, as fast as their age, discretion and good behaviour could allow it; even to that degree, that a father will do well, as his son grows up, and is capable of it, to talk familiarly with him; nay, ask his advice, and consult with him about those things wherein he has any knowledge or understanding. By this, the father will gain two things, both of great moment. The one is, that it will put serious considerations into his son's thoughts, better than any rules or advices he can give him. The sooner you treat him as a man, the sooner he will begin to be one: and if you admit him into serious discourses sometimes with you, you will insensibly raise his mind above the usual amusements of youth, and those trifling occupations which it is commonly wasted in. For it is easy to observe, that many young men continue longer in the thought and conversation of school-boys than otherwise they

would, because their parents keep them at that distance, and in that low rank, by all their carriage to them.

第95节．但是还是再来谈谈我们的方法吧。虽然我曾经谈到过声色俱厉的父亲和由此在孩子年幼的心中树立的敬畏感是教育中重要的工具，但我绝不认为在孩子接受管束和作为学生时要一直推行此法。我以为，等孩子到了一定年纪、形成了一定的判断力和得体的行为时，就可以宽松些。甚至父亲在儿子长大成人，有了一定能力的时候，与之倾谈是很有好处的，甚至在他所熟悉和了解的事情上还可以听听他的建议，与他商量。如此，父亲将收获两点，且都很重要。一是可以让儿子学会严肃地思考，这远胜于任何规则或建议所能给予他的。越早将他视为大人，他就将越早开始成长。间或允许他加入严肃的讨论，不知不觉地就会使他的思维超出一般少年玩乐的层次，不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无聊的消遣中。因为显而易见，很多青年人长大后还总像个学生一样思考和交谈，就是因为父母的举止处处与孩子保持距离，把他们当作学童。若是父母换一种方式，孩子就不致如此。

96．Another thing of greater consequence, which you will obtain by such a way of treating him, will be his friendship. Many fathers, though they proportion to their sons liberal allowances, according to their age and condition, yet they keep the knowledge of their estates and concerns from them with as much reservedness as if they were guarding a secret of state from a spy or an enemy. This, if it looks not like jealousy, yet it wants those marks of kindness and intimacy which a father should shewto his son, and no doubt often hinders or abates that cheerfulness and satisfaction wherewith a son should address himself to and rely upon his father. And I cannot but often wonder to see fathers who love their sons very well, yet so order the matter by a constant stiffness and a mien of authority and distance to them all their lives, as if they were

never to enjoy, or have any comfort from those they love best in the world, till they had lost them by being remov'd into another. Nothing cements and establishes friendship and good-will so much as confident communication of concernments and affairs. Other kindnesses, without this, leave still some doubts: but when your son sees you open your mind to him, when he finds that you interest him in your affairs, as things you are willing should in their turn come into his hands, he will be concern'd for them as for his own, wait his season with patience, and love you in the meantime, who keep him not at the distance of a stranger. This will also make him see, that the enjoyment you have, is not without care; which the more he is sensible of, the less will he envy you the possession, and the more think himself happy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so favourable a friend and so careful a father. There is scarce any young man of so little thought, or so void of sense, that would not be glad of a sure friend, that he might have recourse to, and freely consult on occasion. The reservedness and distance that fathers keep, often deprive their sons of that refuge which would be of more advantage to them than an hundred rebukes and chidings. Would your son engage in some frolic, or take a vagary, were it not much better he should do it with, than without your knowledge? For since allowances for such things must be made to young men, the more you know of his intrigues and designs, the better will you be able to prevent great mischiefs; and by letting him see what is like to follow, take the right way of prevailing with him to avoid less inconveniences. Would you have him open his heart to you, and ask your advice? you must begin to do so with him first, and by your carriage beget that confidence.

第96节．另一点影响更为深远，那就是如果你能这样对待他，就将获得他的友谊。不少为父之人，尽管会根据年龄和状况酌情给孩子

相当一笔零用钱，却不把自家的产业和关心的事情告诉他们，就好像要谨防间谍或敌人盗取国家机密一样。这一点虽然不能说是嫉妒，却缺少了父亲应当展现给孩子的和蔼和亲密的迹象，无疑常常阻碍或削弱了儿子跟父亲说话、依赖父亲时本应具有的喜悦和满足。常令我惊讶的是，有些父亲很爱儿子，但永远都是用一种无可辩驳和高高在上不易接近的方式给孩子下命令，似乎他们一辈子都无法从世上最爱的人身上获得欢乐或安慰，直到他们离开人世，失去所爱。没什么能像亲密畅谈和交流看法一样建立并巩固友谊和善意。无此则其他善意的表示仍会留有疑虑，但如果儿子看到你可以敞开心怀，发现你欢迎他参与你的事务，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有朝一日会交到他们手上，那么他就会像关心自己的事情一样付出心力，耐心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同时因为你没有将他当作陌生人一般提防而爱你。同时也叫他看到，你的享受并非毫无顾虑。他对这一点越明了，就越不会嫉妒你的所有，并在如此友爱的朋友和如此慎重的父亲的照管之下越发感到高兴。极少有年轻人缺乏头脑或不讲道理到不欢迎这样一个朋友的地步，因为他可以随时向这个朋友寻求帮助，并自由地向他请教。如若父亲非要故作矜持、保持距离，则会使孩子失去这种庇护，而这种庇护比一百遍的责骂还要有用。儿子调皮捣乱的时候，与其什么都不告诉你，还不如让你知道，不是吗？因为既然这些事情上对年轻人得宽松些，你对他的诡计和把戏知道越多，就能越好地防止他犯什么大错。而且要让他知道可能产生的后果，就能用正确的方法说服他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你不愿让他敞开心扉，询问你的建议吗？你必须先这样对他，然后用你的行动赢得他的信任。

97 . But whatever he consults you about, unless it leads to some fatal and irremediable mischief, be sure you advise only as a friend of more experience; but with your advice mingle nothing of command or authority, nor more than you would to your equal or a stranger. That would be to drive him forever from any farther demanding, or receiving advantage from your counsel. You must consider that he is a young man, and has pleasures and fancies

which you are pass'd. You must not expect his inclination should be just as yours, nor that at twenty he should have the same thoughts you have at fifty. All that you can wishis that since youth must have some liberty, some outleaps, they might be with the ingenuity of a son, and under the eye of a father, and then no very great harm can come of it. The way to obtain this, as I said before, is (according as you find him capable) to talk with him about your affairs, propose matters to him familiarly, and ask his advice; and when he ever lights on the right, follow it as his; and if it succeed well, let him have the commendation. This will not at all lessen your authority, but increase his love and esteem of you. Whilst you keep your estate, the staff will be in your own hands; and your authority the surer, the more it is strengthen'd with confidence and kindness. For you have not that power you ought to have over him, till he comes to be more afraid of offending so good a friend than of losing some part of his future expectation.

第97节．但是不管他向你寻求什么意见，只要不会引起致命的和不可挽回的后果，都要只以一个经验丰富的朋友身份给出建议。不要再在建议里面掺杂命令或权威，也不要与你对待同龄人或陌生人的方式有什么分别。否则他就再不会来找你，或者再不想从你的指导中获益。你必须认识到他是一个年轻人，和你有过一样的快乐与幻想。别指望他能跟你一样不偏不倚，或者二十岁就能跟你五十岁一样思考。你可以期待的就是，既然是年轻人，就会有些自作主张、跳脱不羁的劲头，但他们只要具备为人子的才智，并拥有父亲的关爱，是不会出什么了不起的差错的。如前所述，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在你认为他具备相应的能力时）要与他谈论你的事情，亲切地向他提出，询问他的建议。如果他说得有道理，就按他说的去做。如果效果不错，要表扬他。这丝毫不会有损你的权威，而是会增加他对你的爱和尊敬。当你掌管着财产，权柄仍在你手中。越是用信任与友爱加强你的威信，这种威信就更有保证。有一天他会认为比起放弃一部分自己的期望，

更害怕得罪你这个好朋友，在此之前你是无法完全控制他的。

98 . Familiarity of discourse, if it can become a father to his son, may much more be condescended to by a tutor to his pupil. All their time together should not be spent in reading of lectures, and magisterially dictating to him what he is to observe and follow. Hearing him in his turn, and using him to reason about what is propos'd, will make the rules go down the easier and sink the deeper, and will give him a liking to study and instruction: And he will then begin to value knowledge, when he sees that it enables him to discourse, and he finds the pleasure and credit of bearing a part in the conversation, and of having his reasons sometimes approv'd and hearken'd to; particularly in morality, prudence, and breeding, cases should be put to him, and his judgment ask'd. This opens the understanding better than maxims, how well soever explain'd, and settles the rules better in the memory for practice. This way lets things into the mind which stick there, and retain their evidence with them; whereas words at best are faint representations, being not so much as the true shadows of things, and are much sooner forgotten. He will better comprehend the foundations and measures of decency and justice, and have livelier, and more lasting impressions of what he ought to do, by giving his opinion on cases propos'd, and reasoning with his tutor on fit instances, than by giving a silent, negligent, sleepy audience to his tutor's lectures; and much more than by captious logical disputes, or set declamations of his own, upon any question. The one sets the thoughts upon wit and false colours, and not upon truth; the other teaches fallacy, wrangling, and opiniatry; and they are both of them things that spoil the judgment, and put a man out of the way of right and fair reasoning; and therefore carefully to be avoided by one who would improve himself, and be acceptable to others.

第98节．如果父亲可以和儿子亲切交谈的话，那么导师就更加可以放下身段与学生交谈。导师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不应当全部用来照本宣科，以及发号施令说应当恪守和遵循什么。适时地听听他的想法，对你的建议作理性的分析，就会使规则更容易实施，也更深入其心。这样一来他就愿意学习和接受指教了。发现知识能够帮助交谈，参与对话还能获得乐趣，受到称赞，自己的理由有时还能得到肯定和倾听，此时他就更加重视知识。尤其是道德、审慎态度和教养方面的例子，须让他知道，并叫他做出判断。这种方法很有启发作用，比格言的效果好得多，无论格言阐述得多么精彩，也无法让人对规则记得这样深刻，在行动时提供参照。这种方法不但能让道理深入心灵，在那里扎根，并保持新鲜，而说教充其量只是模糊的印象，甚至算不上是事物真正的影子，也很容易淡忘。如果能对事件发表自己的观点，在适当的时候和导师一起分析，那么就能更好地领会礼仪和正义的基础和方法，对自己应该怎样做印象更生动、更持久。这可比导师滔滔不绝，学生沉默不语、心不在焉、昏昏欲睡要强得多。也比凡事吹毛求疵，从逻辑上加以反驳，或者雄辩滔滔要好得多。把心思花在小聪明和障眼法而不是事实上，和教人谬论、争辩和固执己见，两样都有损判断，让人脱离正确和公正的推理轨道。因此对于想要完善自身，并让人接受的人而言，这两种都要小心避免。

99 . When by making your son sensible that he depends on you, and is in your power, you have established your authority; and by being inflexibly severe in your carriage to him when obstinately persisting in any ill-natur'd trick which you have forbidden, especially lying, you have imprinted on his mind that awe which is necessary; and, on the other side, when (by permitting him the full liberty due to his age, and laying no restraint in your presence to those childish actions and gaiety of carriage, which, whilst he is very young, is as necessary to him as meat or sleep) you have reconcil'd him to your company, and made him sensible of your

care and love of him, by indulgence and tenderness, especially caressing him on all occasions wherein he does anything well, and being kind to him after a thousand fashions suitable to his age, which nature teaches parents better than I can: When, I say, by these ways of tenderness and affection, which parents never want for their children, you have also planted in him a particular affection for you; he is then in the state you could desire, and you have form'd in his mind that true reverence which is always afterwards carefully to be continu'd, and maintain'd in both parts of it, love, and fear, as the great principles whereby you will always have hold upon him, to turn his mind to the ways of virtue and honour.

第99节．一旦令郎明白自己是依赖你的，并且受你的管束，你的威信就树立起来了。如果儿子在某些明令禁止的坏习气特别是说谎方面屡教不改，就要严加管教，这就会让他心里产生必要的畏惧。另一方面，要给予符合他年纪的充分自由，别去限制他在你面前做出些幼稚和得意忘形的举动，这些对小孩子来说，就跟吃肉或睡觉一样必要。在他已经甘愿与你为伴，并且从你的宽容和温柔中了解了你对他的关心和爱护时，尤其在他处处都表现得不错时，要爱抚他，用各种适合他年纪的方式来疼爱他，这一点大自然比我教得好得多。我认为父母对孩子从来不会缺乏这些温柔和怜爱，而孩子也会因此对你建立起一种特别的感情。这样就如你所期待的那样，他对你怀抱一种真正的敬爱之情。在这以后，爱与敬畏应当同时保留，作为你对他管教的主要原则，并引领他靠近美德和荣耀。

100．When this foundation is once well lay'd, and you find this reverence begin to work in him, the next thing to be done, is carefully to consider his temper, and the particular constitution of his mind. Stubbornness, lying, and ill-natur'd actions, are not (as

has been said) to be permitted in him from the beginning, whatever his temper be. Those seeds of vices are not to be suffer'd to take any root, but must be carefully weeded out, as soon as ever they begin to shewthemselves in him; and your authority is to take place and influence his mind, from the very dawning of any knowledge in him, that it may operate as a natural principle, whereof he never perceiv'd the beginning, never knew that it was, or could be otherwise. By this, if the reverence he owes you be establish'd early, it will always be sacred to him, and it will be as hard for him to resist as the principles of his nature.

第100节．基础一经打下，你就会发现这种敬爱之情开始发挥作用，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认真考虑他的脾气和思想的特性。无论他的脾气如何，偏执、欺骗和居心不良的行为从一开始（前面已经说过）就不能容忍。这些恶习的种子是绝不能姑息任其生根的，一旦在他身上露出蛛丝马迹，就要小心地去除。在他开始接触任何知识时，就要在其头脑中建立你的威信和影响，这样他就会顺理成章地当作原则来遵守，而不会想到最初是怎样，也不会知道事情曾经或者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如此及早地使他对你敬爱有加，那么他就会一直心存畏惧，并且难以反抗，就像他难以反抗根植于天性中的原则一样。

Section 101-110

第101-110节

101 . Having thus very early set up your authority, and by the gentler applications of it sham'd him out of what leads towards an immoral habit, as soon as you have observ'd it in him, (for I would by no means have chiding us'd, much less blows, till obstinacy and incorrigibleness make it absolutely necessary) it will be fit to consider which way the natural make of his mind inclines him. Some men by the unalterable frame of their constitutions, are stout, others timorous, some confident, others modest, tractable, or obstinate, curious or careless, quick or slow. There are not more differences in men's faces, and the outward lineaments of their bodies, than there are in the makes and tempers of their minds; only there is this difference, that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s of the face, and the lineaments of the body, grow more plain and visible with time and age; but the peculiar physiognomy of the mind is most discernible in children, before art and cunning have taught them to hide their deformities, and conceal their ill inclinations under a dissembled outside.

第101节．早早地树立了威信，小心翼翼地加以利用，就能发现在儿子出现不道德习惯的苗头时，让他感到羞愧并改正。没到屡教不改非打骂不可的地步，我是不主张厉声呵斥的，更不用说拳脚相向了。适宜的方法是去考虑他的天性使他倾向于哪个方向。人的天性难以改变，有人性格刚烈，有人怯懦，有人自信，有人谦虚，有人乖巧，有人固执，有人好奇，有人粗心，有人敏捷，有人迟钝。就跟人的面貌千差万别，体格特征各有不同一样，人的心理构造和性情也彼

此不同。唯一的区别在于，面貌和体格的显著特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清楚明白，而心理的特点虽说在儿童身上显而易见，但慢慢地他们就掌握了掩饰缺点的技巧和手法，在伪装下隐藏了自己的不良倾向。

102 . Begin therefore betimes nicely to observe your son's temper; and that, when he is under least restraint, in his play, and as he thinks out of your sight. See what are his predominate passions and prevailing inclinations; whether he be fierce or mild, bold or bashful, compassionate or cruel, open or reserv'd, &c. For as these are different in him, so are your methods to be different, and your authority must hence take measures to apply itself different ways to him. These native propensities, these prevalencies of constitution, are not to be cur'd by rules, or a direct contest, especially those of them that are the humbler and meaner sort, which proceed from fear, and lowness of spirit; though with art they may be much mended, and turn'd to good purposes. But this, be sure, after all is done, the biaswill always hang on that side that nature first plac'd it: And if you carefully observe the characters of his mind, now in the first scenes of his life, you will ever after be able to judge which way his thoughts lean, and what he aims at even hereafter, when, as he grows up, the plot thickens, and he puts on several shapes to act it.

第102节．因此要及早地在令郎不受约束、自娱自乐并以为你看不到他的时候小心观察他的脾气。看他主要的喜好和一般的倾向在哪里，看他是锋芒毕露还是温润平和，大胆还是腼腆，怜悯还是残忍，坦率还是矜持等等。因为个性不同，就要有不同的教育方法，就要用不同的方式让他感受到你的威严。这些与生俱来的倾向和性情是用规则或直接的对抗改正不了的，尤其是其中那些从恐惧和卑贱中而来的

卑微低劣的习性。尽管如果方法得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以改善，使之变得有用。但是要知道，即使尽了全力，习性仍然会永远偏向自然安排的方向。如若在孩子最早显现出个性的时候，就能小心观察他思想的特质，那么从此，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随着事情变得复杂，又有多层伪装遮蔽他的行为时，就可以判断他的想法倾向何处，目标是什么。

103．I told you before, that children love liberty; and therefore they should be brought to do the things are fit for them, without feeling any restraint laid upon them. I now tell you, they love something more; and that is dominion: And this is the first original of most vicious habits, that are ordinary and natural. This love of power and dominion shewsitself very early, and that in these two things.

第103节．我之前说过，儿童爱自由，因此凡是适合他们的事情，就尽可以由他们去做，不使他们感到任何强加的限制。我现在要说的是，儿童更爱一件事，那就是控制欲，而这正是多数常见和天生的恶习的根源。这种权力欲和控制欲很早就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件事上。

104．I. We see children, as soon almost as they are born (I am sure long before they can speak) cry, grow peevish, sullen, and out of humour, for nothing but to have their wills. They would have their desires submitted to by others; they contend for a ready compliance from all about them, especially from those that stand near or beneath them in age or degree, as soon as they come to consider others with those distinctions.

第104节．（1）我们看到，小孩子几乎一出世（我肯定比他们会说话早得多）就会哭闹，发脾气，赌气，反复无常，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意愿。他们要让其他人顺从自己的愿望，争取让所有周围的人都对自己百依百顺，尤其是与自己年纪或地位相仿或比自己更低的人，一旦他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分辨人群就会如此。

105．(2)Another thing wherein they shewtheir love of dominion, is, their desire to have things to be theirs: They would have propriety and possession, pleasing themselves with the power which that seems to give, and the right they thereby have, to dispose of them as they please. He that has not observ'd these two humours working very betimes in children, has taken little notice of their actions: And he who thinks that these two roots of almost all the injustice and contention that so disturb human life, are not early to be weeded out, and contrary habits introduc'd, neglects the proper season to lay the foundations of a good and worthy man. To do this, I imagine these following things may somewhat conduce.

第105节．（2）另一件体现权力欲的事情是要将东西据为己有。通过占有和随意处置权利带给他们权力，让他们感到满足。谁要是没有及早在儿童身上看出这两种行为，就是没有在意孩子的行为。这两种倾向正是影响人类生活的各种不公平和竞争的根源，谁要是认为无需及早清除，并以相反的习惯取而代之，就忽略了培养一个正直的有用之才的最佳时机。而要做到这一点，我想以下两点多少会有所助益。

106．I. That a child should never be suffer'd to have what he craves, much less what he cries for, I had said, or so much as speaks for: But that being apt to the misunderstood, and interpreted as if I

meant a child should never speak to his parents for anything, which will perhaps be thought to lay too great a curb on the minds of children, to the prejudice of that love and affection which should be between them and their parents; I shall explain myself a little more particularly. It is fit that they should have liberty to declare their wants to their parents, and that with all tenderness they should be hearken'd to, and supply'd, at least whilst they are very little. But'tis one thing to say, I am hungry, another to say, I would have roast-meat. Having declar'd their wants, their natural wants, the pain they feel from hunger, thirst, cold, or any other necessity of nature, 'tis the duty of their parents and those about them to relieve them: But children must leave it to the choice and ordering of their parents, what they think properest for them, and how much; and must not be permitted to choosefor themselves, and say, I would have wine, or white-bread; the very naming of it should make them lose it.

第106节．（1）我曾说过，儿童恳求的东西，不要叫他得到，哭闹要求的更是不可给他，也不能他要多少便给多少。但这一点很容易为人误会和解读成我认为儿童永远不应该对向父母提出任何要求，并因此被认为过度束缚了儿童的意愿，有损父母和孩子之间应有的爱与情感。所以我要在此特别解释一下。有一定自由告诉父母自己想要什么是合适的，并且父母应当温柔地倾听，并适当满足，至少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应当如此。但是说我饿了是一码事，说我一定得吃烤肉，是另一码事。孩子说出自己想要的，提出正常的需求，以及表达饥渴、寒冷或其他正当需求匮乏时感到的痛苦，父母和周围的人就有责任满足他们的需要。但给孩子什么和给多少则要由父母斟酌选择和安排，孩子应当听从，而不能由着他们来选择，如果他们还纠缠说我要葡萄酒，或是白面包，就不应让他们得到。

107 . That which parents should take care of here, i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wants of fancy, and those of nature; which Horace has well taught them to do in this verse:

第107节．父母要注意区分奢欲和自然的需要，也就是贺拉斯所指教的：

Queishumanasibidoleat natura negatis .

欲求不满使人痛苦。

Those are truly natural wants, which reason alone, without some other help, is not able to fence against, nor keep from disturbing us. The pains of sickness and hurts, hunger, thirst, and cold, want of sleep and rest or relaxation of the part weary'd with labour, are what all men feel and the best dispos'd minds cannot but be sensible of their uneasiness; and therefore ought, by fit applications, to seek their removal, though not with impatience, or over great haste, upon the first approaches of them, where delay does not threaten some irreparable harm. The pains that come from the necessities of nature are monitors to us to beware of greater mischiefs, which they are the forerunners of; and therefore they must not be wholly neglected, nor strain'd too far. But yet the more children can be inur'd to hardships of this kind, by a wise care to make them stronger in body and mind, the better it will be for them. I need not here give any caution to keep within the bounds of doing them good, and to take care, that what children are made to suffer, should neither break their spirits, nor injure their health,

parents being but too apt of themselves to incline more than they should to the softer side.

那些真正自然的需要，如果仅靠理智本身、没有外力的帮助，是没有能力抵挡或远离其干扰的。伤病、饥渴、寒冷、困乏，或是劳作之后的疲倦，会让人感到痛苦，即使是最坚强的人也概莫能外，所以应该通过适当的方法加以消除。不过也不必一感到不适，就急不可耐或过于急迫地去解决。只要不至于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稍有延迟是可以的。自然的需求引发的痛苦提前叫我们注意到更大的危害，因此不能全盘忽略，或过度压抑。话虽如此，越是明智地锻炼儿童的身心，那么他们越能承受此类痛苦，对他们的成长就越有益处。这里我不必赘述，警告做父母的在对儿童提出要求时，要小心照看，使之控制在对儿童有益的范围内，既不可打击孩子的精神，也不能损害他们的健康。因为父母通常总是过于心慈手软。

But whatever compliance the necessities of nature may require, the wants of fancy children should never be gratify'd in, nor suffered to mention. The very speaking for any such thing should make them lose it. Clothes, when they need, they must have; but if they speak for this stuff or that colour, they should be sure to go without it. Not that I would have parents purposely cross the desires of their children in matters of indifference,; on the contrary, where their carriage deserves it, and one is sure it will not corrupt or effeminate their minds, and make them fond of trifles, I think all things should be contriv'd, as much as could be, to their satisfaction, that they may find the ease and pleasure of doing well. The best for children is that they should not place any pleasure in such things at all, nor regulate their delight by their fancies, but be indifferent to all that nature has made so. This is what their parents and teachers should chiefly aim at; but till this be obtain'd, all that I

oppose here, is the liberty of asking, which in these things of conceit ought to be restrain'd by a constant forfeiture annex'd to it.

虽然自然的需求应当顺从，儿童的奢欲则不应当满足，也不要让他们提出。如果他们自己提出来，就一定不要让他们得到。衣服在需要的范围内，应当让孩子拥有，但必须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提出要特定面料或颜色的衣服，那么就一定不会得到。我并不是要让父母在任何无谓的事情上都故意违背孩子的意愿，相反，如果他们的举止得当，且父母确信不会让孩子的精神堕落或变得娇弱，让他们执迷于琐事，我想可以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样他们就会因为自己良好的表现感到轻松愉悦。对于儿童来说，最好完全不要把快乐建立在这类事物之上，或者将快乐建立在幻想上，而是对自然的安排全然接受，毫不挑剔。这是父母和老师主要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我所反对的是儿童不假思索地提出各种要求。要时刻约束孩子的奢欲，拒绝他们的要求。

This may perhaps be thought a little too severe by the natural indulgence of tender parents; but yet it is no more than necessary: For since the method I propose is to banish the rod, this restraint of their tongues will be of great use to settle that awe we have elsewhere spoken of, and to keep up in them the respect and reverence due to their parents. Next, it will teach to keep in, and so master their inclinations. By this means they will be brought to learn the art of stifling their desires, as soon as they rise up in them, when they are easiest to be subdu'd. For giving vent, gives life and strength to our appetites; and he that has the confidence to turn his wishes into demands, will be but a little way from thinking he ought to obtain them. This, I am sure,everyone can more easily bear a denial from himself, than from anybody else. They should therefore be accustom'd betimes to consult, and make use of their

reason, before they give allowance to their inclinations. 'Tis a great step towards the mastery of our desires, to give this stop to them, and shut them up in silence. This habit got by children, of staying the forwardness of their fancies, and deliberating whether it be fit or no, before they speak, will be of no small advantage to them in matters of greater consequence, in the future course of their lives. For that which I cannot too often inculcate, is, that whatever the matter be about which it is conversant, whether great or small, the main (I had almost said only) thing to be consider'd in every action of a child, is, what influence it will have upon his mind; what habit it tends to, and is like to settle in him; how it will become him when he is bigger; and if it be encourag'd, whither it will lead him when he is grown up.

这么做可能会被认为过于严厉，因为父母总是出于舍不得而娇惯孩子，但这并没有超出必要的程度。因为我所提出的正是放弃体罚，而约束他们的言行，将大大有助于建立起孩子对父母应有的尊敬和敬畏，这一点我们在别处也提到过。此外，还能教他们学会克制，从而控制欲望。他们将学会在欲望刚一出现也是最容易抑制的时候，就加以克制。因为欲望一旦找到出口，我们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凡是有把握把愿望作为要求提出来的人，基本上都认为自己理应得到满足。我相信自我克制总是要比别人让你去克制容易接受。因此在放任自己之前，儿童应当尽早养成征询并运用理智的习惯。克制自己，不把欲望说出口，对于我们管理欲望是重要的一步。儿童养成这种习惯，忍住了冲动，开口前反复斟酌，将在未来处理重大事件时发挥巨大优势。因为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一点就是，无论何事，无论大小，最主要（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就是每个行为对儿童的心理将产生什么影响，会让他建立起怎样的习惯，今后会如何发展，以及如果加以鼓励，在他成年后是否可以作为指引。

My meaning therefore is not, that children should purposely be made uneasy. This would relish too much of inhumanity and ill-nature, and be apt to infect them with it. They should be brought to deny their appetites; and their minds, as well as bodies, be made vigorous, easy, and strong, by the custom of having their inclinations in subjection, and their bodies exercis'd with hardships: But all this, without giving them any mark or apprehension of ill-will towards them. The constant loss of what they crav'd or carv'd to themselves, should teach them modesty, submission, and a power to forbear: But the rewarding their modesty, and silence, by giving them what they lik'd, should also assure them of the love of those who rigorously exacted this obedience. The contenting themselves now in the want of what they wish'd for, is a virtue that another time should be rewarded with what is suited and acceptable to them; which should be bestow'd on them as if it were a natural consequence of their good behaviour, and not a bargain about it. But you will lose your labour, and what is more, their love and reverence too, if they can receive from others what you deny them. This is to be kept very staunch, and carefully to be watch'd. And here the servants come again my way.

因此我并不是说，要刻意让孩子不舒服。否则就是过于无情和恶毒，也会传染给孩子。儿童应当学会克制自己的胃口，通过习惯驯服欲望，磨炼自己的身体，使身心更为精力充沛、安适和强健。但所有这些都不应让他们感到或担心别人对其怀有恶意。常常有所求而不可得，可以教会他们谦逊、克制和忍耐力。而作为奖励他们的谦虚和克制，可以给他们喜欢的东西，这样就能让他们知道严格要求自己顺从的人是爱他们才这样做的。能够把安于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视为一种美德，在另一个时候可以用适合和可以接受的东西加以奖赏，并且是作为表现好的自然结果，而不是讨价还价的结果。但是如果孩子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你拒绝给予的东西，那么你就前功尽弃了，而且会失掉

他们对你的爱和尊敬。这一点应当坚决防范，小心留意。这里我要再次谈一谈仆人的问题。

108 . If this be begun betimes, and they accustom themselves early to silence their desires, this useful habit will settle them; and as they come to grow up in age and discretion, they may be allow'd greater liberty, when reason comes to speak in 'em, and not passion: For whenever reason would speak, it should be hearken'd to. But as they should never be heard, when they speak for any particular thing they would have, unless it be first propos'd to them; so they should always be heard, and fairly and kindly answer'd, when they ask after anything they would know, and desire to be inform'd about. Curiosity should be as carefully cherish'd in children, as other appetites suppress'd.

第108节．如果这种训练能够及早开始，并让孩子很早就习惯于克制欲望，这一有效的习惯就能使他们安静下来。随着孩子年岁渐长，判断力渐增，当他们身上理智取代情感获得发言权的时候，或可容许其拥有更大的自由，因为不论理智何时站出来说话，都应仔细倾听。当孩子说想要某个特定东西的时候，除非是先有人向他们提出来的，否则不能答应其要求；但如果孩子追问一些他们想知道的东西，并希望有人告诉他们，那就要听取他们的提问，并坦诚和善地加以回答。孩子的好奇心应当得到特别的爱护，正如其他欲望应当加以抑制一样。

However strict a hand is to be kept upon all desires of fancy, yet there is one case wherein fancy must be permitted to speak, and be hearken'd to also. Recreation is as necessary as labour or food. But because there can be no recreation without delight, which

depends not always on reason, but oftener fancy, it must be permitted children not only to divert themselves, but to do it after their own fashion, provided it be innocently, an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ir health; and therefore in this case they should not be deny'd, if they proposed any particular kind of recreation. ThoughI think in a well-order'd education, they will seldom be brought to the necessity of asking any such liberty. Care should be taken, that what is of advantage to them, they should always do with delight; and before they are weary'd with one, they should be timely diverted to some other useful employment. But if they are not yet brought to that degree of perfection, that one way of improvement can be made a recreation to them, they must be let loose to the childish play they fancy; which they should be wean'd from by being made to surfeit of it: But from things of use, that they are employ'd in, they should always be sent away with an appetite; at least be dismiss'd before they are tir'd, and grow quite sick of it, that so they may return to it again, as to a pleasure that diverts them. For you must never think them set right, till they can find delight in the practice of laudable things; and the useful exercises of the body and mind, taking their turns, make their lives and improvement pleasant in a continu'd train of recreations, wherein the weary'd part is constantly reliev'd and refresh'd. Whether this can be done in every temper, or whether tutors and parents will be at the pains, and have the discretion and patience to bring them to this, I know not; but that it may be done in most children, if a right course be taken to raise in them the desire of credit, esteem, and reputation, I do not at all doubt. And when they have so much true life put into them, they may freely be talk'd with about what most delights them, and be directed or let loose to it; so that they may perceive that they are belov'd and cherish'd, and that those under whose tuition they are, are not enemies to their satisfaction. Such a management will make them in love with the hand that directs

them, and the virtue they are directed to.

不论怎样严格地控制孩子对其所偏好之物的欲望，在一种情况是应另当别论的——那就是须让他们的爱好获得发言权，并仔细聆听。娱乐就像劳动与食物一样不可或缺。不过，由于没有一种娱乐活动不伴随着快乐，而快乐与其说依赖于理性，不如说更依赖于爱好，那么不独应当容许孩子娱乐消遣，还要容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取乐，只要没有害处、无损健康就行。既然如此，当孩子提议进行某项娱乐活动时，就不应当拒绝他们。尽管我认为如果教育方式得宜，孩子不一定非要在这件事情上去寻求批准。需要注意的是，要让孩子始终在那些对其有益的事中享受快乐，在他们对一件事感到厌倦之前，就要及时地将他们吸引到其他有益的活动中去。但如果孩子还不能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程度，将完善自身的活动视为娱乐，那么就要放手让他们以小孩子所喜爱的方式玩耍嬉戏，要让他们玩个够以至感到腻烦，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对其失去兴趣。至于孩子所从事的那些有益活动，则要让他们在意犹未尽的时候就离开，至少要让他们在感到疲倦与腻烦之前停止，这样他们回过头来还会去做这件事，并把它当作一种娱乐消遣。你不能轻易认为孩子已走上正轨，除非他们在做那些值得赞赏的事情时自己能感受到快乐。并且对他们的身体与心灵轮番进行的有益训练要体现为一系列的娱乐消遣，使孩子的生活和进步都充满快乐，即使有所厌倦也总是能得到缓解，重新振作。我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能在性情各异的孩子身上均取得成功，也不知道父母和教师是否愿意付诸努力，以足够的谨慎与耐心将孩子训练成这样。但我毫不怀疑，只要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激起孩子对美名、自尊与荣誉的渴望，那么大多数孩子都能实现这一目标。当这真正的生命力注入孩子之后，就可以自由地和他们谈论什么最能令其快乐，并指导或任凭他们追求这种快乐。他们因此就会感到自己是受到疼爱、得到珍视的，同时认识到那些教导他们的人并不是阻止其获得满足的敌人。这种教育方式可以使孩子爱戴那些管教他们的人，同时热爱那些他们被告知应当追寻的美德。

This farther advantage may be made by a free liberty permitted them in their recreations, that it will discover their natural tempers, shewtheir inclinations and aptitudes, and thereby direct wise parents in the choice both of the course of life and employment they shall design them for, and of fit remedies, in the meantime, to be apply'd to whatever bent of nature they may observe most likely to mislead any of their children.

让孩子在玩乐时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还能够得到更进一步的益处，那就是可以发现他们的自然天性，显示出他们的爱好与才能，当明智的父母为孩子规划人生道路及职业时，这就能够帮助他们做出选择，同时在发现孩子的某种自然倾向极有可能将其引入歧途时，父母就能找到适当的纠正方法。

109．(2)Children who live together, often strive for mastery, whose wills shall carry it over the rest: whoever begins the contest should be sure to be cross'd in it. But not only that, but they should be taught to have all the deference, complaisance, and civility one for the other imaginable. This, when they see it procures them respect, love and esteem, and that they lose no superiority by it, they will take more pleasure in, than in insolent domineering; for so plainly is the other.

第109节．（2）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常常为控制权一争长短，总把自己的意愿凌驾于他人之上。无论谁发起这种竞争，都必须遭到反对。不仅如此，还要教育他们在对待他人时要尽可能地表现出尊重、恳切及礼貌。一旦孩子发现这能使其获得重视、喜爱与尊重，并且自己的地位丝毫没有降低，他们就能从中得到更多快乐与满足，而不再专横无礼地控制他人，因为后者所造成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The accusations of children one against another, which usually are but the clamours of anger and revenge desiring aid, should not be favourably received, nor hearken'd to. It weakens and effeminates their minds to suffer them to complain; and if they endure sometimes crossing or pain from others without being permitted to think it strange or intolerable, it will do them no harm to learn sufferance, and harden them early. But though you give no countenance to the complaints of the querulous, yet take care to curb the insolence and ill nature of the injurious. When you observe it yourself, reprove it before the injur'd party: but if the complaint be of something really worth your notice, and prevention another time, then reprove the offender by himself alone, out of sight of him that complain'd and make him go and ask pardon, and make reparation: which coming thus, as it were from himself, will be the more cheerfullyperformed, and more kindly receiv'd, the love strengthen'd between them, and a custom of civility grow familiar amongst your children.

当孩子们相互告状的时候，不需要表示认同或仔细听取，因为这通常不过是表示愤怒与报复的叫嚷，以寻求他人的帮助。把孩子的告状当回事会使他们的心灵脆弱无力，并助长他们的抱怨与诉苦。如果令孩子时不时忍受外来的阻挠与痛苦，而不让他们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或难以承受的，便能使其学会忍耐，并尽早变得坚强，这对孩子来说丝毫没有坏处。不过，尽管你可以不理会诉苦一方的抱怨，但对于造成祸害的一方的无礼与怪癖则应加以管束。如果你亲眼看到事情发生，就要当着受害方的面斥责孩子。但如果遭到抱怨的事确实值得你注意，并要防止其再次发生，就要避开告状的一方，在犯错的孩子独自一人时加以训斥，并让他去向对方道歉，同时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这样一来，就好像是他主动道歉一样，他也就更乐于这样做，同时受害方也会更友好地接受道歉，双方的友谊既得到增强，你

的孩子也会逐渐熟悉彼此间讲礼貌的习惯。

110．(3)As to the having and possessing of things, teach them to part with what they have, easily and freely to their friends, and let them find by experience that the most liberal has always the most plenty, with esteem and commendation to boot, and they will quickly learn to practise it. This I imagine, will make brothers and sisters kinder and civiller to one another, and consequently to others, than twenty rules about good manners, with which children are ordinarily perplex'd and cumber'd. Covetousness, and the desire of having in our possession, and under our dominion, more than we have need of, being the root of all evil, should be early and carefully weeded out, and the contrary quality of a readiness to impart to others, implanted. This should be encourag'd by great commendation and credit, and constantly taking care that he loses nothing by his liberality. Let all the instances he gives of such freeness be always repay'd, and with interest; and let him sensibly perceive, that the kindness he shews to others, is no ill husbandry for himself; but that it brings a return of kindness both from those that receive it, and those who look on. Make this a contest among children, who shall out-do one another this way: and by this means, by a constant practice, children having made it easy to themselves to part with what they have, good nature may be settled in them into an habit, and they may take pleasure, and pique themselves in being kind, liberal and civil, to others.

第110节．（3）在获取和占有物品方面，要让孩子学会轻松随意地把自己的东西分给朋友，而且要让他们通过经验发现，最慷慨之人常常最为富足，此外他还能赢得自尊与赞誉，这样孩子很快就能学会这一点。我想如此一来，兄弟姐妹之间就会更为友善、谦让，而最终

他们也会推己及人，而二十条关于良好行为的规矩则常常只会使他们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贪婪，以及在自己所需之外去占有和征服的欲望，是所有邪恶的根源，应当尽早小心拔出，而与此相反，乐于与人分享的品质则应值得培养。应当尽可能地利用赞誉与嘉奖的方式鼓励这种行为，并且要时刻关心，使孩子不会因为慷慨而有所损失。每当孩子做出慷慨之事，都要使他得到加倍的报偿。并且要让他明确意识到，他对别人表示出的善意并不会亏待自己，而会使其同时收获来自受益一方以及旁观者的善意。要使慷慨成为孩子们竞争的目标，使每个人都想比别人做得更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以及不断地实践，孩子们就会感到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并不是一件为难的事，而这种大度的性情也会化为一种习惯，孩子们能从中得到快乐，并且因为自己对他人友善、慷慨、有礼貌而感到自豪。

If liberality ought to be encourag'd certainly great care is to be taken that children transgress not the rules of Justice: and whenever they do, they should be set right, and if there be occasion for it, severely rebuk'd.

如果说慷慨大度是值得鼓励的，那么当然也要格外注意，使孩子不能有违背正义原则的举动。一旦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事，就要令其纠正过来，如果有合适的机会还要严加斥责。

Our first actions being guided more by self-love than reason or reflection, 'tis no wonder that in children they should be very apt to deviate from the just measures of right and wrong; which are in the mind the result of improv'd reason and serious meditation. This the more they are apt to mistake, the more careful guard ought to be kept over them; and every the least slip in this great social virtue taken notice of, and rectify'd; and that in things of the least weight

and moment, both to instruct their ignorance, and prevent ill habits; which from small beginnings in pins and cherry-stones, will, if let alone, grow up to higher frauds, and be in danger to end at last in downright harden'd dishonesty. The first tendency to any injustice that appears, must be suppress'd with a shewof wonder and abhorrence in the parents and governors. But because children cannot well comprehend what injustice is, till they understand property, and how particular persons come by it, the safest way to secure honesty, is to lay the foundations of it early in liberality, and an easiness to part with to others whatever they have or like themselves. This may be taught them early, before they have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enough to form distinct notions of property, and to know what is theirs by a peculiar right exclusive of others. And since children seldom have anything but by gift, and that for the most part from their parents, they may be at first taught not to take or keep anything but what is given them by those, whom they take to have power over it. And as their capacities enlarge, other rules and cases of justice, and rights concerning Meum and Tuum, may be propos'd and inculcated. If any act of injustice in them appears to proceed, not from mistake, but a perverseness in their wills, when a gentle rebuke and shame will not reform this irregular and covetous inclination, rougher remedies must be apply'd: And 'tis but for the father and tutor to take and keep from them something that they value and think their own, or order somebody else to do it; and by such instances, make them sensible what little advantage they are like to make by possessing themselves unjustly of what is another's, whilst there are in the world stronger and more men than they. But if an ingenuous detestation of this shameful vice be but carefully and early instill'd into 'em, as I think it may, that is the true and genuine method to obviate this crime, and will be a better guard against dishonesty than any considerations drawn from interest; habits working more

constantly, and with greater facility, than reason, which, when we have most need of it, is seldom fairly consulted, and more rarely obey'd.

我们最初的举动常常是受利己主义而不是受理智或思考驱动的，这就毫不奇怪孩子易于偏离区分是非的正当标准，因为这种标准原是内心进一步发展的理性和认真反省的产物。孩子越是易于弄错是非标准，就越要在他们身上留心，对于这极为重要的公共美德，每一点小疏漏都要格外注意，并加以纠正。就是在最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也要针对孩子的无知予以指导，同时防止坏习惯养成。即使错误开始时只有针尖或樱桃核一般微小，如果置之不理，也会发展成为严重的欺诈，并面临最终变成彻底而顽固不化的不诚实的危险。当违背正义的倾向头一次在孩子身上露出苗头的时候，父母及教师必须表现出惊讶和厌恶以打压这种倾向。孩子不懂得财产意味着什么，也不懂得有些人的财产是怎样得来的，他们也就没法理解何为不公，那么使孩子诚实的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将诚实的基础尽早建立在慷慨之上，使孩子能毫不介怀地将自己拥有或喜爱之物赠与别人。在孩子掌握语言并且有足够的理解力能形成对财产的明确概念之前，在其懂得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别人无权支配之前，就要尽早教会他们慷慨。孩子拥有的东西大多来自别人的赠与，而父母赠与的东西又占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因此孩子首先应当学会的一点就是，除了那些来自对他们所得之物有支配权之人赠与的东西，他们不得私拿或私藏任何物品。等孩子的能力得到发展之后，就可以教给他们其他关于正义的原则和事例，并告诉他们与什么是“我的”及“你的”的相关权利规则。如果不公正的行为方式在孩子身上露出了苗头，而且不是偶尔犯错，而是出于一意孤行的意志，并且温和的责备及自身的羞耻心也无法纠正这种出格、贪婪的倾向时，就必须动用更为严厉的手段。这就需要父亲或教师将某一样孩子心爱的并认为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拿走收起来，或者吩咐其他人这样做。如此一来，就能让孩子意识到，一旦他们违背正义拿了别人的东西，他们得不到一点好处，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比他们更强有力的人。不过如果能尽早小心地令孩子对这种可耻的行

为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憎，我想这一点也能够做到，那么这才算得上是防止这种恶行的真正方法，而且比任何利益的算计能更有效地防范不诚实的行为。习惯的力量比理智更为持久，也更为简便，因为当我们最应该求诸理智的时候，却很少能公正地征询理智的意见，更少服从于理智。

Section 111-120

第111-120节

111 . Crying is a fault that should not be tolerated in children; not only for the unpleasant and unbecoming noise it fills the house with, but for more considerable reasons, in reference to the children themselves; which is to be our aim in education. Their crying is of two sorts; either stubborn and domineering, or querulous and whining. (1)Their crying is very often a striving for mastery, and an open declaration of their insolence or obstinacy; when they have not the power to obtain their desire, they will, by their clamour and sobbing, maintain their title and right to it. This is an avow'd continuing their claim, and a sort of remonstrance against the oppression and injustice of those who deny them what they have a mind to.

第111节．在儿童身上，哭闹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缺点，不仅因为这会使整栋房子充斥着一种令人不快且不合时宜的噪音，而且更多出于一种对儿童自身的考虑，而后者才是我们教育的目的。哭闹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顽固不化、专横跋扈，另一种是哼哼唧唧、爱发怨气。（1）哭闹常常是一种争取控制权的手段，公开宣告他们的顽固与傲慢。当他们没有权利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时，就通过吵闹和哭泣来保持其拥有欲望的权利。这是对其要求的公开坚持，同时也是一种对压迫和不公的抗议，反抗那些不许他们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的那些人。

112 . (2)Sometimes their crying is the effect of pain, or true

sorrow, and a bemoaning themselves under it.

第112节．（2）有时候哭闹是由痛苦和真正的悲伤所引发的，儿童于是伴着痛苦与悲伤而哭泣。

These two, if carefully observ'd, may, by the mien, looks, actions, and particularly by the tone of their crying be easily distinguished; but neither of them must be suffer'd, much less encourag'd.

如果仔细观察，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可以通过神态、表情、行动、特别是孩子哭泣的腔调轻易区分开来，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不能容许的，更不能受到鼓励。

(1)The obstinate or stomachful crying should by no means be permitted, because it is but another way of flattering their desires, and encouraging those passions which 'tis our main business to subdue: and if it be, as often it is, upon the receiving any correction, it quite defeats all the good effects of it; for any chastisement which leaves them in this declar'd opposition, only serves to make them worse. The restraints and punishments laid on children are all misapply'd and lost, as far as they do not prevail over their wills, teach them to submit their passions, and make their minds supple and pliant to what their parents' reason advises them now, and so prepare them to obey what their own reason shall advise hereafter. But if in anything wherein they are cross'd, they may be suffer'd to go away crying, they confirm themselves in their desires, and cherish the ill humour, with a declaration of their right, and a

resolution to satisfy their inclination the first opportunity. This therefore is another argument against the frequent use of blows: for, whenever you come to that extremity, 'tis not enough to whip or beat them, you must do it, till you find you have subdu'd their minds, till with submission and patience they yield to the correction; which you shall best discover by their crying, and their ceasing from it upon your bidding. Without this, the beating of children is but a passionate tyranny over them; and it is mere cruelty, and not correction, to put their bodies in pain, without doing their minds any good. As this gives us a reason why children should seldom be corrected, so it also prevents their being so.For if, whenever they are chastis'd, it were done thus without passion, soberly, and yet effectually too, laying on the blows and smart not furiously, and all at once, but slowly, with reasoning between, and with observation how it wrought, stopping when it had made them pliant, penitent and yielding; they would seldom need the like punishment again, being made careful to avoid the fault that deserv'd it. Besides, by this means, as the punishment would not be lost for being too little, and not effectual, so it would be kept from being too much, if we gave off as soon as we perceiv'd that it reach'd the mind, and that was better'd. For since the chiding or beating of children should be always the least that possibly may be, that which is laid on in the heat of anger, seldom observes that measure, but is commonly more than it should be, though it prove less than enough.

（1）顽固而愤愤不平的哭闹决不能得到容许，因为一旦容许，就是以一种讨好的方式满足他们的欲望，并助长那些我们有责任加以抑制的强烈欲求。如果常常这样做，它就几乎抵消了孩子在接受惩罚的过程中得到的好处。不论何种惩罚，如果以这种公然的反抗收尾，那只会使孩子变得更坏。如果加在孩子身上的约束与惩罚无法压倒他

们的意志，无法教会他们克制自己的强烈欲望，不能令他们的心灵顺从父母根据理智为其提出的建议，使他们将来能够服从自己的理智，那么这些约束与惩罚就用错了，也白费了。但如果不论孩子在什么事情上遭到阻挠，就容许他们跑到一边哭闹，那只会使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欲求，并将坏脾气看作了不起，公然宣告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有权利并有决心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这就是另一个反对常常责打儿童的理由，因为一旦你采用了这种极端手段，单单鞭打或杖责儿童是不够的，你必须等到发现已经制服了他们的心灵，并且他们对惩罚顺从忍耐的时候才能停止，这一点你可以从他们的哭闹以及在你的命令之下停止哭闹上看得最清楚。如不以此为目的，责打儿童就不过是凭一时冲动加诸其身的暴政，是一种残酷的手段，而非纠正错误的方法，这只能令儿童的身体感到痛楚，却不能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好处。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经常惩罚儿童，同时也可以使他们免遭惩罚。如果我们在惩罚儿童时能够避免感情用事，做到冷静、高效，不在盛怒之下将棍棒和疼痛一下子统统加在孩子身上，而是一边慢慢执行，一边给孩子讲道理，同时观察惩罚的效果，当孩子软化、顺从并悔过时就要停手，当他们懂得小心避免再犯会令他们受罚的错误之后，就很少再用得着同样的惩罚了。此外，通过这种方法，既不会使惩罚因程度太轻、没有效果而白白浪费，也不会使惩罚超过限度，只要我们在观察到它已触动心灵、造成改进时就住手。训斥或责打儿童应越少越好，而盛怒之下往往难以顾及责罚的程度，常常超出了限度，而实际效果又不够。

113 . (2)Many children are apt to cry, upon any little pain they suffer, and the least harm that befalls them puts them into complaints and bawling. This few children avoid: for it being the first and natural way to declare their sufferings or wants, before they can speak, the compassion that is thought due to that tender age foolishly encourages, and continues it in them long after they can speak. 'Tis the duty, I confess, of those about children, to compassionate them, whenever they suffer any hurt; but not to

shew it in pitying them. Help and ease them the best you can, but by no means bemoan them. This softens their minds, and makes them yield to the little harms that happen to them; whereby they sink deeper into that part which alone feels, and makes larger wounds there, than otherwise they would. They should be harden'd against all sufferings, especially of the body, and have no tenderness but what rises from an ingenuous shame, and a quick sense of reputation. The many inconveniences this life is expos'd to, require we should not be too sensible of every little hurt. What our minds yield not to, makes but a slight impression, and does us but very little harm. 'Tis the suffering of our spirits that gives and continues the pain.This brawniness and insensibility of mind, is the best armour we can have against the common evils and accidents of life; and being a temper that is to be got by exercise and custom, more than any other way, the practice of it should be begun betimes; and happy is he that is taught it early. That effeminacy of spirit, which is to be prevented or cured, as nothing that I know so much increases in children as crying; so nothing, on the other side, so much checks and restrains, as their being hinder'd from that sort of complaining. In the little harms they suffer from knocks and falls, they should not be pitied for falling, but bid do so again; which besides that it stops their crying, is a better way to cure their heedlessness, and prevent their tumbling another time, than either chiding or bemoaning them. But, let the hurts they receive be what they will, stop their crying, and that will give them quieter and ease at present, and harden them for the future.

第113节．（2）许多儿童遭到一点小小的痛苦就要哭泣，受了一丁点儿伤害就哭喊抱怨。大多数儿童都这样的，因为在学会说话之前，这是他们表达痛苦与需要的最初也是最自然的方式，人们考虑到他们年幼弱小，出于同情就愚蠢地鼓励这种行为，使它一直持续到儿

童学会说话以后很久。我认为，照顾儿童的人有责任在他们遭受痛苦与伤害的时候表示同情，但不能通过怜悯将这种感情表现出来。要尽可能地帮助并安慰他们，但无论如何也不要怜悯他们。这会软化他们的意志，使他们屈服于哪怕一点小小的伤害，仿佛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有伤害，并在其中越陷越深，将其扩大化，而如果不去怜悯他们则不会这样。要让儿童坚强到能够抵御一切磨难，特别是对身体的考验，要让他们没有丝毫脆弱之处，除非这是出于真正的羞耻心或对名誉特别在意。生活中我们会遇到众多的麻烦，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对每一点小小的伤痛都过于敏感。如果我们的心灵不屈服于苦难，它的影响就会很微弱，对我们造成的伤害也只会非常轻微。只有精神上的折磨才会造成痛苦，并使痛苦延续。这种精神上的顽强与无动于衷是我们抵御常见的罪恶及生活中的不测的最好武器。这样一种性情是在训练与习惯中获得的，这比其他手段都要有效，应及早开始这方面的练习，那些早早接受训练的孩子是非常幸运的。精神上的软弱应当加以防止或医治，而没有什么比啼哭更会增加儿童的软弱。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若要遏止并抑制这种精神上的不堪一击，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阻止儿童啼哭怨诉。如果儿童因跌倒或磕磕碰碰而受了一点伤，不能因为他们栽了跟头就表示怜惜同情，而要让他们同样再做一次。与训斥及怜悯相比，这不仅能令他们停止哭泣，还能更好地治愈他们粗心大意的毛病，防止他们下次再跌跟头。不论儿童受了怎样的伤，都要让他们停止哭泣，这不仅能使他们当下就平静放松下来，还能使其以后变得更为坚强。

114 . The former sort of crying requires severity to silence it; and where a look, or a positive command will not do it, blows must: for it proceeding from pride, obstinacy, and stomach, the will, where the fault lies, must be bent, and made to comply, by a rigour sufficient to master it. But this latter being ordinarily from softness of mind, a quite contrary cause, ought to be treated with a gentler hand. Persuasion or diverting the thoughts another way, or laughing at their whining, may perhaps be at first the proper

method: but for this,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hing, and the particular temper of the child, must be considered. No certain invariablerules can be given about it; but it must be left to the prudence of the parents or tutor. But this, I think, I may say in general, that there should be a constant discountenancing of this sort of crying also; and that the father, by his authority, should always stop it, mixing a greater degree of roughness in his looks or words, proportionately as the child is of a greater age, or a sturdier temper: But always let it be enough to silence their whimpering, and put an end to the disorder.

第114节．前一种类型的哭泣需要用严厉的手段加以制止，如果一个眼神或正面发出的命令不起作用，就必须动用棍棒。因为这种哭泣源于傲慢、顽固与欲望，而意志正是错误的渊薮，因此必须使意志屈服、顺从，所用的手段也要严厉到能够主宰意志。但这后一种类型的哭泣则恰恰相反，它通常源自心灵的软弱，因此要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来对待。劝说，分散儿童的注意力，在他们哭哭啼啼时嘲笑一番，这在一开始或许都是适当的方法，但在这一点上，要考虑到事情的具体情况和儿童的特定性情。这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全在于父母和老师如何谨慎应对。不过概括而言，对这类啼哭同样要不假辞色。做父亲的要时时运用自己的权威，对其加以制止，如果儿童年龄较长、性情较刚强，那么父亲的辞色要相应地更为严厉，不过只要能制止哭泣、使儿童恢复常态就够了。

115 . Cowardice and courage are so nearly related to the fore-mention'd tempers, that it may not be amiss here to take notice of them. Fear is a passion that, if rightly governed, has its use. And though self-love seldom fails to keep it watchful and high enough in us, yet there may be an excess on the daring side; fool-hardiness and insensibility of danger being as little reasonable, as trembling

and shrinking at the approach of every little evil. Fear was given us as a monitor to quicken our industry, and keep us upon our guard against the approaches of evil; and therefore to have no apprehension of mischief at hand, not to make a just estimate of the danger, but heedlessly to run into it, be the hazard what it will, without considering of what use or consequence it may be, is not the resolution of a rational creature, but brutish fury. Those who have children of this temper, have nothing to do, but a little to awaken their reason, which self-preservation will quickly dispose them to hearken to, unless (which is usually the case) some other passion hurries them on head-long, without sense and without consideration. A dislike of evil is so natural to mankind that nobody, I think, can be without fear of it: fear being nothing but uneasiness under the apprehension of that coming upon us, which we dislike. And therefore, whenever anyone runs into danger, we may say, 'tis under the conduct of ignorance, or the command of some more imperious passion, nobody being so much an enemy to himself, as to come within the reach of evil, out of free choice, and court danger for danger's sake. If it be therefore pride, vain-glory, or rage, that silences a child's fear, or makes him not hearken to its advice, those are by fit means to be abated, that a little consideration may allay his heat, and make him bethink himself, whether this attempt be worth the venture. But this being a fault that children are not so often guilty of, I shall not be more particular in its cure. Weakness of spirit is the more common defect, and therefore will require the greater care. Fortitude is the guard and support of the other virtues; and without courage a man will scarce keep steady to his duty, and fill up the character of a truly worthy man.

第115节．懦弱和勇敢与前面提到的种种性情紧密相连，在这里

谈谈它们是十分恰当的。如果正确对待，恐惧也会是一种有用的情感。尽管利己的本能总能令我们怀有高度的畏惧，保持警惕，但我们莽撞无畏的一面也可能会泛滥。对危险毫无察觉、鲁莽冒进，正如面对每一点微小的祸害就畏缩颤抖一样，也是不合情理的。恐惧作为一种监督机制，是为了促使我们更为勤奋，并对到来的灾祸保持警惕。因此，如果一个人对近在咫尺的危害毫无畏惧，不能对危险做出合理的估计，不论风险多大都不管不顾地冲向险境，毫不考虑这有什么用处或会造成怎样的结果，那么这所体现的就不是一个理性生物的果敢，而只是兽性的冲动罢了。如果有了如此性情的孩子，除了唤醒他们的理智之外别无他法，而自我保存的本能也会很快令他们听从理智，除非（这是常有的事）有其他情感迫使他们行事草率鲁莽，丧失理智，不知三思。对灾祸的厌恶对人类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我想每个人在面对灾祸都会心怀畏惧。而畏惧之情不过是在我们所厌恶之事到来之时我们所感到的忧惧不安。因此，一旦有人冲向危险，我们或许会说，这是无知所造成的，或是因为受到某种强大情感的支配，不会有人非要和自己过不去，为了危险而追求危险，以至于有意要落入灾祸掌中。因此，如果自傲、虚荣或愤怒使儿童失去了畏惧心，或者令他不再听从畏惧心的忠告，那么就要采取适当的方法消除他的自傲、虚荣和愤怒，稍稍思考一下或许就能压住他的火气，使他自己想一想，他企图做的事是否值得冒险。不过这并不是儿童常犯的错误，我不必更细致地讨论该如何加以纠正。脆弱的心灵则是更常见的缺点，因此应得到更多关注。坚毅是其他美德的保障和基础，如果没有勇气，一个人很难坚定不移地履行义务，也很难拥有一个可敬之人的品性。

Courage, that makes us bear up against dangers that we fear and evils that we feel, is of great use in an estate, as ours is in this life, expos'd to assaults on all hands: and therefore it is very advisable to get children into this armour as early as we can. Natural temper, I confess, does here a great deal: but even where that is defective, and the heart is in itself weak and timorous, it

may, by a right management, be brought to a better resolution. What is to be done to prevent breaking children's spirits by frightful apprehensions instill'd into them when young, or bemoaning themselves under every little suffering, I have already taken notice; how to harden their tempers, and raise their courage, if we find them too much subject to fear, is farther to be consider'd.

勇气使我们能够抵御畏惧的危险以及感到的灾殃，对于我们人生中四面受敌的状况，勇气能产生极大的作用，因此极有必要让儿童尽早获得这一武器。我承认，天性在此占了很大的比重，但即使天生性格有缺陷，心灵自身软弱怯懦，但只要管教得法，仍有可能将其塑造得更为果敢。关于如何防止在儿童年幼时将骇人的恐惧注入他们心灵，摧折他们的精神，或者如何避免在他们受到一点小小的伤害时就表示出怜悯，我已经都注意到了；至于下面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我们发现儿童过多地感到恐惧，要如何使他们性格变得坚强，并提升他们的勇气。

True fortitude, I take to be the quiet possession of a man's self, and an undisturb'd doing his duty, whatever evil besets, or danger lies in his way. This there are so few men attain to, that we are not to expect it from children. But yet something may be done: and a wise conduct by insensible degrees may carry them farther than one expects.

在我看来，真正的坚强就是不论有怎样的灾祸困扰、危险挡道，一个人都能冷静地控制自己，毫不动摇地履行职责。很少有人能达到这种境界，我们也别指望儿童能够做到。但有些事或许还是能够做到的：循序渐进的合理引导能让儿童的进步超出想象。

The neglect of this great care of them, whilst they are young, is the reason, perhaps, why there are so few that have this virtue in its full latitude when they are men. I should not say this in a nation so naturally brave, as ours is, did I think that true fortitude required nothing but courage in the field, and contempt of life in the face of an enemy. This, I confess, is not the least part of it, nor can be denied the laurels and honours always justly due to the valour of those who venture their lives for their country. But yet this is not all. Dangers attack us in other places besides the field of battle; and though death is the king of terrors, yet pain, disgrace and poverty, have frightful looks, able to discompose most men whom they seem ready to seize on: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contemn some of these, and yet are heartily frighted with the other. True fortitude is prepar'd for dangers of all kinds, and unmoved, whatsoever evil it be that threatens. I do not mean unmoved with any fear at all. Where danger shews itself, apprehension cannot, without stupidity, be wanting; where danger is, sense of danger should be; and so much fear as should keep us awake, and excite our attention, industry, and vigour; but not disturb the calm use of our reason, nor hinder the execution of what that dictates.

在儿童年幼时忽视他们这一重要方面的培养，或许就是他们成人之后很少充分拥有这一美德的原因。如果我认为真正的坚强只是要求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在面对敌人时看轻生死，那么对于像我们这样天生勇敢的民族，我原不该说这些。我承认，这对于坚韧的美德并非无关紧要，我也不能否认，那些为了国家舍生忘死的英勇之士理所当然应当获得荣誉与桂冠，但这并非全部。除了在战场上，危险也在其他地方攻击我们。尽管一切可怖之事中以死亡为最，但痛苦、羞辱和贫穷也有着骇人的面孔，一旦上身就能让大多数人失去常态、心生烦恼。有人或许能够对其中一些事嗤之以鼻，但却被另一些事所吓倒。真正的坚强则是为一切危险做好准备，不论受到什么灾祸的威胁都能

不为所动。我不是说不为所动就丝毫不感到恐惧。当危险来临，除非是感觉迟钝，否则不可能不感到忧虑。有了危险就要意识到危险，同时感受到相应的恐惧以使我们保持清醒，注意力集中，精力充沛，随时准备行动。但不可让忧虑干扰理智的冷静运作，或妨碍我们去做理智所吩咐之事。

The first step to get this noble and manly steadiness, is, what I have above mentioned, carefully to keep children from frights of all kinds, when they are young. Let not any fearful apprehensions be talk'd into them, nor terrible objects surprise them. This often so shatters and discomposes the spirits, that they never recover it again; but during their whole life, upon the first suggestion or appearance of any terrifying idea, are scatter'd and confounded; the body is enervated, and the mind disturb'd, and the man scarce himself, or capable of any composed or rational action. Whether this be from an habitual motion of the animal spirits, introduc'd by the first strong impression, or from the alter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by some more unaccountable way, this is certain, that so it is. Instances of such who in a weak timorous mind, have borne, all their whole lives through, the effects of a fright when they were young, are everywhere to be seen, and therefore as much as may be to be prevented.

若要获得这种高贵而富于男子气概的坚定不移的品格，第一步就是像我上面提到的那样，极力让儿童在年幼避免受到一切惊吓。不要和他们谈及任何可怖之事，也不要让任何骇人的东西吓着他们。这些常常会使他们的精神受到震荡与搅扰，以至再也无法从中恢复。他们一生之中，只要听人提及或脑海中浮现出任何骇人的想法，就会惊慌失措、魂飞魄散，于是身体衰弱，心灵不宁，一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也无法做出任何冷静而理智的举动了。不论这是因为第一次强烈印象

造成了气血的习惯性运行，还是因为某种不明原因导致了体质上的变化，但事实是确定无疑的。精神脆弱之人儿时受到一次惊吓，终其一生都要承担他所造成的后果，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因此要尽可能地防患于未然。

The next thing is by gentle degrees to accustom children to those things they are too much afraid of. But here great caution is to be used, that you do not make too much haste, nor attempt this cure too early, for fear lest you increase the mischief instead of remedying it. Little ones in arms may be easily kept out of the way of terrifying objects, and till they can talk and understand what is said to them, are scarce capable of that reasoning and discourse which should be used to let them know there is no harm in those frightful objects, which we would make them familiar with, and do, to that purpose by gentle degrees bring nearer and nearer to them. And therefore 'tis seldom there is need of any application to them of this kind, till after they can run about and talk. But yet, if it should happen that infants should have taken offence at anything which cannot be easily kept out of their way, and that they shew marks of terror as often as it comes in sight; all the allays of fright, by diverting their thoughts, or mixing pleasant and agreeable appearances with it, must be used, till it be grown familiar and inoffensive to them.

下一步就是要循序渐进地使儿童习惯那些他们特别害怕的事物。不过这里要格外小心的是切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可为之过早，否则非但不能治愈这个毛病，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危害。让怀抱中的婴儿远离那些可怖的事物或许并不难，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这些吓人的事物本身无害，但在他们学会说话并听懂对他们说的话之前，他们很少能理解我们所说的这个道理，我们要让他们熟悉这些事物，并一点一点地

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在他们学会说话并满地跑之前，基本无需用到这类方法。但如果有些东西很难不让婴儿瞧见，他们却对其表示厌恶，一看见就流露出恐惧之色，那么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也好，用可爱的外表装点这些事物也好，总之要不遗余力地缓和这种恐惧，直到婴儿熟悉了这些事物，对其不再厌憎为止。

I think we may observe, that, when children are first born, all objects of sight that do not hurt the eyes, are indifferent to them; and they are no more afraid of a blackamoor or a lion, than of their nurse or a cat. What is it then, that afterwards, in certain mixtures of shape and colour, comes to affright them? Nothing but the apprehensions of harm that accompanies those things.Did a child suck every day a new nurse, I make account it would be no more affrighted with the change of faces at six months old, than at sixty. The reason then why it will not come to a stranger, is, because having been accustomed to receive its food and kind usage only from one or two that are about it, the child apprehends, by coming into the arms of a stranger, the being taken from what delights and feeds it and every moment supplies its wants, which it often feels, and therefore fears when the nurse is away.

我想，或许可以说，当婴儿初临人世之时，所有事物只要不伤害眼睛，对他们而言没什么区别，与保姆及猫咪相比，黑奴和狮子不会令他们更加害怕。那么为什么后来他们会对具有某种形状和色彩的东西感到恐惧？不是因为别的，他们只是害怕伴随这些事物而来的伤害。如果每天换一个保姆给婴儿喂奶，我敢说他们六个月时就不会比五岁时更害怕生面孔。婴儿不愿接近生人，只是因为习惯了从一两个常在其身边的人手中获得食物与宠爱，一旦进入生人的怀抱，婴儿就会感到害怕，怕失去那些喂他吃饱、使他快乐、时刻满足他需要的东西，因此保姆离开时他们就会不安。

The only thing we naturally are afraid of is pain, or loss of pleasure. And because these are not annexed to any shape, colour, or size of visible objects, we are frighted with none of them, till either we have felt pain from them, or have notions put into us that they will do us harm. The pleasant brightness and lustre of flame and fire so delights children, that at first they always desire to be handling of it: but when constant experience has convinced them, by the exquisite pain it has put them to, how cruel and unmerciful it is, they are afraid to touch it, and carefully avoid it. This being the ground of fear, 'tis not hard to find whence it arises, and how it is to be cured in all mistaken objects of terror.And when the mind is confirm'd against them, and has got a mastery over itself and its usual fears in lighter occasions, it is in good preparation to meet more real dangers. Your child shrieks, and runs away at the sight of a frog; let another catch it, and lay it down at a good distance from him: at first accustom him to look upon it; when he can do that, then to come nearer to it, and see it leap without emotion; then to touch it lightly, when it is held fast in another's hand; and so on, till he can come to handle it as confidently as a butterfly or a sparrow. By the same way any other vain terrors may be remov'd; if care be taken, that you go not too fast, and push not the child on to a new degree of assurance, till he be thoroughly confirm'd in the former. And thus the young soldier is to be train'd on to the warfare of life; wherein care is to be taken, that more things be not represented as dangerous than really are so; and then, that whatever you observe him to be more frighten'd at than he should, you be sure to tole him on to by insensible degrees, till he at last, quitting his fears, masters the difficulty, and comes off with applause. Successes of this kind, often repeated, will make him find, that evils are not always so certain or as great as our fears represent them; and that the way to avoid them, is not to run away, or be discompos'd, dejected, and

deterr'd by fear, where either our credit or duty requires us to go on.

我们天生害怕的只有遭受痛苦或丧失快乐。由于这些不附着于任何可见之物的形状、色彩或体量之上，因此在它们给我们带来痛苦、或有人让我们意识到它们会给我们造成伤害之前，我们不会害怕任何事物。火的那令人愉悦的明亮与光彩特别惹儿童喜爱，因此他们一开始总是想要用手触摸火焰，不过一旦他们体验到火烧的剧烈疼痛，而反复的经验也告诉他们火的残酷无情，他们就不敢再碰它，而是小心地避开了。这就是产生恐惧的依据，这就不难发现它从何而来，以及对于那些不应令人害怕的事物，要如何消除儿童对它们的惧怕之情。当心灵确定不再害怕这些事物，同时能够掌控自己，超越那些轻微而寻常的恐惧，那这正是为面对真正的危险做好了准备。如果你的孩子看见一只青蛙就尖叫然后跑开，那就让人抓住青蛙，并在离孩子很远的地方将它放下来：首先要让孩子看惯青蛙；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就让他接近青蛙，看着它跳跃而无动于衷；然后让另一个人紧紧抓住青蛙，叫孩子轻轻触摸；就这样，直到孩子能像对待一只蝴蝶或麻雀那样把握十足地逗弄青蛙为止。通过同样的方式可以消除其他任何毫无必要的恐惧，只要小心行事，不要操之过急，也不要在孩子完全克服了一种恐惧之前就又去逼迫他建立新的自信。年轻的战士就是通过这样的训练走上了人生的战场。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真正危险的事物，不要让更多的事物显得危险。不论你发现他对什么事物表现出不应有的恐惧，都要不知不觉地加以诱导，直到他们最终克服恐惧，战胜困难，受到称赞。像这样成功多次之后，他就会发现灾祸并不总像我们的恐惧所描绘的那样严重或确定无疑。避免灾祸的方法不是逃避，也不是烦恼沮丧，并让恐惧吓倒，无论是名誉还是职责都要求我们勇往直前。

But since the great foundation of fear in children is pain, the way to harden and fortify children against fear and danger is to

accustom them to suffer pain. This 'tis possible will be thought, by kind parents, a very unnatural thing towards their children; and by most, unreasonable, to endeavour to reconcile any one to the sense of pain, by bringing it upon him. 'Twill be said: 'It may perhaps give the child an aversion for him that makes him suffer; but can never recommend to him suffering itself. This is a strange method. You will not have children whipp'd and punish'd for their faults, but you would have them tormented for doing well, or for tormenting sake. ' I doubt not but such objections as these will be made, and I shall be thought inconsistent with myself, or fantastical, in proposing it. I confess, it is a thing to be managed with great discretion, and therefore it falls not out amiss, that it will not be receiv'd or relish'd, but by those who consider well, and look into the reason of things. I would not have children much beaten for their faults, because I would not have them think bodily pain the greatest punishment: and I would have them, when they do well, be sometimes put in pain,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they might be accustom'd to bear it, without looking on it as the greatest evil. How much education may reconcile young people to pain and sufferance, the examples of Sparta do sufficiently shew : and they who have once brought themselves not to think bodily pain the greatest of evils, or that which they ought to stand most in fear of, have made no small advance towards virtue. But I am not so foolish to propose the Lacedaemonian discipline in our age or constitution. But yet I do say, that inuring children gently to suffer some degrees of pain without shrinking, is a way to gain firmness to their minds,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courage and resolution in the future part of their lives.

不过既然儿童恐惧的最大根源在于痛苦，那么要让儿童在恐惧和危险面前变得坚强有力，就要令他们对受苦习以为常。慈爱的父母很

可能认为这对于他们的孩子是件有违自然的事情；而于大多数人而言，为了要让一个人接受痛苦而让他遭受痛苦也是不合情理的。人们会说："这可能会让孩子讨厌那令他遭受痛苦的人，而绝不会让他心甘情愿地接受痛苦本身。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方法，你不让孩子因为犯错而挨打受罚，却因为他表现好而使他受苦，或让他为受苦而受苦。"我毫不怀疑这会遭到类似的反对，以及我提出这样的观点会被认为是自相矛盾、异想天开。我承认，做这件事需极为谨慎，这样就不会造成不当的后果，只有那些深思熟虑、探究事物背后原因的人才会接受或欣赏这种方法。我不希望孩子因为犯错而过多地受到责打，因为我不希望他们认为肉体上的疼痛就是最大的惩罚；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会让他们在表现好的时候偶尔吃点苦头，这样他们就会习惯于忍受痛苦，而不将其看作最大的灾难。斯巴达人的例子充分展现出教育在多大程度上能令年轻人习惯于痛苦和忍耐。那些不将肉体的痛苦看作最大的灾祸、不将其视为最应惧怕之物的人，他们在美德方面都取得了非同小可的进步。不过我还没有愚蠢到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和体制之下推行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但我确实要说，让孩子慢慢习惯于某种程度的痛苦而不退缩，是一种令他们精神顽强的方法，这为他们在今后的人生中成为坚毅勇敢之人打下了基础。

Not to bemoan them, or permit them to bemoan themselves, on every little pain they suffer, is the first step to be made. But of this I have spoken elsewhere.

不要在儿童每遭受一点小小的痛苦时就怜悯他们，或容许他们自哀自怜，这就是所要做的第一步。关于这一点，我已在别处说过了。

The next thing is, sometimes designedly to put them in pain: but care must be taken that this be done when the child is in good humour, and satisfied of the good-will and kindness of him that

hurts him, at the time that he does it. There must no marks of anger or displeasure on the one side, nor compassion or repenting on the other, go along with it: and it must be sure to be no more than the child can bear without repining or taking it amiss, or for a punishment. Managed by these degrees, and with such circumstances, I have seen a child run away laughing with good smart blows of a wand on his back, who would have cried for an unkind word, and have been very sensible of the chastisement of a cold look, from the same person. Satisfy a child by a constant course of your care and kindness, that you perfectly love him, and he may by degrees be accustom'd to bear very painful and rough usage from you, without flinching or complaining: and this we see children do every day in play one with another. The softer you find your child is, the more you are to seek occasions, at fit times, thus to harden him. The great art in this is, to begin with what is but very little painful, and to proceed by insensible degrees, when you are playing, and in good humour with him, and speaking well of him: and when you have once got him to think himself made amends for his suffering by the praise is given him for his courage; when he can take a pride in giving such marks of his manliness, and can prefer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brave and stout, to the avoiding a little pain, or the shrinking under it; you need not despair in time and by the assistance of his growing reason, to master his timorousness, and mend the weakness of his constitution. As he grows bigger, he is to be set upon bolder attempts than his natural temper carries him to; and whenever he is observ'd to flinch from what one has reason to think he would come off well in, if he had but courage to undertake, that he should be assisted in at first, and by degrees sham'd to, till at last practice has given more assurance, and with it a mastery; which must be rewarded with great praise, and the good opinion of others, for his performance. When by these steps he has got resolution enough not to be deterr'd from what he

ought to do, by the apprehension of danger; when fear does not, in sudden or hazardous occurrences, discompose his mind, set his body a-trembling, and make him unfit for action, or run away from it, he has then the courage of a rational creature: and such an hardiness we should endeavour by custom and use to bring children to, as proper occasions come in our way.

第二步，要时不时地有意让孩子吃点苦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要趁孩子心情愉快的时候，同时要让他确信那给他带来痛苦的人在这样做的时候是怀着善意的。在施行的时候，一方不可显示出愤怒或不悦，另一方也不可表现出怜悯或后悔。同时要确保痛苦不可超出孩子能够忍受的程度，以至遭到的他的怨恨或误解，或将其视为一种惩罚。在这样的条件下适度而行，我就知道一个孩子在背上挨了棍棒几下重打之后依然笑嘻嘻地跑开。而同样是他，在平时会为了几句重话就哭起来，别人若给他一个冷眼当作惩罚，他也能觉察到。要不断地给予孩子疼爱及照顾，让他知道你全心全意地爱着他，这样他就会逐渐习惯于忍受你给他带来的痛苦以及你严厉的对待，而不会畏缩或埋怨。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每天玩耍时彼此间都是如此对待的。你的孩子越软弱，就越要寻找机会，在适当的时候磨炼他。诀窍在于，要从痛苦最小的考验开始，要选择你们一起玩得高兴的时候，在你表扬他的时候去施行，不知不觉，循序渐进。一旦你让他明白他因表现勇敢而得到的赞扬足以抵消他所遭受的痛苦，一旦他为这种具有男子汉气概的表现而感到自豪，情愿拥有勇敢和坚强的美名，而不是逃避哪怕一点小小的痛苦或在其面前畏缩不前之后，再加上他的理智不断增长，你就无需担心最后无法战胜他的怯懦，无法改变他脆弱的本性了。随着孩子年岁的增长，就要促使他去做其天性令其不敢为的勇敢的事情。如果有些事但凡他有勇气就能承担，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能做好，却发现他畏缩不前时，一开始可以给予他帮助，进而让他因羞愧而向前，直到最后他因不断练习而拥有自信，并能将事情做好为止。他的表现必须得到极大的赞赏及别人的好评作为奖励。通过这些步骤，孩子就会足够勇敢，不会因为惧怕危险而在应做的事面前止步

不前。遇见突发或危险的事情时，不会因恐惧而心神不安、身体颤抖，以至不知所措或转身逃跑，这样他就具备了一个理性生物所应拥有的勇气。在适当的时机到来时，我们应努力使儿童在习惯与练习中获得这种坚毅的品质。

116 . One thing I have frequently observ'd in children, that when they have got possession of any poor creature, they are apt to use it ill: they often torment, and treat very roughly, young birds, butterflies, and such other poor animals which fall into their hands, and that with a seeming kind of pleasure. This I think should be watched in them, and if they incline to any such cruelty, they should be taught to contrary usage. For the custom of tormenting and killing of beasts, will, by degrees, harden their minds even towards men; and they who delight in the suffering and destruction of inferior creatures, will not be apt to be very compassionate or benign to those of their own kind.Our practice takes notice of this in the exclusion of butchers from juries of life and death. Children should from the beginning be bred up in an abhorrence of killing or tormenting any living creature; and be taught not to spoil or destroy any thing, unless it be for the preservation or advantage of some other that is nobler. And truly, if the preservation of all mankind, as much as in him lies, were every one's persuasion, as indeed it is every one's duty, and the true principle to regulate our religion, politics and morality by, the world would be much quieter, and better natur'd than it is. But to return to our present business; I cannot but commend both the kindness and prudence of a mother I knew, who was won't always to indulge her daughters, when any of them desired dogs, squirrels, birds, or any such things as young girls use to be delighted with: but then, when they had them, they must be sure to keep them well, and look diligently after them, that they wanted nothing, or were not ill-used. For if they were negligent in

their care of them, it was counted a great fault, which often forfeited their possession, or at least they fail'd not to be rebuked for it; whereby they were early taught diligence and good nature. And indeed, I think people should be accustomed, from their cradles, to be tender to all sensible creatures, and to spoil or waste nothing at all.

第116节．我常常在孩子身上观察到的一种情况：当他们得到任何弱小的动物，就会有虐待它们的倾向：孩子经常会折磨并粗暴地对待小鸟、蝴蝶以及此类落入他们掌中的可怜的小生命，并似乎引以为乐。在孩子身上需特别注意这一点，如果他们倾向于此类残忍的举动，就要教导他们怎样以相反的方式行事。虐待和残杀动物的习惯会使孩子对人的心肠也逐渐变硬，那些以弱小动物的痛苦和毁灭为乐的人，通常也不会对他的同类宽厚仁慈、富于同情心。我们在实践中禁止屠夫加入陪审团评判生死，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从一开始，就要培养孩子，使其对任何虐杀动物的行为产生厌憎，同时教导他们不要破坏或损毁任何东西，除非是为了保存某种更高贵的生物或使其从中受益。毫无疑问，保存整个人类是每个人的职责，也是调节我们的宗教、法律和道德的真正准则，如果每个人都以此为信念，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比现在更为安宁和谐。还是回到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我认识一位母亲，我不得不称赞她的仁慈与慎重，当她的女儿中有人想要小狗、松鼠、小鸟或此类年轻女孩常会喜欢的小动物时，她总是如其所愿，但当孩子们得到小动物之后，她们必须保证善待它们，悉心照料，不使它们有所匮乏或遭到虐待。如果她们没有用心照料，就会被视为犯了大错，她们所拥有的小动物也常常因此遭到没收，或至少难逃一顿训斥，这样一来她们很早就学会要勤勉仁慈。确实是这样，我认为人们应该从在摇篮中起就养成习惯，善待一切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体，对任何东西都不能毁损或挥霍。

This delight they take in doing of mischief, whereby I mean

spoiling of anything to no purpose, but more especially the pleasure they take to put anything in pain, that is capable of it; I cannot persuade myself to be any other than a foreign and introduced disposition, an habit borrowed from custom and conversation. People teach children to strike, and laugh when they hurt or see harm come to others: and they have the examples of most about them, to confirm them in it. All the entertainment and talk of history is nothing almost but fighting and killing: and the honour and renown that is bestowed on conquerors (who for the most part are but the great butchers of mankind) farther mislead growing youth, who by this means come to think slaughter the laudable business of mankind, and the most heroic of virtues. By these steps unnatural cruelty is planted in us; and what humanity abhors, custom reconciles and recommends to us, by laying it in the way to honour. Thus, by fashion and opinion that comes to be a pleasure, which in itself neither is, nor can be any. This ought carefully to be watched, and early remedied; so as to settle and cherish the contrary and more natural temper of benignity and compassion in the room of it; but still by the same gentle methods which are to be applied to the other two faults before mention'd. It may not perhaps be unreasonable here to add this farther caution, viz., That the mischiefs or harms that come by play, inadvertency, or ignorance, and were not known to be harms, or design'd for mischief's sake, though they may perhaps be sometimes of considerable damage, yet are not at all, or but very gently, to be taken notice of. For this, I think, I cannot too often inculcate, that whatever miscarriage a child is guilty of, and whatever be the consequence of it, the thing to be regarded in taking notice of it, is only what root it springs from, and what habit it is like to establish: and to that the correction ought to be directed, and the child not to suffer any punishment for any harm which may have come by his play or inadvertency. The faults to be amended lie in the mind; and if they

are such as either age will cure, or no ill habits will follow from, the present action, whatever displeasing circumstances it may have, is to be passed by without any animadversion.

孩子从搞破坏中得到的乐趣，我指的是无目的地损坏东西，特别是以让那些有感知力的东西感到痛苦为乐，我不得不使自己相信这不是一种本质的而是后天习得的性情，是一种在习俗与人际交往中养成的习惯。人们常常教孩子打人，当看见他们打痛了别人或给人带来伤害时便哈哈大笑。孩子身边也不乏类似的榜样，这就更加深了他们的习惯。一切娱乐活动以及关于历史的叙述几乎都是关于战斗与杀戮，征服者（多半只是涂炭生灵的大屠夫）所获得的荣耀和声名更进一步误导了成长中的年轻人，使他们认为杀戮是人类值得赞美的事业，是最具有英雄气概的美德。这样一来，违反自然的残忍习性就在我们身上生根发芽，那些人道所憎恶的品性、习俗却被视为通往荣耀的途径，从而使我们接受它并劝告我们照此而行。于是，风尚与舆论使其成为了一件快意之事，而其本身既无快乐可言，也不会变成快乐。需特别留心这种残忍的习性，并尽早加以医治，从而将与此相反的、善良而富于同情心的自然天性培养起来，将它取而代之。不过这一过程也要循序渐进，就和我们纠正前面提到的那两种错误所用的方法一样。说到这里，还有另一件事需要提醒，这也许并非不合情理，那就是如果孩子出于疏忽或无知在玩耍中做了坏事或造成了伤害，而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伤害，也不是为作恶而作恶，那么尽管有时候造成的伤害很严重，也不必对此特别注意，或稍稍关注一下即可。就这一点，我想我说多少次也不为多，不论孩子犯了什么错误，不论这个错误造成了多严重的后果，唯一需要注意的是错误的根源以及它所能导致的习惯。惩罚需着眼于这一点，孩子不应为了任何玩耍时或无心造成的伤害而遭受惩罚。唯有根植于心灵中的缺陷才需要纠正，如果某些缺点随着年岁的增长就能治愈，或不会导致恶习的养成，那么不论它们怎样令人不快，都可以不予理睬，无需加以指责。

117 . Another way to instill sentiments of humanity, and to keep them lively in young folks, will be, to accustom them to civility in their language and deportment towards their inferiors and the meaner sort of people, particularly servants. It is not unusual to observe the children in gentlemen's families treat the servants of the house with domineering words, names of contempt, and an imperious carriage; as if they were of another race and species beneath them. Whether ill example, the advantage of fortune, or their natural vanity, inspire this haughtiness, it should be prevented, or weeded out; and a gentle, courteous, affable carriage towards the lower ranks of men, placed in the room of it. No part of their superiority will be hereby lost; but the distinction increased, and their authority strengthen'd; when love in inferiors is join'd to outward respect, and an esteem of the person has a share in their submission: and domestics will pay a more ready and cheerfulservice, when they find themselves not spurn'd because fortune has laid them below the level of others at their master's feet. Children should not be suffer'd to lose the consideration of human nature in the shufflings of outward conditions. The more they have, the better humor'd they should be taught to be, and the more compassionate and gentle to those of their brethren who are placed lower, and have scantier portions. If they are suffer'd from their cradles to treat men ill and rudely, because, by their father's title, they think they have a little power over them, at best it is ill-bred; and if care be not taken, will by degrees nurse up their natural pride into an habitual contempt of those beneath them. And where will that probably end but in oppression and cruelty?

第117节．还有一种使仁爱之心扎根并活跃于年轻人心中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在面对地位低下人和卑贱的人，尤其是仆人时，也要在言谈举止上以礼相待。绅士家的孩子对待家中的仆人言辞傲慢、颐

指气使并非什么稀奇的事情，仿佛仆人生来就低他们一等。不管是坏的榜样、财富的优势还是天生的虚荣，凡是引起这种傲慢无礼态度的因素，都应当严加防范或者移除，并代之以对待下人时的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这样做非但不会有损反而有助于加强权威和巩固威信。如果能爱护下人，表现尊重，让他们服从的同时不失尊严，那么仆人们就会更加主动和愉悦地尽职尽责，因为他们并没有因为生活所迫服侍主人而感到低人一等。儿童不能因为外在的财富而忽略人性。物质越丰厚，就越要教会他们充满同情和礼貌地对待那些地位低于自己、物质匮乏的同胞。如果他们从呱呱坠地起，就因为父亲的头衔，以为自己对他人有控制的权力，而粗鲁恶劣地对待别人，那么这最多算是缺乏教养。如果不小心加以改正，就会让这种与生俱来的傲慢变成习惯性地蔑视地位低于自己的人。如此一来，这怎么可能最终不发展成为压迫和残忍呢？

118．Curiosity in children (which I had occasion just to mention Section 108) is but an appetite after knowledge; and therefore ought to be encouraged in them, not only as a good sign, but as the great instrument nature has provided to remove that ignorance they were born with; and which, without this busy inquisitiveness, will make them dull and useless creatures. The ways to encourage it, and keep it active and busy, are, I suppose, these following:

第118节．儿童的好奇心（我在第108节提到过）是一种追求知识的欲望，因此应当加以鼓励。这不单要作为一种好的迹象加以鼓励，而且既然无知与生俱来，自然便提供了这种消除无知的伟大工具。如果没有这份追根究底的好奇，人就会变成蠢笨无用的生物。我认为鼓励和保持好奇心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Not to check or discountenance any enquiries he shall make, nor suffer them to be laugh'd at; but to answer all his questions, and explain the matter he desires to know, so as to make them as much intelligible to him as suits the capacity of his age and knowledge. But confound not his understanding with explications or notions that are above it; or with the variety or number of things that are not to his present purpose. Mark what 'tis his mind aims at in the question, and not what words he expresses it in: and when you have informed and satisfied him in that, you shall see how his thoughts will enlarge themselves, and how by fit answers he may be led on farther than perhaps you could imagine. For knowledge is grateful to the understanding, as light to the eyes: children are pleased and delighted with it exceedingly, especially if they see that their enquiries are regarded, and that their desire of knowing is encouraged and commended. And I doubt not but one great reason why many children abandon themselves wholly to silly sports, and trifle away all their time insipidly, is, because they have found their curiosity baulk'd, and their enquiries neglected. But had they been treated with more kindness and respect, and their questions answered, as they should, to their satisfaction; I doubt not but they would have taken more pleasure in learning, and improving their knowledge, wherein there would be still newness and variety, which is what they are delighted with, than in returning over and over to the same play and play-things.

（1）不要阻拦或看不起儿童提出的任何问题，也不能冷嘲热讽，而是统统给予解答，向他解释感兴趣的事物，让他在自己的年纪和能力范围内能够理解。但阐述和运用概念时不可超出其理解范围，跟当时目的无关的事情也不要去谈，这样反而会让他无所适从。要注意的是他为什么提问，而不是他所用的语言。如果你解释得清楚，叫他满意，就会看到他的思想会怎样举一反三，以及恰当的回答如何能

引发比你能想到的更深远的思考。因为知识要依靠理解才能体现价值，正如光线要依赖眼睛：儿童因此而获得极大的愉悦，尤其是发现他们的提问得到了重视，求知欲受到了鼓舞和称赞。我坚信很多儿童放弃思考转向不动脑筋的游艺，把时间全都消磨在上面，正是因为好奇心受挫，提出的问题被忽视。若是能更和善地对待他们，重视他们，回答问题，让他们满意，我相信他们一定能从学习和增长知识中找到更多的乐趣。这一过程又会带给他们喜欢的新鲜感和变化，而不再会一再地重复同样的游戏，在同样的玩具上消磨时间了。

119．(2)To this serious answering their questions, and informing their understandings, in what they desire, as if it were a matter that needed it, should be added some peculiar ways of commendation. Let others whom they esteem, be told before their faces of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in such and such things; and since we are all, even from our cradles, vain and proud creatures, let their vanity be flatter'd with things that will do them good; and let their pride set them on work on something which may turn to their advantage. Upon this ground you shall find, that there cannot be a greater spur to the attaining what you would have the eldest learn, and know himself, than to set him upon teaching it his younger brothers and sisters.

第119节．（2）为了认真回答儿童的问题，使他们理解，并将其作为必要之事，满足他们的意愿，还要特别补充几种方式。比如当着儿童的面，告诉他们所敬重的人，他们在这件或那件事情上已经掌握了知识，因为我们所有人从出生开始就是爱虚荣要面子的，所以不如用对他们有益的东西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让骄傲推动他们去学习那些对他们有所帮助的事情上。基于同样的原因，你会发现，要让最大的孩子学习并掌握你希望他获得的知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把知识教给他的弟弟妹妹。

120 . (3)As children's enquiries are not to be slighted; so also great care is to be taken, that they never receive deceitful and eluding answers. They easily perceive when they are slighted or deceived; and quickly learn the trick of neglect, dissimulation and falsehood, which they observe others to make use of. We are not to intrench upon truth in any conversation, but least of all with children; since if we play false with them, we not only deceive their expectation, and hinder their knowledge, but corrupt their innocence, and teach them the worst of vices. They are travellers newly arrived in a strange country, of which they know nothing; we should therefore make conscience not to mislead them. And though their questions seem sometimes not very material, yet they should be seriously answer'd; for however they may appear to us (to whom they are long since known) enquiries not worth the making; they are of moment to those who are wholly ignorant. Children are strangers to all we are acquainted with; and all the things they meet with, are at first unknown to them, as they once were to us: and happy are they who meet with civil people, that will comply with their ignorance, and help them to get out of it.

第120节．（3）一方面儿童的问题不可怠慢必须解答，一方面要特别留意回答时绝不可弄虚作假或者闪烁其词。受到怠慢和欺骗时，儿童是很容易就能察觉的。而且看到他人这么去做，他们很快就会学会忽视、虚伪和说谎的伎俩。我们在任何交谈中都不能说假话，对待儿童更是如此。因为如果我们欺骗他们，不光是辜负了他们的期待，阻碍了他们的知识，也玷污了他们的天真，教会了他们最坏的恶习。儿童是来到陌生国度的旅客，对这里一无所知，因此我们要本着良心，不可误导了他们。尽管他们提出的问题有时未必很重要，但也要认真回答。因为无论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早就知道）这些问题多么无关紧要，但它们对于一无所知的人就很重要。所有我们习以为常

的事物，儿童都会感到陌生。他们对遇到的所有事物，最初总是不了解的，就像我们当初一样。如果能遇上有识之士，根据他们欠缺的知识，帮他们摆脱无知，那么儿童就会感到快乐。

If you or I now should be set down in Japan, with all our prudence and knowledge about us, a conceit whereof makes us, perhaps, so apt to slight the thoughts and enquiries of children; should we, I say, be set down in Japan, we should, no doubt (if we would inform ourselves of what is there to be known) ask a thousand questions, which, to a supercilious or inconsiderate Japanese, would seem very idle and impertinent; though to us they would be very material and of importance to be resolved; and we should be glad to find a man so complaisant and courteous, as to satisfy our demands, and instruct our ignorance.

如果你我现在去日本，凭借我们的判断力和见识，带着一点自负，或许我们很容易因为这种自负而怠慢了儿童的想法和问题，但是我说，如果在日本，我们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当地的情况）会提出一千个问题来。而这些问题，在一个傲慢无礼的日本人眼里，恐怕显得无足轻重，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能碰上一个彬彬有礼的人，解答我们的疑问，帮我们摆脱无知，那我们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When any new thing comes in their way, children usually ask the common question of a stranger: What is it? Whereby they ordinarily mean nothing but the name; and therefore to tell them how it is call'd, is usually the proper answer to that demand. And the next question usually is, What is it for? And to this it should be answered truly and directly. The use of the thing should be told,

and the way explained, how it serves to such a purpose, as far as their capacities can comprehend it. And so of any other circumstances they shall ask about it; not turning them going, till you have given them all the satisfaction they are capable of; and so leading them by your answers into farther questions. And perhaps to a grown man, such conversation will not be altogether so idle and insignificant as we are apt to imagine. The native and untaught suggestions of inquisitive children do often offer things, that may set a considering man's thoughts on work. And I think there is frequently more to be learn'd from the unexpected questions of a child, than the discourses of men, who talk in a road, according to the notions they have borrowed, and the prejudices of their education.

看到新鲜的事物，儿童通常会像陌生人一样提问：这是什么？一般来说，这时他们只是想知道这个事物叫什么名字，因此告诉他叫什么通常就可以满足要求了。接下来的问题常常是，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回答这个问题则要真实和直接。要在儿童可以理解的能力范围内，根据需要向他们解释用途和用法。儿童提出其他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根据他们的理解力给出让他们满意的答案，然后才叫他们走开，这样就能让他们借助你的答案提出更多的问题。这种对话对于成年人来说，也并非像我们可能以为的那样，全然是无聊和无意义的。好奇的儿童提出那些天真的、自发的建议，常常能够引发爱动脑筋的大人的思考。我认为从儿童提出的那些出乎意料的问题中，常常有更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不像成年人的对话，往往借用一些概念，并因受到教化而带有偏见，所以总是限定在一个路数中。

Section 121-130

第121-130节

121．(4)Perhaps it may not sometimes be amiss to excite their curiosity by bringing strange and new things in their way, on purpose to engage their enquiry, and give them occasion to inform themselves about them and if by chance their curiosity leads them to ask what they should not know, it is a great deal better to tell them plainly, that it is a thing that belongs not to them to know, than to pop them off with a falsehood of a frivolous answer.

第121节．（4）有时候也可以拿些新奇的东西，故意让儿童发问然后找到答案，来激发其好奇心。如果他们顺着好奇心问了些不该知道的问题，那么最好直白地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不应当知道，而不要用无聊的假话打发它们了事。

122．Pertness, that appears sometimes so early, proceeds from a principle that seldom accompanies a strong constitution of body, or ripens into a strong judgment of mind. If it were desirable to have a child a more brisk talker, I believe there might be ways found to make him so: But I suppose a wise father had rather that his son should be able and useful, when a man, than pretty company, and a diversion to others, whilst a child: though if that too were to be consider'd, I think I may say, there is not so much pleasure to have a child prattle agreeably, as to reason well. Encourage therefore his inquisitiveness all you can, by satisfying his demands, and informing his judgment, as far as it is capable. When

his reasons are any way tolerable, let him find the credit and commendation of it: and when they are quite out of the way, let him, without being laugh'd at for his mistake be gently put into the right; and if he shewa forwardness to be reasoning about things that come in his way, take care, as much as you can, that nobody check this inclination in him, or mislead it by captious or fallacious ways of talking with him. For when all is done, this, as the highest and most important faculty of our minds, deserves the greatest care and attention in cultivating it: the right improvement, and exercise of our reason being the highest perfection that a man can attain to in this life.

第122节．有些人从小机智敏锐，但很少是因为体魄强健的缘故，也很难发展成稳健的判断力。如果想让孩子口齿伶俐，有很多办法。但相比于小小年纪就乖巧可爱，或许一个明智的父亲更希望看到孩子长大以后才能出众。也许可以这么说，虽然小时候的表现也很重要，但比起活泼可爱，思维缜密恐怕更叫人欣慰。因此要尽可能满足其要求，助长其好奇心，激发其判断力。如果他的理由可以接受，要给他奖励和表扬。如果站不住脚，也不必笑他，小心引导便是。如果他凡事愿意分析推理，就尽可能别让任何人横加阻拦，或者以强词夺理、不合逻辑的言谈方式误导他。抛开其他事情而言，这种人类头脑最高级最重要的禀赋需要小心呵护，应获得最大程度的关心和重视。人生在世，所能企及的至臻至善的境界就是完善并运用我们的理智。

123．Contrary to this busy inquisitive temper, there is sometimes observable in children, a listless carelessness, a want of regard to anything, and a sort of trifling even at their business. This sauntering humour I look on as one of the worst qualities can appear in a child, as well as one of the hardest to be cured, where it is natural. But it being liable to be mistaken in some cases, care

must be taken to make a right judgment concerning than trifling at their books or business, which may sometimes be complained of in a child. Upon the first suspicion a father has, that his son is of a sauntering temper, he must carefully observe him, whether he be listless and indifferent in all in his actions, or whether in some things alone he be slow and sluggish, but in others vigorous and eager. For though we find that he does loiter at his book, and let a good deal of the time he spends in his chamber or study, run idly away; he must not presently conclude, that this is from a sauntering humour in his temper. It may be childishness, and a preferring something to his study, which his thoughts run on; and he dislikes his book, as is natural, because it is forced upon him as a task. To know this perfectly, you must watch him at play, when he is out of his place and time of study, following his own inclination; and see there whether he be stirring and active; whether he designs anything, and with labour and eagerness pursues it, till he has accomplished what he aimed at, or whether he lazily and listlessly dreams away his time. If this sloth be only when he is about his book, I think it may be easily cured. If it be in his temper, it will require a little more pains and attention to remedy it.

第123节．观察儿童，有时还会发现一种与好奇心相反的脾气，那就是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即使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都漫不经心。我认为儿童身上最糟糕的特质就是这种懒散了，又因为与生俱来，所以也是最难以克服的。但有时难免判断失误，所以在想要抱怨孩子读书或做事不专心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当父亲开始怀疑儿子玩世不恭的时候，就必须仔细观察，看他到底是对所有事情都无精打采、漠不关心，还是只对一些事情表现出拖拉和懒惰，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却充满活力和兴趣。因为即使我们发现孩子读书时兴味索然，总是无聊地打发在房间或书房学习的时间，也不能马上就得出结论说，这是因为孩子天生的懒散脾气。可能只是因为年幼而对读书

以外的事情更感兴趣，因而总是走神。而他不喜欢书本也是自然的，因为这是强加在身上的任务。要完全了解这一切，就要观察他游戏时候的状态，看他在学习以外的场合和时间，随心所欲的时候，是否活泼好动，是否筹划一些事情，并且热情努力直至达到自己的目标，或者他只是慢慢吞吞、无精打采地消磨时间。如果只是读书时倦怠，我想很容易克服。但如果是天生的脾气，就需要花更多的努力和心思才能治愈。

124．If you are satisfied by his earnestness at play, or anything else he sets his mind on, in the intervals between his hours of business, that he is not of himself inclined to laziness, but that only want of relish of his book makes him negligent and sluggish in his application to it; the first step is to try by talking to him kindly of the folly and inconvenience of it, whereby he loses a good part of his time, which he might have for his diversion: but be sure to talk calmly and kindly, and not much at first, but only these plain reasons in short. If this prevails, you have gain'd the point in the most desirable way, which is that of reason and kindness. If this softer application prevails not, try to shame him out of it, by laughing at him for it, asking every day, when he comes to table, if there be no strangers there, how long he was that day about his business: And if he has not done it in the time he might be well supposed to have dispatched it, expose and turn him into ridicule for it; but mix no chiding, only put on a pretty cold brow towards him, and keep it till he reform; and let his mother, tutor, and all about him do so too. If this work not the effect you desire, then tell him he shall be no longer troubled with a tutor to take care of his education, you will not be at the charge to have him spend his time idly with him; but since he prefers this or that [whatever play he delights in] to his book, that only he shall do; and so in earnest set him to work on his beloved play, and keep him steadily, and in

earnest, to its morning and afternoon, till he be fully surfeited, and would, at any rate, change it for some hours at his book again. But when you thus set him his task of play, you must be sure to look after him yourself, or set somebody else to do it, that may constantly see him employed in it, and that he be not permitted to be idle at that too. I say, yourself look after him; for it is worth a father's while, whatever business he has, to bestow two or three days upon his son, to cure so great a mischief as his sauntering at his business.

第124节．如果你对孩子在闲暇游戏时，或任何他专心致志的事情上表现出的认真感到满意，发现他并非一味偷懒，只是书本的无趣让他毫无兴趣，拖拖拉拉，那么首先应当善意地给他提示，告诉他为此耽误了本可以用来做其他消遣的大好光阴，因而是不明智和不合适的。但是要保证语气平和，态度和善。不必长篇大论地说教，只需把这些道理简短地解释清楚就可以了。如果这样做起了作用，那么你就用理智和和善这种最理想的方式达到了效果。如果温和的劝说没能见效，那么不妨唤起他的廉耻之心。吃饭的时候如果没有外人，问他这一天有多少时间用来做正事，调侃他浪费时间。如果他明明可以分配好时间，却没有完成任务，就要指出，让他因此而成为笑柄。此时无需责备，只需冷眼相对，直到改进。还要让母亲、导师和孩子身边的人都要这么做。假若这样还不能达到你的期望，那么就告诉他不必再为导师上课而烦恼了，因为你不想再花钱让导师跟他一起浪费时间。既然他对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无论他喜欢玩什么］比对读书更感兴趣，那么他只要玩耍就可以了。就这样让他只做自己喜欢的游戏，并且从早到晚督促他玩耍，直到他感到疲倦，至少愿意换换花样，决定要再次花些时间在书本上。但是如果你要他去玩耍，必须保证亲自或请别人时刻监督，保证他一刻不停地玩耍，在游戏中也不允许偷懒。我所说的亲自监督，是因为不论父亲有什么事务缠身，都值得拿出两三天的工夫给儿子，帮他治愈这种不专心工作的大毛病。

125 . This is what I propose, if it be idleness, not from his general temper, but a peculiar or acquir'd aversion to learning, which you must be careful to examine and distinguish. But though you have your eyes upon him, to watch what he does with the time which he has at his own disposal, yet you must not let him perceive that you or any body else do so; for that may hinder him from following his own inclination, which he being full of, and not daring, for fear of you, to prosecute what his head and heart are set upon, he may neglect all other things, which then he relishes not, and so may seem to be idle and listless, when in truth it is nothing but being intent on that, which the fear of your eye or knowledge keeps him from executing. To be clear in this point, the observation must be made when you are out of the way, and he not so much as under the restraint of a suspicion that anybody has an eye upon him. In those seasons of perfect freedom, let somebody you can trust mark how he spends his time, whether he inactively loiters it away, when without any check he is left to his own inclination. Thus, by his employing of such times of liberty, you will easily discern, whether it be listlessness in his temper, or aversion to his book, that makes him saunter away his time of study.

第125节．如果懒惰不是天性，而只是对学习的莫名或不知从哪学来的懒惰，那么就要按上面的办法去做，仔细观察并加以甄别。但是尽管你在观察他自由支配时间时的一举一动，但决不可让他发现你或别人在监视他。因为这会妨碍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原本他是满怀热忱的，但因为怕你就不敢随心所欲，而对于他不感兴趣的事情也完全忽略，这样看上去就真的像懒惰和无所事事。而事实上他脑子里一直在想，只是怕你发现或知道而不敢去实施罢了。明确了这一点，就知道要看似无心地去观察，而不要让孩子因为怀疑受到监视而束手束脚。孩子完全自由的时候，请一个信得过的人记录他的所作所为，看他是否在不受到任何他人限制可以纵情任性的时候，仍然无精打采地

消磨时间。通过观察他如何利用自由的时间，就能轻易地辨别他读书不专心究竟是因为与生俱来的慵懒，还是出于对书本的抗拒。

126 . If some defect in his constitution has cast a damp on his mind, and he be naturally listless and dreaming, this unpromising disposition is none of the easiest to be dealt with, because, generally carrying with it an unconcernedness for the future, it wants the two great springs of action, foresight and desire; which how to plant and increase, where nature has given a cold and contrary temper, will be the question. As soon as you are satisfied that this is the case, you must carefully enquire whether there be nothing he delights in; Inform yourself what it is he is most pleased with;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particular tendency his mind hath, increase it all you can, and make use of that to set him on work, and to excite his industry. If he loves praise, or play, or fine clothes, &c. or, on the other side, dreads pain, disgrace, or your displeasure, &c., whatever it be that he loves most, except it be sloth (for that will never set him on work) let that be made use of to quicken him, and make him bestir himself. For in this listless temper, you are not to fear an excess of appetite (as in all other cases) by cherishing it. 'Tis that which you want, and therefore must labour to raise and increase; for where there is no desire, there will be no industry.

第126节．如果天生就在意志上有所欠缺，无精打采、精神涣散，这种没前途的性情是很难纠正过来的。因为通常来说，对未来漠不关心就意味着缺少行动所需的两股源泉：远见和渴望。如果天性冷漠，毫无动力，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培养和增加这种力量。一旦这一点被证实，就要小心翼翼地探查他是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从而了解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如果你能发现他有任何特别的爱好，就尽量予以加强，让孩子专心致志地去完成，激发他的上进心。如果他喜欢表

扬、玩耍或好看的衣服等等，或者从相反的角度，害怕痛苦、羞辱或让你不高兴等等，不管他最喜欢什么，只要不是偷懒（因为懒惰永远不能让它上进），就要利用其好恶来敦促他，让其自我激励。因为天性懒惰，所以你不必担心会因为鼓励而过度激发其欲望（跟所有其他情况下那样）。这正是你的目标，因此应该努力激发并加强。没有渴望，就不会努力。

127 . If you have not hold enough upon him this way, to stir up vigour and activity in him, you must employ him in some constant bodily labour, whereby he may get an habit of doing something. The keeping him hard to some study were the better way to get him an habit of exercising and applying his mind. But because this is an invisible attention, and nobody can tell when he is or is not idle at it, you must find bodily employments for him, which he must be constantly busied in, and kept to; and if they have some little hardship and shame in them, it may not be the worse, that they may the sooner weary him, and make him desire to return to his book. But be sure, when you exchange his book for his other labour, set him such a task, to be done in such a time as may allow him no opportunity to be idle. Only after you have by this way brought him to be attentive and industrious at his book, you may, upon his dispatching his study within the time set him, give him as a reward some respite from his other labour; which you may diminish as you find him grow more and more steady in his application, and at last wholly take off when his sauntering at his book is cured.

第127节．如果这样还不能完全掌控他，激发他内在的精力和活力，就要让他从事体力劳动，这样他就可以养成做事情的习惯。让他把力气用到学习上更有助于使他养成运用和锻炼思维的习惯。但是因

为学习上的专注是无形的，谁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偷懒，所以你要找些体力活给他干，让他一直忙于其中，脱不开身。即便这些体力活有些难度，而且不那么体面，这也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他很快就会疲倦，想要回到书本中去了。需要确定的是，在拿其他事情来替代书本的时候，这项任务要规定时间，不留任何偷懒的余地。直到成功让他回到书本，专心努力地学习，才可以在他完成学习后，作为奖励，减免一部分其他劳动的时间。随着他的表现越来越稳健，可以逐步减少其他劳动的时间。到他完全治愈了学习懒惰的毛病之后，就可以完全取消这些劳动了。

128 . We formerly observed, that variety and freedom was that that delighted children, and recommended their plays to them; and that therefore their book or anything we would have them learn, should not be enjoined them as business. This their parents, tutors, and teachers are apt to forget; and their impatience to have them busied in what is fit for them to do, suffers them not to deceive them into it: but by the repeated injunctions they meet with, children quickly distinguish between what is required of them, and what not. When this mistake has once made his book uneasy to him, the cure is to be applied at the other end. And since it will be then too late to endeavour to make it a play to him, you must take the contrary course: observe what play he is most delighted with; enjoin that, and make him play so many hours every day, not as a punishment for playing, but as if it were the business required of him. This, if I mistake not, will in a few days make him so weary of his most beloved sport, that he will prefer his book, or anything to it, especially if it may redeem him from any part of the task of play is set him, and he may be suffered to employ some part of the time destined to his task of play in his book, or such other exercise as is really useful to him. This I at least think a better cure than that forbidding, (which usually increases the desire) or any other

punishment should be made use of to remedy it: for when you have once glutted his appetite (which may safely be done in all things but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made him surfeit of what you would have him avoid, you have put into him a principle of aversion, and you need not so much fear afterwards his longing for the same thing again.

第128节．我们之前观察到，儿童喜欢变化和自由，也推荐了适合儿童的游戏，因此不要把书本或任何我们希望他们学习的东西作为任务来布置。父母、导师和教师很容易忘记这一点，往往一有他们认为适合孩子的事情，就急于命令孩子去做而不能循循善诱。但是命令得多了，很快儿童就能辨别出哪些是必须做的，哪些不是。一旦这种错误的方法让孩子对书本心生厌恶，那么就只能从另一个角度着手解决。而此时再费力地想把事情变得轻松就太晚了，所以必须另辟蹊径——观察他最大的乐趣是什么，然后让他每天都必须玩上好几个钟头。不要作为贪玩的处罚，而是作为任务布置给他。如果我没猜错，没过几天他就会对自己最喜欢的运动感到疲惫了，然后他就宁愿读书，或者任何别的活动，尤其是能让他从游戏的任务中解脱出来的事情。于是他就情愿从游戏的任务中挪出时间来读书，或者从事任何实际上对他有益的事情了。我认为这么做至少比严令禁止效果要好（禁止通常反而增加了兴趣），比可能采用的补救性惩罚也要好。因为一旦他的胃口被完全满足（除了进食和饮酒外所有事情这么做都不会有安全的顾虑），在你想要避免的事情上让他过度满足，心生厌倦，那么从此你就不必那么担心他会再次渴望同样的东西了。

129．This I think is sufficiently evident, that children generally hate to be idle. All the care then is that their busy humour should be constantly employ'd in something of use to them; which, if you will attain, you must make what you would have them do a recreation to them, and not a business. The way to do this, so that

they may not perceive you have any hand in it, is this proposed here; viz. To make them weary of that which you would not have them do, by enjoining and making them under some pretence or other do it, till they are surfeited. For example: Does your son play at top and scourge too much? Enjoin him to play so many hours every day, and look that he do it; and you shall see he will quickly be sick of it, and willing to leave it. By this means making the recreations you dislike a business to him, he will of himself with delight betake himself to those things you would have him do, especially if they be proposed as rewards for having performed his task in that play which is commanded him. For if he be ordered every day to whip his top so long as to make him sufficiently weary, do you not think he will apply himself with eagerness to his book, and wish for it, if you promise it him as a reward of having whipped his top lustily, quite out all the time that is set him? Children, in the things they do, if they comport with their age, find little difference so they may be doing: the esteem they have for one thing above another they borrow from others; so that what those about them make to be a reward to them, will really be so. By this art it is in their governor's choice, whether scotch-hoppers shall reward their dancing, or dancing their scotch-hoppers; whether peg-top, or reading; playing at trap, or studying the globes, shall be more acceptable and pleasing to them; all that they desire being to be busy, and busy, as they imagine, in things of their own choice, and which they receive as favours from their parents or others for whom they have respect and with whom they would be in credit. A set of children thus ordered and kept from the ill example of others, would all of them, I suppose, with as much earnestness and delight, learn to read, write, and what else one would have them, as others do their ordinary plays: and the eldest being thus entered, and this made the fashion of the place, it would be as impossible to hinder them from learning the one, as it is ordinarily to keep them from

the other.

第129节．我想显而易见的是，儿童通常讨厌无事可干。所以要注意的就是，他们的好动应当用在对他们有用的事情上，如果要实现你的目标，就要把你要他们做的事情当作一种休闲方式，而不是任务。要不动声色地做到这一点，可以尝试如下的办法。找个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吩咐并要求他们去做那些你不想他们做的事情，直到他们感到乏味。比如：令郎是否喜欢玩陀螺？那就让他每天玩上几个钟头，监督他完成，很快就会看到他厌烦了，想要放弃。这样就可以将你不喜欢的娱乐活动变成他的任务，于是他就会自动去做那些你想要他做的事情，尤其是在命令他完成游戏任务之后作为奖励时更是如此。因为如果每天都命令他花很长时间抽陀螺，玩得精疲力竭，你还不认为他会渴望读书吗？如果你向他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坚持卖力地抽过陀螺之后，奖励他读会儿书，难道他还会不想读书吗？凡是适合他们年纪的事情，儿童并不会挑剔，只会去完成。他们对事情的偏好来自周遭的人，所以如果是作为奖励给他们的事情，就会被当作是奖励。采用这个办法，那么是把跳房子作为跳舞的奖励，还是把跳舞作为跳房子的奖励，就由大人决定了。玩陀螺还是阅读，跳房子还是研习地理，对孩子来说哪个更容易接受更有意思，也都取决于大人了。孩子想要的无非是有事可做。这些事，要么是他们认为是自己选择的，要么是父母或其他的他所尊敬又希望受到其好评之人奖赏的。我猜想如此管教，远离坏榜样的儿童定能个个认真愉悦地学会读书写字或任何其他你要他学的东西，就跟其他孩子学会游戏一样自然。最大的孩子这么做了，自然形成一种风范。这时候他们不学好根本不可能，就跟通常情况下非要孩子放弃某件事情一样难以做到。

130 . Play-things, I think, children should have, and of divers sorts; but still to be in the custody of their tutors or somebody else, whereof the child should have in his power but one at once, and should not be suffered to have another but when he restored that.

This teaches them betimes to be careful of not losing or spoiling the things they have; whereas plenty and variety in their own keeping, makes them wanton and careless, and teaches them from the beginning to be squanderers and wasters. These, I confess, are little things, and such as will seem beneath the care of a governor; but nothing that may form children's minds is to be overlooked and neglected, and whatsoever introduces habits, and settles customs in them, deserves the care and attention of their governors, and is not a small thing in its consequences.

第130节．我认为，孩子应该拥有玩具，而且要多样化，但应当由导师或另外请人保管。孩子只能支配一件，如果不归还就不能获得另一件。这样就能及早地教给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切莫因为粗心而遗失或损坏。如果他们同时占有许多各式各样的玩具就无法让他们学会珍惜和留意，相当于从一开始就教会他们挥霍和浪费。我承认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似乎犯不着导师操心，但任何可能塑造儿童心智的事情都不可掉以轻心，任何形成习惯和惯例的事情都需要导师留心注意，都绝非毫无意义的小事。

One thing more about children's play-things may be worth their parents' care. Though it be agreed they should have of several sorts, yet, I think, they should have none bought for them. This will hinder that great variety they are often overcharged with, which serves only to teach the mind to wander after change and superfluity, to be unquiet, and perpetually stretching itself after something more still, though it knows not what, and never to be satisfied with what it hath. The court that is made to people of condition in such kind of presents to their children, does the little ones great harm. By it they are taught pride, vanity and covetousness, almost before they can speak: and I have known a

young child so distracted with the number and variety of his play-games, that he tired his maid every day to look them over; and was so accustomed to abundance, that he never thought he had enough, but was always asking, What more? What more? What new thing shall I have? A good introduction to moderate desires, and the ready way to make a contented happy man!

还有一件有关儿童玩具的事情值得家长关注。尽管玩具应当是各种各样的，但我认为不应专门购买。如此可避免通常所见的过度纵容，玩具种类过多只会让儿童喜新厌旧，贪得无厌。于是儿童变得躁动不安，即使并不知道要什么却总是想要更多，永远不知满足。为了向有身份的人拍马屁而给他们的孩子买礼物，会害了孩子。小孩子几乎还不会说话，就学会了骄傲、虚荣和贪婪。我认识一个小孩子，因眼花缭乱的玩具变得心思涣散，每天都非要女仆不厌其烦地检查一遍。因为习惯了玩具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而从不认为已经足够，还总是在问，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还能得到什么新鲜的玩意儿？知足才能常乐啊！

“How then shall they have the play-games you allow them, if none must be bought for them?” I answer, they should make them themselves, or at least endeavour it, and set them about it; till then they should have none, and till then they will want none of any great artifice. A smooth pebble, a piece of paper, the mother's bunch of keys, or anything they cannot hurt themselves with, serves as much to divert little children as those more chargeable and curious toys from the shops, which are presently put out of order and broken. Children are never dull, or out of humour, for want of such playthings, unless they have been used to them; when they are little, whatever occurs serves the turn; and as they grow bigger, if they are not stored by the expensive folly of others, they will make

them themselves. Indeed, when they once begin to set themselves to work about any of their inventions, they should be taught and assisted; but should have nothing whilst they lazily sit still, expecting to be furnish'd from other hands, without employing their own. And if you help them where they are at a stand, it will more endear you to them than any chargeable toys you shall buy for them. Play-things which are above their skill to make, as tops, gigs, battledores, and the like, which are to be used with labour, should indeed be procured them. These 'tis convenient they should have, not for variety but exercise; but these too should be given them as bare as might be. If they had a top, the scourge-stick and leather-strap should be left to their own making and fitting. If they sit gaping to have such things drop into their mouths, they should go without them. This will accustom them to seek for what they want, in themselves and in their own endeavours; whereby they will be taught moderation in their desires, application, industry, thought, contrivance, and good husbandry; qualities that will be useful to them when they are men,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learned too soon, nor fixed too deep. All the plays and diversions of children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s good and useful habits, or else they will introduce ill ones. Whatever they do, leaves some impression on that tender age, and from thence they receive a tendency to good or evil: and whatever hath such an influence, ought not to be neglected.

“照此说来，如果不给他们买玩具，他们又如何按你的意思得到玩具呢？”我的回答是，让他们自己制作，或者至少花点工夫努力尝试，在此之前不要给他们玩具，也不要叫他们期望获得什么精致的玩意儿。一块光滑的石子，一页纸，母亲的钥匙串，或任何不致使儿童弄伤自己的东西，都足以吸引小孩子的注意力，丝毫不比商店里买来的那些稀奇的玩具差，何况这些玩具很快就会叫他们摆弄得面目全

非。如果不是养成了习惯，儿童根本不会因为没有这些买来的玩具而感到无聊或者闷闷不乐。稍大一些，如果没有别人花钱买来的玩意儿，他们就会自己制作。一旦他们有了创意开始实施，就要给予提示和协助。但如果他们懒散地无所事事，坐在那里指望别人，就什么都不要管他。而且如果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伸手相助，还能够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这比给他买多贵的玩具的效果都要好。有些玩具超出了他们的制作能力，比如陀螺、鱼叉、球拍等等，使用起来也要花些气力，这些就需要为他们购置。主动为他们预备好这些东西，并非出于花哨而是为了让他们运动，但是也要尽可能减少数量。如果陀螺已经有了，那么木棍和皮带就应由他们自己制作和配备。如果他们指望天上掉馅饼，什么都不去做，那么就什么都不要给他们。如此可形成习惯，让儿童从自身出发，自己努力去获取想要的东西。同时可以让儿童学会克制欲望、努力、勤奋、善于思考、规划和节俭等等将来大有益处的品质。这些品质学习得越早越好，巩固得越深越好。儿童所有的游戏和消遣都应当导向有用的好习惯，否则坏习惯就会乘虚而入。不论做什么，都会给年幼的他们留下印记，并因此埋下善恶的种子。无论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影响，都不容忽视。

Section 131-140

第131-140节

131 . Lying is so ready and cheap a cover for any miscarriage, and so much in fashion among all sorts of people, that a child can hardly avoid observing the use is made of it on all occasions, and so can scarce be kept without great care from getting into it. But it is so ill a quality, and the mother of so many ill ones that spawn from it, and take shelter under it, that a child should be brought up in the greatest abhorrence of it imaginable. It should be always (when occasionally it comes to be mention'd) spoke of before him with the utmost detestation, as a quality so whol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name and character of a gentleman, that no body of any credit can bear the imputation of a lie; a mark that is judg'd the utmost disgrace, which debases a man to the lowest degree of a shameful meanness, and ranks him with the most contemptible part of mankind and the abhorred rascality; and is not to be endured in any one who would converse with people of condition, or have any esteem or reputation in the world. The first time he is found in a lie, it should rather be wondered at as a monstrous thing in him, than reproved as an ordinary fault. If that keeps him not from relapsing, the next time he must be sharply rebuked, and fall into the state of great displeasure of his father and mother and all about him who take notice of it. And if this way works not the cure, you must come to blows; for after he has been thus warned, a premeditated lie must always be looked upon as obstinacy, and never be permitted to escape unpunished.

第131节．犯了任何错误，用撒谎来掩饰既方便又不费力，无论在什么样的人中间都蔚然成风。很难做到完全避免让小孩子在各种场合看到这种现象，如果不特别加以留心，也就不可能防止小孩子有样学样。但说谎是如此恶劣，也是滋生和遮蔽各种恶行的温床，因此要在小孩子成长过程中，使其对此深恶痛绝。每次（一旦提及）在他面前提起说谎，都要表现出极大的反感，让他知道这种恶习与绅士的名声与品性是全然相悖的。任何有声望的人都无法承受说谎的污名。这种污点是最不堪的耻辱，使人堕落成最卑鄙无耻的小人，跟流氓行为一样受到唾弃。任何想要与高雅之士交流，或者获得世人尊敬和推崇的人若是说谎会令人无法容忍。第一次发现他撒谎，就不能作为普通的错误批评了事，而要对他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表现出震惊。如果他之后故态复萌，就要严厉地斥责，让他在父母和所有知情的人面前感到无地自容。如果这样做了还不能使他痛改前非，那么就应当体罚。因为在警告之后还精心编造谎言应当视为顽固不化，切不可姑息纵容。

132 . Children, afraid to have their faults seen in their naked colours, will, like the rest of the sons of Adam, be apt to make excuses. This is a fault usually bordering upon, and leading to untruth, and is not to be indulged in them; but yet it ought to be cured rather with shame than roughness. If therefore, when a child is questioned for anything, his first answer be an excuse, warn him soberly to tell the truth; and then if he persists to shuffle it off with a falsehood, he must be chastised; but if he directly confess, you must commend his ingenuity, and pardon the fault, be it what it will; and pardon it so, that you never so much as reproach him with it, or mention it to him again: for if you would have him in love with ingenuity, and by a constant practice make it habitual to him, you must take care that it never procure him the least inconvenience; but on the contrary, his own confession bringing always with it perfect impunity, should be besides encouraged by

some marks of approbation. If his excuse be such at any time that you cannot prove it to have any falsehood in it, let it pass for true, and be sure not to shewany suspicion of it. Let him keep up his reputation with you as high as is possible; for when once he finds he has lost that, you have lost a great, and your best hold upon him. Therefore let him not think he has the character of a liar with you, as long as you can avoid it without flattering him in it. Thus some slips in truth may be overlooked. But after he has once been corrected for a lie, you must be sure never after to pardon it in him, whenever you find and take notice to him that he is guilty of it: for it being a fault which he has been forbid, and may, unless he be wilful, avoid, the repeating of it is perfect perverseness, and must have the chastisement due to that offence.

第132节．儿童害怕自己的错误被赤裸裸地揭发，于是就像亚当所有的子孙一样，急于找借口来掩饰。这一毛病常常近乎并导致谎言，不能放任自流，但是要用羞耻而不是粗暴来修正。因此如果孩子被问及某事，先以借口作答，那么就严肃地请警告他讲实话。如果他还是企图用谎言来蒙混过关，要严惩不贷。但是如果他坦白，则应对他的醒悟表示称赞，并且原谅他，不再计较此事。既然原谅了他，就不要再因此批评他，或者再次提起。因为如果你希望他诚实，就要坚持不懈地帮他养成习惯，不可使他因此而感到丝毫不便。相反，主动坦白不但要让他免受责罚，还要不吝赞美，加以鼓励。任何时候如果你无法证实他的借口哪里不符合事实，就姑且认为是真话，千万不要流露出任何怀疑。让他在你面前尽可能保持好名声，一旦他发现名誉荡然无存，你就丢掉了控制他的最佳法宝。因此只要是在可以防止他说谎成习，不致纵容的情况下，不要让他以为自己在你眼中成了一个骗子。因此偶尔与事实有出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在他撒谎改正之后，下次再发现并向他指出时，就绝不可原谅。因为这种错误已经明确禁止，是明知故犯。屡教不改无异于自甘堕落，因此必须为此接受惩罚。

133 . This is what I have thought concerning the general method of educating a young gentleman; which, though I am apt to suppose may have some influence on the whole course of his education, yet I am far from imagining it contains all those particulars which his growing years or peculiar temper may require. But this being premised in general, we shall in the next place, descend to a more particular consideration of the several parts of his education.

第133节．这就是我对培养年轻绅士的一般方法的思考。这一方法我相信会对教育的整个过程产生影响，但丝毫不敢奢望其囊括了青年成长过程和特殊个性所要求的一切细节。但有了这一前提，我们接下来就有针对性地探讨教育中的不同方面。

134 . That which every gentleman (that takes any care of his education) desires for his son, besides the estate he leaves him, is contain'd (I suppose) in these four things, virtue, wisdom, breeding and learning. I will not trouble myself whether these names do not some of them sometimes stand for the same thing, or really include one another. It serves my turn here to follow the popular use of these words, which, I presume, is clear enough to make me be understood, and I hope there will be no difficulty to comprehend my meaning.

第134节．但凡对教育有所关注，每个绅士都希望自己的儿子，除了继承家产外，还能具备我所认为的四样品质：道德、智慧、教养和学养。我不想自找麻烦去深究这些概念在某些情况下含义是否有所不同，或者实际上相互重叠。这里只需要遵循这些词汇的通常用法，

我想就可以使人明白，但愿不会在理解上带来任何困难。

135 . I place virtue as the first and most necessary of those endowments that belong to a man or a gentleman; as absolutely requisite to make him valued and beloved by others, acceptable or tolerable to himself. Without that, I think, he will be happy neither in this nor the other world.

第135节．不管是普通人还是绅士，我认为道德是首要的，以及最不可或缺的品质。因为有德之人才能受到他人的重视和爱戴，也才能更好地接纳自己。我想没有道德的人不管是生存于世还是死后都无法幸福。

136 . As the foundation of this, there ought very early to be imprinted on his mind a true notion of God, as of the independent Supreme Being, Author and Maker of all things, from Whom we receive all our good, Who loves us, and gives us all things. And consequent to this, instil into him a love and reverence of this Supreme Being. This is enough to begin with, without going to explain this matter any farther; for fear lest by talking too early to him of spirits, and being unseasonably forward to make him understand the incomprehensible nature of that Infinite Being, his head be either fill'd with false, or perplex'd with unintelligible notions of Him. Let him only be told upon occasion, that God made and governs all things, hears and sees everything, and does all manner of good to those that love and obey Him; you will find, that being told of such a God, other thoughts will be apt to rise up fast enough in his mind about Him; which, as you observe them to have any mistakes, you must set right.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better if

men generally rested in such an idea of God, without being too curious in their notions about a Being which all must acknowledge incomprehensible; whereby many, who have not strength and clearness of though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what they can, and what they cannot know, run themselves in superstitions or atheism, making God like themselves, or (because they cannot comprehend anything else) none at all. And I am apt to think, the keeping children constantly morning and evening to acts of devotion to God, as to their Maker, Preserver and Benefactor, in some plain and short form of prayer, suitable to their age and capacity, will be of much more use to them in religion, knowledge, and virtue, than to distract their thoughts with curious enquiries into His inscrutable essence and being.

第136节．道德的基础在于及早在年幼的头脑中建立上帝的真正概念，作为独立的至高无上的存在，万物的创造者和缔造者，是我们一切善的来源。上帝给予我们爱与一切。随后，要向孩子灌输对上帝的爱与尊敬。开始时如此便已足够，不必进一步解释。过早谈论神灵，冒失地让他琢磨不可知的无限的存在，只能让年幼的头脑充满谬误，或者因为无法言说的上帝的概念而困惑不已。因此只需适时告诉他，上帝创造并主宰万物，聆听并观察一切，向那些爱他和听从他的人行善。你会发现孩子知道了这些，他的头脑中便会迅速地建立起其他关于上帝的想法。如果你在这些想法中发现了错误，定要及时加以纠正。我认为理想的状态是人们总体上建立了关于上帝的认识，对于这一谁都必须承认而无法解释的存在又不必抱有过度的好奇。因为有很多人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清晰的头脑，去分辨可知和不可知，从而陷入迷信和无神论，不是把上帝看成和自身一样，就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别的事物）认为上帝根本不存在。我想，坚持让孩子用平白简略的适合他们年龄和能力的方式，每天早晚向上帝这一缔造者、庇护者和恩赐者祈祷，对于他们宗教、知识和德行方面的修为要有益得多。而不必用那些对于上帝神秘的本质和存在的好奇追问来分散他

们的注意力。

137 . Having by gentle degrees, as you find him capable of it, settled such an idea of God in his mind, and taught him to pray to Him, and praise Him as the Author of his being, and of all the good he does or can enjoy; forbear any discourse of other spirits, till the mention of them coming in his way, upon occasion hereafter to be set down, and his reading the scripture-history, put him upon that enquiry.

第137节．根据孩子能力所及，渐渐地在他心灵中印入上帝的观念，教他向上帝祈祷，赞美上帝，将上帝看作其自身的创造者，以及他所做的和所享有的一切善的创造者。要避免谈及别的神灵，直到他日后听人提起，或在读圣经历史的时候问及这个问题再说。

138 . But even then, and always whilst he is young, be sure to preserve his tender mind from all impressions and notions of spirits and goblins, or any fearful apprehensions in the dark. This he will be in danger of from the indiscretion of servants, whose usual method is to awe children, and keep them in subjection, by telling them of raw-head and bloody-bones, and such other names as carry with them the ideas of something terrible and hurtful, which they have reason to be afraid of when alone, especially in the dark. This must be carefully prevented: for though by this foolish way, they may keep them from little faults, yet the remedy is much worse than the disease; and there are stamped upon their imaginations ideas that follow them with terror and affrightment. Such bug-bear thoughts once got into the tender minds of children, and being set on with a strong impression from the dread that accompanies such

apprehensions, sink deep, and fasten themselves so as not easily, if ever, to be got out again; and whilst they are there, frequently haunt them with strange visions, making children dastards when alone, and afraid of their shadows and darkness all their lives after. I have had those complain to me, when men, who had been thus used when young; that though their reason corrected the wrong ideas they had taken in, and they were satisfied that there was no cause to fear invisible beings more in the dark than in the light, yet that these notions were apt still upon any occasion to start up first in their prepossessed fancies, and not to be removed without some pains. And to let you see how lasting and frightful images are, that take place in the mind early, I shall here tell you a pretty remarkable but true story. There was in a town in the west a man of a disturbed brain, whom the boys used to teaze when he came in their way: this fellow one day seeing in the street one of those lads, that used to vex him, stepped into a cutler's shop he was near, and there seizing on a naked sword, made after the boy; who seeing him coming so armed, betook himself to his feet, and ran for his life, and by good luck had strength and heels enough to reach his father's house before the mad-man could get up to him. The door was only latch'd; and when he had the latch in his hand, he turn'd about his head, to see how near his pursuer was, who was at the entrance of the porch, with his sword up ready to strike; and he had just time to get in, and clap to the door to avoid the blow, which, though his body escaped, his mind did not. This frightening idea made so deep an impression there, that it lasted many years, if not all his life after. For, telling this story when he was a man, he said, that after that time till then, he never went in at that door (that he could remember) at any time without looking back, whatever business he had in his head, or how little soever before he came thither he thought of this mad-man.

第138节．尽管如此，在儿童年纪还小的时候，要特别维护他稚嫩的心灵，避免让他具有任何关于神灵妖怪的印象与概念，不要让他在面对黑暗时产生疑虑与恐惧。而仆人的轻率言行往往会使儿童面临这样的危险，他们常用的办法是令其心生恐惧，从而使其顺从听话，他们给孩子讲关于“绽开的脑袋”、“流血的骨头”以及诸如此类的故事，让人想到某些可怕、有害的东西，孩子听了这些，独自一人时自然会感到恐惧，在黑暗中更是如此。必须小心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尽管仆人们可以用这种愚蠢的办法防止孩子犯一些小错，但这种纠错的手段却比那些小毛病更糟糕，它会在孩子头脑中留下令他们惊恐害怕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会从此追随他们。这些搅扰人心的想法一旦进入孩子稚嫩的心灵，同时由于恐惧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就会在心灵中越扎越深，纠缠固结，即使最终能将其拔除，也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当这些印象留存在孩子的心灵中，他们就常常会产生奇异的幻觉，独自一人时感到胆怯，在此后一生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或黑暗都会害怕。曾有人向我诉苦，他们在儿时就受过这样的惊吓，尽管理智纠正了他们所接受的错误观念，同时他们也确信在黑暗中就像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样，不需要去害怕什么不可见的东西，但这些想法仍会时不时地在他们先入为主的幻象中出现，并很难轻易摆脱。为了让你知道早期进入心灵的幻象是多么地持久而骇人，我在这儿就告诉你一个非同寻常但真实发生的故事。西部的一个镇上有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当他走过时男孩子们常常戏弄他。有一天，这人在街上看见了一个经常招惹他的男孩，于是他走进旁边一家刀具店，抄起一把出鞘的剑就去追赶那个孩子。孩子一看见他带着武器追过来，拔腿就跑，飞奔逃命，幸而体力充沛，脚力强健，在那疯汉追上他之前跑到了家。家门只是上了闩，孩子手持门闩，掉头去看追他的那个人还有多远时，却发现他已经到了门廊入口，举剑正要砍，他仅有时间跑进屋，关上门，这才逃过一劫。尽管他的身体逃脱了，心灵却没能逃脱。这个恐怖的印象如此之深，就算没有终生难忘，也延续了很多年。这个孩子长大后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说，自从那件事之后直到讲故事的时候为止，每当他要进那扇门（这是他能够记得的）的时候，不管他头脑中想着什么事情，就算他进门之前丝毫没有想到那个疯汉，也总要回头看看。

If children were let alone, they would be no more afraid in the dark, than in broad sun-shine; they would in their turns as much welcome the one for sleep as the other to play in. There should be no distinction made to them by any discourse of more danger or terrible things in the one than the other: but if the folly of any one about them should do them this harm, and make them think there is any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in the dark and winking, you must get it out of their minds as soon as you can; and let them know, that God, who made all things good for them, made the night that they might sleep the better and the quieter; and that they being under his protection,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dark to hurt them. What is to be known more of God and good spirits, is to be deferr'd till the time we shall hereafter mention; and of evil spirits, 'twill be well if you can keep him from wrong fancies about them till he is ripe for that sort of knowledge.

如果不去影响孩子，那他们在黑暗之中不会比在光天化日之下更感到害怕。他们会乐于迎接黑暗用以睡眠，正如他们乐于迎接白昼用来玩耍一样。不要告诉他们白昼与黑夜有什么不同，以及在黑暗中比在日光下有更多危险、骇人的东西。但如果孩子身边的什么人愚蠢地给他们造成了这样的伤害，使他们觉得在黑暗中或合着眼的时候有些异样，那你必须尽快从他的脑海中清除这种观念。同时要让他们明白，上帝为他们创造了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创造黑夜是为了让他们睡得更甜更安，既然在上帝的庇护之下，黑暗中就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他们。关于上帝和众多美善的神灵儿童应该知道些什么，在后面我们将会提到。至于那些邪恶的神灵，在儿童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接触这类知识之前，最好不要让他产生错误的幻象。

139．Having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virtue in a true notion of a God, such as the creed wisely teaches, as far as his age is capable,

and by accustoming him to pray to Him; the next thing to be taken care of is to keep him exactly to speaking of truth, and by all the ways imaginable inclining him to be good-natur'd. Let him know that twenty faults are sooner to be forgiven than the straining of truth to cover any one by an excuse. And to teach him betimes to love and be good-natur'd to others, is to lay early the true foundation of an honest man; all injustice generally springing from too great love of ourselves and too little of others.

第139节．既然在儿童的年龄所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教义的英明指导，你已使他通过养成向上帝祈祷的习惯，拥有了真正的关于上帝的观念，为美德打下了基础，那么下面需要注意的事就是使他始终说真话，并以所有能够想到的方式让他成为善良之人。要让儿童知道，就算他做了二十件错事，也能很快得到谅解，但是歪曲事实、以托词掩盖真相则不可原谅。同时要及早地使他学会爱他人、善待他人，这就为他今后成为一个真诚的人早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切的不公通常都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爱得太多，而对他人则爱得太少。

This is all I shall say of this matter in general, and is enough for laying the first foundations of virtue in a child: as he grows up, the tendency of his natural inclination must be observed; which, as it inclines him more than is convenient on one or t'other side from the right path of virtue, ought to have proper remedies applied. For few of Adam's children are so happy, as not to be born with some biasin their natural temper, which it is the business of education either to take off, or counterbalance. But to enter into particulars of this, would be beyond the design of this short treatise of education. I intend not a discourse of all the virtues and vices, how each virtue is to be attained, and every particular vice by its peculiar remedies cured: though I have mentioned some of the most ordinary faults,

and the ways to be used in correcting them.

关于这一点，我大体上要说的就这么多，对儿童而言，这已足以为他奠定美德的最初基础。随着他逐渐长大，必须留意他天性中的自然倾向，如果这种倾向过分牵引他偏离了美德的正道，那就要用适当的方法加以纠正。亚当的子孙中很少有人能那么幸运，天性生来不偏不倚，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消除或制约天性中的缺陷。不过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这篇关于教育的简短谈话的任务。我并不打算去论述所有种类的美德和恶习，或如何获得各种美德，以及每一种恶习要以怎样的方法去纠正，尽管我已提到了某些最常见的毛病，以及医治它们的方法。

140 . Wisdom I take in the popular acceptation, for a man's managing his business ably and with foresight in this world. This is the product of a good natural temper, application of mind, and experience together, and so above the reach of children. The greatest thing that in them can be done towards it, is to hinder them, as much as may be, from being cunning; which, being the ape of wisdom, is the most distant from it that can be: and as an ape for the likeness it has to a man, wanting what really should make him so, is by so much the uglier; cunning is only the want of understanding, which because it cannot compass its ends by direct ways, would do it by a trick and circumvention; and the mischief of it is, a cunning trick helps but once, but hinders ever after. No cover was ever made so big or so fine as to hide it self: no body was ever so cunning as to conceal their being so: and when they are once discovered, everybody is shy, everybody distrustful of crafty men; and all the world forwardly join to oppose and defeat them; whilst the open, fair, wise man has everybody to make way for him, and goes directly to his business. To accustom a child to have true

notions of things, and not to be satisfied till he has them; to raise his mind to great and worthy thoughts, and to keep him at a distance from falsehood and cunning, which has always a broad mixture of falsehood in it; is the fittest preparation of a child for wisdom.The rest, which is to be learn'd from time,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and an acquaintance with men, their tempers and designs, is not to be expected in the ignorance and inadvertency of childhood, or the inconsiderate heat and unwariness of youth: all that can be done towards it, during this unripe age, is, as I have said, to accustom them to truth and sincerity; to a submission to reason; and as much as may be, to reflection on their own actions.

第140节．我对智慧的理解和一般通行的解释一样，那就是一个人在这世间能精明强干、卓有远见地处理他的事务。这是善良的天性、思维的运用和实际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是儿童难以企及的。为了让儿童向智慧迈进，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他们变得狡猾。狡猾是对智慧的拙劣模仿，同时也最远离智慧。正如猿猴外表接近人类，却缺少人所具有的特性，因此也就显得越发丑陋。狡猾是缺乏领悟力的表现，由于无法以正当的途径达到目的，就只能靠欺骗与乖张行诈实现目标。这样做的弊端在于，狡猾的手段只能得逞一次，而此后则再也没有出路。没有什么掩饰能覆盖广阔或细致入微，以至令人无所察觉；也没有人狡猾到能够隐藏他们的狡猾。一旦被人发觉，所有人都会对狡诈之人产生戒心，怀有疑虑，而整个世界也都会加入进来反对他们、攻击他们。对于坦率、正直、智慧之士，则所有人都会为其开路，他们也能直接成其所愿。应使儿童对事物产生真正的认识，不达这一目的不能满足；要提升儿童的心灵，使他们获得崇高、有价值的思想；同时还要让他们远离虚假和狡诈，因为后者具有大量不真实的成分，这就是为儿童走向智慧做的最好的准备。至于其他，则要在岁月、经验和观察中学习，通过与人交往并熟悉他们的性情与意图而获得，不能指望无知粗疏的儿童或轻率浮躁的青年能够实现。就像我所说的，在这些不成熟的年岁所能做的，就是

让他们习惯于真实与诚挚，遵从理智，并尽可能多的反省自己的行为。

Section 141-150

第141-150节

141 . The next good quality belonging to a gentleman, is good breeding. There are two sorts of ill-breeding: the one a sheepish bashfulness and the other a mis-becoming negligence and disrespect in our carriage; both which are avoided by duly observing this one rule, not to think meanly of ourselves, and not to think meanly of others.

第141节．一个绅士所拥有的另一个优点是良好的教养。不良的教养分为两种：一种是羞怯不安；另一种是放诞无礼。要避免这两种问题，就要遵循下面这条规则，那就是既不看轻自己，也不轻视他人。

142 . The first part of this rule must not be understood in opposition to humility, but to assurance. We ought not to think so well of our selves, as to stand upon our own value; and assume to ourselves a preference before others, because of any advantage we may imagine we have over them; but modestly to take what is offered, when it is our due. But yet we ought to think so well of our selves, as to perform those actions which are incumbent on, and expected of us, without discomposure or disorder, in whose presence so ever we are; keeping that respect and distance which is due to every one's rank and quality. There is often in people, especially children, a clownish shamefacedness before strangers or those above them: they are confounded in their thoughts, words,

and looks; and so lose themselves in that confusion as not to be able to do anything, or at least not to do it with that freedom and gracefulness which pleases, and makes them be acceptable. The only cure for this, as for any other miscarriage, is by use to introduce the contrary habit. But since we cannot accustom ourselves to converse with strangers and persons of quality without being in their company, nothing can cure this part of ill-breeding but change and variety of company, and that of persons above us.

第142节．前半部分不能解读为反对谦逊，以致过于自负。我们不应过于高看自己，坚持自己的重要性，或者想象自己拥有别人没有的优势，从而更具特权。而是应当安守本分，谦虚地接受他人的提议。但同时我们也要看重自己，积极履行那些我们有义务去承担而别人也期待我们去承担的职责，不论在谁面前都不心慌意乱、言行失措。同时能根据不同人的地位与身份保持适当的尊重与距离。常常有些人，特别是儿童，在陌生人或地位高于他们的人面前显示出一种上不得台面的羞怯姿态，以至思维紊乱，措辞狼狈，神情惶惑，自己在混乱中六神无主，什么也没法做，或至少在言行中失去了自如洒脱，难以让人产生好感并接纳他们。要医治这种毛病，就像纠正其他缺点一样，要通过练习使他养成与此相反的习惯。但如果我们不和陌生人以及有身份的人相处，就很难使自己习惯于与他们交往，因此治愈这种教养不良之症的唯一办法就是多和不同的人交往，特别是那些地位高于我们的人。

143 . As the before-mentioned consists in too great a concern how to behave ourselves towards others; so the other part of ill-breeding lies in the appearance of too little care of pleasing or shewing respect to those we have to do with. To avoid these two things are requisite: first, a disposition of the mind not to offend others; and secondly, the most acceptable and agreeable way of

expressing that disposition. From the one men are called civil; from the other well-fashion'd. The latter of these is that decency and gracefulness of looks, voice, words, motions, gestures, and of all the whole outward demeanour, which takes in company, and makes those with whom we may converse, easy and well pleased. This is, as it were, the language whereby that internal civility of the mind is expressed; which, as other languages are, being very much governed by the fashion and custom of every country, must, in the rules and practice of it, be learn'd chiefly from observation, and the carriage of those who are allow'd to be exactly well-bred. The other part, which lies deeper than the outside, is that general good-will and regard for all people, which makes any one have a care not to shewin his carriage any contempt, disrespect, or neglect of them; but to express, according to the fashion and way of that country, a respect and value for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rank and condition. It is a disposition of the mind that shews it self in the carriage, whereby a man avoids making any one uneasy in conversation.

第143节．以上所提到的问题在于我们太在意如何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不良教养方面的另一个问题则在于，在与人交往中太不注意尊重他人或取得他人的好感。要避免这一问题须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在意愿上不想冒犯别人；第二，以最易令人接受、最使人愉悦的方式表达这种意愿。一个人做到了第一点就被称为有礼貌；做到了第二点则被称为得体。后面这一点指的是神情、声音、言辞、行动、姿态以及整个外在风度的得体与优雅，这有助于我们与人结交，并能使和我们交往之人轻松愉快。这是一种传达内在的礼敬之心的语言，它就像所有语言一样，受不同国家的风尚与习俗左右，要懂得其规则并付诸实践，主要通过观察，从那些人们公认为有教养之人的仪态中学习。至于第一点，则比外表所体现得更为深入，它是一种对所有人的普遍善意与尊重，使一个人留心不在仪态中流露出对他人的轻蔑、不敬或忽视，而是使他根据一国的风尚和习俗，以及人们的阶层与地

位，对人表现出相应的尊敬与重视。这是通过一个人的风度举止展现出的心灵的内在气质，它不会使人在交往中让对方感到不安。

I shall take notice of four qualities that are most directly opposite to this first and most taking of all the social virtues. And from some one of these four it is, that incivility commonly has its rise. I shall set them down, that children may be preserv'd or recover'd from their ill influence.

这是所有社交美德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条，但需要注意的是，有四种类型尤其与这一点背道而驰，而无礼的言行通常都源于这四种类型中的一种。我将它们列在这里，希望儿童免受其不良影响，或从这种不良影响中挣脱出来。

(1) The first is a natural roughness, which makes a man uncomplaisant to others, so that he has no deference for their inclinations, tempers, or conditions. 'Tis the sure badge of a clown, not to mind what pleases or displeases those he is with; and yet one may often find a man in fashionable clothes give an unbounded swing to his own humour, and suffer it to justle or over-run any one that stands in its way, with a perfect indifferency how they take it. This is a brutality that everyone sees and abhors, and nobody can be easy with: and therefore this finds no place in any one who would be thought to have the least tincture of good-breeding. For the very end and business of good-breeding is to supple the natural stiffness, and so soften men's tempers, that they may bend to a compliance, and accommodate themselves to those they have to do with.

（1）第一种是天生的粗鲁，这会使一个人对别人不恭敬，从而不去考虑别人的喜好、性情或身份地位。这纯粹是乡巴佬的标志，他不去考虑什么能使和他在一起的人高兴，什么使他们不悦。你也常常能够看到一个衣着时髦之人无限度地放任自己的脾气，冲撞并侵害那些对他造成阻碍之人，丝毫不顾别人的感受。这是一种人人都能看见并厌恶的粗鲁性情，没有人能与之和平共处。因此，就算在那些被认为稍有教养的人身上，这种性情也无立足之地。因为良好教养的最终目的与任务在于软化天生的冥顽，从而使人的性情变得温和，能够放下身段迁就别人，并在与人交往中得到别人的接纳。

(2)Contemptor want of due respect, discovered either in looks, words, or gesture: this, from whomsoever it comes, brings always uneasiness with it. For nobody can contentedly bear being slighted.

（2）蔑视，或者说缺乏应有的尊重，这能够从神情、言辞或姿态中看出来，不管是谁对人表现出蔑视，总会使人感到不安，因为没有人会乐意遭人轻视。

(3)Censoriousness, and finding fault with others, has a direct opposition to civility. Men, whatever they are or are not guilty of, would not have their faults display'd and set in open view and broad day-light, before their own or other people's eyes. Blemishes affixed to any one always carry shame with them: and the discovery or even bare imputation of any defect is not borne without some uneasiness. Raillery is the most refined way of exposing the faults of others: but, because it is usually done with wit and good language, and gives entertainment to the company, people are led into a mistake, that where it keeps within fair bounds there is no incivility in it. And so the pleasantry of this sort of conversation often

introduces it amongst people of the better rank; and such talkers are favourably heard and generally applauded by the laughter of the bystanders on their side. But they ought to consider, that the entertainment of the rest of the company is at the cost of that one who is set out in their burlesque colours, who therefore is not without uneasiness, unless the subject for which he is rallied be really in itself matter of commendation. For then the pleasant images and representations which make the raillery carrying praise as well as sport with them, the rallied person also finds his account, and takes part in the diversion. But because the right management of so nice and ticklish a business, wherein a little slip may spoil all, is not every body's talent, I think those who would secure themselves from provoking others, especially all young people, should carefully abstain from raillery, which by a small mistake or any wrong turn, may leave upon the mind of those who are made uneasy by it, the lasting memory of having been piquantly, though wittily, taunted for something censurable in them.

（3）苛评并挑别人的错，这也与礼仪相背。不管一个人有错没错，他们总不愿意有人当着自己或别人的面将他们的错误在光天化日之下揭露出来，公之于众。附着在人身上的污点总会使人感到不光彩，错误一旦被发现，哪怕只是空穴来风，一个人也会有些不安。善意的玩笑是用来揭露别人错误的最微妙的方式，但是，由于它常常伴随着机智与精妙的言辞，并给在座之人带来乐趣，人们常常误以为只要不超出必要的限度，玩笑就没有什么无礼的地方。因此，地位较高的人常常以这种打趣的方式交谈，人们也爱听这样的谈话，和说话人站在一边的旁观者也总会以笑声为其喝彩。不过他们应当考虑，在座之人的欢乐是以牺牲被嘲弄之人为代价的，遭到嘲弄的人难免感到不安，除非人们打趣的是件值得赞许的事。于是玩笑中令人愉快的寓意与描述就不仅是逗趣也是嘉许，而打趣的对象既能从中得到好处，便也加入这种消遣。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正确应对这种微妙而棘手的

局面，其中一点小小的疏忽就会把事情弄糟。因此我认为，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如果保险起见不想惹恼别人，最好小心一点，别开别人的玩笑，因为稍有差池就会在那些因被打趣而感到不安的人心中留下持久的印象，使他们认为自己因为一些过错而遭到了尽管诙谐但却尖刻的嘲笑。

Besides raillery, contradiction is a sort of censoriousness wherein ill-breeding often shews itself. Complaisance does not require that we should always admit all the reasonings or relations that the company is entertain'd with, no, nor silently to let pass all that is vented in our hearing. The opposing the opinions, and rectifying the mistakes of others, is what truth and charity sometimes require of us, and civility does not oppose, if it be done with due caution and care of circumstances. But there are some people that one may observe, possessed as it were with the spirit of contradiction, that steadily, and without regard to right or wrong, oppose someone, or, perhaps, every one of the company, whatever they say. This is so visible and outrageous a way of censuring, that nobody can avoid thinking himself injur'd by it. All opposition to what another man has said, is so apt to be suspected of censoriousness, and is so seldom received without some sort of humiliation, that it ought to be made in the gentlest manner, and softest words can be found, and such as with the whole deportment may express no forwardness to contradict. All marks of respect and good will ought to accompany it, that whilst we gain the argument, we may not lose the esteem of those that hear us.

除了开玩笑，反驳也是一种挑剔别人的方式，常常体现出不良的教养。言行彬彬有礼并不是要求我们总是接受同伴的一切推断与叙述，也不是默不作声地放过我们听到的所有内容。反对别人的意见，

纠正别人的错误，这是真理与仁爱常常要求我们去做的，只要行事谨慎，考虑到具体情况，它就并不与礼仪相背。但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仿佛带着一种反对精神，总是不断地反对某个人，甚至是在座的所有人，不论是对是错，也不管他们说了什么。这是一种显而易见并且肆无忌惮的责难方式，遭到反对的人一定会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所有反对意见很容易被人疑心为一种指责，别人在接受的时候也难免觉得有些丢脸，因此在提出反对意见时态度要尽可能温和，言辞要尽可能婉转，并且整个举止风度中不要带有丝毫鲁莽和抵触。同时要尽可能地体现出尊敬与善意，这样当我们在争论中获胜的时候也不会失去对方对我们的尊重。

(4)Captiousness is another fault opposite to civility; not only because it often produces misbecoming and provoking expressions and carriage; but because it is a tacit accusation and reproach of some incivility taken notice of in those whom we are angry with. Such a suspicion or intimation cannot be borne by anyone without uneasiness. Besides, one angry body discomposes the whole company, and the harmony ceases upon any such jarring.

（4）吹毛求疵是另一种违背礼仪的错误。不仅因为它会导致言行举止不合时宜，惹人恼火，同时也因为这是我们在生别人的气时，对其无礼表现的一种无言的控诉与指责。这种怀疑或暗示任谁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忍受。此外，一个人生气会使大家都感到不安，这一点不和谐会打破整个和睦的气氛。

The happiness that all men so steadily pursue consisting in pleasure, it is easy to see why the civil are more acceptable than the useful. The ability, sincerity, and good intention of a man of weight and worth, or a real friend, seldom atone for the uneasiness that is

produced by his grave and solid representations. Power and riches, nay virtue itself, are valued only as conducing to our happiness. And therefore he recommends himself ill to another as aiming at his happiness, who, in the services he does him, makes him uneasy in the manner of doing them. He that knows how to make those he converses with easy, without debasing himself to low and servile flattery, has found the true art of living in the world, and being both welcome and valued everywhere. Civility therefore is what in the first place should with great care be made habitual to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所有人追求的幸福在于快乐满足，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礼貌周全的人比有能力的人更受欢迎。一个有身份有价值的人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所拥有的能力、真诚与善意，往往很难弥补他表面的严肃及不苟言笑所引起的不安。权力与财富，甚至是美德本身，它们之所以得到重视，只是因为能为我们带来幸福。因此，尽管一个人致力于为别人谋幸福，但在提供帮助时举止态度却令对方不安，那他也不会受到欢迎。如果一个人在与人交往时懂得如何让对方轻松惬意，同时又不降低自己的身份，显出卑躬屈膝的媚态，那他就领悟了为人处世的真谛，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受到欢迎与重视。因此，首先就要努力使儿童和青年养成礼貌周全的习惯。

144 . There is another fault in good manners, and that is excess of ceremony, and an obstinate persisting to force upon another what is not his due, and what he cannot take without folly or shame. This seems rather a design to expose than oblige: or at least looks like a contest for mastery, and at best is but troublesome, and so can be no part of good-breeding, which has no other use or end but to make people easy and satisfied in their conversation with us. This is a fault few young people are apt to fall into; but yet if they

are ever guilty of it, or are suspected to incline that way, they should be told of it, and warned of this mistaken civility. The thing they should endeavour and aim at in conversation, should be to shew respect, esteem, and good-will, by paying to everyone that common ceremony and regard which is in civility due to them. To do this without a suspicion of flattery, dissimulation, or meanness, is a great skill, which good sense, reason, and good company can only teach; but is of so much use in civil life that it is well worth the studying.

第144节．在礼仪方面还有另一种毛病，那就是繁文缛节，一门心思将别人所不应受的礼节强加在对方身上，使对方感到荒唐或惭愧。这与其说是施惠于人不如说是叫人出丑，至少也是与人争锋，充其量也不过惹人讨厌，因此算不上良好的教养，因为良好教养的功用与目的无非是使人在和我们的交往过程中感到轻松满足。很少有年轻人会犯这种错误，不过一旦他们犯了，或疑似有这种倾向，那就应当指出他们的错处，告诫他们这是一种误用的礼节。他们在交往中应当努力达到的目标就是按照恰如其分的礼节以通行的方式向每个人问候致意，从而体现出礼敬、尊重与善意。要做到这一点而不显得谄媚、做作或心怀不轨，乃是一项了不起的技能，只有判断力、理智和适宜的伙伴才能教会人这一点，但它在社交中大有用处，因此也尤其值得学习。

145 . Though the managing ourselves well in this part of our behaviour has the name of good-breeding, as if peculiarly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yet, as I have said, young children should not be much perplexed about it; I mean, about putting off their hats, and making legs modishly. Teach them humility, and to be good-natur'd, if you can, and this sort of manners will not be wanting; civility being in truth nothing but a care not to shew any slighting or contempt of

any one in conversation. What are the most allow'd and esteem'd ways of expressing this, we have above observ'd. It is as peculiar and different, in severa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s their languages; and therefore, if it be rightly considered, rules and discourses made to children about it, are as useless and impertinent, as it would be now and then to give a rule or two of the Spanish tongue to one that converses only with Englishmen. Be as busy as you please with discourses of civility to your son, such as is his company, such will be his manners. A plough-man of your neighbourhood that has never been out of his parish, read what lectures you please to him, will be as soon in his language as his carriage a courtier; that is, in neither will be more polite than those he uses to converse with: and therefore, of this no other care can be taken till he be of an age to have a tutor put to him, who must not fail to be a well-bred man. And, in good earnest, if I were to speak my mind freely, so children do nothing out of obstinacy, pride, and ill-nature, 'tis no great matter how they put off their hats or make legs. If you can teach them to love and respect other people, they will, as their age requires it, find ways to express it acceptably to everyone, according to the fashions they have been used to: and as to their motions and carriage of their bodies, a dancing-master, as has been said, when it is fit, will teach them what is most becoming. In the meantime, when they are young, people expect not that children should be over-mindful of these ceremonies; carelessness is allow'd to that age, and becomes them as well as compliments do grown people: or, at least, if some very nice people will think it a fault, I am sure it is a fault that should be over-look'd, and left to time, a tutor and conversation to cure. And therefore I think it not worth your while to have your son (as I often see children are) molested or chid about it: but where there is pride or ill-nature appearing in his carriage, there he must be persuaded or shamed out of it.

第145节．尽管我们在这方面行为得当就被称作有教养，仿佛教育产生了特别功效。但正如我说过的，年幼的儿童不应在这方面饱受困扰，我的意思是指让他们追随潮流脱帽和退步致意之类。如果你能教会儿童谦逊与和善，那他在仪态方面就不会有所缺失，因为礼仪事实上不过是留意在与人交往中不对任何人表示出藐视与轻蔑。至于以什么样的方式表明这种态度最容易为人所接受并得到好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世界各国的礼仪正如它们的语言一样都独具特色、各不相同。因此，适当考虑一下就会发现，灌输给孩子这些关于礼仪的规则与说教既无用处也与他们毫不相关，就像时不时地给一个每天只和英国人打交道的人教几条西班牙语规则一样。你尽可以专心和令郎谈论礼仪，但他的同伴什么样，他的言行举止就会变成什么样。如果你的邻居中有位农夫从未走出过教区，那不论你怎样教导他，他的言行举止仍会像个弄臣一样，而且不论其言辞或行为都不会比他寻常相交的人更有教养。因此，在儿童到了年龄去请一位教师来教导他之前，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做，而教师自身必须教养良好。如果让我自由地表达观点，那么我真心诚意地认为儿童不应去做任何顽固、傲慢、心地不良的事情，至于他是否脱帽或退步致意则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如果你能教会儿童爱他人，尊重他人，那么到了需要这样去做的年龄，他们自然会根据所习惯的方式找到表达爱与尊重的方法，并让每个人欣然接受。至于他们身体的动作与姿态，我已说过，一名舞蹈教师在适当的时候就会教会他们什么是合宜的。当儿童年纪还小，人们不会指望他们对这些礼仪特别留心，儿童随意粗心也无妨，这正与他们的年龄相合，正如成年人应当懂得寒暄问候一样。如果有些人特别讲究，认为这是一种过错，我仍确信这种错误可以忽略不计，留待岁月、教师及人际交往去纠正。因此我认为，不值得为此对令郎横加干涉或斥责（我常常见到儿童遭受这样的待遇），但如果他的举止中显示出傲慢或恶意，那就必须通过劝说或通过令其蒙羞而使其改正错误。

Though children, when little, should not be much perplexed with rules and ceremonious parts of breeding, yet there is a sort of

unmannerliness very apt to grow up with young people, if not early restrained, and that is, a forwardness to interrupt others that are speaking; and to stop them with some contradiction. Whether the custom of disputing, and the reputation of parts and learning usually given to it as if it were the only standard and evidence of knowledge, make young men so forward to watch occasions to correct others in their discourse, and not to slip any opportunity of shewing their talents: so it is, that I have found scholars most blamed in this point. There cannot be a greater rudeness, than to interrupt another in the current of his discourse; for if there be not impertinent folly in answering a man before we know what he will say, yet it is a plain declaration, that we are weary to hear him talk any longer, and have a dis-esteem of what he says; which we judging not fit to entertain the company, desire them to give audience to us, who have something to produce worth their attention. This shews a very great disrespect, and cannot but be offensive: and yet this is what almost all interruption constantly carries with it. To which, if there be added, as is usual, a correcting of any mistake, or a contradiction of what has been said, it is a mark of yet greater pride and self-conceitedness, when we thus intrude ourselves for teachers, and take upon us either to set another right in his story, or shewthe mistakes of his judgment.

尽管在儿童还小的时候不应总被种种规条和礼貌方面的繁文缛节所困扰，但有一种无礼的行为，如果不及早加以约束，就常常会随着儿童的成长而滋生，那就是在别人说话时鲁莽地插嘴，或者提出反对意见，打断别人。年轻人之所以总爱寻找时机纠正别人所说的话，丝毫不放过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或许是由于论辩之风盛行，能言善辩可以拥有博学多才的美名，于是这便成了证明学识的唯一标准。正因如此，我发现学者在这一点上最应受到指责。没有什么比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插嘴更无礼的了，在知道别人要说什么之前就接过话头，如果

这不是鲁莽而愚蠢的行为，那也明白地表示我们已对他的谈话感到腻烦，不想让他再说下去，并且觉得他所说的无足轻重，已不能够使听众感兴趣，而我们自己则能说些值得一听的话，于是便希望听众转向我们。这体现出一种极大的不敬，也难免冒犯他人，而几乎所有插嘴的行为都带有这种意味。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在插嘴之外还要去纠正别人的错误或反驳别人的观点，那就体现出一种更严重的傲慢与自负，因为我们要强为人师，误以为纠正别人说的话或揭露其判断失误是我们的职责。

I do not say this, that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no difference of opinions in conversation, nor opposition in men's discourses: this would be to take away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society, and the improvements are to be made by ingenious company; where the light is to be got from the opposite arguings of men of parts, shewing the different sides of things and their various aspects and probabilities, would be quite lost, if everyone were obliged to assent to, and say after the first speaker. 'Tis not the owning one's dissent from another, that I speak against, but the manner of doing it. Young men should be taught not to be forward to interpose their opinions, unless asked, or when others have done, and are silent; and then only by way of enquiry, not instruction. The positive asserting and the magisterial air should be avoided; and when a general pause of the whole company affords an opportunity, they may modestly put in their question as learners.

我说这些并不是认为在人际交往中不能有分歧，或者在谈话中不能有反对的声音，如果这样，就会剥夺社交所带来的最大益处，使人无法通过与有才智的人相处取得进步。才能出众之士相互辩论能够展现出事物的各个不同侧面及可能，从而启迪人心。如果每个人都被迫表示赞同，并随声附和，那么便不会带来这些好处。我所反对的并不

是持有不同意见，而是表达这种意见的方式。年轻人应当学会的是，除非别人主动问起他们的意见或人家话已经说完，否则不要太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要保持沉默，同时表现得要像是询问而不是指导别人。还要避免强硬陈词和权威态度，当在座的所有人都停下不说话，从而创造出一个机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以学习者的态度谦虚地提出自己的问题。

This becoming decency will not cloud their parts, nor weaken the strength of their reason; but bespeak the more favourable attention, and give what they say the greater advantage. An ill argument, or ordinary observation, thus introduc'd, with some civil preface of deference and respect to the opinions of others, will procure them more credit and esteem than the sharpest wit, or profoundest science, with a rough, insolent, or noisy management, which always shocks the hearers, leaves an ill opinion of the man, though he get the better of it in the argument.

这种得体的姿态既不会掩盖他们的才能，也不会减弱他们论辩的力量，而会使他们得到更多的关注与认同，使他们所说的话更占优势。即使是拙劣的论点或平庸的意见，如果能这样提出来，以一番对别人的观点表示尊敬的话为铺垫，那就能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好评与尊重。而最敏锐的才智和最深广的学识如果以粗鲁、无礼而聒噪的方式展现出来，那么即使一个人在争论中占了上风，也不免会使听众震惊，并给他们留下糟糕的印象。

This therefore should be carefully watched in young people, stopp'd in the beginning, and the contrary habit introduced in all their conversation. And the rather, because forwardness to talk, frequent interruptions in arguing, and loud wrangling, are too often

observable amongst grown people, even of rank, amongst us. The Indians, whom we call barbarous, observe much more decency and civility in their discourses and conversation, giving one another a fair silent hearing till they have quite done; and then answering them calmly, and without noise or passion. And if it be not so in this civiliz'd part of the world, we must impute it to a neglect in education, which has not yet reform'd this ancientpiece of barbarity amongst us. Was it not, think you, an entertaining spectacle, to see two ladies of quality accidentally seated on the opposite sides of a room, set round with company, fall into a dispute, and grow so eager in it, that in the heat of the controversy, edging by degrees their chairs forwards, they were in a little time got up close to one another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where they for a good while managed the dispute as fiercely as two game-cocks in the pit, without minding or taking any notice of the circle, which could not all the while forbear smiling? This I was told by a person of quality, who was present at the combat, and did not omit to reflect upon the indecencies that warmth in dispute often runs people into; which, since custom makes too frequent, education should take the more care of. There is no body but condemns this in others, though they overlook it in themselves; and many who are sensible of it in themselves, and resolve against it, cannot yet get rid of an ill custom, which neglect in their education has suffer'd to settle into an habit.

因此，在年轻人身上要特别当心这种情况，一露出苗头就要立刻制止，并使他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养成相反的习惯。在我们中间，也常常能够看到成年人急于发表意见，在争论中打断别人，并大声争辩，即使有身份的人也是如此，因此就更要留心这个问题。我们将印第安人称作野蛮人，但他们在谈话和交往中却更加文雅守礼，他们会先安静地听对方把话说完，然后再平静地做出回答，既不吵嚷，也不

激动。如果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还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只能归咎于教育的失职，以至没能纠正我们身上这一部分古老的粗野性情。假如有两位贵妇人偶然对坐于房间的两端，许多人环绕在周围，她们之间却起了争执，并愈演愈烈，在争辩得最凶的时候椅子也愈拉愈近，没一会儿就面对面站到了屋子的中间，有好一会儿工夫她们激烈地争辩，就像场上的两只斗鸡，周围的人早已忍不住发笑，她们却毫不留意，如果你见了，难道不觉得这是有趣的一幕吗？这是一个有身份的人说给我听的，争斗发生时他就在场，他也没忘回想起人们在激烈的争论中常常表现出的有失身份的言行。既然习惯常常导致这种情况出现，教育就更应该下力气去纠正。没有人不谴责别人的这种行为，但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往往视而不见。也有很多人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决心改过，但由于教育的疏漏已经使它成为一种习惯，于是便难以改正了。

146 . What has been above said concerning company, would perhaps, if it were well reflected on, give us a larger prospect, and let us see how much farther its influence reaches. 'Tis not the modes of civility alone, that are imprinted by conversation: the tincture of company sinks deeper than the out-side; and possibly, if a true estimate were made of the morality and religions of the world, we should find that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mankind received even those opinions, and ceremonies they would die for, rather from the fashions of their countries, and the constant practice of those about them, than from any conviction of their reasons. I mention this only to let you see of what moment I think company is to your son in all the parts of his life, and therefore how much that one part is to be weighed and provided for; it being of greater force to work upon him, than all you can do besides.

第146节．如果我们认真想一想上面谈到的与什么样的人交往的

问题，我们就能因此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并看到这能产生怎样更为深远的影响。人际交往使我们牢记的不仅是各种礼仪方式，我们所交往之人的品性所造成影响也不仅是外在的，而是深入内心的。如果可能，我们对世界上的道德和宗教进行一番真正的评估之后就会发现，大多数人所形成的那些他们视同生命的看法和礼仪，不是理智让他们坚信不疑，而是根据一国的风气以及他们周围人的日常行为。我提到这些只是想让你明白，同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令郎有多么重要，因此要多么重视这一点，并在这方面为其创造条件，同伴所造成的影响比你在其他方面所做的要大得多。

147 . You will wonder, perhaps, that I put learning last, especially if I tell you I think it the least part. This may seem strange in the mouth of a bookish man; and this making usually the chief, if not only bustle and stir about children, this being almost that alone which is thought on, when people talk of education, makes it the greater paradox. When I consider, what ado is made about a little Latin and Greek, how many years are spent in it, and what a noise and business it makes to no purpose, I can hardly forbear thinking that the parents of children still live in fear of the school-master's rod, which they look on as the only instrument of education; as a language or two to be its whole business. How else is it possible that a child should be chain'd to the oar seven, eight, or ten of the best years of his life, to get a language or two, which, I think, might be had at a great deal cheaper rate of pains and time, and be learn'd almost in playing?

第147节．我把学业放在最后，你或许会感到惊诧，如果我告诉你我认为这是最无关紧要的一部分，你就更要吃惊了。这话从一个读书人口中说出来或许显得奇怪，我们为孩子操心的如果不全是学业，那么学业通常也是重中之重，人们谈到教育时所想到的几乎也全是学

业，这就使得这种说法越发自相矛盾。当我想到为了让孩子学一点拉丁语和希腊语引发了多少纷扰，花费了多少年月，造成了多少无谓的喧嚣与忙乱，我就忍不住想到，孩子的父母仍然生活在教鞭的威慑之下，他们将其看作教育的唯一手段，而一两门语言就是教育的全部了。孩子要拿出生命中最美好的七年、八年甚至十年，迫不得已下苦功学一两门语言，而我认为他们不必付出如此多的时间与痛苦，就完全可以在玩耍中学到，但这怎么可能呢？

Forgive me therefore if I say, I cannot with patience think, that a young gentleman should be put into the herd, and be driven with a whip and scourge, as if he were to run the gantlet through the several classes,*ad capiendum ingenii cultum.* . What then? say you, would you not have him write and read? Shall he be more ignorant than the clerk of our parish, who takes Hopkins and Sternhold for the best poets in the world, whom yet he makes worse than they are by his ill reading? Not so, not so fast, I beseech you.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learning I allow to be necessary, but yet not the chief business. I imagine you would think him a very foolish fellow that should not value a virtuous or a wise man infinitely before a great scholar. Not but that I think learning a great help to both in well-dispos'd minds; but yet it must be confess'd also, that in others not so dispos'd, it helps them only to be the more foolish, or worse men. I say this, that when you consider the breeding of your son, and are looking out for a school-master or a tutor, you would not have (as is usual) Latin and logic only in your thoughts. Learning must be had, but in the second place, as subservient only to greater qualities. Seek out somebody that may know how discreetly to frame his manners: place him in hands where you may, as much as possible, secure his innocence, cherish and nurse up the good, and gently correct and weed out any bad inclinations, and settle in him good habits. This is the main point, and this being provided for, learning

may be had into the bargain, and that, as I think, at a very easy rate, by methods that may be thought on.

因此请你原谅，如果我说我不忍去想一个年轻绅士要被放入群体中，被鞭子驱赶着，“为了接受天才的教育”一级一级往上念，就像受刑一样。你会问，那怎么办？难道你不让他读书写字吗？我们教区里的执事以为霍普金斯和斯滕霍尔德是世界上最好的诗人，但通过他糟糕的阅读，这两位也不幸失去了本来面目，难道你希望孩子比这执事还无知吗？不是这样，我请求你不要这样性急。我承认读书、写字和学习都必不可少，但它们还并不是最主要的。我想，如果有人不懂得有德行或有智慧的人比大学者更无价，那你一定会将他看作一个极其愚蠢的家伙。我不是不认为学识对于心灵良善之人会有巨大的帮助，但我同时必须承认，对于那些心地不良之人，学识只会使他们变得更加愚蠢，更加恶劣。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当你在考虑令郎的教育问题，并为他寻找一位学校老师或家庭教师的时候，不要像通常的情况那样心里只想着拉丁语和逻辑学。学问是必需的，但它只排第二位，应从属于一些更为重要的品质。寻找一个知道如何慎重培养孩子行为习惯的人，尽可能将孩子交到这样一种人手中，他要能保护孩子的纯真，爱护并培育他的优点，温和地纠正并根除他的不良倾向，同时使他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才是最主要的一点，如果做到了这些，那么我想学问就能以一些我们能够想到的办法轻而易举地获得。

148 . When he can talk, 'tis time he should begin to learn to read. But as to this, give me leave here to inculcate again, what is very apt to be forgotten, viz. That great care is to be taken, that it be never made as a business to him, nor he look on it as a task. We naturally, as I said, even from our cradles, love liberty, and have therefore an aversion to many things for no other reason but because they are enjoin'd us. I have always had a fancy that learning might be made a play and recreation to children: and that

they might be brought to desire to be taught, if it were proposed to them as a thing of honour, credit, delight, and recreation, or as a reward for doing something else; and if they were never chid or corrected for the neglect of it. That which confirms me in this opinion is, that amongst the Portuguese, 'tis so much a fashion and emulation amongst their children, to learn to read and write that they cannot hinder them from it: they will learn it one from another, and are as intent on it, as if it were forbidden them. I remember that being at a friend's house, whose younger son, a child in coats, was not easily brought to his book (being taught to read at home by his mother) I advised to try another way, than requiring it of him as his duty; we therefore, in a discourse on purpose amongst ourselves, in his hearing, but without taking any notice of him, declared, that it was the privilege and advantage of heirs and elder brothers, to be scholars; that this made them fine gentlemen, and beloved by everybody: and that for younger brothers, 'twas a favour to admit them to breeding; to be taught to read and write, was more than came to their share; they might be ignorant bumpkins and clowns, if they pleased. This so wrought upon the child, that afterwards he desired to be taught; would come himself to his mother to learn, and would not let his maid be quiet till she heard him his lesson. I doubt not but some way like this might be taken with other children; and when their tempers are found, some thoughts be instill'd into them, that might set them upon desiring of learning, themselves, and make them seek it as another sort of play or recreation. But then, as I said before, it must never be imposed as a task, nor made a trouble to them. There may be dice and play-things, with the letters on them to teach children the alphabet by playing; and twenty other ways may be found, suitable to their particular tempers, to make this kind of learning a sport to them.

第148节．在孩子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应当开始学着读书。不过就这一点，请容许我再重申一遍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要特别当心，千万别让读书成为儿童的一项任务，或让他将读书视为一件差事。正如我说过的，我们从在摇篮中起就天然地热爱自由，因此对任何强加给我们的事物，仅仅因为它们是强加的，我们就会产生厌恶。我一直设想，可以让学习成为儿童的一种玩乐与消遣，如果把学习当作一种荣耀、光彩、快乐和逍遥的事情，当作一种对于别的事情的奖励，如果儿童从来不会因为疏忽了学业而遭到斥责或惩罚，那么他们自己或许就会渴望读书受教。有一种情况更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在葡萄牙人中，学习读书写字已成为儿童之间的一种风气和竞争，你根本无法阻止他们学习，他们彼此互相请教，专心致志，仿佛这是遭到禁止的一样。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位朋友家里，他的小儿子年纪还很幼小，他的妈妈在家教他读书，但很难让他把心思放在书本上。我建议去尝试另一种方法，不要让他把学习当作他的义务。于是，有一次我们明知他在听我们说话却假装没看见，还故意说，成为博学之人是只有继承人和长兄才能享有特权和优势，这能使他们成为优雅的绅士，得到每个人的喜爱；至于弟弟们，让他们受教育只是一种恩惠，学习读书写字本不是他们分内的事，如果他们愿意，尽可以成为蠢材和乡巴佬。这果然在这孩子身上产生了效果，此后他自觉自愿地要别人教他，主动找他的妈妈去学习，还要女仆听他念书，否则就不让她安生。我毫不怀疑，在其他儿童身上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只要了解了他们的性情，就可以让他们产生一些想法，能够让他们自己渴望学习，同时将学习视作另一种玩乐与消遣。但正如我前面说的，千万不要把学习当作一项任务强加在孩子身上，也不要让它变成孩子的烦恼。可以将字母粘在骰子上，让儿童在掷骰子的游戏中学习字母表。此外还能找到许多种适合儿童性情的方法，让他们能够把这种学习当游戏。

149 . Thus children may be cozen'd into a knowledge of the letters; be taught to read, without perceiving it to be anything but a sport, and play themselves into that which others are whipp'd for. Children should not have anything like work, or serious, laid on

them; neither their minds, nor bodies will bear it. It injures their healths; and their being forced and tied down to their books in an age at enmity with all such restraint, has, I doubt not, been the reason, why a great many have hated books and learning all their lives after. 'Tis like a surfeit, that leaves an aversion behind not to be removed.

第149节．这样一来就能诱导儿童识字，当别的孩子在鞭打之下被逼着去读书的时候，他则只是将读书看作一种游戏，一边玩一边就学会了。不应该将任何工作或严肃的事情加在孩子身上，无论是他们的身体还是心灵都难以承受。这会损害儿童的健康，当他们被迫拴在书本上的时候，他们正处于对一切这样的约束感到厌恶的年纪，我毫不怀疑，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此后一生都憎恶书本和学习的原因。这就像饮食过度一样，会留下一种以后也无法消除的反感。

150．I have therefore thought, that if play-things were fitted to this purpose, as they are usually to none, contrivances might be made to teach children to read, whils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only playing. For example, what if an ivory-ball were made like that of the royal-oak lottery, with thirty two sides, or one rather of twenty four or twenty five sides; and upon several of those sides pasted on an A, upon several others B, on others C, and on others D? I would have you begin with but these four letters, or perhaps only two at first; and when he is perfect in them, then add another; and so on till each side having one letter, there be on it the whole alphabet. This I would have others play with before him, it being as good a sort of play to lay a stake who shall first throw an A or B, as who upon dice shall throw six or seven. This being a play amongst you, tempt him not to it, lest you make it business; for I would not have him understand 'tisanything but a play of older people, and I doubt

not but he will take to it of himself. And that he may have the more reason to think it is a play, that he is sometimes in favour admitted to, when the play is done the ball should be laid up safe out of his reach, that so it may not, by his having it in his keeping at any time, grow stale to him.

第150节．因此我想，倘若没用的玩具能这样加以利用，就应该想出一些巧妙地计策诱导儿童读书，而他们则以为自己不过是在做游戏。例如，我们何不仿照皇家橡树彩票抽签用的圆球，做一个三十二面或者二十四五面的象牙圆球，在某几面上贴上A，在剩下的面上分别贴上B、C、D？我想一开始最好只贴这四个字母，或者两个字母，当孩子完全认识了之后，再加上别的字母，直到每一面上都贴上不同的字母，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字母表了。可以让人在孩子面前玩这个小球，打赌看谁先掷出一个A或者B，这就像别人掷骰子时打赌看谁先掷出六或七一样好玩。这只是你们之间的一种游戏，不要诱使孩子加入，否则你就让它变成了一项任务。我希望孩子只是将其理解为一种成人间的游戏，无疑他自己也会喜欢上它。为了使孩子更加相信这只是一种游戏，相信他只是因为得到别人的喜爱才被允许加入，游戏结束时就要把小球收起来，放在孩子够不着的地方，这样他就不会因为能一直把小球留在身边而渐渐对它失去新鲜感。

Section 151-160

第151-160节

151 . To keep up his eagerness to it, let him think it a game belonging to those above him: and when, by this means, he knows the letters, by changing them into syllables, he may learn to read, without knowing how he did so, and never have any chiding or trouble about it, nor fall out with books because of the hard usage and vexation they have caus'd him. Children, if you observe them, take abundance of pains to learn several games, which, if they should be enjoined them, they would abhor as a task and business. I know a person of great quality (more yet to be honoured for his learning and virtue than for his rank and high place) who by pasting on the six vowels (for in our language Y is one) on the six sides of a die, and the remaining eighteen consonants on the sides of three other dice, has made this a play for his children, that he shall win who, at one cast, throws most words on these four dice; whereby his eldest son, yet in coats, has play'd himself into spelling, with great eagerness, and without once having been chid for it or forced to it.

第151节．要使他保持热情，就要让他以为这是一种属于大人的游戏。等他由此学会了字母之后，就换成音节，他就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读书。不但没有因此而受到斥责或感到困难，也不会因为书本使他们遭罪并带来烦恼而厌恶书本了。如果你观察儿童，就会发现，他们学习各种游戏的时候从来不怕麻烦。但如果是被要求当作任务和工作去完成，则会非常抵触。我有一位贤兄（不过主要是因其学问和德行而受到尊敬，而非其地位和身份），他的做法是把六个元音字母

（因为在我们的语言中Y也是元音）粘在骰子的六个面上，剩下的十八个辅音字母粘在另外三个骰子的面上，为孩子设计了这样一个游戏。谁一次用四个骰子掷出的单词最多就获胜。他的长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带着极大的热情在游戏中学会了拼写，从来没有因此吃过苦或受到逼迫。

152．I have seen little girls exercise whole hours together and take abundance of pains to be expert at dibstones as they call it. Whilst I have been looking on, I have thought it wanted only some good contrivance to make them employ all that industry about something that might be more useful to them; and methinks 'tis only the fault and negligence of elder people that it is not so. Children are much less apt to be idle than men; and men are to be blamed if some part of that busy humour be not turned to useful things; which might be made usually as delightful to them as those they are employed in, if men would be but half so forward to lead the way, as these little apes would be to follow. I imagine some wise Portuguese heretofore began this fashion amongst the children of his country, where I have been told, as I said, it is impossible to hinder the children from learning to read and write: and in some parts of France they teach one another to sing and dance from the cradle.

第152节．我见过一些小女孩一连几个小时凑在一起，玩一种她们称为掷石子的游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是要成为这方面的高手。我一边观察一边想，如果有一些好的发明，儿童就能把所有这些努力花在更为有用的事情上。事实不令人满意只能归咎于长辈的错误和疏忽。儿童远远没有成年人那样爱偷懒，如果这种忙碌的天性没能完全引导到有用的事情上，大人必须承担责任。这些有用的事情通常应当像儿童原本在做的事情一样给他们带来愉悦。如果大人能够至少拿出

一半的心思来以身作则，儿童一定会乐于追随。我相信一些明智的葡萄牙人在本国儿童中间建立了这种风气，如前所述，我听说在那里阻止儿童学会阅读和书写是不可能的。在法国的部分地区，儿童从小就相互学习歌唱和舞蹈。

153 . The letters pasted upon the sides of the dice, or polygon, were best to be of the size of those of the folio *Bible* , to begin with, and none of them capital letters; when once he can read what is printed in such letters, he will not long be ignorant of the great ones: and in the beginning he should not be perplexed with variety. With this die also, you might have a play just like the royal oak, which would be another variety, and play for cherries or apples, &c.

第153节．粘在骰子或多边形物体侧面的字母最好跟对开本的《圣经》字号一样大。开始不要用大写字母。一旦他能够阅读用这些字母印刷的文字时，很快就会认得大写字母，在开始的时候不必花样太多把他搞糊涂了。还可以用骰子来玩类似于皇家橡树的游戏，算是又一种变化，用樱桃或苹果等等来当赌注。

154 . Besides these, twenty other plays might be invented depending on letters, which those who like this way, may easily contrive and get made to this use if they will. But the four dice above-mention'd I think so easy and useful, that it will be hard to find any better, and there will be scarce need of any other.

第154节．除此以外，要基于字母再设计二十款其他的游戏也是可能的。热衷于这种办法的人如果有想法，很容易就能有所创造，并付诸实施。不过上面提到的四个骰子的游戏我认为既简单又有效，恐

怕很难找出更好的办法来，也没必要再用别的方法了。

155 . Thus much for learning to read, which let him never be driven to, nor chid for; cheat him into it if you can, but make it not a business for him. 'Tis better it be a year later before he can read, than that he should this way get an aversion to learning. If you have any contest with him, let it be in matters of moment, of truth, and good nature; but lay no task on him about A B C. Use your skill to make his will supple and pliant to reason: teach him to love credit and commendation; to abhor being thought ill or meanly of, especially by you and his mother, and then the rest will come all easily. But I think if you will do that, you must not shackle and tie him up with rules about indifferent matters, nor rebuke him for every little fault, or perhaps some that to others would seem great ones; but of this I have said enough already.

第155节．关于学习阅读已经谈了不少，无非就是不要用逼迫或斥责的办法，而是尽可能循循善诱，但是绝对不要让他觉得是个任务。与其因此使他对学习心生厌恶，那么宁可推迟一年再开始教他阅读。如果你要与他斗智斗勇，一定是针对重要的、关乎真理和良好秉性的事情，而不是非得把学习字母作为他的任务。要讲求技巧，使他服从理性，教他热爱名誉和嘉奖，厌恶被人误解或鄙视，尤其在意你和他的母亲的态度。做到这一点，其他的自不必担心。但是我想如果你打算这么做，就不要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过多地用规则去束缚他，也不要稍有闪失，或者遇到别人可能会大惊小怪的事情，就横加指责。不过这一点前文已经阐述充分。

156 . When by these gentle ways he begins to read, some easy pleasant book, suited to his capacity, should be put into his hands,

wherein the entertainment that he finds might draw him on, and reward his pains in reading, and yet not such as should fill his head with perfectly useless trumpery, or lay the principles of vice and folly. To this purpose, I think *Aesop's Fables* the best, which being stories apt to delight and entertain a child, may yet afford useful reflections to a grown man; and if his memory retain them all his life after, he will not repent to find them there, amongst his manly thoughts and serious business. If his *Aesop* has pictures in it, it will entertain him much the better, and encourage him to read, when it carries the increase of knowledge with it: for such visible objects children hear talked of in vain and without any satisfaction whilst they have no ideas of them; those ideas being not to be had from sounds, but from the things themselves or their pictures. And therefore I think as soon as he begins to spell, as many pictures of animals should be got him as can be found, with the printed names to them, which at the same time will invite him to read, and afford him matter of enquiry and knowledge. *Reynard the Fox* is another book I think may be made use of to the same purpose. And if those about him will talk to him often about the stories he has read, and hear him tell them, it will, besides other advantages, add encouragement and delight to his reading, when he finds there is some use and pleasure in it. These baits seem wholly neglected in the ordinary method; and 'tis usually long before learners find any use or pleasure in reading, which may tempt them to it, and so take books only for fashionable amusements, or impertinent troubles, good for nothing.

第156节．照此方法慢慢引导他开始阅读的时候，应当为他准备一些简单轻松、适合其水平的读物。这样他就乐在其中，不但愿意读下去而且还能让阅读的辛苦得到回报。但是不要选那些华而不实不能给他带来收获的读物，或者可能埋下恶习和愚蠢种子的书。这方面我

认为《伊索寓言》最佳。书中的故事既带给儿童愉悦和快乐，也能给成人有用的启发。如果长大以后还能记得，也绝不会因为头脑中除了成熟的思想和严肃的工作以外，还对这些故事留有印象而后悔。如果《伊索寓言》带有插图，就更能激发儿童的兴趣，鼓励他们读下去，更好地传达其中的知识。因为耳听为虚，如果对这些形象化的物体一无所知，就无法让他们满足。而那些概念并非从声音中而来，只能从事物本身或图片中来。因此我认为一旦孩子学会拼写，就应当向他展示所有能找到的动物图片，旁边印有动物的名称。这样就能同时诱导孩子去阅读，并把提问和求知的素材提供给孩子。我觉得《列那狐》也可用于当下的目的。如果周围的人能经常跟孩子讨论，听他讲那些读到的故事，这会带来多方面的益处。比如让孩子发现阅读既有用又有趣，从而深受鼓舞，并越发觉得兴趣盎然了。常见的做法似乎完全忽略了这些诱导方式。于是通常读者要事隔很久之后才能在阅读中发现用处和乐趣，从而引发兴趣，因此只把书本当作时髦的消遣，或者无谓的麻烦，总之一无是处。

157 . *The Lord's Prayer* , *the Creeds* , and *Ten Commandments* , 'tis necessary he should learn perfectly by heart; but, I think, not by reading them himself in his primer, but by somebody's repeating them to him, even before he can read. But learning by heart, and learning to read, should not I think be mix'd, and so one made to clog the other. But his learning to read should be made as little trouble or business to him as might be.

第157节 . 《主祷文》、《教义》和《十诫》有必要熟记于心。但我认为不应让他自己通过识字课本阅读，而应当别人反复读给他听，甚至在他识字之前就开始。不过背诵和学会阅读我认为不能混淆，以免相互阻碍。学习阅读时应当尽量为他减少麻烦或者避免作为任务来布置。

What other books there are in English of the kind of those above-mentioned, fit to engage the liking of children, and tempt them to read, I do not know: but am apt to think, that children being generally delivered over to the method of schools, where the fear of the rod is to inforce, and not any pleasure of the employment to invite them to learn, this sort of useful books, amongst the number of silly ones that are of all sorts, have yet had the fate to be neglected; and nothing that I know has been considered of this kind out of the ordinary road of the horn-book, primer, psalter, *Testament* , and *Bible* .

我并不知道还有哪些英文书籍适合孩子口味，能够引导孩子。但是我觉得孩子被交给学校，接受的是严厉的被动的教育，而不会有丝毫的乐趣来激发兴趣。因此这类有用的读物很难不被埋没在各种愚蠢的读物中间。除了常见的角帖书、初级读物、诗篇、《圣约书》和《圣经》外，据我所知这方面学校还没有考虑过别的素材。

158 . As for the *Bible* , which children are usually employ'd in to exercise and improve their talent in reading, I think the promiscuous reading of it through by chapters as they lie in order, is so far from being of any advantage to children, either for the perfecting their reading, or principling their religion, that perhaps a worse could not be found. For what pleasure or encouragement can it be to a child to exercise himself in reading those parts of a book where he understands nothing? And how little are *the law of Moses* , *the song of Solomon* , *the prophecies in the Old* , and *the Epistles* and *Apocalypse* in the *New Testament* , suited to a child's capacity? And though the history of *the Evangelists* and *the Acts* have something easier, yet, taken altogether, it is very disproportional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ldhood. I grant that the principles of religion

are to be drawn from thence, and in the words of the scripture; yet none should be propos'd to a child, but such as are suited to a child's capacity and notions. But 'tis far from this to read through the whole *Bible* , and that for reading's sake. And what an odd jumble of thoughts must a child have in his head, if he have any at all, such as he should have concerning religion, who in his tender age reads all the parts of the *Bible* indifferently as the word of God without any other distinction!I am apt to think, that this in some men has been the very reason why they never had clear and distinct thoughts of it all their lifetime.

第158节．《圣经》通常用于帮助儿童练习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想按照章节顺序囫囵吞枣地阅读对于孩子来说益处不大。不管是从完善阅读还是灌输宗教原则的角度来说，都找不到一个更糟糕的阅读方法了。试想，如果孩子对一些章节不明就里，又如何从中获得趣味或鼓舞呢？凭借儿童的能力，又如何能够理解《摩西律》、《雅歌》、《旧约》中的语言，或是《新约》中的《使徒书》和《启示录》呢？尽管《福音书》的历史和《使徒行传》中有些容易的内容，但是全部放在一起，还是与儿童的理解力是极其不相称的。我同意宗教的原则应当从这些读物中，从宗教典籍中学习。但是只有那些适合儿童阅读能力和认知水平的部分才应当作为材料。但是从头到尾阅读整个《圣经》不仅与此目的相悖，也无法达到训练阅读的目的。如果一个小孩子把《圣经》从头读到尾，只知道是上帝的指示而不求甚解，那么他的头脑中即使有关于宗教的想法，这些想法又该有多么混乱奇怪！我猜想这正是有些人一辈子都不能明确地理解宗教的原因所在。

159 . And now I am by chance fallen on this subject, give me leave to say, that there are some parts of the *Scripture* which may be proper to be put into the hands of a child to engage him to read; such as are the story of Joseph and his brethren, of David and

Goliath, of David and Jonathan, &c. and others that he should be made to read for his instruction, as that, What you would have others do unto you, do you the same unto them; and such other easy and plain moral rules, which being fitly chosen, might often be made use of, both for reading and instruction together; and so often read till they are throughly fixed in the memory; and then afterwards, as he grows ripe for them, may in their turns on fit occasions be inculcated as the standing and sacred rules of his life and actions. But the reading of the whole *Scripture* indifferently, is what I think very inconvenient for children, till after having been made acquainted with the plainest fundamental parts of it, they have got some kind of general view of what they ought principally to believe and practise; which yet, I think, they ought to receive in the very words of the scripture, and not in such as men prepossess'd by systems and analogies are apt in this case to make use of and force upon them. Dr. Worthington, to avoid this, has made a catechism, which has all its answers in the precise words of the *Scripture* ; a thing of good example, and such a sound form of words as no Christian can except against as not fit for his child to learn. Of this, as soon as he can say *the Lord's Prayer* ,*Creed* , *the Ten Commandments* , by heart, it may be fit for him to learn a question every day, or every week, as his understanding is able to receive and his memory to retain them. And when he has this catechism perfectly by heart, so as readily and roundly to answer to any question in the whole book, it may be convenient to lodge in his mind the remaining moral rules scatter'd up and down in the *Bible* , as the best exercise of his memory, and that which may be always a rule to him, ready at hand, in the whole conduct of his life.

第159节．既然现在谈到了这个话题，就容我再说一点。《圣经》的一些部分适合交到孩子手里，让他去读，比如约瑟和他的兄弟

的故事、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大卫和约拿单的故事，以及类似的其他可以让他受到教育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诉以己所欲、施之于人的道理和其他浅显易懂的道德准则。悉心挑选无论对阅读本身还是思想上的启发都是有好处的。而且要让孩子反复去读，直到印象深刻。随着孩子不断成熟，要适时地加以强调，使之成为立身之根本，行动之依据。但是我认为漫不经心地通读《圣经》是不适合儿童的。在对最直白的基本章节有所了解之后，儿童才能对他们应当相信和实践的部分有一种整体的观念。而且我认为应当阅读原典，而不是那些对种种体系和类比先入为主之人希望在此加以利用并强加于人的著述。沃辛顿博士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编写了一部教义问答，所有的回答都是《圣经》的原文，不失为可资借鉴的榜样。况且如此可靠的叙述是任何基督教徒都不容错过的，决不会认为不适合孩子学习。到了可以背诵《主祷文》、《教义》和《十诫》的年纪，就可以教他每天或者每周学习一个问题，具体安排视他接受和记忆的程度而定。等到他把教义问答熟记在心，对书中涉及的任何问题都能对答如流的时候，就可以让他接触《圣经》中其他零散分布的道德准则。这既是对记忆力最好的训练，也是他一生受用，如影随形的行为准则。

160 . When he can read English well, it will be seasonable to enter him in writing: and here the first thing should be taught him is to hold his pen right; and this he should be perfect in before he should be suffered to put it to paper: For not only children but anybody else that would do anything well, should never be put upon too much of it at once, or be set to perfect themselves in two parts of an action at the same time, if they can possibly be separated. I think the Italian way of holding the pen between the thumb and the forefinger alone, may be best; but in this you may consult some good writing-master, or any other person who writes well and quick. When he has learn'd to hold his pen right, in the next place he should learn how to lay his paper, and place his arm and body to it. These practices being got over, the way to teach him

to write without much trouble, is to get a plate graved with the characters of such a hand as you like best: but you must remember to have them a pretty deal bigger than he should ordinarily write; for every one naturally comes by degrees to write a less hand than he at first was taught, but never a bigger. Such a plate being graved, let several sheets of good writing-paper be printed off with red ink, which he has nothing to do but go over with a good pen fill'd with black ink, which will quickly bring his hand to the formation of those characters, being at first shewed where to begin, and how to form every letter. And when he can do that well, he must then exercise on fair paper; and so may easily is brought to write the hand you desire.

第160节．英文阅读掌握之后，就是时候教他写字了。首要之事就是教他正确的握笔方式，直到完全掌握以后才允许在纸上写。因为不光儿童，任何人要想做好一件事情都不能急于求成。如果一个动作可以分解为两部分，就不可能指望一次就将这两部分都做到完美。我认为意大利的握笔法或许最佳，把笔夹在拇指和食指间。当然这一点你也可以咨询那些书写大家，或者其他写得又好又快的人，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掌握了正确的握笔方法之后，就可以学习如何铺陈纸张，如何调整手臂和身体的姿势。这些步骤完成后，一个简便的教他写字的方法，就是找一块刻字板，刻上你最喜欢的字体。但是要记住，板书要比他通常写的字大。因为跟初学书写时相比，每个人的字都会自然而然地逐步缩小，而不是变大。刻字板做好后，找几张上好的纸张，把字用红墨水拓印下来。教他不用管别的，只需要拿一支吸满黑墨水的笔描红字即可。开始的时候要示范给他看从哪里起笔，如何构造每一个字母，这样他就能迅速地使他的手学会写出这些字。这一点掌握以后，就可以继续在普通的纸张上练习，轻松地学会你想要他学习的字体。

Section 161-170

第161-170节

161 . When he can write well and quick, I think it may be convenient not only to continue the exercise of his hand in writing, but also to improve the use of it farther in drawing; a thing very useful to a gentleman in several occasions; but especially if he travel, as that which helps a man often to express, in a few lines well put together, what a whole sheet of paper in writing would not be able to represent and make intelligible. How many buildings may a man see, how many machines and habits meet with, the ideas whereof would be easily retain'd and communicated by a little skill in drawing; which being committed to words, are in danger to be lost, or at best but ill retained in the most exact descriptions? I do not mean that I would have your son a perfect painter; to be that to any tolerable degree, will require more time than a young gentleman can spare from his other improvements of greater moment. But so much insight into perspective and skill in drawing, as will enable him to represent tolerably on paper anything he sees, except faces, may, I think, be got in a little time, especially if he have a genius to it; but where that is wanting, unless it be in the things absolutely necessary, it is better to let him pass them by quietly, than to vex him about them to no purpose: and therefore in this, as in all other things not absolutely necessary, the rule holds, nil invita Minerva.

第161节．等他字写得又好又快的时候，我想就可以趁热打铁，一边继续练习写字，一边教他画画。绘画对于绅士来说有诸多方面的

益处，尤其是在旅行途中，常常可以寥寥数笔，就表达出心中所感，比满纸的长篇大论更准确，也更容易让人理解。不管看到了多少建筑、见识了多少风土人情，只需要掌握些许绘画技巧，就可以轻松地记录和传达见闻和感想。若要诉诸文字，则恐怕有所损失，即使描述得十分精确，给人的印象也不深刻。我这么说并非是要让令郎成为技艺高超的画家。要达到画家最基本的要求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年轻的绅士因为要在其他更重要的方面提高修养，所以分身乏术。而掌握基本的绘画鉴赏力和技巧，能把人像以外的东西差强人意地临摹出来，我想花不了多少时间，若他有些天赋就更是如此。但若是他没什么天赋，除非是不可或缺的事情，最好就顺其自然，不必无端使其烦恼。因此绘画这件事，跟其他并非必要之事一样，遵循一个原则，即不要违背天性。

Short-hand, an art, as I have been told, known only in England, may perhaps be thought worth the learning, both for dispatch in what men write for their own memory, and concealment of what they would not have lie open to every eye. For he that has once learn'd any sort of character, may easily vary it to his own private use or fancy, and with more contraction suit it to the business he would employ it in. Mr. Rich's, the best contriv'd of any I have seen, may, as I think, by one who knows and considers grammar well, be made much easier and shorter. But for the learning this compendious way of writing, there will be no need hastily to look out a master; it will be early enough when any convenient opportunity offers itself at any time, after his hand is well settled in fair and quick writing. For boys have but little use of short hand, and should by no means practise it till they write perfectly well, and have throughly fixed the habit of doing so.

我听说速记只有在英国才被当作值得学习的技能。速记既可以帮

助人们迅速记下他们需要记忆的内容，也可以隐藏他们不愿意公之于世的内容。因为无论是谁，只要掌握了某种文字，都可以根据需要或想象轻松地进行变化，再加上更加简略的记法就可以运用到工作中去。在我见过的各种速记法中，里奇先生的最为巧妙。而且我认为，如果能对语法了如指掌，还可以使其更容易和简短。但是不必着急地为了学习这种简约书写的方法而寻找导师。等到时机成熟，孩子已经可以得心应手地快速书写时去学习便可。因为小孩子极少用到速记，因此大可不必在熟练书写、养成好习惯之前过早地练习这种技能。

162．As soon as he can speak English, 'tis time for him to learn some other language. This nobody doubts of, when French is propos'd. And the reason is, because people are accustomed to the right way of teaching that language, which is by talking it into children in constant conversation, and not by grammatical rules. The Latin tongue would easily be taught the same way, if his tutor, being constantly with him, would talk nothing else to him, and make him answer still in the same language. But because French is a living language, and to be used more in speaking, that should be first learned, that the yet pliant organs of speech might be accustomed to a due formation of those sounds, and he gets the habit of pronouncing French well, which is the harder to be done the longer it is delay'd.

第162节．孩子一旦学会说英语，就是时候教他另一门语言了。那么选择法语，应该不会有任何异议。原因在于大家已经对教授法语的正确方法非常熟悉，那就是不断地跟孩子说法语，而不是灌输语法规则。按照同样的方法，导师跟他不说别的，只说拉丁语，也只允许他用拉丁语作答，那么孩子也很容易学会拉丁语。但是因为法语是一门活语言，在日常对话中更常用，因此应当先学。趁发音器官适应性最强的时候掌握音节的正确读法，字正腔圆地说出法语，这一点越拖

延越难以做到。

163 . When he can speak and read French well, which in this method is usually in a year or two, he should proceed to Latin, which 'tis a wonder parents, when they have had the experiment in French, should not think ought to be learned the same way, by talking and reading. Only care is to be taken whilst he is learning these foreign languages, by speaking and reading nothing else with his tutor, that he do not forget to read English, which may be preserved by his mother or somebody else hearing him read some chosen parts of the *scripture* or other English book every day.

第163节．用这个方法一两年的功夫就可以教会孩子掌握法语的口语和阅读，此时就可以开始学习拉丁语了。奇怪的是，父母已经在法语上成功进行了尝试，但却不认为拉丁语同样应该通过对话和阅读来学习。在学习外语的时候，在导师面前无论说话还是阅读都只能运用这种外语。同时，只需要留意一点，即不可使他忘了读英文。这一点可由母亲或其他人每天听他读几段《圣经》或其他英文读物，保持水平即可。

164 . Latin I look upon a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a gentleman; and indeed custom, which prevails over everything, has made it so much a part of education, that even those children are whipp'd to it, and made spend many hours of their precious time uneasily in Latin, who after they are once gone from school, are never to have more to do with it as long as they live. Can there be anything more ridiculous, than that a father should waste his own money and his son's time in setting him to learn the Roman language, when at the same time he designs him for a trade, wherein he having no use of

Latin, fails not to forget that little which he brought from school, and which 'tis ten to one he abhors for the ill-usage it procured him? Could it be believed, unless we had everywhere amongst us examples of it, that a child should be forced to learn the rudiments of a language which he is never to use in the course of life that he is designed to, and neglect all the while the writing a good hand and casting accounts, which are of great advantage in al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to most trades indispensably necessary? But though these qualifications, requisite to trade and commerce and the business of the world, are seldom or never to be had at grammar-schools, yet thither not only gentlemen send their younger sons, intended for trades, but even tradesmen and farmers fail not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hough they have neither intention nor ability to make them scholars. If you ask them why they do this, they think it as strange a question as if you should ask them, why they go to church. Custom serves for reason, and has, to those who take it for reason, so consecrated this method, that it is almost religiously observed by them, and they stick to it, as if their children had scarce an orthodox education unless they learned Lilly's grammar.

第164节．我认为绅士必须掌握拉丁语。事实上，风俗也已经使拉丁文成为教育的一部分，而风俗的力量高于一切。以至于孩子们不学就要挨打，大量宝贵的时间都被不情愿地用在了拉丁语上。虽然他们一旦离开了学校，终其一生也不再与拉丁语有半点联系。父亲花钱让儿子花那么多时间来学习这种古罗马的语言，却要他将来从事一项完全用不上拉丁语的事业，到时非但把学校里学的忘个精光，多半还会因为学得太辛苦而对拉丁语心生厌恶。还能找出比这更荒唐可笑的事情来吗？若不是身边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我们能相信这是事实吗？孩子一边被逼着学习一门对他们的未来毫无用处的语言的基础知识，一边忽略了书写和计算这样在任何时候都很重要，对多数职业来说都不可或缺的技能。但是尽管这些商贸活动中必备的本领极少或根本无

法从文法学校获得，人们却仍然趋之若鹜。不光那些想把儿子往商业方面培养的绅士送来了他们的公子，生意人和农民虽然既无意愿也没有能力把儿子培养成学者，也选择把他们送进文法学校。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就好像你在问他们为什么去教堂。原本习俗是服务于理性的，对于那些把习俗当作理性的人来说，习俗已经让这种做法变得神圣不由争辩，几乎像宗教一样严格遵守并坚信不疑，似乎不学会流利语法就不能算受到了正统教育似的。

165 . But how necessary soever Latin be to some, and is thought to be to others to whom it is of no manner of use and service; yet the ordinary way of learning it in a grammar-school is that which having had thoughts about I cannot be forward to encourage. The reasons against it are so evident and cogent, that they have prevailed with some intelligent persons to quit the ordinary road, not without success, though the method made use of was not exactly what I imagine the easiest, and in short is this. To trouble the child with no grammar at all, but to have Latin, as English has been, without the perplexity of rules, talked into him; for if you will consider it, Latin is no more unknown to a child, when he comes into the world, than English: and yet he learns English without master, rule, or grammar; and so might he Latin too, as Tully did, if he had some body always to talk to him in this language. And when we so often see a French woman teach an English girl to speak and read French perfectly in a year or two, without any rule of grammar, or anything else but prattling to her, I cannot but wonder how gentlemen have overseen this way for their sons, and thought them more dull or incapable than their daughters.

第165节．但是无论拉丁语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如何必要，又被另一些其实根本用不到也不需要拉丁语的人认为怎样必要，文法学校采取的学习拉丁语的方法我是不敢苟同的。反对的理由明显且充分，那就是一部分有识之士已经放弃了惯常的做法，虽然他们采用的方法未必是我认为最简单的，但也获得了成功。简单来说，方法如下。完全不要用语法去折腾孩子，而是让他们像学英语一样，完全不受规则的束缚，直接用拉丁语对话。因为如果你静下来想一想，拉丁语对初生的孩子而言，并不比英语更加陌生。既然学英语可以无师自通，不需要什么规则和语法，那么拉丁语也一样。就像塔利一样，只要经常有人跟他说这种语言就能学会。我们常常看到，由法国女子来教英国小姑娘法语，用不了一两年的时间，不管是说话还是阅读就可以很流畅了。教的时候根本没有刻意去谈语法规则或别的东西，只是闲聊而已。我不明白绅士们为何不用同样的方法来培养儿子，是不是因为儿子不如女儿机灵能干。

166 . If therefore a man could be got, who himself speaking good Latin, would always be about your son, talk constantly to him, and suffer him to speak or read nothing else, this would be the true and genuine way, and that which I would propose, not only as the easiest and best, wherein a child might, without pains or chiding, get a language, which others are wont to be whipt for at school six or seven years together: but also as that, wherein at the same time he might have his mind and manners formed, and he be instructed to boot in several sciences, such as are a good part of geography, astronomy, chronology, anatomy, besides some parts of history, and all other parts of knowledge of things that fall under the senses and require little more than memory. For there, if we would take the true way, our knowledge should begin, and in those things be laid the foundation; and not in the abstract notions of logic and metaphysics, which are fitter to amuse than inform the understanding in its first setting out towards knowledge. When

young men have had their heads employ'd a while in those abstract speculations without finding the success and improvement, or that use of them, which they expected, they are apt to have mean thoughts either of learning or themselves; they are tempted to quit their studies, and throw away their books as containing nothing but hard words and empty sounds; or else, to conclude, that if there be any real knowledge in them, they themselves have not understandings capable of it. That this is so, perhaps I could assure you upon my own experience. Amongst other things to be learned by a young gentleman in this method, whilst others of his age are wholly taken up with Latin and languages, I may also set down geometry for one; having known a young gentleman, bred something after this way, able to demonstrate several propositions in Euclid before he was thirteen.

第166节．因此如果能给令郎请一位精通拉丁语的人，不断地跟他讲拉丁语，除此以外不可说别的语言或者读别的文字，那么就是我所推荐的真正可靠的办法。这无疑是最简洁最有效的途径。让孩子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就能掌握一门语言，而他们的同龄人要在学校待上六七年的功夫吃尽苦头才能学会。同时还能帮助孩子启迪心智，养成良好的礼仪举止，使他能够涉猎各门科学。除了历史的一部分以外，还有比如地理、天文、年代学、解剖学的诸多内容，以及其他感官范畴内通过记忆可以掌握的全部知识。因为一旦走上正途，就开启了知识的旅程，并扎根在上面提到的领域中间，而不是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中，在心智第一次与知识发生联系的时候，这些抽象的概念更适合用来激发兴趣，而非传达信息。如果年轻人满脑子充斥着抽象的思考，过了一段时间却得不到预想的成就感和进步，或者发现任何实际的用途，就容易对学习或自身产生反感。这时要么就想要放弃学业，丢掉那些满纸术语却空洞无聊的课本，要么就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书本里真有什么真知灼见，那么就是自己不具备理解的能力。根据我的切身经验，这一点我是可以证明的。在同龄人把全部的

时间用来学习拉丁语和其他语言时，我认为年轻绅士还应当采用这种方法来学习其他事物。我认为几何学算是一件，因为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依照此法来培养，在他不到十三岁的时候，就能证明欧几里得书中的好几条定理了。

167 . But if such a man cannot be got, who speaks good Latin, and being able to instruct your son in all these parts of knowledge, will undertake it by this method; the next best is to have him taught as near this way as may be, which is by taking some easy and pleasant book, such as *Aesop's Fables* , and writ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made as literal as it can be) in one line, and the Latin words which answer each of them, just over it in another. These let him read every day over and over again, till he perfectly understands the Latin; and then go on to another fable, till he be also perfect in that, not omitting what he is already perfect in, but sometimes reviewing that, to keep it in his memory. And when he comes to write, let these be set him for copies, which with the exercise of his hand will also advance him to Latin. This being a more imperfect way than by talking Latin unto him; the formation of the verbs first, and afterwards the declensions of the nouns and pronouns perfectly learned by heart, may facilitate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genius and manner of the Latin tongue, which varies the signification of verbs and nouns, not as the modern languages do by particles prefix'd, but by changing the last syllables. More than this of grammar, it thinks he need not have, till he can read himself *Sanctii Minerva* , with Scioppius and Perizonius' notes.

第167节．但是如果找不到能说流利拉丁语，能采用这种办法在所有这些知识门类指导你儿子的人，那么就只好退而求其次，采用最接近的办法。那就是找一些简单有趣的读物，比如《伊索寓言》，英

文翻译（尽量直译）在一行，拉丁文字对应写在上一行。让他每天都反复诵读，直到理解拉丁文的意思，然后可以另找一本寓言，直至精通。对于已经熟读的内容，也不要忽略，而要时时温习，以免遗忘。学写字的时候，也可以此为蓝本。这样就不光练习了书写，也可以使他的拉丁语取得进步。与直接用拉丁语对话相比，这算是次好的办法。教的时候首先要教动词的构成，然后让他牢记名词和代词的变化，这样就能让他领悟到拉丁语的特征和习惯。与现代语言通过虚词前缀来改变动词和名词的意义不同，拉丁语通过变换最后的音节来完成。在孩子借助西欧皮尤斯和佩里佐尼乌斯的注释，能够阅读《圣米勒娃》之前，超出这一点的语法部分我认为不必让他去学。

In teaching of children, this too, I think, is to be observed, that in most cases where they stick, they are not to be farther puzzled by putting them upon finding it out themselves; as by asking such questions as these, (viz.) which is the nominative case, in the sentence they are to construe; or demanding what aufero signifies, to lead them to the knowledge what abstulere signifies, &c., when they cannot readily tell. This wastes time only in disturbing them; for whilst they are learning, and apply themselves with attention, they are to be kept in good humour, and everything made easy to them, and as pleasant as possible. Therefore, wherever they are at a stand, and are willing to go forwards, help them presently over the difficulty, without any rebuke or chiding, remembering, that where harsher ways are taken, they are the effect only of pride and peevishness in the teacher, who expects children should instantly be masters of as much as he knows; whereas he should rather consider, that his business is to settle in them habits, not angrily to inculcate rules, which serve for little in the conduct of our lives; at least are of no use to children, who forget them as soon as given. In sciences where their reason is to be exercised, I will not deny but this method may sometimes be varied, and difficulties proposed on

purpose to excite industry, and accustom the mind to employ its own strength and sagacity in reasoning. But yet, I guess, this is not to be done to children, whilst very young, nor at their entrance upon any sort of knowledge: then everything of itself is difficult, and the great use and skill of a teacher is to make all as easy as he can: but particularly in learning of languages there is least occasion for posing of children. For languages being to be learned by rote, custom and memory are then spoken in greatest perfection, when all rules of grammar are utterly forgotten. I grant the grammar of a language is sometimes very carefully to be studied, but it is not to be studied but by a grown man, when he applies himself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any language critically, which is seldom the business of any but professed scholars. This I think will be agreed to, that if a gentleman be to study any language, it ought to be that of his own country, that he may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which he has constant use of, with the utmost accuracy.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认为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通常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应该让他们自己去摸索，以至更加困惑。比如问他们这样一些问题：在他们所要分析的句子中主格是什么，或者为了说明“已经带走”是什么意思，明知他们不知“带走”的意思还非要他们回答。这样做除了徒增他们的烦恼之外还浪费时间，因为学习和专心致志的时候，应当心情舒畅，尽量使学习的内容变得轻松有趣。因此在他们陷入僵局，又想要继续向前的时候，应当马上针对困难给予帮助，而不是指责或斥责。要牢记，更加严厉的做法不过是老师的傲慢和烦躁所致，这些人指望孩子能够立刻掌握和自己一样多的知识。其实应该想到，教师的职责实则是培养学生的习惯，而不是怒气冲冲地灌输规则，因为规则在人生中作用极小。至少对儿童来说规则毫无用处，学完以后马上就忘得一干二净。就讲求运用理性的理科科学知识方面，我承认这一方法有时可以调整。可以有意提出些难题以激发他们勤奋学习，并且让他们的头脑习惯于开动脑筋，敏锐洞察，进行

推理。但是我认为，对于年纪尚幼的孩子，或者在刚接触某一类知识的时候，不要这么去做。因为在这个阶段，所有东西本身都颇有难度，教师的主要作用和水平就体现在让一切都尽可能变得简单。尤其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更不能采用逼迫的办法。因为语言是通过死记硬背、习惯培养和记忆来学会，等到能够完全抛开语法规则的时候，才能达到最高境界。我同意语法有时需要认真研究，但仅限于那些想要钻研语言、以此作为职业的学者，其他人则无需如此。我认为可以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那就是如果一个绅士想要研究任何一门语言，那么就应当是本国的语言，长期使用才能保证最精确的理解。

There is yet a further reason, why masters and teachers should raise no difficulties to their scholars; but on the contrary should smooth their way, and readily help them forwards, where they find them stop. Children's minds are narrow and weak, and usually susceptible but of one thought at once. Whatever is in a child's head, fills it for the time, especially if set on with any passion. It should therefore be the skill and art of the teacher to clear their heads of all other thoughts whilst they are learning of anything, the better to make room for what he would instill into them, that it may be received with attention and application, without which it leaves no impression. The natural temper of children disposes their minds to wander. Novelty alone takes them; whatever that presents, they are presently eager to have a taste of, and are as soon satiated with it. They quickly grow weary of the same thing, and so have almost their whole delight in change and variety. It is a contradiction to the natural state of childhood for them to fix their fleeting thoughts. Whether this is owing to the temper of their brains, or the quickness or instability of their animal spirits, over which the mind has not yet got a full command; this is visible, that it is a pain to children to keep their thoughts steady to anything. A lasting continued attention is one of the hardest tasks can be

imposed on them; and therefore, he that requires their application, should endeavour to make what he proposes as grateful and agreeable as possible; at least he ought to take care not to join any displeasing or frightful idea with it. If they come not to their books with some kind of liking and relish, 'tis no wonder their thoughts should be perpetually shifting from what disgusts them; and seek better entertainment in more pleasing objects, after which they will unavoidably be gadding. 'Tis, I know, the usual method of tutors, to endeavour to procure attention in their scholars, and to fix their minds to the business in hand, by rebukes and corrections, if they find them ever so little wandering. But such treatment is sure to produce the quite contrary effect. Passionate words or blows from the tutor fill the child's mind with terror and affrightment, which immediately takes it wholly up, and leaves no room for other impressions. I believe there is nobody that reads this, but may recollect what disorder hasty or imperious words from his parents or teachers have caused in his thoughts; how for the time it has turned his brains, so that he scarce knew what was said by or to him. He presently lost the sight of what he was upon, his mind was filled with disorder and confusion, and in that state was no longer capable of attention to anything else.

还有另一条理由说明为什么导师和教师不应当给学生制造困难，而是要帮他们铺平道路，并在他们遇到障碍的时候帮助他们进步。儿童的思想是狭窄和脆弱的，一般来说一次只能想一件事。儿童的脑子里不管在想什么，当下都只有这个想法，激发了热情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教师的本领和技巧就体现在要在儿童学习的时候，帮他们消除头脑中的一切杂念，为将要输入的东西留出空间，从而专心而刻苦地吸收知识。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无法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任何印象。儿童的心思天生就游移不定。他们只对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急切地想要尝试，但过不了多久又厌倦了。一成不变很快就让儿童感

到乏味，所以他们的乐趣差不多都来自多种多样的变化。让这种飘忽不定的思想固定下来有违儿童的天性。不管是因为心理的特性，还是精力充沛所致的躁动不安无法完全受控于头脑，显然对于儿童来说，要长久地专注于一件事是痛苦的。长期持续的注意力是对儿童提出的最艰难的任务，因此提出要求的人就要努力让提议本身尽量变得令人愉悦，至少要小心以确保不致让人产生讨厌和恐惧。如果儿童不是带着愉快的心情接触课本，就一定会不停地走神，想要逃避这些讨厌的任务，在更有趣的事物上找乐子，然后不可避免地在那些事情上虚耗光阴。据我所知，一旦发现学生稍有走神，导师通常都会提出批评并纠正，试图把他们的注意力拉回来，关注手头正在做的事情。但这一做法一定会适得其反。严厉的批评和责罚会让儿童惊恐万分，让他们满脑子都充满这种感觉，除此以外再没有空间留给别的印象。我相信读到这里，大家一定都会想起自己当年被父母或老师无端批评的时候，头脑是多么混乱。此时一时间脑子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自己或者别人都说了什么。当下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头脑混乱疑惑，根本没有能力分神去注意别的东西。

'Tis true, parents and governors ought to settle and establish their authority by awe over the minds of those under their tuition; and to rule them by that: but when they have got an ascendant over them, they should use it with great moderation, and not make themselves such scare-crows that their scholars should always tremble in their sight. Such an austerity may make their government easy to themselves, but of very little use to their pupils. 'Tis impossible children should learn anything whilst their thoughts are possessed and disturbed with any passion, especially fear, which makes the strongest impression on their yet tender and weak spirits. Keep the mind in an easy calm temper, when you would have it receive your instructions or any increase of knowledge. 'Tis as impossible to draw fair and regular characters on a trembling mind as on a shaking paper.

当然，家长和教师应该让孩子心生敬畏，从而建立和维护自己的威信，并且用这种威信去约束他们。但是一旦这种威望建立起来，就要谨慎使用，切莫把自己变成了稻草人，让学生一见到就浑身战栗。这种严厉可以让他们很容易管住学生，但收益甚微。儿童的头脑被某种情绪尤其是恐惧所占据和烦扰时，不可能学进任何东西。因为对他们柔软脆弱的精神而言，这些情绪带来的印象比任何感受都要强烈。如果想要儿童接受你的指导或吸收任何新的知识，就要让他的头脑处于放松平静的状态。这就和无法在一张抖动的纸上把字写得规整美观是一个道理。

The great skill of a teacher is to get and keep the attention of his scholar; whilst he has that, he is sure to advance as fast as the learner's abilities will carry him; and without that, all his bustle and pother will be to little or no purpose. To attain this, he should make the child comprehend (as much as may be) the usefulness of what he teaches him, and let him see, by what he has learnt, that he can do something which he could not do before; something, which gives him some power and real advantage above others who are ignorant of it. To this he should add sweetness in all his instructions, and by certain tenderness in his whole carriage, make the child sensible that he loves him and designs nothing but his good, the only way to beget love in the child, which will make him hearken to his lessons, and relish what he teaches him.

教师的重要技能就是吸引并维持学生的注意力。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就一定能够根据学生的能力迅速地带领他进步，如不这样做的话则徒劳而无所获。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应当让孩子尽可能地理解所学知识的用处。同时让他看到，已经掌握的知识让自己过去无法完成的事情变得可能，有些知识还提高了自己的能力，跟不懂的人比起来，

还获得了实实在在的优势。因此，老师讲授知识时要始终和蔼可亲，举止要温柔，让孩子体会到自己是爱护学生的，只求他取得进步。唯此才能激发儿童的热情，让他专心学业，热爱学习。

Nothing but obstinacy should meet with any imperiousness or rough usage. All other faults should be corrected with a gentle hand; and kind engaging words will work better and more effectually upon a willing mind, and even prevent a good deal of that perverseness which rough and imperious usage often produces in well-disposed and generous minds. 'Tis true, obstinacy and wilful neglects must be mastered, even though it cost blows to do it: but I am apt to think perverseness in the pupils is often the effect of frowardness in the tutor; and that most children would seldom have deserved blows, if needless and misapplied roughness had not taught them ill-nature, and given them an aversion for their teacher and all that comes from him.

除了屡教不改以外，任何问题都不能不由分说地粗暴对待。其他所有的毛病都要采取温和的方法改正。真诚和善的谈话不但会对顺从的头脑产生更好的效果，甚至还能在很大程度上预防粗暴的做法影响温良宽宏的心灵的那种顽固做派。当然，顽固不化和明知故犯必须严厉禁止，即使要用到体罚。但是我更相信，学生屡教不改往往是导师刚愎自用所致。若不是滥用的粗暴教会儿童不良的习性，让他们产生对老师的反感和由此而来的各种抵触情绪，那么大多数儿童几乎没有必要受皮肉之苦。

Inadvertency, forgetfulness, unsteadiness, and wandering of thought, are the natural faults of childhood; and therefore, where they are not observed to be wilful, are to be mention'd softly, and

gain'd upon by time. If every slip of this kind produces anger and rating, the occasions of rebuke and corrections will return so often, that the tutor will be a constant terror and uneasiness to his pupils. Which one thing is enough to hinder their profiting by his lessons, and to defeat all his methods of instruction.

粗心大意、丢三落四、反复无常和三心二意都是儿童的天性使然，因此只要不是故意的，则只需温柔地提醒，逐步地克服。如果每次一出现这种小错误，导师就大发雷霆、严厉斥责，那么过于频繁的训斥和惩戒就会让学生在面对导师时总是感到恐惧和不安。只此一项便足以阻碍他们学业的进步，任何教学方法都是徒劳无功的。

Let the awe he has got upon their minds be so tempered with the constant marks of tenderness and good will, that affection may spur them to their duty, and make them find a pleasure in complying with his dictates. This will bring them with satisfaction to their tutor; make them hearken to him, as to one who is their friend, that cherishes them, and takes pains for their good: this will keep their thoughts easy and free whilst they are with him, the only temper wherein the mind is capable of receiving new informations, and of admitting into itself those impressions, which, if not taken and retain'd, all that they and their teachers do together is lost labour; there is much uneasiness and little learning.

让学生在敬畏的同时，不时感受到老师的亲切友善，就足以使其对学习产生动力，并在遵照指示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发现乐趣。这样他们就会乐于来到导师面前，认真地听讲，就像面对一个重视自己，为了自己甘愿辛苦的朋友一样。和导师在一起的时候，思想就较为放松自由，这是唯一吸收新信息，在头脑中留下印象的心态。若无法获得

并维持这种心态，则学习就变得烦躁不安，毫无收获，师生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168 . When by this way of interlining Latin and English one with another, he has got a moderate knowledge of the Latin tongue, he may then be advanced a little farther to the reading of some other easy Latin-book, such as Justin or Eutropius; and to make the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less tedious and difficult to him, let him help himself if he pleases wit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Nor let the objection that he will then know it only by rote, fright any one. This, when well consider'd, is not of any moment against, but plainly for this way of learning a language. For languages are only to be learned by rote; and a man who does not speak English or Latin perfectly by rote, so that having thought of the thing he would speak of, his tongue of course, without thought of rule or grammar, falls into the proper expression and idiom of that language, does not speak it well, nor is master of it. And I would fain have any one name to me that tongue thatanyone can learn, or speak as he should do, by the rules of grammar. Languages were made not by rules or art, but by accident, and the common use of the people. And he that will speak them well, has no other rule but that; nor anything to trust to,but his memory, and the habit of speaking after the fashion learned from those, that are allowed to speak properly, which in other words is only to speak by rote.

第168节．通过把拉丁语和英语隔行排列的方法，学生可以对拉丁语建立基本的了解，然后逐步开始阅读其他拉丁文的简易读物，比如查士丁尼或尤特罗庇乌斯等。为了读起来没那么乏味和困难，可以让他用英译本来帮助自己阅读和理解。或许有人反对说，这样一来就只会死记硬背，其实谁也不必担心这一点。仔细想来，这种说法在任

何时候都并非是种反对，而恰恰是提倡上述学习语言的方法的。因为语言本来就是只能通过记忆习得。一个人对英文或拉丁文首先烂熟于心然后流利表达，那么在他想要表达某个想法的时候，不必去想规则或语法，舌头就能找到相应语言中恰当的词组和习语。而不肯去背诵的人，既无法说得流利，也无法精通。如果有人能举出反例我会很高兴，看有谁通过语法规则便能掌握一门语言，并流利地表达。语言并非通过规则或技巧创造，而是偶然出现，继而被人们广泛使用形成的。任何人想要学会说一门语言，也只有遵循此法。除了记忆力和模仿以外没有其他方法值得信赖，模仿说话方式的对象应该是那些言辞得体的人，换言之也就是通过记忆来学会说话。

It will possibly be asked here, is grammar then of no use? and have those who have taken so much pains in reducing several languages to rules and observations; who have writ so much about declensions and conjugations, about concords and syntaxis, lost their labour, and been learned to no purpose? I say not so; grammar has its place too. But this I think I may say, there is more stir a great deal made with it than there needs, and those are tormented about it, to whom it does not at all belong; I mean children, at the age wherein they are usually perplexed with it in grammar-schools.

这里恐怕有人会问，那么语法是否一无是处？那些绞尽脑汁用规则和观察结论来简化描述数种语言的人，那些就变格和动词变位，以及语法上的一致性和句法大做文章的人，不是白费力气了吗，他们是不是白学了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语法自有其地位。但我可以说，围绕语法引起的喧嚣大大超出了必要的程度。那些为此深受折磨的人其实根本不需要知道语法。这里我指的是那些通常在文法学校为此而感到手足无措的儿童。

There is nothing more evident, than that languages learnt by rote serve well enough for the common affairs of life and ordinary commerce. Nay, persons of quality of the softer sex, and such of them as have spent their time in well-bred company, shew us, that this plain natural way, without the least study or knowledge of grammar, can carry them to a great degree of elegancy and politeness in their language: and there are ladies who, without knowing what tenses and participles, adverbs and prepositions are, speak as properly and as correctly (they might take it for an ill compliment if I said as any country school-master) as most gentlemen who have been bred up in the ordinary methods of grammar-schools. Grammar therefore we see may be spared in some cases. The question then will be, to whom should it be taught, and when? To this I answer:

通过记忆学会一门语言，就足以应付日常的事务和普通的商贸活动。没什么比这更显而易见的道理了。不仅如此，那些身份高贵的女性，以及与教养良好的人群相伴的人也向我们证明，这种无需学习语法知识的简单自然的方法，完全可以让人获得语言上相当程度的高雅和礼貌。有些女士根本不懂时态、分词、副词或者介词，却能够非常得体而正确地表达（如果我说她们跟乡村教师说得一样好，大概会被当作讽刺），跟多数文法学校的培养出的绅士没有分别。因此我们认为语法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不学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哪些人应当学习语法，又在什么时候开始呢？关于这一点我的回答如下：

(1)Men learn languages for the ordinary intercourse of society and communication of thoughts in common life, without any farther design in the use of them. And for this purpose, the original way of learning a language by conversation not only serves well enough, but is to be preferred as the most expedite, proper and natural.

Therefore, to this use of language one may answer, that grammar is not necessary. This so many of my readers must be forced to allow, as understand what I here say, and who conversing with others, understand them without having ever been taughtth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tongue. Which I suppose is the case of incomparably the greatest part of English men, of whom I have never yet known anyone who learned his mother-tongue by rules.

（1）人们学习语言是为了日常的社会交往和平时的思想交流，除此以外并无他用。出于此目的，通常通过对话来学习语言不光收效甚佳，而且应当作为最便捷、合适和自然的方法。因此，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可以说，语法并非必要。这一点我的读者必须同意。正如你们明白我这里所说的话，在与他人交谈时，无需学会英文的语法，就能明白他们的意思。我想这符合绝大多数英国人的情形，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是通过规则学会说母语的。

(2)Others there are, the greatest part of whose business in this world is to be done with their tongues and with their pens; and to these it is convenient, if not necessary, that they should speak properly and correctly, whereby they may let their thoughts into other men's minds the more easily, and with the greater impression. Upon this account it is, that any sort of speaking, so as will make him be understood, is not thought enough for a gentleman. He ought to study grammar amongst the other helps of speaking well, but it must be the grammar of his own tongue, of the language he uses, that he may understand his own country speech nicely, and speak it properly, without shocking the ears of those it is addressed to, with solecisms and offensive irregularities. And to this purpose grammar is necessary; but it is the grammar only of their own proper tongues, and to those only who would take pains in

cultivating their language, and in perfecting their stiles. Whether all gentlemen should not do this, I leave to be considered, since the want of propriety and grammatical exactness is thought very misbecoming one of that rank, and usually draws on one guilty of such faults the censure of having had a lower breeding and worse company than suits with his quality. If this be so, (as I suppose it is) it will be matter of wonder why young gentlemen are forced to learn the grammars of foreign and dead languages, and are never once told of the grammar of their own tongues, they do not so much as know there is any such thing, much less is it made their business to be instructed in it. Nor is their own language ever proposed to them as worthy their care and cultivating, though they have daily use of it, and are not seldom, in the future course of their lives, judg'd of by their handsome or awkward way of expressing themselves in it. Whereas the languages whose grammars they have been so much employed in, are such as probably they shall scarce ever speak or write; or if, upon occasion, this should happen, they should be excused for the mistakes and faults they make in it. Would not a Chinese who took notice of this way of breeding, be apt to imagine that all our young gentlemen were designed to be teachers and professors of the dead languages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not to be men of business in their own?

（2）对于另一部分以言辞或著述为生的人而言，学习语法不说是必需的，也算是有所助益的。如果能够说得更得体和准确，就能让他人更轻松地理解自己的思想，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基于此，一个绅士仅仅让人明白他所说的话是不够的。为了更好地表达，方法之一就是研习语法。但是应当学习其母语和所使用的语法，如此可理解本国语言，并得体地表述。而不会因为文法不通，措辞不当而让人听起来刺耳。为此就有必要学习语法，但仅限母语语法，且仅适用于那些肯下苦功去提高语言、完善表达的人。是否所有绅士都不应如此，

还有待讨论。现实中，措辞不当和文法不通被认为是与绅士的身份极不相符的。谁要是犯了类似的错误，就会因为缺乏教养、交友不慎、对不起自己的身份而受到指责、感到羞愧。如果如我所想这一点属实，那么奇怪的就是，为何年轻的绅士被迫学习外语和不再使用的语言的语法，却从未学习过母语的语法。很多人对此闻所未闻，更不要说接受相应的指导了。同时，尽管每天都在使用母语，但从没有人提醒他们留意和完善这一语言是值得的。在未来的人生路上，人们又往往根据表达的顺畅或笨拙来评价他们。至于那些他们悉心钻研过语法的语言，以后却极少去说或者去写。即使偶尔使用，偶有错误和疏忽也是可以原谅的。假如一个中国人看到了这种教育方法，难道不会以为我们的年轻绅士未来都是要做教师和教授，专门研究别国那些已经不再使用的语言，而不是要成为本国的经世之才吗？

(3)There is a third sort of men, who apply themselves to two or three foreign, dead, and (which amongst us are called the) learned languages, make them their study, and pique themselves upon their skill in them. No doubt, those who propose to themselves the learning of any language with this view, and would be critically exact in it, ought carefully to study the grammar of it. I would not be mistaken here, as if this were to undervalue Greek and Latin. I grant these are languages of great use and excellency, and a man can have no place among the learned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who is a stranger to them. But the knowledge a gentleman would ordinarily draw for his use out of the Roman and Greek writers, I think he may attain without studying the grammars of those tongues, and by bare reading, may come to understand them sufficiently for all his purposes. How much farther he shall at any time be concerned to look into the grammar and critical niceties of either of these tongues, he himself will be able to determine when he comes to propose to himself the study of anything that shall require it. Which brings me to the other part of the enquiry, viz.

（3）第三种人努力学习两三种已经不再使用的和所谓学者的外语，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此为荣。毫无疑问，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任何一门语言学习，要求做到精确无误的人，应当认真钻研该门语言的语法。这里要避免一个误会，就是我无意贬低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价值。我认为这些都是有用而伟大的语言，在英国，对此一窍不通的人很难在有识之士中立足。但是绅士通常需要从罗马和希腊的作家著述中吸取的知识，我认为完全不必通过学习语法得到，通过阅读，便足以达到所需的理解。至于他是否到了某一个阶段，想要探索一下这两种语言的语法和精妙之处，那么大可以根据当时的进展和需要自行决定研究的深度。这就引出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下节的内容。

When grammar should be taught?

何时教语法？

To which, upon the premised grounds, the answer is obvious, viz.

根据前面提到的理由，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That if grammar ought to be taught at any time, it must be to one that can speak the language already; how else can he be taught the grammar of it? This at least is evident from the practice of the wise and learned nations amongst the ancients. They made it a part of education to cultivate their own, not foreign tongues. The Greeks counted all other nations barbarous, and had contempt for their

languages. And thoughthe Greek learning grew in credit amongst the Romans, towards the end of their commonwealth, yet it was the Roman tongue that was made the study of their youth: their own language they were to make use of, and therefore it was their own language they were instructed and exercised in.

如果有必要教语法，且不论什么时候教，对象都必须是那些已经会说这门语言的人，不会说这门语言的人怎么学语法呢？至少那些文明古国的通常做法就印证了这一点。他们把语法作为教育的一部分是为了提高母语，而非外语。希腊人将所有外邦都视为蛮夷，对他们的语言不屑一顾。尽管在共和国末期，罗马人敬仰希腊学问，但罗马的年轻人学的还是自己的语言。既然用的是母语，那么学习的也是母语。

But, more particularly to determine the proper season for grammar, I do not see how it can reasonably be made any one's study, but as an introduction to rhetoric; when it is thought time to put any one upon the care of polishing his tongue, and of speaking better than the illiterate, then is the time for him to be instructed in the rules of grammar, and not before. For grammar being to teach men not to speak, but to speak correctly and according to the exact rules of the tongue, which is one part of elegancy, there is little use of the one to him that has no need of the other; where rhetoric is not necessary, grammar may be spared. I know not why anyone should waste his time, and beat his head about the Latin grammar, who does not intend to be a critic, or make speeches and write dispatches in it. When any one finds in himself a necessity or disposition to study any foreign language to the bottom, and to be nicely exact in the knowledge of it, it will be time enough to take a grammatical survey of it. If his use of it be only to understand some

books writ in it, without a critical knowledge of the tongue itself, reading alone, as I have said, will attain this end, without charging the mind with the multiplied rules and intricacies of grammar.

不过，具体到学习语法的适当时机，我认为没有比作为修辞学的准备更好的选择了。只有当一个人到了需要润饰他的语言，需要比文盲说话更有文采的时候，才到了学习语法规则的时候，在此之前则毫无必要。因为语法不是为了教人说话，而是教人怎样根据一门语言的准确规则正确地说话，这是言谈优雅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无需言谈优雅，那语法对他也就没什么用处。如果没有修辞方面的需要，也就不必去学语法了。如果一个人不想当评论家，不想用拉丁文演说或写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在拉丁文语法上花费时间和心力。若需要或愿意完全掌握一门外语，乃至精湛，那么就应当深入其语法。但如果只是想读懂以这门语言所写的书籍，并不想研究语言本身，那么我已经说过，单靠阅读就能达此目的，没有必要将纷繁复杂的语法规则灌入脑中。

169 . For the exercise of his writing, let him sometimes translate Latin into English: but the learning of Latin being nothing but the learning of words, a very unpleasant business both to young and old, join as much other real knowledge with it as you can, beginning still with that which lies most obvious to the senses; such as is the knowledge of minerals, plants and animals, and particularly timber and fruit-trees, their parts, and ways of propagation, wherein a great deal may be taught a child which will not be useless to the man: but more especially geography, astronomy, and anatomy. But whatever you are teaching him, have a care still that you do not clog him with too much at once; or make anything his business but downright virtue, or reprove him for anything but vice, or some apparent tendency to it.

第169节．为了练习作文，可时常让你的孩子将拉丁文译成英文。学习拉丁语不外乎学习单词，不论对于老幼，这都是一件令人不快的工作。要尽可能地将实际知识融入拉丁语学习中，一开始可以选择那些通过感官最容易明白的知识，例如矿物、植物和动物方面的，尤其是关于林木和果树，关于它们的各个部分及繁衍方式，这就能够教会儿童很多东西，对于成年人也并非没有用处，而地理、天文学和解剖学就更应当涉及。但不论你教他什么，都必须注意不要贪多。除了纯粹的美德，不要让任何东西成为他的任务。除了恶行以及明显的为恶倾向，不要因任何事责备他。

170．But if after all his fate be to go to school to get the Latin tongue, 'twill be in vain to talk to you concerning the method I think best to be observ'd in schools; you must submit to that you find there, not expect to have it changed for your son; but yet by all means obtain, if you can, that he be not employed in making Latin themes and declamations, and least of all, verses of any kind. You may insist on it, if it will do any good, that you have no design to make him either a Latin orator or poet, but barely would have him understand perfectly a Latin author; and that you observe, those who teach any of the modern languages, and that with success, never amuse their scholars to make speeches or verses either in French or Italian, their business being language barely, and not invention.

第170节．但如果你的孩子终究注定了要去学校学习拉丁文，那我即使告诉你学校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教学方法也是枉然。你只能接受学校的规则，别指望它会为了令郎有所改变。但如果你能做到，就要尽一切可能别让他用拉丁语写作文或发表演讲，尤其不要作诗。如果有任何效果，你也许可以坚称并不打算将孩子培养成一位拉丁语演说

家或诗人，而只是希望他能完全读懂拉丁语作家的作品。并且告诉他们，据你所知，那些教授现代语言且有所成就的人从来不让他们的学生以法语或意大利语演讲或写诗。他们的任务只是学习语言，不是进行创作。

Section 171-180

第171-180节

171 . But to tell you a little more fully why I would not have him exercised in making of themes and verses. I. As to themes, they have, I confess, the pretence of something useful, which is to teach people to speak handsomely and well on any subject; which, if it could be attained this way, I own would be a great advantage, there being nothing more becoming a gentleman, nor more useful in all the occurrences of life, than to be able, on any occasion, to speak well and to the purpose. But this I say, that the making of themes, as is usual at schools, helps not one jot towards it: for do but consider what it is, in making a theme, that a young lad is employed about; it is to make a speech on some Latin saying; as Omniavincit amor; or Non licet in Bello bis peccare, &c. And here the poor lad, who wants knowledge of those things he is to speak of, which is to be had only from time and observation, must set his invention on the rack, to say something where he knows nothing; which is a sort of Egyptian tyranny, to bid them make bricks who have not yet any of the materials. And therefore it is usual in such cases for the poor children to go to those of higher forms with this petition, pray give me a little sense; which, whether it be more reasonable or more ridiculous, it is not easy to determine. Before a man can be in any capacity to speak on any subject, 'tis necessary he be acquainted with it; or else it is as foolish to set him to discourse of it, as to set a blind man to talk of colours, or a deaf man of music. And would you not think him a little crack'd, who would require another to make an argument on a moot point, who understands nothing of our laws? And what, I pray, do school-boys

understand concerning those matters which are used to be proposed to them in their themes as subjects to discourse on, to whet and exercise their fancies?

第171节．但我还可以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要让孩子以拉丁语写诗作文。首先，我承认作文看起来颇有用处，让人们学会就任何题目优雅陈词。我也承认，如果能通过作文达到这一目的，的确能得到很大的益处。对一名绅士而言，若能在任何场合言辞得体，切中肯綮，那么没有什么比这更与其相称，或者在经历生活中的种种事件时更有用的了。但是我要说，学校里通常采用的作文方法对实现这一目的毫无助益。看看年轻人在练习作文的时候都在忙些什么就知道了，无非是就某一拉丁语格言写一篇演讲词，诸如“爱情战胜一切”或“战场不允许两次犯错”等等。可怜的孩子，他对于自己要说的内容一点也不明白，因为这些只能通过阅历才能获得。于是他只能绞尽脑汁，就一些完全不了解的东西发表一通言论。这就像在埃及的暴政之下的人们，没有一点原材料，却被要求去做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可怜的孩子常常跑去找高年级的同学，并恳求道，请给我一点点想法吧。至于合理和愚蠢的成分哪样更多一些，就难以判断了。在一个人有能力对任何话题发表看法之前，他必须先了解这个题目。否则，让他发表意见就像是让盲人谈论颜色、让聋人谈论音乐一样荒谬。如果有人要求一个对我国法律一窍不通的人就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发表观点，你不觉得他有点疯了吗？为了锻炼并促进学生的想象力，他们常常被要求在作文中就某些问题发表看法，我请问他们对这些问题知道些什么呢？

172．In the next place, consider the language that their themes are made in: 'tis Latin, a language foreign in their country, and long since dead everywhere: a language which your son, 'tis a thousand to one, shall never have an occasion once to make a speech in as long as he lives after he comes to be a man; and a language wherein

the manner of expressing one's self is so far different from ours, that to be perfect in that would very little improve the purity and facility of his English stile. Besides that, there is now so little room or use for set speeches in our own language in any part of our English business, that I can see no pretence for this sort of exercise in our schools, unless it can be supposed, that the making of set Latin speeches should be the way to teach men to speak well in English extempore. The way to that, I should think rather to be this: that there should be propos'd to young gentlemen rational and useful questions, suited to their age and capacities, and on subjects not wholly unknown to them nor out of their way: such as these, when they are ripe for exercises of this nature, they should extempore, or after a little meditation upon the spot, speak to, without penning of any thing: for I ask, if we will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his way of learning to speak well, who speak best in any business, when occasion calls them to it upon any debate, either those who have accustomed themselves to compose and write down beforehand what they would say; or those, who thinking only of the matter, to understand that as well as they can, use themselves only to speak extempore? And he that shall judge by this, will be little apt to think, that the accustoming him to studied speeches and set compositions, is the way to fit a young gentleman for business.

第172节．其次，想一想这门他们用来作文的语言吧——拉丁语，一门外国的语言，一门不论在何处都死去已久的语言。对令郎而言，在他长大成人之后，他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性有机会以拉丁语发表演说。而拉丁语的表达方式和我们本国语言差异极大，因此精通拉丁语对他纯熟地运用英语也没有什么帮助。此外，在各类事务中，也很少用得着准备好的英文演说稿，因此我不知道还有何理由要在学校里进行此类练习，除非是撰写拉丁文演说词可以让人学会用英语发表精彩的即席演讲。要使人能够即席演讲，我认为方法应该是这样的：

根据年轻人的年纪和能力向他们提出一些合理而有用的问题，这些问题要既不是他们完全陌生的，也不是与他们毫不相关的。照此而行，当他们成熟到能够进行以下练习的时候，就要让他们即席演说，或者不动笔，当场思考一会儿就说。我要问，若要检验这种学习怎样精彩发言的方法效果如何，当有辩论的机会让人发表言论的时候，不论就什么问题，你觉得以下哪一种人会说得更好，是那些习惯于事先把要说的话写成讲稿的人，还是那些只是把问题略加思考，力求理解，然后就即席发表演说的人？如果以这种方法评判，一个人就不会认为，让年轻人习惯于依赖深思熟虑的演讲词和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能让他们在处理事务时游刃有余。

173 . But perhaps we shall be told, 'tis to improve and perfect them in the Latin tongue. 'Tis true, that is their proper business at school; but the making of themes is not the way to it: that perplexes their brains about invention of things to be said, not about the signification of words to be learn'd; and when they are making a theme, tis thoughts they search and sweat for, and not language. But the learning and mastery of a tongue being uneasy and unpleasant enough in itself, should not be cumbered with any other difficulties, as is done in this way of proceeding. In fine, if boys' invention be to be quicken'd by such exercise, let them make themes in English, where they have facility and a command of words, and will better see what kind of thoughts they have, when put into their own language. And if the Latin tongue be to be learned, let it be done the easiest way, without toiling and disgusting the mind by so uneasy an employment as that of making speeches joined to it.

第173节．但或许会有人说，作文是为了提高并完善儿童的拉丁语。目的没错，这正是他们在学校的任务，但作文却并不是达到这一

目的的好办法。这使得他们因为要捏造些内容来说而头脑发昏，却不在于学习词语的意思。他们在作文时绞尽脑汁所搜寻的是思想，而不是语言。不过学习并掌握一门语言本身就是一件既艰难又令人不快的事，因此就更不应该增加其他的困难去阻碍学习，就像现在所采用的方法一样。总之，如果要以这种方式开发儿童的创造力，那就让他们用英语作文，因为他们能熟练掌握英文，运用字词。当他们以自己的语言表达思想的时候，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是怎样一种思想。如果要学拉丁文，那就以最简单的方法去学，不要以写讲稿之类的困难方式让他们吃苦受累，使其从内心感到厌恶。

174 . If these may be any reasons against children's making Latin themes at school, I have much more to say, and of more weight, against their making verses; verses of any sort: for if he has no genius to poetry, 'tis the most unreasonable thing in the world to torment a child and waste his time about that which can never succeed; and if he have a poetic vein, 'tis to me the strangest thing in the world that the father should desire or suffer it to be cherished or improved. Methinks the parents should labour to have it stifled and suppressed as much as may be; and I know not what reason a father can have to wish his son a poet, who does not desire to have him bid defiance to all other callings and business; which is not yet the worst of the case; for if he proves a successful rhymer, and gets once the reputation of a wit, I desire it may be considered what company and places he is like to spend his time in, nay, and estate too: for it is very seldom seen, that any one discovers mines of gold or silver in Parnassus. 'Tis a pleasant air, but a barren soil; and there are very few instances of those who have added to their patrimony by anything they have reaped from thence. Poetry and gaming, which usually go together, are alike in this too, that they seldom bring any advantage but to those who have nothing else to live on. Men of estates almost constantly go away losers; and 'tis

well if they escape at a cheaper rate than their whole estates, or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m. If therefore you would not have your son the fiddle to every jovial company, without whom the sparks could not relish their wine nor know how to pass an afternoon idly; if you would not have him to waste his time and estate to divert others, and contemn the dirty acres left him by his ancestors, I do not think you will much care he should be a poet, or that his school-master should enter him in versifying. But yet, if any one will think poetry a desirable quality in his son, and that the study of it would raise his fancy and parts, he must needs yet confess, that to that end reading the excellent Greek and Roman poets is of more use than making bad verses of his own, in a language that is not his own. And he whose design it is to excel in English poetry, would not, I guess, think the way to it were to make his first essays in Latin verses.

第174节．假如这些可以作为反对儿童在学校用拉丁语作文的理由，那我还要举出更多、更重要的理由反对他们用拉丁语作诗，不管是什么种类的诗。因为儿童如果天生没有诗才，那么再以作诗去折磨他并浪费他的时间就是世间最不讲道理的事；但如果儿童拥有诗人气质，做父亲的也希望或容许这种才能得到培养和提高，那这在我看来则是世间最不可理喻的事。我认为做父母的应当尽可能地去压制这种气质，我不知道做父亲的有什么理由希望他的儿子成为一位诗人，因为他不会希望孩子蔑视其他一切职业与工作。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因为一旦他证明自己是一个成功的诗人，并拥有了才子之名，我希望人们想一想他将会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人中间度过一生。此外，还要考虑财产，因为很难见到有人在“诗人之山”发现金银矿。这是一种讨人喜欢的气质，但却常常是贫瘠的土壤，很少有人能在这方面有所收获，进而去增加他们的祖产。诗歌和赌博常左右相伴，并且十分相似，那就是除了对于那些除此之外无以为生的人，它们很少给人带来任何利益。有产业的人则几乎总以利益受损而告终，如果他们得以幸

免，没有损失全部或大部分产业，那就算是不错了。因此，如果你不希望令郎成为取悦寻欢作乐者的角色——没了他这些人喝酒就没有趣味，也不知如何打发一下午的光阴；如果你不希望他浪费时间、虚耗产业只为供人消遣，同时鄙视那些祖先留下的肮脏田产，那么我不觉得你会特别费心让他成为一位诗人，或者认为应该让学校老师教他作诗。不过如果有人认为作诗是自己的儿子值得拥有的优点，并且学作诗能够提升他的想象力和才能，那他就必须承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阅读杰出的希腊和罗马诗人的作品比他用一门外语作歪诗有用得多。而如果有人打算在英文诗写作上胜于常人，那么我想他不会认为从拉丁文写诗入手会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好办法。

175 . Another thing very ordinary in the vulgar method of grammar-schools there is, of which I see no use at all, unless it be to baulk young lads in the way to learning languages, which, in my opinion, should be made as easy and pleasant as may be; and that which was painful in it, as much as possible quite removed. That which I mean, and here complain of, is, their being to learn by heart, great parcels of the authors which are taught them; wherein I can discover no advantage at all, especially to the business they are upon. Languages are to be learned only by reading and talking, and not by scraps of authors got by heart; which when a man's head is stuffed with, he has got the just furniture of a pedant, and 'tis the ready way to make him one; than which there is nothing less becoming a gentleman. For what can be more ridiculous, than to mix the rich and handsome thoughts and sayings of others with a deal of poor stuff of his own; which is thereby the more exposed, and has no other grace in it, nor will otherwise recommend the speaker, than a thread-bare russet coat would, that was set off with large patches of scarlet and glittering brocade. Indeed, where a passage comes in the way, whose matter is worth remembrance, and the expression of it very close and excellent, (as there are many

such in the ancientauthors) it may not be amiss to lodge it in the mind of young scholars, and with such admirable strokes of those great masters sometimes exercise the memories of school-boys. But their learning of their lessons by heart, as they happen to fall out in their books, without choice or distinction, I know not what it serves for, but no misspend their time and pains, and give them a disgust and aversion to their books, wherein they find nothing but useless trouble.

第175节．在文法学校中还有另外一种常见的方法，而我认为毫无用处，除非是为了妨碍年轻人学习语言。在我看来，学习语言应当尽可能地轻松愉快，尽可能地去掉那些让人伤脑筋的成分。这里我所指的并且反对的就是让学生死记硬背大量作家的作品，我看不出这有任何好处，特别是对他们的工作能有何益处。习得语言只能通过阅读和说话，而不是零星记诵一些作家的作品。如果一个人的头脑中塞满了这类东西，那他刚好有资格成为一个学究，这也是让他成为学究的现成方法，但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宜于一名绅士的了。将别人宏博、华赡的思想和言辞掺在自己低劣的学识之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笑的吗？这只会更加暴露出后者的浅薄，一个人既然没有优雅的风度，这样做也不会使他更可取，反倒像在一件褴褛的粗布衣上补上大块光芒闪耀的鲜红锦缎一样。如果读到内容值得记诵的段落，而它的表达也精妙紧凑（在古代作家的作品中有许多这样的段落），那么让年轻学生将它背下来，以伟大作家的华丽的辞藻训练他们的记忆也未尝不可。然而根据书本中恰好收录的篇目不加选择和分辨地背诵课文，我不知道这除了虚耗学生的时间和精力之外还有什么用处，由于他们只能在书本中发现无用的麻烦，便会对其产生反感与厌恶。

176 . I hear it is said, that children should be employ'd in getting things by heart, to exercise and improve their memories. I could wish this were said with as much authority of reason, as it is

with forwardness of assurance, and that this practice were established upon good observation more than old custom; for it is evident, that strength of memory is owing to an happy constitution, and not to any habitual improvement got by exercise. 'Tis true, what the mind is intent upon, and, for fear of letting it slip, often imprints afresh on itself by frequent reflection, that it is apt to retain, but still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ural strength of retention. An impression made on bees-wax or lead, will not last so long as on brass or steel. Indeed, if it be renew'd often, it may last the longer; but every new reflecting on it is a new impression; and 'tis from thence one is to reckon, if one would know how long the mind retains it. But the learning pages of Latin by heart, no more fits the memory for retention of anything else, than the graving of one sentence in lead makes it the more capable of retaining firmly any other characters. If such a sort of exercise of the memory were able to give it strength, and improve our parts, players of all other people must needs have the best memories and be the best company. But whether the scraps they have got into their heads this way, make them remember other things the better; and whether their parts be improved proportionably to the pains they have taken in getting by heart others' sayings, experience will shew. Memory is so necessary to all parts and conditions of life, and so little is to be done without it, that we are not to fear it should grow dull and useless for want of exercise, if exercise would make it grow stronger. But I fear this faculty of the mind is not capable of much help and amendment in general by any exercise or endeavour of ours, at least not by that used upon this pretence in grammar-schools. And if Xerxes was able to call every common soldier by name in his army that consisted of no less than an hundred thousand men, I think it may be guessed, he got not this wonderful ability by learning his lessons by heart when he was a boy. This method of exercising and improving the memory by toilsome

repetitions without book of what they read, is, I think, little used in the education of princes, which if it had that advantage is talked of, should be as little neglected in them as in the meanest school-boys: princes having as much need of good memories as any men living, and have generally an equal share in this faculty with other men; though it has never been taken care of this way. What the mind is intent upon and careful of, that it remembers best, and for the reason above-mentioned: to which, if method and order be joined, all is done, I think, that can be, for the help of a weak memory; and he that will take any other way to do it, especially that of charging it with a train of other peoples' words, which he that learns cares not for, will, I guess, scarce find the profit answer half the time and pains employ'd in it.

第176节．我听人说，要让儿童采用熟记的方法学习，以锻炼并提升他们的记忆力。我希望这种说法中理性的说服力大于盲目的自信，希望这样一种实践是建立在可靠的观察而不是古老的惯例之上。因为显而易见，记忆力的强度由健全的体质决定，而不是依靠练习习惯性地获得提高。的确，在一个人集中精力担心遗忘时，通过不断回忆使印象保持新鲜，他就能记住这件事，但这仍然取决于天生记忆力的强弱。蜡和铅上留下的印记不会像在铜和钢上那么长久。如果能常常强化印象，确实可以留存得更久。但每一次思索都是一个新的印象，如果想知道它在记忆中能够存留多久，就要从它印入脑海算起。但是背诵一页页的拉丁文使得记忆很难再储存任何别的事情，正如在铅板上刻上一句话后就很难再将别的字句留存在上面一样。如果这样一种训练能强化记忆力、提高我们的才能，那么那些演员就应该拥有最强的记忆力，同时成为最佳的伴侣。但是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填入头脑的零碎内容是否能使其更好地记住别的东西，才能的提高又是否和他们在记诵别人的言辞时付出的精力成正比，经验会告诉我们答案。记忆力在人生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情况下都不可或缺，做什么事都离不开它，就算训练能够增强记忆力，我们也不必担心它会因为缺乏训练

而变得迟钝或无用。不过我担心的是，任何训练或努力通常都不会对记忆力有所帮助或提高，至少文法学校不能以此为借口让学生死记硬背。薛西斯能叫出他十万余人的军队中每一个普通士兵的名字，我猜想他不是因为从小背诵课文而获得这种非凡的能力的。这种不管书本内容，通过艰苦的重复背诵训练并提高记忆力的方法，我想在君主的教育中很少采用。如果它真的具有人们所说的那些优点，那它在君主身上就应当像在最低微的学童身上一样不容忽视。君主像所有人一样需要良好的记忆力，尽管他们从没经过死记硬背的训练，但这方面的能力通常也不比普通人差。凡思想上注意并留心的事，就能记得最牢，原因我已经说过了。在此之上，如果还能注意方法与次序，我想这就对改善糟糕的记性尽了全力了。如果有人还想采用别的方法以达到这个效果，特别是在头脑中灌入一连串别人的词句，却对这些词句都不在意，我想他从中得到的益处还及不上为此付出的时间与精力的一半。

I do not mean hereby,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exercise given to children's memories. I think their memories should be employ'd, but not in learning by rote whole pages out of books, which, the lesson being once said, and that task over, are delivered up again to oblivion and neglected forever. This mends neither the memory nor the mind. What they should learn by heart out of authors, I have above mentioned: and such wise and useful sentences being once being once given in charge to their memories, they should never be suffer'd to forget again, but be often called to account for them: whereby, besides the use those sayings may be to them in their future life, as so many good rules and observations, they will be taught to reflect often, and bethink themselves what they have to remember, which is the only way to make the memory quick and useful. The custom of frequent reflection will keep their minds from running adrift, and call their thoughts home from useless inattentiveroving: and therefore I think it may do well, to give them

something every day to remember, but something still, that is in itself worth the remembering, and what you would never have out of mind, whenever you call, or they themselves search for it. This will oblige them often to turn their thoughts inwards, than which you cannot wish them a better intellectual habit.

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应对儿童的记忆力进行任何训练。我认为儿童应该使用记忆力，但不是用于整页整页地背诵书本，因为一旦课文背完了，任务完成了，他们就会把这些内容都忘得一干二净，再也不去理会它们了。这既不能改善他们的记忆力，也不能提升他们的心灵。儿童应记诵作家作品中的什么内容，我已经在前面提到过了。这些具有哲理的有用词句一旦存入儿童的记忆，就别让他们将其遗忘，而要经常让他们讲述这些词句的意思。作为有益的行为规范和观察所得的体会，这些警句除了将来会对儿童有用之外，还可以让他们学会常思考，想一想自己应当记住的是些什么，这是让记忆力敏捷有效的唯一途径。常思考的习惯可以防止儿童心思不集中，并把他们漫不经心四处游荡的思想呼唤回来。因此，我认为每天让儿童记诵一些东西会对他们有好处，不过这些东西本身要值得记忆，应当是那些不论你要求他们去说还是他们自己需要的时候，你都不希望他们忘记的内容。这就能促使儿童常常审视内心，这也是你所能希望他们养成的最好的思维习惯。

177 . But under whose care soever a child is put to be taught during the tender and flexible years of his life, this is certain, it should be one who thinks Latin and language the least part of education; one who knowing how much virtue and a well-temper'd soul is to be preferred to any sort of learning or language, makes it his chief business to form the mind of his scholars, and give that a right disposition; which if once got, though all the rest should be neglected, would in due time produce all the rest; and which, if it

be not got and settled so as to keep out ill and vicious habits, languages and sciences and all the other accomplishments of education, will be to no purpose but to make the worse or more dangerous man. And indeed whatever stir there is made about getting of Latin as the great and difficult business, his mother may teach it him herself, if she will but spend two or three hours in a day with him, and make him read the Evangelistsin Latin to her: for she need but buy a Latin *Testament* , and having got some body to mark the last syllable but one where it is long in words above two syllables, (which is enough to regulate her pronunciation, and accenting the words) read daily in the *Gospels* , and then let her avoid understanding them in Latin if she can. And when she understands the Evangelists in Latin, let her, in the same manner, read *Aesop's Fables* , and so proceed on to Eutropius, Justin, and other such books. I do not mention this, as an imagination of what I fancy may do, but as of a thing I have known done, and the Latin tongue with ease got this way.

第177节．当孩子处于柔弱稚嫩、可塑性强的年纪时，不论交由谁来管教，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教导他的人必须认识到拉丁语和语言学习是教育中最无关紧要的部分，明白培养道德与良善的心灵比任何种类的学问与语言学习都更重要，他要将工作重心放在塑造学生的心灵上，培养出良好的性情。一旦做到这一点，其余一切就算没有注意，最终也会水到渠成；但若没有做到这一点，没能将恶习拒之门外，那么语言、科学以及其他一切教育上的成就都是徒劳，只会造就一个更坏、更危险的人。尽管人们为了学拉丁文大费周章，认为这是最艰巨的任务，但如果做母亲的愿意每天花两到三个小时在孩子身上，让孩子念拉丁语的《福音书》给她听，她自己就可以教他。她只需买一本拉丁文的《新约》，让人把两个音节以上的单词的倒数第二个长音标出来（这就足以规范她的发音，以及单词的重读），每天去读《福音书》，可以不用拉丁文去理解。如果她能读懂拉丁文的《福

音书》，就让她以同样的方法去读《伊索寓言》，然后继续去读尤特罗庇乌斯、查士丁尼及其他类似的作品。我这样说并非凭空想象，而是知道有人这么做，毫不费力就学会了拉丁文。

But, to return to what I was saying: he that takes on him the charge of bringing up young men, especially young gentlemen, should have something more in him than Latin, more than even a knowledge in the liberal sciences: he should be a person of eminent virtue and prudence, and with good sense, have good humour, and the skill to carry himself with gravity, ease and kindness, in a constant conversation with his pupils. But of this I have spoken at large in another place.

还是回到我刚说过的问题上：那负责教导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绅士的人，必须具备比拉丁文更多的才能，甚至超出人文知识的范围。他应当具有卓越的品德和过人的慎重，判断力强，性情和善，在和学生的持续交往中有本事做到庄重、从容而和蔼。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别处详细讨论过了。

178 . At the same time that he is learning French and Latin, a child, as has been said, may also be enter'd in Arithmetic, Geography, Chronology, History and Geometry too. For if these be taught him in French or Latin, when he begins once to understand either of these tongues, he will get a knowledge in these sciences, and the language to boot. Geography I think should be begun with: for the learning of the figure of the globe, the situation and boundaries of the fou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hat of particular kingdoms and countries, being only an exercise of the eyes and memory, a child with pleasure will learn and retain them. And this

is so certain, that I now live in the house with a child whom his mother has so well instructed this way in geography, that he knew the limits of the four parts of the world, could readily point, being ask'd, to any country upon the globe, or any county in the map of England; knew all the great rivers, promontories, straits and bays in the world, and could find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of any place, before he was six years old. These things, that he will thus learn by sight, and have by rote in his memory, are not all, I confess, that he is to learn upon the globes. But yet it is a good step and preparation to it, and will make the remainder much easier, when his judgment is grown ripe enough for it: besides that, it gets so much time now; and by the pleasure of knowing things, leads him on insensibly to the gaining of languages.

第178节．正如我说过的，儿童在学习法语和拉丁语的时候，同时也可以学习数学、地理、年代学、历史和几何。因为如果以法语或拉丁语教儿童这些科目，当他学会法语或拉丁语时，在语言之外还会获得关于这几种科学的知识。我想最初可以从地理开始，因为学习地球的形状、世界四大区域及某些王国与国家的位置和疆界只是一种对眼力和记忆力的训练，儿童可以很愉快地学会并记住这些知识。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比如我现在待的这户人家有一个孩子，母亲就以这种方法教他地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六岁之前，他就知道世界四大区域的边界，如果别人问他，他可以在地球仪上指出任何国家，或者在英格兰地图上指出任何一个郡。他知道世界上所有的河流、海角、海峡和港湾，并能找出任何地点的经纬度。我承认，他能从地球仪上学到的知识远不止看到和记住的这些。但这是很好的一步，并为今后的学习做了准备。等到判断力足够成熟的时候，其余的知识对他而言就会简单得多。除此之外，现在时间很充裕，学知识的快乐可以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掌握语言。

179 . When he has the natural parts of the globe well fix'd in his memory, it may then be time to begin arithmetic. By the natural parts of the globe, I mean the several positions of the parts of the earth and sea, under different names and distinctions of countries, not coming yet to those artificial and imaginary lines which have been invented, and are only suppos'd for the better improvement of that science.

第179节．当孩子已经牢记世界上的自然地域之后，就可以开始学算术了。我所说的自然地域是指划在各个国家之下、拥有不同名目的陆地与海洋的位置，还涉及不到那些人工划分和假想出来的界线，而它们只是用来推进地理学发展的。

180 . Arithmetic is the easiest, and consequently the first sort of abstract reasoning, which the mind commonly bears or accustoms itself to: and is of so general use in all parts of life and business, that scarce any thing is to be done without it. This is certain, a man cannothave too much of it, nor too perfectly: he should therefore begin to be exercis'd in counting, as soon, and as far, as he is capable of it; and do something in it every day, till he is master of the art of numbers. When he understands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he then may be advanced farther in geography, after he is acquainted with the poles, zones, parallel circles, and meridians, be taught longitude and latitude, and by them be made to understand the use of maps, and by the numbers placed on their sides, to know the respective situation of countries, and how to find them out on the terrestrial globe. Which when he can readily do, he may then be entered in the celestial; and there going over all the circles again, with a more particular observation of the Ecliptic, or Zodiac, to fix them all very clearly and distinctly in his mind, he

may be taught the figure and position of the several constellations, which may be shewedhim first upon the globe, and then in the heavens.

第180节．因为最简单，算术通常是头脑最早接受并习惯的一种抽象推理。它在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广泛发挥作用，无论做什么都离不了它。可以肯定，一个人算术学得越多越精就越好。因此，一旦他能够计数，就要开始练习，每天去做一些运算，直到他掌握了算术的技巧为止。当儿童学会加减法之后就可以更深入地学习地理，在他认识了两极、环带、纬圈、子午线之后，就可以教他经度和纬度，并让他在此基础上学会使用地图，能通过地图两侧的数字了解各个国家的位置，并在地球仪上找出它们。当儿童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些之后，就可以开始教他天体方面的知识。先要将所有这些环带复习一遍，特别留意黄道带，使儿童清楚明白地将他们记在心里，然后就可以教他各个星座的形状与位置，先在天球仪上看，然后去观测天空。

When that is done, and he knows pretty well the constellations of this our hemisphere, it may be time to give him some notions of this our planetary world; and to that purpose, it may not be amiss to make him a draught of the Copernican system, and therein explain to him the situation of the planets, their respective distances from the sun, the centre of their revolutions. This will prepare him to understand the motion and theory of the planets, the most easy and natural way. For since astronomers no longer doubt of the motion of the planets about the sun, it is fit he should proceed upon that hypothesis, which is not only the simplest and least perplexed for a learner, but also the likeliest to be true in itself. But in this, as in all other parts of instruction, great care must be taken with children, to begin with that which is plain and simple, and to teach them as little as can be at once, and settle that well in their heads

before you proceed to the next, or anything new in that science. Give them first one simple idea, and see that they take it right, and perfectly comprehend it before you go any farther, and then add some other simple idea which lies next in your way to what you aim at; and so proceeding by gentle and insensible steps, children without confusion and amazement will have their understandings opened and their thoughts extended farther than could have been expected. And when any one has learn'd anything himself, there is no such way to fix it in his memory, and to encourage him to go on, as to set him to teach it others.

在这些都已完成以后，儿童也清楚地了解了我们这半球的星座，就可以让他接受一些关于行星体系的观念。为此，让他了解一点哥白尼的学说或许没错，从而可他讲解各个行星的位置以及它们到太阳这一行星公转中心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用最简单最自然的方法让儿童逐渐理解行星的运行及其学说。既然天文学家已不再怀疑行星是围绕太阳运转的，那么也应该让儿童以这一假设为出发点，因为它不仅对于初学者而言最为简单明了，而且本身也最有可能是正确的。不过在这一点上要像教授儿童别的东西一样，要特别注意从最简单直观的内容开始，一次尽可能少教一点，在他们很好地掌握了之后再继续往下，或去教授学科中的新知识。先教给儿童一个简单的观念，看到他们正确接受并完全理解之后再继续，在通往最终目标的道路上选取下一个简单的观念教给他们，依此循序渐进，不知不觉一步步向前，就会开启儿童的悟性，拓展他们的思路，并超出预期的目标，而儿童也不会感到困惑或惊异。当一个人自己学会了任何东西，若要让他的记忆更加牢固，并鼓励他继续努力，没有什么办法比让他把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更好的了。

Section 181-190

第181-190节

181 . When he has once got such an acquaintance with the globes, as is above mentioned, he may be fit to be tried in a little geometry; wherein I think the first six books of Euclid enough for him to be taught. For I am in some doubt, whether more to a man of business be necessary or useful.At least, if he has a genius and inclination to it, being enter'd so far by his tutor, he will be able to go on of himself without a teacher.

第181节．就像前面说的，当儿童熟悉了星体之后，就可以让他试着学一点几何，而我认为欧几里得的前六本书对他而言就足够了。因为我有些怀疑，对于一个做事业的人，去学更多的几何是否必要或是否有用。至少，如果他在几何方面有天分或对此有爱好，老师既然已将他领进门，那他今后离开老师也能够自己继续学习了。

The globes therefore must be studied, and that diligently; and I think may be begun betimes, if the tutor will be but careful to distinguish what the child is capable of knowing, and what not; for which this may be a rule that perhaps will go a pretty way, viz. that children may be taught anything that falls under their senses, especially their sight, as far as their memories only are exercised: and thus a child very young may learn, which is the Aequator, which the Meridian, &c. which Europe, and which England, upon the globes, as soon almost as he knows the rooms of the house he lives in, if care be taken not to teach him too much at once, nor to

set him upon a new part, till that which he is upon be perfectly learned and fixed in his memory.

因此，地球仪是必须学习的，并且要坚持不懈。我认为，只要教师能够谨慎地分辨什么是儿童能够理解的，什么是他们不能理解的，就可以尽早让他们开始学习。以下或许是颇为有用的一条规则：但凡是儿童能够感受到的，特别是能够看到的，只要能训练他们的记忆，就可以让他们去学习。在儿童非常幼小的时候，一旦他们熟悉了自己所居住的房屋，就可以在地球仪上教他们哪里是赤道，哪里是子午线，哪里是欧洲，哪里是英格兰。只要留心别一次教得太多，在他完全掌握了眼下所学的内容并牢记在心之前，不要教他新的内容。

182 . With geography, chronology ought to go hand in hand. I mean the general part of it, so that he may have in his mind a view of the whole current of time, and the several considerable epochs that are made use of in history. Without these two, history, which is the great mistress of prudence and civil knowledge, and ought to be the proper study of a gentleman, or man of business in the world; without geography and chronology, I say, history will be very ill retain'd, and very little useful; but be only a jumble of matters of fact, confusedly heaped together without order or instruction. 'Tis by these two that the actions of mankind are ranked into their proper places of time and countries, under which circumstances they are not only mucheasier kept in the memory, but in that natural order, are only capable to afford those observations which make a man the better and the abler for reading them.

第182节．伴随着地理学还应学习年代学。我指的是一般的年代学知识，这样儿童就能在头脑中形成关于时间的走向以及历史上的主

要时期的观念。历史是慎重言行和文明知识的主宰，对于绅士或经营事业之人，它应当成为一门必修科目。但若没有地理学和年代学基础，历史就只是一些杂乱无章的事件或史实，胡乱堆砌在一起，既无一定次序，也不含教育意义，不但很难记住，也很难发挥作用。有了地理学和年代学才能将人类的行为按照时间和国别归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些行为不仅更容易记住，而且有了这种自然的次序，它们就能够提供知识经验，使人因为阅读历史而变成更好、更有才能的人。

183 . When I speak of chronology as a science he should be perfect in, I do not mean the little controversies that are in it. These are endless, and most of them of so little importance to a gentleman, as not to deserve to be enquir'd into, were they capable of an easy decision. And therefore all that learned noise and dust of the chronologist is wholly to be avoided. The most useful book I have seen in that part of learning, is a small treatise of Strauchius, which is printed in twelves, under the title of *BreviariumChronologicum* , out of which may be selected all that is necessary to be taught a young gentleman concerning chronology; for all that is in that treatise a learner need not be cumbered with. He has in him the most remarkable or useful epochs reduced all to that of the Julian Period, which is the easiest and plainest and surest method that can be made use of in chronology. To this treatise of Strauchius, Helvicus' tables may be added, as a book to be turned to on all occasions.

第183节．当我说年代学是儿童应当精通的一门科学时，我指的并不是其内部细枝末节的纷争。这些纷争永无休止，而且其中大部分对一位绅士而言无关紧要，即使能够轻易得出结论，也不值得费心探究。因此，丝毫别去理睬这些年代学家在学术上的所有纷扰议论。我

所见到的关于这方面的最有用的书是斯持劳奇乌斯所写的题为《年代学要略》的简短论著，共分十二部分出版，由于初学者不需要费力学习书中的全部内容，可以从中挑选出一位年轻绅士所需了解的所有关于年代学的知识。作者在书中将所有最显著或常用的时代分期都简化为儒略周期，这是年代学中所能运用的最简单、最明了、最可靠的方法。除了斯持劳奇乌斯的论著之外，还要加上爱尔法格斯的年代表，以随时查阅。

184 . As nothing teaches, so nothing delights more than history. The first of these recommends it to the study of grown men, the latter makes me think it the fittest for a young lad, who as soon as he is instructed in chronology, and acquainted with the several epochs in use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nd can reduce them to the Julian Period, should then have some Latin history put into his hand. The choice should be directed by the easiness of the stile; for wherever he begins, chronology will keep it from confusion; and the pleasantness of the subject inviting him to read, the language will insensibly be got without that terrible vexation and uneasiness which children suffer where they are put into books beyond their capacity; such as are the Roman orators and poets, only to learn the Roman language. When he has by reading master'd the easier, such perhaps as Justin, Eutropius, Quintius Curtius, etc. the next degree to these will give him no great trouble: and thus by a gradual progress from the plainest and easiest historians, he may at last come to read the most difficult and sublime of the Latin authors, such as are Tully, Virgil, and Horace.

第184节．最能给人教益同时也最能带给人快乐的莫过于历史。历史能给人教益，所以应当建议成年人学历史；历史又能带给人快乐，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历史也是一门适宜的科目。一旦他学过年代

学，熟悉了常常用于我们这一地区的年代分期，同时能将这些分期简化为儒略周期之后，他就应当着手学习以拉丁文写成的历史。在选择时要以文体平易为原则，因为不论他从何处入手，有了年代学知识就不至于杂乱无章。有趣的题材可以诱导他去阅读，同时他也能在不知不觉中习得语言，而不必像一般儿童那样经历极大的沮丧与忧虑，被迫去读那些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书籍，如罗马演说家和诗人的作品，而只是为了学习罗马的语言。当他们通过阅读掌握了较容易的像查士丁尼、尤特罗庇乌斯、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等人的作品之后，再去阅读稍难一些的作家就不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如此一来，从最简单平易的史学著作开始循序渐进，他最终就能去阅读像塔利、维吉尔、贺拉斯这样最为艰深伟大的拉丁语作家的作品。

185 . The knowledge of virtue, all along from the beginning, in all the instances he is capable of, being taught him more by practice than rules; and the love of reputation, instead of satisfying his appetite, being made habitual in him, I know not whether he should read any other discourses of morality but what he finds in the *Bible* ; or have any system of ethics put into his hand till he can read Tully's *Offices* not as a school-boy to learn Latin, but as one that would be informed in the principles and precepts of virtue for the conduct of his life.

第185节．如果从一开始儿童就在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上通过实践而不是规则学习关于美德的知识，如果使热爱名誉而不是满足欲望成为他的一种习惯，我不知道他除了在《圣经》中读到的那些，是否还应阅读其他道德方面的训诫，我也不知道在他能够阅读塔利的《论责任》之前——不是像学童一样为了学习拉丁语，而是为了获得道德方面的原则和认识从而指导生活——是否还应接触其他伦理系统。

186 . When he has pretty well digested Tully's *Offices* , and added to it, *Puffendorf de Officio Hominis&Civis* , it may be seasonable to set him upon *Grotiusde JureBelli&Pacis* , or, which perhaps is the better of the two, *Puffendorf de Jure Naturali&Gentium* ; wherein he will be instructed in the natural rights of men, and the original and foundations of society, and the duties resulting from thence. This general part of civil-law and history, are studies which a gentleman should not barely touch at, but constantly dwell upon, and never have done with. A virtuous and well-behaved young man, that is well-versed in the general part of the civil-law (which concerns not the chicane of private cases, but the affairs and intercourse of civilized nations in general, grounded upon principles of reason) understands Latin well, and can write a good hand, one may turn loose into the world with great assurance that he will find employment and esteem everywhere.

第186节．当他很好地消化了塔利的《论责任》，在此之上又阅读了普芬多夫的《人与公民的职责》之后，就可以去读格劳秀斯的《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或者比这本更好的普芬多夫所著的《论自然及人类律》，他可以从中了解人类的自然权利、社会的起源与基础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责任。这种关于民法与历史的一般知识，一个绅士不能点到即止，而要不懈地研习，永不停止。一位品德高尚、行为端正的年轻人，如果谙熟民法的一般知识（所涉及的不是个案中的欺诈行为，而是基于理性原则，探讨文明国家的一般事务与交往），精于拉丁文，并写得一手好字，我就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世人保证，这样一个青年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职业，获得尊重。

187 . It would be strange to suppose an English gentleman should be ignorant of the law of his country. This, whatever station he is in, is so requisite, that from a Justice of the Peace to a

Minister of State I know no place he can well fill without it. I do not mean the chicane or wrangling and captious part of the law: a gentleman, whose business is to seek the true measures of right and wrong, and not the arts how to avoid doing the one, and secure himself in doing the other, ought to be as far from such a study of the law, as he is concerned diligently to apply himself to that wherein he may be serviceable to his country. And to that purpose, I think the right way for a gentleman to study our law, which he does not design for his calling, is to take a view of our English constitution and government in the ancientbooks of the common-law, and some more modern writers, who out of them have given an account of this government. And having got a true idea of that, then to read our history, and with it join in every king's reign the laws then made. This will give an insight into the reason of our statutes, and shew the true ground upon which they came to be made, and what weight they ought to have.

第187节．难以想象一位英国绅士对本国法律一无所知。不论他在什么职位上，法律知识都必不可少，从治安官到国务大臣，我不知道有什么职务是他离开法律能够胜任的。我指的并不是法律中欺诈、讼争或强词夺理的成分，一个绅士的职责是去寻求是非的准绳，而不是学会一种技巧，从而逃避一桩差事，却把另一桩差事弄到手。他绝不应该这样研究法律，而应坚持不懈地投身于对国家有用的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认为对于一个不打算以法律为职业的绅士，正确的办法是去阅读古代关于习惯法的书籍，以及近代作家论述政府的作品，从而对我们英国的宪法和政府有所了解。真正知晓了这一点之后，就可以去阅读我国的历史，同时去了解历代君主的统治以及他们治下颁布的法律。这种办法能够让人洞悉我国各项法令的依据，指出制定这些法令的真正基础以及它们应有的分量。

188 . Rhetoric and logic being the arts that in the ordinary method usually follow immediately after grammar, it may perhaps be wondered that I have said to little of them. The reason is, because of the little advantage young people receive by them: for I have seldom or never observed any one to get the skill of reasoning well, or speaking handsomely, by studying those rules which pretend to reach it: and therefore I would have a young gentleman take a view of them in the shortest systems could be found, without dwelling long on the contemplation and study of those formalities. Right reasoning is founded on something else than the predicaments and predicables, and does not consist in talking in mode and figure itself. But 'tis beside my present business to enlarge upon this speculation. To come therefore to what we have in hand; if you would have your son reason well, let him read Chillingworth; and if you would have him speak well, let him be conversant in Tully, to give him the true idea of eloquence; and let him read those things that are well writ in English, to perfect his style in the purity of our language.

第188节．按照通常的办法，常常学习完语法就紧接着学习修辞学和逻辑学，我对此却说得很少，大家或许会觉得奇怪。原因在于，年轻人很少从中得到好处。它们貌似教人推理与说话的规则，我却很少见到甚至从未见过有人通过学习这些而掌握了推理严密、措辞优美的技巧。因此，我认为年轻绅士可以通过所能发现的最简明的系统对它们有所了解，但无需花太长时间去思考或探究那些修辞学和逻辑学的程式。正确推理的基础不在于“范畴”与“谓项”，也不在于说话的方式或修辞本身。不过我当前的任务不是对这一点详加论述。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上来：如果你希望令郎善于推理，那就让他去读奇林渥斯的作品；如果你希望他妙于言辞，就让他通晓塔利的作品，从而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雄辩；同时还要让他去读那些以美妙的英文写成的作品，以完善他的语言风格，使他的母语更为纯正。

189 . If the use and end of right reasoning be to have right notions and a right judgment of things, to distinguish betwixt truth and falsehood, right and wrong, and to act accordingly; be sure not to let your son be bred up in the art and formality of disputing, either practising it himself, or admiring it in others; unless instead of an able man, you desire to have him an insignificant wrangler, opiniatrein discourse, and priding himself in contradicting others; or, which is worse, questioning everything, and thinking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ruth to be sought, but only victory, in disputing. There cannot be anything so disingenuous, so misbecoming a gentleman or anyone who pretends to be a rational creature, as not to yield to plain reason and the conviction of clear arguments. Is there anything more consistent with civil conversation, and the end of all debate, than not to take an answer, though never so full and satisfactory, but still to go on with the dispute as long as equivocal sounds can furnish (a medius terminus) a term to wrangle with on the one side, or a distinction on the other; whether pertinent or impertinent, sense or nonsense, agreeing with or contrary to what he had said before, it matters not. For this, in short, is the way and perfection of logical disputes that the opponent never takes any answer, nor the respondent ever yields to any argument. This neither of them must do, whatever becomes of truth or knowledge, unless he will pass for a poor baffled wretch, and lie under the disgrace of not being able to maintain whatever he has once affirm'd, which is the great aim and glory in disputing. Truth is to be found and supported by a mature and due consideration of things themselves, and not by artificial terms and ways of arguing: these lead not men so much into the discovery of truth, as into a captious and fallacious use of doubtful words, which is the most useless and most offensive way of talking, and such as least suits a gentleman or a lover of truth of anything in the world.

第189节．如果正确推理的效用与目的是对于事物拥有正确的观念、做出正确的判断、区分是非对错，并依此而行，那么在教育令郎的时候就不要以辩论的技艺与程式为重，既不要让他自己练习，也不要让他羡慕别人。除非你希望他成为一个无用的争讼之徒，在谈话中固执己见，以驳斥他人为傲，而不是成为一个有才能的人。或者更糟的是，他会质疑一切，认为没有什么真理值得寻求，有的只是辩论中的胜负。对于一名绅士或任何自命为理性动物的人，最不诚实也最不适当的事莫过于不听从明白的道理和清晰的论证。尽管对方的回答已经不能再圆满了，但还是拒绝接受，只要一方面能在辩论中以模棱两可的话修饰逻辑中项，与人争论，另一方面又能彰显自己与众不同，他就会继续辩论下去，不管说出的话是否切题，有没有意义，是否和他之前说过的话相吻合，都毫不在意。还有比这更背离文明交往礼仪以及辩论目的的吗？简言之，这就是逻辑辩论登峰造极的典型，甲方不会认可乙方任何回答，乙方也不会听从甲方的任何论证。无论知识和真理是什么，论辩的双方都不会屈服于对方，除非他想被人看成一个落败的可怜虫，因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而遭受耻辱，而坚持己见就是辩论的主要目的以及荣誉所在。想要发现并支持真理，就要对事物本身进行成熟而充分的思考，而不是通过矫揉造作的话语和辩论的种种方法。这不会使人发现真理，却会让人用含混的字句强词夺理、错误推断，这是最无用也最令人不快的一种言谈方式，也最不适合于一位绅士或一个热爱世间一切真理的人。

There can scarce be a greater defect in a gentleman than not to express himself well either in writing or speaking. But yet I think I may ask my reader, whether he doth not know a great many, who live upon their estates, and so with the name should have the qualities of gentlemen, who cannot so much as tell a story as they should, much less speak clearly and persuasively in any business. This I think not to be so much their fault, as the fault of their education; for I must, without partiality, do my countrymen this

right, that where they apply themselves, I see none of their neighbours outgo them. They have been taught rhetoric, but yet never taught how to express themselves handsomely with their tongues or pens in the language they are always to use; as if the names of the figures that embellish'd the discourses of those who understood the art of speaking, were the very art and skill of speaking well. This, as all other things of practice, is to be learn'd not by a few or a great many rules given, but by exercise and application according to good rules, or rather patterns, till habits are got, and a facility of doing it well.

一个绅士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在写作或谈话中很好地表达自己。不过我想我可以问问读者，看他们是否知道有许多靠产业过活的人，名义上拥有绅士的各种品质，却连得体地讲个故事也不会，就更别说将别的事情说得清楚明白、令人信服了。我认为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应归咎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我必须毫不偏私地为我的同胞说句公道话，只要他们刻苦努力，就不会输于邻邦。他们学过修辞学，却从未学过如何以常用的语言在言谈与书写中优美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仿佛对于那些懂得说话的艺术的人，那些修饰了他们话语的各种名目的修辞手段本身就是让人言谈优美的技艺。这就如同其他一切需要实践的本领一样，不是通过或多或少事先定下的规则就能学会的，而应遵循良好的规范，最好是榜样，去练习与运用，直到养成习惯，有能力做好为止。

Agreeable hereunto, perhaps it might not be amiss to make children, as soon as they are capable of it, often to tell a story of anything they know; and to correct at first the most remarkable fault they are guilty of in their way putting it together. When that fault is cured, then to shew them the next, and so on, till one after another, all, at least the gross ones, are mended. When they can tell

tales pretty well, then it may be the time to make them write them. *The Fables of Aesop* , the only book almost that I know fit for children, may afford them matter for this exercise of writing English, as well as for reading and translating, to enter them in the Latin tongue. When they have got past the faults of grammar, and can join in a continued coherent discourse the several parts of a story, without bald and unhandsome forms of transition (as is usual) often repeated, he that desires to perfect them yet farther in this, which is the first step to speaking well and needs no invention, may have recourse to Tully, and by putting in practice those rules which that master of eloquence gives in his first book *de inventione* , section 20, make them know wherein the skill and graces of an handsome narrative, according to the several subjects and designs of it, lie. Of each of which rules fit examples may be found out, and therein they may be shewn how others have practised them. The ancient classic authors afford plenty of such examples, which they should be made not only to translate, but have set before them as patterns for their daily imitation.

如果到此为止我说的话你都同意，那么一旦儿童拥有了讲故事的能力，也许就应该常常让他们去说一些听到过的故事，一开始要指出他们在联结故事的方式上出现的最明显的问题。等他们克服了这一问题以后，再指出下一个，依此类推，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至少让最严重的问题都得以纠正。当儿童能够很流畅地讲故事之后，就可以让他们将故事写下来。《伊索寓言》几乎是我知道的唯一的一本适合儿童的书籍，既能够为他们的英语写作练习提供材料，又能在他们学习拉丁语时提供阅读和翻译材料。一旦儿童克服了语法上的错误，能将故事的若干部分连缀成一篇前后连贯的文字，而在过渡部分不会像常见的情况那样总是显得突兀而缺少文采，那么为达到不假思索而能出口成章的目标他们就迈出了第一步，如果有人还希望他们更上一层楼，那么就可以求助于辩才无碍的塔利，将他在自

己的第一本书《论创造》的第二十章中列出的规则付诸实践，使儿童知道，对于一段有文采的叙述，根据不同的题材与构思，它的技艺和优美之处究竟何在。可以找出适用于每一条规则的例子，从而让儿童知道别人是怎样将这些规则付诸实践的。古代经典作家提供了大量这样的例子，不仅要让儿童拿来翻译，还要将其当作范例，为他们做日常效仿之用。

When they understand how to write English with due connexion, propriety and order, and are pretty well masters of a tolerable narrative style, they may be advanced to writing of letters; wherein they should not be put upon any strains of wit or compliment, but taught to express their own plain easy sense, without any incoherence, confusion or roughness. And when they are perfect in this, they may, to raise their thoughts, have set before them the examples of Voitures, for the entertainment of their friends at a distance, with letters of compliment, mirth, raillery or diversion; and Tully's *Epistles* , as the best pattern whether for business or conversation. The writing of letters has so much to do in all the occurrences of human life, that no gentleman can avoid shewing himself in this kind of writing. Occasions will daily force him to make this use of his pen, which, besides the consequences that, in his affairs, his well or ill managing of it often draws after it, always lays him open to a severer examination of his breeding, sense, and abilities, than oral discourses; whose transient faults dying for the most part with the sound that gives them life, and so not subject to a strict review, more easily escape observation and censure.

当他们学会怎样把英文写得连贯、得体、条理清晰，同时熟练掌握了一套说得过去的叙事文体之后，他们就可以进一步学写书信。不

要强求他们在风趣机智和恭维客套上做文章，而要让他们学会表达自己平实简单的想法，免于混乱、粗疏、语无伦次就够了。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为了提升儿童的思想，就可以让他们以瓦蒂尔为榜样，写一些或问候、或言欢、或戏谑、或消遣的信件，以慰藉远方的友人。不论关于事务还是交际，塔利的《书信集》都是最好的范例。写信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关联，每一个绅士都难以避免地要在书信中展现自己。每天都会有一些理由使他不得不提笔写信，他的信写得好坏不仅会对他的事务造成影响，还会将他的教养、见识和才能暴露给别人，使他比在谈话中接受到更为严格的检验。在谈话中，随着话音落下，大部分错误也转瞬即逝，因此不会遭受严格地审视，从而能够轻易逃脱人们的注意与责难。

Had the methods of education been directed to their right end, one would have thought this so necessary a part could not have been neglected whilst themes and verses in Latin, of no use at all, were so constantly everywhere pressed, to the racking of children's inventions beyond their strength and hindering their cheerful progress in learning the tongues by unnatural difficulties. But custom has so ordain'd it, and who dares disobey? And would it not be very unreasonable to require of a learned country school-master (who has all the tropes and figures in Farnaby's *Rhetorick* at his fingers' ends) to teach his scholar to express himself handsomely in English, when it appears to be so little his business or thought, that the boy's mother (despised, 'tis like, as illiterate for not having read a system of logic and rhetoric) outdoes him in it?

假如教育的方法指向正确的目标，那么既然用拉丁语写诗作文这种毫无用处之事尚且无时无地不强加在儿童身上，使他们超出其所能地在虚构捏造上绞尽脑汁，以人为的困难阻碍他们快快乐乐地在语言学习中取得进步，人们就会认为写信是一件必不可少之事，原不应当

遭到忽视。但是习俗就是这样规定的，有谁胆敢违背呢？想象一个饱学的乡村学校教师，精通法纳比《修辞学》中的所有修辞手法，若要求他教授学生如何流畅地以英语表达自我难道是合情合理的吗？他或许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也不会认为这是他的职责，在他看来，就算孩子的母亲从未接受过逻辑学和修辞学的系统训练，在这一点上也可以比他做得好。

To write and speak correctly gives a grace and gains a favourable attention to what one has to say: and since 'tis English that an English gentleman will have constant use of, that is the language he should chiefly cultivate, and wherein most care should be taken to polish and perfect his style. To speak or write better Latin than English, may make a man be talk'd of, but he would find it more to his purpose to express himself well in his own tongue, that he uses every moment, than to have the vain commendation of others for a very insignificant quality. This I find universally neglected, and no care taken anywhere to improve young men in their own language, that they may thoroughly understand and be masters of it. If anyone among us has a facility or purity more than ordinary in his mother tongue, it is owing to chance, or his genius, or anything rather than to his education or any care of his teacher. To mind what English his pupil speaks or writes, is below the dignity of one bred up amongst Greek and Latin, though he have but little of them himself. These are the learned languages fit only for learned men to meddle with and teach; English is the language of the illiterate vulgar: thoughyet we see the polity of some of our neighbours hath not thought it beneath the publick care to promote and reward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own language. Polishing and enriching their tongue is no small business amongst them; it hath colleges and stipends appointed it, and there is raised amongst them a great ambition and emulation of writing correctly: and we see

what they are come to by it, and how far they have spread one of the worst languages possibly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if we look upon it as it was in some few reigns backwards, whatever it be now. The great men among the Romans were daily exercising themselves in their own language; and we find yet upon record the names of orators, who taught some of their emperors Latin, though it were their mother tongue.

得体地写作与说话可以使一个人所说的话显得优美，并获得别人的关注与认同。既然一个英国绅士常常使用的是英语，那他应当重点提高的也是英语，要特别留心去改进并完善他的文风。如果一个人的拉丁文写得和说得都比英语更好，那他或许能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但他会发现，与其因为一种无关紧要的优点获得别人无谓的称赞，还不如能用每时每刻所使用的语言更好地表达自己来得有用。我发现这一点遭到了普遍的忽视，没有人在任何方面去留心提高青年人的母语能力，从而让他们彻底地了解并掌握母语。如果我们中有人能比一般人更为娴熟、纯正地使用母语，那也不过是机缘巧合，或者是他天资过人，无论如何不能归功于他所受的教育或教师的培养。一个人从小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虽然对这两种语言不过懂得皮毛，但如果让他去他关心学生所说所写的英文如何，就会觉得辱没了他的才华。希腊语和拉丁语被当成了只有有识之士才有资格钻研和教授的语言，而英语则是无知无识的寻常百姓所使用的语言。但我们看到，邻国的政府并不认为倡导或改进母语不值一提。对他们而言，改进并且丰富自己的语言绝非小事。他们为此建立学校，拨发专款，从而激起了国民的热情，争相要学会母语的正确书写。不论现在情况如何，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几个朝代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他们取得的成果，让一种最糟糕的语言流传到我们这里。罗马的伟人每天都练习他们自己的语言。文献中有一些演说家给皇帝教拉丁语的记载，尽管拉丁语正是他们的母语。

'Tis plain the Greeks were yet more nice in theirs. All other speech was barbarous to them but their own, and no foreign language appears to have been studied or valued amongst that learned and acute people; thoughit be past doubt that they borrowed their learningand philosophy from abroad.

显然希腊人就更加偏爱自己的语言了。他们认为除希腊语以外的所有语言都是蛮夷之语。似乎这个博学聪慧的民族从来没有研究或重视过任何外国语言，尽管他们的学问和哲学都来自别处。

I am not here speaking against Greek and Latin; I think they ought to be studied, and the Latin at least understood well by every gentleman. But whatever foreign languages a young man meddles with (and the more he knows the better) that which he should critically study, and labour to get a facility, clearness and elegancy to express himself in, should be his own; and to this purpose he should daily be exercised in it.

我并不反对使用希腊文和拉丁文，我认为人们应该学习这些语言，而且拉丁文更是每个绅士应当掌握的。但是一个年轻人无论学习什么外语（而且越多越好），他真正需要刻苦研习、娴熟掌握并能清晰优美地表达思想的语言，仍然是他自己的母语。为此，母语应当每天操练。

190 . Natural philosophy, as a speculative science, I imagine we have none, and perhaps I may think I have reason to say we never shall be able to make a science of it. The works of nature are contrived by a wisdom, and operate by ways too far surpassing our

faculties to discover or capacities to conceive, for us ever to be able to reduce them into a science. Natural philosophy being the knowledge of the principles, properties and operations of things as they are in themselves, I imagine there are two parts of it, one comprehending spirits, with their nature and qualities, and the other bodies. The first of these is usually referred to metaphysics: but under what title soever the consideration of spirits comes, I think it ought to go before the study of matter and body, not as a science that can be methodized into a system, and treated of upon principles of knowledge; but as an enlargement of our minds towards a truer and fuller comprehension of the intellectual world to which we are led both by reason and revelation. And since the clearest and largest discoveries we have of other spirits, besides God and our own souls, is imparted to us from heaven by revelation, I think the information that at least young people should have of them, should be taken from that revelation. To this purpose, I conclude, it would be well, if there were made a good history of the *Bible* , for young people to read; wherein if everything that is fit to be put into it, were laid down in its due order of time, and several things omitted which are suited only to riper age, that confusion which is usually produced by promiscuous reading of the Scripture, as it lies now bound up in our Bibles, would be avoided. And also this other good obtained, that by reading of it constantly, there would be instilled into the minds of children a notion and belief of spirits, they having so much to do in all the transactions of that history, which will be a good preparation to the study of bodies. For without the notion and allowance of spirit, our philosophy will be lame and defective in one main part of it, when it leaves out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most excellent and powerful part of the creation.

第190节．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作为思辨科学的自然哲学，而且我有理由相信，我们也许永远也不能使其变为科学。自然造物源自一种智慧，人类的能力远远不能参透或理解其运行的奥秘，所以我们永远也无法将其降格为“科学”。自然哲学是研究原理、属性、及万事万物内在运行方式的知识。我想这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去理解精神，包括本质和特质；而另一部分是去理解实体。第一部分经常被称为形而上学。不过，不论叫什么名字，我认为对于精神问题的考虑应该永远先于对物质和实体的研究。它不应是可以被条理化为一个系统的科学，并且能够依据知识的原则加以认识；它应是我们心灵的扩展，使我们更真实、更全面地理解理性世界——那个在理智和天启的引领下方可到达之地。又因为除了上帝和我们自己的灵魂以外，我们对于其他精神的最清楚和最大的发现是由神的启示带给我们的，所以我认为年轻人应该知道的知识，都应从那启示中得来。为此目的，我的结论是，如果可以将圣经的历史很好地编纂出来供年轻人阅读就再好不过了。如果每件适合被记载于书中的事件都可以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开，将那些学生更成熟一些之后才适宜了解的内容暂时省略，那么在阅读经文时，经常由于混乱的阅读而产生的一些困惑则可以避免，而这也是我们目前的圣经中存在的问题。阅读《圣经》的历史也会带来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不断阅读的过程中，孩子们的心灵中将会注入关于精神的概念和信仰，这与那段历史中的所有活动有着很大的关联，将会为研究实体打下很好的基础。因为如果没有精神的概念和存在，我们的哲学就变成了瘸子，在很重要的部分上存在缺陷，因为它遗失了关于创造的最美妙有力部分的沉思。

Section 191-200

第191-200节

191．Of this History of the *Bible*，I think too it would be well if there were a short and plain epitome made, containing the chief and most material heads, for children to be conversant in as soon as they can read. This, though it will lead them early into some notion of spirits, yet it is not contrary to what I said above, that I would not have children troubled, whilst young, with notions of spirits; whereby my meaning was, that I think it inconvenient that their yet tender minds should receive early impressions of goblins, spectres, and apparitions, wherewith their maids and those about them are apt to fright them into a compliance with their orders, which often proves a great inconvenience to them all their lives after, by subjecting their minds to frights, fearful apprehensions, weakness and superstition; which when coming abroad into the world and conversation they grow weary and ashamed of, it not seldom happens, that to make, as they think, a thorough cure, and ease themselves of a load which has sat so heavy on them, they throw away the thoughts of all spirits together, and so run into the other, but worse, extreme.

第191节．对于这本《圣经》的历史，我也认为，如果有一本篇幅简短、语言通俗、包含最精华部分的浓缩版就再好不过了，这样儿童可以在刚会识字时就看懂。尽管这使他们在早期对精神有了一些概念，但这与我之前所说的并不矛盾。我并不想让儿童在年幼的时候便因精神的问题而困惑。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不适合在儿童年幼的心灵中灌输妖魔、幽灵和幻影的印象。然而与此同时，他们的仆从和身边

的人却倾向于以此来恐吓他们服从命令，使他们的大脑屈从于恐惧、可怕的忧虑、软弱和迷信，而这经常被证明给他们之后的人生造成更大的不便。当他们走入社会与人交往时，这种心理会使他们感到厌倦与可耻——这也不是个例了——为了给自己进行他们认为的彻底的治疗，并使他们彻底从重负之下解脱出来，他们将所有对精神的思考一股脑丢弃，然后进入了另一个更糟的极端。

192 . The reason why I would have this premised to the study of bodies,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Scriptures well imbibed before young men be entered in natural philosophy, is, because matter, being a thing that all our senses are constantly conversant with, it is so apt to possess the mind, and exclude all other beings but matter, that prejudice, grounded on such principles, often leaves no room for the admittance of spirits, or the allowing any such things as immaterial beings in rerum natura; when yet it is evident that by mere matter and motion none of the great phaenomena of nature can be resolved, to instance but in that common one of gravity, which I think impossible to be explained by any natural operation of matter, or any other law of motion, but the positive will of a superior being so ordering it. And therefore since the deluge cannot be well explained without admitting something out of the ordinary course of nature, I propose it to be considered whether God's altering the centre of gravity in the earth for a time (a thing as intelligible as gravity itself, which perhaps a little variation of causes unknown to us would produce) will not more easily account for Noah's flood than any hypothesis yet made use of to solve it. I hear the great objection to this, is, that it would produce but a partial deluge. But the alteration of the centre of gravity once allowed, 'tis no hard matter to conceive that the divine power might make the centre of gravity, plac'd at a due distance from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move round it in a convenient space of time, whereby

the flood would become universal, and, as I think, answer all the phaenomena of the deluge as delivered by Moses, at an easier rate than those many hard suppositions that are made use of to explain it. But this is not a place for that argument, which is here only mentioned by the bye, to shew the necessity of having recourse to something beyond bare matter and its motion in the explication of nature; to which the notions of spirits and their power, as delivered in the Bible, where so much is attributed to their operation, may be a fit preparative, reserving to a fitter opportunity a fuller explication of this hypothesi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t to all the parts of the deluge, and any difficulties can be suppos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flood, as recorded in the scripture.

第192节．我之所以要在研究实体之前讲这些，在年轻人进入自然哲学领域之前使他们接受经文教义，是因为物质是我们的各路感官都无比熟悉的东西，极容易在我们的心理上先入为主，把其他事物都排除在外；而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偏见，经常会使精神无处容身，也不相信类似的非物质的事物存在于大自然之中。但是很显然，只靠物质和运动是无法解释自然中很多伟大的现象的，比如大家再熟悉不过的重力，我认为是不可能用任何物质的自然运行方式或任何运动定律来解释的，只能解释为是一个更高等的存在的强烈意愿使然。如果不承认在自然的常规进程外的力量，洪水现象也不能被很好地解释。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考虑是不是上帝一度改变了地球上重力的中心（这与重力一样是易于理解的，也许一点点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就可以造成）。相比于其他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假设，这一说法可以更容易地解释诺亚洪水。我听到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这只能造成一种局部的洪水。但是一旦允许重力的中心被改变，那么就不难理解，神圣的力量可能将重力的中心放在远离地心一段距离的地方，使其在适当的时限内绕地心移动，这样，洪水便成为了普遍现象。我认为这个解释比其他任何复杂的假设更容易去解释摩西对所有洪水现象的描述。但这里不是争论这个问题的地方。我只是顺便提一下，来证明我们在解释

自然的时候借助物质和运动以外的因素的必要性。在这里，圣经中所记载的得以实际运用的精神和其伟大力量的概念，或许是一种合适的准备。待到时机更加合适，便可以更加充分地解释这个假设，并用其去解释经文中记载的洪水的各个方面和对于洪水历史研究中的任何困难。

193 . But to return to the study of natural philosophy. Thoughthe world be full of systems of it, yet I cannot say, I know any one which can be taught a young man as a science wherein he may be sure to find truth and certainty, which is what all sciences give an expectation of. I do not hence conclude that none of them are to be read. It is necessary for a gentleman in this learned age to look into some of them to fit himself for conversation: but whether that of Des Cartes be put into his hands, as that which is most in fashion, or it be thought fit to give him a short view of that and several others also, I think the systems of natural philosophy that have obtained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re to be read more to know the hypotheses, and to understand the terms and ways of talking of the several sects, than with hopes to gain thereby a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al and satisfactory knowledge of the works of nature. Only this may be said, that the modern Corpuscularians talk in most things more intelligibly than the Peripatetics, who possessed the schools immediately before them. He that would look further back, and acquaint himself with the several opinions of the ancients, may consult Dr. Cudworth's *Intellectual System* , wherein that very learned author hath with such accurateness and judgment collected and explained the opinions of the Greek philosophers, that what principles they built on, and what were the chief hypotheses that divided them, is better to be seen in him than anywhere else that I know. But I would not deter any one from the study of nature because all the knowledge we have or possibly can have of it cannot

be brought into a science. There are very many things in it that are convenient and necessary to be known to a gentleman; and a great many other that will abundantly reward the pains of the curious with delight and advantage. But these, I think, are rather to be found amongst such writers as have employed themselves in making rational experiments and observations than in starting barely speculative systems. Such writings therefore, as many of Mr. Boyle's are, with others that have writ of husbandry, planting, gardening, and the like, may be fit for a gentleman, when he has a little acquainted himself with some of the systems of the natural philosophy in fashion.

第193节．不过让我们还是回到对自然哲学的研究吧。尽管世界充满了自然哲学的系统，然而我并不敢说，我知道其中的哪一个可以作为科学来教给年轻人，使其能像科学所期望的那样，去找到真理和必然。但我也不会因此下定论说，没有一个是值得读的。在这个注重学识的时代，一个绅士通过研究一些自然哲学来赚得谈资是必要的。不过至于他要学习的是什么，是最受追捧的笛卡尔，还是对笛卡尔略懂皮毛后再去学一些别的学派，我并不能确定。我认为我们学习这世界上所有自然哲学系统的目的是去懂得各种假设，明白各个流派所用的术语和说法，而不是期望得到对于自然现象的全面、科学、令人满意的知识。只有一点也许需要说明，现代关于宇宙微粒论的讨论在多数事情上都比逍遥学派的说法更易于理解，而逍遥学派在此之前是占据了学校课堂的。那些愿意追溯历史，去了解古人观点的人，可以参考卡德沃思博士的《宇宙真正的知识体系》。这位博学的作者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收集并解释了希腊哲学家们的观点、他们基于的原则以及造成他们观点不同的主要假设，并力图准确翔实。如果想了解这些，读这本书比其他任何我知道的书都要好。但是我不会因为我们拥有或可能拥有的所有知识都不能变为某种科学而使任何人打消研究自然的念头，这里面的很多知识是易于学习的，也是一个绅士所必备的。还有更多的知识会嘉奖因好奇而付出的辛劳，为其带来喜悦与益处。但

是这些，我宁愿从那些投身于理性实验与观察的作家身上寻求，而不是从那些闭门思辨的人身上。因此，这样的著作，如博伊尔先生的大多数作品，还有一些其他涉及类似畜牧、种植、园艺话题的作品，也许比较适合一位对风行的自然哲学系统略知皮毛的绅士阅读。

194 . Though the systems of physics that I have met with, afford little encouragement to look for certainty or science in any treatise which shall pretend to give us a body of natural philosophy from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bodies in general, yet the incomparable Mr. Newton has shewn, how far mathematics applied to some parts of nature may, upon principles that matter of fact justify, carry us in the knowledge of some, as I may so call them, particular provinces of the incomprehensible universe. And if others could give us so good and clear an account of other parts of nature, as he has of this our planetary world, and the most considerable phaenomena observable in it, in his admirable book, *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 we might in time hope to be furnished with more true and certain knowledge in several parts of this stupendous machine, than hitherto we could have expected. And though there are very few that have mathematics enough to understand his demonstrations, yet the most accurate mathematicians who have examin'd them allowing them to be such, his book will deserve to be read, and give no small light and pleasure to those, who, willing to understand the motions, properties, and operations of the great masses of matter, in this our solar system, will but carefully mind his conclusions, which may be depended on as propositions well proved.

第194节．尽管在我所遇到的物理体系中，那些专著虽然假装从物质的基本原给出自然哲学的解释，但没有一部能揭示必然的知识和

科学。但是伟大的牛顿向我们展示了，当数学被应用到自然的某一部分时，可以在有物质事实佐证的原则下引领我们在不可知的宇宙的某些领域中走多远。如果其他人也可以清晰而令人满意地记录自然界的其他组成部分，如同牛顿在他最令人肃然起敬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记录我们的世界和其中最重大的可观察的现象一样，那么我们也许在那时就可以掌握自然这令人赞叹的机器的若干组成部分中的更多更真实和确定的知识，这将比迄今为止我们能够预期的还要多。尽管只有极少的人具备足够的数学知识可以理解牛顿的证明，但是最精确的数学家已检验过这本书并承认了它的正确性，认为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并且将给想要理解太阳系中物质的运动、性质和运行的人巨大的启示与愉悦。只是要仔细推敲他的结论，因为那也许已被看作经过严密论证的命题。

195 . This is, in short, what I have thought concerning a young gentleman's studies; wherein it will possibly be wonder'd that I should omit Greek, since amongst the Grecians is to be found the original as it were, and foundation of all that learning which we have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I grant it so; and will add that no man can pass for a scholar that is ignorant of the Greek tongue. But I am not here considering the education of a profess'd scholar, but of a gentleman, to whom Latin and French, as the world now goes, is by every one acknowledg'd to be necessary. When he comes to be a man, if he has a mind to carry his studies farther, and look into the Greek learning, he will then easily get that tongue himself: and if he has not that inclination, his learning of it under a tutor will be but lost labour, and much of his time and pains spent in that which will be neglected and thrown away as soon as he is at liberty. For how many are there of an hundred, ever amongst scholars themselves, who retain the Greek they carried from school; or ever improve it to a familiar reading and perfect understanding of Greek authors?

第195节．简短地说，这就是我对于年轻绅士的学业的所思所想。也许这其中有人好奇我为什么对希腊文避而不谈，而一切皆源于希腊，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世界上所有学问的基础。我也认为是这样，并且还会补充一点，即对于希腊文一无所知的人是不配做一名学者的。但是我在这里考虑的问题不是如何培养一名专门的学者，而是一名绅士，对于他来说，拉丁文和法文才是必要的，当下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随着他逐渐长大成人，当他有心继续深造，并研习希腊的学问时，他自己便会轻而易举地习得那门语言；如果他并无此心，让家庭教师对其进行教导也只能是浪费精力。他一旦获得自由，便会全盘丢弃，同时对自己曾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毫不在意。因为，即使是一百个学者中，又有多少还记得他们在学校时学习的希腊文？或者将自己提升到可以熟练阅读和透彻理解希腊作家的作品的地步？

To conclude this part, which concerns a young gentleman's studies, his tutor should remember, that his business is not so much to teach him all that is knowable, as to raise in him a love and esteem of knowledge; and to put him in the right way of knowing and improving himself when he has a mind to it.

作为对年轻绅士教育这一部分的总结，他的家庭教师应该时刻牢记他的任务不是去教一名绅士一切需要知道的知识，而是需要培养他对知识的热爱与尊重，在他有意愿去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时候把他引上正确的道路。

The thoughts of a judicious author on the subject of languages, I shall here give the reader, as near as I can, in his own way of expressing them: he says,

关于语言的学习，我想起了一位权威作家说的话，在此尽力依照原意与所有读者分享。他说：

> “One can scarce burden children too much with the knowledge of languages. They are useful to men of all conditions, and they equally open them the entrance, either to the most profound, or the more easy and entertaining parts of learning. If this irksome study be put off to a little more advanced age, young men either have not resolution enough to apply it out of choice or steadiness to carry it on. And if anyone has the gift of perseverance, it is not without the inconvenience of spending that time upon languages, which is destined to other uses: and he confines to the study of words that age of his life that is above it, and requires things; at least it is the losing the best and beautifullest season of one's life. This large foundation of languages cannot be well laid but when everything makes an easy and deep impression on the mind; when the memory is fresh, ready, and tenacious; when the head and heart are as yet free from cares, passions, and designs; and those on whom the child depends have authority enough to keep him close to a long continued application. I am persuaded that the small number of truly learned, and the multitude of superficial pretenders, is owing to the neglect of this.”

> “孩童很少会负担不了过重的语言知识。语言知

识对于各种人都适用，并且一视同仁地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大门，那里或者通向了最深奥的学问，或者通向了学问中比较平易有趣的部分。如果这种令人心烦的学习略微推迟，则年轻人不是没有足够的决心学，就是没有足够的毅力坚持下去。即使任何人有着坚毅的禀赋，那时他的时间也应作他用了，不便于花费在语言学习上。那时他需要懂得万事万物，而不能局限于文字的学习，这将是在浪费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只有当孩童的大脑能够轻松深刻地习得周围的事物，当他的记忆力充沛、迅捷、持久，当他的头脑和心灵无虑、无欲、无图谋，当管教他的人仍有足够的权威督促他持久地用功的时候，才能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我确信之所以富有学识的少之又少，而徒有虚名的大有人在，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个道理。”

I think everybody will agree with this observing gentleman, that languages are the proper study of our first years. But 'tis to be consider'd by the parents and tutors, what tongues 'tis fit the child should learn. For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it is fruitless pains and loss of time, to learn a language which in the course of life that he is designed to, he is never like to make use of, or which one may guess by his temper he will wholly neglect and lose again, as soon as an approach to manhood, setting him free from a governor, shall put him into the hands of his own inclination, which is not likely to allot any of his time to the cultivating the learned tongues, or dispose him to mind any other language but what daily use or some particular necessity shall force upon him. But yet for the sake of those who are designed to be scholars, I will add what the same author subjoins to make good his foregoing remark. It will deserve to be considered by all who desire to be truly learned, and therefore may be a fit rule for tutors to inculcate and leave with their pupils

to guide their future studies.

我认为所有人都会同意这位富有洞察力的绅士的话，即语言适合在我们的幼年学习。但是家长和家庭教师需要考虑的是，选择什么样的语言让儿童学习。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如果让人究其一生只为了学习而学习一门语言，去学一门他也许永远不会使用的语言，或是一门也许根据他的性情他完全会在长大成人、免于管教、自己做主后立刻抛弃和忘记的语言，或是一门他不太有可能会花时间去培养学者素养的语言，或是其他超乎日常生活和某些特定需要而强加给他的语言，都将导致颗粒无收的痛苦和大把流逝的时间。不过，对于注定要做学者的人来说，我要加一点这位作家对于他之前观点的补充。对于所有想要成为真正博学有教养的人来说，这是值得考虑的，因此导师们需要将这条规则教给学生，用以指导他们今后学业。他说：

> “The study, says he, of the original text can never be sufficiently recommended. 'Tis the shortest, surest, and most agreeable way to all sorts of learning.Draw from the spring-head, and take not things at second hand. Let the writings of the great masters be never laid aside, dwell upon them, settle them in your mind, and cite them upon occasion; make it your business throughly to understand them in their full extent and all their circumstances: acquaint yourself fully with the principles of original authors; bring them to a consistency, and then do you yourself make your deductions. In this state were the first commentators and do not you rest till you bring yourself to the same. Content not yourself with those borrowed lights, nor guide yourself by their

views but where your own fails you and leaves you in the dark. Their explications are not your's, and will give you the slip. On the contrary, your own observations are the product of your own mind, where they will abide and be ready at hand upon all occasions in converse, consultation, and dispute. Lose not the pleasure it is to see that you are not stopp'd in your reading but by difficulties that are invincible; where the commentators and scholiasts themselves are at a stand and have nothing to say. Those copious expositors of other places, who with a vain and pompous overflow of learning poured out on passages plain and easy in themselves, are very free of their words and pains, where there is no need. Convince yourself full by this ordering your studies, that 'tis nothing but men's laziness which hath encouraged pedantry to cram rather than enrich libraries, and to bury good authors under heaps of notes and commentaries, and you will perceive that sloth herein hath acted against itself and its own interest by multiplying reading and enquiries, and increasingthe pains it endeavoured to avoid.”

“对于原始文本的研究，无论怎么推荐和强调都不为过。这是研究一切学问的最快捷、最可靠且最适合的方式。要追本溯源，不要接受二手的学问。要让大师的作品时时不离手，深入地了解这些作品，将它们植根于你的脑海，并根据场合不时地引用；你的本职就是完全透彻地理解它们，理解它们在所有情形下的含义；要使自己完全了解原作者的创作原则；将这

一切有机统一起来，然后进行自己的演绎。这是一流评论家的境界，在达到同等境界之前，你的脚步不应停歇。不要满足于别人借予你的光亮，并被别人的观点牵着走，除非你自己的观点不对，被困在黑暗迷茫中。因为，他们的观点并不是你的答案，轻信会使你跌跟头。相反的是，你自己的观察是自己思考过后的产物，它们可以经历任何场合的检验，无论是交谈、磋商还是争辩。除了遇到不可战胜的困难外，你不可失去流畅阅读的愉悦。当困难真的不可克服时，评论家和学者也会停滞不前，无话可说。那些在别处显得学富五车的评论家们，总在原本简单易懂的文字上夸夸其谈卖弄学识，总是不辞辛苦地在毫无必要的地方大费口舌。要使你自己完全按照这个办法来学习。只有懒惰，会使卖弄学问的人塞满而非充实了他的书架，使好作家的作品埋没于如山的评论和注释下。而且即使懒惰，也并没有达到自己本来的目的。本来想要偷懒少读少问，却因此需要多读多问，增加了自己本想避免的辛苦。”

This, though it may seem to concern none but direct scholars, is of so great moment for the right ordering of their education and studies, that I hope I shall not be blamed for inserting of it here; especially if it be considered, that it may be of use to gentlemen too, when at any time they have a mind to go deeper than the surface, and get to themselves a solid, satisfactory, and masterly insight in any part of learning.

尽管这些似乎只与正经的学者有关，但这对于孩子教育和学习的正确安排极为重要，所以我希望我不会因为在这里插入这些内容而遭到责备。而且，如果我说的这些被考虑和采纳，这也可以应用到绅士

的培养上来，特别是当他们想要深入地了解一些事物，想要在任何学问中获得扎实、理想、精湛的洞察力时。

Order and constancy are said to make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one man and another: this I am sure, nothing so much clears a learner's way, helps him so much on in it, and makes him go so easy and so far in any enquiry, as a good method. His governor should take pains to make him sensible of this, accustom him to order, and teach him method in all the applications of his thoughts; shew him wherein it lies, and the advantages of it; acquaint him with the several sorts of it, either from general to particulars, or from particulars to what is more general; exercise him in both of them, and make him see in what cases each different method is most proper, and to what ends it best serves.

秩序和恒心为人们认为是造成人与人重大差异的因素，我对此深信不疑。没有什么可以像良好的方法一样，帮学习者扫除路上如此多的障碍，给他如此多的帮助，并且使他在任何求索的道路上走得如此轻松和长远。他的教师应该不遗余力使他意识到这一点，使他适应秩序，教他在运用思想的时候需要的方法；告诉他秩序在何方以及拥有它的好处；使他熟悉各种方法，从一般到特殊，或从特殊到较一般的情形；这两种方法应该都让他练习，使他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哪一种方法更加适宜，以及哪种方法服务于怎样的目的。

In history the order of time should govern, in philosophical enquiries that of nature, which in all progression is to go from the place one is then in, to that which joins and lies next to it; and so it is in the mind, from the knowledge it stands possessed of already, to that which lies next, and is coherent to it, and so on to what it aims

at, by the simplest and most uncompounded parts it can divide the matter into. To this purpose, it will be of great use to his pupil to accustom him to distinguish well, that is, to have distinct notions, wherever the mind can find any real difference; but as carefully to avoid distinctions in terms, where he has not distinct and different clear ideas.

历史应由时间的秩序主导，哲学研究应由自然的秩序主导，而这一切进程都是从当时所处的地方向外推进到相邻处。大脑的进程也是同样，应该从头脑中所具有的知识入手，进而探求那些与它相邻相关的知识，以此推演，使它从事物可划分出的最简单最单纯的部分着手去达到它的目的。为此，如果能使学生习惯于辨别任何可以找到实际区别的地方，拥有明晰的概念，是大有益处的；而在他没有明晰、清楚概念的地方，应使他小心避免从术语上进行辨别。

196．Besides what is to be had from study and books, there are other accomplishments necessary for a gentleman, to be got by exercise, and to which time is to be allowed, and for which masters must be had.

第196节．除了从书本和学习中得到的那些之外，还有很多才艺是一个绅士所必备的，是需要经过练习得来，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且需要大师指点的。

Dancing being that which gives graceful motions all the life, and above all things manliness, and a becoming confidence to young children, I think it cannot be learned too early, after they are once of an age and strength capable of it. But you must be sure to

have a good master, that knows, and can teach, what is graceful and becoming, and what gives a freedom and easiness to all the motions of the body. One that teaches not this is worse than none at all: natural unfashionableness being much better than apish affected postures; and I think it much more passable, to put off the hat and make a leg like an honest country gentleman than like an ill-fashioned dancing-master. For as for the jigging part, and the figures of dances, I count that little or nothing, farther than as it tends to perfect graceful carriage.

舞蹈，可以使人终生拥有优雅的动作，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年幼儿童的男子气概和自信心。我认为学习舞蹈不怕过早，只要他们到达一定年龄，有一定身体力量时便可进行。但是你一定要确保有一个好的老师，他要知道并且可以教导别人什么样的肢体动作是优雅得体的，什么是可以让肢体显得自由和舒适的。如果老师不能教你这些，那比不请老师还要糟糕。天然的身体僵硬比东施效颦的矫揉造作强多了。我觉得，在脱帽行礼时，宁愿去像一个诚恳的乡绅，也不要像一个举止不得体的舞蹈老师。因为我认为快步舞或舞蹈动作本身并无太大意义，我关注的只有舞姿所带来的优雅仪态。

197 . Music is thought to have some affinity with dancing, and a good hand upon some instruments is by many people mightily valued. But it wastes so much of a young man's time to gain but a moderate skill in it; and engages often in such odd company, that many think it much better spared: and I have amongst men of parts and business so seldom heard any one commended or esteemed for having an excellency in music, that amongst all those things that ever came into the list of accomplishments, I think I may give it the last place. Our short lives will not serve us for the attainment of all things; nor can our minds be always intent on something to be

learned. The weakness of our constitutions both of mind and body requires that we should be often unbent: and he that will make a good use of any part of his life must allow a large portion of it to recreation. At least, this must not be denied to young people; unless whilst you with too much haste make them old, you have the displeasure to set them in their graves or a second childhood sooner than you could wish. And therefore, I think,that the time and pains allotted to serious improvements, should be employed about things of most use and consequence, and that too in the methods the most easy and short that could be at any rate obtained: and perhaps, as I have above said, it would be none of the least secrets of education, to make the exercises of the body and the mind the recreation one to another. I doubt not but that something might be done in it, by a prudent man that would well consider the temper and inclination of his pupil. For he that is wearied either with study or dancing does not desire presently to go to sleep, but to do something else which may divert and delight him. But this must be always remembered, that nothing can come into the account of recreation that is not done with delight.

第197节．人们一直认为音乐与舞蹈有着紧密的联系，且一个擅长某些乐器的人总是受到很多人青睐。但是，年轻人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才可以学到一点音乐的技能，且需要经常与古怪的朋友混在一起，很多人都认为不如不要。在我认识的那些有才能而务实的人中，很少听到有因极高的音乐造诣而被人尊敬和赞许的。所以在所有可以被称为才艺的事物中，我也许会把音乐这一项放在最后。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我们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一定造诣，我们的大脑也不可能一直都专注于一些需要学习的东西。我们脆弱的大脑和身体使我们不能一直耕耘不休。任何想要好好利用他生命的任何部分的人，都必须要将很大比例的时间投入到消遣中。至少，这对于年轻人也不例外，除非你想加速他们大脑和身体的衰老，想将他们更早地送入坟墓，迎

来投胎转世。所以，我认为，想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努力学习提升的事情应该是最有用且最有结果的事情，而且应该使用至少能够获得的最快捷最容易的方法。也许，就像我之前所说的，让身体和头脑的锻炼成为彼此的消遣，这也许可以成为教育上最大的秘诀之一。我相信，对于一个能够考虑学生的性情与倾向的小心谨慎的人，这是不难做到的。因为厌倦了学习或舞蹈的人最想要的不是睡眠，而是其他可以分散其注意并使其感到愉悦的事。但有一点必须要记住，那就是，任何做起来不愉快的事情，都不可以算作是消遣。

198 . Fencing and riding the great horse, are looked upon so necessary parts of breeding, that it would be thought a great omission to neglect them; the latter of the two being for the most part to be learned only in great towns, is one of the best exercises for health, which is to be had in those places of ease and luxury: and upon that account makes a fit part of a young gentleman's employment during his abode there. And as far as it conduces to give a man a firm and graceful seat on horseback, and to make him able to teach his horse to stop and turn quick, and to rest on his haunches, is of use to a gentleman both in peace and war. But whether it be of moment enough to be made a business of, and deserve to take up more of his time than should barely for his health be employed at due intervals in some such vigorous exercise, I shall leave to the discretion of parents and tutors; who will do well to remember, in all the parts of education, that most time and application is to be bestowed on that which is like to be of greatest consequence and frequentest use in the ordinary course and occurrences of that life the young man is designed for.

第198节．击剑和马术被认为是教养的必要组成部分，忽略了这两条会被认为是绅士培养中的巨大疏漏。后者是最有益于身体健康的

运动中的一项，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在拥有安逸与奢华的大城市进行学习。因此，当一位年轻绅士住在大城市时，他是适合学习马术的。马术可以使人沉稳、优雅地骑在马背上，使人可以教他的马止步、转向、或卧倒，无论战争或和平时期，这对于绅士都是十分有用的。但这是否应该被当作一件大事，是否值得投入比维持身体健康所需的更多时间到这样剧烈的练习中，我将留给父母和家庭教师去考虑；他们应该谨记，在任何形式的教育中，都应把时间和努力运用到年轻人日常和以后的生活中最重要、最常用的事情上。

199 . As for fencing, it seems to me a good exercise for health, but dangerous to the life; the confidence of their skill being apt to engage in quarrels those that think they have learned to use their swords. This presumption makes them often touchier than needs on point of honour and slight or no provocations. Young men, in their warm blood, are forward to think they have in vain learned to fence, if they never shew their skill and courage in a duel; and they seem to have reason. But how many sad tragedies that reason has been the occasion of, the tears of many a mother can witness. A man that cannot fence will be more careful to keep out of bullies' and gamesters' company, and will not be half so apt to stand upon punctilios, nor to give affronts, or fiercely justify them when given, which is that which usually makes the quarrel. And when a man is in the field, a moderate skill in fencing rather exposes him to the sword of his enemy than secures him from it. And certainly a man of courage who cannot fence at all and therefore will put all upon one thrust and not stand parrying, has the odds against a moderate fencer, especially if he has skill in wrestling. And therefore, if any provision be to be made against such accidents, and a man be to prepare his son for duels, I had much rather mine should be a good wrestler than an ordinary fencer, which is the most a gentleman can attain to in it, unless he will be constantly in the fencing-school and

every day exercising. But since fencing and riding the great horse are so generally looked upon as necessary qualifications in the breeding of a gentleman, it will be hard wholly to deny any one of that rank these marks of distinction. I shall leave it therefore to the father to consider, how far the temper of his son and the station he is like to be in, will allow or encourage him to comply with fashions which, having very little to do with civil life, were yet formerly unknown to the most warlike nations, and seem to have added little of force or courage to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them; unless we will think martial skill or prowess have been improved by dueling, with which fencing came into, andwith which I presume it will go out of the world.

第199节．而谈起击剑，对我来说这似乎也是对身体有益的锻炼，但是会危及生命。那些认为自己已经习得剑法的人，那种对于自己水平的自信会使他们倾向于卷入一些争吵当中。这种假定使他们变得更加易怒，尤其是遇到名誉攸关之事，或他们受到轻视，有时甚至完全还没有遭到挑衅时。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会倾向于认为如果不在决斗中一展身手和勇气，击剑就是白学了；他们似乎总是师出有名。但是因此造成了多少惨痛的悲剧，许多母亲的眼泪可以见证。一个不懂得剑术的人，会更加小心翼翼地躲避恶霸和赌徒，不及懂剑术的人一半那样执拗于一些细节，不会有意冒犯别人之后又激烈地为自己争辩——这通常都是争吵的开端。当一个人站在场地中时，一点点击剑技术反而将他暴露于敌人的剑下，而不是保护他免于剑锋。因为即使是一个对剑术一窍不通的人，只要有勇气，也会全力一刺而不是消极躲闪。如果这个人再有些摔跤的技巧的话，他甚至有胜算战胜一个不赖的剑客。因此，如果想应对此类突发事件，如果一个人准备将自己的儿子送入击剑场，我倒是宁愿将儿子培养成一个好的摔跤手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剑客——这是大多数绅士能够达到的境界，除非他终日于击剑学校勤勉练习。但是因为击剑和马术被如此普遍地视为绅士培养中的必要条件，很难令这一阶层中的任何人不去追求这些本领。因此我

将把问题留给每位父亲去思考，就令郎的性情和将来所处的位置而论，是不是可以让他适应或鼓励他去适应这种风尚。这些与民间生活几乎无关的风尚，即使是好战的民族，此前也并不知道。同时，接受这种风尚的人也并没有因此增加多少力量和勇气，除非我们认为决斗时击剑可以提高人们的军事技能和英勇气概，击剑随着决斗而诞生，但我认为它也会随着决斗的消失而销声匿迹。

200 . These are my present thoughts concerning learning and accomplishments. The great business of all is virtue and wisdom:

第200节．这些是我现阶段对于学习和才艺的思考。这一切中最重要的是美德和智慧。

Nullum numen abestsi sitPrudentia .

有智慧，就有神性。

Teach him to get a mastery over his inclinations, and submit his appetite to reason. This being obtained, and by constant practice settled into habit,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task is over. To bring a young man to this, I know nothing which so much contributes as the love of praise and commendation, which should therefore be instilled into him by all arts imaginable. Make his mind as sensible of credit and shame as may be; and when you have done that, you have put a principle into him, which will influence his actions when you are not by, to which the fear of a little smart of a rod is not comparable, and which will be the proper stock whereon afterwards

to graftthe true principl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

教导孩子要对自然天性加以控制，使欲求屈从于理性。学会了这一点，并通过不断的练习使其变为习惯，任务中最艰难的部分就完成了。要使年轻人做到这一点，我以为没有什么比对表扬与赞许的渴望更加有效，因此要想方设法使他产生这种盼望。让他尽可能对光荣和耻辱敏感。当你做到这一点时，你已在他心灵中树立起一项原则，你不在他身边时，这也将影响他的行动；担心棍棒惩罚的恐惧远不能与此相比。而这条原则也将是得力的落脚点，让他在以后可以更好地把握道德和宗教的真正准则。

Section 201-211

第201-210节

201．I have one thing more to add, which as soon as I mention I shall run the danger of being suspected to have forgot what I am about, and what I have above written concerning education all tending towards a gentleman's calling, with which a trade seems wholly inconsistent. And yet I cannot forbear to say, I would have him learn a trade, a manual trade; nay two or three, but one more particularly.

第201节．我还要补充一点。虽然一旦提及这一点恐怕就要有人出来质疑，说我忘乎所以，忘了以上有关教育的论述都是为了绅士的培养，而有关技艺的讨论在这里似乎格格不入。但是我仍然忍不住要说，我希望一个绅士应该学习一种技艺，一种需要体力的技艺；不用多到两三种，而是精通其一。

202．The busy inclination of children being always to be directed to something that may be useful to them, the advantages proposed from what they are set about may be considered of two kinds: (1)where the skill itself that is got by exercise is worth the having. Thus skill not only in languages and learned sciences, but in painting, turning, gardening, tempering and working in iron, and all other useful arts is worth the having. (2)Where the exercise itself, without any consideration, is necessary or useful for health. Knowledge in some things is so necessary to be got by children whilst they are young, that some part of their time is to be allotted

to their improvement in them, though those employments contribute nothing at all to their health. Such are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all other sedentary studies for the cultivating of the mind, which unavoidably take up a great part of a gentleman's time, quite from their cradles. Other manual arts, which are both got and exercised by labour, do many of them by that exercise not only increase our dexterity and skill, but contribute to our health too, especially such as employ us in the open air. In these, then, health and improvement may be join'd together; and of these should some fit ones be chosen, to be made the recreations of one whose chief business is with books and study. In this choice the age and inclination of the person is to be considered, and constraint always to be avoided in bringing him to it. For command and force may often create, but can never cure, an aversion: and whatever any one is brought to by compulsion, he will leave as soon as he can, and be little profited and less recreated by, whilst he is at it.

第202节．儿童好动的天性应当善加引导，使之对其有益，这样做的好处有两方面：1．通过练习获得的技能值得学习。这些技能不光包括语言和广博的科学知识，也包括绘画、加工、园艺、金属回火和处理，以及其他所有有用的技艺。2．毫无疑问，练习本身对健康也是必要或有益的。有些知识有必要从小开始学习，因而儿童应拿出时间取得进步，尽管运用这些知识对健康并无助益。比如阅读和写作，以及所有其他有利心智发展的案头工作，这些活动占据绅士一生相当一部分时间。另一些技艺，则通过劳动来习得并加以练习，它们不仅可以让人心灵手巧，而且有益健康，尤其是那些户外活动。这时身体和智力上的提高便合二为一。因此主要从事书本和研究工作的人应当从中选择几样合适的技艺，作为消遣。挑选时要考虑年龄和个性，永远不要勉强。因为命令和逼迫常常招致厌恶而无法逆转，任何人一旦受了胁迫去做事情，一有机会便会放弃。即使正在进行，也很难乐在其中，有所收获。

203 . That which of all others would please me best, would be a painter, were there not an argument or two against it not easy to be answered. First, ill painting is one of the worst things in the world; and to attain a tolerable degree of skill in it, requires too much of a man's time. If he has a natural inclination to it, it will endanger the neglect of all other more useful studies to give way to that; and if he have no inclination to it, all the time, pains and money shall be employed in it, will be thrown away to no purpose. Another reason why I am not for painting in a gentleman is, because it is a sedentary recreation, which more employs the mind than the body. A gentleman's more serious employment I look on to be study; and when that demands relaxation and refreshment, it should be in some exercise of the body, which unbends the thought, and confirms the health and strength. For these two reasons I am not for painting.

第203节．至于在掌握技艺的人之中最得我心者，本来可以说是画家，但是在这一点上又有一两种难以驳回的反对观点。首先，糟糕的画作是世上最坏的东西之一，而要达到说得过去的程度，又需要太多的时间去提高技艺。如果一个人天生喜爱作画，那么其他更有用的学问就可能让位于此。如果并无天生的兴趣，那么所有投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会付之东流。我不推荐绅士学画的另一个理由是，绘画作为一种静态的娱乐，运用头脑比锻炼身体要多。绅士更重要的任务是读书。读书需要放松和提神的时候，应当作一些身体活动，在大脑得到休息的同时，保证身体健康和精力充沛。出于这两点，我不推荐选择绘画。

204 . In the next place, for a country gentleman I should propose one, or rather both these, viz. Gardening or husbandry in

general, and working in wood, as a carpenter, joiner, or turner, these being fit and healthy recreations for a man of study or business. For since the mind endures not to be constantly employed in the same thing or way, and sedentary or studious men should have some exercise, that at the same time might divert their minds and employ their bodies, I know none that could do it better for a country gentleman than these two; the one of them affording him exercise when the weather or season keeps him from the other. Besides that, by being skill'd in the one of them, he will be able to govern and teach his gardener; by the other, contrive and make a great many things both of delight and use: though these I propose not as the chief end of his labour, but as temptations to it; diversion from his other more serious thoughts and employments by useful and healthy manual exercise being what I chiefly aim at in it.

第204节．接下来，我向乡绅推荐以下技艺，可选择其一或两者都选。第一种为园艺或一般的耕种，第二种为木匠、细木工或打磨工匠所做的木工活。二者都是适合有识之士的健康休闲活动。因为头脑无法一直专注于同一件事或按同一个方式运转，而且静坐或埋首书本的人应当作些运动，让身心都得到放松，此时从事园艺和木工我认为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在天气恶劣或季节限制的时候，如果无法进行园艺，仍然可以做木工来得到锻炼。此外，若精通园艺，就能管理和教导园丁。掌握了木工活，则可以设计和制作很多既有趣又有用的物件。尽管这并非劳动的首要目的，但可以作为吸引人的手段。我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有用而健康的体力劳动使其在更加严肃的思考和工作之余得到放松。

205 . The great men among the ancient sunderstood very well how to reconcile manual labour with affairs of state, and thought it no lessening to their dignity to make the one the recreation to the

other. That indeed which seems most generally to have employed and diverted their spare hours was agriculture.Gideon among the Jews was taken from threshing, as well as Cincinnatus amongst the Romans from the plough, to command the armies of their countries against their enemies; and 'tis plain their dexterous handling of the flailor the plough, and being good workmen with these tools, did not hinder their skill in arms, nor make them less able in the arts of war or government. They were great captains and statesmen as well as husbandmen. Cato Major, who had with great reputation born all the great offices of the commonwealth, has left us an evidence under his own hand, how much he was versed in country affairs; and, as I remember, Cyrus thought gardening so little beneath the dignity and grandeur of a throne, that he shew'd Xenophon a large field of fruit-trees all of his own planting. The records of antiquity, both among Jews and Gentiles, are full of instances of this kind, if it were necessary to recommend useful recreations by examples.

第205节．古代伟大的人物很懂得如何在国家事务之余劳逸结合，丝毫不认为将体力劳动作为智力活动的消遣有损尊严。似乎最常见的用来打发和消磨业余时间的方法就是务农。比如，犹太人勇士是在打谷脱粒时，罗马的辛辛纳图斯是在犁地时受邀出山，指挥本国军队抵御外敌的。显然他们对连枷或犁等农具的熟练运用并没有妨碍他们操作武器，也丝毫没有损害他们的军事或管理才能。他们既是伟大的统帅和政治家，也是出色的农夫。大加图担任过罗马共和国所有重要的职位，他亲笔记录了在乡村事务上的造诣，佐证了我们的观点。我记得波斯王居鲁士大帝曾经向色诺芬展示了自己亲自种植的大片果林，全然不觉得园艺会有损王者的高贵和威严。在犹太人和异教徒的历史文献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充分说明了对有益的娱乐的推崇。

206．Nor let it be thought that I mistake, when I call these or

the like exercises of manual arts, diversions or recreations: for recreation is not being idle (as every one may observe) but easing the wearied part by change of business: and he that thinks diversion may not lie in hard and painful labour, forgets the early rising, hard riding, heat, cold and hunger of huntsmen, which is yet known to be the constant recreation of men of the greatest condition. Delving, planting, inoculating, or any the like profitable employments, would be no less a diversion than any of the idle sports in fashion, if men could but be brought to delight in them, which custom and skill in a trade will quickly bring any one to do. And I doubt not but there are to be found those, who being frequently called to cards or any other play by those they could not refuse, have been more tired with these recreations than with any the most serious employment of life, though the play has been such as they have naturally had no aversion to, and with which they could willingly sometimes divert themselves.

第206节．虽然我把这些或类似的手艺称作消遣或休闲活动，但千万不要误解。因为休闲并非无所事事（谁都可以看出来）而是通过变换使劳累的身心得以放松。有些人认为不能以辛劳作为消遣，却忘记了猎人必须早起、骑马、忍受酷暑严寒与饥饿，而最伟大的人物常常以此为乐。如果从一开始就兴致勃勃，养成习惯并掌握了技巧之后，掘土、种植、嫁接或任何类似的有益劳动，在消遣的功用上不逊色于任何时髦的无聊活动。我毫不怀疑，有些人因为别人的邀请不能拒绝，而去玩牌或其他游戏。渐渐地对这些原本并不讨厌，乐意偶尔为之的活动产生了倦怠，甚至觉得这些比其他严肃的工作更难以招架。

207．Play, wherein persons of condition, especially ladies, waste so much of their time, is a plain instance to me that men

cannot be perfectly idle; they must be doing something; for how else could they sit so many hours toiling at that which generally gives more vexation than delight to people whilst they are actually engag'd in it? 'Tis certain, gaming leaves no satisfaction behind it to those who reflect when it is over, and it no way profits either body or mind: as to their estates, if it strike so deep as to concern them, it is a trade then, and not a recreation, wherein few that have anything else to live on thrive: and at best, a thriving gamester has but a poor trade on't, who fills his pockets at the price of his reputation.

第207节．身份高贵之人，尤其是女士，在游戏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于我而言这明白无误地证明了人不可以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必须做点什么。否则他们如何可以一连几个钟头从事实际痛苦大于快乐的事情呢？可以确定的是，赌局一旦结束，再去回想便不再有满足感，对身心也无益处。至于财产方面，如果深陷其中，赌博便不再是娱乐而是生意了，极少有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靠赌博来发财的。就算赌徒因此获利，在鼓了腰包的同时却牺牲了名誉。

Recreation belongs not to people who are strangers to business, and are not wasted and wearied with the employment of their calling. The skill should be, so to order their time of recreation, that it may relax and refresh the part that has been exercised and is tired, and yet do something which besides the present delight and ease, may produce what will afterwards be profitable. It has been nothing but the vanity and pride of greatness and riches, that has brought unprofitable and dangerous pastimes (as they are called) into fashion, and persuaded people into a belief, that the learning or putting their hands to anything that was useful, could not be a diversion fit for a gentleman. This has been that which has given

cards, dice and drinking so much credit in the world: and a great many throw away their spare hours in them, through the prevalency of custom, and want of some better employment to fill up the vacancy of leisure, more than from any real delight is to be found in them. They cannot bear the dead weight of unemployed time lying upon their hands, nor the uneasiness it is to do nothing at all: and having never learned any laudable manual art wherewith to divert themselves, they have recourse to those foolish or ill ways in use, to help off their time, which a rational man, till corrupted by custom, could find very little pleasure in.

对于那些不务正业，以及并未因专注工作而疲乏的人，娱乐不应有他们的份。正确的做法是，合理安排休闲的时间，使劳累的精神得到放松和提振，所作之消遣不仅能够带来当下的快乐和放松，还可产生长远的收益。一些所谓的毫无益处和危险的乐子之所以变成时髦，无非是身份和财富带来的虚荣和骄傲所致。这种现象让人们误以为，学习或动手参与有用的实践并非绅士所做的消遣。这就是为什么打牌、掷骰子和饮酒得以风靡。很多人白白浪费了大量的业余时间，却并非因为从中体会到真正的乐趣，而只是迫于习惯的力量和缺少更好的消磨时间的方法。他们不堪承受闲暇带来的负担，也无力排遣无所事事的不安。因为从未学过任何可供转移注意力或是值得称赞的手艺，于是只好转而用那些愚蠢或有害的方式打发时间。若非因习惯而堕落，明智之人本来是不会以此为乐的。

208．I say not this, that I would never have a young gentleman accommodate himself to the innocent diversions in fashion amongst those of his age and condition. I am so far from having him austere and morose to that degre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im to more than ordinary complaisance for all the gaieties and diversions of those he converses with, and be averse or testy in nothing they should desire

of him, that might become a gentleman and an honest man. Though as to cards and dice, I think the safest and best way is never to learn any play upon them, and so to be incapacitated for those dangerous temptations and incroaching wasters of useful time. But allowance being made for idle and jovial conversation and all fashionable becoming recreations; I say, a young man will have time enough from his serious and main business, to learn almost any trade. 'tis want of application, and not of leisure, that men are not skilful in more arts than one; and an hour in a day, constantly employed in such a way of diversion, will carry a man in a short time a great deal farther than he can imagine: which, if it were of no other use but to drive the common, vicious, useless, and dangerous pastimes out of fashion, and to shew there was no need of them, would deserve to be encouraged. If men from their youth were weaned from that sauntering humour wherein some out of custom let a good part of their lives run uselessly away, without either business or recreation, they would find time enough to acquire dexterity and skill in hundreds of things, which, though remote from their proper callings, would not at all interfere with them. And therefore, I think, for this, as well as other reasons before-mentioned, a lazy, listless humour that idly dreams away the days, is of all others the least to be indulged or permitted in young people. It is the proper state of one sick and out of order in his health, and is tolerable in nobody else of what age or condition soever.

第208节．这里并不是要求年轻的绅士永远不去参与时下风行于有身份的年轻人中的那些无害的消遣。我绝不认为他应当清心寡欲又愁眉苦脸，相反还要说服他比平常更为礼貌地对待同伴的快乐和消遣。只要与绅士和诚实之人的身份相称，不管他们对自己有何期待，都不必反感或动怒。尽管对于打牌和掷骰子，我认为最保险和最佳的办法就是不要让他学，避免受到危险的引诱而浪费大好的时间。但是

愉快的闲聊和其他时髦的适当消遣是应当允许的。我认为，年轻人除了正事和主业以外，是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任何一门技艺的。人们无法掌握一门以上的技艺，不是因为无暇兼顾，而是努力不够。若能每天一个钟头，坚持进行某项有益的消遣，无需多久便可见到超乎想象的进步。且不论其他的用处，单是取代所见到的有害无益而又危险的时髦乐子，让人知道后者并非必要，就值得提倡了。如果能从小就助其摒弃无所事事的毛病，那么在某些人因屈服于风俗而虚度年华，不务正业也无所谓娱乐的时候，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精通上百件技艺。这些技艺即使与他们的职业本身相去甚远，但也绝不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基于这一点以及上文提及的其他理由，我认为，最不可纵容和允许年轻人去做的事情就是慵懒而百无聊赖地任时光流逝。这是一种健康紊乱的病态，无论什么年纪或地位的人都不应出现。

209 . To the arts above-mentioned may be added perfuming, varnishing, graving, and several sorts of working in iron, brass, and silver; and if, as it happens to most young gentlemen, that a considerable part of his time be spent in a great town, he may learn to cut, polish, and set precious stones, or employ himself in grinding and polishing optical glasses. Amongst the great variety there is of ingenious manual arts, 'twill be impossible that no one should be found to please and delight him, unless he be either idle or debauched, which is not to be supposed in a right way of education. And since he cannot be always employ'd in study, reading, and conversation, there will be many an hour, besides what his exercises will take up, which, if not spent this way, will be spent worse. For I conclude, a young man will seldom desire to sit perfectly still and idle; or, if he does, 'tis a fault that ought to be mended.

第209节．除了上述技艺外，还可以加上制香、涂漆、雕刻和铁

器、铜器和银器制作。如果和大多数年轻绅士一样居住在较大的城镇里，还可以学习切割、抛光和镶嵌宝石，或者从事光学玻璃的琢磨。在各种精巧的手工技艺中，不可能找不出一样让他满意和喜欢的。除非他无所事事或自甘堕落，而正确的教育方法之下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的。人不可能永远在学习、阅读和谈话，因此在练习之外，一定还有更多的时间。若不能善加利用，就会造成浪费。因为我得出一个结论，年轻人极少愿意干坐着，什么也不做。或者说如果他总是无所事事，那么也应该加以修正。

210．But if his mistaken parents, frightened with the disgraceful names of mechanic and trade, shall have an aversion to anything of this kind in their children; yet there is one thing relating to trade, which, when they consider, they will think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their sons to learn.

第210节．但是如果父母忌于机械和手艺的名声，反感孩子从事相关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件与手艺相关之事，细想之下会我觉得绝对有必要让儿子学习。

Merchants' accounts, thougha science not likely to help a gentleman to get an estate, yet possibly there is not anything of more use and efficacy, to make him preserve the estate he has. 'Tis seldom observed, that he keeps an accountof his income and expenses, and thereby has constantly under view the course of his domestic affairs, lets them run to ruin: and I doubt not but many a man gets behind-hand before he is aware, or runs farther on when he is once in, for want of this care, or the skill to do it. I would therefore advise all gentlemen to learn perfectly merchants' accounts, and not to think it is a skill that belongs not to them,

because it has received its name from, and has been chiefly practised by men of traffic.

商人的记账术虽然无法帮助绅士获取资产，但在维护已有资产方面却是用处和收效最大的。将收支状况记录在案，因而得以对家中事务流程了然于心的人，极少听说有家道中落的。我怀疑很多人正是因为大意或缺乏必要的技能，以至入不敷出却后知后觉，或者旧账未还，又添新债。因此我建议所有绅士都精通商人的记账术，切莫因为这一技能得名于商人，并主要由商人使用，而以为与自己无关。

Section 211-217

第211-217节

211 . When my young master has once got the skill of keeping accounts (which is a business of reason more than arithmetic) perhaps it will not be amiss that his father from thenceforth require him to do it in all his concernments. Not that I would have him set down every pint of wine or play that costs him money; the general name of expenses will serve for such things well enough: nor would I have his father look so narrowly into these accounts, as to take occasion from thence to criticise on his expences; he must remember that he himself was once a young man, and not forget the thoughts he had then, nor the right his son has to have the same, and to have allowance made for them. If therefore I would have the young gentleman oblig'd to keep an account, it is not at all to have that way a check upon his expenses (for what the father allows him, he ought to let him be fully master of) but only, that he might be brought early into the custom of doing it, and that it might be made familiar and habitual to him betimes, which will be so useful and necessary to be constantly practised the whole course of his life. A noble Venetian, whose son wallowed in the plenty of his father's riches, finding his son's expenses grow very high and extravagant, ordered his cashier to let him have for the future no more money than what he should count when he received it. This one would think no great restraint to a young gentleman's expenses; who could freely have as much money as he would tell. But yet this, to one that was used to nothing but the pursuit of his pleasures, prov'd a very great trouble, which at last ended in this sober and advantageous reflection: if it be so much pains to me barely to

count the money I would spend, what labour and pains did it cost my ancestors, not only to count, but get it? This rational thought, suggested by this little painimpos'd upon him, wrought so effectually upon his mind that it made him take up, and from that time forwards prove a good husband. This, at least, everybody must allow, that nothing is likelier to keep a man within compass than the having constantly before his eyes the state of his affairs in a regular course of account.

第211节．我的小主人一旦学会了记账（主要是推理而不是计算），他的父亲或许就有理由让他来记录所有相关事务。这并不是说要他把每一品脱酒或者娱乐花销全部记下，只需要记下支出的一般名目即可。也不用父亲严格核查账目，以借机批评他的开支。父亲应当记住自己也曾经年轻过，切莫忘了自己当年的想法，或者儿子同样也可以这样想的权利，而应当对此保持宽容。因此，我要求年轻的绅士记账，并非要通过这种办法来限制其开支（因为一旦得到了父亲的允许，就应该享有充分的支配权），而只是为了及早帮助他养成习惯，让他及时熟悉记账的方法并习以为常。这一能力大有用处和必要，一生中会常常用到。有一个威尼斯贵族，发现儿子沉溺于父亲的财富中，花钱大手大脚，奢侈无度，便吩咐账房，以后儿子来取钱，取的时候就要算清楚数目，绝不多给。有人认为这对年轻绅士的约束力有限，因为他只要开口说一个数字，便可以得到。但是这对于一个只知玩乐的人而言，就已经是很大的麻烦事了。最终他静下心来便会想到：如果只是弄清要花的钱就已经如此费劲，那么我的祖先，不光要计算，还要挣钱，又要花费多少力量和精力呢？这种反思是大有好处的。由施加在他身上的小小的痛苦便可引发这种理性的思考，对他的思想影响深远，能够促其发奋，从此努力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至少每个人都必须承认，要保证一个人不会挥霍无度，最好的办法就是定期记账，随时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

212 . The last part usually in education is travel, which is commonly thought to finish the work, and complete the gentleman. I confess travel into foreign countries has great advantages, but the time usually chosen to send young men abroad, is, I think, of all other, that which renders their least capable of reaping those advantages. Those which are propos'd, as to the main of them, may be reduced to these two: first, language, secondly, an improvement in wisdom and prudence, by seeing men, and conversing with people of tempers, customs and ways of living,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and especially from those of his parish and neighbourhood. But from sixteen to one and twenty, which is the ordinary time of travel, men are, of all their lives, the least suited to these improvements. The first season to get foreign languages, and form the tongue to their true accents, I should think, should be from seven to fourteen or sixteen, and then too a tutor with them is useful and necessary, who may with those languages teach them other things. But to put them out of their parents' view at a great distance under a governor, when they think themselves to be too much men to be governed by others, and yet have not prudence and experience enough to govern themselves, what is it, but to expose them to all the greatest dangers of their whole life, when they have the least fence and guard against them? 'Till that boiling boisterous part of life comes in, it may be hoped the tutor may have some authority: neither the stubbornness of age, nor the temptation or examples of others, can take him from his tutor's conduct till fifteen or sixteen; but then, when he begins to comfort himself with men, and thinks himself one; when he comes to relish and pride himself in manly vices, and thinks it a shame to be any longer under the control and conduct of another, what can be hoped from even the most careful and discreet governor, when neither he has power to compel, nor his pupil a disposition to be persuaded; but on the contrary, has the advice of warm blood and prevailing fashion, to

hearken to the temptations of his companions, just as wise as himself, rather than to the persuasions of his tutor, who is now looked on as an enemy to his freedom? And when is a man so like to miscarry, as when at the same time he is both raw and unruly? This is the season of all his life that most requires the eye and authority of his parents and friends to govern it. The flexibleness of the former part of a man's age, not yet grown up to be headstrong, makes it more governable and safe; and in the after-part, reason and foresight begin a little to take place, and mind a man of his safety and improvement. The time therefore I should think the fittest for a young gentleman to be sent abroad, would be, either when he is younger, under a tutor, whom he might be the better for; or when he is some years older, without a governor; when he is of age to govern himself, and make observations of what he finds in other countries worthy his notice, and that might be of use to him after his return; and when too, being thoroughly acquainted with the laws and fashions, the natural and moral advantages and defects of his own country, he has something to exchange with those abroad, from whose conversation he hoped to reap any knowledge.

第212节．通常教育问题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旅行。通常认为，谈完旅行讨论便可告一段落，培养绅士的工作也可圆满完成。我承认出国旅游有诸多好处，但是通常送年轻人出国的时机，非常不利于发挥其优势。主要的优势可归纳为两类：一是语言，二是增长见闻。旅行中可以遇见各种性格、风俗和生活方式的人，让他们与不同的人，尤其是本教区和邻近地区以外的人交往。但是从十六岁至二十一岁，也就是旅行的通常时间，恰恰是人一生中最难以在这些方面提高的几年。我认为学习外语，得以做到字正腔圆的首要时机是七岁至十四岁或十六岁，而且若能有导师相伴，用相应的语言教他别的知识，则大有益处且十分必要。但是如果要他们在自以为受到太多外来管束，却还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和经验来管理自己的时候，就远离父母，完全交

由某一个家庭教师，则岂不是在他们最没有抵抗和防范能力的时候，任由他们面对人生最大的危险吗？在热血沸腾躁动不安的年纪之前，可以指望导师拥有一些权威。在十五六岁还不是倔强的年纪之前，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诱惑或榜样而让他违背导师的意思，做出出格的举动。但是，一旦到了十五六岁，就逐渐开始习惯与大人相处，并认为自己是个大人了。等到他开始从大人的恶习中发现乐趣和虚荣，以再受到别人的控制和指挥为耻时，纵使是最小心谨慎的教师，又能作何奢望呢？此时不仅导师发号施令毫无作用，学生也根本不想被说服。相反，他们此时深受热血和流行风潮的影响，容易受到与自己具有同等智力水平的伙伴的引诱，而不再去管导师的劝导。这时导师多半被当作自由的敌人了。这个年纪既无阅历又鲁莽冲动，还有比这更容易误入歧途的时候吗？这正是一生中最需要父母和伙伴关注和管束的时期。年纪尚幼时可塑性强，不至于顽固，因此更易管束，也较为安全。长大以后，理智和顾虑开始发挥作用，便会自己注意自我保护和提高。因此我认为最适合年轻绅士出国的时机，要么就是很小的时候，在他喜欢的导师陪伴下出国，要么就再过几年，此时则无需导师陪伴。年纪稍大便有一定的自制力，对其他国家值得关注之事小心观察，并在他回国后发挥作用。同时因为对本国的法律、风土人情和道德的优劣有了充分的了解，他便可以与外国人进行交谈，并期待从中收获新知。

213．[Wanting].

第213节．（略）

214．The ordering of travel otherwise is that, I imagine which makes so many young gentlemen come back so little improved by it. And if they do bring home with them any knowledge of the places and people they have seen, it is often an admiration of the

worst and vainest practices they met with abroad; retaining a relish and memory of those things wherein their liberty took its first swing, rather than of what should make them better and wiser after their return. And indeed how can it be otherwise, going abroad at the age they do under the care of another, who is to provide their necessaries, and make their observations for them? Thus under the shelter and pretence of a governor, thinking themselves excused from standing upon their own legs or being accountable for their own conduct, they very seldom trouble themselves with enquiries or making useful observations of their own. Their thoughts run after play and pleasure, wherein they take it as a lessening to be controll'd; but seldom trouble themselves to examine the designs, observe the address, and consider the arts, tempers, and inclinations of men they meet with; that so they may know how to comport themselves towards them. Here he that travels with them is to screen them; get them out when they have run themselves into the briars; and in all their miscarriages be answerable for them.

第214节．我认为之所以很多年轻的绅士回国后却发现毫无长进，就是因为没有采用上述的方法来安排旅行。如果他们带回了对当地和所见之人的些许了解，也通常是羡慕在国外遇见的最糟糕和最虚荣的事物。留下的只是对那些第一次自由接触的事物的感受和印象，而不是那些能使他们回国后有所改观和更加明智的见解。的确，如果出国的时候，恰好处在需要别人照看的年纪，有人打点一切并代为观察，又怎么会有别的可能呢？在导师的庇护下既然有了借口，认为不必自立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然就极少发问，或是主动观察思考来自寻烦恼了。他们满脑子只想着玩乐，并认为这样可以体现自己受到的管束减少了。他们极少自找麻烦，检视所遇之人的意图，察其言观其色，或者思考其手法、脾气和性情，以得出相处之道。此时陪同之人便出来庇护，在他们陷入荆棘之时施以援手，并对他们所有的不当行为负责。

215 . I confess, the knowledge of men is so great a skill that it is not to be expected a young man should presently be perfect in it. But yet his going abroad is to little purpose, if travel does not sometimes open his eyes, make him cautious and wary, and accustom him to look beyond the outside, and, under the inoffensive guard of a civil and obliging carriage, keep himself free and safe in his conversation with strangers and all sorts of people without forfeiting their good opinion. He that is sent out to travel at the age, and with the thoughts of a man designing to improve himself, may get into the conversation and acquaintance of persons of condition where he comes; which, though a thing of most advantage to a gentleman that travels, yet I ask, amongst our young men that go abroad under tutors, what one is there of an hundred, that ever visits any person of quality? Much less makes an acquaintance with such, from whose conversation he may learn what is good breeding in that country, and what is worth observation in it; though from such persons it is, one may learn more in one day, than in a year's rambling from one inn to another. Nor indeed, is it to be wondered; for men of worth and parts will not easily admit the familiarity of boys who yet need the care of a tutor; though a young gentleman and stranger, appearing like a man, and shewing a desire to inform himself in the customs, manners, laws, and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 he is in, will find welcome assistance and entertainment amongst the best and most knowing persons everywhere, who will be ready to receive, encourage and countenance, an ingenuous and inquisitive foreigner.

第215节．我承认，识人乃重大技巧，不能奢望年轻人短期内就深谙其道。但是，如果出国旅行不能开拓其眼界，教会他小心谨慎，让他养成透过外表发现本质的习惯，或者让他彬彬有礼地与陌生人以

及各类人士自在安全地交流，而不破坏给人留下的好印象，那么就毫无意义了。如果到了合适的年纪，具备了成熟的思想，就会在旅行时与当地的高雅之士交谈和交往。尽管这是绅士出国时所能获得的最大优势，但我要问，在有导师陪伴的年轻人出国的时候，一百个人中是否又有一个曾经拜访了上层人士呢？至于结交上层人士，通过与他们交往学习该国的良好教养，寻找值得观察思考的事物，就更少见了。其实从这些人身上一天学来的东西，可能比游荡在旅馆之间的一年收获还要多。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德高望重的人通常不会与尚需导师照看的小孩子打得火热。但年轻绅士和访客若是举止成熟稳健，对了解该国的风土人情、法律和治理表现出热忱，在哪里都会得到最有德行和博学的人热情的帮助和款待。对于正直而有求知欲的外国人，他们总是乐意接纳、鼓励和支持的。

216 . This, how true soever it be, will not I fear alter the custom, which has cast the time of travel upon the worst part of a man's life; but for reasons not taken from their improvement. The young lad must not be ventured abroad at eight or ten, for fear of what may happen to the tender child, though he then runs ten times less risque than at sixteen or eighteen. Nor must he stay at home till that dangerous, heady age be over, because he must be back again by one and twenty, to marry and propagate. The father cannot stay any longer for the portion, nor the mother for a new set of babies to play with; and so my young master, whatever comes on it, must have a wife look'd out for him by that time he is of age; though it would be no prejudice to his strength, his parts, or his issue, if it were respited for some time, and he had leave to get, in years and knowledge, the start a little of his children, who are often found to tread too near upon the heels of their fathers, to the no great satisfaction either of son or father. But the young gentleman being got within view of matrimony, 'tis time to leave him to his mistress.

第216节．尽管这一点千真万确，恐怕也难以撼动风俗。但是，根据风俗选择的最不恰当的时机却并非出于提高素质的目的。小伙子八岁或十岁时不敢送出国，据说是因为担心孩子太小。尽管跟把十六或十八岁的孩子送出国相比，风险要小十倍。等到危险的叛逆期结束后再把孩子送出去也不行，因为他必须在二十一岁回国，以便娶妻生子。父亲急不可待地等着收嫁妆，母亲则盼着儿孙绕膝，我的小主人无论如何，到了年纪便要娶妻。尽管从身体、才能或后代而言，稍缓一阵并无大碍。况且经过几年，在经验和知识方面，便可以更加领先孩子。一个常见的情形恰恰是父子年岁相差太少，对双方都不好。但是一旦年轻的绅士步入了婚姻，就是把他交给妻子的时候了。

217 . Though I am now come to a conclusion of what obvious remarks have suggested to me concerning education, I would not have it thought that I look on it as a just treatise on this subject. There are a thousand other things that may need consideration; especially if one should take in the various tempers, different inclinations, and particular defaults, that are to be found in children, and prescribe proper remedies. The variety is so great that it would require a volume; nor would that reach it. Each man's mind has some peculiarity, as well as his face, that distinguishes him from all others; and there are possibly scarce two children who can be conducted by exactly the same method. Besides that, I think a prince, a nobleman, and an ordinary gentleman's son, should have different ways of breeding. But having had here only some general views in reference to the main end and aims in education, and those designed for a gentleman's son, whom, being then very little, I considered only as white paper, or wax, to be moulded and fashioned as one pleases; I have touched little more than those heads which I judged necessary for the breeding of a young gentleman of his condition in general; and have now published these my occasional thoughts with this hope, that though this be far

from being a complete treatise on this subject, or such as that every one may find what will just fit his child in it, yet it may give some small light to those, whose concern for their dear little ones makes them so irregularly bold, that they dare venture to consult their own reason in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rather than wholly to rely upon old custom.

第217节．尽管我对与教育密切相关的问题所做的评述即将结束，但并不希望大家把这本书当作法宝。因为这个话题还有上千件其他的事项有待讨论。若是考虑到儿童表现出来的不同脾性、性情和特殊的缺陷，并分别开出恰当的处方，就更是如此了。内容太多，需要用一卷书来收录，而一卷书恐怕也写不完。一如千人千面，每个人的心智都有其特点，不同于任何其他人。极少有两个儿童可以用完全一样的方法去教育。除此以外，我认为王公贵族和普通绅士的孩子，也应当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但是本书只涉及关于教育的主要目的一般观点，适用对象是一位绅士的儿子。绅士的孩子当时年纪还很小，我将其视为白纸或蜡，可以根据想法塑造和培养。我所提到的几乎全部内容都是针对和他一样的培养一般年轻绅士的方法。现在将总结出的偶然想法刊行发表，尽管不够全面，也无法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仍然希望提供些许启发，献给那些对孩子十分关爱而无所畏惧，敢于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诉诸理性，而不是全然遵从旧的风俗的人。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Republic
理想国

Plato
柏拉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理想国

The Republic

柏拉图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ERSONS OF THE DIALOGUE 对话人物
- BOOK I. 第一卷
- BOOK II. 第二卷
- BOOK III. 第三卷
- BOOK IV. 第四卷
- BOOK V. 第五卷
- BOOK VI. 第六卷
- BOOK VII. 第七卷
- BOOK VIII. 第八卷
- BOOK IX. 第九卷
- BOOK X. 第十卷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ERSONS OF THE DIALOGUE

对话人物

Socrates, who is the narrator.

苏格拉底，叙述者

Glaucon.

格劳孔

Adeimantus.

阿得曼托斯

Polemarchus.

玻勒马霍斯

Cephalus.

克法洛斯

Thrasymachus.

色拉叙马霍斯

Cleitophon.

克里托芬

And others who are mute auditors.

在场的其他人均为默不作声的听众

The scene is laid in the house of Cephalus at the Piraeus; and the whole dialogue is narrated by Socrates the day after it actually took place to Timaeus, Hermocrates, Critias, and a nameless person, who are introduced in the Timaeus.

对话地点设在位于比雷埃夫斯的克法洛斯家中。在对话发生后的第二天，苏格拉底向《蒂迈欧篇》中出现的蒂迈欧、赫莫克拉底、克里底亚及一位无名的听者转述整个对话经过。

BOOK I.

第一卷

SOCRATES-GLAUCON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格劳孔

I went down yesterday to the Piraeus with Glaucon the son of Ariston, that I might offer up my prayers to the goddess; and also because I wanted to see in what manner they would celebrate the festival, which was a new thing. I was delighted with the procession of the inhabitants; but that of the Thracians was equally, if not more, beautiful. When we had finished our prayers and viewed the spectacle, we turne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city; and at that instant Polemarchus the son of Cephalus chanced to catch sight of us from a distance as we were starting on our way home, and told his servant to run and bid us wait for him. The servant took hold of me by the cloak behind, and said: Polemarchus desires you to wait.

昨日，我与阿里斯顿的儿子格劳孔一同前往比雷埃夫斯港。这样，一方面我可以祭拜女神，另一方面我想看一看当地的人们如何庆祝这一新兴的节日。我很喜欢当地人的游行盛典，但色雷斯人的游行盛会，若非更胜一筹，亦不稍逊。我们做完祷告，看完庆典，就打算回雅典城了。即将起程时，克法洛斯的儿子玻勒马霍斯，碰巧从远处看见了我们，便连忙命他的仆人跑过来，让我们等他一下。那仆人从背后拉住我的披风，说道："玻勒马霍斯请您稍等片刻。"

I turned round, and asked him where his master was.

我转过身，问他：“你的主人在哪儿？”

There he is, said the youth, coming after you, if you will only wait.

青年仆人答道，“在那儿，他正追您呢，您只需稍等片刻。”

Certainly we will, said Glaucon; and in a few minutes Polemarchus appeared, and with him Adeimantus, Glaucon's brother, Niceratus the son of Nicias, and several others who had been at the procession.

格劳孔说：“我们就等等他吧！”几分钟后，玻勒马霍斯赶至，与他同来的，还有格劳孔的兄弟阿得曼托斯，以及尼西亚的儿子尼凯拉托等人。他们刚刚都参加了游行。

SOCRATES-POLEMARCHUS-GLAUCON-ADEIMANTUS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玻勒马霍斯、格劳孔、阿得曼托斯

Polemarchus said to me: I perceive, Socrates, that you and your

companion are already on your way to the city.

玻勒马霍斯（以下用“玻”）：我猜，苏格拉底，你们已经准备返回雅典城了。

You are not far wrong, I said.

苏格拉底（以下用“苏”）：没错，大体上是这样。

But do you see, he rejoined, how many we are?

玻：但你没看见吗？我们可是人多势众。

Of course.

苏：我看见了，的确如此。

And are you stronger than all these? for if not, you will have to remain where you are.

玻：你们能以少胜多吗？若不能，你们须留在原处。

May there not be the alternative, I said, that we may persuade you to let us go?

苏：难道不是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吗？我们可能会说服你们放我们离开。

But can you persuade us, if we refuse to listen to you? he said.

玻：但若是我们根本就不听你们讲，你们能说服我们吗？

Certainly not, replied Glaucon.

格劳孔（以下用“格”）：当然不能。

Then we are not going to listen; of that you may be assured.

玻：我们决不会听的；你们就放心吧。

Adeimantus added: Has no one told you of the torch-race on horseback in honour of the goddess which will take place in the evening?

阿得曼托斯：难道没有人告诉你们，今晚要举行祭拜女神的马背

火炬接力赛吗？

With horses! I replied: That is a novelty. Will horsemen carry torches and pass them one to another during the race?

苏：马背上的接力！这倒挺有新意。是骑手们在赛马的同时要将手中的火炬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吗？

Yes, said Polemarchus, and not only so, but a festival will be celebrated at night, which you certainly ought to see. Let us rise soon after supper and see this festival; there will be a gathering of young men, and we will have a good talk. Stay then, and do not be perverse.

玻：是的，不仅如此，晚上还要举办庆祝盛典，绝对不容错过。我们吃过晚饭就动身，一同去看庆祝盛典；到时年轻人云集一处，大家尽情畅谈一番。留下来吧，不要固执了。

Glaucon said: I suppose, since you insist, that we must.

格：看来，盛情难却，我们就留下吧。

Very good, I replied.

苏：那好吧。

GLAUCON-CEPHALUS-SOCRATES

主要人物：格劳孔、克法洛斯、苏格拉底

Accordingly we went with Polemarchus to his house; and there we found his brothers Lysias and Euthydemus, and with them Thrasymachus the Chalcedonian, Charmantides the Paeanian, and Cleitophon the son of Aristonymus. There too was Cephalus the father of Polemarchus, whom I had not seen for a long time, and I thought him very much aged. He was seated on a cushioned chair, and had a garland on his head, for he had been sacrificing in the court; and there were some other chairs in the room arranged in a semicircle, upon which we sat down by him. He saluted me eagerly, and then he said:—

于是，我们跟随玻勒马霍斯去了他家，在那见到他的两个兄弟吕西亚和欧塞得摩，还有来自切各斯的色拉叙马霍斯、来自帕尼亚的切曼提得斯，以及阿里斯托摩斯的儿子克里托芬。我们也见到了玻勒马霍斯的父亲克法洛斯。我有好长时间没见过他了，感觉他好像苍老了许多。他坐在有靠垫的座椅里，头上戴着花环，因为他刚刚从神庙祭拜回来。房间里还有几把椅子，摆成了一个半圆形。我们在他身旁落座。他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You don't come to see me, Socrates, as often as you ought: If I were still able to go and see you I would not ask you to come to me.

But at my age I can hardly get to the city, and therefore you should come oftener to the Piraeus. For let me tell you, that the more the pleasures of the body fade away, the greater to me is the pleasure and charm of conversation. Do not then deny my request, but make our house your resort and keep company with these young men; we are old friends, and you will be quite at home with us.

克法洛斯（以下用“克”）：真是稀客啊，苏格拉底，你应该常来看我才对。如果身体状况允许，我早就看你去了，哪里还会有劳你登门造访。可是，如今我年事已高，连进趟城都不行，就得麻烦你常来比雷埃斯港了。可以肯定地说，身体的享乐消失得越快，我就越能发现谈话的魅力，且它能给予我的快乐也越多。所以，不要拒绝我的请求。常来我家，让这些年轻人陪伴在你的左右；我们是老朋友了，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

I replied: There is nothing which for my part I like better, Cephalus, than conversing with aged men; for I regard them as travellers who have gone a journey which I too may have to go, and of whom I ought to enquire, whether the way is smooth and easy, or rugged and difficult. And this is a question which I should like to ask of you who have arrived at that time which the poets call the 'threshold of old age'—Is life harder towards the end, or what report do you give of it?

苏：克法洛斯，我本人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与老人家攀谈了。在我眼里，老人就好比是人生路上的旅行者，已经踏上一条我日后想必也要走上的旅途。关于这是怎样的旅途，我需要向你们多多请教。它究竟是一条康庄坦途，还是崎岖不平，布满荆棘呢？诚如诗人所说，您已经“步入老年”。我想向你请教——晚年生活，是更为痛苦艰辛

吗？还是您别有一番高论？

I will tell you, Socrates, he said, what my own feeling is. Men of my age flock together; we are birds of a feather, as the old proverb says; and at our meetings the tale of my acquaintance commonly is—I cannot eat, I cannot drink; the pleasures of youth and love are fled away: there was a good time once, but now that is gone, and life is no longer life. Some complain of the slights which are put upon them by relations, and they will tell you sadly of how many evils their old age is the cause. But to me, Socrates, these complainers seem to blame that which is not really in fault. For if old age were the cause, I too being old, and every other old man, would have felt as they do. But this is not my own experience, nor that of others whom I have known. How well I remember the aged poet Sophocles, when i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How does love suit with age, Sophocles,—are you still the man you were? Peace, he replied; most gladly have I escaped the thing of which you speak; I feel as if I had escaped from a mad and furious master.

克：好吧，苏格拉底，我愿意把我的个人感受讲给你听。俗话说得好，“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常喜欢聚在一处。聚会的时候，我的熟人总是免不了老生常谈：什么也吃不下，酒也不能喝了；年轻时的情爱享乐也不复存在了：曾经拥有一段美好时光却一去不返，现在过得简直不能叫日子。有的人，会抱怨家人对他们的轻蔑，会凄凄艾艾地向你讲述，年老是各种不幸的根源。但是，苏格拉底，在我看来，这些发牢骚者的指责是有失公允的。如果年老便是祸根，那么我以及其他所有上了年纪的人，都应该和他们深有同感才对。但不论是我，还是我所认识的其他人，对此都不敢苟同。我清楚地记得，一次有人问老诗人索法克勒斯：“索法克勒斯，年龄和爱情有什么关系呢？你仍风流不减当年吗？”索发克勒斯答

道，“请听我说，令我至为欣喜的是，我已经摆脱了你所言之物的困扰；我感觉仿佛自己摆脱了狂暴主人的束缚。”

His words have often occurred to my mind since, and they seem as good to me now as at the time when he uttered them. For certainly old age has a great sense of calm and freedom; when the passions relax their hold, then, as Sophocles says, we are freed from the grasp not of one mad master only, but of many.

此后，我常常会回想起他的这句话。至今，我仍然认为，他回答得非常好。年老能给予人们平和的心态和自由感；年轻时的激情开始退减时，如索法克勒斯所言，我们就仿佛逃离了不只是一个而是许多狂暴主人的掌控。

The truth is, Socrates, that these regrets, and also the complaints about relations, are to be attributed to the same cause, which is not old age, but men's characters and tempers; for he who is of a calm and happy nature will hardly feel the pressure of age, but to him who is of an opposite disposition youth and age are equally a burden.

苏格拉底，事实上，年老者的遗憾以及种种抱怨，归根结底都有一个共同的缘由，那不是年老，而是他们本身的脾气秉性。因为心境平和、知足常乐的人对年龄增长的压力几乎浑然不觉，但是对于性情相反的人来说，无论青春岁月还是垂暮之年，在他们眼中都是一种负担。

I listened in admiration, and wanting to draw him out, that he might go on—Yes, Cephalus, I said: but I rather suspect that people in general are not convinced by you when you speak thus; they think that old age sits lightly upon you, not because of your happy disposition, but because you are rich, and wealth is well known to be a great comforter.

苏：（我听了克法洛斯的话，暗暗佩服，但我想把他的话题转过来）有道理，克法洛斯，但我仍觉得大多数人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他们以为，你在老年没有吃到多少苦头，并非因为你乐天知命，而是因为你富有。众所周知，财富足以给人带来很大的安慰。”

You are right, he replied; they are not convinced: and there is something in what they say; not, however, so much as they imagine. I might answer them as Themistocles answered the Seriphian who was abusing him and saying that he was famous, not for his own merits but because he was an Athenian: 'If you had been a native of my country or I of yours, neither of us would have been famous.' And to those who are not rich and are impatient of old age, the same reply may be made; for to the good poor man old age cannot be a light burden, nor can a bad rich man ever have peace with himself.

克：你说得对，他们不会信服。他们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然而，他们的想法也不完全正确。例如，色里芬嘲笑第米斯多德之所以功成名就，并非是因为他的美德，而是因为他是雅典人。第米斯多德答道：“如果你出生于雅典，而我出生在你的城邦，那么我们俩谁都不会出名。”这句话适用于那些既不富有，又对年老失去耐心的人。对于善良的穷人来说，晚年生活固然是个不小的负担，但邪恶的富

人，从来都不会获得内心的祥和平静。

May I ask, Cephalus, whether your fortune was for the most part inherited or acquired by you?

苏：克法洛斯，可否问一句，你家产的大部分是继承而来的，还是自己挣来的？

Acquired! Socrates; do you want to know how much I acquired? In the art of making money I have been midway betwee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for my grandfather, whose name I bear, doubled and trebled the value of his patrimony, that which he inherited being much what I possess now; but my father Lysanias reduced the property below what it is at present: and I shall be satisfied if I leave to these my sons not less but a little more than I received.

克：自己挣的！苏格拉底，你想知道我挣了多少吗？就赚钱的本领而言，我介于祖父与父亲之间。我与祖父同名。祖父（我和他同名）把他继承的家产增加了两三倍。我现在所拥有的财产大多也是从他那里继承的。但是，在我父亲吕萨尼亚的经营下，家产减少到比我现在的还要少。只要留给儿子们的家产，比我当初得到的稍微多些，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That was why I asked you the question, I replied, because I see that you are indifferent about money, which is a characteristic rather of those who have inherited their fortunes than of those who

have acquired them; the makers of fortunes have a second love of money as a creation of their own, resembling the affection of authors for their own poems, or of parents for their children, besides that natural love of it for the sake of use and profit which is common to them and all men. And hence they are very bad company, for they can talk about nothing but the praises of wealth.

苏：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发现，你不屑于钱财之物。这样的金钱观，在那些继承祖宗家业者中，非常典型，但在创立家业者中，却不多见。创业者对钱财的感情不一般，就好比诗人珍爱自己的诗篇，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但除此之外，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因为钱能带来许多好处，自然会对钱产生喜爱之情。这样，成功的创业者唯一的话题，就是夸耀自己的财富，因此他们往往人缘特别差。

That is true, he said.

克：确实如此。

Yes, that is very true, but may I ask another question? What do you consider to be the greatest blessing which you have reaped from your wealth?

苏：是的，千真万确。不过，我可否再向你请教个问题？在你看来，你从财富中收获的最大福祉是什么呢？

One, he said, of which I could not expect easily to convince

others. For let me tell you, Socrates, that when a man thinks himself to be near death, fears and cares enter into his mind which he never had before; the tales of a world below and the punishment which is exacted there of deeds done here were once a laughing matter to him, but now he is tormented with the thought that they may be true: either from the weakness of age, or because he is now drawing nearer to that other place, he has a clearer view of these things; suspicions and alarms crowd thickly upon him, and he begins to reflect and consider what wrongs he has done to others. And when he finds that the sum of his transgressions is great he will many a time like a child start up in his sleep for fear, and he is filled with dark forebodings. But to him who is conscious of no sin, sweet hope, as Pindar charmingly says, is the kind nurse of his age:

克：一种我料想不易见信于人的福祉。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苏格拉底，当一个人想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会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和忧虑。关于冥界的说法、人死后善恶终有报的各种传说，曾几何时，只是被他作为一笑了之的笑料来听，但是现在或者由于年老体弱，或者由于自己离另一个世界越来越近了，他更加理解这些关于人死后的传说了，于是他精神备受煎熬，担心传说的事情都是真的。他满腹狐疑，充满恐惧，开始努力回想自己做过多少恶事。当他意识到自己一生作恶多端，便经常如孩童般从噩梦中惊醒，对未来充满恐怖的想象。但是，如果一个人问心无愧，那么正如诗人品达迷人的诗句所说，甜美的希望将成为他暮年慈爱的保姆。

'Hope,' he says, 'cherishes the soul of him who lives in justice and holiness, and is the nurse of his age and the companion of his journey;—hope which is mightiest to sway the restless soul of man.'

品达说："希望滋养着正义和神圣的心灵，是其暮年的保姆，人生旅途的同伴——希望是主宰人类不安灵魂的强大力量。"

How admirable are his words! And the great blessing of riches, I do not say to every man, but to a good man, is, that he has had no occasion to deceive or to defraud others, either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and when he departs to the world below he is not in any apprehension about offerings due to the gods or debts which he owes to men. Now to this peace of mind the possession of wealth greatly contributes; and therefore I say, that, setting one thing against another, of the many advantages which wealth has to give, to a man of sense this is in my opinion the greatest.

多么美妙的诗句啊！对于一个好人，而不是任何一个人来说，财富能带来的最大福祉是，无论是故意还是非故意，他都不必去欺骗他人。当他去往冥界之时，他就不必因无力适时献祭而怠慢神明，或者因亏欠他人债务而诚惶诚恐了。如此坦然的心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财富的占有。因此，我要说，拥有财富，固然可以带来诸多好处，但比较而言，对于通情达理之人来说，其中最大的益处莫过于此。

Well said, Cephalus, I replied; but as concerning justice, what is it?—to speak the truth and to pay your debts—no more than this? And even to this are there not exceptions? Suppose that a friend when in his right mind has deposited arms with me and he asks for them when he is not in his right mind, ought I to give them back to him? No one would say that I ought or that I should be right in doing so, any more than they would say that I ought always to speak the truth to one who is in his condition.

苏：你说得真好，克法洛斯。不过说到“正义”，它指的是什么？实话实说，欠债还钱，仅此而已吗？对这一点来说，难道就没有例外的情形吗？假如一个朋友在头脑清醒时，将武器交与我保管，后来他在失去理智的情形下向我索要武器，那么我应该把武器还给他吗？所有人都会认为，我不应该把武器还给他，或者认为我如果归还，就是不对的；同时他们还会说，对于失去理智的朋友，我也不应该总是实话实说。

You are quite right, he replied.

克：你说得很对。

But then, I said, speaking the truth and paying your debts is not a correct definition of justice.

苏：可见，“实话实说，欠债还钱”，并不能正确地定义正义。

CEPHALUS-SOCRATES-POLEMARCHUS

主要人物：克法洛斯、苏格拉底、玻勒马霍斯

Quite correct, Socrates, if Simonides is to be believed, said Polemarchus interposing.

玻勒马霍斯插话说道："不，如果诗人西蒙尼可信的话，这样定义是十分正确的。"

I fear, said Cephalus, that I must go now, for I have to look after the sacrifices, and I hand over the argument to Polemarchus and the company.

克：恐怕我得失陪了，必须去料理献祭之事。我把论辩的任务交由玻勒马霍斯等人继续完成吧。

Is not Polemarchus your heir? I said.

苏："难道玻勒马霍斯不是你的继承人吗？"

To be sure, he answered, and went away laughing to the sacrifices.

克：当然是。克法洛斯大笑着献祭去了

SOCRATES-POLEMARCHUS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玻勒马霍斯

Tell me then, O thou heir of the argument, what did Simonides say, and according to you truly say, about justice?

苏：那么，本场论辩的继承人先生，请告诉我，在你看来，诗人西蒙尼关于正义究竟有何高论呢？

He said that the repayment of a debt is just, and in saying so he appears to me to be right.

玻：他说，欠债还钱，是正义的。我对此深表赞同。

I should be sorry to doubt the word of such a wise and inspired man, but his meaning, though probably clear to you, is the reverse of clear to me. For he certainly does not mean, as we were just now saying, that I ought to return a deposit of arms or of anything else to one who asks for it when he is not in his right senses; and yet a deposit cannot be denied to be a debt.

苏：很抱歉，我本来不该对如此聪明睿智、受神灵启示的诗人提出质疑，可是你可能理解他的意思，但是我却被他的话弄糊涂了。显然，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西蒙尼的本意并不是指，即使在原主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我也应该遵照其意愿，将代为保管的，包括武器在内的一切物品，双手奉还。然而，不可否认，寄存物是一笔必须偿还的债务。

True.

玻：对。

Then when the person who asks me is not in his right mind I am by no means to make the return?

苏：那么，无论如何，我不能在原主失去理智时，归还物件，对吗？

Certainly not.

玻：当然不能。

When Simonides said that the repayment of a debt was justice, he did not mean to include that case?

苏：西蒙尼在提出“欠债还钱，即为正义”这一观点时，他并未打算把上述情形也包括在内吗？

Certainly not; for he thinks that a friend ought always to do good to a friend and never evil.

玻：当然。他认为，朋友之间，应该友善相处，切不可伤害朋友。

You mean that the return of a deposit of gold which is to the injury of the receiver, if the two parties are friends, is not the repayment of a debt,—that is what you would imagine him to say?

苏：你的意思是，如果彼此是朋友，而归还金钱的行为，又会为原主带来伤害，那么这就已经不是欠债还钱了。你觉得，这就是西蒙尼的观点吗？

Yes.

玻：是的。

And are enemies also to receive what we owe to them?

苏：那么，我们亏欠敌人的，是否也要偿还呢？

To be sure, he said, they are to receive what we owe them, and an enemy, as I take it, owes to an enemy that which is due or proper to him—that is to say, evil.

玻：当然，我们亏欠他们的，也要如数偿还。在我看来，一个人亏欠仇敌的东西只有恶。

Simonides, then, after the manner of poets, would seem to have spoken darkly of the nature of justice; for he really meant to say that justice is the giving to each man what is proper to him, and this he termed a debt.

苏：西蒙尼以诗人的方式谈到了正义的本质，但似乎讲得含糊不清。而他真正想说的却是，正义即给予每个人以合适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即他所谓的“债”。

That must have been his meaning, he said.

玻：想必这即是他的本意。

By heaven! I replied; and if we asked him what due or proper thing is given by medicine, and to whom, what answer do you think that he would make to us?

苏：天哪！如果我们向他请教，该向谁提供医药才算合适，你觉得他会如何回答呢？

He would surely reply that medicine gives drugs and meat and drink to human bodies.

玻：他必然会回答，医药为人的身体提供药品与饮食。

And what due or proper thing is given by cookery, and to what?

苏：那么，烹调法把什么合适的东西给予了什么人呢？

Seasoning to food.

玻：给食物以调味品。

And what is that which justice gives, and to whom?

苏：那么，正义给谁以什么合适的东西呢？

If, Socrates, we are to be guided at all by the analogy of the preceding instances, then justice is the art which gives good to friends and evil to enemies.

玻：苏格拉底，如果依此类推下去的话，所谓正义这门艺术，就是给友人以善，给敌人以恶。

That is his meaning then?

苏：这是西蒙尼的本意吗？

I think so.

玻：我认为，这是他的本意。

And who is best able to do good to his friends and evil to his enemies in time of sickness?

苏：在瘟疫蔓延时期，谁最有能力造福友人，打击敌人？

The physician.

玻：医生。

Or when they are on a voyage, amid the perils of the sea?

苏：那么，当他们在险象环生的航海途中呢？

The pilot.

玻：舵手。

And in what sort of actions or with a view to what result is the just man most able to do harm to his enemy and good to his friend?

苏：那么在何种行动中，或者以何为宗旨，正义者最有能力伤害其敌人，有利于其友人？

In going to war against the one and in making alliances with the other.

玻：在战争时期，与友人联盟抗敌。

But when a man is well, my dear Polemarchus, there is no need of a physician?

苏：不过，我亲爱的玻勒马霍斯啊，当人们健康安泰之时，医生就毫无用武之地了，对吗？

No.

玻：是的。

And he who is not on a voyage has no need of a pilot?

苏：那么，不航海之人，便不需要舵手吗？

No.

玻：不需要。

Then in time of peace justice will be of no use?

苏：那么，在和平时期，正义将毫无用处吗？

I am very far from thinking so.

玻：我绝不这么认为。

You think that justice may be of use in peace as well as in war?

苏：在你看来，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正义都可以有用武之地吗？

Yes.

玻：是的。

Like husbandry for the acquisition of corn?

苏：正如种田，可以收获五谷吗？

Yes.

玻：是的。

Or like shoe making for the acquisition of shoes,—that is what you mean?

苏：正如为了得到鞋子而去做鞋，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Yes.

玻：是的。

And what similar use or power of acquisition has justice in time of peace?

苏：那么，和平时期的正义，有什么类似的用途呢？

In contracts, Socrates, justice is of use.

玻：在订立合同时，正义发挥作用，苏格拉底。

And by contracts you mean partnerships?

苏：提到合同，你指的是伙伴关系吧？

Exactly.

玻：完全正确。

But is the just man or the skilful player a more useful and better partner at a game of draughts?

苏：但是，在下棋时，谁是更有用、更好的合作伙伴，是正义者，还是下棋高手？

The skilful player.

玻：下棋高手。

And in the laying of bricks and stones is the just man a more useful or better partner than the builder?

苏：在砌砖垒石时，正义者比施工人员更有用或者更有利于合作吗？

Quite the reverse.

玻：正好相反。

Then in what sort of partnership is the just man a better partner than the harp-player, as in playing the harp the harp-player is certainly a better partner than the just man?

苏：在弹竖琴的时候，琴师必然是较之正义者更为合适的合作者。那么，在哪种合伙关系中，正义者是较之琴师更合适的合作者呢？

In a money partnership.

玻：在事关钱财的合伙关系中。

Yes, Polemarchus, but surely not in the use of money; for you do not want a just man to be your counsellor in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 horse; a man who is knowing about horses would be better for that, would he not?

苏：是的，但是，玻勒马霍斯，这种合伙关系，一定不能涉及钱财的使用问题。比如，在买卖马匹方面，你不能指望去咨询一个正义者来做决定；相比较而言，识马者才是更为合适的合伙人，对不对？

Certainly.

玻：当然。

And when you want to buy a ship, the shipwright or the pilot would be better?

苏：同样，如果你想买一艘船，造船工或者舵手是更好的合伙人吗？

True.

玻：对。

Then what is that joint use of silver or gold in which the just man is to be preferred?

苏：那么，在哪种合伙用钱的情况下，正义者是更好的合伙人呢？

When you want a deposit to be kept safely.

玻：当需要对钱财进行妥善保管时。

You mean when money is not wanted, but allowed to lie?

苏：你是说，当钱财闲置无用，需要存起来的时候吗？

Precisely.

玻：完全正确。

That is to say, justice is useful when money is useless?

苏：也就是说，在钱财不派任何用场的情况下，正义才发挥作用吗？

That is the inference.

玻：可以这么说。

And when you want to keep a pruning-hook safe, then justice is useful to the individual and to the state; but when you want to use it, then the art of the vine-dresser?

苏：当你需要妥善保管一把修枝用的钩刀时，则于公于私正义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需要用它修剪葡萄枝，那么专门的修剪手艺就派上用场了，对吗？

Clearly.

玻：显而易见。

And when you want to keep a shield or a lyre, and not to use them, you would say that justice is useful; but when you want to use them, then the art of the soldier or of the musician?

苏：同样，当你需要找人代为保管闲置无用的盾牌或竖琴时，你会说正义是有用的；但是当你想使用盾牌或竖琴时，军人或琴师的技艺才有用，对吗？

Certainly.

玻：当然。

And so of all the other things;—justice is useful when they are useless, and useless when they are useful?

苏：以此类推，对于其他任何财物，皆是如此。即当正义有用之时，财物无用，而当财物有用之时，正义无用，对吗？

That is the inference.

玻：可以这样说。

Then justice is not good for much. But let us consider this further point: Is not he who can best strike a blow in a boxing match or in any kind of fighting best able to ward off a blow?

苏：由此看来，正义的用处，不过如此。我们不妨再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在拳击比赛中或者在其他形式的打斗中，是不是最善于攻击别人的人才是最擅长于防守的呢？

Certainly.

玻：当然。

And he who is most skilful in preventing or escaping from a disease is best able to create one?

苏：那么，在预防疾病方面最在行的人，是否也最有能力制造疾病呢？

True.

玻：是的。

And he is the best guard of a camp who is best able to steal a march upon the enemy?

苏：同样，以坚守阵地见长者，往往也擅长于偷袭敌人夺取先机，对吗？

Certainly.

玻：当然。

Then he who is a good keeper of anything is also a good thief?

苏：那么，最擅长保管东西的人，同时也是狡猾的窃贼吗？

That, I suppose, is to be inferred.

玻：好像可以这样说。

Then if the just man is good at keeping money, he is good at stealing it.

苏：那么，如果正义者以保管钱物见长，他就一定擅长于偷盗钱物，是吗？

That is implied in the argument.

玻：从推理上看，是这样的。

Then after all the just man has turned out to be a thief. And this is a lesson which I suspect you must have learnt out of Homer; for he, speaking of Autolycus, the maternal grandfather of Odysseus, who is a favourite of his, affirms that 'He was excellent above all men in theft and perjury.' And so, you and Homer and Simonides are agreed that justice is an art of theft; to be practised however 'for the good of friends and for the harm of enemies,'—that was what you were saying?

苏：那么，归根结底，正义者其实就是窃贼。同时，我怀疑，你

的这一说法，是从荷马那里学来的。当荷马说到他最喜爱的一个人物——奥德修斯的外祖父奥托吕科斯时，肯定地讲道：“在偷窃和起伪誓方面，奥托吕科斯技高一筹，无人能敌。”所以说，你、荷马以及西蒙尼一致认为，正义是门偷盗的技术，不过这种偷盗只是“为了给友人以善，给敌人以恶”才从事的——你是这样想的吧？

No, certainly not that, though I do not now know what I did say; but I still stand by the latter words.

玻：不，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尽管我此时也不记得自己当初的话，但是我仍坚持认为，正义就是要给友人以善，给敌人以恶。

Well, there is another question: By friends and enemies do we mean those who are so really, or only in seeming?

苏：好吧，我再向你提一个问题：当我们说到友人与敌人时，我们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敌与友，还是仅仅就是表面意义上的敌友。

Surely, he said, a man may be expected to love those whom he thinks good, and to hate those whom he thinks evil.

玻：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倾向于喜爱那些他们认为善良的人，仇恨那些他们认为邪恶的人。

Yes, but do not persons often err about good and evil: many

who are not good seem to be so, and conversely?

苏：是啊，但人们难道不是经常在判断善恶是非时出错吗？——那些看起来面善的人往往是坏人，反之亦然。

That is true.

玻：的确如此。

Then to them the good will be enemies and the evil will be their friends?

苏：那么，在不辨善恶者眼里，好人岂不是成了敌人，坏人岂不是成了朋友？

True.

玻：对。

And in that case they will be right in doing good to the evil and evil to the good?

苏：这种情形之下，他们的正义，便是善待恶人，仇恨好人吗？

Clearly.

玻：显然如此。

But the good are just and would not do an injustice?

苏：然而，好人是正义的，不会行不义之事，对吗？

True.

玻：对。

Then according to your argument it is just to injure those who do no wrong?

苏：那么，根据你的观点，伤害无辜就是正义，对吗？

Nay, Socrates; the doctrine is immoral.

玻：我反对。苏格拉底，这样说太不道德了。

Then I suppose that we ought to do good to the just and harm to the unjust?

苏：那么，假设说我们应该善待正义之人，打击不义之人呢？

I like that better.

玻：我比较喜欢这个提法。

But see the consequence:—Many a man who is ignorant of human nature has friends who are bad friends, and in that case he ought to do harm to them; and he has good enemies whom he ought to benefit; but, if so, we shall be saying the very opposite of that which we affirmed to be the meaning of Simonides.

苏：但是，让我们看看这样能得出什么结论：许多人由于对人性的无知，错把坏人视为朋友，把好人视为敌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应该做的，就是打击朋友，善待敌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说法，则有悖于我们刚刚提到的西蒙尼的观点。

Very true, he said: and I think that we had better correct an error into which we seem to have fallen in the use of the words 'friend' and 'enemy.'

玻：确实如此。我想，我们最好纠正一个错误：在使用“朋

友”和“敌人”这两个字眼时，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

What was the error, Polemarchus? I asked.

苏：玻勒马霍斯，我们错在哪儿？

We assumed that he is a friend who seems to be or who is thought good.

玻：我们假定，看起来善良或者被认为善良者，即为我们的朋友。

And how is the error to be corrected?

苏：那么，该如何纠正这个错误呢？

We should rather say that he is a friend who is, as well as seems, good; and that he who seems only, and is not good, only seems to be and is not a friend; and of an enemy the same may be said.

玻：更确切地来讲，我们应该说，表里如一的好人，才是朋友，而那些外表善良、内心险恶者，只是看起来像朋友，却并非朋友。对于“敌人”亦是如此。

You would argue that the good are our friends and the bad our enemies?

苏：你认为好人是我们的朋友，坏人是我们的敌人吗？

Yes.

玻：是的。

And instead of saying simply as we did at first, that it is just to do good to our friends and harm to our enemies, we should further say: It is just to do good to our friends when they are good and harm to our enemies when they are evil?

苏：同时，我们也不能再像起初那样，将正义简单地定义为“善待友人，打击敌人”，而是应该进一步明确说明：所谓正义，就是善待善良的朋友，打击邪恶的敌人。对吗？

Yes, that appears to me to be the truth.

玻：对。在我看来，这便是真理。

But ought the just to injure any one at all?

苏：但是，正义者应该伤害他人吗？

Undoubtedly he ought to injure those who are both wicked and his enemies.

玻：毋庸置疑，他应该伤害那些邪恶歹毒、与他为敌的人。

When horses are injured, are they improved or deteriorated?

苏：当马受到伤害，它们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

The latter.

玻：变得更糟。

Deteriorated, that is to say, in the good qualities of horses, not of dogs?

苏：变得更糟，是就马本身的良好品性而言的，而不是狗的品性变了，对吗？

Yes, of horses.

玻：毫无疑问，是马的品性。

And dogs are deteriorated in the good qualities of dogs, and not of horses?

苏：同样，当狗受到伤害时，变得更糟的，是狗本身的良好品性，而不是马的，对吗？

Of course.

玻：当然。

And will not men who are injured be deteriorated in that which is the proper virtue of man?

苏：当人受到伤害时，他的美德会不会变坏呢？

Certainly.

玻：当然会。

And that human virtue is justice?

苏：那么，人类美德是正义吗？

To be sure.

玻：确定无疑。

Then men who are injured are of necessity made unjust?

苏：那么，人们受到伤害后，必然会丧失正义感吗？

That is the result.

玻：结果必然如此。

But can the musician by his art make men unmusical?

苏：但是，音乐家能够运用其音乐才能，使人们不懂音乐吗？

Certainly not.

玻：当然不能。

Or the horseman by his art make them bad horsemen?

苏：那么，骑师能否运用其骑术，使人们不善骑马吗？

Impossible.

玻：不可能。

And can the just by justice make men unjust, or speaking generally, can the good by virtue make them bad?

苏：那么，正义能够使人变得非正义吗？或者笼统点说，美德能使人变坏吗？

Assuredly not.

玻：决不可能。

Any more than heat can produce cold?

苏：正如热不能产生冷吗？

It cannot.

玻：不能。

Or drought moisture?

苏：正如干旱不能导致潮湿吗？

Clearly not.

玻：很明显，不能。

Nor can the good harm any one?

苏：那么，好人也不能伤害他人吗？

Impossible.

玻：不可能。

And the just is the good?

苏：那么，正义者，是好人吗？

Certainly.

玻：当然。

Then to injure a friend or any one else is not the act of a just man, but of the opposite, who is the unjust?

苏：那么，伤害友人或其他人，并非正义者的行为，而是与之对立的非正义者的行为吗？

I think that what you say is quite true, Socrates.

玻：言之有理，苏格拉底。

Then if a man says that justice consists in the repayment of debts, and that good is the debt which a just man owes to his friends, and evil the debt which he owes to his enemies,—to say this is not wise; for it is not true, if, as has been clearly shown, the injuring of another can be in no case just.

苏：假如有人说，正义在于清偿债务，那么正义的人欠友人的钱就只有善行，而欠敌人的只有邪恶——这种说法是颇不足取的。如上

所述，伤人之举，任何情况下，都无正义可言，那么此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I agree with you, said Polemarchus.

玻：我同意。

Then you and I are prepared to take up arms against any one who attributes such a saying to Simonides or Bias or Pittacus, or any other wise man or seer?

苏：那么，你我是否要随时准备，同任何胆敢将此虚妄之说归之于西蒙尼、毕阿斯，皮达科斯等诸贤哲之人，戮力一搏吗？

I am quite ready to do battle at your side, he said.

玻：我很愿意与你并肩作战。

Shall I tell you whose I believe the saying to be?

苏：你想听一听关于这虚妄之说的出处吗？

Whose?

玻：出自何人？

I believe that Periander or Perdiccas or Xerxes or Ismenias the Theban, or some other rich and mighty man, who had a great opinion of his own power, was the first to say that justice is 'doing good to your friends and harm to your enemies.'

苏：我认为是佩里安得鲁、或者佩狄斯、或者泽尔克斯、或者成拜人伊斯梅尼亚，或其他有权势者最先提出正义即“善待友人，打击敌人”这一说法的。

Most true, he said.

玻：很有道理。

Yes, I said; but if this definition of justice also breaks down, what other can be offered?

苏：是啊，可是关于正义的定义又不成立了，那么还有什么合适的定义吗？

Several times in the course of the discussion Thrasymachus had made an attempt to get the argument into his own hands, and had been put down by the rest of the company, who wanted to hear the

end. But when Polemarchus and I had done speaking and there was a pause, he could no longer hold his peace; and, gathering himself up, he came at us like a wild beast, seeking to devour us. We were quite panic-stricken at the sight of him.

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由于大家急欲听我们把话说完，色拉叙马霍斯多次想要发言，均被在座希望听到结尾的诸人拦住。但是，当玻勒马霍斯和我说完，停顿了片刻，这时色拉叙马霍斯再也按捺不住，抖擞精神，犹如一头要把我们吞噬的野兽一般朝我们扑了过来。看到他这副模样，我们不由得惊惶失措。

SOCRATES-POLEMARCHUS-THRASYMACHUS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玻勒马霍斯、色拉叙马霍斯

He roared out to the whole company: What folly. Socrates, has taken possession of you all? And why, sillybillies, do you knock under to one another? I say that if you want really to know what justice is, you should not only ask but answer, and you should not seek honour to yourself from the refutation of an opponent, but have your own answer; for there is many a one who can ask and cannot answer. And now I will not have you say that justice is duty or advantage or profit or gain or interest, for this sort of nonsense will not do for me; I must have clearness and accuracy.

色拉叙马霍斯（以下用“色”）（向众人咆哮道）：愚蠢之极！苏格拉底，已经征服你们所有人吗？你们在这儿瞎吹捧个什么劲儿呀！

要我说，如果你真想了解何为正义，你就应该在提问的同时，做出正面回答；你不该通过反驳对方来邀名，而是应该给出你的答案，因为这世上许多人都只会问，却不会答。现在，你不要跟我说，正义是义务，或是好处、利益之类的话，因为这种废话，对我来说根本不管用，我要求的是，清楚准确的定义。

I was panic-stricken at his words, and could not look at him without trembling. Indeed I believe that if I had not fixed my eye upon him, I should have been struck dumb: but when I saw his fury rising, I looked at him first, and was therefore able to reply to him.

他的话，令我感到十分惶恐；同时我一见他，不禁战栗不已。事实上，我相信，若不是我一直在注视着他，恐怕早就被他吓懵了：但是因为我意识到他开始动怒，便已把目光投向他，因此才得以对他做出回应。

Thrasymachus, I said, with a quiver, don't be hard upon us. Polemarchus and I may have been guilty of a little mistake in the argument, but I can assure you that the error was not intentional. If we were seeking for a piece of gold, you would not imagine that we were 'knocking under to one another,' and so losing our chance of finding it. And why, when we are seeking for justice, a thing more precious than many pieces of gold, do you say that we are weakly yielding to one another and not doing our utmost to get at the truth? Nay, my good friend, we are most willing and anxious to do so, but the fact is that we cannot. And if so, you people who know all things should pity us and not be angry with us.

苏（声音有些发抖）：色拉叙马霍斯，不要为难我们啊。玻勒马霍斯和我，可能在辩论过程中犯些小错误，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那绝非是有意的。假如我们正在寻找一块金子，你绝不会想象我们会‘相互吹捧’，从而错失找到金子的良机吧。那么，我们在寻求正义——一个比许多块金子更为宝贵的东西时，又怎么会因相互吹捧而不尽我们之所能去得到真相呢？不过，我的好朋友，虽然说我们非常愿意而且渴望这样做，但事实是我们力不从心啊。如此说来，像你这样无所不知的人，应该怜悯我们，而不是跟我们一般计较。

How characteristic of Socrates! he replied, with a bitter laugh; —that's your ironical style! Did I not foresee—have I not already told you, that whatever he was asked he would refuse to answer, and try irony or any other shuffle, in order that he might avoid answering?

色（冷笑）：多么典型的苏格拉底式论调啊！这正是你一贯的讽刺挖苦风格。果不出我之所料！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不论你问他什么，他一概拒绝回答，利用讥讽或其他逃遁之术避免回答问题。

You are a philosopher, Thrasymachus, I replied, and well know that if you ask a person what numbers make up twelve, taking care to prohibit him whom you ask from answering twice six, or three times four, or six times two, or four times three, 'for this sort of nonsense will not do for me,'—then obviously, if that is your way of putting the question, no one can answer you. But suppose that he were to retort, 'Thrasymachus, what do you mean? If one of these numbers which you interdict be the tru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am I falsely to say some other number which is not the right one?—is that your meaning?' —How would you answer him?

苏：你是哲学家，色拉叙马霍斯，你当然明白，如果你问一个人，如何能得出十二，同时特别禁止所问之人，以二乘六，或三乘四，或六乘二，或四乘三来回答，因为“这些废话，对我来说，根本不管用。”那么，很显然，这就是你典型的提问方式，让任何人都无法做出回答。但是，假如他反驳说：“色拉叙马霍斯，你有什么想法？如果你禁用的一个数字恰巧是问题的答案，我是不是要以别的、错误的数字来回答？这就是你的意图吗？”你将如何回答他呢？

Just as if the two cases were at all alike! he said.

色：就仿佛这两件事真是一回事似的！

Why should they not be? I replied; and even if they are not, but only appear to be so to the person who is asked, ought he not to say what he thinks, whether you and I forbid him or not?

苏：怎么可能不是呢？即使它们并非一回事，但是对于被问的人来说，它们只能是一回事，不论你我是否禁止他，他是不是都应该说出自己的想法？”

I presume then that you are going to make one of the interdicted answers?

色：我猜想，你是要给出一个被禁止的答案喽？

I dare say that I may, notwithstanding the danger, if upon reflection I approve of any of them.

苏：我敢说，如果经过深思熟虑，我发现其中有正确答案的话，我自会用之，临危而不惧。

But what if I give you an answer about justice other and better, he said, than any of these? What do you deserve to have done to you?

色：可是，如果我在以上说法之外，提供给你一种更好的有关正义的答案，又当如何？你应受何种惩罚呢？

Done to me!—as becomes the ignorant, I must learn from the wise—that is what I deserve to have done to me.

苏：甘愿受罚！——由于自己的无知，我必须求教于智者——这就是我应受的惩罚。

What, and no payment! a pleasant notion!

色：什么，一毛不拔啊！想得可真美！

I will pay when I have the money, I replied.

苏：等我有了钱，我会交罚金的。

SOCRATES-THRASYMACHUS-GLAUCON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色拉叙马霍斯、格劳孔

But you have, Socrates, said Glaucon: and you, Thrasymachus, need be under no anxiety about money, for we will all make a contribution for Socrates.

格劳孔格（以下用“格”）：但是你会有钱的，苏格拉底。色拉叙马霍斯，你也无需为钱的事情担心。我们大家会替苏格拉底凑出来的。

Yes, he replied, and then Socrates will do as he always does—refuse to answer himself, but take and pull to pieces the answer of some one else.

色：那好吧。接下来，苏格拉底可要故伎重演——自己拒绝回答，却把别人的回答批驳得体无完肤。

Why, my good friend, I said, how can any one answer who knows, and says that he knows, just nothing; and who, even if he has some faint notions of his own, is told by a man of authority not

to utter them? The natural thing is, that the speaker should be some one like yourself who professes to know and can tell what he knows. Will you then kindly answer, for the edification of the company and of myself?

苏：怎么了，我的好朋友，一个人本来无知，也承认自己无知，又如何能答出问题呢？更何况，即使他有个一知半解，却被权威人物告知切莫说出来呢？按理来讲，发言者应该为像你这样的人，一方面明言知道答案，另一方面又能够将之娓娓道来。你可愿不吝赐教，给连我自己在内的在座各位以宝贵的启迪呢？

Glaucon and the rest of the company joined in my request, and Thrasymachus, as any one might see, was in reality eager to speak; for he thought that he had an excellent answer, and would distinguish himself. But at first he affected to insiston my answering; at length he consented to begin.

格劳孔及众人，纷纷让色拉叙马霍斯回答。任何人都看得出，色拉叙马霍斯实则迫切希望发言，因为他自恃见解非凡，急于展示身手。但是，他起初仍坚持要我回答，后来才同意发言。

Behold, he said, the wisdom of Socrates; he refuses to teach himself, and goes about learning of others, to whom he never even says thank you.

色：看啊，这就是苏格拉底的聪明之处。他从不教别人，而是四处求教于他人，甚至连道谢的话都没有一句。

That I learn of others, I replied, is quite true; but that I am ungrateful I wholly deny. Money I have none, and therefore I pay in praise, which is all I have: and how ready I am to praise any one who appears to me to speak well you will very soon find out when you answer; for I expect that you will answer well.

苏：你说，我求教于他人，这一点我承认；但是至于说我忘恩负义，我完全不能接受。我身无分文，故而献上我的赞美之词，而这则是我拥有的一切：我非常愿意向雄辩之士表达我的崇拜之情。这一点，你很快就会在发言时注意到，因为我有预感，你的发言一定很精彩。

Listen, then, he said; I proclaim that justice is nothing else than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And now why do you not praiseme? But of course you won't.

色：那么，听好了！我认为，正义不过就是强者的利益。现在，你为什么不向我表达敬意呢？但是，当然了，你是不情愿的。

Let me first understand you, I replied. Justice, as you say, is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What, Thrasymachus, is the meaning of this? You cannot mean to say that because Polydamas, the pancratiast, is stronger than we are, and finds the eating of beef conducive to his bodily strength, that to eat beef is therefore equally for our good who are weaker than he is, and right and just for us?

苏：容我先弄清楚你的高见。如你所说，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色拉叙马霍斯，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你意思是说，因为普里达马斯作为拳击选手，比我们大家都强悍，他觉得食用牛肉有利于增强体质，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弱于他的人来说，吃牛肉也同样是大有裨益的，而且是正确而公正的，不是吗？

That's abominable of you, Socrates; you take the words in the sense which is most damaging to the argument.

色：你真的很可恶，苏格拉底。你故意曲解词义以扰乱我们的辩论。

Not at all, my good sir, I said; I am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m; and I wish that you would be a little clearer.

苏：绝非如此，我尊敬的先生。我是在努力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并且希望你能够讲得再明白些。

Well, he said, have you never heard that forms of government differ; there are tyrannies, and there are democracies, and there are aristocracies?

色：好吧，你是否听说过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政府，有僭主专制，有民主制，还有贵族制。

Yes, I know.

苏：是的，我知道。

And the government is the ruling power in each state?

色：而政府则是一国之统治机器？

Certainly.

苏：当然。

And the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make laws democratical, aristocratical, tyrannical, with a view to their several interests; and these laws, which are made by them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are the justice which they deliver to their subjects, and him who transgresses them they punish as a breaker of the law, and unjust. And that is what I mean when I say that in all states there is the same principle of justice, which is the interest of the government; and as the government must be supposed to have power, the only reasonable conclusion is, that everywhere there is one principle of justice, which is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色：不同形式的政府，着眼于自身的多方面利益，制定了民主制、贵族制以及僭主专制的相关法律。而这些由他们为自身利益而制

定的法律，即他们给予国民的正义，胆敢违犯法律者则以犯罪和非正义论处。这就是我为何说，所有的国家均遵循着同样的正义法则，即政府的利益。同时，由于政府必定拥有权力，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合理结论，即此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法则——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Now I understand you, I said; and whether you are right or not I will try to discover. But let me remark, that in defining justice you have yourself used the word 'interest' which you forbade me to use. It is true, however, that in your definition the words 'of the stronger' are added.

苏：现在我明白了。至于你的说法是否正确，我将尽力去作以考察。但是，且容我说一句，在界定正义时，你自己已然运用了你曾禁止我使用的“利益”一词。诚然，你在定义中还加上了“强者的”这几个字。

A small addition, you must allow, he said.

色：略增几字，总还可以吧。

Great or small, never mind about that: we must first enquire whether what you are saying is the truth. Now we are both agreed that justice is interest of some sort, but you go on to say 'of the stronger'; about this addition I am not so sure, and must therefore consider further.

苏：大增还是略增，倒无所谓：我们当务之急是要考察，你所说的究竟是否为事情的真相。目前，在正义为某种利益这一点上，你我已达成共识，但是你冠之以“强者的”，我就不是很确定了，因此有必要深究一下。

Proceed.

色：深究去吧。

I will; and first tell me, Do you admit that it is just for subjects to obey their rulers?

苏：那好。请先告诉我，你认为，下级服从上级是正义的吗？

I do.

色：是正义的。

But are the rulers of states absolutely infallible, or are they sometimes liable to err?

苏：但是，各国的统治者，是永远正确的吗？还是有时容易出错？

To be sure, he replied, they are liable to err.

色：可以肯定地讲，他们容易出错。

Then in making their laws they may sometimes make them rightly, and sometimes not?

苏：那么，他们在立法之时，有时制定的法律是正确的，有时则是错误的吗？

True.

色：对。

When they make them rightly, they make them agreeably to their interest; when they are mistaken, contrary to their interest; you admit that?

苏：当统治者制定出正确的法律时，法律符合他们的利益；当统治者在立法中出错的时候，法律与他们的利益相悖。你同意吗？

Yes.

色：同意。

And the laws which they make must be obeyed by their subjects,—and that is what you call justice?

苏：而他们制定出的法律，则是国民必须遵守的，——这就是你所谓的正义吗？

Doubtless.

色：毋庸置疑。

Then justice, according to your argument, is not only obedience to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but the reverse?

苏：那么，依照你的论证，正义不仅是服从强者的利益，同时也是损害强者的利益，对吗？

What is that you are saying? he asked.

色：你这是什么话？

I am only repeating what you are saying, I believe. But let us

consider: Have we not admitted that the rulers may be mistaken about their own interest in what they command, and also that to obey them is justice? Has not that been admitted?

苏：我认为，自己不过是在重申你所说的话而已，然而，试想：我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吗？——统治者可能会在发号施令时，误解了自己利益之所在，而奉行统治者弄错的法令，同样也是正义之举。这一点，你不是已经确认过了吗？

Yes.

色：确实如此。

Then you must also have acknowledged justice not to be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when the rulers unintentionally command things to be done which are to their own injury. For if, as you say, justice is the obedience which the subject renders to their commands, in that case, O wisest of men, is there any escape from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weaker are commanded to do, not what is for the interest, but what is for the injury of the stronger?

苏：那么，你也一定已经承认，当统治者无意中下达了伤害其自身利益的命令时，正义并非是站在强者利益这一边的。正如你所说，正义是国民服从统治者的命令，那么在此情形之下，最聪明的人啊，我们是否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弱者受命去做的事情，非但不会维护强者的利益，反而会损害强者的利益呢？

Nothing can be clearer, Socrates, said Polemarchus.

玻：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苏格拉底。

SOCRATES-CLEITOPHON-POLEMARCHUS-THRASYMACHUS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克里托芬、玻勒马霍斯、色拉叙马霍斯

Yes, said Cleitophon, interposing, if you are allowed to be his witness.

克（插话）：是啊，要是有你为他作证，就好了。

But there is no need of any witness, said Polemarchus, for Thrasymachus himself acknowledges that rulers may sometimes command what is not for their own interest, and that for subjects to obey them is justice.

玻：但是，这并不需要什么证人啊，因为色拉叙马霍斯亲口承认，统治者有时可能下达无益于其自身利益的指令，而对于国民来讲，服从命令即为正义。

Yes, Polemarchus,—Thrasymachus said that for subjects to do

what was commanded by their rulers is just.

克：是啊，玻勒马霍斯。色拉叙马霍斯说，正义乃是国民对统治者唯命是从。

Yes, Cleitophon, but he also said that justice is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and, while admitting both these propositions, he further acknowledged that the stronger may command the weaker who are his subjects to do what is not for his own interest; whence follows that justice is the injury quite as much as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玻：没错，克里托芬。可是，他还说，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在确认了这两个命题的同时，他进而承认，强者可以支配受他主宰的弱者，去做无益于强者的事情。由此可见，伤害强者，与维护强者，皆为正义。

But, said Cleitophon, he meant by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what the stronger thought to be his interest,—this was what the weaker had to do; and this was affirmed by him to be justice.

克：但是，他指的是，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强者自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情就是弱者必须履行的义务，亦即他所认可的正义。

Those were not his words, rejoined Polemarchus.

玻：他可并没有这么说啊。

SOCRATES-THRASYMACHUS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色拉叙马霍斯

Never mind, I replied, if he now says that they are, let us accept his statement. Tell me, Thrasymachus, I said, did you mean by justice what the stronger thought to be his interest, whether really so or not?

苏：无妨。如果他此时表明正义当作如此解，我们会接受的。告诉我，色拉叙马霍斯，你本意是说，正义乃强者认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事情，对吗？你的本意果真如此吗？

Certainly not, he said. Do you suppose that I call him who is mistaken the stronger at the time when he is mistaken?

色：当然不是。你认为，当强者犯错时，我还会称之为强者吗？

Yes, I said, my impression was that you did so, when you admitted that the ruler was not infallible but might be sometimes mistaken.

苏：你会啊。在我印象中，你承认统治者并非永远正确，有时也会出错。

You argue like an informer, Socrates. Do you mean, for example, that he who is mistaken about the sick is a physician in that he is mistaken? or that he who errs in arithmetic or grammar is an arithmetician or grammarian at the time when he is making the mistake, in respect of the mistake? True, we say that the physician or arithmetician or grammarian has made a mistake, but this is only a way of speaking; for the fact is that neither the grammarian nor any other person of skill ever makes a mistake in so far as he is what his name implies; they none of them err unless their skill fails them, and then they cease to be skilled artists. No artist or sage or ruler errs at the time when he is what his name implies; though he is commonly said to err, and I adopted the common mode of speaking. But to be perfectly accurate, since you are such a lover of accuracy, we should say that the ruler, in so far as he is a ruler, is unerring, and, being unerring, always commands that which is for his own interest; and the subject is required to execute his commands; and therefore, as I said at first and now repeat, justice is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色：苏格拉底啊，你在诡辩。比如说，医生行医而误诊，你仍以其过失而视之为医生吗？抑或在算术或使用修辞出错之人，在犯错之时，仍以其错误而为算术家或修辞学家吗？诚然，我们会说，此医生、算术家或修辞学家出现了一次失误，这不过是说话的一种方式而已；事实上，无论修辞学家，还是有一技之长的任何其他人，都永远不会在其称号所表明的那个领域出错；他们所有人都不会有失误，除非他们学艺不精，那么一旦出错，他们就不再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名副其实的艺人、圣贤或统治者是不会有失误的；但是，人们通常说，

他们会有失误，而我刚才也是采用了通用的表达方式。既然你如此喜欢准确的表达，那么完全准确地来讲，我们应该说统治者，就其为统治者而言，是没有失误的，并且因为他从不失误，总是下达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指令，同时要求国民执行他的命令。因此，我要重申最初所说的话，即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Indeed, Thrasymachus, and do I really appear to you to argue like an informer?

苏：真的吗？色拉叙马霍斯，在你看来，我当真像个诡辩家吗？

Certainly, he replied.

色：当然。

And do you suppose that I ask these questions with any design of injuring you in the argument?

苏：你认为，我向你发问，是故意在辩论中刁难你吗？

Nay, he replied, 'suppose' is not the word—I know it; but you will be found out, and by sheer force of argument you will never prevail.

色：不，不是“认为”，你的确如此；但是，你不会得逞的，而且纯粹地凭借辩论的口才，你也绝不会占上风的。

I shall not make the attempt, my dear man; but to avoid any misunderstanding occurring between us in future, let me ask, in what sense do you speak of a ruler or stronger whose interest, as you were saying, he being the superior, it is just that the inferior should execute—is he a ruler in the popular or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苏：岂敢啊，我亲爱的先生。但是，为了防止我们之间再发生误会，容许我问一句，用你的话说，因为统治者或强者位高人尊，所以低贱者唯命是从，是正义的，那么你提到的统治者或强者，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他是通俗意义上的统治者，还是严格意义上的统治者？

In the strictest of all senses, he said. And now cheat and play the informer if you can; I ask no quarter at your hands. But you never will be able, never.

色：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如今，你尽可以去欺骗去诡辩了。我决不会向你求饶的。但是，你也别想着向我求饶。

And do you imagine, I said, that I am such a madman as to try and cheat, Thrasymachus? I might as well shave a lion.

苏：你觉得我会如此不可理喻，胆敢在色拉叙马霍斯面前搬弄是

非吗？那何异于与虎谋皮！

Why, he said, you made the attempt a minute ago, and you failed.

色：唉，你刚才还试着与我诡辩呢，可惜没能得逞。

Enough, I said, of these civilities. It will be better that I should ask you a question: Is the physician, taken in that strict sense of which you are speaking, a healer of the sick or a maker of money? And remember that I am now speaking of the true physician.

苏：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吧。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所说的严格意义的医生，是治病救人者，还是生财有道者？切记，我现在所说的，是真正的医生。

A healer of the sick, he replied.

色：治病救人者。

And the pilot—that is to say, the true pilot—is he a captain of sailors or a mere sailor?

苏：那么舵手——即真正的舵手——他究竟是水手的首领，还是

水手中的普通一员？

A captain of sailors.

色：水手的首领。

The circumstance that he sails in the ship is not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neither is he to be called a sailor; the name pilot by which he is distinguishe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ailing, but is significant of his skill and of his authority over the sailors.

苏：他的航行情形如何，是不予考虑的，也不考虑他是否被称为水手。他的舵手头衔，无关乎其航行技术，而是侧重于他驾驭众水手的能力，以及他在水手中的权威地位。

Very true, he said.

色：的确如此。

Now, I said, every art has an interest?

苏：每种技艺，均有其利益吗？

Certainly.

色：当然。

For which the art has to consider and provide?

苏：各种技艺，皆当为此利益而运筹经营吗？

Yes, that is the aim of art.

色：是啊，这是技艺所要达到的目标。

And the interest of any art is the perfection of it—this and nothing else?

苏：任何技艺的利益，无外乎实现该技艺本身的尽善尽美，是吗？

What do you mean?

色：这是何意？

I mean what I may illustrate negatively by the example of the body. Suppose you were to ask me whether the body is self-sufficing or has wants, I should reply: Certainly the body has wants; for the body may be ill and require to be cured, and has therefore interests to which the art of medicine ministers; and this is the origin and intention of medicine, as you will acknowledge. Am I not right?

苏：我将以人体为例来从反面证实这个道理。假如你问我，人体是无所求而自足，还是有所需而求于外，我将回答：人体当然是有所需而求于外的，因为人体可能患病而需医治，因而便出现了须由医疗来负责的利害关系。你也会承认，这就是发明医术的缘起。我说得不对吗？

Quite right, he replied.

色：十分正确。

But is the art of medicine or any other art faulty or deficient in any quality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 eye may be deficient in sight or the ear fail of hearing, and therefore requires another art to provide for the interests of seeing and hearing—has art in itself, I say, any similar liability to fault or defect, and does every art require another supplementary art to provide for its interests, and that another and another without end? Or have the arts to look only after their own interests? Or have they no need either of themselves or of another?—having no faults or defects, they have no need to correct them, either by the exercise of their own art or of any other; they have only to consider the interest of their subject-matter. For

every art remains pure and faultless while remaining true—that is to say, while perfect and unimpaired. Take the words in your precise sense, and tell me whether I am not right.”

苏：但是正如眼睛可能会视力欠佳，耳朵可能会出现听觉障碍，因而需要另一种技艺来维护视听之利益，医术及任何其他技艺，是否也会存在某方面的缺欠或不足呢？我要说，是否技艺本身存在着类似的故障或欠缺倾向？是否每种技艺都需要有另一种辅助性技艺来维护其利益，而辅助性又需其他技艺来加辅助，如此下去，一环接一环无穷无尽呢？抑或各种技艺只须照顾自身利益呢？抑或技艺不需要自身或其他技艺来辅助之？每种技艺都没有缺点或不足，也不需要运用自身技艺或其他技艺来改正缺点，它只须留意于其对象物的利益即可。原因在于，如果每种技艺是真正的技艺，即完美无缺的技艺，那么它也是纯粹的、无缺点的。请你从准确意义上，对我所说的话进行判断，告诉我是否正确。

Yes, clearly.

色：显然，没有问题。

Then medicine does not consider the interest of medicine, but the interest of the body?

苏：那么，医术所留意的并非医术本身的利益，而是人体的利益吗？

True, he said.

色：对。

Nor does the art of horsemanship consider the interests of the art of horsemanship, but the interests of the horse; neither do any other arts care for themselves, for they have no needs; they care only for that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eir art?

苏：马术所在意的并非马术的利益，而是马的利益；任何其他的技艺，都不会在意其自身，因为它们并无所求；它们只关心技艺对象的利益吗？

True, he said.

色：对。

But surely, Thrasymachus, the arts are the superiors and rulers of their own subjects?

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色拉叙马霍斯，技艺是其对象的统治者和上级呀！

To this he assented with a good deal of reluctance.

色（极为不情愿地说道）：对。

Then, I said, no science or art considers or enjoins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or superior, but only the interest of the subject and weaker?

苏：可见，任何科学或技艺所考虑或者严格规定的，并非是强者的利益，而是其支配的对象或弱者的利益吗？

He made an attempt to contest this proposition also, but finally acquiesced.

色：（他试图对这一命题也提出质疑，但最后还是默认了）：对。

Then, I continued, no physician, in so far as he is a physician, considers his own good in what he prescribes, but the good of his patient; for the true physician is also a ruler having the human body as a subject, and is not a mere money-maker; that has been admitted?

苏：就名副其实的医生而言，在开处方之时，任何医生考虑的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病人的利益，因为真正的医生同时也是一个以人体作为其支配对象的统治者，而不仅仅是生财有道者。关于这一点，你已经承认了吧？

Yes.

色：是的。

And the pilot likewise,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is a ruler of sailors and not a mere sailor?

苏：同理，严格意义上讲，舵手是水手的统治者，而不仅仅是一名普通水手？

That has been admitted.

色：这一点已经确认过了。

And such a pilot and ruler will provide and prescribe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sailor who is under him, and not for his own or the ruler's interest?

苏：这样一名舵手——统治者将为维护其手下水手的利益，而并非其自身或治理者的利益，制定规章制度吗？

He gave a reluctant 'Yes.'

色（不情愿地说）：是的。

Then, I said, Thrasymachus, there is no one in any rule who, in so far as he is a ruler, considers or enjoins what is for his own interest, but always what is for the interest of his subject or suitable to his art; to that he looks, and that alone he considers in everything which he says and does. When we had got to this point in the argument, and every one saw that the definition of justice had been completely upset, Thrasymachus, instead of replying to me, said:

苏：色拉叙马霍斯，没有任何统治者会为一己私利而计划筹谋，而总是为其统治的对象或与其技艺相关的对象之利益着想；他留心于支配对象的利益，一言一行，皆仅以此利益为念。辩论进行至此，所有人都意识到，色拉叙马霍斯对正义的定义，已然被彻底推翻。色拉叙马霍斯，这次没有对我的话做出回答，而是反问我。

Tell me, Socrates, have you got a nurse?

色：告诉我，苏格拉底，你有保姆吗？

Why do you ask such a question, I said, when you ought rather to be answering?

苏：你为何不回答我，反倒这样发问？

Because she leaves you to snivel, and never wipes your nose: she has not even taught you to know the shepherd from the sheep.

色：因为她在你流鼻涕时，却从不为你擦拭：她甚至都没有教你认清羊群与牧羊人的区别。

What makes you say that? I replied.

苏：此话怎讲？

Because you fancy that the shepherd or neatherd fattens or tends the sheep or oxen with a view to their own good and not to the good of himself or his master; and you further imagine that the rulers of states, if they are true rulers, never think of their subjects as sheep, and that they are not studying their own advantage day and night. Oh, no; and so entirely astray are you in your ideas about the just and unjust as not even to know that justice and the just are in reality another's good; that is to say, the interest of the ruler and stronger, and the loss of the subject and servant; and injustice the opposite; for the unjust is lord over the truly simple and just: he is the stronger, and his subjects do what is for his interest, and minister to his happiness, which is very far from being their own. Consider further, most foolish Socrates, that the just is always a loser in comparison with the unjust. First of all, in private contracts: wherever the unjust is the partner of the just you will find that, when the partnership is dissolved, the unjust man has always more and the just less. Secondly, in their dealings with the State: when there is an income-tax, the just man will pay more and

the unjust less on the same amount of income; and when there is anything to be received the one gains nothing and the other much. Observe also what happens when they take an office; there is the just man neglecting his affairs and perhaps suffering other losses, and getting nothing out of the public, because he is just; moreover he is hated by his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 for refusing to serve them in unlawful ways. But all this is reversed in the case of the unjust man. I am speaking, as before, of injustice on a large scale in which the advantage of the unjust is most apparent; and my meaning will be most clearly seen if we turn to that highest form of injustice in which the criminal is the happiest of men, and the sufferers or those who refuse to do injustice are the most miserable —that is to say tyranny, which by fraud and force takes away the property of others, not little by little but wholesale; comprehending in one, things sacred as well as profane, private and public; for which acts of wrong, if he were detected perpetrating any one of them singly, he would be punished and incur great disgrace—they who do such wrong in particular cases are called robbers of temples, and man-stealers and burglars and swindlers and thieves. But when a man besides taking away the money of the citizens has made slaves of them, then, instead of these names of reproach, he is termed happy and blessed, not only by the citizens but by all who hear of his having achieved the consummation of injustice. For mankind censure injustice, fearing that they may be the victims of it and not because they shrink from committing it. And thus, as I have shown, Socrates, injustice, when on a sufficient scale, has more strength and freedom and mastery than justice; and, as I said at first, justice is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whereas injustice is a man's own profit and interest.

色：因为你异想天开地以为，牧人喂养照料牛羊，是为了牛羊的

利益，而不是为了他自己抑或他的主人的利益；同时，你还进一步设想，名副其实的国家统治者，绝不会视其国民为牛羊，而他们所夜以继日筹划的也并非其私利。噢，不对。在看待正义者和非正义者这个问题上，你完全误入歧途，甚至于不知道正义与正义者，实际上徒为他人做嫁衣。换言之，正义乃统治者和强者的利益，被统治者与仆从的损失。非正义则反之。原因在于，非正义者凌驾于纯朴正直者而称王称霸：非正义者为强者，其统治对象做符合强者利益的事情，任强者作威作福，绝无国民自身利益可言。迂腐至极的苏格拉底啊，仔细想来，较之非正义者，正义者向来都是吃亏受损害的一方。首先，就私人合约而言：任何时候当非正义者与正义者合伙经营，你都会发现，在合伙关系解除时，非正义者总是能大赚一笔，而正义者则总是吃亏的一方。其次，在他们与国家政府的交往中：在收入所得税方面，当收入相同时，正义者所缴税额较多，而非正义者则较少；当政府发放东西之时，正义者一无所获，而非正义者则收获颇丰。再看他们担任政府公职时的情形：正义者公而忘私，也许还要蒙受其他方面的损失，因为他公正无私，于公无所取；同时，他却被朋友熟人所憎恨，因为他拒绝以不法手段为他们牟取私利。而非正义者，则正好与之截然相反。与之前一样，我正在讲的做尽坏事的人，从他们身上可以明显看出非正义给人们带来的利益；我的意思可以通过最高形式的不义得到最明显地表达，在那里罪犯是最快乐的人，受害者或者那些不愿行不义之事的人则最为悲惨。换言之，暴政专制巧取豪夺他人财产，鲸吞而非蚕食；一切财物，无论神圣的还是世俗的，无论公私，都被搜刮殆尽。如果一个人被查出犯下上述任何一种罪行，他会受到惩罚，并且身败名裂。做出如此恶行之人，按照其具体情况，可被称为抢匪、扒手、窃贼、骗子和小偷。但是，如果一个人除了掠夺公民钱财，还奴役他们，那么他非但不会招致骂名，反倒会备受公民乃至所有听闻其登峰造极不义行径之人的尊崇。原因是，人类谴责非正义行为，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成为受害者，而不是因为自己不愿行不义之事。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当非正义达到一定规模之时，它较之正义更为强大、自由和有优势。正如我当初所言，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而不义则是一己之私利。

Thrasymachus, when he had thus spoken, having, like a bath-man, deluged our ears with his words, had a mind to go away. But the company would not let him; they insisted that he should remain and defend his position; and I myself added my own humble request that he would not leave us.

色拉叙马霍斯说罢，如澡堂伙计一般，把刚才那番话一口气灌满我们双耳，便欲抽身而去。可是，坐中诸人不肯放他离去，坚持要他留下来，为其立场进行辩护。我自己也态度谦逊地请求他不要弃我们而去。

Thrasymachus, I said to him, excellent man, how suggestive are your remarks! And are you going to run away before you have fairly taught or learned whether they are true or not? Is the attempt to determine the way of man's life so small a matter in your eyes—to determine how life may be passed by each one of us to the greatest advantage?

苏：色拉叙马霍斯，优秀的演说家，你的一番话是多么发人深省啊！不等我们大家彻底弄清这些话正确与否，你就打算一走了之吗？我们抉择人生道路——决定每个人如何度过人生以获得最大利益——的尝试，在你的眼中就那么微不足道吗？

And do I differ from you, he said, as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enquiry?

色：在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上，我与你有何区别吗？

You appear rather, I replied, to have no care or thought about us, Thrasymachus—whether we live better or worse from not knowing what you say you know, is to you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Prithee, friend, do not keep your knowledge to yourself; we are a large party; and any benefit which you confer upon us will be amply rewarded. For my own part I openly declare that I am not convinced, and that I do not believe injustice to be more gainful than justice, even if uncontrolled and allowed to have free play. For, granting that there may be an unjust man who is able to commit injustice either by fraud or force, still this does not convince me of the superior advantage of injustice, and there may be others who are in the same predicament with myself. Perhaps we may be wrong; if so, you in your wisdom should convince us that we are mistaken in preferring justice to injustice.

苏：你似乎并不在意或者关心我们，色拉叙马霍斯——在你看来，我们因不明白为你所知晓的道理而出现人生波折起伏，是无关痛痒的小事。拜托了，朋友，务必要不吝赐教。我们人数众多，定当厚报你给予我们的有益教诲。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公开表明并不信服你的观点；同时即使不义之举肆意蔓延，无所约束，我也并不认为，不义比正义更有利可图。尽管我承认，不义之人也许能够通过欺诈或强硬手段来干不义之事，但是这仍然不能使我相信不义更为有利，想必其他人也同我一样感到困惑。可能我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如果这样的话，你应该发挥你的聪明才智证明，我们不该爱正义胜于不义。

And how am I to convince you, he said, if you are not already convinced by what I have just said; what more can I do for you? Would you have me put the proof bodily into your souls?

色：如果我适才所言，仍未使你信服，我此时当如何使你相信呢？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你想让我将有血有肉的证据植入你们灵魂吗？

Heaven forbid! I said; I would only ask you to be consistent; or, if you change, change openly and let there be no deception. For I must remark, Thrasymachus, if you will recall what was previously said, that although you began by defining the true physician in an exact sense, you did not observe a like exactness when speaking of the shepherd; you thought that the shepherd as a shepherd tends the sheep not with a view to their own good, but like a mere diner or banquetter with a view to the pleasures of the table; or, again, as a trader for sale in the market, and not as a shepherd. Yet surely the art of the shepherd is concerned only with the good of his subjects; he has only to provide the best for them, since the perfection of the art is already ensured whenever all the requirements of it are satisfied. And that was what I was saying just now about the ruler. I conceived that the art of the ruler, considered as ruler, whether in a state or in private life, could only regard the good of his flock or subjects; whereas you seem to think that the rulers in states, that is to say, the true rulers, like being in authority. Think!

苏：我的天哪！但愿不要这样。我只是希望，你能够保持前后一致；如果你改变了看法，请明言，切不可有任何欺瞒。我必须指出，色拉叙马霍斯，回想你当初所说的话，尽管你以确切的意义来定义真正的医生，但是当谈到牧羊人时，你并没有遵循其确切定义；在你看来，牧羊人之所以照料羊群，并不是以顾全羊群的利益为目的，而是如用餐者或赴宴的客人一般以满足口舌之欲为目的，或者则如市场上做买卖的商人一般以赚钱为目的，但终究不是牧羊人。然而，牧羊人的技艺所唯一关心的，只是为羊群提供最好的条件；一旦技艺所有的

需求得到满足，技艺臻于尽善尽美。另外，这也应适用于我刚才所说的统治者。我认为，无论是在一个国家还是在私人生活中，名副其实的统治者，只能以其部众或国民的利益为唯一关心的事情；可是，你似乎认为，国家的统治者，即真正的统治者，一贯喜欢当权。仔细想想吧！

Nay, I am sure of it.

色：不用了，我对此非常确信。

Then why in the case of lesser offices do men never take them willingly without payment, unless under the idea that they govern for the advantage not of themselves but of others?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Are not the several arts different, by reason of their each having a separate function? And, my dear illustrious friend, do say what you think, that we may make a little progress.

苏：那么，为什么人们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决不愿担任领导职位呢？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清楚地知道，从政不是为满足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他人谋福利。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数种技艺，是否以其各自不同的功用而不同呢？我亲爱的、大名鼎鼎的朋友，务必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些许进展。

Yes, that is the difference, he replied.

色：是的，功用不同便是其差异所在。

And each art gives us a particular good and not merely a general one—medicine, for example, gives us health; navigation, safety at sea, and so on?

苏：每种技艺带给我们一种不同的好处，而不是许多种好处。例如，医术可以带给我们健康；航海之术，则可以使我们平安渡海，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对吗？

Yes, he said.

色：对。

And the art of payment has the special function of giving pay: but we do not confuse this with other arts, any more than the art of the pilot is to be confused with the art of medicine, because the health of the pilot may be improved by a sea voyage. You would not be inclined to say, would you, that navigation is the art of medicine, at least if we are to adopt your exact use of language?

苏：作为一门技艺，报酬有着支付钱款的特殊功能：但是，我们不会将之与其他技艺相混淆，正如我们不会因为舵手的健康会通过航海得以改善，而混淆舵手的技艺与医术。至少从语言的严格意义来讲，你不会认为，航海术等同于医术，对吗？

Certainly not.

色：当然不会。

Or because a man is in good health when he receives pay you would not say that the art of payment is medicine?

苏：同样，你也不会因为某人收取报酬时体格康健，而认为报偿之术即为医术，对吗？

I should say not.

色：对，我不会那么认为。

Nor would you say that medicine is the art of receiving pay because a man takes fees when he is engaged in healing?

苏：你也不会因为某人在治疗的过程中收取费用，而说医术即为赚钱的技艺，对吗？

Certainly not.

色：当然不会。

And we have admitted, I said, that the good of each art is specially confined to the art?

苏：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即每种技艺的利益都具有仅限于该技艺的特殊性，对吗？

Yes.

色：对。

Then, if there be any good which all artists have in common, that is to be attributed to something of which they all have the common use?

苏：如果所有的手艺人共同拥有某种利益，那么它必然归因于他们共同使用的某种东西，对吗？

True, he replied.

色：对。

And when the artist is benefited by receiving pay the advantage is gained by an additional use of the art of pay, which is not the art professed by him?

苏：当手艺人收取报酬而获益时，此等好处是通过额外地使用报偿之术而实现的，而赚钱并非艺人的专业技能，对吗？

He gave a reluctant assent to this.

色（不情愿地说道）：对。

Then the pay is not derived by the several artists from their respective arts. But the truth is, that while the art of medicine gives health, and the art of the builder builds a house, another art attends them which is the art of pay. The various arts may be doing their own business and benefiting that over which they preside, but would the artist receive any benefit from his art unless he were paid as well?

苏：那么，这报酬并非来自手艺人各自的技艺。但事实上，医术提供健康，建筑之术建造房屋，与此同时，伴随它们的还有另外一种技艺，即报偿之术。不同技艺，各司其职，造福于世，但是倘若没有人付钱，手艺人会从自己的技艺获得任何好处吗？

I suppose not.

色：好像不能。

But does he therefore confer no benefit when he works for nothing?

苏：但是，他工作而无所得，是否会因此而不能给予别人好处呢？

Certainly, he confers a benefit.

色：当然，他能给予别人好处。

Then now, Thrasymachus, there is no longer any doubt that neither arts nor governments provide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but, as we were before saying, they rule and provide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ir subjects who are the weaker and not the stronger—to their good they attend and not to the good of the superior. And this is the reason, my dear Thrasymachus, why, as I was just now saying, no one is willing to govern; because no one likes to take in hand the reformation of evils which are not his concern without remuneration. For, in the execution of his work, and in giving his orders to another, the true artist does not regard his own interest, but always that of his subjects; and therefore in order that rulers may be willing to rule, they must be paid in one of three modes of payment: money, or honour, or a penalty for refusing.

苏：现在，色拉叙马霍斯，已经不再有任何疑问：不论是各种技艺还是各国政府，都不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是正如我们当初所说，他们处于支配者的地位，并为处于弱势而非强势的支配对象谋福利——

他们所关心的，是其支配对象的利益，而不是上层权贵的利益。亲爱的色拉叙马霍斯，我刚才说，没有人愿意当政，原因就在于此：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没有人喜欢以革除罪恶为己任，这并不关乎其个人切身利益。因为，名副其实的手艺人，在执行自己的工作和向他人发号施令的时候，考虑的永远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其支配对象的利益，所以为了使治理者能够甘愿担负治理之责，就必须用以下三种报偿模式的一种来给予他酬劳：金钱、荣誉或由于拒绝行使政务而受的处罚。

SOCRATES-GLAUCON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格劳孔

What do you mean, Socrates? said Glaucon. The first two modes of payment are intelligible enough, but what the penalty is I do not understand, or how a penalty can be a payment.

格：此话怎讲？前两种报偿模式很容易理解，但是我不太理解“由于拒绝行使政务而受的处罚”。换句话说，处罚如何也能成为一种报酬呢？

You mean that you do not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is payment which to the best men is the great inducement to rule? Of course you know that ambition and avarice are held to be, as indeed they are, a disgrace?

苏：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明白这种报酬的本质是吗？而这正是导致最优秀人士出仕的巨大诱因。当然，你知道，野心和贪婪皆为人所不耻，事实上此二者也的确如此，不是吗？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for this reason, I said, money and honour have no attraction for them; good men do not wish to be openly demanding payment for governing and so to get the name of hirelings, nor by secretly helping themselves out of the public revenues to get the name of thieves. And not being ambitious they do not care about honour. Wherefore necessity must be laid upon them, and they must be induced to serve from the fear of punishment.

苏：因此我说，金钱和荣誉对他们而言并无吸引力。优秀人士不愿为担任公职之故，公开提出薪金要求，而招致受雇于人的名声；亦不愿私取公共税收而获窃贼之名。同时，他们没有野心，故而也并不为荣誉动心。因此，就必须强迫他们，使其迫于刑罚之威而不得不从政。

And this, as I imagine, is the reason why the forwardness to take office, instead of waiting to be compelled, has been deemed dishonourable. Now the worst part of the punishment is that he who refuses to rule is liable to be ruled by one who is worse than himself. And the fear of this, as I conceive, induces the good to take

office, not because they would, but because they cannot help—not under the idea that they are going to have any benefit or enjoyment themselves, but as a necessity, and because they are not able to commit the task of ruling to any one who is better than themselves, or indeed as good. For there is reason to think that if a city were composed entirely of good men, then to avoid office would be as much an object of contention as to obtain office is at present; then we should have plain proof that the true ruler is not meant by nature to regard his own interest, but that of his subjects; and every one who knew this would choose rather to receive a benefit from another than to have the trouble of conferring one. So far am I from agreeing with Thrasymachus that justice is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This latter question need not be further discussed at present; but when Thrasymachus says that the life of the unjust is more advantageous than that of the just, his new statement appears to me to be of a far more serious character. Which of us has spoken truly? And which sort of life, Glaucon, do you prefer?

我想，这也是为何躁进而急于入仕者为人轻视的原因所在，总不若等待着被迫走上领导岗位。那么，对于拒绝出仕者最严厉的惩罚，便是他可能会被不如自己的人统治。我认为，正是这样的担心，才诱使优秀人士接受公职，本来他们并不情愿，但又别无选择——他们本无私利可图，又并不以此为乐事，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们找不到胜于自己，或的确与自己能力相当的人选来担当重任。我们有理由设想，倘若一城之人皆为俊杰之士，那么在该城市争相推让领导岗位正如当下人们竞争获取公职一样。由此，我们应该可以清楚地证明，真正的统治者实质上并不以私利为念，而是以国民的利益为重。了解这一点的任何一个人，都宁愿从别人那里获取利益，而不愿费心满足别人利益。因此，我绝不会同意色拉叙马霍斯“正义即强者的利益”的说法。至于后一问题，此刻无需进一步加以讨论；但是，色拉叙马霍斯声称，非正义者比正义者的人生益处更多好。我认为，他提出的这

个新的说法，性质更要严重许多。我们两个，谁说的有道理呢？格劳孔，你更倾向于哪种人生呢？

I for my part deem the life of the just to be the more advantageous, he answered.

格：我个人认为，正义的人生益处更多。

Did you hear all the advantages of the unjust which Thrasymachus was rehearsing?

苏：你听到，色拉叙马霍斯说非正义者会得到诸多好处吗？

Yes, I heard him, he replied, but he has not convinced me.

格：是的，我听到了，但他并没有说服我。

Then shall we try to find some way of convincing him, if we can, that he is saying what is not true?

苏：那么，如果有可能，我们是否应该力求采取某种方式，使他明白其观点并不正确呢？

Most certainly, he replied.

格：完全应该。

If, I said, he makes a set speech and we make another recounting all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just, and he answers and we rejoin, there must be a numbering and measuring of the goods which are claimed on either side, and in the end we shall want judges to decide; but if we proceed in our enquiry as we lately did, by making admissions to one another, we shall unite the offices of judge and advocate in our own persons.

苏：如果他预先发表了一番演说，而我们再发表一次演说来历数正义的诸多好处，他来回答，而后我们再进行答辩，还必须计算并比较一下双方宣称的好处多寡与大小，最后还要请评判者作以裁决；但如果我们采用适才之问答法，以彼此达成共识为前提，我们就能同时充当辩护者和评判者了。

Very good, he said.

格：好主意。

And which method do I understand you to prefer? I said.

苏：你更喜欢哪种方法呢？

That which you propose.

格：悉听尊便。

Well, then, Thrasymachus, I said, suppose you begin at the beginning and answer me. You say that perfect injustice is more gainful than perfect justice?

苏：那好，色拉叙马霍斯，假设你正处于论辩伊始，请回答我的问题。你说，纯粹的不义比纯粹的正义更为有利吗？

SOCRATES-GLAUCON-THRASYMACHUS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格劳孔、色拉叙马霍斯

Yes, that is what I say, and I have given you my reasons.

色：对，我是这样说的，而且我已阐明了我的理由。

And what is your view about them? Would you call one of them virtue and the other vice?

苏：那么，你对此二者究竟有何看法呢？你会分别用善和恶来称呼此二者吗？

Certainly.

色：当然。

I suppose that you would call justice virtue and injustice vice?

苏：我猜，你会称正义为善，而称不义为恶，对吗？

What a charming notion! So likely too, seeing that I affirm injustice to be profitable and justice not.

色：多么有趣的想法啊！鉴于我称不义为有利，而正义为不利，我的回答也同样与之相适应。

What else then would you say?

苏：那么，你会如何说呢？

The opposite, he replied.

色：恰恰相反。

And would you call justice vice?

苏：那么，你会称正义为恶吗？

No, I would rather say sublime simplicity.

色：不，我宁愿称之为崇高的纯真。

Then would you call injustice malignity?

苏：那么，你会称不义为极端恶毒吗？

No; I would rather say discretion.

色：不，我宁愿称之为明智谨慎。

And do the unjust appear to you to be wise and good?

苏：你觉得，非正义者既明智又善良吗？

Yes, he said; at any rate those of them who are able to be perfectly unjust, and who have the power of subduing states and nations; but perhaps you imagine me to be talking of cutpurses. Even this profession if undetected has advantages, though they are not to b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which I was just now speaking.

色：是的，至少那些能够行纯粹不义之事的人，有能力征服国家和民族。但你也许设想，我所说的是小偷小摸之徒吧。即使是这一行当，如若不被发觉，仍是有利的，但是他们与我刚刚谈到之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I do not think that I misapprehend your meaning, Thrasymachus, I replied; but still I cannot hear without amazement that you class injustice with wisdom and virtue, and justice with the opposite.

苏：色拉叙马霍斯，虽然，我想自己并不会误解你的意思，但是当我听到你将不义视作智慧与美德，而将正义视作与之相反的品质，不禁甚感诧异。

Certainly I do so class them.

色：的确，我为他们如此归类。

Now, I said, you are on more substantial and almost unanswerable ground; for if the injustice which you were

maintaining to be profitable had been admitted by you as by others to be vice and deformity, an answer might have been given to you on received principles; but now I perceive that you will call injustice honourable and strong, and to the unjust you will attribute all the qualities which were attributed by us before to the just, seeing that you do not hesitate to rank injustice with wisdom and virtue.

苏：现在，你的理由更充分了，几乎不可辨驳。倘若你能像别人那样承认，你坚持认为有利可图的不义是和常人所认为的一样邪恶、非正式的话，我本来可以遵照公认的准则给予你答复，但是有鉴于你毫不犹豫地将不义归入智慧与美德之列，如今我感觉你欲给不义冠以荣耀而强大的美名，同时对于不义之人，你则欲将我们从前归之于正义者的所有品质归于他们。

You have guessed most infallibly, he replied.

色：你的猜测很正确。

Then I certainly ought not to shrink from going through with the argument so long as I have reason to think that you, Thrasymachus, are speaking your real mind; for I do believe that you are now in earnest and are not amusing yourself at our expense.

苏：那么，只要我有理由相信你——色拉叙马霍斯，讲的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我就一定将辩论进行到底，决不退缩，因为我坚信，你

此时是认真的，并非在拿我们取乐。

I may be in earnest or not, but what is that to you?—to refute the argument is your business.

色：我认真与否，与你何干？你要做的，就是反驳我的观点。

Very true, I said; that is what I have to do: But will you be so good as answer yet one more question? Does the just man try to gain any advantage over the just?

苏：非常正确，我必须如此：但是，你可否帮忙再回答一个问题？正义之人，会竭力战胜正义者而牟利吗？

Far otherwise; if he did hewould not be the simple, amusing creature which he is.

色：绝对不会。如果他果真如此，他就不是现在这个纯真而有趣之人了。

And would he try to go beyond just action?

苏：他会尽力逾越正义之举的界限吗？

He would not.

色：他不会。

And how would he regard the attempt to gain an advantage over the unjust; would that be considered by him as just or unjust?

苏：那么，他又如何看待为战胜非正义者所进行的努力尝试呢？他会将之视为正义之举，还是不义之举呢？

He would think it just, and would try to gain the advantage; but he would not be able.

色：他会视之为正义之举，并且会尽力取得优势，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Whether he would or would not be able, I said, is not to the point. My question is only whether the just man, while refusing to have more than another just man, would wish and claim to have more than the unjust?

苏：他是否有此能力，并非问题的关键。我的问题只是，不愿比同道获得更多利益的正义之人，是否愿意比不义之人拥有更多利益呢？

Yes, he would.

色：是的，他愿意。

And what of the unjust—does he claim to have more than the just man and to do more than is just?

苏：那么，非正义者又如何呢？他会要求得到比正义之人更多利益，并且为此不择手段吗？

Of course, he said, for he claims to have more than all men.

色：当然，因为他要求得到比所有人都要多的利益。

And the unjust man will strive and struggle to obtain more than the unjust man or action, in order that he may have more than all?

苏：为了获取超出所有人的利益，不义之人将会奋力拼搏，以取得比其他不义之人或不义之行更多的利益，对吗？

True.

色：对。

We may put the matter thus, I said—the just does not desire more than his like but more than his unlike, whereas the unjust desires more than both his like and his unlike?

苏：因此，正义者不欲获得比同道之人更多的利益，但欲获得比道不同者更多的利益；不义之人则欲获得比其同道之人和道不同者都要多的利益。我们可以这样说吗？

Nothing, he said, can be better than that statement.

色：如此表述，再好不过。

And the unjust is good and wise, and the just is neither?

苏：非正义者，贤德且明智，而正义者则正好相反吗？

Good again, he said.

色：说得好。

And is not the unjust like the wise and good and the just unlike

them?

苏：非正义与贤德且明智相类似，而正义则与之相反吗？

Of course, he said, he who is of a certain nature, is like those who are of a certain nature; he who is not, not.

色：当然，天性相同者相似，而天性不同者则相异。

Each of them, I said, is such as his like is?

苏：人人皆与其同道中人相似吗？

Certainly, he replied.

色：当然。

Very good, Thrasymachus, I said; and now to take the case of the arts: you would admit that one man is a musician and another not a musician?

苏：很好，色拉叙马霍斯。现在，我们以艺术为例：一人为音乐家，而另外一人则并非音乐家，你同意吗？

Yes.

色：同意。

And which is wise and which is foolish?

苏：此二者，孰智孰愚？

Clearly the musician is wise, and he who is not a musician is foolish.

色：显然，音乐家明智，而外行人愚拙。

And he is good in as far as he is wise, and bad in as far as he is foolish?

苏：明智者为善，愚拙者为恶，对吗？

Yes.

色：对。

And you would say the same sort of thing of the physician?

苏：你会用同样的标准来评价医生吗？

Yes.

色：会。

And do you think, my excellent friend, that a musician when he adjusts the lyre would desire or claim to exceed or go beyond a musician in the tightening and loosening the strings?

苏：我优秀的朋友，在你看来，当音乐家调琴之时，他会在松紧琴弦的过程中，希冀或要求超越其他音乐家吗？

I do not think that he would.

色：我想，他不会的。

But he would claim to exceed the non-musician?

苏：但是，他会要求超越非专业人士吗？

Of course.

色：当然。

And what would you say of the physician? In prescribing meats and drinks would he wish to go beyond another physician or beyond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苏：那么，就医生而论，你会怎么看呢？在开饮食处方之时，他会希望超越别的医生和他现在的医术水平吗？

He would not.

色：他不会。

But he would wish to go beyond the non-physician?

苏：可是，他会希望超越外行人吗？

Yes.

色：会的。

And about knowledge and ignorance in general; see whether you think that any man who has knowledge ever would wish to have the choice of saying or doing more than another man who has knowledge. Would he not rather say or do the same as his like in the same case?

苏：就普遍意义上的知识与无知而言，想一想，任何有知识的人是否会希望选择在言行方面超出其他有知识者呢？在相同情形之下，他是否会选择在言行方面与他的同道中人保持一致呢？

That, I suppose, can hardly be denied.

色：我猜，那几乎是无可否认的。

And what of the ignorant?would he not desire to have more than either the knowing or the ignorant?

苏：无知者会如何呢？他是否会希望超过包括有知识者与无知者在内的所有人呢？

I dare say.

色：很可能。

And the knowing is wise?

苏：有知识者是明智的吗？

Yes.

色：是。

And the wise is good?

苏：明智者是贤德的吗？

True.

色：对。

Then the wise and good will not desire to gain more than his like, but more than his unlike and opposite?

苏：由此，明智且贤德者，并不希望获得比同道更多的利益，而是希望获得比道不同者及对立者更多的利益，对吗？

I suppose so.

色：大抵如此。

Whereas the bad and ignorant will desire to gain more than both?

苏：然而，邪恶且无知者，则希望获得比同道中人和道不同者都要多的利益吗？

Yes.

色：是的。

But did we not say, Thrasymachus, that the unjust goes beyond both his like and unlike? Were not these your words?

苏：可是，色拉叙马霍斯，我们不是说过，非正义者常常要超越包括其同道与道不同者在内的所有人吗？不是你亲口说的吗？

They were.

色：我的确说过。

And you also said that the just will not go beyond his like but his unlike?

苏：另外，你还说过正义者不愿胜过同道中人，却愿意胜过道不同者，对吗？

Yes.

色：对。

Then the just is like the wise and good, and the unjust like the evil and ignorant?

苏：由此，正义者与明智且贤德者类似，而非正义者与邪恶且无知者类似，对吗？

That is the inference.

色：可以这样推理。

And each of them is such as his like is?

苏：人人皆与其同道中人相似吗？

That was admitted.

色：这一点，早已被肯定了。

Then the just has turned out to be wise and good and the unjust evil and ignorant.

苏：结果证明，正义者明智而贤德，非正义者邪恶而无知。

Thrasymachus made all these admissions, not fluently, as I repeat them, but with extreme reluctance; it was a hot summer's day, and the perspiration poured from him in torrents; and then I saw what I had never seen before, Thrasymachus blushing. As we were now agreed that justice was virtue and wisdom, and injustice vice and ignorance, I proceeded to another point:

色拉叙马霍斯在承认上述所有推论合理之时，并不像我复述得这样对答如流，而是流露出极端的不情愿。时值盛夏，天气炎热，他汗流如注。当时，我看到了自己从未见过的情形，色拉叙马霍斯竟然脸红了。既然我们已达成共识，即正义是美德与智慧，而不义则是恶行与无知，我着手进行下一步的讨论。

Well, I said, Thrasymachus, that matter is now settled; but were

we not also saying that injustice had strength; do you remember?

苏：好了，色拉叙马霍斯，这一问题已经解决。可是，我们之前不是还说过，不义拥有强大力量吗？你还记得吧？

Yes, I remember, he said, but do not suppose that I approve of what you are saying or have no answer; if however I were to answer, you would be quite certain to accuse me of haranguing; therefore either permit me to have my say out, or if you would rather ask, do so, and I will answer 'Very good,' as they say to story-telling old women, and will nod 'Yes' and 'No.'

色：是的，我还记得，但是不要指望，我赞成你的说辞，或者答不出来。如果我真要回答的话，你一定会指责我大放厥词，因此你要么允许我讲出答案，要么你愿意提问的话，我就像个喋喋不休的老太太一边对你不住点头，一边说着很好！很好！

Certainly not, I said, if contrary to your real opinion.

苏：如果与你的本意相悖，你当然不会表示赞成。

Yes, he said, I will, to please you, since you will not let me speak. What else would you have?

色：不，既然你不愿让我讲，我就一切依你，只要你高兴就行。

此外，您还有别的要求吗？

Nothing in the world, I said; and if you are so disposed I will ask and you shall answer.

苏：别无他求。既然你愿意，那么，我来问，你来答。

Proceed.

色：开始吧。

Then I will repeat the question which I asked before, in order that our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nature of justice and injustice may be carried on regularly. A statement was made that injustice is stronger and more powerful than justice, but now justice, having been identified with wisdom and virtue, is easily shown to be stronger than injustice, if injustice is ignorance; this can no longer be questioned by any one. But I want to view the matter, Thrasymachus, in a different way: You would not deny that a state may be unjust and may be unjustly attempting to enslave other states, or may have already enslaved them, and may be holding many of them in subjection?

苏：那么，为了继续深入研究正义与不义的相关实质，我将重复一下我之前提出的问题。起初的立论，是不义比正义更为强大而有力，但如今正义被认定为智慧与美德，如果不义为无知的话，那么显

然正义要比不义更强大。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可是，色拉叙马霍斯，我想以另一种方式来审视这个问题：你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即一个城邦可能多行不义，并且企图以不义的手段征服其他城邦，或者可能已经征服了它们，并且将许多城邦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对吗？

True, he replied; and I will add that the best and most perfectly unjust state will be most likely to do so.

色：对。我还要补充一句，最优秀的、将不义演绎到极限的城邦，最有可能会做到这一点。

I know, I said, that such was your position; but what I would further consider is, whether this power which is possessed by the superior state can exist or be exercised without justice or only with justice.

苏：我明白，这就是你当初的立场。但是我想进一步深究的问题是，在没有正义的情况下，此强大城邦所拥有的征服别人的力量，是否能够存在或者得以行使呢？

If you are right in your view, and justice is wisdom, then only with justice; but if I am right, then without justice.

色：如果你的观点正确，正义即智慧，那么必须有正义才可以；但是如果我是对的，那么没有正义也无妨。

I am delighted, Thrasymachus, to see you not only nodding assent and dissent, but making answers which are quite excellent.

苏：色拉叙马霍斯，我欣喜地发现，你不仅颔首表明同意与否，而且还做出了如此绝妙的回答。

That is out of civility to you, he replied.

色：这不过是出于礼貌罢了。

You are very kind, I said; and would you have the goodness also to inform me, whether you think that a state, or an army, or a band of robbers and thieves, or any other gang of evil-doers could act at all if they injured one another?

苏：你很友善，可否再烦请你告诉我，在你看来，国家、军队、强盗和窃贼，或者任何其他的罪犯团伙，在自相残杀的情形之下，能否发挥作用？

No indeed, he said, they could not.

色：绝对不能。

But if they abstained from injuring one another, then they

might act together better?

苏：但如果他们放弃自相残杀的做法，那么他们一起行动起来，效果会更好吗？

Yes.

色：会的。

And this is because injustice creates divisions and hatreds and fighting, and justice imparts harmony and friendship; is not that true, Thrasymachus?

苏：这是因为不义产生出隔阂、仇恨和争斗，而正义则传递和谐与友谊，难得不是吗，色拉叙马霍斯？

I agree, he said, because I do not wish to quarrel with you.

色：我赞同，因为我不想和你发生争执。

How good of you, I said; but I should like to know also whether injustice, having this tendency to arouse hatred, wherever existing, among slaves or among freemen, will not make them hate one another and set them at variance and render them incapable of

common action?

苏：真得谢谢你的一片好心。不过，我还想知道，既然不义无论在哪里都会激起仇恨，那么当不义在奴隶或自由人之间时，难道不会导致他们彼此憎恨并发生分歧，使得他们无法采取一致行动吗？

Certainly.

色：当然会。

And even if injustice be found in two only, will they not quarrel and fight, and become enemies to one another and to the just?

苏：甚至于当不义出现在区区两人之间时，他们也会发生口角与争斗，彼此反目，并且成为正义者的敌人吗？

They will.

色：他们会的。

And suppose injustice abiding in a single person, would your wisdom say that she loses or that she retains her natural power?

苏：试想不义存在于一人身上，凭借你的智慧，你会认为，不义会失去其自然力量，还是保留其自然力量呢？

Let us assume that she retains her power.

色：让我们姑且认为，它将保留其力量。

Yet is not the power which injustice exercises of such a nature that wherever she takes up her abode, whether in a city, in an army, in a family, or in any other body, that body is, to begin with, rendered incapable of united action by reason of sedition and distraction; and does it not become its own enemy and at variance with all that opposes it, and with the just? Is not this the case?

苏：然而，无论是在一座城市，一支军队，一个家庭，还是在任何其他团体，不义一旦出现，该团体首先便因煽动暴乱和倾轧不和而无法做到步调一致，然后，该团体内部相互为敌，同时还同所有反对它的力量，以及正义者存在着分歧。难得不是吗？情况是这样的吧？

Yes, certainly.

色：的确如此。

And is not injustice equally fatal when existing in a single person; in the first place rendering him incapable of action because

he is not at unity with himself,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making him an enemy to himself and the just? Is not that true, Thrasymachus?

苏：当不义存在于一人之身时，不也是具有同样致命性的危害吗？——首先，它使人由于自身矛盾而无法行动；其次，它使人与自身为敌，同时也与正义为敌。色拉叙马霍斯，事实难道并非如此吗？

Yes.

色：对。

And O my friend, I said, surely the gods are just?

苏：噢，我的朋友，诸神想必是正义的吧？

Granted that they are.

色：当然。

But if so, the unjust will be the enemy of the gods, and the just will be their friend?

苏：但是，如此一来，非正义者便是诸神之敌，而正义者便是诸

神之友吗？

Feast away in triumph, and take your fill of the argument; I will not oppose you, lest I should displease the company.

色：尽情地享受凯旋的盛宴，充分地论证你的观点吧。我将不再提出异议，以免扫大家的兴。

Well then, proceed with your answers, and let me have the remainder of my repast. For we have already shown that the just are clearly wiser and better and abler than the unjust, and that the unjust are incapable of common action; nay more, that to speak as we did of men who are evil acting at any time vigorously together, is not strictly true, for if they had been perfectly evil, they would have laid hands upon one another; but it is evident that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remnant of justice in them, which enabled them to combine; if there had not been they would have injured one another as well as their victims; they were but half—villains in their enterprises; for had they been whole villains, and utterly unjust, they would have been utterly incapable of action. That, as I believe, is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and not what you said at first. But whether the just have a better and happier life than the unjust is a further question which we also proposed to consider. I think that they have, and for the reasons which I have given; but still I should like to examine further, for no light matter is at stake, nothing less than the rule of human life.

苏：好吧，请你继续回答我的问题，让我享受完这场盛宴。因为

我们已经证明，正义者显然比非正义者更明智、善良，更有能力，非正义者无力采取共同行动；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刚才所说，邪恶之人在任何时候一致采取有力行动，严格来讲这都是不合情理的，因为他们果真邪恶十足的话，他们会自相残杀，但是显然他们之间尚且存在着些许正义，因此他们才能够联合起来；否则的话，他们在伤害受害者的同时，亦会彼此伤害。他们在其团体内部并非十足的恶棍，因为他们若是彻头彻尾的坏人、纯粹的不义之徒，那么他们将毫无行动能力。我认为，这才是事情的真相，你起初所言则并不足信。但正义者是否较之非正义者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呢？这是我们有待进一步考虑的又一问题。我个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之前已经给出了理由。但是我仍觉得，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深究，因为这决非无足重轻的小问题，其意义不啻于人生法则。

Proceed.

色：愿闻其详。

I will proceed by asking a question: Would you not say that a horse has some end?

苏：我先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认为，马有什么用途吗？

I should.

色：有。

And the end or use of a horse or of anything would be that which could not be accomplished, or not so well accomplished, by any other thing?

苏：马或者其他任何事物的目的或用途，将是任何其他事物所不能或不能很好实现的吗？

I do not understand, he said.

色：我不明白。

Let me explain: Can you see, except with the eye?

苏：我解释一下，在不用眼睛的情况下，你能够看东西吗？

Certainly not.

色：当然不能。

Or hear, except with the ear?

苏：不用耳朵，能听吗？

No.

色：不能。

These then may be truly said to be the ends of these organs?

苏：那么，完全可以说，这些便是相关器官的功能。

They may.

色：对。

But you can cut off a vine-branch with a dagger or with a chisel, and in many other ways?

苏：可是，要修剪葡萄藤，可以用短剑、凿子，以及许多其他方式吗？

Of course.

色：当然。

And yet not so well as with a pruning-hook made for the purpose?

苏：然而，毕竟不如专为此目的而制造的修枝刀，对吗？

True.

色：对。

May we not say that this is the end of a pruning-hook?

苏：那么，这即是修枝刀的用途吧？

We may.

色：可以这么说。

Then now I think you will have no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my meaning when I asked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end of anything would be that which could not be accomplished, or not so well accomplished, by any other thing?

苏：那么，现在你不难明白，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的含义了吧？

即事物的功能，是否是任何其他事物所无法实现，或无法很好实现的？

I understand your meaning, he said, and assent.

色：我明白了，表示赞同。

And that to which an end is appointed has also an excellence? Need I ask again whether the eye has an end?

苏：具有特定功能的事物，同时也拥有一种特长吗？我需要再问一遍吗？眼睛是否有其功用？

It has.

色：它有。

And has not the eye an excellence?

苏：眼睛是否具备一种特长呢？

Yes.

色：是的。

And the ear has an end and an excellence also?

苏：耳朵是否也同时具备功用和特长呢？

True.

色：是的。

And the same is true of all other things; they have each of them an end and a special excellence?

苏：同样，这也适用于所有其他事物。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功用和特异之处。

That is so.

色：的确如此。

Well, and can the eyes fulfil their end if they are wanting in their own proper excellence and have a defect instead?

苏：那么，如果眼睛在专长方面有所欠缺而存在不足，能否实现其功用呢？

How can they, he said, if they are blind and cannot see?

色：如果双目失明而不能视，它们又如何能实现其目的呢？

You mean to say, if they have lost their proper excellence, which is sight; but I have not arrived at that point yet. I would rather ask the question more generally, and only enquire whether the things which fulfil their ends fulfil them by their own proper excellence, and fail of fulfilling them by their own defect?

苏：你的意思是说，如双目尽失其专长，即视力，则毫无用处；但是，我犹未论及于此。我的问题比较笼统，只是想知道，事物是否凭借专长而实现功用，同时也因专长欠缺而无法实现功用？

Certainly, he replied.

色：当然。

I might say the same of the ears; when deprived of their own proper excellence they cannot fulfil their end?

苏：我可以说，耳朵亦是如此，一旦丧失其专长，便无法实现其功用吗？

True.

色：对。

And the same observation will apply to all other things?

苏：此观点亦适用于所有其他事物吗？

I agree.

色：同意。

Well; and has not the soul an end which nothing else can fulfil? for example, to superintend and command and deliberate and the like. Are not these functions proper to the soul, and can they rightly be assigned to any other?

苏：那么，难道灵魂不具有其他事物所无法实现的功用吗？比如，监督、指挥、思考等等。这些功能难道不是灵魂所特有的吗？抑或可由他物代为实现？

To no other.

色：皆为他物所不具备。

And is not life to be reckoned among the ends of the soul?

苏：生命难道不可以被看做灵魂的一种功用吗？

Assuredly, he said.

色：当然可以。

And has not the soul an excellence also?

苏：灵魂难道没有一种特异之处吗？

Yes.

色：有。

And can she or can she not fulfil her own ends when deprived of that excellence?

苏：那么，当它丧失该特异之处时，它能否实现自身的功用呢？

She cannot.

色：它不能。

Then an evil soul must necessarily be an evil ruler and superintendent, and the good soul a good ruler?

苏：那么，邪恶的灵魂必定是邪恶的统治者和管理者，善良的灵魂必定是善良的统治者吗？

Yes, necessarily.

色：对，必定如此。

And we have admitted that justice is the excellence of the soul, and injustice the defect of the soul?

苏：我们已经承认，正义是灵魂的优点，而不义是灵魂的缺点，对吗？

That has been admitted.

色：我们已承认。

Then the just soul and the just man will live well, and the unjust man will live ill?

苏：可见，有着正义灵魂的正义之人，将生活得很幸福，而不义之人将生活得很不幸。

That is what your argument proves.

色：你已证明了这一点。

And he who lives well is blessed and happy, and he who lives ill the reverse of happy?

苏：生活幸福者则幸运快活，生活不幸者则恰恰相反，对吗？

Certainly.

色：当然。

Then the just is happy, and the unjust miserable?

苏：可见，正义者幸福快乐，而非正义者痛苦可悲，对吗？

So be it.

色：姑且如此。

But happiness and not misery is profitable.

苏：幸福是有益的，而不幸则并非如此。

Of course.

色：当然。

Then, my blessed Thrasymachus, injustice can never be more profitable than justice.

苏：那么，亲爱的色拉叙马霍斯，不义永远不会比正义更有益。

Let this, Socrates, he said, be your entertainment at the

Bendidea.

色：苏格拉底，让这场辩论成为你在本迪亚节日的娱乐活动吧。

For which I am indebted to you, I said, now that you have grown gentle towards me and have left off scolding.Nevertheless, I have not been well entertained; but that was my own fault and not yours. As an epicure snatches a taste of every dish which is successively brought to table, he not having allowed himself time to enjoy the one before, so have I gone from one subject to another without having discovered what I sought at first, the nature of justice. I left that enquiry and turned away to consider whether justice is virtue and wisdom or evil and folly; and when there arose a further question about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justice and injustice, I could not refrain from passing on to that. And the result of the whole discussion has been that I know nothing at all. For I know not what justice is, and therefore I am not likely to know whether it is or is not a virtue, nor can I say whether the just man is happy or unhappy.

苏：因此，我对你感激不尽。现在，你对我逐渐态度友善起来，已然不再恶语相加。即便如此，我从中并没有获得多少乐趣。然而，这是我的过错，与你无关。正如一个贪恋口腹之欲者，忙不迭地品尝接连摆上餐桌的每一样美食，竟无暇仔细品味之前的一盘，我则是匆忙地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却忘记了最初探讨的问题，即正义的实质。我忘记去思索正义是美德与智慧，抑或邪恶与愚蠢；当又一个关于正义与不义哪个更为有利的问题出现时，我又忍不住转向这一问题。因此，整个辩论结束后，我一无所知。我不知何为正义，因此我也不可能知道，它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美德；同时，也不能断言，正

义之人究竟幸福还是不幸。

BOOK II.

第二卷

SOCRATES—GLAUCON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格劳孔

With these words I was thinking that I had made an end of the discussion; but the end, in truth, proved to be only a beginning. For Glaucon, who is always the most pugnacious of men, was dissatisfied at Thrasymachus' retirement; he wanted to have the battle out.

话说到这里，我以为论辩可以就此收场了；但是实际上好戏才刚刚开场。素来好战的格劳孔，此时见色拉叙马霍斯退却，颇为不满，希望论战进行到底。

So he said to me: Socrates, do you wish really to persuade us, or only to seem to have persuaded us, that to be just is always better than to be unjust?

格：苏格拉底，你主张正义总是胜于不义，你是真心想说服我们呢，还是只要表面上说服我们就完事大吉？

I should wish really to persuade you, I replied, if I could.

苏：如果能力允许，我的确是希望说服大家。

Then you certainly have not succeeded. Let me ask you now:—How would you arrange goods—are there not some which we welcome for their own sakes, and independently of their consequences, as, for example, harmless pleasures and enjoyments, which delight us at the time, although nothing follows from them?

格：那么，你的目标，想必尚未达成。且容我问一下：你会如何给好的事物进行分类？难道没有这样一些好事物吗？——我们因其本身而乐于接受它们，无关乎其结果。例如，无伤大雅的欢乐与愉悦，虽然它们不能产生任何结果和影响，但可以给我们带来一时的喜悦。

I agree in thinking that there is such a class, I replied.

苏：我承认存在着这样一种类别。

Is there not also a second class of goods, such as knowledge, sight, health, which are desirable not only in themselves, but also for their results?

格：难道不是也存在着另一种类别的好事物，比如知识、视力、健康？它们之所以令人喜爱，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其结果的原

因。

Certainly, I said.

苏：当然存在。

And would you not recognize a third class, such as gymnastic, and the care of the sick, and the physician's art; also the various ways of money-making—these do us good but we regard them as disagreeable; and no one would choose them for their own sakes, but only for the sake of some reward or result which flows from them?

格：那么，你难道不会承认仍存在着第三类东西，如体操技能、护理病人和医术，以及形形色色的赚钱之术吗？——这些事物对我们有好处，但是我们视之为苦差，因为没有人会为了其本身的缘故而选择它们，不过是为了它们带来的报酬或结果罢了。

There is, I said, this third class also. But why do you ask?

苏：第三种也存在。但你为何问这些呢？

Because I want to know in which of the three classes you would place justice?

格：因为我想知道，于此三类别之中，你将如何划定正义之归属？

In the highest class, I replied,—among those goods which he who would be happy desires both for their own sake and for the sake of their results.

苏：属于最高级的类别。追求幸福快乐之人，兼顾其本身与结果的缘故而欲得到它们。

Then the many are of another mind; they think that justice is to be reckoned in the troublesome class, among goods which are to be pursued for the sake of rewards and of reputation, but in themselves are disagreeable and rather to be avoided.

格：可大多数人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心目中，正义当被视为令人反感的那一类。人们追求它们，不外乎为了名与利。至于它们本身，人们则是厌恶的，避之唯恐不及。

I know, I said, that this is their manner of thinking, and that this was the thesis which Thrasymachus was maintaining just now, when he censured justice and praised injustice. But I am too stupid to be convinced by him.

苏：我知道，这便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同时这也是色拉叙马霍斯在贬正义而褒不义之时所持的论点。但是我实在愚钝，无法接受他的

观点。

I wish, he said, that you would hear me as well as him, and then I shall see whether you and I agree. For Thrasymachus seems to me, like a snake, to have been charmed by your voice sooner than he ought to have been; but to my mind the nature of justice and injustice have not yet been made clear. Setting aside their rewards and results, I want to know what they are in themselves, and how they inwardly work in the soul. If you, please, then, I will revive the argument of Thrasymachus. And first I will speak of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justice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view of them. Secondly, I will show that all men who practise justice do so against their will, of necessity, but not as a good. And thirdly, I will argue that there is reason in this view, for the life of the unjust is after all better far than the life of the just—if what they say is true, Socrates, since I myself am not of their opinion. But still I acknowledge that I am perplexed when I hear the voices of Thrasymachus and myriads of others dinning in my ear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 have never yet heard the superiority of justice to injustice maintained by any one in a satisfactory way. I want to hear justice praised in respect of itself; then I shall be satisfied, and you are the person from whom I think that I am most likely to hear this; and therefore I will praise the unjust life to the utmost of my power, and my manner of speaking will indicate the manner in which I desire to hear you too praising justice and censuring injustice. Will you say whether you approve of my proposal?

格：我希望，你能同样倾听一下我的观点，看看你我能否达成一致。在我看来，色拉叙马霍斯，就像着了魔的蛇，一听到你的声音，便过早地屈服了；但是，我认为，正义与不义的本质问题尚未弄清。

撇开它们各自的报酬与结果不谈，我想知道它们内在的本质，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如果你愿意，我想围绕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重新展开辩论。首先，我将谈一谈关于正义本质与起源问题的流行观点。其次，我要向大家说明的是，所有坚持正义之人都是违背其本人意愿，不得已而为之，并非以此为乐事。再次，我将指出，苏格拉底，这一观点是有依据的。虽然我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但是倘若众人所言不虚的话，非正义者的生活，毕竟明显好于正义者的生活。同时，我依然要承认，色拉叙马霍斯以及许多其他人在我耳畔的絮聒，的确令我感到迷惘；另一方面，我从未听说过，任何人能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证明“正义胜于不义”。我希望听到，正义因其自身的原因而受到赞扬。这样，我才会心满意足，而你则是最有希望能讲出这些话的人。为此，我将倾力称颂非正义者的生活，而我之所以如此卖力演说，是因为我期待着一饱耳福，听到你同样不遗余力地褒扬正义而贬斥不义。你是否赞同我的提议呢？

Indeed I do; nor can I imagine any theme about which a man of sense would oftener wish to converse.

苏：完全同意。在我看来，理智之人乐于经常引为谈资的话题，莫过于此。

I am delighted, he replied, to hear you say so, and shall begin by speaking, as I proposed, of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justice.

格：听你这么说，我无比欣喜。按照我之前的提议，我首先说一说正义的本质与起源。

GLAUCON

主要人物：格劳孔

They say that to do injustice is, by nature, good; to suffer injustice, evil; but that the evil is greater than the good. And so when men have both done and suffered injustice and have had experience of both, not being able to avoid the one and obtain the other, they think that they had better agree among themselves to have neither; hence there arise laws and mutual covenants; and that which is ordained by law is termed by them lawful and just. This they affirm to be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justice;—it is a mean or compromise, between the best of all, which is to do injustice and not be punished, and the worst of all, which is to suffer injustice without the power of retaliation; and justice, being at a middle point between the two, is tolerated not as a good, but as the lesser evil, and honoured by reason of the inability of men to do injustice. For no man who is worthy to be called a man would ever submit to such an agreement if he were able to resist; he would be mad if he did. Such is the received account, Socrates, of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justice.

格劳孔：人们常说本质上讲，行不义之事是有利的，而遭受不义则是有害的；但是不义的害处要大于不义带来的好处。于是，人们既行不义之事又遭受不义之害，经历了这两种体验，而无力于趋利而避害。此时，他们想到最好达成共识以远舍弃此二者。因而，法律、契约应运而生。法律所规定者，即为合法而公正的。人们断定，这就是正义的起源与本质。换言之，它是一种折中之道。最为有利者，为行不义而不受惩罚。最为不利者，则是遭遇不义之害而无力报复。正义

是在最为有利与最为不利之间进行折中。正义为二者的中间点，为人们所容忍，是因为害处较小，而不是因为它具有益处；同时，正义得到人们的认可，因为它可以约束人们无法行不义之事。因为在有能力反抗的条件下，任何配称之为人的人，都绝不会服从这一协定的，除非他疯了。苏格拉底，关于正义的本质与起源问题，这就是公认的说法。

Now that those who practise justice do so involuntarily and because they have not the power to be unjust will best appear if we imagine something of this kind: having given both to the just and the unjust power to do what they will, let us watch and see whither desire will lead them; then we shall discover in the very act the just and unjust man to be proceeding along the same road, following their interest, which all natures deem to be their good, and are only diverted into the path of justice by the force of law. The liberty which we are supposing may be most completely given to them in the form of such a power as is said to have been possessed by Gyges, the ancestor of Croesus the Lydian.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Gyges was a shepherd in the service of the king of Lydia; there was a great storm, and an earthquake made an opening in the earth at the place where he was feeding his flock. Amazed at the sight, he descended into the opening, where, among other marvels, he beheld a hollow brazen horse, having doors, at which he stooping and looking in saw a dead body of stature, as appeared to him, more than human, and having nothing on but a gold ring; this he took from the finger of the dead and reascended. Now the shepherds met together, according to custom, that they might send their monthly report about the flocks to the king; into their assembly he came having the ring on his finger, and as he was sitting among them he chanced to turn the collet of the ring inside his hand, when instantly he became invisible to the rest of the

company and they began to speak of him as if he were no longer present. He was astonished at this, and again touching the ring he turned the collet outwards and reappeared; he made several trials of the ring, and always with the same result—when he turned the collet inwards he became invisible, when outwards he reappeared. Whereupon he contrived to be chosen one of the messengers who were sent to the court; whereas soon as he arrived he seduced the queen, and with her help conspired against the king and slew him, and took the kingdom.

行正义之人，如此行事，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为他们无力行不义。这一点，可以在下面假设的情形中得到最好的体现：首先给予正义者与非正义者行使个人自由意志的权利，再让我们仔细观察，欲望的力量会将他们引至何方；然后，我们会发现，在此行动中，正义者与非正义者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行，追求私利；本质不同之人皆以私利为上，只是在法律力量的强制之下，才转入正义之途。我们在假设中给予人们的自由，应该是最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如同传说中利地亚国克里萨斯王的祖先吉哲斯所拥有的神奇力量。据传说，吉哲斯是利地亚国王的牧羊人。一日骤降暴雨，发生了地震，在吉哲斯放牧之处，出现了一个地穴。惊异之下，吉哲斯下至洞穴内，在众多的稀奇物什中，看见一匹中空的铜马，马身有门。他俯在门上，向里望去，只见一具死尸高大非凡。尸体上除却一枚金戒指，别无旁物。吉哲斯从死者的手指上将之取下，回到地面。这日，牧羊人齐集一处。按照惯例，他们每月要派人向国王报告牧群的状况。吉哲斯手上戴着那枚戒指赴会。他坐在众牧羊人之间，偶然将戒指的正面旋向手掌内侧，霎时间他化为无形，不为众人所见，而牧人们便开始议论他，就仿佛他根本不在场。他感到十分诧异，再次摸了摸戒指，将正面旋向外侧，于是重新出现在众人之间。他戴着戒指，反复试验了数次，结果皆如此——戒指正面旋至内侧时，他就会为众人所不见；当它旋至外侧时，他便会再次出现。于是，他设计运作，当选为面见国王的信使之一。吉哲斯一到王宫，就诱奸了王后，并在她的帮助下，阴谋杀害了

国王，篡夺了王位。

Suppose now that there were two such magic rings, and the just put on one of them and the unjust the other; no man can be imagined to be of such an iron nature that he would stand fast in justice. No man would keep his hands off what was not his own when he could safely take what he liked out of the market, or go into houses and lie with any one at his pleasure, or kill or release from prison whom he would, and in all respects be like a God among men. Then the actions of the just would be as the actions of the unjust; they would both come at last to the same point. And this we may truly affirm to be a great proof that a man is just, not willingly or because he thinks that justice is any good to him individually, but of necessity, for wherever any one thinks that he can safely be unjust, there he is unjust. For all men believe in their hearts that injustice is far more profitable to the individual than justice, and he who argues as I have been supposing, will say that they are right. If you could imagine any one obtaining this power of becoming invisible, and never doing any wrong or touching what was another's, he would be thought by the lookers-on to be a most wretched idiot, although they would praise him to one another's faces, and keep up appearances with one another from a fear that they too might suffer injustice. Enough of this.Now, if we are to form a real judgment of the life of the just and unjust, we must isolate them; there is no other way; and how is the isolation to be effected? I answer: Let the unjust man be entirely unjust, and the just man entirely just; nothing is to be taken away from either of them, and both are to be perfectly furnished for the work of their respective lives. First, let the unjust be like other distinguished masters of craft; like the skilful pilot or physician, who knows intuitively his own powers and keeps within their limits, and who,

if he fails at any point, is able to recover himself. So let the unjust make his unjust attempts in the right way, and lie hidden if he means to be great in his injustice: (he who is found out is nobody:) for the highest reach of injustice is, to be deemed just when you are not. Therefore I say that in the perfectly unjust man we must assume the most perfect injustice; there is to be no deduction, but we must allow him, while doing the most unjust acts, to have acquired the greatest reputation for justice. If he has taken a false step he must be able to recover himself; he must be one who can speak with effect, if any of his deeds come to light, and who can force his way where force is required by his courage and strength, and command of money and friends. And at his side let us place the just man in his nobleness and simplicity, wishing, as Aeschylus says, to be and not to seem good. There must be no seeming, for if he seem to be just he will be honoured and rewarded, and then we shall not know whether he is just for the sake of justice or for the sake of honours and rewards; therefore, let him be clothed in justice only, and have no other covering; and he must be imagined in a state of life the opposite of the former. Let him be the best of men, and let him be thought the worst; then he will have been put to the proof; and we shall see whether he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fear of infamy and its consequences. And let him continue thus to the hour of death; being just and seeming to be unjust. When both have reached the uttermost extreme, the one of justice and the other of injustice, let judgment be given which of them is the happier of the two.

现在假设有两枚这样的魔法戒指，由正义者与非正义者各戴一枚，那么可以想象，没有谁会有钢铁般的意志来坚守正义。当人们可以安然无恙地从市场任意盗取财货时，没有人能做到安分守己；抑或入室奸淫他人之妻女，逞其所欲；抑或任意杀人、释放囚犯等等，方

方面面有如人间的神祇。此时，正义者的举动与非正义者无异，他们最终必将殊途而同归。无疑，这即是一个明证：人们行正义之事，既非出于甘心情愿，亦非为了正义带来的个人好处，而是出于无奈，因为一旦任何人认为，自己可以行不义而无后顾之忧，他必将行不义之事。原因在于，所有人在内心深处都认为，对于个人而言，不义着实比正义更为有利。我一直认为，即使是辩论中持异议者，也会认同这一想法。假如有人获得隐身之法，而从不为非作歹或做非分之事，那么尽管旁观者会在人前称赞他，但是私下里却认为他是个无可救药的白痴；实际上，人们之所以彼此之间装腔作势地奉承，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沦为不义之事的受害者。凡此事例，不一而足。如今，我们若要对正义者与非正义者的生活做出真实的判断，则必须划定二者的界限。此外，别无他法。那么，如何使之界限分明呢？我的答案是：让非正义者尽行不义，让正义者恪守正义，我们不剥夺他们的任何东西，并且为他们各自的生活提供所需的一切。首先，非正义者，好比其他杰出匠师，如老练的飞行员或妙手回春的医者，颇有自知之明，不为超出能力极限之事，即使遇到挫折，亦可以自行补救。那么，让非正义者手段高明，以适宜的方式施行其不义企图，而不被人发觉（那些阴谋败露者，不足以为道）：不义的最高境界，是即使行不义之事，犹被视为正义之举。因此，我们一定要假设，手段无比高明的非正义者，会毫不含糊地将不义之举发挥到其极致；可是，我们还一定要任由他在不义至极的同时，收获至为正义的美名。如果一时失算，他一定有能力设法补救；如果某些行径败露，他一定会凭借雄辩之辞化险为夷；如果需要用武力，他可以凭借过人勇力，及众多党羽和大量钱财杀出一条路来。然后，让我们将高尚质朴的正义者置于非正义者之侧进行比较，希望正义者能如埃斯库罗斯所言，为真正善良之人，而并非表面善良。这里绝对不允许存在伪装，因为他若是假充正义者，便会博得名利，使得我们无法判断，他选择正义究竟是为正义本身的缘故，还是为了争名逐利。故而，我们要让他除了正义外，再不允许他有任何其他包装，并且设想他的生活一定与非正义者的生活截然相反。让他做至善之人，却蒙受至恶的骂名，从而经受考验。于是，我们才能看到，他是否会因害怕恶名及其后果而发生改变。不管他是真正的正义者，还是表面上的正义者，我们且让他一直处于这

种生活状态之下，直至死亡。当正义者与非正义者均达到极致时，便可以判断二者之中谁更幸福。

SOCRATES-GLAUCON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格劳孔

Heavens! my dear Glaucon, I said, how energetically you polish them up for the decision, first one and then the other, as if they were two statues.

苏：天啊！亲爱的格劳孔，为了区别二者，你真是不辞辛苦，将他们一一描摹出来，活像两尊雕像。

I do my best, he said. And now that we know what they are like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tracing out the sort of life which awaits either of them. This I will proceed to describe; but as you may think the description a little too coarse, I ask you to suppose, Socrates, that the words which follow are not mine.—Let me put them into the mouths of the eulogists of injustice: They will tell you that the just man who is thought unjust will be scourged, racked, bound—will have his eyes burnt out; and, at last, after suffering every kind of evil, he will be impaled: Then he will understand that he ought to seem only, and not to be, just; the words of Aeschylus may be more truly spoken of the unjust than of the just. For the unjust is pursuing a reality; he does not live with a view to appearances—he wants to be really unjust and not to seem only:—

格：我竭尽全力。既然我们已明了二者之情形，要追踪二者未来的生活，也并非难事。我将详述二者未来生活。但是，苏格拉底，你也许会认为我叙述的语言稍显粗鄙。我请求你设想，下面的话并非出自我本人，让我借称颂不义者之口来说：他们会告诉你，蒙受骂名的正义者会被鞭打、受酷刑、遭囚禁，会被烧瞎双眼，受尽各种折磨，最后他会被钉死在尖桩之上——临终之时，他才会明白，他应该做表面上的正义者，而不是名副其实的正义者。埃斯库罗斯的话，也许用在非正义者身上，比用于正义者更为合适。原因在于，非正义者所追求的是一种现实，他不会满足于表象——他要做的是真正的不义之人，而不仅仅是表面上如此：

'His mind has a soil deep and fertile, Out of which spring his prudent counsels.'

——他的思想是一片沃土，滋生出精明与狡诈。

In the first place, he is thought just, and therefore bears rule in the city; he can marry whom he will, and give in marriage to whom he will; also he can trade and deal where he likes, and always to his own advantage, because he has no misgivings about injustice; and at every contest, whether in public or private, he gets the better of his antagonists, and gains at their expense, and is rich, and out of his gains he can benefit his friends, and harm his enemies; moreover, he can offer sacrifices, and dedicate gifts to the gods abundantly and magnificently, and can honour the gods or any man whom he wants to honour in a far better style than the just, and therefore he is likely to be dearer than they are to the gods. And thus, Socrates, gods and men are said to unite in making the life of

the unjust better than the life of the just.

首先，他拥有正义的美名，故而占据统治城邦的高位；其次，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迎娶女子，想嫁给谁就嫁给谁；再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贸易往来，因为他肆无忌惮地多行不义总是能捞取好处，在无论公私的各种竞争中，胜人一筹，损人利己而暴富，并且凭借财力，帮助朋友，打击敌人；此外，他可以奉祀诸神，祭品丰盛，场面宏大，能够以远胜于正义者的方式，向诸神或者任何他想给予礼遇的个人表示敬意，因此他很可能比正义者更受诸神的青睐。于是，苏格拉底啊，人们常说，人神合力，使非正义者过上比正义者更好的生活。

ADEIMANTUS -SOCRATES

主要人物：阿得曼托斯、苏格拉底

I was going to say something in answer to Glaucon, when Adeimantus, his brother, interposed: Socrates, he said, you do not suppose that there is nothing more to be urged?

我正欲回答格劳孔，他的兄弟阿东曼图斯插言道：苏格拉底，你还需要补充什么吗？

Why, what else is there? I answered.

苏：哦？还有要补充的吗？

The strongest point of all has not been even mentioned, he replied.

阿：最重要的一点，犹未论及。

Well, then, according to the proverb, 'Let brother help brother'—if he fails in any part do you assist him; although I must confess that Glaucon has already said quite enough to lay me in the dust, and take from me the power of helping justice.

苏：那好啊。常言道：‘兄弟同心’——若是他有何遗漏，你尽可以助他一臂之力；但是，坦白地来讲，格劳孔的一番话已让我难以应对，使我无力再伸张正义了。

ADEIMANTUS

主要人物：阿得曼托斯

Nonsense, he replied. But let me add something more: There is another side to Glaucon's argument about the praise and censure of justice and injustice, which is equally required in order to bring out what I believe to be his meaning. Parents and tutors are always telling their sons and their wards that they are to be just; but why?

not for the sake of justice, but for the sake of character and reputation; in the hope of obtaining for him who is reputed just some of those offices, marriages,and the like which Glaucon has enumerated among the advantages accruing to the unjust from the reputation of justice. More, however, is made of appearances by this class of persons than by the others; for they throw in the good opinion of the gods, and will tell you of a shower of benefits which the heavens, as they say, rain upon the pious; and this accords with the testimony of the noble Hesiod and Homer, the first of whom says, that the gods make the oaks of the just— 'To bear acorns at their summit, and bees in the middle;And the sheep are bowed down with the weight of their fleeces,'and many other blessings of a like kind are provided for them. And Homer has a very similar strain; for he speaks of one whose fame is—

阿：你又说笑了。且容我作以补充：关于格劳孔对正义与不义之毁誉的评论，还有另外的一面，我认为同样有利于阐明格劳孔的观点。家长和导师，总是告诫子嗣和学生，要讲正义。但为什么？并非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是为了博得好名声；希望子嗣和学生，凭借正义的名声获得官爵、体面婚姻，得到格劳孔所列举过的正义美名为非正义者带来的种种好处。然而，这类人比其他人更加留意于伪装自己。他们常提到神的旨意，告诉你，上天会降下诸多好处赐予虔诚之人。这与杰出诗人赫西俄德和荷马的说法，是很一致的。赫西俄德说，诸神使得正义者的橡树“橡子缀枝头，蜜蜂飞其中；羊毛盛且厚，压弯羊儿腰。”此外，他还列数了诸神赐予正义者的其他类似的恩惠。荷马以极为相似的口吻，谈及某人的名望：

'As the fame of some blameless king who,

英明君王，恍如神圣。

like a god, Maintains justice;

尊彼道义，自求多福。

to whom the black earth brings forth Wheat and barley,

五谷丰登，硕果累累。

whose trees are bowed with fruit, And his sheep never fail to bear, and the sea gives him fish.'

羊满于坡，鱼跃于渊。

Still grander are the gifts of heaven which Musaeus and his son vouchsafe to the just; they take them down into the world below, where they have the saints lying on couches at a feast, everlastingly drunk, crowned with garlands; their idea seems to be that an immortality of drunkenness is the highest meed of virtue. Some extend their rewards yet further; the posterity, as they say, of the faithful and just shall survive to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 This is the style in which they praise justice. But about the wicked there is another strain; they bury them in a slough in Hades, and make them carry water in a sieve; also while they are yet living

they bring them to infamy, and inflict upon them the punishments which Glaucon described as the portion of the just who are reputed to be unjust; nothing else does their invention supply. Such is their manner of praising the one and censuring the other. Once more, Socrates, I will ask you to consider another way of speaking about justice and injustice, which is not confined to the poets, but is found in prose writers. The universal voice of mankind is always declaring that justice and virtue are honourable, but grievous and toilsome; and that the pleasures of vice and injustice are easy of attainment, and are only censured by law and opinion. They say also that honesty is for the most part less profitable than dishonesty; and they are quite ready to call wicked men happy, and to honour them both in public and private when they are rich or in any other way influential, while they despise and overlook those who may be weak and poor, even though acknowledging them to be better than the others. But most extraordinary of all is their mode of speaking about virtue and the gods: they say that the gods apportion calamity and misery to many good men, and good and happiness to the wicked. And mendicant prophets go to rich men's doors and persuade them that they have a power committed to them by the gods of making an atonement for a man's own or his ancestor's sins by sacrifices or charms, with rejoicings and feasts; and they promise to harm an enemy, whether just or unjust, at a small cost; with magic arts and incantations binding heaven, as they say, to execute their will. And the poets are the authorities to whom they appeal, now smoothing the path of vice with the words of Hesiod;— 'Vice may be had in abundance without trouble; the way is smooth and her dwelling-place is near. But before virtue the gods have set toil,' and a tedious and uphill road: then citing Homer as a witness that the gods may be influenced by men; for he also says:— 'The gods, too, may be turned from their purpose; and men pray to them and avert their wrath by sacrifices and soothing entreaties, and by

libations and the odour of fat, when they have sinned and transgressed.' And they produce a host of books written by Musaeus and Orpheus, who were children of the Moon and the Muses—that is what they say—according to which they perform their ritual, and persuade not only individuals, but whole cities, that expiations and atonements for sin may be made by sacrifices and amusements which fill a vacant hour, and are equally at the service of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the latter sort they call mysteries, and they redeem us from the pains of hell, but if we neglect them no one knows what awaits us.

诗人缪塞拉斯父子，许以正义者在天国的待遇，则更为绝妙：诗人将正义者引至冥界，令其高卧畅饮。正义者头冠花环，长醉不醒。诗人似乎认为，酬劳美德的最高奖励，是使之成为整日酣醉的神仙。还有人进一步延展正义者的福运，称正义虔诚之人的子孙后代可长命百岁。这便是他们称颂正义的手法。但是一说到恶人，诗人的笔调便随之一变：诗人将他们埋葬在地狱沼泽之中，令其用筛子担水；当恶人活在世上之时，诗人使他们身败名裂，遭受种种惩罚，正如格劳孔描述正义者在被诬为不义时所蒙受的。他们的创造力不受任何影响。诗人便是以如此方式抑此而扬彼的。苏格拉底，我再一次希望，你能够将另一种有关正义与不义的评论方式也考虑进去，因为它并非仅仅局限于诗作之中，散文作品也会时常论及。一直以来，人类普遍认为，正义与美德虽然值得称颂，但是悲苦而辛劳；同时认为不义与邪恶愉快而轻松，但要受到法律与舆论的谴责。人们常说，诚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如欺诈有利可图。因此，世人乐于艳羡恶人的福气，并在恶人富贵、有权势之际，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对之表示礼敬。另一反面，尽管他们承认有些人在品质上要好于邪恶之人，但是却会因其穷困无势而表示轻蔑。但最不寻常的，还是他们关于美德与诸神的议论：诸神降灾祸于许多善良之人，赐安乐于邪恶之人。行乞的先知奔走于富贵之门，使主人相信自己具有诸神赐予的一种法力，由此人们可以通过献祭或符咒，以及欢庆盛宴，赎清其本人或其祖先犯下的罪

恶；他们还承诺只要富人以很小的代价，就可以伤害其他人，不管对方是善是恶，并且还扬言可以利用法术，驱使诸神来执行他们的意志。此类先知者，以诗人为权威，征引赫西俄德的诗句，为罪恶铺平了道路："多行不义，却高枕无忧；不义之途，平坦而便捷。但于善德之前，诸神却布下艰辛与漫漫登攀之途。"接着，他们还引用荷马的话，证明神意亦可以为人所左右："诸神的意志，亦可以更改；人们违反戒律，便向诸神祈祷，用献祭与乞求，美酒与脂肪的香气，平息众神的愤怒。"此外，他们还声称，缪萨拉斯和俄耳甫斯为月神与文艺女神的后裔，假托二人之名，编撰大量书籍，并且依照这些书籍来举行仪式。他们使个人乃至整个城邦相信，闲暇时的献祭和乐神盛会，可以达到弥补错误过失的目的。它不仅适用于生者，也适用于死者。他们称为死者举行的献祭乐神仪式为秘仪，秘仪可使我们免受地狱之苦。但是，如果我们对之不以为然，那么未来会有何种命运等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He proceeded: And now when the young hear all this said about virtue and vice, and the way in which gods and men regard them, how are their minds likely to be affected, my dear Socrates,—those of them, I mean, who are quickwitted, and, like bees on the wing, light on every flower, and from all that they hear are prone to draw conclusions as to what manner of persons they should be and in what way they should walk if they would make the best of life? Probably the youth will say to himself in the words of Pindar— 'Can I by justice or by crooked ways of deceit ascend a loftier tower which may be a fortress to me all my days?' For what men say is that, if I am really just and am not also thought just profit there is none, but the pain and loss on the other hand are unmistakeable. But if, though unjust, I acquire the reputation of justice, a heavenly life is promised to me. Since then, as philosophers prove, appearance tyrannizes over truth and is lord of happiness, to appearance I must devote myself. I will describe around me a

picture and shadow of virtue to be the vestibule and exterior of my house; behind I will trail the subtle and crafty fox, as Archilochus, greatest of sages, recommends. But I hear some one exclaiming that the concealment of wickedness is often difficult; to which I answer, Nothing great is easy. Nevertheless, the argument indicates this, if we would be happy, to be the path along which we should proceed. With a view to concealment we will establish secret brotherhoods and political clubs. And there are professors of rhetoric who teach the art of persuading courts and assemblies; and so, partly by persuasion and partly by force, I shall make unlawful gains and not be punished. Still I hear a voice saying that the gods cannot be deceived, neither can they be compelled. But what if there are no gods? or, suppose them to have no care of human things—why in either case should we mind about concealment? And even if there are gods, and they do care about us, yet we know of them only from tradition and the genealogies of the poets; and these are the very persons who say that they may be influenced and turned by 'sacrifices and soothing entreaties and by offerings.' Let us be consistent then, and believe both or neither. If the poets speak truly, why then we had better be unjust, and offer of the fruits of injustice; for if we are just, although we may escape the vengeance of heaven, we shall lose the gains of injustice; but, if we are unjust, we shall keep the gains, and by our sinning and praying, and praying and sinning, the gods will be propitiated, and we shall not be punished. 'But there is a world below in which either we or our posterity will suffer for our unjust deeds.' Yes, my friend, will be the reflection, but there are mysteries and atoning deities, and these have great power. That is what mighty cities declare; and the children of the gods, who were their poets and prophets, bear a like testimony. On what principle, then, shall we any longer choose justice rather than the worst injustice? when, if we only unite the latter with a deceitful regard to appearances, we shall fare to our

mind both with gods and men, in life and after death, as the most numerous and the highest authorities tell us. Knowing all this, Socrates, how can a man who has any superiority of mind or person or rank or wealth, be willing to honour justice; or indeed to refrain from laughing when he hears justice praised? And even if there should be some one who is able to disprove the truth of my words, and who is satisfied that justice is best, still he is not angry with the unjust, but is very ready to forgive them, because he also knows that men are not just of their own free will; unless, peradventure, there be some one whom the divinity within him may have inspired with a hatred of injustice, or who has attained knowledge of the truth—but no other man. He only blames injustice who, owing to cowardice or age or some weakness, has not the power of being unjust. And this is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when he obtains the power, he immediately becomes unjust as far as he can be. The cause of all this, Socrates, was indicated by u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rgument, when my brother and I told you how astonished we were to find that of all the professing panegyrists of justice—beginning with the ancient heroes of whom any memorial has been preserved to us, and ending with the men of our own time—no one has ever blamed injustice or praised justice except with a view to the glories, honours, and benefits which flow from them. No one has ever adequately described either in verse or prose the true essential nature of either of them abiding in the soul, and invisible to any human or divine eye; or shown that of all the things of a man's soul which he has within him, justice is the greatest good, and injustice the greatest evil. Had this been the universal strain, had you sought to persuade us of this from our youth upwards, we should not have been on the watch to keep one another from doing wrong, but every one would have been his own watchman, because afraid, if he did wrong, of harbouring in himself the greatest of evils. I dare say that Thrasymachus and others would seriously hold

the language which I have been merely repeating, and words even stronger than these about justice and injustice, grossly, as I conceive, perverting their true nature. But I speak in this vehement manner, as I must frankly confess to you, because I want to hear from you the opposite side; and I would ask you to show not only the superiority which justice has over injustice, but what effect they have on the possessor of them which makes the one to be a good and the other an evil to him. And please, as Glaucon requested of you, to exclude reputations; for unless you take away from each of them his true reputation and add on the false, we shall say that you do not praise justice, but the appearance of it; we shall think that you are only exhorting us to keep injustice dark, and that you really agree with Thrasymachus in thinking that justice is another's good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and that injustice is a man's own profit and interest, though injurious to the weaker. Now as you have admitted that justice is one of that highest class of goods which are desired indeed for their results, but in a far greater degree for their own sakes—like sight or hearing or knowledge or health, or any other real and natural and not merely conventional good—I would ask you in your praise of justice to regard one point only: I mean the essential good and evil which justice and injustice work in the possessors of them. Let others praise justice and censure injustice, magnifying the rewards and honours of the one and abusing the other; that is a manner of arguing which, coming from them, I am ready to tolerate, but from you who have spent your whole life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is question, unless I hear the contrary from your own lips, I expect something better. And therefore, I say, not only prove to us that justice is better than injustice, but show what they either of them do to the possessor of them, which makes the one to be a good and the other an evil, whether seen or unseen by gods and men.

他继续说道：如今，年轻人听到以上关于善与恶的说法，了解到诸神和世人对待善恶问题的态度，那么他们的思想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我亲爱的苏格拉底？——我的意思是说，那些头脑灵活的年轻人，如同飞舞忙碌采得百花的蜜蜂，在收集了所有这些信息之后，针对以下问题自己得出结论：他们该如何做人？他们该如何行走于人世间，才能不枉此生？大概年轻人会引用品达的话来问自己："我会依靠正义还是机巧来更上一层楼，从而得以安身立命呢？"人们会说，如果我为正义之事而无正义之声名，那么一方面我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另一方面则必然会遭受痛苦与损失。可是，如果我行不义之事却博得正义的声名，我就会过上天堂般的幸福生活。既然先哲们已证实，外貌胜过真理，为快乐之神，我一定要全力以赴去打造一个完美的外表。我将遵照至圣先贤阿尔基洛科斯的至理名言，扮出道貌岸然的模样装点门面，屋内却隐藏着阴险狡诈的狐狸。但是，我听说，有人感叹，作恶而欲掩人耳目，实非易事。对此，我的回答是，容易岂能成大事？无论如何，论证表明，如果我们要寻求幸福快乐，这便是我们的必由之路。为了掩盖恶行，我们成立秘密团伙和政治团体。此外，有雄辩家传授游说议院和法庭的艺术。于是，我软硬兼施，获取不义之利，且免于罪责。有人会说，神不可欺，亦不会被胁迫。但要是并不存在神，又会如何呢？抑或我们假定，诸神毫不关心人间之事呢？在此两种情形之下，我们又何必费心掩盖恶行呢？另外，即使神确实存在，并且他们的确关心我们，可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传统故事和诗人创作的神谱，然而恰恰是这些诗人声称，人们可以通过"供奉、祷告和奉献祭品"改变神的意志。对于诗人的话，我们要形成一贯的态度，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不予理会。如果诗人所言不虚，那么我们最好行不义之事，然后再用不义所得供奉众神。原因在于，我们若是恪守正义，虽可不必遭受天谴，却也同时失去了不义带来的诸多好处；相形之下，倘若我们行不义之事，就可以保全各种好处，同时只要我们在犯错后祷告，祷告后犯错，周而复始，反反复复，诸神便会平息愤怒，不再降罪于我们。有人会说，"但是，在冥界，我们或者我们的子孙，要为我们在世时所作的恶事遭受惩罚的。"是的，朋友，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可以求助于秘仪和主管救赎的神明，很灵验的。这便是强大城邦的论调，而且他们的诗人和先

知——月神和文艺女神的后裔，提供的说法也大抵如此。那么，还有哪种处事原则，能使我们放弃极端不义而重拾正义呢？下至芸芸众生，上至位高尊显者，都会教导我们说，只要我们将不义的行径，隐藏在道貌岸然的外表下面，就可以称心如意地与人和神打交道，不论是在生前，还是在死后。既然如此，苏格拉底，一个人若是在才智、外表、出身，财富中任何一方面胜人一筹的话，他又怎会甘心向正义致意呢？当他听到人们颂扬正义时，又如何能够忍住不笑呢？另外，即使有人能够反驳并指出我的说法并非属实，而且确信正义之道至善至美，他也不会对不义之人耿耿于怀。相反，他会很乐意地去宽恕他们，因为他深知，除了偶尔出现的超凡入圣、疾恶如仇者和已然得悉真理者之外，没有人是发自内心地选择正义。只有因怯懦、年老或者某种弱点而无力行不义的人，才会谴责不义。事实证明，他一朝得势，便会立刻变本加厉地多行不义。至于这一切的根源，苏格拉底，我们在辩论之初就已经说明了。当时，我们兄弟二人对你说，我们极其诧异地发现，在所有公开赞美正义的人（从名垂青史的古代英雄豪杰到我们同时代人）中，无一不是出于荣耀、声名和利益的考虑，才谴责不义和颂扬正义的。不论是用诗意的语言还是平实的语言，从未有人对正义或不义的真实本质进行充分的描述——它们驻留于灵魂深处，人不知而神不见；从未有人表明在构成人类灵魂的诸元素之中，正义为至善，而不义则为至恶。倘若这是人们的普遍共识，并且你在早年便如此教导我们，那么大家就不必时刻彼此防范，因为每个人都在时刻警惕自己，担心一旦做错事，自己就成了至恶的化身。我那一席话，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可是我敢说，色拉叙马霍斯之流会对之非常认同，而且他们的措辞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极大地歪曲正义与不义的本质。但是，有必要对你坦白的是，我之所以措辞如此激烈，是因为我希望听到你更为精彩的反驳。我想请求你不仅阐明正义优越于不义的道理，同时还要解释清楚正义和不义这两种品质对于其所有者产生的影响如何，为何此则有利，而彼则有害？此外，请你按照格劳孔的要求，抛开声誉问题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不夺走他们每个人的真实声誉，而代之以虚妄的声名，我们会说你所赞扬的并非正义本身，而是其光鲜华丽的外表；我们会认为，你只是在劝诫我们不要暴露自己的不义行为，而实际上，你的看法与色拉叙马霍斯一致，

即正义是他人的善良之处，强者的利益，而不义则有利于本人，损害弱者。既然你已承认正义是至善，即人们需要它，是为了它所带来的结果，但更大程度上则是为了它本身的缘故（比如视力、听力、知识、健康，以及其他真实自然而不仅仅是传统惯例层面上的利益），我希望您在称颂正义之时只留心于一点，即正义与不义为正义者和不义者带来的大利和大害。他人在称颂正义、谴责不义时，会赞美正义带来的荣耀和回报，对不义恶语相加。对于他们的这种论辩方式，我很乐意容忍，听任他们如此。但是你却不同，你投入了毕生的精力来思考这个问题。因此，除非我从你口中听到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否则的话，我期待着听到你更为精彩的论辩。因此，我请你不仅要向我们证明正义优越于不义，还要说明它们各自对正义者和非正义者的影响，如何使此人为善，而使彼人为恶，无论神与人对此是否觉察。

SOCRATES-ADEIMANTUS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阿得曼托斯

I had always admired the genius of Glaucon and Adeimantus, but on hearing these words I was quite delighted, and said: Sons of an illustrious father, that was not a bad beginning of the Elegiac verses which the admirer of Glaucon made in honour of you after you had distinguished yourselves at the battle of Megara:— 'Sons of Ariston,' he sang, 'divine offspring of an illustrious hero.' The epithet is very appropriate, for there is something truly divine in being able to argue as you have done for the superiority of injustice, and remaining unconvinced by your own arguments. And I do believe that you are not convinced—this I infer from your general character, for had I judged only from your speeches I should have mistrusted you. But now, the greater my confidence in you, the

greater is my difficulty in knowing what to say. For I am in a strait between two; on the one hand I feel that I am unequal to the task; and my inability is brought home to me by the fact that you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answer which I made to Thrasymachus, proving, as I thought, the superiority which justice has over injustice. And yet I cannot refuse to help, while breath and speech remain to me; I am afraid that there would be an impiety in being present when justice is evil spoken of and not lifting up a hand in her defence. And therefore I had best give such help as I can.

我素来钦佩格劳孔、阿得曼托斯兄弟之才。闻听他们的一番雄辞闳辩，我倍感欣喜，说道：苏：“不愧为名门之后啊！在马拉加战争之中，你们表现英勇，格劳孔的仰慕者作诗以志之，开头写得非常不错：——“‘阿里斯顿之子啊，著名英雄的天赐后裔。’这个说法恰如其分，因为你们的确天赋异禀，虽发雄论，力辩不义胜于正义，自己犹不改初衷，不以为然。我坚信，你们并不信服于这种观点——这是我依据你们一贯的为人推想而知的。倘若我仅凭你们的言论进行判断，我一定早就对你们的人品产生怀疑了。可是，我对你们的信心愈足，愈是感觉难以应对。我已陷入两难之境。一方面，我自认为无法胜任。事实已经使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无能。我对色拉叙马霍斯做了答复，原以为这足以证明正义优越于不义，然而却仍不能令你们满意。另一方面，只要一息尚存，口舌能辩，我就不能坐视不理。如果我眼见正义遭到毁谤，而不援手为之申辩，我唯恐会亵渎神灵。因此，莫不如尽力伸张正义。”

Glaucon and the rest entreated me by all means not to let the question drop, but to proceed in the investigation. They wanted to arrive at the truth, first, about the nature of justice and injustice, and secondly, about their relative advantages.

格劳孔和其他人，皆恳求我务必要继续探讨此问题，不可就此罢休。他们希望弄清问题的真相：其一，正义与不义的本质；其二，二者相对的利害关系。

I told them, what I really thought,

我告诉了他们，我的真实想法：

that the enquiry would be of a serious nature, and would require very good eyes. Seeing then, I said, that we are no great wits, I think that we had better adopt a method which I may illustrate thus; suppose that a short-sighted person had been asked by some one to read small letters from a distance; and it occurred to some one else that they might be found in another place which was larger and in which the letters were larger—if they were the same and he could read the larger letters first, and then proceed to the lesser—this would have been thought a rare piece of good fortune.

苏：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它需要人们具有敏锐的判断力。鉴于我们皆非大智之人，我们最好举个例子来作以说明。假如有人让某近视者从远处读出很小的字。这时，近视的人想到，可以在别处更大的地方，读到内容相同但写得更大的字。这样，他可以先读较大的字，然后再来读写得小的字——这难道不是难得的好运吗？

Very true, said Adeimantus; but how does the illustration apply to our enquiry?

阿：不错。可是，这个例子和我们正在探讨的问题，有何联系呢？

I will tell you, I replied; justice,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our enquiry, is, as you know, sometimes spoken of as the virtue of an individual, and sometimes as the virtue of a State.

苏：听我跟你说，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正义。你知道，正义有时被视为个人的美德，有时则被视为城邦的美德。

True, he replied.

阿：的确如此。

And is not a State larger than an individual?

苏：城邦是否要比个人大？

It is.

阿：是。

Then in the larger the quantity of justice is likely to be larger and more easily discernible. I propose therefore that we enquire into the nature of justice and injustice, first as they appear in the State, and secondly in the individual, proceeding from the greater to the lesser and comparing them.

苏：那么，城邦之中的正义，从量的角度上说，也应更多，而且更容易识别。因此，我提议，在探讨正义与不义之本质时，我们应遵照由大到小的顺序，先考察其在城邦中的本质，然后再考察其在个人中的本质，最后进行比较。

That, he said, is an excellent proposal.

阿：这是个绝妙的提议。

And if we imagine the State in process of creation, we shall see the justice and injustice of the State in process of creation also.

苏：假设城邦处于草创之际，那么正义和不义也正处于萌芽阶段。

I dare say.

阿：当然。

When the State is completed there may be a hope that the object of our search will be more easily discovered.

苏：城邦建立之后，可能我们的研究对象也会更易于识别。

Yes, far more easily.

阿：对，容易得多。

But ought we to attempt to construct one? I said; for to do so, as I am inclined to think, will be a very serious task.

苏：但我们是否要尝试建立一个城邦呢？在我看来，这是项极为重大的任务。

Reflect therefore.

仔细考虑一下吧。

I have reflected, said Adeimantus, and am anxious that you should proceed.

阿：我考虑好了，迫切希望你继续讲下去。

A State, I said, arises, as I conceive, out of the needs of mankind; no one is self-sufficing, but all of us have many wants. Can any other origin of a State be imagined?

苏：我以为，正是由于人类的需要，才产生了城邦。任何人都不能做到自给自足，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多的需求。你认为，除此之外，城邦还可以有别的起源吗？

There can be no other.

阿：没有。

Then, as we have many wants, and many persons are needed to supply them, one takes a helper for one purpose and another for another; and when these partners and helpers are gathered together in one habitation the body of inhabitants is termed a State.

苏：由于我们有着多样的需求，这就需要有许多的人来满足这些需求。一个人为了实现不同的目的而寻求不同的人来帮助。这些合作伙伴和帮手聚居于一处，便形成一个城邦。

True, he said.

阿：对。

And they exchange with one another, and one gives, and another receives, under the idea that the exchange will be for their good.

苏：他们相互交易，有买有卖，其宗旨则是互惠互利。

Very true.

阿：的确如此。

Then, I said, let us begin and create in idea a State; and yet the true creator is necessity, who is the mother of our invention.

苏：那么，让我们着手建立一座理念上的城邦吧。然而，真正的创造者，则是需要；需要是发明创造之母。

Of course, he replied.

阿：当然。

Now the first and greatest of necessities is food, which is the condition of life and existence.

苏：首要的需求是食物，食物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Certainly.

阿：当然。

The second is a dwelling, and the third clothing and the like.

苏：其次是住房，再次是衣物，诸如此类。

True.

阿：对。

And now let us see how our city will be able to supply this great demand: We may suppose that one man is a husbandman, another a builder, some one else a weaver—shall we add to them a shoemaker, or perhaps some other purveyor to our bodily wants?

苏：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城邦将如何能够满足这庞大的需求：假设有农夫、建筑工、纺织工各一名，——那么，是否还应有一名鞋匠，或者别的人员来满足我们的自然需求呢？

Quite right.

阿：完全应该。

The barest notion of a State must include four or five men.

苏：纯粹从概念上讲，一个城邦至少要由四五个人组成。

Clearly.

阿：显而易见。

And how will they proceed? Will each bring the result of his labours into a common stock?—the individual husbandman, for example, producing for four, and labouring four times as long and as much as he need in the provision of food with which he supplies others as well as himself; or will h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others and not be at the trouble of producing for them, but provide for himself alone a fourth of the food in a fourth of the time, and in the remaining three fourths of his time be employed in making a house or a coat or a pair of shoes, having no partnership with others, but supplying himself all his own wants?

苏：他们将如何满足我们的自然需求呢？是否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来满足公众的需求呢？比如，一个农夫会生产出四个人的

粮食，投入四倍于满足个人所需的时间及精力，为自己以及他人提供粮食呢？还是会与他人毫无往来，并不费心为他人从事生产呢？——他只是投入四分之一的时间来生产出自己所需的粮食，再用剩下的四分之三的时间来建造房屋、缝制衣服、制作鞋子，过着与人毫无交流、自给自足的生活。

Adeimantus thought that he should aim at producing food only and not at producing everything.

阿得曼托斯觉得，农夫应专心从事粮食生产，而非面面俱到。

Probably, I replied, that would be the better way; and when I hear you say this, I am myself reminded that we are not all alike; there are diversities of natures among us which are adapted to different occupations.

苏：大概，这样更好。你的话，使我想到我们大家存在着差异，不同的禀赋使我们适合从事不同的职业。

Very true.

阿：确实如此。

And will you have a work better done when the workman has many occupations, or when he has only one?

苏：如果你想找个人来做一件事，那么谁更为胜任呢？是身兼多职者，还是专务一行者？

When he has only one.

阿：专务一行者。

Further,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a work is spoilt when not done at the right time?

苏：此外，如果时机不对，事情无疑会搞砸，对吗？

No doubt.

阿：毫无疑问。

For business is not disposed to wait until the doer of the business is at leisure; but the doer must follow up what he is doing, and make the business his first object.

苏：究其原因，工作不等人。因此，做事的人必须坚守岗位，视工作为第一位。

He must.

阿：必须如此。

And if so, we must infer that all things are produced more plentifully and easily and of a better quality when one man does one thing which is natural to him and does it at the right time, and leaves other things.

苏：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当一个人在适当的时间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从事自己所擅长的行当时，他一定可以更多、更容易地生产出质量更好的产品。

Undoubtedly.

阿：毫无疑问。

Then more than four citizens will be required; for the husbandman will not make his own plough or mattock, or other implements of agriculture, if they are to be good for anything. Neither will the builder make his tools—and he too needs many; and in like manner the weaver and shoemaker.

苏：那么，这个城邦还需要增加四个以上的公民，因为好的犁、锄等农具，不当由农夫亲自制作。建筑工也不该自己动手制作工具

——尽管他也需要大量用具；同理，纺织工和鞋匠亦是如此。

True.

阿：对。

Then carpenters, and smiths, and many other artisans, will be sharers in our little State, which is already beginning to grow?

苏：于是，木匠、铁匠，以及许多其他工匠，也将加入到我们的小城邦中，城邦也随之开始壮大，对吗？

True.

阿：对。

Yet even if we add neatherds, shepherds, and other herdsmen, in order that our husbandmen may have oxen to plough with, and builders as well as husbandmen may have draught cattle, and curriers and weavers fleeces and hides,—still our State will not be very large.

苏：然而，即便为了使农夫得到耕地的牛，建筑工和农夫拥有可供役使的牛马，制革工和纺织工获得羊毛和皮革，我们增添了放牧

牛、羊等的各种牧人，——我们的城邦仍然不会很大。

That is true; yet neither will it be a very small State which contains all these.

阿：确实不大，但是它包含了所有这些人，规模也不会太小。

Then, again, there is the situation of the city—to find a place where nothing need be imported is wellnigh impossible.

苏：然后，让我们再来看城邦的情形——一城之内应有尽有而无需从外界输入，这样的城邦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Impossible.

阿：不可能存在。

Then there must be another class of citizens who will bring the required supply from another city?

苏：那么，必须有人将所需的物资从别的城邦运进来，对吗？

There must.

阿：必须如此。

But if the trader goes empty-handed, having nothing which they require who would supply his need, he will come back empty-handed.

苏：但是，如果商人空手而去，没有带任何对方所需之物，却指望对方满足他的需求，那么他必然会空手而归。

That is certain.

阿：那是当然。

And therefore what they produce at home must be not only enough for themselves, but such both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as to accommodate those from whom their wants are supplied.

苏：因此，他所在城邦生产的产品，不仅要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而且还要在质量和数量上满足与其有贸易往来的城邦的需要，从而从对方那里获得自己所需的商品。

Very true.

阿：确实如此。

Then more husbandmen and more artisans will be required?

苏：于是，就需要有更多的农夫和工匠，对吗？

They will.

阿：对。

Not to mention the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who are called merchants?

苏：更不用说从事进出口生意的商人了，对吗？

Yes.

阿：对。

Then we shall want merchants?

苏：那么，也需要商人喽？

We shall.

阿：需要。

And if merchandise is to be carried over the sea, skilful sailors will also be needed, and in considerable numbers?

苏：如果要从海上运送货物，还需要大量技术精湛的水手，对吗？

Yes, in considerable numbers.

阿：是的。

Then, again, within the city, how will they exchange their productions? To secure such an exchange was, as you will remember, one of our principal objects when we formed them into a society and constituted a State.

苏：然后，再看城邦之中，人们将如何进行产品交易呢？你也许还记得，保护商贸往来，正是我们当初形成社会建立城邦的宗旨之一。

Clearly they will buy and sell.

阿：他们显然买卖公平。

Then they will need a market-place, and a money-token for purposes of exchange.

苏：于是，他们需要有市场和钱币，以便于交易。

Certainly.

阿：当然。

Suppose now that a husbandman, or an artisan, brings some production to market, and he comes at a time when there is no one to exchange with him,—is he to leave his calling and sit idle in the market-place?

苏：现在，假设有一名农夫或者工匠，拿着产品到市场上卖。他来得很不巧，无人愿意同他交易，那么他是否要搁置自己的行当，而在集市无所事事地坐等买主呢？

Not at all; he will find people there who, seeing the want, undertake the office of salesmen. In well-ordered states they are

commonly those who are the weakest in bodily strength, and therefore of little use for any other purpose; their duty is to be in the market, and to give money in exchange for goods to those who desire to sell and to take money from those who desire to buy.

阿：没必要。他可以去找鉴于此种需要从事贩卖生意的商贩。在秩序井然的城邦中，商贩通常身体羸弱，而无法从事其他行业。他们的职责，便是在市场上用钱买入别人想要出手的商品，再将之卖与有意的买主以换取金钱。

This want, then, creates a class of retail-traders in our State. Is not 'retailer' the term which is applied to those who sit in the market-place engaged in buying and selling, while those who wander from one city to another are called merchants?

苏：于是，由于此种需求的存在，我们的城邦产生了零售商群体。难道我们不是以“零售商”来称呼那些置身于市场、忙于买进卖出者，而以“商人”来称呼那些奔走于各个城邦之间的买卖人吗？

Yes, he said.

阿：的确。

And there is another class of servants, who are intellectually hardly on the level of companionship; still they have plenty of bodily strength for labour, which accordingly they sell, and are

called, if I do not mistake, hirelings, hire being the name which is given to the price of their labour.

苏：另外，还有一种从业者，从才智而论，不足为道，却体力旺盛，因而以出卖体力为生。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们被称之为“雇佣工”。称之“雇佣”，是因为他们以劳力换取工钱。

True.

阿：对。

Then hirelings will help to make up our population?

苏：由此，雇佣工，亦构成了城邦居民的一部分。

Yes.

阿：是的。

And now, Adeimantus, is our State matured and perfected?

苏：至此，阿得曼托斯，我们的城邦，是否已臻于完备？

I think so.

阿：我同意。

Where, then, is justice, and where is injustice, and in what part of the State did they spring up?

苏：那么，正义何存，不义安在，它们产生于城邦创建的哪个环节呢？

Probably in the dealings of these citizens with one another. I cannot imagine that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 found any where else.

阿：大概是在城邦居民往来交易中出现的吧。此外，再无其他可能。

I dare say that you are right in your suggestion, I said; we had better think the matter out, and not shrink from the enquiry.

苏：也许你说得对。我们最好把这个问题彻底弄清楚，不可半途而废。

Let us then consider, first of all, what will be their way of life,

now that we have thus established them. Will they not produce corn, and wine, and clothes, and shoes, and build houses for themselves? And when they are housed, they will work, in summer, commonly, stripped and barefoot, but in winter substantially clothed and shod. They will feed on barley-meal and flour of wheat, baking and kneading them, making noble cakes and loaves; these they will serve up on a mat of reeds or on clean leaves, themselves reclining the while upon beds strewn with yew or myrtle. And they and their children will feast, drinking of the wine which they have made, wearing garlands on their heads, and hymning the praises of the gods, in happy converse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y will take care that their families do not exceed their means; having an eye to poverty or war.

在创建城邦之后，让我们先想象一下城邦居民的生活情形吧。想来他们必定要为自己种粮、酿酒、缝衣、做鞋子以及建造房屋吧？安居之后，他们便开始劳作，夏日则袒臂赤足，冬日则着暖衣、穿厚鞋。他们以大麦粉和小麦粉为主食，揉捏烘烤，制成高品质糕点，盛放在芦苇编制的小垫子或干净的叶子上，自己则斜倚在铺满常绿乔木树叶的床榻之上。于是，他们与儿女头戴花环，高唱颂神的赞歌，欢声笑语，尽情享用美食，畅饮自制佳酿。同时，他们过日子还要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以备贫困、战乱的不时之需。

SOCRATES-GLAUCON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格劳孔

But, said Glaucon, interposing, you have not given them a

relish to their meal.

格（插话）：可是，你尚未给他们的饮食加入调味品。

True, I replied, I had forgotten; of course they must have a relish—salt, and olives, and cheese, and they will boil roots and herbs such as country people prepare; for a dessert we shall give them figs, and peas, and beans; and they will roast myrtle-berries and acorns at the fire, drinking in moderation. And with such a diet they may be expected to live in peace and health to a good old age, and bequeath a similar life to their children after them.

苏：对啊，我忘说了。当然，他们的菜肴一定是饶有风味的。他们有盐、橄榄以及乳酪，另外他们还可如乡间人那样烹煮菜根、香草。他们可以用无花果、豌豆、豆作甜点，在火上烧烤桃金娘果和橡子，饮酒适可而止。他们也许会凭着如此的饮食，一生健康平安，直至高寿而终，并将类似的生活方式传给后人。

Yes, Socrates, he said, and if you were providing for a city of pigs, how else would you feed the beasts?

格：是啊，苏格拉底，如果你正在为一座猪猡城邦提供生计，你还会用什么来喂养它们呢？

But what would you have, Glaucon? I replied.

苏：你有何建议，格劳孔？

Why, he said, you should give them the ordinary conveniences of life. People who are to be comfortable are accustomed to lie on sofas, and dine off tables, and they should have sauces and sweets in the modern style.

格：噢，你应该给他们提供方便日常生活的各种用品。若要舒服自在，人们须像现代人一样习惯性地躺在睡椅上，在餐桌前就餐，还要有各种配菜和饭后甜食。

Yes, I said, now I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which you would have me consider is, not only how a State, but how a luxurious State is created; and possibly there is no harm in this, for in such a State we shall be more likely to see how justice and injustice originate. In my opinion the true and healthy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is the one which I have described. But if you wish also to see a State at fever-heat, I have no objection. For I suspect that many will not be satisfied with the simpler way of life. They will be for adding sofas, and tables, and other furniture; also dainties, and perfumes, and incense, and courtesans, and cakes, all these not of one sort only, but in every variety; we must go beyond the necessaries of which I was at first speaking, such as houses, and clothes, and shoes: the arts of the painter and the embroiderer will have to be set in motion, and gold and ivory and all sorts of materials must be procured.

苏：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要求我考虑的问题，不仅仅是城邦

如何产生，而且是奢华城邦如何产生。也许这也没有什么坏处——在奢华的城邦里，我们更易于看到，正义与不义是如何产生的。我认为，真实而健全的城邦，即我所描述的。但你若是想一观高度发达的城邦，我不反对。因为我怀疑，很多人都不会满足于过那种更为质朴的生活。他们会希望添置睡椅、餐桌等家具，增设美味佳肴、香水、熏香、名妓、蛋糕等五花八门、花样繁多的感官享受。我起初所说的房屋、衣物、鞋子等生活必需品，已不足以满足人们的欲望：画师绣工，势必各展其长；金玉象牙等一切材料，必须应有尽有。

True, he said.

格：对。

Then we must enlarge our borders; for the original healthy State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Now will the city have to fill and swell with a multitude of callings which are not required by any natural want; such as the whole tribe of hunters and actors, of whom one large class have to do with forms and colours; another will be the votaries of music—poets and their attendant train of rhapsodists, players, dancers, contractors; also makers of divers kinds of articles, including women's dresses. And we shall want more servants. Will not tutors be also in request, and nurses wet and dry, tirewomen and barbers, as well as confectioners and cooks; and swineherds, too, who were not needed and therefore had no place in the former edition of our State, but are needed now? They must not be forgotten: and there will be animals of many other kinds, if people eat them.

苏：这样，最初健全的城邦已无法满足人们私欲，因此扩充城邦势在必行。如今，城邦必会充斥着大量与人类自然需求无关的职业。举例来说，其中有大批的猎手和穷形极态塑造人物形象的演员，有音乐爱好者构成的一大群体——诗人以及随之而出现的吟诵者、乐师、舞者、监制人，还有制作包括女装在内的各式物件的工匠。同时，我们还将需要更多的仆人。另外，我们会不需要家庭教师、乳娘、保姆、侍女、理发师，以及甜食师傅和厨师吗？会不需要猪倌吗？在之前的那个城邦，因为猪倌并不被人们所需要，所以也并不存在，但现在他们也为人们所需要。千万不可忘记：倘若我们想吃肉，那么就需要饲养种类更为齐全的。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living in this way we shall have much greater need of physicians than before?

苏：在如此安逸奢华的城邦之中，我们是否比以往更迫切地需要医生呢？

Much greater.

格：的确。

And the country which was enough to support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will be too small now, and not enough?

苏：然而，这座城邦虽然在过去足以维系当初的居民生息繁衍，但如今却显得过于狭小，而不能满足需要了，对吗？

Quite true.

格：确实如此。

Then a slice of our neighbours' land will be wanted by us for pasture and tillage, and they will want a slice of ours, if, like ourselves, they exceed the limit of necessity, and give themselves up to the unlimited accumulation of wealth?

苏：这样，我们便萌生了侵占周边城邦的一块土地来放牧和耕种的念头。与此同时，如果周边城邦也和我们一样，不受生存必要的限制，一味地沉迷于无休止的积聚财富，那么他们也会对我们的一块土地抱有非分之想，对吗？

That, Socrates, will be inevitable.

格：必然如此，苏格拉底。

And so we shall go to war, Glaucon. Shall we not?

苏：格劳孔啊，如此一来，我们可就要开战了。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Most certainly, he replied.

格：别无选择。

Then without determining as yet whether war does good or harm, thus much we may affirm, that now we have discovered war to be derived from causes which are also the causes of almost all the evils in States, private as well as public.

苏：不论战争结果好坏，有一点可以断言：我们发现，战争与各城邦内部几乎所有公私罪恶，有着相同的根源。

Undoubtedly.

格：毫无疑问。

And our State must once more enlarge; and this time the enlargement will be nothing short of a whole army, which will have to go out and fight with the invaders for all that we have, as well as

for the things and persons whom we were describing above.

苏：由此，我们城邦必将进一步壮大。这一次，它将拥有整支军队。军队将迎击来犯之敌，保家卫国，守护之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居民与财产安全。

Why? he said; are they not capable of defending themselves?

格：为什么？难道居民不能御敌自卫吗？

No, I said; not if we were right in the principle which was acknowledged by all of us when we were framing the State: the principle, as you will remember, was that one man cannot practise many arts with success.

苏：不能啊！如果我们在初建城邦时一致认同的基本原则没有错的话，他们就无力自卫。你该记得吧，当时我们确立的基本原则，就是一个人技艺众多就无法做到精湛。

Very true,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But is not war an art?

苏：那么，战争难道不是一门技艺吗？

Certainly.

格：当然是。

And an art requiring as much attention as shoe making?

苏：那么，作为一门技艺，它一定也像制鞋术一样，需要人投入大量的精力吧？

Quite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the shoemaker was not allowed by us to be a husbandman, or a weaver, or a builder—in order that we might have our shoes well made; but to him and to every other worker was assigned one work for which he was by nature fitted, and at that he was to continue working all his life long and at no other; he was not to let opportunities slip, and then he would become a good workman. Now nothing can be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the work of a soldier should be well done. But is war an art so easily acquired that a man may be a warrior who is also a husbandman, or shoemaker, or other

artisan; although no one in the world would be a good dice or draught player who merely took up the game as a recreation, and had not from his earliest years devoted himself to this and nothing else? No tools will make a man a skilled workman, or master of defence, nor be of any use to him who has not learned how to handle them, and has never bestowed any attention upon them. How then will he who takes up a shield or other implement of war become a good fighter all in a day, whether with heavy-armed or any other kind of troops?

苏：我们不容许鞋匠兼为农夫、织工、建筑工，目的是使他们能够专心为我们制好鞋。但是，鞋匠也罢，任何其他人也罢，每个人都必须从事适合其天分的一份工作，并且终其一生坚守进取，而不去兼及其他。这样，他才能精益求精，而不会错失良机。如今，军人职责的完美履行，意义至关重大。世上任何人，若仅将掷骰游戏与射箭视作一时消遣，既没有自幼的专心苦练，也没有其他类似的刻苦磨砺，便不会成为游戏高手。可是，作战之技便如此易学，以至于农夫、鞋匠等各行各业之人皆可胜任吗？工具不会使一个人成为技术熟练的工人，或者谙熟战术的军人；工具对于从未学习使用过、从未对之用心留意过的人来说，也是毫无用处的。那么，无论是在全副武装部队，还是其他军队中，他如何会因手持盾牌或其他兵器，而在一夜之间成为优秀的战士呢？

Yes, he said, the tools which would teach men their own use would be beyond price.

格：是啊！工具若是可以授人使用之法，必将成为无价之宝。

And the higher the duties of the guardian, I said, the more time, and skill, and art, and application will be needed by him?

苏：此外，卫国军人责任愈重大，就愈是需要更长时间的训练和实战，以获得更精湛的本领和技艺吗？

No doubt, he replied.

格：毫无疑问。

Will he not also require natural aptitude for his calling?

苏：他是否也应具备适合于该职业的自然禀赋呢？

Certainly.

格：当然。

Then it will be our duty to select, if we can, natures which are fitted for the task of guarding the city?

苏：那么，竭力选拔具有适宜禀赋者守卫城邦，便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吗？

It will.

格：对。

And the selection will be no easy matter, I said; but we must be brave and do our best.

苏：这绝非易事。但我们必须知难而进，尽力而为。

We must.

格：必须如此。

Is not the noble youth very like a well-bred dog in respect of guarding and watching?

苏：就守卫警备而论，优秀青年岂不酷似良种犬？

What do you mean?

格：此话怎讲？

I mean that both of them ought to be quick to see, and swift to overtake the enemy when they see him; and strong too if, when they have caught him, they have to fight with him.

苏：我的意思是，二者皆应机敏警觉，一旦发现敌人，迅速抢占先机；二者皆应体格强壮，一旦与敌人狭路相逢，还须与之正面交锋。

All these qualities, he replied, will certainly be required by them.

格：这都是二者必须具备的优点。

Well, and your guardian must be brave if he is to fight well?

苏：守卫之士，必须英勇，方可善战吗？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is he likely to be brave who has no spirit, whether horse or dog or any other animal? Have you never observed how invincible and unconquerable is spirit and how the presence of it makes the

soul of any creature to be absolutely fearless and indomitable?

苏：不论是马、狗，抑或其他动物，要是缺乏斗志，可能有英勇表现吗？你是否曾经注意到，斗志是何等的无往不胜？任何生灵，一旦有了斗志，就会表现得何等英勇，顽强不屈？

I have.

格：我注意到了。

Then now we have a clear notion of the bodily qualities which are required in the guardian.

苏：那么，对于护卫者理应具备的身体素质，我们已经形成了清晰的认识。

True.

格：对。

And also of the mental ones; his soul is to be full of spirit?

苏：同样，对于其精神素质，也达成了共识——他应该充满斗

志，对吗？

Yes.

格：对。

But are not these spirited natures apt to be savage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everybody else?

苏：然而，如此斗志昂扬之人，是否彼此间会发生摩擦，并且与他人产生冲突呢？

A difficulty by no means easy to overcome, he replied.

格：这倒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Whereas, I said, they ought to be dangerous to their enemies, and gentle to their friends; if not, they will destroy themselves without waiting for their enemies to destroy them.

苏：他们应对敌凶狠，对友亲善。否则的话，不待敌人动手，他们就已自我毁灭了。

True, he said.

格：对。

What is to be done then? I said; how shall we find a gentle nature which has also a great spirit, for the one is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other?

苏：该如何是好呢？温良的性情与蓬勃斗志，是相互对立的，我们该如何找到二者兼得之人呢？

True.

格：的确。

He will not be a good guardian who is wanting in either of these two qualities; and yet the combination of them appears to be impossible; and hence we must infer that to be a good guardian is impossible.

苏：要想成为优秀的护卫者，则此二者缺一不可。然而，二者又似乎不可兼得。因此，我们断言，优秀护卫者实不可得。

I am afraid that what you say is true, he replied.

格：恐怕你说得对。

Here feeling perplexed I began to think over what had preceded.—

至此，我陷入困惑，开始回想之前所言。

My friend, I said, no wonder that we are in a perplexity; for we have lost sight of the image which we had before us.

苏：我的朋友啊，难怪我们陷入困惑：竟把刚刚提到的典型化身抛之脑后。

What do you mean? he said.

格：此话怎讲？

I mean to say that there do exist natures gifted with those opposite qualities.

苏：我想说的是，世上确实存在二者兼得者。

And where do you find them?

格：他们身在何处？

Many animals, I replied, furnish examples of them; our friend the dog is a very good one: you know that well-bred dogs are perfectly gentle to their familiars and acquaintances, and the reverse to strangers.

苏：在动物之中，二者兼得的例子很多。堪称人类朋友的狗，尤为典型。良种犬待主人与熟人极为温和，对待陌生人则极为凶狠。

Yes, I know.

格：是的，我知道。

Then there is nothing impossible or out of the order of nature in our finding a guardian who has a similar combination of qualities?

苏：那么，我们找到具有相似天性的守卫者，亦无不可，或者是情理中事，对吗？

Certainly not.

格：当然。

Would not he who is fitted to be a guardian, besides the spirited nature, need to have the qualities of a philosopher?

苏：适合担任守卫者的人，除了要富有斗志，难道不需要具备哲学家的特质吗？

I do not apprehend your meaning.

格：我对此感到不解。

The trait of which I am speaking, I replied, may be also seen in the dog, and is remarkable in the animal.

苏：我所说的这种品质，在狗身上亦可见到，而且还非常显著。

What trait?

格：何种品质？

Why, a dog, whenever he sees a stranger, is angry; when an

acquaintance, he welcomes him, although the one has never done him any harm, nor the other any good. Did this never strike you as curious?

苏：尽管生疏之人未曾加害于狗，而熟识之人亦未曾施惠于狗，但是狗一见生疏之人则怒，一见熟识之人则喜而迎之。你不觉得这很古怪吗？

The matter never struck me before; but I quite recognise the truth of your remark.

格：之前，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你讲得很有道理。

And surely this instinct of the dog is very charming;—your dog is a true philosopher.

苏：狗具有此种本能，的确十分可爱——因此，狗是真正的哲学家。

Why?

格：此话怎讲？

Why, because he distinguishes the face of a friend and of an enemy only by the criterion of knowing and not knowing. And must not an animal be a lover of learning who determines what he likes and dislikes by the test of knowledge and ignorance?

苏：是何原因呢？因为它区别敌友面孔的唯一标准，便是知与不知。动物以知与不知来决定自己的好恶，难道不能被视作热爱知识者吗？

Most assuredly.

格：完全可以。

And is not the love of learning the love of wisdom, which is philosophy?

苏：对智慧之爱，即为哲学。那么，对学习之爱，难道不同于对智慧之爱吗？

They are the same, he replied.

格：二者相同。

And may we not say confidently of man also, that he who is

likely to be gentle to his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must by nature be a lover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苏：那么以此类推，我们可否断言，凡待故旧亲善之人，必定为天性热爱智慧与知识之人吗？

That we may safely affirm.

格：完全可以断言。

Then he who is to be a really good and noble guardian of the State will require to unite in himself philosophy and spirit and swiftness and strength?

苏：那么，城邦真正优秀的守卫者，需集哲学、斗志、机敏与力量为一身吗？

Undoubtedly.

格：毫无疑问。

Then we have found the desired natures; and now that we have found them, how are they to be reared and educated? Is not this an enquiry which may be expected to throw light on the greater

enquiry which is our final end—How do justice and injustice grow up in States? for we do not want either to omit what is to the point or to draw out the argument to an inconvenient length.

苏：那么，我们就算找到了守卫者必备的天性了。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又当如何教育人们在心中培养这种天性呢？对此问题的探索，是否会为我们所研究的终极问题，即正义和不义如何产生于城邦，提供有益的启示？我们既不想漏掉切中要害的环节，也不想过度纠缠于枝节问题。

SOCRATES-ADEIMANTUS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阿得曼托斯

Adeimantus thought that the enquiry would be of great service to us.

阿得曼托斯认为，此问题的探索将对我们大有裨益。

Then, I said, my dear friend, the task must not be given up, even if somewhat long.

苏：亲爱的朋友，即使要耗费稍长的时间，我们也不要放弃此项艰巨的任务。

Certainly not.

格：当然不会放弃。

Come then, and let us pass a leisure hour in story-telling, and our story shall be the education of our heroes.

苏：来吧，让我们讲个故事放松一下，故事讲的是英雄的教育。

By all means.

格：当然可以。

And what shall be their education? Can we find a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sort?—and this has two divisions, gymnastic for the body, and music for the soul.

苏：他们将会接受何种教育呢？我们还能找到比传统教育更好的教育方式吗？——它包括两部分：以体操锻炼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

True.

阿：对。

Shall we begin education with music, and go on to gymnastic afterwards?

苏：我们可否先讨论音乐教育，而后再论及体操教育呢？

By all means.

阿：当然可以。

And when you speak of music, do you include literature or not?

苏：说到音乐，你是否会将文学也涵盖在内？

I do.

阿：我会。

And literature may be either true or false?

苏：文学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构的，对吗？

Yes.

阿：对。

And the young should be trained in both kinds, and we begin with the false?

苏：年少者既要学习真实文学，又要学习虚构文学，而且首先是虚构文学。

I do not understand your meaning, he said.

阿：我不甚明白你的意思。

You know, I said, that we begin by telling children stories which, though not wholly destitute of truth, are in the main fictitious; and these stories are told them when they are not of an age to learn gymnastics.

苏：你知道，我们起初讲给孩子们的故事，虽非完全不足信，但也是以虚构为主。儿童在年龄尚幼之时，还无法进行体操训练，便听到了这样的故事。

Very true.

阿：的确如此。

That was my meaning when I said that we must teach music before gymnastics.

苏：我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音乐而后体操，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Quite right, he said.

阿：十分正确。

You know also that the beginn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any work,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a young and tender thing; for that is the time at which the character is being formed and the desired impression is more readily taken.

苏：你也知道，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开端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幼年时期的教育更是如此。在幼年时期，性格正处于形成阶段，好的事物容易留下深刻印象。

Quite true.

阿：确实如此。

And shall we just carelessly allow children to hear any casual tales which may be devised by casual persons, and to receive into their minds ideas for the most part the very opposite of those which we should wish them to have when they are grown up?

苏：我们可否任由孩子们去听欠考虑的人们漫不经心编造的故事，任由他们的头脑被灌输以多半我们认为他们成年以后不该有的观点呢？

We cannot.

阿：不可以。

Then the first thing will be to establish a censorship of the writers of fiction, and let the censors receive any tale of fiction which is good, and reject the bad; and we will desire mothers and nurses to tell their children the authorised ones only. Let them fashion the mind with such tales, even more fondly than they mould the body with their hands; but most of those which are now in use must be discarded.

苏：当务之急，应该建立一个虚构作品审查制度，使审查官对虚构作品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接受优秀的作品，摒弃拙劣作品。然

后，我们将要求孩子的母亲和保姆，只给孩子讲授经过审查认可的故事。让他们用审查认可的故事塑造儿童的思想——这较之用双手抚摸儿童的身体，更具温情。但是，目前讲述的大部分故事，都必须弃置不用。

Of what tales are you speaking? he said.

阿：你指的是什么故事呢？

You may find a model of the lesser in the greater, I said; for they are necessarily of the same type, and there is the same spirit in both of them.

苏：在重要的故事中，你也可以看到次要故事的影子，因为二者必然是属于同一类型，具有同样的精神实质。

Very likely, he replied; but I do not as yet know what you would term the greater.

阿：很有可能。但不知，你所谓的重要故事，指的是什么？

Those, I said, which are narrated by Homer and Hesiod, and the rest of the poets, who have ever been the great story-tellers of mankind.

苏：那些由荷马、赫西俄德等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及故事大师叙述的故事。

But which stories do you mean, he said; and what fault do you find with them?

阿：你指的是哪些故事？你认为，那些故事有何不足？

A fault which is most serious, I said; the fault of telling a lie, and, what is more, a bad lie.

苏：一个极为严重的不足，便是说谎，而且是很拙劣的谎言。

But when is this fault committed?

阿：该不足产生于何时？

Whenever an erroneous representation is made of the nature of gods and heroes,—as when a painter paints a portrait not having the shadow of a likeness to the original.

苏：每当诗人对诸神和英雄人物的性格进行错误描述，正如画家为人绘制与本人毫不相符的画像。

Yes, he said, that sort of thing is certainly very blameable; but what are the stories which you mean?

阿：此类事情，确实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你指的究竟是什么故事呢？

First of all, I said, there was that greatest of all lies in high places, which the poet told about Uranus, and which was a bad lie too,—I mean what Hesiod says that Uranus did, and how Cronus retaliated on him. The doings of Cronus, and the sufferings which in turn his son inflicted upon him, even if they were true, ought certainly not to be lightly told to young and thoughtless persons; if possible, they had better be buried in silence. But if there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 for their mention, a chosen few might hear them in a mystery, and they should sacrifice not a common (Eleusinian) pig, but some huge and unprocurable victim; and then the number of the hearers will be very few indeed.

苏：首先是诋毁尊者的弥天大谎，即诗人讲述的关于乌拉诺斯的故事，亦是一个拙劣的谎言——我说的是，赫西俄德有关乌拉诺斯所作所为，以及克洛诺斯如何采取报复行为的叙述。克洛诺斯所行不义，他的儿子反过来对他实施惩罚，此类故事即便真有其事，也不当轻易讲给年少并缺乏思辨能力的人听。如有可能，此类故事最好被尘封起来，永不提及。如果必须要讲，只有选定的少数几个人可以在秘密仪式上听到，而且他们还应先行献祭。所献之物，并非是平常的一头猪，而是某种不可得的庞然大物，故而仅有极少之人方能听到。

Why, yes, said he, those stories are extremely objectionable.

阿：是啊，此类故事真是可恶之极。

Yes, Adeimantus, they are stories not to be repeated in our State; the young man should not be told that in committing the worst of crimes he is far from doing anything outrageous; and that even if he chastises his father when he does wrong, in whatever manner, he will only be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the first and greatest among the gods.

苏：是的，阿得曼托斯，此类故事，切不可在我们的城邦中流传。我们不能让年轻人产生错误的印象——即使他犯下滔天大罪，也是无可厚非；即使他采用任何手段惩罚做错事的父亲，也不过是效仿众神领袖的作法而已。

I entirely agree with you, he said; in my opinion those stories are quite unfit to be repeated.

阿：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此类故事十分不宜流传。

Neither, if we mean our future guardians to regard the habit of quarrelling among themselves as of all things the basest, should any word be said to them of the wars in heaven, and of the plots and fightings of the gods against one another, for they are not true. No, we shall never mention the battles of the giants, or let them be embroidered on garments; and we shall be silent about the innumerable other quarrels of gods and heroes with their friends

and relatives. If they would only believe us we would tell them that quarrelling is unholy, and that never up to this time has there been any quarrel between citizens; this is what old men and old women should begin by telling children; and when they grow up, the poets also should be told to compose for them in a similar spirit. But the narrative of Hephaestus binding Here his mother, or how on another occasion Zeus sent him flying for taking her part when she was being beaten, and all the battles of the gods in Homer—these tales must not be admitted into our State, whether they are supposed to have an allegorical meaning or not. For a young person cannot judge what is allegorical and what is literal; anything that he receives into his mind at that age is likely to become indelible and unalterable; and therefore it is most important that the tales which the young first hear should be models of virtuous thoughts.

此外，如果我们希望未来的守卫者，视内部争斗为最为可耻之事，那么我们也不该对他们提及诸如天神战争、众神明争暗斗的虚妄之事。不，我们应该绝口不提巨人之战，也决不将此类故事绣在衣服上作装饰图案；同时，对诸神祇、英雄与亲朋发生的数不清的其他冲突，我们也应该守口如瓶。如果孩子们肯相信我们的话，我们会告诉他们，争斗是对神的亵渎，因而城邦之内从未发生过争斗。长辈在给孩子讲故事时，也要用此类话语做开场白。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诗人也应该本着类似的宗旨，创造出合适的作品供他们阅读。但是，火神赫菲斯托斯绑缚其母天后赫拉，后来火神在主神宙斯暴打赫拉时，挺身维护她，被宙斯扔下奥林匹斯山，以及荷马史诗中所有关于诸神战争的传说，诸如此类的故事，无论它们是否蕴含着深刻寓意，都不得进入我们的城邦。因为人在幼年时期无法分辨，何为比喻义，何为本义，他在这个年纪接受的任何事物，都会成为其根深蒂固、难以变更的思想，所以确保儿童在启蒙时期听到的故事都可被视为道德思想的楷模，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There you are right, he replied; but if any one asks where are such models to be found and of what tales are you speaking—how shall we answer him?

你的想法固然有道理，可是如果有人问起，此类典范故事何处可得，你所称许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我们将如何答复呢？

I said to him, You and I, Adeimantus, at this moment are not poets, but founders of a State: now the founders of a State ought to know the general forms in which poets should cast their tales, and the limits which must be observed by them, but to make the tales is not their business.

苏：你我，此刻并非诗人，而是城邦缔造者：缔造者此刻应该做的，是设定诗人创作的通式，以及诗人必须恪守的准则，而不是具体从事故事创作。

Very true, he said; but what are these forms of theology which you mean?

阿：的确如此。可是，您认为，诗人应依据何种神学通式创作呢？

Something of this kind, I replied:—God is always to be represented as he truly is, whatever be the sort of poetry, epic, lyric or tragic, in which the representation is given.

苏：大致如下：无论在史诗、抒情诗或悲剧中，诗人都应按照神的本来面目来表现神。

Right.

阿：对。

And is he not truly good? and must he not be represented as such?

苏：神难道并非真善吗？难道不该如此地表现神吗？

Certainly.

阿：当然应该。

And no good thing is hurtful?

苏：善是无害的，对吗？

No, indeed.

阿：的确无害。

And that which is not hurtful hurts not?

苏：无害者不会带来伤害，对吗？

Certainly not.

阿：对。

And that which hurts not does no evil?

苏：不会带来伤害的东西，也不会作恶，对吗？

No.

阿：对。

And can that which does no evil be a cause of evil?

苏：非作恶之物，会成为邪恶的根源吗？

Impossible.

阿：绝对不会。

And the good is advantageous?

苏：善是有益的，对吗？

Yes.

阿：对。

And therefore the cause of well-being?

苏：因而，善是幸福的根源，对吗？

Yes.

阿：对。

It follows therefore that the good is not the cause of all things, but of the good only?

苏：因此，善并非万物之源，只是一切善的事物的根源。

Assuredly.

阿：千真万确。

Then God, if he be good, is not the author of all things, as the many assert, but he is the cause of a few things only, and not of most things that occur to men. For few are the goods of human life, and many are the evils, and the good is to be attributed to God alone; of the evils the causes are to be sought elsewhere, and not in him.

苏：可见，如果神是善的，那么他就并非众人常说的世间万物的造物主，因为他只是创造了少数的事物，人类经历的大多数事物皆非他的创造。究其原因，人世间，善的事物为数甚少，而邪恶事物则往往居多；同时只有善的事物才可归因于神，而邪恶事物的根源却不在神，需另寻他处。

That appears to me to be most true, he said.

阿：确实如此。

Then we must not listen to Homer or to any other poet who is

guilty of the folly of saying that two casks

苏：因此，我们千万不可听信荷马等诗人的荒谬言论。他们说，两只桶

'Lie at the threshold of Zeus, full of lots, one of good, the other of evil lots,'

“设于宙斯宫殿门口，内置命运，一只充满福运，另一只满载厄运”：

and that he to whom Zeus gives a mixture of the two

从宙斯那里得到福祸参半的命运者，

'Sometimes meets with evil fortune, at other times with good;'

“命运跌宕起伏，时喜时悲”；

but that he to whom is given the cup of unmingled ill,

从宙斯那里得到纯粹的厄运者，

'Him wild hunger drives o'er the beauteous earth.'

“为饥饿所驱在美丽的大地上颠沛流离。”

And again—

他们还说，

'Zeus, who is the dispenser of good and evil to us.'

“宙斯将祸福吉凶分配给我们。”

And if any one asserts that the violation of oaths and treaties, which was really the work of Pandarus, was brought about by Athene and Zeus, or that the strife and contention of the gods was instigated by Themis and Zeus, he shall not have our approval; neither will we allow our young men to hear the words of Aeschylus, that

另外，可能有人坚持认为，虽然潘多拉无可非议地成为了破坏誓约的千古罪人，但智慧女神雅典娜和主神宙斯才是罪魁祸首。也可能有人主张，诸神之间的争斗和竞争，皆由正义女神忒弥斯和主神宙斯挑起。对这些说法，我们不敢苟同。同时，我们也不允许年轻人听信埃斯库罗斯之言，即

'God plants guilt among men when he desires utterly to destroy a house.'

“神欲毁灭一个邦国，必先在其国民中播撒罪恶的种子”。

And if a poet writes of the sufferings of Niobe—the subject of the tragedy in which these iambic verses occur—or of the house of Pelops, or of the Trojan war or on any similar theme, either we must not permit him to say that these are the works of God, or if they are of God, he must devise some explanation of them such as we are seeking; he must say that God did what was just and right, and they were the better for being punished; but that those who are punished are miserable, and that God is the author of their misery—the poet is not to be permitted to say; though he may say that the wicked are miserable because they require to be punished, and are benefited by receiving punishment from God; but that God being good is the author of evil to any one is to be strenuously denied, and not to be said or sung or heard in verse or prose by any one whether old or young in any well-ordered commonwealth. Such a fiction is suicidal, ruinous, impious.

若是诗人写到尼俄柏的苦难经历（以抑扬格诗行表现该悲剧主题）、珀罗普斯的家事、特洛伊战争，或者其他类似题材，我们要严禁诗人将此类悲剧归咎于神，但如果此类悲剧果真为神所促成，那么诗人一定要阐明原委，须指出神的意志公正而明智，实施惩罚的目的是使其受益。但是，诗人却决不可以说，受惩戒者的悲惨遭遇，乃是神亲手酿成。诗人不妨说，邪恶之人的不幸，在于他们必须受到惩戒，并通过接受神的惩罚而获益。在任何秩序井然的国家中，任何人都应奋力驳斥“代表善的神却是罪恶创造者”这一观点；任何人，不论

老幼，都不得以诗歌散文等任何形式叙述、吟唱或欣赏表现该主题的作品。此类虚构作品，具有自杀性和破坏力，亵渎神灵。

I agree with you, he replied, and am ready to give my assent to the law.

阿：我同意你的观点，同时也愿意对你提出的规定表示赞同。

Let this then be one of our rules and principles concerning the gods, to which our poets and reciters will be expected to conform,—that God is not the author of all things, but of good only.

苏：这即是我们有关神的规定与准则之一，诗人和吟诵者必须遵守：神并非一切事物的创造者，它只创造了善的事物。

That will do, he said.

阿：理应如此。

And what do you think of a second principle? Shall I ask you whether God is a magician, and of a nature to appear insidiously now in one shape, and now in another—sometimes himself changing and passing into many forms, sometimes deceiving us with the semblance of such transformations; or is he one and the same immutably fixed in his own proper image?

苏：你认为，第二条准则应是什么？我可否问一下，神擅长幻术，时时变幻成不同的形象来欺罔世人吗？抑或神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来面目？

I cannot answer you, he said, without more thought.

阿：我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才可做出回答。

Well, I said; but if we suppose a change in anything, that change must be effected either by the thing itself, or by some other thing?

苏：好吧。但如果我们假设事物发生变化，那么必由内部或者外部因素作用引起，对吗？

Most certainly.

阿：必定如此。

And things which are at their best are also least liable to be altered or discomposed; for example, when healthiest and strongest, the human frame is least liable to be affected by meats and drinks, and the plant which is in the fullest vigour also suffers least from winds or the heat of the sun or any similar causes.

苏：同时，处于最佳状态的事物，最不易于发生改变或失去常态。比如，体格健壮者不易受到饮食的影响；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植物，也最不易受到狂风烈日等恶劣条件的影响。

Of course.

阿：当然。

And will not the bravest and wisest soul be least confused or deranged by any external influence?

苏：最睿智果敢之人，岂非最不易为外界影响所惑吗？

True.

阿：对。

And the same principle, as I should suppose, applies to all composite things—furniture, houses, garments: when good and well made, they are least altered by time and circumstances.

苏：我以为，这一原理也适用于所有合成之物——家具、房屋、衣物等，如质量优良且做工精湛，便最不易被时间与环境所侵蚀。

Very true.

阿：的确如此。

Then everything which is good, whether made by art or nature, or both, is least liable to suffer change from without?

苏：那么，任何事物，不论天然的，还是人造的，还是二者兼而有之的，只要质量优良，就最不易为外力改变，对吗？

True.

阿：对。

But surely God and the things of God are in every way perfect?

苏：想必神以及神的一切皆为完美无缺吧？

Of course they are.

阿：当然。

Then he can hardly be compelled by external influence to take many shapes?

苏：那么，他也不会受外力驱使而幻化作多种形象吧？

He cannot.

阿：他不会。

But may he not change and transform himself?

苏：但是他可以改变和改造自我吗？

Clearly, he said, that must be the case if he is changed at all.

阿：显然，若是他果真改变，必定是自己干的。

And will he then change himself for the better and fairer, or for the worse and more unsightly?

苏：那么，他会将自己变得更善更美，还是更糟更丑？

If he change at all he can only change for the worse, for we cannot suppose him to be deficient either in virtue or beauty.

阿：他若真的改变，只会变得更糟，因为我们认为，他无论是内在修养，还是外表，都已然完美无缺了。

Very true, Adeimantus; but then, would any one, whether God or man, desire to make himself worse?

苏：非常正确，阿得曼托斯。可是，无论神还是人，有谁愿意使自己变得更糟吗？

Impossible.

阿：谁都不愿意。

Then it is impossible that God should ever be willing to change; being, as is supposed, the fairest and best that is conceivable, every God remains absolutely and for ever in his own form.

苏：那么，神必不欲改头换面。既然每位神祇都应是至善至美的化身，他们必然会一成不变地以自己的本来面目示人。

That necessarily follows, he said, in my judgment.

阿：以我之见，必然如此。

Then, I said, my dear friend, let none of the poets tell us that

苏：亲爱的朋友，切莫轻信诗人的虚妄之词：

'The gods, taking the disguise of strangers from other lands, walk up and down cities in all sorts of forms;'

“诸神装扮成异乡人，以各种各样的形貌，奔走游逛于各城邦”；

and let no one slander Proteus and Thetis, neither let any one, either in tragedy or in any other kind of poetry, introduce Here disguised in the likeness of a priestess asking an alms

我们不允许任何人造谣中伤海神普罗透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也不许他们在悲剧或其他形式的诗篇中说，赫拉变成女祭司的模样，请求

'For the life-giving daughters of Inachus the river of Argos;'

“将阿尔戈斯河神伊那科斯孕育生命的女儿赠送给她”；

—let us have no more lies of that sort. Neither must we have mothe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oets scaring their children with a bad version of these myths—telling how certain gods, as they say, 'Go about by night in the likeness of so many strangers and in diverse forms;' but let them take heed lest they make cowards of their children, and at the same time speak blasphemy against the gods.

让我们摒弃一切诸如此类的谎言。另外，我们也要严禁母亲们受诗人的影响，用拙劣的神话故事吓唬孩子，说某些神祇“在夜晚会变成形形色色的异乡人四处走动”。我们要提请她们注意，不要因此而吓坏孩子，出言不敬，亵渎神明。

Heaven forbid, he said.

阿：天理不容。

But although the gods are themselves unchangeable, still by witchcraft and deception they may make us think that they appear in various forms?

苏：诸神虽本身不变，但他们可以通过法术和幻术，使我们产生幻觉以为诸神形象百变，对吗？

Perhaps, he replied.

阿：或许如此。

Well, but can you imagine that God will be willing to lie, whether in word or deed, or to put forth a phantom of himself?

苏：但是，你认为，神欲以谎言、妄行或者其本身的幻象，欺骗世人吗？

I cannot say, he replied.

阿：我并不这么认为。

Do you not know, I said, that the true lie, if such an expression may be allowed, is hated of gods and men?

苏：你难道不认为，真正的谎言——如果此表达成立的话——为人神所共愤吗？

What do you mean? he said.

阿：此话怎讲？

I mean that no one is willingly deceived in that which is the

truest and highest part of himself, or about the truest and highest matters; there, above all, he is most afraid of a lie having possession of him.

苏：我想说，任何人都不愿自身最为真实、最重要的部分或在最为真实、最重要的问题上受人欺骗，尤其不愿让自己成为受谎言支配的傀儡。

Still, he said, I do not comprehend you.

阿：我仍感费解。

The reason is, I replied, that you attribute some profound meaning to my words; but I am only saying that deception, or being deceived or uninformed about the highest realities in the highest part of themselves, which is the soul, and in that part of them to have and to hold the lie, is what mankind least like;—that, I say, is what they utterly detest.

苏：那是因为你把我的话想象得过于高深了。我不过就是在说，灵魂是人生命中最重要部分的至关重要的实在，而对灵魂的欺骗或蒙蔽，则是人类所最为深恶痛绝的。

There is nothing more hateful to them.

阿：可恶之事，莫过于此。

And, as I was just now remarking, this ignorance in the soul of him who is deceived may be called the true lie; for the lie in words is only a kind of imitation and shadowy image of a previous affection of the soul, not pure unadulterated falsehood. Am I not right?

苏：正如我刚才所说，被骗者灵魂的无知，才是真正的谎言，因为假话只是模仿蒙昧状态下的灵魂而产生的影像，而并非纯粹的虚假。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Perfectly right.

阿：完全正确。

The true lie is hated not only by the gods, but also by men?

苏：真正的谎言，不仅为神所厌恶，而且为人所厌恶，对吗？

Yes.

阿：对。

Whereas the lie in words is in certain cases useful and not hateful; in dealing with enemies—that would be an instance; or again, when those whom we call our friends in a fit of madness or illusion are going to do some harm, then it is useful and is a sort of medicine or preventive; also in the tales of mythology, of which we were just now speaking—because we do not know the truth about ancient times, we make falsehood as much like truth as we can, and so turn it to account.

苏：然而，在特定情形之下，假话非但无害，反而是有益的，与敌人周旋就是一个例子。再比如，朋友处于疯癫或狂想状态之下，欲造成伤害，此时的假话则是有益的，如一剂灵药，防患于未然。再有，就神话故事而言，我们刚刚还提到过一些，——因为我们无法了解古老时代的真相，所以我们就尽可能地以假作真，并对之加以利用。

Very true, he said.

阿：很有道理。

But can any of these reasons apply to God? Can we suppose that he is ignorant of antiquity, and therefore has recourse to invention?

苏：可是，上述理由适用于神明吗？我们可否假定，神因不知古代之事，便求助于杜撰虚构之词呢？

That would be ridiculous, he said.

阿：这也许很荒谬。

Then the lying poet has no place in our idea of God?

苏：凭借我们对神的认识，神中间不会存在造谣诗人，对吗？

I should say not.

阿：大概不会。

Or perhaps he may tell a lie because he is afraid of enemies?

苏：抑或神也许会因畏惧敌人而说谎吗？

That is inconceivable.

阿：那太不可思议了。

But he may have friends who are senseless or mad?

苏：但神会有疯狂、丧失理性的朋友吗？

But no mad or senseless person can be a friend of God.

阿：可是，疯狂、丧失理性之人，是不会成为神的朋友的。

Then no motive can be imagined why God should lie?

苏：那么，我们就想象不出，神有何说谎动机了吗？

None whatever.

阿：实在想象不出。

Then the superhuman and divine is absolutely incapable of falsehood?

苏：那么，诸神绝对不会说谎话吗？

Yes.

阿：绝不会。

Then is God perfectly simple and true both in word and deed; he changes not; he deceives not, either by sign or word, by dream or waking vision.

苏：可见，神在言行方面完全地自然而真实；他不改变；他既不以手势或言语进行欺骗，也不以睡梦或清醒时的任何幻象蒙骗世人。

Your thoughts, he said, are the reflection of my own.

阿：你的想法和我完全一致。

You agree with me then, I said, that this is the second type or form in which we should write and speak about divine things. The gods are not magicians who transform themselves, neither do they deceive mankind in any way.

苏：那么，你同意我的看法了。这便是我们写作或谈论与神有关事物的第二条准则。诸神并非幻术家，绝不变幻形貌，也不会以任何其他形式欺骗世人。

I grant that.

阿：我赞成。

Then, although we are admirers of Homer, we do not admire the lying dream which Zeus sends to Agamemnon; neither will we praise the verses of Aeschylus in which Thetis says that Apollo at her nuptials

苏：尽管我们对诗人荷马钦敬有加，但对于宙斯托假梦给阿伽门农，却要另当别论；同时，我们也不能赞美埃斯库罗斯关于海洋女神忒提斯的一段诗句：忒提斯说，阿波罗在她的婚礼上

'Was celebrating in song her fair progeny whose days were to be long, and to know no sickness. And when he had spoken of my lot as in all things blessed of heaven he raised a note of triumph and cheered my soul. And I thought that the word of Phoebus, being divine and full of prophecy, would not fail. And now he himself who uttered the strain, he who was present at the banquet, and who said this—he it is who has slain my son.'

“用歌声赞美她的子孙福寿绵绵，远离疾病。当他唱到我命中注定受到诸神庇佑，歌声顿时高亢激昂，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令我精神为之一振。我以为，太阳神的话，神圣而富有预见性，一定会应验。如今，他这位当日亲唱颂歌者，他这位出席婚宴者，他这位许以福运者——正是他，杀害了我的儿子。”

These are the kind of sentiments about the gods which will arouse our anger; and he who utters them shall be refused a chorus; neither shall we allow teachers to make use of them in the instruction of the young, meaning, as we do, that our guardians, as far as men can be, should be true worshippers of the gods and like

them.

此类有关诸神的思想论调，只会激发我们的愤怒。对之，我们绝不随声附和，也不准许教师采用这些错误思想教导青少年，从而使我们的守卫者和我们一道竭尽全力，真正地敬奉神，爱戴神。

I entirely agree, he said, in these principles, and promise to make them my laws.

阿：我完全接受这些准则，并且保证遵照执行。

BOOK III.

第三卷

SOCRATES—ADEIMANTUS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阿得曼托斯

Such then, I said, are our principles of theology—some tales are to be told, and others are not to be told to our disciples from their youth upwards, if we mean them to honour the gods and their parents, and to value friendship with one another.

苏：这即是我们的神学原则——如果我们希望守卫者信奉神灵，孝敬父母，珍视友谊，那么就要清楚从他们少年时起，一些故事是应该讲述给他们的，而其他故事则是绝对不宜讲述的。

Yes; and I think that our principles are right, he said.

阿：同意。在我看来，如此规定是合理的。

But if they are to be courageous, must they not learn other lessons besides these, and lessons of such a kind as will take away the fear of death? Can any man be courageous who has the fear of

death in him?

苏：但他们若要成为勇敢的军人，是否有必要学习其他的知识，比如了解某些可以使他们不畏牺牲的知识？怕死之人，能够英勇作战吗？

Certainly not, he said.

阿：当然不能。

And can he be fearless of death, or will he choose death in battle rather than defeat and slavery, who believes the world below to be real and terrible?

苏：如果一个人认为冥界是个真实而恐怖的地方，那么他能否临危不惧，能否在战争中宁死不屈？

Impossible.

阿：绝对不能。

Then we must assume a control over the narrators of this class of tales as well as over the others, and beg them not simply to revile but rather to commend the world below, intimating to them that

their descriptions are untrue, and will do harm to our future warriors.

苏：因此，我们必须对讲述此类故事的人进行监督，正如我们监督其他讲故事者一样，请求他们赞美冥界，而不要对之肆意辱骂，暗示其描述不符合事实，并且不利于未来武士的成长。

That will be our duty, he said.

阿：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Then, I said, we shall have to obliterate many obnoxious passages, beginning with the verses, 'I would rather be a serf on the land of a poor and portionless man than rule over all the dead who have come to nought.' We must also expunge the verse, which tells us how Pluto feared, 'Lest the mansions grim and squalid which the gods abhor should be seen both of mortals and immortals.' And again:— 'O heavens! verily in the house of Hades there is soul and ghostly form but no mind at all!' Again of Tiresias:— '(To him even after death did Persephone grant mind,) that he alone should be wise; but the other souls are flitting shades.' Again:— 'The soul flying from the limbs had gone to Hades, lamenting her fate, leaving manhood and youth.' Again:— 'And the soul, with shrilling cry, passed like smoke beneath the earth.' And,— 'As bats in hollow of mystic cavern, whenever any of them has dropped out of the string and falls from the rock, fly shrilling and cling to one another, so did they with shrilling cry hold together as they moved.' And we must beg Homer and the other poets not to be angry if we strike out

these and similar passages, not because they are unpoetical, or unattractive to the popular ear, but because the greater the poetical charm of them, the less are they meet for the ears of boys and men who are meant to be free, and who should fear slavery more than death.

苏：那么，我们就必须删掉许多可憎的片段，首当其冲的是此类诗句，“我宁愿在人间为奴，为穷困孤苦之人所役使，也不愿在冥界称王，统率空灵缥缈的鬼魂。”我们还必须删除表现冥王普鲁托内心恐惧的诗句，“生怕阴间世界会暴露在凡人与神祇的视线中：它阴森恐怖、污秽不堪，众神避之犹恐不及。”还有这句：“天啊！果不其然，阴曹地府之中，魂魄鬼影尚在，而神智意识却荡然无存！”以及有关盲人先知提瑞西阿斯的诗句：“（即使在他死后，冥后珀尔塞福涅也赋予了他神智意识）他将是唯一的智者，此外皆为飘忽不定的魂魄。”再有，“灵魂飞出躯干，奔赴黄泉，哀叹着命运，远离生命与青春。”此外，“鬼魂叫声凄厉，飘入地下，如烟似雾。”加之，“正如置身神秘洞窟之中的蝙蝠，偶有一只从岩石高处不慎坠落，其余的蝙蝠便飞起惊叫，相互靠拢，黄泉路上的众鬼魂一边发出凄厉的惊叫声，一边彼此簇拥着前行。”我们一定要恳请荷马等诗人千万不要动怒，我们之所以删去这类片段，并非因为它们缺乏诗意，或者不为大众所喜爱，而是因为它们愈是富有诗歌魅力，便愈是不适合于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听。人们应该从小就崇尚自由，宁死也不愿沦为亡国之奴。

Undoubtedly.

阿：毋庸置疑。

Also we shall have to reject all the terrible and appalling names

which describe the world below—Cocytus and Styx, ghosts under the earth, and sapless shades, and any similar words of which the very mention causes a shudder to pass through the inmost soul of him who hears them. I do not say that these horrible stories may not have a use of some kind; but there is a danger that the nerves of our guardians may be rendered too excitable and effeminate by them.

苏：同时，我们也拒绝听到任何描述可怕阴间的语汇——哭泣之河、悔恨之河、地下的幽灵、毫无生气的鬼魂以及类似的令人们闻之而毛骨悚然的词语。我并不否定，这些恐怖故事可能会具有一定的益处；但是，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守卫者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变得过于敏感、软弱无能。

There is a real danger, he said.

阿：危险的确存在。

Then we must have no more of them.

苏：那么，我们一定要它们彻底消失。

True.

阿：对。

Another and a nobler strain must be composed and sung by us.

苏：我们在创作、吟唱诗歌时必须采用一种更为高尚的新格调。

Clearly.

阿：显而易见。

And shall we proceed to get rid of the weepings and wailings of famous men?

苏：另外，我们还需删掉诗歌中关于著名人物哭泣悲叹的描写，对吗？

They will go with the rest.

阿：对，与其他一并删掉。

But shall we be right in getting rid of them? Reflect: our principle is that the good man will not consider death terrible to any other good man who is his comrade.

苏：可是，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们删除呢？反思一下：我们的准则，是优秀男人并不认为，身为其同伴的任何其他优秀男子的死，令人生畏。

Yes; that is our principle.

阿：对，这便是我们的准则。

And therefore he will not sorrow for his departed friend as though he had suffered anything terrible?

苏：因此，他不会因朋友的故去而悲不自胜，就仿佛朋友遭遇了任何可怕之事，对吗？

He will not.

阿：他不会的。

Such an one, as we further maintain, is sufficient for himself and his own happiness, and therefore is least in need of other men.

苏：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如此之人，足以自慰，绝少外求于他人。

True, he said.

阿：的确。

And for this reason the loss of a son or brother, or the deprivation of fortune, is to him of all men least terrible.

苏：因此，没有人能够比他更为坦然地面对丧失儿子、兄弟或者财产的变故。

Assuredly.

阿：当然。

And therefore he will be least likely to lament, and will bear with the greatest equanimity any misfortune of this sort which may befall him.

苏：可见，他不太可能会悲伤哀痛。任何此类不幸降临在他头上，他都会以最平和的心态去对待。

Yes, he will feel such a misfortune far less than another.

阿：对，他会觉得这种不幸远比不上其他不幸。

Then we shall be right in getting rid of the lamentations of famous men, and making them over to women (and not even to women who are good for anything), or to men of a baser sort, that those who are being educated by us to be the defenders of their country may scorn to do the like.

苏：那么，我们就应该删除有关英雄人物悲伤的片段，将其视为妇女（其中不包括优秀妇女），或男人中的怯懦无能之辈。这样，在我们的教育引导之下，未来的国家守卫者就会鄙视悲哀痛苦之举，而不去效法。

That will be very right.

阿：合情合理。

Then we will once more entreat Homer and the other poets not to depict Achilles, who is the son of a goddess, first lying on his side, then on his back, and then on his face; then starting up and sailing in a frenzy along the shores of the barren sea; now taking the sooty ashes in both his hands and pouring them over his head, or weeping and wailing in the various modes which Homer has delineated. Nor should he describe Priam the kinsman of the gods as praying and beseeching, 'Rolling in the dirt, calling each man loudly by his name.'

苏：然后，我们还要再次恳请以荷马为首的诗人们，不要把身为女神之子的阿喀琉斯刻画成荷马极力渲染的这种形象：起先侧身躺着，随后又仰面朝天，接着又面朝下；紧接着爬起来，疯狂地在荒凉的海边疾行；忽然，他又双手捧起黑灰，撒在头上，哭泣哀号。他也不该将身为诸神近亲的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描绘成祈求哀告的形象，“在泥土中翻滚着，高声呼唤每个人的名字。”

Still more earnestly will we beg of him at all events not to introduce the gods lamenting and saying, 'Alas! my misery! Alas! that I bore the bravest to my sorrow.' But if he must introduce the gods, at any rate let him not dare so completely to misrepresent the greatest of the gods, as to make him say— 'O heavens! with my eyes verily I behold a dear friend of mine chased round and round the city, and my heart is sorrowful.' Or again:— Woe is me that I am fated to have Sarpedon, dearest of men to me, subdued at the hands of Patroclus the son of Menoetius.' For if, my sweet Adeimantus, our youth seriously listen to such unworth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gods, instead of laughing at them as they ought, hardly will any of them deem that he himself, being but a man, can be dishonoured by similar actions; neither will he rebuke any inclination which may arise in his mind to say and do the like. And instead of having any shame or self-control, he will be always whining and lamenting on slight occasions.

我们还要更加诚挚地拜托他，不要再现诸神悲伤哀告的情景，“唉！我的悲惨命运啊！”“唉！令我悲伤的是，我生育了最勇敢的儿子！”但如果他一定要提到诸神，千万不要让他如此大胆地歪曲众神之王，甚至于让宙斯说：“噢，天啊！我亲眼看着好友被追得来回绕城奔逃，心中充满悲伤。”抑或：“我多么不幸啊，命中注定，自己最心爱的萨耳珀冬，要殒命墨诺提俄斯之子帕特洛克罗斯之手。”亲

爱的阿得曼托斯，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在倾听这些歪曲诸神的史诗故事时，信以为真，并非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去对之进行嘲笑，那么他们身为区区凡人，估计就会觉得做出类似的举动是可耻的；如果他们有了说这类话或做这类事的念头，就不会去克制自己了。他们毫无羞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总会在小的事情上发牢骚、哀叹。

Yes, he said, that is most true.

阿：千真万确。

Yes, I replied; but that surely is what ought not to be, as the argument has just proved to us; and by that proof we must abide until it is disproved by a better.

苏：是啊。但我们的论证表明，此类情形断不可以发生。除非有更好的理由来推翻我们的准则，否则我们就要严格地遵照执行。

It ought not to be.

阿：的确如此。

Neither ought our guardians to be given to laughter. For a fit of laughter which has been indulged to excess almost always produces a violent reaction.

苏：另外，我们的守卫者也不应该有大笑的习惯，因为纵情大笑总会产生暴力的冲动。

So I believe.

阿：我有同感。

Then persons of worth, even if only mortal men, must not be represented as overcome by laughter, and still less must such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gods be allowed.

苏：因此，即便是品行高尚的人类，也决不可被刻画成狂笑不止之辈；至于诸神，则更不用说了。

Still less of the gods, as you say, he replied.

阿：是啊，诸神就更不用说了。

Then we shall not suffer such an expression to be used about the gods as that of Homer when he describes how 'Inextinguishable laughter arose among the blessed gods, when they saw Hephaestus bustling about the mansion.' On your views, we must not admit them.

苏：故而，我们不能容忍诗人如此形容诸神，比如荷马描述到："受人尊敬的诸神看到火神赫菲斯托斯在宫殿里东奔西跑，不禁纵声大笑。"依你之见，我们断不可接受此等说法。

On my views, if you like to father them on me; that we must not admit them is certain.

阿：如果你让我来决策的话，那么我要说，我们千万不可接受此类说法。

Again, truth should be highly valued; if, as we were saying, a lie is useless to the gods, and useful only as a medicine to men, then the use of such medicines should be restricted to physicians; private individuals have no business with them.

苏：再者，要高度肯定讲真话的价值。要是如前所述，谎言对于诸神来说毫无用处，只能为人类治病，那么利用谎言来治病的权力，当专属医生所有，与他人无关。

Clearly not, he said.

阿：当然。

Then if any one at all is to have the privilege of lying, the rulers of the State should be the persons; and they, in their dealings

either with enemies or with their own citizens, may be allowed to lie for the public good. But nobody else should meddle with anything of the kind; and although the rulers have this privilege, for a private man to lie to them in return is to be deemed a more heinous fault than for the patient or the pupil of a gymnasium not to speak the truth about his own bodily illnesses to the physician or to the trainer, or for a sailor not to tell the captain what is happening about the ship and the rest of the crew, and how things are going with himself or his fellow sailors.

苏：如果一国之中有人享有说谎的特权，那么必定非统治者莫属。他们在处理敌我关系、内外事务时，可以出于对公众利益的考虑故意隐瞒真相。但他人却不可擅自使用这种特权。病人或运动员对医生或教练就其自身的身体状况说谎，水手对船长隐瞒船上以及船员、自己以及其他水手的真实情况，这些都是极为可憎的过错。虽然统治者拥有说谎的特权，但平民若是对统治者撒谎，便是犯下令人发指的过错。

Most true, he said.

阿：的确如此。

If, then, the ruler catches anybody beside himself lying in the State, 'Any of the craftsmen, whether he be priest or physician or carpenter,' he will punish him for introducing a practice which is equally subversive and destructive of ship or State.

苏：由此观之，若是统治者发现举国上下，除他以外还有人说谎骗人，那么，无论此人从事任何职业，祭司、医生或木匠，统治者都要对之进行严惩，因为其行为足以颠覆邦国。

Most certainly, he said, if our idea of the State is ever carried out.

阿：在依据我们的理念建立起的国家中，必然要施行如此举措。

In the next place our youth must be temperate?

苏：其次，我们的年轻人必须具备自我克制力，对吗？

Certainly.

阿：当然。

Are not the chief elements of temperance, speaking generally, obedience to commanders and self-control in sensual pleasures?

苏：一般来说，克己自制的要素，难道不是服从命令，克制世俗享乐吗？

True.

阿：对。

Then we shall approve such language as that of Diomede in Homer, 'Friend, sit still and obey my word,' and the verses which follow, 'The Greeks marched breathing prowess, …in silent awe of their leaders,' and other sentiments of the same kind.

苏：那么，我们应该充分肯定荷马史诗中希腊英雄狄俄墨得斯所说的话，“朋友，稍安勿躁，且听我一言。”他还说：“希腊人奋勇前进，……对他们的领袖心存敬畏。”以及其他表达这类情感的诗句。

We shall.

阿：应该肯定。

What of this line, 'O heavy with wine, who hast the eyes of a dog and the heart of a stag,' and of the words which follow? Would you say that these, or any similar impertinences which private individuals are supposed to address to their rulers, whether in verse or prose, are well or ill spoken?

苏：且看这句如何？“哦，酒鬼，目光贪恋如恶狗，内心怯懦似雄鹿。”它下面的几句又如何呢？无论是在诗歌还是散文中，如果平

民对统治者用这种或者类似的无礼方式讲话，这本身是作品的亮点还是败笔？

They are ill spoken.

阿：是败笔。

They may very possibly afford some amusement, but they do not conduce to temperance. And therefore they are likely to do harm to our young men—you would agree with me there?

苏：类似的片段可能具有一定的娱乐价值，却无益于培养克己自制的美德。因此，它们可能危害到我们的年轻人。你会同意我的观点吗？

Yes.

阿：同意。

And then, again, to make the wisest of men say that nothing in his opinion is more glorious than 'When the tables are full of bread and meat, and the cup-bearer carries round wine which he draws from the bowl and pours into the cups,' is it fit or conducive to temperance for a young man to hear such words? Or the verse 'The saddest of fates is to die and meet destiny from hunger?' What

would you say again to the tale of Zeus, who, while other gods and men were asleep and he the only person awake, lay devising plans, but forgot them all in a moment through his lust, and was so completely overcome at the sight of Here that he would not even go into the hut, but wanted to lie with her on the ground, declaring that he had never been in such a state of rapture before, even when they first met one another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ir parents;' or that other tale of how Hephaestus, because of similar goings on, cast a chain around Ares and Aphrodite?

苏：再有，诗人让最有智慧的人说，在他看来人生最快意的事情莫过于“席间满目珍馐佳肴，侍者穿梭斟上美酒。”如此的话语，适合于让年轻人听到吗？有助于年轻人克己自制吗？再听听以下的诗句，“最悲惨的命运莫过于饥饿而终！”那么，至于下面这则关于宙斯的故事，你又会作何感想呢？人与神都进入了梦乡，宙斯却独自未眠，躺着思忖筹划，但炽热的情欲却瞬间让他忘却一切。赫拉的出现，令他情不自持，无暇回房，便双双卧于地上，宣称自己从未如此神醉情驰，即使当年“瞒着父母”的初次幽会也不例外。抑或火神赫菲斯托斯因类似的事情而将战神阿瑞斯与爱神阿芙洛狄特牢牢锁在一起的故事呢？

Indeed, he said, I am strongly of opinion that they ought not to hear that sort of thing.

阿：的确，我坚决认为，年轻人不应听到此类事情。

But any deeds of endurance which are done or told by famous men, these they ought to see and hear; as, for example, what is said

in the verses, 'He smote his breast, and thus reproached his heart, Endure, my heart; far worse hast thou endured!'

苏：但是，关于表现著名人物坚忍自律的言辞和事迹，则是年轻人应该多听多看的，例如以下诗句：“他捶打胸膛，悔恨自责，我的心，忍耐吧。再大的苦难，你也已经忍受！”

Certainly, he said.

阿：理应如此。

In the next place, we must not let them be receivers of gifts or lovers of money.

苏：再者，我们绝不会允许他们收受贿赂，贪爱钱财。

Certainly not.

阿：绝不允许。

Neither must we sing to them of 'Gifts persuading gods, and persuading reverend kings.' Neither is Phoenix, the tutor of Achilles, to be approved or deemed to have given his pupil good counsel when he told him that he should take the gifts of the Greeks and

assist them; but that without a gift he should not lay aside his anger. Neither will we believe or acknowledge Achilles himself to have been such a lover of money that he took Agamemnon's gifts, or that when he had received payment he restored the dead body of Hector, but that without payment he was unwilling to do so.

苏：我们也决不可对他们吟唱“贡品上可打动诸神，下可打动高贵的王者。”我们更不能赞成阿喀琉斯之师福尼克斯对学生的忠告之词：他劝说阿喀琉斯接受希腊人的礼物并助他们一臂之力，同时表示若阿喀琉斯收不到礼物，即便怒气难消，也是合乎情理的。同时，我们也不会相信或承认，阿喀琉斯本人竟然会如此贪财，不仅拿走属于希腊主帅阿伽门农的财物，还在收到赎金之后才归还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的尸体，若无赎金则拒不归还。

Undoubtedly, he said, these are not sentiments which can be approved.

阿：毫无疑问，不可接受此类思想。

Loving Homer as I do, I hardly like to say that in attributing these feelings to Achilles, or in believing that they are truly attributed to him, he is guilty of downright impiety. As little can I believe the narrative of his insolence to Apollo, where he says, 'Thou hast wronged me, O far-darter, most abominable of deities. Verily I would be even with thee, if I had only the power;' or his insubordination to the river-god, on whose divinity he is ready to lay hands; or his offering to the dead Patroclus of his own hair, which had been previously dedicated to the other river-god

Spercheius, and that he actually performed this vow; or that he dragged Hector round the tomb of Patroclus, and slaughtered the captives at the pyre; of all this I cannot believe that he was guilty, any more than I can allow our citizens to believe that he, the wise Cheiron's pupil, the son of a goddess and of Peleus who was the gentlest of men and third in descent from Zeus, was so disordered in his wits as to be at one time the slave of two seemingly inconsistent passions, meanness, not untainted by avarice, combined with overweening contempt of gods and men.

苏：出于对荷马的爱戴，我宁愿保持缄默，但又不得不说的是，他将此类情感归之于阿喀琉斯，并认为阿喀琉斯果真如此作为，明显有着亵渎神明之嫌。同样，我也无法相信，史诗关于阿喀琉斯对太阳神阿波罗傲慢无礼的叙述，他说道："你愚弄了我，啊，远射手，可恶至极的神祇。假如我有足够的力量，一定要向你讨回公道"；无法相信他竟会无视河神的命令，准备对抗神的威严；无法相信他发誓，要将原本准备献给河神斯佩尔克伊奥的一绺头发割下祭奠帕特罗克洛斯的亡灵，并且果真履行了这一誓言；无法相信他拖曳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的尸体绕坟一周，在火葬堆前杀戮战俘。我不认为，他会犯下上述的种种过错。同时，我亦不会准许我们的国民相信，阿喀琉斯作为贤者马人凯隆喀戎的弟子，女神与宙斯之孙、最为仁德礼让的翩翩君子珀琉斯所生养的儿子，会神智混乱到同时受到两种看似毫无关联情感的摆布，并沾染上这两种恶习：卑鄙贪婪与傲视人神。"

You are quite right, he replied.

阿：言之有理。

And let us equally refuse to believe, or allow to be repeated, the tale of Theseus son of Poseidon, or of Peirithous son of Zeus, going forth as they did to perpetrate a horrid rape; or of any other hero or son of a god daring to do such impious and dreadful things as they falsely ascribe to them in our day: and let us further compel the poets to declare either that these acts were not done by them, or that they were not the sons of gods;—both in the same breath they shall not be permitted to affirm. We will not have them trying to persuade our youth that the gods are the authors of evil, and that heroes are no better than men—sentiments which, as we were saying, are neither pious nor true, for we have already proved that evil cannot come from the gods.

苏：同样，我们也不相信，并且不许人讲述，海神波塞冬之子忒修斯，或者宙斯之子珀里托俄斯，色胆包天劫持他人妻女的故事；不相信并且不许人讲述，任何其他英雄或神的儿子竟敢做出如此亵渎神灵的可怕之事，那只是今天的诗人对他们的造谣诬蔑。因此，我们还将进一步迫使诗人声明，此等事情并非这些人所为，或者声明做出此等事情者并非诸神之子。与此同时，严格禁止诗人肯定“英雄或神的儿子为非作歹”之说。我们不能听任他们向年轻人灌输错误的观点——诸神是邪恶的源头，而英雄则无异于普通人。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此类观点既不虔诚，也不真实，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恶并非产生于诸神。

Assuredly not.

阿：当然不能。

And further they are likely to have a bad effect on those who hear them; for everybody will begin to excuse his own vices when he is convinced that similar wickednesses are always being perpetrated by— 'The kindred of the gods, the relatives of Zeus, whose ancestral altar, the altar of Zeus, is aloft in air on the peak of Ida,' and who have 'the blood of deities yet flowing in their veins.' And therefore let us put an end to such tales, lest they engender laxity of morals among the young.

苏：另外，此类故事可能会给听者带来负面的影响，每个人都开始为自己开脱罪责，因为他确信神的后代一贯有着类似的恶行——“诸神之同宗，宙斯之近亲，其先祖祭坛，乃祭祀宙斯之神坛，处于巍峨的伊达山巅，”“其血管之中流淌着神祇的血液”。因此，我们要禁止此类故事，以免败坏青年的道德。

By all means, he replied.

阿：务必禁止。

But now that we are determining what classes of subjects are or are not to be spoken of, let us see whether any have been omitted by us. The manner in which gods and demigods and heroes and the world below should be treated has been already laid down.

苏：但当务之急，我们要决定，哪类主题应予保留，哪类应予禁止，看看是否有所遗漏。关于应该如何处理神祇、半神、英雄，以及冥界题材，我们已经做出了规定。

Very true.

阿：的确如此。

And what shall we say about men? That is clearly the remaining portion of our subject.

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制定人类准则呢？显然，这便是我们以下要讨论的内容。

Clearly so.

阿：显而易见。

But we are not in a condition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at present, my friend.

苏：但是，我的朋友，目前我们还无法对此作出回答。

Why not?

阿：为何不可？

Because, if I am not mistaken, we shall have to say that about men poets and story-tellers are guilty of making the gravest misstatements when they tell us that wicked men are often happy, and the good miserable; and that injustice is profitable when undetected, but that justice is a man's own loss and another's gain—these things we shall forbid them to utter, and command them to sing and say the opposite.

苏：因为要是我没弄错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诗人和故事叙述者犯下的最严重错误是，向我们宣扬恶人幸福而善人受苦难，宣扬不义之行只要能做得掩人耳目便是有益的，而正义则是损己而利人，所以我们必须禁止诗人和讲故事者发表类似言论，并且要求他们宣扬与此相反的观点。

To be sure we shall, he replied.

阿：完全同意。

But if you admit that I am right in this, then I shall maintain that you have implied the principle for which we have been all along contending.

苏：可是，你若认同我的观点，我将断言，你已经暗示了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准则。

I grant the truth of your inference.

阿：我承认，你的推论是正确的。

That such things are or are not to be said about men is a question which we cannot determine until we have discovered what justice is, and how naturally advantageous to the possessor, whether he seems to be just or not.

苏：只有我们发现了正义的本质，发现了正义对其所有者而言的重要意义，我们才能确定应该讲哪些话。

Most true, he said.

阿：言之有理。

Enough of the subjects of poetry: let us now speak of the style; and when this has been considered, both matter and manner will have been completely treated.

苏：关于诗歌主题的探讨，到此为止。现在让我们谈一下艺术风格。届时，我们将完成关于内容与形式的探讨。

I do not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 said Adeimantus.

阿：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Then I must make you understand; and perhaps I may be more intelligible if I put the matter in this way. You are aware, I suppose, that all mythology and poetry is a narration of events, either past, present, or to come?

苏：我一定会让你明白的。如果我换个方式讲，你可能就会更容易理解了。你知道，一切神话和诗歌，均是关于过去、现在或将来事件的叙述，对吗？

Certainly, he replied.

阿：当然。

And narration may be either simple narration, or imitation, or a union of the two?

苏：而叙事则可以是简单叙事，也可以是模仿叙事，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对吗？

That again, he said, I do not quite understand.

阿：对此，我又不甚理解了。

I fear that I must be a ridiculous teacher when I have so much difficulty in making myself apprehended. Like a bad speaker, therefore, I will not take the whole of the subject, but will break a piece off in illustration of my meaning. You know the first lines of the Iliad, in which the poet says that Chryses prayed Agamemnon to release his daughter, and that Agamemnon flew into a passion with him; whereupon Chryses, failing of his object, invoked the anger of the God against the Achaeans. Now as far as these lines, 'And he prayed all the Greeks, but especially the two sons of Atreus, the chiefs of the people,' the poet is speaking in his own person; he never leads us to suppose that he is any one else. But in what follows he takes the person of Chryses, and then he does all that he can to make us believe that the speaker is not Homer, but the aged priest himself. And in this double form he has cast the entire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occurred at Troy and in Ithaca and throughout the Odyssey.

苏：我连说明自己的观点都感到如此困难，要是作为教员，恐怕一定很荒谬可笑。正如一个口才拙劣的人，我并非通观全局，而是从局部入手来阐释我的观点。你知道，在史诗《伊利亚特》的开头，诗人讲到阿波罗的祭司克律塞斯恳求阿伽门农释放自己的女儿，阿伽门农勃然大怒，克律塞斯救女未果，从而引发神对希腊人的愤怒。就以下诗句而言，“他向所有的希腊人恳求，特别是向阿特柔斯的两个儿子——希腊人的统率恳求。”诗人在用自己的口吻讲话，我们绝不会把他错当作任何其他的人。但是，之后他便采用了克律塞斯的口吻，然后又尽力使我们认为叙述者并非诗人荷马，而是年迈的祭司本人。荷马以这种双重叙事形式记叙了发生在特洛伊城、伊萨卡岛以及贯穿奥德修斯返乡旅程的事件。

Yes.

阿：是的。

And a narrative it remains both in the speeches which the poet recites from time to time and in the intermediate passages?

苏：叙事不仅存在于诗人不时吟诵的言论之中，而且存在于穿插其间的语段之中，对吗？

Quite true.

阿：确实如此。

But when the poet speaks in the person of another, may we not say that he assimilates his style to that of the person who, as he informs you, is going to speak?

苏：但是，当诗人以他人的口吻讲话时，我们是否可以说，他使自己的风格与故事中的讲话者相似呢？

Certainly.

阿：当然可以。

And this assimilation of himself to another, either by the use of voice or gesture, is the imitation of the person whose character he assumes?

苏：这种通过声音或姿态模仿他人的行为，是诗人对假想人物的模仿，对吗？

Of course.

阿：当然。

Then in this case the narrative of the poet may be said to proceed by way of imitation?

苏：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说诗人的叙事是通过模仿来实现的，对吗？

Very true.

阿：甚是有理。

Or, if the poet everywhere appears and never conceals himself, then again the imitation is dropped, and his poetry becomes simple narration. However, in order that I may make my meaning quite clear, and that you may no more say, 'I don't understand,' I will show how the change might be effected. If Homer had said, 'The priest came, having his daughter's ransom in his hands, supplicating the Achaeans, and above all the kings;' and then if, instead of speaking in the person of Chryses, he had continued in his own person, the words would have been, not imitation, but simple narration. The passage would have run as follows (I am no poet, and therefore I drop the metre), 'The priest came and prayed the gods on behalf of the Greeks that they might capture Troy and return safely home, but begged that they would give him back his daughter, and take the ransom which he brought, and respect the God. Thus he spoke, and the other Greeks revered the priest and assented. But Agamemnon was wroth, and bade him depart and not come again, lest the staff and chaplets of the God should be of no avail to him—the daughter of Chryses should not be released, he said—she should grow old with him in Argos. And then he told him to go away and not to provoke him, if he intended to get home unscathed. And the old man went away in fear and silence, and, when he had left the camp, he called upon Apollo by his many names, reminding him of everything which he had done pleasing to him, whether in building his temples, or in offering sacrifice, and praying that his good deeds might be returned to him, and that the Achaeans might expiate his tears by the arrows of the god,'—and so on. In this way the whole becomes simple narrative.

苏：抑或当诗人无所不在，从不掩饰自己的身份，那么他便完全撇开了模仿，诗歌便成了简单叙事。不过，为了清楚明白地表达我的思想，使你不再感到费解，我将演示一下由此引发的变化。比如，荷

马说，“祭司手里拿着救女儿的赎金来了，苦苦哀求希腊人，特别是希腊的国王们，”接着他没有采用克律塞斯的口吻，仍旧用诗人自己的语气讲话，那么这时所说的话，便不是模仿，而是简单叙事。该段的叙述应该是这样的（我并无诗才，故而不考虑韵律）：“祭司来了，代表希腊人向神灵们祈祷，保佑他们攻占特洛伊城，平安返回家园，同时祭司乞求希腊人把女儿归还自己，接受他带来的赎金，以示对神明的敬意。听了祭司的一席话，希腊人纷纷向他致敬，表示同意他的请求。但是，阿伽门农却怒不可遏，命他离开，再莫回来，否则就连祭司的节杖与神冠也救不了他，并且说，克律塞斯的女儿是不会被释放的——她将与自己终老于阿尔戈城。然后，他威胁说，如果祭司想毫发无损地回到家，就马上离开，别激怒他。老人默默地离去，惊恐万状。他走出军营，用阿波罗所有名号叫他，提醒阿波罗自己曾为取悦他所做过的每件事，诸如为之修建神庙，时时供奉，并且祈祷神明回报他的善行，祈祷神明利用其神箭让希腊人以鲜血来抵偿他的眼泪，”等等诸如此类。这样，通篇诗歌都变成简单叙事。

I understand, he said.

阿：我明白了。

Or you may suppose the opposite case—that the intermediate passages are omitted, and the dialogue only left.

苏：或者不妨假定情况正好相反——即省去中间的片段，而只留下对话部分。

That also, he said, I understand; you mean, for example, as in

tragedy.

阿：那我也懂。您指的是像在悲剧里那样。

You have conceived my meaning perfectly; and if I mistake not, what you failed to apprehend before is now made clear to you, that poetry and mythology are, in some cases, wholly imitative—instances of this are supplied by tragedy and comedy; there is likewise the opposite style, in which the poet is the only speaker—of this the dithyramb affords the best exampl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is found in epic, and in several other styles of poetry. Do I take you with me?

苏：你已经完全领会了我的意思。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之前感到费解的问题，现在已经弄明白了，即有时诗歌和神话，完全采用模仿叙事，如悲剧和喜剧；同样，有时正相反，诗人是唯一的叙述者，其最好的例子就是酒神赞歌；而两种叙事方式的结合，则可以在史诗等多种诗歌体裁中找到。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

Yes, he said; I see now what you meant.

阿：能，我现在知道你当初的意思了。

I will ask you to remember also what I began by saying, that we had done with the subject and might proceed to the style.

苏：记得我起初说过，我们已经探讨完关于主题的问题，接下来要着手研究风格问题，对吗？

Yes, I remember.

阿：对，我记得。

In saying this, I intended to imply that we must come to an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mimetic art,—whether the poets, in narrating their stories, are to be allowed by us to imitate, and if so, whether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if the latter, in what parts; or should all imitation be prohibited?

苏：我如此说，意在表明我们必须对这种模仿艺术达成共识：我们是否允许诗人在故事叙述过程中运用模仿？如果我们允许，那么是允许通篇运用还是部分运用？如果是允许部分运用，那么在哪些部分可以运用？如果不允许使用模仿，那么是否应该要一律禁止使用模仿？

You mean, I suspect, to ask whether tragedy and comedy shall be admitted into our State?

阿：我猜，您想问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准许悲剧和喜剧这两种风格的作品进入城邦，对吗？

Yes, I said; but there may be more than this in question: I really do not know as yet, but whither the argument may blow, thither we go.

苏：对，但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还不止于此：至今为止，我仍不甚清楚，但不妨让辩论来决定我们何去何从。

And go we will, he said.

阿：同意。

Then, Adeimantus, let me ask you whether our guardians ought to be imitators; or rather, has not this question been decided by the rule already laid down that one man can only do one thing well, and not many; and that if he attempt many, he will altogether fail of gaining much reputation in any?

苏：那么，阿得曼托斯，请问我们的守卫者是否应该模仿他人，抑或更确切地说，我们之前已规定一个人只能专精于一种技能，不能一心多用，倘若他贪多求全，终归不会在任何一方面博得声名，那么这是否就已经决定了该问题的答案？

Certainly.

阿：无庸置疑。

And this is equally true of imitation; no one man can imitate many things as well as he would imitate a single one?

苏：这一规定同样也适用于模仿。任何人在模仿多样事物之时，都不能如专心模仿一个事物那般出色，对吗？

He cannot.

阿：对。

Then the same person will hardly be able to play a serious part in life,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be an imitator and imitate many other parts as well; for even when two species of imitation are nearly allied, the same persons cannot succeed in both, as, for example, the writers of tragedy and comedy—did you not just now call them imitations?

苏：那么，同一个人在履行严肃职责时，不能同时模仿其他行当，更不能模仿多个不同行当；即使两种模仿行为近乎同属一类，同一个人也无法做到同时胜任二者，比如作家从事悲剧以及喜剧的创作——你刚刚不是也将之称为模仿吗？

Yes, I did; and you are right in thinking that the same persons cannot succeed in both.

阿：我的确如此说过。我赞同你的观点，人们无法同时胜任两项职责。

Any more than they can be rhapsodists and actors at once?

苏：正如他们无法集诗人与演员于一身，对吗？

True.

阿：对。

Neither are comic and tragic actors the same; yet all these things are but imitations.

苏：演员亦不能既演悲剧又演喜剧。然而，这一切均为模仿。

They are so.

阿：的确如此。

And human nature, Adeimantus, appears to have been coined into yet smaller pieces, and to be as incapable of imitating many things well, as of performing well the actions of which the

imitations are copies.

苏：阿得曼托斯，人的自然禀赋似乎较为有限，不善于模仿多种事情，亦不善于执行模仿行为本身。

Quite true, he replied.

阿：此言极是。

If then we adhere to our original notion and bear in mind that our guardians, setting aside every other business, are to dedicate themselves wholly to the maintenance of freedom in the State, making this their craft, and engaging in no work which does not bear on this end, they ought not to practise or imitate anything else; if they imitate at all, they should imitate from youth upward only those characters which are suitable to their profession—the courageous, temperate, holy, free, and the like; but they should not depict or be skilful at imitating any kind of illiberality or baseness, lest from imitation they should come to be what they imitate. Did you never observe how imitations, beginning in early youth and continuing far into life, at length grow into habits and become a second nature, affecting body, voice, and mind?

苏：如果我们坚持最初的看法，即我们城邦的守卫者应该心无旁骛，致力于维护城邦自由的事业，以之为职业，不从事任何与此目的无关的工作，那么他们就不可从事或模仿任何其他的行当；如果他们真要模仿，他们应该从青年时代起便模仿只与他们职业相称的品质

——英勇无畏、自我克制、德高望重、宽宏大量，诸如此类。但是，他们却不应描绘或者精于模仿任何狭隘卑劣的品性，以免在模仿中受到狭隘卑劣品性潜移默化的影响。你难道从未注意过，模仿如何始于早年生活，伴随着人们走过很长的人生旅程，最终形成习惯，进而成为人们本性的一部分，影响人的躯体、声音和思想吗？

Yes, certainly, he said.

阿：的确如此。

Then, I said, we will not allow those for whom we profess a care and of whom we say that they ought to be good men, to imitate a woman, whether young or old, quarrelling with her husband, or striving and vaunting against the gods in conceit of her happiness, or when she is in affliction, or sorrow, or weeping; and certainly not one who is in sickness, love, or labour.

苏：因此，我们将不会容许，那些我们对之关爱有加并寄予厚望的人，去模仿老少妇人与丈夫斗嘴，或者模仿她们在得意忘形之际与神明争竞并向神明夸口，或者模仿她们遭遇不幸、悲伤或痛哭哀号之状，当然也不容许模仿处于病痛、恋爱和分娩之中的妇女。

Very right, he said.

阿：言之有理。

Neither must they represent slaves, male or female, performing the offices of slaves?

苏：他们切不可模仿男女奴隶，做奴隶的分内之事，对吗？

They must not.

阿：对。

And surely not bad men, whether cowards or any others, who do the reverse of what we have just been prescribing, who scold or mock or revile one another in drink or out of drink, or who in any other manner sin against themselves and their neighbours in word or deed, as the manner of such is. Neither should they be trained to imitate the action or speech of men or women who are mad or bad; for madness, like vice, is to be known but not to be practised or imitated.

苏：当然，他们亦不可模仿恶劣之人，无论是胆小怯懦者，还是所有其他与我们刚才列举的品质相悖者。其拙劣之行，如或醉或醒相互斥责、嘲讽、谩骂，抑或以其他方式在言行上辱骂自己和他人，均不宜仿效。同时，亦不允许他们在言行上模仿疯狂不驯之人，因为疯狂犹如恶习，了解即可，切不可仿效实践。

Very true, he replied.

阿：深表赞同。

Neither may they imitate smiths or other artificers, or oarsmen, or boatswains, or the like?

苏：他们亦不可模仿铁匠之类的各种工匠，乃至船夫、水手长等等，对吗？

How can they, he said, when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apply their minds to the callings of any of these?

阿：既然他们不被准许从事任何其他行业，他们又怎会费心模仿呢？

Nor may they imitate the neighing of horses, the bellowing of bulls, the murmur of rivers and roll of the ocean, thunder, and all that sort of thing?

苏：此外，他们亦不可模仿马嘶牛吼、河流低吟、海浪咆哮，以及雷声轰鸣，诸如此类，对吗？

Nay, he said, if madness be forbidden, neither may they copy the behaviour of madmen.

阿：当然，既然疯人是被禁止存在的，那么他们也不可以模仿疯人之举。

You mean, I said, if I understand you aright, that there is one sort of narrative style which may be employed by a truly good man when he has anything to say, and that another sort will be used by a man of an opposite character and education.

苏：若是我理解得不错的话，你的意思是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叙述风格，一种为真正的贤良之人说话时使用，一种为品行学养皆与之相反者所运用。

And which are these two sorts? he asked.

阿：究竟是哪两种叙述风格呢？

Suppose, I answered, that a just and good man in the course of a narration comes on some saying or action of another good man,—I should imagine that he will like to personate him, and will not be ashamed of this sort of imitation: he will be most ready to play the part of the good man when he is acting firmly and wisely; in a less degree when he is overtaken by illness or love or drink, or has met with any other disaster. But when he comes to a character which is unworthy of him, he will not make a study of that; he will disdain such a person, and will assume his likeness, if at all, for a moment only when he is performing some good action; at other times he will be ashamed to play a part which he has never practised, nor will he

like to fashion and frame himself after the baser models; he feels the employment of such an art, unless in jest, to be beneath him, and his mind revolts at it.

苏：倘若正义贤良之人在叙述中说到良善者的言行，我可以设想他会极力模仿其音容声色，不以仿效之事为耻：他乐于模仿良善者的谨言慎行；而当对方为疾病、爱情、酒精或其他灾难所困扰之时，他便不是很情愿模仿了。但是，当他说到品行较差者时，他不屑于对之认真研究；他鄙视其人，只会在该人行善事时对其进行模仿，此外他既耻于扮演一个从未尝试的角色，又不愿以卑劣之辈为效法对象，除非是开玩笑，否则在他看来，效法此等人物，是有失身份的，并且令人厌恶的。

So I should expect, he replied.

阿：理当如此。

Then he will adopt a mode of narration such as we have illustrated out of Homer, that is to say, his style will be both imitative and narrative; but there will be very little of the former, and a great deal of the latter. Do you agree?

苏：于是，他将采纳一种我们以荷马史诗为例讲过的叙述方式，也就是说，他将综合运用模仿与叙述，且叙述远多于模仿。你同意吗？

Certainly, he said; that is the model which such a speaker must necessarily take.

阿：当然，此等叙述者必将会采用此种模式。

But there is another sort of character who will narrate anything, and, the worse he is, the more unscrupulous he will be; nothing will be too bad for him: and he will be ready to imitate anything, not as a joke, but in right good earnest, and before a large company. As I was just now saying, he will attempt to represent the roll of thunder, the noise of wind and hail, or the creaking of wheels, and pulleys, and the various sounds of flutes, pipes, trumpets, and all sorts of instruments: he will bark like a dog, bleat like a sheep, or crow like a cock; his entire art will consist in imitation of voice and gesture, and there will be very little narration.

苏：但是，另一种类型的叙述者，则会叙述任何事物，同时其个人品行愈差，就愈是肆无忌惮。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是需要避讳的。因而，他愿意模仿一切事物，不是聊博一笑，而是郑重其事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正如我刚才所说，他会力图模仿隆隆雷鸣、风声和冰雹声、嘎吱作响的车轮滑轮声，以及长笛、排箫、喇叭等五花八门的乐器发出的声响。他还会模仿犬吠、羊咩、鸡鸣。他的全部技艺都体现在对声音和姿态的模仿上，很少进行叙述。

That, he said, will be his mode of speaking.

阿：此类人的叙述方式必当如此。

These, then, are the two kinds of style?

苏：那么，这便是我们所说的两种叙述风格吗？

Yes.

阿：是的。

And you would agree with me in saying that one of them is simple and has but slight changes; and if the harmony and rhythm are also chosen for their simplicity, the result is that the speaker, if he speaks correctly, is always pretty much the same in style, and he will keep within the limits of a single harmony (for the changes are not great), and in like manner he will make use of nearly the same rhythm?

苏：如果我说，其中一种风格质朴，少有变化，倘若为这种质朴的叙述风格选择声调与节奏，其结果必然是讲话人在正常情况下风格一贯保持不变，声调较为单一（变化不大），同时其节奏也近乎相同，你会认同我的观点吗？

That is quite true, he said.

阿：确实如此。

Whereas the other requires all sorts of harmonies and all sorts of rhythms, if the music and the style are to correspond, because the style has all sorts of changes.

苏：然而，另一种风格则富于变化，因而为了使声音与风格协调一致，该风格就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声调和节奏。

That is also perfectly true, he replied.

阿：同样完全正确。

And do not the two styles, or the mixture of the two, comprehend all poetry, and every form of expression in words? No one can say anything except in one or other of them or in both together.

苏：这两种风格以及它们的混合体，难道不是涵盖了所有诗歌及各种文字表达方式吗？人们表情达意时必然要采用此两种风格之一，或者二者的混合体，难道不是吗？

They include all, he said.

阿：是的，它们涵盖一切。

And shall we receive into our State all the three styles, or one only of the two unmixed styles? or would you include the mixed?

苏：那么，我们的城邦会接纳所有三种风格吗？抑或仅限于前两种风格中的一种？抑或接受混合型风格？

I should prefer only to admit the pure imitator of virtue.

阿：我倾向于接纳纯粹模仿美德的风格。

Yes, I said, Adeimantus, but the mixed style is also very charming: and indeed the pantomimic, which is the opposite of the one chosen by you, is the most popular style with children and their attendants, and with the world in general.

苏：说得对，阿得曼托斯，可是混合型也是很受欢迎的，另外与你选择的风格完全相反的哑剧表演，则最为儿童及其陪护者，乃至广大民众所喜爱。

I do not deny it.

阿：我不否认。

But I suppose you would argue that such a style is unsuitable to our State, in which human nature is not twofold or manifold, for one man plays one part only?

苏：但我猜想，你会辩驳说，此种风格不适合于我们城邦，因为在我们城邦，每人只能扮演一个角色，人的禀赋并非双重或多重的，对吗？

Yes; quite unsuitable.

阿：对，相当不适合。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n our State, and in our State only, we shall find a shoemaker to be a shoemaker and not a pilot also, and a husbandman to be a husbandman and not a dicast also, and a soldier a soldier and not a trader also, and the same throughout?

苏：因此，在我们城邦，同时也仅限于我们城邦，鞋匠为纯粹的鞋匠，决不会兼职舵手；农夫为纯粹的农夫，决不会兼任审判官；士兵为纯粹的士兵，决不会兼做商人，以此类推，对吗？

True, he said.

阿：对。

And therefore when any one of these pantomimic gentlemen, who are so clever that they can imitate anything, comes to us, and makes a proposal to exhibit himself and his poetry, we will fall down and worship him as a sweet and holy and wonderful being; but we must also inform him that in our State such as he are not permitted to exist; the law will not allow them. And so when we have anointed him with myrrh, and set a garland of wool upon his head, we shall send him away to another city. For we mean to employ for our souls' health the rougher and severer poet or story-teller, who will imitate the style of the virtuous only, and will follow those models which we prescribed at first when we began the education of our soldiers.

苏：故而，一旦某位聪明睿智、能够模仿一切的哑剧表演家光临我们城邦，欲一展其才艺与诗学，我们将视之为可爱、神圣而美妙的人物，对其顶礼膜拜，敬爱有加。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告知他，像他这类人不可以生活在我们城邦——他们是为法律所禁止的。于是，我们用香料精油涂抹他的身体，为他戴上毛毡花环，将之礼送至其他城邦。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更为质朴严肃的诗人或讲故事者，他们将只效仿德行高洁者的风范，按照我们在讨论士兵教育问题时所制定的模式来说唱故事，从而保证我们身心的健康。

We certainly will, he said, if we have the power.

阿：倘若我们有权决断，必当依此行事。

Then now, my friend, I said, that part of music or literary

education which relates to the story or myth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finished; for the matter and manner have both been discussed.

苏：现在，我的朋友，音乐或文学教育中有关故事或神话的部分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相关的内容和形式问题都已得到讨论。

I think so too, he said.

阿：我有同感。

Next in order will follow melody and song.

苏：下面将要探讨的是关于旋律和歌曲的问题。

That is obvious.

阿：显然如此。

Every one can see already what we ought to say about them, if we are to be consistent with ourselves.

苏：如果我们的思想前后一致的话，那么我们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立场如何，想必诸位已经了然于胸。

SOCRATES-GLAUCON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格劳孔

I fear, said Glaucon, laughing, that the word 'every one' hardly includes me, for I cannot at the moment say what they should be; though I may guess.

格（笑）：恐怕我是例外吧，虽然我可能会猜出几分，但此刻却无法说出究竟。

At any rate you can tell that a song or ode has three parts—the words, the melody, and the rhythm; that degree of knowledge I may presuppose?

苏：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说一首歌或颂歌由三部分组成——歌词、旋律和节奏。我可否做出如此假定呢？

Yes, he said; so much as that you may.

格：对，你可以这样讲。

And as for the words, there will surely be no difference

between words which are and which are not set to music; both will conform to the same laws, and these have been already determined by us?

苏：就歌词而言，谱曲的歌词与非谱曲的歌词并无区别，二者同样都要遵从我们已经确立的规定，对吗？

Yes.

格：对。

And the melody and rhythm will depend upon the words?

苏：旋律与节奏将取决于歌词内容？

Certainly.

格：当然。

We were saying, when we spoke of the subject-matter, that we had no need of lamentation and strains of sorrow?

苏：在谈论主题内容之时，我们曾经说过，我们绝不需要哀歌和

伤感的抒情诗，对吗？

True.

格：对。

And which are the harmonies expressive of sorrow? You are musical, and can tell me.

苏：哪些是抒发悲伤之情的音乐？你精通音乐，能够告诉我的。

The harmonies which you mean are the mixed or tenor Lydian, and the full-toned or bass Lydian, and such like.

格：你所说的抒发悲情的音乐，是次中音的吕底亚调和低音的吕底亚调，以及类似的音乐。

These then, I said, must be banished; even to women who have a character to maintain they are of no use, and much less to men.

苏：这类曲调必须一并废弃，它们不仅无益于品行端正的妇女，更是不利于男子。

Certainly.

格：当然。

In the next place, drunkenness and softness and indolence are utterly unbecoming the character of our guardians.

苏：其次，醉酒、柔弱与怠惰，皆与我们守卫者的品行极不相称。

Utterly unbecoming.

格：极不相称。

And which are the soft or drinking harmonies?

苏：哪些是表达柔弱或是酗酒的音乐？

The Ionian, he replied, and the Lydian; they are termed 'relaxed.'

格：爱奥尼亚调和吕底亚调，二者均以“舒缓”著称。

Well, and are these of any military use?

苏：嗯，此类音乐有军事用途吗？

Quite the reverse, he replied; and if so the Dorian and the Phrygian are the only ones which you have left.

格：正相反。如此一来，就只剩多利亚调和弗里吉亚调了。

I answered: Of the harmonies I know nothing, but I want to have one warlike, to sound the note or accent which a brave man utters in the hour of danger and stern resolve, or when his cause is failing, and he is going to wounds or death or is overtaken by some other evil, and at every such crisis meets the blows of fortune with firm step and a determination to endure; and another to be used by him in times of peace and freedom of action, when there is no pressure of necessity, and he is seeking to persuade God by prayer, or man by instruction and admonition, or on the other hand, when he is expressing his willingness to yield to persuasion or entreaty or admonition, and which represents him when by prudent conduct he has attained his end, not carried away by his success, but acting moderately and wisel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nd acquiescing in the event. These two harmonies I ask you to leave; the strain of necessity and the strain of freedom, the strain of the unfortunate and the strain of the fortunate, the strain of courage, and the strain of temperance; these, I say, leave.

苏：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但我希望有一种用于军事的音乐，模仿勇敢者在种种危难时刻发之于歌喉的音符与节拍，展现出生死关头的坚定意志，以及在事业遭遇失败、英勇赴难，或面临其他灾难时迎接不幸命运的从容自若与坚忍不拔。另外，我还希望有一种音乐供勇敢者在和平与自由的时代使用。此时，他没有咄咄逼人的情势压力，努力以虔诚的祷告来感动神明，以劝勉教诲来说服他人，抑或从另一方面来说，他表示愿意接受他人的劝说、请求或忠告，表示他以审慎严谨而达到了目的，但并不以其成功而飘飘然，行事明智适度，默认接受命运安排。我请求你留下这两种曲调，即表达贫困和自由的曲调，表达不幸与幸运的曲调，以及表达勇气与节制的曲调。这些曲调，需要保留。

And these, he replied, are the Dorian and Phrygian harmonies of which I was just now speaking.

格：它们便是我所说的多利亚调和弗里吉亚调。

Then, I said, if these and these only are to be used in our songs and melodies, we shall not want multiplicity of notes or a panharmonic scale?

苏：假如我们的旋律与歌曲只采用此两种调子，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复杂的调子以及全音阶和声，对吗？

I suppose not.

格：似乎不需要。

Then we shall not maintain the artificers of lyres with three corners and complex scales, or the makers of any other many-stringed curiously-harmonised instruments?

苏：那么，我们便无需制造音阶复杂的三角形里拉琴的技师，以及制作其他新奇多弦乐器的工匠，对吗？

Certainly not.

格：当然。

But what do you say to flute-makers and flute-players? Would you admit them into our State when you reflect that in this composite use of harmony the flute is worse than all the stringed instruments put together; even the panharmonic music is only an imitation of the flute?

苏：可是，你对长笛的制造者和演奏者要说什么呢？当你认识到，长笛对曲调的复合利用，使之比所有弦乐器放在一起还要糟糕，就连多重和旋也不过是对长笛乐曲的模仿而已，你会允许其制造者和演奏者进入我们城邦吗？

Clearly not.

格：显然不会。

There remain then only the lyre and the harp for use in the city, and the shepherds may have a pipe in the country.

苏：这样，城邦之内可用的乐器只有里拉琴和竖琴，而乡下的牧羊人则可保留长笛。

That is surely the conclusion to be drawn from the argument.

格：由以上论证，必然得出如此结论。

The preferring of Apollo and his instruments to Marsyas and his instruments is not at all strange, I said.

苏：偏爱阿波罗及其乐器，而冷落玛尔叙阿斯及其乐器，这根本不足为奇。

Not at all, he replied.

格：根本不奇怪。

And so, by the dog of Egypt, we have been unconsciously purging the State, which not long ago we termed luxurious.

苏：这样，在埃及狗头人身的阿努比斯神庇佑下，不经意间我们已经在净化这座我们不久前还称之“奢华”的城邦了。

And we have done wisely, he replied.

格：此乃明智之举。

Then let us now finish the purgation, I said. Next in order to harmonies, rhythms will naturally follow, and they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same rules, for we ought not to seek out complex systems of metre, or metres of every kind, but rather to discover what rhythms are the expressions of a courageous and harmonious life; and when we have found them, we shall adapt the foot and the melody to words having a like spirit, not the words to the foot and melody. To say what these rhythms are will be your duty—you must teach me them, as you have already taught me the harmonies.

苏：那么，让我们先净化到这儿吧。在曲调之后，自然就是节奏了，而且节奏也要受到相同规定的制约，因为我们不是要找出复杂的格律体系，或者找寻出所有种类的格律，而是要发现哪些是表现英勇人生与和谐人生的节奏。一旦我们找到如此节奏，我们就要调整音步与音调，使之适应于表现类似精神风貌的歌词，而不是使歌词迁就音步与音调。告诉我哪些节奏可以表现上述主题，是你的职责所在——既然你已经教我有关曲调的知识，你也一定要向我传授节奏方面的知

识。

But, indeed, he replied, I cannot tell you. I only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three principles of rhythm out of which metrical systems are framed, just as in sounds there are four notes (i.e. the four notes of the tetrachord.) out of which all the harmonies are composed; that is an observation which I have made. But of what sort of lives they are severally the imitations I am unable to say.

格：但是，事实上，我却无能为力。我只知道，大约三个节奏原理奠定了格律体系的基础，正如乐音有四种，而所有的和音皆由此而生。这即是我的管窥之见。但是，至于它们各自所模仿的是哪种生活，我便不得而知了。

Then, I said, we must take Damon into our counsels; and he will tell us what rhythms are expressive of meanness, or insolence, or fury, or other unworthiness, and what are to be reserved for the expression of opposite feelings. And I think that I have an indistinct recollection of his mentioning a complex Cretic rhythm; also a dactylic or heroic, and he arranged them in some manner which I do not quite understand, making the rhythms equal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oot, long and short alternating; and, unless I am mistaken, he spoke of an iambic as well as of a trochaic rhythm, and assigned to them short and long quantities. Also in some cases he appeared to praise or censure the movement of the foot quite as much as the rhythm; or perhaps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for I am not certain what he meant. These matters, however, as I was saying, had better be referred to Damon himself,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ubject would be difficult, you know?

苏：这样，我们就必须向音乐家达蒙请教，他会告诉我们什么节奏表现卑劣行为，什么节奏表现傲慢无礼，什么节奏表现愤怒，什么节奏表现其他拙劣品行，哪些则是表现优秀品行的节奏而应予保留。我依稀记得，他曾说到过复杂的抑扬抑格律，以及长短格或英雄体。我不甚清楚他组织格律的方式，比如音步轻重音搭配和长短音交替形成节奏。我若是没有弄错，他还提到过抑扬格以及扬抑格，并配之以长音短音。另外，在有些情形之下，他对音步和格律或褒或贬，或者是褒贬兼而有之，所以我不敢确定他的用意所在。可见，弄清此问题实属不易。不过，正如我所说，最好是向达蒙本人请教此类事情。

Rather so, I should say.

格：我承认，确实如此。

But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seeing that grace or the absence of grace is an effect of good or bad rhythm.

苏：然而，我们不难发现，节奏的好坏可以决定曲子优美与否。

None at all.

格：的确如此。

And also that good and bad rhythm naturally assimilate to a

good and bad style; and that harmony and discord in like manner follow style; for our principle is that rhythm and harmony are regulated by the words, and not the words by them.

苏：同时，因为我们的基本准则是，节奏与曲调要适应歌词，而不是让歌词去迁就节奏与曲调，所以节奏的好坏自然取决于写作风格的好坏；曲调的和谐与否也取决于写作风格的好坏。

Just so, he said, they should follow the words.

格：的确，二者均需依从于歌词。

And will not the words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style depend on the temper of the soul?

苏：歌词与文风特点，难道不是由作者性情决定的吗？

Yes.

格：是的。

And everything else on the style?

苏：文风的其他方面呢？

Yes.

格：也如此。

Then beauty of style and harmony and grace and good rhythm depend on simplicity,—I mean the true simplicity of a rightly and nobly ordered mind and character, not that other simplicity which is only an euphemism for folly?

苏：那么，格调之美、和谐之美、优雅之美以及节奏之美，均取决于单纯质朴，——我指的是思想品性公正而高尚之人所具有的真正的纯真质朴，而并非愚蠢的代名词，对吗？

Very true, he replied.

格：很有道理。

And if our youth are to do their work in life, must they not make these graces and harmonies their perpetual aim?

苏：我们的青年若要履行其人生职责，那么他们是否有必要以优雅与和谐为其毕生追求的目标呢？

They must.

格：有必要。

And surely the art of the painter and every other creative and constructive art are full of them,—weaving, embroidery, architecture, and every kind of manufacture; also nature, animal and vegetable,—in all of them there is grace or the absence of grace. And ugliness and discord and inharmonious motion are nearly allied to ill words and ill nature, as grace and harmony are the twin sisters of goodness and virtue and bear their likeness.

苏：无疑，绘画等创造性、建设性的艺术都是优雅与和谐的具体体现，又如编织、刺绣、建筑，乃至各种制造工艺，连同大自然、动植物——万事万物之中，皆有优雅与粗鄙之分。丑陋、纷争与不和谐，与恶毒言辞与险恶用心联系在一起，正如优雅与和谐，是善良和美德的孪生姐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That is quite true, he said.

格：言之有理。

But shall our superintendence go no further, and are the poets only to be required by us to express the image of the good in their works, on pain, if they do anything else, of expulsion from our

State? Or is the same control to be extended to other artists, and are they also to be prohibited from exhibiting the opposite forms of vice and intemperance and meanness and indecency in sculpture and building and the other creative arts; and is he who cannot conform to this rule of ours to be prevented from practising his art in our State, lest the taste of our citizens be corrupted by him? We would not have our guardians grow up amid images of moral deformity, as in some noxious pasture, and there browse and feed upon many a baneful herb and flower day by day, little by little, until they silently gather a festering mass of corruption in their own soul. Let our artists rather be those who are gifted to discern the true nature of the beautiful and graceful; then will our youth dwell in a land of health, amid fair sights and sounds, and receive the good in everything; and beauty, the effluence of fair works, shall flow into the eye and ear, like a health-giving breeze from a purer region, and insensibly draw the soul from earliest years into likeness and sympathy with the beauty of reason.

苏：但我们的监督之责是否仅限于此，即仅仅要求诗人在其作品中塑造良好的形象，违者以驱逐出城邦论处呢?抑或我们是否可以对其他艺术家提出同样的要求，禁止他们在雕塑、建筑等艺术创作中表现与之相对立的邪恶、放荡、卑鄙与龌龊形象呢？同时，对于不遵守此项规定者，我们城邦是否要取消其从业资格，以免公民判断力受到不良影响呢？我们不能让守卫者在充斥着道德畸形图像的环境中成长，正如在一些有毒牧场，牛羊啃食大量有害花草，日复一日，于一点一滴之间，终至毒气攻心而不自觉。我们的艺术家应善于辨识美丽与优雅真谛，这样我们的青年便生活于道德健全的国度，目之所及，耳之所闻，无不尽善尽美。优秀作品中的美，涓涓流淌，为人们带来视听享受，犹如一阵来自净土有益健康的轻风，不知不觉间使人们自幼濡染理性之美。

There can be no nobler training than that, he replied.

格：最好的教育，莫过于此。

And therefore, I said, Glaucon, musical training is a more potent instrument than any other, because rhythm and harmony find their way into the inward places of the soul, on which they mightily fasten, imparting grace, and making the soul of him who is rightly educated graceful, or of him who is ill-educated ungraceful; and also because he who has received this true education of the inner being will most shrewdly perceive omissions or faults in art and nature, and with a true taste, while he praises and rejoices over and receives into his soul the good, and becomes noble and good, he will justly blame and hate the bad, now in the days of his youth, even before he is able to know the reason why; and when reason comes he will recognise and salute the friend with whom his education has made him long familiar.

苏：因此，格劳孔，音乐训练比其他任何教育手段都更为有效，因为节奏与乐调可以达到灵魂的深处，并牢牢扎根，其优雅气息赋予受到良好教育者以优雅风度；相反，音乐教育缺失者，则举止粗鄙。因为他接受了这种心灵世界的真正教育，他具有正确的判断力，会最为敏锐地察觉到自然或人为的缺失或疏忽。同时，他称赞并且喜欢美好的事物，敞开胸怀接纳它，因此他成长为高贵而善良的人，在其人生的初期，甚至懵懂无知之时便会维护正义，疾恶如仇；随着思想的成熟，他会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向他致敬。

Yes, he said, I quite agree with you in thinking that our youth

should be trained in music and on the grounds which you mention.

格：是的，我十分赞同你关于青年应接受音乐教育的观点及理由。

Just as in learning to read, I said, we were satisfied when we knew the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which are very few, in all their recurring sizes and combinations; not slighting them as unimportant whether they occupy a space large or small, but everywhere eager to make them out; and not thinking ourselves perfect in the art of reading until we recognise them wherever they are found:

苏：正如我们学习阅读的过程，字母的数目固然不多，但是我们了解所有字母组合后就会感到满足；不管它们占据的空间是大是小，我们都对之一视同仁；不论它们出现在哪里，我们都热切地将之读出。直到我们能够在任何语境下读出它们，我们才可心满意足，认为自己阅读技艺已精。

True—

格：的确如此。

Or, as we recognise the reflection of letters in the water, or in a mirror, only when we know the letters themselves; the same art and study giving us the knowledge of both:

苏：或者，只有当我们认识字母本身时候，我们才可以认识字母在水中或在镜中的映像。于是，相同的艺术和研究使我们认识到本相与映像。

Exactly—

格：完全正确。

Even so, as I maintain, neither we nor our guardians, whom we have to educate, can ever become musical until we and they know the essential forms of temperance, courage, liberality, magnificence, and their kindred, as well as the contrary forms, in all their combinations, and can recognise them and their images wherever they are found, not slighting them either in small things or great, but believing them all to be within the sphere of one art and study.

苏：即便如此，我坚持认为，我们与我们的守卫者，只有了解了节制、勇气、博大胸怀、高尚情操的基本形式、类似形式与相反形式，以及它们的所有组合，并能在任何地方认出它们的本相与映像，才可以具备音乐修养。无论事情大小，只要是关系到此类品质，我们就绝不含糊，坚信它们同属于一个艺术研究范畴。

Most assuredly.

格：毋庸置疑。

And when a beautiful soul harmonizes with a beautiful form, and the two are cast in one mould, that will be the fairest of sights to him who has an eye to see it?

苏：当美妙的思想配上优美的形式，二者合而为一，它将成为举世公认的最美丽的风景，对吗？

The fairest indeed.

格：的确最美。

And the fairest is also the loveliest?

苏：最美者亦是最可爱者吗？

That may be assumed.

格：可以如此假设。

And the man who has the spirit of harmony will be most in love with the loveliest; but he will not love him who is of an inharmonious soul?

苏：拥有和谐心灵者将以最可爱者为至爱；但他不会爱心灵不和谐者，对吗？

That is true, he replied, if the deficiency be in his soul; but if there be any merely bodily defect in another he will be patient of it, and will love all the same.

格：如果心灵存在缺陷，其情形必然如此。但是，假如对方只存在身体上的缺陷，那么他是可以包容的，而且感情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I perceive, I said, that you have or have had experiences of this sort, and I agree. But let me ask you another question: Has excess of pleasure any affinity to temperance?

苏：我感觉，你似曾有过类似的经历。我赞成你的观点。但让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过度享乐是否近似于克己自制？

How can that be? he replied; pleasure deprives a man of the use of his faculties quite as much as pain.

格：这怎么可能呢！享乐与痛苦一样，使人丧失身体机能。

Or any affinity to virtue in general?

苏：抑或享乐接近于一般意义的美德吗？

None whatever.

格：它不接近任何美德。

Any affinity to wantonness and intemperance?

苏：抑或享乐近似于过度纵欲吗？

Yes, the greatest.

格：是的，最为近似。

And is there any greater or keener pleasure than that of sensual love?

苏：是否存在着比性爱更美好、更强烈的快感？

No, nor a madder.

格：不存在。亦不存在更为疯狂的快感。

Whereas true love is a love of beauty and order—temperate and harmonious?

苏：而真正之爱是一种对美与秩序的爱——和谐而又有节制，对吗？

Quite true, he said.

格：确实如此。

Then no intemperance or madness should be allowed to approach true love?

苏：那么，真爱应该远离放纵与疯狂吗？

Certainly not.

格：当然。

Then mad or intemperate pleasure must never be allowed to come near the lover and his beloved; neither of them can have any part in it if their love is of the right sort?

苏：那么，疯狂或者纵欲的快感千万不可靠近相爱的人们。如果他们的爱是真爱，那么他们就绝不可以沾染爱欲吗？

No, indeed, Socrates, it must never come near them.

格：绝对不可，苏格拉底，爱欲千万不可靠近他们。

Then I suppose that in the city which we are founding you would make a law to the effect that a friend should use no other familiarity to his love than a father would use to his son, and then only for a noble purpose, and he must first have the other's consent; and this rule is to limit him in all his intercourse, and he is never to be seen going further, or, if he exceeds, he is to be deemed guilty of coarseness and bad taste.

苏：那么我想，你会在我们创建的城邦制定一项法律，大意是：朋友与其喜爱之人的亲密行为，不应超出父子之间的亲密方式，其目的必须是高尚的，同时他首先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此规定旨在限制他的交往行为，禁止他有任何逾越之举。或者说，他一旦有所逾越，将被视为粗俗和低级趣味。

I quite agree, he said.

格：十分赞同。

Thus much of music, which makes a fair ending; for what should be the end of music if not the love of beauty?

苏：至此，我们就音乐的讨论可以圆满地结束了，因为音乐之目的若非激发人们对美的热爱，又会是什么呢？

I agree, he said.

格：赞同。

After music comes gymnastic, in which our youth are next to be trained.

苏：音乐之后，当是体育。我们的青年下一步将要接受体育训练。

Certainly.

格：当然。

Gymnastic as well as music should begin in early years; the training in it should be careful and should continue through life. Now my belief is,—and this is a matter upon which I should like to have your opinion in confirmation of my own, but my own belief is,

—not that the good body by any bodily excellence improves the soul, but, on the contrary, that the good soul, by her own excellence, improves the body as far as this may be possible. What do you say?

苏：体育与音乐训练应该始于幼年；训练当认真刻苦，并且终其一生。但是我个人认为：健康的体魄并不能以其完美体格而促进心灵的完善；相反的，美好的心灵却可以凭借自身的完美来尽可能地提高身体素质。现在我想就此问题，听一下你的意见，希望得到你的赞同，你怎么说？

Yes, I agree.

格：我赞同。

Then, to the mind when adequately trained, we shall be right in handing over the more particular care of the body; and in order to avoid prolixity we will now only give the general outlines of the subject.

苏：那么，我们在对心灵进行充分训练后，将明智地让心灵承担起悉心照料身体的责任；为了避免罗嗦，我们现在将提纲挈领地讲一下该问题。

Very good.

格：很好。

That they must abstain from intoxication has been already remarked by us; for of all persons a guardian should be the last to get drunk and not know where in the world he is.

苏：我们已经说过守卫者切勿贪杯。所有人中守卫者最不宜饮酒过量，醉意朦胧不知身在何处。

Yes, he said; that a guardian should require another guardian to take care of him is ridiculous indeed.

格：是的，身为守卫者，却要求别的守卫者来照顾自己，实在非常荒谬。

But next, what shall we say of their food; for the men are in training for the greatestcontest of all—are they not?

苏：下面，关于他们的饮食，我们又该作何规定呢？这些人接受训练，以应对最惨烈的战争，不是吗？

Yes, he said.

格：是的。

And will the habit of body of our ordinary athletes be suited to them?

苏：那么，普通运动员的体质特点，会适合于守卫者吗？

Why not?

格：有何不可？

I am afraid, I said, that a habit of body such as they have is but a sleepy sort of thing, and rather perilous to health. Do you not observe that these athletes sleep away their lives, and are liable to most dangerous illnesses if they depart, in ever so slight a degree, from their customary regimen?

苏：大概他们具有某种嗜睡体质，会对健康造成相当大的危害。你没注意到吗？一旦这些运动员生活规律被打破，哪怕只是稍微发生改变，他们就会整日昏睡不醒，还容易患上重大疾病。

Yes, I do.

格：是的，我注意到了。

Then, I said, a finer sort of training will be required for our warrior athletes, who are to be like wakeful dogs, and to see and hear with the utmost keenness; amid the many changes of water and also of food, of summer heat and winter cold, which they will have to endure when on a campaign, they must not be liable to break down in health.

苏：可见，训练我们的精兵强将，需要采用更好的方法，使他们具有犬一般的清醒警觉，疾于视而敏于听；训练期间，要不断变换他们的饮食，使他们经历严寒酷暑的考验。这些都是他们在战争环境下必须要承受的，从而确保他们的健康不易受损。

That is my view.

格：这便是我的看法。

The really excellent gymnastic is twin sister of that simple music which we were just now describing.

苏：此种卓绝非凡的体育训练，与我们所描述的素朴音乐，如孪生姐妹，有异曲同工之妙。

How so?

格；何以见得？

Why, I conceive that there is a gymnastic which, like our music, is simple and good; and especially the military gymnastic.

苏：哦，我设想，存在一种体育，如同我们的音乐一般，朴素而美好，尤其是军事训练。

What do you mean?

格：此话怎讲？

My meaning may be learned from Homer; he, you know, feeds his heroes at their feasts, when they are campaigning, on soldiers' fare; they have no fish, although they are on the shores of the Hellespont, and they are not allowed boiled meats but only roast, which is the food most convenient for soldiers, requiring only that they should light a fire, and not involving the trouble of carrying about pots and pans.

苏：我不妨用荷马史诗来说明自己的看法。你知道，在荷马史诗中，英雄们于行军作战期间筵席上的吃食，与士兵无异。虽然他们是在赫勒斯滂海岸，但其餐桌上却并没有鱼，另外他们不吃煮熟的肉，只吃烤熟的，因为烤肉，对士兵来说，是最方便的，他们只要燃起一堆火即可，避免了军旅之中携带锅碗瓢盆的麻烦。

True.

格：确有此事。

And I can hardly be mistaken in saying that sweet sauces are nowhere mentioned in Homer. In proscribing them, however, he is not singular; all professional athletes are well aware that a man who is to be in good condition should take nothing of the kind.

苏：我几乎可以很确定地讲，荷马史诗中从未提及甘美的调味汁。然而，荷马对调味汁的排斥，不足为奇；所有职业运动员都知道，要保持状况良好，就绝对不应该食用此类东西。

Yes, he said; and knowing this, they are quite right in not taking them.

格：是的，他们明白其中的道理，并能戒绝美食，十分明智。

Then you would not approve of Syracusan dinners, and the refinements of Sicilian cookery?

苏：那么，你不会赞赏叙拉古晚餐和西西里烹饪的精致吧？

I think not.

格：我想我不会。

Nor, if a man is to be in condition, would you allow him to have a Corinthian girl as his fair friend?

苏：同样道理，如果一个人想要强身健体，你也不会允许他找个科林斯女郎做情人吧？

Certainly not.

格：当然不会。

Neither would you approve of the delicacies, as they are thought, of Athenian confectionary?

苏：那么，你也不会批准他享用公认的美食——雅典甜品吧？

Certainly not.

格：当然不会。

All such feeding and living may be rightly compared by us to melody and song composed in the panharmonic style, and in all the

rhythms.

苏：不妨让我们将所有这些精美饮食、奢华生活，与那些多音调、多节奏的旋律和歌曲等量齐观。

Exactly.

格：完全正确。

There complexity engendered licence, and here disease; whereas simplicity in music was the parent of temperance in the soul; and simplicity in gymnastic of health in the body.

苏：乐歌之复杂催生放纵，而饮食之精美则招致疾病；反之，素朴的音乐为克己自律之母，而简易之体育则为身体康健之道。

Most true, he said.

格：千真万确。

But when intemperance and diseases multiply in a State, halls of justice and medicine are always being opened; and the arts of the doctor and the lawyer give themselves airs, finding how keen is the interest which not only the slaves but the freemen of a city take

about them.

苏：但当放纵与疾病在城邦中泛滥，法庭与诊所遍地皆是；医生和律师意识到，自己受到奴隶乃至自由民的强烈关注，自恃本领而神气十足。

Of course.

格：当然。

And yet what greater proof can there be of a bad and disgraceful state of education than this, that not only artisans and the meaner sort of people need the skill of first-rate physicians and judges, but also those who would profess to have had a liberal education? Is it not disgraceful, and a great sign of want of good-breeding, that a man should have to go abroad for his law and physic because he has none of his own at home, and must therefore surrender himself into the hands of other men whom he makes lords and judges over him?

苏：求助于一流医生和法官的，不仅包括工匠和身份更为卑微者，甚至还包括自称受过人文教育的人。然而，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教育处于何等拙劣与可耻的状态？有人因在国内得不到法律和医学方面的帮助，而只能求诸海外，并且必须听凭他人摆布和处置。这难道不可耻吗？这难道不是缺乏良好教养的一个突出表现吗？

Of all things, he said, the most disgraceful.

格：最为可耻之事。

Would you say 'most,' I replied, when you consider that there is a further stage of the evil in which a man is not only a life-long litigant, passing all his days in the courts, either as plaintiff or defendant, but is actually led by his bad taste to pride himself on his litigiousness; he imagines that he is a master in dishonesty; able to take every crooked turn, and wriggle into and out of every hole, bending like a withy and getting out of the way of justice: and all for what?—in order to gain small points not worth mentioning, he not knowing that so to order his life as to be able to do without a napping judge is a far higher and nobler sort of thing. Is not that still more disgraceful?

苏：你会称之为“最”吗？试想当邪恶进一步蔓延之际，有人终其一生整日在法院争讼不已，或为原告或为被告，并且大言不惭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自恃骗术高明，机关算尽，步步小心经营，狡黠地与正义周旋：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无非是为了谋取不值一提的蝇头小利。殊不知，过一种没有打盹法官的生活，方能更彰显人格的高尚，更有尊严。这岂不是更为可耻？

Yes, he said, that is still more disgraceful.

格：是的，这更为可耻。

Well, I said, and to require the help of medicine, not when a wound has to be cured, or on occasion of an epidemic, but just because, by indolence and a habit of life such as we have been describing, men fill themselves with waters and winds, as if their bodies were a marsh, compelling the ingenious sons of Asclepius to find more names for diseases, such as flatulence and catarrh; is not this, too, a disgrace?

苏：嗯，求医问药，既不是为了疗治伤口，也不是因为发生了流行病，而只是因为怠惰和我们前面描述过的奢华生活习惯。男子酒肉穿肠过，自以为身体是沼泽地，对潮湿与毒气无所畏惧，以至于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天才后裔们要创造出更多的疾病名称，如肠胃胀气和粘膜炎。这岂不是又一件可耻之事吗？

Yes, he said, they do certainly give very strange and newfangled names to diseases.

格：是的，他们给疾病起的名字，的确很新奇特别。

Yes, I said, and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ere were any such diseases in the days of Asclepius; and this I infer from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 hero Eurypylus, after he has been wounded in Homer, drinks a posset of Pramnian wine well besprinkled with barley-meal and grated cheese, which are certainly inflammatory, and yet the sons of Asclepius who were at the Trojan war do not blame the damsel who gives him the drink, or rebuke Patroclus, who is treating his case.

苏：是的，我认为，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时代，这些疾病是不存在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荷马史诗中英雄欧律皮洛斯负伤后喝的是掺入大麦和芝士粉的普拉姆尼牛奶甜酒，虽然大麦和芝士粉可以引起炎症，但是一同参加特洛伊之战的医神儿子们，并未斥责端给他这杯酒的少女，也没有责怪为他治疗的帕特洛克罗斯。

Well, he said, that was surely an extraordinary drink to be given to a person in his condition.

格：嗯，这确实很特别，竟然给伤成这样的人喝如此东西。

Not so extraordinary, I replied, if you bear in mind that in former days, as is commonly said, before the time of Herodicus, the guild of Asclepius did not practise our present system of medicine, which may be said to educate diseases. But Herodicus, being a trainer, and himself of a sickly constitution, by a combination of training and doctoring found out a way of torturing first and chiefly himself, and secondly the rest of the world.

苏：这并非很特别，试想在从前的日子里，正如通常所说，早在赫罗迪科斯之前，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行业尚未施行我们今天的医学体系，即通过教育消除疾病。但赫罗迪科斯，身为教练员，却又体弱多病，于是他将体育训练与医术合二为一，发现了一种方式，首先主要用来折磨他自己，之后用来折磨他人。

How was that? he said.

格：此话怎讲？

By the invention of lingering death; for he had a mortal disease which he perpetually tended, and as recovery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he passed his entire life as a valetudinarian; he could do nothing but attend upon himself, and he was in constant torment whenever he departed in anything from his usual regimen, and so dying hard, by the help of science he struggled on to old age.

苏：他发明了延缓死亡之术。因为他患有一种不治之症，不断地进行治疗，但康复无望，所以他终其一生都十分担心自己的健康，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照料自己。每当他在任何方面背离他通常的治疗方案，他就要承受持续不断的折磨，因此他死得很痛苦。借助于科学的力量，他挣扎着活到了老年。

A rare reward of his skill!

格：对其精湛医术的一个十分难得的回报！

Yes, I said; a reward which a man might fairly expect who never understood that, if Asclepius did not instruct his descendants in valetudinarian arts, the omission arose, not from ignorance or inexperience of such a branch of medicine, but because he knew that in all well-ordered states every individual has an occupation to which he must attend, and has therefore no leisure to spend in continually being ill. This we remark in the case of the artisan, but, ludicrously enough, do not apply the same rule to people of the

richer sort.

苏：是的，的确是一个常人梦寐以求的回报，然而他们不会明白，如果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没有向后人传授助体弱多病者缓死之术，那么该遗漏并非出于对此医学领域的无知或缺乏经验，而是因为他知道，在一切秩序井然的城邦中，人人各司其职，故而无暇常年抱病。我们这里是就手艺人而言的。但同样的规则，却并不适用于富人，还是很荒唐可笑的。

How do you mean? he said.

格：愿闻其详。

I mean this: When a carpenter is ill he asks the physician for a rough and ready cure; an emetic or a purge or a cautery or the knife,—these are his remedies. And if some one prescribes for him a course of dietetics, and tells him that he must swathe and swaddle his head, and all that sort of thing, he replies at once that he has no time to be ill, and that he sees no good in a life which is spent in nursing his disease to the neglect of his customary employment; and therefore bidding good-bye to this sort of physician, he resumes his ordinary habits, and either gets well and lives and does his business, or, if his constitution fails, he dies and has no more trouble.

苏：我想说，当木匠生病时，他会要求医师给予简单有效的治疗，如催吐剂、泻药、烧灼术或手术。这些均为他所希望的治疗手段。如果有人让他注意饮食习惯，并告诉他必须裹住头部，诸如此

类，他会当即表示，他没有时间生病。在他看来，抛开自己平时的工作而专心养病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他告别此类医生，一如既往地过着原来的生活，结果是或者康复并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或者体衰而死，一了百了。

Yes, he said, and a man in his condition of life ought to use the art of medicine thus far only.

格：的确，处于此等境遇之人，所能得到的医疗救治，理应仅限于此。

Has he not, I said, an occupation; and what profit would there be in his life if he were deprived of his occupation?

苏：他难道不是从业者吗？如果他被剥夺了工作，那么生活对他来说又有何意义呢？

Quite true, he said.

格：确实如此。

But with the rich man this is otherwise; of him we do not say that he has any specially appointed work which he must perform, if he would live.

苏：但是，说到富人，却要另当别论。我们并不认为，富人出于生计考虑，而必须从事特别指定的工作。

He is generally supposed to have nothing to do.

格：一般来讲，他应该无事可做。

Then you never heard of the saying of Phocylides, that as soon as a man has a livelihood he should practise virtue?

苏：你难道没听说过诗人福西尼德的名言——“人一旦生计无忧，便须行善”吗？

Nay, he said, I think that he had better begin somewhat sooner.

格：没有。在我看来，他最好尽早行善。

Let us not have a dispute with him about this, I said; but rather ask ourselves: Is the practice of virtue obligatory on the rich man, or can he live without it? And if obligatory on him, then let us raise a further question, whether this dieting of disorders, which is an impediment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ind in carpentering and the mechanical arts, does not equally stand in the way of the sentiment of Phocylides?

苏：姑且让我们不必为此与他计较，而是要问问自己：对富人而言，行善是应尽的义务，还是可有可无之事？若是他应尽的义务，那么让我们再问一个问题：既然生病期间的饮食调节，不利于木匠等手工业者安心从事生产，那么它是否会同样妨碍福西尼德所谓之富人行善呢？

Of that, he replied, there can be no doubt; such excessive care of the body, when carried beyond the rules of gymnastic, is most inimical to the practice of virtue.

格：毫无疑问，这种对健康的过度在意，若是超出了体育保健的标准范畴，便会极为不利于行善。

Yes, indeed, I replied, and equally incompatible with the management of a house, an army, or an office of state; and, what is most important of all, irreconcilable with any kind of study or thought or self-reflection—there is a constant suspicion that headache and giddiness are to be ascribed to philosophy, and hence all practising or making trial of virtue in the higher sense is absolutely stopped; for a man is always fancying that he is being made ill, and is in constant anxiety about the state of his body.

苏：的确如此，同样它也不利于家族、军队或国家机构的管理。最重要的是，它与任何种类的研究、思考或自我反思都形成对立——因为人们总是想象自己会被累病，不断地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而焦虑，所以一直以来人们都在怀疑，头痛和眩晕要归因于对知识的探究，并由此完全终止所有较高层面上的道德追求与实践。

Yes, likely enough.

格：是的，很有可能。

And therefore our politic Asclepius may be supposed to have exhibited the power of his art only to persons who, being generally of healthy constitution and habits of life, had a definite ailment; such as these he cured by purges and operations, and bade them live as usual, herein consul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but bodies which disease had penetrated through and through he would not have attempted to cure by gradual processes of evacuation and infusion: he did not want to lengthen out good-for-nothing lives, or to have weak fathers begetting weaker sons;—if a man was not able to live in the ordinary way he had no business to cure him; for such a cure would have been of no use either to himself, or to the State.

苏：因此，我们富有政治远见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可能只选择诊治那些平时身体康健，生活习惯良好的伤病患者，用泻药、外科手术等方法将之治愈，并且考虑到城邦的利益，要求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对于那些一再遭受病魔折磨的人们，他不会通过给予泻药或输液注射等治疗方法尝试一点点将他们治愈：他不想要延长没有意义的生命，或者使体质羸弱者生养更为虚弱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不能正常生活，医神也不必治好他，因为这样的治疗对其本人，对城邦，都是毫无意义的。

Then, he said, you regard Asclepius as a statesman.

格：那么，你便将阿斯克勒庇俄斯视为政治家。

Clearly; and his character is further illustrated by his sons. Note that they were heroes in the days of old and practised the medicines of which I am speaking at the siege of Troy: You will remember how, when Pandarus wounded Menelaus, they 'Sucked the blood out of the wound, and sprinkled soothing remedies,' but they never prescribed what the patient was afterwards to eat or drink in the case of Menelaus, any more than in the case of Eurypylus; the remedies, as they conceived, were enough to heal any man who before he was wounded was healthy and regular in his habits; and even though he did happen to drink a posset of Pramnian wine, he might get well all the same. But they woul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unhealthy and intemperate subjects, whose lives were of no use either to themselves or others; the art of medicine was not designed for their good, and though they were as rich as Midas, the sons of Asclepius would have declined to attend them.

苏：显而易见。他的个性在他的儿子们身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请注意：他们个个是昔日的英雄，在特洛伊之战中担任行军医生。你会记得，当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被特洛伊人潘达洛斯射伤后，他们“吮吸出伤口中的淤血，洒上缓解伤痛的药物，”但他们在为墨涅拉俄斯疗伤时，从未下达之后如何注意饮食的医嘱，正如为欧律皮洛斯治疗时一样未提及此事。他们认为，这种治疗足以治愈任何在受伤之前拥有健康体魄和良好习惯的人；即使他偶尔喝一杯普拉姆尼牛奶甜酒，也一样会痊愈。但他们却不会治疗那些身体羸弱、生活无节制的人，因为此类人的生命对己对人都毫无价值，医学并非为此类人服务的，即使他们如点物成金的国王迈达斯一般富有，医神之子也会拒绝为之效力。

They were very acute persons, those sons of Asclepius.

格：医神之子，果然见识超凡。

Naturally so, I replied. Nevertheless, the tragedians and Pindar disobeying our behests, although they acknowledge that Asclepius was the son of Apollo, say also that he was bribed into healing a rich man who was at the point of death, and for this reason he was struck by lightning. But w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already affirmed by us, will not believe them when they tell us both;—if he was the son of a god, we maintain that he was not avaricious; or, if he was avaricious, he was not the son of a god.

苏：自然如此。然而，诗人品达和悲剧家们却无视我们的要求，他们虽然承认阿斯克勒庇俄斯是阿波罗之子，却也说他收受贿赂使一个富人起死回生，并因此而遭受天打雷劈。但依据之前确认的准则，我们不会相信，他们自相矛盾的说辞——若他果真是神的儿子，我们断言，他绝非贪得无厌之徒；或者说，如果他贪得无厌，他必定不是神的儿子。

All that, Socrates, is excellent; but I should like to put a question to you: Ought there not to be good physicians in a State, and are not the best those who have treated the greatest number of constitutions good and bad? and are not the best judges in like manner those who are acquainted with all sorts of moral natures?

格：苏格拉底，你讲的这一切，极其精彩；但我要向你提一个问

题：城邦里是否应该有好医生？难道最优秀的医生不是那些为最大数量不同体质的患者排忧解难之人吗？同理，最优秀的法官难道不是那些熟悉各种各样道德本性的人吗？

Yes, I said, I too would have good judges and good physicians. But do you know whom I think good?

苏：是啊，我亦希望拥有好法官、好医生。但是，你知道，谁是我心目中的好人选吗？

Will you tell me?

格：你可愿意相告？

I will, if I can. Let me however note that in the same question you join two things which are not the same.

苏：我愿尽我所能。然而，我要指出，在同一问题中，你将两种不同的事物混为一谈。

How so? he asked.

格：何出此言？

Why, I said, you join physicians and judges. Now the most skilful physicians are those who, from their youth upwards, have combin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ir art the greatest experience of disease; they had better not be robust in health, and should have had all manner of diseases in their own persons. For the body, as I conceive, is not the instrument with which they cure the body; in that case we could not allow them ever to be or to have been sickly; but they cure the body with the mind, and the mind which has become and is sick can cure nothing.

苏：唉，你把医生与法官相提并论。如今，最干练的医生，是那些自幼便将医学知识与最丰富的临床经验相结合的人；他们最好体格并非壮健，并且亲身体验过各种疾病折磨。我认为，医生并非以身体为工具来医治身体。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不论现在还是过去，都不能允许他们体弱多病。但是，他们是用思想头脑来治愈他人，出了问题的思想头脑，则无法行使治病救人的职能。

That is very true, he said.

格：很有道理。

But with the judge it is otherwise; since he governs mind by mind; he ought not therefore to have been trained among vicious minds, and to have associated with them from youth upwards, and to have gone through the whole calendar of crime, only in order that he may quickly infer the crimes of others as he might their bodily diseases from his own self-consciousness; the honourable mind which is to form a healthy judgment should have had no

experience or contamination of evil habits when young.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n youth good men often appear to be simple, and are easily practised upon by the dishonest, because they have no examples of what evil is in their own souls.

苏：但是，法官则不同，他要以心治心。因此他不应该在受培训期间与心性邪恶者为伍，自幼便不可与之有任何往来，不可为了迅速推断他人之罪，而犯下累累罪行，如医生般推己及人以了解他人病痛。正直之心灵，若要作出公正合理的判断，则须自幼远离或毫不沾染任何恶习。这样，正直善良之人在青年时代往往显得十分单纯，易于受到心术不正之人的欺骗，因为他们自己的灵魂里对“何为邪恶”缺乏具体直观的认识。

Yes, he said, they are far too apt to be deceived.

格：是的，他们确实很容易上当受骗。

Therefore, I said, the judge should not be young; he should have learned to know evil, not from his own soul, but from late and long observation of the nature of evil in others: knowledge should be his guide, not personal experience.

苏：因此，法官不可由年轻人担任，他应该通过学习而不是自己的灵魂来了解邪恶，在后来对他人邪恶品性的长期观察中学习：其行动指南是知识，而并非个人经验。

Yes, he said, that is the ideal of a judge.

格：同意。这便是法官的完美典型。

Yes, I replied, and he will be a good man (which is my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for he is good who has a good soul. But the cunning and suspicious nature of which we spoke,—he who has committed many crimes, and fancies himself to be a master in wickedness, when he is amongst his fellows, is wonderful in the precautions which he takes, because he judges of them by himself: but when he gets into the company of men of virtue, who have the experience of age, he appears to be a fool again, owing to his unseasonable suspicions; he cannot recognise an honest man, because he has no pattern of honesty in himself;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bad are more numerous than the good, and he meets with them oftener, he thinks himself, and is by others thought to be, rather wise than foolish.

苏：是啊，他将是正直善良之人（这便是我对你的提问做出的回答），因为拥有善良之心者必定善良。但我们提到过的奸诈多疑之人罪行累累，幻想自己是为非作歹的行家里手。当他与臭味相同者相处时，他拿自己的心思来揣度别人，小心提防，八面玲珑。但是，当他置身于阅历丰富的善德之人中间，他因本身不具备正直的品性而无法识别出正直之人而表现出愚蠢可笑的一面。与此同时，由于邪恶者多于正直者，他所接触之人大多情况下是邪恶之人，在他自己以及他人眼中，他都是明智之人而非愚蠢之徒。

Most true, he said.

格：千真万确。

Then the good and wise judge whom we are seeking is not this man, but the other; for vice cannot know virtue too, but a virtuous nature, educated by time, will acquire a knowledge both of virtue and vice: the virtuous, and not the vicious, man has wisdom—in my opinion.

苏：那么，我们所寻求的正直明智的法官，并非此人，而是另外一个，因为恶人无法了解善行，但正直之人，通过长期的学习历练，则会获得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以我之见，富有智慧之人，当为正直者，而并非邪恶者。

And in mine also.

格：我亦如此认为。

This is the sort of medicine, and this is the sort of law, which you will sanction in your state. They will minister to better natures, giving health both of soul and of body; but those who are diseased in their bodies they will leave to die, and the corrupt and incurable souls they will put an end to themselves.

苏：这便是你所认可的城邦医疗制度与城邦法律制度。它们将向体格心性较佳者施以援手，维护其身心健康；但对于体虚多病者，则

任其自生自灭；对于品质恶劣而无可救药者，则处以死刑。

That is clearly the best thing both for the patients and for the State.

格：显然，不论对于患者还是城邦而言，这都是最好的决策。

And thus our youth, having been educated only in that simple music which, as we said, inspires temperance, will be reluctant to go to law.

苏：这正如我们所说，我们的青年，受过朴素的音乐教育，形成克己自制的品格，而不愿意与人争讼。

Clearly.

格：显而易见。

And the musician, who, keeping to the same track, is content to practise the simple gymnastic, will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medicine unless in some extreme case.

苏：此类的年轻人固守相同的乐调，满足于从事简单的体育训练，除非万不得已，绝不求医问药。

That I quite believe.

格：我深表赞同。

The very exercises and tolls which he undergoes are intended to stimulate the spirited element of his nature, and not to increase his strength; he will not, like common athletes, use exercise and regimen to develop his muscles.

苏：他进行艰苦的体育训练，目的在于激发斗志，而非增强体力，因而与一般的运动员不同，他不会以增加肌肉为目的而选择运动与饮食并重。

Very right, he said.

格：很有道理。

Neither are the two arts of music and gymnastic really designed, as is often supposed, the one for the training of the soul, the other for the training of the body.

苏：因而，音乐、体育教育之目的，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设想的那样，一个培养心智，另一个锻炼体魄。

What then is the real object of them?

格：那么，其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I believe, I said, that the teachers of both have in view chiefl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ul.

苏：我认为，从事这两个学科教育的工作者们，皆以提高精神修养为主旨。

How can that be? he asked.

格：这是为何？

Did you never observe, I said, the effect on the mind itself of exclusive devotion to gymnastic, or the opposite effect of an exclusive devotion to music?

苏：你难道未曾注意过，专注于体育对心智本身的影响，抑或全身心投入音乐对心智所产生的相反影响吗?

In what way shown?he said.

格：具体表现如何?

The one producing a temper of hardness and ferocity, the other of softness and effeminacy, I replied.

苏：一个会使人性情刚烈残暴，另一个则会使人性情温和柔弱。

Yes, he said, I am quite aware that the mere athlete becomes too much of a savage, and that the mere musician is melted and softened beyond what is good for him.

格：是的，我清楚地认识到，专门从事运动的人变得过于粗野残暴，而专门搞音乐的人则变得过于温顺柔弱。

Yet surely, I said, this ferocity only comes from spirit, which, if rightly educated, would give courage, but, if too much intensified, is liable to become hard and brutal.

苏：然而，可以肯定地讲，此等凶猛性情只会源于斗志。斗志在正确的引导下会带给人们勇气胆识，但若是被过度地强化，则易于变得冷酷而残忍。

That I quite think.

格：我深有同感。

On the other hand the philosopher will have the quality of gentleness. And this also, when too much indulged, will turn to softness, but, if educated rightly, will be gentle and moderate.

苏：另一方面，哲学家往往性情温良和顺。同样，如果过度沉湎于其中，这种性情便会蜕变为柔软可欺，但是若经合理教化引导，它就会演化为温文有礼。

True.

格：对。

And in our opinion the guardians ought to have both these qualities?

苏：我们可否认为，城邦守卫者应该刚柔并济？

Assuredly.

格：毫无疑问。

And both should be in harmony?

苏：刚柔是否应该和谐共存呢？

Beyond question.

格：毋庸置疑。

And the harmonious soul is both temperate and courageous?

苏：那么，和谐的灵魂，既温和恭谨，又英勇无畏吗？

Yes.

格：是的。

And the inharmonious is cowardly and boorish?

苏：那么，不和谐的灵魂，则既胆小怯懦，又粗鄙野蛮吗？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when a man allows music to play upon him and to pour into his soul through the funnel of his ears those sweet and soft and melancholy airs of which we were just now speaking, and his whole life is passed in warbling and the delights of song; in the first stage of the process the passion or spirit which is in him is tempered like iron, and made useful, instead of brittle and useless. But, if he carries on the softening and soothing process, in the next stage he begins to melt and waste, until he has wasted away his spirit and cut out the sinews of his soul; and he becomes a feeble warrior.

苏：试想一个人倾心于音乐，让音乐萦绕耳畔，流入心田，注入我们所说的甜美、柔婉和忧郁的气息，在婉转低唱中度过他的一生，陶醉于歌唱的欢乐之中。在最初阶段，他的激情与斗志，如经过回火处理的钢铁，脆性降低，韧性恢复而可用。但是，他若继续沉溺其中，不断软化舒缓，在下一个阶段，他将熔化消解，斗志消磨殆尽，变成一个懦夫。

Very true.

格：确实如此。

If the element of spirit is naturally weak in him the change is speedily accomplished, but if he have a good deal, then the power of music weakening the spirit renders him excitable;—on the least provocation he flames up at once, and is speedily extinguished;

instead of having spirit he grows irritable and passionate and is quite impracticable.

苏：如果他本来就是意志薄弱之人，那么将加速完成第二个阶段的转变。但他若本为意气风发之人，那么在消磨斗志的音乐作用下，他会变得狂躁易怒，稍不如意，他便会勃然大怒，而怒火瞬间又会烟消云散。因此，他不仅丧失了斗志，而且变得急躁易怒，难于相处。

Exactly.

格：确实如此。

And so in gymnastics, if a man takes violent exercise and is a great feeder, and the reverse of a great student of music and philosophy, at first the high condition of his body fills him with pride and spirit, and he becomes twice the man that he was.

苏：同样，在体育方面，倘若有人从事高强度的运动，食量惊人，行为做派较之哲学家与音乐家正好相反，那么起初，他为强健的体魄而自豪，精神百倍，变得比昔日更为强壮。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what happens? if he do nothing else, and holds no converse with the Muses, does not even that intelligence which there may be in him, having no taste of any sort of learning or enquiry or thought or culture, grow feeble and dull and blind, his mind never waking up or receiving nourishment, and his senses not being purged of their mists?

苏：此后又会如何呢？如果他除此之外不做任何事情，从不与缪斯女神交谈，感觉所有知识、研究、思想、文化都索然无味，那么，在此情形之下，难道他原有的智力水平不会变得薄弱暗淡，终至茫然无知吗？如果他的思想从未觉醒，抑或接受精神食粮的滋养，那么他岂不是要感觉迟钝，如坠迷雾？

True, he said.

格：对。

And he ends by becoming a hater of philosophy, uncivilized, never using the weapon of persuasion,—he is like a wild beast, all violence and fierceness, and knows no other way of dealing; and he lives in all ignorance and evil conditions, and has no sense of propriety and grace.

苏：最终，他成为一个仇视知识的人，粗暴野蛮，从不会以理服人，——他犹如一头野兽，一贯是凶猛残暴，别无其他的交往方式，生活在一个蒙昧而邪恶的世界，对于礼法风度毫无概念。

That is quite true, he said.

格：事实的确如此。

And as there are two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 one the spirited and the other the philosophical, some God, as I should say, has given mankind two arts answering to them (and only indirectly to the soul and body), in order that these two principles (like the strings of an instrument) may be relaxed or drawn tighter until they are duly harmonized.

苏：人性有两大本原，一为激情，一为爱知识。神将与之对应的两种技能（同时也间接地对应灵魂与躯体）传授给人类，目的是使这两大本原（如琴瑟之弦）张弛得宜，直至达到和谐。

That appears to be the intention.

格：这似乎便是神意。

And he who mingles music with gymnastic in the fairest proportions, and best attempers them to the soul, may be rightly called the true musician and harmonist in a far higher sense than the tuner of the strings.

苏：因此，能够最恰当地调和音乐与体育，使之适应灵魂成长的

人，可以被正确地称为，更高意义上真正的音乐家与和声学家，远非乐器调音师可比。

You are quite right, Socrates.

格：言之有理，苏格拉底。

And such a presiding genius will be always required in our State if the government is to last.

苏：若要邦国政权长治久安，必定永远需要此类治国英才。

Yes, he will be absolutely necessary.

格：是的，绝对需要。

Such, then, are our principles of nurture and education: Where would be the use of going into further details about the dances of our citizens, or about their hunting and coursing, their gymnastic and equestrian contests?

苏：那么，以上即为我们关于人才培养教育方面的原则。难道还有必要进一步细致地讨论，我们公民的舞蹈、狩猎、体育与马术比赛吗？所有这一切都应遵循上述之普遍原则。一旦我们掌握了基本原

则，我们将不难发现相关问题的具体策略。

For these all follow the general principle, and having found that, we shall have no difficulty in discovering them. I dare say that there will be no difficulty.

格：显然，不会有困难。

Very good, I said; then what is the next question? Must we not ask who are to be rulers and who subjects?

苏：很好。那么，我们下面要谈什么呢？我们难道不是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孰为统治者，孰为国民吗?

Certainly.

格：当然有必要。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elder must rule the younger.

苏：毋庸置疑，年长资深者必定治理年轻幼小者。

Clearly.

格：显然如此。

And that the best of these must rule.

苏：统治者必定是其中的最佳人选。

That is also clear.

格：此亦显而易见之事。

Now, are not the best husbandmen those who are most devoted to husbandry?

苏：最优秀的农夫，难道不是最专心务农之人吗？

Yes.

格：是的。

And as we are to have the best of guardians for our city, must they not be those who have most the character of guardians?

苏：同理，既然我们要以最优秀的守卫者来保护城邦，那么他们难道不一定是最具相关禀赋之人吗？

Yes.

格：一定是。

And to this end they ought to be wise and efficient, and to have a special care of the State?

苏：为此，他们应该聪明能干，并且特别关心城邦安危，对吗？

True.

格：对。

And a man will be most likely to care about that which he loves?

苏：人往往尤为关心其心爱之物，是吗？

To be sure.

格：确实如此。

And he will be most likely to love that which he regards as having the same interests with himself, and that of which the good or evil fortune is supposed by him at any time most to affect his own?

苏：他总是最爱那些他认为与自己有着共同利益的事物，以及那些无论吉凶祸福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事物，对吗？

Very true, he replied.

格：非常正确。

Then there must be a selection. Let us note among the guardians those who in their whole life show the greatest eagerness to do what is for the good of their country, and the greatest repugnance to do what is against her interests.

苏：因此，务必要进行一番选择。让我们关注那些穷其一生以最大的热忱服务国家利益，并对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深恶痛绝的守卫者。

Those are the right men.

格：他们是合适的人选。

And they will have to be watched at every age, in order that we may see whether they preserve their resolution, and n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either of force or enchantment, forget or cast off their sense of duty to the State.

苏：我们必须随时留意他们的动向，从而了解他们面对威逼利诱是否意志坚定，是否会忘却或抛弃他们对城邦的责任。

How cast off? he said.

格：如何会抛弃呢？

I will explain to you, I replied. A resolution may go out of a man's mind either with his will or against his will; with his will when he gets rid of a falsehood and learns better, against his will whenever he is deprived of a truth.

苏：听我来解释。一个人抛弃其决心，或是自愿的，或是违心的：当他抛弃一个错误决心，择善而从之，他是自愿的；但在任何情况下，他被剥夺了坚持真理的勇气，他都是违心的。

I understand, he said, the willing loss of a resolution; the meaning of the unwilling I have yet to learn.

格：我明白，何谓自愿抛弃决心；然而，至于何谓违心抛弃决心，我势必要向你请教。

Why, I said, do you not see that men are unwillingly deprived of good, and willingly of evil? Is not to have lost the truth an evil, and to possess the truth a good? and you would agree that to conceive things as they are is to possess the truth?

苏：哎呀，你难道没发现人不愿意失去幸福，却愿意祛除灾祸吗？　难道失去真理不是一件坏事，而获得真理不是一件乐事吗？同时，你会接受这样的观点：占有真理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看待事物，是吗？

Yes, he replied; I agree with you in thinking that mankind are deprived of truth against their will.

格：是的，我同意你的观点：人类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剥夺真理的。

And is not this involuntary deprivation caused either by theft, or force, or enchantment?

苏：那么，此种非自愿剥夺，难道不是盗窃、压力或者惑人之术造成的吗？

Still, he replied,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格：我仍旧不明白。

I fear that I must have been talking darkly, like the tragedians. I only mean that some men are changed by persuasion and that others forget; argument steals away the hearts of one class, and time of the other; and this I call theft. Now you understand me?

苏：恐怕是我刚才的表达太模糊不清了，有点悲剧家的风格。我只是想说，有些人被别人说服而改变决心，其他人则忘却了决心；论证窃取了一类人的决心，而时间则盗走了另一类人的决心。我将之统称为“盗窃”。如今，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Yes.

格：明白。

Those again who are forced, are those whom the violence of some pain or grief compels to change their opinion.

苏：那些为压力所迫者，屈服于困苦忧患的威胁而改变自己的主张。

I understand, he said, and you are quite right.

格：明白，你说得很对。

And you would also acknowledge that the enchanted are those who change their minds either under the softer influence of pleasure, or the sterner influence of fear?

苏：另外，你会承认，受迷惑之人改变想法，或者是受较为安逸的享乐所影响，或者是受到强硬的恐吓，对吗？

Yes, he said; everything that deceives may be said to enchant.

格：对，任何骗术都具有迷惑性。

Therefore, as I was just now saying, we must enquire who are the best guardians of their own conviction that what they think the interest of the State is to be the rule of their lives. We must watch them from their youth upwards, and make them perform actions in which they are most likely to forget or to be deceived, and he who remembers and is not deceived is to be selected, and he who fails in the trial is to be rejected. That will be the way?

苏：因此，正如我们所说，我们必须访求，那些以城邦利益为人生准则并且矢志不渝之人，他们便是最优秀的守卫者。我们必须从其

幼年时起便密切关注他们，使之在最易于遗忘或者被骗的情形下执行任务，筛选牢记使命、不受骗之人，淘汰经不起考验之人。可否这样做呢？

Yes.

格：可以。

And there should also be toils and pains and conflicts prescribed for them, in which they will be made to give further proof of the same qualities.

苏：同时，还要用艰难困苦和矛盾冲突去考验他们，使他们进一步证明自己的信念与决心。

Very right, he replied.

格：很有道理。

And then, I said, we must try them with enchantments—that is the third sort of test—and see what will be their behaviour: like those who take colts amid noise and tumult to see if they are of a timid nature, so must we take our youth amid terrors of some kind, and again pass them into pleasures, and prove them more thoroughly than gold is proved in the furnace, that we may discover

whether they are armed against all enchantments, and of a noble bearing always, good guardians of themselves and of the music which they have learned, and retaining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a rhythmical and harmonious nature, such as will be most serviceable to the individual and to the State. And he who at every age, as boy and youth and in mature life, has come out of the trial victorious and pure, shall be appointed a ruler and guardian of the State; he shall be honoured in life and death, and shall receive sepulture and other memorials of honour, the greatest that we have to give. But him who fails, we must reject. I am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his is the sort of way in which our rulers and guardians should be chosen and appointed. I speak generally, and not with any pretension to exactness.

苏：之后，我们必须用第三种测试——迷惑之术来考验他们，并且对其行为进行观察：正如人们往往将小马置于嘈杂喧闹之所检验其胆量大小，我们必须置我们的青年于恐怖氛围之中，再使之处于安乐之乡。这样，我们用比以烈火检验真金还要彻底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考验，从而可以判断他们是否具备了抵御一切诱惑的坚定信念与决心，始终志行高洁，守身如玉，坚守他们获得的音乐修养，在任何情境下保持内心的和谐。只有他们具备了上述所有条件，才能成为对个人、对城邦都至为有用的人。如果一个人在少年、青年及壮年各个时期都成功地通过考验，完美无瑕，那么他就应该被任命为城邦的统治者和守卫者，使他享受到生前身后的荣耀，还会为之举行最隆重的国葬以及其他纪念活动。对于未能通过考验者，我们则坚决予以淘汰。我认为，这便是我们选拔任命统治者和守卫者所应采取的方式。我只是从总体上讲，并未涉及具体细则。

And, speaking generally, I agree with you, he said.

格：总的来说，我同意你的观点。

And perhaps the word 'guardian' in the fullest sense ought to be applied to this higher class only who preserve us against foreign enemies and maintain peace among our citizens at home, that the one may not have the will, or the others the power, to harm us. The young men whom we before called guardians may be more properly designated auxiliaries and supporters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rulers.

苏：也许“守卫者”这个词，从完全意义上讲，应该指的是处于上层社会的统治者，他们外御来犯之强敌，内保人民之安定，从而确保内外之敌不敢也无力危害我们。更恰当地说，我们之前称之为“守卫者”的年轻人，不妨可以叫做“辅助者”和“支持者”，给予统治者支持，贯彻其统治思想。

I agree with you, he said.

格：我同意。

How then may we devise one of those needful falsehoods of which we lately spoke—just one royal lie which may deceive the rulers, if that be possible, and at any rate the rest of the city?

苏：那么，我们如何编造出一个不久前说到的那种必要的谎言呢？——它只是一个高贵的谎言，可以欺骗统治者（如果有可能的话），否则至少可以欺骗城邦民众。

What sort of lie? he said.

格：哪一种谎言？

Nothing new, I replied; only an old Phoenician tale (Laws) of what has often occurred before now in other places, (as the poets say, and have made the world believe,) though not in our time, and I do not know whether such an event could ever happen again, or could now even be made probable, if it did.

苏：早已数见不鲜了，不过就是以前在其他地方流行的一个古老的腓尼基传说（诗人如是说，而且整个世界都接受了该说法），但我不知道，如果这样的事件果真发生过，那么在当今的时代，历史是否会重演，抑或是否会有重演的可能。

How your words seem to hesitate on your lips!

格：你为何欲言又止？

You will not wonder, I replied, at my hesitation when you have heard.

苏：你要是听了我下面的一席话，就不会为我的犹豫不决感到惊讶了。

Speak, he said, and fear not.

格：但说无妨，不必多虑。

Well then, I will speak, although I really know not how to look you in the face, or in what words to utter the audacious fiction, which I propose to communicate gradually, first to the rulers, then to the soldiers, and lastly to the people. They are to be told that their youth was a dream, and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hich they received from us, an appearance only; in reality during all that time they were being formed and fed in the womb of the earth, where they themselves and their arms and appurtenances were manufactured; when they were completed, the earth, their mother, sent them up; and so, their country being their mother and also their nurse, they are bound to advise for her good, and to defend her against attacks, and her citizens they are to regard as children of the earth and their own brothers.

苏：那么，我便说一说，但我的确不知如何直视你，更不知采用何种言辞来讲出这大胆的虚构之词。我打算循序渐进，首先告知统治者，其次士兵，最后人民。我将对他们说，他们的青春是一场梦，而他们从我们这里接受的教育和培训，则只不过是一个表象；事实上，整个那段时期，他们都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成长并汲取养料，在那里他们自己及其武器装备被制造出来。待一切就绪之后，大地母亲把他们送到地面之上，因此祖国就是赋予他们生命并哺育他们成长的母亲。这样，他们必定会为了她的利益而献计献策，抵御来犯之敌，保卫她的安全，同时将祖国的公民都视作大地母亲的孩子，即他们的同胞。

You had good reason, he said, to be ashamed of the lie which you were going to tell.

格：难怪您刚才那么耻于讲出这个骗人的假话了。

True, I replied, but there is more coming; I have only told you half. Citizens, we shall say to them in our tale, you are brothers, yet God has framed you differently. Some of you have the power of command, and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se he has mingled gold, wherefore also they have the greatest honour; others he has made of silver, to be auxiliaries; others again who are to be husbandmen and craftsmen he has composed of brass and iron; and the species will generally be preserved in the children. But as all are of the same original stock, a golden parent will sometimes have a silver son, or a silver parent a golden son. And God proclaims as a first principle to the rulers, and above all else, that there is nothing which they should so anxiously guard, or of which they are to be such good guardians, as of the purity of the race. They should observe what elements mingle in their offspring; for if the son of a golden or silver parent has an admixture of brass and iron, then nature orders a transposition of ranks, and the eye of the ruler must not be pitiful towards the child because he has to descend in the scale and become a husbandman or artisan, just as there may be sons of artisans who having an admixture of gold or silver in them are raised to honour, and become guardians or auxiliaries. For an oracle says that when a man of brass or iron guards the State, it will be destroyed. Such is the tale; is there any possibility of making our citizens believe in it?

苏：的确如此，但我还没讲完，话只说了一半。我们要在这个故事中对他们讲，城邦的公民们，你们虽然是同胞兄弟，却是神用不同的材料创造出来的。你们中一些人处于统治地位，是神加入金制成的，因而他们最为尊贵；还有的是他用银制成的，成为统治者的辅助者；其他的则是他用铜和铁制成的，将成为农夫和手工业者。一般来说，这些人种差别流传后世，经久不变。但由于所有这些人种最初都出自相同的血统，有时金血统父母会有银血统儿女，有时银血统父母会有金血统儿女。神告诫统治者坚守的一个首要原则，就是他们作为优秀的守卫者，最为紧要的便是捍卫血统的纯洁性。他们应注意到其后代子孙混入了何种元素。如果金银血统父母的子女混入了铜与铁元素，那么他们的阶级地位要顺应自然要求，发生相应的改变。统治者切勿因子女地位下降并成为农夫或手工业者而动恻隐之心。同样道理，若是手工业者的后代血统中混入了金银元素，他们就应荣升到上层社会，成为守卫者或者其辅助者。神谕有云："铜铁之人守邦卫国，国运休矣。"故事大抵如此。有可能让我们的公民信以为真吗？

Not in the present generation, he replied; there is no way of accomplishing this; but their sons may be made to believe in the tale, and their sons' sons, and posterity after them.

格：现在这代人，是不可能的了。根本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但是可以让他们的儿子，孙子，乃至此后的子子孙孙来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I see the difficulty, I replied; yet the fostering of such a belief will make them care more for the city and for one another. Enough, however, of the fiction, which may now fly abroad upon the wings of rumour, while we arm our earth-born heroes, and lead them forth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ir rulers. Let them look round and

select a spot whence they can best suppress insurrection, if any prove refractory within, and als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enemies, who like wolves may come down on the fold from without; there let them encamp, and when they have encamped, let them sacrifice to the proper Gods and prepare their dwellings.

苏：我明白，这个问题的确很棘手。然而，加强这一信仰，将有利于加深他们对城邦和同胞的感情。对于这个虚构故事，我们就探讨到这里，它将借助谣言的翅膀流传海外。与之同时，我们武装起人间的英雄，将他们引致统治者的麾下。令他们环顾四周并挑选一个地方安营扎寨，在那里他们既可以最强有力地镇压内部叛乱，又可以抵御如狼似虎的外敌入侵。既已安营扎寨，则令他们向特定的神祇献祭，并且建造居所。

Just so, he said.

格：理应如此。

And their dwellings must be such as will shield them against the cold of winter and the heat of summer.

苏：其住所一定可以帮他们躲避严寒酷暑。

I suppose that you mean houses, he replied.

格：恐怕你指的是房屋吧。

Yes, I said; but they must be the houses of soldiers, and not of shop-keepers.

苏：对。但是它们须为军人的房屋，而非商铺老板的房屋。

What is the difference? he said.

格：有何不同？

That I will endeavour to explain, I replied. To keep watch-dogs, who, from want of discipline or hunger, or some evil habit or other, would turn upon the sheep and worry them, and behave not like dogs but wolves, would be a foul and monstrous thing in a shepherd?

苏：我会努力解释清楚。牧羊犬因训练不善，饥饿，或者恶习等其他因素而危害羊群。其行为不似忠犬，却无异于恶狼。对于牧羊人来说，蓄养如此牧羊犬，是否既可恶又荒谬呢？

Truly monstrous, he said.

格：确实荒谬。

And therefore every care must be taken that our auxiliaries, being stronger than our citizens, may not grow to be too much for them and become savage tyrants instead of friends and allies?

苏：因此，一定要时刻注意，我们的辅助者虽然比公民强健，但他们是公民的朋友和同盟，不可以成为扰民的恶霸，对吗？

Yes, great care should be taken.

格：对，应该多加注意。

And would not a really good education furnish the best safeguard?

苏：真正良好的教育，难道不可以使之成为最优秀的保卫者吗？

But they are well-educated already, he replied.

格：但是，他们已经接受良好的教育了。

I cannot be so confident, my dear Glaucon, I said; I am much more certain that they ought to be, and that true education, whatever that may be, will have the greatest tendency to civilize

and humanize them in their relations to one another, and to those who are under their protection.

苏：对此，我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亲爱的格劳孔。但我非常确信的是，接受良好教育对他们来说是必要的，而真正的教育，无论如何，都会在最大程度上倾向于教化他们，使之以仁爱之心对待彼此，对待受其保护之人。

Very true, he replied.

格：的确如此。

And not only their education, but their habitations, and all that belongs to them, should be such as will neither impair their virtue as guardians, nor tempt them to prey upon the other citizens. Any man of sense must acknowledge that.

苏：除了教育，他们的居所，以及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应该既不损害他们作为守卫者所应具备的美德，也不会诱使他们去掠夺其他公民。任何有理智之人，都一定会认同的。

He must.

格：一定会的。

Then now let us consider what will be their way of life, if they are to realize our idea of them. In the first place, none of them should have any property of his own beyond wha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neither should they have a private house or store closed against any one who has a mind to enter; their provisions should be only such as are required by trained warriors, who are men of temperance and courage; they should agree to receive from the citizens a fixed rate of pay, enough to meet the expenses of the year and no more; and they will go to mess and live together like soldiers in a camp. Gold and silver we will tell them that they have from God; the diviner metal is within them, and they have therefore no need of the dross which is current among men, and ought not to pollute the divine by any such earthly admixture; for that commoner metal has been the source of many unholy deeds, but their own is undefiled. And they alone of all the citizens may not touch or handle silver or gold, or be under the same roof with them, or wear them, or drink from them. And this will be their salvation, and they will be the saviours of the State. But should they ever acquire homes or lands or moneys of their own, they will become housekeepers and husbandmen instead of guardians, enemies and tyrants instead of allies of the other citizens; hating and being hated, plotting and being plotted against, they will pass their whole life in much greater terror of internal than of external enemies, and the hour of ruin, both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 rest of the State, will be at hand. For all which reasons may we not say that thus shall our State be ordered, and that these shall be the regulations appointed by us for guardians concerning their houses and all other matters?

苏：那么，让我们考虑一下，假如他们要将我们关于他们的理想想象付诸实际，其生活情形将会如何。首先，他们中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任何超出生活必需品之外的财产；也不可以拥有不完全对外开放

的私人房屋或仓库；他们的必需品应该以满足克己自律而富有勇气、训练有素的武士需要为准；他们应该同意接受公民付予的定额薪金，该薪金足以支付一年内的开销，并且仅限于此；他们如军营中的士兵一般去食堂进餐，并且群居共处。至于金银，我们将对他们说，他们已得到神祇赐予的金银；这圣洁的金属是他们身体内在固有的一部分，故而他们并不需要市场中流通的肮脏金属，不应该因沾染世俗气息的金属而玷污了圣洁；因为这些更为常见的金属实为万恶之源，而他们内在的金银则是纯洁无瑕的。同时，所有公民之中，唯独他们不可接触金银，不可做任何金银交易，不可在家中存放金银，不可佩戴金银，亦不可使用金银酒具。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拯救自己，进而拯救城邦。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私人的房产、土地或金钱，便成为了房主和农夫，而不再是守卫者；便成为了敌人和恶霸，不再是城邦其他公民的朋友；他们相互仇视，尔虞我诈，在惊恐中度过一生，其中对内部敌人的恐惧，远甚于对外来敌人的恐惧。同时，家国沦亡之日亦近在咫尺。根据上述原因，难道我们不可以说，我们订立的关于守卫者房屋及所有其他财产的规定，理应在我们的城邦贯彻执行吗？

Yes, said Glaucon.

格：可以。

BOOK IV.

第四卷

ADEIMANTUS—SOCRATES

主要人物：阿得曼托斯、苏格拉底

Here Adeimantus interposed a question: How would you answer, Socrates, said he, if a person were to say that you are making these people miserable, and that they are the cause of their own unhappiness; the city in fact belongs to them, but they are none the better for it; whereas other men acquire lands, and build large and handsome houses, and have everything handsome about them, offering sacrifices to the gods on their own account, and practising hospitality; moreover, as you were saying just now, they have gold and silver, and all that is usual among the favourites of fortune; but our poor citizens are no better than mercenaries who are quartered in the city and are always mounting guard?

这时，阿得曼托斯插入一个问题：苏格拉底，有人会说，您的这些规定，只会使这些人陷入悲惨的境遇，是造成他们自身不幸的根源；尽管他们拥有整个城邦，但是却未因此而获得任何好处；然而，其他人却购买土地，建造豪宅广厦，拥有一切奢华之物，用自己的钱物献祭神明，款待宾客；另外，正如你所说，他们拥有金银，以及命运女神的宠儿们所应有的一切；但我们可怜的守卫者，却形同驻扎城中的雇佣兵，一味地站岗放哨。对此，您将如何答复？

Yes, I said; and you may add that they are only fed, and not paid in addition to their food, like other men; and therefore they cannot, if they would, take a journey of pleasure; they have no money to spend on a mistress or any other luxurious fancy, which, as the world goes, is thought to be happiness; and many other accusations of the same nature might be added.

苏：是啊，你可以再补充一下，说他们只是解决了吃饭问题而已，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报酬不仅限于食物；因此，畅游山水之乐，对他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即；举世公认之幸福，如千金换美人一笑等奢侈享受，也是他们鉴于财力而无法实现的；此类可以指责之事，不胜枚举。

But, said he, let us suppose all this to be included in the charge.

阿：但是，让我们假设，在责难之中已经囊括了所有这类事情。

You mean to ask, I said, what will be our answer?

苏：你想要问，我将如何答复吗？

Yes.

阿：正是。

If we proceed along the old path, my belief, I said, is that we shall find the answer. And our answer will be that, even as they are, our guardians may very likely be the happiest of men; but that our aim in founding the State was not the disproportionate happiness of any one class, but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whole; we thought that in a State which is ordered with a view to the good of the whole we should be most likely to find justice, and in the ill-ordered State injustice: and, having found them, we might then decide which of the two is the happier. At present, I take it, we are fashioning the happy State, not piecemeal, or with a view of making a few happy citizens, but as a whole; and by-and-by we will proceed to view the opposite kind of State. Suppose that we were painting a statue, and some one came up to us and said, Why do you not put the most beautiful colours on the most beautiful parts of the body—the eyes ought to be purple, but you have made them black—to him we might fairly answer, Sir, you would not surely have us beautify the eyes to such a degree that they are no longer eyes; consider rather whether, by giving this and the other features their due proportion, we make the whole beautiful. And so I say to you, do not compel us to assign to the guardians a sort of happiness which will make them anything but guardians; for we too can clothe our husbandmen in royal apparel, and set crowns of gold on their heads, and bid them till the ground as much as they like, and no more. Our potters also might be allowed to repose on couches, and feast by the fireside, passing round the winecup, while their wheel is conveniently at hand, and working at pottery only as much as they like; in this way we might make every class happy—and then, as you imagine, the whole State would be happy. But do not put this idea into our heads; for, if we listen to you, the husbandman will be no longer a husbandman, the potter will cease to be a potter, and no one will have the character of any distinct class in

the State. Now this is not of much consequence where the corruption of society, and pretension to be what you are not, is confined to cobblers; but when the guardians of the laws and of the government are only seeming and not real guardians, then see how they turn the State upside down;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one have the power of giving order and happiness to the State. We mean our guardians to be true saviours and not the destroyers of the State, whereas our opponent is thinking of peasants at a festival, who are enjoying a life of revelry, not of citizens who are doing their duty to the State. But, if so, we mean different things, and he is speaking of something which is not a State. And therefore we must consider whether in appointing our guardians we would look to their greatest happiness individually, or whether this principle of happiness does not rather reside in the State as a whole. But if the latter be the truth, then the guardians and auxiliaries, and all others equally with them, must be compelled or induced to do their own work in the best way. And thus the whole State will grow up in a noble order, and the several classes will receive the proportion of happiness which nature assigns to them.

苏：只要我们沿着原来的思路走下去，我相信一定能找到答案。我们的答案是，即便我们的守卫者处境如此，他们仍然很可能是最幸福的人；但是，我们建造这座城邦，并非单纯地为某一类人谋福祉，而是为所有人谋得最大的幸福；在我们看来，我们应该最有可能在从全局利益出发、秩序井然的城邦中找到正义，在秩序混乱的城邦中找到不义：我们在找到正义与不义之后，便可以判断二者之中究竟哪个更为幸福。目前，我认为，我们正在筹建的幸福城邦，并非局部意义的，或仅仅造福少数人，而是作为一个整体造福所有人；之后，我们将对与之相反类型的城邦进行考察。假设我们正在绘制一座雕塑，某人走过来说道："你们为何不将最美的颜色涂到最漂亮的身体部位上——眼睛应为紫色，但你们却已把它涂成黑色。"对于他的问题，我

们可以清楚地做出回答，“先生，您当然不会让我们将眼睛美化成不再称其为眼睛的样子；不妨思考一下，我们在以适当的比例画出五官各部位的同时，是否实现了整体美感呢？”因此，我要告诉你，不要迫使我们赋予守卫者一种使之不再称其为守卫者的幸福，因为我们也可以给农夫穿上皇室的衣服，戴上黄金王冠，然后吩咐他们随心所欲地锄地，仅此而已。我们也可以允许制陶工在卧榻上休息，在炉边宴饮，推杯换盏，而制陶工具就在近旁，他们可以自行决定干多干少。以此种方式，我们可以使各个阶层的人都幸福安乐。由此，可以想象，整个城邦都将其乐融融。但是，不要向我们灌输此类思想了。如果我们听信了你的观点，那么农夫将不再是农夫，陶工也不再是陶工，这个城邦中的所有人都不再具有特定阶层的特征。倘若这种腐化堕落和自欺欺人的风气，仅仅局限于手艺笨拙的工匠，后果不会很严重。但是，如果身为法律和政府的守卫者，却徒有虚名，那么整个城邦将为之而倾覆；反之，他们自身便足可安邦定国，造福城邦。我们旨在使守卫者成为真正的拯救者，而不是城邦的毁灭者，然而我们的反对者想到的，却是适逢节庆而狂欢宴饮的农夫，并非履行义务的城邦公民。但是，即便如此，我们指的便是不同的事物，他也并非在讲治国之道。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在任命守卫者之时，是否要照顾其个人的最大幸福，抑或如此的幸福原则是否与城邦构成一个整体。但若是后者属实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迫使或者诱导守卫者、辅助者以及其他处于平等地位的人，竭尽全力地做好其分内工作。于是，整个城邦将蒸蒸日上，各个阶层将得到自然按合理比例赋予他们的幸福。

I think that you are quite right.

阿：言之有理。

I wonder whether you will agree with another remark which occurs to me.

苏：我又想到一句话，不知你是否会赞同？

What may that be?

阿：有何话要说？

There seem to be two causes of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arts.

苏：好像有两种原因，都可导致技艺退化。

What are they?

阿：哪两种？

Wealth, I said, and poverty.

苏：富有与贫穷。

How do they act?

阿：它们如何影响技艺呢？

The process is as follows: When a potter becomes rich, will he, think you, any longer take the same pains with his art?

苏：其过程大抵如此：在你看来，当陶工发迹之后，他仍会不辞辛苦地钻研技艺吗？

Certainly not.

阿：当然不会。

He will grow more and more indolent and careless?

苏：他会日益变得慵懒粗心吗？

Very true.

阿：的确如此。

And the result will be that he becomes a worse potter?

苏：结果，他的陶艺变差，对吗？

Yes; he greatly deteriorates.

阿：对。他大不如前。

But, on the other hand, if he has no money, and cannot provide himself with tools or instruments, he will not work equally well himself, nor will he teach his sons or apprentices to work equally well.

苏：但是，反之，如果他身无分文，不能为自己提供工具或器械，他不但自己无法很好地工作，而且同样也不能教导自己的后人或学徒用心工作。

Certainly not.

阿：当然不能。

Then, under the influence either of poverty or of wealth, workmen and their work are equally liable to degenerate?

苏：那么，不论在贫穷还是富有的影响下，工匠及其技艺，同样都很容易堕落退化，对吗？

That is evident.

阿：显而易见。

Here, then, is a discovery of new evils, I said, against which the guardians will have to watch, or they will creep into the city unobserved.

苏：于是，在此，我们发现了新的灾害。我们的守卫者必须对之严加防范，以免它们趁人不备潜入城邦。

What evils?

阿：何种灾难？

Wealth, I said, and poverty; the one is the parent of luxury and indolence, and the other of meanness and viciousness, and both of discontent.

苏：富有与贫穷。一个孕育奢华和惰怠，另一个则催生卑鄙与邪恶，二者同样可以滋生不满。

That is very true, he replied; but still I should like to know, Socrates, how our city will be able to go to war, especially against an enemy who is rich and powerful, if deprived of the sinews of war.

阿：很有道理。但是，苏格拉底，我仍有一事不明，如果我们城邦丧失了战斗的体力，特别是当敌方强大富有之际，那么，城邦将如何能够进行战争呢？

There would certainly be a difficulty, I replied, in going to war with one such enemy; but there is no difficulty where there are two of them.

苏：与如此的敌人开战，确实相当棘手。但是，在敌方为两人的情形下，这并非难事。

How so? he asked.

阿：何以见得？

In the first place, I said, if we have to fight, our side will be trained warriors fighting against an army of rich men.

苏：首先，如果我们必须参战的话，我方将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对抗一支富人组成的军队。

That is true, he said.

阿：的确如此。

And do you not suppose, Adeimantus, that a single boxer who was perfect in his art would easily be a match for two stout and well-to-do gentlemen who were not boxers?

苏：阿得曼托斯，你难道不认为，一个技艺绝伦的拳击手，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独自对付两个壮实而富有的门外汉吗？

Hardly, if they came upon him at once.

阿：如果两人同时发起进攻，他便胜算不大了。

What, now, I said, if he were able to run away and then turn and strike at the one who first came up? And supposing he were to do this several times under the heat of a scorching sun, might he not, being an expert, overturn more than one stout personage?

苏：什么？不会的，他可以抽身便走，然后回身攻击第一个追来的敌人，对吗？假如在炎炎烈日之下，他反复用此方法，那么精通拳击之术的他，难道不能打倒不止一个壮汉吗？

Certainly, he said, there would be nothing wonderful in that.

阿：当然，这绝对不足为奇。

And yet rich men probably have a greater superiority in the science and practice of boxing than they have in military qualities.

苏：然而，富人大概在拳击术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造诣，较之他们的军事素质，还要更胜一筹。

Likely enough.

阿：极为可能。

Then we may assume that our athletes will be able to fight with two or three times their own number?

苏：那么，我们可否假定，我们的军人可以力敌在数量上两三倍于自己的敌人呢？

I agree with you, for I think you right.

阿：我同意，言之有理。

And suppose that, before engaging, our citizens send an

embassy to one of the two cities, telling them what is the truth: Silver and gold we neither have nor are permitted to have, but you may; do you therefore come and help us in war, and take the spoils of the other city: Who, on hearing these words, would choose to fight against lean wiry dogs, rather than, with the dogs on their side, against fat and tender sheep?

苏：假设在开战前夕，我们的公民派一支使团前往两个敌对城邦中的一个，开诚布公地对他们讲，“我们没有金银，而且城邦的法律也不允许我们拥有金银，但是你们却可以拥有。因此，你们是否愿意在战争中与我们结盟，并且独占攻陷另一城邦所得之战利品呢？”听到如此一席话，谁会选择与精瘦干练的狗群为敌，而不是让狗群站在自己一方，一起向肥而柔弱的羊群发起攻击呢？

That is not likely; and yet there might be a danger to the poor State if the wealth of many States were to be gathered into one.

阿：这是不大可能。然而，若是多国之财富积聚于一国，势必会对穷国构成威胁。

But how simple of you to use the term State at all of any but our own!

苏：但是，你多么天真啊，将我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亦称为“国家”。

Why so?

阿：何出此言？

You ought to speak of other States in the plural number; not one of them is a city, but many cities, as they say in the game. For indeed any city, however small, is in fact divided into two, one the city of the poor, the other of the rich; these are at war with one another; and in either there are many smaller divisions, and you would be altogether beside the mark if you treated them all as a single State. But if you deal with them as many, and give the wealth or power or persons of the one to the others, you will always have a great many friends and not many enemies. And your State, while the wise order which has now been prescribed continues to prevail in her, will be the greatest of States, I do not mean to say in reputation or appearance, but in deed and truth, though she number not more than a thousand defenders. A single State which is her equal you will hardly find, either among Hellenes or barbarians, though many that appear to be as great and many times greater.

苏：你在提及他国时应该用复数形式，因为正如人们开玩笑时所说，它们中任何一个都并非一个城邦，而是多个城邦。的确，任何一个城邦，不论它多么狭小，事实上都分化成两部分，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二者之间冲突不断。同时，这两部分各自内部还可分化出许多部分，因此如果你将它们视作统一的国家，你就大错而特错了。但假如你将之视为多国，将其中之一的财富、权利或人口分与他国，你会总是拥有许多朋友，而非许多敌人。只要你的城邦继续实行已确定的明智秩序，它便会成为最强盛的城邦，而且我指的并非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强盛，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即使它的兵力不超

过一千。不论是在希腊，还是希腊以外的地方，尽管有很多貌似与它同样强大或者比它强盛好多倍的国家，但是你却很难找到可以与之匹敌的统一的国家。

That is most true, he said.

阿：千真万确。

And what, I said, will be the best limit for our rulers to fix when they are considering the size of the State and the amount of territory which they are to include, and beyond which they will not go?

苏：当我们的统治者在规划城邦规模与疆域大小时，他们最好应该做出如何限定呢？

What limit would you propose?

阿：你对此有何建议？

I would allow the State to increase so far as is consistent with unity; that, I think, is the proper limit.

苏：我认为，只要城邦能保持一贯的团结一致，便可不断发展壮

大。这便是其合适的限度。

Very good, he said.

阿：很好。

Here then, I said, is another order which will have to be conveyed to our guardians: Let our city be accounted neither large nor small, but one and self-sufficing.

苏：那么，在此须向我们的守卫者传达另外一项命令：确保我们的城邦不大不小，统一而自足。

And surely, said he, this is not a very severe order which we impose upon them.

阿：当然，这并非我们强加于他们的甚为苛刻的命令。

And the other, said I, of which we were speaking before is lighter still,—I mean the duty of degrading the offspring of the guardians when inferior, and of elevating into the rank of guardians the offspring of the lower classes, when naturally superior. The intention was, that, in the case of the citizens generally, each individual should be put to the use for which nature intended him, one to one work, and then every man would do his own business,

and be one and not many; and so the whole city would be one and not many.

苏：另一项任务，之前我们说到过，会更为容易——即必须把守卫者素质低劣的后代降至其他阶层，并且将下层人民天赋优秀的后代擢升至守卫者行列。其目的是用以昭示：就所有公民普遍地来讲，每个个人都应凭借自然赋予的能力，人尽其才，专心从事一项工作，进而使每个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唯一而非多个职业，所以整个城邦才会是统一的，而非分裂的。

Yes, he said; that is not so difficult.

阿：是的，此事并非很难。

The regulations which we are prescribing, my good Adeimantus, are not, as might be supposed, a number of great principles, but trifles all, if care be taken, as the saying is, of the one great thing,—a thing, however, which I would rather call, not great, but sufficient for our purpose.

苏：正直的阿得曼托斯，我们此时所做的规定，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般，为一系列重大的原则，而只是一个重大问题的细节而已，因此正如人们常说的，只要小心谨慎便可以了——然而，至于该问题，我宁愿称之为“并非重大，却足以实现我们的目的”。

What may that be? he asked.

阿：是何问题？

Education, I said, and nurture: If our citizens are well educated, and grow into sensible men, they will easily see their way through all these, as well as other matters which I omit; such, for example, as marriage, the possession of women and the procreation of children, which will all follow the general principle that friends have all things in common, as the proverb says.

苏：教育与培养。如果我们的公民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成长为通晓事理之人，他们会很轻松地洞察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我漏掉没提的其他问题，例如婚姻、占有妇女和生育子女等等，都应如谚语所说，遵循“朋友之间不分彼此”这一普遍原则。

That will be the best way of settling them.

阿：这将是解决此类问题的绝佳途径。

Also, I said, the State, if once started well, moves with accumulating force like a wheel. For good nurture and education implant good constitutions, and these good constitutions taking root in a good education improve more and more, and this improvement affects the breed in man as in other animals.

苏：另外，国家犹如车轮，一旦发动得好，它就会加速前进。良

好的教育，培养出良好的素质，扎根于良好教育的良好素质不断得到完善，这种完善影响到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的物种进化。

Very possibly, he said.

阿：极有可能。

Then to sum up: This is the point to which, above all, the attention of our rulers should be directed,—that music and gymnastic be preserved in their original form, and no innovation made. They must do their utmost to maintain them intact. And when any one says that mankind most regard 'The newest song which the singers have,' they will be afraid that he may be praising, not new songs, but a new kind of song; and this ought not to be praised, or conceived to be the meaning of the poet; for any musical innovation is full of danger to the whole State, and ought to be prohibited. So Damon tells me, and I can quite believe him;—he says that when modes of music change,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the State always change with them.

苏：总之，这便是我们的统治者所要引起注意的头等大事，——音乐和体育应该保持其最初的形式，不得进行任何革新。他们必须竭尽全力使之保持原貌。当有人说人类最看重歌手的最新歌曲时，统治者们会担心，此人正在赞扬的，可能并非新的歌曲，而是新的歌曲类型。新的歌曲类型是不应被赞美的，也不可被理解为诗人的本义，因为任何音乐创新都会对整个城邦构成十足的威胁，并应予以禁止。所以，我非常认同达蒙所说的话。他说，一旦音乐模式发生改变，城邦的基本法律也总会随之而改变。

Yes, said Adeimantus; and you may add my suffrage to Damon's and your own.

阿：对，我也赞同达蒙和你的观点。

Then, I said, our guardians must lay the foundations of their fortress in music?

苏：那么，我们的守卫者必须为其音乐堡垒奠定基石，对吗？

Yes, he said; the lawlessness of which you speak too easily steals in.

阿：对，你所说的不良音乐很容易潜入。

Yes, I replied, in the form of amusement; and at first sight it appears harmless.

苏：是啊，以娱乐的形式潜入，而且乍看起来似乎并无害处。

Why, yes, he said, and there is no harm; were it not that little by little this spirit of licence, finding a home, imperceptibly penetrates into manners and customs; whence, issuing with greater

force, it invades contracts between man and man, and from contracts goes on to laws and constitutions, in utter recklessness, ending at last, Socrates, by an overthrow of all rights, private as well as public.

阿：哎呀，是的，毫无害处。只是放纵的风气会渐渐落地扎根，不知不觉间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由此以更大的力量释放出来，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并由契约到律法再到宪法，完全不顾后果，最终以颠覆所有的公私权利而收场。

Is that true? I said.

苏：果真如此吗？

That is my belief, he replied.

阿：我是如此认为的。

Then, as I was saying, our youth should be trained from the first in a stricter system, for if amusements become lawless, and the youths themselves become lawless, they can never grow up into well-conducted and virtuous citizens.

苏：那么，正如我所说，我们的青年应该从开始便接受更为严格的训练，因为消遣娱乐要是不正当，他们自己便会成为不法青年，并

将永远不会成长为品行端正的公民。

Very true, he said.

阿：的确如此。

And when they have made a good beginning in play, and by the help of music have gained the habit of good order, then this habit of order, in a manner how unlike the lawless play of the others will accompany them in all their actions and be a principle of growth to them, and if there be any fallen places in the State will raise them up again.

苏：他们既已在娱乐中有了良好的开端，再借助音乐的力量，养成了守秩序的好习惯。然后，守秩序的习惯，将会以一种与他人的非法娱乐截然不同的方式，在他们的一切活动中陪伴着他们，成为他们成长的准则。假如国家某些地方堕落，那么国家的准则将使之恢复原有的秩序。

Very true, he said.

阿：确实如此。

Thus educated, they will invent for themselves any lesser rules which their predecessors have altogether neglected.

苏：经过如此的教育历程，他们将自行订立所有为先辈们所忽略的次要规则。

What do you mean?

阿：此话怎讲呢？

I mean such things as these:—when the young are to be silent before their elders; how they are to show respect to them by standing and making them sit; what honour is due to parents; what garments or shoes are to be worn; the mode of dressing the hair; deportment and manners in general. You would agree with me?

苏：我指的是类似于以下这些方面：年幼者何时应在年长者面前默不作声；他们如何以起身让座以示礼敬；如何向父母表达敬意；穿衣戴帽的规矩；发饰礼节；普遍意义的行为举止与礼貌规矩。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Yes.

阿：同意。

But there is, I think, small wisdom in legislating about such matters,—I doubt if it is ever done; nor are any precise written

enactments about them likely to be lasting.

苏：但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此类事情进行规定，则并非明智之举。我怀疑人们是否曾经如此做过，同时我也怀疑，明确做出此类规定的成文法令，是否可能长久流传。

Impossible.

阿：不可能。

It would seem, Adeimantus, that the direction in which education starts a man, will determine his future life. Does not like always attract like?

苏：阿得曼托斯，看来教育为一个人所确立的人生方向，将决定其未来生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难道不是吗？

To be sure.

阿：必定如此。

Until some one rare and grand result is reached which may be good, and may be the reverse of good?

苏：直到产生出一个罕见而重大的结果，而该结果或许美好，或许与美好恰恰相反，对吗？

That is not to be denied.

阿：毋庸置疑。

And for this reason, I said, I shall not attempt to legislate further about them.

苏：因此，我不会尝试进一步通过立法对之进行规定。

Naturally enough, he replied.

阿：当然，无需如此。

Well, and about the business of the agora, and the ordinary dealings between man and man, or again about agreements with artisans; about insult and injury, or the commencement of actions, and the appointment of juries, what would you say? There may also arise questions about any impositions and exactions of market and harbour dues which may be required, and in general about the regulations of markets, police, harbours, and the like. But, oh heavens! shall we condescend to legislate on any of these particulars?

苏：嗯，关于市场贸易、民间普通交易、手工业者协议、侮辱与侵害、起诉程序以及陪审团任命等问题，又该如何对待呢？同时，还会出现有关市场与海港的赋税征收问题，以及有关市场、公安、海港等的规章制度问题。然而，我的天啊！我们是否应该屈尊为所有此类具体问题制定立法呢？

I think, he said,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impose laws about them on good men; what regulations are necessary they will find out soon enough for themselves.

阿：以我之见，无需将相关的法律强加于正直的国民。如有必要，他们会自行及时制定出规章制度。

Yes, I said, my friend, if God will only preserve to them the laws which we have given them.

苏：是啊，我的朋友，但愿上天护佑，使我们为他们制定的法律得以流传下去。

And without divine help, said Adeimantus, they will go on for ever making and mending their laws and their lives in the hope of attaining perfection.

阿：若无天助，他们将永不停息地制定并修改律法与生活，以期达到完美无缺。

You would compare them, I said, to those invalids who, having no self-restraint, will not leave off their habits of intemperance?

苏：你会将他们比作因缺乏自制力而致病，却仍不愿改掉无节制生活习惯的病人吗？

Exactly.

阿：正是此意。

Yes, I said; and what a delightful life they lead! they are always doctoring and increasing and complicating their disorders, and always fancying that they will be cured by any nostrum which anybody advises them to try.

苏：是啊，他们生活得多么快乐啊！他们不断就医，病情却日益严重，而且日趋复杂，但是他们仍然幻想着，只要自己尝试一下某人推荐的秘方，便可药到病除。

Such cases are very common, he said, with invalids of this sort.

阿：类似情形，在此类病人中极为常见。

Yes, I replied; and the charming thing is that they deem him their worst enemy who tells them the truth, which is simply that, unless they give up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wenching and idling, neither drug nor cautery nor spell nor amulet nor any other remedy will avail.

苏：是的，而且奇怪的是，他们将敢于实言相告者视为死敌。事实很简单，就是除非他们不再大吃大喝，不再纵情声色，不再无所事事，否则的话，任何药物、烧灼术、符咒、护身符乃至其他疗法，都不会见效。

Charming! he replied. I see nothing charming in going into a passion with a man who tells you what is right.

阿：真的很奇怪！我认为，冲着对自己实言相告者发脾气，太没品位了。

These gentlemen, I said, do not seem to be in your good graces.

苏：这些人当然不能博得你的好感了。

Assuredly not.

阿：的确不能。

Nor would you praise the behaviour of States which act like the men whom I was just now describing. For are there not ill-ordered States in which the citizens are forbidden under pain of death to alter the constitution; and yet he who most sweetly courts those who live under this regime and indulges them and fawns upon them and is skilful in anticipating and gratifying their humours is held to be a great and good statesman—do not these States resemble the persons whom I was describing?

苏：假如国家行事与我刚才所描述的病人相仿，那么你也不会称许它的所作所为吧。难道不是存在一些政治混乱的国家吗？在此类国家中，公民不得修改宪法，否则以死罪论处；然而，百般谄媚、纵容讨好当权者之徒，善于迎合当权者的喜好，却被誉为伟大的政治家。此类国家是否酷似我所描述的病人呢？

Yes, he said; the States are as bad as the men; and I am very far from praising them.

阿：是的。此类国家与那些病人，同样不可救药，我对之毫无好感可言。

But do you not admire, I said, the coolness and dexterity of these ready ministers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苏：但是，你难道不佩服这些政治腐败的大臣人选所具备的沉着冷静与八面玲珑吗？

Yes, he said, I do; but not of all of them, for there are some whom the applause of the multitude has deluded into the belief that they are really statesmen, and these are not much to be admired.

阿：是的，我的确佩服，但并非佩服他们所有人，因为其中一些人在众人的喝彩声中飘飘然忘乎所以，竟以真正的政治家自居，实在不值得人佩服。

What do you mean? I said; you should have more feeling for them. When a man cannot measure, and a great many others who cannot measure declare that he is four cubits high, can he help believing what they say?

苏：你这是何意？你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同情。假如有人不懂得如何测量，另有许多人也不会测量却宣称他身高六尺，他能不相信众人之言吗？

Nay, he said, certainly not in that case.

阿：不能，当此情形，不得不信。

Well, then, do not be angry with them; for are they not as good as a play, trying their hand at paltry reforms such as I was describing; they are always fancying that by legislation they will make an end of frauds in contracts, and the other rascalities which I was mentioning, not knowing that they are in reality cutting off the

heads of a hydra?

苏：那么，就不要与他们计较了。他们难道不是像演戏一样有趣吗？他们不断尝试进行类似于我所说的琐碎改革，总是幻想可以通过立法，结束合同诈骗，以及我提及的其他卑鄙行径，殊不知，事实上，他们的行为，无异于砍九头蛇的头，只会造成恶性循环，却于事无补。

Yes, he said; that is just what they are doing.

阿：是的，这恰恰便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I conceive, I said, that the true legislator will not trouble himself with this class of enactments whether concerning laws or the constitution either in an ill-ordered or in a well-ordered State; for in the former they are quite useless, and in the latter there will be no difficulty in devising them; and many of them will naturally flow out of our previous regulations.

苏：我认为，真正立法者，不论他所在之国政治秩序好坏，都不会不辞辛苦地制定此类法令，无论它们有关律法抑或宪法。其原因在于，在政治秩序混乱之国，此种法令于事无补；在政治秩序良好之国，制定此类法令，决非难事，其中许多可从我们之前的规定中自然引申出来。

What, then, he said, is still remaining to us of the work of

legislation?

阿：那么，就立法而言，我们尚有何事可做呢？

Nothing to us, I replied; but to Apollo, the God of Delphi, there remains the ordering of the greatest and noblest and chiefest things of all.

苏：就我们而言，无事可做。但是，就特尔斐之神阿波罗而言，尚且需要对至为重大、崇高与主要之事进行立法。

Which are they? he said.

阿：至为重大、崇高与主要之事，所指为何？

The institution of temples and sacrifices, and the entire service of gods, demigods, and heroes; also the ordering of the repositories of the dead, and the rites which have to be observed by him who would propitiate the inhabitants of the world below. These are matters of which we are ignorant ourselves, and as founders of a city we should be unwise in trusting them to any interpreter but our ancestral deity. He is the god who sits in the centre, on the navel of the earth, and he is the interpreter of religion to all mankind.

苏：有关庙宇与献祭的礼仪制度，整套祭祀神、半神以及英雄的

仪式；殡葬与安魂仪式。此皆为我们一无所知之事。作为城邦缔造者，我们不该愚蠢地将之委托给任何解释者，只能求诸古老的神祇。他是端坐于世界中心的神祇，向所有人类诠释宗教的奥秘。

You are right, and we will do as you propose.

阿：言之有理。我们必当谨遵教诲。

But where, amid all this, is justice? son of Ariston, tell me where. Now that our city has been made habitable, light a candle and search, and get your brother and Polemarchus and the rest of our friends to help, and let us see where in it we can discover justice and where injustice, and in what they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and which of them the man who would be happy should have for his portion, whether seen or unseen by gods and men.

苏：可是，在这一切之中，何处有正义呢？阿里斯顿之子，请你告诉我。如今，我们的城邦已经落成，请燃起蜡烛，在你的兄弟——玻勒马霍斯以及其他朋友的帮助下，让我们看看正义与不义分别存于何处，二者差异之所在，以及在不考虑神人是否看见的情况下，追求幸福之人应该在二者之中如何抉择。

SOCRATES-GLAUCON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格劳孔

Nonsense, said Glaucon: did you not promise to search yourself, saying that for you not to help justice in her need would be an impiety?

格：一派胡言！你难道不是承诺要亲自寻找，并且表示你若不伸张正义便是犯下亵渎之罪吗？

I do not deny that I said so, and as you remind me, I will be as good as my word; but you must join.

苏：我不否认的确如此说过。既然你提醒了我，我将兑现诺言。但是，你们必须助我一臂之力。

We will, he replied.

格：我们愿意效劳。

Well, then, I hope to make the discovery in this way: I mean to begin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our State, if rightly ordered, is perfect.

苏：那么，我希望如此进行探寻：我打算在最初假定，如果我们的城邦秩序井然，那么它便是完美的。

That is most certain.

格：毫无疑问。

And being perfect, is therefore wise and valiant and temperate and just.

苏：既然它完美，它便拥有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

That is likewise clear.

格：此亦显而易见。

And whichever of these qualities we find in the State, the one which is not found will be the residue?

苏：不论在城邦之中我们觅到此类品质中的哪种，其他未发现的品质必定存在于城邦的其他地方，对吗？

Very good.

格：很好。

If there were four things, and we were searching for one of them, wherever it might be, the one sought for might be known to us from the first, and there would be no further trouble; or we might know the other three first, and then the fourth would clearly be the one left.

苏：假设有四件物品，我们正在寻找其中之一，不论它在何处，若是我们一开始就认出它，便大功告成了；或者，我们可以先找到其余三件，那么显然剩下的便是第四件。

Very true,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And is not a similar method to be pursued about the virtues, which are also four in number?

苏：我们在寻找数量刚好也是四种的美德时，不是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吗？

Clearly.

格：显然如此。

First among the virtues found in the State, wisdom comes into view, and in this I detect a certain peculiarity.

苏：城邦诸美德之中，首先走入我们视野的，便是智慧。同时，我察觉到，智慧具有某种特性。

What is that?

格：何种特性？

The State which we have been describing is said to be wise as being good in counsel?

苏：我们所说的城邦，因决策英明，而被认为富有智慧吗？

Very true.

格：确实如此。

And good counsel is clearly a kind of knowledge, for not by ignorance, but by knowledge, do men counsel well?

苏：英明的决策，显然是一种知识，因为人们做出正确决策凭借

的是知识而非无知，对吗？

Clearly.

格：显而易见。

And the kinds of knowledge in a State are many and diverse?

苏：城邦之中，知识种类繁多，各不相同吗？

Of course.

格：当然。

There is the knowledge of the carpenter; but is that the sort of knowledge which gives a city the title of wise and good in counsel?

苏：其中包括木工知识，但此种知识会赋予城邦决策英明的美誉吗？

Certainly not; that would only give a city the reputation of skill in carpentering.

格：当然不会。它只会使城邦在木工技术方面享有盛誉。

Then a city is not to be called wise because possessing a knowledge which counsels for the best about wooden implements?

苏：那么，一个城邦，不会因拥有最先进的木制工具制造知识，而被称为“英明城邦”吗？

Certainly not.

格：当然不会。

Nor by reason of a knowledge which advises about brazen pots, I said, nor as possessing any other similar knowledge?

苏：亦不会因制造铜锅知识，或其他类似的知识吧？

Not by reason of any of them, he said.

格：并非因为以上任何知识。

Nor yet by reason of a knowledge which cultivates the earth; that would give the city the name of agricultural?

苏：亦不会因拥有为城邦带来农业发达美誉的农耕知识吧？

Yes.

格：对。

Well, I said, and is there any knowledge in our recently-founded State among any of the citizens which advises, not about any particular thing in the State, but about the whole, and considers how a State can best deal with itself and with other States?

苏：那么，是否在我们刚刚建立的城邦中的某些公民之间存在着某种知识——它不是关于城邦内某一特定方面，而是关于整个城邦，同时考虑如何最好地处理城邦内政外交呢？

There certainly is.

格：当然存在。

And what is this knowledge, and among whom is it found? I asked.

苏：那是什么知识？可在哪些人身上找到？

It is the knowledge of the guardians, he replied, and is found among those whom we were just now describing as perfect guardians.

格：这是守卫者的知识，可在我们刚刚称之为优秀守卫者的人身上找到。

And what is the name which the city derives from the possession of this sort of knowledge?

苏：拥有此种知识的城邦，会获得什么声誉呢？

The name of good in counsel and truly wise.

格：会享有决策英明，富有真正智慧的美誉。

And will there be in our city more of these true guardians or more smiths?

苏：在我们的城邦之中，哪种人会更多些，是真正的守卫者还是铁匠呢？

The smiths, he replied, will be far more numerous.

格：铁匠要远多于守卫者。

Will not the guardians be the smallest of all the classes who receive a name from the profession of some kind of knowledge?

苏：在各种类别因拥有某方面的知识而得名的人当中，守卫者是为数最少的一类人吗？

Much the smallest.

格：绝对是为数最少。

And so by reason of the smallest part or class, and of the knowledge which resides in this presiding and ruling part of itself, the whole State, being thus constituted according to nature, will be wise; and this, which has the only knowledge worthy to be called wisdom, has been ordained by nature to be of all classes the least.

苏：因此，由于人数最少的一类人拥有统治治理城邦的知识，依照自然规律构成的整个城邦必定富有智慧；同时，唯独这类人拥有可称之为智慧的知识，依照自然规律，他们注定是各个阶层中人数最少的。

Most true.

格：千真万确。

Thus, then, I said, the nature and place in the State of one of the four virtues has somehow or other been discovered.

苏：于是，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已经发现了四种美德之一在城邦中的地位与本质。

And, in my humble opinion, very satisfactorily discovered, he replied.

格：愚见以为，已经以令人非常满意的方式被找到了。

Again, I said,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seeing the nature of courage, and in what part that quality resides which gives the name of courageous to the State.

苏：再者，我们不难发现勇气的本质，以及为国家带来勇敢美誉的这种品质存在于国家的哪个阶层。

How do you mean?

格：此话怎讲？

Why, I said, every one who calls any State courageous or cowardly, will be thinking of the part which fights and goes out to war on the State's behalf.

苏：唉，任何人在称一个国家勇敢抑或懦弱时，总会想起，为国家而战、为国家而奔赴沙场的那部分人。

No one, he replied, would ever think of any other.

格：没有人会想到其他人。

The rest of the citizens may be courageous or may be cowardly, but their courage or cowardice will not, as I conceive, have the effect of making the city either the one or the other.

苏：其他公民也许勇敢，抑或懦弱，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勇敢或懦弱，不会造成城邦的勇敢或懦弱。

Certainly not.

格：当然不会。

The city will be courageous in virtue of a portion of herself

which preserves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that opinion about the nature of things to be feared and not to be feared in which our legislator educated them; and this is what you term courage.

苏：城邦之所以勇敢，是因为城邦中的一部分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我们的立法者灌输给他们的观点，即关于可怕与不可怕事物的本质。这便是你所谓的勇敢。

I should like to hear what you are saying once more, for I do not think that I perfectly understand you.

格：我似乎无法完全领会你的意思，想再听一遍你刚才所讲的话。

I mean that courage is a kind of salvation.

苏：我认为，勇敢便是一种坚守。

Salvation of what?

格：坚守什么呢？

Of the opinion respecting things to be feared, what they are and of what nature, which the law implants through education; and

I mean by the words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to intimate that in pleasure or in pain, o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esire or fear, a man preserves, and does not lose this opinion. Shall I give you an illustration?

苏：坚守律法通过教育灌输的关于可怕事物的观点，即可怕的事物是什么，其实质是什么；其中“在任何情况下”，指的是无论痛苦与欢乐，无论是处于欲望还是恐惧之中，一个人都要坚守，而不是放弃该观点。需要我来举例说明一下吗？

If you please.

格：如果你愿意的话。

You know, I said, that dyers, when they want to dye wool for making the true sea-purple, begin by selecting their white colour first; this they prepare and dress with much care and pains, in order that the white ground may take the purple hue in full perfection. The dyeing then proceeds; and whatever is dyed in this manner becomes a fast colour, and no washing either with lyes or without them can take away the bloom. But, when the ground has not been duly prepared, you will have noticed how poor is the look either of purple or of any other colour.

苏：你知道，当染工想要把羊毛染成纯正的紫色时，他们首先要挑选出白色羊毛，不辞辛苦地对之进行仔细整理，从而使白色底子可以完美地吸收紫色。接下来进行染色。如果我们采用这种方式，不论

织物染成什么颜色，都不易褪色；不论水洗时用不用皂碱，都不会损害到完美的色泽。如果衣料未经过适当处理，你会发现不论织物染成紫色还是其他颜色，样子都会很难看。

Yes, he said; I know that they have a washed-out and ridiculous appearance.

格：是的。我知道，织物褪色，而且看起来很可笑。

Then now, I said, you will understand what our object was in selecting our soldiers, and educating them in music and gymnastic; we were contriving influences which would prepare them to take the dye of the laws in perfection, and the colour of their opinion about dangers and of every other opinion was to be indelibly fixed by their nurture and training, not to be washed away by such potent lyes as pleasure—mightier agent far in washing the soul than any soda or lye; or by sorrow, fear, and desire, the mightiest of all other solvents. And this sort of universal saving power of true opinion in conformity with law about real and false dangers I call and maintain to be courage, unless you disagree.

苏：现在，你便明白我们挑选战士并教之以音乐、体育的目的之所在了。我们是想施与他们影响，从而使他们做好准备完美地接受律法染料——他们关于危险乃至一切其他事物的观点，通过教育培养的方式固定下来，永远也擦不掉。这种颜色也不会被强有力的洗涤剂，如享乐——比苏打或皂碱都更为有效力的灵魂漂洗剂冲洗掉，抑或被威力仅次于享乐的溶解剂——悲伤、恐怖以及欲望冲洗掉。如果你没有异议的话，我主张称这种坚守符合律法精神有关真假威胁的正确观

点的普遍力量为勇敢。

But I agree, he replied; for I suppose that you mean to exclude mere uninstructed courage, such as that of a wild beast or of a slave—this, in your opinion, is not the courage which the law ordains, and ought to have another name.

格：我并无异议，因为我猜想，你有意将纯粹未经教育引导的胆量排除在外，比如野兽的勇猛与奴隶的匹夫之勇——你认为，这并非符合律法要求的勇敢，应该有别的名称。

Most certainly.

苏：毫无疑问。

Then I may infer courage to be such as you describe?

格：那么，我便可依照你的说法来推知勇敢吗？

Why, yes, said I, you may, and if you add the words 'of a citizen,' you will not be far wrong;—hereafter, if you like, we will carry the examination further, but at present we are seeking not for courage but justice; and for the purpose of our enquiry we have said enough.

苏：当然可以。如果你在勇敢前添上“公民的”，也未尝不可。如果你同意的话，将来我们再对此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但此刻我们正在寻求的是正义，而不是勇敢。就我们所探寻的目的而言，我们就此话题的讨论可以告一段落了。

You are right, he replied.

格：言之有理。

Two virtues remain to be discovered in the State-first, temperance, and then justice which is the end of our search.

苏：在城邦之中，仍有待我们去发现的两种美德——首先是节制，其次是正义——即我们所要寻找的目标。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Now, can we find justice without troubling ourselves about temperance?

苏：现在，我们可否绕过节制而找到正义呢？

I do not know how that can be accomplished, he said, nor do I desire that justice should be brought to light and temperance lost sight of; and therefore I wish that you would do me the favour of considering temperance first.

格：我不知，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不希望，在发现正义的同时，却丢掉节制。因此，我希望你能看在我的份上，首先考虑节制。

Certainly, I replied, I should not be justified in refusing your request.

苏：当然，我应该没有理由拒绝你的请求。

Then consider, he said.

格：那就考虑一下吧。

Yes, I replied; I will; and as far as I can at present see, the virtue of temperance has more of the nature of harmony and symphony than the preceding.

苏：好的，我愿意。就目前情况看来，节制比前面讲过的美德，更具协调性与调和性。

How so? he asked.

格：何出此言？

Temperance, I replied, is the ordering or controlling of certain pleasures and desires; this is curiously enough implied in the saying of 'a man being his own master;' and other traces of the same notion may be found in language.

苏：节制是对某些享乐或欲望的整治或控制。它在那句古话“人是自己的主人”中得到巧妙的暗示，此外还可在语言中找到其他的表达来印证同样的观念。

No doubt, he said.

格：毋庸置疑。

There is something ridiculous in the expression 'master of himself'; for the master is also the servant and the servant the master; and in all these modes of speaking the same person is denoted.

苏：“自己的主人”这个表达存在着一定的荒谬性，因为主人同时又是奴隶，而奴隶同时又是主人，而所有表达模式，所指的皆为同一个人。

Certainly.

格：当然。

The meaning is, I believe, that in the human soul there is a better and also a worse principle; and when the better has the worse under control, then a man is said to be master of himself; and this is a term of praise: but when, owing to evil education or association, the better principle, which is also the smaller, is overwhelmed by the greater mass of the worse—in this case he is blamed and is called the slave of self and unprincipled.

苏：我认为，其含义，是在人类的灵魂里同时存在着善与恶两种根源。当善的根源控制了恶的根源，人便可被称之为自己的主人。这是赞美之词。但是如果善的根源由于不良的教育或者社会交往而处于劣势，被恶的根源以压倒性的优势打败，那么在此情形之下，人便要受到谴责，并被称为“自己的奴隶”，“缺乏原则”。

Yes, there is reason in that.

格：对，言之有理。

And now, I said, look at our newly-created State, and there you will find one of these two conditions realized; for the State, as you will acknowledge, may be justly called master of itself, if the words

'temperance' and 'self-mastery' truly express the rule of the better part over the worse.

苏：如今，反观我们刚缔造的城邦，你将发现，以上两种情形之一，在此已经成为现实，因为“节制”、“自主”这些词倘若果真表示善对恶的统治，那么此城邦无疑可以被准确称为“自己的主人”。

Yes, he said, I see that what you say is true.

格：是的，我认为你说得对。

Let me further note that the manifold and complex pleasures and desires and pains are generally found in children and women and servants, and in the freemen so called who are of the lowest and more numerous class.

苏：我要进一步特别指出的是，形形色色、复杂多样的快乐、欲望与苦痛，往往存在于儿童、妇女与奴仆，以及被称为处于最底层并人数众多的自由民中间。

Certainly, he said.

格：当然。

Whereas the simple and moderate desires which follow reason, and a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mind and true opinion, are to be found only in a few, and those the best born and best educated.

苏：然而，遵循理智的、简单而有节制的欲望，接受灵魂与正确观念的引导，却只存在于极少数出身高贵并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中间。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These two, as you may perceive, have a place in our State; and the meaner desires of the many are held down by the virtuous desires and wisdom of the few.

苏：正如你所知，此两者在城邦中共同存在，而多数人低级的欲望，受到极少数人正直欲望与智慧的抑制。

That I perceive, he said.

格：我知道。

Then if there be any city which may be described as master of its own pleasures and desires, and master of itself, ours may claim

such a designation?

苏：那么，倘若某城邦可以称得上“自己快乐与欲望的主人”、“自己的主人”的话，我们的城邦必定当仁不让。

Certainly, he replied.

格：当然。

It may also be called temperate, and for the same reasons?

苏：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亦可被称为有节制的国家，对吗？

Yes.

格：对。

And if there be any State in which rulers and subjects will be agreed as to the question who are to rule, that again will be our State?

苏：假如在某国家，统治者与国民，能够就“谁来统治”的问题达成共识，那么它也必定是我们国家。

Undoubtedly.

格：毫无疑问。

And the citizens being thus agreed among themselves, in which class will temperance be found—in the rulers or in the subjects?

苏：在公民就此达成一致之后，那么我们将在哪个阶层中找到节制——在统治者中抑或在国民中呢？

In both, as I should imagine, he replied.

格：依我看来，二者之中皆可找到。

Do you observe that we were not far wrong in our guess that temperance was a sort of harmony?

苏：你是说，我们未尝不可假设“节制即为某种和谐”吗？

Why so?

格：此话怎讲？

Why, because temperance is unlike courage and wisdom, each of which resides in a part only, the one making the State wise and the other valiant; not so temperance, which extends to the whole, and runs through all the notes of the scale, and produces a harmony of the weaker and the stronger and the middle class, whether you suppose them to be stronger or weaker in wisdom or power or numbers or wealth, or anything else. Most truly then may we deem temperance to be the agreement of the naturally superior and inferior, as to the right to rule of either, both in states and individuals.

苏：唉，因为节制不同于勇气和智慧，后两者只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一个赋予城邦智慧，一个赋予城邦勇敢；而节制则不然，它无所不在，涵盖音阶上的所有音符，产生出弱者阶层、有权阶层、中等阶层的和音，不分贤愚贵贱、多寡贫富及其他方面。我们可以确信，节制，即为天赋优劣不同之人，就城邦事务与人际交往中一方有权统治另一方而达成的共识。

I entirely agree with you.

格：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And so, I said, we may consider three out of the four virtues to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our State. The last of those qualities which make a state virtuous must be justice, if we only knew what that was.

苏：这样，我们便可以认为，四种美德中的三种，已经在我们城邦中找到了。既然我们已预先知道，未论及的美德为何，那么赋予我们国家道德力量的最后一种美德必定是正义。

The inference is obvious.

格：显然，可以如此推论。

The time then has arrived, Glaucon, when, like huntsmen, we should surround the cover, and look sharp that justice does not steal away, and pass out of sight and escape us; for beyond a doubt she is somewhere in this country: watch therefore and strive to catch a sight of her, and if you see her first, let me know.

苏：格劳孔，关键的时刻到来了。我们要像猎人包围猎物藏身之处一样，高度警惕以防正义偷偷溜走，消失得无影无踪，逃脱我们的掌控。毫无疑问，它就藏在国家的某个地方：因此，密切注意，努力捕捉到它的行踪。如果你先发现了它，一定要告诉我。

Would that I could! but you should regard me rather as a follower who has just eyes enough to see what you show him—that is about as much as I am good for.

格：果真如此的话，我会那样做的！但是，你最好视我为追随者，一个仅能够按照你的指示见你之所见的人——这便是我能做的。

Offer up a prayer with me and follow.

苏：同我一道祈祷神灵庇佑，然后随我来。

I will, but you must show me the way.

格：我会的，但你必须为我指引道路。

Here is no path, I said, and the wood is dark and perplexing; still we must push on.

苏：此间无路，林暗幽深，我们须奋力前行。

Let us push on.

格：让我们奋力前行。

Here I saw something: Halloo! I said, I begin to perceive a track, and I believe that the quarry will not escape.

苏（看到了什么）：喂，格劳孔，我开始察觉到蛛丝马迹了，相信猎物一定跑不掉的。

Good news, he said.

格：好消息。

Truly, I said, we are stupid fellows.

苏：我们真是愚不可及。

Why so?

格：何出此言？

Why, my good sir, at the beginning of our enquiry, ages ago, there was justice tumbling out at our feet, and we never saw her; nothing could be more ridiculous. Like people who go about looking for what they have in their hands—that was the way with us—we looked not at what we were seeking, but at what was far off in the distance; and therefore, I suppose, we missed her.

苏：哎呀，正直的先生，很久以前，在我们踏上寻找正义征程之初，正义便在我们跟前嬉戏打滚，我们却从未注意到它。这实在是可笑至极。就好比人们明明把东西握在自己手里，却还要四处寻找——我们便是如此——我们并不看正在找寻之物，却把目光投向远方。我认为，我们便是如此与它失之交臂的。

What do you mean?

格：此话怎讲？

I mean to say that in reality for a long time past we have been talking of justice, and have failed to recognise her.

苏：我想说的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谈了好久关于正义的事，却一直未能意识到它的存在。

I grow impatient at the length of your exordium.

格：听了你滔滔不绝的开场白，我已有些不耐烦了。

Well then, tell me, I said, whether I am right or not: You remember the original principle which we were always laying down 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that one man should practise one thing only, the thing to which his nature was best adapted;—now justice is this principle or a part of it.

苏：好吧，告诉我，我的判断是否正确：你记得，我们缔造此城邦一直以来主张的独创原则，即一个人应该只从事一个最适合其天性的行业——如今，正义即为该原则，抑或该原则的一部分。

Yes, we often said that one man should do one thing only.

格：是的，我们曾一再强调，一人只应做一件事情。

Further, we affirmed that justice was doing one's own business, and not being a busybody; we said so again and again, and many others have said the same to us.

苏：再者，我们曾经断言，正义即为专司一事，而非身兼数职。我们一再申明这个原则，许多其他人也已对我们说过同样的话。

Yes, we said so.

格：是的，我们的确如此说过。

Then to do one's own business in a certain way may be assumed to be justice. Can you tell me whence I derive this inference?

苏：那么，某种程度上，专司一事，即可被视作正义。你能说说，我是如何做出如此推论吗？

I cannot, but I should like to be told.

格：我不能，还望赐教。

Because I think that this is the only virtue which remains in the State when the other virtues of temperance and courage and wisdom are abstracted; and, that this is the ultimate cause and condi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all of them, and while remaining in them is also their preservative; and we were saying that if the three were discovered by us, justice would be the fourth or remaining one.

苏：因为我想，在我们分离出节制、勇气与智慧之后，这是城邦中剩下的唯一美德；它是所有美德存在的根本原因和根本条件，存在于各种美德中并为它们提供保护。另外，我们曾说过，如果我们找到了前三种美德，那么正义便是第四种或者剩下的那种美德。

That follows of necessity.

格：必然如此。

If we are asked to determine which of these four qualities by its presence contributes most to the excellence of the State, whether the agreement of rulers and subjects, or the preservation in the soldiers of the opinion which the law ordains about the true nature of dangers, or wisdom and watchfulness in the rulers, or whether this other which I am mentioning, and which is found in children and women, slave and freeman, artisan, ruler, subject,—the quality, I mean, of every one doing his own work, and not being a

busybody, would claim the palm—the question is not so easily answered.

苏：如果有人要我们判断，此四种品质中，哪一个最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尽善尽美，是统治者与国民之间的和谐一致，抑或军人对符合律法精神关于可怕事物实质观念的坚守，抑或统治者的智慧与警觉，抑或我正在说的这种存在于妇孺、奴隶与自由民、手工业者、统治者、国民中的品质，即要求人人各司其职，不可多管闲事的品质，究竟它们中哪一个可以胜出呢？此问题并不那么容易回答。

Certainly, he replied, there would be a difficulty in saying which.

格：当然，难以取舍。

Then the power of each individual in the State to do his own work appears to compete with the other political virtues, wisdom, temperance, courage.

苏：那么，似乎是城邦人人各司其职的权利与其他政治美德，即智慧、节制、勇敢之间的抗争。

Yes, he said.

格：是的。

And the virtue which enters into this competition is justice?

苏：此参与抗争之美德，便是正义吗？

Exactly.

格：正是。

Let us look at the question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Are not the rulers in a State those to whom you would entrust the office of determining suits at law?

苏：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此问题：城邦统治者难道不是我们所委任的负责评判法律诉讼的那些人吗？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are suits decided on any other ground but that a man may neither take what is another's, nor be deprived of what is his own?

苏：判断诉讼所依据的原则，无外乎一个人不可侵占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亦不可被剥夺属于自己的东西，对吗？

Yes; that is their principle.

格：对，这便是他们的原则。

Which is a just principle?

苏：它是一个公正的原则吗？

Yes.

格：是的。

Then on this view also justice will be admitted to be the having and doing what is a man's own, and belongs to him?

苏：根据此观点，我们可以达成一致，认为正义即为各司其职，各自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对吗？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Think, now, and say whether you agree with me or not. Suppose a carpenter to be doing the business of a cobbler, or a cobbler of a carpenter; and suppose them to exchange their implements or their duties, or the same person to be doing the work of both, or whatever be the change; do you think that any great harm would result to the State?

苏：现在想一想，然后告诉我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假设一名木匠正在做鞋匠的工作，或者一名鞋匠在做木匠的工作。假设他们交换了彼此的工具和责任，或者一人身兼二职，或者无论他们发生了如何改变。你认为，这会对城邦造成严重的危害吗？

Not much.

格：危害不会很大。

But when the cobbler or any other man whom nature designed to be a trader, having his heart lifted up by wealth or strength or the number of his followers, or any like advantage, attempts to force his way into the class of warriors, or a warrior into that of legislators and guardians, for which he is unfitted, and either to take the implements or the duties of the other; or when one man is trader, legislator, and warrior all in one, then I think you will agree with me in saying that this interchange and this meddling of one with another is the ruin of the State.

苏：但是，倘若鞋匠或其他禀赋商人资质的人，由于财力雄厚，或身强体健，或追随者的妄想推许，或者种种其他优势，而心高气傲企图强行跻身军人阶层，抑或一名军人想强行挤入本不适合于自己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的行列，强夺别人的工具或职位，抑或有人集商人、立法者与军人身份于一身，那么我提出，如此的人员胡乱互换势必祸国殃民。我想，你会同意我的说法吧？

Most true.

格：千真万确。

Seeing then, I said, that there are three distinct classes, any meddling of one with another, or the change of one into another, is the greatest harm to the State, and may be most justly termed evil-doing?

苏：可见，三个等级泾渭分明，任何混淆颠倒等级界线之举，都会对国家造成无比的危害，而堪称恶行。

Precisely.

格：恰如其分。

And the greatest degree of evil-doing to one's own city would

be termed by you injustice?

苏：你会将危及城邦的穷凶极恶之举称为不义吗？

Certainly.

格：当然。

This then is injustice; and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trader, the auxiliary, and the guardian each do their own business, that is justice, and will make the city just.

苏：那么，这便是不义。反之，商人、辅助者与守卫者各司其职，即为正义，而城邦也将因此成为正义的城邦。

I agree with you.

格：我同意你的观点。

We will not, I said, be over-positive as yet; but if, on trial, this conception of justice be verified in the individual as well as in the State, there will be no longer any room for doubt; if it be not verified, we must have a fresh enquiry. First let us complete the old investigation, which we began, as you remember,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if we could previously examine justice on the larger scale, there would be less difficulty in discerning her in the individual. That larger example appeared to be the State, and accordingly we constructed as good a one as we could, knowing well that in the good State justice would be found. Let the discovery which we made be now applied to the individual—if they agree, we shall be satisfied; or, if there be a difference in the individual, we will come back to the State and have another trial of the theory. The friction of the two when rubbed together may possibly strike a light in which justice will shine forth, and the vision which is then revealed we will fix in our souls.

苏：然而，我们还不可过于肯定。但是，如果经过试验此关于正义之概念在个人乃至城邦范围都得到证实，那么就不再有任何值得怀疑之处了；如果它并不能得到证实，那么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对此问题进行考察。首先让我们重循旧路进行考察，记得当初我们的想法是，倘若我们可以事先在较大范围内对正义进行考察，那么认识个人意义上的正义也会变得轻松些。此较大范畴似乎便是城邦，于是我们竭尽所能打造一个良好的城邦，深信在良好的城邦必然可以找到正义。让我们将获得的发现应用于个人——假如二者相符，我们便圆满达到目的；假如在应用于个人时出现分歧，我们将回到城邦层面，重新对理论进行检验。当此二者彼此相互发生摩擦，便可能会燃起一道亮光，亮光之中正义迸射出流光溢彩，此美好的瞬间将永远珍藏在我们心底。

That will be in regular course; let us do as you say.

格：理当如此，让我们照你的意见办吧。

I proceeded to ask: When two things, a greater and less, are called by the same name, are they like or unlike in so far as they are called the same?

苏：假设一大一小两个物件有着同样的名称，那么具有相同名称的这两个物件是否相似呢？

Like, he replied.

格：相似。

The just man then, if we regard the idea of justice only, will be like the just State?

苏：那么，仅就正义的概念而论，正义之人与正义之城邦是否相似呢？

He will.

格：相似。

And a State was thought by us to be just when the three classes in the State severally did their own business; and also thought to be temperate and valiant and wise by reason of certain other affections

and qualities of these same classes?

苏：当城邦中的此三个阶层各司其职，我们便认为这是一个正义的城邦。同时，城邦也因为此三个阶层其他特定情感和品质而被认为是节制、勇敢并且富有智慧的。

True, he said.

格：对。

And so of the individual; we may assume that he has the same three principles in his own soul which are found in the State; and he may be rightly described in the same terms, because he is affected in the same manner?

苏：个人亦是如此。我们可以假设，个人的灵魂与城邦同样都具有三种品质，而且个人由于同样也要受到此三种品质的影响，因此可以用此三种品质来描述个人。

Certainly, he said.

格：当然。

Once more then, O my friend, we have alighted upon an easy

question—whether the soul has these three principles or not?

苏：噢，我的朋友，我们再次遇到了一个简单的问题——灵魂是否具有此三种品质呢？

An easy question! Nay, rather, Socrates, the proverb holds that hard is the good.

格：一个简单的问题！绝非如此，苏格拉底，人常说："做好事难。"

Very true, I said; and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method which we are employing is at all adequate to the accurate solution of this question; the true method is another and a longer one. Still we may arrive at a solution not below the level of the previous enquiry.

苏：的确如此。在我看来，我们目前运用的方法，并不足以完美地解决此问题；正确的方法与之不同，且需要更长的时间。尽管如此，我们用现在的方法仍旧可以解决问题，且效果并不比之前的研究差。

May we not be satisfied with that? he said;—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 am quite content.

格：我们难道不可以满足于现状吗？目前这种情形，我就已经心

满意足了。

I too, I replied, shall be extremely well satisfied.

苏：我也是深有同感。

Then faint not in pursuing the speculation, he said.

格：那么，不要灰心，继续探究吧。

Must we not acknowledge, I said, that in each of us there are the same principles and habits which there are in the State; and that from the individual they pass into the State?—how else can they come there? Take the quality of passion or spirit;—it would be ridiculous to imagine that this quality, when found in States, is not derived from the individuals who are supposed to possess it, e.g. the Thracians, Scythians, and in general the northern nations; and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the love of knowledge, which is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our part of the world, or of the love of money, which may, with equal truth, be attributed to the Phoenicians and Egyptians.

苏：我们难道没有必要承认，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普遍存在着与我们城邦相同的品质和习性；此类品质和习性始自个人而延至城邦吗？此外，它们还会来源于何处呢？就激情或斗志而论，设想此种存在于城邦的品质却并非来自应该拥有该品质的个人，比如色雷斯人、

西赛亚人以及广义上的北方民族，那将会是荒谬可笑的。同理，热爱知识是我们这一地区的特有品质，贪爱钱财则可以准确地被认为是腓尼基人和埃及人的性格特点。

Exactly so, he said.

格：正是如此。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this.

苏：这并不难理解。

None whatever.

格：毫无困难。

But the question is not quite so easy when we proceed to ask whether these principles are three or one; whether, that is to say, we learn with one part of our nature, are angry with another, and with a third part desire the satisfaction of our natural appetites; or whether the whole soul comes into play in each sort of action—to determine that is the difficulty.

苏：但是，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些本性是三个各自独立的部分，

抑或一个共同的整体？问题就并非那么简单了。换言之，我们是凭借我们本性的一部分来学习认知，一部分宣泄愤恨，最后一部分渴望获得自然欲望的满足，还是无论在每种行为中都有整个灵魂在发挥作用？这是一个难以做出判断的问题。

Yes, he said; there lies the difficulty.

格：是的，存在困难。

Then let us now try and determine whether they are the same or different.

苏：那么，现在让我们试着来判断一下：它们究竟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

How can we? He asked.

格：我们如何进行判断呢？

I replied as follows: The same thing clearly cannot act or be acted upon in the same part or in relation to the same thing at the same time, in contrary ways; and therefore whenever this contradiction occurs in things apparently the same, we know that they are really not the same, but different.

苏：显然，相同事物的相同部分，不能在同一时间以矛盾的方式施动或受动，因此一旦表面相同的事物出现了这样的矛盾现象，我们便知道它们并非相同，而是不同。

Good.

格：好。

For example, I said, can the same thing be at rest and in motion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ame part?

苏：例如，相同事物的相同部分，可能在同一时间处于既静止又运动的状态吗？

Impossible.

格：不可能。

Still, I said, let us have a more precise statement of terms, lest we should hereafter fall out by the way. Imagine the case of a man who is standing and also moving his hands and his head, and suppose a person to say that one and the same person is in motion and at rest at the same moment-to such a mode of speech we should object, and should rather say that one part of him is in motion while another is at rest.

苏：我们还是对之做以更为准确的说明吧，以免此后中途发生意见上的分歧。想象一下，一个人站在原地，与此同时他的双手和头却处于运动状态。假如某人说，此人同时处于静止与运动的状态，我们会对此种讲话方式表示异议，而会说他的一部分在运动，而另一部分则处于静止。

Very true.

格：非常正确。

And suppose the objector to refine still further, and to draw the nice distinction that not only parts of tops, but whole tops, when they spin round with their pegs fixed on the spot, are at rest and in motion at the same time (and he may say the same of anything which revolves in the same spot), his objection would not be admitted by us, because in such cases things are not at rest and in motion in the same parts of themselves; we should rather say that they have both an axis and a circumference, and that the axis stands still, for there is no deviation from the perpendicular; and that the circumference goes round. But if, while revolving, the axis inclines either to the right or left, forwards or backwards, then in no point of view can they be at rest.

苏：设想持异议者挖空心思地进一步阐述并以陀螺为例，指出当陀螺绕着固定于一点的陀尖旋转时，同时处于静止兼运动状态的，不仅是陀螺的某些部分，而且是陀螺的整体。由此，他可以说，任何原地旋转的物体都具有如此特性。我们不会认可他的这一说法，因为在

此情形之下物体本身的相同部分并非同时处于静止与运动状态，相反我们应该说，他们具有中轴和圆周，中轴由于并不发生偏离而保持静止，圆周则处于旋转状态。但如果在旋转的过程中，中轴发生向左右或前后的偏离，那么中轴便绝非处于静止状态。

That is the correct mode of describing them, he replied.

格：如此描述，十分恰当。

Then none of these objections will confuse us, or incline us to believe that the same thing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ame part or in relation to the same thing, can act or be acted upon in contrary ways.

苏：那么，我们将再也不会被此类反对的观点所迷惑，再也不会相信，相同物体的相同部分，在同一时间可以以相反的方式施动或受动。

Certainly not, according to my way of thinking.

格：以我之见，当然不会。

Yet, I said, that we may not be compelled to examine all such objections, and prove at length that they are untrue, let us assume their absurdity, and go forward 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hereafter,

if this assumption turn out to be untrue, all the consequences which follow shall be withdrawn.

苏：然而，我们不可能逐一考证所有这些反对意见，然后最后证实它们并不可信。因而我们不妨假定它们荒诞不经，并继续进行研究，前提是如果此后我们发现此假定是错误的，由此而得出的所有结论将被一并撤销。

Yes, he said, that will be the best way.

格：是的，此法最好。

Well, I said, would you not allow that assent and dissent, desire and aversion,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are all of them opposites, whether they are regarded as active or passive (for that makes no difference in the fact of their opposition)?

苏：你难道不同意，赞成与异议、欲望与厌恶、吸引与排斥均为对立的事物吗？不论它们被视为主动抑或被动，皆不会影响它们之间彼此对立的事实。

Yes, he said, they are opposites.

格：同意，它们是对立的。

Well, I said, and hunger and thirst, and the desires in general, and again willing and wishing,—all these you would refer to the classes already mentioned. You would say—would you not?—that the soul of him who desires is seeking after the object of his desire; or that he is drawing to himself the thing which he wishes to possess: or again, when a person wants anything to be given him, his mind, longing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is desire, intimates his wish to have it by a nod of assent, as if he had been asked a question?

苏：饮食之欲，乃至广义上的欲望，连同意愿与希望，所有这些都可以划到以上提及的类别中去。你是否会说，渴求者的灵魂正在追寻其欲望之物？抑或他正在吸引自己希望占有之物？抑或当人欲得到任何东西之时，他一心渴望实现其欲望，会颔首认可心之所想，有如回应一个问题？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what would you say of unwillingness and dislike and the absence of desire; should not these be referred to the opposite class of repulsion and rejection?

苏:你又将如何看待不情不愿、厌恶反感和无欲无求呢？难道这些不应该被归在与欲望相对的拒绝排斥那一类别吗？

Certainly.

格：当然应该。

Admitting this to be true of desire generally, let us suppose a particular class of desires, and out of these we will select hunger and thirst, as they are termed, which are the most obvious of them?

苏：既然我们已经对欲望达成了基本的共识，让我们以一特定类别的欲望为例。从中我们将选出饮食之欲，正如其名称所表明的那样，它们是诸多欲望中最为显而易见的。

Let us take that class, he said.

格：让我们选定这一类欲望吧。

The object of one is food, and of the other drink?

苏：饮食之欲的目标，一为食物，一为饮品。

Yes.

格：是的。

And here comes the point: is not thirst the desire which the soul has of drink, and of drink only; not of drink qualified by anything else; for example, warm or cold, or much or little, or, in a word, drink of any particular sort: but if the thirst be accompanied by heat, then the desire is of cold drink; or, if accompanied by cold, then of warm drink; or, if the thirst be excessive, then the drink which is desired will be excessive; or, if not great, the quantity of drink will also be small: but thirst pure and simple will desire drink pure and simple, which is the natural satisfaction of thirst, as food is of hunger?

苏：由此，我们要提出观点：干渴是灵魂对饮品的欲望，并且是单纯对饮品的欲望，而非对有任何特别限定的饮品，比如冷热或多少，抑或一言以蔽之，任何特定种类的饮品的欲望，难道不是吗？但是如果人又热又渴，那么他渴望的就是冷饮；人若是又冷又渴，那么他渴望的就是热饮；如果人极度口渴，那么他渴望的是一顿狂饮；如果人不是很渴，对饮品的需求也将会很少。但是，单纯的口渴要求的是单纯的饮品，即对口渴之欲的自然满足，正如食物是对饥饿之欲的自然满足一样，难道不是吗？

Yes, he said; the simple desire is, as you say, in every case of the simple object, and the qualified desire of the qualified object.

格：是的，在任何情形之下，欲望单纯则对象单纯，而在特定条件下的欲望，则对应特定条件的对象。

But here a confusion may arise; and I should wish to guard

against an opponent starting up and saying that no man desires drink only, but good drink, or food only, but good food; for good is the universal object of desire, and thirst being a desire, will necessarily be thirst after good drink; and the same is true of every other desire.

苏：但是，此处可能会出现一点混乱，因此我提请大家提高警惕，反对者会突然站出来发难道："人希望得到的，并非是单纯的饮品，而是美味的饮品；人愿意得到的，并非是单纯的食物，而是美味的食物，因为追求优良的品质是欲望的普遍要求，而渴作为一种欲望，必然要求得到美味的饮品。以此类推，其他欲望，皆是如此。"

Yes, he replied, the opponent might have something to say.

格：是的，反对者会提出异议的。

Nevertheless I should still maintain, that of relatives some have a quality attached to either term of the relation; others are simple and have their correlatives simple.

苏：不过，我仍坚持认为，就欲望的相关物而言，有些欲望附加特定限制条件，其相关物亦附加特定限制条件；其他单纯的欲望，则对应单纯的相关物。

I do not know what you mean.

格：我不明白你的含义。

Well, you know of course that the greater is relative to the less?

苏：嗯，你当然知道，较大者是较小者的相关物，对吗？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the much greater to the much less?

苏：大得多者是小得多者的相关物，对吗？

Yes.

格：对。

And the sometime greater to the sometime less, and the greater that is to be to the less that is to be?

苏：来日的较大者是来日的较小者的相关物，将来的较大者是将

来的较小者的相关物，对吗？

Certainly, he said.

格：当然。

And so of more and less, and of other correlative terms, such as the double and the half, or again, the heavier and the lighter, the swifter and the slower; and of hot and cold, and of any other relatives;—is not this true of all of them?

苏：同理，更多与更少相对，以此类推，双倍与一半相对，较重者与较轻者相对，较快者与较慢者相对，热与冷相对，任何其他相关物，亦皆如此，难道不是吗？

Yes.

格：是的。

And does not the same principle hold in the sciences? The object of science is knowledge (assuming that to be the true definition), but the object of a particular science is a particular kind of knowledge; I mean, for example, that the science of house-building is a kind of knowledge which is defined and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kinds and is therefore termed architecture.

苏：此原理是否也适用于科学呢？科学的对象是知识（假定该界定是正确的），但是一个特定学科的对象是一门特定的知识。例如，建造房屋的科学，是一门明确地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知识，因此被称为建筑学。

Certainly.

格：当然。

Because it has a particular quality which no other has?

苏：因为它具有任何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某种特质吗？

Yes.

格：是的。

And it has this particular quality because it has an object of a particular kind; and this is true of the other arts and sciences?

苏：它具有该特质，因为它有一个特定的对象。这同时也适用于其他学科和艺术门类吗？

Yes.

格：适用。

Now, then, if I have made myself clear, you will understand my original meaning in what I said about relatives. My meaning was, that if one term of a relation is taken alone, the other is taken alone; if one term is qualified, the other is also qualified. I do not mean to say that relatives may not be disparate, or that the science of health is healthy, or of disease necessarily diseased, or that the sciences of good and evil are therefore good and evil; but only that, when the term science is no longer used absolutely, but has a qualified object which in this case is the nature of health and disease, it becomes defined, and is hence called not merely science, but the science of medicine.

苏：现在，如果我表达得还算清楚的话，你将明白，我最初说到相关物的含义所在了。我的意思是，在一个相对关系中，如果一个术语没有任何限定，那么另一个也没有任何限定；如果一个术语是有限定的，那么另一个也是有限定的。我并不是说，相关物不可以互不相干，也不是说研究保健的科学有益于健康，而研究疾病的科学必定是有损健康的，也不是说研究善和恶的学科也因此分别是美好和丑恶的。我只想说，只有在“科学”这个术语失去了绝对的意义，并具有一个限定的对象——在此情形之下，即为健康与疾病的本质，它才有了明确的意义，由此不仅被称作科学，更被称为医学。

I quite understand, and I think as you do.

格：我完全懂了，同意你的看法。

Would you not say that thirst is one of these essentially relative terms, having clearly a relation—

苏：你难道不认为，渴是这些本质上相对的术语之一吗？它明显有一个对应物。

Yes, thirst is relative to drink.

格：是的，干渴与饮品相对。

And a certain kind of thirst is relative to a certain kind of drink; but thirst taken alone is neither of much nor little, nor of good nor bad, nor of any particular kind of drink, but of drink only?

苏：特定类别的渴对应特定类别的饮品，但是就渴本身而言，它所对应的饮品既无关乎多少好坏，也无关乎特定类别，而只是饮品本身。

Certainly.

格：当然。

Then the soul of the thirsty one, in so far as he is thirsty, desires only drink; for this he yearns and tries to obtain it?

苏：那么，就名副其实的干渴者而言，他的灵魂渴望的只是饮品，为此他向往并努力得到它，对吗？

That is plain.

格：显而易见。

And if you suppose something which pulls a thirsty soul away from drink, that must be different from the thirsty principle which draws him like a beast to drink; for, as we were saying, the same thing cannot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same part of itself act in contrary ways about the same.

苏：如果你假设，某物能让一个干渴的灵魂对饮品的需求并不强烈，那么它一定不同于使人猛兽般扑向饮品的干渴，因为我们曾经说过，相同的物体，不可能在同一时间用它的同一部分从事相反的行为。

Impossible.

格：的确不可能。

No more than you can say that the hands of the archer push and pull the bow at the same time, but what you say is that one hand pushes and the other pulls.

苏：正如你不能说，射箭的人用双手同时推拉弓弦，但是你可以说，他一手推，一手拉。

Exactly so, he replied.

格：正是如此。

And might a man be thirsty, and yet unwilling to drink?

苏：一个人可否口渴却不愿饮水呢？

Yes, he said, it constantly happens.

格：可以的，此事时有发生。

And in such a case what is one to say? Would you not say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 soul bidding a man to drink, and something else forbidding him, which is other and stronger than the principle which bids him?

苏：在此情形之下，人们会如何说？你会说，在一个人的灵魂里存在某种事物命令他饮水，同时存在着别的事物阻止他饮水，阻止他饮水的事物不同于命令他饮水的事物，而且更为强大，难道不是吗？

I should say so.

格：我会如此说的。

And the forbidding principle is derived from reason, and that which bids and attracts proceeds from passion and disease?

苏：该阻止的力量来自理性，而命令并诱使的力量来自激情与不适吗？

Clearly.

格：显然如此。

Then we may fairly assume that they are two, and that they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the one with which a man reasons, we may call the rational principle of the soul, the other, with which he loves and hungers and thirsts and feels the flutterings of any other desire, may be termed the irrational or appetitive, the ally of sundry pleasures and satisfactions?

苏：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存在，一个是人进行理性思考的凭借，我们称之为灵魂的理性源泉；另一个是人喜爱、饥渴等各种欲望的根源，可以被称之为非理性或嗜欲，各种享乐与满足的盟友，对吗？

Yes, he said, we may fairly assume them to be different.

格：对，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它们是不同的。

Then let us finally determine that there are two principles existing in the soul. And what of passion, or spirit? Is it a third, or akin to one of the preceding?

苏：那么，我们最后可以断言，在灵魂深处存在着两种源泉。那么，激情或斗志是什么呢？是不同于前两者的又一个组成部分呢？抑或可归属于前两者之一呢？

I should be inclined to say—akin to desire.

格：我倾向于认为其与欲望同类。

Well, I said, there is a story which I remember to have heard, and in which I put faith. The story is, that Leontius, the son of Aglaion, coming up one day from the Piraeus, under the north wall on the outside, observed some dead bodies lying on the ground at

the place of execution. He felt a desire to see them, and also a dread and abhorrence of them; for a time he struggled and covered his eyes, but at length the desire got the better of him; and forcing them open, he ran up to the dead bodies, saying, Look, ye wretches, take your fill of the fair sight.

苏：嗯，我记得曾经听到过一个故事，感觉颇为可信。故事讲道：一日，阿格莱翁之子勒翁提俄斯，从比雷埃夫斯港来至雅典，在北城外发现刑场那里有几具尸体躺在地上。他感觉有股强烈的渴望想去看看死尸，同时又感到一阵恐惧和厌恶。一时间他陷入内心的挣扎，蒙上了双眼，但最终欲望占了上风，迫使他睁开眼睛。他奔向那些死尸，咒骂着自己的眼睛："看吧，卑鄙的家伙们，一饱眼福吧。"

I have heard the story myself, he said.

格：我也曾听过该故事。

The moral of the tale is, that anger at times goes to war with desire, as though they were two distinct things.

苏：故事的寓意是，愤怒有时会与欲望发生冲突，就仿佛它们是两个各不相同的事物。

Yes; that is the meaning, he said.

格：是的，正是此意。

And are there not many other cases in which we observe that when a man's desires violently prevail over his reason, he reviles himself, and is angry at the violence within him, and that in this struggle, which is like the struggle of factions in a State, his spirit is on the side of his reason;—but for the passionate or spirited element to take part with the desires when reason decides that she should not be opposed, is a sort of thing which I believe that you never observed occurring in yourself, nor, as I should imagine, in any one else?

苏：在许多其他情形之下，我们也会注意到人的欲望粗暴地战胜理性，他怒斥自己，为自己内心中的暴力元素而气恼，其内心中的较量好似城邦内部派系斗争，他的激情站在理性一边；——但是至于激情不顾理智的反对而与欲望联合对抗理智，我相信你从未发现过此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而且我可能想象得到，它也不曾发生在任何其他人身上，难道不是吗？

Certainly not.

格：当然未曾发生过。

Suppose that a man thinks he has done a wrong to another, the nobler he is the less able is he to feel indignant at any suffering, such as hunger, or cold, or any other pain which the injured person may inflict upon him—these he deems to be just, and, as I say, his

anger refuses to be excited by them.

苏：假设有人觉得自己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那么他越是品德高尚，越是不会为受害人可能使他遭受的任何痛苦，如饥寒等等，而愤愤不平—。他认为，这些痛苦对他而言是正义的。按照我的说法是，他不愿为此而怒火中烧。

True, he said.

格：对。

But when he thinks that he is the sufferer of the wrong, then he boils and chafes, and is on the side of what he believes to be justice; and because he suffers hunger or cold or other pain he is only the more determined to persevere and conquer. His noble spirit will not be quelled until he either slays or is slain; or until he hears the voice of the shepherd, that is, reason, bidding his dog bark no more.

苏：但是一旦他认为自己蒙冤受屈，他就会激动气恼，为他心目中的正义而战，而且他会因遭受饥寒或其他苦楚而意志更为坚定地争取胜利。他豪情万丈，直至他手刃敌人，或者自己牺牲，或者听到像牧人禁止牧羊犬吠叫般的理智的呼唤后，才会恢复平静。

The illustration is perfect, he replied; and in our State, as we were saying, the auxiliaries were to be dogs, and to hear the voice of the rulers, who are their shepherds.

格：此说法很贴切，在我们城邦，正如我们所说，辅助者犹如牧羊犬，随时听从牧人即统治者的命令。

I perceive, I said, that you quite understand me; there is, however, a further point which I wish you to consider.

苏：我感觉，你已完全明白了。然而，还有一点，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What point?

格：哪一点？

You remember that passion or spirit appeared at first sight to be a kind of desire, but now we should say quite the contrary; for in the conflict of the soul spirit is arrayed on the side of the rational principle.

苏：你还记得，激情或斗志乍一看似乎属于一种欲望，但如今我们的看法正好相反，因为在灵魂的冲突斗争中，斗志却站在理智的一边吗？

Most assuredly.

格：千真万确。

But a further question arises: Is passion different from reason also, or only a kind of reason; in which latter case, instead of three principles in the soul, there will only be two, the rational and the concupiscent; or rather, as the State was composed of three classes, traders, auxiliaries, counsellors, so may there not be in the individual soul a third element which is passion or spirit, and when not corrupted by bad education is the natural auxiliary of reason?

苏：可是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激情亦不同于理智吗？抑或激情仅为理智的一种类型吗？如果后一种情况属实，那么灵魂并非有三个组成部分，而只是有两个组成部分，即理性与欲望；如果前一种情况属实，正如城邦由三个等级即商人、辅助者与治国者组成，那么难道个人的灵魂中不可以存在第三种元素即激情或斗志吗？在未受不良教育影响的情况下，它会自然地成为理智的辅助力量。

Yes, he said, there must be a third.

格：是的，一定存在着第三种元素。

Yes, I replied, if passion, which has already been shown to be different from desire, turn out also to be different from reason.

苏：对，激情已然被证明不同于欲望，如果我们能证明激情亦不同于理智，便可以了。

But that is easily proved:—We may observe even in young children that they are full of spirit almost as soon as they are born, whereas some of them never seem to attain to the use of reason, and most of them late enough.

格：但这很容易证明：我们甚至可以在稚童中找到证据。他们一出生便满怀激情，然而有些孩子似乎从未达到理性的境界，并且大多数孩子也都是很晚才开始培养自己的理性的。

Excellent, I said, and you may see passion equally in brute animals, which is a further proof of the truth of what you are saying. And we may once more appeal to the words of Homer, which have been already quoted by us,'He smote his breast, and thus rebuked his soul,'for in this verse Homer has clearly supposed the power which reasons about the better and worse to be different from the unreasoning anger which is rebuked by it.

苏：妙极了，而且在凶残的动物中，你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激情，这进一步证明，你的说法是正确的。同时，我们可以再次以荷马诗句为例，这一句我们已经引用过："他捶打胸膛，悔恨自责"，因为荷马在这行诗句中明确地假定，推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不同于它所谴责的无理性愤怒。

Very true, he said.

格：确实如此。

And so, after much tossing, we have reached land, and are fairly agreed that the same principles which exist in the State exist also in the individual, and that they are three in number.

苏：因此，经历了海上长久的颠簸，我们终于回到陆地，并且充分达成共识，即存在于城邦的三个要素同样也存在于个人。

Exactly.

格：正是。

Must we not then infer that the individual is wise in the same way, and in virtue of the same quality which makes the State wise?

苏：我们难道不可以断言，个人与城邦以同样的方式，凭借相同的品质，博得智慧之名吗？

Certainly.

格：当然可以。

Also that the same quality which constitutes courage in the State constitutes courage in the individual, and that both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bear the same relation to all the other virtues?

苏：铸就城邦之勇气的品质，同样也铸就了个人之勇气，以此类推，城邦与个人在所有其他美德方面亦具有同样的关系。

Assuredly.

格：毋庸置疑。

And the individual will be acknowledged by us to be just in the same way in which the State is just?

苏：同时我们也将承认，个人与城邦亦以同样的方式成就正义之名？

That follows, of course.

格：理当如此。

We cannot but remember that the justice of the State consisted in each of the three classes doing the work of its own class?

苏：我们必定记得，城邦之正义，在于三个阶层各司其职吧？

We are not very likely to have forgotten, he said.

格：我们不大可能会忘记。

We must recollect that the individual in whom the several qualities of his nature do their own work will be just, and will do his own work?

苏：我们必定记得，如果个人本性中的各个要素各尽其责，那么他便是正义的，会安分守己地履行分内职责吧？

Yes, he said, we must remember that too.

格：对，我们必定也会记得的。

And ought not the rational principle, which is wise, and has the care of the whole soul, to rule, and the passionate or spirited principle to be the subject and ally?

苏：难道理智要素，即智慧，不应该守护整个灵魂，处于统治地位，而激情要素不应该服从并协助理智吗？

Certainly.

格：当然应该。

And, as we were saying, the united influence of music and gymnastic will bring them into accord, nerving and sustaining the reason with noble words and lessons, and moderating and soothing and civilizing the wildness of passion by harmony and rhythm?

苏：正如我们所说，音乐与体育共同作用，使理智与激情协调一致，以高尚的言辞说教培植理性，以和音与节奏使激情变得和缓而文明，对吗？

Quite true,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And these two, thus nurtured and educated, and having learned truly to know their own functions, will rule over the concupiscent, which in each of us is the largest part of the soul and by nature most insatiable of gain; over this they will keep guard, lest, waxing great and strong with the fullness of bodily pleasures, as they are termed, the concupiscent soul, no longer confined to her own sphere, should attempt to enslave and rule those who are not her natural-born subjects, and overturn the whole life of man?

苏：此二者在受到如此培养教育后，真正懂得各自职责，将负责

管理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魂中占有最大比重且本性贪得无厌的欲望，对之保持戒备，以免多欲的灵魂因充分的肉体享乐而不断膨胀，不甘心于现状，企图将原本不受它支配者沦为奴役与统治的对象，并且毁掉人的一生，对吗？

Very true, he said.

格：此言极是。

Both together will they not be the best defenders of the whole soul and the whole body against attacks from without; the one counselling, and the other fighting under his leader, and courageously executing his commands and counsels?

苏：理智与激情将一道保卫整个身心的安全，并且外拒强敌，一个谋划方略，另一个在其领导下奋战不息，英勇地执行指令与决策，难道不是吗？

True.

格：对。

And he is to be deemed courageous whose spirit retains in pleasure and in pain the commands of reason about what he ought or ought not to fear?

苏：假如一个人的志气，不论喜乐忧患，都谨遵理智关于何为当惧与不当惧的指令，我们便认为，他是真正的勇者，对吗？

Right, he replied.

格：对。

And him we call wise who has in him that little part which rules, and which proclaims these commands; that part too being supposed to have a knowledge of what is for the interest of each of the three parts and of the whole?

苏：而被我们称为智者之人，拥有灵魂中所占比重微小但起支配作用并发布上述指令的部分，该部分理应不仅了解如何维护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利益，而且还清楚如何维护整体的利益，对吗？

Assuredly.

格：确实如此。

And would you not say that he is temperate who has these same elements in friendly harmony, in whom the one ruling principle of reason, and the two subject ones of spirit and desire are equally agreed that reason ought to rule, and do not rebel?

苏：某个人若能够使灵魂的三部分和睦相处，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元素理智，与两个被支配的元素激情与欲望，一致同意理应由理智实行统治而无反叛之心，那么他难道不是有节制的吗？

Certainly, he said, that is the true account of temperance whether in the State or individual.

格：当然，无论就城邦还是个人而言，这都是对节制美德的真实描述。

And surely, I said, we have explained again and again how and by virtue of what quality a man will be just.

苏：无疑，我们已经一再申明，一个人如何并且凭借何种品质方可成为正义之人。

That is very certain.

格：这是确定无疑的。

And is justice dimmer in the individual, and is her form different, or is she the same which we found her to be in the State?

苏：个人正义，较之国家正义，更为暗淡模糊吗？个人正义在形式上不同吗？抑或个人正义与我们在城邦中发现的正义是相同的吗？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my opinion, he said.

格；以我之见，并无区别。

Because, if any doubt is still lingering in our minds, a few commonplace instances will satisfy us of the truth of what I am saying.

苏：如果我们心中仍旧存在任何疑虑，不妨看看几个司空见惯的例子，大家会相信我所说的是真实的。

What sort of instances do you mean?

格：你指的是哪类事例？

If the case is put to us, must we not admit that the just State, or the man who is trained in the principles of such a State, will be less likely than the unjust to make away with a deposit of gold or silver? Would any one deny this?

苏：假如要我们判断，我们必然承认，正义城邦或依照正义城邦

的原则培养的个人，较之不义之城邦或个人，更不大可能会携他人寄存于己处的金银财物而逃之夭夭，难道不是吗？有谁会否认这一点呢？

No one, he replied.

格：没有人。

Will the just man or citizen ever be guilty of sacrilege or theft, or treachery either to his friends or to his country?

苏：正义之人或公民会行悖理逆天之事，犯下偷盗之罪，抑或出卖朋友或国家吗？

Never.

格：决不会。

Neither will he ever break faith where there have been oaths or agreements?

苏：他也不可能背信弃义，破坏誓言与约定吗？

Impossible.

格：不可能。

No one will be less likely to commit adultery, or to dishonour his father and mother, or to fail in his religious duties?

苏：他最不可能犯下通奸、使父母蒙羞或不履行宗教义务的罪行，对吗？

No one.

格：对。

And the reason is that each part of him is doing its own business, whether in ruling or being ruled?

苏：原因在于他灵魂中的各个部分，无论处于统治地位抑或被统治地位，均各司其职，对吗？

Exactly so.

格：正是如此。

Are you satisfied then that the quality which makes such men and such states is justice, or do you hope to discover some other?

苏：正是正义造就了如此之人与如此之国，这个观点你能接受吗？抑或你希望另寻他种品质？

Not I, indeed.

格：我个人绝对没有问题。

Then our dream has been realized; and the suspicion which we entertained at the beginning of our work of construction, that some divine power must have conducted us to a primary form of justice, has now been verified?

苏：至此，我们梦想成真。我们在缔造城邦之初，便开始怀疑定是有神明助佑，指引我们找到正义之雏形。如今事实已然证明了这一点，对吗？

Yes, certainly.

格：对，当然。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which required the carpenter and the shoemaker and the rest of the citizens to be doing each his own business, and not another's, was a shadow of justice, and for that reason it was of use?

苏：而劳动分工要求木匠、鞋匠以及其他公民各司其职，并且不可从事他人之行业，这便是正义所呈现的一个影像。正义的作用，亦在于此，对吗？

Clearly.

格：显然如此。

But in reality justice was such as we were describing, being concerned however, not with the outward man, but with the inward, which is the true self and concernment of man: for the just man does not permit the several elements within him to interfere with one another, or any of them to do the work of others,—he sets in order his own inner life, and is his own master and his own law, and at peace with himself; and when he has bound together the three principles within him, which may be compared to the higher, lower, and middle notes of the scale, and the intermediate intervals—when he has bound all these together, and is no longer many, but has become one entirely temperate and perfectly adjusted nature, then he proceeds to act, if he has to act, whether in a matter of property, or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body, or in some affair of politics or private business; always thinking and calling that which preserves and co-operates with this harmonious condition, just and

good action, and the knowledge which presides over it, wisdom, and that which at any time impairs this condition, he will call unjust action, and the opinion which presides over it ignorance.

苏：但是，现实中正义却正如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它所关心的并非是外在的人，而是内在的人，即人的真实自我及其真正关心的事：正义之人不准许其自身诸要素之间互相干涉，越俎代庖，他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安排得井井有条，是他自己的主人，为自己立法，实现自我和谐；当他将自己灵魂的三要素联系在一起，它们便好比音阶上高中低的音符以及中间的音程。当他将所有这些结成一体，它们便不再是多个部分，而是成为一个完全有节制、和谐一致的整体。此后，他如需采取行动，不论是有关财产人身，还是军国政治，还是个人私事，一向以保持并维护此和谐局面为正义的善举，以正义行为的指导思想为智慧；以破坏此局面为不义之举，并以非正义的思想言论为无知谬论。

You have said the exact truth, Socrates.

格：苏格拉底，你准确无误地阐明了真理。

Very good; and if we were to affirm that we had discovered the just man and the just State, and the nature of justice in each of them, we should not be telling a falsehood?

苏：很好。假如我们断言，现已发现正义之人与正义之邦，以及二者各自的正义实质，那么我们不是在痴人说梦吧？

Most certainly not.

格：绝非痴人说梦。

May we say so, then?

苏：那么，我们可以如此断言吗？

Let us say so.

格：但说无妨。

And now, I said, injustice has to be considered.

苏：如今，不得不考虑一下不义的问题。

Clearly.

格：毋庸置疑。

Must not injustice be a strife which arises among the three principles—a meddlesomeness, and interference, and rising up of a

part of the soul against the whole, an assertion of unlawful authority, which is made by a rebellious subject against a true prince, of whom he is the natural vassal,—what is all this confusion and delusion but injustice, and intemperance and cowardice and ignorance, and every form of vice?

苏：非正义一定是发生在灵魂三要素之间的冲突，或者是越俎代庖、横加干涉，或者是灵魂的一部分背叛整个灵魂，或者是逆臣褫夺明君之位要求确立非法权威。所有这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事必定是非正义、过度放纵、懦弱无知，以及各种形式的罪恶，难道不是吗？

Exactly so.

格：正是如此。

And if the nature of justice and injustice be known, then the meaning of acting unjustly and being unjust, or, again, of acting justly, will also be perfectly clear?

苏：若是我们弄清楚了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那么“不义之举”，或“正义之举”这类表达也将其义自现，对吗？

What do you mean? he said.

格：此话怎讲？

Why, I said, they are like disease and health; being in the soul just what disease and health are in the body.

苏：唉，二者有如疾病与健康。人之身体有疾病与健康之分，人之灵魂亦然。

How so? he said.

格：何以见得？

Why, I said, that which is healthy causes health, and that which is unhealthy causes disease.

苏：唉，有益健康者带来健康，而对健康有害者则导致疾病。

Yes.

格：对。

And just actions cause justice, and unjust actions cause injustice?

苏：正义之举促成正义，不义之举则导致不义，对吗？

That is certain.

格：必然如此。

And the creation of health is the institution of a natural order and government of one by another in the parts of the body; and the creation of disease is the production of a state of things at variance with this natural order?

苏：创造健康，便是在身体各部位中建立一种自然的秩序，使某一部位统治另一部位；而制造疾病则是产生一种不同于自然秩序的状态，对吗？

True.

格：对。

And is not the creation of justice the institution of a natural order and government of one by another in the parts of the soul, and the creation of injustice the production of a state of things at variance with the natural order?

苏：创造正义，便是在灵魂的各部分中建立一种自然的秩序，使一部分统治另一部分；而制造非正义，便是产生一种不同于自然秩序的状态，难道不是吗？

Exactly so, he said.

格：正是如此。

Then virtue is the health and beauty and well-being of the soul, and vice the disease and weakness and deformity of the same?

苏：那么，美德便是灵魂的健康、美与福音，而恶习则是灵魂的疾病、缺点与畸形，对吗？

True.

格：对。

And do not good practices lead to virtue, and evil practices to vice?

苏：积善成德，积恶成患，难道不是吗？

Assuredly.

格：毋庸置疑。

Still our old question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justice and injustice has not been answered: Which is the more profitable, to be just and act justly and practise virtue, whether seen or unseen of gods and men, or to be unjust and act unjustly, if only unpunished and unreformed?

苏：关于正义与非正义，我们仍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二者之中哪个更为有利，是不论人神知与不知，做正义之人，行正义之事，还是心存侥幸，做不义之人，行不义之事而不受惩罚、不接受改造？

In my judgment, Socrates, the question has now become ridiculous. We know that, when the bodily constitution is gone, life is no longer endurable, though pampered with all kinds of meats and drinks, and having all wealth and all power; and shall we be told that when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vital principle is undermined and corrupted, life is still worth having to a man, if only he be allowed to do whatever he likes with the single exception that he is not to acquire justice and virtue, or to escape from injustice and vice; assuming them both to be such as we have described?

格：苏格拉底，在我看来，此问题如今已变得很可笑。我们知道，当肉体消磨殆尽，尽管他玉液珍馐享之不尽，坐拥天下财富，权倾四海，生命仍旧会不复持久。当生命要素的本质渐渐受到破坏而腐

烂，对于一个人来说，生活仍然值得迷恋，只要他可以为所欲为就行，不在意自己在正义与道德上的缺失，抑或身陷不义恶习而不自拔——假定正义与不义二者皆如之前所述，我们能否接受这样的观点呢？

Yes, I said, the question is, as you say, ridiculous. Still, as we are near the spot at which we may see the truth in the clearest manner with our own eyes, let us not faint by the way.

苏：正如你所说，此问题有些可笑。但是，我们已接近目标，即将至为真切地亲眼目睹问题的真相，我们不要半途而废。

Certainly not, he replied.

格：当然不能半途而废。

Come up hither, I said, and behold the various forms of vice, those of them, I mean, which are worth looking at.

苏：这里，且让我们看看不同形式的恶习，尤其是那些值得一观的。

I am following you, he replied: proceed.

格：我跟上你的思路了，请继续。

I said, The argument seems to have reached a height from which, as from some tower of speculation, a man may look down and see that virtue is one, but that the forms of vice are innumerable; there being four special ones which are deserving of note.

苏：我们的辩论似乎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人们可从这里正如从某思辨之高塔上俯视鸟瞰，并且发现美德仅居其一，而恶习之形式则不计其数，其中四种尤其值得注意。

What do you mean? he said.

格：此话怎讲？

I mean, I replied, that there appear to be as many forms of the soul as there are distinct forms of the State.

苏：我想说的是，灵魂类型，似乎与不同的城邦类型数目相等。

How many?

格：有多少种呢？

There are five of the State, and five of the soul, I said.

苏：城邦有五种类型，灵魂亦有五种类型。

What are they?

格：它们是哪些类型呢？

The first, I said, is that which we have been describing, and which may be said to have two names, monarchy and aristocracy, accordingly as rule is exercised by one distinguished man or by many.

苏：第一种即为我们一直在描述的城邦类型，根据实行统治之人数目的多寡，它可以有两种名称：由高高在上的一人专制的君主制和由多人共同执政的贵族制。

True, he replied.

格：对。

But I regard the two names as describing one form only; for whether the government is in the hands of one or many, if the

governors have been trained in the manner which we have supposed,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the State will be maintained.

苏：可是，我认为这两个名称描述的是同一种类型的城邦，因为无论政府掌握在一个还是多个人手中，如果统治者接受的都是我们所预期的那种教育，那么城邦的基本法制会保持不变。

That is true, he replied.

格：果真如此。

BOOK V.

第五卷

SOCRATES—GLAUCON—ADEIMANTUS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格劳孔、阿得曼托斯

Such is the good and true City or State, and the good and true man is of the same pattern; and if this is right every other is wrong; and the evil is one which affects not only the ordering of the State, but also the regulation of the individual soul, and is exhibited in four forms.

苏：这即为真而善的城邦或国家，真而善的人亦具有相同的模式。同时，如果此种模式是正确的，那么所有其他模式则是错误的。恶的模式不仅影响城邦的秩序，而且还会影响个人灵魂的管理，表现为四种形式。

What are they? he said.

格：哪四种？

I was proceeding to tell the order in which the four evil forms

appeared to me to succeed one another, when Polemarchus, who was sitting a little way off, just beyond Adeimantus, began to whisper to him: stretching forth his hand, he took hold of the upper part of his coat by the shoulder, and drew him towards him, leaning forward himself so as to be quite close and saying something in his ear, of which I only caught the words, 'Shall we let him off, or what shall we do?'

我正欲按照自己的看法依次列出那四种邪恶形式，坐在不远处的玻勒马霍斯开始对身边的阿得曼托斯耳语。玻勒马霍斯伸手勾住阿得曼托斯的肩部，将他拉向自己，同时自己也靠过去，贴近耳边说了几句。我只隐约听到，“我们要不要打断他？还是做点什么？”

Certainly not, said Adeimantus, raising his voice.

阿（提高了嗓门）：当然要打断他。

Who is it, I said, whom you are refusing to let off?

苏：他是谁？你们要打断谁啊？

You, he said.

阿：你。

I repeated, Why am I especially not to be let off?

苏（重复）：为何要打断我啊？

Why, he said, we think that you are lazy, and mean to cheat us out of a whole chapter which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ory; and you fancy that we shall not notice your airy way of proceeding; as if it were self-evident to everybody, that in the matter of women and children 'friends have all things in common.'

阿：唉，我们觉得你在偷懒，想要骗我们略过整个问题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你设想，我们不会注意到你的草率，就仿佛在妇女与儿童问题上，“朋友共同拥有一切”，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

And was I not right, Adeimantus?

苏：阿得曼托斯，我的看法不对吗？

Yes, he said; but what is righ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like everything else, requires to be explained; for community may be of many kinds. Please, therefore, to say what sort of community you mean. We have been long expecting that you would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the family life of your citizens—how they will bring children into the world, and rear them when they have arrived, and, in general,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is community of

women and children—for we are of opinion that the right or wrong management of such matters will have a great and paramount influence on the State for good or for evil. And now, since the question is still undetermined, and you are taking in hand another State, we have resolved, as you heard, not to let you go until you give an account of all this.

阿：对，但是像对待其他所有问题那样，你有必要解释一下在此特定情形下应以何种共同体为宜，因为共同体可以是林林总总的。故而，请说明，你指的究竟是何种共同体。我们一直期盼着你能够介绍一下理想城邦公民的家庭生活：他们如何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并如何将之养育成人，以及妇女儿童共同体的总体性质如何？因为我们认为，此类问题处理得当与否，将对城邦造成重大影响。如今，当此问题尚未解决之际，你却要着手分析别的城邦，因此正如你所听到的，我们决心让你对所有这些问题做以解释，然后才让你接着往下说。

To that resolution, said Glaucon, you may regard me as saying Agreed.

格：对于该决议，你可以认为，我已经表示同意了。

SOCRATES-ADEIMANTUS-GLAUCON-THRASYMACHUS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阿得曼托斯、格劳孔、色拉叙马霍斯

And without more ado, said Thrasymachus, you may consider

us all to be equally agreed.

色：不用再麻烦地表决了。你就只管认为，我们所有人都赞同吧。

I said, You know not what you are doing in thus assailing me: What an argument are you raising about the State! Just as I thought that I had finished, and was only too glad that I had laid this question to sleep, and was reflecting how fortunate I was in your acceptance of what I then said, you ask me to begin again at the very foundation, ignorant of what a hornet's nest of words you are stirring. Now I foresaw this gathering trouble, and avoided it.

苏:你们不晓得，在如此为难我之际，正引发起怎样的一场关系到邦国大计的辩论啊！我本以为讨论已经告一段落，万分欣喜自己已然绕过了该问题，并且正暗自庆幸你们已接受了我刚才的观点。这时，你们却要求我重新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全然不知正在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我本来已经预见到这场蓄势待发的灾难，并且避开了它。

For what purpose do you conceive that we have come here, said Thrasymachus,—to look for gold, or to hear discourse?

色：你以为，我们来此，所为何故？是寻求宝藏，抑或聆听演说？

Yes, but discourse should have a limit.

苏：是啊，但是演说应该有个限度。

Yes, Socrates, said Glaucon, and the whole of life is the only limit which wise men assign to the hearing of such discourses. But never mind about us; take heart yourself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in your own way: What sort of community of women and children is this which is to prevail among our guardians and how shall we manage the period between birth and education, which seems to require the greatest care? Tell us how these things will be.

格：说得对，苏格拉底。穷其一生时光，便是明哲之人为自己听取此类演说所设定的唯一限度。切莫以我们为念；振作精神就此问题谈谈你的独到见解：在我们的护国者之间盛行的共有妻儿制，其模式究竟如何？学龄前儿童，似乎尤其需要得到悉心照顾，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幼儿阶段的教育问题呢？告诉我们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Yes, my simple friend, but the answer is the reverse of easy; many more doubts arise about this than about our previous conclusions. For the practicability of what is said may be doubted; and looked at in another point of view, whether the scheme, if ever so practicable, would be for the best, is also doubtful. Hence I feel a reluctance to approach the subject, lest our aspiration, my dear friend, should turn out to be a dream only.

苏：可以，我天真的朋友。但回答此问题，绝非易事。这比我们之前的结论，更能引发疑问。我所提方案的可行性，会受到怀疑；同时，换个角度来看，即使该方案具备可行性，它是否为最佳方案，也

是不能确定的。因此，亲爱的朋友，我不愿触及该话题，生怕我们的雄心壮志最终只是一场梦。

Fear not, he replied, for your audience will not be hard upon you; they are not sceptical or hostile.

格：不必担心，你的听众不会强人所难。他们既非生性多疑，亦非故意与人作对。

I said: My good friend, I suppose that you mean to encourage me by these words.

苏：我的好朋友，我猜想，你希望用这番言辞来鼓起我的勇气。

Yes, he said.

格：是的。

Then let me tell you that you are doing just the reverse; the encouragement which you offer would have been all very well had I myself believed that I knew what I was talking about: to declare the truth about matters of high interest which a man honours and loves among wise men who love him need occasion no fear or faltering in his mind; but to carry on an argument when you are yourself only a hesitating enquirer, which is my condition, is a dangerous and

slippery thing; and the danger is not that I shall be laughed at (of which the fear would be childish), but that I shall miss the truth where I have most need to be sure of my footing, and drag my friends after me in my fall. And I pray Nemesis not to visit upon me the words which I am going to utter. For I do indeed believe that to be an involuntary homicide is a less crime than to be a deceiver about beauty or goodness or justice in the matter of laws. And that is a risk which I would rather run among enemies than among friends, and therefore you do well to encourage me.

苏：那么，让我告诉你，你的做法适得其反。假如我自认为很了解自己正在谈论的话题，你所给予的鼓励，便是恰到好处：一个人若置身友好博学之人中间，宣扬人人敬仰乐闻、志趣高尚的真理，本不必担惊受怕，踌躇退缩。但当你自己尚且犹豫不决，有待深查细究，却又要展开辩论，岂非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这即是我此时的状态。我并非害怕贻笑大方（此种恐惧固然幼稚），而是害怕在需要万分确定的根本问题上与真理失之交臂，不仅自己遭遇失败，还要连累朋友。我请求复仇女神，不要为我即将发表的言论而惩罚我。我坚信，就法律而言，失手杀人，犹不及在美、善与正义问题上欺罔世人，罪行更为深重。如需冒险一试，我宁愿试之于敌营，也不愿试之于朋友之中，因此你的鼓励确实很有必要。

Glaucon laughed and said: Well then, Socrates, in case you and your argument do us any serious injury you shall be acquitted beforehand of the homicide, and shall not be held to be a deceiver; take courage then and speak.

格（笑着）：既然如此，苏格拉底，如果你或者你的论辩对我们造成任何严重伤害，你预先已被免去杀人罪，也不会以欺诈罪而受到

法律制裁。请拿出勇气畅所欲言吧！

Well, I said, the law says that when a man is acquitted he is free from guilt, and what holds at law may hold in argument.

苏：好，既然如此，法律规定，当一个人免于罪责，他便无罪。这一条适用于法律，同样亦适用于辩论。

Then why should you mind?

格：那么，你为何还顾虑重重呢？

Well, I replied, I suppose that I must retrace my steps and say what I perhaps ought to have said before in the proper place. The part of the men has been played out, and now properly enough comes the turn of the women. Of them I will proceed to speak, and the more readily since I am invited by you.

苏：嗯，也许我有必要沿着原来的思路，返回到适当之处，说出可能之前本该说的话。男人已是曲终戏尽，现在该轮到女人登场了。我正欲谈谈她们，恰逢应你之邀，更是乐此不疲。

For men born and educated like our citizens, the only way, in my opinion, of arriving at a right conclusion about the possession and use of women and children is to follow the path on which we

originally started, when we said that the men were to be the guardians and watchdogs of the herd.

以我之见，就自幼生活在我们城邦并接受正规公民教育的男人而言，拥有妻子儿女的唯一可行办法，就是遵循我们最初开辟的道路，即我们之前所说的“男人将成为守卫者，是护卫犬”。

True.

格：对。

Let us further suppose the birth and education of our women to be subject to similar or nearly similar regulations; then we shall see whether the result accords with our design.

苏：让我们进一步假定，我们城邦妇女的出身和教育，也受到类似或几乎类似规章制度的约束，然后我们便可知道，其结果是否与我们的预期相符。

What do you mean?

格：此话怎讲？

What I mean may be put into the form of a question, I said: Are

dogs divided into hes and shes, or do they both share equally in hunting and in keeping watch and in the other duties of dogs? or do we entrust to the males the entire and exclusive care of the flocks, while we leave the females at home, under the idea that the bearing and suckling their puppies is labour enough for them?

苏：我不妨用提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吧。狗是雌雄有别，各司其职，还是共同承担狩猎、看守等职责？换言之，我们全权委派公狗照料羊群，而将母狗留在家中，认为母狗的全部责任仅限于生养幼崽吗？

No, he said, they share alike;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that the males are stronger and the females weaker.

格：不分雌雄，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共同承担。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公狗更加强壮，而母狗较为虚弱。

But can you use different animals for the same purpose, unless they are bred and fed in the same way?

苏：但是，如果你不以同一种方式饲养调教不同动物，你能够将之用于同一用途吗？

You cannot.

格：不能。

Then, if women are to have the same duties as men, they must have the same nurture and education?

苏：那么，若是要妇女履行与男人相同的义务，她们必须受到与之相同的照料与教育，对吗？

Yes.

格：对。

The education which was assigned to the men was music and gymnastic.

苏：男人所受的教育，为音乐与体育。

Yes.

格：对。

Then women must be taught music and gymnastic and also the art of war, which they must practise like the men?

苏：那么，妇女必须接受体育与音乐教育，同时还要学习军事，一定要与男人同样精通作战技术，对吗？

That is the inference, I suppose.

格：也许可以如此推论。

I should rather expect, I said, that several of our proposals, if they are carried out, being unusual, may appear ridiculous.

苏：我则倾向于认为，我们提出的多条建议很是不同寻常，若是付诸实施，则会显得荒谬可笑。

No doubt of it.

格：毫无疑问。

Yes, and the most ridiculous thing of all will be the sight of women naked in the palaestra, exercising with the men,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no longer young; they certainly will not be a vision of beauty, any more than the enthusiastic old men who in spite of wrinkles and ugliness continue to frequent the gymnasia.

苏：是的，其中最为荒谬的，当数赤身裸体的妇女在体育场上与男人一道从事运动，特别是当她们已不再年轻。她们当然不会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正如狂热的老年男子，虽满脸皱纹，丑陋不堪，却依旧频繁光顾健身场所。

Yes, indeed, he said: according to present notions the proposal would be thought ridiculous.

格：的确如此。以时下的观点来看，此项建议确实很好笑。

But then, I said, as we have determined to speak our minds, we must not fear the jests of the wits which will be directed against this sort of innovation; how they will talk of women's attainments both in music and gymnastic, and above all about their wearing armour and riding upon horseback!

苏：但是，我们既然已下定决心讲出自己的想法，便千万不能畏惧各种针对这一新提法的讽刺挖苦：他们会对妇女音乐、体育方面的造诣品头论足，而且首当其冲的便是妇女戎服跨马。

Very true, he replied.

格：确实如此。

Yet having begun we must go forward to the rough places of

the law; at the same time begging of these gentlemen for once in their life to be serious. Not long ago, as we shall remind them, the Hellenes were of the opinion, which is still generally received among the barbarians, that the sight of a naked man was ridiculous and improper; and when first the Cretans and then the Lacedaemonians introduced the custom, the wits of that day might equally have ridiculed the innovation.

苏：我们既然已经踏上征程，就必须勇往直前，向着立法进程中的崎岖不平之地进发。同时，我要恳请这些先生务必要保持严肃。我们要提醒他们，不久以前，希腊人还像现在大多数野蛮人那样认为，男子赤身裸体，是滑稽可笑和不成体统的。当初克里特岛人，乃至后来的古斯巴达人，推行裸体操练，那时的智者贤士可能也要对此进行一番冷嘲热讽。

No doubt.

格：毫无疑问。

But when experience showed that to let all things be uncovered was far better than to cover them up, and the ludicrous effect to the outward eye vanished before the better principle which reason asserted, then the man was perceived to be a fool who directs the shafts of his ridicule at any other sight but that of folly and vice, or seriously inclines to weigh the beautiful by any other standard but that of the good.

苏：可是，经验表明，让一切真相大白远胜于掩盖事实，表面看起来可笑的事物因受到理性的推崇而不再可笑。那么，我们认为，只有傻瓜才会刻意嘲讽绝非荒诞与罪恶的现象，或者一本正经地用善以外的其他标准来衡量美。

Very true, he replied.

格：的确如此。

First, then, whether the question is to be put in jest or in earnest, let us come to an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nature of woman: Is she capable of sharing either wholly or partially in the actions of men, or not at all? And is the art of war one of those arts in which she can or can not share? That will be the best way of commencing the enquiry, and will probably lead to the fairest conclusion.

苏：首先，不论我要提的这个问题是出于开玩笑，还是认真严肃的，让我们对女人的天性达成共识：她能够分担男人的所有事务，部分事务，抑或根本无法分担男人的任何事务？她能否分担行军打仗之事？我们最好以如此方式开始讨论，并且很可能会得出最公允的结论。

That will be much the best way.

格：最好如此。

Shall we take the other side first and begin by arguing against ourselves; in this manner the adversary's position will not be undefended.

苏：我们首先应该站在批评者的立场上，向自己提出诘难，从而为批评者留有辩护的余地，你看如何？

Why not? he said.

格：有何不可？

Then let us put a speech into the mouths of our opponents. They will say: 'Socrates and Glaucon, no adversary need convict you, for you yourselves, at the first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admitted the principle that everybody was to do the one work suited to his own nature.' And certainly, if I am not mistaken, such an admission was made by us. 'And do not the natures of men and women differ very much indeed?' And we shall reply: Of course they do. Then we shall be asked, 'Whether the tasks assigned to men and to women should not be different, and such as are agreeable to their different natures?' Certainly they should. 'But if so, have you not fallen into a serious inconsistency in saying that men and women, whose natures are so entirely different, ought to perform the same actions?'—What defence will you make for us, my good Sir, against any one who offers these objections?

苏：那么，让我们以批评者的口吻发表一番言论吧。他们会说："苏格拉底和格劳孔，无需别人批评你们。你们自己早在缔造城邦之初，便确定了一条准则——人人都需从事符合其本性的工作。"当然，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我们的确曾经认可了这一准则。"男人与女人在天性上是否的确大不相同呢？"我们会回答："他们确实大不相同。"然后，他们会问道："我们是否应该依照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天性分配给他们不同的工作呢？"我们会说："当然应该。"于是，他们说："但是如此一来，你们不是犯了严重的前后矛盾的错误吗？你们不是说差别如此显著的男女应该做同样的事吗？"我正直的先生啊，面对他人提出的这番异议，你将如何为我们辩护呢？

That is not an easy question to answer when asked suddenly; and I shall and I do beg of you to draw out the case on our side.

格：该问题有些突然，不容易回答。我将恳请你为我方辩护，阐明理由。

These are the objections, Glaucon, and there are many others of a like kind, which I foresaw long ago; they made me afraid and reluctant to take in hand any law about the possession and nurture of women and children.

苏：格劳孔啊，我早已预见到如此以及许多类似的反对意见，这使我感到不安，不愿触及关于占有及妇女儿童本质的法律问题。

By Zeus, he said, the problem to be solved is anything but easy.

格：天啊，该问题着实棘手。

Why yes, I said, but the fact is that when a man is out of his depth, whether he has fallen into a little swimming bath or into mid ocean, he has to swim all the same.

苏：当然，但是当人落入深水，不管他是坠入小的游泳池，还是汪洋大海，他都只能游泳自救。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must not we swim and try to reach the shore: we will hope that Arion's dolphin or some other miraculous help may save us?

苏：我们岂不是只得奋力游向岸边，并暗暗祈祷阿里昂的海豚，或者其他神奇力量，会帮助我们获救吗？

I suppose so, he said.

格：看来只得如此。

Well then, let us see if any way of escape can be found. We acknowledged—did we not? that different natures ought to have different pursuits, and that men's and women's natures are different. And now what are we saying?—that different natures ought to have the same pursuits,—this is the inconsistency which is charged upon us.

苏：好吧，让我们看看能否找到任何出路。我们此前承认，禀赋不同之人应当从事不同的职业，并且认为男女具有不同的禀赋，难道不是吗？如今，我们正在说什么呢？我们说，禀赋不同之人应当从事相同的职业。这便是我们被归结为自相矛盾的问题所在。

Precisely.

格：非常确切。

Verily, Glaucon, I said, glorious is the power of the art of contradiction!

苏：格劳孔啊，论辩艺术的力量确实值得称颂啊！

Why do you say so?

格：何出此言？

Because I think that many a man falls into the practice against his will. When he thinks that he is reasoning he is really disputing, just because he cannot define and divide, and so know that of which he is speaking; and he will pursue a merely verbal opposition in the spirit of contention and not of fair discussion.

苏：因为可能许多人卷入其中，皆言不由衷。当他自以为在推理之时，实际上却在争辩，因为他无法进行明确地定义与界定，以致不知所云，同时他出于与人竞争的心理，追求的只是言辞上的针锋相对，而并非公平的讨论。

Yes, he replied, such is very often the case; but what has that to do with us and our argument?

格：是啊，此类情形很常见，但是这与我们，乃至我们的论辩有何关联？

A great deal; for there is certainly a danger of our getting unintentionally into a verbal opposition.

苏：大有关联，因为我们当然存在无意中陷入言词对抗的危险。

In what way?

格：何以见得？

Why we valiantly and pugnaciously insist upon the verbal truth, that different natures ought to have different pursuits, but we never considered at all what was the meaning of sameness or difference of nature, or why we distinguished them when we assigned different pursuits to different natures and the same to the same natures.

苏：唉，我们毫不示弱地坚持字面上的真理——禀赋不同之人应当从事不同的职业，但是我们却从未考虑过何谓禀性异同的内涵，也未考虑过我们为何要加以区分，将不同的职业分配给禀赋不同之人，相同的职业分配给禀赋相同之人。

Why, no, he said, that was never considered by us.

格：哦，真的，我们从未考虑过此类问题。

I said: Suppose that by way of illustration we were to ask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re is not an opposition in nature between bald men and hairy men; and if this is admitted by us, then, if bald men are cobblers, we should forbid the hairy men to be cobblers, and conversely?

苏：举个例子，假设我们要问，秃头之人，是否与毛发茂盛之人禀赋不同？假如我们认同这一点，那么秃头者若是制鞋匠，我们便应禁止毛发茂盛者成为制鞋匠，反之亦然，对吗？

That would be a jest, he said.

格：那会成为笑柄。

Yes, I said, a jest; and why? because we never meant when we constructed the State, that the opposition of natures should extend to every difference, but only to those differences which affected the pursuit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is engaged; we should have argued, for example, that a physician and one who is in mind a physician may be said to have the same nature.

苏：是的，一个笑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草创城邦之时区分不同的禀赋，并非是要巨细无遗地进行区分，而是仅限于分辨出那些影响到人们从事何种职业的不同禀赋。举个例子，我们可以说，医生与有志从医之人有着相同的禀赋。

True.

格：对。

Whereas the physician and the carpenter have different natures?

苏：然而，医生与木匠则具有不同的禀赋，对吗？

Certainly.

格：当然不同。

And if, I said, the male and female sex appear to differ in their fitness for any art or pursuit, we should say that such pursuit or art ought to be assigned to one or the other of them; but if the difference consists only in women bearing and men begetting children, this does not amount to a proof that a woman differs from a man in respect of the sort of education she should receive; and we shall therefore continue to maintain that our guardians and their wives ought to have the same pursuits.

苏：如果男女在某种行业上表现出不同的适应能力，我们应该说此种行业应分配给他们中适合的一方；但是如果男女的差别仅限于生儿育女方面，那么据此而主张男女不应接受同等的教育，是不合情理的。因此，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主张，我们的守卫者和他们的妻子应该从事同样的职业。

Very true,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Next, we shall ask our opponent how, in reference to any of the pursuits or arts of civic life, the nature of a woman differs from that of a man?

苏：其次，我们要问反对者，就国民生活中的各种职业而言，妇女如何在禀性上不同于男子？

That will be quite fair.

格：这将会很公平。

And perhaps he, like yourself, will reply that to give a sufficient answer on the instant is not easy; but after a little reflection there is no difficulty.

苏：可能反对者会给出与你相同的答复：一时之间不易做出充分答复，但若稍加思考亦非难事。

Yes, perhaps.

格：是的，很可能。

Suppose then that we invite him to accompany us in the argument, and then we may hope to show him that there is nothing peculiar in the constitution of women which would affect them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tate.

苏：假设我们邀请反对者加入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将向他证明，妇女的性情禀赋中并不存在任何会影响她们治理城邦的因素。

By all means.

格：必将如此。

Let us say to him: Come now, and we will ask you a question:—when you spoke of a nature gifted or not gifted in any respect, did you mean to say that one man will acquire a thing easily, another with difficulty; a little learning will lead the one to discover a great deal; whereas the other, after much study and application, no sooner learns than he forgets; or again, did you mean, that the one has a body which is a good servant to his mind, while the body of the other is a hindrance to him?—would not these be the sort of differences which distinguish the man gifted by nature from the one who is ungifted?

苏：让我们对他说：来吧，我们要向你提一个问题：当你说到一个人是否具备某方面天赋时，你是否想说，有的人会很轻松地学会一种东西，而别人却会很费力；前者会举一反三，而后者费尽功夫，且随学随忘呢？抑或你想说，有的人身体可以很好地服务于思想，而有的人身体却阻碍其意志的实现呢？难道这些差异不能判别一个人是否具有天赋吗？

No one will deny that.

格：不可否认。

And can you mention any pursuit of mankind in which the male sex has not all these gifts and qualities in a higher degree than the female? Need I waste time in speaking of the art of weav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pancakes and preserves, in which womankind does really appear to be great, and in which for her to be beaten by a man is of all things the most absurd?

苏：你能说出在什么事务上男性不比女性更有天赋吗？在纺织、做薄煎饼和制果酱方面，妇女的确表现出色——这还用我说吗？若说男子在这些方面技高一筹，那实在是可笑之极，不是吗？

You are quite right, he replied, in maintaining the general inferiority of the female sex: although many women are in many things superior to many men, yet on the whole what you say is true.

格：你关于女性普遍不如男性的观点是正确的。尽管很多妇女在许多方面胜过众多男子，但从整体上看，你的说法是真实可信的。

And if so, my friend, I said, there is no special faculty of administration in a state which a woman has because she is a woman, or which a man has by virtue of his sex, but the gifts of nature are alike diffused in both; all the pursuits of men are the pursuits of women also, but in all of them a woman is inferior to a man.

苏：既然如此，我的朋友，一国之中既没有任何行政事务专属于妇女，也没有任何行政事务专属于男子，相同的天赋禀性分布于男女两性，只是总体来说女性不如男性。

Very true.

格：确实如此。

Then are we to impose all our enactments on men and none of them on women?

苏：那么，我们的法律只适应男子，而不适应妇女吗？

That will never do.

格：万万不可。

One woman has a gift of healing, another not; one is a musician, and another has no music in her nature?

苏：有的妇女具备医学天赋，有的则毫无医学天赋；有的妇女擅长音乐，有的则毫无音乐天赋，对吗？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one woman has a turn for gymnastic and military exercises, and another is unwarlike and hates gymnastics?

苏：有的妇女天性喜好体育与军事训练，有的则不喜作战并憎恶体育运动，对吗？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one woman is a philosopher, and another is an enemy of philosophy; one has spirit, and another is without spirit?

苏：有的妇女明哲善思，有的则敌视知识思辨；有的妇女斗志昂扬，有的则毫无斗志，对吗？

That is also true.

格：这也不假。

Then one woman will have the temper of a guardian, and another not. Was not the selection of the male guardians determined by differences of this sort?

苏：那么，有的妇女具备成为守卫者的禀性，而有的则并不具备。我们在男子中选拔守卫者时不也是参照同样的禀性特征吗？

Yes.

格：是的。

Men and women alike possess the qualities which make a guardian; they differ only in their comparative strength or weakness.

苏：男女均具备成为守卫者的资质，只是强弱略有不同。

Obviously.

格：显然如此。

And those women who have such qualities are to be selected as the companions and colleagues of men who have similar qualities

and whom they resemble in capacity and in character?

苏：具备此类资质的妇女，将被选拔为资质、能力、禀性相近男子的伴侣与同事，对吗？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ought not the same natures to have the same pursuits?

苏：禀性相同之人难道不应该从事相同的职业吗？

They ought.

格：应该。

Then, as we were saying before, there is nothing unnatural in assigning music and gymnastic to the wives of the guardians—to that point we come round again.

苏：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为守卫者的妻子提供音乐与体育教育，丝毫不违背常理——至此，我们再次回到了原地。

Certainly not.

格：当然不违背常理。

The law which we then enacted was agreeable to nature, and therefore not an impossibility or mere aspiration; and the contrary practice, which prevails at present, is in reality a violation of nature.

苏：因此，我们制定的法律符合常理，并非不切实际的空想；相反的做法目前正大行其道，其实质却是有违常理的。

That appears to be true.

格：似乎如此。

We had to consider, first, whether our proposals were possible, and secondly whether they were the most beneficial?

苏：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的提议是否可行？其次，这些提议是否最为有益？

Yes.

格：对。

And the possibility has been acknowledged?

苏：我们已经认可其可行性，对吗？

Yes.

格：对。

The very great benefit has next to be established?

苏：其次，要确定其优越性，对吗？

Quite so.

格：确实如此。

You will admit that the same education which makes a man a good guardian will make a woman a good guardian; for their original nature is the same?

苏：因为男女本性是相同的，所以同样的教育既可以将男子培养为优秀的守卫者，也可以将妇女培养为优秀的守卫者。你同意吗？

Yes.

格：同意。

I shoul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苏：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What is it?

格：什么问题？

Would you say that all men are equal in excellence, or is one man better than another?

苏：你认为，芸芸众生，是禀赋相同，抑或贤愚有别？

The latter.

格：贤愚有别。

And in the commonwealth which we were founding do you conceive the guardians who have been brought up on our model system to be more perfect men, or the cobblers whose education has been cobbling?

苏：在我们正在缔造的这个国家里，你认为谁会是更完美之人呢？是我们的典范教育体制造就的守卫者，抑或制鞋学徒出身的鞋匠？

What a ridiculous question!

格：多么可笑的问题啊！

You have answered me, I replied: Well, and may we not further say that our guardians are the best of our citizens?

苏：你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嗯，我们可否进一步说，我们的守卫者是最优秀的公民呢？

By far the best.

格：绝对是最优秀的。

And will not their wives be the best women?

苏：他们的妻子难道不是最优秀的妇女吗？

Yes, by far the best.

格：绝对是最优秀的。

And can there be anything better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than that the men and women of a State should be as good as possible?

苏：对于国家利益而言，可否存在比一国男女公民皆尽善尽美更好的事情吗？

There can be nothing better.

格：没有比这更好的。

And this is what the arts of music and gymnastic, when present in such manner as we have described, will accomplish?

苏：我们所提倡的音乐和体育教育，必将实现如此目标，对吗？

Certainly.

格：当然。

Then we have made an enactment not only possible but in the highest degree beneficial to the State?

苏：那么，我们已制定的法律，既具有可行性，又在最大程度上造福于国家，对吗？

True.

格：对。

Then let the wives of our guardians strip, for their virtue will be their robe, and let them share in the toils of war and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onl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labours the lighter are to be assigned to the women, who are the weaker natures, but in other respects their duties are to be the same. And as for the man who laughs at naked women exercising their bodies from the best of motives, in his laughter he is plucking 'A fruit of unripe wisdom,' and he himself is ignorant of what he is laughing at, or what he is about;—for that is, and ever will be, the best of sayings, That the

useful is the noble and the hurtful is the base.

苏：那么，让守卫者的妻子们裸体操练吧，因为美德将会成为她们的衣衫；让她们与男人并肩接受战火的考验，为国而战吧；只是在分工时将较轻的分配给女性，因为其体质较弱；在其他方面，他们都要履行同样的职责。对出于至善动机而裸体操练的妇女进行嘲笑的人，正在采撷“青涩的思想果实”，他自己一无所知，不知自己因何发笑，也不自知所做何事。正如那句亘古恒今的至理名言所说，“有益者高贵，有害者低俗”。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Here, then, is one difficulty in our law about women, which we may say that we have now escaped; the wave has not swallowed us up alive for enacting that the guardians of either sex should have all their pursuits in common; to the utility and also to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arrangement the consistency of the argument with itself bears witness.

苏：至此，我们可以说，在关于妇女的法律问题上，我们逃过了一劫。我们规定男女守卫者共同分担一切事务，并且证明了此项举措的实用性和可行性，却未被轩然大波所吞没。

Yes, that was a mighty wave which you have escaped.

格：是啊，你确实逃过了一场惊涛骇浪啊。

Yes, I said, but a greater is coming; you will not think much of this when you see the next.

苏：是的，但更大的风浪行将到来；当你目睹下面一场轩然大波时，你将不再介怀眼下。

Go on; let me see.

格：请继续。让我见识一下。

The law, I said, which is the sequel of this and of all that has preceded, is to the following effect,—'that the wives of our guardians are to be common, and their children are to be common, and no parent is to know his own child, nor any child his parent.'

苏：我们制定了这一条法律以及所有之前的法律，下一条法律便随之而来："我们的守卫者应共有妻子，共有子女，父母不知谁是亲生子女，子女也不知谁为亲生父母。"

Yes, he said, that is a much greater wave than the other; and the possibility as well as the utility of such a law are far more questionable.

格：是啊，这的确是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浪。此项律法的可行性与实用价值，也远较前者更值得怀疑。

I do not think, I said, that there can be any dispute about the very great utility of having wives and children in common; the possibility is quite another matter, and will be very much disputed.

苏：在我看来，妻子儿女公有化的重要实用价值，是毫无争议的；但是，其可行性，却是另一回事，势必引起巨大争议。

I think that a good many doubts may be raised about both.

格：我想，此二者均会遭到强烈质疑。

You imply that the two questions must be combined, I replied. Now I meant that you should admit the utility; and in this way, as I thought, I should escape from one of them, and then there would remain only the possibility.

苏：你的意思是，我必须同时面对这两个问题。我本以为，你会赞同其实用价值。这样，我便可以避开其中之一，只需应对剩下的可行性问题了。

But that little attempt is detected, and therefore you will please

to give a defence of both.

格：但是，这点小企图被识破了。因此，请你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申辩。

Well, I said, I submit to my fate. Yet grant me a little favour: let me feast my mind with the dream as day dreamers are in the habit of feasting themselves when they are walking alone; for before they have discovered any means of effecting their wishes—that is a matter which never troubles them—they would rather not tire themselves by thinking about possibilities; but assuming that what they desire is already granted to them, they proceed with their plan, and delight in detailing what they mean to do when their wish has come true—that is a way which they have of not doing much good to a capacity which was never good for much. Now I myself am beginning to lose heart, and I should like, with your permission, to pass over the question of possibility at present. Assuming therefor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roposal, I shall now proceed to enquire how the rulers will carry out these arrangements, and I shall demonstrate that our plan, if executed, will be of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the State and to the guardians. First of all, then, if you have no objection, I will endeavour with your help to consider the advantages of the measure; and hereafter the question of possibility.

苏：好吧，我服从命运的安排。然而，能否通融一下：让我像做白日梦的人在独自散步时习惯做的那样尽情驰骋自己的想象，因为他们在找到实现梦想的途径（这是他们从不考虑的问题）之前，不愿自寻烦恼地考虑是否行得通的问题，只是假设他们已经达成愿望，开始着手筹划，欣喜地想象在美梦成真之时自己具体要做的事情——这便

是他们一贯的做法，无所作为，于事无补。现在，我自己亦开始心灰意冷，希望征得你的同意，暂时不理会可行性的问题。因此，姑且假定此项提议可行，我现在要探讨施政者如何贯彻这些政治举措，同时我还将证明，我的计划一旦得以实施，将最大限度地造福于国家，造福于守卫者。首先，如果你没有任何异议的话，我将借助于你的力量，力求证明此举措的优越性，然后再讨论可行性的问题。

I have no objection; proceed.

格：我没有异议，请继续。

First, I think that if our rulers and their auxiliaries are to be worthy of the name which they bear, there must be willingness to obey in the one and the power of command in the other; the guardians must themselves obey the laws, and they must also imitate the spirit of them in any details which are entrusted to their care.

苏：第一，在我看来，我们的执政者及其辅助者若要做到名副其实，辅助者必须愿意服从命令，执政者必须有权发号施令；护国者自己必须遵守法律，并在他们有权进行具体决策的事情上严格贯彻法律精神。

That is right, he said.

格：理应如此。

You, I said, who are their legislator, having selected the men, will now select the women and give them to them;—they must be as far as possible of like natures with them; and they must live in common houses and meet at common meals. None of them will have anything specially his or her own; they will be together, and will be brought up together, and will associate at gymnastic exercises. And so they will be drawn by a necessity of their natures to have intercourse with each other—necessity is not too strong a word, I think?

苏：你身为立法者，既已选拔了男子充当守卫者，现在将选择女性来做他们的配偶。她们必须在最大程度上与守卫者们性情相近。他们必须居住在公共的房屋内，在公共的餐厅就餐。他们中所有人都没有任何专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一起生活，一起长大，一起进行体育锻炼。他们将会在情感必然性的驱动下彼此结合。用“必然性”一词，没有什么不妥吧？

Yes, he said;—necessity, not geometrical, but another sort of necessity which lovers know, and which is far more convincing and constraining to the mass of mankind.

格：没什么不妥。这不同于几何学的必然性，而是爱情的必然性。爱情的必然性，对于人类则更具说服力与制约力。

True, I said; and this, Glaucon, like all the rest, must proceed after an orderly fashion; in a city of the blessed, licentiousness is an unholy thing which the rulers will forbid.

苏：确实如此。格劳孔，此事与所有其他事物一样，必须遵从法律规章。在一个福佑的城邦中，放荡淫欲是亵渎之举，应为统治者所禁止。

Yes, he said, and it ought not to be permitted.

格：对，此举不可纵容。

Then clearly the next thing will be to make matrimony sacred in the highest degree, and what is most beneficial will be deemed sacred?

苏：显然，下一步就是要使婚姻处于至为神圣的地位，而利国利民的事物必然会被神圣化，对吗？

Exactly.

格：正是。

And how can marriages be made most beneficial?—that is a question which I put to you, because I see in your house dogs for hunting, and of the nobler sort of birds not a few. Now, I beseech you, do tell me, have you ever attended to their pairing and breeding?

苏：如何使婚姻生活造福国民？这是我向你提出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你的宅子里见到成群的猎犬，以及大量品种名贵的飞禽。现在，我恳请你务必告诉我，你可曾留意于它们的配对与繁殖吗？

In what particulars?

格：具体指的是哪些方面呢?

Why, in the first place, although they are all of a good sort, are not some better than others?

苏：哦，首先，尽管它们皆为良种，但其中是否存在更为出类拔萃者呢？

True.

格：存在。

And do you breed from them all indifferently, or do you take care to breed from the best only?

苏：你是不加区分地任其繁殖呢？抑或专择最佳者来培养繁殖？

From the best.

格：择最佳者。

And do you take the oldest or the youngest, or only those of ripe age?

苏：你将择其中最老者或最幼者，抑或专择壮年者呢？

I choose only those of ripe age.

格：我只选择壮年者。

And if care was not taken in the breeding, your dogs and birds would greatly deteriorate?

苏：如果你不在良种培育上留意的话，你所豢养的猎犬与飞禽的品种，势必会退化，对吗？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the same of horses and animals in general?

苏：马匹乃至其他动物，一般来讲，亦是如此，对吗？

Undoubtedly.

格：毫无疑问。

Good heavens! my dear friend, I said, what consummate skill will our rulers need if the same principle holds of the human species!

苏：天啊！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此项原理亦适用于人类，那么我们的统治者需要具有多么高明的手段啊！

Certainly, the same principle holds; but why does this involve any particular skill?

格：当然，同样的原理亦适用于人类，但这又怎会牵涉到什么特别的手段呢？

Because, I said, our rulers will often have to practise upon the body corporate with medicines. Now you know that when patients do not require medicines, but have only to be put under a regimen,

the inferior sort of practitioner is deemed to be good enough; but when medicine has to be given, then the doctor should be more of a man.

苏：因为我们的统治者治国，必须如医者治病般施用药剂。你知道，如果病人无需药物治疗，只须接受调养，那么较低级别的医生就足可以胜任；但若须接受药物治疗，则须有良医。

That is quite true, he said; but to what are you alluding?

格：的确如此，可是你在暗示什么呢？

I mean, I replied, that our rulers will find a considerable dose of falsehood and deceit necessary for the good of their subjects: we were saying that the use of all these things regarded as medicines might be of advantage.

苏：我想说，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我们的统治者有必要以谎言与欺骗手段为良方：我们曾说过，将这些东西作为药物来使用，或许会很有用处。

And we were very right.

格：我们的观点恰如其分。

And this lawful use of them seems likely to be often needed in the regulations of marriages and births.

苏：在有关婚姻和生育的法律规定中，可能要经常使用善意的谎言与欺骗。

How so?

格：这是为何？

Why, I said, the principle has been already laid down that the best of either sex should be united with the best as often, and the inferior with the inferior, as seldom as possible; and that they should rear the offspring of the one sort of union, but not of the other, if the flock is to be maintained in first-rate condition. Now these goings on must be a secret which the rulers only know, or there will be a further danger of our herd, as the guardians may be termed, breaking out into rebellion.

苏：我们已经规定，应该尽量使男女中最优秀者相互结合，多多益善，并且还要尽可能避免两性中较差者之间的相互结合；为了优化人口素质，最优秀者相互结合而生育的后代应给予养育，而较差者相互结合生育的后代则不予养育。这些事情，必须严格保密，仅为统治者所知晓。否则，我们内部将会存在更大的危险，即守卫者发动叛乱。

Very true.

格：确实如此。

Had we not better appoint certain festivals at which we will bring together the brides and bridegrooms, and sacrifices will be offered and suitable hymeneal songs composed by our poets: the number of weddings is a matter which must be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rulers, whose aim will be to preserve the average of population? There are many other things which they will have to consider, such as the effects of wars and diseases and any similar agencies, in order as far as this is possible to prevent the State from becoming either too large or too small.

苏：我们是否该指定某些节庆之日，使新婚男女欢聚一堂，祭祀神明，并由诗人作婚歌以助兴呢？而婚礼数目之多寡，当由统治者裁定，其目的在于保持人口平均，对吗？统治者还须同时考虑许多其他因素，诸如战争与疾病等的影响，从而尽可能地防止国家人口过度膨胀或缩小。

Certainly, he replied.

格：当然。

We shall have to invent some ingenious kind of lots which the less worthy may draw on each occasion of our bringing them

together, and then they will accuse their own ill-luck and not the rulers.

苏：我们必须设计某种巧妙的抽签方式，使不配成婚者在欢聚婚庆之时每次都抽不中，那么他们只能怪自己运气不佳，却不能怪统治者不公。

To be sure, he said.

格：毋庸置疑。

And I think that our braver and better youth, besides their other honours and rewards, might have greater facilities of intercourse with women given them; their bravery will be a reason, and such fathers ought to have as many sons as possible.

苏：在我看来，我们更为勇敢优秀的青年，除获得其他荣誉和奖励之外，还应优先得到与分配给他们的女子婚配的机会。其勇敢无畏便是充分的理由，而如此的父亲理应拥有尽量多的子嗣。

True.

格：对。

And the proper officers, whether male or female or both, for offices are to be held by women as well as by men—

苏：有关部门的官吏，不分男女，亦可男女共同担任，因为女人同男人一样可以担任各种职务。

Yes—

格：对。

The proper officers will take the offspring of the good parents to the pen or fold, and there they will deposit them with certain nurses who dwell in a separate quarter; but the offspring of the inferior, or of the better when they chance to be deformed, will be put away in some mysterious, unknown place, as they should be.

苏：有关部门的官吏会将优秀父母所生的孩子送到养育之所，在那里交给另居别所的特定保姆照顾。可是，较差父母生育的孩子，以及优秀父母生育的有缺陷孩子，则会按照规定被送到某个神秘而不为人知的地方。

Yes, he said, that must be done if the breed of the guardians is to be kept pure.

格：是的，必当如此，方可保证守卫者血脉纯正。

They will provide for their nurture, and will bring the mothers to the fold when they are full of milk, taking the greatest possible care that no mother recognizes her own child; and other wet-nurses may be engaged if more are required. Care will also be taken that the process of suckling shall not be protracted too long; and the mothers will have no getting up at night or other trouble, but will hand over all this sort of thing to the nurses and attendants.

苏：专职官吏负责安排抚育孩子的各项事宜，会把处于哺乳期的孩子母亲接到育儿所，同时竭力不让她们认出自己的孩子；如果有需要，他们还会另外请些奶妈。此外，还应确保喂奶时间不宜过长，母亲无须半夜起来，也不必承受其他方面的辛劳，而是将诸如此类之事交由奶妈和保姆负责。

You suppose the wives of our guardians to have a fine easy time of it when they are having children.

格：你认为，守卫者之妻在为人母的日子里过得轻松自在吧。

Why, said I, and so they ought. Let us, however, proceed with our scheme. We were saying that the parents should be in the prime of life?

苏：哦，理应如此。不过，让我们继续谈我们的设想吧。我们曾经说，为人父母者应当正值壮年，对吗？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what is the prime of life? May it not be defined as a period of about twenty years in a woman's life, and thirty in a man's?

苏：何谓壮年？可否将妇女和男子的壮年时期分别界定为二十年和三十年？

Which years do you mean to include?

格：你指的是哪几年？

A woman, I said, at twenty years of age may begin to bear children to the State, and continue to bear them until forty; a man may begin at five-and-twenty, when he has passed the point at which the pulse of life beats quickest, and continue to beget children until he be fifty-five.

苏：妇女从二十岁起为国家生育儿女，直至四十岁；男子二十五岁血气方刚，娶妻生子，直至五十五岁。

Certainly, he said, both in men and women those years are the

prime of physical as well as of intellectual vigour.

格：确实，这正是男女身心精力充沛的时期。

Any one above or below the prescribed ages who takes part in the public hymeneals shall be said to have done an unholy and unrighteous thing; the child of which he is the father, if it steals into life, will have been conceived under auspices very unlike the sacrifices and prayers, which at each hymeneal priestesses and priest and the whole city will offer,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may be better and more useful than their good and useful parents, whereas his child will be the offspring of darkness and strange lust.

苏：因此，如果有人超过或尚未达到规定年龄，而参加公共婚庆盛典，则被视为亵渎神明的罪恶之举。如果是偷偷生下的孩子，也不会得到祝福和庇佑。在每个婚礼庆典上，男女祭司连同整个城邦的人会献祭祷告，希望婚姻诞育的新一代会比他们的父母更出色，成为更为有用的人，但苟合而生的孩子则是愚昧无知与放荡淫欲的产物。

Very true, he replied.

格：的确如此。

And the same law will apply to any one of those within the prescribed age who forms a connection with any woman in the prime of life without the sanction of the rulers; for we shall say that

he is raising up a bastard to the State, uncertified and unconsecrated.

苏：同样的法律，亦适用于任何未经统治者准许而苟合的壮年男女，因为我们会说，他们正在为国家养育私生子，这是非法的，亵渎神明的。

Very true, he replied.

格：确实如此。

This applies, however, only to those who are within the specified age: after that we allow them to range at will, except that a man may not marry his daughter or his daughter's daughter, or his mother or his mother's mother; and women, on the other hand, are prohibited from marrying their sons or fathers, or son's son or father's father, and so on in either direction. And we grant all this, accompanying the permission with strict orders to prevent any embryo which may come into being from seeing the light; and if any force a way to the birth, the parents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 offspring of such an union cannot be maintained, and arrange accordingly.

苏：然而，此法律仅适用于在规定年龄范围内的人。我们准许已过生育年龄的人自由婚配，只是规定男人不可娶自己的女儿、孙女、母亲或祖母；另一方面，女人亦不可嫁给自己的儿子、父亲、孙子或者祖父，以此类推。我们在给予他们以上权利的同时，还要严令禁止

他们产下任何胎儿。如果发生意外，孩子的父母必须要明白，此类结合所生的孩子不可保留，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That also, he said, is a reasonable proposition. But how will they know who are fathers and daughters, and so on?

格：这一主张，合情合理。可是，他们如何知道，谁为父女等等诸如此类的血缘关系呢？

They will never know. The way will be this:—dating from the day of the hymeneal, the bridegroom who was then married will call all the male children who are born in the seventh and tenth month afterwards his sons, and the female children his daughters, and they will call him father, and he will call their children his grandchildren, and they will call the elder generation grandfathers and grandmothers. All who were begotten at the time when their fathers and mothers came together will be called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hese, as I was saying, will be forbidden to inter-marry. This, however, is not to be understood as an absolute prohibition of the marriage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the lot favours them, and they receive the sanction of the Pythian oracle, the law will allow them.

苏：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自婚礼之日起，新郎将称所有七至十个月后出生的男孩为自己的儿子，女孩为自己的女儿，而这些孩子将称他为父亲，他将称他们的孩子为自己的孙子，同时他们将称呼他的父母为祖父母。而他们的父母婚后生育的孩子都被称为他们的兄弟姐妹。正如我所说，这些兄弟姐妹之间将禁止结婚。

然而，这并不是说，要绝对禁止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如果他们在抽签决定中交到好运，并且得到阿波罗神谕的批准，便可以结为合法夫妻。

Quite right, he replied.

格：非常合理。

Such is the scheme, Glaucon, according to which the guardians of our State are to have their wives and families in common. And now you would have the argument show that this communit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t of our polity, and also that nothing can be better—would you not?

苏：这便是我的荒谬计划，格劳孔。根据这个想法，我们国家的守卫者将实行妻子与家庭公有。现在，你将要求我，证明这种公有是与我们的其他政策相一致的，并且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难道不是吗？

Yes, certainly.

格：是的，必当如此。

Shall we try to find a common basis by asking of ourselves what ought to be the chief aim of the legislator in making laws and

in the organization of a State,—what is the greatest good, and what is the greatest evil, and then consider whether our previous description has the stamp of the good or of the evil?

苏：我们是否应该尽力找到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则，问问自己，立法者制定法律和组建国家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何谓至善？何谓至恶？然后，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下，我们之前的描述究竟是打上了善的烙印，还是恶的烙印呢？

By all means.

格：务必如此。

Can there be any greater evil than discord and distraction and plurality where unity ought to reign? or any greater good than the bond of unity?

苏：能否存在比分裂倾轧、破坏统一更大的恶呢？抑或比团结一致更大的善呢？

There cannot.

格：不可能。

And there is unity where there is community of pleasures and pains—where all the citizens are glad or grieved on the same occasions of joy and sorrow?

苏：只有同甘共苦，即所有的公民为共同的喜事而欣喜，为共同的伤心事而悲哀，才能实现团结一致，对吗？

No doubt.

格：毋庸置疑。

Yes; and where there is no common but only private feeling a State is disorganized—when you have one half of the world triumphing and the other plunged in grief at the same events happening to the city or the citizens?

苏：是的。对于发生在城邦或城邦公民身上的相同事件，半数的人欢庆胜利，另一半的人悲不自胜。如果没有共同的情感，而只有私人恩怨，那么国家便会分崩离析，对吗？

Certainly.

格：当然。

Such differences commonly originate in a disagreement about the use of the terms 'mine' and 'not mine,' 'his' and 'not his.'

苏：如此分歧，通常起源于人们在使用“我的”与“不是我的”，“他的”与“不是他的”等类似表达时，出现的不一致。

Exactly so.

格：正是如此。

And is not that the best-ordered State in which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ersons apply the terms 'mine' and 'not mine' in the same way to the same thing?

苏：如果在一个国家，绝大多数的人以同样的方式称同样的事物为“我的”与“不是我的”，那么它便是秩序井然的国家，难道不是吗？

Quite true.

格：确实如此。

Or that again which most nearly approaches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individual—as in the body, when but a finger of one of us is hurt, the whole frame, drawn towards the soul as a centre and

forming one kingdom under the ruling power therein, feels the hurt and sympathizes all together with the part affected, and we say that the man has a pain in his finger; and the same expression is used about any other part of the body, which has a sensation of pain at suffering or of pleasure at the alleviation of suffering.

苏：换言之，秩序井然的国家，其情形酷似于个人——以身体为例，当我们中某个人手指受伤时，整个身体在灵魂的感召下形成以灵魂为统治核心的王国，与受伤部位一道感受疼痛，于是我们说，此人手指疼痛；当身体的任何其他部位为病痛折磨而感到痛苦，为病痛减轻而感到喜悦时，我们亦可使用同样的表达。

Very true, he replied; and I agree with you that in the best-ordered State there is the nearest approach to this common feeling which you describe.

格：确实如此。我同意你的观点，秩序井然的国家存在着酷似于你所描述的共同情感。

Then when any one of the citizens experiences any good or evil, the whole State will make his case their own, and will either rejoice or sorrow with him?

苏：那么，任何公民所经历的吉凶祸福，都将成为整个国家的吉凶祸福，因而全国人会同他一道或喜悦或悲哀，对吗？

Yes, he said, that is what will happen in a well-ordered State.

格：是的，秩序井然的国家理应如此。

It will now be time, I said, for us to return to our State and see whether this or some other form is mo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苏：此时，我们须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缔造的国家，看看是这种政体，还是别的政体，与这些基本原则最为相宜。

Very good.

格：很好。

Our State like every other has rulers and subjects?

苏：我们国家同其他国家一样，既有统治者，也有国民，对吗？

True.

格：对。

All of whom will call one another citizens?

苏：所有人都将称呼彼此为公民，对吗？

Of course.

格：当然。

But is there not another name which people give to their rulers in other States?

苏：在其他国家，人民是否以别的名号称呼其统治者呢？

Generally they call them masters, but in democratic States they simply call them rulers.

格：通常他们称之为主人，但是在民主制的国家，他们仅称之为统治者。

And in our State what other name besides that of citizens do the people give the rulers?

苏：在我们国家，人民除了用公民，还用什么名号称呼其统治

者？

They are called saviours and helpers, he replied.

格：他们称之为救世主和扶持者。

And what do the rulers call the people?

苏：那么，统治者如何称呼人民呢？

Their maintainers and foster-fathers.

格：他们的衣食父母。

And what do they call them in other States?

苏：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如何称呼人民？

Slaves.

格：奴隶。

And what do the rulers call one another in other States?

苏：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彼此之间如何称呼呢？

Fellow-rulers.

格：同治国者。

And what in ours?

苏：我们国家的统治者彼此之间如何称呼？

Fellow-guardians.

格：同守卫者。

Did you ever know an example in any other State of a ruler who would speak of one of his colleagues as his friend and of another as not being his friend?

苏：你可曾听说，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会将自己的同事分为友与非友吗？

Yes, very often.

格：是的，时有耳闻。

And the friend he regards and describes as one in whom he has an interest, and the other as a stranger in whom he has no interest?

苏：被视作朋友者，是他所感兴趣的人；至于其他人，则是他毫无兴趣的陌路人。

Exactly.

格：正是。

But would any of your guardians think or speak of any other guardian as a stranger?

苏：你国家中的哪位守卫者会将他的任何一位同事视为陌路人吗？

Certainly he would not; for every one whom they meet will be regarded by them either as a brother or sister, or father or mother, or son or daughter, or as the child or parent of those who are thus connected with him.

格：当然不会。因为他们所遇到的任何同事都会被视作或者兄弟姐妹，或者父母儿女，或者孙子孙女，或者祖父母。

Capital, I said; but let me ask you once more: Shall they be a family in name only; or shall they in all their actions be true to the name? For example, in the use of the word 'father,' would the care of a father be implied and the filial reverence and duty and obedience to him which the law commands; and is the violator of these duties to be regarded as an impious and unrighteous person who is not likely to receive much good either at the hands of God or of man? Are these to be or not to be the strains which the children will hear repeated in their ears by all the citizens about those who are intimated to them to be their parents and the rest of their kinsfolk?

苏：妙极了。但是，我要再问你一个问题：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家庭成员，还是名副其实的家庭成员呢？比如，在使用“父亲”一词时，是否意味着要依照法律关心照料父亲、克尽孝顺之道呢？不尽孝道者是否会被视为亵渎神明的不义之人，并遭人神共弃呢？当孩子们被告知哪些公民是他们的父母和亲属之后，这些公民是否要不断地向孩子灌输恪守孝道的思想呢？

These, he said, and none other; for what can be more ridiculous than for them to utter the names of family ties with the lips only and not to act in the spirit of them?

格：这方面的教育必不可少。如果对家庭关系的确认只是停留在

口头，而没有实际行动，那岂不是太荒谬了吗？

Then in our city the language of harmony and concord will be more often heard than in any other. As I was describing before, when any one is well or ill, the universal word will be 'with me it is well' or 'it is ill.'

苏：那么，在我们城邦比任何其他城邦，都更容易听到和谐的语言。正如我之前所描述的那样，一人的吉凶祸福，便是整个城邦的吉凶祸福。

Most true.

格：千真万确。

And agreeably to this mode of thinking and speaking, were we not saying that they will have their pleasures and pains in common?

苏：我们曾说，如此的思维与表达方式，意味着人们会同甘共苦，休戚与共，对吗？

Yes, and so they will.

格：对，必然如此。

And they will have a common interest in the same thing which they will alike call 'my own,' and having this common interest they will have a common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苏：他们共同拥有每个人都称之为“我的”的东西，因而会共同关心相同的事物，具备共同的利害关系，进而拥有休戚与共的共同情感，对吗？

Yes, far more so than in other States.

格：对，这是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And the reason of this, over and above the general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will be that the guardians will have a community of women and children?

苏：究其原因，除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以外，守卫者共有妻子儿女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对吗？

That will be the chief reason.

格：它是主要因素。

And this unity of feeling we admitted to be the greatest good, as was implied in our own comparison of a well-ordered State to the rela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members, when affected by pleasure or pain?

苏：我们之前承认，这种一致的情感即为至善。我们将秩序井然的国家比之于受到痛苦或快乐影响的身体和身体各部分的关系时，这一点已被清楚地表明，对吗？

That we acknowledged, and very rightly.

格：我们确实承认过，那是理所应当的。

Then the community of wives and children among our citizens is clearly the source of the greatest good to the State?

苏：显然，我们公民共同拥有妻子儿女，便是我们国家最大福祉的源泉，对吗？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this agrees with the other principle which we were

affirming,—that the guardians were not to have houses or lands or any other property; their pay was to be their food, which they were to receive from the other citizens, and they were to have no private expenses; for we intended them to preserve their true character of guardians.

苏：这与我们已经确定的另一条原则是一致的，即守卫者不可拥有房屋、土地或任何其他财产；其酬劳便是其他公民提供的食物，不得有私人开销；我们之所以如此规定，是为了使他们保持守卫者的本色。

Right, he replied.

格：对。

Both the community of property and the community of families, as I am saying, tend to make them more truly guardians; they will not tear the city in pieces by differing about 'mine' and 'not mine;' each man dragging any acquisition which he has made into a separate house of his own, where he has a separate wife and children and private pleasures and pains; but all will be affected as far as may be by the same pleasures and pains because they are all of one opinion about what is near and dear to them, and therefore they all tend towards a common end.

苏：我要强调的是，财产和家眷公有化，会使他们成为更加名副其实的守卫者。我们不会由于“我的”与“非我的”问题上的分歧而使城

邦陷入分裂的局面——即每个人都把值钱的东西拖回到单独属于自己的房子里，在那里他拥有只属于自己的妻子儿女，以及个人的快乐与苦痛，而且会尽其所能地与大家分享共同的快乐与分担共同的痛苦，因为他们对何为亲近而珍贵的事物有着一致的看法，从而戮力同心，团结一致。

Certainly, he replied.

格：当然。

And as they have nothing but their persons which they can call their own, suits and complaints will have no existence among them; they will be delivered from all those quarrels of which money or children or relations are the occasion.

苏：除了自己的子民外，他们一切公有，所以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控诉争端，从而他们可从一切有关钱财、儿女、情感纠纷中解脱出来。

Of course they will.

格：当然。

Neither will trials for assault or insult ever be likely to occur among them. For that equals should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equals we shall maintain to be honourable and right; we shall make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rson a matter of necessity.

苏：他们之间亦不可能发生关于人身侵犯或人身攻击的事件。因为同辈人之间的自卫行为是合理的，值得称颂的；我们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人身安全。

That is good, he said.

格：这很好。

Yes; and there is a further good in the law; viz. that if a man has a quarrel with another he will satisfy his resentment then and there, and not proceed to more dangerous lengths.

苏：是的。这条律法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如果一个人与他人发生争执，他可以当场泄愤，而不至于走极端做出更加危险的事情。

Certainly.

格：当然。

To the elder shall be assigned the duty of ruling and chastising the younger.

苏：应该赋予长辈管理、责罚晚辈的权利。

Clearly.

格：理所当然。

Nor can there be a doubt that the younger will not strike or do any other violence to an elder, unless the magistrates command him; nor will he slight him in any way. For there are two guardians, shame and fear, mighty to prevent him: shame, which makes men refrain from laying hands on those who are to them in the relation of parents; fear, that the injured one will be succoured by the others who are his brothers, sons, fathers.

苏：毫无疑问，除非有法官下达指令，否则晚辈既不会以攻击等任何形式冒犯长辈，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怠慢长辈。阻止他的原因有二：羞耻之心，禁止人们冒犯父母尊长；畏惧之心，使人们害怕因冒犯长辈而遭到家族上下的一致声讨。

That is true, he replied.

格：的确如此。

Then in every way the laws will help the citizens to keep the

peace with one another?

苏：那么，我们的律法将尽一切可能确保公民们和睦相处，对吗？

Yes, there will be no want of peace.

格：是的，永保太平。

And as the guardians will never quarrel among themselves there will be no danger of the rest of the city being divided either against them or against one another.

苏：由于守卫者内部毫无纷争，城邦既不存在国民群起而反对守卫者的危险，也不存在国民分崩离析，相互攻击的危险。

None whatever.

格：不存在任何危险。

I hardly like even to mention the little meannesses of which they will be rid, for they are beneath notice: such, for example, as the flattery of the rich by the poor, and all the pains and pangs which men experience in bringing up a family, and in finding

money to buy necessaries for their household, borrowing and then repudiating, getting how they can, and giving the money into the hands of women and slaves to keep—the many evils of so many kinds which people suffer in this way are mean enough and obvious enough, and not worth speaking of.

苏：他们将不再受到无聊琐事的困扰。这些事务如此琐碎，我甚至都不屑提及：比如说，囊中羞涩而不得不去奉承有钱人，历尽艰辛地养育儿女、赚钱养家糊口、向人借贷然后又无钱还债、千方百计挣钱再交到妇女和奴仆手中保管——诸如此类的人间苦难与不幸，显然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Yes, he said, a man has no need of eyes in order to perceive that.

格：是的，尽人皆知。

And from all these evils they will be delivered, and their life will be blessed as the life of Olympic victors and yet more blessed.

苏：他们会从所有这些不幸中摆脱出来，生活快乐幸福，犹如奥林匹克获胜者，然而有过之而无不及。

How so?

格：这是为何？

The Olympic victor, I said, is deemed happy in receiving a part only of the blessedness which is secured to our citizens, who have won a more glorious victory and have a more complete maintenance at the public cost. For the victory which they have won is the salvation of the whole State; and the crown with which they and their children are crowned is the fulness of all that life needs; they receive rewards from the hands of their country while living, and after death have an honourable burial.

苏：虽说奥林匹克获胜者是幸福的，但与我们守卫者的幸福生活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守卫者取得的胜利更为辉煌，得到公众提供的更加完善的生活保障。守卫者的胜利是拯救整个国家，他们及其子孙所获得的褒奖便是世世代代衣食无忧的生活。活着时从国民手中接受奖赏，死后亦享有哀荣。

Yes, he said, and glorious rewards they are.

格：是的，那是多么荣耀的奖赏啊！

Do you remember, I said, how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vious discussion some one who shall be nameless accused us of making our guardians unhappy—they had nothing and might have possessed all things—to whom we replied that, if an occasion offered, we might perhaps hereafter consider this question, but that, as at present advised, we would make our guardians truly

guardians, and that we were fashioning the State with a view to the greatest happiness, not of any particular class, but of the whole?

苏：你还记得吗？在之前讨论的过程中，某个人（最好不提姓名）曾批评我们使守卫者陷于不幸——本可以拥有一切却一无所有，当时我们答道，在合适的场合下，我们会考虑此问题，但是在当前，我们要使守卫者成为名副其实的守卫者，因此我们要建立一个以全体国民最大福祉为目的的国家，而不是以某个特定阶级最大福祉为目的的国家。

Yes, I remember.

格：是的，我记得。

And what do you say, now that the life of our protectors is made out to be far better and nobler than that of Olympic victors—is the life of shoemakers, or any other artisans, or of husbandmen, to be compared with it?

苏：现在，我们发现，守卫者的生活较之奥林匹克获胜者更幸福，更高尚，你感觉如何呢？鞋匠等手工业者乃至农民的生活，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吗？

Certainly not.

格：当然不能。

At the same time I ought here to repeat what I have said elsewhere, that if any of our guardians shall try to be happy in such a manner that he will cease to be a guardian, and is not content with this safe and harmonious life, which, in our judgment, is of all lives the best, but infatuated by some youthful conceit of happiness which gets up into his head shall seek to appropriate the whole state to himself, then he will have to learn how wisely Hesiod spoke, when he said, 'half is more than the whole.'

苏：同时，我要在此重申之前说过的话，如果我们守卫者中的任何人如此刻意追求快乐，他将不再是守卫者，不再满足于在我们看来最为美满的安定和谐生活，而是着迷于某种幼稚的幸福观，因私害公，中饱私囊，那么他就有必要学习一下赫西俄德的那句至理名言“半多于全”。

If he were to consult me, I should say to him: Stay where you are, when you have the offer of such a life.

格：倘若他征求我的意见，我会对他说：你享有如此生活，应当知足常乐。

You agree then, I said, that men and women are to have a common way of life such as we have described—common education, common children; and they are to watch over the citizens in common whether abiding in the city or going out to war;

they are to keep watch together, and to hunt together like dogs; and always and in all things, as far as they are able, women are to share with the men? And in so doing they will do what is best, and will not violate, but preserve the natural relation of the sexes.

苏：那么，你是否同意，男女应该共同按照我们所描述的方式生活——接受相同的教育，拥有共同的孩子；他们共同守卫城邦公民的安全，不论是留守城邦抑或外出征战；他们有如猎犬，一同放哨，一同打猎；女人总是要尽其所能与男人分享一切呢？他们这样做，是最为明智之举——男女之间的天然联系，非但不会被破坏，反而会得到很好的保持。

I agree with you, he replied.

格：我同意你的看法。

The enquiry, I said, has yet to be made, whether such a community be found possible—as among other animals, so also among men—and if possible, in what way possible?

苏：那么，我们不得不追问，如此的社会团体能否——像在动物中一样——建立起来？如果可能，以何种方式？

You have anticipated the question which I was about to suggest.

格：你已经料到我要如此发问。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 said, in seeing how war will be carried on by them.

苏：不难想象他们将如何参战。

How?

格：如何？

Why, of course they will go on expeditions together; and will take with them any of their children who are strong enough, that,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artisan's child, they may look on at the work which they will have to do when they are grown up; and besides looking on they will have to help and be of use in war, and to wait upon their fathers and mothers. Did you never observe in the arts how the potters' boys look on and help, long before they touch the wheel?

苏：嗨，当然他们会一同出征，并带上体格壮健的孩子，让孩子们像工匠的后人那样，见识一下自己长大以后必将做的事情；除了一旁见习，他们还须充当帮手，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侍奉父母。你难道没有见过，在手工作坊，陶工的儿子如何早在触摸陶轮之前便开始在旁观看帮忙吗？

Yes, I have.

格：对，我见过。

And shall potters be more careful in educating their children and in giving them the opportunity of seeing and practising their duties than our guardians will be?

苏：那么，陶工是否比守卫者更应该认真教育孩子，并给予他们见习自己未来职责的机会呢？

The idea is ridiculous, he said.

格：这个观点实在荒唐！

There is also the effect on the parents, with whom, as with other animals, the presence of their young ones will be the greatest incentive to valour.

苏：父母亦会受到影响：与动物一样，子女在场最能激发出父母的英勇斗志。

That is quite true, Socrates; and yet if they are defeated, which may often happen in war, how great the danger is! the children will

be lost as well as their parents, and the State will never recover.

格：苏格拉底，这话很有道理。然而，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旦战败，风险实在太大了！孩子连同他们的父母都会丧生，国家将永无复兴之日。

True, I said; but would you never allow them to run any risk?

苏：对，但是你打算永远不让他们冒任何风险吗？

I am far from saying that.

格：我决无此意。

Well, but if they are ever to run a risk should they not do so on some occasion when, if they escape disaster, they will be the better for it?

苏：好，既然他们要冒一定的风险，而且有时候一旦大难不死，他们必将受益匪浅，那么在此情形之下，他们是否应该冒险而为之呢？

Clearly.

格：当然应该。

Whether the future soldiers do or do not see war in the days of their youth is a very important matter, for the sake of which some risk may fairly be incurred.

苏：未来的军人是否于幼年时见识过战争，此问题关系重大。因此，一定的风险也许是在所难免的。

Yes, very important.

格：是的，关系重大。

This then must be our first step,—to make our children spectators of war; but we must also contrive that they shall be secured against danger; then all will be well.

苏：那么，我们的第一步必定如此，即让我们的孩子见识战争；但我们同时必须设法保证他们的安全，这样便没问题了。

True.

格：对。

Their parents may be supposed not to be blind to the risks of war, but to know, as far as human foresight can, what expeditions are safe and what dangerous?

苏：我可以推测，他们的父母并非对战争的风险毫无判断，而是会尽可能预测，哪些远征是安全的，哪些是危险的，对吗？

That may be assumed.

格：可以如此推测。

And they will take them on the safe expeditions and be cautious about the dangerous ones?

苏：他们会带孩子参加安全的远征；至于危险的远征，他们会谨慎考虑，对吗？

True.

格：对。

And they will place them under the command of experienced veterans who will be their leaders and teachers?

苏：他们会使孩子们听从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指挥，接受老兵的领导和训练，对吗？

Very properly.

格：非常正确。

Still, the dangers of war cannot be always foreseen;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chance about them?

苏：但是，我们无法预见战争中的所有危险，而且发生意外的几率还很大，对吗？

True.

格：对。

Then against such chances the children must be at once furnished with wings, in order that in the hour of need they may fly away and escape.

苏：那么，孩子们必须即刻肋插双翅以防不测，在需要的时候便可以远走高飞。

What do you mean? he said.

格：此话怎讲？

I mean that we must mount them on horses in their earliest youth, and when they have learnt to ride, take them on horseback to see war: the horses must not be spirited and warlike, but the most tractable and yet the swiftest that can be had. In this way they will get an excellent view of what is hereafter to be their own business; and if there is danger they have only to follow their elder leaders and escape.

苏：我想说，我们必须让他们自幼学会骑马，之后带着他们乘马观战。他们的坐骑不必骁勇善战，但却是最易驾驭，最为迅疾。这样，孩子们便可以充分地了解自己日后要做的事情；一旦出现险情，他们便可以跟随阅历丰富的领队迅速逃脱。

I believe that you are right, he said.

格：我认为，你说得对。

Next, as to war; what are to be the relations of your soldiers to one another and to their enemies? I should be inclined to propose that the soldier who leaves his rank or throws away his arms, or is guilty of any other act of cowardice, should be degraded into the rank of a husbandman or artisan. What do you think?

苏：下面，就战事而言，你们的军人该如何处理对敌对己的各种关系呢？我认为，临阵脱逃、丢下武器，或者有其他怯懦之举的军人，应该被降为农民或手工业者。你觉得如何？

By all means, I should say.

格：务必如此。

And he who allows himself to be taken prisoner may as well be made a present of to his enemies; he is their lawful prey, and let them do what they like with him.

苏：对于任何甘愿做敌人俘虏的军人，我们不妨把他当做礼物送给敌人，让他作为他们应得的战利品，任凭他们随意处置。

Certainly.

格：当然。

But the hero who has distinguished himself, what shall be done to him? In the first place, he shall receive honour in the army from his youthful comrades; every one of them in succession shall crown him. What do you say?

苏：但是，对于脱颖而出的英雄，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呢？首先，他应接受军中年轻战友的敬意；大家依次对他进行表彰。你有何看法？

I approve.

格：我同意。

And what do you say to his receiving the right hand of fellowship?

苏：你觉得，大家是否应该主动和他握手表示友好呢？

To that too, I agree.

格：对此，我同样表示赞同。

But you will hardly agree to my next proposal.

苏：但是，你恐怕不会赞同我下面的提议。

What is your proposal?

格：什么提议？

That he should kiss and be kissed by them.

苏：他应该亲吻战友，并被他们亲吻。

Most certainly, and I should be disposed to go further, and say: Let no one whom he has a mind to kiss refuse to be kissed by him while the expedition lasts. So that if there be a lover in the army, whether his love be youth or maiden, he may be more eager to win the prize of valour.

格：绝对赞同，而且我要更进一步提出：在战争期间，任何人不得拒绝他的亲吻。这样，如果军营中有他喜爱之人（无论是小伙子还是年轻姑娘），他会分外英勇，以赢得这一奖赏。

Capital, I said. That the brave man is to have more wives than others has been already determined: and he is to have first choices in such matters more than others, in order that he may have as many children as possible?

苏：好极了。我们已经规定，英勇的军人应该比他人娶更多的妻子，在择偶问题上享有优先权，从而得到尽可能多的儿女，对吗？

Agreed.

格：是的。

Again, there is another manner in which, according to Homer, brave youths should be honoured; for he tells how Ajax, after he had distinguished himself in battle, was rewarded with long chines, which seems to be a compliment appropriate to a hero in the flower of his age, being not only a tribute of honour but also a very strengthening thing.

苏：此外，根据诗人荷马的述说，还有另一种嘉奖青年勇士的做法。荷马告诉我们，埃阿斯在战斗中大出风头，因而得到全副脊骨肉的赏赐。这用来犒劳正值壮年的英雄似乎非常恰当，不仅可以彰显敬意，还可以强身健体。

Most true, he said.

格：千真万确。

Then in this, I said, Homer shall be our teacher; and we too, at sacrifices and on the like occasions, will honour the brave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their valour, whether men or women, with hymns and those other distinctions which we were mentioning; also with 'seats of precedence, and meats and full cups;' and in honouring them, we shall be at the same time training them.

苏：那么，在这方面，我们要以荷马为师。在献祭或其他类似的场合，我们也要按照战功大小表彰男女英雄，可以作诗歌颂、给予刚刚提到的那些礼遇奖赏，也可以给以上座和酒肉美食。通过嘉奖他们，我们同时也将培养他们的荣誉感。

That, he replied, is excellent.

格：妙极了。

Yes, I said; and when a man dies gloriously in war shall we not say,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he is of the golden race?

苏：是的。当军人英勇战死沙场之时，我们难道不应该首先认可，他是黄金族裔吗？

To be sure.

格：应该。

Nay, have we not the authority of Hesiod for affirming that when they are dead 'They are holy angels upon the earth, authors of good, averters of evil, the guardians of speech-gifted men'?

苏：此外，难道我们不该相信诗人赫西俄德的权威论断——当英

雄陨落之际，“他们成为圣洁的守护神，扬善除恶，护佑具有语言天赋的人类”吗？

Yes; and we accept his authority.

格：对，我们接受他的权威论断。

We must learn of the god how we are to order the sepulture of divine and heroic personages, and what is to be their special distinction; and we must do as he bids?

苏：我们必须向神学习，了解如何安葬神圣的英雄人物，了解他们应该享有何种特殊礼遇，然后一定遵照神的指示去做，对吗？

By all means.

格：务必如此。

And in ages to come we will reverence them and kneel before their sepulchres as at the graves of heroes. And not only they but any who are deemed pre-eminently good, whether they die from age, or in any other way, shall be admitted to the same honours.

苏：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要按照坟前祭拜传说中半神英雄的礼

节，到他们的墓前跪拜致以崇高的敬意。除了他们，那些无比优秀的军人，在因年迈抑或其他原因去世后，也应享有同样的礼遇。

That is very right, he said.

格：非常正确。

Next, how shall our soldiers treat their enemies? What about this?

苏：其次，我们的军士应如何对待敌人呢？这该如何回答？

In what respect do you mean?

格：你指的是哪方面？

First of all, in regard to slavery! Do you think it right that Hellenes should enslave Hellenic States, or allow others to enslave them, if they can help? Should not their custom be to spare them, considering the danger which there is that the whole race may one day fall under the yoke of the barbarians?

苏：首先，谈谈奴役问题吧！在你看来，希腊人应该奴役希腊城邦吗？抑或希腊人能够坐视他人奴役希腊城邦吗？鉴于整个民族有他

日沦为异族奴隶的危险，难道希腊人不应该形成不奴役希腊城邦的惯例吗？

To spare them is infinitely better.

格：能够赦免它们，当然再好不过。

Then no Hellene should be owned by them as a slave; that is a rule which they will observe and advise the other Hellenes to observe.

苏：那么，任何希腊人都不得为本族人据为己有而成为奴隶。我们的军人要遵守此项规定，并且劝告别的希腊人也要遵守。

Certainly, he said; they will in this way be united against the barbarians and will keep their hands off one another.

格：当然。这样，他们就可以联合抵御外族，而不会自相残害。

Next as to the slain; ought the conquerors, I said, to take anything but their armour? Does not the practice of despoiling an enemy afford an excuse for not facing the battle? Cowards skulk about the dead, pretending that they are fulfilling a duty, and many an army before now has been lost from this love of plunder.

苏：其次，关于战死的敌军。战胜者应该拿走死者盔甲以外的东西吗？难道劫掠敌人财物不是逃避战斗的借口吗？胆怯者躲在死者周围，表面上似乎在履行职责。可是，迄今为止，许多军队都因热衷劫掠战利品而全军覆没。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is there not illiberality and avarice in robbing a corpse, and also a degree of meanness and womanishness in making an enemy of the dead body when the real enemy has flown away and left only his fighting gear behind him,—is not this rather like a dog who cannot get at his assailant, quarrelling with the stones which strike him instead?

苏：难道劫掠死人之举不是心胸狭隘与贪得无厌的表现吗？同时，此举不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卑鄙龌龊，缺乏男子气概吗？与死尸为敌，却让真正的敌人丢下武器装备逃之夭夭。这情形很像一条狗对着打中它的石头狂吠，却不敢对付袭击者，不是吗？

Very like a dog, he said.

格：很像一条狗。

Then we must abstain from spoiling the dead or hindering their burial?

苏：那么，我们一定要避免劫掠尸体、阻碍埋葬死者的行为，对吗？

Yes, he replied, we most certainly must.

格：对，务必如此。

Neither shall we offer up arms at the temples of the gods, least of all the arms of Hellenes, if we care to maintain good feeling with other Hellenes; and, indeed, we have reason to fear that the offering of spoils taken from kinsmen may be a pollution unless commanded by the god himself?

苏：我们也不应该在诸神的庙堂献上武器。如果我们希望与其他希腊城邦保持良好的关系，就尤其不该献任何希腊人的武器。的确，我们有理由担心，用从本族人那里夺来的战利品献祭诸神，会亵渎神明，除非这是神的指示，对吗？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gain, as to the devastation of Hellenic territory or the burning of houses, what is to be the practice?

苏：再次，关于在希腊领土上的肆意破坏或烧毁房屋问题。该如何处理？

May I have the pleasure, he said, of hearing your opinion?

格：可否听听你有何高见呢？

Both should be forbidden, in my judgment; I would take the annual produce and no more. Shall I tell you why?

苏：以我之见，应一律禁止此类行为。我只拿走其一年的收成，足矣。需要我说明原因吗？

Pray do.

格：请讲。

Why, you see,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names 'discord' and 'war,' and I imagine that there is also a difference in their natures; the one is expressive of what is internal and domestic, the other of what is external and foreign; and the first of the two is termed

discord, and only the second, war.

苏：唉，你知道，“冲突”与“战争”存在名称上的不同。同时，我认为，二者在性质上也是不同的：一个表示内部的和国内的，另一个则表示外部的和国外的。对内称之为“冲突”，只有对外才可称为“战争”。

That is a very proper distinction, he replied.

格：如此区别二者，恰如其分。

And may I not observe with equal propriety that the Hellenic race is all united together by ties of blood and friendship, and alien and strange to the barbarians?

苏：我是否可以同样恰如其分地指出，整个希腊民族是由血统与友情纽带紧密联系起来的，而对异族人则是相互陌生、格格不入的？

Very good, he said.

格：说得很好。

And therefore when Hellenes fight with barbarians and barbarians with Hellenes, they will be described by us as being at

war when they fight, and by nature enemies, and this kind of antagonism should be called war; but when Hellenes fight with one another we shall say that Hellas is then in a state of disorder and discord, they being by nature friends; and such enmity is to be called discord.

苏：因此，当希腊人与异族人之间相互征战时，我们会说，他们正处于战争状态，在本质上是敌我关系，而这种对抗就应该被称作“战争”；但是，在希腊人内部自相残杀之际，我们会说，希腊正处于混乱与冲突状态，本质上是朋友关系，而这种敌对则被称为“冲突”。

I agree.

格：我同意。

Consider then, I said, when that which we have acknowledged to be discord occurs, and a city is divided, if both parties destroy the lands and burn the houses of one another, how wicked does the strife appear! No true lover of his country would bring himself to tear in pieces his own nurse and mother: There might be reason in the conqueror depriving the conquered of their harvest, but still they would have the idea of peace in their hearts and would not mean to go on fighting for ever.

苏：试想一旦发生我们所说的“冲突”，整个城邦一分为二，如果双方彼此践踏土地，烧毁房屋，那么这将是一场多么邪恶的冲突啊！

真正热爱自己祖国的人，绝不会肆意伤害生养哺育自己的祖国母亲：胜利者夺取失败者的收成也许事出有因，但是胜利者心中抱着和平的希望，并不打算让争斗永远进行下去。

Yes, he said, that is a better temper than the other.

格：对，这并不像另一种做法那样走极端。

And will not the city, which you are founding, be an Hellenic city?

苏：难道你所创建的城邦并非希腊城邦吗？

It ought to be, he replied.

格：它应当是希腊城邦。

Then will not the citizens be good and civilized?

苏：那么，难道城邦公民不够正直而文明吗？

Yes, very civilized.

格：不，非常文明。

And will they not be lovers of Hellas, and think of Hellas as their own land, and share in the common temples?

苏：他们热爱希腊，以希腊为自己的祖国，在共同的庙宇里向神祇献祭，难道不是吗？

Most certainly.

格：毋庸置疑。

And any difference which arises among them will be regarded by them as discord only—a quarrel among friends, which is not to be called a war?

苏：他们之间发生的分歧，只会被他们视为“冲突”——朋友之间的争吵，而不应被称为“战争”吗？

Certainly not.

格：当然不应被称为“战争”。

Then they will quarrel as those who intend some day to be reconciled?

苏：那么，他们虽然争吵，却希望有朝一日得以和解，对吗？

Certainly.

格：当然。

They will use friendly correction, but will not enslave or destroy their opponents; they will be correctors, not enemies?

苏：他们会友好地校正对方的错误，而不会奴役或者毁灭对方；他们是校正者，而不是敌人，对吗？

Just so.

格：正是如此。

And as they are Hellenes themselves they will not devastate Hellas, nor will they burn houses, nor ever suppose that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a city—men, women, and children—are equally their enemies, for they know that the guilt of war is always confined to a few persons and that the many are their friends. And for all these

reasons they will be unwilling to waste their lands and raze their houses; their enmity to them will only last until the many innocent sufferers have compelled the guilty few to give satisfaction?

苏：由于他们自己便是希腊人，他们不会使希腊垮掉，不会烧毁房屋，也不会将全城邦的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同视作自己的敌人，因为他们知道，难辞其咎的战犯总是局限于某些人，而绝大多数则是朋友，而不是敌人。因此，他们不愿践踏土地、摧毁房屋；他们的敌对不会长久，只要大量无辜的战争受害者迫使处于少数的有罪之人作出补偿，便可重修于好。

I agree, he said, that our citizens should thus deal with their Hellenic enemies; and with barbarians as the Hellenes now deal with one another.

格：我同意，我们的公民应该如此对待希腊敌人；对待异族人则应采取目前希腊人对付彼此的方式。

Then let us enact this law also for our guardians:—that they are neither to devastate the lands of Hellenes nor to burn their houses.

苏：那么，让我们为守卫者订立如下规定：他们不得蹂躏希腊人的土地，不得烧毁希腊人的房屋。

Agreed; and we may agree also in thinking that these, like all our previous enactments, are very good. But still I must say,

Socrates, that if you are allowed to go on in this way you will entirely forget the other question which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discussion you thrust aside:—Is such an order of things possible, and how, if at all? For I am quite ready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plan which you propose, if only feasible, would do all sorts of good to the State. I will add, what you have omitted, that your citizens will be the bravest of warriors, and will never leave their ranks, for they will all know one another, and each will call the other father, brother, son; and if you suppose the women to join their armies, whether in the same rank or in the rear, either as a terror to the enemy, or as auxiliaries in case of need, I know that they will then be absolutely invincible; and there are many domestic advantages which might also be mentioned and which I also fully acknowledge: but, as I admit all these advantages and as many more as you please, if only this State of yours were to come into existence, we need say no more about them; assuming then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let us now turn to the question of possibility and ways and means—the rest may be left.

格：同意。我们可以一致认为，我们之前制定的所有这些规定都是极好的。但是，苏格拉底，我仍然有必要指出，如果一味听任你如此继续讲下去，你会把讨论之初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忘得一干二净。那就是：如此一种制度能否实现？如果可以，那么如何实现？我很乐意承认，你的提议，一旦可行，对于城邦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我将补充你未及说明的诸多好处：你城邦里的公民将是最英勇善战的勇士，绝不会临阵脱逃，因为他们彼此熟识，皆为父子兄弟；如果他们的队伍中必定要有女兵的话，那么，不论是与之并肩战斗，还是留在后方，不论是作为令敌人胆战心惊的尖兵，还是作为应不时之需的后援力量，他们都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同时，我还要指出在内政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益处，对此我也完全认同。但是，正因我认同所有这些好处，并且会如你所愿认同更多的好处，只要你的这个城邦能够建

成，我们便不必多说什么；让我们先假设存在如此的城邦，现在再回到可行性与方法途径的问题——余者暂且不谈。

If I loiter for a moment, you instantly make a raid upon me, I said, and have no mercy; I have hardly escaped the first and second waves, and you seem not to be aware that you are now bringing upon me the third, which is the greatest and heaviest. When you have seen and heard the third wave, I think you will be more considerate and will acknowledge that some fear and hesitation was natural respecting a proposal so extraordinary as that which I have now to state and investigate.

苏：我若有片刻清闲，你便立即对我发起突然袭击，而且毫不留情。我刚刚逃脱了第一和第二股浪潮，你却似乎在不经意间为我带来了第三股浪潮，而这正是最为猛烈与沉重的。当你亲身见证这第三股浪潮之际，你便更能体会我此时的心情，并且认为我现在要阐明与调查的问题非同一般，某种程度上的恐惧与踌躇是合乎情理的。

The more appeals of this sort which you make, he said, the more determined are we that you shall tell us how such a State is possible: speak out and at once.

格：你越是恳求同情，我们越是坚决要求，你告诉我们如此城邦何以成为可能——请畅所欲言，莫要犹豫。

Let me begin by reminding you that we found our way hither in the search after justice and injustice.

苏：首先，我要提醒你的是，我们之所以一路讨论至此，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追寻正义与非正义。

True, he replied; but what of that?

格：对，那又如何？

I was only going to ask whether, if we have discovered them, we are to require that the just man should in nothing fail of absolute justice; or may we be satisfied with an approximation, and the attainment in him of a higher degree of justice than is to be found in other men?

苏：我只是想问，如果我们已经发现了它们，那么我们将要求正义之人无处不体现绝对正义吗？抑或只要他近似于绝对正义，获得了较之他人更高程度的正义，我们便心满意足了呢？

The approximation will be enough.

格：近似即可。

We were enquiring into the nature of absolute justice and into the character of the perfectly just, and into injustice and the perfectly unjust, that we might have an ideal. We were to look at

these in order that we might judge of our own happiness and unhappines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which they exhibited and the degree in which we resembled them, but not with any view of showing that they could exist in fact.

苏：我们探究绝对正义的实质与绝对正义之人的品格，以及非正义的实质与非正义之人的品格，旨在获得理想的范式。我们将参照这些理想范式，按照它们所体现的标准以及我们与之相似的程度，评价我们自己的幸福与不幸。我们的目的，并非想表明它们存在于现实之中。

True, he said.

格：对。

Would a painter be any the worse because, after having delineated with consummate art an ideal of a perfectly beautiful man, he was unable to show that any such man could ever have existed?

苏：如果画家凭借高超技艺画出完美男子的理想范式，却无法证明此男子确实存在，那么画家是否会因此而成为更糟糕的画家呢？

He would be none the worse.

格：绝对不会的。

Well, and were we not creating an ideal of a perfect State?

苏：哦，我们难道不是在创建一个完美城邦的理想范式吗？

To be sure.

格：的确如此。

And is our theory a worse theory because we are unable to prove the possibility of a city being ordered in the manner described?

苏：那么，我们的理论，是否会因为我们无法证明理想城邦存在的可能性，而成为蹩脚的理论呢？

Surely not, he replied.

格：当然不会。

That is the truth, I said. But if, at your request, I am to try and show how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the possibility is highest, I

must ask you, having this in view, to repeat your former admissions.

苏：这便是事实。但是，如果我即将按照你的要求设法说明，在何种情形之下其存在的可能性最大，那么有鉴于此，我必须请你重复一下你之前所认可之事。

What admissions?

格：认可什么事情？

I want to know whether ideals are ever fully realized in language? Does not the word express more than the fact, and must not the actual, whatever a man may think, alway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fall short of the truth? What do you say?

苏：我想知道，是否理想可通过语言实现？难道该词语不是言过其实吗？任何事物的本质，难道不是必定依照事物的规律而落后于真理吗？你有何看法？

I agree.

格：我同意。

Then you must not insist on my proving that the actual State will in every respect coincide with the ideal: if we are only able to discover how a city may be governed nearly as we proposed, you will admit that we have discovered the possibility which you demand; and will be contented. I am sure that I should be contented—will not you?

苏：那么，你便绝对不可以坚持要我证明，实际城邦在各个方面与理想城邦吻合：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城邦的治国之道与我们主张的理想城邦大致相同，你就得承认我们已按照你的要求证明了其可能性，并且别无他求。我一定会心满意足的——难道你不会满足吗？

Yes, I will.

格：是的，我会的。

Let me next endeavour to show what is that fault in States which is the cause of their present maladministration, and what is the least change which will enable a State to pass into the truer form; and let the change, if possible, be of one thing only, or, if not, of two; at any rate, let the changes be as few and slight as possible.

苏：其次，我将力图阐明，各城邦存在何种不足而造成它们的当前时弊，如何使城邦发生最小的改变从而使得城邦变成更理想的形式；尽可能仅改变一种事物，实在不行，才改变两种事物；无论如何，要让变化尽可能细微。

Certainly, he replied.

格：当然。

I think, I said, that there might be a reform of the State if only one change were made, which is not a slight or easy though still a possible one.

苏：我想，只要进行一项改变，就可以改革城邦政治。尽管此法可行，却并非轻而易举。

What is it? he said.

格：它是什么？

Now then, I said, I go to meet that which I liken to the greatest of the waves; yet shall the word be spoken, even though the wave break and drown me in laughter and dishonour; and do you mark my words.

苏：那么，我现在要迎接被我比作最猛烈的恶浪了；然而，即使在这场浪潮中成为笑柄、身败名裂，我也要说出来；你一定要仔细听好了。

Proceed.

格：请讲。

I said: 'Until philosophers are kings, or the kings and princes of this world have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greatness and wisdom meet in one, and those commoner natures who pursue either to the exclusion of the other are compelled to stand aside, cities will never have rest from their evils,—nor the human race, as I believe,—and then only will this our State have a possibility of life and behold the light of day.' Such was the thought, my dear Glaucon, which I would fain have uttered if it had not seemed too extravagant; for to be convinced that in no other State can there be happiness private or public is indeed a hard thing.

苏：我认为，直到立哲学家为王，或者当今世界的国王和王储拥有哲学的精神和力量，使政治权势与聪明学识合二为一，同时那些只追求二者之一而摒弃另一个的更为平庸之辈，被禁止从政，各个城邦才可以摆脱苦难，获得安宁——全人类亦是如此。只有这样，我们的理想城邦才可能实现，并得见天日。这便是我的想法，亲爱的格劳孔。若不是它看起来极为荒诞不经，我也不会踌躇至此，因为要证明在任何其他城邦无论公私皆无幸福可言，殊非易事。

Socrates, what do you mean? I would have you consider that the word which you have uttered is one at which numerous persons, and very respectable persons too, in a figure pulling off their coats all in a moment, and seizing any weapon that comes to hand, will run at you might and main, before you know where you

are, intending to do heaven knows what; and if you don't prepare an answer, and put yourself in motion, you will be 'prepared by their fine wits,' and no mistake.

格：苏格拉底，你何出此言？我要提请你注意的是，你讲了如此一席话，一时间众多身份高贵之人赤膊上阵，随手抓起武器，还未等你弄清状况，便拼尽全力向你发动攻击，无人能晓他们将要做出如何举动。如果你未能准备答复之词并且积极应战，你将成为众矢之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You got me into the scrape, I said.

苏：我现在的困境是你造成的。

And I was quite right; however, I will do all I can to get you out of it; but I can only give you good-will and good advice, and, perhaps, I may be able to fit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s better than another—that is all. And now, having such an auxiliary, you must do your best to show the unbelievers that you are right.

格：我完全没有错。然而，我将尽我所能帮你走出困境，但我能给予你的，只有善意与忠告。此外，我或许可以比别人更好地回答你的问题——这便是全部。如今，你有我作为助手，一定要全力以赴向怀疑者证明，你是正确的。

I ought to try, I said, since you offer me such invaluable

assistance. And I think that, if there is to be a chance of our escaping, we must explain to them whom we mean when we say that philosophers are to rule in the State; then we shall be able to defend ourselves: There will be discovered to be some natures who ought to study philosophy and to be leaders in the State; and others who are not born to be philosophers, and are meant to be followers rather than leaders.

苏：有你大力相助，我当尽力为之。我想，如果有机会逃过一劫，我们必须向他们解释，哲学家治理城邦，指的是哪些人。然后，我们才能够为自己辩护：人们会发现，一些人生性应该研究哲学，并担当国家的领导者；其他人天生做不了哲学家，命中注定是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

Then now for a definition, he said.

格：此处有待阐明。

Follow me, I said, and I hope that I may in some way or other be able to give you a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苏：跟我来，我希望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给你一个满意的解释。

Proceed.

格：请讲。

I dare say that you remember, and therefore I need not remind you, that a lover, if he is worthy of the name, ought to show his love, not to some one part of that which he loves, but to the whole.

苏：大概你还记得，因而我无需提醒你。一个名副其实的爱好者，应该爱的不是所爱之物的某一部分，而是它的全部。

I really do not understand, and therefore beg of you to assist my memory.

格：我实在不明白，因此恳请你给我点提示。

Another person, I said, might fairly reply as you do; but a man of pleasure like yourself ought to know that all who are in the flower of youth do somehow or other raise a pang or emotion in a lover's breast, and are thought by him to be worthy of his affectionate regards. Is not this a way which you have with the fair: one has a snub nose, and you praise his charming face; the hook-nose of another has, you say, a royal look; while he who is neither snub nor hooked has the grace of regularity: the dark visage is manly, the fair are children of the gods; and as to the sweet 'honey pale,' as they are called, what is the very name but the invention of a lover who talks in diminutives, and is not adverse to paleness if appearing on the cheek of youth? In a word, there is no excuse which you will not make, and nothing which you will not say, in

order not to lose a single flower that blooms in the spring-time of youth.

苏：别人或许会如此回答，但像你这类享乐型的男子应该清楚，所有花季少年都会莫名其妙地在爱人的心中掀起情感的波澜，并被想象成是值得深情挚爱的。你难道不是这样对待美人的吗？——一个人长着狮子鼻，你夸他容貌可爱；另一个长着鹰钩鼻，你说他气质高贵；一个人既非狮子鼻，又非鹰钩鼻，便是美得恰到好处；面庞黝黑，便是具有男人气概；皮肤白皙，便是诸神的宠儿；至于可爱的“甜蜜的苍白”者，则是爱恋之人发明的昵称——当苍白出现在少年的面颊上时，爱称丝毫没有反对苍白之意，对吗？总而言之，为了不失去一朵绽放在青春嘉年华的鲜花，你会毫不吝啬自己的遁词巧辩，没有什么是你不能说的。

If you make me an authority in matters of love, for the sake of the argument, I assent.

格：如果你要我充当感情问题的权威，为了方便论证起见，我同意。

And what do you say of lovers of wine? Do you not see them doing the same? They are glad of any pretext of drinking any wine.

苏：那么，你会如何看待嗜酒者呢？你难道没发现他们的作法完全相同吗？他们喜欢利用各种借口来喝每一种酒。

Very good.

格：说得好。

And the same is true of ambitious men; if they cannot command an army, they are willing to command a file; and if they cannot be honoured by really great and important persons, they are glad to be honoured by lesser and meaner people,—but honour of some kind they must have.

苏：这同样也适用于汲汲于功名者。如果他们不能统领一支大军，他们宁愿指挥二人小分队；如果他们得不到达官贵人的敬重，他们乐于被身份较低微者所敬重，但无论如何，他们一定要获得荣誉。

Exactly.

格：正是如此。

Once more let me ask: Does he who desires any class of goods, desire the whole class or a part only?

苏：请让我再问一次：如果一个人渴望得到某类财物，那么他渴望得到这类财物的全部，还是其中的一部分呢？

The whole.

格：全部。

And may we not say of the philosopher that he is a lover, not of a part of wisdom only, but of the whole?

苏：那么，我们会说，哲学家并非只热爱一部分知识，而是热爱全部的知识，难道不是吗？

Yes, of the whole.

格：对，全部的。

And he who dislikes learning, especially in youth, when he has no power of judging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not, such an one we maintain not to be a philosopher or a lover of knowledge, just as he who refuses his food is not hungry, and may be said to have a bad appetite and not a good one?

苏：那么，如果一个人，特别是在早年还不具备判断善恶能力时，就不喜欢学习，我们便认为他不会成为哲学家或者爱知识者，正如一个人不感觉饥饿而拒绝食物，可以被说成食欲不振，却不能被说成食欲旺盛，对吗？

Very true,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Whereas he who has a taste for every sort of knowledge and who is curious to learn and is never satisfied, may be justly termed a philosopher? Am I not right?

苏：反之，如果一个人喜欢各种知识，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永不满足，那么他就应当被称为哲学家吗？难道我说错了吗？

Glaucon said: If curiosity makes a philosopher, you will find many a strange being will have a title to the name. All the lovers of sights have a delight in learning, and must therefore be included. Musical amateurs, too, are a folk strangely out of place among philosophers, for they are the last persons in the world who would come to anything like a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if they could help, while they run about at the Dionysiac festivals as if they had let out their ears to hear every chorus; whether the performance is in town or country—that makes no difference—they are there. Now are we to maintain that all these and any who have similar tastes, as well as the professors of quite minor arts, are philosophers?

格：如果求知欲可以造就哲学家的话，你会发现许多奇怪的人都可以被冠以“哲学家”的头衔。所有喜欢观光览胜的人，都乐于增长学识，因而一定被包括在内。再者，音乐爱好者置身于哲学家队伍中更是格格不入：音乐爱好者是最不愿意从事哲学讨论的，但是在酒神节

的日子里，他们东奔西跑，仿佛耳朵已被预先租出去听取所有合唱演出一样，不论在城镇还是乡村（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区别），他们都会到场的。如今我们是否要主张，所有这些人、任何类似的爱好者，以及雕虫小技的行家里手，皆为哲学家呢？

Certainly not, I replied; they are only an imitation.

苏：当然不是。他们只是一种模仿。

He said: Who then are the true philosophers?

格：那么，谁是真正的哲学家呢？

Those, I said, who are lovers of the vision of truth.

苏：那些喜欢探索真理的人。

That is also good, he said; but I should like to know what you mean?

格：很好。但是我希望知道，你具体指的是什么？

To another, I replied, I might have a difficulty in explaining;

but I am sure that you will admit a proposition which I am about to make.

苏：若是换作别人，我也许很难解释清楚。但是，我肯定，你会认同我即将提出的命题。

What is the proposition?

格：什么命题？

That since beauty is the opposite of ugliness, they are two?

苏：因为美与丑相互对立，所以它们是两种不同事物，对吗？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inasmuch as they are two, each of them is one?

苏：既然它们是两种事物，那么它们每一个都是一种事物，对吗？

True again.

格：对。

And of just and unjust, good and evil, and of every other class, the same remark holds: taken singly, each of them is one; but from the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them with actions and things and with one another, they are seen in all sorts of lights and appear many?

苏：这亦适用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以及其他的对立事物：在单独拿出来的时候，它们是个体；但是，它们在与各种事物、行为以及彼此之间形成不同组合后，便姿态万千，呈现出众多形象，对吗？

Very true.

格：确实如此。

And this is the distinction which I draw between the sight-loving, art-loving, practical class and those of whom I am speaking, and who are alone worthy of the name of philosophers.

苏：我以此来将爱好观光者、艺术爱好者、注重实际者，与我正在讲的唯一配称作“哲学家”的那些人区别开来。

How do you distinguish them? he said.

格：你如何区别他们？

The lovers of sounds and sights, I replied, are, as I conceive, fond of fine tones and colours and forms and all the artificial products that are made out of them, but their mind is incapable of seeing or loving absolute beauty.

苏：按照我的理解，喜欢美丽图景和悦耳声音的人，喜爱优美的声音、颜色和形态以及由所有这些元素构成的艺术品，但是他们的心智却无法理解或者欣赏美本身。

True, he replied.

格：对。

Few are they who are able to attain to the sight of this.

苏：很少有人能够领会美本身。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he who, having a sense of beautiful things has no sense of absolute beauty, or who, if another lead him to a knowledge of that beauty is unable to follow—of such an one I ask, Is he awake or in a dream only? Reflect: is not the dreamer, sleeping or waking, one who likens dissimilar things, who puts the copy in the place of the real object?

苏：一个人理解美的事物，却无法理解美本身。即使有人引导他去了解美本身，他仍是无法理解。我想问的是，如此之人是清醒的呢？抑或只是在梦中？试想：无论睡梦还是清醒，空想者难道不都是用不相似的事物相互比拟，用复制品取代实物吗？

I should certainly say that such an one was dreaming.

格：如此之人当然是在梦中。

But take the case of the other, who recognises the existence of absolute beauty and is able to distinguish the idea from the objects which participate in the idea, neither putting the objects in the place of the idea nor the idea in the place of the objects—is he a dreamer, or is he awake?

苏：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一个人认识到美本身的存在，并且能够区别美本身与美的事物，既不以美的事物取代美本身，也不以美本

身取代美的事物——他是在梦中呢，还是清醒的呢？

He is wide awake.

格：他完全清醒。

And may we not say that the mind of the one who knows has knowledge, and that the mind of the other, who opines only, has opinion?

苏：难道我们不可以说，知之者的头脑中拥有知识，而只会发表意见者的头脑中拥有意见吗？

Certainly.

格：当然可以。

But suppose that the latter should quarrel with us and dispute our statement, can we administer any soothing cordial or advice to him, without revealing to him that there is sad disorder in his wits?

苏：但是，假设后者与我们争辩，并对我们的说法提出质疑，我们可否好言相慰，而不必以“其心智错乱”之语相告呢？

We must certainly offer him some good advice, he replied.

格：我们当然要好言相慰。

Come, then, and let us think of something to say to him. Shall we begin by assuring him that he is welcome to any knowledge which he may have, and that we are rejoiced at his having it? But we should like to ask him a question: Does he who has knowledge know something or nothing? (You must answer for him.)

苏：那么，让我们来想一想对他说些什么。首先，我们是否应该郑重地告诉他，他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努力获得任何知识，我们亦会为他的收获而感到欣喜呢？可是，我们要问他一个问题：有知识的人，是知道一些呢，还是一无所知？

I answer that he knows something.

（你必须代为回答。）格：我的回答是，他知道一些。

Something that is or is not?

苏：一些存在的事物，抑或不存在的事物？

Something that is; for how can that which is not ever be

known?

格：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事物，又如何会为人所知呢？

And are we assured, after looking at the matter from many points of view, that absolute being is or may be absolutely known, but that the utterly non-existent is utterly unknown?

苏：在对此问题进行多方面考虑之后，我们是否可以确定，绝对存在的事物绝对会为人所知，但是完全不存在的事物，则完全不为人所知呢？

Nothing can be more certain.

格：确定无疑。

Good. But if there be anything which is of such a nature as to be and not to be, that will have a place intermediate between pure being and the absolute negation of being?

苏：好。假设有某种东西介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那么它是否介乎绝对存在与绝对不存在之间呢？

Yes, between them.

格：是的，介于二者之间。

And, as knowledge corresponded to being and ignorance of necessity to not-being, for that intermediate between being and not-being there has to be discovered a corresponding intermediate between ignorance and knowledge, if there be such?

苏：因为知识对应存在，而无知必然对应非存在，因此介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事物，须与介乎知识与无知之间的事物相对应——假设此类事物存在，对吗？

Certainly.

格：当然。

Do we admit the existence of opinion?

苏：我们承认意见的存在吗？

Undoubtedly.

格：毫无疑问。

As being the same with knowledge, or another faculty?

苏：意见是与知识相同呢，还是另一种不同的能力？

Another faculty.

格：不同的能力。

Then opinion and knowledge have to do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matter corresponding to this difference of faculties?

苏：既然意见与知识属于不同的能力，那么二者必然对应不同的事物，对吗？

Yes.

格：对。

And knowledge is relative to being and knows being. But before I proceed further I will make a division.

苏：知识与存在对应，并且了解存在。但是，在继续深入之前，我将作以必要的界定。

What division?

格：界定什么呢？

I will begin by placing faculties in a class by themselves: they are powers in us, and in all other things, by which we do as we do. Sight and hearing, for example, I should call faculties. Have I clearly explained the class which I mean?

苏：首先，我将使各种能力自成一类：它们是我们自身，以及所有其他事物所具有的能力和功能，我们凭借这些能力和功能来做事。例如，视与听，我可将之称为能力。关于此类别，我是否已经解释清楚了呢？

Yes, I quite understand.

格：是的，我十分明白。

Then let me tell you my view about them. I do not see them, and therefore the distinctions of figure, colour, and the like, which enable me to discern the differences of some things, do not apply to them. In speaking of a faculty I think only of its sphere and its result; and that which has the same sphere and the same result I call the same faculty, but that which has another sphere and another result I call different. Would that be your way of speaking?

苏：然后，让我告诉你，我关于能力的看法。我看不见它们，因而我在识别一些事物的不同时常用的区别形状、颜色等的方法，对它们并不适用。就能力而言，我仅能想到其适用范围和效果，因此我将具有相同适用范围和相同效果的，称为相同的能力；具有不同适用范围和不同效果的，称为不同能力。你是否也会如此说呢？

Yes.

格：是的。

And will you be so very good as to answer one more question? Would you say that knowledge is a faculty, or in what class would you place it?

苏：你好人做到底，再回答一个问题，好吗?你认为知识是一种能力吗？抑或你会将之归为其他什么类别呢？

Certainly knowledge is a faculty, and the mightiest of all faculties.

格：知识当然是一种能力，而且是所有能力中最强有力的。

And is opinion also a faculty?

苏：那么，意见也是一种能力吗？

Certainly, he said; for opinion is that with which we are able to form an opinion.

格：当然，正是凭借意见这种能力，我们才能够形成观点。

And yet you were acknowledging a little while ago that knowledge is not the same as opinion?

苏：然而，不久前你还承认，知识不同于意见，对吗？

Why, yes, he said: how can any reasonable being ever identify that which is infallible with that which errs?

格：噢，对，任何有理性之人何尝会将绝无谬误的知识与可以出错的意见混为一谈呢？

An excellent answer, proving, I said, that we are quite conscious of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苏：绝妙的回答。这说明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区别。

Yes.

格：是的。

Then knowledge and opinion having distinct powers have also distinct spheres or subject-matters?

苏：那么，具有不同能力的知识与意见，也有不同的适用范围或者对象吗？

That is certain.

格：那是必然的。

Being is the sphere or subject-matter of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is to know the nature of being?

苏：存在是知识的适用范围或对象，知识以认识存在的本质为目的吗？

Yes.

格：是的。

And opinion is to have an opinion?

苏：意见以形成观点为目的吗？

Yes.

格：对。

And do we know what we opine? or is the subject-matter of opinion the same as the subject-matter of knowledge?

苏：我们了解自己发表意见的对象吗？抑或意见的对象是否与知识的对象相同呢？

Nay, he replied, that has been already disproven; if difference in faculty implies difference in the sphere or subject-matter, and if, as we were saying, opinion and knowledge are distinct faculties, then the sphere of knowledge and of opinion cannot be the same.

格：不，我们已经证明这并不成立。如果能力的不同意味着适用范围或对象的不同，并且正如我们所说，意见与知识属于两种不同的能力，那么二者的适用范围也不能相同。

Then if being is the subject-matter of knowledge, something else must be the subject-matter of opinion?

苏：如果存在是知识的对象，那么意见的对象一定是别的某种东西吗？

Yes, something else.

格：对，别的某种东西。

Well then, is not-being the subject-matter of opinion? or, rather, how can there be an opinion at all about not-being? Reflect: when a man has an opinion, has he not an opinion about something? Can he have an opinion which is an opinion about nothing?

苏：那么，意见的对象是非存在吗？或者，更确切地说，无论如何怎么可能会有关于非存在的意见呢？试想：当一个人持有意见的时候，难道他不是持有对某种事物的意见吗？他能够持有一个关于非存在的意见吗？

Impossible.

格：不可能。

He who has an opinion has an opinion about some one thing?

苏：持有意见者是持有对某一事物的意见吗？

Yes.

格：是的。

And not-being is not one thing but, properly speaking, nothing?

苏：非存在不是一种事物，准确地说，便是“无”。

True.

格：对。

Of not-being, ignorance was assumed to be the necessary correlative; of being, knowledge?

苏：我们假设，非存在对应的相关物必然是无知；存在对应的相关物必然是知识，对吗？

True, he said.

格：对。

Then opinion is not concerned either with being or with not-being?

苏：意见与存在或非存在均无关吗？

Not with either.

格：均无关。

And can therefore neither be ignorance nor knowledge?

苏：因此，可否既非无知，又非有知识呢？

That seems to be true.

格：似乎可以。

But is opinion to be sought without and beyond either of them,

in a greater clearness than knowledge, or in a greater darkness than ignorance?

苏：但是，要在二者之外，即比知识更为清晰之处，或者比无知更为黑暗之处，寻求意见吗？

In neither.

格：均不可。

Then I suppose that opinion appears to you to be darker than knowledge, but lighter than ignorance?

苏：那么，我猜想，你是否认为意见比知识模糊，比无知清晰呢？

Both; and in no small degree.

格：完全正确，而且绝非是微小程度上的较前者模糊，较后者清晰。

And also to be within and between them?

苏：那么，也是介乎二者之间吗？

Yes.

格：是的。

Then you would infer that opinion is intermediate?

苏：那么，你会表明，意见介于二者之间吗？

No question.

格：没问题。

But were we not saying before, that if anything appeared to be of a sort which is and is not at the same time, that sort of thing would appear also to lie in the interval between pure being and absolute not-being; and that the corresponding faculty is neither knowledge nor ignorance, but will be found in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m?

苏：但是，我们之前说过，如果任何事物既存在，也不存在，那么该事物也似乎应该介于绝对存在与绝对非存在之间；其相应的能力既非知识，亦非无知，而是介于二者之间，难道不对吗？

True.

格：对。

And in that interval there has now been discovered something which we call opinion?

苏：在二者之间，我们已发现某种称为意见的事物了吗？

There has.

格：是的。

Then what remains to be discovered is the object which partakes equally of the nature of being and not-being, and cannot rightly be termed either, pure and simple; this unknown term, when discovered, we may truly call the subject of opinion, and assign each to their proper faculty,—the extremes to the faculties of the extremes and the mean to the faculty of the mean.

苏：然后，我们要找到兼具存在与非存在本质的事物，该事物不可以，也不适合于被简单地称作存在或非存在；该未知术语一旦为人们所发现，我们便可以很合理地将之称为意见的对象，使每一项与各自的能力一一对应：两个极端分别对应两个极端的能力，中间者对应

中间者的能力。

True.

格：对。

This being premised, I would ask the gentleman who is of opinion that there is no absolute or unchangeable idea of beauty—in whose opinion the beautiful is the manifold—he, I say, your lover of beautiful sights, who cannot bear to be told that the beautiful is one, and the just is one, or that anything is one—to him I would appeal, saying, Will you be so very kind, sir, as to tell us whether, of all these beautiful things, there is one which will not be found ugly; or of the just, which will not be found unjust; or of the holy, which will not also be unholy?

苏：以此为前提，我要问问那位对于存在美本身或者永恒美的理式有异议的先生。他，便是你说过的喜欢美景之人。他认为，美是多种多样的。因而，他无法接受，美是唯一的，正义是唯一的，乃至任何事物都是唯一的。我将恳请他回答：先生，可否拜托您告诉我们，在所有美的事物中，是否存在一个永远不会变丑陋的事物？在所有正义的事物中，是否存在一个永远不会变非正义的事物；在所有圣洁的事物中，是否存在一个永远不会变邪恶的事物？

No, he replied; the beautiful will in some point of view be found ugly; and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rest.

格：不存在。从某个角度上看，美的事物会被认为是丑陋的。其他事物，亦是如此。

And may not the many which are doubles be also halves?—doubles, that is, of one thing, and halves of another?

苏：难道许多事物是成倍的，同时又是半数的吗？或者是甲物的倍数，又是乙物的半数，不对吗？

Quite true.

格：完全正确。

And things great and small, heavy and light, as they are termed, will not be denoted by these any more than by the opposite names?

苏：事物有大小、轻重。虽然我们如此称呼它们，但是这些称谓并不比相反的称谓更能表明它们的性质，对吗？

True; both these and the opposite names will always attach to all of them.

格：对。这些称谓以及相反的称谓，都将永远伴随着所有事物。

And can any one of those many things which are called by particular names be said to be this rather than not to be this?

苏：诸多有着特定称谓的事物中的任何一个，可否被说成是这个，而决不是那个？

He replied: They are like the punning riddles which are asked at feasts or the children's puzzle about the eunuch aiming at the bat, with what he hit him, as they say in the puzzle, and upon what the bat was sitting. The individual objects of which I am speaking are also a riddle, and have a double sense: nor can you fix them in your mind, either as being or not-being, or both, or neither.

格：它们就好像宴会上说的双关语，或者孩子们关于阉人瞄准蝙蝠的谜语——谜题中说，他用什么打了蝙蝠，而它当时正停落在什么上面。我所说的单个对象也是一个谜题，具有双重意义：你无法在头脑中确定它们是存在，还是非存在，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抑或两者之一。

Then what will you do with them? I said. Can they have a better place than between being and not-being? For they are clearly not in greater darkness or negation than not-being, or more full of light and existence than being.

苏：那么，你将如何对待它们呢？它们可否有一个比介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更好的所在呢？显然，它们不会处于更幽暗之地，比非存

在更为虚无；也不会处于更明亮之地，比存在更实在。

That is quite true, he said.

格：确实如此。

Thus then we seem to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many ideas which the multitude entertain about the beautiful and about all other things are tossing about in some region which is half-way between pure being and pure not-being?

苏：由此，我们似乎已经发现，众人对美以及所有其他事物的许多看法，皆盘旋于绝对存在与绝对非存在之间，对吗？

We have.

格：的确。

Yes; and we had before agreed that anything of this kind which we might find was to be described as matter of opinion, and not as matter of knowledge; being the intermediate flux which is caught and detained by the intermediate faculty.

苏：对。我们之前已达成共识，我们可能找到的任何这类事物，

都将被称作意见的对象，而不是知识的对象；介于中间的不确定物质当为中间性的能力所羁绊。

Quite true.

格：的确如此。

Then those who see the many beautiful, and who yet neither see absolute beauty, nor can follow any guide who points the way thither; who see the many just, and not absolute justice, and the like,—such persons may be said to have opinion but not knowledge?

苏：那么，那些看见诸多美的事物之人，不但自己无法看到美本身，而且在经人指点之后仍无法发现美本身；那些看见诸多正义事物之人，不但自己不能看到正义本身，而且在经人指点后仍无法发现正义本身，可以说，如此之人只能拥有意见，却不会拥有知识，对吗？

That is certain.

格：必然如此。

But those who see the absolute and eternal and immutable may be said to know, and not to have opinion only?

苏：相反，可以说，那些看见绝对而永恒不变事物之人，具有知识，而不是仅具备意见而已，对吗？

Neither can that be denied.

格：同样，不可否认。

The one loves and embraces the subjects of knowledge, the other those of opinion? The latter are the same, as I dare say you will remember, who listened to sweet sounds and gazed upon fair colours, but would not tolerate the existence of absolute beauty.

苏：热爱并侍奉人民的人拥有知识，而其他人则只拥有意见，对吗？我敢说你还记得，后者便是那些听悦耳之音，观悦目之色，却无法容忍美本身之存在的人。

Yes, I remember.

格：是的，我记得。

Shall we then be guilty of any impropriety in calling them lovers of opinion rather than lovers of wisdom, and will they be very angry with us for thus describing them?

苏：我们会因称后者为爱意见者而非爱知识者，而自责用词不当吗？他们会因被我们如此称呼而愤愤不已吗？

I shall tell them not to be angry; no man should be angry at what is true.

格：我将劝说他们不必介怀；任何人都不应该对真理耿耿于怀。

But those who love the truth in each thing are to be called lovers of wisdom and not lovers of opinion.

苏：相反，那些热爱每一种事物内在真理的人，应该被称作爱知识者而非爱意见者。

Assuredly.

格：必然如此。

BOOK VI.

第六卷

SOCRATES—GLAUCON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格劳孔

And thus, Glaucon, after the argument has gone a weary way, the true and the false philosophers have at length appeared in view.

苏：好了，格劳孔，经过这番颇费周折的讨论，我们终于看清了真伪哲学家。

I do not think, he said, that the way could have been shortened.

格：在我看来，并无捷径可走。

I suppose not, I said; and yet I believe that we might have had a better view of both of them if the discussion could have been confined to this one subject and if there were not many other questions awaiting us, which he who desires to see in what respect the life of the just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unjust must consider.

苏：对此，我有同感。此外，我认为，如果我们专心探讨这一话题，便可对真伪哲学家形成更明晰的认识，但是目前还有诸多其他问题等待着我们，这些问题是希望了解正义者与非正义者生活有何差异之人所必须思考的。

And what is the next question? he asked.

格：那么，下面我们要探讨什么问题呢？

Surely, I said, the one which follows next in order. Inasmuch as philosophers only are able to grasp the eternal and unchangeable, and those who wander in the region of the many and variable are not philosophers, I must ask you which of the two classes should be the rulers of our State?

苏：当然要按照顺序来。既然唯独哲学家们能够参透恒久不变之事物，那些在纷繁变化的领域中徘徊之人则并非哲学家。我必须问你，此两类人中，谁应当成为我们城邦的统治者？

And how can we rightly answer that question?

格：我们该如何正确地回答呢？

Whichever of the two are best able to guard the laws and

institutions of our State—let them be our guardians.

苏：此二者中，善于守卫我们城邦的法律和制度者，即可成为我们城邦的守卫者。

Very good.

格：很好。

Neither, I said, can there be any question that the guardian who is to keep anything should have eyes rather than no eyes?

苏：同时毫无疑问，担任守护职责的守卫者，应视力健全，而不可双目失明，对吗？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of that.

格：这是毋庸置疑的。

And are not those who are verily and indeed wanting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e being of each thing, and who have in their souls no clear pattern, and are unable as with a painter's eye to look at the absolute truth and to that original to repair, and having perfect vision of the other world to order the laws about beauty,

goodness, justice in this, if not already ordered, and to guard and preserve the order of them—are not such persons, I ask, simply blind?

苏：有些人的确缺乏对万物本质的认识，内心中没有任何清晰的图案，无法像画家那样洞察绝对真理，依照绝对真理对现实进行改造加工，运用对另一世界的美好想象来为当世的美、善和正义立法（如果当世还不存在如此法律的话），并且加以守护和维持。那么，我的问题是，如此之辈难道不是纯粹的盲人吗？

Truly, he replied, they are much in that condition.

格：的确，他们近似于那种情形。

And shall they be our guardians when there are others who, besides being their equals in experience and falling short of them in no particular of virtue, also know the very truth of each thing?

苏：如果尚有他人经验阅历与之不分上下，品行修养亦毫不逊色，同时还洞悉世间万物的真谛，那么他们还能成为我们城邦的守卫者吗？

There can be no reason, he said, for rejecting those who have this greatest of all great qualities; they must always have the first place unless they fail in some other respect.

格：不会存在任何理由来拒绝这些具备所有优点中最大优点的人；除非他们在别的方面有所缺欠，否则他们必定永远是最佳人选。

Suppose then, I said, that we determine how far they can unite this and the other excellences.

苏：那么，我们来看看，他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将此种优点以及其他长处集于一身？

By all means.

格：务必如此。

In the first place, as we began by observing, the nature of the philosopher has to be ascertained. We must come to an understanding about him, and, when we have done so, then, if I am not mistaken, we shall also acknowledge that such an union of qualities is possible, and that those in whom they are united, and those only, should be rulers in the State.

苏：首先，在我们对此问题进行观照之初，必须要明确哲学家的天性。我们必须对他形成一致的看法。然后，如果我说得没错，我们还将承认——集众长为一身，并非是不可能的；兼具众长之人，且唯有此等之人，方可成为国家的治理者。

What do you mean?

格：此话怎讲？

Let us suppose that philosophical minds always love knowledge of a sort which shows them the eternal nature not varying from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

苏：我们姑且认为，哲学家们向来所喜爱的知识，向他们展示不受兴衰变迁影响的永恒本性。

Agreed.

格：同意。

And further, I said, let us agree that they are lovers of all true being; there is no part whether greater or less, or more or less honourable, which they are willing to renounce; as we said before of the lover and the man of ambition.

苏：另外，我们姑且认同哲学家们喜欢一切的真实存在；无论事物大小尊卑，他们皆不忍放弃，正如我们之前面所说的爱好者和爱荣誉者。

True.

格：对。

And if they are to be what we were describing, is there not another quality which they should also possess?

苏：如果他们要成为我们所描述之人，他们难道不应再拥有另一种品质吗？

What quality?

格：何种品质？

Truthfulness: they will never intentionally receive into their mind falsehood, which is their detestation, and they will love the truth.

苏：诚实。他们决不会有目的地将虚伪纳入自己的思想。他们厌恶虚伪，热爱真理。

Yes, that may be safely affirmed of them.

格：是的，他们或许如此。

'May be,' my friend, I replied, is not the word; say rather 'must be affirmed:' for he whose nature is amorous of anything cannot help loving all that belongs or is akin to the object of his affections.

苏：我的朋友，“或许”是不准确的，要说“绝对如此”，因为一个人天性喜欢什么，他便会情不自禁地喜欢那些与此喜好相同或相近的事物。

Right, he said.

格：对。

And is there anything more akin to wisdom than truth?

苏：那么，存在比知识更接近真理的事物吗？

How can there be?

格：怎么可能存在？

Can the same nature be a lover of wisdom and a lover of

falsehood?

苏：一个人会同时喜欢知识与虚伪吗？

Never.

格：绝对不会。

The true lover of learning then must from his earliest youth, as far as in him lies, desire all truth?

苏：那么，真正热爱知识的人，必定是自幼内心中就存有对一切真理的渴望，是吗？

Assuredly.

格：必定如此。

But then again, as we know by experience, he whose desires are strong in one direction will have them weaker in others; they will be like a stream which has been drawn off into another channel.

苏：其次，根据经验，我们知道，他在一方面欲望强烈，在其他方面欲望便会比较弱，正如河水被引入到了另一条河道。

True.

格：对。

He whose desires are drawn towards knowledge in every form will be absorbed in the pleasures of the soul, and will hardly feel bodily pleasure—I mean, if he be a true philosopher and not a sham one.

苏：一个追求广博知识的人，会沉浸在心灵的愉悦中，而很少在意肉体的快乐——我指的是真正的哲学家，而非有名无实者。

That is most certain.

格：这是千真万确的。

Such an one is sure to be temperate and the reverse of covetous; for the motives which make another man desirous of having and spending, have no place in his character.

苏：此人必定洁身自好，绝不贪婪，因为使得他人贪婪和挥霍的

动机于此人的天性中根本难觅踪影。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nother criter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nature has also to be considered.

苏：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到鉴别哲学家天性的另一标准。

What is that?

格：什么标准？

There should be no secret corner of illiberality; nothing can be more antagonistic than meanness to a soul which is ever longing after the whole of things both divine and human.

苏：不可有狭隘私心。在神与人的事物上追求完整的灵魂，与器量狭小最不相容。

Most true, he replied.

格：千真万确。

Then how can he who has magnificence of mind and is the spectator of all time and all existence, think much of human life?

苏：一个心胸开阔，博古通今，阅尽万物的人又怎会贪恋尘世间的生活呢？

He cannot.

格：他不会的。

Or can such an one account death fearful?

苏：换言之，如此之人会贪生怕死吗？

No indeed.

格：断然不会。

Then the cowardly and mean nature has no part in true philosophy?

苏：那么，在真正的哲学领域，决没有胆小懦弱且胸襟狭窄之人，是吗？

Certainly not.

格：当然没有。

Or again: can he who is harmoniously constituted, who is not covetous or mean, or a boaster, or a coward—can he, I say, ever be unjust or hard in his dealings?

苏：抑或一个人心智健康，既不贪婪也不狭隘，既不吹嘘也不怯懦，那么他会处事不公或冷酷残暴吗？

Impossible.

格：不可能。

Then you will soon observe whether a man is just and gentle, or rude and unsociable; these are the signs which distinguish even in youth the philosophical nature from the unphilosophical.

苏：那么，你将很快断定一个人是正义、温和之人，抑或是粗

鲁、难交往之人；纵使我们处于青年时期，亦可以凭此类特征辨明真假哲学。

True.

格：对。

There is another point which should be remarked.

苏：还有一点需要说明。

What point?

格：什么？

Whether he has or has not a pleasure in learning; for no one will love that which gives him pain, and in which after much toil he makes little progress.

苏：此人是否乐于学习——没有人会喜欢给自己带来痛苦且劳而无功的事情。

Certainly not.

格：当然不会喜欢。

And again, if he is forgetful and retains nothing of what he learns, will he not be an empty vessel?

苏：此外，如果一个人健忘，所学知识消失殆尽，他岂不是头脑空空？

That is certain.

格：当然如此。

Labouring in vain, he must end in hating himself and his fruitless occupation?

苏：劳而无功之人，最终必将怨恨自身以及这个一无所获的职业，是吗？

Yes.

格：是的。

Then a soul which forgets cannot be ranked among genuine philosophic natures; we must insist that the philosopher should have a good memory?

苏：因此，健忘之人不能被归入真正哲学家的行列；我们坚信哲学家应该拥有良好的记忆力，对吗？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once more, the inharmonious and unseemly nature can only tend to disproportion?

苏：再者，内心不和谐、举止不得体之人，必定会有失偏颇，是吗？

Undoubtedly.

格：毫无疑问。

And do you consider truth to be akin to proportion or to disproportion?

苏：那么，你认为，真理倾向于公允抑或偏颇呢？

To proportion.

格：倾向于公允。

Then, besides other qualities, we must try to find a naturally well-proportioned and gracious mind, which will move spontaneously towards the true being of everything.

苏：那么，除了其他品质，我们必须找到生性公允且思想高尚、自觉追寻万物真实存在的人。

Certainly.

格：当然。

Well, and do not all these qualities, which we have been enumerating, go together, and are they not, in a manner, necessary to a soul, which is to have a full and perfect participation of being?

苏：我们刚刚所列举的这些品质难道不是相互关联的吗？难道某种程度上它们不是以完全而充分把握存在为目的之人所必须具备的吗？

They are absolutely necessary, he replied.

格：绝对是必需的。

And must not that be a blameless study which he only can pursue who has the gift of a good memory, and is quick to learn,—noble, gracious, the friend of truth, justice, courage, temperance, who are his kindred?

苏：如果此类记性上佳、思维敏捷、思想高尚、温文尔雅、崇尚真理、公正、勇敢、洁身自好之人从事哲学研究，这难道还有什么可指摘的吗？

The god of jealousy himself, he said, could find no fault with such a study.

格：纵使是嫉妒之神，亦无法从中找出任何毛病。

And to men like him, I said, when perfected by years and education, and to these only you will entrust the State.

苏：如此之人一旦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教育的塑造会愈加完美，你也会仅仅愿意将城邦托付给他们。

SOCRATES-ADEIMANTUS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阿得曼托斯

Here Adeimantus interposed and said: To these statements, Socrates, no one can offer a reply; but when you talk in this way, a strange feeling passes over the minds of your hearers: They fancy that they are led astray a little at each step in the argument, owing to their own want of skill in asking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these littles accumulate, and at the end of the discussion they are found to have sustained a mighty overthrow and all their former notions appear to be turned upside down. And as unskilful players of draughts are at last shut up by their more skilful adversaries and have no piece to move, so they too find themselves shut up at last; for they have nothing to say in this new game of which words are the counters; and yet all the time they are in the right. The observation is suggested to me by what is now occurring. For any one of us might say, that although in words he is not able to meet you at each step of the argument, he sees as a fact that the votaries of philosophy, when they carry on the study, not only in youth as a part of education, but as the pursuit of their maturer years, most of them become strange monsters, not to say utter rogues, and that those who may be considered the best of them are made useless to the world by the very study which you extol.

这时，阿得曼托斯插话说道：苏格拉底，对于你的这些话，我们无法做出回答。但你如此的说话方式，令你的听众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他们认为，由于他们自己缺乏问与答的技巧，因而在论辩中总是一步步地受你误导而一点点偏离主题；这一点点积少成多，以致待论

辩结束之时才发觉自己已经遭遇强势颠覆，之前的观念似乎也被彻底颠倒过来。正如下棋时棋艺不精者被棋艺较好的对手最终困住而无子可走，你的这些听众最后也被困住了。在这场以言词为筹码的游戏中，他们无话可说，然而他们始终是正确的。我的这番议论是在此情此景之下有感而发的。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可能说，虽然他无法在论辩的每一环节都给予你语言上的反击，但是他看到的事实是，在那些年轻时接受哲学教育并且在成年后以之为职业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成了怪人（虽说不上是十足的无赖）。他们中可以称得上是佼佼者的，则正是因为你所称颂的哲学而成为对社会毫无用处之人。

Well, and do you think that those who say so are wrong?

苏：那么，在你看来，那些持如此说法之人是错误的吗？

I cannot tell, he replied; but I should like to know what is your opinion.

阿：我不清楚，但是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Hear my answer; I am of opinion that they are quite right.

苏：听我说，我认为，他们完全正确。

Then how can you be justified in saying that cities will not cease from evil until philosophers rule in them, when philosophers

are acknowledged by us to be of no use to them?

阿：既然我们承认哲学家对城邦毫无用处，那你为何说，只有哲学家治理城邦，城邦才会终止不幸呢？

You ask a question, I said, to which a reply can only be given in a parable.

苏：你提出了一个我只能用打比方来回答的问题。

Yes, Socrates; and that is a way of speaking to which you are not at all accustomed, I suppose.

阿：可以，苏格拉底。我猜想，这并非你惯用的讲话方式吧。

I perceive, I said, that you are vastly amused at having plunged me into such a hopeless discussion; but now hear the parable, and then you will be still more amused at the meagreness of my imagination: for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best men are treated in their own States is so grievous that no single thing on earth is comparable to it; and therefore, if I am to plead their cause, I must have recourse to fiction, and put together a figure made up of many things, like the fabulous unions of goats and stags which are found in pictures. Imagine then a fleet or a ship in which there is a captain who is taller and stronger than any of the crew, but he is a little deaf and has a similar infirmity in sight, and his knowledge of

navigation is not much better. The sailors are quarrelling with one another about the steering—every one is of opinion that he has a right to steer, though he has never learned the art of navigation and cannot tell who taught him or when he learned, and will further assert that it cannot be taught, and they are ready to cut in pieces any one who says the contrary. They throng about the captain, begging and praying him to commit the helm to them; and if at any time they do not prevail, but others are preferred to them, they kill the others or throw them overboard, and having first chained up the noble captain's senses with drink or some narcotic drug, they mutiny and take possession of the ship and make free with the stores; thus, eating and drinking, they proceed on their voyage in such manner as might be expected of them. Him who is their partisan and cleverly aids them in their plot for getting the ship out of the captain's hands into their own whether by force or persuasion, they compliment with the name of sailor, pilot, able seaman, and abuse the other sort of man, whom they call a good-for-nothing; but that the true pilot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year and seasons and sky and stars and winds, and whatever else belongs to his art, if he intends to be really qualified for the command of a ship, and that he must and will be the steerer, whether other people like or not—the possibility of this union of authority with the steerer's art has never seriously entered into their thoughts or been made part of their calling. Now in vessels which are in a state of mutiny and by sailors who are mutineers, how will the true pilot be regarded? Will he not be called by them a prater, a star-gazer, a good-for-nothing?

苏：我感觉，你看到我陷入无望的论辩而无比开心，但现在听听我这个故事，这样我贫乏的想象力会逗得你更为开心：最优秀的人士在自己城邦所受到的痛苦待遇，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因

此我若要为他们鸣冤辩屈，则务必要借助于虚构，然后拼凑出一个由诸多事物组成的形象，就好比在图画中看到的由山羊和雄鹿构成的可笑组合体。假设有一支船队或一艘轮船，其船长比其他船员都更高大强壮，但是此人有些耳聋、眼花，而且他的航海知识亦不比他人强多少。水手们就掌舵事宜相互争吵不休，虽然这些人从未学过航海而且也说不出何时、跟何人学过航海术，但他们都认为应该由自己来掌舵，同时他们还进一步断言，航海术是无法教会的，并准备将任何反对他们的人碎尸万段。他们围住船长，恳求船长让他们来掌舵；如果在任何时候他们没有获胜，而有其他人更受青睐，他们便会杀掉那些人并将尸体丢入水中。他们先用酒精或麻药麻痹尊贵的船长的意识，继而发动叛乱将船据为己有，接着任意挥霍船上的库存。于是，他们吃吃喝喝，按照我们可以料想的那样以他们的方式继续航行。凡是在夺船阴谋中巧妙地帮助他们——或以武力相逼或出言相劝——从船长手中夺得指挥权的人，他们都称誉为水手、舵手、一级水手，而对其他人则加以谩骂，称之为废物。然而，名副其实的舵手，若想成为真正胜任的船长，他必须要留意年份、季节、天空、星辰和风向，以及一切与其技艺相关的因素，而且无论别人喜欢与否，他都必然会行使舵手之责。而这些夺权者既未认真想过，也未尝试过将权利与舵手的技艺结合，并使之成为自己职责一部分的可能性。在发生叛乱的船上，靠叛乱起家的水手们，会如何看待真正的舵手呢？他们难道不会称呼他为唠叨鬼、占星者或废物吗？

Of course, said Adeimantus.

阿：当然。

Then you will hardly need, I said, to hea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gure, which describes the true philosopher in his relation to the State; for you understand already.

苏：那么，你不用再听对这个故事的解释了吧。你已经清楚，该故事所描述的便是真正的哲学家与城邦之间的关系。

Certainly.

阿：当然。

Then suppose you now take this parable to the gentleman who is surprised at finding that philosophers have no honour in their cities; explain it to him and try to convince him that their having honour would be far more extraordinary.

苏：那么，假设现在有位先生对哲学家在城邦中不受重视而感到惊讶，你且将这个故事说给他听，并且告诉他哲学家受尊重才是更奇怪的呢。

I will.

阿：我会的。

Say to him, that, in deeming the best votaries of philosophy to be useles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he is right; but also tell him to attribute their uselessness to the fault of those who will not use them, and not to themselves. The pilot should not humbly beg the

sailors to be commanded by him—that is not the order of nature; neither are 'the wise to go to the doors of the rich'—the ingenious author of this saying told a lie—but the truth is, that, when a man is ill, whether he be rich or poor, to the physician he must go, and he who wants to be governed, to him who is able to govern. The ruler who is good for anything ought not to beg his subjects to be ruled by him; although the present governors of mankind are of a different stamp; they may be justly compared to the mutinous sailors, and the true helmsmen to those who are called by them good-for-nothings and star-gazers.

苏：告诉他，认为最优秀的哲学家对世人毫无用处，是正确的；但还要告诉他，哲学家之所以变成无用之人，是那些不重用哲学家的人们的错误，而非哲学家自身之错。舵手没有必要央求水手们接受自己的指挥，这不合常理；“智者亦不会去敲富人的门”——发表如此言论者颇有才华，却没有说真话——但事实上，一旦有人生病，不论穷富，他都必须求医；如果有人需要治理者，他必须登门拜访有治理之才者。任何有治理之才者，均不该央求其统治对象接受自己的管理；但是，如今人类的统治者却具有一种不同的性质，他们就好比叛乱的水手们，而真正的舵手却是那些被他们称为废物或占星者的人。

Precisely so, he said.

阿：正是如此。

For these reasons, and among men like these, philosophy, the noblest pursuit of all, is not likely to be much esteemed by those of the opposite faction; not that the greatest and most lasting injury is

done to her by her opponents, but by her own professing followers, the same of whom you suppose the accuser to say, that the greater number of them are arrant rogues, and the best are useless; in which opinion I agreed.

苏：因此，在这些人当中，哲学这门至为高尚的学科，却不可能受到反对者的尊重；然而对该学科造成最大、最持久伤害的，并非其反对者，而是自称从事哲学之人。可想而知，指责者所说的，正是这些人：他们中大多为十足的无赖，最优秀者也毫无建树。对此，我也承认。

Yes.

阿：是的。

And the reason why the good are useless has now been explained?

苏：现在，优秀者之所以无用的原因，已经解释清楚了，对吗？

True.

阿：对。

Then shall we proceed to show that the corruption of the majority is also unavoidable, and that this is not to be laid to the charge of philosophy any more than the other?

苏：那么，我们继而要证明大多数哲学家之堕落亦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这种堕落也不能只归咎于哲学，好吗？

By all means.

阿：务必如此。

And let us ask and answer in turn, first going back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gentle and noble nature. Truth, as you will remember, was his leader, whom he followed always and in all things; failing in this, he was an impostor, and had no part or lot in true philosophy.

苏：我们采用轮流问答的方式，首先回到之前关于天性温和而高尚之人的讨论。你会记得，真理便是他的向导，他总要紧紧跟从，在一切事物上都不例外；做不到这一点，他便是冒牌货，与真正的哲学毫不相干。

Yes, that was said.

阿：是的，你的确说过。

Well, and is not this one quality, to mention no others, greatly at variance with present notions of him?

苏：那么，别的暂且不谈，这一品行不是与当前对哲学家的看法完全背道而驰吗？

Certainly, he said.

阿：当然。

And have we not a right to say in his defence, that the true lover of knowledge is always striving after being—that is his nature; he will not rest in the multiplicity of individuals which is an appearance only, but will go on—the keen edge will not be blunted, nor the force of his desire abate until he have attained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e nature of every essence by a sympathetic and kindred power in the soul, and by that power drawing near and mingling and becoming incorporate with very being, having begotten mind and truth, he will have knowledge and will live and grow truly, and then, and not till then, will he cease from his travail.

苏：我们难道无权为其辩护吗？真正热爱知识的人，总是不断为探索本质而努力——这便是他的天性；他不会停留在表面的个体多样性，而是执着前行——其锋芒不会变钝，求知欲望不会减弱，直至凭借灵魂中一种相似的、意气相投的力量，最终获得关于一切事物真实

本质的知识，并且通过该力量接近真实存在，与之混合交织，并结成一体，从而产生理性与真理。他将获得知识，真实地生活成长，也唯有此时他才会停止艰难求知之旅。

Nothing, he said, can be more just than such a description of him.

阿：如此评价他，再公正不过。

And will the love of a lie be any part of a philosopher's nature? Will he not utterly hate a lie?

苏：那么，哲学家会天性喜爱谎言吗？他会对谎言深恶痛绝吗？

He will.

阿：他会的。

And when truth is the captain, we cannot suspect any evil of the band which he leads?

苏：如果由真理来任领队，我们不会怀疑其队伍中有邪恶相随吧？

Impossible.

阿：绝不会。

Justice and health of mind will be of the company, and temperance will follow after?

苏：正义与健全的心智将会在队伍中，后面跟随着节制，对吗？

True, he replied.

阿：对。

Neither is there any reason why I should again set in array the philosopher's virtues, as you will doubtless remember that courage, magnificence, apprehension, memory, were his natural gifts. And you objected that, although no one could deny what I then said, still, if you leave words and look at facts, the persons who are thus described are some of them manifestly useless, and the greater number utterly depraved; we were then led to enquire into the grounds of these accusations, and have now arrived at the point of asking why are the majority bad, which question of necessity brought us back to the examin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true philosopher.

苏：想必你还记得，勇敢高尚、有悟性、记忆力佳，是哲学家所具有的天赋，我亦不必再一一列举他的美德了。你曾提出，虽然大家无法反驳我所说的话，但是一旦人们抛开言词而正视事实，那么在这些被如此形容的人中，有一些显然百无一用，更多的人则彻底地堕落了。于是，我们开始探讨造成此类批评的原因，目前我们已探讨到这样一点，提出为何大多数人都已堕落。这一问题必然让我们重新审视和定义真正的哲学家。

Exactly.

阿：正是。

And we have next to consider the corruptions of the philosophic nature, why so many are spoiled and so few escape spoiling—I am speaking of those who were said to be useless but not wicked—and, when we have done with them, we will speak of the imitators of philosophy, what manner of men are they who aspire after a profession which is above them and of which they are unworthy, and then, by their manifold inconsistencies, bring upon philosophy, and upon all philosophers, that universal reprobation of which we speak.

苏：那么，下面我们务必要探讨哲学家天性的堕落，弄清何以有如此多的哲学家们堕落，而仅有极少数得以幸免（这里我指的是，那些被说成百无一用而并不邪恶之人）。一旦我们弄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说一说那些伪哲学家们，他们如何妄图从事一种超乎自己能力、亦无资格从事的职业，再以各种各样与该职业不协调的行为，导致哲学，以及所有的哲学家，受到普遍的排斥。

What are these corruptions? he said.

阿：其堕落行为，指的是什么呢？

I will see if I can explain them to you. Every one will admit that a nature having in perfection all the qualities which we required in a philosopher, is a rare plant which is seldom seen among men.

苏：我试试看可否将此解释清楚。每个人都将承认，完善具备哲学家所应拥有的一切品质之人，纯属稀有物种，非常少见。

Rare indeed.

阿：的确少见。

And what numberless and powerful causes tend to destroy these rare natures!

苏：同时，倾向于毁掉这些稀有之人的因素，数量多么庞大，力量多么强大啊！

What causes?

阿：哪些因素呢？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are their own virtues, their courage, temperance, and the rest of them, every one of which praiseworthy qualities (and this is a most singular circumstance) destroys and distracts from philosophy the soul which is the possessor of them.

苏：首先，是他们自身的美德——勇气、节制，以及所有其他值得称道的品质（这是很奇怪的情况）侵蚀它们所属的灵魂，使之远离哲学。

That is very singular, he replied.

阿：这太奇怪了。

Then there are all the ordinary goods of life—beauty, wealth, strength, rank, and great connections in the State—you understand the sort of things—these also have a corrupting and distracting effect.

苏：继而便是生活中一切寻常的有益事物（美貌、财富、体力、地位，以及与城邦达官显贵的亲属关系）——你是知道这一类事物的，它们同样具有腐蚀和干扰作用。

I understand; but I should like to know more precisely what you mean about them.

阿：我明白，但我还是希望更为确切地了解你话中的涵义。

Grasp the truth as a whole, I said, and in the right way; you will then have no difficulty in apprehending the preceding remarks, and they will no longer appear strange to you.

苏：采用正确的方式从整体上把握真理，你便会毫无困难地理解前面讲过的话，那些话米听起来也不会感到很奇怪了。

And how am I to do so? he asked.

阿：我将如何做到呢？

Why, I said, we know that all germs or seeds, whether vegetable or animal, when they fail to meet with proper nutriment or climate or soil, in proportion to their vigour, are all the more sensitive to the want of a suitable environment, for evil is a greater enemy to what is good than to what is not.

苏：哦，我们知道，所有的胚芽或种子，不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在不能得到适当的养分、气候或土壤时，其生命力越旺盛，就越容易因缺乏适宜生长环境而受到影响，因为恶对好事物的危害要大于对不

好事物的危害。

Very true.

阿：的确如此。

There is reason in supposing that the finest natures, when under alien conditions, receive more injury than the inferior, because the contrast is greater.

苏：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适当的环境下，最优秀之人比较差之人受到更多的伤害，因为其反差也更大。

Certainly.

阿：当然。

And may we not say, Adeimantus, that the most gifted minds, when they are ill-educated, become pre-eminently bad? Do not great crimes and the spirit of pure evil spring out of a fulness of nature ruined by education rather than from any inferiority, whereas weak natures are scarcely capable of any very great good or very great evil?

苏：那么，阿得曼托斯，我们难道不能说，那些最有才华的人，一旦受到不良教育，会变得奇坏无比吗？滔天罪行和至恶的灵魂，源于那些充满天赋却毁于教育之人，而并非源于天性愚钝之人；无能之辈，既难以成就大善，亦难以铸成大恶，难道不是吗？

There I think that you are right.

阿：我想，你是对的。

And our philosopher follows the same analogy—he is like a plant which, having proper nurture, must necessarily grow and mature into all virtue, but, if sown and planted in an alien soil, becomes the most noxious of all weeds, unless he be preserved by some divine power. Do you really think, as people so often say, that our youth are corrupted by Sophists, or that private teachers of the art corrupt them in any degree worth speaking of? Are not the public who say these things the greatest of all Sophists? And do they not educate to perfection young and old, men and women alike, and fashion them after their own hearts?

苏：我们的哲学家亦可如此类推——他如同一株植物，若受到适当的培养，便必定会长大成熟，具备一切美德，可是一旦被播种到了一片并不适合的土地上，除非有神力助佑，否则它便会长成最惹人厌恶的东西了。你真的以为，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年轻人受到诡辩家的腐蚀，抑或教授诡辩术的私人教师在任何值得一提的程度上腐蚀年轻人吗？说这些话的人们，难道不是最大的诡辩家吗？难道他们并没有力求完美地教育男女老少，并按自己的心愿对之进行塑造吗？

When is this accomplished? he said.

阿：何时做到这一点的呢？

When they meet together, and the world sits down at an assembly, or in a court of law, or a theatre, or a camp, or in any other popular resort, and there is a great uproar, and they praise some things which are being said or done, and blame other things, equally exaggerating both, shouting and clapping their hands, and the echo of the rocks and the place in which they are assembled redoubles the sound of the praise or blame—at such a time will not a young man's heart, as they say, leap within him? Will any private training enable him to stand firm against the overwhelming flood of popular opinion? or will he be carried away by the stream? Will he not have the notions of good and evil which the public in general have—he will do as they do, and as they are, such will he be?

苏：当他们齐集一处，众人落座，或是在会场开会，或是出庭听取审判，或是在剧场看戏，或是在宿营地过军旅生活，或是在任何其他公共场所参加活动，那里大声响起一阵鼓噪，他们赞美一些当时的言行，又指责另一些言行，无不言过其实，高声喊叫，热烈鼓掌，在其所聚集之地的石壁巨岩间回荡着，使得赞美和指责之声更加地响亮。此时此刻，如他们所说，年轻人的心难道不会在胸中狂跳吗？是否会有任何私人训练可以使他们面对铺天盖地的舆论大潮而岿然不动呢？抑或他将随波逐流吗？难道他不会持有与广大民众相同的善恶观念——像他们一样行事，像他们一样做人吗？

Yes, Socrates; necessity will compel him.

阿：是的，苏格拉底，他也是迫不得已。

And yet, I said, there is a still greater necessity, which has not been mentioned.

苏：那么，更有甚者，我尚未提及。

What is that?

阿：它是什么？

The gentle force of attainder or confiscation or death, which, as you are aware, these new Sophists and educators, who are the public, apply when their words are powerless.

苏：正如你所知道的，这些公众的新诡辩家兼教育家，一旦其言论发挥不了威力，便会使用诸如剥夺公民权，没收财产或死刑等刑罚。

Indeed they do; and in right good earnest.

阿：他们的确如此，而且还一本正经。

Now what opinion of any other Sophist, or of any private person, can be expected to overcome in such an unequal contest?

苏：在如此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抗中，其他诡辩家或个人的何种观点会有希望胜出呢？

None, he replied.

阿：没有任何观点。

No, indeed, I said, even to make the attempt is a great piece of folly; there neither is, nor has been, nor is ever likely to be, any different type of character which has had no other training in virtue but that which is supplied by public opinion—I speak, my friend, of human virtue only; what is more than human, as the proverb says, is not included: for I would not have you ignorant that, in the present evil state of governments, whatever is saved and comes to good is saved by the power of God, as we may truly say.

苏：确实没有，即使做出如此尝试，也是愚蠢之举。我的朋友，现在没有，以前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人类善的品格是不经过善的训练而单单从舆论中产生的。（俗话所说的超人类的力量不包括在内。）我希望你不要忘了，如我们所说，如果此时这座管理不善的城邦中有什么东西被救赎或获善报，那都得益于神的力量。

I quite assent, he replied.

阿：我十分赞同。

Then let me crave your assent also to a further observation.

苏：那么，我希望你也会赞同我下面的观点。

What are you going to say?

阿：你要说什么？

Why, that all those mercenary individuals, whom the many call Sophists and whom they deem to be their adversaries, do, in fact, teach nothing but the opinion of the many, that is to say, the opinions of their assemblies; and this is their wisdom. I might compare them to a man who should study the tempers and desires of a mighty strong beast who is fed by him—he would learn how to approach and handle him, also at what times and from what causes he is dangerous or the reverse, and what is the meaning of his several cries, and by what sounds, when another utters them, he is soothed or infuriated; and you may suppose further, that when, by continually attending upon him, he has become perfect in all this, he calls his knowledge wisdom, and makes of it a system or art, which he proceeds to teach, although he has no real notion of what

he means by the principles or passions of which he is speaking, but calls this honorable and that dishonorable, or good or evil, or just or unjust, a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stes and tempers of the great brute. Good he pronounces to be that in which the beast delights and evil to be that which he dislikes; and he can give no other account of them except that the just and noble are the necessary, having never himself seen, and having no power of explaining to others the nature of either, 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which is immense. By heaven, would not such an one be a rare educator?

苏：哦，所有那些被公众称为诡辩家并被视为其反对者的唯利是图的个人，实际上只会教给人们一些大众的观点，换言之是他们从集会中听来的观点；这便是他们的智慧。我会将他们比作某个喂养一只猛兽并要对其性情和喜好加以研究的人。他要知道如何接近、如何应付这只野兽，也要知道何时、哪些因素会令其兽性大发或温顺无害，该猛兽不同的叫声代表着什么，外界的哪些声音会令其安静下来或变得烦躁。然后，通过对猛兽的毫不间断的照顾，他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便将其知识称为智慧，并使之形成体系或一门技艺，之后再传授给他人。尽管他根本不了解自己口中所说的准则或起作用的外界情况，但是他完全根据其猛兽的性情和喜好去评判荣誉与无耻，抑或善与恶，抑或正义与非正义。他断言，善便是猛兽所喜欢的，恶便是猛兽所厌恶的。对此，他除了说正义与高尚是必然以外，便再说不出所以然。但是，他从未曾亲见，亦无法向别人解释正义和必然的本质，抑或说出此本质截然不同的两种事物区别所在。天啊，如此之人，却为人师，难道不是很少见吗？

Indeed he would.

阿：的确少见。

And in what way does he who thinks that wisdom is the discernment of the tempers and tastes of the motley multitude, whether in painting or music, or, finally, in politics, differ from him whom I have been describing? For when a man consorts with the many, and exhibits to them his poem or other work of art or the service which he has done the State, making them his judges when he is not obliged, the so-called necessity of Diomede will oblige him to produce whatever they praise. And yet the reasons are utterly ludicrous which they give in confirmation of their own notions about the honourable and good. Did you ever hear any of them which were not?

苏：如果有人无论在美术、音乐还是最终在政治方面，都把辨别形形色色人群的性情和喜好当做智慧，那么他又与之前描述的养野兽者何异？因为一旦某个人迎合大众，向大众展示自己的诗歌、艺术作品或对城邦的贡献，在本无必要的情况下，却要让大众对自己作出评判，那么所谓的“迪俄墨得斯的必然”，便会迫使他为投大众之所好而创作。为了证明自己所理解的荣誉和善是对的，他们给出十分荒唐的解释。你可曾听到，他们给过什么并不荒唐的解释吗？

No, nor am I likely to hear.

阿：没听过，将来也不会听到。

You recognise the truth of what I have been saying? Then let me ask you to consider further whether the world will ever be induced to believe in the existence of absolute beauty rather than of

the many beautiful, or of the absolute in each kind rather than of the many in each kind?

苏：你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吗？那么请你再进一步想一想，可否使世人相信绝对美丽的存在，而不要去相信诸多美的事物，抑或相信每一种类别中的绝对事物，而不是每一类别中的诸多个体呢？

Certainly not.

阿：当然不可。

Then the world cannot possibly be a philosopher?

苏：那么世人不可能成为哲学家吗？

Impossible.

阿：不可能。

And therefore philosophers must inevitably fall under the censure of the world?

苏：那么哲学家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世人的责难吗？

They must.

阿：必然如此。

And of individuals who consort with the mob and seek to please them?

苏：亦会受到那些与民众为伍并极力讨好民众的个人责难吗？

That is evident.

阿：显而易见。

Then, do you see any way in which the philosopher can be preserved in his calling to the end? and remember what we were saying of him, that he was to have quickness and memory and courage and magnificence—these were admitted by us to be the true philosopher's gifts.

苏：那么你认为哲学家还能自始至终坚守自己的职责吗？还记得我们关于哲学家的看法吗？——他敏于领悟、博学强记，英勇无畏、气度恢宏——我们已经承认，这些便是真正的哲学家所具有的天赋。

Yes.

阿：记得。

Will not such an one from his early childhood be in all things first among all, especially if his bodily endowments are like his mental ones?

苏：如此之人难道不是自幼便凡事领先于他人（尤其是当他的身体素质和头脑一样出类拔萃）吗？

Certainly, he said.

阿：当然。

And his friends and fellow-citizens will want to use him as he gets older for their own purposes?

苏：他的朋友与城邦同胞会期望，让他长大成人后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人吗？

No question.

阿：毫无疑问。

Falling at his feet, they will make requests to him and do him honour and flatter him, because they want to get into their hands now, the power which he will one day possess.

苏：他们会拜倒于他的脚下，恳求他，向他表达敬意，殷勤取悦于他，因为他们想有朝一日能获得他现在拥有的权利。

That often happens, he said.

阿：此类事情屡见不鲜。

And what will a man such as he is be likely to do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especially if he be a citizen of a great city, rich and noble, and a tall proper youth? Will he not be full of boundless aspirations, and fancy himself able to manage the affairs of Hellenes and of barbarians, and having got such notions into his head will he not dilate and elevate himself in the fulness of vain pomp and senseless pride?

苏：在此情形之下，尤其当一个人生于强大的城邦，富有而高贵，年轻力壮，高大英俊，他会如何自处呢？他难道不会野心勃勃地幻想自己可以治理好整个希腊及其他各国吗？一旦有此想法，他难道不会自我膨胀，自高自大，陷入虚荣的浮夸和无知的骄傲吗？

To be sure he will.

阿：必定如此。

Now, when he is in this state of mind, if some one gently comes to him and tells him that he is a fool and must get understanding, which can only be got by slaving for it, do you think that, under such adverse circumstances, he will be easily induced to listen?

苏：如今，处于如此的思想状态之下，如果有人走上前，温柔地对他说，他很愚蠢，必须要获得判断力，而判断力只有通过艰苦的学习才可获得，你认为在如此不利的情形下，他会轻易听从吗？

Far otherwise.

阿：难上加难。

And even if there be some one who through inherent goodness or natural reasonableness has had his eyes opened a little and is humbled and taken captive by philosophy, how will his friends behave when they think that they are likely to lose the advantage which they were hoping to reap from his companionship? Will they not do and say anything to prevent him from yielding to his better nature and to render his teacher powerless, using to this end private intrigues as well as public prosecutions?

苏：纵然某人由于天性好善或者追求理性而未被完全蒙蔽心灵，为人谦恭，迷恋哲学，那么一旦他的朋友们意识到无望从与他的交情中获益，他们会如何行事呢？难道他们不会通过一些私下的阴谋和公开的指控来阻止他听从更善的天性，并诋毁其老师吗？

There can be no doubt of it.

阿：毋庸置疑。

And how can one who is thus circumstanced ever become a philosopher?

苏：那么在此情形下，一个人如何会成为哲学家呢？

Impossible.

阿：不可能。

Then were we not right in saying that even the very qualities which make a man a philosopher may, if he be ill-educated, divert him from philosophy, no less than riches and their accompaniments and the other so-called goods of life?

苏：那么，我们当初的说法难道不对吗？——一旦受到不好的引

导，甚至就连那些会使人成为哲学家的好品质都会使之远离哲学，其影响不亚于一切所谓的生活中的优越条件，如财富及其附属品。

We were quite right.

阿：我们完全正确。

Thus, my excellent friend, is brought about all that ruin and failure which I have been describing of the natures best adapted to the best of all pursuits; they are natures which we maintain to be rare at any time; this being the class out of which come the men who are the authors of the greatest evil to States and individuals; and also of the greatest good when the tide carries them in that direction; but a small man never was the doer of any great thing either to individuals or to States.

苏：我的朋友啊，我之前描述的最适合从事哲学之人，便是如此被毁掉或堕落的。我们认为，如此之人在任何时代均属少见；正是从此类人中产生了为城邦和个人带来最大祸患之人；同时如果善加引导的话，他们也会最大限度地造福于城邦和个人。无论是对城邦还是个人，庸庸碌碌之辈从来都是难成大事的。

That is most true, he said.

阿：这是千真万确的。

And so philosophy is left desolate, with her marriage rite incomplete: for her own have fallen away and forsaken her, and while they are leading a false and unbecoming life, other unworthy persons, seeing that she has no kinsmen to be her protectors, enter in and dishonour her; and fasten upon her the reproaches which, as you say, her reprovers utter, who affirm of her votaries that some are good for nothing, and that the greater number deserve the severest punishment.

苏：哲学因此变得孤寂凄凉，如同未能完成婚礼的女子：她的家人已然抛弃了她，与此同时其他卑鄙的家伙过着虚伪又猥琐的生活，趁该女子身边没有男性亲属保护之际，走进去玷污了她，并如你所说使该女子蒙上了她的反对者加给她的诸多恶名——这些反对者认定，追求该女子之人，一些一无是处，而大多数则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That is certainly what people say.

阿：人们确实这么说。

Yes; and what else would you expect, I said, when you think of the puny creatures who, seeing this land open to them—a land well stocked with fair names and showy titles—like prisoners running out of prison into a sanctuary, take a leap out of their trades into philosophy; those who do so being probably the cleverest hands at their own miserable crafts? For, although philosophy be in this evil case, still there remains a dignity about her which is not to be found in the arts. And many are thus attracted by her whose natures are imperfect and whose souls are maimed and disfigured by their

meannesses, as their bodies are by their trades and crafts. Is not this unavoidable?

苏：是的。如果一些卑微的人们看到一块向他们开放的土地，上面堆满了美名和堂皇的头衔，他们除了像犯人逃离监狱，奔向避难所一样抛弃自己的行业而转投哲学领域，你认为还会发生别的什么事情吗？很可能这些采取如此行动的人，在自己曾经不太体面的行业里是能工巧匠。其原因在于，虽然现在哲学处境很不幸，但是它仍旧保持着其他艺术所不具备的尊严。很多天性不完美的人都会被哲学所吸引，他们的灵魂也因为卑鄙而变得残缺畸形，正如其身体被行业和技艺折磨而严重受损一样。这难道不是不可避免的吗？

Yes.

阿：是的。

Are they not exactly like a bald little tinker who has just got out of durance and come into a fortune; he takes a bath and puts on a new coat, and is decked out as a bridegroom going to marry his master's daughter, who is left poor and desolate?

苏：他们正如一个秃顶的小铜匠，刚从监狱释放便交上好运：他沐浴更衣，打扮得像个新郎官，准备去迎娶主人家如今贫穷又凄惨的女儿，难道不是吗？

A most exact parallel.

阿：一个极为贴切的比方。

What will be the issue of such marriages? Will they not be vile and bastard?

苏：如此婚姻会有怎样的后代呢？他们难道不会又卑鄙又混账吗？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of it.

阿：那是毫无疑问的。

And when persons who are unworthy of education approach philosophy and make an alliance with her who is in a rank above them what sort of ideas and opinions are likely to be generated? Will they not be sophisms captivating to the ear, having nothing in them genuine, or worthy of or akin to true wisdom?

苏：那么当不配接受教育之人从事哲学，与自己身份高贵的哲学联姻，会产生出何种理念和观点呢？他们难道不会成为哗众取宠的诡辩家，没有任何真才实学，没有任何称得上或接近于真正智慧的东西吗？

No doubt, he said.

阿：毫无疑问。

Then, Adeimantus, I said, the worthy disciples of philosophy will be but a small remnant: perchance some noble and well-educated person, detained by exile in her service, who in the absence of corrupting influences remains devoted to her; or some lofty soul born in a mean city, the politics of which he contemns and neglects; and there may be a gifted few who leave the arts, which they justly despise, and come to her;—or peradventure there are some who are restrained by our friend Theages' bridle; for everything in the life of Theages conspired to divert him from philosophy; but ill-health kept him away from politics. My own case of the internal sign is hardly worth mentioning, for rarely, if ever, has such a monitor been given to any other man. Those who belong to this small class have tasted how sweet and blessed a possession philosophy is, and have also seen enough of the madness of the multitude; and they know that no politician is honest, nor is there any champion of justice at whose side they may fight and be saved. Such an one may be compared to a man who has fallen among wild beasts—he will not join in the wickedness of his fellows, but neither is he able singly to resist all their fierce natures, and therefore seeing that he would be of no use to the State or to his friends, and reflecting that he would have to throw away his life without doing any good either to himself or others, he holds his peace, and goes his own way. He is like one who, in the storm of dust and sleet which the driving wind hurries along, retires under the shelter of a wall; and seeing the rest of mankind full of wickedness, he is content, if only he can live his own life and be pure from evil or unrighteousness, and depart in peace and good-will, with bright hopes.

苏：那么，阿得曼托斯，真正有资格从事哲学之人便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了：可能有些人出身高贵且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被流放异地而得以继续研究哲学，他们不曾受到不良影响因此一直忠诚于哲学；还有些人天性高尚，乌烟瘴气的故乡之城使得他厌恶并远离了政治；可能还有一些人天赋异禀，因鄙视其他技艺转而投身于哲学；抑或有些人偶然地因受到我们的朋友赛亚格斯的约束而留在哲学领域——赛亚格斯生活中具备一切使之远离哲学的条件，但是病魔缠身的他却无法从政。我得灵魂感召而成为哲学家的事例，几乎不值一提，因为可能很少有他人会得到如此的警示。那些为数不多的哲学家，已经感受到了哲学是何等美好而神圣的财产，也看惯了大众的疯狂无知，同时他们清楚政治家们无一是诚实的，也不存在任何可以与之并肩作战正义之士使之获得拯救。如此之人正如一个深陷兽群之人：他既不愿与邪恶猛兽同流合污，也无法单枪匹马与猛兽对抗。于是自觉自己对城邦和朋友无用，认为自己不得不虚掷一生，于人、于己毫无益处，便选择了沉默并不问世事。他犹如一个在狂风暴雨、飞沙走石间避于墙隅之人；在目睹世间万恶之后，他只愿能够独善其身，清清白白，远离邪恶与不义，最后平静祥和、怀着美好的愿望而离开人世。

Yes, he said, and he will have done a great work before he departs.

阿：是的，人活一世，这已经是很伟大的成就了。

A great work—yes; but not the greatest, unless he find a State suitable to him; for in a State which is suitable to him, he will have a larger growth and be the saviour of his country, as well as of himself.The causes why philosophy is in such an evil name have

now been sufficiently explained: the injustice of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has been shown—is there anything more which you wish to say?

苏：伟大的成就——是的。但是这却并非最大的成就，除非他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城邦，因为在一座适合于自己的城邦中，他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会成为国家与自己的拯救者。我们现在已经充分解释了哲学名声何以如此不佳的原因，同时也指出了对于哲学的这些指责是不公正的。你还希望再说些什么吗？

Nothing more on that subject, he replied; but I should like to know which of the governments now existing is in your opinion the one adapted to her.

阿：就此话题而言，不用再多说了。但是，我想知道，你认为现存政体中哪一个适合于哲学呢？

Not any of them, I said; and that is precisely the accusation which I bring against them—not one of them is worthy of the philosophic nature, and hence that nature is warped and estranged;—as the exotic seed which is sown in a foreign land becomes denaturalized, and is wont to be overpowered and to lose itself in the new soil, even so this growth of philosophy, instead of persisting, degenerates and receives another character. But if philosophy ever finds in the State that perfection which she herself is, then will be seen that she is in truth divine, and that all other things, whether natures of men or institutions, are but human;—and now, I know, that you are going to ask, What that State is:

苏：它们中任何一个都不适合，这也正是我反对当今政体的原因。没有一种政体适合于哲学天性，因此哲学天性被歪曲和疏远——正如一颗外来的种子被种在陌生的土壤中，改变了本性，易于被同化，并在新的土壤中迷失了自己。同理，哲学的发展非但不能长久，反倒发生退化，并沾染了别的品性。可是一旦哲学真的找寻到了与自身一样完美的城邦，那时就会发现哲学确实为神圣之物，而其他的一切，无论是人的天性，抑或是制度本身，都不过是人间之物。现在我知道，你会问，这是什么城邦？

No, he said; there you are wrong, for I was going to ask another question—whether it is the State of which we are the founders and inventors, or some other?

阿：不，你错了，因为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它是否便是我们缔造的城邦呢？还是别的城邦？

Yes, I replied, ours in most respects; but you may remember my saying before, that some living authority would always be required in the State having the same idea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guided you when as legislator you were laying down the laws.

苏：是的，从很多方面而言，就是我们的城邦。但是你或许还记得我之前说过，在城邦中应该存在一位权威人士，他需要持有与你这位立法者一致的城邦政体观点。

That was said, he replied.

阿：这已经说过。

Yes, but not in a satisfactory manner; you frightened us by interposing objections, which certainly showed that the discussion would be long and difficult; and what still remains is the reverse of easy.

苏：是的，但是效果不尽如人意。你突然插话反驳吓到了我们，当然这也表明讨论将会是漫长而艰难的，同时下面的讨论绝非易事。

What is there remaining?

阿：下面要讨论什么？

The question how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may be so ordered as not to be the ruin of the State: All great attempts are attended with risk; 'hard is the good,' as men say.

苏：要探讨的问题是，哲学研究要如何发展才不会导致城邦的沦落：一切伟大的尝试都会伴随着风险，正如人们所说“好事多磨”。

Still, he said, let the point be cleared up, and the enquiry will then be complete.

阿：虽然如此，我们仍要将此问题解释清楚，这样讨论就会完整。

I shall not be hindered, I said, by any want of will, but, if at all, by a want of power: my zeal you may see for yourselves; and please to remark in what I am about to say how boldly and unhesitatingly I declare that States should pursue philosophy, not as they do now, but in a different spirit.

苏：如果真的有阻力的话，那便是我能力的不足，绝非缺乏决心。你将亲眼目睹我的热忱。请看，我将多么果断、大胆地宣布：城邦应该用一种与现在不同的方式去从事哲学研究。

In what manner?

阿：采用何种方式？

At present, I said, the students of philosophy are quite young; beginning when they are hardly past childhood, they devote only the time saved from moneymaking and housekeeping to such pursuits; and even those of them who are reputed to have most of the philosophic spirit, when they come within sight of the great difficulty of the subject, I mean dialectic, take themselves off. In after life when invited by some one else, they may, perhaps, go and hear a lecture, and about this they make much ado, for philosophy is not considered by them to be their proper business: at last, when they grow old, in most cases they are extinguished more truly than

Heracleitus' sun, inasmuch as they never light up again. (Heraclitus said that the sun was extinguished every evening and relighted every morning.)

苏：现在，学习哲学的人都很年轻，当他们还是懵懂少年便已开始，只是利用挣钱和料理家务的时间间隙来学习哲学，甚至那些被称为极具哲学家风范的人，也不过是刚刚接触到哲学中非常难懂的部分（我指的是逻辑辩证），便离此而去。之后，倘若受邀，或许他们会去听一场讲座，这于他们来说已经很了不得，因为他们并没有把哲学看成是件正经营生。最后，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对哲学的兴趣大多会比赫拉克利特的太阳熄灭得还要彻底，以致再也不会被重新燃起。

But what ought to be their course?

阿：但他们该如何做呢？

Just the opposite. In childhood and youth their study, and what philosophy they learn, should be suited to their tender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while they are growing up towards manhood, the chief and special care should be given to their bodies that they may have them to use in the service of philosophy; as life advances and the intellect begins to mature, let them increase the gymnastics of the soul; but when the strength of our citizens fails and is past civil and military duties, then let them range at will and engage in no serious labour, as we intend them to live happily here, and to crown this life with a similar happiness in another.

苏：做与之相反的事。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他们的学习以及哲学课程应该符合他们尚未成熟的心智；在他们逐渐长大成人期间，他们应该首要并重点关注体魄，以便有好的身体来学习哲学；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他们要加大对心灵的锻炼；但是当他们的精力开始衰退，并且已经过了参与民事和军事事务的年龄，那就让他们逍遥度日，不为任何艰辛劳作所累，因为我们要让他们在此生愉快地生活，并作为对其此生的奖赏让他们在来生也要拥有同样的幸福。

How truly in earnest you are, Socrates! he said; I am sure of that; and yet most of your hearers, if I am not mistaken, are likely to be still more earnest in their opposition to you, and will never be convinced; Thrasymachus least of all.

阿：你讲得多么认真啊，苏格拉底！我对此非常确信，但是我若没弄错的话，你的大部分听众会更加真诚地反驳你，并且永远不会被你说服，其中最不服气的便是色拉叙马霍斯。

Do not make a quarrel, I said, between Thrasymachus and me, who have recently become friends, although, indeed, we were never enemies; for I shall go on striving to the utmost until I either convert him and other men, or do something which may profit them against the day when they live again, and hold the like discourse in another state of existence.

苏：不要挑唆我和色拉叙马霍斯的关系，虽然我们以前实际上也从未为敌，但我们新近已成为朋友。我要全力以赴地争取或者改变色拉叙马霍斯及其他人的看法，或者对他们来世进行类似的谈话有所助益。

You are speaking of a time which is not very near.

阿：你说得够远的。

Rather, I replied, of a time which is as nothing in comparison with eternity. Nevertheless, I do not wonder that the many refuse to believe; for they have never seen that of which we are now speaking realized; they have seen only a conventional imitation of philosophy, consisting of words artificially brought together, not like these of ours having a natural unity. But a human being who in word and work is perfectly moulded, as far as he can be, into the proportion and likeness of virtue—such a man ruling in a city which bears the same image, they have never yet seen, neither one nor many of them—do you think that they ever did?

苏：与永恒相比，这点时间不算什么。不过，这么多的人拒绝相信我的话，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不曾见过，我们所描绘的一切变成现实；他们一直以来所见到的只是一种对哲学的约定俗成的模仿，它由词语的生硬堆砌而成，不像我们的话语这般自然、统一。一个在言行方面都力求与至善完全相称相像的人，再由他来统治一座同样至善的城邦——如此的城邦，他们从未见过一个，更谈不上多见。你觉得他们见过吗？

No indeed.

阿：确实未曾见过。

No, my friend, and they have seldom, if ever, heard free and noble sentiments; such as men utter when they are earnestly and by every means in their power seeking after truth for the sake of knowledge, while they look coldly on the subtleties of controversy, of which the end is opinion and strife, whether they meet with them in the courts of law or in society.

苏：我的朋友，他们也很少听到过自由且高贵的言论。此种言论来自那些为了获取知识而想方设法寻求真理的人们，同时这些人对于那些纠缠不清、最终导致分歧和冲突的争执，无论是在法庭还是在社会上，都只是冷眼旁观。

They are strangers, he said, to the words of which you speak.

阿：他们听不懂你的这些言论。

And this was what we foresaw, and this was the reason why truth forced us to admit, not without fear and hesitation, that neither cities nor States nor individuals will ever attain perfection until the small class of philosophers whom we termed useless but not corrupt are providentially compelled, whether they will or not, to take care of the State, and until a like necessity be laid on the State to obey them; or until kings, or if not kings, the sons of kings or princes, are divinely inspired with a true love of true philosophy. That either or both of these alternatives are impossible, I see no reason to affirm: if they were so, we might indeed be justly ridiculed as dreamers and visionaries. Am I not right?

苏：对此，我们已有所预见，因此真理迫使我们在恐惧与犹豫中承认：只有当这为数甚少被我们称为无用却并未堕落的哲学家们，顺从天意（无论他们本人愿意与否）治理城邦，同时整个城邦必须服从于他们之时，又或者当国王（即便不是国王，国王的儿子或王子们也可）受到神明的启示而真正热爱真实的哲学之际，城邦、国家或个人方可臻于完美。没有任何理由能证明，此两种条件或其中之一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若果真如此，我们便真的会被取笑为空想家和理想主义者了。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Quite right.

阿：完全正确。

If then, in the countless ages of the past, or at the present hour in some foreign clime which is far away and beyond our ken, the perfected philosopher is or has been or hereafter shall be compelled by a superior power to have the charge of the State, we are ready to assert to the death, that this our constitution has been, and is—yea, and will be whenever the Muse of Philosophy is queen. There is no impossibility in all this; that there is a difficulty, we acknowledge ourselves.

苏：如果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或者在当今的某个遥远而陌生、不为我们所知道的地方，最优秀的哲学家曾经、正在或将要受到命运的驱使来掌管城邦，只要司掌哲学的缪斯女神在管理着国家，那么我们便可坚定地说，我们的政体曾经、正在——是的，还有将来要实现。这并非没有任何可能；我们自己也清楚地了解存在着困难。

My opinion agrees with yours, he said.

阿：我赞同你的看法。

But do you mean to say that this is not the opinion of the multitude?

苏：但你想说，大众不会赞同，是吗？

I should imagine not, he replied.

阿：我想，他们不会赞同的。

O my friend, I said, do not attack the multitude: they will change their minds, if, not in an aggressive spirit, but gently and with the view of soothing them and removing their dislike of over-education, you show them your philosophers as they really are and describe as you were just now doing their character and profession, and then mankind will see that he of whom you are speaking is not such as they supposed—if they view him in this new light, they will surely change their notion of him, and answer in another strain. Who can be at enmity with one who loves them, who that is himself gentle and free from envy will be jealous of one in whom there is no jealousy? Nay, let me answer for you, that in a few this harsh temper may be found but not in the majority of mankind.

苏：哦，我的朋友，不要攻击大众：如果你并不咄咄逼人，而是态度温和地去安抚他们，消除他们对过度说教的厌恶，让他们看到哲学家真实的一面，像刚刚那样向公众描绘哲学家的品行和职业，这样公众便会意识到，你所说的哲学家与他们之前所设想的并不相同，从而转变观念——一旦他们用这种全新的角度来审视哲学家，他们必定会改变对哲学家的看法，从而以另外一种口吻来回答该问题。人们会与爱他们的人敌对吗？温和而无嫉妒心的人，会嫉妒一个毫无嫉妒心的人吗？不会。让我来代你回答。这种粗暴的性情只会见于少数人，而不会出现在大多数人身上。

I quite agree with you, he said.

阿：你我所见相同。

And do you not also think, as I do, that the harsh feeling which the many entertain towards philosophy originates in the pretenders, who rush in uninvited, and are always abusing them, and finding fault with them, who make persons instead of things the theme of their conversation? and nothing can be more unbecoming in philosophers than this.

苏：同我一样，你不是也认为，很多人对于哲学的厌恶都是源于那些伪哲学家吗？这些人擅闯哲学领域，彼此间辱骂不休，相互指责，所发言论针对人而不针对事。与哲学家身份最不相称的行为，莫过于此。

It is most unbecoming.

阿：的确极其不相称。

For he, Adeimantus, whose mind is fixed upon true being, has surely no time to look down upon the affairs of earth, or to be filled with malice and envy, contending against men; his eye is ever directed towards things fixed and immutable, which he sees neither injuring nor injured by one another, but all in order moving according to reason; these he imitates, and to these he will, as far as he can, conform himself. Can a man help imitating that with which he holds reverential converse?

苏：阿得曼托斯，一个一心追求真正本质的人，必然无暇理会世事或心中充满恶意和妒忌而与人争竞；他的眼睛永远望向固定且恒久的事物，他看到此类事物既不造成伤害亦不会为他物所伤，只会理性且有序地发展；他模仿此类事物，并尽自己所能来以此规范自身。当人怀着敬意与事物进行精神交流之际，他会阻止自己模仿该事物吗？

Impossible.

阿：不可能。

And the philosopher holding converse with the divine order, becomes orderly and divine, as far as the nature of man allows; but like every one else, he will suffer from detraction.

苏：与神的秩序相交流的哲学家，将发挥人性最大的可能，成为一名有序且神圣之人；但是像其他人一样，他必将遭受毁谤。

Of course.

阿；当然。

And if a necessity be laid upon him of fashioning, not only himself, but human nature generally, whether in States or individuals, into that which he beholds elsewhere, will he, think you, be an unskilful artificer of justice, temperance, and every civil virtue?

苏：如果某种必然性驱使他不仅将自身、同时将无论是城邦抑或个人的普遍天性，塑造成他在别处所看到的样子，你认为在塑造正义、节制和一切的公民美德方面，他会像个蹩脚的工匠吗？

Anything but unskilful.

阿：定然不会蹩脚。

And if the world perceives that what we are saying about him is the truth, will they be angry with philosophy? Will they disbelieve us, when we tell them that no State can be happy which

is not designed by artists who imitate the heavenly pattern?

苏：如果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关于哲学家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他们还会对哲学不满吗？如果我们说，所有并非模仿神圣的模式而设计的城邦都是不幸的，人们会不相信我们吗？

They will not be angry if they understand, he said. But how will they draw out the plan of which you are speaking?

阿：如果他们懂得了道理，便不会反对。但是，他们该如何绘制你所谓的蓝图呢？

They will begin by taking the State and the manners of men, from which, as from a tablet, they will rub out the picture, and leave a clean surface. This is no easy task. But whether easy or not, herein will li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every other legislator,—they will have nothing to do either with individual or State, and will inscribe no laws, until they have either found, or themselves made, a clean surface.

苏：他们首先要除去该城邦及人们的习俗，就好像从画板上擦去图画，留下清洁的表面。这实属不易。但是，无论难易与否，在这方面他们不同于其他的立法者——除非他们找到了干净的画板或自己动手擦净了画板，否则他们不会对个人或城邦做任何事情，也不会制定任何的法律。

They will be very right, he said.

阿：其做法非常正确。

Having effected this, they will proceed to trace an outline of the constitution?

苏：他们完成这一切后，便要着手勾勒政体的轮廓了吗？

No doubt.

阿：毫无疑问。

And when they are filling in the work, as I conceive, they will often turn their eyes upwards and downwards: I mean that they will first look at absolute justice and beauty and temperance, and again at the human copy; and will mingle and temper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life into the image of a man; and thus they will conceive according to that other image, which, when existing among men, Homer calls the form and likeness of God.

苏：我设想，当绘制图画时，他们要经常上下打量：我指的是他们要一边审视绝对正义、美和节制，一边要端详对之进行模仿的人类副本，在人类的形象中混合并适当地掺杂各种生命元素；至此，他们将参照另一形象——既荷马所谓的神的体形和相貌（如果存在于人类

的话）——进行创作。

Very true, he said.

阿：有道理。

And one feature they will erase, and another they will put in, until they have made the ways of men, as far as possible, agreeable to the ways of God?

苏：他们抹掉一种特征，再添加上另一种特征，已经竭尽所能使人类与神保持一致了吗？

Indeed, he said, in no way could they make a fairer picture.

阿：的确，他们绝不会画出比这更美的图画。

And now, I said, are we beginning to persuade those whom you described as rushing at us with might and main, that the painter of constitutions is such an one as we are praising; at whom they were so very indignant because to his hands we committed the State; and are they growing a little calmer at what they have just heard?

苏：那么，我们已经开始说服那些你所说的要奋力扑向我们的

人，让他们相信此种体制的设计者便是我们所赞美之人，对吗？人们曾因为我们将城邦托付给他而极度愤慨，那么在听到刚才的一番话后，他们会稍稍冷静一些吗？

Much calmer, if there is any sense in them.

阿：但凡有理智之人，都会冷静很多。

Why, where can they still find any ground for objection? Will they doubt that the philosopher is a lover of truth and being?

苏：唉，他们如何会找到依然反对的理由呢？他们会不相信，哲学家热爱真理与存在吗？

They would not be so unreasonable.

阿：他们不会如此不可理喻。

Or that his nature, being such as we have delineated, is akin to the highest good?

苏：抑或他们会不相信，我们关于哲学家的天性接近至善的说法吗？

Neither can they doubt this.

阿：他们亦不会如此。

But again, will they tell us that such a nature, placed under 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will not be perfectly good and wise if any ever was? Or will they prefer those whom we have rejected?

苏：但是，他们是否会说，如此天性之人，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仍会像以往一样既非大善亦非大智吗？抑或他们会更加倾向于那些我们所反对的人吗？

Surely not.

阿：必然不会。

Then will they still be angry at our saying, that, until philosophers bear rule, States and individuals will have no rest from evil, nor will this our imaginary State ever be realized?

苏：如果我们说，只有哲学家掌权，国家和个人才可远离灾祸，得到安宁，我们想象中的城邦才会成为现实，他们还会动怒吗？

I think that they will be less angry.

阿：我认为，他们不会那么生气了。

Shall we assume that they are not only less angry but quite gentle, and that they have been converted and for very shame, if for no other reason, cannot refuse to come to terms?

苏：我们可以设想，他们不但会态度有所缓和，而且会很和气；他们已被说服，出于羞愧，而不是其他原因，他们也不会拒绝同我们达成妥协的，对吗？

By all means, he said.

阿：必定如此。

Then let us suppose that the reconciliation has been effected. Will any one deny the other point, that there may be sons of kings or princes who are by nature philosophers?

苏：那么，我们姑且认为，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会有人否认另一点，即国王或亲王们的儿子或许生而具有哲学家天赋吗？

Surely no man, he said.

阿：当然，没人会否认。

And when they have come into being will any one say that they must of necessity be destroyed; that they can hardly be saved is not denied even by us; but that in the whole course of ages no single one of them can escape—who will venture to affirm this?

苏：那么，当这些有天赋的后代出现，会有人说他们必然会走向毁灭吗？虽然我们也不可否认，他们几乎在劫难逃，但是谁又能断言，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中绝不会有任何一个人逃脱呢？

Who indeed!

阿：的确，有谁会出如此断言呢！

But, said I, one is enough; let there be one man who has a city obedient to his will, and he might bring into existence the ideal polity about which the world is so incredulous.

苏：但是，一人便足矣；让整个城邦服从他的意志，他也许会将深受世人质疑的理想政治体制化为现实。

Yes, one is enough.

阿：是啊，一人足矣。

The ruler may impose the laws and institutions which we have been describing, and the citizens may possibly be willing to obey them?

苏：这位治理者会施行我们所说的法律和制度吗？城邦公民或许会愿意遵守这些法律吗？

Certainly.

阿：当然。

And that others should approve, of what we approve, is no miracle or impossibility?

苏：那么，别人将会赞同我们的观点，这绝非奇迹或不可能之事吧？

I think not.

阿：我想，绝不是。

But we have sufficiently shown, in what has preceded, that all this, if only possible, is assuredly for the best.

苏：前面我们已经充分地证明，所有这一切如果可能，便必定是尽善尽美的。

We have.

阿：已经证明。

And now we say not only that our laws, if they could be enacted, would be for the best, but also that the enactment of them, though difficult, is not impossible.

苏：此外，现在我们不但认为我们的法律一旦被实施将会带来至善的结果，而且这些法律的实施纵使很难也并非是不可能的。

Very good.

阿：很好。

And so with pain and toil we have reached the end of one subject, but more remains to be discussed;—how and by what studies and pursuits will the saviours of the constitution be created,

and at what ages are they to apply themselves to their several studies?

苏：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在一个问题上有了定论，但是仍有更多问题亟待探讨，诸如：这种政体的救星该如何产生？他们要通过怎样的学习和训练？以及他们在什么年龄段进行各种学习？

Certainly.

阿：当然。

I omitted the troublesome business of the possession of women, and the procreation of children, and the appointment of the rulers, because I knew that the perfect State would be eyed with jealousy and was difficult of attainment; but that piece of cleverness was not of much service to me, for I had to discuss them all the same.

苏：我前面省略了棘手的娶妻生子和城邦统治者任命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完美的城邦会招人嫉妒，也很难实现。我的这点小聪明并未给我带来多少好处，因为我照样讨论了这些问题。

The women and children are now disposed of, but the other question of the rulers must be investigat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e were saying, as you will remember, that they were to be lovers of their country, tried by the test of pleasures and pains, and neither in hardships, nor in dangers, nor at any other critical moment were

to lose their patriotism—he was to be rejected who failed, but he who always came forth pure, like gold tried in the refiner's fire, was to be made a ruler, and to receive honours and rewards in life and after death. This was the sort of thing which was being said, and then the argument turned aside and veiled her face; not liking to stir the question which has now arisen.

现在，关于妇女和儿童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另一个关于统治者的问题则必须从头谈起了。你记得吧，我们说过统治者要热爱自己的国家，经受得住欢乐与苦难的考验，无论遇到任何险阻、任何危难；或在任何其他的关键时刻，都不会丧失爱国心——不能做到者，将会落选，而经考验一贯表现完美者，如同经受住火炼考验的真金，将被任命为统治者，生前死后都将获得荣誉和褒奖。此方面的内容，我们之前有所涉及，后来因为不愿引起目前这样的争执而避之不谈，掩盖了其本来面目。

I perfectly remember, he said.

阿：我记得很清楚。

Yes, my friend, I said, and I then shrank from hazarding the bold word; but now let me dare to say—that the perfect guardian must be a philosopher.

苏：是的，我的朋友，我当时不敢斗胆发表如此大胆的言论，但是现在让我大胆地断言：城邦的完美守卫者必然是哲学家。

Yes, he said, let that be affirmed.

阿：是的，让我们认可这一说法。

And do not suppose that there will be many of them; for the gifts which were deemed by us to be essential rarely grow together; they are mostly found in shreds and patches.

苏：不要指望有很多的哲学家可以做守卫者，因为那些我们看来哲学家所必需的天赋，很少集中生长；它们大多零落而分散。

What do you mean? he said.

阿：此话怎讲？

You are aware, I replied, that quick intelligence, memory, sagacity, cleverness, and similar qualities, do not often grow together, and that persons who possess them and are at the same time high-spirited and magnanimous are not so constituted by nature as to live orderly and in a peaceful and settled manner; they are driven any way by their impulses, and all solid principle goes out of them.

苏：你注意到，敏锐善学、记忆力强、洞察事理、聪明机智等类似的品性并不总是共存；拥有这些品性且同时朝气蓬勃、宽容洒脱的

人，从本性上就不愿生活在有序的状态下，不愿过平静、安定的生活；他们会受冲动的驱使横冲直撞，丝毫无原则可言。

Very true, he said.

阿：的确如此。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steadfast natures which can better be depended upon, which in a battle are impregnable to fear and immovable, are equally immovable when there is anything to be learned; they are always in a torpid state, and are apt to yawn and go to sleep over any intellectual toil.

苏：另一方面，有些人性情稳重、为人较前者可靠，即使发生战争，他们也会毫无畏惧，坚定不移，而且面对学习同样是纹丝不动，永远呈迟钝状，遇到需要动脑筋的工作，就会哈欠连天继而睡去。

Quite true.

阿：的确如此。

And yet we were saying that both qualities were necessary in those to whom the higher education is to be imparted, and who are to share in any office or command.

苏：但是我们曾提出，一个人必须具有这两方面的品性，方可成为高级教育的对象，担任要职或发号施令。

Certainly, he said.

阿：当然。

And will they be a class which is rarely found?

苏：他们将是很罕见的一类人吗？

Yes, indeed.

阿：的确如此。

Then the aspirant must not only be tested in those labours and dangers and pleasures which we mentioned before, but there is another kind of probation which we did not mention—he must be exercised also in many kinds of knowledge, to see whether the soul will be able to endure the highest of all, or will faint under them, as in any other studies and exercises.

苏：那么，有志之士，不仅必须经受住我们之前提及的艰辛、危难和欢乐的考验，而且还要经历另一种考验——他务必要在多种知识

中得到锻炼，以此来判断其灵魂是否有能力承受最高层次的知识，是否会像在其他学习或运动中一样中途晕倒。

Yes, he said, you are quite right in testing him. But what do you mean by the highest of all knowledge?

阿：是的，你如此考验他，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你所谓“最高层次的知识”，指的是什么呢？

You may remember, I said, that we divided the soul into three parts; and distinguished the several natures of justice, temperance, courage, and wisdom?

苏：你或许还记得，我们曾把人的灵魂分成三部分，并区分了一些诸如正义、节制、勇气和智慧等方面的天性吧？

Indeed, he said, if I had forgotten, I should not deserve to hear more.

阿：当然记得，我若是忘记，便没资格再听下去了。

And do you remember the word of caution which preceded the discussion of them?

苏：那你记得，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提出的警告吗？

To what do you refer?

阿：你指的是什么？

We were saying, if I am not mistaken, that he who wanted to see them in their perfect beauty must take a longer and more circuitous way, at the end of which they would appear; but that we could add on a popular exposition of them on a level with the discussion which had preceded. And you replied that such an exposition would be enough for you, and so the enquiry was continued in what to me seemed to be a very inaccurate manner; whether you were satisfied or not, it is for you to say.

苏：若没记错，当时我们说，如要见识到最完美状态的此类美德，必定要选择一条更加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直至路之尽头，此类美德方尽现；当时我们亦曾提及，要增补一个与前面论述水平相当的通俗阐释。你回答说，对你而言，如此阐释便足够了。于是，我们继续以一种依我看来相当不缜密的方式进行探讨。至于你究竟满意与否，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Yes, he said, I thought and the others thought that you gave us a fair measure of truth.

阿：满意。我和其他人都认为，你提供给我们一个衡量真理的公

平标准。

But, my friend, I said, a measure of such things which in any degree falls short of the whole truth is not fair measure; for nothing imperfect is the measure of anything, although persons are too apt to be contented and think that they need search no further.

苏：但是，我的朋友，作为衡量此类事物的标准，哪怕稍有偏颇，也将不能成为好的标准。虽然人类易于安于现状，止步不前，但是自身不完美的事物是不能成为他物的衡量标准的。

Not an uncommon case when people are indolent.

阿：人们往往是有惰性的。

Yes, I said; and there cannot be any worse fault in a guardian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laws.

苏：是的。就城邦和法律的守卫者而言，此种恶习最为不可取。

True.

阿：对。

The guardian then, I said, must be required to take the longer circuit, and toil at learning as well as at gymnastics, or he will never reach the highest knowledge of all which, as we were just now saying, is his proper calling.

苏：那么，我们必须要求守卫者踏上更为漫长的征程，刻苦学习知识，锻炼身体，否则他将永远无缘获得最高层次的知识，即我们方才所说的守卫者特有的职业。

What, he said, is there a knowledge still higher than this—higher than justice and the other virtues?

阿：什么，还有比这更高的学识——高于正义和其他美德的吗？

Yes, I said, there is. And of the virtues too we must behold not the outline merely, as at present—nothing short of the most finished picture should satisfy us. When little things are elaborated with an infinity of pains, in order that they may appear in their full beauty and utmost clearness, how ridiculous that we should not think the highest truths worthy of attaining the highest accuracy!

苏：有的。关于这些美德，我们千万不可像现在这样只观其大概——不看到最为完善的图画，便绝不满足。对于微不足道的事物，我们为见其至美、至纯之态，尚且会不遗余力地详加描述，倘若我们认为，最高的真理不需要最大程度的严谨，这岂不是很可笑吗？

A right noble thought; but do you suppose that we shall refrain from asking you what is this highest knowledge?

阿：很好的想法，有道理。但是你认为，我们会不问何为最高的学识吗？

Nay, I said, ask if you will; but I am certain that you have heard the answer many times, and now you either do not understand me or, as I rather think, you are disposed to be troublesome; for you have often been told that the idea of good is the highest knowledge, and that all other things become useful and advantageous only by their use of this. You can hardly be ignorant that of this I was about to speak, concerning which, as you have often heard me say, we know so little; and, without which, any other knowledge or possession of any kind will profit us nothing. Do you think that the possession of all other things is of any value if we do not possess the good? or the knowledge of all other things if we have no knowledge of beauty and goodness?

苏：不，你尽管问吧。但是我肯定，你已经多次听过这个答案了，现在要么是你没听懂，要么我宁愿相信，你是存心捣乱。我已经向你讲过，善的理式便是最高层次的知识，其他知识只因借用了善的理式才变得有用又有益。你不会不晓得我即将说的话，因为你已多次听我说，对此我们知之甚少；同时，没有善的理式，其他知识或对任何学问的掌握都将于我们毫无裨益。如果我们没有善，你认为对其他事物的了解还有价值吗？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美、何为善，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知识还有价值吗？

Assuredly not.

阿：必然没有。

You are further aware that most people affirm pleasure to be the good, but the finer sort of wits say it is knowledge?

苏：再者，你也知道，大多数人断言善是快乐，更高明些的人认为善是知识。

Yes.

阿：是的。

And you are aware too that the latter cannot explain what they mean by knowledge, but are obliged after all to say knowledge of the good?

苏：你也注意到，后者无法说清楚他们所谓的知识为何物，最后只好说是关于善的知识，是吗？

How ridiculous!

阿：多么荒谬！

Yes, I said, that they should begin by reproaching us with our ignorance of the good, and then presume our knowledge of it—for the good they define to be knowledge of the good, just as if we understood them when they use the term 'good'—this is of course ridiculous.

苏：是的。他们会先指责我们不懂“善”，继而又假设我们都懂“善”——因为他们将“善”定义为“善的知识”，就仿佛他们使用“善”这个术语时，我们便懂得何为“善”了——这当然荒谬了。

Most true, he said.

阿：对极了。

And those who make pleasure their good are in equal perplexity; for they are compelled to admit that there are bad pleasures as well as good.

苏：那些以快乐为“善”的人，也同样感到困惑。他们不得不承认，快乐亦有善、恶之分。

Certainly.

阿：当然。

And therefore to acknowledge that bad and good are the same?

苏：于是，他们被迫承认，善与恶是相同的，对吗？

True.

阿：对。

There can be no doubt about the numerous difficulties in which this question is involved.

苏：无疑，此问题困难重重。

There can be none.

阿：毫无疑问。

Further, do we not see that many are willing to do or to have or to seem to be what is just and honourable without the reality; but no one is satisfie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good—the reality is what they seek; in the case of the good, appearance is despised by

every one.

苏：另外，我们看到，很多人乐于行虚假的正义与高尚之事，或者乐于假装成徒有虚名的正义与高尚之人；但是，没人会满足于善的假象——真实才是人们所追求的；在关于善的问题上，假象遭所有人鄙视，难道不是吗？

Very true, he said.

阿：确实如此。

Of this then, which every soul of man pursues and makes the end of all his actions, having a presentiment that there is such an end, and yet hesitating because neither knowing the nature nor having the same assurance of this as of other things, and therefore losing whatever good there is in other things,—of a principle such and so great as this ought the best men in our State, to whom everything is entrusted, to be in the darkness of ignorance?

苏：人人都追求善的事物，并将其视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人们可以感受到该目标的存在，但却犹豫不前，一方面因为不清楚善为何物，另一方面则因为不能像对其他的事物那样对善有十足的把握，因此也就丧失掉其他事物所具有的善。我们城邦中的最优秀人士，那些我们要将一切托付给他们的人们，对于此等重要的原则问题，可以完全茫然无知吗？

Certainly not, he said.

阿：当然不可以。

I am sure, I said, that he who does not know how the beautiful and the just are likewise good will be but a sorry guardian of them; and I suspect that no one who is ignorant of the good will have a true knowledge of them.

苏：我确信，不知晓美与正义何以为善的人将无法守护美和正义；我怀疑，对善一无所知的人将不能真正了解美和正义。

That, he said, is a shrewd suspicion of yours.

阿：你的怀疑很有道理。

And if we only have a guardian who has this knowledge our State will be perfectly ordered?

苏：只要我们拥有一位懂得“善”的守卫者，我们的城邦将会一切秩序井然，是吗？

Of course, he replied; but I wish that you would tell me whether you conceive this supreme principle of the good to be

knowledge or pleasure, or different from either?

阿：当然。但是，我希望你说清楚，你主张善的最高准则是知识，还是快乐，抑或两者皆不是？

Aye, I said, I knew all along that a fastidious gentleman like you would not be contented with the thoughts of other people about these matters.

苏：啊，我一向知道，像你这般挑剔的人在这些问题上是不会满足于倾听他人看法的。

True, Socrates; but I must say that one who like you has passed a lifetime in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should not be always repeating the opinions of others, and never telling his own.

阿：对，苏格拉底。可是，我必须说，像你这样一生致力于哲学研究的人，不应该总是人云亦云，毫无己见。

Well, but has any one a right to say positively what he does not know?

苏：好吧，但是，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人们有权武断地发表观点吗？

Not, he said, with the assurance of positive certainty; he has no right to do that: but he may say what he thinks, as a matter of opinion.

阿：当然不应该了。他无权这么做，但是他可以讲出自己的想法，即意见。

And do you not know, I said, that all mere opinions are bad, and the best of them blind? You would not deny that those who have any true notion without intelligence are only like blind men who feel their way along the road?

苏：你难道不清楚，空谈观点实属恶劣，最好的观点也是盲目的吗？你不会否认，那些空有见地却无智慧的人，正如一路摸索前行的盲人吧？

Very true.

阿：确实如此。

And do you wish to behold what is blind and crooked and base, when others will tell you of brightness and beauty?

苏：当有人向你讲述光明与美时，你还愿意去看盲目、畸形而卑劣的事物吗？

GLAUCON-SOCRATES

主要人物：格劳孔、苏格拉底

Still, I must implore you, Socrates, said Glaucon, not to turn away just as you are reaching the goal; if you will only give such an explanation of the good as you have already given of justice and temperance and the other virtues, we shall be satisfied.

格：苏格拉底，我拜托你不要在临近终点之际调转方向。如果你能像解释正义、节制和其他美德那样，把善解释清楚，我们便心满意足了。

Yes, my friend, and I shall be at least equally satisfied, but I cannot help fearing that I shall fail, and that my indiscreet zeal will bring ridicule upon me. No, sweet sirs, let us not at present ask what is the actual nature of the good, for to reach what is now in my thoughts would be an effort too great for me. But of the child of the good who is likest him, I would fain speak, if I could be sure that you wished to hear—otherwise, not.

苏：是啊，我的朋友，我会同样心满意足的，但是我不禁担心自己无法胜任，凭着一腔热血贸然行事，只会贻人笑柄。不，亲爱的先生们，我们暂时不要探究善的真实本质。要将我此刻的想法说清楚，对我来说实在力不从心。但是，关于“善”的孩子，如果你们确实愿意听，我很乐意说一说，它酷似“善”；否则，我便不说了。

By all means, he said, tell us about the child, and you shall remain in our debt for the account of the parent.

格：那你一定要给我们讲讲善的孩子的事，但是你还欠我们一个关于其父亲的说法。

I do indeed wish, I replied, that I could pay, and you receive, the account of the parent, and not, as now, of the offspring only; take, however, this latter by way of interest, and at the same time have a care that I do not render a false account, although I have no intention of deceiving you.

苏：我确实希望能向你们偿清关于父亲的这笔欠债，而不是像现在，我只能讲这个孩子。把这个孩子看成是利息吧，同时尽管我并非有意去骗你们，你们还是要当心我是否会开出假账。

Yes, we will take all the care that we can: proceed.

格：好，我们会尽量当心的。开始吧。

Yes, I said, but I must first come to an understanding with you, and remind you of what I have mentioned in the course of this discussion, and at many other times.

苏：但首先我必须要和你们达成共识，提醒你们我曾在一讨论中以及在其他场合多次提到过的说法。

What?

格：什么？

The old story, that there is a many beautiful and a many good, and so of other things which we describe and define; to all of them the term 'many' is applied.

苏：老生常谈了：存在着诸多美、诸多善，以及诸多我们描述和定义的其他事物；“诸多”适用于它们中的所有。

True, he said.

格：对。

And there is an absolute beauty and an absolute good, and of other things to which the term 'many' is applied there is an absolute; for they may be brought under a single idea, which is called the essence of each.

苏：我们也认为存在着一种美本身、善本身，同理“诸多”所适用

的其他事物亦存在一种绝对性的本身；因为它们都可以被置于一种单一的理式之下，该理式被称为每种事物的本质。

Very true.

格：确实如此。

The many, as we say, are seen but not known, and the ideas are known but not seen.

苏：正如我们所说，“诸多”事物见得到却不明所以，而这些理式却是明其所以但见不到。

Exactly.

格：正是。

And what is the organ with which we see the visible things?

苏：我们凭借哪种感官看到可见之物呢？

The sight, he said.

格：视觉。

And with the hearing, I said, we hear, and with the other senses perceive the other objects of sense?

苏：我们借助听觉来听，借助其他的感官，感受到其他可感觉的事物，对吗？

True.

格：对。

But have you remarked that sight is by far the most costly and complex piece of workmanship which the artificer of the senses ever contrived?

苏：那你可曾想过，视觉是迄今为止感官的造物主所创造的成本最高、工艺最为复杂的一种工艺品吗？

No, I never have, he said.

格：没有，我从未想过。

Then reflect; has the ear or voice need of any third or additional nature in order that the one may be able to hear and the other to be heard?

苏：想一想：为了使一个人听到另一个人发出的声音，耳朵或声音是否还需要借助任何第三种类型的事物，或者其他附加条件吗？

Nothing of the sort.

格：根本不需要。

No, indeed, I replied; and the same is true of most, if not all, the other senses—you would not say that any of them requires such an addition?

苏：实际上，大多数的感官都不需要。你不会认为其他的感官需要什么附加条件吧？

Certainly not.

格：当然不会。

But you see that without the addition of some other nature there is no seeing or being seen?

苏：但是你觉得，如果缺乏了某种其他类型的事物，见与被见将无法实现吗？

How do you mean?

格：你这是何意？

Sight being, as I conceive, in the eyes, and he who has eyes wanting to see; colour being also present in them, still unless there be a third nature 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purpose, the owner of the eyes will see nothing and the colours will be invisible.

苏：我认为，视觉存在于眼睛之中，视力健全者可视物。颜色也存在于眼中，但是如果没有专门用于视觉的第三种事物存在，眼睛的主人将看不见任何东西，颜色也将不可见。

Of what nature are you speaking?

格：你所说的第三种事物是什么？

Of that which you term light, I replied.

苏：正是你称为“光”的东西。

True, he said.

格：对。

Noble, then, is the bond which links together sight and visibility, and great beyond other bonds by no small difference of nature; for light is their bond, and light is no ignoble thing?

苏：那么，联系视觉与可见性的纽带是多么不平凡啊，其性质与其他起纽带作用的事物大不相同，因为光便是它们的纽带，光是高尚圣洁的吗？

Nay, he said, the reverse of ignoble.

格：是的，光高尚圣洁。

And which, I said, of the gods in heaven would you say was the lord of this element? Whose is that light which makes the eye to see perfectly and the visible to appear?

苏：你认为，天上的哪位神祇赐给了我们此种元素呢？谁的光芒，使我们的眼睛可以清楚地看见物体，使可视的事物得以显现呢？

You mean the sun, as you and all mankind say.

格：众所周知，你指的是太阳神。

May not the relation of sight to this deity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苏：视觉与太阳神的关系可否被如此描述呢？

How?

格：如何描述？

Neither sight nor the eye in which sight resides is the sun?

苏：视觉和视觉所依附的眼睛，二者均不是太阳吧？

No.

格：不是。

Yet of all the organs of sense the eye is the most like the sun?

苏：但是在所有的感官中，眼睛是最近似于太阳的，对吗？

By far the most like.

格：绝对是最像太阳的。

And the power which the eye possesses is a sort of effluence which is dispensed from the sun?

苏：眼睛拥有的这种能力，是否有些像是从太阳中流溢出来，并分配给眼睛的呢？

Exactly.

格：正是。

Then the sun is not sight, but the author of sight who is recognised by sight?

苏：那么太阳不是视觉，但视觉所看到的太阳，却是视觉的创造者。

True, he said.

格：对。

And this is he whom I call the child of the good, whom the good begat in his own likeness, to be in the visible world, in relation to sight and the things of sight, what the good is in the intellectual world in relation to mind and the things of mind:

苏：那么，太阳便是我所说的善之子。在这个可见的世界中，善得到与自己相似的儿子，使之与视觉和视觉所看到的事物相联系，正如知识世界的善同理性、理性可感知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一样。

Will you be a little more explicit? he said.

格：你可否说得再清楚些呢？

Why, you know, I said, that the eyes, when a person directs them towards objects on which the light of day is no longer shining, but the moon and stars only, see dimly, and are nearly blind; they seem to have no clearness of vision in them?

苏：唉，你知道，当日光退去，只有月光时，人把目光投向物体，他视线模糊，几乎不可视物；他眼中似乎根本没有清晰的影像，对吗？

Very true.

格：确实如此。

But when they are directed towards objects on which the sun shines, they see clearly and there is sight in them?

苏：但是，当双眼望向有阳光照耀的物体时，便可以清晰视物，就说明他们的视力好，对吗？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the soul is like the eye: when resting upon that on which truth and being shine, the soul perceives and understands, and is radiant with intelligence; but when turned towards the twilight of becoming and perishing, then she has opinion only, and goes blinking about, and is first of one opinion and then of another, and seems to have no intelligence?

苏：灵魂便如同眼睛：当灵魂停留在闪耀着真理与存在光芒的事物上时，她便认知、理解并放射出智慧的光彩；当灵魂转向晦暗的黄昏时，她便只能空谈意见，闪烁其词，立场动摇不定，似乎毫无智慧

可言了，是吗？

Just so.

格：正是如此。

Now, that which imparts truth to the known and the power of knowing to the knower is what I would have you term the idea of good, and this you will deem to be the cause of science, and of truth in so far as the latter becomes the subject of knowledge; beautiful too, as are both truth and knowledge, you will be right in esteeming this other nature as more beautiful than either; and, as in the previous instance, light and sight may be truly said to be like the sun, and yet not to be the sun, so in this other sphere, science and truth may be deemed to be like the good, but not the good; the good has a place of honour yet higher.

苏：现在，我希望，你们将这种使真理得以被了解、使人们具有了解真理能力的事物称为善的理式。你可以将善的理式视为科学以及作为人们认知对象的真理的起因。真理和科学都是美的，但你完全可以认为，善的理式比此二者更美。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曾认为光和视觉与太阳十分相似，但却不是太阳。同理，在这里，我们认为科学和真理像善，却不是善，善比它们更为可敬。

What a wonder of beauty that must be, he said, which is the author of science and truth, and yet surpasses them in beauty; for you surely cannot mean to say that pleasure is the good?

格：善的理式一定是美好事物的奇迹吧！它是科学和真理的创造者，然而就美好而言，又超越了两者。你当然不是想说快乐便是善吧？

God forbid, I replied; but may I ask you to consider the image in another point of view?

苏：神不准许我有如此想法的。但请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象一下好吗？

In what point of view?

格：从何角度？

You would say, would you not, that the sun is not only the author of visibility in all visible things, but of generation and nourishment and growth, though he himself is not generation?

苏：你会说，太阳不但使一切可见的事物被看见，而且虽然太阳本身并非繁衍之神，太阳却为万物繁衍、获取养分和成长创造了条件，难道不是吗？

Certainly.

格：当然。

In like manner the good may be said to be not only the author of knowledge to all things known, but of their being and essence, and yet the good is not essence, but far exceeds essence in dignity and power.

苏：同理，我们可以说，善不但使所有可知的知识为人所知，而且还是知识存在和知识之本质的起因。善不是知识的本质，但却比知识的本质高贵和强大得多。

Glaucon said, with a ludicrous earnestness: By the light of heaven, how amazing!

格（一本正经，略显滑稽）：太阳神在上，多么神奇啊！

Yes, I said, and the exaggeration may be set down to you; for you made me utter my fancies.

苏：是的，有点言过其实，但责任在你，是你要我把这些怪念头讲出来的。

And pray continue to utter them; at any rate let us hear if there is anything more to be said about the similitude of the sun.

格：请继续讲下去。无论如何，关于太阳，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说明，一定要讲给我们听。

Yes, I said, there is a great deal more.

苏：好的，要说的还很多呢。

Then omit nothing, however slight.

格：那么请不要遗漏任何细节，哪怕一丝一毫。

I will do my best, I said; but I should think that a great deal will have to be omitted.You have to imagine, then, that there are two ruling powers, and that one of them is set over the intellectual world, the other over the visible. I do not say heaven, lest you should fancy that I am playing upon the name ('ourhanoz, orhatoz'). May I suppose that you have this distinction of the visible and intelligible fixed in your mind?

苏：我将尽力而为；不过我认为，有很多东西将不得不被省略掉。那么，请设想有两种统治力量，一种统治着可知世界，另一种统治着可见世界。我所言并非是上天，否则你又将认为我在玩弄术语。我可否认为，你清楚地了解可见事物与可知事物的区别吗？

I have.

格：我了解了。

Now take a line which has been cut into two unequal parts, and divide each of them again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nd suppose the two main divisions to answer, one to the visible and the other to the intelligible, and then compare the subdivisions in respect of their clearness and want of clearness, and you will find that the first section in the sphere of the visible consists of images. And by images I mean, in the first place, shadows,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reflections in water and in solid, smooth and polished bodies and the like: Do you understand?

苏：假设有一条线段被分割成不等的两段，现在将两部分按照同样的比例分割。假定第一次分割的两段中，一段代表可视事物，另一段代表可知事物。然后再比较第二次分割后的两段的清晰与模糊程度，这时你会发现在代表可视领域的第一段中包含有影像。我所谓的影像，首先指的是阴影，其次是在水中的倒影，或平滑、明亮、致密的物体上的映像等。你明白吗？

Yes, I understand.

格：是的，我明白。

Imagine, now, the other section, of which this is only the resemblance, to include the animals which we see, and everything that grows or is made.

苏：现在，想象一下第二段，这里仅有实物，即我们所见到的动物，以及一切自然生长的植物和人造之物。

Very good.

格：很好。

Would you not admit that both the sections of this division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truth, and that the copy is to the original as the sphere of opinion is to the sphere of knowledge?

苏：你难道不认为，可视世界所分割的这两段中都包含不同程度的真理；影像之于实物正如同观点之于知识吗？

Most undoubtedly.

格：毫无疑问。

Next proceed to consider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sphere of the intellectual is to be divided.

苏：下面想一想可知事物的划分方式。

In what manner?

格：以何种方式？

Thus:—There are two subdivisions, in the lower of which the soul uses the figures given by the former division as images; the enquiry can only be hypothetical, and instead of going upwards to a principle descends to the other end; in the higher of the two, the soul passes out of hypotheses, and goes up to a principle which is above hypotheses, making no use of images as in the former case, but proceeding only in and through the ideas themselves.

苏：大致是这样：把可知事物分成两部分，在较为低级的部分，灵魂把可视事物中的实物形象作为影像，此阶段的研究只能从假设出发，研究不会上升为原理，而只会沦为另一种结论；在二者中较为高级的部分，灵魂已经超越了假设，与前面的情况不同，它并不使用映像，而是单凭理式上升为高于假设的原理。

I do not quite understand your meaning, he said.

格：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Then I will try again; you will understand me better when I have made 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You are aware that students of geometry, arithmetic, and the kindred sciences assume the odd and the even and the figures and three kinds of angles and the like

in their several branches of science; these are their hypotheses, which they and every body are supposed to know, and therefore they do not deign to give any account of them either to themselves or others; but they begin with them, and go on until they arrive at last, and in a consistent manner, at their conclusion?

苏：那我再来试试。待我略加铺垫后，你便会更好地理解我的意思了。你知道，研究几何学、算术以及诸如此类学科的人，首先要假定奇数、偶数、各种图形、三种角以及其他学科分支中类似的概念；他们假设，他们及所有人都应该掌握的，这样他们便不必对自己或其他人解释这些概念了；他们要从这些概念出发，坚持不懈，直到最后得出结论，是吗？

Yes, he said, I know.

格：是的，我明白。

And do you not know also that although they make use of the visible forms and reason about them, they are thinking not of these, but of the ideals which they resemble; not of the figures which they draw, but of the absolute square and the absolute diameter, and so on—the forms which they draw or make, and which have shadows and reflections in water of their own, are converted by them into images, but they are really seeking to behold the things themselves, which can only be seen with the eye of the mind?

苏：虽然他们利用各种可见的图形，并对之加以解释，但是他们

脑中考虑的却不是这些图形而是图形所模拟的理想范式，他们所想的并非他们所绘制的图形，而是正方形本身、直径本身等等——他们所绘制或制作的图形，以及那些具有影子与水中倒影的实物，皆被他们转换为影像，但他们其实是在力求看到那些只有用理性的目光才能见到的事物本身，难道不是吗？

That is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of this kind I spoke as the intelligible, although in the search after it the soul is compelled to use hypotheses; not ascending to a first principle, because she is unable to rise above the region of hypothesis, but employing the objects of which the shadows below are resemblances in their turn as images, they having in relation to the shadows and reflections of them a greater distinctness, and therefore a higher value.

苏：此类的事物属于我所说的可知事物，但是在研究此类事物的过程中，灵魂还是被迫要使用假设。灵魂在一开始时不能上升为原理，因其无法超越假设，而只能借用一些实物（这些实物的影子与其很相似）作为影像，这些物体比其影子和映像更为清晰，因此具有更高的价值。

I understand, he said, that you are speaking of the province of geometry and the sister arts.

格：我明白，你在说几何学以及与之相近的其他学科领域。

And when I speak of the other division of the intelligible, you will understand me to speak of that other sort of knowledge which reason herself attains by the power of dialectic, using the hypotheses not as first principles, but only as hypotheses—that is to say, as steps and points of departure into a world which is above hypotheses, in order that she may soar beyond them to the first principle of the whole; and clinging to this and then to that which depends on this, by successive steps she descends again without the aid of any sensible object, from ideas, through ideas, and in ideas she ends.

苏：我讲到可知事物的另一部分，你便会明白我所说的是理性本身借助于辩证的力量所获得的另一种知识。那时，假设将不被当成基本原则，而是仅仅被当成假设——也就是说作为台阶或通往一个高于假设世界的起点，然后超越假设上升为基本原理，继而依靠这一基本原理和由此衍生出的一切，不断下行，直到理智不依靠任何感性事物，始于理式，依靠理式，最终获得理式。

I understand you, he replied; not perfectly, for you seem to me to be describing a task which is really tremendous; but, at any rate, I understand you to say that knowledge and being, which the science of dialectic contemplates, are clearer than the notions of the arts, as they are termed, which proceed from hypotheses only: these are also contemplated by the understanding, and not by the senses: yet, because they start from hypotheses and do not ascend to a principle, those who contemplate them appear to you not to exercise the higher reason upon them, although when a first

principle is added to them they are cognizable by the higher reason. And the habit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geometry and the cognate sciences I suppose that you would term understanding and not reason, as being intermediate between opinion and reason.

格：我听懂了，但是不完全懂，你似乎在向我描述一个巨大的工程，但不管怎么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是，来自辩证思维的知识与存在要比那些仅仅依靠假设的所谓艺术概念更为清晰：那些知识也是通过理性而非感性而获知的，但是由于他们是从假设出发，且并没能上升为原理，因此虽然当它们与基本原理相结合时，它们可以为更为高级的理性思维所认知，但是你仍会认为那些研究者并没有运用更为高级的理性思维。我想，你会把从事几何学和其他类似学科研究者的心理状态称为理智，而不是理性，介乎意见和理性之间。

You have quite conceived my meaning, I said; and now, corresponding to these four divisions, let there be four faculties in the soul—reason answering to the highest, understanding to the second, faith (or conviction) to the third, and perception of shadows to the last—and let there be a scale of them, and let us suppose that the several faculties have clearness in the same degree that their objects have truth.

苏：你很清楚我的意思了。现在，对应刚刚将绳子分割的四段，我们也把人的灵魂分成四种功能，即最高层次为理性，其次为理智，信念居第三位，对虚幻事物的感觉排在最末。让我们对这四种功能进行衡量，假设它们的对象具有多少真实性，它们就相应具有多少清晰度。

I understand, he replied, and give my assent, and accept your arrangement.

格：我听懂了，同意你的观点，并会按你说的来做。

BOOK VII.

第七卷

SOCRATES—GLAUCON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格劳孔

And now, I said, let me show in a figure how far our nature is enlightened or unenlightened:—Behold! human beings living in a underground den, which has a mouth open towards the light and reaching all along the den; here they have been from their childhood, and have their legs and necks chained so that they cannot move, and can only see before them, being prevented by the chains from turning round their heads. Above and behind them a fire is blazing at a distance, and between the fire and the prisoners there is a raised way; and you will see, if you look, a low wall built along the way, like the screen which marionette players have in front of them, over which they show the puppets.

苏：现在，请允许我以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的天性受过教育或未受过教育的情况。请看：一些人住在地下的洞穴里，光线从洞口照射进来照亮整个洞穴。这些人从小便生活在这里，他们的腿部和颈部都被锁链捆绑无法动弹，受锁链所困他们不能转头，只能看见自己眼前的事物。在他们后面较远处上方有燃烧着的火把，在火把和这些被囚禁的人之间有一条处于较高水平面的路；仔细看，你会发现一堵沿路筑起的矮墙，这墙仿佛遮挡在木偶戏演员前方的帷幕，演员们在幕后

操纵木偶表演。

I see.

格：我想象得到。

And do you see, I said, men passing along the wall carrying all sorts of vessels, and statues and figures of animals made of wood and stone and various materials, which appear over the wall? Some of them are talking, others silent.

苏：人们从墙边走过，将各种各样的木制的、石制的、或其他材质的容器、雕像或动物形象举过墙头，你想象得到吗？他们中有的在说话，有的则默不作声。

You have shown me a strange image, and they are strange prisoners.

格：你向我展示了一个奇特的画面和一群怪异的囚徒。

Like ourselves, I replied; and they see only their own shadows, or the shadows of one another, which the fire throws on the opposite wall of the cave?

苏：这些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另外，他们只能看到火把投射在洞穴对面墙上自己的影子或者他们彼此的影子，是吗？

True, he said; how could they see anything but the shadows if they were never allowed to move their heads?

格：是的。如果他们无法转头，他们又如何能见到影子以外的事物呢?

And of the objects which are being carried in like manner they would only see the shadows?

苏：同样，至于那些路人举着的东西，他们也仅能看到其影子，对吗？

Yes, he said.

格：是的。

And if they were able to converse with one another, would they not suppose that they were naming what was actually before them?

苏：如果他们彼此间能够交谈的话，难道他们不会认为他们所谈论的是他们面前真实存在的事物吗？

Very true.

格：必定如此。

And suppose further that the prison had an echo which came from the other side, would they not be sure to fancy when one of the passers-by spoke that the voice which they heard came from the passing shadow?

苏：倘若这个囚室传来对面的回声，那么当某个路人讲话时，这些囚徒难道不会认为，他们所听到的声音是移动的影子所发出的吗？

No question, he replied.

格：毫无疑问。

To them, I said, the truth would be literally nothing but the shadows of the images.

苏：对于他们来说，真实不过就是事物的影子。

That is certain.

格：确实如此。

And now look again, and see what will naturally follow if the prisoners are released and disabused of their error. At first, when any of them is liberated and compelled suddenly to stand up and turn his neck round and walk and look towards the light, he will suffer sharp pains; the glare will distress him, and he will be unable to see the realities of which in his former state he had seen the shadows; and then conceive some one saying to him, that what he saw before was an illusion, but that now, when he is approaching nearer to being and his eye is turned towards more real existence, he has a clearer vision,—what will be his reply? And you may further imagine that his instructor is pointing to the objects as they pass and requiring him to name them,—will he not be perplexed? Will he not fancy that the shadows which he formerly saw are truer than the objects which are now shown to him?

苏：现在，再想一想，如果这些囚徒被释放，并且被纠正迷误，此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首先，如果他们中的某个人被释放，被迫突然起身、转头、走路、面向光，此人一定会感到剧痛。光线灼痛了他，他无法看见那些之前所见到的影子的实物。设想如果有人告诉他，他之前所见到的都是假象，而如今由于他走向了真实的存在，看到了更真实存在的事物，于是他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会如何答复呢？再设想这位指引他的人指向墙头上经过的物体，并让此人说出名称时，他难道不会一脸困惑吗？他难道不会认为，他之前所见到的影子要比现在他所见到的实物更为真实吗？

Far truer.

格：更真实得多。

And if he is compelled to look straight at the light, will he not have a pain in his eyes which will make him turn away to take refuge in the objects of vision which he can see, and which he will conceive to be in reality clearer than the things which are now being shown to him?

苏：如果他被迫迎着光看，他难道不会感到眼睛刺痛，并因此而转身看向那些他能看清并且认为实际上要比现在所看到的一切还要清晰的影子吗？

True, he said.

格：对。

And suppose once more, that he is reluctantly dragged up a steep and rugged ascent, and held fast until he is forced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sun himself, is he not likely to be pained and irritated? When he approaches the light his eyes will be dazzled, and he will not be able to see anything at all of what are now called realities.

苏：倘若再有人硬拉他沿着崎岖的坡路向上爬，紧抓住他不放，一直将其拖到阳光充足的地方，他难道不会双眼刺痛，并火冒三丈吗？当他走到阳光下时，他将目眩不已，根本无法看清眼前任何所谓

真实的事物。

Not all in a moment, he said.

格：一瞬间看不清。

He will require to grow accustomed to the sight of the upper world. And first he will see the shadows best, next the reflections of men and other objects in the water, and then the objects themselves; then he will gaze upon the light of the moon and the stars and the spangled heaven; and he will see the sky and the stars by night better than the sun or the light of the sun by day?

苏：他需要逐渐适应地面上的光线。他最好先去看一些物体的影子，再看人或其他物体的水中倒影，然后看物体本身，之后再注视月亮、星星和星光璀璨的天宇。他会觉得夜晚观看天空和星星，要比在白天看太阳或太阳光好，是吗？

Certainly.

格：当然。

Last of all he will be able to see the sun, and not mere reflections of him in the water, but he will see him in his own proper place, and not in another; and he will contemplate him as he

is.

苏：最后他可以观看太阳了，不是太阳在水中的倒影，而是天空中真实存在的太阳，同时他也可以思考太阳的本质了。

Certainly.

格：当然。

He will then proceed to argue that this is he who gives the season and the years, and is the guardian of all that is in the visible world, and in a certain way the cause of all things which he and his fellows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behold?

苏：然后他便会认为，正是太阳主宰着四季和岁月的更替，正是太阳守护着这个可视世界的万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太阳也是他和他的同伴们习惯看到的一切事物的缘起，是吗？

Clearly, he said, he would first see the sun and then reason about him.

格：显然，他会先看到太阳，然后对之进行理性思考。

And when he remembered his old habitation, and the wisdom

of the den and his fellow-prisoners, do you not suppose that he would felicitate himself on the change, and pity them?

苏：如果他想起了自己以前的居处，洞穴里的知识以及他的囚徒同伴们，你难道不认为他会庆幸自己的转变并可怜那些洞穴中的人们吗？

Certainly, he would.

格：当然会。

And if they were in the habit of conferring honours among themselves on those who were quickest to observe the passing shadows and to remark which of them went before, and which followed after, and which were together; and who were therefore best able to draw conclusions as to the future, do you think that he would care for such honours and glories, or envy the possessors of them? Would he not say with Homer, 'Better to be the poor servant of a poor master,' and to endure anything, rather than think as they do and live after their manner?

苏：如果这些囚徒们之间存在着一个惯例，如果谁能够最先看到经过的影子并且能说出哪些影子在前，哪些紧随在后，哪些是并行的，而且能赞扬那些擅长准确预见未来的人，你认为，他现在还会在乎这些荣誉和光环，或者嫉妒那些取得荣誉的人们吗？他难道不会像荷马所说的那样，“宁愿做穷苦主人的穷苦奴隶”去忍受一切痛苦，也不愿像那些人一样思考，过与他们一样的生活吗？

Yes, he said, I think that he would rather suffer anything than entertain these false notions and live in this miserable manner.

格：正是。我认为，他宁愿吃尽一切苦头，也不会抱着这些错误的观念过这种悲惨的生活。

Imagine once more, I said, such an one coming suddenly out of the sun to be replaced in his old situation; would he not be certain to have his eyes full of darkness?

苏：再设想一下，如果他突然离开阳光回到原来的环境，他一定会感到眼前一片漆黑，难道不是吗？

To be sure, he said.

格：一定如此。

And if there were a contest, and he had to compete in measuring the shadows with the prisoners who had never moved out of the den, while his sight was still weak, and before his eyes had become steady (and the time which would be needed to acquire this new habit of sight might be very considerable), would he not be ridiculous? Men would say of him that up he went and down he came without his eyes; and that it was better not even to think of ascending; and if any one tried to loose another and lead him up to

the light, let them only catch the offender, and they would put him to death.

苏：如果举行一场竞赛，他要和那些从未走出洞穴的囚徒比试估量影子的本领，而此时他的视力还很弱，那么在他恢复视力之前（适应洞穴里的光线所需时间或许很长），他难道不会被人嘲笑吗？人们会说，他走出洞穴来到地面上然后再回到洞穴，便失去了视力，所以最好还是连想都不要想到地面上。如果有人试图解开他们的锁链将他们带到光明之处，只要他们能够捉住此害人者，就会将其杀掉。

No question, he said.

格：毫无疑问。

This entire allegory, I said, you may now append, dear Glaucon, to the previous argument; the prison-house is the world of sight, the light of the fire is the sun, and you will not misapprehend me if you interpret the journey upwards to be the ascent of the soul into the intellectual world according to my poor belief, which, at your desire, I have expressed—whether rightly or wrongly God knows. But, whether true or false, my opinion is that in the world of knowledge the idea of good appears last of all, and is seen only with an effort; and, when seen, is also inferred to be the universal author of all things beautiful and right, parent of light and of the lord of light in this visible world, and the immediate source of reason and truth in the intellectual; and that this is the power upon which he who would act rationally, either in public or private life must have his eye fixed.

苏：现在，亲爱的格劳孔，你可以把这整个的比喻和之前的争论联系到一起。此囚室便是可视世界，火把便是太阳，我想如果你能把升至地面的旅程看成是人的心灵上升为理性的过程，那你便没有误解我的意思。这些都是你想要弄清楚的，至于我解释得准确与否，就只有神知道了。但是不管正确与否，我认为，在可知世界中，善的理式是最后出现的，而且必经努力方可见到；但人们一旦见到善的理式，便可推论得知，它是一切美好而合理事物共同的创造者，是此可视世界中光和太阳的主宰，是可知世界中理性和真理的直接来源；无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里，人们若想理智行事，都必须要专注于善的理式。

I agree, he said, as far as I am able to understand you.

格：就我所能理解的而言，我同意你的观点。

Moreover, I said, you must not wonder that those who attain to this beatific vision are unwilling to descend to human affairs; for their souls are ever hastening into the upper world where they desire to dwell; which desire of theirs is very natural, if our allegory may be trusted.

苏：另外，你也一定不会怀疑，那些领略过极乐圣境之人是不愿意再重新堕入凡尘的；他们向往进入并居住于上层世界，而他们的灵魂也一直为此而努力；如果我们讲过的比喻可信的话，他们有此愿望实属正常。

Yes, very natural.

格：是的，很正常。

And is there anything surprising in one who passes from divine contemplations to the evil state of man, misbehaving himself in a ridiculous manner; if, while his eyes are blinking and before he has become accustomed to the surrounding darkness, he is compelled to fight in courts of law, or in other places, about the images or the shadows of images of justice, and is endeavouring to meet the conceptions of those who have never yet seen absolute justice?

苏：一个人经历过神圣关照而重新置身于扰攘的人间，他会手足无措，荒唐可笑；他不停地眨眼，还没有适应周围的黑暗，便被迫到法庭或其他场所关于正义的影像或正义影像的影子展开论辩，而且还要努力地去反驳那些从未见过正义本身的人们的观念。这一点奇怪吗？

Anything but surprising, he replied.

格：丝毫不足为奇。

Any one who has common sense will remember that the bewilderments of the eyes are of two kinds, and arise from two causes, either from coming out of the light or from going into the light, which is true of the mind's eye, quite as much as of the bodily eye; and he who remembers this when he sees any one whose vision is perplexed and weak, will not be too ready to laugh; he will first

ask whether that soul of man has come out of the brighter light, and is unable to see because unaccustomed to the dark, or having turned from darkness to the day is dazzled by excess of light. And he will count the one happy in his condition and state of being, and he will pity the other; or, if he have a mind to laugh at the soul which comes from below into the light, there will be more reason in this than in the laugh which greets him who returns from above out of the light into the den.

苏：任何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视物不清分两类，有两种原因：或者是刚从光亮处走出来或者是刚刚进入到光亮处。理性的眼睛正如人的眼睛，人们一旦了解了这一点，那么当他遇到任何视物不清者时，便一定不会加以嘲笑了。他会首先询问此人，是否来自于某个更加光明之处以致因无法适应黑暗而视线模糊，或者是否刚刚从黑暗处离开，因白昼的强光而产生了目眩。他会认为其中一种人的处境和状态是幸福的，而对另一种人表示怜悯。相比于嘲笑那些从光明处返回到洞穴中的人，他更有理由嘲笑那些从地下洞穴走向光明的人。

That, he said, is a very just distinction.

格：如此区别二者，十分合理。

But then, if I am right, certain professors of education must be wrong when they say that they can put a knowledge into the soul which was not there before, like sight into blind eyes.

苏：但是，如果我是正确的，那么某些教育专家们的观点便一定

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可以将知识灌输到原本无知的灵魂里去，正如为失明的双眼植入视力。

They undoubtedly say this, he replied.

格：他们的确如此说过。

Whereas, our argument shows that the power and capacity of learning exists in the soul already; and that just as the eye was unable to turn from darkness to light without the whole body, so too the instrument of knowledge can only by the movement of the whole soul be turned from the world of becoming into that of being, and learn by degrees to endure the sight of being, and of the brightest and best of being, or in other words, of the good.

苏：然而，我们的论证表明学习的能力早就存在于灵魂之中；正如不转动身体，眼睛便不能从黑暗转向光明，从事学习的器官只有在整个灵魂从变化的世界转向存在的世界，才能够学着逐渐接受存在的景象，接受最明亮、最美好的存在，即善。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must there not be some art which will effect conversion in

the easiest and quickest manner; not implanting the faculty of sight, for that exists already, but has been turned in the wrong direction, and is looking away from the truth?

苏：一定存在某种技巧，它可以让灵魂实现最快、最轻松的转向；灵魂已经有了视觉的能力，无需要再添加，但是灵魂已转向错误的方向，它正在偏离真理，难道不是吗？

Yes, he said, such an art may be presumed.

格：是的，可以假设存在如此技巧。

And whereas the other so-called virtues of the soul seem to be akin to bodily qualities, for even when they are not originally innate they can be implanted later by habit and exercise, the virtue of wisdom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contains a divine element which always remains, and by this conversion is rendered useful and profitable; or, on the other hand, hurtful and useless. Did you never observe the narrow intelligence flashing from the keen eye of a clever rogue—how eager he is, how clearly his paltry soul sees the way to his end; he is the reverse of blind, but his keen eye-sight is forced into the service of evil, and he is mischievous in proportion to his cleverness?

苏：灵魂的其他所谓优点似乎与身体的优点很相似，因为这些优点即使并非与生俱来，也可以通过后天的习惯和锻炼获得。智慧的优点超越其他一切事物，具有永恒的神圣特质，在灵魂的这种转向过程

中会变得有用且有益，或者反之，变得有害且无用。你可曾留意过那些头脑机灵的无赖们敏锐目光中闪烁着的狭隘智慧吗？他们急不可耐，猥琐的心中目标明确。他并非视力欠缺，但是他敏锐的视力却被迫为恶服务，他们越是聪明，所做的恶事越多。

Very true, he said.

格：确实如此。

But what if there had been a circumcision of such natures in the days of their youth; and they had been severed from those sensual pleasures, such as eating and drinking, which, like leaden weights, were attached to them at their birth, and which drag them down and turn the vision of their souls upon the things that are below—if, I say, they had been released from these impediments and turne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e very same faculty in them would have seen the truth as keenly as they see what their eyes are turned to now.

苏：假设在他们幼年时对如此本性施以割礼，使其摆脱掉那些感官愉悦，诸如贪食与纵酒——这些感官愉悦从其一出生就如沉重的铅块般加诸于其身，引其堕落，令其灵魂只能看到下面的事物——如果他们果真被从这些禁锢中解放出来，并转向相反的方向，我认为他们的眼睛将敏锐地看到真理，正如它们此刻看到眼前的一切。

Very likely.

格：很有可能。

Yes, I said; and there is another thing which is likely, or rather a necessary inference from what has preceded, that neither the uneducated and uninformed of the truth, nor yet those who never make an end of their education, will be able ministers of State; not the former, because they have no single aim of duty which is the rule of all their actions, private as well as public; nor the latter, because they will not act at all except upon compulsion, fancying that they are already dwelling apart in the islands of the blest.

苏：是的，还有一件事很可能，或者说是上述观点的必然推论，即无论是不学无术、对真理一无所知的人，还是那些终生治学的人，都不可能成为能干的城邦管理者。前者输在他们凡事无论公与私都没有丝毫的目标和责任感；后者输在他们若非被迫绝不主动行事，幻想着自己早已身居世外仙岛。

Very true, he replied.

格：的确如此。

Then, I said, the business of us who are the founders of the State will be to compel the best minds to attain that knowledge which we have already shown to be the greatest of all—they must continue to ascend until they arrive at the good; but when they have ascended and seen enough we must not allow them to do as they do now.

苏：那么，我们这些城邦创建者们的职责，便是迫使最优秀的人去获得我们前面探讨的最高级的知识。这些人必须不断上进直至趋于完美。可是，一旦他们上升到高处且眼界变得开阔，我们务必不允许他们出现像现在这般行为。

What do you mean?

格：这是何意？

I mean that they remain in the upper world: but this must not be allowed; they must be made to descend again among the prisoners in the den, and partake of their labours and honours, whether they are worth having or not.

苏：我的意思是，他们要留在上面的世界，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他们必须被迫返回到洞穴里的囚徒中间，与他们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无论这些苦乐荣辱是否值得。

But is not this unjust? he said; ought we to give them a worse life, when they might have a better?

格：这岂不是很不公平吗？如果他们原本可以生活得很好，那么我们应该让他们过一种更糟糕的生活吗？

You have again forgotten, my friend, I said, the intention of the legislator, who did not aim at making any one class in the State happy above the rest; the happiness was to be in the whole State, and he held the citizens together by persuasion and necessity, making them benefactors of the State, and therefore benefactors of one another; to this end he created them, not to please themselves, but to be his instruments in binding up the State.

苏：我的朋友，你似乎又忘记了，立法者的目的不是要使得城邦中的某个阶级比其他阶级幸福。幸福将是属于整个城邦的。立法者通过劝说或强制的手段使全体公民团结起来，共同为城邦继而为公民本身谋福利。立法者造就了他们，并非为了取悦于他们，而是要使之成为凝聚整个城邦的工具。

True, he said, I had forgotten.

格：对啊，我已经忘了。

Observe, Glaucon, that there will be no injustice in compelling our philosophers to have a care and providence of others; we shall explain to them that in other States, men of their class are not obliged to share in the toils of politics: and this is reasonable, for they grow up at their own sweet will, and the government would rather not have them. Being self-taught, they cannot be expected to show any gratitude for a culture which they have never received. But we have brought you into the world to be rulers of the hive, kings of yourselves and of the other citizens, and have educated you far better and more perfectly than they have been educated, and

you are better able to share in the double duty. Wherefore each of you, when his turn comes, must go down to the general underground abode, and get the habit of seeing in the dark. When you have acquired the habit, you will see ten thousand times better tha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den, and you will know what the several images are, and what they represent, because you have seen the beautiful and just and good in their truth. And thus our State, which is also yours, will be a reality, and not a dream only, and will be administered in a spirit unlike that of other States, in which men fight with one another about shadows only and are distracted i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which in their eyes is a great good. Whereas the truth is that the State in which the rulers are most reluctant to govern is always the best and most quietly governed, and the State in which they are most eager, the worst.

苏：注意，格劳孔，迫使我们的哲学家关心和庇护他人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合理。我们要告诉他们，在其他城邦，他们这类人是不必为政务而劳碌的——这很合理，因为他们出于自己的美好意愿而成长为哲学家，政府并不待见他们。因为他们自学成才，未曾接受任何来自国家的教育，所以他们自然不必报答国家的培养之恩。而在这里，我们把这些哲学家带到这个世界就是成为让他们成为自身及其他公民的统治者，我们还让他们接受更加良好、更加完善的教育，从而希望他们更有能力承担起哲学和政治双重的责任。因此你们中的每个人，无论轮到了谁，都必须要回到地下与大家一起生活，并习惯在黑暗中视物。一旦你们习惯了黑暗，你们的视线要比那些洞穴中的人们好上一万倍，因为你已经见过真实的美、正义和善，所以你很清楚这些影子为何物，代表着什么。因此我们的城邦，也是你们的城邦，将会变为现实，而不仅仅是梦想，这个城邦的管理理念将不同于其他城邦，因为在那些城邦中的人们只会互相因为影子而吵来吵去，他们视权力为大善，在权力的角逐中耗费着精力。然而，事实上，由最不愿从政的人所管理的城邦是最好、最稳定的，而由最热衷权力者所统治

的城邦却是最糟糕的。

Quite true, he replied.

格：确实如此。

And will our pupils, when they hear this, refuse to take their turn at the toils of State, when they are allowed to spe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time with one another in the heavenly light?

苏：那么，当我们培养的学员——那些大部分时间都可以一起生活在上面世界的阳光中的人们——闻听此言，还会在轮到他的时候拒绝分担国家的重担吗？

Impossible, he answered; for they are just men, and the commands which we impose upon them are just;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every one of them will take office as a stern necessity, and not after the fashion of our present rulers of State.

格：不可能的。他们是正义之士，我们对他们提出的也是正义的要求。毫无疑问，他们所有人都会把担任公职视为义不容辞之事，其情形与我们当前的城邦统治者们正好相反。

Yes, my friend, I said; and there lies the point. You must contrive for your future rulers another and a better life than that of

a ruler, and then you may have a well-ordered State; for only in the State which offers this, will they rule who are truly rich, not in silver and gold, but in virtue and wisdom, which are the true blessings of life. Whereas if they go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affairs, poor and hungering after their own private advantage, thinking that hence they are to snatch the chief good, order there can never be; for they will be fighting about office, and the civil and domestic broils which thus arise will be the ruin of the rulers themselves and of the whole State.

苏：是的，我的朋友。正是如此。你必须为你所谓的未来统治者设想出一种不同于统治者的、更好的生活，这样你才会拥有一个秩序井然的城邦，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城邦中才能有真正的富有之人愿意从政。他们富有的并非金银财富，而是美德学识，此二者方是生活真正的恩赐。相反，如果这些未来的统治者投身公共事务管理时缺乏美德学识，只知追逐私利，以为从此便可借机攫取大量好处，那么城邦将永无秩序。他们整日争权夺势，内部纷争随之而起，如此既会毁了他们自身，也会毁了整个城邦。

Most true, he replied.

格：千真万确。

And the only life which looks down upon the life of political ambition is that of true philosophy. Do you know of any other?

苏：对政治生活不屑一顾的，只有真正的哲学。除此之外，你还

知道其他的吗？

Indeed, I do not, he said.

格：我确实不知道了。

And those who govern ought not to be lovers of the task? For, if they are, there will be rival lovers, and they will fight.

苏：那些统治者不应该迷恋于执政，对吗？否则，他们便会成为竞争对手，彼此争斗。

No question.

格：毫无疑问。

Who then are those whom we shall compel to be guardians? Surely they will be the men who are wisest about affairs of State, and by whom the State is best administered, and who at the same time have other honours and another and a better life than that of politics?

苏：那么，我们该迫使哪些人担任城邦的守卫者呢？当然这些人要最精通城邦事务，最善于管理城邦，同时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还

有其他方面的荣誉，拥有一种比从政更好的生活，对吗？

They are the men, and I will choose them, he replied.

格：他们是合适的人选，我亦属意于他们。

And now shall we consider in what way such guardians will be produced, and how they are to be brought from darkness to light,—as some are said to have ascended from the world below to the gods?

苏：现在，我们该想想如此的守卫者会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将他们从黑暗引至光明——正如传说中的一些人从冥界升至神界，对吗？

By all means, he replied.

格：必须如此。

The process, I said, is not the turning over of an oyster-shell (In allusion to a game in which two parties fled or pursued according as an oyster-shell which was thrown into the air fell with the dark or light side uppermost.), but the turning round of a soul passing from a day which is little better than night to the true day of being, that is, the ascent from below, which we affirm to be true philosophy?

苏：此事并非像抛贝壳般容易，而是要扭转灵魂，使其从暗夜般的白昼转向存在的真正白昼，也就是说上升至我们所谓真正的哲学，对吗？

Quite so.

格：的确如此。

And should we not enquire what sort of knowledge has the power of effecting such a change?

苏：我们难道不应该研究一下，哪种知识能够导致此种转变吗？

Certainly.

格：当然。

What sort of knowledge is there which would draw the soul from becoming to being? And another consideration has just occurred to me: You will remember that our young men are to be warrior athletes?

苏：哪种知识可以引领灵魂从变化转为永恒不变呢？我刚刚想到

了另外一件事：你该记得，我们的年轻人将成为强健的勇士，对吗？

Yes, that was said.

格：对，我们如此说过。

Then this new kind of knowledge must have an additional quality?

苏：那么，此种新知识必须具备另外一种特性吗？

What quality?

格：什么特性？

Usefulness in war.

苏：军事实用性。

Yes, if possible.

格：是的，如果可能的话。

There were two parts in our former scheme of education, were there not?

苏：我们之前讲过，教育计划有两部分组成，难道不是吗？

Just so.

格：正是如此。

There was gymnastic which presided over the growth and decay of the body, and may therefore be regarded as having to do with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

苏：体育关系到人体的成长与衰弱，因此也被认为与生与灭有关，对吗？

True.

格：对。

Then that is not the knowledge which we are seeking to discover?

苏：那么它不就是我们正在寻求的知识吗？

No.

格：不是。

But what do you say of music, which also entered to a certain extent into our former scheme?

苏：那么你认为音乐如何呢？音乐亦构成了我们之前教育计划的一部分。

Music, he said, as you will remember, was the counterpart of gymnastic, and trained the guardians by the influences of habit, by harmony making them harmonious, by rhythm rhythmical, but not giving them science; and the words, whether fabulous or possibly true, had kindred elements of rhythm and harmony in them. But in music there was nothing which tended to that good which you are now seeking.

格：你知道，音乐是与体育相对的，它通过习惯来训练守卫者，以和声使之取得和谐，以韵律使之优雅得体，但不会教授他们科学；其文辞，无论虚构的或是可能真实的，皆具有类似的韵律和声元素。但是，音乐中并不存在你正在找寻的知识。

You are most accurate, I said, in your recollection; in music there certainly was nothing of the kind. But what branch of knowledge is there, my dear Glaucon, which is of the desired nature; since all the useful arts were reckoned mean by us?

苏：你的记忆极其准确；音乐中当然不存在此类知识，但既然我们前面说过所有实用的技艺都是低贱的，那么亲爱的格劳孔，哪种学科具有我们渴望的那种性质呢？

Undoubtedly; and yet if music and gymnastic are excluded, and the arts are also excluded, what remains?

格：确实如此。但是如果音乐、体操不属于这类知识，各种技艺亦不属于，那么还剩下什么学科了呢？

Well, I said, there may be nothing left of our special subjects; and then we shall have to take something which is not special, but of universal application.

苏：哦，我们的那些专业的学科皆不属于此类知识；那么，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非专业的、广泛适用的学科。

What may that be?

格：那会是什么呢？

A something which all arts and sciences and intelligences use in common, and which every one first has to learn among the elements of education.

苏：某种所有技艺、科学和思想都会使用到的知识，某种所有人都要在教育中最先掌握的知识。

What is that?

格：那是什么？

The little matter of distinguishing one, two, and three—in a word, number and calculation:—do not all arts and sciences necessarily partake of them?

苏：区分一、二、三的小伎俩——换句话说，便是数字和计算。难道不是所有的技艺和科学都必然会用到它们吗？

Yes.

格：是的。

Then the art of war partakes of them?

苏：那么，军事会涉及它们吗？

To be sure.

格：当然会。

Then Palamedes, whenever he appears in tragedy, proves Agamemnon ridiculously unfit to be a general. Did you never remark how he declares that he had invented number, and had numbered the ships and set in array the ranks of the army at Troy; which implies that they had never been numbered before, and Agamemnon must be supposed literally to have been incapable of counting his own feet—how could he if he was ignorant of number? And if that is true, what sort of general must he have been?

苏：因此在悲剧中，每当帕拉墨得斯上场，阿伽门农便都成了可笑的、蹩脚的将军。你可曾注意过，帕拉墨得斯宣称说他发明了数字，在特洛伊战争中清点了船只数目并组织排列了各支队伍。这意味着他们在此之前从未清点过数目，而据说阿伽门农连数自己有几只脚都不会。如果他对数字一无所知，他怎么会担任统帅呢？果真如此的话，他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将军呢？

I should say a very strange one, if this was as you say.

格：若如你所说，我认为他一个十足怪异的将军。

Can we deny that a warrior should have a knowledge of arithmetic?

苏：军人应当具备算术知识，这一点我们能否认吗？

Certainly he should, if he is to have the smallest understanding of military tactics, or indeed, I should rather say, if he is to be a man at all.

格：军人当然要如此，这样他才会了解最起码的战术知识，抑或我会说，这样他才算作人。

I should like to know whether you have the same notion which I have of this study?

苏：我想知道，关于这门学科，你是否同我看法一致？

What is your notion?

格：你有何看法？

It appears to me to be a study of the kind which we are seeking, and which leads naturally to reflection, but never to have

been rightly used; for the true use of it is simply to draw the soul towards being.

苏：我觉得，这似乎便是我们在找寻的那种学问，它天性引人思考，但却从未得到过正确的使用，因为它真正的作用便是引导灵魂走向永恒。

Will you explain your meaning? he said.

格：可否详细解释一下呢？

I will try, I said; and I wish you would share the enquiry with me, and say 'yes' or 'no' when I attempt to distinguish in my own mind what branches of knowledge have this attracting power, in order that we may have clearer proof that arithmetic is, as I suspect, one of them.

苏：我尽力而为。我想尝试弄清楚哪些学科的知识具有这种引导灵魂的作用，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来探究，以“是”或“否”来回答我，这样我们便能更清楚地证明，算数是否如我揣测为其中之一了。

Explain, he said.

格：愿闻其详。

I mean to say that objects of sense are of two kinds; some of them do not invite thought because the sense is an adequate judge of them; while in the case of other objects sense is so untrustworthy that further enquiry is imperatively demanded.

苏：我想说，感知的对象分为两类：一类对象不会引发思考，因为凭感觉就足以做出判断；而关于另一类对象，感觉便不那么可信了，因此必须进行深入的探究。

You are clearly referring, he said, to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senses are imposed upon by distance, and by painting in light and shade.

格：显然，你指的是感知在绘画中会受到距离和明暗影响吧？

No, I said, that is not at all my meaning.

苏：不，这完全不是我所指。

Then what is your meaning?

格：那你所指为何呢？

When speaking of uninviting objects, I mean those which do

not pass from one sensation to the opposite; inviting objects are those which do; in this latter case the sense coming upon the object, whether at a distance or near, gives no more vivid idea of anything in particular than of its opposite.

苏：所谓不能唤起理性思维的对象，我指的是不会同时产生相反感觉的事物；能唤起理性思维的对象，则是能够同时产生相反感觉的事物。对于后一种事物，无论是远观或近看，感官都无法在相反的感觉中做出明确的判断。

An illustration will make my meaning clearer:—here are three fingers—a little finger, a second finger, and a middle finger.

苏：为了说明地更清晰些，下面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三根手指：小拇指、无名指和中指。

Very good.

格：很好。

You may suppose that they are seen quite close: And here comes the point.

苏：你可以认为，我们是从很近的地方来观察它们的。那么，请注意下面一点。

What is it?

格：是什么？

Each of them equally appears a finger, whether seen in the middle or at the extremity, whether white or black, or thick or thin—it makes no difference; a finger is a finger all the same. In these cases a man is not compelled to ask of thought the question what is a finger? for the sight never intimates to the mind that a finger is other than a finger.

苏：无论是位于中间还是两端，无论是白或黑、粗或细，它们中每一根似乎都是同样的手指——没有区别。手指仍旧是手指。在此情形之下，人不会被迫去询问理性思维，何为手指？因为视觉绝不会向理性思维暗示，手指是手指以外的事物。

True.

格：对。

And therefore, I said, as we might expect, there is nothing here which invites or excites intelligence.

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此种情形并不能引起或激发理性思

维。

There is not, he said.

格：确实不能。

But is this equally true of the greatness and smallness of the fingers? Can sight adequately perceive them? and is no difference made by the circumstance that one of the fingers is in the middle and another at the extremity? And in like manner does the touch adequately perceive the qualities of thickness or thinness, of softness or hardness? And so of the other senses; do they give perfect intimations of such matters? Is not their mode of operation on this wise—the sense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quality of hardness is necessarily concerned also with the quality of softness, and only intimates to the soul that the same thing is felt to be both hard and soft?

苏：但是关于手指大小，其情形亦是如此吗？视觉能够充分地感知它们的大小吗？一根手指位于中间，另一根手指位于一端，也不会产生区别吗？同样，触觉能够充分感知粗、细或软、硬等特征吗？同样，其他感官呢？关于如此问题，它们能够向灵魂做出圆满汇报吗？感官是如此运作的——负责感知坚硬的感官，一定会负责感知柔软，然后只会通知灵魂同样的东西既是软的也是硬的，难道不是吗？

You are quite right, he said.

格：你说的很对。

And must not the soul be perplexed at this intimation which the sense gives of a hard which is also soft? What, again, is the meaning of light and heavy, if that which is light is also heavy, and that which is heavy, light?

苏：灵魂接收到感官传递来的物体亦硬亦软的信息，难道不会感到困惑吗？另外，如果轻的亦是重的，重的亦是轻的，那么到底何为轻与重呢？

Yes, he said, these intimations which the soul receives are very curious and require to be explained.

格：是的，灵魂接收的这些信息很复杂，需要加以解释。

Yes, I said, and in these perplexities the soul naturally summons to her aid calculation and intelligence, that she may see whether the several objects announced to her are one or two.

苏：是啊，陷入茫然的灵魂自然会搬来救兵——计算和智慧，要弄清楚它所接收到的信息究竟是属于一个物体，还是两个物体。

True.

格：对。

And if they turn out to be two, is not each of them one and different?

苏：如果结果发现它们是两种事物，那么它们每一个难道不是单一而不同的吗？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if each is one, and both are two, she will conceive the two as in a state of division, for if there were undivided they could only be conceived of as one?

苏：如果各为一种事物，放在一起则为两种事物，那么灵魂会认为这两种事物处于分立的状态，因为如果并非分立，它们只会被认作是一种事物，对吗？

True.

格：对。

The eye certainly did see both small and great, but only in a confused manner; they were not distinguished.

苏：眼睛当然能看到大和小，但是却将两者混在一起，不加以区分。

Yes.

格：是的。

Whereas the thinking mind, intending to light up the chaos, was compelled to reverse the process, and look at small and great as separate and not confused.

苏：但是，理性要在这种纷繁无序中理出头绪，必须扭转这一过程，将大和小分开来看而不能混在一起。

Very true.

格：很正确。

Was not th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quiry 'What is great?' and 'What is small?'

苏：这难道不是关于“何为大”、“何为小”的思考的开始吗？

Exactly so.

格：正是如此。

And thus arose the distinction of the visible and the intelligible.

苏：于是便产生了“可视事物”和“可知事物”的区别。

Most true.

格：千真万确。

This was what I meant when I spoke of impressions which invited the intellect, or the reverse—those which are simultaneous with opposite impressions, invite thought; those which are not simultaneous do not.

苏：这便是我所谓“引起理性思考”与“不引起理性思考”的含义所在：与相反事物并存，则会引起理性思考；不与相反事物并存，则不会引起理性思考。

I understand, he said, and agree with you.

格：我明白了，并且同意你的观点。

And to which class do unity and number belong?

苏：那么，“一”和“数”属于哪个类别呢?

I do not know, he replied.

格：我不知道。

Think a little and you will see that what has preceded will supply the answer; for if simple unity could be adequately perceived by the sight or by any other sense, then, as we were saying in the case of the finger, there would be nothing to attract towards being; but when there is some contradiction always present, and one is the reverse of one and involves the conception of plurality, then thought begins to be aroused within us, and the soul perplexed and wanting to arrive at a decision asks 'What is absolute unity?' This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study of the one has a power of drawing and converting the mind to the contemplation of true being.

苏：只需稍加思考，你便会从之前我们的讨论中找到答案。如果

单独的“一”能够被视觉或其他感官所完全理解的话，便不能引导走向存在，正如我们前面在手指的例子中所说的；但是如果总是存在着矛盾，“一”是与自身相反的事物，包涵着多重概念，那么理性思维便会被激发，灵魂会产生困惑并为了得到答案而思考“何为一本身？”通过如此方式，对“一”的研究可以将理性思维带入到对真实存在的思考之中。

And surely, he said, this occurs notably in the case of one; for we see the same thing to be both one and infinite in multitude?

格：确实，就“一”而言，这一点表现尤其明显，因为我们看到的同一个事物既是一个又是无限多个。

Yes, I said; and this being true of one must be equally true of all number?

苏：是的，此规则适用于“一”，那么也必定同样适用于所有的数，对吗？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all arithmetic and calculation have to do with number?

苏：一切算术和计算都必须牵涉到数吗？

Yes.

格：是的。

And they appear to lead the mind towards truth?

苏：它们似乎会将理性引向真理，对吗？

Yes, in a very remarkable manner.

格：是的，很显然。

Then this is knowledge of the kind for which we are seeking, having a double use, military and philosophical; for the man of war must learn the art of number or he will not know how to array his troops, and the philosopher also, because he has to rise out of the sea of change and lay hold of true being, and therefore he must be an arithmetician.

苏：那么这便是我们要寻找的学问了，它在哲学和军事上都有用途。军人必须学会数学，否则他不知道该如何排兵布阵；哲学家必须学会数学，他必须超越变化的世界把握真实的存在，因此他必须是一

个数学家。

That is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our guardian is both warrior and philosopher?

苏：我们城邦的守护者，既是军人又是哲学家吗？

Certainly.

格：当然。

Then this is a kind of knowledge which legislation may fitly prescribe; and we must endeavour to persuade those who are to be the principal men of our State to go and learn arithmetic, not as amateurs, but they must carry on the study until they see the nature of numbers with the mind only; nor again, like merchants or retail-traders, with a view to buying or selling, but for the sake of their military use, and of the soul herself; and because this will be the easiest way for her to pass from becoming to truth and being.

苏：那么可以通过立法来规定人们学习这门知识。我们需尽全力

劝说那些未来要成为城邦栋梁的人们去学习数学。他们不是作为业余爱好来学算术，而是要坚持学习，直到仅凭理性思维便可理解数的本质。同时，他们学习算术不是要像商人或零售商那样单是为了买卖货物，他们学习是为了军事用途，为了自身的灵魂，因为这是让灵魂从变化的世界进入到真理与存在的世界的最简单途径了。

That is excellent, he said.

格：如此甚妙。

Yes, I said, and now having spoken of it, I must add how charming the science is! and in how many ways it conduces to our desired end, if pursued in the spirit of a philosopher, and not of a shopkeeper!

苏：是的，既然话已至此，我必须补充一句，这真是一门让人着迷的学科啊！如果我们以哲学家而非小商贩的立场来学习它，它可以在很多方面引导我们去实现所渴求的目标。

How do you mean?

格：此话怎讲？

I mean, as I was saying, that arithmetic has a very great and elevating effect, compelling the soul to reason about abstract

number, and rebelling against the introduction of visible or tangible objects into the argument. You know how steadily the masters of the art repel and ridicule any one who attempts to divide absolute unity when he is calculating, and if you divide, they multiply (Meaning either (1) that they integrate the number because they deny the possibility of fractions; or (2) that division is regarded by them as a process of multiplication, for the fractions of one continue to be units.), taking care that one shall continue one and not become lost in fractions.

苏：我总是认为算术有一种强大的、让灵魂上升的力量，迫使灵魂对抽象的数字进行论证，并且在论证中排斥可视或有形事物。你知道，如果有人在计算时试图分割“一”本身，那么精于算术的人们就会对其不厌其烦地反驳和嘲笑。如果你用除法，他们就用乘法，他们要让“一”永远是“一”而不会在分割中迷失。

That is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Now, suppose a person were to say to them: O my friends, what are these wonderful numbers about which you are reasoning, in which, as you say, there is a unity such as you demand, and each unit is equal, invariable, indivisible,—what would they answer?

苏：现在假设有人问他们：“哦，我的朋友，按你们的说法，存在着一种‘一’，每个‘一’之间又是相等、固定和不可分割的，那么你们

论证的这些奇妙的数字是什么啊？”他们会如何作答呢？

They would answer, as I should conceive, that they were speaking of those numbers which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thought.

格：我想他们会回答说，他们所谈论的数字只能存在于理性思考中。

Then you see that this knowledge may be truly called necessary, necessitating as it clearly does the use of the pure intelligence in the attainment of pure truth?

苏：那么，你看这种学问也许真的很必要，很明显，它在运用纯智慧去获取纯粹的真理，对吗？

Yes; that is a marked characteristic of it.

格：对，这显然是它的特色。

And have you further observed, that those who have a natural talent for calculation are generally quick at every other kind of knowledge; and even the dull, if they have had an arithmetical training, although they may derive no other advantage from it, always become much quicker than they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苏：再者，你可曾注意到，那些具有计算天赋的人通常也会快速地掌握其他的知识；即使是愚钝之人倘若接受了算术的训练，即便在其他方面没有起色，但是与自身相比总是会聪敏得多吗？

Very true, he said.

格：确实如此。

And indeed, you will not easily find a more difficult study, and not many as difficult.

苏：实际上，你很难找到比算术更难的学科了，同它并列的也并不多。

You will not.

格：的确。

And, for all these reasons, arithmetic is a kind of knowledge in which the best natures should be trained, and which must not be given up.

苏：因此，算术是那些天资最高的人应该学习且决不可放弃的一门学问。

I agree.

格：我同意。

Let this then be made one of our subjects of education. And next, shall we enquire whether the kindred science also concerns us?

苏：那么把算术定为教育的一门学科吧。下面，我们将探讨其相近学科是否亦与我们相关，好吗？

You mean geometry?

格：你指几何学？

Exactly so.

苏：正是。

Clearly, he said, we are concerned with that part of geometry which relates to war; for in pitching a camp, or taking up a position, or closing or extending the lines of an army, or any other military manoeuvre, whether in actual battle or on a march, it will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whether a general is or is not a geometrician.

格：显然，我们关心的是几何中与作战有关的部分。无论是安营扎寨、夺取阵地、集结或部署军队及任何其它的军事调动，无论是在实际的战斗还是行军中，指挥官是否懂得几何关系重大。

Yes, I said, but for that purpose a very little of either geometry or calculation will be enough; the question relates rather to the greater and more advanced part of geometry—whether that tends in any degree to make more easy the vision of the idea of good; and thither, as I was saying, all things tend which compel the soul to turn her gaze towards that place, where is the full perfection of being, which she ought, by all means, to behold.

苏：的确如此，但若仅为军事，些许的几何或算术知识就够了。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几何更广泛、更高深的用途，即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它会使善的理式更加易于辨认。如前所述，所有事物都会迫使灵魂转向最完美状态的善，无论如何，灵魂都要看到善。

True, he said.

格：是的。

Then if geometry compels us to view being, it concerns us; if becoming only, it does not concern us?

苏：如果几何学迫使我们看到存在，那么它便是我们需要的；如果它只是让我们看到了变化，那它便并非我们所需，对吗？

Yes, that is what we assert.

格：对，这便是我们的主张。

Yet anybody who has the least acquaintance with geometry will not deny that such a conception of the science is in flat contradiction to the ordinary language of geometricians.

苏：但即使是最不懂几何的人也会认为，对于该学科的如此认识，是与几何学家们通常使用的语言完全相悖的。

How so?

格：何以见得？

They have in view practice only, and are always speaking, in a narrow and ridiculous manner, of squaring and extending and applying and the like—they confuse the necessities of geometry with those of daily life; whereas knowledge is the real object of the whole science.

苏：这些人只晓得实用，狭隘而可笑，终日讲着求面积、扩大和应用等诸如此类的话，他们将几何学的必要性和这些日常应用混为一谈。但是，整个学科的真正目标却是知识。

Certainly, he said.

格：当然。

Then must not a further admission be made?

苏：我们难道不应该更进一步地达成共识吗？

What admission?

格：什么共识？

That the knowledge at which geometry aims is knowledge of the eternal, and not of aught perishing and transient.

苏：即几何学研究的乃是永恒的知识，而非幻灭及转瞬即逝的事物。

That, he replied, may be readily allowed, and is true.

格：可以这么说，的确如此。

Then, my noble friend, geometry will draw the soul towards truth, and create the spirit of philosophy, and raise up that which is now unhappily allowed to fall down.

苏：那么，我亲爱的朋友，几何学会让心灵靠近真实，产生哲学精神并挽救那正在痛苦堕落的灵魂。

Nothing will be more likely to have such an effect.

格：最有可能产生如此效果的学问，非几何莫属。

Then nothing should be more sternly laid down than that the inhabitants of your fair city should by all means learn geometry. Moreover the science has indirect effects, which are not small.

苏：因此，我们需要制定最严格的规定，使得你们理想城邦中的居民务必学习几何学。此外，几何学有着非同小可的、间接的作用。

Of what kind?he said.

格：什么作用？

There are the military advantages of which you spoke, I said; and in all departments of knowledge, as experience proves, any one who has studied geometry is infinitely quicker of apprehension than one who has not.

苏：你说过几何在军事上的用处，此外经验证明，在所有学科领域，学习过几何学的人无疑要比未学过几何的人具有更敏锐的领悟力。

Yes indeed, he said, there is an infinit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格：是的，的确如此。两者固不可同日而语。

Then shall we propose this as a second branch of knowledge which our youth will study?

苏：那么，我们可否提议将几何设为我们的年轻人应该学习的又一门学科呢？

Let us do so, he replied.

格：我们就这么定吧。

And suppose we make astronomy the third—what do you say?

苏：如果我们把天文学定为第三门学科，你认为如何？

I am strongly inclined to it, he said; the observation of the seasons and of months and years is as essential to the general as it is to the farmer or sailor.

格：我非常同意。对季节和年、月的观察，无论是对农民、船员，还是对于公众来说，都至关重要。

I am amused, I said, at your fear of the world, which makes you guard against the appearance of insisting upon useless studies; and I quite admit the difficulty of believing that in every man there is an eye of the soul which, when by other pursuits lost and dimmed, is by these purified and re-illumined; and is more precious far than ten thousand bodily eyes, for by it alone is truth seen. Now there are two classes of persons: one class of those who will agree with you and will take your words as a revelation; another class to whom they will be utterly unmeaning, and who will naturally deem them to be idle tales, for they see no sort of profit which is to be obtained from them. And therefore you had better decide at once with which of the two you are proposing to argue. You will very likely say with neither, and that your chief aim in carrying on the argument is your own impr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you do not grudge to others any benefit which they may receive.

苏：真有趣，你害怕公众，所以一直提防不敢建议设立一些无用的学科。我承认去相信每个人都有一只灵魂的眼睛确属不易。如果这只眼睛因从事其他事务而失明或暗淡无光，但是由于学了我们提议的这些学科便会被净化而重新焕发光彩；它比我们的肉眼珍贵一万倍，因为人们单凭它便可发现真理。现在有两类人：一类人同意你的观点，并视你的话为至理名言；另一类人认为你的话毫无意义，当然也会视之为无聊的闲话，因为他们认为它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因此，你最好立即决定要同哪一类人辩论。你可能会说哪一类都不想，你论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自我提升。同样，你也不会去妒忌他们可能获得的好处。

I think that I should prefer to carry on the argument mainly on my own behalf.

格：我想，我更倾向于主要为了我个人继续进行论证。

Then take a step backward, for we have gone wrong in the order of the sciences.

苏：然后我们要稍微后退一点，因为我们弄错了这些学科的顺序。

What was the mistake? he said.

格：有何错误？

After plane geometry, I said, we proceeded at once to solids in revolution, instead of taking solids in themselves; whereas after the second dimension the third,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cubes and dimensions of depth, ought to have followed.

苏：在平面几何之后，我们尚未讨论立体图形本身，便马上开始谈运动立体。然而，在二维之后应是关于立方体以及具有厚度物体的三维空间的讨论。

That is true, Socrates; but so little seems to be known as yet about these subjects.

格：是的，苏格拉底，但是对于这些学科，我们目前知之甚少。

Why, yes, I said, and for two reasons:—in the first place, no government patronises them; this leads to a want of energy in the pursuit of them, and they are difficult; in the second place, students cannot learn them unless they have a director. But then a director can hardly be found, and even if he could, as matters now stand, the students, who are very conceited, would not attend to him. That, however, would be otherwise if the whole State became the director of these studies and gave honour to them; then disciples would want to come, and there would be continuous and earnest search, and discoveries would be made; since even now, disregarded as they are by the world, and maimed of their fair proportions, and although none of their votaries can tell the use of them, still these studies force their way by their natural charm, and very likely, if they had the help of the State, they would some day

emerge into light.

苏：唉，是啊，原因有二：首先，政府不扶植这些学科，导致学科学习动力不足，同时此类学科不易学习；其次，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学生无法学习它们。但良师难求，即便寻得良师，就目前情况看来，这些自视甚高的学子们也不会虚心求学的。但是如果整个城邦都来支持、推崇这些学科，情况就大不同了。接着便会有求学者前来，进行坚持不懈、执著严谨的研究，成果也将层出不穷。现如今，世人轻视这些学科，它们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研习者也说不清其作用，即便如此，学科研究还是以自身固有的魅力奋力前行，并且一旦得到城邦的帮助，有朝一日定会大放异彩。

Yes, he said, there is a remarkable charm in them. But I do not clearly understand the change in the order. First you began with a geometry of plane surfaces?

格：是的，它们确实魅力非凡。但是，关于讨论顺序的变化，我不是很清楚。你先谈论的是平面几何学，对吗？

Yes, I said.

苏：对。

And you placed astronomy next, and then you made a step backward?

格：此外，你把天文学作为第三门必修学科，然后却想把它调整为第四门必修学科了，是吗？

Yes, and I have delayed you by my hurry; the ludicrous state of solid geometry, which, in natural order, should have followed, made me pass over this branch and go on to astronomy, or motion of solids.

苏：是的，我欲速则不达。通常立体几何应放在平面几何之后学习，但是立体几何的尴尬处境，迫使我舍弃了几何的这一分支而直接跃到了天文学，或者叫立体几何的运动形式。

True, he said.

格：对。

Then assuming that the science now omitted would come into existence if encouraged by the State, let us go on to astronomy, which will be fourth.

苏：那么，假定这门此时受忽视的科学，假以城邦的扶植便会从无到有，让我们还是继续讨论第四门科学——天文学吧。

The right order, he replied. And now, Socrates, as you rebuked the vulgar manner in which I praised astronomy before, my praise

shall be given in your own spirit. For every one, as I think, must see that astronomy compels the soul to look upwards and leads us from this world to another.

格：合理的排序。苏格拉底，你曾批评说我对天文学的赞美很是庸俗，那么现在我将用你的方式来赞美天文学。众所周知，天文学迫使灵魂仰视，并带领我们从尘世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Every one but myself, I said; to every one else this may be clear, but not to me.

苏：唯独我不以为然。在所有其他人看来，这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对我而言，却并非如此。

And what then would you say?

格：那么你有何看法？

I should rather say that those who elevate astronomy into philosophy appear to me to make us look downwards and not upwards.

苏：我宁愿认为，那些将天文学上升为哲学的人们，似乎是在让我们俯视而非仰视。

What do you mean? he asked.

格：此话怎讲？

You, I replied, have in your mind a truly sublime conception of our knowledge of the things above. And I dare say that if a person were to throw his head back and study the fretted ceiling, you would still think that his mind was the percipient, and not his eyes. And you are very likely right, and I may be a simpleton: but, in my opinion, that knowledge only which is of being and of the unseen can make the soul look upwards, and whether a man gapes at the heavens or blinks on the ground, seeking to learn some particular of sense, I would deny that he can learn, for nothing of that sort is matter of science; his soul is looking downwards, not upwards, whether his way to knowledge is by water or by land, whether he floats, or only lies on his back.

苏：关于我们对天上事物的认识，你的看法确实极端而盲目。我敢说，如果有人仰起头研究网格状的天花板，你仍然会说此人在使用其敏锐的心智而非其肉眼。或许你是对的，我可能有些愚钝。但是以我看来，只有关于存在、关于不可见物体的知识才会使灵魂仰视。一个人为了认识某种感官可见的事物，无论他是在凝视天宇还是在俯瞰大地，我都不认为他能够有所收获，因为这里根本没有科学。无论走水路还是陆路，无论他是漂浮着还是仰卧着，他的灵魂都是在俯视，而非仰视。

I acknowledge, he said, the justice of your rebuke. Still, I should like to ascertain how astronomy can be learned in any

manner more conducive to that knowledge of which we are speaking?

格：我承认，你的批评很有道理。但是，我还是想弄清楚，如何学习天文学才能更有助于获得我们所说的知识呢？

I will tell you, I said: The starry heaven which we behold is wrought upon a visible ground, and therefore, although the fairest and most perfect of visible things, must necessarily be deemed inferior far to the true motions of absolute swiftness and absolute slowness, which are relative to each other, and carry with them that which is contained in them, in the true number and in every true figure.

苏：我来告诉你：我们所见的星空是可见的，因此即使是最美好、最无可挑剔的可视的事物，也必定被认为远不及那些真实的、有着绝对的快和绝对的慢的运动天体。这些运动的天体有着真实的数目和真实的形状，彼此间相互关联，并且带动着它们所包含的事物一起运动。

Now, these are to be apprehended by reason and intelligence, but not by sight.

现在，这些要用理性和智慧而非肉眼来理解。

True, he replied.

格：对。

The spangled heavens should be used as a pattern and with a view to that higher knowledge; their beauty is like the beauty of figures or pictures excellently wrought by the hand of Daedalus, or some other great artist, which we may chance to behold; any geometrician who saw them would appreciate the exquisiteness of their workmanship, but he would never dream of thinking that in them he could find the true equal or the true double, or the truth of any other proportion.

苏：以闪烁的星空为模型，可以获得更高深的知识。星空的美就像是戴达罗斯或其他伟大的艺术家所精心创作的、我们难得一见的雕像和图画一样。任何几何学家在仰望星空时都会赞叹其精美的构图，但却从未梦想过在星空中他会发现关于相等、加倍或其他比例关系之类的真理。

No, he replied, such an idea would be ridiculous.

格：他不会，如此想法实在荒谬。

And will not a true astronomer have the same feeling when he looks at the movements of the stars? Will he not think that heaven and the things in heaven are framed by the Creator of them in the most perfect manner? But he will never imagine that the proportions of night and day, or of both to the month, or of the

month to the year, or of the stars to these and to one another, and any other things that are material and visible can also be eternal and subject to no deviation—that would be absurd; and it is equally absurd to take so much pains in investigating their exact truth.

苏：那么当一位真正的天文学家观察星体运行时，难道不会有同样的感受吗？难道他不会认为造物主已经将天空和天体构建得完美无缺了吗？但是，他从不会认为白昼和黑夜之间、日夜与月份之间、月份与年份之间、其他星体的周期与日月年之间、其他星体周期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其他所有物质的、可视的物体也同样是恒久且绝无偏差的，因为那是很荒唐的；要不辞辛苦地找出它们中存在的确切真理，也是同样荒唐可笑的。

I quite agree, though I never thought of this before.

格：我以前从未想到过这些，不过我同意你的说法。

Then, I said, in astronomy, as in geometry, we should employ problems, and let the heavens alone if we would approach the subject in the right way and so make the natural gift of reason to be of any real use.

苏：如果我们要正确地研究天文学，使我们的推理天赋真正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对待天文学，我们就要像研究几何学那样运用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暂时不要理会天空了。

That, he said, is a work infinitely beyond our present astronomers.

格：我们当代的天文学家完全无法胜任如此一项任务。

Yes, I said; and there are many other things which must also have a similar extension given to them, if our legislation is to be of any value. But can you tell me of any other suitable study?

苏：是的。若让我们的立法具有价值，还须以同样的方式扩展到很多其他的学科领域。你能提出其他合适的学科吗？

No, he said, not without thinking.

格：不能，我需要时间好好想想。

Motion, I said, has many forms, and not one only; two of them are obvious enough even to wits no better than ours; and there are others, as I imagine, which may be left to wiser persons.

苏：运动的形式不止一种而是很多。其中有两种形式很明显，即使像我们这般智识的人也会如此认为。至于其他的形式，我认为还是留给智识更高的人去研究吧。

But where are the two?

格：哪两种形式呢？

There is a second, I said, which is the counterpart of the one already named.

苏：一种是已经提到的天文学，第二种则与之相对。

And what may that be?

格：那会是什么？

The second, I said, would seem relatively to the ears to be what the first is to the eyes; for I conceive that as the eyes are designed to look up at the stars, so are the ears to hear harmonious motions; and these are sister sciences—as the Pythagoreans say, and we, Glaucon, agree with them?

苏：第二种同耳朵的关系，正如第一种与眼睛的关系。我认为眼睛是为了观看天体而生，同样，耳朵是为了听和谐的声音而存在。正如毕达哥拉斯派所主张的那样，此二者为兄弟学科。格劳孔，我们同意他们的观点吗？

Yes, he replied.

格：是的。

But this, I said, is a laborious study, and therefore we had better go and learn of them; and they will tell us whether there are any other applications of these sciences.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not lose sight of our own higher object.

苏：但是此项研究异常艰苦，因此我们最好去了解一下毕达哥拉斯派的意见，他们会告诉我们是否这些学科有其他方面的应用。同时，我们务必不要忘记我们更重要的目标。

What is that?

格：什么目标？

There is a perfection which all knowledge ought to reach, and which our pupils ought also to attain, and not to fall short of, as I was saying that they did in astronomy. For in the science of harmony, as you probably know, the same thing happens. The teachers of harmony compare the sounds and consonances which are heard only, and their labour, like that of the astronomers, is in vain.

苏：一切知识都应达到一种完美境界，我们培养的学生也应达到这种完美境界，而不应该存在缺欠，不该有之前所说的类似于天文学方面的缺欠。你也许知道，在和声学方面，也发生同样的事情。教授和声的老师们只是专注于把声响与耳朵所能闻的和声进行比较，他们的辛苦劳作无异于那些天文学家，皆为徒劳而无功。

Yes, by heaven! he said; and 'tis as good as a play to hear them talking about their condensed notes, as they call them; they put their ears close alongside of the strings like persons catching a sound from their neighbour's wall—one set of them declaring that they distinguish an intermediate note and have found the least interval which should be the unit of measurement; the others insisting that the two sounds have passed into the same—either party setting their ears before their understanding.

格：天啊，的确！听他们谈论所谓密密麻麻的音符，就像看戏一样可笑；他们把耳朵贴近琴弦，好像是伏在邻居的墙上偷听——一群人会宣称，他们听出了一个中间的音符，并发现了作为计量单位的最小音程；另一些人则坚持说这两个音是相同的——讨论双方都是宁信耳朵而不相信理智。

You mean, I said, those gentlemen who tease and torture the strings and rack them on the pegs of the instrument: I might carry on the metaphor and speak after their manner of the blows which the plectrum gives, and make accusations against the strings, both of backwardness and forwardness to sound; but this would be tedious, and therefore I will only say that these are not the men, and that I am referring to the Pythagoreans, of whom I was just now proposing to enquire about harmony. For they too are in error,

like the astronomers; they investigate the numbers of the harmonies which are heard, but they never attain to problems—that is to say, they never reach the natural harmonies of number, or reflect why some numbers are harmonious and others not.

苏：你说的是那些戏弄并折磨琴弦、在琴栓上拷问琴弦的人。我可以继续将此比喻说下去，说这些人用琴拨击打琴弦，指责琴弦发声过早或过晚。但是这么讲下去很无趣，因此我要讲的并非这些人，而是毕达哥拉斯派，刚刚我还在提议向他们询问有关和声的事情。毕达哥拉斯派的人像天文学家一样犯错误。他们研究听到的和声数量却从来没有触及到问题本身。换句话说，他们从未达到数字的自然和谐，也从未思考为何某些数和谐，而其他数则并非如此。

That, he said, is a thing of more than mortal knowledge.

格：此为凡人智慧所不能及者。

A thing, I replied, which I would rather call useful; that is, if sought after with a view to the beautiful and good; but if pursued in any other spirit, useless.

苏：我宁愿说这是一门有用的学问。换言之，如果以美和善为目的，这门学问便是有用的。但是如果为了其他目的，该学科便毫无裨益。

Very true,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Now, when all these studies reach the point of inter-communion and connection with one another, and come to be considered in their mutual affinities, then, I think, but not till then, will the pursuit of them have a value for our objects; otherwise there is no profit in them.

苏：如果所有的研究都能够实现互相渗透、互相关联，并且了解了相互之间的亲缘关系，那么我认为那时针对这些学科的研究便会对我们实现目标有益，否则便毫无益处。

I suspect so; but you are speaking, Socrates, of a vast work.

格：我以为如此。但是苏格拉底，你所说的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What do you mean? I said; the prelude or what? Do you not know that all this is but the prelude to the actual strain which we have to learn? For you surely would not regard the skilled mathematician as a dialectician?

苏：你指的是什么？是前奏还是什么？这一切不过是我们必学的真正曲调的前奏而已，你难道不知道吗？你当然不会将卓越的数学家视为辩证学家吧？

Assuredly not, he said; I have hardly ever known a mathematician who was capable of reasoning.

格：当然不会。我几乎从未见过善于推理的数学家。

But do you imagine that men who are unable to give and take a reason will have the knowledge which we require of them?

苏：你认为，那些既不会提出论证、也不理解论证的人们，会具有我们所要求的知识吗？

Neither can this be supposed.

格：绝无可能。

And so, Glaucon, I said, we have at last arrived at the hymn of dialectic. This is that strain which is of the intellect only, but which the faculty of sight will nevertheless be found to imitate; for sight, as you may remember, was imagined by us after a while to behold the real animals and stars, and last of all the sun himself. And so with dialectic; when a person starts on the discovery of the absolute by the light of reason only, and without any assistance of sense, and perseveres until by pure intelligence he arrives at the perception of the absolute good, he at last finds himself at the end of the intellectual world, as in the case of sight at the end of the visible.

苏：至此，格劳孔，我们终于说到了赞美诗的正文部分——辩证法。它只属于理性的范畴，但是视觉感官经常会去加以模仿。你或许还记得，我们曾认为视觉会见到真正的动物和星体，最终见到太阳本身。辩证法和视觉一样。当一个人仅凭辩证推理而不依靠任何感官开始发现事物本身，单纯依靠理智而坚持不懈，直到获得了善本身。此时他发现自己位于理性世界的尽头，正如视觉最终达到了可视世界的尽头。

Exactly, he said.

格：正是。

Then this is the progress which you call dialectic?

苏：这便是你所谓的辩证的过程吗？

True.

格：对。

But the release of the prisoners from chains, and their translation from the shadows to the images and to the light, and the ascent from the underground den to the sun, while in his presence they are vainly trying to look on animals and plants and the light of the sun, but are able to perceive even with their weak eyes the

images in the water (which are divine), and are the shadows of true existence (not shadows of images cast by a light of fire, which compared with the sun is only an image)—this power of elevating the highest principle in the soul to the contemplation of that which is best in existence, with which we may compare the raising of that faculty which is the very light of the body to the sight of that which is brightest in the material and visible world—this power is given, as I was saying, by all that study and pursuit of the arts which has been described.

苏：囚徒们从枷锁中解放出来，从阴影转向投射阴影的影像再到光亮，从地下洞穴到太阳光下，虽然此时他们还看不清动物、植物和太阳，但是却能够用微弱的视力感受到水中的（神所创造）影像和真实物体的投影（不是火光映衬下阴影，火光与太阳相比只是影像）。这种力量会使灵魂的最高标准得以提升，开始注重最完美的状态，提升的过程好像是人体的视觉器官转向了物质和可视世界中最明亮的光。我曾说过，这种力量是后天的，可以通过之前所提及的一些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而获得。

I agree in what you are saying, he replied, which may be hard to believe, yet,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is harder still to deny. This, however, is not a theme to be treated of in passing only, but will have to be discussed again and again. And so, whether our conclusion be true or false, let us assume all this, and proceed at once from the prelude or preamble to the chief strain (A play upon the Greek word, which means both 'law' and 'strain.'), and describe that in like manner. Say, then, what is the nature and what are the divisions of dialectic, and what are the paths which lead thither; for these paths will also lead to our final rest.

格：我同意你的说法，虽然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但另一方面来看却是更难加以否定。但是这并非是一个可以一带而过的主题，而是要反复地加以讨论。因此，无论我们的结论正确与否，我们姑且认定这些，然后马上从前奏或序文部分进入到正文，对正文加以同样的讨论。也就是说，我们要讨论辩证法的性质和分支，以及学习辩证法的途径——这些途径会把我们带至最后的终点，对吗？

Dear Glaucon, I said,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follow me here, though I would do my best, and you should behold not an image only but the absolute truth, according to my notion. Whether what I told you would or would not have been a reality I cannot venture to say; but you would have seen something like reality; of that I am confident.

苏：亲爱的格劳孔，我会尽力地解释，而你将看到绝对的真实而非单纯的影像，但是我想至此你无法再跟上我的思路了。不管我曾对你所说的是否真实，我都不敢断言。但是你一定已经见过某些类似实在的事物了，对此我深信不疑。

Doubtless, he replied.

格：毋庸置疑。

But I must also remind you, that the power of dialectic alone can reveal this, and only to one who is a disciple of the previous sciences.

苏：但是我也必须提醒你，只有凭辩证法才能让研习过之前诸学科的人们（且只有这些人）去辨识实在。

Of that assertion you may be as confident as of the last.

格：对此，我同样深信不疑。

And assuredly no one will argue that there is any other method of comprehending by any regular process all true existence or of ascertaining what each thing is in its own nature; for the arts in general are concerned with the desires or opinions of men, or are cultivated with a view to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r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such productions and constructions; and as to the mathematical sciences which, as we were saying, have some apprehension of true being—geometry and the like—they only dream about being, but never can they behold the waking reality so long as they leave the hypotheses which they use unexamined, and are unable to give an account of them. For when a man knows not his own first principle, and when the conclusion and intermediate steps are also constructed out of he knows not what, how can he imagine that such a fabric of convention can ever become science?

苏：没有人会认为有其他的办法、其他的步骤可以来理解事物的真实存在，或确定每个事物的自身属性。一般的学科或者与人们的欲望和观点有关，或者都是为了生产、建设或维持生产、建设而被扶植。至于数学，如前所述，它和几何学一样对真实存在有某种认识，但他们只是对真实存在加以想象，如果数学所依赖的假设不能通过验证，那么它将永远见不到真正的实在，也无法对实在进行描述。因为

如果人们不清楚其最主要的原则，结论和中间的步骤也都是他所不了解的，那么他如何能指望这种常规惯例的组合物会变为科学呢？

Impossible, he said.

格：不可能。

Then dialectic, and dialectic alone, goes directly to the first principle and is the only science which does away with hypotheses in order to make her ground secure; the eye of the soul, which is literally buried in an outlandish slough, is by her gentle aid lifted upwards; and she uses as handmaids and helpers in the work of conversion, the sciences which we have been discussing. Custom terms them sciences, but they ought to have some other name, implying greater clearness than opinion and less clearness than science: and this, in our previous sketch, was called understanding. But why should we dispute about names when we have realities of such importance to consider?

苏：辩证法，并且唯有辩证法，直触第一原则，并且是唯一的一门摒弃假设以求基础之牢固的学科。辩证法轻轻一拉，深埋于淤泥中的灵魂之眼便离地而起。辩证法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诸学科作为侍从或助手，协助灵魂完成转变。习惯上我们称这些学科为科学，但我们应该另寻其他称谓。这个新的称谓要比“意见”一词更清晰，比“科学”一词稍模糊。在我们之前的讨论中，我们曾称其为“理智”。但是有如此重要的问题等待我们去考虑，我们又何必要为了称谓而争论呢？

Why indeed, he said, when any name will do which expresses the thought of the mind with clearness?

格：的确，只要能清楚地表达理性的思想，任何称谓都无所谓。

At any rate, we are satisfied, as before, to have four divisions; two for intellect and two for opinion, and to call the first division science, the second understanding, the third belief, and the fourth perception of shadows, opinion being concerned with becoming, and intellect with being; and so to make a proportion:—As being is to becoming, so is pure intellect to opinion. And as intellect is to opinion, so is science to belief, and understanding to the perception of shadows.But let us defer the further correlation and subdivision of the subjects of opinion and of intellect, for it will be a long enquiry, many times longer than this has been.

苏：不论如何，我们很高兴在之前已经分成了四部分：两部分属于理性，两部分属于意见，并且将第一部分称为科学，第二部分称为理智，第三部分称为信念，第四部分称为想象。意见是关于变化的，理性是关于存在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理性之于意见，正如存在之于变化。科学之于信念，理智之于想象，正如理性之于意见。对意见和理性的各个学科间的关联和细分留到以后再说吧。这将会是个漫长的探讨，要比我们之前的讨论长很多倍。

As far as I understand, he said, I agree.

格：就我所理解的而言，我赞同。

And do you also agree, I said, in describing the dialectician as one who attains a conception of the essence of each thing? And he who does not possess and is therefore unable to impart this conception, in whatever degree he fails, may in that degree also be said to fail in intelligence? Will you admit so much?

苏：你是否也同样认同，辩证学家是某个掌握所有事物本质的人呢？一个不懂得因此也无法说清楚事物本质的人，他的任何失败都会被说成是因为缺乏理性，是吗？对此，你赞同吗？

Yes, he said; how can I deny it?

格：是的，我如何能否定呢？

And you would say the same of the conception of the good? Until the person is able to abstract and define rationally the idea of good, and unless he can run the gauntlet of all objections, and is ready to disprove them, not by appeals to opinion, but to absolute truth, never faltering at any step of the argument—unless he can do all this, you would say that he knows neither the idea of good nor any other good; he apprehends only a shadow, if anything at all, which is given by opinion and not by science;—dreaming and slumbering in this life, before he is well awake here, he arrives at the world below, and has his final quietus.

苏：你认为不懂得善的人亦是如此吗？如果一个人不能将善的理

式抽象化并对其做理性的定义，不能经受所有批评意见的考验，不愿意准备通过绝对的真理而非意见来进行反驳，无法做到在论辩中毫不退缩，那么你便会认为此人既不懂善的理式，也不晓得任何善的事物。他理解的不过是源于意见而非科学的影子而已。这种人一生如在梦乡，还没醒便到了地府，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In all that I should most certainly agree with you.

格：我完全赞同你的说法。

And surely you would not have the children of your ideal State, whom you are nurturing and educating—if the ideal ever becomes a reality—you would not allow the future rulers to be like posts (Literally 'lines,' probably the starting-point of a race-course.), having no reason in them, and yet to be set in authority over the highest matters?

苏：你必然不会允许你所养育和教导的理想国中的孩子们（如果有一天理想国变为了现实）——那些未来的统治者们像标杆一样，毫无理性却身居高位、定夺要事，是吗？

Certainly not.

格：绝不允许。

Then you will make a law that they shall have such an education as will enable them to attain the greatest skill in asking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苏：那么你会制定法律，规定他们务必接受培养提出并回答问题这一最高技能的教育吗？

Yes, he said, you and I together will make it.

格：是的，你我将一同制定相关法律。

Dialectic, then, as you will agree, is the coping-stone of the sciences, and is set over them; no other science can be placed higher—the nature of knowledge can no further go?

苏：那么你同意辩证法位于所有学科的最顶端，高于其他学科，任何学科都无法超越它——知识的本质决定其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吗？

I agree, he said.

格：我同意。

But to whom we are to assign these studies, and in what way they are to be assigned, are questions which remain to be

considered.

苏：但是仍需我们考虑的问题是，要选定哪些人来学习，以及该如何甄选他们，对吗？

Yes, clearly.

格：是的，显然如此。

You remember, I said, how the rulers were chosen before?

苏：你可记得之前所说的挑选统治者的方法吗？

Certainly, he said.

格：当然记得。

The same natures must still be chosen, and the preference again given to the surest and the bravest, and, if possible, to the fairest; and, having noble and generous tempers, they should also have the natural gifts which will facilitate their education.

苏：我们仍然要挑选具有那些品质的人。最好挑选那些最坚定、

最勇敢，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最公正的人。他们具有高贵、宽厚的性情以及善于学习的天赋。

And what are these?

格：哪些天赋呢？

Such gifts as keenness and ready powers of acquisition; for the mind more often faints from the severity of study than from the severity of gymnastics: the toil is more entirely the mind's own, and is not shared with the body.

苏：比如敏锐、好学的天赋。学习之苦要比体育锻炼之苦，更加令灵魂感到畏惧：这种痛苦完全是灵魂上的，而与肉体无关。

Very true, he replied.

格：的确如此。

Further, he of whom we are in search should have a good memory, and be an unwearied solid man who is a lover of labour in any line; or he will never be able to endure the great amount of bodily exercise and to go through all the intellectual discipline and study which we require of him.

苏：此外，我们所寻觅之人应该强于记忆、不知疲倦、身强体健。他应该热爱一切意义上的劳动，否则他将无法承受巨大的体力消耗，无法完成我们所要求的全部学习和训练。

Certainly, he said; he must have natural gifts.

格：当然，他必须具备天赋。

The mistake at present is, that those who study philosophy have no vocation, and this, as I was before saying, is the reason why she has fallen into disrepute: her true sons should take her by the hand and not bastards.

苏：目前的错误在于，那些哲学研究者不具备应有的素质。如我之前所述，此即为哲学声名狼藉的原因：与她牵手的应是她真正的儿子，而非出身不正统的冒牌货。

What do you mean?

格：此话怎讲？

In the first place, her votary should not have a lame or halting industry—I mean, that he should not be half industrious and half idle: as, for example, when a man is a lover of gymnastic and hunting, and all other bodily exercises, but a hater rather than a

lover of the labour of learning or listening or enquiring. Or the occupation to which he devotes himself may be of an opposite kind, and he may have the other sort of lameness.

苏：首先，热爱哲学的人不应该在学业某方面有缺陷。我是指他不应该在一些事情上勤奋而在其他事情上懒散。就比如有某个人，他喜欢体育、打猎和所有的体力运动，但却憎恶学习、听讲或研究。或者反之，他专注于学习，那么他可能在体育上表现得很懈怠。

Certainly, he said.

格：当然。

And as to truth, I said, is not a soul equally to be deemed halt and lame which hates voluntary falsehood and is extremely indignant at herself and others when they tell lies, but is patient of involuntary falsehood, and does not mind wallowing like a swinish beast in the mire of ignorance, and has no shame at being detected?

苏：同样，对于真相，如果一个人憎恨有意的造假，绝不原谅自己或他人说谎，但此人却对无意识的造假表示宽容，不介意像猪一样在无知的泥潭中打滚，并且即使被发现也毫不羞耻，如此之人难道不会被认为存在缺陷吗？

To be sure.

格：一定会。

And, again, in respect of temperance, courage, magnificence, and every other virtue, should we not carefully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rue son and the bastard? for where there is no discernment of such qualities States and individuals unconsciously err; and the State makes a ruler, and the individual a friend, of one who, being defective in some part of virtue, is in a figure lame or a bastard.

苏：此外，对于节制，勇敢，大气等美德，我们难道不应该仔细甄别真正的儿子与伪劣的私生子吗？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辨别力，国家和个人便会无意识地犯错，会错用某个道德缺失的存在缺陷之人或伪劣的私生子做国家的统治者或个人的朋友。

That is very true, he said.

格：确实如此。

All these things, then, will have to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by us; and if only those whom we introduce to this vast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re sound in body and mind, justice herself will have nothing to say against us, and we shall be the saviour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of the State; but, if our pupils are men of another stamp, the reverse will happen, and we shall pour a still greater flood of ridicule on philosophy than she has to endure at present.

苏：因此我们务必仔细留心这一切。只有当我们挑选了身心健康的人来接受这种庞大系统的教育和训练，我们才不会触犯正义，才会成为政体和城邦的保护者。如果我们用人不善，情况就正好相反，我们会为哲学招致比现在更多的嘲讽。

That would not be creditable.

格：这便不妙了。

Certainly not, I said; and yet perhaps, in thus turning jest into earnest I am equally ridiculous.

苏：当然不妙。然而，如果我们把戏言当真，也同样够可笑的。

In what respect?

格：哪方面？

I had forgotten, I said, that we were not serious, and spoke with too much excitement. For when I saw philosophy so undeservedly trampled under foot of men I could not help feeling a sort of indignation at the authors of her disgrace: and my anger made me too vehement.

苏：我忘记了我们不过是在说笑，讲得太激动了。我一见到哲学无辜遭到人们的诽谤，便禁不住对那些令哲学蒙羞之人生气——愤怒让我言辞过于激烈了。

Indeed! I was listening, and did not think so.

格：我一直在听你讲，却并未觉得有何不妥。

But I, who am the speaker, felt that I was. And now let me remind you that, although in our former selection we chose old men, we must not do so in this. Solon was under a delusion when he said that a man when he grows old may learn many things—for he can no more learn much than he can run much; youth is the time for any extraordinary toil.

苏：但我作为讲话人，觉得自己的确如此。现在我要提醒你，虽然在之前的选拔中我们重用老者，但是在这里却万万不可如此。梭伦认为，当人们变老之时可以学会许多东西。这是错误的，因为老年人无法多学，正如他无法多行；青春年少，方是发奋用功之时。

Of course.

格：当然。

And, therefore, calculation and geometry and all the other

elements of instruction, which are a preparation for dialectic, should be presented to the mind in childhood; not, however, under any notion of forcing our system of education.

苏：那么，作为辩证法预备科目的数学、几何学和其他必学科目，都应该在人们年幼时教授给他们，并且教育不可带有任何强迫。

Why not?

格：为何不可？

Because a freeman ought not to be a slave in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of any kind. Bodily exercise, when compulsory, does no harm to the body; but knowledge which is acquired under compulsion obtains no hold on the mind.

苏：因为一个自由人不应该在获取任何知识的过程中变为奴隶。强制性的身体训练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但强制灌输的知识是不会铭记于心的。

Very true.

格：确实如此。

Then, my good friend, I said, do not use compulsion, but let early education be a sort of amusement; you will then be better able to find out the natural bent.

苏：那么，我的朋友，不要使用强制手段，而是要让早期教育成为一种娱乐，以便更好地了解到儿童的天性所在。

That is a very rational notion, he said.

格：言之有理。

Do you remember that the children, too, were to be taken to see the battle on horseback; and that if there were no danger they were to be brought close up and, like young hounds, have a taste of blood given them?

苏：你还记得前面说过，要让儿童骑在马背上观战，并在没有危险的前提下，带他们到战场，像猎犬幼崽一样尝尝血腥的味道，是吗？

Yes, I remember.

格：是的，我记得。

The same practice may be followed, I said, in all these things—labours, lessons, dangers—and he who is most at home in all of them ought to be enrolled in a select number.

苏：同样的训练可应用于所有的事情——劳动、功课、涉险，并从中精选出一定数量的各方面表现俱佳者。

At what age?

格：以多大年龄为宜？

At the age when the necessary gymnastics are over: the period whether of two or three years which passes in this sort of training is useless for any other purpose; for sleep and exercise are unpropitious to learning; and the trial of who is first in gymnastic exercis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ests to which our youth are subjected.

苏：在必要的体育训练结束的时候。这种训练大概要持续两到三年，因为睡眠和锻炼不利于学习，所以这期间做别的事情是不会有成效的。同时，先接受体育训练是对我们的年轻人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Certainly, he replied.

格：当然。

After that time those who are selected from the class of twenty years old will be promoted to higher honour, and the sciences which they learned without any order in their early education will now be brought together, and they will be able to see the natural relationship of them to one another and to true being.

苏：之后，从二十岁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佼佼者，将被授予更高的荣誉。前期教育中所学的庞杂学科现在要整合到一起，他们将能够发现诸学科相互关联，以及诸学科与事物真实存在间的关联。

Yes, he said, that is the only kind of knowledge which takes lasting root.

格：是的，这是唯一一种可以驻足生根的知识。

Yes, I said; and the capacity for such knowledge is the great criterion of dialectical talent: the comprehensive mind is always the dialectical.

苏：是的，这样的知识是用以判断人们是否具有辩证天赋的重要标准，因为只有博学、全面的思维才是辩证法的思维。

I agree with you, he said.

格：我同意你的观点。

These, I said, are the points which you must consider; and those who have most of this comprehension, and who are most steadfast in their learning, and in their military and other appointed duties, when they have arrived at the age of thirty have to be chosen by you out of the select class, and elevated to higher honour; and you will have to prove them by the help of dialectic, in order to learn which of them is able to give up the use of sight and the other senses, and in company with truth to attain absolute being: And here, my friend, great caution is required.

苏：这都是你必须要考虑的。凡是最具洞察力者、在学习、执行军事任务和其他职责时意志更为坚定者，年届三十，你便要再次将他们挑选出来，并赋予更高的荣誉。你务必要借助辩证法来甄别他们，了解他们中哪些人能够摒弃视觉和其他感官，能够跟随着真理而获知事物的绝对存在：此时，我的朋友啊，你一定要格外谨慎。

Why great caution?

格：为何要格外谨慎？

Do you not remark, I said, how great is the evil which dialectic has introduced?

苏：你难道没有注意到，辩证法所带来的恶果有多么严重吗？

What evil? he said.

格：什么恶果？

The students of the art are filled with lawlessness.

苏：学习辩证法者目无法纪。

Quite true,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Do you think that there is anything so very unnatural or inexcusable in their case? or will you make allowance for them?

苏：你认为他们的情形不正常或不可饶恕吗？抑或你会纵容他们如此吗？

In what way make allowance?

格：如何纵容？

I want you, I said, by way of parallel, to imagine a supposititious son who is brought up in great wealth; he is one of a great and numerous family, and has many flatterers. When he grows up to manhood, he learns that his alleged are not his real parents; but who the real are he is unable to discover. Can you guess how he will be likely to behave towards his flatterers and his supposed parents, first of all during the period when he is ignorant of the false relation, and then again when he knows? Or shall I guess for you?

苏：比方说，你假定一个非亲生子自幼长在富庶之家。该家族门庭显赫，人丁兴旺，他的身边有着众多的阿谀奉承者。待他长大成人，他得知所谓的父母并非亲生，而亲生父母又无从找寻。你能猜测出他在起初不知晓自己的领养身份，以及后来获知真相时，对那些奉承者和养父母的前后态度如何吗？抑或由我来给你说说我的猜测？

If you please.

格：求之不得。

Then I should say, that while he is ignorant of the truth he will be likely to honour his father and his mother and his supposed relations more than the flatterers; he will be less inclined to neglect them when in need, or to do or say anything against them; and he will be less willing to disobey them in any important matter.

苏：我认为，当初不知真相时，与那些奉承者相比，他更重视他

的养父母及亲戚。他需要他的养父母时，他不会对他们置之不理，也不会违背养父母意愿行事或出言顶撞养父母；在重大事情上，他更不愿违抗父母之命。

He will.

格：的确如此。

But when he has made the discovery, I should imagine that he would diminish his honour and regard for them, and would become more devoted to the flatterers; their influence over him would greatly increase; he would now live after their ways, and openly associate with them, and, unless he were of an unusually good disposition, he would trouble himself no more about his supposed parents or other relations.

苏：可是他一旦了解真相，我想他对养父母的敬重与关心便会减少，转而更多地关注那些阿谀奉承者；阿谀奉承者对其影响剧增；他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公开与之交往。除非他性情善良超凡，否则他不会再过问养父母或者其他亲人。

Well, all that is very probable. But how is the image applicable to the disciples of philosophy?

格：哦，这极有可能。但该比喻和学习哲学者有何关系呢？

In this way: you know that there are certain principles about justice and honour, which were taught us in childhood, and under their parental authority we have been brought up, obeying and honouring them.

苏：大致如此：你知道，在幼年时我们被教以某些关于正义和荣誉的准则，这些准则有着父母般的权威，我们在服从与尊重它们的过程中长大成人。

That is true.

格：的确如此。

There are also opposite maxims and habits of pleasure which flatter and attract the soul, but do not influence those of us who have any sense of right, and they continue to obey and honour the maxims of their fathers.

苏：此外还有一些与此相悖的、享乐的理念和习惯在煽动和蛊惑着我们的灵魂，但却无法影响我们中间有着是非观念之人，这些人继续恪守和敬重着父辈们的信条。

True.

格：对。

Now, when a man is in this state, and the questioning spirit asks what is fair or honourable, and he answers as the legislator has taught him, and then arguments many and diverse refute his words, until he is driven into believing that nothing is honourable any more than dishonourable, or just and good any more than the reverse, and so of all the notions which he most valued, do you think that he will still honour and obey them as before?

苏：现在，当人处于如此状态之时，其质疑精神问他何为公平、何为荣誉，他便用立法者所教之言作答，然后便会有众多不同的论据来反驳他的言辞，最后他只好承认荣誉等同于耻辱，正义与善等同于非正义与恶，诸如此类，他以前倍加珍视的所有信条都被颠覆。你认为他还会一如既往地尊重和信守那些信条吗？

Impossible.

格：不可能的。

And when he ceases to think them honourable and natural as heretofore, and he fails to discover the true, can he be expected to pursue any life other than that which flatters his desires?

苏：当此之时，他不再相信这些信条是受人尊敬、天经地义的，但真理又尚不为他所知，那么除了选择迎合自己心意的生活，他还会选择其他吗？

He cannot.

格：不会的。

And from being a keeper of the law he is converted into a breaker of it?

苏：他从一个守法者转变为违法者，对吗？

Unquestionably.

格：毫无疑问。

Now all this is very natural in students of philosophy such as I have described, and also, as I was just now saying, most excusable.

苏：如前所述，学习哲学者自然会有此番境遇，亦是完全可谅解的

Yes, he said; and, I may add, pitiable.

格：是的。我补充一句，亦是很可怜的。

Therefore, that your feelings may not be moved to pity about our citizens who are now thirty years of age, every care must be taken in introducing them to dialectic.

苏：因此，如果你不想让这些年届三十的公民们变得可怜的话，那么你在引导他们学习辩证法时便务必要格外谨慎。

Certainly.

格：当然。

There is a danger lest they should taste the dear delight too early; for youngsters, as you may have observed, when they first get the taste in their mouths, argue for amusement, and are always contradicting and refuting others in imitation of those who refute them; like puppy-dogs, they rejoice in pulling and tearing at all who come near them.

苏：让他们过早地品尝到成功的喜悦是很危险的。你可能注意到，这些年轻人一旦尝到了好处，便会以辩论为乐，模仿那些反驳他们的人的样子到处去否定和推翻别人。他们如小狗般乐此不疲地拖咬一切靠近之物。

Yes, he said, there is nothing which they like better.

格：是的。他们最喜欢之事，莫过于此。

And when they have made many conquests and received defeats at the hands of many, they violently and speedily get into a way of not believing anything which they believed before, and hence, not only they, but philosophy and all that relates to it is apt to have a bad nam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苏：当他们在经历了屡次获胜与落败众人之手后，便快速地陷入到对从前信仰的强烈怀疑之中，结果不但他们自身、连同哲学以及与哲学相关的事物，在世人眼中都变得声名狼藉。

Too true, he said.

格：千真万确。

But when a man begins to get older, he will no longer be guilty of such insanity; he will imitate the dialectician who is seeking for truth, and not the eristic, who is contradicting for the sake of amusement; and the greater moderation of his character will increase instead of diminishing the honour of the pursuit.

苏：但是当一个人开始变得比较老成，他便不再有如此疯狂之举；他会效仿追求真理的辩证学家，而非以逗乐嬉戏为目的的诡辩家；他会变得愈加地收敛，其事业声誉必有增而无减。

Very true,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And did we not make special provision for this, when we said that the disciples of philosophy were to be orderly and steadfast, not, as now, any chance aspirant or intruder?

苏：以往我们主张涉足哲学的人们要循规蹈矩和脚踏实地，绝非现在这群投机的野心家或擅闯哲学之辈，我们不正是在有意预防此种状况发生吗？

Very true.

格：正是如此。

Suppose, I said,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to take the place of gymnastics and to be continued diligently and earnestly and exclusively for twice the number of years which were passed in bodily exercise—will that be enough?

苏：假设以哲学学习取代体育锻炼，并持之以恒、心无旁骛地用相当于体育两倍的时间加以学习是否足够了呢？

Would you say six or four years? he asked.

格：你是说要花上六年或者四年吗？

Say five years, I replied; at the end of the time they must be sent down again into the den and compelled to hold any military or other office which young men are qualified to hold: in this way they will get their experience of life, and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trying whether, when they are drawn all manner of ways by temptation, they will stand firm or flinch.

苏：假定为五年。五年后，他们必须再次被送回地穴，并被迫担任适合年轻人的军职或其他行政职务，以此获取人生经验。同时，他们亦有机会考验自己，在各种诱惑面前是岿然不动抑或动摇退缩。

And how long is this stage of their lives to last?

格：他们人生的这一阶段，需持续多长时间？

Fifteen years, I answered; and when they have reached fifty years of age, then let those who still survive and have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in every action of their lives and in every branch of knowledge come at last to their consummation: the time has now arrived at which they must raise the eye of the soul to the universal light which lightens all things, and behold the absolute good; for that is the pattern according to which they are to order the State

and the lives of individuals, and the remainder of their own lives also; making philosophy their chief pursuit, but, when their turn comes, toiling also at politics and ruling for the public good, not as though they were performing some heroic action, but simply as a matter of duty; and when they have brought up in each generation others like themselves and left them in their place to be governors of the State, then they will depart to the Islands of the Blest and dwell there; and the city will give them public memorials and sacrifices and honour them, if the Pythian oracle consent, as demigods, but if not, as in any case blessed and divine.

苏：十五年。等到他们年届五十，那些接受住考验、精通各项事务和所有知识的人，最终获得了胜利。此时他们必须让灵魂向上注视照耀世间万物之光，并看到善的本身。他们将参照着善来管理城邦、城邦民众的生活以及自己的余生。他们以哲学为主业，但是一旦有需要，他们会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辞辛苦地参与到政治和国家管理中来。这么做并非为了显示威风而仅仅是出于责任。待到他们培养出各个年龄层次的、像他们一样的接班人并使他们成为城邦统治者时，他们就将寻得乐土定居下来。如果阿波罗神谕同意，他们会被敬为神灵，城邦将会纪念、祭祀、歌颂他们；即使不同意，他们也会获得神佑成为圣人。

You are a sculptor, Socrates, and have made statues of our governors faultless in beauty.

格：苏格拉底，你简直是位雕刻家！你已经雕刻出完美无瑕的统治者雕像了。

Yes, I said, Glaucon, and of our governesses too; for you must not suppose that what I have been saying applies to men only and not to women as far as their natures can go.

苏：是的，格劳孔，也包含女统治者们的雕像。你不要以为我刚刚所说只针对男性而不包含有天赋的女性。

There you are right, he said, since we have made them to share in all things like the men.

格：对，我们说过要让女性和男性分享一切。

Well, I said, and you would agree (would you not?) that what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State and the government is not a mere dream, and although difficult not impossible, but only possible in the way which has been supposed; that is to say, when the true philosopher kings are born in a State, one or more of them, despising the honours of this present world which they deem mean and worthless, esteeming above all things right and the honour that springs from right, and regarding justice as the greatest and most necessary of all things, whose ministers they are, and whose principles will be exalted by them when they set in order their own city?

苏：方才对城邦和政治制度的设想不只是一个梦想，虽然实现起来很难，但是也只有这一种实现方式了。换句话说，当城邦中诞生了真正的哲学家（一人或多人），这些人不屑于当世的荣誉，认为这些

荣誉卑微而毫无价值，他们敬重正义和正义赢来的名声，视正义为最重要及最必要。他们整顿自己的城邦，推崇和宣扬正义。对此，你难道会不同意吗？

How will they proceed?

格：他们该如何做？

They will begin by sending out into the country all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ity who are more than ten years old, and will take possession of their children, who will be unaffected by the habits of their parents; these they will train in their own habits and laws, I mean in the laws which we have given them: and in this way the State and constitution of which we were speaking will soonest and most easily attain happiness, and the nation which has such a constitution will gain most.

苏：他们首先将城市中所有十岁以上的居民送到乡下，他们将接管这些孩子使其不受父母习气的影响。他们将接受自己的法律和习俗，我指的是我们前面所提及的法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所提及的国家和政治体制才会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容易的方式实现繁荣昌盛，实行该政体的国家也将获益匪浅。

Yes, that will be the best way. And I think, Socrates, that you have very well described how, if ever, such a constitution might come into being.

格：是的，这将是最佳途径。此外，苏格拉底，如果确有这种政体存在的话，我想你已经很好地对其进行描述了。

Enough then of the perfect State, and of the man who bears its image—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seeing how we shall describe him.

苏：关于理想国以及与该国相对应的人，我们已经说得很充分了，不难理解我们需要怎样的人。

There is no difficulty, he replied; and I agree with you in thinking that nothing more need be said.

格：很好理解。我也同样认为论述可以结束。

BOOK VIII.

第八卷

SOCRATES—GLAUCON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格劳孔

And so, Glaucon, we have arrived at the conclusion that in the perfect State wives and children are to be in common; and that all education and the pursuits of war and peace are also to be common, and the best philosophers and the bravest warriors are to be their kings?

苏：那么，格劳孔，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即在理想城邦中妇女和儿童应为公有，所有的教育以及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各项事宜也为全体公有，并且最优秀的哲学家和最勇敢的武士们将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对吗？

That, replied Glaucon, has been acknowledged.

格：这一点已得到认可。

Yes, I said; and we have further acknowledged that the

governors, when appointed themselves, will take their soldiers and place them in houses such as we were describing, which are common to all, and contain nothing private, or individual; and about their property, you remember what we agreed?

苏：是的。我们也曾认可，统治者一经任命，将带领士兵进驻我们所描述过的那种营房中。营房亦属公有，里面没有任何私有或个人物品。关于财产，你记得我们所达成的共识吗？

Yes, I remember that no one was to have any of the ordinary possessions of mankind; they were to be warrior athletes and guardians, receiving from the other citizens, in lieu of annual payment, only their maintenance, and they were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nd of the whole State.

格：是的，我记得任何人不得拥有通常意义的人类财物；作为战士和城邦守护者，他们没有年薪，只是从城邦居民那里获得生活费用，并要担当起保护自身及整个城邦的职责。

True, I said; and now that this division of our task is concluded, let us find the point at which we digressed, that we may return into the old path.

苏：对。既然我们已经完成这一部分话题的讨论，我们且看看是从何处偏离主题的，以便能够回归原路。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returning; you implied, then as now, that you had finishe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tate: you said that such a State was good, and that the man was good who answered to it, although, as now appears, you had more excellent things to relate both of State and man. And you said further, that if this was the true form, then the others were false; and of the false forms, you said, as I remember, that there were four principal ones, and that their defects, and the defects of the individuals corresponding to them, were worth examining. When we had seen all the individuals, and finally agreed as to who was the best and who was the worst of them, we were to consider whether the best was not also the happiest, and the worst the most miserable. I asked you what were the four forms of government of which you spoke, and then Polemarchus and Adeimantus put in their word; and you began again, and have found your way to the point at which we have now arrived.

格：回归主题并不难。你之前和现在都认为已经完成了对理想国的描述。你当时说过该城邦是善的，治理城邦者亦是善的。但是现在看来，你当时对城邦和个人仍有更多精彩内容要阐述。另外，你也说过，如果此类城邦是正确的，那么其他皆为错误的。关于这些错误的形式，我记得你说过有四种主要类型。这四种城邦类型以及与之对应的个人的缺陷值得我们来探讨。当我们见识过了形形色色的人并最终认定至善和至恶的类型之后，我们便要考虑至善之人是否亦是最幸福的，至恶之人是否是最不幸的。我曾问何为你所谓的四种政体，当时玻勒马霍斯和阿得曼托斯插话进来，于是你便又开始讲起了我们目前的话题。

Your recollection, I said, is most exact.

苏：你的记忆，分毫不爽。

Then, like a wrestler, he replied, you must put yourself again in the same position; and let me ask the same questions, and do you give me the same answer which you were about to give me then.

格：那么，正如摔跤手那样，你必须再站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由我提出同样的问题，你将当初欲作的答复讲给我。

Yes, if I can, I will, I said.

苏：好吧，尽我所能。

I shall particularly wish to hear what were the four constitutions of which you were speaking.

格：我愿洗耳倾听，何为你所谓的四种政体。

That question, I said, is easily answered: the four governments of which I spoke, so far as they have distinct names, are, first, those of Crete and Sparta, which are generally applauded; what is termed oligarchy comes next; this is not equally approved, and is a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teems with evils: thirdly, democracy, which naturally follows oligarchy, although very different: and lastly comes tyranny, great and famous, which differs from them all, and

is the fourth and worst disorder of a State. I do not know, do you? of any other constitution which can be said to have a distinct character. There are lordships and principalities which are bought and sold, and some other intermediate forms of government. But these are nondescripts and may be found equally among Hellenes and among barbarians.

苏：该问题很容易回答。我所谓的四种政体有着截然不同的名称。第一种为克里特和斯巴达政体，该政体为大众所称道；第二种为寡头政体，它不如第一种受欢迎，并且劣迹斑斑；第三种为民主政体，它与寡头政体大不相同，却是在寡头政体之后自然产生的；最后一种为僭主政体，赫赫有名，与前面三种政体完全不同，是四种中最混乱的政体。据我所知，此外无他。你还知道其他称得上独具特色的政体吗？还有一些是可以买卖的贵族领地、公国和其他一些处于过渡期的政权。但是这些政体都很难归类，在希腊和异邦中可能都存在。

Yes, he replied, we certainly hear of many curious forms of government which exist among them.

格：是的，我们的确听说过存在着很多离奇的政治制度。

Do you know, I said, that governments vary as the dispositions of men vary, and that there must be as many of the one as there are of the other? For we cannot suppose that States are made of 'oak and rock,' and not out of the human natures which are in them, and which in a figure turn the scale and draw other things after them?

苏：你知道吗？政体之不同，犹如人们性情之不同。有多少种不同的性情，便必然有多少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我们不要以为，城邦是由“橡木和石头”而非城中的人们所构成的。这些城邦居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其他的事物。

Yes, he said, the States are as the men are; they grow out of human characters.

格：是的，国家与人相同；它们源于人们的性格。

Then if the constitutions of States are five, the dispositions of individual minds will also be five?

苏：那么，如果国家的政体有五种，人的性格亦将为五种吗？

Certainly.

格：当然。

Him who answers to aristocracy, and whom we rightly call just and good, we have already described.

苏：关于与特权贵族阶层相对应的人，我们已经描述完毕，并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正义而善良之人。

We have.

格：是的。

Then let us now proceed to describe the inferior sort of natures, being the contentious and ambitious, who answer to the Spartan polity; also the oligarchical, democratical, and tyrannical. Let us place the most just by the side of the most unjust, and when we see them we shall be able to compare the relative happiness or unhappiness of him who leads a life of pure justice or pure injustice. The enquiry will then be completed. And we shall know whether we ought to pursue injustice, as Thrasymachus advises, o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lusions of the argument to prefer justice.

苏：那么，现在我们继续来谈一谈较为低劣的人性，包括与斯巴达制度相对应的野蛮好斗且野心勃勃的性格，还有与寡头制、民主制和僭主制对应的性格。我们且将最正义者置于最不正义者旁边，从而形成对照，并了解到纯粹正义人生和纯粹不正义人生相对的幸福与不幸。我们的探讨便可圆满完成。于是，我们便知道，究竟我们应该听从色拉叙马霍斯的建议而多行不义，还是要按照我们现在论证的结论去追求正义。

Certainly, he replied, we must do as you say.

格：当然，务必按你说的做。

Shall we follow our old plan, which we adopted with a view to clearness, of taking the State first and then proceeding to the individual, and begi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honour?—I know of no name for such a government other than timocracy, or perhaps timarchy. We will compare with this the like character in the individual; and, after that, consider oligarchy and the oligarchical man; and then again we will turn our attention to democracy and the democratical man; and lastly, we will go and view the city of tyranny, and once more take a look into the tyrant's soul, and try to arrive at a satisfactory decision.

苏：为了便于说清楚，我们按照之前的想法，先讨论国家再讨论个人。先从爱荣誉的政体说起，好吗？我认为，称之为荣誉政体或者荣誉政治，最合适不过。我们将该政体与相似个人的品行进行比较。其次是寡头式个人。再次，我们又将关注民主政体和民主个人。最后，我们将探讨僭主之城，重新审视暴君们的灵魂并努力做出满意的判断。

That way of viewing and judging of the matter will be very suitable.

格：如此审视和判断，恰当得体。

First, then, I said, let us enquire how timocracy (the government of honour) arises out of aristocracy (the government of the best). Clearly, all political changes originate in divisions of the actual governing power; a government which is united, however

small, cannot be moved.

苏：那么，首先，我们且探讨荣誉政体是如何源起于贵族制这一最完美的政体的。显然，所有的政治动荡都源于统治阶层的分裂。内部团结的政权，无论多么渺小，都不能被动摇。

Very true,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In what way, then, will our city be moved, and in what manner will the two classes of auxiliaries and rulers disagree among themselves or with one another? Shall we, after the manner of Homer, pray the Muses to tell us 'how discord first arose'? Shall we imagine them in solemn mockery, to play and jest with us as if we were children, and to address us in a lofty tragic vein, making believe to be in earnest?

苏：那么我们的城邦如何会被动摇呢？臣民和统治阶层自身，以及相互之间何以产生分歧呢？我们可否效仿荷马，祈求缪斯女神告诉我们“何以祸乱起”？我们可否想象文艺女神们像对待孩童一样，嘲讽、戏弄我们，并用悲剧的崇高之声对我们一本正经地讲话呢？

How would they address us?

格：他们会如何向我们讲话呢？

After this manner:—A city which is thus constituted can hardly be shaken; but, seeing that everything which has a beginning has also an end, even a constitution such as yours will not last for ever, but will in time be dissolved. And this is the dissolution:—In plants that grow in the earth, as well as in animals that move on the earth's surface,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of soul and body occur when the circumferences of the circles of each are completed, which in short-lived existences pass over a short space, and in long-lived ones over a long space. But to the knowledge of human fecundity and sterility all the wisdom and education of your rulers will not attain; the laws which regulate them will not be discovered by an intelligence which is alloyed with sense, but will escape them, and they will bring children into the world when they ought not. Now that which is of divine birth has a period which is contained in a perfect number (i.e. a cyclical number, such as 6, which is equal to the sum of its divisors 1, 2, 3, so that when the circle or time represented by 6 is completed, the lesser times or rotations represented by 1, 2, 3 are also completed.), but the period of human birth is comprehended in a number in which first increments by involution and evolution (or squared and cubed) obtaining three intervals and four terms of like and unlike, waxing and waning numbers, make all the terms commensurable and agreeable to one another. (Probably the numbers 3, 4, 5, 6 of which the three first = the sides of the Pythagorean triangle. The terms will then be 3 cubed, 4 cubed, 5 cubed, which together = 6 cubed = 216.) The base of these (3) with a third added (4) when combined with five (20) and raised to the third power furnishes two harmonies; the first a square which is a hundred times as great (400 = 4 x 100) (Or the first a square which is 100 x 100 = 10,000. The whole

number will then be 17,500 = a square of 100, and an oblong of 100 by 75.), and the other a figure having one side equal to the former, but oblong, consisting of a hundred numbers squared upon rational diameters of a square (i.e. omitting fractions), the side of which is five (7 x 7 = 49 x 100 = 4900), each of them being less by one (than the perfect square which includes the fractions, sc. 50) or less by (Or, 'consisting of two numbers squared upon irrational diameters,' etc. = 100. For other explanations of the passage see Introduction.) two perfect squares of irrational diameters (of a square the side of which is five = 50 + 50 = 100); and a hundred cubes of three (27 x 100 = 2700 + 4900 + 400 = 8000). Now this number represents a geometrical figure which has control over the good and evil of births. For when your guardians are ignorant of the law of births, and unite bride and bridegroom out of season, the children will not be goodly or fortunate. And though only the best of them will be appointed by their predecessors, still they will be unworthy to hold their fathers' places, and when they come into power as guardians, they will soon be found to fail in taking care of us, the Muses, first by under-valuing music; which neglect will soon extend to gymnastic; and hence the young men of your State will be less cultivated. In the succeeding generation rulers will be appointed who have lost the guardian power of testing the metal of your different races, which, like Hesiod's, are of gold and silver and brass and iron. And so iron will be mingled with silver, and brass with gold, and hence there will arise dissimilarity and inequality and irregularity, which always and in all places are causes of hatred and war. This the Muses affirm to be the stock from which discord has sprung, wherever arising; and this is their answer to us.

苏：大致如下：此般体制的国家不易被动摇；但既然万物皆有始有终，你们的政体也不会永恒不变，日久必将分散瓦解。解体过程如

下：地上所生长的植物连同地面上活动的动物，其肉体与灵魂的繁衍时机与不育时机构成了一个循环，生存时间短者周期短，生存时间长者周期长。但是凭你们统治者的智慧及其所受的教育，他们无法领会人类繁衍及不育知识；凭理性和智慧也掌握不了调节繁衍生息的规律，反而会对其加以违背，于是很多孩子在不适宜的时候降临到了人世。虽然神圣产物有着完美的数的周期，但人类生育周期的数如下：它首先通过乘方和开方（或开方和乘方）获得相似或不相似的三个区间和四个数的形式以及数的盈亏，以此达到增值，最后使得所有的单位间实现通约并相协调。基数（3）与第三位（40）的和与5的积（20），再立方，就产生两个和谐：其一是大了100倍的平方（400＝4×100），构成正方形；其二是长方形。该长方形一边边长与前面正方形相同，另一边边长是边长为5的正方形的对角线的有理数形式（也就是说去掉小数部分）的平方的倍。各个数字与包含小数部分的完美正方形相比少一个或两个具有无理直径的正方形（此正方形边长为5，两个无理直径为50＋50＝100）；以及100个3的立方（27x100＝2700）。这些数字代表着出生时机优劣的几何图案。如果城邦守卫者们不懂得出生时节的规律，让新郎和新娘在不适当的时机结合，他们的孩子便不会优秀或幸运。虽然前辈们只会选中他们中的佼佼者，但是他们仍不配接替父位。一旦他们上台执政成为守卫者，不久便会忽视我们，并冷落文艺。他们先是轻视音乐，继而很快会忽视体育，造成城邦中的年轻人缺乏教养。继任的统治者们丧失了守卫者应具备的辨别不同族裔金属属性的能力，如赫西俄德所谓的“金、银、铜、铁”。于是铁和银混杂，铜和金混杂，差异、不平等、无序因此而起，并随时随地引发仇恨和战争。无论纷乱发生于何处，文艺女神们都会坚称，血统是纷争之源。这便是她们给我们的答案。

Yes, and we may assume that they answer truly.

格：是的，我们认为，她们回答正确。

Why, yes, I said, of course they answer truly; how can the Muses speak falsely?

苏：啊，是的，当然，她们回答正确。文艺女神如何会说错呢？

And what do the Muses say next?

格：此后文艺女神们如何说？

When discord arose, then the two races were drawn different ways: the iron and brass fell to acquiring money and land and houses and gold and silver; but the gold and silver races, not wanting money but having the true riches in their own nature, inclined towards virtue and the ancient order of things. There was a battle between them, and at last they agreed to distribute their land and houses among individual owners; and they enslaved their friends and maintainers, whom they had formerly protected in the condition of freemen, and made of them subjects and servants; and they themselves were engaged in war and in keeping a watch against them.

苏：一旦出现冲突，两派间差异凸显：铁、铜一派热衷于金钱、土地、房屋和财宝，金、银一派不求金钱但求真正的精神财富，他们热衷的是善以及远古的秩序。两派间展开斗争，最后他们同意将土地和房屋分配给个人，将他们的朋友和供养人——之前受自己保护的自由人——降为奴隶，使他们成为受压迫者和奴仆。他们自身亦纷争不

断，互相监视。

I believe that you have rightly conceived the origin of the change.

格：我认为，你准确描述了变动的起因。

And the new government which thus arises will be of a form intermediate between oligarchy and aristocracy?

苏：于是，产生的新政体将会介乎于寡头制和贵族制之间，对吗？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Such will be the change, and after the change has been made, how will they proceed? Clearly, the new State, being in a mean between oligarchy and the perfect State, will partly follow one and partly the other, and will also have some peculiarities.

苏：政体发生了变化，那么变化之后，他们将如何行事呢？显然，介乎于寡头制和理想的贵族制之间的新政体，兼有二者的部分特

点，同时也具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True, he said.

格：对。

In the honour given to rulers, in the abstinence of the warrior class from agriculture, handicrafts, and trade in general, in the institution of common meals, and in the attention paid to gymnastics and military training—in all these respects this State will resemble the former.

苏：在尊崇统治者、禁止士兵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各种贸易，以及设立公共食堂和重视体育及军事训练等方面，该政体将效仿贵族制。

True.

格：对。

But in the fear of admitting philosophers to power, because they are no longer to be had simple and earnest, but are made up of mixed elements; and in turning from them to passionate and less complex characters, who are by nature fitted for war rather than peace; and in the value set by them upon military stratagems and

contrivances, and in the waging of everlasting wars—this State will be for the most part peculiar.

苏：但是此政体惧怕哲学家执政，因为哲学家们已不再单纯、热忱，而是成分复杂；此政体舍弃哲学家转而偏爱那些意气风发、头脑较为简单的人，但是他们天性好战而不好和平；此政体讲究军事策略和技巧，征战不休——这使得该政体在很大程度上特色鲜明。

Yes.

格：是的。

Yes, I said; and men of this stamp will be covetous of money, like those who live in oligarchies; they will have, a fierce secret longing after gold and silver, which they will hoard in dark places, having magazines and treasuries of their own for the deposit and concealment of them; also castles which are just nests for their eggs, and in which they will spend large sums on their wives, or on any others whom they please.

苏：是的。此类统治者贪婪财富，与寡头政体下的统治者相像。他们不露声色、迷恋金银、暗中敛财，建自己的仓库和金库用于存放和藏匿财宝。城堡亦是藏匿隐私之所，他们挥霍无度，纵情酒色。

That is most true, he said.

格：千真万确。

And they are miserly because they have no means of openly acquiring the money which they prize; they will spend that which is another man's on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ir desires, stealing their pleasures and running away like children from the law, their father: they have been schooled not by gentle influences but by force, for they have neglected her who is the true Muse, the companion of reason and philosophy, and have honoured gymnastic more than music.

苏：因为贪财却没有正大光明获取金钱的途径，他们极其吝啬。但他们却很乐于挥霍他人钱物满足私欲，剥夺他人幸福，并像孩子脱离父亲管教一样不受法律的约束。他们所受的并非是循循善诱的教育，而是外力强加于身的教育。他们忽视伴随着理性与哲学的真正缪斯女神，崇尚体育甚于音乐。

Undoubtedly, he said, the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you describe is a mixture of good and evil.

格：无疑，你所言的这种政体，善恶混杂。

Why, there is a mixture, I said; but one thing, and one thing only, is predominantly seen,—the spirit of contention and ambition; and these are due to the prevalence of the passionate or spirited element.

苏：啊，有善有恶。但是有一种特点，且仅此一种，极其明显，那就是争强好胜、野心勃勃。这都源于激情品性的盛行。

Assuredly,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Such is the origin and such the character of this State, which has been described in outline only; the more perfect execution was not required, for a sketch is enough to show the type of the most perfectly just and most perfectly unjust; and to go through all the States and all the characters of men, omitting none of them, would be an interminable labour.

苏：这便是此政体的起源以及其特征，此处仅陈述了其大概，勿需再多言，因此概述便足以揭示至为正义与至为不义两种类型的人。要想巨细无遗地列举出所有国家与所有国民性格，其工作量将是无尽无休。

Very true, he replied.

格：的确如此。

Now what man answers to this form of government-how did he come into being, and what is he like?

苏：哪类人与该政体相对应——他是如何产生，为人又如何呢？

SOCRATES-ADEIMANTUS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阿得曼托斯

I think, said Adeimantus, that in the spirit of contention which characterises him, he is not unlike our friend Glaucon.

阿：我认为，从此人争强好胜的特点来看，跟我们的朋友格劳孔很相似。

Perhaps, I said, he may be like him in that one point; but there are other respects in which he is very different.

苏：也许在某一点上他们很相似，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却迥然不同。

In what respects?

阿：哪些方面不同？

He should have more of self-assertion and be less cultivated, and yet a friend of culture; and he should be a good listener, but no speaker. Such a person is apt to be rough with slaves, unlike the educated man, who is too proud for that; and he will also be courteous to freemen, and remarkably obedient to authority; he is a lover of power and a lover of honour; claiming to be a ruler, not because he is eloquent, or on any ground of that sort, but because he is a soldier and has performed feats of arms; he is also a lover of gymnastic exercises and of the chase.

苏：他比格劳孔自信，虽然学识不如格劳孔，但是热爱文化，善于倾听却不善言论。与有教养者不屑于理会奴隶相比，这种人对待奴隶很严厉。他对自由人有礼貌、对权威异常恭顺。他爱权利、爱荣誉。他认为自己掌权不是凭借口才，而是因为他是战士，并且战功赫赫。他也热爱体育和狩猎。

Yes, that is the type of character which answers to timocracy.

阿：是的，这是与荣誉政体相应类型的个人性格。

Such an one will despise riches only when he is young; but as he gets older he will be more and more attracted to them, because he has a piece of the avaricious nature in him, and is not single-minded towards virtue, having lost his best guardian.

苏：这种人只在年轻时蔑视财物，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他会变得越来越贪恋钱财，因为其本性贪婪，不能一心向善，且失去了最宝贵

的守护者。

Who was that? said Adeimantus.

阿：何谓最宝贵的守护者？

Philosophy, I said, tempered with music, who comes and takes up her abode in a man, and is the only saviour of his virtue throughout life.

苏：与音乐相协调的哲学，直达并深入人心，是唯一使人终生不背离善的救星。

Good, he said.

阿：说得好。

Such, I said, is the timocratical youth, and he is like the timocratical State.

苏：这便是爱荣誉的年轻人，与爱荣誉的城邦颇为相似。

Exactly.

阿：正是如此。

His origin is as follows:—He is often the young son of a brave father, who dwells in an ill-governed city, of which he declines the honours and offices, and will not go to law, or exert himself in any way, but is ready to waive his rights in order that he may escape trouble.

苏：他产生的情形大致如此：通常，该年轻人有一位不苟言笑的父亲，父亲居于政局混乱的城邦中，不贪图荣誉权力，不打官司告状，不出风头，为了免于是非，处处忍让退步。

And how does the son come into being?

阿：那么，他的儿子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The character of the son begins to develop when he hears his mother complaining that her husband has no place in the government, of which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she has no precedence among other women. Further, when she sees her husband not very eager about money, and instead of battling and railing in the law courts or assembly, taking whatever happens to him quietly; and when she observes that his thoughts always centre in himself, while he treats her with very considerable indifference, she is annoyed, and says to her son that his father is only half a man and far too easy-going: adding all the other complaints about

her own ill-treatment which women are so fond of rehearsing.

苏：在母亲的抱怨声中，儿子的性格慢慢形成。母亲抱怨说自己的丈夫不在政府任职，使得自己在其他妇女中不能扬眉吐气。此外，母亲抱怨自己的丈夫不热衷钱财，在法庭、集会上不会据理力争、咄咄逼人，相反却默默忍受一切。同时，母亲认为丈夫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对她漠不关心。于是她感到愤怒，对儿子说他的父亲并非男子汉，太软弱，再添油加醋地讲述妇女们热衷于反复谈论的自己受委屈之类的其他一切不满。

Yes, said Adeimantus, they give us plenty of them, and their complaints are so like themselves.

阿：是的，我们常听到她们如此抱怨，内容都大致相同。

And you know, I said, that the old servants also, who are supposed to be attached to the family, from time to time talk privately in the same strain to the son; and if they see any one who owes money to his father, or is wronging him in any way, and he fails to prosecute them, they tell the youth that when he grows up he must retaliate upon people of this sort, and be more of a man than his father. He has only to walk abroad and he hears and sees the same sort of thing: those who do their own business in the city are called simpletons, and held in no esteem, while the busy-bodies are honoured and applauded. The result is that the young man, hearing and seeing all these things—hearing, too, the words of his father, and having a nearer view of his way of life, and making comparisons of him and others—is drawn opposite ways: while his

father is watering and nourishing the rational principle in his soul, the others are encouraging the passionate and appetitive; and he being not originally of a bad nature, but having kept bad company, is at last brought by their joint influence to a middle point, and gives up the kingdom which is within him to the middle principle of contentiousness and passion, and becomes arrogant and ambitious.

苏：再者，你知道，家里有一些老仆人，他们应该是忠实于主人的，时常会私下里对儿子说些类似的话。当仆人们看到有人欠父亲的钱，或者在某些方面冤枉了父亲，而父亲却不加以追究时，他们便会对着儿子说等他长大时一定要报复那些人，要比其父更像男子汉。他只要走出家门，耳闻目睹莫非如此：城邦中安分守己者被称为笨蛋，丝毫不为人所尊重；好管闲事者却享有盛名，受人称赞。结果，年轻人耳闻目睹这一切，又亲耳听闻父亲的言论并进一步地了解了父亲做事方式，从而将父亲与他人进行对比，受到了两股相反力量的牵引：一边是父亲浇灌、培育其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另一边是其他人在怂恿助长灵魂中属于意气和欲望的部分。他本人最初本性并不坏，但却与坏人为伍，最终双方力量的争夺使他选择了折中的立场，放弃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折中为争强好胜又热情洋溢，既态度高傲又野心勃勃。

You seem to me to have described his origin perfectly.

阿：在我看来，你好像把他本性的由来解释得很清楚了。

Then we have now, I said, the second form of government and the second type of character?

苏：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将第二种类型的政体和个人性格说清楚了吗？

We have.

阿：是的。

Next, let us look at another man who, as Aeschylus says, 'Is set over against another State;' or rather, as our plan requires, begin with the State.

苏：下面，我们来谈论另一种人，如埃斯库罗斯所谓的“另一座城邦所对应的人”；抑或按照我们的计划，先从国家说起。

By all means.

阿：必须从国家说起。

I believe that oligarchy follows next in order.

苏：我认为按顺序该是寡头制了。

And what manner of government do you term oligarchy?

阿：你会将何种政体称为寡头制呢？

A government resting on a valuation of property, in which the rich have power and the poor man is deprived of it.

苏：一种以财富多寡为基础的政体，富人掌权，穷人无权。

I understand, he replied.

阿：我懂了。

Ought I not to begin by describing how the change from timocracy to oligarchy arises?

苏：我难道不应该先从荣誉政体如何过渡到寡头制政体说起吗？

Yes.

阿：理应如此。

Well, I said, no eyes are required in order to see how the one passes into the other.

苏：唉，即使盲者也能明白，这种从一者过渡到另一者的转变。

How?

阿：如何转变？

The accumulation of gold in the treasury of private individuals is the ruin of timocracy; they invent illegal modes of expenditure; for what do they or their wives care about the law?

苏：个人聚敛财富导致了荣誉政体的覆灭。他们违法乱纪，大肆挥霍。他们或者他们的家属又何必要在乎法律呢？

Yes, indeed.

阿：是的，的确。

And then one, seeing another grow rich, seeks to rival him, and thus the great mass of the citizens become lovers of money.

苏：于是，人们见到他人致富，便争着去攀比，结果大多数的市民都变得贪恋财富。

Likely enough.

阿：很有可能。

And so they grow richer and richer, and the more they think of making a fortune the less they think of virtue; for when riches and virtue are placed together in the scales of the balance, the one always rises as the other falls.

苏：于是他们变得日益富有。他们越是一心想着发财，就会越不顾及美德，因为当把金钱和美德各置天平一端时，总是会一边升起而另一边下降。

True.

阿：对。

And in proportion as riches and rich men are honoured in the State, virtue and the virtuous are dishonoured.

苏：同时，金钱和有钱人在城邦中愈是受推崇，美德和有德行的人便愈是声名扫地。

Clearly.

阿：显然如此。

And what is honoured is cultivated, and that which has no honour is neglected.

苏：受推崇的事物会得以发展，不光彩的事物会受人遗弃。

That is obvious.

阿：显然如此。

And so at last, instead of loving contention and glory, men become lovers of trade and money; they honour and look up to the rich man, and make a ruler of him, and dishonour the poor man.

苏：因此，最后人们不再热衷争斗和荣誉，转而开始痴迷于贸易和金钱。他们推崇和敬重富人，推举富人担任统治者，对穷人则嗤之以鼻。

They do so.

阿：他们的确如此。

They next proceed to make a law which fixes a sum of money as the qualification of citizenship; the sum is higher in one place and lower in another, as the oligarchy is more or less exclusive; and they allow no one whose property falls below the amount fixed to have any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These changes in the constitution they effect by force of arms, if intimidation has not already done their work.

苏：此后，他们立法规定想拥有公民身份所需要的金钱数量，因为寡头制大抵都很专断独行，所以这笔钱数有的地方多一些，有的地方少一些。财产少于此数目的人不得从政。如果恐吓无效，他们便依靠武力来推行体制上的变革。

Very true.

阿：的确如此。

And this, speaking generally, is the way in which oligarchy is established.

苏：总的来说，寡头制便如此确立了。

Yes, he said; but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form of government, and what are the defects of which we were speaking?

阿：是的。但是如此政体有何特点呢？我们说过它有何弊端呢？

First of all, I said, consider the nature of the qualification. Just think what would happen if pilots were to be chosen according to their property, and a poor man were refused permission to steer, even though he were a better pilot?

苏：首先从有关资格的规定说起。只需想一想如果船长都是根据财产数量选拔的，穷人即使航海技术再高超也不允许担任船长，这会有什么后果呢？

You mean that they would shipwreck?

阿：你说他们会遭遇海难吗？

Yes; and is not this true of the government of anything?

苏：是的。一切事物的管理皆如此，难道不是吗？

I should imagine so.

阿：理应如此。

Except a city?—or would you include a city?

苏：城邦会是例外吗？抑或你认为城邦亦是如此吗？

Nay, he said, the case of a city is the strongest of all, inasmuch as the rule of a city is the greatest and most difficult of all.

阿：不会，城邦最是如此，城邦的管理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

This, then, will be the first great defect of oligarchy?

苏：那么，这算是寡头制的第一个重大弊端吗？

Clearly.

阿：显然如此。

And here is another defect which is quite as bad.

苏：再说一个同样严重的弊端。

What defect?

阿：什么弊端？

The inevitable division: such a State is not one, but two States, the one of poor, the other of rich men; and they are living on the same spot and always conspiring against one another.

苏：不可避免的城邦分裂：如此的国家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为两个国家，一个属于穷人，一个属于富人；他们同居一处，却总图谋要颠覆对方。

That, surely, is at least as bad.

阿：此项弊端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Another discreditable feature is, that, for a like reason, they are incapable of carrying on any war. Either they arm the multitude, and then they are more afraid of them than of the enemy; or, if they do not call them out in the hour of battle, they are oligarchs indeed, few to fight as they are few to rul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ir fondness for money makes them unwilling to pay taxes.

苏：另一个不光彩的特点在于，如此城邦，出于类似的原因，根本无力进行任何战争。统治者们若是武装群众，他们对群众的恐惧会

甚于对敌人的恐惧；若是战争期间他们不动员群众，便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几乎无人任其指挥，无人参加战斗。同时，他们视财如命，不情愿缴纳国家税赋。

How discreditable!

阿：真的很不光彩啊！

And, as we said before, under such a constitution the same persons have too many callings—they are husbandmen, tradesmen, warriors, all in one. Does that look well?

苏：我们之前说过，如此体制下，一人会身兼数职——农夫、商人、士兵，集于一身。这好吗？

Anything but well.

阿：一点也不好。

There is another evil which is, perhaps, the greatest of all, and to which this State first begins to be liable.

苏：还有一个也许是国家最大的罪恶，也是此类城邦最早容易犯的毛病。

What evil?

阿：什么罪恶？

A man may sell all that he has, and another may acquire his property; yet after the sale he may dwell in the city of which he is no longer a part, being neither trader, nor artisan, nor horseman, nor hoplite, but only a poor, helpless creature.

苏：有人可能会变卖自己所有财产，被其他人所收购。两手空空后，他会继续住在这里，但是不再发挥任何作用。他既不是商人也不是工匠、马夫或士兵，他不过是一个无助的穷人。

Yes, that is an evil which also first begins in this State.

阿：是的。这也是此类城邦最早会犯的罪恶。

The evil is certainly not prevented there; for oligarchies have both the extremes of great wealth and utter poverty.

苏：这种罪恶当然不会得到遏制，因为寡头制就是巨富和赤贫并存的。

True.

阿：对。

But think again: In his wealthy days, while he was spending his money, was a man of this sort a whit more good to the State for the purposes of citizenship? Or did he only seem to be a member of the ruling body, although in truth he was neither ruler nor subject, but just a spendthrift?

苏：但是请三思，当某人因富有而挥霍钱财时，作为公民他对城邦的作用会更大些吗？抑或他是否仅仅看上去属于统治阶级，而事实上他既非统治者也非国民，仅是挥霍无度者呢？

As you say, he seemed to be a ruler, but was only a spendthrift.

阿：如你所言，他看上去是统治者，而实际上不过就是挥霍无度者。

May we not say that this is the drone in the house who is like the drone in the honeycomb, and that the one is the plague of the city as the other is of the hive?

苏：我们难道不可以说他们是家中的寄生虫，正如蜂房中的雄蜂；雄蜂是蜂房中的祸害，他们则是城邦的祸害吗？

Just so, Socrates.

阿：正是如此，苏格拉底。

And God has made the flying drones, Adeimantus, all without stings, whereas of the walking drones he has made some without stings but others have dreadful stings; of the stingless class are those who in their old age end as paupers; of the stingers come all the criminal class, as they are termed.

苏：阿得曼托斯啊，神安排会飞的雄蜂都不带刺，然而却让这些雄蜂一样的人有的无刺，有的带着可怕的刺。无刺的人皆老来穷困潦倒，带刺的人据说无恶不作。

Most true, he said.

阿：千真万确。

Clearly then, whenever you see paupers in a State, somewhere in that neighborhood there are hidden away thieves, and cut-purses and robbers of temples, and all sorts of malefactors.

苏：显然，无论你在城邦任何地方见到了穷人，那么在其附近一定藏有小偷、扒手、盗神庙者以及形形色色的作恶者。

Clearly.

阿：显然如此。

Well, I said, and in oligarchical States do you not find paupers?

苏：那么，在寡头制的国家中你见不到穷人吗？

Yes, he said; nearly everybody is a pauper who is not a ruler.

阿：会见到。除了执政者，几乎人人都是穷人。

And may we be so bold as to affirm that there are also many criminals to be found in them, rogues who have stings, and whom the authorities are careful to restrain by force?

苏：我们可否大胆地断言，在他们中间也存在着众多的罪犯，皆为带刺的恶人——当权者留心用武力压制的对象吗？

Certainly, we may be so bold.

阿：当然，我们可以如此断言。

The existence of such persons is to be attributed to want of education, ill-training, and an evil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苏：教育的缺失、错误的训练和不良的国家政体导致了此类人的存在。

True.

阿：对。

Such, then, is the form and such are the evils of oligarchy; and there may be many other evils.

苏：以上便是寡头制的政体形式及其弊端；或许还存在更多其他弊端。

Very likely.

阿：极其可能。

Then oligarchy, or the for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rulers are elected for their wealth, may now be dismissed. Let us next proceed to consider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the individual who

answers to this State.

苏：关于寡头制，即参照财富选举统治者的政权形式，暂时可以告一段落了。此后，我们探讨一下与寡头制对应的个人天性及其由来。

By all means.

阿：务必如此。

Does not the timocratical man change into the oligarchical on this wise?

苏：从荣誉至上政体式人格到寡头政体式人格，难道不是如此转变的吗？

How?

阿：如何转变？

A time arrives when the representative of timocracy has a son: at first he begins by emulating his father and walking in his footsteps, but presently he sees him of a sudden foundering against the State as upon a sunken reef, and he and all that he has is lost;

he may have been a general or some other high officer who is brought to trial under a prejudice raised by informers, and either put to death, or exiled, or deprived of the privileges of a citizen, and all his property taken from him.

苏：转变从荣誉政体式的典型人物生了一个儿子开始：起初，儿子以父亲为榜样，效仿父亲的行事方式，但是不久他目睹父亲突然在政治上触礁，人财两空。父亲或许曾是一位将军或其他高官，由于受人告密陷害而受到法庭的审判，结果或被处死，或遭流放，或被剥夺公民权利，财产全部被没收。

Nothing more likely.

阿：必定如此。

And the son has seen and known all this—he is a ruined man, and his fear has taught him to knock ambition and passion head-foremost from his bosom's throne; humbled by poverty he takes to money-making and by mean and miserly savings and hard work gets a fortune together. Is not such an one likely to seat the concupiscent and covetous element on the vacant throne and to suffer it to play the great king within him, girt with tiara and chain and scimitar?

苏：儿子目睹并了解了这一切。他此时破落潦倒，恐惧会令其将雄心与激情从自己灵魂深处的宝座上推翻在地。贫穷带来的寒酸让他迷恋上生财牟利，通过省吃俭用和辛苦劳作终于攒下了一笔财富。如

此之人难道不会将贪婪和欲望推上空荡荡的宝座，使之成为心中的帝王，并饰以冠冕、配饰与波斯宝刀吗？

Most true, he replied.

阿：必定如此。

And when he has made reason and spirit sit down on the ground obediently on either side of their sovereign, and taught them to know their place, he compels the one to think only of how lesser sums may be turned into larger ones, and will not allow the other to worship and admire anything but riches and rich men, or to be ambitious of anything so much as the acquisition of wealth and the means of acquiring it.

苏：他令理性和灵魂顺从地安坐在贪欲之王的两侧，并令他们安分守己，他会迫使理性只关注如何让财富由少变多，同时不允许灵魂崇拜和敬仰财富和富人以外的任何事物，也不允许灵魂对任何事物的追求超越其对致富和敛财之道的渴望。

Of all changes, he said, there is none so speedy or so sure as the conversion of the ambitious youth into the avaricious one.

阿：在所有的变化中，没有比有野心的青年向贪婪之徒的转变更快更准的了。

And the avaricious, I said, is the oligarchical youth?

苏：此贪婪之徒，便是寡头制中的年轻人吗？

Yes, he said; at any rate the individual out of whom he came is like the State out of which oligarchy came.

阿：是的，无论如何，寡头式个人的起源与寡头政体的起源是相似的。

Let us then consider whether there is any likeness between them.

苏：那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似之处。

Very good.

阿：很好。

First, then, they resemble one another in the value which they set upon wealth?

苏：首先，他们的财富价值观是相似的，对吗？

Certainly.

阿：当然。

Also in their penurious, laborious character; the individual only satisfies his necessary appetites, and confines his expenditure to them; his other desires he subdues, under the idea that they are unprofitable.

苏：此外，他们都具有吝啬、勤劳的品性。寡头制的人们只满足自己必要的需求，不会在其他事物上铺张浪费；他会压制自己的其他欲望，认为它们无利可图。

True.

阿：对。

He is a shabby fellow, who saves something out of everything and makes a purse for himself; and this is the sort of man whom the vulgar applaud. Is he not a true image of the State which he represents?

苏：他为人吝啬，处处节省并略有积蓄，却受到百姓的欢迎。他难道不是其所代表的城邦的真实折射吗？

He appears to me to be so; at any rate money is highly valued by him as well as by the State.

阿：我认为似乎如此。无论如何，他和他的城邦一样极其看重金钱。

You see that he is not a man of cultivation, I said.

苏：你知道，他并非有教养之人。

I imagine not, he said; had he been educated he would never have made a blind god director of his chorus, or given him chief honour.

阿：我猜他没有修养。如果他接受过教育，他是不会让一个盲目之神来指导他的合唱队并授予他最大荣誉的。

Excellent! I said. Yet consider: Must we not further admit that owing to this want of cultivation there will be found in him dronelike desires as of pauper and rogue, which are forcibly kept down by his general habit of life?

苏：说得好！但请思量，我们可否进一步认为：因为缺乏教育，他心中会有一些雄蜂一样的、穷人和无赖式的欲望，但皆因为日常生

活习惯而被迫压制了下去呢？

True.

阿：对。

Do you know where you will have to look if you want to discover his rogueries?

苏：如果想发现他的恶人行径，你知道需从何处着眼吗？

Where must I look?

阿：从何处着眼？

You should see him where he has some great opportunity of acting dishonestly, as in the guardianship of an orphan.

苏：你应看他最可欺人之际，比如监护孤儿。

Aye.

阿：啊。

It will be clear enough then that in his ordinary dealings which give him a reputation for honesty he coerces his bad passions by an enforced virtue; not making them see that they are wrong, or taming them by reason, but by necessity and fear constraining them, and because he trembles for his possessions.

苏：显然，他在为自己赚得诚实美名的日常交往中，用虚情假意压抑自己的恶欲。他不是因为知道这些欲望有多不好或是靠理性来抑制欲望，而是出于必需和恐惧才这样做，因为他担忧失去自己的财产。

To be sure.

阿：正是如此。

Yes, indeed, my dear friend, but you will find that the natural desires of the drone commonly exist in him all the same whenever he has to spend what is not his own.

苏：的确，我亲爱的朋友，一旦他们不得已挥霍别人的财物时，你就会见到雄蜂般与生俱来的欲望同样存在于他身上。

Yes, and they will be strong in him too.

阿：是的，这些欲望在他身上表现得也很强烈。

The man, then, will be at war with himself; he will be two men, and not one; but, in general, his better desires will be found to prevail over his inferior ones.

苏：因此，此人内心纠结。他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裂成两个人。但总体上，他善的欲望会压制恶的欲望。

True.

阿：对。

For these reasons such an one will be more respectable than most people; yet the true virtue of a unanimous and harmonious soul will flee far away and never come near him.

苏：综上所述，此人较之大多数人更值得尊敬，但是统一而和谐的灵魂所具备的真正美德与他绝对无缘，相去甚远。

I should expect so.

阿：我应该料到这一点。

And surely, the miser individually will be an ignoble competitor in a State for any prize of victory, or other object of honourable ambition; he will not spend his money in the contest for glory; so afraid is he of awakening his expensive appetites and inviting them to help and join in the struggle; in true oligarchical fashion he fights with a small part only of his resources, and the result commonly is that he loses the prize and saves his money.

苏：另外，这种吝啬鬼必然不会光明正大地去争夺任何本邦的胜利或荣誉的。他不会花钱在夺取虚名上。他很担心会激起自己浪费的欲望，让欲望引着自己加入到争夺中。作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他只投入少量的钱财去争夺，结果通常是错失了荣耀但也保住了财富。

Very true.

阿：的确如此。

Can we any longer doubt, then, that the miser and money-maker answers to the oligarchical State?

苏：那么，守财奴兼敛财者与寡头制国家相对应，对此我们还有疑问吗？

There can be no doubt.

阿：毫无疑问。

Next comes democracy; of this the origin and nature have still to be considered by us; and then we will enquire into the ways of the democratic man, and bring him up for judgment.

苏：下面轮到民主政体。我们仍不得不考虑其起源和本性，继而我们将讨论民主制公民的性格，并对其作出判断。

That, he said, is our method.

阿：这是我们一贯的方法。

Well, I said, and how does the change from oligarchy into democracy arise? Is it not on this wise?—The good at which such a State aims is to become as rich as possible, a desire which is insatiable?

苏：是的，那么如何从寡头制过渡到民主制呢？难道并非如此吗？——国家所追求的善便是实现其财富最大化，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欲望，是吗？

What then?

阿：此后又当如何呢？

The rulers, being aware that their power rests upon their wealth, refuse to curtail by law the extravagance of the spendthrift youth because they gain by their ruin; they take interest from them and buy up their estates and thus increase their own wealth and importance?

苏：统治者们意识到权利依仗着财富，他们不会通过法律去制止奢靡的年轻人挥霍无度，因为他们可以从其堕落中获利。他们向这些年轻人收取利息，收购其财产，以此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是吗？

To be sure.

阿：正是。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love of wealth and the spirit of moderation cannot exist together in citizens of the same State to any considerable extent; one or the other will be disregarded.

苏：无疑，在同一城邦的人们身上，崇尚财富与奉行节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共存的，二者必去其一。

That is tolerably clear.

阿：显然如此。

And in oligarchical States, from the general spread of carelessness and extravagance, men of good family have often been reduced to beggary?

苏：在寡头制国家中，因为毫无节制、奢侈浪费成风，体面家庭的子弟常常沦为穷人，是吗？

Yes, often.

阿：是的，常有发生。

And still they remain in the city; there they are, ready to sting and fully armed, and some of them owe money, some have forfeited their citizenship; a third class are in both predicaments; and they hate and conspire against those who have got their property, and against everybody else, and are eager for revolution.

苏：这些人仍然滞留于城邦中；他们全副武装，随时准备用毒针蜇人，其中一些人债务缠身，一些人被剥夺了公民权，还有一些人负债的同时丧失了公民权。他们憎恨并密谋推翻那些夺走其财产的人以及其他所有人，渴望发动革命。

That is true.

阿：正是如此。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n of business, stooping as they walk, and pretending not even to see those whom they have already ruined, insert their sting—that is, their money—into some one else who is not on his guard against them, and recover the parent sum many times over multiplied into a family of children: and so they make drone and pauper to abound in the State.

苏：另一方面，那些放贷敛财者，只顾低头走路，对他们曾经毁掉的这些人假装视而不见，并继续将毒针——他们的钱——插到对他们毫无戒心的人身上，不仅收回本金，还追加成倍的利息；于是，他们使得雄蜂和穷人充满了该城邦。

Yes, he said, there are plenty of them—that is certain.

阿：是的，很多穷人和雄蜂——这是肯定的。

The evil blazes up like a fire; and they will not extinguish it, either by restricting a man's use of his own property, or by another remedy:

苏：罪恶之火已呈燎原之势，统治者们却对此置之不理，既不约

束人们挥霍自己的财产，也不采取其他手段。

What other?

阿：何为其他手段？

One which is the next best, and has the advantage of compelling the citizens to look to their characters:—Let there be a general rule that every one shall enter into voluntary contracts at his own risk, and there will be less of this scandalous money-making, and the evils of which we were speaking will be greatly lessened in the State.

苏：退而求其次的手段，此举之优点在于可以迫使民众关注自身德行，即：制定一项通则，规定每人签订自愿契约，并自担风险。如此一来，城中无耻敛财的风气会收敛，我们所提及的城邦罪恶亦会大为减少。

Yes, they will be greatly lessened.

阿：是的，会大为减少。

At present the governors, induced by the motives which I have named, treat their subjects badly; while they and their adherents, especially the young men of the governing class, are habituated to

lead a life of luxury and idleness both of body and mind; they do nothing, and are incapable of resisting either pleasure or pain.

苏：此时的统治者们出于我之前提到的动机，置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连同他们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统治阶层中的年轻人，过惯了奢侈的生活，四体不勤、思想懈怠；他们无所事事，既贪图享乐又耐不得苦难。

Very true.

阿：的确如此。

They themselves care only for making money, and are as indifferent as the pauper to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e.

苏：他们一心只顾敛财，与穷人们一样漠视道德的培养。

Yes, quite as indifferent.

阿：是的，相当漠视。

Such is the state of affairs which prevails among them. And often rulers and their subjects may come in one another's way, whether on a journey or on some other occasion of meeting, on a

pilgrimage or a march, as fellow-soldiers or fellow-sailors; aye and they may observe the behaviour of each other in the very moment of danger—for where danger is, there is no fear that the poor will be despised by the rich—and very likely the wiry sunburnt poor man may be placed in battle at the side of a wealthy one who has never spoilt his complexion and has plenty of superfluous flesh—when he sees such an one puffing and at his wits'-end, how can he avoid drawing the conclusion that men like him are only rich because no one has the courage to despoil them? And when they meet in private will not people be saying to one another 'Our warriors are not good for much'?

苏：双方情形大致如此。统治者与其国民经常会碰面，无论是在旅途或是某些其他集会场合，在朝拜或行军途中，在陆战或海战中并肩战斗，啊，他们都会观察彼此在险境中的行为——在险境中，穷人一点不用担心会被富人们轻视——很可能在战场上，瘦长结实、皮肤黝黑的穷人被安排和皮肤白嫩、满身赘肉的富人在一起。穷人看到富人气喘吁吁、手足无措的样子，必定会认为这种人之所以富有不过是因为无人有胆量去劫掠他们而已，是吗？当穷人们私下碰面时，难道他们不会彼此议论说“我们的勇士一无是处”吗？

Yes, he said, I am quite aware that this is their way of talking.

阿：是的，我十分清楚，这便是他们的论调。

And, as in a body which is diseased the addition of a touch from without may bring on illness, and sometimes even when there is no external provocation a commotion may arise within—in the

same way wherever there is weakness in the State there is also likely to be illness, of which the occasion may be very slight, the one party introducing from without their oligarchical, the other their democratical allies, and then the State falls sick, and is at war with herself; and may be at times distracted, even when there is no external cause.

苏：正如有病的身体，稍微诱以外因便会患病，甚至有时在毫无外因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内部的紊乱。同理，哪怕诱因很小，城邦中的薄弱之处也易患病。一派引进寡头制外援，一派引进民主制盟友，于是城邦困厄，内战开始；有时即使在没有外因的情况下，该城邦亦会解体。

Yes, surely.

阿：是的，的确如此。

And then democracy comes into being after the poor have conquered their opponents, slaughtering some and banishing some, while to the remainder they give an equal share of freedom and power; and this is the for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magistrates are commonly elected by lot.

苏：此外，贫民取得胜利，将一部分反对者屠杀、一部分流放，其余人则被赋予平等的自由和权利，民主政体得以确立。在该政体形式中，地方官员通常通过抽签产生。

Yes, he said, that is the nature of democracy, whether the revolution has been effected by arms, or whether fear has caused the opposite party to withdraw.

阿：是的，不论是通过武力斗争，抑或是反对派因畏惧而退出发生了变革，民主政体本质既是如此。

And now what is their manner of life, and what sort of a government have they? for as the government is, such will be the man.

苏：那么，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如何？他们建立的是何种政府呢？政体性质会决定政体里人的性格。

Clearly, he said.

阿：显然如此。

In the first place, are they not free; and is not the city full of freedom and frankness—a man may say and do what he likes?

苏：首先，他们难道不自由吗？城邦里难道不是盛行自由和坦诚吗？这里的人们难道不是畅所欲言、为所欲为吗？

'Tis said so, he replied.

阿：据说如此。

And where freedom is, the individual is clearly able to order for himself his own life as he pleases?

苏：在自由的乐土，人们显然可以按自身喜好选择自己的生活，是吗？

Clearly.

阿：显然如此。

Then in this kind of State there will be the greatest variety of human natures?

苏：那么，在此城邦中，人们的性格会呈现最大程度的多样化，是吗？

There will.

阿：会的。

This, then, seems likely to be the fairest of States, being like an embroidered robe which is spangled with every sort of flower. And just as women and children think a variety of colours to be of all things most charming, so there are many men to whom this State, which is spangled with the manners and characters of mankind, will appear to be the fairest of States.

苏：那么，这似乎是最为美好的城邦了，如一件刺绣华袍，缀满了各色的花朵。妇孺们见到缤纷的色彩便觉大美，同样对于很多人来说，此等集聚各类生活方式、各色人格的城邦似乎便是最美好的城邦了。

Yes.

阿：是的。

Yes, my good Sir, and there will be no better in which to look for a government.

苏：对，好心的先生，若想寻觅一种政府形式，这里再好不过了。

Why?

阿：为何？

Because of the liberty which reigns there—they have a complete assortment of constitutions; and he who has a mind to establish a State, as we have been doing, must go to a democracy as he would to a bazaar at which they sell them, and pick out the one that suits him; then, when he has made his choice, he may found his State.

苏：因为这里自由盛行——这里可见各色的政体；凡同我们一样有志建立城邦者都必定要去民主制国家，正如同来到售卖各色政体的集市，然后挑选出适合自己的一款，一旦做好了选择，他便可以创建属于自己的城邦。

He will be sure to have patterns enough.

阿：这些模式一定足够他选择了。

And there being no necessity, I said, for you to govern in this State, even if you have the capacity, or to be governed, unless you like, or go to war when the rest go to war, or to be at peace when others are at peace, unless you are so disposed—there being no necessity also, because some law forbids you to hold office or be a dicast, that you should not hold office or be a dicast, if you have a fancy—is not this a way of life which for the moment is supremely delightful?

苏：在这个国家，即使能力允许，你也未必一定要掌权；若不情愿，也可以不服从统治；若不情愿，别人都去参战你也可不必去，别人都要和平，你也可不必要。即使有法律禁止你担任官职或任法官，只要你自己愿意，你也没必要一定守法。就目前而言，这难道不是极其愉悦的生活方式吗？

For the moment, yes.

阿：目前看来，的确如此。

And is not their humanity to the condemned in some cases quite charming? Have you not observed how, in a democracy, many persons, although they have been sentenced to death or exile, just stay where they are and walk about the world—the gentleman parades like a hero, and nobody sees or cares?

苏：他们有时仁慈对待犯人，难道不是很可爱吗？你难道未曾注意到在民主国家中，很多人虽已被判死刑或遭流放，却仍生活在原处，四处走动——这些先生们像英雄一般招摇过市，竟无人注意或理会吗？

Yes, he replied, many and many a one.

阿：是的，此等情况很多。

See too, I said, the forgiving spirit of democracy, and the 'don't care' about trifles, and the disregard which she shows of all the fine principles which we solemnly laid down 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city—as when we said that, except in the case of some rarely gifted nature, there never will be a good man who has not from his childhood been used to play amid things of beauty and make of them a joy and a study—how grandly does she trample all these fine notions of ours under her feet, never giving a thought to the pursuits which make a statesman, and promoting to honour any one who professes to be the people's friend.

苏：同时，你会看到民主制国家的宽容、对琐事的无所谓，以及对我们精心制定的作为城市基石的所有高尚信条所表现出来的蔑视（我们曾说过，除非极其罕见的天赋异禀之人，否则若非自幼见惯美的事物并怀以愉悦之心加以学习的人是不能成为善人的）。民主政体堂而皇之地将我们所有高尚的信条都踩到了脚下，丝毫不在乎从政者们曾经的过往，只要此人声称是人民的朋友便会得到任用和荣誉。

Yes, she is of a noble spirit.

阿：是的，此种政体气度非凡。

These and other kindred characteristics are proper to democracy, which is a charming form of government, full of variety and disorder, and dispensing a sort of equality to equals and unequals alike.

苏：这些诸如此类的特征为民主政体所特有。该政体魅力无穷，多样且无序，对于平等与不平等都一视同仁。

We know her well.

阿：我们对此非常了解。

Consider now, I said, what manner of man the individual is, or rather consider, as in the case of the State, how he comes into being.

苏：现在考虑一下，城邦中的个人具有何种性格；抑或正如我们考察该政体如何形成一样，让我们思考一下，民主制的个人是如何产生的。

Very good, he said.

阿：很好。

Is not this the way—he is the son of the miserly and oligarchical father who has trained him in his own habits?

苏：他有一个吝啬兼寡头性格的父亲，父亲一直按自己的习惯来培育儿子，难道不是如此吗？

Exactly.

阿：正是。

And, like his father, he keeps under by force the pleasures which are of the spending and not of the getting sort, being those which are called unnecessary?

苏：正如父亲一样，他强力压制花钱而非赚钱所带来的快乐，认为这些快乐没有必要。

Obviously.

阿：显然如此。

Would you like, for the sake of clearness, to distinguish which are the necessary and which are the unnecessary pleasures?

苏：为了明晰概念，你愿意对必要的快乐与不必要的快乐作以区分吗？

I should.

阿：我愿意。

Are not necessary pleasures those of which we cannot get rid, and of which the satisfaction is a benefit to us? And they are rightly called so, because we are framed by nature to desire both what is beneficial and what is necessary, and cannot help it.

苏：必要的快乐是那些我们不能避免的快乐，且此欲望的满足对我们是有益的，不是吗？他们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天性会要我们去追求有益的、必要的且难以自制的快乐。

True.

阿：对。

We are not wrong therefore in calling them necessary?

苏：因此，我们称之为“必要”，并无不妥吧？

We are not.

阿：并无不妥。

And the desires of which a man may get rid, if he takes pains from his youth upwards—of which the presence, moreover, does no good, and in some cases the reverse of good—shall we not be right in saying that all these are unnecessary?

苏：如果自幼年起通过努力可以戒除毫无益处、有时反有害处的欲望，我们难道不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不必要”吗？

Yes, certainly.

阿：是的，当然可以。

Suppose we select an example of either kind, in order that we may have a general notion of them?

苏：为了对之形成大致了解，我们关于此二者各举一例，好吗？

Very good.

阿：很好。

Will not the desire of eating, that is, of simple food and condiments, in so far as they are required for health and strength, be of the necessary class?

苏：饮食之欲，即食用简单食材和调味品，用以维持健康和保持体力，难道不属于必要的欲望吗？

That is what I should suppose.

阿：理应属于。

The pleasure of eating is necessary in two ways; it does us good and it is essential to the continuance of life?

苏：饮食之欲的必要性体现为两方面：它对我们有益，并且它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是吗？

Yes.

阿：是的。

But the condiments are only necessary in so far as they are good for health?

苏：但是，调味品只有在对健康有益处时才是必要的，对吗？

Certainly.

阿：当然。

And the desire which goes beyond this, of more delicate food, or other luxuries, which might generally be got rid of, if controlled and trained in youth, and is hurtful to the body, and hurtful to the soul in the pursuit of wisdom and virtue, may be rightly called unnecessary?

苏：逾越此限度的欲望，如要求更精致的食物或其他珍馐，若在年少时便加以控制和训练是可以戒除的。这些欲望伤身，并且不利于灵魂对智慧和美德的追求，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不必要”的快乐，是吗？

Very true.

阿：的确如此。

May we not say that these desires spend, and that the others make money because they conduce to production?

苏：我们难道不可以说一些欲望属于“铺张浪费”，而另一些因为有利于生产所以会“创造财富”吗？

Certainly.

阿：当然可以。

And of the pleasures of love, and all other pleasures, the same holds good?

苏：爱欲以及其他所有的欲望，是否皆可以此类推呢？

True.

阿：可以。

And the drone of whom we spoke was he who was surfeited in pleasures and desires of this sort, and was the slave of the unnecessary desires, whereas he who was subject to the necessary only was miserly and oligarchical?

苏：我们刚刚提及的雄蜂式人物便充满了此类的欲望和快乐，成为了不必要欲望的奴隶；而那些只受制于必要欲望的人既吝啬又具有寡头性格，对吗？

Very true.

阿：正是如此。

Again, let us see how the democratical man grows out of the oligarchical: the following, as I suspect, is commonly the process.

苏：让我们再看一看民主式人物是如何从寡头制中诞生的：我想其过程通常如下。

What is the process?

阿：其过程如何？

When a young man who has been brought up as we were just now describing, in a vulgar and miserly way, has tasted drones' honey and has come to associate with fierce and crafty natures who are able to provide for him all sorts of refinements and varieties of pleasure—then, as you may imagine, the change will begin of the oligarchical principle within him into the democratical?

苏：如前所述，如果某年轻人在粗俗、吝啬的环境中长大，已品尝过做雄蜂式人物的甜蜜快乐，与粗暴、狡诈之人结交，并从中学到了五花八门的享乐方式，那么你可以想象，他在内心将开始从寡头制向民主制转变，是吗？

Inevitably.

阿：必然如此。

And as in the city like was helping like, and the change was effected by an alliance from without assisting one division of the citizens, so too the young man is changed by a class of desires coming from without to assist the desires within him, that which is akin and alike again helping that which is akin and alike?

苏：在城中，同一派别的人们相互扶持，当有外界盟友援助民众中的某一派别时，变革便会发生。同理，如果外界的某种欲望和自己内心中的欲望相同或近似，相辅相成时，年轻人便要发生改变，对吗？

Certainly.

阿：当然。

And if there be any ally which aids the oligarchical principle within him, whether the influence of a father or of kindred, advising or rebuking him, then there arises in his soul a faction and an opposite faction, and he goes to war with himself.

苏：如果年轻人内心中存在支持寡头制的盟友（这可能是其父亲或其他家人对其劝说或指责的结果），那么年轻人的内心便会生成两股相反的派别，内心充满矛盾。

It must be so.

阿：必定如此。

And there are times when the democratical principle gives way to the oligarchical, and some of his desires die, and others are banished; a spirit of reverence enters into the young man's soul and order is restored.

苏：有时候，民主制的思想屈服于寡头制思想，于是他的一些欲望遭扼杀，另一些被摒弃；年轻人心中有了敬畏的念头，内心秩序得以恢复。

Yes, he said, that sometimes happens.

阿：是的，有时的确如此。

And then, again, after the old desires have been driven out, fresh ones spring up, which are akin to them, and because he, their father, does not know how to educate them, wax fierce and numerous.

苏：于是，当旧有的欲望被打消后，与其类似的新欲望便会不断涌现，而因为孕育这些欲望的年轻人却不知如何对之加以引导管束，

欲望便愈加膨胀、大量滋生。

Yes, he said, that is apt to be the way.

阿：是的，极可能如此。

They draw him to his old associates, and holding secret intercourse with them, breed and multiply in him.

苏：它们将他拖回到旧相识那里，让他们秘密交往，从而使欲望在年轻人灵魂中大量繁衍。

Very true.

阿：正是如此。

At length they seize upon the citadel of the young man's soul, which they perceive to be void of all accomplishments and fair pursuits and true words, which make their abode in the minds of men who are dear to the gods, and are their best guardians and sentinels.

苏：最后，欲望攻占了年轻人的灵魂堡垒，发现那里没有学问、没有正当的追求和真实的言论——这些都安居于神所喜爱者的灵魂，

是灵魂的最佳守卫者和卫兵。

None better.

阿：莫过于此。

False and boastful conceits and phrases mount upwards and take their place.

苏：于是虚假、自负的意见和言论一拥而上，取而代之。

They are certain to do so.

阿：必定如此。

And so the young man returns into the country of the lotus-eaters, and takes up his dwelling there in the face of all men; and if any help be sent by his friends to the oligarchical part of him, the aforesaid vain conceits shut the gate of the king's fastness; and they will neither allow the embassy itself to enter, nor if private advisers offer the fatherly counsel of the aged will they listen to them or receive them. There is a battle and they gain the day, and then modesty, which they call silliness, is ignominiously thrust into exile by them, and temperance, which they nickname unmanliness, is trampled in the mire and cast forth; they persuade men that

moderation and orderly expenditure are vulgarity and meanness, and so, by the help of a rabble of evil appetites, they drive them beyond the border.

苏：于是，年轻人回到了食忘忧果者的国度，公开安居下来。如果他的朋友试图声援他心中寡头制的思想，我们之前提到的那种虚假、自负的意见和言论便会关闭他灵魂城堡的大门。它们不允许使者进入；如果私下里有人以长辈身份提出一些忠告劝诫，它们也不予倾听或接待。它们在内心的冲突中占据上风，称“朴素”为“土气”，并可耻地将之强行流放；它们称“节制”为“懦弱”，对其加以践踏并将其逐出灵魂，使人们相信适度节制和合理开销又土气又小气，于是集结其他众多的恶念，将诸多美德驱逐出境。

Yes, with a will.

阿：确实如此。

And when they have emptied and swept clean the soul of him who is now in their power and who is being initiated by them in great mysteries, the next thing is to bring back to their house insolence and anarchy and waste and impudence in bright array having garlands on their heads, and a great company with them, hymning their praises and calling them by sweet names; insolence they term breeding, and anarchy liberty, and waste magnificence, and impudence courage. And so the young man passes out of his original nature, which was trained in the school of necessity, into the freedom and libertinism of useless and unnecessary pleasures.

苏：虚假和自负清空了年轻人灵魂中的美德，将年轻人牢牢地控制住并带领他见识许多以前不懂的事物。此后，他们便要率领傲慢、骄纵、奢侈、鲁莽等品格，头戴花冠，浩浩荡荡、高唱赞歌、亲亲热热、大张旗鼓地回归到年轻人灵魂里了。他们把“傲慢”说成“教养”，“骄纵”说成“自由”，“奢侈”说成“慷慨”，“鲁莽”说成“勇敢”。于是，曾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年轻人，现在失去了原本的天性，变得自由、散漫，追求无用和不必要的快乐。

Yes, he said, the change in him is visible enough.

阿：是的，他的变化很明显。

After this he lives on, spending his money and labour and time on unnecessary pleasures quite as much as on necessary ones; but if he be fortunate, and is not too much disordered in his wits, when years have elapsed, and the heyday of passion is over—supposing that he then re-admits into the city some part of the exiled virtues, and does not wholly give himself up to their successors—in that case he balances his pleasures and lives in a sort of equilibrium, putting the government of himself into the hands of the one which comes first and wins the turn; and when he has had enough of that, then into the hands of another; he despises none of them but encourages them all equally.

苏：之后，年轻人终日会在必要和不必要的快乐上花费同样多的金钱、体力和时间。如果他够幸运，头脑不是过分昏庸，随着年龄增长，年轻气盛时期一过，倘若他能让一部分曾经被驱逐的美德回归内心，并且本人并没有完全屈服于后来心中的恶念，那么他便会在两种

快乐中求得平衡，生活也较平静。哪种快乐先占据上风，他便把控制权交给它。待充分享受后，再去找寻另一种快乐。两种快乐他都不怠慢，而是对它们一视同仁。

Very true, he said.

阿：的确如此。

Neither does he receive or let pass into the fortress any true word of advice; if any one says to him that some pleasures are the satisfactions of good and noble desires, and others of evil desires, and that he ought to use and honour some and chastise and master the others—whenever this is repeated to him he shakes his head and says that they are all alike, and that one is as good as another.

苏：他的灵魂堡垒拒绝一切好言相劝。如果有人对他说某些快乐的满足是善和高尚的，而另一些快乐则是邪恶的，并告诉他前者要满足和推崇，后者要摒弃并控制，他只要一听此言便会马上摇头说这些快乐是一样的，都是善的。

Yes, he said; that is the way with him.

阿：是的，他的确如此。

Yes, I said, he lives from day to day indulging the appetite of

the hour; and sometimes he is lapped in drink and strains of the flute; then he becomes a water-drinker, and tries to get thin; then he takes a turn at gymnastics; sometimes idling and neglecting everything, then once more living the life of a philosopher; often he is busy with politics, and starts to his feet and says and does whatever comes into his head; and, if he is emulous of any one who is a warrior, off he is in that direction, or of men of business, once more in that. His life has neither law nor order; and this distracted existence he terms joy and bliss and freedom; and so he goes on.

苏：对。他整日沉迷于一时兴起的乐趣中。他有时喝酒赏乐，有时又饮清水，求瘦身；有时爱上了体育锻炼；有时无所事事、清心寡欲，有时又再次研究起哲学。他经常忙于参政议政，偶有所感，便起身发表出来，并付诸行动。如果他羡慕军旅生活，他便会朝此方向努力；如果想做商人，他亦会如此。他的生活毫无章法和秩序可言，他称这种混乱的生活为快乐、幸福和自由，因此他要继续如此生活。

Yes, he replied, he is all liberty and equality.

阿：是的，他已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

Yes, I said; his life is motley and manifold and an epitome of the lives of many;—he answers to the State which we described as fair and spangled. And many a man and many a woman will take him for their pattern, and many a constitution and many an example of manners is contained in him.

苏：对。他的生活丰富多样、五色杂陈，集中体现了很多人生活的状态——他对应了我们之前提及的美好、华丽的城邦。众多的男男女女会效仿他，他的生活中包含了众多的政体和生活的摹本。

Just so.

阿：确实如此。

Let him then be set over against democracy; he may truly be called the democratic man.

苏：让他与民主政体对应；他可以被准确地称为民主制类型的个人。

Let that be his place, he said.

阿：如此决定吧。

Last of all comes the most beautiful of all, man and State alike, tyranny and the tyrant; these we have now to consider.

苏：最后将是最完美的政体和个人，即僭主制和僭主。这是现在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主题。

Quite true, he said.

阿：的确如此。

Say then, my friend, in what manner does tyranny arise?—that it has a democratic origin is evident.

苏：啊，我的朋友，僭主制如何产生？很明显，它来自民主政体。

Clearly.

阿：显然如此。

And does not tyranny spring from democracy in the same manner as democracy from oligarchy—I mean, after a sort?

苏：僭主制起源于民主制，难道不是同民主制起源于寡头制有几分相似吗？

How?

阿：何以见得？

The good which oligarchy proposed to itself and the means by which it was maintained was excess of wealth—am I not right?

苏：寡头制所提倡的善以及维系这种善的方式便是巨额财富，我说的不对吗？

Yes.

阿：对。

And the insatiable desire of wealth and the neglect of all other things for the sake of money-getting was also the ruin of oligarchy?

苏：对财富无止境的贪欲以及因热衷赚钱而对其他事务的漠视，同时也是寡头制灭亡的原因，对吗？

True.

阿：对。

And democracy has her own good, of which the insatiable desire brings her to dissolution?

苏：那么民主制拥有属于自己的善，对善无止境的欲望导致了其灭亡，对吗？

What good?

阿：何谓“善”？

Freedom, I replied; which, as they tell you in a democracy, is the glory of the State—and that therefore in a democracy alone will the freeman of nature deign to dwell.

苏：自由。在民主政体中，人们会说自由是国家的荣耀，因此天性自由的人们只喜欢在民主制国家安家落户。

Yes; the saying is in everybody's mouth.

阿：是的。众人皆如是说。

I was going to observe, that the insatiable desire of this and the neglect of other things introduces the change in democracy, which occasions a demand for tyranny.

苏：我之前要说，对自由不知餍足的追求以及对其他事务的忽视，导致民主制发生了变革，产生了对僭主制的需求。

How so?

阿：何出此言？

When a democracy which is thirsting for freedom has evil cup-bearers presiding over the feast, and has drunk too deeply of the strong wine of freedom, then, unless her rulers are very amenable and give a plentiful draught, she calls them to account and punishes them, and says that they are cursed oligarchs.

苏：渴求自由的民主人士，在酒宴上遇到了糟糕的侍酒者，并饮下了大量自由的烈酒，此时除非统治者们服从他们的意愿，并提供足够的酒水，否则他便会怪罪并责罚统治者们，声称他们是受诅咒的寡头者。

Yes, he replied, a very common occurrence.

阿：是的，此类事情时有发生。

Yes, I said; and loyal citizens are insultingly termed by her slaves who hug their chains and men of naught; she would have subjects who are like rulers, and rulers who are like subjects: these are men after her own heart, whom she praises and honours both in private and public. Now, in such a State, can liberty have any limit?

苏：是的。另外，忠诚的公民会被辱骂为死心塌地的奴隶和一文不值的废物；在民主制国家，臣民如统治者，统治者如臣民；如此之人方合国家心意，在公私场合得到褒扬和赞誉。此时，在如此的国家，自由会受到限制吗？

Certainly not.

阿：当然不会。

By degrees the anarchy finds a way into private houses, and ends by getting among the animals and infecting them.

苏：渐渐地，混乱的无政府主义渗透到私人家庭生活中，最后渗透到动物之中并感染了它们。

How do you mean?

阿：何出此言？

I mean that the father grows accustomed to descend to the level of his sons and to fear them, and the son is on a level with his father, he having no respect or reverence for either of his parents; and this is his freedom, and the metic is equal with the citizen and the citizen with the metic, and the stranger is quite as good as either.

苏：我指的是，父亲惯于降低身份和儿子平等并惧怕儿子；儿子和父亲平起平坐，对双亲毫无尊敬或畏惧之感，这便是儿子的自由；此外，公民中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平等，本地人口也等同于外来人口，即使是异乡人也与公民一般无二。

Yes, he said, that is the way.

阿：是的，的确如此。

And these are not the only evils, I said—there are several lesser ones: In such a state of society the master fears and flatters his scholars, and the scholars despise their masters and tutors; young and old are all alike; and the young man is on a level with the old, and is ready to compete with him in word or deed; and old men condescend to the young and are full of pleasantry and gaiety; they are loth to be thought morose and authoritative, and therefore they adopt the manners of the young.

苏：其弊病不止如此，稍轻些的还包括：老师害怕并要讨好学生，学生轻视老师和教育者；年长者与年轻人之间亦如此；年轻人与年长者平级，随时以言语或行为顶撞长者；年长者要平等对待年轻人，还要表现出兴高采烈；年长者由于担心被视为古板、专断之人，便效仿年轻人的做派。

Quite true, he said.

阿：的确如此。

The last extreme of popular liberty is when the slave bought with money, whether male or female, is just as free as his or her purchaser; nor must I forget to tell of the liberty and equality of the two sexes in relation to each other.

苏：最后，该自由最极端的例子，便是买来的男女奴隶竟与他们的男女主人享有同样的自由。关于男女关系之间的自由和平等，我也必须提及。

Why not, as Aeschylus says, utter the word which rises to our lips?

阿：如埃斯库罗斯所说，何不畅所欲言呢？

That is what I am doing, I replied; and I must add that no one who does not know would believe, how much greater is the liberty which the animals who are under the dominion of man have in a democracy than in any other State: for truly, the she-dogs, as the proverb says, are as good as their she-mistresses, and the horses and asses have a way of marching along with all the rights and dignities of freemen; and they will run at anybody who comes in their way if he does not leave the road clear for them: and all things are just ready to burst with liberty.

苏：我正欲如此。我必须补充一句，不知情者根本不会相信，在民主制国家中人们所饲养的动物要比在其他政体的国家中享有大得多的自由。事实上，如谚语所言，母狗如其女主。马匹和驴子像自由人一样有权利且大模大样地在街上行走。如果有人碍事且不肯让路的话，它们便会横冲直撞：所有的事物都洋溢着自由的精神。

When I take a country walk, he said, I often experience what you describe. You and I have dreamed the same thing.

阿：当我在郊外行走时，经常会遇到你所说的情形。你和我想法一致。

And above all, I said, and as the result of all, see how sensitive the citizens become; they chafe impatiently at the least touch of authority, and at length, as you know, they cease to care even for the laws, written or unwritten; they will have no one over them.

苏：最重要的是，最后这些市民们变得极其敏感，稍受约束便暴躁不已。后来，正如你知道的，他们甚至不再理会成文或不成文的法律，任何人都无法管束他们。

Yes, he said, I know it too well.

阿：是的，我特别了解。

Such, my friend, I said, is the fair and glorious beginning out of which springs tyranny.

苏：我的朋友，这便是僭主制美好而光辉灿烂的开端。

Glorious indeed, he said. But what is the next step?

阿：的确光辉灿烂。那么此后如何呢？

The ruin of oligarchy is the ruin of democracy; the same disease magnified and intensified by liberty overmasters democracy—the truth being that the excessive increase of anything often causes a reaction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and this is the case not only in the seasons and in vegetable and animal life, but above all in forms of government.

苏：导致寡头制毁灭的祸根也毁灭了民主制。自由使得弊病增强变大，凌驾于民主之上。事实上，物极则必反，不仅节气如此，植物和动物的生命如此，而且最重要的是政体形式亦如此。

True.

阿：对。

The excess of liberty, whether in States or individuals, seems only to pass into excess of slavery.

苏：无论是对个人或是城邦，过度自由似乎只能渐渐演变为过度的奴役。

Yes, the natural order.

阿：是的，自然规律使然。

And so tyranny naturally arises out of democracy, and the most aggravated form of tyranny and slavery out of the most extreme form of liberty?

苏：因此从民主制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僭主制，从最极端的自由中产生了最恶劣的僭主制及奴役制度，是吗？

As we might expect.

阿：可以想象得到。

That, however, was not, as I believe, your question—you rather desired to know what is that disorder which is generated alike in oligarchy and democracy, and is the ruin of both?

苏：但是，我想，这并非你要问的问题，你更想知道寡头制和民主制的何种共同弊病导致二者灭亡，对吗？

Just so, he replied.

阿：正是如此。

Well, I said, I meant to refer to the class of idle spendthrifts, of whom the more courageous are the leaders and the more timid the followers, the same whom we were comparing to drones, some stingless, and others having stings.

苏：哦，我指的是游手好闲、挥霍无度的一群人，其中以胆量较大者为领导，胆量较小者为随从。我们曾将这群人比喻成雄蜂，一些人无刺，另一些人有刺。

A very just comparison.

阿：很恰当的比喻。

These two classes are the plagues of every city in which they are generated, being what phlegm and bile are to the body. And the good physician and lawgiver of the State ought, like the wise bee-master, to keep them at a distance and prevent, if possible, their

ever coming in; and if they have anyhow found a way in, then he should have them and their cells cut out as speedily as possible.

苏：正如身体中的黏液与胆汁，这两类人均为所在城邦的祸害。因此，好的医生和城邦立法者，会像聪明的养蜂人一样与它们保持距离，如果可能，禁止它们进入蜂巢。一旦它们设法进入了蜂巢，养蜂人便会尽快将这些雄蜂连同它们的蜂巢一同铲除。

Yes, by all means, he said.

阿：是的，务必如此。

Then, in order that we may see clearly what we are doing, let us imagine democracy to be divided, as indeed it is, into three classes; for in the first place freedom creates rather more drones in the democratic than there were in the oligarchical State.

苏：那么，为了能够解释清楚，我们假设将民主政体按照实际状况分成三部分。首先，自由使得民主制国家较之寡头制国家产生了更多的雄蜂式人物。

That is true.

阿：的确如此。

And in the democracy they are certainly more intensified.

苏：在民主政体中，这些人必然会变本加厉。

How so?

阿：何以见得？

Because in the oligarchical State they are disqualified and driven from office, and therefore they cannot train or gather strength; whereas in a democracy they are almost the entire ruling power, and while the keener sort speak and act, the rest keep buzzing about the bema and do not suffer a word to be said on the other side; hence in democracies almost everything is managed by the drones.

苏：因为在寡头制国家中这些人被剥夺了权利且不被允许参政，因此他们得不到锻炼，无法积蓄力量。但是在民主政体中，他们几乎占据了整个领导政权。其中较出色者讲话办事于前，而其余人等则在讲坛周围嗡嗡，不准许反对者发表任何言论。因此，在民主制中，几乎一切事务都由雄蜂式的人物管理着。

Very true, he said.

阿：正是如此。

Then there is another class which is always being severed from the mass.

苏：还有一类人总是与第一类人截然不同。

What is that?

阿：哪类人？

They are the orderly class, which in a nation of traders is sure to be the richest.

苏：守秩序之人，在人人谋利的国家，一定会是最为富有者。

Naturally so.

阿：必然如此。

They are the most squeezable persons and yield the largest amount of honey to the drones.

苏：这些人受敲诈最多，要将最大份额的蜂蜜拱手送给雄蜂。

Why, he said, there is little to be squeezed out of people who have little.

阿：啊，一无所有的人并无可供敲诈的东西。

And this is called the wealthy class, and the drones feed upon them.

苏：这即是富人阶层，而雄蜂们则靠掠夺他们为生。

That is pretty much the case, he said.

阿：情况大致如此。

The people are a third class, consisting of those who work with their own hands; they are not politicians, and have not much to live upon. This, when assembled,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powerful class in a democracy.

苏：第三部分人是靠双手劳动的人们。他们不参与政治，没有多少财产。这些人聚到一起构成民主政体中数量最多、力量最大的群体。

True, he said; but then the multitude is seldom willing to congregate unless they get a little honey.

阿：对。但是除非可以分享到一点点的好处，否则这个群体很少会团结到一起。

And do they not share? I said. Do not their leaders deprive the rich of their estates and distribute them among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aking care to reserve the larger part for themselves?

苏：他们难道不会分享吗？他们的带头人不会抢夺富人们的财富然后分发给他们，同时自己留下最大的份额吗？

Why, yes, he said, to that extent the people do share.

阿：啊，是的，如此说来，他们确实分享。

And the persons whose property is taken from them are compelled to defend themselves before the people as they best can?

苏：被抢夺的人们会被迫全力进行自卫反击，是吗？

What else can they do?

阿：他们还有其他选择吗？

And then, although they may have no desire of change, the others charge them with plotting against the people and being friends of oligarchy?

苏：那么，这些富人虽不想变革，但会有他人指控他们阴谋反对人民或亲近寡头制，是吗？

True.

阿：对。

And the end is that when they see the people, not of their own accord, but through ignorance, and because they are deceived by informers, seeking to do them wrong, then at last they are forced to become oligarchs in reality; they do not wish to be, but the sting of the drones torments them and breeds revolution in them.

苏：结果，当他们看到人民，虽非自愿但出于无知，受造谣者蛊惑试图冤枉自己时，此时他们被迫真的成为了寡头者。这非他们所愿，但雄蜂的毒针折磨着他们，逼迫他们造反。

That is exactly the truth.

阿：正是如此。

Then come impeachments and judgments and trials of one another.

苏：于是各方开始相互检举、指控、审判。

True.

阿：对。

The people have always some champion whom they set over them and nurse into greatness.

苏：人民总是会拥戴某人，然后将其神化。

Yes, that is their way.

阿：是的，他们向来如此。

This and no other is the root from which a tyrant springs; when he first appears above ground he is a protector.

苏：这便是僭主产生的唯一原因了。僭主出现时，都是救世主。

Yes, that is quite clear.

阿：是的，显然如此。

How then does a protector begin to change into a tyrant? Clearly when he does what the man is said to do in the tale of the Arcadian temple of Lycaean Zeus.

苏：那么，救世主是如何开始变为僭主呢？显然是他做了吕克亚宙斯圣地阿卡狄亚神庙故事中人物所做的事情。

What tale?

阿：什么故事？

The tale is that he who has tasted the entrails of a single human victim minced up with the entrails of other victims is destined to become a wolf. Did you never hear it?

苏：故事讲的是，谁要是尝过一块与其他动物内脏祭品混在一起的人的内脏，他便一定会变成狼。你难道没听说过吗？

Oh, yes.

阿：哦，听说过。

And the protector of the people is like him; having a mob entirely at his disposal, he is not restrained from shedding the blood of kinsmen; by the favourite method of false accusation he brings them into court and murders them, making the life of man to disappear, and with unholy tongue and lips tasting the blood of his fellow citizens; some he kills and others he banishes, at the same time hinting at the abolition of debts and partition of lands: and after this, what will be his destiny? Must he not either perish at the hands of his enemies, or from being a man become a wolf—that is, a tyrant?

苏：人民的救世主便是如此之人。人民完全听信于他，他肆无忌惮地屠杀同胞，用惯用的莫须有罪名审判并杀害同胞，取人性命，用其罪恶的舌和唇舔食同胞的鲜血。一些人遭杀害，一些人被流放，与此同时他暗示要取消债务、划分土地。之后，他的命运如何呢？他难道不会死于敌人之手，抑或从人变为狼——即僭主吗？

Inevitably.

阿：必定如此。

This, I said, is he who begins to make a party against the rich?

苏：这便是聚众反抗富有者之人吗？

The same.

阿：正是。

After a while he is driven out, but comes back, in spite of his enemies, a tyrant full grown.

苏：之后他会遭驱逐，但不惧强敌的他还会归来，因其羽翼已丰满而成为一名僭主。

That is clear.

阿：显然如此。

And if they are unable to expel him, or to get him condemned to death by a public accusation, they conspire to assassinate him.

苏：如果敌人们无法驱逐他，抑或无法通过公诉判其死罪，便会阴谋刺杀他。

Yes, he said, that is their usual way.

阿：是的，通常会如此。

Then comes the famous request for a body-guard, which is the device of all those who have got thus far in their tyrannical career—'Let not the people's friend,' as they say, 'be lost to them.'

苏：然后便是要求护卫的请求了，任何僭主走到这一步都会如此，如他们所言“莫让人民之友与人民分离”。

Exactly.

阿：正是。

The people readily assent; all their fears are for him—they have none for themselves.

苏：人民很容易答应这一请求。他们为他的安危担忧，却丝毫不担心自身的处境。

Very true.

阿：的确如此。

And when a man who is wealthy and is also accused of being an enemy of the people sees this, then, my friend, as the oracle said to Croesus, 'By pebbly Hermus' shore he flees and rests not, and is not ashamed to be a coward.'

苏：如果被指控为人民之敌的富人见此情景，我的朋友啊，此时他一定会按照克里萨斯王所得神谕的指示：“沿着布满鹅卵石的赫尔墨斯河岸逃跑，片刻莫做停留，被人取笑胆怯亦不可耻。”

And quite right too, said he, for if he were, he would never be ashamed again.

阿：此言亦有理，如果他羞于做逃跑之人，便永远不会再度羞愧了。

But if he is caught he dies.

苏：一旦被抓，他便会丧命。

Of course.

阿：当然。

And he, the protector of whom we spoke, is to be seen, not 'larding the plain' with his bulk, but himself the overthrower of many, standing up in the chariot of State with the reins in his hand, no longer protector, but tyrant absolute.

苏：我们所说的救世主此时并未“横尸荒野”，而是手握缰绳站在国家这辆战车上将许多人打翻在地。他不再是救世主，而是彻头彻尾的僭主。

No doubt, he said.

阿：毫无疑问。

And now let us consider the happiness of the man, and also of the State in which a creature like him is generated.

苏：现在我们将探讨僭主以及他所诞生的僭主制国家的幸福感。

Yes, he said, let us consider that.

阿：好吧。让我们探讨一下。

At first, in the early days of his power, he is full of smiles, and

he salutes every one whom he meets;—he to be called a tyrant, who is making promises in public and also in private! liberating debtors, and distributing land to the people and his followers, and wanting to be so kind and good to every one!

苏：起初在执政早期，他满脸堆笑，逢人问好。为了做好君主，公私场合他都有求必应。他解除人民债务，分配土地给人民及他的追随者，试图树立亲民形象。

Of course, he said.

阿：当然。

But when he has disposed of foreign enemies by conquest or treaty, and there is nothing to fear from them, then he is always stirring up some war or other, in order that the people may require a leader.

苏：每当通过征服或谈判方式解除外患，无外敌困扰之时，他总会挑起另一场争端，从而使人民需要一名领袖。

To be sure.

阿：确实如此。

Has he not also another object, which is that they may be impoverished by payment of taxes, and thus compelled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ir daily wants and therefore less likely to conspire against him?

苏：借税收陷人民于贫困，使得人民只能全力忙于生计而根本无暇阴谋反对他——这难道不是他的另一个目的吗？

Clearly.

阿：显然如此。

And if any of them are suspected by him of having notions of freedom, and of resistance to his authority, he will have a good pretext for destroying them by placing them at the mercy of the enemy; and for all these reasons the tyrant must be always getting up a war.

苏：如果他怀疑谁有自由倾向，反抗他的统治，他便会寻机借敌人之手除掉他们。鉴于这些原因，僭主必须不断挑起战争。

He must.

阿：必定如此。

Now he begins to grow unpopular.

苏：现在他开始不得人心。

A necessary result.

阿：必然如此。

Then some of those who joined in setting him up, and who are in power, speak their minds to him and to one another, and the more courageous of them cast in his teeth what is being done.

苏：曾经拥戴他、现在共掌大权的一些元老们，开始向他谏言并议论纷纷，较勇敢者公开反对他的所作所为。

Yes, that may be expected.

阿：是的，可想而知。

And the tyrant, if he means to rule, must get rid of them; he cannot stop while he has a friend or an enemy who is good for anything.

苏：如果这位僭主想维持统治，便必须除掉这些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只要还剩一个具有任何价值之人，他便一定不会收手。

He cannot.

阿：不会收手。

And therefore he must look about him and see who is valiant, who is high-minded, who is wise, who is wealthy; happy man, he is the enemy of them all, and must seek occasion against them whether he will or no, until he has made a purgation of the State.

苏：因此他必须环视四周寻找勇敢者、高尚者、明智者、富有者。无论愿意与否，为了自己幸福，他与所有这些人为敌，并且必须伺机除掉他们，直至完成对整个城邦的清洗。

Yes, he said, and a rare purgation.

阿：是的，一场罕见的大清洗。

Yes, I said, not the sort of purgation which the physicians make of the body; for they take away the worse and leave the better part, but he does the reverse.

苏：是的，这种清洗不同于医生对身体的清洗。医生是除掉坏的部分、留下好的，而他恰恰相反。

If he is to rule, I suppose that he cannot help himself.

阿：为了巩固统治，我想他身不由己。

What a blessed alternative, I said:—to be compelled to dwell only with the many bad, and to be by them hated, or not to live at all!

苏：多好的抉择啊——或者被迫与一无是处的众人生活在一起并受他们憎恨，或者便根本不能活着！

Yes, that is the alternative.

阿：是的，别无选择。

And the more detestable his actions are to the citizens the more satellites and the greater devotion in them will he require?

苏：他的行为越不得民心，他便越要求更多、更忠心的卫兵，是吗？

Certainly.

阿：当然。

And who are the devoted band, and where will he procure them?

苏：谁是忠心的人，他到何处寻觅他们呢？

They will flock to him, he said, of their own accord, if he pays them.

阿：如果他支付薪金，他们会主动成群结队飞来。

By the dog! I said, here are more drones, of every sort and from every land.

苏：天哪！世界各地存在着更多的、形形色色的雄蜂。

Yes, he said, there are.

阿：是的，确实有。

But will he not desire to get them on the spot?

苏：但是难道他不想就地获得卫兵吗？

How do you mean?

阿：此话怎讲？

He will rob the citizens of their slaves; he will then set them free and enrol them in his body-guard.

苏：他将夺走公民的奴隶，解放他们，再将他们招募到自己的卫队。

To be sure, he said; and he will be able to trust them best of all.

阿：是的，他可以视之为心腹。

What a blessed creature, I said, must this tyrant be; he has put to death the others and has these for his trusted friends.

苏：这位僭主多么幸运啊！他处死了异己，又拥有了这些心腹知己。

Yes, he said; they are quite of his sort.

阿：是的，他们皆为一丘之貉。

Yes, I said, and these are the new citizens whom he has called into existence, who admire him and are his companions, while the good hate and avoid him.

苏：对。这些拜他所赐成为新公民的人们敬仰他，成为他的同伙。而那些正直的人们却对他憎恨且唯恐避之不及。

Of course.

阿：当然。

Verily, then, tragedy is a wise thing and Euripides a great tragedian.

苏：事实上，悲剧蕴含智慧，欧里庇得斯便是一名伟大的悲剧大师。

Why so?

阿：何出此言？

Why, because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pregnant saying, 'Tyrants are wise by living with the wise;' and he clearly meant to say that they are the wise whom the tyrant makes his companions.

苏：啊，因为他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与聪明人为友的君主为明君。显然他是在说，陪伴君主者为聪明之人。

Yes, he said, and he also praises tyranny as godlike; and many other things of the same kind are said by him and by the other poets.

阿：是的，他还称颂僭主为神；他连同众多别的诗人说过很多类似的话。

And therefore, I said, the tragic poets being wise men will forgive us and any others who live after our manner if we do not receive them into our State, because they are the eulogists of tyranny.

苏：这些聪明的悲剧诗人们为僭主制高唱赞歌，因此如果我们以及步我们之后尘者不允许他们进入我们的城邦，他们也会谅解的。

Yes, he said, those who have the wit will doubtless forgive us.

阿：是的，这些聪明人无疑会谅解我们的。

But they will continue to go to other cities and attract mobs, and hire voices fair and loud and persuasive, and draw the cities over to tyrannies and democracies.

苏：但是他们会继续到其他城邦，拉拢民众，雇佣声音优美、洪亮、有说服力的歌手们，使这些城邦转向僭主制和民主制。

Very true.

阿：确实如此。

Moreover, they are paid for this and receive honour—the greatest honour, as might be expected, from tyrants, and the next greatest from democracies; but the higher they ascend our constitution hill, the more their reputation fails, and seems unable from shortness of breath to proceed further.

苏：他们因此会获得报酬和名誉——可以预料，最大的荣誉为僭主制所提供，其次为民主制所提供。但是在攀爬我们的政治体制高山时，他们却爬得越高，名声越坏，一副气喘吁吁寸步难行的样子。

True.

阿：对。

But we are wandering from the subject: Let us therefore return and enquire how the tyrant will maintain that fair and numerous and various and ever-changing army of his.

苏：不过，我们偏离了主题，因此我们还是回来说说，僭主是如何维系他装备精良、数量巨大、成员复杂、变动频繁的部队的。

If, he said, there are sacred treasures in the city, he will confiscate and spend them; and in so far as the fortunes of attainted persons may suffice, he will be able to diminish the taxes which he would otherwise have to impose upon the people.

阿：城里若有宗教的财产，僭主便会将其充公变现。如果对罪犯罚没的财产够多，他便会减少原本应该强加在民众身上的税赋。

And when these fail?

苏：那么这些财源耗尽之日呢？

Why, clearly, he said, then he and his boon companions, whether male or female, will be maintained out of his father's estate.

阿：哦，显然，他以及他男男女女的酒肉朋友们便要靠他父亲的财产来维系了。

You mean to say that the people, from whom he has derived his being, will maintain him and his companions?

苏：你是说那些推举他的民众现在要来供养他本人以及他的党羽了吗？

Yes, he said; they cannot help themselves.

阿：是的，他们不得不如此。

But what if the people fly into a passion, and aver that a grown-up son ought not to be supported by his father, but that the father should be supported by the son? The father did not bring him into being, or settle him in life, in order that when his son became a man he should himself be the servant of his own servants and should support him and his rabble of slaves and companions; but that his son should protect him, and that by his help he might be emancipate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rich and aristocratic, as they are termed. And so he bids him and his companions depart, just as any other father might drive out of the house a riotous son and his undesirable associates.

苏：但是如果民众发怒，说儿子长大成人不应该再由父亲供养，反倒是儿子应担负赡养父亲之责，又当如何呢？父亲将他培养成人，使之安身立命，并非为了待儿子长大成人，反受仆人的奴役，并要供养儿子、儿子的奴隶以及同伙；而是为了儿子能够保护父亲，并且要助父亲摆脱所谓富人及贵族们的统治。于是正如其他父亲将逆子及其狐朋狗友从家里赶出一样，这位父亲喝令儿子以及他同伙离开。

By heaven, he said, then the parent will discover what a monster he has been fostering in his bosom; and, when he wants to drive him out, he will find that he is weak and his son strong.

阿：天啊，这时父亲便会发现他亲手抚育的竟是如此野兽；当他要赶儿子出门，却发现自己竟如此虚弱，而儿子已然强壮。

Why, you do not mean to say that the tyrant will use violence? What! beat his father if he opposes him?

苏：啊，你难道不是要说僭主会诉诸暴力吗？如果父亲反对，他会殴打其父吗？

Yes, he will, having first disarmed him.

阿：会的，他会在解除对方武装之后动手。

Then he is a parricide, and a cruel guardian of an aged parent;

and this is real tyranny, about which there can be no longer a mistake: as the saying is, the people who would escape the smoke which is the slavery of freemen, has fallen into the fire which is the tyranny of slaves. Thus liberty, getting out of all order and reason, passes into the harshest and bitterest form of slavery.

苏：然后他成为一名弑父者，成为年迈父母残暴的照顾者。这便是真正的僭主制，千真万确。如谚语所言，人们从受自由人奴役的浓烟中逃脱出来，又落入到僭主制的火坑中，受奴隶们奴役。因此，自由一旦失去理智与秩序，便会沦为最残酷、最痛苦的奴隶制形式。

True, he said.

阿：对。

Very well; and may we not rightly say that we have sufficiently discussed the nature of tyranny, and the manner of the transition from democracy to tyranny?

苏：很好。我们难道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已经充分地讨论了僭主制的性质以及从民主制到僭主制的过程吗？

Yes, quite enough, he said.

阿：是的，相当充分。

BOOK IX.

第九卷

SOCRATES—ADEIMANTUS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阿得曼托斯

Last of all comes the tyrannical man; about whom we have once more to ask, how is he formed out of the democratical? and how does he live, in happiness or in misery?

苏：最后说到僭主制个人。关于此人，我们必须再次发问，问及他是如何从民主制中诞生、生活如何，幸福抑或痛苦？

Yes, he said, he is the only one remaining.

阿：是的，仅剩僭主制个人。

There is, however, I said, a previous question which remains unanswered.

苏：但是，还有一个之前尚未解答的问题。

What question?

阿：什么问题？

I do not think that we have adequately determined the nature and number of the appetites, and until this is accomplished the enquiry will always be confused.

苏：我认为，我们未曾充分地判断欲望的本质与数量。在此问题解决之前，我们的论辩将会一直杂乱无章。

Well, he said, it is not too late to supply the omission.

阿：好吧，现在填补疏漏亦不为迟。

Very true, I said; and observe the point which I want to understand: Certain of the unnecessary pleasures and appetites I conceive to be unlawful; every one appears to have them, but in some persons they are controlled by the laws and by reason, and the better desires prevail over them—either they are wholly banished or they become few and weak; while in the case of others they are stronger, and there are more of them.

苏：的确如此。请注意我要说明的观点：我认为，一些不必要的

快乐和欲望是不道德的；每个人似乎都有如此欲望，但是在有些人身上，不必要的欲望被天性和理智所控制，较善的欲望占据了优势——这些不必要的欲望或者被全部摒弃，或者变得稀少、微弱；然而，在另一些人身上，这些欲望却变得更强烈，数量更多。

Which appetites do you mean?

阿：你指的是何种欲望？

I mean those which are awake when the reasoning and human and ruling power is asleep; then the wild beast within us, gorged with meat or drink, starts up and having shaken off sleep, goes forth to satisfy his desires; and there is no conceivable folly or crime—not excepting incest or any other unnatural union, or parricide, or the eating of forbidden food—which at such a time, when he has parted company with all shame and sense, a man may not be ready to commit.

苏：我所指的是那些在理性、人性和控制力昏睡时活跃着的欲望。于是我们体内的野兽饱餐酒肉之后，站起身来，甩掉困意，冲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当人摒弃了一切的羞耻和理智，荒唐绝伦，便会无恶不作——乱伦、非正常的交合、弑父，或者食用被禁食物。

Most true, he said.

阿：千真万确。

But when a man's pulse is healthy and temperate, and when before going to sleep he has awakened his rational powers, and fed them on noble thoughts and enquiries, collecting himself in meditation; after having first indulged his appetites neither too much nor too little, but just enough to lay them to sleep, and prevent them and their enjoyments and pains from interfering with the higher principle—which he leaves in the solitude of pure abstraction, free to contemplate and aspire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unknown, whether in past, present, or future: when again he has allayed the passionate element, if he has a quarrel against any one—I say, when, after pacifying the two irrational principles, he rouses up the third, which is reason, before he takes his rest, then, as you know, he attains truth most nearly, and is least likely to be the sport of fantastic and lawless visions.

苏：如果一个人的激情健康且有节制，在入睡前先唤醒自己的理性部分，以高尚的思想与追求喂食之，并通过冥想让自身冷静下来；他先既不过多也不过少而是恰到好处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安抚它们入睡，不让这些欲望以及快乐和痛苦的情绪干扰到自己更善的本性，他把这善的本性留给独处时的空想，让自己自由地思考和追求未知的、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知识。如果他曾与人发生争吵，他也会安抚自己激动的情绪。我是说，等他安顿好这两种不理智的本性后，他便会唤醒第三种——即理智，然后再睡去。于是，如你所知，他离真理最近，也最不可能受激情和非法的梦境摆布。

I quite agree.

阿：我完全同意。

In saying this I have been running into a digression; but the point which I desire to note is that in all of us, even in good men, there is a lawless wild-beast nature, which peers out in sleep. Pray, consider whether I am right, and you agree with me.

苏：我的这番话已经偏离了主题。但我想指出的是，在我们所有人（包括善人）的体内都有一种无法无天、野兽般的本性，趁我们熟睡对外窥视。务必请你考虑一下：我的说法正确与否？你是否赞同？

Yes, I agree.

阿：是的，我赞同。

And now remember the character which we attributed to the democratic man. He was supposed from his youth upwards to have been trained under a miserly parent, who encouraged the saving appetites in him, but discountenanced the unnecessary, which aim only at amusement and ornament?

苏：现在请回忆一下，我们认为民主制个人所应具有的品性。此人应该自小一直受节俭的父母教养，父母鼓励他节俭，不要为了娱乐和表面风光乱花钱，对吗？

True.

阿：对。

And then he got into the company of a more refined, licentious sort of people, and taking to all their wanton ways rushed into the opposite extreme from an abhorrence of his father's meanness. At last, being a better man than his corruptors, he was drawn in both directions until he halted midway and led a life, not of vulgar and slavish passion, but of what he deemed moderate indulgence in various pleasures. After this manner the democrat was generated out of the oligarch?

苏：后来他与一些较为世故、放荡的人为伍，并喜欢上了他们那种奢侈的生活，出于对父亲节俭吝啬的厌恶他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最终，他受两个方向的拉扯，但因其本性要好于那些教唆他的人，最后停在了中间，过着一种不放纵、不寒酸、在他看来适度的、享受各种快乐的生活。于是，寡头式人物变成了民主式人物，是吗？

Yes, he said; that was our view of him, and is so still.

阿：是的。我们当时如此认为，现在仍然如此认为。

And now, I said, years will have passed away, and you must conceive this man, such as he is, to have a son, who is brought up in his father's principles.

苏：如今，数年过去，你一定想象得到，此人已为人父，儿子按

照父亲的理念被抚养成人。

I can imagine him.

阿：我可以想象。

Then you must further imagine the same thing to happen to the son which has already happened to the father:—he is drawn into a perfectly lawless life, which by his seducers is termed perfect liberty; and his father and friends take part with his moderate desires, and the opposite party assist the opposite ones. As soon as these dire magicians and tyrant-makers find that they are losing their hold on him, they contrive to implant in him a master passion, to be lord over his idle and spendthrift lusts—a sort of monstrous winged drone—that is the only image which will adequately describe him.

苏：然后你一定进一步想象得到，父亲当年的遭遇已经在儿子身上重演——受人影响过着完全无法无天的生活。按照教唆者们的说法，这即是完全的自由。他的父亲和朋友支持他拥有适度的欲望，而教唆者却鼓吹极端的欲望。当这些可怕的巫师和僭主制造者们发现他们已经无法掌控他时，他们会设法在他心中培育一种最大的爱好，以此来主宰他懒散挥霍的欲望（犹如一种巨大的雄蜂——这是唯一能充分描述这种人的形象）。

Yes, he said, that is the only adequate image of him.

阿：是的，唯有如此，方能充分展现其形象。

And when his other lusts, amid clouds of incense and perfumes and garlands and wines, and all the pleasures of a dissolute life, now let loose, come buzzing around him, nourishing to the utmost the sting of desire which they implant in his drone-like nature, then at last this lord of the soul, having Madness for the captain of his guard, breaks out into a frenzy: and if he finds in himself any good opinions or appetites in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there is in him any sense of shame remaining, to these better principles he puts an end, and casts them forth until he has purged away temperance and brought in madness to the full.

苏：他的其他欲望以及所有放纵带来的快乐此刻都被释放出来，在香雾缭绕、花环美酒之中，嗡嗡地围着他团团转，并极力地滋养着在他雄蜂本性中所植下的毒针一般的欲望，最后灵魂的国王将‘疯狂’选为了自己的护卫长，灵魂开始放纵。如果他发觉体内有处于萌芽状态的善的观点、欲望或残余的羞耻感，他会扼杀、摒弃善的部分，直到最后他毫无节制，彻底疯狂。

Yes, he said, that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tyrannical man is generated.

阿：是的，僭主式个人由此而产生。

And is not this the reason why of old love has been called a tyrant?

苏：自古色欲被称为专制暴君，难道不是正因为如此吗？

I should not wonder.

阿：我认为，不足为奇。

Further, I said, has not a drunken man also the spirit of a tyrant?

苏：此外，醉汉亦具有僭主气质吗？

He has.

阿：是的。

And you know that a man who is deranged and not right in his mind, will fancy that he is able to rule, not only over men, but also over the gods?

苏：你知道，疯子或精神错乱的人会幻想自己不但可以统治人类，还可以统治诸神吗？

That he will.

阿：他的确如此。

And the tyrannical man 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word comes into being when, eith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ature, or habit, or both, he becomes drunken, lustful, passionate? O my friend, is not that so?

苏：当人受本性、习性或两者共同的影响而变得醉醺醺、贪婪好色、狂躁易怒时，一个十足的僭主式个人便诞生了，是吗？哦，我的朋友，难道并非如此吗？

Assuredly.

阿：的确如此。

Such is the man and such is his origin. And next, how does he live?

苏：这便是僭主式个人及其产生的原因。之后，他是如何生活的呢？

Suppose, as people facetiously say, you were to tell me.

阿：如人们玩笑所说，该由你来告诉我啊。

I imagine, I said, at the next step in his progress, that there will be feasts and carousals and revellings and courtezans, and all that sort of thing; Love is the lord of the house within him, and orders all the concerns of his soul.

苏：我想他下一步将要纵情狂欢、酒宴与声色，诸如此类。色欲是他灵魂之所的主人，主宰着灵魂的所有事务。

That is certain.

阿：当然如此。

Yes; and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desires grow up many and formidable, and their demands are many.

苏：是的，欲望在日夜不息地增长壮大，其需求亦繁多。

They are indeed, he said.

阿：的确如此。

His revenues, if he has any, are soon spent.

苏：如果他有财产的话，财产很快便会被挥霍一空。

True.

阿：对。

Then comes debt and the cutting down of his property.

苏：之后便要举债以及变卖家产。

Of course.

阿：当然。

When he has nothing left, must not his desires, crowding in the nest like young ravens, be crying aloud for food; and he, goaded on by them, and especially by love himself, who is in a manner the captain of them, is in a frenzy, and would fain discover whom he can defraud or despoil of his property, in order that he may gratify them?

苏：当他一无所有，欲望难道不会像挤在鸟巢的小鸟一样大吵着要食物吗？他被自己的欲望，尤其是色欲（在某种程度上，色欲已成为欲望们的队长）逼迫得发疯，急切地找寻可欺诈或掠夺的对象，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是吗？

Yes, that is sure to be the case.

阿：是的，必定如此。

He must have money, no matter how, if he is to escape horrid pains and pangs.

苏：如果他想摆脱可怕的痛苦与折磨，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弄到钱。

He must.

阿：必定如此。

And as in himself there was a succession of pleasures, and the new got the better of the old and took away their rights, so he being younger will claim to have more than his father and his mother, and if he has spent his own share of the property, he will take a slice of theirs.

苏：他内心的欲望层出不穷，新的欲望打败旧的欲望，并剥夺其权利。于是，他作为晚辈，声称要拥有多于父母的财产，待耗尽自己的财产，便从父母那里索取。

No doubt he will.

阿：毫无疑问。

And if his parents will not give way, then he will try first of all to cheat and deceive them.

苏：如果父母不答应，他便先设法骗取。

Very true.

阿：的确如此。

And if he fails, then he will use force and plunder them.

苏：他骗取不成，便会强行抢夺。

Yes, probably.

阿：是的，大抵如此。

And if the old man and woman fight for their own, what then, my friend? Will the creature feel any compunction at tyrannizing over them?

苏：如果年老的父母反抗，我的朋友，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会因为自己对父母的暴行而内疚吗？

Nay, he said, I should not feel at all comfortable about his parents.

阿：不会的。我为他的父母感到难过。

But, O heavens! Adeimantus, on account of some new-fangled love of a harlot, who is anything but a necessary connection, can you believe that he would strike the mother who is his ancient friend and necessary to his very existence, and would place her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other, when she is brought under the same roof with her; or that, under like circumstances, he would do the same to his withered old father, first and most indispensable of friends, for the sake of some newly-found blooming youth who is the reverse of indispensable?

苏：但是，天啊。阿得曼托斯，你能相信，他会因为新结交了一个漂亮的情妇，为了这可有可无的关系，去虐待他一直以来的朋友

——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母亲吗？当情妇被带来与母亲同处一室时，他会让母亲受制于情妇吗？再者，同样，为了某个新觅得的妙龄少年，一个根本无关紧要的人物，他会使自己衰老的父亲——他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朋友——受制于他人吗？

Yes, indeed, he said; I believe that he would.

阿：是的，我认为他的确会如此。

Truly, then, I said, a tyrannical son is a blessing to his father and mother.

苏：那么，拥有僭主式的儿子，真是父母之“福”啊！

He is indeed, he replied.

阿：的确如此。

He first takes their property, and when that fails, and pleasures are beginning to swarm in the hive of his soul, then he breaks into a house, or steals the garments of some nightly wayfarer; next he proceeds to clear a temple. Meanwhile the old opinions which he had when a child, and which gave judgment about good and evil, are overthrown by those others which have just been emancipated, and are now the body-guard of love and share his empire. These in

his democratic days, when he was still subject to the laws and to his father, were only let loose in the dreams of sleep. But now that he is under the dominion of love, he becomes always and in waking reality what he was then very rarely and in a dream only; he will commit the foulest murder, or eat forbidden food, or be guilty of any other horrid act. Love is his tyrant, and lives lordly in him and lawlessly, and being himself a king, leads him on, as a tyrant leads a State, to the performance of any reckless deed by which he can maintain himself and the rabble of his associates, whether those whom evil communications have brought in from without, or those whom he himself has allowed to break loose within him by reason of a similar evil nature in himself. Have we not here a picture of his way of life?

苏：他先试图夺走父母的财产，待挥霍殆尽而欲望却在灵魂的蜂巢中拥挤时，他便会强闯民宅，盗取夜行旅客的衣物，再去洗劫神庙。同时，他幼年时恪守的一些旧有的甄别善恶的观念被刚刚释放出来的欲望所瓦解，这些欲望现在成为色欲的护卫，分享着色欲的帝国。这些欲望在民主制期间，在他还未丧失天性，还处于父亲管辖之下时，只有在睡梦中才会被释放出来。但是现在，他完全受色欲指使，这些过去很少或只在睡梦中才被释放出来的欲望如今在清醒时也总是存在。他无恶不作——最邪恶的谋杀、食用禁食或任何其他可怕的罪行。色欲是他的僭主，在他体内自立为王，妄自尊大、无法无天，像僭主指挥国家一样指挥他不计后果地行事，以此来供养自己和其他欲望——无论这些欲望是因受外界不良影响所形成的，抑或是因自身本性不善而听任其发展的。我们已经描绘了他的生活方式，难道不是吗？

Yes, indeed, he said.

阿：的确如此。

And if there are only a few of them in the State, and the rest of the people are well disposed, they go away and become the body-guard or mercenary soldiers of some other tyrant who may probably want them for a war; and if there is no war, they stay at home and do many little pieces of mischief in the city.

苏：如果城邦中只有少数如此之人，其他人皆为驯良之民，那么他们便会离开，当某些其他僭主可能需要他们去打仗时，他们便会成为其护卫或雇佣军。如果没有战争，他们便留在家中，在城邦中犯下许多罪过。

What sort of mischief?

阿：何种罪过？

For example, they are the thieves, burglars, cut-purses, foot-pads, robbers of temples, man-stealers of the community; or if they are able to speak they turn informers, and bear false witness, and take bribes.

苏：比如偷窃、夜盗、割人钱袋、拦路、抢劫神庙、贩卖人口。如果巧言善辩，他们会去告密、做假证和受贿。

A small catalogue of evils, even if the perpetrators of them are few in number.

阿：即使犯下这些罪恶的人数不多，也算是小恶了。

Yes, I said; but small and great are comparative terms, and all these things, in the misery and evil which they inflict upon a State, do not come within a thousand miles of the tyrant; when this noxious class and their followers grow numerous and become conscious of their strength, assisted by the infatuation of the people, they choose from among themselves the one who has most of the tyrant in his own soul, and him they create their tyrant.

苏：是的。但是大与小是相对的概念。他们所做的一切，就对城邦造成的痛苦和罪恶程度而言，与僭主相比相差不止千里。一旦这种败类和他们的追随者们数量巨大，形成一股力量，再利用人民的愚昧，他们便会从自己人中挑选出一个灵魂最具僭主特点的人，并推举他为僭主。

Yes, he said, and he will be the most fit to be a tyrant.

阿：是的，此人最适合做僭主。

If the people yield, well and good; but if they resist him, as he began by beating his own father and mother, so now, if he has the power, he beats them, and will keep his dear old fatherland or

motherland, as the Cretans say, in subjection to his young retainers whom he has introduced to be their rulers and masters. This is the end of his passions and desires.

苏：如果民众顺从他，皆大欢喜。正如最初殴打自己的父母一样，如果民众反抗他而他又手握重权，此时他便会殴打民众并将自己亲爱的、年迈的母国或父国（如克里特人所称呼一样）交给他所任用的年轻仆人们来统治管辖。这便是他的激情和欲望所造成的后果。

Exactly.

阿：正是。

When such men are only private individuals and before they get power, this is their character; they associate entirely with their own flatterers or ready tools; or if they want anything from anybody, they in their turn are equally ready to bow down before them: they profess every sort of affection for them; but when they have gained their point they know them no more.

苏：当这些人只是单个个体且尚未掌权之时，他们的性格便是如此。他们只和奉承自己或将来有用之人交往。抑或是若有求于某人，他们会立刻对其点头哈腰、阿谀奉承。然而一旦达到目的，他们便翻脸不认人。

Yes, truly.

阿：的确如此。

They are always either the masters or servants and never the friends of anybody; the tyrant never tastes of true freedom or friendship.

苏：他们向来不是主人便是仆人，永远不与人为友。僭主从未体会过真正的自由和友谊。

Certainly not.

阿：当然。

And may we not rightly call such men treacherous?

苏：我们难道不能称这种人为不可靠之人吗？

No question.

阿：当然可以。

Also they are utterly unjust, if we were right in our notion of

justice?

苏：如果我们之前对正义的理解是正确的，这种人便是十足的不义之人，是吗？

Yes, he said, and we were perfectly right.

阿：是的。我们之前的看法是正确的。

Let us then sum up in a word, I said, the character of the worst man: he is the waking reality of what we dreamed.

苏：这种最恶之人的品性，一言以蔽之：他是我们梦境的清醒现实。

Most true.

阿：千真万确。

And this is he who being by nature most of a tyrant bears rule, and the longer he lives the more of a tyrant he becomes.

苏：最具僭主天性的人一旦获得权力，其掌权时间越久，其专制

性质便越残暴。

SOCRATES-GLAUCON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格劳孔

That is certain, said Glaucon, taking his turn to answer.

格（接过话题）：必然如此。

And will not he who has been shown to be the wickedest, be also the most miserable? and he who has tyrannized longest and most, most continually and truly miserable; although this may not be the opinion of men in general?

苏：最可恨之人难道不也是最可怜之人吗？虽然大多数人未必认可，但是难道不是暴君统治的时间越久、越残暴，他便越可怜吗？

Yes, he said, inevitably.

格：是的，难免如此。

And must not the tyrannical man be like the tyrannical State,

and the democratical man like the democratical State; and the same of the others?

苏：僭主式个人必定如同僭主制之国，民主式个人必定如同民主制之国，以此类推，难道不是吗？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as State is to State in virtue and happiness, so is man in relation to man?

苏：在美德与幸福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对比正如人与人之间的对比，是吗？

To be sure.

格：的确。

Then comparing our original city, which was under a king, and the city which is under a tyrant, how do they stand as to virtue?

苏：通过对比我们最初描绘的君主统治下的国家与僭主统治下的国家，你认为二者德行如何？

They are the opposite extremes, he said, for one is the very best and the other is the very worst.

格：它们处于两个极端：一个为至善，另一个为至恶。

There can be no mistake, I said, as to which is which, and therefore I will at once enquire whether you would arrive at a similar decision about their relative happiness and misery. And here we must not allow ourselves to be panic-stricken at the apparition of the tyrant, who is only a unit and may perhaps have a few retainers about him; but let us go as we ought into every corner of the city and look all about, and then we will give our opinion.

苏：关于孰善孰恶，显而易见。因此，我随即问你，关于两国相对的幸福与不幸，你是否会做出同样的判断呢？我们千万不要一看到僭主本人或是由一堆家丁簇拥着的僭主便吓得不知所措。我们要在城中四处走动，到处看看，然后再发表意见。

A fair invitation, he replied; and I see, as every one must, that a tyranny is the wretchedest form of government, and the rule of a king the happiest.

格：很好的提议。我认为，大家也必定如此认为，僭主制是最不

幸的政体，君主制则是最幸福的。

And in estimating the men too, may I not fairly make a like request, that I should have a judge whose mind can enter into and see through human nature? He must not be like a child who looks at the outside and is dazzled at the pompous aspect which the tyrannical nature assumes to the beholder, but let him be one who has a clear insight. May I suppose that the judgment is given in the hearing of us all by one who is able to judge, and has dwelt in the same place with him, and been present at his daily life and known him in his family relations, where he may be seen stripped of his tragedy attire, and again in the hour of public danger—he shall tell us about the happiness and misery of the tyrant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 men?

苏：在评判人民时，我难道不可以同样要求由可以洞悉人的本性之人来担任裁判吗？他务必不要像孩童一般，一见到僭主表面的盛大气势便昏了头；他应具有良好的洞察力。我认为此人要有判断力，与僭主同处一处，整日可见，知晓他在亲友圈中（此时或可见僭主脱去悲剧性外衣的样貌）以及面对公众威胁时的行为，我们只听从这样的人所作出的判断，他会告诉我们与他人相比僭主的幸福抑或不幸，可以吗？

That again, he said, is a very fair proposal.

格：此亦为不错的提议。

Shall I assume that we ourselves are able and experienced judges and have before now met with such a person? We shall then have some one who will answer our enquiries.

苏：我可以假设我们都具有判断能力，有过与僭主式的个人相处的经验吗？这样我们当中的某人便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

By all means.

格：务必如此。

Let me ask you not to forget the parallel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tate; bearing this in mind, and glancing in turn from one to the other of them, will you tell me their respective conditions?

苏：请你不要忘了个人与国家的相似性。记住这一点，并逐一对国家和个人进行审视，这样你可以告诉我二者各自的情形了吗？

What do you mean? he asked.

格：此话怎讲？

Beginning with the State, I replied, would you say that a city which is governed by a tyrant is free or enslaved?

苏：先从国家说起，你认为一个僭主统治的城邦是自由的抑或是受奴役的？

No city, he said, can be more completely enslaved.

格：最受奴役的城邦，莫过于此。

And yet, as you see, there are freemen as well as masters in such a State?

苏：你认为，如此国家有自由民和奴隶主吗？

Yes, he said, I see that there are—a few; but the people, speaking generally, and the best of them are miserably degraded and enslaved.

格：有，我认为有——却为数不多；但是普通民众和最优秀的人士都屈辱地忍受着凌辱和奴役。

Then if the man is like the State, I said, must not the same rule prevail? his soul is full of meanness and vulgarity—the best elements in him are enslaved; and there is a small ruling part, which is also the worst and maddest.

苏：如果说个人与国家相似，那么在个人身上难道不是必定存在同样的情形吗？他的灵魂世界卑鄙而粗俗——其中最优秀的品质遭受奴役，而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品质却是最邪恶、最疯狂的一部分。

Inevitably.

格：必然如此。

And would you say that the soul of such an one is the soul of a freeman, or of a slave?

苏：你认为，此人的灵魂是自由的抑或是受奴役的？

He has the soul of a slave, in my opinion.

格：我认为，他的灵魂是受奴役的。

And the State which is enslaved under a tyrant is utterly incapable of acting voluntarily?

苏：僭主奴役下的国家，完全不能自主行事吗？

Utterly incapable.

格：完全不能。

And also the soul which is under a tyrant (I am speaking of the soul taken as a whole) is least capable of doing what she desires; there is a gadfly which goads her, and she is full of trouble and remorse?

苏：同样，遭受暴君式奴役的灵魂（整个灵魂）根本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灵魂总是被讨厌的事物驱赶着，充满了不安和自责，是吗？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is the city which is under a tyrant rich or poor?

苏：僭主统治下的国家是富裕还是贫穷呢？

Poor.

格：贫穷。

And the tyrannical soul must be always poor and insatiable?

苏：那么僭主统治下的灵魂必定永远贫瘠、空虚吗？

True.

格：对。

And must not such a State and such a man be always full of fear?

苏：这样的国家和个人必定总是充满恐惧吗？

Yes, indeed.

格：必然是。

Is there any State in which you will find more of lamentation and sorrow and groaning and pain?

苏：你能在其他的国家见到比这里更多的哀伤、悲痛、呻吟和痛苦吗？

Certainly not.

格：当然不能。

And is there any man in whom you will find more of this sort of misery than in the tyrannical man, who is in a fury of passions and desires?

苏：僭主式人物充满狂野的激情和欲望，你是否会找到较之更为不幸之人呢？

Impossible.

格：不可能。

Reflecting upon these and similar evils, you held the tyrannical State to be the most miserable of States?

苏：鉴于诸如此类的罪恶，你觉得僭主制国家是最不幸的吗？

And I was right, he said.

格：我认为是的。

Certainly, I said. And when you see the same evils in the tyrannical man, what do you say of him?

苏：当然。当你看到僭主式个人身上同样的恶时，你有何看法吗？

I say that he is by far the most miserable of all men.

格：我认为，他是所有人中最为不幸者。

There, I said, I think that you are beginning to go wrong.

苏：我想，这你可有点弄错了。

What do you mean?

格：何出此言？

I do not think that he has as yet reached the utmost extreme of misery.

苏：我认为，他尚未达到不幸的极点。

Then who is more miserable?

格：那么谁比他更为不幸呢？

One of whom I am about to speak.

苏：我将要说到的某个人。

Who is that?

格：他是谁？

He who is of a tyrannical nature, and instead of leading a private life has been cursed with the further misfortune of being a public tyrant.

苏：一个天生的僭主，他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不幸成为众人瞩目的僭主，因而遭受了更大的不幸。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I gather that you are right.

格：根据之前的分析，我认为你说得对。

Yes, I replied, but in this high argument you should be a little more certain, and should not conjecture only; for of all questions, this respecting good and evil is the greatest.

苏：是的。但是在这一要点上，你应该更肯定些，而不应该只凭想象。关于善、恶的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

Very true,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Let me then offer you an illustration, which may, I think, throw a light upon this subject.

苏：那么为了解释清楚此话题，我来给你举个例子。

What is your illustration?

格：什么例子？

The case of rich individuals in cities who possess many slaves: from them you may form an idea of the tyrant's condition, for they both have slaves;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he has more slaves.

苏：以城邦中拥有大量奴隶的富人们为例：从富人们身上你或许会了解到僭主的境遇，因为富人和僭主都拥有奴隶，区别只是在于僭主的奴隶数目更多。

Yes, that is the difference.

格：是的，数量有区别。

You know that they live securely and have nothing to apprehend from their servants?

苏：你知道他们生活安全，无需害怕自己的奴隶，对吗？

What should they fear?

格：他们有何害怕的呢？

Nothing. But do you observe the reason of this?

苏：没有。但是你注意到其中的原因了吗？

Yes; the reason is, that the whole city is leagued togeth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each individual.

格：是的。因为整个城邦是团结起来保护每一个个人的。

Very true, I said. But imagine one of these owners, the master say of some fifty slaves, together with his family and property and slaves, carried off by a god into the wilderness, where there are no freemen to help him—will he not be in an agony of fear lest he and his wife and children should be put to death by his slaves?

苏：确实如此。但是假设其中有位拥有五十余名奴隶的奴隶主，神将他本人、家人、财产连同这些奴隶都带到了荒漠之地，在那里他没有自由民可以求助——他会不会担心自己和妻儿会被他的奴隶所杀呢？

Yes, he said, he will be in the utmost fear.

格：是的，他会极其恐惧。

The time has arrived when he will be compelled to flatter divers of his slaves, and make many promises to them of freedom and other things, much against his will—he will have to cajole his own servants.

苏：此时他被迫讨好自己的奴隶，经常违心地许给他们自由或其

他此类的承诺，不得不用好话来哄骗奴隶们。

Yes, he said, that will be the only way of saving himself.

格：是的。为了自保，唯有如此。

And suppose the same god, who carried him away, to surround him with neighbours who will not suffer one man to be the master of another, and who, if they could catch the offender, would take his life?

苏：倘若该神祇在他的周围安置了一些邻居，这些邻居不容忍任何人奴役他人，且一经发现必取其性命，他会害怕吗？

His case will be still worse, if you suppose him to be everywhere surrounded and watched by enemies.

格：若是假设他四周皆有敌人包围、监视，他的情形便更糟了。

And is not this the sort of prison in which the tyrant will be bound—he who being by nature such as we have described, is full of all sorts of fears and lusts? His soul is dainty and greedy, and yet alone, of all men in the city, he is never allowed to go on a journey, or to see the things which other freemen desire to see, but he lives in his hole like a woman hidden in the house, and is jealous of any

other citizen who goes into foreign parts and sees anything of interest.

苏：这不正是僭主的下场吗？他拥有我们所描述过的那种天性，充满恐惧与欲望，所以注定要陷入的困境。他的灵魂吝啬贪恋，却很孤独，他是整个城邦中唯一一个从来不可以远途旅行的人，亦不能像其他自由民那样观赏喜闻乐见的事物。他如同深宅大院中的女人一样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对去异国他乡见识各种有趣事物的公民羡慕不已。

Very true,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And amid evils such as these will not he who is ill-governed in his own person—the tyrannical man, I mean—whom you just now decided to be the most miserable of all—will not he be yet more miserable when, instead of leading a private life, he is constrained by fortune to be a public tyrant? He has to be master of others when he is not master of himself: he is like a diseased or paralytic man who is compelled to pass his life, not in retirement, but fighting and combating with other men.

苏：处于此类诸多不利条件下，这样一个无法掌控自己生活的人——我指的是僭主型人物，一个你刚刚认为最不幸的人，如果他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却被命运安排去做公众的专制君主，他岂不是更可怜？他无法控制自己却要去控制他人，正如一个病人或残疾人，不能

退隐静养却要被迫戎马厮杀。

Yes, he said, the similitude is most exact.

格：是的，极其相似。

Is not his case utterly miserable? and does not the actual tyrant lead a worse life than he whose life you determined to be the worst?

苏：其境遇岂不是痛苦不堪？僭主的生活实际上岂不是比你认为的最不幸之人还要悲惨呢？

Certainly.

格：当然。

He who is the real tyrant, whatever men may think, is the real slave, and is obliged to practise the greatest adulation and servility, and to be the flatterer of the vilest of mankind. He has desires which he is utterly unable to satisfy, and has more wants than any one, and is truly poor, if you know how to inspect the whole soul of him: all his life long he is beset with fear and is full of convulsions and distractions, even as the State which he resembles: and surely the resemblance holds?

苏：无论他人作何感想，真正的僭主亦是真正的奴隶。他被迫极尽阿谀奉承、奴颜婢膝之能事，向那些最卑贱的人们献媚。如果你懂得如何审视其整个灵魂，便会发现他根本无力实现自己的欲望。他的需求多于任何人，他才是真正的穷人。正如他所代表的国家一样，他一生充满了恐惧、动荡和痛苦。此二者必然相似，是吗？

Very true, he said.

格：确实如此。

Moreover, as we were saying before, he grows worse from having power: he becomes and is of necessity more jealous, more faithless, more unjust, more friendless, more impious, than he was at first; he is the purveyor and cherisher of every sort of vice, and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he is supremely miserable, and that he makes everybody else as miserable as himself.

苏：此外，我们之前说过，此人上台之后会更加糟糕：他必然会比最初愈加妒忌、愈加背信弃义，愈加不义，愈加六亲不认、愈加大逆不道；他无恶不作，结果不但自己极端不幸，而且还导致其他人同他一样不幸。

No man of any sense will dispute your words.

格：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反驳你的观点。

Come then, I said, and as the general umpire in theatrical contests proclaims the result, do you also decide who in your opinion is first in the scale of happiness, and who second, and in what order the others follow: there are five of them in all—they are the royal, timocratical, oligarchical, democratical, tyrannical.

苏：那么，像总裁判在戏剧性竞赛中宣布结果那样，对于这五种人——君主型、荣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和僭主型的幸福排行，孰为第一，孰为第二等等依次排名，你是否也心中有数呢？

The decision will be easily given, he replied; they shall be choruses coming on the stage, and I must judge them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enter, by the criterion of virtue and vice, happiness and misery.

格：这很容易决定。他们犹如要登台的合唱团，我必须按照善与恶、幸福与不幸的尺度来决定他们的出场顺序。

Need we hire a herald, or shall I announce, that the son of Ariston (the best) has decided that the best and justest is also the happiest, and that this is he who is the most royal man and king over himself; and that the worst and most unjust man is also the most miserable, and that this is he who being the greatest tyrant of himself is also the greatest tyrant of his State?

苏：最优秀的阿里斯顿之子已经判定：最善、最正义者最幸福，

这种人最具王者气势，最能自制；最恶、最不义者属最不幸，这种人最具僭主气质、也是国家最暴戾的僭主。我们需要请报幕员来宣布还是由我来宣布呢？

Make the proclamation yourself, he said.

格：你自己宣布吧。

And shall I add, 'whether seen or unseen by gods and men'?

苏：我可否补充“无论是否为神人所知”呢？

Let the words be added.

格：加上这句吧。

Then this, I said, will be our first proof; and there is another, which may also have some weight.

苏：那么这将是我们的第一条证据。还有另外一条证据，也同样重要。

What is that?

格：什么证据？

The second proof is derived from the nature of the soul: seeing that the individual soul, like the State, has been divided by us into three principles, the division may, I think, furnish a new demonstration.

苏：第二条证据来自灵魂的本性：正如给国家分类一样，我们曾经将人的灵魂分成三个主要部分，我想这种分类方法可以提供新的证据。

Of what nature?

格：有关何种本性？

It seems to me that to these three principles three pleasures correspond; also three desires and governing powers.

苏：我认为，这三个部分似乎对应着三种快乐，三种欲望和三种支配力量。

How do you mean? he said.

格：这是何意？

There is one principle with which, as we were saying, a man learns, another with which he is angry; the third, having many forms, has no special name, but is denoted by the general term appetitive, from the extraordinary strength and vehemence of the desires of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the other sensual appetites which are the main elements of it; also money-loving, because such desires are generally satisfied by the help of money.

苏：一部分如我们所言是人借以认知的，另一部分是人由之而发怒的，第三部分形式多样，没有明确的名称但却统称为欲望，包括强烈的饮食欲望和其他一些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感官欲望，也包括贪财的欲望，因为总的来说这些欲望都要靠金钱来满足。

That is true,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If we were to say that the loves and pleasures of this third part were concerned with gain, we should then be able to fall back on a single notion; and might truly and intelligibly describe this part of the soul as loving gain or money.

苏：如果说第三部分的喜好和快乐都来自于“收益”，那么我们便可以将其统一命名，可以将灵魂的这一部分恰当而明确地称为“爱

利”或“爱财”。

I agree with you.

格：我赞同。

Again, is not the passionate element wholly set on ruling and conquering and getting fame?

苏：此外，激情难道不是全部都用于统治、征服和获取名誉吗？

True.

格：对。

Suppose we call it the contentious or ambitious—would the term be suitable?

苏：我们将其称为“好胜”或“好强”，这些名称合适吗？

Extremely suitable.

格：极其合适。

On the other hand, every one sees that the principle of knowledge is wholly directed to the truth, and cares less than either of the others for gain or fame.

苏：另外，众所周知，学习的目的在于寻找真理，在此三部分之中最不在乎名利。

Far less.

格：根本不在乎。

'Lover of wisdom,' 'lover of knowledge,' are titles which we may fitly apply to that part of the soul?

苏：我们恰当地将灵魂的这部分称为“爱智慧”、“爱知识”，好吗？

Certainly.

格：当然。

One principle prevails in the souls of one class of men, another in others, as may happen?

苏：某一部分天性在某类人的灵魂中占优势，另一部分天性在另一类人中占优势，视情形而定吗？

Yes.

格：是的。

Then we may begin by assuming that there are three classes of men—lovers of wisdom, lovers of honour, lovers of gain?

苏：那么我们先假设有三种人——爱智慧者，爱荣誉者和爱获利者，可以吗？

Exactly.

格：完全可以。

And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pleasure, which are their several objects?

苏：他们追求三种目标，即三种快乐，是吗？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Now, if you examine the three classes of men, and ask of them in turn which of their lives is pleasantest, each will be found praising his own and depreciating that of others: the money-maker will contrast the vanity of honour or of learning if they bring no money with the solid advantages of gold and silver?

苏：现在，若你仔细考察此三类人，依次询问他们哪类生活是最快乐的，每个人都会称赞自己的生活而贬低其他人的生活：爱获利者会认为爱荣誉者和爱智慧者虚荣，因为他们赚不到真金白银，对吗？

True, he said.

格：对。

And the lover of honour—what will be his opinion? Will he not think that the pleasure of riches is vulgar, while the pleasure of learning, if it brings no distinction, is all smoke and nonsense to him?

苏：那么爱荣誉者，他会如何认为呢？难道他不会认为来自财富的快乐很粗俗，并认为知识因无法带来荣誉所以虚无缥缈、毫无意义吗？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are we to suppose, I said, that the philosopher sets any value on other pleasur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leasure of knowing the truth, and in that pursuit abiding, ever learning, not so far indeed from the heaven of pleasure? Does he not call the other pleasures necessary, under the idea that if there were no necessity for them, he would rather not have them?

苏：我们设想，哲学家将追求真理和永恒学习的快乐与其他快乐相比较时，他会认为其他的快乐有价值吗？他难道不会认为学习之乐近似于天堂般的快乐吗？他会称其他的快乐为必要的快乐，因为他认为若非情势所迫，他是不需要这些快乐的，难道不是吗？

There can be no doubt of that, he replied.

格：毫无疑问。

Since, then, the pleasures of each class and the life of each are

in dispute, and the question is not which life is more or less honourable, or better or worse, but which is the more pleasant or painless—how shall we know who speaks truly?

苏：因此，每一类的快乐和每一种生活都受质疑，问题不在于哪种生活更光彩、更善或更恶，而在于哪种生活更快乐抑或更远离痛苦。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谁讲的是真话呢？

I cannot myself tell, he said.

格：我无从分辨。

Well, but what ought to be the criterion? Is any better than experience and wisdom and reason?

苏：嗯，但是应该参照何种标准呢？是否存在任何比经验、智慧和理性更好的标准呢？

There cannot be a better, he said.

格：不可能存在更好的标准。

Then, I said, reflect. Of the three individuals, which has the greatest experience of all the pleasures which we enumerated? Has

the lover of gain, in learning the nature of essential truth, greater experience of the pleasure of knowledge than the philosopher has of the pleasure of gain?

苏：那么，请想一想。此三种人中，谁最好地体验到了我们所列举的所有快乐？在学习真理本质的过程中，爱获利者从知识中获得的快乐会比追求钱财的哲学家所获得的快乐多吗？

The philosopher, he replied, has greatly the advantage; for he has of necessity always known the taste of the other pleasures from his childhood upwards: but the lover of gain in all his experience has not of necessity tasted—or, I should rather say, even had he desired, could hardly have tasted—the sweetness of learning and knowing truth.

格：哲学家很占优势，因为哲学家必定自小便体味到其他快乐，但是爱获利者必定从未尝过（或者可以说，即使有过如此念头，他也几乎无法体验过）学习以及掌握真理的乐趣。

Then the lover of wisdom has a great advantage over the lover of gain, for he has a double experience?

苏：那么爱智慧者因拥有过双重经历而较爱获利者占很大优势，是吗？

Yes, very great.

格：是的，占很大优势。

Again, has he greater experience of the pleasures of honour, or the lover of honour of the pleasures of wisdom?

苏：再者，爱智慧者会体会到更多荣誉带来的快乐吗？抑或是爱荣誉者会体会到更多智慧带来的快乐呢？

Nay, he said, all three are honoured in proportion as they attain their objects; for the rich man and the brave man and the wise man alike have their crowd of admirers, and as they all receive honour they all have experience of the pleasures of honour; but the delight which is to be found in the knowledge of true being is known to the philosopher only.

格：不是的，三者实现各自的目标，都会获得相应的荣誉感；富者、勇者和智者都同样有自己的崇拜者群体，他们在接受敬意的同时也都体会到了荣誉带来的快乐；但是从对事物真实存在的学习中获得的快乐，却是唯哲学家独享的。

His experience, then, will enable him to judge better than any one?

苏：那么哲学家的经历使得他能够比任何人更好地做出判断，是吗？

Far better.

格：要比其他人的判断好得多。

And he is the only one who has wisdom as well as experience?

苏：他是唯一一位既有智慧又有经验的人，对吗？

Certainly.

格：当然。

Further, the very faculty which is the instrument of judgment is not possessed by the covetous or ambitious man, but only by the philosopher?

苏：此外，判断所需的能力是贪婪家或野心家所不具备的，却是为哲学家所独有的，是吗？

What faculty?

格：什么能力？

Reason, with whom, as we were saying, the decision ought to rest.

苏：推理。我们之前提过，人们应该通过推理而做出判断。

Yes.

格：是的。

And reasoning is peculiarly his instrument?

苏：推理是哲学家特有的工具吗？

Certainly.

格：当然。

If wealth and gain were the criterion, then the praise or blame of the lover of gain would surely be the most trustworthy?

苏：如果以财富和收益为判断标准，那么爱获利者的喜或恶便必定是最可靠的，是吗？

Assuredly.

格：当然。

Or if honour or victory or courage, in that case the judgment of the ambitious or pugnacious would be the truest?

苏：或者如果以荣誉、胜利或勇气为判断标准，那么野心家或者好战者的判断便是最真实的，是吗？

Clearly.

格：显然如此。

But since experience and wisdom and reason are the judges—

苏：但是既然判断的标准是经验、智慧和理性，那么……

The only inference possible, he replied, is that pleasures which are approved by the lover of wisdom and reason are the truest.

格：唯一可能的结论便是：爱智慧与理智之人所赞成的快乐才是

最真实的。

And so we arrive at the result, that the pleasure of the intelligent part of the soul is the pleasantest of the three, and that he of us in whom this is the ruling principle has the pleasantest life.

苏：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灵魂中理智部分带来的快乐居三者之首，灵魂以此部分为主宰的人，便是生活最幸福之人。

Unquestionably, he said, the wise man speaks with authority when he approves of his own life.

格：无疑，当明智之人对自己的生活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的话是真实可靠的。

And what does the judge affirm to be the life which is next, and the pleasure which is next?

苏：那么你认为什么是居第二位的生活与第二位的快乐呢？

Clearly that of the soldier and lover of honour; who is nearer to himself than the money-maker.

格：显然是军人或爱荣誉者的生活。相比于爱获利者，爱荣誉者

更接近于爱智慧者。

Last comes the lover of gain?

苏：爱获利者居末吗？

Very true,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Twice in succession, then, has the just man overthrown the unjust in this conflict; and now comes the third trial, which is dedicated to Olympian Zeus the saviour: a sage whispers in my ear that no pleasure except that of the wise is quite true and pure—all others are a shadow only; and surely this will prove the greatest and most decisive of falls?

苏：在这场交锋中，正义之士已经连续两次打败了非正义之士。现在是第三次，也是献给救世主奥林匹亚神宙斯的交锋：圣人在我耳边轻语道，唯有爱智慧者的快乐才真实、纯粹，其他皆幻影而已。这也必将是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回合，对吗？

Yes, the greatest; but will you explain yourself?

格：是的，最重要，但是可否详加说明呢？

I will work out the subject and you shall answer my questions.

苏：我会说清楚的，你也要回答我的问题。

Proceed.

格：尽管问吧。

Say, then, is not pleasure opposed to pain?

苏：那么，快乐难道不是痛苦的对立面吗？

True.

格：是的。

And there is a neutral state which is neither pleasure nor pain?

苏：是否存在介于快乐和痛苦的中间状态呢？

There is.

格：存在。

A state which is intermediate, and a sort of repose of the soul about either—that is what you mean?

苏：一种介于中间的状态，灵魂对两种情绪的某种反应——你是如此理解的吗？

Yes.

格：是的。

You remember what people say when they are sick?

苏：你记得人们在生病时所说的话吗？

What do they say?

格：他们如何说？

That after all nothing is pleasanter than health. But then they never knew this to be the greatest of pleasures until they were ill.

苏：归根结底，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拥有健康。但是，直到生病，他们才会意识到，这是最大的快乐。

Yes, I know, he said.

格：是的，我同意。

And when persons are suffering from acute pain, you must have heard them say that there is nothing pleasanter than to get rid of their pain?

苏：当人们承受剧痛时，你一定听他们说过，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免除病痛，对吗？

I have.

格：确实听到过。

And there are many other cases of suffering in which the mere rest and cessation of pain, and not any positive enjoyment, is extolled by them as the greatest pleasure?

苏：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痛苦情形，只要痛苦可以停息，不需要任何实际的快乐，人们便会称其为最大的幸福，是吗？

Yes, he said; at the time they are pleased and well content to be at rest.

格：是的。此时，他们得以喘息，便会感到快乐和满足。

Again, when pleasure ceases, that sort of rest or cessation will be painful?

苏：同样，当快乐停止时，这种停滞和中断也会令人痛苦，是吗？

Doubtless, he said.

格：毋庸置疑。

Then the intermediate state of rest will be pleasure and will also be pain?

苏：那么，处于停息的中间状态，既是快乐，也是痛苦，是吗？

So it would seem.

格：似乎如此。

But can that which is neither become both?

苏：但是既不快乐也不痛苦的状态，可否变得既快乐又痛苦呢？

I should say not.

格：我认为不能。

And both pleasure and pain are motions of the soul, are they not?

苏：快乐和痛苦都是心理活动，不是吗？

Yes.

格：是的。

But that which is neither was just now shown to be rest and not

motion, and in a mean between them?

苏：那么既不快乐也不痛苦的状态，便是像刚刚所说的停息状态和无心理活动的状态，属于居中的状态，是吗？

Yes.

格：是的。

How, then, can we be right in supposing that the absence of pain is pleasure, or that the absence of pleasure is pain?

苏：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没有痛苦便是快乐，抑或没有快乐便是痛苦呢？

Impossible.

格：绝对不能。

This then is an appearance only and not a reality; that is to say, the rest is pleasure at the moment and in comparison of what is painful, and painful in comparison of what is pleasant; but all these representations, when tried by the test of true pleasure, are not real but a sort of imposition?

苏：那么这仅仅是表象而非事实。换言之，停息时的快乐是暂时的，是与痛苦相对而言的；停息时的痛苦是与快乐相对而言的。但是如果与真正的快乐相比较，所有的这些感受都并非真实，而不过是一种假象，是吗？

That is the inference.

格：理应如此。

Look at the other class of pleasures which have no antecedent pains and you will no longer suppose, as you perhaps may at present, that pleasure is only the cessation of pain, or pain of pleasure.

苏：你或许此时有此想法，但请看看另一种并无痛苦在其先的快乐，你便不会再认为快乐只是痛苦的停息，或痛苦只是快乐的停息。

What are they, he said, and where shall I find them?

格：那是何种快乐？我将于何处寻得呢？

There are many of them: take as an example the pleasures of smell, which are very great and have no antecedent pains; they come in a moment, and when they depart leave no pain behind

them.

苏：此类快乐有很多种。以香气为例，这种快乐的感觉很强烈，且不以痛苦为前提；它们来得快，消失时亦不会令人产生痛苦的感觉。

Most true, he said.

格：千真万确。

Let us not, then, be induced to believe that pure pleasure is the cessation of pain, or pain of pleasure.

苏：那么我们不能认为，脱离了痛苦才会快乐，或者失去了快乐便会痛苦。

No.

格：不能。

Still, the more numerous and violent pleasures which reach the soul through the body are generally of this sort—they are reliefs of pain.

苏：尽管如此，通过身体传达给灵魂的众多而强烈的快乐，通常皆属于此类，即脱离痛苦后的快乐。

That is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the anticipations of future pleasures and pains are of a like nature?

苏：对即将到来的快乐与痛苦的期待，亦属于此类，是吗？

Yes.

格：是的。

Shall I give you an illustration of them?

苏：我需要对之进行解释吗？

Let me hear.

格：愿闻其详。

You would allow, I said, that there is in nature an upper and lower and middle region?

苏：你会同意，自然界存在着上、中、下层吗？

I should.

格：我同意。

And if a person were to go from the lower to the middle region, would he not imagine that he is going up; and he who is standing in the middle and sees whence he has come, would imagine that he is already in the upper region, if he has never seen the true upper world?

苏：如果某人从底层升至中层，他难道不会认为自己在上升吗？他站在中层，向他所由来处看，如果他之前从未见过真正的上层，难道他不会认为自己已置身于上层了吗？

To be sure, he said; how can he think otherwise?

格：必定如此。他如何会有其他想法呢？

But if he were taken back again he would imagine, and truly imagine, that he was descending?

苏：但是如果他再返回下层，他会认为，并且是正确地以为，自己是在下降，是吗？

No doubt.

格：毫无疑问。

All that would arise out of his ignorance of the true upper and middle and lower regions?

苏：这一切都是源于他对真实的上、中、下层的无知，是吗？

Yes.

格：是的。

Then can you wonder that persons who are inexperienced in the truth, as they have wrong ideas about many other things, should also have wrong ideas about pleasure and pain and the intermediate state; so that when they are only being drawn towards

the painful they feel pain and think the pain which they experience to be real, and in like manner, when drawn away from pain to the neutral or intermediate state, they firmly believe that they have reached the goal of satiety and pleasure; they, not knowing pleasure, err in contrasting pain with the absence of pain, which is like contrasting black with grey instead of white—can you wonder, I say, at this?

苏：那么，没有经历过真实的人会对许多其他事物抱有错误的看法，他们对快乐、痛苦乃至两者的中间状态都会形成错误的认识；因此，他们只有在遭遇痛苦时才会感到痛苦，并认为自己所经历的痛苦是真实的；同样，当他们从痛苦转到中间状态时，他们坚信自己是快乐和满足的；他们不知道何为快乐，于是错误地认为痛苦和没有痛苦是对立的，正如不以黑色与白色为对立，却以黑色与灰色为对立——对此，你感到奇怪吗？

No, indeed; I should be much more disposed to wonder at the opposite.

格：的确，并不奇怪；如果他们并非如此，我反倒要奇怪了。

Look at the matter thus:—Hunger, thirst, and the like, are inanitions of the bodily state?

苏：从下面的角度来审视此问题：饥饿、口渴诸如此类，都是身体处于虚空的状态，是吗？

Yes.

格：是的。

And ignorance and folly are inanitions of the soul?

苏：那么，无知与愚蠢是灵魂处于虚空状态吗？

True.

格：对。

And food and wisdom are the corresponding satisfactions of either?

苏：食物和智慧分别是二者对应的填充物吗？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is the satisfaction derived from that which has less or from

that which has more existence the truer?

苏：更可靠的填充物，是由较多实在的事物中获得，还是由较少实在的事物中获得呢？

Clearly, from that which has more.

格：显然，从较多实在的事物中。

What classes of things have a greater share of pure existence in your judgment—those of which food and drink and condiments and all kinds of sustenance are examples, or the class which contains true opinion and knowledge and mind and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virtue? Put the question in this way:—Which has a more pure being—that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invariable, the immortal, and the true, and is of such a nature, and is found in such natures; or that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and found in the variable and mortal, and is itself variable and mortal?

苏：一类是食物、饮料、香料以及全部诸如此类的生活资料，另一类是真实的观点、知识、理性以及一切不同种类的美德——你认为哪一类事物更属于绝对存在呢？换言之，哪一种具有更纯粹的存在——一种有关永恒、不朽、真实的事物，它们具有如此属性，并且存在于具有如此属性的事物中；另一种有关变化、可灭的事物，它们存在于变化、可灭的事物中，并且其本身是变化、可灭的？

Far purer, he replied, is the being of that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invariable.

格：关于永恒的存在，要更为纯粹得多。

And does the essence of the invariable partake of knowledge in the same degree as of essence?

苏：永恒事物的实质是否超过它的可知性？

Yes, of knowledge in the same degree.

格：是的。

And of truth in the same degree?

苏：真实性是否也相同呢？

Yes.

格：是的。

And, conversely, that which has less of truth will also have less of essence?

苏：反之，具有较少真实的事物，亦具有较少的实在吗？

Necessarily.

格：必定如此。

Then, in general, those kinds of things which are in the service of the body have less of truth and essence than those which are in the service of the soul?

苏：那么，总的来说，服务于身体的事物相比于服务于灵魂的事物，其真实性和实在性都较少吗？

Far less.

格：少得多。

And has not the body itself less of truth and essence than the soul?

苏：较之灵魂，身体本身具有较少的真实与实在吗？

Yes.

格：是的。

What is filled with more real existence, and actually has a more real existence, is more really filled than that which is filled with less real existence and is less real?

苏：被具有更多真实、实在的事物填充并且本身更真实、实在的事物，是否要比被具有较少真实、实在的事物填充并且本身较为不真实的事物更加充实呢？

Of course.

格：当然。

And if there be a pleasure in being filled with that which is according to nature, that which is more really filled with more real being will more really and truly enjoy true pleasure; whereas that which participates in less real being will be less truly and surely satisfied, and will participate in an illusory and less real pleasure?

苏：同时，如果被与本性相一致的事物所填充便会快乐的话，那么被更多实在事物所填充的更实在的事物便会更真实、实在地享受到真正的快乐；相反，被不那么实在的事物填充便不会那么真正地满足，会产生错觉并较少获得真正的快乐，是吗？

Unquestionably.

格：毫无疑问。

Those then who know not wisdom and virtue, and are always busy with gluttony and sensuality, go down and up again as far as the mean; and in this region they move at random throughout life, but they never pass into the true upper world; thither they neither look, nor do they ever find their way, neither are they truly filled with true being, nor do they taste of pure and abiding pleasure. Like cattle, with their eyes always looking down and their heads stooping to the earth, that is, to the dining-table, they fatten and feed and breed, and, in their excessive love of these delights, they kick and butt at one another with horns and hoofs which are made of iron; and they kill one another by reason of their insatiable lust. For they fill themselves with that which is not substantial, and the part of themselves which they fill is also unsubstantial and incontinent.

苏：那些既无智慧又无美德、贪婪美食、纵欲好色的人总是在中间地带上下徘徊；他们一生都在中间地带四处乱走，却从未曾进入到真正的上层世界。在中间地带，他们不四处张望，也不曾寻找道路，他们既没有真正地被真实存在所填充也没有体验到纯粹、持久的快

乐。他们犹如牛群一般终日俯首下视，盯着土地即餐桌，吃食、长膘、繁衍，并为了达到最大的满足，用牛角去顶、用铁蹄去踢同类，为了自己无止境的贪欲自相残杀。因为他们用以填充自己的皆为不能持续的事物，同时他们本身需要填充的部分也是难以满足且不可持续的。

Verily, Socrates, said Glaucon, you describe the life of the many like an oracle.

格：的确，苏格拉底啊，你如发布神谕一般描绘了众人的生活。

Their pleasures are mixed with pains—how can they be otherwise? For they are mere shadows and pictures of the true, and are coloured by contrast, which exaggerates both light and shade, and so they implant in the minds of fools insane desires of themselves; and they are fought about as Stesichorus says that the Greeks fought about the shadow of Helen at Troy in ignorance of the truth.

苏：他们的快乐夹杂着痛苦——否则他们又当如何呢？这些快乐不过是真正快乐的影子和图像而已，而且被放大了，并且让那些愚昧的人心中产生了疯狂的欲望。人们为了这些欲望而争斗，正如诗人斯特西科罗斯所说：不明真相的希腊人在特洛伊为海伦的影子而战。

Something of that sort must inevitably happen.

格：此类事情必然如此。

And must not the like happen with the spirited or passionate element of the soul? Will not the passionate man who carries his passion into action, be in the like case, whether he is envious and ambitious, or violent and contentious, or angry and discontented, if he be seeking to attain honour and victory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his anger without reason or sense?

苏：灵魂中情绪或激情部分必然也是如此，难道不是吗？同样，如果易于激动之人失去理性和理智，为了争名、获胜和平息怒火，——无论他是嫉妒、好胜、暴力、好斗抑或是愤怒和不满——难道不会把这些激烈的情绪转化为行动吗？

Yes, he said, the same will happen with the spirited element also.

格：是的，激情部分亦是如此。

Then may we not confidently assert that the lovers of money and honour, when they seek their pleasures under the guidance and in the company of reason and knowledge, and pursue after and win the pleasures which wisdom shows them, will also have the truest pleasures in the highest degree which is attainable to them, inasmuch as they follow truth; and they will have the pleasures which are natural to them, if that which is best for each one is also most natural to him?

苏：我们可否肯定地说，如果追随理性与知识去寻求快乐，按智慧指引去追求和获取快乐，那么爱获利者和爱荣誉者由于遵循真理也会获得自身所能及的最大程度、最真实的快乐？如果说对每个人来说最好的事物亦是最符合其本性的，那么这些人将会获得最符合其本性的快乐，是吗？

Yes, certainly; the best is the most natural.

格：是的，当然如此。最好的东西是最合乎本性的。

And when the whole soul follows the philosophical principle, and there is no division, the several parts are just, and do each of them their own business, and enjoy severally the best and truest pleasures of which they are capable?

苏：如果整个灵魂都追随爱智慧的部分，而不存在任何分歧，那么灵魂的各部分皆属正义，各司其职，感受着各个部分所能够获得的最美好、最真实的快乐，是吗？

Exactly.

格：正是。

But when either of the two other principles prevails, it fails in

attaining its own pleasure, and compels the rest to pursue after a pleasure which is a shadow only and which is not their own?

苏：但是如果灵魂的另外两部分之一获胜，它将无法获得自身的快乐，并会迫使其他部分去追求本不属于它们的、快乐的假象，对吗？

True.

格：对。

And the greater the interval which separates them from philosophy and reason, the more strange and illusive will be the pleasure?

苏：愈是远离哲学和理性，快乐便会愈古怪、愈虚幻，是吗？

Yes.

格：是的。

And is not that farthest from reason which is at the greatest distance from law and order?

苏：最背离理性的，亦最偏离法律与秩序，难道不是吗？

Clearly.

格：显然如此。

And the lustful and tyrannical desires are, as we saw, at the greatest distance?

苏：如之前所见，爱欲与僭主暴君的欲望偏离得最远，是吗？

Yes.

格：是的。

And the royal and orderly desires are nearest?

苏：君主制和有节制的欲望偏离得最小，是吗？

Yes.

格：是的。

Then the tyrant will live at the greatest distance from true or natural pleasure, and the king at the least?

苏：那么，僭主会离真正的、自然的快乐最远，君主则离之最近，是吗？

Certainly.

格：当然。

But if so, the tyrant will live most unpleasantly, and the king most pleasantly?

苏：若如此，僭主将生活得最不快乐，君主则是生活得最为快乐，是吗？

Inevitably.

格：必定如此。

Would you know the measure of the interval which separates them?

苏：你知道，他们间的差距如何吗？

Will you tell me?

格：可否指教一下？

There appear to be three pleasures, one genuine and two spurious: now the transgression of the tyrant reaches a point beyond the spurious; he has run away from the region of law and reason, and taken up his abode with certain slave pleasures which are his satellites, and the measure of his inferiority can only be expressed in a figure.

苏：快乐似乎有三种，一种为真，另两种为假：僭主之不幸比虚假更甚；他偏离了法律和理智，与其同处的只有唯唯诺诺的受奴役的快乐，其不幸程度只能用图形来表示。

How do you mean?

格：此话怎讲？

I assume, I said, that the tyrant is in the third place from the oligarch; the democrat was in the middle?

苏：我假定，从寡头人物算起，僭主人物位列第三位，民主人物居中，是吗？

Yes.

格：是的。

And if there is truth in what has preceded, he will be wedded to an image of pleasure which is thrice removed as to truth from the pleasure of the oligarch?

苏：如果我们之前的观点正确，那么僭主所拥有的快乐不过是种幻象，与寡头人物的快乐在真实性方面相差三倍之多，是吗？

He will.

格：是的。

And the oligarch is third from the royal; since we count as one royal and aristocratical?

苏：如果我们假设君主人物即为贵族人物，那么寡头人物又居于君主人物之下第三位，是吗？

Yes, he is third.

格：是的，他在第三位。

Then the tyrant is removed from true pleasure by the space of a number which is three times three?

苏：因此，僭主与真正的快乐之间的距离，是三乘以三吗？

Manifestly.

格：显而易见。

The shadow then of tyrannical pleasure 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of length will be a plane figure.

苏：那么僭主快乐的幻像用长度数字来表示的话，将会是一个平方数。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if you raise the power and make the plane a solid,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seeing how vast is the interval by which the tyrant is parted from the king.

苏：如果你加大力度，把平方数变成立方数，你会不难看出僭主与君主的差距有多么大。

Yes; the arithmetician will easily do the sum.

格：是的。精通数学的人会很容易算出这个数字。

Or if some person begins at the other end and measures the interval by which the king is parted from the tyrant in truth of pleasure, he will find him, when the multiplication is completed, living 729 times more pleasantly, and the tyrant more painfully by this same interval.

苏：抑或如果有人反过来计算君主和僭主在真正的快乐上的差距，他会发现层层倍增后君主要比僭主快乐729倍，僭主较之不幸729倍。

What a wonderful calculation! And how enormous is the distance which separates the just from the unjust in regard to pleasure and pain!

格：多么精彩的计算！就快乐与痛苦而言，正义者与非正义者差距是多么大啊！

Yet a true calculation, I said, and a number which nearly concerns human life, if human beings are concerned with days and nights and months and years. (729 NEARLY equals the number of days and nights in the year.)

苏：很准确的计算，而且如果人类关注白昼、黑夜、月份和年轮的话，这个数字也几乎关乎到人类的生活。

Yes, he said, human life is certainly concerned with them.

格：是的，人类生活当然与此相关。

Then if the good and just man be thus superior in pleasure to the evil and unjust, his superiority will be infinitely greater in propriety of life and in beauty and virtue?

苏：如果善的正义者在快乐方面超过恶的非正义者如此之多，那么在礼仪、美和品德方面也必定无数倍地超过了对方，是吗？

Immeasurably greater.

格：不计其数。

Well, I said, and now having arrived at this stage of the argument, we may revert to the words which brought us hither: Was not some one saying that injustice was a gain to the perfectly unjust who was reputed to be just?

苏：嗯，现在论证已经到了这一阶段，我们可以折返到最初引起此话题的说法上，即：有人认为对于那些极其不义但却博得正义之名的人来说，行不义之事对他是有利的，难道不是吗？

Yes, that was said.

格：是的，的确如此。

Now then, having determined the power and quality of justice and injustice, let us have a little conversation with him.

苏：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正义与不义的影响和性质，我们要同持有此见解的人谈一谈。

What shall we say to him?

格：我们将如何对他说呢？

Let us make an image of the soul, that he may have his own words presented before his eyes.

苏：我们塑造一个灵魂的形象，从而使其话语的涵义直观地呈现在他面前。

Of what sort?

格：何种形象？

An ideal image of the soul, like the composite creations of ancient mythology, such as the Chimera or Scylla or Cerberus, and there are many others in which two or more different natures are said to grow into one.

苏：灵魂的理想形象，是像古代神话中诸如喀迈拉、斯库拉或刻耳柏洛斯一样的复合生物体。此外，还有很多其他此类的据说由两、三种不同物种合成的单个个体。

There are said of have been such unions.

格：据说曾经存在如此的组合体。

Then do you now model the form of a multitudinous, many-headed monster, having a ring of heads of all manner of beasts, tame and wild, which he is able to generate and metamorphose at will.

苏：那么，现在请塑造出一个复杂、多头的怪兽形象。它的头在脖子上可围成一个圈，有温顺的、有狂野的，可以随意生成或变换这些兽头。

You suppose marvellous powers in the artist; but, as language is more pliable than wax or any similar substance, let there be such a model as you propose.

格：这必须要有工匠的非凡工艺才行。但是，因为语言要比蜡或其他此类的材料可塑性强得多，就假定存在你所说的这个形象吧。

Suppose now that you make a second form as of a lion, and a third of a man, the second smaller than the first, and the third smaller than the second.

苏：现在假设你在塑造第二个狮子的形象和第三个人类的形象。第二个形象要比第一个怪兽的形象小，第三个要小于第二个。

That, he said, is an easier task; and I have made them as you say.

格：这次要容易些，我已经按你说的做好了。

And now join them, and let the three grow into one.

苏：现在把他们糅合到一起，让三者合而为一。

T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格：已经完成了。

Next fashion the outside of them into a single image, as of a man, so that he who is not able to look within, and sees only the outer hull, may believe the beast to be a single human creature.

苏：然后再为此形象做一个人类的外形，这样无法洞察灵魂之人便只看到外壳，会认为此怪兽单纯是一个人。

I have done so, he said.

格：我已经做好了。

And now, to him who maintains that it is profitable for the human creature to be unjust, and unprofitable to be just, let us

reply that, if he be right, it is profitable for this creature to feast the multitudinous monster and strengthen the lion and the lion-like qualities, but to starve and weaken the man, who is consequently liable to be dragged about at the mercy of either of the other two; and he is not to attempt to familiarize or harmonize them with one another—he ought rather to suffer them to fight and bite and devour one another.

苏：现在让我们对那个持“人们做不义之事对自身有利”、“做正义之事对自身不利”观点的人做出如此答复：如果他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合成的形象为了自身利益便要去喂养多头的怪兽，使狮子和狮子般的性情增强，但却要让其人类部分挨饿、衰弱，以致最后被其他两部分任意呼来唤去。该形象不会试图让三部分亲近或和谐相处，相反会让它们相互争斗、撕咬、吞噬。

Certainly, he said; that is what the approver of injustice says.

格：当然，这正是赞成不义行为之人的论调。

To him the supporter of justice makes answer that he should ever so speak and act as to give the man within him in some way or other the most complete mastery over the entire human creature. He should watch over the many-headed monster like a good husbandman, fostering and cultivating the gentle qualities, and preventing the wild ones from growing; he should be making the lion-heart his ally, and in common care of them all should be uniting the several parts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himself.

苏：支持正义之人会如此答复：他的所说所做，应该永远都是为了尽其所能让灵魂的人类部分对整个人拥有完全彻底的主宰权。他应该像好农夫那样驯服这只多头的怪兽，培养其和善的品质，遏制野蛮凶暴性情的滋生；他应该使狮子成为自己的盟友，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部分，并使各部分之间及其自身融为一体。

Yes, he said, that is quite what the maintainer of justice say.

格：是的。这正是维护正义者的主张。

And so from every point of view, whether of pleasure, honour, or advantage, the approver of justice is right and speaks the truth, and the disapprover is wrong and false and ignorant?

苏：因此从各方面看，无论是快乐，荣誉还是获利方面，支持正义之人都是正确的，其话语亦是真实可信的，而反对者则是错误、虚假和无知的。

Yes, from every point of view.

格：是的，从各方面看都是如此。

Come, now, and let us gently reason with the unjust, who is not intentionally in error. 'Sweet Sir,' we will say to him, 'what think you of things esteemed noble and ignoble? Is not the noble that

which subjects the beast to the man, or rather to the god in man; and the ignoble that which subjects the man to the beast?' He can hardly avoid saying Yes—can he now?

苏：现在，让我们和蔼地规劝这些无意中犯错的非正义者。“亲爱的先生，”我们会对他说，“您认为，何为高尚行为，何为卑鄙行为？高尚行为难道不是那些让兽性受制于人性，抑或是说是受制于人性中的神性吗？卑鄙行为难道不是那些使人性受制于兽性吗？”他此时无法不表示同意，是吗？

Not if he has any regard for my opinion.

格：如果他能听从我的意见，他一定会同意的。

But, if he agree so far, we may ask him to answer another question: 'Then how would a man profit if he received gold and silver on the condition that he was to enslave the noblest part of him to the worst? Who can imagine that a man who sold his son or daughter into slavery for money, especially if he sold them into the hands of fierce and evil men, would be the gainer, however large might be the sum which he received? And will any one say that he is not a miserable caitiff who remorselessly sells his own divine being to that which is most godless and detestable? Eriphyle took the necklace as the price of her husband's life, but he is taking a bribe in order to compass a worse ruin.'

苏：但是，如果他同意了，我们再让他回答另一个问题：“如果

人们获取金钱的条件是使自己最高尚的部分受制于最卑鄙的部分，那么这对他有何好处呢？”如果有人为了钱财出卖自己的儿女为奴，尤其是将他们卖给了残暴、邪恶之人，无论他获得多么丰厚的回报，有谁会认为他从中获利呢？如果一个人残忍地将自己最神圣的部分出卖给最异端、最卑鄙的部分，能说他并非可怜卑鄙之人吗？厄里费勒用丈夫的生命换来一根项链，而他却是为了一点好处招致了更糟糕的毁灭性后果。

Yes, said Glaucon, far worse—I will answer for him.

格：是的，后果更严重——我来替他回答吧。

Has not the intemperate been censured of old, because in him the huge multiform monster is allowed to be too much at large?

苏：古往今来，放荡不羁者向来为人们所诟病，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体内这头庞大的多头怪兽太过放纵了吗？

Clearly.

格：显然如此。

And men are blamed for pride and bad temper when the lion and serpent element in them disproportionately grows and gains strength?

苏：人们傲慢与暴怒的品行受人谴责，难道不是因为他们体内的狮性与蛇性因素过度地滋生和变强吗？

Yes.

格：是的。

And luxury and softness are blamed, because they relax and weaken this same creature, and make a coward of him?

苏：骄奢与软弱受人指责，难道不是因为它们体内的猛兽松懈、羸弱，从而使人成为胆怯的懦夫吗？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is not a man reproached for flattery and meanness who subordinates the spirited animal to the unruly monster, and, for the sake of money, of which he can never have enough, habituates him in the days of his youth to be trampled in the mire, and from being a lion to become a monkey?

苏：谄媚与吝啬因为人对钱财的无尽贪婪而使灵魂中象征激情的野兽受制于失控的怪兽，使之自幼便含冤受屈，以致无法长成狮子却变成了猴子，难道不也同样受人谴责吗？

True, he said.

格：对。

And why are mean employments and manual arts a reproach? Only because they imply a natural weakness of the higher principle; the individual is unable to control the creatures within him, but has to court them, and his great study is how to flatter them.

苏：低贱的职业和手工技艺，为何会遭到谴责呢？不过是因为他们天生缺乏高贵的原则，无法控制体内众多的猛兽，只能向其献媚，其人最大的本领便是去讨好这些猛兽。

Such appears to be the reason.

格：似乎正是这个原因。

And therefore, being desirous of placing him under a rule like that of the best, we say that he ought to be the servant of the best, in whom the Divine rules; not, as Thrasymachus supposed, to the injury of the servant, but because every one had better be ruled by

divine wisdom dwelling within him; or, if this be impossible, then by an external authority, in order that we may be all, as far as possible, under the same government, friends and equals.

苏：因此，我们希望让这种人受最善者的统治，让他成为最善、内心顺从神意之人的仆人。这么做不是像色拉叙马霍斯认为的那样会伤害到仆人，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最好顺从自己内心中神的智慧的统治。若内心没有神的智慧，则要接受来自外部的统治，这样我们才会尽可能地受到相同的管理，相互友爱和平等。

True, he said.

格：对。

And this is clearly seen to be the intention of the law, which is the ally of the whole city; and is seen also in the authority which we exercise over children, and the refusal to let them be free until we have established in them a principle analogous to the constitution of a state, and by cultivation of this higher element have set up in their hearts a guardian and ruler like our own, and when this is done they may go their ways.

苏：法律是全城公民的盟友，显然这也是立法的目的。我们对孩子的监护也是这个目的，直到我们已经教会了他们行为准则（相当于国家中的体制），我们才会对他们放手；直到他们心中较善的部分已经形成并成为了自身的保护者和统治者（正如我们最善的部分），他们才能独立。

Yes, he said, the purpose of the law is manifest.

格：是的，法律的目的很明显。

From what point of view, then, and on what ground can we say that a man is profited by injustice or intemperance or other baseness, which will make him a worse man, even though he acquire money or power by his wickedness?

苏：纵使邪恶让人们获得了金钱或权利，但是从哪方面、或者根据什么我们认为不义、放纵或其他卑鄙的、令人堕落的行径会让其人从中获益呢？

From no point of view at all.

格：无论如何都说不通。

What shall he profit, if his injustice be undetected and unpunished? He who is undetected only gets worse, whereas he who is detected and punished has the brutal part of his nature silenced and humanized; the gentler element in him is liberated, and his whole soul is perfected and ennobled by the acquirement of justice and temperance and wisdom, more than the body ever is by receiving gifts of beauty, strength and health, in proportion as the soul is more honourable than the body.

苏：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未被发现及惩罚，这对他有何好处呢？如果他的罪行不为人知，只会让其变本加厉；而被发现并受惩罚的人，其本性中兽性的部分则会被扼杀或被人性化，其灵魂内温顺的部分被释放，整个灵魂因为正义、节制和智慧而得到完善和升华，身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美、力量和健康的恩赐，灵魂与身体相比提升得更多。

Certainly, he said.

格：当然。

To this nobler purpose the man of understanding will devote the energies of his life. And in the first place, he will honour studies which impress these qualities on his soul and will disregard others?

苏：具有理智的人，会倾其毕生精力于这种身心的升华。首先，他会重视能够使灵魂获得此类品性的学问，而厌恶其他，是吗？

Clearly, he said.

格：显然如此。

In the next place, he will regulate his bodily habit and training, and so far will he be from yielding to brutal and irrational

pleasures, that he will regard even health as quite a secondary matter; his first object will be not that he may be fair or strong or well, unless he is likely thereby to gain temperance, but he will always desire so to attemper the body as to preserve the harmony of the soul?

苏：其次，他会调整作息习惯，加强锻炼，使自己远离兽性的、无理性的快乐，甚至认为健康是一种次要问题。他的第一目标不是身体如何健美、强壮或健康（除非这些可以令其自制），而是时刻希望通过协调身体以保持灵魂的和谐，是吗？

Certainly he will, if he has true music in him.

格：如果他的灵魂中存在真正的音乐，他必然如此。

And in the acquisition of wealth there is a principle of order and harmony which he will also observe; he will not allow himself to be dazzled by the foolish applause of the world, and heap up riches to his own infinite harm?

苏：在追求财富过程中，他也会遵守秩序与和谐的原则；他不会因世人愚蠢的恭维而忘乎所以，也不会聚敛大量钱财却给自己带来无穷的害处，是吗？

Certainly not, he said.

格：他当然不会。

He will look at the city which is within him, and take heed that no disorder occur in it, such as might arise either from superfluity or from want; and upon this principle he will regulate his property and gain or spend according to his means.

苏：他会审视其灵魂的城邦，提防因富足或贫乏而产生混乱；他也会照此原则来管理自己的财产，量入为出。

Very true.

格：正是如此。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he will gladly accept and enjoy such honours as he deems likely to make him a better man; but those, whether private or public, which are likely to disorder his life, he will avoid?

苏：因此，他会很乐于接受和享用他认为可能会使自身得到提升的荣誉；而凡是会打乱他生活的荣誉，无论公私，他将一概予以回避，是吗？

Then, if that is his motive, he will not be a statesman.

格：如果他志在于此，他便不会去从政。

By the dog of Egypt, he will! in the city which is his own he certainly will, though in the land of his birth perhaps not, unless he have a divine call.

苏：以埃及之犬——阿努比斯神的名义起誓，他会的。在他所出生的城邦，除非他受神谕，否则他不会从政的；但是在属于他的城邦，他当然积极从政。

I understand; you mean that he will be a ruler in the city of which we are the founders, and which exists in idea only; for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ere is such an one anywhere on earth?

格：我懂了。你指的是，他会在我们所创建的、只存在于空想中的城邦担任统治者，因为我不认为世界上有我们所谓的城邦，对吗？

In heaven, I replied, there is laid up a pattern of it, methinks, which he who desires may behold, and beholding, may set his own house in order. But whether such an one exists, or ever will exist in fact, is no matter; for he will live after the manner of that city,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any other.

苏：我想，在天上存在着它的一个模式，向往这一模式的人便会看到它，并且在注视模式的同时，将自身的房屋布置得井井有条。但是至于此城邦是否真的存在，抑或是否未来会真的存在并不重要，因

为他会按照此城邦的模式来生活，而不会理会其他任何城邦。

I think so, he said.

格：我同意。

BOOK X.

第十卷

SOCRATES—GLAUCON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格劳孔

Of the many excellences which I perceive in the order of our State, there is none which upon reflection pleases me better than the rule about poetry.

苏：我认为，我们城邦制度的诸多优点中，最令我开心的莫过于有关诗歌的规定了。

To what do you refer?

格：你指的是什么？

To the rejection of imitative poetry, which certainly ought not to be received; as I see far more clearly now that the parts of the soul have been distinguished.

苏：即拒绝模仿性的诗歌。这种诗歌当然是不能被接受。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廓清了灵魂的三个部分，这一点便更加地明显了。

What do you mean?

格：此后怎讲？

Speaking in confidence, for I should not like to have my words repeated to the tragedians and the rest of the imitative tribe—but I do not mind saying to you, that all poetical imitations are ruinou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earers, and that the knowledge of their true nature is the only antidote to them.

苏：仅私下里说说而已，因为我不希望我的话被传给悲剧诗人或者其他模仿者听，但是我不介意同你讲：所有诗歌上的模仿对于听者的理智都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了解这类诗歌的真正性质是对听者的唯一救赎之道。

Explain the purport of your remark.

格：请对这句话的涵义加以解释。

Well, I will tell you, although I have always from my earliest youth had an awe and love of Homer, which even now makes the words falter on my lips, for he is the great captain and teacher of

the whole of that charming tragic company; but a man is not to be reverenced more than the truth, and therefore I will speak out.

苏：好的，我讲给你听。我自幼便对荷马怀有敬畏与热爱之心，这甚至使得我此时话到嘴边尚犹豫不决，因为他是整个悲剧界伟大的先行者和导师，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某个人的尊敬而掩盖真理，因此我要说出我的看法。

Very good, he said.

格：很好。

Listen to me then, or rather, answer me.

苏：那么请听我说，或者请回答我的问题。

Put your question.

格：请问吧。

Can you tell me what imitation is? for I really do not know.

苏：你能告诉我何为模仿吗？因为我的确不知道。

A likely thing, then, that I should know.

格：那么，我跟你一样不甚了解。

Why not? for the duller eye may often see a thing sooner than the keener.

苏：为什么你也不了解？目光迟钝的人可能经常会比目光敏锐的人更快地发现事物。

Very true, he said; but in your presence, even if I had any faint notion, I could not muster courage to utter it. Will you enquire yourself?

格：的确如此；但是在你面前，即使我有一知半解，亦无法鼓足勇气说出来。你自己解答如何？

Well then, shall we begin the enquiry in our usual manner: Whenever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have a common name, we assume them to have also a corresponding idea or form:—Do you understand me?

苏：那么，我们按照通常的方式开始探讨吧。每当多数个体共用一个名称，我们便假定它们也有着一个对应的共同理式或形式。你明

白我的意思吗？

I do.

格：我明白。

Let us take any common instance; there are beds and tables in the world—plenty of them, are there not?

苏：让我们举一些常见事物为例。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床和桌子，难道不是吗？

Yes.

格：是的。

But there are only two ideas or forms of them—one the idea of a bed, the other of a table.

苏：但是，关于它们，只存在两个理式或形式——一个是关于床的理式，另一个是关于桌子的理式。

True.

格：对。

And the maker of either of them makes a bed or he makes a table for our u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dea—that is our way of speaking in this and similar instances—but no artificer makes the ideas themselves: how could he?

苏：同时，匠人根据理式——也就是我们对这个或类似物体的称呼——制作出我们所使用的床和桌子。但是任何匠人都无法创造出理式本身：他又如何能行呢？

Impossible.

格：不可能。

And there is another artist,—I should like to know what you would say of him.

苏：还有另一位能工巧匠，我想知道你对他有何看法。

Who is he?

格：他是谁？

One who is the maker of all the works of all other workmen.

苏：一个会做一切工匠的所有活计的匠人。

What an extraordinary man!

格：多么了不起的人啊！

Wait a little, and there will be more reason for your saying so. For this is he who is able to make not only vessels of every kind, but plants and animals, himself and all other things—the earth and heaven, and the things which are in heaven or under the earth; he makes the gods also.

苏：稍后，你会有更多的理由来发表如此评论。因为此人不仅能够制作各种器皿，还能制作植物、动物、自身以及其他一切事物——包括天空、土地以及天上、地下的一切事物；他还能创造诸神。

He must be a wizard and no mistake.

格：毫无疑问，他必定是名巫师。

Oh! you are incredulous, are you? Do you mean that there is no

such maker or creator, or that in one sense there might be a maker of all these things but in another not? Do you see that there is a way in which you could make them all yourself?

苏：哦，你表示怀疑，是吗？你的意思是，如此的匠人或造物者并不存在吗？抑或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存在能造万物的匠人，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又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你自己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制作万物。

What way?

格：什么方式？

An easy way enough; or rather, there are many ways in which the feat might be quickly and easily accomplished, none quicker than that of turning a mirror round and round—you would soon enough make the sun an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nd yourself, and other animals and plants, and all the other things of which we were just now speaking, in the mirror.

苏：很简单。确切地说，有很多方法可以使我们快速、轻易地做到这一点，但最快捷的方法，莫过于转动镜子——很快你便能在镜子中造出太阳、天空、地球、自身、其他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一切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事物。

Yes, he said; but they would be appearances only.

格：是的，但是它们都只是表象而已。

Very good, I said, you are coming to the point now. And the painter too is, as I conceive, just such another—a creator of appearances, is he not?

苏：很好，你即将说到要点了。此外，我认为，画家也不过是另一种创作事物表象的匠人，不是吗？

Of course.

格：当然。

But then I suppose you will say that what he creates is untrue. And yet there is a sense in which the painter also creates a bed?

苏：但是，我认为，你会说他所创作的事物是不真实的。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画家也创作了一张床，是吗？

Yes, he said, but not a real bed.

格：是的，但是并非真正的床。

And what of the maker of the bed?Were you not saying that he too makes, not the idea which, according to our view, is the essence of the bed, but only a particular bed?

苏：那么造床的匠人呢?你不是说过，他所制造的并不是在我们看来作为床本质的理式，而是一张特定的床吗？

Yes, I did.

格：是的，我说过。

Then if he does not make that which exists he cannot make true existence, but only some semblance of existence; and if any one were to say that the work of the maker of the bed, or of any other workman, has real existence, he could hardly be supposed to be speaking the truth.

苏：那么，如果他不是在制作存在的事物，他便不能制造真实的存在，而只是在制造存在的某种假象；如果有人认为，造床的工匠或其他手工匠所做的东西都具有真实的存在，他的话很可能并不真实可信。

At any rate, he replied, philosophers would say that he was not speaking the truth.

格：无论如何，哲学家们会认为此人的说法有误。

No wonder, then, that his work too is an indistinct expression of truth.

苏：毫无疑问，工匠所造之物，亦不能清楚地表达真实。

No wonder.

格：不足为奇。

Suppose now that by the light of the examples just offered we enquire who this imitator is?

苏：姑且让我们用刚刚所举的例子来探究谁是模仿者，可以吗？

If you please.

格：请便。

Well then, here are three beds: one existing in nature, which is made by God, as I think that we may say—for no one else can be the maker?

苏：那么，现在有三张床：一张床存在于自然，由神明所造——我想，我们可以如此说，否则还有谁能是造物主呢？

No.

格：没有。

There is another which is the work of the carpenter?

苏：另一张床为木匠所造，是吗？

Yes.

格：是的。

And the work of the painter is a third?

苏：第三张床为画家所画，是吗？

Yes.

格：是的。

Beds, then, are of three kinds, and there are three artists who superintend them: God, the maker of the bed, and the painter?

苏：那么，有三种床，三个造床者：神、木匠和画家，对吗？

Yes, there are three of them.

格：是的，有三个。

God, whether from choice or from necessity, made one bed in nature and one only; two or more such ideal beds neither ever have been nor ever will be made by God.

苏：神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于所需制作了一张、且是唯一的一张存在于自然的床；神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再造出第二张或更多此类完美的床了。

Why is that?

格：为什么？

Because even if He had made but two, a third would still appear behind them which both of them would have for their idea, and that would be the ideal bed and not the two others.

苏：即使他当时只造了两张床，第三张床仍然会在其后出现，那么前两张床将会以第三张为理式，第三张床便是理想的床，而非前两张。

Very true,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God knew this, and He desired to be the real maker of a real bed, not a particular maker of a particular bed, and therefore He created a bed which is essentially and by nature one only.

苏：神了解这一点，他希望成为真正床的真正制作者，而不是某张床的某一个制作者，于是他只做了一张在本性上独一无二的床。

So we believe.

格：我们相信。

Shall we, then, speak of Him as the natural author or maker of

the bed?

苏：那么，我们可以说，神是床的自然创造者吗？

Yes, he replied; inasmuch as by the natural process of creation He is the author of this and of all other things.

格：是的。按照造物的自然过程，他是床以及世上一切其他事物的造物者。

And what shall we say of the carpenter—is not he also the maker of the bed?

苏：那么关于木匠，我们该如何说呢？他难道不是床的制造者吗？

Yes.

格：是的。

But would you call the painter a creator and maker?

苏：但是，你会说，画家亦是床的创造者和制作者吗？

Certainly not.

格：当然不能。

Yet if he is not the maker, what is he in relation to the bed?

苏：如果他不是制作者，那么他与床有何联系呢？

I think, he said, that we may fairly designate him as the imitator of that which the others make.

格：我想，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对他人所造事物的模仿者。

Good, I said; then you call him who is third in the descent from nature an imitator?

苏：好。你将离事物本质最远、排在第三位的人称为模仿者，是吗？

Certainly, he said.

格：当然。

And the tragic poet is an imitator, and therefore, like all other imitators, he is thrice removed from the king and from the truth?

苏：那么，悲剧诗人是模仿者，因此，像所有的模仿者一样，他是远离君主和真实，排在第三位的人，是吗？

That appears to be so.

格：似乎如此。

Then about the imitator we are agreed. And what about the painter?—I would like to know whether he may be thought to imitate that which originally exists in nature, or only the creations of artists?

苏：我们对模仿者达成了一致看法。那么画家呢？我想问你，画家是模仿本来存在于自然的事物，还是模仿工匠的作品？

The latter.

格：后者。

As they are or as they appear?You have still to determine this.

苏：模仿事物真实的样子，还是模仿事物的表象？你仍然不得不弄清楚这一点。

What do you mean?

格：此话怎讲？

I mean, that you may look at a bed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obliquely or directly or from any other point of view, and the bed will appear different, bu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reality. And the same of all things.

苏：我想，你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张床，可以从侧面看，从正面看或者从其他任何角度来看，床便会呈现不同的样子，但是实际上却并无不同。万般事物皆如此。

Yes, he said, the difference is only apparent.

格：是的，只是表象不同而已。

Now let me ask you another question: Which is the art of painting designed to be—an imitation of things as they are, or as they appear—of appearance or of reality?

苏：现在容我再问你另一个问题：绘画艺术旨在模仿事物的本质还是事物的表象，是画事物的外表还是其实质？

Of appearance.

格：画事物的外表。

Then the imitator, I said, is a long way off the truth, and can do all things because he lightly touches on a small part of them, and that part an image. For example: A painter will paint a cobbler, carpenter, or any other artist, though he knows nothing of their arts; and, if he is a good artist, he may deceive children or simple persons, when he shows them his picture of a carpenter from a distance, and they will fancy that they are looking at a real carpenter.

苏：那么，模仿者与真相相去甚远，并且无所不能，因为他只是对事物很小的一部分稍有触及，而这一部分只是表象。举例说明：画家要画一名补鞋匠、木匠或其他此类的匠人，他对他们的行业一无所知；但如果他技艺高超，当他让人们从远处观看他所画的木匠肖像时，儿童和头脑简单的人都被他欺骗，误以为他们看到的是一名真正的木匠。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whenever any one informs us that he has found a man who knows all the arts, and all things else that anybody knows, and every single thing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accuracy than any other man—whoever tells us this, I think that we can only imagine him to be a simple creature who is likely to have been deceived by some wizard or actor whom he met, and whom he thought all-knowing, because he himself was unable to analyse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and ignorance and imitation.

苏：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他们认识一个无所不会、无所不知、无所不精的人时，不管说话者是谁，我想我们只能认为此人头脑简单，易为所遇的术士或狡诈之人所骗。他会认为此人无所不知，不过是因为其自身无力分辨何为学问、何为无知、何为模仿而已。

Most true.

格：对极了。

And so, when we hear persons saying that the tragedians, and Homer, who is at their head, know all the arts and all things human, virtue as well as vice, and divine things too, for that the good poet cannot compose well unless he knows his subject, and that he who has not this knowledge can never be a poet, we ought to consider whether here also there may not be a similar illusion. Perhaps they may have come across imitators and been deceived by them; they may not have remembered when they saw their works that these were but imitations thrice removed from the truth, and

could easily be made without any knowledge of the truth, because they are appearances only and not realities? Or, after all, they may be in the right, and poets do really know the things about which they seem to the many to speak so well?

苏：同样，当我们听人们说悲剧诗人及其领袖荷马知晓一切技艺、或善或恶的世间万事万物，以及诸神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诗人不了解自己所写的对象，便不能创作出好作品，并且不具备这方面知识者决不会成为诗人，我们要考虑此处或者彼处是否存在着类似的假象。可能他们遇到了模仿者并被其所骗，不知道他们所看到的作品是与真实有着三倍之遥的仿制品，是只有表象、没有任何实在的、不需要任何真正的知识便可以轻易制作出来的，对吗？抑或归根结底，他们也许是对的，诗人们确实很了解自己描写的（对许多人来说）很精彩的事物，对吗？

The question, he said, should by all means be considered.

格：务必要对此问题加以考虑。

Now do you suppose that if a person were able to make the original as well as the image, he would seriously devote himself to the image-making branch? Would he allow imitation to be the ruling principle of his life, as if he had nothing higher in him?

苏：如果一个人既能制作原创作品又能制作影像，你想他会热心地投身到影像的创作中吗？他会一生都致力于模仿，仿佛模仿便是他的最高目标吗？

I should say not.

格：我认为不会。

The real artist, who knew what he was imitating, would be interested in realities and not in imitations; and would desire to leave as memorials of himself works many and fair; and, instead of being the author of encomiums, he would prefer to be the theme of them.

苏：对自己所模仿的事物有所了解的真正艺术家，会对真实的而非模仿的东西感兴趣；他们会热衷于制作许多优秀的、不朽的作品；他更想做别人模仿的对象，而不是去模仿别人。

Yes, he said, that would be to him a source of much greater honour and profit.

格：是的，这会给他带来更大的荣誉和好处。

Then, I said, we must put a question to Homer; not about medicine, or any of the arts to which his poems only incidentally refer: we are not going to ask him, or any other poet, whether he has cured patients like Asclepius, or left behind him a school of medicine such as the Asclepiads were, or whether he only talks about medicine and other arts at second-hand; but we have a right

to know respecting military tactics, politics, education, which are the chiefest and noblest subjects of his poems, and we may fairly ask him about them. 'Friend Homer,' then we say to him, 'if you are only in the second remove from truth in what you say of virtue, and not in the third—not an image maker or imitator—and if you are able to discern what pursuits make men better or worse in private or public life, tell us what State was ever better governed by your help? The good order of Lacedaemon is due to Lycurgus, and many other cities great and small have been similarly benefited by others; but who says that you have been a good legislator to them and have done them any good? Italy and Sicily boast of Charondas, and there is Solon who is renowned among us; but what city has anything to say about you?' Is there any city which he might name?

苏：那么，我们必须要问荷马一个问题。此问题既无关乎医学，也无关于他诗作中偶有提及的其他技艺。我们也不会问荷马或其他诗人，是否曾经像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那样治病救人，或在身后留下一个如阿斯克勒庇俄斯后裔那样的医学学派，或者去问他们，是否他们所谈论的医学和其他技艺都是道听途说而来的。但是关于军事策略、政治、教育等这些在荷马的诗作中最宏大、最高尚的话题，我们有权利知道，并不妨向荷马请教这些方面的问题。“荷马吾友，”我们这样问他，“如果你所说的美德与真实只有一层之隔，而非两层——你并非表象制造者或模仿者；如果你能分辨出哪些追求会使人们在公私场合变得更善或更恶，那么请告诉我们，哪个城邦曾因为你的帮助而被治理得更好？斯巴达城因莱克格斯而井然有序，其他很多大大小小的城邦同样因其他人的存在而获益。但有谁说过，你是优秀的立法者，曾经造福于他们呢？意大利和西西里城以卡隆达斯为荣，我们以梭伦为荣，但是哪座城邦会以你为荣呢？”荷马能说出任何一座以之为荣的城邦吗？

I think not, said Glaucon; not even the Homerids themselves pretend that he was a legislator.

格：我想不能。连荷马的崇拜者也不会声称荷马是立法者。

Well, but is there any war on record which was carried on successfully by him, or aided by his counsels, when he was alive?

苏：啊，但是在他在世期间，可曾有任何有案可稽的由他指挥或出谋划策的胜仗呢？

There is not.

格：没有。

Or is there any invention of his, applicable to the arts or to human life, such as Thales the Milesian or Anacharsis the Scythian, and other ingenious men have conceived, which is attributed to him?

苏：抑或他可曾有像米利都的泰勒斯、西塞亚的阿那卡西斯，或其他能工巧匠那样有过任何适用于工艺或人类生活上的发明呢？

There is absolutely nothing of the kind.

格：绝对没有此类发明。

But, if Homer never did any public service, was he privately a guide or teacher of any? Had he in his lifetime friends who loved to associate with him, and who handed down to posterity an Homeric way of life, such as was established by Pythagoras who was so greatly beloved for his wisdom, and whose followers are to this day quite celebrated for the order which was named after him?

苏：如果荷马不曾担任过任何公职，那么他私下里可曾做过某人的导师或老师吗？他在世时有乐于与其往来的朋友吗？有朋友将其生活方式传授给自己的后人吗？——正如因睿智而备受尊敬的毕达哥拉斯创建的、由其追随者们以其名字所命名的生活方式，直至今日其追随者们仍以遵循这种生活方式而闻名于世。

Nothing of the kind is recorded of him. For surely, Socrates, Creophylus, the companion of Homer, that child of flesh, whose name always makes us laugh, might be more justly ridiculed for his stupidity, if, as is said, Homer was greatly neglected by him and others in his own day when he was alive?

格：并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苏格拉底啊，的确。食肉氏族的后裔克雷奥菲洛斯，是荷马的同伴。这个名字够可笑的人，也许会因自己的愚蠢受到更多的嘲笑。如果按现在说法，荷马在世时便受到此人和当时其他人的轻视，是吗？

Yes, I replied, that is the tradition. But can you imagine, Glaucon, that if Homer had really been able to educate and improve mankind—if he had possessed knowledge and not been a mere imitator—can you imagine, I say, that he would not have had many followers, and been honoured and loved by them? Protagoras of Abdera, and Prodicus of Ceos, and a host of others, have only to whisper to their contemporaries: 'You will never be able to manage either your own house or your own State until you appoint us to be your ministers of education'—and this ingenious device of theirs has such an effect in making men love them that their companions all but carry them about on their shoulders. And is it conceivable that the contemporaries of Homer, or again of Hesiod, would have allowed either of them to go about as rhapsodists, if they had really been able to make mankind virtuous? Would they not have been as unwilling to part with them as with gold, and have compelled them to stay at home with them? Or, if the master would not stay, then the disciples would have followed him about everywhere, until they had got education enough?

苏：是的，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格劳孔，你想，如果荷马果真会教育和改善人类（如果他有真才实学而非一味模仿），你认为他会没有众多追随者，会得不到这些人的尊敬和爱戴吗？阿夫季拉的普罗泰戈拉、喀俄斯岛的普罗迪克和许多其他的人只需轻声对同时代的人说："如果不任命我们来掌管教育，你们永远不会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及国家的"——他们的才智使他们受到人们的爱戴，追随者就差将他们抬在肩上到处游行了。那么，如果荷马或者赫西俄德果真能让人类变善，他们同时代的人会让他们到处游走卖唱吗？人们难道不会像割舍不下黄金一样不愿与他们分开吗？难道不会强留他们与自己同住吗？抑或，如果挽留不成，他们的门徒们会随着他们周游各处，直到学有所成，是吗？

Yes, Socrates, that, I think, is quite true.

格：是的，苏格拉底，我认为这十分正确。

Then must we not infer that all these poetical individuals, beginning with Homer, are only imitators; they copy images of virtue and the like, but the truth they never reach? The poet is like a painter who, as we have already observed, will make a likeness of a cobbler though he understands nothing of cobbling; and his picture is good enough for those who know no more than he does, and judge only by colours and figures.

苏：那么，我们难道不能推断出，自荷马以来的所有诗人们不过都是模仿者吗？他们难道不是在模仿美德之类的表象而根本未触及到真相吗？诗人像我们刚刚说过的画家一样，虽然对鞋匠的手艺一窍不通，却将鞋匠画得很像。对于那些同他一样一知半解的只懂得靠颜色和形状来判断的人来说，他的画足够好了。

Quite so.

格：完全如此。

In like manner the poet with his words and phrases may be said to lay on the colours of the several arts, himself understanding their nature only enough to imitate them; and other people, who are as ignorant as he is, and judge only from his words, imagine

that if he speaks of cobbling, or of military tactics, or of anything else, in metre and harmony and rhythm, he speaks very well—such is the sweet influence which melody and rhythm by nature have. And I think that you must have observed again and again what a poor appearance the tales of poets make when stripped of the colours which music puts upon them, and recited in simple prose.

苏：同样，人们认为，诗人用辞藻表现各行技艺，他本人只需初通各种技艺的本性，便足以对之进行模仿了；还有一些同诗人一样无知、只会从字面做判断的人，他们认为当诗人在描写鞋匠、军事策略或其他事物时，只要韵律、和声和节奏恰到好处，便演绎得很精彩——这亦是韵律和节奏自身所具有的美妙效果。我想你一定屡屡注意到，当诗人作品褪尽音乐赋予诗歌的色彩，仅加平实的散文进行吟诵，它们是多么的不堪入目。

Yes, he said.

格：是的。

They are like faces which were never really beautiful, but only blooming; and now the bloom of youth has passed away from them?

苏：它们过去如同本来并不美丽的面庞，却洋溢着青春的光彩；如今韶华逝去，容颜枯槁，对吗？

Exactly.

格：正是如此。

Here is another point: The imitator or maker of the image knows nothing of true existence; he knows appearances only. Am I not right?

苏：此外还须指出的是，模仿者或影像的创造者，对于真实的存在一无所知；他只知表象。我说得不对吗？

Yes.

格：是的。

Then let us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and not be satisfied with half an explanation.

苏：那么，让我们对之形成清楚的认识，不要满足于一知半解。

Proceed.

格：请继续吧！

Of the painter we say that he will paint reins, and he will paint a bit?

苏：我们说，画家会画缰绳和马衔，是吗？

Yes.

格：是的。

And the worker in leather and brass will make them?

苏：此外，皮匠和铜匠会制作这些东西吗？

Certainly.

格：当然。

But does the painter know the right form of the bit and reins? Nay, hardly even the workers in brass and leather who make them; only the horseman who knows how to use them—he knows their right form.

苏：但是，画家知道缰绳和马衔的正确形式吗？不知道，就连制作它们的铜匠和皮匠也不甚了解；只有懂得如何使用这些东西的骑马者，才会知晓其正确形式。

Most true.

格：千真万确。

And may we not say the same of all things?

苏：我们可否对所有事物持同样的看法呢？

What?

格：何种看法？

That there are three arts which are concerned with all things: one which uses, another which makes, a third which imitates them?

苏：即关于一切事物皆存在着三种相关技艺：一是使用技艺，二是制作技艺，三是模仿技艺，是吗？

Yes.

格：是的。

And the excellence or beauty or truth of every structure, animate or inanimate, and of every action of man, is relative to the use for which nature or the artist has intended them.

苏：一切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体以及人类一切行为的好、美或真，都与使用密切相关，大自然或匠人创造它们便是以使用为目的的。

True.

格：对。

Then the user of them must have the greatest experience of them, and he must indicate to the maker the good or bad qualities which develop themselves in use; for example, the flute-player will tell the flute-maker which of his flutes is satisfactory to the performer; he will tell him how he ought to make them, and the other will attend to his instructions?

苏：那么，其使用者一定拥有最为丰富的使用经验，他必定会向制造者说明该事物在使用中的优点或缺点；例如，长笛的吹奏者会告诉长笛的制作者哪种长笛适合表演，他会告诉制作者应如何制作长笛，而制作者也将遵从他的要求，是吗？

Of course.

格：当然。

The one knows and therefore speaks with authority about the goodness and badness of flutes, while the other, confiding in him, will do what he is told by him?

苏：一个人对于长笛的好坏很内行，因此他说话很有权威，而另一个人则充分地信任他，并将按其要求制作长笛，是吗？

True.

格：对。

The instrument is the same, but about the excellence or badness of it the maker will only attain to a correct belief; and this he will gain from him who knows, by talking to him and being compelled to hear what he has to say, whereas the user will have knowledge?

苏：但是，对于同一件乐器，关于乐器的优劣，制作者仅有正确的认识；此正确的认识是他通过与通晓乐器之人交谈并被迫听取此人看法而获得的，而乐器的使用者则拥有知识，是吗？

True.

格：对。

But will the imitator have either? Will he know from use whether or no his drawing is correct or beautiful? Or will he have right opinion from being compelled to associate with another who knows and gives him instructions about what he should draw?

苏：但是模仿者会有正确的认识或知识吗？他会通过使用而了解其绘画是否正确或美观吗？抑或他会被迫与知之者交流，并接受对方的指导，从而形成正确的认知吗？

Neither.

格：均不可能。

Then he will no more have true opinion than he will have knowledge about the goodness or badness of his imitations?

苏：那么对于所模仿之物，他既没有正确的意见，也不了解其优劣，是吗？

I suppose not.

格：我认为，的确如此。

The imitative artist will be in a brilliant state of intelligence about his own creations?

苏：从事模仿的艺术家对其创作物有着绝妙出众的智识吗？

Nay, very much the reverse.

格：不，恰恰相反。

And still he will go on imitating without knowing what makes a thing good or bad, and may be expected therefore to imitate only that which appears to be good to the ignorant multitude?

苏：虽然他不知道所模仿的事物优劣之所在，但仍旧会继续模仿，因此很可能只是模仿那些无知的大众眼中很美好的事物，是吗？

Just so.

格：正是如此。

Thus far then we are pretty well agreed that the imitator has no knowledge worth mentioning of what he imitates. Imitation is only a kind of play or sport, and the tragic poets, whether they write in Iambic or in Heroic verse, are imitators in the highest degree?

苏：那么至此我们一致认为，模仿者根本不了解自己所模仿的事物。模仿仅仅是一种游戏或娱乐，无论悲剧诗人是运用抑扬格体还是史诗体从事创作，他们都不过是最高级的模仿者而已，是吗？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now tell me, I conjure you, has not imitation been shown by us to be concerned with that which is thrice removed from the truth?

苏：现在请你告诉我，我们是否已证明模仿与真实有三层之隔呢？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what is the faculty in man to which imitation is addressed?

苏：模仿属于人类的何种能力呢？

What do you mean?

格：你指的是什么？

I will explain: The body which is large when seen near, appears small when seen at a distance?

苏：我是说：物体近看时会很大，远看时会显得很小，是吗？

True.

格：对。

And the same object appears straight when looked at out of the water, and crooked when in the water; and the concave becomes convex, owing to the illusion about colours to which the sight is liable. Thus every sort of confusion is revealed within us; and this is that weakness of the human mind on which the art of conjuring and of deceiving by light and shadow and other ingenious devices

imposes, having an effect upon us like magic.

苏：同一物体在水外面看是直的，在水中看则是弯曲的。由于视力容易对色彩产生错觉，凹面会被看成是凸面。因此这体现出我们内心存在着种种混沌；魔术和骗术正是利用人类心智的这一弱点，运用光影和其他奇妙手段对我们产生如魔法一般的效果。

True.

格：对。

And the arts of measuring and numbering and weighing come to the rescue of the human understanding—there is the beauty of them—and the apparent greater or less, or more or heavier, no longer have the mastery over us, but give way before calculation and measure and weight?

苏：测量、计数、称重等美妙的技艺可以弥补人类理智的不足。那些表面上的更大或更小，更多或更重，已经无法再主宰我们的思维，在计算、测量和称重面前荡然无存，是吗？

Most true.

格：千真万确。

And this, surely, must be the work of the calculating and rational principle in the soul?

苏：当然，这一定是灵魂的计算与理性部分作用的结果吧？

To be sure.

格：想必如此。

And when this principle measures and certifies that some things are equal, or that some are greater or less than others, there occurs an apparent contradiction?

苏：当这部分灵魂测量并证明一些物体是等量的，或者一些物体较之其他更多或更少，那么该结论常常会与表面印象相矛盾，对吗？

True.

格：对。

But were we not saying that such a contradiction is impossible—the same faculty cannot have contrary opinions at the same time about the same thing?

苏：但是我们不是说过，同一种官能不能对同一事物同时产生相反的观点吗？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Then that part of the soul which has an opinion contrary to measure is not the same with that which has an opinion in accordance with measure?

苏：那么灵魂中形成与测量相反意见的部分，同产生与测量一致意见的部分，并不是同一个吗？

True.

格：对。

And the better part of the soul is likely to be that which trusts to measure and calculation?

苏：信赖测量和计算结果的那部分，或许是灵魂中较善的部分，是吗？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that which is opposed to them is one of the inferior principles of the soul?

苏：与之相对的便是灵魂中较差的一部分，是吗？

No doubt.

格：毫无疑问。

This was the conclusion at which I was seeking to arrive when I said that painting or drawing, and imitation in general, when doing their own proper work, are far removed from truth, and the companions and friends and associates of a principle within us which is equally removed from reason, and that they have no true or healthy aim.

苏：这正是我当初力求得出的结论，当时我说绘画以及所有的模仿都是远离真实的，它们与我们灵魂中同样远离理性的官能作伴、结交并且交往，不具有任何真实或健康的目的。

Exactly.

格：正是。

The imitative art is an inferior who marries an inferior, and has inferior offspring.

苏：模仿技艺正如低劣者之间相互结合，再生育低劣的后代。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is this confined to the sight only, or does it extend to the hearing also, relating in fact to what we term poetry?

苏：这只局限于视觉艺术吗？抑或亦可以扩展到听觉艺术，即我们所谓的诗歌呢？

Probably the same would be true of poetry.

格：大概亦适用于诗歌吧。

Do not rely, I said, on a probability derived from the analogy of painting; but let us examine further and see whether the faculty with which poetical imitation is concerned is good or bad.

苏：不要一味相信从绘画的例子中得出的大致结论。我们要进一步探究，看看诗歌模仿所涉之官能善恶得失究竟如何。

By all means.

格：务必如此。

We may state the question thus:—Imitation imitates the actions of men, whether voluntary or involuntary, on which, as they imagine, a good or bad result has ensued, and they rejoice or sorrow accordingly. Is there anything more?

苏：我们可以如此说：诗歌模仿人们自愿或被迫的行为——人们认为这些行为导致吉凶祸福的产生，因而他们或喜或悲。此外，还有什么吗？

No, there is nothing else.

格：没有，别无其他。

But in all this variety of circumstances is the man at unity with himself—or rather, as in the instance of sight there was confusion and opposition in his opinions about the same things, so here also is there not strife and inconsistency in his life? Though I need hardly raise the question again, for I remember that all this has been already admitted; and the soul has been acknowledged by us to be full of these and ten thousand similar oppositions occurring at the same moment?

苏：但是，在诸如此类的不同情境之下，人自身能够保持意见一致吗？抑或正如视觉对相同事物存在着困惑和截然相反的观点，人的生活中难道不是同样存在着冲突与矛盾吗？我记得这一切已然有了定论，本不必再提出此问题。我们皆已承认，人的灵魂中存满了此类冲突与矛盾，并且会同时产生出成千上万种相反的观点，是吗？

And we were right, he said.

格：我们是正确的。

Yes, I said, thus far we were right; but there was an omission which must now be supplied.

苏：是的，到目前为止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补全之前遗漏的部分。

What was the omission?

格：有何遗漏？

Were we not saying that a good man, who has the misfortune to lose his son or anything else which is most dear to him, will bear the loss with more equanimity than another?

苏：我们当时说，当性善之人不幸失去爱子或任何其他心爱之物，他会较之他人更为平静地承受痛失所爱的打击，不是吗？

Yes.

格：是的。

But will he have no sorrow, or shall we say that although he cannot help sorrowing, he will moderate his sorrow?

苏：但是，他根本不难过吗？抑或我们是否应该说，虽然他难免要伤心，但能够节制悲痛呢？

The latter, he said, is the truer statement.

格：后者表述更为准确。

Tell me: will he be more likely to struggle and hold out against his sorrow when he is seen by his equals, or when he is alone?

苏：告诉我：在哪种情况下，他更可能努力地去抑制自己的悲伤：有与他平等的人在场时，抑或是独自一人时？

It will make a great difference whether he is seen or not.

格：是否有他人在场，会对他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

When he is by himself he will not mind saying or doing many things which he would be ashamed of any one hearing or seeing him do?

苏：当独处时，他不会介意说出或做出很多羞于为别人听到或看到的事情，是吗？

True.

格：对。

There is a principle of law and reason in him which bids him resist, as well as a feeling of his misfortune which is forcing him to indulge his sorrow?

苏：不幸的感觉会迫使他深陷悲伤，同样灵魂中的法律和理性则会促使他尽力克制，是吗？

True.

格：对。

But when a man is drawn in two opposite directions, to and from the same object, this, as we affirm, necessarily implies two distinct principles in him?

苏：但是，当一个人受两股相反力量来回拉扯时，我们肯定，这一定意味着他的灵魂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原则，是吗？

Certainly.

格：当然。

One of them is ready to follow the guidance of the law?

苏：其中之一愿意听从法律的指引，是吗？

How do you mean?

格：此话怎讲？

The law would say that to be patient under suffering is best, and that we should not give way to impatience, as there is no knowing whether such things are good or evil; and nothing is gained by impatience; also, because no human thing is of serious importance, and grief stands in the way of that which at the moment is most required.

苏：法律会说，在蒙受苦难时忍耐是最明智的选择——如此苦难是福是祸尚无定论，我们切不可烦躁；烦躁于事无补；另外，世间万事均无关紧要，而悲伤则会阻碍我们着手进行当下最紧迫之事。

What is most required? he asked.

格：何事最为紧迫？

That we should take counsel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and when the dice have been thrown order our affairs in the way which reason deems best; not, like children who have had a fall, keeping hold of the part struck and wasting time in setting up a howl, but always accustoming the soul forthwith to apply a remedy, raising up that which is sickly and fallen, banishing the cry of sorrow by the healing art.

苏：即我们应思考现已发生之事。当骰子已然抛出，我们要按照最符合理性的方式来安排事务；不要像摔倒的孩子那样捂着受伤的部位，在号啕大哭中浪费时间，而是总要让灵魂立即适应并寻求补救措施，借用治疗术救死扶伤，消除悲愁哭喊。

Yes, he said, that is the true way of meeting the attacks of fortune.

格：是的，这便是面对命运打击的正确做法。

Yes, I said; and the higher principle is ready to follow this suggestion of reason?

苏：是的。较为高尚的本性乐于遵循理性的建议，对吗？

Clearly.

格：显而易见。

And the other principle, which inclines us to recollection of our troubles and to lamentation, and can never have enough of them, we may call irrational, useless, and cowardly?

苏：另一种本性让我们想起不幸境遇并沉湎于无休止的悲鸣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非理性、无用和懦弱吗？

Indeed, we may.

格：的确可以。

And does not the latter—I mean the rebellious principle—furnish a great variety of materials for imitation? Whereas the wise and calm temperament, being always nearly equable, is not easy to imitate or to appreciate when imitated, especially at a public festival when a promiscuous crowd is assembled in a theatre. For the feeling represented is one to which they are strangers.

苏：后者——即人的叛逆本性——难道不是为模仿提供了各式各样的素材吗？然而，理智、冷静的性情总是近乎平静，因此不易模仿或即使被模仿也不易为观众欣赏，当公共节日大量杂乱的人群聚在剧场里时尤其如此。因为它所表现的情感对于这些人来说是陌生的。

Certainly.

格：当然。

Then the imitative poet who aims at being popular is not by nature made, nor is his art intended, to please or to affect the

rational principle in the soul; but he will prefer the passionate and fitful temper, which is easily imitated?

苏：于是，以博取大众欢迎为目的的模仿诗人，无论在本性上，或是出于行业所需，并不会取悦或者喜欢灵魂中平静的本性，相反他偏爱描写易于模仿的暴躁而多变的性情，是吗？

Clearly.

格：显而易见。

And now we may fairly take him and place him by the side of the painter, for he is like him in two ways: first, inasmuch as his creations have an inferior degree of truth—in this, I say, he is like him; and he is also like him in being concerned with an inferior part of the soul; and therefore we shall be right in refusing to admit him into a well-ordered State, because he awakens and nourishes and strengthens the feelings and impairs the reason. As in a city when the evil are permitted to have authority and the good are put out of the way, so in the soul of man, as we maintain, the imitative poet implants an evil constitution, for he indulges the irrational nature which has no discernment of greater and less, but thinks the same thing at one time great and at another small—he is a manufacturer of images and is very far removed from the truth.

苏：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将诗人置于画家身旁，因为他们在两个方面很相似：首先，诗人的作品真实性较差，这方面他与画家很像；

此外，诗人亦同画家一样关注灵魂较低劣的部分。于是，我们有理由禁止诗人进入井然有序的城邦，因为他会唤醒、滋养、加强情感，并削弱理性。正如在城邦中若让恶人当权则善人必遭排斥，在人的灵魂中同样如此——我们认为模仿的诗人在人的灵魂中植入恶的性情，因为诗人纵容人的非理性天性，该天性使人们无法分辨大与小，对同一个物体时而认为是大的，时而又认为是小的。诗人是影像的制作者，与真实相差甚远。

Exactly.

格：正是。

But we have not yet brought forward the heaviest count in our accusation:—the power which poetry has of harming even the good (and there are very few who are not harmed), is surely an awful thing?

苏：但是我们在对诗人的指控中尚未提出最大的罪状，即诗歌所具有的甚至可以危害到优秀人士力量（很少有人不受腐蚀），的确很可怕，难道不是吗？

Yes, certainly, if the effect is what you say.

格：是的。其影响果真如你所言的话，当然很可怕。

Hear and judge: The best of us, as I conceive, when we listen to a passage of Homer, or one of the tragedians, in which he represents some pitiful hero who is drawling out his sorrows in a long oration, or weeping, and smiting his breast—the best of us, you know, delight in giving way to sympathy, and are in raptures at the excellence of the poet who stirs our feelings most.

苏：且听我说再做定论：我想，当我们中的最优秀之人聆听荷马或某一个悲剧诗人的诗篇时，听到诗人所描写的某位可怜的英雄长篇大论地讲述自己的痛苦、哭哭啼啼、捶胸顿足，你知道的，我们中的最优秀之人，会充满同情，并会在最打动我们情感的诗人卓越才华的感染下心醉神迷。

Yes, of course I know.

格：是的，我当然知道。

But when any sorrow of our own happens to us, then you may observe th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the opposite quality—we would fain be quiet and patient; this is the manly part, and the other which delighted us in the recitation is now deemed to be the part of a woman.

苏：但是，当我们自己遭遇任何不幸之时，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引以为荣的却是恰好相反的性格——我们会欣然保持镇定而容忍；这便是男子气概，而为我们称道的诗歌中的行为现在看来乃是妇人之举。

Very true,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Now can we be right in praising and admiring another who is doing that which any one of us would abominate and be ashamed of in his own person?

苏：那么，如果他人做出了我们皆为之不齿且厌恶的行为，我们是否应该称赞并敬仰此人呢？

No, he said, that is certainly not reasonable.

格：不应该，这当然不合乎情理。

Nay, I said, quite reasonable from one point of view.

苏：不，从一个角度来看却是完全合理的。

What point of view?

格：哪个角度？

If you consider, I said, that when in misfortune we feel a natural hunger and desire to relieve our sorrow by weeping and lamentation, and that this feeling which is kept under control in our own calamities is satisfied and delighted by the poets;—the better nature in each of u lose this and the poem too? Few persons ever reflect, as I should imagine, that from the evil of other men something of evil is communicated to themselves. And so the feeling of sorrow which has gathered strength at the sight of the misfortunes of others is with difficulty repressed in our own.

苏：你想，当身处不幸，我们自然渴望通过哭泣和哀号来减轻我们的悲伤，这种在困境中被压抑的情感在诗歌中获得了满足和愉悦；我们每个人天性中较善的部分，未能受到理性和习惯充分的训练，因而在面对他人的不幸时便开始同情心泛滥。作为旁观者，他会认为，赞赏和同情一个前来倾诉自己如何善良并对所遭遇的麻烦小题大做的人，这毫不可耻。他会认为这份快乐是一种收获，他何苦要故作傲慢，错失掉这种快乐并否定这首诗歌呢？我想，很少有人曾想过：观他人之恶，其恶亦会沾染自身。因此在观看他人不幸之时悲痛的情感得以增强，当不幸发生在自身时，悲伤便很难得到抑制。

How very true!

格：对极了！

And does not the same hold also of the ridiculous? There are jests which you would be ashamed to make yourself, and yet on the comic stage, or indeed in private, when you hear them, you are greatly amused by them, and are not at all disgusted at their

unseemliness;—the case of pity is repeated;—there is a principle in human nature which is disposed to raise a laugh, and this which you once restrained by reason, because you were afraid of being thought a buffoon, is now let out again; and having stimulated the risible faculty at the theatre, you are betrayed unconsciously to yourself into playing the comic poet at home.

苏：难道滑稽剧不是同样如此吗？有些笑话你自己羞于出口，但是在喜剧舞台上或甚至是私下里，你听到这些笑话会觉得很好笑，并丝毫不嫌弃笑话的粗俗——这与悲天悯人如出一辙。人天生有一种说笑的本能，因为担心会被别人视为小丑而一度要靠理性来压制，现在这种本能再次得到了释放；在剧院这种插科打诨的本能得到激发，回到家里你便会无意识地本性毕露扮起了喜剧诗人。

Quite true, he said.

格：的确如此。

And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lust and anger and all the other affections, of desire and pain and pleasure, which are held to be inseparable from every action—in all of them poetry feeds and waters the passions instead of drying them up; she lets them rule, although they ought to be controlled, if mankind are ever to increase in happiness and virtue.

苏：被认为与人类一切行为紧密相关的爱欲、愤怒及所有其他的感情，乃至欲望、痛苦和快乐大概都是如此——诗歌不会使其干涸反

倒会滋养、浇灌它们。如果人们想得到更多幸福和美德，这些情感本应被管制，而诗歌却任由它们统治灵魂。

I cannot deny it.

格：对此，我无法否认。

Therefore, Glaucon, I said, whenever you meet with any of the eulogists of Homer declaring that he has been the educator of Hellas, and that he is profitable for education and for the ordering of human things, and that you should take him up again and again and get to know him and regulate your whole life according to him, we may love and honour those who say these things—they are excellent people, as far as their lights extend; and we are ready to acknowledge that Homer is the greatest of poets and first of tragedy writers; but we must remain firm in our conviction that hymns to the gods and praises of famous men are the only poetry which ought to be admitted into our State. For if you go beyond this and allow the honeyed muse to enter, either in epic or lyric verse, not law and the reason of mankind, which by common consent have ever been deemed best, but pleasure and pain will be the rulers in our State.

苏：因此，格劳孔，当你遇到赞颂荷马的人，声称荷马是希腊的教育家，在教育和管理人民生活方面发挥作用，而且人们应该不断地听从荷马的教导，遵照他的指示来规范整个人生，这时你要欣赏和尊敬发表以上言论之人——就其智识而言，他们皆为优秀人才。我们很愿意承认荷马是最伟大的诗人和悲剧作家的先驱，但是我们必须坚持

立场，只允许歌颂神和伟人的赞美诗进入我们城邦。因为一旦你逾越该界限，准许执掌史诗或抒情诗的甜蜜缪斯女神入城，那么统治城邦的将不是被公认为至善的法律与人类理性，而是快乐与痛苦。

That is most true, he said.

格：千真万确。

And now since we have reverted to the subject of poetry, let this our defence serve to show the reasonableness of our former judgment in sending away out of our State an art having the tendencies which we have described; for reason constrained us. But that she may not impute to us any harshness or want of politeness, let us tell her that there is an ancient quarrel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etry; of which there are many proofs, such as the saying of 'the yelping hound howling at her lord,' or of one 'mighty in the vain talk of fools,' and 'the mob of sages circumventing Zeus,' and the 'subtle thinkers who are beggars after all'; and there are innumerable other signs of ancient enmity between them. Notwithstanding this, let us assure our sweet friend and the sister arts of imitation, that if she will only prove her title to exist in a well-ordered State we shall be delighted to receive her—we are very conscious of her charms; but we may not on that account betray the truth. I dare say, Glaucon, that you are as much charmed by her as I am, especially when she appears in Homer?

苏：现在，既然我们又回到诗歌话题，上述的观点可以证明我们之前所作出的将具有此类倾向的诗歌逐出城邦的决定是正确的；理智

迫使我们如此。但是诗歌艺术女神也许会指责我们粗暴、无礼，且让我们告诉她哲学和诗歌之争自古有之。诸多证据，如“对着主人狂吠的狗”，或“以痴人空谈见长”者，以及“智困宙斯的圣贤暴徒”和“缜密的乞丐思想家”等说法，以及难以计数的种种其他迹象均表明两者自古不和。即便如此，我们向亲爱的诗歌朋友和其他模仿技艺保证，诗歌只需证明有权存在于秩序井然的城邦中，我们便会愉快地对她表示接纳——我们清楚地了解诗歌的魅力，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而违背真理。格劳孔，我敢肯定，你我彼此彼此，同样为诗歌的魅力所倾倒，尤其是当她出自荷马之时，是吗？

Yes, indeed, I am greatly charmed.

格：是的，的确，我深深为之倾倒。

Shall I propose, then, that she be allowed to return from exile, but upon this condition only—that she make a defence of herself in lyrical or some other metre?

苏：那么，我提议只要诗歌能满足此条件——即诗歌用抒情诗格或其他格律为自身辩解，我们便允许诗歌结束流放返回城邦，可以吗？

Certainly.

格：当然。

And we may further grant to those of her defenders who are lovers of poetry and yet not poets the permission to speak in prose on her behalf: let them show not only that she is pleasant but also useful to States and to human life, and we will listen in a kindly spirit; for if this can be proved we shall surely be the gainers—I mean, if there is a use in poetry as well as a delight?

苏：我们可以进一步准许，那些热爱诗歌但并非诗人的人们用诗歌的形式为诗歌辩护：他们要证明诗歌不但令人愉悦而且于国于民有用，而我们将洗耳恭听。一旦这能够得到证实，即诗歌果然有趣且实用，我们必然会成为受益者，是吗？

Certainly, he said, we shall be the gainers.

格：当然，我们会成为受益者。

If her defence fails, then, my dear friend, like other persons who are enamoured of something, but put a restraint upon themselves when they think their desires are opposed to their interests, so too must we after the manner of lovers give her up, though not without a struggle. We too are inspired by that love of poetry which the education of noble States has implanted in us, and therefore we would have her appear at her best and truest; but so long as she is unable to make good her defence, this argument of ours shall be a charm to us, which we will repeat to ourselves while we listen to her strains; that we may not fall away into the childish love of her which captivates the many. At all events we are well aware that poetry being such as we have described is not to be

regarded seriously as attaining to the truth; and he who listens to her, fearing for the safety of the city which is within him, should be on his guard against her seductions and make our words his law.

苏：如果诗歌辩护失利，亲爱的朋友，那么我们便要像那些着迷某事物但因自知这些欲望与自身兴趣相悖便加以抑制的人一样，必须放弃诗歌，尽管困难重重也在所不惜。伟大城邦的教育已经使我们深爱诗歌并从中获得启迪，因此我们希望诗歌能呈现出最善、最真实的一面。但是如果诗歌无法成功为自己辩护，那么我们的这一论点便将成为我们的护身咒语，每当我们聆听诗歌时便要不断地暗自默念咒语，以免陷入到众人所无法摆脱的对诗歌的幼稚爱恋。总之，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诗歌正如我们所描述的那样，不可信以为真并指望从中获得真理。为了自己内心世界的安全，听诗歌吟诵的人要抵制诗歌的诱惑并以我们的话为准则。

Yes, he said, I quite agree with you.

格：是的，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Yes, I said, my dear Glaucon, for great is the issue at stake, greater than appears, whether a man is to be good or bad. And what will any one be profited if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onour or money or power, aye, or under the excitement of poetry, he neglect justice and virtue?

苏：是的，亲爱的格劳孔，这关系到人们的善恶选择，意义重大，其重大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一个人受荣誉、金钱、权利的

摆布，啊，或者受诗歌诱惑而不顾正义与美德，那么他又如何会受益呢？

Yes, he said; I have been convinced by the argument, as I believe that any one else would have been.

格：是的。我对此心悦诚服，同时我相信其他人亦会怀有同感。

And yet no mention has been made of the greatest prizes and rewards which await virtue.

苏：然而，我们犹未提及美德会带来的最大奖励和回报呢！

What, are there any greater still? If there are, they must be of an inconceivable greatness.

格：什么？会存在（比我们提过的）更为大的奖励和回报吗？如果存在，它们必定大得无法想象。

Why, I said, what was ever great in a short time? The whole period of three score years and ten is surely but a little thing in comparison with eternity?

苏：啊，短暂的时间里什么是不朽的呢？人的一生七十年相对于

永恒来说当然是微乎其微的，是吗？

Say rather 'nothing,' he replied.

格：更准确地讲，“不值一提”。

And should an immortal being seriously think of this little space rather than of the whole?

苏：那么，一个不朽不灭的存在会重视这短暂的一段时间而轻视永恒吗？

Of the whole, certainly. But why do you ask?

格：当然，要重视永恒。但是你为何如此发问呢？

Are you not aware, I said, that the soul of man is immortal and imperishable?

苏：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人的灵魂是不朽不灭的吗？

He looked at me in astonishment, and said: No, by heaven: And are you really prepared to maintain this?

格（惊讶地看着苏格拉底）：没有，天啊，你真的打算如此立论吗？

Yes, I said, I ought to be, and you too—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proving it.

苏：是的，我理应如此，而且你也不例外——这不难证明。

I see a great difficulty; but I should like to hear you state this argument of which you make so light.

格：我认为这殊非易事。但我愿意听你说说你如此轻松提出的主张。

Listen then.

苏：请听我说吧。

I am attending.

格：洗耳恭听。

There is a thing which you call good and another which you call evil?

苏：存在着某种你称之为善的事物，同时亦存在着另一种你称之为恶的事物吗？

Yes, he replied.

格：存在。

Would you agree with me in thinking that the corrupting and destroying element is the evil, and the saving and improving element the good?

苏：你是否赞同我的观点认为具有腐蚀与破坏性质者为恶，具有救赎与提升性质者为善呢？

Yes.

格：赞同。

And you admit that every thing has a good and also an evil; as ophthalmia is the evil of the eyes and disease of the whole body; as mildew is of corn, and rot of timber, or rust of copper and iron: in

everything, or in almost everything, there is an inherent evil and disease?

苏：你承认万物皆有善有恶，比如眼炎是眼睛的恶，疾病是整个身体的恶；同样，霉菌是玉米的恶；腐烂是木材的恶；锈是铜和铁的恶——所有的事物，或者说在几乎所有的事物中，都存在与生俱来的恶和病，是吗？

Yes, he said.

格：是的。

And anything which is infected by any of these evils is made evil, and at last wholly dissolves and dies?

苏：任何事物一旦感染上任何一种上述之恶便会变恶，最后整体完全分解、消亡，对吗？

True.

格：对。

The vice and evil which is inherent in each is the destruction of each; and if this does not destroy them there is nothing else that

will; for good certainly will not destroy them, nor again, that which is neither good nor evil.

苏：每个事物内在的恶都会毁灭事物本身。如果恶不毁灭该事物，那么便不存在任何其他毁灭该事物的元素，因为善不会危害它，非善非恶的事物亦不会危害它。

Certainly not.

格：当然不会。

If, then, we find any nature which having this inherent corruption cannot be dissolved or destroyed, we may be certain that of such a nature there is no destruction?

苏：那么，如果我们找到某种具有内在的恶但却无法被分解或毁灭的本性，我们便可以肯定该本性是不可毁灭的，是吗？

That may be assumed.

格：可以如此认为。

Well, I said, and is there no evil which corrupts the soul?

苏：哦，难道不存在败坏灵魂的恶吗？

Yes, he said, there are all the evils which we were just now passing in review: unrighteousness, intemperance, cowardice, ignorance.

格：是的。我们刚刚回顾了所有这些恶：不义、放纵、怯懦与无知。

But does any of these dissolve or destroy her?—and here do not let us fall into the error of supposing that the unjust and foolish man, when he is detected, perishes through his own injustice, which is an evil of the soul. Take the analogy of the body: The evil of the body is a disease which wastes and reduces and annihilates the body; and all the things of which we were just now speaking come to annihilation through their own corruption attaching to them and inhering in them and so destroying them. Is not this true?

苏：但是其中任何一种恶分解或毁灭灵魂吗？我们不要错误地以为，被人察觉的不义、蠢笨之人是毁于自身不正义的行为，即灵魂的恶。以身体为例：身体之恶为病痛，病痛会损耗、削弱并摧毁身体；我们刚刚所提及的所有事物都会因依附其上的、与生俱来的、具有破坏力的恶而消亡。难道不是吗？

Yes.

格：是的。

Consider the soul in like manner. Does the injustice or other evil which exists in the soul waste and consume her? Do they by attaching to the soul and inhering in her at last bring her to death, and so separate her from the body?

苏：请以同样的方式来思考灵魂问题。灵魂中的不义或其他的恶会毁灭灵魂吗？这些附着于灵魂并且为灵魂所固有的恶最终会毁灭灵魂，使其与肉体相分离吗？

Certainly not.

格：当然不会。

And yet, I said, it is unreasonable to suppose that anything can perish from without through affection of external evil which could not be destroyed from within by a corruption of its own?

苏：但是，如果任何事物没有毁于自身之恶反倒被外界之恶所毁掉，这种假设并不合乎情理，是吗？

It is, he replied.

格：的确不合理。

Consider, I said, Glaucon, that even the badness of food, whether staleness, decomposition, or any other bad quality, when confined to the actual food, is not supposed to destroy the body; although, if the badness of food communicates corruption to the body, then we should say that the body has been destroyed by a corruption of itself, which is disease, brought on by this; but that the body, being one thing, can be destroyed by the badness of food, which is another, and which does not engender any natural infection—this we shall absolutely deny?

苏：想一想，格劳孔，食物之恶（无论是不新鲜、腐烂变质抑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劣质）如只限于食物本身，是不会损害人体的。但是当劣质的食物将腐化之恶传给人体，我们应该说身体是毁于自身的腐败变质——即食物之恶所导致的疾病。但是如果说身体（一种事物）为食物之恶（另一种事物）所毁，而食物之恶却未引起任何自然感染，对此我们坚决不会同意，对吧？

Very true.

格：确实如此。

And, on the same principle, unless some bodily evil can produce an evil of the soul, we must not suppose that the soul, which is one thing, can be dissolved by any merely external evil which belongs to another?

苏：同理，除非某种身体之恶可引发灵魂之恶，否则我们切不可认为，灵魂（一种事物）会被某一外来之恶（属于另一事物）所毁灭，是吗？

Yes, he said, there is reason in that.

格：是的，言之有理。

Either, then, let us refute this conclusion, or, while it remains unrefuted, let us never say that fever, or any other disease, or the knife put to the throat, or even the cutting up of the whole body into the minutest pieces, can destroy the soul, until she herself is proved to become more unholy or unrighteous in consequence of these things being done to the body; but that the soul, or anything else if not destroyed by an internal evil, can be destroyed by an external one, is not to be affirmed by any man.

苏：那么，我们或者反驳该结论，或者在该结论无可反驳的情况下，今后除非谁能证明灵魂会因肉体悲惨遭遇而变得罪恶或不义，否则便不要说发烧、疾病或割喉甚至是碎尸万段会毁掉人的灵魂，而要说任何人不可断言灵魂，或其他任何事物，若未毁于内在的恶则会毁于外在的恶。

And surely, he replied, no one will ever prove that the souls of men become more unjust in consequence of death.

格：当然，永远不会有人证明，人的灵魂因死亡而变得更加不义。

But if some one who would rather not admit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boldly denies this, and says that the dying do really become more evil and unrighteous, then, if the speaker is right, I suppose that injustice, like disease, must be assumed to be fatal to the unjust, and that those who take this disorder die by the natural inherent power of destruction which evil has, and which kills them sooner or later, but in quite another way from that in which, at present, the wicked receive death at the hands of others as the penalty of their deeds?

苏：但是，如果不承认灵魂永恒的人否认此观点，认为濒死之人的确变得更加邪恶和不义，那么倘若此人观点正确，我猜想，不义如同疾病，对于不义之人来说一定是致命的，沾染此类恶习者会命丧于恶天生所具有的、迟早取人性命的破坏力，但是完全不同于当今的情况，即恶人因自身恶行遭惩罚而被人取了性命。

Nay, he said, in that case injustice, if fatal to the unjust, will not be so very terrible to him, for he will be delivered from evil. But I rather suspect the opposite to be the truth, and that injustice which, if it have the power, will murder others, keeps the murderer alive—aye, and well awake too; so far removed is her dwelling-place from being a house of death.

格：不仅如此，在那种情形之下，倘若不义会置不义之人于死地，那么对不义之人而言，不义便不那么可怕了，因为他终将会从罪

恶中解脱出来。但是我毋宁认为事实正好与之相反，不义如果真具有如此的破坏力，便会让他人丧命而让杀人者存活于世——啊，而且还精神抖擞地活着；不义的栖身之所与坟墓相距甚远呢。

True, I said; if the inherent natural vice or evil of the soul is unable to kill or destroy her, hardly will that which is appointed to be the destruction of some other body, destroy a soul or anything else except that of which it was appointed to be the destruction.

苏：对。如果灵魂固有之恶行或邪恶无法扼杀或毁灭灵魂，那么用以破坏某种其他物体的恶也无法摧毁灵魂或其他任何非指定要破坏的事物。

Yes, that can hardly be.

格：是的，无法摧毁。

But the soul which cannot be destroyed by an evil, whether inherent or external, must exist for ever, and if existing for ever, must be immortal?

苏：但是，无论内在抑或外在的恶都无法毁掉的灵魂，一定是永恒的，同时如果灵魂是永恒的，它就一定是不朽的，是吗？

Certainly.

格：当然。

That is the conclusion, I said; and, if a true conclusion, then the souls must always be the same, for if none be destroyed they will not diminish in number. Neither will they increase, for the increase of the immortal natures must come from something mortal, and all things would thus end in immortality.

苏：这便是结论。如果结论正确，那么灵魂必定永远保持不变，因为如果灵魂不灭，其数量便不会减少。同时它们亦不会增多，因为新增的不朽事物必定是由可朽的事物转化而来，于是所有事物最终都变为不朽。

Very true.

格：非常正确。

But this we cannot believe—reason will not allow us—any more than we can believe the soul, in her truest nature, to be full of variety and difference and dissimilarity.

苏：但是，我们无法相信这一说法，因为理性不允许我们。同样我们也无法相信，最真实的灵魂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

What do you mean? he said.

格：此话怎讲？

The soul, I said, being, as is now proven, immortal, must be the fairest of compositions and cannot be compounded of many elements?

苏：既然此时灵魂被证实为不朽，那么它必定具有最为纯净的组成成分，不会是由诸多物质混合而成的，是吗？

Certainly not.

格：当然不会。

Her immortality is demonstrated by the previous argument, and there are many other proofs; but to see her as she really is, not as we now behold her, marred by communion with the body and other miseries, you must contemplate her with the eye of reason, in her original purity; and then her beauty will be revealed, and justice and injustice and all the things which we have described will be manifested more clearly. Thus far, we have spoken the truth concerning her as she appears at present, but we must remember also that we have seen her only in a condition which may be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sea-god Glaucus, whose original image can hardly be discerned because his natural members are broken off and

crushed and damaged by the waves in all sorts of ways, and incrustations have grown over them of seaweed and shells and stones, so that he is more like some monster than he is to his own natural form. And the soul which we behold is in a similar condition, disfigured by ten thousand ills. But not there, Glaucon, not there must we look.

苏：之前的论证以及很多其他方面的证据均表明灵魂不朽，但是要想弄清灵魂真相（不同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受到肉体及其他种种忧患的影响而形象受损的灵魂），你必须用理性之眼来观察灵魂，看到其最原始、最纯粹的形象。那时灵魂之美便得以显露，正义、不义以及我们所描绘的所有事物将会被更为清楚地展现出来。至此，我们已经真实展现了目前灵魂所显现的形象，但是我们亦须铭记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处于一定条件下的灵魂，正如海神格劳克斯那样——海神本来的形貌几乎无从分辨，因为其原本的躯体已被百般肆虐的海浪折断、击碎、损毁，上面布满了海草、贝壳和石子，现在海神看起来更像是魔鬼，失去了其自然形态。我们所看到的灵魂，情形与之类似，上万种病痛使其扭曲变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格劳孔，我们不必着眼于此。

Where then?

格：那么要着眼于何处呢？

At her love of wisdom. Let us see whom she affects, and what society and converse she seeks in virtue of her near kindred with the immortal and eternal and divine; also how different she would become if wholly following this superior principle, and borne by a

divine impulse out of the ocean in which she now is, and disengaged from the stones and shells and things of earth and rock which in wild variety spring up around her because she feeds upon earth, and is overgrown by the good things of this life as they are termed: then you would see her as she is, and know whether she has one shape only or many, or what her nature is. Of her affections and of the forms which she takes in this present life I think that we have now said enough.

苏：于灵魂对智慧之爱。让我们看看灵魂凭借与不朽、永恒、神圣事物的亲缘关系，对谁产生影响，又与何者交往、交流；我们还要看看如果整个灵魂都追随智慧这一较为高级的部分，并被一种神圣的力量将它从目前所处的深海中托出，扯掉遍布其周身的各种石块、贝壳和土石之物（因为灵魂是靠俗物为生，所以它为尘世中所谓的美好事物笼罩）：这时你会看到它的真实面目，弄清它究竟是仅拥有一种，还是具备多种形态，以及它的本性如何。我想，关于灵魂在今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呈现的形式，我们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True, he replied.

格：对。

And thus, I said, we have fulfilled the conditions of the argument; we have not introduced the rewards and glories of justice, which, as you were saying, are to be found in Homer and Hesiod; but justice in her own nature has been shown to be best for the soul in her own nature. Let a man do what is just, whether he have the ring of Gyges or not, and even if in addition to the ring of

Gyges he put on the helmet of Hades.

苏：因此我们已经满足了论辩的条件。我们并未提及正义所带来的好处和荣誉（正如你之前所说，可以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诗中找到它们），但是我们已经证明了正义本身对于灵魂本身是最有益处的。为人应行正义之事，无论他是否拥有盖吉斯之戒，即使他除了盖吉斯之戒，还戴有冥王哈得斯的隐身帽，也不例外。

Very true.

格：的确如此。

And now, Glaucon, there will be no harm in further enumerating how many and how great are the rewards which justice and the other virtues procure to the soul from gods and men, both in life and after death.

苏：格劳孔，正义以及其他美德会在人的生前和死后为其灵魂带来诸多来自神、人的回报，那么进一步点数其回报如何之多、如此之丰厚，应该无妨吧？

Certainly not, he said.

格：当然无妨。

Will you repay me, then, what you borrowed in the argument?

苏：那么，你是否应该把讨论中借用的东西归还给我呢？

What did I borrow?

格：我借用什么了呢？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just man should appear unjust and the unjust just: for you were of opinion that even if the true state of the case could not possibly escape the eyes of gods and men, still this admission ought to be made for the sake of the argument, in order that pure justice might be weighed against pure injustice. Do you remember?

苏：即假设正义者应表面上不义，不义者应表面上正义，因为当时你认为即便真相最终不可能逃过神与世人的眼睛，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仍然应该容许此等假设，从而形成纯粹正义与纯粹不义的较量。你可记得？

I should be much to blame if I had forgotten.

格：我若忘记，便是大错而特错。

Then, as the cause is decided, I demand on behalf of justice that the estimation in which she is held by gods and men and which we acknowledge to be her due should now be restored to her by us; since she has been shown to confer reality, and not to deceive those who truly possess her, let what has been taken from her be given back, that so she may win that palm of appearance which is hers also, and which she gives to her own.

苏：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代表正义要求我们现在恢复正义在人、神处享有的声望（我们也认可，这是正义应有的声望）。既然正义被证明能够赐予真正拥有正义之人真实，而不会欺骗他们，请归还从正义身上拿走的东西吧，这样它才能获得也是属于它的、它授予自己的外在荣誉。

The demand, he said, is just.

格：要求很合理。

In the first place, I said—and this is the first thing which you will have to give back—the nature both of the just and unjust is truly known to the gods.

苏：首先，这也是你必须第一个归还的，即神是很清楚正义者和不义者的品性的。

Granted.

格：同意。

And if they are both known to them, one must be the friend and the other the enemy of the gods, as we admitted from the beginning?

苏：此外，如果神对两者都了解，那么正如我们最初所认可的那样，二者中必定有一个为神的朋友，另一个则为神的敌人，对吗？

True.

格：对。

And the friend of the gods may be supposed to receive from them all things at their best, excepting only such evil as is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former sins?

苏：那么，除非他因前世的罪孽而必须遭受某种不幸，否则神的朋友应该从神那里得到一切最好的东西，是吗？

Certainly.

格：当然。

Then this must be our notion of the just man, that even when he is in poverty or sickness, or any other seeming misfortune, all things will in the end work together for good to him in life and death: for the gods have a care of any one whose desire is to become just and to be like God, as far as man can attain the divine likeness, by the pursuit of virtue?

苏：因此，我们务必如此看待正义之人——即便遭遇贫穷、疾病或其他不幸，无论生前抑或死后，最终一切都会好转：因为只要人类通过向善而获得与神祇相似的品质，诸神便会眷顾所有渴望成为正义者、效仿神明之人，是吗？

Yes, he said; if he is like God he will surely not be neglected by him.

格：是的。如果他效仿神明，神必然不会无视他的存在。

And of the unjust may not the opposite be supposed?

苏：不义者的情形难道不是与之正相反吗？

Certainly.

格：当然。

Such, then, are the palms of victory which the gods give the just?

苏：那么，这便是神赐予正义者的胜利的荣光，是吗？

That is my conviction.

格：我对此深信不疑。

And what do they receive of men? Look at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and you will see that the clever unjust are in the case of runners, who run well from the starting-place to the goal but not back again from the goal: they go off at a great pace, but in the end only look foolish, slinking away with their ears draggling on their shoulders, and without a crown; but the true runner comes to the finish and receives the prize and is crowned. And this is the way with the just; he who endures to the end of every action and occasion of his entire life has a good report and carries off the prize which men have to bestow.

苏：此外，正义者从人们那里获得什么呢？如果你客观地看待事物，你会发现狡诈的不义者正如从起点快速跑到终点却并未从终点返回的赛跑者：他们起跑速度快，但最后却只是滑稽地耷拉着头溜走了，未获得任何代表胜利的荣誉；真正的赛跑者却跑到终点领取奖品，并被授予胜利的桂冠。正义者便是如此。他在整个一生每个行为、每个活动中最终都取得良好的成绩，并领走人们授予的奖品。

True.

格：对。

And now you must allow me to repeat of the just the blessings which you were attributing to the fortunate unjust. I shall say of them, what you were saying of the others, that as they grow older, they become rulers in their own city if they care to be; they marry whom they like and give in marriage to whom they will; all that you said of the others I now say of these. And, on the other hand, of the unjust I say that the greater number, even though they escape in their youth, are found out at last and look foolish at the end of their course, and when they come to be old and miserable are flouted alike by stranger and citizen; they are beaten and then come those things unfit for ears polite, as you truly term them; they will be racked and have their eyes burned out, as you were saying. And you may suppose that I have repeated the remainder of your tale of horrors. But will you let me assume, without reciting them, that these things are true?

苏：属于正义者的福分却被你归之于幸运的不义者，现在你必须允许我重申正义者的福分。我将用你说其他人的话来说正义者，即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如果他们愿意，他们会成为自己城邦的统治者；他们会称心如意地娶妻嫁女。现在我主张，你之前所说的属于不义者的一切都归属于正义者。另一方面，我认为，更多的不义之人即使年轻时躲过了惩罚，但终将原形毕露，在人生旅程的尽头身败名裂，在风烛残年处境悲惨，受尽国人与陌生人的嘲笑；他们遭受拷打，以及你名副其实地称为不堪入耳的刑罚；他们饱受摧残，并且如你所说被

灼瞎双眼。你不妨假定，我已经将重述了你讲述的恐怖遭遇的剩余部分。我不再重复了，但是你容许我假设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可信的吗？

Certainly, he said, what you say is true.

格：当然，你的话真实可信。

These, then, are the prizes and rewards and gifts which are bestowed upon the just by gods and men in this present life, in addition to the other good things which justice of herself provides.

苏：除了正义本身给正义者带来的好处外，上述的这些便是神与人赐予正义者此生的奖品、回报和礼物。

Yes, he said; and they are fair and lasting.

格：是的，它们美好而持久。

And yet, I said, all these are as nothing, either in number or greatness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other recompenses which await both just and unjust after death. And you ought to hear them, and then both just and unjust will have received from us a full payment of the debt which the argument owes to them.

苏：但是，如果这一切与在正义者和不正义者死后等待着他们的东西相比较，无论在数量还是程度上，都是不值一提的。你应该听听他们各自的际遇，这样我们的论述所亏欠正义者和不正义者的债务便会被全额还清的。

Speak, he said; there are few things which I would more gladly hear.

格：请讲。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喜欢听的了。

SOCRATES

主要人物：苏格拉底

Well, I said, I will tell you a tale; not one of the tales which Odysseus tells to the hero Alcinous, yet this too is a tale of a hero, Er, the son of Armenius, a Pamphylian by birth. He was slain in battle, and ten days afterwards, when the bodies of the dead were taken up already in a state of corruption, his body was found unaffected by decay, and carried away home to be buried. And on the twelfth day, as he was lying on the funeral pile, he returned to life and told them what he had seen in the other world. He said that when his soul left the body he went on a journey with a great company, and that they came to a mysterious place at which there were two openings in the earth; they were near together, and over against them were two other openings in the heaven above. In the intermediate space there were judges seated, who commanded the

just, after they had given judgment on them and had bound their sentences in front of them, to ascend by the heavenly way on the right hand; and in like manner the unjust were bidden by them to descend by the lower way on the left hand; these also bore the symbols of their deeds, but fastened on their backs. He drew near, and they told him that he was to be the messenger who would carry the report of the other world to men, and they bade him hear and see all that was to be heard and seen in that place. Then he beheld and saw on one side the souls departing at either opening of heaven and earth when sentence had been given on them; and at the two other openings other souls, some ascending out of the earth dusty and worn with travel, some descending out of heaven clean and bright. And arriving ever and anon they seemed to have come from a long journey, and they went forth with gladness into the meadow, where they encamped as at a festival; and those who knew one another embraced and conversed, the souls which came from earth curiously enquiring about the things above, and the souls which came from heaven about the things beneath. And they told one another of what had happened by the way, those from below weeping and sorrowing at the remembrance of the things which they had endured and seen in their journey beneath the earth (now the journey lasted a thousand years), while those from above were describing heavenly delights and visions of inconceivable beauty. The story, Glaucon, would take too long to tell; but the sum was this:—He said that for every wrong which they had done to any one they suffered tenfold; or once in a hundred years—such being reckoned to be the length of man's life, and the penalty being thus paid ten times in a thousand years. If, for example, there were any who had been the cause of many deaths, or had betrayed or enslaved cities or armies, or been guilty of any other evil behaviour, for each and all of their offences they received punishment ten times over, and the rewards of beneficence and justice and holiness

were in the same proportion. I need hardly repeat what he said concerning young children dying almost as soon as they were born. Of piety and impiety to gods and parents, and of murderers, there were retributions other and greater far which he described. He mentioned that he was present when one of the spirits asked another, 'Where is Ardiaeus the Great?' (Now this Ardiaeus lived a thousand years before the time of Er: he had been the tyrant of some city of Pamphylia, and had murdered his aged father and his elder brother, and was said to have committed many other abominable crimes.) The answer of the other spirit was: 'He comes not hither and will never come. And this,' said he, 'was one of the dreadful sights which we ourselves witnessed. We were at the mouth of the cavern, and, having completed all our experiences, were about to reascend, when of a sudden Ardiaeus appeared and several others, most of whom were tyrants; and there were also besides the tyrants private individuals who had been great criminals: they were just, as they fancied, about to return into the upper world, but the mouth, instead of admitting them, gave a roar, whenever any of these incurable sinners or some one who had not been sufficiently punished tried to ascend; and then wild men of fiery aspect, who were standing by and heard the sound, seized and carried them off; and Ardiaeus and others they bound head and foot and hand, and threw them down and flayed them with scourges, and dragged them along the road at the side, carding them on thorns like wool, and declaring to the passers-by what were their crimes, and that they were being taken away to be cast into hell.' And of all the many terrors which they had endured, he said that there was none like the terror which each of them felt at that moment, lest they should hear the voice; and when there was silence, one by one they ascended with exceeding joy. These, said Er, were the penalties and retributions, and there were blessings as great.

苏：啊，我给你讲个故事，不是奥德修斯讲给英雄阿尔基努斯的故事，但也仍然是关于英雄的，即出身潘菲利亚的阿尔迈尼俄斯之子厄洛斯。他在战斗中牺牲，十天后其他的尸体都已经处于腐烂状态，而他的尸体却未受任何腐蚀，于是人们把他抬回家准备埋葬。死后第十二天，在火葬堆上，他起死回生，并给人们讲述了他在来世所看到的一切。他说，当他的灵魂脱离肉体后，他便跟着一大群鬼魂结伴上路了，他们来至一个地面上有两个并排洞口的神秘所在，在洞口之上的天上亦有两个洞口。在天地之间坐着判官们，他们在对每个正义者进行审判，并将判决书贴在胸前，然后命令他们从右侧升天；同样，不义者被吩咐从左侧下到地下，他们也都带有对他们所作所为的标记，不过是缚在后背。他走上前，法官们说他将作为使者把来世的情形转达给世人，并命令他聆听和观察这里发生的一切。于是他看到，当判决结束后，一侧的鬼魂们纷纷从天上和地面的洞口离开。同时另两个洞口出现另一些灵魂，有从地下上来形容污秽、风尘仆仆的鬼魂，有从天上下来光鲜整洁的鬼魂。不断到来的鬼魂似乎都经过了长途的跋涉，正欣然走向一片草地，扎下帐篷好像过节一样。互相认识的鬼魂们拥抱、交谈，下面来的鬼魂好奇地询问天上的情况，天上来的鬼魂们则打听地下的情况。他们互相诉说着各自旅途中的遭遇，地下来的人提起在地下的遭遇和旅途中看到的情景（现在一趟旅行就是一千年）便悲叹痛哭，天上来的鬼魂则讲述天上难以置信的美景和幸福。格劳孔，这个故事讲起来太长了。但大致如此：厄洛斯说，人们生前对任何人造成的每个伤害，现在要忍受十倍的痛苦，即每隔一百年便受罚一次——一百年被视为是人一生的时间，因此一千年里他受到了十倍的惩罚。比如，有些人生前害死多条性命、曾经背叛或奴役过城邦或军队，或犯下过其他罪行，那么他们对所犯下的每一桩以及全部的罪行，都要承受十倍的惩罚；同样，善行、正义和虔诚，也将获得同样多的回报和好处。厄洛斯讲述了关于出生不久便夭折的婴孩的故事，我在此不必复述了。对神祇、父母的敬重与不敬，以及谋杀等行为，会受到更多、更大的报应。厄洛斯提到亲耳听到一个鬼魂问另一个“阿尔狄阿欧斯大王何在？”（该阿尔狄阿欧斯大王，此时距厄洛斯刚好相隔一千年，此人曾是潘菲里亚某城邦的暴君，谋杀了年迈

的父亲和兄长，据说还犯下了许多其他可怕的罪行。）另一个鬼魂答道：“他没来，永远不会来了。”此鬼魂接着说，“这是我们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种景象了。”“我们走到洞口，受尽了我们该受的苦，马上要重回地面了，这时突然阿尔狄阿欧斯大王和另几个人出现了，他们大多曾是暴君，暴君旁边还有几位曾犯下重罪的人。这些人以为自己可以返回到上面的世界，但是只要这些不可饶恕的罪人们，或其他没有吃尽苦头的人接近洞口，洞口便会发出吼叫不许他们进入，然后站在洞口旁相貌凶狠的野人听到声音，便会将他们抓住并带走。阿尔狄阿欧斯和其他几个人手脚和头被捆绑起来，丢在地上，鞭打剥皮，然后再拖到一边，用荆棘条在身上拉锯，并向经过的人们讲述他们的罪行，还说他们将被拖走投入地狱。”该鬼魂说在他们的所有可怕经历中，最骇人的便是那一刻，他们担心会听到洞口的吼叫。如果没有声音，他们便会欢天喜地地逐个上到地面。厄洛斯说，这便是惩罚和报应，福泽亦是如此。

Now when the spirits which were in the meadow had tarried seven days, on the eighth they were obliged to proceed on their journey, and, on the fourth day after, he said that they came to a place where they could see from above a line of light, straight as a column, extending right through the whole heaven and through the earth, in colour resembling the rainbow, only brighter and purer; another day's journey brought them to the place, and there, in the midst of the light, they saw the ends of the chains of heaven let down from above: for this light is the belt of heaven, and holds together the circle of the universe, like the under-girders of a trireme. From these ends is extended the spindle of Necessity, on which all the revolutions turn. The shaft and hook of this spindle are made of steel, and the whorl is made partly of steel and also partly of other materials. Now the whorl is in form like the whorl used on earth; and the description of it implied that there is one large hollow whorl which is quite scooped out, and into this is

fitted another lesser one, and another, and another, and four others, making eight in all, like vessels which fit into one another; the whorls show their edges on the upper side, and on their lower side all together form one continuous whorl. This is pierced by the spindle, which is driven home through the centre of the eighth. The first and outermost whorl has the rim broadest, and the seven inner whorls are narrower, in the following proportions—the sixth is next to the first in size, the fourth next to the sixth; then comes the eighth; the seventh is fifth, the fifth is sixth, the third is seventh, last and eighth comes the second. The largest (of fixed stars) is spangled, and the seventh (or sun) is brightest; the eighth (or moon) coloured by the reflected light of the seventh; the second and fifth (Saturn and Mercury) are in colour like one another, and yellower than the preceding; the third (Venus) has the whitest light; the fourth (Mars) is reddish; the sixth (Jupiter) is in whiteness second. Now the whole spindle has the same motion; but, as the whole revolves in one direction, the seven inner circles move slowly in the other, and of these the swiftest is the eighth; next in swiftness are the seventh, sixth, and fifth, which move together; third in swiftness appeared to move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is reversed motion the fourth; the third appeared fourth and the second fifth. The spindle turns on the knees of Necessity; and on the upper surface of each circle is a siren, who goes round with them, hymning a single tone or note. The eight together form one harmony; and round about, at equal intervals, there is another band, three in number, each sitting upon her throne: these are the Fates, daughters of Necessity, who are clothed in white robes and have chaplets upon their heads, Lachesis and Clotho and Atropos, who accompany with their voices the harmony of the sirens—Lachesis singing of the past, Clotho of the present, Atropos of the future; Clotho from time to time assisting with a touch of her right hand the revolution of the outer circle of the whorl or spindle, and

Atropos with her left hand touching and guiding the inner ones, and Lachesis laying hold of either in turn, first with one hand and then with the other.

此时，草地上的鬼魂们已经跋涉了七天，第八天他们被要求继续赶路，又过了四天，厄洛斯说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这里可以看到一条自上而下、贯穿天地笔直如彩虹般色彩斑斓，但要比彩虹更绚丽、更清澈的光柱。又走了一天，他们到达了光柱，在光柱中间他们见到了这条自上而下的天之锁链的终端：这道光柱是天空的链带，像捆缚三层划桨战船的巨大缆索一样，把圆形宇宙聚拢起来。推动所有天体运转的必然女神的纺锤，自光线的末端伸出。纺锤的轴和挂钩部分皆由钢制成，锭盘则是由钢以及其他金属制成的。此刻，这个锭盘和人间所使用的锭盘很相似，根据描述是一个被挖空的大圆拱里面正好放入了另一个稍小一点的圆拱，然后再放另一个再稍小的圆拱，再放入另一个，再依次放入四个，共计八个，就像是摞放到一起的碗一样。从上面可以看到每个圆拱的边缘，从下面看他们构成了一个连续的螺纹。纺锤从第八个锭盘中心穿过去。第一个也是最外面的锭盘边沿最宽，其他七个里面的锭盘边缘要更窄，依此是：第六个的边沿仅次于第一个，第四个次于第六个，第八个排第四，第七个排第五，第五个排第六，第三个排第七，最窄也是排第八的是第二个。（这些恒星中）最大的一个闪闪发光，排在第七位的（或者说是太阳）最亮；第八位的（或者说是月亮）折射第七位的光芒；第二位和第五位（土星和水星）彼此颜色相近，比前几种星体颜色略黄；第三位的是金星，发白光；第四位的是火星，颜色发红；第六位的是木星，颜色第二白。此刻，整个纺锤做同时运动；整体朝一个方向旋转，但内部的七个锭盘却缓慢地朝相反方向旋转：排在第八位的星体运动得最快；速度第二快的是一同转动的第七、第六、第五位星体；运动速度排在第三位的是似乎相反运动的第四位星体；第三位的星体速度排第四，第二位星体速度排第五。纺锤在必然女神的膝上旋转；每一个锭盘的上方都有一名女海妖与其一同旋转，并各自哼唱一种音调。八种曲调合在一起构成和声。在附近围坐一圈的是三个分别安坐在自己宝座上、

与纺锤距离相等的女神，她们是必然女神的女儿——命运三女神。她们身着白袍，头束发带，名字分别为拉克西丝、克洛索、阿特洛波斯。她们随着海妖们的和声歌唱着：拉克西丝唱着过去，克洛索唱着现在，阿特洛波斯歌唱着未来。克洛索不时地用右手触碰锭盘外部或纺锤帮助其旋转；阿特洛波斯用左手触碰来帮助内侧的星体运转；拉克西丝则两手轮流交替内外都要帮忙转动。

When Er and the spirits arrived, their duty was to go at once to Lachesis; but first of all there came a prophet who arranged them in order; then he took from the knees of Lachesis lots and samples of lives, and having mounted a high pulpit, spoke as follows: 'Hear the word of Lachesis, the daughter of Necessity. Mortal souls, behold a new cycle of life and mortality. Your genius will not be allotted to you, but you will choose your genius; and let him who draws the first lot have the first choice, and the life which he chooses shall be his destiny. Virtue is free, and as a man honours or dishonours her he will have more or less of her; the responsibility is with the chooser—God is justified.' When the Interpreter had thus spoken he scattered lots indifferently among them all, and each of them took up the lot which fell near him, all but Er himself (he was not allowed), and each as he took his lot perceived the number which he had obtained. Then the Interpreter placed on the ground before them the samples of lives; and there were many more lives than the souls present, and they were of all sorts. There were lives of every animal and of man in every condition. And there were tyrannies among them, some lasting out the tyrant's life, others which broke off in the middle and came to an end in poverty and exile and beggary; and there were lives of famous men, some who were famous for their form and beauty as well as for their strength and success in games, or, again, for their birth and the qualities of their ancestors; and some who were the reverse of famous for the

opposite qualities. And of women likewise; there was not, however, any definite character in them, because the soul, when choosing a new life, must of necessity become different. But there was every other quality, and they all mingled with one another, and also with elements of wealth and poverty, and disease and health; and there were mean states also. And here, my dear Glaucon, is the supreme peril of our human state; and therefore the utmost care should be taken. Let each one of us leave every other kind of knowledge and seek and follow one thing only, if peradventure he may be able to learn and may find some one who will make him able to learn and discern between good and evil, and so to choose always and everywhere the better life as he has opportunity. He should consider the bearing of all these things which have been mentioned severally and collectively upon virtue; he should know what the effect of beauty is when combined with poverty or wealth in a particular soul, and what are the good and evil consequences of noble and humble birth, of private and public station, of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cleverness and dullness, and of all the natural and acquired gifts of the soul,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m when conjoined; he will then look at the nature of the soul, and from the consideration of all these qualities he will be able to determine which is the better and which is the worse; and so he will choose, giving the name of evil to the life which will make his soul more unjust, and good to the life which will make his soul more just; all else he will disregard. For we have seen and know that this is the best choice both in life and after death. A man must take with him into the world below an adamantine faith in truth and right, that there too he may be undazzled by the desire of wealth or the other allurements of evil, lest, coming upon tyrannies and similar villainies, he do irremediable wrongs to others and suffer yet worse himself; but let him know how to choose the mean and avoid the extremes on either side, as far as possible, not only in this life but in

all that which is to come. For this is the way of happiness.

当厄洛斯和鬼魂们到达时，他们要马上走向拉克西丝，首先有一名先知帮助他们排好顺序，从拉克西丝的膝盖上取下阄和生活模式，登上高台说出下面的话："请听必然女神之女拉克西丝的旨意。凡人的鬼魂们，看一下你们新的生死轮回吧。你们的命运不由神来分配而是由你自行选择。谁拈阄拿到第一号，谁便先选，他所选的生活即是他的命运。美德可随意选取，每个人可以依据对美德的重视程度多选或者少选。抓阄者责任自负，神明不任其咎。"解释完毕后，他表情漠然地将阄撒到他们之间。除了厄洛斯（不许他拾取），每个人都拾起了离自己近的一张，看清上面所写的号码。然后，先知将各种生活模式放在了他们前面的地上，生活模式的数量远多于这里的鬼魂数，种类齐全。有各种动物和各色人等的生活。其中还有僭主们的生活，一些是终身在位的，一些是中途下台而最终过着穷苦、流放和乞讨的生活；有名声显赫之人的生活，这些人中有些是因身材、美貌或是力气和战绩而出名，有些是因出身或祖上有德，还有些人是因相反的情况而臭名昭著。女性的生活同样如此。但是这里没有明确他们的性格，因为当灵魂选择了新的生活，他们的性格必然会变得不同。但是还有各种其他的条件，彼此间互相混杂，也会混合着富裕与贫穷、疾病与健康等因素。此外，还有一些是中和状态。我亲爱的格劳孔，这是我们做人的最大危险了，因此需要万分小心。如果人们可以学习或者可以找到某人来助其学习如何分辨善恶，那么我们还是摒弃其他知识只专注于这一门吧，这样我们有机会便可以随时随地选择更善的生活。人们应该分别或综合地考虑刚刚提及的一切事物对于美德的影响；他应该知道当一个人的美貌与贫穷或富有结合到一起时会产生如何的影响，应该知道高贵或贫贱的出身、有官职或无官职、身强或体弱、聪明或愚钝以及人的整个灵魂会带来如何的善或恶的结果，当这些因素混杂一起时应该如何应付。然后他要审视灵魂的天性，在考虑到所有条件后他要能够判定哪种天性更善、哪种更恶。于是，他便能够做出选择，将令灵魂变得更加不义的生活称为恶，将令灵魂变得更正义的生活称为善，此外一概不予考虑。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并且知

道，无论生前死后，这都是最好的选择。一个人即使到了冥界也要坚信真理与正义。在冥界他可能会因金钱的欲望或其他恶的诱惑昏了头脑而做出专横或其他诸如此类的恶行，他对他人所犯下的无法弥补的恶行会给自身招致更严重的报应。无论是在今生还是来世，如果可能，要让他知道如何选择折中的生活而非至善或至恶两种极端的生活。因为这是获得幸福的方式。

And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the messenger from the other world this was what the prophet said at the time: 'Even for the last comer, if he chooses wisely and will live diligently, there is appointed a happy and not undesirable existence. Let not him who chooses first be careless, and let not the last despair.' And when he had spoken, he who had the first choice came forward and in a moment chose the greatest tyranny; his mind having been darkened by folly and sensuality, he had not thought out the whole matter before he chose, and did not at first sight perceive that he was fated, among other evils, to devour his own children. But when he had time to reflect, and saw what was in the lot, he began to beat his breast and lament over his choice, forgetting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prophet; for, instead of throwing the blame of his misfortune on himself, he accused chance and the gods, and everything rather than himself. Now he was one of those who came from heaven, and in a former life had dwelt in a well-ordered State, but his virtue was a matter of habit only, and he had no philosophy. And it was true of others who were similarly overtaken, that the greater number of them came from heaven and therefore they had never been schooled by trial, whereas the pilgrims who came from earth, having themselves suffered and seen others suffer, were not in a hurry to choose. And owing to this inexperience of theirs, and also because the lot was a chance, many of the souls exchanged a good destiny for an evil or an evil for a good. For if a man had always on

his arrival in this world dedicated himself from the first to sound philosophy, and had been moderately fortunate in the number of the lot, he might, as the messenger reported, be happy here, and also his journey to another life and return to this, instead of being rough and underground, would be smooth and heavenly. Most curious, he said, was the spectacle—sad and laughable and strange; for the choice of the souls was in most cases based on their experience of a previous life. There he saw the soul which had once been Orpheus choosing the life of a swan out of enmity to the race of women, hating to be born of a woman because they had been his murderers; he beheld also the soul of Thamyras choosing the life of a nightingale; birds, on the other hand, like the swan and other musicians, wanting to be men. The soul which obtained the twentieth lot chose the life of a lion, and this was the soul of Ajax the son of Telamon, who would not be a man, remembering the injustice which was done him in the judgment about the arms. The next was Agamemnon, who took the life of an eagle, because, like Ajax, he hated human nature by reason of his sufferings. About the middle came the lot of Atalanta; she, seeing the great fame of an athlete, was unable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and after her there followed the soul of Epeus the son of Panopeus passing into the nature of a woman cunning in the arts; and far away among the last who chose, the soul of the jester Thersites was putting on the form of a monkey. There came also the soul of Odysseus having yet to make a choice, and his lot happened to be the last of them all. Now the recollection of former toils had disenchanted him of ambition, and he went about for a considerable time in search of the life of a private man who had no cares; he had some difficulty in finding this, which was lying about and had been neglected by everybody else; and when he saw it, he said that he would have done the same had his lot been first instead of last, and that he was delighted to have it. And not only did men pass into animals, but I must also

mention that there were animals tame and wild who changed into one another and into corresponding human natures—the good into the gentle and the evil into the savage, in all sorts of combinations.

根据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使（即厄洛斯）的说法，当时先知是如此说的："即使是最后到来者，如果他做出明智的选择，并将勤勉地生活，同样会选中幸福、美满的生活。优先选择者切莫大意，最后选择者也莫灰心。"先知刚讲完，第一号走上前来，不一会儿选中了最大僭主的生活。他的心智被愚蠢和贪婪所蒙蔽，尚未全面思考就做出了定夺，根本没注意到在他命中注定所犯下的恶中甚至包含吞食自己的孩子。待有空思考并看清阄的内容时，他忘记先知的警告，开始捶胸痛哭，因为他不认为是自己造成了这种不幸，他不怪自己反倒怪罪机遇、诸神和一切。他此时刚从天上下来，在前世，他所生活的城邦秩序井然，但是他的善只是习惯而已，他不懂何为哲学。其他急于做出选择的鬼魂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大多数都是从天上下来的，因此未曾经历磨难而得到教训。那些从地下来的鬼魂，亲历苦难或亲见他人受苦，故而并不急于选择。由于经验不足，或许也因为拈阄的偶然性很大，很多的鬼魂命运发生了改变，或者由善变恶，或者由恶变善。如果人们自降生时起便献身真正的哲学，加之拈阄时排位还算幸运，那么就如信使厄洛斯所说，还是可能在当世、死后和来世获得幸福的。他们走的是平坦的通向天国的道路，而不是崎岖的通往地下的道路。厄洛斯说当时的场面非常古怪——既让人悲伤，又让人觉得可笑和奇怪，因为这些鬼魂所作出的决定大部分都是基于自己前世的经历。在那里厄洛斯看到了俄耳甫斯的灵魂，他因为曾经死于女性之手因而仇恨女性，不愿由女性生养，便选择来世做一只天鹅；厄洛斯还见到了塔米里斯的灵魂，他选择做一只夜莺；另一方面，像天鹅等善于歌唱的鸟类等，希望做人类。抽到第二十号的灵魂选择了做一只狮子，这是忒拉蒙之子埃阿斯的灵魂，因记恨在武器判决上的不公而不愿为人。下一个轮到阿伽门农。他选择做一只雄鹰。正如埃阿斯，他也因自己的痛苦往事而厌恶人性。进行到大概一半时轮到了阿塔兰特。她看到了运动员的巨大荣誉，不敌诱惑而选择了运动员的生活。

她之后是帕诺派厄斯之子厄帕俄斯，他选择做一名手艺高超的女性。远远排在队伍后面的是滑稽家忒耳西忒斯的鬼魂，他正变身为猴子。奥德修斯的灵魂也来了，碰巧拈到排号最末的阄，必须做出一个抉择。此时，前世的辛苦劳累使他摒弃了雄心壮志，他花了很长时间到处寻找一种无忧无虑的普通人的生活。他颇费了一番力气，才找到了这种随意散落在地上、无人问津的生活。当他找到了这种生活时，他说，即使他并非最后一个而是第一个来选择的人，他也会如此抉择的，并为能拥有这样的生活而感到欣喜。不仅有人变成了动物，我必须说明动物（包含驯化的和野生的动物）也在各物种间相互转换或变成相应性情的人类—善的变成温顺的人，恶的变成残暴的人，各种各样的组合。

All the souls had now chosen their lives, and they went in the order of their choice to Lachesis, who sent with them the genius whom they had severally chosen, to be the guardian of their lives and the fulfiller of the choice: this genius led the souls first to Clotho, and drew them within the revolution of the spindle impelled by her hand, thus ratifying the destiny of each; and then, when they were fastened to this, carried them to Atropos, who spun the threads and made them irreversible, whence without turning round they passed beneath the throne of Necessity; and when they had all passed, they marched on in a scorching heat to the plain of Forgetfulness, which was a barren waste destitute of trees and verdure; and then towards evening they encamped by the river of Unmindfulness, whose water no vessel can hold; of this they were all obliged to drink a certain quantity, and those who were not saved by wisdom drank more than was necessary; and each one as he drank forgot all things. Now after they had gone to rest,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ere was a thunderstorm and earthquake, and then in an instant they were driven upwards in all manner of ways to their birth, like stars shooting. He himself was hindered

from drinking the water. But in what manner or by what means he returned to the body he could not say; only, in the morning, awaking suddenly, he found himself lying on the pyre.

所有的灵魂此时都选择好各自的生活，他们按照所选定的顺序走向拉克西丝跟前，拉克西丝斯给他们派出他们各自所选定的保护神，该保护神会监护并协助他们度过自己所选择的生活：保护神首先将灵魂引到克洛索跟前，将他们拉到了克洛索用手转动的纺锤的旋转范围内，于是每个人所选择的命运得到了批准。之后，每个人的命运固定后，他们被带到阿特洛波斯跟前，阿特洛波斯将线纺好使其无法再更改，然后他们头也不回地从必然女神的宝座下经过。等所有的灵魂都通过后，他们冒着酷暑上路，走到忘记女神的平原。这是一片毫无生机的荒芜之地。将近傍晚时分，他们就在“忘忧河”边扎营，“忘忧河”中的水无法用任何器皿来盛取。他们都被要求喝一定量的河水，一些缺乏智慧的人会喝得过量。喝过河水后，人们便会忘掉所有的事情。在他们睡下后，半夜时分一阵响雷和地震，瞬间他们像流星一样腾空而起，四处散开，如流星四射一般投向新生。厄洛斯本人是被禁止喝水的。但是，他说不清楚自己是如何回到肉身的，只知道，早晨突然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火葬的柴堆上。

And thus, Glaucon, the tale has been saved and has not perished, and will save us if we are obedient to the word spoken; and we shall pass safely over the river of Forgetfulness and our soul will not be defiled. Wherefore my counsel is, that we hold fast ever to the heavenly way and follow after justice and virtue always, considering that the soul is immortal and able to endure every sort of good and every sort of evil. Thus shall we live dear to one another and to the gods, both while remaining here and when, like conquerors in the games who go round to gather gifts, we receive our reward. And it shall be well with us both in this life and in the

pilgrimage of a thousand years which we have been describing.

格劳孔啊，这个故事被保留了下来而没有消亡，如果我们相信它的内容，我们便将得到救赎。我们会安全地渡过“忘忧河”，并使我们的灵魂不受任何的污染。因此，鉴于灵魂之永生且灵魂能够承受一切的善与恶，我建议，我们应坚持走通向天堂之路，永远追求正义和美德。这样无论是在当世，还是当我们像获胜后绕场领赏一样获得来世回报时，我们都能获得我们自己和神的爱。无论在今生，还是在刚刚所描述的一千年的旅程中，我们都将一帆风顺。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妇女的屈从地位

John Stuart Mill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妇女的屈从地位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CHAPTER I 第一章
- CHAPTER II 第二章
- CHAPTER III 第三章
- CHAPTER IV 第四章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CHAPTER I

第一章

The object of this Essay is to explain as clearly as I am able, the grounds of an opinion which I have held from the very earliest period when I had formed any opinions at all on social or political matters, and which, instead of being weakened or modified, has been constantly growing stronger by the progress of reflec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fe. That the principle which regulates the existing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exes—the legal subordination of one sex to the other—is wrong in itself, and now one of the chief hindrances to human improvement; and that it ought to be replaced by a principle of perfect equality, admitting no power or privilege on the one side, nor disability on the other.

本文旨在为我的一个观点提供尽可能清晰的依据，我最初对社会政治问题有所见解时就持有该观点，而伴随我思考的深入和生活经验的积累，这一观点非但没有弱化或有所改变，反而在不断增强。这一观点就是：规范两性之间现存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在已经成为阻碍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取而代之的，应是一个完全平等的原则，即不允许一方享有权力或特权，也不允许另一方受到歧视。

The very words necessary to express the task I have undertaken, show how arduous it is. But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suppose that the difficulty of the case must lie in the insufficiency or obscurity of the grounds of reason on which my conviction rests.

The difficulty is that which exists in all cases in which there is a mass of feeling to be contended against. So long as an opinion is strongly rooted in the feelings, it gains rather than loses in stability by having a preponderating weight of argument against it. For if it were accepted as a result of argument, the refutation of the argument might shake the solidity of the conviction; but when it rests solely on feeling, the worse it fares in argumentative contest, the more persuaded its adherents are that their feeling must have some deeper ground, which the arguments do not reach; and while the feeling remains, it is always throwing up fresh intrenchments of argument to repair any breach made in the old. And there are so many causes tending to make the feelings connected with this subject the most intense and most deeply-rooted of all those which gather round and protect old institutions and customs, that we need not wonder to find them as yet less undermined and loosened than any of the rest by the progress of the great modern spiritual and social transition; nor suppose that the barbarisms to which men cling longest must be less barbarisms than those which they earlier shake off.

从用来阐明我承担的任务所需要的词句中就能看出这一任务有多艰巨。不过如果认为这一任务难在我缺少支持观点的论据或论据不明晰，那就错了。我所面临的困难在于需要同大众情感作斗争。只要一种观点牢牢扎根于感情基础上，当遇到比自己强的反面论点时，其坚定性就会不降反增。因为如果经过争论这一观点被接受了，那么反面观点对它的驳斥可能会动摇这一信念的坚定性；但如果该观点纯粹以感情作依托，那么在争论中它的处境越差，其追随者越会相信他们的感情一定有着这些争论所触及不到的深层根据；而只要这种感情存在，它就会不断提出新的论据来弥补旧论据中的缺陷。众多原因将人们的感情与汇聚在一起的那些捍卫传统制度与习俗的最强烈、最根深蒂固的情感联系起来，以至于当我们发现这些感情在现代伟大的精神

和社会变迁中还未像其他感情一样遭受巨大破坏或弱化时，都不必感到惊奇；我们也无需认为，人类保持最久的野蛮习俗一定比他们早先抛弃的野蛮习俗更文明。

In every respect the burthen [1_1] is hard on those who attack an almost universal opinion. They must be very fortunate as well as unusually capable if they obtain a hearing at all. They have more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a trial, than any other litigants have in getting a verdict. If they do extort a hearing, they are subjected to a set of logical requirement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exacted from other people. In all other cases, the burthen of proof is supposed to lie with the affirmative. If a person is charged with a murder, it rests with those who accuse him to give proof of his guilt, not with himself to prove his innocence. If there is a difference of opinion about the reality of an alleged historical event, in which the feelings of men in general are not much interested, as the Siege of Troy for example, those who maintain that the event took place are expected to produce their proofs, before those who take the other side can be required to say anything; and at no time are these required to do more than show that the evidence produced by the others is of no value. Again, in practical matters, the burthen of proof is supposed to be with those who are against liberty; who contend for any restriction or prohibition; either any limitation of the general freedom of human action, or any disqualification or disparity of privilege affecting one person or kind of persons, as compared with others. The *à priori* presumption is in favour of freedom and impartiality. It is held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restraint not required by the general good, and that the law should be no respecter of persons, but should treat all alike, save where dissimilarity of treatment is required by positive reasons, either of justice or of policy. But of none of these rules of evidence will the benefit be

allowed to those who maintain the opinion I profess. It is useless for me to say that those who maintain the doctrine that men have a right to command and women are under an obligation to obey, or that men are fit for government and women unfit, are on the affirmative side of the question, and that they are bound to show positive evidence for the assertions, or submit to their rejection. It is equally unavailing for me to say that those who deny to women any freedom or privilege rightly allowed to men, having the double presumption against them that they are opposing freedom and recommending partiality, must be held to the strictest proof of their case, and unless their success be such as to exclude all doubt, the judgment ought to go against them. These would be thought good pleas in any common case; but they will not be thought so in this instance. Before I could hope to make any impression, I should be expected not only to answer all that has ever been said by those who take the other side of the question, but to imagine all that could be said by them—to find them in reasons, as well as answer all I find: and besides refuting all arguments for the affirmative, I shall be called upon for invincible positive arguments to prove a negative. And even if I could do all this, and leave the opposite party with a host of unanswered arguments against them, and not a single unrefuted one on their side, I should be thought to have done little; for a cause supported on the one hand by universal usage, and on the other by so great a preponderance of popular sentiment, is supposed to have a presumption in its favour, superior to any conviction which an appeal to reason has power to produce in any intellects but those of a high class.

从各方面看，一个人如果要攻击一种几乎为大众所接受的观点，就要背负着沉重的负担 [2_1] 。如果他们能获得申诉的机会，那么他们一定非常幸运，而且能力非凡。对他们而言，得到一次审讯远比诉讼

人得到判决困难。即使他们确实强行得到一个申诉机会，还必须服从一系列与其他人截然不同的逻辑要求。在其他所有案件中，提供证据的应该是正方。如果某人被控谋杀，则应由控告人提供证据证明其有罪，而非由他本人来证明自己无辜。如对某个有争议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有异议，这种情况一般不会涉及人们的感情。以围困特洛伊城为例，主张确有此事发生的人应在他们的反对者发言之前提出自己的证据；在任何时候，反方要做的只不过是证明正方提供的证据没有任何价值而已。再以现实为例，应该由那些反对自由的人以及那些为解除某种制约或禁令而奋力抗争的人来提供证据；这些人不是在为制约人们行动的普遍自由而抗争，就是在为某人或某类人争取被剥夺或削减的与他人相比的特权。既定的假设赞成自由与公平。人们认为，只有回应公众利益而提出的要求能受到制约，而且除非有公正或政策等方面的合理原因要求有不同的对待，否则法律应一视同仁，不应对人区别对待。然而上述这些关于证据的规定，没有一条对支持我意见的人有利。即使我说那些主张男性有权发号施令而女性有义务服从，或男性适合从政而女性不适合的人是这个问题的正方，因此他们有义务为其主张提出确凿证据，否则就要服从反方的话，也毫无用处。同样，就算我指出如果不赋予女性那些男性已正当拥有的自由或特权就违反了两项既定假设，即，这些人既反对自由，又不主张公平，而且必须为自己的案子提出最严格的证据，除非他们能够成功排除一切疑问，否则就应判他们败诉，也是徒劳之举。在普通案件中，这些都会被认为是有力的答辩，但在该案中却不同。在我希望让读者朋友们对本文留有印象之前，我不仅要对对方所述一切进行答辩，而且要想象出他们可能提到的一切——找出他们的立论依据，还要对我发现的一切进行答辩：在被传唤时，我除了要驳斥正方所有论据外，还要提出无可辩驳的正面论据来证明一个反面观点。而且即使我做到了上述一切，给对方留下了许多未答辩过的、且无一能驳的论据，我还是会被认为少有作为；因为一方面有普遍习俗的支持，另一方面还有大众情感这一巨大优势的支持，那么这一观点就拥有对它有利的一种推论，且这一推论要比理性在知识分子（一流的知识分子除外）中产生的信念更有力。

I do not mention these difficulties to complain of them; first, because it would be useless; they are inseparable from having to contend through people's understandings against the hostility of their feelings and practical tendencies: and truly 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 majority of mankind would need to be much better cultivated than has ever yet been the case, before they can be asked to place such reliance in their own power of estimating arguments, as to give up practical principles in which they have been born and bred and which are the basis of much of the existing order of the world, at the first argumentative attack which they are not capable of logically resisting. I do not therefore quarrel with them for having too little faith in argument, but for having too much faith in custom and the general feeling. It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 prejudices of the reac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gainst the eighteenth, to accord to the unreasoning elements in human nature the infallibility which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s supposed to have ascribed to the reasoning elements. For the apotheosis of Reason we have substituted that of Instinct; and we call everything instinct which we find in ourselves and for which we cannot trace any rational foundation. This idolatry, infinitely more degrading than the other, and the most pernicious of the false worships of the present day, of all of which it is now the main support, will probably hold its ground until it gives way before a sound psychology laying bare the real root of much that is bowed down to as the intention of Nature and the ordinance of God. As regards the present question, I am willing to accept the unfavourable conditions which the prejudice assigns to me. I consent that established custom, and the general feeling, should be deemed conclusive against me, unless that custom and feeling from age to age can be shown to have owed their existence to other causes than their soundness, and to have derived their power from the worse rather than the better parts of human nature. I am willing that judgment should go against me,

unless I can show that my judge has been tampered with. The concession is not so great as it might appear; for to prove this, is by far the easiest portion of my task.

我提到这些困难并非要抱怨。首先，抱怨是没用的，因为这些困难跟抗争是分不开的，我们必须争取获得人们的理解，从而与他们的情感和实际倾向中的敌意抗争：要求大多数人确信自己评估论据的能力，却使其无法以恰当的逻辑抵御所经历的第一轮论战攻击会导致他们放弃天生的且奠定世界上大量现存秩序基础的实际原则，所以在这之前，我们要更好地培养并提升他们的理解力。因此，我跟他们争吵并非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论点把握不足，而是因为他们太信赖习俗和大众情感。十九世纪跟十八世纪相比，有一个特有的偏见，即，认为人类天性中的非理性因素是绝对可靠的，就像十八世纪时期人们认为理性因素绝对可靠一样。我们已经用对本能的崇拜代替了对理性的崇拜，而我们把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找不到任何理性基础的东西都叫做本能。这种对本能的崇拜比对理性的崇拜要低级得多，它是当今各种错误崇拜中最有害的，而且已成为这些错误崇拜的支柱。在某种健全心理揭露出很多错误崇拜的真正根源在于服从自然的意愿和上帝的指示之前，这种崇拜可能会一直存在。对于当前的问题，我愿意接受这种偏见带给我的各种不利条件。既定的习俗和大众情感对我不利是确定无疑的，除非我能说明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和情感之所以能够存在，并非因为它们是正确的，而是由于其他原因，且其力量源自人性中较差而非较好的部分。而且，除非我能证明法官已被收买，否则我情愿判决对我不利。我作的让步可能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大；因为要证明这一点是我目前最容易的任务。

The generality of a practice is in some cases a strong presumption that it is, or at all events once was, conducive to laudable ends. This is the case, when the practice was first adopted, or afterwards kept up, as a means to such ends, and was grounded

on experience of the mode in which they could be most effectually attained. If the authority of men over women, when first established, had been the result of a conscientious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modes of constituting the government of society; if, after trying various other mod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the government of women over men, equality between the two, and such mixed and divided modes of government as might be invented—it had been decided, on the testimony of experience, that the mode in which women are wholly under the rule of men, having no share at all in public concerns, and each in private being under the legal obligation of obedience to the man with whom she has associated her destiny, was the arrangement most conducive to the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of both; its general adoption might then be fairly thought to be some evidence that, at the time when it was adopted, it was the best: though even then the considerations which recommended it may, like so many other primeval social fact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have subsequently, in the course of ages, ceased to exist. But the state of the case is in every respect the reverse of thi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opinion in favour of the present system, which entirely subordinates the weaker sex to the stronger, rests upon theory only; for there never has been trial made of any other: so that experience, in the sense in which it is vulgarly opposed to theory, can- not be pretended to have pronounced any verdict.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adoption of this system of inequality never was the result of deliberation, or forethought, or any social ideas, or any notion whatever of what conduced to the benefit of humanity or the good order of society. It arose simply from the fact that from the very earliest twilight of human society, every woman (owing to the value attached to her by men, combined with her inferiority in muscular strength) was found in a state of bondage to some man. Laws and systems of polity always begin by recognising the relations they find already existing

between individuals. They convert what was a mere physical fact into a legal right, give it the sanction of society, and principally aim at the substitution of public and organised means of asserting and protecting these rights, instead of the irregular and lawless conflict of physical strength. Those who had already been compelled to obedience became in this manner legally bound to it. Slavery, from being a mere affair of force between the master and the slave, became regularised and a matter of compact among the masters, who, binding themselves to one another for common protection, guaranteed by their collective strength the private possessions of each, including his slaves. In early times,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male sex were slaves, as well as the whole of the female. And many ages elapsed, some of them ages of high cultivation, before any thinker was bold enough to question the rightfulness, and the absolute social necessity, either of the one slavery or of the other. By degrees such thinkers did arise; and (the general progress of society assisting) the slavery of the male sex has, in all the countries of Christian Europe at least (though, in one of them, only within the last few years) been at length abolished, and that of the female sex has been gradually changed into a milder form of dependence. But this dependence, as it exists at present, is not an original institution, taking a fresh start from considerations of justice and social expediency—it is the primitive state of slavery lasting on, through successive mitigations and modifications occasioned by the same causes which have softened the general manners, and brought all human relations more under the control of justice and the influence of humanity. It has not lost the taint of its brutal origin. No presumption in its favour, therefore, can be drawn from the fact of its existence. The only such presumption which it could be supposed to have, must be grounded on its having lasted till now, when so many other things which came down from the same odious source have been done away with. And this, indeed, is what makes

it strange to ordinary ears, to hear it asserted that the inequality of rights between men and women has no other source than the law of the so numerous and so weighty as they are..

在某些情况下，一种做法的普及足以让人们做出推断，这种做法现在是，或者无论如何曾经是有助于实现美好目标的。如果我们最初采纳甚至过后保留这种有助于实现美好目标的做法，并且以最有效达到目标的经验为基础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最初确立男性凌驾于女性的权威是我们认真比较了组成社会政府的各种不同方式得出的结果；如果试行过其他各种社会组织方式，包括女性统治男性、男女平等以及各种可能想到的混合政府与分治政府，而在经验证明的基础上，决定采用女性完全受男性统治的组织方式，即女性在公共事务中没有丝毫权利，而私下里，女性在法律上有服从跟她命运相连的男性的义务，这是最有利于双方幸福与安乐的安排；如果……那么在证明采纳这一做法时，该做法的普遍接受性可能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证明该做法为最佳之选的证据：尽管选择它时考虑的种种因素，像许多其他最重要的原始时代的社会事实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不复存在，然而这个例子的情况在各方面都与此截然相反。首先，赞成现行制度的观点，即较弱的女性完全屈从于较强的男性，只有理论依据；由于从来没有试行过其他制度，所以，经验在通俗的、同理论对立的意义上，无法作出任何判断。第二，这种不平等制度的推行从来就不是深思熟虑或者事先计划的结果，也不是提出任何有利于人类利益或社会良好秩序的社会观点或观念的结果。这一制度的兴起仅仅是由于在人类社会最早的黎明时期，每位女性（由于男性赋予她的价值，再加上她在体力上不如男性）都处在某个男性的奴役之下。法律和政治制度总是始于承认个体间已存在的关系。他们把活生生的实际情况变成了法律的权利，给予它社会认可，旨在用公共、有组织的手段，而非混乱、不法的体力冲突来确认和保护这些权利。那些已经被迫服从的人就被法律以这种方式束缚住了。奴役，从只是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强迫行为变成了正规的、奴隶主之间的契约问题。他们为了共同的保障相互结合，齐心协力保证每个人的私有财产，包括他们的奴隶。在早

期，大部分男性和所有的女性都是奴隶。然后又经过了许多时代，其中不乏高度文明的时代，也没有一个思想家敢于对这种或那种奴役制度的正确性与绝对的社会必要性提出质疑。后来敢于质疑的思想家终于渐渐出现了；而且（在社会总体进步的协助下）至少在信奉基督教的所有欧洲国家（虽然其中一个只是在近几年才出现），终于废除了对男性的奴役，而对女性的奴役也逐渐演变为一种更为温和的依附形式。但像现存的这种依附，并非是出于对公正和社会权宜的考量而设立的一种原创制度——而在于经过不断缓和与改进的原始奴役状态的持续，造成这些缓和与改进的原因已经使人们待人接物的方式不再那么死板，并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处于公正与人道的影响之下。然而，它并未失去其残酷源头所带来的污点。因此，从其存在这一事实中无法作出赞成这一制度的任何推断。它能拥有的唯一推断，必定基于其持续至今这一事实，而与它来自同一可憎源头的众多其他事物却已经被废除了。因此，当我们听到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权利来源于最具强制性的法律，而非其他来源的论断时，不禁匪夷所思。

That this statement should have the effect of a paradox, is in some respects creditable 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s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oral sentiments of mankind. We now live—that is to say, one or two of the most advanced nations of the world now live—in a state in which the law of the strongest seems to be entirely abandoned as the regulating principle of the world's affairs: nobody professes it, and, as regards mos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s, nobody is permitted to practise it. When anyone succeeds in doing so, it is under cover of some pretext which gives him the semblance of having some general social interest on his side. This being the ostensible state of things, people flatter themselves that the rule of mere force is ended; that the law of the strongest cannot be the reason of existence of anything which has remained in full operation down to the present time. However any of our present institutions may have begun, it can only, they think,

have been preserved to this period of advanced civilisation by a well-grounded feeling of its adaptation to human nature, and conduciveness to the general good. They do not understand the great vitality and durability of institutions which place right on the side of might; how intensely they are clung to; how the good as well as the bad propensities and sentiments of those who have power in their hands, become identified with retaining it; how slowly these bad institutions give way, one at a time, the weakest first, beginning with those which are least inter-woven with the daily habits of life; and how very rarely those who have obtained legal power because they first had physical, have ever lost their hold of it until the physical power had passed over to the other side. Such shifting of the physical force not having taken place in the case of women; this fact, combined with all the peculiar and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particular case, made it certain from the first that this branch of the system of right founded on might, though softened in its most atrocious features at an earlier period than several of the others, would be the very last to disappear. It was inevitable that this one case of a social relation grounded on force, would survive through generations of institutions grounded on equal justice, an almost solitary exception to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ir laws and customs; but which, so long as it does not proclaim its own origin, and as discussion has not brought out its true character, is not felt to jar with modern civilisation, any more than domestic slavery among the Greeks jarred with their notion of themselves as a free people.

这种说法应该有自相矛盾的效果：在某些方面，应归功于文明的进步与人类道德情操的提高。我们——也就是说，世界上一两个最先进的国家现在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即作为调整世界事务原则的最具强制性的法律似乎被完全抛弃了：没有人承认它，而且，在人与

人之间的大部分关系中，任何人都不许执行它。即使有人成功执行了，也是在某种借口的掩护下，使他看上去代表着某种大众的社会利益。这就是事情的表面状态，人们得意地认为，单凭暴力实施的统治已经结束了；而最具强制性的法律不可能是全面推行并保留至今的任何事物存在的理由。他们认为，无论我们现行的制度是如何创建的，它得以保存到这一高度文明的时期，只是因为有一种理据充分的情感，即感觉它适应人类天性，并有利于大众利益。他们不了解将权利置于力量一方的制度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与持久力，以及它们是如何被紧紧地守住不放；不了解那些掌权者的倾向和感情（无论好坏）都相当于对现行制度的保护；不了解让这些坏的习俗制度让路是多么艰难，从有缺陷且与日常生活习惯交织最少的制度开始，一次铲除一个坏制度；他们也不了解，那些因体力而获得法律权力的人丧失权力是多么罕见，除非这种体力已作他用。这种体力的转移从未在女性身上发生过，这一事实，加上这一特定情况中所有独特的特点，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种基于力量的权力制度分支将是最后一个消失的，尽管其最残暴的方面变得温和的时间比其他几个分支要早。这种基于体力的社会关系，会不可避免地，经过一代一代基于平等公正的制度留存下来，这对他们的法律与习俗的一般特点来讲几乎是唯一的例外；但只要它不公开自己的起源，只要其真实特点还未在讨论中被揭示出来，人们就不会感到它与现代文明不一致，也不会感到希腊人的家庭奴役制度与将自己视为自由民族的观念不一致。

The truth is, that people of the present and the last two or three generations have lost all practical sense of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humanity; and only the few who have studied history accurately, or have much frequented the parts of the world occupied by the living representatives of ages long past, are able to form any mental picture of what society then was. People are not aware how entirely, in former ages, the law of superior strength was the rule of life; how publicly and openly it was avowed, I do not say cynically or shamelessly—for these words imply a feeling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in it to be ashamed of, and no such notion could find a place in the faculties of any person in those ages, except a philosopher or a saint. History gives a cruel experience of human nature, in showing how exactly the regard due to the life, possessions, and entire earthly happiness of any class of persons, was measured by what they had the power of enforcing; how all who made any resistance to authorities that had arms in their hands, however dreadful might be the provocation, had not only the law of force but all other laws, and all the notions of social obligation against them; and in the eyes of those whom they resisted, were not only guilty of crime, but of the worst of all crimes, deserving the most cruel chastisement which human beings could inflict. The first small vestige of a feeling of obligation in a superior to acknowledge any right in inferiors, began when he had been induced, for convenience, to make some promise to them. Though these promises, even when sanctioned by the most solemn oaths, were for many ages revoked or violated on the most trifling provocation or temptation, it is probable that this, except by persons of still worse than the average morality, was seldom done without some twinges of conscience. The ancient republics, being mostly grounded from the first upon some kind of mutual compact, or at any rate formed by an union of persons not very unequal in strength, afforded, in consequence, the first instance of a portion of human relations fenced round, and placed under the dominion of another law than that of force. And though the original law of force remained in full opera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ir slaves, and also (except so far as limited by express compact) between a commonwealth and its subjects, or other independent commonwealths; the banishment of that primitive law even from so narrow a field, commenced the regeneration of human nature, by giving birth to sentiments of which experience soon demonstrated the immense value even for material interests, and which

thenceforward only required to be enlarged, not created. Though slaves were no part of the commonwealth, it was in the free states that slaves were first felt to have rights as human beings. The Stoics were, I believe, the first (except so far as the Jewish law constitutes an exception) who taught as a part of morality that men were bound by moral obligations to their slaves. No one, after Christianity became ascendant, could ever again have been a stranger to this belief, in theory; nor, after the ris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as it ever without persons to stand up for it. Yet to enforce it was the most arduous task which Christianity ever had to perform.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the Church kept up the contest, with hardly any perceptible success. It was not for want of power over men's minds. Its power was prodigious. It could make kings and nobles resign their most valued possessions to enrich the Church. It could make thou- sands in the prime of life and the height of worldly advantages, shut themselves up in convents to work out their salvation by poverty, fasting, and prayer. It could se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across land and sea, Europe and Asia, to give their lives for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Sepulchre. It could make kings relinquish wives who were the object of their passionate attachment, because the Church declared that they were within the seventh (by our calculation the fourteenth) degree of relationship. All this it did; but it could not make men fight less with one another, nor tyrannise less cruelly over the serfs, and when they were able, over burgesses. It could not make them renounce either of the applications of force; force militant, or force triumphant. This they could never be induced to do until they were themselves in their turn compelled by superior force. Only by the growing power of kings was an end put to fighting except between kings, or competitors for kingship; only by the growth of a wealthy and warlike bourgeoisie in the fortified towns, and of a plebeian infantry which proved more powerful in the field than the

undisciplined chivalry, was the insolent tyranny of the nobles over the bourgeoisie and peasantry brought within some bounds. It was persisted in not only until, but long after, the oppressed had obtained a power enabling them often to take conspicuous vengeance; and on the Continent much of it continued to the tim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ough in England the earlier and better organisation of the democratic classes put an end to it sooner, by establishing equal laws and free national institutions.

事实是，现在的人和前两、三代人已经失去了所有对人类原始状态的实际判断力；只有少数精确研究过历史的人，或者经常到世界上一些生活着代表久远时代的人的地方去的人，才能对当时社会的样子有一点印象。人们不知道，在以前的时代，超群实力的法则是如何完全统治生活的；也不知道这一点是如何被公开坦诚的——我并非嘲笑或厚颜无耻地这样说——因为这些字眼包含着一种耻辱感，但在那些时代，除了哲学家和圣人之外，没有任何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历史赋予了人性一种残酷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对任何阶层的人的生活、财产，以及所有尘世幸福的关注，并通过他们所拥有的强制权力来加以精确衡量；它还表明所有反抗掌握武装的当权者的人，无论他们受到的挑衅多么可怕，都不仅会受到强制性法律而且会受到其他各种法律，以及所有社会责任观念的反对；在那些遭到他们反抗的人眼中，他们不仅犯了罪，而且犯的是所有罪行中最恶劣的，理应受到人类所能施加的最严酷的刑罚。一位上级感觉有责任承认下属的任何权利，刚开始，他为了一己之便而受到诱使，从而对他们作出某种承诺。虽然这些承诺会受到最庄严的誓言约束，但是很多年来也会由于最微小的挑衅或诱惑而被废除或违反。但事实很可能是，多数这样做的人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除非这些人的道德比一般水平还要低下。古老的共和政体，最初大部分都基于某种共同的契约，或至少是由力量相当的一些人联合组成的，因此，这些政体提供了一个先例，避开一部分人类关系，并将之置于其他法律，而非强制性法律统治之下。而且尽管原来的强制性法律仍然在他们与其奴隶之间，以及（受特殊契约限

制的除外）一个共和政体与其子民，或与其他独立的共和政体之间全面发挥着作用，但即使只在如此狭窄的领域废弃这一原始法律，也产生了即使对物质利益来说，也具有巨大价值的情操（这很快就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从而开始了人类天性的复苏，而且此后人类天性也只要求扩大，而非创造。奴隶虽然不是共和政体的一部分，但他们是在自由城邦里首先被承认具有人权的群体。我相信，斯多葛学派最先（犹太法除外）教导人们，人对其奴隶负有道德义务，这是道德的一部分。基督教兴起后，在理论上，没有人会再对这一信念感到陌生，而且在天主教会强大后，它也不乏支持者。然而要推行它，却是基督教不得不履行的最艰难的任务。基督教会坚持推行了一千多年，却成效甚微。这并非因为缺少控制人们思想的力量。其力量是惊人的，能使王公贵族放弃自己最宝贵的财富来改进教堂。它能使数千正值壮年、处于尘世利益巅峰的人禁足于修道院中，致力于通过贫穷、斋戒、和祈祷获得救赎。它能使千千万万人长途跋涉、漂洋过海，来到欧洲和亚洲，为拯救圣墓献出生命。它能使君主舍弃宠爱的妻子，因为教会宣称她们属于第七级（根据我们的计算是第十四级）关系。所有这些教会都做到了；但它却不能减少人们之间的争斗，也不能减轻人们对农奴以及（在他们有能力时）对市民的残酷虐待。它也不能使人们放弃使用暴力，无论是战争暴力还是争强好胜的暴力。在他们自己受到更强势力量的逼迫之前，永远不可能接受劝导、放弃暴力。后来只是由于君主力量的增强才制止了争斗（君主之间或王位争夺者之间的争斗除外）；只是由于一个富裕而且尚武的中产阶级在设防城镇中成长了起来，而且一批平民步兵在战场上证明了他们比毫无纪律的武士更强大时，贵族对中产阶级和农民的残暴统治才受到一些约束。这种统治不但一直持续到受压迫者获得力量从而能够经常进行公开复仇的阶段，而且在此之后也长久存在；虽然在英格兰，民主阶级组织得较早也较好，通过建立平等的法律和自由的国家制度，很快废除了这种暴虐统治，但在欧洲大陆，仍有很多暴力统治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

If people are mostly so little aware how completely, dur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duration of our species, the law of force was the avowed rule of general conduct, any other being only a special and exceptional consequence of peculiarities—and from how very recent a date it is that the affairs of society in general have been even pretended to be regulated according to any moral law; as little do people remember or consider, how institutions and customs which never had any ground but the law of force, last on into ages and states of general opinion which never would have permitted their first establishment. Less than forty years ago, Englishmen might still by law hold human beings in bondage as saleable property: within the present century they might kidnap them and carry them off, and work them literally to death. This absolutely extreme case of the law of force, condemned by those who can tolerate almost every other form of arbitrary power, and which, of all others presents features the most revolting to the feelings of all who look at it from an impartial position, was the law of civilised and Christian England within the memory of persons now living: and in one half of Anglo-Saxon America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not only did slavery exist, but the slave-trade, and the breeding of slaves expressly for it, was a general practice between slave-states. Yet not only was there a greater strength of sentiment against it, but, in England at least, a less amount either of feeling or of interest in favour of it, than of any other of the customary abuses of force: for its motive was the love of gain, unmixed and undisguised; and those who profited by it were a very small numerical fraction of the country, while the natural feeling of all who were not personally interested in it, was unmitigated abhorrence. So extreme an instance makes it almost superfluous to refer to any other: but consider the long duration of absolute monarchy. In England at present it is the almost universal conviction that military despotism is a case of the law of force, having no other origin or justification. Yet in all the great nations of Europe except England it either still

exists, or has only just ceased to exist, and has even now a strong party favourable to it in all ranks of the people, especially among persons of station and consequence. Such is the power of an established system, even when far from universal; when not only in almost every period of history there have been great and well-known examples of the contrary system, but these have almost invariably been afforded by the most illustrious and most prosperous communities. In this case, too, the possessor of the undue power, the person directly interested in it, is only one person, while those who are subject to it and suffer from it are literally all the rest. The yoke is naturally and necessarily humiliating to all persons, except the one who is on the throne, together with, at most, the one who expects to succeed to it. How different are these cases from that of the power of men over women!I am not now prejudging the question of its justifiableness. I am showing how vastly more permanent it could not but be, even if not justifiable, than these other dominations which have nevertheless lasted down to our own time. Whatever gratification of pride there is in the possession of power, and whatever personal interest in its exercise, is in this case not confined to a limited class, but common to the whole male sex. Instead of being, to most of its supporters, a thing desirable chiefly in the abstract, or, like the political ends usually contended for by factions, of little private importance to any but the leaders; it comes home to the person and hearth of every male head of a family, and of everyone who looks forward to being so. The clodhopper exercises, or is to exercise, his share of the power equally with the highest nobleman. And the case is that in which the desire of power is the strongest: for everyone who desires power, desires it most over those who are nearest to him, with whom his life is passed, with whom he has most concerns in common, and in whom any independence of his authority is oftenest likely to interfere with his individual preferences. If, in the

other cases specified, powers manifestly grounded only on force, and having so much less to support them, are so slowly and with so much difficulty got rid of, much more must it be so with this, even if it rests on no better foundation than those. We must consider, too, that the possessors of the power have facilities in this case, greater than in any other, to prevent any uprising against it. Every one of the subjects lives under the very eye, and almost, it may be said, in the hands, of one of the masters—in closer intimacy with him than with any of her fellow-subjects; with no means of combining against him, no power of even locally overmastering him, and,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strongest motives for seeking his favour and avoiding to give him offence. In struggles for political emancipation, everybody knows how often its champions are bought off by bribes, or daunted by terrors. In the case of women, each individual of the subject-class is in a chronic state of bribery and intimidation combined. In setting up the standard of resistance, a large number of the leaders, and still more of the followers, must make an almost complete sacrifice of the pleasures or the alleviations of their own individual lot. If ever any system of privilege and enforced subjection had its yoke tightly riveted on the necks of those who are kept down by it, this has. I have not yet shown that it is a wrong system: but everyone who is capable of thinking on the subject must see that even if it is, it was certain to outlast all other forms of unjust authority. And when some of the grossest of the other forms still exist in many civilised countries, and have only recently been got rid of in others, it would be strange if that which is so much the deepest rooted had yet been perceptibly shaken anywhere. There is more reason to wonder that the protests and testimonies against it should have been so numerous and so weighty as they are.

如果在人类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人都不甚了解强制性法律是如何完全被公认为人们一般行为的规则，而任何其他法律只是某些独特情况特殊、例外的结果——甚至从最近开始，才假装由道德法律来规范整个社会的事务；就像人们很少记得或去考虑，除强制法律外从来没有任何其他依据的制度和习俗是如何持续到大众舆论的时代与状态的，而大众舆论永远不可能允许这些制度习俗先建立起来。不到四十年前，英国人还可以依法将人作为可以买卖的财产来奴役：在本世纪内，他们可以劫持并把其他人带走，然后毫不夸张地说，让他们干活干到累死。这种在强制性法律中的绝对极端情况，受到那些几乎可以容忍任何其他专制权力形式的人的谴责；在其他所有情况中，这种情况呈现出的特点是公正看待问题的人在感情上最厌恶的，而这种情况（至今还存在于活着的人的记忆中）却是文明的、英格兰基督徒的法律：就在三、四年前，在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还有一半地方不仅存在着奴隶制，而且在存在奴隶制的各州之间，奴隶贸易，以及为奴隶贸易而公开蓄奴的做法仍然普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群众间不仅存在更强烈的反对情绪，而且，至少在英格兰，人们赞成这一制度表现出的情感或兴趣比赞成其他习惯性的暴力滥用要少一些：因为其动机是对利益纯粹且毫无掩饰的追逐；那些从中获益的人只占这个国家很少的一部分，而那些与它没有个人利害关系的人，他们的天然感情就是有增无减的憎恶。有了如此极端的事例，再提到其他例子似乎显得多余了，不过让我们再来看看长期存在的专制君主政体。目前在英格兰，人们几乎普遍认为，军事专制就是强制性法律的一种情况，没有其他起源或正当理由。然而除英格兰外，欧洲所有大国，军事专制要么依然存在，要么只是刚刚废除。即使是现在，在各个阶层，特别是有身份、有影响的人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在支持它。即使其流传并不广，但这就是既成体制的威力；即使在历史上几乎每个时期，都有重大而著名的相反体制的例子，而且这些体制几乎无一例外全都是由最辉煌、最繁荣的社会建立的，也是如此。同样，在这种情况下，拥有不正当权力、与之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只是一个人，而那些屈从于它并深受其害的人却是其他所有人。这种奴役，除了在位者，最多再加上期待接替王位的人以外，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必然的耻辱。这些情况与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情况是多

么不同啊！我并非在急于判断其是否合理。我只想表明，即便它是不合理的，它也只能比其他那些无论如何已经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更为久远。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拥有权力多能满足自豪感，无论行使权力有何种个人利益，都并非局限于某一个阶级，而是所有男性共有。对其大部分支持者来说，这并非主要是抽象的理想，或者，像派别之间通常争夺的政治目标那样，除了对领导人外，对别人没有什么个人重要性，而是直接关系着每个家庭中男性家长本人（以及期待成为家长的每个人）及其家庭。庄稼汉行使的，或将要行使的这份权力，同最高等贵族的是完全平等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权力的渴望是最强烈的：因为任何渴望权力的人，都最渴望把这种权力凌驾于其最亲近、与其共度一生、并与其有最多共同关心的事情的人之上；凌驾于任何不服从其权威，可能时常干扰其个人喜好的人之上。如果在上述其他几种情况中，废除那些明显基于暴力且支持甚少的权力都要如此缓慢、如此困难的话，那么即使这种权力的基础可能相对薄弱，想要废除它也会消耗更长的时间，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中的权力拥有者，有比其他情况中更多压制反抗的手段。每个从属者都生活在主人的眼皮底下，而且可以说，几乎都处于其控制中——某个女性跟她的男性支配者的关系比跟她的女性同伴更亲密；她们没有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手段，没有哪怕是局部征服他的力量；另一方面，她们却有要讨好并避免得罪他的最强烈的动机。在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中，每个人都知道斗士们时常会被贿赂收买，或者被恐吓吓倒。对于女性而言，每个从属阶级的个体都长期处于贿赂与恐吓并存的状态。为了树立反抗的楷模，很多领导人，以及更多的追随者，必须以近乎完全牺牲享乐为代价或改善他们自己的命运。假如说有任何特权和强制屈从的制度会将枷锁紧紧地铆在被制服者脖子上的话，那就是这种制度。我还没有说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制度：但每位有能力思考这一问题的人都必定能看出，即便它是错误的，它也肯定会比其他形式的不公正权威持续时间更长。如果某些最令人作呕的制度在很多文明国家依然存在，且在另一些国家也只是最近才被废除，那么无论在何处都无法察觉这种最根深蒂固的制度发生了动摇就显得很奇怪了。还有更多理由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反对它的抗议和证词居然像现在这么多，这么有分量。

Some will object, that a comparison cannot fairly be mad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male sex and the forms of unjust power which I have adduced in illustration of it, since these are arbitrary, and the effect of mere usurpation, while it on the contrary is natural. But was there ever any domination which did not appear natural to those who possessed it?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 division of mankind into two classes, a small one of masters and a numerous one of slaves, appeared, even to the most cultivated minds, to be natural, and the only natural, condition of the human race. No less an intellect, and one which contributed no less to the progress of human thought, than Aristotle, held this opinion without doubt or misgiving; and rested it on the same premises on which the same assertion in regard to the dominion of men over women is usually based, namely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natures among mankind, free natures, and slave natures; that the Greeks were of a free nature, the barbarian races of Thracians and Asiatics of a slave nature. But why need I go back to Aristotle? Did not the slave-owners of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maintain the same doctrine, with all the fanaticism with which men cling to the theories that justify their passions and legitimate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Did they not call heaven and earth to witness that the dominion of the white man over the black is natural, that the black race is by nature incapable of freedom, and marked out for slavery? Some even going so far as to say that the freedom of manual labourers is an unnatural order of things anywhere. Again, the theorists of absolute monarchy have always affirmed it to be the only natural form of government; issuing from the patriarchal, which was the primitive and spontaneous form of society, framed on the model of the paternal, which is anterior to society itself, and, as they contend, the most natural authority of all. Nay, for that matter, the law of force itself, to those who could not plead any

other has always seemed the most natural of all grounds for the exercise of authority. Conquering races hold it to be Nature's own dictate that the conquered should obey the conquerors, or as they euphoniously paraphrase it, that the feebler and more unwarlike races should submit to the braver and manlier. The smallest acquaintance with human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shows how supremely natural the dominion of the feudal nobility over men of low condition appeared to the nobility themselves, and how unnatural the conception seemed, of a person of the inferior class claiming equality with them, or exercising authority over them. It hardly seemed less so to the class held in subjection. The emancipated serfs and burgesses, even in their most vigorous struggles, never made any pretension to a share of authority; they only demanded more or less of limitation to the power of tyrannising over them. So true is it that unnatural generally means only uncustomary, and that everything which is usual appears natural.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to men being a universal custom, any departure from it quite naturally appears unnatural. But how entirely, even in this case, the feeling is dependent on custom, appears by ample experience. Nothing so much astonishes the people of distant parts of the world, when they first learn anything about England, as to be told that it is under a queen; the thing seems to them so unnatural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To Englishmen this does not seem in the least degree unnatural, because they are used to it; but they do feel it unnatural that women should be soldiers or Members of Parliament. In the feudal ages, on the contrary, war and politics were not thought unnatural to women, because not unusual; it seemed natural that women of the privileged classes should be of manly character, inferior in nothing but bodily strength to their husbands and fathers. The independence of women seemed rather less unnatural to the Greeks than to other ancients, on account of the fabulous Amazons (whom

they believed to be historical), and the partial example afforded by the Spartan women; who, though no less subordinate by law than in other Greek states, were more free in fact, and being trained to bodily exercises in the same manner with men, gave ample proof that they were not naturally disqualified for them.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Spartan experience suggested to Plato, among many other of his doctrines, that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quality of the two sexes.

有些人会反对说，男性统治和我刚才为说明它而援引的不公正的权力形式之间无法公平比较，因为这些情况具有任意性，仅仅是篡权的结果，而前者则相反，它是自然的。但统治者实施统治何曾是不自然的事？曾经有个时期，人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占少数的主人，另一类是占多数的奴隶。当时，这种划分即使在最有教养的人看来也是自然的，而且是唯一自然的人类状态。没有一个智者比亚里士多德差，对人类思想进步做出的贡献也不比他少，这种观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其立论的前提与男性统治女性这一论断的前提相同，即人类有不同的天性——自由人天性和奴隶天性；希腊人具有自由人天性，而色雷斯人与亚洲人的野蛮种族有奴隶天性。可我何必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呢？难道美国南部各州的奴隶主不是尽其狂热坚持着同样的信条吗？男性就用这种狂热坚持使其感情合理化、使其个人利益合法化的理论。难道他们没有呼天喊地地要证明白人统治黑人是自然的，而且黑种人生来就没有自由，生来就是要被划为奴隶的吗？有些人竟然还说，手工劳动者的自由无论到哪里都是一种非自然的秩序。此外，专制君主制度的理论家们总是断言专制君主制是唯一自然的统治形式，它产生于父系家长制这种原始、自发的社会形式，后者以父系模式为框架，在社会形成前就已经存在。而且，他们坚持说，它是所有权威里面最自然的权威。不仅如此，在这点上，对那些不能为其他法律辩护的人来说，强制性法律本身看上去总是行使权力的所有根据中最自然的。征服别人的种族认为，被征服者应该服从征服者（或者，按他们委婉的解释，较软弱、不好战的种族应该屈从于更勇敢、更强悍的

种族），这是造物主的旨意。对中世纪人类的生活稍有了解就可知道，封建贵族对地位低下的人的统治对贵族自己来说是如此自然；而下等人要求跟他们平等，或要求对他们行使权力的概念又是多么不自然。多数处于屈从地位的阶级也这样想。获得解放的农奴和市民，即使在他们最激烈的斗争中，也从未主张过分享权力；他们仅仅要求多少限制一下对他们进行暴虐统治的权力。不自然通常只是意味着不习惯；而所有习惯的事物都是自然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女性屈从于男性是一个普遍习惯，因而对它的任何背离自然就显得不自然了。但感情是如何完全（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依赖习俗的，也可以由大量的实例表现出来。当来自远方世界的人第一次了解英格兰时，没有什么比听说它受女王统治更让他们吃惊了。在他们看来，这件事情非常不自然，几乎难以置信。英国人却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因为他们对此已经习惯了；但对女性当兵或当国会议员，他们的确也觉得不自然。相反，在封建时代，人们并不认为战争和政治对女性来说不自然，因为这是很平常的事；特权阶级的女性具有男性的品质，除体力外任何方面都不输于其丈夫和父亲，这似乎也很自然。由于亚马逊女战士的传说（希腊人认为是史实）及斯巴达女性提供的一部分例子，女性独立对希腊人比对其他古代人来说看起来更自然；尽管这些女性在法律上并不比希腊其他城邦的女性地位更高，但事实上她们更自由，而且能接受同男子一样的体能训练，这也充分证明她们并非天生不行。几乎毋庸置疑，斯巴达女性的经历使柏拉图受到启发，创立了其众多学说中两性之间社会与政治平等的学说。

But, it will be said, the rule of men over women differs from all these others in not being a rule of force: it is accepted voluntarily; women make no complaint, and are consenting parties to it. In the first place, a great number of women do not accept it. Ever since there have been women able to make their sentiments known by their writings (the only mode of publicity which society permits to them),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hem have recorded protests against their present social condition: and recently many thousands of

them, headed by the most eminent women known to the public, have petitioned Parliament for their admission to the Parliamentary Suffrage. The claim of women to be educated as solidly, and in the same branches of knowledge, as men, is urged with growing intensity, and with a great prospect of success; while the demand for their admission into professions and occupations hitherto closed against them, becomes every year more urgent. Though there are not in this country, as there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periodical conventions and an organised party to agitate for the Rights of Women, there is a numerous and active society organised and managed by women, for the more limited object of obtaining the political franchise. Nor is it only in our own country and in America that women are beginning to protest, more or less collectively, against the disabilities under which they labour. France, and Italy, and Switzerland, and Russia now afford examples of the same thing. How many more women there are who silently cherish similar aspirations, no one can possibly know; but there are abundant tokens how many would cherish them, were they not so strenuously taught to repress them as contrary to the proprieties of their sex. It must be remembered, also, that no enslaved class ever asked for complete liberty at once. When Simon de Montfort called the deputies of the commons to sit for the first time in Parliament, did any of them dream of demanding that an assembly, elected by their constituents, should make and destroy ministries, and dictate to the king in affairs of State? No such thought entered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the most ambitious of them. The nobility had already these pretensions; the commons pretended to nothing but to be exempt from arbitrary taxation, and from the gross individual oppression of the king's officers. It is a political law of nature that those who are under any power of ancient origin, never begin by complaining of the power itself, but only of its oppressive exercise. There is never any want of women who complain of ill-usage by

their husbands. There would be infinitely more, if complaint were not the greatest of all provocatives to a repetition and increase of the ill-usage. It is this which frustrates all attempts to maintain the power but protect the woman against its abuses. In no other case (except that of a child) is the person who has been proved judicially to have suffered an injury, replaced under the physical power of the culprit who inflicted it. Accordingly wives, even in the most extreme and protracted cases of bodily ill-usage, hardly ever dare avail themselves of the laws made for their protection: and if, in a moment of irrepressible indignation, or by the interference of neighbours, they are induced to do so, their whole effort afterwards is to disclose as little as they can, and to beg off their tyrant from his merited chastisement.

但是，有人会说，男性统治女性与其他所有统治不同，它并非暴力统治：而是女性自愿接受的；女性并无怨言，而且同意参与其中。首先，很多女性并不接受这种统治。自从女性能够通过写作（社会许可她们的唯一宣传方式）使人们了解其情感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就其目前的社会状况提出了抗议：最近，在公众所知的最杰出的女性带领下，几千名女性向议会请愿，要求给予她们议会选举权。女性要求在同样的知识领域跟男性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这一要求越来越强烈，也很有希望成功；同时，要求女性涉足迄今为止还未对她们开放的职业和专业的呼声也逐年高涨。虽然这个国家并不像美国召开定期会议并利用一个有组织的政党来鼓吹女权，但是也有为数众多的由女性组织、管理的活跃社团，它们的目标比较细化，即争取获得参政权。与此同时，不仅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和美国开始有女性或多或少地集体抗议她们有别于男性的劳动条件，包括法国、意大利、瑞士、以及俄国等其他国家现在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没有人知道还有多少女性也在心底怀有这样的愿望；但大量迹象表明，如果没有受到谆谆教导来压抑这些与她们性别合宜行为相矛盾的愿望，会有多少女性怀有这种愿望。我们还必须记住，从来没有一个被奴役的阶级一开始就要

求完全的自由。当西蒙•德•蒙福尔特召集平民代表第一次出席议会时，他们中会有人梦想着要求由选民选出议会，来建立、解散政府部门，并就国事向国王发号施令吗？当时最野心勃勃的人也不会有这种想法。贵族阶层已经有了这些要求；而平民只要求免除随意征收的税款，以及国王手下的官吏们对其个人进行的野蛮压迫。那些处在具有古老起源的权力之下的人，从来不会从抱怨这种权力本身开始寻求自由，而只是从其压迫行为开始，这是一个自然政治法则。世界上从来不乏抱怨遭到丈夫虐待的女性。假如抱怨不是引起反复、更多虐待的最大原因的话，就会有无限多的抱怨存在。正是这一点使所有试图保持权力却又要保护女性不受虐待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除了孩子，任何在法律上已经证明受到伤害的人，都不会再被置于伤害他的犯人体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因此，即使在遭到最极端、最长期的身体虐待的情况下，妻子也几乎从不敢求助于为保护她们而制定的法律：而如果她们在无法压抑愤怒或受到邻居干预的情况下忍不住这样做了，那么事后她们会竭力掩盖事实，并恳求免除丈夫应得的惩罚。

All causes, social and natural, combine to make it unlikely that women should be collectively rebellious to the power of men. They are so far in a position different from all other subject classes, that their masters require something more from them than actual service. Men do not want solely the obedience of women, they want their sentiments. All men, except the most brutish, desire to have, in the woman most nearly connected with them, not a forced slave but a willing one, not a slave merely, but a favourite. They have therefore put everything in practice to enslave their minds. The masters of all other slaves rely, for maintaining obedience, on fear; either fear of themselves, or religious fears. The masters of women wanted more than simple obedience, and they turned the whole force of education to effect their purpose. All women are brought up from the very earliest years in the belief that their ideal of character is the very opposite to that of men; not self-will, and

government by self-control, but submission, and yielding to the control of others. All the moralities tell them that it is the duty of women, and all the current sentimentalities that it is their nature, to live for others; to make complete abnegation of themselves, and to have no life but in their affections. And by their affections are meant the only ones they are allowed to have—those to the men with whom they are connected, or to the children who constitute an additional and indefeasible tie between them and a man. When we put together these three things—first, the natural attraction between opposite sexes; secondly, the wife's entire dependence on the husband, every privilege or pleasure she has being either his gift, or depending entirely on his will; and lastly, that the principal object of human pursuit, consideration, and all objects of social ambition, can in general be sought or obtained by her only through him, it would be a miracle if the object of being attractive to men had not become the polar star of feminine education and formation of character. And, this great means of influence over the minds of women having been acquired, an instinct of selfishness made men avail themselves of it to the utmost as a means of holding women in subjection, by representing to them meekness, submissiveness, and resignation of all individual will into the hands of a man,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sexual attractiveness. Can it be doubted that any of the other yokes which mankind have succeeded in breaking, would have subsisted till now if the same means had existed, and had been so sedulously used, to bow down their minds to it? If it had been made the object of the life of every young plebeian to find personal favour in the eyes of some patrician, of every young serf with some seigneur; if domestication with him, and a share of his personal affections, had been held out as the prize which they all should look out for, the most gifted and aspiring being able to reckon on the most desirable prizes; and if, when this prize had been obtained, they had been shut out by a wall of brass from all interests not

centring in him, all feelings and desires but those which he shared or inculcated; would not serfs and seigneurs, plebeians and patricians, have been as broadly distinguished at this day as men and women are? and would not all but a thinker here and there, have believed the distinction to be a fundamental and unalterable fact in human nature?

我们结合种种原因，无论是社会的还是自然的，使女性不可能集体反抗男权。目前她们所处的地位与所有其他从属阶层不同，即她们的主人除要求实际的服务之外还要求更多的东西。男性不只想要女性顺从，还想要她们的感情。所有男性（最残酷的除外）都想让跟他们最亲近的女性成为心甘情愿而非强迫的奴隶；成为最宠爱的奴隶，而不仅仅是奴隶。因此他们采取一切手段来奴役她们的心灵。所有其他奴隶主为了让奴隶一直顺从他们，靠的都是畏惧；要么是对他们本人的畏惧，要么是宗教畏惧。而女性的主人不仅仅想要简单的顺从，因此他们动用教育的全部力量以达到其目的。所有女性在童年时期就被灌输了这样的信念：她们的理想性格跟男性的截然相反；她们没有自我意志，不是通过自制约束自己，而是顺从，并屈从于别人的控制。为他人而活、完全没有自我、除了与自己喜欢的人相处外没有其他生活，所有的道德都告诉她们这是她们的职责，所有的公认的多愁善感告诉她们这是她们的天性；所谓她们的感情指仅允许她们对特定的人动感情——对与她们结合的男性，或者对孩子动感情。后者构成了她们与一个男性之间另一不可切断的纽带。当我们把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考虑时——首先，异性之间天然的相互吸引；其次，妻子对丈夫完全的依赖，她所拥有的每种特殊权益或享受要么是丈夫的赐予，要么完全依赖他的意愿；最后，她通常只能通过丈夫来追求或获得人类所追求、考虑的主要目标，以及一切社会抱负的目标——假如吸引男性这一目标没有成为女性教育与性格养成的最高目标，那就是奇迹了。而且，得到这一影响女性精神的重要手段后，自私的本能使男性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作为使女性屈服的手段，把温顺、服从以及将一切个人意志交到男性手中描绘成女性魅力最重要的部分。如果存在同样的手

段，并一直被人孜孜不倦地用来奴役人们精神的话，我们能否质疑任何被人类成功废除的其他奴役形式都会一直持续到现在呢？如果每位年轻平民都以获得某贵族的青睐，每位年轻农奴都以获得某领主的宠爱为生活目标；如果得以与他亲近，并分享其个人情感是他们共同追求的奖赏，而只有最有才能、最有抱负的人才能得到他们最渴望的奖赏；如果当他们得到这一奖赏时，已经被一堵铜墙挡在了所有不以他为中心的权益之外，挡在了所有情感与渴望之外（那些他也拥有或反复灌输的除外），难道农奴和领主，平民和贵族现在就不会像男性与女性那样被大致区分开吗？而且除了思想家外，难道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一区分是人性中基本、不可改变的事实吗？

The preceding considerations are amply sufficient to show that custom, however universal it may be, affords in this case no presumption, and ought not to create any prejudice, in favour of the arrangements which place wome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subjection to men. But I may go farther, and maintain that the course of history, and the tendencies of progressive human society, afford not only no presumption in favour of this system of inequality of rights, but a strong one against it; and that, so far as the whole course of human improvement up to the time, the whole stream of modern tendencies, warrants any inference on the subject, it is, that this relic of the past is discordant with the future, and must necessarily disappear.

上述考虑充分表明，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多么普遍接受的习惯，在赞成让女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都屈从于男性安排这一问题上都不能作出论断，也不应产生任何偏见。但我可以更进一步主张，历史进程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不仅没有得出赞成这种不平等权力制度的推论，反而是强烈反对它的；而且，假如迄今为止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以及整个现代趋势的潮流对这一问题能得出任何推断的话，那就

是，这一历史传统与未来是不协调的，是必定会消失的。

For, what is the peculiar character of the modern world—the difference which chiefly distinguishes modern institutions, modern social ideas, modern life itself, from those of times long past? It is, that human beings are no longer born to their place in life, and chained down by an inexorable bond to the place they are born to, but are free to employ their faculties, and such favourable chances as offer, to achieve the lot which may appear to them most desirable. Human society of old was constituted on a very different principle. All were born to a fixed social position, and were mostly kept in it by law, or interdicted from any means by which they could emerge from it. As some men are born white and others black, so some were born slaves and others freemen and citizens; some were born patricians, others plebeians; some were born feudal nobles, others commoners and *roturiers* . A slave or serf could never make himself free, nor, except by the will of his master, become so. In most European countries it was not till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and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growth of regal power, that commoners could be ennobled. Even among nobles, the eldest son was born the exclusive heir to the paternal possessions, and a long time elapsed before it was fully established that the father could disinherit him. Among the industrious classes, only those who were born members of a guild, or were admitted into it by its members, could lawfully practise their calling within its local limits; and nobody could practise any calling deemed important, in any but the legal manner—by processes authoritatively prescribed. Manufacturers have stood in the pillory for presuming to carry on their business by new and improved methods. In modern Europe, and most in those parts of it which have participated most largely in all other modern improvements, diametrically opposite doctrines

now prevail. Law and government do not undertake to prescribe by whom any social or industrial operation shall or shall not be conducted, or what modes of conducting them shall be lawful. These things are left to the unfettered choice of individuals. Even the laws which required that workmen should serve an apprenticeship, have in this country been repealed: there being ample assurance that in all cases in which an apprenticeship is necessary, its necessity will suffice to enforce it. The old theory was, that the least possible should be left to the choice of the individual agent; that all he had to do should, as far as practicable, be laid down for him by superior wisdom. Left to himself he was sure to go wrong. The modern conviction, the fruit of a thousand years of experience, is, that things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is the person directly interested, never go right but as they are left to his own discretion; and that any regulation of them by authority, except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others, is sure to be mischievous. This conclusion, slowly arrived at, and not adopted until almost every possible application of the contrary theory had been made with disastrous result, now (in the industrial department) prevails universally in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almost universally in all that have pretensions to any sort of advancement. It is not that all processes are supposed to be equally good, or all persons to be equally qualified for everything; but that freedom of individual choice is now known to be the only thing which procures the adoption of the best processes, and throws each operation into the hands of those who are best qualified for it. Nobody thinks it necessary to make a law that only a strong- armed man shall be a blacksmith. Freedom and competition suffice to make blacksmiths strong-armed men, because the weak-armed can earn more by engaging in occupations for which they are more fit. In consonance with this doctrine, it is felt to be an overstepping of the proper bounds of authority to fix beforehand, on some general

presumption, that certain persons are not fit to do certain things. It is now thoroughly known and admitted that if some such presumptions exist, no such presumption is infallible. Even if it be well grounded in a majority of cases, which it is very likely not to be, there will be a minority of exceptional cases in which it does not hold: and in those it is both an injustice to the individuals, and a detriment to society, to place barriers in the way of their using their faculties for their own benefit and for that of others. In the cases, on the other hand, in which the unfitness is real, the ordinary motives of human conduct will on the whole suffice to prevent the incompetent person from making, or from persisting in, the attempt.

现代世界的特点——主要将现代制度、现代社会观念以及现代生活本身与久远年代的那些区分开来的区别——是什么呢？那就是，人不再生来就具有其生活地位，并被牢牢束缚在那里，而是可以自由运用其才能和有利时机来创造他们最渴望拥有的命运。以前的人类社会是根据非常不同的原则构成的。所有人生来就具有固定的社会地位，而且大部分都由法律来维持，禁止他们以任何方式脱离这一地位。由于有些人生为白人，而其他人生为黑人，因此就有人生而为奴，其他人则为自由人和市民；有些生为贵族，其他人为平民；有些生为封建贵族，其他则为平民和佃农。除非其主人同意，否则奴隶或农奴永远无法解放，也不能成为自由人。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直到中世纪行将结束时，由于王权增长，平民才可以被封为贵族。即便都是贵族，长子生来就是其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直到很久以后，父亲可以剥夺儿子继承权这一制度才被完全确立下来。在手工业者阶层中，只有那些生来就是行会成员，或由其成员认可进入行会的人，才能在当地区域内合法经营；任何人都不得以法定方式之外的其他方式从事由当局规定程序认定的重要行业。制造业者会因大胆采用改进的新方法来做生意而受到人们的嘲笑。而在现代欧洲，以及大量参与所有其他推动现代进步事业活动的大部分地区，盛行的信条恰恰相反。法律和政府并

不规定任何社会或工业活动应该或不该由哪些人来进行，或用哪种方式进行才是合法的。这些事情都由个人自由选择，甚至要求工匠应经过学徒期的法律，在这个国家也已经被废除了：可以完全确信，在所有必须有学徒期的情况下，其必要性本身就足以推动其强制实行。以前的理论是，留给个人选择的可能性应该是最小的；他必须要做的事应该在可行的范围内，由其优越的智者为他安排。如果留给他自己安排，他就一定会出错。根据积累了千年的经验，现代理论则认为，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事情，除非留给他们自己处理，否则永远做不好；任何权威人士对他们的管理，除非是为了保护别人的权力，否则一定是有害的。但我们每次运用的却是与之相反的理论，而且直到导致了灾难性后果，才采用这一经年累月得出的结论。现在这一理论（在工业部门）在最先进的国家普遍盛行，在所有试图有所改进的地方也占据了相对优势。但这并非认为所有程序都同等优良，或所有人对所有事情都同样胜任；而是说，个人选择的自由是现在已知能够采取并实现的最佳程序中唯一将每一活动都交到最能胜任的人手中的手段。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制定法律来规定，只有胳膊粗壮的人才应该成为铁匠。自由和竞争足以使铁匠成为胳膊粗壮的人，因为胳膊细弱的人可以通过从事更适合他们的职业挣到更多钱。与这一信念相一致，人们感觉，根据某些普遍推断，预先确定某些人不适合做某些事情，已经超越了权威的恰当界限。现在众所周知并承认，如果存在诸如此类的推断，也没有绝对正确无误的。即使在很多情况下某个推断有充分根据，（很可能没有），也会在少数例外情况中站不住脚：在这些情况下，在他们运用自己的才能为自己和别人谋利益的路上设置障碍，既是对个人的不公，也是对社会的损害。相反，在确实不适合的情况下，人类行为的正常动机总体上将足以阻止无能之辈进行，或者坚持进行这种尝试。

If this general principle of social and economical science is not true; if individuals, with such help as they can derive from the opinion of those who know them, are not better judges than the law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ir own capacities and vocation; the

world cannot too soon abandon this principle, and return to the old system of regulations and disabilities. But if the principle is true, we ought to act as if we believed it, and not to ordain that to be born a girl instead of a boy, any more than to be born black instead of white, or a commoner instead of a nobleman, shall decide the person's position through all life, shall interdict people from all the more elevated social positions, and from all, except a few, respectable occupations. Even were we to admit the utmost that is ever pretended as to the superior fitness of men for all the functions now reserved to them, the same argument applies which forbids a legal qualification for Members of Parliament. If only once in a dozen years the conditions of eligibility exclude a fit person, there is a real loss, while the exclusion of thousands of unfit persons is no gain; for i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electoral body disposes them to choose unfit persons, there are always plenty of such persons to choose from. In all things of any difficulty and importance, those who can do them well are fewer than the need, even with the most unrestricted latitude of choice: and any limitation of the field of selection deprives society of some chances of being served by the competent, without ever saving it from the incompetent.

如果这一社会和经济科学的一般原则不正确；如果听从朋友的意见后，个人对自己能力与职业的判断并不比法律和政府的更好，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迫不及待地抛弃这一原则，并回到管制与无能的旧制度中去。但如果该原则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像我们相信它一样践行这一原则，而不是规定生为女孩而非男孩，正如生为黑人而非白人，或生为平民而非贵族一样，这将决定这个人一生的地位，同时禁止人们追求一切更高级的社会地位，以及从事除少数职业外，一切体面的职业。即便我们接受这个最大的谎言，即现在给男性保留的一切职能，都是高度适合男性的，禁止成为国会议员要具有法定资格的同一论据也仍然适用。如果十二年中只有一次由于选举资格的条件将一位合适

的人选排除在外，那么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损失；而排除掉几千不适合的人选也毫无益处，因为如果选举团体的构成使他们倾向于选择不合适的人，那么总有许多这样的人可供选择。对一切困难和重要的事情，即使以最不受限制的自由度来选择，那些可以胜任的人也少于需要的人：任何对选择范围的限制都会使社会失去某些由胜任者来为之服务的机会，却从来无法防止不称职的人为这个社会服务。

At present, in the more improved countries, the disabilities of women are the only case, save one, in which laws and institutions take persons at their birth, and ordain that they shall never in all their lives be allowed to compete for certain things. The one exception is that of royalty. Persons still are born to the throne; no one, not of the reigning family, can ever occupy it, and no one even of that family can, by any means but the course of hereditary succession, attain it. All other dignities and social advantages are open to the whole male sex: many indeed are only attainable by wealth, but wealth may be striven for by anyone, and is actually obtained by many men of the very humblest origin. The difficulties, to the majority, are indeed insuperable without the aid of fortunate accidents; but no male human being is under any legal ban: neither law nor opinion super add artificial obstacles to the natural ones. Royalty, as I have said, is excepted: but in this case everyone feels it to be an exception—an anomaly in the modern world, in marked opposition to its customs and principles, and to be justified only by extraordinary special expediences, which, though individuals and nations differ in estimating their weight, unquestionably do in fact exist. But in this exceptional case, in which a high social function is, for important reasons, bestowed on birth instead of being put up to competition, all free nations contrive to adhere in substance to the principle from which they nominally derogate; for they circumscribe this high function by conditions avowedly intended to

prevent the person to whom it ostensibly belongs from really performing it; while the person by whom it is performed, the responsible minister, does obtain the post by a competition from which no full-grown citizen of the male sex is legally excluded. The disabilities, therefore, to which women are subject from the mere fact of their birth, are the solitary examples of the kind in modern legislation. In no instance except this, which comprehends half the human race, are the higher social functions closed against anyone by a fatality of birth which no exertions, and no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can overcome; for even religious disabilities (besides that in England and in Europe they have practically almost ceased to exist) do not close any career to the disqualified person in case of conversion.

目前在比较进步的国家，除非女性身体有残疾，只有王室能依照法律和制度根据女性的出身规定，她们一生永远不许参与竞争。王位是生来就有的，不属于王室家族的人，永远不会得到；即使是王室家族的人，也不能通过世袭继承之外的任何手段获得王位。其他一切荣誉和社会利益都对所有男性开放：很多的确只能通过财富才能取得，但每个人都可以为财富而奋斗，而且实际上很多出身最卑微的人也获得了财富。对大部分人来说，如果没有好运气，困难的确难以克服；但没有任何男性处在法律禁令之下：无论法律还是舆论都没有在天然障碍之外再增加人为障碍。如上述所言，王室是个例外：但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感觉这是例外——这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反常例子，与现代世界的风俗和原则有显著不同，只有通过极其特殊的权宜措施才能证明其正当性，而尽管个人和国家在估计其分量上各不相同，但毋庸置疑，它们事实上的确存在。但在这一例外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要原因，一个高级社会职能是根据出身而非通过竞争来赋予的），所有自由国家都试图在实质上遵循他们在名义上贬低的原则；因为他们用一些条件限定了这一高级职能，这些条件公然意图阻止表面拥有这一职能的人来真正履行它；而这一职能的真正履行人，

负责的部长，的确是通过竞争才获得这一职位的，而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在法律上都可以参与这种竞争。因此，女性仅仅由于其出身就受到歧视，这是现代司法中独一无二的例子。除这一涉及半数人口的例子外，没有任何情况会由于出身而阻碍履行高级社会职能，而这种命运无法通过努力或改变环境克服；因为即使是宗教歧视（而且在英格兰和欧洲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在改信基督教的情况下，也不会向受歧视者关闭就业的大门。

The social subordination of women thus stands out an isolated fact in modern social institutions; a solitary breach of what has become their fundamental law; a single relic of an old world of thought and practice exploded in everything else, but retained in the one thing of most universal interest; as if a gigantic dolmen, or a vast temple of Jupiter Olympius, occupied the site of St. Paul's and received daily worship, while the surrounding Christian churches were only resorted to on fasts and festivals.

女性的社会从属地位就这样在现代社会制度中作为孤立的事实突出出来；这是唯一违反她们基本法律的事实；是在废除传统思想后，在最具普遍利益的一件事情中保留下来的唯一残余的思想与做法；这就像一个巨大的墓石牌坊，或者一个占据了圣保罗教堂所在地且接受每日朝拜的丘比特•奥林匹斯巨大神庙，而周围的基督教堂只在斋戒日和节日时才会有人光顾。

This entire discrepancy between one social fact and all those which accompany it, and the radical opposition between its nature an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which is the boast of the modern world, and which has successively swept away everything else of an analogous character, surely affords, to a conscientious observer of

human tendencies, serious matter for reflection. It raises a prima facie presumption on the unfavourable side, far outweighing any which custom and usage could in such circumstances create on the favourable; and should at least suffice to make this, like the choice between republicanism and royalty, a balanced question.

一个社会事实及其所有伴随事实之间的整体差异，以及该社会事实的本质和进步运动之间的根本对立（这种进步运动是现代社会所引以为豪的，而且已经陆续清除了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事实），无疑为认真观察人性趋势的人提供了严肃的思考素材。它为反对方提出了一个初步论断，其重要性远远超过风俗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为赞成方做出的任何论断；而且至少足以使这成为一个周全的问题，就像共和政体和王权之间的选择一样。

The least that can be demanded is, that the question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prejudged by existing fact and existing opinion, but open to discussion on its merits, as a question of justice and expediency: the decision on this, as on any of the other social arrangements of mankind, depending on what an enlightened estimate of tendencies and consequences may show to be most advantageous to humanity in general, without distinction of sex. And the discussion must be a real discussion, descending to foundations, and not resting satisfied with vague and general assertions. It will not do, for instance, to assert in general terms, that the experience of mankind has pronounced in favour of the existing system. Experience cannot possibly have decided between two courses, so long as there has only been experience of one. If it be said that the doctrine of 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 rests only on theory,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the contrary doctrine also has only theory to rest upon. All that is proved in its favour by direct

experience, is that mankind have been able to exist under it, and to attain the degree of improvement and prosperity which we now see; but whether that prosperity has been attained sooner, or is now greater,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under the other system, experience does not say. On the other hand, experience does say, that every step in improvement has been so invariably accompanied by a step made in raising the social position of women, that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have been led to adopt their elevation or debasement as on the whole the surest test and most correct measure of the civilisation of a people or an age. Through all the progressive period of human history, the condition of women has been approaching nearer to equality with men. This does not of itself prove that the assimilation must go on to complete equality; but it assuredly affords some presumption that such is the case.

至少我们可以要求，在考虑这一问题时，不应带着现有事实和现有意见的成见，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公正与涉及利害关系的问题对其价值进行讨论：像对人类其他社交活动一样，对这一问题的决定（取决于对趋势和后果做出的开明估计）可能会表明，它对全人类（不做性别区分）是最有利的。而且讨论必须是真正的讨论，要深入到问题的根本，而非满足于停留在模糊、空泛的主张上。比如，不能笼统地断言，人类的经验已经表明赞成现有的制度。只要有一种进程的经验，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在两种进程之间做出决定。如果说男女平等的学说仅有理论依据，那么我们必须记住，与之相反的理论也仅仅只有理论支撑。所有对它有利、可以用直接经验证明的就是，人类能够在这一制度下生存，并达到我们现在可见的进步与繁荣程度；但能否在另一种制度下更快，或更好地实现这种繁荣，经验就无法说明了。相反，经验能够说明，每一步改进都无一例外伴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由此史学家与哲学家们在整体上采用女性地位的上升或下降作为衡量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文明程度最可信的检验方式和最正确的尺度。经过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进步时期，女性的地位日趋与男性平等。这本

身并不证明这种同化必须持续发展到完全平等；但它无疑引起了一些推测，即事情就是这样的。

Neither does it avail anything to say that the *nature* of the two sexes adapts them to their present functions and position, and renders these appropriate to them. Standing on the ground of common sens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uman mind, I deny that anyone knows, or can know, the nature of the two sexes, as long as they have only been seen in their present relation to one another. If men had ever been found in society without women, or women without men, or if there had been a society of men and women in which the women were no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men, something might have been positively known about the mental and moral differences which may be inherent in the nature of each. What is now called the nature of women is an eminently artificial thing—the result of forced repression in some directions, unnatural stimulation in others. It may be asserted without scruple, that no other class of dependents have had their character so entirely distorted from its natural proportions by their relation with their masters; for, if conquered and slave races have been, in some respects, more forcibly repressed, whatever in them has not been crushed down by an iron heel has generally been let alone, and if left with any liberty of development, it has developed itself according to its own laws; but in the case of women, a hot-house and stove cultivation has always been carried on of some of the capabilities of their nature, for the benefit and pleasure of their masters. Then, because certain products of the general vital force sprout luxuriantly and reach a great development in this heated atmosphere and under this active nurture and watering, while other shoots from the same root, which are left outside in the wintry air, with ice purposely heaped all round them, have a stunted growth,

and some are burnt off with fire and disappear; men, with that inability to recognise their own work which distinguishes the unanalytic mind, indolently believe that the tree grows of itself in the way they have made it grow, and that it would die if one half of it were not kept in a vapour bath and the other half in the snow.

它也未利用任何事物来说明，是男女的天性使他们适应了现在的职能和地位，并使其认为这些是合适的。站在常识和人类头脑的构造这一立场上看，只要男女两性一直处于现在的相互关系中，我就不会承认有人知道，或能够知道，男女两性的天性。如果有人曾见过社会上只有男性，没有女性，或只有女性，没有男性，或者曾经存在女性不受男性控制的社会，那么他肯定会知道一些可能在男女天性中固有的精神和道德差异。现在被称为女性天性的东西明显是非天然的——某些方面是强行压制的结果，另一些方面则是非自然刺激的结果。完全可以断言，没有一个附属阶层像她们一样，性格的自然均衡完全被她们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扭曲了；因为，被征服的民族和奴隶，即使在某些方面受到更严厉的压迫，但他们身上没有被铁蹄践踏摧毁的东西一般都不再受到干扰，而且如果有任何发展的自由，它就会根据自己的法则去发展；但对女性而言，为了她们主人的利益和享乐，她们总是利用天性中的某些才能在温室里和炉灶边忙碌。另外，在温暖的空气中，在精心的培育和灌溉下，某些具有一般生命力的果实繁茂地萌发出来；而同根生的其他嫩芽，却被留在外面的严寒中，周围又被故意堆上了冰，从而阻碍了生长，有些用火烧掉消失了；由于没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有别于不善分析的头脑，人们就怠惰地认为，树木是按他们培养的方式生长的，而且如果不把一半放在蒸汽中，另一半放在雪里，树就会死掉。

Of all difficulties which impede the progress of thought, and the formation of well-grounded opinions on life and social arrangements, the greatest is now the unspeakable ignorance and

inattention of mankind in respect to the influences which form human character. Whatever any portion of the human species now are, or seem to be, such, it is supposed, they have a natural tendency to be: even when the most elementary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y have been placed, clearly points out the causes that made them what they are. Because a cottier deeply in arrears to his landlord is not industrious, there are people who think that the Irish are naturally idle. Because constitutions can be overthrown when the authorities appointed to execute them turn their arms against them, there are people who think the French incapable of free government. Because the Greeks cheated the Turks, and the Turks only plundered the Greeks, there are persons who think that the Turks are naturally more sincere: and because women, as is often said, care nothing about politics except their personalities, it is supposed that the general good is naturally less interesting to women than to men. History, which is now so much better understood than formerly, teaches another lesson: if only by showing the extraordinary susceptibility of human nature to external influences, and the extreme variableness of those of its manifestations which are supposed to be most universal and uniform. But in history, as in travelling, men usually see only what they already had in their own minds; and few learn much from history, who do not bring much with them to its study.

在所有阻碍思想进步、阻碍形成有充分根据的关于生活与社交活动的意见的困难当中，最难的是现在人类在形成他们性格的影响方面具有无法言说的无知和漠视。现在无论是哪些人种，或是怎样的人种，人们都认为，他们有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自然趋势：即便当他们所处的环境中最基本的知识都明确指出使他们变成这样的原因时，也是如此。因为如果有一个对地主负债累累的佃农不勤快，就有人认为爱尔兰人天生懒惰。因为被指定来执行宪法的当局起来反对宪法，宪法

可能会被废除，就有人认为法国人没有能力自治。因为希腊人欺骗了土耳其人，而后者只是劫掠了希腊人，就有人认为土耳其人天性更真诚：因为人们常说女性除了她们的人格外，对政治毫不关心，就有人认为女性对大众利益天生就不如男性热心。历史（我们现在对它的理解比以前好得多了）还给予我们其他启示：它表明了人类对外部影响高度敏感的天性，及其在表现形式上最普遍、最一致的极端多样性。但在历史中，就像在旅行中一样，人们通常只看到他们头脑中已有的东西，那些研究历史时头脑里没有多少东西的人，从历史中也学不到多少东西。

Hence, in regard to that most difficult question, what are the na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exes—a subject on which it is impossible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society to obtain complete and correct knowledge—while almost everybody dogmatises upon it, almost all neglect and make light of the only means by which any partial insight can be obtained into it. This is, an analytic study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he laws of the influence of circumstances on character. For, however great and apparently ineradicable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might be, the evidence of there being natural differences could only be negative. Those only could be inferred to be natural which could not possibly be artificial—the residuum, after deducting every characteristic of either sex which can admit of being explained from education or external circumstances. The profoundest knowledge of the laws of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is indispensable to entitle anyone to affirm even that there is any difference, much more what the difference is, between the two sexes considered as moral and rational beings; and since no one, as yet, has that knowledge (for there is hardly any subject which, in proportion to its importance, has been so little studied), no one is thus far entitled to any positive opinion on the

subject. Conjectures are all that can at present be made; conjectures more or less probable, according as more or less authorised by such knowledge as we yet have of the laws of psychology, as applied to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因此，关于那个最困难的问题，即两性之间天生有哪些不同，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不可能得到完整、正确的认识——人人对此几乎都有独断的主张，而几乎所有人都忽略、轻视那个唯一能够得到哪怕是部分认识的方法。这就是，对心理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做分析研究，即环境影响性格的规律。因为，无论男女之间道德与智力的差异多么大、多么难以根除，我们只能否定他们之间天生存在差异的证据。去掉两性中每个可以用教育或外部环境来解释的特征之后所剩余的部分，就只能推断为天生的，而不可能是人为的因素。任何人即使只想证实作为道德和理性人的两性之间存在差异都必须具备关于性格形成规律的最渊博的知识，更别说要证实差异是什么了；而由于还没有人具备这一知识（因为要跟重要性成比例的话，几乎没有一个主题像这个一样研究得这么少），因此目前还没有人有资格就这一问题给出确定的意见。目前能做的只有推测；根据我们已有的、适用于性格形成的心理学规律的知识，或多或少做出可能的推测。

Even the preliminary knowledge, w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xes now are, apart from all question as to how they are made what they are, is still in the crudest and most incomplete state. Medical practitioners and physiologists have ascertained, to some extent, the differences in bodily constitution;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to the psychologist: but hardly any medical practitioner is a psychologist. Respecting the 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 their observations are of no more worth than those of common men. It is a subject on which nothing final can be known, so long as those who alone can really know it, women themselves,

have given but little testimony, and that little, mostly suborned. It is easy to know stupid women. Stupidity is much the same all the world over. A stupid person's notions and feelings may confidently be inferred from those which prevail in the circle by which the person is surrounded. Not so with those whose opinions and feelings are an emanation from their own nature and faculties. It is only a man here and there who has any tolerable knowledge of the character even of the women of his own family. I do not mean, of their capabilities; these nobody knows, not even themselves, because most of them have never been called out. I mean their actually existing thoughts and feelings. Many a man thinks he perfectly understands women, because he has had amatory relations with several, perhaps with many of them. If he is a good observer, and his experience extends to quality as well as quantity, he may have learnt something of one narrow department of their nature—an important department, no doubt. But of all the rest of it, few persons are generally more ignorant, because there are few from whom it is so carefully hidden. The most favourable case which a man can generally have for studying the character of a woman, is that of his own wife: for the opportunities are greater, and the cases of complete sympathy not so unspeakably rare. And in fact, this is the source from which any knowledge worth having on the subject has, I believe, generally come. But most men have not had the opportunity of studying in this way more than a single case: accordingly one can, to an almost laughable degree, infer what a man's wife is like, from his opinions about women in general. To make even this one case yield any result, the woman must be worth knowing, and the man not only a competent judge, but of a character so sympathetic in itself, and so well adapted to hers, that he can either read her mind by sympathetic intuition, or has nothing in himself which makes her shy of disclosing it. Hardly anything, I believe, can be more rare than this conjunction. It often

happens that there is the most complete unity of feeling and community of interests as to all external things, yet the one has as little admission into the internal life of the other as if they were common acquaintance. Even with true affection, authority on the one side and subordination on the other prevent perfect confidence. Though nothing may be intentionally withheld, much is not shown. In the analogous relation of parent and child, the corresponding phenomenon must have been in the observation of everyone. As between father and son, how many are the cases in which the father, in spite of real affection on both sides, obviously to all the world does not know, nor suspect, parts of the son's character familiar to his companions and equals. The truth is, that the position of looking up to another is extremely unpropitious to complete sincerity and openness with him. The fear of losing ground in his opinion or in his feelings is so strong, that even in an upright character, there is an unconscious tendency to show only the best side, or the side which, though not the best, is that which he most likes to see: and it may be confidently said that thorough knowledge of one another hardly ever exists, but between persons who, besides being intimates, are equals. How much more true, then, must all this be, when the one is not only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other, but has it inculcated on her as a duty to reckon everything else subordinate to his comfort and pleasure, and to let him neither see nor feel anything coming from her, except what is agreeable to him. All these difficulties stand in the way of a man's obtaining any thorough knowledge even of the one woman whom alone, in general, he has sufficient opportunity of studying. When we further consider that to understand one woman is not necessarily to understand any other woman; that even if he could study many women of one rank, or of one country, he would not thereby understand women of other ranks or countries; and even if he did, they are still only the women of a single period of history;

we may safely assert that the knowledge which men can acquire of women, even as they have been and are, without reference to what they might be, is wretchedly imperfect and superficial, and always will be so, until women themselves have told all that they have to tell.

即便是两性之间现有何种差异这样初级的知识（先抛开它们是怎样成为现在这个状态的所有问题），也仍然处于最粗糙、最不完整的状态。医务人员和生理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确认了两性之间身体构成方面的差异；这对心理学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几乎没有医务人员是心理学家。至于女性的精神特征，他们的观察并不比普通人的观察更有价值。只要那些真正了解它的人，即女性自身，提供极少的证据，而这点证据大部分也是诱导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永远得不出最终结果。要了解愚蠢的女人很容易。世上的愚蠢差不多都一样。蠢人的观念和感情可以通过其周围圈子里流行的观念和感情可靠地推断出来。那些观念和感情源自其本性与才能的人则不同。很少有男性会对自己家里女性的性格有一定的了解。我不是指她们的潜能；没有人，甚至她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潜能，因为她们大部分的潜能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运用。我指的是她们实际拥有的思想和情感。很多人认为自己非常了解女性，因为他已经跟几个，或许跟很多女性都有过恋情。如果他善于观察，且其经历既有质量又有数量，那么他也许会了解她们天性中的一小部分——无疑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对于其他的一切，少数人通常更加无知，因为天性对这些少数人是小心翼翼地加以隐瞒的。通常，男性研究女性的性格，最有利的情况是研究自己的妻子：因为这样机会更多，而且完全同情的事例也不是少到无法言说。实际上，我认为，这一问题中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通常来源于此。但大部分男性都没有机会以这一方式来研究多个情况：因此，一个人可以从他对一般女性的意见中推断出一个男性的妻子是什么样子的，这几乎是很可笑的。即便为了使这种情况能取得结果，也要求这位女性必须值得了解，而这个男性不仅要是称职的评判员，而且其本身的性格要非常富有同情心，要非常适应这位女性的性格，以便他或通过

其富有同情心的直觉来洞察她的心思，或者让这位女性不会羞于面对自己，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思想。我认为，几乎没有任何事物能比这种结合更罕见。通常的情况是，他们对所有外界事物有着完全一致的情感和兴趣；然而，他们很少能进入彼此的内心世界，就像只是普通的熟人一样。即使有真正的爱情，一方的权威地位与另一方的从属地位也会妨碍彼此达到完全的信任。他们虽然可能不会有意隐瞒什么，但表露出来的也很少。在类似的亲子关系中，每个人必定都观察到了相应的现象。正如父子之间，多少情况都是如此，尽管父子间有着真正的亲情，但显然父亲根本不了解，也不怀疑儿子有某些性格，但这些性格对他的伙伴和同辈人来说却很熟悉。事实是，处在需要仰望别人的位置上是非常不利于对他人完全真诚相见和敞开心扉的。由于非常害怕在他的看法或情感中失去权威地位，因此即便在正直的性格中，也有一个下意识的趋势——只表现出最好的一面，或者，尽管不是最好的，但却是他最喜欢看到的一面：也许可以有把握地说，除了在既亲密、又平等的人之间外，几乎从来不存在双方对彼此彻底的了解。那么，当一个人不仅处在另一个人的权威之下，而且被不断地灌输这样的观点，即她的职责就是认定其他一切都要服从于他的舒适和享受，而且不能让他看到或感觉到有使他不快的东西时，所有这些又必定是多么真实啊！所有这些困难都妨碍男性彻底了解这一个即使一般说来他有足够机会去了解的女人。当我们进一步考虑到，理解一位女性并不一定说明理解了其他女性，而且即使他能了解一个等级的，或一个国家的很多女性，他也不能由此就了解其他等级或其他国家的女性；即便他都做到了，她们也仍然只是历史上某一个时期的女性；虽然很遗憾，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男性对女性的了解，即使只是关于她们的过去和现在，而不提及她们将来的样子，也是既不完全也很肤浅的，除非女性自己说出她们要说的一切，否则情况会一直这样下去。

And this time has not come; nor will it come otherwise than gradually. It is but of yesterday that women have either been qualified by literary accomplishments, or permitted by society, to

tell anything to the general public. As yet very few of them dare tell anything, which men, on whom their literary success depends, are unwilling to hear.

但这样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它只能逐渐到来。女性由于其文学成就而获得资格，或者得到社会许可，向公众讲话，也不过才是昨天的事。但很少有女性敢于说出男性不愿听的话——她们在文学上的成功要依赖男性。

Let us remember in what manner, up to a very recent time, the expression, even by a male author, of uncustomary opinions, or what are deemed eccentric feelings, usually was, and in some degree still is, received; and we may form some faint conception under what impediments a woman, who is brought up to think custom and opinion her sovereign rule, attempts to express in books anything drawn from the depths of her own nature. The greatest woman who has left writings behind her sufficient to give her an eminent rank in the literature of her country, thought it necessary to prefix as a motto to her boldest work, “Un hommepeut braver l'opinion; une femme doits'ysoumettre.“ [1_2] The greater part of what women write about women is mere sycophancy to men. In the case of unmarried women, much of it seems only intended to increase their chance of a husband. Many, both married and unmarried, overstep the mark, and inculcate a servility beyond what is desired or relished by any man, except the very vulgarest. But this is not so often the case as, even at a quite late period, it still was. Literary women are becoming more free-spoken, and more willing to express their real sentiments. Unfortunately, in this country especially, they are themselves such artificial products, that their sentiments are compounded of a small element of individual

observation and consciousness, and a very large one of acquired associations. This will be less and less the case, but it will remain true to a great extent, as long as social institutions do not admit the same free development of originality in women which is possible to men. When that time comes, and not before, we shall see, and not merely hear, as much as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of the nature of women, and the adaptation of other things to it.

我们要记住，直到最近，人们通常是，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仍然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接受即使是由男性作者表达出来的非传统观点，或被认为不寻常的情感的；因此，我们也许能形成一些模糊的概念，在其成长过程中将传统和意见作为最高统治规则的女性，试图在书里表达任何源自其内心深处的东西，会遇到什么样的阻碍。生前曾留下作品、足以让她在自己国内文学界赢得杰出地位的最伟大的女性认为，有必要在她最大胆的作品前面写上下面的句子作为座右铭：男人能够挑战舆论；女人必须顺从舆论 [2_2] 。女性写的关于女性的书，大部分只是对男性的阿谀奉承。至于未婚女性写的书，大部分似乎只是想增加给自己找个丈夫的机会。很多女性——包括已婚和未婚的——超越了界限，反复教导一种过分的屈从，甚至超过了男性（最低俗的男性除外）所渴望和喜爱的程度。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像以前，甚至更久远的一个时期那么多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女性说话更直率，更愿意表达她们的真情实感。不幸的是，尤其在这个国家，她们本身就是非自然的产物，因此她们的情感是混杂的，有一小部分个人观察和个人意识的成分，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与外界的联系。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但只要社会制度不允许女性像男性那样拥有同样发展独创性的自由，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还会维持下去。当这个时刻到来时，而非在此之前，我们不仅仅可以听到，还可以看到，了解女性天性并使其他事物来适应它的必要性。

I have dwelt so much on the difficulties which at present

obstruct any real knowledge by men of the true nature of women, because in this as in so many other things “opiniocopiæ inter maximascausasinopiæest”; [1_3] and there is little chance of reasonable thinking on the matter, while people flatter themselves that they perfectly understand a subject of which most men know absolutely nothing, and of which it is at present impossible that any man, or all men taken together, should have knowledge which can qualify them to lay down the law to women as to what is, or is not, their vocation. Happily, no such knowledge is necessary for any practical purpose connected with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relation to society and life. For, according to all the principles involved in modern society, the question rests with women themselves—to be decided by their own experience, and by the use of their own faculties. There are no means of finding what either one person or many can do, but by trying—and no means by which anyone else can discover for them what it is for their happiness to do or leave undone.

我说了很多目前妨碍男性准确了解女性真正天性的困难，因为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很多方面一样，“大众舆论在大部分事情上都不充分在大部分事情上都不充分” [2_3] ；在这件事上几乎没有理性的思考，可人们却自以为对其完全了解，然而大部分男性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而且目前无论是哪个男性，或者所有男性加在一起，都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足够多的知识，使他们有资格制定关于什么是，或什么不是女性职业的法律。所幸与女性社会和生活地位相关的实际目标并不需要这种知识。因为，根据现代社会所包含的所有原则，这一问题取决于女性本身——由她们利用自己的经验与才能来决定。除了尝试再没有其他方法能够知道一个人或者很多人能够做什么——别人也无法看出，为了她们的幸福，应该去做什么或者不去做什么。

One thing we may be certain of—that what is contrary to women's nature to do, they never will be made to do by simply giving their nature free play. The anxiety of mankind to interfere in behalf of nature, for fear lest nature should not succeed in effecting its purpose, is an altogether unnecessary solicitude. What women by nature cannot do, it is quite superfluous to forbid them from doing. What they can do, but not so well as the men who are their competitors, competition suffices to exclude them from; since nobody asks for protective duties and bounties in favour of women; it is only asked that the present bounties and protective duties in favour of men should be recalled. If women have a greater natural inclination for some things than for others, there is no need of laws or social inculcation to make the majority of them do the former in preference to the latter. Whatever women's services are most wanted for, the free play of competition will hold out the strongest inducements to them to undertake. And, as the words imply, they are most wanted for the things for which they are most fit; by the apportionment of which to them, the collective faculties of the two sexes can be applied on the whole with the greatest sum of valuable result.

也许我们能确定一件事情，即如果仅任凭女性的天性，要她们去做违反天性的事情，永远都做不成。人们由于害怕仅凭天性不能实现目标，因此急于以天性的名义横加干涉，这完全没有必要。禁止女性做她们天性不能做的事情，是多余的。而对她们能做，但做得没有其竞争者——男性——好的事情，竞争就足以把她们排除在外；没有人要求对女性有利的保护性义务和奖励，而只是要求取消目前对男性有利的奖励和保护性义务。如果女性对某些事情比对其他事情有更大的天然倾向性，那么根本不需要法律或社会的谆谆教导来让大部分女性去做前者而非后者。无论人们最想让女性提供什么服务，自由竞争都会给予她们最大的刺激去从事这种服务。那么，正如这些话所暗示

的，人们最想要的东西就是她们最适合做的；因此通过把最适合她们的工作分配给她们，男女两性的集体能力才能从整体上得到发挥，取得最有价值的结果。

The general opinion of men is supposed to be, that the natural vocation of a woman is that of a wife and mother. I say, is supposed to be, because, judging from acts—from the whole of the present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ne might infer that their opinion was the direct contrary. They might be supposed to think that the alleged natural vocation of women was of all things the most repugnant to their nature; insomuch that if they are free to do anything else—if any other means of living or occupation of their time and faculties, is open, which has any chance of appearing desirable to them—there will not be enough of them who will be willing to accept the condition said to be natural to them. If this is the real opinion of men in general, it would be well that it should be spoken out. I should like to hear somebody openly enunciating the doctrine (it is already implied in much that is written on the subject)—“It is necessary to society that women should marry and produce children. They will not do so unless they are compell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mpel them.“The merits of the case would then be clearly defined. It would be exactly that of the slave-holders of South Carolina and Louisiana.” It is necessary that cotton and sugar should be grown. White men cannot produce them. Negroes will not, for any wages which we choose to give. *Ergo* they must be compelled.” An illustration still closer to the point is that of impressment. Sailors must absolutely be had to defend the country. It often happens that they will not voluntarily enlist. Therefore there must be the power of forcing them. How often has this logic been used! and, but for one flaw in it, without doubt it would have been successful up to this day. But it is open to the retort—First pay

the sailors the honest value of their labour. When you have made it as well worth their while to serve you, as to work for other employers, you will have no more difficulty than others have in obtaining their services. To this there is no logical answer except “I will not”: and as people are now not only ashamed, but are not desirous, to rob the labourer of his hire, impressment is no longer advocated. Those who attempt to force women into marriage by closing all other doors against them, lay themselves open to a similar retort. If they mean what they say, their opinion must evidently be, that men do not render the married condition so desirable to women, as to induce them to accept it for its own recommendations. It is not a sign of one's thinking the boon one offers very attractive, when one allows only Hobson's choice, “that or none.” And here, I believe, is the clue to the feelings of those men, who have a real antipathy to the equal freedom of women. I believe they are afraid, not lest women should be unwilling to marry, for I do not think that anyone in reality has that apprehension; but lest they should insist that marriage should be on equal conditions; lest all women of spirit and capacity should prefer doing almost anything else, not in their own eyes degrading, rather than marry, when marrying is giving themselves a master, and a master too of all their earthly possessions. And truly, if this consequence were necessarily incident to marriage, I think that the apprehension would be very well founded. I agree in thinking it probable that few women, capable of anything else, would, unless under an irresistible *entraînement* , rendering them for the time insensible to anything but itself, choose such a lot, when any other means were open to them of filling a conventionally honourable place in life: and if men are determined that the law of marriage shall be a law of despotism, they are quite right, in point of mere policy, in leaving to women only Hobson's choice. But, in that case, all that has been done in the modern world to relax the chain on

the minds of women, has been a mistake. They never should have been allowed to receive a literary education. Women who read, much more women who write, are, in the existing constitution of things, a contradiction and a disturbing element: and it was wrong to bring women up with any acquirements but those of an odalisque, or of a domestic servant.

男性一般的看法应该是，女性的天职就是做贤妻良母。我说“应该是”是因为，从他们的行为——从目前整个社会的构成——来看，我们可以推断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也许应该认为，所谓的女性天职是所有事物里面最违反她们天性的；以至于，如果她们可以自由地去做其他任何事情——如果任何别的对她们有吸引力的谋生方式或适合她们时间和才能的职业对她们开放的话——那么将不会有很多女性愿意接受据说对她们来说是自然的条件。假如这是一般男性的真实意见，如果能说出来就好了。我倒是想听听有人公开宣扬这个信条（很多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都已经暗示了）——“社会需要女性结婚、生子。但除非被迫，否则她们不会这么做。因此必须强迫她们。”然后，这件事情的真相就会得到清晰的说明。这与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奴隶主的情况一模一样。“必须要种棉花和甘蔗。白人不能种。而黑人，无论我们给多少工钱，都不愿去种。因此必需强迫他们。”一个更恰当的例子是强制服兵役。必须要有水手来保卫国家。但情况常常是，他们不会自愿服役。因此，必须有强制征兵的权力。人们是多么经常地运用这个逻辑啊！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它存在缺陷，这个逻辑无疑到今天仍然是成功的。但它却遭到了反击——首先是根据水手劳动的正当价值付给他们工钱。当你使他们感到，为你服务跟为其他雇主服务一样值得时，你要得到他们的服务时就不会比别人更难。对此，除了“我不愿意”，就没有其他合理答案了：由于人们现在不仅羞于，而且不想去掠夺劳动者的工资，因此已经不再强制服兵役了。那些把女性其他所有发展渠道都封闭，试图将她们逼入婚姻的人，自己也面临着同样的反击。如果他们说的是真心话，那么显然，这些男性没有提供女性渴望的婚姻条件，而是以自身优势引诱

她们接受这些条件。当人们没有选择余地——“要么这个，要么没有”时，他们不会觉得提供给他们的这个恩惠很有吸引力。我认为，这就是理解那些男性情感的线索，他们对女性的平等自由有着真实的反感。我认为，他们并非害怕女性不愿结婚（因为我认为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担心）；而是害怕她们会坚持在平等的基础上结婚；害怕当结婚只是给自己，以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找一个主人的时候，所有有勇气和才能的女性更愿意做其他几乎任何事情（且她们并不认为这些事情可耻），而不愿结婚。的确，如果这是婚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那么我认为这种担心将是很有根据的。我同意这种想法：多多少少能做其他事情、而且只要有其他方式能让她们在生活中获得传统上有尊严的地位的，女性就很少会选择这样一种命运，除非她们受到不可抗拒的牵制，暂时察觉不到其他事情；而如果男性坚决认为，婚姻法应该是一部专制法，那么仅从政策上看，他们不给女性选择的余地是很正确的。然而，如果这样的话，现代世界为解开束缚女性精神的锁链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根本不该允许她们接受文学教育。在现存的事物制度下，读书的女性，更多从事写作的女性，就是一个矛盾和不安定因素：培养有学识的女性是错误的，只要培养一个女奴或女仆就可以了。

[1_1].burden

[1_2]."A man can defy public opinion; a woman must submit to it." From the title page of Mme. de Staël's *Delphine* .

[1_3]."General opinion is inadequate on most matters."

[2_1].“Burthen”同“burden”，负担。

[2_2].引自斯塔尔夫人的长篇小说《黛尔菲娜》的扉页。

[2_3].原文为古法文。

CHAPTER II

第二章

It will be well to commence the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subject by the particular branch of it to which the course of our observations has led us: the conditions which the laws of this and all other countries annex to the marriage contract. Marriage being the destination appointed by society for women, the prospect they are brought up to, and the object which it is intended should be sought by all of them, except those who are too little attractive to be chosen by any man as his companion; one might have supposed that everything would have been done to make this condition as eligible to them as possible, that they might have no cause to regret being denied the option of any other. Society, however, both in this, and, at first, in all other cases, has preferred to attain its object by foul rather than fair means: but this is the only case in which it has substantially persisted in them even to the present day. Originally women were taken by force, or regularly sold by their father to the husband. Until a late period in European history, the father had the power to dispose of his daughter in marriage at his own will and pleasure, without any regard to hers. The Church, indeed, was so far faithful to a better morality as to require a formal “yes” from the woman at the marriage ceremony;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show that the consent was other than compulsory; and it was practically impossible for the girl to refuse compliance if the father persevered, except perhaps when she might obtain the protection of religion by a determined resolution to take monastic vows. After marriage, the man had anciently (but this was anterior to Christianity) th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over his wife. She could invoke no law against

him; he was her sole tribunal and law. For a long time he could repudiate her, but she had no corresponding power in regard to him. By the old laws of England, the husband was called the lord of the wife; he was literally regarded as her sovereign, inasmuch that the murder of a man by his wife was called treason (*petty* as distinguished from *high* treason), and was more cruelly avenged than was usually the case with high treason, for the penalty was burning to death. Because these various enormities have fallen into disuse (for most of them were never formally abolished, or not until they had long ceased to be practised) men suppose that all is now as it should be in regard to the marriage contract; and we are continually told that civilisation and Christianity have restored to the woman her just rights. Meanwhile the wife is the actual bond-servant of her husband: no less so, as far as legal obligation goes, than slaves commonly so called. She vows a lifelong obedience to him at the altar, and is held to it all through her life by law. Casuists may say that the obligation of obedience stops short of participation in crime, but it certainly extends to everything else. She can do no act whatever but by his permission, at least tacit. She can acquire no property but for him; the instant it becomes hers, even if by inheritance, it becomes *ipso facto* his. In this respect the wife's under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is worse than that of slaves in the laws of many countries: by the Roman law, for example, a slave might have his peculium,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law guaranteed to him for his exclusive use. The higher classes in this country have given an analogous advantage to their women, through special contracts setting aside the law, by conditions of pin-money, etc. : since parental feeling being stronger with fathers than the class feeling of their own sex, a father generally prefers his own daughter to a son-in-law who is a stranger to him. By means of settlements, the rich usually contrive to withdraw the whole or part of the inherited property of the wife from the absolute control of

the husband: but they do not succeed in keeping it under her own control; the utmost they can do only prevents the husband from squandering it, at the same time debarring the rightful owner from its use. The property itself is out of the reach of both; and as to the income derived from it, the form of settlement most favourable to the wife (that called “to her separate use”) only precludes the husband from receiving it instead of her: it must pass through her hands, but if he takes it from her by personal violence as soon as she receives it, he can neither be punished, nor compelled to restitution. This is the amount of the protection which, under the laws of this country, the most powerful nobleman can give to his own daughter as respects her husband. In the immense majority of cases there is no settlement: and the absorption of all rights, all property, as well as all freedom of action, is complete. The two are called “one person in law,” for the purpose of inferring that whatever is hers is his, but the parallel inference is never drawn that whatever is his is hers; the maxim is not applied against the man, except to make him responsible to third parties for her acts, as a master is for the acts of his slaves or of his cattle. I am far from pretending that wives are in general no better treated than slaves; but no slave is a slave to the same lengths, and in so full a sense of the word, as a wife is. Hardly any slave, except one immediately attached to the master's person, is a slave at all hours and all minutes; in general he has, like a soldier, his fixed task, and when it is done, or when he is off duty, he disposes, within certain limits, of his own time, and has a family life into which the master rarely intrudes.” Uncle Tom” under his first master had his own life in his “cabin,” almost as much as any man whose work takes him away from home, is able to have in his own family. But it cannot be so with the wife. Above all, a female slave has (in Christian countries) an admitted right, and is considered under a moral obligation, to refuse to her master the last familiarity. Not so the wife: however

brutal a tyrant she may unfortunately be chained to—though she may know that he hates her, though it may be his daily pleasure to torture her, and though she may feel it impossible not to loathe him—he can claim from her and enforce the lowest degradation of a human being, that of being made the instrument of an animal function contrary to her inclinations. While she is held in this worst description of slavery as to her own person, what is her position in regard to the children in whom she and her master have a joint interest? They are by law his children. He alone has any legal rights over them. Not one act can she do towards or in relation to them, except by delegation from him. Even after he is dead she is not their legal guardian, unless he by will has made her so. He could even send them away from her, and deprive her of the means of seeing or corresponding with them, until his power was in some degree restricted by Serjeant Talfourd's Act. This is her legal state. And from this state she has no means of withdrawing herself. If she leaves her husband, she can take nothing with her, neither her children nor anything which is rightfully her own. If he chooses, he can compel her to return, by law, or by physical force; or he may content himself with seizing for his own use anything which she may earn, or which may be given to her by her relations. It is only legal separation by a decree of a court of justice, which entitles her to live apart, without being forced back into the custody of an exasperated jailer—or which empowers her to apply any earnings to her own use, without fear that a man whom perhaps she has not seen for twenty years will pounce upon her some day and carry all off. This legal separation, until lately, the courts of justice would only give at an expense which made it inaccessible to anyone out of the higher ranks. Even now it is only given in cases of desertion, or of the extreme of cruelty; and yet complaints are made every day that it is granted too easily. Surely, if a woman is denied any lot in life but that of being the personal body-servant of a despot, and is

dependent for everything upon the chance of finding one who may be disposed to make a favourite of her instead of merely a drudge, it is a very cruel aggravation of her fate that she should be allowed to try this chance only once. The natural sequel and corollary from this state of things would be, that since her all in life depends upon obtaining a good master, she should be allowed to change again and again until she finds one. I am not saying that she ought to be allowed this privilege. That is a totally different consideration. The question of divorce, in the sense involving liberty of remarriage, is one into which it is foreign to my purpose to enter. All I now say is, that to those to whom nothing but servitude is allowed, the free choice of servitude is the only, though a most insufficient, alleviation. Its refusal completes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wife to the slave—and the slave under not the mildest form of slavery: for in some slave codes the slave could,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of ill usage, legally compel the master to sell him. But no amount of ill usage, without adultery superadded, will in England free a wife from her tormentor.

要详尽探讨这一问题，最好从我们研究过程所引向的特定方面开始：即这个国家以及其他所有国家的法律附加在婚姻契约上的条件。婚姻是社会为女性指定的命运，是女性成长的目标，除了那些相貌太差，不会被任何男人选中作为伴侣的女性外，所有女性都应该寻找结婚对象。人们也许认为，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使女性对这一条件称心如意，这样她们可能就没有理由对没有其他选择而感到后悔了。然而，社会——在这个问题上，以及最初在所有其他问题上——都倾向于使用恶劣而非公平的手段来达成其目标：但唯独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坚持这样做，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最初，女性被强抢，或被其父按传统习俗卖给丈夫。直到欧洲历史上很晚的一个时期，父亲仍然有权凭自己的意愿和喜好将女儿嫁掉，根本不考虑女儿的意愿。教会确实仍然忠于较好的道德准则，要求女性在婚礼上正式

说出“我愿意”，但没有任何事实表明，这种意愿不是被迫的。如果父亲坚持，一个女孩几乎不可能拒绝服从，除非也许她下定决心，宣誓修道，从而得到宗教的保护。古时候（在基督教之前），男人在婚后握有对妻子的生杀大权。她不能控告丈夫，因为他是她唯一的裁判和法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丈夫可以休掉妻子，但妻子对他却没有相应的权力。按英格兰旧法，丈夫被称为妻子的领主；实际上丈夫被视为妻子的最高统治者，因为妻子杀害丈夫被称为叛逆（有别于“弑君”或“叛国”的“小”叛逆），而且其惩罚是火刑，与弑君或叛国相比，这种刑罚更为残酷。由于诸如此类的酷刑已经废弃（因为大部分都从未正式废除过，或直到早就废弃不用后才废除的），于是男人认为，在婚姻契约上，现在的状态就理应如此，我们也不断被告知，文明和基督教已经将女性的正当权益还给她们了。同时，妻子却是其丈夫事实上的家奴：就法律义务而言，一点都不比通常我们所谓的奴隶少。她在神坛上宣誓，要一生一世服从他，法律规定她要一生遵从她的誓言。诡辩家们也许会说，服从的义务不适用于参与犯罪，但在其他事情上肯定都适用。没有他的允许，或至少是默许，她什么都不能做。如果不是为了丈夫，她不能获得任何财产；财产在属于她的瞬间，即使是继承来的，也会立刻为丈夫所有。在这方面，英格兰普通法下的妻子的处境比很多国家的法律中奴隶的处境还要悲惨：例如，根据罗马法，奴隶可以有私产，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他独自享用。这个国家的上层通过订立法律之外的特殊契约，以零花钱等形式给他们的女性一种类似的利益：由于父亲的父女之情比对同性的阶级感情要强烈，所以父亲一般更偏爱自己的女儿，而不是作为陌生人的女婿。富有者通常通过财产授予契约，设法将妻子继承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从丈夫的绝对支配下撤出来：但他们无法让妻子支配这些财产；最多只能是防止丈夫将其挥霍掉，但同时也阻止了合法的拥有者享用。财产本身是双方都不能得到的；至于其衍生的收入，对妻子最有利的（叫做“供她单独使用”）转让契约形式也只是阻止丈夫代替妻子拿到它：该契约必须要经她的手，但如果丈夫在她刚拿到时就使用个人暴力抢走，那么他既不会受到惩罚，也不会被强迫归还。这就是在这个国家的法律下，最有权力的贵族能够给予女儿针对其丈夫的一点儿保护。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财产授予契约的：所有权力，所有财产，以及

所有行动自由被完全合并。夫妻二人被称为“法律上的一个人”，目的是为了推导出妻子的一切都是丈夫的，但却从来没有并行推理，即丈夫的一切都是妻子的；除了使丈夫为妻子对第三方的行为负责（就像主人要为其奴隶或家畜的行为负责一样）外，这一准则不会用来对抗男人。我绝非假装认为，妻子的一般待遇并不比奴隶好；但没有一个奴隶能像妻子那样，竭尽所能体现了奴隶一词的全部含义。除了同主人本人直接相连的奴隶外，几乎没有任何奴隶，是时时刻刻都在为他人服务的奴隶；通常，奴隶像士兵一样，有自己固定的任务，当他完成任务或下班后，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而且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主人很少干预。“汤姆叔叔”在第一个主人那里时，在他的“小屋”里有着自己的生活，几乎跟任何要离开家去工作的人一样，能够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但妻子却不能这样。最重要的是，女奴隶（在基督教国家）有一项公认的权利，并被认为是道德上的责任，即拒绝其主人过分的亲密行为。妻子则不然：无论她多么不幸地跟残忍的暴君拴在了一起——尽管她可能知道他恨她，尽管折磨她可能是他每天的享受，尽管她可能感到自己厌恶他——他都可以违反她的意愿，强迫她做人类最堕落的事情，成为他发泄兽欲的工具。就她本人来讲，她处在这样一种最悲惨的奴隶状态，那么在她和主人有着共同利益的孩子这里，她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在法律上，他们是他的孩子。他独自拥有对孩子的所有法律权利。她不能对他们或与他们相关的事有任何行动，除非有丈夫的授权。即使丈夫死后，她也不是孩子们的合法监护人，除非丈夫在遗嘱中给她这种权利。他甚至可以把孩子从她身边送走，剥夺她与孩子见面或通信的手段，直到萨金特•塔尔福德法案出现后，丈夫的权力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这就是她的法律地位。她自己无法摆脱这种地位。如果她离开丈夫，她不能带走任何东西，包括孩子，以及任何应该属于她个人的东西。他可以选择用法律手段或用暴力强迫她回来；或者，他可能将她可能挣到的或其亲友送给她的任何东西据为己用，来获得满足。只有法庭判决了合法离异，她才能分开居住，才不会强制回去受愤怒的狱卒的监管；她才能享用自己挣来的东西，而不用担心某一天会被一个也许有二十年没见面的男人抢走。直到最近，法庭却只将这种合法离异判给能够支付得起费用的高等人士。甚至现在也仅在遗弃或极度残暴的情况下才会

判决离异；然而每天都有人控诉，说离异判得太容易了。当然，如果除了做暴君的贴身奴仆，一切都要靠有机会找到一个喜欢她、而不仅把她当成苦工的男人外，女性没有其他命运可言的话，那么给予她一次机会只能使她的命运更悲惨。这种状况自然及必然的结果将是，既然她生活中的一切都要靠找到一位好主人，那么应该允许她一次又一次地更换，直到她找到为止。我并非说她应该得到这种特权。这是完全不同的考虑因素。涉及自由再婚的离婚问题并非我的研究目的。我现在要说的只是：对那些只能受奴役的人来说，能够选择被谁奴役的自由是唯一的安慰，虽然这种安慰远远不够。拒绝给予这种自由选择就使妻子与奴隶完全等同了，而且还不是处于最温和的奴隶制下的奴隶：因为在有些奴隶法规中，如果奴隶受到某些虐待，可以依法强迫其主人卖掉他。但在英格兰，无论怎样的虐待，只要不加上通奸，都不能将妻子从她的摧残者那里解放出来。

I have no desire to exaggerate, nor does the case stand in any need of exaggeration. I have described the wife's legal position, not her actual treatment. The laws of most countries are far worse than the people who execute them, and many of them are only able to remain laws by being seldom or never carried into effect. If married life were all that it might be expected to be, looking to the laws alone, society would be a hell upon earth. Happily there are both feelings and interests which in many men exclude, and in most, greatly temper, the impulses and propensities which lead to tyranny: and of those feelings, the tie which connects a man with his wife affords, in a normal state of things, incomparably the strongest example. The only tie which at all approaches to it, that between him and his children, tends, in all save exceptional cases, to strengthen, instead of conflicting with, the first. Because this is true; because men in general do not inflict, nor women suffer, all the misery which could be inflicted and suffered if the full power of tyranny with which the man is legally invested were acted on; the

defenders of the existing form of the institution think that all its iniquity is justified, and that any complaint is merely quarrelling with the evil which is the price paid for every great good. But the mitigations in practice, which are compatible with maintaining in full legal force this or any other kind of tyranny, instead of being any apology for despotism, only serve to prove what power human nature possesses of reacting against the vilest institutions, and with what vitality the seeds of good as well as those of evil in human character diffuse and propagate themselves. Not a word can be said for despotism in the family which cannot be said for political despotism. Every absolute king does not sit at his window to enjoy the groans of his tortured subjects, nor strips them of their last rag and turns them out to shiver in the road. The despotism of Louis XVI was not the despotism of Philippe le Bel, or of Nadir Shah, or of Caligula; but it was bad enough to justify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o palliate even its horrors. If an appeal be made to the intense attachments which exist between wives and their husbands, exactly as much may be said of domestic slavery. It was quite an ordinary fact in Greece and Rome for slaves to submit to death by torture rather than betray their masters. In the proscriptions of the Roman civil wars it was remarked that wives and slaves were heroically faithful, sons very commonly treacherous. Yet we know how cruelly many Romans treated their slaves. But in truth these intense individual feelings nowhere rise to such a luxuriant height as under the most atrocious institutions. It is part of the irony of life, that the strongest feelings of devoted gratitude of which human nature seems to be susceptible, are called forth in human beings towards those who, having the power entirely to crush their earthly existence, voluntarily refrain from using that power. How great a place in most men this sentiment fills, even in religious devotion, it would be cruel to inquire. We daily see how much their gratitude to Heaven appears to be stimulated by the contemplation of fellow-

creatures to whom God has not been so merciful as he has to themselves.

我不想夸大其词，这种情况也无需夸大其词。我描述了妻子的法律地位，并非她实际受到的对待。大部分国家的法律都远比执法的人要糟糕，很多法律之所以还能持续下去，只是因为很少或从未实施过。如果婚姻生活像法律所期望的那样（单从法律上说），那么社会将成为人间地狱。幸运的是，某些感情和兴趣排除了很多男人、并大大缓和了多数男人身上暴虐的冲动和倾向：在正常情况下，连接丈夫和妻子的纽带是在这些感情中一个无可比拟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在所有与之类似的纽带中，唯一一根——即他跟孩子之间的纽带，在所有情况下（特殊情况除外），都倾向于加固第一种纽带，而非与之冲突。因为这是事实；也因为男人普遍不会行使他依法获得的所有暴虐权力，从而不会导致、而女性也不会遭受他行使这种权力所带来的一切痛苦；现行制度模式下的守卫者认为，其所有不公正都是正当的，任何对它的控诉只是在与邪恶争吵，而这邪恶就是每做一件大好事所要付出的代价。但实际上的缓和行为，却跟法律完全维持这种或其他任何一种暴虐并存，它并非为专制统治道歉，相反，它只是证明，人类天性在与最恶劣的制度斗争时有何等的力量，证明人类性格里面善与恶的种子在以多大的生命力传播、繁衍。描述家庭专制的词汇完全可以用来谈论政治专制。没有一个专制君主会坐在窗前，欣赏被他迫害的臣民的呻吟，或者扯掉他们身上最后一块布，把他们赶到街上冻得发抖。路易十六的暴政不同于腓力四世、纳迪尔•沙阿，或卡利古拉的暴政，但要为法国大革命辩护，甚至宽容其恐怖性也够不可取的。如果要诉诸夫妻之间的强烈情感的话，那么在家庭奴隶制中也完全可以这么说。奴隶宁肯受酷刑折磨而死也不背叛主人，这在希腊和罗马是很平常的事。在罗马内战中剥夺公权的公告里，人们注意到，妻子和奴隶都是英勇和忠诚的，而儿子却通常背信弃义。然而，我们也知道很多罗马人是如何残酷对待其奴隶的。但事实上，这些强烈的个人情感无论在哪里，都达不到在最残暴制度下情感的丰富程度。那种似乎很容易影响人性的、最强烈的忠诚感恩之情，能在人身

上被唤起、并倾注于那些拥有完全摧毁他们的权力而又自愿放弃使用这种权力的人身上，这是生活的一种讽刺。如果要问这种情感在大部分人身上，甚至在宗教的虔诚中，占多大的位置，将是很残忍的。我们每天都看见，他们对上天的感恩在很大程度上看起来是受到他们同胞的感悟而激起的——而上帝对这些同胞并没有比对他们自己仁慈。

Whether the institution to be defended is slavery, political absolutism, or the absolutism of the head of a family, we are always expected to judge of it from its best instances; and we are presented with pictures of loving exercise of authority on one side, loving submission to it on the other—superior wisdom ordering all things for the greatest good of the dependents, and surrounded by their smiles and benedictions. All this would be very much to the purpose if anyone pretended that there are no such things as good men. Who doubts that there may be great goodness, and great happiness, and great affection, under the absolute government of a good man? Meanwhile, laws and institutions require to be adapted, not to good men, but to bad. Marriage is not an institution designed for a select few. Men are not required, as a preliminary to the marriage ceremony, to prove by testimonials that they are fit to be trusted with the exercise of absolute power. The tie of affection and obligation to a wife and children is very strong with those whose general social feelings are strong, and with many who are little sensible to any other social ties; but there are all degrees of sensibility and insensibility to it, as there are all grades of goodness and wickedness in men, down to those whom no ties will bind, and on whom society has no action but through its *ultima ratio* , the penalties of the law. In every grade of this descending scale are men to whom are committed all the legal powers of a husband. The vilest malefactor has some wretched woman tied to him, against whom he can commit any atrocity except killing her, and, if

tolerably cautious, can do that without much danger of the legal penalty. And how many thousands are there among the lowest classes in every country, who, without being in a legal sense malefactors in any other respect, because in every other quarter their aggressions meet with resistance, indulge the utmost habitual excesses of bodily violence towards the unhappy wife, who alone, at least of grown persons, can neither repel nor escape from their brutality; and towards whom the excess of dependence inspires their mean and savage natures, not with a generous forbearance, and a point of honour to behave well to one whose lot in life is trusted entirely to their kindness, but on the contrary with a notion that the law has delivered her to them as their thing, to be used at their pleasure, and that they are not expected to practise the consideration towards her which is required from them towards everybody else. The law, which till lately left even these atrocious extremes of domestic oppression practically unpunished, has within these few years made some feeble attempts to repress them. But its attempts have done little, and cannot be expected to do much, because it is contrary to reason and experience to suppose that there can be any real check to brutality, consistent with leaving the victim still in the power of the executioner. Until a conviction for personal violence, or at all events a repetition of it after a first conviction, entitles the woman *ipso facto* to a divorce, or at least to a judicial separation, the attempt to repress these “aggravated assaults” by legal penalties will break down for want of a prosecutor, or for want of a witness.

无论要桿卫的是奴隶制度、政治专制制度、还是家长专制制度，人们总是期望我们从其最好的事例来评价这一制度；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一方面是仁慈地施行权威；另一方面是忠实地服从权威——优越的智者为满足其依附者的最大利益而发号施令，并博得他们

的笑容和祝福。如果所有人都假装认为世界上没有好人的话，就达到了上述目的。有谁会怀疑，在一个好人的专制统治下，可能会存在高尚的美德、巨大的幸福、以及伟大的感情呢？同时，法律和制度要求要适应坏人，而非好人。婚姻不是只为几个精选出来的人设计的制度。在举行婚礼前，并不要求男人有证书证明，他们适合受到委托来行使专制权力。一般社会感很强的人，与妻儿之间感情和义务上的纽带也会很强，对其他社会纽带不敏感的人也是这样；然而对这种纽带也有各种级别的敏感性和不敏感性，正如人有各种级别的善良和邪恶一样，最低级的是那些不受任何纽带约束的人，社会除了通过最后手段，即法律惩罚外无法再采取其他行动。在这一下行趋势中，每一级上的男人都拥有做丈夫的一切合法权利。最卑鄙的罪犯也有某个可怜的女性跟他结合，除了不能杀她外，他对她可以施行任何暴行，而且，如果他稍加谨慎，就不会有受到法律惩罚的危险。在每个国家最底层的人中，有成千上万个男人在其他方面，从法律意义上讲并不是罪犯，因为在其他任何地方，他们的侵犯都会遇到抵抗。但他们却放纵自己对不幸的妻子施行习惯性的、最极端的肉体暴虐行为，而只有后者（至少是成人），既不能反抗，也无法逃避他们的暴行。妻子的过分依赖激起了他们卑鄙野蛮的本性；对于将命运完全寄托于丈夫仁慈心的女人，他们没有大度的耐性，也不必顾及体面对待她们；相反，他们认为，法律将女人作为他们的所有物交给他们，供其随意使用，而且人们不会期望他们像对其他人那样体谅她。甚至时至今日，法律对这些极端残忍的家庭暴行都没有进行惩处；只是近几年才做了些软弱的尝试，试图制止这些暴行。但这些尝试没起到什么作用，而且也不能指望它们有什么作用，因为只要受害者仍然处于虐待者的暴力之下，就会认为能真正阻止暴行有悖理性和经验。以法律惩处来制止这些“严重侵害行为”的尝试，将会由于缺少原告或目击证人而失败，除非个人暴力侵害的判决，或无论如何，在第一次判决后的重判能使女性根据事实得以离婚，或至少得到法庭判决的分居。

When we consider how vast is the number of men, in any great country, who are little higher than brutes, and that this never

prevents them from being able, through the law of marriage, to obtain a victim,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human misery caused in this shape alone by the abuse of the institution swells to something appalling. Yet these are only the extreme cases. They are the lowest abysses, but there is a sad succession of depth after depth before reaching them. In domestic as in political tyranny, the case of absolute monsters chiefly illustrates the institution by showing that there is scarcely any horror which may not occur under it if the despot pleases, and thus setting in a strong light what must be the terrible frequency of things only a little less atrocious. Absolute fiends are as rare as angels, perhaps rarer: ferocious savages, with occasional touches of humanity, are however very frequent: and in the wide interval which separates these from any worth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human species, how many are the forms and gradations of animalism and selfishness, often under an outward varnish of civilisation and even cultivation, living at peace with the law, maintaining a creditable appearance to all who are not under their power, yet sufficient often to make the lives of all who are so, a torment and a burthen to them!It would be tiresome to repeat the commonplaces about the unfitness of men in general for power, which, after the political discussions of centuries, everyone knows by heart, were it not that hardly anyone thinks of applying these maxims to the case in which above all others they are applicable, that of power, not placed in the hands of a man here and there, but offered to every adult male, down to the basest and most ferocious. It is not because a man is not known to have broken any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or because he maintains a respectable character in his dealings with those whom he cannot compel to have intercourse with him, or because he does not fly out into violent bursts of ill-temper against those who are not obliged to bear with him, that it is possible to surmise of what sort his conduct will be in the unrestraint of home. Even the commonest men reserve the violent,

the sulky, theundisguisedly selfish side of their character for those who have no power to withstand it. The relation of superiors to dependents is the nursery of these vices of character, which, wherever else they exist, are an overflowing from that source. A man who is morose or violent to his equals, is sure to be one who has lived among inferiors, whom he could frighten or worry into submission. If the family in its best forms is, as it is often said to be, a school of sympathy, tenderness, and loving forgetfulness of self, it is still oftener, as respects its chief, a school of wilfulness, overbearingness, unbounded selfish indulgence, and a double-dyed and idealised selfishness, of which sacrifice itself is only a particular form: the care for the wife and children being only care for them as parts of the man's own interests and belongings, and their individual happiness being immolated in every shape to his smallest preferences. What better is to be looked for under the existing form of the institution? We know that the bad propensities of human nature are only kept within bounds when they are allowed no scope for their indulgence. We know that from impulse and habit, when not from deliberate purpose, almost everyone to whom others yield, goes on encroaching upon them, until a point is reached at which they are compelled to resist. Such being the common tendency of human nature; the almost unlimited power which present social institutions give to the man over at least one human being—the one with whom he resides, and whom he has always present—this power seeks out and evokes the latent germs of selfishness in the remotest corners of his nature—fans its faintest sparks and smouldering embers—offers to him a licence for the indulgence of those points of his original character which in all other relations he would have found it necessary to repress and conceal, and the repression of which would in time have become a second nature. I know that there is another side to the question. I grant that the wife, if she cannot effectually resist, can at least retaliate; she, too,

can make the man's life extremely uncomfortable, and by that power is able to carry many points which she ought, and many which she ought not, to prevail in. But this instrument of self-protection—which may be called the power of the scold, or the shrewish sanction—has the fatal defect, that it avails most against the least tyrannical superiors, and in favour of the least deserving dependents. It is the weapon of irritable and self-willed women; of those who would make the worst use of power if they themselves had it, and who generally turn this power to a bad use. The amiable cannot use such an instrument, the highminded disdain it.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husbands against whom it is used most effectively are the gentler and more inoffensive; those who cannot be induced, even by provocation, to resort to any very harsh exercise of authority. The wife's power of being disagreeable generally only establishes a counter-tyranny, and makes victims in their turn chiefly of those husbands who are least inclined to be tyrants.

当我们考虑到，在任何伟大的国家，有多少与禽兽无异的男人都能够通过婚姻法顺利获得一个牺牲品时，仅由滥用这一制度的方式造成的人类悲剧，其广度和深度就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然而，这些只是很极端的情况。他们处在最底层的深渊，但可悲的是，在触底之前，还有一层接一层的深渊。家庭暴虐犹如政治暴政，专制恶魔的例子主要说明了这个制度的情况，它表明，在这一制度下，只要暴君愿意，什么样的恐怖事件都可能发生，从而让人们看清了，程度轻微的暴行必定在以可怕的频率发生着。绝对的魔鬼正如绝对的天使一样罕见，也许更少，然而，偶尔带点人性的凶猛的野蛮人却很常见：这样的人和值得尊敬的人类代表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在这鸿沟中，有多少种形式和类别的兽性和自私，经常在文明甚至有教养的外表掩饰下，与法律和平共处；在不属于他们统治下的所有人面前保持着值得称赞的外表，却常常足以将其统治下的所有人的生活变成一种折磨，

一种负担！要重复一般人不适合拥有权力这样的老生常谈将会令人感到厌倦，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政治讨论后，人人都记住了，然而几乎无人想到将这些格言运用于这种情况：即在所有其他可以运用权力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随便将权力交给某个男性，而是赋予每个成年男性，直到最底层、最残忍的人。这并非因为人们不知道一个男人已经违背了《圣经》十诫，或是因为他在同他不能强迫与之交往的人打交道时保持了可敬的品格，或是因为他不对没有义务容忍他的人发脾气，人们就可能猜想他在没有制约的家里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即使最普通的男人也会将他们性格中粗暴、阴沉以及不加掩饰的自私的一面展现给那些没有力量反抗的人。高高在上者和依附者之间的关系是这些恶劣性格的温床，这些性格无论在其他什么地方存在，都来源于此。一个人如果对与他同等的人脾气暴躁或者行为粗暴，那他一定与不如他的人一起生活过，他可以恐吓或骚扰他们，使他们服从。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如果状态最好的家庭是一所同情、温存、和慈爱忘我的学校，那么对于一家之长，它更倾向于是一所任性、专横、无节制的自私放纵，以及根深蒂固和理想化的自私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牺牲本身只是一种特定的形式：照顾妻儿相当于照顾男人的部分利益和财产，为了他最小的喜好，就以各种形式牺牲他们的个人幸福。在现有的制度形式下，还能期望找到什么更好的呢？我们知道，人性中坏的倾向只有在没有机会放纵时才能有所节制。我们知道，几乎每个人都是出于感情冲动和习惯，而不是仔细考虑过后，继续侵犯屈服于他的人，直到他们被迫反抗为止。这就是人类天性的共同倾向；现有社会制度赋予男性的这种几乎无限的权力至少可以统治一个人——那个跟他住在一起的人，总是在他面前的人——这种权力可从他天性最偏僻的角落里找到并唤起了隐藏着的自私自利的萌芽，把它最微弱的火花和焖烧的余烬都扇了起来，准许他放纵其原始性格中的那些特点，但在其他各种关系中，他会发现有必要抑制并隐藏这些特点，而这种抑制经过一段时间后将会成为第二天性。我知道，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我承认，如果妻子不能有效地反抗，至少她可以进行报复；她也可以让这个男人不好过，运用这种力量，她能让很多她应有或不应有的很多特点占据优势。但这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可以叫做责骂力量，或者泼妇制裁——有着致命的缺陷，即它对最不暴虐的

统治者最有效，对最不值得帮助的依附者有利。它是易怒、任性的女性的武器；是一旦有权就滥用权力并通常用权力来做坏事的人的武器。和蔼亲切的人不能使用这种手段，品德高尚的人也鄙视它。另一方面，这种手段最有效对付的是比较温和、不那么让人讨厌的丈夫，是那些即使受到挑衅，也不会被诱使粗暴使用其权力的丈夫。妻子这种暴躁的力量通常只是建立一种反向暴虐，即主要将那些最不可能成为暴君的丈夫变成其受害者。

What is it, then, which really tempers the corrupting effects of the power, and makes it compatible with such amount of good as we actually see? Mere feminine blandishments, though of great effect in individual instances, have very little effect in modifying the general tendencies of the situation; for their power only lasts while the woman is young and attractive, often only while her charm is new, and not dimmed by familiarity; and on many men they have not much influence at any time. The real mitigating causes are, the personal affection which is the growth of time in so far as the man's nature is susceptible of it and the woman's character sufficiently congenial with his to excite it; their common interests as regards the children, and their general community of interest as concerns third persons (to which however there are very great limitations); the real importance of the wife to his daily comforts and enjoyments, and the value he consequently attaches to her on his personal account, which, in a man capable of feeling for others, lays the foundation of caring for her on her own; and lastly, the influence naturally acquired over almost all human beings by those near to their persons (if not actually disagreeable to them): who, both by their direct entreaties, and by the insensible contagion of their feelings and dispositions, are often able, unless counteracted by some equally strong personal influence, to obtain a degree of command over the conduct of the superior, altogether

excessive and unreasonable. Through these various means, the wife frequently exercises even too much power over the man; she is able to affect his conduct in things in which she may not be qualified to influence it for good—in which her influence may be not only unenlightened, but employed on the morally wrong side; and in which he would act better if left to his own prompting. But neither in the affairs of families nor in those of states is power a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f freedom. Her power often gives her what she has no right to, but does not enable her to assert her own rights. A Sultan's favourite slave has slaves under her, over whom she tyrannises; but the desirable thing would be that she should neither have slaves nor be a slave. By entirely sinking her own existence in her husband; by having no will (or persuading him that she has no will) but his, in anything which regards their joint relation, and by making it the business of her life to work upon his sentiments, a wife may gratify herself by influencing and very probably perverting, his conduct, in those of his external relations which she has never qualified herself to judge of, or in which she is herself wholly influenced by some personal or other partiality or prejudice. Accordingly, as things now are, those who act most kindly to their wives, are quite as often made worse, as better, by the wife's influence, in respect to all interests extending beyond the family. She is taught that she has no business with things out of that sphere; and accordingly she seldom has any honest and conscientious opinion on them; and therefore hardly ever meddles with them for any legitimate purpose, but generally for an interested one. She neither knows nor cares which is the right side in politics, but she knows what will bring in money or invitations, give her husband a title, her son a place, or her daughter a good marriage.

那么，什么才能真正减轻这种权力的破坏性效果，并使它跟我们实际看到的如此多的善行相容呢？在个别情况下仅凭女性的甜言蜜语虽然很有效，但在改变这一状况的整体趋势方面却收效甚微；因为这种力量只有在女性年轻、迷人时，且经常只在其魅力还具有新奇感，没有被熟悉感减弱时才能持续；无论何时，这种力量不会对很多男人造成多大影响。真正可以减轻权力破坏性效果的因素是，随着时间推移，男人天性中容易受到影响而产生的感情，以及女性的性格同男人意气相投而足以激起的感情；他们对孩子的共同关心，以及对第三方（但有很大局限性）的共同兴趣；妻子对他日常舒适和享受的真正重要性，以及他为自己的利益而赋予她的价值等在一个有能力为他人着想的男人身上就奠定了真正关心她的基础；最后，几乎所有人都会自然而然受到他们身边那些人（如果事实上并不令他们讨厌的话）的影响：他们用直接的恳求及其感情与气质的潜移默化，常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左右其上级既过分又不理智的行为，除非有某种同等强烈的个人影响与之抗衡。通过这些不同的手段，妻子甚至经常对男人使用过多的权力；她能够在有些事情上影响他的行为，而在这些事情上她也许并无资格与能力为他的行为带来好的影响——也许其影响不仅落后，而且被用于道德上错误的方面；如果让男人自己去行动的话，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无论在家庭事务还是在国家事务中，权力并非对丧失了自由的补偿。她的权力常常能带给她无权得到的东西，但并不能使她维护自己的权利。苏丹最宠爱的奴隶还拥有自己的奴隶，她残暴地对待他们；但最理想的情况可能是，她既不拥有奴隶，自己也不是奴隶。妻子将自己的存在完全寄托在丈夫身上，在与他们共同关系相关的所有事情上没有自己的意志（或让他相信她没有自己的意志），而只有他的意志，把笼络丈夫的感情作为自己生活的目的；在丈夫的外部关系事务中，尽管她根本没有资格加以判断，或者她自己完全受某些个人或其他偏爱或偏见的影响，然而她却在这些事务中影响、并很可能误导丈夫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满足。因此，现在事情就是这样：那些对妻子最和善的人，由于妻子的影响，经常会损失在家庭之外的一切利益。她受到的教导是，她与家庭之外的事情无关；所以，她对这些事情很少有什么诚恳、认真的意见；因此她几乎从不会为某种正当目的来插手这些事，除非涉及利害相关的事。她不知道、也不

关心哪一方在政治方向正确，但她知道什么会给她带来财富和请柬，什么能给她丈夫头衔，什么能给她儿子职位，或给她女儿带来良缘。

But how, it will be asked, can any society exist without government? In a family, as in a state, some one person must be the ultimate ruler. Who shall decide when married people differ in opinion? Both cannot have their way, yet a decis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must be come to.

但人们会问，没有政府，社会何以维系呢？在家里，如同在一个国家中，必须有一个人是最后的统治者。当夫妻意见不合时，谁来做决定呢？谁都不能各行其是，但必须要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

It is not true that in all voluntary association between two people, one of them must be absolute master: still less that the law must determine which of them it shall be. The most frequent case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 next to marriage, is partnership in business: and it is not found or thought necessary to enact that in every partnership, one partner shall have entire control over the concern, and the others shall be bound to obey his orders. No one would enter into partnership on terms which would subject him to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 principal, with only the powers and privileges of a clerk or agent. If the law dealt with other contracts as it does with marriage, it would ordain that one partner should administer the common business as if it was his private concern; that the others should have only delegated powers; and that this one should be designated by some general presumption of law, for example as being the eldest. The law never does this: nor does experience show it to be necessary that any theoretical inequality of power should

exist between the partners, or that the partnership should have any other conditions than what they may themselves appoint by their articles of agreement. Yet it might seem that the exclusive power might be conceded with less danger to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inferior, in the case of partnership than in that of marriage, since he is free to cancel the power by withdrawing from the connexion. The wife has no such power, and even if she had, it is almost always desirable that she should try all measures before resorting to it.

在所有两人之间的自愿结合体中，其中一人必须是绝对的主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而法律必须确定他们中哪一个应该是绝对的主人，这一观点更离谱。除婚姻外，自愿结合体最常见的情况就是生意上的合作关系。没人发现或认为有必要规定：在每个合伙关系中，一个合伙人应该对业务拥有完全控制权，而其他人应该有义务服从其命令。没有人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加入合伙关系：具有领导的责任，却只有职员或代理人的权力和权威。假如法律对待其他契约如同对待婚姻一样，那么它就会规定，一个合伙人应该像管理自己的私人商行一样管理他们共同的企业；其他人应该只有授权的权力；而这个合伙人应该由法律的某个推定来指定，比如最年长的人。法律从未如此做过，而经验也从未表明过合伙人之间有必要存在理论上的权力不平等，或者合伙关系除了他们自己根据协议条款指定外还应该有什么其他条件。然而，在合伙关系中，容许专享的权力对劣势者权利和利益造成的危险似乎不如在婚姻中大，因为他可以自行选择退出该结合体，从而取消这种权力。然而妻子没有这种权力，而且即使有，人们也认为几乎总是可取的做法是，在她使用这种权力之前，应该先尝试所有其他办法。

It is quite true that things which have to be decided every day, and cannot adjust themselves gradually, or wait for a compromise,

ought to depend on one will; one person must have their sole control. But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is should always be the same person. The natural arrangement is a division of powers between the two; each being absolute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ir own department, and any change of system and principle requiring the consent of both. The division neither can nor should be pre-established by the law, since it must depend on individual capacities and suitabilities. If the two persons chose, they might pre-appoint it by the marriage contract, as pecuniary arrangements are now often pre-appointed. There would seldom be any difficulty in deciding such things by mutual consent, unless the marriage was one of those unhappy ones in which all other things, as well as this, become subjects of bickering and dispute. The division of rights would naturally follow the division of duties and functions; and that is already made by consent, or at all events not by law, but by general custom, modified and modifiable at the pleasure of the persons concerned.

有些事情必须每天都要做出决定，不能任其慢慢调整，或者等双方做出妥协，这些事情应该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必须由一个人单独控制，这是很正确的。但这并非说，应该总是由同一个人来控制。自然的安排方式是在两人之间分权；每个人在自己的范围内有绝对的权力，任何制度和原则上的改变都需要经过两个人的同意。这种分权不能，也不应由法律事先规定，因为它必须视个人能力和适配性而定。如果两人愿意，他们可以在婚姻契约上事先约定，如同现在事先约定的金钱安排一样。由双方同意来决定这样的事情就会很少遇到困难，除非这是个不幸的婚姻，包括这种事情在内的其他各种事情都成为争吵和争论的对象。权利自然根据职责和功能进行分配，这一点已经过双方同意，或者无论如何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通常的习惯，按双方意愿进行过修改，并且可以随时修改。

The real practical decision of affairs, to whichever may be given the legal authority, will greatly depend, as it even now does, upon comparative qualifications. The mere fact that he is usually the eldest, will in most cases give the preponderance to the man; at least until they both attain a time of life at which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years is of no importance. There will naturally also be a more potential voice on the side, whichever it is, that brings the means of support. Inequality from this source does not depend on the law of marriage, but on the general conditions of human society, as now constituted.

无论哪一方可能拥有合法权威以真正决定事务，甚至像现在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对资格。而拥有合法权威的人通常是年纪最大的人，仅这一事实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给他带来优势；至少直到他们都达到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的年龄差异无关紧要。很自然地，哪一方得到支持，哪一方就会有积累较多潜在优势。由这一原因造成的不平等并非依赖婚姻法，而是依赖现在形成的人类社会的一般条件。

The influence of mental superiority, either general or special, and of superior decision of character, will necessarily tell for much. It always does so at present. And this fact shows how little foundation there is for the apprehension that the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artners in life (as of partners in business), cannot be satisfactorily apportioned by agreement between themselves. They always are so apportioned, except in cases in which the marriage institution is a failure. Things never come to an issue of downright power on one side, and obedience on the other, except where the connexion altogether has been a mistake, and it would be a blessing to both parties to be relieved from it. Some may

say that the very thing by which an amicable settlement of differences becomes possible, is the power of legal compulsion known to be in reserve; as people submit to an arbitration because there is a court of law in the background, which they know that they can be forced to obey. But to make the cases parallel, we must suppose that the rule of the court of law was, not to try the cause, but to give judgment always for the same side, suppose the defendant. If so, the amenability to it would be a motive with the plaintiff to agree to almost any arbitration, but it would be just the reverse with the defendant. The despotic power which the law gives to the husband may be a reason to make the wife assent to any compromise by which power is practically shared between the two, but it cannot be the reason why the husband does. That there is always among decently conducted people a practical compromise, though one of them at least is under no physical or moral necessity of making it, shows that the natural motives which lead to a voluntary adjustment of the united life of two persons in a manner acceptable to both, do on the whole, except in unfavourable cases, prevail. The matter is certainly not improved by laying down as an ordinance of law, that the superstructure of free government shall be raised upon a legal basis of despotism on one side and subjection on the other, and that every concession which the despot makes may, at his mere pleasure, and without any warning, be recalled. Besides that no freedom is worth much when held on so precarious a tenure, its conditions are not likely to be the most equitable when the law throws so prodigious a weight into one scale; when the adjustment rests between two persons one of whom is declared to be entitled to everything, the other not only entitled to nothing except during the good pleasure of the first, but under the strongest moral and religious obligation not to rebel under any excess of oppression.

心理优势（无论一般还是特殊），以及占优势的果断性格的影响必然是很大的。目前一直是这样。这一事实表明，几乎找不到证据证明我们担心生活伴侣（如同生意伙伴）不能通过协商而令人满意地分配权力和责任。除婚姻制度很失败的情况，他们一直是这样分配的。事情不会发展到一方完全拥有权力，另一方只是服从的地步，除非这个结合是完全错误的，而从中解脱出来对双方都是好事。有些人可能会说，众所周知，和平解决分歧是最后得以诉诸的法律强制力；人们服从仲裁，因为后面有法庭，而他们知道他们会被迫服从。但为使情况类似，我们必须假设，法庭的判决不是审讯原因，而总是为同一方做出判决，比如被告。如果是这样，那么服从判决的义务将成为原告同意几乎任何仲裁的动机，但被告则恰恰相反。法律赋予丈夫的专横权力可能是妻子同意任何妥协的原因，通过妥协，权力实际上由他们两人分享。但这不可能是丈夫同意的原因。在行为得体的人中，总有一种实际的妥协，虽然其中至少有一种并非由于生理或道德需要而做出的。这表明，总体来说（不适宜的情况除外），导致以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对他们的共同生活做出自愿调整的自然动机是普遍的。如果法令规定，自由政府的上层建筑应该建立在一方专制，另一方臣服的法律基础上，而且暴君所做的每一次妥协，都可以由他随意地、事先没有任何警告地收回，那么情况肯定不会得到改善。当享有的自由如此不确定时；当法律将如此巨大的分量投进天平一端，从而使自由的条件不可能最合理时；当调整放在两人之间进行，其中一人被宣告拥有一切，另一人非但除前者发善心时外一无所有，且如果怀着最强烈的道德和宗教责任感而对任何过分的压迫都不反抗，自由也就没有多少价值了。

A pertinacious adversary, pushed to extremities, may say, that husbands indeed are willing to be reasonable, and to make fair concessions to their partners without being compelled to it, but that wives are not: that if allowed any rights of their own, they will acknowledge no rights at all in anyone else, and never will yield in anything, unless they can be compelled, by the man's mere

authority, to yield in everything. This would have been said by many persons some generations ago, when satires on women were in vogue, and men thought it a clever thing to insult women for being what men made them. But it will be said by no one now who is worth replying to. It is not the doctrine of the present day that women are less susceptible of good feeling, and consideration for those with whom they are united by the strongest ties, than men are. On the contrary, we are perpetually told that women are better than men, by those who are totally opposed to treating them as if they were as good; so that the saying has passed into a piece of tiresome cant, intended to put a complimentary face upon an injury, and resembling those celebrations of royal clemency which, according to Gulliver, the king of Lilliput always prefixed to his most sanguinary decrees. If women are better than men in anything, it surely is in individual self-sacrifice for those of their own family. But I lay little stress on this, so long as they are universally taught that they are born and created for self-sacrifice. I believe that equality of rights would abate the exaggerated self-abnegation which is the present artificial ideal of feminine character, and that a good woman would not be more self-sacrificing than the best man: but on the other hand, men would be much more unselfish and self-sacrificing than at present, because they would no longer be taught to worship their own will as such a grand thing that it is actually the law for another rational being. There is nothing which men so easily learn as this self-worship: all privileged persons, and all privileged classes, have had it. The more we descend in the scale of humanity, the intenser it is; and most of all in those who are not, and can never expect to be, raised above anyone except an unfortunate wife and children. The honourable exceptions are proportionally fewer than in the case of almost any other human infirmity.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stead of keeping it in check, are generally suborned to defend it; and nothing controls it but that

practical feeling of the equality of human beings, which is the theory of Christianity, but which Christianity will never practically teach, while it sanctions institutions grounded on an arbitrary preference of one human being over another.

如果一个固执的对手被推向极端，他可能会说，丈夫确实愿意通情达理，愿意不需要强迫就对其伴侣做出公平的让步，但妻子却并非如此：如果允许她们有任何自己的权利，她们就根本不会承认别人的任何权利，也从不会对任何事作出让步，直到迫于丈夫的权威而让出一切。在几代人之前，很多人会这么说。当时，讽刺女性是流行的风尚。男性认为，侮辱按其意志塑造出来的女性是聪明的做法。但现在，没有一个值得理会的人会这样说了。今天的信条已不再是，女性对美好感情的敏感性不如男性，以及女性不如男性更体谅通过最牢固的纽带与其结合在一起的人。相反，人们总在告诉我们，女人比男人好，然而说这话的人却完全反对善待女性；因此，这一说法已成为令人生厌的谎言，目的是为了在伤口上贴金，就像《格列佛游记》里小人国的国王一样，在颁布其最残暴的法令前，总要举行庆贺皇家仁慈的盛典。如果女性在什么事情上比男人强的话，那一定是在对她们家人做出的自我牺牲上。只要女性还普遍受到教导，就说她们是为自我牺牲而生的，我很少强调这一点。因为我相信，权利平等将会减轻这种被夸大了的自我克制，后者是目前人为编造的女性理想性格；我还相信，一个好女人不会比最好的男人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但另一方面，男性将会比现在更无私、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因为人们将不再教导他们去崇拜自己的意志，把它当作如此伟大的事物，以致它事实上成为另一个理性人的法律。没有什么东西像自我崇拜一样是男人如此轻而易举就学会的：所有特权人士及特权阶层都有自我崇拜。我们越是下到人性的底层，自我崇拜就越强烈；拥有最强烈的自我崇拜的是那些除了不幸的妻子和孩子，就不会，也永远不指望能被提升到任何人之上的人。可敬的例外情况在比例上几乎比任何人类其他弱点中的例外都要少。哲学和宗教非但不阻止，反而普遍受到挑唆来维护它；除人类平等这种实际感情外，没有任何东西能控制它，人类平等

是基督教的理论，但基督教却永远不会用它来实际教导人们；相反，它认可的是建立在武断的偏爱（一人优于另一人）基础上的制度。

There are, no doubt, women, as there are men, whom equality of consideration will not satisfy; with whom there is no peace while any will or wish is regarded but their own. Such persons are a proper subject for the law of divorce. They are only fit to live alone, and no human beings ought to be compelled to associate their lives with them. But the legal subordination tends to make such characters among women more, rather than less, frequent. If the man exerts his whole power, the woman is of course crushed: but if she is treated with indulgence, and permitted to assume power, there is no rule to set limits to her encroachments. The law, not determining her rights, but theoretically allowing her none at all, practically declares that the measure of what she has a right to, is what she can contrive to get.

毫无疑问，有些女性，也有些男性，不会满足于平等考虑；任何受到重视的意志或愿望，除非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否则就让它们不得安宁。这类人就是离婚法适合的对象。他们只适合独自生活，不应强迫任何人将自己的生活跟他们联系在一起。但法律规定的附属性倾向于认为，这种人在女性当中更常见，而非更少见。如果男人运用他全部的权力，女性当然被压倒：但如果放纵她，并允许她拥有权力，那么就没有什么规则来限制她的侵权行为。法律没有限定她的权利，但理论上却不允许她有任何权利；实际上法律宣称，她设法得到的就是她有权使用的。

The equality of married persons before the law, is not only the sole mode in which that particular relation can be made consistent

with justice to both sides, and conducive to the happiness of both, but it is the only means of rendering the daily life of mankind, in any high sense, a school of moral cultivation. Though the truth may not be felt or generally acknowledged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the only school of genuine moral sentiment is society between equals. The moral education of mankind has hitherto emanated chiefly from the law of force, and is adapted almost solely to the relations which force creates. In the less advanced states of society, people hardly recognise any relation with their equals. To be an equal is to be an enemy. Society, from its highest place to its lowest, is one long chain, or rather ladder, where every individual is either above or below his nearest neighbour, and wherever he does not command he must obey. Existing moralities, accordingly, are mainly fitted to a relation of command and obedience. Yet command and obedience are but unfortunate necessities of human life: society in equality is its normal state. Already in modern life, and more and more as it progressively improves, command and obedience become exceptional facts in life, equal association its general rule. The morality of the first ages rested on the obligation to submit to power; that of the ages next following, on the right of the weak to the forbear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strong. How much longer is one form of society and life to content itself with the morality made for another? We have had the morality of submission, and the morality of chivalry and generosity; the time is now come for the morality of justice. Whenever, in former ages, any approach has been made to society in . equality, justice has asserted its claims as the foundation of virtue. It was thus in the free republics of antiquity. But even in the best of these, the equals were limited to the free male citizens; slaves, women, and the unenfranchised residents were under the law of force. The joint influence of Roman civilisation and of Christianity obliterated these distinctions, and in theory (if only partially in practice) declared the

claims of the human being, as such, to be paramount to those of sex, class, or social position. The barriers which had begun to be levelled were raised again by the northern conquests; and the whole of modern history consists of the slow process by which they have since been wearing away. We are entering into an order of things in which justice will again be the primary virtue; grounded as before on equal, but now also on sympathetic association; having its root no longer in the instinct of equals for self-protection, but in a cultivated sympathy between them; and no one being now left out, but an equal measure being extended to all. It is no novelty that mankind do not distinctly foresee their own changes, and that their sentiments are adapted to past, not to coming ages. To see the futurity of the species has always been the privilege of the intellectual elite, or of those who have learnt from them; to have the feelings of that futurity has been the distinction, and usually the martyrdom, of a still rarer elite. Institutions, books, education, society, all go on training human beings for the old, long after the new has come; much more when it is only coming. But the true virtue of human beings is fitness to live together as equals; claiming nothing for themselves but what they as freely concede to everyone else; regarding command of any kind as an exceptional necessity, and in all cases a temporary one; and preferring, whenever possible, the society of those with whom leading and following can be alternate and reciprocal. To these virtues, nothing in life as at present constituted gives cultivation by exercise. The family is a school of despotism, in which the virtues of despotism, but also its vices, are largely nourished. Citizenship, in free countries, is partly a school of society in equality; but citizenship fills only a small place in modern life, and does not come near the daily habits or inmost sentiments. The family, justly constituted, would be the real school of the virtues of freedom. It is sure to be a sufficient one of everything else. It will always be a school of obedience for the

children, of command for the parents. What is needed is, that it should be a school of sympathy in equality, of living together in love, without power on one side or obedience on the other. This it ought to be between the parents. It would then be an exercise of those virtues which each requires to fit them for all other association, and a model to the children of the feelings and conduct which their temporary training by means of obedience is designed to render habitual, and therefore natural, to them. The moral training of mankind will never be adapted 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life for which all other human progress is a preparation, until they practise in the family the same moral rule which is adapted to the normal constitution of human society. Any sentiment of freedom which can exist in a man w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intimacies are with those of whom he is absolute master, is not the genuine or Christian love of freedom, but, what the love of freedom generally was in the ancients and in the middle ages—an intense feeling of the dignity and importance of his own personality; making him disdain a yoke for himself, of which he has no abhorrence whatever in the abstract, but which he is abundantly ready to impose on others for his own interest or glorification. I readily admit (and it is the very foundation of my hopes) that numbers of married people even under the present law (in the higher classes of England probably a great majority), live in the spirit of a just law of equality. Laws never would be improved, if there were not numerous persons whose moral sentiments are better than the existing laws. Such persons ought to support the principles here advocated; of which the only object is to make all other married couples similar to what these are now. But persons even of considerable moral worth, unless they are also thinkers, are very ready to believe that laws or practices, the evils of which they have not personally experienced, do not produce any evils, but (if seeming to be generally approved of) probably do good, and that it

is wrong to object to them. It would, however, be a great mistake in such married people to suppose, because the legal conditions of the tie which unites them do not occur to their thoughts once in a twelvemonth, and because they live and feel in all respects as if they were legally equals, that the same is the case with all other married couples, wherever the husband is not a notorious ruffian. To suppose this, would be to show equal ignorance of human nature and of fact. The less fit a man is for the possession of power—the less likely to be allowed to exercise it over any person with that person's voluntary consent—the more does he hug himself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ower the law gives him, exact its legal rights to the utmost point which custom (the custom of men like himself) will tolerate, and take pleasure in using the power, merely to enliven the agreeable sense of possessing it. What is more; in the most naturally brutal and morally uneducated part of the lower classes, the legal slavery of the woman, and something in the merely physical subjection to their will as an instrument, causes them to feel a sort of disrespect and contempt towards their own wife which they do not feel towards any other woman, or any other human being, with whom they come in contact; and which makes her seem to them an appropriate subject for any kind of indignity. Let an acute observer of the signs of feeling, who has the requisite opportunities, judge for himself whether this is not the case: and if he finds that it is, let him not wonder at any amount of disgust and indignation that can be felt against institutions which lead naturally to this depraved state of the human mind.

法律面前夫妻平等，这并非使婚姻关系和谐、对双方都公平并有利于双方幸福的唯一模式，但它却是使人类日常生活在任何高级意义上成为道德修养的学校的唯一手段。尽管未来几代人可能都不会感觉到或普遍承认这一真理，但具有真正道德情操的唯一学校就是人人平

等的社会。人类的道德教育迄今为止主要来源于强制性法律，并几乎只适应暴力产生的关系。在相对落后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几乎不承认与跟他们平等的人之间有任何关系。与他们平等的人就是敌人。社会地位从最高到最低是一条长长的链子，或梯子，每个人要么在他的近邻之上，要么在其之下，在他不能发号施令的地方，他就必须要服从。相应地，现存的道德准则也主要适合命令与服从的关系。然而命令与服从仅是人类生活中的不幸需要：平等社会才是其正常形态。在现代生活中，并随之不断进步与改善，命令与服从已经，并越来越成为生活中异常的事情，而平等关系则成为其一般规则。在较早的时代，道德以服从权力的义务为基础；到了后来，则以弱者有权得到强者的容忍和保护为基础。一种形态的社会和生活对为另一种形态而设立的道德准则还能感到多久的满足呢？我们曾有过服从的道德及侠义与宽容的道德；现在已经到了公正道德的时候了。在以前的时代，每当接近平等社会的时候，就会宣称公正是美德的基础。古代的自由共和国就是这样。但即使在最好的共和国，平等也仅限于自由的男性公民；奴隶、女性以及无公民权的居民都处于强制法律的统治下。罗马文明与基督教的共同影响消除了这些差别，并在理论上（哪怕只是部分地在实践上）宣称，相对于性别、阶级、或社会地位的要求来说，人类这些权利要求是至高无上的。一度开始要铲平的壁垒又被北方的多次征服竖立起来；全部现代史就包含着它们从那以后慢慢消逝的缓慢历程。我们正在创建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公正将再次成为最重要的美德；它仍然像以前一样基于平等，但现在也同样基于同情；它不再根植于平等的人自卫的本能，而是根植于平等的人之间有修养的同情；现在平等的标准适用于所有人，不会漏掉任何人。人类不能清晰预见自己的变化，且其感情也是适应过去而非未来时代的，这并不新鲜。能看到物种的未来一直是知识精英或那些师从他们的人的特权；而具有那种未来的感情则是更罕见的精英（通常是殉难者）的特质。制度、书籍、教育、社会，所有这些都在新事物早就出现以后，还在为旧事物训练人；新事物刚出现时尤其如此。但人类真正的美德在于适合作为平等的人生活在一起；除了自愿承认其他人也要有的要求外，自己别无所求；把任何形式的命令都看作是例外的必需，而且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暂时的；只要有可能，总是赞成由这样的人组成的

社会：领导者和跟随者可以轮流并互换。构成目前生活的事物中，没有一件是通过训练而对这些美德加以培养的。家庭是专横暴虐的学校，其中，暴虐的美德及罪恶得到很大程度的培养。在自由国家里，公民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是平等社会的学校；但在现代生活中，公民身份只占据很小的位置，且距离日常习惯或内心深处的情感很遥远。公正组建起来的家庭，将是自由这一美德真正的学校。它也一定足以成为所有事情的学校。它将永远是孩子顺从，父母发号施令的学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等、充满同情的学校，是共同生活在爱中的学校，没有只有一方有权力，而另一方只是服从的现象。父母之间应该是这样。它将培养这些美德，每种美德都让他们感到适合建立其他关系，并成为孩子们感情与行为的楷模。孩子们通过顺从的方式进行暂时的训练，目的是使这些变成他们习惯性，进而发展为自然的感情和行为。如果所有其他人类进步都是为某些生活条件而准备的话，那么人类的道德训练永远不会适应这些生活条件，除非在家庭中也实行适应人类社会正常结构的同样的道德准则条件。如果一个人最亲近的关系是与处于他专制统治下的人建立的，那么他对自由的任何情感都不是真正的或基督教义上的热爱自由，而是像古代及中世纪普遍存在的热爱自由一样，是对自己人格的尊严与重要性的一种强烈感情；他会蔑视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尽管从抽象意义上看，他对这种枷锁并不憎恨，而且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荣耀，他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套到别人身上。我愿意承认（我的希望正基于此），许多已婚人士即使在现行法律下（在英国上层阶级中很可能是多数）也生活在平等的公正法律体系下。假如没有众多道德情操高于现行法律的人，那么法律永远不会得以改进。这些人应该支持这里倡导的原则，其唯一目标就是使所有其他已婚夫妇像这些人现在这样。但即使是具有很高道德价值的人（除非他们同时也是思想家），也很愿意相信，他们个人没有经历过邪恶的法律或实践，所以不会产生邪恶之心；相反（如果普遍都赞成的话），很可能是有益的，要反对它们则是错误的。然而，由于这些已婚的人一年也不会想到一次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法律条款，同时由于他们在各方面都生活得并感觉就像法律上平等的人一样，所以这些人如果假设所有其他已婚夫妇（只要丈夫不是出了名的恶棍）都是这样的话，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如果这样假设，那就说明了对人类

天性和事实的同等无知。一个人越不适合拥有权力，越不可能得到允许对任何人在自愿的情况下实施权力，就越沾沾自喜于法律赋予他的权力，要求其合法权利达到习惯（像他那种人的习惯）所能容忍的程度，并仅为增强其拥有权力的愉悦感而乐于实施该权力。更有甚者，在下层阶级天性最残忍且未受到道德教化的人中，女性法律上的受奴役地位，以及作为工具仅仅在肉体上屈从于其意志中的某种东西，使他们感到对自己妻子的一种不敬和轻蔑，而对与其交往的任何其他女性或其他人则没有这种感觉；这使妻子对他们来说似乎成为接受任何侮辱的合适对象。我们必须要给那些对感觉征兆有敏锐观察力的人判断的机会，看看情况是否如此：如果他发现的确如此，他对这些制度感到有任何程度的厌恶和愤怒就毫不奇怪，正是这些制度把人类的心态自然而然地引向这种堕落状态。

We shall be told, perhaps, that religion imposes the duty of obedience; as every established fact which is too bad to admit of any other defence, is always presented to us as an injunction of religion. The Church, it is very true, enjoins it in her formularies, but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derive any such injunction from Christianity. We are told that St. Paul said, “Wives, obey your husbands”: but he also said, “Slaves, obey your masters.” It was not St. Paul's business, nor was it consistent with his object, the propagation of Christianity, to incite anyone to rebellion against existing laws. The Apostle's acceptance of all social institutions as he found them, is no more to be construed as a disapproval of attempts to improve them at the proper time, than his declaration, “The powers that be are ordained of God,” gives his sanction to military despotism, and to that alone, as the Christian form of political government, or commands passive obedience to it. To pretend that Christianity was intended to stereotype existing forms of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nd protect them against change, is to reduce it to the level of Islamism or of Brahminism.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Christianity has not done this, that it has been the religion of the progressive portion of mankind, and Islamism, Brahminism, etc. have been those of the stationary portions; or rather (fo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really stationary society) of the declining portions. There have been abundance of people, in all ages of christianity, who tried to make it something of the same kind; to convert us into a sort of Christian Mussulmans, with the Bible for a Koran, prohibiting all improvement: and great has been their power, and many have had to sacrifice their lives in resisting them. But they have been resisted, and the resistance has made us what we are, and will yet make us what we are to be.

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是宗教将顺从的义务强加到我们身上；就像每个太糟糕以致不能容许任何其他辩护理由的既定事实一样，总是被说成宗教的禁令。教堂在其仪式集里的确规定了顺从的义务，但从基督教中却很难得出这类禁令。有人告诉我们，圣保罗说过："妻子们，服从你们的丈夫。"但他也说过："奴隶们，服从你们的主人。"煽动任何人起来反抗现存法律不是圣保罗的责任，也跟他的目标——宣传基督教——不符。基督教使徒坚持接受所有社会制度，不能认为他们不赞同在恰当的时期尝试改进这些制度；同样，他的宣言"权力赐自上帝"认可了军事暴政，而且只认可作为基督教政治统治的形式，或者命令对其作消极服从。假借基督教意图使现存政府形式和社会固化，并保护它们免于改变，是将基督教降到了伊斯兰教或婆罗门教的水平。正因基督教并未这么做，所以才成为进步人士信奉的宗教，而伊斯兰教、婆罗门教等则是那部分固守成规的人信奉的宗教；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不存在真正不变的社会），是那部分退步人士信奉的宗教。在基督教各个时代，有许多人试图把它变成同类事物；把我们转变为一种基督穆斯林，把《圣经》变成《古兰经》，禁止一切改进：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很多人为了抵制他们，不得不牺牲生命。但他们被抵制住了，这种抵制使我们成为了现在这样，而且还会决定我们的未来。

After what has been said respecting the obligation of obedience, it is almost superfluous to say anything concerning the more special point included in the general one—a woman's right to her own property; for I need not hope that this treatise can make any impression upon those who need anything to convince them that a woman's inheritance or gains ought to be as much her own after marriage as before. The rule is simple: whatever would be the husband's or wife's if they were not married, should be under their exclusive control during marriage; which need not interfere with the power to tie up property by settlement, in order to preserve it for children. Some people are sentimentally shocked at the idea of a separate interest in money matters, as inconsistent with the ideal fusion of two lives into one. For my own part, I am one of the strongest supporters of community of goods, when resulting from an entire unity of feeling in the owners, which makes all things common between them. But I have no relish for a community of goods resting on the doctrine, that what is mine IS yours, but what is yours is not mine; and I should prefer to decline entering into such a compact with anyone, though I were myself the person to profit by it.

谈完服从的义务后，再谈论任何包含在一般之中的较特殊之处——女性对自己财产的权利——几乎是多余的；因为我并不希望这篇论文能够给那些人留下什么印象（这些人居然还需要什么东西来说服他们，女性的继承财产或收益在婚后应该跟婚前一样归她自己所有）。规则很简单：婚前属于夫妻双方个人的任何财产，婚后都应由他们分别单独支配；与为了留给孩子而通过财产授予处理将财产搁置不用的权力无关。在财务问题上有各自的利益，这一观点使有些人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这与理想中两个生命合二为一不符。就我个人来说，当财产共有源于所有者在感情上的完全融合，因而他们之间的所

有东西都是双方共有的，那么我也是财产共有最强烈的支持者之一。但我对基于以下原则的财产共有却没有兴趣，即我的是你的，但你的却不是我的；我将拒绝与任何人达成这样的契约，即便我自己是从中受益的那个人。

This particular injustice and oppression to women, which is, to common apprehensions, more obvious than all the rest, admits of remedy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any other mischiefs: and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it will be one of the earliest remedied. Already, in many of the new and several of the old States of the American Confederation, provisions have been inserted even in the written Constitutions, securing to women equality of rights in this respect: and thereby improving materially the position, in the marriage relation, of those women at least who have property, by leaving them one instrument of power which they have not signed away; and preventing also the scandalous abuse of the marriage institution, which is perpetrated when a man entraps a girl into marrying him without a settlement,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getting possession of her money. When the support of the family depends, not on property, but on earnings, the common arrangement, by which the man earns the income and the wife superintends the domestic expenditure, seems to me in general the most suitable division of labour between the two persons. If, in addition to the physical suffering of bearing children, and the whole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care and education in early years, the wife undertakes the careful and economical application of the husband's earnings to the general comfort of the family; she takes not only her fair share, but usually the larger share, of the bodily and mental exertion required by their joint existence. If she undertakes any additional portion, it seldom relieves her from this, but only prevents her from performing it properly. The care which she is herself disabled from

taking of the children and the household, nobody else takes; those of the children who do not die, grow up as they best can,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household is likely to be so bad, as even in point of economy to be a great drawback from the value of the wife's earnings. In an otherwise just state of things, it is not, therefore, I think, a desirable custom, that the wife should contribute by her labour to the income of the family. In an unjust state of things, her doing so may be useful to her, by making her of more value in the eyes of the man who is legally her master;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enables him still farther to abuse his power, by forcing her to work, and leaving the support of the family to her exertions, while he spends most of his time in drinking and idleness. The *power* of earning is essential to the dignity of a woman, if she has not independent property. But if marriage were an equal contract, not implying the obligation of obedience; if the connexion were no longer enforced to the oppression of those to whom it is purely a mischief, but a separation, on just terms (I do not now speak of a divorce), could be obtained by any woman who was morally entitled to it; and if she would then find all honourable employments as freely open to her as to men; it would not be necessary for her protection, that during marriage she should make this particular use of her faculties. Like a man when he chooses a profession, so, when a woman marries, it may in general be understood that she makes choice of the management of a household, and the bringing up of a family, as the first call upon her exertions, during as many years of her life as may be required for the purpose; and that she renounces, not all other objects and occupations, but all which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The actual exercise, in a habitual or systematic manner, of outdoor occupations, or such as cannot be carried on at home, would by this principle be practically interdicted to the greater number of married women. But the utmost latitude ought to exist

for the adaptation of general rules to individual suitabilities; and there ought to be nothing to prevent faculties exceptionally adapted to any other pursuit, from obeying their vocation notwithstanding marriage: due provision being made for supplying otherwise any falling-short which might become inevitable, in her full performance of the ordinary functions of mistress of a family. These things, if once opinion were rightly directed on the subject, might with perfect safety be left to be regulated by opinion, without any interference of law.

这种对女性特别的不公正和压迫比其他事情要更明显地引起普遍的忧虑，无需涉及任何其他棘手问题就可治愈：无疑，这将是最早治愈的不公正和压迫之一。在美利坚合众国，很多新州以及个别老州甚至已经将规定写进了成文宪法中，保障女性在这方面的平等权利，从而在婚姻关系中至少大大改善了那些有财产的女性的地位，留给了她们一种还没有签字声明放弃的权力工具；同时也防止了对婚姻制度可耻地滥用，即男人为达到他唯一的目的，即得到一个女孩的金钱，就设圈套诱使她嫁给他，而且结婚时不签财产授予处理协议。如果一个家庭不是靠财产，而是靠收入来维持生计，通常则是男人负责挣钱，而妻子管理家庭开支。这种安排在我看来一般是两人之间最合适的劳动分工了。如果除了生孩子要遭受的身体痛苦，以及早期照顾和教育孩子的全部责任外，妻子还需要保证谨慎、节俭地使用丈夫的收入以使全家人过得很舒适的话，那么在为他们共同生存而付出的体力与精神努力方面，妻子不仅承担了她应尽的那份义务，而且通常还承担了较大的那份义务。如果她再承担额外的部分，她不仅难以从这份义务中解脱，反而只会妨碍她把事情做好。如果她自己无法照顾孩子和家庭，就没有人照顾；那些存活下来的孩子艰难地长大，家庭可能也打理得非常糟糕，即便从经济上说，妻子收入的价值也是得不偿失的。因此，我认为，即使在公平状况下，妻子工作为家庭增加收入的做法也并不可取。在不公平的状况下，她这样做也许对她有用，可以让她在其丈夫——她合法的主人——眼中更有价值；但另一方面，这也使

丈夫更加滥用其权力，强迫她去工作，将养家糊口的责任留给她，自己则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喝酒、闲荡。如果女性没有独立财产，那么赚钱的能力对其尊严来说必不可少。但假如婚姻是一张平等契约，不包含服从的义务；假如这种结合不再强制压迫那些认为该结合只是一种伤害的人，而是任何道德上有权要求分开的女性都可以在公正条件下得以与丈夫分开（我现在不说离婚）；假如之后她发现，所有体面的工作对她像对男人一样自由开放；那么她在婚姻中就不必为保护自己而使用这些特别的才能。像男性选择职业时一样，当女性结婚时，一般说来也可以理解为，她选择了管理家务以及生儿育女作为她努力的第一目标，这一目的可能要求她付出生命中的很多岁月；同时，虽然她并未放弃所有其他目标和职业，但却放弃了所有与这些要求不一致的目标和职业。根据这一原则，经常或定期要在户外实际完成的工作，或那些不能在家做的工作，实际上将排除大多数已婚女性。但应该存在将一般规则适应于个人适用性的最大灵活度；任何事情都不应该阻挡一个人从事特别适合自己的事业，即使是婚姻也不能：在她履行家庭主妇全部的日常功能中，应该做适当准备，来替弥补难免出现的缺口。在这一问题上，舆论一旦有正确导向，这些事情就可以安心交与舆论来调节，而无需法律干预了。

CHAPTER III

第三章

On the other point which is involved in the just equality of women, their admissibility to all the functions and occupations hitherto retained as the monopoly of the stronger sex, I should anticipate no difficulty in convincing anyone who has gone with me on the subject of the equality of women in the family. I believe that their disabilities elsewhere are only clung to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subordination in domestic life; because the generality of the male sex cannot yet tolerate the idea of living with an equal. Were it not for that, I think that almost everyone, in the existing state of opinion i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would admit the injustice of excluding half the human race from the greater number of lucrative occupations, and from almost all high social functions; ordaining from their birth either that they are not, and cannot by any possibility become, fit for employments which are legally open to the stupidest and basest of the other sex, or else that however fit they may be, those employments shall be interdicted to them, in order to be preserved for the exclusive benefit of males.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 when (which was seldom the case) any reason beyond the mere existence of the fact was thought to be required to justify the disabilities of women, people seldom assigned as a reason their inferior mental capacity; which, in times when there was a real trial of personal faculties (from which all women were not excluded) in the struggles of public life, no one really believed in. The reason given in those days was not women's unfitness, but the interest of society, by which was meant the interest of men: just as the *raison d'état* , meaning the convenien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upport of existing authority, was deemed a sufficient explanation and excuse for the most flagitious crimes. In the present day, power holds a smoother language, and whomsoever it oppresses, always pretends to do so for their own good: accordingly, when anything is forbidden to women, it is thought necessary to say, and desirable to believe, that they are incapable of doing it, and that they depart from their real path of success and happiness when they aspire to it. But to make this reason plausible (I do not say valid), those by whom it is urged must be prepared to carry it to a much greater length than anyone ventures to do in the face of present experience.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maintain that women on the average are less gifted than men on the average, with certain of the higher mental faculties, or that a smaller number of women than of men are fit for occupations and functions of the highest intellectual character. I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at no women at all are fit for them, and that the most eminent women are inferior in mental faculties to the most mediocre of the men on whom those functions at present devolve. For i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unction is decided either by competition, or by any mode of choice which secures regard to the public interest, there needs be no apprehension that any important employments will fall into the hands of women inferior to average men, or to the average of their male competitors. The only result would be that there would be fewer women than men in such employments; a result certain to happen in any case, if only from the preference always likely to be felt by the majority of women for the one vocation in which there is nobody to compete with them. Now, the most determined depreciator of women will not venture to deny, that when we add the experience of recent times to that of ages past, women, and not a few merely, but many women, have proved themselves capable of everything, perhaps without a single exception, which is done by men, and of doing it successfully and creditably. The utmost that

can be said is, that there are many things which none of them have succeeded in doing as well as they have been done by some men—many in which they have not reached the very highest rank. But there are extremely few, dependent only on mental faculties, in which they have not attained the rank next to the highest. Is not this enough, and much more than enough, to make it a tyranny to them, and a detriment to society,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compete with men for the exercise of these functions? Is it not a mere truism to say, that such functions are often filled by men far less fit for them than numbers of women, and who would be beaten by women in any fair field of competition?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that there may be men somewhere, fully employed about other things, who may be still better qualified for the things in question than these women? Does not this take place in all competitions? Is there so great a superfluity of men fit for high duties, that society can afford to reject the service of any competent person? Are we so certain of always finding a man made to our hands for any duty or function of social importance which falls vacant, that we lose nothing by putting a ban upon one half of mankind, and refusing beforehand to make their faculties available, however distinguished they may be? And even if we could do without them, would it be consistent with justice to refuse to them their fair share of honour and distinction, or to deny to them the equal moral right of all human beings to choose their occupation (short of injury to other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references, at their own risk? Nor is the injustice confined to them: it is shared by those who are in a position to benefit by their services. To ordain that any kind of persons shall not be physicians, or shall not be advocates, or shall not be Members of Parliament, is to injure not them only, but all who employ physicians or advocates, or elect Members of Parliament, and who are deprived of the stimulating effect of greater competition on the exertions of the competitors, as

well as restricted to a narrower range of individual choice.

在关于女性平等的另外一点上，要说服那些与我一起探讨女性享有平等家庭地位的人，允许女性参与当前强势性别独占的所有职责和职业，我认为并不难。我相信，人们之所以坚持认为女性在其他领域能力不足，只是为了保持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的从属地位；因为大部分男性尚不能容忍与一个地位平等的人一起生活这一观念。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我想，在政治与政治经济的现有观念中，几乎人人都会承认，把人类的一半排除在众多收入丰厚的职业和几乎所有高等社会职务之外是不公正的。女性自出生之日起即被判定，她们决不适合或决不能适合从事某些职业，而这些职业，即使最愚蠢、出身最低下的男性，也可以合法从事；或者无论女性可能多么适合，也会被禁止从事这些职业，以维护男性的专有利益。在上两个世纪，当人们认为除这一仅存的事实之外，还需要理由来证明女性无能力时（这是极个别情况），很少把女性才智较差作为理由。因为在社会生活的斗争中，当个人能力面临真正考验时（并非所有女性都被排除在外），没有人真正相信这一点。那时的理由并非女性不适合，而是由于社会的利益，即男性的利益：正如我们认为国家（即指政府的便利与当局的支持）足以提供借口为最残忍的罪行作出解释并为之开脱。今天，当权者的措辞更加委婉，它无论压迫什么人，其借口总是为受压迫者自己好。因此，当禁止女性做什么事时，它必须说成、并且愿意相信，是她们自己能力不足，而当她们渴望去做这件事时，她们就背离了真正的成功和幸福之路。然而，为了使这一理由听起来合理（我说的不是“正当”），力主该理由的人必须准备好在现有经验面前，比任何冒险去阐述该理由的人讲得更极端。主张虽然某些女性拥有更高的智力才能，但女性的平均天赋不如男性的平均天赋；或主张有更多的男性比女性适合需要最高智力才能的职业与职务，都是不够的。必须主张没有任何女性适合做这些事，而且在智力才能方面，最杰出的女性也比不上当今拥有这些职务的最平庸的男性。因为，如果履行职务是通过竞争决定，或通过任何着眼于公众利益的选择方式决定，那就无需顾虑任何重要的职业会落入不如中等水平男性的女性之手，或不如其男

性竞争者平均水平的女性手中。这样做的唯一结果是，在这类职业中女性少于男性；如果从大多数女性总感到她们宁可要无人与之竞争的职业看，这是在任何情况下必然会出现的结果。现在，最坚定的女性歧视者也不会冒险去否认，当我们把近期的经验同几个时代前的经验加在一起时，许多女性（不只是少数几位）已证明，她们可能无一例外地能做男性所做的所有事情，而且能够做得很成功，值得称赞。最多只能说，有许多事她们没有干得像某些男性那么好——在许多工作中，她们没有到达最高级别。但仅有在极少数完全依靠智力才能的事上，她们尚未达到次于最高的级别。在履行这些职务时不允许女性同男性竞争，难道还不够、还不足以构成对她们的暴虐，对社会造成损害吗？说这些职务常被远不及许多女性更适合的男性占据着，而且在任何公正的竞争中男性会被女性击败，难道这不是纯粹的老生常谈吗？可能在某个地方有做其他事情的男性，他们可能比这些女性更适合做其正在做的事情，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不是在所有竞争中都存在这种情况吗？难道适合高级职务的男性如此过剩，以致社会都可以拒绝有能力的人为其服务了吗？难道我们如此有把握永远能为有社会重要性的职责或职务空缺找到一个男性，从而得以把禁令加在占人类半数的人身上吗？难道不管女性多么出色，预先就拒绝她们发挥才能，对我们就毫无损失吗？而且即使没有她们我们也能应付，难道拒绝给她们应得的尊严和荣誉，或拒绝给她们以所有人都有的平等的道德权利，即按自己的爱好并自担风险选择自己的职业（对别人无损害），这公正吗？不公并不限于对她们，那些得益于她们服务的人也承受了不公。规定某类人不能当医生、不能当律师、或不能当国会议员，不但伤害了这些人，也伤害了雇用医生、律师，或选举议员的所有人，使他们看不到更激烈的竞争施加在竞争者身上的刺激效果，而且在个人选择方面受限于较窄的范围。

It will perhaps be sufficient if I confine myself, in the details of my argument, to functions of a public nature: since, if I am successful as to those, it probably will be readily granted that women should be admissible to all other occupations to which it is

at all material whether they are admitted or not. And here let me begin by marking out one function, broadly distinguished from all others, their right to which is entirely independent of any question which can be raised concerning their faculties. I mean the suffrage, both parliamentary and municipal. The right to share in the choice of those who are to exercise a public trust, is altogether a distinct thing from that of competing for the trust itself. If no one could vote for a Member of Parliament who was not fit to be a candidate,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a narrow oligarchy indeed. To have a voice in choosing those by whom one is to be governed, is a means of self-protection due to everyone, though he were to remain for ever excluded from the function of governing: and that women are considered fit to have such a choice, may be presumed from the fact, that the law already gives it to women in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cases to themselves: for the choice of the man who is to govern a woman to the end of life, is always supposed to be voluntarily made by herself. In the case of election to public trusts, it is the business of constitutional law to surround the right of suffrage with all needful securities and limitations; but whatever securities are sufficient in the case of the male sex, no others need be required in the case of women. Under whatever conditions, and within whatever limits, men are admitted to the suffrage, there is not a shadow of justification for not admitting women under the same. The majority of the women of any class are not likely to differ in political opinion from the majority of the men of the same class, unless the question be one in which the interests of women, as such, are in some way involved; and if they are so, women require the suffrage, as their guarantee of just and equal consideration. This ought to be obvious even to those who coincide in no other of the doctrines for which I contend. Even if every woman were a wife, and if every wife ought to be a slave, all the more would these slaves stand in need of legal protection: and we

know what legal protection the slaves have, where the laws are made by their masters.

也许在我的详细论证中，只限于公共性质的职务就足够了，因为如果论证成功，大概人们就会甘愿承认在至关重要的所有其他职业中，无论女性最终是否能被接纳，她们也应有被接纳的权利。在此，我首先要提出一种职能，这种职能与其他所有职能有很大区别，而女性对这一职能的权利，与可能提出的涉及她们才能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我指的是选举权，包括国会和市政选举权。对要去执行公众委托的人享有选择的权利，同为此委托而竞争的权利完全不同。如果没有人能为不适合当候选人的国会议员投票，那么这个政府无疑会是一个寡头政府。在选择统治自己的人时表达自己的意见，是每个人应有的自我保护手段，虽然他永远要被置于统治职能之外。女性被认为是适合有这种选择的，这可由以下事实推定，即法律已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给了女性自己选择的权利，因为对统治其终身的男性作出的选择，总是被认为自愿的。在选举公共信托机构时，宪法的职责在于，用所有必要的安全措施限制选举权。但是，无论什么安全措施，只要满足男性需求就无需考虑女性需求了。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有什么限制，男性都被赋予选举权；在同样条件下，不允许女性有选举权是毫无道理的。任何阶级的大多数女性不太可能会同本阶级的大多数男性持不同政治意见，除非是关于以某种方式涉及这类女性利益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女性要求选举权就是为了保证她们得到公正平等的考虑。很明显，即使是不赞成我主张的其他观点的人也会这样认为。即使每位女性都是妻子，而且每个妻子都应是奴隶，这些奴隶更需要法律的保护：而我们知道，当由其主人制定法律时，奴隶享有什么样的法律保护。

With regard to the fitness of women, not only to participate in elections, but themselves to hold offices or practise professions involving important public responsibilities; I have already observed

that this consideration is not essential to the practical question in dispute: since any woman, who succeeds in an open profession, proves by that very fact that she is qualified for it. And in the case of public offices, i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country is such as to exclude unfit men, it will equally exclude unfit women: while if it is not, there is no additional evil in the fact that the unfit persons whom it admits may be either women or men. As long therefore as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even a few women may be fit for these duties, the laws which shut the door on those exceptions cannot be justified by any opinion which can be held respecting the capacities of women in general. But, though this last consideration is not essential, it is far from being irrelevant. An unprejudiced view of it gives additional strength to the arguments against the disabilities of women, and reinforces them by high considerations of practical utility.

至于女性适合与否，不仅在参与选举方面，而且还有她们自己担任职务或担任涉及重要公共责任的职业方面，我已说过，这一考虑对争论实际问题并不必要，因为在面向男女平等开放的职业中所有成功的女性已用事实证明了她是合格的。在担任公职方面，如果该国政治制度排除不适合的男性，它也将平等地排除不适合的女性；如果不是这样，它任用的不适合的人可能是女性也可能是男性，那么这一事实并不增加邪恶。因此，只要人们承认，甚至只有几位女性可能适合这些职务，那么关于一般女性能力的任何意见，都不能证明对这些例外情况紧闭大门的法律之正当性。虽然上述考虑并非根本性的，但也远非不相干。在这一问题上不偏不倚的观点，进一步论证了反对女性无能的观点，并通过对实际效用的高层次考虑使之得以增强。

Let us at first make entire abstraction of all psychological considerations tending to show that any of the mental differences

supposed to exist between women and men are but the natural effect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education and circumstances, and indicate no radical difference, far less radical inferiority, of nature. Let us consider women only as they already are, or as they are known to have been; and the capacities which they have already practically shown. What they have done, that at least, if nothing else, it is proved that they can do. When we consider how sedulously they are all trained away from, instead of being trained towards, any of the occupations or objects reserved for men, it is evident that I am taking a very humble ground for them, when I rest their case on what they have actually achieved. For, in this case, negative evidence is worth little, while any positive evidence is conclusive. It cannot be inferred to be impossible that a woman should be a Homer, or an Aristotle, or a Michael Angelo, or a Beethoven, because no woman has yet actually produced works comparable to theirs in any of those lines of excellence. This negative fact at most leaves the question uncertain, and open to psychological discussion. But it is quite certain that a woman can be a Queen Elizabeth, or a Deborah, or a Joan of Arc, since this is not inference, but fact. Now it is a curious consideration, that the only things which the existing law excludes women from doing, are the things which they have proved that they are able to do. There is no law to prevent a woman from having written all the plays of Shakespeare, or composed all the operas of Mozart. But Queen Elizabeth or Queen Victoria, had they not inherited the throne, could not have been entrusted with the smallest of the political duties, of which the former showed herself equal to the greatest.

我们首先完全摒弃所有心理学方面的考虑，这些考虑趋于表明，所谓男女之间存在的智力差别，不过是其接受教育与所处环境差异的自然结果，并不表明天性上的根本差别，更不必说极端低劣了。我们

只考虑女性现在的状态，或人们认为的她们曾经的状态，以及她们已实际表现出来的能力。她们已经做了的事情，如果没有其他什么，至少证明她们有能力做。她们所接受的刻苦训练，并非要她们去做任何为男性保留的职业或目标，而是要她们避开这些；显然，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时，我基于她们已获得的成就在讨论她们时是持非常温和的立场的。因为在这件事上，反面证据并无价值，而任何正面证据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能因为下面的事实就推断女性不可能成为荷马、亚里士多德、迈克尔•安杰洛或贝多芬，即还没有女性在上述任何一个优秀的行业中实际创造出可与他们相比拟的作品。这一反面事实最多使该问题没有定论并引发心理学上的讨论。但相当肯定的是，女性可以成为伊丽莎白女王、底波拉或贞德，因为这并非推断，而是事实。但莫名其妙的是，现行法律排除女性做的那些事情，正是她们已经证明她们能够做的事情。没有法律阻止女性创作出莎士比亚的所有戏剧或谱写莫扎特的所有歌剧。但如果伊丽莎白女王或维多利亚女王不继承王位，就不可能被委以最微小的政治责任，而在这方面，伊丽莎白女王显示出其与最伟大的政治人物具有同等才能。

If anything conclusive could be inferred from experience, without psychological analysis, it would be that the things which women are not allowed to do are the very ones for which they are peculiarly qualified; since their vocation for government has made its way, and become conspicuous, through the very few opportunities which have been given; while in the lines of distinction which apparently were freely open to them, they have by no means so eminently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We know how small a number of reigning queens history presents,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kings. Of this smaller number a far larger proportion have shown talents for rule; though many of them have occupied the throne in difficult periods. It is remarkable, too, that they have, in a great number of instances, been distinguished by merits the most opposite to the imaginary and conventional character of

women: they have been as much remarked for the firmness and vigour of their rule, as for its intelligence. When, to queens and empresses, we add regents, and viceroys of provinces, the list of women who have been eminent rulers of mankind swells to a great length. [3_1] This fact is so undeniable, that someone, long ago, tried to retort the argument, and turned the admitted truth into an additional insult, by saying that queens are better than kings, because under kings women govern, but under queens, men.

如果不做心理分析，从经验就可以推断出任何决定性结论的话，那就是，不允许女性做的事情正是她们特别有能力去做的，因为通过给予她们的有限机会，她们的政治才能已开辟了道路并引人注目；而在明显向她们自由开放的特别行业中，她们却未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我们知道，历史上有统治权的女皇较诸国王，其数目何其之少。在这很少的数目中，大多数女皇都表现出治国之才，尽管其中很多位是在困难时期登上皇位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事例中，她们以其优点闻名，这些优点同想象中的传统女性性格正相反，她们在心智方面以其统治的坚定性与气势而引人注目。如若在女皇和皇后之外，加上摄政者及省总督，那么曾经当过人类卓越统治者的女性名单会剧增。 [4_1] 这一事实实在不容否认，以致很久以前有人试图进行反驳，把公认的事实变成一种侮辱，说什么女皇比国王好，因为在国王治理下是女性当政，而在女皇治理下则是男性当政。

It may seem a waste of reasoning to argue against a bad joke; but such things do affect people's minds; and I have heard men quote this saying, with an air as if they thought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in it. At any rate, it will serve as anything else for a starting-point in discussion. I say, then, that it is not true that under kings, women govern. Such cases are entirely exceptional: and weak kings have quite as often governed ill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male

favourites, as of female. When a king is governed by a woman merely through his amatory propensities, good government is not probable, though even then there are exceptions. But French history counts two kings who have voluntarily given the direction of affairs during many years, the one to his mother, the other to his sister: one of them, Charles VIII, was a mere boy, but in doing so he followed the intentions of his father Louis XI, the ablest monarch of his age. The other, Saint Louis, was the best, and one of the most vigorous rulers, since the time of Charlemagne. Both these princesses ruled in a manner hardly equalled by any prince among their contemporaries. The Emperor Charles the Fifth, the most politic prince of his time, who had as great a number of able men in his service as a ruler ever had, and was one of the least likely of all sovereigns to sacrifice his interest to personal feelings, made two princesses of his family successively Governors of the Netherlands, and kept one or other of them in that post during his whole life (they were afterwards succeeded by a third). Both ruled very successfully, and one of them, Margaret of Austria, was one of the ablest politicians of the age. So much for one side of the question. Now as to the other. When it is said that under queens men govern, is the same meaning to be understood as when kings are said to be governed by women? Is it meant that queens choose as their instruments of government, the associates of their personal pleasures? The case is rare even with those who are as unscrupulous on the latter point as Catherine II: and it is not in these cases that the good government, alleged to arise from male influence, is to be found. If it be true, then,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in the hands of better men under a queen than under an average king, it must be that queens have a superior capacity for choosing them; and women must be better qualified than men both for the position of sovereign, and for that of chief minister; for the principal business of a Prime Minister is not to govern in person, but to find the fittest

persons to conduct every department of public affairs. The more rapid insight into character, which is one of the admitted points of superiority in women over men, must certainly make them, with anything like parity of qualifications in other respects, more apt than men in that choice of instruments, which is nearly the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of everyone who has to do with governing mankind. Even the unprincipled Catherine de Medici could feel the value of a Chancellor de l'Hôpital. But it is also true that most great queens have been great by their own talents for government, and have been well served precisely for that reason. They retained the supreme direction of affairs in their own hands: and if they listened to good advisers, they gave by that fact the strongest proof that their judgment fitted them for dealing with the great questions of government.

与一个拙劣的笑话争论似乎是浪费推理，但这类事情确实影响人们的思想。我曾听到男性们援引这一说法，还带着一种似乎认为这一说法有些道理的神情。无论如何，它可以作为讨论的开始。然而我说，事实并非国王统治下女性当政。这类情况全然是例外，能力弱的国王也经常受其男宠的影响而统治得很糟糕，就像受到女性影响一样。当国王只因贪恋女色而甘受女性统治时，就不太可能治理好国家，虽然也有例外。不过，法国历史上曾有两位国王，自愿交出事务指挥权多年，一位交与其母，另一位交与其姊。第一位是查理八世，他只是个孩子，之所以如此，是遵其父路易十一世的意愿，而其父是当时最能干的帝王。另一位是圣路易，他是自查理曼时代以来最好、最具魄力的统治者之一。两位王室女性的治政方式是她们同时代的任何君主都难以比拟的。查理五世皇帝是其所在时代最精明的帝王，拥有作为统治者罕有的大量有才能的男性大臣为他服务，是统治者中最不可能因个人感情而牺牲其利益的，可他却让其家族中两位公主相继担任荷兰女摄政，并终其一生让她们保留该职位（后来她们又得以由第三位女性继任）。两位公主治政很成功，其中一人，奥地利的玛格

丽特是当时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关于该问题的这个方面就谈这些。现在，谈谈另一方面。当人们说在女皇统治下男性当政时，能否将其理解为与国王被女性统治同一个意思呢？是否指女皇选择她们个人享乐的伙伴作她们政府的官员呢？即使像在后一点上最不检点的叶卡捷琳娜二世那样的女皇，也很少这么做。那些由于男性影响而出现的好政府，在这些事例中是找不到的。此外，如果在女皇统治下比在一般国王统治下，行政权果真掌握在较好的人手中，这必定是因为女皇在挑选人才上有很强的能力。女性必定比男性更有能力担任统治者及首席部长的职位，因为首相的主要任务并非亲自管理，而是寻找最合适的人选去管理各个公共事务部门。对人物更敏锐的洞察力是人们公认的女性优于男性的一点，当女性在其他方面的条件与男性平分秋色时，这一点使她们比男性更适合选拔人才。而对任何统治者而言，选拔人才几乎是最重要的任务。即使毫无原则的凯瑟琳•德•梅迪奇也能感觉到德•奥皮塔尔总理的价值。但是，大多数伟大的女皇因其治国天才而伟大，正因如此，其下属也尽心竭力为其效忠，这也是事实。她们自己掌握事务的最高方针，如果她们听取良臣之谏，这一事实本身就最有力地证明了其判断力使其适合处理政府重大问题。

Is it reasonable to think that those who are fit for the greater functions of politics, are incapable of qualifying themselves for the less? Is there any reason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that the wives and sisters of princes should, whenever called on, be found as competent as the princes themselves to their business, but that the wives and sisters of statesmen, and administrators, and directors of companies, and managers of public institutions, should be unable to do what is done by their brothers and husbands? The real reason is plain enough; it is that princesses, being more raised above the generality of men by their rank than placed below them by their sex, have never been taught that it was improper for them to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politics; but have been allowed to feel the liberal interest natural to any cultivated human being, in the great

transactions which took place around them, and in which they might be called on to take a part. The ladies of reigning families are the only women who are allowed the same range of interests and freedom of development as men; and it is precisely in their case that there is not found to be any inferiority. Exactly where and in proportion as women's capacities for government have been tried, in that proportion have they been found adequate.

认为适合担任更重大政治职务的人不能胜任次要职务，这合理吗？王子的妻子与姐妹无论何时只要使命召唤就可以像王子那样胜任其工作，然而政治家、行政官员、公司经理及公共机构总务的妻子、姐妹却干不了其兄弟与丈夫做的事，这些事情在本质方面有什么原因吗？真正的原因很明显，因为公主们因其等级而被抬高到大多数男性之上，而并未因其性别被置于男性之下，因此从未有人教过她们不适合关心政治；相反，她们得以像任何有教养的人一样，对周围发生的重大事件自然而然地感兴趣，并且还可能被请去参与这些事情。统治者家庭的女性是唯一得到允许拥有同男性一样的兴趣与发展自由的女性。只有在她们身上，我们找不到任何卑微感。正是在女性已经过考验的从政能力方面，我们发现她们是可以胜任政务的。

This fac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est general conclusions which the world's imperfect experience seems as yet to suggest, concerning the peculiar tendencies and aptitudes characteristic of women, as women have hitherto been. I do not say, as they will continue to be; for, as I have already said more than once, I consider it presumption in anyone to pretend to decide what women are or are not, can or cannot be, by natural constitution. They have always hitherto been kept, as far as regards spontaneous development, in so unnatural a state, that their nature cannot but have been greatly distorted and disguised; and no one can safely

pronounce that if women's nature were left to choose its direction as freely as men's, and if no artificial bent were attempted to be given to it except that required by the conditions of human society, and given to both sexes alike, there would be any material difference, or perhaps any difference at all, in the character and capacities which would unfold themselves. I shall presently show, that even the least contestable of the differences which now exist, are such as may very well have been produced merely by circumstances, without any difference of natural capacity. But, looking at women as they are known in experience, it may be said of them, with more truth than belongs to most other generalisations on the subject, that the general bent of their talents is towards the practical. This statement is conformable to all the public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It is no less borne out by common and daily experience. Let us consider the special nature of the mental capacities most characteristic of a woman of talent. They are all of a kind which fits them for practice, and makes them tend towards it. What is meant by a woman's capacity of intuitive perception? It means, a rapid and correct insight into present fac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general principles. Nobody ever perceived a scientific law of nature by intuition, nor arrived at a general rule of duty or prudence by it. These are results of slow and careful collection and comparison of experience; and neither the men nor the women of intuition usually shine in this department, unless, indeed, the experience necessary is such as they can acquire by themselves. For what is called their intuitive sagacity makes them peculiarly apt in gathering such general truths as can be collected from their individual means of observation. When, consequently, they chance to be as well provided as men are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experience, by reading and education (I use the word chance advisedly, for, in respect to the knowledge that tends to fit them for the greater concerns of life, the only educated women are

the self-educated) they are better furnished than men in general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sites of skilful and successful practice. Men who have been much taught, are apt to be deficient in the sense of present fact; they do not see, in the facts which they are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what is really there, but what they have been taught to expect. This is seldom the case with women of any ability. Their capacity of “intuition” preserves them from it. With equality of experience and of general faculties, a woman usually sees much more than a man of what is immediately before her. Now this sensibility to the present, is the main quality on which the capacity for practice,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ory, depends. To discover general principles, belongs to the speculative faculty: to discern and discriminate the particular cases in which they are and are not applicable, constitutes practical talent: and for this, women as they now are have a peculiar aptitude. I admit that there can be no good practice without principles, and that the predominant place which quickness of observation holds among a woman's faculties, makes her particularly apt to build overhasty generalisations upon her own observation; though at the same time no less ready in rectifying those generalisations, as her observation takes a wider range. But the corrective to this defect, is access to the experience of the human race; general knowledge—exactly the thing which education can best supply. A woman's mistakes are specifically those of a clever self-educated man, who often sees what men trained in routine do not see, but falls into errors for want of knowing things which have long been known. Of course he has acquired much of the pre-existing knowledge, or he could not have got on at all; but what he knows of it he has picked up in fragments and at random, as women do.

关于女性迄今特有的性情与才能特点，虽然还未积累足够多的经

验，但已经得出了最好的普遍结论，而该事实与这些普遍结论一致。我并非说她们将来会继续如此，因为，正如我已不止一次说过的，我认为任何人以天生素质为借口来判定女性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都有失冒昧。就其自然发展而言，迄今为止，她们一直囿于非常不自然的状态，以致其天性不得不被极度扭曲并伪装起来，没有人能有把握地断言，如果让女性的天性像男性的一样自由选择方向，如果除人类社会的条件所要求并同等给予两性的人为扭曲外，无人再试图给它以人为的扭曲，那么，在女性所显露的性格与能力上，会与男性有重大差异，甚至说会有差异吗？现在我将要表明，目前存在的即便是最少有争论的差别都只是由于环境产生的，不存在任何天生能力上的差异。但是，从人们的经验去看待女性时，可以说——比其他在该问题上的大多数概括都更准确——女性的才能一般是倾向于实践的。这一说法同女性现在和过去的整个社会历史相一致。也同样为普通的日常经验所证实。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具有才干的女性其最典型的智力能力特征，这些特征使她们适应实践并使其倾向实践。女性的直觉洞察力是指什么？它是指，对当前事实作出迅速正确的判断。它与一般原则无关。从未有人凭直觉去洞察自然科学定律，也没有人凭直觉得出关于责任或谨慎明智的一般规则。这些是对经验进行缓慢而又仔细的积累与比较的结果。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直觉在这方面通常都不突出，除非他们自己可以获取必需的经验。因为所谓他们直觉的睿智，使他们特别善于得到能由其个人观察所积累的一般性真理。结果，当女性只要像男性一样，通过学习和教育偶然也得到别人的经验时（我使用“偶然”这个词是经过考虑的，因为就使她们更适应生活的知识来说，唯一受教育的女性都是自学的），她们就比一般男性更具备熟练与成功的实践所必需的基本条件。接受过很多教育的男性容易缺少对现实的敏感，看不到他们处理的事件的真相，只看到别人教他们要去期待的东西。有能力的女性很少如此。“直觉”能力赋予她们这一优点。具有同等经验与一般能力的女性，对出现在眼前的事物，看到的通常比男性要多得多。这种对现实的敏感，是实践能力（有别于理论）所依赖的主要品质。发现一般原则属于推理能力，洞悉和区别在什么情况下它们可用或不可用则构成实践能力，在这方面，现在的女性具有特殊的资质。我承认没有原则就不会有好的实

践，并且承认观察的敏捷性在女性能力中所占的主要位置，使其特别容易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草率的结论，虽然同时随着其观察面的拓宽她也同样愿意改正这些结论。然而改正这一缺点的方法是积累人类的经验，增加普遍的知识——这正是教育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女性的错误也是一个聪明、自学成才的男性特有的错误，这些男性常常看到受过常规教育的男性所看不到的东西，但却因缺少早已为人所知的知识而犯错误。当然，他已习得许多早已存在的知识，否则他将难以为继。但是，像女性一样，他的知识是零散拾取或随意获得的。

But this gravitation of women's minds to the present, to the real, to actual fact, while in its exclusiveness it is a source of errors, is also a most useful counteractive of the contrary error. The principal and most characteristic aberration of speculative minds as such, consists precisely in the deficiency of this lively perception and ever-present sense of objective fact. For want of this, they often not only overlook the contradiction which outward facts oppose to their theories, but lose sight of the legitimate purpose of speculation altogether, and let their speculative faculties go astray into regions not peopled with real beings, animate or inanimate, even idealised, but with personified shadows created by the illusions of metaphysics or by the mere entanglement of words, and think these shadows the proper objects of the highest, the most transcendent, philosophy. Hardly anything can be of greater value to a man of theory and speculation who employs himself not in collecting materials of knowledge by observation, but in working them up by processes of thought into comprehensive truths of science and laws of conduct, than to carry on his speculations in the companionship, and under the criticism, of a really superior woman. There is nothing comparable to it for keeping his thoughts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l things, and the actual facts of nature. A woman seldom runs wild after an abstraction. The habitual direction of her mind to

dealing with things as individuals rather than in groups, and (what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it) her more lively interest in the present feelings of persons, which makes her consider first of all, in anything which claims to be applied to practice, in what manner persons will be affected by it—these two things make her extremely unlikely to put faith in any speculation which loses sight of individuals, and deals with things as if they existed for the benefit of some imaginary entity, some mere creation of the mind, not resolvable into the feelings of living beings. Women's thoughts are thus as useful in giving reality to those of thinking men, as men's thoughts in giving width and largeness to those of women. In depth, as distinguished from breadth, I greatly doubt if even now, women, compared with men, are at any disadvantage.

不过，女性思想中这种偏重眼前的、真实与具体的事实，其独特之处既是错误的来源，也是对相反错误最有用的反作用。纯理论头脑主要及最典型的偏差恰恰是缺少对客观事实生动的洞察力以及无时不在的敏感。因为缺少这一点，他们常常不仅忽视外部事实与其理论的矛盾之处，而且完全忘记了推理的真正目的，使其推理能力误入歧途，进入那些有生命或无生命、甚至是理想化了的并未真正存在的领域，进入由形而上学的幻觉或仅仅由于文字纠葛所制造的拟人化影子的领域，并认为这些影子是最高端、最卓越的哲学研究的恰当对象。一个从事理论和推理的男性，并非通过观察去搜集知识材料，而是通过思考过程努力获得全面的科学真理与行为法则。对于这样的男性，没有什么比在一个真正优秀的女性陪伴和批评下进行推理对他有更大的价值了。为使其思想保持在真实事物与自然现实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东西可与之比拟。女性很少疯狂地追逐抽象概念。她习惯作为个人而非集体来处理事情的思想倾向，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对人们当前情感更加浓厚的兴趣使她首先考虑那些所谓可应用于实践的事情，考虑人们会以何种方式受其影响。这两件事使她根本不可能相信任何不考虑个人的推理，也不可能处理那些似乎作为某些想象的事物、某些

纯粹的思想创造物的利益而存在，而无法融合到人们感情中的事情。因此，女性思想的益处在于给予爱思考的男性以现实，正如男性思想的益处是给予女性思想以宽度与广度。在有别于广度的深度方面，即便现在，女性与男性相比是否处于劣势，我还很怀疑。

If the existing 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 are thus valuable even in aid of speculation, they are still more important, when speculation has done its work, for carrying out the results of speculation into practice. For the reasons already given, women are comparatively unlikely to fall into the common error of men, that of sticking to their rules in a case whose specialities either take it out of the class to which the rules are applicable, or require a special adaptation of them. Let us now consider another of the admitted superiorities of clever women, greater quickness of apprehension. Is not this preeminently a quality which fits a person for practice? In action, everything continually depends upon deciding promptly. In speculation, nothing does. A mere thinker can wait, can take time to consider, can collect additional evidence; he is not obliged to complete his philosophy at once, lest the opportunity should go by. The power of drawing the best conclusion possible from insufficient data is not indeed useless in philosophy;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ovisional hypothesis consistent with all known facts is often the needful basis for further inquiry. But this faculty is rather serviceable in philosophy, than the main qualification for it: and, for the auxiliary as well as for the main operation, the philosopher can allow himself any time he pleases. He is in no need of the capacity of doing rapidly what he does; what he rather needs is patience, to work on slowly until imperfect lights have become perfect, and a conjecture has ripened into a theorem. For those, on the contrary, whose business is with the fugitive and perishable—with individual facts, not kinds of facts—rapidity of thought is a

qualification next only in importance to the power of thought itself. He who has not his faculties under immediate command, in the contingencies of action, might as well not have them at all. He may be fit to criticise, but he is not fit to act. Now it is in this that women, and the men who are most like women, confessedly excel. The other sort of man, however pre-eminent may be his faculties, arrives slowly at complete command of them: rapidity of judgment and promptitude of judicious action, even in the things he knows best, are the gradual and late result of strenuous effort grown into habit.

如果女性现有的智力特点即使在利于推理方面也是可贵的，那么当推理已经完成，要把推理的成果运用于实践时，就更加重要了。由于前面已陈述过的原因，相比之下，女性不太可能会犯男性通常会犯的错误，即在一件事情的特点使之不属于某些规则适用之列，或要求对这些规则作出特别改变时，他们仍要坚持这些规则。我们现在研究一下人们公认的聪慧女性的另一优点，即较快的理解力。这难道不是适合务实的人的一种卓越品质吗？在行动中，我们要迅速决定每件事。在推理中则无此必要。只思索的人可以等待，可以花时间去考虑，可以搜集更多的证据，他不必担心会失去时机因此必须立刻完成其哲学思想。在哲学研究中，从不足的材料中得出尽可能最好的结论，这一能力确实有用；创立与所有已知事实一致的临时假设，常常是进一步探索的必要基础。而这一能力比哲学需要的主要素质更有用处：为了完成主要工作及辅助工作，哲学家想用多少时间都行。他不需要具备快速工作的能力，反而需要耐心来慢慢地工作，直到不完善的思想变得完善，或一个设想发展成一个定理。相反，那些同瞬间即逝、易于消失的一个个事实而非各类事实打交道的人，敏捷思考的重要性仅次于思考能力本身。在行为的偶发事件中，他若不能立即运用其能力，就等于完全没有能力。他可能适合做评论，但不适合行动。女性与性格上最接近女性的男性最擅长这一点。另一种男性，无论其能力可能多么突出，但在充分运用时却很迟缓，即使在他很熟悉的事

情上，迅速判断及敏捷的明智行动，也是通过后期日积月累的刻苦努力形成习惯的结果。

It will be said, perhaps, that the greater nervous susceptibility of women is a disqualification for practice, in anything but domestic life, by rendering them mobile, changeable, too vehement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oment, incapable of dogged perseverance, unequal and uncertain in the power of using their faculties. I think that these phrases sum up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objections commonly made to the fitness of women for the higher class of serious business. Much of all this is the mere overflow of nervous energy run to waste, and would cease when the energy was directed to a definite end. Much is also the result of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cultivation; as we see by the almost total disappearance of “hysterics” and fainting-fits, since they have gone out of fashion. Moreover, when people are brought up, like many women of the higher classes (though less so in our own country than in any other), a kind of hot-house plants, shielded from the wholesome vicissitudes of air and temperature, and untrained in any of the occupations and exercises which give stimulus and development to the circulatory and muscular system, while their nervous system, especially in its emotional department, is kept in unnaturally active play; it is no wonder if those of them who do not die of consumption, grow up with constitutions liable to derangement from slight cause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and without stamina to support any task, physical or mental, requiring continuity of effort. But women brought up to work for their livelihood show none of these morbid characteristics, unless indeed they are chained to an excess of sedentary work in confined and unhealthy rooms. Women who in their early years have shared in the healthfu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bodily freedom of their

brothers, and who obtain a sufficiency of pure air and exercise in after-life, very rarely have any excessive susceptibility of nerves which can disqualify them for active pursuits. There is indeed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persons, in both sexes, in whom an unusual degree of nervous sensibility is constitutional, and of so marked a character as to be the feature of their organisation which exercise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ver the whole character of the vital phenomena. This constitution, like other physical conformations, is hereditary, and is transmitted to sons as well as daughters; but it is possible, and probable, that the nervous temperament (as it is called) is inherited by a greater number of women than of men. We will assume this as a fact: and let me then ask, are men of nervous temperament found to be unfit for the duties and pursuits usually followed by men? If not, why should women of the same temperament be unfit for them?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temperament are, no doubt, within certain limits, an obstacle to success in some employments, though an aid to it in others. But when the occupation is suitable to the temperament, and sometimes even when it is unsuitable, the most brilliant examples of success are continually given by the men of high nervous sensibility. They are distinguished in their practical manifestations chiefly by this, that being susceptible of a higher degree of excitement than those of another physical constitution, their powers when excited differ more than in the case of other people, from those shown in their ordinary state: they are raised, as it were, above themselves, and do things with ease which they are wholly incapable of at other times. But this lofty excitement is not, except in weak bodily constitutions, a mere flash, which passes away immediately, leaving no permanent traces, and incompatible with persistent and steady pursuit of an object. It is the character of the nervous temperament to be capable of sustained excitement, holding out through long-continued efforts. It is what is meant by spirit. It is what makes the

high-bred racehorse run without slackening speed till he drops down dead. It is what has enabled so many delicate women to maintain the most sublime constancy not only at the stake, but through a long preliminary succession of mental and bodily tortures. It is evident that people of this temperament are particularly apt for what may be called the executive department of the leadership of mankind. They are the material of great orators, great preachers, impressive diffusers of moral influences. Their constitution might be deemed less favourable to the qualities required from a statesman in the cabinet, or from a judge. It would be so, if the consequence necessarily followed that because people are excitable they must always be in a state of excitement. But this is wholly a question of training. Strong feeling is the instrument and element of strong self-control: but it requires to be cultivated in that direction. When it is, it forms not the heroes of impulse only, but those also of self-conquest. History and experience prove that the most passionate characters are the most fanatically rigid in their feelings of duty, when their passion has been trained to act in that direction. The judge who gives a just decision in a case where his feelings are intensely interested on the other side, derives from that same strength of feeling the determined sense of the obligation of justice, which enables him to achieve this victory over himself. The capability of that lofty enthusiasm which takes the human being out of his everyday character, reacts upon the daily character itself. His aspirations and powers when he is in this exceptional state, become the type with which he compares, and by which he estimates, his sentiments and proceedings at other times: and his habitual purposes assume a character moulded by and assimilated to the moments of lofty excitement, although those, from the physical nature of a human being, can only be transient. Experience of races, as well as of individuals, does not show those of excitable temperament to be less fit, on the average, either for speculation or

practice, than the more unexcitable. The French, and the Italians, are undoubtedly by nature more nervously excitable than the Teutonic races, and, compared at least with the English, they have a much greater habitual and daily emotional life: but have they been less great in science, in public business, in legal and judicial eminence, or in war? There is abundant evidence that the Greeks were of old, as their descendants and successors still are, one of the most excitable of the races of mankind. It is superfluous to ask, what among the achievements of men they did not excel in. The Romans, probably, as an equally southern people, had the same original temperament: but the stern character of their national discipline, like that of the Spartans, made them an example of the opposite type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e greater strength of their natural feelings being chiefly apparent in the intensity which the same original temperament made it possible to give to the artificial. If these cases exemplify what a naturally excitable people may be made, the Irish Celts afford one of the aptest examples of what they are when left to themselves; (if those can be said to be left to themselves who have been for centuries under the indirect influence of bad government, and the direct training of a Catholic hierarchy and of a sincere belief in the Catholic religion). The Irish character must be considered, therefore, as an unfavourable case: yet, whenev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individual have been at all favourable, what people have shown greater capacity for the most varied and multifarious individual eminence? Like the French compared with the English, the Irish with the Swiss, the Greeks or Italians compared with the German races, so women compared with men may be found, on the average, to do the same things with some variety in the particular kind of excellence. But, that they would do them fully as well on the whole, if their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were adapted to correcting instead of aggravating the infirmities incident to their temperament, I see not the smallest

reason to doubt.

或许人们会说，女性的神经比较敏感，不适合家庭生活以外的实践活动。神经敏感使她爱动，易变，过于强烈地受一时的影响，不能顽强坚持，运用才能的能力不平衡、不确定。我想，这些措辞概括了大部分通常认为女性不适合做较高级重要事务的反对意见。所有这些，很多不过是过剩的神经活力造成的浪费，如果把这种活力引向一个具体目标，它们就会终止。这些有很多也是有意识或无意识教养的结果，一如自从“歇斯底里”和晕厥不再流行后，我们就看到它们几乎绝迹了。此外，高级阶层的许多女性（虽然在我国少于其他国家）像温室中的植物，全然未经历有益身心的空气与温度的变化，未经过任何职业训练，未得到过对循环和肌肉系统进行刺激和发展的体育锻炼，但同时，她们的神经系统，特别是其感情冲动的部分，却保持在不自然的活跃状态，因此她们之中那些未死于肺病而成长起来的体格，易于因细小的内部或外部原因而精神错乱，没有支持连续工作的体力或脑力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受到培养要为生计而工作的女性就无此类病态的特征，除非她们确实曾被迫在不通风、不卫生的屋内做过度久坐的工作。年幼时同她的兄弟分享健康的体育教育及身体自由的女性，以及晚年有充足的清新空气和足够运动的女性，很少有致使她们无法从事灵活工作的过度神经敏感。的确有一定比例的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其超常程度的神经敏感是体质带来的，这种性格明显变成了他们生理组织的特征，对其生命现象的整个性质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体质像其他生理构造一样是遗传的。既遗传给女儿，也遗传给儿子。但这种所谓神经质的遗传，可能，而且很可能是女性多于男性。我们假定这是事实，那么我要问，有神经质的男性是否不适合做通常由男性担任的职务和事业？如果并非如此，为什么有同样气质的女性就不适合呢？这种气质的特点无疑在一定限度内会妨碍某些职业的成功，尽管在别的职业中它有助于成功。但是，当职业适合这种气质时，有时甚至不适合时，也有高度神经敏感的男性不断做出最光辉的成功榜样。他们的实际表现突出，主要由于对较高程度的刺激比另一种生理构造的人敏感。他们的力量被激发起来后，同其他表现

为平常状态的人有较大差别。他们仿佛超越了自己，做起事来轻而易举，这是他们在其他时候做不到的。但是，除体质孱弱的情况外，这种高度兴奋并非转瞬即逝、不留永久痕迹的，与坚持不变地对目标的追求并不矛盾。神经气质的特点是能够保持兴奋，持续长时间的工作。这就是精神的意义。正是这种精神使良种赛马不肯放慢速度，拼命奔跑，直至力竭倒地而死。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众多纤弱的女性不仅冒着风险，而且在经历了长期脑力与体力上一系列磨难时，仍保持着最崇高的坚定性。显然，具备这种气质的人特别适合可称作人类领导的管理部门。他们是伟大演说家与传道者的素材，是道德影响的杰出传播者。人们也许认为他们的体质不太利于担任内阁政治家或法官等职位。这样一来，产生的必然后果是，由于人们易于兴奋，他们就必定总是处于兴奋状态。但这完全是一个训练的问题。强烈的感情是很强的自我控制的工具和要素，但需要朝这一方向培养。培养之后，它不但造就富有激情的英雄，也造就战胜自我的英雄。历史与经验证明，最富激情的人，如果其热情曾受过这方面训练的话，他们的责任感是最狂热最严格的。在一件案子中，虽然法官的情感强烈倾向于另一方，但他能作出公正的判决，这是他从那种同样强烈的情感中获得了对正义坚定的责任感，使他得以战胜自己。这种崇高热情使人不同于其日常性格，而这种能力也反作用于日常性格本身。他处于这种不寻常状态时的渴望和力量成为他用来比较和评价其在其他时候的情感与行动的模范。他的习惯性目标表现为一种在崇高的兴奋时刻形成并与之同化了的性格，虽然从人的身体本性看，这些只能是短暂的。种族与个体的经验都未表明，具有兴奋气质的人一般比不易兴奋的人更不适应推理或实践。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天性无疑比条顿族人更易于神经兴奋，至少同英国人相比，他们的习惯及日常的情感生活要更多，然而他们在科学上、公共事务上，在法律与司法成就上或在战争中，难道比其他民族差吗？有充分证据表明，希腊人是人类最古老、最易激动的种族之一，他们的子孙和继承者依然如此。要问在人类的成就中哪一项他们不擅长，那是多余的。罗马人作为同样靠南的民族，大概也有同样的原始气质，但他们国家严格的纪律（像斯巴达人那样），使他们成为相反类型民族性格的典型。他们天生的情感更多表现在强度上，这种强度是他们相同的原始气质赋予人为气质的。如

果这些事例证明了一个天性易激动的民族可能是怎样形成的，那么，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则提供了一个最恰当的范例，说明在听之任之的情况下他们是怎样的（如果几个世纪都处在恶劣统治的间接影响下，并在天主教等级制度和笃信天主教的直接训练下，可以被说成是听之任之的话）。因此，必须把爱尔兰人的性格视为不利条件：可是当个体环境全然有利时，什么民族对最为多样的个人成就表现出较大的宽容呢？正如把法国人同英国人相比、把爱尔兰人同瑞士人相比、把希腊人或意大利人同日耳曼民族相比一样，将女性同男性相比，一般说来，可能会发现他们做同样的事情，并在各自擅长的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如果她们所受的教育和培养是旨在改正而非强化其气质易有的弱点，那么她们在整体上也完全可以做得很好，我看不到任何理由来怀疑这一点。

Supposing it, however, to be true that women's minds are by nature more mobile than those of men, less capable of persisting long in the same continuous effort, more fitted for dividing their faculties among many things than for travelling in any one path to the highest point which can be reached by it: this may be true of women as they now are (though not without great and numerous exceptions), and may account for their having remained behind the highest order of men in precisely the things in which this absorption of the whole mind in one set of ideas and occupations may seem to be most requisite. Still, this difference is one which can only affect the kind of excellence, not the excellence itself, or its practical worth: and it remains to be shown whether this exclusive working of a part of the mind, this absorption of the whole thinking faculty in a single subject, and concentration of it on a single work, is the normal and healthful condition of the human faculties, even for speculative uses. I believe that what is gained in special development by this concentration, is lost in the capacity of the mind for the other purposes of life; and even in

abstract thought, it is my decided opinion that the mind does more by frequently returning to a difficult problem, than by sticking to it without interruption. For the purposes, at all events, of practice, from its highest to its humblest departments, the capacity of passing promptly from one subject of consideration to another, without letting the active spring of the intellect run down between the two, is a power far more valuable; and this power women pre-eminently possess, by virtue of the very mobility of which they are accused. They perhaps have it from nature, but they certainly have it b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for nearly the whole of the occupations of women consist in the management of small but multitudinous details, on each of which the mind cannot dwell even for a minute, but must pass on to other things, and if anything requires longer thought, must steal time at odd moments for thinking of it. The capacity indeed which women show for doing their thinking in circumstances and at times which almost any man would make an excuse to himself for not attempting it, has often been noticed: and a woman's mind, though it may be occupied only with small things, can hardly ever permit itself to be vacant, as a man's so often is when not engaged in what he chooses to consider the business of his life. The business of a woman's ordinary life is things in general, and can as little cease to go on as the world to go round.

然而，假定下述情况都是事实，即女性的思想生来就比男性的灵活些，不像男性那样能长时间坚持作同样的、持续的努力，更适合把能力分散在许多事情上，而不是只沿着一条道路走到可能达到的最高点：就她们（虽然不是没有杰出的、众多的例外）现在而言，可能是真的，而且可能正说明了在恰恰需要全神贯注于一套思想与工作的事情上，女性落后于最高级别男性的原因。可这一差别只能影响其擅长的方面而非擅长本身或其实际价值。而且，这种大脑一部分的独特运作，这种将全部思维全神贯注于单一题目上的能力以及将能力集中于

单一的工作上，是否是人类能力正常、健康的状态（哪怕只是为了好奇），还有待证明。我认为，这种集中于特殊发展上之所得，又在思考生活中其他目的时失去了。即使在抽象思维中，我确信无疑的意见是，大脑经常回到一个困难的题目上，比持续不断地思考它时效率更高。无论如何，为了实践目的，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部门，迅速从一个研究题目转到另一个，在二者之间不让智力的泉涌低落下去，这种能力才更为可贵。女性凭借这种灵活性，而突出具有这种能力，但是也饱受诟病。她们也许生来就有这种能力，但通过教育和训练她们一定会具有，因为女性整个职业几乎就包括管理细小而众多的琐事，在每件琐事上哪怕思考的时间不足一分钟，也必须转到其他事情上，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较长时间的思考，她们必须抽出零散的时间去想。确实，女性在几乎任何男性都不想思考的情况下和时间内所表现出的思考能力，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女性的头脑可能只被一些小事占据，但很少允许它闲着，而男性的头脑，在没有思考他认为是重要的事情时，常常是闲着的。女性日常生活的任务都是平凡的事情，但却像世界的运转一样，不会停止。

But (it is said) there is anatomical evidence of the superior mental capacity of men compared with women: they have a larger brain. I reply, tha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fact itself is doubtful. It is by no means established that the brain of a woman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a man. If it is inferred merely because a woman's bodily frame generally is of less dimensions than a man's, this criterion would lead to strange consequences. A tall and large-boned man must on this showing be wonderfully superior in intelligence to a small man, and an elephant or a whale must prodigiously excel mankind. The size of the brain in human beings, anatomists say, varies much less than the size of the body, or even of the head, and the one cannot be at all inferred from the other. It is certain that some women have as large a brain as any man. It is within my knowledge that a man who had weighed many human brains, said

that the heaviest he knew of, heavier even than Cuvier's (the heaviest previously recorded), was that of a woman. Next, I must observe that the precise relation which exists between the brain and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is not yet well understood, but is a subject of great dispute. That there is a very close relation we cannot doubt. The brain is certainly the material organ of thought and feeling: and (making abstraction of the great unsettled controversy respecting the appropriation of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rain to different mental faculties) I admit that it would be an anomaly, and an exception to all we know of the general laws of life and organisation, if the size of the organ were wholly indifferent to the function; if no accession of power were derived from the great magnitude of the instrument. But the exception and the anomaly would be fully as great if the organ exercised influence by its magnitude only. In all the more delicate operations of nature -of which those of the animated creation are the most delicate, and those of the nervous system by far the most delicate of these—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 depend as much on differences of quality in the physical agents, as on their quantity: and if the quality of an instrument is to be tested by the nicety and delicacy of the work it can do, the indications point to a greater average fineness of quality in the brain and nervous system of women than of men. Dismissing abstract difference of quality, a thing difficult to verify, the efficiency of an organ is known to depend not solely on its size but on its activity: and of this we have an approximate measure in the energy with which the blood circulates through it, both the stimulus and the reparative force being mainly dependent on the circulation. It would not be surprising—it is indeed a hypothesis which accords well with the differences actually observed between the mental operations of the two sexes—if men on the average should have the advantage in the size of the brain, and women in activity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The results which conjecture, founded on analogy, would lead us to

expect from this difference of organisation, would correspond to some of those which we most commonly see. In the first place, the mental operations of men might be expected to be slower. They would neither be so prompt as women in thinking, nor so quick to feel. Large bodies take more time to get into full action. On the other hand, when once got thoroughly into play, men's brain would bear more work. It would be more persistent in the line first taken; it would have more difficulty in changing from one mode of action to another, but, in the one thing it was doing, it could go on longer without loss of power or sense of fatigue. And do we not find that the things in which men most excel women are those which require most plodding and long hammering at a single thought, while women do best what must be done rapidly? A woman's brain is sooner fatigued, sooner exhausted; but given the degree of exhaustion, we should expect to find that it would recover itself sooner. I repeat that this speculation is entirely hypothetical; it pretends to no more than to suggest a line of inquiry. I have before repudiated the notion of its being yet certainly known that there is any natural difference at all in the average strength or direction of the mental capacities of the two sexes, much less what that difference is. Nor is it possible that this should be known, so long as the psychological laws of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have been so little studied, even in a general way, and in the particular case never scientifically applied at all; so long as the most obvious external causes of difference of character are habitually disregarded —left unnoticed by the observer, and looked down upon with a kind of supercilious contempt by the prevalent schools both of natural history and of mental philosophy: who, whether they look for the source of what mainly distinguishes human beings from one another, in the world of matter or in that of spirit, agree in running down those who prefer to explain these differences by the different relations of human beings to society and life.

但是，（据说）男性的智力才能高于女性是有解剖学证据的：男性的大脑更大。我的回答是：首先，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可疑的。女性的大脑小于男性完全不是确定的事实。如果只是因为女性身体的骨架通常比男性的小而作出这种推断，这一标准将会导致奇怪的后果。据此说法，如果骨骼高大的男性智力一定比矮小的男性高得多，那么大象或鲸鱼必定大大超过人类。解剖学家说，人类大脑的大小差异比身材差异要小很多，甚至比头部大小的差异也小很多，用身材或头部的大小决不能推断出大脑的大小。可以肯定，有些女性的大脑与男性同样大。据我所知，有个称过许多人脑重量的人说，他所知道的最重的大脑是一位女性的，比居维叶的（之前的最重记录）还重。其次，我必须指出，人们尚未透彻了解大脑与智力的确切关系，这一问题还存在很大争议。我们不能怀疑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大脑无疑是思想与感觉的物质器官，并且（在将关于不同的智力才能专属大脑不同部分这一大未决的争议问题加以抽象化时）我承认，如果器官大小与其功能全然无关，如果器官增大而其能力没有得到相应增加，那将是一种反常现象，并且是我们已知的生命与组织一般规律的例外情况。但是，如果器官仅仅因其大小而造成影响，那么，反常现象或例外情况也同样很多。在大自然所有较精密的造物中（生命的创造是最精密的，其中又以神经系统最为精密），效果差异不仅取决于物理因子的量化差异，也取决于其质化差异。如果用其能做工作的优良和精细程度来检验器官质量，那么有迹象表明女性大脑及其神经系统的平均精细度比男性高。除去难以证实的、抽象的质量差异外，我们知道一个器官的效率不仅取决于其大小，而且取决于其活动：关于这一点，我们做过血液流经它时所携能量的大概测算，包括刺激及主要依赖循环的修复力。如果平均而言男性的大脑在大小上占优势，而女性在大脑循环的活力方面占优势，这并不会令人惊讶（这一假设的确同实际观察到的两性智力活动之间的差异非常吻合）。基于类比的推测结果会引导我们预期器官的差异，会同我们最常见的某些结果相对应。首先，预期中的男性大脑运作速度可能会较慢。与女性相比，他们的思维没有那么敏捷，感知力也没有那么迅速。个子越高，启动全速运转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另外，一旦开始全速运转，男性大脑的负荷会较

大。男性大脑会在最初选择的那条线路上坚持更久，从一种行为模式转换到另一种会比较困难。但是，在做这一件事时，男性大脑会以无能量损耗、无疲劳感的方式工作更长时间。难道我们没有发现，男性更擅长那些需要对某个想法进行苦苦探究和长时间琢磨的事情，而女性却擅长做那些需要快速解决的事情吗？女性大脑会很快疲惫，也会很快筋疲力尽。然而考虑到疲惫程度，我们也应期待，女性大脑能更快恢复。在此我要重申，这一推测完全是假设，仅仅是建议一条探究路线而已。我之前批判过一种看法，即尚未确知两性智力在平均能力与方向上存在先天差异，更不用提这种差异是什么了。哪怕以最笼统的方式，只要性格形成的心理规律还未得到充分研究，而且还未科学地应用到个案上；只要引起性格差异最明显的外部因素仍被习惯性忽视——观察者对其视而不见，并遭到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然历史与精神哲学两大学派带有轻蔑自大的对待，那么下面这点得到了解的可能性也将不存在，即：那些试图在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找寻将一部分人类与其他人类区分开来之根源的人，都已达成一致，贬低那些喜欢从人类与社会和生活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解释两性之间差异的人。

To so ridiculous an extent are the notions formed of the nature of women, mere empirical generalisations, framed, without philosophy or analysis, upon the first instances which present themselves, that the popular idea of it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ccording as the opinions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ountry have given to the women living in it any speciality of development or non-development. An Oriental thinks that women are by nature peculiarly voluptuous; see the violent abuse of them on this ground in Hindoo writings. An Englishman usually thinks that they are by nature cold. The sayings about women's fickleness are mostly of French origin; from the famous distich of Francis the First, upward and downward. In England it is a common remark, how much more constant women are than men. Inconstancy has been longer reckoned discreditable to a woman, in England than in

France; and Englishwomen are besides, in their inmost nature, much more subdued to opinion. It may be remarked by the way, that Englishmen are in peculiarly un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for attempting to judge what is or is not natural, not merely to women, but to men, or to human beings altogether, at least if they have only English experience to go upon: because there is no place where human nature shows so little of its original lineaments. Both in a good and a bad sense, the English are farther from a state of nature than any other modern people. They are, more than any other people, a product of civilisation and discipline. England is the country in which social discipline has most succeeded, not so much in conquering, as in suppressing, whatever is liable to conflict with it. The English, more than any other people, not only act but feel according to rule. In other countries, the taught opinion, or the requirement of society, may be the stronger power, but the promptings of the individual nature are always visible under it, and often resisting it: rule may be stronger than nature, but nature is still there. In England, rule has to a great degree substituted itself for nature. The greater part of life is carried on, not by following inclination under the control of rule, but by having no inclination but that of following a rule. Now this has its good side doubtless, though it has also a wretchedly bad one; but it must render an Englishman peculiarly ill-qualified to pass a judgment on the original tendencies of human nature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The errors to which observers elsewhere are liable on the subject, are of a different character. An Englishman is ignorant respecting human nature, a Frenchman is prejudiced. An Englishman's errors are negative, a Frenchman's positive. An Englishman fancies that things do not exist, because he never sees them; a Frenchman thinks they must always and necessarily exist, because he does see them. An Englishman does not know nature, because he has had no opportunity of observing it; a Frenchman generally knows a great

deal of it, but often mistakes it, because he has only seen it sophisticated and distorted. For the artificial state superinduced by society disguises the natural tendencies of the thing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observation, in two different ways: by extinguishing the nature, or by transforming it. In the one case there is but a starved residuum of nature remaining to be studied; in the other case there is much, but it may have expanded in any direction ra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would spontaneously grow.

有关女性本性观念形成的框架建立在第一批出现的事例上，仅仅来自经验概括，没有经过任何理性思考或分析。这种观念的形成如此荒诞，以致不同国度的大众观念都各有相同，与该国观念及社会环境赋予本国女性以某种促进发展或无益发展的专长相适应。东方人认为，女性天生贪图享乐，由此便对女性暴力虐待，这从印度教的作品中可见一斑。而英国人则通常认为女性生性冷淡。关于女性喜乐无常的谚语大多来自法国，从弗朗西斯一世著名的两行诗中而来。在英国，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评论，即女性比男性忠贞得多。在英国，反复无常被认为是女性的耻辱，该观念比在法国持续得更久。英国女性在骨子里也更容易顺从外界的观点。顺便一提的是，如果英国男性试图评判对于女性来说什么是天生的，什么不是，而且不仅对女性，他们还评判男性或者整个人类的话，他们会处于尤为不利的境地，至少如果他们仅有的依据是其英国式经验的话：因为人类天性的原始特点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最少。无论从褒义还是贬义上讲，英国人与其他现代民族相比都算不上处于自然的状态。与其他民族相比，他们更算得上是文明与纪律的产物。英国的社会纪律最为成功，不仅在于征服，更多的在于镇压一切可能与之产生冲突的事物。英国人不仅按法规办事，也按法规来感觉，在这一点上，其他民族都望尘莫及。在其他国家，推行的思想或社会的要求，可能有更强的势力，但压抑其下的个体本性的冲动却总是显露出来，甚至时常作出反抗：法规可能比本性更加强势，但本性一直都在。在英国，法规已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人的本性。绝大部分生活在继续，但并非遵循在规则控制下的本能，而

是完全遵循规则，本能已不存在。尽管这很不幸，有不好的一面，但无疑也有好的一面。然而这一点却使英国人特别不适合从自身经验对人类本性最原始的趋向作出判断。至于别处的观察家在这一问题上容易犯的错误，其性质则大不相同。英国人对人性知之甚少，法国人则持有偏见。英国人的错误是消极的，法国人的则是积极的。英国人认为有些事物不存在，因为他们从未亲眼见过。法国人则认为那些事物肯定而且必须存在，因为他们确实见过。英国人不了解本性，因为他们从未有过观察本性的机会。法国人对此一般有很多了解，但却常常误解它，因为他们看到的本性都是复杂化并被扭曲了的。由社会造成的非自然状态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掩盖了作为观察对象的事物的本能趋向：即消灭天性或改造天性。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供研究的只剩星星点点的残存天性；在后一种情况下，可供研究的很多，但天性可能已经不是自然的发展，而是向各个方向发展了。

I have said that it cannot now be known how much of the existing 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s natural, and how much artificial; whether there are any natural differences at all; or, supposing all artificial causes of difference to be withdrawn, what natural character would be revealed. I am not about to attempt what I have pronounced impossible: but doubt does not forbid conjecture, and where certainty is unattainable, there may yet be the means of arriving at some degree of probability. The first point, the origin of the differences actually observed, is the one most accessible to speculation; and I shall attempt to approach it, by the only path by which it can be reached—by tracing the mental consequences of external influences. We cannot isolate a human being from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condition, so as to ascertain experimentally what he would have been by nature; but we can consider what he is, and what his circumstances have been, and whether the one would have been capable of producing the other.

我之前已陈述过，女性与男性之间现存的智力差异有多少来自天性，多少来自人为因素；究竟是否存在天性差异；或假定排除所有人为因素，那么会显现出来怎样的自然特征，这些问题目前都很难找到答案。我并非试图解决我已宣布不可能解决的事情，但怀疑不能阻止推测，而且在无法得到确定的答案时，或许我们有办法得到某种程度上可能的答案。第一点，即已观察到的两性差异的起源，最容易引起猜测。我将试图从唯一可能且可行的路径着手解决该问题，即追踪外界影响对大脑产生的结果。我们不能将一个人从其所处的环境中隔离开，从而用实验方法确定他在天性指引下会怎样发展，但我们可以考虑其现状，其经历过的成长环境以及这样的环境是否还能塑造出其他人来。

Let us take, then, the only marked case which observation affords, of apparent inferiority of women to men, if we except the merely physical one of bodily strength. No production in philosophy, science, or art, entitled to the first rank, has been the work of a woman. Is there any mode of accounting for this, without supposing that women are naturally incapable of producing them?

现在我们来看看唯一观察到的女性明显不如男性的事例（如果排除体力这一物理差异的话）。哲学、科学或艺术方面的一流作品，没有一件出自女性。如果不假定女性天生就没有创作一流作品的能力，那么有没有一种模式来解释该现象？

In the first place, we may fairly question whether experience has afforded sufficient grounds for an induction. It is scarcely three generations since women, saving very rare exceptions, have begun to try their capacity in philosophy, science, or art. It is only in the present generation that their attempts have been at all numerous;

and they are even now extremely few, everywhere but in England and France. It is a relevant question, whether a mind possessing the requisites of first-rate eminence in speculation or creative art could have been expected, on the mere calculation of chances, to turn up during that lapse of time, among the women whose tastes and personal position admitted of their devoting themselves to these pursuits. In all things which there has yet been time for—in all but the very highest grades in the scale of excellence, especially in the department in which they have been longest engaged, literature (both prose and poetry)—women have done quite as much, have obtained fully as high prizes and as many of them, as could be expected from the length of time and the number of competitors. If we go back to the earlier period when very few women made the attempt, yet some of those few made it with distinguished success. The Greeks always accounted Sappho among their great poets; and we may well suppose that Myrtis, said to have been the teacher of Pindar, and Corinna, who five times bore away from him the prize of poetry, must at least have had sufficient merit to admit of being compared with that great name. Aspasia did not leave any philosophical writings; but it is an admitted fact that Socrates resorted to her for instruction, and avowed himself to have obtained it.

首先，我们可以公平地质疑：经验能否提供充足的依据来归纳出一个原因。除了极少数例外，自女性开始涉足哲学、科学及艺术领域以来，几乎不到三代人的时间。只是到了当今这一代，女性才开始在多个领域有所尝试，甚至除英格兰及法国外，其他地方仍鲜有涉足这些领域的女性。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期望，单纯以概率计算，在这一时间段中，拥有推理或创新艺术所需一流条件的人物，能在那些品位与个人地位都允许她们投身于这些领域的女性中出现？在她们有时间从事的所有事情上——除去最为优异的那些，尤其是女性

从事时间最久的文学领域（包括散文和诗歌）之外——女性所付出的，以及所获奖项的级别和数量，从时间跨度及竞争者数量方面已达到期望值。我们如果追溯到早期，进行此类尝试的女性少之又少，但就在这为数不多的人中仍旧有些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希腊人总是把萨福列入本族伟大诗人的行列；我们也完全至少可以设想，据称是品达老师的马蒂斯和五次从他那里夺走诗歌奖的科琳娜一定拥有足够的智慧，才得到与那个伟大的名字相提并论的待遇。阿斯帕西娅未留下任何哲学著作，但苏格拉底曾向她求教，且公开承认得到教诲，这是公认的事实。

If we consider the works of women in modern times, and contrast them with those of men, either in the literary or the artistic department, such inferiority as may be observed resolves itself essentially into one thing: but that is a most material one—deficiency of originality. Not total deficiency; for every production of mind which is of any substantive value, has an originality of its own—is a conception of the mind itself, not a copy of something else. Thoughts origin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unborrowed—of being derived from the thinker's own observations or intellectual processes—are abundant in the writings of women. But they have not yet produced any of those great and luminous new ideas which form an era in thought, nor those fundamentally new conceptions in art, which open a vista of possible effects not before thought of, and found a new school. Their compositions are mostly grounded on the existing fund of thought, and their creations do not deviate widely from existing types. This is the sort of inferiority which their works manifest: for in point of execution, in the detailed application of thought, and the perfection of style, there is no inferiority. Our best novelists in point of composition, and of the management of detail, have mostly been women; and there is not in all modern literature a more eloquent vehicle of thought than the style of Madame de

Staël, nor, as a specimen of purely artistic excellence, anything superior to the prose of Madame Sand, whose style acts upon the nervous system like a symphony of Haydn or Mozart. High originality of conception is, as I have said, what is chiefly wanting. And now to examine if there is any manner in which this deficiency can be accounted for.

如果我们将现代女性在文学或艺术领域的作品与男性的作品进行比较，便会发现我们可能观察到的女性相对男性的弱势最终归为一点，但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缺乏原创力。但不是完全的缺乏；因为任一具有实质价值的精神产物，都具有自己的原创性，它是精神自身的一种设想，而非其他事物的复制。原创的思想，即不做任何借鉴，而是来自思想家自身观察或智力活动的思想，在女性的写作中比比皆是。但她们仍旧没有创作出任何能够引领思想史时代潮流的那种伟大的、具有启发性的新思想，也没有创造出全新的艺术思想，能够开创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的效果视界，并建立新的学派。她们的作品大部分根植于现有的思想，她们的创造也与现有类型相差不远。这便是女性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低等性，但在技巧、思想的细致运用以及风格的修饰上，则毫不逊色。在构思与细节管理上，我们最优秀的小说家大多是女性；在整个现代文学里，再没有比斯塔埃尔夫人的风格更富于表达思想的方式，也没有优于乔治•桑的散文，堪称纯艺术美的范例。后者的风格犹如海顿或莫扎特的交响乐一样，作用于人的神经系统。如前所述，女性最缺乏的是思想的高度原创性。现在，我们来看看能否以某种方式对这一缺陷做出解释。

Let us remember, then, so far as regards mere thought, that during all that period in the world's existence, and in the progress of cultivation, in which great and fruitful new truths could be arrived at by mere force of genius, with little previous study and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during all that time women did not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speculation at all. From the days of Hypatia to those of the Reformation, the illustrious Heloisa is almost the only woman to whom any such achievement might have been possible; and we know not how great a capacity of speculation in her may have been lost to mankind by the misfortunes of her life. Never since any considerable number of women have begun to cultivate serious thought, has originality been possible on easy terms. Nearly all the thoughts which can be reached by mere strength of original faculties, have long since been arrived at; and originality, in any high sense of the word, is now scarcely ever attained but by minds which have undergone elaborate discipline, and are deeply versed in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thinking. It is Mr. Maurice, I think, who has remarked on the present age, that its most original thinkers are those who have known most thoroughly what had been thought by their predecessors: and this will always henceforth be the case. Every fresh stone in the edifice has now to be placed on the top of so many others, that a long process of climbing, and of carrying up materials, has to be gone through by whoever aspires to take a share in the present stage of the work. How many women are there who have gone through any such process? Mrs. Somerville, alone perhaps of women, knows as much of mathematics as is now needful for making any considerable mathematical discovery: is it any proof of inferiority in women, that she has not happened to be one of the two or three persons who in her lifetime have associated their names with some striking advancement of the science? Two women, since political economy has been made a science, have known enough of it to write usefully on the subject of how many of the innumerable men who have written on it during the same time, is it possible with truth to say more? If no woman has hitherto been a great historian, what woman has had the necessary erudition? If no woman is a great philologist, what woman has studied Sanscrit and Slavonic, the

Gothic of Ulphila and the Persic of the Zendavesta? Even in practical matters we all know what is the value of the originality of untaught geniuses. It means, inventing over again in its rudimentary form something already invented and improved upon by many successive inventors. When women have had the preparation which all men now require to be eminently original, it will be time enough to begin judging by experience of their capacity for originality.

让我们记住，就单纯的思想而言，在世界存在的整个时期内，在教化的进步过程中，伟大并富有成效的新的真理仅仅依靠天才的力量就能够获得，几乎不需要前期的研究与知识的积淀时——在这整个时期内，女性根本没有进行过思考活动。从希帕蒂娅时代到宗教改革时期，杰出的海洛薇兹几乎是唯一可能实现这种成就的女性。我们无从知晓她有多少思考能力因其生活中的不幸而丧失。自从相当数量的女性开始培养严肃思考的能力以来，原创力的获得从来并非易事。几乎所有只通过原创力就可获得的思想，都早已出现。除了那些经历过严格训练，且深悉前人思维成果的人，从任何高标准的意义上说，如今几乎无人能做到原创性。我想是莫里斯先生对当今时代作出了评论：当代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是那些对前人的思想了解最为透彻的人，而且这一情况将一直持续下去。宏伟大厦上的每块新石现在都要放到那么多其他石头上面，因此那些立志要在工程现阶段参与建造的人，都有漫长的路要爬，要长时间去搬运材料。有多少女性经历过任何这样的过程？萨默维尔夫人可能是女性中唯一将数学知识掌握到足以作出重大数学发现的人。那么，能否因其未成为那两三个在其时代中作出突出科学进步的人之一，而认定这可以证明女性低等呢？自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以来，有两位女性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足以使其在这一学科上写出有用的作品，而同时有数不清的男性也在就同一话题写作。老实说，有多少人能说出更多的意见呢？如果迄今为止还没有女性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那么什么样的女性才具备所需的学识？如果没有女性成为伟大的语言学者，那么是什么样的女性学习了梵文和

斯拉夫语、乌尔菲拉的哥特文以及《真德亚吠陀》的古波斯语？甚至在实际问题上，我们都知道未接受过教育的天才所具有的原创力具有怎样的价值。这意味着，重复发明前人已发明过并经许多后继发明者改进过的某种事物的最初形式。当女性做好所有男性达到卓越的原创力而需要的各种准备后，便有足够的时间开始以其原创力的经验对她们进行判断。

It no doubt often happens that a person, who has not widely and accurately studied the thoughts of others on a subject, has by natural sagacity a happy intuition, which he can suggest, but cannot prove, which yet when matured may be an important addition to knowledge: but even then, no justice can be done to it until some other person, who does possess the previous acquirements, takes it in hand, tests it, gives it a scientific or practical form, and fits it into its place among the existing truths of philosophy or science. Is it supposed that such felicitous thoughts do not occur to women? They occur by hundreds to every woman of intellect. But they are mostly lost, for want of a husband or friend who has the other knowledge which can enable him to estimate them properly and bring them before the world: and even when they are brought before it, they generally appear as his ideas, not their real author's. Who can tell how many of the most original thoughts put forth by male writers, belong to a woman by suggestion, to themselves only by verifying and working out? If I may judge by my own case, a very large proportion indeed.

无疑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一个还未就某一问题广泛而准确地学习过他人思想的人，由于其天生睿智，具有幸运的直觉，他可以提出，但却不能证明一种想法。然而当这一想法成熟时，可能会是对知识重要的补充。但即使到那时，他也得不到公正的对待，除非某个确

实掌握前人成就的人接手并对其进行检验，赋予它一种科学或实践的形式，然后置之于现存的各种哲学与科学真理间的合适位置上。难道人们认为女性不会有这样巧妙的想法吗？每位知识女性都能有数百个这样的想法。然而，因为缺少拥有其他知识、使其能对这些想法作出正确评估并将之公之于众的丈夫或朋友，这些思想大部分都流失了。即使这些思想被公之于众，这些思想一般也被视为是他的，而不属于它们真正的创造者。谁能知道，有多少男性作家提出的最为原创的思想，其实是由一位女性最先提出，但却仅仅因为他们进行了验证并付诸实践而最终归他们所有？如果以我自身情况来判断的话，这种现象的确常见。

If we turn from pure speculation to literature in the narrow sense of the term, and the fine arts, there is a very obvious reason why women's literature is, in its general conception and in its main features, an imitation of men's. Why is the Roman literature, as critics proclaim to satiety, not original, but an imitation of the Greek? Simply because the Greeks came first. If women lived in a different country from men, and had never read any of their writings, they would have had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As it is, they have not created one, because they found a highly advanced literature already created. If there had been no suspension of the knowledge of antiquity, or if the Renaissance had occurred before the Gothic cathedrals were built, they never would have been built. We see that, in France and Italy, imitation of the ancient literature stopped the original development even after it had commenced. All women who write are pupils of the great male writers. A painter's early pictures, even if he be a Raffaello, are undistinguishable in style from those of his master. Even a Mozart does not display his powerful originality in his earliest pieces. What years are to a gifted individual, generations are to a mass. If women's literature is destined to have a different collective character from that of men,

depending on any difference of natural tendencies, much longer time is necessary than has yet elapsed, before it can emancipate itself from the influence of accepted models, and guide itself by its own impulses. But if, as I believe, there will not prove to be any natural tendencies common to women, and distinguishing their genius from that of men, yet every individual writer among them has her individual tendencies, which at present are still subdued by the influence of precedent and example: and it will require generations more, before their individuality is sufficiently developed to make head against that influence.

如果我们从纯粹的推理转到狭义上的文学与高雅艺术，女性文学作品在整体构思与主要特点上都模仿男性的做法，原因很明显。正如评论家已充分说明的那样，为何罗马文学并非原创，而是对希腊作品的模仿？很简单，因为希腊人早到一步。如果女性住在与男性不同的国家，而且从未读过男性的任何作品，她们会拥有自己的文学。事实是，她们并未创造出自己的文学，因为她们发现男性已经创造出了高度发展的文学。假如古代的知识从未中止，或者假如文艺复兴的出现早于哥特式教堂的建造，那么我们永远不会建造出哥特式教堂。我们看到，在法国和意大利，即便原创力已经开始发展，但对古代文学的模仿抑制了这一趋势。从事写作的女性都是伟大的男性作家的学生。画家的早期画作，即使是拉斐尔，在风格上也无法与其老师的画作区分开来。甚至莫扎特的早期作品都没有显示出其强大的原创力。岁月对一个有天赋的个人意味着什么，那么世代对大众就意味着什么。如果女性文学——依据自然倾向的某种差异——注定要与男性文学具有不同的集体特征，那么在从已被接受的模式影响中解放出来，任由自己的灵感引导它之前，它还需要比已逝的时间长得多的岁月。但我相信，即使证明不了女性有任何共同的自然倾向，从而将女性天才与男性天才区分开，但每位女性作家个体都有自己的个人倾向，这种倾向目前仍处于先例和榜样影响的压制下，因而在她们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以抵御那些影响之前，还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It is in the fine arts, properly so called, that the prima facie evidence of inferior original powers in women at first sight appears the strongest: since opinion (it may be said) does not exclude them from these, but rather encourages them, and their education, instead of passing over this department, is in the affluent classes mainly composed of it. Yet in this line of exertion they have fallen still more short than in many others, of the highest eminence attained by men. This shortcoming, however, needs no other explanation than the familiar fact, more universally true in the fine arts than in anything else; the vast superiority of professional persons over amateurs. Women in the educated classes are almost universally taught more or less of some branch or other of the fine arts, but not that they may gain their living or their social consequence by it. Women artists are all amateurs. The exceptions are only of the kind which confirm the general truth. Women are taught music, but not for the purpose of composing, only of executing it: and accordingly it is only as composers, that men, in music, are superior to women. The only one of the fine arts which women do follow, to any extent, as a profession, and an occupation for life, is the histrionic; and in that they are confessedly equal, if not superior, to men. To make the comparison fair, it should be made between the productions of women in any branch of art, and those of men not following it as a profession. In musical composition, for example, women surely have produced fully as good things as have ever been produced by male amateurs. There are now a few women, a very few, who practise painting as a profession, and these are already beginning to show quite as much talent as could be expected. Even male painters (*pace* Mr. Ruskin) have not made any very remarkable figure these last centuries, and it will be long before they do so. The reason why the old painters were so greatly superior to the modern, is that a greatly superior

class of men applied them- selves to the art.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the Italian painters were the most accomplished men of their age. The greatest of them were men of encyclopaedical acquirements and powers, like the great men of Greece. But in their times fine art was, to men's feelings and conceptions, among the grandest things in which a human being could excel; and by it men were made, what only political or military distinction now makes them, the companions of sovereigns, and the equals of the highest nobility. In the present age, men of anything like similar calibre find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to do, for their own fame and the uses of the modern world, than painting: and it is only now and then that a Reynolds or a Turner (of whose relative rank among eminent men I do not pretend to an opinion) applies himself to that art. Music belongs to a different order of things: it does not require the same general powers of mind, but seems more dependent on a natural gift: and it may be thought surprising that no one of the great musical composers has been a woman. But even this natural gift, to be made available for great creations, requires study, and professional devotion to the pursuit. The only countries which have produced first-rate composers, even of the male sex, are Germany and Italy—countries in which, both in point of special and of general cultivation, women have remained far behind France and England, being generally (it may be said without exaggeration) very little educated, and having scarcely cultivated at all any of the higher faculties of mind. And in those countries the men who are acquainted with the principles of musical composition must be counted by hundreds, or more probably by thousands, the women barely by scores: so that here again, on the doctrine of averages, we cannot reasonably expect to see more than one eminent woman to fifty eminent men; and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have not produced fifty eminent male composers either in Germany or in Italy.

在被恰当地称为艺术的领域里，女性原创力较差的证据显得最为突出。因为舆论（可以这样说）并不将她们排除在外，反而鼓励她们并鼓励对她们的教育，在富有阶级中，她们受的教育非但未回避艺术，而且还以艺术为主要内容。即便这样，女性在这条路线上的成就仍然远比男性取得的最高成就落后，在其他很多方面也不如男性。然而，这一缺陷除下述熟悉的事实可以解释外，其他解释都是多余的，而这一点在艺术领域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更常见，即专业人士相对业余人员的极大优越性。受教育阶层的女性几乎普遍或多或少都学习过艺术领域中这样或是那样的分支，但他们学习的目的不是能以艺术为生，或借其获得社会影响。女性艺术家都是业余人员。那些特例都属于验证普遍真理的一类。女性受到音乐教育，但却并非为了作曲，只是为了演奏，因此男性只有作为作曲家时才比女性优秀。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在艺术领域中唯一作为专业和职业终生从事的艺术形式就是戏剧表演。在这方面，即使不比男性优越，女性也被公认与男性平等。为了公平，应该将女性在任一艺术分支的作品与未将艺术作为职业的男性的作品进行比较。以作曲为例。女性创作的作品与业余男性所创作的同样优秀。现在很少有女性把画画作为一种职业，而且她们已经开始表现出期待中的才能。甚至在过去几个世纪，也未曾出现过非常杰出的男性画家（对不起，罗斯金先生），而且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出现。老一代画家之所以比现代画家优秀这么多，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极其高级的阶层从事艺术创作。在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画家是当时成就最高的人。他们中最杰出的人拥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知识与权力，就像希腊的伟人一样。但在他们的年代，从男性的感情与观念上讲，艺术属于人类能够擅长的最为伟大的事物之一。这些最为伟大的事物造就了男性，使他们可以伴随统治阶级，与最高阶层的贵族平起平坐，就像现在只有政治和军事业绩才能使他们做到这样一样。在当今时代，有类似才干的男性为了自己的名声，也为了利用现代世界，找到了比作画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能出现一个雷诺斯或特纳（至于他在杰出人物中的相对排名，我并不自称有任何观点）式的人物投身于美术，也仅是偶尔的事情。音乐属于另一种情况：它不需要同样的大脑整体机能，却似乎更多依靠天赋。因此人们可能会感到惊奇：在伟大的音乐作曲家中，竟然没有一位是女性。但即便有这种天赋，

要做出伟大的创作，也需要学习，以及对这一职业的专业精神。出现一批顶级作曲家，甚至是男性作曲家的国家仅有德国和意大利。在这两个国家，女性在专业和整体培养两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法国和英格兰，接受的教育普遍都极少，这一说法毫不夸张；而且几乎没有对大脑高级能力的培养。在那些国家，熟悉音乐作曲原理的男性数以百计，或者更可能数以千计，而女性仅有几十个。因此，这里再重复一下，就平均主义而言，我们无法合理地期望在杰出的人物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会多于五十分之一。而且在过去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无论德国还是意大利，都未能产生五十位著名的男性作曲家。

There are other reasons, besides those which we have now given, that help to explain why women remain behind men, even in the pursuits which are open to both. For one thing, very few women have time for them. This may seem a paradox; it is an undoubted social fact. The time and thoughts of every woman have to satisfy great previous demands on them for things practical. There is, first, the superintendence of the family and the domestic expenditure, which occupies at least one woman in every family, generally the one of mature years and acquired experience; unless the family is so rich as to admit of delegating that task to hired agency, and submitting to all the waste and malversation inseparable from that mode of conducting it. The superintendence of a household, even when not in other respects laborious, is extremely onerous to the thoughts; it requires incessant vigilance, an eye which no detail escapes, and presents questions for consideration and solution, foreseen and unforeseen, at every hour of the day, from which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them can hardly ever shake herself free. If a woman is of a rank and circumstances which relieve her in a measure from these cares, she has still devolving on her the management for the whole family of its intercourse with others—of what is called society, and the less the call made on her by the

former duty, the greater is alway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tter: the dinner parties, concerts, evening parties, morning visits, letter-writing, and all that goes with them. All this is over and above the engrossing duty which society imposes exclusively on women, of making themselves charming. A clever woman of the higher ranks finds nearly a sufficient employment of her talents in cultivating the graces of manner and the arts of conversation. To look only at the outward side of the subject: the great and continual exercise of thought which all women who attach any value to dressing well (I do not mean expensively, but with taste, and perception of natural and of artificial *convenance*) must bestow upon their own dress, perhaps also upon that of their daughters, would alone go a great way towards achieving respectable results in art, or science, or literature, and does actually exhaust much of the time and mental power they might have to spare for either. [3_2] If it were possible that all this number of little practical interests (which are made great to them) should leave them either much leisure, or much energy and freedom of mind, to be devoted to art or speculation, they must have a much greater original supply of active faculty than the vast majority of men. But this is not all. Independently of the regular offices of life which devolve upon a woman, she is expected to have her time and faculties always at the disposal of everybody. If a man has not a profession to exempt him from such demands, still, if he has a pursuit, he offends nobody by devoting his time to it; occupation is received as a valid excuse for his not answering to every casual demand which may be made on him. Are a woman's occupations, especially her chosen and voluntary ones, ever regarded as excusing her from any of what are termed the calls of society? Scarcely are her most necessary and recognised duties allowed as an exemption. It requires an illness in the family, or something else out of the common way, to entitle her to give her own business the precedence over other people's amusement. She

must always be at the beck and call of somebody, generally of everybody. If she has a study or a pursuit, she must snatch any short interval which accidentally occurs to be employed in it. A celebrated woman, in a work which I hope will some day be published, remarks truly that everything a woman does is done at odd times. Is it wonderful, then, if she does not attain the highest eminence in things which require consecutive attention, and the concentration on them of the chief interest of life? Such is philosophy, and such, above all, is art, in which, besides the devotion of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the hand also must be kept in constant exercises to attain high skill.

除去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些原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对男女都开放的工作中，女性仍然落后于男性。有一点是几乎没有女性有时间去从事这些工作。这似乎像是悖论，但却是一个确凿无疑的社会事实。每位女性的时间和精力都要消耗在上述加之于她们身上的大量实践活动中。首先，她们要管理家庭事务及日常开支，每个家庭中至少需要一位女性专门负责这一工作，一般是比较成熟且经验丰富的女性。除非这个家庭很富裕，可以雇人代做，而且还能够容忍这种方式所带来的难以避免的浪费与腐败。即使从其他方面来说管理家务算不上繁重的工作，但却极为费心劳神。它不仅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不放过任何细节，而且每时每刻都要考虑解决那些预见到及未预见到的问题。这些使负责这一工作的女性很难脱身。即使一位女性来自上流社会，可以免受这些琐事的干扰，但她仍然有代表其家庭负责与外界交流的责任——即所谓的社交活动。她越少受到家庭琐事的干扰，就越有精力来进行这些社交活动，包括晚宴、音乐会、舞会、晨访、书信以及各种与此相关的事务。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强加给女性（而且仅仅是女性）、使她们无暇他顾的责任，目的是使她们富有魅力。上层社会的女性几乎能够充分发挥其才智，培养优雅的举止以及得体的谈话艺术。现在我们仅看这个问题的表面：所有注重穿着（我并非指穿得昂贵，而是穿得有品位并洞察自然及社会礼仪）的女性都在如何穿着得

体上费尽心思，也许对其女儿的穿着也要仔细考究。而这种持续不断地思考本可以在艺术、科学或文学领域取得令人敬佩的成果，但实际上却耗尽了她们本可以用在这些领域的时间和心思。[4_2] 如果所有这些琐碎的日常兴趣（对她们来说并不琐碎）有可能给她们空出些时间，或空出些精力和自由的思考空间，去专心致志于艺术和思考，那么同绝大多数男性相比，她们必定会涌现出更多源源不断的创造力。然而，这还不是全部。除去社会施加给女性的日常生活事务，每个人都希望在需要她时，她总有时间和精力。但如果男性没有正式的职业使他能够免除此类要求，只要他有自己追求的事情，即使投注了所有的时间，也不会因此得罪任何人。人们把这种追求视为一个婉拒任何日常责任要求的有效借口。但人们曾经将女性的追求——尤其是那些她们自己选择并乐意从事的追求——视为将她们从所谓的社会责任中解脱出来的借口过吗？她们最为必要及公认的责任，是几乎不会免除的。除非家里有人生病，或有什么意外情况，才会让她有权把自己的日常事务放在他人的娱乐之前。她必须永远听命于某个人，通常是所有的人。若她想学习或追求某种特别爱好，只能利用那些偶然出现的空暇。有位著名的女士在一本书中说过（我希望有一天这本书会出版）：确实，女性做的任何事，都是在挤出来的零散时间做的。那么在一个需要耗费几乎所有精力的领域内，如果女性没有获得最高荣誉，是很奇怪的事情吗？哲学就是如此，艺术也是而且尤其如此，它们不仅需要长期投入思想和情感，还需要不停地实践以磨炼技艺。

There is another consideration to be added to all these. In the various arts and intellectual occupations, there is a degree of proficiency sufficient for living by it, and there is a higher degree on which depend the great productions which immortalise a name. To the attainment of the former, there are adequate motives in the case of all who follow the pursuit professionally: the other is hardly ever attained where there is not, or where there has not been at some period of life, an ardent desire of celebrity. Nothing less is commonly a sufficient stimulus to undergo the long and patient

drudgery, which, in the case even of the greatest natural gifts, is absolutely required for great eminence in pursuits in which we already possess so many splendid memorials of the highest genius. Now, whether the cause be natural or artificial, women seldom have this eagerness for fame. Their ambition is generally confined within narrower bounds. The influence they seek is over those who immediately surround them. Their desire is to be liked, loved, or admired, by those whom they see with their eyes: and the proficiency in knowledge, arts, and accomplishments, which is sufficient for that, almost always contents them. This is a trait of character which cannot be left out of the account in judging of women as they are. I do not at all believe that it is inherent in women. It is only the natural result of their circumstances. The love of fame in men is encouraged by education and opinion: to “scorn delights and live laborious days” for its sake, is accounted the part of “noble minds,” even if spoken of as their “last infirmity,” and is stimulated by the access which fame gives to all objects of ambition, including even the favour of women; while to women themselves all these objects are closed, and the desire of fame itself considered daring and unfeminine. Besides, how could it be that a woman's interests should not be all concentrated upon the impressions made on those who come into her daily life, when society has ordained that all her duties should be to them, and has contrived that all her comforts should depend on them? The natural desire of consideration from our fellow-creatures is as strong in a woman as in a man; but society has so ordered things that public consideration is, in all ordinary cases, only attainable by her through the consideration of her husband or of her male relations, while her private consideration is forfeited by making herself individually prominent, or appearing in any other character than that of an appendage to men. Whoever is in the least capable of estimating the influence on the mind of the entire domestic and

social position and the whole habit of a life, must easily recognise in that influence a complete explanation of nearly all the apparent differences between women and men, including the whole of those which imply any inferiority.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另一种情况。在广阔的艺术和思想领域，只要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就能以此谋生。但若想做出青史留名的伟大作品，还需精益求精。要达到第一种程度，以此为职业的所有人都有足够的动力；而后者，如果在生命中的某一阶段没有对出名的强烈渴望，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通常情况下，即便那些天赋异禀的人，要在已经有很多由最高天才创造的优异成果的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也绝对需要足够的激励来忍受这漫长而枯燥的工作。而女性，无论由于自然原因还是社会原因，都很少追名逐利。她们的志向通常都局限在较为狭窄的领域。她们追求的是对周边人产生影响。她们渴望得到所见之人的爱戴、爱慕和钦佩：在知识、艺术以及才艺方面的精通足以使她们达到目的，而这几乎总能使她们知足了。在实事求是地评估女性特点时，这一性格特征不能不考虑。而我却绝不相信女性生来如此。这只是环境塑造的自然结果。男性热爱追求名声，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及社会观念就是如此：为名誉而“鄙视娱乐，辛苦工作”，即使被人称为“最后的弱点”，仍被认为是“贵族精神”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还被名声所带来的权利刺激着，因为名声能够满足各种目标，包括获得女性的芳心。而对于女性自身，所有这些目标都不对她们开放，而且仅仅渴望名声本身都被认为是出格的、不守本分的行为。而且，当社会规定女性的全部职责都应集中在给周围人留下好印象，且其安逸生活也应依赖这些人时，那么女性怎么能不把兴趣放在这些事情上呢？女性同男性一样，天生都渴望他人的关注，但社会的规定使得女性只能通过其丈夫或其男性亲属才能获得公众的关注；与此同时，她个人的出色表现，或以男性附属品的任一形式出现，都无法得到人们的关注了。即使最不擅长估计对整个家庭的思想、社会地位乃至全部生活习惯产生影响的人，也能够轻而易举意识到在这一影响中男性与女性之间几乎所有明显的差异，其中也包括表明女性地位低下的那些

差异。

As for moral differences, considered as distinguished from intellectual, the distinction commonly drawn is to the advantage of women. They are declared to be better than men; an empty compliment, which must provoke a bitter smile from every woman of spirit, since there is no other situation in life in which it is the established order, and considered quite natural and suitable, that the better should obey the worse. If this piece of idle talk is good for anything, it is only as an admission by men, of the corrupting influence of power; for that is certainly the only truth which the fact, if it be a fact, either proves or illustrates. And it is true that servitude, except when it actually brutalises, though corrupting to both, is less so to the slaves than to the slave-masters. It is wholesomer for the moral nature to be restrained, even by arbitrary power, than to be allowed to exercise arbitrary power without restraint. Women, it is said, seldomer fall under the penal law—contribute a much smaller number of offenders to the criminal calendar—than men. I doubt not that the same thing may be said, with the same truth, of negro slaves. Those who are under the control of others cannot often commit crimes, unless at the command and for the purposes of their masters. I do not know a more signal instance of the blindness with which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herd of studious men, ignore and pass over all the influences of social circumstances, than their silly depreci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silly panegyrics on the moral, nature of women.

至于道德差异（通常认为有别于智力差异），结论通常对女性有利。大家公认女性的道德优于男性，而这空洞的恭维话，必定会让那

些高尚的女性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因为道德高尚的应该服从道德低下的（这是生活中唯一的情况），这既是不成文的规定，又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如果这些闲谈能起点儿作用的话，那也只是男人们承认了权力的腐蚀性影响；因为这的确是事实（如果能称之为事实的话）证明或说明的唯一真理。而且，除了让人变残忍之外，奴役制度虽然对奴隶主和奴隶双方都有腐蚀作用，但事实是，前者受腐蚀的程度要大于后者。约束道德天性，即便通过强权，也比允许肆无忌惮地行使强权更有益。据说，女性比男性更少触犯刑法（女性罪犯的数目比男性少得多）。同理，黑奴的犯罪率也比较低，这我一点都不怀疑。那些受别人控制的人通常不会犯罪，除非受主人之命、为满足主人的目的而做。世人，包括那些有学识的男性，竟然忽视所有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愚蠢地贬低女性天生的才智，且愚蠢地歌颂女性天生的高尚道德，据我所知，没有比这更愚蠢的无知了。

The complimentary dictum about women's superior moral goodness may be allowed to pair off with the disparaging one respecting their greater liability to moral bias. Women, we are told, are not capable of resisting their personal partialities: their judgment in grave affairs is warped by their sympathies and antipathies. Assuming it to be so, it is still to be proved that women are oftener misled by their personal feelings than men by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The chief difference would seem in that case to be, that men are led from the course of dut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by their regard for themselves, women (not being allowed to have private interests of their own) by their regard for somebody else. It is also to be considered, that all the education which women receive from society inculcates on them the feeling that the individuals connected with them are the only ones to whom they owe any duty—the only ones whose interest they are called upon to care for; while, as far as education is concerned, they are left strangers even to the elementary ideas which are presupposed in

any intelligent regard for larger interests or higher moral objects. The complaint against them resolves itself merely into this, that they fulfil only too faithfully the sole duty which they are taught, and almost the only one which they are permitted to practise.

对女性高尚道德的歌颂可以与对她们更易有道德偏见的轻视相对。人们认为，女性没有能力抗拒个人偏见：在重大严肃的事情上，她们的判断总是被个人情感的好恶所蒙蔽。假设上述说法属实，那么女性由其个人情感误导的情况是否比男性因个人利益而做错事的情况更多呢？这一问题尚待证明。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主要区别在于：男性因为追求个人利益而偏离了公众利益与社会责任；而女性（由于社会不允许女性有自身利益）则是为了他人而这样做。同样要考虑的是，女性接受的所有社会教育都给她们灌输了这种观念，即那些与自己相关的人是她们唯一负有责任的人——只有他们的利益才是要求她们去关心的。同时，就教育而言，即使那些最基本的、任何智力层面都应涉及的社会利益与道德教化问题，社会也把她们拒之门外。这样，对她们的不满就只剩一点：即她们过于忠实地履行了社会赋予她们的、几乎唯一能够践行的职责。

The concessions of the privileged to the unprivileged are so seldom brought about by any better motive than the power of the unprivileged to extort them, that any arguments against the prerogative of sex are likely to be little attended to by the generality, as long as they are able to say to themselves that women do not complain of it. That fact certainly enables men to retain the unjust privilege some time longer; but does not render it less unjust. Exactly the same thing may be said of the women in the harem of an Oriental: they do not complain of not being allowed the freedom of European women. They think our women insufferably bold and unfeminine. How rarely it is that even men complain of the general

order of society; and how much rarer still would such complaint be, if they did not know of any different order existing anywhere else. Women do not complain of the general lot of women; or rather they do, for plaintive elegies on it are very common in the writings of women, and were still more so as long as the lamentations could not be suspected of having any practical object. Their complaints are like the complaints which men make of the general unsatisfactoriness of human life; they are not meant to imply blame, or to plead for any change. But though women do not complain of the power of husbands, each complains of her own husband, or of the husbands of her friends. It is the same in all other cases of servitude, at least in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emancipatory movement. The serfs did not at first complain of the power of their lords, but only of their tyranny. The commons began by claiming a few municipal privileges; they next asked an exemption for themselves from being taxed without their own consent; but they would at that time have thought it a great presumption to claim any share in the king's sovereign authority. The case of women is now the only case in which to rebel against established rules is still looked upon with the same eyes as was formerly a subject's claim to the right of rebelling against his king. A woman who joins in any movement which her husband disapproves, makes herself a martyr, without even being able to be an apostle, for the husband can legally put a stop to her apostleship. Women cannot be expected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 until men in considerable number are prepared to join with them in the undertaking.

特权阶层很少向无特权阶层作出让步，除非无特权阶层强行提出要求，因此，只要人们能够对自己说，女性并没有抱怨，那么任何反对性别特权的言论就可能很少为大众所关注。该事实必能使男性持有

不公正特权的时间更长一些，但并不能使它变得更公正。对东方伊斯兰教信徒后宫里的女性来说，事实也同样如此：她们丝毫不抱怨她们没有享受到像欧洲女性那样的自由。她们认为欧洲女性行为大胆、不像女性，令人无法忍受。最后竟然是男性在抱怨这种社会秩序，这是多么罕见啊！如果他们这样抱怨时还不知道在世界其他地方有不同的社会秩序存在，那就更为罕见了。女性不抱怨她们普通的命运，或者也许她们还是有所抱怨的，因为，悲伤和哀怨在女性著作中是很普遍的，过去的著作中更为普遍，只要没有被怀疑有什么实质性目的就好。她们抱怨的主题跟男性抱怨生活不美满很相似，都无意去谴责什么，或者祈求有所变革。尽管女性不抱怨丈夫的权力，但她们却时常抱怨自己的或朋友的丈夫。这与所有其他情况下的奴役制度相同，至少在解放运动伊始时如此。奴隶们起初并未抱怨主人拥有的权力，只是抱怨他们的暴虐。起初，平民要求少量的市政权；然后，他们要求只有在自己同意后才能向他们征税；但那时他们还认为，若要求分享王权，则是极大的僭越。如今，女性对既定规则的反叛是唯一还遭受别人冷眼的情况，就像以前臣民要求反抗国王的权利时一样。如女性未经丈夫许可而参加任何运动，她便成为殉道者，甚至无法成为“使徒”，因其丈夫可合法地终止其使徒身份。我们不能期待女性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直到有数量众多的男性准备好投身这一事业为止。

[3_1].Especially is this true if we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Asia as well as Europe. If a Hindoo principality is strongly, vigilantly, and economically governed; if order is preserved without oppression; if cultivation is extending, and the people prosperous, in three cases out of four that principality is under a woman's rule. This fact, to me an entirely unexpected one, I have collected from a long official knowledge of Hindoo governments. There are many such instances: for though, by Hindoo institutions, a woman cannot reign, she is the legal regent of a kingdom during the minority of the heir; and minorities are frequent, the lives of the male rulers being so often prematurely terminated through the effect of inactivity and sensual excesses. When we consider that these princesses have never been seen in public, have never conversed with any man not of their own family except from behind a curtain, that they do not read, and if they did, there is no book in their languages which can give them the smallest instruction on political affairs; the example they afford of the natural capacity of women for government is very striking.

[3_2].It appears to be the same right turn of mind which enables a man to acquire the truth, or the just idea of what is right, in the ornaments, as in the more stable principles of art. It has still the same centre of perfection, though it is the centre of a smaller circle. —To illustrate this by the fashion of dress, in which there is allowed to be a good or bad taste. The component parts of dress are continually changing from great to little, from short to long; but the general form still remains: it is still the same general dress which is comparatively fixed, though on a very slender foundation; but it is on this which fashion must rest. "He who invents with the most success, or dresses in the best taste, would probably, from the same sagacity employed to greater purposes, have discovered equal skill, or have formed the same correct taste, in the highest labours of art." —Sir Joshua Reynolds' Discourses, Disc. vii.

[4_1].如果我们同时考虑亚洲与欧洲的话，情况尤其如此。如果印度公国的统治强大、谨慎，而且经济繁荣；如果社会井然有序，没有压迫；如果教育普及，百姓富足；那么十有八九，这个公国是在女性统治下。这一对我来说完全意想不到的事实是我从印度政府冗长的官方记录中收集到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因为，尽管印度体制规定女性不能统治国家，但当国家继承人未成年时，女性是可以合法摄政的；而未成年继承者经常会出现，因为男性统治者由于活动太少或沉溺于寻欢作乐而经常早逝。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公主王妃从未公开露面，从未同皇族外的任何男性交谈过（她们垂帘听政时除外），从未读书识字（即使她们识字，她们的文字里也没有任何书籍能够给她们提供哪怕最少的、关于政事的指导），那么，她们显示出的这种女性治理国家的天赋能力是惊人的。

[4_2].人们在装饰品中追求真理，或追求恰当做法的心态，与更为稳定的艺术原则似乎并无不同。二者都以追求完美为中心，尽管这个圈子要小得多。——以时装为例，在这方面，我们允许人们的品味有好有坏。衣服的元素在不断变化，由大到小，由短到长；但其基本形式并未改变：尽管基础略显纤细，但仍是大致相同的、相对较为固定的衣服；这是时尚的根本所在。“那些发明最成功的人士，或穿着最高雅的人们，很可能都用其智慧（为更高层次的目的也运用同样的智慧）发现了与艺术最高形式中同样的技巧，或形成了同样恰当的品味。”——《约书亚•雷诺兹爵士谈话录》第七篇。

CHAPTER IV

第四章

There remains a question, not of less importance than those already discussed, and which will be asked the most importunately by those opponents whose conviction is somewhat shaken on the main point. What good are we to expect from the changes proposed in our customs and institutions? Would mankind be at all better off if women were free? If not, why disturb their minds, and attempt to make a social revolution in the name of an abstract right?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已讨论过的那些，而且这也将是信心已经开始动摇的反对者们乐此不疲频频提出的问题。变革我们的习俗与制度能带给我们什么益处？如果女性都自由了，人类的境况能有所改善吗？如果不能，那么以某种抽象的权利为名，绞尽脑汁企图进行一场社会变革又有何意义？

It is hardly to be expected that this question will be asked in respect to the change proposed in the condition of women in marriage. The sufferings, immoralities, evils of all sorts, produced in innumerable cases by the subjection of individual women to individual men, are far too terrible to be overlooked. Unthinking or uncandid persons, counting those cases alone which are extreme, or which attain publicity, may say that the evils are exceptional; but no one can be blind to their existence, nor, in many cases, to their intensity. And it is perfectly obvious that the abuse of the power cannot be very much checked while the power remains. It is a

power given, or offered, not to good men, or to decently respectable men, but to all men; the most brutal, and the most criminal. There is no check but that of opinion, and such men are in general within the reach of no opinion but that of men like themselves. If such men did not brutally tyrannise over the one human being whom the law compels to bear everything from them, society must already have reached a paradisiacal state. There could be no need any longer of laws to curb men's vicious propensities. Astræamust not only have returned to earth, but the heart of the worst man must have become her temple. The law of servitude in marriage is a monstrous contradiction to all the principles of the modern world, and to all the experience through which those principles have been slowly and painfully worked out. It is the sole case, now that negro slavery has been abolished, in which a human being in the plenitude of every faculty is delivered up to the tender mercies of another human being, in the hope forsooth that this other will use the power solely for the good of the person subjected to it. Marriage is the only actual bondage known to our law. There remain no legal slaves, except the mistress of every house.

如果针对女性在婚姻中的处境而提出变革，这个问题恐怕不会有人提起。在无数案例中，由女性隶属于男性而造成的苦难、道德败坏等各种形式的罪恶如此骇人，实在令人难以忽视。一些欠考虑或不真诚的人仅凭一些极端事例或那些被曝光的事例，或许会声称，这些罪恶只是例外情况。但没有人能对其存在视而不见，很多时候也不会对其发指的程度视而不见。而且非常明显的一点是，当权力仍然存在时，很难阻止权力滥用。这种权力给予，或赋予了所有男性，而不只是其中的好人或体面可敬的人，连最残忍、最罪恶的男性也包含其中。除舆论对其加以遏制外，并无其他手段，而除同类人的舆论外，这些人通常接触不到其他舆论。如果这些男性不残忍地欺压这一个人（这个人受法律强迫，要忍受他们的一切对待），那么社会一定早已

实现人间天堂。因此也不再需要法律来遏制男性的恶劣习性。阿斯特赖亚一定不仅早返人间，而且已将最恶劣的男性之心当作了神庙。婚姻中的奴役法则不仅与现代社会的一切原则背道而驰，而且与缓慢并艰难发展这些原则的经验也背道而驰。在黑人奴隶制度废除之后，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情形了：把一个富有才能的人交付给另一个富有恻隐之心的人来处置，希望对方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这个臣服者谋福利。婚姻是现有法律所承认的唯一的奴役制度。除每户家中的女主人外，再无其他合法的奴隶。

It is not, therefore, on this part of the subject, that the question is likely to be asked, *Cui bono* ? [4_1] We may be told that the evil would outweigh the good, but the reality of the good admits of no dispute. In regard, however, to the larger question, the removal of women's disabilities—their recognition as the equals of men in all that belongs to citizenship—the opening to them of all honourable employments, and of th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which qualifies for those employments—there are many persons for whom it is not enough that the inequality has no just or legitimate defence; they require to be told what express advantage would be obtained by abolishing it.

因此，在这一方面，似乎不可能提出这一问题：谁能得到好处呢[5_1]？可能有人会告诉我们，邪恶会战胜善良，但善良存在的现实性不容争辩。然而，回到那个更重大的问题上，即去除女性面临的各种不利条件——承认她们在所有公民的权力中与男性平等——对她们开放一切体面的职业，为她们提供这些职业所需的培训和教育等；对很多人来讲，不公平是不正义的，或者与法律保护不符，这一事实是不够的，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们，消除不平等可以获得什么特定的好处。

To which let me first answer, the advantage of having the most universal and pervading of all human relations regulated by justice instead of injustice. The vast amount of this gain to human nature, it is hardly possible, by any explanation or illustration, to place in a stronger light than it is placed by the bare statement, to anyone who attaches a moral meaning to words. All the selfish propensities, the self-worship, the unjust self-preference, which exist among mankind, have their source and root in, and derive their principal nourishment from, the present constitu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ink what it is to a boy, to grow up to manhood in the belief that without any merit or any exertion of his own, though he may be the most frivolous and empty or the most ignorant and stolid of mankind, by the mere fact of being born a male he is by right the superior of all and every one of an entire half of the human race: including probably some whose real superiority to himself he has daily or hourly occasion to feel; but even if in his whole conduct he habitually follows a woman's guidance, still, if he is a fool, she thinks that of course she is not, and cannot be, equal in ability and judgment to himself; and if he is not a fool, he does worse—he sees that she is superior to him, and believes that, notwithstanding her superiority, he is entitled to command and she is bound to obey. What must be the effect on his character, of this lesson? And men of the cultivated classes are often not aware how deeply it sinks into the immense majority of male minds. For, among right-feeling and well-bred people, the inequality is kept as much as possible out of sight; above all, out of sight of the children. As much obedience is required from boys to their mother as to their father: they are not permitted to domineer over their sisters, nor are they accustomed to see these postponed to them, but the contrary; the compensations of the chivalrous feeling being made prominent, while the servitude which requires them is kept in the background. Well brought-up youths in the higher

classes thus often escape the bad influences of the situation in their early years, and only experience them when, arrived at manhood, they fall under the dominion of facts as they really exist. Such people are little aware, when a boy is differently brought up, how early the notion of his inherent superiority to a girl arises in his mind; how it grows with his growth and strengthens with his strength; how it is inoculated by one schoolboy upon another; how early the youth thinks himself superior to his mother, owing her perhaps forbearance, but no real respect; and how sublime and sultan—like a sense of superiority he feels, above all, over the woman whom he honours by admitting her to a partnership of his life. Is it imagined that all this does not pervert the whole manner of existence of the man, both as an individual and as a social being? It is an exact parallel to the feeling of a hereditary king that he is excellent above others by being born a king, or a noble by being born a noble. The relation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s very like that between lord and vassal, except that the wife is held to more unlimited obedience than the vassal was. However the vassal's character may have been affected,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by his subordination, who can help seeing that the lord's was affected greatly for the worse? whether he was led to believe that his vassals were really superior to himself, or to feel that he was placed in command over people as good as himself, for no merits or labours of his own, but merely for having, as Figaro says, taken the trouble to be born. The self-worship of the monarch, or of the feudal superior, is matched by the self-worship of the male. Human beings do not grow up from childhood in the possession of unearned distinctions, without pluming themselves upon them. Those whom privileges not acquired by their merit, and which they feel to be disproportioned to it, inspire with additional humility, are always the few, and the best few. The rest are only inspired with pride, and the worst sort of pride, that which values itself upon accidental

advantages, not of its own achieving. Above all, when the feeling of being raised above the whole of the other sex is combined with personal authority over one individual among them; the situation, if a school of conscientious and affectionate forbearance to those whose strongest points of character are conscience and affection, is to men of another quality a regularly constituted academy or gymnasium for training them in arrogance and overbearingness; which vices, if curbed by the certainty of resistance in their intercourse with other men, their equals, break out towards all who are in a position to be obliged to tolerate them, and often revenge themselves upon the unfortunate wife for the involuntary restraint which they are obliged to submit to elsewhere.

对于这个问题，让我先给出这样的答案：其好处在于，我们可以在最大范围内建立由公正而非不公正所规范的各种人际关系。人类天性从中得到的巨大利益，对任何把道德含义赋予言辞的人来说，以任何解释或说明的方式，都几乎不可能比一纸声明表达得更清楚。人类所有的自私自利、自我崇拜以及毫无公正可言的自我偏爱都根源于现行的男女关系制度，并从中汲取最主要的营养。假如男孩子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持这样的信念，即即使自己没有任何优点或做出努力，即使他可能是最轻浮空虚或者最无知迟钝的人，但只因自己生为男儿身，他就依法处于比半数人类优越的地位，即使这半数人类很可能包括连他自己都无时无刻不觉得比自己优越得多的人。但即使他全部的行为都习惯听从一位女性的指导，即使他是个傻瓜，女性也不会觉得自己在能力和判断力上能与男性平等；如果他不傻，他就会得寸进尺：他知道她比自己优秀，并相信即便如此，他也有权力对她发号施令，而女性则有义务去服从其命令。想想看，这对他意味着什么？这一课对他的性格会有什么影响？甚至有教养的男性通常也未意识到这一观念有多深刻地渗透进了绝大部分男性的思想中。因为在能正确感知且教养良好的人群中，这种不平等被尽量隐藏起来；最重要的是，不让孩子看见。他们要求男孩对母亲像对父亲一样服从，不允许

他对姐妹们颐指气使，也不习惯看见别人对他们指手画脚，相反，他们指挥别人就够了；对侠义精神的奖赏被突显出来，而需要她们作出的劳役则被隐蔽起来。因此，上层阶级教养良好的年轻人早年通常能避免这一状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只是在成年之后，当他们进入真实存在的现实中时，才会经历这些。这些人很少会意识到，当一个男孩子接受不同的教养方式长大，他与生俱来比女孩优越的想法会多么早地进入他的思想；这种优越感如何随着男孩的成长和力量的增强而日益强烈；它又怎么在孩子之间相互流传；年轻人从多么早就开始认为自己比母亲优越，对她可能只需要忍耐，而不是真正的尊敬；而对有幸被他接受成为终身伴侣的女性，他所感到的优越感是多么崇高、多么不可一世。有人会幻想，这种情形不会败坏男性（作为自然人与社会人）的整体存在方式吗？这一思维方式与世袭制国王因为生而为王，或贵族因为生而为贵族就认为自己比别人优秀如出一辙。夫妻之间的关系很像贵族和家奴的关系，不同的是，妻子被强加了比家奴更多的、无条件的顺从。无论家奴的性格会由于其臣服地位向好的或坏的方面转变，又有谁看不见，主人的性格却因此变差了很多？无论他是受到引导而相信家奴真的比他强，或是感觉他被置于统治与他同样优秀的人的地位，却并非因其才能或其劳动，而是像菲加罗所说，仅仅因其费心降临到了人间。男性的自我崇拜，可与君王的自我崇拜，或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我崇拜相匹敌。人如果不是自夸其拥有不劳而获的荣誉就不会长大。那些并非因自己的功绩而享有特权、并感到受之有愧、转而更加谦恭、奋发图强的人，只是极少数，也是最优秀的极少数。其余的人则仅靠一种最糟糕的傲气鼓舞，通过偶然的优势而非其本身的成就来评价自己。最重要的是，当一个人被高高置于全体异性之上的感受同他对这些异性中的某个个体享有的权威结合在一起时；如果在那些这两大性格优点的人眼里，一所学校是认真负责而且慈爱宽容的学校，它对于另一种品质的人来说，就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的，专门训练其傲慢和专横的学校或体育馆；在同与自己平等的男性交往中，如果他们的恶习遭遇坚决的抵制或压制，那么那些不得不容忍他们的人就会成为他们恶习发泄的对象，而且因为他们经常在别处必须屈从，不得不克制自己，不幸的妻子就成了他们报复的对象。

The example afforded, and the education given to the sentiments, by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domestic existence upon a relation contradictory to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social justice, must, from the very nature of man, have a perverting influence of such magnitude, that it is hardly possible with our present experience to raise our imaginations to the conception of so great a change for the better as would be made by its removal. All that education and civilisation are doing to efface the influences on character of the law of force, and replace them by those of justice, remains merely on the surface, as long as the citadel of the enemy is not attacked. The principle of the modern movement in morals and politics, is that conduct, and conduct alone, entitles to respect: that not what men are, but what they do, constitutes their claim to deference; that, above all, merit, and not birth, is the only rightful claim to power and authority. If no authority, not in its nature temporary, were allowed to one human being over another, society would not be employed in building up propensities with one hand which it has to curb with the other. The child would really, for the first time in man's existence on earth, be trained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and when he was old there would be a chance that he would not depart from it. But so long as the right of the strong to power over the weak rules in the very heart of society, the attempt to make the equal right of the weak the principle of its outward actions will always be an uphill struggle; for the law of justice, which is also that of Christianity, will never get possession of men's inmost sentiments; they will be working against it, even when bending to it.

通过将家庭存在的基础建立在与社会正义的首要原则相矛盾的关系之上，这样提供的范例和情感教育，从人最根本的天性来讲，一定具有非常强大的破坏性影响，以我们现有的经验，很难想象当这一现

象消失时，会产生多好的变化。教育和文明的作用是消除权利法则对性格的影响，并代之以正义的影响，但只要敌人的堡垒一日不攻破，教育和文明的作用就仅仅是隔靴搔痒。现代社会道德与政治运动的原则是，行为且只有行为，才能赢得尊重：不是因为他是谁，而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才能得到他所要求的尊重；功绩，而非出身，是获得权力与威信的唯一正当理由。如果不允许一个人对另一人享有非暂时性的权威，那么社会就不会一面扶植一些特点，而另一面却来遏制它们。孩子也会在地球有人类存在以来第一次真正在他应该追求的方向得到培养。当他长大时，他也有可能不会背离这一方向。但只要这个社会的核心权力规则是强者控制弱者，那么要使弱者的平等权利成为社会外在行为准则的这一尝试将永远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因为正义法则，即基督教的法则，永远无法控制男性内心最深处的情结。这些情结即使在屈从于正义法则之时，也会不断反抗。

The second benefit to be expected from giving to women the free use of their faculties, by leaving them the free choice of their employments, and opening to them the same field of occupation and the same prizes and encouragements as to other human beings, would be that of doubling the mass of mental faculties available for the higher service of humanity. Where there is now one person qualified to benefit mankind and promote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as a public teacher, or an administrator of some branch of public or social affairs, there would then be a chance of two. Mental superiority of any kind is at present everywhere so much below the demand; there is such a deficiency of persons competent to do excellently anything which it requires any considerable amount of ability to do; that the loss to the world, by refusing to make use of one-half of the whole quantity of talent it possesses, is extremely serious. It is true that this amount of mental power is not totally lost. Much of it is employed, and would in any case be employed, in domestic management, and in the few other occupations open to

women; and from the remainder indirect benefit is in many individual cases obtained, through the personal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women over individual men. But these benefits are partial; their range is extremely circumscribed; and if they must be admitted, on the one hand, as a deduction from the amount of fresh social power that would be acquired by giving freedom to one half of the whole sum of human intellect, there must be added, on the other, the benefit of the stimulus that would be given to the intellect of men by the competition; or (to use a more true expression) by the necessity that would be imposed on them of deserving precedency before they could expect to obtain it.

给予女性选择工作的自由，让女性可以从事男性从事的职业，并提供相同的奖赏和鼓励，通过这些使女性能够自由运用他们能力的做法，我们还可以得到第二项好处，即为全人类提供更好服务的智力才能的总数会多一倍。如果目前只有一个人有作为老师，或者某公共或社会事务部门管理人员为人类服务，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素质，那么到时候，可能会有两个人。目前，优秀的高智商人才比比皆是，供不应求，而有能力做好任何需要相当多能力才能做好的工作的人却如此缺乏，以至世界因拒绝使用占整个人类半数聪明才智的女性而导致严重的人才流失。诚然，这些人才并未全部流失。多数正在从事，或将不可避免将要从事的是操持家务，以及极少数对女性开放的职业。而从剩余部分中，我们所能得到的只是一些间接的好处，即通过女性个体对男性个体的个人影响而获得。但这些益处只是一部分，它们的范围极其有限。假如一方面必须承认这些是要从给人类智力总数的一半以自由所获得的新鲜社会力量中减去的，那么另一方面，就必须加上由于竞争对男性智慧的刺激得到的益处，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他们期望获得优势地位之前，有必要使他们先做到应有的领先程度。

This great accession to the intellectual power of the species,

and to the amount of intellect available for the good management of its affairs, would be obtained, partly, through the better and more complete intellectual education of women, which would then improve *paripassu* with that of men. Women in general would be brought up equally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business, public affairs, and the higher matters of speculation, with men in the same class of society; and the select few of the one as well as of the other sex, who were qualified not only to comprehend what is done or thought by others, but to think or do something considerable themselves, would meet with the same facilities for improving and training their capacities in the one sex as in the other. In this way, the widening of the sphere of action for women would operate for good, by raising their education to the level of that of men, and making the one participate in all improvements made in the other. But independently of this, the mere breaking down of the barrier would of itself have an educational virtue of the highest worth. The mere getting rid of the idea that all the wider subject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ll the things which are of general and not solely of private interest, are men's business, from which women are to be warned off—positively interdicted from most of it, coldly tolerated in the little which is allowed them—the mere consciousness a woman would then have of being a human being like any other, entitled to choose her pursuits, urged or invited by the same inducements as anyone else to interest herself in whatever is interesting to human beings, entitled to exert the share of influence on all human concerns which belongs to an individual opinion, whether she attempted actual participation in them or not—this alone would effect an immense expansion of the faculties of women, as well as enlargement of the range of their moral sentiments.

这种人类智力及可用于良好事务管理才能的巨大增加，将部分通

过为女性提供更好、更完备的智力教育而获得，这种教育日后将同男性的教育一起得到同等的改善。一般女性将在成长过程中，培养出与她们同一阶层的男性相同的能力，包括了解商业、公共事务及对更高级别事务的思考能力；两性中那些不仅能了解别人所作所思，而且还能独立思考或完成重要事情的最为杰出的少数人，将能够获得提高并训练自身能力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对于两性，将是毫无差别的。这样，通过将女性所受教育提升到男性所受教育的高度，并使女性参与到所有完善男性的活动中，女性活动范围的扩大将会继续下去并带来益处。然而，除了上述益处，仅仅打破这种界线本身就有最高意义上的教育价值。仅仅摆脱这个想法，即所有较宽泛的思维与行动的学科，所有关乎公众而不仅仅是个人利益的问题都应该是男性的事情，而女性则被警告不要涉足——明令禁止大多数事情；冷漠地容忍有极少数允许做的事情——仅仅是女性那时会有的一种意识，即她们像任何人一样，有权去追求自己的事业；像任何受到激励和鼓舞的人一样，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任何事情；还能够以个人意见对所有人类关心的问题施加自己的影响，而无论她是否真的试图参与其中——仅这一点就足以大大增长女性的才干，并升华她们的道德情操。

Besides the addition to the amount of individual talent available for the conduct of human affairs, which certainly are not at present so abundantly provided in that respect that they can afford to dispense with one-half of what nature proffers; the opinion of women would then possess a more beneficial, rather than a greater, influence upon the general mass of human belief and sentiment. I say a more beneficial, rather than a greater influence; for the influence of women over the general tone of opinion has always, or at least from the earliest known period, been very considerable. The influence of mothers on the early character of their sons, and the desire of young men to recommend themselves to young women, have in all recorded times been important agencies in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and have determined some

of the chief steps in the progress of civilisation. Even in the Homeric age, αἰδὼς towards the *Τρωάδας*ἑλκεσιπέπλους [4_2] is an acknowledged and powerful motive of action in the great Hector. The moral influence of women has had two modes of operation. First, it has been a softening influence. Those who were most liable to be the victims of violence, have naturally tended as much as they could towards limiting its sphere and mitigating its excesses. Those who were not taught to fight, have naturally inclined in favour of any other mode of settling differences rather than that of fighting. In general, those who have been the greatest sufferers by the indulgence of selfish passion, have been the most earnest supporters of any moral law which offered a means of bridling passion. Women were powerfully instrumental in inducing the northern conquerors to adopt the creed of Christianity, a creed so much more favourable to women than any that preceded it. The conversion of the Anglo-Saxons and of the Franks may be said to have been begun by the wives of Ethelbert and Clovis. The other mode in which the effect of women's opinion has been conspicuous, is by giving a powerful stimulus to those qualities in men, which, not being themselves trained in,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m that they should find in their protectors. Courage, and the military virtues generally, have at all times been greatly indebted to the desire which men felt of being admired by women: and the stimulus reaches far beyond this one class of eminent qualities, since, by a very natural effect of their position, the best passport to the admiration and favour of women has always been to be thought highly of by men.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kinds of moral influence thus exercised by women, arose the spirit of chivalry: the peculiarity of which is, to aim at combining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the warlike qualities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a totally different class of virtues—those of gentleness, generosity, and self-abnegation, towards the non-military and defenceless classes generally, and a special submission

and worship directed towards women; who wer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ther defenceless classes by the high rewards which they had it in their power voluntarily to bestow on those who endeavoured to earn their favour, instead of extorting their subjection. Though the practice of chivalry fell even more sadly short of its theoretic standard than practice generally falls below theory, it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precious monuments of the moral history of our race; as a remarkable instance of a concerted and organised attempt by a most disorganised and distracted society, to raise up and carry into practice a moral ideal greatly in advance of its social condition and institutions; so much so as to have been completely frustrated in the main object, yet never entirely inefficacious, and which has left a most sensible, and for the most part a highly valuable impress on the ideas and feelings of all subsequent times.

除在各种人类事务的管理中增加的个人才能之外（目前没有给女性提供大量事务，因为她们会浪费掉大自然赐予的那一半才能），女性的意见将更有益于产生全人类的信念与道德情操，而不是为其带来更大的影响。我之所以说女性的见解能产生更有益而不是更大的影响，是因为女性一直以来，或至少从最早的已知时期来说，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众的意见。在有历史记录以来，母亲对自己儿子早期性格发展的影响以及年轻男子想取悦心仪女子的愿望，对于性格的塑造都很重要，甚至决定了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的某些重要阶段。即使在荷马时代，向穿着长袍拖地的特洛伊妇女致敬[5_2]，也是著名的赫克托耳在公认的、强大动力刺激下的行为。女性的道德影响力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软化事态。那些最有可能沦为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们会自然而然地尽自己所能来限制暴力范围并减轻其暴力行径；那些没有学过打斗的人也理所当然地赞成除打斗外的任何消除分歧的方式。普遍而言，那些由于放纵自己的极端情绪而遭受危害最大的人，也会最强有力地支持任何可以遏制此种情绪的道德法律。在劝导北方征服者接受基督教信条时，女性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一教义对女性来说比

之前的任何教义都更有利。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转而信仰基督教可以说是始于埃特尔伯特国王和克洛维国王的妻子们。第二，强有力的激励男性的优良品质。女性本身没有这些品质方面的训练，因此有必要在她们的保护者身上激发出来，这也是女性意见产生的显著影响。勇气，以及总体而言的武德一直以来都被男性看作是获得女性爱慕的品质。而上述激励则更超越了这种品质，因为由于其所处地位的自然影响，得到女性仰慕与喜爱的最好办法就是得到男性的高度评价。上述两种女性道德影响力的结合产生了“骑士精神”，其独特之处在于，其目的是要将尚武品德的最高标准与培养一类完全不同的美德（对那些非武力、无自卫能力的人举止文雅、为人慷慨、自我克制，对女性特别屈从与崇拜）结合起来，而女性有别于其他无自卫能力的人，因为她们有能力去主动奖赏那些努力获其芳心而不是强迫她们屈从的人。实践通常达不到理论的高度，但“骑士精神”的践行更可悲，因为它连理论标准都没有。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我们人类道德史上最为珍贵的丰碑之一。它是由一个最无组织、最令人困扰的社会提出并付诸道德实践的一个协调有序的杰出尝试，这种道德理念已经超越了当时的社会条件与制度。它在其主要目标上甚至可以说完全受挫，但也并非完全无用，它为后来时代的观念和情操留下了最为理智并在绝大程度上具有很高价值的烙印。

The chivalrous ideal is the acme of the influence of women's sentiments on the moral cultivation of mankind: and if women are to remain in their subordinate situation, it were greatly to be lamented that the chivalrous standard should have passed away, for it is the only one at all capable of mitigating the demoralising influences of that position. But the changes in the general state of the species rendered inevitable the substitution of a totally different ideal of morality for the chivalrous one. Chivalry was the attempt to infuse moral elements into a state of society in which everything depended for good or evil on individual prowess, under the softening influences of individual delicacy and generosity. In

modern societies, all things, even in the military department of affairs, are decided, not by individual effort, but by the combined operations of numbers; while the main occupation of society has changed from fighting to business, from military to industrial life. The exigencies of the new life are no more exclusive of the virtues of generosity than those of the old, but it no longer entirely depends on them. The main foundations of the moral life of modern times must be justice and prudence; the respect of each for the rights of every other, and the ability of each to take care of himself. Chivalry left without legal check all forms of wrong which reigned unpunished throughout society; it only encouraged a few to do right in preference to wrong, by the direction it gave to the instruments of praise and admiration. But the real dependence of morality must always be upon its penal sanctions—its power to deter from evil. The security of society cannot rest on merely rendering honour to right, a motive so comparatively weak in all but a few, and which on very many does not operate at all. Modern society is able to repress wrong through all departments of life, by a fit exertion of the superior strength which civilisation has given it, and thus to render the existence of the weaker members of society (no longer defenceless but protected by law) tolerable to them, without reliance on the chivalrous feelings of those who are in a position to tyrannise. The beauties and graces of the chivalrous character are still what they were, but the rights of the weak, and the general comfort of human life, now rest on a far surer and steadier support; or rather, they do so in every relation of life except the conjugal.

这种“骑士精神”的理念是女性情感影响人类情操培养的顶点。如果女性在社会中依然处于从属地位，那么我们应该感到惋惜，因为唯一能够缓解这种地位所带来的道德堕落影响的“骑士精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人类总体境况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种全新的道德理念

来替代“骑士精神”。“骑士精神”试图把道德元素融入到这样一个社会状态，即在个人优雅与慷慨的软化性影响下，一切事物的好坏都将取决于个人才能。在当代社会，所有事务（甚至包括军机事务）都不是由个人努力决定的，而是聚合了众人之力。同时，社会的主要职能也由战争转为贸易往来，由军队生活转为工业化生活。但这并不是说新社会不再像旧社会一样依赖慷慨等美德，只是不再完全依赖它们。当代社会道德生活的主要基础一定是公正、谨慎、尊重彼此的权利以及衡量自己的能力。由于不受法律监管，“骑士精神”也在全社会范围内留下了各种未受到应有惩罚的恶行。它仅仅通过给予赞扬和倾慕来鼓励少数有识之士去做正义之事而不作奸犯科。但道德必须凭借法律的制裁，唯有法律能够威慑邪恶之事。社会的稳定无法仅仅通过扬善来维护，因为这只对少数人起作用，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动力太微弱，根本不起作用。凭借各部门之力以及文明给予的适当权力，当代社会可以遏制不正当行为，从而使社会弱势群体（不再毫无防御能力，而是受到法律保护）能够生活得较为舒适，而无需再去依赖那些施暴者们的“骑士精神”。当然，“骑士精神”的魅力和优雅依然如故，只是弱势群体的权利和普通大众的安逸生活已有了更为稳固与可靠的支持。或更确切地说，除了夫妻关系，生活中的一切关系都是如此。

At present the moral influence of women is no less real, but it is no longer of so marked and definite a character; it has more nearly merged in the general influence of public opinion. Both through the contagion of sympathy, and through the desire of men to shine in the eyes of women, their feelings have great effect in keeping alive what remains of the chivalrous ideal—in fostering the sentiments and continuing the traditions of spirit and generosity. In these points of character, their standard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en; in the quality of justice, somewhat lower. As regards the relations of private life it may be said generally, that their influence is, on the whole, encouraging to the softer virtues, discouraging to the sterner; though the statement must be taken with all the

modifications dependent on individual character. In the chief of the greater trials to which virtue is subject in the concerns of life—the conflict between interest and principle—the tendency of women's influence is of a very mixed character. When the principle involved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 very few which the course of their religious or moral education has strongly impressed upon themselves, they are potent auxiliaries to virtue: and their husbands and sons are often prompted by them to acts of abnegation which they never would have been capable of without that stimulus. But, with the present education and position of women, the moral principles which have been impressed on them cover but a comparatively small part of the field of virtue, and are, moreover, principally negative; forbidding particular acts, but having little to do with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thoughts and purposes. I am afraid it must be said, that disinterestedness in the general conduct of life —the devotion of the energies to purposes which hold out no promise of private advantages to the family—is very seldom encouraged or supported by women's influence. It is small blame to them that they discourage objects of which they have not learnt to see the advantage, and which withdraw their men from them, and from the interests of the family. But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women's influence is often anything but favourable to public virtue.

目前，女性的道德情操依旧有一定的影响力，只是不再那么突出和确定，而是更加与公众舆论融合在一起。女性通过唤起人们的同情心以及男性渴望在她们面前好好表现这一点，使“骑士精神”的残余理念依旧富有生机，包括培养道德情操以及延续其勇敢与慷慨等传统。在这些品质特点方面，女性的标准高于男性；但在公正方面，就略低于男性了。至于私生活方面的关系，可以概括地说，整体上，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鼓励较温和的美德，劝阻较严厉的品德，当然这一结论因人而异，对不同的个人性格，需要作出相应的修改。在生活中影

响并考验美德的重大问题（利益和原则的冲突问题）上，女性的影响则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当涉及的原则恰巧是她们所接受的宗教或道德教育对她们产生较强影响的为数不多的原则之一时，她们就会强有力地推动美德；她们经常督促丈夫和儿子厉行克己，假如没有这种激励，恐怕他们永远不会做。但是，鉴于女性当前的教育与社会地位，对她们影响较大的道德原则也只能覆盖美德领域中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些还大都是消极的，即禁止某些行为，但不涉及思想与人生目标的大方向。但恐怕我不得不说的是，女性的影响力极少鼓励或支持那些对一般生活准则不感兴趣的行为，即将精力花费在对家庭毫无私利的事情上。由于女性没有学会看到一些事物的优点，于是她们阻止丈夫从事这些与自己分开及于家庭利益无益的活动，我们实在不能责怪她们。但结果却是，女性这种影响通常不利于社会公德。

Women have, however, some share of influence in giving the tone to public moralities since their sphere of action has been a little widened, and sinc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them have occupied themselves practically in the promotion of objects reaching beyond their own family and household. The influence of women counts for a great deal in two of the most marked features of modern European life—its aversion to war, and its addiction to philanthropy. Excellent characteristics both; but unhappily, if the influence of women is valuable in the encouragement it gives to these feelings in general, in the particular applications the direction it gives to them is at least as often mischievous as useful. In the philanthropic department more particularly, the two provinces chiefly cultivated by women are religious proselytism and charity. Religious proselytism at home, is but another word for embittering of religious animosities: abroad, it is usually a blind running at an object, without either knowing or heeding the fatal mischiefs—fatal to the religious object itself as well as to all other desirable objects—which may be produced by the means employed. As for charity, it

is a matter in which the immediate effect on the persons directly concerned, and the ultimate consequence to the general good, are apt to be at complete war with one another: while the education given to women—an education of the sentiments rather than of the understanding—and the habit inculcated by their whole life, of looking to immediate effects on persons, and not to remote effects on classes of persons—make them both unable to see, and unwilling to admit, the ultimate evil tendency of any form of charity or philanthropy which commends itself to their sympathetic feelings. The great and continually increasing mass of unenlightened and short-sighted benevolence, which, taking the care of people's lives out of their own hands, and relieving them from the disagreeable consequences of their own acts, saps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the self-respect, self-help, and self-control which are the essential conditions both of individual prosperity and of social virtue—this waste of resources and of benevolent feelings in doing harm instead of good, is immensely swelled by women's contributions, and stimulated by their influence. Not that this is a mistake likely to be made by women, where they have actually the practical management of schemes of beneficence. It sometimes happens that women who administer public charities—with that insight into present fact, and especially into the minds and feelings of those with whom they are in immediate contact, in which women generally excel men—recognise in the clearest manner the demoralising influence of the alms given or the help afforded, and could give lessons on the subject to many a male political economist. But women who only give their money, and are not brought face to face with the effects it produces, how can they be expected to foresee them? A woman born to the present lot of women, and content with it, how should she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self-dependence? She is not self-dependent; she is not taught self-dependence; her destiny is to receive everything from others, and

why should what is good enough for her be bad for the poor? Her familiar notions of good are of blessings descending from a superior. She forgets that she is not free, and that the poor are; that if what they need is given to them unearned, they cannot be compelled to earn it: that everybody cannot be taken care of by everybody, but there must be some motive to induce people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nd that to be helped to help themselves, if they are physically capable of it, is the only charity which proves to be charity in the end.

尽管如此，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对社会公德产生积极影响的，因为随着她们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展，相当多的女性也开始从事推进家庭与家务以外的工作。女性在现代欧洲生活两大特征中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即厌战情节和热衷慈善。这两点都是非常好的。但遗憾的是，如果说女性的影响力在鼓励大众拥有这些情操方面很宝贵的话，那么在这些情操的具体实施方面，她们的影响力在有益的同时，至少也是经常有害的。尤其在慈善部门，女性重点工作的两个领域是改变宗教信仰与发展慈善事业。在国内，改变宗教信仰这种说法，相当于说加剧宗教仇视；在国外，它通常指盲目追求一个目标，却不知道或不注意其致命危害——不仅对宗教信仰也对所有其他合适的事物都是致命的——这可能是由于采用的方式不对造成的。至于慈善事业，它关系到当事人的直接利益与大众利益的终极结果，二者很容易互相冲突。而女性所受的教育（道德情操教化而非认知教育）与她们长期受到教导所形成的只关注个人直接效果而忽视对各个阶层长期影响的习惯，也使她们看不到且不愿承认，唤起她们同情心的任何形式的慈善最终都要走向邪恶。这种大规模的、不断增长的、愚昧且目光短浅的善心（用一己之力照顾他人生活，将他们从自己行为的恶果中解救出来），恰恰破坏了自尊、自助、自制等美德的基础，而这些美德对于个人的成功和社会的公德都是至关重要的条件。于是，女性的“贡献”与影响有害而非有益，这大大加剧并刺激了这种感情与资源的浪费。这并不是说，女性易于犯此类错误；事实上，慈善计划的具

体管理都是女性来做的。有时，管理公共慈善的女士，能够洞悉当前状况，特别是与之直接接触的人们的感情和想法（在这点上，女性一般比男性有优势），她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施舍与帮助对道德造成的负面影响，并能够就此课题给许多男性政治经济学家好好上一课。但只负责出钱而未亲眼所见其效果的女性呢？我们怎么能指望她们去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呢？一位生在当今并满足于此种命运的女性，又怎么能欣赏自立的价值呢？她本身并不自立，也没人教她自立，从出生起，她的使命就是从别人那里接受一切，那么究竟为什么对她是好的事情到穷人那里就成了坏事呢？她所熟知的“好”的概念，就是上层给予下层人民的福祉。她忘记了自己是不自由的，真正自由的是穷人；她忘记了，如果穷人们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如此不劳而获，他们就不会被迫学着去挣得自己所需的；她忘记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人的照料，因此必须有动力，人们才能学会照顾自己；她忘记了如果别人身体状况允许，那么帮助其学会自助，才是最终的慈善。

These considerations show how usefully the part which women take in the formation of general opinion, would be modified for the better by that more enlarged i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conversancy with the things which their opinions influence, that would necessarily arise from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emancipation. But the improvement it would work through the influence they exercise, each in her own family, would be still more remarkable.

上述意见表明，女性在舆论形成方面的作用将可以通过扩大教育范围，增加她们对其意见所影响事物的熟悉度来进行更好更有用的转变。随着她们的社会与政治解放，这些必然会出现。但通过她们施加的影响力，在她们自己家庭中做出的改善会更加显著。

It is often said that in the classes most exposed to temptation, a

man's wife and children tend to keep him honest and respectable, both by the wife's direct influence, and by the concern he feels for their future welfare. This may be so, and no doubt often is so, with those who are more weak than wicked; and this beneficial influence would be preserved and strengthened under equal laws; it does not depend on the woman's servitude, but is, on the contrary, diminished by the disrespect which the inferior class of men always at heart feel towards those who are subject to their power. But when we ascend higher in the scale, we come among a totally different set of moving forces. The wife's influence tends, as far as it goes, to prevent the husband from falling below the common standard of approbation of the country. It tends quite as strongly to hinder him from rising above it. The wife is the auxiliary of the common public opinion. A man who is married to a woman his inferior in intelligence, finds her a perpetual dead weight, or, worse than a dead weight, a drag, upon every aspiration of his to be better than public opinion requires him to be. It is hardly possible for one who is in these bonds, to attain exalted virtue. If he differs in his opinion from the mass—if he sees truths which have not yet dawned upon them, or if, feeling in his heart truths which they nominally recognise, he would like to act up to those truths more conscientiously than the generality of mankind—to all such thoughts and desires, marriage is the heaviest of drawbacks, unless he be so fortunate as to have a wife as much above the common level as he himself is.

人们常说，在最易受到诱惑的阶层中，妻子儿女会使男性保持诚实与可敬的品格，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妻子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注重未来的幸福。对于那些较软弱但不邪恶的人来说可能是这样，而且毫无疑问经常如此。在平等法律的保障下，这种有益影响将会得到保留和加强。它不依赖对女性的奴役，相反，后者还会使它减

少，因为处于低层的男性在内心深处总会对那些屈从于自己的人怀有不敬。但当我们往社会更高层看时，就会遇到全然不同的推动力。目前来说，妻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防止自己丈夫的水准低于国家认可的一般标准；同样，她们也强烈反对他们高于国家标准。妻子成为公共舆论的推手。同智力低于自己的女性结婚的男性会觉得她是一辈子的负担。当他想做得比舆论标准更好时，她便不止是负担了，而是一种拖累。受到这些束缚的男性几乎不可能获得崇高的美德。如果他的意见与大众相左——如果他认识到了他们尚未想到的真理，或者如果他深切感知到那些还仅是大家肤浅认可的真理，而他想比一般民众更认真地践行真理——那么，对于所有这类想法及愿望，婚姻就成为他最大的绊脚石，除非他足够幸运，能娶到一位像他一样出类拔萃的妻子。

For,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is always some sacrifice of personal interest required; either of social consequence, or of pecuniary means; perhaps the risk of even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These sacrifices and risks he may be willing to encounter for himself; but he will pause before he imposes them on his family. And his family in this case means his wife and daughters; for he always hopes that his sons will feel as he feels himself, and that what he can do without, they will do without, willingly, in the same cause. But his daughters—their marriage may depend upon it: and his wife, who is unable to enter into or understand the objects for which these sacrifices are made—who, if she thought them worth any sacrifice, would think so on trust, and solely for his sake—who could participate in none of the enthusiasm or the self-approbation he himself may feel, while the things which he is disposed to sacrifice are all in all to her; will not the best and most unselfish man hesitate the longest before bringing on her this consequence? If it be not the comforts of life, but only social consideration, that is at stake, the burthen upon his conscience and feelings is still very

severe. Whoever has a wife and children has given hostages to Mrs. Grundy. The approbation of that potentate may be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to him, but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his wife. The man himself may be above opinion, or may find sufficient compensation in the opinion of those of his own way of thinking. But to the women connected with him, he can offer no compensation. The almost invariable tendency of the wife to place her influence in the same scale with social consideration, is sometimes made a reproach to women, and represented as a peculiar trait of feebleness and childishness of character in them: surely with great injustice. Society makes the whole life of a woman, in the easy classes, a continued self-sacrifice; it exacts from her an unremitting restraint of the whole of her natural inclinations, and the sole return it makes to her for what often deserves the name of a martyrdom, is consideration. Her consideration is inseparably connected with that of her husband, and after paying the full price for it, she finds that she is to lose it, for no reason of which she can feel the cogency. She has sacrificed her whole life to it, and her husband will not sacrifice to it a whim, a freak, an eccentricity; something not recognised or allowed for by the world, and which the world will agree with her in thinking a folly, if it thinks no worse!The dilemma is hardest upon that very meritorious class of men, who, without possessing talents which qualify them to make a figure among those with whom they agree in opinion, hold their opinion from conviction, and feel bound in honour and conscience to serve it, by making profession of their belief, and giving their time, labour, and means, to anything undertaken in its behalf. The worst case of all is when such men happen to be of a rank and position which of itself neither gives them, nor excludes them from, what is considered the best society; when their admission to it depends mainly on what is thought of them personally—and however unexceptionable their breeding and

habits, their being identified with opinions and public conduct unacceptable to those who give the tone to society would operate as an effectual exclusion. Many a woman flatters herself (nine times out of ten quite erroneously) that nothing prevents her and her husband from moving in the highest society of her neighbourhood—society in which others well known to her, and in the same class of life, mix freely—except that her husband is unfortunately a Dissenter, or has the reputation of mingling in low radical politics. That it is, she thinks, which hinders George from getting a commission or a place, Caroline from making an advantageous match, and prevents her and her husband from obtaining invitations, perhaps honours, which, for aught she sees, they are as well entitled to as some folks. With such an influence in every house, either exerted actively, or operating all the more powerfully for not being asserted, is it any wonder that people in general are kept down in that mediocrity of respectability which is becoming a marked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 times?

因为，首先，如果要这样做，总是需要牺牲掉一些个人利益：可能是社会关系、金钱损失，甚至也许要丢掉自己的生存手段。如果只为他自己，他可能愿意去承受这种牺牲和风险；但如果要影响到自己的家庭，他便会犹豫不决。这里，家庭指的仅是其妻子和女儿，因为他总是希望儿子与他感同身受，如果他自己可以做到，儿子们也能为了同样的事业而心甘情愿地做到。但他的女儿们——她们的婚姻可能要依赖它，他的妻子不能参与或不理解这些牺牲的目的所在——如果她认为这些牺牲值得，也是出于对丈夫的信任，而且只是为了丈夫才这样想的，即她体会不到他可能感受到的热情或自我认可，然而他牺牲的东西在她眼里还是最珍贵的。那么，最优秀、最无私的男性在给她带来这种影响之前，能不长时间犹豫吗？即便要牺牲的并非生活的安逸，而只是社会问题，压在他良知和情感上的负担依然很重。无论是谁，只要有妻子儿女，就会沦为葛兰地太太的人质。这种对权力的

认可对他来说可能无关紧要，但对其妻子来说却极为重要。男性可能对舆论置之不理，或者从与他持有相同看法的人那里得到心理安慰。但他无法为妻子女儿们提供心理补偿。有时，人们会责备女性，因为她们几乎总是倾向于将个人影响与社会顾虑并重，这也被认为代表了她们性格中软弱与幼稚的特点，而这显然是非常不公正的。社会使处于安逸生活中的女性不断做出自我牺牲，要求她们不懈克制自己所有的自然本性，而社会对她们这些经常可称之为“殉难”行为的唯一回报是：尊重。对她的尊重与对其丈夫的尊重是密不可分的，在为此付出全部代价之后，她却发现要失去它，而且毫无正当理由。她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全部生活，而其丈夫竟不愿做出一点牺牲，哪怕是一个奇怪的想法，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甚至是一种怪癖。这些都不被世人承认或允许，世人跟她一样（如果不是更糟的话），都认为这是愚蠢的行为。最进退两难的是那些具有品德高尚的男性，他们本身不具备使他们在志同道合的人中崭露头角的才能，但出于信念却坚持自己的意见，出于荣誉和良知，感觉自己有责任为之服务，于是将自己的信念作为职业，为任何以其名义进行的事业花费时间、劳力及手段。最坏的情况是这类男性恰好身处一定的等级和职位，这种等级和职位让他们既进不了上流社会，也不让上流社会排斥他们。而他们能否被上流社会接受则主要取决于别人对他们个人的看法。无论其教养与习惯如何完美，如果他们认同的看法与社会行为不能被那些主宰社会风气的人接受，则其看法与社会行为将会有效地把他们排除在上流社会之外。很多女性自以为（90%都是错的）什么也阻挡不了夫妻二人跻身进入当地上层社会——在这里，大家彼此熟知，社会等级相似并且交往自由——不幸的是，其丈夫是一位持异议者，或背上了与底层激进政客交往的坏名声。她认为正因如此，才影响了乔治的仕途，使卡罗琳嫁不进最好的人家，使自己和丈夫收不到别人的邀请或得到荣誉。在她看来，他们理应像别人一样有资格拥有。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影响力，有时积极发挥出来，有时因未明言反而更加有力地暗中操作，人们普遍被迫过这种碌碌无为、稍显体面的生活还有什么奇怪的呢？这难道不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吗？

There is another very injurious aspect in which the effect, not of women's disabilities directly, but of the broad line of difference which those disabilities create between the education and character of a woman and that of a man, requires to be considered. Nothing can be more unfavourable to that union of thoughts and inclinations which is the ideal of married life. Intimate society between people radically dissimilar to one another, is an idle dream. Unlikeness may attract, but it is likeness which retains; 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likeness is the suit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s to give each other a happy life. While women are so unlike men, it is not wonderful that selfish men should feel the need of arbitrary power in their own hands, to arrest *in limine* the life-long conflict of inclinations, by deciding every question on the side of their own preference. When people are extremely unlike, there can be no real identity of interest. Very often there is conscientious difference of opinion between married people, on the highest points of duty. Is there any reality in the marriage union where this takes place? Yet it is not uncommon anywhere, when the woman has any earnestness of character; and it is a very general case indeed in Catholic countries, when she is supported in her dissent by the only other authority to which she is taught to bow, the priest. With the usual barefacedness of power not accustomed to find itself disputed, the influence of priests over women is attacked by Protestant and Liberal writers, less for being bad in itself, than because it is a rival authority to the husband, and raises up a revolt against his infallibility. In England, similar differences occasionally exist when an Evangelical wife has allied herself with a husband of a different quality; but in general this source at least of dissension is got rid of, by reducing the minds of women to such a nullity, that they have no opinions but those of Mrs. Grundy, or those which the husband tells them to have. When there is no difference of opinion, differences merely of taste may be sufficient to detract greatly from

the happiness of married life. And though it may stimulate the amatory propensities of men, it does not conduce to married happiness, to exaggerate by differences of education whatever may be the native differences of the sexes. If the married pair are well-bred and well-behaved people, they tolerate each other's tastes; but is mutual toleration what people look forward to, when they enter into marriage? These differences of inclination will naturally make their wishes different, if not restrained by affection or duty, as to almost all domestic questions which arise. What a difference there must be in the society which the two persons will wish to frequent, or be frequented by!Each will desire associates who share their own tastes: the persons agreeable to one, will be indifferent or positively disagreeable to the other; yet there can be none who are not common to both, for married people do not now li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house and have totally different visiting lists, as in the reign of Louis XV. They cannot help having different wishes as to the bringing up of the children: each will wish to see reproduced in them their own tastes and sentiments: and there is either a compromise, and only a half-satisfaction to either, or the wife has to yield -often with bitter suffering; and, with or without intention, her occult influence continues to counterwork the husband's purposes.

还有另一非常有害的方面，这种危害的影响（不是直接源自女性的不利条件，而是源自这些不利条件所导致的男女所受教育以及性格之间的巨大差异）需要加以考虑。理想的婚姻生活是思想与爱好的结合，没有什么比这种影响更不利于这种结合了。期待想法截然不同的人有亲密交往只是痴人说梦。差异可能会使双方相互吸引，但相似才能真正持久。而与相似成正比的是能够给彼此幸福的相配性。既然女性与男性如此不同，那么当自私的男性渴望手中拥有绝对权力，从一开始便抓住彼此爱好不同这个筹码，按自己的偏好来决断问题时，我

们也不应当感到奇怪。当人们的性格截然不同时，他们也不会有真正的共同兴趣。事实也经常是，夫妻经常在最高责任上出现分歧。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婚姻结合还有现实性吗？然而，对于诚实正直的女性，这种结合到处可见。在信仰天主教的国家，这确实是普遍的，因为她的异议会受到另一个唯一的权威——神父（她被教导要服从他）的支持。通常情况下，赤裸裸的权力不习惯受到质疑。然而，新教徒与自由主义学者却抨击牧师对女性的影响，并对其“绝对真理”举起了反旗，这并非因为其本身不好，而是因为它挑战了丈夫的权威。在英国，当信仰新教的妻子嫁给了信仰不同的丈夫时，有时也会出现类似的分歧。不过，通过将女性变为“零价值”，一般可以避免产生异议的根源。这样一来，除了葛兰地太太的看法，或其丈夫灌输给她的看法外，她们没有自己的意见。即使没有意见分歧，仅个人品位的差异可能也足以使幸福的婚姻生活大打折扣。尽管将两性的固有差异夸大为教育的差异可能会激起男性的爱意，却丝毫无助于婚后的幸福。如果夫妻二人都很有教养，品行端正，他们会彼此包容对方的品位。但当人们跨进婚姻殿堂时，他们期盼的只是彼此包容吗？如果没有爱情或责任的制约，这些兴趣爱好上的差异自然会造成彼此在几乎所有出现的家庭问题上有不同的追求。那么两人的交际圈该有多大的差异啊！每个人都会渴望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然而适合一方的人，就肯定不适合或不在意另一方。然而，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是夫妻双方共同的朋友，因为现在不像路易十五时代那样，那时夫妻住在不同的地方，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访客。至于抚养孩子，他们也难免有不同的看法：每个人都希望孩子具有自己的品位和情操。于是，要么一个人妥协，要么使每个人都不满意，要么是妻子忍痛让步；之后，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她潜移默化的影响会继续不停地与丈夫的目标相冲突。

It would of course be extreme folly to suppose that these differences of feeling and inclination only exist because women are brought up differently from men, and that there would not be differences of taste under any imaginable circumstances. But there is nothing beyond the mark in saying that the distinction in

bringing up immensely aggravates those differences, and renders them wholly inevitable. While women are brought up as they are, a man and a woman will but rarely find in one another real agreement of tastes and wishes as to daily life. They will generally have to give it up as hopeless, and renounce the attempt to have, in the intimate associate of their daily life, that *idem velle, idem nolle* , [4_3] which is the recognised bond of any society that is really such: or if the man succeeds in obtaining it, he does so by choosing a woman who is so complete a nullity that she has no *velle* or *nolle* at all, and is as ready to comply with one thing as another if anybody tells her to do so. Even this calculation is apt to fail; dullness and want of spirit are not always a guarantee of the submission which is so confidently expected from them. But if they were, is this the ideal of marriage? What, in this case, does the man obtain by it, except an upper servant, a nurse, or a mistress? On the contrary, when each of two persons, instead of being a nothing, is a something; when they are attached to one another, and are not too much unlike to begin with; the constant partaking in the same things, assisted by their sympathy, draws out the latent capacities of each for being interested in the things which were at first interesting only to the other; and works a gradual assimilation of the tastes and characters to one another, partly by the insensible modification of each, but more by a real enriching of the two natures, each acquiring the tastes and capacities of the other in addition to its own. This often happens between two friends of the same sex, who are much associated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it would be a common, if not the commonest, case in marriage, did not the totally different bringing up of the two sexes make it next to an impossibility to form a really well-assorted union. Were this remedied, whatever differences there might still be in individual tastes, there would at least be, as a general rule, complete unity and unanimity as to the great objects of life. When the two persons both

care for great objects, and are a help and encouragement to each other in whatever regards these, the minor matters on which their tastes may differ are not all-important to them; and there is a foundation for solid friendship, of an enduring character, more likely than anything else to make it, through the whole of life, a greater pleasure to each to give pleasure to the other, than to receive it.

当然，如果认为男女之间的品位与爱好差异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教养不同，如果他们在理想环境下成长，就不会有此差异——这些想法都是极端愚蠢的。然而，如果说不同的教养方式大大加重了这些差异，并使这些差异难以避免的话，倒并不过分。女性被以这样的方式抚养长大，其结果必然是男性与女性都很难找到在日常生活中真正趣味相投的人。他们一般都会因为无望而放弃，并放弃在亲密伴侣身上找寻那种默契——渴望同样的事物，讨厌同样的事物 [5_3] ——的努力，这种默契也是任何社会都认可的一种契约。或者，如果男性终于得到了这种默契，那他也是靠选择一个愚蠢到根本没有自己主张的女性而得到的，别人让她做什么，她都会顺从地去做。即使这种推测站不住脚，我们也不能满怀信心地期待沉闷无趣和毫无生气的女性就一定会完全顺从。然而，即便她们完全顺从，难道这就是理想的婚姻吗？在这样的婚姻里，男性娶的是什么呢？高级仆人？保姆？还是情妇？相反，如果两人都不是空虚的人，而是有内涵的人，那么当他们彼此依恋时，两人从一开始就有很多相似点：经常参加同样的活动，再加上他们的同情心，能发掘出其潜能，使他们对起初只有对方感兴趣的事物有了兴趣；也使他们逐渐被彼此的品位和性格同化。这一部分是由于彼此毫无察觉的改变，更多的是因为真正丰富了彼此的天性，从而在自己品位和能力的基础上又获得了对方的品位和才能。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两个同性朋友之间，也经常出现。在婚姻中，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果不是最普遍的话）。两个成长方式截然不同的男女要成就一段真正匹配的婚姻，是几乎不可能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无论个人品位有多大差异，一般来说，两人

对于人生重大目标的看法至少还是完全一致的。当两人都关注人生的重大目标并在关乎这些问题的所有事情上都能够互相帮助和鼓励时，那些在琐碎小事上的品位分歧就根本不重要了。这样，牢固的友谊有了基础，又具有持久的性质，在他们的一生中，为对方带来快乐可能比任何其他事情更能给彼此带来快乐，比自己得到快乐还要快乐得多。

I have considered, thus far, the effects on the pleasures and benefits of the marriage union which depend on the mere unlikeness between the wife and the husband: but the evil tendency is prodigiously aggravated when the unlikeness is inferiority. Mere unlikeness, when it only means difference of good qualities, may be more a benefit in the way of mutual improvement, than a drawback from comfort. When each emulates, and desires and endeavours to acquire, the other's peculiar qualities the difference does not produce diversity of interest, but increased identity of it, and makes each still more valuable to the other. But when one is much the inferior of the two in mental ability and cultivation, and is not actively attempting by the other's aid to rise to the other's level, the whole influence of the connection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perior of the two is deteriorating: and still more so in a tolerably happy marriage than in an unhappy one. It is not with impunity that the superior in intellect shuts himself up with an inferior, and elects that inferior for his chosen, and sole completely intimate, associate. Any society which is not improving, is deteriorating: and the more so, the closer and more familiar it is. Even a really superior man almost always begins to deteriorate when he is habitually (as the phrase is) king of his company: and in his most habitual company the husband who has a wife inferior to him is always so. While his self-satisfaction is incessantly ministered to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e insensibly imbibes the modes of

feeling, and of looking at things, which belong to a more vulgar or a more limited mind than his own. This evil differs from many of those which have hitherto been dwelt on, by being an increasing one. The association of men with women in daily life is much closer and more complete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Men's life is more domestic. Formerly, their pleasures and chosen occupations were among men, and in men's company: their wives had but a fragment of their lives.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progress of civilisation, and the turn of opinion against the rough amusements and convivial excesses which formerly occupied most men in their hours of relaxation -together with (it must be said) the improved tone of modern feeling as to the reciprocity of duty which binds the husband towards the wife—have thrown the man very much more upon home and its inmates, for his personal and social pleasures: while the kind and degree of improvement which has been made in women's education, has made them in some degree capable of being his companions in ideas and mental taste, while leaving them, in most cases, still hopelessly inferior to him. His desire of mental communion is thus in general satisfied by a communion from which he learns nothing. An unimproving and unstimulating companionship is substituted for (what he might otherwise have been obliged to seek) the society of his equals in powers and his fellows in the higher pursuits. We see, accordingly, that young men of the greatest promise generally cease to improve as soon as they marry, and, not improving, inevitably degenerate. If the wife does not push the husband forward, she always holds him back. He ceases to care for what she does not care for; he no longer desires, and ends by disliking and shunning, society congenial to his former aspirations, and which would now shame his falling-off from them; his higher faculties both of mind and heart cease to be called into activity. And this change coinciding with the new and selfish interests which are created by the family, after a few years he

differs in no material respect from those who have never had wishes for anything but the common vanities and the common pecuniary objects.

迄今为止，我已探讨了夫妻间的差异对婚姻幸福与利益的影响，但如果这种差异是不平等，则这种坏的倾向也会大大加重。当差异指的仅仅是不同的良好品质时，它可能更会促进彼此完善，而不是妨碍舒适。当其中一人仿效、渴望并努力获得对方的特有品质时，这种差异不会扩大二人兴趣的多样性，而是增加彼此的认同感，使彼此在对方眼中更加可贵。但当其中一人的才智与个人素养都低于另一方，而且又不积极努力借另一方的帮助将自己提高到对方的水平时，这一结合对于优秀方的发展来说完全是退化，而且在勉强幸福的婚姻中比在不幸福的婚姻中更甚。那个才智优秀的人把自己和才智一般的人联系在一起，并选择与之结为亲密的夫妻，会出现恶化的后果。任何交往都是不进则退，越是亲近、熟悉的人越是如此。即使一个真正优秀的人，当他习惯性地向周围朋友发号施令时，他几乎总是会开始退化。同理，当妻子不如丈夫时，丈夫也总是如此。一方面，人们不断满足其满足感；另一方面，他又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个比自己平庸或思想狭隘之人的思维方式和看法。这一坏处同之前讨论过的那些不同，因为这个会不断增强。男性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联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紧密、更全面。男性的生活变得更加家庭化。以前，他们的娱乐与所选职业都是在男性中进行，妻子只占据其生活的一小部分。如今，随着文明的进步和舆论转向反对那些占用男性大部分闲暇时间的粗俗娱乐活动和过多的狂欢活动，加之（这是必须要说的）使丈夫更多陪伴妻子的夫妻间应有相互责任这种改进了的现代风气，都使男性更多地转向家庭及家人来寻找个人及交往的乐趣。与此同时，女性所受的教育在形式与程度上也有改进，使得她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为其丈夫在观点与审美趣味上的伴侣，当然多数情况下，她们仍然无法望其项背。他对心灵交流的渴望通常只能在他学不到任何东西的交流中得到满足。一个没有进步、毫无激情的婚姻取代了（否则他有可能不得不去寻找）与其有平等地位、有较高追求的伙伴关系。因此，我

们看到那些最有前途的年轻人通常在婚后就止步不前了，事实上，没有进步就难免要退步。如果妻子不去推动丈夫向前发展，那么她就会起反作用。她不关心的事，他也不去关心了；他不再渴望，并且开始厌恶和躲避以前与他志趣相投的朋友，而他们也为他的堕落感到遗憾。结果他的才智和激情再也活跃不起来了。这种变化恰与其新家庭利益一致，几年后，他与那些只懂得虚荣自负与金钱利益而无其他追求的人们相差无几。

What marriage may be in the case of two persons of cultivated faculties, identical in opinions and purposes, between whom there exists that best kind of equality, similarity of powers and capacities with reciprocal superiority in them—so that each can enjoy the luxury of looking up to the other, and can have alternately the pleasure of leading and of being led in the path of development—I will not attempt to describe. To those who can conceive it, there is no need; to those who cannot, it would appear the dream of an enthusiast. But I maintain, with the profoundest conviction, that this, and this only, is the ideal of marriage; and that all opinions, customs, and institutions which favour any other notion of it, or turn the conceptions and aspirations connected with it into any other direction, by whatever pretences they may be coloured, are relics of primitive barbarism. The moral regeneration of mankind will only really commence, when the most fundamental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is placed under the rule of equal justice, and when human beings learn to cultivate their strongest sympathy with an equal in rights and in cultivation.

关于另一种婚姻——双方都受过教育并富有才华，个人见解与人生目标相同，他们之间关系平等、地位相近、优势互补，所以彼此崇拜，在双方的发展道路上，也都能相互指引——这样的婚姻毋庸赘

述。对于能想象出此种婚姻的人，无此必要。而对于想象不出来的人，它就如同狂热者的梦一般。但我坚信，这种婚姻，也只有这种婚姻，才是理想的婚姻。所有赞成其他任何婚姻观的观点、习俗与制度，或把与之相关的观念与志趣转到其他任何方向，无论如何粉饰，都是原始野蛮制度的残余。只有当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置于平等公正的法则之下，只有当人类学会培养其对权利与教育层次平等的人最真切的同情之心时，人类的道德重生才会真正开始。

Thus far, the benefits which it has appeared that the world would gain by ceasing to make sex a disqualification for privileges and a badge of subjection, are social rather than individual; consisting in an increase of the general fund of thinking and acting power, and an improvement in the general condi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of men with women. But it would be a grievous understatement of the case to omit the most direct benefit of all, the unspeakable gain in private happiness to the liberated half of the species; the difference to them between a life of subjection to the will of others, and a life of rational freedom. After the primary necessities of food and raiment, freedom is the first and strongest want of human nature. While mankind are lawless, their desire is for lawless freedom. When they have learnt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duty and the value of reason, they incline more and more to be guided and restrained by these in the exercise of their freedom; but they do not therefore desire freedom less; they do not become disposed to accept the will of other people as the representative and interpreter of those guiding principles. On the contrary, the communities in which the reason has been most cultivated, and in which the idea of social duty has been most powerful, are those which have most strongly asserted the freedom of action of the individual—the liberty of each to govern his conduct by his own feelings of duty, and by such laws and social

restraints as his own conscience can subscribe to.

至此，当世人不再把性别作为衡量人们有无资格享受特权或谁必须服从谁的标准时，由此带来的益处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这些益处包括人类整体思维力与行动力的提高以及男女整体婚姻状况的改善。但如果我们忽略其带来的、最直接的益处，即被解放的半数人类得到的无法言说的个人幸福，那么上述论述则严重不足。因为对她们而言，区别在于要么屈从他人意志生活，要么理性、自由地生活。除了衣食等必需品外，自由是人性最基本、最强烈的渴望。当人类处于无法律状态时，他们渴望一种无法律约束的自由。当他们明白责任的意义与理性的价值后，在他们行使自由的过程中，就越来越倾向于接受责任与理性的指导和约束。但他们渴望的自由并未因此而减少，也不愿屈从于他人的意志，任由他们代表或阐释那些指导性原则。相反，理性得到最好发展、社会责任意识最强的社会都是最坚定维护个人行动自由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靠自己的责任感以及良知所能承担的法律和社会制约，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He who would rightly appreciate the worth of personal independence as an element of happiness, should consider the value he himself puts upon it as an ingredient of his own. There is no subject on which there is a greater habitual difference of judgment between a man judging for himself, and the same man judging for other people. When he hears others complaining that they are not allowed freedom of action—that their own will has not sufficient influence in the regulation of their affairs—his inclination is, to ask, what are their grievances? what positive damage they sustain? and in what respect they consider their affairs to be mismanaged? and if they fail to make out, in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what appears to him a sufficient case, he turns a deaf ear, and regards their complaint as the fanciful querulousness of people whom nothing

reasonable will satisfy. But he has a quite different standard of judgment when he is deciding for himself. Then, the most unexceptionable administration of his interests by a tutor set over him, does not satisfy his feelings: his personal exclusion from the deciding authority appears itself the greatest grievance of all, rendering it superfluous even to enter into the question of mismanagement. It is the same with nations. What citizen of a free country would listen to any offers of good and skilful administration, in return for the abdication of freedom? Even if he could believe that good and skilful administration can exist among a people ruled by a will not their own, would not the consciousness of working out their own destiny under their own moral responsibility be a compensation to his feelings for great rudeness and imperfection in the details of public affairs? Let him rest assured that whatever he feels on this point, women feel in a fully equal degree. Whatever has been said or written, from the time of Herodotus to the present, of the ennobling influence of free government—the nerve and spring which it gives to all the faculties, the larger and higher objects which it presents to the intellect and feelings, the more unselfish public spirit, and calmer and broader views of duty, that it engenders, and the generally loftier platform on which it elevates the individual as a moral, spiritual, and social being—is every particle as true of women as of men. Are these things no important part of individual happiness? Let any man call to mind what he himself felt on emerging from boyhood—from the tutelage and control of even loved and affectionate elders—and entering upo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manhood. Was it not like the physical effect of taking off a heavy weight, or releasing him from obstructive, even if not otherwise painful, bonds? Did he not feel twice as much alive, twice as much a human being, as before? And does he imagine that women have none of these feelings? But it is a striking fact, that the satisfactions

and mortifications of personal pride, though all in all to most men when the case is their own, have less allowance made for them in the case of other people, and are less listened to as a ground or a justification of conduct, than any other natural human feelings; perhaps because men compliment them in their own case with the names of so many other qualities, that they are seldom conscious how mighty an influence these feelings exercise in their own lives. No less large and powerful is their part, we may assure ourselves, in the lives and feelings of women. Women are schooled into suppressing them in their most natural and most healthy direction, but the internal principle remains, in a different outward form. An active and energetic mind, if denied liberty, will seek for power: refused the command of itself, it will assert its personality by attempting to control others. To allow to any human beings no existence of their own but what depends on others, is giving far too high a premium on bending others to their purposes. Where liberty cannot be hoped for, and power can, power becomes the grand object of human desire; those to whom others will not leave the undisturbed management of their own affairs, will compensate themselves, if they can, by meddling for their own purposes with the affairs of others. Hence also women's passion for personal beauty, and dress and display; and all the evils that flow from it, in the way of mischievous luxury and social immorality. The love of power and the love of liberty are in eternal antagonism. Where there is least liberty, the passion for power is the most ardent and unscrupulous. The desire of power over others can only cease to be a depraving agency among mankind, when each of them individually is able to do without it: which can only be where respect for liberty in the personal concerns of each is an established principle.

那些能够将个人独立恰当理解为幸福要素之一的人，应当将个人独立的价值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评价自己和他人时，没有其他问题比这一问题有更大的习惯性评价差异。当他听到别人抱怨说不能自由活动，即其个人意志不足以控制自己的事务管理时，他自然产生这样的疑问：他们在抱怨什么？他们遭受了什么确切的伤害？他们认为自己的事务在哪方面没有管理好？如果他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无法证明这些问题对他来说是充分的情况，他就充耳不闻，认为任何合理的答案都无法满足他们，他们的抱怨只不过是吹毛求疵。但当他为自己做决定时，其评定标准却又迥然不同。这时，即使自己的利益由一位上级管理得无懈可击，他也不会满意：因为他觉得不公的是，自己被排除在决定权之外，甚至在管理不善的问题上，自己插手也显得多余。国家也是如此。哪个自由国家的公民愿意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去换取当权者优秀、娴熟的管理呢？即便他相信确实会存在这样优秀而娴熟的管理者，而人们也愿意被他们剥夺个人意志，难道他们在个人道德义务约束下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觉悟，不能弥补他对公共事务细节管理中粗陋与瑕疵的不满吗？对此他可以完全放心，无论他对此有何感觉，女性的感觉也会完全相同。从希罗多德时代至今，无论人们就自由政府崇高的影响力说过或写过什么——它不仅给所有有才能的人带来勇气与活力，给智慧与情感带来更大、更高的目标，更为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更为冷静与宽广的责任观念，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高尚的平台，在这里个人也升华成为有道德、有信仰的社会公民——所有这些，对男女都一样适用。这些难道不是个人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吗？让任何男性回顾一下他从青少年时期——受到即使是自己敬爱的长辈的监护与控制——到开始承担责任的成年期这一成长历程中的感受。这难道不像将重担从身上卸下来或摆脱约束（即使并不痛苦）后产生的身体反应吗？难道他没有感到自己活力倍增，活得比以前更像个人吗？难道他认为女性没有这些感受吗？但是一个事实凸显了出来：个人自豪感所带来的满足感与屈辱感（尽管对大多数男性来说，这在事情涉及他们自己时才有），在涉及别人的情况下，很少会被考虑在内，而且同其他任何人类情感相比，这两种感觉更少被作为行为依据或正当理由来听取，可能是因为男性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中，以太多其他名义来恭维自己，以至于他们很少意识到这些感受会在他

们自己的生活中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确定，这些感受在女性的生活与情感中同样丰富、强大。她们所接受的教育抑制她们向最本性、最健康的方向发展，但其内部原则依旧保持着，只是外在表现形式不同。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如果被剥夺了自由，将会寻求权力。如果不能自治，就会试图通过控制他人来表达自己的个性。对任何人来说，如果没有自己的存在，仅靠他人活着，就意味着要让他人服从于自己的目的，这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当我们不能指望自由但可以依赖权力时，权力就成为人类追求的主要目标。那些无法不受别人干扰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人，在可能的情况下，会为了自己的目的通过干预别人的事情来补偿自己。女性对于个人美貌、衣着和炫耀的热情，以及由此滋生的、以社会道德败坏与过度奢侈为表现形式的所有罪恶都是如此。对权力的热爱与对自由的渴望永远是对立的。自由最匮乏的地方也是权力追逐最激烈、最肆无忌惮的地方。当每个人在没有任何权力也能生存时，对他人使用权力的渴望才会停止，而这只有在尊重他人在管理自己事务上的自由成为既定原则时才能实现。

But it is not only through the sentiment of personal dignity that the free direction and disposal of their own faculties is a source of individual happiness, and to be fettered and restricted in it, a source of unhappiness, to human beings, and not least to women. There is nothing, after disease, indigence, and guilt, so fatal to the pleasurable enjoyment of life as the want of a worthy outlet for the active faculties. Women who have the cares of a family, and while they have the cares of a family, have this outlet, and it generally suffices for them: but what of the greatly increasing number of women, who have had no opportunity of exercising the vocation which they are mocked by telling them is their proper one? What of the women whose children have been lost to them by death or distance, or have grown up, married, and formed homes of their own? There are abundant examples of men who, after a life engrossed by business, retire with a competency to the enjoyment,

as they hope, of rest, but to whom, as they are unable to acquire new interests and excitements that can replace the old, the change to a life of inactivity brings ennui, melancholy, and premature death. Yet no one thinks of the parallel case of so many worthy and devoted women, who, having paid what they are told is their debt to society—having brought up a family blamelessly to manhood and womanhood—having kept a house as long as they had a house needing to be kept—are deserted by the sole occupation for which they have fitted themselves; and remain with undiminished activity but with no employment for it, unless perhaps a daughter or daughter-in-law is willing to abdicate in their favour the discharge of the same functions in her younger household. Surely a hard lot for the old age of those who have worthily discharged, as long as it was given to them to discharge, what the world accounts their only social duty. Of such women, and of those others to whom this duty has not been committed at all—many of whom pine through life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thwarted vocations, and activities which are not suffered to expand—the only resources, speaking generally, are religion and charity. But their religion, though it may be one of feeling, and of ceremonial observance, cannot be a religion of action, unless in the form of charity. For charity many of them are by nature admirably fitted; but to practise it usefully, or even without doing mischief, requires the education, the manifold preparation, the knowledge and the thinking powers, of a skilful administrator. There are few of th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for which a person would not be fit, who is fit to bestow charity usefully. In this as in other cases (pre-eminently in that of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the duties permitted to women cannot be performed properly, without their being trained for duties which, to the great loss of society, are not permitted to them. And here let me notice the singular way in which the question of women's disabilities is frequently presented to view, by those who

find it easier to draw a ludicrous picture of what they do not like, than to answer the arguments for it. When it is suggested that women's executive capacities and prudent counsels might sometimes be found valuable in affairs of State, these lovers of fun hold up to the ridicule of the world, as sitting in Parliament or in the Cabinet, girls in their teens, or young wives of two or three and twenty, transported bodily, exactly as they are, from the drawing-room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They forget that males are not usually selected at this early age for a seat in Parliament, or for responsible political functions. Common sense would tell them that if such trusts were confided to women, it would be to such as having no special vocation for married life, or preferring another employment of their faculties (as many women even now prefer to marriage some of the few honourable occupations within their reach), have spent the best years of their youth in attempting to qualify themselves for the pursuits in which they desire to engage; or still more frequently perhaps, widows or wives of forty or fifty, by whom the knowledge of life and faculty of government which they have acquired in their families, could by the aid of appropriate studies be made available on a less contracted scale. There is no country of Europe in which the ablest men have not frequently experienced, and keenly appreciated, the value of the advice and help of clever and experienced women of the world, in the attainment both of private and of public objects; and there are important matter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 which few men are equally competent with such women; among others, the detailed control of expenditure. But what we are now discussing is not the need which society has of the services of women in public business, but the dull and hopeless life to which it so often condemns them, by forbidding them to exercise the practical abilities which many of them are conscious of, in any wider field than one which to some of them never was, and to others is no longer, open. If there is

anything vitally important to the happiness of human beings, it is that they should relish their habitual pursuit. This requisite of an enjoyable life is very imperfectly granted, or altogether denied, to a large part of mankind; and by its absence many a life is a failure, which is provided, in appearance, with every requisite of success. But if circumstances which society is not yet skilful enough to overcome, render such failures often for the present inevitable, society need not itself inflict them. The injudiciousness of parents, a youth's own inexperience, or the absence of extern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ngenial vocation, and their presence for an uncongenial, condemn numbers of men to pass their lives in doing one thing reluctantly and ill, when there are other things which they could have done well and happily. But on women this sentence is imposed by actual law, and by customs equivalent to law. What, in unenlightened societies, colour, race, religion, or in the case of a conquered country, nationality, are to some men, sex is to all women; a peremptory exclusion from almost all honourable occupations, but either such as cannot be fulfilled by others, or such as those others do not think worthy of their acceptance. Sufferings arising from causes of this nature usually meet with so little sympathy, that few persons are aware of the great amount of unhappiness even now produced by the feeling of a wasted life. The case will be even more frequent as increased cultivation creates a greater and greater disproportion between the ideas and faculties of women and the scope which society allows to their activity.

但并非仅仅个人尊严的情操才使他们自己才能的自由发展与运用成为个人幸福的源泉，或者由于这些才能和自由发展受到束缚和制约，造成人类（女性也同样）的不幸福感。除疾病、贫困、犯罪外，妨碍人们愉快享受生活最致命的莫过于无法有价值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了。那些需要照顾家庭的女性就在照料家人时发挥自己的才能，通常

这对她们来说就足够了。但对现在大量涌现的，没有机会去从事被人嘲笑为最适合她们的职业的女性该怎么办呢？还有那些孩子夭折或远行，或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并有了自己家庭的女性又该怎么办呢？男性不乏这样的例子：在一辈子全神贯注于事业后，他们退休了，之前他们希望退休后能好好享受生活，但对他们来说，由于找不到新的兴趣和刺激来取代旧的，生活变得毫无生气，这种变化带来的是倦怠、忧郁、甚至早逝。然而，没有人想到那些有同样处境的许许多多令人敬佩的、全身心投入的女性，她们向社会偿还了所谓的债务——兢兢业业地把子女养大成人，只要有家务需要操持就辛勤操劳家务——却又被自己已经适应的唯一“职业”所抛弃，活力不减但已无处可施。除非她的女儿或儿媳愿意放弃管理自己的家庭而授权与她。同样，那些尽心履行（只要赋予她们要履行的职责）社会认为的、她们的唯一社会职责的老年女性，其命运也很悲惨。上述这些女性，以及那些根本没有履行这一职责的其他女性——她们中很多人因为意识到有那些自己受到阻挠的职业以及无法容纳她们的社会活动而憔悴一生——一般来说，她们只能诉之于宗教与慈善事业。但她们的宗教，尽管充满感情并具备宗教仪式，却不是宗教活动，除非是以慈善的形式。她们中许多人天生就适合做慈善活动，但要做得更有实效，甚至只是不出乱子，就需要具备熟练管理者的教育、多重准备、才识及思维能力。能够把慈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却不胜任政府管理职位的情况极其少见。正如在其他情况下（尤其在儿童教育中），如果不事先在禁止她们承担的任务方面对她们进行培训，那么她们也无法完成可以承担的责任，这对社会是个巨大的损失。在此，请注意，女性能力低下的问题，经常只通过一种奇怪的方式提出来，提出问题的人发现绘制一幅荒诞的图画（描绘他们不喜欢的东西），要比回应反驳这一观点的论据容易得多。当有人提议说女性的执行能力与谨慎的讨论有时可能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很有价值，这些爱开玩笑的人便开始嘲笑说，让十几岁的小姑娘，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妻子们都坐到国会或内阁席位上，这简直就像把她们从客厅直接运到下议院。可他们却忘了，即使是男性，通常也不会这么年纪轻轻就坐上国会的议席，或者处理重大政务。常识会告诉他们，如果赋予女性这种信任，那就像婚后没有适合她们的专门职业，或者更想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在其他职业上（正如现

在许多女性甚至宁愿选择那些她们力所能及的、受人尊敬的少数职业而不愿结婚那样），为了使自己能够胜任她们所追求的事业而牺牲最好的青春年华；或者也许更常见的是，四五十岁的寡妇或妻子，凭借其在家庭中获得的生活知识与管理能力，再加上适当的学习，就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成为有用之才。每个欧洲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为达到个人或公共目标，即使最能干的男性也经常寻求并十分欣赏世界上那些才华横溢、经验丰富的女性的建议或帮助。在公共管理的某些重要事务上，很少有男性能够像这些女性一样胜任，其中包括控制支出。但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社会需要女性在公共事务中提供什么服务，而是社会经常迫使她们过一种沉闷、无望的生活。社会禁止她们在除了一个领域之外的任何更宽的领域发挥任何才能（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她们的才能），而这一个领域对一些女性从未开放过，而对其他女性，则不再开放。如果有什么事情对人类的幸福至关重要，那一定是：人们应该享受他们惯常的工作。这个幸福人生所必备的条件，大部分人都没有完全具备，或者完全没有。由于缺乏这个条件，许多人的人生都是失败的，虽然从表面来看，它拥有成功的每个必要条件。但如果由环境造成的这种失败经常不可避免（而社会发展得又不成熟，不足以克服此种环境），那么社会本身就不要再打击人们了。父母的不明智，年轻人自己缺乏经验，或缺少从事合适工作的外部机会，上述这些迫使不少男性终身只做一件自己不情愿做，而且做不好的事情。事实上，他们本能够找到自己喜欢做，且能胜任的其他事。但对于女性，这一命运由实际的法律来规定，同时还有与法律等同的社会习俗。在未开化的社会里，肤色、种族、宗教、国别（对于那些被征服的国家来说）对男性的影响就如同性别对所有女性的影响——她们被专横地排除在几乎所有体面的职业之外，除了那些其他人无法完成的，或其他人认为不值得做的工作。由于此类原因而造成的痛苦，很少得到同情，以至于即使现在也很少有人意识到此种虚度的生活给她们带来的不幸。而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女性观念和才华的增长与社会许可她们的活动范围之间的比例越来越失调，这种情况会更常见。

When we consider the positive evil caused to the disqualified

half of the human race by their disqualification—first in the loss of the most inspiriting and elevating kind of personal enjoyment, and next in the weariness, disappointment, and profound dissatisfaction with life, which are so often the substitute for it—one feels that, among all the lessons which men require for carrying o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inevitable imperfections of their lot on earth, there is no lesson which they more need, than not to add to the evils which nature inflicts, by their jealous and prejudiced restrictions on one another. Their vain fears only substitute other and worse evils for those which they are idly apprehensive of: while every restraint on the freedom of conduct of any of their human fellow-creatures (otherwise than by making them responsible for any evil actually caused by it), dries up *pro tanto* the principal fountain of human happiness, and leaves the species less rich, to an inappreciable degree, in all that makes life valuable to the individual human being.

当我们考虑到这种由女性不合格而对她们造成的危害时——首先是丧失了最有活力与振奋人心的那种个人乐趣。其次，取而代之的经常是对生活的厌倦、失望、与强烈不满——人们感到，在同他们命运中难免的不完美进行斗争时，在他们必须学到的教训中，最需要学习的是：除去大自然降到人类头上的不幸之外，不要再因为嫉妒和偏见而给彼此徒增邪恶。他们徒劳的担心只不过代替了他们很容易就能觉察出来的那些更坏的罪恶；与此同时对其他任何人行动自由的每项限制（否则就让他们自饮其果）都在相当程度上使人类幸福的源泉干涸，并使人类在对个人有价值的一切事物方面都变得一文不值。

[4_1].For whose good?

[4_2].Respect for the Trojan women of the trailing robes.

[4_3].To share the same wishes, whe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velle = to want;

nolle = not to want)

[5_1].原文为法文。

[5_2].原文为拉丁文。

[5_3].原文非英语。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

论公民的不服从

Henry David Thoreau
亨利·大卫·梭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论公民的不服从

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

亨利·大卫·梭罗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 论公民的不服从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

论公民的不服从

I heartily accept the motto, “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 and I should like to see it acted up to more rapidly and systematically. Carried out, it finally amounts to this, which also I believe—“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not at all”; and when men are prepared for it, that will be the kind of government which they will have. Government is at best but an expedient; but most governments are usually, and all governments are sometimes, inexpedient. The objections which have been brought against a standing army, and they are many and weighty, and deserve to prevail, may also at last be brought against a standing government. The standing army is only an arm of the standing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itself, which is only the mode which the people have chosen to execute their will, is equally liable to be abused and perverted before the people can act through it. Witness the present Mexican war, the work of comparatively a few individuals using the standing government as their tool; for in the outset, the people would not have consented to this measure.

我衷心接受这句名言：“管得越少的政府，就越是好政府。”我也十分希望看到这句话被迅速、系统地实施。如果该思想被彻底实施，最终将会得到大约这样一个结果：“什么都不管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这也是我坚信的。当人们准备好接受它时，这便会成为人们将拥有的那种社会管理模式。政府至多算某种权宜，可带来方便，但大部分政府通常、所有的政府有时都不带来方便。我们一直以来谴责常备军。常备军人数众多，机构繁冗，好采用暴力，所以反对声此起

彼伏本为理所应当。到最后，我们也许会发现这些谴责会指向常设政府，常备军只是政府的一条手臂而已。政府本身是一种形式，一种人民选举出来执行自己意志的形式，但当人民需要它执行民意时，它却像常备军一样可能被人利用，甚至滥用。看看现在正在进行的美墨战争吧，它正是相对少数人利用政府工具的杰作，因为从一开始，人民就不同意这种做法。

This American government—what is it but a tradition, though a recent one, endeavoring to transmit itself unimpaired to posterity, but each instant losing some of its integrity? It has not the vitality and force of a single living man; for a single man can bend it to his will. It is a sort of wooden gun to the people themselves. But it is not the less necessary for this; for the people must have some complicated machinery or other, and hear its din, to satisfy that idea of government which they have. Governments show thus how successfully men can be imposed upon, even impose on themselves, for their own advantage. It is excellent, we must all allow. Yet this government never of itself furthered any enterprise, but by the alacrity with which it got out of its way. *It* does not keep the country free. *It* does not settle the West. *It* does not educate. The character inherent in the American people has done all t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and it would have done somewhat more, if the government had not sometimes got in its way. For government is an expedient, by which men would fain succeed in letting one another alone; and, as has been said, when it is most expedient, the governed are most let alone by it. Trade and commerce, if they were not made of India rubber, would never manage to bounce over obstacles which legislators are continually putting in their way; and if one were to judge these men wholly by the effects of their actions and not partly by their intentions, they would deserve to be classed and punished with those mischievous persons who put obstructions

on the railroads.

现在的美国政府是过去留下来的，但是历史不长。它始终在努力要把自己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但实际上每一刻它都在丢失一些东西，不能让自己完好无损。它本身不像一个活人那样充满生机和力量，因为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来控制自己。对人民来说，政府倒更像是一杆木枪。虽然如此，它却并非完全不必要，人民总是需要这样一种复杂的大机器，听一听它的噪音，以此满足他们对“社会管理秩序”的想法。这样一来，政府们的优势便显露出来，展示出它们是多么有能力去指挥国民，欺骗自己，只为了一己私利。这样当然很好，我们也必须接受。但是，这个政府却从未想过促进任何事业的发展，而是身手敏捷地走偏了。它不去促进国家的自由，也不去稳定西部的骚乱，更不好好以身作则教化国民。美国人天生自带的性格，创造了美国人现在所有的成就，但如果没有政府干扰，他们还会做得更多。政府作为表达人民意愿的一种工具，是一种可提供便利的权宜工具，人们非常乐意通过它保持彼此独立。但正如我从前所说，当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权宜时，它就最大限度地独立了。贸易和商业若不是像印度橡胶一样有足够的弹性，就无法跳过立法者们不断设下的一道道障碍。如果我们根据立法者给我们带来的后果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意图，那他们真应当同那些把障碍物放到铁轨上的调皮捣蛋者一样，受到同样的惩罚。

But, to speak practically and as a citizen, unlike those who call themselves no-government men, I ask for, not *at once* no government, but at once a better government. Let every man make known what kind of government would command his respect, and that will be one step toward obtaining it.

但是，作为一个公民，如实地讲，我并不完全赞同那些自称无政

府主义者的人，比起无政府，我更赞同有一个好政府。让每个人都说明什么样的政府会赢得他们的尊重，这将是政府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After all, the practical reason why, when the power is once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a majority are permitted, and for a long period continue, to rule is not because they are most likely to be in the right, nor because this seems fairest to the minority, but because they are physically the strongest. But a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majority rule in all cases cannot be based on justice, even as far as men understand it. Can there not be a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majorities do not virtually decide right and wrong, but conscience?—in which majorities decide only those questions to which the rule of expediency is applicable? Must the citizen ever for a moment, or in the least degree, resign his conscience to the legislator? Why has every man a conscience then? I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men first, and subjects afterward. It is not desirable to cultivate a respect for the law, so much as for the right. The only obligation which I have a right to assume is to do at any time what I think right. It is truly enough said that a corporation has no conscience; but a corporation of conscientious men is a corporation *with* a conscience. Law never made men a whit more just; and, by means of their respect for it, even the well-disposed are daily made the agents on injustice. A common and natural result of an undue respect for the law is, that you may see a file of soldiers, colonel, captain, corporal, privates, powder-monkeys, and all, marching in admirable order over hill and dale to the wars, against their wills, ay, against their common sense and consciences, which makes it very steep marching indeed, and produces a palpitation of the heart. They have no doubt that it is a damnable business in which they are concerned; they are all peaceably inclined. Now, what are they? Men at all?or small movable forts and magazines, at the service of some unscrupulous

man in power? Visit the Navy Yard, and behold a marine, such a man as an American government can make, or such as it can make a man with its black arts—a mere shadow and reminiscence of humanity, a man laid out alive and standing, and already, as one may say, buried under arms with funeral accompaniment, though it may be,

毕竟存在现实的原因。为什么人民一旦掌握权力，便会立刻同意由多数人来进行统治，并持续统治很长时间？多数人进行统治，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权力，也不是因为这对少数群体来说似乎最公平，而是因为，他们是最强大的。但是，在诸多政府形式中，由多数人进行管理的政府在很多时候也是有失公平的，甚至超乎理解地不公。那么，能不能有这样一种政府，对于一件事情的对错，不是完全由强势多数的意志决定的，而是以道德为标准去评判？能不能有这样一种政府，强势多数只决定那些可以根据权宜原则进行管理的问题？难道公民在某个时刻必须让良心在立法者面前止步？良心是一丝一毫都不得违反的啊！如果可以违反，人们还要良心做什么！我想，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臣民”。遵守法律就是对正义的尊敬，这种思想并不值得大力提倡。但是，无论何时，只要是我认为是正义的事情，我都有义务去做。群体是没有道德的，这话说得贴切，但若群体由道德高尚的人组成，群体便有了道德。法律并不让人正义，一丝一毫都不会，法律只是让人服从自己，所以，一个最善良的人，也可能因为严格遵守法律而成为不公的代言人。那么，对法律的绝对遵守一般会得到何种自然结果呢？你也许看见过一队士兵，上校、上尉、班长、士兵、军火搬运工……所有人整齐划一地行军，跨过高山，穿过溪流，奔向战场。这其实并不是他们内心的意愿，甚至有悖常识和道德，所以，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行军，让他们每个人都心惊肉跳。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行动只是一纸军令，是该死的公事，他们在内心深处都是渴望和平的。那么，他们算什么，还是人吗？或许他们只是移动的堡垒、弹盒，在为某些不择手段的掌权者效劳？参观一下海军造船厂，盯着某个水兵，你就知道，这正是美国政

府的产物，或者说只有美国政府可以施这妖术把一个人变成这样。我们在这个海军身上看不到一点点人性的影子或记忆。他只是被安排在外面站岗的人，活着。而有人说得好：他其实早就带着陪葬物，埋在武器堆里了，不过也可能是：

“Not a drum was heard, not a funeral note,

“没有一声送别的锣鼓，没有讣告，

As his corpse to the rampart we hurried;

当他的尸体被草草埋进“堡垒”，

Not a soldier discharged his farewell shot

没有一个士兵为他鸣枪送别，

O'er the grave where our hero we buried.”

在我们的英雄埋葬的坟前。”

The mass of men serve the state thus, not as men mainly, but as machines, with their bodies. They are the standing army, and the

militia, jailers, constables, *posse comitatus, &c* . In most cases there is no free exercise whatever of the judgment or of the moral sense; but they put themselves on a level with wood and earth and stones; and wooden men can perhaps be manufactured that will serve the purpose as well. Such command no more respect than men of straw or a lump of dirt. They have the same sort of worth only as horses and dogs. Yet such as these even are commonly esteemed good citizens. Others—as most legislators, politicians, lawyers, ministers, and office-holders—serve the state chiefly with their heads; and, as they rarely make any moral distinctions, they are as likely to serve the devil, without *intending* it, as God. A very few—as heroes, patriots, martyrs, reformers in the great sense, and *men* —serve the state with their consciences also, and so necessarily resist it for the most part; and they are commonly treated as enemies by it. A wise man will only be useful as a man, and will not submit to be "clay," and "stop a hole to keep the wind away," but leave that office to his dust at least:

大批的人不是作为"人"在为这个国家尽忠，而是作为肉体机器。这就是常备军、民兵、狱卒、警察、临时兵团等。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运用自己的道德感和判断力，他们把自己降格成为木头、泥土或石头。也许可以大批量制造木头人，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如此，这些人就像卑微的稻草或是一块肮脏的烂泥，还需要什么尊严呢？他们的价值充其量就是一匹马或是一条狗。然而，正是他们这样的人被普遍认为是良民。其他的那些议员、政客、律师、外交官、高官，用他们的头脑服务国家，却毫无道德观念，可能为魔鬼服务却浑然不知，就好像魔鬼才是他们的上帝。还有另外一小部分人——英雄、爱国者、烈士、广义上的改革家和其他用良知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人——往往都在抵制这些行径，所以统统被它视为敌人。智慧的人要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作为"人"存在，不应被降低成一块"泥巴"，只为"挡住墙上的风洞"。当他脱离世俗、尘归尘土归土时可以说：

“I am too high born to be propertied,

“我生来高贵，故受不得奴役，

To be a second at control,

我不比任何人低也不受制于任何人，

Or useful serving-man and instrument

我不是有用的仆人和工具，

To any sovereign state throughout the world.”

不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帝国服务。”

He who gives himself entirely to his fellow men appears to them useless and selfish; but he who gives himself partially to them is pronounced a benefactor and philanthropist.

有的人把自己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了他的同胞，却仿佛被人们认为无用、自私；有的人只奉献了一点点，却被高歌为恩人、慈善家。

How does it become a man to behave towar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oday? I answer, that he cannot without disgrace be associated with it. I cannot for an instant recognize that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s *my* government which is the *slave's* government also.

对待当今的美国政府，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算正直之人呢？我回答：和它有任何关系都使人蒙羞。如果它同时是奴隶们的政府，我怎能承认这个政治机构是我的政府？要我成为这样的政府的臣民，我一秒钟都不愿意。

All men recognize the right of revolution; that is, the right to refuse allegiance to, and to resist, the government, when its tyranny or its inefficiency are great and unendurable. But almost all say that such is not the case now. But such was the case, they think, in the Revolution of '75. If one were to tell me that this was a bad government because it taxed certain foreign commodities brought to its ports, it is most probable that I should not make an ado about it, for I can do without them. All machines have their friction; and possibly this does enough good to counter-balance the evil. At any rate, it is a great evil to make a stir about it. But when the friction comes to have its machine, and oppression and robbery are organized, I say, let us not have such a machine any longer. In other words, when a sixth of the population of a nation which has undertaken to be the refuge of liberty are slaves, and a whole country is unjustly overrun and conquered by a foreign army, and subjected to military law, I think that it is not too soon for honest men to rebel and revolutionize. What makes this duty the more urgent is that fact that the country so overrun is not our own, but

ours is the invading army.

所有人都承认革命权的存在，即当暴政或无能甚巨，超出人们的忍耐极限时，人们有权拒绝效忠并抵制政府。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至少现在的情形还不至如此，而1775年的那场革命才适用。有人可能会告诉我说：政府对运进本国港口的特定进口商品征税所以它是个坏政府，如果问题那么简单，我就不会无事生非、大惊小怪了，因为不用进口商品我也照样活得挺好。所有的机器运转起来都会有摩擦，有的摩擦甚至可以弄拙成巧，其益处抵消了其弊端。不管怎样，要是有人揪住摩擦不放大做文章，则罪不可赦。但当摩擦的力量大到控制机器，出现系统性的压迫和掠夺，那么我说，这样的机器我们不要也罢；换言之，当一个国家打着自由国度的幌子，而其六分之一的人口却是奴隶，而一个国家全境都被一支侵略军霸占，被不公地蹂躏，被军法统治，以我个人所见，就算是老实人，现在就反叛和起义都绝对不算早。使该义务更加急迫的是这个事实：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不是我们的国家，但侵略军却是我们自己的。

Paley, a common authority with many on moral questions, in his chapter on the “Duty of Submission to Civil Government,” resolves all civil obligation into expediency; and he proceeds to say that “so long as the interest of the whole society requires it, that is, so long as the established government cannot be resisted or changed without public inconvenience, it is the will of God… that the established government be obeyed—and no longer. This principle being admitted, the justice of every particular case of resistance is reduced to a computation of the quantity of the danger and grievance on the one side, and of the probability and expense of redressing it on the other. " Of this, he says, every man shall judge for himself. But Paley appears never to have contemplated those cases to which the rule of expediency does not apply, in

which a people, as well as an individual, must do justice, cost what it may. If I have unjustly wrested a plank from a drowning man, I must restore it to him though I drown myself. This, according to Paley, would be inconvenient. But he that would save his life, in such a case, shall lose it. This people must cease to hold slaves, and to make war on Mexico, though it cost them their existence as a people.

佩利，公共权威，在道德问题上著述颇丰，在他的文章《论公民的服从义务》中，他将所有公民责任都解释为“权宜”，并接着解释说：“只要整个社会的利益需要它，也就是说，只要抵制或改变所建立的政府会引起公众不便，那么上帝的意志便是：遵从既定政府。”一旦认同这个原则，判断每个具体的抵制案例是否正义，便简单多了，也就是一方面计算现存的危险和伤痛的数量，另一方面计算成功的可能性和矫正这些危险和伤痛的代价。他说：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进行判断。但佩利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不适用权宜规则的情况：当一个民族或个人必须伸张正义时，无论代价是什么。如果我昧着良心从一个快要溺水的人手里夺下一块救命的木板，那么，即使我会死去，也必须把木板还给他。根据佩利的观点，这是不对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想自救的人才应当毙命。这个民族必须停止蓄奴，必须停止征伐墨西哥，即使那样会让这个民族消亡。

In their practice, nations agree with Paley; but does anyone think that Massachusetts does exactly what is right at the present crisis?

各国在行动上支持佩利的观点，但人们真的认为在当前这个危机时刻，马萨诸塞州的做法是正确的吗？

“A drab of stat, a cloth-o'-silver slut,

“一个装腔作势的娼妓，穿着银灰色外衣的荡妇，

To have her train borne up,and her soul trail in the dirt.”

无论如何挺直身体的线条，她的灵魂都在肮脏的泥里拖行。”

Practically speaking, the opponents to a reform in Massachusetts are not a hundred thousand politicians at the South, but a hundred thousand merchants and farmers here, who are more interested in commerce and agriculture than they are in humanity, and are not prepared to do justice to the slave and to Mexico, *cost what it may* . I quarrel not with far-off foes, but with those who, near at home, co-operate with, and do the bidding of, those far away, and without whom the latter would be harmless. We are accustomed to say, that the mass of men are unprepared; but improvement is slow, because the few are not as materially wiser or better than the many. It is not so important that many should be good as you, as that there be some absolute goodness somewhere; for that will leaven the whole lump.

说实话，反对马萨诸塞州改革的，并不是成千上万的南方政治家们，而是千千万万的奴隶贩子和农场主们，他们对商业和农业的兴趣远大于对人性的关注，准备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死守阵地，继续非正义地对待奴隶和墨西哥。我的论战对象不是遥远的敌人，而是那些在家

里穿戴整齐、和远处的敌人合作或指挥他们的人，若没有这些人的存在，我远处的那些敌人本是无害的。我们习惯地认为，改革发展得这么慢，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没有准备好，而且统治阶层那一小部分人，并不比被统治的民众有实质上的智慧优势或别的优势。很多人是不是像你一样优秀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世界的某个地方一定存在着某种绝对的善，这种善会让整个面团发酵成功。

There are thousands who are *in opinion* opposed to slavery and to the war, who yet in effect do nothing to put an end to them; who, esteeming themselves children of Washington and Franklin, sit down with their hands in their pockets, and say that they know not what to do, and do nothing; who even postpone the question of freedom to the question of free trade, and quietly read the prices-current along with the latest advices from Mexico, after dinner, and, it may be, fall asleep over them both. What is the price-current of an honest man and patriot today? They hesitate, and they regret, and sometimes they petition; but they do nothing in earnest and with effect. They will wait, well disposed, for others to remedy the evil, that they may no longer have it to regret. At most, they give up only a cheap vote, and a feeble countenance and Godspeed, to the right, as it goes by them. There are nine hundred and ninety-nine patrons of virtue to one virtuous man. But it is easier to deal with the real possessor of a thing than with the temporary guardian of it.

有成千上万的人一边反对奴隶制、反对战争，一边几乎不做任何事情去结束它们；他们以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子孙自居，却稳稳地坐着，双手插兜，说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什么也不做；他们甚至先谈自由贸易的问题，而把自由本身推后；在茶余饭后，他们一边阅读行市价格表，一边看着从墨西哥传来的最新建议，然后，可能就进入了

梦乡，枕着价格表和那些建议。那么今天，正直之人和爱国者的市价又是多少呢？面对这个问题，他们迟疑了，后悔了，有时也请愿，但他们总不愿积极地做些什么，做了也没啥效果。他们会等待，端庄地坐着等待，等待有一天别人消除邪恶，这样他们就不用继续后悔了。而现在，他们顶多会上交一张廉价的选票以示微乎其微的抗议，或对正义表示微弱的支持与良好的祝愿，他们也就这样了。当一个道德完善的人出现，就会出现999个人拥护美德。但是，和一件东西的真正主人打交道，比起和它的暂时保管者打交道来说，要容易得多。

All voting is a sort of gaming, like checkers or backgammon, with a slight moral tinge to it, a playing with right and wrong, with moral questions; and betting naturally accompanies it. The character of the voters is not staked. I cast my vote, perchance, as I think right; but I am not vitally concerned that that right should prevail. I am willing to leave it to the majority. Its obligation, therefore, never exceeds that of expediency. Even *voting for the right* is *doing* nothing for it. It is only expressing to men feebly your desire that it should prevail. A wise man will not leave the right to the mercy of chance, nor wish it to prevail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majority. There is but little virtue in the action of masses of men. When the majority shall at length vote for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it will be because they are indifferent to slavery, or because there is but little slavery left to be abolished by their vote. *They* will then be the only slaves. Only *his* vote can hasten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who asserts his own freedom by his vote.

所有的投票都是一种赌博，虽然牵涉道德问题，但其实就像赌博，获胜不需要什么道德，只涉及到你是不是下对了赌注。投票者的品行不会掺杂在赌局中，人们又不用道德下注。我投了选票给我认为可能正确的那方，但我并不十分关心我的这个正确选择是否会获胜，

我更愿意把它留给多数派去决定。因此，投票的责任，从来都没有超过权宜的范围。即使人们是为正义投票的，也没有为正义做任何事情，它只是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人们，你希望这一方获胜。一个智者是不会允许正义任由几率摆布的，也不会寄希望于通过多数派的力量使之获胜。在群体行为中没有什么美德可言。将来有一天，强势多数最终还是会投票废除奴隶制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对奴隶制已经漠不关心，或是因为奴隶制已经自然衰落到所剩不多，那就索性投票完全废除吧。最后，他们却成了唯一的奴隶。只有扔掉选票以保自由的人，其选票才能真正加速奴隶制的废除。

I hear of a convention to be held at Baltimore, or elsewhere, for the selection of a candidate for the Presidency, made up chiefly of editors, and men who are politicians by profession; but I think, what is it to any independent, intelligent, and respectable man what decision they may come to? Shall we not have the advantage of this wisdom and honesty, nevertheless? Can we not count upon some independent votes? Are there not many individuals in the country who do not attend conventions? But no: I find that the respectable man, so called, has immediately drifted from his position, and despairs of his country, when his country has more reasons to despair of him. He forthwith adopts one of the candidates thus selected as the only *available* one, thus proving that he is himself *available* for any purposes of the demagogue. His vote is of no more worth than that of any unprincipled foreigner or hireling native, who may have been bought. O for a man who is a man, and, as my neighbor says, has a bone in his back which you cannot pass your hand through! Our statistics are at fault: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eturned too large. How many *men* are there to a square thousand miles in the country? Hardly one. Does not America offer any inducement for men to settle here? The American has dwindled into an Odd Fellow—one who may be known by the development of his

organ of gregariousness, and a manifest lack of intellect and cheerful self-reliance; whose first and chief concern, on coming into the world, is to see that the almshouses are in good repair; and, before yet he has lawfully donned the virile garb, to collect a fund to the support of the widows and orphans that may be; who, in short, ventures to live only by the aid of the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 which has promised to bury him decently.

我听说在巴尔的摩港还是哪里，举行了一场推选总统候选人的大会，参会人员主要是编辑或职业政客。但是我想，他们决定推举谁，对那些独立、明智、受人尊敬的人来说又能算什么呢？难道，我们不能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诚实？我们不能指望有独立的选票吗？这个州里有很多人都没去参加大会啊！但是，不，我发现，所有值得尊敬的人们——暂时这么叫吧——刚一起身投票，就会对自己的国家绝望，同时国家有更多的理由不对他们寄予什么希望。这样的大会选出了候选人，值得尊敬的人则迅速从这些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因为只有这么几个人可选。这就证明了值得尊敬的人们，只能是被煽动的对象和达成某些人特定目的的工具。他的投票不具有任何价值，充其量还不如一个没什么原则的外国人，或者被买通了的本国人的选票。我的邻居说：一个真正有骨气的人，一个真正的人，怎会受别人的左右！我们的统计数字出了错误：选票数量大大超过了实际人口数。在美国，平均一千平方米有多少人？几乎不到一人。难道美国就不愿给人一个愿意在此定居的借口吗？美国人已经堕落成一个怪物救济会了——以交际器官发达著称，却明显缺乏智慧和乐观自主精神。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首要、主要目的就是保证救济院管理有序，发展良好，于是一身正义的打扮，为救济那些孤儿寡妇四处筹钱；总之，活着就是冒险，只能靠互助保险公司帮忙才能存活，因为保险公司答应他们不会死得很不体面。

It is not a man's duty, as a matter of course, to devote himself

to the eradication of any, even to most enormous wrong; he may still properly have other concerns to engage him; but it is his duty, at least, to wash his hands of it, and, if he gives it no thought longer, not to give it practically his support. If I devote myself to other pursuits and contemplations, I must first see, at least, that I do not pursue them sitting upon another man's shoulders. I must get off him first, that he may pursue his contemplations too. See what gross inconsistency is tolerated. I have heard some of my townsmen say, “I should like to have them order me out to help put down an insurrection of the slaves, or to march to Mexico—see if I would go”; and yet these very men have each, directly by their allegiance, and so indirectly, at least, by their money, furnished a substitute. The soldier is applauded who refuses to serve in an unjust war by those who do not refuse to sustain the unjust government which makes the war; is applauded by those whose own act and authority he disregards and sets at naught; as if the state were penitent to that degree that it hired one to scourge it while it sinned, but not to that degree that it left off sinning for a moment. Thus, under the name of Order and Civil Government, we are all made at last to pay homage to and support our own meanness. After the first blush of sin comes its indifference; and from immoral it becomes, as it were, unmoral, and not quite unnecessary to that life which we have made.

自然，为了消除任何恶——甚至大恶——奉献自己，不是个人的职责，或许他还有其他正经事忙着去做。但是，他至少应当完全和它划清界限，这便是他的职责，根本不去思考它，因为思考它就是给了它实际上的支持。如果让我投身于某种追求或某种思想，我首先要确定自己不是在跟随别人的意志，坐在别人的肩膀上进行思考。我必须离开这个人，这样他也能自己追求自己的思考。让我们看看多大的不协调同时共存吧。我曾听一位同乡说：“我倒想让人们命令我去镇压

一场奴隶暴乱，或是加入到对墨西哥的战争中去，等着看，看我会不会去！”这些人反对奴隶制和墨西哥战争，但正是这些人，直接用他们的效忠、间接用他们的税钱，找了别人代替自己去镇压奴隶、去向墨西哥开火。有一种士兵是我们大加赞赏的，他们拒绝参战任何一场非正义的战争，鼓掌的正是那些从不拒绝供养挑起不正义战争的政府的人们，正是那些行为上和权威上都被这个士兵漠视甚至蔑视的人们。好像这个国家会悔过当初，所以雇了一个人，当它一做错就鞭打它，但它却从未有一刻让悔恨阻止自己犯罪。这样，在秩序和国民政府的名义下，我们最终等于被迫尊敬并支持了自己的卑贱。羞愧之色一闪而过，无动于衷立刻取而代之；从对道德的漠视，变成了不道德，道德对我们已经过成这样的生活来说，本就不那么必需。

The broadest and most prevalent error requires the most disinterested virtue to sustain it. The slight reproach to which the virtue of patriotism is commonly liable, the noble are most likely to incur. Those who, while they disapprove of the character and measures of a government, yield to it their allegiance and support are undoubtedly its most conscientious supporters, and so frequently the most serious obstacles to reform. Some are petitioning the State to dissolve the Union, to disregard the requisitions of the President. Why do they not dissolve it themselves—the union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State—and refuse to pay their quota into its treasury? Do not they stand in same relation to the State that the State does to the Union? And have not the same reasons prevented the State from resisting the Union which have prevented them from resisting the State?

最盛行的错误影响也最广泛，只有最无私的美德才能支持它的传播。爱国主义美德常引起轻声的责备，越高尚的人们越容易这样做。有些人不赞成政府的品德和策略，却依旧效忠并支持它，所以无疑是

它最忠实的支持者，所以是改革最大的障碍。一些人向州政府请愿，请求解散联邦政府，请求不遵从总统的意志。为什么他们不自己解散，解散自己和州的关系，拒绝向州库交纳钱财？他们和州政府的关系，不正像州与联邦的关系吗？州不能抵制联邦的理由，不正是他们不能抵制州的理由吗？

How can a man be satisfied to entertain an opinion merely, and enjoy *it* ? Is there any enjoyment in it, if his opinion is that he is aggrieved? If you are cheated out of a single dollar by your neighbor, you do not rest satisfied with knowing you are cheated, or with saying that you are cheated, or even with petitioning him to pay you your due; but you take effectual steps at once to obtain the full amount, and see to it that you are never cheated again. Action from principle, the percep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right, changes things and relations; it is essentially revolutionary, and does not consist wholly with anything which was. It not only divided States and churches, it divides families; ay, it divides the *individual* , separating the diabolical in him from the divine.

懂了这些就满足了吗，还蛮开心的？他明知自己受到了侵害，那还有任何开心可言？如果你被邻居骗了一美元，知道你被骗了就够了，不用行动了？或是到处去说你被骗了，或反复请求他把钱还给你，这就算完了？你会尽全力讨回你的一切，并保证永远不会再次上当。正确地认识和行使正义，并按原则行动，会大大改变事物和事物间的关系。行动本身，从本质上讲就是革命性的，把任何旧事物抛诸脑后。行动，不仅将各州分开，将教会分开，也分离家庭；它也分离个人，把恶魔从他的身体中驱逐，只留下真善美。

Unjust laws exist: shall we be content to obey them, or shall we

endeavor to amend them, and obey them until we have succeeded, or shall we transgress them at once? Men, generally, under such a government as this, think that they ought to wait until they have persuaded the majority to alter them. They think that, if they should resist, the remedy would be worse than the evil. But it is the fault of the government itself that the remedy is worse than the evil. *It* makes it worse. Why is it not more apt to anticipate and provide for reform? Why does it not cherish its wise minority? Why does it cry and resist before it is hurt? Why does it not encourage its citizens to put out its faults, and *do* better than it would have them? Why does it always crucify Christ and excommunicate Copernicus and Luther, and pronounce Washington and Franklin rebels?

存在不公正的法律，那么，我们应当去遵守它们，还是努力去完善它们，等它们成功完善后才遵守？或者干脆现在就对它们置之不理？一般人在这个政府体制下，通常认为应该先等一等，等到说服大多数人投票修改法律。他们还认为，如果抵抗，那药方就比恶疾本身更邪恶了。但导致药方比恶疾更邪恶的，正是这个政府本身的错，是它把一切搞得更糟了。为什么它不能有点预见性，并为改革提供帮助呢？它为什么不能珍惜智慧的少数人呢？它为什么还没受到伤害就开始大叫并反抗？它为什么不鼓励它的臣民纠正它的缺点，既然自己没有纠正好？它为什么总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把哥白尼和伽利略驱逐出教会，宣布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为叛徒？

One would think, that a deliberate and practical denial of its authority was the only offense never contemplated by its government; else, why has it not assigned its definite, its suitable and proportionate, penalty? If a man who has no property refuses but once to earn nine shillings for the State, he is put in prison for a period unlimited by any law that I know, and determined only by

the discretion of those who put him there; but if he should steal ninety times nine shillings from the State, he is soon permitted to go at large again.

人们可能会想到，故意挑衅权威的行为，是政府唯一没有明确定罪的罪行。但是，为什么没有明确而适当的相应处罚呢？如果一个人分文未有，并拒绝向本州交纳9先令的税款，据我所知的法律，他就要被关进大牢，时间多久就不好说了，这要由把他送进大牢的那伙人决定。但是如果他在州里交高于9先令90倍的钱，他很快就会被释放，不管这钱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

If the injustice is part of the necessary friction of the machine of government, let it go, let it go: perchance it will wear smooth—certainly the machine will wear out. If the injustice has a spring, or a pulley, or a rope, or a crank, exclusively for itself, then perhaps you may consider whether the remedy will not be worse than the evil; but if it is of such a nature that it requires you to be the agent of injustice to another, then I say, break the law. Let your life be a counter-friction to stop the machine. What I have to do is to see, at any rate, that I do not lend myself to the wrong which I condemn.

如果不正义是政府机器必定要产生的摩擦，无法避免，那么，随它去吧，不管了；可能有一天它会磨合好的——当然，也可能有一天它终会磨坏。如果不公正不是机器的摩擦，而是专门配有弹簧、滑轮、绳子或曲柄，这时，你就要考虑是否药方并不比恶疾更糟了。但是，如果性质变成这样，就需要你不公正地对待别人，这可如何是好？我说：不遵守那法律就好了。让你的生命成为反摩擦力，停止机器的运转。不管怎样，我要保证自己不会随波逐流，不会把力气用在助长自己所唾弃的不公正上。

As for adopting the ways which the State has provided for remedying the evil, I know not of such ways. They take too much time, and a man's life will be gone. I have other affairs to attend to. I came into this world, not chiefly to make this a good place to live in, but to live in it, be it good or bad. A man has not everything to do, but something; and because he cannot do *everything* ,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he should be doing *something* wrong. It is not my business to be petitioning the Governor or the Legislature any more than it is theirs to petition me; and if they should not hear my petition, what should I do then? But in this case the State has provided no way: its very Constitution is the evil. This may seem to be harsh and stubborn and unconcilliatory; but it is to treat with the utmost kindness and consideration the only spirit that can appreciate or deserves it. So is all change for the better, like birth and death, which convulse the body.

至于州政府提出的那些修正错误的方法，我还真不看好。那些方法要花费太久的时间，以至于超过了人们一生的时间。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首要的任务不是要把世界变成一个适宜生活的好地方，而是要先活着，不管好与坏。一个人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能做的只有某些事情。正因为他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做，所以也没有必要向州长或立法者请愿，就像州长和议员们不必向我请愿一样。而且，如果他们不听我的请愿，我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州政府没有提供解决方式。所以，出问题的其实正是宪法体制，它是罪恶本身。这听起来好像太激进、太固执、太严厉了，但对待这样的宪法体制，这是最斟酌、最温和也是唯一可用的精神了，政府的态度应该是感激与接收。凡是改变，方向都是向上的，如同出生与死亡时身体的颤抖。

I do not hesitate to say, that those who call themselves Abolitionists should at once effectually withdraw their support, both in person and property, from the government of Massachusetts, and not wait till they constitute a majority of one, before they suffer the right to prevail through them. I think that it is enough if they have God on their side, without waiting for that other one. Moreover, any man more right than his neighbors constitutes a majority of one already.

我毫不犹豫地说，那些宣称要废除奴隶制的人们，对马萨诸塞州给予个人形式和物质上的所有支持，应该马上统统停止并撤回，而不要等废奴势力成为大势后投票解决。那种权利是痛苦的。我想，只要上帝与他们并肩，这就足够了，不用等什么多数投票之类的了吧！而且，一个比邻居们正义得多的人，本身一个人就是大多数了。

I meet this American government, or its representative, the State government, directly, and face to face, once a year—no more—in the person of its tax-gatherer; this is the only mode in which a man situated as I am necessarily meets it; and it then says distinctly, Recognize me; and the simplest, the most effectual, and, in the present posture of affairs, the indispensablest mode of treating with it on this head, of expressing your little satisfaction with and love for it, is to deny it then. My civil neighbor, the tax-gatherer, is the very man I have to deal with—for it is, after all, with men and not with parchment that I quarrel—and he has voluntarily chosen to be an agent of the government. How shall he ever know well that he is and does as an officer of the government, or as a man, until he is obliged to consider whether he will treat me, his neighbor, for whom he has respect, as a neighbor and well-disposed man, or as a maniac and disturber of the peace, and see if he can get over this

obstruction to his neighborliness without a ruder and more impetuous thought or speech corresponding with his action. I know this well, that if one thousand, if one hundred, if ten men whom I could name—if ten *honest* men only—ay, if *one* HONEST man, in this State of Massachusetts, *ceasing to hold slaves* , were actually to withdraw from this co-partnership, and be locked up in the county jail therefor, it would be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America. For it matters not how small the beginning may seem to be: what is once well done is done forever. But we love better to talk about it: that we say is our mission. Reform keeps many scores of newspapers in its service, but not one man. If my esteemed neighbor, the State's ambassador, who will devote his days to the settlement of the ques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Council Chamber, instead of being threatened with the prisons of Carolina, were to sit down the prisoner of Massachusetts, that State which is so anxious to foist the sin of slavery upon her sister—though at present she can discover only an act of inhospitality to be the ground of a quarrel with her—the Legislature would not wholly waive the subject of the following winter.

我每年都会和美国政府，或者它的代表州政府，有一次面对面直接接触的机会，就是和收税官打交道。他是像我这样的地位的人，唯一必须和政府打交道的形式。政府有它明确的态度：“承认我。”在这种情形下处理这种事情，要表达你的不满和讨厌的情感，最有效、最简单的必经之途，就是否定它的存在。我的一个公仆邻居，也就是那个收税官，正是我要用这种方式对待的人。毕竟我要反对的不是一张没有思想的羊皮纸，而是人。这个自愿当了政府代表的人，为政府效力。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会认为我是个疯子，一个扰乱治安的人；作为一个人，他应该把我当成他所尊敬的邻居，和一个好人。如果他不能在两者之间权衡，就不能有所领悟，就无法克服障碍成为亲切有爱的人，言语和善，不出现过激的想法并言行一致。我很明白：如果

我认识的人中有一千个人、一百个人、十个人——即使只有十个诚实的人，或只有一个诚实的人在马萨诸塞州解散奴隶，并因为实际上停止了和政府在奴隶方面的合谋被关进大牢，这也可以说是美国已经开始废除奴隶制了。因为不管开始多么微小，只要做了，就永远有效果。但我们更喜欢谈论，谈论说废奴是我们的使命。有很多报纸在为改革服务，但没有一个人。就拿我令人尊敬的邻居来说，他是本州的大使，宁愿黑天白昼地致力于在议会大厅解决人权问题，也不愿冒可能被关进卡罗莱纳州监狱的风险。马萨诸塞州迫切地想把奴隶制的罪名嫁祸在这个邻州上，虽然它发现只有一些不友善的行为可以作为争吵的理由。我想，只要这个大人物愿意坐在马萨诸塞州监狱里，立法院第二个冬天就不会再继续回避讨论奴隶制的问题了。

Under a government which imprisons unjustly, the true place for a just man is also a prison. The proper place today, the only place which Massachusetts has provided for her freer and less despondent spirits, is in her prisons, to be put out and locked out of the State by her own act, as they have already put themselves out by their principles. It is there that the fugitive slave, and the Mexican prisoner on parole, and the Indian come to plead the wrongs of his race should find them; on that separate but more free and honorable ground, where the State places those who are not *with* her, but *against* her—the only house in a slave State in which a free man can abide with honor. If any think that their influence would be lost there, and their voices no longer afflict the ear of the State, that they would not be as an enemy within its walls, they do not know by how much truth is stronger than error, nor how much more eloquently and effectively he can combat injustice who has experienced a little in his own person. Cast your whole vote, not a strip of paper merely, but your whole influence. A minority is powerless while it conforms to the majority; it is not even a minority then; but it is irresistible when it clogs by its whole

weight. If the alternative is to keep all just men in prison, or give up war and slavery, the State will not hesitate which to choose. If a thousand men were not to pay their tax bills this year, that would not be a violent and bloody measure, as it would be to pay them, and enable the State to commit violence and shed innocent blood. This is, in fact, the definition of a peaceable revolution, if any such is possible. If the tax-gatherer, or any other public officer, asks me, as one has done, “But what shall I do?” my answer is, “If you really wish to do anything, resign your office.” When the subject has refused allegiance, and the officer has resigned from office, then the revolution is accomplished. But even suppose blood should flow. Is there not a sort of blood shed when the conscience is wounded? Through this wound a man's real manhood and immortality flow out, and he bleeds to an everlasting death. I see this blood flowing now.

如果一个政府出现非法关押，那么，正义的人的正确归宿便是监狱。马萨诸塞州为崇尚自由和不那么沮丧的人们，准备的最合适的地方就是监狱了，它亲自将这些人驱逐出境，或者关起来，而他们实际上早就根据自己的原则进行自我放逐了。这里有逃亡的奴隶、被假释的墨西哥囚徒，要为自己的部落洗刷冤屈的印第安人有幸会在牢房中遇到他们。那是一片虽被隔绝却开满了自由与尊严之花的乐园。在这里，马萨诸塞州政府放置不同意见者，把反对自己的人关进监狱，而就是这里，却成了这个盛行奴隶制的州里唯一一个后花园，崇尚自由的人们可以有尊严地继续。如果有人认为，这些人的影响消失在那里了，他们的声音不会搅得当权者的耳朵不得安宁了，他们在围墙内就不再是敌人了，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们不知道和错误比起来，真理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他们也不知道，经历过些许不公的人，当不公再次出现时会变得多么有力量和有效果。扔掉你的投票权吧，不只是那张纸，而是扔掉你的全部影响。面对多数，少数无力反抗，只能服从，这样就连少数也算不上了。但当少数使出全力去反抗时却能战无不

胜。如果在这两个选项——把全部的正义之人都送入监狱，或放弃战争和奴隶制——之间选择一个的话，州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如果有一千人今年都拒绝交税，这就不是血腥和暴力的措施了。而我们交了税，州政府就有能力实施暴力，出现无辜的鲜血。这就是“和平革命”的定义，如果和平革命是可能的。如果税收官，或其他任何公共官员问我，正如一个人已经这样问过：“我该做点什么？”我回答说：“如果你真的希望做点什么的话，就辞职吧。”当国民拒绝效忠，官员已经辞职，和平革命就完成了。良心受伤了也会流血吧。这种创伤，会剥夺一个人真正的气概，生命随着鲜血流淌，直至精神上的死亡。我现在就看到这种鲜血在不停地流淌。

I have contemplated the imprisonment of the offender, rather than the seizure of his goods—though both will serve the same purpose—because they who assert the purest right, and consequently are most dangerous to a corrupt State, commonly have not spent much time in accumulating property. To such the State renders comparatively small service, and a slight tax is wont to appear exorbitant, particularly if they are obliged to earn it by special labor with their hands. If there were one who lived wholly without the use of money, the State itself would hesitate to demand it of him. But the rich man—not to make any invidious comparison—is always sold to the institution which makes him rich. Absolutely speaking, the more money, the less virtue; for money comes between a man and his objects, and obtains them for him; it was certainly no great virtue to obtain it. It puts to rest many questions which he would otherwise be taxed to answer; while the only new question which it puts is the hard but superfluous one, how to spend it. Thus his moral ground is taken from under his feet. The opportunities of living are diminished in proportion as that are called the “means” are increased. The best thing a man can do for his culture when he is rich is to endeavor to carry out those

schemes which he entertained when he was poor. Christ answered the Herodians according to their condition. “Show me the tribute-money,” said he—and one took a penny out of his pocket—if you use money which has the image of Caesar on it, and which he has made current and valuable, that is, *if you are men of the State* , and gladly enjoy the advantages of Caesar's government, then pay him back some of his own when he demands it. “Render therefore to Caesar that which is Caesar's and to God those things which are God's”—leaving them no wiser than before as to which was which; for they did not wish to know.

我曾经目睹一位犯人的关押，而不是没收他的财产（虽然关押和没收财产的目的是一样的），因为坚持最纯真正义的人们，也就是通常对腐败州政府最危险的人，往往没有聚集起过多少财富。使人们富裕起来，政府到从来没用过什么心思，所以一项它觉得非常小的税项，在人们看来都像抢劫，尤其是人们交不起就必须得用双手去进行特殊劳动时。即使一个人完全靠自给自足，从来没用过钱这种东西，州府也从不犹豫地叫他必须交税。但是富人——这不是在做恶毒的比较——常把自己出卖给那些能使他致富的机构。肯定地说，金钱越多，美德越少；因为金钱连接人与欲望，使人们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获得金钱也不需要什么美德。钱拿出来，征税官就不会问东问西，没钱的话，无数问题就蜂拥而至了。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多余且难以回答，就是怎么花的。这样，有钱人的道德根基就从他的脚下被挖了出来。当所谓赚钱的手段增多时，生活的机会便随之减小。当一个人变得富有，他能为自己的心灵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完成他做穷人时的美好的愿望。希律王的一个爪牙对耶稣说：“给我贡钱。”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硬币，接着说：如果你使用这个带有恺撒头像的钱，那就说明你属于这个国家，并享受恺撒的政府带来的好处，那么当恺撒要求时，你就该还给恺撒本属于他的东西，因为正是恺撒使得这些硬币可以流通并有价值。根据当时的情景，基督回答：“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但希律王的

收税官们的智慧并未开光，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因为他们不想知道他在说什么。

When I converse with the freest of my neighbors, I perceive that, whatever they may say about the magnitude and seriousness of the question, and their regard for the public tranquillity, the long and the shor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hey cannot spare the protection of the existing government, and they dread the consequences to their property and families of disobedience to it. For my own part, I should not like to think that I ever rely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State. But, if I deny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when it presents its tax bill, it will soon take and waste all my property, and so harass me and my children without end. This is hard. This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a man to live honestly, and at the same time comfortably, in outward respects. It will not be worth the while to accumulate property; that would be sure to go again. You must hire or squat somewhere, and raise but a small crop, and eat that soon. You must live within yourself, and depend upon yourself always tucked up and ready for a start, and not have many affairs. A man may grow rich in Turkey even, if he will be in all respects a good subject of the Turkish government. Confucius said: “If a state is governed by the principles of reason, poverty and misery are subjects of shame; if a state is not governed by the principles of reason, riches and honors are subjects of shame.” No: until I want the protection of Massachusetts to be extended to me in some distant Southern port, where my liberty is endangered, or until I am bent solely on building up an estate at home by peaceful enterprise, I can afford to refuse allegiance to Massachusetts, and her right to my property and life. It costs me less in every sense to incur the penalty of disobedience to the State than it would to obey. I should feel as if I were worth less in that case.

当我和邻居中最向往自由的人们交谈时，我意识到，尽管他们或许谈论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对社会公共稳定表示关注，但关键是他们不能没有当局政府的保护，他们害怕违背政府的后果可能会危及到他的财产和家庭。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从不认为我需要来自政府的任何形式的保护。但是，当政府要我交税而我拒交时，我的钱财才会迅速被政府夺走或浪费掉，我和我的家人才将永无安宁之日。生活真艰难，诚实的人要在物质上过上舒服的生活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积攒财富是一件划不来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天你可能又会失去它。所以，你只能受雇于人或蹲在某个地方种一点儿庄稼，赶紧吃完。你必须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蓄势待发，随时准备好重新开始，所以不能有太多的事情，免得累赘。即使在土耳其，人们也能致富，只要他成为土耳其政府无可挑剔的好臣民。正如孔子所言："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我断然说不：我绝对不会效忠马萨诸塞州，它无权支配我的财产和生命，除非我的自由在遥远的南部港口受到威胁，而需要求助于马萨诸塞州政府为我提供保护，或者当我一门心思只想通过默默辛劳和正当手段挣钱创一番事业。从各个方面来说，不服从州政府会带来的处罚，都小于忠于它的代价。如果效忠它，我就会感觉自己的价值减少了。

Some years ago, the State met me in behalf of the Church, and commanded me to pay a certain sum toward the support of a clergyman whose preaching my father attended, but never I myself. "Pay," it said, "or be locked up in the jail." I declined to pay. But, unfortunately, another man saw fit to pay it. I did not see why the schoolmaster should be taxed to support the priest, and not the priest the schoolmaster; for I was not the State's schoolmaster, but I supported myself by voluntary subscription. I did not see why the lyceum should not present its tax bill, and have the State to back its demand, as well as the Church. However, at the request of the selectmen, I condescended to make some such statement as this in

writing: “Know all men by these presents, that I, Henry Thoreau, do not wish to be regarded as a member of any incorporated society which I have not joined.” This I gave to the town clerk; and he has it. The State, having thus learned that I did not wish to be regarded as a member of that church, has never made a like demand on me since; though it said that it must adhere to its original presumption that time. If I had known how to name them, I should then have signed off in detail from all the societies which I never signed on to; but I did not know where to find such a complete list.

几年前，州政府代表教会来到我这里，要我交一笔钱来支持一位牧师，我父亲参加过他的传教会，但我从来没有去过。税单上写着：“不交就关起来！”我拒绝交付，但很不幸，收税官觉得我应当交。我不明白，为什么教师要交税支持牧师，而不是牧师交税给教师。我不是州立学校的教师，但我接受别人的自主捐赠并以此过活。我不明白，学校为什么不能让州政府支持，为学校捐税，就像对教会那样。我不愿交税，所以在被选出的说客们的要求下，我不得不屈尊写下了这样一段声明：“谨以此言向大家保证：我本人，亨利•梭罗，没参加过任何社会团体，所以不希望任何人把我看作任何团体的一份子。”这份声明我交给了镇上的文书，他现在还保管着呢。这样一来，政府便知道了我不想成为教会的一员，虽然它表示还是要坚持他们最初的假设，但从那时起，它再也没有对我提出过类似要求了。如果我能知道所有社会团体的名称，我就会一一写上，以示我不是任何团体的成员，只可惜我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份清单。

I have paid no poll tax for six years. I was put into a jail once on this account, for one night; and, as I stood considering the walls of solid stone, two or three feet thick, the door of wood and iron, a foot thick, and the iron grating which strained the light, I could not help being struck with the foolishness of that institution which

treated me as if I were mere flesh and blood and bones, to be locked up. I wondered that it should have concluded at length that this was the best use it could put me to, and had never thought to avail itself of my services in some way. I saw that, if there was a wall of stone between me and my townsmen, there was a still more difficult one to climb or break through before they could get to be as free as I was. I did nor for a moment feel confined, and the walls seemed a great waste of stone and mortar. I felt as if I alone of all my townsmen had paid my tax. They plainly did not know how to treat me, but behaved like persons who are underbred. In every threat and in every compliment there was a blunder; for they thought that my chief desire was to stand the other side of that stone wall. I could not but smile to see how industriously they locked the door on my meditations, which followed them out again without let or hindrance, and *they* were really all that was dangerous. As they could not reach me, they had resolved to punish my body; just as boys, if they cannot come at some person against whom they have a spite, will abuse his dog. I saw that the State was half-witted, that it was timid as a lone woman with her silver spoons, and that it did not know its friends from its foes, and I lost all my remaining respect for it, and pitied it.

我拒交人头税已有六年了，还因此在监狱里待了一晚。当我打量着四周两三英尺厚的石墙，一英尺厚的包满了铁皮的木门，还有密不透光的铁栅栏，我被震撼到了，被这个制度的愚蠢，它对待我的方式，仿佛只把我当成一个血肉之躯，可以锁起来。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过要利用我做什么事，还是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这是处置我的最佳方式。我知道，如果一堵厚厚的石墙把我和我的邻居朋友们隔开，那么还有一堵无形的墙把自由的我和不自由的他们隔开，而无形的墙则更难爬过，更难穿破。对我来说，肉身的监禁根本不算监禁，它毫无作用，这些墙只是一种浪费水泥、浪费砖头的行为。我此时的感觉

是，整个城镇只有我一个人交了税。他们很头疼，不知道该怎样对付像我这样的人，他们的行为举止一看就像那种很没教养的人。在他们的威胁或赞美中，都存在着一个错误，即他们认为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从监狱中释放。我笑着看他们费心地把牢门锁好，想要锁住我的思考。但我的思绪进出自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碍，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允许，这才是真正危险的，是锁不住的。当他们无法触及我的思想，就只能惩罚我的身体；这种做法就和小孩子一样，如果他们无法反抗他们讨厌的人，就会去打骂他的狗。我发现我们的州政府是多么愚蠢，它就像一个继承了万贯家财的女人，胆小、孤独，不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丧失了对它仅存的敬意，开始可怜它。

Thus the state never intentionally confronts a man's sense, intellectual or moral, but only his body, his senses. It is not armed with superior wit or honesty, but with superior physical strength. I was not born to be forced. I will breathe after my own fashion. Let us see who is the strongest. What force has a multitude? They only can force me who obey a higher law than I. They force me to become like themselves. I do not hear of *men* being *forced* to live this way or that by masses of men. What sort of life were that to live? When I meet a government which says to me,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why should I be in haste to give it my money? It may be in a great strait, and not know what to do: I cannot help that. It must help itself; do as I do. It is not worth the while to snivel about it. I am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successful working of the machinery of society. I am not the son of the engineer. I perceive that, when an acorn and a chestnut fall side by side, the one does not remain inert to make way for the other, but both obey their own laws, and spring and grow and flourish as best they can, till one, perchance, overshadows and destroys the other. If a plant cannot live according to nature, it dies; and so a man.

这个州从来没打算去面对人的智慧和道德，只把人看做知道疼痛的躯体，和人的五官打交道。它没有用更高的智慧或道德武装自己，而是用武力。我不是为服从而生的。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呼吸。让我们看看谁才是最强大的。大部分人都那样做，我就要照做吗？群体有什么力量？我遵循自己的原则。那些遵循更加高尚的原则的人，可以使我屈服，他们可以使我变得和他们一样。但我从没听说过人必须按照主流的活法生活。那样还叫活着吗？当我遇到一个政府官员对我说："交钱还是交命？"难道这样我就要急忙交钱吗？也许政府正处在困境中，不知如何是好，但我也帮不上忙。它必须学会自救，就像我帮助自己一样。出现困难，并不值得哭鼻子。我没有责任为社会机器的顺利运转负责，因为我不是工程师的儿子。据我观察，当一颗橡果和一颗栗子同时落地，挨在一起，它们谁也不会为谁让路，它们都遵循自己的法则，竭尽全力地发芽、生长、繁荣，直到也许其中一棵影响了另一棵的生长，甚至使得它死掉。如果植物不能按照自然规律生长，它就会死，人也是一样。

The night in prison was novel and interesting enough. The prisoners in their shirtsleeves were enjoying a chat and the evening air in the doorway, when I entered. But the jailer said, "Come, boys, it is time to lock up"; and so they dispersed, and I heard the sound of their steps returning into the hollow apartments. My room-mate was introduced to me by the jailer as "a first-rate fellow and clever man." When the door was locked, he showed me where to hang my hat, and how he managed matters there. The rooms were whitewashed once a month; and this one, at least, was the whitest, most simply furnished, and probably neatest apartment in town. He naturally wanted to know where I came from, and what brought me there; and, when I had told him, I asked him in my turn how he came there, presuming him to be an honest man, of course; and as the world goes, I believe he was. "Why," said he, "they accuse me of burning a barn; but I never did it." As near as I could discover, he

had probably gone to bed in a barn when drunk, and smoked his pipe there; and so a barn was burnt. He had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a clever man, had been there some three months waiting for his trial to come on, and would have to wait as much longer; but he was quite domesticated and contented, since he got his board for nothing, and thought that he was well treated.

监狱的夜晚新奇而有趣。我进去的时候，人们穿着狱服，正依着门口闲聊，享受着夜晚的空气。狱卒很不识趣地说："进来吧，伙计们，该锁门了。"于是他们便各分散了，留下的是他们回去空屋子的脚步声。狱卒这样介绍我的室友："一流好人，且很聪明。"当牢门锁上，他指给我挂帽子的地方，并告诉我他是怎么样在这里过的。这里的房间，一个月粉刷一次，而我们那个房间尤其好，应当是最白的一个了，配备非常简单，看起来像是全镇最整洁的房间。很自然地，他问我从哪里来，怎么坐牢的，我都告诉他了，也反问了他同样的问题。我当然假设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永远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他说："哎，他们控告我点燃了粮仓，可我根本就没有。"最终我发现，可能他喝醉后在粮仓里睡着了，抽了一袋烟，结果粮仓烧光了。他是公认的聪明人，抓来这里有三个多月了，等着对他的审判，可能还要等得更久。他是个非常温顺的人，很容易满足，他觉得这里待遇不错，可以白吃白住。

He occupied one window, and I the other; and I saw that if one stayed there long, his principal business would be to look out the window. I had soon read all the tracts that were left there, and examined where former prisoners had broken out, and where a grate had been sawed off, and heard the history of the various occupants of that room; for I found that even here there was a history and a gossip which never circulated beyond the walls of the jail. Probably this is the only house in the town where verses are

composed, which are afterward printed in a circular form, but not published. I was shown quite a long list of young men who had been detected in an attempt to escape, who avenged themselves by singing them.

他守着一扇窗户，我守着另一扇。我发现，一个人在这里待久了，他主要的事情就是向窗外望着。我仔细阅读过留在这里的所有的只言片语，也仔细观看过犯人的越狱处，哪根栏杆被锯下来过。听着曾经住在这间屋子里的人们发过的故事，我发现这个地方有自己的历史，曾流传过一些轶闻，它们从来没有传出过高墙之外，外面的人对这些故事一无所知。或许这是城里唯一一个产生诗歌的地方，之后以传单的形式流传，只是从来没有出版过。他给我看了一个长长的名单，都是被人发现企图越狱的年轻人，因为没有成功，所以只好唱一些诗歌来抒发自己的郁闷。

I pumped my fellow-prisoner as dry as I could, for fear I should never see him again; but at length he showed me which was my bed, and left me to blow out the lamp.

我尽可能向我这位室友灌输我的思想，因为我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最后，他的反应只是告诉我该睡哪张床，然后让我别忘了吹灯。

It was like travelling into a far country, such as I had never expected to behold, to lie there for one night. It seemed to me that I never had heard the town clock strike before, not the evening sounds of the village; for we slept with the windows open, which were inside the grating. It was to see my native village in the light

of the Middle Ages, and our Concord was turned into a Rhine stream, and visions of knights and castles passed before me. They were the voices of old burghers that I heard in the streets. I was an involuntary spectator and auditor of whatever was done and said in the kitchen of the adjacent village inn—a wholly new and rare experience to me. It was a closer view of my native town. I was fairly inside of it. I never had seen its institutions before. This is one of its peculiar institutions; for it is a shire town. I began to comprehend what its inhabitants were about.

这就像在一个遥远的国度远游，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看到这个国度，而且在这儿睡了一晚。仿佛我以前从未听过城镇的钟声，也没有听过村庄夜晚的声音。难道是因为今晚我们开着窗子睡觉的原因吗，在铁栏内？我仿佛看见了我们的小镇笼罩在中世纪的月光下，康科德河变成了莱茵河，骑士与城堡在眼前若隐若现，我在街上听到一些老者的声音，在村边旅馆的厨房里，我无意听到并看到了一些事情——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以前很少有过。这是个近距离观察我的小镇的地方，我就在其中。我之前从未看见过它的机构，这是它的机构中比较独特的一个，因为这个镇是个郡级镇。我开始理解它的居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了。

In the morning, our breakfasts were put through the hole in the door, in small oblong-square tin pans, made to fit, and holding a pint of chocolate, with brown bread, and an iron spoon. When they called for the vessels again, I was green enough to return what bread I had left, but my comrade seized it, and said that I should lay that up for lunch or dinner. Soon after he was let out to work at haying in a neighboring field, whither he went every day, and would not be back till noon; so he bade me good day, saying that he doubted if he should see me again.

早上，我们的早餐从门上的洞中送进来，一个专门制作的长方形锡盘上，托着一品脱的巧克力和黑面包，还有个铁勺子。当狱卒叫我们把餐具还给他们时，我很傻地要把剩下的一点面包也一起还给他们，这时我的室友抓住了我，告诉我说，这可以留着在午餐或晚餐时吃。很快，他被叫去在附近的田里割晒干草，那是他天天要做的工作，不到中午不会回来。所以，他和我道别，祝愿我有个美好的一天，不知道还会不会见到我了。

When I came out of prison—for some one interfered, and paid that tax—I did not perceive that great changes had taken place on the common, such as he observed who went in a youth and emerged a gray-headed man; and yet a change had come to my eyes come over the scene—the town, and State, and country, greater than any that mere time could effect. I saw yet more distinctly the State in which I lived. I saw to what extent the people among whom I lived could be trusted as good neighbors and friends; that their friendship was for summer weather only; that they did not greatly propose to do right; that they were a distinct race from me by their prejudices and superstitions, as the Chinamen and Malays are; that in their sacrifices to humanity they ran no risks, not even to their property; that after all they were not so noble but they treated the thief as he had treated them, and hoped, by a certain outward observance and a few prayers, and by walking in a particular straight though useless path from time to time, to save their souls. This may be to judge my neighbors harshly; for I believe that many of them are not aware that they have such an institution as the jail in their village.

有人介入，替我付了税钱，所以我被放了出来。但我没有发现外

面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那个年轻时进山出来时成了头发灰白的老头的人发现的那样。然而，我却又看到了某种变化，这个镇、这个州甚至这个国家，一切都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是时间的推移所不能产生的。我对这个州看得更加清晰了：我看到同胞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信任为好邻居和好朋友；他们的友谊只在夏天的天气里存在；他们并不那么愿意去做正义的事情；由于偏见和迷信，他们和我简直就不像一个人种，就像中国人和马来人一样；他们认为人性值得捍卫，但不会冒任何风险，甚至财富方面的风险也不可以冒一点点；而且人们并没有那么高尚，因为他们会对小偷以牙还牙，但同时希望通过某种仪式或祷告，或者时不时的在特定的荒路上走直线，借此拯救自己的灵魂。这样说我的邻居们，可能太过严厉了，因为我相信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村里还有监狱这样一个机构。

It was formerly the custom in our village, when a poor debtor came out of jail, for his acquaintances to salute him, looking through their fingers, which were crossed to represent the jail window, “How do ye do?” My neighbors did not thus salute me, but first looked at me, and then at one another, as if I had returned from a long journey. I was put into jail as I was going to the shoemaker's to get a shoe which was mended. When I was let out the next morning, I proceeded to finish my errand, and, having put on my mended shoe, joined a huckleberry party, who were impatient to put themselves under my conduct; and in half an hour—for the horse was soon tackled—was in the midst of a huckleberry field, on one of our highest hills, two miles off, and then the State was nowhere to be seen.

我们村从前有个习惯，当一个穷借债人从监狱里释放，朋友们和他打招呼时，会把手指交叉模仿监狱的窗子，“你好吗？”但我的邻居们没有这样和我打招呼，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我被关进了监狱。他们看

看我，又看看别人，好像我刚刚长途旅行回来一样。我有只鞋修好了，我是在去鞋匠那里取它时被送入监狱的。当我第二天早上被放出来后，我便继续之前的安排。我穿上修好的鞋，准备参加一个越橘派对，它们迫不及待地在等我主持。马已经备好了，一个半小时后我就出现在一片越橘林中了，这里是附近最高的山，在两英里远的郊外，州政府触及不到。

This is the whole history of “My Prisons.”

这就是我在监狱里的全部故事。

I have never declined paying the highway tax, because I am as desirous of being a good neighbor as I am of being a bad subject; and as for supporting schools, I am doing my part to educate my fellow countrymen now. It is for no particular item in the tax bill that I refuse to pay it. I simply wish to refuse allegiance to the State, to withdraw and stand aloof from it effectually. I do not care to trace the course of my dollar, if I could, till it buys a man or a musket to shoot one with—the dollar is innocent—but I am concerned to trace the effects of my allegiance. In fact, I quietly declare war with the State, after my fashion, though I will still make use and get what advantages of her I can, as is usual in such cases.

我从来没有拒绝交纳修路费，因为我希望做一个好邻居，正如我不希望做一个好臣民；我也不拒绝为教育纳税，而我本人也一直在为教育村民进一份力。税单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项目让我拒交，我只是不愿愚忠于政府，我想和它撇清关系，离它越远越好。我也并不想去

了解上交的钱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哪怕是买了一把杀人的枪，毕竟钱本身是无辜的。但我顾虑的是，我的效忠会有什么后果。事实上，我静静地和州政府宣战，用我自己的方式，虽然我还是会享用它提供的各种优势，并得利于此，一般这很正常。

If others pay the tax which is demanded of me, from a sympathy with the State, they do but what they have already done in their own case, or rather they abet injustice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the State requires. If they pay the tax from a mistaken interest in the individual taxed, to save his property, or prevent his going to jail, it is because they have not considered wisely how far they let their private feelings interfere with the public good.

如果别总总交我之前被要求交的税，那么可能是两种情况，一是出自对政府的同情，二是他们向来如此只是因循前例，但这可能是在遵守甚至煽动不公，比州政府要求的不公更加严重。如果他们交税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比如以此保护他们的财产，或不被抓进监狱，这便是错误的。他们自己根本没有仔细考虑清楚，这种自私的想法会如何干涉整个社会的公正。

This, then, is my position at present. But one cannot be too much on his guard in such a case, lest his actions be biased by obstinacy or an undue regard for the opinions of men. Let him see that he does only what belongs to himself and to the hour.

这就是我目前的观点。但在我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再谨慎也不为过，以免自己的行为被自己的固执引向歧途，或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一个人只要确定自己只做自己现在该做的分内事，这就够了。

I think sometimes, Why, this people mean well, they are only ignorant; they would do better if they knew how: why give your neighbors this pain to treat you as they are not inclined to? But I think again, This is no reason why I should do as they do, or permit others to suffer much greater pain of a different kind. Again, I sometimes say to myself, When many millions of men, without heat, without ill will, without personal feelings of any kind, demand of you a few shillings only,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such is their constitution, of retracting or altering their present demand, and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n your side, of appeal to any other millions, why expose yourself to this overwhelming brute force? You do not resist cold and hunger, the winds and the waves, thus obstinately; you quietly submit to a thousand similar necessities. You do not put your head into the fire. But just in proportion as I regard this as not wholly a brute force, but partly a human force, and consider that I have relations to those millions as to so many millions of men, and not of mere brute or inanimate things, I see that appeal is possible, first and instantaneously, from them to the Maker of them, and, secondly, from them to themselves. But if I put my head deliberately into the fire, there is no appeal to fire or to the Maker of fire, and I have only myself to blame. If I could convince myself that I have any right to be satisfied with men as they are, and to treat them accordingly, and not according, in some respects, to my requisi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what they and I ought to be, then, like a good Mussulman and fatalist, I should endeavor to be satisfied with things as they are, and say it is the will of God. And, above all, there is this difference between resisting this and a purely brute or natural force, that I can resist this with some effect; but I cannot expect, like Orpheus, to change the nature of the rocks and trees and beasts.

我有时想：啊，这个民族，心地善良却很无知，如果人们知道怎么做，也许会更好一些。为什么让你的邻居受苦，然后不情愿地反过来折磨你？但我又想：我没有理由像别人一样行动，去允许别人承受另一种更大的痛苦。有时我又会对自己说：当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没有热情也没有恶意，总之没有任何个人情感，他们就是想管你要几先令——这就是那个制度——他们不可能撤回或改变要求，你也不可能向另外成千上万的人求情撤回或改变要求，那么，为什么要让自己暴露在这种自然蛮力之中呢？你不需要执拗地去抵御饥寒、风浪，数千种其他自然力也都被你默默地接受了，但你不会把头伸进火里。我不认为组织完全是一种自然蛮力，部分是人力。它不只是冷酷的非生命，它包括成千上万的人，我想我和他们都是彼此联系的，所以我想现在立刻祈祷是可能的，首先向上帝祈祷，其次是向自己祈祷。但如果我故意把头伸入火中，那我就不应当祈求火或生火者不要烧我，那是我自己的错。假使我能说服自己应当满意地接受他们本来的样子，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就应该像一个异教徒或宿命论者一样，努力接受事实，认为那就是上帝的旨意。但我不能，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我对人、对自己的期望和要求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最重要的，抗拒这种力和抗拒自然的无情之力，是有区别的：我可以抵抗住这种力，会有效果，而无法像奥菲士一样改变石头、树木与野兽的性质。

I do not wish to quarrel with any man or nation. I do not wish to split hairs, to make fine distinctions, or set myself up as better than my neighbors. I seek rather, I may say, even an excuse for conforming to the laws of the land. I am but too ready to conform to them. Indeed, I have reason to suspect myself on this head; and each year, as the tax-gatherer comes round, I find myself disposed to review the acts and position of the gen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and the spirit of the people to discover a pretext for conformity.

我不想和任何人或任何国家争吵。我不想吹毛求疵，斤斤计较，和邻居们一争高下。我可以说，我只是想找一个借口遵守这片土地上的法律，我非常愿意遵纪守法。事实上，我有理由怀疑自己在这件事上是否做错了；每年当税收官又来的时候，我发现我都愿意去回顾一下州和整体政府的法令和职责，以及这个民族的精神，去寻找一个服从的借口。

“We must affect our country as our parents,

“我们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如同我们的父母。

And if at any time we alienate

如果有一天我们无国可爱，

Our love or industry from doing it honor,

不能再努力为它的荣誉而勤奋工作，

We must respect effects and teach the soul

我们必须要接收后果，并让我们的灵魂

Matter of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充满宗教和良心道德，

And not desire of rule or benefit.”

不要去渴望统治谁或者获取利益。”

I believe that the State will soon be able to take all my work of this sort out of my hands, and then I shall be no better patriot than my fellow-countrymen. Seen from a lower point of view, the Constitution, with all its faults, is very good; the law and the courts are very respectable; even this State and this American government are, in many respects, very admirable, and rare things, to be thankful for, such as a great many have described them; seen from a higher still, and the highest, who shall say what they are, or that they are worth looking at or thinking of at all?

我相信州政府很快就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迫使我停下寻找理由的行为，那时，我就会成为比我的乡亲们还差的爱国者了。从较低的视角来看，虽然我们的宪法还存在很多问题，但确实已经很不错了；法律和法庭也都值得尊敬；州政府，甚至美国政府，在很多方面都非常让人敬佩，很难得，让人充满感恩，确实和很多人描述的一样。但从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来看呢，有谁还说得出它们算个什么东西，还值得一看或一想吗？

However,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concern me much, and I shall bestow the fewest possible thoughts on it. It is not many moments that I live under a government, even in this world. If a man is thought-free, fancy-free, imagination-free, that which *is not* never for a long time appearing *to be* to him, unwise rulers or reformers cannot fatally interrupt him.

但政府和我的关系并不大，我也尽量不去理它。甚至在这个世界上，我和政府打交道的机会也不多。如果一个人能自由思考，自由幻想，自由想象，那些愚蠢的统治者或改革家对他就没什么影响，那些对他来说本就不存在的东西，从不会长久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或眼前。

I know that most men think differently from myself; but those whose lives are by profession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se or kindred subjects content me as little as any. Statesmen and legislators, standing so completely within the institution, never distinctly and nakedly behold it. They speak of moving society, but have no resting-place without it. They may be men of a certain experience and discrimination, and have no doubt invented ingenious and even useful systems, for which we sincerely thank them; but all their wit and usefulness lie within certain not very wide limits. They are wont to forget that the world is not governed by policy and expediency. Webster never goes behind government, and so cannot speak with authority about it. His words are wisdom to those legislators who contemplate no essential reform in the existing government; but for thinkers, and those who legislate for all time, he never once glances at the subject. I know of those whose serene and wise speculations on this theme would soon reveal the limits of his mind's range and hospitality. Yet, compared

with the cheap professions of most reformers, and the still cheaper wisdom an eloquence of politicians in general, his are almost the only sensible and valuable words, and we thank Heaven for him. Comparatively, he is always strong, original, and, above all, practical. Still, his quality is not wisdom, but prudence. The lawyer's truth is not Truth, but consistency or a consistent expediency. Truth is always in harmony with herself, and is not concerned chiefly to reveal the justice that may consist with wrong-doing. He well deserves to be called, as he has been called, the Defender of the Constitution. There are really no blows to be given him but defensive ones. He is not a leader, but a follower. His leaders are the men of '87. “I have never made an effort,” he says, “and never propose to make an effort; I have never countenanced an effort, and never mean to countenance an effort, to disturb the arrangement as originally made, by which various States came into the Union.” Still thinking of the sanction which the Constitution gives to slavery, he says, “Because it was part of the original compact—let it stand.” Notwithstanding his special acuteness and ability, he is unable to take a fact out of its merely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behold it as it lies absolutely to be disposed of by the intellect—what, for instance, it behooves a man to do here in America today with regard to slavery—but ventures, or is driven, to make some such desperate answer to the following, while professing to speak absolutely, and as a private man—from which what new and singular of social duties might be inferred? “The manner,” says he, “in whic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States where slavery exists are to regulate it is for their own consideration,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to their constituents, to the general laws of propriety, humanity, and justice, and to God. Associations formed elsewhere, springing from a feeling of humanity, or any other cause, have nothing whatever to do with it. They have never received any encouragement from me and they never will.” [These extracts have

been inserted since the lecture was read -HDT]

我知道大多数人和我想的不一样，但那些专门研究该类或类似问题的专家们很少让我满意。政治家和立法者完全立足于制度内，故从未真正把它看透看清。他们总说要促进社会发展，但除了“说说要促进社会发展”也没别的可干了。也许，他们都经验丰富、智慧过人，毫无疑问创建了天才的实用体系，对此我们必须衷心感谢。但他们的智慧与能力只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他们总愿忘记这个事实，即世界并非仅由政策和权宜之计统治。韦伯斯特从没有深入研究过政府，自然对它的理论也不具权威性。对于那些没有打算对政府进行必要改革的立法者们来说，他的话是十分有用的；在思想家们看来，在那些从永恒角度考虑立法的人们看来，他则从未正视过这一问题。我认识一些人对这个主题进行过冷静和智慧的思考，不久即将揭示韦伯斯特的思想广度有局限性，且偏袒一方。比起大部分低贱的职业改革家，比起所有智慧与口才都更低贱的政客，韦伯斯特的言论还是强大有力并有开创性的，而且讲究实际，我们感谢上苍将他赐予我们。但智慧并不是他的本质，而是谨慎小心。律师口中的真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理，它只是一种协调，或者某种协调的权宜。真理本身是和谐的，它最关心的不是去揭露恶行中的正义。韦伯斯特被称为“宪法的保卫者”，这是名副其实的。他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有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不是个领导者，而是追随者，领袖是1787年宪法的制定者们。他说：“我从未做出过任何努力，也不建议别人去努力，我没有支持过任何努力，也不打算去支持任何努力，去打乱最初的决定，宪法的安排使我们各个州组成了一个国家。”当提到宪法支持奴隶制时，他说：“既然这是最初契约的一部分，那就让它继续存在吧。”虽然他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过人的能力，却无法把一个事实从繁杂的政治联系中剥离，把它视作只能靠理智解决的问题。例如，当今的美国人对于奴隶制这一问题应该尽一些什么样的义务？他只是冒险，或者被迫说出了让人这样沮丧的话，还坚定地宣称这样说是把你当成了私底下的朋友。他说这样的话，到底想让人该承担什么样的新颖而特殊的社会义务呢？他说：“存在奴隶制的各州政府，治理本州的方式是它

们自己的事情，由他们自己考虑，因为它们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对适当、人性、公正及上帝的普遍律法负责。”“非政府组织，无论生发自共同的人类情感或其他什么原因，都与之无关，我从未鼓励过他们，永远也不会。”

They who know of no purer sources of truth, who have traced up its stream no higher, stand, and wisely stand, by the Bible and the Constitution, and drink at it there with reverence and humanity; but they who behold where it comes trickling into this lake or that pool, gird up their loins once more, and continue their pilgrimage toward its fountainhead.

有些人不知真理之源要更加纯洁得多，他们从未沿着真理的溪流走得更高，只是聪明地守在圣经和宪法旁边，尊敬地、谦恭地掬水解渴；但有些人发现，这只是一个湖或池塘，注入其中的水自有他处来源，于是他们再次抖擞精神，继续他们寻找真理水源的朝圣之旅。

No man with a genius for legislation has appeared in America. They are rar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re are orators, politicians, and eloquent men, by the thousand; but the speaker has not yet opened his mouth to speak who is capable of settling the much-vexed questions of the day. We love eloquence for its own sake, and not for any truth which it may utter, or any heroism it may inspire. Our legislators have not yet learned the comparative value of free trade and of freedom, of union, and of rectitude, to a nation. They have no genius or talent for comparatively humble questions of taxation and finance,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and agriculture. If we were left solely to the wordy wit of legislators in Congress for our guidance, uncorrected by the seasonable

experience and the effectual complaints of the people, America would not long retain her rank among the nations. For eighteen hundred years, though perchance I have no right to say it, the New Testament has been written; yet where is the legislator who has wisdom and practical talent enough to avail himself of the light which it sheds on the science of legislation.

美国就没出现过一个立法的天才，世界历史上也很少有这样的人。演说家、政治家、雄辩家成千上万，但真正有能力解决这难题的人还没开始张口说话。我们因为喜欢雄辩所以喜欢雄辩，而不是因为它会说出真理，或能激起某种英雄主义。我们的立法者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由贸易、自由联盟、操守端正对一个国家的巨大价值，他们也没有天赋和才能去解决税收、金融、商业、制造业还有农业这些更世俗的问题。如果我们完全以议会立法者们的空洞理论为指导，而不根据人民的实际经历和普遍抱怨做出纠正，那么美国将很快失去它目前的国际地位。《新约》存世1800年了，或许我无权这么说，但我还是想问一问，那些具有大智慧和足够的实际能力能根据《新约》之光指导立法科学的人究竟在哪里呢？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even such as I am willing to submit to—for I will cheerfully obey those who know and can do better than I, and in many things even those who neither know nor can do so well—is still an impure one: to be strictly just, it must have the sanction and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It can have no pure right over my person and property but what I concede to it. The progress from an absolute to a limited monarchy, from a limited monarchy to a democracy, is a progress toward a true respect for the individual. Even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was wise enough to regard the individual as the basis of the empire. Is a democracy, such as we know it, the last improvement possible in government?

Is it not possible to take a step further towards recognizing and organizing the rights of man? There will never be a really free and enlightened State until the State comes to recognize the individual as a higher and independent power, from which all its own power and authority are derived, and treats him accordingly. I please myself with imagining a State at last which can afford to be just to all men, and to treat the individual with respect as a neighbor; which even would not think it inconsistent with its own repose if a few were to live aloof from it, not meddling with it, nor embraced by it, who fulfilled all the duties of neighbors and fellow men. A State which bore this kind of fruit, and suffered it to drop off as fast as it ripened, would prepare the way for a still more perfect and glorious State, which I have also imagined, but not yet anywhere seen.

我愿服从某些政府权威，因为我会欣然服从那些知道得比我多、做得比我好的人，甚至在许多事情上愿意服从那些懂得和做得都不如我的人，但现在这个权威是不纯洁的。严格地讲，它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赞同。政府无权干涉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除非我承认它。从绝对的君主制到受限君主制，从受限君主制到民主制，每一步都是对人的尊重的进步。一位睿智的中国哲学家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人民才是国家的基础。那么，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民主制，是不是政府的终极发展形式呢？是否可能在人权的认知和组织上更进一步呢？直到国家把个人作为更高而独立的力量，认为个人的这种力量是国家力量和权威的来源，并能正确地对待每个人，才会出现真正自由和文明的国家。我还很开心地描绘出这样一幅画面：最后，国家可以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国家对待个人就像邻里之间那样相互尊敬。如果有人愿意离群索居，不愿隶属于它，只要他尽到邻居和国民的责任，不干涉它，那它就可以处之泰然，任其自由。如果一个国家可以结出这样的果实，直到它成熟落地，那么，一条通往我所设想的、更加辉煌的完美国家的道路就修好了，尽管现在任何地方还见不到这样一个理想的州。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Jean-Jacques Rousseau
让－雅克·卢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让-雅克·卢梭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Dedication to the Republic of Geneva 献词：致日内瓦共和国
- Preface 序
- Introduction 引言
- The First Part 第一部分
- The Second Part 第二部分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Dedication to the Republic of Geneva

献词：致日内瓦共和国

MOST HONOURABLE, MAGNIFICENT AND SOVEREIGN LORDS,

光荣、伟大、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

convinced that only a virtuous citizen can confer on his country honours which it can accept, I have been for thirty years past working to make myself worthy to offer you some public homage; and, this fortunate opportunity supplementing in some degree the insufficiency of my efforts, I have thought myself entitled to follow in embracing it the dictates of the zeal which inspires me, rather than the right which should have been my authorisation. Having had the happiness to be born among you, how could I reflect on the equality which nature has ordained between men, and the inequality which they have introduced, without reflecting on the profound wisdom by which both are in this State happily combined and made to coincide, in the manner that is most in conformity with natural law, and most favourable to society, to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and to the happiness of individuals? In my researches after the best rules common sense can lay down for the constitution of a government, I have been so struck at finding them all in actuality in your own, that even had I not been born within your walls I should have thought it indispensable for me to offer this picture of human society to that people, which of all

others seems to be possessed of its greatest advantages, and to have best guarded against its abuses.

我深信，只有道德高尚的公民才资格向自己的祖国致敬，并且为国家所接纳。过去三十年，我辛勤工作，希冀有资格向你们呈献公开的敬意。而现在这幸运的机会，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过往努力所未逮之处，使我能够听从自己的满腔热忱，不去考虑是否拥有这种权利。我很幸运地与诸位身处同一时代，我又怎么能只想到自然所赋予人们的平等和人们自己创造的不平等，而不去思考这个国家精深的智慧呢？这种智慧，以最契合自然法且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把自然的平等和人类的不平等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既能维护公共秩序又能保障个人幸福。我在研究良知对于一个政府的制度所能提供的最好准则时，震惊地发现这些准则都已由你们的政府付诸实现，因此，即便我并未生在你们国家，也应当把这幅人类社会图景献给你们，因为我觉得你们是世界各民族中享有最大权益而又最善于防范政府弊窦的人民。

If I had had to make choice of the place of my birth, I should have preferred a society which had an extent proportionate to the limits of the human faculties; that is, to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well governed: in which every person being equal to his occupation, no one should be obliged to commit to others the functions with which he was entrusted: a State, in which all the individuals being well known to one another, neither the secret machinations of vice, nor the modesty of virtue should be able to escape the notice and judgment of the public; and in which the pleasant custom of seeing and knowing one another should make the love of country rather a love of the citizens than of its soil.

假如可以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我定会选择一个其幅员与人民才能相匹配的国家，也就是说它能得到良好的治理：在这个国家中，每个人都能胜任他的职务，没有人需要把他所负的责任委托给别人。在这样的国家中，人民彼此间互相熟识，无论邪恶的阴谋，抑或谦逊的美德，都逃不脱公众的目光与评断。这个国家里，人们互相往来、互相认识的美好习惯，将会使他们从热爱祖国转变为热爱公民，褪去对土地的眷恋。

I should have wished to be born in a country in which the interest of the Sovereign and that of the people must be single and identical; to the end that all the movements of the machine might tend always to the general happiness. And as this could not be the case, unless the Sovereign and the people were one and the same person, it follows that I should have wished to be born under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wisely tempered.

我多希望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主权者和人民只能拥有单纯且唯一的共同利益，因之国家机器的一切运作，永远都只是为了公共的福祉。要做到这样，唯有人民和主权者同一不可，因此，我情愿在一个法度适宜的民主政府治下生活。

I should have wished to live and die free: that is, so far subject to the laws that neither I, nor anybody else, should be able to cast off their honourable yoke: the easy and salutary yoke which the haughtiest necks bear with the greater docility, as they are made to bear no other.

我愿意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也就是说，我要这样地服从法

律：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的束缚：这是一种温和而有益的束缚，即使是最骄傲的人，也同样会驯顺地接受这种束缚，因为他不是为了受任何其他束缚而生的。

I should have wished then that no one within the State should be able to say he was above the law; and that no one without should be able to dictate so that the State should be obliged to recognise his authority. For, be the constitution of a government what it may, if there be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a single man who is not subject to the law, all the rest are necessarily at his discretion. And if there be a national ruler within, and a foreign ruler without, however they may divide their authority, it is impossible that both should be duly obeyed, or that the State should be well governed.

所以我期望，这个国家之内无人能宣称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国外也无人能迫使这一国家承认他的权威。因为，不管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如果在它管辖范围内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的人就必然受这个人的任意摆布；如果有一个本国人为首领，同时又另有一个外国人为首领，那么无论他们之间的权利如何分配，二者既不可能都得到很好的服从，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得好。

I should not have chosen to live in a republic of recent institution, however excellent its laws; for fear the government, being perhaps otherwise framed tha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moment might require, might disagree with the new citizens, or they with it, and the State run the risk of overthrow and destruction almost as soon as it came into being. For it is with liberty as it is with those solid and succulent foods, or with those generous wines which are well adapted to nourish and fortify robust constitutions

that are used to them, but ruin and intoxicate weak and delicate constitutions to which they are not suited. Peoples once accustomed to masters are not in a condition to do without them. If they attempt to shake off the yoke, they still more estrange themselves from freedom, as, by mistaking for it an unbridled license to which it is diametrically opposed, they nearly always manage, by their revolutions, to hand themselves over to seducers, who only make their chains heavier than before. The Roman people itself, a model for all free peoples, was wholly incapable of governing itself when it escaped from the oppression of the Tarquins. Debased by slavery, and the ignominious tasks which had been imposed upon it, it was at first no better than a stupid mob, which it was necessary to control and govern with the greatest wisdom; in order that, being accustomed by degrees to breathe the health-giving air of liberty, minds which had been enervated or rather brutalised under tyranny, might gradually acquire that severity of morals and spirit of fortitude which made it at length the people of all most worthy of respect. I should, then, have sought out for my country some peaceful and happy Republic, of an antiquity that lost itself, as it were, in the night of time: which had experienced only such shocks as served to manifest and strengthen the courage and patriotism of its subjects; and whose citizens, long accustomed to a wise independence, were not only free, but worthy to be so.

我绝不想住在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里，不管它有多么好的法律。我害怕其政府架构不合时宜，不适合于新的公民，或者公民不适合于新的政府，这个国家几乎刚诞生就经历着风雨飘摇、全盘倾覆的危险。因为自由正如那些富有营养的固体食物或香醇的美酒，它适合滋养和强健习惯于这种饮食的体质；却会败坏或烂醉那些不适应它们的虚弱之躯。人民一旦习惯于某些主人，就再也不能脱离他。倘若他们企图打破束缚，那就反而会更远地离开自由；因为他们常常会把与自

由相对立的那种放荡不羁当作自由，结果他们的革命，差不多总使自己沦落到煽惑家的手里，后者只会加重束缚他们的锁链。罗马人虽然是一切自由民族的楷模，但他们推翻塔尔昆王朝高压统治之时，却根本没有自治的能力。因为塔尔昆王朝强加给他们的奴役以及迫使他们屈辱地劳作，使得这群罗马人起初不过是愚民。因此，人们必须以最大的智慧教养和治理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让他们逐渐习惯于呼吸健康而自由的空气；而在暴政中变得颓丧甚至痴呆的心智，也逐渐接纳淳朴的德行和坚毅的精神，正是这些品质使得罗马人备受尊重。所以我将寻找一个幸福而安宁的共和国作为我的祖国：它的古旧陈腐已随时间消逝，它所遭受过的种种侵害足以发扬和巩固公民们的胆识与对祖国的热爱。这个共和国的公民，因为他们长久以来已养成了明智的独立性，他们不仅自由，而且配得上这份自由。

I should have wished to choose myself a country, diverted, by a fortunate impotence, from the brutal love of conquest, and secured, by a still more fortunate situation, from the fear of becoming itself the conquest of other States: a free city situated between several nations, none of which should have any interest in attacking it, while each had an interest in preventing it from being attacked by the others; in short, a Republic which should have nothing to tempt the ambition of its neighbours, but might reasonably depend on their assistance in case of need. It follows that a republican State so happily situated could have nothing to fear but from itself; and that, if its members trained themselves to the use of arms, it would be rather to keep alive that military ardour and courageous spirit which are so proper among freemen, and tend to keep up their taste for liberty, than from the necessity of providing for their defence.

我愿意选择这样一个国家作为自己的祖国。它很幸运地远离了征服他国的热望，同时更幸运的是，由于地理位置优渥，它免除了被他

国征服的恐惧：它是一个处在许多国家中的自由的城市，这些国家不但无意侵略它，而且每个国家还注意防范其他民族来侵略它。总之，它是一个非但不会引起邻国的野心，并且必要时还可以合理地指望邻邦援助的共和国。因此，在这样幸运的处境中，这个国家除了它自己本身以外，没有什么可怕的；公民们所以要受军事训练，与其说是准备自卫的需要，毋宁说是为了保持尚武的精神和英勇的气概。这种尚武的精神和英勇的气概最适合于自由，最能培育他们对自由的热爱。

I should have sought a country, in which the right of legislation was vested in all the citizens; for who can judge better than they of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y had best dwell together in the same society? Not that I should have approved of Plebiscita, like those among the Romans; in which the rulers in the State, and those most interested in its preservation, were excluded from the deliberations on which in many cases its security depended; and in which, by the most absurd inconsistency, the magistrates were deprived of rights which the meanest citizens enjoyed.

我将选择一个立法权属于全体公民的国家：因为有谁比公民自己更了解在怎样条件下，他们才更适于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同生活呢？但是我并不赞成类似罗马人的那种公民投票决议，因为这样的话，国家的治理者和最关切国家存续的人们反而被排除在诸多有关国家安全的决议之外；且罗马人这种决议就着一种荒谬混乱的逻辑，行政官员反而不能保有很多即便是最普通公民也享有的权利。

On the contrary, I should have desired that, in order to prevent self-interested and ill-conceived projects, and all such dangerous innovations as finally ruined the Athenians, each man should not be at liberty to propose new laws at pleasure; but that this right should

belong exclusively to the magistrates; and that even they should use it with so much caution, the people, on its side, be so reserved in giving its consent to such laws, and the promulgation of them be attended with so much solemnity, that before the constitution could be upset by them, there might be time enough for all to be convinced, that it is above all the great antiquity of the laws which makes them sacred and venerable, that men soon learn to despise laws which they see daily altered, and that States, by accustoming themselves to neglect their ancient customs under the pretext of improvement, often introduce greater evils than those they endeavour to remove.

相反地，为了阻止那些谋求私利的和考虑欠周的计划，为了预防那些最终毁灭了雅典人的危险的改革，我希望任何人都无权随心所欲地提出新的法律；我希望这项权利只属于行政官员；我希望即便是行政官员也应当审慎地行使这种权利；公民一方，批准这些法律时要谨慎，而法律颁布时则应庄重；我希望在宪法遭遇动摇之前，全体公民还有足够的时间确信，法律正因其久远的历史才神圣可敬。我希望人们很快就会唾弃那些朝三暮四的法律，同时也会鄙弃那些靠着革新名号的掩护不断废除古老习俗的国家，因为比起努力祛除旧俗的流弊，革新会引入更大的时弊。

I should have particularly avoided, as necessarily ill-governed, a Republic in which the people, imagining themselves in a position to do without magistrates, or at least to leave them with only a precarious authority, should imprudently have kept for themselves the administration of civil affairs and the execution of their own laws. Such must have been the rude constitution of primitive governments, directly emerging from a state of nature; and this was another of the vice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downfall of the Republic

of Athens.

我尤其会避开一个因下述的情形而必定治理得不好的共和国：此国人相信可以不要行政官员，或者只赋予这些官员些许不确定的权力，因而轻率地自行掌管民政与践行法律。这必然是刚从自然状态脱胎而来的原初政府，其政治架构粗劣不堪，它也是致使雅典共和国衰亡的政治缺陷之一。

But I should have chosen a community in which the individuals, content with sanctioning their laws, and deciding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affairs in general assembly and on the motion of the rulers, had established honoured tribunals, carefully distinguished the several departments, and elected year by year some of the most capable and upright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to administer justice and govern the State; a community, in short, in which the virtue of the magistrates thus bearing witness to the wisdom of the people, each class reciprocally did the other honour. If in such a case any fatal misunderstandings arose to disturb the public peace, even these intervals of blindness and error would bear the marks of moderation, mutual esteem, and a common respect for the laws; which are sure signs and pledges of a reconciliation as lasting as sincere. Such are the advantages, most honourable, magnificent and sovereign lords, which I should have sought in the country in which I should have chosen to be born. And if providence had added to all these a delightful situation, a temperate climate, a fertile soil, and the most beautiful countryside under Heaven, I should have desired only, to complete my felicity, the peaceful enjoyment of all these blessings, in the bosom of this happy country; to live at peace in the sweet society of my fellow-citizens, and practising towards them, from their own example, the

duties of friendship, humanity, and every other virtue, to leave behind me the honourable memory of a good man, and an upright and virtuous patriot.

但是我将选择这样一个共和国：那里的人民很满意于批准法律；他们可以根据治理者的提议集体决定最重要的公共事务；建立其富有威信的法庭；慎重地划分国家行政区域；每年选举公民中最能干、最正直的人来掌管司法和治理国家。总之在这样的共和国里，行政官员的道德可以见证人民的智慧，每个阶层都相互尊重，互相之间相得益彰。因此，即便偶有不幸的误会搅乱了大家的和睦，人们就是处在盲目和错误之中，也都能保持节制，大家依然互相尊敬，共同遵守法律。这就是诚挚而永久和睦的征兆和保证。光荣、伟大、至高无上的执政们！这就是在我为自己选定的祖国里所要寻求的优点。倘若上帝能在这个国家里再增加一种优越的环境，赋予它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以及天堂之外最美丽的风景，那么，为了满足我的幸福，我只希望在这幸运的祖国怀抱里，享受以上一切的好处，和同胞们安宁地生活在温暖的社会里，并且依照他们的榜样，与他们仁爱相待、友好相处，并向他们尽道德上应尽的责任，死后留下一个善良、正直和有道德的爱国者的光荣美名。

But, if less fortunate or too late grown wise, I had seen myself reduced to end an infirm and languishing life in other climates, vainly regretting that peaceful repose which I had forfeited in the imprudence of youth, I should at least have entertained the same feelings in my heart, though denied the opportunity of making use of them in my native country. Filled with a tender and disinterested love for my distant fellow-citizens, I should have addressed them from my heart, much in the following terms.

然而，我时运较差，或者洞悉事理过迟，因此不得不在其他国家里终此一生，病态且颓唐地生活着，同时又徒然追悔着荒唐的青年时代让我失去的安宁和平静，但是在我内心深处，至少还蕴藏着那些在我的国家上没机会表示出来的感情。我对远方的同胞满怀着一种温柔的、无私的关爱，由衷地向他们致以如下言辞：

“My dear fellow-citizens, or rather my brothers, since the ties of blood, as well as the laws, unite almost all of us, it gives me pleasure that I cannot think of you, without thinking, at the same time, of all the blessings you enjoy, and of which none of you, perhaps, more deeply feels the value than I who have lost them. The more I reflect on your civi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 the less can I conceive that the nature of human affairs could admit of a better. In all other governments, when there is a question of ensuring the greatest good of the State, nothing gets beyond projects and ideas, or at best bare possibilities. But as for you, your happiness is complete,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do but enjoy it; you require nothing more to be made perfectly happy, than to know how to be satisfied with being so. Your sovereignty, acquired or recovered by the sword, and maintained for two centuries past by your valour and wisdom, is at length fully and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Your boundaries are fixed, your rights confirmed and your repose secured by honourable treaties. Your constitution is excellent, being not only dictated by the profoundest wisdom, but guaranteed by great and friendly powers. Your State enjoys perfect tranquillity; you have neither wars nor conquerors to fear; you have no other master than the wise laws you have yourselves made; and these are administered by upright magistrates of your own choosing. You are neither so wealthy as to be enervated by effeminacy, and thence to lose, in the pursuit of frivolous pleasures, the taste for real happiness and solid virtue; nor poor enough to require more

assistance from abroad than your own industry is sufficient to procure you. In the meantime the precious privilege of liberty, which in great nations is maintained only by submission to the most exorbitant impositions, costs you hardly anything for its preservation.

“亲爱的同胞们，毋宁说是兄弟们，既然血统和法律几乎把我们大家都联系起来了，所以最使我感觉愉快的是：我只要一想到你们，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你们所享受的一切幸福，而你们之中恐怕没有人能比我这个失掉了那些幸福的人更感觉到它们的可贵。我越想到你们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的情况，就越难以想象怎么还会有更加美好的人类事务。在所有其他的政府中，但凡所讨论的问题涉及保障国家的最大幸福之时，全都滞留在空想阶段，最多不过保留某些理论可能性罢了。而你们呢，你们的幸福已经呈现在你们面前，只待你们去享受；如果你们要想成为完全幸福的人，只要能够满足于自己的幸福就够了。你们以武力得取或收复的主权，在你们勇敢和智慧的庇佑下，保持了两世纪之久，而现在终于得到了完全且普遍的承认。公正的条约划定了你们的疆域，保障了你们的权益，也巩固了你们的安宁。你们的宪法极为杰出，因为它不仅奠基在崇高的理智之上，还得到了友好、可敬的邻邦的支持。你们的国家是安定的，无需恐惧战争打响或征服来袭。你们唯一的主人是由你们自己制定且由你们自己选举出的廉洁行政官员执掌的法律。你们没有富有到那样程度，以致于你们因过度安逸而耗损了精力，致使你们沉湎在无聊的舒适享受中而丧失对真正幸福和稳固品德的爱好；你们也没有贫困到那样地步——本国工业无法自足尚且需要外国的援助。这种珍贵的自由，在大国里，只能以苛重的赋税来维持，而你们几乎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就能保有这种自由。

May a Republic, so wisely and happily constituted, last for ever, for an example to other nations, and for the felicity of its own citizens! This is the only prayer you have left to make, the only

precaution that remains to be taken. It depends, for the future, on yourselves alone (not to make you happy, for your ancestors have saved you that trouble), but to render that happiness lasting, by your wisdom in its enjoyment. It is on your constant union, your obedience to the laws, and your respect for their ministers, that your preservation depends. If there remains among you the smallest trace of bitterness or distrust, hasten to destroy it, as an accursed leaven which sooner or later must bring misfortune and ruin on the State. I conjure you all to look into your hearts, and to hearken to the secret voice of conscience. Is there any among you who can find,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a more upright, more enlightened and more honourable body than your magistracy? Do not all its members set you an example of moderation, of simplicity of manners, of respect for the laws, and of the most sincere harmony? Place, therefore, without reserve, in such wise superiors, that salutary confidence which reason ever owes to virtue. Consider that they are your own choice, that they justify that choice, and that the honours due to those whom you have dignified are necessarily yours by reflexion. Not one of you is so ignorant as not to know that, when the laws lose their force and those who defend them their authority, security and liberty are universally impossible. Why, therefore, should you hesitate to do that cheerfully and with just confidence which you would all along have been bound to do by your true interest, your duty and reason itself?

“你们的共和国，组织得那么合理而又那么完善，为了其公民们的幸福，为了作其他民族的榜样，但愿它永世长存！这就是今后你们所应有的唯一的愿望，也就是你们所应有的唯一的关怀。此后，你们自己的责任，不是要创造幸福，因为你们的祖先已经给你们创造好了，而是要用善于享受幸福的那种智慧，使幸福永远存在。你们是否能保存自己，取决于你们能否永久团结，能否遵守法律并尊敬执行法

律的人。在你们之间，只要还有极小的愤懑或猜疑的根苗，你们就必须赶快根除它，就像铲除祸根那样，因为它必会给共和国带来不幸和毁灭。我恳求你们都检视自己心灵的深处，听取你们良心的隐密声音。你们之中有谁知道世界上还有比你们的执政人员更正直、更英明和更可尊敬的人呢？你们所有的执政人员不都在节制、素朴、尊法、为善上树立了榜样吗？因此，毫无保留地把信任托付给这些贤明的官员们吧，这是你们的理性应当给予德性的信任。你们要想到，这些官员是你们选出来的，他们本人就可以证实你们选择的明智性；而你们所拥戴出来的人们应得的光荣，也必然会落回你们自己的身上。你们心里都清楚，但凡法律效力的丧失及其捍卫者权威衰微，任何人都将失去安全和自由。因此，你们除了热切又满怀信心地根据自己真正的利益和职责，从理智出发做你们经常应当做的那些事情之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Let not a culpable and pernicious indifference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onstitution ever induce you to neglect, in case of need, the prudent advice of the most enlightened and zealous of your fellow-citizens; but let equity, moderation and firmness of resolution continue to regulate all your proceedings, and to exhibit you to the whole universe as the example of a valiant and modest people, jealous equally of their honour and of their liberty. Beware particularly, as the last piece of advice I shall give you, of sinister constructions and venomous rumours, the secret motives of which are often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actions at which they are levelled. A whole house will be awake and take the first alarm given by a good and trusty watch-dog, who barks only at the approach of thieves; but we hate the importunity of those noisy curs, which are perpetually disturbing the public repose, and whose continual ill-timed warnings prevent our attending to them, when they may perhaps be necessary.”

对维护宪法而言，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秉持那种罪恶而致命的冷漠态度，它会让你们在必要时忽视了最英明和最热诚的人们的远见卓识。但是我希望公正、节制的美德和最可尊敬的坚强意志，能继续支配着你们的一切行动，并且能继续由你们自身，向全世界展示你们作为英勇而谦逊的、既热爱名誉也热爱自由的民族之典范。我的最后一条忠告是：你们尤其要小心，永远不要听信那些别有用心的曲解和恶毒的言论，因为这些曲解和言论的隐密动机，往往比在这种动机支配下的行动更险恶。一只机警而忠心的看家犬只在盗匪来临的时候才会疾声吠喊，于是全家便都惊醒戒备；但是人们厌恶那些不断扰乱公共安宁、不停狂吠的狗，它们连续且不适时的警报，会使人们在必要的时候，反而不愿再听信其声。”

And you, most honourable and magnificent lords, the worthy and revered magistrates of a free people, permit me to offer you in particular my duty and homage. If there is in the world a station capable of conferring honour on those who fill it, it is undoubtedly that which virtue and talents combine to bestow, that of which you have made yourselves worthy, and to which you have been promoted by your fellow-citizens. Their worth adds a new lustre to your own; while, as you have been chosen, by men capable of governing others, to govern themselves, I cannot but hold you as much superior to all other magistrates, as a free people, and particularly that over which you have the honour to preside, is by its wisdom and its reason superior to the populace of other States.

你们，光荣伟大的执政们，自由民众的尊贵可敬的官员们，请准许我恪尽本分，专程向你们献上我的敬意。如果世界上有一种地位，能使处于这种地位的人们获得荣耀，毫无疑问，它应当是由才能和德行所造就，而你们得到它确实当之无愧，于是你们的公民才把你们选拔到那种地位上去。他们自己的功绩使得你们的功绩更加光辉灿烂；

而且，因为你们是被一群有能力领导他人的公民遴选出来承担管理之责的，所以我认为你们高于其他各国的行政官员，恰如一个自由民族，特别是你们很荣幸地领导的这个自由民族，它在智慧和理性上都高于其他各国的平民一样。

Be it permitted me to cite an example of which there ought to have existed better records, and one which will be ever near to my heart. I cannot recall to mind, without the sweetest emotions, the memory of that virtuous citizen, to whom I owe my being, and by whom I was often instructed, in my infancy, in the respect which is due to you. I see him still, living by the work of his hands, and feeding his soul on the sublimest truths. I see the works of Tacitus, Plutarch, and Grotius lying before him in the midst of the tools of his trade. At his side stands his dear son, receiving, alas with too little profit, the tender instructions of the best of fathers. But, if the follies of youth made me for a while forget his wise lessons, I have at length the happiness to be conscious that, whatever propensity one may have to vice, it is not easy for an education, with which love has mingled, to be entirely thrown away.

请准许我援引一个事例，它给我留下了最好的印象，镌刻在我的心头。我一想起那位道德高尚的公民的音容相貌，某种最甜蜜的情感便油然而生，是他赐给了生命。他在我幼年时代，常常教导我应当尊敬你们。我回想起他依靠自己的双手劳作过活，回想起他用最崇高的真理滋养自己灵魂。现在我眼前还有这样的影子：塔西佗、普鲁塔克和格劳秀斯的著作和一堆他赖以谋生的工具摆放在一起。我仿佛还看见他那亲爱的儿子依偎在他身旁，领会着最慈祥的父亲的谆谆教诲，可惜这个褴褛的顽童收效甚微。如果说年少的无知轻狂一度使我忘记了他英明的训诫，但我最后却也幸运地意识到：无论一个人习性如何恶劣，也永远抹不平慈爱的教育烙下的痕迹。

Such, my most honourable and magnificent lords, are the citizens, and even the common inhabitants of the State which you govern; such are those intelligent and sensible men, of whom, under the name of workmen and the people, it is usual, in other nations, to have a low and false opinion. My father, I own with pleasure, was in no way distinguished among his fellow-citizens. He was only such as they all are; and yet, such as he was, there is no country, in which his acquaintance would not have been coveted, and cultivated even with advantage by men of the highest character. It would not become me, nor is it, thank Heaven, at all necessary for me to remind you of the regard which such men have a right to expect of their magistrates, to whom they are equal both by education and by the rights of nature and birth, and inferior only, by their own will, by that preference which they owe to your merit, and, for giving you, can claim some sort of acknowledgment on your side. It is with a lively satisfaction I understand that the greatest candour and condescension attend, in all your behaviour towards them, on that gravity which becomes the ministers of the law; and that you so well repay them, by your esteem and attention, the respect and obedience which they owe to you. This conduct is not only just but prudent; as it happily tends to obliterate the memory of many unhappy events, which ought to be buried in eternal oblivion. It is also so much the more judicious, as it tends to make this generous and equitable people find a pleasure in their duty; to make them naturally love to do youhonour, and to cause those who are the most zealous in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own rights to be at the same time the most disposed to respect yours.

光荣伟大的执政们，在你们领导的国家里出生的公民，甚至于普通居民便是如此。他们都是有智慧、明事理的公民，别国则称他们为

工人和平民，并且总对他们抱有鄙夷的错误观念。我很愉快地承认，我的父亲在全国公民中并不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只不过是普通人。但就像他这样的为人，随便在什么国家，大家都喜欢接近他，并且和他结交，即使那些最高尚的人士和他来往也会获得教益。这不是我应该说的，同时，蒙天之幸，本不应由我来说——像这种品质的人，应当受到你们何等之尊重。他们在所受的教育方面、在自然的权利方面、以及依凭出身而具有的权利方面，和你们平等；只是出于他们的自己意愿，出于对你们的功绩所应有的并已经表达出的敬爱，他们甘愿位居你们臣下；但是，他们这样敬爱你们，你们对他们当然也会有一种感激的心情。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你们对待他们，多么谦恭与屈就，才缓和了法律执行者应有的严峻；对于理应给予你们的服从和尊敬，你们报以如此之多的尊重与关怀。你们这种行为，既公正又智慧，足以使人逐渐遗忘那些应该忘却的不幸，永远把它们埋葬在遗忘之谷；正因为如此，公正、慷慨的民族会以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乐，自然而然尊崇你们，况且最热衷维护自己的权利的人，也便是最能尊重你们的权利的人。

It ought not to be thought surprising that the rulers of a civil society should have the welfare and glory of their communities at heart: but it is uncommonly fortunate for the peace of men, when those persons who look upon themselves as the magistrates, or rather the masters of a more holy and sublime country, show some love for the earthly country which maintains them. I am happy in having it in my power to make so singular an exception in our favour, and to be able to rank, among its best citizens, those zealous depositaries of the sacred articles of faith established by the laws, those venerable shepherds of souls whose powerful and captivating eloquence are so much the better calculated to bear to men's hearts the maxims of the gospel, as they are themselves the first to put them into practice. All the world knows of the great success with which the art of the pulpit is cultivated at Geneva; but men are so

used to hearing divines preach one thing and practise another, that few have a chance of knowing how far the spirit of Christianity, holiness of manners, severity towards themselves and indulgence towards their neighbours, prevail throughout the whole body of our ministers. It is, perhaps, given to the city of Geneva alone, to produce the edifying example of so perfect a union between its clergy and men of letters. It is in great measure on their wisdom, their known moderation, and their zeal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State that I build my hopes of its perpetual tranquillity. At the same time, I notice, with a pleasure mingled with surprise and veneration, how much they detest the frightful maxims of those accursed and barbarous men, of whom history furnishes us with more than one example; who,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pretended rights of God, that is to say their own interests, have been so much the less greedy of human blood, as they were more hopeful their own in particular would be always respected.

文明社会的治理者理应关怀俗世社会的荣誉和福祉，这不足为奇。但是那些视自己为更神圣、更崇高的天国之官员的人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把自己视为天国主人的人们，他们竟还热爱着滋育自己的俗世国家，这无益于人类安宁。但是我惊喜地发现，我们这个国家竟是罕见有益灵魂安宁的反例，我们能把那些法律所认可的神圣教义的热诚的受托者和那些可敬的人类灵魂的教士，纳入我们最优秀的公民的之列；他们不但能用其生动而文雅的口才传播福音书中的箴言，而且自己还永远首先以身作则遵奉这些箴言！众所周知，步道这门伟大技艺深耕于日内瓦城。但因为人们久已看惯了言行上的不一致，所以鲜有人知道，日内瓦的行政机构有多么盛行基督教的精神、圣洁的习惯以及恪守律己、宽爱邻人的品性。或许唯有日内瓦这个城市，才能如此完美地把神职人员与书吏团体结合起来，唯有它给我们树立了这个模板。我把国家永享太平的希望大部分寄托在教士们所具有的人所公认的智慧和节制的精神上，寄托在他们希冀国家昌盛的殷切期望

上。与此同时我欣喜而崇敬地注意到：他们多么憎恶那些可恨且野蛮之人的箴言，历史已经展现了许多这样的例子，这些人往往以维护上帝的权利为借口，实际上就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一面珍视自己的生命得到尊重，一面肆意践踏别人的生命。

I must not forget that precious half of the Republic, which makes the happiness of the other; and whose sweetness and prudence preserve its tranquillity and virtue. Amiable and virtuous daughters of Geneva, it will be always the lot of your sex to govern ours. Happy are we, so long as your chaste influence, solely exercised within the limits of conjugal union, is exerted only for the glory of the State and the happiness of the public. It was thus the female sex commanded at Sparta; and thus you deserve to command at Geneva. What man can be such a barbarian as to resist the voice of honour and reason, coming from the lips of an affectionate wife? Who would not despise the vanities of luxury, on beholding the simple and modest attire which, from the lustre it derives from you, seems the most favourable to beauty? It is your task to perpetuate, by your insinuating influence and your innocent and amiable rule, a respect for the laws of the State, and harmony among the citizens. It is yours to reunite divided families by happy marriages; and, above all things, to correct, by the persuasive sweetness of your lessons and the modest graces of your conversation, those extravagancies which our young people pick up in other countries, whence, instead of many useful things by which they might profit, they bring home hardly anything, besides a puerile air and a ridiculous manner, acquired among loose women, but an admiration for I know not what so-called grandeur, and paltry recompenses for being slaves, which can never come near the real greatness of liberty. Continue, therefore, always to be what you are, the chaste guardians of our morals, and the sweet security for

our peace, exerting on every occasion the privileges of the heart and of nature, in the interests of duty and virtue.

我又怎能忘记在共和国里珍贵的另一半人——妇女们呢？她们给男人以幸福，她们的温柔和智慧维护着共和国的安宁与品格。日内瓦城可爱又有德性的女同胞们，你们这些女子的命运将永远左右着我们的命运。你们只是为了共和国的荣誉和公众幸福，才运用起你们在婚姻关系中所限定的纯洁的权威，我们这些男人多么有福！斯巴达女人之所以能主导该城邦的男子，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你们也有资格号令日内瓦。什么样粗野男子能够抵挡从他深情款款的妻子口中发出的那荣耀与理性的声音呢？当男人目睹你们身着那些简单又端庄的服饰，可这些东西因为你们光彩倍增，最能凸显出美丽的意义，有谁会不鄙视奢华的浮夸呢？你们的责任是：用你们那春风化雨的影响力与平易近人的方法，维持住人们对共和国法律的尊重以及相互间的和睦。你们要用幸福的婚姻使那些不和的家庭破镜重圆；最重要的是，你们要用自己循循善诱的教诲和高雅的言谈举止，来纠正我们的青年们可能从别国沾染的恶习。这些青年人到了那些国家，不去学对他们有利的好东西，反而从那些浪荡女子学会了轻佻幼稚的言语和荒诞可笑的举止，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学来，我认为这些所谓的气派，不过是对他们被奴役的微不足道的补偿，它与自由那真正的伟大性无关。因此，希望你们永远像现在一样，做一个善良风俗坚贞的守卫者，人类和平的良好纽带；为了滋育国民的职责和美德，请继续时刻施行你们内心与自然的权利吧。

I flatter myself that I shall never be proved to have been mistaken, in building on such a foundation my hopes of the general happiness of the citizens and the glory of the Republic. It must be confessed, however, that with all these advantages, it will not shine with that lustre, by which the eyes of most men are dazzled; a puerile and fatal taste for which is the most mortal enemy of

happiness and liberty.

我自以为我所说的论断不会有错，因为我把公民们的共同幸福和共和国的荣誉寄托在如此可靠的根基上。我承认，尽管共和国有这些优点，它也不会发出令人头晕目眩的荣光；幼稚而有害地急迫渴求这种荣光，则是幸福与自由最致命的敌人。

Let our dissolute youth seek elsewhere light pleasures and long repentances. Let our pretenders to taste admire elsewhere the grandeur of palaces, the beauty of equipages, sumptuous furniture, the pomp of public entertainments, and all the refinements of luxury and effeminacy. Geneva boasts nothing but men; such a sight has nevertheless a value of its own, and those who have a taste for it are well worth the admirers of all the rest.

让轻浮的青年到别处去追求无限度的欢乐和长远的懊悔吧！让所谓有高尚趣味的人到别处去叹赏宏伟的宫殿、华美的车马、高贵的陈设、富丽堂皇的排场以及一切骄奢淫佚的享受吧！在日内瓦只有平凡的人，但是，能见到这些平凡的人，这件事本身就具有莫大的价值；急于想看到日内瓦公民的人们，和那些羡慕其余一切事物的人们相比，是毫无逊色的。

Deign, most honourable, magnificent and sovereign lords, to receive, and with equal goodness, this respectful testimony of the interest I take in your common prosperity. And, if I have been so unhappy as to be guilty of any indiscreet transport in this glowing effusion of my heart, I beseech you to pardon me, and to attribute it to the tender affection of a true patriot, and to the ardent and

legitimate zeal of a man, who can imagine for himself no greater felicity than to see you happy.

光荣伟大、至高无上的执政们，我非常关切你们的共同幸福，希望你们大家都欣然接纳我这种最恭敬的表示。如果不幸我因内心过度兴奋，态度未免有些冒昧的话，我恳求你们原谅我的过失，恳求你们念及一个爱国者的真实情感、一个热心人应有的忠诚而宥恕我，因为我除了看到你们大家都很幸福因而也感到幸福而外，再不设想自己还会有什么更大的幸福。

Most honourable, magnificent and sovereign lords, I am, with the most profound respect,

光荣伟大、至高无上的执政们，我谨向你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Your most humble and obedient servant and fellow-citizen.

你们的最谦逊、最恭顺的仆人和同国的公民

J. J. ROUSSEAU

让·雅克·卢梭。

Chambéry, June 12, 1754

1754年6月12日于商贝里。

Preface

序

OF all human sciences the most useful and most imperfect appears to me to be that of mankind: and I will venture to say, the single inscription on the Temple of Delphi contained a precept more difficult and more important than is to be found in all the huge volumes that moralists have ever written. I consider the subject of the following discourse as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questions philosophy can propose, and unhappily for us, one of the most thorny that philosophers can have to solve. For how shall we know the source of inequality between men, if we do not begin by knowing mankind? And how shall man hope to see himself as nature made him, across all the changes which the succession of place and time must have produced in his original constitution? How can he distinguish what is fundamental in his nature from the changes and additions which his circumstances and the advances he has made have introduced to modify his primitive condition? Like the statue of Glaucus, which was so disfigured by time, seas and tempests, that it looked more like a wild beast than a god, the human soul, altered in society by a thousand causes perpetually recurring, by the acquisition of a multitude of truths and errors, by the changes happening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body, and by the continual jarring of the passions, has, so to speak, changed in appearance, so as to be hardly recognisable. Instead of a being, acting constantly from fixed and invariable principles, instead of that celestial and majestic simplicity, impressed on it by its divine Author, we find in it only the frightful contrast of passion mistaking itself for reason, and of understanding grown delirious.

我觉得人类的所有科学中最有用却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我敢说，德尔菲神庙里镌刻的那句神谕，比伦理学家们写下任何的巨著都更为晦涩与重要。因此，我把这篇论文的主题，看成是哲学所能提出的最耐人寻味的问题之一。但是不幸得很，对我们说来，它也是哲学家试图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因为，如果我们不从认识人类本身开始，又怎么能够认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呢？因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更迭必然使人类的原来之构造发生变化，我们若不通过这些变化，又怎么能够看出最初由自然形成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又怎么能把人本性中固有不移的东西，和因环境变迁与人类进步使他的原始状态有所改观的那部分区别开来呢？正如格劳库斯神像，由于时间、海洋和暴风雨的侵蚀，现在已经变得不像一位天神，反而像凶残的野兽；而人类身处社会环境之中，由于不断涌现的千百种原因、由于获得无数知识和谬误、由于身体构造发生变化、由于情欲的持续涌动等等，我们可以说，人类灵魂的样态已经改变，以致于我们无法辨识它。我们现在再也看不到一个始终依照确定不移的原则而行动的人；再也看不到其神圣造物者曾经赋予人的那种高贵而庄严的朴素，相反我们只能把情欲错当成理性、把迷狂解释成智慧的可怖对立。

It is still more cruel that, as every advance made by the human species removes it still farther from its primitive state, the more discoveries we make, the more we deprive ourselves of the means of making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us it is, in one sense, by our very study of man, that the knowledge of him is put out of our power.

更不幸的是：人类所有之进步，都不断地疏离自己的原始状态，我们发现越多，便越失去获得最重要发现的途径。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越努力研究人类，我们越丧失理解人类的能力。

It is easy to perceive that it is in these successive change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that we must look for the origin of those differences which now distinguish men, who, it is allowed, are as equal among themselves as were the animals of every kind, before physical causes had introduced those varieties which are now observable among some of them.

不难看出，我们应该在人类构造的这些承续性变化中，来寻求区分人类如今各种差异的最初根源。大家都承认，人与人在自然上都平等，正如各种动物，在物质性原因介入致使它们成为不同种类之前，它们也都是平等的。

It is, in fact, not to be conceived that these primary changes, however they may have arisen, could have altered, all at once and in the same manner, every individual of the species. It is natural to think that, while the condition of some of them grew better or worse, and they were acquiring various good or bad qualities not inherent in their nature, there were others who continued a longer time in their original condition. Such was doubtless the first source of the inequality of mankind, which it is much easier to point out thus in general terms, than to assign with precision to its actual causes.

事实上，不管这些最初的变化如何产生，我们都不会相信，它们在相同的时间、以相同的方式，改变了人类所有个体。我们很自然就想到，其中某些人的状态完善或者堕落了，他们所获得的这些差异性，皆非承袭自己的本性，而另一些人则更长期地滞留在他们的原初状态之下。这无疑便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不过笼统地指出这

一点很容易，可要确切地分析出个中真正的原因则困难得多。

Let not my readers therefore imagine that I flatter myself with having seen what it appears to me so difficult to discover. I have here entered upon certain arguments, and risked some conjectures, less in the hope of solving the difficulty, than with a view to throwing some light upon it, and reducing the question to its proper form. Others may easily proceed farther on the same road, and yet no one find it very easy to get to the end. For it is by no means a light undertaking to distinguish properly between what is original and what is artificial in the actual nature of man, or to form a true idea of a state which no longer exists, perhaps never did exist, and probably never will exist; and of which, it is, nevertheless, necessary to have true ideas, in order to form a proper judgment of our present state. It requires, indeed, more philosophy than can be imagined to enable any one to determine exactly what precautions he ought to take, in order to make solid observations on this subject; and it appears to me that a good solution of the following problem would be not unworthy of the Aristotles and Plinys of the present age. What experiments would have to be made, to discover the natural man? And how are those experiments to be made in a state of society?

因此，我希望读者朋友们不要认为——我夸下海口说自己理解了此问题，他们对我而言如此高深莫测，我不过搞出了某种推论，大胆地作出了某些猜测；这与其说是希望解决问题，毋宁说是希望把它照亮——还原该问题真正的面目。别人也许轻易地就能开展这条研究路径，但没有人能轻易到达其终点。因为我们还没有任何清晰方法去解释，如何正确地在人类真实状态中区分出什么是原初的、什么是人为的，或者无法去认清这样一种状态：它现已不复存在、过去或许从来

没有存在过、将来也许永远不会存在（然而，为了合理地评断人类现在的处境，我们必须对此状态有深刻的理解）。谁想要确切地说明它须注意哪些事项，才能在这个问题上给出牢靠的阐释，谁就必须要有一套更好的哲学理论。如果有谁在此问题上给出了精妙的答案，我觉得他配称为当代的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为了认识自然人，我们必须做什么样的实验呢？而社会状态中，这些实验又要怎么开展呢？

So far am I from undertak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at I think I have sufficiently considered the subject, to venture to declare beforehand that our greatest philosophers would not be too good to direct such experiments, and our most powerful sovereigns to make them. Such a combination we have very little reason to expect, especially attended with the perseverance, or rather succession of intelligence and goodwill necessary on both sides to success.

我离解答出该问题还差着十万八千里，但我已经深思过这个问题，因此敢于事先回答说：即便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也不见得能指导该项实验；即便是最强力的执政者也不能做出这种实验。我们无法期待他们两者通力合作，因为这项实验要成功，必须有坚忍的精神，或者说有无穷的智慧和必要的善意。

These investigations, which are so difficult to make, and have been hitherto so little thought of, are, nevertheless, the only means that remain of obviating a multitude of difficulties which deprive us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real foundations of human society. It is this ignorance of the nature of man, which casts so much uncertainty and obscurity on the true definition of natural right: for, the idea of right, says Burlamaqui, and more particularly that of natural right, are ideas manifestly relative to the nature of man. It is then from

this very nature itself, he goes on, from the constitution and state of man, that we must deduce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this science.

这些研究如此之难，所以迄今为止人们还很少进行过考察，但这种研究毕竟是我们得以理解人类社会真正基石的唯一途径。自然法的真正的定义，之所以难以确定且模糊不清，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人之本性的缘故。布尔拉马基说过，权利的观念——尤其是自然权利的观念，显然与人之本性的观念有关。他还说，因此我们正该由人的本性、人的构造、人的状态来推断出这门科学的第一原理。

We cannot see without surprise and disgust how little agreement there is between the different authors who have treated this great subject. Among the more important writers there are scarcely two of the same mind about it. Not to speak of the ancient philosophers, who seem to have done their best purposely to contradict one another on the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e Roman jurists subjected man and the other animals indiscriminately to the same natural law, because they considered, under that name, rather the law which nature imposes on herself than that which she prescribes to others; or rather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 acceptation of the term law among those jurists; who seem on this occasion to have understood nothing more by it than the general relations established by nature between all animated beings, for their common preservation. The moderns, understanding, by the term law, merely a rule prescribed to a moral being, that is to say intelligent, free and considered in his relations to other beings, consequently confine the jurisdiction of natural law to man, as the only animal endowed with reason. But, defining this law, each after his own fashion, they have established it on such metaphysical principles, that there are very few persons among us capable of

comprehending them, much less of discovering them for themselves. So that the definitions of these learned men, all differing in everything else, agree only in thi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comprehend the law of nature, and consequently to obey it, without being a very subtle casuist and a profound metaphysician. All which is as much as to say that mankind must have employ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ety, a capacity which is acquired only with great difficulty, and by very few persons, even in a state of society.

我们无须惊讶和反感，论述过该重要问题的学者们竟鲜有一致的意见。在最有权威的学者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两个人观点相同。古代的那些哲学家们更不必谈了，他们好像竭力要在最基本的原理上相互反对。罗马法学家们竟把毫无区别地人类和其他一切动物，都置于相同的自然法之下，因为，他们把自然法理解为自然施加于其自身的法则，而不是自然所规定的法则。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法学家们是从特殊的意义来理解“法”这个词，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法”这个词表示自然为保证所有生命体的自我保存而建立的普遍关联。现代法学家只承认法这个词是为有道德的存在而设定的规范，也就是说，这种存在相较于其他生物要更为智慧、自由且具有思考性，因此他们认为自然法的适用范围，只限定在理性的动物上，这种动物就是人。但当法学家们给这种法下定义的时候，则各有不同的说法，他们都把这种法建立在一些形而上学的原理上，所以就是在我们之间，也很少有人能理解这些原理，当然更不能自己发现这些原理了。因此，尽管这些学者所下的各种定义永远相互抵牾，他们却只有一点类似：即他们认为，除了伟大的推理家或思想深邃的形而上学家之外，没人能理解自然法，也无法服从自然法。这正是说，人类为了建立社会，必定使用了不少智慧，人们需要费尽心血能发展这些智慧，而即便在社会状态里，仅有少数人才具备这样的智慧。

Knowing so little of nature, and agreeing so ill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law,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us to fix on a good definition of natural law. Thus all the definitions we meet with in books, setting aside their defect in point of uniformity, have yet another fault, in that they are derived from many kinds of knowledge, which men do not possess naturally, and from advantages of which they can have no idea until they have already departed from that state. Modern writers begin by inquiring what rules it would be expedient for men to agree on for their common interest, and then give the name of natural law to a collection of these rules, without any other proof than the good that would result from their being universally practised. This is undoubtedly a simple way of making definitions, and of explaining the nature of things by almost arbitrary conveniences.

既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这么肤浅，对“法”这个词的理解又不能达成一致，所以我们很难给自然法下一个完善的定义。因此，我们在书籍里所找到的那些定义，除了极不一致以外，还有缺点：即这些定义来自诸多人类非自然拥有的知识，它们源自人类已经脱离自然状态之后才能想到的有力状况。这些现在著作家往往从此入手：先人类为了共同利益而彼此同意的法则，然后把这些法则汇总起来，把它们叫作自然法；他们的唯一根据就是那些规则通过普遍的实践可能使人得到好处。无疑地，这是一种最简便的下定义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以随意武断的态度来解释事物本质的方法。

But as long as we are ignorant of the natural man, it is in vain for us to attempt to determine either the law originally prescribed to him, or that which is best adapted to his constitution. All we can know with any certainty respecting this law is that, if it is to be a law, not only the wills of those it obliges must be sensible of their

submission to it; but also, to be natural, it must come directly from the voice of nature.

但在我们完全不认识自然人之前，如果我们想确定自然人所遵循的法则，或者最适合于他构造的法律，这些努力都将白费。关于“法”这个问题，我们所能了解得最清楚的就是：它要成为“法”，不仅需要受它约束的人能够自觉地服从它；而且它还必须由自然的声音直接表达出来，这样才合乎自然。

Throwing aside, therefore, all those scientific books, which teach us only to see men such as they have made themselves, and contemplating the first and most simple operations of the human soul, I think I can perceive in it two principles prior to reason, one of them deeply interesting us in our own welfare and preservation, and the other exciting a natural repugnance at seeing any other sensible being, and particularly any of our own species, suffer pain or death. It is from the agreement and combination which the understanding is in a position to establish between these two principles, without its being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at of sociability, that all the rules of natural right appear to me to be derived — rules which our reason is afterwards obliged to establish on other foundations, when by its successive developments it has been led to suppress nature itself.

因此，我们把所有哪些只能使我们认识已经变成现今这个样子的人类的那些科学论著都搁置一旁，来思考一下人类心灵最初的和最简单的活动吧。我相信在这里可以看出两个先于理性而存在的原理：一个原理使我们热烈地关切自我的幸福和存续；另一个原理使我们在看到任何有感觉的生物、主要是我们的同类遭受灭亡或痛苦时，感到一

种天然的憎恶。我们的精神活动能够使这两个原理相互协调并且配合起来。在我看来，自然法的一切规则正是从这两个原理（这里无须再加上人的社会性那一原理）的协调和配合中产生出来的。此后理性不断发展，终于达到了窒息天性的程度，那时候，便不得不把这类规则重新建立在别的基础上面了。

In proceeding thus, we shall not be obliged to make man a philosopher before he is a man. His duties toward others are not dictated to him only by the later lessons of wisdom; and, so long as he does not resist the internal impulse of compassion, he will never hurt any other man, nor even any sentient being, except on those lawful occasions on which his own preservation is concerned and he is obliged to give himself the preference. By this method also we put an end to the time-honoured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animals in natural law: for it is clear that, being destitute of intelligence and liberty, they cannot recognise that law; as they partake, however, in some measure of our nature, in consequence of the sensibility with which they are endowed, they ought to partake of natural right; so that mankind is subjected to a kind of obligation even toward the brutes. It appears, in fact, that if I am bound to do no injury to my fellow-creatures, this is less because they are rational than because they are sentient beings: and this quality, being common both to men and beasts, ought to entitle the latter at least to the privilege of not being wantonly ill-treated by the former.

这样一来，在人成为人之前，我们就不必先使人成为哲学家。一个人不会非等到受过后天智慧的教导，才明白他对别人的义务；只要他不抗拒怜悯心的内在性冲动，他非但永远不会加害于，甚至也不会伤害其他任何有感觉的生物，除非在他自身的保存受到威胁的正当情

况下，他才会优先考虑保全自己。我们可用这个方法，终结“自然法是否也适用于禽兽”这一旷日持久争论：很明显禽兽不具备智慧和自由意志，它们不能认识此法；然而，由于它们也具有天赋的感知，在某些方面，也和我们所具有的天性一样，所以我认为它们也应当受自然法的支配；因此人类甚至对于野兽也该服膺于某种义务。实际上，我之所以不应当伤害我的同类生物，似乎并非因为他是一个有理性的生物，而在于他是一个有感觉的生物。既然人与兽都具备这种特质，我们至少认为，动物应该有权利免受人类无端的虐待。

The very study of the original man, of his real wants, 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his duty, is besides the only proper method we can adopt to obviate all the difficulties which the origin of moral inequality presents, on the true foundations of the body politic, on the reciprocal rights of its members, and on many other similar topics equally important and obscure.

在精神上的不平等的起源上，在政治组织的真实基础和组织成员相互间的权利上，以及千百种其他与此相类似、既重要而又未经加以阐明的问题上，都存在许多困难；这种对原始人、对原始人的真实需要以及他的义务的基本原理的研究，同时也是解决这些困难的唯一好方法。

If we look at human society with a calm and disinterested eye, it seems, at first, to show us only the violence of the powerful and the oppression of the weak. The mind is shocked at the cruelty of the one, or is induced to lament the blindness of the other; and as nothing is less permanent in life than those external relations, which are more frequently produced by accident than wisdom, and which are called weakness or power, riches or poverty, all human

institutions seem at first glance to be founded merely on banks of shifting sand. It is only by taking a closer look, and removing the dust and sand that surround the edifice, that we perceive the immovable basis on which it is raised, and learn to respect its foundations. Now, without a serious study of man, his natural faculties and their successive development, we shall never be able to make these necessary distinctions, or to separate, in the actual constitution of things, that which is the effect of the divine will, from the innovations attempted by human art. The political and moral investigations, therefore, to which the important question before us leads, are in every respect useful; while the hypothetical history of governments affords a lesson equally instructive to mankind.

假如我们以一种冷静的、客观的眼光来审视人类社会，首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似乎只是对弱者强暴的镇压。我们的心灵或震惊于一部分人的残暴，或哀叹于另一部分人的愚昧。并且，因为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那些外在关系更不稳固了，人们把它们叫作强与弱、贫与富，而这些关系通常诞生于机缘巧合而不由智慧造就，因此乍看之下，全部人类的制度，就只好像奠基在许多流沙构成的河滩上。我们唯有仔细地研究这些制度，掸去人类制度大厦周围包裹的尘土与泥沙，才能发现此大厦构筑起来的不可动摇的根基，才能学会尊重它的基石。如今，如果我们不对人进行系统的研究，我们永远也无法对人的自然能力及其日后的发展做出必须的区分，或者说我们永远无法在事情的现实状况中分辨出哪些遵照了神圣意志，哪些又源于人类技艺的创新。因此，我们之前提过那个重要的问题，引出了这些对政治和道德的研究，从各方面来看，它们会很有用；而我所假设的各种政体的历史，从各方面看，对人类而言也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

In considering what we should have become, had we been left

to ourselves, we should learn to bless Him, whose gracious hand, correcting our institutions, and giving them an immovable basis, has prevented those disorders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arisen from them, and caused our happiness to come from those very sources which seemed likely to involve us in misery.

当我们考虑到，如果让我们放任自流地发展，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就应当学会为这样一个人祝福：他用造福人群的手修正了我们的种种制度，并给予这些制度以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他已经预防了从这些制度中可能产生出来的种种混乱，并从一些看来是给我们以无限苦难的方法中，创造出我们的幸福。

Introduction

引言

It is of man that I have to speak; and the question I am investigating shows me that it is to men that I must address myself: for questions of this sort are not asked by those who are afraid to honour truth. I shall then confidently uphold the cause of humanity before the wise men who invite me to do so, and shall not be dissatisfied if I acquit myself in a manner worthy of my subject and of my judges.

我要论述的是人，我在讲述人类的时候所回答的问题，充分启示我应当向人类来论述。因为只有那些敢于推崇真理的人，才会进行这种讨论。所以，我将满怀信心地站在激励我这样做的智者面前，为人类辩护。如果我能够无愧于这个论题和各位评审的话，我将不胜荣幸。

I conceive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inequality among the human species; one, which I call natural or physical, because it is established by nature, and consists in a difference of age, health, bodily strength, and the qualities of the mind or of the soul: and another, which may be called moral or political inequality, because it depends on a kind of convention, and is established, or at least authorised by the consent of men. This latter consists of the different privileges, which some men enjoy to the prejudice of others; such as that of being more rich, more honoured, more powerful or even in a position to exact obedience.

我认为人类有两种不平等：第一种我称之为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形成于自然，体现在年龄、健康状况、体力以及智力或心灵方面的差异；另一种我则定义为精神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缘于某种传统惯例，是在大众同意的情况下建立的，或者至少得到了人类的普遍认同。这种不平等往往存在于一些人以损害别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享受到的种种特权之中，譬如：比别人更富有、更尊贵、更有权势，甚至让别人对他们言听计从。

It is useless to ask what is the source of natural inequality, because that question is answered by the simple definition of the word. Again, it is still more useless to inquire whether there is any essenti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inequalities; for this would be only asking, in other words, whether those who command are necessarily better than those who obey, and if strength of body or of mind, wisdom or virtue are always found in particular individual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power or wealth: a question fit perhaps to be discussed by slaves in the hearing of their masters, but highly unbecoming to reasonable and free men in search of the truth.

追问什么是自然不平等的起源是荒谬的，因为答案从它的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追问这两种不平等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本质上的联系则更为荒谬。因为换言之，这就等于在问是否那些发号施令者就必然优越于服从命令者？是否个人的体力或智力、学识或德行都与他们的权势或财富成正比？这个问题可能适合奴隶们在他们的主人面前讨论，但却不适合自由而理性的人用来探索真理。

The subject of the present discourse, therefore, is more precisely this. To mark, in the progress of things, the moment at

which right took the place of violence and nature became subject to law, and to explain by what sequence of miracles the strong came to submit to serve the weak, and the people to purchase imaginary repose at the expense of real felicity.

因此，本文的主题更准确地说，是如下内容。指出在事物发展的进程中，从何时开始“权利”取代了“暴力”，“自然”服从于“法律”，表明是怎样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使强者为弱者服务，使人类不惜牺牲真正的幸福以换取想象中的安宁。

The philosophers, who have inquired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society, have all felt the necessity of going back to a state of nature; but not one of them has got there. Some of them have not hesitated to ascribe to man, in such a state, the idea of just and unjust, without troubling themselves to show that he must be possessed of such an idea, or that it could be of any use to him. Others have spoken of the natural right of every man to keep what belongs to him, without explaining what they meant by *belongs* . Others again, beginning by giving the strong authority over the weak, proceeded directly to the birth of government, without regard to the time that must have elapsed before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authority and government could have existed among men. Every one of them, in short, constantly dwelling on wants, avidity, oppression, desires and pride, has transferred to the state of nature ideas which were acquired in society; so that, in speaking of the savage, they described the social man. It has not even entered into the heads of most of our writers to doubt whether the state of nature ever existed; but it is clear from the Holy Scriptures that the first man, having received his understanding and commandments immediately from God, was not himself in such a state; and that, if we give such

credit to the writings of Moses as every Christian philosopher ought to give, we must deny that, even before the deluge, men were ever in the pure state of nature; unless, indeed, they fell back into it from some very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 a paradox which it would be very embarrassing to defend, and quite impossible to prove.

但凡对社会的基础进行过研究的哲学家，都意识到追溯到人类的自然状态的必要性，可是至今没有人能够追溯到那种状态。其中一些人毫不犹豫地认定，自然状态中的人已有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却没有花费心思去证明自然状态中的人就一定有这种观念，甚至也没有证明这些观念对自然状态中的人有何用处。另一些人谈到每个人都拥有保护属于自己东西的天赋权利，但却没有向我们阐明“属于”这个词的含义。还有一些人直接赋予强者以统治弱者的权力，随即提出“政府”的概念，根本没有考虑到人类形成“权力”和“政府”的概念所需要的时间。总之，所有的哲学家们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论需求、贪婪、压迫、欲望和自尊，把在社会内部获得的概念搬到了自然状态之中。表面上他们说的是野蛮人，其实他们描绘的是文明人。不仅如此，现代的著书立说者似乎并未对自然状态确实存在过这一表述心存怀疑。然而《圣经》中记载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史上第一个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教诲和戒律的人，从未生活在那种状态之中。而且如果我们像每个信奉基督教的哲学家那样相信摩西著述的话，即便是在大洪水之前，我们也必须否认人类曾经处于这样的自然状态，除非他们因某种变故而陷入其中。这个矛盾的观点很难站得住脚，而且完全无法证实。

Let us begin then by laying facts aside, as they do not affect the question. The investigations we may enter into, in treating this subject, must not be considered as historical truths, but only as mere conditional and hypothetical reasonings, rather calculated to explain the nature of things, than to ascertain their actual origin;

just like the hypotheses which our physicists daily form respec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ld. Religion commands us to believe that, God Himself having taken men out of a state of nature immediately after the creation, they are unequal only because it is His will they should be so: but it does not forbid us to form conjectures based solely on the nature of man, and the beings around him, concerning what might have become of the human race, if it had been left to itself. This then is the question asked me, and that which I propose to discuss in the following discourse. As my subject interests mankind in general, I shall endeavour to make use of a style adapted to all nations, or rather, forgetting time and place, to attend only to men to whom I am speaking. I shall suppose myself in the Lyceum of Athens, repeating the lessons of my masters, with Plato and Xenocrates for judges, and the whole human race for audience.

所以，我们不妨先抛开事实，因为它们并不影响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进行的研究不应当被看作是历史的真相，它们只是一些假定的和有条件的推理。与其说这些推理适合用来表明事物的真实起源，不如说它们适合用来阐明事物的性质，正如我们的博物学家在每天研究宇宙的形成时提出的那些方法一样。宗教让我们相信：在上帝使人类脱离了自然状态之后，他们就是不平等的，因为上帝的意愿就是如此。但是，宗教并未禁止我们单凭人及其周围事物的性质作出种种猜测：如果任凭人类自由发展，人类的命运将会如何。这就是我要回答的问题，也就是我在本篇论文中提出来要研究的问题。由于整个人类都关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会尽力使用一种各民族都能理解的语言；或者说，为了专注于听我讲话的人，我将忽略时间和地点，想象我正置身于雅典的吕克昂学园，复述着我的导师们的教诲，柏拉图和色诺芬等那样著名的哲学大师做我的评判员，整个人类做我的听众。

O man, of whatever country you are, and whatever your opinions may be, behold your history, such as I have thought to read it, not in books written by your fellow-creatures, who are liars, but in nature, which never lies. All that comes from her will be true; nor will you meet with anything false, unless I have involuntarily put in something of my own. The times of which I am going to speak are very remote: how much are you changed from what you once were! It is, so to speak, the life of your species which I am going to write, after the qualities which you have received, which your education and habits may have depraved, but cannot have entirely destroyed. There is, I feel, an age at which the individual man would wish to stop: you are about to inquire about the age at which you would have liked your whole species to stand still. Discontented with your present state, for reasons which threaten your unfortunate descendants with still greater discontent, you will perhaps wish it were in your power to go back; and this feeling should be a panegyric on your first ancestors, a criticism of your contemporaries, and a terror to the unfortunates who will come after you.

啊！人啊，不论你来自何方，持何观点，请倾听我的话语吧！你们将听到你们的历史，我自信我已经读过它，它不存在于你们同类所编写的书籍中，因为他们谎话连篇，它仅存在于从不撒谎的自然之书中。我所说的一切皆源于自然，没有任何不实之词，如果出现虚假成分，则是我无意中掺入了自己的看法。我将要谈到的时代极为悠远。相比过去，你们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我要描述的是你们这类生灵的生活方式，从你们的天赋秉性写起，但这些禀性已经被你们的教育和习惯所败坏，所幸尚未完全毁灭。我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个时代，每一个个体都愿意停留其中。如你们有意愿，你们将会去追寻让整个人类都愿意停留其中的那个时代。因为种种原因，你们对现状感到不满，而这些原因预示着你们不幸的子孙将会感到更加不满，所以你们

可能希望自己有能力回到从前。这种情愫可以看作是对你们先祖的颂扬，对同时代人的谴责，并令你们不幸的后人深感恐惧。

The First Part

第一部分

IMPORTANT as it may be, in order to judge rightly of the natural state of man, to consider him from his origin, and to examine him, as it were, in the embryo of his species; I shall not follow his organisation through its successive developments, nor shall I stay to inquire what his animal system must have been at the beginning, in order to become at length what it actually is. I shall not ask whether his long nails were at first, as Aristotle supposes, only crooked talons; whether his whole body, like that of a bear, was not covered with hair; or whether the fact that he walked upon all fours, with his looks directed toward the earth, confined to a horizon of a few paces, did not at once point out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his ideas. On this subject I could form none but vague and almost imaginary conjectures. Comparative anatomy has as yet made too little progress, and the observations of naturalists are too uncertain to afford an adequate basis for any solid reasoning. So that, without having recourse to the supernatural information given us on this head, or paying any regard to the changes which must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internal, as well as the external, conformation of man, as he applied his limbs to new uses, and fed himself on new kinds of food, I shall suppose his conformation to have been at all times what it appears to us at this day; that he always walked on two legs, made use of his hands as we do, directed his looks over all nature, and measured with his eyes the vast expanse of Heaven.

为了正确地判断人类的自然状态，我们需要从人类最初的起源来考虑，可以说是从人类最初胚胎时期来研究。尽管这很重要，但我并不打算探索人类在连续不断的进化完善过程中的身体构造：我不想停下笔来研究在动物体系中人类是怎样从他最初的样子最终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我也不想去探究是否真像亚里士多德所想的，最初人类的长指甲不过是弯曲着的爪子；我不想探究是否人类的身体并不像熊一样覆盖着一层厚毛；我也不想探求人类是否因四足行走，目光向下，视野局限于几步之遥，才不能立刻看到自己的本质和思想的局限。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能作一些模糊的、近乎于想象的猜测。比较解剖学至今尚未取得充分的发展，自然哲学的观察结果也尚待证实，因而不能以此为据建立坚实的论证基础。因此，如果不借助于我们被赐予的超自然知识，也不去关注人类由于将四肢用于新用途和习惯于新食物而使身体内外构造都必然发生的那些变化，那么我会认为人类的身体构造一直以来都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样：双足行走，双手做事，放眼世界，极目苍穹。

If we strip this being, thus constituted, of all the supernatural gifts he may have received, and all the artificial faculties he can have acquired only by a long process; if we consider him, in a word, just as he must have come from the hands of nature, we behold in him an animal weaker than some, and less agile than others; but, taking him all round, the most advantageously organised of any. I see him satisfying his hunger at the first oak, and slaking his thirst at the first brook; finding his bed at the foot of the tree which afforded him a repast; and, with that, all his wants supplied.

倘若从如此构造的生灵身上，剥去他已经接受的所有超自然的天赋，剥去他通过长期进化逐步获得的所有后天的能力，总之，如果我们把他当成刚刚脱离自然的人，那么，我所看到的人便是这样的一种动物：他既没有某些动物那么强悍凶猛，也没有其他动物那么灵活敏

捷。但是，总体来讲，其身体构造的完善度高于任何一种生灵。我看到他找到橡果就充饥，遇到小溪就解渴，还看见他在为他提供食物的树下小憩，如此他全部的需求就都满足了。

While the earth was left to its natural fertility and covered with immense forests, whose trees were never mutilated by the axe, it would present on every side both sustenance and shelter for every species of animal. Men, dispersed up and down among the rest, would observe and imitate their industry, and thus attain even to the instinct of the beasts, with the advantage that, whereas every species of brutes was confined to one particular instinct, man, who perhaps has not any one peculiar to himself, would appropriate them all, and live upon most of those different foods which other animals shared among themselves; and thus would find his subsistence much more easily than any of the rest.

倘若大地依旧天然肥沃，而且覆盖着从未遭受刀斧砍伐的茂密森林，处处都能够为每一种生灵提供生活资料和栖息之地。生活于其他动物之中的人类，通过观察和模仿它们的技巧，习得了兽类的本能。人类具有这样一种优势：每一种动物都局限于自己某种独特的本能，而人类虽然很可能并不具有任何专属的本能，但却能使用其他各种兽类的本能。同理，其他动物仅能在同类间分配食物，而绝大部分的食物人类都能享用，因此人类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易觅食。

Accustomed from their infancy to the inclemencies of the weather and the rigour of the seasons, inured to fatigue, and forced, naked and unarmed, to defend themselves and their prey from other ferocious animals, or to escape them by flight, men would acquire a robust and almost unalterable constitution. The children, bringing

with them into the world the excellent constitution of their parents, and fortifying it by the very exercises which first produced it, would thus acquire all the vigour of which the human frame is capable. Nature in this case treats them exactly as Sparta treated the children of her citizens: those who come well formed into the world she renders strong and robust, and all the rest she destroys; differing in this respect from our modern communities, in which the State, by making children a burden to their parents, kills them indiscriminately before they are born.

自幼年起，人类便适应了恶劣的天气和严酷的季节，习惯了生活中的劳累辛苦。为了自我防御、保护捕获的猎物不被森林中的其他野兽抢走，人类不得不赤身裸体、赤手空拳地勇斗猛兽；或者至少他们为了躲避凶猛的野兽，不得不拼命奔跑，也由此造就了强壮结实的、几乎不会改变的体质。孩子降生时便遗传了其父母的优良体质，并用原来造就这种体质的同样的锻炼方法来加强自己的体质，由此获得了人类所能拥有的全部体力。大自然对待他们，恰如斯巴达古国人对待其子民的孩子一样：她让生而体壮的孩子茁壮成长，而让其余的孩子夭亡。这一点与我们的社会大相径庭。我们的国度让父母将孩子视为累赘，甚至在孩子尚未出生时便不分优劣地将他们置于死地了。

The body of a savage man being the only instrument he understands, he uses it for various purposes, of which ours, for want of practice, are incapable: for our industry deprives us of that force and agility, which necessity obliges him to acquire. If he had had an axe, would he have been able with his naked arm to break so large a branch from a tree? If he had had a sling, would he have been able to throw a stone with so great velocity? If he had had a ladder, would he have been so nimble in climbing a tree? If he had had a horse, would he have been himself so swift of foot? Give civilised

man time to gather all his machines about him, and he will no doubt easily beat the savage; but if you would see a still more unequal contest, set them together naked and unarmed, and you will soon see the advantage of having all our forces constantly at our disposal, of being always prepared for every event, and of carrying one's self, as it were, perpetually whole and entire about one.

由于身体是野蛮人能够熟练掌握的唯一工具，于是他把身体用在不同的方面；而我们的身体由于缺乏锻炼而鲜有用处。技术的应用使我们丧失了野蛮人因生计所迫而必备的那种力量和敏捷。假予短斧一柄，他是否还能用手臂轻易地从橡树上折断粗壮的枝丫？假予投石器一架，他是否还能徒手掷石于千米之外？假予云梯一把，他是否还能机敏灵活，缘树如猴？假予良驹一匹，他是否还能健步如飞，纵横原野？给文明人充裕的时间去集结所有的装备，毫无疑问，他们制服野蛮人易如反掌。不过倘若你有意目睹一场实力更为悬殊的竞技，就让双方赤膊上阵，徒手比试吧。你很快便会发现：优势永远属于那些能游刃有余地运用自身力量，随时准备应对各种事件，可以说总能全力以赴的人。

Hobbes contends that man is naturally intrepid, and is intent only upon attacking and fighting. Another illustrious philosopher holds the opposite, and Cumberland and Puffendorf also affirm that nothing is more timid and fearful than ma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at he is always in a tremble, and ready to fly at the least noise or the slightest movement. This may be true of things he does not know; and I do not doubt his being terrified by every novelty that presents itself, when he neither knows the physical good or evil he may expect from it, nor can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his own strength and the dangers he is about to encounter. Such

circumstances, however, rarely occur in a state of nature, in which all things proceed in a uniform manner, and the face of the earth is not subject to those sudden and continual changes which arise from the passions and caprices of bodies of men living together. But savage man, living dispersed among other animals, and finding himself betimes in a situation to measure his strength with theirs, soon comes to compare himself with them; and, perceiving that he surpasses them more in adroitness than they surpass him in strength, learns to be no longer afraid of them. Set a bear, or a wolf, against a robust, agile, and resolute savage, as they all are, armed with stones and a good cudgel, and you will see that the danger will be at least on both sides, and that, after a few trials of this kind, wild beasts, which are not fond of attacking each other, will not be at all ready to attack man, whom they will have found to be as wild and ferocious as themselves. With regard to such animals as have really more strength than man has adroitness, he is in the same situation as all weaker animals, which notwithstanding are still able to subsist; except indeed that he has the advantage that, being equally swift of foot, and finding an almost certain place of refuge in every tree, he is at liberty to take or leave it at every encounter, and thus to fight or fly, as he chooses. Add to this that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any animal naturally makes war on man, except in case of self-defenceor excessive hunger, or betrays any of those violent antipathies, which seem to indicate that one species is intended by nature for the food of another.

霍布斯认为人生来无所畏惧，且喜好攻击打斗。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则意见相左，其观点得到坎伯兰和普芬道夫的认同。该哲学家认为没有比在自然状态中的人更胆小的了，他总是战战兢兢，一察觉到细微的动作、一耳闻到轻微的声响便立刻逃跑。的确，人对于那些感到陌生的事物，确实会产生这种反应。我也毫不怀疑，每当人看到任

何新景象时都会表现出极度的恐惧，因为他辨别不了眼前的事物对他的利害关系，也不能够把自己的能力与面临的危险进行比较。然而这些情形在自然状态中却鲜有出现。在自然状态中，所有的事物皆以统一的方式向前发展，大地上不易发生那些因聚居人群的欲望膨胀和恣意妄为而引起的突然而持续的变故。但是，生活于其他动物间的野蛮人，没有社会团体，居无定所，却早早发现了权衡自身力量与其他动物力量的必要性。很快，野蛮人发现他在技巧上的优势超过了其他动物在体力上的优势，自此便学着不再害怕其他动物。倘若使一只狗熊或一匹野狼与一个身强体壮、机敏灵活、刚毅勇敢（所有野蛮人皆如此）并有石块与坚棒的野蛮人较量，不久你就会发现危险对于双方来讲至少是均等的。经过几番如此的试探，素来就不喜欢相互攻击的野兽们也就不太愿意去进攻人类了，因为它们发现人类与它们一样凶猛无比。对于有些动物，它们在力量上的优势确实远胜于人类在技巧上的优势，人类在它们面前恰如其他弱小的动物，然而，弱小的动物总能找到生存下去的方法。人类甚至有弱小动物所没有的优势：除了能与它们一样快步疾飞，能在任何一棵树上找到难以入侵的避难所外，人类还可根据自身的需求自由选择是守还是弃，当然也可依据适合自己的情况选择是战还是逃。而且，我们说没有动物是生来就要攻击人类的，除非是迫于自我防卫或饥饿难耐。动物也从来没有对人类表现过任何强烈的反感，而这种反感似乎表明某些特定物种天生注定要成为其他物种的口中餐、腹中食。

This is doubtless why negroes and savages are so little afraid of the wild beasts they may meet in the woods. The Caraibs of Venezuela among others live in this respect in absolute security and without the smallest inconvenience. Though they are almost naked, Francis Corréal tells us, they expose themselves freely in the woods, armed only with bows and arrows; but no one has ever heard of one of them being devoured by wild beasts.

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何当黑人与野蛮人在树林里遇到野兽时，他们并不害怕。其中在这方面委内瑞拉的加拉伊波人就居住在绝对安全的地方，也没有任何不方便。弗朗索瓦·柯勒阿就说，尽管他们几乎全裸，也自由地露身在树林中，只配有弓和箭，然而从未有人听过他们中有人被野兽吃掉了。

But man has other enemies more formidable, against which is is not provided with such means of defence: these are the natural infirmities of infancy, old age, and illness of every kind, melancholy proofs of our weakness, of which the two first are common to all animals, and the last belongs chiefly to man in a state of society. With regard to infancy, it is observable that the mother, carrying her child always with her, can nurse it with much greater ease than the females of many other animals, which are forced to be perpetually going and coming, with great fatigue, one way to find subsistence, and another to suckle or feed their young. It is true that if the woman happens to perish, the infant is in great danger of perishing with her; but this risk is common to many other species of animals, whose young take a long time before they are able to provide for themselves. And if our infancy is longer than theirs, our lives are longer in proportion; so that all things are in this respect fairly equal; though there are other rules to be considered regarding the duration of the first period of life, and the number of young, which do not affect the present subject. In old age, when men are less active and perspire little, the need for food diminishes with the ability to provide it. As the savage state also protects them from gout and rheumatism, and old age is, of all ills, that which human aid can least alleviate, they cease to be, without others perceiving that they are no more, and almost without perceiving it themselves.

但是，人类有另外一些更为可怕的敌人，而且不能用上述的防御方法来对付。这里所说的敌人便是幼小、衰老和各种疾病等天然弱点。这些都不幸地证明了我们的弱点。其中前两项为所有动物所共有，而最后一项则主要关乎生活在社会状态中的人类。论及幼弱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到，母亲无论走到哪里都携带着自己的幼子，不离左右，她们与其他许多母兽相比，更能起到养育的责任，还省却了不少麻烦。而那些母兽们被迫不断往来穿梭，劳碌不堪，一则为了觅食维持生存，一则为了哺乳和喂养它们的幼崽。诚然，如果母亲不幸死亡，孩子随母亲死亡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对于那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自食其力的其他许多动物的幼崽来说，同样会面临这种危险。如果我们的幼年期比别的动物长，那么我们的寿命同样也比它们长。因此，所有的动物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虽然在幼年期的长短上和幼儿数量的多少上还存在着其他的规律，但这些与我所探讨的问题无关。至于老年人，他们因活动少、出汗少，对食物的需求随着提供食物的能力的减弱而相应减少。虽然生活在蛮荒状态的野蛮人不会患上痛风和风湿等疾病，但衰老则是所有不幸中人类最无能为力的一项，他们最终会悄无声息地离去，非但别人不会注意到他们的消逝，连他们自己几乎也觉察不到。

With respect to sickness, I shall not repeat the vain and false declamations which most healthy people pronounce against medicine; but I shall ask if any solid observations have been made from which it may be justly concluded that, in the countries where the art of medicine is most neglected, the mean duration of man's life is less than in those where it is most cultivated. How indeed can this be the case, if we bring on ourselves more diseases than medicine can furnish remedies? The great inequality in manner of living, the extreme idleness of some, and the excessive labour of others, the easiness of exciting and gratifying our sensual appetites, the too exquisite foods of the wealthy which overheat and fill them with indiges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wholesome food of

the poor, often, bad as it is, insufficient for their needs, which induces them, when opportunity offers, to eat voraciously and overcharge their stomachs; all these, together with sitting up late, and excesses of every kind, immoderate transports of every passion, fatigue, mental exhaustion, the innumerable pains and anxieties inseparable from every condition of life, by which the mind of man is incessantly tormented; these are too fatal proofs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our ills are of our own making, and that we might have avoided them nearly all by adhering to that simple, uniform and solitary manner of life which nature prescribed. If she destined man to be healthy, I venture to declare that a state of reflection is a state contrary to nature, and that a thinking man is a depraved animal. When we think of the good constitution of the savages, at least of those whom we have not ruined with our spirituous liquors, and reflect that they are troubled with hardly any disorders, save wounds and old age, we are tempted to believe that, in following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we shall be telling also that of human sickness. Such, at least, was the opinion of Plato, who inferred from certain remedies prescribed, or approved, by Podalirius and Machaon at the siege of Troy, that several sicknesses which these remedies gave rise to in his time, were not then known to mankind: and Celsus tells us that diet, which is now so necessary, was first invented by Hippocrates.

至于疾病，我不想去重复大多数健康人士质疑药物作用的那些无用虚伪的言论。试问，是否有确凿的观察结果足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医术最被忽视的国度里的人的平均寿命，是否要比在医术最发达的国度里的人的平均寿命短？假使我们罹患的疾病比医学的治疗方法还多，又怎么会出现那种情况呢？人类不同等级的生活方式极为不平等，一些人过于安逸闲散，而其他人则过于劳碌奔波；我们的情欲和食欲容易被激起，也容易得到满足；富人的饮食过于考究，在带

给他们丰富营养的同时，也会使他们消化不良；穷人的食物不但不健康，而且往往难以果腹。食物匮乏难免使其一有机会便暴饮暴食，增加肠胃负担；还有彻夜不眠、种种过度、情欲放纵、身体疲劳、精神衰竭等等。总之，凡此种种都会引起人类无数的痛苦与焦虑，折磨着人类的精神。这一切都很好地证明了我们大部分的苦痛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导致的。如果我们能够坚守大自然赋予我们的那种简朴、单一、恬静的生活方式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所有的不幸与痛楚。倘若自然欲使我们永远身康体健，那么我几乎可以断言，思考便是一种违反自然的状态，而沉思的人则是堕落的动物。我们仅需思考一下野蛮人的良好体质，至少应该想想那些还没有被我们的烈酒毁坏身体的野蛮人。我们仅需思考，为什么他们除了由受伤和衰老引起的疾病之外，竟不知疾病为何物，就会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循着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便能轻而易举地编写出人类疾病的历史。至少柏拉图是这样认为的。他的结论源于特洛伊城被围困时希腊军医波达利里俄斯和玛卡翁使用过或赞成使用的某些治病药方。他认为这些药物引起的一些疾病，在那样遥远的年代尚无人知晓。

Being subject therefore to so few causes of sickness, ma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can have no need of remedies, and still less of physicians: nor is the human race in this respect worse off than other animals, and it is easy to learn from hunters whether they meet with many infirm animals in the course of the chase. It is certain they frequently meet with such as carry the marks of having been considerably wounded, with many that have had bones or even limbs broken, yet have been healed without any other surgical assistance than that of time, or any other regimen than that of their ordinary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ir cures seem not to have been less perfect, for their not having been tortured by incisions, poisoned with drugs, or wasted by fasting. In short, however useful medicine, properly administered, may be among us, it is certain that, if the savage, when he is sick and left to himself, has nothing

to hope but from nature, he has, on the other hand, nothing to fear but from his disease; which renders his situation often preferable to our own.

由于自然界中鲜有病源，因此，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人没什么必要服用药物，更不需要医生了。从这一点上看，人比其他种类的动物并不应受到更多同情。试问以狩猎为乐或为生的人，他们在狩猎时，可曾遇到过许多患病或孱弱的动物？他们遇到过许多动物，有的浑身都是重伤后愈合完好的伤疤；有的曾经骨折，有的肢体几乎被撕掉，但它们断裂处的骨头已完全接好长合。它们的痊愈不是靠外科医生的医治，也没有任何的养生疗法，而只有惯常的生活方式。有些疗法堪称完美，因为它们不曾遭受手术的痛苦、药物的毒害或节食禁欲的折磨。总之，无论精良的药物对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状态中的人多么有用，都毋庸置疑：一方面，由于缺乏帮助，患病的野蛮人只有寄希望于自然；另一方面，除了害怕疾病外，他无所畏惧。这常使野蛮人的生存状况优于我们。

We should beware, therefore, of confounding the savage man with the men we have daily before our eyes. Nature treats all the animals left to her care with a predilection that seems to show how jealous she is of that right. The horse, the cat, the bull, and even the ass are generally of greater stature, and always more robust, and have more vigour, strength and courage, when they run wild in the forests than when bred in the stall. By becoming domesticated, they lose half these advantages; and it seems as if all our care to feed and treat them well serves only to deprave them. It is thus with man also: as he becomes sociable and a slave, he grows weak, timid and servile; his effeminate way of life totally enervates his strength and courage. To this it may be added that there is still a greater difference between savage and civilised man, than between wild

and tame beasts: for men and brutes having been treated alike by nature, the several conveniences in which men indulge themselves still more than they do their beasts, are so many additional causes of their deeper degeneracy.

因此，谨防把野蛮人与我们平常看到和交谈的人混淆起来。自然以偏爱之心照管其麾下的所有动物，她的偏爱似乎证明她是何等地珍视这种特权。生活在森林中的马、猫、公牛，还有驴子，普遍比家养的有更高大的身躯、强壮的体质、旺盛的精力，还有更多力量和胆量。驯养之后，它们原有优势的一半都消失殆尽。由此看来，反倒是我们对它们的善待与精心喂养使其退化了。人也如此。随着他成为社会人和为人所役的奴仆，他变得懦弱、怕事、卑劣，他那软弱和萎靡的生活方式使他曾经的勇气和力量顷刻间荡然无存。可以说，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差异，比起野兽与家畜之间的差异必然要大一些。因为尽管自然对人类与野兽都是同等对待，但是与家养的动物相比，人会更多地放纵自己于种种享乐之中，这些便是使人类退化得更为显著的特殊原因。

It is not therefore so great a misfortune to these primitive men, nor so great an obstacle to their preservation, that they go naked, have no dwellings and lack all the superfluities which we think so necessary. If their skins are not covered with hair, they have no need of such covering in warm climates; and, in cold countries, they soon learn to appropriate the skins of the beasts they have overcome. If they have but two legs to run with, they have two arms to defend themselves with, and provide for their wants. Their children are slowly and with difficulty taught to walk; but their mothers are able to carry them with ease; an advantage which other animals lack, as the mother, if pursued, is forced either to abandon her young, or to regulate her pace by theirs. Unless, in short, we

suppose a singular and fortuitous concurrence of circumstances of which I shall speak later, and which would be unlikely to exist, it is plain in every state of the case, that the man who first made himself clothes or a dwelling was furnishing himself with things not at all necessary; for he had till then done without them, and there is no reason why he sh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put up in manhood with the same kind of life as had been his in infancy.

因此，赤身裸体、无家可归，以及所有无用之物——我们视之为不可或缺，这些对原始人来说却并不是大不幸，更谈不上会对其自我保护产生障碍了。诚然，他们的身上没有毛发覆盖。再说，在温暖的气候中也没有长毛的必要。要是身处寒冷地带，他们不久就能学会利用所捕获的动物的皮毛来御寒。虽然他们只有双足奔跑，但他们却能用双手自卫并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教孩子行走或许耗去他们大量的时间，并带来许多麻烦，但是母亲们携带幼子却非常容易，这一点是其他物种都不具备的优势，母兽们在遭遇追击时，只得放弃幼崽，或者放慢脚步与幼崽一致。总之，除非我们承认发生了那些偶然的事件（我将在后文讲到这点），而它们在现实中很可能从来都未存在过。很显然，从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来讲，第一个为自己制作衣服、建造房屋的人无端地制造了一些自己不怎么需要的东西，因为在此之前没有这些东西他们一样生活得很好。可为什么到了成年之后他们却不能忍受他们在幼年时代的生活方式？

Solitary, indolent, and perpetually accompanied by danger, the savage cannot but be fond of sleep; his sleep too must be light, like that of the animals, which think but little and may be said to slumber all the time they do not think. Self-preservation being his chief and almost sole concern, he must exercise most those faculties which are most concerned with attack or defence, either for overcoming his prey, or for preventing him from becoming the prey

of other animals.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organs which are perfected only by softness and sensuality will remain in a gross and imperfect state, incompatible with any sort of delicacy; so that, his senses being divided on this head, his touch and taste will be extremely coarse, his sight, hearing and smell exceedingly fine and subtle. Such in general is the animal condition, and such, according to the narratives of travellers, is that of most savage nations. It is therefore no matter for surprise that the Hottentots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distinguish ships at sea, with the naked eye, at as great a distance as the Dutch can do with their telescopes; or that the savages of America should trace the Spaniards, by their smell, as well as the best dogs could have done; or that these barbarous peoples feel no pain in going naked, or that they use large quantities of piemento with their food, and drink the strongest European liquors like water.

孤独清闲，经常与危险为伍的野蛮人一定很喜欢睡觉，且需像其他动物一样睡得很轻。他们很少思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不思考的时候就是睡眠的状态：自我保护几乎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因此野蛮人必须要常常练习进攻和防御的本领，要么用于捕获猎物，要么用于保护自己避免成为其他动物的美餐。相反，野蛮人身上那些只有通过逸乐和情欲才能趋于完善的器官，必然停留在粗鄙的状态，与一切文雅皆不相容。他的感官在这一点上分化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所以他的触觉、味觉一定极为迟钝，而视觉、听觉及嗅觉则都异常敏锐。总的来说，动物都是如此。因此，如果我们相信旅行家的话，这也应该是大多数野蛮民族的状态了。因此，我们就没有必要为以下的情形感到惊诧不已了：为什么好望角的霍屯督人能用肉眼辨认大洋深处的船只，和荷兰人用望远镜看得一样远？为什么美洲的野蛮人仅靠嗅觉便能判断西班牙人的行径，其准确度堪与最优良的猎狗相媲美？为什么那些野蛮人赤身裸体而不感到痛苦，能食用大量的辣椒来增进食欲，能如喝水般畅饮欧洲最烈的酒？

Hitherto I have considered merely the physical man; let us now take a view of him on his metaphysical and moral side.

至此，我仅论及了野蛮人的生理状况。接下来，让我们试着从形而上学和精神方面来观察他。

I see nothing in any animal but an ingenious machine, to which nature hath given senses to wind itself up, and to guard itself, to a certain degree, against anything that might tend to disorder or destroy it. I perceive exactly the same things in the human machine, with this difference, that in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ute, nature is the sole agent, whereas man has some share in his own operations, in his character as a free agent. The one chooses and refuses by instinct, the other from an act of free-will: hence the brute cannot deviate from the rule prescribed to it, even when it would be advantageous for it to do so; and, on the contrary, man frequently deviates from such rules to his own prejudice. Thus a pigeon would be starved to death by the side of a dish of the choicest meats, and a cat on a heap of fruit or grain; though it is certain that either might find nourishment in the foods which it thus rejects with disdain, did it think of trying them. Hence it is that dissolute men run into excesses which bring on fevers and death; because the mind depraves the senses, and the will continues to speak when nature is silent.

在我看来，任何动物只不过是一部精巧的机器而已，自然赋予它一些感官，使其运转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它能够防御任何可能对它造成的破坏和扰乱。在人这部机器上，情况何其相同！但有一点例

外，那便是，在运作野兽这台机器时，自然是唯一的操作者；而人，作为一个自主的行为体，在其运作过程中享有部分权利。野兽依靠本能进行选择，而人类靠的则是自由的意志。由此，野兽无法偏离自然为其设定的法则，即使是这种偏离会对其有利。而人经常在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偏离法则。所以，一只在盛满美味鲜肉的盘子旁的鸽子，和一只守着一堆水果或谷物的猫咪都可能会饿死。只要它们想到不妨尝试一下身边的美食，它们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尽管它们对这些食物有些鄙弃。这种试一试的做法致使一些人为所欲为，因而招致疾病与死亡。因为思想毁坏感官，在自然的需求已得到满足时，意志依然无止境地提出要求。

Every animal has ideas, since it has senses; it even combines those ideas in a certain degree; and it is only in degree that man differs, in this respect, from the brute. Some philosophers have even maintained that there is a greater difference between one man and another than between some men and some beasts. It is not, therefore, so muc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constitutes the specif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n and the brute, as the human quality of free-agency. Nature lays her commands on every animal, and the brute obeys her voice. Man receives the same impuls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knows himself at liberty to acquiesce or resist: and it is particularly in his consciousness of this liberty that the spirituality of his soul is displayed. For physics may explain, in some measure, the mechanism of the senses and the formation of ideas; but in the power of willing or rather of choosing, and in the feeling of this power, nothing is to be found but acts which are purely spiritual and wholly inexplicable by the laws of mechanism.

动物皆有感官，因而也都有观念，它们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把观念组织起来。而人和野兽的差别仅体现在程度的不同。一些哲学家甚

至认为一些人与另一些人之间的差别更甚于一些人与一些野兽之间的差别。因此，在动物界，与其说是理解能力突显了人的特征，不如说是作为自主的行为体的特性将人从动物中区分出来。自然向一切动物发号施令，野兽们唯命是从。人与动物都认识到自然的支配性，但与此同时，他还意识到自己能自主地选择是拒绝还是服从。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这种自由，他心智的灵性才得以彰显：自然哲学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感官的运作机制和观念的形成原理，但对人的意志力，更确切地说是选择力，以及在对这种能力的认识方面，我们只能发现一些纯粹的精神活动，而这些活动是不能用力学原理来解释的。

However, even if the difficulties attending all these questions should still leave room for difference in this respect between men and brutes, there is another very specific quality which distinguishes them, and which will admit of no dispute. This is the faculty of self-improvement, which, by the help of circumstances, gradually develops all the rest of our faculties, and is inherent in the species as in the individual: whereas a brute is, at the end of a few months, all he will ever be during his whole life, and his species, at the end of a thousand years, exactly what it was the first year of that thousand. Why is man alone liable to grow into a dotard? Is it not because he returns, in this, to his primitive state; and that, while the brute, which has acquired nothing and has therefore nothing to lose, still retains the force of instinct, man, who loses, by age or accident, all that his *perfectibility* had enabled him to gain, falls by this means lower than the brutes themselves? It would be melancholy, were we forced to admit that this distinctive and almost unlimited faculty is the source of all human misfortunes; that it is this which, in time, draws man out of his original state, in which he would have spent his days insensibly in peace and innocence; that it is this faculty, which, successively producing in different ages his discoveries and his errors, his vices and his

virtues, makes him at length a tyrant both over himself and over nature. It would be shocking to be obliged to regard as a benefactor the man who first suggested to the Oroonoko Indians the use of the boards they apply to the temples of their children, which secure to them some part at least of their imbecility and original happiness.

尽管涉及的问题中有各种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却给人与野兽之间的区别留下了争论的余地。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质使人与野兽区别开来，而且这个特质无可争议，那就是自我完善的能力。该能力借助于环境，使其他的能力相继显露出来；这种能力不仅存在于我们这个物种之中，也存在于构成物种的每一个个体的身上。而野兽则不然：几个月后，模样定形，且终身不变；即使逾经千年，也仍和千年前一样，没有丝毫的改变。为什么只有人类易于衰退，变得老弱糊涂呢？会不会是因为他在衰退中又回到了原始状态呢？会不会是野兽因无所得，便无所失，故能始终保持其本能；而人，因年老或意外事故丧失其在自我完善过程中的一切所得，以致沦落到比野兽还不如的境地？可悲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特殊的、近乎无限发展的能力正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根源。正是这种能力，使人类逐渐脱离了那种任凭时间流逝我自安宁无忧的原始生活状态；正是这种能力，赋予人类各具时代特色的种种发现和种种错误、种种美德和种种邪恶，最终使人成为他们自己和自然的暴君。奥里诺科河沿岸的印第安人用木片贴在他们孩子们的太阳穴上，认为这样至少可以让孩子们保留一部分纯朴的无知和幸福。如果我们被迫把第一个提议这样做的人赞誉为造福于人的人，那就太可怕了。

Savage man, left by nature solely to the direction of instinct, or rather indemnified for what he may lack by faculties capable at first of supplying its place, and afterwards of raising him much above it, must accordingly begin with purely animal functions: thus seeing and feeling must be his first condition, which would be common to

him and all other animals. To will, and not to will, to desire and to fear, must be the first, and almost the only operations of his soul, till new circumstances occasion new developments of his faculties.

野蛮人仅具有自然赋予的本能，更确切地讲，自然为了弥补野蛮人在本能上可能存在的缺陷，赋予了他一些能力。起初只是为了弥补其本能的缺陷，随后又提升，使其大大超越了本能。因此，野蛮人最初的能力都是纯动物性的：视觉和触觉或许是他最基本的能力，这与其他动物别无二致。在新环境促使他的能力得到发展之前，从某种程度上讲，愿或不愿、希望或恐惧，可能是人类最初的、所有的精神活动。

Whatever moralists may hold,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is greatly indebted to the passions, which, it is universally allowed, are also much indebted to the understanding. It is by the activity of the passions that our reason is improved; for we desire knowledge only because we wish to enjoy;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conceive any reason why a person who has neither fears nor desires should give himself the trouble of reasoning. The passions, again, originate in our wants, and their progress depends on that of our knowledge; for we cannot desire or fear anything, except from the idea we have of it, or from the simple impulse of nature. Now savage man, being destitute of every species of intelligence, can have no passions save those of the latter kind: his desires never go beyond his physical wants. The only goods he recognises in the universe are food, a female, and sleep: the only evils he fears are pain and hunger. I say pain, and not death: for no animal can know what it is to die; the knowledge of death and its terrors being one of the first acquisitions made by man in departing from an animal state.

不论伦理学家们持何观点，人类智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欲望；而欲望能否被满足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智力的发展。正是由于欲望的作用，我们的理性才得以发展：我们求知无非是贪图享受。因此很难想象一个既无恐惧感也无欲望的人会去劳神费心地思考。欲望本身源于我们的需求，欲望的膨胀源于科学的进步。除非我们对某种事物有了一定的想法，或者出于自然的简单冲动，否则我们不会对它产生渴求感或恐惧感。野蛮人没有知识，仅有自然冲动的欲望，因此他的欲望仅限于其生理需求。对他而言，好东西不外乎食物、女人和休息，恐惧的不过是疼痛和饥饿而已。我说的是疼痛，而不是死亡，那是因为这样的动物不知道死亡为何物。对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的认识，乃是人类脱离动物状态后所获得的最早的知识之一。

It would be easy, were it necessary, to support this opinion by facts, and to show that, in all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the progr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has been exactly proportionate to the wants which the peoples had received from nature, or been subjected to by circumstances, and in consequence to the passions that induced them to provide for those necessities. I might instance the arts, rising up in Egypt and expanding with the inundation of the Nile. I might follow their progress into Greece, where they took root afresh, grew up and lowered to the skies, among the rocks and sands of Attica, without being able to germinate on the fertile banks of the Eurotas: I might observe that in general, the people of the North are more industrious than those of the South, because they cannot get on so well without being so: as if nature wanted to equalise matters by giving their understandings the fertility she had refused to their soil.

如有必要，我可以信手引用许多事实来支持这一观点；我也不难

证明，就世界范围来看，人类智力的发展总是与其自然的需求或者迫于环境而产生的需求保持一致的步调，因此，也与促使人们去满足这些需求的种种欲望成正比。我还能证明埃及的艺术是随着尼罗河的泛滥而产生并传播开来的。我可以追寻艺术在希腊的发展踪迹：人们曾看见它们在阿提卡的沙砾间萌芽、生长继而成为参天大树，却无法在埃夫罗塔斯河沿岸肥沃的土地上扎根。我观察到生长在北方的人一般会比南方人更加勤劳，因为不如此便无法生存。好像自然着意使万物趋于平等，在土地欠肥沃的地方，自然便把高明的智慧赐给那里的人们。

But who does not see, without recurring to the uncertain testimony of history, that everything seems to remove from savage man both the temptation and the means of changing his condition? His imagination paints no pictures; his heart makes no demands on him. His few wants are so readily supplied, and he is so far from having the knowledge which is needful to make him want more, that he can have neither foresight nor curiosity. The face of nature becomes indifferent to him as it grows familiar. He sees in it always the same order, the same successions: he has not understanding enough to wonder at the greatest miracles; nor is it in his mind that we can expect to find that philosophy man needs, if he is to know how to notice for once what he sees every day. His soul, which nothing disturbs, is wholly wrapped up in the feeling of its present existence, without any idea of the future, however near at hand; while his projects, as limited as his views, hardly extend to the close of day. Such, even at present, is the extent of the native Caribbean's foresight: he will improvidently sell you his cotton-bed in the morning, and come crying in the evening to buy it again, not having foreseen he would want it again the next night.

然而，即便没有这些尚不确定的历史证据，谁又能看不出野蛮人想改变其所处状态的欲望和手段似乎在被剥夺、被蚕蚀呢？野蛮人的想象力不能为其描绘出任何图景；他的内心没有任何渴求。他的需求并不过分，随处举手即可满足。他远不具备那种能让他产生更多需求的知识，所以他既没有预见力，也没有好奇心。自然的景象，对他来说过于熟悉，因此最终都变得索然无趣。自然的景象总是周而复始，一成不变。野蛮人没有足够的感悟力去赞叹壮丽的自然奇观，我们也不指望在他的头脑中能找到人所必备的智慧，让他能观察每天见到的事物。由于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他的想法单一，唯一的关注就是眼前的生存感受。他从不为将来作打算，即便是不远的当下。他的计划如同他的视野一样有限，很少作出一整天的计划。时至今日，加勒比人的预见力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他通常早上卖掉棉褥，晚上又哭着再去买回来，不曾预见到当天晚上他还要用到它。

The more we reflect on this subject, the greater appears the distance between pure sensation and the most simple knowledge: it is impossible indeed to conceive how a man, by his own powers alone, without the aid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spur of necessity, could have bridged so great a gap. How many ages may have elapsed before mankind were in a position to behold any other fire than that of the heavens. What a multiplicity of chances must have happened to teach them the commonest uses of that element! How often must they have let it out before they acquired the art of reproducing it? and how often may not such a secret have died with him who had discovered it? What shall we say of agriculture, an art which requires so much labour and foresight, which is so dependent on others that it is plain it could only be practised in a society which had at least begun, and which does not serve so much to draw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from the earth—for these it would produce of itself—but to compel it to produce what is most to our taste? But let us suppose that men had so multiplied that the

natural produce of the earth was no longer sufficient for their support; a supposition, by the way, which would prove such a life to be very advantageous for the human race; let us suppose that, without forges or workshops, the instruments of husbandry had dropped from the sky into the hands of savages; that they had overcome their natural aversion to continual labour; that they had learnt so much foresight for their needs; that they had divined how to cultivate the earth, to sow grain and plant trees; that they had discovered the arts of grinding corn, and of setting the grape to ferment—all being things that must have been taught them by the gods, since it is not to be conceived how they could discover them for themselves—yet after all this, what man among them would be so absurd as to take the trouble of cultivating a field, which might be stripped of its crop by the first comer, man or beast, that might take a liking to it; and how should each of them resolve to pass his life in wearisome labour, when, the more necessary to him the reward of his labour might be, the surer he would be of not getting it? In a word, how could such a situation induce men to cultivate the earth, till it was regularly parcelled out among them; that is to say, till the state of nature had been abolished?

我们越是深思这个问题，就越会发现纯粹的感觉与最简单的知识之间的差距在加大。难以想象，人如何能仅凭一己之力，而不借助于与他人交流和需求的刺激，就跨越如此大的鸿沟。流转了多少漫长的岁月，人们才认识了雷电之外的火？发生多少偶然事件之后，他们才熟知火最基本的用途？火焰熄灭了多少次之后，他们才学会了生火的技术？又有多少次这些生火的秘诀才能流传下来，不因发现者的死亡而失传？关于农业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它作为一门技艺，除了需要大量的劳作和远见外，还需依赖于其他的技术而发展。显而易见，农业只能在社会中产生，即便不是在已经形成的社会，至少是在社会的某个阶段。农业与其说是从土地中获取无需耕种也能生长的食物，不

如说是让土地生长出那些我们最为喜爱、最合口味的食物。但是，假设人口激增到土地上的自然产品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顺便说一句，该假设证明这种生活方式对人类非常有利——假设没有锻造炉和铁砧，农业工具都从天而降，落入这些野蛮人的手中，假设他们都克服了对持续劳作的极度厌恶，假设他们早就学会了对自身需求的预见，假设他们准确地猜到了如何耕地、播种和植树，假设他们发现了碾谷技术和用葡萄汁发酵酿酒的技术，所有这一切我们只能认定是上帝教会他们的，因为我们难以想象他们是如何自己发现的。假如这一切都发生了，如果他们的劳动成果被第一个来到并看上这些成果的人或野兽抢走的话，又有谁会喜欢耕种土地呢？当他越需要辛苦劳作的成果、却越是得不到时，还有谁愿意整日辛苦劳作呢？总之，只要土地还没有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说，只要自然状态依然存在，如何能使人们欣然地去耕种土地呢？

Were we to suppose savage man as trained in the art of thinking as philosophers make him; were we, like them, to suppose him a very philosopher capable of investigating the sublimest truths, and of forming, by highly abstract chains of reasoning, maxims of reason and justice, deduced from the love of order in general, or the known will of his Creator; in a word, were we to suppose him as intelligent and enlightened, as he must have been, and is in fact found to have been, dull and stupid, what advantage would accrue to the species, from all such metaphysics, which could not be communicated by one to another, but must end with him who made them? What progress could be made by mankind, while dispersed in the woods among other animals? and how far could men improve or mutually enlighten one another, when, having no fixed habitation, and no need of one another's assistance, the same persons hardly met twice in their lives, and perhaps then, without knowing one another or speaking together?

即使我们假定野蛮人真像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善于思考，即使我们也像哲学家们那样把野蛮人看作一个哲学家，单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发现最崇高的真理，能通过高度抽象的逻辑推理，从对普遍秩序的热爱中或对造物主意志的认识中，创造出正义与理性的箴言：简言之，即使我们假定野蛮人聪慧明智（但实际上，他们却是那样蠢笨无知），那么，人类又能从所有这些既不能互相交流，又必然随着创造者的死亡而消逝的形而上学的发现中获得什么益处呢？这些分散在林中与其他动物混居的人类又能取得什么进步呢？没有固定的住所，不需要彼此协助，人们一生难得与相同的人谋面两次，相遇却互不交谈，互不相识。在这种状况下野蛮人能有何种改善呢，彼此之间又能有何种启迪？

Let it be considered how many ideas we owe to the use of speech; how far grammar exercises the understanding and facilitates its operations. Let us reflect on the inconceivable pains and the infinite space of time that the first invention of languages must have cost. To these reflections add what preceded, and then judge how many thousand ages must have elapsed in the successive development in the human mind of those operations of which it is capable.

试想一下，我们有多少思想观念的产生得益于言语的运用，语法对于锻炼和促进人类的思维活动起了多大的作用。再想一下，最初发明语言一定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辛痛苦与漫长岁月。根据这些假设与前面所作的阐述，我们就能作出判断，要经历多少个千年的漫长岁月，人类才能在其头脑中形成他所能进行的这些连续的思维活动。

I shall here take the liberty for a moment, of considering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origin of languages, on which subject I might

content myself with a simple repetition of the AbbéCondillac's investigations, as they fully confirm my system, and perhaps even first suggested it. But it is plain, from the manner in which this philosopher solves the difficulties he himself raises,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arbitrary signs, that he assumes what I question, viz., that a kind of society must already have existed among the first inventors of language. While I refer, therefore, to his observations on this head, I think it right to give my own, in order to exhibit the same difficulties in a light adapted to my subject. The first which presents itself is to conceive how language can have become necessary; for as there was no communication among men and no need for any, we can neither conceive the necessity of this invention, nor the possibility of it, if it was not somehow indispensable. I might affirm, with many others, that languages arose in the domestic intercourse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But this expedient would not obviate the difficulty, and would besides involve the blunder made by those who, in reasoning on the state of nature, always import into it ideas gathered in a state of society. Thus they constantly consider families as living together under one roof, and the individuals of each as observing among themselves a union as intimate and permanent as that which exists among us, where so many common interests unite them: whereas, in this primitive state, men had neither houses, nor huts, nor any kind of property whatever; every one lived where he could, seldom for more than a single night; the sexes united without design, as accident, opportunity or inclination brought them together, nor had they any great need of words to communicate their designs to each other; and they parted with the same indifference. The mother gave suck to her children at first for her own sake; and afterwards, when habit had made them dear, for theirs: but as soon as they were strong enough to go in search of their own food, they forsook her of their own accord; and, as they

had hardly any other method of not losing one another than that of remaining continually within sight, they soon became quite incapable of recognising one another when they happened to meet again. It is farther to be observed that the child, having all his wants to explain, and of course more to say to his mother than the mother could have to say to him, must have borne the brunt of the task of invention, and the language he used would be of his own device, so that the number of languages would be equal to that of the individuals speaking them, and the variety would be increased by the vagabond and roving life they led, which would not give time for any idiom to become constant. For to say that the mother dictated to her child the words he was to use in asking her for one thing or another, is an explanation of how languages already formed are taught, but by no means explains how languages were originally formed.

请允许我暂停片刻来谈谈语言产生时所遇到的诸多困难吧。在此，我仅想引用或重述孔狄亚克神父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但能充分证实我的理论体系，而且也许正是它们启发了我最初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但是从这位哲学家解决任意性语言符号的起源的方式来看，他把我质疑的东西当成了他假设的前提，即：在语言创始者中已经存在某种社会联系了。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引用他的观点的同时说明我的观点，以便从一种适合我的角度来说明同样的难题。首先呈现的难题是：语言因何成为必要。因为那时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来往，也就没有交流的必要，如果可以没有语言，那就没有考虑发明语言的必要了，也没有发明语言的可能性了。和其他许多人所持的观点相同，我也认为语言源于父母子女之间家庭内部的交流。但是这种观点，不但解决不了任何难题，还会犯那些把在社会中获得的观点强加于自然状态上的人所犯的错误。在他们看来，家庭即指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家庭成员就像我们在文明国家中看到的那样和睦相处，许多共同的利益让他们结合成亲密而持久的关系。但在原始状态

中，人没有窝棚，没有房屋，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财产。每个人都随意找栖身之所，很少能在同一地方度过两晚。男女的结合也没有任何预先计划，或者是机缘，或者是偶然，或者是欲望让他们走到一起，他们基本上也不需要语言来交流彼此的想法。他们聚得容易，散得也容易。孩子呱呱落地，母亲喂养孩子，这仅出自于她自己的生理需求。但是随后由于习惯和风俗使孩子对她变得重要，她开始疼爱孩子。一旦孩子们能独立觅食，他们便会主动离开母亲的怀抱。除非母子一直不离左右才不会忘记彼此，否则他们很快就会彼此相忘，即使以后偶然相遇也不会相识。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我发现，孩子需要表达种种需求，因此孩子要对母亲说的事情比母亲要向他说的还要多。孩子在语言发明上承担了重大的责任，而且他使用的绝大部分的语言应当是自己所创。这就使得语言的种类与使用它的人的数量一样多。此外，人类浪迹天涯、居无定所的生活更加剧了语言的多样化，使得任何习语都来不及固定下来。母亲可能会教孩子使用某些词语来向她表达他们的需要，虽然这能很好地解释已经形成的语言是通过何种方式传授的，却不能说明语言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We will suppose, however, that this first difficulty is obviated. Let us for a moment then take ourselves as being on this side of the vast space which must lie between a pure state of nature and that in which languages had become necessary, and, admitting their necessity, let us inquire how they could first be established. Here we have a new and worse difficulty to grapple with; for if men need speech to learn to think, they must have stood in much greater need of the art of thinking, to be able to invent that of speaking. And though we might conceive how the articulate sounds of the voice came to be taken as the conventional interpreters of our ideas, it would still remain for us to inquire what could have been the interpreters of this convention for those ideas, which, answering to no sensible objects, could not be indicated either by gesture or voice; so that we can hardly form any tolerable conjectures about

the origin of this art of communicating our thoughts and establishing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inds: an art so sublime, that far distant as it is from its origin, philosophers still behold it at such an immeasurable distance from perfection, that there is none rash enough to affirm it will ever reach it, even though the revolutions time necessarily produces were suspended in its favour, though prejudice should be banished from our academies or condemned to silence, and those learned societies should devote themselves uninterruptedly for whole ages to this thorny question.

让我们假设第一个难题已经解决了：让我们暂且跨过语言由纯粹的自然状态到成为必需的那段漫长时期，让我们先假定语言是必要的，再来探究它们是如何开始形成的。这时，新难题出现了，而且比前一个更难解答。因为，如果说人类需要用言语来学习思维的话，那么为了发明语言，他们更需要先学会思考。而且即使我们能够理解有声语言是如何成为表达我们思想观念的约定工具的，但是我们仍无法知道那些抽象的、无法被感知的、既无法用手势又不能用声音来表达的思想，是通过什么约定的工具来表达的。因此，对于这种交流思想和建立精神联系的技艺的诞生情况，我们至今仍难以作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猜测。语言这一艺术如此精深，虽然早已远离其源头，但哲学家们仍然在一个离其完美化遥不可及的地方研究它。纵使时间必然带来的变革有利地得到了推迟，纵使我们的学者们能够摒弃偏见或者至少让持偏见者保持沉默，纵使学术界数百年来穷尽其毕生精力、潜心研究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我也从未见过他们中有如此大胆的人敢去断言语言曾经达到过完美的程度。

The first language of mankind, the most universal and vivid, in a word the only language man needed, before he had occasion to exert his eloquence to persuade assembled multitudes, was the simple cry of nature. But as this was excited only by a sort of

instinct on urgent occasions, to implore assistance in case of danger, or relief in case of suffering, it could be of little use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life, in which more moderate feelings prevail. When the ideas of men began to expand and multiply, and closer communication took place among them, they strove to invent more numerous signs and a more copious language. They multiplied the inflections of the voice, and added gestures, which are in their own nature more expressive, and depend less for their meaning on a prior determination. Visible and movable objects were therefore expressed by gestures, and audible ones by imitative sounds: but, as hardly anything can be indicated by gestures, except objects actually present or easily described, and visible actions; as they are not universally useful—for darkness or the interposition of a material object destroys their efficacy—and as besides they rather request than secure our attention; men at length bethought themselves of substituting for them the articulate sounds of the voice, which, without bearing the same relation to any particular ideas, are better calculated to express them all, as conventional signs. Such an institution could only be made by common consent, and must have been effected in a manner not very easy for men whose gross organs had not been accustomed to any such exercise. It is also in itself still more difficult to conceive, since such a common agreement must have had motives, and speech seems to have been highly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use of it.

在人类还没有必要使用语言劝说聚集在一起的民众之前，其最初的语言，即所有语言中使用最普遍、最具活力的语言，简言之就是人类需要使用的唯一的语言，是自然的呼喊。因为这种呼喊是在紧要关头由本能的激发而形成的，在身处危险之际它被用来寻求帮助，或者在承受剧痛之时用来减轻痛苦，在日常生活中则少有用途，因为平时人们的情感都比较温和。当人类的思想观念开始扩展并逐渐增多，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日趋密切的时候，他们便致力于创造出更多的符号和一种使用更为广泛的语言：他们增加了音调变化，并辅以手势。手势就其本质而言更富于表现力，而且其含义也较少依赖于任何预先规定的含义。于是，人们用手势表示那些能看得见和可移动的事物，用模拟的声音表示能听得到的事物。但是，手势除了可以表达那些存在于眼前或者易于描述的事物以及能看得到的行为外，几乎不能表达别的任何事物。手势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有用，因为在黑暗之中或者有不透明物体的阻挡时，手势就会失去效用。此外，因为手势并不能引起注意，而是需要人来注意的，人们最终想出了使用发声的方式来代替手势，虽然这些声音不能与特定的事物一一对应，但作为约定俗成的符号更适于表达人类的所有思想。然而，这种代替关系，只有通过人们达成共识才能得以实现。野蛮人在实施的时候是有相当的困难的，因为他们粗糙的器官尚未经过训练。这种代替本身比理解难，因为这种共识就必须以这样或是那样的方式来表述，这就意味着要想使用言语就必须先有言语。

It is reasonable to suppose that the words first made use of by mankind had a much more extensive signification than those used in languages already formed, and that ignorant as they were of the division of discourse into its constituent parts, they at first gave every single word the sense of a whole proposition. When they began to distinguish subject and attribute, and noun and verb, which was itself no common effort of genius, substantives were first only so many proper names; the present infinitive was the only tense of verbs; and the very idea of adjectives must have been developed with great difficulty; for every adjective is an abstract idea, and abstractions are painful and unnatural operations.

如此推断是合乎情理的，人们最初使用的词语含义一定比语言形成后的词语含义宽泛得多；当时人们还不懂得要把一个句子划分为不

同的部分，一开始，他们给每个词语都赋予整个命题的含义。后来，人们开始认识到主语与定语、动词与名词之间的差异，那已是非凡的天才之力了。名词性实词一度仅指那些专有名词，不定式是动词唯一的时态。至于形容词，其概念的发展一定颇费周折，因为每个形容词都是一个抽象的词语，而抽象思维本身就是非自然的、极为艰难的活动。

Every object at first received a particular name without regard to genus or species, which these primitive originators were not in a position to distinguish; every individual presented itself to their minds in isolation, as they are in the picture of nature. If one oak was called A, another was called B; for the primitive idea of two things is that they are not the same, and it often takes a long time for what they have in common to be seen: so that, the narrower the limits of their knowledge of things, the more copious their dictionary must have been. The difficulty of using such a vocabulary could not be easily removed; for, to arrange beings under common and generic denominations, it became necessary to know their distinguishing properties: the need arose for observation and definition, that is to say, for natural history and metaphysics of a far more developed kind than men can at that time have possessed.

起初，每个事物不论种属都被赋予一个特定的名称，因为最早创造语言的人还没有能力区分种属概念，所有的物体都按照他们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样子，以独立的个体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如果他们把一棵橡树称作甲，他们就把另一棵橡树称作乙：因此，人们的知识越有限，他们的词汇就越庞杂。要想解决如此繁冗复杂的命名法所带来的困扰并非易事，因为若想把几种事物归到一个代表种类的名下，人们首先必须熟知它们的属性和差异，还需要积累大量的观察和定义。

也就是说，需要博物学和形而上学的知识，而这一切远非那个时代的人力所能及。

Add to this, that general ideas cannot be introduced into the mind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words, nor can the understanding seize them except by means of propositions.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animals cannot form such ideas, or ever acquire that capacity for self-improvement which depends on them. When a monkey goes from one nut to another, are we to conceive that he entertains any general idea of that kind of fruit, and compares its archetype with the two individual nuts? Assuredly he does not; but the sight of one of these nuts recalls to his memory the sensations which he received from the other, and his eyes, being modified after a certain manner, give information to the palate of the modification it is about to receive. Every general idea is purely intellectual; if the imagination meddles with it ever so little, the idea immediately becomes particular. If you endeavour to trace in your mind the image of a tree in general, you never attain to your end. In spite of all you can do, you will have to see it as great or little, bare or leafy, light or dark, and were you capable of seeing nothing in it but what is common to all trees, it would no longer be like a tree at all. Purely abstract beings are perceivable in the same manner, or are only conceivable by the help of language. The definition of a triangle alone gives you a true idea of it: the moment you imagine a triangle in your mind, it is some particular triangle and not another, and you cannot avoid giving it sensible lines and a coloured area. We must then make use of propositions and of language in order to form general ideas. For no sooner does the imagination cease to operate than the understanding proceeds only by the help of words. If then the first inventors of speech could give names only to ideas they already had, it follows that the first

substantives could be nothing more than proper names.

此外，不借助于词语，人们心中便不会形成观念；不借助于命题，人们便不能理解观念。这也是为什么动物不能形成这样的观念、不能借此获得自我完善能力的原因之一。当一只猴子毫不犹豫地扔掉一个坚果去摘另一个坚果时，我们能否认为它知晓坚果的一般观念，并能用坚果的一般概念和这两个具体的坚果作比较呢？当然不能。不过，当它看到一个坚果时，这个坚果便会唤起它从另一个坚果那里得到过的感觉；它的眼睛因接受过某种特定坚果的样子，因此能预知它将要吃到的这个坚果的味道。凡是概括的观念皆纯粹理性，一旦想象介入，即便程度轻微，概括的观念也会立即变成具体的观念。你若尝试着在脑海中勾勒出一棵普通树的图画，是无论如何也描绘不出的。无论你怎样竭尽全力，这棵树要么是大树要么是小树，要么枝叶稀疏要么枝繁叶茂，要么颜色鲜亮要么色泽灰暗。如果你只想看到所有树木的共同点，那么你脑海中的形象将不再像任何一棵树。人们认知纯粹抽象的事物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换言之，只能借助言语方可想象。三角形定义的本身就能让你想象到这个图形的确切形状：当你在头脑中勾勒出一个三角形时，它一定是这个或那个具体的三角形，而非其他，并且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象出它具体的大小和其图面的颜色。所以我们必须使用各种命题，必须通过言语来形成一般的观念，因为如果不借助言语的话，一旦想象停住脚步，我们的思考也就停止了。因此，如果最初的语言创造者只能给他们已有的观念命名的话，那么早期的名词就只能是些专有名词了。

But when our new grammarians, by means of which I have no conception, began to extend their ideas and generalise their terms, the ignorance of the inventors must have confined this method within very narrow limits; and, as they had at first gone too far in multiplying the names of individuals, from ignorance of their genus and species, they made afterwards too few of these, from not having

considered beings in all their specific differences. It would indeed have needed mor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han they could have, and more pains and inquiry than they would have bestowed, to carry these distinctions to their proper length. If, even to-day, we are continually discovering new species, which have hitherto escaped observation, let us reflect how many of them must have escaped men who judged things merely from their first appearance! It is superfluous to add that the primitive classes and the most general notions must necessarily have escaped their notice also. How, for instance, could they have understood or thought of the words matter, spirit, substance, mode, figure, motion, when even our philosophers, who have so long been making use of them, have themselves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them; and when, the ideas attached to them being purely metaphysical, there are no models of them to be found in nature?

但是，当我们早期的文法学家们以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开始扩展他们的观念和概括归纳词汇的时候，语言创造者的无知一定已经使其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了。并且，因为他们起初缺乏属种的知识，所以创造出了太多的个体名称，在后来又由于不能认识到所有事物间的差异，仅创造出了极少的属种类别。要想进行更精细的分类，他们必定拥有比我们可以承认他们所拥有的更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他们必定需要进行比我们假定他们所愿意进行的更多的研究并承受更多的辛苦。即便时至今日，如果我们每天都会发现新的物种，这些物种在此之前未被人发觉，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出有多少物种被那些仅靠表面就判断事物种类的人们遗漏掉了！至于那些原始类别和最一般的概念，无须赘述，也同样被他们忽视了：例如，他们如何想到或者理解诸如“物质”、“精神”、“实体”、“样态”、“数字”、“运动”这样的词语？因为，即使是长期以来经常使用这些术语的哲学家们也不能完全理解它们的含义，并且他们赋予这些词语的观念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在自然界中没有原型可寻。

But I stop at this point, and ask my judges to suspend their reading a while, to consider, after the invention of physical substantives, which is the easiest part of language to invent, that there is still a great way to go, before the thoughts of men will have found perfect expression and constant form, such as would answer the purposes of public speaking, and produce their effect on society. I beg of them to consider how much time must have been spent, and how much knowledge needed, to find out numbers, abstract terms, aorists and all the tenses of verbs, particles, syntax, the method of connecting propositions, the forms of reasoning, and all the logic of speech. For myself, I am so aghast at the increasing difficulties which present themselves, and so well convinced of the almost demonstrable impossibility that languages should owe their original institution to merely human means, that I leave, to any one who will undertake it, the discussion of the difficult problem, which was most necessary, the existence of society to the invention of language, or the invention of languag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ety.

初探至此，且告一段落，也恳请我的评判员们暂停阅读，稍作思考：仅从物质名词的发明创造（虽然它是语言发明中最容易的部分）来看，语言要能够表达人类所有的思想感情，要采用一种固定的形式，要能够用来当众演说并影响社会，其发展可谓是任重而道远，人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诚挚地恳请他们想一想，人类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掌握多少知识才能发明数字、抽象词汇、不定过去时和动词的各种时态、小品词、句法、连接命题和论证的方法以及构成话语全部逻辑的方法。至于我，早已被每前进一步就成倍增长的困难吓住了，并深信单凭人类的智能发明并创造出语言几乎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必须把这一难题留给任何有意致力于此项研究的人去探讨："社会的存在对于语言的发明，或者语言的发明对于社会的建

立，哪一个更为必要呢？”

But be the origin of language and society what they may, it may be at least inferred, from the little care which nature has taken to unite mankind by mutual wants, and to facilitate the use of speech, that she has contributed little to make them sociable, and has put little of her own into all they have done to create such bonds of union. It is in fact impossible to conceive why, in a state of nature, one man should stand more in need of the assistance of another, than a monkey or a wolf of the assistance of another of its kind: or, granting that he did, what motives could induce that other to assist him; or, even then, by what means they could agree about the conditions. I know it is incessantly repeated that man would in such a state have been the most miserable of creatures; and indeed, if it be true, as I think I have proved, that he must have lived many ages, before he could have either desire or an opportunity of emerging from it, this would only be an accusation against nature, and not against the being which she had thus unhappily constituted. But as I understand the word *miserable* , it either has no meaning at all, or else signifies only a painful privation of something, or a state of suffering either in body or soul. I should be glad to have explained to me, what kind of misery a free being, whose heart is at ease and whose body is in health, can possibly suffer. I would ask also, whether a social or a natural life is most likely to become insupportable to those who enjoy it. We see around us hardly a creature in civil society, who does not lament his existence: we even see many deprive themselves of as much of it as they can, and laws human and divine together can hardly put a stop to the disorder. I ask, if it was ever known that a savage took it into his head, when at liberty, to complain of life or to make away with himself. Let us therefore judge, with less vanity, on which side

the real misery is found. On the other hand, nothing could be more unhappy than savage man, dazzled by science, tormented by his passions, and reasoning about a state different from his own. It appears that Providence most wisely determined that the faculties, which he potentially possessed, should develop themselves only as occasion offered to exercise them,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not be superfluous or perplexing to him, by appearing before their time, nor slow and useless when the need for them arose. In instinct alone, he had all he required for living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with a developed understanding he has only just enough to support life in society.

但是，无论语言和社会的起源如何神秘，我们至少可以推断，由于自然极少关心，人类出于相互需要而聚集在一起，自然也没有促进人类更为简单地使用语言，所以自然为人们社交关系的建立做的是多么少啊，并且在人们建立相互间的联系时贡献又是多么少啊！事实上，我们难以想象，在原始状态下，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帮助的机会会多于一只猴子或一匹狼需要同类帮助的机会；或者，假设他真的需要，是什么动机促使另一个人来帮助他；又或者别人愿意帮助他，求助者与救助者又是如何就条件达成一致的呢？我知道著书立说者常常对我们说，原始状态下的人是最悲惨的生物了；若真如此，就如我认为我已经证明过的，人类在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之后才有脱离自然状态的愿望或者机会，那么他们的控诉对象只能是自然，而不是自然创造的人类。但是，倘若我透彻地理解了“悲惨”一词，它或者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字眼，或者仅仅表示一种痛苦穷困的生活和身心遭受苦难的状态。那么我倒很乐意有人能告诉我：一个心态平和、身体健康的自由人，会遭受怎样的悲惨呢？是文明社会生活还是自然生活更容易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无法忍受呢？在文明社会里，我们所遇之人几乎都在抱怨自己的人生；许多人甚至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神、人的法律联合起来也很难制止这种混乱。有谁听闻过一个自由的野蛮人会抱怨他的人生或者想到过自杀呢？所以，让我们放下虚荣心，公正

地判断哪种状态才是真正的悲惨吧。相反，对于野蛮人来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为知识所迷惑，被情欲所折磨，以及时时纠结于探索一种异己的状态而不能自拔。感谢最英明的上帝，赋予人类的潜能只有在合适的时机才得以发展，以免这些潜能在人们不需要的时候成为多余或带来麻烦，或者在人们需要的时候姗姗来迟无济于事。野蛮人仅依靠本能就拥有生活在自然状态中所需的一切；就其理性的发展来看，他几乎不曾拥有生活在社会状态中所需的一切。

It appears, at first view, that men in a state of nature, having no moral relations or determinate obligations one with another, could not be either good or bad, virtuous or vicious; unless we take these terms in a physical sense, and call, in an individual, those qualities vices which may be injurious to his preservation, and those virtues which contribute to it; in which case, he would have to be accounted most virtuous, who put least check on the pure impulses of nature. But without deviating from the ordinary sense of the words, it will be proper to suspend the judgment we might be led to form on such a state, and be on our guard against our prejudices, till we have weighed the matter in the scales of impartiality, and seen whether virtues or vices preponderate among civilised men; and whether their virtues do them more good than their vices do harm; till we have discovered, whether the progress of the sciences sufficiently indemnifies them for the mischiefs they do one another, in proportion as they are better informed of the good they ought to do; or whether they would not be, on the whole, in a much happier condition if they had nothing to fear or to hope from any one, than as they are, subjected to universal dependence, and obliged to take everything from those who engage to give them nothing in return.

第一眼看上去，这种状态下的人与人之间似乎不存在任何的道德上的关系，也没有任何普遍认可的义务，既无好坏之分，亦无善恶之别。除非我们从生理意义上理解这些词，把那些有损于个人自我生存的特质称为“恶”，有利于个人自我生存的特质称之为“善”；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认为对纯粹的自然冲动作最小抵抗的人是最善良的人。但是，假使我们仅从常规意义来理解这些词语，我们就不会急于对这种情况进行判断，以免产生偏见。先用手中的天秤去衡量，在文明人之中，邪恶和善良孰多孰少？当人们逐渐懂得应该互相帮助时，知识的进步是否能够弥补他们彼此间的伤害？或者，总体来说，一种是他们对彼此既不畏惧，也没有要求，另一种是他们处处依附别人，不得不一切都依赖于别人的善意，而别人并不认为应该回报他们，他们在第一种情况时不会比第二种情况幸福多少的。

Above all, let us not conclude, with Hobbes, that because man has no idea of goodness, he must be naturally wicked; that he is vicious because he does not know virtue; that he always refuses to do his fellow-creatures services which he does not think they have a right to demand; or that by virtue of the right he truly claims to everything he needs, he foolishly imagines himself the sole proprietor of the whole universe. Hobbes had seen clearly the defects of all the modern definitions of natural right: but the consequences which he deduces from his own show that he understands it in an equally false sense. In reasoning on the principles he lays down, he ought to have said that the state of nature, being that in which the care for our own preservation is the least prejudicial to that of others, was consequently the best calculated to promote peace, and the most suitable for mankind. He does say the exact opposite, in consequence of having improperly admitted, as a part of savage man's care for self-preservation, the gratification of a multitude of passions which are the work of society, and have made laws necessary. A bad man, he says, is a

robust child. But it remains to be proved whether man in a state of nature is this robust child: and, should we grant that he is, what would he infer? Why truly, that if this man, when robust and strong, were dependent on others as he is when feeble, there is no extravagance he would not be guilty of; that he would beat his mother when she was too slow in giving him her breast; that he would strangle one of his younger brothers, if he should be troublesome to him, or bite the arm of another, if he put him to any inconvenience. But that ma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is both strong and dependent involves two contrary suppositions. Man is weak when he is dependent, and is his own master before he comes to be strong. Hobbes did not reflect that the same cause, which prevents a savage from making use of his reason, as our jurists hold, prevents him also from abusing his faculties, as Hobbes himself allows: so that it may be justly said that savages are not bad merely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what it is to be good: for it is neith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nor the restraint of law that hinders them from doing ill; but the peacefulness of their passions, and their ignorance of vice: *tanto plus in illis proficit vitiorum ignoratio, quam in his cognitiovirtutis.* [4_1]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小心和霍布斯得出一样的结论：人因没有善念，所以性本恶；人之所以邪恶是因为其不知善为何物；人拒绝帮助同类，因为他不认为对同类负有这种义务；人根据他对于所需之物有正当要求的权利，便愚蠢地把自己看作是整个世界的主人。尽管霍布斯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所有关于“自然权利”的现代定义的缺陷，但是从他自己的定义所推导出来的结论表明，他对于“自然权利”的理解也同样经不起推敲。该作者，依照自己的原则来推论，本该说自然状态中的人只关心自我生存，这是最无害于他人的生活方式，那么自然状态当属最有利于保持和平、最适于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然而他由于判断失当，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他把满足无数欲望的需要，不

适当地掺入到野蛮人对自我生存的关心之中，而这些欲望是社会的产物，也正是这些欲望使制定法律成为必然。霍布斯认为，恶人恰如精力充沛的儿童。但是，尚未证明野蛮人就是精力充沛的儿童；纵使我们承认他是如此，那么这位哲学家又能从该假设中推断出什么呢？那就是说，如果该人在强壮时，也要像其在孱弱时一样依赖他人，那么无论做什么过分的事他也不会有负罪感了。当母亲给他喂奶时稍有迟缓，他便举手就打；当年少的兄弟不小心碰撞到他或无意惹恼了他，他便连抓带咬对其无情地折磨。但是，一个人身强力壮却又处处依赖别人，这乃是自然状态中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设。需要依赖他人时，便是人虚弱之时；待身强力壮之日，人就该成为自己的主人。霍布斯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法学家们所主张的阻止野蛮人使用理性的原因，正是他自己所主张的阻止野蛮人滥用自己智力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说野蛮人并非恶人，仅是因为他们不知何为善而已；阻止他们为非作歹的既非智力的发展，也非法律的约束，而是因为他们内心平静并对邪恶一无所知，*tanto plus in illisproficitvitiorumignoratio, quam in his cognitiovirtutis.* [5_1]

There is another principle which has escaped Hobbes; which, having been bestowed on mankind, to moderate, on certain occasions, the impetuosity of egoism, or, before its birth, the desire of self-preservation, tempers the ardour with which he pursues his own welfare, by an innate repugnance at seeing a fellow-creature suffer.[1] I think I need not fear contradiction in holding man to be possessed of the only natural virtue, which could not be denied him by the most violent detractor of human virtue. I am speaking of compassion, which is a disposition suitable to creatures so weak and subject to so many evils as we certainly are: by so much the more universal and useful to mankind, as it comes before any kind of reflec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so natural, that the very brutes themselves sometimes give evident proofs of it. Not to mention the tenderness of mothers for their offspring and the perils they

encounter to save them from danger, it is well known that horses show a reluctance to trample on living bodies. One animal never passes by the dead body of another of its species: there are even some which give their fellows a sort of burial; while the mournful lowings of the cattle when they enter the slaughter-house show the impressions made on them by the horrible spectacle which meets them. We find, with pleasure, the author of the Fable of the Bees obliged to own that man is a compassionate and sensible being, and laying aside his cold subtlety of style, in the example he gives, to present us with the pathetic description of a man who, from a place of confinement, is compelled to behold a wild beast tear a child from the arms of its mother, grinding its tender limbs with its murderous teeth, and tearing its palpitating entrails with its claws. What horrid agitation must not the eyewitness of such a scene experience, although he would not be personally concerned! What anxiety would he not suffer at not being able to give any assistance to the fainting mother and the dying infant!

另外还有一条原则霍布斯没有注意到：当看到同类遭受苦难时，人的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天生的厌恶之情，从而使其追逐自身利益的巨大热情受到限制，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盲目而强烈的自爱心，或者说在自爱心未产生之前，抑制了他自我保存的意愿。[1] 我相信这是人类唯一的与生俱来的美德，即使是对人类美德最激烈的诋毁者也无法否认，因此我不必担心会有任何非议。我所说的同情心对于像我们这样虚弱、易于多灾多难的生物而言是一种颇为适宜的禀性。这也是人类所拥有的最普遍、最有益的美德。因为同情心会在人们作任何思考之前就发生，它是那么自然，甚至动物在某些时候也会流露出来。且不谈母兽对幼崽的温柔呵护，也不说在危险之际它们为了保护幼崽可以奋不顾身。一匹马不愿意踩踏任何活物；一只动物从它同类的尸首旁边走过时也难免动容：有些动物甚至会以某种方式安葬死去的同伴；家畜一进入屠宰场就会悲鸣不

已，表达它们对突然呈现在眼前的恐怖景象的畏惧。我们欣喜地看到，就连《蜜蜂的寓言》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人是一种具有同情心的有感情的动物。他一改平日冷隽敏锐的文风，在举出的例子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令人悲怆心碎的场景：一个双手被缚的人被迫目睹了一只野兽从一个母亲的怀里掳走了她的孩子，巨齿咬碎了孩子稚嫩的肢体，利爪撕碎了这个无辜罹难者还在抽搐着的内脏。亲眼目睹此等惨相，虽与他本人无关，却怎能不令他毛骨悚然？面对昏厥的母亲和垂死的孩子却无能为力，又怎能不令他悲痛万分？

1: Egoism must not be confused with self-respect: for they differ both in themselves and in their effects. Self-respect is a natural feeling which leads every animal to look to its own preservation, and which, guided in man by reason and modified by compassion, creates humanity and virtue. Egoism is a purely relative and factitious feeling, which arises in the state of society, leads each individual to make more of himself than of any other, causes all the mutual damage men inflict one on another, and is the real source of the "sense of honour." This being understood, I maintain that, in our primitive condition, in the true state of nature, egoism did not exist; for as each man regarded himself as the only observer of his actions, the only being in the universe who took any interest in him, and the sole judge of his deserts, no feeling arising from comparisons he could not be led to make could take root in his soul;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he could know neither hatred nor the desire for

revenge, since these passions can spring only from a sense of injury: and as it is the contempt or the intention to hurt, and not the harm done, which constitutes the injury, men who neither valued nor compared themselves could do one another much violence, when it suited them, without feeling any sense of injury. In a word, each man, regarding his fellows almost as he regarded animals of different species, might seize the prey of a weaker or yield up his own to a stronger, and yet consider these acts of violence as mere natural occurrences, without the slightest emotion of insolence or despite, or any other feeling than the joy or grief of success or failure.

1: 自尊心和自爱心不能混为一谈，这两种感情，无论按它们的性质或效果来说，都迥然不同。自爱心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它使所有的动物都注意自我保存。在人类中，由于自爱心为理性所指导，为怜悯心所节制，从而产生人道和美德。自尊心只是一种相对的、人为的、而且是在社会中产生的感情，它使每一个人重视自己甚于重视其他任何人，它促使人们彼此间作出种种的恶，它是荣誉心的真正根源。如果以上所述被人正确理解的话，我还可以说，在人类的原始状态中，在真正的自然状态中，自尊心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看成是观察其自身的唯一的观察者，是宇宙中关心自己的唯一存在物，是自己才能的唯一评判人，因之，以他所不能作出的互相比较为根源的那种感情，在他的心灵中萌芽是不可能的。由于

同样的理由，自然人既没有怨恨，更没有复仇的欲望，因为这些感情只能从对于所受某种凌辱的看法中而产生。而且，因为构成凌辱的是轻蔑或侵害的意图，并不是损害本身，所以不会相互评价或相互比较的人，是永远不会相互侵害的，虽然他们彼此之间为了获得利益也会发生许多暴力行为。总之，每个人看他的同类，不过如同看另一种动物一样，他能从较弱者的手里抢夺猎获物，或者对强者放弃他自己的猎获物，但是，他只把这种掠夺看作是自然的事件，一点没有傲慢或愤恨的情绪，而且除对成功或失败的结果感到快乐或痛苦外，是没有别的心情的。

Such is the pure emotion of nature, prior to all kinds of reflection! Such is the force of natural compassion, which the greatest depravity of morals has as yet hardly been able to destroy! for we daily find at our theatres men affected, nay shedding tears at the sufferings of a wretch who, were he in the tyrant's place, would probably even add to the torments of his enemies; like the bloodthirsty Sulla, who was so sensitive to ills he had not caused, or that Alexander of Pheros who did not dare to go and see any tragedy acted, for fear of being seen weeping with Andromache and Priam, though he could listen without emotion to the cries of all the citizens who were daily strangled at his command.

这就是人类纯真的自然情感，先于一切思考而存在；这就是天生怜悯的力量，再败坏的风气也无法将它毁灭。在剧院中，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一些人为不幸的戏中人的悲惨遭遇唏嘘感怀，伤心落泪；然而有朝一日他们成为暴君，他们一样会加重对敌人的虐待，使其备受折磨。正如嗜杀的苏拉，对于不是由他自己所造成的痛苦，也非常伤

戚；又如菲尔王亚历山大不敢去看任何悲剧的演出，怕人们会看见他和昂朵马克和普里亚莫一同叹息，但当他听到每天因执行他的命令而被处死的那么多人的呼号时，却丝毫无动于衷。

Mollissimacorda

Mollissimacorda

Humanogeneri dare se naturafatetur,

Humanogeneri dare se naturafatetur,

Quœlacrimasdedit. Juvenal, Satires , xv. 151 [4_2]

Quœlacrimasdedit.

Mandeville well knew that, in spite of all their morality, men would have never been better than monsters, had not nature bestowed on them a sense of compassion, to aid their reason: but he did not see that from this quality alone flow all those social virtues, of which he denied man the possession. But what is generosity, clemency or humanity but compassion applied to the weak, to the guilty, or to mankind in general? Even benevolence and friendship are, if we judge rightly, only the effects of compassion, constantly set upon a particular object: for how is it different to wish that

another person may not suffer pain and uneasiness and to wish him happy? Were it even true that pity is no more than a feeling, which puts us in the place of the sufferer, a feeling, obscure yet lively in a savage, developed yet feeble in civilised man; this truth would have no other consequence than to confirm my argument. Compassion must, in fact, be the stronger, the more the animal beholding any kind of distress identifies himself with the animal that suffers. Now, it is plain that such identification must have been much more perfect in a state of nature than it is in a state of reason. It is reason that engenders self-respect, and reflection that confirms it: it is reason which turns man's mind back upon itself, and divides him from everything that could disturb or afflict him. It is philosophy that isolates him, and bids him say, at sight of the misfortunes of others: “Perish if you will, I am secure.” Nothing but such general evils as threaten the whole community can disturb the tranquil sleep of the philosopher, or tear him from his bed. A murder may with impunity be committed under his window; he has only to put his hands to his ears and argue a little with himself, to prevent nature, which is shocked within him, from identifying itself with the unfortunate sufferer. Uncivilised man has not this admirable talent; and for want of reason and wisdom, is always foolishly ready to obey the first promptings of humanity. It is the populace that flocks together at riots and street-brawls, while the wise man prudently makes off. It is the mob and the market-women, who part the combatants, and hinder gentle-folks from cutting one another's throats.

曼德维尔清楚地认识到，尽管人类拥有一切道德，如果自然不曾赋予他们同情心去辅佐理性，人类将无异于一群怪兽。但是曼德维尔没有认识到，他所否认的所有的人类的美德正是源于同情心这种品质。事实上，如果没有对弱者、罪人和人类普遍的同情，何谈慷慨、

仁慈和博爱？如果我们判断无误，爱心和友谊不过是对特定对象的恒久怜悯心的产物：因为希望一个人免遭痛苦，不是希望他能够幸福，还能是什么呢？纵然同情之心、怜悯之情只不过是我们设身处地与受苦者引起共鸣而产生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野蛮人虽不能名状，但却反应强烈；文明人深谙就里，却又表现得不明显。这种说法，除了使我的观点不言而喻外，又怎能影响我提出的观点呢？事实上，旁观的动物与受苦的动物越亲近，共鸣越强烈，怜悯心也就越强。显而易见，这种共鸣的感觉，在自然状态中比在理性状态中要深切得多。理性产生自爱，思考强化自爱；理性使人敛翼自保、明哲保身；理性使人远离困扰、免遭痛苦。哲学使人产生隔阂；听从哲学的教诲，人才会在受难者面前暗自嘀咕：生死由天，与我何干？只有关乎整个人类存亡的危险，才能搅扰哲学家的清梦，眠不成寐、卧不成寝。有人可以在他窗下杀害另一个人而不受惩罚，他只需用双手掩住自己的耳朵，替自己稍作辩解，便可以阻止内心那份油然而生的对不幸受害者的怜悯与同情。野蛮人绝对没有这种令人艳羡的本领，由于缺乏智慧和理性，他们总是不假思索地盲从于人类的初始情感。聚众闹事、街头斗殴，群氓蜂拥而至，谨小慎微者伺机溜走。拉开厮打、阻止上层人士相互残杀的人反倒是底层人士和贫穷的市井女人。

It is then certain that compassion is a natural feeling, which, by moderating the violence of love of self in each individual, contributes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hole species. It is this compassion that hurries us without reflection to the relief of those who are in distress: it is this which in a state of nature supplies the place of laws, morals and virtues, with the advantage that none are tempted to disobey its gentle voice: it is this which will always prevent a sturdy savage from robbing a weak child or a feeble old man of the sustenance they may have with pain and difficulty acquired, if he sees a possibility of providing for himself by other means: it is this which, instead of inculcating that sublime maxim of rational justice. *Do 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 ,

inspires all men with that other maxim of natural goodness, much less perfect indeed, but perhaps more useful; *Do good to yourself with as little evil as possible to others.* In a word, it is rather in this natural feeling than in any subtle arguments that we must look for the cause of that repugnance, which every man would experience in doing evil, even independently of the maxims of education. Although it might belong to Socrates and other minds of the like craft to acquire virtue by reason, the human race would long since have ceased to be, had its preservation depended only on the reasonings of the individuals composing it.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怜悯之心属于自然的情感，它调节着每个人的自爱活动，推动着全人类的互相保护。正是这种怜悯之心，促使我们毫不犹豫地去援救我们所见到的受苦者；正是这种怜悯之心，在自然状态中替代着法律、规矩和道德，因为这个优势，没有人企图违背她那甜美、温柔的声音；正是这种怜悯之心，使得一个健壮的野蛮人，只要有一线希望能自我谋取生计，就绝对不会去掠夺幼弱孩童或体弱老者千辛万苦得来的东西；正是这种怜悯之心，不遵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句富有理性正义的崇高格言，而是用另一句更合乎善良天性的格言：“利己而不损人”来启示所有的人。后一句格言远不如前一句完美，但也许更为有用。总之，与其在那些高深的论证中，不如在这种自然的情感中，去探求一个人在作恶后会感到内疚的原因，即使他可能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箴言的启示。虽然苏格拉底和像他那种类型的天才人物能够十分有幸地通过理性获得美德，但如果人类的存在完全依赖于构成种群的个体的理性活动，那么人类早已不复存在。

With passions so little active, and so good a curb, men, being rather wild than wicked, and more intent to guard themselves against the mischief that might be done them, than to do mischief

to others, were by no means subject to very perilous dissensions. They maintained no kind of intercourse with one another, and were consequently strangers to vanity, deference, esteem and contempt; they had not the least idea of *meum* and *tuum* , and no true conception of justice; they looked upon every violence to which they were subjected, rather as an injury that might easily be repaired than as a crime that ought to be punished; and they never thought of taking revenge, unless perhaps mechanically and on the spot, as a dog will sometimes bite the stone which is thrown at him. Their quarrels therefore would seldom have very bloody consequences; for the subject of them would be merely the question of subsistence. But I am aware of one greater danger, which remains to be noticed.

人类性情温顺，自控力强，与其说他们邪恶，不如说他们粗野，而且他们更关注保护自己免受损害而不是去伤害其他动物，因此他们不会招致危险的争执：由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因此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虚荣、尊崇、重视和轻视；由于他们根本没有“你的”和“我的”这种概念，也不知正义为何物；由于他们把可能遭受的任何暴力视为一种易于弥补的罪恶，因此不认为这种伤害应该受到惩罚；由于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报复，除了有可能会像一只狗去扑咬投向它的石头一般，机械地而非预谋地予以反抗；如果他们争执的对象不比食物更令其动心的话，他们的争执也很少会导致流血的后果。但是，确有一种比较危险的争端，我必须加以说明。

Of the passions that stir the heart of man, there is one which makes the sexes necessary to each other, and is extremely ardent and impetuous; a terrible passion that braves danger, surmounts all obstacles, and in its transports seems calculated to bring destruction on the human race which it is really destined to preserve. What

must become of men who are left to this brutal and boundless rage, without modesty, without shame, and daily upholding their amours at the price of their blood?

使人心波动的各种欲望中，有一种炽热激烈的欲望使男女两性互相需要彼此。这种可怕的情欲足以使人藐视一切危险，冲破一切障碍，当它达到癫狂的程度时，足以毁灭全人类，而它注定保护人类。如果人们一味地沉湎于这种无法无天、凶猛残暴的狂热中，没有节制、没有廉耻，每天不惜流血冲突、互相争夺他们的所爱，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It must, in the first place, be allowed that, the more violent the passions are, the more are laws necessary to keep them under restraint. But, setting aside the inadequacy of laws to effect this purpose, which is evident from the crimes and disorders to which these passions daily give rise among us, we should do well to inquire if these evils did not spring up with the laws themselves; for in this case, even if the laws were capable of repressing such evils, it is the least that could be expected from them, that they should check a mischief which would not have arisen without them.

首先必须承认，情欲越强，就越需要法律的约束。然而，且不论这种情欲每天在社会中所引起的混乱和所造成的罪恶早已证明法律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我们需进一步深究的是这些混乱和罪恶是否伴随着法律本身一起产生。因为，在此情形下，虽然法律能够抑制这种混乱，但是如果要求法律来制止这种没有法律就根本不会存在的祸害，那未免是向法律提出最无意义的要求，无异于缘木求鱼了。

Let us begin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physical and moral ingredients in the feeling of love. The physical part of love is that general desire which urges the sexes to union with each other. The moral part is that which determines and fixes this desire exclusively upon one particular object; or at least gives it a greater degree of energy toward the object thus preferred. It is easy to see that the moral part of love is a factitious feeling, born of social usage, and enhanced by the women with much care and cleverness, to establish their empire, and put in power the sex which ought to obey. This feeling, being founded on certain ideas of beauty and merit which a savage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acquire, and on comparisons which he is incapable of making, must be for him almost non-existent; for, as his mind cannot form abstract ideas of proportion and regularity, so his heart is not susceptible of the feelings of love and admiration, which are even insensibly produc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ideas. He follows solely the character nature has implanted in him, and not tastes which he could never have acquired; so that every woman equally answers his purpose.

首先让我们区分一下精神上的“爱”和生理上的“爱”。生理上的爱是指人间普遍存在的、想和异性结合的情欲；精神上的爱，则具有排他性，把情欲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对象上，或者说，这种情欲至少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一个偏爱的对象身上。由此容易看出，精神上的爱是一种人为情感，产生于社会习惯。女性对其极尽颂扬之能事，以建立她们自己的权威，使本来应该处于服从地位的女性处于统治地位。这种情感建立在野蛮人不能够拥有的某些美与德的观念之上，建立在野蛮人不能够作出的种种比较之上，所以野蛮人几乎没有这种情感。野蛮人的头脑里根本没有“匀称”和“协调”等抽象观念，他们的心里不会产生赞赏和爱慕之情；这些情感形成于对这些观念的运用，人们不易觉察出来。野蛮人仅听从于自然禀性的支配，不能自发尝试爱的甜美，任何女人都能满足他的需求。

Men in a state of nature being confined merely to what is physical in love, and fortunate enough to be ignorant of those excellences, which whet the appetite while they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gratifying it, must be subject to fewer and less violent fits of passion, and consequently fall into fewer and less violent disputes. The imagination, which causes such ravages among us, never speaks to the heart of savages, who quietly await the impulses of nature, yield to them involuntarily, with more pleasure than ardour, and, their wants once satisfied, lose the desire. It is therefore incontestable that love, as well as all other passions, must have acquired in society that glowing impetuosity, which makes it so often fatal to mankind. And it is the more absurd to represent savages as continually cutting one another's throats to indulge their brutality, because this opinion is directly contrary to experience; the Caribbeans, who have as yet least of all deviated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being in fact the most peaceable of people in their amours, and the least subject to jealousy, though they live in a hot climate which seems always to inflame the passions.

完全局限于生理之爱的野蛮人幸福无比，他们不知道这些偏爱会激起爱的情感，也不知道它们同时会增加满足这种情感的难度。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他们的感情冲动不会太频繁，也不会太激烈，因而他们之间的争执比较少，也不那么残酷。在我们之间造成许多创伤的那种假想，从来不会侵扰野蛮人的心灵，他只是静静地等候着自然的冲动，当他毫无选择地屈从于这种冲动时，他的心情与其说是狂热的，不如说是愉悦的。他的需求一旦得到满足，他的欲望便完全消失。所以，显而易见，爱情也和其他一切情欲一样，只有在社会中才会变得狂热起来，常常给人类带来灾难。如果认为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性而不断相互残杀，那是很荒谬的，因为这种想法与实际经验正好相反。就拿加勒比人来说，他们是迄今为止最接近于自然状态的一个民

族，按说他们生活在炎热地带，受气候影响，他们的情欲似乎应该总是很强烈的，然而他们的爱情生活最为平和，他们之间很少因嫉妒而发生纷争。

With regard to the inferences that might be drawn, in the case of several species of animals, the males of which fill our poultry-yards with blood and slaughter, or in spring make the forests resound with their quarrels over their females; we must begin by excluding all those species, in which nature has plainly established, in the comparative power of the sexes, relations different from those which exist among us: thus we can base no conclusion about men on the habits of fighting cocks. In those species where the proportion is better observed, these battles must be entirely due to the scarcity of females in comparison with males; or, what amounts to the same thing, to the intervals during which the female constantly refuses the advances of the male: for if each female admits the male but during two months in the year, it is the same as if the number of females were five-sixths less. Now, neither of these two cases is applicable to the human species, in which the number of females usually exceeds that of males, and among whom it has never been observed, even among savages, that the females have, like those of other animals, their stated times of passion and indifference. Moreover, in several of these species, the individuals all take fire at once, and there comes a fearful moment of universal passion, tumult and disorder among them; a scene which is never beheld in the human species, whose love is not thus seasonal. We must not then conclude from the combats of such animals for the enjoyment of the females, that the case would be the same with mankind in a state of nature: and, even if we drew such a conclusion, we see that such contests do not exterminate other kinds of animals, and we have no reason to think they would be

more fatal to ours. It is indeed clear that they would do still less mischief than is the case in a state of society; especially in those countries in which, morals being still held in some repute, the jealousy of lovers and the vengeance of husbands are the daily cause of duels, murders, and even worse crimes; where the obligation of eternal fidelity only occasions adultery, and the very laws of honour and continence necessarily increase debauchery and lead to the multiplication of abortions.

在有些动物种类中，由于雄性为争夺雌性相互争斗，一年四季养禽场都充斥着血性的厮杀；尤其是在春天，林间处处是吵吵闹闹的叫春声。若要依据这种现象推及人类，我们首先应当排除所有这些动物，因为自然明确规定了这些动物与人类有着不同的两性关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雄鸡相斗中得出适用于人类的推论。在这些动物中，可以更好地观察到两性的比例关系，这些争斗完全是由于雌性数量远远少于雄性数量，或者，雌性有段时间经常会拒绝雄性的接近而引起的。因为假使每年雌性动物与雄性动物交配的时间仅为两个月，那就等于雌性的数目减少了六分之五。然而，这两种情形都不适用于人类。人类女性的数目往往多于男性，即使是野蛮人，也难以发现女性像其他动物那样，有发情期和性冷淡期。另外，上述那些动物的一些种类往往会同时进入发情期，于是我们就会看到持续几天的狂热、喧嚣、混乱、流血的场景。这种现象绝不会发生在人类身上，因为人类的性欲根本没有周期性。所以，我们不能根据某些动物因为争夺雌性而进行争斗，就推定自然状态中人类的情形也是如此。即便这样的推断成立，我们也不能因为这种争斗不会使其他动物灭绝，就设想这种争斗也不会对人类造成致命的威胁。而且，这类争斗在自然状态中所造成的祸害远比在社会状态中所造成的祸害要少得多，尤其是比起在那些崇尚道德的国家里，其祸害更要少得多。在这些国家里，情人的嫉妒和丈夫的报复，每天都会引发决斗、谋杀或更为严重的其他犯罪行为。夫妻间忠贞不渝的约定只会促成通奸行为；那些提倡贞操和荣誉的法律，必然会助长淫乱行为，增加堕胎事件。

Let us conclude then that man in a state of nature, wandering up and down the forests, without industry, without speech, and without home, an equal stranger to war and to all ties, neither standing in need of his fellow-creatures nor having any desire to hurt them, and perhaps even not distinguishing them one from another; let us conclude that, being self-sufficient and subject to so few passions, he could have no feelings or knowledge but such as befitted his situation; that he felt only his actual necessities, and disregarded everything he did not think himself immediately concerned to notice, and that his understanding made no greater progress than his vanity. If by accident he made any discovery, he was the less able to communicate it to others, as he did not know even his own children. Every art would necessarily perish with its inventor, where there was no kind of education among men, and generations succeeded generations without the least advance; when, all setting out from the same point, centuries must have elapsed in the barbarism of the first ages; when the race was already old, and man remained a child.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整日游荡、漂泊于森林中的野蛮人，没有劳役，没有言语，没有固定住所，对战争和社会关系一无所知；他们对于同类既无所求，也无意加害，甚至也许从来不能区分出同类中谁是谁；他们清心寡欲，自给自足。我想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野蛮人的感情和知识仅仅适合于他所处的环境，他只能意识到自己的现实需要，他所注意的只限于他感兴趣的东西，他的智力水平并不比他的幻想有更多的发展。即使他偶有发明，也不能授之于人，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自己的子女。每项技艺都随着发明者的死亡而消失了。既无所谓教育，也无所谓进步。一代代人繁衍生息，毫无目的，每一代都从相同的起点开始轮回，许多世纪过去了，人类依旧生活在初始时代那种极其粗野的状态中。人类已经很古老了，而人的个体幼

稚如故。

If I have expatiated at such length on this supposed primitive state, it is because I had so many ancient errors and inveterate prejudices to eradicate, and therefore thought it incumbent on me to dig down to their very root, and show, by means of a true picture of the state of nature, how far even the natural inequalities of mankind are from having that reality and influence which modern writers suppose.

我之所以不惜笔墨来阐述我所设想的原始状态，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有许多由来已久的错误观念和根深蒂固的成见，我有义务去消除它们。我认为必须追本溯源，挖掘出自然状态的真实画面，说明即使在这种状态中，自然的不平等也不像现在的著书立说者认为的那样真实，也没有他们认为的那样有影响。

It is in fact easy to see that many of the differences which distinguish men are merely the effect of habit and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life men adopt in society. Thus a robust or delicate constitution, and the strength or weakness attaching to it, are more frequently the effects of a hardy or effeminate method of education than of the original endowment of the body. It is the same with the powers of the mind; for education not only makes a difference between such as are cultured and such as are not, but even increases the differences which exist among the former, in proportion to their respective degrees of culture: as the distance between a giant and a dwarf on the same road increases with every step they take. If we compare the prodigious diversity, which obtains in the education and manner of life of the various orders of

men in the state of society, with the uniformity and simplicity of animal and savage life, in which every one lives on the same kind of food and in exactly the same manner, and does exactly the same things, it is easy to conceive how much le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n and man must be in a state of nature than in a state of society, and how greatly the natural inequality of mankind must be increased by the inequalities of social institutions.

事实上，我们很容易理解，综观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差别，有许多被认为是天性所致，其实这些差别只不过是习惯使然，是人们为了适应社会生活而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结果。因此，一个人体质的强弱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力量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他的成长环境和教养方式是艰苦磨炼还是娇生惯养，而不是取决于他身体的先天禀赋。智力的强弱之别，亦是如此。教育不仅能在受过教育的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之间产生差别，而且随着所受文化程度的提高，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差别也随之加大。因为，如果让一个巨人和一个侏儒在同一条道路上行走，两人每走一步，巨人与侏儒之间的差距也就增加一分。文明社会中，不同等级的人在教育和生活方式方面存在着千差万别，而动物和野蛮人的生活特点则是普遍的简单性和单一性；所有的个体都吃同样的食物，过同样的生活，做同样的事情。假如现在我们把这两者作一比较，就会很容易看出自然状态中人之间的差别竟有多小；而制度的种种不平等给人类所平添的不平等又竟有多大。

But even if nature really affect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er gifts, that partiality which is imputed to her, what advantage would the greatest of her favourites derive from it, to the detriment of others, in a state that admits of hardly any kind of relation between them? Where there is no love, of what advantage is beauty? Of what use is wit to those who do not converse, or cunning to those who have no business with others? I hear it constantly repeated

that, in such a state, the strong would oppress the weak; but what is here meant by oppression? Some, it is said, would violently domineer over others, who would groan under a servile submission to their caprices. This indeed is exactly what I observe to be the case among us; but I do not see how it can be inferred of men in a state of nature, who could not easily be brought to conceive what we mean by dominion and servitude. One man, it is true, might seize the fruits which another had gathered, the game he had killed, or the cave he had chosen for shelter; but how would he ever be able to exact obedience, and what ties of dependence could there be among men without possessions? If, for instance, I am driven from one tree, I can go to the next; if I am disturbed in one place, what hinders me from going to another? Again, should I happen to meet with a man so much stronger than myself, and at the same time so depraved, so indolent, and so barbarous, as to compel me to provide for his sustenance while he himself remains idle; he must take care not to have his eyes off me for a single moment; he must bind me fast before he goes to sleep, or I shall certainly either knock him on the head or make my escape. That is to say, he must in such a case voluntarily expose himself to much greater trouble than he seeks to avoid, or can give me. After all this, let him be off his guard ever so little; let him but turn his head aside at any sudden noise, and I shall be instantly twenty paces off, lost in the forest, and, my fetters burst asunder, he would never see me again.

但是，即便自然在赋予人类各种禀性时会厚此薄彼，有失公正，但是在人与人之间几乎不可能发生任何关系的自然环境中，那些最受自然偏爱的人们伤害到别人之后，又会获得什么好处呢？在没有爱情的地方，美貌有何用处？在没有交流的地方，才智有何用处？在没有贸易往来的地方，欺诈又有何用处呢？著书立说者常说，强者恃强凌弱，压迫弱者；然而但愿他们能够说明何谓“压迫”。有人使用暴力来

实施统治，就有人呻吟着屈从于统治者的为所欲为。这正是我在我们之间所观察到的情形，但是我不理解如何能据此推断野蛮人也是如此，因为能使他们了解什么是“奴役”、什么是“统治”都颇具困难。诚然，一个人会掠夺别人采摘的果实，夺取他人捕获的猎物，霸占别人用以遮风避雨的洞穴，但他怎样能够做到强迫别人服从他的意志呢？没有财产，人们之间怎么会有依附、从属的关系呢？如果我在某一棵树上被驱赶走，我只得另寻他树；如果我在某一个地方受到搅扰，谁又能阻挡我另寻他处呢？然而，假定我遇到这样一个人，他不但力量大我许多，而且还相当邪恶、相当懒惰、相当凶狠，他强迫我替他提供生计，而他自己却无所事事。那么这个人就务必时时刻刻留意我，不敢有片刻的疏忽，即使在小憩之前，也要把我捆牢，唯恐我会把他杀死，或者伺机逃跑。也就是说，他必须甘愿让自己陷于无穷无尽的麻烦之中，而这种麻烦远比他自己想要避免的和他强加给我的要多得多。毕竟，只要他的戒备心稍有松懈，只要一个意外的声响使他分神，我就会瞬间隐身于森林，我的束缚就解除了，他也再不会看到我了。

Without my expatiating thus uselessly on these details, every one must see that as the bonds of servitude are formed merely by the mutual dependence of men on one another and the reciprocal needs that unite them,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any man a slave, unless he be first reduced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he cannot do without the help of others: and, since such a situation does not exist in a state of nature, every one is there his own master, and the law of the strongest is of no effect.

细节无须赘述。每个人都会明白：人们之间的奴役关系形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需要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之时。因此，如果不先使一个人沦落到要依靠别人才能存活的地步，便不可能奴役这个人；这种情形在自然状态中是不存在的，在那种状态中，每个人都是

自己的主人，强者法则无从生效。

Having proved that the inequality of mankind is hardly felt, and that its influence is next to nothing in a state of nature, I must next show its origin and trace its progress in the successive developments of the human mind. Having shown that human *perfectibility* ,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other faculties which natural man potentially possessed, could never develop of themselves, but must require the fortuitous concurrence of many foreign causes that might never arise, and without which he would have remained for ever in his primitive condition, I must now collect and consider the different accidents which may have improved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while depraving the species, and made man wicked while making him sociable; so as to bring him and the world from that distant period to the point at which we now behold them.

我已经证明，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几乎感觉不到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存在，而且自然的不平等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接下来，我将在人类思想连续发展的过程中继续寻找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轨迹。上文已经指出，在自然状态中人的自我完善、社会美德，以及上天赋予的各种其他潜质，绝不能自发形成、发展，必须借助于许多外部诱因。但是，这些外因可能永远不会发生。这样的话，自然状态中的人则会永远停留在原始状态。所以，我还应该把各种不同的偶然事件加以观察和归纳，这些偶然事件完善了人的智慧，却败坏了人类本身。在使人成为社会的人的同时，也使人变得邪恶起来，最终把人和世界从那么遥远的时代发展到了今天的样子。

I confess that, as the events I am going to describe might have

happened in various ways, I have nothing to determine my choice but conjectures: but such conjectures become reasons, when they are the most probable that can be drawn from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the only means of discovering the truth. The consequences, however, which I mean to deduce will not be barely conjectural; as, on the principles just laid down,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form any other theory that would not furnish the same results, and from which I could not draw the same conclusions.

我必须承认，由于我要叙述的事件可能出现过多种不同的情形，所以我只能通过一些猜测来决定我的选择；但是，当这些猜测成为从自然事物本性中所能作出的最接近于真实的猜测时，当这些猜测作为我们用以发现真理的唯一途径时，这些猜测便转化为推理的依据。我从猜测中推出的结论也不仅是猜测性的结论，因为依据我在上面建立的那些猜想，人们不可能推导出其他理论体系，任何别的理论也都不能给我提供同样的结果，也不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This will be a sufficient apology for my not dwelling on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lapse of time compensates for the little probability in the events; on the surprising power of trivial causes, when their action is constant; on the impossibility, on the one hand, of destroying certain hypotheses, though on the other we cannot give them the certainty of known matters of fact; on its being within the province of history, when two facts are given as real, and have to be connected by a series of intermediate facts, which are unknown or supposed to be so, to supply such facts as may connect them; and on its being in the province of philosophy when history is silent, to determine similar facts to serve the same end; and lastly, on the influence of similarity, which, in the case of events, reduces the facts to a much smaller number of different classes than is

commonly imagined. It is enough for me to offer these hints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my judges, and to have so arranged that the general reader has no need to consider them at all.

这样我就无需对以下这些作出更加深入细致的思考：时间的流逝如何还原各种事件的真实面貌；一些无足轻重的因素在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时会产生多么惊人的力量；某些并无既定事实佐证的假说如何会显得无懈可击；当两件被认可的实事，需要用一系列未知的或者被认为未知的中介事实联系起来时，若有历史可寻，便由历史提供那些起联系作用的事实，若无历史可以考证，则由哲学来提供那些起联系作用的类似事实；最后，就事件而言，事物之间的类似性已使各种事实在类别上简化为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还要少得多的数目。我只需把这些问题呈献给评判员们去思考，我只需把我的研究以一种使普通读者免受思虑之苦的方式呈现出来。

[4_1].Justin, *Hist.* ii. 2. So much more does the ignorance of vice profit the one sort than the knowledge of virtue the other.

[4_2].Nature avows she gave the human race the softest hearts, who gave them tears.

[5_1].优斯坦："通史简编"，ii，2。"一个人因对邪恶的无知而得到的好处要远多于他从美德的认识中获得的好处"。

The Second Part

第二部分

THE first man who, having enclosed a piece of ground, bethought himself of saying *This is mine* , and found people simple enough to believe him, was the real founder of civil society. From how many crimes, wars and murders, from how many horrors and misfortunes might not any one have saved mankind, by pulling up the stakes, or filling up the ditch, and crying to his fellows, “Beware of listening to this impostor; you are undone if you once forget that the fruits of the earth belong to us all, and the earth itself to nobody.” But there is great probability that things had then already come to such a pitch, that they could no longer continue as they were; for the idea of property depends on many prior ideas, which could only be acquired successively, and cannot have been formed all at once in the human mind. Mankind must have made very considerable progress, and acquired considerable knowledge and industry which they must also have transmitted and increased from age to age, before they arrived at this last point of the state of nature. Let us then go farther back, and endeavour to unify under a single point of view that slow succession of events and discoveries in the most natural order.

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第一个圈起来一块土地，产生了“这是我的”的想法，并且还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来相信他的话。倘若此时有人拔掉木桩或填平沟壕，向同胞们大声疾呼：“千万别听信这个骗子的鬼话！土地上的果实是属于我们大家的，土地本身不属于任何人！要是忘记这一点，那你们就要遭殃

啦！”那么人类该会免除多少犯罪、多少战争、多少谋杀、多少不幸和恐怖啊！但是，极可能的是，当时事情的发展已经到了不能再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的地步了。因为私有财产的概念是依赖于一些逐步相继出现的先行观念的，而并不是一下子出现在人的头脑中的。在人类发展到这一自然状态的最后阶段前，他们一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获得了大量的技巧与知识，而把这些技巧与知识世代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因此，我们可以把视角放得更高一点，按照最自然的顺序，把这一系列缓慢发展的事件和精神上的进步综合成一种观点。

Man's first feeling was that of his own existence, and his first care that of self-preservation. The produce of the earth furnished him with all he needed, and instinct told him how to use it. Hunger and other appetites made him at various times experience various modes of existence; and among these was one which urged him to propagate his species—a blind propensity that,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the heart, produced a merely animal act. The want once gratified, the two sexes knew each other no more; and even the offspring was nothing to its mother, as soon as it could do without her.

人类最原始的情感就是对自身生存的情感，最原始的关怀就是对维持生存的关怀。大地的物产供给了他所有的所需之物，而本能促使他去利用这些物产。种种欲念使他在不同时期经历不同的生存方式，有一种欲念刺激他延续自己的种群。然而这种盲目的习性与任何纯粹的爱情或感情毫无关系，只能产生一种纯动物的行为。激情一旦消退，两性彼此就视为路人，甚至孩子一旦不再需要母亲的呵护，便也与母亲没有丝毫的关系了。

Such was the condition of infant man; the life of an animal

limited at first to mere sensations, and hardly profiting by the gifts nature bestowed on him, much less capable of entertaining a thought of forcing anything from her. But difficulties soon presented themselves, and it became necessary to learn how to surmount them: the height of the trees, which prevented him from gathering their fruits, the competition of other animals desirous of the same fruits, and the ferocity of those who needed them for their own preservation, all obliged him to apply himself to bodily exercises. He had to be active, swift of foot, and vigorous in fight. Natural weapons, stones and sticks, were easily found: he learnt to surmount the obstacles of nature, to contend in case of necessity with other animals, and to dispute for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even with other men, or to indemnify himself for what he was forced to give up to a stronger.

这就是早期人的生存状况，这就是最初局限于纯粹的感觉、动物般的生活方式，那时，他没有想过用自己的才能向大自然索取什么，所以他几乎不会利用大自然主动提供的东西。但是困难很快出现了，他必须学会如何战胜它们：一些高大树木妨碍他采摘果实，与其他动物争夺双方都喜爱的果实，许多动物凶猛异常甚至觊觎他的生命，各种各样的境况都迫使他锻炼体魄。在战争中他必须得身手敏捷，奔跑迅速，还要身体强健。像石块、树枝等天然武器，很快便为他所用。人类学会了如何克服大自然的障碍，学会了如何在必要时与其他动物进行搏斗，学会了如何与其他人争夺有限的食物，也学会了如何补偿自己先前不得不让给强者的那些东西。

In proportion as the human race grew more numerous, men's cares increased. The difference of soils, climates and seasons, must have introduced some differences into their manner of living. Barren years, long and sharp winters, scorching summers which

parched the fruits of the earth, must have demanded a new industry. On the seashore and the banks of rivers, they invented the hook and line, and became fishermen and eaters of fish. In the forests they made bows and arrows, and became huntsmen and warriors. In cold countries they clothed themselves with the skins of the beasts they had slain. The lightning, a volcano, or some lucky chance acquainted them with fire, a new resource against the rigours of winter: they next learned how to preserve this element, then how to reproduce it, and finally how to prepare with it the flesh of animals which before they had eaten raw.

随着人类数量的不断增多，种群规模的不断扩大，人类同样的痛苦也越来越多。也许是土壤、气候与季节的差异，迫使人们遵循不同的生活方式。欠佳的收成、漫漫的寒冬，还有炙烤了大地上的所有果实的夏日骄阳，都要求人们拥有特别的劳作方式。在沿海和在沿河的地方，人们发明了渔线和渔钩，并由此成了渔民和以鱼为食的人。在森林里，人们制作了弯弓与利箭，并由此成了猎人和勇士。在寒冷的国度，人们用捕杀的野兽的皮来裹身御寒；电闪雷鸣、火山爆发或者出于某次侥幸人们认识了火——一种抵御严寒的新方法：他们首先发现了保存火源的方法，接着又学会了如何生火，最后还学会了用火烧烤兽肉，而在此之前他们只能吞噬野兽尸体上的生肉。

This repeated relevance of various beings to himself, and one to another, would naturally give rise in the human mind to the perceptions of certain relations between them. Thus the relations which we denote by the terms, great, small, strong, weak, swift, slow, fearful, bold, and the like, almost insensibly compared at need, must have at length produced in him a kind of reflection, or rather a mechanical prudence, which would indicate to him the precautions most necessary to his security.

这种人与不同事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反复接触，必定会在其头脑中自然而然地产生某些特定关系的观念。我们用如下的词语来表示这些关系：大、小、强、弱、快、慢、惧怕、勇敢等等。它们源于人们几乎无意识的偶然的对比，并在其头脑中产生了某种思考，或者说是一种机械的谨慎。而这种谨慎则成了人们保障自身生存和安全的最必要的防备措施。

The new intelligence which resulted from this development increased his superiority over other animals, by making him sensible of it. He would now endeavour, therefore, to ensnare them, would play them a thousand tricks, and though many of them might surpass him in swiftness or in strength, would in time become the master of some and the scourge of others. Thus, the first time he looked into himself, he felt the first emotion of pride; and, at a time when he scarce knew how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t orders of beings, by looking upon his species as of the highest order, he prepared the way for assuming pre-eminence as an individual.

人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新知识，使人意识到自己的优势，从而增强了人相对于其他动物的优势。人给动物布置陷阱请君入瓮，千方百计诱骗动物上当被捉。尽管有的动物比人更为强壮或者更加敏捷，但久而久之，人变成了可供人使用的动物的主人，也变成了那些会伤人的动物的克星。由此，当人类首次对自身作了一番审察后，便产生了最初的自豪感。由此，在他还不知道如何给各种生物划分等级时，他通过把自己的种群视作所有动物中最高的等级，早早地把自己当作同类中的佼佼者了。

Other men, it is true, were not then to him what they now are

to us, and he had no greater intercourse with them than with other animals; yet they were not neglected in his observations. The conformities, which he would in time discover between them, and between himself and his female, led him to judge of others which were not then perceptible; and finding that they all behaved as he himself would have done in like circumstances, he naturally inferred that their manner of thinking and acting was altogether in conformity with his own. This important truth, once deeply impressed on his mind, must have induced him, from an intuitive feeling more certain and much more rapid than any kind of reasoning, to pursue the rules of conduct, which he had best observe towards them, for his own security and advantage.

尽管他的同类和他的关系与我们的同类和我们的关系不尽相同，尽管他与同类之间的交往并不比他与其他动物之间的交往更多，但他并没有忽视对自己同类的观察。久而久之，他也许发现了他与同类之间以及他与异性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并能据此推断出另一些尚未察觉的相同点。当他发现在类似的情况下其他人的行为和自己一致时，他便得出结论，大家的思维方式和意愿与他的十分相同。这一重要的真理，一旦深深地刻在其脑海中，便会促使他凭着预感来寻求最佳的行为方式。这种预感与任何逻辑推理都一样，不但准确无误，而且更为快捷。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他应当遵循这些行为方式。

Taught by experience that the love of well-being is the sole motive of human actions, he found himself in a position to distinguish the few cases, in which mutual interest might justify him in relying upon the assistance of his fellows; and also the still fewer cases in which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might give cause to suspect them. In the former case, he joined in the same herd with them, or at most in some kind of loose association, that laid no

restraint on its members, and lasted no longer than the transitory occasion that formed it. In the latter case, every one sought his own private advantage, either by open force, if he thought himself strong enough, or by address and cunning, if he felt himself the weaker.

经验告诉他，所有人类活动的唯一准则是追求自身幸福，由此他发现自己能够区分：在少数情形下，共同的利益让他可以依靠同伴的帮助；在更加罕见的情形下，彼此利益的冲突使他不能相信自己的同伴。在第一种情形下，他与其他人聚集成群，或者至多是自由的联合体，对其成员不加任何约束，短暂的聚集需要一旦得到了满足，团伙随即解散。在第二种情形下，每个人都力图获取自己的私利。如果他认为自己足够强壮，就会公开使用武力；如果他认为自身在力量上处于劣势，无法使用暴力，就会通过诡计与机智谋取私利。

In this manner, men may have insensibly acquired some gross ideas of mutual undertakings, and of the advantages of fulfilling them: that is, just so far as their present and apparent interest was concerned: for they were perfect strangers to foresight, and were so far from troubling themselves about the distant future, that they hardly thought of the morrow. If a deer was to be taken, every one saw that, in order to succeed, he must abide faithfully by his post: but if a hare happened to come within the reach of any one of them, it is not to be doubted that he pursued it without scruple, and, having seized his prey, cared very little, if by so doing he caused his companions to miss theirs.

就这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对彼此之间的义务以及履行这种义务将能带来的好处有了某种粗略的观念。但这也仅限于当前的利益或意

识到的利益，他们完全没有远见，更不会为遥远的未来而烦恼，甚至很少去想第二天的事情。要抓捕一头鹿吗？每个人都认识到要想成功抓捕就必须忠于职守、坚守岗位；但是，假如有一只野兔恰巧路过并进入其中一人的抓捕范围，毋庸置疑，他会毫无顾虑地追赶上去。当他抓住自己的猎物后，也绝不会因自己的行为让同伴们失去了猎物而有任何的自责。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that such intercourse would not require a language much more refined than that of rooks or monkeys, who associate together for much the same purpose. Inarticulate cries, plenty of gestures and some imitative sounds, must have been for a long time the universal language; and by the addition, in every country, of some conventional articulate sounds (of which, as I have already intimated, the first institution is not too easy to explain) particular languages were produced; but these were rude and imperfect, and nearly such as are now to be found among some savage nations.

我们不难理解，人类之间的这种交往所需要的语言，并不比类似人类群居在一起的乌鸦与猴子的语言更加精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普遍使用的语言一定是含糊不清的呼喊、许许多多的手势以及一些模仿性的声音。之后，每一个地区又给这些语言加进了一些发音清晰的而又约定俗成的声音（就像我曾讲到的，语言的形成是不太容易解释的），便产生了特定的语言，但这种语言是粗糙的、不完善的，与现在一些野蛮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极为相似。

Hurried on by the rapidity of time, by the abundance of things I have to say, and by the almost insensible progress of things in their beginnings, I pass over in an instant a multitude of ages; for

the slower the events were in their succession, the more rapidly may they be described.

由于时光飞逝、所需描述的事物过于繁杂以及人类在最初阶段的发展缓慢不易察觉，我的笔如箭一般转瞬间划过了无数的岁月长河，只能对其作最简略的说明。因为事情的发展越是缓慢，对其的叙述就越应当简洁明快。

These first advances enabled men to make others with greater rapidity. In proportion as they grew enlightened, they grew industrious. They ceased to fall asleep under the first tree, or in the first cave that afforded them shelter; they invented several kinds of implements of hard and sharp stones, which they used to dig up the earth, and to cut wood; they then made huts out of branches, and afterwards learnt to plaster them over with mud and clay. This was the epoch of a first revolution, which established and distinguished families, and introduced a kind of property, in itself the source of a thousand quarrels and conflicts. As, however, the strongest were probably the first to build themselves huts which they felt themselves able to defend, it may be concluded that the weak found it much easier and safer to imitate, than to attempt to dislodge them: and of those who were once provided with huts, none could have any inducement to appropriate that of his neighbour; not indeed so much because it did not belong to him, as because it could be of no use, and he could not make himself master of it without exposing himself to a desperate battle with the family which occupied it.

终于，这些早期的进步使得人类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步了。头脑

越是发达，技巧越趋于完善。不久，人们就不再遇树倒头便睡，或见山洞就当避风港了。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些形状类似铲子或斧子的坚硬、锋利的石器，便用它们来挖掘土地和砍伐树木，然后用树枝搭起窝棚；后来又想到给窝棚敷抹上一层黏土或泥土。这是人类第一次变革的时代，这次变革促进了家庭的形成和家庭的区分，从此引进了某种所有制形式，由此无穷无尽的争吵与战争随之而来。然而，第一个为自己建造房屋的人极有可能是最强壮的人，他知道自己有能力保护房屋。这样，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弱者会发现与其试图把强者从那小屋里赶走，不如模仿他们建座小屋来得更快也更安全些。至于那些已有小屋的人，谁还会有任何企图去抢夺邻人的小屋？这倒不是因为那房子不属他所有，而是因为他觉得小屋对他没有用处，况且要占据它并成为其主人，势必要与现任房主发生激烈的冲突，酿成一场恶战。

The first expansions of the human heart were the effects of a novel situation, which united husbands and wives, fathers and children, under one roof. The habit of living together soon gave rise to the finest feelings known to humanity, conjugal love and paternal affection. Every family became a little society, the more united because liberty and reciprocal attachment were the only bonds of its union. The sexes, whose manner of life had been hitherto the same, began now to adopt different ways of living. The women became more sedentary, and accustomed themselves to mind the hut and their children, while the men went abroad in search of their common subsistence. From living a softer life, both sexes also began to lose something of their strength and ferocity: but, if individuals became to some extent less able to encounter wild beasts separately, they found it, on the other hand, easier to assemble and resist in common.

人类情感的发端源于一种新情况，这种新情况把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结合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的习惯产生了人类所有情感中最甜蜜的情感：夫妻之间的爱情和父亲对子女的亲情。每一个家庭成了一个小社会，家庭越是团结越是如此，因为维系家庭成员的唯一纽带就是对彼此的依恋与自由。这时，男女两性开始采用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习惯，而此前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完全相同的。女人们活动少了，并习惯于呆在家里照顾孩子；男人则在外四处走动为整个家庭寻找赖以生存的食物。由于生活较以前安逸，男女两性便开始失去几分昔日的勇猛与强悍之气。然而，虽说个人单独与野兽搏斗的能力不如以前，但是他们聚集起来共同抵御野兽，却比以前容易多了。

The simplicity and solitude of man's life in this new condition, the paucity of his wants, and the implements he had invented to satisfy them, left him a great deal of leisure, which he employed to furnish himself with many conveniences unknown to his fathers: and this was the first yoke he inadvertently imposed on himself, and the first source of the evils he prepared for his descendants. For, besides continuing thus to enervate both body and mind, these conveniences lost with use almost all their power to please, and even degenerated into real needs, till the want of them became far more disagreeable than the possession of them had been pleasant. Men would have been unhappy at the loss of them, though the possession did not make them happy.

在这种新的状态中，人们过着简单索居的生活，他们的需求有限，并且发明了工具以满足这些需求，凡此种种使人们有了大量的闲暇来追逐他们先辈们未曾有过的一些舒适享受。然而，这正是他在无意识中为自己套上的第一副枷锁，也是为其子孙后代种下的第一个祸根。因为这些享受除了使人们的身体与思想继续软弱外，更会让他们在长时间的享受中失去原有的趣味，甚至蜕化为人们的现实需要。失

去这些享受的痛苦远远超过了获得它们所能感到的快乐；失去这些享受会感到不幸，而得到它们，也不怎么让人感到幸福。

We can here see a little better how the use of speech became established, and insensibly improved in each family, and we may form a conjecture also concerning the manner in which various causes may have extended and accelerated the progress of language, by making it more and more necessary. Floods or earthquakes surrounded inhabited districts with precipices or waters: revolutions of the globe tore off portions from the continent, and made them islands. It is readily seen that among men thus collected and compelled to live together, a common idiom must have arisen much more easily than among those who still wandered through the forests of the continent. Thus it is very possible that after their first essays in navigation the islanders brought over the use of speech to the continent: and it is at least very probable that communities and languages were first established in islands, and even came to perfection there before they were known on the mainland.

在这里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语言的使用是怎样不知不觉地在每个家庭中开始或完善的。而且，我们还可以作出猜测，各种特殊的原因用什么方式使语言一天天变得更为必要，从而扩大了语言的使用并加速了它的发展。大洪水或大地震使得人类的聚居地被洪水或悬崖峭壁所包围，地球的变迁使部分陆地从大陆架上断裂开来，割裂成一座座岛屿。显然，这样被聚集起来、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们，肯定要比那些在大陆森林中自由自在游荡的人们会更快地形成一种共同的惯用语。因此，很有可能是这样：在这些被割裂后形成的岛屿上的居民，在他们最初的试航后，给我们大陆带来了使用语言的习惯；或者，至少很可能是这样：在大陆居民对社会和语言一无所知之

前，岛屿上已经建立了社会，产生了语言，甚至已经达到了完善的地步。

Everything now begins to change its aspect. Men, who have up to now been roving in the woods, by taking to a more settled manner of life, come gradually together, form separate bodies, and at length in every country arises a distinct nation, united in character and manners, not by regulations or laws, but by uniformity of life and food, and the common influence of climate. Permanent neighbourhood could not fail to produce, in time, some connection between different families. Among young people of opposite sexes, living in neighbouring huts, the transient commerce required by nature soon led, through mutual intercourse, to another kind not less agreeable, and more permanent. Men began now to tak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bjects into account, and to make comparisons; they acquired imperceptibly the ideas of beauty and merit, which soon gave rise to feelings of preference. In consequence of seeing each other often, they could not do without seeing each other constantly. A tender and pleasant feeling insinuated itself into their souls, and the least opposition turned it into an impetuous fury: with love arose jealousy; discord triumphed, and human blood was sacrificed to the gentlest of all passions.

于是，一切都变得与原来大相径庭了。那些原来游荡在树林中的人们，由于采用更加定居的生活方式，逐渐地聚集在一起，结成了不同的群体，并最终在各个地区形成了拥有各自特点与风俗的截然不同的民族。维系这些民族的不是任何法律与规章，而是同样的生活方式、相同的饮食习惯以及共同的气候影响。长时间比邻而居，不同的家庭之间最终肯定会产生某种联系。居住在相邻小屋的青年男女之

间，由于天然的需求，很快就有了临时的关系，通过彼此间相互交往，这种关系不久就演变成另一种同样亲密且更为持久的关系。人们开始观察不同的对象并加以比较，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才能和美丽的观念，继而产生了偏爱的情感。经常见面让他们养成了习惯，转而不能常常见面时，便会让彼此痛苦不堪。温柔而又甜蜜的情感潜入心灵，但这种感情会因极小的冲突演变为强烈的怒火：爱会生妒，一旦妒起恨生，至柔的情感就将会以血相报。

As ideas and feelings succeeded one another, and heart and head were brought into play, men continued to lay aside their original wildness; their private connections became every day more intimate as their limits extended. They accustomed themselves to assemble before their huts round a large tree; singing and dancing, the true offspring of love and leisure, became the amusement, or rather the occupation, of men and women thus assembled together with nothing else to do. Each one began to consider the rest, and to wish to be considered in turn; and thus a value came to be attached to public esteem. Whoever sang or danced best, whoever was the handsomest, the strongest, the most dexterous, or the most eloquent, came to be of most consideration; and this was the first step towards inequa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towards vice. From these first distinctions arose on the one side vanity and contempt and on the other shame and envy: and the fermentation caused by these new leavens ended by producing combinations fatal to innocence and happiness.

随着观念和情感的相互推动，思想与心灵的日益活跃，人类不断摆脱自身原有的野性，相互之间的联系变得越加亲密而广泛。他们开始在大树下聚会，载歌载舞。这本是爱情与闲暇的真实产物，却成为了他们的娱乐活动，更确切地说，变成了那些悠闲地聚集在一起的男

男女女们的消遣活动。每一个人都开始关注他人，并希望自己被关注。于是，公众的尊敬具有了价值。那些最能歌善舞的人、最英俊潇洒的人、最强壮有力的人、最身手敏捷的人、最能言善辩的人就成为了最受尊敬的人。这就是人类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邪恶的第一步。从这种最初的偏爱中，一方面产生了虚荣与轻蔑，另一方面产生了羡慕与羞耻。最终这些新因素所引起紊乱局面的后果，对幸福与天真来讲是致命的。

As soon as men began to value one another, and the idea of consideration had got a footing in the mind, every one put in his claim to it, and it became impossible to refuse it to any with impunity. Hence arose the first obligations of civility even among savages; and every intended injury became an affront; because, besides the hurt which might result from it, the party injured was certain to find in it a contempt for his person, which was often more insupportable than the hurt itself.

人们一旦开始互相品评，一旦在头脑中形成了尊重的观念，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被尊重的权利，并且任何不尊重他人的人都不再可能平安无事了。由此，最初的种种礼仪与礼让的义务产生了，甚至在野蛮人之间也是如此。由此，每一种故意的伤害都变成了一种侮辱，因为，除了由于伤害带来的损害外，被冒犯的一方必然会从中觉察出对其人格的藐视，而这往往比损害本身更加令他无法忍受。

Thus, as every man punished the contempt shown him by others, in proportion to his opinion of himself, revenge became terrible, and men bloody and cruel. This is precisely the state reached by most of the savage nations known to us: and it is for want of having made a proper distinction in our ideas, and see how

very far they already are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that so many writers have hastily concluded that man is naturally cruel, and requires civil institutions to make him more mild; whereas nothing is more gentle than man in his primitive state, as he is placed by nature at an equal distance from the stupidity of brutes, and the fatal ingenuity of civilised man. Equally confined by instinct and reason to the sole care of guarding himself against the mischiefs which threaten him, he is restrained by natural compassion from doing any injury to others, and is not led to do such a thing even in return for injuries received. For, according to the axiom of the wise Locke, *There can be no injury, where there is no property* .

正因如此，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尊重标准来决定别人对他的尊重程度，对轻视他的人施以惩罚。于是报复的后果变得可怕，人们因此变得嗜血成性、残酷无情。这正是我们熟知的大多数野蛮民族曾经达到的程度。许多著述者就是因为没能充分区分这些观念，没有注意到这些民族距离最初的自然状态多么遥远，就草率地下结论说，人生而残暴，他们需要文明制度的感化。然而，再没有比原始状态中的人更温和的了。自然给人的定位，距离野兽的愚钝和文明人的不良心智同样遥远，他受到本能和理性的同等制约，只知道提防所面临伤害的威胁，天生的怜悯之心制止他去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情，非但如此，即使在他受到伤害后也不会去报复。因为按照智者洛克的格言："没有私有制，就没有伤害。"

But it must be remarked that the society thus formed, and the relations thus established among men, required of them qualities different from those which they possessed from their primitive constitution. Morality began to appear in human actions, and every one, before the institution of law, was the only judge and avenger of the injuries done him, so that the goodness which was suitable in

the pure state of nature was no longer proper in the new-born state of society. Punishments had to be made more severe, as opportunities of offending became more frequent, and the dread of vengeance had to take the place of the rigour of the law. Thus, though men had become less patient, and their natural compassion had already suffered some diminution, this period of expansion of the human faculties, keeping a just mean between the indolence of the primitive state and the petulant activity of our egoism, must have been the happiest and most stable of epochs. The more we reflect on it, the more we shall find that this state was the least subject to revolutions, and altogether the very best man could experience; so that he can have departed from it only through some fatal accident, which, for the public good, sh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The example of savages, most of whom have been found in this state, seems to prove that men were meant to remain in it, that it is the real youth of the world, and that all subsequent advances have been apparently so many steps towards the perfection of the individual, but in reality towards the decrepitude of the species.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已经形成的社会和已经建立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要求人们所具有的品质已不同于他们原始体质中所禀赋的品质；由于道德观念已开始渗入人类的行为之中，在法律确立之前，人人都是对自己所受伤害的唯一裁判者和复仇者；适合于纯粹的自然状态的善良已不再适合于新生的社会；随着人们互相冒犯的几率日趋增高，处罚必然也会日益严酷，对复仇的恐惧感为过于软弱的法律增强了约束作用。因此，尽管人们的耐心减弱了，尽管自然的怜悯心也已经历了某种变化，但由于人类的能力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恰恰介于原始状态中的闲散和利己主义的急剧活动之间的一个时期，这应当是最幸福而最稳定的一个时期。在这一点上越加深思，我们就越加深信这个时期最不易发生变革，而且最适合于人类的状态；除非发生

某种不幸的偶然事件，否则人类是不会脱离这种状态的。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这种偶然事件最好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发现的野蛮人大多数都处于这种状态，他们的事例似乎证实：人类生来就是要一直处于这种状态的，这种状态才是人类世界的真正青春，后来取得的所有进步，从表面上看是个体日臻完善，实际上是人类整体渐趋衰落。

So long as men remained content with their rustic huts, so long as they were satisfied with clothes made of the skins of animals and sewn together with thorns and fish-bones, adorned themselves only with feathers and shells, and continued to paint their bodies different colours, to improve and beautify their bows and arrows and to make with sharp-edged stones fishing boats or clumsy musical instruments; in a word, so long as they undertook only what a single person could accomplish, and confined themselves to such arts as did not require the joint labour of several hands, they lived free, healthy, honest and happy lives, so long as their nature allowed, and as they continued to enjoy the pleasures of mutual and independent intercourse. But from the moment one man began to stand in need of the help of another; from the moment it appeared advantageous to any one man to have enough provisions for two, equality disappeared, property was introduced, work became indispensable, and vast forests became smiling fields, which man had to water with the sweat of his brow, and where slavery and misery were soon seen to germinate and grow up with the crops.

只要人们还满足于他们粗陋的小屋，只要人们还局限于用荆棘和鱼骨缝制兽皮衣服，只要人们继续把羽毛和贝壳当作装饰品装点自己，把身体涂画得五颜六色，把弓箭制造得更为精良和美观，用锋利的石头凿制出渔船或制作粗陋的乐器：总之，只要他们从事那些仅靠一个人就能单独完成的工作，从事那些不需要许多人手通力合作才能

完成的手艺活，只要遵循本性，他们就可以过着自由、健康、率真而幸福的生活，继续享受着无拘无束自由交往的快乐。但是，自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帮助的那一刻起，自人们察觉到一个人占有两份食物的好处的那一瞬开始，所有的平等都消失了，私有制随之出现，劳动成了必需，广袤的森林变成了需要人们用汗水来浇灌的风景明媚的田野。接着，人们不久就会看到，奴役和苦难伴随着农作物一起萌芽、生长。

Metallurgy and agriculture were the two arts which produced this great revolution. The poets tell us it was gold and silver, but, for the philosophers, it was iron and corn, which first civilised men, and ruined humanity. Thus both were unknown to the savages of America, who for that reason are still savage: the other nations also seem to have continued in a state of barbarism while they practised only one of these arts. One of the best reasons, perhaps, why Europe has been, if not longer, at least more constantly and highly civilised th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that it is at once the most abundant in iron and the most fertile in corn.

冶金术和农业这两种技术的发明，引发了这场伟大的变革。在诗人看来是黄金和白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器和谷物，正是这些东西教化了人，又败坏了人类。美洲的野蛮人对冶金术和农业这两种技术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他们依然是野蛮人；而其他民族倘若只掌握其中的一种技术，那么他们似乎也停留在未开化的状态。欧洲的文明，虽然不比世界上其他地区开始得早，但至少更为持久、程度更高，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原因可能就是欧洲既是世界上铁矿最为丰富的地方，也是盛产谷物的地方。

It is difficult to conjecture how men first came to know and use

iron; for it is impossible to suppose they would of themselves think of digging the ore out of the mine, and preparing it for smelting, before they knew what would be the result.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the less reason to suppose this discovery the effect of any accidental fire, as mines are only formed in barren places, bare of trees and plants; so that it looks as if nature had taken pains to keep that fatal secret from us. There remains, therefore, only the extraordinary accident of some volcano which, by ejecting metallic substances already in fusion, suggested to the spectators the idea of imitating the natural operation. And we must further conceive them as possessed of uncommon courage and foresight, to undertake so laborious a work, with so distant a prospect of drawing advantage from it; yet these qualities are united only in minds more advanced than we can suppose those of these first discoverers to have been.

很难推测人类当初是怎样认识并使用铁的，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在无法预知可能产生的结果之前，就能想到从矿藏中挖掘出铁矿，然后为熔炼这些物质作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我们更没有理由把这个发明归因于某次偶然的火灾，因为矿藏只有在干燥、贫瘠的地方以及一些没有树木与植被的不毛之地才会形成。由此看来，大自然似乎早已竭力隐藏这个不幸的秘密，以防被我们发现。因此，只有在某一火山突然爆发这种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喷涌而出正在熔化的金属物质，可能使看到这一现象的人们受到启发，产生模仿大自然这种行为的想法。即便如此，我们还必须假定这些人拥有非凡的勇气和先见之明，才能从事如此艰难的工作，并且很久以前就看到他们可能从中获得的利益。只有智慧比较发达的人才会拥有这些品质，而当时的发现者想必还没有这种头脑。

With regard to agriculture, the principles of it were known long before they were put in practice; and it is indeed hardly possible

that men, constantly employed in drawing their subsistence from plants and trees, should not readily acquire a knowledge of the means made use of by nature for the propagation of vegetables. It was in all probability very long, however, before their industry took that turn, either because trees, which together with hunting and fishing afforded them food, did not require their attention; or because they were ignorant of the use of corn, or without instruments to cultivate it; or because they lacked foresight to future needs; or lastily, because they were without means of preventing others from robbing them of the fruit of their labour.

至于农业，其原理早在人们开始耕种以前就已为人所知了。由于人们不断地从树木上、植物中获取食物，他们可能早早就发现了大自然繁殖植物的方法；但是，很可能在很久以后，人类才开始从事农业。这或者是因为树木有土地有水源即可生长，不需要人们的照管；或者是因为他们尚不知道谷物的用途；或者是因为没有种植谷物的工具；或者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的需要缺乏深谋远虑；或是，总而言之，是因为他们需要阻止他人掠夺其劳动成果的方法。

When they grew more industrious, it is natural to believe that they began, with the help of sharp stones and pointed sticks, to cultivate a few vegetables or roots around their huts; though it was long before they knew how to prepare corn, or were provided with the implements necessary for raising it in any large quantity; not to mention how essential it is, for husbandry, to consent to immediate loss, in order to reap a future gain—a precaution very foreign to the turn of a savage's mind; for, as I have said, he hardly foresees in the morning what he will need at night.

我们可以相信，当人类变得日益勤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了，用锐利的石块和带尖的木棒，在房前屋后种植为数不多的豆类或根茎作物。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才了解谷物的种植方法，并拥有了大规模种植谷物所需要的工具。更不必说，要从事农业这门技术就要播种土地，就必须愿意先失去一些眼前的利益，然后才能收获更多的好处。这种远见对于生活在野蛮状态中的人来说是陌生的。正如我曾经说过的，他们往往在早晨都预料不到晚上的需求。

The invention of the other arts must therefore have been necessary to compel mankind to apply themselves to agriculture. No sooner were artificers wanted to smelt and forge iron, than others were required to maintain them; the more hands that were employed in manufactures, the fewer were left to provide for the common subsistence, though the number of mouths to be furnished with food remained the same: and as some required commodities in exchange for their iron, the rest at length discovered the method of making iron serve for the multiplication of commodities. By this means the arts of husbandry and agriculture were established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art of working metals and multiplying their uses on the other.

因此，为使人类致力于农业生产，其他各种技术的发明就变得很必要了。一旦需要一些人从事熔铁和锻铁的工作，就需要有另外一些人来养活他们。从事制造业的人口越多，为所有人提供生活资料的人口就越少，只是需要食物的人口总数并没有改变。而且，由于一些人需要用农产品来换取铁，所以另一些人终于想出了用铁制工具增加农产品的方法。自此，一方面产生了耕耘法和农业：另一方面出现了金属加工业和推广金属用具用途的技术。

The cultivation of the earth necessarily brought about its distribution; and property, once recognised, gave rise to the first rules of justice; for, to secure each man his own, it had to be possible for each to have something. Besides, as men began to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and all had something to lose, every one had reason to apprehend that reprisals would follow any injury he might do to another. This origin is so much the more natural, as it is impossible to conceive how property can come from anything but manual labour: for what else can a man add to things which he does not originally create, so as to make them his own property? It is the husbandman's labour alone that, giving him a title to the produce of the ground he has tilled, gives him a claim also to the land itself, at least till harvest, and so, from year to year, a constant possession which is easily transformed into property. When the ancients, says Grotius, gave to Ceres the title of Legislatrix, and to a festival celebrated in her honour the name of Thesmophoria, they meant by that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s had produced a new kind of right: that is to say, the right of proper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right deducible from the law of nature.

土地的耕种必然会引起土地的分配问题，而土地的所有权一旦被承认，就必然会产生最初的公正规则。因为，要获得个人的东西，首先就必须得让每个人拥有一些东西。此外，由于人们已经开始关注未来，并且他们都明白自己拥有一些可能会失去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害怕由于损害他人而使自己遭到报复。这种起源是比较合乎自然规律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设想所有权的观念除了劳动以外还会从别的来源产生。因为一个人要把非他创造的东西据为己有，除了加入自己的劳动以外还能做什么呢？唯有劳动才能给予耕耘者所耕种土地上农作物的拥有权，给予他对土地本身的拥有权，至少是到庄稼收获时为止。这样年复一年的连续占有就很容易转化为私有财产。格劳秀斯说，古人赋予刻瑞斯女神立法者的称号，并将纪念她的节日命名为“黛丝摩

芙里节”，它的意思是：土地的分配产生了一种新的权利，即所有权，这种权力与自然法产生的权利不同。

In this state of affairs, equality might have been sustained, had the talents of individuals been equal, and had, for example, the use of iron and the consumption of commodities always exactly balanced each other; but, as there was nothing to preserve this balance, it was soon disturbed; the strongest did most work; the most skilful turned his labour to best account; the most ingenious devised methods of diminishing his labour: the husbandman wanted more iron, or the smith more corn, and, while both laboured equally, the one gained a great deal by his work, while the other could hardly support himself. Thus natural inequality unfolds itself insensibly with that of combination,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n, developed by thei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becomes more sensible and permanent in its effects, and begins to have an influence, in the same proportion, over the lot of individuals.

在这种状态中，如果人们的才能是相等的，例如，如果铁的使用与农产品的消费量总能恰好保持平衡，那么一切事物尚能保持平等。但是，这种均衡是无法持续的，它很快就被打破了。力气最大的人完成的工作最多；技术最熟练的人获得的利益最大；头脑最机灵的人发明了许多省力的方法；或是农夫需要更多的铁具，或是铁匠需要更多的谷物。虽然二者同样在劳作，但一位获得很多报酬，另一位则难以糊口。这样，自然的不平等随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不知不觉地渐渐显露出来。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变得更为显著，其效应也更加显著且更为持久，并且相应地开始影响个人的命运。

Matters once at this pitch, it is easy to imagine the rest. I shall

not detain the reader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successive invention of other arts,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the trial and utilisation of talents, the inequality of fortunes, the use and abuse of riches, and all the details connected with them which the reader can easily supply for himself. I shall confine myself to a glance at mankind in this new situation.

事物一旦发展到这种地步，其他的事情便不难想象了。我不想再去描述其他技术的相继发明、语言的发展进步、才能的试验和运用、机遇的不均、财富的使用或滥用，也不想描写随之而来的所有细节，因为人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补充。我仅想概括地观察一下处在这种新秩序下的人类。

Behold then all human faculties developed, memory and imagination in full play, egoism interested, reason active, and the mind almost at the highest point of its perfection. Behold all the natural qualities in action, the rank and condition of every man assigned him; not merely his share of property and his power to serve or injure others, but also his wit, beauty, strength or skill, merit or talents: and these being the only qualities capable of commanding respect, it soon became necessary to possess or to affect them.

这时，人类所有的能力都得到了发展，记忆力和想象力在发挥作用，自尊心受到关注，理性日趋活跃，智力几乎达到了它所能及的最完善的程度。这时，人类全部的天赋品质都在发挥作用；每个人的等级和地位不仅建立在其财产的多寡以及能帮助或损害别人能力的强弱之上，也同样建立在天赋、美貌、体力或口才、美德或才能等种种品质之上。因为只有这些品质才能令人肃然起敬，所以，每个人都必须

拥有或者至少假装拥有这些品质。

It now became the interest of men to appear what they really were not. To be and to seem became two totally different things; and from this distinction sprang insolent pomp and cheating trickery, with all the numerous vices that go in their train. On the other hand, free and independent as men were before, they were now, in consequence of a multiplicity of new wants, brought into subjection, as it were, to all nature, and particularly to one another; and each became in some degree a slave even in becoming the master of other men: if rich, they stood in need of the services of others; if poor, of their assistance; and even a middle condition did not enable them to do without one another. Man must now, therefore, have been perpetually employed in getting others to interest themselves in his lot, and in making them, apparently at least, if not really, find their advantage in promoting his own. Thus he must have been sly and artful in his behaviour to some, and imperious and cruel to others; being under a kind of necessity to ill-use all the persons of whom he stood in need, when he could not frighten them into compliance, and did not judge it his interest to be useful to them. Insatiable ambition, the thirst of raising their respective fortunes, not so much from real want as from the desire to surpass others, inspired all men with a vile propensity to injure one another, and with a secret jealousy, which is the more dangerous, as it puts on the mask of benevolence, to carry its point with greater security. In a word, there arose rivalry and competi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conflicting interests on the other, together with a secret desire on both of profiting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All these evils were the first effects of property, and the inseparable attendants of growing inequality.

人们本来是某种样子，但却必须让别人以为自己是另外一个样子。“实际上是”和“看起来是”变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情。正是这种区别催生了浮华虚荣、尔虞我诈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邪恶。另一方面，从前本是自由而独立的人，如今却因众多的新生欲望而受制于人，可以说，他要受到整个大自然的支配，尤其要受到同类的支配。纵使他变成了同类的主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也变成了同类的奴隶。如果他富有，他需要别人的服侍；如果他贫穷，他需要别人的资助；即使他不穷不富，也不能离开他人而独自生活。于是他必须不断设法使别人关心他的幸福，并至少在表面上让人看来，为他服务就能给他们自己带来好处，即使事实并非如此。这样一来，他与一部分人相处时会变得虚伪狡猾，而对另一部分人则专横残忍。并且，每当他不能使他需要的人对他产生敬畏时，每当他不能认识到为他们服务也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时，他就不得不对他需要的一切人动恶。总而言之，贪得无厌的野心，聚积财富的狂热，与其说他们是出于真正的需要，毋宁说是出于想高人一等的渴望，使所有的人产生一种损人利己的邪恶意图，以及一种隐秘的嫉妒心。这种嫉妒心尤为危险，因为人们为了更加有保障地达到目的，往往戴着伪善的面具。总之，虽然有时看来是激烈竞争，有时看来是利益冲突，但是人人都时时暗藏着损人利己之心。这一切都是私有制的最初后果，也是新生的不平等的必然产物。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signs to represent riches, wealth could hardly consist in anything but lands and cattle, the only real possessions men can have. But, when inheritances so increased in number and extent as to occupy the whole of the land, and to border on one another, one man could aggrandise himself only at the expense of another; at the same time the supernumeraries, who had been too weak or too indolent to make such acquisitions, and had grown poor without sustaining any loss, because, while they saw everything change around them, they remained still the same, were obliged to receive their subsistence, or steal it, from the rich;

and this soon bred,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characters, dominion and slavery, or violence and rapine. The wealthy, on their part, had no sooner begun to taste the pleasure of command, than they disdained all others, and, using their old slaves to acquire new, thought of nothing but subduing and enslaving their neighbours; like ravenous wolves, which, having once tasted human flesh, despise every other food and thenceforth seek only men to devour.

在人们尚未发明代表财富的符号之前，财富仅包括土地和家畜，这是人们能够拥有的唯一真正的财产。然而，当不动产在数量和范围上不断增长和扩张，直至占据整片土地并相互毗邻的时候，一个人只有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才能扩大自己的财富。那些因太过虚弱或懒惰而未能发财致富的人们，就成了多余的人，尽管他们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却变成了穷人。因为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在改变，只有他们自己依然没有改变。于是，他们不得不从富人手中接受施舍或抢夺生活必需品。这样一来，由于富人和穷人各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开始产生统治与奴役，或者暴力与强夺。为富者一方，一尝到发号施令的快感，便立即摈弃其他一切的乐趣了。并且，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已有的奴隶来获得新的奴隶，所以他们一心只想征服和奴役他们的邻人。就如同饿狼一般，一旦尝过人肉，之后便厌弃其他一切食物，只想吃人了。

Thus, as the most powerful or the most miserable considered their might or misery as a kind of right to the possessions of others, equivalent, in their opinion, to that of property, the destruction of equality was attended by the most terrible disorders. Usurpations by the rich, robbery by the poor, and the unbridled passions of both, suppressed the cries of natural compassion and the still feeble voice of justice, and filled men with avarice, ambition and vice. Between the title of the strongest and that of the first occupier, there arose perpetual conflicts, which never ended but in battles and

bloodshed. The new-born state of society thus gave rise to a horrible state of war; men thus harassed and depraved were no longer capable of retracing their steps or renouncing the fatal acquisitions they had made, but, labouring by the abuse of the faculties which do them honour, merely to their own confusion, brought themselves to the brink of ruin.

正因如此，最强势的人或最弱势的人分别将他们的强势或不幸视为对他人所有物的占有权，甚至可以说是财产所有权。平等一旦破裂，最可怕的混乱便接踵而至。正因如此，富人们的巧取豪夺、穷人们的盗窃抢劫以及人的一切情欲放纵，扼杀了人类天生的怜悯之心和原本微弱的正义之声，使人变得贪婪、邪恶、野心勃勃。最强者和先占者的权力之争永无穷尽，而这种冲突总是以战争和杀戮作为终结。新生的社会陷入了最可怕的战争状态：人类由此堕落低劣，疲惫不堪，他们再也不能回到原点，再也不能摆脱掉他们已拥有的不幸的所得。他们滥用能给自己带来荣光的种种才能，结果却迷失了自我，将自己推向毁灭的边缘。

Attonitusnovitatemali, divesquemiserque, Effugereoptatopes; etquæmodovoveratodit. [5_1]

Attonitusnovitatemali, divesquemiserque, Effugereoptatopes; et quæmodovoveratodit. [6_1]

It is impossible that men should not at length have reflected on so wretched a situation, and on the calamities that overwhelmed them. The rich, in particular, must have felt how much they suffered by a constant state of war, of which they bore all the expense; and in which, though all risked their lives, they alone risked their property. Besides, however speciously they might

disguise their usurpations, they knew that they were founded on precarious and false titles; so that, if others took from them by force what they themselves had gained by force, they would have no reason to complain. Even those who had been enriched by their own industry, could hardly base their proprietorship on better claims. It was in vain to repeat, “I built this well; I gained this spot by my industry.” Who gave you your standing, it might be answered,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demand payment of us for doing what we never asked you to do? Do you not know that numbers of your fellow-creatures are starving, for want of what you have too much of? You ought to have had the express and universal consent of mankind, before appropriating more of the common subsistence than you needed for your own maintenance. Destitute of valid reasons to justify and sufficient strength to defend himself, able to crush individuals with ease, but easily crushed himself by a troop of bandits, one against all, and incapable, on account of mutual jealousy, of joining with his equals against numerous enemies united by the common hope of plunder, the rich man, thus urged by necessity, conceived at length the profoundest plan that ever entered the mind of man: this was to employ in his favour the forces of those who attacked him, to make allies of his adversaries, to inspire them with different maxims, and to give them other institutions as favourable to himself as the law of nature was unfavourable.

但是，人们不可能始终不反思他们所处的悲惨境遇和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尤其是富人，他们一定很快就会意识到持续不断的战争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因为他们负担着战争的全部费用。虽说在战争中，人人都有丧命的危险，但只有富人承担着损失财产的风险。除此之外，无论他们怎样粉饰自己巧取豪夺的行为，他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些财产皆建立在伪造的和不稳定的名头之上，仅靠暴力夺得的

东西也可能再次被别人用暴力夺去；对这一得失的过程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抱怨的余地。即便那些全凭自己的勤劳而致富的人们，也很难为其财产的所有权争得更为正当的名分。他们尽管这样说："这道墙是我修建的，这块土地是我靠劳动获得的。"但这又有何用？有人会反诘："是谁给你划的地界？我们并没有强迫你劳动，你有何权利向大家索取报酬呢？难道你不知晓，正因你占有过多的生活资料，无数的同胞因此受尽折磨或死亡？难道你不知晓，要占有超出你自己生存所需的公共生活资料，必须经过全人类的确认和一致的同意吗？"富人既缺乏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也缺乏足够的力量来保卫自己；他镇压某一个人易如反掌，但同样也会被成群的人轻松制服；富人是以一敌众的，而且由于富人之间相互嫉妒，他们不能联合起来对抗那些以抢劫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的"匪徒"。迫于形势，富人终于构想出了一个人类智慧所能企及的最深谋远虑的计划：利用那些攻击他的力量为其服务，化敌为盟，向其灌输另外的人生格言，使他们采纳其他的制度，这些制度对富人之有利正如自然法对富人之不利。

With this view, after having represented to his neighbours the horror of a situation which armed every man against the rest, and made their possessions as burdensome to them as their wants, and in which no safety could be expected either in riches or in poverty, he readily devised plausible arguments to make them close with his design. "Let us join," said he, "to guard the weak from oppression, to restrain the ambitious, and secure to every man the possession of what belongs to him: let us institute rules of justice and peace, to which all without exception may be obliged to conform; rules that may in some measure make amends for the caprices of fortune, by subjecting equally the powerful and the weak to the observance of reciprocal obligations. Let us, in a word, instead of turning our forces against ourselves, collect them in a supreme power which may govern us by wise laws, protect and defend all the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repulse their common enemies, and maintain

eternal harmony among us.”

怀着这种目的，富人向他的邻人们讲述一种可怕的情形：如果所有的人都武装起来相互对抗，那么每个人的财产和需求都一样会成为无法忍受的负担，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将永无宁日。就这样，富人轻而易举地编造出了虚假的理由，诱导人们以达到他的目的。他说：“让我们联合起来吧，好保护弱者免受压迫，约束那些有野心的人，以保证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东西拥有所有权。让我们来制定一些人人必须遵守的维护公正与和平的规则吧。它让强者和弱者一样互尽义务，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命运的不济。总之，我们不要搞内讧消耗我们的力量，我们要集中力量使之汇聚成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权力将依据明智的法律来治理我们，保卫这一团体中的所有成员，抵御共同的敌人，使我们永久地生活在和睦中。”

Far fewer words to this purpose would have been enough to impose on men so barbarous and easily seduced; especially as they had too many disputes among themselves to do without arbitrators, and too much ambition and avarice to go long without masters. All ran headlong to their chains, in hopes of securing their liberty; for they had just wit enough to perceive the advantage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ithout experience enough to enable them to foresee the dangers. The most capable of foreseeing the dangers were the very persons who expected to benefit by them; and even the most prudent judged it not inexpedient to sacrifice one part of their freedom to ensure the rest; as a wounded man has his arm cut off to save the rest of his body.

其实，寥寥数语足以诱惑那些容易受骗的粗野之人了。何况他们之间本来就有太多的纠纷需要解决，以至于不能没有仲裁人。并且，

他们又有太多的贪欲和野心，以至于不能长时间没有主人。于是，所有的人甘愿引颈受缚，希望这个枷锁能保障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虽然能敏锐地觉察到政治制度的好处，却缺乏足够的经验预见其种种潜在的危险。最有能力预见这些弊端的人恰恰就是期望从中牟利的人。甚至头脑最为清醒的人也认为，牺牲一部分自由以确保另一部分自由是必要的，就像一个人四肢中有严重受伤，情愿砍掉其中的残肢来保全身体的其他部分。

Such was, or may well have been, the origin of society and law, which bound new fetters on the poor, and gave new powers to the rich; which irretrievably destroyed natural liberty, eternally fixed the law of property and inequality, converted clever usurpation into unalterable right, and, for the advantage of a few ambitious individuals, subjected all mankind to perpetual labour, slavery and wretchedness. It is easy to see how the establishment of one community made that of all the rest necessary, and how, in order to make head against united forces, the rest of mankind had to unite in turn. Societies soon multiplied and spread over the face of the earth, till hardly a corner of the world was left in which a man could escape the yoke, and withdraw his head from beneath the sword which he saw perpetually hanging over him by a thread. Civil right having thus become the common rule among the members of each community, the law of nature maintained its place only between different communities, where, under the name of the right of nations, it was qualified by certain tacit conventions, in order to make commerce practicable, and serve as a substitute for natural compassion, which lost, when applied to societies, almost all the influence it had over individuals, and survived no longer except in some great cosmopolitan spirits, who, breaking down the imaginary barriers that separate different peoples, follow the example of our Sovereign Creator, and include the whole human

race in their benevolence.

如果任由人类自行发展的话，这就是，也必定是社会和法律的起源，它加重了弱者的桎梏，增强了富人的实力；天赋的自由被不可挽回地摧毁殆尽，保障私有制和不平等的法律却得以永远确立；它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为了少数野心家的利益，使其余的人陷入无穷无尽的劳苦、奴役和苦难的深渊。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一个社会的建立如何使其他社会的建立成为必然；为了对抗联合的力量，其余的人不论如何也必须联合起来。依此构建的社会一旦形成，不久后便会增加或者扩展，以至于覆盖整个地球；茫茫宇宙再也找不到一个角落，在那里人能够摆脱桎梏，并能避开永远悬于头顶的经常被恶意操控的利剑。就这样，民法成了公民的共同准则，自然法则仅存于各个社会之间，被称作万国法。自然法则受默认惯例的认可，使社会间的交流成为可能，并且替代了天生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在各个社会间已逐渐失去了它最初在人们身上起到的全部影响力，如今仅存于一些把他们自己当作是世界公民的伟人们的灵魂深处。这种同情心，冲破了那些分离各民族人民的臆想藩篱，效仿使我们得以存在的造物主，将整个人类都纳入其仁爱之中。

But bodies politic, remaining thus in a state of nature among themselves, presently experienced the inconveniences which had obliged individuals to forsake it; for this state became still more fatal to these great bodies than it had been to the individuals of whom they were composed. Hence arose national wars, battles, murders, and reprisals, which shock nature and outrage reason; together with all those horrible prejudices which class among the virtues the honour of shedding human blood. The most distinguished men hence learned to consider cutting each other's throats a duty; at length men massacred their fellow-creatures by thousands without so much as knowing why, and committed more

murders in a single day's fighting, and more violent outrages in the sack of a single town, than were committed in the state of nature during whole ages over the whole earth. Such were the first effects which we can see to have followed the division of mankind into different communities. But let us return to their institutions.

因此，依然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政治组织很快就遭遇到曾迫使人们脱离这种自然状态的种种不便；并且，这种自然状态对于这些庞大的政体远比之前对于构成这些政体的个体们的危害更具毁灭性。由此就产生了那些令自然战栗、使理性休克的民族战争、斗争、残杀和报复；由此就产生了那些把杀人流血当作美德和荣耀的可怕偏见。就连最高尚的人也学着把扼断同胞之喉视为己任；最终，成千上万的人们互相残杀，却茫然不知为何这么做；在一次战斗中伤亡的人数，以及攻占一座城池所引起的恐怖骚乱，比在自然状态中，整个世界在所有年代被杀害的人数和所引起的骚乱还要多得多。这就是我们可以设想到的人类分成不同社会阶层后所产生的最初结果。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些阶层怎样形成的问题。

I know that some writers have given other explanations of the origin of political societies, such as the conquest of the powerful, or the association of the weak. It is, indeed, indifferent to my argument which of these causes we choose. That which I have just laid down, however, appears to me the most natural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because, in the first case, the right of conquest, being no right in itself, could not serve as a foundation on which to build any other; the victor and the vanquished people still remained with respect to each other in the state of war, unless the vanquished, restored to the full possession of their liberty, voluntarily made choice of the victor for their chief. For till then, whatever capitulation may have been made being founded on

violence, and therefore *ipso facto* void, there could not have been on this hypothesis either a real society or body politic, or any law other than that of the strongest. Secondly: because the words *strong* and *weak* are, in the second case, ambiguous; for during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ight of property, or prior occupancy, and that of political government, the meaning of these words is better expressed by the terms *rich* and *poor* : because, in fact, before the institution of laws, men had no other way of reducing their equals to submission, than by attacking their goods, or making some of their own over to them. Thirdly: because, as the poor had nothing but their freedom to lose, it would have been in the highest degree absurd for them to resign voluntarily the only good they still enjoyed, without getting anything in exchange: whereas the rich having feelings, if I may so express myself, in every part of their possessions, it was much easier to harm them, and therefore more necessary for them to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it; and, in short, because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suppose a thing to have been invented by those to whom it would be of service, than by those whom it must have harmed.

我知道对于政治社会起源问题，已经有一些人著书予以其他种种解释。譬如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社会起源于强者的征服或弱者的联合。然而，对于我将要构建的理论而言，选用哪一种理由并不重要。可我知道，我上文中所概括出的理由是最符合自然的，理由如下：首先，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征服权本身不是一种权利，因而它不能成为其他权利的基础。除非被征服者完全恢复了自由，甘愿臣服于征服者，否则，他们二者之间仍旧处于战争状态。此前，无论他们之间签订了怎样的投降条约，只要是以暴力为基础，这样的条约就是无效的。所以，基于这种假说，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真正的社会，或者任何的政府组织，除了强者法则外，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法律。其次，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强”和“弱”这两个词本身意义含糊，所以在财产所有权或

者说先占权的确立与政治机构的建立这段时间间隔里，这两个词是用比他们更为贴切的“富”和“穷”来表达的。因为在有法律以前，事实上人们要想减少他们的对手，除了通过侵占对手的财产或者将自己的部分财产赠与他们之外，别无他法。再者，因为穷人除了自由之外，别无可失，除非他们癫狂之极，否则他们是绝不会得不到某些补偿就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仅有的恩惠的。然而，如果我可以这么说，富人对其财产的每一笔都慎之又慎，他们更容易受到损害，因此，富人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最后，我们有理由去设想，一个人发明一样东西是因为该事物对他有利，而不是对他有害。

Government had, in its infancy, no regular and constant form. The want of experience and philosophy prevented men from seeing any but present inconveniences, and they thought of providing against others only as they presented themselves. In spite of the endeavours of the wisest legislators, the political state remained imperfect, because it was little more than the work of chance; and, as it had begun ill, though time revealed its defects and suggested remedies, the original faults were never repaired. It was continually being patched up, when the first task should have been to get the site cleared and all the old materials removed, as was done by Lycurgus at Sparta, if a stable and lasting edifice was to be erected. Society consisted at first merely of a few general conventions, which every member bound himself to observe; an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ovenants the whole body went security to each individual. Experience only could show the weakness of such a constitution, and how easily it might be infringed with impunity, from the difficulty of convicting men of faults, where the public alone was to be witness and judge: the laws could not but be eluded in many ways; disorders and inconveniences could not but multiply continually, till it became necessary to commit the dangerous trust of public authority to private persons, and the care of enforcing

obedience to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people to the magistrate. For to say that chiefs were chosen before the confederacy was formed, and that the administrators of the laws were there before the laws themselves, is too absurd a supposition to consider seriously.

初立之政府没有常规或固定的形式。由于经验和哲学的双重匮乏，人们只能看到眼前的不便，至于未来的不便，往往在其出现之后，人们才会想起去补救。尽管英明的立法者们殚精竭虑，但是政治状况仍未完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讲，它属机缘之作；并且，因其根基拙劣，时间虽然能够暴露它的缺陷，并昭示一些对其改善的措施，但却永远无法弥补它自始就存在的缺陷。人们不断地修修补补，尽完善之能事。然而要成就广厦伟业，他们就应该像莱克格斯在斯巴达所做的那样，从清理场地和扫除旧物开始。社会起先仅仅由一些普遍的公约构成，全体成员约定遵守这些公约，并且由整个社会团体对每一位成员负保护之责。我们需要经验方能证明这种制度的巨大弱点，有罪之人如何轻易逃脱罪责和惩罚，因为只有公众才能作其证人，加以评判。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规避法律的制约，不便和混乱一直层出不穷，直到最后人们觉得有必要将公众的权力冒险地托付于私人，将执法的权力托付于法官。如果说在联盟形成以前就已经选举出首领，在法律制定之前就已经存在法官，那么这个假设真是荒谬得不用我去反驳。

It would be as unreasonable to suppose that men at first threw themselves irretrievably and unconditionally into the arms of an absolute master, and that the first expedient which proud and unsubdued men hit upon for their common security was to run headlong into slavery. For what reason, in fact, did they take to themselves superiors, if it was not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be defended from oppression, and have protection for their lives, liberties and properties, which are, so to speak,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ir being? Now,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man, the worst that can happen is for one to find himself at the mercy of another, and it would have been inconsistent with common-sense to begin by bestowing on a chief the only things they wanted his help to preserve. What equivalent could he offer them for so great a right? And if he had presumed to exact it under pretext of defending them, would he not have received the answer recorded in the fable: “What more can the enemy do to us?” It is therefore beyond dispute, and indeed the fundamental maxim of all political right, that people have set up chiefs to protect their liberty, and not to enslave them. *If we have a prince* , said Pliny to Trajan, *it is to save ourselves from having a master* .

我们同样没有理由设想人们从一开始就无条件地、不假思索地投入专制君王的怀抱，也没有理由设想善妒多疑和桀骜不驯的人们在想到保障公共安全的首选方式时竟会轻率地直奔奴隶制。事实上，如果不是为了免受压迫，不是为了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等那些构成他们生存的要素，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交给统治者呢？既然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一个人最糟糕的境遇莫过于任人差遣，那么本想让首领保护自己的财产，却一开始就将仅有的财产拱手相送，这难道不有悖常理吗？对于如此优厚的特权，首领能给予他们什么样的等价回馈呢？倘若他以保护人们为借口向他们强索特权，人们便即刻用讽刺的话语答道：就是敌人对待我们也不过如此吧？因此，毋庸置疑，人们拥立首领是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使自己受奴役，这确实是整个政治法的基本准则。正如普林尼对图拉真所说：“倘若我们需要一位国王，那也是因为他能够使我们免受主人的奴役。”

Politicians indulge in the same sophistry about the love of liberty as philosophers about the state of nature. They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f very different things, which they have not seen;

and attribute to man a natural propensity to servitude, because the slaves within their observation are seen to bear the yoke with patience; they fail to reflect that it is with liberty as with innocence and virtue; the value is known only to those who possess them, and the taste for them is forfeited when they are forfeited themselves. “I know the charms of your country,” said Brasidas to a satrap, who was comparing the life at Sparta with that at Persepolis, “but you cannot know the pleasures of mine.”

政治家们关于热爱自由所做的辩术与哲学家关于自然状态所做的辩术如出一辙。他们根据自己看到的事物来推断那些他们前所未闻、截然不同的事物。当看到奴隶枷锁在身却忍气吞声、忍耐有加时，他们便认定人类生来就有奴性的倾向。他们不曾想到，自由犹如天真和美德一般，只有拥有者才能体会到它们的价值，一旦失去，对它的感受也就随之荡然无存。布拉西达斯曾对一个把斯巴达人的生活同波斯波利斯人的生活作比较的总督说：“我知道贵国的魅力，但你却不会了解我国的快乐。”

An unbroken horse erects his mane, paws the ground and starts back impetuously at the sight of the bridle; while one which is properly trained suffers patiently even whip and spur: so savage man will not bend his neck to the yoke to which civilised man submits without a murmur, but prefers the most turbulent state of liberty to the most peaceful slavery. We cannot therefore, from the servility of nations already enslaved, judge of the natural disposition of mankind for or against slavery; we should go by the prodigious efforts of every free people to save itself from oppression. I know that the former are for ever holding forth in praise of the tranquillity they enjoy in their chains, and that they call a state of wretched servitude a state of peace: *miserrimam*

servitutem pacem appellant . [5_2] But when I observe the latter sacrificing pleasure, peace, wealth, power and life itself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at one treasure, which is so disdained by those who have lost it; when I see free-born animals dash their brains out against the bars of their cage, from an innate impatience of captivity; when I behold numbers of naked savages, that despise European pleasures, braving hunger, fire, the sword and death, to preserve nothing but their independence, I feel that it is not for slaves to argue about liberty.

一匹未经驯服的骏马一看到马勒就立刻鬃毛竖立，奋蹄刨地，暴怒抗拒；而一匹经过驯服的马则可以平心静气忍受马鞭和踢马刺的痛苦。同理，文明人面对枷锁逆来顺受，毫无怨言；而野蛮人则绝不肯向枷锁低头，他宁愿要暴风雨般的自由，也不愿在安宁中受奴役。因此，在判断人的天性是倾向奴役还是反抗奴役时，我们决不能根据被奴役人民沉沦、堕落的状态，而必须根据一切致力于抵抗压迫的自由民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判断。我知道前一种人（即被奴役的人）不断地炫耀锁链带给他们的平静和安宁，*miserrimam servitutem pacem appellant* [6_2] 。然而，当我看到后一种人（那些自由的人）不惜牺牲幸福、安宁、财产、权力乃至生命来捍卫他们唯一的宝贵财富，而已经失去自由的人却对此不屑一顾的时候；当我看到生来自由的野兽不堪忍受监禁，在铁笼的栅栏上撞得脑浆迸裂的时候；当我看到无数赤身裸体的野蛮人蔑视欧洲人骄奢淫逸的生活，勇敢面对忍饥挨饿、枪林炮火、死神威胁的情况，只为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时候，我明白了：奴隶是没有资格谈论自由的。

With regard to paternal authority, from which some writers have derived absolute government and all society, it is enough, without going back to the contrary arguments of Locke and Sidney, to remark that nothing on earth can be further from the ferocious

spirit of despotism than the mildness of that authority which looks more to the advantage of him who obeys than to that of him who commands; that, by the law of nature, the father is the child's master no longer than his help is necessary; that from that time they are both equal, the son being perfectly independent of the father, and owing him only respect and not obedience. For gratitude is a duty which ought to be paid, but not a right to be exacted: instead of saying that civil society is derived from paternal authority, we ought to say rather that the latter derives its principal force from the former. No individual was ever acknowledged as the father of many, till his sons and daughters remained settled around him. The goods of the father, of which he is really the master, are the ties which keep his children in dependence, and he may bestow on them, if he pleases, no share of his property, unless they merit it by constant deference to his will. But the subjects of an arbitrary despot are so far from having the like favour to expect from their chief, that they themselves and everything they possess are his property, or at least are considered by him as such; so that they are forced to receive, as a favour, the little of their own he is pleased to leave them. When he despoils them, he does but justice, and mercy in that he permits them to live.

谈及父权，一些学者认为专制政治和整个社会模式都是派生于此。我们无需引用洛克和锡德尼的论证就足以这样说：世界上大相径庭的事莫过于专制政治的残暴与父权的温和。父权与其说是对命令者有利，毋宁说是对服从者有利。根据自然法则，父亲只是在其子女需要他的养育帮助时，他才是子女的主人。过了这个阶段，他们便地位平等，子女脱离父亲而完全独立，对父亲不是唯命是从，而只是敬重。的确，报恩是一种应尽的义务，而不是施恩者可以强求的权利。因此，我们不应说文明社会是从父权派生出来的，而应该说父权从文明社会中汲取了它重要的力量：只有当子女们聚居在他的周围时，这

个人才能被认为是这些孩子的父亲。父亲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财产，而这些财产是保持其子女依附于他的纽带。他可以根据每个子女遵从他意志、服从他管教的情况，决定每人所应得的财产份额。现在我们看一下暴君的臣民们。他们根本不要奢望暴君能给予他们任何类似的恩惠，因为臣民自身及其一切所有皆属于暴君，或者至少暴君自以为如此，所以当暴君把臣民原本的一些财产留给他们时，他们还不得不把它当作一种恩惠来接受。暴君盘剥臣民，算是公正；暴君允许臣民活着，算是恩典。

By proceeding thus to test fact by right, we should discover as little reason as truth in the voluntary establishment of tyranny. It would also be no easy matter to prove the validity of a contract binding on only one of the parties, where all the risk is on one side, and none on the other; so that no one could suffer but he who bound himself. This hateful system is indeed, even in modern times, very far from being that of wise and good monarchs, and especially of the kings of France; as may be seen from several passages in their edicts; particularly from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 a celebrated edict published in 1667 in the name and by order of Louis XIV.

通过这种方式继续对比事实与权利，我们就会发现专制政治的建立出于人民自愿之说，既无确凿证据，也缺乏真实性；如果一种契约只约束当事者的一方，一切义务都由该方来承担，另一方不担任何责任，而受害者恰恰是承担义务者，那么，要证明这种契约有效是非常困难的。这种丑恶的制度，即使在现在看来，也远远不能与贤明善良的君主制度相媲美，特别是法兰西王国的君主制。我们在这些国王颁布的敕令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尤其是1667年以路易十四的名义及他的敕令发布的经典诏书中的这段文字：

“Let it not, therefore, be said that the Sovereign is not subject to the laws of his State; since the contrary is a true proposition of the right of nations, which flattery has sometimes attacked but good princes have always defended as the tutelary divinity of their dominions. How much more legitimate is it to say with the wise Plato, that the perfect felicity of a kingdom consists in the obedience of subjects to their prince, and of the prince to the laws, and in the laws being just and constantly directed to the public good!“ [5_3]

“因此，我们决不能说君主可以不受自己本国法律的约束，因为与此相反的命题乃是万民法上的一条真理，虽然这种说法有时为阿谀奉承者所攻击，但贤明的国王总是像国家的守护神一样守卫着这一真理。我们如果能像圣人柏拉图说的那样：一个王国完美的幸福在于臣民服从国王，国王服从法律，法律公正公平且永远为公众谋福利，那将会合理许多。” [6_3]

I shall not stay here to inquire whether, as liberty is the noblest faculty of man, it is not degrading our very nature, reducing ourselves to the level of the brutes, which are mere slaves of instinct, and even an affront to the Author of our being, to renounce without reserve the most precious of all His gifts, and to bow to the necessity of committing all the crimes He has forbidden, merely to gratify a mad or a cruel master; or if this sublime craftsman ought not to be less angered at seeing His workmanship entirely destroyed than thus dishonoured. I will waive (if my opponents please) the authority of Barbeyrac, who, following Locke, roundly declares that no man can so far sell his liberty as to submit to an arbitrary power which may use him as it likes. *For* , he adds, *this would be to sell his own life, of which he is not master* . I shall ask only what right those

who were not afraid thus to debase themselves could have to subject their posterity to the same ignominy, and to renounce for them those blessings which they do not owe to the liberality of their progenitors, and without which life itself must be a burden to all who are worthy of it.

我不想搁笔考虑：自由既然是人的一切能力中最崇高的智能，如果有人仅仅为了迎合一个残暴或疯狂的主人就彻底抛弃自己最为宝贵的天赋，屈从于主人的意愿，不惜忤逆造物主的意旨去犯各种其禁止的罪行，这是否就是堕落天性，自甘沦落成完全受本能支配的那些禽兽之流呢？甚至是对创物主的冒犯呢？伟大的造物主在看到他最美的创造物遭到毁灭时，应该比看到其遭到侮辱更感到愤慨吧。我只想知道：那些不怕这样贬低自己的人，他们有什么权利使他们的后代也遭受同样的耻辱？他们有什么权利代替自己的后代放弃那些并非他们恩赐的幸福？对于那些值得拥有这幸福的人来说，若无幸福可言，生活本身就成为了沉重的负担。

Puffendorf says that we may divest ourselves of our liberty in favour of other men, just as we transfer our property from one to another by contracts and agreements. But this seems a very weak argument. For in the first place, the property I alienate becomes quite foreign to me, nor can I suffer from the abuse of it; but it very nearly concerns me that my liberty should not be abused, and I cannot without incurring the guilt of the crimes I may be compelled to commit, expose myself to become an instrument of crime. Besides, the right of property being only a convention of human institution, men may dispose of what they possess as they please: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essential gifts of nature, such as life and liberty, which every man is permitted to enjoy, and of which it is at least doubtful whether any have a right to divest themselves.

By giving up the one, we degrade our being; by giving up the other, we do our best to annul it; and, as no temporal good can indemnify us for the loss of either, it would be an offence against both reason and nature to renounce them at any price whatsoever. But, even if we could transfer our liberty, as we do our property, there would be a great difference with regard to the children, who enjoy the father's substance only by the transmission of his right; whereas, liberty being a gift which they hold from nature as being men, their parents have no right whatever to deprive them of it. As then, to establish slavery, it was necessary to do violence to nature, so, in order to perpetuate such a right, nature would have to be changed. Jurists, who have gravely determined that the child of a slave comes into the world a slave, have decided, in other words, that a man shall come into the world not a man.

普芬道夫说：正如可以根据协议与契约把自己的财产转让给别人一样，我们也可以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自由。我认为这样的推理委实拙劣。因为首先，我若这样把财产让与别人，该财产就变得与我毫无关系，别人滥用它也不会影响到我；但是，我自己的自由是否被滥用则与我关系重大，因为，我会对自己被迫犯下的罪行充满负罪感，我也不能放任自己成为任何犯罪的工具。此外，所有权不过是人为的协议和制度，谁都能够随意处置自己拥有的东西。但是，人人可以享受的、基本的天然禀赋，例如生命和自由，则不能与此相提并论，而且人们自己是否有权抛弃这些天赋是值得怀疑的：放弃自由，我们就会贬低自己；放弃生命，我们自身就会消亡。因为任何物质享受都不能抵偿这两种东西，所以无论以什么样的借口抛弃生命和自由，都是违背自然和理性的。而且，纵使我们能像转让财产一样转让自由，但是对子女们来说，这两者的区别颇大。我们的子女们享受我们的财产，只是权利的转让；而自由乃是上苍赐予他们作为人的禀赋，父母无权剥夺。那么，为了建立奴隶制，就不得不违背自然，同样，为了使这种权利永世长存，就必须改变自然。法学家们既然郑重

其事地宣布奴隶的孩子生来就是奴隶，用其他的话表述，他们就是在说人生来就不是人。

I regard it then as certain, that government did not begin with arbitrary power, but that this is the depravation, the extreme term, of government, and brings it back, finally, to just the law of the strongest, which it was originally designed to remedy. Supposing, however, it had begun in this manner, such power, being in itself illegitimate, could not have served as a basis for the laws of society, nor, consequently, for the inequality they instituted.

所以，毋庸置疑：政府不是从专制权力开始的——专制权力只不过是政府腐化和终极的形式，它使政府又返回到强者法则上，而最初政府的建立只不过是对强者法则的补救。而且即使政府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由于这种权力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所以根本不能把它当作社会各种权利的基础，也自然不能把它看作制度不平等的基础。

Without entering at present upon the investigations which still remain to be made into the nature of the fundamental compact underlying all government, I content myself with adopting the common opinion concerning it, and reg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olitical body as a real contract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chiefs chosen by them: a contract by which both parties bind themselves to observe the laws therein expressed, which form the ties of their union. The people having in respect of their social relations concentrated all their wills in one, the several articles, concerning which this will is explained, become so many fundamental laws, obligatory on all the members of the State without exception, and one of these articles regulates the choice and power of the

magistrates appointed to watch over the execution of the rest. This power extends to everything which may maintain the constitution, without going so far as to alter it. It is accompanied by honours, in order to bring the laws and their administrators into respect. The ministers are also distinguished by personal prerogatives, in order to recompense them for the cares and labour which good administration involves. The magistrate, on his side, binds himself to use the power he is entrusted with only in conformity with the intention of his constituents, to maintain them all in the peaceable possession of what belongs to them, and to prefer on every occasio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his own.

关于一切政府的基本契约的性质都尚待探讨，这里姑且不作深入研究。依照普遍观点，我只探究这样的问题：政治组织的建立就是人民与他们选举的首领之间的一种真正的契约。契约双方约定共同遵守契约规定的法律，而这些法律构成了他们联系的纽带。在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民众将他们的意志高度集中成为一个人的意志，表达这个意志的所有条款就成为国家全体成员都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其中有一部法律规定了负责监督其他各项法律的官员的选任和权力。这种权力包括了维护宪法所需要的一切职权，但不涉及变更宪法的权力。人民赋予这种权力以荣誉，使得法律和执行法官都受到敬重；他们赋予法律执行官员一些特权，以报偿他们为了管理好国家而不可避免付出的艰辛劳动。官员自己必须依照委托人的意志行使所委任的权力而不能擅自越权，他们必须确保每个人能安全地享有自己的财产，并无条件地置公共利益于其个人利益之上。

Before experience had shown, or knowledge of the human heart enabled men to foresee, the unavoidable abuses of such a constitution, it must have appeared so much the more excellent, as those who were charged with the care of its preservation had

themselves most interest in it; for magistracy and the rights attaching to it being based solely on the fundamental laws, the magistrates would cease to be legitimate as soon as these ceased to exist; the people would no longer owe them obedience; and as not the magistrates, but the laws, are essential to the being of a State, the members of it would regain the right to their natural liberty.

在经验还没有证明以前，或者说在人类目前的所有知识尚不足以证明宪法有不可避免的弊端以前，这一宪法看上去一定是较为完善之法，因为负责维护宪法者本身与宪法有着息息相关的利益。基本法是政府官员的设置以及官员权利的唯一依据，一旦基本法不复存在，官员们便丧失了其合法地位，人民也就没有义务再服从他们。并且，因为构成国家的实质不是官员而是法律，所以每个人可立即重获他们原始的、天赋的自由。

If we reflect with ever so little attention on this subject, we shall find new arguments to confirm this truth, and be convinced from the very nature of the contract that it cannot be irrevocable: for, if there were no superior power capable of ensuring the fidelity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or compelling them to perform their reciprocal engagements, the parties would be sole judges in their own cause, and each would always have a right to renounce the contract, as soon as he found that the other had violated its terms, or that they no longer suited his convenience. It is upon this principle that the right of abdication may possibly be founded. Now, if, as here, we consider only what is human in this institution, it is certain that, if the magistrate, who has all the power in his own hands, and appropriates to himself all the advantages of the contract, has none the less a right to renounce his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suffer for all the faults of their chief, must have a much

better right to renounce their dependence. But the terrible and innumerable quarrels and disorders that would necessarily arise from so dangerous a privilege, show,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how much human government stood in need of a more solid basis than mere reason, and how expedient it was for the public tranquillity that the divine will should interpose to invest the sovereign authority with a sacred and inviolable character, which might deprive subjects of the fatal right of disposing of it. If the world had received no other advantages from religion, this would be enough to impose on men the duty of adopting and cultivating it, abuses and all, since it has been the means of saving more blood than fanaticism has ever spilt. But let us follow the thread of our hypothesis.

稍作思考我们就可以找到新的论据来支持上述观点，而且，契约的性质本身足以证明它并非不可变更：因为如果没有更高的权力来保证缔约者信守承诺并强迫他们履行相互间的承诺，缔约双方仍然是他们自己诉讼案中唯一的法官，那么，一旦发现对方违背了契约的条款或者那些条款对他不再有利时，任何一方都有权随时终止契约。弃权的权利很有可能就是基于这种原则之上。然而，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制度中的人。如果一个大权在握、并把契约中的所有益处都据为己有的官员有权抛弃权力的话，那么，因为其错误而遭受损害的人民就应当更有权利抛弃从属于他的关系。但是，这种危险的特权必然会导致可怕的纷争和无穷的混乱。这些纷争和混乱足以说明：政府组织多么需要比单纯的理性更为坚固的基础；为了公共的安宁，多么需要万能的神来授予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统治权，从而剥夺臣民对于最高权力任意处置的危险的权利。即便人没有从宗教得到其他好处，但仅此一项足以使人皈依并热爱它，因为它避免人类流的血多过于人类因宗教狂热而流的血。然而，还是沿着我们原来假定的线索继续推论吧。

The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owe their origin to the differing degrees of inequality which existed between individuals at the time of their institution. If there happened to be any one man among them pre-eminent in power, virtue, riches or personal influence, he became sole magistrate, and the State assumed the form of monarchy. If several, nearly equal in point of eminence, stood above the rest, they were elected jointly, and formed an aristocracy. Again, among a people who had deviated less from a state of nature, and between whose fortune or talents there was less disproportion,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on was retained in common, and a democracy was formed. It was discovered in process of time which of these forms suited men the best. Some peoples remained altogether subject to the laws; others soon came to obey their magistrates. The citizens laboured to preserve their liberty; the subjects, irritated at seeing others enjoying a blessing they had lost, thought only of making slaves of their neighbours. In a word, on the one side arose riches and conquests, and on the other happiness and virtue.

政府的各种不同形式，是在其成立时成员之间不同程度的不平等造成的。如果正好有一个人在能力、道德、财富或声望方面特别出众，他就会成为唯一的长官，那么，这个国家便也就成为君主政体的国家。如果有一些彼此不相上下且才华出众的人同时被选举出来，那么这种选举制度就会产生贵族政体。如果人们的财产或才能都比较均等，而且他们距离自然状态又并不遥远，那么，他们便共同保留着最高行政机构，形成民主政体。时间已经证明众多政体中哪一种最适合人类。有些人始终只服从于法律，而另一些人不久便听命于主人；前者力保他们的自由，而后者一味想着怎样侵夺他们的邻人，看到别人享受自己已失去的幸福，他们便妒火中烧。总之，一方享受的是财富和征服，另一方则是美德和幸福。

In these different governments, all the offices were at first elective; and when the influence of wealth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the preference was given to merit, which gives a natural ascendancy, and to age, which is experienced in business and deliberate in council. The Elders of the Hebrews, the Gerontes at Sparta, the Senate at Rome, and the very etymology of our word Seigneur, show how old age was once held in veneration. But the more often the choice fell upon old men, the more often elections had to be repeated, and the more they became a nuisance; intrigues set in, factions were formed, party feeling grew bitter, civil wars broke out; the lives of individuals were sacrificed to the pretended happiness of the State; and at length men were on the point of relapsing into their primitive anarchy. Ambitious chiefs profited by these circumstances to perpetuate their offices in their own famil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eople, already used to dependence, ease, and the conveniences of life, and already incapable of breaking its fetters, agreed to an increase of its slavery, in order to secure its tranquillity. Thus magistrates, having become hereditary, contracted the habit of considering their offices as a family estate, and themselves as proprietors of the communities of which they were at first only the officers, of regarding their fellow-citizens as their slaves, and numbering them, like cattle, among their belongings, and of calling themselves the equals of the gods and kings of kings.

在这些不同的政体中，官员最初都是通过选举而产生的。当一个人的财产不比他人更多时，人们就根据他的功绩来选举他，因为功绩赋予他自然的优势；人们也会根据他的年龄来选举他，因为年长者往往在议事时深思熟虑，在处事时经验丰富。希伯来人的“长者”，斯巴达的“元老”，罗马的“元老院”，还有我们所谓“领主”一词在字源上的意义，都说明先前年长者颇受尊敬。年长者当选的频率越高，选举便

越频繁，这种频繁带来的麻烦也就越加明显。于是，拉选票的勾当出现了，派系形成了，党派间的怨恨产生了，内战的火焰燃起了，公民的生命为了所谓的国家幸福而捐献了，一切最终又到了从前那种原始的混乱状态的前夕。有野心的权贵们便利用这种混乱的状态，变临时性管治权为永久性的权力，掌控在自己的家族内部；而已经习惯于依附他人以及安逸便捷生活的人们，再也无力摆脱身上的枷锁，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宁，他们甘愿别人加重对自己的奴役。这样一来，已经成为世袭的首领们，也习惯把官爵看成是家族的财产，把自己看作是辖区的所有者，而最初他们只不过是国家的官吏而已；他们把自己的同胞叫做奴隶，鄙视他们，把他们当作牛羊一般看成是他们的部分财产，标榜自己与诸神并列，是王中之王。

If we follow the progress of inequality in these various revolutions, we shall fin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laws and of the right of property was its first term, the institution of magistracy the second, and the conversion of legitimate into arbitrary power the third and last; so that the condition of rich and poor was authorised by the first period; that of powerful and weak by the second; and only by the third that of master and slave, which is the last degree of inequality, and the term at which all the rest remain, when they have got so far, till the government is either entirely dissolved by new revolutions, or brought back again to legitimacy.

通过追踪这些各不相同的变革的不平等的进程，我们就会发现：法律和私有权的设定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官职制度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便是合法权力变成专制权力。因此，贫富差异是为第一个时期所认可的；强弱之别是为第二个时期所认可的；主仆之分是为第三个时期所认可的，这一状态是不平等的顶点，也是其他各个阶段最终要达到的阶段，直到新的变革使政府完全瓦解，或者使政府的权力恢复到更为合法的状态。

To understand this progress as necessary we must consider not so much the motiv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ody politic, as the forms it assumes in actuality, and the faults that necessarily attend it: for the flaws which make social institutions necessary are the same as make the abuse of them unavoidable. If we except Sparta, where the laws were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and where Lycurgus established such morality as practically made laws needles—for laws as a rule, being weaker than the passions, restrain men without altering them—it would not be difficult to prove that every government, which scrupulously complied with the ends for which it was instituted, and guarded carefully against change and corruption, was set up unnecessarily. For a country, in which no one either evaded the laws or made a bad use of magisterial power, could require neither laws nor magistrates.

为了思考这种进程的必然性，我们与其去考察设立政治组织的动机，不如着重考察这些政治组织在管理时所采取的形式，以及本质上随之而来的种种不便。因为使社会制度成为必要的许多恶习，恰恰也就是造成这些制度不可避免地被滥用的那些恶习。因为——姑且不谈斯巴达这一特例，其法律主要关切的是儿童教育，莱克格斯在那里建立的礼貌和风俗，在很大程度上，使法律无用武之地——法律通常弱于情感，它只能约束人，而不能改变人，所以不难证明：任何一个政府，如果能够谨防变质和腐败、严格遵循各项制度的话，那么这个政府就没有设立的必要；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人人能够遵纪守法，官员个个不滥用职权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既不需要法律也不需要官员。

Political distinctions necessarily produce civil distinctions. The

growing equality between the chiefs and the people is soon felt by individuals, and modified in a thousand ways according to passions, talents and circumstances. The magistrate could not usurp any illegitimate power, without giving distinction to the creatures with whom he must share it. Besides, individuals only allow themselves to be oppressed so far as they are hurried on by blind ambition, and, looking rather below than above them, come to love authority more than independence, and submit to slavery, that they may in turn enslave others. It is no easy matter to reduce to obedience a man who has no ambition to command; nor would the most adroit politician find it possible to enslave a people whose only desire was to be independent. But inequality easily makes its way among cowardly and ambitious minds, which are ever ready to run the risks of fortune, and almost indifferent whether they command or obey, as it is favourable or adverse. Thus, there must have been a time, when the eyes of the people were so fascinated, that their rules had only to say to the least of men, “Be great, you and all your posterity,” to make him immediately appear great in the eyes of every one as well as in his own. His descendants took still more upon them, in proportion to their distance from him; the more obscure and uncertain the cause, the greater the effect: 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idlers one could count in a family, the more illustrious it was held to be.

政治上的差别必然会引发民众的差别。民众与其首领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增长得非常迅速，很快个体成员就会感知到这种不平等，并且在他们之间也显露出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因欲望、才智和事情情况的不同而呈现出上千种表现形式。官员只有发展自己的党羽，并分给他们一定的权力，才可以篡夺非法的权力。而且，自由国度的公民们被盲目的野心所驱使，宁向下看也不愿向上看，才会受人压迫，他们变得热爱权势胜过独立。当他们屈从于枷锁时，为的是有

朝一日能把枷锁更好地反套在别人身上。要想驯服一个无意指使别人的人绝非易事，即使是最有智谋的政治家也不能使那些以自由为唯一愿望的人们屈服。但是不平等却很容易在卑贱者和野心家的灵魂里伸展，这些人随时都准备冒险，他们几乎不在乎是治人还是受制于人，因为时运也是时好时坏。这样，接下来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人们竟被蛊惑到这样的程度，只要统治者对一个极其卑微可怜的人说："让你和你的族人都当显贵人物吧，"他就立刻在众人面前显得尊贵起来，而且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变得尊贵了。他的后代和他相隔的时间越久远，便越显得尊贵：使他们变得显贵的原因越久远，越捉摸不透，其效果也就越大；一个家庭里无所事事的人越多，就越可以认定这个家族显赫。

If this were the place to go into details, I could readily explain how, even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government, inequality of credit and authority became unavoidable among private persons, as soon as their union in a single society made them compare themselves one with another,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differences which they found out from the continual intercourse every man had to have with his neighbours.[1] These differences are of several kinds; but riches, nobility or rank, power and personal merit being the principal distinctions by which men form an estimate of each other in society, I could prove that the harmony or conflict of these different forces is the surest indication of the good or bad constitution of a State. I could show that among these four kinds of inequality, personal qualities being the origin of all the others, wealth is the one to which they are all reduced in the end; for, as riches tend most immediately to the prosperity of individuals, and are easiest to communicate, they are used to purchase every other distinction. By this observation we are enabled to judge pretty exactly how far a people has departed from its primitive constitution, and of its progress towards the extreme term of

corruption. I could explain how much this universal desire for reputation, honours and advancement, which inflames us all, exercises and holds up to comparison our faculties and powers; how it excites and multiplies our passions, and, by creating universal competition and rivalry, or rather enmity, among men, occasions numberless failures, successes and disturbances of all kinds by making so many aspirants run the same course. I could show that it is to this desire of being talked about, and this unremitting rage of distinguishing ourselves, that we owe the best and the worst things we possess, both our virtues and our vices, our science and our errors, our conquerors and our philosophers; that is to say, a great many bad things, and a very few good ones. In a word, I could prove that, if we have a few rich and powerful men on the pinnacle of fortune and grandeur, while the crowd grovels in want and obscurity, it is because the former prize what they enjoy only in so far as others are destitute of it; and because, without changing their condition, they would cease to be happy the moment the people ceased to be wretched.

倘若这里可细察其究竟，我便不难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声望和权力的不平等为何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一旦形成团体，人与人之间就不得不互相比较，并注意到在持续不断的相互利用中所发现的彼此间的种种差异。[1] 这些差异可分为许多种类。但是，由于在人类社会中通常人们主要是根据财富、爵位或等级、权势和个人功绩等方面的差异来互相评价，因此我可以证明这些不同力量间的协调或冲突，是衡量任何一个国家初始机构好坏的最可靠的指标：我可以指明，在这四种不平等中，个人品质是其他各种不平等的根源，而各种不平等最终都必然会归结到财富上，因为财富对于个人飞黄腾达最为直接有用，又最易于流动，所以人们用它来购置其他的区别。通过这种观察，我们就能够较为确切地判断每个民族距离其原始制度的远近和走向腐败顶点时还需要走过的历程。我可以指出，毁灭着我们全体的那种普遍愿

望，即声望、荣誉和特权，是如何锻炼并促使我们互相较量才智和力量的，又是如何刺激并膨胀着我们的欲望的，以及如何通过在人们之间引起普遍的竞争、对抗，更确切地说是仇恨，使无数野心勃勃的人在同一竞技场上经历形形色色的失败、成功和灾难。我可以说明：正是由于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颂扬，正是由于每个人都疯狂地想出人头地，不给自己一刻喘息的时间，才产生了人间最美好和最糟糕的事物：我们的美德和我们的恶行，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谬误，我们的征服者和我们的哲学家。也就是说，产生了大量的坏事的同时只产生了极少数的好事。简而言之，我可以证明：人们之所以会看见一小部分有钱有势的人达到了财富和地位的顶点，而广大群众却匍匐、呻吟于无名和贫困之中，那是因为前者只有在占有他人所没有的东西时才会觉得是享受，其他人越是需要，他们就越觉得享受；如果情况不变，只要人民不再贫困，他们也就不再幸福了。

1: Distributive justice would oppose this rigorous equality of the state of nature, even were it practicable in civil society; as all the members of the State owe it their service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talents and abilities, they ought, on their side, to be distinguished and favoured in proportion to the services they have actually rendered. It is in this sense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passage of Isocrates, in which he extols the primitive Athenians, for having determined which of the two kinds of equality was the most useful, viz., that which consists in dividing the same advantages indiscriminately among all the citizens, or that which consists in distributing them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deserts. These able politicians, adds the orator, banishing that unjust inequality

which make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good and bad men, adhered inviolably to that which rewards and punishes every man according to his deserts.

1: 在文明社会里，赏罚上的公平即便是可以实行的话，这种公平与自然状态中严格的平等也是相对立的。由于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应当按自己的才能和力量为国家服务，所以公民也应当按照他们的贡献受到提拔和优待。我们应当从这种意义上去理解伊索克拉特的一段文章。在这段文章里，他盛赞古雅典人，因为他们已经善于区分在两种平等中哪一种是最有益的：一种是毫无差别地给予所有的公民同样的利益；另一种是按每人的功劳给以不同的利益。这位雄辩家还说，这些熟练的政治家们，一面摈弃了对恶人和善人不加任何区别的那种不公正的平等，同时，坚决拥护按照每人的功过予以赏罚的那种平等。

But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never existed a society, however corrupt some may have become, where no difference was made between the good and the bad; and with regard to morality, where no measures can be prescribed by law exact enough to serve as a practical rule for a magistrate, it is with great prudence that, in order not to leave the fortune or quality of the citizens to his discretion, it prohibits him from passing judgment on persons and confines his judgment to actions. Only morals such as those of the ancient Romans can bear

censors, and such a tribunal among us would throw everything into confus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od and bad men is determined by public esteem; the magistrate being strictly a judge of right alone; whereas the public is the truest judge of morals, and is of such integrity and penetration on this head, that although it may be sometimes deceived, it can never be corrupted. The rank of citizens ought, therefore, to be regulated, not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 merit — for this would put it in the power of the magistrate to apply the law almost arbitrarily — bu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ervices done to the State, which are capable of being more exactly estimated.

但我在这里应当指出：第一，从来不曾有一个对恶人和善人不加任何区别的社会，无论这个社会腐败到什么程度；其次，关于道德方面的事情，法律不能规定出一种相当精确的尺度作为官吏运用的准则，为了不使公民的等级或命运完全听凭官吏的支配，所以法律禁止官吏判断人的本身的善恶，而只许他判断人的行为的是非，这是很明智的措施。只有古代罗马人那样淳朴的风俗，才能经得起监察官的监察；但是象这样的裁判所，如果今天还存在的话，很快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如何把恶人和善人加以区别，应当付之于公众的评论。官吏只不过是严正的法律上的裁判者；人民才是真正的道德上的裁判者，也就是：最清廉的，甚至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富有经验的裁判者，这样的裁判者，人们或许可以欺骗他，却决不能腐蚀他。因

此，公民的等级，不应该根据他们个人的善恶来决定（这差不多等于给官吏以任意适用法律的方便），而应该根据他们对国家的实际贡献来决定，只有根据实际的贡献才能做出更正确的评价。

These details alone, however, would furnish matter for a considerable work, in whic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very kind of government might be weighed, as they are related to ma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all the different aspects, under which inequality has up to the present appeared, or may appear in ages yet to come,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several governments, and the alterations which time must unavoidably occasion in them, might be demonstrated. We should then see the multitude oppressed from within, in consequence of the very precautions it had taken to guard against foreign tyranny. We should see oppression continually gain ground without it being possible for the oppressed to know where it would stop, or what legitimate means was left them of checking its progress. We should see the rights of citizens, and the freedom of nations slowly extinguished, and the complaints, protests and appeals of the weak treated as seditious murmurings. We should see the honour of defending the common cause confined by statecraft to a mercenary part of the people. We should see taxes made necessary by such means, and the disheartened husbandman deserting his fields even in the midst of peace, and leaving the plough to gird on the sword. We should see fatal and capricious codes of honour established; and the champions of their country sooner or later becoming its enemies, and for ever holding their daggers to the breasts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The time would come when they would be heard saying to the oppressor of their country—

仅如上细节便足以写出一部鸿篇巨著了。在这一著作里，我们可以根据自然状态中人的权利，权衡各种政府的利弊；同样，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政府的性质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必然引起的变革，来揭露不平等迄今所呈现的和在未来可能产生的不同形态。我们会看到，人民大众为了抵御外敌威胁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结果在国内却受到暴君同样方法的压迫。我们会看到，这种压迫在不断地增长，而被压迫者永远无法知晓何处是尽头，也不知晓他们还有何种合法的手段来制止这种压迫的继续。我们会看到，公民的权利和民族的自由在逐渐消失，弱者的呻吟、抗议和哀求被看作是叛乱的怨言。我们会看到，政策把保卫公共利益的荣誉只交给一小部分唯利是图的人。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措施下，征税成为必然。灰心丧气的农民，即使在和平的年代，也甘愿抛弃田地，放下犁耙，拿起利剑。我们会看到以荣誉的名义而制定出台的那些能决定命运而又反复无常的法规。我们会看到，那些祖国的捍卫者迟早会变成祖国的敌人，不断地拿起匕首刺向自己同胞的胸膛。不仅如此，而且会出现这样一个时期，人们对他们国家的压迫者说：

Pectoresifratrisgladiumjuguloque parentis

如果你命令我把利剑插进我父亲的胸膛，

Condere me jubeas, gravidœque in viscera partu

刺入我怀孕的妻子的脏腑，

Conjugis, invitaperagamtamenomniadextrâ.

我终将不辱使命，尽管我的臂膀在反抗。

Lucan, i. 376

——卢坎，i，376。

From great inequality of fortunes and conditions, from the vast variety of passions and of talents, of useless and pernicious arts, of vain sciences, would arise a multitude of prejudices equally contrary to reason, happiness and virtue. We should see the magistrates fomenting everything that might weaken men united in society, by promoting dissension among them; everything that might sow in it the seeds of actual division, while it gave society the air of harmony; everything that might inspire the different ranks of people with mutual hatred and distrust, by set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ne against those of another, and so strengthen the power which comprehended them all.

从社会地位和财产的极端不平等中，从各种各样的欲望和才能中，从各种无用或有害的技术里，从肤浅的科学中，都将产生出数不胜数的偏见。这些偏见都同样地违背理性、违背幸福、违背道德。我们会看到：首领们在利用一切办法离间已经团结起来的人们，以便削弱他们的力量；他们运用一切手段使社会呈现出一种和睦的假象，同时，播散分裂的种子；他们挑起一切事端使各等级的人们因权利和利益的矛盾而相互猜疑和憎恨，以达到巩固其征服所有人的权力的目的。

It is from the midst of this disorder and these revolutions, that despotism, gradually raising up its hideous head and devouring

everything that remained sound and untainted in any part of the State, would at length trample on both the laws and the people, and establish itself on the ruins of the republic. The times which immediately preceded this last change would be times of trouble and calamity; but at length the monster would swallow up everything, and the people would no longer have either chiefs or laws, but only tyrants. From this moment there would be no question of virtue or morality; for despotism *cui ex honestonullaestspes* , wherever it prevails, admits no other master; it no sooner speaks than probity and duty lose their weight and blind obedience is the only virtue which slaves can still practise.

正是在这种混乱和这些变革之中，专制政治逐渐露出了其狰狞的面目，贪婪地吞噬着这个国家各部门中依然保存的一切健全和纯洁的东西，最终达到了蹂躏法律、践踏人民和在共和国的废墟上建立起它的统治的目的。这最后一次变革发生前的阶段，必然是一个充满灾难和混乱的时期。但是最后，一切都将被这恶魔吞没殆尽，人民不再拥有首领或法律，拥有的仅是暴君而已。在这个灾难性的时刻，所有美德和品行都不复存在，因为专制政治“从不希望从忠贞中得到什么”，凡是专制政治统治的辖区绝不容许有任何其他主人；主人发号施令时，从不考虑道义和职责。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可怜的奴隶们唯一剩下的美德。

This is the last term of inequality, the extreme point that closes the circle, and meets that from which we set out. Here all private persons return to their first equality, because they are nothing; and, subjects having no law but the will of their master, and their master no restraint but his passions, all notions of good and all principles of equity again vanish. There is here a complete return to the law of the strongest, and so to a new state of nature, differing from that we

set out from; for the one was a state of nature in its first purity, while this is the consequence of excessive corruption. There is so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tates in other respects, and the contract of government is so completely dissolved by despotism, that the despot is master only so long as he remains the strongest; as soon as he can be expelled, he has no right to complain of violence. The popular insurrection that ends in the death or deposition of a Sultan is as lawful an act as those by which he disposed, the day before, of the lives and fortunes of his subjects. As he was maintained by force alone, it is force alone that overthrows him. Thus everything takes place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order; and, whatever may be the result of such frequent and precipitate revolutions, no one man has reason to complain of the injustice of another, but only of his own ill-fortune or indiscretion.

这里是不平等的顶点，这是一个圆圈的终极封闭点，它和我们的出发点相重合。在这里，一切个体都重新恢复到原始的平等状态，因为他们都没有任何价值；而且，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没有任何法律，君主除了自己的欲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法律；所有善念和正义的原则再次消失了。在这里，一切又都回归到强者法则这唯一的规律上来，当然，是回到一个新的自然状态。然而这种自然状态不同于我们刚开始的那种自然状态，因为先出现的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状态，而后出现的乃是过度腐化的结果。但是，这两种状态在其他方面的差别非常之小，并且政府契约已被专制政治破坏得很严重，以致只有当暴君在最强大的时候才是主人；一旦他的奴隶们可以驱逐他的时候，他丝毫也不能抱怨奴隶们对他施暴。以处死或推翻暴君为结果的起义，与暴君前一天任意处置臣民们的生命和财产的行为一样，同样合乎法律。暴力成就他，暴力也推翻他。世间万物皆按自然的顺序发生和进行着，无论这些短促而频繁的革命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抱怨别人的不公正，他唯一能抱怨的是自己的过错或者不幸。

If the reader thus discovers and retraces the lost and forgotten road, by which man must have passed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to the state of society; if he carefully restores, along with the intermediate situations which I have just described, those which want of time has compelled me to suppress, or my imagination has failed to suggest, he cannot fail to be struck by the vast distance which separates the two states. It is in tracing this slow succession that he will find the solution of a number of problems of politics and morals, which philosophers cannot settle. He will feel that, men being different in different ages, the reason why Diogenes could not find a man was that he sought among his contemporaries a man of an earlier period. He will see that Cato died with Rome and liberty, because he did not fit the age in which he lived; the greatest of men served only to astonish a world which he would certainly have ruled, had he lived five hundred years sooner. In a word, he will explain how the soul and the passions of men insensibly change their very nature; why our wants and pleasures in the end seek new objects; and why, the original man having vanished by degrees, society offers to us only an assembly of artificial men and factitious passions, which are the work of all these new relations, and without any real foundation in nature. We are taught nothing on this subject, by reflection, that is not entirely confirmed by observation. The savage and the civilised man differ so much in the bottom of their hearts and in their inclinations, that what constitutes the supreme happiness of one would reduce the other to despair. The former breathes only peace and liberty; he desires only to live and be free from labour; even the *ataraxia* of the Stoic falls far short of his profound indifference to every other object. Civilised man, on the other hand, is always moving, sweating, toiling and racking his brains to find still more laborious occupations: he goes on in drudgery to his last moment, and even seeks death to put himself in a position to live, or renounces life to acquire immortality. He pays

his court to men in power, whom he hates, and to the wealthy, whom he despises; he stops at nothing to have the honour of serving them; he is not ashamed to value himself on his own meanness and their protection; and, proud of his slavery, he speaks with disdain of those, who have not the honour of sharing it. What a sight would the perplexing and envied labours of a European minister of State present to the eyes of a Caribbean! How many cruel deaths would not this indolent savage prefer to the horrors of such a life, which is seldom even sweetened by the pleasure of doing good! But, for him to see into the motives of all this solicitude, the words *power* and *reputation* , would have to bear some meaning in his mind; he would have to know that there are men who set a value on the opinion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o can be made happy and satisfied with themselves rather on the testimony of other people than on their own. In reality, the source of all these differences is, that the savage lives within himself, while social man lives constantly outside himself, and only knows how to live in the opinion of others, so that he seems to receive the consciousness of his own existence merely from the judgment of others concerning him. It is not to my present purpose to insist on the indifference to good and evil which arises from this disposition, in spite of our many fine works on morality, or to show how, everything being reduced to appearances, there is but art and mummery in even honour, friendship, virtue, and often vice itself, of which we at length learn the secret of boasting; to show, in short, how, always asking others what we are, and never daring to ask ourselves, in the midst of so much philosophy, humanity and civilisation, and of such sublime codes of morality, we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ourselves but a frivolous and deceitful appearance, honour without virtue, reason without wisdom, and pleasure without happiness. It is sufficient that I have proved that this is not by any means the original state of man, but that it is merely the

spirit of society, and the inequality which society produces, that thus transform and alter all our natural inclinations.

这样，通过发现和追溯曾把人类从自然状态引向文明状态的已经被人们迷失和遗忘了的道路，通过还原我刚才指出的那些中间状况，即我因时间关系而省略了的，或者因想象力所不及而没有想到的那些状况，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惊讶地发现自然状态和文明状态之间的鸿沟是多么巨大。正是在事物这种缓慢演变的过程中，他可能会找到在伦理上和政治上的无数难题的答案，而这些难题一直困扰着哲学家们，难以解决。他将会感觉到：一个时代的人类不同于另一个时代的人类。第欧根尼之所以找不到他要找的人，是因为他想在他同时代的人中寻找一个较早时代的人。那时他也会明白：加图会与罗马和自由同归于尽，是因为他不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如果他早出生五百年的话，这位最伟大的人恐怕会震惊世界，那时的人们会兴高采烈地服从于他的意志。总之，他会发现：人类的灵魂和情欲是如何在不知不觉的变化中改变了它们的本性；为何时间一久，我们的需求和快乐就要变换对象；为何随着原始人的逐渐消逝，社会向我们提供的仅是一种失去纯朴本性的人和人为欲望的集合体，而这样的人和欲望乃是所有新生关系的产物，并没有任何天然基础。在这个一问题上，我们通过思考而获得的东西已完全被经验所证实。实际上，野蛮人和文明人在意向和欲望上可谓大相径庭，以致其中一人感到无上幸福的东西，反而会使另外一人陷于绝望。野蛮人仅喜爱安宁和自由，他只想生存，同时无需劳作，即使是那些最为坚定的斯多葛派的恬静，也无法与他们对一切身外之物的淡漠相提并论。相反，劳作中的文明人为了寻求更为艰苦的差事，不惜来回奔波、汗流浃背、辛苦耕耘、绞尽脑汁，他们一直劳苦到死；他们甚至有时为了维持生活宁愿去冒生命危险，或者舍弃自己的生命以求永生。他阿谀奉承自己所憎恶的权贵和自己所鄙视的富人；他为争取到为他们服务的荣幸而不择手段；他恬不知耻地夸耀自己的卑贱，夸耀那些人对他的保护；他以充当奴隶为荣，言谈之间流露出对那些未能分享这种荣幸的人们的蔑视。一位欧洲大臣那种繁重而令人羡慕的工作，在加勒比人看来，该是多么令人惊奇

的景象啊！面对这种可怕的生活，悠闲的野蛮人宁愿冒着许多残酷死亡的危险，也不愿意生活其中。这种生活之可怕，纵然有行善的快乐，也往往不能使其得以缓和。但是，要让野蛮人理解人人如此辛劳的目的，就先要在其头脑中灌输“权势”和“名望”这些词汇的意义，就应该让他知道有些人非常看重其余的人对他们的看法。而他们之所以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并对自己感到满意，与其说是来源于他们自己，不如说是来源于他人的证明。实际上，野蛮人与文明人的所有这一切差别的真正根源是，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文明人则终日惶恐，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文明人极其重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以致自己生存的意义都是来自于别人的判断。以下话题不在我的讨论之列：纵使我们有许多谈论道德的卓越文章，为什么这种重视他人评判的倾向还是使人们对善恶漠不关心；在一切都归结为表象时，为什么一切都变得人为和造作；荣誉、友谊、美德，甚至恶行本身，从这一切中，我们最终学会了炫耀自己的秘诀。总之，当我们身处众多的哲学、仁义、礼仪和高尚的格言之中，我们为什么不断地询问别人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从来不敢拿这一敏感的话题来问自己呢。因此，我们除了浮华和欺人的外表，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东西，我们缺乏道德的荣誉，缺乏智慧的理性，缺乏幸福的快乐。我认为证明以下两点足已：即，上述情况绝不是人类的原始状态；正是社会的精神和因社会而产生的不平等，使我们一切的自然倾向发生改变与转化。

I have endeavoured to trace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inequality, and the institution and abuse of political societies, as far as these are capable of being deduced from the nature of man merely by the light of reason, and independently of those sacred dogmas which give the sanction of divine right to sovereign authority. It follows from this survey that, as there is hardly any inequality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ll the inequality which now prevails owes its strength and growth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faculties and the advance of the human mind, and becomes at last

permanent and legitimate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perty and laws. Secondly, it follows that moral inequality, authorised by positive right alone, clashes with natural right, whenever it is not proportionate to physical inequality; a distinction which sufficiently determines what we ought to think of that species of inequality which prevails in all civilised, countries; since it is plainly contrary to the law of nature, however defined, that children should command old men, fools wise men, and that the privileged few should gorge themselves with superfluities, while the starving multitude are in want of the bare necessities of life.

我已竭尽全力展示了不平等的起源与发展、政治社会的建立与弊端。所有这一切，仅凭理性便可从人的本性中推演出来，并未借助赋予至高权威以神权的神圣教义。由上文可知，自然状态中的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我们能力的发展和理解力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力量并成长起来。并且最终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变得根深蒂固而合法化了。同样也说明，仅仅被实体的权利所认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一旦与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称时，便与自然的权利相抵触。这种不相称的特征充分决定了我们对于流行于一切文明民族之中的那种不平等应持什么看法。因为，孩童命令老人，傻子指导智者，一小部分人拥有过多的剩余财产，而大量的饥民则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这显然是违背自然法则的。

[5_1].Ovid, *Metamorphoses* , xi. 127.
Both rich and poor, shocked at their new-found ills,
Would fly from wealth, and lose what they had sought.

[5_3].Of the Rights of the Most Christian Queen over Various States of the Monarchy of Spain, 1667.

[6_1].这是奥维德的“变形记”，xi，127。“这种新奇的灾难使他诚惶诚恐，固然富有，却招致苦难，他想要逃离财富，并对他曾经焚香期盼的财富憎恶如仇。”

[6_3].见“论法兰西王后对西班牙王国各邦的权利”（1667年）。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On the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

论生成与消亡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论生成与消亡

On the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

亚里士多德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Book I 第一卷
- Book II 第二卷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Book I

第一卷

Chapter 1

第一章

Our next task is to study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We are to distinguish the causes, and to state the definitions, of these processes considered in general—as changes predicable uniformly of all the things that come-to-be and pass-away by nature. Further, we are to study growth and 'alteration'. We must inquire what each of them is; and whether 'alteration' is to be identified with coming-to-be, or whether to these different names there correspond two separate processes with distinct natures.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研究生成与消亡。我们将分辨这两种过程产生的原因并阐明其定义，这两种过程通常被看作是一切事物本性上会经历的生成与消亡的可预见的变化。此外，我们还将研究生长与“更替”。我们必须探究二者分别是什么，探究“更替”是否等同于生成，或者这些不同的名称是否对应于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独立的过程。

On this question, indeed, the early philosophers are divided. Some of them assert that the so-called 'unqualified coming-to-be' is 'alteration', while others maintain that 'alteration' and coming-to-be are distinct. For those who say that the universe is one something (i.e. those who generate all things out of one thing) are bound to assert that coming-to-be is 'alteration', and that whatever 'comes-to-

be' in the proper sense of the term is 'being altered': but those who make the matter of things more than one must distinguish coming-to-be from 'alteration'. To this latter class belong Empedocles, Anaxagoras, and Leucippus. And yet Anaxagoras himself failed to understand his own utterance. He says, at all events, that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are the same as 'being altered': yet, in common with other thinkers, he affirms that the elements are many. Thus Empedocles holds that the corporeal elements are four, while all the elements—including those which initiate movement—are six in number; whereas Anaxagoras agrees with Leucippus and Democritus that the elements are infinite.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早期哲学家们的意见是不同的。他们之中有些人断言所谓“非性质方面的生成”就是“更替”，而另一些人则主张“更替”与生成是截然不同的。那些认为宇宙是某种单一物（即那些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源于某一事物）的人必定会断言生成就是“更替”，而且任何“生成”的事物，按照这个术语的本义，都在“被更替”；但是那些认为构成事物的物质不止一种的人就必定会把生成和“更替”区别开来。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哥拉和留基伯就属于后一类人。然而，阿那克萨哥拉本人却未能理解他自己所说的话。他说，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成与消亡就是“被更替”，不过，与其他思想家一样，他断言元素是有许多种的。因此，恩培多克勒认为，有形的元素有四种，而所有的元素——包括那些引发运动的元素——总共有六种；而阿那克萨哥拉则同意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观点，认为元素是无限的。

(Anaxagoras posits as elements the 'homoeomeries', viz. bone, flesh, marrow, and everything else which is such that part and whole are the same in name and nature; while Democritus and Leucippus say that there are indivisible bodies, infinite both in

number and in the varieties of their shapes, of which everything else is composed—the compounds differing one from another according to the shapes, 'positions', and 'groupings' of their constituents.)

（阿那克萨哥拉把“同质体”认定为元素，即骨、肉、骨髓以及其他一切整体和部分名实相副的事物，而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却认为不可分割的物体是存在的，其在数量和形状的种类方面都是无限的，其他一切事物均由其组成——这些组成物根据其组成成分的形状、“位置”和“组合方式”的不同而相区别。）

For the views of the school of Anaxagoras seem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those of the followers of Empedocles. Empedocles says that Fire, Water, Air, and Earth are four elements, and are thus 'simple' rather than flesh, bone, and bodies which, like these, are 'homoeomeries'. But the followers of Anaxagoras regard the 'homoeomeries' as 'simple' and elements, whilst they affirm that Earth, Fire, Water, and Air are composite; for each of these is (according to them) a 'common seminary' of all the 'homoeomeries'.

阿那克萨哥拉派的观点与恩培多克勒追随者的观点似乎是截然相反的。恩培多克勒认为，火、水、气和土是四种元素，它们与肉、骨、肢体之类的“同质体”相比而言是“简单的”。但是阿那克萨哥拉的追随者却把“同质体”视为“简单”物和元素，他们断言土、火、水和气是复合物，因为这四者中的每一种（按照他们的观点）都是所有“同质体”的一种“集合体”。

Those, then, who construct all things out of a single element,

must maintain that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are 'alteration'. For they must affirm that the underlying something always remains identical and one; and change of such a substratum is what we call 'altering'. Those, on the other hand, who make the ultimate kinds of things more than one, must maintain that 'alteration' is distinct from coming-to-be: for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result from the consilience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any kinds. That is why Empedocles too uses language to this effect, when he says 'There is no coming-to-be of anything, but only a mingling and a divorce of what has been mingled'. Thus it is clear (i) that to describe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in these term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fundamental assumption, and (ii) that they do in fact so describe them: nevertheless, they too must recognize 'alteration' as a fact distinct from coming-to-be, though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do so consistently with what they say.

因此，那些认为万物皆生于单一元素的人必定会认为生成与消亡都是“更替”。因为他们必定会断言作为基础的某样东西总是保持同一；这一基质的变化就是我们所说的“更替”。而那些认为事物的根本种类不止一种的人则必定会坚持认为“更替”不同于生成，因为生成和消亡都源自于这诸多种类的一致与分散。这就是为什么恩培多克勒也说了大意相同的话，他说：“世间没有任何东西生成，有的只是事物的融合和融合物的分离。”由此可见，用这些措辞来描述生成与消亡是和他们的基本假设相一致的，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这样来描述生成与消亡的。不过，他们也必定会把“更替”视为一种不同于生成的事实，尽管他们的行为和言论并不可能完全一致。

That we are right in this criticism is easy to perceive. For 'alteration' is a fact of observation. While the substance of the thing remains unchanged, we see it 'altering' just as we see in it the

changes of magnitude called 'growth' and 'diminution'. Nevertheless, the statements of those who posit more 'original reals' than one make 'alteration' impossible. For 'alteration', as we assert, takes place in respect to certain qualities: and these qualities (I mean, e.g. hot-cold, white-black, dry-moist, soft-hard, and so forth) are, all of them, differences characterizing the 'elements'. The actual words of Empedocles may be quoted in illustration

在这个问题上，很显然我们是正确的。因为“更替”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事物的本质保持不变，而我们却认为它在“更替”，恰恰是因为我们在其中看到了被称为“生长”和“减少”的量变。不过，那些主张“本真”不止一个的论述却使“更替”变得不再可能。因为正如我们所断言，“更替”的发生与特定的性质有关，而这些性质（例如说，冷和热、白和黑、干和湿、软和硬等）全都是构成“元素”特点的差异之处。恩培多克勒的原话可以引来作为例证

The sun everywhere bright to see, and hot,

太阳不管在哪里都耀眼而炽热，

The rain everywhere dark and cold;

雨水不管在哪里都使周围昏暗而阴冷；

and he distinctively characterizes his remaining elements in a similar manner. Since, therefore, it is not possible for Fire to

become Water, or Water to become Earth, neither will it be possible for anything white to become black, or anything soft to become hard; and the same argument applies to all the other qualities. Yet this is what 'alteration' essentially is.

他也以类似的方式分别描述了其他几种元素。因此，既然火不可能变成水，水不可能变成土，那么同样，白的也不可能变成黑的，软的也不可能变成硬的；这种论证同样适用于所有其他的性质。而这正是“更替”的本质。

It follows, as an obvious corollary, that a single matter must always be assumed as underlying the contrary 'poles' of any change whether change of place, or growth and diminution, or 'alteration'; further, that the being of this matter and the being of 'alteration' stand and fall together. For if the change is 'alteration', then the substratum is a single element; i.e. all things which admit of change into one another have a single matter. And, conversely, if the substratum of the changing things is one, there is 'alteration'.

由此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即某种单一的质料必定常被假定为构成了任何改变的相反“两极”的基础，不管这种改变是位置的变化，生长与减少，还是“更替”；此外，这种质料与“更替”是存亡与共的。因为如果改变就是“更替”，那么其基质就是某种单一元素；换言之，所有可相互转变的事物都具有某种单一的质料。反过来说，如果变化中的事物的基质是单一的，那么就会有“更替”发生。

Empedocles, indeed, seems to contradict his own statements as well as the observed facts. For he denies that any one of his

elements comes-to-be out of any other, insisting on the contrary that they are the things out of which everything else comes-to-be; and yet (having brought the entirety of existing things, except Strife, together into one) he maintains, simultaneously with this denial, that each thing once more comes-to-be out of the One. Hence it was clearly out of a One that this came-to-be Water, and that Fire, various portions of it being separated off by certain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s or qualities—as indeed he calls the sun 'white and hot', and the earth 'heavy and hard'. If, therefore, these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s be taken away (for they can be taken away, since they came-to-be), it will clearly be inevitable for Earth to come to-be out of Water and Water out of Earth, and for each of the other elements to undergo a similar transformation—not only then, but also now—if, and because, they change their qualities. And, to judge by what he says, the qualities are such that they can be 'attached' to things and can again be 'separated' from them, especially since Strife and Love are still fighting with one another for the mastery. It was owing to this same conflict that the elements were generated from a One at the former period. I say 'generated', for presumably Fire, Earth, and Water had no distinctive existence at all while merged in one.

事实上，恩培多克勒似乎否定了他自己的观点，也否认了观察到的事实。他否认他所说的元素可以互相生成，却坚持了相反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生成于这些元素；然而在坚持这种否定观点的同时（在把除了争斗之外的所有现存事物合而为一之后），他认为这些事物中的每一个都由“一”生成。因此，水和火显然都来自于某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各种各样的组成部分由于某些特有的差异或性质而被分离了出来——正如他形容太阳为“白而热”，形容土为“重而硬”一样。因此，如果去掉这些特有的差异（既然它们生成了，就可以被去掉），那么水中就会不可避免地生成土，土中就会不可避免地生成

水，其他任何一种元素也会经历类似的转变——不仅是在那时，现在也是如此——如果，也是因为，它们改变了自身的性质。根据他所说的来判断，这些性质既可以“依附”于事物，也可以从事物中“分离”，尤其是争斗和友爱仍旧在争夺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正是因为这同一个矛盾，元素才在前一个阶段产生于“一”。我说“产生”，是因为在火、土和水混为一体时，他们可能就不是独特的存在。

There is another obscurity in the theory Empedocles. Are we to regard the One as his 'original real'? Or is it the Many—i.e. Fire and Earth, and the bodies co-ordinate with these? For the One is an 'element' in so far as it underlies the process as matter-as that out of which Earth and Fire come-to-be through a change of qualities due to 'the motion'. On the other hand, in so far as the One results from composition (by a consilience of the Many), whereas they result from disintegration the Many are more 'elementary' than the One, and prior to it in their nature.

在恩培多克勒的理论中，还有一点晦涩难懂之处。我们是要把“一”视为他所谓的“本真”呢？还是说这个本真是“多”，即火、土以及与其协调共存的那些物体？因为土和火通过因“移动”而发生的性质改变而生成，就其作为这一过程的基础物质而言，“一”就是指一种“元素”。而另一方面，就“一”是合成的结果（通过“多”的一致）、而“多”是分解的结果而言，“多”要比“一”更为“根本”，并且在本质上也先于“一”。

Chapter 2

第二章

We have therefore to discuss the whole subject of 'unqualified'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we have to inquire whether these changes do or do not occur and, if they occur, to explain the precise conditions of their occurrence. We must also discuss the remaining forms of change, viz. growth and 'alteration'. For though, no doubt, Plato investigated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ings come-to-be and pass-away, he confined his inquiry to these changes; and he discussed not all coming-to-be, but only that of the elements. He asked no questions as to how flesh or bones, or any of the other similar compound things, come-to-be; nor again did he examin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lteration' or growth are attributable to things.

因此，我们不得不对“非性质方面的”生成与消亡进行一番全面的讨论；我们必须探究这些变化到底是否发生了。如果它们的确发生了，那就还要解释它们得以发生的确切条件。我们还必须讨论变化的其他形式，即生长和“更替”。因为，毫无疑问，尽管柏拉图的确考察过万物生成与消亡的条件，但其研究只限于这些变化；他并未论述所有的生成，而是只涉及了元素的生成。他没有考问肉或骨，或任何其他类似的合成物是如何生成的；他也没有考察“更替”或生长在何种条件下是因事物而发生的。

A similar criticism applies to all our predecessors with the single exception of Democritus. Not one of them penetrated below the surface or made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a single one of the problems. Democritus, however, does seem not only to have thought carefully about all the problems, but also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utset by his method. For, as we are saying, none of the other philosophers made any definite statement about growth, except such as any amateur might have made. They said

that things grow 'by the accession of like to like', but they did not proceed to explain the manner of this accession. Nor did they give any account of 'combination': and they neglected almost every single one of the remaining problems, offering no explanation, e.g. of 'action' or 'passion' how in physical actions one thing acts and the other undergoes action. Democritus and Leucippus, however, postulate the 'figures', and make 'alteration' and coming-to-be result from them. They explain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by their 'dissociation' and 'association', but 'alteration' by their 'grouping' and 'Position'. And since they thought that the 'truth' lay in the appearance, and the appearances are conflicting and infinitely many, they made the 'figures' infinite in number. Hence—owing to the changes of the compound—the same thing seems different and conflicting to different people: it is 'transposed' by a small additional ingredient, and appears utterly other by the 'transposition' of a single constituent. For Tragedy and Comedy are both composed of the same letters.

除德谟克利特之外，所有先哲都遭受了类似的抨击。他们没有一位进行深入的探索或对某一个问题进行过透彻的研究。然而德谟克利特却似乎不仅仔细思考了所有的问题，而且从一开始就以自己的方式而显得与众不同。因为正如我们所说，其他哲学家没有一位对生长进行过明确的界定，有的只是些不太专业的论述。他们认为事物是“因同种数量的增加”而生长，但他们却没有进一步解释这种增加的方式，也没有解释“混合”，而且他们几乎忽视了所有其他的问题：他们没有解释诸如“行动”或“承受”，即在自然行动中，一物是如何施加作用力，另一物又是如何承受作用力的。然而，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却假定了“形状”，认为“更替”和生成都源自于形状。他们用形状的“分离”和“联合”来解释生成与消亡，而用形状的“组合”和“位置”来解释“更替”。因为他们认为真理存在于表象之中，而表象是相互冲突且无限多的，所以他们就认为“形状”在数量上也是无限的。因此——由

于合成物的变化——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人看来似乎是不同且互相冲突的，它可以被一个微小的附加成分所“置换”，并因一个成分的“置换”而显得全然不同。因为悲剧和喜剧这两个词中有相同的字。

Since almost all our predecessors think (i) that coming-to-be is distinct from 'alteration', and (ii) that, whereas things 'alter' by change of their qualities, it is by 'association' and 'dissociation' that they come-to-be and pass-away, we must concentrate our attention on these theses. For they lead to many perplexing and well-grounded dilemmas. If, on the one hand, coming-to-be is 'association', many impossible consequences result: and yet there are other arguments, not easy to unravel, which force the conclusion upon us that coming-to-be cannot possibly be anything else. If, on the other hand, coming-to-be is not 'association', eithe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coming-to-be at all or it is 'alteration': or else we must endeavour to unravel this dilemma too—and a stubborn one we shall find it.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in dealing with all these difficulties, is this: 'Do things come-to-be and “alter” and grow, and undergo the contrary changes, because the primary “reals” are indivisible magnitudes? Or is no magnitude indivisible?' For the answer we give to this question makes the greatest difference. And again, if the primary 'reals' are indivisible magnitudes, are these bodies, as Democritus and Leucippus maintain? Or are they planes, as is asserted in the Timaeus?

既然几乎所有的先哲都认为生成不同于“更替”，并且认为事物是因其性质的变化而“更替”的，那么事物正是通过“联合”与“分离”才得以生成与消亡，所以我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论点上。因为它们引发了许多令人困惑却有充分证据的难题。一方面，如果生成即“联合”，那么便会产生许多无法成立的结论，而其他一些不易反驳的论

点却会迫使我们接受这样的结论，即生成不可能是其他事物。另一方面，如果生成不是“联合”，那么，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生成，或者生成就是“更替”，否则，我们必须尽力化解这个难题——我们将会发现它很难对付。要处理所有这些难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事物生成、‘更替’、生长以及经历相反的变化都是由于第一‘存在’是不可再分的量吗？还是原本就不存在不可再分的量？”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造成极大的不同。再者，如果第一“存在”是不可再分的量，那它们是德谟克利特与留基伯所说的物体吗？还是有如《蒂迈欧篇》中所断言的那些平面图形呢？

To resolve bodies into planes and no further—this, as we have also remarked elsewhere, in itself a paradox. Hence there is more to be said for the view that there are indivisible bodies. Yet even these involve much of paradox. Still, as we have said, it is possible to construct 'alteration' and coming-to-be with them, if one 'transposes' the same by 'turning' and 'intercontact', and by 'the varieties of the figures', as Democritus does. (His denial of the reality of colour is a corollary from this position: for, according to him, things get coloured by 'turning' of the 'figures'.) But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construction no longer exists for those who divide bodies into planes. For nothing except solids results from putting planes together: they do not even attempt to generate any quality from them.

只把物体分解到平面——正如我们在别处已经提到的那样，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关于存在不可再分的物体这一观点还需要进行更多的讨论。但即使是这些观点也多有悖理之处。就像上文提到的，如果如德谟克利特那样通过“翻转”、“互触”以及“形状的多样”来对同一事物进行“调整”的话，那就有可能用这些物体构造出“更替”与生成。（他否认了颜色的真实性，这是基于这种立场的必然结果，因

为，他认为事物的颜色是由“形状”的“翻转”而得来的。）但是对于那些把物体分解到平面的人来说，这种构建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因为除了固体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由多个平面集合而成的，它们也不试图从中生出任何性质。

Lack of experience diminishes our power of taking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admitted facts. Hence those who dwell in intimate association with nature and its phenomena grow more and more able to formulate, as the foundations of their theories, principles such as to admit of a wide and coherent development: while those whom devotion to abstract discussions has rendered unobservant of the facts are too ready to dogmatize on the basis of a few observations. The rival treatments of the subject now before us will serve to illustrate how gre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cientific' and a 'dialectical' method of inquiry. For, whereas the Platonists argue that there must be atomic magnitudes 'because otherwise “The Triangle” will be more than one', Democritus would appear to have been convinced by arguments appropriate to the subject, i.e. drawn from the science of nature. Our meaning will become clear as we proceed. For to suppose that a body (i.e. a magnitude) is divisible through and through, and that this division is possible, involves a difficulty. What will there be in the body which escapes the division?

经验的缺乏削弱了我们以综合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公认的事实的能力。因此，那些与自然及其现象密切接触的人就会越来越有能力来设定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广泛且合乎逻辑发展的原理，而那些致力于抽象的理论研究而不观察事实的人则往往根据少量的观察结果来提出论断。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种相反的处理方式将会有助于说明“科学的”调查方法与“辩证的”调查方法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柏拉图学派的

论者认为，原子的大小必定存在，“否则，‘三角形’将不止一个”，而德谟克利特却似乎已经相信自然科学中与这个论题相关的结论。随着讨论的继续，我们的意思将会变得清楚显豁。因为要假定一个物体（即有特定大小的东西）是彻底可分的，且这种分割是可能的，就会遇到一个难题：没被分割的部分会有什么呢？

If it is divisible through and through, and if this division is possible, then it might be, at one and the same moment, divided through and through, even though the dividings had not been effected simultaneously; and the actual occurrence of this result would involve no impossibility. Hence the same principle will apply whenever a body is by nature divisible through and through, whether by bisection, or generally by any method whatever: nothing impossible will have resulted if it has actually been divided—not even if it has been divided into innumerable parts, themselves divided innumerable times. Nothing impossible will have resulted, though perhaps nobody in fact could so divide it.

如果它是彻底可分的，且这种分割是可能的，那么，即使这些分割并非是同时发生的，它也可能同时被彻底分割。因此，只要一个物体本性就是彻底可分的，那么无论是通过二分法，还是任何其他的方法，这个原则都将适用，即如果这个物体确实已被分割的话，就不会出现什么不可能的结果——即使它已经被分割成无数部分，而这些部分本身也已被分割了无数次。尽管也许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这样分割它，也不会出现不可能的结果。

Since, therefore, the body is divisible through and through, let it have been divided. What, then, will remain? A magnitude? No: that is impossible, since then there will be something not divided,

whereas ex hypothesis the body was divisible through and through. But if it be admitted that neither a body nor a magnitude will remain, and yet division is to take place, the constituents of the body will either be points (i.e. without magnitude) or absolutely nothing. If its constituents are nothings, then it might both come-to-be out of nothings and exist as a composite of nothings: and thus presumably the whole body will be nothing but an appearance. But if it consists of points, a similar absurdity will result: it will not possess any magnitude. For when the points were in contact and coincided to form a single magnitude, they did not make the whole any bigger (since, when the body was divided into two or more parts, the whole was not a bit smaller or bigger than it was before the division): hence, even if all the points be put together, they will not make any magnitude.

所以，既然物体是彻底可分的，那就假定它已经被分割。那么，剩余的会是什么呢？某种有特定大小的东西吗？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有某种东西未被分割，而先前的假设是这种物体是彻底可分的。但是如果承认既没有某种物体也没有某种具有特定大小的东西会剩余，而分割还将发生的话，那么这个物体的构成成分要么是点（即没有大小），要么是绝对的虚无。如果其构成成分是虚无的话，那么它就可能既生成于虚无，也作为一种虚无的复合物而存在，这样的话整个物体就很可能只是一种表象而已。但是如果它由点构成，就会出现一种同样荒谬的结果：它将没有任何大小。因为当点接触连接形成一个单一的大小时，它们并没有使整体变得更大（因为，当这个物体被分割成两个或更多的部分时，整体不会比分割之前变得更小或更大），因此，即使所有的点都被放在一起，它们也不会形成任何大小。

But suppose that, as the body is being divided, a minute section

—a piece of sawdust, as it were—is extracted, and that in this sense —a body 'comes away' from the magnitude, evading the division. Even then the same argument applies. For in what sense is that section divisible? But if what 'came away' was not a body but a separable form or quality, and if the magnitude is 'points or contacts thus qualified': it is paradoxical that a magnitude should consist of elements, which are not magnitudes. Moreover, where will the points be? And are they motionless or moving? And every contact is always a contact of two somethings, i.e.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besides the contact or the division or the point.

但是假定，在这个物体被分割之时，一个微小的部分——一粒锯末状的东西——被提取了出来，同时假定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物体从大小中“产生”，且不可再被分割。即使这样，上文的论点仍然适用：因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这个微小部分都不可以被分割。但如果“分出”的不是一个物体，而是一种可分离的形式或性质，还有如果大小是“符合这种描述的点或接触”，那么一个大小要由没有大小的元素构成就是前后矛盾的了。此外，这些点的位置如何呢？它们是静止不动还是变动不居呢？每一种接触总是两个东西的接触，换言之，除了接触、分割或点之外，总还有某种东西。

These, then, are the difficulties resulting from the supposition that any and every body, whatever its size, is divisible through and through. There is, besides, this further consideration. If, having divided a piece of wood or anything else, I put it together, it is again equal to what it was, and is one. Clearly this is so, whatever the point at which I cut the wood. The wood, therefore, has been divided potentially through and through. What, then, is there in the wood besides the division? For even if we suppose there is some quality, yet how is the wood dissolved into such constituents and

how does it come-to-be out of them? Or how are such constituents separated so as to exist apart from one another? Since, therefore, it is impossible for magnitudes to consist of contacts or points, there must be indivisible bodies and magnitudes. Yet, if we do postulate the latter, we are confronted with equally impossible consequences, which we have examined in other works. But we must try to disentangle these perplexities, and must therefore formulate the whole problem over again.

之所以产生上述这些难题是因为这样一种假设，即任何物体，无论其大小，都是可以彻底分割的。另外还要考虑下面一种情况。如果在分割了一块木头或别的什么东西之后我又把它们组合在一起，那么它就又和原先一样，复归于一了。显然，无论我分割木头时是在哪一点，情况都会是这样。因此，木头已经潜在地被彻底分割了。那么，除了分割之外，木头里还有什么呢？因为即使我们假定其中有某种性质，但木头是如何分解成这些成分，又是如何从这些成分中生成的呢？或者这些成分是如何被分离从而得以彼此独立存在的呢？因此，既然大小不可能由接触或点构成，那就必定存在不可分割的物体和大小。然而，如果我们确实假定后一种情形为事实的话，我们得到的结论同样是不可能。这些结论我们在其他著作中已经考察过了。不过我们必须尽力解开这些困惑，因而必须要再次系统地阐述整个问题。

On the one hand, then, it is in no way paradoxical that every perceptible body should be indivisible as well as divisible at any and every point. For the second predicate will attach to it potentially, but the first actually. On the other hand, it would seem to be impossible for a body to be, even potentially, divisible at all points simultaneously. For if it were possible, then it might actually occur, with the result, not that the body would simultaneously be actually both (indivisible and divided), but that it would be

simultaneously divided at any and every point. Consequently, nothing will remain and the body will have passed-away into what is incorporeal: and so it might come-to-be again either out of points or absolutely out of nothing. And how is that possible?

那么，一方面，那种认为每个可感知物在任何一点既是不可分割的又是可以分割的看法绝不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第二种论断是从潜能上来描述这个物体的，而第一种论断则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的。另一方面，即使是从潜能上来讲，一个物体可以同时在所有的点上分割似乎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实际上就可能发生，结果并不是这个物体实际上会兼具两种情形（既不可分割又已被分割），而是这个物体会在任何一点上同时被分割。因此，没有什么会剩余，这个物体将消亡成无形，然后它还可能再次生成，或源于点或完全源于虚无。那么这又怎么可能呢？

But now it is obvious that a body is in fact divided into separable magnitudes which are smaller at each division—into magnitudes which fall apart from one another and are actually separated. Hence (it is urged) the process of dividing a body part by part is not a 'breaking up' which could continue ad infinitum; nor can a body be simultaneously divided at every point, for that is not possible; but there is a limit, beyond which the 'breaking up' cannot proceed.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especially if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are to take place by 'association' and 'dissociation' respectively—is that a body must contain atomic magnitudes which are invisible. Such is the argument which is believed to establish the necessity of atomic magnitudes: we must now show that it conceals a faulty inference, and exactly where it conceals it.

可是，显然一个物体实际上是被分割成了越来越小的大小，被分割成了彼此分离且实际上也会被分开的大小。因此，（我们强烈主张）一部分一部分地分割物体的过程不是一种可无限进行的“分离”过程；一个物体也不会同时在每一个点上被分割，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是存在一个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分离”就无法继续进行。必然的结果是——尤其是在生成和消亡会分别通过“联合”与“分离”发生的情况下——一个物体必定包含不可见的原子大小。这就是那种认为原子大小必然存在的观点，我们现在必须要指出这种论点隐藏了一个错误的推论，并指出其确切所在。

For, since point is not 'immediately-next' to point, magnitudes are 'divisible through and through' in one sense, and yet not in another. When, however, it is admitted that a magnitude is 'divisible through and through', it is thought there is a point not only anywhere, but also everywhere, in it: hence it is supposed to follow, from the admission, that the magnitude must be divided away into nothing. For it is supposed—there is a point everywhere within it, so that it consists either of contacts or of points. But it is only in one sense that the magnitude is 'divisible through and through', viz. in so far as there is one point anywhere within it and all its points are everywhere within it if you take them singly one by one. But there are not more points than one anywhere within it, for the points are not 'consecutive': hence it is not simultaneously 'divisible through and through'. For if it were, then, if it be divisible at its centre, it will be divisible also at a point 'immediately-next' to its centre. But it is not so divisible: for position is not 'immediately-next' to position, nor point to point—in other words, division is not 'immediately-next' to division, nor composition to composition.

因为，既然点与点不是“直接相邻”的，那么大小就在一种意义上

是“彻底可分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不可分的。然而，如果假定大小是“彻底可分”的，那就是说在大小中不仅是任意一处，而且是到处，都存在一个点。这样，由这一假定就应当可以推出，大小必定可以被分割到无。因为假定大小内部到处都存在着一个点，所以大小要么由接触组成，要么由点组成。但是，大小只在某种意义上是“彻底可分”的，也就是说，在大小内部的任何一处都存在一个点，而且如果一个个分别来看的话，其所有的点都无处不在。但是，大小内部任何一处存在的点都不会多于一，因为点不是“接续的”。因此，它不会同时被“彻底地分割”。因为假设它是可分的话，那么，如果它的中心部分可分，与中心“直接相邻”的一点也将是可分的。但它是不可以这样被分的，因为位置与位置、点与点都不是“直接相邻”的——换言之，分割与分割、结合与结合也都不是“直接相邻”的。

Hence there are both 'association' and 'dissociation', though neither (a) into, and out of, atomic magnitudes (for that involves many impossibilities), nor (b) so that division takes place through and through—for this would have resulted only if point had been 'immediately-next' to point: but 'dissociation' takes place into small (i.e. relatively small) parts, and 'association' takes place out of relatively small parts.

因此，既有“联合”也有“分离”，不过，（1）它们既不会形成也不会源于原子的大小（因为这会牵涉到许多不可能性），（2）而分割也不会彻底发生——因为这种结果只有在点与点“直接相邻”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而“分离”会形成小的（即相对小的）部分，“联合”则是由相对小的部分组成的。

It is wrong, however, to suppose, as some assert, that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in the unqualified and complete sense are

distinctively defined by 'association' and 'dissociation', while the change that takes place in what is continuous is 'alteration'. On the contrary, this is where the whole error lies. For unqualified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are not effected by 'association' and 'dissociation'. They take place when a thing changes, from this to that, as a whole. But the philosophers we are criticizing suppose that all such change is 'alteration': whereas in fact there is a difference. For in that which underlies the change there is a factor corresponding to the definition and there is a material factor. When, then, the change is in these constitutive factors, there will be coming-to-be or passing-away: but when it is in the thing's qualities, i.e. a change of the thing per accidents, there will be 'alteration'.

然而，有些人错误地认为生成与消亡在非性质和完全的意义上可以区别性地由“联合”和“分离”来定义，而在连续物中发生的变化就是“更替”。恰恰相反，这正是全部谬误所在。因为非性质意义上的生成和消亡并不受“联合”和“分离”的影响。它们是在一个事物作为一个整体由此变成彼的时候产生的。但是我们正在批评的这些哲学家则认为所有此类变化都是“更替”，而事实上它们是有区别的。因为在构成这种变化的基础中既有某种符合定义的因素，也有某种质料的因素。所以，当变化是发生在这些构成因素中时，就会产生生成或消亡；但是当变化是发生在事物的性质中时，也就是说该事物每次发生意外变化时，就会产生“更替”。

'Dissociation' and 'association' affect the thing's susceptibility to passing-away. For if water has first been 'dissociated' into smallish drops, air comes-to-be out of it more quickly: while, if drops of water have first been 'associated', air comes-to-be more slowly. Our doctrine will become clearer in the sequel. Meantime, so much may be taken as established—viz. that coming-to-be cannot be

'association', at least not the kind of 'association' some philosophers assert it to be.

“分离”和“联合”影响该事物的易消亡性。因为如果水先被“分离”成了小水珠，那么气就会较快地从中生成；而如果水珠先被“联合”在一起，那么气就会生成得较慢。我们的观点会在后续的讨论中变得更加清楚。与此同时，有很多内容已经是可以确定的了，即生成不可能是“联合”，至少不是像有些哲学家宣称的那种“联合”。

Chapter 3

第三章

Now that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preceding distinctions, we must first consider whether there is anything which comes-to-be and passes-away in the unqualified sense: or whether nothing comes-to-be in this strict sense, but everything always comes-to-be something and out of something—I mean, e.g. comes-to-be-healthy out of being-ill and ill out of being-healthy, comes-to-be-small out of being big and big out of being-small, and so on in every other instance. For if there is to be coming-to-be without qualification, 'something' must—without qualification—'come-to-be out of not-being', so that it would be true to say that 'not-being is an attribute of some things'. For qualified coming-to-be is a process out of qualified not-being (e.g. out of not-white or not-beautiful), but unqualified coming-to-be is a process out of unqualified not-being.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上述的区别，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考虑是否存在任何非性质意义上的生成和消亡的东西，或者说是否在这种严格

意义上没有什么东西生成，但是所有的东西都会生成某物，也是由某物生成的——我的意思是，例如，由病态生成健康和由健康生成病态，由大生成小和由小生成大等其他一切情形。因为如果有不受限定地生成的话，那么“某物”必定——不受限定地——“由非存在生成”，这样的话，说“非存在是某些事物的一种属性”就是正确的了。因为性质方面的生成是出自于性质方面的非存在的一个过程（例如，出自于非白或非美），而非性质方面的生成则是出自于非性质方面的非存在的一个过程。

Now 'unqualified' means either (i) the primary predication within each Category, or (ii) the universal, i.e. the all-comprehensive, predication. Hence, if 'unqualified not-being' means the negation of 'being' in the sense of the primary term of the Category in question, we shall have, in 'unqualified coming-to-be', a coming-to-be of a substance out of not-substance. But that which is not a substance or a 'this' clearly cannot possess predicates drawn from any of the other Categories either—e.g. we cannot attribute to it any quality, quantity, or position. Otherwise, properties would admit of existence in separation from substances. If, on the other hand, 'unqualified not-being' means 'what is not in any sense at all', it will be a universal negation of all forms of being, so that what comes-to-be will have to come-to-be out of nothing.

那么，“非性质方面的”指的既是每个范畴内最初的断定，也是普遍的（即无所不包的）断定。因此，如果“非性质方面的非存在”从讨论范畴的基本术语的意义而言是指“存在”的对立面，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在“非性质方面的生成”中，有出自非实体的某种实体的生成。但是某种非实体的东西或某种“这个”东西显然也不可能拥有来自其他任何范畴的属性——例如，我们无法将任何性质、数量或者位置归属于它。不然的话，属性就可能以脱离于实体的形式存在。另一方面，

如果“非性质方面的非存在”是指“在任何意义上什么都不是”，那将是对所有存在形式的一种普遍否定，那样的话生成的东西也必将是生成于无。

Although we have dealt with these problems at greater length in another work, where we have set forth the difficulties and established the distinguishing definitions, the following concise restatement of our results must here be offered: In one sense things come-to-be out of that which has no 'being' without qualification: yet in another sense they come-to-be always out of what 'is'. For coming-to-be necessarily implies the pre-existence of something which potentially 'is', but actually 'is not'; and this something is spoken of both as 'being' and as 'not-being'.

尽管我们已经在另一部著作中更为详尽地探讨过这些问题（在那部作品中我们已经摆明了这些难题并确立了截然不同的定义），但是仍必须在这里简明地重申一下我们的结论：在一种意义上，事物生成于不受限定的“非存在”，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们又总是生成于“存在”。因为生成必然意味着事先存在某种潜能上“存在”、而实际上“不存在”的事物；而这种事物既可以从“存在”来讲，也可以从“非存在”来讲。

These distinctions may be taken as established: but even then it is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to see how there can be 'unqualified coming-to-be' (whether we suppose it to occur out of what potentially 'is', or in some other way), and we must recall this problem for further examination. For the question might be raised whether substance (i.e. the 'this') comes-to-be at all. Is it not rather the 'such', the 'so great', or the 'somewhere', which comes-to-be?

And the same question might be raised about 'passing-away' also. For if a substantial thing comes-to-be, it is clear that there will 'be' (not actually, but potentially) a substance, out of which its coming-to-be will proceed and into which the thing that is passing-away will necessarily change. Then will any predicate belonging to the remaining Categories attach actually to this presupposed substance? In other words, will that which is only potentially a 'this' (which only potentially is), while without the qualification 'potentially' it is not a 'this' (i.e. is not), possess, e.g. any determinate size or quality or position? For (i) if it possesses none of these determinations actually, but all of them only potentially, the result is first that a being, which is not a determinate being, is capable of separate existence; and in addition that coming-to-be proceeds out of nothing pre-existing—a thesis which, more than any other, preoccupied and alarmed the earliest philosophers. On the other hand (ii) if, although it is not a 'this somewhat' or a substance, it is to possess some of the remaining determinations quoted above, then (as we said) properties will be separable from substances.

可以将上述区分看作是已经确定的，但是即使这样，要弄清楚如何能有“非性质方面的生成”（无论我们假定它是生成于潜能上“存在”的事物还是以其他方式“存在”的事物）是异常困难的，我们必须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来进一步探讨。因为这个问题可能会被提出来，即究竟是否会生成实体（也就是“这个”）。它是以“这种”方式、以“如此巨大”的数量或者在“某处”生成的吗？同样的问题也可能会针对“消亡”提出来。因为如果一种实在事物生成的话，显然会“存在”（不是实际上，而是潜能上）一种实体，事物的生成将源自于这一实体，而消亡的事物也必将变成这一实体。那么会有属于剩余范畴的属性实际上附属于这一预先假定的实体吗？换言之，只是潜能上是“这个”（只是潜能上存在）、而从纯粹意义的潜能上讲不是“这个”（也就是说不存在）的东西会有任何确定的大小、性质或位置吗？因为（1）如果它

实际上不受这些限定，而只是潜在具有所有这些性质的话，那么结果首先是并未确定的存在可以单独存在；其次是生成源自于事先存在的虚无，这个论点比其他任何论点都更吸引也更困扰着早期的哲学家们。（2）另一方面，如果说尽管它不是“这个”或某个实体，但它却具有上述的某些剩余的限定，那么（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性质将可以与实体相分离。

We must therefore concentrate all our powers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se difficulties and on the solution of a further question—viz. What is the cause of the perpetuity of coming-to-be? Why is there always unqualified, as well as partial, coming-to-be? Cause in this connexion has two senses. It means (i) the source from which, as we say, the process 'originates', and (ii) the matter. It is the material cause that we have here to state. For, as to the other cause, we have already explained (in our treatise on Motion) that it involves (a) something immovable through all time and (b) something always being moved. And the accurate treatment of the first of these—of the immovable 'originative source'—belongs to the province of the other, or 'prior', philosophy: while as regards 'that which sets everything else in motion by being itself continuously moved', we shall have to explain later which amongst the so-called 'specific' causes exhibits this character. But at present we are to state the material cause—the cause classed under the head of matter—to which it is due that passing-away and coming-to-be never fail to occur in Nature. For perhaps, if we succeed in clearing up this question, it will simultaneously become clear what account we ought to give of that which perplexed us just now, i.e. of unqualified passing-away and coming-to-be.

因此，我们必须集中所有的精力来讨论这些难题并解决一个更深

层的问题，即生成总在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总会有非性质方面的生成以及部分的生成发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两重意义。它既可以指来源，正如我们所说的“发源”过程的那个来源，还可以指质料。我们要在这里说明的正是质料意义的原因。因为关于另外一种原因，我们已经（在关于移动的论述中）解释过它涉及两个方面：（1）永远都不可移动的东西和（2）总是在被移动的东西。对第一个方面的细致探讨，即不可移动的“本原”，属于另一个领域或者说“先前的”哲学的范畴，而至于“通过自身的不断移动来使其他一切事物移动的东西”，我们稍后将解释在所谓“具体的”原因中哪一种原因展示了这种特性。但是现在我们将说明质料意义的原因，即归类于质料名下的原因——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自然中的消亡与生成才总在发生。因为如果我们成功地搞清楚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有可能会同时明确该如何说明刚刚困扰我们的问题，即非性质方面的消亡与生成。

Our new question too—viz. 'what is the cause of the unbroken continuity of coming-to-be?'—is sufficiently perplexing, if in fact what passes-away vanishes into 'what is not' and 'what is not' is nothing (since 'what is not' is neither a thing, nor possessed of a quality or quantity, nor in any place). If, then, some one of the things 'which are' constantly disappearing, why has not the whole of 'what is' been used up long ago and vanished away assuming of course that the material of all the several comings-to-be was finite? For, presumably, the unfailing continuity of coming-to-be cannot be attributed to the infinity of the material. That is impossible, for nothing is actually infinite. A thing is infinite only potentially, i.e. the dividing of it can continue indefinitely: so that we should have to suppose there is only one kind of coming-to-be in the world—viz. one which never fails, because it is such that what comes-to-be is on each successive occasion smaller than before. But in fact this is not what we see occurring.

如果实际上消亡的东西消失成了“非存在”，而“非存在”又是虚无（因为“非存在”既不是某种事物，也不具有某种性质或数量，也不存在于任何地方），我们的新问题“什么是连续性生成的起因”也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如果“存在的”某种事物总是在消失，那假定所有产生生成的质料都是有限的话，为什么所有“存在的”事物没有在很久以前就被消耗殆尽呢？因为，或许我们不能将生成的连续不衰归因于质料的无限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什么事物实际上是无限的。某个事物只可能在潜能上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分割它是可以无限进行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假定世界上只存在一种生成，那就是一种从来不衰退的生成，因为这样生成的东西总是后续的比先前的要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正在发生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Why, then, is this form of change necessarily ceaseless? Is it because the passing-away of this is a coming-to-be of something else, and the coming-to-be of this a passing-away of something else?

那么，为什么这种形式的改变必定是永不停歇的呢？是因为此物的消亡是他物的生成，而此物的生成又是他物的消亡吗？

The cause implied in this solution must no doubt be considered adequate to account for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in their general character as they occur in all existing things alike. Yet, if the same process is a coming-to-be of this but a passing-away of that, and a passing-away of this but a coming-to-be of that, why are some things said to come-to-be and pass-away without qualification, but others only with a qualification?

当它们发生在所有现存的同类事物中的时候，这一结论所隐含的

原因无疑会被认为是适用于解释具有普遍特征的生成和消亡现象的。然而，如果同一个过程是此物的生成、彼物的消亡以及此物的消亡、彼物的生成的话，那为什么说有些事物是没有限定地生成和消亡，而其他事物则只能是有条件地生成和消亡呢？

The distinction must be investigated once more, for it demands some explanation. (It is applied in a twofold manner.) For (i) we say 'it is now passing-away' without qualification, and not merely 'this is passing-away': and we call this change 'coming-to-be', and that 'passing-away', without qualification. And (ii) so-and-so 'comes-to-be-something', but does not 'come-to-be' without qualification; for we say that the student 'comes-to-be-learned', not 'comes-to-be' without qualification.

这一差别必须重新加以考察，因为它需要某种解释。（它是以一种双重方式被应用的。）因为（1）我们说“它现在正在没有限定地消亡”，而不仅仅是说“这个事物正在消亡”；我们称这种变化为没有限定地“生成”，称那种变化为没有限定地“消亡”；（2）某人或某物“成为某物”，但不是没有限定地“成为”，因为我们说学生“成为博学多识的”，而不是说没有限定地“成为”。

Now we often divide terms into those which signify a 'this somewhat' and those which do not. And (the first form of) the distinction, which we are investigating, results from a similar division of terms: for it makes a difference into what the changing thing changes. Perhaps, e.g. the passage into Fire is 'coming-to-be' unqualified, but 'passing-away-of-something' (e.g. Earth): whilst the coming-to-be of Earth is qualified (not unqualified) 'coming-to-be', though unqualified 'passing-away' (e.g. of Fire). This would be the

case on the theory set forth in Parmenides: for he says that the things into which change takes place are two, and he asserts that these two, viz. what is and what is not, are Fire and Earth. Whether we postulate these, or other things of a similar kind, makes no difference. For we are trying to discover not what undergoes these changes, but what is their characteristic manner. The passage, then, into what 'is' not except with a qualification is unqualified passing-away, while the passage into what 'is' without qualification is unqualified coming-to-be. Hence whatever the contrasted 'poles' of the changes may be—whether Fire and Earth, or some other couple—the one of them will be 'a being' and the other 'a not-being'.

现在我们常常把术语划分成两类，一类是那些表示某种“这个”的术语，一类是那些不表示相应概念的术语。这种区分（的第一种形式）是我们正在探究的，它源自于一种类似的术语区分，因为它区分了正在改变的事物所发生的变化。例如火的生成是非性质方面的“生成”，但也是“某物的消亡”（例如土），而土的生成是性质方面的（不是非性质方面的）生成，尽管“消亡”是非性质方面的（例如火）。这将和巴门尼德提出的理论观点一致，因为他说变化的结果是生成两种事物，他断言这两种事物，即存在与非存在，是火和土。我们是假定这些事物还是假定同类的其他事物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正努力发现的不是经历这些变化的事物，而是这些变化特有的方式。那么，变成单纯的“非存在”的路径是非性质方面的消亡，而变成单纯的“存在”的路径是非性质方面的生成。因此，无论变化的相对“两极”会是什么——无论是火与土，还是其他一对什么事物——二者之一将是一种“存在”，而另一个将是一种“非存在”。

We have thus stated one characteristic manner in which unqualified will be distinguished from qualified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but they are also distinguish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nature of the material of the changing thing. For a material, whose constitutive differences signify more a 'this somewhat', is itself more 'substantial' or 'real': while a material, whose constitutive differences signify privation, is 'not real'. (Suppose, e.g. that 'the hot' is a positive predication, i.e. a 'form', whereas 'cold' is a privation, and that Earth and Fire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by these constitutive differences.)

这样我们就阐明了区分性质方面的生成和消亡与非性质方面的生成和消亡的一种特有方式，不过也可以依据变化物体质料的特性来加以区分。因为构成差异越多表示某种“这个”的质料本身就越是“实在的”或“真实的”，而构成差异越少表示质料则是“非真实的”。（例如，假设“热”是一种积极的断言，即一种“形式”，反之“冷”就是一种缺失，而土和火就是凭借这些构成差异而彼此区分的。）

The opinion, however, which most people are inclined to prefer, is that the distinction depends up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rceptible' and 'the imperceptible'. Thus, when there is a change into perceptible material, people say there is 'coming-to-be'; but when there is a change into invisible material, they call it 'passing-away'. For they distinguish 'what is' and 'what is not' by their perceiving and not-perceiving, just as what is knowable 'is' and what is unknowable 'is not'—perception on their view having the force of knowledge. Hence, just as they deem themselves to live and to 'be' in virtue of their perceiving or their capacity to perceive, so too they deem the things to 'be' qua perceived or perceptible—and in this they are in a sense on the track of the truth, though what they actually say is not true.

然而，大多数人赞成的观点是这种区分取决于“可感知的”和“不可感知的”事物之间的差异。于是，当有东西变成可感知质料时，人们就说有“生成”；而当有东西变成不可见的质料时，他们就称之为“消亡”。因为他们区分“存在”和“非存在”的依据是他们能否感知得到，就像可知的就“存在”，不可知的就“不存在”——在他们看来知觉具有认知的力量。因此，正如他们认为自己活着并“存在”是由于他们在感知或他们具有感知能力，他们也同样认为事物“存在”是因为被感知或可感知——就这一点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追求真理，尽管他们所说的实际上并不是正确的。

Thus unqualified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turn out to b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common opinion from what they are in truth. For Wind and Air are in truth more real, more a 'this somewhat' or a 'form' —than Earth. But they are less real to perception which explains why things are commonly said to 'pass-away' without qualification when they change into Wind and Air, and to 'come-to-be' when they change into what is tangible, i.e. into Earth.

这样，按照普遍的观点，非性质方面的生成和消亡就变得和它们实际的情形不同。因为风和气实际上要比土更实在，更是某种“这个”或某种“形式”。但是要去感知它们就没那么真实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事物变成风和气的时候人们通常会说是没有限定地“消亡”，而当它们变成了有形的东西，例如土的时候，则会说是“生成”。

We have now explained why there is 'unqualified coming-to-be' (though it is a passing-away-of-something) and 'unqualified passing-away (though it is a coming-to-be-of-something). For this distinction of appellation depends upon a difference in the material out of which, and into which, the changes are effected. It depends

either upon whether the material is or is not 'substantial', or upon whether it is more or less 'substantial', or upon whether it is more or less perceptible.

现在我们已经解释了为什么会存在“非性质方面的生成”（尽管它是某物的消亡）和“非性质方面的消亡”（尽管它是某物的生成）。因为这种名称的区分取决于变化来源以及变化归属的那种质料中存在的某种差异。它或者取决于这种质料是否是“实在的”，或者取决于它是否或多或少是“实在的”，或者取决于它是否或多或少是可感知的。

But why are some things said to 'come-to-be' without qualification, and others only to 'come-to-be-so-and-so', in cases different from the one we have been considering where two things come-to-be reciprocally out of one another? For at present we have explained no more than this:—why, when two things change reciprocally into one another, we do not attribute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uniformly to them both, although every coming-to-be is a passing-away of something else and every passing-away some other thing's coming-to-be. But the question subsequently formulated involves a different problem—viz. why, although the learning thing is said to 'come-to-be-learned' but not to 'come-to-be' without qualification, yet the growing thing is said to 'come-to-be'.

但是在和我们一直考虑的情形（即两个事物相互生成于彼此）不同的情形下，为什么有些事物被说成是没有限定地“生成”，而另一些事物则只是“生成为某物”呢？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解释过的也不过是这样一点，即当两个事物相互转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把生成和消亡一概归因于它们二者，尽管每种生成都是他物的一种消亡，而每种消亡又都是他物的生成。但后来阐述的问题涉及了一个不同的

问题，即尽管正在学习的东西被说成是“生成为博学多识的”而不是没有限定地“生成”，为什么正在生长的东西却被说成是“生成”。

The distinction here turns upon the difference of the Categories. For some things signify a this somewhat, others a such, and others a so-much. Those things, then, which do not signify substance, are not said to 'come-to-be' without qualification, but only to 'come-to-be-so-and-so'. Nevertheless, in all changing things alike, we speak of 'coming-to-be' when the thing comes-to-be something in one of the two Columns—e.g. in Substance, if it comes-to-be Fire but not if it comes-to-be Earth; and in Quality, if it comes-to-be learned but not when it comes-to-be ignorant.

此处的这一区分是由于范畴的不同。因为有些事物表示某种这个，另一些事物表示某种这样的物，还有些事物则表示如此数量的物。那么，不表示实体的那些事物就不被说成不受限定地“生成”，而只是“生成为某物”。然而，在所有正在变化的同类事物中，我们说“生成”的时候是当两列之中的一列事物生成了某物。例如，在实体一列，如果生成了火，那就是生成，而如果生成了土，那就不是；在性质一列，如果生成的是博学，那就是生成，而如果生成的是无知，那就不是。

We have explained why some things come-to-be without qualification, but not others both in general, and also when the changing things are substances and nothing else; and we have stated that the substratum is the material cause of the continuous occurrence of coming-to-be, because it is such as to change from contrary to contrary and because, in substances, the coming-to-be of one thing is always a passing-away of another, and the passing-

away of one thing is always another's coming-to-be. But there is no need even to discuss the other question we raised—viz. why coming-to-be continues though things are constantly being destroyed. For just as people speak of 'a passing-away' without qualification when a thing has passed into what is imperceptible and what in that sense 'is not', so also they speak of 'a coming-to-be out of a not-being' when a thing emerges from an imperceptible. Whether, therefore, the substratum is or is not something, what comes-to-be emerges out of a 'not-being': so that a thing comes-to-be out of a 'not-being' just as much as it 'passes-away into what is not'. Hence it is reasonable enough that coming-to-be should never fail. For coming-to-be is a passing-away of 'what is not' and passing-away is a coming-to-be of 'what is not'.

我们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事物不受限定地生成，而有些不是（我们既解释了一般的情况，也解释了当变化的事物是实体而非他物时的情况）；我们也已经阐明了基质是生成之所以连续发生的质料原因，因为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向相反面的变化，因为在实体中，一物的生成总是另一物的消亡，而一物的消亡总是另一物的生成。不过，我们甚至没有必要去讨论以前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事物在不断被损坏的同时生成还在继续。因为正如在一物变得不可感知以及在那个意义上“不存在的”时候，人们会说它是某种不受限定地“消亡”一样，人们在一物从某种不可感知的东西中显现的时候会说它是“源自非存在的某种生成”。因此，无论基质是或不是某物，生成的东西总是显现于某种“非存在”，这样，一物生成于某种“非存在”就正如它“消亡成非存在”一样。因此，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生成是绝不会衰竭的。因为生成是“非存在”的某种消亡，而消亡则是“非存在”的某种生成。

But what about that which 'is' not except with a qualification?

Is it one of the two contrary poles of the change—e.g. Earth (i.e. the heavy) a 'not-being', but Fire (i.e. the light) a 'being'? Or, on the contrary, does what is 'include Earth as well as Fire, whereas what is not' is matter—the matter of Earth and Fire alike? And again, is the matter of each different? Or is it the same, since otherwise they would not come-to-be reciprocally out of one another, i.e. contraries out of contraries? For these things—Fire, Earth, Water, Air—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traries'.

但是不受限定的“非存在”又怎么样呢？它是变化的相反两极之一吗？例如土（即重）是某种“非存在”，而火（即轻）则是某种“存在”。或者，相反，存在是“既包括火也包括土，而非存在”则是质料，即土和火的质料是相同的吗？再者，每一个的质料是不同的吗？或者每个质料是相同的，因为不然的话它们不会相互由对方生成，即反面出于反面？因为这些事物——火、土、水、气——都是以“相反面”为特征的。

Perhaps the solution is that their matter is in one sense the same, but in another sense different. For that which underlies them, whatever its nature may be qua underlying them, is the same: but its actual being is not the same. So much, then, on these topics.

也许答案是它们的质料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同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不同的。因为构成它们基础的东西（无论其潜在的性质为何）是相同的，而其实际存在形式却是不同的。那么，关于这些论题就说这么多了。

Chapter 4

第四章

Next we must state what the difference is between coming-to-be and 'alteration'—for we maintain that these changes are distinct from one another.

接下来我们必须阐明生成与“更替”之间的差异——因为我们坚持认为这些变化是截然不同的。

Since, then, we must distinguish (a) the substratum, and (b) the property whose nature it is to be predicated of the substratum; and since change of each of these occurs; there is 'alteration' when the substratum is perceptible and persists, but changes in its own properties, the properties in question being opposed to one another either as contraries or as intermediates. The body, e.g. although persisting as the same body, is now healthy and now ill; and the bronze is now spherical and at another time angular, and yet remains the same bronze. But when nothing perceptible persists in its identity as a substratum, and the thing changes as a whole (when e.g. the seed as a whole is converted into blood, or water into air, or air as a whole into water), such an occurrence is no longer 'alteration'. It is a coming-to-be of one substance and a passing-away of the other—especially if the change proceeds from an imperceptibl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perceptible (either to touch or to all the senses), as when water comes-to-be out of, or passes-away into, air: for air is pretty well imperceptible. If, however, in such cases, any property (being one of a pair of contraries) persists, in the thing that has come-to-be, the same as it was in the thing which has passed-away—if, e.g. when water comes-to-be out of air, both are transparent or cold—the second

thing, into which the first changes, must not be a property of this persistent identical something. Otherwise the change will be 'alteration.' Suppose, e.g. that the musical man passed-away and an unmusical man came-to-be, and that the man persists as something identical. Now, if 'musicalness and unmusicalness' had not been a property essentially inhering in man, these changes would have been a coming-to-be of unmusicalness and a passing-away of musicalness: but in fact 'musicalness and unmusicalness' are a property of the persistent identity, viz. man. (Hence, as regards man, these changes are 'modifications'; though, as regards musical man and unmusical man, they are a passing-away and a coming-to-be.) Consequently such changes are 'alteration.' When the change from contrary to contrary is in quantity, it is 'growth and diminution'; when it is in place, it is 'motion'; when it is in property, i.e. in quality, it is 'alteration': but, when nothing persists, of which the resultant is a property (or an 'accident' in any sense of the term), it is 'coming-to-be', and the converse change is 'passing-away'.

那么，既然我们必须区分基质与由基质来说明其本性的属性，且这两者都会发生变化，那么当基质是可感知的且保持不变的时候，就会有“更替”，但基质本身的属性（即讨论中的要么作为对立面要么作为中间物的彼此对立的属性）则会改变。例如，尽管一直是同一个身体，但这个身体却有时是健康的，有时是患病的；青铜有时是球形的，有时是有角的，但却同样是青铜。但是当其本身没有什么可感知的东西作为一种基质保持不变，而且这个东西整体发生了变化（例如当精液整体转化成了血液，或者水化成了气，或者气作为整体化成了水）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不再是“更替”了。它是一种物质的生成和另一种物质的消亡——尤其当这种变化是从某种不可感知的事物转变为可感知的事物的时候更是如此（或者通过触觉，或者通过所有的感觉），正如当水由气生成或消亡为气的时候，因为气是很难感知到

的。然而，在此类情况下，如果某个属性（对立面的一方）在已经生成的事物中保持不变，在已经消亡的事物中也同样保持不变——例如，如果在气生成水的时候二者都是透明的或者冷的，那么由第一种事物变化而来的第二种事物就肯定不会是保持不变的同一事物的某种属性。否则这个变化就是“更替”了。假设一个喜欢音乐的人消亡了，一个不喜欢音乐的人生成了，而这个人仍保持不变。如果“喜欢音乐和不喜欢音乐”不是人所固有的属性，那么这些变化就是不喜欢音乐的生成和喜欢音乐的消亡，但事实上“喜欢音乐和不喜欢音乐”是这一持续不变的实体（即人）的一种属性。（因此，就人而言，这些变化就是“变动”，尽管就喜欢音乐的人和不喜欢音乐的人而言，它们分别是一种消亡和一种生成。）因此，这些变化就是“更替”。当相反面的变化发生在数量方面时，那就是“生长和减少”；当发生在地点方面时，那就是“移动”；当发生在属性即性质方面时，那就是“更替”，但是，当没有什么保持不变且其结果是某种属性（或者就该词的所有意义而言是某种“偶性”）时，那就是“生成”，相反的变化则是“消亡”。

'Matter', in the most proper sense of the term, is to be identified with the substratum which is receptive of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but the substratum of the remaining kinds of change is also, in a certain sense, 'matter', because all these substrata are receptive of 'contrarieties' of some kind. So much, then, as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i) whether coming-to-be 'is' or 'is not'—i.e. what are the precise conditions of its occurrence and (ii) what 'alteration' is: but we have still to treat of growth.

“质料”就其真正意义而言，等同于易于接受生成与消亡的基质。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他种类变化的基质也是“质料”，因为所有这些基质都易于接受某类“相反物”。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回答了两个问题：（1）生成“存在”还是“不存在”，即生成产生的确切条件是什么；（2）什么是“更替”。不过，我们还将继续探讨生长的问

题。

Chapter 5

第五章

We must explain (i) wherein growth differs from coming-to-be and from 'alteration', and (ii) what is the process of growing and the process of diminishing in each and all of the things that grow and diminish.

我们必须说明两个问题：（1）生长和生成以及生长和“更替”的差异到底在哪里；（2）所有生长和减少的事物所经历的生长和减少的过程是怎样的1。

Hence our first question is this: Do these changes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solely because of a difference in their respective 'spheres'? In other words, do they differ because, while a change from this to that (viz. from potential to actual substance) is coming-to-be, a change in the sphere of magnitude is growth and one in the sphere of quality is 'alteration'—both growth and 'alteration' being changes from what is—potentially to what is—actually magnitude and quality respectively? Or is there also a difference in the manner of the change, since it is evident that, whereas neither what is 'altering' nor what is coming-to-be necessarily changes its place, what is growing or diminishing changes its spatial position of necessity, though in a different manner from that in which the moving thing does so? For that which is being moved changes its place as a whole: but the growing thing changes its place like a

metal that is being beaten, retaining its position as a whole while its parts change their places. They change their places, but not in the same way as the parts of a revolving globe. For the parts of the globe change their places while the whole continues to occupy an equal place: but the parts of the growing thing expand over an ever-increasing place and the parts of the diminishing thing contract within an ever-diminishing area.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变化彼此迥异完全是因为其各自的“范围”存在某种差异吗？换句话说，它们彼此迥异是因为由此到彼的某种变化（即由潜在的实体变为现实的实体）是生成，而大小范围的变化是生长，性质范围的变化是“更替”——生长和“更替”是大小和性质分别从潜能上的存在到实际上的存在的变化吗？或者说变化的方式是否也存在某种差异呢？因为显然正在“更替”的和正在生成的都未必会改变其位置，而正在生长或减少的却必然会改变其空间位置，尽管其改变位置的方式不同于正在运动的事物改变位置的方式。因为正在被移动的东西是整个改变其位置，而正在生长的事物却像一块正在被锻打的金属那样改变其位置，即整体上保持其原位，而其组成部分却会改变位置。它们改变了自己的位置，但却不同于一个旋转球体各部分的改变方式。因为球体的各部分改变了其位置，而球的整体却继续占据同一个位置，而正在生长的事物的各部分在一个不断增长的地方扩展，正在减少的事物的各部分在一个不断减小的区域缩小。

It is clear, then, that these changes—the changes of that which is coming-to-be, of that which is 'altering', and of that which is growing—differ in manner as well as in sphere. But how are we to conceive the 'sphere' of the change which is growth and diminution? The 'sphere' of growing and diminishing is believed to be magnitude. Are we to suppose that body and magnitude come-

to-be out of something which, though potentially magnitude and body, is actually incorporeal and devoid of magnitude? And since this description may be understood in two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of these two ways are we to apply it to the process of growth? Is the matter, out of which growth takes place, (i) 'separate' and existing alone by itself, or (ii) 'separate' but contained in another body?

那么，显然，这些变化——生成物的变化、“更替”物的变化以及生长物的变化——在范围上和方式上都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我们将如何构想生长和减少的变化“范围”呢？生长和减少的“范围”一般被认为就是大小。我们要假定物体和大小生成于某种潜能上是大小和物体，但实际上却既无实体也无大小的东西吗？既然这种描述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方法来加以理解，那么我们会用二者中的哪一种方法来将这种描述运用于生长的过程呢？生长由以产生的质料是“独立”并独自存在呢？还是“独立”但却寓于另一个物体之中呢？

Perhaps it is impossible for growth to take place in either of these ways. For since the matter is 'separate', either (a) it will occupy no place (as if it were a point), or (b) it will be a 'void', i.e. a non-perceptible body. But the first of these alternatives is impossible. For since what comes-to-be out of this incorporeal and sizeless something will always be 'somewhere', it too must be 'somewhere'—either intrinsically or indirectly. And the second alternative necessarily implies that the matter is contained in some other body. But if it is to be 'in' another body and yet remains 'separate' in such a way that it is in no sense a part of that body (neither a part of its substantial being nor an 'accident' of it), many impossibilities will result. It is as if we were to suppose that when, e.g. air comes-to-be out of water the process were due not to a change of the water but to the matter of the air being 'contained in'

the water as in a vessel. This is impossible. For (i) there is nothing to prevent an indeterminate number of matters being thus 'contained in' the water, so that they might come-to-be actually an indeterminate quantity of air; and (ii) we do not in fact see air coming-to-be out of water in this fashion, viz. withdrawing out of it and leaving it unchanged.

也许生长不可能以上述任何一种方式发生。因为既然质料是“分离的”，那么要么（1）它不占据任何地方（仿佛它是一个点）；要么（2）它是某种“虚空”，即某种不可感知物。但是这两种选择中第一种是不可能的。因为既然由这种无形无状的东西生成的事物总是在“某处”，那么质料也必定在“某处”——或以固有的方式或以间接的方式。而第二种选择则必然意味着质料包含在某种别的物体之中。但是如果其“寓于”另一物体之中但却保持“分离”，即它绝非那个物体的一部分（既非其实体的一部分，亦非其“偶性”），那么就会产生许多不可能的结论。这就好比我们假定，当气生成于水时，这一过程不是因为水的变化，而是因为“包含”在水中（正如包含在一个容器中一样）的气的质料。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1）没有什么可以妨碍无限多的质料以这种方式“包含”在水中，这样它们实际上可能会生成无限多的气；（2）事实上我们没有见过气以这种方式生成于水，即气出自于水而水则留存未变。

It is therefore better to suppose that in all instances of coming-to-be the matter is inseparable, being numerically identical and one with the 'containing' body, though isolable from it by definition. But the same reasons also forbid us to regard the matter, out of which the body comes-to-be, as points or lines. The matter is that of which points and lines are limits, and it is something that can never exist without quality and without form.

因此我们最好假定，在所有生成的情形中，质料都是不可分离的，数目上与这种“包含”的物体是一样的，尽管这种物体从定义上来讲是可以与质料分离的。同理，我们也不能把（这种物体由以生成的）质料视为点或线。质料是以点和线为界限的东西，是无法脱离性质和形式而存在的东西。

Now it is no doubt true, as we have also established elsewhere, that one thing 'comes-to-be' (in the unqualified sense) out of another thing: and further it is true that the efficient cause of its coming-to-be is either (i) an actual thing (which is the same as the effect either generically—or the efficient cause of the coming-to-be of a hard thing is not a hard thing—or specifically, as e.g. fire is the efficient cause of the coming-to-be of fire or one man of the birth of another), or (ii) an actuality. Nevertheless, since there is also a matter out of which corporeal substance itself comes-to-be (corporeal substance, however, already characterized as such-and-such a determinate body, fo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body in general), this same matter is also the matter of magnitude and quality—being separable from these matters by definition, but not separable in place unless Qualities are, in their turn, separable.

现在，正如我们已经在别处确定了的那样，这个事实无疑是真的，即一物“生成”（在非性质方面的意义上）于另一物，此外，其生成的动力因或者是某个现实事物（其或者与结果同属——或者说某个坚硬事物之生成的动力因不是某个坚硬事物——或者与结果同种，正如火是火之生成的动力因或者说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生成的动力因），或者是某种现状。不过，既然存在有形实体本身由以生成的质料（然而，有形实体是已被赋予了这般特点的某种确定的物体，因为不存在一般的物体这样的东西），那么这同一种质料也就是大小和性质的质料——从定义上来说是和这些质料分离的，但在位置上却是不可分离

的，除非这些性质反过来是可以分离的。

It is evident, from the preceding development and discussion of difficulties, that growth is not a change out of something which, though potentially a magnitude, actually possesses no magnitude. For, if it were, the 'void' would exist in separation; but we have explained in a former work that this is impossible. Moreover, a change of that kind is not peculiarly distinctive of growth, but characterizes coming-to-be as such or in general. For growth is an increase, and diminution is a lessening, of the magnitude which is there already—that, indeed, is why the growing thing must possess some magnitude. Hence growth must not be regarded as a process from a matter without magnitude to an actuality of magnitude: for this would be a body's coming-to-be rather than its growth.

从前面对诸多难题的阐发和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生长并非出自尽管潜能上是某种大小，但实际上却没有大小的某物的一种变化。因为，如果生长是这样一种变化的话，那么“虚空”将存在于分离中，但是我们已经在前面的一部作品中解释过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此外，这种变化不是专属于生长的，而是此类或总体而言所有生成的特点。因为生长是已存在的大小的增加，减少是已存在的大小的缩减——这事实上就是正在生长的事物必定会有某种大小的原因。因此，一定不能把生长视为一种从没有大小的某种质料变为具有大小的某种现实存在的过程，因为这种过程是某个物体的生成，而非其生长。

We must therefore come to closer quarters with the subject of our inquiry. We must 'grapple' with it (as it were) from its beginning, and determine the precise character of the growing and diminishing whose causes we are investigating.

所以我们必须更加细致地来考察我们的论题。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就“抓住”论题，确定生长和减少的确切特性，探究它们的起因。

It is evident (i) that any and every part of the growing thing has increased, and that similarly in diminution every part has become smaller: also (ii) that a thing grows by the accession, and diminishes by the departure, of something. Hence it must grow by the accession either (a) of something incorporeal or (b) of a body. Now, if (a) it grows by the accession of something incorporeal, there will exist separate a void: but (as we have stated before) is impossible for a matter of magnitude to exist 'separate'. If, on the other hand (b) it grows by the accession of a body, there will be two bodies—that which grows and that which increases it—in the same place: and this too is impossible.

显然，（1）生长物的每个部分都增加了，同样，在减少的情形中，每个部分也都变小了；（2）某个事物通过增加某样东西而生长，通过去除某样东西而减少。因此，事物生长必定是通过增加无形的东西或者是某个物体来实现的。如果事物生长（1）是通过增加某种无形的东西，那么就会分离存在某种虚空，但是（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具有大小的某种质料是不可能“分离”存在的。而另一方面，（2）如果事物生长是通过增加某个物体实现的，那么就会有两个物体——生长的物体和促进生长的物体——在同一地点出现，而这也是不可能的。

But neither is it open to us to say that growth or diminution occurs in the way in which e.g. air is generated from water. For,

although the volume has then become greater, the change will not be growth, but a coming-to-be of the one—viz. of that into which the change is taking place—and a passing-away of the contrasted body. It is not a growth of either. Nothing grows in the process; unless indeed there be something common to both things (to that which is coming-to-be and to that which passed-away), e.g. 'body', and this grows. The water has not grown, nor has the air: but the former has passed-away and the latter has come-to-be, and—if anything has grown—there has been a growth of 'body.' Yet this too is impossible. For our account of growth must preser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at which is growing and diminishing. And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three: (i) any and every part of the growing magnitude is made bigger (e.g. if flesh grows, every particle of the flesh gets bigger), (ii) by the accession of something, and (iii) in such a way that the growing thing is preserved and persists. For whereas a thing does not persist in the processes of unqualified coming-to-be or passing-away, that which grows or 'alters' persists in its identity through the 'altering' and through the growing or diminishing, though the quality (in 'alteration') and the size (in growth) do not remain the same. Now if the generation of air from water is to be regarded as growth, a thing might grow without the accession (and without the persistence) of anything, and diminish without the departure of anything—and that which grows need not persist. But this characteristic must be preserved: for the growth we are discussing has been assumed to be thus characterized.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生长或减少发生的方式会像气生成于水的方式。因为，尽管体积变大了，但是变化却不是生长，而是“一”的生成——即变化将变成之物的生成——及其相反物的消亡。它不是任何一方的生长。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生长，除非的确存在两种事物（生成物和消亡物）共有的某个东西，例如“物体”，那么这个东西会生

长。水没有生长，气也没有生长，但是前者消亡了，而后者生成了，那么——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生长的话——那就是“物体”生长了。然而这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对生长的阐释必须保留生长物和减少物的特征。此类特征有三个：（1）正在生长的大小的任一部分变得更大（例如，如果肉生长了，肉的每个分子都会变大）；（2）通过增加某物的方式；（3）以这种方式使正在生长的事物被保留且持续存在。因为一物在非性质方面的生成或消亡过程中并不持续存在，而生长的或“更替”的事物却通过“更替”以及生长或减少的方式保持身份的同一，尽管（在“更替”中的）性质和（在生长中的）大小不会保持同一。那么如果气生成于水被看作是生长的话，那么一物就可能会没有任何增加（和存留）而生长、没有任何分离而减少了——生长的事物也就未必存留了。但是这个特点必须加以保留，因为我们已经假定正在讨论的生长是具有这种特点的。

One might raise a further difficulty. What is 'that which grows'? Is it that to which something is added? If, e.g. a man grows in his shin, is it the shin which is greater—but not that 'whereby' he grows, viz. not the food? Then why have not both 'grown'? For when A is added to B, both A and B are greater, as when you mix wine with water; for each ingredient is alike increased in volume. Perhaps the explanation is that the substance of the one remains unchanged, but the substance of the other (viz. of the food) does not. For indeed, even in the mixture of wine and water, it is the prevailing ingredient which is said to have increased in volume. We say, e.g. that the wine has increased, because the whole mixture acts as wine but not as water. A similar principle applies also to 'alteration'. Flesh is said to have been 'altered' if, while its character and substance remain, some one of its essential properties, which was not there before, now qualifies it: on the other hand, that 'whereby' it has been 'altered' may have undergone no change, though sometimes it too has been affected. The altering agent,

however, and the originative source of the process are in the growing thing and in that which is being 'altered': for the efficient cause is in these. No doubt the food, which has come in, may sometimes expand as well as the body that has consumed it (that is so, e.g. if, after having come in, a food is converted into wind), but when it has undergone this change it has passed-away: and the efficient cause is not in the food.

有人可能会进一步提出一个难题。“那个生长的事物”是什么？它是被添加到某物上去的东西吗？譬如说一个人胫骨生长了，那么就是说胫骨变大了，而不是说他“由以”生长的那个东西（即食物）变大了吗？那么为什么不是两者都“生长”了呢？因为当甲物被添加到乙物，甲乙两者都会变得更大，正如当你把酒和水混在一起时的情形一样，因为每种成分都同样在体积方面增加了。或许可以解释为一种成分的实质没有改变，而另一种成分的实质（即食物的实质）却发生了改变。因为事实上，即使是在酒和水的混合物中，也是占优势的那种成分被认为是在体积方面增加了。例如我们说酒增加了，那是因为整个混合物是用作酒而不是水。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更替”。如果在肉的特性和实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其基本属性中原先没有的某一种属性现在具有了，那么我们就说肉已经发生了“更替”，而另一方面，其由以“更替”的那个东西却可能没有经历变化，尽管有时它也会受到影响。然而，更替的动因和这一过程的本原则存在于生长物和被“更替”的事物之中，因为动因就存在于这些事物之中。诚然，已经进入腹中的食物有时可能会和消化它的身体一样膨胀（例如，如果在进入腹中后某种食物转化成了风，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当食物经历了这种变化，它就消亡了，动力因不存在于食物之中。

We have now developed the difficulties sufficiently and must therefore try to find a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ur solution must preserve intact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growth—that the

growing thing persists, that it grows by the accession (and diminishes by the departure) of something, and further that every perceptible particle of it has become either larger or smaller. We must recognize also (a) that the growing body is not 'void' and that yet there are not two magnitudes in the same place, and (b) that it does not grow by the accession of something incorporeal.

现在我们已经充分地阐发了这些难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努力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解决办法必须要完整保留生长的三个特征，即生长物是持续存在的；它通过增加某物来实现生长（而通过分离某物来实现减少）；此外，生长物的每一个可感知的部分都会变大或变小。我们还必须清楚：（1）生长物并非“虚空”，而且在同一个地点也没有两个大小；（2）它并非通过增加非物质的东西来生长。

Two preliminary distinctions will prepare us to grasp the cause of growth. We must note (i) that the organic parts grow by the growth of the tissues (for every organ is composed of these as its constituents); and (ii) that flesh, bone, and every such part—like every other thing which has its form immersed in matter—has a twofold nature: for the form as well as the matter is called 'flesh' or 'bone'.

两种初步的区分将帮助我们理解生长的起因。我们必须注意：（1）有机部分的生长是通过组织的生长来实现的（因为每个器官都是由这些组织作为组成成分而构成的）；（2）肉、骨和每个同类部分——正如所有其他形式寓于质料之中的事物一样——都具有双重性质，因为质料和形式均被称作是“肉”或“骨”。

Now, that any and every part of the tissue qua form should grow—and grow by the accession of something—is possible, but not that any and every part of the tissue qua matter should do so. For we must think of the tissue after the image of flowing water that is measured by one and the same measure: particle after particle comes-to-be, and each successive particle is different. And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the matter of the flesh grows, some flowing out and some flowing in fresh; not in the sense that fresh matter accedes to every particle of it. There is, however, an accession to every part of its figure or 'form'.

现在，作为形式的组织的任一部分都会生长——通过增加某物而生长——这是可能的，但是作为质料的组织的任一部分却不会以同样的方式生长。因为我们必须把组织看作用同一尺度度量的流水，分子接分子陆续生成，而每个后续的分子都与众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肉的质料生长了，有的流出，有的流进，而不是说新鲜的质料增加到了肉的每个分子上。然而肉的形状或“形式”的每一部分却会有增加。

That growth has taken place proportionally, is more manifest in the organic parts—e.g. in the hand. For there the fact that the matter is distinct from the form is more manifest than in flesh, i.e. than in the tissues. That is why there is a greater tendency to suppose that a corpse still possesses flesh and bone than that it still has a hand or an arm.

在有机的部分，例如在手中，生长按比例发生这一特点会更加明显。因为在那里，质料不同于形式这一事实要比在肉中（即比在组织中）更加明显。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尸体仍然具有肉和骨，而不具有手或臂。

Hence in one sense it is true that any and every part of the flesh has grown; but in another sense it is false. For there has been an accession to every part of the flesh in respect to its form, but not in respect to its matter. The whole, however, has become larger. And this increase is due (a) on the one hand to the accession of something, which is called 'food' and is said to be 'contrary' to flesh, but (b) on the other han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food into the same form as that of flesh as if, e.g. 'moist' were to accede to 'dry' and, having acceded, were to be transformed and to become 'dry'. For in one sense 'Like grows by Like', but in another sense 'Unlike grows by Unlike'.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肉的任一部分的确生长了，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这却不是真的。因为在形式方面肉的任一部分都有增加，而在质料方面却没有。不过，整体却变大了。这种增加（1）是由于被称作“食物”、据说是肉的“相反物”的某物的增加，（2）则是由于这种食物转化为与肉相同的形式，正如向“湿”加入“干”后，“湿”会变形转化为“干”。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相似之物凭借相似之物而生长”，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则是“不相似之物凭借不相似之物而生长”。

One might discuss what must be the character of that 'whereby' a thing grows. Clearly it must be potentially that which is growing —potentially flesh, e.g. if it is flesh that is growing. Actually, therefore, it must be 'other' than the growing thing. This 'actual other', then, has passed-away and come-to-be flesh. But it has not been transformed into flesh alone by itself (for that would have been a coming-to-be, not a growth): on the contrary, it is the growing thing which has come-to-be flesh (and grown) by the food. In what way, then, has the food been modified by the growing

thing? Perhaps we should say that it has been 'mixed' with it, as if one were to pour water into wine and the wine were able to convert the new ingredient into wine. And as fire lays hold of the inflammable, so the active principle of growth, dwelling in the growing thing (that which is actually flesh), lays hold of an acceding food which is potentially flesh and converts it into actual flesh. The acceding food, therefore, must be together with the growing thing: for if it were apart from it, the change would be a coming-to-be. For it is possible to produce fire by piling logs on to the already burning fire. That is 'growth'. But when the logs themselves are set on fire, that is 'coming-to-be'.

有人可能会探讨某物“由以”生长之物的特征必定会是怎样的。显然，它必定会是潜能上正在生长的东西——例如，如果肉正在生长，那么潜能上正在生长的是肉。事实上，它必定会是“他物”，而非正在生长的东西。而这“事实上的他物”则已经消亡并生成了肉。但是它并非是单凭其自身转化成肉的（因为那样的话将会是生成，而非生长）。与此相反，正是生长物通过食物生成了肉（并得以生长）。那么，食物是以何种方式被生长物所改变的呢？也许我们可以说它是和生长物混合在了一起，仿佛一个人把水倒进酒里，然后酒就会把这种新成分转化成酒。正如火控制了易燃物一样，生长之有效原则寓于生长物（即现实的肉）中，它控制了某种潜能上是肉的、增加的食物，然后将其转化为现实的肉。因此，这种增加的食物必定是和生长物在一起的，因为如果它们不在一起的话，这种变化就会是某种生成了。因为往已经燃烧的火上堆加木料是可能产生火的。这是“生长”。但是当木料本身着火的话，那就是“生成”了。

'Quantum-in-general' does not come-to-be any more than 'animal' which is neither man nor any other of the specific forms of animal: what 'animal-in-general' is in coming-to-be, that 'quantum-

in-general' is in growth. But what does come-to-be in growth is flesh or bone—or a hand or arm (i.e. the tissues of these organic parts). Such things come-to-be, then, by the accession not of quantified-flesh but of a quantified-something. In so far as this acceding food is potentially the double result e.g. is potentially so-much-flesh—it produces growth: for it is bound to become actually both so-much and flesh. But in so far as it is potentially flesh only, it nourishes: for it is thus that 'nutrition' and 'growth' differ by their definition. That is why a body's 'nutrition' continues so long as it is kept alive (even when it is diminishing), though not its 'growth'; and why nutrition, though 'the same' as growth, is yet different from it in its actual being. For in so far as that which accedes is potentially 'so-much-flesh' it tends to increase flesh: whereas, in so far as it is potentially 'flesh' only, it is nourishment.

“一般的数量”并不生成，正如“动物”不生成一样，“动物”是指既不是人、也不是任何其他特定种类的动物，生成中的“一般的动物”，就相当于生长中的“一般的数量”。但是在生长中真正生成的东西是肉或骨——或者是手或臂（即这些有机部分的组织）。那么，这些东西的生成并非是通过增加量化了的肉，而是通过增加量化了的某物。这种增加的食物潜在地是一种双重结果（例如它潜在地是大量的肉），就这一点而言，它引起了生长，因为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它必定既有数量的增加，又会变成肉。但是就其潜在地仅是肉这一点而言，它供给营养，正是因为如此，“营养”和“生长”才得以从定义上区分开来。这就是为何只要身体活着（甚至当其变得虚弱时），其“营养”就会持续存在，而其“生长”就不会这样；这也是为何营养尽管与生长“相同”，但在现实的存在形态上却与其不同。因为就增加物潜在地是“大量的肉”而言，它会使肉增加，而就其潜在地仅是“肉”而言，它就是养料。

The form of which we have spoken is a kind of power immersed in matter—a duct, as it were. If, then, a matter accedes—a matter, which is potentially a duct and also potentially possesses determinate quantity the ducts to which it accedes will become bigger. But if it is no longer able to act—if it has been weakened by the continued influx of matter, just as water, continually mixed in greater and greater quantity with wine, in the end makes the wine watery and converts it into water—then it will cause a diminution of the quantum; though still the form persists.

我们谈到的这种形式是寓于质料之中的一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根管道。那么，如果增加了某种质料，某种潜在地是一根管道、同时也潜在地具有确定数量的质料，那么其加入的管道就会变大。但是如果这种形式不再发挥作用——如果不断涌入的质料使其弱化，正如越来越多的水不断地与酒混合，最终会使酒变淡，进而化酒为水——那么将会引起数量的减少，尽管这种形式仍将存留。

Chapter 6

第六章

(In discussing the causes of coming-to-be) we must first investigate the matter, i.e. the so-called 'elements'. We must ask whether they really are elements or not, i.e. whether each of them is eternal or whether there is a sense in which they come-to-be: and, if they do come-to-be, whether all of them come-to-be in the same manner reciprocally out of one another, or whether one amongst them is something primary. Hence we must begin by explaining certain preliminary matters, about which the statements now current are vague.

（在讨论生成的起因时）我们必须首先来探究质料，即所谓的“元素”。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它们是否真的是元素，是否每一种都是永恒的，是否存在某种它们据以生成的意义，并且如果它们的确生成了，那它们是全都以相同的方式彼此生成，还是其中有一种为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先来解释某些基本问题，目前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都是不明确的。

For all (the pluralist philosophers)—those who generate the 'elements' as well as those who generate the bodies that are compounded of the elements—make use of 'dissociation' and 'association', and of 'action' and 'passion'. Now 'association' is 'combination'; but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e process we call 'combining' has not been explained. Again, (all the monists make use of 'alteration': but) without an agent and a patient there cannot be 'altering' any more than there can be 'dissociating' and 'associating'. For not only those who postulate a plurality of elements employ their reciprocal action and passion to generate the compounds: those who derive things from a single element are equally compelled to introduce 'acting'. And in this respect Diogenes is right when he argues that 'unless all things were derived from one, reciprocal action and passion could not have occurred'. The hot thing, e.g. would not be cooled and the cold thing in turn be warmed: for heat and cold do not change reciprocally into one another, but what changes (it is clear) is the substratum. Hence, whenever there is action and passion between two things, that which underlies them must be a single something. No doubt, it is not true to say that all things are of this character: but it is true of all things between which there is reciprocal action and passion.

因为所有的人（持多元论观点的哲学家们）——包括那些主张生成“元素”的人和那些主张元素生成物体的人——都使用“分离”和“联合”以及“动作”和“承受”这些词语。“联合”就是“混合”，但被称为“混合”的这种过程的确切含义我们还未加以解释。同样，（所有持一元论观点的人都使用“更替”这个词，但是）如果没有行动者和承受者的话，那就不可能有“更替”，也不可能有“分离”和“联合”。因为不仅是那些假定元素多元性的人认为元素彼此的动作与承受生成了复合物，那些认为事物源自单一元素的人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引入“动作”这一概念。在这一点上，第欧根尼是正确的，他辩论道：“除非所有的事物都源自于一，否则相互的动作与承受是不可能发生的。”例如，热的东西不会变冷，冷的东西同样也不会变热，因为热与冷不会相互转变为彼此，而变化了的（这是很清楚的）是基质。因此，只要两个事物之间存在动作与承受，那么构成其基础的事物必定是某种单一的东西。无疑，要说所有的事物都具有这种特性，那是不正确的，但是说所有彼此间有相互的动作与承受关系的事物具有这种性质却是正确的。

But if we must investigate 'action-passion' and 'combination', we must also investigate 'contact'. For action and passion (in the proper sense of the terms) can only occur between things which are such as to touch one another; nor can things enter into combination at all unless they have come into a certain kind of contact. Hence we must give a definite account of these three things—of 'contact', 'combination', and 'acting'.

但是如果我们必须要探究“动作和承受”以及“混合”的话，我们也必须探究“接触”。因为动作与承受（就这两个词的本来意义而言）只有在彼此接触的事物之间才能发生；同样，除非形成某种接触，否则事物是根本不会混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说明这三种情形——“接触”、“混合”与“动作”。

Let us start as follows. All things which admit of 'combination' must be capable of reciprocal contact: and the same is true of any two things, of which one 'acts' and the other 'suffers action' in the proper sense of the terms. For this reason we must treat of 'contact' first. Every term which possesses a variety of meaning includes those various meanings either owing to a mere coincidence of language, or owing to a real order of derivation in the different things to which it is applied: but, though this may be taken to hold of 'contact' as of all such terms, it is nevertheless true that 'contact' in the proper sense applies only to things which have 'position'. And 'position' belongs only to those things which also have a 'place': for in so far as we attribute 'contact' to the mathematical things, we must also attribute 'place' to them, whether they exist in separation or in some other fashion. Assuming, therefore, that 'to touch' is—as we have defined it in a previous work—'to have the extremes together', only those things will touch one another which, being separate magnitudes and possessing position, have their extremes 'together'. And since position belongs only to those things which also have a 'place', while the primary differentiation of 'place' is 'the above' and 'the below' (and the similar pairs of opposites), all things which touch one another will have 'weight' or 'lightness' either both these qualities or one or the other of them. But bodies which are heavy or light are such as to 'act' and 'suffer action'. Hence it is clear that those things are by nature such as to touch one another, which (being separate magnitudes) have their extremes 'together' and are able to move, and be moved by, one another.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所有能“混合”的事物必定也能够相互接触，就其本来意义而言，这同样适用于一个“动作”、另一个“承受动作”的任何两个事物。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先来谈谈“接触”。每个具有不

同意义的词语之所以有这些不同的意义，或者是因为某种纯粹的语言巧合，或者是因为其用来指称的不同事物中的确存在着某种派生顺序，不过，尽管这可以用来描述“接触”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词语，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接触”一词只适用于那些有“位置”的事物。而“位置”又只属于那些有“地点”的事物，因为只要我们把“接触”归于数学对象，我们也必须把“地点”归于数学对象，无论这些数学对象是以分离还是以某种其他方式存在的。因此，假定“接触”就意味着——正如我们在前面的著作中已经定义过的那样——“极端相聚”，那么只有那些有独立大小与位置且极端相聚的事物才会彼此接触。既然位置只属于那些同时也有“地点”的事物，而“地点”的主要差别是“上”与“下”（以及其他类似的对立范畴），那么所有互相接触的事物就应有“重”或“轻”，或者这两种性质都有，或者只有两者中的一种。重或轻的物体能够“动作”与“承受动作”。因此，显然这些事物从本性上来讲就是彼此接触的，其（作为独立的大小）极端“相聚”且能够相互移动和被移动。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mover' moves the 'moved' not always the same: on the contrary, whereas one kind of 'mover' can only impart motion by being itself moved, another kind can do so though remaining itself unmoved. Clearly therefore we must recognize a corresponding variety in speaking of the 'acting' thing too: for the 'mover' is said to 'act' (in a sense) and the 'acting' thing to 'impart motion'. Nevertheless there is a difference and we must draw a distinction. For not every 'mover' can 'act', if (a) the term 'agent' is to be used in contrast to 'patient' and (b) 'patient' is to be applied only to those things whose motion is a 'qualitative affection'—i.e. a quality, like 'white' or 'hot', in respect to which they are 'moved' only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re 'altered': on the contrary, to 'impart motion' is a wider term than to 'act'. Still, so much, at any rate, is clear: the things which are 'such as to impart motion', if that description be interpreted in one sense, will touch the things which

are 'such as to be moved by them'—while they will not touch them, if the description be interpreted in a different sense. But the disjunctive definition of 'touching' must include and distinguish (a) 'contact in general'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two things which, having position, are such that one is able to impart motion and the other to be moved, and (b) 'reciprocal contact'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two things, one able to impart motion and the other able to be moved in such a way that 'action and passion' are predicable of them.

“移动者”移动“被移动者”的方式并不总是相同的。相反，当一种“移动者”只能通过自身也被移动才能施动的时候，另一种“移动者”却可以保持自身不被移动而施动。因此，显然我们也必须认定一种相应的说法来谈论“正在动作”的事物，因为“移动者”据称是在“动作”（在某种意义上），而“正在动作”的事物则被说成是“施动”。不过这是有差异的，我们必须加以区分。因为并非所有的“移动者”都能“动作”，如果（1）我们将“动作者”与“承受者”相对照，且（2）“承受者”仅适用于那些其移动是某种“性质变异”的话——所谓性质变异，例如像“白”或“热”之类的某种性质，有鉴于这种性质这些事物才会仅在被“更替”的意义上被“移动”。相反，“施动”一词就要比“动作”一词意义更为宽泛。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施动”的事物（如果这种描述从一种意义上加以阐释的话）会与“被其移动的事物”相接触，但是如果这种描述从另一种不同的意义上来加以阐释的话，它们就不会相互接触。但是“接触”的定义必须包括和区分（1）“一般意义上的接触”，即具有位置且一方能施动而另一方能受动的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2）“相互接触”，即一方能施动而另一方能受动且“动作与承受”是它们之间可以断定的关系。

As a rule, no doubt, if A touches B, B touches A. For indeed practically all the 'movers' within our ordinary experience impart

motion by being moved: in their case, what touches inevitably must, and also evidently does, touch something which reciprocally touches it. Yet, if A moves B, it is possible—as we sometimes express it—for A 'merely to touch' B, and that which touches need not touch a something which touches it. Nevertheless it is commonly supposed that 'touching' must be reciprocal. The reason of this belief is that 'movers' which belong to the same kind as the 'moved' impart motion by being moved. Hence if anything imparts motion without itself being moved, it may touch the 'moved' and yet itself be touched by nothing—for we say sometimes that the man who grieves us 'touches' us, but not that we 'touch' him.

通常情况下，如果甲物接触乙物，那么乙物也会接触甲物。因为事实上，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几乎所有的“移动者”都是通过被移动来施动的。在这些情形中，接触的东西必定会（也显然是）接触同样也与之接触的东西。然而，如果甲物移动了乙物，可能的情况是——正如我们有时表述的那样——甲物“仅仅是接触了”乙物，且接触的东西也未必会接触与之接触的某物。然而，人们一般认为“接触”必定是相互的。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在于和“被移动者”属于同一类的“移动者”是通过被移动来施动的。因此，如果某物施加了运动但自身却没有被移动，那么它可能接触了“被运动者”，但其自身却没有被任何东西所接触——因为我们有时会说那个让我们伤心的人“触动”了我们，但我们却没有“触动”他。

The account just given may serve to distinguish and define the 'contact' which occurs in the things of Nature.

刚刚给出的这种解释可以用来区分和定义发生在自然万物之中的“接触”。

Chapter 7

第七章

Next in order we must discuss 'action' and 'passion'.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on the subject are conflicting. For (i) most thinkers are unanimous in maintaining (a) that 'like' is always unaffected by 'like', because (as they argue) neither of two 'likes' is more apt than the other either to act or to suffer action, since all the properties which belong to the one belong identically and in the same degree to the other; and (b) that 'unlikes', i.e. 'differents', are by nature such as to act and suffer action reciprocally. For even when the smaller fire is destroyed by the greater, it suffers this effect (they say) owing to its 'contrariety' since the great is contrary to the small. But (ii) Democritus dissented from all the other thinkers and maintained a theory peculiar to himself. He asserts that agent and patient are identical, i.e. 'like'. It is not possible (he says) that 'others', i.e. 'differents', should suffer action from one another: on the contrary, even if two things, being 'others', do act in some way on one another, this happens to them not qua 'others' but qua possessing an identical property.

接下来按照顺序我们必须讨论“动作”与“承受”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传统理论的观点是相互冲突的。因为，一方面，大多数思想家都一致认为（1）“相似物”总是不受“相似物”的影响，因为（正如他们所言）两个“相似物”中没有哪一方会比另一方更易于动作或承受动作，因为属于一方的所有性质也同样地、同等程度地属于另一方；（2）而“不相似物”（即“不同的事物”）却从本性上而言就相互动作与承受动作。因为当小火毁于大火时，小火承受这种影响（他们说）是由于它的“相反物”，因为大与小相反。但是，另一方面，德谟克利

特却持有不同于其他所有思想家的观点，他主张一种独属于他自己的理论。他断言行动者与承受者是同一的，即“相似的”。（他说）有一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即“相异的事物”，也就是“不同的事物”，会彼此承受动作；相反，即使彼此为“相异的事物”的两种事物的确以某种方式相互动作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也并非是因为它们是“相异的事物”，而是因为它们具有某种同一的属性。

Such, then, are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and it looks as if the statements of their advocates were in manifest conflict. But the reason of this conflict is that each group is in fact stating a part, whereas they ought to have taken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subject as a whole. For (i) if A and B are 'like'—absolutely and in all respects without difference from one another—it is reasonable to infer that neither is in any way affected by the other. Why, indeed, should either of them tend to act any more than the other? Moreover, if 'like' can be affected by 'like', a thing can also be affected by itself: and yet if that were so—if 'like' tended in fact to act qua 'like'—there would be nothing indestructible or immovable, for everything would move itself. And (ii) the same consequence follows if A and B are absolutely 'other', i.e. in no respect identical. Whiteness could not be affected in any way by line nor line by whiteness—except perhaps 'coincidentally', viz. if the line happened to be white or black: for unless two things either are, or are composed of, 'contraries', neither drives the other out of its natural condition. But (iii) since only those things which either involve a 'contrariety' or are 'contraries'—and not any things selected at random—are such as to suffer action and to act, agent and patient must be 'like' (i.e. identical) in kind and yet 'unlike' (i.e. contrary) in species. (For it is a law of nature that body is affected by body, flavour by flavour, colour by colour, and so in general what belongs to any kind by a member of the same kind—the reason being that

'contraries' are in every case within a single identical kind, and it is 'contraries' which reciprocally act and suffer action.) Hence agent and patient must be in one sense identical, but in another sense other than (i.e. 'unlike') one another. And since (a) patient and agent are generically identical (i.e. 'like') but specifically 'unlike', while (b) it is 'contraries' that exhibit this character: it is clear that 'contraries' and their 'intermediates' are such as to suffer action and to act reciprocally—for indeed it is these that constitute the entire sphere of passing-away and coming-to-be.

那么，这些就是传统的理论观点，看上去这些提倡者的说法明显是针锋相对的。但是这种对立的原因是各方事实上都只阐明了一部分，而他们本应该采用一种全面的观点从整体上来看这个问题的。因为，（1）如果甲和乙是完全“相似的”——在所有方面彼此毫无差异——那么合理的推断就是任何一方都不会以任何方式受到另一方的影响。而事实上，为什么任何一方要比另一方更倾向于动作呢？此外，如果“相似物”可以被“相似物”影响，那么某物也可以被其自身影响。然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相似物”事实上倾向于作为“相似物”来动作的话——那么就不存在什么不能毁坏或者不可移动的事物了，因为任何事物都可能会移动自身。（2）如果甲和乙完全是“相异的”，即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相同，那么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白不会以任何方式受线的影响，同样线也不会受白的影响——除非或许出于“巧合”，也就是说，如果线碰巧是白的或黑的，因为除非两物是“相反物”或者是由“相反物”构成，否则任何一方都不会从其自然条件中生出另一方。但是，（3）既然只有那些或者包含某种“相反性”或者互为“相反物”的事物——并非任意挑选的任何事物——才能承受动作与施加动作，那么动作者和承受者就必定在种类上是“相似的”（即同一的），而在属类上则是“不同的”（即相反的）。（因为自然法则之一就是物体受物体影响，味道受味道影响，颜色受颜色影响，同样，总体而言，属于任何一类的事物都受同类物的影响——原因就在于，“相反物”总是寓于同种之中，而且正是“相反物”才相互动作与承

受动作。）因此行动者与承受者必定在一种意义上是同一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彼此相异的（即“不相似”）。因为（1）承受者与行动者在属类上同一（即“相似”）、在种类上“不相似”，（2）而表现出这种特性的正是“相反物”，那么显然“相反物”及其“中间物”就能够相互承受动作与施加动作——因为事实上正是这些构成了整体的消亡与生成。

We can now understand why fire heats and the cold thing cools, and in general why the active thing assimilates to itself the patient. For agent and patient are contrary to one another, and coming-to-be is a process into the contrary: hence the patient must change into the agent, since it is only thus that coming-to-be will be a process into the contrary. And, again, it is intelligible that the advocates of both views, although their theories are not the same, are yet in contact with the nature of the facts. For sometimes we speak of the substratum as suffering action (e.g. of 'the man' as being healed, being warmed and chilled, and similarly in all the other cases), but at other times we say 'what is cold is being warmed', 'what is sick is being healed': and in both these ways of speaking we express the truth, since in one sense it is the 'matter', while in another sense it is the 'contrary', which suffers action. (We make the same distinction in speaking of the agent: for sometimes we say that 'the man', but at other times that 'what is hot', produces heat.) Now the one group of thinkers supposed that agent and patient must possess something identical, because they fastened their attention on the substratum: while the other group maintained the opposite because their attention was concentrated on the 'contraries'. We must conceive the same account to hold of action and passion as that which is true of 'being moved' and 'imparting motion'. For the 'mover', like the 'agent', has two meanings. Both (a) that which contains the originative source of the motion is thought

to 'impart motion' (for the originative source is first amongst the causes), and also (b) that which is last, i.e. immediately next to the moved thing and to the coming-to-be. A similar distinction holds also of the agent: for we speak not only (a) of the doctor, but also (b) of the wine, as healing. Now, in motion, there is nothing to prevent the first mover being unmoved (indeed, as regards some 'first movers' this is actually necessary) although the last mover always imparts motion by being itself moved: and, in action, there is nothing to prevent the first agent being unaffected, while the last agent only acts by suffering action itself. For agent and patient have not the same matter, agent acts without being affected: thus the art of healing produces health without itself being acted upon in any way by that which is being healed. But the food, in acting, is itself in some way acted upon: for, in acting, it is simultaneously heated or cooled or otherwise affected. Now the art of healing corresponds to an 'originative source', while the food corresponds to 'the last' (i.e. 'continuous') mover.

现在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火能加热、冷的东西能降温，以及总体而言为何能动作的东西会将承受者同化于自身。因为行动者与承受者是彼此相反的，生成是变成相反面的一种过程，因此，承受者必定会变成行动者，因为只有这样，生成才会是变成相反面的一种过程。而且，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各自的理论不同，但两种观点的提倡者却都触及到了事实的本质。因为有时我们说基质承受动作（如我们说“人”被治愈、被温暖、被冻冰以及所有类似的其他情形），但是有时我们又说“冷的被变暖”，“病的被治愈”，我们用这两种说法来表达真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承受动作的是“质料”，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承受动作的则是“相反物”。（在谈到动作者时我们也作同样的区分，因为有时我们说“人”产生热，而有时我们又说是“热的东西”产生热。）现在，一些思想家认为行动者与承受者必定具有某种同一的东西，因为他们把注意力固定在基质上，而另一些思想家则持相反的

观点，因为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相反物”上。我们必须假定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动作与承受，正如其适用于“承受移动”与“施加移动”的解释一样。因为“移动者”和“动作者”一样，也有两层含义：（1）包含运动本原的事物被认为能够“施动”（因为本原在诸多原因中占据第一位）；（2）最后的事物，即仅次于被移动的事物和生成的事物。类似的区分也适于动作者，因为我们不仅说医生是具有治愈功用的，酒也是如此。那么，在移动中，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第一移动者不被移动（确实，就有些“第一移动者”而言，这实际上是必然的），尽管最后的移动者总是通过自身被移动来施加移动，而在动作中，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第一行动者不受影响，而最后的行动者只有通过自身承受动作才能施加动作。因为行动者与承受者没有相同的质料，所以行动者可以施加动作而不受影响，这样治愈之术产生健康而其自身却不会以任何方式受到被治愈物的影响。但是食物在动作时自身会以某种方式承受动作，因为在动作中，食物同时被加热、被冷却或以其他方式受到影响。那么，治愈之术就相当于某种“本原”，而食物则相当于“最后的”（即“持续的”）移动者。

Those active powers, then, whose forms are not embodied in matter, are unaffected: but those whose forms are in matter are such as to be affected in acting. For we maintain that one and the same 'matter' is equally, so to say, the basis of either of the two opposed things—being as it were a 'kind'; and that which can be hot must be made hot, provided the heating agent is there, i.e. comes near. Hence (as we have said) some of the active powers are unaffected while others are such as to be affected; and what holds of motion is true also of the active powers. For as in motion 'the first mover' is unmoved, so among the active powers 'the first agent' is unaffected.

那些形式不在质料中加以体现的能动作的力量不承受影响，而那

些形式寓于质料中的事物则在动作中承受影响。因为我们坚持认为，同一种“质料”可以说是同等地构成了两个对立事物的基础——仿佛是“一类”；我们还认为，可以发热的东西必定可以被加热，只要热的起因存在，例如，它就在我们眼前。因此，（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有些能动作的力量不承受影响，而另一些则承受影响；适于移动的情形同样也适于能动作的力量。因为正如在移动中“第一移动者”不被移动那样，在能动作的力量之中“第一动作者”也同样不受影响。

The active power is a 'cause' in the sense of that from which the process originates: but the end, for the sake of which it takes place, is not 'active'. (That is why health is not 'active', except metaphorically.) For when the agent is there, the patient becomes something: but when 'states' are there, the patient no longer becomes but already is—and 'forms' (i.e. 'ends') are a kind of 'state'. As to the 'matter', it (qua matter) is passive. Now fire contains 'the hot' embodied in matter: but a 'hot' separate from matter (if such a thing existed) could not suffer any action. Perhaps, indeed,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 hot' should exist in separation from matter: but if there are any entities thus separable, what we are saying would be true of them.

就这一过程由以产生之本源的意义上而言，能动作的力量是“原因”，但是，其产生的目的却不是“能动作的”。（这就是为什么健康不是“能动作的”，除非是从比喻意义上而言。）因为当行动者存在时，承受者生成为某物，但是当“状况”存在时，承受者就不会再生成而是已经存在了——“形式”（即“目的”）是某种“状况”。而“质料”则是承受者。火包含有体现在质料中的“热”，但是与质料分离的某种“热”（假如这样一种东西存在的话）却无法承受任何动作。也许，事实上，“热”不可能分离于质料存在，但是如果存在可以分离的实体，那我们所说的也将对其适用。

We have thus explained what action and passion are, what things exhibit them, why they do so, and in what manner. We must go on to discuss how it is possible for action and passion to take place.

这样，我们解释了动作与承受是什么，哪些事物具有这些特点，它们为什么以及以何种方式具有这些特点。我们应当继续探讨动作与承受的产生是何以成为可能的。

Chapter 8

第八章

Some philosophers think that the 'last' agent—the 'agent' in the strictest sense—enters in through certain pores, and so the patient suffers action. It is in this way, they assert, that we see and hear and exercise all our other senses. Moreover, according to them, things are seen through air and water and other transparent bodies, because such bodies possess pores, invisible indeed owing to their minuteness, but close-set and arranged in rows: and the more transparent the body, the more frequent and serial they suppose its pores to be. Such was the theory which some philosophers (including Empedocles) advanced in regard to the structure of certain bodies. They do not restrict it to the bodies which act and suffer action: but 'combination' too, they say, takes place 'only between bodies whose pores are in reciprocal symmetry'. The most systematic and consistent theory, however, and one that applied to all bodies, was advanced by Leucippus and Democritus: and, in maintaining it, they took as their starting-point what naturally

comes first.

一些哲学家认为“最后的”行动者——最严格意义上的“行动者”——通过某些孔道进入，然后承受者就承受动作了。他们断言，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看、听以及动用我们其他所有的感觉。此外，按照他们的说法，事物是通过气、水以及其他透明的物体被看见的，因为这些物体具有孔道，这些孔道事实上细小得用肉眼根本看不见，但却密集排列着。他们认为，物体越透明，其孔道越是紧密有序。这就是一些哲学家（包括恩培多克勒）提出的有关某些物体结构的理论。他们没有将这一理论局限于施加动作与承受动作的那些物体，他们认为，“混合”也同样只发生在“那些孔道相互对称的物体之间”。然而，最成体系、最连贯的理论，同时也是适用于所有物体的理论，是由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提出来的，在坚持这一理论时，他们是以自然先到之物作为其出发点的。

For some of the older philosophers thought that 'what is' must of necessity be 'one' and immovable. The void, they argue, 'is not': but unless there is a void with a separate being of its own, 'what is' cannot be moved—nor again can it be 'many', since there is nothing to keep things apart. And in this respect, they insist, the view that the universe is not 'continuous' but 'discretes-in-contact' is no better than the view that there are 'many' (and not 'one') and a void. For (suppose that the universe is discretes-in-contact. Then), if it is divisible through and through, there is no 'one', and therefore no 'many' either, but the Whole is void; while to maintain that it is divisible at some points, but not at others, looks like an arbitrary fiction. For up to what limit is it divisible? And for what reason is part of the Whole indivisible, i.e. a plenum, and part divided? Further, they maintain, it is equally necessary to deny the existence of motion.

因为有些老一辈的哲学家曾认为“存在”必然会是“一”且不可移动。他们认为，虚空“不存在”，但是除非有独立存在的虚空，否则“存在”就无法被移动。再者，它也不可能是“多”，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事物分离。在这一点上，他们坚持认为，那种认为宇宙不是“连续的”而是由“分离物接触而成”的观点与认为“多”（不是“一”）和虚空存在的观点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假定宇宙是由分离物接触而成的，那么）如果它是彻底可分的，那么就不存在“一”，因此也就不存在“多”，而是整体为虚空；如果说它在某些点而非其他点是可分的，这种观点就如同是一种任意的虚构了。因为，在什么样的界限它是可分的呢？为什么整体的一部分不可分，即某种充实，而另一部分又是可分的呢？此外，他们认为，否认移动的存在也是同样必要的。

Reasoning in this way, therefore, they were led to transcend sense-perception, and to disregard it on the ground that 'one ought to follow the argument': and so they assert that the universe is 'one' and immovable. Some of them add that it is 'infinite', since the limit (if it had one) would be a limit against the void.

因此，依照这种方式来进行论证，他们就超越了感官知觉，并且基于“一个人应当服从理性”的认识而忽视了感官知觉，因此他们断言宇宙是“一”且不可移动。他们中有些人补充说，宇宙是“无限的”，因为其界限（如果它确有界限的话）是针对虚空的某种限制。

There were, then, certain thinkers who, for the reasons we have stated, enunciated views of this kind as their theory of 'The Truth'… Moreover, although these opinions appear to follow logically in a dialectical discussion, yet to believe them seems next door to madness when one considers the facts. For indeed no lunatic seems

to be so far out of his senses as to suppose that fire and ice are 'one': it is only between what is right and what seems right from habit, that some people are mad enough to see no difference.

那么，还有某些思想家由于我们已经阐述过的原因而把此类观点宣称为其有关“真理”的理论……此外，尽管这些观点似乎是在一种辩证的讨论中被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的，但是考虑到事实的话，相信这些观点就近乎于愚蠢了。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疯子会愚蠢地认为火与冰是“一”，只有在好的事物与从习惯来看似乎是好的事物之间，才会有些人愚蠢到看不出任何差异的地步。

Leucippus, however, thought he had a theory which harmonized with sense-perception and would not abolish either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or motion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things. He made these concessions to the facts of perception: on the other hand, he conceded to the Monists that there could be no motion without a void. The result is a theory which he states as follows: 'The void is a “not being”, and no part of “what is” is a “not-being”; for what “is”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is an absolute plenum. This plenum, however, is not “one”: on the contrary, it is a “many” infinite in number and invisible owing to the minuteness of their bulk. The “many” move in the void (for there is a void): and by coming together they produce “coming to-be”, while by separating they produce “passing-away”. Moreover, they act and suffer action wherever they chance to be in contact (for there they are not “one”), and they generate by being put together and becoming intertwined. From the genuinely-on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never could have come-to-be a multiplicity, nor from the genuinely-many a “one”: that is impossible. But' (just as Empedocles and some of the other philosophers say that things

suffer action through their pores, so) 'all “alteration” and all “passion” take place in the way that has been explained: breaking-up (i.e. passing-away) is effected by means of the void, and so too is growth—solids creeping in to fill the void places.' Empedocles too is practically bound to adopt the same theory as Leucippus. For he must say that there are certain solids which, however, are indivisible—unless there are continuous pores all through the body. But this last alternative is impossible: for then there will be nothing solid in the body (nothing beside the pores) but all of it will be void. It is necessary, therefore, for his 'contiguous discretes' to be indivisible, while the intervals between them—which he calls 'pores'—must be void. But this is precisely Leucippus' theory of action and passion.

然而，留基伯认为他有一种理论既与感官知觉相协调，也不会消除事物的生成与消亡或移动与多样性。他对感知存在的事实作出了这些让步；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了一元论者的观点（即没有虚空就没有移动）是正确的。结果就是他这样阐述的一种理论：“虚空是一种‘非存在’，‘存在’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是‘非存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存在’是一种绝对的充实。然而，这种充实并非‘一’，相反，它是一种‘多’，其数量无限且因体积太小而不可见。这种‘多’在虚空中运动（因为有虚空），它们通过聚合引起‘生成’，而通过分离引起‘消亡’。此外，在它们偶然接触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它们不是‘一’），它们就施加动作和承受动作，当它们被聚合且缠结在一起时，它们也生成。另一方面，从真正的‘一’，绝不可能生成某种多样性，而从真正的多也绝不会生成‘一’。”（就如恩培多克勒及其他一些哲学家所言，事物通过其孔道承受动作），“一切‘更替’与一切‘承受’都是以已阐明的这种方式发生，分解（即消亡）借助虚空来实现，生长也是如此，即固体潜入来填补虚空的地点。”恩培多克勒实际上也不得已采纳了与留基伯同样的观点。因为他很可能说，有某些固体是不可分的——除非其通体有连续的孔道。但是这后一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的话

物体中（除了孔道之外）就没有什么固体的东西了，而其整体则会是虚空。因此，他所说的那些“接触的分离物”必然是不可分的，而这些分离物之间的间歇物——他称之为“孔道”——却必定是虚空。而这恰恰是留基伯关于动作与承受的理论。

Such, approximately, are the current explanations of the manner in which some things 'act' while others 'suffer action'. And as regards the Atomists, it is not only clear what their explanation is: it is also obvious that it follows with tolerable consistency from the assumptions they employ. But there is less obvious consistency in the explanation offered by the other thinkers.

大致说来，这些说法可以阐述有些事物“动作”而另一些“承受动作”的方式。就这些原子论者而言，他们不仅可以清楚解释这一点，而且显然他们的解释和他们所做出的假设是具有可容忍的一致性的。但是其他思想家给出的解释就没有那么明显的一致性了。

It is not clear, for instance, how, on the theory of Empedocles, there is to be 'passing-away' as well as 'alteration'. For the primary bodies of the Atomists—the primary constituents of which bodies are composed, and the ultimate elements into which they are dissolved—are indivisible, differing from one another only in figure. In the philosophy of Empedocle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evident that all the other bodies down to the 'elements' have their coming-to-be and their passing-away: but it is not clear how the 'elements' themselves, severally in their aggregated masses, come-to-be and pass-away. Nor is it possible for Empedocles to explain how they do so, since he does not assert that Fire too (and similarly every one of his other 'elements') possesses 'elementary constituents' of itself.

例如，恩培多克勒在其理论中并未阐述“更替”与“消亡”是如何发生的。因为原子论者的第一物体——即物体由以构成的主要成分以及它们最终消解归依的根本元素——是不可分的，它们只是在形状上彼此迥异。而另一方面，按照恩培多克勒的观点，直到“元素”为止的所有其他物体都显然有生成与消亡，但是这些“元素”本身各自以其聚合的团块如何生成与消亡这一点并不清楚。同样恩培多克勒也不可能解释清楚它们是如何这样做的，因为他没有断言火（以及他所说的其他“元素”中的每一种）具有其自身的“基本成分”。

Such an assertion would commit him to doctrines like those which Plato has set forth in the Timaeus. For although both Plato and Leucippus postulate elementary constituents that are indivisible and distinctively characterized by figures, there is this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heories: the 'indivisibles' of Leucippus (i) are solids, while those of Plato are planes, and (ii) are characterized by an infinite variety of figures, while the characterizing figures employed by Plato are limited in number. Thus the 'comings-to-be' and the 'dissociations' result from the 'indivisibles' (a) according to Leucippus through the void and through contact (for it is at the point of contact that each of the composite bodies is divisible), but (b) according to Plato in virtue of contact alone, since he denies there is a void.

这样一种断言会使他接受诸如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提出的那类学说。尽管柏拉图和留基伯都假定了不可分且由形状决定特色的元素，但他们所主张的两种观点还是有巨大差异的，留基伯所说的“不可分物”（1）是固体的，而柏拉图所说的则是平面的，留基伯认为（2）不可分物的特点是由无限多的形状决定的，而柏拉图则认为此类决定其特色的形状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因此，按照（1）留基伯的

观点，“生成”与“分离”是通过虚空与接触由“不可分物”产生的（因为每种复合物正是在接触点才是可分的），而按照（2）柏拉图的观点，“生成”与“分离”的产生则只是由于接触，因为他否认存在虚空。

Now we have discussed 'indivisible planes' in the preceding treatise. But with regard to the assumption of 'indivisible solids', although we must not now enter upon a detailed study of its consequences, the following criticisms fall within the compass of a short digression:

现在，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探讨过了“不可分的平面”。而关于“不可分的固体”的假设，尽管我们不可能现在就对其后果展开详细的研究，但下面这些评述是一个简短的题外话：

I. The Atomists are committed to the view that every 'indivisible' is incapable alike of receiving a sensible property (for nothing can 'suffer action' except through the void) and of producing one—no 'indivisible' can be, e.g. either hard or cold. Yet it is surely a paradox that an exception is made of 'the hot'—'the hot' being assigned as peculiar to the spherical figure: for, that being so, its 'contrary' also ('the cold') is bound to belong to another of the figures. If, however, these properties (heat and cold) do belong to the 'indivisibles', it is a further paradox that they should not possess heaviness and lightness, and hardness and softness. And yet Democritus says 'the more any indivisible exceeds, the heavier it is'—to which we must clearly add 'and the hotter it is'. But if that is their character, it is impossible they should not be affected by one another: the 'slightly-hot indivisible', e.g. will inevitably suffer action from one which far exceeds it in heat. Again, if any

'indivisible' is 'hard', there must also be one which is 'soft': but 'the soft' derives its very name from the fact that it suffers a certain action—for 'soft' is that which yields to pressure.

1．原子论者坚持认为，每一种“不可分物”都不能承受某种可感知的属性（因为只有通过虚空事物才可以“承受动作”），也不能产生这样的一种属性——任何“不可分物”都既非硬的也非冷的。然而把“热”作为一种例外来看待——将要发生的“热”专属于圆的形状，这无疑是一种悖论，因为，如果真是这样，其“反面”（“冷”）也必定会属于另一种形状。然而，如果这些性质（热与冷）的确属于“不可分物”，那么认为它们不应具有重与轻、硬与软这些性质的观点将是另一种悖论。但德谟克利特却说“任一不可分物超过的越多，它就越重”，对此我们必须明确补充一点，即“它也就越热”。但是如果这是不可分物的特性，那么它们就不可能不相互影响，例如，“略微发热的不可分物”必将承受来自在热量方面远胜一筹的另一不可分物的作用。再者，如果某个“不可分物”是“硬的”，那必定还存在某个“软的”，但是“软”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其承受某种动作这一事实——因为“软”就是那种屈服于压力的东西。

II．But further, not only is it paradoxical (i) that no property except figure should belong to the 'indivisibles': it is also paradoxical (ii) that, if other properties do belong to them, one only of these additional properties should attach to each—e.g. that this 'indivisible' should be cold and that 'indivisible' hot. For, on that supposition, their substance would not even be uniform. And it is equally impossible (iii) that more than one of these additional properties should belong to the single 'indivisible'. For, being indivisible, it will possess these properties in the same point—so that, if it 'suffers action' by being chilled, it will also, qua chilled, 'act' or 'suffer action' in some other way. And the same line of

argument applies to all the other properties too: for the difficulty we have just raised confronts, as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all who advocate 'indivisibles' (whether solids or planes), since their 'indivisibles' cannot become either 'rarer' or 'denser' inasmuch as there is no void in them.

2．此外，有两种观点都是自相矛盾的：（1）除了形状之外没有任何属性属于“不可分物”；（2）如果其他属性的确属于不可分物的话，那么每种不可分物只会具有这些额外属性中的一种。例如，这种“不可分物”是冷的，而那种“不可分物”则是热的。因为依照这种假定，不可分物的实质不会是同一的。同样不可能的还有一种观点，（3）即这些额外性质中不止一种属于某一个“不可分物”。因为由于不可分的特性，不可分物将在同一点上具有这些性质。因此，如果它是以变寒冷的方式来“承受动作”，那么它也将作为寒冷以某种其他的方式来“动作”或“承受动作”。同样的论证思路也适用于其他所有性质，因为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我们刚刚提出的难题会摆在所有主张“不可分物”（无论是固体还是平面）的人面前，既然由于不可分物中没有虚空，“不可分物”就无法变得“更稀少”或者“更稠密”。

III．It is a further paradox that there should be small 'indivisibles', but not large ones. For it is natural enough, from the ordinary point of view, that the larger bodies should be more liable to fracture than the small ones, since they (viz. the large bodies) are easily broken up because they collide with many other bodies. But why should indivisibility as such be the property of small, rather than of large, bodies?

3．此外，还有一种悖论，即存在小的“不可分物”，但却不存在大的不可分物。较大的物体应该会比小的物体更易破碎，因为它们

（即大的物体）更容易和其他许多物体互撞，所以更容易被打碎，这种观点从常理来看再合理不过了。但是为何这种不可分性就应该是小的物体的属性而不是大的物体的属性呢？

IV . Again, is the substance of all those solids uniform, or do they fall into sets which differ from one another—as if, e.g. some of them, in their aggregated bulk, were 'fiery', others 'earthy'? For (i) if all of them are uniform in substance, what is it that separated one from another? Or why, when they come into contact, do they not coalesce into one, as drops of water run together when drop touches drop (for the two cases are precisely parallel)? On the other hand (ii) if they fall into differing sets, how are these characterized? It is clear, too, that these, rather than the 'figures', ought to be postulated as 'original reals', i.e. causes from which the phenomena result. Moreover, if they differed in substance, they would both act and suffer action on coming into reciprocal contact.

4．再者，所有这些固体的实质都是同一的，还是互不相同的？例如，就它们的总体积而言，是否有些是“火性的”，而另一些是“土性的”呢？因为（1）如果它们的实质都是同一的，那么把它们彼此分开的东西是什么呢？或者，当它们接触时，为什么没有合二为一，正如水滴互相接触时会融合一样（因为这两种情形是完全相同的）？（2）如果它们区分成不同的集合，那么这些集合的特色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显然，正是这些，应该被假定为“本真”，而不是“形状”，即现象由以产生的原因。此外，如果它们在实质上不同的话，它们就会在互相接触时既施加动作又承受动作。

V . Again, what is it which sets them moving? For if their 'mover' is other than themselves, they are such as to 'suffer action'.

If, on the other hand, each of them sets itself in motion, either (a) it will be divisible ('imparting motion' qua this, 'being moved' qua that), or (b) contrary properties will attach to it in the same respect—i.e. 'matter' will be identical in—potentiality as well as numerically-identical.

5．再者，促使它们运动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如果“移动者”不是其自身，那么它们就会“承受动作”。但是，如果它们每一个都能促使自身移动，那么它（1）是可分的（这部分“施加移动”，那部分“承受移动”），（2）会具有在同一方面相反的性质。例如，其“质料”不仅可以在数量方面同一，而且可以在潜能方面同一。

As to the thinkers who explain modification of property through the movement facilitated by the pores, if this is supposed to occur not withstanding the fact that the pores are filled, their postulate of pores is superfluous. For if the whole body suffers action under these conditions, it would suffer action in the same way even if it had no pores but were just its own continuous self. Moreover, how can their account of 'vision through a medium' be correct?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visual ray) to penetrate the transparent bodies at their 'contacts'; and impossible for it to pass through their pores if every pore be full. For how will that differ from having no pores at all? The body will be uniformly 'full' throughout. But, further, even if these passages, though they must contain bodies, are 'void', the same consequence will follow once more. And if they are 'too minute to admit any body', it is absurd to suppose there is a 'minute' void and yet to deny the existence of a 'big' one (no matter how small the 'big' may be), or to imagine 'the void' means anything else than a body's place—whence it clearly follows that to every body there will correspond a void of equal

cubic capacity.

至于那些通过孔道促成的运动来解释属性改变的人，如果事情确实发生的话（纵使孔道是充塞的），那么他们有关孔道的假设就是多余的。因为如果整个物体在这些条件下承受动作的话，即使没有孔道，它也会仅靠自身的连续，以同样的方式来承受动作。此外，他们所描述的“通过某种媒介看见”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在“接触点”上（视线）是不可能穿透透明物体的；如果每个孔道都充塞的话，那么视线也不可能通过透明物体的孔道。这和根本没有孔道有什么区别呢？物体将毫无例外地到处都是“充塞”的。但是，即使这些通道（尽管它们必定会包含物体）是“虚空”，结果还是会一样的。如果它们“细小得无法接纳任何物体”，那么假定存在某种“小的”虚空而否认存在某种“大的”虚空（无论这个“大的”虚空的大小如何），或者假想“虚空”意味着某个物体地点之外的任何别的东西，都将是荒谬的——由此，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对于每个物体而言，都存在着某种对应的、体积相等的虚空。

As a general criticism we must urge that to postulate pores is superfluous. For if the agent produces no effect by touching the patient, neither will it produce any by passing through its pores. On the other hand, if it acts by contact, then—even without pores—some things will 'suffer action' and others will 'act', provided they are by nature adapted for reciprocal action and passion. Our arguments have shown that it is either false or futile to advocate pores in the sense in which some thinkers conceive them. But since bodies are divisible through and through, the postulate of pores is ridiculous: for, qua divisible, a body can fall into separate parts.

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批评，我们必须强调，对孔道的假定是多余

的。因为如果行动者接触了承受者而不产生任何作用，那么贯穿其孔道也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另一方面，如果动作者通过接触来动作，那么——即使没有孔道——一些事物也会“承受动作”，而另一些则会“动作”，倘使它们在本性上就适合相互动作与承受的话。我们的论述已经表明，从某些思想家假定孔道的那种意义上而言，假定孔道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徒劳的。但是既然物体是彻底可分的，那么对于孔道的假定就是荒谬的，因为作为可分物，某个物体可以被分成不同的部分。

Chapter 9

第九章

Let us explain the way in which things in fact possess the power of generating, and of acting and suffering action: and let us start from the principle we have often enunciated. For, assum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 that which is potentially and (b) that which is actually such-and-such, it is the nature of the first, precisely in so far as it is what it is, to suffer action through and through, not merely to be susceptible in some parts while insusceptible in others. But its susceptibility varies in degree, according as it is more or less; such-and-such, and one would be more justified in speaking of 'pores' in this connexion: for instance, in the metals there are veins of 'the susceptible' stretching continuously through the substance.

现在，我们来解释事物事实上具有生成力、动作力与承受力的方式，我们将从我们经常谈论的原则开始。假定（1）潜在地是这样的事物与（2）事实上是这样的事物之间存在区别，那么前者的本性，就其是其所是而言，就是完全承受动作，而不仅仅是一部分承受、另

一部分不承受。但是其承受性依其性质大小而程度不同；人们从这一点来谈论“孔道”会更为合理，例如，在金属中存在“能承受物”的纹理，它们贯穿实体，连续伸展。

So long, indeed, as any body is naturally coherent and one, it is insusceptible. So, too, bodies are insusceptible so long as they are not in contact either with one another or with other bodies which are by nature such as to act and suffer action. (To illustrate my meaning: Fire heats not only when in contact, but also from a distance. For the fire heats the air, and the air—being by nature such as both to act and suffer action—heats the body.) But the supposition that a body is 'susceptible in some parts, but insusceptible in others' (is only possible for those who hold an erroneous view concerning the divisibility of magnitudes. For us) the following account results from the distinctions we established at the beginning. For (i) if magnitudes are not divisible through and through—if, on the contrary, there are indivisible solids or planes—then indeed no body would be susceptible through and through: but neither would any be continuous. Since, however, (ii) this is false, i.e. since every body is divisibl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having been divided into parts which remain in contact' and 'being divisible'. For if a body 'can be separated at the contacts' (as some thinkers express it), then, even though it has not yet been divided, it will be in a state of dividedness—since, as it can be divided, nothing inconceivable results. And (iii) the supposition is open to this general objection—it is a paradox that 'passion' should occur in this manner only, viz. by the bodies being split. For this theory abolishes 'alteration': but we see the same body liquid at one time and solid at another, without losing its continuity. It has suffered this change not by 'division' and 'composition', nor yet by 'turning' and 'intercontact' as Democritus asserts; for it has passed from the

liquid to the solid state without any change of 'grouping' or 'position' in the constituents of its substance. Nor are there contained within it those 'hard' (i.e. congealed) particles 'indivisible in their bulk': on the contrary, it is liquid—and again, solid and congealed—uniformly all through. This theory, it must be added, makes growth and diminution impossible also. For if there is to be opposition (instead of the growing thing having changed as a whole, either by the admixture of something or by its own transformation), increase of size will not have resulted in any and every part.

事实上，只要物体自然地连贯一致，就不承受影响。因此，只要物体不相互接触或不与其他在本性上施加动作与承受动作的物体相接触，它们也不承受影响。（举例来说明一下我的意思，火不仅在接触的时候发热，而且在有一定距离的时候也如此。因为火加热了气，而气——在本性上既施加动作又承受动作——又加热了物体。）但是，假定某个物体“有些部分承受，而另一些部分不承受”的观点仅仅是那些对大小的可分性持错误看法的人才可能持有的。对于我们来说，下面的说明源自于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明确的区别。因为（1）如果大小不是完全可分的——相反，如果存在不可分的固体或平面——那么事实上任何物体都不会完全承受，而且任何物体也都不连续。然而，（2）既然这种看法（即所有物体都是可分的）是错误的，那么“已被分割但各部分之间仍然接触”与“可被分割”之间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因为如果某个物体“在接触点可以被分离”（正如有些思想家所说的那样），那么，即使它还未被分割，它也将处于某种已被分割的状态中——既然它可被分割，结果就不会出人意料。这一假设一般会遭受这样的批评——说“承受”仅以这种方式（即以物体被分割的方式）产生是一种悖论，因为这种理论摒弃了“更替”，但是我们看到，同一种物体有时是液体，有时是固体，却都未失去其连续性。该物体经历这种变化并非通过“分割”与“结合”，也并非通过德谟克利特所说的“旋转”与“互动”，因为其从液态过渡到固态就其实体的构成成分而言没有

经历任何“组合”或“位置”的变化。其内部也没有包含“在其体积中不可分的”“坚硬”（即凝结的）分子，相反，它一律是液体——有时又是固体和凝结的。必须补充的一点是，这种理论使生长与减少都变得不可能。因为如果存在对立（不是通过某物的混合或其自身的转变而导致的增长物的整体变化），任一部分都不会有大小的增加。

So much, then, to establish that things generate and are generated, act and suffer action, reciprocally; and to distinguish the way in which these processes can occur from the (impossible) way in which some thinkers say they occur.

那么，关于事物之间相互生成与被生成、动作与承受动作的过程以及区分这些过程可以发生的方式与有些思想家认为它们发生的（那种不可能的）方式的问题，我们就谈这么多。

Chapter 10

第十章

But we have still to explain 'combination', for that was the third of the subjects we originally proposed to discuss. Our explanation will proceed on the same method as before. We must inquire: What is 'combination', and what is that which can 'combine'? Of what things,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is 'combination' a property? And, further, does 'combination' exist in fact, or is it false to assert its existence?

不过我们还得解释“混合”，因为这是我们最初提出要探讨的第三

个论题。我们的解释将采用和前面一样的方法来进行。我们必须探究：什么是“混合”？可以“混合”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事物、在什么条件下具有“混合”的属性呢？此外，“混合”事实上存在吗？断言其存在是错误的吗？

For, according to some thinkers, it is impossible for one thing to be combined with another. They argue that (i) if both the 'combined' constituents persist unaltered, they are no more 'combined' now than they were before, but are in the same condition: while (ii) if one has been destroyed, the constituents have not been 'combined'—on the contrary, one constituent is and the other is not, whereas 'combination' demands uniformity of condition in them both: and on the same principle (iii) even if both the combining constituents have been destroyed as the result of their coalescence, they cannot 'have been combined' since they have no being at all.

因为，在有些思想家看来，一物与另一物是不可能混合的。他们认为：（1）如果“混合”的成分依然如故、没有更替，那么它们现在与先前相比就没有被继续“混合”，而是处于相同的状况；（2）如果一种成分已经被毁坏，那么这些成分就没有被“混合”——相反，一种成分存在，另一种不存在，而“混合”却要求二者的条件保持一致，依照相同的原则；（3）即使混合的两种成分由于其结合而都被毁坏了，它们也无法“被混合”，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

What we have in this argument is, it would seem, a demand for the precise distinction of 'combination' from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for it is obvious that 'combination', if it exists, must differ from these processes) and for the precise distinction of the

'combinable' from that which is such as to come-to-be and pass-away. As soon, therefore, as these distinctions are clear, the difficulties raised by the argument would be solved.

这种论点似乎要求我们确切地区分“混合”与生成和消亡（因为显然如果“混合”存在的话，必定是不同于这两种过程的），要求我们确切地区分“可混合物”与可生成物和可消亡物。因此，一旦弄清楚这些区分，这个论点提出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Now (i) we do not speak of the wood as 'combined' with the fire, nor of its burning as a 'combining' either of its particles with one another or of itself with the fire: what we say is that 'the fire is coming-to-be, but the wood is passing-away'. Similarly, we speak neither (ii) of the food as 'combining' with the body, nor (iii) of the shape as 'combining' with the wax and thus fashioning the lump. Nor can body 'combine' with white, nor (to generalize) 'properties' and 'states' with 'things': for we see them persisting unaltered. But again (iv) white and knowledge cannot be 'combined' either, nor any other of the 'adjectivals'. (Indeed, this is a blemish in the theory of those who assert that 'once upon a time all things were together and combined'. For not everything can 'combine' with everything. On the contrary, both of the constituents that are combined in the compound must originally have existed in separation: but no property can have separate existence.)

我们不说（1）木头与火“混合”，也不说其燃烧或是其分子间相互“混合”，或是其自身与火混合，我们所说的是“火在生成，而木头在消亡”。同样，我们不说（2）食物与身体“混合”，也不说（3）形状与蜡“混合”因而形成团块。身体也不会和白色“混合”，（概括而

言）“性质”与“状态”也不会和“事物”混合，因为我们看到它们是保持不变的。再者，（4）白色和知识也无法被“混合”，任何其他“形容词性的东西”也都无法被“混合”。（事实上，这是那些断言“万物一度曾在一起且被混合”的人们所持理论的一个缺点。因为并非一切都可以和一切“混合”。相反，复合物中混合的两种成分最初必定是分离存在的，但任何属性都无法分离存在。）

Since, however, some things are—potentially while others are—actually, the constituents combined in a compound can 'be' in a sense and yet 'not-be'. The compound may be—actually other than the constituents from which it has resulted; nevertheless each of them may still be—potentially what it was before they were combined, and both of them may survive undestroyed. (For this was the difficulty that emerged in the previous argument: and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ombining constituents not only coalesce, having formerly existed in separation, but also can again be separated out from the compound.) The constituents, therefore, neither (a) persist actually, as 'body' and 'white' persist: nor (b) are they destroyed (either one of them or both), for their 'power of action' is preserved. Hence these difficulties may be dismissed: but the problem immediately connected with them—whether combination is something relative to 'perception' must be set out and discussed.

然而，既然有些事物潜在地存在，而另一些现实地存在，复合物中混合的成分就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存在”而又“不存在”。复合物可能在现实中不同于其由以产生的成分，不过它们各自可能仍然潜在地是混合之前的那种东西，二者都可能没有被毁坏。（因为这是先前论证中出现的难题，显然，混合的成分是由原先分离存在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它们还可以再次从复合物中分离出来。）因此，这些成分（1）既不像“身体”和“白色”那样在现实中存留，（2）（其中一个或

二者）也不会被毁坏，因为它们保持了“动作力”。因此，这些难题可以放在一边了，但是与其直接相关的问题——即混合是否是与“知觉”相关的某种东西却必须提出来加以讨论。

When the combining constituents have been divided into parts so small, and have been juxtaposed in such a manner, that perception fails to discriminate them one from another, have they then 'been combined' or ought we to say 'No, not until any and every part of one constituent is juxtaposed to a part of the other'? The term, no doubt, is applied in the former sense: we speak, e.g. of wheat having been 'combined' with barley when each grain of the one is juxtaposed to a grain of the other. But every body is divisible and therefore, since body 'combined' with body is uniform in texture throughout, any and every part of each constituent ought to be juxtaposed to a part of the other.

当混合的成分被分割成很小的部分且以这种方式并置、以至于知觉都无法区分这些部分的时候，它们是否已经“被混合”了呢？还是我们应该说“不，直到一种成分的任一部分与另一成分的某一部分并置在一起它们才会被混合”？无疑这个词被用作了前一种意义。例如，当小麦的每一粒都与大麦的某一粒并置的时候，我们就说小麦已经与大麦“混合”。但是每个物体都是可分的，因此，既然与物体“混合”的物体在结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每种成分的任一部分都应该是与另一成分的某一部分并置着的。

No body, however, can be divided into its 'least' parts: and 'composition' is not identical with 'combination', but other than it. From these premises it clearly follows (i) that so long as the constituents are preserved in small particles, we must not speak of

them as 'combined'. (For this will be a 'composition' instead of a 'blending' or 'combination': nor will every portion of the resultant exhibit the same ratio between its constituents as the whole. But we maintain that, if 'combination' has taken place, the compound must be uniform in texture throughout—any part of such a compound being the same as the whole, just as any part of water is water: whereas, if 'combination' is 'composition of the small particles', nothing of the kind will happen. On the contrary, the constituents will only be 'combined' relatively to perception: and the same thing will be 'combined' to one percipient, if his sight is not sharp, (but not to another,) while to the eye of Lynceus nothing will be 'combined'.) It clearly follows (ii) that we must not speak of the constituents as 'combined' in virtue of a division such that any and every part of each is juxtaposed to a part of the other: for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be thus divided. Either, then, there is no 'combination', or we have still to explain the manner in which it can take place.

然而，任何物体都不能被分割成“最小的”部分，“结合”与“混合”并不同一，而是与之相异。从上述前提可以清楚地看出，（1）只要混合的成分以微粒的形式得以保存，我们就不应说它们被“混合”了。（因为这将是某种“结合”，而非某种“混杂”或“混合”：其产物的每一部分也不会具有与整体相同的比例。但是我们坚持认为，如果“混合”已经发生，那么复合物必然在结构上是完全一致的，即这样一种复合物的任一部分都与整体相同，正如水的任一部分都是水，相反，如果“混合”只是“微粒的结合”，那就没有此类情形发生。相反，其成分只是相对于知觉来说被“混合”了，同一事物对于一个人而言是被“混合”了，如果其目光不敏锐的话，而对于另一个人则并非如此，在林叩斯看来就什么都没有被“混合”。）（2）同样清楚的一点是，我们也不应说其成分是以某种分割的方式（即每个成分的任一部分都与另一成分的某一部分并置）被“混合”，因为它们是不可能被这样分

割的。那么，要么没有“混合”，要么我们仍得解释其可以发生的方式。

Now, as we maintain, some things are such as to act and others such as to suffer action from them. Moreover, some things—viz. those Which have the same matter—'reciprocate', i.e. are such as to act upon one another and to suffer action from one another; while other things, viz. agents which have not the same matter as their patients, act without themselves suffering action. Such agents cannot 'combine'—that is why neither the art of healing nor health produces health by 'combining' with the bodies of the patients. Amongst those things, however, which are reciprocally active and passive, some are easily-divisible. Now (i) if a great quantity (or a large bulk) of one of these easily-divisible 'reciprocating' materials be brought together with a little (or with a small piece) of another, the effect produced is not 'combination', but increase of the dominant: for the other material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dominant. (That is why a drop of wine does not 'combine' with ten thousand gallons of water: for its form is dissolved, and it is changed so as to merge in the total volume of water.) On the other hand (ii) when there is a certain equilibrium between their 'powers of action', then each of them changes out of its own nature towards the dominant: yet neither becomes the other, but both become an intermediate with properties common to both.

现在，正如我们所断言的，有些事物会施加动作，而另一些则承受来自前者的动作。此外，有些事物——即那些具有相同质料的事物——是相互作用的，即相互施加动作且彼此承受动作；而另一些事物，即那些具有与其承受者不同质料的动作者，则是动作而自身不承受动作。此类动作者无法“混合”——这也是为何治愈术与健康二者都

无法通过与病人的身体相“混合”而产生健康的原因。然而，在那些既能动作又能承受动作的事物之中，有些是易于分开的。如果（1）大量（或大块）某种此类相互作用的易分物与少量（或小块）另一种同类物被放在一起，产生的结果不是“混合”，而是主导因素的增加，因为另一物被转化成了主导因素。（这就是为何一滴酒不是与一万加仑的水“混合”，因为其形式被消解了，酒被改变了，融入了水的总量之中。）另一方面，（2）当它们的“动作力”之间存在某种平衡时，它们各自都会出自本性地朝主导因素变化，但二者都不会变成另一方，而是变成具有二者共同属性的某种中间物。

Thus it is clear that only those agents are 'combinable' which involve a contrariety—for these are such as to suffer action reciprocally. And, further, they combine more freely if small pieces of each of them are juxtaposed. For in that condition they change one another more easily and more quickly; whereas this effect takes a long time when agent and patient are present in bulk.

因此，显然只有那些具有某种相反物的动作者才是“可混合的”，因为这样的动作者才能相互承受动作。此外，如果二者的小部分被并置的话，它们可以更自由地混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会更容易且更快速地改变彼此；而当行动者与承受者体积较大时，产生这种结果就需要较长的时间。

Hence, amongst the divisible susceptible materials, those whose shape is readily adaptable have a tendency to combine: for they are easily divided into small particles, since that is precisely what 'being readily adaptable in shape' implies. For instance, liquids are the most 'combinable' of all bodies—because, of all divisible materials, the liquid is most readily adaptable in shape, unless it be viscous.

Viscous liquids, it is true, produce no effect except to increase the volume and bulk. But when one of the constituents is alone susceptible—or superlatively susceptible, the other being susceptible in a very slight degree—the compound resulting from their combination is either no greater in volume or only a little greater.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tin is combined with bronze. For some things display a hesitating and ambiguous attitude towards one another—showing a slight tendency to combine and also an inclination to behave as 'receptive matter' and 'form' respectively. The behaviour of these metals is a case in point. For the tin almost vanishes, behaving as if it were an immaterial property of the bronze: having been combined, it disappears, leaving no trace except the colour it has imparted to the bronze. The same phenomenon occurs in other instances too.

因此，在可分且易于承受的质料中，那些形状易于改变的易于混合，因为它们容易被分割成微粒，而这恰恰就是“形状易于改变”的含义。例如，液体是所有物体中最“可混合的”，因为，在所有可分物中，液体的形状是最易于改变的，除非液体是黏稠的。的确，黏稠的液体除了体积增大之外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当只有一种成分能承受，或者极度能承受，而另一种成分能承受的程度则非常低时，它们二者混合的产物要么在体积上没有增大，要么仅仅增大一点点。锡与铜混合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形。因为有些事物彼此间呈现出某种模棱两可的态势——既有轻微混合的倾向，也有分别作为“能承受的质料”与“形式”的倾向。上述两种金属的情形正是如此。因为锡几乎不见了，仿佛是铜的某种无形的属性，混合之后，锡就消失了，了无痕迹，只有它所赋予铜的那种颜色。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其他例证中。

It is clear, then, from the foregoing account, that 'combination' occurs, what it is, to what it is due, and what kind of thing is

'combinable'. The phenomenon depends upon the fact that some things are such as to be (a) reciprocally susceptible and (b) readily adaptable in shape, i.e. easily divisible. For such things can be 'combined' without its being necessary either that they should have been destroyed or that they should survive absolutely unaltered: and their 'combination' need not be a 'composition', nor merely 'relative to perception'. On the contrary: anything is 'combinable' which, being readily adaptable in shape, is such as to suffer action and to act; and it is 'combinable with' another thing similarly characterized (for the 'combinable' is relative to the 'combinable'); and 'combination' is unification of the 'combinables', resulting from their 'alteration'.

那么，经过上面的论述，“混合”确有发生以及它是什么、因何而起、何物是“可混合的”等问题就都清楚了。这种现象取决于这样的事实，即（1）有些事物是能相互承受的，（2）形状易于改变，即易于分开。因为此类事物可以被“混合”，但它们未必会已被毁灭，或者保持绝对不变，它们的“混合”未必是某种“结合”，也未必仅仅是“与知觉相关”。相反，任何因形状易于改变而承受动作与施加动作的事物都是“可混合的”；它可以与具有相同特色的另一物“相混合”（因为“可混合物”是与“可混合物”相关的）；“混合”是“可混合物”的统一，是由可混合物的“更替”产生的。

Book II

第二卷

Chapter 1

第一章

We have explained under what conditions 'combination', 'contact', and 'action-passion'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things which undergo natural change. Further, we have discussed 'unqualified'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and explained under what conditions they are predicable, of what subject, and owing to what cause. Similarly, we have also discussed 'alteration', and explained what 'altering' is and how it differs from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But we have still to investigate the so-called 'elements' of bodies.

我们已经解释了“混合”、“接触”以及“行动和承受”在何种条件下因自然变化的事物而发生。此外，我们已经讨论了“非性质方面”的生成与消亡，解释了这些过程发生的条件、主体和原因。同样，我们也讨论了“更替”，阐释了“更替”是什么以及它是怎样与生成和消亡相区别的。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去考察所谓的物体的“元素”。

For the complex substances whose formation and maintenance are due to natural processes all presuppose the perceptible bodies as the condition of their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but philosophers disagree in regard to the matter which underlies these perceptible bodies. Some maintain it is single, supposing it to be,

e.g. Air or Fire, or an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se two (but still a body with a separate existence). Others, on the contrary, postulate two or more materials—ascribing to their 'association' and 'dissociation', or to their 'alteration', the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of things. (Some, for instance, postulate Fire and Earth: some add Air, making three: and some, like Empedocles, reckon Water as well, thus postulating four.)

由于复杂实体的形成和保持都有赖于自然进程，人们都将可感知物预设为它们生成与消亡的条件，但是哲学家们不认为质料以其可感知物为基础。他们有的认为质料是纯粹的，就算它是，例如空气或火，或者认为质料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中间物”（但是该物依然有其独立存在）。相反，其他人则认为有两个或更多质料，因为它们之间“联合”或“分离”，或者因为它们发生“更替”，才形成事物的生成与消亡。（例如，有人假定世界有火和土两种物质；有人又加上了气，认为有三种；还有人，像是恩培多克勒，把水也看作一种物质，因此假定有四种。）

Now we may agree that the primary materials, whose change (whether it be 'association and dissociation' or a process of another kind) results in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are rightly described as 'originative sources, i.e. elements'. But (i) those thinkers are in error who postulate, beside the bodies we have mentioned, a single matter—and that corporeal and separable matter. For this 'body' of theirs cannot possibly exist without a 'perceptible contrariety': this 'Boundless', which some thinkers identify with the 'original real', must be either light or heavy, either cold or hot. And (ii) what Plato has written in the Timaeus is not based on any precisely-articulated conception. For he has not stated clearly whether his 'Omni-recipient' exists in separation from the

'elements'; nor does he make any use of it. He says, indeed, that it is a substratum prior to the so-called 'elements'—underlying them, as gold underlies the things that are fashioned of gold. (And yet this comparison, if thus expressed, is itself open to criticism. Things which come-to-be and pass-away cannot be called by the name of the material out of which they have come-to-be: it is only the results of 'alteration' which retain the name of the substratum whose 'alterations' they are. However, he actually says that the truest account is to affirm that each of them is 'gold'.) Nevertheless he carries his analysis of the 'elements'—solids though they are-back to 'planes', 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Nurse' (i.e. the primary matter) to be identical with 'the planes'.

现在我们已经认同，由于原初质料的改变（诸如“联合与分离”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过程）导致生成与消亡，这种质料恰恰可以描述为“本原，例如那些元素”。但是，（1）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物体以外，如果那些思想家认为那个有形体的并且可分离的质料是简单质料，他们就错了。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可感知的相反物”，他们所说的这个“物体”就不可能存在。这个被有些思想家定义为“本真”的“无定”必定既轻又重，既冷又热。（2）而且，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所写的也没有以任何准确的相关概念为依据。因为他没有清晰地阐明其“无所不包者”是否独立于“元素”而存在，而且他也没有用过这一名词。确实，他说过，这是一个更先于所谓“元素”的基质，“元素”要以它们为载体，就像金这个“元素”要以金制品为载体一样。（但是，这种类比本身应受批判。那些生成和消亡的东西不能以生成它们的质料之名义而被命名，那只是更替的结果，并且保留了使其成为“更替物”的基质的名称。然而，他却说“可以推定的是它们每一个都是‘金’”。）此外，他贯彻了自己对于“元素”的分析，例如，他认为，尽管立体可以还原为平面，但是“养育者”（之类的第一质料）是不可能等同于“平面”的。

Our own doctrine is that although there is a matter of the perceptible bodies (a matter out of which the so-called 'elements' come-to-be), it has no separate existence, but is always bound up with a contrariety. A more precise account of these presuppositions has been given in another work': we must, however, give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primary bodies as well, since they too are similarly derived from the matter. We must reckon as an 'originative source' and as 'primary' the matter which underlies, though i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trary qualities: for 'the hot' is not matter for 'the cold' nor 'the cold' for 'the hot', but the substratum is matter for them both. We therefore have to recognize three 'originative sources': firstly that which potentially perceptible body, secondly the contrarieties (I mean, e.g. heat and cold), and thirdly Fire, Water, and the like. Only 'thirdly', however: for these bodies change into one another (they are not immutable as Empedocles and other thinkers assert, since 'alteration' would then have been impossible), whereas the contrarieties do not change.

我们自己的主张是，尽管存在可感知物的质料（一个质料是由所谓“元素”生成的），但是它也没有独立存在，而总是与一个相反物相联系。关于这些预设我在另一篇作品中已经作出了更准确的表述；然而，由于第一物体同样也是由质料中得出的，我们必须也对第一物体作出更详尽的解释。我们必须承认一种质料为“本原”和“原初”，尽管它不能从其中分离出来但却是相反性质的基础，例如“热”不是“冷东西”的质料，“冷”也不是“热东西”的质料，但是基质就是它们二者的质料。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三种“本原”：首先是那些潜在的可感知物，第二是其相反物（我的意思是例如热和冷），第三种就是火、水之类的东西。然而，只有第三类的物体变成另外一个（它们不是像恩培多克勒和其他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恒定不变，否则“更替”就不可能发生了），而其相反物不变。

Nevertheless, even so the question remains: What sorts of contrarieties, and how many of them, are to be accounted 'originative sources' of body? For all the other thinkers assume and use them without explaining why they are these or why they are just so many.

此外，还要说明这样的问题：是什么类型和多少数量的相反物，这些相反物是如何被说成是物体的“本原”的？所有其他的思想家在考虑和使用它们时，都没有解释为什么它们恰好就是这些东西，为什么它们恰好有那么多。

Chapter 2

第二章

Since, then, we are looking for 'originative sources' of perceptible body; and since 'perceptible' is equivalent to 'tangible', and 'tangible' is that of which the perception is touch; it is clear that not all the contrarieties constitute 'forms' and 'originative sources' of body, but only those which correspond to touch. For it is in accordance with a contrariety—a contrariety, moreover, of tangible qualities—that the primary bodies are differentiated. That is why neither whiteness (and blackness), nor sweetness (and bitterness), nor (similarly) any quality belonging to the other perceptible contrarieties either, constitutes an 'element'. And yet vision is prior to touch, so that its object also is prior to the object of touch. The object of vision, however, is a quality of tangible body not qua tangible, but qua something else—qua something which may well be naturally prior to the object of touch.

那么，既然我们在寻找可感知物的“本原”，既然“可感知”相当于“有形”，而且“有形的”就是那些可以触知的东西，那么显然不是一切相反物都能构成物体的“形式”和“本原”，而只有那些可以触知的东西才能这样。因为正是由于对立——而且是实实在在性质的对立——原初物质才相互区别开来。因此既不是白（和黑），也不是甜（和苦），（同样地）也不是属于其他可感知的相反物的任何性质，形成了“元素”。而且视觉还先于触觉，因此视觉对象也先于触觉对象。然而，视觉的对象是有形物的一种性质，不是有形这一性质，而是其他的性质，一种可能本来就先于触觉对象的性质。

Accordingly, we must segregate the tangible differences and contrarieties, and distinguish which amongst them are primary. Contrarieties correlative to touch are the following: hot-cold, dry-moist, heavy-light, hard-soft, viscous-brittle, rough-smooth, coarse-fine. Of these (i) heavy and light are neither active nor susceptible. Things are not called 'heavy' and 'light' because they act upon, or suffer action from, other things. But the 'elements' must be reciprocally active and susceptible, since they 'combine' and are transformed into one another. On the other hand (ii) hot and cold, and dry and moist, are terms, of which the first pair implies power to act and the second pair susceptibility. 'Hot' is that which 'associates' things of the same kind (for 'dissociating', which people attribute to Fire as its function, is 'associating' things of the same class, since its effect is to eliminate what is foreign), while 'cold' is that which brings together, i.e. 'associates', homogeneous and heterogeneous things alike. And 'moist' is that which, being readily adaptable in shape, is not determinable by any limit of its own: while 'dry' is that which is readily determinable by its own limit, but not readily adaptable in shape.

相应地，我们必须将有形的差异和相反物两者区别开来，分辨出其中谁是首要的。与触觉相关联的相反物如下所示：热与冷，干与湿，重与轻，硬与软，韧与脆，粗糙与光滑，浓厚与稀薄。其中（1）重与轻既非能动的，也不易受影响。那些东西不能被称作是“重的”与“轻的”，因为它们作用于或者受力于其他东西。但是这些“元素”必定相互作用与影响，因为它们“结合”并且向对方转化。另一方面，（2）热与冷，干与湿这些术语，如果第一组暗示行动力，第二组则会表现出受影响的情况。热是同一类东西的“联合”（因为人们所说的由于火的作用产生的“分离”是同类东西的联合，因为其作用是消灭异类），而冷是将类似的同质或异质的东西放在一起，也就是“联合”。湿更易于变换形状，而不受制于自身的任何限制；而干更多被其自身限制所决定，不易于变换形状。

From moist and dry are derived (iii) the fine and coarse, viscous and brittle, hard and soft, and the remaining tangible differences. For (a) since the moist has no determinate shape, but is readily adaptable and follows the outline of that which is in contact with it,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it to be 'such as to fill up'. Now 'the fine' is 'such as to fill up'. For 'the fine' consists of subtle particles; but that which consists of small particles is 'such as to fill up', inasmuch as it is in contact whole with whole—and 'the fine' exhibits this character in a superlative degree. Hen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fine derives from the moist, while the coarse derives from the dry. Again (b) the viscous' derives from the moist: for 'the viscous' (e.g. oil) is a 'moist' modified in a certain way. 'The brittle', on the other hand, derives from the dry: for 'brittle' is that which is completely dry—so completely, that its solidification has actually been due to failure of moisture. Further (c) 'the soft' derives from the moist. For 'soft' is that which yields to pressure by retiring into itself, though it does not yield by total displacement as the moist does—which explains why the moist is not 'soft', although 'the soft'

derives from the moist. 'The hard', on the other hand, derives from the dry: for 'hard' is that which is solidified, and the solidified is dry.

从湿与干可以得出（3）稀薄与浓厚，韧与脆，硬与软以及其他实实在在的差异。因为（1）由于湿没有固定形状，但是易于改变，并且随着与它接触的东西的外廓而改变形状，因此“如此被填充”就是它的性质。那么，“稀薄的东西”也是“如此被填充的”。因为“稀薄”由极细微的部分构成，但是极细微的部分组成的空间正是“如此被填充”的，因为整体与整体接触，“稀薄的东西”最可以展现这种特性。因此推出稀薄来自于湿，而浓厚来自于干；（2）“韧”也来自于湿，因为“韧的东西”（如油）是以某种方式变化了的“湿”。另一方面，“脆的东西”来自于干，因为“脆”是完全干的，实际上就是由于缺少湿，它才变得坚固了；（3）“软的东西”也来自于湿。因为“软”也是通过自己收缩而屈服于压力的，尽管它不像湿那样完全被取代，也正因如此，湿不是“软”，尽管“软的东西”来自于湿。另一方面，“硬的东西”来自于干，因为“硬”是变得坚固的东西，而坚固的东西就是干。

The terms 'dry' and 'moist' have more senses than one. For 'the damp', as well as the moist, is opposed to the dry: and again 'the solidified', as well as the dry, is opposed to the moist. But all these qualities derive from the dry and moist we mentioned first. For (i) the dry is opposed to the damp: i.e. 'damp' is that which has foreign moisture on its surface ('sodden' being that which is penetrated to its core), while 'dry' is that which has lost foreign moisture. Hen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damp will derive from the moist, and 'the dry' which is opposed to it will derive from the primary dry. Again (ii) the 'moist' and the “solidified” derive in the same way from the primary pair. For 'moist' is that which contains moisture of its-own deep within it ('sodden' being that which is deeply penetrated by

foreign moisture), whereas 'solidified' is that which has lost this inner moisture. Hence these too derive from the primary pair, the 'solidified' from the dry and the 'liquefiable' from the moist.

术语“干”和“湿”有不止一种含义。因为“潮的东西”与湿一样都与干相反，而且，“坚固的东西”和干都与湿相反。但是所有这些性质都源自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干与湿。（1）因为干与潮相反，也就是“潮”是表面有外来的湿（“浸泡”是湿贯穿了核心），而“干”是失去了外来的湿。因此，很显然，潮源自于湿，与之相反的“干的东西”来自于原初的干；（2）“湿”与坚固同样源自于原初的一组范畴。因为，“湿”拥有深入其中的湿度（“浸泡”是湿贯穿了核心），而“坚固”是失去了内部的湿性。因此，这些也是源自于原初的范畴，“坚固”源自于干，“可溶解”则源自于湿。

It is clear, then, that all the other differences reduce to the first four, but that these admit of no further reduction. For the hot is not essentially moist or dry, nor the moist essentially hot or cold: nor are the cold and the dry derivative forms, either of one another or of the hot and the moist. Hence these must be four.

那么显然，其他各种差异都可以归结为四种原初差异，但是不能再少于这四种了。因为热本质上不是湿或干，湿本质上也不是热或冷，冷与干不能彼此推出，也不能从热或湿中推出。因此原初的必定是四种。

Chapter 3

第三章

The elementary qualities are four, and any four terms can be combined in six couples. Contraries, however, refuse to be coupled: for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same thing to be hot and cold, or moist and dry. Hen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ouplings' of the elementary qualities will be four: hot with dry and moist with hot, and again cold with dry and cold with moist. And these four couples have attached themselves to the apparently 'simple' bodies (Fire, Air, Water, and Earth) in a manner consonant with theory. For Fire is hot and dry, whereas Air is hot and moist (Air being a sort of aqueous vapour); and Water is cold and moist, while Earth is cold and dry. Thus the differences are reasonably distributed among the primary bodies, and the number of the latter is consonant with theory. For all who make the simple bodies 'elements' postulate either one, or two, or three, or four. Now (i) those who assert there is one only, and then generate everything else by condensation and rarefaction, are in effect making their 'originative sources' two, viz. the rare and the dense, or rather the hot and the cold: for it is these which are the moulding forces, while the 'one' underlies them as a 'matter'. But (ii) those who postulate two from the start—as Parmenides postulated Fire and Earth—make the intermediates (e.g. Air and Water) blends of these. The same course is followed (iii) by those who advocate three. (We may compare what Plato does in 'Me Divisions': for he makes 'the middle' a blend.) Indeed, there is practically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ose who postulate two and those who postulate three, except that the former split the middle 'element' into two, while the latter treat it as only one. But (iv) some advocate four from the start, e.g. Empedocles: yet he too draws them together so as to reduce them to the two, for he opposes all the others to Fire.

基本的性质有四种，任何四种概念都可以结合成六对。然而，相

反物不能配对，因为同一种东西不可能既热又冷，既湿又干。因此，很显然，基本性质的“配对”有四种：热和干，湿和热，冷和干以及冷和湿。而且从理论上说，这四组都要依附于明显的“简单”物（火、气、水和土），因为火既热又干，而气既热又湿（气是一种蒸汽），水既冷又湿，而土既冷又干。因此，差异就被合理地分配给这些第一物体，而且后者的数目与理论上相一致。因为所有视简单物为“元素”的人都认为其数目是一，或二，或三，或四。因此，（1）那些宣称本原只有一种、只是由于本原的浓或稀而生出万物的人，其实提出了两种“本原”，即稀与浓，或者说是热与冷，因为这二者正是造物的力量，而“一”作为一种“质料”依赖于它们；（2）但是，那些认为本原有两种的人——如巴门尼德认为是火和土——使中间物（如气和水）变成了它们的混合物；同样的情形（3）还出现在主张本原有三种的人那里。（我们要比较柏拉图在《划分》中所主张的，因为他让“中间物”成为一种混合物。）实际上，那些认为本原有两种或者三种的人，几乎并无差别，只不过前者将中间的“元素”一分为二了，而后者将它视为单独的一个；（4）也有一些主张本原有四种的人，如恩培多克勒，但是他还是把它们归结为两种，因为他认为其他三种都与火对立。

In fact, however, fire and air, and each of the bodies we have mentioned, are not simple, but blended. The 'simple' bodies are indeed similar in nature to them, but not identical with them. Thus the 'simple' body corresponding to fire is 'such-as-fire', not fire: that which corresponds to air is 'such-as-air': and so on with the rest of them. But fire is an excess of heat, just as ice is an excess of cold. For freezing and boiling are excesses of heat and cold respectively. Assuming, therefore, that ice is a freezing of moist and cold, fire analogously will be a boiling of dry and hot: a fact, by the way, which explains why nothing comes-to-be either out of ice or out of fire.

然而，事实上，我们所提到的每一种物体——火和气，都不是简单的，而是混合的。从本质上说，“简单”物确实与它们类似，但却不同一。因此与火相关的“简单”物，只是“像火”而不是火；与气相关的简单物只是“像气”而不是气，其他的也是这样。但是火是过度的热，正如冰是过度的冷。因为凝结与升腾分别是过度的冷和热。所以，假设冰是湿与冷的凝结，类似的，火将会是干与热的升腾。因此，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事实上没有什么既是从冰又是从火中生成的。

The 'simple' bodies, since they are four, fall into two pairs which belong to the two regions, each to each: for Fire and Air are forms of the body moving towards the 'limit', while Earth and Water are forms of the body which moves towards the 'centre'. Fire and Earth, moreover, are extremes and purest: Water and Air, on the contrary are intermediates and more like blends. And, further, the members of either pair are contrary to those of the other, Water being contrary to Fire and Earth to Air; for the qualities constituting Water and Earth are contrary to those that constitute Fire and Air. Nevertheless, since they are four, each of them is characterized par excellence a single quality: Earth by dry rather than by cold, Water by cold rather than by moist, Air by moist rather than by hot, and Fire by hot rather than by dry.

由于“简单”物是四种，它们分成两组，属于两个范围，各自相对，因为火和气构成朝向“边界”移动的物体，而土和水构成朝向“中心”移动的物体。此外，火和土是极端的和最纯粹的，相反，水和气是中间物，更像是混合的。而且，每一组的成员都与其他组的相反，水与火相反，土与气相反，因为构成水与土的性质与构成火与气的性质相反。然而，由于“简单物”有四种，每一种就更准确地对应于一种单一的性质：土对应干而不是冷，水对应冷而不是湿，气对应湿而不是热，火对应热而不是干。

Chapter 4

第四章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before that the coming-to-be of the 'simple' bodies is reciprocal. At the same time, it is manifest, even on the evidence of perception, that they do come-to-be: for otherwise there would not have been 'alteration', since 'alteration' is change in respect to the qualities of the objects of touch. Consequently, we must explain (i) what is the manner of their reciprocal transformation, and (ii) whether every one of them can come to-be out of every one—or whether some can do so, but not others.

前面已经确定，“简单”物的生成是相互的。同时，可感知的证据也表明，它们确实生成了。因为既然“更替”是触觉对象性质方面的改变，不相互生成就不会有“更替”发生了。那么，我们必须说明（1）它们相互转化的方式是怎样的，（2）是其中每一个都能生成于另外的每一个——还是有些能，有些不能。

Now it is evident that all of them are by nature such as to change into one another: for coming-to-be is a change into contraries and out of contraries, and the 'elements' all involve a contrariety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 because their distinctive qualities are contrary. For in some of them both qualities are contrary—e.g. in Fire and Water, the first of these being dry and hot, and the second moist and cold: while in others one of the qualities (though only one) is contrary—e.g. in Air and Water, the first being moist and hot, and the second moist and cold. It is

evident, therefore, if we consider them in general, that every one is by nature such as to come-to-be out of every one: and when we come to consider them severall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e manner in which their transformation is effected. For, though all will result from all, both the speed and the facility of their conversion will differ in degree.

显然，它们之间都会自然地相互转化，因为生成就是向相反物转化或者转化自相反物。而且所有“元素”因其具有明显相反的性质，从而在其相互关系中都包含了一个相反物。因为它们中有些两个性质都是相反的，如火和水，第一个性质是干和热，第二个性质是湿和冷。而有些只有一个性质（尽管只有一个）是相反的，如气和水，第一个性质是湿和热，第二个性质是湿和冷。所以，显然如果我们从总体上来考虑它们，每一种都自然地生成于另一种，而且当我们从个体上考虑它们时，就不难发现它们转化的方式是相互影响的。因为，尽管一切都来自于一切，但是它们转化的速度和难易在程度上都有所不同。

Thus (i) the process of conversion will be quick between those which have interchangeable 'complementary factors', but slow between those which have none. The reason is that it is easier for a single thing to change than for many. Air, e.g. will result from Fire if a single quality changes: for Fire, as we saw, is hot and dry while Air is hot and moist, so that there will be Air if the dry be overcome by the moist. Again, Water will result from Air if the hot be overcome by the cold: for Air, as we saw, is hot and moist while Water is cold and moist, so that, if the hot changes, there will be Water. So too, in the same manner, Earth will result from Water and Fire from Earth, since the two 'elements' in both these couples have interchangeable 'complementary factors'. For Water is moist and cold while Earth is cold and dry—so that, if the moist be

overcome, there will be Earth: and again, since Fire is dry and hot while Earth is cold and dry, Fire will result from Earth if the cold pass-away.

因此，（1）如果二者之间具有可以相互转变的“互补性”，转化进程就快，没有的则慢。原因是改变一个要比改变多个来得更容易些。例如，改变一个简单性质，火就生成了气，因为如我们所见，火是热与干，而气是热与湿，因此如果湿克服了干，就生成了气。而且，如果冷克服了热，水就在气中产生了，因为如我们所见，气是热与湿，而水是冷与湿，因此如果热改变了，就生成了水。同样，土生成于水，火生成于土，因为这两种“元素”中都有可以相互转变的“互补性”。因为水是湿与冷，而土是冷与干——因此如果湿被克服，就生成土；而火是干与热，土是冷与干，如果冷消亡，火就自土中生成。

It is evident, therefore, that the coming-to-be of the 'simple' bodies will be cyclical; and that this cyclical method of transformation is the easiest, because the consecutive 'elements' contain interchangeable 'complementary factors'.

因此，显然，“简单”物的生成是循环式的，而且这种转变的循环方式是最容易的，因为在相继的“元素”中包含了可以相互转变的“互补性”。

On the other hand (ii)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re into Water and of Air into Earth, and again of Water and Earth into Fire and Air respectively, though possible, is more difficult because it involves the change of more qualities. For if Fire is to result from Water, both the cold and the moist must pass-away: and again, both

the cold and the dry must pass-away if Air is to result from Earth. So, too, if Water and Earth are to result from Fire and Air respectively—both qualities must change. This second method of coming-to-be, then, takes a longer time. But (iii) if one quality in each of two 'elements' pass-away, the transformation, though easier, is not reciprocal. Still, from Fire plus Water there will result Earth and Air, and from Air plus Earth Fire and Water. For there will be Air, when the cold of the Water and the dry of the Fire have passed-away (since the hot of the latter and the moist of the former are left): whereas, when the hot of the Fire and the moist of the Water have passed-away, there will be Earth, owing to the survival of the dry of the Fire and the cold of the Water. So, too, in the same Way, Fire and Water will result from Air plus Earth. For there will be Water, when the hot of the Air and the dry of the Earth have passed-away (since the moist of the former and the cold of the latter are left): whereas, when the moist of the Air and the cold of the Earth have passed-away, there will be Fire, owing to the survival of the hot of the Air and the dry of the Earth—qualities essentially constitutive of Fire. Moreover, this mode of Fire's coming-to-be is confirmed by perception. For flame is par excellence Fire: but flame is burning smoke, and smoke consists of Air and Earth.

（2）另一方面，火向水的转化，气向土的转化，还有水和土向火和气各自的转化，尽管也有可能发生，但是就要困难得多，因为其中包含了更多性质的改变。因为如果火生成于水，就必须将冷和湿都排除，同样，如果气生成于土，就必须将冷和干都排除。还有水和土各自生成于火和气，两种性质都必须改变。生成的第二种方式就要花更长时间。但是（3）如果两个“元素”中每一个克服掉其中一种性质，尽管转变会容易一些，却又不是相互的了。而且，火和水中将生成土和气，气和土中将生成火和水。因为，当水中的冷和火中的干被克服（由于前者中的湿和后者中的热被留下了），就会生成气。而当

火中的热和水中的湿被克服，因为火中的干和水中的冷还存在，就会生成土。同样，火和水会生成于气与土。因为，当气的热和土的干被排除（由于前者的湿和后者的冷留下了），就会生成水。而当气的湿和土的冷被排除，因为气的热和土的干还存在——这些性质是火的构成要素，因此就生成了火。此外，火的生成方式是被感觉所确认的。因为火焰是最显而易见的火，而火焰会冒出烟，烟又是由气和土组成的。

No transformation, however, into any of the 'simple' bodies can result from the passing-away of one elementary quality in each of two 'elements' when they are taken in their consecutive order, because either identical or contrary qualities are left in the pair: but no 'simple' body can be formed either out of identical, or out of contrary, qualities. Thus no 'simple' body would result, if the dry of Fire and the moist of Air were to pass-away: for the hot is left in both.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hot pass-away out both, the contraries—dry and moist—are left. A similar result will occur in all the others too: for all the consecutive 'elements' contain one identical, and one contrary, quality. Hence, too, it clearly follows that, when one of the consecutive 'elements' is transformed into one, the coming-to-be is effected by the passing-away of a single quality: whereas, when two of them are transformed into a third, more than one quality must have passed-away.

然而，当两个“元素”处于相继顺序时，排除掉其中一种基本性质后，“简单”物之间不会发生任何转化。因为其中留下的是相同或相反的性质，而没有一个“简单”物可以由完全相同或者相反的性质形成。因此，如果火的干和气的湿被排除，就不会生成任何一种“简单”物，因为两者都留下了热。另一方面，如果两者中的热都被排除，就留下了相反物——干和湿。其他的也会出现同样的结果，因为各种相

继“元素”都包含一个相同和一个相反的性质。因此，可以清楚地发现，当相继“元素”中的一种转化为另一种时，排除掉单一性质就会有生成，而当两种“元素”转化为第三种时，就必须排除不止一种性质。

We have stated that all the 'elements' come-to-be out of any one of them; and we have explained the manner in which their mutual conversion takes place. Let us nevertheless supplement our theory by the following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them.

我们已经指出，各种“元素”都生成于其中的某一种，而且也说明了它们发生相互转化的方式。让我们通过以下相关讨论继续完善该理论。

Chapter 5

第五章

If Water, Air, and the like are a 'matter' of which the natural bodies consist, as some thinkers in fact believe, these 'elements' must be either one, or two, or more. Now they cannot all of them be one—they cannot, e.g. all be Air or Water or Fire or Earth—because 'Change is into contraries'. For if they all were Air, then (assuming Air to persist) there will be 'alteration' instead of coming-to-be. Besides, nobody supposes a single 'element' to persist, as the basis of all, in such a way that it is Water as well as Air (or any other 'element') at the same time. So there will be a certain contrariety, i.e. a differentiating quality: and the other member of this contrariety, e.g. heat, will belong to some other 'element', e.g. to Fire. But Fire will certainly not be 'hot Air'. For a change of that

kind (a) is 'alteration', and (b) is not what is observed. Moreover (c) if Air is again to result out of the Fire, it will do so by the conversion of the hot into its contrary: this contrary, therefore, will belong to Air, and Air will be a cold something: hence it is impossible for Fire to be 'hot Air', since in that case the same thing will be simultaneously hot and cold. Both Fire and Air, therefore, will be something else which is the same; i.e. there will be some 'matter', other than either, common to both.

实际上，如果水、气之类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自然物体包含的一种“质料”，那么这些“元素”一定是“一”或“二”，或更多。它们不可能都是一——例如不能全都是气、水、火或土——因为“改变是向相反物转化”。如果它们都是气（假定气持续存在），那么就会发生“更替”而不是生成。此外，没人敢说一种作为一切存在基础的单一“元素”（或其他任何“元素”）既是水又是气地存在。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有某个相反性，例如一种有差异的性质。而且这个对立性的另一个性质（如热）就会属于其他的“元素”（如火）。但是火不一定是“热气”。因为（1）这类改变是“更替”，（2）不是我们平时所观察到的。此外，（3）如果气生成于火，一定是通过热转化为其相反物得到的，这个相反物属于气，而气是一个冷东西。因此火不可能是“热气”，因为那样的话，同一个东西就会既是热的又是冷的。因此，火和气将是另外某个相同的东西，例如另外一些为二者所共有的“质料”。

The same argument applies to all the 'elements', proving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one of them out of which they all originate. But neither is there, beside these four, some other body from which they originate—a something intermediate, e.g. between Air and Water (coarser than Air, but finer than Water), or between Air and Fire (coarser than Fire, but finer than Air). For the supposed

'intermediate' will be Air and Fire when a pair of contrasted qualities is added to it: but, since one of every two contrary qualities is a 'privation', the 'intermediate' never can exist—as some thinkers assert the 'Boundless' or the 'Environing' exists—in isolation. It is, therefore, equally and indifferently any one of the 'elements', or else it is nothing.

这个论证适用于所有“元素”，即没有哪个单一“元素”是它们所有的本原。除这四种之外的其他东西也不是它们的本原——一种中间物，例如气与水之间的（比气更浓厚，比水更稀薄）或气与火之间的（比火更浓厚，比气更稀薄）。因为当一组相反的性质加进去了，这个所谓的“中间物”就会既是气又是火，这是由于每两个相反的性质中的一方是一种“缺失”，所以这个“中间物”——如一些人所说的“无定”或者“包容”——永远不会独立存在。因此，它要么是这些“元素”中的任何一个，要么什么也不是。

Since, then, there is nothing—at least, nothing perceptible—prior to these, they must be all. That being so, either they must always persist and not be transformable into one another: or they must undergo transformation—either all of them, or some only (as Plato wrote in the Timaeus). Now it has been proved before that they must undergo reciprocal transformation. It has also been proved that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y come-to-be, one out of another, is not uniform—since the process of reciprocal transformation is relatively quick between the 'elements' with a 'complementary factor', but relatively slow between those which possess no such factor. Assuming, then, that the contrariety, in respect to which they are transformed, is one, the elements' will inevitably be two: for it is 'matter' that is the 'mean' between the two contraries, and matter is imperceptible and inseparable from

them. Since, however, the 'elements' are seen to be more than two, the contrarieties must at the least be two. But the contrarieties being two, the 'elements' must be four (as they evidently are) and cannot be three: for the 'couplings' are four, since, though six are possible, the two in which the qualities are contrary to one another cannot occur.

那么，既然没有什么可感知到的东西先于这些，它们就必定是所有的了。它们必定总是保持自身、不变成另外一个，或者必定发生了如下的转变——要么全部变，要么只有一些变（像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所写的那样）。前边已经证明了它们必然相互转变，也证明了它们一个向另一个生成的速度是不一致的。因为具有互补性的“元素”之间的互相转变，其进程相对要快，而那些不具有这样性质的，转变起来就相对要慢。所以，假定它们据此转变的相反物是“一”，“元素”就必定是“二”，因为“质料”是两个对立性之间的“中介”，而它是不可感知和不可分割的。然而，既然“元素”被视为多于“二”，相反物必定至少是“二”。但是相反物是“二”，“元素”必定是“四”而不是“三”（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成对的”是“四”，尽管“六”也有可能，但由于其中两性质是相反的，所以不可能成立。

These subjects have been discussed before: but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will make it clear that, since the 'elements' are transformed into one another, it is impossible for any one of them—whether it be at the end or in the middle—to be an 'originative source' of the rest. There can be no such 'originative element' at the ends: for all of them would then be Fire or Earth, and this theory amounts to the assertion that all things are made of Fire or Earth. Nor can a 'middle-element' be such an 'originative source'—as some thinkers suppose that Air is transformed both into Fire and into Water, and Water both into Air and into Earth, while the 'end-

elements' are not further transformed into one another. For the process must come to a stop, and cannot continue ad infinitum in a straight line in either direction, since otherwise an infinite number of contrarieties would attach to the single 'element'. Let E stand for Earth, W for Water, A for Air, and F for Fire. Then (i) since A is transformed into F and W, there will be a contrariety belonging to A and F. Let these contraries be whiteness and blackness. Again (ii) since A is transformed into W, there will be another contrariety: for W is not the same as F. Let this second contrariety be dryness and moistness, D being dryness and M moistness. Now if, when A is transformed into W, the 'white' persists, Water will be moist and white: but if it does not persist, Water will be black since change is into contraries. Water, therefore, must be either white or black. Let it then be the first. On similar grounds, therefore, D (dryness) will also belong to F. Consequently F (Fire) as well as Air will be able to be transformed into Water: for it has qualities contrary to those of Water, since Fire was first taken to be black and then to be dry, while Water was moist and then showed itself white. Thus it is evident that all the 'elements' will be able to be transformed out of one another; and that, in the instances we have taken, E (Earth) also will contain the remaining two 'complementary factors', viz. the black and the moist (for these have not yet been coupled).

这些问题前边已经讨论过了，但是接下来的讨论将使问题更加清晰，由于“元素”之间互相转变，那么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是其他的“本原”，不管它是在序列的两端还是在中间。处于两端的“元素”不可能是“本原”，因为它们是火或土，这样相当于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火或土构成的。也没有一个“中间元素”是这样的“本原”，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气变成火和水，水变成气和土，而“两端元素”不会再进一步变成别的什么。因为这个过程必定会终止，不会在任何方向的一条直线上持续到无限，否则属于单一“元素”的相反性质就会无限多

了。用E代表土，W代表水，A代表气，F代表火。那么，（1）由于A变为F和W，就会有一个属于A和F的相反物。假设这对相反物是白与黑。（2）又由于A变成W，就会有另一个相反物，因为W不同于F。假设第二对相反物是干与湿，D代表干，M代表湿。如果A变成W，这个“白”持续存在，水是湿和白，但是如果白不存在，由于要变成相反物，水就是黑。因此，水必定要么白要么黑。假设是第一种。同样，D（干）也属于F（火）。结果F（火）和气一样可以变成水，因为它的性质与水相反。既然火开始是黑的，然后是干的；而水开始是湿的，然后是白的，因此，显然所有“元素”能够相互转变。而且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E（土）也包含了其他两个“互补的性质”，即黑与湿（因为这些还未配对）。

We have dealt with this last topic before the thesis we set out to prove. That thesis—viz. that the process cannot continue ad infinitum—will be clear from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If Fire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F) is not to revert, but is to be transformed in turn into some other 'element' (e.g. into Q), a new contrariety, other than those mentioned, will belong to Fire and Q: for it has been assumed that Q is not the same as any of the four, E W A and F. Let K, then, belong to F and Y to Q. Then K will belong to all four, E W A and F: for they are transformed into one another. This last point, however, we may admit, has not yet been proved: but at any rate it is clear that if Q is to be transformed in turn into yet another 'element', yet another contrariety will belong not only to Q but also to F (Fire). And, similarly, every addition of a new 'element' will carry with it the attachment of a new contrariety to the preceding 'elements'. Consequently, if the 'elements' are infinitely many, there will also belong to the single 'element' an infinite number of contrarieties. But if that be so, it will be impossible to define any 'element': impossible also for any to come-to-be. For if one is to result from another, it will have to pass through such a

vast number of contrarieties—and indeed even more than any determinate number. Consequently (i) into some 'elements' transformation will never be effected—viz. if the intermediates are infinite in number, as they must be if the 'elements' are infinitely many: further (ii) there will not even be a transformation of Air into Fire, if the contrarieties are infinitely many: moreover (iii) all the 'elements' become one. For all the contrarieties of the 'elements' above F must belong to those below F, and vice versa: hence they will all be one.

我们在证明论点之前，已经解决了最后的问题。这个论点是过程不能被无限推进，从下面的考虑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论点。如果火（用F代表）不再变回去，而是依次变成另外一些“元素”，例如Q，一种新的相反物（不是已经提到的那些）将属于火和Q。因为已经假定Q不同于E、W、A、F中的任何一种。那么，让K属于F，Y属于Q，则K就属于所有这四种“元素”，即E、W、A和F，因为它们互相转变。但是要承认，这最后一点还未得到证实，但无论如何这是很明确的，如果Q依次变成另外一种“元素”，那么另一种相反物将不只属于Q，还属于F（即火）。同样，每个额外的新“元素”都会将一种新的相反物赋予前边的“元素”。那么，如果“元素”是无限多的，将有无限多的相反物属于一个简单“元素”。但是如果是这样，就不可能界定也不能生成任何一个“元素”了。因为如果它们互相生成，就要克服数目多得难以想象的相反物。结果（1）永远不会发生向一些“元素”的转变，即如果中间物的数目是无限的，“元素”也一定是无限多的。（2）如果相反物是无限多的，气变成火就不会发生。（3）此外，所有“元素”都变成“一”了。因为F以上的“元素”的各种相反物都必定属于F以下的那些“元素”，反之亦然。因此，它们将全部都是“一”。

Chapter 6

第六章

As for those who agree with Empedocles that the 'elements' of body are more than one, so that they are not transformed into one another—one may well wonder in what sense it is open to them to maintain that the 'elements' are comparable. Yet Empedocles says 'For these are all not only equal….

恩培多克勒认为物体的“元素”多于“一”，所以它们不能相互转变。有人会质疑那些赞同该看法的人是在何种意义上认为“元素”是等同的。但恩培多克勒说“因为这些‘元素’不只是等同……”

If it is meant that they are comparable in their amount, all the 'comparables' must possess an identical something whereby they are measured. If, e.g. one pint of Water yields ten of Air, both are measured by the same unit; and therefore both were from the first an identical something. On the other hand, suppose (ii) they are not 'comparable in their amount' in the sense that so-much of the one yields so much of the other, but comparable in 'power of action' (a pint of Water, e.g. having a power of cooling equal to that of ten pints of Air); even so, they are 'comparable in their amount., though not qua 'amount' but qua 'so-much power.. There is also (iii) a third possibility. Instead of comparing their powers by the measure of their amount, they might be compared as terms in a 'correspondence.: e.g. 'as x is hot, so correspondingly y is white.. But 'correspondence., though it means equality in the quantum, means similarity in a quale. Thus it is manifestly absurd that the 'simple' bodies, though they are not transformable, are comparable not merely as 'corresponding., but by a measure of their powers; i.e. that so-much Fire is comparable with many times-that-amount of

Air, as being 'equally' or 'similarly' hot. For the same thing, if it be greater in amount, will, since it belongs to the same kind, have its ratio correspondingly increased.

如果意指这些“元素”在数量上相当，那么所有这些“相当的”必定拥有同一的东西，并且据此来加以量度。例如，如果一品脱水产生十品脱气，两者就是用同一单位称量的，因此两者都源自于起初的同一种东西。另一方面，（2）假定它们不是“在数目上相当”，也就是说，不能说这么多的这个产生那么多的那个，但是它们在“行动力上”相当（一品脱水具有的致冷力等同于十品脱气的致冷力），即使如此，它们还是“在量上相当”，尽管不是作为数量，而是作为“能力”。（3）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不是通过量的量度来比较它们的能力，而是通过这样的“对应”来进行比较，例如，由于X是热的，所以对应的Y是白的。这个“对应”，尽管也意指量上相等，但是更意味着性状的同一。因此，有人认为“简单”物尽管不可转化，但是不仅由于对应，而且通过量度其力量，可以得出它们是等同的，例如，一定量的火与数倍于此量的气是相当的，因为有等量或近似量的热。这种看法很明显是荒唐的。因为，如果同一事物在数量上大得多，由于属于同一类，就会有相应比例的增长。

A further objection to the theory of Empedocles is that it makes even growth impossible, unless it be increase by addition. For his Fire increases by Fire: 'And Earth increases its own frame and Ether increases Ether.' These, however, are cases of addition: but it is not by addition that growing things are believed to increase. And it is far more difficult for him to account for the coming-to-be which occurs in nature. For the things which come-to-be by natural process all exhibit, in their coming-to-be, a uniformity either absolute or highly regular: while any exceptions any results which are in accordance neither with the invariable nor with the general

rule are products of chance and luck. Then what is the cause determining that man comes-to-be from man, that wheat (instead of an olive) comes-to-be from wheat, either invariably or generally? Are we to say 'Bone comes-to-be if the “elements” be put together in such and such a manner'? For, according to his own estatements, nothing comes-to-be from their 'fortuitous consilience', but only from their 'consilience' in a certain proportion. What, then, is the cause of this proportional consilience? Presumably not Fire or Earth. But neither is it Love and Strife: for the former is a cause of 'association' only, and the latter only of 'dissociation'. No: the cause in question is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each thing—not merely (to quote his words) 'a mingling and a divorce of what has been mingled'. And chance, not proportion, 'is the name given to these occurrences': for things can be 'mingled' fortuitously.

还有一个反对恩培多克勒理论的观点，认为增长甚至是不可能的，除非有额外的增加。因为在他看来，火靠火来增加：“土增加它自己的体积，以太使以太增加”。然而，这些都是因为有额外的增加。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增长物不是额外地增长的。对于他来说，阐释自然发生的生成更为困难。因为自然过程中生成的事物总是在其生成过程中，展现出一种绝对的或者相当程度的变化规则，而任何与稳定趋势或一般规则不相符的意外结果都是出于偶然或机缘。那么，是什么原因决定了人总是或一般生成于人，并且小麦（而不是橄榄）总是或一般生成于小麦？我们会说“如果‘元素’被如此这般地放在一起，就会生成骨头”吗？因为按照恩培多克勒的说法，没有什么能由于“碰巧一致”而生成，而只能生成于一定比例的“一致”。那么，按比例一致的原因是什么呢？假定不是火或土，也不是爱或争斗，因为前者只是“联合”的原因，而后者只是“分离”的原因。不是这样的，这一被质疑的原因是每一事物的本质，不仅是他所说的“已混合物的混合与分离”，而且是偶然性（而不是比例），“是用来描述这些情形的，”因为事物可以偶然间“被混合”。

The cause, therefore, of the coming-to-be of the things which owe their existence to nature is that they are in such-and-such a determinate condition: and it is this which constitutes, the 'nature' of each thing—a 'nature' about which he says nothing. What he says, therefore, is no explanation of 'nature'. Moreover, it is this which is both 'the excellence' of each thing and its 'good': whereas he assigns the whole credit to the 'mingling'. (And yet the 'elements' at all events are 'dissociated' not by Strife, but by Love: since the 'elements' are by nature prior to the Deity, and they too are Deities.)

因此，那些自然存在的事物的生成原因是它们处于如此这般的决定性条件下，而且这个条件构成了每个物体的“本质”。关于这个“本质”，恩培多克勒没说什么。因此，他也没有解释这个“本质”。而且，他把每一物的“美”和“善”都归因于“混合”。（然而所有事件中的“元素”不是被争斗，而是被爱分离开来，因为“元素”本质上是神，也先于神。）

Again, his account of motion is vague. For it is not an adequate explanation to say that 'Love and Strife' set things moving, unless the very nature of Love is a movement of this kind and the very nature of Strife a movement of that kind. He ought, then, either to have defined or to have postulated these characteristic movements, or to have demonstrated them—whether strictly or laxly or in some other fashion. Moreover, since (a) the 'simple' bodies appear to move 'naturally' as well as by compulsion, i.e. in a manner contrary to nature (fire, e.g. appears to move upwards without compulsion, though it appears to move by compulsion downwards); and since (b) what is 'natural' is contrary to that which is due to compulsion, and movement by compulsion actually occurs; it follows that

'natural movement' can also occur in fact. Is this, then, the movement that Love sets going? No: for, on the contrary, the 'natural movement' moves Earth downwards and resembles 'dissociation', and Strife rather than Love is its cause—so that in general, too, Love rather than Strife would seem to be contrary to nature. And unless Love or Strife is actually setting them in motion, the 'simple' bodies themselves have absolutely no movement or rest. But this is paradoxical: and what is more, they do in fact obviously move. For though Strife 'dissociated', it was not by Strife that the 'Ether' was borne upwards. On the contrary, sometimes he attributes its movement to something like chance ('For thus, as it ran, it happened to meet them then, though often otherwise'), while at other times he says it is the nature of Fire to be borne upwards, but 'the Ether' (to quote his words) 'sank down upon the Earth with long roots'. With such statements, too, he combines the assertion that the Order of the World is the same now, in the reign of Strife, as it was formerly in the reign of Love. What, then, is the 'first mover' of the 'elements'? What causes their motion? Presumably not Love and Strife: on the contrary, these are causes of a particular motion, if at least we assume that 'first mover' to be an 'originative source'.

而且他关于移动的说明也是模糊的。因为说“爱和争斗”使物移动理由不充分，除非爱本质上是这类移动，争斗在本质上是那类移动。那么，他就应该或严格，或松散，或以某种其他方式界定或论证它们的移动性质。此外，既然（1）“简单”物似乎既强制移动（以一种反自然的方式），也“自然地”移动（例如，火会自然地向上冒，也会受到外力向下移动）。（2）既然因为“自然的”东西与强制发生的东西相反，而且实际上强制移动确实发生了，那么“自然移动”实际上也会发生。那么，这是不是爱引起的移动呢？不是，因为正好相反，“自然移动”使土向下并且产生“分离”，而且总体上是争斗造成这种结果的，而不是爱。因此，总体来说，看起来反自然的是爱，而不是争

斗。除非爱或争斗实际上引起它们移动，否则，“简单”物自身绝对不会移动，或者静止不动。但是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它们明显已经移动了。因为，即使争斗引起“分离”，以太生来向上也不是因为争斗。相反，有时他把这种移动归因于类似偶然性的东西（“因为由于移动，就会碰巧遇到对方，尽管经常不是这样”），而有时，他又说火本质上是向上的，但是“以太”（按他的话说）“深深植根于土中”。同时，他也说，争斗统治的世界与先前爱统治的世界有着同样的秩序。那么，“元素”的“第一动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导致了它们的移动？可假定并不是爱和争斗，相反它们只是某种移动的原因，如果我们假定“第一动因”是“本原”的话。

An additional paradox is that the soul should consist of the 'elements', or that it should be one of them. How are the soul's 'alterations' to take Place? How, e.g. is the change from being musical to being unmusical, or how is memory or forgetting, to occur? For clearly, if the soul be Fire, only such modifications will happen to it as characterize Fire qua Fire: while if it be compounded out of the 'elements', only the corporeal modifications will occur in it. But the changes we have mentioned are none of them corporeal.

另外，认为灵魂由一些“元素”或者是其中一种“元素”组成的看法也是矛盾的。灵魂的“更替”是如何发生的？例如，从优雅到不优雅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记忆与遗忘是如何发生的？因为，显然，如果灵魂是火，那么只有那些作为火的属性会发生，而如果灵魂是由“元素”组成的，那就只会发生形体的改变。但是我们提到的改变没有一个是形体的改变。

Chapter 7

第七章

The discussion of these difficulties, however, is a task appropriate to a different investigation: let us return to the 'elements' of which bodies are composed. The theorie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common to all the “elements”', and that they are 'reciprocally transformed', are so related that those who accept either are bound to accept the other as well. Those, on the other hand, who do not make their coming-to-be reciprocal—who refuse to suppose that any one of the 'elements' comes-to-be out of any other taken singly, except in the sense in which bricks come-to-be out of a wall—are faced with a paradox. How, on their theory, are flesh and bones or any of the other compounds to result from the 'elements' taken together?

但是，讨论这些难题是另一个学科的任务。我们还是研究组成物体的“元素”吧。“各种‘元素’中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和“这些‘元素’间相互转化”两个理论的相关度很高，接受其中一种的人必定也认可另外一种。另一方面，那些不认为“元素”间相互生成或者一个从另一个中分别生成的人（除了在这个意义上，例如砖来自于墙）又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按照他们的看法，肉和骨或其他任何复合物是怎样因“元素”集合而产生的呢？

Indeed, the point we have raised constitutes a problem even for those who generate the 'elements' out of one another. In what manner does anything other than, and beside, the 'elements' come-to-be out of them? Let me illustrate my meaning. Water can come-to-be out of Fire and Fire out of Water; for their substratum is something common to them both. But flesh too, presumably, and marrow come-to-be out of them. How, then, do such things come

to-be? For (a) how is the manner of their coming-to-be to be conceived by those who maintain a theory like that of Empedocles? They must conceive it as composition—just as a wall comes-to-be out of bricks and stones: and the 'Mixture', of which they speak, will be composed of the 'elements', these being preserved in it unaltered but with their small particles juxtaposed each to each. That will be the manner, presumably, in which flesh and every other compound results from the 'elements'. Consequently, it follows that Fire and Water do not come-to-be 'out of any and every part of flesh'. For instance, although a sphere might come-to-be out of this part of a lump of wax and a pyramid out of some other part, it was nevertheless possible for either figure to have come-to-be out of either part indifferently: that is the manner of coming-to-be when 'both Fire and Water come-to-be out of any and every part of flesh'. Those, however, who maintain the theory in question, are not at liberty to conceive that 'both come-to-be out of flesh' in that manner, but only as a stone and a brick 'both come-to-be out of a wall'—viz. each out of a different place or part. Similarly (b) even for those who postulate a single matter of their 'elements' there is a certain difficulty in explaining how anything is to result from two of them taken together—e.g. from 'cold' and 'hot', or from Fire and Earth. For if flesh consists of both and is neither of them, nor again is a 'composition' of them in which they are preserved unaltered, what alternative is left except to identify the resultant of the two 'elements' with their matter? For the passing-away of either 'element' produces either the other or the matter.

确实，我们提到的这一点，甚至对于那些认为“元素”间相互生成的人都是一个问题。即“元素”之外的某物是以何种方式由“元素”生成的呢？下面我谈谈我的观点。水可以由火生成，火也可生成于水，因为它们有某种共同的基质。但是，假定肉和髓也是由它们生成的。那

么，它们是怎样生成的？（1）那些与恩培多克勒持类似观点的人会认为它们是怎样生成的？他们必定认为是像砖与石构成墙一样，是“混合物”。它们所说的“混合物”是由“元素”组成的，“元素”在其中保持不变，且以小的片段一一并列起来。或许，肉与其他每种混合物都是以这种方式产生于“元素”。这样就会推出，火和水不能“由肉的任何一个部分”生成。例如，尽管一个圆或许由这块蜡的这一部分生成，锥体由另一部分生成，然而这两种形状又都有可能由别的部分生成。这就是“火与水从肉的任一部分生成”的方式。但是，那些对此观点表示质疑的人，不会随便相信这种“都生成于肉”的生成方式，而只会认可砖石“都由墙中生成”的方式，即每一个都生成于不同部分或不同位置。（2）同样，那些主张“元素”有单一质料的人也会遇到某种困难，任一东西是怎样由两种“元素”集合起来产生的？例如产生于“冷”和“热”，或产生于火和土。因为，如果肉由此二者组成，而且既不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是它们在其中保持不变的复合物，那么，除了由两种“元素”的质料产生的东西可以识别外，剩下的是什么呢？因为，任一“元素”的消亡要么产生另一“元素”，要么产生质料。

Perhaps we may suggest the following solution. (i) There are differences of degree in hot and cold. Although, therefore, when either is fully real without qualification, the other will exist potentially; yet, when neither exists in the full completeness of its being, but both by combining destroy one another's excesses so that there exist instead a hot which (for a 'hot') is cold and a cold which (for a 'cold') is hot; then what results from these two contraries will be neither their matter, nor either of them existing in its full reality without qualification. There will result instead an 'intermediate': and this 'intermediate', according as it is potentially more hot than cold or vice versa, will possess a power-of-heating that is double or triple its power-of-cooling, or otherwise related thereto in some similar ratio. Thus all the other bodies will result from the contraries, or rather from the 'elements', in so far as these have been

'combined': while the 'elements' will result from the contraries, in so far as these 'exist potentially' in a special sense—not as matter 'exists potentially', but in the sense explained above. And when a thing comes-to-be in this manner, the process is 'combination'; whereas what comes-to-be in the other manner is matter. Moreover (ii) contraries also 'suffer a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junctively-articulated definition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part of this work. For the actually hot is potentially-cold and the actually cold potentially-hot; so that hot and cold, unless they are equally balanced, are transformed into one another (and all the other contraries behave in a similar way). It is thus, then, tha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elements' are transformed; and that (in the second place) out of the 'elements' there come-to-be flesh and bones and the like—the hot becoming cold and the cold becoming hot when they have been brought to the 'mean'. For at the 'mean' is neither hot nor cold. The 'mean', however, is of considerable extent and not indivisible. Similarly, it is qua reduced to a 'mean' condition that the dry and the moist, as well as the contraries we have used as examples, produce flesh and bone and the remaining compounds.

或许我们会思考下面的解决方案。（1）尽管热与冷在程度上有所差异。当其中一个完全真实地存在时，另一个会潜在地存在，然而，当两者都不是完全地存在，而是在破坏另一个的优势中混合起来，就会有冷的热和热的冷存在。那么从这两个相反物中产生的既非其质料，也非没有限制的现实存在中的任何一个而是会产生一个“中间物”，而且这个“中间物”会根据其潜在的热多于冷或冷多于热拥有一种加热能力，它是冷却能力的两倍或三倍，或者是其他倍。因此，其他各种物体都由相反物或者干脆从“元素”的“混合”中生成，而“元素”由相反物生成，这些相反物在特殊意义上“潜在地存在”时，当然不是像质料“潜在地存在”一样，而是在上述意义上。当一物以此种方式生成，其过程就是“混合”，而以另外方式生成的是质料。（2）但按

本文先前所定义的，相反物也“承受动作”。因为实际上的冷潜在有热，实际上的热潜在有冷，以至于除非二者达到平衡，否则热与冷会向对方转化（各种其他的相反物都是这样）。因此，首先，“元素”是变化的；其次，当热变冷，冷变热，热和冷均置于“中间”状态时，肉、骨之类的东西由“元素”生成。因为“中间”既不是热也不是冷。而这个“中间”具有广延性，并且不可分割。同样，也是在达到“中间”状况时，干与湿以及其他我们引用过的相反物会生成肉、骨和其他混合物。

Chapter 8

第八章

All the compound bodies—all of which exist in the region belonging to the central body—are composed of all the 'simple' bodies. For they all contain Earth because every 'simple' body is to be found specially and most abundantly in its own place. And they all contain Water because (a) the compound must possess a definite outline and Water, alone of the 'simple' bodies, is readily adaptable in shape: moreover (b) Earth has no power of cohesion without the moist. On the contrary, the moist is what holds it together; for it would fall to pieces if the moist were eliminated from it completely.

所有存在于中心体区域范围的混合物都是由一切“简单”物组成的。它们都含有土，因为每个“简单”物都尤其会在它们自己的地点大量地被发现。它们都含有水，因为（1）混合物必定有明确的轮廓，而水在“简单”物中最易于适应各种形状，（2）土没有湿则无黏合力。相反，湿使它黏合在一起，因为如果湿被彻底消除，土就会裂成碎片。

They contain Earth and Water, then, for the reasons we have given: and they contain Air and Fire, because these are contrary to Earth and Water (Earth being contrary to Air and Water to Fire, in so far as one Substance can be 'contrary' to another). Now all compounds presuppose in their coming-to-be constituents which are contrary to one another: and in all compounds there is contained one set of the contrasted extremes. Hence the other set must be contained in them also, so that every compound will include all the 'simple' bodies.

那么，由于我们给出的原因，混合物含有土和水。而且它们还含有气和火，这是因为此二者与土和水相反（土相反于气，水相反于火，而一个实体能与另一个实体相反）。假定各种混合物在与其相反的它们的生成物中，且在各种混合物中都已包含了相反的一极。因此另一极也必定包含其中，所以每个混合物都会包含各种“简单”物。

Additional evidence seems to be furnished by the food each compound takes. For all of them are fed by substances which are the same as their constituents, and all of them are fed by more substances than one. Indeed, even the plants, though it might be thought they are fed by one substance only, viz. by Water, are fed by more than one: for Earth has been mixed with the Water. That is why farmers too endeavour to mix before watering. Although food is akin to the matter, that which is fed is the 'figure'—i.e. the 'form' taken along with the matter. This fact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why, whereas all the 'simple' bodies come-to-be out of one another, Fire is the only one of them which (as our predecessors also assert) 'is fed'. For Fire alone—or more than all the rest—is akin to the 'form' because it tends by nature to be borne towards the limit. Now each of them naturally tends to be borne towards its own place; but

the 'figure'—i.e. the 'form'—Of them all is at the limits.

每个混合物具有的养分也会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因为所有混合物都由它们由以构成的养分所供养，都由与其相同的不止一种实体所供养。确实，即使是植物，尽管人们也许认为它们只需要一种养分，即水，但其实它们也要多种养分，因为土已经与水混合。所以，农民在浇水时也会努力使二者混合。既然养分类似于质料，被供养者就是与质料同在的“形式”。这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火是它们中唯一“被供养”的一种（正如以前哲学家们认为的那样），而其他各种“简单”物都相互生成。因为火比其他“简单”物更类似于“形式”：它更自然地向边界移动。每一种简单物都自然地趋向自己的位置，但是它们的“形状”（如形式）都在边界之内。

Thus we have explained that all the compound bodies are composed of all the 'simple' bodies.

因此我们已经说明了，所有混合物是由一切“简单”物组成的。

Chapter 9

第九章

Since some things are such as to come-to-be and pass-away, and since coming-to-be in fact occurs in the region about the centre, we must explain the number and the nature of the 'originative sources' of all coming-to-be alike: for a grasp of the true theory of any universal facilitates the understanding of its specific forms.

既然一些东西就是这样生成与消亡，既然生成实际上发生在中心附近区域，我们就必须解释清楚所有类似生成的“本原”的数目与本质。因为把握普遍理论有利于掌握其特殊的形式。

The 'originative sources', then, of the things which come-to-be are equal in number to, and identical in kind with, those in the sphere of the eternal and primary things. For there is one in the sense of 'matter', and a second in the sense of 'form': and, in addition, the third 'originative source' must be present as well. For the two first are not sufficient to bring things into being, any more than they are adequate to account for the primary things.

那么，生成物的“本原”与处于永恒物和原初物区域的东西在数量上相等，种类上同一。因为第一个是“质料”意义上的，第二个是“形式”意义上的，此外，第三个“本原”也要同样呈现出来。前两个不足以使物存在，它们都不足以说明原初物。

Now cause, in the sense of material origin, for the things which are such as to come-to-be is 'that which can be-and-not-be': and this is identical with 'that which can come-to-be-and-pass-away', since the latter, while it is at one time, at another time is not. (For whereas some things are of necessity, viz. the eternal things, others of necessity are not. And of these two sets of things, since they cannot diverge from the necessity of their nature,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first not to be and impossible for the second to be. Other things, however, can both be and not be.) Hence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must occur within the field of 'that which can be-and not-be'. This, therefore, is cause in the sense of material origin for the things which are such as to come-to-be; while cause, in the

sense of their 'end', is their 'figure' or 'form'—and that is the formula expressing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each of them.

因为在质料本原的意义上，生成的东西“既存在又不存在”，等于是说“它能生成与消亡”，而后者有时如此，有时又不是这样。（因为一些东西必然存在，如永恒物，而另外的东西就不一定了。这两类东西，由于不能从其本身必然性中找到差异，第一个就不可能不存在，第二个就不可能存在。但是，还有些东西则可以都在或都不在。）因此，生成和消亡一定发生在那个“可以在和可以不在”的领域。所以，这就是质料意义上生成物的本原，而在“终结”意义上是它们的“形状”或“形式”——这就是表明它们各自实质的原理。

But the third 'originative source' must be present as well—the cause vaguely dreamed of by all our predecessors, definitely stated by none of them. On the contrary (a) some amongst them thought the nature of 'the Forms' was adequate to account for coming-to-be. Thus Socrates in the Phaedo first blames everybody else for having given no explanation; and then lays it down; that 'some things are Forms, others Participants in the Forms', and that 'while a thing is said to “be” in virtue of the Form, it is said to “come-to-be” qua sharing in, to “pass-away” qua “losing” the “Form”'. Hence he thinks that 'assuming the truth of these theses, the Forms must be causes both of coming-to-be and of passing-away'. On the other hand (b) there were others who thought 'the matter' was adequate by itself to account for coming-to-be, since 'the movement originates from the matter'.

但是第三个“本原”也必定存在，我们先前的哲学家只是作了大概构想，并没有进行明确阐述。相反，（1）他们中有些人认为“形

式”的本质就足以说明生成。因此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首次批评了没有人对这个问题予以解释，然后他指出，“一些东西是形式，而另一些参与形式构成”，“一物由于形式被说成是‘存在’，一物由于参与形式构成被说成是‘生成’，一物由于‘失去’‘形式’的东西被说成是‘消亡’”。因此，他认为，“假定这些理论成立，形式就必定是生成与消亡的原因”。（2）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质料”本身就足以说明生成，因为“移动源于质料”。

Neither of these theories, however, is sound. For (a) if the Forms are causes, why is their generating activity intermittent instead of perpetual and continuous—since there always are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Forms? Besides, in some instances we see that the cause is other than the Form. For it is the doctor who implants health and the man of science who implants science, although 'Health itself' and 'Science itself' are as well as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everything else that is produced in accordance with an art. On the other hand (b) to say that 'matter generates owing to its movement' would be, no doubt, more scientific than to make such statements as are made by the thinkers we have been criticizing. For what alters and transfigures plays a greater part in bringing, things into being; and we are everywhere accustomed, in the products of nature and of art alike, to look upon that which can initiate movement as the producing cause. Nevertheless this second theory is not right either.

然而，这些理论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因为（1）如果形式是原因，又总有形式构成的参与者，为什么它们的生成活动不是持续进行，而是断断续续？此外，在一些情况下，我们看到原因不只有形式一种。因为正是医生带来健康，科学家传播知识，尽管“健康本身”和“科学本身”与它们的分有物都存在。依照技艺而产生的其他活动

也遵循这样的原则。（2）另一方面，认为“质料由于移动而生成”毫无疑问要比一些我们批评的人所言说的观点更科学。因为性质更替和形状改变在事物生成中能发挥更大作用，而且，在自然生成的和类似由技艺而生成的产品中，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能产生移动的东西看作生成的原因。然而，第二个理论也不正确。

For, to begin with,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matter to suffer action, i.e. to be moved: but to move, i.e. to act, belongs to a different 'power'. This is obvious both in the things that come-to-be by art and in those that come to-be by nature. Water does not of itself produce out of itself an animal: and it is the art, not the wood, that makes a bed. Nor is this their only error. They make a second mistake in omitting the more controlling cause: for they eliminate the essential nature, i.e. the 'form'. And what is more, since they remove the formal cause, they invest the forces they assign to the 'simple' bodies—the forces which enable these bodies to bring things into being—with too instrumental a character. For since (as they say) 'it is the nature of the hot to dissociate, of the cold to bring together, and of each remaining contrary either to act or to suffer action', it is out of such materials and by their agency (so they maintain) that everything else comes-to-be and passes-away. Yet (a) it is evident that even Fire is itself moved, i.e. suffers action. Moreover (b) their procedure is virtually the same as if one were to treat the saw (and the various instruments of carpentry) as 'the cause' of the things that come-to-be: for the wood must be divided if a man saws, must become smooth if he planes, and so on with the remaining tools. Hence, however true it may be that Fire is active, i.e. sets things moving, there is a further point they fail to observe—viz. that Fire is inferior to the tools or instruments in the manner in which it sets things moving.

因为，首先，质料的性质是承受，例如被移动。但是移动，例如行动，属于另外一种不同的“能力”。这一点在由于技艺而生成的和自然生成的两种事物中都十分明显。水本身不会由自己生成一只动物，而且不是木头而是技艺造就了一张床。他们的错误还不止于此。由于忽略了更多的控制因素，他们犯了第二个错误：他们忽略了本质，例如“形式”的东西。而且，由于他们忽略了形式因，他们赋予“简单”物的力量就过于工具化了，而正是这些力量使事物存在。因为（正如他们所说），“既然热的本质是分离，冷的本质是联合，其余每对相反物都是一方行动，一方承受”，正是由于这样的质料以及这些质料的行为（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才有了其他事物的生成与消亡。然而，（1）显然即使是火，自身也被移动，例如承受动作。此外，（2）他们的做法无异于一个人把锯子（和其他木匠工具）当作事物生成的“原因”，因为如果一个人锯木头，木头就会分开，如果刨木头，木头就会光滑，其他工具也会有相应的效果。然而，无论如何，火是能动者，例如可使物移动，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即在使物移动的方式上，火还不如那些工具。

Chapter 10

第十章

As to our own theory—we have given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causes in an earlier work, we have now explained and distinguished the 'matter' and the 'form'. Further, since the change which is motion has been proved to be eternal, the continuity of the occurrence of coming-to-be follows necessarily from what we have established: for the eternal motion, by causing 'the generator' to approach and retire, will produce coming-to-be uninterruptedl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clear that we were right when, in an earlier work, we called motion (not coming-to-be) 'the primary form of change'. For it is far more reasonable that what is should cause the

coming-to-be of what is not, than that what is not should cause the being of what is. Now that which is being moved is, but that which is coming-to-be is not: hence, also, motion is prior to coming-to-be.

对于我们自己的理论，我们已经在先前作品中对原因作了总体说明，现在我们来解释和辨析“质料”与“形式”。此外，既然作为移动的改变已经被证明是永恒的，那么生成发生的持续性也一定是必然的，因为永恒移动不断接近和离开“发生者”，所以将产生持续不断的生成。同时，显然在先前的作品中，将移动（不是生成）叫做“改变的最初形式”是正确的。因为存在生成非存在要比非存在生成存在要合理许多。被移动的存在要优先于正在生成的非存在，因此移动先于生成。

We have assumed, and have proved, that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happen to things continuously; and we assert that motion causes coming-to-be. That being so, it is evident that, if the motion be single, both processes cannot occur since they are contrary to one another: for it is a law of nature that the same cause, provided it remain in the same condition, always produces the same effect, so that, from a single motion, either coming-to-be or passing-away will always result. The movements must, on the contrary, be more than one, and they must be contrasted with one another either by the sense of their motion or by its irregularity: for contrary effects demand contraries as their causes.

我们已经假设并且证明，事物在不断地生成和消亡，我们可以断言是移动引起生成的。那么，显然如果移动是单一的，由于它们各自相反，两个过程就不会发生，因为自然法则决定了同样的原因在同等条件下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所以从一个单一的移动，总是产生同样

的生成与消亡。但是相反地，移动必定不止一个，它们必定从移动的意义或是不规则性上互相对立，因为相反的结果要求由相反物作为其原因。

This explains why it is not the primary motion that causes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but the motion along the inclined circle: for this motion not only possesses the necessary continuity, but includes a duality of movements as well. For if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are always to be continuous, there must be some body always being moved (in order that these changes may not fail) and moved with a duality of movements (in order that both changes, not one only, may result). Now the continuity of this movement is caused by the motion of the whole: but the approaching and retreating of the moving body are caused by the inclination. For the consequence of the inclination is that the body becomes alternately remote and near; and since its distance is thus unequal, its movement will be irregular. Therefore, if it generates by approaching and by its proximity, it—this very same body—destroys by retreating and becoming remote: and if it generates by many successive approaches, it also destroys by many successive retirements. For contrary effects demand contraries as their causes; and the natural processes of passing-away and coming-to-be occupy equal periods of time. Hence, too, the times—i.e. the lives—of the several kinds of living things have a number by which they are distinguished: for there is an Order controlling all things, and every time (i.e. every life) is measured by a period. Not all of them, however, are measured by the same period, but some by a smaller and others by a greater one: for to some of them the period, which is their measure, is a year, while to some it is longer and to others shorter.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是最初的移动而是沿着偏斜的圆周移动才能产生生成与消亡，因为后者不仅具有必然的持续性，同时包含了双重移动。因为如果生成和消亡总是持续的，必定有一些物体总在移动（以获得这些改变），也一定有双重移动（以使得发生不止一种改变）。移动的持续性源于整体的移动，而移动物体的接近与退去是由于偏斜移动。因为偏斜移动的结果是物体不断变远、变近，由于距离不等，其移动也不规则。因此，如果它通过接近和邻近而生成，这同一物体也就通过撤退和远离而破坏，如果它通过多次持续的接近而生成，它也就通过多次持续的远离而破坏。因为相反的结果要求由相反物作为其原因，而生成与消亡的自然过程会用去同样多的时间。因此，多种生物的生命周期也会各自不同，因为存在一种控制众物的秩序，每一段时间（如每一种生命）都可以用一个时期来量度。但不是各种生命都用同样的时间来衡量，而是有一些用更小的时间段，有一些则更长。因为有些时间的量度是一年，而一些更长，另外一些更短。

And there are facts of observation in manifest agreement with our theories. Thus we see that coming-to-be occurs as the sun approaches and decay as it retreats; and we see that the two processes occupy equal times. For the durations of the natural processes of passing-away and coming-to-be are equal. Nevertheless it often happens that things pass-away in too short a time. This is due to the 'intermingling' by which the things that come-to-be and pass-away are implicated with one another. For their matter is 'irregular', i.e. is not everywhere the same: hence the processes by which they come-to-be must be 'irregular' too, i.e. some too quick and others too slow. Consequently the phenomenon in question occurs, because the 'irregular' coming-to-be of these things is the passing-away of other things.

我们观察到一些事实，它们和我们的理论显然是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到，当太阳离得近时，就会发生生成；当太阳离得远时，就会发生消亡，而且这两个过程所用时间一样长。因为生成与消亡的自然过程时间长度是相等的。而且通常事物的消亡更快一些。这是因为“相互混合”使生成与消亡的事物之间彼此影响。因为它们的质料“不规则”，即不是每处都相同，因此它们生成的过程必定也“不规则”——有些太快，有些则太慢。因为这些事物“不规则”的生成是其他事物的消亡，所以就发生了让人疑惑的现象。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will, as we have said, always be continuous, and will never fail owing to the cause we stated. And this continuity has a sufficient reason on our theory. For in all things, as we affirm, Nature always strives after 'the better'. Now 'being' (we have explained elsewhere the exact variety of meanings we recognize in this term) is better than 'not-being': but not all things can possess 'being', since they are too far removed from the 'originative source'. God therefore adopted the remaining alternative, and fulfilled the perfection of the universe by making coming-to-be uninterrupted: for the greatest possible coherence would thus be secured to existence, because that 'coming-to-be should itself come-to-be perpetually' is the closest approximation to eternal being.

正如我们所说，生成与消亡总是连续不断的，而且由于我们提到的原因，这个过程总在发生。在理论中我们对此持续性给出了充足的理由。因为正如我们认为的，各种事物的本性总是追求“更好”。“存在”总是比“非存在”更好（我们已经在别处说过了存在的多种含义），但是不是各种事物都能拥有其“存在”，因为它们过于远离“本原”。因此，神接纳了余下的更替物，通过使生成不间断实现了宇宙的完美，因为存在将获得最大可能的联合，原因在于“本身连续生成的生成”才

最接近永恒存在。

The cause of this perpetuity of coming-to-be, as we have often said, is circular motion: for that is the only motion which is continuous. That, too, is why all the other things—the things, I mean, which are reciprocally transformed in virtue of their 'passions' and their 'powers of action' e.g. the 'simple' bodies imitate circular motion. For when Water is transformed into Air, Air into Fire, and the Fire back into Water, we say the coming-to-be 'has completed the circle', because it reverts again to the beginning. Hence it is by imitating circular motion that rectilinear motion too is continuous.

正如我们常说的，生成持续性的原因是圆周移动，因为这是唯一的持续移动。这也就是其他各种东西——那些凭借其“特性”和“行动力”而相互转化的“简单”物按照圆周移动的原因。因为当水变成气，气变成火，火又变回水，生成又回到了开始，即“完成了一个周期”。因此，通过模仿圆周移动，直线移动也是连续的了。

These considerations serve at the same time to explain what is to some people a baffling problem—viz. why the 'simple' bodies, since each them is travelling towards its own place, have not become dissevered from one another in the infinite lapse of time. The reason is their reciprocal transformation. For, had each of them persisted in its own place instead of being transformed by its neighbour, they would have got dissevered long ago. They are transformed, however, owing to the motion with its dual character: and because they are transformed, none of them is able to persist in any place allotted to it by the Order.

这样的思考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困惑一些人的问题，即既然每个“简单”物都向自己的位置移动，为什么没有在无限的时间里彼此分离。因为它们发生了相互转化。如果它们每个都坚守在自己的位置而不向近邻转化，它们早就分离开来了。然而，它们由于双重移动而转化了，而且因为它们被转化了，所以没有一个能留在自己本来的位置上。

It is clear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i) that coming-to-be and passing-away actually occur, (ii) what causes them, and (iii) what subject undergoes them. But (a) if there is to be movement (as we have explained elsewhere, in an earlier work)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hich initiates it; if there is to be movement always, there must always be something which initiates it; if the movement is to be continuous, what initiates it must be single, unmoved, ungenerated, and incapable of 'alteration'; and if the circular movements are more than one, their initiating causes must all of them, in spite of their plurality, be in some way subordinated to a single 'originative source'. Further (b) since time is continuous, movement must be continuous, inasmuch as there can be no time without movement. Time, therefore, is a 'number' of some continuous movement—a 'number', therefore, of the circular movement, as was established in the discussions at the beginning. But (c) is movement continuous because of the continuity of that which is moved, or because that in which the movement occurs (I mean, e.g. the place or the quality) is continuous? The answer must clearly be 'because that which is moved is continuous'. (For how can the quality be continuous except in virtue of the continuity of the thing to which it belongs? But if the continuity of 'that in which' contributes to make the movement continuous, this is true only of 'the place in which'; for that has 'magnitude' in a sense.) But (d)

amongst continuous bodies which are moved, only that which is moved in a circle is 'continuous' in such a way that it preserves its continuity with itself throughout the movement. The conclusion therefore is that this is what produces continuous movement, viz. the body which is being moved in a circle; and its movement makes time continuous.

从上述内容可清楚得知，（1）生成和消亡确实会发生，（2）也看到了导致它们发生的原因以及（3）经历这一过程的主体。但是（1）（如我们在先前作品所解释的那样，）如果存在移动，那么必定有移动者。如果总是存在移动，就必定总有一个移动者。如果移动是连续的，那么移动者必定是简单的、不动的、自在的而且是不能“更替”的。如果圆周移动不止一种，那么它们移动的原因，尽管有很多，但都必定以某种方式附属于一种单一“本原”；（2）由于时间是连续的，移动必定是连续的，所以不存在没有移动的时间。而时间是一些持续移动的“值”，即圆周移动的“值”，正如我们在开始讨论时所确立的；（3）但是，持续移动是由于被移动者的持续呢，还是由于移动发生于其中的环境（如位置或性质等）的持续呢？显然，答案必定是“由于被移动者的持续”；（因为除非凭借所属之物的持续性，性质是不能够持续的。但是如果其“环境的”持续性导致移动的持续，也就只适合描述它“所在的位置”，因为它具有某种“大小”。）（4）但是在移动的持续物中，只有以圆周方式移动的那个以某种方式“持续”着，这种方式通过移动使它持续保持其自身。所以，结论为：以圆周移动的物体产生持续移动，其移动让时间连续。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Wherever there is continuity in any process (coming-to-be or

'alteration' or any kind of change whatever) we observe 'consecutiveness', i.e. this coming-to-be after that without any interval. Hence we must investigate whether, amongst the consecutive members, there is any whose future being is necessary; or whether, on the contrary, every one of them may fail to come-to-be. For that some of them may fail to occur, is clear. (a) We need only appeal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tatements 'x will be' and 'x is about to' which depends upon this fact. For if it be true to say of x that it 'will be', it must at some time be true to say of it that 'it is': whereas, though it be true to say of x now that 'it is about to occur', it is quite possible for it not to come-to-be-thus a man might not walk, though he is now 'about to' walk. And (b) since (to appeal to a general principle) amongst the things which 'are' some are capable also of 'not-being', it is clear that the same ambiguous character will attach to them no less when they are coming-to-be: in other words, their coming-to-be will not be necessary.

无论任何过程存在持续（生成或“更替”或其他类型改变的），我们都可以观察到“持续性”，例如这个生成接着那个生成，没有任何中断。因此我们必须考察，在持续的对象中，是否有将必然生成的东西，或者，相反的，是否它们哪一个都不会生成。因为，显然其中一些不会发生。（1）正是基于此，我们需要清楚“将生成”和“预计生成”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区别。因为如果说某物“将存在”，它就必定会在某个时间“存在”，而尽管说“某物预计会生成”，但是很有可能它不会生成。例如尽管一个人现在“预计会去”走路，但他可能没走。（2）而且（总体而言）由于“存在”物中的一些也会“不存在”，显然在生成之时，也会发生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也就是说，其生成不是必然的。

Then are all the things that come-to-be of this contingent

character? Or, on the contrary, is it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some of them to come-to-be? Is there, in fact, a distinction in the field of 'coming-to-be' corresponding to the distinction, within the field of 'being', between things that cannot possibly 'not-be' and things that can 'not-be'? For instance, is it necessary that solstices shall come-to-be, i.e. impossible that they should fail to be able to occur?

那么，各种生成之物都有这样偶然的性质吗？或者，不是这样，而是有一些会绝对必然地生成吗？事实上，像在“生成”问题上有差异一样，在“存在”问题上，事物是否也有“不能不存在”与“可能不存在”之间的差异呢？例如，冬至和夏至必定会发生，而不可能不发生。

Assuming that the antecedent must have come-to-be if the consequent is to be (e.g. that foundations must have come-to-be if there is to be a house: clay, if there are to be foundations), is the converse also true? If foundations have come-to-be, must a house come-to-be? The answer seems to be that the necessary nexus no longer holds, unless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consequent (as well as for the antecedent) to 'come-to-be-necessary' absolutely. If that be the case, however, 'a house must come to-be if foundations have come-to-be', as well as vice versa. For the antecedent was assumed to be so related to the consequent that, if the latter is to be, the antecedent must have come-to-be before it. If,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consequent should come-to-be, the antecedent also must have come-to-be: and if the antecedent has come-to-be, then the consequent also must come-to-be-not, however, because of the antecedent, but because the future being of the consequent was assumed as necessary. Hence, in any sequence, when the being of the consequent is necessary, the nexus is reciprocal—in other

words, when the antecedent has come-to-be the consequent must always come-to-be too.

假设后在的东西存在，那么先在的东西必然已经存在（例如房屋存在，就必然有地基存在，而有地基就必然有黏土），那么，反过来成立吗？如果地基有了，就一定会有房屋吗？答案似乎不是必然的，除非对于后在的来说（与先在的一样）都绝对“必然地生成”。如果是这样，“有地基就有房屋”，反过来也成立。因为先在者的存在被认为与后在者相关，如果后在者存在，则先在者必定先于它而生成。因此，如果后在者必然生成的话，先在者必定已经生成，如果先在者已经生成，则后在者也必定生成，但是，不是因为先在者，而是因为后在者未来的存在被假定为是必然的。因此，在任何序列中，当后在者的存在是必然的，联系就是相互的，换句话说，当先在者已经生成，后在者必定也总会生成。

Now (i) if the sequence of occurrences is to proceed ad infinitum 'downwards', the coming to-be of any determinate 'this' amongst the later members of the sequence will not be absolutely, but only conditionally, necessary. For it will always be necessary that some other member shall have come-to-be before 'this' as the presupposed condition of the necessity that 'this' should come-to-be: consequently, since what is 'infinite' has no 'originative source', neither will there be in the infinite sequence any 'primary' member which will make it 'necessary' for the remaining members to come-to-be.

（1）如果把发生的序列无限“向后”推演，任何既定的后在的“生成”都不是绝对必然的，而只是有条件地必然发生。因为，总是必然会有其他的先于“这个”而生成，来作为“这个”必然生成的假定条件。

结果，由于“无限”的东西没有“本原”，就没有哪一个在无限推演中成为使其他生成必然发生的“原初”者。

Nor again (ii) will it be possible to say with truth, even in regard to the members of a limited sequence, that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any one of them to come-to-be. We cannot truly say, e.g. that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a house to come-to-be when foundations have been laid': for (unless it is always necessary for a house to be coming-to-be) we should be faced with the consequence that, when foundations have been laid, a thing, which need not always be, must always be. No: if its coming-to-be is to be 'necessary', it must be 'always' in its coming-to-be. For what is 'of necessity' coincides with what is 'always', since that which 'must be' cannot possibly 'not-be'. Hence a thing is eternal if its 'being' is necessary: and if it is eternal, its 'being' is necessary. And if, therefore, the 'coming-to-be' of a thing is necessary, its 'coming-to-be' is eternal; and if eternal, necessary.

（2）甚至关于一个有限序列的推演，也都不可能说哪一个对其他任何的生成具有“绝对的必然性”。例如，不能说“有了地基，就绝对一定有房屋生成”，因为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结果，有了地基，一个不必总是存在的东西必定总是存在（除非它对于房屋生成总是必然的）。但不是这样的，如果它的生成是“必然”的，它就必定“总是”在生成中了。因为有“必然性的”东西同时也就是“总是”的东西，因为必定存在的不可能“不存在”。因此如果某物的“存在”是必然的，它就是永恒的，如果它是永恒的，其“存在”就是必然的。所以，如果一物的“生成”是必然的，其“生成”就是永恒的，反之亦然。

It follows that the coming-to-be of anything, if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must be cyclical—i.e. must return upon itself. For coming-to-be must either be limited or not limited: and if not limited, it must be either rectilinear or cyclical. But the first of these last two alternatives is impossible if coming-to-be is to be eternal, because there could not be any 'originative source' whatever in an infinite rectilinear sequence, whether its members be taken 'downwards' (as future events) or 'upwards' (as past events). Yet coming-to-be must have an 'originative source' (if it is to be necessary and therefore eternal), nor can it be eternal if it is limited. Consequently it must be cyclical. Hence the nexus must be reciprocal. By this I mean that the necessary occurrence of 'this' involves the necessary occurrence of its antecedent: and conversely that, given the antecedent,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the consequent to come-to-be. And this reciprocal nexus will hold continuously throughout the sequence: for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ether the reciprocal nexus, of which we are speaking, is mediated by two, or by many, members.

那么就可以推出，如果任何一物的生成是绝对必然的，它必定是循环着的，即必定会返回自身。因为生成必定要么是有限制的，要么是没有限制的，如果是后者，它必定要么是直线式，要么是圆周式的。但是，如果生成是永恒的，这最后两种更替的第一种不可能发生，因为无论在怎样的一个无限的直线序列中，不管我们“向下”看（如未来事件），还是“向上”看（如过去事件）都不可能有任何“本原”。然而，生成必定有一个“本原”（如果它是必然的从而是永恒的），如果它是有限制的，就不可能永恒。所以，它必定是圆周式的。因此，其联系必定是相互的。据此，我认为“这个”的必然发生包含着其先在者的必然发生，反过来，给定了先在者，后在者也就必然发生。这个相互关系通过序列不断延续，因为不管我们所说的是两者还是多者，其间的相互关系都没有区别。

It is in circular movement, therefore, and in cyclical coming-to-be that the 'absolutely necessary' is to be found. In other words, if the coming-to-be of any things is cyclical, it is 'necessary' that each of them is coming-to-be and has come-to-be: and if the coming-to-be of any things is 'necessary', their coming-to-be is cyclical.

所以，正是在圆周移动和循环式生成中，才能发现“绝对必然”。换句话说，如果事物的生成是循环式的，那么其中每一个正在生成的和已经生成的都是“必然”的，如果事物的生成是“必然”的，其生成就是循环式的。

The result we have reached is logically concordant with the eternity of circular motion, i.e. the eternity of the revolution of the heavens (a fact which approved itself on other and independent evidence), since precisely those movements which belong to, and depend upon, this eternal revolution 'come-to-be' of necessity, and of necessity 'will be'. For since the revolving body is always setting something else in motion, the movement of the things it moves must also be circular. Thus, from the being of the 'upper revolution' it follows that the sun revolves in this determinate manner; and since the sun revolves thus, the seasons in consequence come-to-be in a cycle, i.e. return upon themselves; and since they come-to-be cyclically, so in their turn do the things whose coming-to-be the seasons initiate.

这个结果与圆周移动的永恒性在逻辑上一致，即天体移动是永恒的（这一事实已经为其他独立证据所证明），因为它所进行的移动和由此而引起的移动都必然“生成”，也必然会“将存在”。因为，由于旋转的物体总是使他物移动，它所推动的物体的移动也必定是圆周式

的。因此，它所跟随的“高处旋转”的存在使太阳以其既定方式旋转，由于太阳的旋转，四季就循环生成，即返回自身。四季的循环交替又推动了事物的顺次生成。

Then why do some things manifestly come to-be in this cyclical fashion (as, e.g. showers and air, so that it must rain if there is to be a cloud and, conversely, there must be a cloud if it is to rain), while men and animals do not 'return upon themselves' so that the same individual comes-to-be a second time (for though your coming-to-be presupposes your father's, his coming-to-be does not presuppose yours)? Why, on the contrary, does this coming-to-be seem to constitute a rectilinear sequence?

那么，为什么有些事物明显地以这种循环方式生成（例如雨和气，如果有云就会有雨，反过来，如果有雨必定有云），而人和动物就不“返回自身”，也就是同一个人不会第二次生成（因为即使你的生成是由于有你的父亲，但是你父亲的生成不必定有你的生成）呢？相反地，为什么这个生成似乎形成一种直线序列呢？

In discussing this new problem, we must begin by inquiring whether all things 'return upon themselves' in a uniform manner; or whether, on the contrary, though in some sequences what recurs is numerically the same, in other sequences it is the same only in species. In consequence of this distinction, it is evident that those things, whose 'substance'—that which is undergoing the process—is imperishable, will be numerically, as well as specifically, the same in their recurrence: for the character of the process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 of that which undergoes it. Those things, on the other hand, whose 'substance' is perish, able (not imperishable) must

'return upon themselves' in the sense that what recurs, though specifically the same, is not the same numerically. That why, when Water comes-to-be from Air and Air from Water, the Air is the same 'specifically', not 'numerically': and if these too recur numerically the same, at any rate this does not happen with things whose 'substance' comes-to-be-whose 'substance' is such that it is essentially capable of not-being.

为了讨论这个新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质疑是否所有事物都以统一的方式“返回自身”，或者相反，即使在一些序列中，循环的发生在数量上同一，在另外的序列中，其发生只在种类上同一。这样区别之后会发现，显然那些拥有永恒“实体”的事物（正在经历发生的过程），其循环发生会在数目上同一，因为，这一过程的性质决定于发生主体的性质。而另一方面，那些消亡的（不是永恒的）“实体”必定会在再次发生时“返回自身”，尽管种类上同一，但不在数目上同一。因此，当水生成于气，气生成于水，气在“种类上”而不是“数目上”同一。如果它们在再次发生时在数目上同一，就无论如何也不适于那些由本质上不存在的“实体”所生成的事物了。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Conquest of Bread
面包与自由

Peter Alexevich Kropotkin

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面包与自由

The Conquest of Bread

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CHAPTER I OUR RICHES 第一章　我们的财富
- CHAPTER II WELL-BEING FOR ALL 第二章　全民幸福
- CHAPTER III ANARCHIST COMMUNISM 第三章　无政府共产主义
- CHAPTER IV EXPROPRIATION 第四章　充公
- CHAPTER V FOOD 第五章　食物
- CHAPTER VI DWELLINGS 第六章　住房
- CHAPTER VII CLOTHING 第七章　衣服
- CHAPTER VIII WAYS AND MEANS 第八章　生产方式和手段
- CHAPTER IX THE NEED FOR LUXURY 第九章　对奢侈品的需求
- CHAPTER X AGREEABLE WORK 第十章　愉快的劳动
- CHAPTER XI FREE AGREEMENT 第十一章　自由协议
- CHAPTER XII OBJECTIONS 第十二章　反对观点
- CHAPTER XIII THE COLLECTIVIST WAGES SYSTEM 第十三章　集体主义者的工资制
- CHAPTER XIV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第十四章　消费与生产
- CHAPTER XV THE DIVISION OF LABOUR 第十五章　劳动分工
- CHAPTER XVI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INDUSTRY 第十六章　工业的分散
- CHAPTER XVII AGRICULTURE 第十七章　农业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CHAPTER I OUR RICHES

第一章　我们的财富

I

一

The human race has travelled a long way, since those remote ages when men fashioned their rude implements of flint and lived on the precarious spoils of hunting, leaving to their children for their only heritage a shelter beneath the rocks, some poor utensils—and Nature, vast, unknown, and terrific, with whom they had to fight for their wretched existence.

人类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在远古时代，人们制造出粗糙的石器，依靠不稳定的狩猎所得维持生计，留给子孙的唯一遗产不过是可以遮风避雨的岩洞和几件粗糙的燧石工具——还有大自然，那么广袤无垠、神秘莫测和令人生畏，人类为了悲惨的生存，不得不与其斗争。

During the long succession of agitated ages which have elapsed since, mankind has nevertheless amassed untold treasures. It has cleared the land, dried the marshes, hewn down forests, made roads, pierced mountains; it has been building, inventing, observing, reasoning; it has created a complex machinery, wrested her secrets from Nature, and finally it pressed steam and electricity into its service. And the result is, that now the child of the civilized man finds at its birth, ready for its use, an immense capital

accumulated by those who have gone before him. And this capital enables man to acquire, merely by his own labour combined with the labour of others, riches surpassing the dreams of the fairy tales of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在随后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人类竟然积累下数不尽的财富。人类开垦土地，排干沼泽，砍伐森林，修建道路，开山劈石；人类不断地建造、发明、观察、推理；人类创造出了复杂的机械，破解了大自然的秘密，并最终使蒸汽和电力为人类效力。结果，现在文明社会的孩子一出世就可以享用有前人所积累的巨大资本。这些资本使人类只需将自己的劳动和他人的劳动联合起来，便能获得大量的财富，《天方夜谭》里的神话故事中编织的财富也无法与之相比。

The soil is cleared to a great extent, fit for the reception of the best seeds, ready to give a rich return for the skill and labour spent upon it—a return more than sufficient for all the wants of humanity. The methods of rational cultivation are known.

土地经过精心开垦，适于播种优良的种子，它们随时准备能对人类所付出的辛劳智慧给予丰厚的回报——远远超出人类的一切需求。人类现在已经掌握了合理的耕作方法。

On the wide prairies of America each hundred men, with the aid of powerful machinery, can produce in a few months enough wheat to maintain ten thousand people for a whole year. And where man wishes to double his produce, to treble it, to multiply it a hundred-fold, he makes the soil, gives to each plant the requisite care, and thus obtains enormous returns. While the hunter of old

had to scour fifty or sixty square miles to find food for his family, the civilized man supports his household, with far less pains, and far more certainty, on a thousandth part of that space. Climate is no longer an obstacle. When the sun fails, man replaces it by artificial heat; and we see the coming of a time when artificial light also will be used to stimulate vegetation. Meanwhile, by the use of glass and hot water pipes, man renders a given space ten and fifty times more productive than it was in its natural state.

在美洲广阔的大草原上，每一百个劳动力借助强大机械在几个月之内生产出的小麦，足够一万人整整吃上一年。如果人们希望产量两倍、三倍或数百倍地增长，就会改良土壤，精心护理每一株农作物，如此便能得到巨大收获。古时的猎人为了养活全家，不得不寻遍五六十平方英里，而文明社会中的人要养活全家，走古时猎人千分之一的路程就足够了，花费的力气要小得多，把握也大得多。如今气候也不再是障碍。如果日照不足，人们可以人工加热，并且我们即将迎来用人造光来为作物提供光照的时代。与此同时，在人们使用气压计和热水管的时候，土地的产出与自然状态下相比高出了十倍乃至五十倍。

The prodigies accomplished in industry are still more striking.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ose intelligent beings, modern machines—themselves the fruit of three or four generations of inventors, mostly unknown—a hundred men manufacture now the stuff to provide ten thousand persons with clothing for two years. In well-managed coal mines the labour of a hundred miners furnishes each year enough fuel to warm ten thousand families under an inclement sky. And we have lately witnessed the spectacle of wonderful cities springing up in a few months f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without interrupting in the slightest degree the regular work of the nations.

工业上的成就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在智能工具，也就是现代机器的帮助下——这些机器本身就是三四代默默无闻的发明家努力的成果——一百个工人生产出的衣服足够一万个人穿两年。在管理得力的煤矿，一百个矿工的劳动，每年产出的煤，足够让一万个家庭在寒冷的冬天取暖。最近，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个壮观景象：为了迎接各种国际博览会，一座座繁华的都市在几个月内拔地而起，而国民的日常工作却丝毫未受影响。

And if in manufactures as in agriculture, and as indeed through our whole social system, the labour,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inventions of our ancestors profit chiefly the few, it is none the less certain that mankind in general, aided by the creatures of steel and iron which it already possesses, could already procure an existence of wealth and ease for every one of its members.

如果说在制造业、农业乃至整个社会体制中，我们祖先的劳动、发现和发明只是让少数人获益，那么现在，整个人类借助钢铁工具，足以使所有人都过上富足安逸的生活。

Truly, we are rich—far richer than we think; rich in what we already possess, richer still in the possibilities of production of our actual mechanical outfit; richest of all in what we might win from our soil, from our manufactures, from our science, from our technical knowledge, were they but applied to bringing about the well-being of all.

的确，我们很富有——富有得超乎自己的想象；就我们所拥有的财产而言，我们很富有；就我们现有的机械设备的生产潜力而言，我

们更加富有；如果我们从土地、制造业、科学、技术知识中之所得，都能用来为所有人的福祉服务，我们将是最富有的。

II

二

In our civilized societies we are rich. Why then are the many poor? Why this painful drudgery for the masses? Why, even to the best paid workman, this uncertainty for the morrow,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wealth inherited from the past, and in spite of the powerful means of production, which could ensure comfort to all, in return for a few hours of daily toil?

在文明社会，我们是富有的。可是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穷人？为什么芸芸众生还要辛苦地劳作？虽然从过去继承了诸多财富，虽然生产方式非常先进，每天只需工作几小时，就可以保证所有人生活得舒适惬意，可为什么即便收入最高的工人，对明天也毫无信心呢？

The Socialists have said it and repeated it unwearyingly. Daily they reiterate it, demonstrating it by arguments taken from all the sciences. It is because all that is necessary for production—the land, the mines, the highways, machinery, food, shelter, education, knowledge—all have been seized by the few in the course of that long story of robbery, enforced migration and wars, of ignorance and oppression, which has been the life of the human race before it had learned to subdue the forces of Nature. It is because, taking advantage of alleged rights acquired in the past, these few appropriate to-day two-thirds of the products of human labour, and

then squander them in the most stupid and shameful way. It is because, having reduced the masses to a point at which they have not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for a month, or even for a week in advance, the few can allow the many to work, only on the condition of themselves receiving the lion's share. It is because these few prevent the remainder of men from producing the things they need, and force them to produce, not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for all, but whatever offers the greatest profits to the monopolists. In this is the substance of all Capitalism.

社会主义者指出过这个问题，而且坚持不懈地一再重复。他们每天都在重复这个问题，并且引用不同学科的观点加以说明。这是因为，人类在学会征服自然的力量之前，遭遇了无数次掠夺、被迫迁徙和战争，经历了漫长的蒙昧和压迫，而在此期间，进行生产所必需的——土地、矿井、公路、机器、食物、住所、教育和知识——都被少数人占有了。这是因为，那些少数人利用过去获得的所谓权利，占有了今天人类三分之二的劳动成果，并用最愚蠢、最可耻的方式将这些成果挥霍一空。这是因为，这些少数人窃取了大部分劳动成果，他们压榨人民大众，使他们没法保障维持一个月甚至一周的生活所需，然后这些少数人才允许人民大众开始工作。这是因为，这些少数人并不让生产者生产自身所需要的产品，他们强迫生产者生产的，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的生活必需品，而是能为垄断资本家获得最大利益的产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

Take, indeed, a civilized country. The forests which once covered it have been cleared, the marshes drained, the climate improved. It has been made habitable. The soil, which bore formerly only a coarse vegetation, is covered to-day with rich harvests. The rock-walls in the valleys are laid out in terraces and covered with vines. The wild plants, which yielded nought but acrid

berries, or uneatable roots, have been transformed by generations of culture into succulent vegetables or trees covered with delicious fruits. Thousands of highways and railroads furrow the earth, and pierce the mountains. The shriek of the engine is heard in the wild gorges of the Alps, the Caucasus, and the Himalayas. The rivers have been made navigable; the coasts, carefully surveyed, are easy of access; artificial harbours, laboriously dug out and protected against the fury of the sea, afford shelter to the ships. Deep shafts have been sunk in the rocks; labyrinths of underground galleries have been dug out where coal may be raised or minerals extracted. At the crossings of the highways great cities have sprung up, and within their borders all the treasures of industry, science, and art have been accumulated.

以一个文明国家为例。曾经覆盖国土的森林被砍伐，沼泽被泄洪成田，气候得到了改善。这个国家已经变得适合人类居住。曾经杂草丛生的土地上，如今结满了丰硕的果实；山谷的崖壁已修整为梯田，覆满了藤蔓；那些从前只能结出苦涩的果实或者无法入口的根茎的野生植物，经过几代改良，变成了甘美多汁的蔬菜和硕果累累的果树；成千上万的公路、铁路纵横交错，穿越群山；机器的轰鸣声响彻阿尔卑斯山、高加索山和喜马拉雅山的峡谷。河流经过改造，适于航行；海岸经仔细勘测，易于停泊；辛苦挖掘而成的人造港口，为船只提供庇护所，免受大海汹涌澎湃的侵袭。矿井深入地下，打进岩石；为了挖煤采矿，人们开凿出密密麻麻的地下坑道，如同迷宫一般。在公路交汇的地方，涌现出一座座大城市；而城市里工业、科学和艺术创造的财富不断累积。

Whole generations, that lived and died in misery, oppressed and ill- treated by their masters, and worn out by toil, have handed on this immense inheritance to our century.

世世代代的人民，生于苦难，卒于苦难，受尽主人的压迫和虐待，整日辛苦劳作，疲惫不堪，却给我们这个世纪留下了巨大的财富。

For thousands of years millions of men have laboured to clear the forests, to drain the marshes, and to open up highways by land and water. Every rood of soil we cultivate in Europe has been watered by the sweat of several races of men. Every acre has its story of enforced labour, of intolerable toil, of the people's sufferings. Every mile of railway, every yard of tunnel, has received its share of human blood.

数百万人民，经过几千年的努力，砍伐了森林，抽干了沼泽，开通了陆路水路。欧洲的每一寸土地都浇灌着各民族人民辛勤的汗水；每一寸土地都讲述着劳动人民被迫劳作、承受非人的苦役、受尽苦难的历史；每英里铁路、每一码隧道都浸透着劳动者的鲜血。

The shafts of the mine still bear on their rocky walls the marks made by the pick of the workman who toiled to excavate them. The space between each prop in the underground galleries might be marked as a miner's grave; and who can tell what each of these graves has cost, in tears, in privations, in unspeakable wretchedness to the family who depended on the scanty wage of the worker cut off in his prime by fire-damp, rock-fall, or flood?

矿井的岩壁上还保留着工人们开凿矿井时留下的痕迹。地下坑道支柱之间的空地，可能就是一名矿工的墓地；谁能说得清，有多少正

值壮年的矿工，因瓦斯爆炸、矿井崩塌或坑道透水，生命戛然而止，而这些坟墓又给那些依靠这些矿工微薄工资度日的家庭，带来多少眼泪、多少难以言说的苦难，生活又会变得多么穷困呢？

The cities, bound together by railroads and waterways, are organisms which have lived through centuries. Dig beneath them and you find, one above another, the foundations of streets, of houses, of theatres, of public buildings. Search into their history and you will see how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town, its industry, its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have slowly grown and ripened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of generations of its inhabitants before it could become what it is to-day. And even to-day, the value of each dwelling, factory, and warehouse, which has been created by the accumulated labour of the millions of workers, now dead and buried, is only maintained by the very presence and labour of legions of the men who now inhabit that special corner of the globe. Each of the atoms composing what we call the Wealth of Nations owes its value to the fact that it is a part of the great whole. What would a London dockyard or a great Paris warehouse be if they were not situated in these great centr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What would become of our mines, our factories, our workshops, and our railways, without the immense quantities of merchandise transported every day by sea and land?

由铁路和水路连接起来的城市好比一个个有机体，存在了若干个世纪。挖开这些城市的地面，你会发现层层叠叠的街道、房屋、剧院以及公共建筑的地基。深入探寻其历史，你会发现，城市的文明、工业及其特点，是经过一代代居民的共同努力，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并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模样。每一座住宅、工厂和仓库都是由数百万工人的劳动累积而成的，这些工人早已逝去，长眠地下。即便现

在，这些建筑的价值也是依靠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劳动来维系的。构成我们所谓的“国富”的每一个分子，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整体的一部分。伦敦的造船厂或者是巴黎的大型仓库，若非处于国际商业的核心区域，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若没有每天经海路和陆路输送的大量货物，我们的矿井、工厂、手工车间以及铁路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Millions of human beings have laboured to create this civilization on which we pride ourselves to-day. Other millions, scattered through the globe, labour to maintain it. Without them nothing would be left in fifty years but ruins.

数百万人辛苦劳动，创造出了我们今日引以为傲的文明。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付出劳动，维持我们的文明。没有他们，50年后我们的文明将只剩下废墟。

There is not even a thought, or an invention, which is not common property, born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ousands of inventors, known and unknown, who have died in poverty, have co-operated in the invention of each of these machines which embody the genius of man.

所有的思想、发明，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是过去和现在共同的成果。成千上万有名或无名的发明家，死于贫困之中，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才发明出了体现人类天分的各种机器。

Thousands of writers, of poets, of scholars, have laboured to

increase knowledge, to dissipate error, and to create that atmosphere of scientific thought, without which the marvels of our century could never have appeared. And these thousands of philosophers, of poets, of scholars, of inventors, have themselves been supported by the labour of past centuries. They have been upheld and nourished through life,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by legions of workers and craftsmen of all sorts. They have drawn their motive force from the environment.

成千上万的作家、诗人、学者，努力累积知识，消弭谬误，形成了科学思考的新风气，没有这种风气，就不会有本世纪文明惊人的进步。而这些成千上万的哲学家、诗人、学者，都得到了过去若干个世纪劳动成果的供养。在他们的一生中，无论是在智力还是在体力上，他们都得到了无数工人和匠人的滋养，是他们周围的环境给了他们动力。

The genius of a Séguin, a Mayer, a Grove, has certainly done more to launch industry in new directions than all the capitalists in the world. But men of genius are themselves the children of industry as well as of science. Not until thousands of steam-engines had been working for years before all eyes, constantly transforming heat into dynamic force, and this force into sound, light, and electricity, could the insight of genius proclaim the mechanical origin and the unity of the physical forces. And if we, childre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ve at last grasped this idea, if we know now how to apply it, it is again because daily experience has prepared the way. The thinke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aw and declared it, but the idea remained undeveloped, becaus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ad not grown up like ours, side by side with the steam-engine. Imagine the decades that might have passed

while we remained in ignorance of this law, which has revolutionized modern industry, had Watt not found at Soho skilled workmen to embody his ideas in metal, bringing all the parts of his engine to perfection, so that steam, pent in a complete mechanism, and rendered more docile than a horse, more manageable than water, became at last the very soul of modern industry.

像赛甘[2_1]、迈尔[2_2]、格罗夫[2_3]这样的天才，开启了工业发展的新方向，全世界所有其他的资本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然而，这些天才本身就是工业和科技的产儿。成千上万的蒸汽机在人们眼前不断将热能转化为动能，又将动能转化为声、光、电，多年之后，天才们才依靠敏锐的洞察力揭示出这些物理力的机械原理及相互关系。如果我们这些19世纪的人们最终理解了这一原理，如果我们现在知道如何运用这一原理，那也是日常经验铺垫的结果。虽然18世纪的思想家们发现并公布了这一思想，但这个思想并没有得到发展，因为18世纪并不像我们一样，是伴随着蒸汽机一起发展的。瓦特在索霍区寻找到技艺娴熟的工人，将自己的想法转化为钢铁机器，完善了蒸汽机的各个部分，这样封于机器内、比马匹更易于驾驭、比水力更易于控制的蒸汽，才最终成了现代工业的灵魂。试想，若无瓦特的成就，那即便是几十年后，我们对变革现代工业的法则仍是一无所知。

Every machine has had the same history—a long record of sleepless nights and of poverty, of disillusions and of joys, of partial improvements discovered by several generations of nameless workers, who have added to the original invention these little nothings, without which the most fertile idea would remain fruitless. More than that: every new invention is a synthesis, the resultant of innumerable inventions which have preceded it in the vast field of mechanics and industry.

每一台机器都有着相同的历史——这长长的历史中，记载了无数的不眠之夜，记载了贫穷、失落和欢笑，记载了一代又一代无名工人的不断改进。如果不是他们对最初的机器进行的点滴改良，再伟大的构想也只能成为空想。不仅如此：每项发明都是合成的产物，是各个机械和工业领域无数项发明创造综合作用的结果。

Science and industry, knowledge and application, discovery and practical realization leading to new discoveries, cunning of brain and of hand, toil of mind and muscle—all work together. Each discovery, each advance, each increase in the sum of human riches, owes its being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travail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科学与工业、知识与应用、发现与带来新发现的实际运用、聪慧的头脑与灵巧的双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一切共同发挥作用。每一项发现，每一次进步，每一笔财富，无不是过去和现在体力和脑力辛勤付出的结果。

By what right then can any one whatever appropriate the least morsel of this immense whole and say—This is mine, not yours?

那么，谁又有权利去占据这巨大财富的其中一小部分，然后说——这是我的，不是你的？

III

三

It has come about, however, in the course of the ages traversed by the human race, that all that enables man to produce and to increase his power of production has been seized by the few. Some time, perhaps, we will relate how this came to pass. For the present let it suffice to state the fact and analyze its consequences.

在人类所经历过的漫长的历程中，那些使人们能够进行生产、增加生产能力的一切事物，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等有时间，我们也许可以讲讲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但是目前，仅仅陈述事实并分析其后果就可以了。

To-day the soil, which actually owes its value to the needs of an ever-increasing population, belongs to a minority who prevent the people from cultivating it—or do not allow them to cultivate it according to modern methods.

今天的土地，其价值取决于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而土地却归少数人所有，这些人不许人民耕种土地——或者不许他们按照现代模式耕种。

The mines, though they represent the labour of several generations, and derive their sole value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dustry of a nation and the density of the population—the mines also belong to the few; and these few restrict the output of coal, or prevent it entirely, if they find more profitable investments for their capital. Machinery, too, has become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 few, and even when a machine incontestably represents the improvements added to the original rough invention by three or

four generations of workers, it none the less belongs to a few owners. And i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very inventor who constructed the first machine for lace-making, a century ago, were to present themselves to-day in a lace factory at Bale or Nottingham, and claim their rights, they would be told: “Hands off! This machine is not yours,” and they would be shot down if they attempt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it.

虽然矿产代表着几代人的劳动成果，但他们的唯一价值取决于国家的工业需要和人口的稠密程度——而矿产也归少数人所有；如果这些人发现对自己的资本等有利的投资项目后，他们会限制煤的产量，或者完全不生产。同样，机械也变成了少数人的独有财产，毫无疑问，机器是由三代或四代工人在原始的粗糙发明的基础上逐渐改良完善的，但它仍然归少数人所有。如果一百年前建造第一台花边机器的发明者的子孙，今天来到贝尔或者诺丁汉一家花边工厂，索要机器的所有权时，他们会听到：“把手拿开！这台机器可不是你的。”如果他们试图占有这台机器，他们就会被开枪打死。

The railways, which would be useless as so much old iron without the teeming population of Europe, its industry, its commerce, and its marts, belong to a few shareholders, ignorant perhaps of the whereabouts of the lines of rails which yield them revenues greater than those of medieval kings. And if the children of those who perished by thousands while excavating the railway cuttings and tunnels were to assemble one day, crowding in their rags and hunger, to demand bread from the shareholders, they would be met with bayonets and grapeshot, to disperse them and safeguard “vested interests.”

如果没有欧洲如此稠密的人口、工业、商业和市场，铁路就只是一堆无用的废铁；但铁路归少数股东所有，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铁路通向何处，而铁路给他们的收益，却远远超过中世纪的帝王。假如有一天，那些成千上万为开凿铁道和山洞而死的工人的孩子们，迫于饥寒，聚集起来向股东索要补贴，就会有人拿着刺刀和炮弹驱散他们，保卫少数人“既定的利益”。

In virtue of this monstrous system, the son of the worker, on entering life, finds no field which he may till, no machine which he may tend, no mine in which he may dig, without accepting to leave a great part of what he will produce to a master. He must sell his labour for a scant and uncertain wage. His father and his grandfather have toiled to drain this field, to build this mill, to perfect this machine. They gave to the work the full measure of their strength, and what more could they give? But their heir comes into the world poorer than the lowest savage. nIf he obtains leave to till the fields, it is on condition of surrendering a quarter of the produce to his master, and another quarter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iddlemen. Ad this tax, levied upon him by the State, the capitalist, the lord of the manor, and the middleman, is always increasing; it rarely leaves him the power to improve his system of culture. If he turns to industry, he is allowed to work—though not always even that—only on condition that he yield a half or two-thirds of the product to him whom the land recognizes as the owner of the machine.

由于这种可怕的制度，工人的儿子一出生，若不答应将自己生产的一大部分产品献给主人，就得不到可以耕种的土地，可以运转的机器，可以挖掘的矿坑。他必须出卖劳力，换来极少且不稳定的工资。他的父亲和祖父辛勤劳动排干田地，建造工厂，改良这台机器。他们

把所有的力气都贡献在这个工作上，他们还可以贡献什么呢？可是他们的后代来到这个世界上，却比最低贱的野蛮人还要贫穷。如果他想获得耕地许可，他必须向主人交纳四分之一的产量，然后再向政府和中间人交四分之一。政府、资本家、地主和中间人向他征收的税款不断增长；他几乎没有能力改良农业生产。如果他转行当工人，他可以去工作——尽管这种机会也并非随时都有——只要他将产品的一半或三分之二交给国家承认的机器所有人。

We cry shame on the feudal baron who forbade the peasant to turn a clod of earth unless he surrendered to his lord a fourth of his crop. We called those the barbarous times. But if the forms have changed, the relations have remained the same, and the worker is forced, under the name of free contract, to accept feudal obligations. For, turn where he will, he can find no better conditions. Everything has become private property, and he must accept, or die of hunger.

我们责备封建时代的领主欺人太甚，除非农夫上交其收成的四分之一，否则连一块耕地也得不到。我们把这样的时代称为野蛮时代。但是如果只是形式改变了，关系仍然一样，在自由契约的名义下，工人被迫接受封建义务。因为，不管他到哪里，都找不到更好的条件。一切都变成了私人所有，他必须接受，否则就会饿死。

The result of this state of things is that all our production tends in a wrong direction. Enterprise takes no thought for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Its only aim is to increase the gains of the speculator. Hence the constant fluctuations of trade, the periodical industrial crises, each of which throws scores of thousands of workers on the streets.

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我们所有的生产都会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企业根本不考虑社会的需求，它的唯一目标就是提高投机商的收益。因此，行业的不断波动，周期性的工业危机，每次都使成千上万的工人流落街头。

The working people cannot purchase with their wages the wealth which they have produced, and industry seeks foreign markets among the monied classes of other nations. In the East, in Africa, everywhere, in Egypt, Tonkin or the Congo, the European is thus bound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serfdom. And so he does. But soon he finds that everywhere there are similar competitors. All the nations evolve on the same lines, and wars, perpetual wars, break out for the right of precedence in the market. Wars for the possession of the East, wars for the empire of the sea, wars to impose duties on imports and to dictate conditions to neighbouring states; wars against those “blacks” who revolt! The roar of the cannon never ceases in the world, whole races are massacred, the states of Europe spend a third of their budgets in armaments; and we know how heavily these taxes fall on the workers.

工人用工资买不起自己生产的商品，工业便在他国的富裕阶层中寻找国外市场。因此在东方，在非洲，在埃及，在东京或者刚果，欧洲人不得不在各个地方，推动农奴制的发展。他也果然这么做了。但是很快，他便发现到处都有同样的竞争。所有国家都沿着同样的道路发展，战争，无休无止的战争，为争夺市场优先权而爆发了。为了占领东方的战争，为了争夺海洋霸权的战争，为了向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和强迫邻国接受本国条件的战争，为了压制反叛的“黑人”的战争。整个世界上子弹的怒吼声从未停止，许多种族遭到屠杀，欧洲各国把三分之一的预算花在军备上；于是我们明白，落在工人身上的赋税该有

多么沉重。

Education still remains the privilege of a small minority, for it is idle to talk of education when the workman's child is forced, at the age of thirteen, to go down into the mine or to help his father on the farm. It is idle to talk of studying to the worker, who comes home in the evening wearied by excessive toil, and its brutalizing atmosphere. Society is thus bound to remain divided into two hostile camps, and in such conditions freedom is a vain word. The Radical begins by demanding a greater extension of political rights, but he soon sees that the breath of liberty leads to the uplifting of the proletariat, and then he turns round, changes his opinions, and reverts to repressive legislation and government by the sword.

受教育也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工人的孩子十三岁就被迫下矿井或帮父亲在田里干农活，再谈教育纯属多余。工人们在残酷无情的环境中过度工作，晚上疲惫地回家，和他们谈学习也纯属多余。因此，整个社会就分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由只是一句空话。激进派最初主张扩张政治权利，但是很快就明白自由的呼吸会使无产阶级振奋，于是他们便转回头，改变了意见，转而依靠刀剑压迫的残酷立法和政府。

A vast array of courts, judges, executioners, policemen, and gaolers is needed to uphold these privileges; and this array gives rise in its turn to a whole system of espionage, of false witness, of spies, of threats and corruption.

维护这些特权需要大量的法院、法官、行刑者、警察和狱吏；而

这些又衍生出了专门暗中破坏、作伪证、当间谍、恐吓和贿赂等一连串组织。

The system under which we live checks in its turn the growth of the social sentiment. We all know that without uprightness, without self-respect, without sympathy and mutual aid, human kind must perish, as perish the few races of animals living by rapine, or the slave-keeping ants. But such ideas are not to the taste of the ruling classes, and they have elaborated a whole system of pseudo-science to teach the contrary.

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制度又阻碍了社会情感的发展。我们都知道，没有正义，没有自尊，没有同情和互助，人类必将灭亡，就像几种少见的靠掠夺为生的动物一样，或者像蓄奴的蚂蚁一般。可是统治阶级并不喜欢这样的思想，他们挖空心思地创造出了一套伪科学的体系，传授给人们与其完全相反的思想。

Fine sermons have been preached on the text that those who have should share with those who have not, but he who would carry out this principle would be speedily informed that these beautiful sentiments are all very well in poetry, but not in practice. “To lie is to degrade and besmirch oneself,” we say, and yet all civilized life becomes one huge lie. We accustom ourselves and our children to hypocrisy, to the practice of a double-faced morality. And since the brain is ill at ease among lies, we cheat ourselves with sophistry. Hypocrisy and sophistry become the second nature of the civilized man.

漂亮的说教屡屡讲到拥有的人应该和没有的人一起分享，但是一旦有人这么做，立即会有人告诉他，这些美丽的情感在诗歌中很美好，但在现实中就不是了。我们说“欺骗是贬低和诽谤”，可是文明社会的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都习惯了虚伪，习惯了两面的道德。可是处于谎言之中的头脑却无法安稳，于是我们就用诡辩来欺骗自己。虚伪和诡辩是文明人的第二天性。

But a society cannot live thus; it must return to truth, or cease to exist.

但是社会无法这样运作；社会必须回归到真理，否则就会灭亡。

Thus the consequences which spring from the original act of monopoly spread through the whole of social life. Under pain of death, human societies are forced to return to first principles: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being the collective work of humanity, the product should be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of the race. Individual appropriation is neither just nor serviceable. All belongs to all. All things are for all men, since all men have need of them, since all men have worked in the measure of their strength to produce them, and since it is not possible to evaluate every one's part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world's wealth.

因此从最初的垄断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已经蔓延到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在濒临灭亡的痛苦之下，人类社会不得不恢复基本的原则：生产工具既然是人类集体劳动的结果，劳动产品就应该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个人占有既不公平，也无益处。所有产品属于所有人。所有产品为所有人所用，因为所有人都需要这些产品，所有人都尽全力生产这

些产品，而且我们无法评价每个人在创造整个世界的财富中起了多大作用。

All things for all. Here is an immense stock of tools and implements; here are all those iron slaves which we call machines, which saw and plane, spin and weave for us, unmaking and remaking, working up raw matter to produce the marvels of our time. But nobody has the right to seize a single one of these machines and say: “This is mine; if you want to use it you must pay me a tax on each of your products,” any more than the feudal lord of medieval times had the right to say to the peasant: “This hill, this meadow belong to me, and you must pay me a tax on every sheaf of corn you reap, on every brick you build.”

所有产品属于所有人。这里有无数的工具和器械，这里有我们称之为机器的铁质工具，这些机器或锯，或刨，或纺，或织，或破坏，或改造，将原材料生产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然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抓起其中一件机器说：“这是我的，你要是想用，你的所有产品都要给我交税。”正如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也没有权利对农民说：“这座山、这片草地都是我的，你收的每一粒粮食、建造的每一块砖头都必须给我交税。”

All is for all! If the man and the woman bear their fair share of work, they have a right to their fair share of all that is produced by all, and that share is enough to secure them well-being. No more of such vague formulas as “The right to work,” or “To each the whole result of his labour.” What we proclaim is THE RIGHT TO WELL-BEING: WELL-BEING FOR ALL!

所有产品为所有人！无论男女，只要能够承担适当的工作，就有权利适当分配所有人所生产的所有产品，而且所分配的份额足以保证他们过得幸福。什么“工作的权利”，什么“各人的全部劳动成果属于各人”，这种含糊的话别再说了。我们所主张的，是幸福的权利：全民幸福！

[2_1].塞甘（Marc Séguin, 1786—1875），法国工程师，发明了钢索桥和管式蒸汽机锅炉。

[2_2].迈尔（Julius Robert von Mayer, 1814—1878），德国物理学家，为热力学研究作出很大贡献。

[2_3].格罗夫（Sir William Robert Grove,1811—1896），英国物理学家，他在自己撰写的经典著作《论各种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64）中阐明了能量守恒原理。

CHAPTER II WELL-BEING FOR ALL

第二章　全民幸福

I

一

Well-being for all is not a dream. It is possible, realizable, owing to all that our ancestors have done to increase our powers of production.

全民幸福并不是梦想。由于我们的祖先付出了辛勤劳动来提高生产能力，所有人都幸福是有可能的，是可以实现的。

We know, indeed, that the producers, although they constitute hardly one-third of the inhabitants of civilized countries, even now produce such quantities of goods that a certain degree of comfort could be brought to every hearth. We know further that if all those who squander to-day the fruits of others! toil were forced to employ their leisure in useful work, our wealth would increase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producers, and more. Finally, we know that contrary to the theory enunciated by Malthus—that Oracle of middle-class Economics—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the human race increase at a much more rapid ratio than its powers of reproduction. The more thickly men are crowded on the soil, the more rapid is the growth of their wealth-creating power.

我们都知道，虽然生产者确实不及文明国家居民的三分之一，但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足以使每个家庭都能过得舒适。我们还知道，如果迫使那些现在挥霍他人劳动成果的人，用他们闲暇的时间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的财富就会按照生产者的数量成倍增加，甚至更多。最后，我们知道，与马尔萨斯——中产阶级经济学的教主——所宣扬的理论相反，人类生产能力提高的速度远远超过其生殖能力。土地上的人口越稠密，创造财富的能力增长得也越快。

Thus, although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 has only increased from 1844 to 1890 by 62 per cent, its production has grown, even at the lowest estimate, at double that rate—to wit, by 130 per cent. In France, where the population has grown more slowly, the increase in production is nevertheless very rapid. Notwithstanding the crises through which agriculture is frequently passing, notwithstanding State interference, the blood-tax (conscription), and speculative commerce and finance, the production of wheat in France has increased four-fold,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more than tenfold, in the course of the last eighty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rogress is still more striking. In spite of immigration, or rather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influx of surplus European labour, the United States have multiplied their wealth tenfold.

因此，尽管英国的人口从1844年到1890年只增加了62%，但是其生产力，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也比人口增长速度快了一倍——也就是130%。在法国，人口增长速度更缓慢，而其生产力却增长得非常迅速。虽然农业生产经常遭遇各种危机，虽然政府时常干预，还有血税（征兵）、投机商业和金融，但是在过去80年里，法国的小麦产量却增长了4倍，工业生产增长了10倍还多。在美国，增长速度更为惊人。虽然有大量移民，或者更确切地来说，正是由于欧洲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美国的财富反而增长了10倍。

However, these figures give but a very faint idea of what our wealth might become under better conditions. For alongsid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wealth-producing powers we have an overwhelming increase in the ranks of the idlers and middlemen. Instead of capital gradually concentrating itself in a few hands, so that it would only be necessary for the community to dispossess a few millionaires and enter upon its lawful heritage—instead of this Socialist forecast proving true, the exact reverse is coming to pass: the swarm of parasites is ever increasing.

然而，这些数字并不能清楚地表明，在更好的社会条件下，我们的财富会增长到什么程度。因为，伴随着财富生产能力的快速增长，闲散人员和中间人阶层的增长也是非常惊人的。资本会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有必要处理一些百万富翁，并把他们的钱充公，但是这个社会主义预言不仅没有实现，完全相反的情况却正在发生：寄生虫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In France there are not ten actual producers to every thirty inhabitants. The whole agricultural wealth of the country is the work of less than seven millions of men, and in the two great industries, mining and the textile trades, you will find that the workers number less than two and one-half millions. But the exploiters of labour, how many are the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little over one million workers—men, women, and children, are employed in all the textile trades; less than nine hundred thousand work the mines; much less than two million till the ground, and it appeared from the last industrial census that only a little over four million men, women and children were employed in all the industries. So that the statisticians have to exaggerate all the figur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maximum of eight million producers to forty-five million inhabitants. Strictly speaking the creators of the goods exported from Britain to all the ends of the earth comprise only from six to seven million workers. And what is the number of the shareholders and middlemen who levy the first fruits of labour from far and near, and heap up unearned gains by thrusting themselves between the producer and the consumer?

在法国，每30位居民中，真正的生产者只有不超过10个。整个国家的农业收入是由不到700万人创造出来的，在采矿和纺织这两大行业里，只有不到250万名工人。但是，有多少剥削者呢？在英国，纺织行业的工人——包括男工、女工和儿童工，刚刚超过100万；采矿工人不到90万；种地的远远不到200万，从上次的工业普查结果来看，所有行业里的男女工及童工只有400余万。因此统计学家们不得不夸大其辞，从4500万居民中计算出了最多有800万名生产者。严格来说，从英国出口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商品，不过是由六七百万名工人创造出来的。那些股东和中间人，他们到处榨取劳动者的精华，又插身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不劳而获收取利润，有多少这样的人呢？

Nor is this all. The owners of capital constantly reduce the output by restraining production. We need not speak of the cartloads of oysters thrown into the sea to prevent a dainty, hitherto reserved for the rich, from becoming a food for the people. We need not speak of the thousand and one luxuries—stuffs, foods, etc., etc.—treated after the same fashion as the oysters. It is enough to remember the way in which the production of the most necessary things is limited. Legions of miners are ready and willing to dig out coal every day, and send it to those who are shivering with cold; but too often a third, or even one-half, of their number are forbidden to work more than three days a week, because, forsooth,

the price of coal must be kept up! Thousands of weavers are forbidden to work the looms, although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go in rags, and although three- quarters of the population of Europe have no clothing worthy the name.

还不止这些。资本所有者不断地通过控制生产来降低产量。我们不必说那些专供富人吃的牡蛎，宁可一车一车地扔进海里，也不能变成平民的食物。我们不必说许许多多的奢侈品——织物、食品等等——像牡蛎一样被处理掉了。只要记着他们如何限制生产生活必需品就够了。大批的矿工时刻准备着，也情愿每挖煤，将煤炭送到那些冻得发抖的人手中；可是往往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矿工一周之内工作不许超过三天，因为实在是要维持煤炭的价格！成千上万名纺织工人不能在织布机前工作，即便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即便欧洲四分之三的人口都没有像样的衣服穿。

Hundreds of blast-furnaces, thousands of factories periodically stand idle, others only work half-time—and in every civilized nation there is a permanent population of about two million individuals who ask only for work, but to whom work is denied.

成千上万的鼓风炉、工厂定期闲置，还有一些只开半天工——然而在每一个文明国家里，永远都有大约二百万人，一心只想着工作，但却没有工作可做。

How gladly would these millions of men set to work to reclaim waste lands, or to transform ill-cultivated land into fertile fields, rich in harvests! A year of well-directed toil would suffice to multiply fivefold the produce of those millions of acres in this

country which lie idle now as “permanent pasture,” or of those dry lands in the south of France which now yield only about eight bushels of wheat per acre. But men, who would be happy to become hardy pioneers in so many branches of wealth-producing activity, must remain idle because the owners of the soil, the mines and the factories prefer to invest their capital—taken in the first place from the community—in Turkish or Egyptian bonds, or in Patagonian gold mines, and so make Egyptian fellahs, Italian emigrants, and Chinese coolies their wage-slaves.

如果让这些上千万的人去开垦荒地，或者把贫瘠的土地变为丰收的肥沃良田，他们该是多么地欢喜！他们按照正确的方法开垦一年的土地，所生产出的粮食，将是目前本国闲置的数千英亩“永久牧场”或者法国南部每英亩只出产八蒲式耳小麦的干旱土地产量的五倍。可是这些愿意在各个生产领域吃苦耐劳去开拓的人却得不到工作，不得不继续无所事事，因为土地、矿山和工厂的主人喜欢把他们的资本——最初从社会中掠夺来的——投资到土耳其和埃及公债中，投资到巴达哥尼亚的金矿中，使埃及的农夫、意大利的移民、中国的苦力成为他们的工资奴隶。

This is the direct and deliberate limitation of production; but there is also a limitation indirect and not of set purpose, which consists in spending human toil on objects absolutely useless, or destined only to satisfy the dull vanity of the rich.

这是直接和有意的限制生产；还有一种间接限制，没有明确的目的，比如把劳动力花费在生产那些毫无用处，或者只为满足富人无聊虚荣心的物品上。

It is impossible to reckon in figures the extent to which wealth is restricted indirectly, the extent to which energy is squandered, while it might have served to produce, and above all to prepare the machinery necessary to production. It is enough to cite the immense sums spent by Europe in armament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acquiring control of markets, and so forcing her own goods on neighbouring territories, and making exploitation easier at home; the millions paid every year to officials of all sorts, whose function it is to maintain the “rights” of minorities—the right, that is, of a few rich men—to manipulate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nation; the millions spent on judges, prisons, policemen, and all the paraphernalia of so-called justice—spent to no purpose, because we know that every alleviation, however slight, of the wretchedness of our great cities is always followed by a considerable diminution of crime; lastly, the millions spent on propagating pernicious doctrines by means of the press, and news “cooked” in the interest of this or that party, of this politician or of that group of speculators.

无法用数字来估计限制了多少财富，浪费了多少精力，而这些精力原本可以用来进行生产，尤其是准备生产所必需的机械。只需列举欧洲每年在军备上耗费的巨额款项大家就会明白，这些消费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市场控制权，使本国货物可在邻国领土上销售，剥削国内的劳动者；剥削者们每年支付给各类官吏的数百万，而这些官吏的作用就是维护少数人的“权利”——也就是少数富人的权利——来控制本国的经济活动；他们支付给法官、监狱、警察还有其他所谓正义的数百万——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大城市里的贫困程度稍稍有所缓解，犯罪行为就会大大减少；最后，还有为了宣传印刷出版的谬论学说，以及为了某个政党、某个政客或者某些投机分子的利益“炮制”出来的新闻所花费的数百万。

But over and above this w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all the labour that goes to sheer waste,—here, in keeping up the stables, the kennels, and the retinue of the rich; there, in pandering to the caprices of society and the depraved tastes of the fashionable mob; there again, in forcing the consumer to buy what he does not need, or foisting an inferior article upon him by means of puffery, and in producing on the other hand wares which are absolutely injurious, but profitable to the manufacturer. What is squandered in this manner would be enough to double the production of useful things, or so to plenish our mills and factories with machinery that they would soon flood the shops with all that is now lacking to two-thirds of the nation. Under our present system a full quarter of the producers in every nation are forced to be idle for three or four months in the year, and the labour of another quarter, if not of the half, has no better results than the amusement of the rich or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ublic.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被彻底浪费了的劳动力——比如照料富人的马厩、狗窝、随从等等；比如迎合社会的反复无常和庸俗之众的低级趣味；又比如强迫消费者购买本不需要的物品，或通过夸大宣传把劣等货卖给他们，另一方面是生产绝对有害但制造商有利可图的物品。这样浪费掉的劳动力如果能得到利用，可以使有用产品的产量增加一倍，如果利用这些劳动力把机械装备到磨坊和工厂，现在三分之二的国民所缺乏的物品会充满各个商店。在现存的制度下，各国生产者中整整四分之一的人，一年之中有三到四个月无所事事，还有四分之一的劳力，甚至二分之一，只是在取悦富人，或者剥削大众。

Thus, if we consider on the one hand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civilized nations augment their powers of produc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limits set to that production, be i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existing conditions, we cannot but conclude that an economic system a trifle more reasonable would permit them to heap up in a few years so many useful products that they would be constrained to say—“Enough! We have enough coal and bread and raiment! Let us rest and consider how best to use our powers, how best to employ our leisure.”

因此，如果我们一方面看到文明国家提高生产能力的速度，另一方面也看到现有的条件直接或间接对生产造成的限制，会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如果经济制度稍微合理一些，经过几年的时间，就可以生产出许多有用的产品，到那时，人人都会说——“够了！我们的煤、面包、衣服都够了！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考虑怎样最好地发挥我们的能力，利用我们的闲暇时间。”

No, plenty for all is not a dream—though it was a dream indeed in those days when man, for all his pains, could hardly win a few bushels of wheat from an acre of land, and had to fashion by hand all the implements he used i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Now it is no longer a dream, because man has invented a motor which, with a little iron and a few sacks of coal, gives him the mastery of a creature strong and docile as a horse, and capable of setting the most complicated machinery in motion.

不，所有人都有充足的产品不再是个梦想——虽然在过去，人类费尽心血耕种一英亩土地，只能收获一点蒲式耳小麦，还要手工制造农业和工业器具，在那样的年代，这确实是一个梦想。现在，这不再是梦想了，因为人类已经发明了发动机，只需少量的铁和几包煤炭，就能控制一个强壮而又温驯的生物，就像控制一匹马一样，还能运转

最复杂的机械。

But, if plenty for all is to become a reality, this immense capital—cities, houses, pastures, arable lands, factories, highways, education—must cease to be regarded as private property, for the monopolist to dispose of at his pleasure. This rich endowment, painfully won, builded, fashioned, or invented by our ancestors, must become common property, so that the collective interests of men may gain from it the greatest good for all. There must be EXPROPRIATION. The well-being of all—the end; expropriation—the means.

但是，想要所有人都有充足的产品，就不能再把这个巨大的资本——城市、房屋、牧场、耕地、工厂、公路及教育——视为私人财产，任由垄断者随意支配。这个丰富的馈赠，是我们的祖先历经艰辛赢得、建筑、创造、发明的，应该成为公共财产，这样人们才能从共同利益中获得最大益处。必须要充公。全民幸福是目的，而充公是手段。

II

二

Expropriation, such then is the problem which History has put before the me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return to Communism in all that ministers to the well-being of man.

充公，这就是历史摆在20世纪人面前的一个问题：凡是能帮助实

现全民幸福的方面，都要回归到共产主义。

But this problem cannot be solved by means of legislation. No one imagines that. The poor, as well as the rich, understand that neither the existing Governments, nor any which might arise out of possible political changes, would be capable of finding such a solution. They feel the necessity of a social revolution; and both rich and poor recognize that this revolution is imminent, that it may break out in a few years.

但是这个问题不能靠立法解决。没有人会这么想。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他们都明白，现在的政府、或者任何一个从可能的政治变革中出现的政府，都无法找到答案。他们都感觉有必要来一场社会革命；富人和穷人都意识到，这场革命正在临近，可能几年之内就会爆发。

A great change in thought has taken place during the la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ut suppressed, as it was, by the propertied classes, and denied its natural development, this new spirit must now break its bonds by violence and realize itself in a revolution.

在19世纪后半期，人类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被有产阶级扼制住了，无法自然发展，现在这种新精神必须以强力冲破藩篱，通过一场革命来实现。

Whence will the revolution come? How will it announce its coming? No one can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e future is hidden.

But those who watch and think do not misinterpret the signs: workers and exploiters, Revolutionists and Conservatives, thinkers and men of action, all feel that a revolution is at our doors.

革命什么时候发生？革命会怎么发生？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未来是不可知的。但是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人不会错过这些信息：工人和剥削者，革命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思想家和行动派，都感觉到一场革命即将来临。

Well, then,—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hen the thunderbolt has fallen?

那么——雷电到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We have all been bent on studying the dramatic side of revolutions so much, and the practical work of revolutions so little, that we are apt to see only the stage effects, so to speak, of these great movements; the fight of the first days; the barricades. But this fight, this first skirmish, is soon ended, and it only after the breakdown of the old system that the real work of revolution can be said to begin.

我们都曾非常用心地研究过革命戏剧性的一面，却很少研究革命的实际工作，可以说，我们往往只看到这些大运动的一些舞台效果，最初几天的战斗，设置的路障。可是这场斗争，最初的小冲突很快就结束了，一直到旧体制轰然倒塌，真正的革命工作才刚刚开始。

Effete and powerless, attacked on all sides, the old rulers are soon swept away by the breath of insurrection. In a few days the middle-class monarchy of 1848 was no more, and while Louis Philippe was making good his escape in a cab, Paris had already forgotten her “citizen king.” The government of Thiers disappeared, on the 18th of March, 1871, in a few hours, leaving Paris mistress of her destinies. Yet 1848 and 1871 were only insurrections. Before a popular revolution the masters of “the old order” disappear with a surprising rapidity. Its upholders fly the country, to plot in safety elsewhere and to devise measures for their return.

旧时的统治者已经无能为力，四处受敌，很快就会被暴动的狂风席卷而去。几天以后，1848年的中产阶级的君主政体就不复存在，国王路易·菲利普坐马车出逃，巴黎很快就忘记了它的“国民国王”。1871年3月18日，几个小时之内，梯也尔的政府就消失了，留下巴黎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可是1848年和1871年只是两场暴动。在民众发动革命之前，“旧秩序”的主人会以惊人的速度逃窜，旧秩序的支持者逃离国内，躲到安全的地方，图谋策划，设法卷土重来。

The former Government having disappeared, the army, hesitating before the tide of popular opinion, no longer obeys its commanders, who have also prudently decamped. The troops stand by without interfering, or join the rebels. The police, standing at ease, are uncertain whether to belabour the crowd, or to cry: “Long live the Commune!” while some retire to their quarters to “await the pleasure of the new Government.” Wealthy citizens pack their trunks and betake themselves to places of safety. The people remain. This is how a revolution is ushered in.

前一个政府刚一消失，军队在民众潮水般的意见面前犹豫不决，不再听众指挥官的命令，而指挥官早已精明地躲了起来。军队站在一旁，既不干涉，也不加入叛乱。警察悠闲地站着，不知道该痛打群众，还是该大喊："公社万岁"！有些警察则回到自己的住处"等着新政府成立"。富裕的市民收拾好行李，逃到安全的地方。只有平民留在城里。革命就是这样爆发的。

In several large towns the Commune is proclaimed. In the streets wander scores of thousands of men, and in the evening they crowd into improvised clubs, asking: "What shall we do?" and ardently discuss public affairs. All take an interest in them; those who yesterday were quite indifferent are perhaps the most zealous. Everywhere there is plenty of good-will and a keen desire to make victory certain. It is a time when acts of supreme devotion are occurring.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are full of the desire of going forward.

一些大城市里宣告成立了公社。成千上万的人们在街道上游行，晚上他们挤进各个临时俱乐部问："我们该干些什么？"然后开始热心地讨论公众事务。许多人都对公众问题很感兴趣；那些昨天还冷漠的人，现在变得异常热心。到处都有人主动提供帮助，热切盼望革命取得胜利。崇高的奉献精神就在这时产生了。人民群众唯一的愿望就是继续前进。

All this is splendid, sublime; but still, it is not a revolution. Nay, it is only now that the work of the revolutionist begins.

这一切太辉煌、太壮观了；但是，这并不是革命。不，这时只是

革命刚刚开始。

Doubtless there will be acts of vengeance. The Watrins and the Thomases will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unpopularity; but these are mere incidents of the struggle—not the revolution.

毫无疑问，有人会来报仇。像沃特金斯、托马斯这样的坏人将要接受惩罚；但这只是小的斗争——并不是革命。

Socialist politicians, radicals, neglected geniuses of journalism, stump orators—both middle-class people and workmen—will hurry to the Town Hall, to the Government offices,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vacant seats. Some will decorate themselves with gold and silver lace to their hearts' content, admire themselves in ministerial mirrors, and study to give orders with an air of importance appropriate to their new position. How could they impress their comrades of the office or the workshop without having a red sash, an embroidered cap, and magisterial gestures! Others will bury themselves in official papers, trying, with the best of wills, to make head or tail of them. They will indite laws and issue high-flown worded decrees that nobody will take the trouble to carry out—because revolution has come.

社会党的政客们、激进派、新闻界的失意分子、竞选演说家——都是中产阶级和工人——他们会匆匆赶到市政厅，赶到政府办公室占个空位子。有些人会心满意足地用金银花边装饰自己，对着内阁政府里的镜子瞻仰自己，学习用适合自己新地位的威仪来发号施令。他们要是不挂上红色的饰带，戴上绣花帽子，装出威风凛凛的架势，又怎

么能够去压迫办公室里或者工厂里的旧同事呢？还有一些人埋头在政府公文中，费尽气力，好心好意想整理出一个头绪。他们要制造法律，还要发布言辞夸张的法令，但是这个时候没有人再来实行了——因为革命已经开始了。

To give themselves an authority which they have not they will seek the sanction of old forms of Government. They will take the names of “Provisional Government,”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Mayor,” “Governor of the Town Hall,” “Commissioner of Public Safety,” and what not. Elected or acclaimed, they will assemble in Boards or in Communal Councils, where men of ten or twenty different schools will come together, representing—not as many “private chapels,” as it is often said, but as many different conceptions regarding the scope, the bearing, and the goal of the revolution. Possibilists, Collectivists, Radicals, Jacobins, Blanquists, will be thrust together, and waste time in wordy warfare. Honest men will be huddled together with the ambitious ones, whose only dream is power and who spurn the crowd whence they are sprung. All coming together with diametrically opposed views, all—forced to enter into ephemeral alliances, in order to create majorities that can but last a day. Wrangling, calling each other reactionaries, authoritarians, and rascals, incapable of coming to an understanding on any serious measure, dragged into discussions about trifles, producing nothing better than bombastic proclamations; all giving themselves an awful importance while the real strength of the movement is in the streets.

要抓住他们从未有过的权势，就要求助于旧的政府形式。他们要采用“临时政府”“公安委员会”“市长”“县长”“公安委员”等等名字，不管是当选的还是推举的，他们都要参加委员会或公社的会议，十个或

二十个不同派别的人集合在一起——他们并不是像通常说的，来自各个“私人教堂”，但他们对革命的范围、态度以及目的等，各有不同的看法。“实行派”“集体主义者”“激进派”“雅各宾派”“布朗基派”，互相排挤，浪费时间打口水仗。诚实的人和野心家挤在一起，野心家只梦想着获取权力，一旦得势，就会把人民排除在外。大家带着完全相反的观点聚在一起——被迫结成临时联盟，成为大多数，这个大多数只能维持一天而已。他们彼此争吵，互相谩骂对方是反动派、官僚、流氓等等，遇到重大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对微不足道的琐事争论不休，只会发布言过其实的公告，人人都以为自己非常重要，而真正的运动力量却在街头巷尾。

All this may please those who like the stage, but it is not revolution. Nothing has been accomplished as yet.

爱看舞台表演的人可能会喜欢这样的情形，但这并不是革命。什么事都还没办成呢。

And meanwhile the people suffer. The factories are idle, the workshops closed; trade is at a standstill. The worker does not even earn the meagre wage which was his before. Food goes up in price. With that heroic devotion which has always characterized them, and which in great crises reaches the sublime, the people will wait patiently.” We place these three months of want at the service of the Republic,” they said in 1848, while “their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gentlemen of the new Government, down to the meanest Jack-in-office received their salary regularly.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正在受苦。工厂闲置，厂房关闭；商业停

顿。工人连以前那微薄的工资也拿不到了。食品价格不断上涨。民众始终具有英勇的献身精神，每遇到危急关头，这种精神就越发崇高，他们会耐心地等待着。“为了共和国，我们就忍饥挨饿三个月，”1848年革命时，他们曾这样说，可是那些“他们的代表”和新政府的先生们，还有办公室里的无名之辈，还在正常领取工资。

The people suffer. With the childlike faith, with the good humour of the masses who believe in their leaders, they think that “yonder,” in the House, in the Town Hall, in the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their welfare is being considered. But “yonder” they are discussing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except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In 1793, while famine ravaged France and crippled the Revolution; whilst the people were reduced to the depths of misery, although the Champs- lysees were lined with luxurious carriages where women displayed their jewels and splendour, Robespierre was urging the Jacobins to discuss his treatise on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While the worker was suffering in 1848 from the general stoppage of trade,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al Assembly were wrangling over military pensions and prison labour, without troubling how the people managed to live during the terrible crisis. And could one cast a reproach at the Paris Commune, which was born beneath the Prussian cannon, and lasted only seventy days, it would be for this same error—this failur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Revolution could not triumph unless those who fought on its side were fed: that on fifteen pence a day a man cannot fight on the ramparts and at the same time support a family.

民众在遭受苦难。他们有着孩子般的虔诚，有着相信自己领袖的好脾气，他们以为，“在那里”，在议会里、在市政厅里、在公安委员会里——那些人正在考虑他们的幸福。可是“在那里”，那些人所讨论

的却唯独不包括人民的幸福。1793年，饥荒席卷了整个法国，摧毁了革命；人民处于贫困的深渊，香榭丽舍大街上仍然停满了豪华马车，贵妇人们在马车上竞相展示她们的珠宝和华服，罗伯斯庇尔催促雅各宾党讨论他对于英国宪法的意见。1848年，劳动者因工商业总停顿而受尽苦难时，临时政府与国民议会却在讨论军人的饷银和囚徒的工作，根本没考虑过人民群众在水深火热的危机中如何生活。普鲁士炮弹之下诞生的巴黎公社，仅仅支持了70天，如果有人批评巴黎公社的话，那是因为它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没有弄明白，如果为革命而战的民众吃不饱肚子，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每人每天只挣15便士，他是不可能一边在城墙上作战，一边养活一个家庭的。

The people will suffer and say: “How is a way out of these difficulties to be found?”

民众会一边受苦一边问道：“怎么才能摆脱这些困难呢？”

III

三

It seems to u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We must recognize, and loudly proclaim, that every one, whatever his grade in the old society, whether strong or weak, capable or incapable, has, before everything, THE RIGHT TO LIVE, and that society is bound to share amongst all, without exception, the means of existence it has at its disposal. We must acknowledge this, and proclaim it aloud, and act up to it.

这个问题似乎只有一个答案：我们必须承认，必须大声宣布，每一个人，不管他在旧社会是什么阶层，不管他强壮还是瘦弱，有能力还是无能力，首先享有生存权，社会应该把生存必需品无差别地分给所有人。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大声宣布这一点，根据这一点行动。

Affairs must be managed in such a way that from the first day of the revolution the worker shall know that a new era is opening before him; that henceforward none need crouch under the bridges, while palaces are hard by, none need fast in the midst of plenty, none need perish with cold near shops full of furs; that all is for all, in practice as well as in theory, and that at last,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a revolution has been accomplished which considers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before schooling them in their DUTIES.

必须这样行事，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让工人们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从此以后再没有人蜷缩在高楼大厦附近的桥下，再没有人在充足的食物中绝食，再没有人在装满皮毛的商店旁冻死；所有产品为所有人，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这样。最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场真正的革命成功了，这场革命首先考虑的是民众的需求，其次才教育他们去完成自己的义务。

This cannot be brought about by Acts of Parliament, but only by taking immediate and effective possession of all tha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well-being of all; this is the only really scientific way of going to work, the only way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and desired by the mass of the people. We must take possession,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of the granaries, the shops full of clothing and the dwelling houses. Nothing must be wasted. We must organize without delay a way to feed the hungry, to satisfy all wants, to meet

all needs, to produce not for the special benefit of this one or that one, but so as to ensure to society as a whole its life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只靠议会法案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立刻有效地占有保证全民幸福的一切物资；这是唯一真正科学的方法，人民大众能够理解并希望的唯一的方法。我们必须以人民的名义，占领谷仓、服装店和住宅。不能浪费一丝一毫。我们必须立刻组织起来，为饥饿的人送去食物，填补所有的不足，满足所有的需求，组织生产，但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的特殊利益，而是保证整个社会的生存和持续发展。

Enough of ambiguous words like “the right to work,” with which the people were misled in 1848, and which are still resorted to with the hope of misleading them. Let us have the courage to recognise that Well-being for all, henceforward possible, must be realized.

像“工作的权利”这样含糊不清的话，已经太多了，1848年时就已经误导了民众，现在还有人想用这样的话来误导民众。让我们大胆地承认，今后全民幸福是可能的，是必须实现的。

When the workers claimed the right to work in 1848, national and municipal workshops were organized, and workmen were sent to drudge there at the rate of 1s. 8d. a day! When they asked the “Organization of Labour,” the reply was: “Patience, friends, the Government will see to it; meantime here is your 1s. 8d. Rest now, brave toiler, after your life-long struggle for food!” And in the meantime the cannons were overhauled, the reserves called out,

and the workers themselves disorganized by the many methods well known to the middle classes, till one fine day, in June, 1848, four months after the overthrow of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they were told to go and colonize Africa, or be shot down.

工人们在1848年要求工作的权利时，已经建立了国有的工厂和城市的工厂，工人们被送进去做苦工，工钱一天只有1先令8便士。他们去找“劳工组织”，得到的回答是：“耐心点，朋友们，政府会想办法的；这是你们的1先令8便士。勇敢的工友们，你们为了糊口辛苦了一辈子，现在稍微休息一下吧”。与此同时，政府彻底检修大炮，召集预备兵，用中产阶级所熟悉的方法，导致工人分裂，直到1848年6月，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在前一个政府被推翻的四个月前，政府下令，工人们要么去非洲开拓殖民地，要么等着被枪毙。

Very different will be the result if the workers claim the RIGHT TO WELL-BEING! In claiming that right they claim the right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wealth of the community—to take houses to dwell in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each family; to socialize the stores of food and learn the meaning of plenty, after having known famine too well. They proclaim their right to all social wealth—fruit of the labour of past and present generations—and learn by its means to enjoy those higher pleasures of art and science which have too long been monopolized by the rich.

如果工人们要求的是幸福的权利，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如果要求幸福的权利，他们就要求占有社会的财富——根据每个家庭的需求获得住房；把食品仓库收归公有，让富人们们尝到饥饿的滋味后再来学习富裕的含义。他们主张占有全社会的财富——过去和现在，世世代代民众劳动的果实——学习利用这些财富来享受科学和艺术带来的

高尚的快乐，而这种快乐长期以来都被富人所垄断。

And while asserting their right to live in comfort, they assert, what is still more important, their right to decide for themselves what this comfort shall be, what must be produced to ensure it, and what discarded as no longer of value.

他们主张舒适生活的权利，同时也主张更重要的权利，就是由他们自己决定什么才是舒适的生活，必须生产哪些产品才能保证这种舒适的生活，哪些东西因为没有价值应当被抛弃。

The “right to well-being” means the possibility of living like human beings, and of bringing up children to be members of a society better than ours, whilst the “right to work” only means the right to be always a wage-slave, a drudge, ruled over and exploited by the middle class of the future. The right to well-being is the Social Revolution, the right to work means nothing but the Treadmill of Commercialism. It is high time for the worker to assert his right to the common inheritance, and to enter into possession of it.

“幸福的权利”意味着能够像人一样地生活，养育后代，使他们生活的社会超过我们生活的社会，而“工作的权利”仅仅意味着永远做一个工资奴隶，做苦工，受未来的中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幸福的权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作的权利只不过是商业制度的踏车而已。现在正是时候，劳动者应当主张对公共遗产的权利，并且占有公共遗产。

CHAPTER III ANARCHIST COMMUNISM

第三章　无政府共产主义

I

一

Every society, on abolishing private property will be forced, we maintain, to organize itself on the lines of Communistic Anarchy. Anarchy leads to Communism, and Communism to Anarchy, both alike being expressions of the predominant tendency in modern societies, the pursuit of equality.

我们认为，每个社会在废除私有制后，就不得不沿着共产主义的无政府方向组织起来。无政府主义通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可以通向无政府主义，两者都代表着近代社会的主要趋势，即追求平等。

Time was when a peasant family could consider the corn it sowed and reaped, or the woolen garments woven in the cottage, as the products of its own soil. But even then this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was not quite correct. There were the roads and the bridges made in common, the swamps drained by common toil, the communal pastures enclosed by hedges which were kept in repair by each and all. If the looms for weaving or the dyes for colouring fabrics were improved by somebody, all profited; and even in those days a peasant family could not live alone, but was dependent in a thousand ways on the village or the commune.

在过去，一个农民家庭可以把自己种植或收割的粮食，或者把自己织出的羊毛衣服，当成自己土地上的产品。但就连这种看法也不大正确。道路、桥梁是共同修建的；排干沼泽地是共同劳动，公共牧场周围的篱笆是所有人共同维修的。如果有个人把织布机或者染料进行了改良，所有人都可以受益；即便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民家庭也不可能独自生活，在许多方面还要依靠乡村或公社的其他人。

But nowadays,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industry, when everything is interdependent, when each branch of production is knit up with all the rest, the attempt to claim an Individualist origin for the products of industry is absolutely untenable. The astonishing perfection attained by the textile or mining industries in civilized countries is due to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a thousand other industries, great and small,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railroad system, to inter-oceanic navigation, to the manual skill of thousands of workers, to a certain standard of culture reached by the working class as a whole—to the labours, in short, of men in every corner of the globe.

但是现在，在工业目前的发展状况下，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生产的各个部门与其他所有部门紧密相关，如果想主张某些工业产品是个人创造的结果，这完全站不住脚。文明国家的纺织业和采矿业之所以达到令人惊奇的完美地步，得益于其他千百种大小工业的同步发展，得益于铁路网的扩张、海洋间的航行、成千上万劳动者手工娴熟的技能以及整个劳动阶层都达到了一定水平的文化——总而言之，得益于全球各地人们的劳动。

The Italians who died of cholera while making the Suez Canal, or of anchylosis in the St. Gothard Tunnel, and the Americans

mowed down by shot and shell while fighting for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have helped to develop the cotton industry of France and England, as well as the work-girls who languish in the factories of Manchester and Rouen, and the inventor who (following the suggestion of some worker) succeeds in improving the looms.

开凿苏伊士运河时死于霍乱、建造圣·哥特哈德隧道死于关节僵硬的意大利人，和参加废奴运动而死在枪林弹雨之下的美国人，对于英、法两国棉纺织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并不亚于在曼彻斯特和鲁昂的工厂中辛苦劳作的青年女工和（在某个工人的建议下）成功改良织布机的发明家。

How then, shall we estimate the share of each in the riches which ALL contribute to amass?

那么我们又怎么去估计，在所有人共同积累的巨大财富中，每个人究竟占有多少份额呢？

Looking at production from this general, synthetic point of view, we cannot hold with the Collectivists that payment proportionate to the hours of labour rendered by each would be an ideal arrangement, or even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如果用笼统的、综合的观点去观察生产，我们就不能赞同集体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根据每个人劳动的时间按相应比例支付其报酬，是一种理想的安排，或者至少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

Without discussing whether exchange value of goods is really measured in existing societies by the amount of work necessary to produce it—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of Adam Smith and Ricardo, in whose footsteps Marx has followed—suffice it to say here, leaving ourselves free to return to the subject later, that the Collectivist ideal appears to us untenable in a society which considers the instruments of labour as a common inheritance. Starting from this principle, such a society would find itself forced from the very outset to abandon all forms of wages.

我们暂时先不讨论现在社会中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否真正由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劳动量决定——这是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理论，马克思也赞成他们的观点——后面再回到这个话题上，这里先说一说我们的观点，在一个把劳动工具视作共同遗产的社会里，这种集体主义理想在我们看来是站不住脚的。从这个原则出发，一个这样的社会从一开始就被迫放弃各种形式的工资制度。

The migrated individualism of the Collectivist system certainly could not maintain itself alongside a partial communism—the socialization of land and th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 new form of property requires a new form of remuneration. A new method of production cannot exist side by side with the old forms of consumption, any more than it can adapt itself to the old forms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从集体主义制度下迁移出来的个人主义无法与局部共产主义——土地和生产工具公有——保持同步。新的财产形式需要新的分配形式。新的生产方式无法与旧的消费形式并肩前进，也无法适应旧的政治组织形式。

The wage system arises out of the individual ownership of the land and the instruments of labour. It wa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nd will perish with it, in spite of the attempt to disguise it as “profit-sharing.” The common possession of the instruments of labour must necessarily bring with it the enjoyment in common of the fruits of common labour.

工资制度起源于土地和劳动工具私有化。这是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便有人想把它伪装成“利益分配”，它也将随资本主义一同消亡。劳动工具共同所有必将导致人们共同分享集体劳动的成果。

We hold further that Communism is not only desirable, but that existing societies, founded on Individualism, are inevitably impelled in the direction of Communism.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sm during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is explained by the efforts of the individual to protect himself from the tyranny of Capital and of the State. For a time he imagined, and those who expressed his thought for him declared, that he could free himself entirely from the State and from society. “By means of money,” he said, “I can buy all that I need.” But the individual was on a wrong track, and modern history has taught him to recognize that, without the help of all, he can do nothing, although his strong-boxes are full of gold.

我们更进一步认为，共产主义不仅是值得向往的，如今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社会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向共产主义转变。过去三个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发展，就是个人为保护自己不受资本和政府的专

制统治所进行的努力。有时，个人设想着自己能够完全脱离政府和社会，那些替他发声的人也这么宣扬。“有了钱，”他说，“就能买到我需要的所有东西。”可是这个人错了，近代历史让他明白，没有所有人的帮助，即使保险箱里装满了黄金，他也什么都做不成。

In fact, along this current of Individualism, we find in all modern history a tendency, on the one hand to retain all that remains of the partial Communism of antiquity, and, on the other, to establish the Communist principle in the thousand developments of modern life.

事实上，伴随着个人主义的潮流，我们发现在整个近代史中还有一种趋势，它一方面保持着古代局部共产主义的所有遗产，另一方面又在近代生活的各项发展中确立着共产主义原则。

As soon as the communes of the tenth,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had succeeded in emancipating themselves from their lords, ecclesiastical or lay, their communal labour and communal consumption began to extend and develop rapidly. The township—and not private persons—freighted ships and equipped expeditions, for the export of their manufacture, and the benefit arising from the foreign trade did not accrue to individuals, but was shared by all. At the outset, the townships also bought provisions for all their citizens. Traces of these institutions have lingered on in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people piously cherish the memory of them in their legends.

随着10、11、12世纪的公社从宗教和世俗领主那里获得解放之

后，他们的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就开始迅速地扩张和发展。城镇——而不是个人——把货物装船，组织远征队出口他们的产品，从国外贸易中得到的利润并不属于个人，而是由所有人共享。一开始，城镇还为所有居民购买粮食。这些制度的痕迹一直流传到19世纪，人们在传说故事中，虔诚地珍藏着有关这些制度的记忆。

All that has disappeared. But the rural township still struggles to preserve the last traces of this Communism, and it succeeds—except when the State throws its heavy sword into the balance.

一切都消失了。可是农村乡镇的居民仍然费力保存这种共产主义的最后痕迹，而且他们成功了——只要政府不挥起重剑打破这种平衡。

Meanwhile new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same principle—to every man according to his needs—spring up under a thousand different forms; for without a certain leaven of Communism the present societies could not exist. In spite of the narrowly egoistic turn given to men's minds by the commercial system, the tendency towards Communism is constantly appearing, and it influences our activities in a variety of ways.

同时，根据同样的原则——各取所需——众多新组织以各种形式蓬勃兴起；因为如果没有共产主义的某种影响，现在的社会都不复存在。虽然商业制度使人的思想变得狭隘自私，但迈向共产主义的趋势仍不断涌现，并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我们的活动。

The bridges, for the use of which a toll was levied in the old days, have become public property and are free to all; so are the high roads, except in the East, where a toll is still exacted from the traveller for every mile of his journey. Museums, free libraries, free schools, free meals for children; parks and gardens open to all; streets paved and lighted, free to all; water supplied to every house without measure or stint—all such arrangements are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 “Take what you need.”

过去人们过桥要交过桥费，现在桥梁变成了公共财产，所有人免费通行；公路也是如此，除了在东方，那里的游客每过一英里就要交过路费。博物馆、免费图书馆、免费学校、免费儿童食堂；公园和花园向所有人开放；铺筑的马路灯光明亮，任人通行；供应给各家各户的水没有限制一一所有这些安排都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各取所需”。

The tramways and railways have already introduced monthly and annual season tickets, without limiting the number of journeys taken; and two nations, Hungary and Russia, have introduced on their railways the zone system, which permits the holder to travel five hundred or eight hundred miles for the same price. It is but a short step from that to a uniform charge, such as already prevails in the postal service. In all these innovations, and in a thousand others, the tendency is not to measure the individual consumption. One man wants to travel eight hundred miles, another five hundred. These are personal requirements. There is no sufficient reason why one should pay twice as much as the other because his need is twice as great. Such are the signs which appear even now in our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电车和铁路已经引进了月票和年票，不限制旅行次数；匈牙利和俄国两国的铁路已经引进了区域制度，允许持票人以同样的票价旅行五百或八百英里，这离邮政服务的统一票价只差一小步了。所有这些新改革以及其他许多新改革中，都有一种趋势，就是不考虑个人消费多少。有的人想旅行八百英里，有的人想旅行五百英里，这些都是个人需要。一个人的需求是另一个人的两倍，就要付两倍的钱，这也没有充足的理由。这些现象现在都出现在我们的个人主义社会里。

Moreover, there is a tendency, though still a feeble one, to consider the needs of the individual, irrespective of his past or possible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We are beginning to think of society as a whole, each part of which is so intimately bound up with the others that a service rendered to one is a service rendered to all.

而且，还有一种趋势，尽管不太明显，就是只考虑一个人的需求，不管他过去或者可能对公社出过什么力。我们开始把整个社会当成一个整体，每个部分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一个人服务就是为所有人服务。

When you go to a public library—not indeed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aris, but, say, into the British Museum or the Berlin Library—the librarian does not ask what services you have rendered to society before giving you the book, or the fifty books, which you require; he even comes to your assistance if you do not know how to manage the catalogue. By means of uniform credentials—and very often a contribution of work is preferred—the scientific society opens its museums, its gardens, its library, its laboratories, and its annual conversaziones to each of its members, whether he be a

Darwin, or a simple amateur.

如果你来到一个公立图书馆——不一定是巴黎的国家图书馆，比如大英博物馆或者柏林博物馆——管理员不会先问你有何贡献，再把你借的书给你，无论是一本还是五十本；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查找目录，他甚至还会过来帮助你。只要有统一的凭证——通常情况下赠送自己的作品更受欢迎——学术团体就会向每位会员敞开其博物馆、花园、图书馆、实验室和每年的学术座谈会，不管他是一位科学家还仅仅是一位业余爱好者。

At St. Petersburg, if you are elaborating an invention, you go into a special laboratory, where you are given a place, a carpenter's bench, a turning lathe, all the necessary tools and scientific instruments, provided only you know how to use them; and you are allowed to work there as long as you please. There are the tools; interest others in your idea; join with fellow workers skilled in various crafts, or work alone if you prefer it. Invent a flying machine, or invent nothing—that is your own affair. You are pursuing an idea—that is enough.

在圣彼得堡，如果你正在进行发明创造，你可以去一个特别的实验室，那里会为你提供一间屋子、一个木匠长椅、一个旋转车床、所有必需的工具和科学仪器，当然你懂得如何操作这些器械；你在里面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那里有各种工具；让别人对你的思想感兴趣；和技巧熟练的工人们一起干活，要是你乐意，也可以单独做。发明出一架飞行机，或者什么也没发明出来——这是你自己的事。你在追求一个理想——这就够了。

In the same way, those who man the lifeboat do not ask credentials from the crew of a sinking ship; they launch their boat, risk their lives in the raging waves, and sometimes perish, all to save men whom they do not even know. And what need to know them? “They are human beings, and they need our aid—that is enough, that establishes their right—To the rescue!”

同样，驾驶救生艇的人也不会要正在下沉的船上的船员们出具证明；他们开动救生艇，在怒海狂涛中冒着生命危险，有时甚至葬身水底，就是为了去救那些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有什么必要知道他们的名字呢？“他们是人，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这就够了，他们有这个权利——快去救人！”

Thus we find a tendency, eminently communistic, springing up on all sides, and in various guises, in the very heart of theoretically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因此我们发现，在这个理论上是个人主义的社会的正中心，通过各种伪装表现出来的一种非常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正在各个方面蓬勃兴起。

Suppose that one of our great cities, so egotistic in ordinary times, were visited to-morrow by some calamity—a siege, for instance—that same selfish city would decide that the first needs to satisfy were those of the children and the aged. Without asking what services they had rendered, or were likely to render to society, it would first of all feed them. Then the combatants would be cared for, irrespective of the courage or the intelligence which each had

displayed, and thousands of men and women would outvie each other in unselfish devotion to the wounded.

假设我们的某个大城市，平时非常自私自利，明天就要遭到灾难——比如说被围困——这个自私的城市会作出决定，最先要照顾好孩子和老人。不问他们对社会尽了什么力，或者可能尽什么力，首先要给他们食物，然后才去照顾那些士兵，不管他们是否表现出了勇气和智慧，城里的人们也争先恐后无私奉献地照顾伤者。

This tendency exists, and is felt as soon as the most pressing needs of each are satisfied, and in proportion as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the race increases. It becomes an active force every time a great idea comes to oust the mean preoccupations of everyday life.

这种趋势存在着，一旦每个人最迫切的需求得到满足时就会感觉到这种趋势，而且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成正比。每当一种伟大的思想驱赶走日常生活中的浅陋成见时，这种趋势就变成一股活跃的力量。

How can we doubt, then, that when th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re placed at the service of all, when business is conducted on Communist principles, when labour, having recovered its place of honour in society, produces much more than is necessary to all—how can we doubt that this force (already so powerful), will enlarge its sphere of action till it becomes the ruling principle of social life?

我们还需要怀疑吗，到了那个时候，生产工具由所有人随意支

配，一切事务都按共产主义原则处理，劳动重新在社会中取得光荣的位置，生产的产品远远超过所有人的需求——这种力量（已经如此强大）还会扩大活动范围，直到变成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原则，我们还需要怀疑吗？

Following these indications, and considering further the practical side of expropriation, of which we shall speak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s, we are convinced that our first obligation, when the revolution shall have broken the power upholding the present system, will be to realize Communism without delay.

根据这些迹象，我们再进一步考虑后面几章要讲到的充公的实际方面，我们相信，当革命打破了现有制度的势力的时候，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毫不迟疑地实现共产主义。

But ours is neither the Communism of Fourier and the Phalansterians, nor of the German State Socialists. It is Anarchist Communism, Communism without government—the Communism of the Free. It is the synthesis of the two ideals pursued by humanity throughout the ages—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berty.

但是我们的共产主义，不是傅立叶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也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共产主义。我们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即没有政府的共产主义——自由人民的共产主义。这是人类历代所追求的两大理想的综合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综合体。

II

二

In taking “Anarchy” for our ideal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we are only giving expression to another marked tendency of human progress. Whenever European societies have developed up to a certain point, they have shaken off the yoke of authority and substituted a system founded more or less on the principles of individual liberty. And history shows us that these periods of partial or general revolution, when the old governments were overthrown, were also periods of sudden, progress both in the economic and the intellectual field. So it was after the enfranchisement of the communes, whose monuments, produced by the free labour of the guilds, have never been surpassed; so it was after the great peasant uprising which brought about the Reformation and imperilled the papacy; and so it was again with the society, free for a brief space, which was create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Atlantic by the malcontents from the Old world.

我们把“无政府”作为政治制度的理想，只不过是在说明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另一个明显趋势。欧洲社会发展到某个程度时，就会打破强权的束缚，以一种或多或少建立在个人自由原则上的制度代之。历史表明，旧政府被推翻的局部革命或全面革命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和智力领域急速发展的时期。中世纪各公社自由独立后就是如此，各行业协会自由劳动程度达到顶峰；伟大的农民起义后也是如此，农民起义带动了宗教改革，动摇了教皇的权势；社会也是如此，来自旧世界的反抗者在大西洋对岸创造了短暂的自由。

And, if we observe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ivilized

nations, we see, most unmistakably, a movement ever more and more marked tending to limit the sphere of ac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o allow more and more liberty to the individual. This evolution is going on before our eyes, though cumbered by the ruins and rubbish of old institutions and old superstitions. Like all evolutions, it only waits a revolution to overthrow the old obstacles which block the way, that it may find free scope in a regenerated society.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文明各国现在的发展情况，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限制政府的行动范围，给予个人越来越多的自由。这种进化虽然受到旧制度和旧迷信的废砖碎瓦的阻碍，但是依然在我们眼前继续前进。和其他进化过程一样，它只等着一场革命扫除道路上的障碍，就可以在一个新生的社会里自由活动了。

After having striven long in vain to solve the insoluble problem—the problem of constructing a government “which will constrain the individual to obedience without itself ceasing to be the servant of society,” men at last attempt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every form of government and to satisfy their need for organization by free contact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pursuing the same aim. The independence of each small territorial unit becomes a pressing need; mutual agreement replaces law in order to regulate individual interests in view of a common object—very often disregarding the frontiers of the present States.

人类长期徒劳地努力想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建设一个“压迫个人来服从又自称社会公仆”的政府，人们最后终于尝试着把自己从各种形式的政府下解放出来，与志同道合的个人和团体按照自

由契约建立组织以满足自身需求。于是各个小的地区迫切需要独立；用双方协议代替法律，以调节各自在某一共同目标上的利益——往往漠视现在的国家界限。

All that was once looked on as a function of the Government is to¬day called in question. Things are arranged more easily and more satisfactorily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tate. And in studying the progress made in this direction, we are led to conclude that the tendency of the human race is to reduce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to zero; in fact, to abolish the State, the personification of injustice, oppression, and monopoly.

曾经被认为是政府功能的，现在都遭到质疑。没有政府干涉，事情会更容易处理，更令人满意。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的趋势是将政府干涉减少为零；事实上，是完全消灭政府，它代表着不公正、压迫和垄断。

We can already catch glimpses of a world in which the bonds which bind the individual are no longer laws, but social habits—the result of the need felt by each one of us to seek the support, the co-operation, the sympathy of his neighbours.

我们已经能够大概看出未来的世界了，到那时，约束个人的不再是法律，而是社会习惯——这是我们每个人所感受到的希望获得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和相互同情的结果。

Assuredly the idea of a society without a State will give rise to

at least as many objections a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society without private capital. We have all been brought up from our childhood to regard the State as a sort of Providence; all our education, the Roman history we learned at school, the Byzantine code which we studied later under the name of Roman law, and the various sciences taught at the universities, accustom us to believe in Government and in the virtues of the State providential.

毫无疑问，这种无政府社会的思想，必定会受到很多人很多反对，就像废弃私人资本的社会政治经济一样。我们从小就被教化着把政府奉做神的旨意；我们所有的教育，我们在学校学到的罗马史，后来在罗马法里学到的拜占廷法典，以及后来在大学里所学的各种科学，都要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建立国家是神的旨意。

To maintain this superstition whole systems of philosophy have been elaborated and taught; all politics are based on this principle; and each politician, whatever his colours, comes forward and says to the people, “Give my party the power; we can and we will free you from the miseries which press so heavily upon you.”

为了维持这种迷信思想，人们制定并教授完整的哲学体系；一切政治都以这个原则为基础；不管什么党派的政客都走上前对民众说：“把权力给我的党；我们能够而且愿意解除压迫在你们身上的沉重苦难。”

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 all our actions are guided by this principle. Open any book on sociology or jurisprudence, and you will find there the Government, its organization, its acts, filling so

large a place that we come to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world of statesmen.

我们从生到死，我们的所有行为都受到这种原则的支配。随便翻开一本社会学或法学著作，你会发现，政府、政府组织、政府行为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这使我们不得不相信，除了政府和政客的世界，什么也没有。

The Press teaches us the same in every conceivable way. Whole columns are devoted to parliamentary debates and to political intrigues; while the vast everyday life of a nation appears only in the columns given to economic subjects, or in the pages devoted to reports of police and law cases. And when you read the newspapers, your hardly think of the incalculable number of beings—all humanity, so to say—who grow up and die, who know sorrow, who work and consume, think and create outside the few encumbering personages who have been so magnified that humanity is hidden by their shadows, enlarged by our ignorance.

报纸也通过各种途径向我们传达这种思想。所有专栏都在讨论议会辩论和政治阴谋；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大量信息只出现在探讨经济问题的专栏中，或者报道警察和法律诉讼的消息栏中。我们读报纸时，很难想起数不胜数的人——所有人类，可以这么说——他们成长、死亡，他们了解悲伤，他们工作、消费，他们思考、创造，我们只能想起“伟大的”少数人，由于我们的无知，他们被无限放大，整个人类都被遮盖在他们的阴影下。

And yet as soon as we pass from printed matter to life itself, as

soon as we throw a glance at society, we are struck by the infinitesimal part played by the Government. Balzac already has remarked how millions of peasants spend the whole of their lives without knowing anything about the State, save the heavy taxes they are compelled to pay. Every day millions of transactions are made withou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the greatest of them—those of commerce and of the Exchange—are carried on in such a way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not be appealed to if one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had the intention of not fulfilling his agreement. Should you speak to a man who understands commerce, he will tell you that the everyday business transacted by merchants would be absolutely impossible were it not based on mutual confidence. The habit of keeping his word, the desire not to lose his credit, amply suffice to maintain this relative honesty. The man who does not feel the slightest remorse when poisoning his customers with noxious drugs covered with pompous labels, thinks he is in honour bound to keep his engagements. But if this relative morality has developed under present conditions, when enrichment is the only incentive and the only aim, can we doubt its rapid progress when appropriation of the fruits of others' labour will no longer be the basis of society?

可是只要从报纸转到实际生活，看一看真实的社会，我们就会因政府所发挥的微乎其微的作用而震惊。巴尔扎克曾描写过，数百万农民一辈子不知道国家是什么，只知道自己被迫缴纳的重税。每天数百万件的业务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进行，其中绝大多数——商业和贸易——即使缔约一方有意不履行契约，不用上诉到政府就能解决。假若你和一个熟悉商业的人交谈，他便会告诉你，商人间的日常交易完全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恪守诺言的习惯和保全信用的愿望，足以维持这种相对的诚实。那些用被豪华品牌包装的毒药毒害顾客、但却丝毫不感到悔恨的人，也会为了名誉，信守合约的。即使在

目前的条件下，致富是唯一的动力和唯一的目标，这种相对的诚实且能发展，到了整个社会不再以占有他人的劳动果实为基础时，我们还用得着怀疑它的飞速发展吗？

Another striking fact, which especially characterizes our generation, speaks still more in favour of our ideas. It is the continual extension of the field of enterprise due to private initiative, and the prodigious development of free organizations of all kinds. We shall discuss this more at length in the chapter devoted to Free Agreement. Suffice it to mention that the facts are so numerous and so customary that they are the essence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ven though political and socialist writers ignore them, always preferring to talk to us about the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正是我们这一代的特色，更说明了我们的思想是正确的。那就是，私人创办企业的范围不断扩大，各种各样的自由组织也发展壮大起来。在讨论自由契约的章节里，我们再仔细地探讨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只说明，这些事实非常多，非常普遍，已经成为19世纪后半期的主流了，即便政治作家和社会作家忽视这些现象，只愿意向我们讲述政府的职能。

These organizations, free and infinitely varied, are so natural an outcome of our civilization; they expand so rapidly and federate with so much ease; they are so necessary a result of the continual growth of the needs of civilized man; and lastly, they so advantageously replace governmental interference, that we must recognize in them a factor of growing importance in the life of societies. If they do not yet spread over the whol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life, it is that they find an insurmountable obstacle in the poverty of the worker, in the divisions of present society, in the private appropriation of capital, and in the State. Abolish these obstacles, and you will see them covering the immense field of civilized man's activity.

这些自由的组织多种多样，是我们的文明自然发展的结果；他们发展得异常迅速，而且很容易团结一致；他们是文明人的需求不断增长的结果；最后，他们有效地取代了政府干预，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果这些组织尚未覆盖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那是因为他们发现，工人的贫困、现代社会的阶级区分、资本的私人占有和国家等，都是无法逾越的障碍。排除了这些障碍，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覆盖到文明人活动的所有领域。

The history of the last fifty years furnishes a living proof that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s impotent to discharge all the functions we have sought to assign to it. In days to com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ill be quoted as having witnessed the failure of parliamentarianism.

过去50年的历史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代议制政府无法实现我们所赋予它的所有功能。到将来，会有人拿19世纪作例子，证明代议制政体是失败的。

This impotence is becoming so evident to all; the faults of parliamentarianism, and the inherent vices of the representative principle, are so self-evident, that the few thinkers who have made a critical study of them (J. S. Mill, Leverdays), did but give literary

form to the popular dissatisfaction. It is not difficult, indeed, to see the absurdity of naming a few men and saying to them, “Make laws regulating all our spheres of activity, although not one of you knows anything about them!”

议会制的无能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代议制的失败和代议制原则的固有缺点就足以证明这一切，对其作过批判研究的少数思想家（约翰·密尔、莱弗戴斯）只不过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人民大众的不满罢了。非要指定几个人对他们说：“制定法律来规范我们的所有活动，就算你们什么都不懂也没关系”，这个办法的荒谬之处，一看便知。

We are beginning to see that government by majorities means abandoning all the affairs of the country to the tide-waiters who make up the majorities in the House and in election committees; to those, in a word, who have no opinion of their own.

我们开始明白，所谓多数政治不过是把所有的国家事务扔给那些在议会和选举委员会里占有大多数席位的左摇右摆的人，简而言之，扔给那些根本没有自己主见的人。

Mankind is seeking and already finding new issues. The International Postal Union, the railway unions, and the learned societies give us examples of solutions based on free agreement in place and stead of law.

人类一直在寻求新方法，而且现在已经找到了。万国邮政联盟、铁路联盟以及学术团体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用自由契约代替法律的解决

实例。

To-day, when groups scattered far and wide wish to organize themselves for some object or other, they no longer elect an international parliament of Jacks-of-all-trades. They proceed in a different way. Where it is not possible to meet directly or come to an agreement by correspondence, delegates versed in the question at issue are sent, and they are told: “Endeavour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on such or such a question, and then return, not with a law in your pocket, but with a proposition of agreement which we may or may not accept.” Such is the method of the great industrial companies, the learned societies, and numerous association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ch already cover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ch will be the method of a free society. A society founded on serfdom is in keeping with absolute monarchy; a society based on the wage system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masses by the capitalists finds its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parliamentarianism. But a free society, regaining possession of the common inheritance, must seek in free groups and free federations of groups, a new organization, in harmony with the new economic phase of history.

现在，散布在各地的团体希望为某个目的组织起来，不再选举由“无所不能的人”组成的国际议会了。他们采用了一种不同的办法。如果不能直接见面会谈，或者信件往来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就委派熟悉这个问题的代表，并且吩咐他们：“就这个问题，努力达成一致意见，不能带着法规回来，而要带回协议提案，接受与否我们另作决定。”这便是欧洲和美国的大实业公司、学术团体及其他各种协会所采取的方法。这也是一个自由社会要采取的方法。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社会无法脱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在工资制度和资本家剥削民众基础上的社会实行代议制的政治制度。但是一个自由社会重新占有共

同遗产后，必须从一些自由团体以及自由团体联盟中寻找一种新组织，与历史上的新经济时期相适应。

Every economic phase has a political phase corresponding to it, and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touch private property unless a new mode of political life be found at the same time.

每个经济时期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政治时期，只有同时找到一种新模式的政治生活，才有可能推翻私有财产制。

CHAPTER IV EXPROPRIATION

第四章　充公

I

一

It is told of Rothschild that, seeing his fortune threatened by the Revolution of 1848, he hit upon the following stratagem: “I am quite willing to admit,” said he, “that my fortune has been accumulated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but if it were divided to-morrow among the millions of Europe, the share of each would only amount to four shillings. Very well, then, I undertake to render to each his four shillings if he asks me for it.”

据说1848年法国革命时，罗思柴尔德 [5_1] 看到自己的财产可能不保，就想出了这样的招数：“我很愿意承认，”他说，“正是因为别人的牺牲，我才有了今天的财产，不过要是明天将我的财产分给欧洲数百万人，每人只能分到四个先令。那么好吧，如果谁向我要这四个先令，我保证给他。”

Having given due publicity to his promise, our millionaire proceeded as usual to stroll quietly through the streets of Frankfort. Three or four passers-by asked for their four shillings, which he disbursed with a sardonic smile. His stratagem succeeded, and the family of the millionaire is still in possession of its wealth.

我们这位百万富翁对公众作了此番承诺后，仍旧在法兰克福的大街上悠闲地散步。三四个路人向他要四个先令，他冷冷一笑，随手甩给他们。他的伎俩成功了，罗氏家族仍坐拥自己的财产。

It is in much the same fashion that the shrewed heads among the middle classes reason when they say, “Ah, Expropriation! I know what that means. You take all the overcoats and lay them in a heap, and every one is free to help himself and fight for the best.”

中产阶级中的那些滑头也如法炮制。他们说：“啊，充公！我知道充公是什么意思。你们拿走所有的大衣，堆在一起，谁都可以随意挑选，还都抢着要最好的。”

But such jests are irrelevant as well as flippant. What we want is not a redistribution of overcoats, although it must be said that even in such a case, the shivering folk would see advantage in it. Nor do we want to divide up the wealth of the Rothschilds. What we do want is so to arrange things that every human being born into the world shall be ensured the opportunity, in the first instance of learning some useful occupation, and of becoming skilled in it; and next, that he shall be free to work at his trade without asking leave of master or owner, and without handing over to landlord or capitalist the lion's share of what he produces. As to the wealth held by the Rothschilds or the Vanderbilts, it will serve us to organize our system of communal production.

但是，像这样的嘲讽，既离题甚远，也不够严肃。我们想要做的不是重新分配大衣，尽管有一点必须要说明，就是分配大衣，在冷得

瑟瑟发抖的人看来也是不错的。我们想要做的也不是分割罗思柴尔德家族的财产。我们真正想要做的是妥善安排好一切，首先保障出生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学习一技之长并能熟练掌握，其次保障出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工作，既不用征得主人的同意，也不用将自己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交给地主或资本家。至于罗思柴尔德家族或范德比尔特[5_2]家族的财产，可以为我们所用，组建我们的公共生产体系。

The day when the labourer may till the ground without paying away half of what he produces, the day when the machines necessary to prepare the soil for rich harvests are at the free disposal of the cultivators, the day when the worker in the factory produces for the community and not the monopolist—that day will see the workers clothed and fed, and there will be no more Rothschilds or other exploiters.

等到有一天农民耕地无需交纳一半的收成，等到有一天土地丰收所需的农机具由农民自由支配，等到有一天工人为社会大众生产而不是为垄断者生产——这一天工人可以吃饱穿暖——那么就不会再有像罗氏这样的剥削者了。

No one will then have to sell his working power for a wage that only represents a fraction of what he produces.

到了这一天，所有人都不必出卖力气，换取只占自己劳动产出一小部分的工钱。

“So far, so good,” say our critics, “but you will have

Rothschilds coming in from the outside. How are you to prevent a person from amassing millions in China, and then settling amongst you? How are you going to prevent such a one from surrounding himself with lackeys and wage-slaves—from exploiting them and enriching himself at their expense?

“要是这样的话，还不错，”持反对意见的人说，“可是，罗思柴尔德之流还会从国外进来呀。那你们如何阻止一个人在中国积攒数百万英镑，然后在你们身边定居呢？如何防止这样四周簇拥着仆人和雇佣劳力的人——防止这样的人剥削他们，满足一己之利？

“You cannot bring about a revolution all over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Well, then—are you going to establish custom-houses on your frontiers to search all who enter your country and confiscate the money they bring with them?—Anarchist policemen firing on travellers would be a fine spectacle!”

“你们不能在世界各地同时发起革命。噢，那么，你们要在边境设立海关，检查所有入境人员，没收他们携带的所有钱款吗？——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警察向旅行者开枪，这场面可够壮观的！”

But at the root of this argument there is a great error. Those who propound it have never paused to inquire whence come the fortunes of the rich. A little thought would, however, suffice to show them that these fortunes have their beginnings in the poverty of the poor. When there are no longer any destitute, there will no longer be any rich to exploit them.

但是，这种见解有一个根本性错误。提出这种见解的人，从来没有花时间调查一下富人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这些人只要稍稍动动脑子就会发现，富人的财产发端于穷人的贫困。没有了穷人，就不再有剥削穷人的富人。

Let us glance for a moment at the Middle Ages, when great fortunes began to spring up.

让我们看一看中世纪，那是巨额财富的萌芽时期。

A feudal baron seizes on a fertile valley. But as long as the fertile valley is empty of folk our baron is not rich. His land brings him in nothing; he might as well possess a property in the moon.

一位封建领主占有一处肥沃的河谷。不过，肥沃的河谷只要空无一人，这位领主就不会富裕。土地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益，他同样可以到月亮上占块地方。

What does our baron do to enrich himself? He looks out for peasants—for poor peasants!

那这位领主要怎么做才能发财呢？他寻找农民——寻找贫困的农民！

If every peasant-farmer had a piece of land, free from rent and

taxes, if he had in addition the tools and the stock necessary for farm labour—Who would plough the lands of the baron? Everyone would look after his own. But there are thousands of destitute persons ruined by wars, or drought, or pestilence. They have neither horse nor plough. (Iron was very costly in the Middle Ages, and a draught-horse still more so.)

如果每个个体小农都有一块土地，不用交地租，也不用纳税，如果还有农耕所需的器具和牲口，那么还有谁会耕种这位领主的土地呢？每个人都会去料理自己的土地。但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因遭遇战争、干旱或瘟疫而破产，变得穷困潦倒。他们既没有马，也没有犁。（在中世纪，铁价高昂，而耕地用的马就更贵了。）

All these destitute creatures are trying to better their condition. One day they see on the road at the confines of our baron's estate a notice- board indicating by certain signs adapted to their comprehension that the labourer who is willing to settle on his estate will receive the tools and materials to build his cottage and sow his fields, and a portion of land rent free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years. The number of years is represented by so many crosses on the sign-board, and the peasant understands the meaning of these crosses.

这些穷人都在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一天，他们在路上，看到这位领主的土地旁竖着一块告示牌，上面画着一些他们能看懂的符号，意思是说：谁要是愿意在他的土地上住下来，就会获得建房和种地所需的工具和材料，而且还能获得一块土地，并在一定年限内免交地租。免租年限由告示牌上的许多“×”号表示，而且农民明白这些“×”号的意义。

So the poor wretches come to settle on the baron's lands. They make roads, drain the marshes, build villages. In nine or ten years the baron begins to tax them. Five years later he increases the rent. Then he doubles it, and the peasant accepts these new conditions because he cannot find better ones elsewhere. Little by little, with the aid of laws made by the barons, the poverty of the peasant becomes the source of the landlord's wealth. And it is not only the lord of the manor who preys upon him. A whole host of usurers swoop down upon the villages, multiplying as the wretchedness of the peasants increases. That is how these things happened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o-day is it not still the same thing? If there were free lands which the peasant could cultivate if he pleased, would he pay 50 to some “shabble of a Duke” for condescending to sell him a scrap? Would he burden himself with a lease which absorbed a third of the produce? Would he—on the m tayer system—consent to give half of his harvest to the landowner?

于是，可怜的穷人开始在领主的土地上定居。他们修筑道路，排干沼泽，建设村落。过了九年或十年，领主开始向他们收地租了。又过了五年，领主提高了地租。之后领主又把地租增加了一倍，农民接受了这些新条件，因为他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更好的条件。渐渐地，靠着领主们制定的规则，农民的贫困成了地主财富的源泉。然而，剥削农民的不止是地主。村庄里还突然冒出一群人放债，农民越是贫困，放债的人就越多。巨额财富就是这样出现于中世纪的。而今天不也是这样吗？如果有免费的土地，农民想种就能种，那么农民会屈服于“公爵的军刀”，拿出50英镑，求公爵行行好卖一小块土地吗？农民会背负吞噬三分之一收成的租约吗？农民会同意——按照土地收益均分制一一将一半收成交给地主吗？

But he has nothing. So he will accept any conditions, if only he can keep body and soul together, while he tills the soil and enriches the landlord.

但是，农民一无所有。所以，尽管是农民种地、地主发财，但只要能勉强糊口，农民会接受任何条件。

So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ust a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poverty of the peasant is a source of wealth to the landed proprietor.

所以，19世纪就像中世纪一样，农民的贫困是土地所有者的一个财富之源。

II

二

The landlord owes his riches to the poverty of the peasants, and the wealth of the capitalist comes from the same source.

地主的财富源于农民的贫困，而资本家的财富也有着类似的源头。

Take the case of a citizen of the middle class, who somehow or other finds himself in possession of £20,000. He could, of course,

spend his money at the rate of £2,000 a year, a mere bagatelle in these days of fantastic, senseless luxury. But then he would have nothing left at the end of ten years. So, being a “practical person,” he prefers to keep his fortune intact, and win for himself a snug little annual income as well.

比如一位中产阶级市民，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获得了2万英镑。当然，他可以每年花2000英镑，这点钱在目前极尽奢华、挥霍无度的年代里，简直不值一提，不过，十年之后他就身无分文了。因此，如果他是一个“务实的人”，那么他更愿意留住自己的财产，而且每年再有点进项。

This is very easy in our society, for the good reason that the towns and villages swarm with workers who have not the wherewithal to live for a month, or even a fortnight. So our worthy citizen starts a factory. The banks hasten to lend him another £20,000, especially if he has a reputation for “business ability”; and with this round sum he can command the labour of five hundred hands.

这在我们的社会很容易办到，因为在城镇和乡村里，到处都是无以为继的工人，他们连一个月甚至两个星期的生活都维持不了。所以，我们这位尊贵的市民开办了一家工厂。那些银行会急着另借给他2万英镑，他要是有“善于经商”的名声，银行就更迫不及待地借给他钱了。有了这样一笔巨款，他可以雇500个人手。

If all the men and women in the countryside had their daily bread assured, and their daily needs already satisfied, who would

work for our capitalist at a wage of half a crown a day, while the commodities one produces in a day sell in the market for a crown or more?

如果乡下的男女老少每天都能吃饱，其他日常需求也都能得到满足，而他们为资本家工作，每天只挣半克朗，可每天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可以卖到一克朗甚至更高，那么又有谁会为资本家工作呢？

Unhappily—we know it all too well—the poor quarters of our towns and the neighbouring villages are full of needy wretches, whose children clamour for bread. So, before the factory is well finished, the workers hasten to offer themselves. Where a hundred are required three hundred besiege the doors, and from the time his mill is started, the owner, if he only has average business capacities, will clear 40 a year out of each mill-hand he employs.

不幸的是，在我们城镇和附近的乡村满是可怜的穷人，他们的孩子吵闹着要吃面包——这一点我们实在是太清楚了。所以，工厂尚未完全建好，工人就已经争先报名了。只需要100名工人，却有300人堵在工厂门口报名。工厂一开业，厂主只要拥有一般的经营能力，就能每年从每名工人身上捞取40英镑。

He is thus able to lay by a snug little fortune; and if he chooses a lucrative trade, and has “business talents,” he will soon increase his income by doubling the number of men he exploits.

这样，他便能存下一笔小钱；如果生意有利可图，自己又有“商

业头脑”，那么他可以将雇佣工人增加一倍，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增加收入。

So he becomes a personage of importance. He can afford to give dinners to other personages—to the local magnates, the civic, legal, and political dignitaries. With his money he can “marry money”; by and by he may pick and choose places for his children, and later on perhaps get something good from the Government—a contract for the army or for the police. His gold breeds gold; till at last a war, or even a rumour of war, or a speculation on the Stock Exchange, gives him his great opportunity.

如此一来，他便成了一位重要人物。他有能力宴请其他重要人物——本地巨贾、市政高官、法界和政界要员。有了钱，他可以“和有钱人结婚”；渐渐地，他可以为子女谋划前程，而且不久之后可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好处——一份供给军队或警察的合同。他的钱又生钱；直到后来，战争，哪怕只是战争传言，或者是证券投机，都给他带来了赚大钱的机会。

Nine-tenths of the great fortunes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as Henry George has shown in his “Social Problems”) the result of knavery on a large scale, assisted by the State. In Europe, nine-tenths of the fortunes made in our monarchies and republics have the same origin. There are not two ways of becoming a millionaire.

美国的巨额财富，十分之九是（如亨利·乔治在他的《社会问题》一书中所讲的）靠着一连串欺诈行为获得的，背后都少不了政府的协助。在欧洲，君主国和共和国的财富，十分之九是靠同样的手段获得

的。要成为百万富翁，别无选择。

This is the secret of wealth: find the starving and destitute, pay them half a crown, and make them produce five shillings worth in the day, amass a fortune by these means, and then increase it by some lucky speculation, made with the help of the State.

这就是财富的秘密：找到忍饥挨饿、贫困潦倒的人，每天付给他们半克朗，让他们生产价值五先令的产品，这样就攒下一笔钱，尔后仰仗政府的帮助，靠侥幸投机，增加财富。

Need we go on to speak of small fortunes attributed by the economists to forethought and frugality, when we know that mere saving in itself brings in nothing, so long as the pence saved are not used to exploit the famishing?

我们知道，一味攒钱，而不用攒下的钱剥削穷人，是不会有任何收益的，那么我们还需要再说说经济学家归因于深谋远虑、勤俭节约而获得的小钱吗？

Take a shoemaker, for instance. Grant that his work is well paid, that he has plenty of custom, and that by dint of strict frugality he contrives to lay by from eighteen pence to two shillings a day, perhaps two pounds a month.

我们以鞋匠为例。假如他的工作很挣钱，假如他有许多客户，假

如他异常节俭，想方设法每天攒18便士到2先令，一个月就可以攒下2英镑左右。

Grant that our shoemaker is never ill, that he does not half starve himself, in spite of his passion for economy; that he does not marry or that he has no children; that he does not die of consumption; suppose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you please!

假如我们的鞋匠从不生病，假如他虽然迫切地想省钱，却从不饿着自己，假如他不结婚或者没有孩子，假如他没有死于肺病……想怎么假设，就怎么假设！

Well, at the age of fifty he will not have scraped together 800; and he will not have enough to live on during his old age, when he is past work. Assuredly this is not how fortunes are made. But suppose our shoemaker, as soon as he has laid by a few pence, thriftily conveys them to the savings bank and that the savings bank lends them to the capitalist who is just about to “employ labour,” i. e. , to exploit the poor. Then our shoemaker takes an apprentice, the child of some poor wretch, who will think himself lucky if in five years! time his son has learned the trade and is able to earn his living.

哎，他到了50岁也攒不到800英镑；等到不能工作了，他还没有足够的钱安度晚年。这肯定不是发财之道。但是，假如鞋匠很节俭，刚攒了几个便士，就存进储蓄银行，储蓄银行又将这些钱借给资本家，而借款的资本家正要“雇佣劳动力”，也就是要剥削穷人。之后，鞋匠收了一个学徒，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穷苦人家想着，如果他儿

子五年后学会了手艺，能自谋生路，自己就很幸运了。

Meanwhile our shoemaker does not lose by him, and if trade is brisk he soon takes a second, and then a third apprentice. By and by he will take two or three working men—poor wretches, thankful to receive half a crown a day for work that is worth five shillings, and if our shoemaker is “in luck,” that is to say, if he is keen enough and mean enough, his working men and apprentices will bring him in nearly one pound a day, over and above the product of his own toil. He can then enlarge his business. He will gradually become rich, and no longer have any need to stint himself i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He will leave a snug little fortune to his son.

同时，鞋匠没有因学徒蒙受损失，而且如果生意兴隆，他不久就可以收第二个、第三个学徒。很快，他会雇佣两三名工人——都是可怜的穷苦人，每天的劳动量值五个先令，却只能挣到半个克朗，但他们仍心存感激；如果我们的鞋匠“运气好”，也就是说，如果他才思敏捷、自私吝啬，那么除了他本人的劳动成果外，工人和学徒每天还将为他赚取近一英镑。然后，他可以把生意做大。他会渐渐地富起来，再也不用缩减必要的生活开支了。他会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一笔小钱。

That is what people call “being economical and having frugal, temperate habits.” At bottom it is nothing more nor less than grinding the face of the poor.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厉行节约，一贯朴素节制”。说到底，还不是压榨穷人。

Commerce seems an exception to this rule.” Such a man,” we are told, “buys tea in China, brings it to France, and realizes a profit of thirty per cent. on his original outlay. He has exploited nobody.”

商业似乎是个例外。“有这样一个人，”有人跟我们说，“他在中国买茶叶，运到法国，挣得的利润达本钱的30%。他没有剥削任何人。”

Nevertheless the case is quite similar. If our merchant had carried his bales on his back, well and good! In early medieval times that was exactly how foreign trade was conducted, and so no one reached such giddy heights of fortune as in our days. Very few and very hardly earned were the gold coins which the medieval merchant gained from a long and dangerous voyage. It was less the love of money than the thirst of travel and adventure that inspired his undertakings.

话虽如此，但情形也差不多。如果我们的商人自己背着货物，那自然是没有剥削任何人。在中世纪初期，对外贸易正是这么进行的，所以没有人能获得今时今日这么巨大的财富。中世纪的商人经过漫长而艰险的海上航行，好不容易才能挣到寥寥数枚金币。他之所以干这一行，倒不单单是因为喜欢钱，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渴望旅行和冒险。

Nowadays the method is simpler. A merchant who has some capital need not stir from his desk to become wealthy. He telegraphs to an agent telling him to buy a hundred tons of tea; he freights a ship, and in a few weeks, in three months if it is a sailing ship, the vessels brings him his cargo. He does not even take the

risks of the voyage, for his tea and his vessel are insured, and if he has expended four thousand pounds he will receive more than five or six thousand; that is to say, if he has not attempted to speculate in some novel commodities, in which case he runs a chance of either doubling his fortune or losing it altogether.

时至今日，方法就更为简单了。商人要是有些资本，无需离开书桌半步，就能发家致富。他给代理人发封电报，告诉他买入一百吨茶叶；代理人将茶叶装船，几周内就能运到，如果是帆船，三个月内也运到了。他连航运风险都不用承担，因为茶叶和船舶都投了保险。要是投入四千英镑，至少能收回五六千英镑；要是投机买卖新奇商品，他的财富有可能翻倍，也有可能输得分文不剩。

Now, how could he find men willing to cross the sea, to travel to China and back, to endure hardship and slavish toil and to risk their lives for a miserable pittance? How could he find dock labourers willing to load and unload his ships for “starvation wages”? How? Because they are needy and starving. Go to the seaports, visit the cook-shops and taverns on the quays, and look at these men who have come to hire themselves, crowding round the dock-gates, which they besiege from early dawn, hoping to be allowed to work on the vessels. Look at these sailors, happy to be hired for a long voyage, after weeks and months of waiting. All their lives long they have gone to the sea in ships, and they will sail in others still, until they have perished in the waves.

那他怎么找到人呢？这些人要愿意为少得可怜的薪水而漂洋过海、往返中国、忍受艰辛与苦役，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他怎么找到码头的劳工呢？他们要愿意为“难以糊口的微薄工资”而装卸船只。怎么

找呢？因为他们都贫穷，都吃不饱饭。到港口去走一走，到码头的小餐馆和小酒馆去瞧一瞧，看看去那里找工作的人，他们一大早就挤在码头门口，把门围得水泄不通，就是希望能到船上工作。看看这些水手，他们很高兴，因为等了几周和几个月后终于有人雇他们去远航了。水手一生都乘船在海上奔波，他们会在不同的船上工作，直到葬身于波涛之中。

Enter their homes, look at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in rags, living one knows not how till the father's return, and you will have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到水手的家里去，看看他们衣衫褴褛的妻儿，女人和孩子不知道如何才能维持生活，只能等着孩子的父亲回来。看到这一切，您就会知道问题的答案了。

Multiply examples, choose them where you will, consider the origin of all fortunes, large or small, whether arising out of commerce, finance, manufacturers, or the land. Everywhere you will find that the wealth of the wealthy springs from the poverty of the poor. This is why an anarchist society need not fear the advent of a Rothschild who would settle in its midst. If every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knows that after a few hours of productive toil he will have a right to all the pleasures that civilization procures, and to those deeper sources of enjoyment which art and science offer to all who seek them, he will not sell his strength for a starvation wage. No one will volunteer to work for the enrichment of your Rothschild. His golden guineas will be only so many pieces of metal—useful for various purposes, but incapable of breeding more.

例子有很多，您可以随意挑选，想一想财富都是从哪里来的，不论财富多寡，也不论是来自商业、金融业、制造业还是来自土地。不论走到哪里，您都会发现富人的财产来源于穷人的贫困。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社会不用担心会冒出一个像罗思柴尔德这样的富豪前来定居。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知道，从事数小时的生产劳动后，就有权享受文明社会提供的一切快乐，就有权追求科学艺术，享受更深层次的快乐，那么就绝不会为了难以糊口的工资而出卖力气。没有人会主动为了罗氏这样的人发财而工作，他的基尼金币不过是许多金属片罢了，用途虽然很广，但却不能生钱。

In answering the above objection we have at the same time indicated the scope of Expropriation. It must apply to everything that enables any man—be he financier, mill-owner, or landlord—to appropriate the product of others' toil. Our formula is simple and comprehensive.

在回答上面这些异议时，我们同时点出了充公的范围。任何东西，只要是能让哪个人——不论是金融家、工厂主还是地主——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都必须充公。我们的充公方案既简单又易于理解。

We do not want to rob any one of his coat, but we wish to give to the workers all those things the lack of which makes them fall an easy prey to the exploiter, and we will do our utmost that none shall lack aught, that not a single man shall be forced to sell the strength of his right arm to obtain a bare subsistence for himself and his babes. This is what we mean when we talk of Expropriation; this will be our duty during the Revolution, for whose coming we look, not two hundred years hence, but soon, very soon.

我们不想夺走任何人的大衣，但是我们希望给劳动者所需的一切，避免他们成为剥削者容易捕获的猎物；我们将竭尽全力，让人人满足，这样任何人都不必迫于维持自己和子女的生计而出卖体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充公，这将是我们在革命时期肩负的责任。我们期望，革命不是两百年之后才来，而是很快很快就会发生。

III

三

The ideas of Anarchism in general and of Expropriation in particular find much more sympathy than we are apt to imagine among men of independent character, and those for whom idleness is not the supreme ideal. “Still,” our friends often warn us, “take care you do not go too far! Humanity cannot be changed in a day, so do not be in to great a hurry with your schemes of Expropriation and Anarchy, or you will be in danger of achieving no permanent result.”

无政府主义的总体思想和充公的具体思想，在拥有独立人格和不以悠闲无事为最高理想的人中间得到的共鸣，要远超我们的想象。“就算是这样”，我们的朋友经常告诫我们，“当心做得过头！人性的改变不能一蹴而就，所以不要这么急于实施你那些充公和无政府主义的计划，否则你取得的成果可能无法巩固持久。”

Now, what we fear with regard to Expropriation is exactly the contrary. We are afraid of not going far enough, of carrying out Expropriation on too small a scale to be lasting. We would not have the revolutionary impulse arrested in mid-career, to exhaust itself in

half measures, which would content no one, and while producing a tremendous confusion in society, and stopping its customary activities, would have no vital power—would merely spread general discontent and inevitably prepare the way for the triumph of reaction.

不过，我们对充公的担忧却恰恰相反。我们担心做得不够彻底，担心充公的范围太小，以致无法长久。我们不会让革命的激情在中途受到压抑，不会让革命因折中妥协而夭亡。不彻底充公，谁都无法满意，除了造成社会剧烈动荡、阻碍社会的正常活动之外，不会产生什么重要影响——只能让普遍不满的情绪蔓延开来，还必然为反动派复辟创造条件。

There are, in fact, in a modern State established relations which it is practically impossible to modify if one attacks them only in detail. There are wheels within wheels in our economic organization—the machinery is so complex and interdependent that no one part can be modified without disturbing the whole. This becomes clear as soon as an attempt is made to expropriate anything.

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各个方面联系紧密，如若只变动局部，几乎无法撼动整体。我们的经济结构环环相扣，犹如复杂的机器，各个零件相互依存，不论要改进哪个零件，若不从机器整体入手，必定无法实现。一旦要将什么东西充公时，道理就十分明显了。

Let us suppose that in a certain country a limited form of expropriation is effected. For example, that, as it has been suggested

more than once, only the property of the great landlords is socialized, whilst the factories are left untouched; or that, in a certain city, house property is taken over by the Commune, but everything else is left to private ownership; or that, in some manufacturing centre, the factories are communalized, but the land is not interfered with.

让我们设想一下在一个国家只实行部分充公。比如说，曾经有人不止一次地建议过，只将大地主的财产收归公有，工厂则保持不变；或者在某座城市，房产收归公有，但其他所有东西都留归私人所有；或者在某个制造中心，工厂收归公有，但不触及土地。

The same result would follow in each case—a terrible shattering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without the means of reorganizing it on new lines. Industry and finance would be at a deadlock, yet a return to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justice would not have been achieved, and society would find itself powerless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whole.

这三种做法会导致同样的后果：工业体系破坏严重，无法按照新政策加以重组。工业和金融业将停滞不前，社会既未重建起最为重要的正义原则，也无力达到整体和谐。

If agriculture were freed from great landowners, while industry still remained the bond-slave of the capitalist, the merchant, and the banker, nothing would be accomplished. The peasant suffers to-day not only in having to pay rent to the landlord; he is oppressed on all hands by existing conditions. He is exploited by the

tradesman, who makes him pay half a crown for a spade which, measured by the labour spent on it, is not worth more than sixpence. He is taxed by the State, which cannot do without its formidable hierarchy of officials, and finds it necessary to maintain an expensive army, because the traders of all nations are perpetually fighting for the markets, and any day a little quarrel arising from the exploitation of some part of Asia or Africa may result in war.

如果农业脱离大地主获得自由，而工业仍是资本家、商人和银行家的奴隶，那么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时至今日，农民不仅向地主交纳租金，而且还受到现有条件方方面面的束缚。商人剥削农民。农民买把铁锹，要付给商人半个克朗，而铁锹的价值按照生产所耗的劳动量计算，不过六便士。政府向农民征税。政府脱离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无法运行，而且政府还必须维持一支耗资巨大的军队，因为各国商人总是不停地争夺市场，不知哪一天，因为剥削亚洲或非洲的什么地方起了点争执，就会爆发战争。

Then again the peasant suffers from the depopulation of country places: the young people are attracted to the large manufacturing towns by the bait of high wages paid temporarily by the producers of articles of luxury, or by the attractions of a more stirring life. The artificial protection of industry, the industrial exploitation of foreign countries, the prevalence of stock-jobbing, the difficulty of improving the soil and the machinery of production—all these agencies combine nowadays to work against agriculture, which is burdened not only by rent, but by the whole complex of conditions in a society based on exploitation. Thus, even if the expropriation of land were accomplished, and every one were free to till the soil and cultivate it to the best advantage, without paying

rent, agriculture, even though it should enjoy—which can by no means be taken for granted—a momentary prosperity, would soon fall back into the slough in which it finds itself to-day. The whole thing would have to be begun over again, with increased difficulties.

接着，农民会因乡村地区人口减少而受苦。要么受到奢侈品制造商暂时开出的高工资的诱惑，要么受到更加多姿多彩的生活的吸引，年轻人纷纷前往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城镇。对工业进行人为保护，外国对我国进行产业剥削，证券交易盛行，改良土壤和生产机器困难重重——现在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冲击着农业生产，农业不仅受累于地租，还受到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中各种条件的制约。因此，即便土地充公了，即便每个人都不用交纳地租，可以自由自在地耕地，最大限度地增加土地产量，那么农业虽得以繁荣一时——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定如此——不久之后农民会再次掉进泥淖，与当前农业的境地一样。一切只能重新开始，不过过程会更加艰难。

The same holds true of industry. Take the converse case: instead of turning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s into peasant-proprietors, make over the factories to those who work in them. Abolish the master- manufacturers, but leave the landlord his land, the banker his money, the merchant his Exchange; maintain the swarm of idlers who live on the toil of the workmen, the thousand and one middlemen, the State with its numberless officials,—and industry would come to a standstill. Finding no purchasers in the mass of peasants who would remain poor; not possessing the raw material, and unable to export their produce, partly on account of the stoppage of trade, and still more so because industries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the manufacturers would feel unable to struggle, and thousands of workers would be thrown upon the streets. These

starving crowds would be ready and willing to submit to the first schemer who came to exploit them; they would even consent to return to the old slavery, under promise of guaranteed work.

工业也是如此。与前面的做法恰好相反：不是把农业劳动者转变为自耕农，而是将工厂交给工人。消灭工厂主，但是保留地主的土地、银行家的钱、商人的买卖场所，保留那一群群依靠工人血汗为生的懒汉、那许许多多的掮客，保留政府和无数的政府官员，那么工业终将陷入停顿。大批农民依然贫困，无力购买工人生产的产品；工人不占有原材料；由于贸易中断，更由于工业已遍布世界各地，工人生产的产品无法出口。因此工人感觉无力竞争，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工作，流落街头。这些人忍饥挨饿，就算遇到要剥削他们的阴谋家，他们也会立即心甘情愿地屈从。只要有人许诺提供工作，他们甚至会同意恢复古老的奴隶制。

Or, finally, suppose you oust the landowners, and hand over the mills and factories to the worker,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the swarm of middlemen who drain the product of our manufacturers, and speculate in corn and flour, meat and groceries, in our great centres of commerce. Then, as soon as the exchange of produce is slackened; as soon as the great cities are left without bread, while the great manufacturing centres find no buyers for the articles of luxury they produce,—the counter-revolution is bound to take place, and it would come, treading upon the slain, sweeping the towns and villages with shot and shell; indulging in orgies of proscriptions and deportations, such as were seen in France in 1815, 1848, and 1871.

或者最后，假设你驱逐了地主，将工厂交给工人，而保留那许许

多多的掮客，让他们继续在主要的商业中心榨取工人生产的产品，投机买卖谷物、面粉、肉类等商品。那么，一旦商品交易放缓，一旦大城市没有了面包，而主要制造中心生产的奢侈品没有了买家，就会爆发反革命。反革命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城镇和乡村遍布枪眼弹孔，无数人遭到流放和驱逐，无异于1815年、1848年和1871年时的法国。

All is interdependent in a civilized society; it is impossible to reform any one thing without altering the whole. Therefore, on the day a nation will strike at private property, under any one of its forms, territorial or industrial, it will be obliged to attack them all. The very success of the Revolution will impose it.

在文明社会，一切都相互依存，只改变局部而不变动整体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有一天一个国家要没收私有财产——不论是土地财产还是工业财产——必须要全部没收。若想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如此。

Besides, even if it were desired,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confine the change to a partial expropriation. Once the principle of the “Divine Right of Property” is shaken, no amount of theorizing will prevent its overthrow, here by the slaves of the field, there by the slaves of the machine.

此外，就算只想实施部分充公，那也是不可能的。一旦“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动摇了，土地的奴隶和机器的奴隶将群起而攻之，土崩瓦解是必然的，找出再多的理由也无济于事。

If a great town, Paris for example, were to confine itself to taking possession of the dwelling houses of the factories, it would be forced also to deny the right of the bankers to levy upon the Commune a tax amounting to £2,000,000, in the form of interest for former loans. The great city would be obliged to put itself in touch with the rural districts, and its influence would inevitably urge the peasants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landowner.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communalize the railways, that the citizens might get food and work, and lastly, to prevent the waste of supplies; and to guard against the trusts of cornspeculators, like those to whom the Paris Commune of 1793 fell a prey, it would have to place in the hands of the City the work of stocking its warehouses with commodities, and apportioning the produce.

一座大城市，比如说巴黎，如果只没收住宅或工厂，那么也势必否认银行家有权向巴黎公社征收200万英镑作为之前贷款的利息。大城市与乡村保持联系，所以大城市的影响必然促使农民脱离地主。为了使市民获得食物和工作，同时也为避免供给浪费，巴黎有必要将铁路收归公有。1793年的巴黎公社吃了谷物投机商的亏，为了提防这帮人相互勾结，只能由城市自行负责商品的仓储和分配。

Some Socialists still seek, however, to establish a distinction. “Of course,” they say, “the soil, the mines, the mills, and manufacturers must be expropriated, these are th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nd it is right we should consider them public property. But articles of consumption—food, clothes, and dwellings—should remain private property.”

但是，一些社会主义者仍要作出如下区分。“当然，”他们说，“土

地、矿井、工厂必须要充公，这些是生产工具，理当看成公共财产。但是消费品——食品、服装和住宅——还应是私有财产。”

Popular common sense has got the better of this subtle distinction. We are not savages who can live in the woods, without other shelter than the branches. The civilized man needs a roof, a room, a hearth, and a bed. It is true that the bed, the room, and the house is a home of idleness for the non-producer. But for the worker, a room, properly heated and lighted, is as much an instrument of production as the tool or the machine. It is the place where the nerves and sinews gather strength for the work of the morrow. The rest of the workman is the daily repairing of the machine.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此细分有多荒唐。我们不是可以住在森林里、只用树枝遮风避雨的原始人。文明人需要一栋房子、一间屋子、一个壁炉和一张床。诚然，对于不事生产的人来说，床、屋子和房子组成了一个诱人懒散的居所。但是对于工人来说，一间温暖明亮的屋子是一件生产工具，就如同一件器具或一台机器一样。工人在那里恢复精力，以便次日工作。工人休息如同机器的日常修理。

The same argument applies even more obviously to food. The so- called economists, who make the just-mentioned distinction, would hardly deny that the coal burnt in a machine is as necessary to production as the raw material itself. How then can food, without which the human machine could do no work, be excluded from the list of things indispensable to the producer? Can this be a relic of religious metaphysics? The rich man's feast is indeed a matter of luxury, but the food of the worker is just as much a part

of production as the fuel burnt by the steam-engine.

说到食物，道理就更显而易见了。所谓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上面的见解，即生产工具收归公有，而消费品仍归私有，但是他们难以否认，机器中烧的煤如同原材料一样，对于生产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既然人类这台机器没有了食物就无法工作，那又怎么能说食物不是生产者的必需品呢？食物像宗教玄学的遗迹那样可有可无吗？富人的宴席的确奢侈，但工人的食物不过是生产的一部分，和蒸汽机使用的燃料一样。

The same with clothing. We are not New Guinea savages. And if the dainty gowns of our ladies must rank as objects of luxury, there is nevertheless a certain quantity of linen, cotton, and woolen stuff which is a necessity of life to the producer. The shirt and trousers in which he goes to his work, the jacket he slips on after the day's toil is over, are as necessary to him as the hammer to the anvil.

衣服也是一样。我们不是新几内亚的原始人。如果女士的华美礼服必须列为奢侈品，那么几件亚麻、棉花和羊毛衣裳只能是生产者的生活必需品。上班时穿的衬衫和裤子，以及一日辛劳之后罩上的夹克，对工人而言如同铁锤之于铁砧，是必不可少的。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this is what the people mean by a revolution. As soon as they have made a clean sweep of the Government, they will seek first of all to ensure to themselves decent dwellings and sufficient food and clothes—free of capitalist rent.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人民所说的革命就是这个样子。人民一旦彻底推翻政府，首先会确保自己有舒适的住宅、充足的食物和衣服——不用向资本家交租。

And the people will be right. The methods of the people will be much more in accordance with science than those of the economists who draw so many distinctions between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nd articles of consumption. The people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just the point where the Revolution ought to begin; and they will lay the foundations of the only economic science worthy the name—a science which might be called: “The Study of the Needs of Humanity, and of the Economic Means to satisfy them.”

而人民将是正确的。人民使用的方法，比那些在生产工具和消费品之间划出许多区别的经济学家要科学得多。人民知道革命就应从这里开始；人们将为唯一一门名副其实的经济学科奠定基础，这门学科或许可以叫做“人类需求以及满足人类需求的经济方法之研究”。

[5_1].罗思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是欧洲乃至世界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这里指的是雅各布·罗思柴尔德（1792—1868）。

[5_2].范德比尔特家族（Vanderbilt Family），是美国渊源很深的大家族，它名下的庞大财团具有长达百余年的历史。

CHAPTER V FOOD

第五章　食物

I

一

If the coming Revolution is to be a Social Revolution, it will be distinguished from all former uprisings not only by its aim, but also by its methods. To attain a new end, new means are required.

如果即将到来的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那么这场革命与之前历次起义相比，不仅目的要有所不同，方法也要有所区别。为达成新目标，必须采用新方法。

The three great popular movements which we have seen in France during the last hundred year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many ways, but they have one common feature.

我们在过去一百年间目睹的法国三大人民运动，这三次运动存在诸多差异，但却有一个相同的特点。

In each case the people strove to overturn the old regime, and spent their heart's blood for the cause. Then, after having borne the brunt of the battle, they sank again into obscurity. A Government, composed of men more or less honest, was formed and undertook to

organize a new regime: the Republic in 1793, Labour in 1848, the Free Commune in 1871. Imbued with Jacobin ideas, this Government occupied itself first of all with political questions, such as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machinery of government, the purifying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civic liberty, and such matters. It is true the workmen's clubs kept an eye on the members of the new Government, and often imposed their ideas on them. But even in these clubs, whether the leaders belonged to the middle or the working classes, it was always middle-class ideas which prevailed. They discussed various political questions at great length, but forgot to discuss the question of bread.

人民每次都呕心沥血，努力推翻旧政权。他们饱受战争摧残，继而又湮没无闻。政府——其成员或多或少算是正直之士——成立后，着手建立新政权：1793年建立共和国，1848年建立劳动政权，1871年建立自由公社。政府深受雅各宾派思想的影响，首先忙于处理政治事务，比如改造政府机构，净化行政部门，政教分离，公民自由等等。诚然，工人组织监督新政府成员，而且经常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思想。不过，即便是在这些工人组织中，不论领导人是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总是中产阶级思想占上风。他们长篇大论地讨论政治问题，但却忘记讨论面包的问题。

Great ideas sprang up at such times, ideas that have moved the world; words were spoken which still stir our hearts, at the interval of more than a century. But the people were starving in the slums.

人民运动孕育出伟大的思想，推动世界向前发展的思想；一百多年前的话语，时至今日仍然激荡着我们的心灵。但人民却在贫民窟中

忍饥挨饿。

From the very commencement of the Revolution industry inevitably came to a stop—the circulation of produce was checked, and capital concealed itself. The master—the employer—had nothing to fear at such times, he fattened on his dividends, if indeed he did not speculate on the wretchedness around; but the wage-earner was reduced to live from hand to mouth. Want knocked at the door.

革命初至，工业势必停滞——产品流通受阻，资本销声匿迹。这时，老板——雇主——有恃无恐，就算不剥削身边的穷苦人，也能依靠红利自肥；但是，工薪族就落得个食不果腹的境地。饥饿时刻困扰着他们。

Famine was abroad in the land—such famine as had hardly been seen under the old regime.

国内饥荒四起，这在旧政权统治时期也是异常罕见的。

“The Girondists are starving us!” was the cry in the workmen's quarters in 1793, and thereupon the Girondists were guillotined, and full powers were given to “the Mountain” and to the Commune. The Commune indeed concerned itself with the question of bread, and made heroic efforts to feed Paris. At Lyons, Fouche and Collot d'Herbois established city granaries, but the sums spent on filling them were woefully insufficient. The town councils made great

efforts to procure corn; the bakers who hoarded flour were hanged—and still the people lacked bread.

“吉伦特派要饿死我们”1793年，工人组织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于是，他们将吉伦特及其党徒送上了断头台，“山岳派”和巴黎公社执掌大权。巴黎公社的确重视面包问题，为了养活巴黎人，他们作出了英勇无畏的努力。福凯和科洛·德布瓦在里昂建立了城市谷仓，但是购买粮食、填充谷仓的资金却严重不足。市议会全力收集谷物；囤积面粉的面包商被处以绞刑——而人民依然没有面包吃。

Then they turned on the royalist conspirators and laid the blame at their door. They guillotined a dozen or fifteen a day—servants and duchesses alike, especially servants, for the duchesses had gone to Coblentz. But if they had guillotined a hundred dukes and viscounts every day, it would have been equally hopeless.

于是，市议会攻击谋逆的保皇党人，将责任推到他们身上。委员会每日处决12至15人，仆人和公爵夫人都难逃厄运，最惨的是仆人，因为公爵夫人已经跑到科布伦茨去了。不过，就算他们每天处决一百位公爵、子爵，也无望解决面包问题。

The want only grew. For the wage-earner cannot live without his wage, and the wage was not forthcoming. What difference could a thousand corpses more or less make to him?

饥饿仍在蔓延。因为工薪族靠工资过活，但工资却迟迟不到。纵然横尸遍野，又于事何补？

Then the people began to grow weary. “So much for your vaunted Revolution! You are more wretched than ever before,” whispered the reactionary in the ears of the worker. And little by little the rich took courage, emerged from their hiding-places, and flaunted their luxury in the face of the starving multitude. They dressed up like scented fops and said to the workers: “Come, enough of this foolery! What have you gained by your Revolution?”

这时，人民开始厌倦了。“你们吹嘘的革命，不过如此！你们比以前更惨。”反动派对工人窃窃私语。渐渐地，富人鼓起勇气，从藏身处冒出来，当着饥饿群众的面，炫耀奢侈生活。他们衣冠楚楚、香雾缭绕，跟工人说道：“嗨，这场闹剧该停了吧！你们闹革命都得到了什么？”

And, sick at heart, his patience at an end, the revolutionary had at last to admit to himself that the cause was lost once more. He retreated into his hovel and awaited the worst.

革命者灰心丧气，耐心尽失，最后只好承认革命事业又失败了。他们蜷缩在简陋的家中，只等大难临头。

Then reaction proudly asserted itself, and accomplished a counter¬revolutionary stroke. The Revolution dead, nothing remained but to trample its corpse under foot.

这时，反动派却洋洋得意，四处叫嚣，然后向革命发动反击。革

命失败了，什么也没留下，革命的果实被反动派踩在脚下。

The White Terror began. Blood flowed like water, the guillotine was never idle, the prisons were crowded, while the pageant of rank and fashion resumed its old course, and went on as merrily as before.

白色恐怖开始了。一边是血流成河，断头台上一刻不停，监狱里关满革命家，而另一边，上流社会回到以前的轨道，过得和以前一样快活。

This picture is typical of all our revolutions. In 1848 the workers of Paris placed “three months of starvation” at the service of the Republic, and then, having reached the limit of their powers, they made, in June, one last desperate effort—an effort which was drowned in blood. In 1871 the Commune perished for lack of combatants. It had taken measures for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but it neglected, alas, until too late, to take measures for providing the people with bread. And so it came to pass in Paris that elegantes and fine gentlemen could spurn the confederates, and bid them go sell their lives for a miserable pittance, and leave their “betters” to feast at their ease in fashionable restaurants.

我们的历次革命都呈现过此番景象。1848年，巴黎工人为了共和国“忍饥挨饿三个月”，忍到力量近乎枯竭的时候，他们在六月孤注一掷，奋力一搏，最终还是被扼杀于血泊之中。1871年，巴黎公社因缺少战士以失败告终。当时，巴黎公社已经采取措施实施政教分离，但很可惜，巴黎公社忘了给人民提供面包，等到后来发现，为时已晚。

所以在巴黎，优雅淑女和高贵绅士可以一脚踢开盟友，让他们为了微薄的工资卖命，而“上等人”却在豪华饭店悠闲地享用美味。

At last the Commune saw its mistake, and opened communal kitchens. But it was too late. Its days were already numbered, and the troops of Versailles were on the ramparts.

最终，巴黎公社发现了这个错误，开设了公共食堂，可是太迟了。巴黎公社已时日无多，凡尔赛政府军业已兵临城下。

“Bread, it is bread that the Revolution needs!”

“面包，革命需要的是面包！”

Let others spend their time in issuing pompous proclamations, in decorating themselves lavishly with official gold lace, and in talking about political liberty!

让别人花时间发表动听的宣言、周身缠满金线带、去大谈政治自由吧！

Be it ours to see, from the first day of the Revolution to the last, in all the provinces fighting for freedom, that there is not a single man who lacks bread, not a single woman compelled to stand with the wearied crowd outside the bakehouse-door, that haply a

coarse loaf may be thrown to her in charity, not a single child pining for want of food.

我们想要看到的是：从革命开始直至最后一刻，在为自由而战的各个地区，没有一个男人缺少面包，没有一个女人和疲倦的人群一起站在面包店外苦等，希望偶尔有人发发善心，扔给她一片面包，也没有一个孩子因缺少食物而消瘦。

It has always been the middle-class idea to harangue about “great principles”—great lies rather!

中产阶级总是夸夸其谈地讲着“伟大信念”——倒不如说是弥天大谎！

The idea of the people will be to provide bread for all. And while middle-class citizens, and workmen infested with middle-class ideas admire their own rhetoric in the “Talking Shops”, and “practical people” are engaged in endless discussions on forms of government, we, the “Utopian dreamers”—we shall have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of daily bread.

人民的理想是让人人都有面包。中产阶级市民和沾染了中产阶级思想的工人在“空谈俱乐部”中赞美自己的修辞，“实干家”滔滔不绝地讨论政体，而我们这些“空想家”——必须要考虑每天的面包问题。

We have the temerity to declare that all have a right to bread,

that there is bread enough for all, and that with this watchword of Bread for All the Revolution will triumph.

我们有胆量向世人宣告：人人有权获得面包，面包也足够分给所有人，只要以“人人有面包”为口号，革命必将胜利。

II

二

That we are Utopians is well known. So Utopian are we that we go the length of believing that the Revolution can and ought to assure shelter, food, and clothes to all—an idea extremely displeasing to middle-class citizens, whatever their party colour, for they are quite alive to the fact that it is not easy to keep the upper hand of a people whose hunger is satisfied.

众所周知，我们是空想家。因为我们是空想家，所以才会相信，革命应该而且也能够保证人人有居所、有食物、有衣服——中产阶级市民，无论属于哪个党派，都对这个想法感到极度不快，因为他们深知，一旦人们能够填饱肚子，就难以控制了。

All the same, we maintain our contention: bread must be found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bread must take precedence of all other questions. If it is settled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will be on the right road; for in solving the question of Bread we must accept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which will force itself upon us to the exclusion of every

other solution.

尽管如此，我们仍坚持己见：必须给革命群众提供面包，必须首先解决面包问题。如果解决面包问题时，能以人民利益为重，革命就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因为解决面包问题时，我们必须接受平等原则，放弃其他一切方案。

It is certain that the coming Revolution—like in that respect to the Revolution of 1848—will burst upon us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industrial crisis. Things have been seething for half a century now, and can only go from bad to worse. Everything tends that way—new nations entering the lis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ghting for possession of the world's markets, wars, taxes ever increasing. National debts, the insecurity of the morrow, and huge colonial undertakings in every corner of the globe.

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将到来的革命——就像1848年革命一样——会在工业陷入严重危机的时刻突然降临。半个世纪以来，局势动荡，变得越发不可收拾。凡事都有那个趋势——不断有新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争夺世界市场，战争越益频繁，赋税日趋繁重。国债，未来的不安全诱因，再加上遍布世界各地的大规模殖民活动。

There are millions of unemployed workers in Europe at this moment. It will be still worse when Revolution has burst upon us and spread like fire laid to a train of gunpowder. The number of the out-of-works will be doubled as soon as the barricades are erected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at is to be done to provide these multitudes with bread?

此时此刻，欧洲的失业工人达到数百万。革命一旦突然降临，而且像点燃了的火药引信迅速燃烧，失业问题将越发严重。一旦欧洲和美国爆发革命，失业人口将增加一倍。如何才能为他们提供面包呢？

We do not know whether the folk who call themselves “practical people” have ever asked themselves this question in all its nakedness. But we do know that they wish to maintain the wage system, and we must therefore expect to have “national workshops” and “public works” vaunted as a means of giving food to the unemployed.

我们不知道，自诩为“实干家”的人是否坦率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却知道，他们希望延续工资制，于是我们可以确定，必定会有“国家工场”和“公共工程”，因为这两项举措被夸耀为可以让失业人口有饭吃。

Because national workshops were opened in 1789 and 1793; because the same means were resorted to in 1848; because Napoleon III. succeeded in contenting the Parisian proletariat for eighteen years by giving them public works—which cost Paris to-day its debt of £ 80,000,000 and its municipal tax of three or four pounds a-head; because this excellent method of “taming the beast” was customary in Rome, and even in Egypt four thousand years ago; and lastly, because despots, kings, and emperors have always employed the ruse of throwing a scrap of food to the people to gain time to snatch up the whip—it is natural that “practical” men should extol this method of perpetuating the wage system. What need to rack our brains when we have the time-honoured method of

the Pharaohs at our disposal?

因为1789年和1793年曾开办过国家工场；因为1848年也曾诉诸此法，因为拿破仑三世成功依靠公共工程建设，安抚巴黎无产阶级长达18年，巴黎为此负债8000万英镑，每人缴纳三四英镑的市政税；因为四千年前，这种高明的“驯兽”法在罗马乃至埃及都司空见惯，因为暴君、国王、皇帝总是使用同一诡计，扔给人民一点吃的，好乘机抓起鞭子，所以“实干家”自然对延续工资制的办法赞不绝口。既然暴君之法经久不衰，又任由我们使用，那又何必绞尽脑汁，另寻良策呢？

Yet should the Revolution be so misguided as to start on this path, it would be lost.

然而，革命若被误引到这条道路上，一定会迷失方向。

In 1848, when the national workshops were opened on February 27, the unemployed of Paris numbered only 8,000; a fortnight later they had already increased to 49,000. They would soon have been 100,000, without counting those who crowded in from the provinces.

1848年2月27日开办国家工场时，巴黎的失业人口仅为8000人，而两星期后，失业人口已升至4.9万人。失业者要不了多久就会达到10万人，这还不包括从各地涌来的失业者。

Yet at that time trade and manufacturers in France employed half as many hands as to-day. And we know that in time of Revolution exchange and industry suffer most from the general upheaval. We have only to think, indeed, of the number of workmen whose labour depend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upon export trade, or of the number of hands employed in producing luxuries, whose consumers are the middle-class minority.

不过当时，法国贸易和制造业的雇佣工人仅为现在的一半。而且我们知道，在革命期间，社会剧变，商品交换，工业损失最重。其实，我们只需想一想，有多少工人直接或间接依靠出口贸易生活，有多少人受雇生产奢侈品，卖给少数中产阶级，道理就显而易见了。

A revolution in Europe means, then, the unavoidable stoppage of at least half the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It means millions of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thrown on the streets. And our “practical men” would seek to avert this truly terrible situation by means of national relief works; that is to say, by means of new industries created on the spot to give work to the unemployed!

所以欧洲一旦爆发革命，至少有一半工厂和作坊必须停产。这意味着数百万工人及其家人会流落街头。“实干家”会尽力避出现这可怕的局面，他们会实施国家救济，也就是说，在当地兴建新产业，为失业者提供工作！

It is evident, as Proudhon had already pointed out more than fifty years ago, that the smallest attack upon property will bring in its train the complete disorganization of the system based upon

private enterprise and wage labour. Society itself will be forced to take production in hand, in its entirety, and to reorganize i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whole people. But this cannot be accomplished in a day, or even in a month; it must take a certain time to reorganize the system of production, and during this time millions of men will be deprived of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What then is to be done?

蒲鲁东 [6_1] 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经指出，很明显，所有权哪怕遭到一丁点攻击，根植于私人企业和工资劳动之上的制度就将彻底瓦解。社会自身只好将全部生产攥在手中，而且要改造生产，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但这不是一天或一个月就能完成的，必然需要一段时间改造生产体系，而在此期间数百万人将无以为生。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There is only one really practical solution of the problem—boldly to face the great task which awaits us, and instead of trying to patch up a situation which we ourselves have made untenable, to proceed to reorganize production on a new basis.

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勇敢面对前方的艰巨任务，对于我们制造出的危局，不可小修小补，应在新的基础上改造生产。

Thus the really practical course of action, in our view, would be that the people should take immediate possession of all the food of the insurgent communes, keeping strict account of it all, that none might be wasted, and that by the aid of these accumulated resources every one might be able to tide over the crisis. During that time an agreement would have to be made with the factory

workers, the necessary raw material given them, and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assured to them, while they worked to supply the needs of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For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while France weaves silks and satins to deck the wives of German financiers, the Empress of Russia, and the Queen of the Sandwich Islands, and while Paris fashions wonderful trinkets and playthings for rich folk all the world over, two-thirds of the French peasantry have not proper lamps to give them light, or the implements necessary for modern agriculture. Lastly, unproductive land, of which there is plenty, would have to be turned to the best advantage, poor soils enriched, and rich soils, which yet, under the present system, do not yield a quarter, no, nor a tenth of what they might produce, would be submitted to intensive culture, and tilled with as much care as a market garden or a flower pot. It is impossible to imagine any other practical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and,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sheer force of circumstances will bring it to pass.

因此依我们所见，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是：人民应该迅速控制发动革命的各公社的所有粮食，认真清点，杜绝浪费，利用集中起来的粮食，让所有人都能渡过难关。在此期间，还需同工厂的工人订立协议，给工人必要的原材料，保证他们获得生活资料，而工人则要生产产品，满足农业人口的需要。因为我们切不可忘记，在法国织造绫罗绸缎，装扮德国金融家的夫人、俄国皇后和桑威奇岛女王时，在巴黎制造精美饰品和奇异玩物、卖给全世界的富人时，法国三分之二的农民却没有合适的灯来照明，他们没有现代化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工具。最后，必须充分利用那些广袤的不毛之地；必须改良贫瘠土壤；至于肥沃的土壤，在现有的制度下，连四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的生产潜力都没有发挥出来，所以应当集约种植肥沃土地，像料理商业园圃或盆栽一样悉心照料。没有其他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且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由于情势所迫，只能这么做。

III

三

The most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 of our present capitalism is the wage system, which in brief amounts to this:—

当前资本主义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工资制，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A man, or a group of men, possessing the necessary capital, starts some industrial enterprise; he undertakes to supply the factory or workshops with raw material, to organize production, to pay the employees a fixed wage, and lastly, to pocket the surplus value or profits, under pretext of recouping himself for managing the concern, for running the risks it may involve, and for the fluctuations of price in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wares.

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有了必要的资本之后就开始经营工厂；随后，这个人或这群人向工厂或作坊提供原材料，组织生产，向雇员支付一定薪水，最后将剩余价值或利润据为己有，美其名曰是为了补偿自己管理企业、承担风险，为了弥补商品价格波动造成的损失。

To preserve this system, those who now monopolize capital would be ready to make certain concessions; to share, for example, a part of the profits with the workers, or rather to establish a “sliding scale,” which would oblige them to raise wages when prices

were high; in brief they would consent to certain sacrifices on condition that they were still allowed to direct industry and to take its first fruits.

为了维持工资制，垄断资本的人愿意妥协；比如说，拿出部分利润分给工人，其实就是设定“浮动计算法”，即物价上涨时，提高工人工资。简而言之，资本家愿意有所牺牲，只要能管理工厂，优先获益。

Collectivism, as we know, does not abolish the wage system, though it introduces considerable modifications into the existing order of things. It only substitutes the State, that is to say, some form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ational or local, for the individual employer of labour. Under Collectivism it i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ation, or of the commune, and their deputies and officials who are to have the control of industry. It is they who reserve to themselves the right of employing the surplus of production—in the interests of all. Moreover, Collectivism draws a very subtle but very far-reaching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work of the labourer and of the man who has learned a craft. Unskilled labour in the eyes of the collectivist is simple labour, while the work of the craftsman, the mechanic, the engineer, the man of science, etc. , is what Marx calls complex labour, and is entitled to a higher wage. But labourers and craftsmen, weavers and men of science, are all wage-servants of the State—“all officials,” as was said lately, to gild the pill.

如我们所知，集体主义虽然会考虑修改现行秩序，但不会废除工资制。集体主义不过是用政府——中央或地方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

——代替单个雇主。在集体主义制度下，中央或地方议员、议员代表和官员控制着工业。正是这些人把剩余产品的使用权留归己有——为了维护所有人的利益。再者，在普通劳动者和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之间，集体主义进行了颇为微妙又影响深远的区分。在集体主义者看来，无需技能即可从事的劳动是简单劳动，而工匠、技工、工程师、科学家等等从事的劳动——马克思称之为复杂劳动——理应获得较高的工资。然而，无论是普通劳动者还是工匠，无论是织布工还是科学家，都是从国家挣工资的仆人——最近我们称之为“所有官员”，不过是说得好听点罢了。

Well, then, the coming Revolution could render no greater service to humanity than by making the wage system, in all its forms, an impossibility, and by rendering Communism, which is the negation of wage-slavery, the only possible solution.

那么，即将到来的革命为人类作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让形形色色的工资制无处立足，让反对工资奴役的共产主义成为唯一可以实施的解决办法。

For even admitting that the Collectivist modification of the present system is possible, if introduced gradually during a period of prosperity and peace—though for my part I question its practicability even under such conditions—it would become impossible in a period of Revolution, when the need of feeding hungry millions would spring up with the first call to arms. A political revolution can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shaking the foundations of industry, but a revolution where the people lay hands upon property will inevitably paralyse exchange and production. The millions of public money flowing into the Treasury

would not suffice for paying wages to the millions of out-of-works.

即便承认，按照集体主义设想改革现行制度，若在太平盛世逐步推行，或许可行——但在我看来，就算是在太平盛世，集体主义改革也未必可行——但在革命期间，就万万不行了。革命爆发后，会突然出现数百万饥民需要养活，而且还要马上呼吁人民拿起武器，保卫革命。一场政治革命不足以撼动工业根基；但是革命触及财产权的地方，势必导致商品交易和生产处于瘫痪状态。流入国库的数百万公款，也不够给数百万失业人口开工资。

This point cannot be too much insisted up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on a new basis (and we shall presently show how tremendous this problem is) cannot be accomplished in a few days; nor, on the other hand, will the people submit to be half starved for years in order to oblige the theorists who uphold the wage system. To tide over the period of stress they will demand what they have always demanded in such cases—communization of supplies—the giving of rations.

不可太过执著于工资制，在新的基础上改造工业（这个问题有多重要，我们一会儿就讲）绝非数日之功。再者，人民也不会为了帮助那些支持工资制的理论家，忍饥挨饿好几年。为了渡过难关，人民会像以往遇到危机时那样，要求物资尽归公有，实施配给制。

It will be in vain to preach patience. The people will be patient no longer, and if food is not forthcoming they will plunder the bakeries.

空谈忍耐不过是白费唇舌。人民不会再忍耐下去。如果迟迟没有吃的，人民就会洗劫面包店。

Then, if the people are not strong enough to carry all before them, they will be shot down, to give Collectivism a fair field for experiment. To this end “order” must be maintained at any price—order, discipline, obedience! And as the capitalists will soon realize that when the people are shot down by those who call themselves Revolutionists, the Revolution itself will become hateful in the eyes of the masses, they will certainly lend their support to the champions of order—even though they are collectivists. In such a line of conduct, the capitalists will see a means of hereafter crushing the collectivists in their turn. And if “order is established” in this fashion, the consequences are easy to foresee. Not content with shooting down the “marauders,” the faction of “order” will search out the “ringleaders of the mob.” They will set up again the law courts and reinstate the hangman. The most ardent revolutionists will be sent to the scaffold. It will be 1793 over again.

而后，如果人民抵不住诱惑，不能把抢来的东西全都交出来，就会被枪毙，这是为了给集体主义一个公平的试验场。为此，必须维持“秩序”，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秩序、纪律、服从！资本家不久就会意识到，如果自称革命者的人枪杀人民，那么人民将会仇视革命。那时，资本家当然支持捍卫秩序的人——哪怕是集体主义者也无妨。如此一来，资本家就会知道今后如何镇压集体主义者。如果靠这种方法“维持了秩序”，结果也就不难预料了。集体主义者中的“秩序”派，不甘于击毙几个“抢匪”，还要揪出“匪首”。他们会重建法庭，重新雇佣刽子手。把最坚定的革命者押送到断头台，1793年的悲剧将会重演。

Do not let us forget how reaction triumphed in the last century. First the “Hebertists” and “the madmen”, were guillotined—those whom Mignet, with the memory of the struggle fresh upon him, still called “Anarchists.” The Dantonists soon followed them; and when the party of Robespierre had guillotined these revolutionaries, they in their turn had to mount the scaffold; whereupon the people, sick of bloodshed, and seeing the revolution lost, threw up the sponge, and let the reactionaries do their worst.

我们不要忘记，反动派在上个世纪是如何胜利的。首先是埃贝尔派和忿激派遭屠杀。米涅对当年的斗争记忆犹新，仍称他们为“无政府主义者”。不久之后，丹东派也步其后尘。罗伯斯庇尔派将这些革命者送上断头台后，最终他们也难逃厄运，同样走上了断头台。人民厌倦了血腥杀戮，看到革命失败便认输投降，任凭反动派肆意妄为。

If “order is restored”, we say, the social democrats will hang the anarchists; the Fabians will hang the social democrats, and will in their turn be hanged by the reactionaries; and the Revolution will come to an end.

我们说，如果“秩序恢复”了，社会民主党人就会杀害无政府主义者；之后，费边派再杀害社会民主党人，然后再被反动派杀害；最后，革命走到尽头。

But everything confirms us in the belief that the energy of the people will carry them far enough, and that, when the Revolution takes place, the idea of anarchist Communism will have gained ground. It is not an artificial idea. The people themselves have

breathed it in our ear, and the number of communists is ever increasing, as the impossibility of any other solu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evident.

但是，这一切使我们更加确信：人民富有活力，可以走得很远；革命爆发后，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将普及开来。这个想法不是捏造出来的，是人民亲口告诉我们的。人民越是清楚其他路都走不通，共产主义者就会越多。

And if the impetus of the people is strong enough, affairs will take a very different turn. Instead of plundering the bakers" shops one day, and starving the next, the people of the insurgent cities will take possession of the warehouses, the cattle markets,—in fact of all the provision stores and of all the food to be had. The well-intentioned citizens, men and women both, will form themselves into bands of volunteers and address themselves to the task of making a rough general inventory of the contents of each shop and warehouse.

如果人民有强大的推动力，形势将会转变。起义城市的人民，不会抢劫面包店，因为第二天还得挨饿，他们会占领仓库、家畜市场——实际上他们会控制所有物资储备和所有食物。善良的市民——不论男女——将自发组建志愿队，全力以赴，清点每间商店的商品、每间仓库的物资，然后粗略地登记造册。

If such a revolution breaks out in France, namely in Paris, then in twenty-four hours the Commune will know what Paris has not found out yet, in spite of its statistical committees, and what it

never did find out during the siege of 1871—the quantity of provisions it contains. In forty-eight hours millions of copies will be printed of the tables giving a sufficiently exact account of the available food, the places where it is stored, and the means of distribution.

倘使在法国，也就是在巴黎，爆发这样一场革命，24小时后，公社就能了解巴黎没有统计清楚的（虽然巴黎有不少统计委员会），就会知道巴黎在1871年遭围困时压根没有统计过的——城内有多少粮食。48小时后，就可以印出数百万份表格，详细标明可供取用的食物数量、食物的存放地点和分发方式。

In every block of houses, in every street, in every town ward, groups of volunteers will have been organized, and these commissariat volunteers will find it easy to work in unison and keep in touch with each other. If only the Jacobin bayonets do not get in the way; if only the self-styled “scientific” theorists do not thrust themselves in to darken counsel! Or rather let them expound their muddle-headed theories as much as they like, provided they have no authority, no power! And that admirable spirit of organization inherent in the people, above all in every social grade of the French nation, but which they have so seldom been allowed to exercise, will initiate, even in so huge a city as Paris, and in the midst of a Revolution, an immense guild of free workers, ready to furnish to each and all the necessary food.

在各住宅区、街道、商业区，多个志愿队将组织起来，负责粮食供给，而这些负责给养的志愿者会发现，彼此之间容易合作交流。只要雅各宾派不端出刺刀坏事，只要自诩“信守科学”的理论家不插手捣

乱，一切就会进展顺利或者，只要理论家无权无势，无权无势！那就任他们讲自己的糊涂理论。人民生来就有良好的组织观念，在法国各社会阶层更是如此，但是他们很少有机会显露。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革命爆发后，自由工人凭借良好的组织观念，可以组建一个庞大的联盟，准备好为每个人提供所需的食物。

Give the people a free hand, and in ten days the food service will be conducted with admirable regularity. Only those who have never seen the people hard at work, only those who have passed their lives buried among the documents, can doubt it. Speak of the organizing genius of the “Great Misunderstood”, the people, to those who have seen it in Paris in the days of the barricades, or in London during the great dockers” strike, when half a million of starving folk had to be fed, and they will tell you how superior it is to the official ineptness of Bumbledom.

让人民放手去干，十天后，食物供给就会平稳有序，令人佩服。只有从未见过人民勤奋工作的人，只有一辈子都埋头于文案的人，才会有所怀疑。人民被误解了，其实人民很伟大。说到人民的组织天分，凡是目睹了巴黎革命和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当时有50万饥民要养活——的人，就会告诉大家，人民的组织才能远胜于愚蠢傲慢的官僚。

And even supposing we had to endure a certain amount of discomfort and confusion for a fortnight or a month, surely that would not matter very much. For the mass of the people it would still be an improvement on their former condition; and, besides, in times of Revolution one can dine contentedly enough on a bit of bread and cheese while eagerly discussing events.

而且，纵然我们必须忍耐两周乃至一个月的困难和混乱，也一定不会有太大影响。对于人民大众而言，革命毕竟会改善他们的处境。而且革命期间，人们渴望一边评论国家大事，一边吃点面包和奶酪。

In any case, a system which springs up spontaneously, under stress of immediate need, will be infinitely preferable to anything invented between four walls by hide-bound theorists sitting on any number of committees.

不管怎样，因迫切需求而自然形成的体制，总比各色委员会中迂腐的理论家闭门生造的东西要好上千万倍。

IV

四

The people of the great towns will be driven by force of circumstances to take possession of all the provisions, beginning with the barest necessaries, and gradually extending Communism to other things,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all the citizens. The sooner it is done the better; the sooner it is done the less misery there will be and the less strife.

大城市的人民迫于时势占有全部物资，起初是最紧缺的必需品，然后逐渐将其他物资收归公有，以便满足所有市民的需求。这个行动实行得越快越好；实行得越快，痛苦越轻，纷争越少。

But upon what basis must society be organized in order that all may have their due share of food produce? This is the question that meets us at the outset.

不过，为了人人都能拿到自己应得的食物，社会需要组建在何种基础之上呢？这是我们一开始就必须面对的问题。

We answer that there are no two ways of it. There is only one way in which Communism can be established equitably, only one way which satisfies our instincts of justice and is at the same time practical; namely, the system already adopted by the agrarian communes of Europe.

我们的答案是，办法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办法才能公正地建立共产主义，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既让我们感到公平正义又切实可行，这就是欧洲农民公社采用的制度。

Take for example a peasant commune, no matter where, even in France, where the Jacobins have done their best to destroy all communal usage. If the commune possesses woods and copses, then, so long as there is plenty of wood for all, every one can take as much as he wants, without other let or hindrance than the public opinion of his neighbours. As to the timber-trees, which are always scarce, they have to be carefully apportioned.

比方说一个农民公社，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甚至在法国也可以，虽然雅各宾派在法国不遗余力地破坏公社的作用。如果农民公社

占有树林，那么只要木材充足，谁都可以随意取用。除了邻里可能会有非议，没有任何顾忌。成材木总是很短缺，必须慎重分配。

The same with the communal pasture land; while there is enough and to spare, no limit is put to what the cattle of each homestead may consume, nor to the number of beasts grazing upon the pastures. Grazing grounds are not divided, nor is fodder doled out, unless there is scarcity. All the Swiss communes, and scores of thousands in France and Germany, wherever there is communal pasture land, practise this system.

公有牧场也是如此。只要牧草丰腴，放养多少家畜、每家家畜消耗多少牧草均无限制。只要充足够用，则牧场共用，牧草共享。瑞士的所有公社以及法国、德国的数万公社，只要有公有牧场，都采用这个制度。

And in the countries of Eastern Europe, where there are great forests and no scarcity of land, you will find the peasants felling the trees as they need them, and cultivating as much of the soil as they require, without any thought of limiting each man's share of timber or of land. But the timber will be allowanced, and the land parcelled out, to each household according to its needs, as soon as either becomes scarce, as is already the case in Russia.

东欧森林茂密，土地广袤。在东欧各国，农民需要多少树就砍多少树，需要种多少地就种多少地，从未有人想过要限制每个人砍树种地。不过一旦树木或土地短缺，像俄国现在那样，就要依各户需要，按户分配。

In a word, the system is this: no stint or limit to what the community possesses in abundance, but equal sharing and dividing of those commodities which are scarce or apt to run short. Of the 350 millions who inhabit Europe, 200 millions still follow this system of natural Communism.

简而言之，这个制度就是：凡公社财产，数量丰富的，取用不受限制，而数量短缺或容易短缺的，则要公平分配。在欧洲居住的3.5亿人中，有2亿人仍遵守这个自然共产主义制度。

It is a fact worth remarking that the same system prevails in the great town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one commodity at least, which is found in abundance, the water supplied to each house.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城市，至少有一种商品的分配是遵循自然共产主义制度，这种商品数量丰富，就是供给各家各户的水。

As long as there is no fear of the supply running short, no water company thinks of checking the consumption of water in each house. Take what you please! But during the great droughts, if there is any fear of the supply failing, the water companies know that all they have to do is to make known the fact, by means of a short advertisement in the papers, and the citizens will reduce their consumption of water and not let it run to waste.

只要不担心供水短缺，没有哪家供水公司会考虑限制各家用水，

各户想用多少，就用多少！不过，遇到干旱时节，如果担心供水短缺，供水公司知道只需在报上刊登一则简短的声明，让公众知悉此事，那么市民就会减少用水，避免浪费。

But if water were actually scarce, what would be done? Recourse would be had to a system of rations. Such a measure is so natural, so inherent in common sense, that Paris twice asked to be put on rations during the two sieges which it underwent in 1871.

不过倘若水资源确实匮乏，那怎么办呢？只能使用配给制。当然实施配给制，有常识的人都会这么做，所以1871年巴黎两次被围时均要求实施配给制。

Is it necessary to go into details, to prepare tables, showing how the distribution of rations may work, to prove that it is just and equitable, infinitely more just and equitable than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ings? All these tables and details will not serve to convince those of the middle classes, nor, alas, those of the workers tainted with middle- class prejudices, who regard the people as a mob of savages ready to fall upon and devour each other, as soon as the Government ceases to direct affairs. But those only who have never seen the people resolve and act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could doubt for a moment that if the masses were masters of the situation, they would distribute rations to each and all in strictest accordance with justice and equity.

有必要详细阐述、制图绘表，来阐明定量配给如何实施吗？有必要证明定量配给公平公正，远胜当前的制度吗？详细阐述、制图绘

表，都无法说服中产阶级，很可惜，也无法说服沾染了中产阶级偏见的工人群体。他们视人民为暴徒，认为只要政府不管事了，人民随时会相互撕咬。不过，只要见过人民自主决断、自主行动，就会时刻坚信，如果普通民众能够掌控局势，他们一定会严守公平公正，将物资配给到每个人。

If you were to give utterance, in any gathering of people, to the opinion that delicacies—game and such-like—should be reserved for the fastidious palates of aristocratic idlers, and black bread given to the sick in the hospitals, you would be hissed. But say at the same gathering, preach at the street corners and in the market places, that the most tempting delicacies ought to be kept for the sick and feeble—especially for the sick. Say that if there are only five brace of partridge in the entire city, and only one case of sherry, they should go to sick people and convalescents. Say that after the sick come the children. For them the milk of the cows and goats should be reserved if there is not enough for all. To the children and the aged the last piece of meat, and to the strong man dry bread, if the community be reduced to that extremity.

如果你在群众集会上讲话，说美味佳肴——如野味什么的——应留给游手好闲的贵族，满足他们挑剔的味觉，而黑面包应拿给医院的病人，听众定然嘘声不断。相反，请在群众集会上这样讲，在街角、集市上这样宣传：极品美味应留给病人和体弱者，尤其是病人；请这样讲：如果全城只有五对鹧鸪和一箱雪利酒，那么这些应该留给病人和康复期的病人；请这样讲：病人优先，儿童其次；如果牛奶和羊奶不够所有人共享，就应留给儿童；如果社会陷入此等绝境，那就把最后一块肉留给老人和孩子，让壮汉吃干面包。

Say, in a word, that if this or that article of consumption runs short, and has to be doled out, to those who have most need most should be given. Say that and see if you do not meet with universal agreement.

简而言之，请这样讲：如果有这种或那种消费品短缺，必须定量配给，那么最困难的人，应得到的最多。讲完后，看看是否会得到一致赞同。

The man who is full-fed does not understand this, but the people do understand, and have always understood it; and even the child of luxury, if he is thrown on the street and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the masses, even he will learn to understand.

饱食终日之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人民明白，而且一直都明白。即使富贵人家的孩子，如果流落街头，与百姓交往，也会慢慢明白。

The theorists—for whom the soldier!s uniform and the barrack mess- table are civilization!s last word—would like no doubt to start a regime of National Kitchens and “Spartan Broth”. They would point out the advantages thereby gained, the economy in fuel and food, if such huge kitchens were established, where every one could come for their rations of soup and bread and vegetables.

那些理论家——在他们看来，军人的制服和军营的共餐制就是文明——他们定然愿意开办国有厨房，实行“斯巴达的肉汤”（共餐

制）。他们会指出，如果建立若干这种大型的国有厨房，人人都可以去取定量配给的汤、面包和蔬菜，可以产生诸多便利，其一便是节约燃料和粮食。

We do not question these advantages. We are well aware that important economies have already been achieved in this direction—as, for instance, when the handmill, or quern, and the baker's oven attached to each house were abandoned. We can see perfectly well that it would be more economical to cook broth for a hundred families at once, instead of lighting a hundred separate fires. We know, besides, that there are a thousand ways of preparing potatoes, but that cooked in one huge pot for a hundred families they would be just as good.

我们并不怀疑这些便利之处。我们深知，用类似的方法已经节约了很多燃料和粮食，比如各家各户已经不再使用必备的手动研磨机、手推磨和面包炉了。我们非常清楚，同时为一百家煮肉汤，比一百家分别点火煮汤更划算。此外，我们还知道，土豆的做法数不胜数，但是在一口巨锅内烹制出够一百家吃的土豆，味道也不错。

We know, in fact, that variety in cooking being a matter of the seasoning introduced by each cook or housewife, the cooking together of a hundredweight of potatoes would not prevent each cook or housewife from dressing and serving them in any way she pleased. And we know that stock made from meat can be converted into a hundred different soups to suit a hundred different tastes.

我们知道，事实上，烹饪的各种味道全凭厨师和家庭主妇调制，

同时烹制一英担（一吨的二十分之一）土豆以后，厨师或家庭主妇尽可随心所欲地调味和上菜。而且我们知道，用肉熬制的原汁，可以做成多种汤水，满足各种口味。

But though we are quite aware of all these facts, we still maintain that no one has a right to force a housewife to take her potatoes from the communal kitchen ready cooked if she prefers to cook them herself in her own pot on her own fire. And, above all, we should wish each one to be free to take his meals with his family, or with his friends, or even in a restaurant, if it seemed good to him.

尽管我们很清楚这些事实，但是我们也认为，如果家庭主妇想自己烧火，用自己的锅做土豆，那么任何人都无权强迫她必须取公共厨房已经做好的土豆。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人人可以自由地与家人吃饭，与朋友吃饭，甚至在饭店吃饭，只要自己觉得好就行。

Naturally large public kitchens will spring up to take the place of the restaurants, where people are poisoned nowadays. Already the Parisian housewife gets the stock for her soup from the butcher, and transforms it into whatever soup she likes, and London housekeepers know that they can have a joint roasted, or an apple or rhubarb tart baked at the baker's for a trifling sum, thus economizing time and fuel. And when the communal kitchen—the common bakehouse of the future—is established, and people can get their food cooked without the risk of being cheated or poisoned, the custom will no doubt become general of going to the communal kitchen for the fundamental parts of the meal, leaving the last touches to be added as individual taste shall suggest.

大型的公有厨房必然会代替现在毒害人民的饭店。巴黎的家庭主妇从肉贩那里购买原料，然后再随心情做各种口味的汤；伦敦的家庭主妇知道，在面包店可以烤肉，也可以烘烤苹果馅饼和大黄馅饼，花不了几个钱，却节省时间和燃料。如果公有厨房——未来的公共面包房——建立后，民众不用冒着被骗、被毒害的风险，就可以得到做好的食物，那么公有厨房做好饭菜，让个人依据口味完成最后工序，一定会十分普遍。

But to make a hard and fast rule of this, to make a duty of taking home our food ready cooked, that would be as repugnant to our modern minds as the ideas of the convent or the barrack—morbid ideas born in brains warped by tyranny or superstition.

不过，硬性规定只能将做好的食物带回家，这与建造修道院和兵营的想法毫无二致，都是专制迷信头脑生出的病态想法，与我们的现代观念格格不入。

“Who will have a right to the food of the commune?” will assuredly be the first question which we shall have to ask ourselves. Every township will answer for itself, and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 answers will all be dictated by the sentiment of justice. Until labour is reorganized, as long as the disturbed period lasts, and while it is impossi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inveterate idlers and genuine workers thrown out of work, the available food ought to be shared by all without exception. Those who have been enemies to the new order will hasten of their own accord to rid the commune of their presence. But it seems to us that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which have always been magnanimous, and have nothing of vindictiveness

in their disposition, will be ready to share their bread with all who remain with them, conquered and conquerers alike. It will be no loss to the Revolution to be inspired by such an idea, and, when work is set agoing again, the antagonists of yesterday will stand side by side in the same workshops. A society where work is free will have nothing to fear from idlers.

“什么人有权从公社拿取食物？”这肯定是我们首要思考的问题。每座城市都将给出自己的答案，不过我们坚信，如何回答取决于如何看待正义。如果生产尚未改造，乱局持续不止，无法断定哪些人懒惰成性，哪些人真正失业，就应该把可以利用的食物分给所有人，无一例外。一直与新秩序为敌的人会赶紧消失，不敢在公社露面。不过在我们看来，人民大众一向心胸宽广，性情仁慈，只要与自己站在一起，不论是胜者还是败者，都会与其分享面包。人民有这样的心胸和性情，不会损害革命，而且一旦生产恢复，昔日的敌人将在同一作坊并肩劳动。在劳动自由的社会里，懒人不足为虑。

“But provisions will run short in a month!” our critics at once exclaim.

“但是食物一个月后就没了！”反对我们的人立刻惊呼道。

“So much the better,” say we. It will prove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on record the people have had enough to eat. As to the question of obtaining fresh supplies, we shall discuss the means in our next chapter.

“这样更好”，我们会说。这将是有案可查以来，人民第一次有足够的东西吃。至于如何补给食物，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V

五

By what means could a city in a state of revolution be supplied with food? We shall answer this question, but it is obvious that the means resorted to will depend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 and in neighbouring countries. If the entire nation, or, better still, if all Europe should accomplish the Social Revolution simultaneously, and start with thorough-going Communism, our procedure would be simplified; but if only a few communities in Europe make the attempt, other means will have to be chosen. The circumstances will dictate the measures.

一座处于革命中的城市要如何补给食物呢？我们会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很明显，补给食物的方法取决于各个省以及邻国革命的特点。如果是全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同时完成社会革命，开始彻底实行共产主义，我们的方法就会简单得多；不过，如果只有欧洲的几个公社进行尝试，就只能选用其他办法了。形势决定方法。

We are thus led, before we proceed further, to glance at the State of Europe, and, without pretending to prophesy, we may try to foresee what course the Revolution will take, or at least what will be its essential features.

因此，我们在展开下文前，先大概看一眼欧洲形势，我们虽然无意装作能未卜先知，但要设法预见革命的发展道路，至少要预见革命的主要特征。

Certainly it would be very desirable that all Europe should rise at once, that expropriation should be general, and that communistic principles should inspire all and sundry. Such a universal rising would do much to simplify the task of our century.

理想状态当然是全欧洲同时起义，普遍实行充公，共产主义原则让所有人心潮澎湃。如果整个欧洲全部起义，本世纪的任务便要简单得多了。

But all the signs lead us to believe that it will not take place. That the Revolution will embrace Europe we do not doubt. If one of the four great continental capitals—Paris, Vienna, Brussels, or Berlin—rises in revolution and overturns its Government, it is almost certain that the three others will follow its example within a few weeks! time. It is, moreover, highly probable that the Peninsulas and even London and St. Petersburg would not be long in following suit. But whether the Revolution would everywhere exhibit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is highly doubtful.

但是种种迹象都告诉我们这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坚信，革命定会席卷欧洲。如果欧洲大陆的四大首都——巴黎、维也纳、布鲁塞尔和柏林——之一爆发革命、推翻政府，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其他三个城市在几周之内定会效仿。而且，欧洲各主要半岛，甚至伦敦和圣彼得堡不久之后都很可能会紧随其后。不过，我们很难断定各地革命是否

会呈现出相同的特征。

It is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expropriation will be everywhere carried into effect on a larger scale, and that this policy carried out by any one of the great nations of Europe will influence all the rest; yet the beginnings of the Revolution will exhibit great local differences, and its course will var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1789-1793, the French peasantry took four years to finally rid themselves of the redemption of feudal rights, and the bourgeois to overthrow royalty. Let us keep that in mind, and therefore be prepared to see the Revolution develop itself somewhat gradually. Let us not be disheartened if here and there its steps should move less rapidly. Whether it would take an avowedly socialist character in all European nations, at any rate at the beginning, is doubtful. Germany, be it remembered, is still realizing its dream of a United Empire. Its advanced parties see visions of a Jacobin Republic like that of 1848, and of the organization of labour according to Louis Blanc; while the French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want above all things a free Commune, whether it be a communist Commune or not.

极为可能的是，各地会实施大规模充公，而一个欧洲大国实施充公，将影响到其余各国。不过，各地革命在初期将呈现出巨大差异，各国的革命道路也将迥然不同。1789至1793年，法国农民耗时四年，最终摆脱了地主压榨；资产阶级耗时四年，推翻了皇权统治。我们当将此牢记于心，也应因此耐心等待革命逐步发展，如果革命脚步偶尔迟缓，我们也不要灰心丧气。在欧洲各国，革命不一定会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至少在革命初期如此。要记得，德国仍然在努力实现建立联合帝国的梦想。德国的进步政党憧憬着模仿1848年的法国、建立一个雅各宾式的共和国，还希望依照路易·布兰克的想法建立劳动

组织；而另一方面，法国人民最向往的是建立自由公社，是不是共产主义公社都可以。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when the coming Revolution takes place, Germany will go further than France went in 1793. The eigh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France was an advance o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abolishing as it did at one stroke the power of the throne and the landed aristocracy, whose influence still survives in England. But, if Germany goes further and does greater things than France did in 1793,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ideas which will foster the birth of her Revolution will be those of 1848; while the ideas which will inspire the Revolution in Russia will probably be a combination of those of 1789 with those of 1848.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一旦爆发革命，德国将比1793年的法国走得更远。法国18世纪革命比英国17世纪革命前进了一步：法国18世纪革命一举废除了国王和地主权力，但在英国，国王和地主权力至今余威犹存。然而，如果德国比1793年的法国走的路更远，做的事更伟大，那么促使德国诞生革命的思想必定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思想，而激发俄国革命的思想可能是法国1789年和1848年两次革命的思想。

Without, however, attaching to these forecasts a greater importance than they merit, we may safely conclude this much: the Revolution will take a different character in each of the different European nations; the point attained in the socialization of wealth will not be everywhere the same.

然而，即便不过分看重上述预言，我们也可自信地作出以下结论：在欧洲各国，革命特征不同；各地财产公有化的程度也不会相同。

Will it therefore be necessary, as is sometimes suggested, that the nations in the vanguard of the movement should adapt their pace to those who lag behind? Must we wait till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s ripe in all civilized countries? Clearly not! Even if it were a thing to be desired, it is not possible. History does not wait for the laggards.

如此一来，立于革命潮头的国家是否有必要放慢脚步、等待落后的国家？不时有人这样建议。我们必须等到共产主义革命在所有文明国家都孕育成熟吗？当然不是，即使有心如此，也不可能实现。历史从不等待落后者。

Besides, we do not believe that in any one country the Revolution will be accomplished at a stroke,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as some socialists dream. It is highly probable that if one of the five or six large towns of France—Paris, Lyons, Marseilles, Lille, Saint-Etienne, Bordeaux—were to proclaim the Commune, the others would follow its example, and that many smaller towns would do the same. Probably also various mining districts and industrial centres would hasten to rid themselves of “owners” and “masters”, and form themselves into free groups.

再者，虽然一些社会主义者梦想着革命能毕其功于一役，转眼间便大功告成，但是我们认为，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的。很可

能发生的是，法国的五六个大城市——巴黎、里昂、马赛、里尔、圣艾蒂安、波尔多，只要有一个宣布成立公社，其他大城市就会紧随其后，而许多小城市也会纷纷效仿。同时，各矿区、工业中心可能迅速摆脱“业主”和“老板”，成立自由团体。

But many country places have not advanced to that point. Side by side with the revolutionized communes such places would remain in an expectant attitude, and would go on living on the Individualist system. Undisturbed by visits of the bailiff or the tax-collector, the peasants would not be hostile to the revolutionaries, and thus, while profiting by the new state of affairs, they would defer the settlement of accounts with the local exploiters. But with that practical enthusiasm which always characterizes agrarian uprisings (witness the passionate toil of 1792) they would throw themselves into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the land, which, freed from taxes and mortgages, would become so much dearer to them.

但是，许多乡村地区还没有进步到此等程度。各地成立革命公社后，乡村地区仍将观望，继续依存于个体制。没有法警和税务员来打扰，农民对革命者也不会怀有敌意。因此，农民一方面因新形势而获益，一方面又会拖延向当地的剥削者交纳欠款。不过，农民会满怀热情、脚踏实地地种田——历次农民起义都有此特点，比如1792年革命时，法国农民的劳动热情十分高涨——因为种田不纳税，不抵押财产，这对农民来说更有吸引力。

As to other countries, revolution would break out everywhere, but revolution under divers aspects; in one country State Socialism, in another Federation; everywhere more or less Socialism, not conforming to any particular rule.

至于其他国家，革命也会随处爆发，但特点各不相同：有的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有的实行联邦制，各地虽然大体上都是社会主义，但并无特定规律可循。

VI

六

Let us now return to our city in revolt, and consider how its citizens can provide foodstuffs for themselves. How are the necessary provisions to be obtained if the nation as a whole has not accepted Communism? This is the question to be solved. Take, for example, one of the large French towns—take the capital itself, for that matter. Paris consumes every year thousands of tons of grain, 400,000 head of oxen, 300,000 calves, 400,000 swine, and more than two millions of sheep, besides great quantities of game. This huge city devours, besides, more than 20 million pounds of butter, 200 million eggs, and other produce in like proportion.

我们再来谈谈起义的城市，想一想市民如何找食物。如果不是全国都接受了共产主义，那么如何获得必需的物资呢？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拿法国一座大城市来说吧，比如说首都巴黎。巴黎每年消耗数千吨粮食、40万头公牛、30万头小牛、40万头猪、两百多万头羊，外加许多猎物。此外，这座庞大的城市每天还要吞没两千多万磅黄油、2亿个鸡蛋和其他海量农产品。

It imports flour and grai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om Russia, Hungary, Italy, Egypt, and the Indies; live stock from

Germany, Italy, Spain—even Roumania and Russia; and as for groceries, there is not a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it does not lay under contribution.

巴黎从美国、俄国、匈牙利、意大利、埃及和印度进口面粉和谷物，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乃至罗马尼亚和俄国进口牲畜，而食杂百货，则来自世界各个国家。

Now, let us see how Paris or any other great town could be revictualled by home-grown produce, supplies of which could be readily and willingly sent in from the provinces.

那么，我们来看看巴黎或其他大城市是如何靠国内农产品实现再补给的，而且这些农产品是由各省主动供给。

To those who put their trust in “authority” the question will appear quite simple. They would begin by establishing a strongly centralized Government, furnished with all the machinery of coercion—the police, the army, the guillotine. This Government would draw up a statement of all the produce contained in France. It would divide the country into districts of supply, and then command that a prescribed quantity of some particular foodstuff be sent to such a place on such a day, and delivered at such a station, to be there received on a given day by a specified official and stored in particular warehouses.

在盲信“强权”的人看来，此事易如反掌。他们首先建立高度集权

的政府，配有各种强制机构——警察、军队和刑场。集权政府将登记法国全境的农产品。它将国家分为若干供应区，命令将规定数量的某种食物在某日送至某地，在某车站交付，由某官员在某日前往接收，然后存储在某仓库。

Now, we declare with the fullest conviction, not merely that such a solution is undesirable, but that it never could by any possibility be put into practice. It is wildly Utopian!

现在，我们敢断言，这个办法不仅令人生厌，而且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践。这纯粹是空想！

Pen in hand, one may dream such a dream in the study, but in contact with reality it comes to nothing,—this was proved in 1793; for, like all such theories, it leaves out of account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that is in man. The attempt would lead to a universal uprising, to three or four Vendees, to the villages rising against the towns, all the country up in arms defying the city for its arrogance in attempting to impose such a system upon the country.

手中握笔，置身书房，尽可做如此美梦，可离开了书房，接触到现实，梦也就碎了，这在1793年得到了证实，因为所有这类理论都没有考虑到人的独立精神。一旦采取强权手段，各地将出现暴动，一些省抵制革命，农村起义反对城市——农村全都武装起来，反抗城市傲慢地将这套做法强加给农村。

We have already had too much of Jacobin Utopias! Let us see if

some other form of organization will meet the case.

我们受够了雅各宾式的空想！我们看看是否另有适用的组织形式。

During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the provinces starved the large towns, and killed the Revolution. And yet it is a known fact that the production of grain in France during 1792-1793 had not diminished; indeed, the evidence goes to show that it had increased. But after having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manorial lands, after having reaped a harvest from them, the peasants would not part with their grain for paper-money. They withheld their produce, waiting for a rise in the price, or the introduction of gold. The most rigorous measures of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were without avail, and her executions failed to break up the ring, or force the farmers to sell their corn. For it is a matter of history that the commissaries of the Convention did not scruple to guillotine those who withheld their grain from the market, and pitilessly executed those who speculated in foodstuffs. All the same, the corn was not forthcoming, and the townsfolk suffered from famine.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各地断了大城市的粮，扼杀了革命。然而众所周知，法国1792至1793年的粮食产量没有减少，有证据表明产量甚至还增长了。不过，等到农民占了农场主的土地，粮食丰收了，就不愿为纸币出售粮食了。他们囤积粮食，等着粮价上涨或是有人用金子购买。国民公会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但仍无济于事，就连死刑也未能扭转困局，也未能迫使农民卖粮。公会委员曾经断然处决囤积粮食的人，无情地处死投机买卖食物的人。可粮食还是不见踪影，市民还是忍饥挨饿。

But what was offered to the husbandman in exchange for his hard toil? Assignats, scraps of paper decreasing in value every day, promises of payment, which could not be kept. A forty-pound note would not purchase a pair of boots, and the peasant, very naturally, was not anxious to barter a year's toil for a piece of paper with which he could not even buy a shirt.

不过，拿来换取农民辛苦劳作果实的是什么呢？是（流通于1789至1796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纸券，是无日不贬值的纸片，根本花不出去。一张面值40磅的纸券买不了一双长靴，农民自然不急着拿出苦干一年的果实，换取一张连一件衬衫都买不起的纸币。

As long as worthless paper-money—whether called assignats or labour notes—is offered to the peasant-producer it will always be the same. The country will withhold its produce, and the towns will suffer want, even if the recalcitrant peasants are guillotined as before.

只要向农业生产者支付毫无价值的纸币——不论叫纸券还是叫劳动券——情况都不会改变。农村将拒售农产品，城市将忍饥挨饿，就算效法从前，处决顽抗的农民，也无济于事。

We must offer to the peasant in exchange for his toil not worthless paper-money, but the manufactured articles of which he stands in immediate need. He lacks the proper implements to till the land, clothes to protect him from the inclemencies of the weather, lamps and oil to replace his miserable rushlight or tallow

dip, spades, rakes, ploughs. All these things, under present conditions, the peasant is forced to do without, not because he does not feel the need of them, but because, in his life of struggle and privation, a thousand useful things are beyond his reach; because he has no money to buy them.

若要换取农民的劳动果实，我们切不可用毫无价值的纸币去换，而要用农民急需的机器制成品去交换。农民没有好用的农具耕地，没有衣服抵御恶劣天气，没有灯和油代替灰暗的灯芯草蜡烛和动物油脂，也没有铁锹、耙子和犁。目前情况下，农民缺这少那，也只得勉力支撑，不是因为农民觉得不需要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贫困中挣扎，许多有用之物都遥不可及，这源自农民无钱购买。

Let the town apply itself, without loss of time, to manufacturing all that the peasant needs, instead of fashioning geegaws for the wives of rich citizens. Let the sewing machines of Paris be set to work on clothes for the country folk workaday clothes and clothes for Sunday too, instead of costly evening dresses for the English and Russian landlords and the African gold-magnates' wives. Let the factories and foundries turn out agricultural implements, spades, rakes, and such-like, instead of waiting till the English send them to France, in exchange for French wines!

让城市即刻全力以赴生产农民需要的一切，不要再为富太太生产华而不实的东西了；让巴黎的缝纫机运转起来，为农民缝制工作服和周日穿的衣服，不要再为英国地主、俄国地主、非洲金矿巨头的太太们制作昂贵的晚礼服了；让工厂——包括铸造厂——生产农具，如铁锹和耙子，不要再等英国将农具运到法国，换取法国葡萄酒了。

Let the towns send no more inspectors to the villages, wearing red, blue, or rainbow-coloured scarves, to convey to the peasant orders to take his produce to this place or that, but let them send friendly embassies to the country folk and bid them in brotherly fashion: “Bring us your produce, and take from our stores and shops all the manufactured articles you please.” Then provisions would pour in on every side. The peasant would only withhold what he needed for his own use, and would send the rest into the cities, feel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at these toiling townsfolk were his comrades—his brethren, and not his exploiters.

城市不能再往农村派遣佩戴红色、蓝色或彩色绶带的监察员，命令农民将农产品送到某某地；城市应该派出友好使者，以兄弟般的口吻恳请农民：“只要给我们农产品，你们就可以从我们的仓库和商店拿走喜欢的机器制成品。”——随后粮食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农民只会留下自己所需要的，其余的粮食都会运到城市，因为他们把辛勤工作的市民看成同志——看成兄弟，而非剥削者，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We shall be told, perhaps, that this would necessitate a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 Well, yes, that is true of certain departments; but there are other branches which could be rapidly modified in such a way as to furnish the peasant with clothes, watches, furniture, and the simple implements for which the towns make him pay such exorbitant prices at the present time. Weavers, tailors, shoemakers, tinsmiths, cabinet-makers, and many other trades and crafts could easily direct their energies to the manufacture of useful and necessary articles, and abstain from producing mere luxuries. All that is needed is that the public mind

should be thoroughly convinced of the necessity of this transformation, and should come to look upon it as an act of justice and of progress, and that it should no longer allow itself to be cheated by that dream, so dear to the theorists—the dream of a revolution which confines itself to taking possession of the profits of industry, and leaves production and commerce just as they are now.

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说，这需要先对工业进行彻底的改造。没错，有些部门确实如此，不过有些部门改造起来很迅速，不久就可以为农民生产衣服、钟表、家具和简单的工具，眼下城市卖给农民的这些东西，价钱高得离谱。织布工、裁缝、鞋匠、洋铁匠、细木工以及许多其他行业的手艺人，很容易集中精力制造实用品和必需品，不再只是制造奢侈品。现在需要的，是让公众从心理上完全认同改革的必要性，视其为正义之举、进步之举，而且不再受理论家难以割舍的空想的欺骗——理论家们梦想着在革命中只占有工业利润，而让生产和商业照旧运行。

This, then, is our view of the whole question. Cheat the peasant no longer with scraps of paper—be the sums inscribed upon them ever so large; but offer him in exchange for his produce the very things of which he, the tiller of the soil, stands in need. Then the fruits of the land will be poured into the towns. If this is not done there will be famine in our cities, and reaction and despair will follow in its train.

综上所述，这便是我们对整个问题的看法。不要再用纸片欺骗农民了——哪怕纸片上印着惊人的数字；农民是种田人，要拿他们所需之物，来换取农产品。这样，土地上长出的果实会大量涌入城市。如若不然，城市就会闹饥荒，随后反动势力抬头，接着绝望情绪将会蔓

延。

VII

七

All the great towns, we have said, buy their grain, their flour, and their meat, not only from the provinces, but also from abroad. Foreign countries send Paris not only spices, fish, and various dainties, but also immense quantities of corn and meat.

我们已经讲过，各大城市不仅从国内各省、也从国外购买米、面、肉。外国不仅向巴黎运送香料、鱼以及其他各种美味，还运送大量的谷物和肉。

But when the Revolution comes these cities will have to depend on foreign countries as little as possible. If Russian wheat, Italian or Indian rice, and Spanish or Hungarian wines abound in the markets of western Europe, it is not that the countries which export them have a superabundance, or that such a produce grows there of itself, like the dandelion in the meadows. In Russia for instance, the peasant works sixteen hours a day, and half starves from three to six months every year, in order to export the grain with which he pays the landlord and the State. To-day the police appears in the Russian village as soon as the harvest is gathered in, and sells the peasant's last horse and last cow for arrears of taxes and rent due to the landlord, unless the victim immolates himself of his own accord by selling the grain to the exporters. Usually, rather than part with his livestock at a disadvantage, he keeps only a nine-months' supply

of grain, and sells the rest. Then, in order to sustain life until the next harvest, he mixes birch-bark and tares with his flour for three months, if it has been a good year, and for six months if it has been bad, while in London they are eating biscuits made of his wheat.

不过革命爆发后，大城市须尽可能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如果俄国的小麦、意大利或印度的大米、西班牙或匈牙利的葡萄酒大量充盈着西欧市场，那并不是因为这些产品在出口国大量过剩，也不是因为它们就像草地上的蒲公英那样可以自然生长。比如在俄国，农民每日劳作16个小时，可每年还要忍饥挨饿三至六个月，就是为了出口粮食，好交钱给地主和政府。如今在俄国，粮食刚收割完，警察就立即赶到农村，若农民不主动把粮食卖给出口商，警察就卖光农民的牛马，抵偿到期的税款和应付给地主的地租。通常情况下，为了避免牲口被拉走贱卖，农民仅留下能吃九个月的粮食，把其余的粮食卖掉。于是，农民为了维持到下一个收获季节，就把树皮、野草掺进面粉里，年头好的时候要吃三个月，年头的差时候要吃六个月，而他们生产出的小麦却做成饼干，供伦敦人食用。

But as soon as the Revolution comes, the Russian peasant will keep bread enough for himself and his children; the Italian and Hungarian peasants will do the same; the Hindoo, let us hope, will profit by these good examples; and the farmers of America will hardly be able to cover all the deficit in grain which Europe will experience. So it will not do to count on their contributions of wheat and maize satisfying all the wants.

但是一旦革命到来，俄国农民将给自己和孩子留足面包，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农民也是如此；我们希望印度农民也能从这些好的例子中有所受益；而美国农民几乎不可能弥补欧洲所有的粮食缺口。所以，

不能寄希望于美国农民供应小麦和玉米来满足所有需求。

Since all our middle-class civilization is based on the exploitation of inferior races and countries with less advanced industrial systems, the Revolution will confer a boon at the very outset, by menacing that “civilization,” and allowing the so-called inferior races to free themselves.

由于中产阶级的全部文明是建立在压榨劣势种族、剥削工业落后国家的基础上的，而革命可以撼动“文明”，让劣势种族自我解放，因此革命从一开始就有益处。

But this great benefit will manifest itself by a steady and marked diminution of the food supplies pouring into the great cities of Western Europe.

但是，随着涌入西欧各大城市的食物供给不断锐减，这个巨大的益处会越发明显。

It is difficult to predict the course of affairs in the provinces. On the one hand the slave of the soil will take advantage of the Revolution to straighten his bowed back. Instead of working fourteen or fifteen hours a day, as he does at present, he will be at liberty to work only half that time, which of course would have the effect of decreasing the production of the principal articles of consumption—grain and meat.

我们很难预测国内各地的情况如何。一方面，土地的奴隶可以借革命之机，挺直弯曲已久的腰板。农民不必像现在这样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可以只工作一半的时间，当然会造成主要消费品——粮食和肉类的产量下降。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ill be an increase of production as soon as the peasant realizes that he is no longer forced to support the idle rich by his toil. New tracts of land will be cleared, new and improved machines set a-going.

不过另一方面，农民一旦意识到，再也无人强迫自己日夜辛劳，供养无所事事的有钱人，产量会马上增加。会开垦出来大片的新土地，也会投入使用新机器和改良机器。

“Never was the land so energetically cultivated as in 1792, when the peasant had taken back from the landlord the soil which he had coveted so long,” Michelet tells us speaking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1792年，农民从地主手中拿回了渴望已久的土地，种地热情高涨，可谓空前绝后。”米什莱论及法国大革命时这样说道。

Of course, before long, intensive culture would be within the reach of all. Improved machinery, chemical manures, and all such matters would soon be supplied by the Commune. But everything tends to indicate that at the outset there would be a falling off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rance and elsewhere.

当然不久之后，就可以广泛普及集约种植，公社很快就可以提供改良过的机器以及化学肥料等物品。但是，种种事实都表明：革命之初，农产品必然减少，法国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

In any case it would be wisest to count upon such a falling off of contributions from the provinces as well as from abroad.—How is this falling off to be made good?

无论如何，预见国内外粮食供给会减少，是极为明智的。可是粮食供给减少，如何补救呢？

Why! by setting to work ourselves! No need to rack our brains for far¬fetched panaceas when the remedy lies close at hand.

哎！我们自己动手，良方就在眼前，无需绞尽脑汁苦寻远方的万应灵药。

The large towns, as well as the villages, must undertake to till the soil. We must return to what biology calls “the integration of functions”—after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taking up of it as a whole—this is the course followed throughout Nature.

大城市和农村必须都开始种田。我们必须回归到生物学所说的“功能整合”，即劳动分工后，再合为一体——在自然界，万事万物都遵循这个规律。

Besides, philosophy apart, the force of circumstances would bring about this result. Let Paris see that at the end of eight months it will be running short of bread, and Paris will set to work to grow wheat.

此外，撇开哲理不谈，迫于形势也会这样做。巴黎会看到，到第八个月的月末，面包就会开始短缺，巴黎就要着手种植小麦。

Land will not be wanting, for it is round the great towns, and round Paris especially, that the parks and pleasure grounds of the landed gentry are to be found. These thousands of acres only await the skilled labour of the husbandman to surround Paris with fields infinitely more fertile and productive than the steppes of southern Russia, where the soil is dried up by the sun. Nor will labour be lacking. To what should the two million citizens of Paris turn their attention, when they would be no longer catering for the luxurious fads and amusements of Russian princes, Romanian grandees, and wives of Berlin financiers?

土地并不匮乏，因为大城市周边尽是土地，尤其巴黎周边有地主的公园和游乐场。这数千英亩土地，只要有了农夫的熟练劳动，就能变为环绕巴黎的良田，比俄国南部被太阳烘烤的平原肥沃千百倍。劳动力也不会匮乏。巴黎两百万市民如果不再围着俄国王子、罗马尼亚贵族和柏林金融家的太太团团转，只顾迎合他们奢侈的时尚追求和娱乐消遣，那能把注意力转向哪里呢？

With all the mechanical inventions of the century; with all the

intelligence and technical skill of the worker accustomed to deal with complicated machinery; with inventors, chemists, professors of botany, practical botanists like the market gardeners of Gennevilliers; with all the plant that they could use for multiplying and improving machinery; and, finally, with the organizing spirit of the Parisian people, their pluck and energy—with all these at its command, the agriculture of the anarchist Commune of Paris would be a very different thing from the rude husbandry of the Ardennes.

有了本世纪发明的所有机器，有了工人——经常与复杂机器打交道——的才智和技术能力，有了发明家、化学家、植物学教授和像热讷维耶商业园艺师一样的应用植物学家，有了用于增加和改良机器的所有工厂，最后，有了巴黎人民的组织意识、勇气和干劲——有了这一切为其所用，巴黎无政府主义公社的农业将迥异于阿登省的粗放农业。

Steam, electricity, the heat of the sun, and the breath of the wind, will ere long be pressed into service. The steam plough and the steam harrow will quickly do the rough work of preparation, and the soil, thus cleaned and enriched, will only need the intelligent care of man, and of woman even more than man, to be clothed with luxuriant vegetation—not once but three or four times in the year.

蒸汽、电、太阳热能和风不久就可以服务人类。种地的粗活、累活，很快就可以交给蒸汽机引犁和蒸汽耙了。土壤经蒸汽机引犁和蒸汽耙除草增肥后，人们（女性比男性更佳）只要动点脑筋，细心照料，就会长满茂密的庄稼，不是一年一熟，而是一年三熟或四熟。

Thus, learning the art of horticulture from experts, and trying experiments in different methods on small patches of soil reserved for the purpose, vying with each other to obtain the best returns, finding in physical exercise, without exhaustion or overwork, the health and strength which so often flags in cities,—men, women and children will gladly turn to the labour of the fields, when it is no longer a slavish drudgery, but has become a pleasure, a festival, a renewal of health and joy.

于是，向专家学习园艺，在小块实验田尝试不同的耕种方法，比较谁的收成好，适量锻炼，强身健体（许多城市人体质下降，力气衰减）——大人小孩、男男女女都高高兴兴去种地，此时种地已不是奴役，而是乐趣，是节日，可以让人恢复健康、重拾快乐。

“There are no barren lands; the earth is worth what man is worth”—that is the last word of modern agriculture. Ask of the earth, and she will give you bread, provided that you ask aright.

“没有贫瘠的土地；人努力多少，土地就回报多少。”这就是现代农业给出的定论。向土地索取，只要方法正确，土地一定会给你面包。

A district, though it were as small as the two departments of the Seine and the Seine-et-Oise, and with so great a city as Paris to feed, would be practically sufficient to grow upon it all the food supplies, which otherwise might fail to reach it.

一个地区，即便如塞纳和塞纳一瓦兹两省一样小，又有一个如巴黎那样大的城市需要供养，也基本上足以长出所需的粮食，但如果方法不当，恐怕就难以实现。

The combin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the husbandman and the mechanic in the same individual—this is what anarchist communism will inevitably lead us to, if it starts fair with expropriation.

农业和工业相结合，一个人兼顾农民和机械师二职一一无政府共产主义如果从一开始就直接实施充公，必然会带领我们走到这一步。

Let the Revolution only get so far, and famine is not the enemy it will have to fear. No, the danger which will menace it lies in timidity, prejudice, and half-measures. The danger is where Danton saw it when he cried to France: “De l'audace, de l'audace, et encore de l'audace.” The bold thought first, and the bold deed will not fail to follow.

只要革命走到这一步，那么饥荒就不是可怕的敌人。不，革命面临的危险在于怯懦、偏见、妥协。丹东看到了这种危险，因而向法国呼喊：“勇敢些，勇敢些，再勇敢些”先有大胆之思想，随后必有大胆之行动。

[6_1].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

CHAPTER VI DWELLINGS

第六章　住房

I

一

Those who have closely watched the growth of Socialist ideas among the workers must have noticed that on one momentous question—the housing of the people—a definite conclusion is being imperceptibly arrived at. It is a fact that in the large towns of France, and in many of the smaller ones, the workers are coming gradually to the conclusion that dwelling-houses are in no sense the property of those whom the State recognizes as their owners.

谁要是仔细观察过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的发展，肯定已经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人民的住房，这个问题正悄无声息地有了明确结论。事实上，在法国大城市和许多小城市，工人正渐渐明白，房屋的所有者绝不是政府认定的那些房主。

This idea has evolved naturally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and nothing will ever convince them again that the “rights of property” ought to extend to houses.

这个想法在人民心中自然发展，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再相信，住房应列入“财产权”的范畴。

The house was not built by its owner. It was erected, decorated and furnished by innumerable workers in the timber yard, the brick field, and the workshop, toiling for dear life at a minimum wage.

房屋不是房主建的，而是无数木场、砖厂、车间工人搭建、装潢和布置起来的。他们收入微薄，却拼命劳作。

The money spent by the owner was not the product of his own toil. It was amassed, like all other riches, by paying the workers two-thirds or only a half of what was their due.

房主付的钱也非自己的劳动成果。与其他财富如出一辙，都是通过付给工人应得报酬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积累起来的。

Moreover—and it is here that the enormity of the whole proceeding becomes most glaring—the house owes its actual value to the profit which the owner can make out of it. Now, this profit results from the fact that his house is built in a town—that is, in an agglomeration of thousands of other houses, possessing paved streets, bridges, quays, and fine public buildings, well lighted, and affording to its inhabitants a thousand comforts and conveniences unknown in villages; a town in regular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towns, and itself a centre of industry, commerce, science, and art; a town which the work of twenty or thirty generations has made habitable, healthy, and beautiful.

而且，房屋的实际价值取决于房主可从房屋获利多少，这赤裸裸

地暴露了住房私有所隐藏的罪恶。其实，房主之所以可以从房屋获利，是因为房屋建在城市中，也就是说，它是建在成千上万的其他房屋中间。那里有铺好的道路、桥梁、码头、美观实用的公共建筑、良好的照明，能让住家享受农村所没有的舒适和便利的生活；它是建在一座与其他城市经常交往的城市，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汇集了工业、商业、科学、艺术的中心；它是建在一座经二三十代人努力才变得宜居、健康和美丽的城市。

A house in certain parts of Paris is valued at many thousands of pounds sterling, not because thousands of pounds' worth of labour have been expended on that particular house, but because it is in Paris; because for centuries workmen, artists, thinkers, and men of learning and letters have contributed to make Paris what it is to-day—a centre of industry, commerce, politics, art, and science; because Paris has a past; because, thanks to literature, the names of its streets are household words in foreign countries as well as at home; because it is the fruit of eighteen centuries of toil, the work of fifty generations of the whole French nation.

巴黎一些区域的房屋，估价数千英镑，这倒不是因为建造房屋耗费了数千英镑，而是因为房屋建在巴黎；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工人、艺术家、思想家和学者文人贡献己力，让巴黎有了今天的模样——一个汇集了工业、商业、政治、艺术、科学的中心；因为巴黎有历史积淀；因为借助文学的传播，巴黎的街道名称在国内外家喻户晓；因为巴黎是十八个世纪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整个法兰西民族五十代人的共同杰作。

Who, then, can appropriate to himself the tiniest plot of ground, or the meanest building in such a city, without committing

a flagrant injustice? Who, then, has the right to sell to any bidder the smallest portion of the common heritage?

所以，有谁能把这样一座城市的一小块土地或一处破屋占为己有，而不公然践踏正义呢？所以，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共有遗产，又有谁有权向哪个买家出售呢？

On that point, as we have said, the workers begin to be agreed. The idea of free dwellings showed its existence very plainly during the siege of Paris, when the cry was for an abatement pure and simple of the terms demanded by the landlords. It appeared again during the Commune of 1871, when the Paris workmen expected the Council of the Commune to decide boldly on the abolition of rent. And when the New Revolution comes, it will be the first question with which the poor will concern themselves.

恰如前言，工人看待住房的观点开始趋于一致。巴黎遭围困时，人民就呼吁取消房东提出的所有条件，那时住房免费的思想就已清晰可见。1871年巴黎公社执掌政权时，巴黎工人期望公社委员会作出大胆决定，取消房租，这一思想又再次显现。新革命爆发后，住房免费将成为穷人关心的首要问题。

Whether in time of revolution or in time of peace, the worker must be housed somehow or other; he must have some sort of roof over his head. But, however tumble-down and squalid his dwelling may be, there is always a landlord who can evict him. True, during the Revolution the landlord cannot find bailiffs and police-sergeants to throw the workman's rags and chattels into the street, but who

knows what the new Government will do to-morrow? Who can say that it will not call coercion to its aid again, and set the police pack upon the tenant to hound him out of his hovels? Have we not seen the commune of Paris proclaim the remission of rents due up to the first of April only! After that, rent had to be paid, though Paris was in a state of chaos, and industry at a standstill; so that the "federate" who had taken arms to defend the independence of Paris had absolutely nothing to depend upon—he and his family—but an allowance of fifteen pence a day!

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工人都要有住的地方，头顶总要有片瓦遮护。不过，无论工人的住房怎样破败肮脏，总有房东可以将其逐出门外。诚然，在革命期间，房东即便要把工人的破旧衣物等个人物品扔到大街上，也找不到来做这件事的法警和警察，但有谁知道新政府今后将怎么做呢？谁敢说，新政府不会再次借助强制手段，动用警察，将租户撵出简陋的小屋呢？难道我们未曾听过巴黎公社宣布，只取消4月1日前到期的房租吗？尽管巴黎局势混乱、工业停滞，但4月1日后到期的房租，仍要照付不误；结果，为捍卫巴黎独立而拿起武器的"同盟军"，除了每日15便士的补贴外，全家竟然无所依靠！

Now the worker must be made to see clearly that in refusing to pay rent to a landlord or owner he is not simply profiting by the disorganization of authority. He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 abolition of rent is a recognized principle, sanctioned, so to speak, by popular assent; that to be housed rent-free is a right proclaimed aloud by the people.

现在，必须让工人看清楚，之所以要拒付房东或房主租金，并非全因政权瓦解。工人必须明白，取消房租是公认的原则，可以说，得

到了普遍认同；住房免租是人民强烈主张的权利。

Are we going to wait till this measure, which is in harmony with every honest man's sense of justice, is taken up by the few socialists scattered among the middle class elements, of which the Provisionary Government will be composed? If it were so, the people should have to wait long—till the return of reaction, in fact!

但凡正直之士，出于正义感，都会赞同取消房租。既然临时政府将由中产阶级分子组成，而中产阶级内还有零星几位社会主义者，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等这几位社会主义者采取此项措施呢？如果这样，那人民可要久等了——实际上，要等到反动派卷土重来啊！

This is why, refusing uniforms and badges—those outward signs of authority and servitude—and remaining people among the people, the earnest revolutionists will work side by side with the masses, that the abolition of rent, the expropriation of houses, may become an accomplished fact. They will prepare the ground and encourage ideas to grow in this direction; and when the fruit of their labours is ripe, the people will proceed to expropriate the houses without giving heed to the theories which will certainly be thrust in their way—theories about paying compensation to landlords, and finding first the necessary funds.

这就是为什么热忱的革命志士排斥制服和徽章——权力与奴役的外在标志——并保持人民本色，与人民大众并肩努力，争取实现取消房租和房屋充公。革命者将做好准备工作，推动思想朝着这一方向发展；革命者的工作开花结果时，人民将接着充公房屋，不必理睬那些

来捣乱的各种理论——说要给房东补偿，说要先筹集必要资金。

On the day that the expropriation of houses takes place, on that day, the exploited workers will have realized that new times have come, that Labour will no longer have to bear the yoke of the rich and powerful, that Equality has been openly proclaimed, that this Revolution is a real fact, and not a theatrical make-believe, like so many others preceding it.

房屋充公开始之日，遭受剥削的工人就会意识到，新时代已经到来，劳动者再也不必受财富和权势的压榨，平等得以公开宣扬，这次革命是真正的革命，绝不同于之前的诸多次革命，那些不过是装模作样的戏剧表演罢了。

II

二

If the idea of expropriation be adopted by the people it will be carried into effect in spite of all the “insurmountable” obstacles with which we are menaced.

若要人民接受充公思想，必将克服横在我们面前的所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Of course, the good folk in new uniforms, seated in the official arm¬chairs of the H tel de Ville, will be sure to busy themselves in

heaping up obstacles. They will talk of giving compensation to the landlords, of preparing statistics, and drawing up long reports. Yes, they would be capable of drawing up reports long enough to outlast the hopes of the people, who, after waiting and starving in enforced idleness, and seeing nothing come of all these official researches, would lose heart and faith in the Revolution and abandon the field to the reactionaries. The new bureaucracy would end by making expropriation hateful in the eyes of all.

当然，身穿新制服、坐在巴黎市政厅扶手椅上的好心人，肯定会忙着设置层层障碍。他们会讨论给房东补偿，统计数据，拟订长篇报告。是的，他们能拟订冗长的报告，长得足以拖垮人民的希望，而人民迫于无奈，无事可做，只能饿着肚子等待，眼睁睁看着这些官方研究没有任何结果，接着就失掉革命的勇气和信心，最后向反动派低头。新建立的官僚机构弄得人人仇视充公，结果自己也走到了尽头。

Here, indeed, is a rock which might shipwreck our hopes. But if the people turn a deaf ear to the specious arguments used to dazzle them, and realize that new life needs new conditions, and if they undertake the task themselves, then expropriation can be effected without any great difficulty.

这里，确有一处暗礁，可能倾覆我们的希望之船。不过，如果人民不理会让人头晕目眩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如果人民认识到过新生活需要新条件，如果人民自己承担起任务，那么实现充公就不会遇到什么大困难了。

“But how? How can it be done?” you ask us. We shall try to

reply to this question, but with a reservation. We have no intention of tracing out the plans of expropriation in their smallest details. We know beforehand that all that any man, or group of men, could suggest to¬day would be far surpassed by the reality when it comes. Man will accomplish greater things, and accomplish them better and by simpler methods than those dictated to him beforehand. Thus we shall merely indicate the manner by which expropriation might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Government. We do not propose to go out of our way to answer those who declare that the thing is impossible. We confine ourselves to replying that we are not the upholders of any particular method of organization. We are only concerned to demonstrate that expropriation could be effected by popular initiative, and could not be effected by any other means whatever.

“但是怎么做呢？怎么充公呢？”你们问。我们将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但会有所保留，我们不打算从头到尾详细阐述充公计划。我们早就知道，任何人或任何团体现在给的建议，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起不了多大作用。人民将成就伟业，而且方法简单、效果显著，胜过预先设定的方法。因此我们只讲一讲，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如何完成充公。至于有人宣称充公不可能实现，我们无意自找麻烦，跟他们分辨谁是谁非。我们的答复只有一个：我们不支持任何特定的组织方式。我们只想证明，人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充公就可以实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It seems very likely that, as soon as expropriation is fairly started, groups of volunteers will spring up in every district, street, and block of houses, and undertake to inquire into the number of flats and houses which are empty and of those which are overcrowded, the unwholesome slums, and the houses which are

too spacious for their occupants and might well be used to house those who are stifled in swarming tenements. In a few days these volunteers would have drawn up complete lists for the street and the district of all the flats, tenements, family mansions and villa residences, all the rooms and suites of rooms, healthy and unhealthy, small and large, foetid dens and homes of luxury.

情况很可能会是这样：一旦开始大规模充公，数支志愿队将迅速进入各行政区、街道、住宅区，着手调查房屋数量，看有多少房屋闲置、无人居住，有多少房屋住的人太多、拥挤不堪，有多少房屋脏乱残破、损害健康，有多少房屋住的人太少、空间浪费，可以让挤在出租屋里的人住进去。几天后，志愿者就能拟好完整清单，列出各行政区、街道、住宅区的所有公寓、出租屋、公馆、别墅以及所有房间、套房。不管是卫生的还是不卫生的，是大的还是小的，也不管是臭气熏天的窝棚还是奢侈豪华的宅院，都将一一列入。

Freely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these volunteers would soon have their statistics complete. False statistics can be manufactured in board rooms and offices, but true and exact statistics must begin with the individual and mount up from the simple to the complex.

志愿者相互间自由交流，不久就可以得出完整数据。虚假数据可以在会议室和办公室捏造出来，而真实准确的数据须从一个个数据入手，而且要由简入繁。

Then, without waiting for anyone's leave, those citizens will probably go and find their comrades who were living in miserable

garrets and hovels and will say to them simply: “It is a real Revolution this time, comrades, and no mistake about it. Come to such a place this evening; all the neighbourhood will be there; we are going to redistribute the dwelling- houses. If you are tired of your slum-garret, come and choose one of the flats of five rooms that are to be disposed of, and when you have once moved in you shall stay, never fear. The people are up in arms, and he who would venture to evict you will have to answer to them.”

而后，不等什么人许可，志愿者可能就去找住在狭小阁楼和简陋房屋中的同志，直接告诉他们：“同志们，这次是真正的革命，绝对没错。今晚来这里，所有邻居都会到，我们要重新分配住房。如果厌倦了狭小污秽的阁楼，那就来选一间待处理的五居室公寓吧。搬进去，住下来，不用害怕。人民已经武装起来了，谁敢驱逐你，就要向人民作出交代。”

“But every one will want a fine house or a spacious flat!” we are told.—No, you are quite mistaken. It is not the people's way to clamour for the moon. On the contrary, every time we have seen them set about repairing a wrong we have been struck by the good sense and instinct for justice which animates the masses. Have we ever known them demand the impossible? Have we ever seen the people of Paris fighting among themselves while waiting for their rations of bread or firewood during the two sieges or during the terrible years of 1792-1794? The patience and resignation which prevailed among them in 1871 was constantly presented for admiration by the foreign Press correspondents; and yet these patient waiters knew full well that the last comers would have to pass the day without food or fire.

“但是每个人都想要好房子或大公寓”有人跟我们说。不，完全错了。人民从不痴心妄想。相反，我们每次看到人民纠正错误，无不感慨于他们出色的判断力和与生俱来的正义感。我们几时听说他们提过不切实际的要求？在巴黎两次被围期间，在1792至1794年的艰苦岁月，巴黎人民等着定量配给的面包和柴火，我们那时可见过他们相互争抢？巴黎人民1871年表现出的宽容和坚忍，让国外记者由衷敬佩，因此经常见诸报端。不过，耐心等待的巴黎人十分清楚，后来的人分不到粮食或柴火，只能勉强度过当日。

We do not deny that there are plenty of egotistic instincts in isolated individuals. We are quite aware of it. But we contend that the very way to revive and nourish these instincts would be to confine such questions as the housing of the people to any board or committee, in fact, to the tender mercies of officialism in any shape or form. Then indeed all the evil passions spring up, and it becomes a case of who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person on the board. The least inequality causes wranglings and recriminations. If the smallest advantage is given to any one, a tremendous hue and cry is raised—and not without reason.

我们并不否认，人类生性自私。我们非常清楚这一点。不过我们认为，像人民住房这样的问题，若全凭哪个委员会解决，就是说指靠这样那样的官僚做派，恰恰会唤起和助长人的利己心。而后，各种罪恶的念头骤然而起，本是要解决住房问题，却成了看谁在委员会最有影响。一点点不平等就会引发争执和攻讦。如果谁得到了一点点好处，就会有人强烈抗议，而这也并非没有道理。

But if the people themselves, organized by streets, districts, and parishes, undertake to move the inhabitants of the slums into the

half¬empty dwellings of the middle classes, the trifling inconveniences, the little inequalities will be easily tided over. Rarely has appeal been made to the good instincts of the masses—only as a last resort, to save the sinking ship in times of revolution—but never has such an appeal been made in vain; the heroism, the self-devotion of the toiler has never failed to respond to it. And thus it will be in the coming Revolution.

不过，要是人民自己按照街道、行政区和教区组织起来，着手将贫民窟的居民迁入中产阶级空旷的房子里，那么些许不便和不平等便很容易克服容忍了。我们很少恳求生性善良的人民大众——只有迫不得已，为了挽救革命危亡才会这么做——但只要恳求，就无有不应，劳苦大众总是以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予以回应。即将到来的革命便是如此。

But,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some inequalities, some inevitable injustices, undoubtedly will remain. There are individuals in our societies whom no great crisis can lift out of the deep mire of egoism in which they are sunk. The question, however, is not whether there will be injustices or no, but rather how to limit the number of them.

可是，就算一切都说了、一切都做了，不公平的现象无疑仍会存在，不公正的事情肯定依旧难以避免。我们社会中有一些人，无论遇到多严重的危机，都无法从自私的深潭中爬出来。不过，问题不在于不公之事是否存在，而在于如何减少。

Now all history, all the experience of the human race, and all

social psychology, unite in showing that the best and fairest way is to trust the decision to those whom it concerns most nearly. It is they alone who can consider and allow for the hundred and one details which must necessarily be overlooked in any merely official redistribution.

现在，全部历史、人类的全部经验、全部的社会心理都表明，最好、最合理的做法是，事情与谁的利益最相关，就由谁做决定。许许多多的细节，只有他们能顾及，若全由官员重新分配，这些细节一定会被忽略。

III

三

Moreover, it is by no means necessary to make straightway an absolutely equal redistribution of all the dwellings. There will no doubt be some inconveniences at first, but matters will soon be righted in a society which has adopted expropriation.

再者，没有必要立即将所有住房绝对公平地重新分配。起初肯定有些不便，但在实施充公的社会里，情况很快就会好起来。

When the masons, and carpenters, and all who are concerned in house building, know that their daily bread is secured to them, they will ask nothing better than to work at their old trades a few hours a day. They will adapt the fine houses, which absorbed the time of a whole staff of servants, for giving shelter to several

families, and in a few months homes will have sprung up, infinitely healthier and more conveniently arranged than those of to-day. And to those who are not yet comfortably housed the anarchist Commune will be able to say: “Patience, comrades! Palaces fairer and finer than any the capitalists built for themselves will spring from the ground of our enfranchised city. They will belong to those who have most need of them. The anarchist Commune does not build with an eye to revenues. These monuments erected to its citizens, products of the collective spirit, will serve as models to all humanity; they will be yours.”

如果泥瓦匠、木匠和其他建筑工人知道，每天都能吃到面包，那么他们最大的要求不过是每天干几个小时的老本行。他们将改造那些曾有一大群仆人打扫的上好宅院以供多个家庭遮风避雨。几个月后，新房子将拔地而起，既卫生又实用，远非现在的房子所能比。而对于没有舒适住房的人，无政府主义公社可以说：“同志们，耐心些！我们将在我们这座自由的城市建起一幢幢房屋，比资本家为自己建造的豪宅更漂亮、更坚固。谁最需要，就给谁。无政府主义公社建房不是为了赚钱。这些房子是为市民建造的，有纪念意义，是集体精神的结晶，将成为全人类的典范。这些房子就是你们的。”

If the people of the Revolution expropriate the houses and proclaim free lodgings—the communalizing of houses and the right of each family to a decent dwelling—then the Revolution will have assumed a communistic character from the first, and started on a course from which it will be by no means easy to turn it. It will have struck a fatal blow at individual property.

如果革命群众将房屋充公，宣布取消房租——将房屋收归公有，

每家每户都有权住上好房子——那么革命一开始就有共产主义特征，断难回头。住房充公将对个人财产挥出致命一击。

For the expropriation of dwellings contains in germ the whole social revolution. On the manner of its accomplishment depends the character of all that follows. Either we shall start on a good road leading straight to anarchist communism, or we shall remain sticking in the mud of despotic individualism.

因为，住房充公是整个社会革命的起点。充公如何完成，决定充公之后事态如何发展。我们或者驶上一条直通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阳光大道，或者仍困于利己主义专制的泥坑。

It is easy to see the numerous objections—theoretic on the one hand, practical on the other—with which we are sure to be met. As it will be a question of maintaining iniquity at any price, our opponents will of course protest “in the name of justice.” “Is it not a crying shame,” they will exclaim, “that the people of Paris should take possession of all these fine houses, while the peasants in the country have only tumble-down huts to live in?” But do not let us make a mistake. These enthusiasts for justice forget, by a lapse of memory to which they are subject, the “crying shame” which they themselves are tacitly defending. They forget that in this same city the worker, with his wife and children, suffocates in a noisome garret, while from his window he sees the rich man's palace. They forget that whole generations perish in crowded slums, starving for air and sunlight, and that to redress this injustice ought to be the first task of the Revolution.

这很容易遭到众人反驳——一些人谈理论，另一些人摆事实——肯定有人反驳我们。反对者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维持不公平的现状，所以当然会冒用“正义之名”抗议。“这难道不是十分可耻的事吗？”他们会惊叫，“巴黎人民把所有好房子占为己有，而农民只能住在农村残破的窝棚里。”不过，我们不要弄错了，这些热心的正义之士很健忘，他们忘了自己正暗地里为“十分可耻的事”辩护；他们忘了，就在同一座城市中，工人及妻儿挤在狭小污秽的阁楼，而工人透过窗户就能看到富人的豪宅；他们忘了，整整几代人都死在拥挤的贫民窟，生前都无法畅快享受空气和阳光。消灭此种不公，应为革命的首要任务。

Do not let these disingenuous protests hold us back. We know that any inequality which may exist between town and countr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volution will be transitory and of a nature that will right itself from day to day; for the village will not fail to improve its dwellings as soon as the peasant has ceased to be the beast of burden of the farmer, the merchant, the money-lender, and the State. In order to avoid an accidental and transitory inequality, shall we stay our hand from righting an ancient wrong?

不要让这些虚伪的反对派阻止我们前进。我们知道，在革命初期，城市与农村之间可能存在不平等，但都是暂时的，论其性质，是可以逐步消除的；因为，农民不再是为农场主、商人、放债人和政府所驱使的牛马时，农村的居住条件一定会得到改善。为了避开偶然的、一时的不平等，我们就不去改正长久以来的错误吗？

The so-called practical objections are not very formidable either. We are bidden to consider the hard case of some poor fellow who by dint of privation has contrived to buy a house just large

enough to hold his family. And we are going to deprive him of his hard-earned happiness, to turn him into the street! Certainly not. If his house is only just large enough for his family, by all means let him stay there. Let him work in his little garden, too; our “boys” will not hinder him—nay, they will lend him a helping hand if need be. But suppose he lets lodgings, suppose he has empty rooms in his house; then the people will make the lodger understand that he need not pay his former landlord any more rent. Stay where you are, but rent free. No more duns and collectors; Socialism has abolished all that!

还有一些人用所谓的事实来反驳我们，其实也不太可怕。有人给我们出了道难题，让我们考虑。说一个穷人靠着节衣缩食，买了一间房，刚好够全家住。而我们要剥夺他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把他撵到大街上！当然不是。如果他的房子刚好够全家住，当然让他继续住。他也可以在小花园里干点什么；我们不会妨碍他——不仅如此，如果他有需求，我们还会帮助他。不过，假如他出租房屋，假设他有空房间，那么人民告诉租户，不用向以前的房东再交纳房租了。他们可以住在原处，不过房租免了。不会再有人催债收钱，社会主义废除了这一切！

Or again, suppose that the landlord has a score of rooms all to himself, and some poor woman lives near by with five children in one room. In that case the people would see whether, with some alterations, these empty rooms could not be converted into a suitable home for the poor woman and her five children. Would not that be more just and fair than to leave the mother and her five little ones languishing in a garret, while Sir Gorgeous Midas sat at his ease in an empty mansion? Besides, good Sir Gorgeous would probably hasten to do it of his own accord; his wife will be

delighted to be freed from half her big, unwieldy house when there is no longer a staff of servants to keep it in order.

再或者，假设房东一人住着二十来个房间，而就在附近，有个一贫如洗的女人和五个孩子挤在一个房间。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要看看，是否可以将空房间改造成一间适合他们居住的房子。难道这么做不叫公平公正吗？难道母亲和五个孩子困居在阁楼上，而富人悠闲地坐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才叫公平公正吗？此外，善良的富人可能自己就会急着这么做；房子又大又不实用，没有了一班仆人打扫整理房间，他的夫人会高高兴兴地腾出一半。

“So you are going to turn everything upside down,” say the defenders of law and order. “There will be no end to the evictions and removals. Would it not be better to start fresh by turning everybody out of doors and redistributing the houses by lot?” Thus our critics; but we are firmly persuaded that if no Government interferes in the matter, if all the changes are entrusted to these free groups which have sprung up to undertake the work, the evictions and removals will be less numerous than those which take place in one year under the present system, owing to the rapacity of landlords.

“这么说，你们要颠覆一切。”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说。“各种驱逐和迁移将会永无止境。要是重新开始，将所有人赶出家门，然后以抽签的方式重新分配住宅，岂不是更好？”反对我们的人这样说道。但我们坚信，如果政府不干涉，如果所有住房变更全部交给为此而出现的自由团体，那么驱逐和迁移要少得多；在当前制度下，由于房东贪婪无度，驱逐和迁移反而更多。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are in all large towns almost enough empty houses and flats to lodge all the inhabitants of the slums. As to the palaces and suites of fine apartments, many working people would not live in them if they could. One could not “keep up” such houses without a large staff of servants. Their occupants would soon find themselves forced to seek less luxurious dwellings. The fine ladies would find that palaces were not well adapted to self-help in the kitchen. Gradually people would shake down. There would be no need to conduct Dives to a garret at the bayonet's point, or install Lazarus in Dives!s palace by the help of an armed escort. People would shake down amicably into the available dwellings with the least possible friction and disturbance. Have we not the example of the village communes redistributing fields and disturbing the owners of the allotments so little that one can only praise the intelligence and good sense of the methods they employ? Fewer fields change hands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Russian Commune than where personal property holds sway, and is for ever carrying its quarrels into courts of law. And are we to believe that the inhabitants of a great European city would be less intelligent and less capable of organization than Russian or Hindoo peasants?

首先，各大城市的闲置房屋几乎足以容纳贫民窟的全部居民。至于豪宅和上等公寓的套房，许多工人即便可以，也不会去住。偌大的房子，需要一大群仆人打扫整理。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过不了多久，自己就不得不找简朴些的房子住了。贵妇会发现，豪宅不太适合亲自下厨做饭的人。慢慢地，人民会适应。没有必要端着刺刀威胁富人住进阁楼里，也没有必要派遣荷枪实弹的护卫队，将穷人安顿到富人的豪宅。人民会友善地搬进可供居住的房子，尽量避免冲突和混乱。难道我们没见过下面的例子吗？农村公社重新分配土地，对土地所有者的影响微乎其微，人们不由得佩服农村公社用的方法高明巧妙。在俄国公社的管理下，土地很少易主；如果土地仍多属私有财产，一有争

吵就诉诸法院解决，那么土地就会频频易主。难道在我们看来，欧洲大城市居民的智慧和组织能力还不及俄国或印度农民吗？

Moreover, we must not blink at the fact that every revolution means a certain disturbance to everyday life, and those who expect this tremendous climb out of the old grooves to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so much as jarring the dishes on their dinner tables will find themselves mistaken. It is true that Governments can change without disturbing worthy citizens at dinner, but the crimes of society towards those who have nourished and supported it are not to be redressed by any such political sleight of parties.

而且每次革命，日常生活一定会出现点混乱，我们切不可大惊小怪。如果指望既要彻底打破旧社会，又不影响到自己的一日三餐，那可就错了。诚然，政府更迭可以不打搅尊贵的市民用餐，但是城市对养育、支持城市的人所犯的罪行，绝非政党的任何政治把戏所能补偿。

Undoubtedly there will be a disturbance, but it must not be one of pure loss; it must be minimized. And again—it is impossible to lay too much stress on this maxim—it will be by addressing ourselves to the interested parties, and not to boards and committees, that we shall best succeed in reducing the sum of inconveniences for everybody.

肯定会出现混乱，但并不纯粹是损失；混乱必须尽降到最低。再者——不可能放任混乱局势发展——我们要找到利益相关团体而非委员会，这样才能成功减少给每个人造成的麻烦。

The people commit blunder on blunder when they have to choose by ballot some hare-brained candidate who solicits the honour of representing them, and takes upon himself to know all, to do all, and to organize all. But when they take upon themselves to organize what they know, what touches them directly, they do it better than all the “talking-shops” put together. Is not the Paris Commune an instance in point? and the great dockers' strike? and have we not constant evidence of this fact in every village commune?

人民如果非要投票选举候选人，那就错上加错了。请求获得代表人民的殊荣的愚蠢的候选人，认为自己什么都要知道，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组织。不过，要是人民动手，组织起来做自己了解的事，做与自己直接相关的事，那么就算所有“空谈俱乐部”一同努力，也不如人民做得好。巴黎公社不就是一个例子吗？码头工人大罢工不也是吗？我们在每个农村公社不也总能见到实证吗？

CHAPTER VII CLOTHING

第七章　衣服

When the houses have become the common heritage of the citizens, and when each man has his daily supply of food, another forward step will have to be taken. The question of clothing will of course demand consideration next, and again the only possible solution will be to take possession,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of all the shops and warehouses where clothing is sold or stored, and to throw open the doors to all, so that each can take what he needs. The communalization of clothing—the right of each to take what he needs from the communal stores, or to have it made for him at the tailors and outfitters—is a necessary corollary of the communalization of houses and food.

当房屋已经成为市民普遍的财产、每人每天都有食物供应时，就必须再前进一步了。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自然就是衣服了。同样，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以人民的名义，占领所有卖衣服的商店和存放衣服的仓库，把商店、仓库的大门向所有人开放，这样每个人就可以各取所需。衣服公有化，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利从公有的商店里各取所需，或者在裁缝店、服装店为自己量身定做服装。这是房屋及食物公有化的必然结果。

Obviously we shall not need for that to despoil all citizens of their coats, to put all the garments in a heap and draw lots for them, as our critics, with equal wit and ingenuity, suggest. Let him who has a coat keep it still—nay, if he have ten coats it is highly

improbable that any one will want to deprive him of them, for most folk would prefer a new coat to one that has already graced the shoulders of some fat bourgeois; and there will be enough new garments, and to spare, without having recourse to second-hand wardrobes.

显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并没有必要把所有市民的大衣都脱下来堆在一起，再让人们抽签分衣服。这是我们那些同样睿智又机灵的批评者提出的建议。让那有大衣的人继续保留着他的大衣吧——不仅如此，即使他有十件大衣，也不会有人想去要他的衣服，因为大多数人都更喜欢新外套，而不是某个胖乎乎的资本家已经穿过的旧外套。到那时，新衣服就已经足够了，甚至还有富余，不需要再穿旧衣服了。

If we were to take an inventory of all the clothes and stuff for clothing accumulated in the shops and stores of the large towns, we should find probably that in Paris, Lyons, Bordeaux, and Marseilles, there was enough to enable the commune to offer garments to all the citizens, of both sexes; and if all were not suited at once, the communal outfitters would soon make good these shortcomings. We know how rapidly our great tailoring and dressmaking establishments work nowadays, provided as they are with machinery specially adapted for production on a large scale.

假如我们把大城市店铺和仓库里存放的布料及填充物列个清单的话，很可能会发现巴黎、里昂、波尔多和马赛四个城市的库存足够给公社每个成员提供衣服，不论男女。如果有人没有一下子拿到合适的衣服，公有的服装店很快就会弥补这些不足之处。我们知道，如果现在的大裁缝店和大制衣店有了适合大规模生产的机器，那么工作速度

就会变得非常快。

“But every one will want a sable-lined coat or a velvet gown!” exclaim our adversaries.

“但是每个人都会想要一件貂皮衬里的大衣或天鹅绒礼服”我们的反对者这样说。

Frankly, we do not believe it. Every woman does not dote on velvet nor does every man dream of sable linings. Even now, if we were to ask each woman to choose her gown, we should find some to prefer a simple, practical garment to all the fantastic trimmings the fashionable world affects.

坦白说，我们不相信这样的话。女人不见得都爱天鹅绒，男人也不见得都想要貂皮衬里。即使是现在，如果我们让所有女人选择衣服的话，会发现有的女人喜欢简单、实用的衣服，胜过时尚世界里流行的华美服装。

Tastes change with the times, and the fashion in vogue at the time of the Revolution will certainly make for simplicity. Societies, like individuals, have their hours of cowardice, but also their heroic moments; and though the society of to-day cuts a very poor figure sunk in the pursuit of narrow personal interests and second-rate ideas, it wears a different air when great crises come. It has its moments of greatness and enthusiasm. Men of generous nature will gain the power which to-day is in the hand of jobbers. Self-devotion

will spring up, and noble deeds beget their like; even the egotists will be ashamed of hanging back, and will be drawn in spite of themselves to admire, if not to imitate, the generous and brave.

对服装的品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革命时期流行的时尚一定是趋于简单朴素的。社会和个人一样，既有懦弱的时候，也有英勇的时候。虽然今天的社会沉沦于追求个人利益和二流的思想，形象不佳，但当大危机到来时，社会便会呈现不同的风气。社会也有它伟大和热忱的时刻。现在营私舞弊者手中的权力将会转移到生性慷慨大度的人手里。自我牺牲的精神会涌现，高尚的行为会引人效仿；即使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也会耻于徘徊不前，即使不去模仿那些大度勇敢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去钦佩他们。

The great Revolution of 1793 abounds in examples of this kind, and it is always during such times of spiritual revival—as natural to societies as to individuals—that the spring-tide of enthusiasm sweeps humanity onwards.

1793年大革命期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而且总是在精神复兴的时候——对社会来说如此，对个人亦然——热忱的大潮会驱使人类前进。

We do not wish to exaggerate the part played by such noble passions, nor is it upon them that we would found our ideal of society. But we are not asking too much if we expect their aid in tiding over the first and most difficult moments. We cannot hope that our daily life will be continuously inspired by such exalted enthusiasms, but we may expect their aid at the first, and that is all

we need.

我们并不想夸大高尚情感所发挥的作用，也不会把它作为建设理想社会的根基。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这种情感能帮助我们度过最初和最困难的时刻，也并不算是过高的奢求。我们并不指望日常生活一直为这种高尚的热情所激励，但是希望在革命初期得到它的帮助。这是我们唯一的要求。

It is just to wash the earth clean, to sweep away the shards and refuse, accumulated by centuries of slavery and oppression, that the new anarchist society will have need of this wave of brotherly love. Later on it can exist without appealing to the spirit of self-sacrifice, because it will have eliminated oppression, and thus created a new world instinct with all the feelings of solidarity.

要想把这世界冲洗干净，把数百年的奴役和压迫所积累的污物渣滓清除，无政府主义的新社会需要这兄弟般友谊的浪潮。之后，没有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新社会也能够存在了，因为它消除了压迫，这样就创造了充满团结的新世界。

Besides, should the character of the Revolution be such as we have sketched here, the free initiative of individuals would find an extensive field of action in thwarting the efforts of the egotists. Groups would spring up in every street and quarter to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 clothing. They would make inventories of all that the city possessed, and would find out approximately what were the resources at their disposal. It is more than likely that in the matter of clothing the citizens would adopt the same principle as in the

matter of provisions—that is to say, they would offer freely from the common store everything which was to be found in abundance, and dole out whatever was limited in quantity.

此外，如果大革命的性质果真如我们这里所描述的那样，那么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挫败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图谋方面将会有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每一条街、每一个街区都会涌现团体，负责供给衣服。他们将会、列出城资产的清单，弄清可供他们支配的财富到底有多少。在衣服分配方面，市民们很有可能采取在食品供给方面相同的原则——那就是，数量充裕的物品，将在公有商店里无限量供应；数量有限的物品，将少量发放。

Not being able to offer to each man a sable-lined coat and to every woman a velvet gown, society would probably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superfluous and the necessary, and, provisionally at least class sable and velvet among the superfluities of life, ready to let time prove whether what is a luxury to-day may not become common to all to-morrow. While the necessary clothing would be guaranteed to each inhabitant of the anarchist city, it would be left to private activity to provide for the sick and feeble those things, provisionally considered as luxuries, and to procure for the less robust such special articles, as would not enter into the daily consumption of ordinary citizens.

由于不能给每个男人都发一件貂皮衬里的大衣，或给每个女人发一件天鹅绒礼服，所以社会将会对奢侈品和必需品进行区分，并且至少会暂时把貂皮衬里大衣和天鹅绒礼服列入奢侈品。至于今天的奢侈品到底能不能成为明天人人都有的东西，就要靠时间来证明了。无政府主义城市里的每个居民都确定能得到必需的衣服，至于给病弱之人

提供的我们暂时视为奢侈品的东西，或者给不够强壮的人提供普通市民日常消费之外的物品，则要靠个人的行为来实现。

“But,” it may be urged, “this means grey uniformity and the end of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life and art.”

有人可能会说：“但是，这意味着人人都穿灰色，生活和艺术中的美丽事物将不复存在。”

“Certainly not,” we reply. And, still basing our reasonings on what already exists, we are going to show how an Anarchist society could satisfy the most artistic tastes of its citizens without allowing them to amass the fortunes of millionaires.

我们的回答是：“当然不是这样。”我们的论证是以现存的事物为依据的，而且我们将会让大家看到，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不用让公民去积累百万富翁才有的财富，就能够满足他们最高的艺术品位和追求。

CHAPTER VIII WAYS AND MEANS

第八章　生产方式和手段

I

一

If a society, a city or a territory were to guarantee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to its inhabitants (and we shall see how the conception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can be so extended as to include luxuries), it would be compell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what is absolutely needed for production; that is to say—land, machinery, factories, means of transport, etc. Capital in the hands of private owners would be expropriated, to be returned to the community.

一个社会、城市或地区要想保证所有的居民都能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我们要看到生活必需品的概念会扩大到包括奢侈品），必须拥有生产所必需的东西——土地、机器、工厂、交通工具等。私人手里的资本也将充公，归还给社会。

The great harm done by bourgeois society, as we have already mentioned, is not only that capitalists seize a large share of the profits of each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 thus enabling themselves to live without working, but that all production has taken a wrong direction, as it is not carried on with a view to securing well-being to all. There is the reason why it must be condemned.

正如我们所言，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危害不仅仅是资本家占有了工业、商业企业大部分的利润，不用劳动就能过好日子；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有的生产都是沿着错误的方向进行的，进行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确保所有人的安乐。这正是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谴责的原因。

It is absolutely impossible that mercantile production should be carried on in the interest of all. To desire it would be to expect the capitalist to go beyond his province and to fulfil duties that he cannot fulfil without ceasing to be what he is—a private manufacturer seeking his own enrichment. Capitalist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onal interest of each individual employer of labour, has given to society all that could be expected of it: it has increased the productive force of Labour. The capitalist, profiting by the revolution effected in industry by steam, by the sudden development of chemistry and machinery, and by other inventions of our century, has worked in his own interest to increase the yield of human labour, and in a great measure he has succeeded so far. But to attribute other duties to him would be unreasonable. For example, to expect that he should use this superior yield of labour in the interest of society as a whole, would be to ask philanthropy and charity of him, and a capitalist enterprise cannot be based on charity.

想让现在的商业生产为大众的利益服务，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的愿望无异于让资本家做超出自己职责和能力范围之内的事，他不可能做这些事的，除非他不再是资本家——一个追求个人财富的私人制造业者。以雇主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组织，已经给了社会它所能给的一切：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蒸汽带来的工业革命、化学和机械

的迅猛发展以及我们这个世纪其他发明给资本家带来了利润。为了自己的利益，资本家努力提高人类劳动的产出；到目前为止，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然而，要他们再去承担其他责任却是不合理的。比如说，指望着他们能用这劳动力的高产出为整个社会谋福利，就相当于要他们去做慈善，而资本主义企业不可能建立于慈善之上。

It now remains for society, first, to extend this greater productivity, which is limited to certain industries, and to apply it to the general good. But it is evident that to utilize this high productivity of labour, so as to guarantee well-being to all, Society must itself take possession of all means of production.

首先还要靠社会去提高目前某些有限产业更高的生产力，并用它为所有人谋福利。但是很明显，要想利用高生产力去保障大众的福利，社会本身必须占有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

Economists, as is their wont, will not fail to remind us of the comparative well-being of a certain category of young robust workmen, skilled in certain special branches of industry which has been obtained under the present system. It is always this minority that is pointed out to us with pride. But even this well-being, which is the exclusive right of a few, is it secure? To-morrow, maybe, negligence, improvidence, or the greed of their employers, will deprive these privileged men of their work, and they will pay for the period of comfort they have enjoyed with months and years of poverty or destitution. How many important industries—the textiles, iron, sugar, etc.—without mentioning all sorts of short-lived trades, have we not seen decline or come to a standstill on

account of speculations, or in consequence of natural displacement of work, or from the effects of competition amongst the capitalists themselves! If the chief textile and mechanical industries had to pass through such a crisis as they have passed through in 1886, we hardly need mention the small trades, all of which have their periods of standstill.

经济学家总是习惯性地提醒我们，一些具备某些特殊行业技能的少壮劳动者，在现有体制下过上了相对安逸的生活。经济学家总是自豪地跟我们提起这少数的人。但是，即便是这种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特权——安逸，就是安全的吗？或许明天，由于雇主的疏忽、短视或贪婪，这些享有特权的人就会失去工作。为这短暂的安逸，他们将以数月乃至数年的贫困为代价。有多少重要的行业——纺织业、钢铁业、制糖业等，更不用说那各种各样短命的小行业，由于投机、行业自然的更迭或者资本家自己内部竞争，而衰退或者停滞不前。如果连纺织业和机械工业都要经历1886年那样的危机的话，那些小行业就更不用提了，都会经历停滞期。

What, too, shall we say to the price which is paid for the relative well-being of certain categories of workmen? Unfortunately, it is paid for by the ruin of agriculture, the shameless exploitation of the peasants, the misery of the mass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feeble minority of workers who enjoy a certain comfort, how many millions of human beings live from hand to mouth, without a secure wage, ready to go wherever they are wanted; how many peasants work fourteen hours a day for a poor pittance! Capital depopulates the country, exploits the colonies and the countries where industries are but little developed, dooms the immense majority of workmen to remain without technical education, to remain mediocre even in their own trade.

那么，对于为了某些行业工人相对的安逸而付出的巨大代价，我们又该怎么看呢？不幸的是，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对农业的破坏、对农民无耻的剥削以及民众的苦难。相比那些享受一定安逸的少数工人，又有多少人过着仅仅可以糊口的日子，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哪里需要就随时准备过去；又有多少农民为了微薄的收入一天工作14个小时！资本家使农村人口减少，开发殖民地、剥削工业欠发达的国家，他们使绝大多数工人因无法接受技术教育而在自己的行业中碌碌无为。

This is not merely accidental, it is a necessity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In order well to remunerate certain classes of workmen, peasants must become the beasts of burden of society; the country must be deserted for the town; small trades must agglomerate in the foul suburbs of large cities, and manufacture a thousand little things for next to nothing, so as to bring the goods of the greater industries within reach of buyers with small salaries. That bad cloth may be sold to ill-paid workers, garments are made by tailors who are satisfied with a starvation wage! Eastern lands in a backward state are exploited by the West, in order that, under the capitalist system, workers in a few privileged industries may obtain certain limited comforts of life.

这不是偶然，而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为了让某些阶层的劳动者获得丰厚的报酬，农民不得不在社会中当牛做马，背负重担；人们不得不离开乡村，奔往城市；小型贸易也不得不聚集在大城市肮脏的郊区，生产许多廉价的小商品，获取微薄的利润，就是为了让低收入的人们也能买得到大型工厂的产品。质量差的衣服可以卖给薪水低的工人，而这些衣服则是由那些满足于工资低得无法维持生活的裁缝做的。东方落后的国家被西方国家所剥削，目的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让少数特权行业的工人能享受到生活中有限的舒适。

The evil of the present system is therefore not that the “surplus-value” of production goes to the capitalist, as Rodbertus and Marx said, thus narrowing the Socialist conception and the general view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 surplus-value itself is but a consequence of deeper causes. The evil lies in the possibility of a surplus-value existing, instead of a simple surplus not consumed by each generation; for, that a surplus-value should exist, means that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re compelled by hunger to sell their labour for a small part of what this labour produces, and still more so, of what their labour is capable of producing: But this evil will last as long as th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belong to the few. As long as men are compelled to pay a heavy tribute to property holders for the right of cultivating land or putting machinery into action, and the owners of the land and the machine are free to produce what bids fair to bring them in the largest profits—rather than the greatest amount of useful commodities—well-being can only be temporarily guaranteed to a very few; it is only to be bought by the poverty of a large section of society.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distribute the profits realized by a trade in equal parts, if at the same time thousands of other workers are exploited. It is a case of PRODUCING THE GREATEST AMOUNT OF GOODS NECESSARY TO THE WELL-BEING OF ALL, WITH THE LEAST POSSIBLE WASTE OF HUMAN ENERGY.

因此，现有制度的弊端并不在于罗德贝图斯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得到了生产的剩余价值，这种说法其实是缩小了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对资本主义制度总的看法，剩余价值本身只不过是更深层次原因产生的结果。真正的弊端在于剩余价值有存在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每一

代人消费不完的剩余物品本身。因为，剩余价值应该存在，就意味着，男人、女人还有儿童在饥饿的驱使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而劳动所得仅仅是其劳动产物的一小部分，更是其劳动力产能的一小部分。但是，只要生产工具仍归少数人所有，这种弊端就会依然存在。如果人们为了获得耕种土地或者操作机器的权利就不得不向财产的所有者交纳重税，如果土地和机器的所有者们可以随意生产那些有望给他们带来最大利润的商品，而不是最大量地生产有用的日用品，那么，就只会有极少数人能得到暂时的安乐；这种安乐是以社会当中大部分人的贫穷为代价换来的。如果其他行业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受着剥削的话，那么即使把某个行业获取的利润在行业内部平均分配也是不够的。问题在于要尽可能少地浪费人类精力，来最大量地生产保证所有人安乐所必需的商品。

This generalized aim cannot be the aim of a private owner; and this is why society as a whole, if it takes this view of production as its ideal, will be compelled to expropriate all that enhances well-being while producing wealth. It will have to take possession of land, factories, mines, means of communication, etc. , and besides, it will have to study what products will promote general well-being, as well as the ways and means of an adequate production.

这一普遍的目标不可能成为私有业主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整个社会以这种对生产的看法为理想的话，就必须将一切可以生产财富、促进安乐的物品充公。社会必须拥有土地、工厂、矿山、交通工具等，还应该研究什么样的产品能促进全体成员的安乐，以及生产足够产品的方法和手段。

II

二

How many hours a day will man have to work to produce nourishing food, a comfortable home, and necessary clothing for his family? This question has often preoccupied Socialists, and they generally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four or five hours a day would suffice, on condition, be it well understood, that all men work. At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Benjamin Franklin fixed the limit at five hours; and if the need of comfort is greater now, the power of production has augmented too, and far more rapidly.

人们一天究竟需要工作多少小时才能生产出全家所需的营养丰富的食物、舒适的居所和必需的衣物？社会主义者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通常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所有人都工作的话，四五个小时就够了。上世纪末，本杰明·富兰克林定的劳动时间就是五小时；虽说现在对舒适安逸的要求更多了，但同时生产力也提高了，而且提高的速度更快。

In speaking of agriculture further on, we shall see what the earth can be made to yield to man when he cultivates it in a reasonable way, instead of throwing seed haphazard in a badly ploughed soil as he mostly does to-day. In the great farms of Western America, some of which cover 30 square miles, but have a poorer soil than the manured soil of civilized countries, only 10 to 15 English bushels per English acre are obtained; that is to say, half the yield of European farms or of American farms in the Eastern States. And nevertheless, thanks to machines which enable 2 men to plough 4 English acres a day, 100 men can produce in a year all that is necessary to deliver the bread of 10,000 people at their homes during a whole year.

再以农业为例，我们看到，如果人类能合理耕种土地，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大多是在粗劣耕种的土地上随意撒播种子的话，土地会给我们丰厚的回报。美国西部的大农场，虽然有些面积达30平方英里，但与文明国家施过肥的土地相比，土地相对贫瘠，每英亩的产量只有10到15蒲式耳，只有欧洲农场或美国东部各州农场产量的一半。然而，靠着机器的力量，两人一天就可以耕种四英亩的土地，100人一年生产的粮食就足够一万个人足不出户吃上一年。

Thus it would suffice for a man to work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for 30 hours, say 6 half-days of five hours each, to have bread for a whole year; and to work 30 half-days to guarantee the same to a family of 5 people.

因此，在相同条件下，一个人工作30个小时，也就是6个半天，每个半天5个小时，就可以获得一年所需的食物；工作30个半天就可以确保一家5人获得一年的口粮。

We shall also prove by results obtained nowadays, that if we took recourse to intensive agriculture, less than 6 half-days' work could procure bread, meat, vegetables, and even luxurious fruit for a whole family.

我们还可以用今天得到的结果证明，如果实行集约农业的话，工作不到6个半天就可以获得全家所需的面包、肉类、蔬菜还有奢侈的水果。

Again, if we study the cost of workmen's dwellings, built in large towns to-day, we can ascertain that to obtain, in a large English city, a semi-detached little house, as they are built for workmen for 250, from 1400 to 1800 half-days' work of 5 hours would be sufficient. And as a house of that kind lasts 50 years at least, it follows that 28 to 36 half-days' work a year would provide well-furnished, healthy quarters, with all necessary comfort for a family. Whereas when hiring the same apartment from an employer, a workman pays from 75 to 100 days' work per year.

如果我们再看看今天大城市工人住房的成本，就会清楚地看到，要得到一座位于英国大城市、花费250英镑为工人建造的半独立的小房子，只需1400到1800天、每天工作五小时就够了。这样的房子至少可以住50年，这就是说，一年工作28到36个半天，就可以为全家提供设施齐全、健康、卫生而又舒适的居所。然而，如果工人从雇主那里租住同样的房屋的话，每年需要为其劳动75到100天。

Mark that these figures represent the maximum of what a house costs in England to-day, being given the defective organization of our societies. In Belgium, workmen's houses in the cit s ouvri res have been built at a much smaller cost. So that, taking everything into consideration, we are justified in affirming that in a well-organized society 30 or 40 half-days' work a year will suffice to guarantee a perfectly comfortable home.

注意，由于现在我们的社会在组织方面有缺陷，因此，这些数字体现的是目前英国房屋成本的最高值。在比利时的工人区，工人房屋的建造成本要低得多。因此，将所有因素都考虑进去，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组织良好的社会中，每年工作30到40个半天就可以确保有个非

常舒适的家。

There now remains clothing, the exact value of which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fix, because the profits realized by a swarm of middlemen cannot be estimated. Let us take cloth, for example, and add up all the tribute levied on every yard of it by the landowners, the sheep owners, the wool merchants, and all their intermediate agents, then by the railway companies, mill-owners, weavers, dealers in ready-made clothes, sellers and commission agents, and we shall get then an idea of what we pay to a whole swarm of capitalists for each article of clothing. That is why it is perfectly impossible to say how many days' work an overcoat that you pay 3 or 4 for in a large London shop represents.

剩下的就是衣服了。衣服的准确价值几乎无法确定，因为大量中间人赚取的利润是无法估计的。我们就以毛料为例。许许多多的人都在从一码码毛料中赚取利润，如地主、养羊者、羊毛商人还有他们的代理人，此外还有铁路公司、纺织厂主、织布业主、成衣经销商、销售商还有佣金代理人。把这些费用都加起来，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为每一件衣服付给这群资本家的费用有多少。这也是为什么不可能说出一件在伦敦的大商店里卖三或四英镑的大衣到底需要多少天的劳动。

What is certain is that with present machinery it is possible to manufacture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goods both cheaply and quickly.

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了今天的机械，我们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制造出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商品。

A few examples will suffice. Thu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751 cotton mills (for spinning and weaving), 175,000 men and women produce 2,033,000,000 yards of cotton goods, besides a great quantity of thread. On the average, more than 12,000 yards of cotton goods alone are obtained by a 300 days' work of nine and one-half hours each, say 40 yards of cotton in 10 hours. Admitting that a family needs 200 yards a year at most, this would be equivalent to 50 hours' work, say 10 half-days of 5 hours each. And we should have thread besides; that is to say, cotton to sew with, and thread to weave cloth with, so as to manufacture woolen stuffs mixed with cotton.

几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美国751个棉纺工厂里的17.5万个男女工人，不仅生产大量的线，还能生产20.33亿码的棉布。如果平均每10个小时能生产40码棉布的话，一天工作9个半小时，300天就能生产超过1.2万码棉布。一个家庭一年最多需要200码棉布，也就相当于50个小时的工作，或者说相当于10个半天，每个半天5小时。另外我们还得有线，也就是说要有可供缝纫的棉布，有把布料缝起来的线，这样就能生产棉毛混纺的产品。

As to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weaving alone,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teach us that in 1870, if workmen worked 13 or 14 hours a day, they made 10,000 yards of white cotton goods in a year; sixteen years later (1886) they wove 30,000 yards by working only 55 hours a week.

看一下纺织业取得的成果：美国的官方数据告诉我们，在1870年，如果工人每天工作13或者14个小时的话，一年可以生产1万码的

白棉布；在16年后的1886年，他们每周只需工作55小时就能生产3万码白棉布。

Even in printed cotton goods they obtained, weaving and printing included, 32,000 yards in 2670 hours of work a year—say about 12 yards an hour. Thus to have your 200 yards of white and printed cotton goods 17 hours' work a year would suffice. It is necessary to remark that raw material reaches these factories in about the same state as it comes from the fields, an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s gone through by the piece before it is converted into goods are completed in the course of these 17 hours. But to buy these 200 yards from the tradesman, a well-paid workman must give at the very least 10 to 15 days' work of 10 hours each, say 100 to 150 hours. And as to the English peasant, he would have to toil for a month, or a little more, to obtain this luxury.

即使是印花棉布，纺织和印花都算上，一年2670个工时能生产3.2万码，也就是说每工时大约能生产12码。因此，每年工作17个小时，就能得到你要的200码白底印花的白棉布。需要说明的是，原材料到达工厂时和在田间地头时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从原材料到产品的逐渐转变都是在这17个小时里完成的。但是，如果要从商人那里买这200码棉布的话，工资较高的工人至少也得付出10到15天、每天10个小时的劳动，也就是100到150个小时的劳动。而英国农民必须辛苦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得到这样奢侈的享受。

By this example we already see that by working 50 half-days per year in a well- organized society we could dress better than the lower middle classes do to-day.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已经看出，在组织得力的社会中，每年只需工作50个半天，我们的穿着就会比今天的小中产阶级更好。

But with all this we have only required 60 half-days' work of 5 hours each to obtain the fruits of the earth, 40 for housing, and 50 for clothing, which only makes half a year's work, as the year consists of 300 working- days if we deduct holidays.

但是，这样算来，我们每年只需要60个半天、每个半天工作5小时就能获取所需的农产品，工作40个半天就能得到房屋居所，50个半天就能得到衣服，全部加起来也只是工作半年，因为除去假期，一年有300个工作日。

There remain still 150 half-days' work which could be made use of for other necessaries of life—wine, sugar, coffee, tea, furniture, transport, etc. , etc.

还有150个半天可以用来获取其他生活所需——葡萄酒、糖、咖啡、茶、家具、交通等。

It is evident that these calculations are only approximative, but they can also be proved in another way. When we take into account how many, in the so-called civilized nations, produce nothing, how many work at harmful trades, doomed to disappear, and lastly, how many are only useless middlemen, we see that in each nation the number of real producers could be doubled. And if, instead of every 10 men, 20 were occupied in producing useful commodities, and if

society took the trouble to economize human energy, those 20 people would only have to work 5 hours a day without production decreasing.

显然，这些都是粗略估算，但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得到证明。在所谓的文明国度里，有多少人不从事生产？有多少人从事注定要消失的有害行业？又有多少毫无用处的中间人？把这些都考虑进去的话，我们就能明白，假如所有人都从事生产劳动的话，每个国家实际生产者的数量就会加倍。假如10个人从事的有用商品的生产由20个人来承担，假如社会能努力地去节约人力资源，那么这20个人每天只需工作5个小时，而且产品量也不会减少。

And it would suffice to reduce the waste of human energy which is going on in the rich families with the scores of useless servants, or in the administrations which occupy one official to every ten or even six inhabitants, and to utilize those forces, to augment immensely the productivity of a nation. In fact, work could be reduced to four or even three hours a day, to produce all the goods that are produced now.

富人的家里有着数十个无用的佣人，行政部门官员和居民的比例达到了一比十甚至是一比六，减少这些领域人力资源的浪费并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就足够大大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实际上，要生产今天的产品，每天的工作时间可以减少到四小时甚至是三小时。

After studying all these facts together, we may arrive, then, a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Imagine a society, comprising a few million inhabitants, engaged in agriculture and a great variety of

industries—Paris, for example, with the Department of Seine-et-Oise. Suppose that in this society all children learn to work with their hands as well as with their brains. Admit that all adults, save women, engaged in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bind themselves to work 5 hours a day from the age of twenty or twenty-two to forty-five or fifty, and that they follow occupations they have chosen themselves in any one of those branches of human work which in this city are considered necessary. Such a society could in return guarantee well-being to all its members, a well-being more substantial than that enjoyed to-day by the middle classes. And, moreover, each worker belonging to this society would have at his disposal at least 5 hours a day which he could devote to science, art, and individual needs which do not come under the category of necessities, but will probably do so later on, when man's productivity will have augmented, and those objects will no longer appear luxurious or inaccessible.

综合以上事实，我们现在可以得到以下结论：设想有这么一个社会，由几百万从事农业和各种工业的居民组成——如巴黎和塞纳瓦兹省。假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的儿童都学着用手和脑去劳动；所有成年人，除了教育孩子的妇女，从20或22岁开始到45或55岁，每天都工作五个小时，在任意部门从事着他们自己选择的、在这个城市被认为有用的工作。这样的社会将会使所有成员感到安乐，而且这种安乐比今天中产阶级所享有的更为丰厚。此外，这个社会里的每个工人每天至少将有五个小时时间由他自己支配，可以从事科学、艺术以及其他不属于必需品范畴的个人需求。或许只有在将来生产力提高了，这些东西不再显得奢侈或者遥不可及时，他们才会去这么做。

CHAPTER IX THE NEED FOR LUXURY

第九章　对奢侈品的需求

I

一

Man is not a being whose exclusive purpose in life is eating, drinking, and providing a shelter for himself. As soon as his material wants are satisfied, other needs, which, generally speaking, may be described as of an artistic character, will thrust themselves forward. These needs are of the greatest variety; they vary with each and every individual; and the more society is civilized, the more will individuality be developed, and the more will desires be varied.

人生活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吃、喝以及为自己寻求一个庇护所，一旦其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就会有其他可以说是带有艺术性质的需求。这些需求种类繁多，因人而异；而且，社会文明程度越高，个性越发展，欲求的种类也就越多。

Even to-day we see men and women denying themselves necessaries to acquire mere trifles, to obtain some particular gratification, or some intellectual or material enjoyment. A Christian or an ascetic may disapprove of these desires for luxury; but it is precisely these trifles that break the monotony of existence and make it agreeable. Would life, with all its inevitable drudge and sorrows, be worth living, if, besides daily work, man could never

obtain a single pleasure according to his individual tastes?

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也能看到，有些人为了追求某些小乐趣，为了获取某种满足，或者某种文化、物质享受，可以放弃生活必需品。基督徒或禁欲者或许不赞同这种对奢侈品的欲望；然而，恰恰是这些奢侈的小东西打破了生活的单调，使生活更有趣味。假如在日常工作之外，人们无法得到发自内心的快乐，那么这充满着辛苦与悲伤的生活，还有活下去的价值吗？

If we wish for a Social Revolution, it is no doubt, first of all, to give bread to everyone; to transform this execrable society, in which we can every day see capable workmen dangling their arms for want of an employer who will exploit them; women and children wandering shelterless at night; whole families reduced to dry bread; men, women, and children dying for want of care and even for want of food. It is to put an end to these iniquities that we rebel.

如果我们要进行社会革命，毫无疑问，首先就是要给每个人面包，要改变这个万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天我们都能看到能干的工人，因找不到剥削他的雇主而无奈地摇晃着双臂；妇女和儿童夜里无家可归，四处飘荡；全家人只能吃干面包来维持生命；男人、女人还有儿童因为缺乏护理甚至是缺乏食物而生命垂危。我们起来反抗的目的就是要结束这所有的不平等。

But we expect more from the Revolution. We see that the worker, compelled to struggle painfully for bare existence, is reduced to ignore the higher delights, the highest within man!s

reach, of science, and especially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of art, and especially of artistic creation. It is in order to obtain for all of us joys that are now reserved to a few; in order to give leisur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everyone's intellectual capacities, that the social revolution must guarantee daily bread to all. After bread has been secured, leisure is the supreme aim.

然而，我们对革命的期望不止这些。我们看到工人为了勉强生存，不得不痛苦地奋斗，而忽略了更高层次的科学的乐趣（这是人类所能得到最高层次的乐趣），特别是科学发现的乐趣，忽略了艺术的乐趣，特别是艺术创作的乐趣。社会革命必须保证每人每天的面包供应，正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获得现在少数人享有的快乐，正是为了给每个人闲暇去发展他们的才智。在得到面包之后，休闲就成了首要目标。

No doubt, nowadays, when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human beings are in need of bread, coal, clothing, and shelter, luxury is a crime; to satisfy it, the worker's child must go without bread! But in a society in which all have the necessary food and shelter, the needs which we consider luxuries to-day will be the more keenly felt. And as all men do not and cannot resemble one another (the variety of tastes and needs is the chief guarantee of human progress) there will always be, and it is desirable that there should always be, men and women whose desire will go beyond those of ordinary individuals in some particular direction.

毫无疑问，在今天成百上千的人缺少面包、煤炭、衣物和房屋的情况下，奢侈品是一种罪过；如果满足了对奢侈品的追求，工人的孩子就得挨饿。但是，在所有人都有必需的食物和居所的社会中，我们

今天认为是奢侈品的需求将会成为迫切的需要。另外，因为所有人都不一样也不能一样（不同的品位和需求是人类进步的首要保证），所以总会有、也应当有很多人，他们在某些方面比普通人有更高的追求。

Everybody does not need a telescope, because, even if learning were general, there are people who prefer to examine things through a microscope to studying the starry heavens. Some like statues, some like pictures.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has no other ambition than to possess a good piano, while another is pleased with an accordion. The tastes vary, but the artistic needs exist in all. In our present, poor capitalistic society, the man who has artistic needs cannot satisfy them unless he is heir to a large fortune, or by dint of hard work appropriates to himself an intellectual capital which will enable him to take up a liberal profession. Still he cherishes the hope of some day satisfying his tastes more or less, and for this reason he reproaches the idealist Communist societies with having the material life of each individual as their sole aim. “In your communal stores you may perhaps have bread for all,” he says to us, “but you will not have beautiful pictures, optical instruments, luxurious furniture, artistic jewelry—in short, the many things that minister to the infinite variety of human tastes. And you suppress the possibility of obtaining anything besides the bread and meat which the commune can offer to all, and the drab linen in which all your lady citizens will be dressed.”

并非所有人都需要望远镜，因为不管知识普及的如何，总有一些人更愿意用显微镜来仔细观察事物，而不是用望远镜研究星空；有的人喜欢雕像，有的喜欢绘画；某个人可能只想拥有一架好钢琴；而另一个人则喜欢手风琴。品位各异，但每个人都有对艺术的需求。在今

天贫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人如果不是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或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了知识并以此为资本找到了收入丰厚的工作的话，那么他的艺术需求将无法得到满足。然而，他依然怀着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多多少少满足他的艺术品位与需求。因为这个缘故，他指责理想共产主义社会视物质生活为人们唯一的追求。他告诉我们："在你们共有的商店里，或许你们给每个人面包了，但是你们没有美丽的画幅，没有光学仪器，没有奢华的家具，没有华丽的珠宝——一句话，你们缺乏满足人们各种不同品位的东西。而且，你们压制获取公社能给每个人提供的面包和肉以及所有女性公民穿的单调的亚麻之外的任何东西的机会。"

These are the objections which all communist systems have to consider, and which the founders of new societies, established in American deserts, never understood. They believed that if the community could procure sufficient cloth to dress all its members, a music-room in which the "brothers" could strum a piece of music, or act a play from time to time, it was enough. They forgot that the feeling for art existed in the agriculturist as well as in the burgher, and,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expression of artistic feeling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in culture, in the main it remains the same. In vain did the community guarantee the common necessaries of life, in vain did it suppress all education that would tend to develop individuality, in vain did it eliminate all reading save the Bible. Individual tastes broke forth, and caused general discontent; quarrels arose when somebody proposed to buy a piano or scientific instruments; and the elements of progress flagged. The society could only exist on condition that it crushed all individual feeling, all artistic tendency, and all development.

这些不同的意见是所有共产主义体系都必须要考虑的，而建立在

美国荒漠中的新社会的缔造者们却从没有理解这些不同的意见。这些新社会的缔造者们认为，只要社会能让所有成员有衣穿，再有间音乐室去乱弹一曲，或者偶尔表演场戏剧什么的，就足够了。他们忘记了，不管是农夫还是市民，都有对艺术的喜爱。尽管文化的不同，这些人对艺术的爱好的表现方式各异，但大体上还是相同的。社会只保障普通的生活必需品，压制所有能发展个性的教育，除了《圣经》之外禁止阅读其他一切书籍，但所有这些都是徒劳的。个性化的品位与爱好还是纷纷出现，并导致普遍的不满；当有人提议买一架钢琴或科学仪器时，就会发生争吵；同时进步的要素会衰减。这样的社会只有粉碎了所有个人喜好、所有对艺术的追求、所有的发展才能够存在。

Will the anarchist Commune be impelled by the same direction?—Evidently not, if it understands that while it produces all that is necessary to material life, it must also strive to satisfy all manifestations of the human mind.

无政府主义的公社会不会被迫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呢？——如果公社能明白，在生产所有物质生活必需品的同时，还必须努力满足人类各种精神需求的话，显然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II

二

We frankly confess that when we think of the abyss of poverty and suffering that surrounds us, when we hear the heartrending cry of the worker walking the streets begging for work, we are loth to discuss the question: How will men act in a society, whose members are properly fed, to satisfy certain individuals desirous of possessing

a piece of S vres china or a velvet dress?

我们坦率地承认，当想到围绕在我们身边贫困与苦难的深渊时，当听到在街上四处游走祈求工作的工人令人心碎的呐喊时，我们不愿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在人人丰衣足食的社会里，人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满足那些想要拥有色佛尔瓷器或天鹅绒礼服的某些个体呢？

We are tempted to answer: Let us make sure of bread to begin with, we shall see to china and velvet later on.

我们不禁想要这样回答：先确保解决面包的问题，再去考虑瓷器和天鹅绒的问题。

But as we must recognize that man has other needs besides food, and as the strength of Anarchy lies precisely in that that it understands all human faculties and all passions, and ignores none, we shall, in a few words, explain how man can contrive to satisfy all his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needs.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人除了食物还有其他需求，而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在于它了解人类所有的才能和情感，对这些才能与情感无一忽视，因此，我们要简单地解释一下人们如何满足自己的知识和艺术需求。

We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hat by working 4 or 5 hours a day till the age of forty-five or fifty, man could easily produce all that is

necessary to guarantee comfort to society.

我们已经讲过，只要每天工作四或五小时，一直到45岁或50岁，人们轻轻松松就能生产出所有确保社会安乐的商品。

But the day's work of a man accustomed to toil does not consist of 5 hours; it is a 10 hours' day for 300 days a year, and lasts all his life. Of course, when a man is harnessed to a machine, his health is soon undermined and his intelligence is blunted; but when man has the possibility of varying occupations, and especially of alternating manual with intellectual work, he can remain occupied without fatigue, and even with pleasure, for 10 or 12 hours a day. Consequently, the man who will have done the 4 or 5 hours of manual work that are necessary for his existence, will have before him 5 or 6 hours which he will seek to employ according to his tastes. And these 5 or 6 hours a day will fully enable him to procure for himself, if he associates with others, all he wishes for, in addition to the necessaries guaranteed to all.

但是习惯了长期辛苦劳作的人们现在每天的工作时间不是五小时，而是十小时，一年三百天，直到生命的终点。当然，当人被束缚在机器上时，身体很快就会受损，智力也会下降；而当他有机会从事不同职业的时候，特别是有机会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交替时，他就可以每天忙十到十二个小时而不感到疲惫，甚至是感到愉悦。这样，人在从事完生存所必需的四个小时的体力劳动之后，就会有五到六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支配。如果他和别人合作的话，除了每人都能保障的必需品之外，这每天五到六小时的时间足以让他得到所想要的一切。

He will discharge first his task in the field, the factory, and so on, which he owes to society as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ral production. And he will employ the second half of his day, his week, or his year, to satisfy his artistic or scientific needs, or his hobbies.

他首先要完成在田地、工厂等不同地方的任务，这是他为社会一般生产应做的贡献。然后他会把一天、一周或一年的后半段用来满足自己的艺术或科学需求，或者说是他的爱好。

Thousands of societies will spring up to gratify every taste and every possible fancy.

成千上万的团体将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去满足人们所有的品位与可能拥有的嗜好。

Some, for example, will give their hours of leisure to literature. They will then form groups comprising authors, compositors, printers, engravers, draughtsmen, all pursuing a common aim—the propagation of ideas that are dear to them.

比如说，有些人会把闲暇时间花在文学上。接着，他们会结成由作家、排字工、印刷工、雕工和制图员组成的团体。这些人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宣传他们认为很宝贵的思想。

Nowadays an author knows that there is a beast of burden, the

worker, to whom, for the sum of a few shillings a day, he can entrust the printing of his books; but he hardly cares to know what a printing office is like. If the compositor suffers from lead-poisoning, and if the child who sees to the machine dies of an mia, are there not other poor wretches to replace them?

现在作家都知道，工人们就是“驮畜”，给几个先令，就可以把印书的事交给他们。然而，作家根本就不屑于去了解印刷厂是个什么样子。即便是排字工因铅中毒而受苦，操作机器的学徒工因贫血而死，难道还愁找不到替代他们的穷苦人吗？

But when there will be no more starvelings ready to sell their work for a pittance, when the exploited worker of to-day will be educated, and will have his own ideas to put down in black and white and to communicate to others, then the authors and scientific men will be compelled to combine among themselves and with the printers, in order to bring out their prose and their poetry.

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些为了微薄的薪水而出卖自己劳动的人，如果今天被剥削的工人受到了教育，有自己的观点要写出来、要和别人交流的话，那么作家和学者想要发表他们的散文和诗歌的话，首先要内部合作，并且还要和印刷工联合起来。

So long as men consider fustian and manual labour a mark of inferiority, it will appear amazing to them to see an author setting up his own book in type, for has he not a gymnasium or games by way of diversion? But when the opprobrium connected with manual labor has disappeared, when all will have to work with their hands,

there being no one to do it for them, then the authors as well as their admirers will soon learn the art of handling composing-sticks and type; they will know the pleasure of coming together—all admirers of the work to be printed—to set up the type, to shape it into pages, to take it in its virginal purity from the press. These beautiful machines, instruments of torture to the child who attends on them from morn till night, will be a source of enjoyment for those who will make use of them in order to give voice to the thoughts of their favourite author.

因此，只要人们把粗布织物和手工劳动视为低等的标志，在看到作家自己印书的时候他们就会很惊讶。难道这个作家不去健身房或其他方式来休闲娱乐吗？但是，当人们不再以手工劳动为耻，当所有人都必须用双手劳动，再也没有人替他们干活的时候，作家以及他们的拥趸很快就能掌握使用排字架和铅字的技术。这些人都是即将印刷出来的这部作品的崇拜者，他们将会体会到聚到一起劳动的快乐。他们一起把铅字准备好，一起排版，一起感受刚刚印刷出来的作品的纯净。这些美丽的机器，对每天从早到晚侍弄它们的学徒工来说是一种折磨，但对那些要用它们来传播自己最喜欢的作家的思想的人们来说，将会是快乐的源泉。

Will literature lose by it? Will the poet be less a poet after having worked out of doors or helped with his hands to multiply his work? Will the novelist lose his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after having rubbed shoulders with other men in the forest or the factory, in the laying out of a road or on a railway line? Can there be two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难道文学会因手工劳动而受到损害么？难道诗人从事户外劳动，

或者用自己的双手帮忙印刷自己的作品就不是诗人了么？难道小说家在森林或工厂里、在铺设公路时、在铁路上和他人并肩工作之后，就失去了对人类天性的了解吗？这样的问题还会有两个答案吗？

Maybe some books will be less voluminous; but then, more will be said on fewer pages. Maybe fewer waste-sheets will be published; but the matter printed will be more attentively read and more appreciated. The book will appeal to a larger circle of better educated readers, who will be more competent to judge.

或许某些书不是长篇大论，但较短的篇幅却内容丰富。或许会少印几页废纸，但人们会更认真地阅读、更好地欣赏印刷出来的作品。这样的书将会吸引更多受到良好教育的读者，而这样的读者有更准确的判断力。

Moreover, the art of printing, that has so little progressed since Gutenberg,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It takes two hours to compose in type what is written in ten minutes, but more expeditious methods of multiplying thought are being sought after and will be discovered.

此外，印刷术尚处于婴儿期，自古腾堡以来鲜有进步。十分钟写出来的东西铅字排版需要两个小时。人们正在寻找且终将找到更加快捷有效的传播思想的方法。

What a pity every author does not have to take his share in the printing of his works! What progress printing would have already

made! We should no longer be using movable letters, a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参与到自己作品的印刷中来，这真是一种遗憾啊！假如每个作家都能参与进来的话，印刷术肯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肯定已经不再像17世纪那样用活字印刷了。

III

三

Is it a dream to conceive a society in which—all having become producers, all having received an education that enables them to cultivate science or art, and all having leisure to do so—men would combine to publish the works of their choice, by contributing each his share of manual work? We have already hundreds of learned, literary, and other societies; and these societies are nothing but voluntary groups of men, interested in certain branches of learning, and associated for the purpose of publishing their works. The authors who write for the periodicals of these societies are not paid, and the periodicals, apart from a limited number of copies, are not for sale; they are sent gratis to all quarters of the globe, to other societies, cultivating the same branches of learning. This member of the Society may insert in its review a one-page note summarizing his observations; another may publish therein an extensive work, the results of long years of study; while others will confine themselves to consulting the review as a starting-point for further research. It does not matter: all these authors and readers are associat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works in which all of them take an interest.

设想有这么一个社会，所有的人都是生产者，所有人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有能力和闲暇去求科学或艺术，人们一齐动手，共同努力来印刷出版自己选出来的作品。这样的社会只是一个梦想吗？我们现在已经有成百上千的学术、文学以及其他团体；这些团体都只是自愿组成的，团体成员对某一学术领域有着共同的兴趣，都为了发表自己的作品而联合在一起。为这些团体的学术期刊撰稿的作者没有稿酬；这些学术期刊，除了少量销售之外，大多是非卖品；它们被免费送往世界各个角落，送给其他对相同学术领域感兴趣的团体。这个团体的甲会员可能把自己的观察写成一页总结发表在该团体的刊物上；乙会员则可能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写成鸿篇巨制发表；而其他人则只是参考该刊物，将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这都没有关系：所有这些作者和读者都因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作品而联结在一起。

It is true that a learned society, like the individual author, goes to a printing office where workmen are engaged to do the printing. Nowadays, those who belong to the learned societies despise manual labour which indeed is carried on under very bad conditions; but a community which would give a generous philosophic and scientific education to all its members, would know how to organize manual labour in such a way that it would be the pride of humanity. Its learned societies would become associations of explorers, lovers of science, and workers—all knowing a manual trade and all interested in science.

事实上，一个学术团体，就像单个作家一样，也要到印刷厂去，让那里的工人去印刷其作品。现在，学术团体的成员都轻视手工劳动，而手工劳动的工作环境确实很差；然而，一个让所有成员都受到充分的哲学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社会，一定会知道如何组织手工劳动才能使它成为人类的荣耀。这个社会里的学术团体将成为探索者、科学

爱好者和劳动者的联合，每个成员都会一门手艺，每个成员都对科学感兴趣。

If, for example, the Society is studying geology, all will contribute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arth's strata; each member will take his share in research, and ten thousand observers, where we have now only a hundred, will do more in a year than we can do in twenty years. And when their works are to be published, ten thousand men and women, skilled in different trades, will be ready to draw maps, engrave designs, compose, and print the books. With gladness will they give their leisure—in summer to exploration, in winter to indoor work. And when their works appear, they will find not only a hundred, but ten thousand readers interested in their common work.

举例来说，如果这个团体是研究地质学的，所有成员都将致力于地层的探索；每个成员都将为这项研究尽一份力。现在我们只有区区百名观测人员，而到那时将会有上万名，一年就能完成我们现在需要二十年才能完成的科学观测。当他们要发表作品时，将会有上万名具备不同技能的人，随时展开各项工作，或绘图，或雕版，或排字，或印刷。夏天的闲暇时光，他们愉悦地进行探索；冬日的闲暇里，他们会做一些室内的工作。他们的著作一经问世，就会有上万名而不是区区百名对他们的共同事业感兴趣的读者。

This is the direction in which progress is already moving. Even to-day, when England felt the need of a complet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birth of a Littr , who would devote his life to this work, was not waited for. Volunteers were appealed to, and a thousand men offered their services, spontaneously and

gratuitously, to ransack the libraries, to take notes, and to accomplish in a few years a work which one man could not complete in his lifetime. In all branches of human intelligence the same spirit is breaking forth, and we should have a very limited knowledge of humanity could we not guess that the future is announcing itself in such tentative co-operation, which is gradually taking the place of individual work.

社会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进步了。即使是在当今社会，在英国觉得需要一部完整的英语词典的时候，也没有等待将一生致力于词典编纂的利德勒那样的人出现。编撰词典工作都是由志愿者完成的。上千人自愿、无偿地提供了服务，他们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作记录，这样，几年之内就做完了一个人穷其一生都无法完成的工作。在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在涌动着这样的精神。这种尝试性的合作正在逐渐取代个人单枪匹马的努力，同时也昭示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对人类的认识也是非常有限的。

For this dictionary to be a really collective work, it would have been necessary that many volunteer authors, printers, and printers' readers should have worked in common; but something in this direction is done already in the Socialist Press, which offers us examples of manual and intellectual work combined. It happens in our newspapers that a Socialist author composes in lead his own article. True, such attempts are rare, but they indicate in which direction evolution is going.

对这部辞典来说，要想真正成为集体努力的结果，就必须有许多自愿的作家、印刷工以及校对者一同劳动；社会主义的出版界已经朝这个方向走出了一步，给我们提供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范

例。在我们的报界，社会主义作家亲自为自己的文章排铅字。虽然这样的事情不常见，但是却表明了发展的方向。

They show the road of liberty. In future, when a man will have something useful to say—a word that goes beyond the thoughts of his century, he will not have to look for an editor who might advance the necessary capital. He will look for collaborators among those who know the printing trade, and who approve the idea of his new work. Together they will publish the new book or journal.

它们指明了自由之路。将来，当某个人要表达超越了时代、富有价值的思想时，他就不用去寻找可以给他提供必要资金的出版家了，他可以从那些懂印刷技术并且赞同他新作品观点的人当中寻找合作伙伴，并一起发行这本新书或者期刊。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will cease to be a means of money-making and living at the cost of others. But is there any one who knows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from within, and who does not ardently desire that literature should at last be able to free itself from those who formerly protected it, and who now exploit it, and from the multitude, which, with rare exceptions, pays for it in proportion to its mediocrity, or to the ease with which it adapts itself to the bad taste of the greater number?

文学和新闻业将不再是赚取他人钱财的谋生之道。那些真正了解文学和新闻事业本质的人，难道不热切地期望文学能脱离之前保护它、现在又利用它的那些人的控制吗？难道不希望它摆脱那些为平庸的、品位低俗的作品买单的大众（很少有例外）吗？

Letters and science will only take their proper place in the work of human development when, freed from all mercenary bondage, they will be exclusively cultivated by those who love them, and for those who love them.

文字和科学只有摆脱了逐利的枷锁，由热爱它们的人培育，为热爱它们的人所用，才能在人类发展的事业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IV

四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 must be cultivated by free men. Only on this condition will they succeed in emancipating themselves from the yoke of the State, of Capital, and of the bourgeois mediocrity which stifles them.

文学、科学和艺术必须由自由的人来发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成功地摆脱令它们窒息的政府、资本以及资产阶级平庸的羁绊。

What means has the scientist of to-day to make researches that interest him? Should he ask help of the State, which can only be given to one candidate in a hundred, and which only he may obtain who promises ostensibly to keep to the beaten track? Let us remember how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France repudiated Darwin, how the Academy of St. Petersburg treated Mendeleeff with contempt, and how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refused to publish

Joule's paper, in which he determined the mechanical equivalent of heat, finding it “unscientific.”

今天的科学家有什么办法去进行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呢？去请求政府的资助吗？在一百个申请者当中，政府只能资助一个，而且只有那些保证墨守成规的人才能得到政府资助。我们不要忘记法国科学院曾怎样拒绝对达尔文进行资助，圣彼得堡学院曾怎样拒绝过门捷列夫，而伦敦皇家学会又是如何拒绝发表焦耳确定热功当量的文章，他们认为他的文章“不科学”。

It was why all great researches, all discoveries revolutionizing science, have been made outside academies and universities, either by men rich enough to remain independent, like Darwin and Lyell, or by men who undermined their health by working in poverty, and often in great straits, losing endless time for want of a laboratory, and unable to procure the instruments or book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heir researches, but persevering against hope, and often dying before they had reached the end in view. Their name is legion.

因此，所有重大的研究，所有给科学带来革命的重大发现，都是在学院和大学之外完成的。完成这样的重大研究和发现的人，或者如达尔文和莱伊尔一样有足够的财富来进行独立的研究；或者是在贫穷困苦中工作而身体每况愈下，因没有实验室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无法得到进行研究所必需的仪器和书籍，但是依旧心怀希望，却往往在看到终点之前离开人世。这样的人有很多。

Altogether, the system of help granted by the State is so bad

that science has always endeavoured to emancipate itself from it. For this very reason there are thousands of learned societies organized and maintained by volunteers in Europe and America,—some having developed to such a degree that all the resources of subventioned societies, and all the wealth of millionaires, would not buy their treasures. No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 is as rich as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which is supported by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总之，政府的科研资助体系非常糟糕，因此科学一直在努力摆脱其束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欧洲和美洲有很多由志愿者组织和维持的学术团体。其中，有些团体高度发达，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即使是所有得到政府资助的团体的资源和所有百万富翁的财产加起来，都无法匹及。任何政府组织都没有依靠志愿者捐助的伦敦动物学会富有。

It does not buy the animals which in thousands people its gardens: they are sent by other societies and by collectors of the entire world.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Bombay will send an elephant as a gift; another time a hippopotamus or a rhinoceros is offered by Egyptian naturalists. And these magnificent presents are pouring in every day, arriving from all quarters of the globe—birds, reptiles, collections of insects, etc. Such consignments often comprise animals that could not be bought for all the gold in the world; thus a traveller who has captured an animal at life's peril, and now loves it as he would love a child, will give it to the Society because he is sure it will be cared for. The entrance fee paid by visitors, and they are numberless, suffice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at immense institution.

这个学会的园子里成千上万的动物都不是买来的，而是由全世界其他团体和个人赠与的。有时孟买动物学会送来一头大象作为礼物；有时埃及的博物学家会送来一头河马或犀牛。这样贵重的礼物每天都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有鸟类、爬行动物和各类昆虫等等。其中，有些动物更是弥足珍贵。比如说，某个旅行者冒着生命危险抓住了一只动物，并且爱它如爱子，然而他会把这只动物送给学会，因为他知道学会将会很好的照料它。无数的参观者买门票的钱足够维持这个庞大机构的运转。

What is defective in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and in other kindred societies, is that the member's fee cannot be paid in work; that the keepers and numerous employes of this large institution are not recognized as members of the Society, while many have no other incentive to joining the society than to put the cabalistic letters F. Z. S (Fellow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n their cards. In a word, what is needed is a more perfect co-operation.

伦敦动物学会以及类似的学术团体的不足之处在于不能用劳动代替缴纳会费。此外，这个大机构的管理者和众多雇员无法成为学会会员，而那些加入学会只是为了在名片上加上“动物学会会员”这一神秘头衔的人却能成为会员。简而言之，这个机构需要更完善的合作机制。

We may say the same about inventors, that we have said of scientists. Who does not know what sufferings nearly all great inventions have cost? Sleepless nights, families deprived of bread, want of tools and materials for experiments, this is the history of nearly all those who have enriched industry with inventions which are the truly legitimate pride of our civilization.

我们所说的关于科学家的事情也适用于发明家。谁不知晓所有伟大发明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夜里无法入睡、家人没有面包、没有实验的材料和工具，几乎所有作出过促进工业发展的重大发明的人都有这样的历史。他们的发明是我们文明真正的骄傲。

But what are we to do to alter the conditions that everybody is convinced are bad? Patents have been tried, and we know with what results. The inventor sells his patent for a few pounds, and the man who has only lent the capital pockets the enormous profits often resulting from the invention. Besides, patents isolate the inventor. They compel him to keep secret his researches which therefore end in failure; whereas the simplest suggestion, coming from a brain less absorbed in the fundamental idea, sometimes suffices to fertilize the invention and make it practical. Like all State control, patents hamper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Thought being incapable of being patented, patents are a crying injustice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they result in one of the great obstacles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vention.

然而，我们要怎样做才能改变这公认的困境呢？我们曾尝试过专利，也知道是什么结果。发明家为了区区几个英镑，就卖掉了自己的专利，而发明带来的巨大利润却落进了借给他资本的那个人的口袋之中。另外，专利使发明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专利迫使发明家对自己的研究保密，这会导致其研究的失败；而并不专注于这项研究的基本观点的旁观者所给的最简单的建议，有时就能够让发明家的发明更丰富、更实用。专利和其他所有政府的控制一样，妨碍了工业的发展进步。思想是不能够作为专利的，因此在理论上，专利是大大的不公；在实践中，专利成了发明快速发展的巨大障碍。

What is needed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invention is, first of all, the awakening of thought, the boldness of conception, which our entire education causes to languish; it is the spreading of a scientific education, which woul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inquirers a hundredfold; it is faith that humanity is going to take a step forward, because it is enthusiasm, the hope of doing good, that has inspired all the great inventors. The Social Revolution alone can give this impulse to thought, this boldness, this knowledge, this conviction of working for all.

要弘扬发明精神，首先需要唤醒人的思想和大胆的观念，而这些正是我们整个教育体系在削弱的东西；其次是科学教育的普及，这将使研究者的数量成百倍地增加；再次是对人类不断进步的坚定信念，因为鼓舞伟大发明家的正是这种热忱，正是从事造福人类的事业的愿望。只有社会革命才能刺激思想的觉醒，才能带来这种胆识，带来知识，带来为万众工作的信念。

Then we shall have vast institutes supplied with motor-power and tools of all sorts, immense industrial laboratories open to all inquirers, where men will be able to work out their dreams, after having acquitted themselves of their duty towards society; machinery palaces where they will spend their five or six hours of leisure; where they will make their experiments; where they will find other comrades, experts in other branches of industry, likewise coming to study some difficult problem, and therefore able to help and enlighten each other,—the encounter of their ideas and experience causing the longed-for solution to be found. And yet again, this is no dream. Solan y Gorod k, in Petersburg, has already partially realized it as regards technical matters. It is a factory well furnished with tools and free to all; tools and motor-power are

supplied gratis, only metals and wood are charged for at cost price. Unfortunately workmen only go there at night when worn out by ten hours' labour in the workshop. Moreover, they carefully hide their inventions from each other, as they are hampered by patents and Capitalism—that bane of present society, that stumbling-block in the path of intellectual and moral progress.

到那时，将会有许多庞大的机构，这些机构配有各种动力和设备，还有很大的工业实验室对所有研究者开放。在履行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之后，人们可以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在这里，还有各类机械供他们打发五六个小时的闲暇时光；在这里，他们可以进行实验；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其他志同道合的人，来这里研究疑难问题的其他领域的专家，他们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启迪——思想和经验的交流与碰撞会让他们找到期盼已久的答案。而且，这绝不是梦想。圣彼得堡的索兰诺·高罗道克工厂在技术领域已经部分地实现了这一点。这家工厂配备许多供人们免费使用的工具。工具和动力都可以免费使用，只有金属和木料需要按成本付费。然而，不幸的是，工人们只有在每天工作了十个小时之后才能在晚上疲惫地来到这里，另外，由于专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发明创造隐瞒起来。专利和资本主义制度是当今社会的大祸根，是知识与道德进步的绊脚石。

V

五

And what about art? From all sides we hear lamentations about the decadence of art. We are, indeed, far behind the great masters of the Renaissance. The technicalities of art have recently made great progress; thousands of people gifted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talent cultivate every branch, but art seems to fly from civilization! Technicalities make headway, but inspiration frequents artists' studios less than ever.

那艺术怎么样呢？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对艺术衰落的哀叹。事实上，我们远远落后于那些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艺术的技巧最近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成千上万有一定天赋的人在艺术的各个领域耕耘，然而艺术似乎却在飞离文明。技巧在前进，而灵感却很少光临艺术家的工作室了。

Where, indeed, should it come from? Only a grand idea can inspire art. Art is in our ideal synonymous with creation, it must look ahead; but save a few rare, very rare exceptions, the professional artist remains too philistine to perceive new horizons.

艺术的灵感到底应该从哪里来呢？只有伟大的思想才能给艺术灵感。艺术是我们的理想，与创造同义，应该眺望着前方；然而，除了极少数之外，大多数的职业艺术家常常囿于世俗常规而看不到新的天际。

Moreover, this inspiration cannot come from books; it must be drawn from life, and present society cannot arouse it.

此外，这种灵感从书本上是找不到的；它必须来源于生活，而当今社会却不能激起这种灵感。

Raphael and Murillo painted at a time when the search of a new ideal could be pursued while retaining the old religious traditions. They painted to decorate churches which themselves represented the pious work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a given city. The basilic with its mysterious aspect, its grandeur, was connected with the life itself of the city, and could inspire a painter. He worked for a popular monument; he spoke to his fellow-citizens, and in return he received inspiration; he appealed to the multitude in the same way as did the nave, the pillars, the stained windows, the statues, and the carved doors. Nowadays the greatest honour a painter can aspire to is to see his canvas, framed in gilded wood, hung in a museum, a sort of old curiosity shop, where you see, as in the Prado, Murillo's Ascension next to a beggar of Velasquez and the dogs of Philip II. Poor Velasquez and poor Murillo! Poor Greek statues which lived in the Acropolis of their cities, and are now stifled beneath the red cloth hangings of the Louvre!

画家拉斐尔和穆里洛所处的时代，可以在追寻新理想的同时又保留旧的宗教传统。他们画画来装饰教堂，而这些教堂本身又代表着这个城市几代人的虔诚。那神秘庄严的大殿和城市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给画家以艺术的灵感。他为教堂这样的公众纪念场所而工作；他和同胞们交流，从他们身上得到灵感；他正如教堂的正殿、梁柱、彩色的窗户、雕像和雕有图案的门一样感召着大众。而现在，一个画家所渴求的最大荣耀也就是看到自己的画作镶在镀金的木框里，悬挂在博物馆中。博物馆只不过是一种古董店而已。在普拉多博物馆，你可以看到穆里洛的画作《升天》和委拉斯凯兹的《乞讨者》还有《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群狗》挂在一起。可怜的委拉斯凯兹，可怜的穆里洛，可怜那些曾经生活在卫城里的希腊雕像，现在却在卢浮宫的红色帷幔下窒息！

When a Greek sculptor chiseled his marble he endeavored to express the spirit and heart of the city. All its passions, all its traditions of glory, were to live again in the work. But to-day the united city has ceased to exist; there is no more communion of ideas. The town is a chance agglomeration of people who do not know one another, who have no common interest, save that of enriching themselves at the expense of one another. The fatherland does not exist. . . . What fatherland can the international banker and the rag-picker have in common? Only when cities, territories, nations, or groups of nations, will have renewed their harmonious life, will art be able to draw its inspiration from ideals held in common. Then will the architect conceive the city's monument which will no longer be a temple, a prison, or a fortress; then will the painter, the sculptor, the carver, the ornament-worker know where to put their canvases, their statues, and their decoration; deriving their power of execution from the same vital source, and gloriously marching all together towards the future.

当希腊的雕刻家雕琢大理石的时候，他是在试图表达城市的精神与情感。这城市所有的激情，所有光荣的传统，将在他的作品中再生。然而今天却不再有团结一致的城市，也不再有共同的思想。今天的城镇是一群人偶然聚集在一起组成的。这些人彼此并不了解，除了想着牺牲别人以换来自己的富足之外没有其他共同的爱好。祖国也已经不复存在……国际银行家和拾荒者会有共同的祖国吗？只有当城市、地区、国家以及国家的联合重新开始和谐生活时，艺术才能从这共同的理想中获得灵感。到那时，建筑师设计出的城市的纪念性建筑将不再是寺院、监狱或者堡垒；到那时，画家、雕塑家、雕刻家还有装饰工人也将知道该将他们的画幅、雕塑以及装饰品放到什么地方；他们从同一个活力的源泉得到了动力，昂首阔步一起迈向未来。

But till then art can only vegetate. The best canvases of modern artists are those that represent nature, villages, valleys, the sea with its dangers, the mountain with its splendours. But how can the painter express the poetry of work in the fields if he has only contemplated it, imagined it, if he has never delighted in it himself? If he only knows it as a bird of passage knows the country he soars over in his migrations? If, in the vigour of early youth, he has not followed the plough at dawn, and enjoyed mowing grass with a large sweep of the scythe next to hardy haymakers vying in energy with lively young girls who fill the air with their songs? The love of the soil and of what grows on it is not acquired by sketching with a paint-brush—it is only in its service; and without loving it, how paint it? This is why all that the best painters have produced in this direction is still so imperfect, not true to life, nearly always merely sentimental. There is no strength in it.

然而，在此之前，艺术只能毫无生机地苟且着。现代艺术家最好的画作是那些表现自然、村庄、山谷、危机四伏的大海以及壮美的高山的作品。但是，如果画家没有体会过田园劳动之乐，只是凭空想象，又怎么能表达出它的意境呢？如果画家对田园劳动的了解，就像迁徙途中的鸟儿对它飞过的大地的了解一样，他怎么能表达出田园劳动的意境呢？如果画家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没有在黎明时耕过田，没有和吃苦耐劳的割草人一起用大镰刀割过草，没有和歌声飞满天际、充满活力的年轻姑娘比过干劲，他又怎么能描绘出田园劳动的意境呢？对土地以及土地上生长的作物的热爱不是能用画笔描绘得来的——画笔只是为土地服务；没有对土地的热爱，又如何去描绘它？因此用这种方式创作的作品，即便是由最好的画家创作，也是那么的不完美、不真实，几乎总是在空发感慨。这样的作品是绵软无力的。

You must have seen a sunset when returning from work. You

must have been a peasant among peasants to keep the splendour of it in your eye. You must have been at sea with fishermen at all hours of the day and night, have fished yourself, struggled with the waves, faced the storm, and after rough work experienced the joy of hauling a heavy net, or the disappointment of seeing it empty, to understand the poetry of fishing. You must have spent time in a factory, known the fatigues and the joys of creative work, forged metals by the vivid light of a blast furnace, have felt the life in a machine, to understand the power of man and to express it in a work of art. You must, in fact, be permeated with popular feelings, to describe them.

劳动归来的路上就能看到落日，只有做过农夫的人，才能把落日的绚烂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只有和渔夫一起不分昼夜地出过海、自己捕过鱼、和海浪搏斗过、经历过风暴、在艰辛之后经历过拽起满满一网鱼的喜悦及看到空网的失落的人才能体会到捕鱼的诗意；只有在工厂呆过、经历过创造性工作的辛劳和喜悦、用鼓风炉的火焰锻造过金属、体会过机器的生命力的人才能了解人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在艺术作品中表达出来。要描述人民群众的情感，就必须融入到这种情感之中。

Besides, the works of future artists who will have lived the life of the people, like the great artists of the past, will not be destined for sale. They will be an integral part of a living whole that would not be complete without them, any more than they would be complete without it. Men will go to the artist's own city to gaze at his work, and the spirited and serene beauty of such creations will produce its beneficial effect on heart and mind.

另外，和过去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一样，经历过普通大众生活的未来艺术家的作品是不能拿来卖的。这些作品是某个活的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离开了它们，这个整体不完整；离开了这个整体，这些作品不完整。人们会到艺术家所在的城市去欣赏他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活泼而又宁静的美对人的情感和心智都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Art, in order to develop, must be bound up with industry by a thousand intermediate degrees, blended, so to say, as Ruskin and the great Socialist poet Morris have proved so often and so well. Everything that surrounds man, in the street, in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of public monuments, must be of a pure artistic form.

艺术要想发展，就必须通过各种媒介与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融为一体。英国作家拉斯金和社会主义诗人莫里斯已经无数次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人周围的一切、街上的一切、公共建筑物的里里外外，都必须以纯艺术的形式呈现。

But this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a society in which all enjoy comfort and leisure. Then only shall we see art associations, of which each member will find room for his capacity; for art cannot dispense with an infinity of purely manual and technical supplementary works. These artistic associations will undertake to embellish the houses of their members, as those kind volunteers, the young painters of Edinburgh, did in decorating the walls and ceilings of the great hospital for the poor in their city.

但是，只有在所有人都享受安逸和闲适的社会里才能实现这一点。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看到为所有会员提供发展个人潜力空间的

艺术协会；因为艺术无法和无数的纯手工以及技术性的辅助工作分离开来。这些艺术协会将承担起装饰会员房屋的任务，正如爱丁堡的青年画家那样善良的志愿者，装饰为城市的穷人开设的大医院的墙壁和天花板。

A painter or sculptor who has produced a work of personal feeling will offer it to the woman he loves, or to a friend. Executed for love's sake,—will his work, inspired by love, be inferior to the art that to-day satisfies the vanity of the philistine, because it has cost much money?

创作了表达个人情感的作品的画家或雕塑家会把这个作品送给心爱的女人或朋友。为爱而作、以爱为灵感的作品，难道真的就不如今天以售价高昂来满足庸俗的人们虚荣心的艺术作品吗？

The same will be done as regards all pleasures not comprised i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He who wishes for a grand piano will enter the association of musical instrument makers. And by giving the association part of his half-days' leisure, he will soon possess the piano of his dreams. If he is fond of astronomical studies he will join the association of astronomers, with its philosophers, its observers, its calculators, with its artists in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its scientists and amateurs, and he will have the telescope he desires by taking his share of the associated work, for it is especially the rough work that is needed in an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bricklayer's, carpenter's, founder's, mechanic's work, the last touch being given to the instrument of precision by the artist.

日常生活所需之外的所有乐趣，都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想得到大钢琴的人会加入乐器制造者协会，把众多的半日闲暇的一部分贡献给协会，他很快就会拥有梦想的钢琴。如果他对天文学研究感兴趣，就可以加入天文学家协会，天文学家协会里有许许多多的哲学家、观察家、计算家，还有许多制作天文仪器的技师、专业的科学家以及业余天文爱好者。只要他做了自己分内的相关工作，就能拥有自己朝思暮想的天文望远镜。建造天文台特别需要干重活的人，比如说砖瓦匠、木匠、铸造师和技工，最后再由专业的技师来校对精密的仪器。

In short, the five or seven hours a day which each will have at his disposal, after having consecrated several hours to the production of necessities, would amply suffice to satisfy all longings for luxury, however varied. Thousands of associations would undertake to supply them. What is now the privilege of an insignificant minority would be accessible to all. Luxury, ceasing to be a foolish and ostentatious display of the bourgeois class, would become an artistic pleasure.

总之，为生产生活必需品贡献了几个小时后，每人每天还有五小时或七小时的自由时间可供支配，这足够满足人们对各种不同奢侈品的欲求。成千上万的协会将会提供这些奢侈品。现在只有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将为众人所享有，奢侈品将会成为一种艺术的乐趣，而不再是资产阶级荒唐炫耀的资本。

Everyone would be the happier for it. In collective work, performed with a light heart to attain a desired end, a book, a work of art, or an object of luxury, each will find an incentive and the necessary relaxation that makes life pleasant.

因为享受到奢侈品，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加幸福快乐。为了某个想要的结果，比如说一本书、一件艺术作品或者是一件奢侈品，大家一起轻松愉快地一同工作，每个人都会找到动力，每个人都会得到能让生活变快乐的必要的放松。

In working to put an end to the division between master and slave, we work for the happiness of both, for the happiness of humanity.

在消除奴隶主和奴隶之间差别的过程中，我们是为双方的幸福而努力，是为整个人类的幸福而努力。

CHAPTER X AGREEABLE WORK

第十章　愉快的劳动

I

一

When Socialists maintain that a society, freed from the rule of the capitalists, would make work agreeable, and would suppress all repugnant and unhealthy drudgery, they are laughed at. And yet even to-day we can see the striking progress that is being made in this direction; and wherever this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employers congratulate themselves on the economy of energy obtained thereby.

社会主义者主张，摆脱了资本家统治的社会，应该让劳动变得愉快，应该禁绝一切招人厌恶又不卫生的苦工。他们的主张遭到了嘲笑。然而，即使是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在这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凡是取得这种进步的地方，雇主们都击掌相庆，因为这让他们省了不少精力。

It is evident that a factory could be made as healthy and pleasant as a scientific laboratory. And it is no less evident that it would be advantageous to make it so. In a spacious and well-ventilated factory the work is better; it is easy to introduce many small ameliorations, of which each represents an economy of time or of manual labour. And if most of the workshops we know are foul and unhealthy, it is because the workers are of no account in

the organization of factories, and because the most absurd waste of human energy 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presen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显然，工厂也能变得像科学实验室那样即卫生又舒适。而且毫无疑问，这样的变化是有好处的。在宽敞又通风的工厂里，工人们会更好地工作；做一些小的改进并不难，而且每一次改进都能够节省更多的时间和体力劳动。至于说我们了解的工厂车间大多数都污秽不堪，卫生状况糟糕，一是因为工人在工厂的组织中无足轻重，二是因为现在工业组织结构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对人类精力的浪费。

Nevertheless, now and again, we already find, even now, some factories so well managed that it would be a real pleasure to work in them, if the work, be it well understood, were not to last more than four or five hours a day, and if every one had the possibility of varying it according to his tastes.

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常常发现一些管理得当的工厂，假如大家都很熟悉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四五个小时，且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变换工作的话，那么在这样的工厂工作，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There are immense works, which I know, in one of the Midland counties, unfortunately consecrated to engines of war. They are perfect as regards sanitary and intelligent organization. They occupy fifty English acres of land, fifteen of which are roofed with glass. The pavement of fire-proof bricks is as clean as that of a miner's cottage, and the glass roof is carefully cleaned by a gang of

workmen who do nothing else. In these works are forged steel ingots or blooms weighing as much as twenty tons; and when you stand thirty feet from the immense furnace, whose flames have a temperature of more than a thousand degrees, you do not guess its presence save when its great doors open to let out a steel monster. And the monster is handled by only three or four workmen, who now here, now there, open a tap causing immense cranes to move one way or another by the pressure of water.

据我所知，在英国中部某郡县，有几家大工厂不幸被用来制造重型武器。这些工厂在卫生和智能组织方面都是完美的。它们占地50英亩，其中15英亩覆盖着玻璃屋顶。用耐火砖铺过的路面和矿工的屋子一样干净，玻璃屋顶也有一帮专门的工人精心擦洗。这些工厂里有许多重达20吨的铸好的钢锭和钢坯。虽然炼钢炉的温度超过了一千度，但是站在离炉30英尺的地方，根本感觉不到热。只有当巨大的炉门打开放出怪物般的钢铁熔液时，你才能感觉到炼钢炉的存在。对付这钢铁熔液也只需要三四个工人，他们走来走去，打开水龙头用水的压力控制巨大的起重机。

You enter these works expecting to hear the deafening noise of stampers, and you find that there are no stampers. The immense hundred- ton guns and the crank-shafts of transatlantic steamers are forged by hydraulic pressure, and the worker has but to turn a tap to give shape to the immense mass of steel, which makes a far more homogeneous metal, without crack or flaw, of the blooms, whatever be their thickness.

走进这些工厂的时候，你本以为一定会听到冲压机震耳欲聋的声音，却发现这些工厂根本没有冲压机。百吨重的大炮和横跨大洋的大

轮船的曲轴都是靠水的压力来锻造的，工人们只需要扭转龙头就能让巨大的钢块成形。用这种方法，不管多厚的钢坯，都能锻造成纯度高、无裂缝、无瑕疵的金属。

I expected an infernal grating, and I saw machines which cut blocks of steel thirty feet long with no more noise than is needed to cut cheese. And when I expressed my admiration to the engineer who showed us round, he answered—

我以为会听到地狱般刺耳的噪音，然而看到的却是机器切开30英尺长的钢块，就像切奶酪一样，没有什么声响。当我向陪同我们参观的工程师表达由衷赞叹时，他却这样回答：

“A mere question of economy! This machine, that planes steel, has been in use for forty-two years. It would not have lasted ten years if its parts, badly adjusted, 'interfered' and creaked at each movement of the plane!

“这只是一笔经济账这台刨平钢铁的机器已经用了42年了。假如机器各个部件没有调校好，刨床每动一下都会受阻，嗄吱作响，这台机器连十年都用不了”

“And the blast-furnaces? It would be a waste to let heat escape instead of utilizing it. Why roast the founders, when heat lost by radiation represents tons of coal?

“至于这些鼓风炉，如果让热量白白跑出来而不加以利用，那将是巨大的浪费。何必一边烘烤着铸锻工人一边又浪费相当于数吨煤炭的热量呢？”

“The stampers that made buildings shake five leagues off were also waste. Is it not better to forge by pressure than by impact, and it costs less—there is less loss.”

“能让周围五里格范围内的建筑都震动的冲压机也是一种浪费。用压力去锻造不比冲压更好吗？花费更低，浪费也更少。”

“In these works, light, cleanliness, the space allotted to each bench, are but a simple question of economy. Work is better done when you can see what you do, and have elbow-room.”

“在这些工厂里，亮堂、干净，每个工作台都有宽敞的空间，这些都是一笔简单的经济账。能看到你在做什么，又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工作才会做得更好。”

“It is true,” he said, “we were very cramped before coming here. Land is so expensive in the vicinity of large towns—landlords are so grasping!”

他还说：“来这里之前，我们也拥挤不堪。大城市附近的土地太贵了，因为地主们太贪婪了！”

It is even so in mines. We know what mines are like nowadays from Zola's descriptions and from newspaper reports. But the mine of the future will be well ventilated, with a temperature as easily regulated as that of a library; there will be no horses doomed to die below the earth: underground traction will be carried on by means of an automatic cable put into motion at the pit's mouth. Ventilators will be always working, and there will never be explosions. This is no dream, such a mine is already to be seen in England; I went down it. Here again the excellent organization is simply a question of economy. The mine of which I speak, in spite of its immense depth (466 yards), has an output of a thousand tons of coal a day, with only two hundred miners—five tons a day per each worker, whereas the average for the two thousand pits in England at the time I visited this mine in the early' nineties, was hardly three hundred tons a year per man.

在矿井里更是如此。从左拉的描述和报纸的报道中，我们知道矿井是什么情形。未来的矿井通风良好，温度调节得像图书馆里那样舒适；再也不会有注定要葬身矿井的马儿：拖运工作将由安装在矿坑口的自动钢索来完成。通风机一刻也不会停，也永远不会有瓦斯爆炸。这并不是梦想，在英国就有这样的矿井，我亲自下去过。这良好的组织还是一笔经济账。我说的那个矿井，尽管很深（466码），也只有200个矿工，每天却能采1000吨煤——每人平均每天采5吨煤。而在当时，19世纪90年代早期，我去参观这个矿井的时候，英国所有2000个矿井的工人每年平均采煤量还不到300吨。

If necessary, it would be easy to multiply examples proving that as regards the material organization Fourier's dream was not a Utopia.

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轻易举出很多的例子来证明，在物质组织方面，傅立叶的梦想决不是“乌托邦”。

This question has, however, been so frequently discussed in Socialist newspapers that public opinion should already be educated on this point. Factory, forge and mine can be as healthy and magnificent as the finest laboratories in modern universities, and the better the organization the more will man's labour produce.

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报纸上已经有过非常频繁的讨论，因此公众舆论对这一点应该已经有很多的了解。工厂、锻造车间和矿井可以和现代大学里最好的实验室一样卫生，一样漂亮，而且组织越是得力，人类劳动的产出就越多。

If it be so, can we doubt that work will become a pleasure and a relaxation in a society of equals, in which “hands” will not be compelled to sell themselves to toil, and to accept work under any conditions? Repugnant tasks will disappear, because it is evident that these unhealthy conditions are harmful to society as a whole. Slaves can submit to them, but free men will create new conditions, and their work will be pleasant and infinitely more productive. The exceptions of to-day will be the rule of to-morrow.

如果是这样，我们还会怀疑在人人平等的社会里，劳动将成为一种乐趣、一种放松吗？我们还会怀疑劳动者将再也不必出卖自己的劳力去做苦工，再也不必接受任何条件下的工作吗？令人厌恶的工作将会消失，因为这些不卫生的环境显然对整个社会是有害的。只有奴隶才会屈从于这种环境，而自由人会去创造新环境，他们的工作也会变

得更舒适，也更富有成效。今天的例外会成为明天的常规。

The same will come to pass as regards domestic work, which to-day society lays on the shoulders of that drudge of humanity—woman.

在家务方面也会有同样的进步。今天的女性是人类的苦工，家务就落在她们的肩上。

II

二

A society regenerated by the Revolution will make domestic slavery disappear—this last form of slavery, perhaps the most tenacious, because it is also the most ancient. Only it will not come about in the way dreamt of by Phalansterians, nor in the manner often imagined by authoritarian Communists.

因革命而获得新生的社会成立后，家庭奴隶制将不复存在，家庭奴隶制是奴隶制最后一种形式，或许因为它最古老，也是最顽固的一种奴隶制形式。只是这一切并不会以社会共同组合会梦想的方式或独裁共产主义者想象的方式实现。

Phalansteries are repugnant to millions of human beings. The most reserved man certainly feels the necessity of meeting his fellow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on work, which becomes the more

attractive the more he feels himself a part of an immense whole. But it is not so for the hours of leisure, reserved for rest and intimacy. The phalanstery and the familystery do not take this into account, or else they endeavour to supply this need by artificial groupings.

数以百万计的人憎恶社会共同组合会。哪怕是再矜持的人，为了共同的工作，也觉得需要和同伴们见面，他越觉得自己是巨大整体的一部分，就越对这共同事业感兴趣。但对用来休息和陪伴家人的闲暇时间，人们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态度。社会共同组合会和家族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或者他们通过人为的分组来满足这种需要。

A phalanstery, which is in fact nothing but an immense hotel, can please some, and even all at a certain period of their life, but the great mass prefers family life (family life of the future, be it understood). They prefer isolated apartments, Anglo-Saxons even going as far as to prefer houses of from six to eight rooms, in which the family, or an agglomeration of friends, can live apart. Sometimes a phalanstery is a necessity, but it would be hateful, were it the general rule. Isolation, alternating with time spent in society, is the normal desire of human nature. This is why one of the greatest tortures in prison is the impossibility of isolation, much as solitary confinement becomes torture in its turn, when not alternated with hours of social life.

社会共同组合会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庞大的宾馆，它会让一些人感到满意，甚至在某个阶段会让所有人满意。然而，广大群众更喜欢家庭生活（当然是未来的家庭生活）。人们更喜欢彼此独立的公寓房。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更甚，他们喜欢有六个到八个房间的大别墅，这样

一家人或者一群朋友就可以住在单独的房间里。社会共同组合会有时是必要的，但如果成了通行的规则，就比较可恶了。独居生活与社交生活相交替，是人性的正常欲求。因此，监狱的最大痛苦之一就是不能独居。同样，长期的独居，不能与数小时的社交生活相交替，也是一种折磨。

As to considerations of economy, which are sometimes laid stress on in favour of phalansteries, they are those of a petty tradesman.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y, the only reasonable one, is to make life pleasant for all, because the man who is satisfied with his life produces infinitely more than the man who curses his surroundings.

有时人们会强调社会共同组合会符合经济、节约方面的考虑，但这只不过是目光狭隘的小商人考虑的经济罢了。最重要、同时也是唯一合理的经济，就是要让所有人生活愉快，因为对生活满意的人的生产力远远大于那些抱怨周围环境的人。

Other Socialists reject the phalanstery. But when you ask them how domestic work can be organized, they answer: “Each can do 'his own work.' My wife manages the house; the wives of bourgeois will do as much.” And if it is a bourgeois playing at Socialism who speaks, he will add, with a gracious smile to his wife: “Is it not true, darling, that you would do without a servant in the Socialist society? You would work like the wife of our good comrade Paul or the wife of John the carpenter?”

其他社会主义者也排斥社会共同组合会。但是，当你问他们如何

组织家务活的时候，他们会说：“每个人都能‘做自己的事’我妻子做我家的家务；资产阶级的太太们也要做自己的家务。”如果说话的是一位假装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资本家，他还会面带微笑亲切地对妻子再说几句：“亲爱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你不用佣人自己也能做家务，不是吗？你会像我们的好同志保罗的妻子还有木匠约翰的妻子一样劳动，不是吗？”

Servant or wife, man always reckons on woman to do the house-work.

不管是佣人还是妻子，男人总是指望着女人做家务。

But woman, too, at last claims her share in the emancipation of humanity. She no longer wants to be the beast of burden of the house. She considers it sufficient work to give many years of her life to the rearing of her children. She no longer wants to be the cook, the mender, the sweeper of the house! And, owing to American women taking the lead in obtaining their claims, there is a general complaint of the dearth of women who will condescend to domestic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My lady prefers art, politics, literature, or the gaming tables; as to the work-girls, they are few, those who consent to submit to apron-slavery, and servants are only found with difficulty in the States. Consequently, the solution, a very simple one, is pointed out by life itself. Machinery undertakes three-quarters of the household cares.

然而，女性也会要求解放。她们再也不想为家庭做牛做马。女人们认为花数年的光阴养儿育女就已经足够了。她们再也不想去做饭、

补衣服、打扫卫生。美国女性首先要求妇女解放。因此，在美国，人们都在抱怨，愿意屈尊做家务的女性越来越少了。女士们更喜欢艺术、政治、文学或者是赌博；女工数量很少，而愿意做家务、做女佣的女人在美国就更难找了。结果，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简单的解决家务问题的方法，机器承担了四分之三的家务。

You black your boots, and you know how ridiculous this work is. What can be more stupid than rubbing a boot twenty or thirty times with a brush? A tenth of the European population must be compelled to sell itself in exchange for a miserable shelter and insufficient food, and woman must consider herself a slave, in order that millions of her sex should go through this performance every morning.

你自己擦过皮鞋，也知道这样的工作多荒唐。难道还有比用刷子打理二三十次皮鞋更荒唐的工作吗？然而，欧洲有十分之一的人不得不用自己的劳动力以换来简陋的居所和不足以果腹的食物，数百万女性也不得不把自己当成奴隶，每天早上做擦皮鞋的工作。

But hairdressers have already machines for brushing glossy or woolly heads of hair. Why should we not apply, then, the same principle to the other extremity? So it has been done, and nowadays the machine for blacking boots is in general use in big American and European hotels. Its use is spreading outside hotels. In large English schools, where the pupils are boarding in the houses of the teachers, it has been found easier to have one single establishment which undertakes to brush a thousand pairs of boots every morning.

但是，理发师已经有了梳头发的机器，光洁或杂乱的头发都能梳理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同样的原则应用到脚上呢？已经有人这样做了。今天，美国和欧洲的大宾馆已广泛使用擦皮鞋的机器，甚至不仅只局限于宾馆。在英国比较大的学校里，很多学生寄宿在教师家里。人们发现，如果有一个专门机构每天早上打理一千双皮鞋的话，会更简单方便。

As to washing up! Where can we find a housewife who has not a horror of this long and dirty work, that is usually done by hand, solely because the work of the domestic slave is of no account.

那么洗盘子洗碗呢？到哪里能找到不怕洗碗这又脏又耗时的工作的家庭主妇呢？这样的工作通常是用手来完成的，仅仅是因为这种像家庭奴隶的工作无足轻重。

In America they do better. There are already a number of cities in which hot water is conveyed to the houses as cold water is in Europe.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problem was a simple one, and a woman—Mrs. Cochrane—solved it. Her machine washes twelve dozen plates or dishes, wipes them and dries them, in less than three minutes. A factory in Illinois manufactures these machines and sells them at a price within reach of the average middle-class purse. And why should not small households send their crockery to an establishment as well as their boots? It is even probable that the two functions, brushing and washing up, will be undertaken by the same association.

美国人在这方面做得要更好。在美国一些城市，热水已经进入了

千家万户，而欧洲只有冷水。在这样的条件下，问题就变得简单了。一位女性解决了这个问题，她就是柯克伦夫人。她的洗碗机只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能把12打盘子或碗洗干净然后再擦干。伊利诺伊州有一家工厂生产这样的机器，再以中产阶级可以承受的价格卖出去。为什么小的家庭不把盘子和碗与皮鞋一样送到专门机构去打理呢？甚至这两件事情，洗碗和擦鞋，可以由同一个机构完成。

Cleaning, rubbing the skin off your hands when washing and wringing linen; sweeping floors and brushing carpets, thereby raising clouds of dust which afterwards occasion much trouble to dislodge from the places where they have settled down, all this work is still done because woman remains a slave, but it tends to disappear as it can be infinitely better done by machinery. Machines of all kinds will be introduced into household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otor-power in private houses will enable people to work them without muscular effort.

在做清洁的时候，洗衣服、拧干衣服会搓掉手上的皮；扫地、清理地毯会使尘土像云雾般飞扬，不管落在哪里想要清理掉都很麻烦。所有这些工作仍然由女性来做，因为她们还是奴隶。但是，机器做这些工作要好得多，因此这些工作将会消失。各种各样的机器将走进千家万户，为各户配送动力，让人们不费体力就可以操作这些机器。

Such machines cost little to manufacture. If we still pay very much for them, it is because they are not in general use, and chiefly because an exorbitant tax is levied upon every machine by the gentlemen who wish to live in grand style and who have speculated on land, raw material, manufacture, sale, patents, and duties.

这些机器的制造成本并不高。如果我们要花很多钱才能买到这些机器的话，那么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还未普及，但主要原因是每台机器上面附加了过高的税额。收税的绅士老爷们想过奢华的生活，他们在土地、原材料、生产、销售、专利和税收方面都进行了投机。

But emancipation from domestic toil will not be brought about by small machines only. Households are emerging from their present state of isolation; they begin to associate with other households to do in common what they did separately.

但是单靠小机械还不足以把人们从辛苦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千家万户正在从他们现在的孤立状态中走出来，开始和其他家庭交流合作，开始一起做从前单独做的事情。

In fact, in the future we shall not have a brushing machine, a machine for washing up plates, a third for washing linen, and so on, in each house. To the future, on the contrary, belongs the common heating apparatus that sends heat into each room of a whole district and spares the lighting of fires. It is already so in a few American cities. A great central furnace supplies all houses and all rooms with hot water, which circulates in pipes; and to regulate the temperature you need only turn a tap. And should you care to have a blazing fire in any particular room you can light the gas specially supplied for heating purposes from a central reservoir. All the immense work of cleaning chimneys and keeping up fires—and woman knows what time it takes—is disappearing.

实际上，将来擦鞋机、洗碗机、洗衣机不必每家一台。相反，未

来会有统一的供暖设备为整个区的各个家庭供暖，而不必家家户户生火。在美国，一些城市已经是这样了。一座巨大的中央火炉通过管道给所有家庭、所有房间提供热水；只需转动水龙头就能调节水温。如果你想在某个房间生明火，只需要点燃取暖用的煤气。煤气是由中心煤气站提供的。清洁烟囱、不让炉火熄灭等艰巨的工作都在渐渐消失。女人们清楚这些工作要花多少时间。

Candles, lamps, and even gas have had their day. There are entire cities in which it is sufficient to press a button for light to burst forth, and, indeed, it is a simple question of economy and of knowledge to give yourself the luxury of electric light. And lastly, also in America, they speak of forming societies for the almost complete suppression of household work. It would only be necessary to create a department for every block of houses. A cart would come to each door and take the boots to be blacked, the crockery to be washed up, the linen to be washed, the small things to be mended (if it were worth while), the carpets to be brushed, and the next morning would bring back the things entrusted to it, all well cleaned. A few hours later your hot coffee and your eggs done to a nicety would appear on your table. It is a fact that between twelve and two o'clock there are more than twenty million Americans and as many Englishmen who eat roast beef or mutton, boiled pork, potatoes and a seasonable vegetable. And at the lowest figure eight million fires burn during two or three hours to roast this meat and cook these vegetables; eight million women spend their time preparing a meal which, taking all households, represents at most a dozen different dishes.

蜡烛、灯盏甚至是煤气都将成为历史。在一些城市里，只要按一下按钮，就会一片光明。实际上，享受到电灯这样的奢侈品只是简单

的经济和知识的问题。最后，还是在美国，人们在讨论着如何组成社团来彻底掌控家务工作。每个街区都要设立这样的一个部门。一辆大车会挨家挨户收集要打理的鞋子、要洗的陶器和衣服、要修补的小物件（如果值得一修的话），还有要清理的毛毯，第二天早上再把这些清洗好的东西送回来。几个小时候，热咖啡和做得恰到好处的鸡蛋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实际上，在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之间，有超过2000万的美国人和同等数量的英国人在吃烤牛肉、烤羊肉、烧猪肉、土豆以及应季的蔬菜。在这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至少有八百万团火烤肉、烹制蔬菜；800万妇女在做饭，把所有家庭都算进来，准备的菜至多也不过12种。

“Fifty fires burn,” wrote an American woman the other day, “where one would suffice!” Dine at home, at your own table, with your children, if you like; but only think yourself, why should these fifty women waste their whole morning to prepare a few cups of coffee and a simple meal! Why fifty fires, when two people and one single fire would suffice to cook all these pieces of meat and all these vegetables? Choose your own beef or mutton to be roasted if you are particular. Season the vegetables to your taste if you prefer a particular sauce! But have a single kitchen with a single fire and organize it as beautifully as you are able to.

“一团火就能完成的事，却有五十团火在燃烧。”一位美国妇女曾这样写道。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自己家、在自家的餐桌上和自己的孩子吃饭；但是，你自己想一想，为什么这50位妇女为了几杯咖啡和一顿便饭就要浪费整个上午的时光呢？两个人、一团火就能做好所有这些肉和菜，为什么非要生50团火呢？如果你很挑剔，可以自己挑选要烤的牛肉和羊肉。如果你喜欢某种调味汁，可以按自己的口味调制蔬菜。但是，你只需要一个厨房、一团火，并且把厨房装饰得越漂亮越好。

Why has woman,s work never been of any account? Why in every family are the mother and three or four servants obliged to spend so much time at what pertains to cooking? Because those who want to emancipate mankind have not included woman in their dream of emancipation, and consider it beneath their superior masculine dignity to think “of those kitchen arrangements,” which they have put on the shoulders of that drudge—woman.

为什么人们一直忽略女性的工作呢？为什么每家的母亲和三四个佣人都必须花那么多时间准备一日三餐呢？因为那些胸怀解放人类梦想的人并没有把女性算进来，认为考虑“那厨房的杂事”有辱其男性尊严。他们把“厨房的杂事”放在了做苦工的女性肩上。

To emancipate woman, is not only to open the gates of the university, the law courts, or the parliaments to her, for the “emancipated” woman will always throw her domestic toil on to another woman. To emancipate woman is to free her from the brutalizing toil of kitchen and washhouse; it is to organize your household in such a way as to enable her to rear her children, if she be so minded, while still retaining sufficient leisure to take her share of social life.

要想解放妇女，仅仅向她们敞开大学、法院和国会的大门是不够的，因为“解放了的妇女”还得把她的家务重担交给另一位女性。解放妇女就是要把她们从厨房、洗衣房等折磨人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就是要合理安排家务，让妇女在养儿育女的同时（如果她愿意这么做），又有足够的空闲去参加社会活动。

It will come. As we have said, things are already improving. Only let us fully understand that a revolution, intoxicated with the beautiful words, Liberty, Equality, Solidarity, would not be a revolution if it maintained slavery at home. Half humanity subjected to the slavery of the hearth would still have to rebel against the other half.

这样的时代会到来的。正如我们所说，所有的一切都在进步。只是我们应该记住，醉心于自由、平等、团结这样的美丽辞藻的革命，如果在家里还保留着奴隶制的话，就不是真正的革命。如果有一半的人还在火炉边做奴隶，那她们必将起来反抗另一半。

CHAPTER XI FREE AGREEMENT

第十一章　自由协议

I

一

Accustomed as we are by heredity prejudices and our unsoun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represent ourselves the beneficial hand of Government, legislation and magistracy everywhere, we have come to believe that man would tear his fellow-man to pieces like a wild beast the day the police took his eye off him; that absolute chaos would come about if authority were overthrown during a revolution. And with our eyes shut we pass by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human groupings which form themselves freely, without any intervention of the law, and attain results infinitely superior to those achieved under governmental tutelage.

由于与生俱来的偏见、不健全的教育和训练，我们习惯于把自己当成是政府、立法和行政执法的受益人，认为人如果没有了警察的监督，就会像野兽一样残害他的同胞；认为在革命中，如果当局被推翻，就会产生绝对的混乱。我们双眼紧闭，对成千上万由人们自由组织、不受法律干涉的团体视而不见，尽管他们取得的成果比处于政府监督之下的团体要好得多。

If you open a daily paper you find that its pages are entirely devoted to Government transactions and to political jobbery. A man from another world, reading it, would believe th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Stock Exchange transactions, nothing gets done in Europe save by order of some master. You find nothing in the paper about institutions that spring up, grow up, and develop without ministerial prescription! Nothing—or almost nothing! Even where there is a heading, “Sundry Events” (Faits divers, a favorite column in the French papers), it is because they are connected with the police. A family drama, an act of rebellion, will only be mentioned if the police have appeared on the scene.

如果打开报纸，你会发现各个版面都刊登着政府事务和政治勾当的消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读到这份报纸的话，会认为在欧洲，如果没有某个老爷的命令，除了证券交易什么事情都干不成。那些没有政府的命令自己出现、成长发展起来的制度或体系是不会出现在报纸上的！没有——或者基本没有！报纸上即使出现“杂闻逸事”（社会杂闻，法国报纸最受欢迎的栏目）这样的标题，也是因为这些杂事儿和警察有关。如果警察不在现场，是不会报道家事和叛逆的行为的。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million Europeans love or hate one another, work, or live on their incomes; but, apart from literature, theatre, or sport, their lives remain ignored by newspapers if Governments have not intervened in it in some way or other. It is even so with history. We know the least details of the life of a king or of a parliament; all good and bad speeches pronounced by the politicians have been preserved: “speeches that have never had the least influence on the vote of a single member,” as an old parliamentarian said. Royal visits, the good or bad humour of politicians, their jokes and intrigues, are all carefully recorded for posterity. But we have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to reconstitute a city of the Middle Ages,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that immense commerce that was carried on between Hanseatic cities, or to know

how the city of Rouen built its cathedral. If a scholar spends his life in studying these questions, his works remain unknown, and parliamentary histories—that is to say, the defective ones, as they only treat of one side of social life—multiply; they are circulated, they are taught in schools.

三亿五千万欧洲人彼此相爱着、厌恶着、工作着，靠自己的收入生活着；然而，除了文学、戏剧或体育运动，报纸一直忽略他们的生活，除非政府干预了他们的生活中。历史更是如此。如果是国王的生活或者议会发生的事情，再小的细节我们都了如指掌；政治家所做的或精彩或糟糕的演说都保存着，一位老议员这样说道："这些演说从未影响过议员投票"。国王的来访、政客们的好脾气或坏脾气，还有他们的玩笑和阴谋诡计，都有仔细地记录，留给后人。但是，当我们想重构中世纪的城市，或者想了解汉萨同盟各城市之间进行的巨大的商业贸易，或者想知道法国鲁昂市如何建造大教堂，就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如果一个学者一生都在钻研这些问题，他的作品将不为人所知，而议会的历史——也就是那些有缺陷的历史，因为它只涉及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却不断增加，广为传播，成了学校的教程。

In this way we do not even perceive the prodigious work, accomplished every day by spontaneous groups of men, which constitutes the chief work of our century.

就这样，我们不知那些自发团体中的人们每天进行的大量工作。然而他们的工作，才是这个世纪的主要工作。

We therefore propos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se most striking manifestations, and to show how men, as soon as their interests do

not absolutely clash, act in concert, harmoniously, and perform collective work of a very complex nature.

因此我们要指出几个最突出的例子，用这些例子证明，如果没有绝对利益冲突的话，人们能够协调一致地一起行动，能够完成非常复杂的集体工作。

It is evident that in present society, based on individual property—that is to say, on plunder, and on a narrow-minded, and therefore foolish individualism—facts of this kind are necessarily limited; agreements are not always perfectly free, and often they have a mean, if not execrable aim.

今天的社会是以个人财产为基础的，也就是以掠夺为基础，以狭隘、愚蠢的个人主义为基础。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团结合作的例子自然不多；协议也并不都是完全自由的，总有一些带着自私甚至是卑劣的目的。

But what concerns us is not to give examples which might be blindly followed, and which, moreover, present society could not possibly give us. What we have to do is to show that, in spite of the authoritarian individualism which stifles us, there remains in our life, taken as a whole, a very great part in which we only act by free agreement; and that therefore it would be much easier than is usually thought, to dispense with Government.

但是，我们要做的不是给出几个例子让大家盲目效仿，而且，这

样的例子是今天的社会所不能给予的。我们要做的是，要表明，尽管强权的个人主义让我们窒息，但总的来说，我们生活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按自由的协议行事。因此消除政府比想象中的要容易得多。

In support of our view we have already mentioned railways, and we will now return to them.

我们已经用铁路的例子支持我们的观点，现在我们还要讲铁路。

We know that Europe has a system of railways, over 175,000 miles long, and that on this network you can nowadays travel from north to south, from east to west, from Madrid to Petersburg, and from Calais to Constantinople, without delays, without even changing carriages (when you travel by express). More than that: a parcel deposited at a station will find its addressee anywhere, in Turkey or in Central Asia, without more formality needed for sending it than writing its destination on a bit of paper.

我们知道欧洲的铁路系统总长度超过17.5万英里。今天，通过铁路网络可以从北走到南，从东走到西，从马德里走到圣彼得堡，从加来走到君士坦丁堡，没有延误，也不用换车（如果乘坐快车的话）。不仅如此：寄存在车站的包裹，不管收件人身处何方，是在土耳其还是在中亚，都会送达。寄送程序也很简单，要在一张纸上写下目的地即可。

This result might have been obtained in two ways. A Napoleon, a Bismarck, or some potentate having conquered Europe, would

from Paris, Berlin, or Rome, draw a railway map and regulate the hours of the trains. The Russian Tsar Nicholas I. dreamt of such a power. When he was shown rough drafts of railways between Moscow and Petersburg, he seized a ruler and drew on the map of Russia a straight line between these two capitals, saying, “Here is the plan.” And the road was built in a straight line, filling in deep ravines, building bridges of a giddy height, which had to be abandoned a few years later, after the railway had cost about 120,000 to 150,000 per English mile.

得到这样的结果有两种方法。拿破仑、俾斯麦或者某个征服了整个欧洲的君主，可以从巴黎、柏林或罗马画一张铁路图，并定好火车的时刻表。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一世曾梦想拥有这样的权利。当人们给他看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铁路的草图时，他抓起一把尺子，在俄罗斯地图上画了一条直线，连接这两个首都，然后说：“这就是我的计划。”这条铁路真的修成了一条直线。人们填平了深深的峡谷，也建起令人眩晕的大桥。然而铁路的造价每英里高达12到15万英镑，几年后不得不放弃。

This is one way, but happily things were managed differently. Railways were constructed piece by piece, the pieces were joined together, and the hundred different companies, to whom these pieces belonged, gradually came to an understanding concerning the arrival and departure of their trains, and the running of carriages on their rails, from all countries, without unloading merchandise as it passes from one network to another.

这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幸运的是，人们采取了另一种方法。铁路是一段一段的，段段相连，各段铁路所属的上百家不同的公司逐渐达

成了协议。协议涉及各家列车的出发和到站时间，此外，协议还规定，从铁路上通过的各国列车，在经过某条铁路线驶往另外的铁路线时，不必把货物卸下。

All this was done by free agreement, by exchange of letters and proposals, and by congresses at which delegates met to discuss well specified special points, and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about them, but not to make laws. After the congress was over, the delegates returned to their respective companies, not with a law, but with the draft of a contract to be accepted or rejected.

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自由协议完成的。大家互相通信，交换意见；或者通过会议，代表们聚在一起讨论具体问题，就这些具体问题达成协议，而不是制定出法律。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回到各自的公司，手里拿的不是法律，而是合同的草案。公司可以接受该草案，也可以将其驳回。

Of course difficulties were met in the way. There were obstinate men who would not be convinced. But a common interest compelled them to agree in the end, without invoking the help of armies against the refractory members.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遇到困难。会有固执的人，你怎么都无法说服他们。你不必求助军队来解决问题，因为在共同的利益面前，这些人最终会同意。

This immense network of railways connected together, and the

enormous traffic it has given rise to, no doubt constitutes the most striking trai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it is the result of free agreement. If somebody had foretold it eighty years ago, our grandfathers would have thought him idiotic or mad. They would have said: “Never will you be able to make the shareholders of a hundred companies listen to reason! It is a Utopia, a fairy tale. A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an 'iron' dictator, can alone enforce it.'

庞大的铁路网络连接在一起，铁路带来了繁忙的交通，这些都是19世纪最显著的特征；而且这些都是自由协议的结果。假如80年前有人做了这样的预言，我们的祖父们会把他当成傻子或疯子。他们会说：“你永远无法让一百家公司的股东都来听道理。这是乌托邦，是童话故事。只有由铁腕的独裁者领导的中央政府才能强制他们。”

And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in this organization is, that there is no European Central Government of Railways! Nothing! No minister of railways, no dictator, not even a continental parliament, not even a directing committee! Everything is done by free agreement.

最有趣的是，这个组织里根本没有管理铁路的欧洲中央政府什么都没有没有铁路大臣，没有独裁者，甚至连大陆议会或指导委员会都没有！所有一切都是按照自由协议进行的。

So we ask the believers in the State, who pretend that “we can never do without a central Government, were it only for regulating the traffic,” we ask them: “But how do European railways manage without them? How do they continue to convey millions of

travellers and mountains of luggage across a continent? If companies owning railways have been able to agree, why should railway workers, who would take possession of railways, not agree likewise? And if the Petersburg-Warsaw Company and that of Paris-Belfort can act in harmony, without giving themselves the luxury of a common commander, why, in the midst of our societies, consisting of groups of free workers, should we need a Government?”

于是我们就问那些相信政府的人，他们虚伪地说：“我们离不开中央政府，即便政府只是管理交通。”我们追问道：“那么欧洲铁路没有中央政府是怎么运营的呢？它是怎么把数百万旅客和堆成山的行李从大陆的一边运送到另一边的呢？既然铁路所属的公司能够达成协议，那么为什么将来铁路的主人——铁路工人们，不能同样达成协议呢？既然圣彼得堡——华沙线的铁路公司和巴黎——贝尔福线的铁路公司在没有共同的指挥官的情况下能够和谐共事，我们由自由工人组成的社会要政府干什么呢？”

II

二

When we endeavour to prove by examples that even to-day, in spite of the iniquitous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s a whole, men, provided their interests be not diametrically opposed, agree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authority, we do not ignore the objections that will be put forth.

一方面，我们努力用实例证明，尽管今天整个社会的组织极不公

正，人们在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可以无需政府干预而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对别人提出的反对意见视而不见。

All such examples have their defective side,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to quote a single organization exempt from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weak by the strong, the poor by the rich. This is why the Statists will not fail to tell us with their wonted logic: “You see that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tate is necessary to put an end to this exploitation!”

因为引用的组织都存在强者剥削弱者、富人剥削穷人的情况，我们的例子都有缺陷。因此，主张中央集权的人总是会用他们惯常的逻辑告诉我们：“你们看，要消灭剥削，还需进行政府干预！”

Only they forget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y do not tell us to what extent the State itself has contributed towards the existing order by creating proletarians and delivering them up to exploiters. They forget to prove u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put an end to exploitation while the primal causes—private capital and poverty, two-thirds of which are artificially created by the State—continue to exist.

但是，他们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正是政府制造出无产阶级并把他们交给剥削者，这样才造就了现在的社会秩序。他们忘记告诉我们，在剥削的首要原因——私有资本和贫穷——继续存在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消灭剥削，而且，政府人为制造了三分之二的穷人。

When we speak of the accord established among the railway companies, we expect them, the worshippers of the bourgeois State, to say to us: “Do you not see how the railway companies oppress and ill- use their employees and the travellers! The only way is, that the State should intervene to protect the workers and the public!”

当我们提到铁路公司之间达成的协议时，估计那些资产阶级政府的崇拜者会说：“难道你看不见铁路公司对员工和乘客的压迫和虐待吗？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介入，保护工人和公众！”

But have we not said and repeated over and over again, that as long as there are capitalists, these abuses of power will be perpetuated? It is precisely the State, the would-be benefactor, that has given to the companies that monopoly and those rights upon us which they possess to-day. Has it not created concessions, guarantees? Has it not sent its soldiers against railwaymen on strike? And during the first trials (quite lately we saw it still in Russia), has it not extended the privilege of the railway magnates as far as to forbid the Press to mention railway accidents, so as not to depreciate the shares it guaranteed? Has it not favoured the monopoly which has anointed the Vanderbilts and the Polyakoffs, the directors of the P. L. M. , the C. P. R. , the St. Gothard, “the kings of our days”?

难道我们没有一次次地重申过，只要有资本家，像这样滥用权力的现象就会永远存在吗？恰恰是常以施恩者自诩的政府，给了这些公司今天拥有的垄断地位和其他特权。创造特许经营权和保证制度的不正是政府吗？派士兵镇压铁路工人罢工的不正是政府吗？在最初铁路试运行期间，政府为了不让自己担保的股票价格下跌，就给那些铁路

巨头更多的特权，甚至禁止报纸报道铁路事故。政府也允许了范德比尔特家族、波利亚科夫家族、P. L. M. 公司的董事们、C. P. R. 公司以及圣哥萨德公司的垄断行为。正是垄断使他们成了神，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国王”。

Therefore, if we give as an example the tacit agreement come to between railway companies, it is by no means as an ideal of economical management, nor even an ideal of technical organization. It is to show that if capitalists, without any other aim than that of augmenting their dividends at other people's expense, can exploit railways successfully without establishing an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societies of working men will be able to do it just as well, and even better, without nominating a Ministry of European railways.

因此，我们所说的铁路公司之间达成的默契，绝对不是经济管理的理想范例，甚至连技术组织的理想范例都算不上。这个例子只是表明，如果资本家的目的只是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增加自己的红利的话，无需成立“国际部委”也能从铁路上面获取丰厚利润——不组建“欧洲铁道部”，工人团体也会把工作做好，甚至更好。

Another objection is raised that is more serious at first sight. We may be told that the agreement we speak of is not perfectly free, that the large companies lay down the law to the small ones. It might be mentioned, for example, that a certain rich German company, supported by the State, compel travellers who go from Berlin to Bale to pass via Cologne and Frankfort, instead of taking the Leipzig route; or that such a company carries goods a hundred and thirty miles in a roundabout way (on a long distance) to favour

its influential shareholders, and thus ruins the secondary li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vellers and goods are sometimes compelled to travel impossibly circuitous routes so that dollars may flow into the pocket of a Vanderbilt.

另外一种反对意见，乍一看似乎更严重。有人可能会说，我们提到的协议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总是大公司为小公司制定规矩。比如，有人可能会说，某个财力雄厚的德国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强迫从柏林到巴塞尔的旅客取道科隆和法兰克福，而不走莱比锡线；或者说这样的公司运送货物时，为了有影响力的大股东的利益，绕道走了130英里，从而使备选线路衰落。在美国，为了让美元进入范德比尔特这样的铁路大亨的口袋，旅客和货物都常常被迫绕远路。

Our answer will be the same: As long as Capital exists, the Greater Capital will oppress the lesser. But oppression does not result from Capital only. It is also owing to the support given them by the State, to monopoly created by the State in their favour, that the large companies oppress the small ones.

我们的答案还是一样的：只要有资本存在，大资本就会压迫小资本。但是单单凭借资本不足以造成压迫。大公司之所以能压迫小公司，还要靠政府的支持以及政府出台的对大公司有利的垄断政策。

The early English and French Socialists have shown long since how English legislation did all in its power to ruin the small industries, drive the peasant to poverty, and deliver over to wealthy industrial employers battalions of men, compelled to work for no matter what salary. Railway legislation did exactly the same.

Strategic lines, subsidized lines, companies which received the International Mail monopoly, everything was brought into play to forward the interests of wealthy financiers. When Rothschild, creditor to all European States, puts capital in a railway, his faithful subjects, the ministers, will do their best to make him earn more.

很久之前，英、法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就向我们表明，英国政府的立法是如何竭尽所能打垮小工业、让农民贫困不堪，然后再把大批被迫成为廉价劳动力的人送到有钱的大工业主手里的。铁路立法的功能完全相同。战略线路、补助线路，还有那些取得国际邮政垄断权的公司，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财大气粗的金融家带来收益。如果罗思柴尔德，这个所有欧洲国家的债主，在某个铁路投资了，那么他忠实的臣民，那些部长们，会尽力让他赚更多的钱。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Democracy that authoritarians hold up to us as an ideal, the most scandalous fraudulency has crept into everything that concerns railroads. Thus, if a company ruins its competitors by cheap fares, it is often enabled to do so because it is reimbursed by land given to it by the State for a gratuity. Documents recently published concerning the American wheat trade have fully shown up the part played by the State in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weak by the strong. Here, too, the power of accumulated capital has increased tenfold and a hundredfold by means of State help. So that, when we see syndicates of railway companies (a product of free agreement) succeeding in protecting their small companies against big ones, we are astonished at the intrinsic force of free agreement that can hold its own against all-powerful Capital favoured by the State.

在美国，在这被权力主义者奉为民主典范的国家里，只要和铁路有关的东西，都充斥着可耻的欺诈。因此，如果某家公司通过低价来打垮竞争对手，那通常是这家公司得到了政府赠予的作为补偿的土地。最近公布的美国小麦贸易方面的文件充分表明了政府在强者剥削弱者过程中的作用。同样，累积的资本的力量在政府的帮助下增加了十倍、一百倍。因此，当我们看到，铁路公司联合组成的辛迪加（这是自由协议的产物）成功地保护小公司不受大公司压迫，我们会惊叹于自由协议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居然能和政府支持的无所不能的资本相抗衡。

It is a fact that little companies exist, in spite of the State's partiality. If in France, land of centralization, we only see five or six large companies, there are more than a hundred and ten in Great Britain who agree remarkably well, and who are certainly better organized for the rapid transit of travellers and goods than the French and German companies.

尽管政府偏袒大公司，小公司还是在生存着，这是事实。如果说在法国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只有五六个大公司的话，那么在英国就有110家公司。这些英国公司之间有默契的协议，它们的组织肯定要比法国和德国的公司更加得力，能够快速运送旅客和货物。

Moreover, that is not the question. Large Capital, favoured by the State, can always, if it be to its advantage, crush the lesser one. What is of importance to us is this: The agreement between hundreds of capitalist companies to whom the railways of Europe belong, was established without intervention of a central government to lay down the law to the divers societies; it has subsisted by means of congresses composed of delegates, who

discuss among themselves, and submit proposals, not laws, to their constituents. It is a new principle that differs completely from all governmental principle, monarchical or republican, absolute or parliamentarian. It is an innovation that has been timidly introduced into the customs of Europe, but has come to stay.

而且，问题还不在于此。政府支持的大资本，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会压垮小资本。而我们所看重的是：铁路所属的数百家资本主义公司之间的协议，是在没有中央政府干预、没有中央政府为各个团体制定法律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协议是通过代表组成的议会存在的，代表们一起讨论，然后把提议，而不是法律，呈递给“选民”，也就是他们所属的公司。这是一个新的原则，与所有的政府运作原则都不同，不论是君主制的政府还是共和制的政府，不论是强权制的政府还是议会制的政府。这是一种创新，它曾被小心翼翼地引入到欧洲的惯例中，但是最终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III

三

How often have we not read in the writings of State-loving Socialists: “Who, then, will undertake the regulation of canal traffic in the future society? Should it enter the mind of one of your Anarchist 'comrades' to put his barge across a canal and obstruct thousands of boats, who will force him to reason?”

在那些热爱政府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里，我们曾多少次读到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政府的话，谁会在未来社会里承担管理运河交通的任务呢？假如有一个你们无政府主义的‘同志’把自己的驳船横在运

河中央，堵住数千只小船，谁又能去让他讲道理呢？”

Let us confess the supposition to be somewhat fanciful. Still, it might be said, for instance: “Should a certain commune, or a group of communes, want to make their barges pass before others, they might perhaps block the canal in order to carry stones, while wheat, needed in another commune, would have to stand by. Who, then, would regulate the traffic if not the Government?”

说实话，我们觉得这种假设有点异想天开。然而，有人或许还会说：“假如某个公社，或者几个公社一起，想让自己运石头的驳船插队先通过，这就有可能堵塞河道，而另一个需要小麦的公社，就只能干等着。除了政府，还有谁会去管理交通呢？”

But real life has again demonstrated that Government can be very well dispensed with here as elsewhere. Free agreement, free organization, replace that noxious and costly system, and do better.

但是，现实生活证明，不管是在这个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没有政府，世界照常运转。自由协议和自由组织取代了有害又昂贵的政府体系，而且做得比政府更好。

We know what canals mean to Holland. They are its highways. We also know how much traffic there is on the canals. What is carried along our highroads and railroads is transported on canal-boats in Holland. There you could find cause to fight, in order to make your boats pass before others. There the Government might

really interfere to keep the traffic in order.

我们知道运河对荷兰意味着什么。运河就是荷兰的公路。我们也清楚荷兰的运河是多么地繁忙。在荷兰，运河船只来承担了我们的公路和铁路的运输重担。在那里，为了让你的船能在别人前边通过，你有理由去争去抢。在那里，政府真的会去干涉，维护交通秩序。

Yet it is not so. The Dutch settled matters in a more practical way, long ago, by founding guilds, or syndicates of boatmen. These were free associations sprung from the very needs of navigation. The right of way for the boats was adjusted by the order of inscription in a navigation register; they had to follow one another in turn. Nobody was allowed to get ahead of the others under pain of being excluded from the guild. None could station more than a certain number of days along the quay; and if the owner found no goods to carry during that time, so much the worse for him; he had to depart with his empty barge to leave room for newcomers. Obstruction was thus avoided, even though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private owners of the boats continued to exist. Were the latter suppressed, the agreement would have been only the more cordial.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荷兰人在很久以前就用更实用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他们成立了行业协会，或者说是船夫组成的辛迪加。这正是出于航行的需要自发形成的自由协会。所有船只都要按着航行登记簿上面的次序，排队依次通行，谁都不能插队。只要插队，就会被行业协会开除。船在码头停留超过规定的天数之后就必须离开；如果船东在此期间没有拉到货物，就更不幸了，必须空船离开，为新来的船只腾出位置。这样虽然私有船东之间的竞争还在，但是却避免了拥堵。如

果连竞争都能压制的话，那这样的协议就更好了。

It is unnecessary to add that the shipowners could adhere or not to the syndicate. That was their business, but most of them elected to join it. Moreover, these syndicates offered such great advantages that they spread also along the Rhine, the Weser, the Oder, and as far as Berlin. The boatmen did not wait for a great Bismarck to annex Holland to Germany, and to appoint an Ober Haupt General Staats Canal Navigation's Rath (Supreme Head Councillor of the General States Canal Navigation), with a number of gold stripes on his sleeves, corresponding to the length of the title. They preferred coming to an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Besides, a number of shipowners, whose sailing-vessels ply between Germany and Scandinavia, as well as Russia, have also joined these syndicates, in order to regulate traffic in the Baltic, and to bring about a certain harmony in the chass -crois of vessels. These associations have sprung up freely, recruiting volunteer adherents, and have nought in common with governments.

船东可以加入辛迪加，也可以不加入，这一点无须再说。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大多数船东都选择加入。此外，辛迪加能提供很多巨大的好处，因此已经推广到了莱茵河、威悉河和奥得河，甚至是柏林。船夫们并没有等着出现一位像俾斯麦那样的伟大人物，把荷兰并入德国，也没有等着任命袖子上金色条饰的数量与头衔长度相对应的“万国运河航行最高主管”。他们更希望达成国际协议。另外，有些船东的船只往来于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之间，为了管理波罗的海的交通，让船只的航行和谐有序，这些船东也加入了辛迪加。这些协会都是自发的，协会成员都是自愿加入，与政府组织截然不同。

It is, however,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here too greater capital oppresses lesser. Maybe the syndicate has also a tendency to become a monopoly, especially where it receives the precious patronage of the State that surely did not fail to interfere with it. Let us not forget either, that these syndicates represent associations whose members have only private interests at stake, and that if at the same time each shipowner were compelled—by the socializing of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exchange—to belong to federated Communes, or to a hundred other associations for the satisfying of his needs, things would have a different aspect. A group of shipowners, powerful on sea, would feel weak on land, and they would be obliged to lessen their claims in order to come to terms with railways, factories, and other groups.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协会里，也很有可能出现大资本压迫小资本的情况。或许辛迪加也具有成为垄断组织的倾向，特别是得到了政府宝贵资助、面临政府干涉的辛迪加。我们还要记住，辛迪加这样的协会的会员涉及的仅仅是个人利益，假如在生产、消费和交易全部社会化之后，所有船东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全都被迫加入联合公社或其他种种协会组织的话，情况就不同了。在海上很强大的船东们，到了陆地上就会感到不够强大。于是，为了和铁路、工厂以及其他团体达成一致，他们不得不减少他们的要求。

At any rate, without discussing the future, here is another spontaneous association that has dispensed with Government. Let us quote more examples.

姑且不论将来，上面讲的又是一个脱离了政府的自发组成协会的例子。我们再举一些例子。

As we are talking of ships and boats, let us mention one of the most splendid organizations tha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s brought forth, one of those we may with right be proud of—the English Lifeboat Association.

既然我们在讲大小船只，那就再讲一些19世纪最辉煌的组织，其中就有值得我们自豪的英国救生艇协会。

It is known that every year more than a thousand ships are wrecked on the shores of England. At sea a good ship seldom fears a storm. It is near the coasts that danger threatens—rough seas that shatter her stern- post, squalls that carry off her masts and sails, currents that render her unmanageable, reefs and sand banks on which she runs aground.

我们知道，每年有超过1000艘船只在英国海岸失事。在海上，好的船只并不惧怕风浪。在靠近海岸的地方最容易遇到危险：那足以击碎船尾柱的汹涌浪涛，吹走桅杆和船帆的狂风，让船只失控的水流，还有让船搁浅的暗礁和浅滩。

Even in olden times, when it was a custom among inhabitants of the coasts to light fires in order to attract vessels on to reefs, in order to plunder their cargoes, they always strove to save the crew. Seeing a ship in distress, they launched their boats and went to the rescue of shipwrecked sailors, only too often finding a watery grave themselves. Every hamlet along the sea shore has its legends of heroism, displayed by woman as well as by man, to save crews in

distress.

在远古时代，岸边的居民常常点火引诱船只触礁，然后抢夺船上的货物。即使是那时，人们也总是努力抢救船员。看到船只遇险，他们发动自己的小船去营救失事的船员，但他们自己却常常葬身水底。海边的每个小村庄都有抢救失事船员的英雄传说，这些英雄有男有女。

No doubt the State and men of science have done something to diminish the number of casualties. Lighthouses, signals, charts, meteorological warnings have diminished them greatly, but there remains a thousand ships and several thousand human lives to be saved every year.

毫无疑问，政府和科学家在减少人员伤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灯塔、信号、航海图还有气象预警大大降低了伤亡，但是每年仍需要营救上千船只、数千生命。

To this end a few men of goodwill put their shoulders to the wheel. Being good sailors and navigators themselves, they invented a lifeboat that could weather a storm without being torn to pieces or capsizing, and they set to work to interest the public in their venture, to collect the necessary funds for constructing boats, and for stationing them along the coasts, wherever they could be of use.

为了营救失事船只和人员，几个好心人开始了行动。这些人都是优秀的水手和领航员。他们发明的救生艇，能乘风破浪，不会被风浪

撕碎，也不会倾覆。他们努力激起公众对其事业的兴趣，筹集资金建造救生艇，并将救生艇停靠在海岸边需要的地方。

These men, not being Jacobins, did not turn to the Government. They understood that to bring their enterprise to a successful issue they must have the co-operation, the enthusiasm, the local knowledge, and especially the self-sacrifice of the local sailors. They also understood that to find men who at the first signal would launch their boat at night, in a chaos of waves, not suffering themselves to be deterred by darkness or breakers, and struggling five, six, ten hours against the tide before reaching a vessel in distress—men ready to risk their lives to save those of others—there must be a feeling of solidarity, a spirit of sacrifice not to be bought with galloon. It was therefore a perfectly spontaneous movement, sprung from agreement and individual initiative. Hundreds of local groups arose along the coasts. The initiators had the common senses not to pose as masters. They looked for sagacity in the fishermen's hamlets, and when a rich man sent 1,000 to a village on the coast to erect a lifeboat station, and his offer was accepted, he left the choice of a site to the local fishermen and sailors.

这些人不是雅各宾派，也没有求助于政府。他们明白，想让事业成功，必须靠当地水手的合作、热情以及对当地的了解，特别是自我牺牲精神。他们也清楚，他们要找的人收到信号立刻就能在夜里迎着大浪开船出发，不畏惧黑暗或浪花，在波涛里奋战五六个甚至十个小时才能达到遇险船只跟前，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去营救别人。要找到这样的人必须有团结的精神，必须有牺牲的精神，这是金银绶带买不来的。因此，这完全是自发的行动，来源于个人意愿和主动性。沿着海岸出现了数百个这样的团体。团体的发起者明白事理，从不以主人自

居。他们在渔村寻找贤明的人。如果某个富人给某个岸边的村庄1000英镑成立救生站，得到村民同意后，就把选址的工作交给当地的渔夫和村民。

Models of new boats were not submitted to the Admiralty. We read in a Report of the Association: “As it is of importance that life-boatmen should have full confidence in the vessel they man, the Committee will make a point of constructing and equipping the boats according to the life-boatmen's expressed wish.” In consequence every year brings with it new improvements.

也不必上交到英国海军部报批新船的款式。该协会的一个报告中曾这么写道：“由于救生艇艇员必须对所驾驶的救生艇只有足够的信心，本委员会决定必须按艇员的意见建造和装备救生艇。”结果，救生艇每年都会有新的改进。

The work is wholly conducted by volunteers organizing in committees and local groups; by mutual aid and agreement!—Oh, Anarchists! Moreover, they ask nothing of the ratepayers, and in a year they may receive 40,000 in spontaneous subscriptions.

所有的工作都是通过互助和协议由组成委员会和地方团体的志愿者完成的！噢！无政府主义者！此外，他们每年收到的自发捐助达四万英镑，不要纳税人一分钱。

As to the results, here they are: In 1891 the Association possessed 293 lifeboats. The same year it saved 601 shipwrecked

sailors and 33 vessels. Since its foundation it has saved 32,671 human beings.

至于他们的成果，看看吧：1891年，协会拥有救生艇293艘。同年，营救失事船员601名、船只33艘。从成立至今，协会成功营救人员共计32,671名。

In 1886, three lifeboats with all their men having perished at sea, hundreds of new volunteers entered their names, organized themselves into local groups, and the agitation resul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wenty additional boats. As we proceed, let us note that every year the Association sends to the fishermen and sailors excellent barometers at a price three times less than their sale price in private shops. It propagates meteorological knowledge, and warns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the sudden changes of weather predicted by men of science.

1886年，三艘救生艇及艇上所有船员在海上遇难。之后就有数百名新志愿者报名，组成了当地团体。在志愿者积极参与的浪潮下，又新建了20艘救生艇。我们还要注意，协会每年都要给渔民和船员发放优质的晴雨表，价钱不到私人商店售价的三分之一。晴雨表不仅普及气象知识，还能在科技人员预测天气突变时，给相关的团体发出预警。

Let us repeat that these hundreds of committees and local groups are not organized hierarchically, and are composed exclusively of volunteers, lifeboatmen, and people interested in the work. The Central Committee, which is more of a centre for

correspondence, in no wise interferes.

我们再次强调，这些数以百计的委员会和地方团体都不是按等级组成的，它们的成员都是志愿者、救生艇艇员以及对该事业感兴趣的人。救生艇协会的中央委员会更像是一个通信中心，绝对不会干涉各委员会和地方团体的工作。

It is true that when a voting on some question of education or local taxation takes place in a district, these committees of the National Lifeboat Association do not, as such, take part in the deliberations—a modesty, which unfortunately the members of elected bodies do not imitate.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brave men do not allow those who have never faced a storm to legislate for them about saving life. At the first signal of distress they rush to their boats, and go ahead. There are no embroidered uniforms, but much goodwill.

如果某个区就教育和地方税收问题要进行投票，全国救生艇协会的各委员会绝对不会参与这些问题的研究讨论——这是一种谦虚。然而不幸的是，我们选举产生的机构的成员却不去效仿这种谦虚。但是，反过来，这些勇敢的人同样也不允许那些从未面对过风浪的外行人为他们的救人行动制定法律。看到遇险的信号，他们冲向船只，立刻就出发。他们没有缀满徽章绶带的制服，却有着仁爱和善良。

Let us take another society of the same kind, that of the Red Cross. The name matters little; let us examine it.

现在我们将讲到另外一个团体——红十字会。名字并不重要，我们仔细看看它的内容。

Imagine somebody saying fifty years ago: “The State, capable as it is of massacring twenty thousand men in a day, and of wounding fifty thousand more, is incapable of helping its own victims; consequently, as long as war exists private initiative must intervene, and men of goodwill must organize internationally for this humane work!” What mockery would not have met the man who would have dared to speak thus! To begin with, he would have been called a Utopian, and if that did not silence him he would have been told: “What nonsense! Your volunteers will be found wanting precisely where they are most needed, your volunteer hospitals will be centralized in a safe place, while everything will be wanting in the ambulances. Utopians like you forget the national rivalries which will cause the poor soldiers to die without any help.” Such disheartening remarks would have only been equalled by the number of speakers. Who of us has not heard men hold forth in this strain?

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在50年前这样说：“一场战役中，国家一天要牺牲两万人，伤残五万多人，但是却没有能力救助战争中的受害者；因此，只要存在着战争，个人必须主动干预，为了人道主义的事业，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必须组织起来”。人们会如何嘲笑说这番话的人呢？首先，人们会给他戴上空想主义者的帽子。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他封口，人们会告诉他：“简直是废话！你的那些志愿者，需要他们的地方找不到人影，你的志愿者医院集中在安全的地方，野战医院里更是什么都没有。可怜的士兵得不到救助而牺牲，这是国家之间对抗的必然结果，你这样的空想主义者怎会记得这样的事。”这样的话真是让人丧气，而且这样说的人竟然会有那么多，我们当中又有谁没有

听过这样的论调呢？

Now we know what happened. Red Cross societies organized themselves freely, everywhere, in all countries, in thousands of localities; and when the war of 1870-1 broke out, the volunteers set to work. Men and women offered their services. Thousands of hospitals and ambulances were organized; trains were started carrying ambulances, provisions, linen, and medicaments for the wounded. The English committees sent entire convoys of food, clothing, tools, grain to sow, beasts of draught, even steam-ploughs with their attendants to help in the tillage of departments devastated by the war! Only consult La Croix Rouge, by Gustave Moynier, and you will be really struck by the immensity of the work performed.

我们现在都知道之后发生的事情。红十字会团体都是自由组织，他们无处不在。所有的国家，数千个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1870年到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时，志愿者参与了救助。提供志愿服务的有男有女，他们组织了数千家医院和野战医院；火车拉着救护车、给养、纱布和药品驶向伤员。国际红十字会英国委员会赠送了整车的食品、衣物、工具、谷物种子还有驮畜，甚至还有蒸汽犁及其操作人员，帮助耕耘因战争而荒芜的土地。读一下古斯塔夫·莫瓦尼埃 [12_1] 写的《红十字会》，你就会为该组织所做的工作惊叹不已。

As to the prophets ever ready to deny other men,s courage, good sense, and intelligence, and believing themselves to be the only ones capable of ruling the world with a rod, none of their predictions were realized. The devotion of the Red Cross volunteers was beyond all praise. They were only too eager to occupy the most

dangerous posts; and whereas the salaried doctors of the Napoleonic State fled with their staff when the Prussians approached, the Red Cross volunteers continued their work under fire, enduring the brutalities of Bismarck's and Napoleon's officers, lavishing their care on the wounded of all nationalities. Dutch, Italians, Swedes, Belgians, even Japanese and Chinese agreed remarkably well. They distributed their hospitals and their ambulance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occasion. They vied with one another especially in the hygiene of their hospitals. And there is many a Frenchman who still speaks with deep gratitude of the tender care he received from the Dutch or German volunteers in the Red Cross ambulances. But what is this to an authoritarian? His ideal is the regiment doctor, salaried by the State. What does he care for the Red Cross and its hygienic hospitals, if the nurses be not functionaries!

至于那些所谓的预言家，他们否定他人的勇气、判断力和智慧，认为只有自己能用大棒统治世界。这些人的预言没有一条成为现实。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渴望到最危险的岗位；当普鲁士人逼近时，那些拿着法兰西第二帝国俸禄的医生和他们的随员一哄而散，只有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还在炮火下坚持工作。他们忍受着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手下军官的粗暴，给各国的伤员以慷慨无私的爱。红十字会中的荷兰人、意大利人、瑞典人、比利时人还有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协同一致。他们根据形势的需要派送医院及野战医院。在医院的卫生工作方面，他们更是争先恐后。现在还有许多法国人心怀感激地讲述他们在红十字会的野战医院受到荷兰或德国志愿者的悉心照料的往事。但这对权力主义者来说又算什么呢？他的理想就是由受国家俸禄的军医救助伤员。如果那些护士不是公职人员的话，不管红十字会多么出色、其所属医院卫生状况多么良好，他都不会在乎！

Here is then an organization, sprung up but yesterday, and which reckons its members by hundreds of thousands; possesses ambulances, hospital trains, elaborates new processes for treating wounds, and so on, and is due to the spontaneous initiative of a few devoted men.

于是有了这么一个组织，它刚刚组建，却有数十万成员；该组织有战地医院、医疗救护列车，运用新疗法处理伤病。这个组织是几个全心奉献的人自发行动的结果。

Perhaps we shall be told that the State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is organization. Yes, States have laid hands on it to seize it. The directing committees are presided over by those whom flunkeys call princes of the blood. Emperors and queens lavishly patronize the national committees. But it is not to this patronage that the success of the organization is due. It is to the thousand local committees of each nation; to the activity of individuals, to the devotion of all those who try to help the victims of war. And this devotion would be far greater if the State did not meddle with it.

或许有人会告诉我们这个组织和政府有关。是的，是有关系，政府想把它据为己有。那些被穿制服的奴才们称作“嫡传王子”的人主持指导委员会，国王和王后经常慷慨地资助全国委员会。但是，该组织的成功并不是靠着皇室的资助。它的成功靠的是各个国家里数以千计的地方委员会；靠的是个人的努力，靠的是那些想救助战争受害者的人的奉献。如果政府不插手的话，他们会奉献更多。

In any case, it was not by the order of an International

Directing Committee that Englishmen and Japanese, Swedes and Chinamen, bestirred themselves to send help to the wounded in 1871. It was not by order of an international ministry that hospitals rose on the invaded territory and that ambulances were carried on to the battlefield. It was by the initiative of volunteers from each country. Once on the spot, they did not get hold of one another by the hair as was foreseen by the Jacobinists of all nations; they all set to work without distinction of nationality.

无论如何，英国人、日本人、瑞典人和中国人自发地去救助伤员，绝对不是因为某个“国际指导委员会”的命令。医院出现在沦陷的土地上，野战医院出现在战场上，绝对不是“国际部委”的命令。这些都是因为各个国家志愿者的主观能动性。一旦到达现场，他们就不分国籍立刻投入工作，而不是像雅各宾派所预料的那样，互相抓头发扭打成一团。

We may regret that such great efforts should be put to the service of so bad a cause, and we may ask ourselves like the poet's child: “Why inflict wounds if you are to heal them afterwards?” In striving to destroy the power of capitalist and middle-class authority, we work to put an end to the massacres called wars, and we would far rather see the Red Cross volunteers put forth their activity to bring about (with us) the suppression of war; but we had to mention this immense organization as another illustration of results produced by free agreement and free aid.

我们会感到遗憾这么伟大的努力竟然用来服务战争。我们像诗人的孩子问自己：“既然后来要治伤，那么为什么还要把人弄伤呢？”要破坏资本家和中产阶级的强权，我们必须要消灭战争这样的大屠杀。

我们更愿意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和我们一起努力来消灭战争。但是，为了表明自由协议和自由救助的成果，我们还得提到红十字会这个庞大的组织。

If we wished to multiply examples taken from the art of exterminating men we should never end. Suffice to quote the numerous societies to which the German army owes its force, that does not only depend on discipline, as is generally believed. I mean the societies whose aim is to propagate military knowledge.

如果我们想找更多来自于战争的自由协议方面的例子的话，那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只需要说说那些让德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团体就够了。人们通常认为德军战斗力靠的是纪律，其实不然。我说的是那些普及军事知识的团体。

At one of the last congresses of the Military Alliance (Kriegerbund), delegates from 2,452 federated societies, comprising 151,712 members, were present. But there are besides very numerous Shooting, Military Games, Strategical Games, Topographical Studies Societies—these are the workshops in which the technical knowledge of the German army is developed, not in regimental schools. It is a formidable network of all kinds of societies, including military men and civilians, geographers and gymnasts, sportsmen and technologists, which rise up spontaneously, organize, federate, discuss, and explore the country. It is these voluntary and free associations that go to make the real backbone of the German army.

在最近举行的德国军人联盟的一次大会上，来自2,452个联合团体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些团体的会员总数达到了151,712名。但是，除了射击、军事、战略和地形学研究团体外，一些研发德军技术的团体也参加了会议。这是一个由各类团体组成的无比庞大的体系，包括军人和平民，地理学家和体育专家，运动员和技术人员。德军的技术并不是在军队院校里研发的，而是这些人自发地组织、联合起来，一起讨论，一起到全国各地探险的结晶。这些自愿、自由的协会才是德国军队的真正骨干。

Their aim is execrable. It i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Empire. But what concerns us, is to point out that, in spite of military organization being the “Great Mission of the State,” success in this branch is the more certain the more it is left to the free agreement of groups and to the free initiative of individuals.

他们的目的让人憎恶。他们要维持帝国的存在。但是，我们要指出，尽管军事组织是“政府的伟大使命”，军事部门越是依赖于各团体的自由协议和个人的主动性，成功的概率就越大。

Even in matters pertaining to war, free agreement is thus appealed to; and to further prove our assertion let us mention the Volunteer Topographers' Corps of Switzerland who study in detail the mountain passages, the Aeroplane Corps of France, the three hundred thousand British volunteers, the British National Artillery Association, and the Society, now in course of organization, for the defence of England's coasts, as well as the appeals made to the commercial fleet, the Bicyclists' Corps, and the new organizations of private motorcars and steam launches.

即使是在与战争相关的事务中，人们也依赖自由协议；为了进一步证明我们的观点，再提一些团体的名字：如对山路仔细研究的瑞士地形考察志愿队、法国飞行队、英国的30万志愿者、英国国家炮兵协会、正在组建中的保护英国海岸的团体、商船队、自行车队还有私人汽车和汽艇的新组织。

Everywhere the State is abdicating and abandoning its holy functions to private individuals. Everywhere free organization trespasses on its domain. And yet, the facts we have quoted give us only a glimpse of what free government has in store for us in the future when there will be no more State.

在所有领域，政府都在把自己的神圣职责让位给个人。在所有领域，自由的组织都在闯入政府的领地。然而，我们所举的这些实例，与未来没有政府情况下的自治所具备的潜力相比，只是冰山一角罢了。

[12_1].古斯塔夫·莫瓦尼埃（Gustave Moynier），与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同为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

CHAPTER XII OBJECTIONS

第十二章　反对观点

I

一

Let us now examine the principal objections put forth against Communism. Most of them are evidently caused by a simple misunderstanding, yet they raise important questions and merit our attention.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针对共产主义提出的主要的反对观点吧。多数反对观点明显源自无知的误解。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It is not for us to answer the objections raised by authoritarian Communism—we ourselves hold with them. Civilized nations have suffered too much in the long, hard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individual, to disown their past work and to tolerate a Government that would make itself felt in the smallest details of a citizen's life, even if that Government had no other aim than the good of the community. Should an authoritarian Socialist society ever succeed in establishing itself, it could not last; general discontent would soon force it to break up, or to reorganize itself on principles of liberty.

我们并不需要回答独裁共产主义提出的反对观点，因为我们自己也赞同这些观点。文明国家为了争取个体解放而进行过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它们否认他们过去工作的意义，容忍一个对公民生活的细枝末节都要干涉的政府，哪怕这个政府的唯一目标就是造福于全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文明国家已经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即使一个独裁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建立，也不能持久。人民的普遍不满会使它快速解体，或者按照自由的原则进行重组。

It is of an Anarchist-Communist society we are about to speak, a society that recognizes the absolute liberty of the individual, that does not admit of any authority, and makes use of no compulsion to drive men to work. Limiting our studies to the economic side of the question, let us see if such a society, composed of men as they are to-day, neither better nor worse, neither more nor less industrious, would have a chance of successful development.

我们即将要讨论的是无政府主义一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承认个体的绝对自由，不允许有任何权威存在，也不强迫人们去工作。由于我们的研究仅限于这个问题的经济学方面，因此，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社会一一其成员就是该社会目前的成员，既不更好，也不更坏，既不更勤劳，也不更懒惰一一是否有机会成功发展。

The objection is known. “If the existence of each is guaranteed, and if the necessity of earning wages does not compel men to work, nobody will work. Every man will lay the burden of his work on another if he is not forced to do it himself. “Let us first note the incredible levity with which this objection is raised, without even realizing that the real question raised by this objection is merely to know, on the one hand, whether you effectively obtain by wage-

work, the results that are said to be obtained, and, on the other hand, whether voluntary work is not already now more productive than work stimulated by wages. A question which, to be dealt with properly, would require a serious study. But whereas in exact sciences men give their opinion on subjects infinitely less important and less complicated after serious research, after carefully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facts—on this question they will pronounce judgment without appeal, resting satisfied with any one particular event, such as, for example, the want of success of some communist association in America. They act like the barrister who does not see in the counsel for the opposite side a representative of a cause, or an opinion contrary to his own, but a simple nuisance,—an adversary in an oratorical debate; and if he be lucky enough to find a repartee, does not otherwise care to justify his cause.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is essential basis of all Political Economy, the study of the most favourable conditions for giving society the greatest amount of useful products with the least waste of human energy, does not advance. People either limit themselves to repeating commonplace assertions, or else they pretend ignorance of our assertions.

人尽皆知反对意见。“如果人人生活有保障，如果人们不必为了挣工资而工作，那么没有人会愿意工作。如果不是被迫去工作，每个人都将把自己的工作负担转到别人身上。”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实在是过于轻率。反对者甚至没有认识到，这一反对意见的核心问题在于明白两点：首先，是否能够通过工资劳动有效获取应当获取的成果；其次，自愿劳动现在是否没有工资劳动创造的成果多。要想解答好这个问题，必须进行认真研究。在精密科学领域，人们只有经过认真研究、仔细收集和分析资料之后，才会对某些话题发表观点，而这些话题无论在重要性还是在复杂性上都远远比不上这个问题。可是，他们却在没有任何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作出判断，

随便一件什么事情，比如美国的某个共产主义团体未能取得成功，就能让他们满意。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如同那种律师，他不把对方的辩护律师当成一项事业的代表，也听不进对方的不同意见，而是把他们视为讨厌鬼——口头辩论中的对手。如果他能幸运找到应答之辞，他就不在乎能不能进行有力地辩护。因此，对于一切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基础——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最少地浪费人力而为社会提供最大量的有用产品——的研究，始终不能取得进展。人们要么只是重复那些司空见惯的观点，要么假装不懂我们的观点。

What is most striking in this levity is that even in capitalist Political Economy you already find a few writers compelled by facts to doubt the axiom put forth by the founders of their science, that the threat of hunger is man's best stimulant for productive work. They begin to perceive that in production a certain collective element is introduced, which has been too much neglected up till now, and which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personal gain. The inferior quality of wage-work, the terrible waste of human energy in modern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labour, the ever-growing quantity of pleasure-seekers, who shift their burden on to others' shoulders, the absence of a certain animation in production tha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pparent; all this is beginning to preoccupy the economists of the “classical” school. Some of them ask themselves if they have not got on the wrong track: if the imaginary evil being, that was supposed to be tempted exclusively by a bait of lucre or wages, really exists. This heresy penetrates even into universities; it is found in books of orthodox economy.

这种轻率态度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即使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里，你也已经能够找到一些人被事实所迫，开始怀疑那些学科开创者们提出的公理了。这一理论认为，饥饿的威胁是人类从事生产的最大

动力。他们开始认识到，生产过程中会引入一种集体因素。而直到目前为止，这种集体因素还很少有人注意，但它可能比个人收益更加重要。工资劳动制度质量低下，现代农业和工业中人力大量浪费，寻欢作乐的人日益增加，这些人把自己的负担转移到别人肩上，生产过程中缺乏活力，这一点越来越明显，所有这些问题都吸引了“传统”学派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他们中的有些人自问是不是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那个想象中的大坏蛋，那个只有用金钱或者工资做诱饵才能引诱的坏家伙，是否真实存在。这种异端邪说甚至进入了大学里，正统经济学的著作里面也能见到这种学说。

But this does not prevent a great many Socialist reformers from remaining partisans of individual remuneration, and defending the old citadel of wagedom, notwithstanding that it is being delivered over stone by stone to the assailants by its former defenders.

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社会主义改革家坚定不移地支持个人计酬劳动，守卫着工资劳动的大本营。可现实情况是，之前主张工资劳动制的人正在一步步向反对者退让。

They fear that without compulsion the masses will not work.

他们担心，如果不强迫的话，民众就不会工作。

But during our own lifetime, have we not heard the same fears expressed twice? Once, by the anti-abolitionists in America before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Negroes, and, for a second time, by the Russian nobility before the liberation of the serfs? “Without the

whip the Negro will not work," said the anti-abolitionist. "Free from their master's supervision the serfs will leave the fields uncultivated," said the Russian serf-owners. It was the refrain of the French noblemen in 1789, the refrain of the Middle Ages, a refrain as old as the world, and we shall hear it every time there is a question of sweeping away an injustice. And each time actual facts give it the lie. The liberated peasant of 1792 ploughed with an eager energy, unknown to his ancestors; the emancipated Negro works more than his fathers; and the Russian peasant, after having honoured the honeymoon of his emancipation by celebrating Fridays as well as Sundays, has taken up work with an eagerness proportionate to the completeness of his liberation. There, where the soil is his, he works desperately; that is the exact word for it.

可是，在我们自己的有生之年，我们不是已经有两次听到过这样的担心吗？其中的一次是在解放黑奴之前，美国反废奴主义者感到十分担心。而另一次则是在解放农奴之前，俄国贵族感到十分担心。反废奴主义者说："没有鞭子，黑人就不会工作。"俄国的农奴主们说："没有主人的监督，农奴们就不会去耕种田地。"这是1789年法国贵族们的老调重弹，是中世纪的老调重弹。这种论调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存在，每次在我们消除不公正的时候都会听到它。而每一次，事实都证明这种论调是无稽之谈。1792年得到解放的农民，以前人从未有过的积极性耕种土地；被解放的黑奴比他们的父辈干的活更多；而俄国的农奴们，在庆祝完星期五和星期日以纪念获得自由之后，就热情高涨地开始了耕作。正是因为他们完全获得了解放，他们才表现出这种高涨的热情。在他自己的土地上，他会拼命工作，用"拼命"这个词是再合适不过了。

The anti-abolitionist refrain can be of value to slave-owners; as to the slaves themselves, they know what it is worth, as they know

its motive.

反废奴主义者的老调重弹对奴隶主是有价值的。而对奴隶们自己来说，他们知道这种论调的用途，也明白它的动机。

Moreover, who but the economists themselves taught us that while a wage-earner's work is very often indifferent, an intense and productive work is only obtained from a man who sees his wealth increase in proportion to his efforts? All hymns sung in honour of private property can be reduced to this axiom.

此外，不正是经济学家们自己告诉我们，靠工资为生的人干活质量常常不高，而只有看到自己的财富会随着劳动成比例增长的人才能够从事高强度、高产出的工作吗？所有歌颂私有财产的赞美诗都可以归结为这条公理。

For it is remarkable that when economists, wishing to celebrate the blessings of property, show us how an unproductive, marshy, or stony soil is clothed with rich harvests when cultivated by the peasant proprietor, they in nowise prove their thesis in favour of private property. By admitting that the only guarantee not to be robbed of the fruits of your labour is to possess the instruments of labour—which is true—the economists only prove that man really produces most when he works in freedom, when he has a certain choice in his occupations, when he has no overseer to impede him, and lastly, when he sees his work bringing in a profit to him and to others who work like him, but bringing in little to idlers. Nothing else can be deducted from their argumentation, and this is what we

maintain ourselves.

经济学家们想要显示私有财产的好处，因此，他们向我们展示，一块不毛的沼泽地或石头地经过自耕农的耕作之后，获得了大丰收，可这个例子完全不能证明他们支持私有财产的观点。这种现象令人称奇。经济学家们承认，唯一能够确保劳动成果不被剥夺的方式就是拥有劳动工具——这种观点是对的——可这只能证明人在自由劳动的时候，在他能够选择职业的时候，在没有监工妨碍他的时候，在他看到自己的工作能够为自己和其他像他一样工作的人带来好处，而不会让无所事事的人受益的时候，才能创造最大的劳动成果。从他们的论点中再也推导不出什么其他的东西，而我们的论点正是由此而引发。

As to the form of possession of the instruments of labour, the economists only mention it indirectly in their demonstration, as a guarantee to the cultivator that he shall not be robbed of the profits of his yield nor of his improvements. Besides, in support of their thesis in favour of private property against all other forms of possession, should not the economists demonstrate that under the form of communal property land never produces such rich harvests as when the possession is private? But this they could not prove; in fact, it is the contrary that has been observed.

有关劳动工具的拥有形式，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论证中只是间接提到，它为耕作者提供了保障，使得他的劳动成果和改良成果不会被剥夺。此外，为了支持他们有关私有财产制比其他所有制更优越的观点，难道他们不应该证明：在公共财产制度下，土地不会有在私有财产制度下那样的好收成吗？但是，这一点他们无法证明。事实上，人们看到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

Take for example a commune in the canton of Vaud, in the winter time, when all the men of the village go to fell wood in the forest, which belongs to them all. It is precisely during these festivals of labour that the greatest ardour for work and the most considerable display of human energy are apparent. No salaried labour, no effort of a private owner can bear comparison with it.

举个例子来说吧。在瑞士沃州的一个公社里，每到冬季，村里的所有人都去森林里砍伐木材，而森林为全体村民共有。正是在这些全民劳动的劳动节日里，人们体现出了最强烈的劳动热情和最大的干劲。任何付酬劳动，任何私有主的努力都无法与之相比。

Or let us take a Russian village, when all its inhabitants mow a field belonging to the commune, or farmed by it. There you will see what man can produce when he works in common for communal production. Comrades vie with one another in cutting the widest swathe, women bestir themselves in their wake so as not to be distanced by the mowers. It is a festival of labour, in which a hundred people accomplish in a few hours a work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finished in a few days had they worked separately. What a miserable contrast compared to them is offered by the work of the isolated owner!

我们也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在俄国的一个村子里，全体村民耕种一块属于公社所有的土地。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人们在共同为了公社劳动的时候创造出的巨大劳动成果。男人们相互比赛，看谁收割的庄稼面积最大，女人振作精神，紧随其后，生怕被收割者落下太远。这是一个劳动的节日，一百人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劳动任务。如果他们分散劳动的话，这些活可能好几天也完成不了。那些孤立的私

有主的工作同他们比起来实在是不值一提。

In fact, we might quote scores of examples among the pioneers of America, in Swiss, German, Russian, and in certain French villages; or the work done in Russia by gangs (artels) of masons, carpenters, boatmen, fishermen, etc. , who undertake a task and divide the produce or the remuneration among themselves without it passing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of middlemen; or else the amount of work I saw performed in English shipyards when the remuneration was paid on the same principle. We could also mention the great communal hunts of nomadic tribes, and an infinite number of successful collective enterprises. And in every case we could show the unquestionable superiority of communal work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wage-earner or the isolated private owner.

事实上，我们可以在美国的拓荒者中间，在瑞士、德国、俄国的村庄以及某些法国村庄里举出众多的例子；也可以援引俄国众多合作社（如泥瓦匠、木匠、船工、渔夫等）的工作为例，这些人共同工作，将劳动所得直接在内部进行分配，无需中间人经手；还可以援引我看到的英国船坞里的工作为例，在这里，工人们按照相同的原则领取报酬。我们还可以举出游牧民族集体狩猎以及众多其他成功的集体企业的例子。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证明，共同劳动较工薪族的劳动和孤立的私有主的劳动无疑要优越得多。

Well-being—that is to say, the satisfaction of physical, artistic, and moral needs, has always been the most powerful stimulant to work. And where a hireling hardly succeeds to produce the bare necessities with difficulty, a free worker, who sees ease and luxury

increasing for him and for others in proportion to his efforts, spends infinitely far more energy and intelligence, and obtains products in a far greater abundance. The one feels riveted to misery, the other hopes for ease and luxury in the future. In this lies the whole secret. Therefore a society aiming at the well-being of all, and at the possibility of all enjoying life in all its manifestations, will give voluntary work, which will be infinitely superior and yield far more than work has produced up till now under the goad of slavery, serfdom, or wagedom.

幸福，也就是身体、艺术和道德需求的满足，从来都是从事劳动的最大动力。雇佣劳动者可能连生产生活必需品都有困难，而自由劳动者则预见到由于自己的劳动，他本人和其他人会相应地过得更加舒适自在。因此，他会投入多得多的体力和脑力，他的劳动成果也要多得多。前者感觉到无法摆脱贫困，后者则希望将来能够舒适自在。这就是全部的秘密。因此，一个旨在让全体成员更幸福、让所有人全方位享受生活的社会，会让人们自愿劳动。这种方式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较之到目前为止，在奴隶制、农奴制、工资制的刺激下创造的劳动成果要多得多。

II

二

Nowadays, whoever can load on others his share of labour indispensable to existence does so,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it will always be so.

现在，那些但凡能够将维持生计所必需的劳动转移到别人身上的

人一定会这么做。人们相信，这种情况将永远持续下去。

Now, work indispensable to existence is essentially manual. We may be artists or scientists; but none of us can do without things obtained by manual work—bread, clothes, roads, ships, light, heat, etc. And, moreover, however highly artistic or however subtly metaphysical are our pleasures, they all depend on manual labour. And it is precisely this labour—the basis of life—that everyone tries to avoid.

而维持生计所必需的劳动本质上都是体力劳动。我们也许是艺术家，也许是科学家，但是，如果没有体力劳动的成果——面包、衣服、道路、船只、照明、取暖等等——没有人能够生存下去。而且，无论我们的喜好多么具有艺术性，多么玄妙，他们都有赖于体力劳动。可也就是这种劳动——生命的基础——人人唯恐避之而不及。

We understand perfectly well that it must be so nowadays.

我们很清楚，现如今情况只能是这样。

Because, to do manual work now, means in reality to shut yourself up for ten or twelve hours a day in an unhealthy workshop, and to remain chained to the same task for twenty or thirty years, and maybe for your whole life.

因为，现在从事体力劳动在现实中就意味着把自己关在空气污浊

的车间里，每天要关上10到12个小时，20年，30年，甚至一辈子固定在同样的岗位上。

It means to be doomed to a paltry wage, to the uncertainty of the morrow, to want of work, often to destitution, more often than not to death in a hospital, after having worked forty years to feed, clothe, amuse, and instruct others than yourself and your children.

这就意味着你注定要拿微薄的工资，注定要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注定缺乏工作机会，注定穷困潦倒，还往往注定你要死在医院——而在这之前，你工作了40年，不是为了你自己和你的孩子们，而是为其他人提供食物、衣服、娱乐和教育。

It means to bear the stamp of inferiority all your life; because, whatever the politicians tell us, the manual worker is always considered inferior to the brain worker, and the one who has toiled ten hours in a workshop has not the time, and still less the means, to give himself the high delights of science and art, nor even to prepare himself to appreciate them; he must be content with the crumbs from the table of privileged persons.

这就意味着，你一辈子都要烙上低人一等的印记。因为，无论政客们对我们说什么，人们总是认为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低一等。每天在车间劳作十个小时的人根本没有时间，更没有钱去享受科学和艺术带来的愉悦，甚至也没有准备好欣赏这些愉悦。他只能满足于特权阶层的饭桌上掉下来的碎屑。

We understand that under these conditions manual labour is considered a curse of fate.

我们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体力劳动被视为命运的诅咒。

We understand that all men have but one dream—that of emerging from, or enabling their children to emerge from this inferior state; to create for themselves an “independent” position, which means what?—To also live by other men's work!

我们认为，所有人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摆脱或者使他们的孩子摆脱低人一等的处境，为自己创造一个“独立的”位置。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也靠别人的劳动生活！

As long as there will be a class of manual workers and a class of “brain” workers, black hands and white hands, it will be thus.

只要还有体力劳动者阶层和脑力劳动者阶层，情况就必定如此。

What interest, in fact, can this depressing work have for the worker, when he knows that the fate awaiting him 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 will be to live in mediocrity, poverty, and insecurity of the morrow? Therefore, when we see the immense majority of men take up their wretched task every morning, we feel surprised at their perseverance, at their zeal for work, at the habit that enables them, like machines blindly obeying an impetus given, to lead this

life of misery without hope for the morrow; without foreseeing ever so vaguely that some day they, or at least their children, will be part of a humanity rich in all the treasures of a bountiful nature, in all the enjoyments of knowledge,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creation, reserved to-day to a few privileged favourites.

事实上，当工人知道自己从一出生到走进坟墓，等待他的命运将是生活在平庸、贫困和不安全感中，这种令人压抑的工作又怎能引起他的兴趣呢？因此，在我们看到绝大多数人每天早上开始痛苦地工作时，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的毅力，他们的工作热情，以及他们那种像盲目服从指令的机器一样，过着这种毫无希望的悲惨生活的习惯。他们从来都没有预见到这样的场景：有一天，他们自己，或者至少是他们的孩子们，会成为人类的一部分，能够享用慷慨的大自然赐予的全部财富，能够享受知识、科学和艺术创造带来的愉悦。而这些在今天只有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才能够享受。

It is precisely to put an end to this separation between manual and brain work that we want to abolish wagedom, that we want the Social Revolution. Then work will no longer appear a curse of fate: it will become what it should be—the free exercise of all the faculties of man.

正是为了结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我们才想废除工资制，我们才想发动社会革命。如此以来，工作将不再是命运的诅咒，它将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自由地发挥人类全部的才能。

Moreover, it is time to submit to a serious analysis this legend about superior work, supposed to be obtained under the lash of

wagedom.

不仅如此，我们也应该对这个有关工资制可以带来更多劳动成果的神话进行认真的分析了。

It would be sufficient to visit, not the model factory and workshop that we find now and again, but a number of the ordinary factories, to conceive the immense waste of human energy that characterizes modern industry. For one factory more or less rationally organized, there are a hundred or more which waste man's labour, without any more substantial motive than that of perhaps bringing in a few pounds more per day to the employer.

不用去造访我们时不时能见到的示范工厂和车间，只去一些普通工厂看看就可以明白，现代工业是多么浪费人力。有一家组织结构还算合理的工厂，就会有百余家浪费人力的工厂。而这样做除了可能每天为雇主多赚几十英镑之外，并没有什么有实际意义。

Here you see youths from twenty to twenty-five years of age, sitting all day long on a bench, their chests sunken in, feverishly shaking their heads and bodies, to tie, with the speed of conjurers, the two ends of worthless scraps of cotton, the refuse of the lace-looms. What progeny will these trembling and rickety bodies bequeath to their country? “But they occupy so little room in the factory, and each of them brings me in sixpence net every day,” will say the employer.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20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整天坐在条凳上，他们胸膛凹陷，拼命摇晃着头和身体，以变魔术般的速度，把纺纱机用剩下的毫无用处的碎棉花两头系在一起。像这样颤抖摇摆的身体会给他们的国家留下什么样的后代呢？雇主会说："可他们在工厂里占用的地方很少，而每个人每天能为我带来六便士的净利润。"

In an immense London factory we saw girls, bald at seventeen from carrying trays of matches on their heads from one room to another, when the simplest machine could wheel the matches to their tables. But "It costs so little, the work of women who have no special trade! Why should we use a machine? When these can do no more, they will be easily replaced,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in the street!"

在伦敦的一家大工厂里面，我们看到一群只有17岁的女孩子们，由于经常顶着一盘盘的火柴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她们已经秃头了。可是，即使最简单的机器也可以把火柴运送到他们的工作台上。不过，"这些女人没有一技之长，用她们廉价得很。干吗还要用机器呢？等她们干不动了，很容易找到可替换的人，街上这样的人太多了！"

On the steps of a mansion on an icy night you will find a bare-footed child asleep, with its bundle of papers in its arms … child-labour costs so little that it may be well employed, every evening, to sell tenpenny- worth of papers, of which the poor boy will receive a penny, or a penny halfpenny. And continually in all big cities you may see robust men tramping about who have been out of work for months, while their daughters grow pale in the overheated vapours of the workshops for dressing stuffs, and their

sons are filling blacking-pots by hand, or spend those years during which they ought to have learned a trade, in carrying about baskets for a greengrocer, and at the age of eighteen or twenty become regular unemployed.

一个寒冷的晚上，在一座公馆前的台阶上，你会看到一个赤脚的孩子正在睡觉，手里还拿着一叠报纸。童工实在是太廉价了，每天傍晚都有人雇佣童工售卖十便士一份的报纸，而可怜的小男孩只能拿到一个便士或者一个半便士。在所有的大城市，你会不断看到精力充沛的人们到处流浪，他们已经失业好几个月了。他们的女儿们在纺织车间的高温蒸汽中变得面色苍白，他们的儿子们则用手往鞋油管里灌黑色的鞋油，或者在他们本来应该学习一门技能的时候，只能帮蔬菜水果商拎篮子。等他们到18或20岁的时候，就经常失业了。

And so it is everywhere, from San Francisco to Moscow, and from Naples to Stockholm. The waste of human energy is the distinguishing and predominant trait of our industry, not to mention trade where it attains still more colossal proportions.

这样的情况随处可见，从旧金山到莫斯科，从那不勒斯到斯德哥尔摩，人力的浪费是我们的工业最显著、最主要的特征。就更不必说贸易行业了，这一行业的人力浪费达到了更加惊人的地步。

What a sad satire is that name, Political Economy, given to the science of waste and energy under the system of wagedom!

“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居然给了工资制下有关人力浪费的科学，

这可真是一个绝妙讽刺！

This is not all. If you speak to the director of a well-organized factory, he will naively explain to you that it is difficult nowadays to find a skilful, vigorous, and energetic workman, who works with a will." Should such a man present himself among the twenty or thirty who call every Monday asking us for work, he is sure to be received, even if we are reducing the number of our hands. We recognize him at the first glance, and he is always accepted, even though we have to get rid of an older and less active worker the next day." And the one who has just received notice to quit, and all those who will receive it to-morrow, go to reinforce that immense reserve-army of capital—workmen out of work—who are only called to the loom or the bench when there is pressure of work, or to oppose strikers. And those others—the average workers who are sent away by the better-class factories as soon as business is slackened? They also join the formidable army of aged and indifferent workers who continually circulate among the second-class factories—those which barely cover their expenses and make their way in the world by trickery and snares laid for the buyer, and especially for the consumer in distant countries.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你同一个组织结构良好的工厂负责人交谈，他会天真地向你解释说，现在要找到技术好、身体好、精力好而且还愿意工作的工人非常困难。“每个星期一有二三十个人给我们打电话求职，如果里面有这样的人，我们一定会雇用他，哪怕我们正在裁员。我们一眼就能够认出他，也会雇用它，尽管第二天我们不得不解雇一名年龄更大、工作积极性不高的工人。”那位刚刚收到辞工通知的工人以及所有那些明天将要收到辞工通知的工人们，增加了十分庞大的资本后备军——失业者大军——的人数。只有在需要赶工，

或者为了对付罢工者的时候，他们才会被召唤到织机旁或者条凳上。还有另外一批人——一旦生意不景气，就被那些状况较好的工厂解雇的普通工人，他们又会怎样呢？他们也要加入那支年龄偏大、不再有利用价值的工人大军。他们只能频繁地出入一些二流工厂——那些勉强能够保本，靠欺诈和给消费者（特别是偏远乡村的消费者）下套维持下去的企业。

And if you talk to the workmen themselves, you will soon learn that the rule in such factories is—never to do your best. “Shoddy pay—shoddy work!” this is the advice which the working man receives from his comrades upon entering such a factory.

如果你同工人们本人交谈，你很快就会发现，在这样的工厂里，大家奉行永远不要尽力的原则。“工资太低，不要好好干活”，这是工人一进入工厂，其他工友们的告诫。

For the workers know that if in a moment of generosity they give way to the entreaties of an employer and consent to intensify the work in order to carry out a pressing order, this nervous work will be exacted in the future as a rule in the scale of wages. Therefore in all such factories they prefer never to produce as much as they can. In certain industries production is limited so as to keep up high prices, and sometimes the pass-word, “Go- canny,” is given, which signifies, “Bad work for bad pay!”

因为工人们明白，如果由于一时发善心，他们答应了雇主的恳求，同意增加工作量以完成一桩紧急订单的话，将来这个工资等级就会规定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量。因此，在所有这样的工厂里，他们宁愿

永远不尽力而为。有些行业限制产量以保持高昂的价格。有时人们会用到“精明”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工资低，不要好好干活”。

Wage-work is serf-work; it cannot, it must not, produce all that it could produce. And it is high time to disbelieve the legend which represents wagedom as the best incentive to productive work. If industry nowadays brings in a hundred times more than it did in the days of our grandfathers, it is due to the sudden awakening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sciences towards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not to the capitalist organization of wagedom, but in spite of that organization.

工资劳动是奴隶式劳动。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发挥工人全部的生产力。现在是时候怀疑那个将工资制视为刺激生产的最佳途径的神话了。如果说今天的工业获得的利润比我们的前辈那时候要多上百倍，那是因为世纪末物理学和化学的突然觉醒，而非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相反，正是由于克服了这种制度的弊端才能取得这样的利润。

III

三

Those who have seriously studied the question do not deny any of the advantages of Communism, on condition, be it well understood, that Communism be perfectly free, that is to say, Anarchist. They recognize that work paid with money, even disguised under the name of “labour cheques,” to Workers' associations governed by the State, would keep 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gedom and would retain its disadvantages.

They agree that the whole system would soon suffer from it, even if Society came into possession of th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nd they admit that, thanks to an “integral” complete education given to all children, to the laborious habits of civilized societies, with the liberty of choosing and varying their occupations and the attractions of work done by equals for the well-being of all, a Communist society would not be wanting in producers who would soon make the fertility of the soil triple and tenfold, and give a new impulse to industry.

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完全自由，也就是说无政府主义的话，那么那些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否认共产主义的好处。他们看到，付酬劳动，哪怕将报酬伪装成以“劳动支票”的名目发给国家管理的工人协会，也只能继续维持工资制的特点并保留它的种种弊端。他们同意，整个体制很快就要因此付出代价，哪怕社会拥有了生产工具。他们也承认，由于所有的孩子都受到了“完整的”教育，由于文明社会的勤劳习惯，再加上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和变更工作，可以和自己的同伴为了所有人的福祉而努力工作，工作也因此变得很有吸引力。由于上述因素，共产主义社会是不会缺乏生产者的，这些人可以很快让土地的产量达到原来的三倍，乃至十倍，并为工业带来新的推动力。

This our opponents agree to. “But the danger,” they say, “will come from that minority of loafers who will not work, and will not have regular habits, in spite of the excellent conditions that would make work pleasant. To-day the prospect of hunger compels the most refractory to move along with the others. The one who does not arrive in time is dismissed. But one black sheep suffices to contaminate the whole flock, and two or three sluggish or refractory workmen would lead the others astray and bring a spirit of disorder and rebellion into the workshop that would make work

impossible; so that in the end we should have to return to a system of compulsion that would force such ringleaders back into the ranks. And then,—Is not the system of wages, paid in proportion to work performed, the only one that enables compulsion to be employed, without hurting the feelings of independence of the worker? All other means would imply the continual intervention of an authority that would be repugnant to free men." This, we believe, is the objection fairly stated.

我们的反对者赞同这一点。他们说："可是危险来自于那些少数游手好闲的人，尽管条件很优越，工作也因此变成了一种享受，但这些人就是不愿意工作，也没法养成勤劳的习惯。今天，由于担心忍饥挨饿，最难驾驭的人也不得不跟其他人一起工作。不按时上班的人会被解雇。可是，一颗老鼠屎就能坏掉一锅汤。两三个懒汉或刺头就会把其他人带坏，就会让车间里滋生混乱和反抗的情绪，使得工作无法进行。以至于到最后，我们不得不恢复强迫制度，让这些带头滋事的人回到队伍中去。那么，难道工资制——根据工作量发放相应的工资——不是使用强迫手段而又不会伤害到工人自主感的唯一手段吗？如果采用任何其他手段，那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权威持续不断地进行干涉，而自由人是不喜欢这样的。"我们认为，这样说已经很公道地解释了反对意见。

To begin with, such an objection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arguments which try to justify the State, the Penal Law, the Judge, and the Gaoler.

首先，这样的反对意见属于那类试图为国家、刑法、法官和监狱看守找到存在理由的论点。

“As there are people, a feeble minority, who will not submit to social customs,” the authoritarians say, “we must maintain magistrates, tribunals and prisons, although these institutions become a source of new evils of all kinds.”

“因为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遵守社会规范，”权利主义者说，“所以我们必须设立地方法官、法庭和监狱，尽管它们也会滋生各种各样新的弊病。”

Therefore we can only repeat what we have so often said concerning authority in general: “To avoid a possible evil you have recourse to means which in themselves are a greater evil, and become the source of those same abuses that you wish to remedy. For, do not forget that it is wagedom, the impossibility of living otherwise than by selling your labour, which has created the present Capitalist system, whose vices you begin to recognize.” Besides, this way of reasoning is merely a sophistical justification of the evils of the present system. Wagedom was not instituted to remove the disadvantages of Communism; its origin, like that of the State and private ownership, is to be found elsewhere. It is born of slavery and serfdom imposed by force, and only wears a more modern garb. Thus the argument in favour of wagedom is as valueless as those by which they seek to apologize for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因此，我们只能重复我们经常谈到的有关普遍意义上的权力的观点。“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弊端，你们采取了一些手段，而这些手段本身就是更为严重的弊端。你本来是想拯救时弊，可是你采取的手段本身就会引发这些弊端。不要忘了，正是工资制——不出卖劳动就无

法谋生——造就了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你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它的弊端了。”此外，这种推论方式不过是强词夺理，试图为当今制度的种种弊端辩解。创立工资制并不是为了消除共产主义的弊端，它的出现，如同国家和私有制的出现一样，是有其他原因的。它起源于靠暴力推行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只不过穿上了一件更加时髦的衣服。因此，支持工资制的论点是毫无价值的，一如那些他们用来为私有制和国家辩护的论点。

We are, nevertheless, going to examine the objection, and see if there is any truth in it.

然而，我们仍然要认真对待他们的反对意见，看看里面是否有正确的成分。

First of all,—Is it not evident that if a society,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 of free work, were really menaced by loafers, it could protect itself without the authoritarian organization we have nowadays, and without having recourse to wagedom?

首先，如果建立在自由劳动原则基础之上的社会真的受到了游手好闲者的威胁，那么即使没有我们现在的独裁体制，即使不采用工资制，它也可以保护自己。这一点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Let us take a group of volunteers, combining for some particular enterprise. Having its success at heart, they all work with a will, save one of the associates, who is frequently absent from his post. Must they on his account dissolve the group, elect a president

to impose fines, and work out a code of penalties? It is evident that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will be done, but that some day the comrade who imperils their enterprise will be told: “Friend, we sh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but as you are often absent from your post, and you do your work negligently, we must part. Go and find other comrades who will put up with your indifference!”

就以为了某项特定工作而集合在一起的一群志愿者为例吧。他们一心想顺利完成任务，因此，除了一名经常不在岗的同事之外，他们所有人同心同德，努力工作。他们必须因为这个人而解散团体，选出一名负责人专门进行罚款，并制定一套惩罚措施吗？很显然，他们不会这样做。但是，总有一天，会有人对那个危害到工作的同事说：“朋友，我们很想和你共事。可是，你总不在岗，工作也很马虎，我们只好各走各路了。谁要是受得了你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你就找他们去吧。”

This way is so natural that it is practiced everywhere, even nowadays, in all industries, in competition with all possible systems of fines, docking of wages, supervision, etc. ; a workman may enter the factory at the appointed time, but if he does his work badly, if he hinders his comrades by his laziness or other defects, if he is quarrelsome, there is an end of it; he is compelled to leave the workshop.

这种方式非常自然，即使在今天也在各行各业普遍运用。它同其他所有可能的罚款、扣工资、监工制度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一名工人可能会准点进厂，但是，如果他工作干得不好，如果他由于懒惰或其他毛病妨碍了同事，如果他喜欢寻衅滋事，那么他的工作就算完了，他不得不离开工厂。

Authoritarians pretend that it is the almighty employer and his overseers who maintain regularity and quality of work in factories. In reality, in every somewhat complicated enterprise, in which the goods produced pass through many hands before being finished, it is the factory itself, the workmen as a unity, who see to the good quality of the work. Therefore the best factories of British private industry have few overseers, far less on an average than the French factories, and less than the British State factories.

独裁者借口说，正是无所不能的雇主和监工们保证了工厂能够正常地高质量地完成生产。事实上，在每一项稍微复杂的工作中，也就是说产品在最终完成之前要经过很多人的手。恰恰是工厂自身，是全体工人保证了高质量的工作。因此，英国私人经营的效益最好的工厂里监工很少，平均算来，比法国工厂里要少得多，比英国的国营工厂里也要少。

A certain standard of public morals is maintained in the same way. Authoritarians say it is due to rural guards, judges, and policemen, whereas in reality it is maintained in spite of judges, policemen, and rural guards. “Many are the laws producing criminals!” was said long ago.

用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维持一定的公共道德水准。权利主义者说，必须要靠农村护卫队、法官和警察才能维持公共道德，而事实上，即使没有法官、警察和农村护卫队，也能够维持公共道德。很久以前，人们就曾说过：“很多法律都是制造罪犯的法律。”

Not only in industrial workshops do things go on in this way; it happens everywhere, every day, on a scale that only bookworms have as yet no notion of. When a railway company, federated with other companies, fails to fulfil its engagements, when its trains are late and goods lie neglected at the stations, the other companies threaten to cancel the contract, and that threat usually suffices.

不止在工厂里是这种情况，每天，这种情况在各地均有发生，其程度之严重，只有那些书虫们才没有意识到。当一家同其他公司结盟的铁路公司未能履行承诺的时候，当它的列车晚点，货物堆积在车站而无人理睬的时候，其他公司威胁说要撤销合同，而这种威胁通常已经足够了。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at any rate it is taught in State-approved schools, that commerce only keeps to its engagements from fear of lawsuits. Nothing of the sort; nine times in ten the trader who has not kept his word will not appear before a judge. There, where trade is very active, as in London, the sole fact of having driven a creditor to bring a lawsuit suffices for the immense majority of merchants to refuse for good to have any dealings with a man who has compelled one of them to go to law.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至少在国家批准设立的学校里面是这样教的），人们之所以信守商业承诺，完全是由于害怕吃官司。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十之八九，没有履行承诺的商人不会出现在法官面前。在贸易活跃的地方，例如在伦敦，如果有人迫使债权人对他提起诉讼，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商人来说，这足以让他们永远拒绝同那个迫使别人对簿公堂的人做生意了。

This being so, why should means that are used to-day among workers in the workshop, traders in the trade, and railway compani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ransport, not be made use of in a society based on voluntary work?

既然情况是这样，那么，今天在工厂的工人中、在从事贸易的商人中以及在运输业的铁路公司中广泛运用的手段，为什么不可以用在基于自愿劳动的社会中呢？

Take, for example, an association stipulating that each of its members should carry out the following contract: “We undertake to give you the use of our houses, stores, streets, means of transport, schools, museums, etc. , on condition that, from twenty to forty-five or fifty years of age, you consecrate four or five hours a day to some work recognized as necessary to existence. Choose yourself the producing groups which you wish to join, or organize a new group, provided that it will undertake to produce necessaries. And as for the remainder of your time, combine together with whomsoever you like, for recreation, art, or science, according to the bent of your taste.

举例来说吧。一家协会规定，每一名成员都应当履行以下合同条款：“我们负责为你提供我们的住房、商店、街道、交通工具、学校、博物馆等等，但前提条件是，从20岁到45或50岁期间，你每天应拿出四五个小时的时间，用于从事维持生计所必需的劳动。你可以挑选你愿意加入的生产小组，或者还可以组建新的小组，但是组建的小组必须生产必需品。至于你其余的时间，你愿意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消遣娱乐或者从事科学艺术。

“Twelve or fifteen hundred hours of work a year, in one of the groups producing food, clothes, or houses, or employed in public sanitation, transport, and so on, is all we ask of you. For this amount of work we guarantee to you the free use of all that these groups produce, or will produce. But if not one, of the thousands of groups of our federation, will receive you, whatever be their motive; if you are absolutely incapable of producing anything useful, or if you refuse to do it, then live like an isolated man or like an invalid. If we are rich enough to give you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we shall be delighted to give them to you. You are a man, and you have the right to live. But as you wish to live under special conditions, and leave the ranks, it is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you will suffer for it in your daily relations with other citizens. You will be looked upon as a ghost of bourgeois society, unless some friends of yours, discovering you to be a talent, kindly free you from all moral obligation towards society by doing all the necessary work for you.

“我们对你的全部要求就是，每年你应当在那些生产食品、缝制衣物、建造房屋的小组里，或者在公共卫生、公共交通等行业里工作1200到1500个小时。如果达到了这个工作量，我们保证，你可以免费享用这些小组生产的或将要生产的产品。可是，如果在我们的联盟成千上万个小组中没有一个小组愿意接纳你，无论它们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完全不能生产任何有用的东西，或者如果你不愿意生产任何有用的东西，那么你就像一个被孤立的人或残疾人一样生活吧。如果我们足够富裕，可以为你提供生活必需品，我们会很愿意提供。你是人，你有生存权。可是，既然你想搞特殊化，离开了大部队，那么，在你同其他公民日常交往的过程中，你很可能要吃到苦头。你会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幽灵，除非有几个朋友发现你是个人才，愿意替你完成必要的工作，从而免除你对社会的道德上的义务。

“And finally, if it does not please you, go and look for other conditions elsewhere in the wide world, or else seek adherents and organize with them on novel principles. We prefer our own.”

“最后，如果你对条款不满意，你可以在这世上任何其他地方去寻找其他条件，或者寻找你的同道，和他们一起按新的原则组织起来。我们坚守自己的原则。”

This is what could be done in a communal society in order to turn away sluggards if they became too numerous.

在公共社会里面，如果懒汉太多了，这是赶走他们的好方法。

IV

四

We very much doubt that we need fear this contingency in a society really based on the entire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我们认为，在一个真正建立在个体完全自由的社会里，完全不必担心出现这种现象。

In fact, in spite of the premium on idleness offered by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capital, the really lazy man is comparatively rare, unless his laziness be due to illness.

事实上，尽管资本私有制给懒汉们支付报酬，真正的懒汉还是很少的，除非他是由于疾病而懒惰。

Among workmen it is often said that the bourgeois are idlers. There are certainly enough of them, but they, too, are the exception. On the contrary, in every industrial enterprise, you are sure to find one or more bourgeois who work very hard. It is true that the majority of bourgeois profit by their privileged position to award themselves the least unpleasant tasks, and that they work under hygienic conditions of air, food, etc. , which permits them to do their business without too much fatigue. But these are precisely the conditions which we claim for all workers, without exception.

工人们常说，资本家都是懒汉。当然，资本家的数量是够多的了，但他们也属于例外。相反，在每个工业企业里面，你肯定能找到一个或更多的辛勤工作的资本家。的确，大多数资本家都是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为自己分派最轻松的工作，他们呼吸着新鲜空气，吃着清洁食物，这使得他们在工作时不会太疲劳。可是，这些正是我们要求所有工人无一例外应当享有的工作条件。

It must also be said that if, thanks to their privileged position, rich people often perform absolutely useless or even harmful work in society, nevertheless the Ministers, Heads of Departments, factory owners, traders, bankers, etc. , subject themselves for a number of hours every day to work which they find more or less tiresome, all preferring their hours of leisure to this obligatory work. And if in nine cases out of ten this work is a harmful work, they find it none the less tiring for that. But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the middle class

put forth a great energy, even in doing harm (knowingly or not) and defending their privileged position, that they have succeeded in defeating the landed nobility, and that they continue to rule the masses. If they were idlers, they would long since have ceased to exist, and would have disappeared like the aristocracy. In a society that would expect only four or five hours a day of useful, pleasant, and hygienic work, these same middle-class people would perform their task perfectly well, and they certainly would not put up with the horrible conditions in which men toil nowadays without reforming them. If a Huxley spent only five hours in the sewers of London, rest assured that he would have found the means of making them as sanitary as his physiological laboratory.

还应当补充一句，如果说富人由于自己的特权地位，经常在社会上做一些完全无益、甚至有害的工作的话，那么，与此同时也有部长、主任、工厂老板、商人、银行家等等，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从事他们觉得或多或少有些乏味的工作。他们悠然自得，而不是不得不做。哪怕这种工作十之八九都是有害的，他们也仍然觉得它单调乏味。可是，恰恰是因为中产阶级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甚至是用于干坏事（不管他们有意还是无意）和保卫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才能成功击败了拥有土地的贵族，才能继续统治大众。如果说他们是懒汉，那么他们应该早就不复存在了，应该像贵族一样消亡了。在一个人们每天只需花上四五个小时从事有益、轻松而又卫生的工作的社会里面，这些中产阶级的人们能够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他们当然无法忍受今天辛勤劳作的人们所处的恶劣环境，他们一定会进行改革。一个生物学家只要在伦敦的下水道里呆上五个小时，他肯定就能想到办法，让下水道和他的生理学实验室一样卫生。

As to the laziness of the great majority of workers, only philistine economists and philanthropists can utter such nonsense.

至于说大多数工人都很懒惰，只有庸俗的经济学家和慈善家才能讲出这么不着边际的话。

If you ask an intelligent manufacturer, he will tell you that if workmen only put it into their heads to be lazy, all factories would have to be closed, for no measure of severity, no system of spying would be of any use. You should have seen the terror caused in 1887 among British employers when a few agitators started preaching the “go- canny” theory—“Bad pay, bad work”; “Take it easy, do not overwork yourselves, and waste all you can.“—“They demoralize the worker, they want to kill our industry!” cried those same people who the day before inveighed against the immorality of the worker and the bad quality of his work. But if the workers were what they are represented to be—namely, the idler whom the employer is supposed continually to threaten with dismissal from the workshop—what would the word “demoralization” signify?

如果你问一位聪明的工厂主，他会跟你说，如果工人一心一意想要偷懒，那么所有的工厂都只能倒闭，因为，无论多么严厉的措施，无论什么样的监视手段都完全没有用处。1887年，一小部分闹事者开始宣扬“精明”理论——“工资低，别好好干活”“慢慢来，别累着了，尽情浪费”——的时候，你应该见过当时英国雇主们的惊慌失措。“他们让工人情绪不振，他们想谋杀我们的工业”一天前还在痛骂工人没有道德、干活质量不高的那帮人大声疾呼。但是，如果工人们真的像雇主说的那样——也就是懒汉，雇主只能不断对其以解雇相要挟——那么“情绪不振”又是什么意思呢？

So when we speak of possible idlers, we must well understand

that it is a question of a small minority in society; and before legislating for that minority, would it not be wise to study the origin of that idleness? Whoever observes with an intelligent eye, sees well enough that the child reputed lazy at school is often the one which simply does not understand, because he is being badly taught. Very often, too, it is suffering from cerebral an mia, caused by poverty and an anti-hygienic education. A boy who is lazy at Greek or Latin would work admirably were he taught science, especially if he were taught with the aid of manual labour. A girl who is stupid at mathematics becomes the first mathematician of her class if she by chance meets somebody who can explain to her the elements of arithmetic which she did not understand. And a workman, lazy in the workshop, cultivates his garden at dawn, while gazing at the rising sun, and will be at work again at nightfall, when all nature goes to its rest.

因此，在我们谈论可能的懒汉时，我们必须明白，它只是社会里的极少数人。在为这少数人立法之前，先探讨一下懒惰的原因难道不是很明智的选择吗？任何长着一双慧眼的观察者都会很清楚地看到，在学校里被视为懒惰的孩子通常都是因为老师教得不好而不能理解所学内容的学生。而且，由于贫穷和缺乏正确的卫生教育，他还患有大脑贫血症。一个不愿意学习希腊文或拉丁文的男孩如果学习科学的话，他的表现会令人惊讶，特别是在从事体力劳动的过程进行学习的话；一个数学成绩很差的女孩如果机缘巧合，遇到了能够把她不能理解的算术原理解释给她听的人，可以成为班上第一个数学家；一个在工厂里不愿干活的工人，会在黎明时分就起来打理自己的花园，还不忘观赏冉冉升起的朝阳，黄昏时分，万物即将安歇之际，他又在花园里忙碌。

Somebody has said that dust is matter in the wrong place. The

same definition applies to nine-tenths of those called lazy. They are people gone astray in a direction that does not answer to their temperament nor to their capacities. In reading the biography of great men, we are struck with the number of “idlers” among them. They were lazy so long as they had not found the right path; afterwards they became laborious to excess. Darwin, Stephenson, and many others belonged to this category of idlers.

有人说过，尘土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同样的定义也适用于90%的所谓懒汉们。他们是一群走岔了路的人，选择的道路与他们的性情或能力不符。在读伟人传记的时候，我们每每惊叹于他们之中“懒汉”的数量如此之多。在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之前，他们是懒汉。一旦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就会变得极度勤奋。达尔文，斯蒂芬森，还有其他很多人都属于这类“懒汉”。

Very often the idler is but a man to whom it is repugnant to spend all his life making the eighteenth part of a pin, or the hundredth part of a watch, while he feels he has exuberant energy which he would like to expend elsewhere. Often, too, he is a rebel who cannot submit to being fixed all his life to a work-bench in order to procure a thousand pleasures for his employer, while knowing himself to be far the less stupid of the two, and knowing his only fault to be that of having been born in a hovel instead of coming into the world in a castle.

通常，懒汉是这样一类人，他不愿浪费一辈子制造别针的第18个部件或者手表的第100个部件。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充沛的精力要用在别的地方。同样常见的是，懒汉是一个叛逆者，他不能忍受一辈子固定在工作台上，为他的雇主谋取种种福利，因为他知道，自己一点

也不比雇主差；他知道，自己唯一的过错就是生在了简陋的小屋里，而不是生在城堡里。

Lastly, an immense number of “idlers” are idlers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well enough the trade by which they are compelled to earn their living. Seeing the imperfect thing they make with their own hands, striving vainly to do better, and perceiving that they never will succeed on account of the bad habits of work already acquired, they begin to hate their trade, and, not knowing any other, hate work in general. Thousands of workmen and artists who are failures suffer from this cause.

最后，大量的“懒汉”之所以成为懒汉，是因为他们不够了解被迫用于谋生的行当。他们看到自己双手造出来的产品有缺陷，拼命想做得更好，可是却做不到。他们觉得，那些已经养成的坏习惯让自己永远不可能做好。于是，他们开始憎恨这个行当，由于他们不懂其他行当，因此他们也憎恨所有的工作。成千上万的工人和艺术家都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惨遭失败的。

On the other hand, he who since his youth has learned to play the piano well, to handle the plane well, the chisel, the brush, or the file, so that he feels that what he does is beautiful, will never give up the piano, the chisel, or the file. He will find pleasure in his work which does not tire him, so long as he is not overdriven.

另一方面，从小就会弹奏钢琴，会使刨子、凿子、画笔和锉刀，而且技艺高超的人就会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的，他永远也不会放弃弹钢琴、使凿子和锉刀。只要不是工作量过大，他就能从工作中

得到乐趣，也不会感到厌烦。

Under the one name, idleness, a series of results due to different causes have been grouped, of which each one could be a source of good, instead of being a source of evil to society. Like all questions concerning criminality and related to human faculties, facts have been collected having nothing in common with one another. People speak of laziness or crime, without giving themselves the trouble to analyze the cause. They are in a hurry to punish these faults without inquiring if the punishment itself does not contain a premium on “laziness” or “crime.”

在懒惰这个名目下，汇集了一系列由不同原因导致的结果。每个结果都可以为社会带来好处，而不是坏处。与一切与犯罪和人类能力有关的问题一样，我们已经收集的事实彼此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人们谈论懒惰或犯罪，却不愿意费神去分析原因。他们急急忙忙地惩罚这些过错，根本不问惩罚本身是否助长了“懒惰”或“犯罪”。

This is why a free society, if it saw the number of idlers increasing in its midst, would no doubt think of looking first for the cause of laziness, in order to suppress it, before having recourse to punishment. When it is a case, as we have already mentioned, of simple bloodlessness, then before stuffing the brain of a child with science, nourish his system so as to produce blood, strengthen him, and, that he shall not waste his time, take him to the country or to the seaside; there, teach him in the open air, not in books—geometry, by measuring the distance to a spire, or the height of a tree; natural sciences, while picking flowers and fishing in the sea; physical science, while building the boat he will go to fish in. But

for mercy's sake do not fill his brain with classical sentences and dead languages. Do not make an idler of him!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自由社会在看到社会成员中懒汉数量增加时，首先想到的是查找懒惰的原因，以便消除懒惰，而不是动辄采取惩罚手段。如果是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孩子仅仅只是贫血，那么在给孩子灌输科学知识之前，应该给他的身体补充营养，以便能够造血；让他的身体强壮起来；在不浪费他的时间的前提下，带他到乡下或者海滨去；在户外教他，而不是用书本来教他——通过测量到尖顶的距离或者树的高度来教三角；通过采摘花朵和在海上钓鱼来教自然科学；通过建造钓鱼的小舟来教物理学。但是，千万不要往他的脑子塞满古典句子和死的语言。不要让他成为懒汉！

Or, here is a child which has neither order nor regular habits. Let the children first inculcate order among themselves, and later on, the laboratory, the workshop, the work that will have to be done in a limited space, with many tools about, under the guidance of an intelligent teacher, will teach them method. But do not make disorderly beings out of them by your school, whose only order is the symmetry of its benches, and which—true image of the chaos in its teachings—will never inspire anybody with the love of harmony, of consistency, and method in work.

否则，孩子就会既不守秩序，又不能养成好习惯。首先，让孩子们在他们自己中间灌输守秩序的观念。其次，必须在实验室、工厂这些空间有限的地方，利用身边的诸多工具完成工作，富有智慧的老师将教会他们方法。但是，不要因为你们的学校使得他们中间出现不守秩序的人，学校里面唯一的秩序就是板凳的对称美。学校教授的东西里面充满了混乱不堪，因此，学校永远不可能激发学生热爱和谐、协

调和工作方法。

Do not you see that by your methods of teaching, framed by a Ministry for eight million scholars, who represent eight million different capacities, you only impose a system good for mediocrities, conceived by an average of mediocrities? Your school becomes a University of laziness, as your prison is a University of crime. Make the school free, abolish your University grades, appeal to the volunteers of teaching; begin that way, instead of making laws against laziness which only serve to increase it.

你们难道不明白，你们的教学方法是由一个政府部门为八百万个学者设计的，他们代表了八百万种不同的能力。可是，通过你们的教学方法，你们强行设立了一个由一帮庸才想出来的、只对庸才有好处的体系。你们的学校成了培养懒惰的大学，你们的监狱成了滋生犯罪的大学。解放学校吧，取消大学分数吧，向从事教学的志愿者发起呼吁吧。先从这一步做起，而不是制定法律惩罚懒惰，因为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

Give the workman who cannot condemn himself to make all his life a minute particle of some object, who is stifled at his little tapping machine, which he ends by loathing, give him the chance of tilling the soil, of felling trees in the forest, sailing the seas in the teeth of a storm, dashing through space on an engine, but do not make an idler of him by forcing him all his life to attend to a small machine, to plough the head of a screw, or to drill the eye of a needle.

一个工人如果一辈子只做一个小小零部件，在小小的攻丝机前感到窒息，会让他觉得无法忍受，最终感到十分憎恶，给他机会吧，让他耕作土地，在森林里伐木，冒着暴风雨在海上航行，驾着机车风驰电掣。但是，不要强迫他一辈子只守着一台小小的机器，制作螺丝钉的螺帽，或者在针上钻出针眼，不要让他成为懒汉。

Suppress the cause of idleness, and you may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few individuals will really hate work, especially voluntary work, and that there will be no need to manufacture a code of laws on their account.

要消除掉懒惰的根源。你可能会想当然地以为，很少有人会真正讨厌工作，特别是自愿工作，因此，没有必要对此制定一部法典。

CHAPTER XIII THE COLLECTIVIST WAGES SYSTEM

第十三章　集体主义者的工资制

I

一

In their plan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ety the collectivists commit, in our opinion, a twofold error. While speaking of abolishing capitalist rule, they intend nevertheless to retain two institutions which are the very basis of this rule—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Wages' System.

在我们看来，集体主义者在制定重建社会的计划时，犯下了双重错误。在谈论废除资本主义统治时，他们却试图保留恰恰是作为这个统治基础的两项制度——代议制政府和工资制。

As regards so-calle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we have often spoken about it. It is absolutely incomprehensible to us that intelligent men—and such are not wanting in the collectivist party—can remain partisans of national or municipal parliaments after all the lessons history has given them—in France, in England, in Germany,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至于所谓的代议制政府，我们经常谈论它。我们完全不能理解，有理性的人（在法国、英国、德国或美国）——这样的人在集体主义者里面并不少见——在汲取了这么多的历史教训之后，竟然还支持设

立全国性或地方性议会。

While we see parliamentary rule breaking up, and from all sides criticism of this rule growing louder—not only of its results, but also of its principles—how is it that the 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defend a system already condemned to die?

我们看到了议会制正在解体，各方面对这一制度的批评也越来越严厉——不仅批评它的结果，也批评它的原则——可是，充满革命精神的社会主义者怎么会维护这样一个注定要消亡的制度呢？

Built up by the middle classes to hold their own against royalty, sanction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ing, their sway over the workers, parliamentary rule is pre-eminently a middle-class rule. The upholders of this system have never seriously maintained that a parliament or a municipal council represent a nation or a city. The most intelligent among them know that this is impossible. The middle classes have simply used the parliamentary system to raise a protecting barrier against the pretensions of royalty, without giving the people liberty. But gradually, as the people become conscious of their real interests, and the variety of their interests is growing, the system can no longer work. Therefore democrats of all countries vainly imagine various palliatives. The Referendum is tried and found to be a failure;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is spoken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minorities, and other parliamentary Utopias. In a word, they strive to find what is not to be found, and after each new experiment they are bound to recognize that it was a failure; so that confidence i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vanishes more and more.

议会制是中产阶级为了对抗贵族阶级而创立的，这种制度认可并强化了他们对于工人的统治。很明显，议会制就意味着中产阶级统治。拥护这一制度的人从来没有很严肃地提出：全国议会或者市议会代表着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他们中间最理性的人明白，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中产阶级不过是利用了议会制建起一道防护墙，借以对抗贵族的特权，但他们却没有给予人民自由。可是，慢慢地，随着人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个制度就不能再发挥作用了。因此，各国的民主人士设想出各种各样的改良措施，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尝试过全民公投，但失败了；他们还提到比例代表制、少数派代表制和其他种种不切实际的改良议会制的方案。总而言之，他们试图找到根本就不可能找到的东西。每次尝试过后，他们必定会发现，这个尝试失败了。因此，人们对代议制政府越来越没有了信心。

It is the same with the Wages' system; because, once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s proclaimed, and the possession in common of all means of production is introduced,—how can the wages' system be maintained in any form? This is, nevertheless, what collectivists are doing when they recommend the use of the labour-cheques as a mode of remuneration for labour accomplished for the great Collectivist employer—the State.

工资制的情况也是如此。一旦宣布了废除私有制，开始实施生产资料全体共有，工资制无论以什么形式又怎么维持下去呢？然而，这正是集体主义者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建议，用劳动支票作为人们为国家这个伟大的集体主义雇主工作的付酬方式。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why the early English socialists, since

the time of Robert Owen, came to the system of labour-cheques. They simply tried to make Capital and Labour agree. They repudiated the idea of laying hands on capitalist property by means of revolutionary measures.

早期的英国社会主义者，自从罗伯特·欧文那时开始，一直鼓吹劳动支票制度。这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他们不过是想让资方和劳方达成一致。他们反对通过革命手段获得资本家的财产。

It is also easy to understand why Proudhon took up later on the same idea. In his Mutualist system he tried to make Capital less offensive, notwithstanding the retaining of private property, which he detested from the bottom of his heart, but which he believed to be necessary to guarantee individuals against the State.

蒲鲁东后来也主张同样的观点，这其中的原因同样不难理解。在他的互助论体系里，他试图让资方在保留私有财产的同时，不那么咄咄逼人。他从内心深处是很厌恶私有财产的，但是，他相信，私有财产可以保证个人不受国家侵害，因此又是必不可少的。

Neither is it astonishing that certain economists, more or less bourgeois, admit labour-cheques. They care little whether the worker is paid in labour-notes or in coin stamped with the effigy of the Republic or the Empire. They only care to save from destruction the individual ownership of dwelling-houses, of land, of factories; in any case—that, at least, of dwelling-houses and the capital that is necessary for manufacturing. And labour-notes would just answer the purpose of upholding this private property.

某些或多或少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认可劳动支票制度，这也不奇怪。他们根本不关心工人拿到的报酬是劳动券，还是上面铸着共和国或帝国图案的硬币。他们只关心拯救对于住房、土地和工厂的私人所有制，无论如何，至少要拯救生产所必需的住房和资本私人所有制，使它不至于消亡。劳动券正好能够达到维护私有财产的目的。

As long as labour-notes can be exchanged for jewels or carriages, the owner of the house will willingly accept them for rent. And as long as dwelling houses, fields, and factories belong to isolated owners, men will have to pay these owners, in one way or another, for being allowed to work in the fields or factories, or for living in the houses. The owners will agree to be paid by the workers in gold, in paper-money, or in cheques exchangeable for all sorts of commodities, once that toll upon labour is maintained, and the right to levy it is left with them. But how can we defend labour-notes, this new form of wagedom, when we admit that the houses, the fields, and the factories will no longer be private property,—that they will belong to the commune or the nation?

只要劳动券可以用来购买珠宝和马车，房东就会很乐意收下它们来抵房租。只要住房、土地和工厂属于孤立的所有者，人们就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付钱给他们，从而获许在土地上耕作，在工厂里上班，在住房里居住。一旦这种交钱才能劳动的制度维持下去，而收钱的权利由所有者掌握，那么，他们就会同意工人支付纸币或者支票，以便他们换取各种各样的商品。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住房、工厂和土地不再是私有财产，而是属于公社或国家，我们又怎能为劳动券这种新型的工资制辩护呢？

II

二

Let us closely examine this system of remuneration for work done, preached by the French, German, English, and Italian collectivists (the Spanish anarchists, who still call themselves collectivists, imply by Collectivism the possession in common of all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nd the “liberty of each group to divide the produce, as they think fit, according to communist or any other principles”).

我们来仔细看看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集体主义者（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把自己叫做集体主义者，他们认为集体主义就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以及“每一个群体按照他们所希望的共产主义或者其他原则分配劳动成果的自由”）宣扬的这种劳动报酬制吧。

It amounts to this: Everybody works in field, factory, school, hospital, etc. The working-day is fixed by the State, which owns the land, the factories, the roads, etc. Every work-day is paid for with a labour-note, which is inscribed with these words: Eight hours” work. With this cheque the worker can procure all sorts of merchandise in the stores owned by the State or by divers corporations. The cheque is divisible, so that you can buy an hour's-work worth of meat, ten minutes' worth of matches, or half an hour of tobacco. After the Collectivist Revolution, instead of saying “twopence worth of soap,” we shall say “five minutes' worth of soap.”

这个制度可以归结为一点：每个人都在土地上、工厂里、学校里和医院里等地方工作。工作日由拥有土地、工厂、道路等的国家规定。完成一个工作日的工作，工人们就会得到一张劳动券，上面写着：八小时工作。工人们用这种支票可以在国营商店或者各个公司开办的商店里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支票是可以分割的，因此，你可以购买价值一小时工作的肉类，价值十分钟工作的火柴，或者价值半小时工作的烟草。在集体主义革命之后，我们不说“两便士的肥皂”了，而是说“价值五分钟劳动的肥皂”。

Most collectivists, true to the distinction laid down by middle-class economists (and by Marx as well) between qualified work and simple work, tell us, moreover, that qualified or professional work must be paid a certain quantity more than simple work. Thus one hour's work of a doctor will have to be considered as equivalent to two or three hours' work of a hospital nurse, or to three or five hours' work of a navvy.” Professional, or qualified work, will be a multiple of simple work,” says the collectivist Granlund, “because this kind of work needs a more or less long apprenticeship.”

大多数集体主义者严守中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做的合格工作和简单工作的区分，他们还告诉我们，从事合格的或者专业的工作的人应该得到比从事简单的工作的人多一些的报酬。因此，医生一小时的工作会被认为相当于护士两个或三个小时的工作，或者相当于普通工人三个或五个小时的工作。“专业或者合格的工作相当于好多个简单工作的总和，”集体主义者格兰隆德说，“因为这种工作需要更长的学徒期。”

Some other collectivists, such as the French Marxist, Guesde, do not make this distinction. They proclaim the “Equality of

Wages.” The doctor, the schoolmaster, and the professor will be paid (in labourcheques) at the same rate as the navvy. Eight hours visiting the sick in a hospital will be worth the same as eight hours spent in earthworks or else in mines or factories.

其他一些集体主义者，例如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盖德，并不做这种区分。他们主张“工资平等”。医生、校长和教授应当得到和普通工人同样的报酬（以劳动券的形式）。在病房看护病人八个小时的价值同在土木工事或者矿井、工厂里工作八个小时的价值是一样的。

Some make a greater concession; they admit that disagreeable or unhealthy work—such as sewerage—could be paid for at a higher rate than agreeable work. One hour's work of a sewerman would be worth, they say, two hours of a professor's work.

有人作出更大的让步。他们承认，从事令人讨厌或者有害身心的工作——例如疏通下水道——得到的报酬应该比从事那些惬意的工作得到的报酬要多。他们说，疏通下水道的工人干一个小时的活得到的报酬应该相当于教授讲两个小时的课得到的报酬。

Let us add that certain collectivists admit of corporations being paid a lump sum for work done. Thus a corporation would say: “Here are a hundred tons of steel. A hundred workmen were required to produce them, and it took them ten days. Their work-day being an eight-hours day, it has taken them eight thousand working hours to produce a hundred tons of steel—eight hours a ton.” For this the State would pay them eight thousand labour-notes of one hour each, and these eight thousand cheques would be

divided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iron¬works as they themselves thought proper.

我们补充一句，有的集体主义者允许一次性向公司结清劳动报酬。这样一来，公司就会说："这里有100吨钢铁。100名工人花10天时间才能生产出来。他们每天工作8小时，因此生产100吨钢铁共耗费他们8000小时——每吨耗费80小时。"由于他们的劳动，政府将支付给他们8000张面额一小时的劳动券，这8000张支票将在这些钢铁工人中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分配。

On the other hand, a hundred miners having taken twenty days to extract eight thousand tons of coal, coal would be worth two hours a ton, and the sixteen thousand cheques of one hour each, received by the Guild of Miners, would be divided among their member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appreciation.

另一方面，100名矿工耗费了20天生产出了8000吨煤，每吨煤相当于两小时的工作。矿工协会总共可以拿到16,000张面额一小时的支票，这些支票可以按照成员们自己的意愿在内部进行分配。

If the miners protested and said that a ton of steel should only cost six hours' work instead of eight; if the professor wished to have his day paid four times more than the nurse, then the State would interfere and would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如果矿工提出抗议，说一吨钢铁只相当于六小时的工作，而非八小时；如果教授希望自己每个工作日的报酬相当于护士的四倍，那

么，政府就应当干预，解决他们的分歧。

Such is, in a few words, the organization the collectivists wish to see arise out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 As we see, their principles are: Collective property of th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nd remuneration to each according to the time spent in producing,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roductivity of his labour. As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it would be the Parliamentary system, modified by positive instructions given to those elected, and by the Referendum—a vote, taken by noes or ayes by the nation.

简而言之，这就是集体主义者希望看到的社会革命带来的体制。正如我们所见，他们的原则是：生产资料集体拥有，按照劳动时间、兼顾劳动效率给每名劳动者支付报酬。政治制度则实行议会制，不过会有一些改良措施。例如，对那些选出来的代表进行积极的教育，还有全民公投——由全体国民投票表示赞同或反对。

Let us own that this system appears to us simply unrealizable.

必须承认，在我们看来，这个制度根本就无法实现。

Collectivists begin by proclaiming a revolutionary principle—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and then they deny it, no sooner than proclaimed, by upholding an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which originated in private property.

集体主义者首先声明了一条革命性原则——废除私有财产——然后又马上把它否定了。因为他们主张的生产和消费体制起源于私有财产。

They proclaim a revolutionary principle, and ignore the consequences that this principle will inevitably bring about. They forget that the very fact of abolishing individual property in the instruments of work—land, factories, road, capital—must launch society into absolutely new channels; must completely overthrow the present system of production, both in its aim as well as in its means; must modify daily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s soon as land, machinery, and all other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re considered common property.

他们声明了一条革命性原则，却对这条原则必然会导致的后果视而不见。他们忘了，废除生产资料——土地、工厂、道路、资本——私有制必然会使社会走上全然不同的道路；必然会完全推翻现有的生产体制，包括它的目标和手段；必然会改变个体之间的日常关系，不久后土地、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被视为公共财产。

They say, “No private property,” and immediately after strive to maintain private property in its daily manifestations.” You shall be a Commune as far as regards production: fields, tools, machinery, all that has been invented up till now—factories, railways, harbours, mines, etc. , all are yours. Not the slightest distinction will be made concerning the share of each in this collective property.

他们说，“废除私有制”，可是，他们马上又设法维持私有制的日常表现形式。“只要土地、工具、机器以及所有到目前为止的种种发明——工厂、铁路、港口、矿井等等——都属于你们，你们就成了一个公社。在这种集体所有制下，人们完全不会区分哪是你的，哪是他的。

“But from to-morrow you will minutely debate the share you are going to take in the creation of new machinery, in the digging of new mines. You will carefully weigh what part of the new produce belongs to you. You will count your minutes of work, and you will take care that a minute of your neighbours should not buy more than yours.

“可是，从明天开始，你与别人锱铢必较，在发明新机器的时候，你出了多少力，在开挖新矿井的时候，你又出了多少力。你会认真思考，新收获的劳动成果哪些是属于你的。你会计算工作时间，会非常小心，以免身边的人的劳动时间比你的更值钱。

“And as an hour measures nothing, as in some factories a worker can see to six power-looms at a time, while in another he only tends two, you will weigh the muscular force, the brain energy, and the nervous energy you have expended. You will accurately calculate the years of apprenticeship in order to appraise the amount each will contribute to future production. And this—after having declared that you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his share in past production.”

“在一些工厂，一名工人可以同时看管六台动力织布机，而在另

一家工厂，一名工人只能看管两台织布机，因此，就不能用小时来衡量劳动价值了，你只能衡量消耗的体力、脑力和精力。你需要精确计算当学徒的时间，从而评价每个人对未来生产所作的贡献大小。而在这样做之前，你会宣布，你并没有考虑到他对于过去生产所作出的贡献。”

Well, for us it is evident that a society cannot be based on two absolutely opposed principles, two principles that contradict one another continually. And a nation or a commune which would have such an organization would be compelled to revert to private property in th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or to transform itself into a communist society.

好了，对我们来说，一个社会不能建立在两个完全相反、始终相互矛盾的原则之上，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具有这样的体制的国家或公社将不得不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或者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III

三

We have said that certain collectivist writers desire that a distinction should be made between qualified or professional work and simple work. They pretend that an hour's work of an engineer, an architect, or a doctor, must be considered as two or three hours' work of a blacksmith, a mason, or a hospital nurse. And the same distinction must be made between all sorts of trades necessitating apprenticeship, and the simple toil of day labourers.

我们已经说过，有的集体主义作者希望，对合格的或专业劳动和简单劳动进行区分。他们伪称，工程师、建筑师或者医生一个小时的工作相当于铁匠、石匠或护士两到三个小时的工作。各种需要实习期的行业同日工们从事的简单劳作也应当进行同样的区分。

Well, to establish this distinction would be to maintain all the inequalities of present society. It would mean fixing a dividing line, from the beginning, between the workers and those who pretend to govern them. It would mean dividing society into two very distinct classes—the aristocracy of knowledge placed above the horny-handed lower orders—the one doomed to serve the other; the one working with its hands to feed and clothe those who, profiting by their leisure, study how to govern their fosterers.

进行这种区分就意味着要维持当今社会的种种不平等。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就为工人和那些企图统治他们的人之间划下了一条分割线。这就意味着，社会要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拥有知识的贵族和被他们统治的手上长茧的下等人——后者注定了要为前者服务，通过自己双手的劳动为前者提供食物和衣服，而前者则有大把的空暇来研究如何统治他们的衣食父母。

It would mean reviving one of the distinct peculiarities of present society and giving it the sanction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 It would mean setting up as a principle an abuse already condemned in our ancient crumbling society.

这就意味着，要恢复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并让它得到社会

革命的认可。这就意味着，要把古代已经崩溃的社会里的一大弊端确立为原则。

We know the answer we shall get. They will speak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y will quote bourgeois economists, and Marx too, to prove that a scale of wages has its raison d' tre, as “the labour force” of the engineer will have cost more to society than the “labour-force” of the navvy. In fact—have not economists tried to prove to us that if an engineer is paid twenty times more than a navvy it is because the “necessary” outlay to make an engineer is greater than that necessary to make a navvy? And has not Marx asserted that the same distinction is equally logical between two branches of manual labour? He could not conclude otherwise, having taken up on his own account Ricardo's theory of value, and upheld that goods are exchanged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f work socially necessary for their production.

我们知道将得到什么答案。他们会说什么“科学社会主义”，他们会引用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还有马克思的论述，以证明工资等级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工程师的“劳动力”比工人的“劳动力”对社会来说价值更高。事实上，难道经济学家们没有尝试向我们证明，如果工程师的报酬是工人的20倍，这是因为造就工程师的“必要”费用要比造就工人的必要费用多得多吗？难道马克思没有说过，在两种体力劳动之间进行同样的区分也是合乎逻辑的吗？既然他自愿接受了李嘉图的价值论，主张商品之间应当按照社会生产它们所必要的劳动量进行交换，他就不可能得出其他的结论。

But we know what to think of this. We know that if engineers, scientists, or doctors are paid ten or a hundred times more than a

labourer, and if a weaver earns three times more than an agricultural labourer, and ten times more than a girl in a match factory, it is not by reason of their “cost of production,” but by reason of a monopoly of education, or a monopoly of industry. Engineers, scientists, and doctors merely exploit their capital—their diplomas—as middle-class employers exploit a factory, or as nobles used to exploit their titles of nobility.

但我们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如果工程师、科学家或者医生得到的报酬比工人多十倍或一百倍，如果纺织工人得到的报酬比农民多三倍，比火柴厂的小女孩多十倍，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生产成本”较高，而是由于他们对于教育或工业的垄断。工程师、科学家和医生只是利用了他们的资本——学历——这就好比中产阶级雇主利用工厂，贵族利用他们的贵族头衔一样。

As to the employer who pays an engineer twenty times more than a labourer, it is simply due to personal interest; if the engineer can economize 4,000 a year on the cost of production, the employer pays him 800. And if the employer has a foreman who saves 400 on the work by cleverly sweating workmen, he gladly gives him 80 or 120 a year. He parts with an extra 40 when he expects to gain 400 by it; and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 same differences obtain among different manual trades.

至于说雇主愿意支付给工程师的报酬比工人多20倍，那纯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如果工程师每年能够节约4000块的生产成本，雇主会支付给他800块。如果雇主手下有一个工头，能够想出好点子让工人辛苦工作，从而让他省下400块，他会很高兴地每年支付80或120块的工资。如果他可以预期赚得400块，他愿意额外多付40块的工

资，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同的体力劳动工作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区别。

Let them, therefore, not talk to us of “the cost of production” which raises the cost of skilled labour, and tell us that a student who has gaily spent his youth in a university has a right to a wage ten times greater than the son of a miner who has grown pale in a mine since the age of eleven; or that a weaver has a right to a wage three or four times greater than that of an agricultural labourer. The cost of teaching a weaver his work is not four times greater than the cost of teaching a peasant his. The weaver simply benefits by the advantages his industry reap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from countries that have as yet no industries, and in consequence of the privileges accorded by all States to industries in preference to the tilling of the soil.

因此，别让他们再给我们说什么“生产成本”了，它只会提高熟练劳动的报酬；别让他们再给我们说，在大学里幸福地度过了青年岁月的学生有权得到高工资，他应该比从11岁开始就在矿井里劳作、脸色变得苍白的矿工的儿子工资高十倍；别让他们再给我们说，织布工人的工资应该比农民多三到四倍。教会织布工人如何织布所花费的成本，并不是教会农民如何种地所花费的成本的四倍。织布工人能拿高工资，只不过是因为他的行业在国际贸易上占据的优势地位，其他国家至今还没有工业，以及所有的政府均将工业放在农业之前，给予种种优惠政策。

Nobody has ever calculated the cost of production of a producer; and if a noble loafer costs far more to society than a worker,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a robust day-labourer does

not cost more to society than a skilled artisan, when we have taken into account infant-mortality among the poor, the ravages of anemia, and premature deaths.

还没有人计算过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如果一个无所事事的贵族要比一名工人耗费的社会成本多得多，那么，一个强壮的日工是不是要比一个熟练技工耗费的社会成本少呢。这一点还难以得出结论，因为我们必须考虑穷人的婴儿死亡率，贫血症肆虐以及夭亡等情况。

Could they, for example, make us believe that the 1s. 3d. paid to a Paris workwoman, the 3d. paid to an Auvergne peasant girl who grows blind at lace-making, or the 1s. 8d. paid to the peasant represent their “cost of production.” We know full well that people work for less, but we also know that they do so exclusively because, thanks to our wonderful organization, they would die of hunger did they not accept these mock wages.

例如，他们能不能让我们相信，支付给巴黎工人的1先令3便士，支付给生产花边时眼睛失明了的奥弗涅农村小姑娘的3便士，支付给农民的1先令8便士，能够反映出他们的“生产成本”吗？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人们得到的报酬偏低，但我们也知道，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好制度，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些少得可怜的工资，他们就会饿死。

For us the scale of remuneration is a complex result of taxes, of governmental tutelage, of Capitalist monopoly. In a word, of State and Capital. Therefore, we say that all wages' theories have been invented after the event to justify injustices at present existing, and

that we need not take them into consideration.

对我们来说，工资等级是税收、政府保护和资本主义垄断共同造成的复杂结果。简而言之，工资等级是国家和资本造成的结果。因此我们说，所有有关工资的理论都是在事后提出来为当前的不平等现象辩护的。因此，我们不必把它们考虑在内。

Neither will they fail to tell us that the Collectivist scale of wages would be an improvement.“It would be better,” so they say, “to see certain artisans receiving a wage two or three times higher than common labourers, than to see a minister receiving in a day what a workman cannot earn in a year. It would be a great step towards equality.”

他们也必然会告诉我们，集体主义工资等级制会是一个进步。他们会这样说：“有些技工的工资比普通工人高两到三倍，这总比工人一年也挣不到大臣一天挣的钱要好。这样做是向平等迈出了一大步。”

For us this step would be the reverse of progress.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simple and professional work in a new society would result in the Revolution sanctioning and recognizing as a principle a brutal fact we submit to nowadays, but that we nevertheless find unjust. It would mean imitating those gentlemen of the French Assembly who proclaimed on August 4th, 1789, the abolition of feudal rights, but who on August 8th sanctioned these same rights by imposing dues on the peasants to compensate the noblemen, placing these dues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volution. It would mean imitating the Russian Government, which proclaimed, at the time of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serfs, that certain lands should henceforth belong to the nobility, while formerly these lands were considered as belonging to the serfs.

在我们看来，这一步恰恰是退步。在一个新社会里，把简单劳动和专业劳动区分开来，会导致革命认可和承认一个野蛮的事实，并把它确立为原则。今天，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不公正的。这样做就意味着效法法国议会的那些议员们。1789年8月4日，他们宣布废除封建主的权利。可是，8月8日，他们又向农民收费补偿贵族，并将这些费用置于革命的保护之下，这样一来，他们又认可了那些被废除的权利。这样做就意味着效法俄国政府。在解放农奴的时候，政府宣布，有些土地今后将属于贵族，而此前这些土地被认为是农奴所有。

Or else, to take a better known example, when the Commune of 1871 decided to pay members of the Commune Council 12s. 6d. a day, while the Federates on the ramparts received only 1s. 3d. , this decision was hailed as an act of superior democratic equality. In reality, the Commune only ratified the former inequality between functionary and soldier, Government and governed. Coming from an Opportunist Chamber of Deputies, such a decision would have appeared admirable, but the Commune doomed her own revolutionary principles when she failed to put them into practice.

或者再举一个更有名的例子。1871年，巴黎公社决定每天支付给公社委员会委员们12先令6便士，而那些守城的士兵们每天只能拿到有1先令3便士。这个决定受到了欢迎，被认为是更优越的民主平等之举。事实上，公社只是认可了以前就存在的官员和士兵、政府和被统

治者之间的不平等。这个决定是由投机取巧的法国国民议会作出的，它看上去是个绝妙的主意。但是，公社却一手导致了她自己的革命原则的失败，因为她未能将其付诸实践。

Under our existing social system, when a minister gets paid 4,000 a year, while a workman must content himself with 40 or less; when a foreman is paid two or three times more than a workman, and among workmen there is every gradation, from 8s. a day down to the peasant girl's 3d. , we disapprove of the high salary of the minister as well a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8s. of the workman and the 3d. of the poor woman. And we say, “Down with the privileges of education, as well as with those of birth!” We are anarchists precisely because these privileges revolt us.

在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下，大臣每年可以拿到4000块，普通工人却只能拿到40块甚至更少，工头的工资比工人高两到三倍，工人内部的工资也分成不同的等级，从八个先令一天到农村小姑娘三个便士一天。我们既反对大臣拿高工资，也反对工人每天八个先令和那个可怜的姑娘每天三个便士之间的巨大差距。我们说：“打倒教育特权打倒出身特权”。我们主张无政府主义，恰恰是因为这些特权让我们反感。

They revolt us already in this authoritarian society. Could we endure them in a society that began by proclaiming equality?

在这个极端主义社会里，他们已经让我们反感了。我们还能够在一个一开始就主张平等的社会里容忍这些特权吗？

This is why some collectivists, understanding the impossibility of maintaining a scale of wages in a society inspired by the breath of the Revolution, hasten to proclaim equality of wage. But they meet with new difficulties, and their equality of wages becomes the same unrealizable Utopia as the scale of wages of other collectivists.

有些集体主义者明白，在大革命的激励下诞生的社会里，不可能再维持工资等级制，所以他们赶紧宣布实行工资平等。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此。可是，他们遇到了新的困难，他们的平等工资制同其他集体主义者主张的工资等级制一样，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A society having taken possession of all social wealth, having boldly proclaimed the right of all to this wealth—whatever share they may have taken in producing it—will be compelled to abandon any system of wages, whether in currency or labour-notes.

一个拥有所有社会财富的社会，一个大胆地宣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财富的社会——无论他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将不得不放弃任何形式的工资制，无论工资是货币还是者劳动券。

IV

四

The collectivists sa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deeds”; or, in other terms, according to his share of services rendered to society. They think it expedient to put this principle into practice, as soon as

the Social Revolution will have made all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common property. But we think that if the Social Revolution had the misfortune of proclaiming such a principle, it would mean its necessary failure; it would mean leaving the social problem, which past centuries have burdened us with, unsolved.

集体主义者说："按劳分配。"或者换句话说，按照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他们认为，只要社会革命使得所有生产资料成为共同财产，就应当将这一原则付诸实施。但我们认为，如果社会革命不幸宣布了这一原则，这也就意味着革命必然失败，也就意味着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困扰我们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Of course, in a society like ours, in which the more a man works the less he is remunerated, this principle, at first sight, may appear to be a yearning for justice. But in reality it is only the perpetuation of injustice. It was by proclaiming this principle that wagedom began, to end in the glaring inequalities and all the abominations of present society; because, from the moment work done began to be appraised in currency, or in any other form of wage, the day it was agreed upon that man would only receive the wage he should be able to secure to himself, the whole history of a State-aided Capitalist Society was as good as written; it was contained in germ in this principle.

当然，在一个像我们这样活干得越多，报酬却越少的社会里，这条原则乍一看上去好像体现了对公正的渴望。但事实上，它只是让不公正继续存在下去。正是在宣扬这条原则的过程中，工资制才得以诞生，可结果它导致了今日社会里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不平等和种种丑恶现象。因为，从人们开始用货币或其他形式的工资来衡量劳动成果那

一刻开始，从人们一致认为工人只能得到他能够获得的工资那天开始，政府援助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历史已然写就，其雏形就在这条原则之中。

Shall we, then, return to our starting-point, and go through the same evolution again? Our theorists desire it, but fortunately it is impossible. The Revolution, we maintain, must be communist; if not, it will be drowned in blood, and have to be begun over again.

那么，我们应该回到起点，再来一次这样的革命吗？我们的理论家们想要这样做，但幸运的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革命必须是共产主义的。如果不是这样，革命就会由于流血而失败，只能从头再来。

Services rendered to society, be they work in factory or field, or mental services, cannot be valued in money. There can be no exact measure of value (of what has been wrongly termed exchange value), nor of use value, in terms of production. If two individuals work for the community five hours a day, year in year out, at different work which is equally agreeable to them, we may say that on the whole their labour is approximately equivalent. But we cannot divide their work, and say that the result of any particular day, hour, or minute of work of the one is worth the result of one day, one hour, or one minute of the other.

为社会提供的服务，无论是工厂里或土地上的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就生产来说，价值（以前人们错误地称之为交换价值）是不能准确衡量的，使用价值也如此。如果两个人年复

一年地每天为社会工作五个小时，从事的工作虽然不同，但他们自己都很喜欢，我们就可以说，总体上看，他们的劳动大致是等价的。但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劳动分开来，说其中一个某一天、某一个小时或者某一分钟的劳动成果相当于另一个人一天、一小时或一分钟的劳动成果。

We may roughly say that the man, who during his lifetime has deprived himself of leisure during ten hours a day has given far more to society than the one who has only deprived himself of leisure during five hours a day, or who has not deprived himself at all. But we cannot take what he has done during two hours, and say that the yield of his two hours' work is worth twice as much as the yield of another individual, who has worked only one hour, and remunerate the two in proportion. It would be disregarding all that is complex in industry, in agriculture, in the whole life of present society; it would be ignoring to what extent all individual work is the result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labour of society as a whole. It would mean believing ourselves to be living in the Stone Age, whereas we are living in an age of steel.

我们可以粗略地说，一个一辈子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不得闲暇的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要比一个每天工作五个小时、不得闲暇的人或者一个根本就没有牺牲闲暇时间的人要多得多。但是，我们不能把他两个小时的工作拿出来，说他在这两个小时之内的成果是另一个只工作了一个小时的人的成果的两倍，并据此相应地支付工资。这样做无视了工业、农业和现代社会的整个生活中的复杂性。这样做忽视了所有的个体劳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过去和现在所有劳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钢铁机器的年代，我们却自欺欺人地认为生活在石器时代。

If you enter a modern coal-mine you will see a man in charge of a huge machine that raises and lowers a cage. In his hand he holds a lever that stops and reverses the course of the machine; he lowers it and the cage reverses its course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he sends it upwards or downwards into the depths of the shaft with a giddy swiftness. All attention, he follows with his eyes fixed on an indicator which shows him, on a small scale, at which point of the shaft the cage is at each second of its progress; and as soon as the indicator has reached a certain level, he suddenly stops the course of the cage, not a yard higher nor lower than the required spot. And no sooner have the colliers unloaded their coal-wagonettes, and pushed empty ones instead, than he reverses the lever and again sends the cage back into space.

如果你走进一个现代的矿井，你会看到一名工人操作一台能够控制升降梯的巨大机器。他的手里握着一根操纵杆，可以停住机器，也可以颠倒机器的运动方向。他把操纵杆向下一拨，升降梯在一瞬间就颠倒了运动方向。他把操纵杆时而向上拨，时而向下拨，升降梯很快就下到井筒深处，速度之快，令人头晕目眩。他全神贯注，眼睛死死盯着一个指示器。这个指示器可以在一个小刻度尺上显示升降梯每一个瞬间位于井筒的哪个位置。一旦指示器到达某个刻度，他就会突然让井筒停下来，不多不少，恰恰停在需要停的位置上。矿工们把矿车上的煤卸下来推走空车之后，他马上把操纵杆打到相反的方向，升降梯又开始升空了。

During eight or ten consecutive hours every day he must keep the same strain of attention. Should his brain relax for a moment, the cage would inevitably strike against the gear, break its wheels, snap the rope, crush men, and put a stop to all work in the mine. Should he waste three seconds at each touch of the lever,—the

extraction, in our modern, perfected mines, would be reduced from twenty to fifty tons a day.

每天，他必须连续八到十个小时像这样全神贯注，精神高度紧张。哪怕他的脑子走神一小会儿，升降梯都会撞上传动装置，会导致轮子破裂，绳索断开，人被压碎，矿井里的一切工作都得停下来。如果他每次触摸操纵杆的时候浪费三秒钟，那么，在我们现代化的改良过的矿井里，每天的开采量就要减少20到50吨。

Is it he who is the most necessary man in the mine? Or, is it perhaps the boy who signals to him from below to raise the cage? Is it the miner at the bottom of the shaft, who risks his life every instant, and who will some day be killed by fire-damp? Or is it the engineer, who would lose the layer of coal, and would cause the miners to dig on rock by a simple mistake in his calculations? Or is it the mine owner who has put his capital into the mine, and who has perhaps, contrary to expert advice, asserted that excellent coal would be found there?

矿井里最不可或缺的人是他吗？或许，是在矿井下面给他发信号升起升降梯的男孩吗？是在井筒底部，每时每刻都冒着生命危险，总有一天要因沼气而丧命的矿工吗？或者，是弄错了煤层分布，由于计算时的低级错误而使得矿工在岩石上开挖的工程师吗？是将资本投入煤矿，或许对专家的意见置之不理，宣称在那里找到了优质原煤的煤矿主吗？

All those who are engaged in the mine contribute to the extraction of coal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trength, their energy, their

knowledge, their intelligence, and their skill. And we may say that all have the right to live, to satisfy their needs, and even their whims, whe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have been secured for all. But how can we appraise the work of each one of them?

所有从事与煤矿有关工作的人都对采煤作出了贡献，贡献大小与他们的力气、精力、知识、智力和技能成正比。我们可以说，所有人都有权利生存，有权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所有人都能得到生活必需品的话，他们甚至还有权满足自己的古怪想法。但我们怎么能够评价他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呢？

And, moreover, Is the coal they have extracted entirely their work? Is it not also the work of the men who have built the railway leading to the mine and the roads that radiate from all the railway stations? Is it not also the work of those that have tilled and sown the fields, extracted iron, cut wood in the forests, built the machines that burn coal, slowly developed the mining industry altogether, and so on?

而且，他们开采出来的煤难道全部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吗？这些劳动成果难道不属于那些修建了通往煤矿的铁路以及从所有火车站始发的公路的人们吗？这些劳动成果难道不属于那些在土地上耕作播种、开采铁矿、在森林里伐木、建造烧煤的机器、慢慢发展采矿业的人们吗？

It is utterly impossible to draw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work of each of those men. To measure the work by its results leads us to an absurdity; to divide the total work, and to measure its fractions

by the number of hours spent on the work also leads us to absurdity. One thing remains: to put the needs above the works, and first of all to recognize the right to live, and later on the right to well-being for all those who took their share in production.

想把这些人的工作完全区分开来，是完全不可能的。用劳动成果来衡量劳动让我们得出荒谬的结论；把总体劳动分割开来，以工作消耗的小时数衡量其各个部分同样让我们得出荒谬的结论。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基本需求应置于精神追求之上，首先承认生存权，然后再谈所有参与生产的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

But take any other branch of human activity—take the manifestations of life as a whole. Which one of us can claim the higher remuneration for his work? Is it the doctor who has found out the illness, or the nurse who has brought about recovery by her hygienic care? Is it the inventor of the first steam-engine, or the boy, who, one day getting tired of pulling the rope that formerly opened the valve to let steam under the piston, tied the rope to the lever of the machine, without suspecting that he had invented the essential mechanical part of all modern machinery—the automatic valve?

但是，如果把任何其他的人类活动——把生命的表现形式视为一个整体。我们中间谁能够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呢？是发现疾病的医生，还是通过保健护理让病人复原的护士？是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者，还是那个小男孩呢？有一天，他厌倦了拉动以前用于打开阀门让蒸汽进入活塞的绳子，于是他把绳子系到机器的控制杆上，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发明了所有现代机器最重要的机械部件——自动阀门。

Is it the inventor of the locomotive, or the workman of Newcastle, who suggested replacing the stones formerly laid under the rails by wooden sleepers, as the stones, for want of elasticity, caused the trains to derail? Is it the engineer on the locomotive? The signalman who stops the trains, or lets them pass by? The switchman who transfers a train from one line to another?

是火车头的发明者，还是纽卡斯尔的工人们？他们建议把以前铺在铁轨下面的石头换成木枕，因为石头缺乏弹性，会导致火车出轨。是火车头上的工程师吗？是阻止火车或放行火车的信号工吗？是让火车从一条线路转到另一条线路的扳道工吗？

Again, to whom do we owe the transatlantic cable? Is it to the electrical engineer who obstinately affirmed that the cable would transmit messages while learned men of science declared it to be impossible? Is it to Maury, the learned physical geographer, who advised that thick cables should be set aside for others as thin as a walking cane? Or else to those volunteers, come from nobody knows where, who spent their days and nights on deck minutely examining every yard of the cable, and removed the nails that the shareholders of steamship companies stupidly caused to be driven into the non-conducting wrapper of the cable, so as to make it unserviceable?

此外，跨大西洋电缆的铺设又该归功于谁呢？是那名在博学的科学家们都宣称电缆不能传播信息时仍然固执地坚持己见的电气工程师吗？是那位主张应该用手杖一样细的电缆替代粗电缆的博学的物理地理学家毛利吗？还是那些不知道来自哪里的志愿者们呢？他们没日没

夜地在甲板上仔细检查每一码电缆，把钉进电缆不导电的外层里的钉子拔出来。轮船公司的股东们为了让它不能正常工作，愚蠢地让人钉了这些钉子。

And in a wider sphere, the true sphere of life, with its joys, its sufferings, and its accidents, cannot each one of us recall someone who has rendered him so great a service that we should be indignant if its equivalent in coin were mentioned? The service may have been but a word, nothing but a word spoken at the right time, or else it may have been months and years of devotion, and we are going to appraise these “incalculable” services in “labour-notes”?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从充满了欢乐、痛苦和事故的生命的真正历程来看，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回忆起一个这样的人吗？他帮过我们大忙，但只要提到用等价的钱来报答，我们就会义愤填膺。这个忙可能只是一个词，一个在适当的时候讲出的词，或者可能是常年的奉献，我们难道要用“劳动券”来衡量这些“无价的”帮忙吗？

“The works of each!” But human society would not exist for more than two consecutive generations if everyone did not give infinitely more than that for which he is paid in coin, in “cheques,” or in civic rewards. The race would soon become extinct if mothers did not sacrifice their lives to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if men did not give continually, without demanding an equivalent reward, if men did not give most precisely when they expect no reward.

“每个人干自己的工作”。但是，如果每个人付出的劳动不比用他们得到的金钱、“支票”或福利来衡量的劳动要得多得多的话，人类社

会根本无法延续超过两代。如果母亲不牺牲自己的生命照顾自己的孩子，如果人类不是不求回报地持续付出，如果人类不是在恰恰不求回报的时候才付出最大的劳动，这个种族很快就会灭绝。

If middle-class society is decaying, if we have got into a blind alley from which we cannot emerge without attacking past institutions with torch and hatchet,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we have given too much to counting. It is because we have let ourselves be influenced into giving only to receive. It is because we have aimed at turning society into a commercial company based on debit and credit.

如果中产阶级社会正在衰亡，如果我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不用火把和斧头攻击旧体制就无法找到出路，那恰恰是因为我们太斤斤计较了。那是因为，我们让自己接受了付出就是为了得到回报的观点。那是因为，我们想把社会变成一个建立在借贷基础上的商业公司。

After all, the Collectivists know this themselves. They vaguely understand that a society could not exist if it carried out the principle of “Each according to his deeds.” They have a notion that necessaries—we do not speak of whims—the needs of the individual, do not always correspond to his works. Thus De Paepe tells us: “The principle—the eminently Individualist principle—would, however, be tempered by social interven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including maintenance and lodging), and b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for assisting the infirm and the sick, for retreats for aged workers, etc.” They understand that a man of forty, father of three children, has other needs than a young man of twenty. They know that the woman who suckles her

infant and spends sleepless nights at its bedside, cannot do as much work as the man who has slept peacefully. They seem to take in that men and women, worn out maybe by dint of overwork for society, may be incapable of doing as much work as those who have spent their time leisurely and pocketed their “labour-notes” in the privileged career of State functionaries.

毕竟，集体主义者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们隐隐约约地觉得，如果一个社会实施了“按劳分配”的原则，那它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他们认为，生活必需品——我们不谈论那些奇怪的念头——个人的需要，并不总是同他的劳动相对应。因此德·帕普告诉我们：“然而，那个明显是个人主义的原则应当通过一些手段加以调和，例如社会应当介入孩子和年轻人的教育（包括生活费和住宿费），以及建立社会机构，帮助病弱，为年老的工人找到休养之地等等。”他们认为，一个有三个孩子的40岁男人有一些不同于20岁年轻男子的需求。他们知道，一个处于哺乳期、在婴儿床边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的妇女，不可能跟一个甜甜美美睡了一大觉的男子完成等量的工作。他们似乎认为，为社会操劳过度而疲惫不堪的男人和女人们，跟那些悠闲度日、利用他们担任政府官员的特权把“劳动券”揣进兜里的人相比，能够完成的工作要少。

They are eager to temper their principle. They say: “Society will not fail to maintain and bring up its children; to help both aged and infirm. Without doubt needs will be the measure of the cost that society will burden itself with, to temper the principle of deeds.”

他们迫切地想修正自己的原则。他们说：“社会不会不抚育和培养自己的孩子，也不会不帮助年老体弱者。毫无疑问，要修正按劳分

配的原则，就要用需求来衡量社会需要担负的成本。”

Charity, charity, always Christian charity, organized by the State this time. They believe in improving the asylums for foundlings, in effecting old-age and sick insurances—so as to temper their principle. But they cannot yet throw aside the idea of “wounding first and healing afterwards”!

慈善组织，慈善组织，总是基督教的慈善组织，不过这次是政府设立的慈善组织。他们相信，通过改善为弃儿设立的收容所，通过使老人和病人加入保险，可以修正他们的原则。可是，他们却仍然不能放弃“先伤害后治疗”的想法！

Thus, after having denied Communism, after having laughed at their ease at the formula—“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these great economists discover that they have forgotten something, the needs of the producers, which they now admit. Only it is for the State to estimate them, for the State to verify if the needs are not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work.

因此，在拒绝接受共产主义之后，在肆意嘲笑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之后，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忘掉了什么东西，那就是生产者的需要，这一点他们现在已经承认。不过，需要政府来评估这些需求，需要政府来核实这些需求和他们的劳动是成正比的。

The State will dole out charity. Thence to the English poor-law and the workhouse is but a step.

政府会少量地发放救济。这距离制定英国济贫法和设立救济院仅仅一步之遥。

There is but a slight difference, because even this stepmother of a society against whom we are in revolt has also been compelled to temper her individualist principles; she, too, has had to make concessions in a communist direction and under the same form of charity.

但二者之间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因为我们正在反对的这个社会的继母也同样被迫修正她的个人主义原则。她也得像共产主义者那样以慈善的名义作出让步。

She, too, distributes halfpenny dinners to prevent the pillaging of her shops; builds hospitals—often very bad ones, but sometimes splendid ones—to prevent the ravages of contagious diseases. She, too, after having paid the hours of labour, shelters the children of those she has wrecked. She takes their need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doles out charity.

她也得分发价值半个便士的食物，以防止她的商店被洗劫；她也得建立医院——往往是很糟糕的医院，但有时候也会有一流的医院——以预防传染病肆虐；她也得在支付过劳动报酬之后，为那些被她伤害的孩子们提供栖身之所；她得考虑他们的需要，少量地发放救济。

Poverty, we have said elsewhere, was the primary cause of wealth. It was poverty that created the first capitalist; because, before accumulating “surplus value,” of which we hear so much, men had to be sufficiently destitute to consent to sell their labour, so as not to die of hunger. It was poverty that made capitalists. And if the number of the poor increased so rapidly during the Middle Ages, it was due to the invasions and wars that followed the founding of States, and to the increase of riches resulting from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East. These two causes tore asunder the bonds that kept men together in the agrarian and urban communities, and taught them to proclaim the principle of wages, so dear to the exploiters, instead of the solidarity they formerly practiced in their tribal life.

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说过，贫穷是财富的主因。正是贫穷造就了最早的资本家，因为，在积累“剩余价值”（关于这个我们经常听说）之前，人们必须足够贫穷，才会为了不饿死，同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如果说在中世纪穷人的人数增长十分迅速，那是因为众多的入侵和民族国家建立之后紧接着发生的战争以及由于对东方的剥削而急剧增加的财富。这两个原因把以前将人们维系在农业和城市社区里的纽带撕得支离破碎，并教会了他们赞美剥削者视为珍宝的工资原则，而不是他们在之前的部落生活中奉行的团结一致。

And it is this principle that is to spring from a revolution which men dare to call by the name of Social Revolution,—a name so dear to the starved, the oppressed, and the sufferers!

一场革命诞生了这条原则，人们竟然将其称为社会革命——一个对挨饿的人、受压迫的人和忍受痛苦的人来说珍贵无比的名称。

It can never be. For the day on which old institutions will fall under the proletarian axe, voices will cry out: “Bread, shelter, ease for all!” And those voices will be listened to; the people will say: “Let us begin by allaying our thirst for life, for happiness, for liberty, that we have never quenched. And when we shall have tasted of this joy, we will set to work to demolish the last vestiges of middle-class rule: its morality drawn from account books, its 'debit and credit” philosophy, its 'mine and yours” institutions. 'In demolishing we shall build,' as Proudhon said; and we shall build in the name of Communism and Anarchy.”

这场革命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因为，旧体制在无产阶级的斧头下土崩瓦解之日，很多声音高喊着：“人人都应当享有面包、住房和舒适。”这些喊声会被倾听。人们会说：“我们先缓解对生命、幸福和自由的渴求吧，反正这些渴求我们从来也没有完全满足过。当我们尝到了这种幸福的滋味，我们将着手摧毁中产阶级统治的最后残余力量：它从账簿上得来的道德观念，它的‘借贷’哲学，它的‘我的和你的’制度。‘在摧毁的同时，我们也将建设，’正如蒲鲁东所说，我们将以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名义进行建设。”

CHAPTER XIV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第十四章　消费与生产

I

一

Looking at society and its political organization from a different standpoint than that of all the authoritarian schools—for we start from a free individual to reach a free society, instead of beginning by the State to come down to the individual—we follow the same method in economic questions. We study the needs of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means by which they satisfy them, before discussing Production, Exchange, Taxation, Government, and so on. At first sight the difference may appear trifling, but in reality it upsets all the canons of official Political Economy.

如果以不同于权利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及其政治组织——因为我们要通过个体自由达到社会自由，而不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地给予个人自由——那么我们在经济问题上也要遵循同样的方法。我们研究个体的需求以及他们如何满足这些需求，然后才能讨论生产、交换、税收、政府等等。初看上去，这之间的差异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颠覆了官方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准则。

If you open the works of any economist you will find that he begins with PRODUCTION, i.e., by the analysis of the means employed nowadays for the creation of wealth: division of labour, the factory, its machinery,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From Adam

Smith to Marx, all have proceeded along these lines. Only in the latter parts of their books do they treat of CONSUMPTION, that is to say, of the means resorted to in our present Society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 individuals; and even there they confine themselves to explaining how riches are divided among those who vie with one another for their possession.

翻开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的著作，你会发现他总是从生产开始谈起，也就是分析当今为了创造财富采取何种手段：劳动分工、工厂、机器、资本积累。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的。只有到了著作靠后的部分，他们才谈到了消费，也就是在我们当今社会用于满足个人需求的各种手段。即使在这时，他们也仅仅局限于解释财富是如何在那些相互争夺其所有权的人之间分配的。

Perhaps you will say this is logical. Before satisfying needs you must create the wherewithal to satisfy them. But, before producing anything, must you not feel the need of it? Was it not necessity that first drove man to hunt, to raise cattle, to cultivate land, to make implements, and later on to invent machinery? Is it not the study of the needs that should govern production? To say the least, it would therefore be quite as logical to begin by considering the needs, and afterwards to discuss how production is, and ought to be, organized, in order to satisfy these needs.

也许你会说这是合乎逻辑的。在满足需求之前，你必须创造出满足需求的手段。可是，在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之前，你就不会感到有需求吗？难道不是因为需求，人们才开始打猎、饲养家畜、耕种土地、制造工具以及后来发明机器吗？难道不应当研究需求来支配生产吗？退一步说，先考虑这些需求，然后再讨论如何组织生产以及应当

如何组织生产来满足这些需求，这样做也同样合乎逻辑。

This is precisely what we mean to do.

这也正是我们想要做的。

But as soon as we look at Political Economy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t entirely changes its aspect. It ceases to be a simple description of facts, and becomes a science, and we may define this science as: “The study of the needs of mankind, and the means of satisfying them with the least possible waste of human energy”. Its true name should be, Physiology of Society. It constitutes a parallel science to the physiology of plants and animals, which is the study of the needs of plants and animals, and of the most advantageous ways of satisfying them. In the series of sociological sciences, the economy of human societies takes the place, occupied in the series of biological sciences by the physiology of organic bodies.

然而，一旦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政治经济学，它的面貌马上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它不再是简单地对事实的描述，而变成了一门科学，我们可以把这门科学定义为：“对人类需求以及在浪费最少人力的情况下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的研究。”它真正的名称应当是社会生理学。它是一门同动植物生理学并列的科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研究的是动植物的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最有利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的序列里，人类社会经济占据的位置相当于有机体生理学在生物科学序列里占据的位置。

We say, here are human beings, united in a society. All of them feel the need of living in healthy houses. The savage's hut no longer satisfies them; they require a more or less comfortable solid shelter. The question is, then: whether, taking the present capacity of men for production, every man can have a house of his own? and what is hindering him from having it?

我们说，这就是人类，共同生活在社会里。所有人都有生活在有益健康的住房里的需求。原始人居住的小屋不再能满足他们，他们需要比较舒适的结实的栖身之所。问题是，考虑到人类现在的生产能力，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住房呢？是什么导致了他们不能拥有住房呢？

And as soon as we ask this question, we see that every family in Europe could perfectly well have a comfortable house, such as are built in England, in Belgium, or in Pullman City, or else an equivalent set of rooms. A certain number of days' work would suffice to build a pretty little airy house, well fitted up and lighted by electricity.

我们一提出这个问题，马上就会发现，欧洲每个家庭都完全可以拥有一套舒适的住房，就像那些建在英国、比利时或者普尔曼市的住房，或者与之相当的套房。一定天数的劳动所获取的报酬就足够建造一座漂亮通风、设施齐全，用电灯照明的房子。

But nine-tenths of Europeans have never possessed a healthy house, because at all times common people have had to work day after day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ir rulers, and have never had the

necessary leisure or money to build, or to have built, the home of their dreams. And they can have no houses, and will inhabit hovels as long as present conditions remain unchanged.

但是，90%的欧洲人从未拥有一套有益健康的住房，因为普通人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劳作以满足统治者的需求，从来没有必要的闲暇或金钱建造他们梦寐以求的住房。因此他们没有住房，只要目前的情况不发生变化，他们就只能住在简陋的小屋里。

It is thus seen that our method is quite contrary to that of the economists, who immortalize the so-called laws of production, and, reckoning up the number of houses built every year, demonstrate by statistics, that as the number of the new-built houses is too small to meet all demands, nine-tenths of Europeans must live in hovels.

因此，可以看到，我们的方法同经济学家的方法正好相反。他们把所谓的生产法则奉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在计算过每年建造的住房之后，通过统计数字证明，因为新建住房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90%的欧洲人必须生活在简陋的小屋里。

Let us pass on to food. After having enumerated the benefits accruing from the division of labour, economists tell us the division of labour requires that some men should work at agriculture and others at manufacture. Farmers producing so much, factories so much, exchange being carried on in such a way, they analyze the sale, the profit, the net gain or the surplus value, the wages, the taxes, banking, and so on.

我们接下来看看食物问题。在列举了劳动分工的种种好处之后，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劳动分工需要有人从事农业，有人从事制造业。农民生产多少，工厂生产多少，应当以什么方式进行交换，他们分析销售额、利润、净利或剩余价值、工资、税收、银行业务等等。

But after having followed them so far, we are none the wiser, and if we ask them: “How is it that millions of human beings are in want of bread, when every family could grow sufficient wheat to feed ten, twenty, and even a hundred people annually?” they answer us by droning the same anthem—division of labour, wages, surplus value, capital, etc.—arriving at the same conclusion, that production is insufficient to satisfy all needs; a conclusion which, if true, does not answer the question: “Can or cannot man by his labour produce the bread he needs? And if he cannot, what is it that hinders him?”

但是，看他们谈了这么多，我们还是不明白。如果我们问他们：“数以百万计的人没有面包吃，可是每个家庭每年生产的小麦足以养活十个、二十个，甚至一百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在回答的时候只能老调重弹——劳动分工、工资、剩余价值、资本等等。最终还是同样的结论：生产不足以满足所有的需求。这个结论即使正确，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人们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出自己所需的面包？如果不能，又是什么阻碍了他们呢？”

Here are 350 million Europeans. They need so much bread, so much meat, wine, milk, eggs, and butter every year. They need so many houses, so much clothing. This is the minimum of their needs. Can they produce all this? and if they can, will sufficient leisure be left them for art, science, and amusement?—in a word, for

everything that is not comprised in the category of absolute necessities? If the answer is in the affirmative,—What hinders them going ahead? What must they do to remove the obstacles? Is it time that is needed to achieve such a result? Let them take it! But let us not lose sight of the aim of production—the satisfaction of the needs of all.

欧洲这里有3.5亿人。每年，他们需要许多面包、肉、酒、牛奶、鸡蛋和黄油，需要许多住房和衣服。这是他们最低限度的需求。他们能生产出这些吗？如果能，他们能够有足够的闲暇从事艺术、科学和娱乐活动吗？一句话，他们能够有足够的闲暇从事一切必须活动之外的活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又是什么使得他们未能做到呢？他们应该如何消除障碍呢？这个目标需要的是时间吗？那就给他们时间。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生产的目标——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If the most imperious needs of man remain unsatisfied now,—What must we do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our work? But is there no other cause? Might it not be that production, having lost sight of the needs of man, has strayed in an absolutely wrong direction, and that its organization is at fault? And as we can prove that such is the case, let us see how to reorganize production so as to really satisfy all needs.

如果现在人类最迫切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提高劳动生产率呢？难道就没有其他原因了吗？有没有可能由于生产忽视了人类的需求而走上了完全错误的道路，因而生产的组织工作才是罪魁祸首呢？我们可以证明，事实的确如此。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如何重新组织生产以满足所有的需求吧。

This seems to us the only right way of facing things. The only way that would allow of Political Economy becoming a science—the Science of Social Physiology.

在我们看来，这是面对问题唯一正确的方法。这是让社会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社会生理学——的唯一方法。

It is evident that so long as science treats of production, as it is carried on at present by civilized nations, by Hindoo communes, or by savages, it can hardly state facts otherwise than the economists state them now; that is to say, as a simple descriptive chapter, analogous to the descriptive chapters of Zoology and Botany. But if this chapter were written so as to throw some light on the economy of the energy that is necessary to satisfy human needs, the chapter would gain in precision, as well as in descriptive value. It would clearly show the frightful waste of human energy under the present system, and it would prove that as long as this system exists, the needs of humanity will never be satisfied.

很明显，只要科学论及生产，无论是文明国家、印度公社还是野蛮人从事的生产，它就只能像经济学家一样陈述事实。也就是说，用一章的篇幅简单地描述一下生产，就像动物学和植物学里的描述性章节一样。但是，如果书写这一章是为了能够揭示满足人类需求必不可少的能量，那么这一章无论是在准确性上，还是在描述价值上都会大幅增加。它会很清楚地表明，在现行制度下，人类能量的浪费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它还可以证明，只要这个制度存在下去，人类的需求将永远不能得到满足。

The point of view, we see, would be entirely changed. Behind the loom that weaves so many yards of cloth, behind the steel-plate perforator, and behind the safe in which dividends are hoarded, we should see man, the artisan of production, more often than not excluded from the feast he has prepared for others. We should also understand that the standpoint being wrong, the so-called “laws” of value and exchange are but a very false explanation of events, as they happen nowadays; and that things will come to pass very differently when production is organized in such a manner as to meet all needs of society.

显然，这种观点将会得到彻底的改变。在纺织了不知多少码布匹的织机后面，在钢板穿孔器后面，在存放红利的保险箱后面，我们看到那些从事生产的工人们常常不能享受到他为别人准备的盛宴。我们还应当明白，一旦立场有问题，所谓的价值和交换“规律”只能是对事实歪曲的解释，今天的情况正是如此。如果组织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全部需求，那么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II

二

There is not one singl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at does not change its aspect if you look at it from our point of view.

如果你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政治经济学，就会发现，没有哪一条原则是一成不变的。

Take, for instance, over-production, a word which every day re-echoes in our ears. Is there a single economist, academician, or candidate for academical honours, who has not supported arguments, proving that economic crises are due to over-production—that at a given moment more cotton, more cloth, more watches are produced than are needed! Have we not, all of us, thundered against the rapacity of the capitalists who are obstinately bent on producing more than can possibly be consumed!

就拿生产过剩这个每天回荡在我们耳边的词来说吧。有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学者或者即将获得学术荣誉的候选人在证明金融危机是生产过剩导致的时候没有支持过这样的论点呢？那就是，在某一特定时期，生产出来的棉花、布料和手表超过了需求难道我们所有人没有大声疾呼，抗议那些执意生产出超出需求的产品的资本家的贪婪吗？

However, on careful examination all these reasonings prove unsound. In fact, Is there one single commodity among those in universal use which is produced in greater quantity than need be. Examine one by one all commodities sent out by countries exporting on a large scale, and you will see that nearly all are produced in insufficient quantities for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ies exporting them.

然而，仔细审视之后，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推理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所有那些广泛使用的商品里面，有一样的产量超出了需求吗？仔细看每个大规模出口的商品，你会发现，所有这些商品的产量都不足以满足出口国居民的需求。

It is not a surplus of wheat that the Russian peasant sends to Europe. The most plentiful harvests of wheat and rye in European Russia only yield enough for the population. And as a rule, the peasant deprives himself of what he actually needs when he sells his wheat or rye to pay rent and taxes.

俄国农民卖到欧洲的并不是过剩的小麦。俄国的小麦和黑麦收成最好的时候也只能刚刚满足当地人的需求。通常，当农民卖掉小麦或黑麦以缴纳租金和税款的时，他们也就卖掉了自己真正需要的粮食。

It is not a surplus of coal that England sends to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globe, because only three-quarters of a ton, per head of population, annually, remains for home 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millions of Englishmen are deprived of fire in the winter, or have only just enough to boil a few vegetables. In fact, setting aside useless luxuries, there is in England, which exports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one single commodity in universal use—cottons—whose production is sufficiently great to perhaps exceed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Yet when we look upon the rags that pass for wearing apparel worn by over a third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we are led to ask ourselves whether the cottons exported would not, on the whole, suit the real needs of the population?

英国向全世界输送的也不是过剩的煤，因为每年每个英国人只剩下四分之三吨煤以供家用，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在冬天没有煤取暖，或者手头的煤只能用来煮一些蔬菜。事实上，抛开那些无用的奢侈品不谈，在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有一样广泛使用的商品——棉花——产量极大，或许已经超出了社会的需求。可是，当我们看到

超过三分之一的英国居民穿的那些破破烂烂的衣服时，我们不由得会问自己，那些出口的棉花难道不能基本上满足英国人的真正需求吗？

As a rule it is not a surplus that is exported, though it may have been so originally. The fable of the barefooted shoemaker is as true of nations as it was formerly of individual artisans. We export the necessary commodities. And we do so, because the workmen cannot buy with their wages what they have produced, and pay besides the rent and interest to the capitalist and the banker.

通常，出口的商品并不是过剩的商品，尽管最初的时候可能是这样的。光脚的鞋匠的寓言对于国家来说，同它以前对于个体工匠来说同样适用。我们出口的是必需品。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工人们不能用工资购买他们生产的产品，而且还要向资本家和银行家缴纳租金和利息。

Not only does the ever-growing need of comfort remain unsatisfied, but the strict necessities of life are often wanting. Therefore, “surplus production” does not exist, at least not in the sense given to it by the theorists of Political Economy.

不仅日益增长的对于舒适生活的需求仍然没有得到满足，甚至那些确定无疑的生活必需品也往往短缺。因此，“生产过剩”并不存在，至少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们赋予的意义上不存在。

Taking another point—all economists tell us that there is a well- proved law: “Man produces more than he consumes.” After he

has lived on the proceeds of his toil, there remains a surplus. Thus, a family of cultivators produces enough to feed several families, and so forth.

再来看另一点——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告诉我们，有一条被反复证明的法则："人生产的东西要比他消费的多。"在他靠自己的劳动所得谋生度日之后，还会有剩余。因此，一个耕作者家庭生产出来的食物足够养活好多家庭。

For us, this oft-repeated sentence has no sense. If it meant that each generation leaves something to future generations, it would be true; thus, for example, a farmer plants a tree that will live, maybe, for thirty, forty, or a hundred years, and whose fruits will still be gathered by the farmer's grandchildren. Or he clears a few acres of virgin soil, and we say that the heritage of future generations has been increased by that much. Roads, bridges, canals, his house and his furniture are so much wealth bequeathed to succeeding generations.

在我们看来，这个经常被重复的句子完全站不住脚。如果它的意思是说每一代都能给后人留下点东西，那么它是对的；例如，农民种下一棵树，这棵树也许可以活三十、四十年，或者一百年，农民的孙子仍然可以采摘它的果实。或者他清理出几英亩的处女地，我们说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相应地增加了那么多。公路、桥梁、运河以及他的住房和家具都是他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

But this is not what is meant. We are told that the cultivator produces more than he need consume. Rather should they say that,

the State having always taken from him a large share of his produce for taxes, the priest for tithe, and the landlord for rent, a whole class of men has been created, who formerly consumed what they produced—save what was set aside for unforeseen accidents, or expenses incurred in afforestation, roads, etc.—but who to-day are compelled to live very poorly, from hand to mouth, the remainder having been taken from them by the State, the landlord, the priest, and the usurer.

可是，这句话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被告知，耕作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比他所能消费的要多。他们应该这样说，国家总是拿走他很大一部分的劳动成果作为税收，牧师拿走一部分作为什一税，地主拿走一部分作为租金。这样一来，整整一个阶层的人就产生了，他们本来是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的——除了那些预留下来应对不可预知的事故，或者种树、修路等的费用等——可现在，他们被迫过着贫苦的生活，仅能勉强糊口，因为其他的劳动所得都被政府、地主、牧师和高利贷者夺走了。

Therefore we prefer to say: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 the industrial worker and so on consume less than they produce,—because they are compelled to sell most of the produce of their labour and to be satisfied with but a small portion of it.

因此，我们更愿意这样说：农民、工人等消费的东西比他们生产的要少，因为他们被迫出卖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只能保留很少的一部分。

Let us also observe that if the needs of the individual are taken

as the starting-point of our political economy, we cannot fail to reach Communism, an organization which enables us to satisfy all needs in the most thorough and economical way. While if we start from our present method of production, and aim at gain and surplus value, without asking whether our production corresponds to the satisfaction of needs, we necessarily arrive at Capitalism, or at most at Collectivism—both being but two different forms of the present wages' system.

我们还要说，如果个体的需求被视为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我们就不会到不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可以使我们以最全面和最经济的方式满足所有的需求。如果我们从现在的生产方式出发，眼里只有利润和剩余价值，而不去追问我们的生产能否满足需求，我们必然会到达资本主义，或者最多到达集体主义——这两种制度都是现今工资制的两种不同的形式。

In fact, when we consider the needs of the individual and of society, and the means which man has resorted to in order to satisfy them during his varied phases of development, we see at once the necessity of systematizing our efforts, instead of producing haphazard as we do nowadays.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the appropriation by a few of all riches not consumed, and transmitted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is not in the general interest. And we see as a fact that owing to these methods the needs of three-quarters of society are not satisfied, so that the present waste of human strength in useless things is only the more criminal.

事实上，当我们考虑个体和社会的需求，以及人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为了满足需求而采取的手段之时，我们马上就能明白，生产应当

实行系统化，而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盲目生产。很显然，少数人占有没有消耗的财富，并将他们代代相传，是不符合大众利益的。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事实：由于这些生产方式，四分之三的社会成员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现今在没有价值的东西上的人力浪费就显得更加可耻。

We discover, moreover, that the most advantageous use of all commodities would be, for each of them, to go, first, for satisfying those needs which are the most pressing: that, in other words, the so-called “value in use” of a commodity does not depend on a simple whim, as has often been affirmed, but on the satisfaction it brings to real needs.

我们还发现，利用所有商品最好的方法是每样商品都首先用来满足那些最为迫切的需求。换句话说，所谓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不像人们经常断言地那样取决于突发奇想，而是取决于它对于真正需求的满足。

Communism—that is to say, an organization which would correspond to a view of Consumption,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taken as a whole—therefore becomes the logical consequence of such a comprehension of things—the only one, in our opinion, that is really scientific.

共产主义——也就是说，一种与消费、生产和交换总体观相一致的制度——因此就成了这种理解合乎逻辑的结论了——在我们看来，这种理解才是唯一真正科学的。

A society that will satisfy the needs of all, and which will know how to organize production to answer to this aim will also have to make a clean sweep of several prejudices concerning industry, and first of all the theory often preached by economists—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ory—which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in the next chapter.

一个致力于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知道如何组织生产以达到这一目标的社会，也必须要彻底扫清对于工业的一些偏见。首先是经济学家们经常宣扬的理论——劳动分工理论——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CHAPTER XV THE DIVISION OF LABOUR

第十五章　劳动分工

Political Economy has always confined itself to stating facts occurring in society, and justifying them in the interest of the dominant class. Therefore, it pronounces itself in favour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industry. Having found it profitable to capitalists, it has set it up as a principle.

政治经济学总是把自己局限在陈述社会已发生的事实，然后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对这些事实进行辩护。因此，它支持工业中的劳动分工。它发现劳动分工对于资本家而言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将其确立为一条原则。

Look at the village smith, said Adam Smith, the father of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If he has never been accustomed to making nails he will only succeed by hard toil in forging two or three hundred a day, and even then they will be bad. But if this same smith has never made anything but nails, he will easily supply as many as two thousand three hundred in the course of a day. And Smith hastened to the conclusion—“Divide labour, specialize, go on specializing; let us have smiths who only know how to make heads or points of nails, and by this means we shall produce more. We shall grow rich.”

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说，看看村里的铁匠。如果他没有

习惯于制作钉子，那么他只能通过辛苦的劳动每天制作两百到三百个，而且质量还不高。可是，如果这名铁匠除了钉子之外，从来没有制作过其他东西，他可以很轻松地每天制作2300个钉子。于是斯密马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劳动进行分工，专门化，继续专门化；让铁匠们只知道如何制作钉帽或者钉尖，这样我们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我们会变得富裕。”

That a smith condemned for life to make the heads of nails would lose all interest in his work, that he would be entirely at the mercy of his employer with his limited handicraft, that he would be out of work four months out of twelve, and that his wages would fall very low down, when it would be easy to replace him by an apprentice, Smith did not think of all this when he exclaimed—“Long live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is is the real gold-mine that will enrich the nation!” And all joined him in this cry.

一辈子只能制作钉帽的铁匠会对自己的工作丧失兴趣；由于他的手艺很有限，他会完全受制于雇主；一年十二个月有四个月没有工作；他的工资会降到很低很低，此时他很容易被学徒取代。史密斯全然没有想到这些，他只是高喊“劳动分工万岁。这是能让国家富裕起来的真正的金矿！”所有人都跟他一起高呼。

And later on, when a Sismondi or a J. B. Say began to understand that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stead of enriching the whole nation, only enriches the rich, and that the worker, who is doomed for life to making the eighteenth part of a pin, grows stupid and sinks into poverty—what did official economists propose? Nothing! They did not say to themselves that by a lifelong grind at one and the same mechanical toil the worker would lose his

intelligence and his spirit of invention, and that, on the contrary, a variety of occupations would result in considerably augmenting the productivity of a nation. But this is the very issue we have now to consider.

后来，西斯蒙第式或者J. B. 萨伊式的人物开始明白，劳动分工不会让国家富裕起来，而只会让富人更富；一辈子只能制作钢钉的第十八个部件的工人会变得愚蠢，陷入贫困。这个时候，那些正统的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什么建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没有对自己说，由于一辈子只能从事同一种机械式的劳作，工人会丧失自己的智力和创造精神。反之，多样化的工作可以极大地提升国家的生产率。但这正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

If, however, learned economists were the only ones to preach the permanent and often hereditary division of labour, we might allow them to preach it as much as they pleased. But the ideas taught by doctors of science filter into men's minds and pervert them; and from repeatedly hearing the division of labour, profits, interest, credit, etc. , spoken of as problems long since solved, all middle-class people, and workers too, end by arguing like economists; they venerate the same fetishes.

如果仅仅是那些有学问的经济学家们宣扬永久的、往往是世袭的劳动分工，我们还可以让他们随便宣扬去。可是，科学博士们讲授的理念逐渐进到了人们的脑子里，让他们产生了错误的认知。由于经常听到劳动分工、利润、利息、贷款等等，好像这些问题早已经得到了解决，所有的中产阶级以及工人最后都像经济学家们一样论辩。他们对于同样的论调顶礼膜拜。

Thus we see most socialists, even those who have not feared to point out the mistakes of economical science, justifying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alk to them about the organization of work during the Revolution, and they answer that the division of labour must be maintained; that if you sharpened pins before the Revolution you must go on sharpening them after. True, you will not have to work more than five hours a day, but you will have to sharpen pins all your life, while others will make designs for machines that will enable you to sharpe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ins during your lifetime; and others again will be specialists in the highe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 etc. You were born to sharpen pins while Pasteur was born to invent the inoculation against anthrax, and the Revolution will leave you both to your respective employments. Well, it is this horrible principle, so noxious to society, so brutalizing to the individual, source of so much harm, that we propose to discuss in its divers manifestations.

因此，我们看到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甚至那些不惧怕指出经济学错误的社会主义者，都在为劳动分工辩护。你跟他们谈革命期间的劳动组织，他们会回答说，劳动分工必须保持下去。如果你在革命前的工作是打磨钉子，那么革命后你应该继续打磨钉子。的确，你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五个小时，但是你仍然要一辈子打磨钉子，而其他人负责设计的机器会使你一辈子打磨千千万万个钉子，还有一些人则成为文学、科学、艺术等高级门类的专家。你生来就是要打磨钉子的，而巴斯德生来就是要发明预防炭疽热的疫苗的，革命让你们俩继续各自的工作。这个可怕的原则对社会有害，对个人无情，造成了许多弊端，下面我们将会讨论它的各种表现形式。

We know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full well. It is evident that, first of all, we ar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on the

one hand, producers, who consume very little and are exempt from thinking because they only do physical work, and who work badly because their brains remain inactiv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sumers, who, producing little or hardly anything, have the privilege of thinking for the others, and who think badly because the whole world of those who toil with their hands is unknown to them. Then, we have the labourers of the soil who know nothing of machinery, while those who work at machinery ignore everything about agriculture. The idea of modern industry is a child tending a machine that he cannot and must not understand, and a foreman who fines him if his attention flags for a moment. The ideal of industrial agriculture is to do away with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 altogether and to set a man who does odd jobs to tend a steam-plough or a threshing- machine. The division of labour means labelling and stamping men for life—some to splice ropes in factories, some to be foremen in a business, others to shove huge coal-baskets in a particular part of a mine; but none of them to have any idea of machinery as a whole, nor of business, nor of mines. And thereby they destroy the love of work and the capacity for invention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industry, created the machinery on which we pride ourselves so much.

我们非常清楚劳动分工带来的后果。显然，首先，我们被分成了两个阶层：一方面是生产者，他们消耗很少，由于只从事体力劳动而不能思考，他们工作效率很低，因为大脑不活动。另一方面是消费者，他们生产的东西很少，甚至不生产，却享有替别人思考的特权。可是，由于他们对劳动者的世界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思考往往是错误的。此外，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对机器一无所知，操作机器的人也不熟悉农业。现代工业就是让一个孩子操作他不明白而且也不需要明白的机器，再让工头监督他，稍有怠慢，就对他进行罚款。产业化农业的理想就是彻底将农业劳动者抛在一边，找个人打零工，看管蒸汽机

引犁或脱粒机。劳动分工意味着将人们一辈子贴上标签、打上印记——有人在工厂里拼接绳子，有人在公司里做工头，有人在矿井的某个地方推装煤的筐子。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对机器、公司和矿井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因此，他们丧失了对工作的热爱和发明创造的能力，而在现代工业的肇始阶段，正是这些才创造出了我们如此引以为豪的机器。

What they have done for individuals, they also wanted to do for nations. Humanity was to be divided into national workshops, having each its speciality. Russia, we were taught, was destined by nature to grow corn; England to spin cotton; Belgium to weave cloth; while Switzerland was to train nurses and governesses. Moreover, each separate city was to establish a specialty. Lyons was to weave silk, Auvergne to make lace, and Paris fancy articles. In this way, economists said, an immense field was opened for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in this way an era of limitless wealth for mankind was at hand.

他们想把自己对个人所做的一切都运用到国家上。人类将被分成各种国家工厂，每个国家的工厂均有自己的特产。他们告诉我们，俄国注定要种植玉米，英国注定要纺棉，比利时注定要织布，而瑞士注定要训练护士和女家庭教师。此外，每一个独立的城市也应有自己的特产。里昂应当织丝，奥弗涅应该制作饰带，巴黎则生产各种奢侈品。经济学家们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开辟生产和消费的广袤空间；通过这样的方式，人类获取无限财富的时代近在咫尺。

However, these great hopes vanished as fast as technical knowledge spread abroad. As long as England stood alone as a weaver of cotton and as a metal-worker on a large scale; as long as

only Paris made artistic fancy articles, etc. , all went well, economists could preach the so-called division of labour without being refuted.

然而，一旦科技知识传播到国外，这些伟大的希望就破灭了。只要英国是唯一大规模纺棉和制造金属的国家，只要巴黎是唯一制造富有艺术性的奢侈品的城市，那就一切安好。经济学家们可以宣扬所谓的劳动分工，没有人会来反驳他们。

But a new current of thought induced bye and bye all civilized nations to manufacture for themselves. They found it advantageous to produce what they formerly received from other countries, or from their colonies, which in their turn aimed at emancipating themselves from the mother-country. Scientific discoveries universalized the methods of production, and henceforth it was useless to pay an exorbitant price abroad for what could easily be produced at home. And now we see already that this industrial revolution strikes a crushing blow at the theory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which for a long time was supposed to be so sound.

但是，一种新的思潮逐渐使所有的文明国家开始为自己生产。他们发现，自己生产那些以前从其他国家或其殖民地（它们自己也试图摆脱宗主国的束缚）进口的商品更有好处。科学发现使生产方式实现了普及，因此，再花大价钱从国外购买那些很容易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就显得毫无意义。现在，我们已经明白，这场工业革命对于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正确合理的劳动分工理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CHAPTER XVI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INDUSTRY

第十六章　工业的分散

I

一

After the Napoleonic wars Britain had nearly succeeded in ruining the main industries which had sprung up in France at the end of the preceding century. She also became mistress of the seas and had no rivals of importance. She took in the situation, and knew how to turn its privileges and advantages to account. She established an industrial monopoly, and, imposing upon her neighbours her prices for the goods she alone could manufacture, accumulated riches upon riches.

经过拿破仑战争，英国几乎毁掉了18世纪末法国崛起的各大主要工业。英国还成为了海上霸王，没有对手能够与之抗衡。英国清楚了解当时的形势，并知道如何将自身的特权和优势转化为切实的利益。它建立了工业垄断，并且将只有英国才能制造的物品以高昂的价格强加于邻国，财富与日俱增。

But as the middle-class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ad abolished serfdom and created a proletariat in France, French industry, hampered for a time in its flight, soared again, and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ceased to be a tributary of England for manufactured goods. To-day she too has grown into a nation with an export trade. She sells far more than

sixty million pounds' worth of manufactured goods, and two- thirds of these goods are fabrics. The number of Frenchmen working for export or living by their foreign trade, is estimated at three millions.

由于18世纪的法国中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农奴制并形成了无产阶级，一度受到束缚的法国工业再度腾飞，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法国已不再是英国制造的附庸了。现如今她同样成长为一个贸易输出国。她年销售的制造品价值超过6000万，其中三分之二为纺织品。大约有300万从事输出品制造或者靠外贸为生。

France is therefore no longer England's tributary. In her turn she has striven to monopolize certain branches of foreign industry, such as silks and ready-made clothes, and has reaped immense profits therefrom; but she is on the point of losing this monopoly for ever, just as England is on the point of losing the monopoly of cotton goods.

法国因此不再是英国的附庸。它也开始竭力想垄断外国工业的某些部门，例如丝绸和成衣，并因此收获了莫大的利益；但它即将永远失去这种垄断，就如同英国即将失去对棉织品的垄断一样。

Travelling eastwards, industry has reached Germany. Fifty years ago Germany was a tributary of England and France for most manufactured commodities in the higher branches of industry. It is no longer so. In the course of the last fifty years, and especially since the Franco-German war, Germany has completely reorganized her industry. The new factories are stocked with the best

machinery; the latest creations of industrial art in cotton goods from Manchester, or in silks from Lyons, etc. , are now realized in new German factories. It took two or three generations of workers, at Lyons and Manchester, to construct the modern machinery; but Germany adopted it in its perfected state. Technical schools,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industry, supply the factories with an army of intelligent workmen—practical engineers, who can work with both hand and brain. German industry starts at the point which was only reached by Manchester and Lyons after fifty years of groping in the dark, of exertion and experiments.

工业向东蔓延，最后到达了德国。50年前，德国高等工业大部分制造品都依赖于英国和法国。现在不是了。在过去的50年里，尤其是自普法战争以来，德国已经彻底调整了自己的工业结构。新工厂里装备了最精良的机械；曼彻斯特最新的棉织品工艺或者里昂最新的丝织品工艺，等等不一而足，如今这一切都可以在德国新工厂里实现了。在里昂和曼彻斯特，要历经两代或三代工人的努力才能制造出那些现代的机械；但德国直接就采用了最现代的机械。适合工业需求的工业学校为工厂提供了大量有聪明才智的工人——有实践经验的技师，他们既有操作能力，又有智慧。以曼彻斯特与里昂经过50年在黑暗中摸索、经过50年的努力和实验方才到达的地方作为出发点，德国工业开始起步。

It follows that since Germany manufactures so well at home, she diminishes her imports from France and England year by year. She has not only become their rival in manufactured goods in Asia and in Africa, but also in London and in Paris. Shortsighted people in France may cry out against the Frankfort Treaty; English manufacturers may explain German competition by little differences in railway tariffs; they may linger on the petty side of questions,

and neglect great historical facts. But it is none the less certain that the main industries, formerly in the hands of England and France, have progressed eastward, and in Germany they have found a country, young, full of energy, possessing an intelligent middle class, and eager in its turn to enrich itself by foreign trade.

因此，既然德国本国的制造业如此发达，它自然会逐年减少对法国和英国的进口。德国不仅成为了英国和法国在亚洲和非洲出口工业制造品的竞争对手，甚至在伦敦和巴黎也是如此。法国一些目光短浅的人可能会大声疾呼反对《法兰克福条约》；英国的制造商可能用几乎无差别的铁路关税解释德国的竞争；他们可能会只盯着问题微不足道的一面而忽视了重要的史实。但毫无疑问的是，此前还掌握在英格兰和法国手里的主要工业，现在已经东渐到了德国，这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国家，拥有头脑聪慧的中产阶级，并且这个国家现在也渴望通过对外贸易让自己富足起来。

While Germany has freed herself from subjection to France and England, has manufactured her own cotton-cloth, and constructed her own machines—in fact, manufactured all commodities—the main industries have also taken root in Russia, where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e is the more instructive as it sprang up but yesterday.

就在德国业已摆脱了法国和英格兰的束缚，生产出了自己的棉布，建造出了自己的机器之时——实际上德国已经制造出了所有的物品，与此同时，主要工业在俄罗斯也已经扎下了根。由于俄罗斯制造业的发展是新近才如雨后春笋般一夜而起的，因而对我们就更具有启迪性。

At the time of the abolition of serfdom in 1861, Russia had hardly any factories. Everything needed in the way of machines, rails, railway- engines, fine dress materials, came from the West. Twenty years later she possessed already 85,000 factories, and the value of the goods manufactured in Russia had increased fourfold.

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时，俄国还几乎没有工厂。机器、铁路、机车、高档服装面料等方面的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均来自西方。20年以后，俄罗斯已经拥有了85,000个工厂，她所生产出的货物价值已经提高了四倍。

The old machinery was superseded, and now nearly all the steel in use in Russia, three-quarters of the iron, two-thirds of the coal, all railway- engines, railway-carriages, rails, nearly all steamers, are made in Russia.

陈旧的机器已经被取代，现在俄罗斯使用的几乎所有的钢材，四分之三的铁矿，三分之二的煤炭，所有的铁路机车、车厢、铁轨，和几乎所有的蒸汽轮船，都是俄罗斯自己制造的。

Russia, destined—so wrote economists—to remain an agricultural territory, has rapidly developed into a manufacturing country. She orders hardly anything from England, and very little from Germany.

曾被济学家称之为注定要一直停留在农业社会的俄罗斯，已经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制造业国家。它几乎不再从英格兰购买东西了，从德

国买的东西也少之又少。

Economists hold the customs responsible for these facts, and yet cottons manufactured in Russia are sold at the same price as in London. Capital taking no cognizance of father-lands, German and English capitalists, accompanied by engineers and foremen of their own nationalities, have introduced in Russia and in Poland manufactories whose goods compete in excellence with the best from England. If customs were abolished to-morrow, manufacture would only gain by it. Not long ago the British manufacturers delivered another hard blow to the import of cloth and woolens from the West. They set up in southern and middle Russia immense wool factories, stocked with the most perfect machinery from Bradford, and already now Russia imports only the highest sorts of cloth and woolen fabrics from England, France and Austria. The remainder is fabricated at home, both in factories and as domestic industries.

经济学家认为是关税导致了这一切，但实际上俄罗斯生产的棉布与伦敦生产的棉布售价相同。资本是六亲不认的，德国和英国的资本家带着本国的工程师和监工，将制造厂引入了俄罗斯和波兰，这些工厂制造的商品在质量上可以和从英国制造的最上乘的商品相媲美。一旦废除关税的话，制造业只会从中受益。不久之前，英国的制造商还对从西方进口布料和毛纺品的贸易给予了另一次沉重的打击。英国的制造商在俄罗斯南部和中部设立了多个巨大的毛纺品工厂，装备上了布拉福德制造的最为精良的机器，而且现在俄罗斯只是从英格兰、法国和奥地利进口最高档的布料和毛纺品。其余的东西都在俄罗斯本国制造，通过工厂和家庭工业生产出来。

The main industries not only move eastward, they are spreading also to the southern peninsulas. The Turin Exhibition of 1884 already demonstrated the progress made in Italian manufactured produce; and, let us not make any mistake about it, the mutual hatred of the French and Italian middle classes has no other origin than their industrial rivalry. Spain is also becoming an industrial country; while in the East, Bohemia has suddenly sprung into importance as a new centre of manufactures, provided with perfected machinery and applying the best scientific methods.

主要工业不仅东渐，还向南部各半岛传播开来。1884年都灵博览会已经展示了意大利制造业生产的产品所取得的进展；而且，我们要清楚，法国和意大利中产阶级之间的相互仇恨其实完全是根源于他们之间工业上的竞争。西班牙也正在成为一个工业国家；而在东方，波西米亚已经一跃而起成为新的制造中心，拥有改良的机械并使用了最为科学的工艺。

We might also mention Hungary's rapid progress in the main industries, but let us rather take Brazil as an example. Economists sentenced Brazil to cultivate cotton forever, to export it in its raw state, and to receive cotton- cloth from Europe in exchange. In fact, forty years ago Brazil had only nine wretched little cotton factories with 385 spindles. To-day there are 160 cotton-mills, possessing 1,500,000 spindles and 50,000 looms, which throw 500 million yards of textiles on the market annually.

我们还可以提一下匈牙利在各大工业上的迅速发展，但还是让我们以巴西为例吧。经济学家曾断言巴西只能永远种植棉花，将其作为原材料出口，而从欧洲进口棉布。实际上，40年前巴西还仅拥有9个

可怜的小棉纺厂，总计不过385个纺锤。现如今，巴西有160家棉纺厂，拥有150万个纺锤和五万台织布机，可以每年向市场投送长度达五亿码的纺织品。

Even Mexico is now very successful in manufacturing cotton-cloth, instead of importing it from Europe. A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ave quite freed themselves from European tutelage, and have triumphantly developed their manufacturing powers to an enormous extent.

即便是墨西哥现在也能很好地自己加工棉布，不再从欧洲进口了。至于说美国各州，他们早已完全脱离了欧洲的监护，而且成功地将其制造能力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了。

But it was India which gave the most striking proof against the specialization of national industry.

然而能为反对国家工业专门化提供最佳证明的国家非印度莫数。

We all know the theory: the great European nations need colonies, for colonies send raw material—cotton fibre, unwashed wool, spices, etc. , to the mother-land. And the mother-land, under pretense of sending them manufactured wares, gets rid of her damaged stuffs, her machine scrap- iron and everything which she no longer has any use for. It costs her little or nothing, and none the less the articles are sold at exorbitant prices.

我们都知道这个理论：欧洲大国需要殖民地，因为殖民地会把原材料——棉纤维、原料毛、香料等等运到本国。而本国则借口为殖民地提供制造品，掩盖了将自己破损的物品、机器废料以及任何不再有用的东西处理掉的事实。对殖民者而言，这些物品花费了了甚至一钱不值，却被以高价卖给殖民地。

Such was the theory—such was the practice for a long time. In London and Manchester fortunes were made, while India was being ruined. In the India Museum in London unheard of riches, collected in Calcutta and Bombay by English merchants, are to be seen.

理论便是如此——而且长久以来也是这样实践的。伦敦和曼彻斯特在大量积累财富，而同时印度却正在遭受毁灭。在伦敦的印度博物馆，可以看到很多闻所未闻的宝物，这些都是英国商人从加尔各答和孟买收集的。

But other English merchants and capitalists conceived the very simple idea that it would be more expedient to exploit the natives of India by making cotton-cloth in India itself, than to import from twenty to twenty-four million pounds” worth of goods annually.

但其他的英国商人和资本家却持有这样一个朴素的观念，那就是通过在印度本土生产棉布而剥削印度人，比起每年出口价值2000万到2400万英镑的货物要更为有利。

At first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ended in failure. Indian weavers—artists and experts in their own craft—could not inure themselves

to factory life; the machinery sent from Liverpool was bad; the climate had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merchants had to adapt themselves to new conditions, now fully mastered, before British India could become the menacing rival of the Mother-land she is to-day.

起初一系列的试验均以失败告终。印度的织工——那些本行业的艺术家和行家里手——无法适应工厂生活；从利物浦来的机器也不好用；要考虑气候；而且商人也必须适应新条件（现在他们已经完全适应），还必须赶在英国管辖下的印度像现在一样成为英国本国有威胁的对手之前。

She now possesses more than 200 cotton-mills which employ about 230.0 workmen, and contain more than 6,000,000 spindles and 80.0 looms, and 40 jute-mills, with 400,000 spindles. She exports annually to China, to the Dutch Indies, and to Africa, nearly eight million pounds” worth of the same white cotton-cloth, said to be England's specialty. And while English workmen are often unemployed and in great want, Indian women weave cotton by machinery, for the Far East at wages of six-pence a day. In short,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ers are fully aware that the day is not far off when they will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e “factory hands” who formerly wove cotton-cloth for export from England. Besides which i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vident that India will no import a single ton of iron from England. The initial difficulties in using the coal and the iron-ore obtained in India have been overcome; and foundries, rivalling those in England, have been built on the shores of the Indian Ocean.

印度现在有200余家棉纺厂，大约有23万雇工，拥有超过600万个纺锤和8万台织布机，此外还有40家黄麻加工厂，这些加工厂共有40万个纺锤。印度每年向中国、荷属东印度、非洲出口价值将近800万英镑的白棉布，这些棉布和英国生产的没什么两样，要知道以前人们总说只有英国才能生产白棉布。就在英国工人经常失业，陷于贫困的时候，印度妇女用机器以每天6便士的工钱为远东国家编织棉线。简而言之，那些聪明的制造商充分意识到那一天并不遥远了，到那时他们将不知道该拿那些以前编织棉布供英格兰出口的工厂工人怎么办。除此之外，越加明显的是，印度以后将不会从英格兰进口哪怕一吨的钢材。印度已经克服使用印度国内开发的煤炭和铁矿石最初阶段的困难；而且在印度洋海岸已经建起了那些和英国竞争的铸造厂。

Colonies competing with the mother-land in its production of manufactured goods, such is the factor which will regulate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殖民地在制造商品方面和属国进行竞争，这就是将对20世纪的经济起到调整作用的因素。

And why should India not manufacture? What should be the hindrance? Capital?—But capital goes wherever there are men, poor enough to be exploited. Knowledge? But knowledge recognizes no national barriers. Technical skill of the worker?—No. Are, then, Hindoo workmen inferior to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boys and girls, not eighteen years old, at present working in the English textile factories?

那么为什么印度不应加工制造呢？其障碍又是什么呢？是因为没

有资本吗？——可哪里有穷得可以任人剥削的人，哪里就有资本。是因为没有知识吗？可知识并无国界。是因为工人缺乏技术吗？不是。那么是印度工人不如那些目前正在英国纺织厂里做工的数以万计的年龄不足18岁的男孩和女孩吗？

II

二

After having glanced at national industries it would be very interesting to turn to some special branches.

在大概了解了国家工业之后，再去看看某些特别的部门，这将会非常有趣。

Let us take silk, for example, an eminently French produ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e all know how Lyons became the emporium of the silk trade. At first raw silk was gathered in southern France, till little by little they ordered it from Italy, from Spain, from Austria, from the Caucasus, and from Japan, for the manufacture of their silk fabrics. In 1875, out of five million kilos of raw silk converted into stuffs in the vicinity of Lyons, there were only four hundred thousand kilos of French silk. But if Lyons manufactured imported silk, why should not Switzerland, Germany, Russia, do as much? Consequently, silk-weaving began to develop in the villages round Zurich. Ble became a great centre of the silk trade. The Caucasian Administration engaged women from Marseilles and workmen from Lyons to teach Georgians the perfected rearing of silk-worms, and the art of converting silk into

fabrics to the Caucasian peasants. Austria followed. Then Germany, with the help of Lyons workmen, built great silk factories. The United States did likewise at Paterson.

让我们以丝绸为例，丝绸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一种不同寻常的特产。我们都知道里昂是如何成为丝绸交易的中心的。起初用于加工丝织品的生丝是从法国南部收购来的，后来逐渐从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高加索、日本等地定购。1875年，在里昂附近被变成原材料的500万公斤的生丝里，只有40万公斤的生丝是法国出产的。但是如果里昂能对进口生丝进行加工，那么为什么瑞士、德国、俄罗斯不也那样做呢？结果，丝织开始在苏黎世周围的村庄里发展起来。伯勒成为丝绸贸易中的一大中心。高加索行政当局雇佣马赛的妇女和里昂的工人来教授格鲁吉亚人改良的饲养家蚕的方法，教授高加索农民将生丝变成丝织品的技术。奥地利也如此效法。然后是德国，在里昂工人的帮助下，德国建立起了很大的丝绸工厂。美国在帕特森也如法炮制。

And to-day the silk trade is no longer a French monopoly. Silks are made in Germany, in Austri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England, and it is now reckoned that one-third of the silk stuffs used in France are imported. In winter, Caucasian peasants weave silk handkerchiefs at a wage that would mean starvation to the silk-weavers of Lyons. Italy and Germany send silks to France; and Lyons, which in 1870-4 exported 460 million francs! worth of silk fabrics, exports now only one-half of that amount. In fact, the time is not far off when Lyons will only send higher class goods and a few novelties as patterns to Germany, Russia and Japan.

如今丝绸贸易再也不受法国垄断了。德国、奥地利、美国、英格兰都制造丝绸，而且据估计，法国所使用的三分之一的丝织品都是进

口的。在冬季，高加索农民编织丝绸手帕所得到的工钱数目对于里昂的丝绸编织者来说将意味着食不果腹。意大利和德国将丝绸运往法国；而在1870—1874年间曾出口价值4.6亿法郎丝织品的里昂，如今丝绸的出口量仅有以前的一半。实际上，里昂只能把高档商品和作为样品的为数不多的新织品运往德国、俄罗斯和日本的那一天并不遥远了。

And so it is in all industries. Belgium has no longer the cloth monopoly; cloth is made in Germany, in Russia, in Austria, in the United States. Switzerland and the French Jura have no longer a clockwork monopoly; watches are made everywhere. Scotland no longer refines sugar for Russia: refined Russian sugar is imported into England. Italy, although neither possessing coal nor iron, makes her own iron-clads and engines for her steamers. Chemical industry is no longer an English monopoly; sulphuric acid and soda are made even in the Urals. Steam-engines, made at Winterthur, have acquired everywhere a wide reputation, and at the present moment, Switzerland, which has neither coal nor iron, and no sea-ports to import them—nothing but excellent technical schools—makes machinery better and cheaper than England. So ends the theory of Exchange.

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比利时无法再继续垄断布业；现在德国、俄罗斯、奥地利和美国都能生产布料。瑞士和法国侏罗纪地区无法再继续垄断钟表业；现在到处都在制造钟表。苏格兰不再为俄罗斯精炼食糖：现在是俄罗斯精炼食糖进口到英国来了。意大利尽管既没有煤炭也没有钢铁，却也在自己建造铁甲舰和蒸汽引擎了。化学工业不再为英国所独占；硫酸和苏打甚至在乌拉尔地区都能生产。温特图尔制造的蒸汽机车已经在各地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而且现如今，既没有煤炭也没有钢铁，甚至连进口煤炭和钢铁的海港都没有的瑞士一一这个除

了拥有卓越的技工学校再无他物的国家一一现在造出的机械比英国的又好又便宜。交换的理论就此结束。

The tendency of trade, as for all else, is toward decentralization.

不管怎样，贸易的趋向是分散化。

Every nation finds it advantageous to combine agriculture with the greatest possible variety of factories. The specialization, of which economists spoke so highly, certainly has enriched a number of capitalists, but is now no longer of any use. On the contrary, it is to the advantage of every region, every nation, to grow their own wheat, their own vegetables, and to manufacture at home most of the produce they consume. This diversity is the surest pledge of the complet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by mutual co-operation, and the moving cause of progress, while specialization is now a hindrance to progress.

每个国家都发现尽可能将农业与各类工厂结合起来是十分有利的。经济学家推崇备至的专门化无疑可以让很多资本家富有起来，但是现在却没什么用了。相反，自己种植所需的小麦、蔬菜，自己在本地制造所需的大部分产品对每个地区、每个国家来说都是有利的。这种多样性充分地确保了通过相互合作和不断进步充分发展生产，而专门化目前却是进步的一个障碍。

Agriculture can only prosper in proximity to factories. And no

sooner does a single factory appear than an infinite variety of other factories must spring up around, so that, mutually supporting and stimulating one another by their inventions, they increase their productivity.

农业只有与工厂为邻才能繁荣起来。一旦某一工厂出现，多种多样的其他类工厂就必定会在其周围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起来，这样，通过各自创新发明而相互支持相互激励，这些工厂的生产力就会提高。

III

三

It is foolish indeed to export wheat and to import flour, to export wool and import cloth, to export iron and import machinery; not only because transportation is a waste of time and money, but, above all, because a country with no developed industry inevitably remains behind the times in agriculture; because a country with no large factories to bring steel to a finished condition is doomed to be backward in all other industries; and lastly, because the industrial and technical capacities of the nation remain undeveloped, if they are not exercised in a variety of industries.

实际上出口小麦而进口面粉，出口羊毛然而进口衣料，出口钢铁然而进口机械，这都是些愚蠢的做法；这不仅因为运输本身就浪费了时间和金钱，而且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一个没有发达工业的国家将无可避免地在农业上落后于时代；因为一个没有大型钢铁冶炼工厂的国家是注定要在所有其他工业上落后的；而且还因为，若一国工业能力和技术能力不能在各种工业上得到广泛实践的话，其工业能力和技术

能力将停滞不前。

Nowadays everything holds together in the world of production. Cultivation of the soil is no longer possible without machinery, without great irrigation works, without railways, without manure factories. And to adapt this machinery, these railways, these irrigation engines, etc. , to local conditions, a certain spirit of invention, and a certain amount of technical skill must be developed, while they necessarily lie dormant so long as spades and ploughshares are the only implements of cultivation.

如今生产已经将所有的东西聚合到了一起。如今没有机械，没有庞大的水利灌溉工程，没有铁路，没有肥料工厂，已经不可能耕种土地了。要使这些机器、铁路、灌溉机车等等适应当地的条件，就必须发扬一种创新精神并发展一些工艺技术，而只要铁锹和铧头还是耕作的唯一工具，这种种创新精神和工艺技术就永远处于休眠状态。

If fields are to be properly cultivated, if they are to yield the abundant harvests that man has the right to expect, it is essential that workshops, foundries, and factories develop within the reach of the fields. A variety of occupations, and a variety of skill arising therefrom, both working together for a common aim—these are the true forces of progress.

若要土地得到恰当的耕种，若要土地能够产出人们有权期望的大丰收，那么必须在这片土地上发展车间、铸造厂和工厂。种种不同的职业以及由此而兴起的种种技能，二者共同致力于同一个目的——这就是推进步的真正动力。

And now let us imagine the inhabitants of a city or a territory—whether vast or small—stepping for the first time on to the path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

现在让我们设想某个城市或者某个地区——无论大小，其居民第一次走上了社会革命的道路。

We are sometimes told that “nothing will have changed”: that the mines, the factories, etc. , will be expropriated, and proclaimed national or communal property, that every man will go back to his usual work, and that the Revolution will then be accomplished.

有时候我们会被告知，“什么都不会改变”：告诉我们矿山、工厂等等将会被征用，归为国家或者集体财产，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回到以前的工作岗位上去，告诉我们这样革命就算完成了。

But this is a mere dream: the Social Revolution cannot take place so simply.

但这不过是个梦而已：社会革命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完成的。

We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hat should the Revolution break out to¬morrow in Paris, Lyons, or any other city—should the workers lay hands on factories, houses, and banks, present production would be completely revolutionized by this simple fact.

我们已经提到过，要是明天在巴黎、里昂或者其他别的什么城市爆发革命的话，要是工人得到工厂、住房和银行的话，目前的生产将因这一简单的事实而得到彻底的革命。

International commerce will come to a standstill; so also will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bread-stuffs; the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and of provisions will be paralyzed. And then, the city or territory in revolt will be compelled to provide for itself, and to reorganize its production, so as to satisfy its own needs. If it fails to do so, it is death. If it succeeds, it will revolutionize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country.

国际贸易将停滞不前；对国外面包原料的进口也将陷于停顿；货物的流通和供应品的流通也将近乎瘫痪。到了那个时候，起义的城市或地区将被迫自我供给，被迫重新组织生产以满足其自身需求。要是做不到这样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若是成功，这将给该地的经济生活带来彻底变革。

The quantity of imported provisions having decreased, consumption having increased, one million Parisians working for exportation purposes having been thrown out of work, a great number of things imported to-day from distant or neighbouring countries not reaching their destination, fancy-trade being temporarily at a standstill,—What will the inhabitants have to eat six months after the Revolution?

进口粮食的数量减少，消耗增加，一百万从事出口工作的巴黎人

被迫失业，此时从或远或近的国家进口的大量物品又未抵达目的地，奢侈品行业也暂时处于停顿状态——那么在革命六个月以后这些居民还有什么东西可吃呢？

We think that when the stores containing food-stuffs are empty, the masses will seek to obtain their food from the land. They will see the necessity of cultivating the soil, of combin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ith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the suburbs of Paris itself and its environs. They will have to abandon the merely ornamental trades and consider their most urgent need—bread.

我们认为当储存食物的仓库空了的时候，民众将会想办法从土地那里获取食物。他们会觉得有必要耕种土地，有必要在巴黎郊区和郊外地区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结合起来。他们将不得不放弃那些仅仅为了装饰性的行业，转而考虑他们最迫切的需求——面包。

A great number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ities will have to become agriculturists. Not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present peasants who wear themselves out, ploughing for a wage that barely provides them with sufficient food for the year, but by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intensive agriculture, of the market gardeners, applied on a large scale by means of the best machinery that man has invented or can invent. They will till the land—not, however, like the country beast of burden: a Paris jeweller would object to that. They will organize cultivation on better principles; and not in the future, but at once,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from fear of being worsted by the enemy.

城市里的大量居民将不得不转而从事农业。与现在的农民只为能够全年填饱肚子而筋疲力尽的劳作方式不同，而是遵照精细耕作的原则，依照市场蔬菜供应者的办法，依靠人类业已发明的或所能够发明的最优良的机器大规模地实施运用。他们会耕种土地——当然并不会像乡间骡马那样辛苦：巴黎珠宝商是不会那么辛苦劳作的。他们将根据更好的原则来组织耕种；而且这样做不要等到将来，而是要从即刻做起，就在革命斗争的伊始，因为他们担心被敌人打败。

Agriculture will have to be carried out on intelligent lines, by men and women availing themselves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present time, organizing themselves in joyous gangs for pleasant work, like those who, a hundred years ago, worked in the Champ de Mars for the Feast of the Federation—a work of delight, when not carried to excess, when scientifically organized, when man invents and improves his tools and is conscious of being a useful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农业耕作将也得依靠才智，进行耕作的男男女女会利用现有的经验，将自己组织成一个个欢快的群体从事这项愉快的工作，就像一百年前在巴黎战神校场为联合大祭日愉快地进行劳动的那些人一样，不过度劳动，组织科学，人们发明并改良劳动工具，而且意识到自身是团体中的有用一员。

Of course, they will not only cultivate wheat and oats—they will also produce those things which they formerly used to order from foreign parts. And let us not forget that for the inhabitants of a revolted territory, “foreign parts” may include all districts that have not joined i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During the Revolutions of 1793 and 1871 Paris was made to feel that “foreign parts” meant

even the country district at her very gates. The speculator in grains at Troyes starved in 1793 and 1794 the sansculottes of Paris as badly, and even worse, than the German armies brought on to French soil by the Versailles conspirators. The revolted city will be compelled to do without these “foreigners,” and why not? France invented beet¬root sugar when sugar-cane ran short during the continental blockade. Parisians discovered saltpetre in their cellars when they no longer received any from abroad. Shall we be inferior to our grandfathers, who hardly lisped the first words of science?

当然，他们不仅要种植小麦和燕麦——他们还得生产那些他们之前习惯于从外地购买来的东西。我们不要忘记，对于起义地区的居民来说，“外地”还可能包括所有那些没有参加革命运动的地区。在1793年和1871年大革命期间，巴黎被迫意识到“外地”甚至还意味着就在自家大门口的乡下地区。特鲁亚的粮食投机商在1793年和1794年着实把被称为无套裤汉的巴黎激进派革命家饿得不轻，比起德国军队通过凡尔赛同谋者带给法国大地的饥荒还要严重。起义城市将被迫放弃依靠那些“外地人”而自谋生路，这又有何不可呢？在欧洲大陆封锁期间，当甘蔗短缺时，法国发明了甜菜根糖。在巴黎人不能从国外获得硝石的时候，他们在自家的地窖里发现了硝酸钠。难道我们还不如那些连基本的科学语言都不懂的祖先吗？

A revolution is more than a mere change of the prevailing political system. It implies the awakening of human intelligence, the increasing of the inventive spirit tenfold, a hundredfold; it is the dawn of a new science—the science of men like Laplace, Lamarck, Lavoisier. It is a revolution in the minds of men, as deep, and deeper still, than in their institutions.

革命绝不是仅仅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革命意味着人类智慧的觉醒，意味着创造精神数十倍、上百倍地增加；革命是一种新科学的黎明，那是像拉普拉斯、拉马克、拉瓦锡等人所从事的科学。这是一场人类思想的革命，和人类体制机构的革命相比，这种革命同样深刻，甚至要更为深刻。

And there are still economists, who tell us that once the “revolution is made,” everyone will return to his workshop, as if passing through a revolution were going home after a walk in the Epping forest!

然而仍有经济学家会告诉我们说，一旦“革命成功”，人人都得重返原来的车间，说得就好像历经一场革命就好比在爱平森林里散完步回家一般。

To begin with, the sole fact of having laid hands on middle-class property will imply the necessity of completely reorganizing the whole of economic life in the workshops, the dockyards, the factories.

不管怎么说，夺取了中产阶级财产便意味着一定要彻底改造车间、造船厂、工厂里的经济生活。

And the revolution surely will not fail to act in this direction. Should Paris, during the social revolution, be cut off from the world for a year or two by the supporters of middle-class rule, its millions of intellects, not yet depressed by factory life—that City of little

trades which stimulate the spirit of invention—will show the world what man's brain can accomplish without asking for help from without, but the motor force of the sun that gives light, the power of the wind that sweeps away impurities, and the silent life-forces at work in the earth we tread on.

这场革命肯定会沿着这个方向进行。在这场社会革命中，巴黎如果被中产阶级统治的支持者孤立上一两年，那些尚未曾受过工厂生活压迫的数以百万计的才智非凡的人民——这座激发创造精神的小商品贸易之城——将会向世界展示，无需外界帮助，只需依靠散发光热给一切带来生机的太阳的力量，靠着涤荡一切污秽的风的力量，靠着我们脚下的大地上不停运转的无声的生命力，人类的智慧究竟会取得怎样的成就。

We shall see then what a variety of trades, mutually cooperating on a spot of the globe and animated by a revolution, can do to feed, clothe, house, and supply with all manner of luxuries millions of intelligent men.

那时我们将会看到，在世界某处相互协作并被革命所激发而生机勃勃的多种多样的行业将在为数以百万计的聪明的人们供给食物、衣物、住房以及各种各样的奢侈品方面能够作出何等的贡献。

We need write no fiction to prove this. What we are sure of, what has already been experimented upon, and recognized as practical, would suffice to carry it into effect, if the attempt were fertilized, vivified by the daring inspiration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spontaneous impulse of the masses.

我们不需要通过虚构的故事来证实这一点。我们所确信的是，那些已经加以实验并被认定为可行的东西就足以付诸实践了，前提是这样的尝试须在大革命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大众自发冲动的滋养下别开生面。

CHAPTER XVII AGRICULTURE

第十七章　农业

I

一

Political Economy has often been reproached with drawing all its deductions from the decidedly false principle, that the only incentive capable of forcing a man to augment his power of production is personal interest in its narrowest sense.

政治经济学因从一条分明虚伪的原则中得出众多推论而因此常常遭到谴责，这条原则是：能够促使人提高生产力的唯一诱因便是最狭义的个人利益。

The reproach is perfectly true; so true that epochs of great industrial discoveries and true progress in industry are precisely those in which the happiness of all was inspiring men, and in which personal enrichment was least thought of. The great investigators in science and the great inventors aimed, above all, at giving greater freedom of mankind. And if Watt, Stephenson, Jacquard, etc. , could have only foreseen what a state of misery their sleepless nights would bring to the workers, they certainly would have burned their designs and broken their models.

这个谴责完全正确；因为工业大发现和大进步的时代恰是人们追

求全体的幸福，而很少考虑个人财富得失的时代。伟大的科学家和伟大的发明家首要的就是致力于使人类获得更大的自由。倘若瓦特、史蒂芬森、雅卡尔等人能够预见到他们潜心钻研无数个不眠之夜的硕果将给工人们带来如此悲惨的生活，他们必定会烧掉自己的图纸、砸碎自己的模型。

Another principle that pervades Political Economy is just as false. It is the tacit admission, common to all economists, that if there is often over-production in certain branches, a society will nevertheless never have sufficient products to satisfy the wants of all, and that consequently the day will never come when nobody will be forced to sell his labour in exchange for wages. This tacit admission is found at the basis of all theories and all the so-called “laws” taught by economists.

贯穿于政治经济学的另一条原则同样也是虚假的。所有经济学家全都默认，即便是某些部门经常生产过剩，社会仍将永远不会拥有足够的产品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认为正因如此没人被迫为工资出卖劳动的那一天将永远不会到来。这条默认的道理是建立在经济学家们所教授的所有的理论和全部所谓的“法则”基础之上的。

And yet it is certain that the day when any civilized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s would ask itself, what are the needs of all, and the means of satisfying them, it would see that, in industry, as in agriculture, it already possesses sufficient to provide abundantly for all needs, on condition that it knows how to apply these means to satisfy real needs.

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某一天某个由众多个体构成的文明团体自问，所有成员的需求是什么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途径又是什么，这个团体就会发现，如同农业一样，工业也已经拥有足够多的东西来充分满足各种需求，条件是这个团体知道如何运用这些已有的手段以满足现实的需求。

That this is true as regards industry no one can contest. Indeed, it suffices to study the processes already in use to extract coals and ore, to obtain steel and work it, to manufacture on a great scale what is used for clothing, etc. , in order to perceive that we could already increase our production fourfold or more, and yet use for that less work than we are using now.

就工业而言这，一点完全正确。实际上，通过研究现在开采煤炭和矿物，获取钢铁和锻造钢铁制品，大规模制造制衣的原料等等所已经正在使用的方法就能够满足需要了，可以想见那时我们将能够使生产力提高四倍或更多，为之使用的劳动却比我们现在的更少。

We go further. We assert that agriculture is in the same position: those who cultivate the soil, like the manufacturers, already could increase their production, not only fourfold but tenfold, and they can put it into practice as soon as they feel the need of it,—as soon as a socialist organization of work will be established instead of the present capitalistic one.

让我们更进一步讨论。我们坚信，农业同工业一样：同工业制造者一样，那些耕种土地的人们已经能够将他们的农业生产力提高至不只四倍甚至达到十倍之多，而且在他们觉得需要时立即就能够将其付

诸实践——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劳动体制取代目前的资本主义劳动体制。

Each time agriculture is spoken of, men imagine a peasant bending over the plough, throwing badly assorted corn haphazard into the ground and waiting anxiously for what the good or bad season will bring forth; they think of a family working from morn to night and reaping as reward a rude bed, dry bread, and coarse beverage. In a word, they picture “the savages” of La Bruyere.

每每提到农业，人们就会想到一个农民弯腰扶犁，把良莠不齐的谷种随意地抛撒到土地里，然后就不安地等着或好或坏的季节所能带给他们的收成；人们会想到一户农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收获的却只是简陋的床铺、干干巴巴的面包和粗糙的饮料。一言以蔽之，人们勾画出了拉布吕耶尔笔下的“野兽”。

And for these men, ground down to such a misery, the utmost relief that society proposes, is to reduce their taxes or their rent. But even most social reformers do not care to imagine a cultivator standing erect, taking leisure, and producing by a few hours” work per day sufficient food to nourish, not only his own family, but a hundred men more at the least. In their most glowing dreams of the future Socialists do not go beyond American extensive culture, which, after all, is but the infancy of agricultural art.

对于这些被折磨到如此惨境的人来说，为减轻其痛苦社会所能提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他们的赋税或者租金。可是甚至大部分的社会改革者都不愿意设想，一个农耕者可以直起腰板来，享受闲暇，每

天只工作几个小时就能得到充足的食物，不仅足够养育家人，甚至再多一百个人也绰绰有余。在社会主义者最美妙的未来梦里，也没能超越美国的粗放耕作，而这种方法毕竟不过是农耕艺术的幼年阶段而已。

But the thinking agriculturist has broader ideas to-day—his conceptions are on a far grander scale. He only asks for a fraction of an acre in order to produce sufficient vegetables for a family; and to feed twenty-five horned beasts he needs no more space than he formerly required to feed one; his aim is to make his own soil, to defy seasons and climate, to warm both air and earth around the young plant; to produce, in a word, on one acre what he used to gather from fifty acres, and that without any excessive fatigue—by greatly reducing, on the contrary, the total of former labour. He knows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feed everybody by giving to the culture of the fields no more time than what each can give with pleasure and joy.

可是如今不断思索的农耕者却有更为开阔的想法——他们的构想更有气魄。他们只需要一英亩大的一小块地种植足够一个家庭所需的蔬菜；喂养25头牛羊，他们需要的地方并不比之前喂养一头牲畜所需的大；他们的目标是造出属于自己的土壤，不受季节和气候影响，给幼苗周围的空气和土壤增温；总而言之，就是要在一英亩大的土地上产出过去50英亩土地才能收获的东西，而且无需额外劳动——相反，要大量减少以前的劳动量。他们知道只需要每个人在耕种的土地上付出刚好让他们感到愉快的劳动时间便能做到人人有饭吃。

This is the present tendency of agriculture.

这就是当今农业的趋势。

While scientific men, led by Liebig, the creator of the chemical theory of agriculture, often got on the wrong tack in their love of mere theories, unlettered agriculturists opened up new roads to prosperity. Market-gardeners of Paris, Troyes, Rouen, Scotch and English gardeners, Flemish and Lombardian farmers, peasants of Jersey, Guernsey, and farmers on the Scilly Isles have opened up such large horizons that the mind hesitates to grasp them. While up till lately a family of peasants needed at least seventeen to twenty acres to live on the produce of the soil—and we know how peasants live—we can now no longer say what is the minimum area on which all that is necessary to a family can be grown, even including articles of luxury, if the soil is worked by means of intensive culture.

就在以农业化学理论创始人李比希为首的科学界人士纷纷走上其钟爱的纯理论那条错误道路上时，那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却开辟了通向富裕的新道路。巴黎、特鲁亚、鲁昂的商品蔬菜种植者，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蔬菜种植者，弗兰德和伦巴第的农场主，泽西、根西的农夫，以及西西里岛上的农场主，他们开辟的领域之广阔让我们简直不敢相信。直到最近，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大家庭至少需要耕种17到20英亩的土地才能糊口——而且我们都清楚农民的生活——要是采用集约耕作法进行耕种的话，我们现在就不能再断言养活一大家子人，甚至包括提供奢侈品，至少得种多少地了。

Twenty years ago it could already be asserted that a population of thirty million individuals could live very well, without importing anything, on what could be grown in Great Britain. But now, when

we see the progress recently made in France, in Germany, in England, and when we contemplate the new horizons which open before us, we can say that in cultivating the earth as it is already cultivated in many places, even on poor soils, fifty or sixty million inhabitants to the territory of Great Britain would still be a very feeble proportion to what man could extract from the soil.

20年前我们还能说，不用进口任何东西，靠着英国本土种出来的东西3000万人口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可是如今，当看到法国、德国、英国最近的进步，深入思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全新远景，我们可以说，若象在很多地方已经采取的方法一样耕作的话，即便是在贫瘠的土壤上，同人们可以从土地里获取的东西相比，五六千万的居民对英国的土地面积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In any case (as we are about to demonstrate) we may consider it as absolutely proved that if to-morrow Paris and the two departments of Seine and of Seine-et-Oise organized themselves as an Anarchist commune, in which all worked with their hands, and if the entire universe refused to send them a single bushel of wheat, a single head of cattle, a single basket of fruit, and left them only the territory of the two departments, they could not only produce all the corn, meat, and vegetables necessary for themselves, but also vegetables and fruit which are now articles of luxury, in sufficient quantities for all.

无论如何（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论证）我们都可以这样毫无疑问地认为，如果明天巴黎与塞纳和塞纳一瓦兹两省把自己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公社，在公社里所有人都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如果全世界都拒绝为他们提供哪怕一蒲式耳的小麦、一头牛、一篮子水果，只留给他们两

省的土地，他们也不仅能生产出足够他们自己食用的谷物、肉类和蔬菜，还能生产出足够所有人享用的目前作为奢侈品的蔬菜和水果。

And, in addition, we affirm that the sum total of this labour would be far less than that expended at present to feed these people with corn harvested in Auvergne and Russia, with vegetables produced a little everywhere by extensive agriculture, and with fruit grown in the South.

此外，我们还确信，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总和远比目前靠奥威尼和俄罗斯所收获的谷物、靠各处用粗放耕作法种出来的一点蔬菜和南方生产的水果来养活他们所付出的劳动要少得多。

It is self-evident that we in nowise desire all exchange to be suppressed, nor that each region should strive to produce that which will only grow in its climate by a more or less artificial culture. But we care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 theory of exchange, such as is understood to-day, is strangely exaggerated—that exchange is often useless and even harmful. We assert, moreover, that people have never had a right conception of the immense labour of Southern wine growers, nor that of Russian and Hungarian corn growers, whose excessive labour could also be very much reduced if they adopted intensive culture, instead of their present system of extensive agriculture.

不言而喻，我们并不是希望禁止所有的交换，也不是希望每个地区都要全力生产只有通过多多少少的人工种植才能在当地气候里生长的农产品。但我们想让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件事，那就是交换的理论正

如今天为人们所理解的样子，已经被奇怪地夸大了一一那样的交换通常是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此外我们断言，人们对南方葡萄种植者还有俄罗斯和匈牙利的谷物种植者所付出的巨大劳动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采用集约耕种法来取代他们目前的粗放耕种法的话，他们大大减少劳动量。

II

二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quote here the mass of facts on which we base our assertions. We are therefore obliged to refer our readers who want further information to another book,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Above all we earnestly invite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question to read several excellent works published in France and elsewhere, and of which we give a list at the close of this book. As to the inhabitants of large towns, who have as yet no real notion of what agriculture can be, we advise them to explore the surrounding market- gardens. They need but observe and question the market-gardeners, and a new world will be open to them. They will then be able to see what European agriculture may b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y will understand with what force the social revolution will be armed when we know the secret of taking everything we need from the soil.

我们的主张所依据的大量事实无法在此一一罗列。因此我们不得不推荐那些想进一步了解情况的读者去读另一本书《土地、工厂和车间》。首先我们要诚挚地邀请那些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去阅读法国和其他国家出版的几本优秀著作，在本书结尾处已经列了这些书单。

至于说大城镇里的居民，由于他们对农业究竟怎样还没有真实的概念，因此我们建议那些人到周围的商品菜园里看一看。他们只需观察和询问一下商品蔬菜种植者，一个崭新的世界就会展现在他们面前。这样他们就会看到在20世纪欧洲的农业会变成什么样；而且他们将会明白要是我们知道了从土壤获得我们所需一切的秘密后社会革命将会获得怎样的力量。

A few facts will suffice to show that our assertions are in no way exaggerated. We only wish them to be preceded by a few general remarks.

只需罗列几个事实就足以表明我们的主张绝非夸大其辞。我们只想在陈述这些事实之前先加上几句对总体情况的说明。

We know in what a wretched condition European agriculture is. If the cultivator of the soil is not plundered by the landowner, he is robbed by the State. If the State taxes him moderately, the money-lender enslaves him by means of promissory notes, and soon turns him into the simple tenant of soil belonging in reality to a financial company. The landlord, the State, and the banker thus plunders the cultivator by means of rent, taxes, and interest. The sum varies in each country, but it never falls below the quarter, very often the half of the raw produce. In France and in Italy agriculturists paid the State quite recently as much as 44 per cent of the gross produce.

我们清楚欧洲的农业如何惨淡。即使土地耕作者没遭到地主压榨，他也会遭到政府的掠夺。即使政府对他们适度征税的话，放款人

又会通过期票等方式使他们沦为奴隶，很快就会把他们变成事实上属于一家金融公司的土地的天真的佃户。地主、国家和银行家就这样通过地租、税收和利息来掠夺土地耕种者。劫掠的数目在各个国家虽不尽相同，但却从未降到毛产量的四分之一以下，通常是毛产量的二分之一。在法国和意大利，农场经营者最近要支付给政府高达总产量44%。

Moreover, the share of the owner and of State always goes on increasing. As soon as the cultivator has obtained more plentiful crops by prodigies of labour, invention, or initiative, the tribute he will owe to the landowner, the State, and the banker will augment in proportion. If he doubles the number of bushels reaped per acre, rent will be doubled, and taxes too, and the State will take care to raise them still more if the prices go up. And so on. In short, everywhere the cultivator of the soil works twelve to sixteen hours a day; these three vultures take from him everything he might lay by; they rob him everywhere of what would enable him to improve his culture. This is why agriculture progresses so slowly.

况且，土地所有者和政府所得的份额一直在增加。只要耕作者通过非凡的劳作、发明或者主动性而收获更多的收成，那他们上交给地主、政府和银行家一干人等的贡税也就成比例地增加。要是他们让亩产翻倍，地租也会随之翻倍，税款也随之翻倍，而且要是粮价上涨的话，政府还会想着继续提高税收。一切都是水涨船高。简言之，无论在哪里，土地的耕种者都要每天劳作12至16个小时；那三只秃鹰把他可能储藏的一切都夺走了；他们的掠夺无处不在，夺走了一切能用来提高其耕作能力的东西。这就是缘何农业进步如此之慢的原因。

The cultivator can only occasionally make some progress, in

some exceptional regions, under quite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following upon a quarrel between the three vampires. And yet we have said nothing about the tribute every cultivator pays to the manufacturer. Every machine, every spade, every barrel of chemical manure, is sold to him at three or four times its real cost. Nor let us forget the middleman, who levies the lion's share of the earth's produce.

只有在个别例外的地区，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趁着那三个吸血鬼争吵的时候，耕作者才会偶尔在农业上有一点进步。说到现在我们对农业耕作者向工业制造者所付的贡税还只字未提。每台机器，每把铁锹，每桶化学肥料，都是以其实际成本价格的三四倍卖给农业耕作者的。此外我们也不要忘了中间人，他们要从土地农产品中拿走大部分份额。

This is why, during all this century of invention and progress, agriculture has only improved from time to time on very limited areas.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处在这个发明和进步的时代里，农业却只能偶尔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取得进步。

Happily there have always been small oases, neglected for some time by the vulture; and here we learn what intensive agriculture can produce for mankind. Let us mention a few examples.

幸而总是有一些小块的绿洲被贪婪的秃鹰所忽视；在那里我们了解到集约耕作究竟可以为人类生产出什么。且让我们列举几个例子。

In the American prairies (which, however, only yield meagre spring wheat crops, from 7 to 15 bushels acre, and even these are often marred by periodical droughts), 500 men, working only during eight months, produce the annual food of 50,000 people. With all the improvements of the last three years, one man's yearly labour (300 days) yields, delivered in Chicago as flour, the yearly food of 250 men. Here the result is obtained by a great economy in manual labour: on those vast plains, ploughing, harvesting, thrashing, are organized in almost military fashion. There is no useless running to and fro, no loss of time—all is done with parade-like precision.

在美国大平原（那里只有少得可怜的春麦收成，大概是每英亩7到15蒲式耳不等，而即便是这个产量也经常因定期的干旱而不能保障），500名劳力只需劳作8个月就能够产出50,000人一年的口粮。随着过去三年的进步，一个劳力一年的劳动（以每年300天计算），便可以产出250人一年的口粮（以交付到芝加哥的面粉计算）。这个结果是从大量节省人工劳动而得来的：在那些广袤无垠的大平原上，耕种、收割和打谷几乎全都是以军队的方式组织进行的。那里没有无益的奔波，没有时间的浪费——所有的一切都是精确完成的，精确得就好似参加检阅的队列。

This is agriculture on a large scale—extensive agriculture, which takes the soil from nature without seeking to improve it. When the earth has yielded all it can, they leave it; they seek elsewhere for a virgin soil, to be exhausted in its turn. But here is

also “intensive” agriculture, which is already worked, and will be more and more so, by machinery. Its object is to cultivate a limited space well, to manure, to improve, to concentrate work, and to obtain the largest crop possible. This kind of culture spreads every year, and whereas agriculturists in the south of France and on the fertile plains of western America are content with an average crop of 11 to 15 bushels per acre by extensive culture, they reap regularly 39, even 55, and sometimes 60 bushels per acre in the north of France. The annual consumption of a man is thus obtained from less than a quarter of an acre.

这就是大范围的耕作——粗放型耕作，这种耕作只利用天然的土地而不试图加以改良。要是土地枯竭了，人们就离开那里；他们就跑到别处去寻找未开垦过的土地，直到把新垦殖的土地耗费枯竭。但这里也有“集约”耕作，它已然通过机械在运作了，并将越来越多地得到运用。集约耕作其目的是把一个有限的空间耕作好，施肥、改良、集中劳作，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收成。这种农业耕作方式逐年传播开去，比起法国南部和美国西部肥沃平原上的农场经营者通过粗放耕作而满足于平均每英亩11到15蒲式耳的收成，法国北部的农场经营者却通常每英亩收获39蒲式耳粮食，甚至是55，还有时竟高达60。这样一来从不到四分之一英亩的土地中就可以获取一个人一年的食品消耗了。

And the more intense the culture is, the less work is expended to obtain a bushel of wheat. Machinery replaces man at the preliminary work and for the improvements needed by the land—such as draining, clearing of stones—which will double the crops in future, once and for ever. Sometimes nothing but keeping the soil free of weeds, without manuring, allows an average soil to yield excellent crops from year to year. It has been done for forty years in succession at Rothamstead, in Hertfordshire.

而且耕作越是集约，每获得一蒲式耳小麦所需的劳动就越少。准备阶段的工作，以及土地需要的改良工作，比如排水、清理石块——这可以一劳永逸地让产量在今后翻番，在这些工作上机械替代了人工。有时候不需要做什么，只是保持土地不生杂草，也不需要施肥，便可以让土质一般的土地连年长出极好的庄稼。在赫特福德郡的罗森斯得，这样做已有连续40年了。

However, let us not write an agricultural romance, but be satisfied with a crop of 44 bushels per acre. That needs no exceptional soil, but merely a rational culture; and let us see what it means.

我们还是别去写农业的传奇故事了，就让我们满足于每英亩44蒲式耳的收成吧。这个收成并不需要异常肥沃的土壤，需要的只是一种理性的耕作；让我们来看看这意味着什么。

The 3,600,000 individuals who inhabit the two departments of Seine and Seine-et-Oise consume yearly for their food a little less than 22 million bushels of cereals, chiefly wheat; and in our hypothesis they would have to cultivate, in order to obtain this crop, 494,200 acres out of the 1,507,300 acres which they possess. It is evident they would not cultivate them with spades. That would need too much time—96 work-days of 5 hours per acre. It would be preferable to improve the soil once for all—to drain what needed draining, to level what needed levelling, to clear the soil of stones, were it even necessary to spend 5 million days of 5 hours in this preparatory work—an average of 10 work-days to each acre.

居住在塞纳和塞纳一瓦兹两省的360万居民每年要消耗差不多2200万蒲式耳的各种谷物，其中以小麦为主；我们推算为了获得这些谷物，在所拥有的1,507,300英亩的土地中，他们必须得耕作494,200英亩。显然他们不会用铁锹来耕作这些土地。那样将需要太长的时间——按五个小时一天计算每英亩需要96个工作日。一劳永逸地改良土地将更为可取——需要排水的排水、需要平整的平整、把石块清理干净，即使花上五百万个每天五小时的工作日——平均合十个工作日一英亩——去做耕种前的准备工作也并不为过。

Then they would plough with the steam-digger, which would take one and three-fifths of a day per acre, and they would give another one and three-fifths of a day for working with the double plough. Seeds would be sorted by steam instead of taken haphazard, and they would be carefully sown in rows instead of being thrown to the four winds. Now all this work would not take 10 days of 5 hours per acre if the work were done under good conditions. But if 10 million work-days are given to good culture during 3 or 4 years, the result will be that later on crops of 44 to 55 bushels per acre will be obtained by only working half the time.

接下来他们会用蒸汽挖掘机来犁地，平均每英亩会花费一又五分之三天，然后他们会再花上同样的时间把地再翻一遍。人们用蒸汽选种机来将种子拣选分类，而不再是随便拣拣就算了，之后细心地将这些种子撒播成垄，也不再随风抛洒了。如果条件好的话，现在完成所有这些工作按五小时工作日算连十天都用不了。但是如果在三四年内花上1000万个工作日来精耕细作的话，以后将只需要花费一半的劳动时间就能亩产44到55蒲式耳的庄稼。

Fifteen million work-days will thus have been spent to give

bread to a population of 3,600,000 inhabitants. And the work would be such that everyone could do it without having muscles of steel, or without having even worked the ground before. The initiative and the general distribution of work would come from those who know the soil. As to the work itself, there is no townsman of either sex so enfeebled as to be incapable of looking after machines and of contributing his share to agrarian work after a few hours' apprenticeship.

这样花费1500万个工作日就能提供360万户居民所需的面包了。而且这些活人人都能干，并不需要有钢筋铁骨，甚至都不要求以前在田地里干过农活。工作的带头人和总体分配者将来自于那些熟悉土地的人。至于说农活本身，城市居民经过几小时的学习不论男女没有一个虚弱到连机器都不能照看，虚弱到不能为农事贡献出一份力量。

Well, when we consider that in the present chaos there are, in a city like Paris, without counting the unemployed of the upper classes, there are always about 100,000 workmen out of work in their several trades, we see that the power lost in our present organization would alone suffice to give, with a rational culture, all the bread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three or four million inhabitants of the two departments.

那么，想到目前混乱状况中，比如像在巴黎这样的城市，即使不算上那些闲散的上层阶级，也总是有好几个行业的大约十万的工人在失业，我们就会清楚单单是我们目前社会所丧失的人力本身，若用于合理耕作的话，就足以为两省三四百万居民提供必要的面包了。

We repeat, this is no fancy dream, and we have not yet spoken of the truly intensive agriculture. We have not depended upon the wheat (obtained in three years by Mr. Hallett) of which one grain, replanted, produced 5,000 or 6,000, and occasionally 10,000 grains, which would give the wheat necessary for a family of five individuals on an area of 120 square yards. On the contrary, we have only mentioned what is being already achieved by numerous farmers in France, England, Belgium, etc. , and what might be done to-morrow with th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acquired already by practice on a large scale.

我们重申，这并非不切实际的梦想，而且我们还没有谈到真正的集约耕作。我们并没有将那些哈利特先生在三年里所获得的小麦作为依据，一粒这样的麦子再次种下，可以产出5000或者6000粒，有时甚至达到10000粒，这就可以为一个120平方码土地上的五口之家提供必需的小麦了。相反，我们只是提到了法国、英格兰、比利时等国家的众多的农场主已经取得的成就，以及拥有了经大规模实践获取的经验和知识后，明天有可能做得到的事情。

But without a revolution, neither to-morrow, nor after to-morrow will see it done, because it is not to the interest of landowners and capitalists; and because peasants who would find their profit in it have neither the knowledge nor the money, nor the time to obtain what is necessary to go ahead.

但是，不发动革命，无论是今天还是后天都不会看到它完成，因为它不符合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而且，还因为能够从中获利的农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去获取他们前进所必需的东西。

The society of to-day has not yet reached this stage. But let Parisians proclaim an Anarchist Commune, and they will of necessity come to it, because they will not be foolish enough to continue making luxurious toys (which Vienna, Warsaw, and Berlin make as well already), and to run the risk of being left without bread.

当今社会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不过要是让巴黎人民宣布成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公社，他们必然会达到这一阶段，因为他们不会愚蠢到继续制造奢侈的玩具（维也纳、华沙和柏林也已经在制造这些东西）而甘冒让自己没有面包吃的风险。

Moreover, agricultural work, by the help of machinery, would soon become the most attractive and the most joyful of all occupations.

此外，农业劳动在机械的辅助下很快就会成为所有职业中最有吸引力、最令人欢欣鼓舞的工作了。

“We have had enough jewelery and enough dolls' clothes,” they would say; “it is high time for the workers to recruit their strength in agriculture, to go in search of vigour, of impressions of nature, of the joy of life, that they have forgotten in the dark factories of the suburbs.”

“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珠宝和足够多的洋娃娃的衣服了。”他们会这样说，“现在到了这些工人在耕作中恢复体力，去追寻生命活力、

追寻大自然的美妙、追寻生命的乐趣的时候了，而这一切，他们在置身于市郊阴暗的工厂时都已遗忘。”

In the Middle Ages it was Alpine pasture lands, rather than guns, which allowed the Swiss to shake off lords and kings. Modern agriculture will allow a city in revolt to free itself from the combined bourgeois forces.

中世纪时，使瑞士人摆脱领主和君主压迫的并非是枪炮，而是阿尔卑斯山的牧场。现代农业将使起义的城市从联合的资产阶级势力压制下自我解放出来。

III

三

We have seen how the three and one-half million inhabitants of the two departments round Paris could find ample bread by cultivating only a third of their territory. Let us now pass on to cattle.

我们已经看到，巴黎附近两省350万左右的居民是如何能靠耕种他们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来得到充足的面包的。现在让我们来讨论牲畜的问题。

Englishmen, who eat much meat, consume on an average a little less than 220 pounds a year per adult. Supposing all meats

consumed were oxen, that makes a little less than the third of an ox. An ox a year for five individuals (including children) is already a sufficient ration. For three and one-half million inhabitants this would make an annual consumption of 700,000 head of cattle.

英国人吃肉多，他们每个成年人每年平均消耗接近二百二十磅肉。假定吃的都是牛肉，那就是将近一头牛的三分之一。对五个人（包括儿童）来说每年一头牛已经是很充裕的配给了。这样算来，350万左右的居民每年将消耗掉70万头牛。

To-day, with the pasture system, we need at least five million acres to nourish 660,000 head of cattle. This makes nine acres per each head of horned cattle. Nevertheless, with prairies moderately watered by spring water (as recently done on thousands of acres in the southwest of France), one and one-fourth million acres already suffice. But if intensive culture is practiced, and beet-root is grown for fodder, you only need a quarter of that area, that is to say, about 310,000 acres. And if we have recourse to maize and practice ensilage (the compression of fodder while green) like Arabs, we obtain fodder on an area of 217,500 acres.

在如今的牧场体制下，要养活66万头牛我们需要至少500万英亩的土地。也就是说每头牛需要9英亩土地。然而，只要牧场适当地用泉水加以灌溉（一如近来法国西南部数千英亩土地上的做法），那么125万英亩的土地就足够了。但如果实行了集约耕作，种植甜菜根用作饲料，那么你只需要该面积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大概需要31万英亩。但是如果我们改用玉米并像阿拉伯人那样保藏新鲜青贮饲料（将青饲料压缩），我们就只需21.75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植饲料。

In the environs of Milan, where sewer water is used to irrigate the fields, fodder for two to three horned cattle per each acre is obtained on an area of 22,000 acres; and on a few favoured fields, up to 177 tons of hay to the 10 acres have been cropped, the yearly provender of 36 milch cows. Nearly nine acres per head of cattle are needed under the pasture system, and only two and one-half acres for nine oxen or cows under the new system. These are the opposite extremes in modern agriculture.

在米兰郊外，用污水灌溉田地，在22,000英亩土地上，每亩可以产出足够两三头牛吃的草料；而在几处状况良好的田地上，10英亩的土地上可以收获高达177吨干草，足够36头奶牛一年的饲料。在牧场制度之下，养一头牛需要大概9英亩的土地，而使用新方法养活九头牛则只需要2.5英亩的土地。这是现代农业中两个相反的极端。

In Guernsey, on a total of 9,884 acres utilized, nearly half (4,695 acres) are covered with cereals and kitchen-gardens; only 5,189 acres remain as meadows. On these 5,189 acres, 1,480 horses, 7,260 head of cattle, 900 sheep, and 4,200 pigs are fed, which makes more than three head of cattle per two acres, without reckoning the sheep or the pigs. It is needless to add that the fertility of the soil is made by seaweed and chemical manures.

在根西岛，在已开垦的9,884英亩土地上，约一半(4,695英亩）的土地上种的是谷类和菜园；只有5,189英亩还留作牧场。在这5,189英亩牧场上，喂养着1,480匹马，7,260头牛，900头羊，4,200头猪，算下来每两英亩土地上饲养了三头牛还多，这还没把羊和猪计算在内。不用说，这里的土壤是用海草和化肥增加肥力的。

Returning to our three and one-half million inhabitants belonging to Paris and its environs, we see that the land necessary for the rearing of cattle comes down from five million acres to 197,000. Well, then, let us not stop at the lowest figures, let us take those of ordinary intensive culture; let us liberally add to the land necessary for smaller cattle which must replace some of the horned beasts and allow 395,000 acres for the rearing of cattle—494,000 if you like, on the 1,013,000 acres remaining after bread has been provided for the people.

回过头再说巴黎和巴黎郊外的那350万左右的居民，我们会得出，饲养牲畜所需的土地已经从500万英亩降到了19.7万英亩。我们姑且不只盯着那些最低标准的数字，就让我们取普通的集约耕作的数字为准；我们再在必不可少的基础上，大方地增加一些土地来饲养小型牲畜来代替一部分牛，在为人们提供了面包之后余下的101.3万英亩土地中划出39.5万英亩——如果你愿意，49.4万英亩也可以——用来饲养这些牲畜。

Let us be generous and give five million work-days to put this land into a productive state.

就让我们慷慨一点，假定让这些土地保持正常耕种需要500万个工作日。

After having therefore employed in the course of a year twenty million work-days, half of which are for permanent improvements, we shall have bread and meat assured to us, without including all the extra meat obtainable in the shape of fowls, pigs, rabbits, etc.;

withou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a population provided with excellent vegetables and fruit consumes less meat than Englishmen, who supplement their poor supply of vegetables by animal food. Now, how much do twenty million work-days of five hours make per inhabitant? Very little indeed. A population of three and one-half millions must have at least 1,200,000 adult men, and as many women capable of work. Well, then, to give bread and meat to all, it would need only seventeen half-days of work a year per man. Add three million work-days, or double that number if you like, in order to obtain milk. That will make twenty-five work-days of five hours in all—nothing more than a little pleasureable country exercise—to obtain the three principal products: bread, meat, and milk. The three products which, after housing, cause daily anxiety to nine-tenths of mankind.

在一年之中雇工2000万个工作日，其中的一半用于永久改良，这样我们就能够确保自己有面包和肉吃，还不包括禽类、猪和兔等其他肉类，我们也不考虑有上等蔬菜和水果供应的那些人所食用的肉要比英国人少，英国人是用动物性食品来补充他们蔬菜供应上的不足。那么，2000万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工作5个小时）平均到每个居民身上是多少呢？实际上非常少。在350万的人口中至少会有120万名壮年男子，还有同样多能够劳动的妇女。这样一来，要实现所有的人都有面包和肉吃，只需要每个人一年工作17.5天。再加上300万个工作日用于得到牛奶，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这个数字加倍。那就意味着一共需要25个工作日，每天5个小时，不过是进行一点愉快的田间劳动，就可获得这三样主要的物产：面包、肉和牛奶。这三样东西，仅次于住房问题，日夜困扰着全人类90％的人。

And yet—let us not tire of repeating—these are not fancy dreams. We have only told what is, what been, obtained by

experience on a large scale. Agriculture could be reorganized in this way to-morrow if property laws and general ignorance did not offer opposition.

但是——不要怕重复——这些并非幻想。我们所讲述的只不过是现在及过去通过大规模实验获得的东西。要是财产法和普遍的无知不反对的话，未来农业就会以这样的方式被认识。

The day Paris has understood that to know what you eat and how it is produced, is a question of public interest; the day when everybody will have understood that this question is infinitely more important than all 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 of the present times—on that day the Revolution will be an accomplished fact. Paris will take possession of the two departments and cultivate them. And then the Parisian worker, after having laboured a third of his existence in order to buy bad and insufficient food, will produce it himself, under his walls, within the enclosure of his forts (if they still exist), and in a few hours of healthy and attractive work.

了解你吃些什么及其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是一个事关公众利益的问题，等到巴黎明白这个问题的那一天，等到人人都懂得这个问题比目前一切议会辩论都重要得多的那一天，就是革命成功之日。巴黎会占领两个省的土地并对耕种这些土地。于是巴黎的工人，那些一辈子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为了购买劣质且不够用的食物而劳作的人们，他们将会在自己的房前屋后、在自己的堡垒里（要是它们还能留下来的话）生产食物，而且每天只需几个小时有益于健康的有趣的劳动。

And now we pass on to fruit and vegetables. Let us go outside

Paris and visi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arket-gardener who accomplishes wonders (ignored by learned economists) at a few miles from the academies.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水果和蔬菜。让我们走出巴黎，去看看距离各大学院数英里之外的某个商品蔬菜种植者吧，他有很多创举（但都被博学的经济学家所忽视）。

Let us visit, suppose, M. Ponce, the author of a work on market¬gardening, who makes no secret of what the earth yields him, and who has published it all along.

我们去拜访一下，比如庞沙先生，他是一部商品蔬菜种植业著作的作者。他在书中毫无保留地告诉读者土地所给他带来的收益，并将之公之于众。

M.Ponce, and especially his workmen, work like niggers. It takes eight men to cultivate a plot a little less than three acres (2. 7). They work twelve and even fifteen hours a day, that is to say, three times more than is needed. Twenty-four of them would not be too many. To which M. Ponce will probably answer that as he pays the terrible sum of 100 rent a year for his 2. 7 acres of land, and 100 for manure bought in the barracks, he is obliged to exploit. He would no doubt answer, “Being exploited, I exploit in my turn.” His installation has also cost him 1,200, of which certainly more than half went as tribute to the idle barons of industry. In reality, this establishment represents at most 3,000 work¬days, probably much less.

庞沙先生本人，尤其是他的工人，像黑奴一样辛苦劳作。耕种不足三英亩（2.7英亩）的一小块地他们就需要八个劳力。这些人每天工作12个甚至是15个小时，也就是说，比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多了三倍。他们一共24个人，并不算多。就劳作时间长这一点庞沙先生可能会应对说，他每年要为这2.7英亩的土地支付高达100块的地租，还要花100从兵营中购买肥料，他是被逼着剥削别人的。他会毫无疑问地回答："我受别人剥削，反过来也要剥削别人。"他的设备还花费了他1200块，这些钱当中肯定有一大半被整天什么都不干的工业大亨拿走了。实际上，这种设施至多需要3000个工作日，也许更少。

But let us examine his crops: nearly ten tons of carrots, nearly ten tons of onions, radishes, and small vegetables, 6,000 heads of cabbage, 3,000 heads of cauliflower, 5,000 baskets of tomatoes, 5,000 dozen of choice fruit, 154,000 salads; in short, a total of 123 tons of vegetables and fruit to 2. 7 acres—120 yards long by 109 yards broad, which makes more than forty-four tons of vegetables to the acre.

但是让我们看看他的收成：将近十吨的胡萝卜、将近十吨的洋葱、萝卜和小蔬菜，6000颗卷心菜，3000颗花椰菜，5000篮番茄，5000打精选水果，15.4万棵生菜；也就是说他那块120码长、109码宽、面积2.7英亩的土地总计产出了123吨的蔬菜和水果，即平均每英亩收获44多吨蔬菜。

But a man does not eat more than 660 pounds of vegetables and fruit a year, and two and one-half acres of a market-garden yield enough vegetables and fruit to richly supply the table of 350 adults during the year. Thus twenty-four persons employed a whole

year in cultivating 2.7 acres of land, and only five working hours a day, would produce sufficient vegetables and fruit for 350 adults, which is equivalent at least to 500 individuals.

可是一个人一年吃的蔬菜和水果加起来不超过660磅，这样算来2.5英亩的商品菜园产出的蔬菜和水果供350个成年人食用一年都绰绰有余。这样一来，雇佣24个人耕种2.7英亩的土地一年，每天只工作5个小时，就能生产出足够350个成年人食用的蔬菜和水果，相当于至少500个人的量。

To put it another way: in cultivating like M. Ponce—and his results have already been surpassed—350 adults should each give a little more than 100 hours a year (103) to produce vegetables and fruit necessary for 500 people.

换言之：像庞沙先生那样耕作——更何况他的产出已经被人超过了——350个壮年每人每年只要付出100个小时多一点点（103个小时）的劳动就足以产出够500人食用的蔬菜和水果了。

Let us mention that such a production is not the exception. It takes place, under the walls of Paris, on an area of 2,220 acres, by 5,000 market- gardeners. Only these market-gardeners are reduced nowadays to a state of beasts of burden, in order to pay an average rent of 32 per acre.

要知道这样的生产力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巴黎，在2220英亩的土地上，5000个商品蔬菜种植者都是如此。只是现在这些商品蔬

菜种植者为了支付每英亩32块的租金不得不累死累活，沦为骡马了。

But do not these facts, which can be verified by every one, prove that 17,300 acres (of the 519,000 remaining to us) would suffice to give all necessary vegetables, as well as a liberal amount of fruit to the three and one-half million inhabitants of our two departments?

这些每个人都能去验证的事实难道不足以证明（留给我们的51.9万英亩土地中的）17,300英亩土地就足够为我们两个省350万左右的居民提供必要的蔬菜以及丰富的水果吗？

As to the quantity of work necessary to produce these fruits and vegetables, it would amount to fifty million work-days of five hours (50 days per adult male), if we measure by the market-gardeners' standard of work. But we could reduce this quantity if we had recourse to the process in vogue in Jersey and Guernsey. We must also remember that the Paris market-gardener is forced to work so hard because he mostly produces early season fruits, the high prices of which have to pay for fabulous rents, and that this system of culture entails more work than is necessary for growing the ordinary staple-food vegetables and fruit. Besides, the market-gardeners of Paris, not having the means to make a great outlay on their gardens, and being obliged to pay heavily for glass, wood, iron, and coal, obtain their artificial heat out of manure, while it can be had at much less cost in hothouses.

至于说生产这些水果和蔬菜所必需的工作量，要是按照商品蔬菜

商的工作标准，我们将需要5000万个每天5小时的工作日，即每名壮年男劳力工作50天。但是如果我们采用泽西岛和根西岛流行的劳动办法，这个数字还可以再少。我们还要记得，巴黎的商品蔬菜种植者是无奈才那么辛苦劳作的，因为他们主要种植早季水果，这样才能用高价水果赚来的钱支付高得惊人的地租，而且我们还要知道，这种劳作方式所需的劳动要比种植普通蔬菜和水果所必需的劳动多得多。此外，由于没钱在菜园投入更多，又得花很多钱买玻璃、木材、钢铁和煤炭，巴黎的商品蔬菜种植者是通过粪肥为土地提升温度的，而在温室中提升温度花费就要少得多了。

IV

四

The market-gardeners, we say, are forced to become machines and to renounce all joys of life in order to obtain their marvellous crops. But these hard grinders have rendered a great service to humanity in teaching us that the soil can be “made.” They make it with old hot-beds of manure, which have already served to give the necessary warmth to young plants and to early fruit; and they make it in such great quantity that they are compelled to sell it in part, otherwise it would raise the level of their gardens by one inch every year. They do it so well (so Barral teaches us, in his “Dictionary of Agriculture,” in an article on market-gardeners) that in recent contracts, the market-gardener stipulates that he will carry away his soil with him when he leaves the bit of ground he is cultivating. Loam carried away on carts, with furniture and glass frames—that is the answer of practical cultivators to the learned treatises of a Ricardo, who represented rent as a means of equalizing the natural advantages of the soil. “The soil is worth what the man is worth,” that is the gardeners' motto.

我们要知道，商品蔬菜种植者是出于无奈才变成劳动机器的，是出于无奈才放弃所有生活乐趣的，一切都是为了要获取更多的收成。但是这些辛苦劳作的人却为人类作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他们让我们知道土壤是可以“人造”的。他们用已经为幼苗和早季水果提供了必要热量的旧粪肥温床做土壤；他们造的土壤多得不得不出售一部分，否则他们的菜园每年都要抬高一寸。他们人工制造土壤的技术相当好（巴拉尔在《农业词典》里一篇论述商品蔬菜种植者的文章中这样评价），因此在近期签订的合同中，商品蔬菜种植者约定要是他离开自己所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他要把自己造的土壤也带走。肥土被成车拉走，一起运走的还有器具和玻璃框架——这是实际的耕作者们对出自一位名为里卡多的人之手的那部博学论著的回答，里卡多把地租描绘为平衡土地天然优势的方法。“土壤就是一个人全部的身家。”这就是商品蔬菜种植者的格言。

And yet the market-gardeners of Paris and Rouen labour three times as hard to obtain the same results as their fellow-workers in Guernsey or in England. Applying industry to agriculture, these last make their climate in addition to their soil, by means of the greenhouse.

可是要获得同样的收成，巴黎和鲁昂的商品蔬菜种植者付出的辛劳是根西岛或英格兰同业者的三倍。将工业运用于农业，通过温室的方法，除了制造土壤之外，那些人最近还制造了气候。

Fifty years ago the greenhouse was the luxury of the rich. It was kept to grow exotic plants for pleasure. But nowadays its use begins to be generalized. A tremendous industry has grown up lately in Guernsey and Jersey, where hundreds of acres are already

covered with glass—to say nothing of the countless small greenhouses kept in every little farm garden. Acres and acres of greenhouses have lately been built also at Worthing (103 acres in 1912), in the suburbs of London, and in several other parts of England and Scotland.

50年前，温室还是富人的奢侈物。那时温室用来种植奇花异草，以供赏玩。但是如今温室的使用开始得以推广。最近一种规模巨大的工业在根西岛和泽西岛发展起来，在那里数百英亩的土地被罩上玻璃——更不用说各个农场菜园里都有的加起来不计其数的小温室了。数英亩的温室最近接连不断地在沃森（那里1912年的温室有103英亩）、在伦敦郊区以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其他几个地方建造起来。

They are built of all qualities, beginning with those which have granite walls, down to those which represent mere shelters made in planks and glass frames, which cost, even now, with all the tribute paid to capitalists and middlemen, less than 3s. 6d. per square yard under glass. Most of them are heated for at least three or four months every year; but even the cool greenhouses, which are not heated at all, give excellent results—of course, not for growing grapes and tropical plants, but for potatoes, carrots, peas, tomatoes, and so on.

这些温室各种各样，上至那些有花岗岩墙体的温室，下至用木板和玻璃框架搭建的遮风避雨的棚子，后者即便是现在，算上需要向资本家和中间商上的贡，其花费也不超过三先令六便士每平方码。这些温室大部分每年至少有三四个月要加热，但即便是那些完全不给加热的冷温室，也产出丰厚——当然，这些温室不是用来种植葡萄和热带作物的，而是用来种植马铃薯、胡萝卜、豌豆、西红柿等农作物的。

In this way man emancipates himself from climate, and at the same time he avoids also the heavy work with the hot-beds, and he saves both in buying much less manure and in work. Three men to the acre, each of them working less than sixty hours a week, produce on very small spaces what formerly required acres and acres of land.

人们用这种方法摆脱了气候的束缚，同时还避免了使用温床而带来的繁重劳动，而且他不仅因不用购买那么多肥料而节约了开支，还节省了劳动。每英亩地三个人，每人每周劳作不超过六十个小时，这样就能在很小的空间里生产出以前需要成亩的土地才能生产出的农产品。

The result of all these recent conquests of culture is, that if one-half only of the adults of a city gave each about fifty half-days for the culture of the finest fruit and vegetables out of season, they would have all the year round an unlimited supply of that sort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for the whole population.

所有近来了不起的农业发展都说明，一个城市只要有一半成年人每人付出五十个半天的劳动，来种植最上等的非时令水果和蔬菜，那么他们就能为全部人口敞开供应那些水果和蔬菜一整年。

But there is a still more important fact to notice. The greenhouse has nowadays a tendency to become a mere kitchen garden under glass. And when it is used to such a purpose, the simplest plank-and-glass unheated shelters already give fabulous

crops—such as, for instance, 500 bushels of potatoes per acre as a first crop, ready by the end of April; after which a second and a third crop are obtained in the extremely high temperature which prevails in the summer under glass.

但还要注意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温室目前有一个发展趋势，那就是仅仅变成玻璃温室中的菜园而已。当温室被人们以这样的用途使用的时候，那些最为简陋的用木板和玻璃搭建起来的没有加热的棚子已经产量惊人——比如说，第一季生产的马铃薯在四月底之前即已就绪，每英亩可得500蒲式耳；此后在炎热的夏季又可以在温室里种植和收获第二季和第三季作物。

I gave in my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most striking facts in this direction. Sufficient to say here, that at Jersey, thirty-four men, with one trained gardener only, cultivate thirteen acres under glass, from which they obtain 143 tons of fruit and early vegetables, using for this extraordinary culture less than 1,000 tons of coal.

我在《田地、工厂和车间》一书中描述了许多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事实。在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在泽西岛，34个人，只需要一个训练有素的蔬菜种植者，耕种13英亩温室土地，他们就可以从中收获143吨的水果和早季蔬菜，而生产数量如此之多的农作物却只用不到1000吨的煤炭。

And this is done now in Guernsey and Jersey on a very large scale, quite a number of steamers constantly plying between Guernsey and London, only to export the crops of the greenhouses.

这种做法目前在根西岛和泽西岛得到大规模推广，众多蒸汽轮船定期往返于根西岛和伦敦之间，把温室产出的果蔬运出来。

Nowadays, in order to obtain that same crop of 500 bushels of potatoes, we must plough every year a surface of four acres, plant it, cultivate it, weed, it, and so on; whereas with the glass, even if we shall have to give perhaps, to start with, half a day's work per square yard in order to build the greenhouse—we shall save afterwards at least one-half, and probably three-quarters of the yearly labour required formerly.

如今，一样为了收获500蒲式耳的马铃薯，我们却必须每年犁耕4英亩的土地，要种植、耕作、除草等等；而有了玻璃温室，即便一开始我们在每平方码的土地上花费半天的时间来建造温室——但此后与以前每年所需的劳动相比，我们将节省二分之一，也许是四分之三。

These are facts, results which every one can verify himself. And these facts are already a hint as to what man could obtain from the earth if he treated it with intelligence.

这些都是实情，人人都可以去证实。这些情况提示我们人类如果运用聪明才智去耕种，将会从土地里获得怎样的收获。

V

五

In all the above we have reasoned upon what already withstood the test of experience. Intensive culture of the fields, irrigated meadows, the hot-house, and finally the kitchen garden under glass are realities. Moreover, the tendency is to extend and to generalize these methods of culture, because they allow of obtaining more produce with less work and with more certainty.

上文我们详尽地论述了业已经受住了实践检验的事实。田地的集约耕作、灌溉的牧场、暖房以及现在的玻璃温室菜园都是现实中的事。此外，目前的趋势是把这些耕作的方法扩大并推广，因为这些方法可以用更少的劳动更有保障地获得更多的农产品。

In fact, after having studied the most simple glass shelters of Guernsey, we affirm that, taking all in all, far less work is expended for obtaining potatoes under glass in April, than in growing them in the open air, which requires digging a space four times as large, watering it, weeding it, etc. Work is likewise economized in employing a perfected tool or machine, even when an initial expense had to be incurred to buy the tool.

实际上，对根西岛最为简陋的温室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可以断定，总的算下来，四月份在玻璃温室内种马铃薯的所耗费的劳动要远比在露天地种马铃薯少得多，而在露天地种马铃薯需要耕作比在温室里大四倍的土地，还要灌溉、除草等。使用改良的工具和机械同样会节约劳动，尽管一开始要花钱买那些工具。

Complete figures concerning the culture of common vegetables under glass are still wanting. This culture is of recent origin, and is

only carried out on small areas. But we have already figures concerning the fifty years old culture of early season grapes, and these figures are conclusive.

现在还没有温室内种植普通蔬菜的完整的数据。这种耕种方法只是最近才有的，而且也只是在范围内施行。但是我们手头有五十年来种植早季葡萄的数据资料，而且这些数据是确凿的。

In the north of England, on the Scotch frontier, where coal only costs 3s. a ton at the pit!s mouth, they have long since taken to growing hot-house grapes. Thirty years ago these grapes, ripe in January, were sold by the grower at 20s. per pound and resold at 40s. per pound for Napoleon III. 's table. To-day the same grower sells them at only 2s. 6d. per pound. He tells us so himself in a horticultural journal. The fall in the prices is caused by the tons and tons of grapes arriving in January to London and Paris.

在英格兰北部，苏格兰边境，由于那里煤炭在矿口一吨只卖三先令，因此那里的人很早就习惯于在温室里种植葡萄。30年前种植者以每磅20先令的价格出售这些一月份成熟的葡萄，等转售到拿破仑三世的餐桌上时售价已经高达每磅40先令了。现在同样的种植者每磅葡萄只能卖到2先令6便士。他本人在一本园艺期刊中这样告诉我们：一月份成吨成吨的葡萄运抵了伦敦和巴黎导致了葡萄价格下降。

Thanks to the cheapness of coal and an intelligent culture, grapes from the north travel now southwards, in a contrary direction to ordinary fruit. They cost so little that in May, English and Jersey grapes are sold at 1s. 8d. per pound by the gardeners,

and yet this price, like that of 40s. thirty years ago, is only kept up by slack production.

得益于低廉的煤炭价格和聪明的耕作，北方产的葡萄现在开始南下，这和普通水果运输方向正好相反。花费是如此之小，因此五月份英国和泽西岛种植商的葡萄售价是每磅1先令8便士，而这个售价，就像30年前40先令的价格一样，只有通过减少生产才能维持。

In March, Belgium grapes are sold at from 6d. to 8d., while in October, grapes cultivated in immense quantities—under glass, and with a little artificial heating in the environs of London—are sold at the same price as grapes bought by the pound in the vineyards of Switzerland and the Rhine, that is to say, for a few halfpence. Yet they still cost two-thirds too much, by reason of the excessive rent of the soil and the cost of installation and heating, on which the gardener pays a formidable tribute to the manufacturer and the middleman. This being understood, we may say that it costs “next to nothing” to have delicious grapes under the latitude of, and in our misty London in autumn. In one of the suburbs, for instance, a wretched glass and plaster shelter, nine feet ten inches long by six and one-half feet wide, resting against our cottage, gave us about fifty pounds of grapes of an exquisite flavour in October, for nine consecutive years. The crop came from a Hamburg vine-stalk, six year old. And the shelter was so bad that the rain came through. At night the temperature was always that of outside. It was evidently not heated, for it would have been as useless as heating the street! And the care which was given was: pruning the vine, half an hour every year; and bringing a wheel-barrowful of manure, which was thrown over the stalk of the vine, planted in red clay outside the shelter.

三月份，比利时的葡萄售价是六到八先令，而十月份，大量栽培的葡萄——在伦敦郊外温室内栽培，需要一点人工加热——售价与瑞士和莱茵河国家葡萄园里大量出售的葡萄价格是一样的，也就每磅几个便士。然而种植者仍然多耗费了三分之二，因为高额的地租，以及他们要贡献给制造商和中间商的设备和加热的费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说，要想在秋天里伦敦这个纬度，这个多雾的城市里吃到美味的葡萄，其花费“几乎等于零”。例如在某一市郊，一间不起眼的玻璃和泥灰大棚，九英尺十英寸长六英尺半宽，紧靠着我们的农舍，连续9年在十月份给我们提供约五十五磅精美的葡萄。这些都产自汉堡的一棵六年龄的葡萄藤。这个大棚的遮蔽状况很糟糕，连雨水都挡不住。到了晚上里面的温度常常和外面没什么两样。里面显然没有加热，因为那就跟给大街加热一样，根本就没有用。对葡萄藤的耕作包括：剪枝，每年半个小时；推来一车粪肥，洒在种于大棚外红土里的葡萄藤主干周围。

On the other hand, if we estimate the amount of care given to the vine on the borders of the Rhine of Lake Leman, the terraces constructed stone upon stone on the slopes of the hills, the transport of manure and also of earth to a height of two or three hundred feet, w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on the whole the expenditure of work necessary to cultivate vines is more considerable in Switzerland or on the banks of the Rhine than it is under glass in London suburbs.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算一算照料莱茵河畔莱芒湖旁葡萄树所花的工夫——在山坡上用层层叠叠的石头建造梯田，把肥料和土壤运到二三百英尺的高处，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就耕种葡萄树所必须付出的全部劳动而言，瑞士或者莱茵河畔地区所需要的劳动要比伦敦郊区玻璃温室里多得多。

This may seem paradoxical, because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vines grow of themselves in the south of Europe, and that the vine- grower's work costs nothing. But gardeners and horticulturists, far from contradicting us, confirm our assertions.” The most advantageous culture in England is vine culture,” wrote a practical gardener, editor of the “English Journal of Horti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ces speak eloquently for themselves, as we know.

这看似矛盾，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葡萄树在欧洲南部是自己成长的，葡萄栽培者耗费不了什么。可是园丁和园艺家的说法与我们的说法根本就不矛盾，反而证实了我们的说法。“英格兰最有利可图的农业就是葡萄业。”——一个有经验的园丁，19世纪《英国园艺杂志》的编辑这样写道。正如我们所知，价格本身胜过一切雄辩。

Translating these facts into communist language, we may assert that the man or woman who takes twenty hours a year from his leisure time to give some little care—very pleasant in the main—to two or three vine-stalks sheltered by simple glass under any European climate, will gather as many grapes as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can eat. And that applies not only to vines, but to all fruit trees.

要把这些实际情况转化为共产主义者的语言，我们可以断言，无论男女，一年只要从闲暇时间中拿出20个小时稍微照料一下——大体上非常令人愉快——两三棵无论任何欧洲天气下都由简单的玻璃遮挡的葡萄树，那么此人收获的葡萄足够全家人和朋友享用。这不仅适用于葡萄树，而且还适用于所有的果树。

The Commune that will put the processes of intensive culture into practice on a large scale will have all possible vegetables, indigenous or exotic, and all desirable fruits, without employing more than about ten hours a year per inhabitant.

能够把集约耕作大规模付诸实践的公社将会拥有各种各样的蔬菜，既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以及各种想要的水果，却只需要利用每个居民每年大约十个小时的时间。

In fact, nothing would be easier than to verify the above statements by direct experiment. Suppose 100 acres of a light loam (such as we have at Worthing) are transformed into a number of market gardens, each one with its glass houses for the rearing of the seedlings and young plants. Suppose also that fifty more acres are covered with glass house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whole is left to practical experienced French mara chers, and Guernsey or Worthing greenhouse gardeners.

实际上，通过直接的实验是验证以上说法的最容易的办法。假定100英亩轻壤土的田地（像沃森那里的土地一样）被改造为数个商品菜园，每个菜园都有自己的温室用于培育秧苗和幼苗。再假定另有50英亩地上建的都是温室，全部农事都由富有经验的法国市场园艺家，以及根西岛或沃森的温室园丁来统筹。

In basing the maintenance of these 150 acres on the Jersey average, requiring the work of three men per acre under glass—which makes less than 8,600 hours of work a year—it would need

about 1,300,000 hours for the 150 acres. Fifty competent gardeners could give five hours a day to this work, and the rest would be simply done by people who, without being gardeners by profession, would soon learn how to use a spade, and to handle the plants. But this work would yield at least—we have seen it in a preceding chapter—all necessaries and articles of luxury in the way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for at least 40,000 or 50,000 people. Let us admit that among this number there are 13,500 adults, willing to work at the kitchen garden; then, each one would have to give 100 hours a year distributed over the whole year. These hours of work would become hours of recreation spent among friends and children in beautiful gardens, more beautiful probably than those of the legendary Semiramis.

假定按照泽西岛的平均水平来侍弄这150英亩土地，即每英亩温室需要三个人劳动年加起来不超过8600个小时的劳动——这样150英亩土地将需要大约一百三十万个小时的劳动。50位称职的园丁可以一天干5个小时，其他的工作可以由那些虽然不是职业园丁但能很快学会如何使用铁锹、如何侍弄庄稼的人去干。但是这样的劳作将至少产出——我们在前一章已经了解——在蔬菜和水果方面的所有必需品和奢侈品，可以满足至少四万或五万人食用。我们假设，在这些人中有13,500名成年人愿意在菜园里劳作；那么，这些人每人全年要付出100个小时的劳动。这些工作时间会变成美丽菜园里朋友间的消遣和孩子们的娱乐，这些菜园可能比那些传说中的塞米勒米斯的花园还要美丽。

This is the balance sheet of the labour to be spent in order to be able to eat to satiety fruit which we are deprived of to-day, and to have vegetables in abundance, now so scrupulously rationed out by the housewife, when she has to reckon each half-penny which

must go to enrich capitalists and landowners.

为了能大量去吃水果（要知道如今我们被剥夺了这些水果的享用权），为了获得充裕的蔬菜（要知道现在的家庭主妇要用心仔细安排每顿饭的用量，因为她不得不算计必须用于送去养肥资本家和地主的每半便士），这就是我们必须为此付出的劳动清单。

If only humanity had the consciousness of what it CAN, and if that consciousness only gave it the power to WILL!

但愿人类觉醒到了自己的能力，但愿这种觉醒给人类的意愿以力量。

If it only knew that cowardice of the spirit is the rock on which all revolutions have stranded until now.

但愿人类知道精神上的怯懦正是导致所有革命搁浅的礁石。

VI

六

We can easily perceive the new horizons opening before the social revolution.

我们很容易就能预见到社会革命所带来的新局面。

Each time we speak of revolution, the face of the worker who has seen children wanting food darkens and he asks—" What of bread? Will there be sufficient, if everyone eats according to his appetite? What if the peasants, ignorant tools of reaction, starve our towns as the black bands did in France in 1793—what shall we do?"

每一次我们提到革命，看着自己孩子挨饿的那些工人就会沉下脸来，他们会问："面包怎么解决？要是人人都尽情吃喝，面包能够吃吗？要是被反动派用作工具的无知农民，像1793年法国革命时黑手党那样，断了给我们城里的粮食供应，我们该怎么办？"

Let them do their worst. The large cities will have to do without them.

让那些无知农民尽管去用他们的招数吧。大城市离开他们也能生存。

At what, then, should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workers, who are asphyxiated to-day in small workshops and factories, be employed on the day they regain their liberty? Will they continue to shut themselves up in factories after the Revolution? Will they continue to make luxurious toys for export when they see their stock or corn getting exhausted, meat becoming scarce, and vegetables disappearing without being replaced?

那么如今在小作坊和工厂里累死累活的无数工人，一旦重获自由又会被雇佣去做什么呢？革命之后他们还会继续把自己关在工厂里吗？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储备或者谷物消耗殆尽、肉类日益缺乏、蔬菜日渐消失而又无可替代之时，他们还会继续制造用于出口的奢侈玩具吗？

Evidently not! They will leave the town and go into the fields! Aided by a machinery which will enable the weakest of us to put a shoulder to the wheel, they will carry revolution into previously enslaved culture as they will have carried it into institutions and ideas.

显然不会他们会离开城市走进田地在即使是最虚弱的人也能操控的机械的帮助下，这些工人会把革命带到之前被束缚的农业之中，正如他们让制度和思想发生革命一样。

Hundreds of acres will be covered with glass, and men, and women with delicate fingers, will foster the growth of young plants. Hundreds of other acres will be ploughed by steam, improved by manures, or enriched by artificial soil obtained by the pulverization of rocks. Happy crowds of occasional labourers will cover these acres with crops, guided in the work and experiments partly by those who know agriculture, but especially by the great and practical spirit of a people roused from long slumber and illumined by that bright beacon—the happiness of all.

数百英亩的土地会覆盖上玻璃温室，然后人们会用他们灵巧的双

手来培育幼苗。另有数百英亩的土地会用蒸汽犁来翻地，用肥料改良的，或用粉碎的岩石构成的人工土壤来改善土质。偶尔劳动的愉快的人们会在这些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在劳动和试验中有时受到农业行家的指导，但更多的时候，指引他们的是被从长眠中唤醒的、受着那光明的灯塔——所有人类的福祉——所指引的一个民族的实践精神。

And in two or three months the early crops will receive the most pressing wants, and provide food for a people who, after so many centuries of expectation, will at least be able to appease their hunger and eat according to their appetite.

在两三个月内，早熟的农作物便可满足最迫切的需要、为一些人提供食物了，这些人在企盼了那么多个世纪以后，终于能抚慰自己的饥饿感，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了。

In the meanwhile, popular genius, the genius of a nation which revolts and knows its wants, will work at experimenting with new processes of culture that we already catch a glimpse of, and that only need the baptism of experience to become universal. Light will be experimented with—that unknown agent of culture which makes barley ripen in forty-five days under the latitude of Yakutsk; light, concentrated or artificial, will rival heat in hastening the growth of plants. A Mouchot of the future will invent a machine to guide the rays of the sun and make them work, so that we shall no longer seek sun-heat stored in coal in the depths of the earth. They will experiment the watering of the soil with cultures of micro-organisms—a rational idea, conceived but yesterday, which will permit us to give to the soil those little living beings, necessary to feed the rootlets, to decompose and assimilate th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soil.

与此同时，有一些很受欢迎的天才，他们不仅反叛，还知道国家的需求。他们将致力于试验那些我们已经窥见一斑的新型农耕方法，这些方法只需要受到经验的洗礼即可普遍适用了。人们会就光线做试验——光在农业中发挥着不为人所知的作用，它让雅库茨克纬度下的大麦在45天内就成熟了；无论是聚集起来的光还是人造的光，在加速植物生长方面都将和热竞争。未来的太阳能学者将发明一种机器引导太阳光并使其发挥功效，这样我们就不用再去寻找地底煤炭中所贮藏的太阳热量了。他们将试验通过微生物的培植来灌溉土地——这种合理的想法，刚刚才被构想出来，它使我们能够给土壤增加一些为根系生长提供必要养料、分解与同化土壤成分的微小生物。

They will experiment. …But let us stop here, or we shall enter into the realm of fancy. Let us remain in the reality of acquired facts. With the processes of culture in use, applied on a large scale, and already victoriou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industrial competition, we can give ourselves ease and luxury in return for agreeable work. The near future will show what is practical in the processes that recent scientific discoveries give us a glimpse of. Let us limit ourselves at present to opening up the new path that consists in the study of the needs of man, and the means of satisfying them.

他们还将做许多许多试验。……但我们就此打住，否则便要进入空想了。让我们停留在已有的事实中。运用已经大规模使用并且在与工业的竞争中获胜的农耕方法，我们便能在令人愉悦的劳动中觉得轻松和享受。不久的将来会表明最近各种科学发现让我们看到的那些实用的耕作方法。我们现在还是只将自己致力于开辟探索人类需求及满

足途径的新道路吧。

The only thing that may be wanting to the Revolution is the boldness of initiative.

革命有时唯一缺乏的就是大无畏的首创精神。

With our minds already narrowed in our youth and enslaved by the past in our mature age, we hardly dare to think. If a new idea is mentioned—before venturing on an opinion of our own, we consult musty books a hundred years old, to know what ancient masters thought on the subject.

因为我们的思维在年轻时就已变得狭隘，在我们成年时又被过去的历史所束缚，所以我们几乎不敢去思考。如果一个新观点被提来的时候——我们还没鼓起勇气去探寻自己的观点，就去向那些有着百年历史的发了霉的书本请教，去了解古代贤哲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想的。

It is not food that will fail, if boldness of thought and initiative are not wanting to the revolution.

如果革命不缺乏思想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话，那么革命绝不会因为食物而失败。

Of all the great day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most beautiful, the greatest, was the one on which delegates who had come from all parts of France to Paris, worked all with the spade to plane the ground of the Champ de Mars, preparing it for the Feast of the Federation.

在法国大革命的那些辉煌岁月里，最美丽、最伟大的日子就是来自法国各地聚集到巴黎的那些代表，全都拿着铁锹铲平大校场的土地为联合大祭日做准备的那一天。

That day France was united: animated by the new spirit, she had a vision of the future in the working in common of the soil.

那一天法国是团结一致的：被这种新的精神所鼓舞，法国在共同的劳动中看到了未来。

And it will again be by the working in common of the soil that the enfranchised societies will find their unity and will obliterate the hatred and oppression which has hitherto divided them.

仍然是通过对土地的共同劳作，解放了的社会各界将发现他们的一致所在，并将消除一直以来令他们分裂的仇恨和压迫。

Henceforth, able to conceive solidarity—that immense power which increases man's energy and creative forces a hundredfold—the new society will march to the conquest of the future with all the

vigour of youth.

今后，若新社会能够做到团结一致——这一能够百倍提高人类活力和创造力的无限力量——那么这一新社会将以年轻人的全部活力阔步向前去征服未来。

Ceasing to produce for unknown buyers, and looking in its midst for needs and tastes to be satisfied, society will liberally assure the life and ease of each of its members, as well as that moral satisfaction which work give when freely chosen and freely accomplished, and the joy of living without encroaching on the life of others.

不再为那些陌生的买主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去发现那些需要得到满足的需求和品位，这样社会将公平地确保每个成员的生活和安逸，并确保自由选择以及自由完成工作时人们从中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确保不必侵犯他人的生活便能获得的生活的快乐。

Inspired by a new daring—born of the feeling of solidarity—all will march together to the conquest of the high joys of knowledge and artistic creation.

在一种新的胆识的激发之下——这种胆识源自团结的感觉——所有人都将共同阔步前进，直到获得知识与艺术创造带来的无限的愉悦。

A society thus inspired will fear neither dissensions within nor enemies without. To the coalitions of the past it will oppose a new harmony, the initiative of each and all, the daring which springs from the awakening of a people's genius.

受到如此鼓舞的社会既不会害怕内部的纷争，也不会害怕外部的敌人。与旧势力的结合体相对抗的将是一种新的和谐，是每一员和全体的主动性，是由民众才智的觉醒而产生的勇敢。

Before such an irresistible force “conspiring kings” will be powerless. Nothing will remain for them but to bow before it, and to harness themselves to the chariot of humanity, rolling towards new horizons opened up by the Social Revolution.

在这一势不可挡的力量面前，那些“密谋的君主”将无能为力。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向这一力量俯首，套上人类的战车，滚滚驶向由社会革命所开辟的新的地平线。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民主与教育（上）

John Dewey

约翰·杜威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民主与教育（上）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I

约翰·杜威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REFACE 前言
- Chapter 1 Education as A Necessity of Life 第一章　教育乃生存之本
- Chapter 2 Education as a Social Function 第二章　社会职能下的教育
- Chapter 3 Education as Direction 第三章　教育是一种指示
- Chapter 4 Education as Growth 第四章　教育即成长
- Chapter 5 Preparation, Unfolding, And Formal Discipline 第五章　准备，展开和形式训练
- Chapter 6 Education as Conservative and Progressive 第六章　保守的教育与进步的教育
- Chapter 7 The Democratic Conception in Education 第七章　教育中的民主观念
- Chapter 8 Aims In Education 第八章　教育的目标
- Chapter 9 Natur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Efficiency as Aims 第九章　把自然发展和社会效率作为教育目标
- Chapter 10 Interest and Discipline 第十章　兴趣与训练
- Chapter 11 Experience and Thinking 第十一章　经验与思维
- Chapter 12 Thinking in Education 第十二章　教育中的思维
- Chapter 13 The Nature of Method 第十三章　方法的性质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REFACE

前言

The following pages embody an endeavor to detect and state the ideas implied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and to apply these ideas to the problems of the enterprise of education. The discussion includes an indication of the constructive aims and methods of public education as seen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and a critical estimate of the theories of knowing and moral development which were formulated in earlier social conditions, but which still operate, in societies nominally democratic, to hamper the adequate realization of the democratic ideal. As will appear from the book itself, the philosophy stated in this book connects the growth of democrac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in the sciences, evolutionary ideas in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the industrial reorganization, and is concerned to point out the changes in subject matter and method of education indicated by these developments.

本书主要内容是：寻找并说明民主社会内涵的概念，以及就这些概念来剖析教育事业所面临的难题。讨论的内容包括：关于公共教育的建设性目标和方法的意见，还有对一些求知与道德发展的理论提出批判。这些理论在之前的社会条件下就已经形成了，在今天却依然是名义上民主的社会在起作用，妨碍民主理念落实。在本书将要提出的思考模式中，民主兴起与科学实验的进步、生物学科的进化论思想、产业结构的重组都有关联。这种思考方向也将证明，随着教育题材上和方法上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变迁。

Hearty acknowledgments are due to Dr. Goodsell of Teachers College for criticisms; to Professor Kilpatrick of the same institution for criticisms, and for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order of topics, of which I have freely availed myself, and to Miss Elsie Ripley Clapp for many criticisms and suggestions. The two first named have also been kind enough to read the proofsheets. I am also greatly indebted to a long line of students whose successive classes span more years than I care to enumerate.

在此，我要由衷地感谢教师学院的谷塞尔博士所给予的批评，还有他的同事吉尔派特里克教授的批评和对于本书题目顺序的宝贵意见，我已不客气地采纳；要感谢的还有克莱普小姐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前两位帮忙校稿我在此一并致以我衷心的谢意。还有，我十分感谢我历届的学生们，由于人数众多，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J. D.

约翰•杜威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August, 1915.

1915年8月

Chapter 1 Education as A Necessity of Life

第一章　教育乃生存之本

1．Renewal of Life by Transmission.

一、生命在传承中再生

The most notable distinction between living and inanimate beings is that the former maintain themselves by renewal. A stone when struck resists. If its resistance is greater than the force of the blow struck, it remains outwardly unchanged. Otherwise, it is shattered into smaller bits. Never does the stone attempt to react in such a way that it may maintain itself against the blow, much less so as to render the blow a contributing factor to its own continued action. While the living thing may easily be crushed by superior force, it none the less tries to turn the energies which act upon it into means of its own further existence. If it cannot do so, it does not just split into smaller pieces (at least in the higher forms of life), but loses its identity as a living thing.

生命体和无生命体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能通过再生保存自我。石头受打击时会产生抵抗力。如其抵抗力大于打击力，则外表保持不变，否则，就会被砸成碎片。石头既不指望在遭受打击时免受损害，更谈不上将打击力转变为自我延续的动力。尽管生命面临优势力量时会不堪一击，它却能设法将其转化成自我延续的手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生命不仅会支离瓦解（至少高等生物是这样），而且会失去其

特性。

As long as it endures, it struggles to use surrounding energies in its own behalf. It uses light, air, moisture, and the material of soil. To say that it uses them is to say that it turns them into means of its own conservation. As long as it is growing, the energy it expends in thus turning the environment to account is more than compensated for by the return it gets: it grows. Understanding the word 'control' in this sense, it may be said that a living being is one that subjugates and controls for its own continued activity the energies that would otherwise use it up. Life is a self-renewing process through action upon the environment.

只要还活着，生命就会竭力利用周围的能量，包括光、空气、水分以及土壤所含的物质，把这些能量变为保存自己的手段。只要生命还在生长，其利用环境时所耗费的能量就会得到更多的弥补，得大于失：它成长着。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支配”一词，可以说生命是为了生存而去征服和支配终究会消耗殆尽的能源的。生命其实就是以行动来改变环境而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

In all the higher forms this process cannot be kept up indefinitely. After a while they succumb; they die. The creature is not equal to the task of indefinite self-renewal. But continuity of the life process is not dependent upon the prolong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any one individual. Reproduction of other forms of life goes on in continuous sequence. And though, as the geological record shows, not merely individuals but also species die out, the life process continues in increasingly complex forms. As some species die out, forms better adapted to utilize the obstacles against which they

struggled in vain come into being. Continuity of life means continual readap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o the needs of living organisms.

在高等生物身上，这个过程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一段时间之后，它们就要屈服，就要死亡。生物不可能无限期自我更新。但是，生命的延续并不依靠个体延长生存时间，生命其他形式的繁殖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虽然地质学的记录表明，不仅个体会死亡，物种也会灭绝，但生命却以更加复杂的形式得以延续。随着一批物种的灭绝，就会诞生另一批更能适应环境的物种，并能将曾经与之对抗的困难因素变为有利条件。生命的延续意味着环境产生了变化以不断适应生命有机体的需求。

We have been speaking of life in its lowest terms—as a physical thing. But we use the word 'life' to denote the whole range of experience, individual and racial. When we see a book called *the Life of Lincoln* we do not expect to find within its covers a treatise on physiology. We look for an account of social antecedents; a description of early surroundings, of the conditions and occupation of the family; of the chief episod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of signal struggl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individual's hopes, tastes, joys and sufferings. In precisely similar fashion we speak of the life of a savage tribe, of the Athenian people, of the American nation. “Life” covers customs, institutions, beliefs, victories and defeats, recreations and occupations.

我们一直以最谦卑的措辞来讲述生命，视之为物质。但是我们却用“生活”一词来表示个体和种族的全部经验。我们看到一本题为《林肯传记》的书时，我们并不期待读到一部生理学专著，而是期待读到

有关社会背景、早期生活环境、家庭条件和职业、人物性格发展的主要阶段、非凡奋斗史和成就以及个人愿望、爱好、快乐和痛苦经历的描写。我们以极为相似的方式讲述原始部落的生活，雅典人的生活以及美国人的生活。“生活”涵盖了习俗、制度、信仰、成功与失败、娱乐和工作。

We employ the word 'experience' in the same pregnant sense. And to it, as well as to life in the bare physiological sense, the principle of continuity through renewal applies. With the renewal of physical existence goes, in the case of human beings, the re-creation of beliefs, ideals, hopes, happiness, misery, and practices. The continuity of any experience, through renewing of the social group, is a literal fact. Education, in its broadest sense, is the means of this social continuity of life. Every one of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a social group, in a modern city as in a savage tribe, is born immature, helpless, without language, beliefs, ideas, or social standards. Each individual, each unit who is the carrier of the life-experience of his group, in time passes away. Yet the life of the group goes on.

我们赋予“经验”一词同样丰富的含义。通过更新而延续的原理适用于纯粹生理意义上的生命，也适用于经验。通过更新社会群体延续经验是不争的事实。就人类来说，随着物质生存条件的改变，我们的信仰、理想、希望、幸福、痛苦和习惯做法也会随之改变。就广义而言，教育就是使生命在社会得以延续的手段。无论是在现代都市，还是在原始部落，其社会群体的每一成员与生俱来就是幼稚无助的。他们没有语言、没有信仰、也缺乏见解和社会准则。每一位承载着其群体生活经历的个体，总有一天会死亡。但群体的生命却会得以延续。

The primary ineluctable facts of the birth and death of each one of the constituent members in a social group determine the necessity of education. On one hand, there is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immaturity of the new-born members of the group—its future sole representatives—and the maturity of the adult members who possess the knowledge and customs of the group.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the necessity that these immature members be not merely physically preserved in adequate numbers, but that they be initiated into the interests, purposes, information, skill, and practices of the mature members: otherwise the group will cease its characteristic life. Even in a savage tribe, the achievements of adults are far beyond what the immature members would be capable of if left to themselves. With the growth of civilization, the gap between the original capacities of the immature and the standards and customs of the elders increases. Mere physical growing up, mere mastery of the bare necessities of subsistence will not suffice to reproduce the life of the group. Deliberate effort and the taking of thoughtful pains are required. Beings who are born not only unaware of, but quite indifferent to, the aims and habits of the social group have to be rendered cognizant of them and actively interested.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alone, spans the gap.

社群里的每个成员注定会经历生与死，这个事实决定了教育的必要性。一方面，新生成员——唯一能够代表未来的群体——的幼稚和掌握群体知识并形成习惯行为的成年成员之间存在差异。另一方面，这些未成年的成员不仅必须要保证足够的数量，而且还要了解成年成员的兴趣、目的、信息、知识、技能和实践活动，否则群体就会丧失其特性。即使是在原始部落，成年人也能取得远大于未成年成员凭借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成就。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未成年人与生俱来的接受能力和成年人的行为准则和习惯之间的差距扩大，仅仅是个体上的发育，或者仅仅掌握生活必需品是不足以传承群体生活的。还

需要周密的安排和精心的计划。人类生来就不会认识到也不会去关注社会群体的生活目标和行为习惯，我们必须培养他们在这方面的意识并使之对此产生兴趣。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填补这个差距。

Society exists through a process of transmission quite as much as biological life. This transmission occurs by means of communication of habits of doing, thinking, and feeling from the older to the younger. Without this communication of ideals, hopes, expectations, standards, opinions, from those members of society who are passing out of the group life to those who are coming into it, social life could not survive. If the members who compose a society lived on continuously, they might educate the new-born members, but it would be a task directed by personal interest rather than social need. Now it is a work of necessity.

社会凭借传播而存在，这一点和生物的生存方式极为相似。这种传播是通过年长者和年轻人之间行为、思维和情感之间的交流来实现的。人类社会每天都有人与世长辞，也有新生儿降临人间，如果人类不交流彼此的理想、希望、期待、标准和见解，人类社会就不能延续。从前，如果人类某一群体想要繁衍生存，就需要教育其新生成员，但实施这项任务往往是出于个人兴趣而并非社会需要。现在，教育已成为一种必须。

If a plague carried off the members of a society all at onc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group would be permanently done for. Yet the death of each of its constituent members is as certain as if an epidemic took them all at once. But the graded difference in age, the fact that some are born as some die, makes possible through transmission of ideas and practices the constant reweaving of the

social fabric. Yet this renewal is not automatic. Unless pains are taken to see that genuine and thorough transmission takes place, the most civilized group will relapse into barbarism and then into savagery. In fact, the human young are so immature that if they were left to themselves without the guidance and succor of others, they could not even acquire the rudimentary abilities necessary for physical existence. The young of human beings compare so poorly in original efficiency with the young of many of the lower animals, that even the powers needed for physical sustentation have to be acquired under tuition. How much more, then, is this the case with respect to all the technological, artistic, scientific, and moral achievements of humanity!

如果一场瘟疫一次性夺去了所有社会成员的生命，那么这个族群必然会永远消失。每个成员都难逃一死，这正如瘟疫会立刻夺走所有人的生命一样。但是人的年龄各不相同，有生有死，这个事实使得社会组织通过思想和实践活动的传承而不断更新交替。可是这种更新交替不是自发进行的。只有竭力做到真正彻底的传承，文明程度最高的人类才能避免退化到野蛮状态，回归原始状态。事实上，早期的人类十分幼稚，如果对他们不闻不问，不加指导和帮助，他们甚至连维持生存的基本能力都学不会。人类幼年时期的学习效率远不及低等动物的幼崽，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技巧也要在旁人的教导下才能学会。有鉴于此，人类如果想在技术、艺术、科学和道德方面取得成就，就更离不开教育了！

2．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二、教育和交流

So obvious, indeed, is the necessi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a society that we may seem to be dwelling unduly on a truism. But justification is found in the fact that such emphasis is a means of getting us away from an unduly scholastic and formal notion of education. Schools are, indeed, one important method of the transmission which forms the dispositions of the immature; but it is only one means, and, compared with other agencies, a relatively superficial means. Only as we have grasped the necessity of more fundamental and persistent modes of tuition can we make sure of placing the scholastic methods in their true context.

社会要继续存在就需要聆听别人的教导和加强自身学习，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为了摆脱过分学究气和正规的教育观念，我们似乎对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着力过多。学校教育的确是传承文明、塑造未成年人性格的重要手段，但与其他教育渠道相比，它只能是一种相对肤浅的教育手段。只有意识到更为基本，更为持久的教育方法的必要性时，我们才能把学校教育摆在适当的位置上。

Society not only continues to exist by transmission, by communication, but it may fairly be said to exist in transmission, in communication. There is more than a verbal tie between the words common, community, and communication. Men live in a community in virtue of the things which they have in common; and communication is the way in which they come to possess things in common. What they must have in common in order to form a community or society are aims, beliefs, aspirations, knowledge—a common understanding—like-mindedness as the sociologists say. Such things cannot be passed physically from one to another, like bricks; they cannot be shared as persons would share a pie by

dividing it into physical pieces. The communication which insures participation in a common understanding is one which secures similar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dispositions—like ways of responding to expectations and requirements.

我们不仅可以说，社会通过传承和交流得以延续，我们还甚至可以说，社会是在传承和交流的过程中生存发展的。在共同、共同体和交流三者之间不只是有字面上的关联。人们因彼此间的共同之处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交流是他们产生并拥有共同点的方式。为了形成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必须有共同的人生目的、信仰、期望、知识——有共同的了解——即社会学家所说的志趣相投。这些共享的东西不是砖块，能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也不是一块馅饼，能被切成小块，与人分享。交流能保证人们都加入到寻求共识的活动中来，可以产生共同的情感和思维倾向——正如人们都所期待和需要的那样。

Persons do not become a society by living in physical proximity, any more than a man ceases to be socially influenced by being so many feet or miles removed from others. A book or a letter may institute a more intimate associ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separated thousands of miles from each other than exists between dwellers under the same roof. Individuals do not even compose a social group because they all work for a common end. The parts of a machine work with a maximum of cooperativeness for a common result, but they do not form a community. If, however, they were all cognizant of the common end and all interested in it so that they regulated their specific activity in view of it, then they would form a community. But this would involve communication. Each would have to know what the other was about and would have to have some way of keeping the other informed as to his own purpose and progress. Consensus demands communication.

正如人不会因为相距遥远就可以免受社会影响，邻近而居的人也并非能组成一个社群。有时候，书信可以使相隔千里的人建立起比同住一屋檐下的人更为紧密的联系。有时候，即使是为一个共同目标而一起工作的人也不会构成一个社会群体。一部机器的各个零件，为了一个共同的结果最大限度地相互合作，但是并不能形成一个共同体。但是，如果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个共同结果的重要性，并且为之调节各自的活动，这样他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共同体。但是这将牵涉到交流。每个人必须了解别人在干什么，而且必须有办法使别人知道自己的目的和进展情况。意见的统一需要彼此交流。

We are thus compelled to recognize that within even the most social group there are many relations which are not as yet social. A large number of human relationships in any social group are still upon the machine-like plane. Individuals use one another so as to get desired results,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disposition and consent of those used. Such uses express physical superiority, or superiority of position, skill, technical ability, and command of tools, mechanical or fiscal. So far as the relations of parent and child, teacher and pupil, employer and employee, governor and governed, remain upon this level, they form no true social group, no matter how closely their respective activities touch one another. Giving and taking of orders modifies action and results, but does not of itself effect a sharing of purposes, a communication of interests.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在社会化程度最高的群体内部，也仍有许多关系没有实现社会化。在许多社会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都仍停留在机器般的冷漠层面。人们相互利用以得到预期的结果，却忽视了被利用者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也未征得他人同意。这种

相互利用体现了某一方物质上的优势，或者地位、手腕、技术能力和掌控机械手段或财政手段的优势。就亲子关系、师生关系、雇主和雇员的关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而言，他们也仍旧处于这个层面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社会群体，不管他们各自的活动之间有多么紧密的关联。发布和接受命令能够调整行为和结果，但是它本身并不能使人们分享目的，交流彼此的兴趣。

Not only is social life identical with communication, but all communication (and hence all genuine social life) is educative. To be a recipient of a communication is to have an enlarged and changed experience. One shares in what another has thought and felt and in so far, meagerly or amply, has his own attitude modified. Nor is the one who communicates left unaffected. Try the experiment of communicating, with fullness and accuracy, some experience to another, especially if it be somewhat complicated, and you will find your own attitude toward your experience changing; otherwise you resort to expletives and ejaculations. The experience has to be formulated in order to be communicated. To formulate requires getting outside of it, seeing it as another would see it, considering what points of contact it has with the life of another so that it may be got into such form that he can appreciate its meaning. Except in dealing with commonplaces and catch phrases one has to assimilate, imaginatively, something of another's experience in order to tell him intelligently of one's own experience. All communication is like art. It may fairly be said, therefore, that any social arrangement that remains vitally social, or vitally shared, is educative to those who participate in it. Only when it becomes cast in a mold and runs in a routine way does it lose its educative power.

不仅社会生活等同于交流，甚至一切交流（因而也就是所有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具有教育性。要成为交流对象，就得有丰富的经历，知晓变通。当与他人分享所想所感时，我们自己的态度或多或少也会有所改变。参与交流活动的人无不受到影响。比如，尝试一项实验，把某种经验完整无误地传达给另一个人，特别是一些稍显复杂的经验，你会发现对自己以前经验的态度也在变化；如果没有变化，你就会突然惊叫起来。要交流经验，必须形成经验；要形成经验，就要身处经验之外，以他者的身份来看待经验，使之和另一个人的生活联系起来，通过这种形式才能使他理解经验的意义。除了要对付老生常谈和流行语之外，必须富有想象力地吸收别人经验中的某些东西，以便把自己的经验巧妙地告诉别人。所有交流都是艺术。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只要能保持社交性或为大家所分享，任何社交活动对其参加者来说都是有教育意义的。只有当其成为浇筑模板，人们只能墨守成规时，它才会失去其教育权力。

In final account, then, not only does social life dem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its own permanence, but the very process of living together educates. It enlarges and enlightens experience; it stimulates and enriches imagination; it creates responsibility for accuracy and vividness of statement and thought. A man really living alone (alone mentally as well as physically) would have little or no occasion to reflect upon his past experience to extract its net meaning. The inequality of achievement between the mature and the immature not only necessitates teaching the young, but the necessity of this teaching gives an immense stimulus to reducing experience to that order and form which will render it most easily communicable and hence most usable.

最后，维持社会生活经久不衰不仅需要他人的教导和自我学习，而且共同生活过程本身也具有教育意义。这种共同生活可以增长我们

的经验，启发我们的思想，还可以刺激并丰富我们的想象，为我们提供准确的论述和清晰的思路。一个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完全独居的人，很少有机会反省其过去的生活，总结得失。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的成就差异不仅使年轻人的教育成为必须，而且这种教育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经验形成一定的次序和形式；使之易于传达而被广泛采用。

3．The Place of Formal Education.

三、正规教育的地位

There is, accordingly, a marke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ducation which every one gets from living with others, as long as he really lives instead of just continuing to subsist, and the deliberate educating of the young. In the former case the education is incidental; it is natural and important, but it is not the express reason of the association. While it may be said, without exaggeration, that the measure of the worth of any social institution, economic, domestic, political, legal, religious, is its effect in enlarging and improving experience; yet this effect is not a part of its original motive, which is limited and more immediately practical. Religious associations began, for example, in the desire to secure the favor of overruling powers and to ward off evil influences; family life in the desire to gratify appetites and secure family perpetuity; systematic labor, for the most part, because of enslavement to others, etc. Only gradually was the by-product of the institution, its effect upon the quality and extent of conscious life, noted, and only more gradually still was this effect considered as a directive factor in the conduct of the institution. Even today, in

our industrial life, apart from certain values of industriousness and thrift, the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reaction of the forms of human association under which the world's work is carried on receives little attention as compared with physical output.

因此，从和别人共同生活（只要是真正的生活而不是维持生存）中所得到的教育与有意识地教育年轻人，这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前一种教育是偶然的，自然发生的，虽然很重要，但并不是人们交往的确切理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衡量任何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家庭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宗教制度的价值在于它们在扩大和改进经验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其原始动机的一部分，因为原始动机是有限的，而且能直接应用到实践中去。例如，与宗教联姻始于能够赢得统治阶层的恩赐，消除邪恶的影响；家庭生活始于能够满足各种欲望，使家族持久延续；系统化的劳作主要为了奴役别人等等。制度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负面影响只是慢慢地才受到关注，而把这种负面影响视为实施这种制度的指导性因素则更为缓慢。即便是现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除了一些勤奋和节俭的价值观以外，和实物产出相比，人类交往的各种形式中所体现出的理智和情感几乎得不到任何关注。

But in dealing with the young, the fact of association itself as an immediate human fact, gains in importance. While it is easy to ignore in our contact with them the effect of our acts upon their disposition, or to subordinate that educative effect to some external and tangible result, it is not so easy as in dealing with adults. The need of training is too evident; the pressure to accomplish a change in their attitude and habits is too urgent to leave these consequences wholly out of account. Since our chief business with them is to enable them to share in a common life we cannot help considering whether or no we are forming the powers which will

secure this ability. If humanity has made some headway in realizing that the ultimate value of every institution is its distinctively human effect—its effect upon conscious experience—we may well believe that this lesson has been learned largely through dealings with the young.

对于年轻人而言，人际关系本身就是人类现实的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和年轻人交往并不像和成年人交往那么简单，我们往往容易忽略自己的行为对他们性格的影响，或者把这种教育性影响归因于某种外在有形的因素。我们必须对之进行训练，改变其态度和习惯。面临这一紧迫的任务，我们完全无法预料之后的结果。既然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使年轻人参与社会生活，我们不免要担心我们能否获得保护这种能力的力量。如果我们已经得到启示，认识到各种制度的最终价值在于其对人类的特殊影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与年轻人交往的成果。

We are thus led to distinguish, within the broad educational process which we have been so far considering, a more formal kind of education—that of direct tuition or schooling. In undeveloped social groups, we find very little formal teaching and training. Savage groups mainly rely for instilling needed dispositions into the young upon the same sort of association which keeps adults loyal to their group. They have no special devices, material, or institutions for teaching save in connection with initiation ceremonies by which the youth are inducted into full social membership. For the most part, they depend upon children learning the customs of the adults, acquiring their emotional set and stock of ideas, by sharing in what the elders are doing. In part, this sharing is direct, taking part in the occupations of adults and thus serving an apprenticeship; in part, it is indirect, through the dramatic plays in which children reproduce

the actions of grown-ups and thus learn to know what they are like. To savages it would seem preposterous to seek out a place where nothing but learning was going on in order that one might learn.

因此，我们可以从上述广泛意义上的教育过程中区分出一种比较正规的教育，即直接教学或学校教育。在尚未开化的社会群体中，往往缺少正规的教学和训练。为了把必要的技能灌输给年轻一代，野蛮部落采取的方法与其把成年人维持在群体内的方法完全相同。除了举行成年仪式使年轻人成为其社会成员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的教育手段、教学题材或制度。他们主要通过让儿童学习成年人的风俗习惯，获得成年人的情感倾向和思想观念。其中一部分人是直接参与成年人的各种职业活动，当他们的学徒；另一部分是通过演戏，让儿童模仿成年人的行为，从而间接了解自己的个性。对野蛮人来说，要找到一个专供学习的地方，除学习以外别无他事，这是十分荒谬的事。

But as civilization advances, the gap between the capacities of the young and the concerns of adults widens. Learning by direct sharing in the pursuits of grown-ups becomes increasingly difficult except in the case of the less advanced occupations. Much of what adults do is so remote in space and in meaning that playful imitation is less and less adequate to reproduce its spirit. Ability to share effectively in adult activities thus depends upon a prior training given with this end in view. Intentional agencies—schools—and explicit material—studies—are devised. The task of teaching certain things is delegated to a special group of persons.

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年轻人的能力和成年人所关心的事情之间差距扩大。除了比较低等的职业以外，通过直接参与成年人的工作来学习知识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很多情况下，成年人所做的事情在空

间和意义上很难捉摸，因此游戏性质的模仿越来越不足以再现其精髓。有效参与成年人活动的能力依靠的是以此为目标的事先训练。因此，人们设计出教育机构和学校、详尽的教学题材和课程。一群专业教学人员被委以传授知识的重任。

Without such formal education, it is not possible to transmit all the resources and achievements of a complex society. It also opens a way to a kind of experience which would not be accessible to the young, if they were left to pick up their training in informal association with others, since books and the symbols of knowledge are mastered.

没有这种正规教育，就不可能把人类复杂社会的所有资源和成就传承下去。正规教育同样为年轻人获得本来难以企及的知识开辟了新道路，如果仍由他们在与别人的非正式交往中获得教育，也就是从书本中和那些象征着知识的事物中学习，他们则无法得到这种经验。

But there are conspicuous dangers attendant upon the transition from indirect to formal education. Sharing in actual pursuit, whether directly or vicariously in play, is at least personal and vital. These qualities compensate, in some measure, for the narrowness of available opportunities. Formal instruction, on the contrary, easily becomes remote and dead—abstract and bookish, to use the ordinary words of depreciation. What accumulated knowledge exists in low grade societies is at least put into practice; it is transmuted into character; it exists with the depth of meaning that attaches to its coming within urgent daily interests.

但是从间接教育到正规教育的转变中存有明显的风险。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参与游戏，抑或参与实际工作，至少要亲力亲为，而且这不可或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优点可以弥补无法参与实际工作的缺憾。与此相反，正规教学容易使教育变得晦涩，呆板——换成常用的贬义词就是，变得抽象，学究气重。初级社会所积累的知识至少是能够付诸实践并且有品性。由于它包含在日常事物之中，因而具有深刻的意义。

But in an advanced culture much which has to be learned is stored in symbols. It is far from translation into familiar acts and objects. Such material is relatively technical and superficial. Taking the ordinary standard of reality as a measure, it is artificial. For this measure is connection with practical concerns. Such material exists in a world by itself, unassimilated to ordinary customs of thought and expression. There is the standing danger that the material of formal instruction will be merely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schools, isolated from the subject matter of life-experience. The permanent social interests are likely to be lost from view. Those which have not been carried over into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life, but which remain largely matters of technical information expressed in symbols, are made conspicuous in schools. Thus we reach the ordinary notion of education: the notion which ignores its social necessity and its identity with all human association that affects conscious life, and which identifies it with imparting information about remote matters and the conveying of learning through verbal signs: the acquisition of literacy.

但是在先进的文明社会，很多必须学习的知识都储存在符号里。它们还远没有变成人们熟知的行为和认知对象。这种符号是相对比较专业和肤浅的。用通常的现实标准来衡量，这种符号是人造的，因为

该标准的制定源于对现实的考量。此类符号独立存在，没有受到日常思想和表达习惯的影响。还有一种长期存在的危险：正规教育的内容仅仅是与生活经验脱节的学校教学题材，长远的社会利益很可能被忽视。受到学校重视的大部分是尚未融入社会生活体系、仍用符号记录的专业知识。因此，我们通常有这样的教育概念：这种概念忽视教育的社会必要性，不顾教育对人类交往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影响，把教育等同于传授有关遥远事物的知识以及通过语言符号传递来获取知识。

Hence one of the weightiest problems with which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has to cope is the method of keeping a proper balance between the informal and the formal, the incidental and the intentional, modes of education. When the acquiring of information and of technical intellectual skill do not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of a social disposition, ordinary vital experience fails to gain in meaning, while schooling, in so far, creates only 'sharps' in learning—that is, egoistic specialists. To avoid a split between what men consciously know because they are aware of having learned it by a specific job of learning, and what they unconsciously know because they have absorbed it in the formation of their characters by intercourse with others, becomes an increasingly delicate task with every development of special schooling.

因此，教育学必须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要在非正规和正规、偶然的和有意的教育方式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如果所获得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不能影响社会特性的形成，日常重要的经验没有意义，那么学校教育就只能培养出学习上的“骗子”——自私自利的专家。一种是人们自觉学到的知识，这是在特定的学习任务中学会的；另一种是无意间地学得的知识。在与别人的交往中，人们吸取他人的知识，形成自己的特性。如何避免在这两种知识之间产生割裂已成为发展特殊教育的难题。

Summary.

总结

It is the very nature of life to strive to continue in being. Since this continuance can be secured only by constant renewals, life is a self-renewing process. What nutrition and reproduction are to physiological life, education is to social life. This education consists primarily in transmission through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is a process of sharing experience till it becomes a common possession. It modifies the disposition of both the parties who partake in it. That the ulterior significance of every mode of human association lies in the contribution which it mak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experience is a fact most easily recognized in dealing with the immature. That is to say, while every social arrangement is educative in effect, the educative effect first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urpose of the associ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ssociation of the older with the younger. As societies become more complex in structure and resources, the need of formal or intention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creases. As formal teaching and training grow in extent, there is the danger of creating an undesirable split between the experience gained in more direct associations and what is acquired in school. This danger was never greater than at the present time, on account of the rapid growth in the last few centuries of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modes of skill.

生活的本质就是要努力使自己生存下去。因为生命的延续只有通过持久不断更新才能实现，所以生命是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教育和

社会生活的关系，正如生理生活中营养和繁殖的关系一样。这种教育首先是在交际活动进行传递的。在为大众接受之后，交际活动成为一个分享经验的过程。它能够改变交际双方的特性。每一种社交方式的长远意义在于它对提高生活质量所能做出的贡献。这最直接体现在与未成年人之间的交往中。换言之，虽然每一种社交安排都具有实际的教育意义，但是教育的成效首先会成为年轻人和成年人交流目的的重要部分。随着社会结构和资源越来越复杂，对正规的或有目的的教育和学习的需要也日益增加。随着正规教育和训练范围的扩大，在更为直接的交流中所获得的经验和在学校习得的经验之间产生了不合人意的分歧。由于几个世纪以来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迅猛发展，这种危机已十分严重。

Chapter 2 Education as a Social Function

第二章　社会职能下的教育

1．The Nature and Meaning of Environment.

一、环境的本质和意义

We have seen that a community or social group sustains itself through continuous self-renewal, and that this renewal takes place by means of the educational growth of the immature members of the group. By various agencies, unintentional and designed, a society transforms uninitiated and seemingly alien beings into robust trustees of its own resources and ideals. Education is thus a fostering, a nurturing, a cultivating, process. All of these words mean that it implies attention to the conditions of growth. We also speak of rearing, raising, bringing up—words which express the difference of level which education aims to cover. Etymologically, the word education means just a process of leading or bringing up. When we have the outcome of the process in mind, we speak of education as shaping, forming, molding activity—that is, a shaping into the standard form of social activity. In this chapter we are concerned with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the way in which a social group brings up its immature members into its own social form.

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团体或社会群体通过不断的自我更新维持生命，这种更新方式依靠的是在该群体中未成年人受教育程度的不断增

加来实现的。通过各种自然的或精心设计的手段，社会把蒙昧无知和看似不正常的人改造成为自己理想的资源和健全的托管者。因此，教育乃是一个抚养、培养和培育人才的过程。所有这些词都暗含了教育对成长环境的关注。我们也用养育、培养和培育等词来表明教育所要达到的不同水平。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教育一词恰好就是教养培育的过程。当考虑到过程完成后的结果时，我们可以把教育当作塑造、培养、模仿的活动——即塑造成符合社会活动的标准模式。我们在本章要研究社会把其未成熟的成员培养成符合社会活动的标准模式的一般特征。

Since what is required is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quality of experience till it partakes in the interests, purposes, and ideas current in the social group, the problem is evidently not one of mere physical forming. Things can be physically transported in space; they may be bodily conveyed. Beliefs and aspirations cannot be physically extracted and inserted. How then are they communicated? Given the impossibility of direct contagion or literal inculcation, our problem is to discover the method by which the young assimilate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old, or the older bring the young into like-mindedness with themselves.

既然需要改变的是经验特性，使之符合社会群体中广泛流行的兴趣、目的和观念，这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物质方面的问题。物质的东西可以在一定的空间内搬动、传递。信仰和抱负却不能像物质那样任意取出和插入。人们是怎样交流各自的信仰和抱负呢？因为它们不可能直接传播或灌输，所以我们要找到一种方法，让年轻人接受成年人的观点，让成年人和年轻人能够志气相投。

The answer, in general formulation, is: By means of the a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calling out certain responses. The required beliefs cannot be hammered in; the needed attitudes cannot be plastered on. But the particular medium in which an individual exists leads him to see and feel one thing rather than another; it leads him to have certain plans in order that he may act successfully with others; it strengthens some beliefs and weakens others as a condition of winning the approval of others. Thus it gradually produces in him a certain system of behavior, a certain disposition of action. The words 'environment,' 'medium' denote something more than surroundings which encompass an individual. They denote the specific continuity of the surroundings with his own active tendencies. An inanimate being is, of course, continuous with its surroundings; but the environing circumstances do not, save metaphorically, constitute an environment. For the inorganic being is not concerned in the influences which affect it. On the other hand, some things which are remote in space and time from a living creature, especially a human creature, may form his environment even more truly than some of the things close to him. The things with which a man varies are his genuine environment. Thus the activities of the astronomer vary with the stars at which he gazes or about which he calculates. Of his immediate surroundings, his telescope is most intimately his environment. The environment of an antiquarian, as an antiquarian, consists of the remote epoch of human life with which he is concerned, and the relics, inscriptions, etc. , by which he establishes connections with that period.

一般来说，答案就是：在环境的作用下引起某些反应。所需要的信仰不能硬灌进去；所需要的态度不能硬粘上去。但是，个人生存的特定生活条件将引导他看到和感受到某件特定的东西，而不是其他东西；引导他制订具体的计划，以便和别人完美配合；强化他的某些信仰而弱化另一些信仰作为赢得他人赞同的条件。于是，这会在他的身

上逐渐产生某种系统行为，即某种行为特性。“环境”、“生活条件”这些词不仅表示围绕个体周围的事物，还表示周围事物和个体自身行为趋势的特定连续性。当然，非生命体与其周围事物是有关联的；但是除非用比喻的说法，周围的条件并不构成环境。非生命体并不关心影响它的各种因素。另一方面，有些物体虽然在时空上与人类相隔甚远，却能比有些与之接近的东西更加真实地形成环境。人的行为活动会随着事物的不同而变化，这些事物便是他所处的真实环境。正如天文学家的活动会随着他所观测的星星而变化。在他直接接触的周围事物中，望远镜是与他关系最密切的环境。文物研究者所处的环境则包括他所研究的远古时代的人类生活以及和那个时代相关的文物遗产、铭刻碑文等。

In brief, the environment consists of those conditions that promote or hinder, stimulate or inhibit, the characteristic activities of a living being. Water is the environment of a fish because it is necessary to the fish's activities—to its life. The north pole is a significant element in the environment of an arctic explorer, whether he succeeds in reaching it or not, because it defines his activities, makes them what they distinctively are. Just because life signifies not bare passive existence (supposing there is such a thing), but a way of acting, environment or medium signifies what enters into this activity as a sustaining or frustrating condition.

总而言之，环境包括促进或阻碍、刺激或抑制生物的特征活动的各种条件。水是鱼的环境，因为水对鱼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不管北极探险家是否成功到达北极，北极都是他所处环境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北极确定了探险家的活动特征。正因为生命不仅仅意味着消极的存在（假如有这样的东西），生命还是一种行为方式，而环境或生活条件是维持或者阻挠这种行为方式的条件。

2．The Social Environment.

二、社会环境

A being whose activities are associated with others has a social environment. What he does and what he can do depend upon the expectations, demands, approvals, and condemnations of others. A being connected with other beings cannot perform his own activities without taking the activities of others into account. For they are the indispensable conditions of the realization of his tendencies. When he moves he stirs them and reciprocally. We might as well try to imagine a business man doing business, buying and selling, all by himself, as to conceive it possible to define the activities of an individual in terms of his isolated actions. The manufacturer moreover is as truly socially guided in his activities when he is laying plans in the privacy of his own counting house as when he is buying his raw material or selling his finished goods. Thinking and feeling that have to do with ac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others is as much a social mode of behavior as is the most overt cooperative or hostile act.

一个人的活动和他人的活动联系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环境。他所做的和所能做的事情都离不开他人的期望、需求、赞同和反对。一个和别人有联系的人，如果不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就无法完成他自己的活动。这些行为活动是促成他的各种行为倾向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他的活动可以引起别人的活动；别人活动也带动他的活动。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做生意的商人，自买自卖，用他孤立的商业活动来解释他的行为。此外，某制造商独自在会计室里为购买原料或出售成品而制定预算，这种行为活动同样受到真正社交活动的影响。和别人交流思想

和情感，公开合作或敌对，这些也同样是社会行为。

What we have more especially to indicate is how the social medium nurtures its immature members. There is no great difficulty in seeing how it shapes the external habits of action. Even dogs and horses have their actions modified by association with human beings; they form different habits because human beings are concerned with what they do. Human beings control animals by controlling the natural stimuli which influence them; by creating a certain environment in other words. Food, bits and bridles, noises, vehicles, are used to direct the ways in which the natural or instinctive responses of horses occur. By operating steadily to call out certain acts, habits are formed which function with the same uniformity as the original stimuli. If a rat is put in a maze and finds food only by making a given number of turns in a given sequence, his activity is gradually modified till he habitually takes that course rather than another when he is hungry.

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社会中介是如何培养未成年人的。要了解社会环境怎样塑造他们的外在行为习惯并不困难，即使是狗和马在与人产生联系时，也会改变其行为；它们也因为人的参与而养成不同的习惯。人通过刺激动物，即创造一定的环境来影响动物的行为习惯。食物、马嚼子、缰绳、噪音、车辆都能影响马的本能反应。通过持续的作用而引起的行为会逐渐形成某种习惯，这种习惯和原来的刺激具有相同的功能。如果把一只老鼠放在迷宫里，让它按照一定的顺序转几个弯才找到食物，那么它的活动会逐渐改变。当它饥饿时，就能习惯性地走这条路而不走另一条路。

Human actions are modified in a like fashion. A burnt child

dreads the fire; if a parent arranged conditions so that every time a child touched a certain toy he got burned, the child would learn to avoid that toy as automatically as he avoids touching fire. So far, however, we are dealing with what may be called training in distinction from educative teaching. The changes considered are in outer action rather than in mental and emotional dispositions of behavior. The distinction is not, however, a sharp one. The child might conceivably generate in time a violent antipathy, not only to that particular toy, but to the class of toys resembling it. The aversion might even persist after he had forgotten about the original burns; later on he might even invent some reason to account for his seemingly irrational antipathy. In some cases, altering the external habit of action by changing the environment to affect the stimuli to action will also alter the mental disposition concerned in the action. Yet this does not always happen; a person trained to dodge a threatening blow, dodges automatically with no corresponding thought or emotion. We have to find, then, some differentia of training from education.

人的行为也以同样的方式改变。被灼伤过的孩子会对火产生恐惧；如果父母提前做一些安排，让孩子每次接触到某一玩具就烫他一下，孩子就会自动地避开玩具就像他会避免触碰火苗一样。但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训练有别于具有教育性质的教学。我们考虑的是外在的行为变化，而不是行为心理和情感倾向的变化。不过，这两者的区别并不是非常明显。不难想象，这个孩子最后可能不仅对特定的玩具，而且对其他类似的玩具都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即使他已经忘却了原来的烧伤，这种抵触情绪依然还在；以后他甚至会制造一些理由来解释自己不合常理的抵触情绪。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改变环境条件对行为的刺激影响来改变外在的行为习惯，也可以改变与行为有关的心理倾向。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在接受了躲避危险攻击的训练之后，人会习惯性地自然避开，并不需要多加考虑。因此我们必须找

到训练和教育之间的某种区别。

A clew may be found in the fact that the horse does not really share in the social use to which his action is put. Some one else uses the horse to secure a result which is advantageous by making it advantageous to the horse to perform the act—he gets food, etc. But the horse, presumably, does not get any new interest. He remains interested in food, not in the service he is rendering. He is not a partner in a shared activity. Were he to become a copartner, he would, in engaging in the conjoint activity, have the same interest in its accomplishment which others have. He would share their ideas and emotions.

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发现这种区别：马虽然有自己的活动，但它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用途。有人会利用马做有益的事，然后给马一些好处，例如喂它食物。但是也许这匹马不会有任何新的兴趣。他仍然只对食物感兴趣，并不在意它所从事的劳动，他不是共同行动中的伙伴。假如他成了活动伙伴，那么在从事共同活动时，他会和别人一样，关心活动的成功完成，进而分享他们的思想和感情。

Now in many cases—too many cases—the activity of the immature human being is simply played upon to secure habits which are useful. He is trained like an animal rather than educated like a human being. His instincts remain attached to their original objects of pain or pleasure. But to get happiness or to avoid the pain of failure he has to act in a way agreeable to others. In other cases, he really shares or participates in the common activity. In this case, his original impulse is modified. He not merely acts in a way agreeing with the actions of others, but, in so acting, the same ideas

and emotions are aroused in him that animate the others. A tribe, let us say, is warlike. The successes for which it strives, the achievements upon which it sets store, are connected with fighting and victory. The presence of this medium incites bellicose exhibitions in a boy, first in games, then in fact when he is strong enough. As he fights he wins approval and advancement; as he refrains, he is disliked, ridiculed, shut out from favorable recognition.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his original belligerent tendencies and emotions are strengthened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and that his ideas turn to things connected with war. Only in this way can he become fully a recognized member of his group. Thus his mental habitudes are gradually assimilated to those of his group.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情况真是太多了），未成年人的活动只是被用于获得良好的习惯。年轻人像动物一样接受训练，而不像人那样接受教育。他的本能仍与给他带来最初的痛苦或快乐有关。为了得到快乐或避免失败的痛苦，他的行为必须得到他人的同意。在其他情况下，他能够真正分享或参与共同的活动。但现在，他必须控制他的原始冲动。他不仅必须以别人所能接受的方式行动，而且还要激发别人产生相同的思想和感情。譬如说有一个好战的部落追求成功，重视结果，这些与战斗和胜利都有关。这种环境条件让少年产生争强好胜的心理，首先表现在游戏中，当他足够强壮时，就会体现在实践中。当投身战斗时，他就能赢得赞许和升迁；反之，他就不会受到喜爱，甚至会被嘲笑，而且得不到认同。显然，他最初好斗的倾向和情感会得到强化，而其他倾向和感情则会受到抑制，他的思想会转向与战争有关的事物。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成为被群体认可的成员，让自己的心理习惯逐渐地融入群体的心理习惯。

If we formulate the principle involved in this illustration, we shall perceive that the social medium neither implants certain

desires and ideas directly, nor yet merely establishes certain purely muscular habits of action, like 'instinctively' winking or dodging a blow. Setting up conditions which stimulate certain visible and tangible ways of acting is the first step. Making the individual a sharer or partner in the associated activity so that he feels its success as his success, its failure as his failure, is the completing step. As soon as he is possessed by the emotional attitude of the group, he will be alert to recognize the special ends at which it aims and the means employed to secure success. His beliefs and ideas, in other words, will take a form similar to those of others in the group. He will also achieve pretty much the same stock of knowledge since that knowledge is an ingredient of his habitual pursuits.

如果把这个例子里包含的原理概括起来，我们发现社会环境既不能直接给人灌输某些需求和观念，也不仅仅只培养某些纯属生理本能的习惯动作，如“本能地”眨眼或躲避打击。第一步是设置一种情境，以便引发某些看得见和摸得着的行为方式。让个人为参与者或伙伴，参与到交际活动中，让他意识到交际活动的成功就是他自己的成功，交际活动的失败就是他自己的失败，这是对第一步的补充。一旦受到群体情感态度的支配，他就会留意要取得成功的方法，认清群体的行为目的。他也将获得同样丰富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是他习惯性工作的组成部分。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in gaining knowledge is doubtless the chief cause of the common notion that knowledge may be passed directly from one to another. It almost seems as if all we have to do to convey an idea into the mind of another is to convey a sound into his ear. Thus imparting knowledge gets assimilated to a purely physical process. But learning from language will be found, when analyzed, to confirm the principle just laid down. It would

probably be admitted with little hesitation that a child gets the idea of, say, a hat by using it as other persons do; by covering the head with it, giving it to others to wear, having it put on by others when going out, etc. But it may be asked how this principle of shared activity applies to getting through speech or reading the idea of, say, a Greek helmet, where no direct use of any kind enters in. What shared activity is there in learning from books about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语言对获取知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通常以为知识可以从一人直接传给另一人。看来，要想把一个想法传递给另一人就必须要把声音传进他的耳朵。因而传授知识的过程和纯粹意义上的物理传递过程相似。但是如果分析语言的学习过程，我们会发现它符合刚才所提出的原则。通过模仿别人使用帽子，比如把帽子戴在头上，把帽子给别人，出门时给别人戴帽子等等，孩子就可以形成帽子的概念，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可能有人会问，这个合作原则是怎样利用言语或阅读来了解例如希腊头盔等概念，现在这个原则还没有被直接使用。从书本上了解和发现美洲的历史，会有什么合作活动呢？

Since language tends to become the chief instrument of learning about many things, let us see how it works. The baby begins of course with mere sounds, noises, and tones having no meaning, expressing, that is, no idea. Sounds are just one kind of stimulus to direct response, some having a soothing effect, others tending to make one jump, and so on. The sound h-a-t would remain as meaningless as a sound in Choctaw, a seemingly inarticulate grunt, if it were not uttered in connection with an action which is participated in by a number of people. When the mother is taking the infant out of doors, she says 'hat' as she puts something on the baby's head. Being taken out becomes an interest

to the child; mother and child not only go out with each other physically, but both are concerned in the going out; they enjoy it in common. By conjunction with the other factors in activity the sound 'hat' soon gets the same meaning for the child that it has for the parent; it becomes a sign of the activity into which it enters. The bare fact that language consists of sounds which are mutually intelligible is enough of itself to show that its meaning depends upon connection with a shared experience.

既然语言是学习知识的重要工具，那么让我们看看语言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婴儿刚开始学说话时无法表达意义，只是一些不表达任何意义的清脆声音、杂音和音调。声音只是能够引起直接反应的一种刺激，有些声音能产生抚慰的效果，而另一些声音则使人惊讶。如果不和众人参与的行为活动联系起来，帽子的读音就会和含糊不清的呼噜声一样毫无意义。当母亲带着婴儿出门时，她把一件物品戴在婴儿头上的同时说“帽子”。孩子把外出当作一种兴趣；母亲和孩子不仅一同出门，而且两人都与外出有关；他们享受一同出行的乐趣。在与活动中其他因素的结合之后，“帽子”的读音很快会在孩子脑海中产生与母亲的所指物品相同的意义；“帽子”这个读音成为他所参与的活动的一个符号。语言由可以相互理解的声音构成，仅凭这一事实足以表明语言的意义在于它与共同经验的联系。

In short, the sound h-a-t gains meaning in precisely the same way that the thing 'hat' gains it, by being used in a given way. And they acquire the same meaning with the child which they have with the adult because they are used in a common experience by both. The guarantee for the same manner of use is found in the fact that the thing and the sound are first employed in a joint activity, as a means of setting up an a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ild and a grown-up. Similar ideas or meanings spring up because both

persons are engaged as partners in an action where what each does depends upon and influences what the other does. If two savages were engaged in a joint hunt for game, and a certain signal meant 'move to the right' to the one who uttered it, and 'move to the left' to the one who heard it, they obviously could not successfully carry on their hunt together. Understanding one another means that objects, including sounds, have the same value for both with respect to carrying on a common pursuit.

总之，“帽子”的读音和“帽子”这件物品以同样的方式获得各自的意义。帽子的读音和帽子这件物品，对孩子和成年人来说具有相同的意义，因为它们在共同的经历中得到使用。“帽子”这件物品和“帽子”的读音被同时使用，这确保了孩子和成年人之间能够建立起主动的联系。他们会产生相似的想法或理解，这是因为他们作为伙伴从事同一个活动，每个人所做的事都要依靠另一人所做的事并对之产生影响。譬如有两个野蛮人一起打猎，如果一个信号对发出信号的人来说，意思是“向右走”，而对收到信号的人来说，意思却是“向左走”，他们显然不能一同成功狩猎。相互了解意味着包括声音在内的事物对从事共同工作的人具有同样价值。

After sounds have got meaning through connection with other things employed in a joint undertaking, they can be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other like sounds to develop new meanings, precisely as the things for which they stand are combined. Thus the words in which a child learns about, say, the Greek helmet originally got a meaning (or were understood) by use in an action having a common interest and end. They now arouse a new meaning by inciting the one who hears or reads to rehearse imaginatively the activities in which the helmet has its use. For the time being, the one who understands the words 'Greek helmet'

becomes mentally a partner with those who used the helmet. He engages, through his imagination, in a shared activity. It is not easy to get the full meaning of words. Most persons probably stop with the idea that 'helmet' denotes a queer kind of headgear a people called the Greeks once wore. We conclude, accordingly, that the use of language to convey and acquire ideas is an extension and refinement of the principle that things gain meaning by being used in a shared experience or joint action; in no sense does it contravene that principle. When words do not enter as factors into a shared situation, either overtly or imaginatively, they operate as pure physical stimuli, not as having a meaning or intellectual value. They set activity running in a given groove, but there is no accompanying conscious purpose or meaning. Thus, for example, the plus sign may be a stimulus to perform the act of writing one number under another and adding the numbers, but the person forming the act will operate much as an automaton would unless he realizes the meaning of what he does.

在与合作中所使用的其他事物建立联系之后，声音就有了意义。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可以联合起来构成新事物，声音也可以和其他相似的声音结合在一起构成新的意义。孩子把学到的词，比如说希腊头盔，用于一次具有共同的兴趣和目的的活动中，这个词就有了自己的意义（或者被理解）。通过听读的刺激，运用想象力再现头盔的作用，就可以唤起新的意义。了解“希腊头盔”意义的人就成了头盔使用者的精神伙伴。他想象自己参与了一个合作活动，掌握这些词的全部意义并不容易。也许大多数人只知道“头盔”表示希腊人曾经戴过的一种奇怪的帽子。因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语言可以表达想法，形成观念；事物只有共同的经历或联合行动中使用才能获得意义，语言的使用能够扩大和完善这一原则，但决不违反这一原则。当词语成为共同情境中的一个因素时，它们只能用作纯粹的物理刺激，并不具有意义或思考价值。它们使活动正常进行，但并不带有意识作用或意义。例

如，加号可能激发人们的活动，进行加法运算。但是除非动作的实施者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否则他就像机器人一样，只能从事机械活动。

3．The Social Medium as Educative.

三、社会环境的教育性

Our net result thus far is that social environment forms the mental and emotional disposition of behavior in individuals by engaging them in activities that arouse and strengthen certain impulses, that have certain purposes and entail certain consequences. A child growing up in a family of musicians will inevitably have whatever capacities he has in music stimulated, and, relatively, stimulated more than other impulses which might have been awakened in another environment. Save as he takes an interest in music and gains a certain competency in it, he is 'out of it'; he is unable to share in the life of the group to which he belongs. Some kind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life of those with whom the individual is connected are inevitable; with respect to them, the social environment exercises an educative or formative influence unconsciously and apart from any set purpose.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通过不同的个体活动，社会环境能够塑造个人的思维和情感倾向。这些活动能唤醒并增强某些动力，而且都带有某种目的并承担某种后果。一个出生于音乐世家的孩子会被激发出音乐方面的所有潜能，而且相对来说，会比在另一环境中激发出更大的潜力。除非这个孩子对音乐感兴趣并有一定天分，否

则他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不能融入所从属的群体生活。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参与一些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的生活；社会环境无意识地并且是不带有任何既定目的地发挥着教育和塑造作用。

In savage and barbarian communities, such direct participation (constituting the indirect or incidental education of which we have spoken) furnishes almost the sole influence for rearing the young into the practices and beliefs of the group. Even in present-day societies, it furnishes the basic nurture of even the most insistently schooled youth. In accord with the interests and occupations of the group, certain things become objects of high esteem; others of aversion. Association does not create impulses of affection and dislike, but it furnishes the objects to which they attach themselves. The way our group or class does things tends to determine the proper objects of attention, and thus to prescribe the directions and limits of observation and memory. What is strange or foreign (that is to say outside the activities of the groups) tends to be morally forbidden and intellectually suspect. It seems almost incredible to us, for example, that things which we know very well could have escaped recognition in past ages. We incline to account for it by attributing congenital stupidity to our forerunners and by assuming superior native intelligence on our own part. But the explanation is that their modes of life did not call for attention to such facts, but held their minds riveted to other things. Just as the senses require sensible objects to stimulate them, so our powers of observation, recollection, and imagination do not work spontaneously, but are set in motion by the demands set up by current social occupations. The main texture of disposition is formed, independently of schooling, by such influences. What conscious, deliberate teaching can do is at most to free the capacities thus formed for fuller exercise, to purge them of some of their grossness, and to furnish

objects which make their activity more productive of meaning.

在未开化的原始社会，这种直接参与（即我们提到的间接或偶然的教育），几乎成为影响青年教育的唯一行为，让他们学习到社会群体里的习俗和信仰。甚至在当今社会，即使对于一直接受学校教育的青年，这种直接的参与也能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教育。根据社会群体的兴趣和职业，有一些事物享有很高的威望，而另外一些事物却遭到厌恶。合作并不能带来喜爱和厌恶的冲动，却可以提供他们依附的对象。一个群体或一个阶层的处事方法决定了应该注意哪些事物，从而确定了观察和记忆的方向和范围。凡是陌生或外来的东西（即在群体活动以外的东西）非但不能为道德所认可，还常常受到怀疑。例如我们熟知的东西，在过去的时代竟没有得到认可，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倾向于把这种情况归结为我们祖辈先天的愚蠢，同时假定我们自己是天赋异禀。但是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形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他们对这些事实的忽视，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东西上。正如感官需要受到可感知的东西的刺激一样，我们的观察力、记忆力和想象力并不会自动发挥作用，而是在当前社会职业的要求下启动的。我们性情的形成主要是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与学校教育无关。精心设计的教学方案能够尽可能多地释放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各种能力，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去粗取精，给青年提供一些事物，使他们的活动变得更丰富和更有意义。

While this “unconscious influence of the environment” is so subtle and pervasive that it affects every fiber of character and mind, it may be worth while to specify a few directions in which its effect is most marked. First, the habits of language. Fundamental modes of speech, the bulk of the vocabulary, are formed in the ordinary intercourse of life, carried on not as a set means of instruction but as a social necessity. The babe acquires, as we well say, the mother tongue. While speech habits thus contracted may be

corrected or even displaced by conscious teaching, yet, in times of excitement, intentionally acquired modes of speech often fall away, and individuals relapse into their really native tongue. Secondly, manners. Example is notoriously more potent than precept. Good manners come, as we say, from good breeding or rather are good breeding; and breeding is acquired by habitual action, in response to habitual stimuli, not by conveying information. Despite the never ending play of conscious correction and instruction, the surrounding atmosphere and spirit is in the end the chief agent in forming manners. And manners are but minor morals. Moreover in major morals, conscious instruction is likely to be efficacious only in the degree in which it falls in with the general “walk and conversation” of those who constitute the child's social environment. Thirdly, good taste an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If the eye is constantly greeted by harmonious objects, having elegance of form and color, a standard of taste naturally grows up. The effect of a tawdry, unarranged, and over-decorated environment works for the deterioration of taste, just as meager and barren surroundings starve out the desire for beauty. Against such odds, conscious teaching can hardly do more than convey second-hand information as to what others think. Such taste never becomes spontaneous and personally engrained, but remains a labored reminder of what those think to whom one has been taught to look up. To say that the deeper standards of judgments of value are framed by the situations into which a person habitually enters is not so much to mention a fourth point, as it is to point out a fusion of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We rarely recognize the extent in which our conscious estimates of what is worthwhile and what is not, are due to standards of which we are not conscious at all. But in general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things which we take for granted without inquiry or reflection are just the things which determine our conscious thinking and decide our conclusions. And these habitudes

which lie below the level of reflection are just those which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constant give and take of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虽然这种“潜意识的环境影响”不易察觉但又无处不在，影响着性格和心理的每个细微之处，但值得指出的是，它所能达到的效果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是最有价值的。第一，语言习惯。言语的基本模式，即大量的词汇，是在日常交际中形成的；生活中的交际不是作为既定的教导手段，而是出于社会需要。我们常说，婴儿掌握了母语。虽然以这样的方式养成的言语习惯可能会被纠正或者甚至被有计划的教学所取代，但是在人们激动的时候，他们专门学习的言语模式常常会消失，恢复自己真正的母语。第二，行为举止。榜样的作用远大于格言的力量。人们常说，礼貌的举止来自良好的教养，或者说礼貌的举止就是良好的教养；教养是通过对习惯性的刺激做出反应所养成的习惯性行为，而不是通过知识的传授。尽管有计划的纠正和教导在不停地发挥作用，但是周围的气氛和人们的情绪是形成良好举止的最终决定性力量。行为举止并不是主要的品德。在主要的品德方面，有计划的教导也许只有在符合儿童社会环境的一般言行标准时才会奏效。第三，高品味和美学底蕴。如果眼睛常常看到具有形体优美，色彩斑斓的事物，那么审美标准自然会有所提高。一个低劣粗俗、杂乱无章，装潢过度的环境会破坏美感，正如贫乏荒芜的环境会降低美的追求。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有计划的教导只不过是间接传达一些别人讲过的有关美感的老话罢了。传说中的美感决不会自己产生，也不会对人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它不过是用来提醒我们别人是怎么想的。个人习惯性地参与的情境构成了更深刻的价值判断标准；这不能作为第四点，因为这是上面提到的几点内容的结合。我们用有意识的估计去分辨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和什么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很少认识这种有意识的估计在多大程度上受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那些标准的影响。但是一般来说，恰恰是那些没有经过研究或思考就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明确了我们的思想意识，影响我们的结论。这些没有经过思考而养成的习惯正是来自于日常交际中的授受关系。

4．The School as a Special Environment.

四、学校是特殊的环境

The chief importance of this foregoing statement of the educative process which goes on willy-nilly is to lead us to note that the only way in which adults consciously control the kind of education which the immature get is by controlling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act, and hence think and feel. We never educate directly, but indirectly by means of the environment. Whether we permit chance environments to do the work, or whether we design environments for the purpose makes a great difference. And any environment is a chance environment so far as its educative influence is concerned unless it has been deliberately regulated with reference to its educative effect. An intelligent home differs from an unintelligent one chiefly in that the habits of life and intercourse which prevail are chosen, or at least colored, by the thought of their bearing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But schools remain, of course, the typical instance of environments framed with express reference to influencing the mental and moral disposition of their members.

对于以上那种无视人们的意愿而进行的教育过程的论述，其重要性在于，它指出了成年人有意识地指导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唯一方法就是管理他们的环境。让他们在这个环境中活动，思考和体验。我们从不进行直接教育，而是通过环境进行间接教育。我们是应该允许在偶然的环境下进行教育，还是应该为了教育的目的设计环境，这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就其教育影响而言，任何环境都是一种偶然的环境，

除非已经根据预期的教育成效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调节。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和程度低的家庭的主要区别在于家庭普遍的生活和交往习惯对儿童的思想发展是否有关，或者至少带有这种思想的色彩。但是学校一定是为培养其成员的智力和品德特性而塑造的环境典范。

Roughly speaking, they come into existence when social traditions are so complex that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social store is committed to writing and transmitted through written symbols. Written symbols are even more artificial or conventional than spoken; they cannot be picked up in accidental intercourse with others. In addition, the written form tends to select and record matters which are comparatively foreign to everyday life. The achievements accumula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re deposited in it even though some of them have fallen temporarily out of use. Consequently as soon as a community depends to any considerable extent upon what lies beyond its own territory and its own immediate generation, it must rely upon the set agency of schools to insure adequate transmission of all its resources. To take an obvious illustration: The life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our own, and yet the ways in which they affect us do not present themselves on the surface of our ordinary experiences. In similar fashion, peoples still existing, but remote in space, British, Germans, Italians, directly concern our own social affairs, but the nature of the interaction cannot be understood without explicit statement and attention. In precisely similar fashion, our daily associations cannot be trusted to make clear to the young the part played in our activities by remote physical energies, and by invisible structures. Hence a special mode of social intercourse is instituted, the school, to care for such matters.

大体上说，当社会传统变得很复杂，需要把绝大部分的社会经验用文字记载下来并以书面符号的形式加以传承时，学校教育便应运而生了。与口头符号相比，书面符号更属于人为的或传统产物；不可能在和别人偶然的交往中学会。另外，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的事物常常与日常生活不相干。书面文字储存的是人类社会逐代积累的成就，虽然有些已经暂不使用了。因而，一旦社会的持续需要扩展到其领域之外，牵涉到与其有直接关联之外的人，那么就必须依靠固定的学校机构来保证其所有资源的充分传递。举一个公认的例子：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生活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它们的影响并不体现在我们表面的日常经验。同样的，我们与远隔千山万水的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都有直接的社交往来，如果不加以明确的说明，我们就无法理解彼此合作的性质。同样，日常交际生活不足以向年轻人说明遥远的自然力量和肉眼看不见的物质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所以便成立了社交的特殊模式，即学校来处理这件事情。

This mode of association has three functions sufficiently specific, as compared with ordinary associations of life, to be noted. First, a complex civilization is too complex to be assimilated in toto. It has to be broken up into portions, as it were, and assimilated piecemeal, in a gradual and graded way. The relationships of our present social life are so numerous and so interwoven that a child placed in the most favorable position could not readily share in many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m. Not sharing in them, their meaning would not be communicated to him, would not become a part of his own mental disposition. There would be no seeing the trees because of the forest. Business, politics, art, science, religion, would make all at once a clamor for attention; confusion would be the outcome. The first office of his social organ we call the school is to provide a simplified environment. It selects the features which are fairly fundamental and capable of being responded to by the young. Then it establishes a progressive order, using the factors first

acquired as means of gaining insight into what is more complicated.

这种合作模式和日常生活交往相比较，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殊作用。第一，错综的文明复杂到不能被同化吸收。因此必须把它拆解，分层次地逐步吸收。目前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不计其数，相互交织在一起，即使处于最优位置的儿童，也不能很快分享其中很多最重要的部分。由于没有儿童的参与，它们的意义便不为儿童所理解，因而不会成为儿童心理特性的一部分。见林不见木。商业、政治、艺术、科学、宗教都曾盛极一时，吸引人们注意；到头来却是乱七八糟，无所适从。被我们称为学校的社会机构，其首要职责就在于提供一个简化的教育环境。选择对青少年有影响而且具有基本特征的教学内容。然后利用先行掌握的因素来学习比较复杂的因素，确立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

In the second place, it is the business of the school environment to eliminate, so far as possible, the unworthy features of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 from influence upon mental habitudes. It establishes a purified medium of action. Selection aims not only at simplifying but at weeding out what is undesirable. Every society gets encumbered with what is trivial, with dead wood from the past, and with what is positively perverse. The school has the duty of omitting such things from the environment which it supplies, and thereby doing what it can to counteract their influence in the ordinary social environment. By selecting the best for its exclusive use, it strives to reenforce the power of this best. As a society becomes more enlightened, it realizes that it is responsible not to transmit and conserve the whole of its existing achievements, but only such as make for a better future society. The school is its chief agenc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is end.

第二，学校环境的职责在于尽可能地消除现存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以免影响儿童的心理习惯。学校创立了一个纯净的活动环境。选择的目的不仅是要简化环境，而且要清除不良因素。一些无关紧要、被旧时遗弃以及极其荒谬的东西阻碍了每个社会进步。学校有责任清除环境所提供的不良因素，从而尽可能地抑制它们在普通社会环境中的影响。学校选择其中最优良的东西供自己专用并强化它们的力量。随着社会的进步，学校认识到其责任只是传承和保存有利于建设更美好的未来社会的部分，而不是社会中现存的全部成就。学校就是社会完成这项任务的主要机构。

In the third place, it is the office of the school environment to balance the various elements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o see to it that each individual gets an opportunity to escape from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ocial group in which he was born, and to come into living contact with a broader environment. Such words as 'society' and 'community' are likely to be misleading, for they have a tendency to make us think there is single thing corresponding to the single word. As a matter of fact, a modern society is many societies more or less loosely connected. Each household with its immediate extension of friends makes a society; the village or street group of playmates is a community; each business group, each club, is another. Passing beyond these more intimate groups, there is in a country like our own a variety of races, religious affiliations, economic divisions. Inside the modern city, in spite of its nominal political unity, there are probably more communities, more differing customs, traditions, aspirations, and forms of government or control, than existed in an entire continent at an earlier epoch.

第三，学校环境的职责在于协调社会环境中的各个部分，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摆脱其所属社会群体的限制，并在更广阔的环境建立起

灵活的人际关系。“社会”和“团体”这类词可能会令人产生误解，因为我们通常认为有一种单个物体符合这些名词。事实上，现代社会是许多组织松散的社团联合体，例如每个家庭和亲近的朋友都构成一个团体；乡村或街道上的一群游戏伙伴也是一个共同体；每个企业集团，每个俱乐部都是共同体。除了这些联系比较密切的群体，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就有各个种族、不同的宗教团体和不同的经济区域。尽管名义上是政治统一体，但比起过去现代都市里可能有更多的团体，有更多不同的风俗习惯、传统、追求和不同的政府或管理模式，比以前存在于整个大陆上的还多。

Each such group exercises a formative influence on the active dispositions of its members. A clique, a club, a gang, a Fagin's household of thieves, the prisoners in a jail, provide educative environments for those who enter into their collective or conjoint activities, as truly as a church, a labor union, a business partnership, or a political party. Each of them is a mode of associated or community life, quite as much as is a family, a town, or a state. There are also communities whose members have little or no direct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like the guild of artists,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the members of the professional learned class scattered over the face of the earth. For they have aims in common, and the activity of each member is directly modified by knowledge of what others are doing.

每一个这样的群体都有能够形成本群体成员积极的思维特性。如同教会、工会、商业团体或政党所具有的功能一样，任何派系、俱乐部、团伙、以教唆犯为首的盗窃集团、监狱里的犯人都在为那些参与群体或彼此合作的人提供教育的环境。如同家庭、城镇或国家一样，每个团体都是一种合作或社群生活的模式。还有许多团体内的成员互相之间很少或者没有直接的联系，如艺术家协会、文学界和分布在世

界各地的专业学术团体成员。因为有共同的目的，每个成员在了解其他成员的活动之后会直接改变自己的活动。

In the olden times, the diversity of groups was largely a geographical matter. There were many societies, but each, within its own territory, was comparatively homogeneous.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transportation, intercommunication, and emigration,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mposed of a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with different traditional customs. It is this situation which has, perhaps more than any other one cause, forced the demand for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which shall provide something like a homogeneous and balanced environment for the young.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centrifugal forces set up by juxtaposi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within one and the same political unit be counteracted. The intermingling in the school of youth of different races, differing religions, and unlike customs creates for all a new and broader environment. Common subject matter accustoms all to a unity of outlook upon a broader horizon than is visible to the members of any group while it is isolated. The assimilative force of the American public school is eloquent testimony to the efficacy of the common and balanced appeal.

从前，群体的多样性大体上是由于地理原因造成的。虽然社团很多，但是相对而言，每个社团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仍是相同的。但是随着商业、运输、交通事业的发展和移民数量的增加，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就是由具有各种传统习惯的群体联合组成。比起其他缘由，我们才更急需建立一个教育机构，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平等、和谐的环境。只有这样，同一社会里不同群体的结合所引起的离心力才能得到抑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和不同风俗习惯的青少年混合在同一所学校里，就能为大家创造一个更为广阔的新环境。相同的教学题材使彼

此习惯于接受统一的观点，这就可以比任何孤立群体的成员看到更为广阔的前景。美国公立学校的亲和力有力地证明了追求统一及和谐的功效。

The school has the function also of coordinating within the disposition of each individual the diverse influences of the various social environments into which he enters. One code prevails in the family; another, on the street; a third, in the workshop or store; a fourth, in the religious association. As a person passes from one of the environments to another, he is subjected to antagonistic pulls, and is in danger of being split into a being having different standards of judgment and emotion for different occasions. This danger imposes upon the school a steadying and integrating office.

学校还具有这样一种功能。由于每个人所加入的社会环境不同，每个人的性情都会受到不同势力的影响。这时，学校就起到协调的作用。譬如在家里遵守一种准则；在街道遵守另一种准则；在工场或商店，遵守第三种准则；在教会，遵守第四种准则。当一个人从某一环境进入到另一个环境时，他肯定会受到来自不同环境之间的对抗性拉力的影响，要冒风险，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判断和情感标准。这时，学校就能起到平衡稳定和调和折中的作用。

Summary.

总结

Th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young of the attitudes and

dispositions necessary to the continuous and progressive life of a society cannot take place by direct conveyance of beliefs, emotions, and knowledge. It takes place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of the environment. The environment consists of the sum total of conditions which are concerned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activity characteristic of a living be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 consists of all the activities of fellow beings that are bound up in the carrying on of the activities of any one of its members. It is truly educative in its effect in the degree in which an individual shares or participates in some conjoint activity. By doing his share in the associated activity, the individual appropriates the purpose which actuates it, becomes familiar with its methods and subject matters, acquires needed skill, and is saturated with its emotional spirit.

在不断提高的社会生活中，青少年要培养其必需的态度和性情，不能依靠信念、情感和知识的直接传授，而是需要环境作为中介。环境是由与生物的特殊活动有关联的全部条件构成的。社会环境包括社群里参与其他成员活动的每个成员的所有行为。社会环境起到的真正教育效果取决于其成员参与共同活动的程度。个人因为参与合作活动，就需要把合作活动的目的当作自己的活动目的；熟悉参与这种活动的方法和所需材料，学会必需的技能，并且充分了解其精神。

The deeper and more intimate educative formation of disposition comes, without conscious intent, as the young gradually partake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various groups to which they may belong. As a society becomes more complex, however, it is found necessary to provide a special social environment which shall especially look after nurturing the capacities of the immature. Three of the mor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this special environment are: simplifying and ordering the factors of the disposition it is wished

to develop; purifying and idealizing the existing social customs; creating a wider and better balanced environment than that by which the young would be likely, if left to themselves, to be influenced.

当青少年逐渐开始参与他们所属的各种群体的活动时，其性情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更加深刻、更加直接的陶冶。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我们必须提供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特别关注未成年人的能力培养。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有三个比较重要的作用；一是简化培养年轻人性情的手段；二是净化当今社会的习惯并将其理想化；三是创造一个更加广阔，和谐的环境，使青少年摆脱原有环境的限制。

Chapter 3 Education as Direction

第三章　教育是一种指示

1．The Environment as Directive.

一、环境的指向作用

We now pass to one of the special forms which the general function of education assumes: namely, that of direction, control, or guidance. Of these three words, direction, control, and guidance, the last best conveys the idea of assisting through cooperation the natural capacities of the individuals guided; control conveys rather the notion of an energy brought to bear from without and meeting some resistance from the one controlled; direction is a more neutral term and suggests the fact that the active tendencies of those directed are led in a certain continuous course, instead of dispersing aimlessly. Direction expresses the basic function, which tends at one extreme to become a guiding assistance and at another, a regulation or ruling. But in any case, we must carefully avoid a meaning sometimes read into the term 'control. ' It is sometimes assumed, explicitly or unconsciously, that an individual's tendencies are naturally purely individualistic or egoistic, and thus antisocial. Control then denotes the process by which he is brought to subordinate his natural impulses to public or common ends. Since, by conception, his own nature is quite alien to this process and opposes it rather than helps it, control has in this view a flavor of coercion or compulsion about it. Systems of government and

theories of the state have been built upon this notion, and it has seriously affected educational ideas and practices. But there is no ground for any such view. Individuals are certainly interested, at times, in having their own way, and their own way may go contrary to the ways of others. But they are also interested, and chiefly interested upon the whole, in entering into the activities of others and taking part in conjoint and cooperative doings. Otherwise, no such thing as a community would be possible. And there would not even be any one interested in furnishing the policeman to keep a semblance of harmony unless he thought that thereby he could gain some personal advantage. Control, in truth, means only an emphatic form of direction of powers, and covers the regulation gained by an individual through his own efforts quite as much as that brought about when others take the lead.

现在我们进一步研究教育的一般作用中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即指示、管理或引导。这三个词中，“引导”一词最能传达通过合作活动来开发个人潜能的思想；“管理”一词，更确切地说，指的是受控承受外力并会产生抵抗力；“指示”是较为中性的词，表明得到指示的人会主动沿着某一确定路线持续自己的活动，而不是无目的地游走。指示是一种基本作用，体现出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指示起到了引导和辅助作用，另一种是调节或支配作用。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慎防产生额外的“管理”意义。我们有时会贸然或下意识地假定，人的天性是纯粹的个人主义或自我中心主义，因而是反社会的意识形态。管理过程要求人不能凭一时冲动行事，而是要遵从集体或共同目标。从概念上理解，其实他的本性和这个过程格格不入，事实上是对它持反对意见而不是帮助改进这个过程；因而，管理具有压制或强迫的意味。政府体制和国家论正是基于这个观念，所以它严重地影响了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但是这些观点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有时，个人肯定有自己喜欢的做事方式，而这些方式可能和别人行为方式相反。但总的来说，他们也会有兴趣参加其他人的活动，集体活动和合作活

动。否则像团体这种形式是不可能存在的。甚至不会有一个人会有兴趣给警察提供情报来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除非他认为自己能从中获利。事实上，管理只是一种强调权力指向的形式，包括个人自己努力调节自身的行为活动，这和别人指挥下的调节完全相同。

In general, every stimulus directs activity. It does not simply excite it or stir it up, but directs it toward an object. Put the other way around, a response is not just a re-action, a protest, as it were, against being disturbed; it is, as the word indicates, an answer. It meets the stimulus, and corresponds with it. There is an adaptation of the stimulus and response to each other. A light is the stimulus to the eye to see something, and the business of the eye is to see. If the eyes are open and there is light, seeing occurs; the stimulus is but a condition of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roper function of the organ, not an outside interruption. To some extent, then, all direction or control is a guiding of activity to its own end; it is an assistance in doing fully what some organ is already tending to do.

总而言之，每种刺激都会指导一种活动。它不仅仅引起或挑起活动，而且指引活动朝着某个目标发展。反过来说，一种反应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反作用，而似乎是对干扰活动的抗议。正如这个词所表示的，它是一种回答。它遇到刺激并做出反应。刺激和反应互相适应，例如，眼睛受到光线的刺激，就看到东西；眼睛的任务就是看。如果眼睛是睁开的，又有光线，那么眼就看见东西。刺激只是完成器官的正当功能的一个条件，而不是一个外界的阻碍。在某种程度上，一切指导或管理都是实现自己目标的活动向导，辅助某个器官使其完全发挥作用。

This general statement needs, however, to be qualified in two

respects. In the first place, except in the case of a small number of instincts, the stimuli to which an immature human being is subject are not sufficiently definite to call out, in the beginning, specific responses. There is always a great deal of superfluous energy aroused. This energy may be wasted, going aside from the point; it may also go against the successful performance of an act. It does harm by getting in the way. Compare the behavior of a beginner in riding a bicycle with that of the expert. There is little axis of direction in the energies put forth; they are largely dispersive and centrifugal. Direction involves a focusing and fixating of action in order that it may be truly a response, and this requires an elimination of unnecessary and confusing movements. In the second place, although no activity can be produced in which the person does not cooperate to some extent, yet a response may be of a kind which does not fit into the sequence and continuity of action. A person boxing may dodge a particular blow successfully, but in such a way as to expose himself the next instant to a still harder blow. Adequate control means that the successive acts are brought into a continuous order; each act not only meets its immediate stimulus but helps the acts which follow.

但是，必须对这一说法做两点补充。第一，除少数本能反应以外，未成年人刚开始接受外界刺激时不会产生特殊的反应，反而总会激发出大量过剩的精力。这种过多的精力可能会造成浪费，与活动目标的实现无关，也可能阻碍活动的顺利完成。这种多余的精力有时会成为一种障碍，造成对别人的损害。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自行车初学者和骑车高手的行为。初学者没有朝着一个中心方向集中发力；这种投入的精力基本上都是分散的，偏离中心的。对其加以指引就是要将其注意力集中，固定一个动作，使其变成一种真正的反应。这就需要排除不必要的，杂乱无章的动作。第二，如果一个人不与他人合作，就不能产生活动，但是所谓的反应可能并不受活动的顺序和连贯性的影

响。一个拳师可以成功地躲避一次打击，但是这也就意味着下一次他将面临更沉重的打击。恰当的管理就是把连续的动作有序地排列；每一个动作不仅会是对直接刺激的直接反映，还可以帮助引发后续动作。

In short, direction is both simultaneous and successive. At a given time, it requires that, from all the tendencies that are partially called out, those be selected which center energy upon the point of need. Successively, it requires that each act be balanced with those which precede and come after, so that order of activity is achieved. Focusing and ordering are thus the two aspects of direction, one spatial, the other temporal. The first insures hitting the mark; the second keeps the balance required for further action. Obviously, it is not possible to separate them in practice as we have distinguished them in idea. Activity must be centered at a given time in such a way as to prepare for what comes next. The problem of the immediate response is complicated by one's having to be on the lookout for future occurrences.

总之，指导既是同时又是相继发生的。在特定的时间内，要从所有部分形成的思维倾向中，挑选出需要集中精力的那些倾向。从前后连续性来说，教育指导要求每一个动作与其前后动作保持和谐，从而使整个活动井然有序。所以，使动作集中和有序是教育指引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空间上的，另一个是时间上的。前者保证达到目标；后者保持进一步活动的协调发展。显然，我们可以从概念上对两者加以区别，但却不能在实践中把它们分开。活动必须集中在特定时间内，从而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由于人们必须注意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使得本能反应这件事变得复杂起来。

Two conclusions emerge from these general statements. On the one hand, purely external direction is impossible. The environment can at most only supply stimuli to call out responses. These responses proceed from tendencies already possessed by the individual. Even when a person is frightened by threats into doing something, the threats work only because the person has an instinct of fear. If he has not, or if, though having it, it is under his own control, the threat has no more influence upon him than light has in causing a person to see who has no eyes. While the customs and rules of adults furnish stimuli which direct as well as evoke the activities of the young, the young, after all, participate in the direction which their actions finally take. In the strict sense, nothing can be forced upon them or into them. To overlook this fact means to distort and pervert human nature.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existing instincts and habits of those directed is to direct them economically and wisely. Speaking accurately, all direction is but re-direction; it shifts the activities already going on into another channel. Unless one is cognizant of the energies which are already in operation, one's attempts at direction will almost surely go amiss.

从以上综述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方面，单纯的外部指引是不可能的。环境至多只能提供刺激，引起反应。这些反应始于个人已有的思维倾向。甚至当一个人在受到威胁去做一件事情时，也只是因为人有恐惧本能，所以威胁才起作用。如果没有恐惧本能，或者说人能抑制这种恐惧，那么，威胁对人产生的影响并不比让一个没有眼睛的人能看到东西的光线影响大。虽然成年人的行为习惯和准则会提供多种刺激，启发并指引未成年人的活动，但是未成年人终究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活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强制或迫使未成年人去做什么事情。如果忽视这个事实，就是歪曲和误解人的本性。如果能够考虑接受指导的人在现有的本能和习惯的驱使下所做出的贡献，那

么我们就能给予正确有效的指导。准确地说，所有的指导只不过是再指导；它能改变正在进行中的活动的轨迹。除非了解哪种教育已经发挥了有效作用，否则他试图提供的教育指引不会成功。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trol afforded by the customs and regulations of others may be short-sighted. It may accomplish its immediate effect, but at the expense of throwing the subsequent action of the person out of balance. A threat may, for example, prevent a person from doing something to which he is naturally inclined by arousing fear of disagreeable consequences if he persists. But he may be left in the position which exposes him later on to influences which will lead him to do even worse things. His instincts of cunning and slyness may be aroused, so that things henceforth appeal to him on the side of evasion and trickery more than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the case. Those engaged in directing the actions of others are always in danger of overlook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quential development of those they direct.

另一方面，别人的行为习惯和规则所提供的管理也许缺乏远见，这种管理的效果可能立竿见影，但却会妨碍被管理者今后行动的协调发展。例如，通过威胁可以让人觉得如果他要坚持做这件事，就会产生不良后果，从而阻止他去做想要做的事。但是他以后可能会受到一些引诱，让他去做一些更糟糕的事情。他的狡诈本能可能被唤醒，让他对今后的事情采取逃避和欺骗的方式。那些从事指导他人行为工作的人总会面临着忽视受指导者今后发展的重要性的危险。

2．Modes of Social Direction.

二、社会指引的模式

Adults are naturally most conscious of directing the conduct of others when they are immediately aiming so to do. As a rule, they have such an aim consciously when they find themselves resisted; when others are doing things they do not wish them to do. But the more permanent and influential modes of control are those which operate from moment to moment continuously without such deliberate intention on our part.

当成年人以直接指导别人的行为为目的时，他们肯定会意识到自己在指导别人的行为。一般来说，当他们发现自己受到他人的排斥或者别人违背了他们意愿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自己指导行为的目的。但是，更为持久，更有影响力的管理模式乃是并非故意为之的持续的运作。

1．When others are not doing what we would like them to or are threatening disobedience, we are most conscious of the need of controlling them and of the influences by which they are controlled. In such cases, our control becomes most direct, and at this point we are most likely to make the mistakes just spoken of. We are even likely to take the influence of superior force for control, forgetting that while we may lead a horse to water we cannot make him drink; and that while we can shut a man up in a penitentiary we cannot make him penitent. In all such cases of immediate action upon others, we need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physical results and moral results. A person may be in such a condition that forcible feeding or enforced confinement is necessary for his own good. A child may have to be snatched with roughness away from a fire so that he

shall not be burnt. But no improvement of disposition, no educative effect, need follow. A harsh and commanding tone may be effectual in keeping a child away from the fire, and the same desirable physical effect will follow as if he had been snatched away. But there may be no more obedience of a moral sort in one case than in the other. A man can be prevented from breaking into other persons' houses by shutting him up, but shutting him up may not alter his disposition to commit burglary. When we confuse a physical with an educative result, we always lose the chance of enlisting the person's own participating disposition in getting the result desired, and thereby of developing within him an intrinsic and persisting direction in the right way.

1．当别人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或者不屈服于威胁时，我们最能清楚地意识到管理他们以及对其施加影响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管理是最直接的；也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最有可能犯刚才所提到的错误。我们甚至可能进行强制管理，而忘了虽然我们可以把马引到水边，却不能迫使它饮水；虽然我们能把人关在感化院，却不能使他悔过。在所有这些直接强加在别人身上的活动中，我们需要把实际的结果与道德结果加以区别。有时，强迫进食或强制监禁可能对人有好处。儿童可能会被人从火旁拖走，以免被火灼伤。但是他的性情不一定有所改进，也不一定有教育成效。口气强硬的命令也许会使儿童远离火源，这样就能达到好像他是被人从火焰旁拖走了一样的良好效果。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不会产生道德意义上的服从。我们可以把人关起来，防止他入户抢劫，但这样并不会改变他的盗窃心理。当我们混淆实际的结果与教育结果时，我们总是失去让人自己参与获得所希望结果的机会，从而失去一种内在的和持久的自我发展机会。

In general, the occasion for the more conscious acts of control should be limited to acts which are so instinctive or impulsive that

the one performing them has no means of foreseeing their outcome. If a person cannot foresee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act, and is not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what he is told about its outcome by those with more experience, it is impossible for him to guide his act intelligently. In such a state, every act is alike to him. Whatever moves him does move him, and that is all there is to it. In some cases, it is well to permit him to experiment, and to discover the consequences for himself in order that he may act intelligently next time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But some courses of action are too discommoding and obnoxious to others to allow of this course being pursued. Direct disapproval is now resorted to. Shaming, ridicule, disfavor, rebuke, and punishment are used. Or contrary tendencies in the child are appealed to to divert him from his troublesome line of behavior. His sensitiveness to approbation, his hope of winning favor by an agreeable act, are made use of to induce action in another direction.

一般来说，有意识地管理行为应该局限于本能或一时的冲动，而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则无法预见其管理行为的结果。如果不能预见到自己的行为结果，又不能理解有经验的人所传授的行为后果，此人就不可能明智地指导自己的行为。在此情况下，每一个行为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凡是能感动他的东西都确实地在感动他，但除了感动以外，一点用处也没有。在某些情况下，不如让他放手尝试，认清自己的行为后果，以便以后在同样情况下会采取明智行动。但是，有些行为方式的确使人十分为难，令人反感，故而不能采用。现在人们往往求助于直接反对，采用羞辱、嘲笑、疏远、指责和惩罚等方法，或者利用儿童的逆反心理，使其摆脱令人烦恼的行为。儿童很在意别人的认可，希望用优良的行为赢得人们的好感。我们可以利用儿童的这种心理，使其走上正道。

2．These methods of control are so obvious (because so intentionally employed) that it would hardly be worth while to mention them if it were not that notice may now be taken, by way of contrast, of the other more important and permanent mode of control. This other method resides in the ways in which persons, with whom the immature being is associated, use things; the instrumentalities with which they accomplish their own ends.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social medium in which an individual lives, moves, and has his being is the standing effective agency of directing his activity.

2．这些管理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是有意识地加以运用），若不是为了要和另外一种更重要而且持久的管理方式进行对比，几乎不值一提。这另一种方法属于常和青少年相处的人使用的方法，同时也是他们用来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人在社会环境中生活、行动、存在，这种社会环境就是有效指引他们社交活动的持久动力。

This fact makes it necessary for us to examine in greater detail what is meant by the social environment. We are given to separating from each other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in which we live. The separation is responsible on one hand for an exaggeration of the moral importance of the more direct or personal modes of control of which we have been speaking; and on the other hand for an exaggeration, in current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of the intellectual possibilities of contact with a purely physical environment. There is not, in fact, any such thing as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one human being on another apart from use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s an intermediary. A smile, a frown, a rebuke, a word of warning or encouragement, all involve some physical change. Otherwise, the attitude of one would not get over

to alter the attitude of another. Comparatively speaking, such modes of influence may be regarded as personal. The physical medium is reduced to a mere means of personal contact. In contrast with such direct modes of mutual influence, stand associations in common pursuits involving the use of things as means and as measures of results. Even if the mother never told her daughter to help her, or never rebuked her for not helping, the child would be subjected to direction in her activities by the mere fact that she was engaged, along with the parent, in the household life. Imitation, emulation, the need of working together, enforce control.

这使我们有必要较为详细地考察何为社会环境。我们习惯于把自己生存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加以区别。一方面夸大了已经提到的比较直接的或个人管理方式在道德方面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夸大了在当前心理学和哲学中，直接接触纯粹物质环境的可能性。实际上，除了把物质环境作为中介以外，任何人都无法对另一个人产生直接影响。一个微笑，一个皱眉，一次指责，一次口头警告或口头鼓励，都包含着某种物质上的改变。否则，一个人的态度不可能改变另一个人的态度。相比而言，这种影响方式可以当作个人的属性。物质环境沦为个人交往的手段。与这种互相影响的直接方式相反，人们可以合作共事，并借以取得成果。譬如母女俩共同生活，即使母亲从来没有主动让女儿帮忙，或者母亲也不会因为女儿不帮忙而加以指责，女儿在生活中还是会遵从母亲的教导，这是因为她在家庭生活中一直与母亲朝夕相处。模仿、竞争、共同工作的需要等都能加强管理。

If the mother hands the child something needed, the latter must reach the thing in order to get it. Where there is giving there must be taking. The way the child handles the thing after it is got, the use to which it is put, is surely influenced by the fact that the child has watched the mother. When the child sees the parent

looking for something, it is as natural for it also to look for the object and to give it over when it finds it, as it was, under other circumstances, to receive it. Multiply such an instance by the thousand details of daily intercourse, and one has a picture of the most permanent and enduring method of giving direction to the activities of the young.

如果母亲给予孩子某些需要的东西，孩子必须伸手去拿才能得到。有所给必有所取。关于得到这个东西以后如何处理，用在什么地方，孩子肯定会受到他亲眼所见母亲做法的影响。孩子看见母亲在寻找东西时，他自然也会去寻找；而找到这个东西后，他就会交给母亲。这种例子在日常交往中屡见不鲜，于是我们就得到了指导儿童行为的最持久的方法。

In saying this, we are only repeating what was said previously about participating in a joint activity as the chief way of forming disposition. We have explicitly added, howeve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part played in the joint activity by the use of things. The philosophy of learning has been unduly dominated by a false psychology. It is frequently stated that a person learns by merely having the qualities of things impressed upon his mind through the gateway of the senses. Having received a store of sensory impressions, association or some power of mental synthesis is supposed to combine them into ideas—into things with a meaning. An object, stone, orange, tree, chair, is supposed to convey different impressions of color, shape, size, hardness, smell, taste, etc. , which aggregated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characteristic meaning of each thing. But as matter of fact, it is the characteristic use to which the thing is put, because of its specific qualities, which supplies the meaning with which it is identified. A chair is a thing which is put

to one use; a table, a thing which is employed for another purpose; an orange is a thing which costs so much, which is grown in warm climes, which is eaten, and when eaten has an agreeable odor and refreshing taste, etc.

我们这样说，只是重复提及如何把参与团体活动作为性格倾向的主要方法。但是，我们曾明确承认实物在团体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学习理论曾经过多地受到错误的心理学的影响。人们常说，我们仅仅通过感官就可以把事物的特性铭记在脑海里。在接受大量感官印象后，通过联想或综合某种智力，我们形成某种观念并赋予其特定意义。一件物品、一块石头、一个橘子、一棵树木、一把椅子，传达不同的颜色、形状、大小、硬度、嗅觉、味觉等等印象，这些印象结合起来就构成每一件东西的特定含义。但事实上，一件东西之所以有意义，能够让人们认识，是因为它的特性而形成特殊的用途。一把椅子有一种用途；一张桌子，因为另一个目的而被人使用；一种生长在温暖地方的橘子，如此昂贵，不仅可以食用，而且味美可口，令人神清气爽，如此等等。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adjustment to a physical stimulus and a mental act is that the latter involves response to a thing in its meaning; the former does not. A noise may make me jump without my mind being implicated. When I hear a noise and run and get water and put out a blaze, I respond intelligently; the sound meant fire, and fire meant need of being extinguished. I bump into a stone, and kick it one side purely physically. I put it to one side for fear some one will stumble upon it, intelligently; I respond to a meaning which the thing has. I am startled by a thunderclap whether I recognize it or not—more likely, if I do not recognize it. But if I say, either out loud or to myself, that is thunder, I respond to the disturbance as a meaning. My behavior has a mental quality. When

things have a meaning for us, we mean (intend, propose) what we do: when they do not, we act blindly, unconsciously, unintelligently.

对物质刺激和心理活动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包含对事物意义的反应，而前者则没有包括这种反应。喧哗声也许使我惊跳，但这与我的心理无关。当我听到救火声，便跑去取水扑火，这是我做出的理智反应：声音意味着火灾，起火意味着要灭火。我碰到一个石块，便把它踢到一旁，这纯粹是物理反应。如果我把石块搬到旁边，担心有人会被绊倒，这就有了理智的因素，这是我对石块具有的意义所做出反应。不管我是否知道雷声，只要有雷声大作，都能使我大吃一惊。如果它不为我所知，其声音更会使我吃惊。如果我大声说出或自言自语说出那是雷声，这就是我对这一大自然对我的惊扰做出的反应。我的行为就有了智力的性质。如果事物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所做的事就是有意义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如果它们没有意义，那么我们的行为就是盲目的、无意识的、没有理智的。

In both kinds of responsive adjustment, our activities are directed or controlled. But in the merely blind response, direction is also blind. There may be training, but there is no education. Repeated responses to recurrent stimuli may fix a habit of acting in a certain way. All of us have many habits of whose import we are quite unaware, since they were formed without our knowing what we were about. Consequently they possess us, rather than we them. They move us; they control us. Unless we become aware of what they accomplish, and pass judgment upon the worth of the result, we do not control them. A child might be made to bow every time he met a certain person by pressure on his neck muscles, and bowing would finally become automatic. It would not however, be an act of recognition or deference on his part, till he did it with a

certain end in view—as having a certain meaning. And not till he knew what he was about and performed the act for the sake of its meaning could he be said to be "brought up" or educated to act in a certain way. To have an idea of a thing is thus not just to get certain sensations from it. It is to be able to respond to the thing in view of its place in an inclusive scheme of action; it is to foresee the drift and probable consequence of the action of the thing upon us and of our action upon it. To have the same ideas about things which others have, to be like-minded with them, and thus to be really members of a social group, is therefore to attach the same meanings to things and to acts which others attach. Otherwise, there is no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no community life. But in a shared activity, each person refers what he is doing to what the other is doing and vice-versa. That is, the activity of each is placed in the same inclusive situation. To pull at a rope at which others happen to be pulling is not a shared or conjoint activity, unless the pulling is done with knowledge that others are pulling and for the sake of either helping or hindering what they are doing. A pin may pass in the course of its manufacture through the hands of many persons. But each may do his part without knowledge of what others do or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what they do; each may operate simply for the sake of a separate result—his own pay. There is, in this case, no common consequence to which the several acts are referred, and hence no genuine intercourse or association, in spite of juxtaposition, and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ir respective doings contribute to a single outcome. But if each views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own acts as having a bearing upon what others are doing and takes into accoun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behavior upon himself, then there is a common mind; a common intent in behavior. There is an understanding set up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ntributors; and this common understanding controls the action of each.

在适应这两种对外界反应的过程中，我们的行为活动都受到指导或被限制。但是对于纯粹的盲目反应，它所得到的指导作用也是盲目的。我们也许会得到锻炼，但是没有受到教育。反复出现的刺激让我们重复做出相同的反应，这也许可以使我们养成某种固定的行为习惯。我们都有许多习惯，但我们并不是完全了解这些习惯的意义，因为它们都是在我们不经意间形成的。因此，是它们支配我们，而不是我们支配它们。习惯影响着我们的活动，限制我们的行为。除非我们了解这些习惯的作用，并且能判断它们所产生的价值，否则我们就没法掌控它们。我们可以按着孩子的颈部，让他对遇到的每一个人鞠躬；到了后来，鞠躬就会成为一种自发的行为。但是，在他的鞠躬具有一定目的和一定意义之前，这还不是一种认可或尊敬他人的行为。除非他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为实现这件事的意义而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就不能说培养或教育过他，让他以某种方式去做事。要明白事物的概念，并不仅仅是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就够了。我们要能根据事物在行为活动的整个计划中的位置而做出相应的反应，要预见到对事物采取的行动对我们的思维倾向和可能出现的结果，以及我们的行为对事物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要和别人的观念相同，我们赋予事物和行为的意义必须与别人所赋予的意义相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社会群体的真正成员。没有共同的理解，就没有社会生活。但在共同参与的活动中，每个人都会参照别人的做事方法，别人也会参照我们的做事方法。这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行为活动放在同一情境之中。当你拉绳子时，碰巧别人也在拉这根绳子，但这并不属于共同参与的联合行动；除非你拉绳子时知道别人也在拉，而且是为了帮助或阻碍他们才去拉绳的，这才是一种共同参与的联合活动。再比如，又如，一根针在其制造过程中也许会经过许多人的手，但是，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并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也没有参照别人的做事方法。每人可能都只是为了一个结果——挣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共同的结果，尽管这些活动交叉在一起有助于同一个结果，但彼此并没有真正的交流或合作。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行为的结果和别人所做的事情联系起来，并考虑他们的行为对自己造成的结果，那么他们就有了一致的看法，他们的行为也就

有了相同的意愿。在每个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就会限制每个人的行为。

Suppose that conditions were so arranged that one person automatically caught a ball and then threw it to another person who caught and automatically returned it; and that each so acted without knowing where the ball came from or went to. Clearly, such action would be without point or meaning. It might be physically controlled, but it would not be socially directed. But suppose that each becomes aware of what the other is doing, and becomes interested in the other's action and thereby interested in what he is doing himself as connected with the action of the other. The behavior of each would then be intelligent; and socially intelligent and guided. Take one more example of a less imaginary kind. An infant is hungry, and cries while food is prepared in his presence. If he does not connect his own state with what others are doing, nor what they are doing with his own satisfaction, he simply reacts with increasing impatience to his own increasing discomfort. He is physically controlled by his own organic state. But when he makes a back and forth reference, his whole attitude changes. He takes an interest, as we say; he takes note and watches what others are doing. He no longer reacts just to his own hunger, but behaves in the light of what others are doing for its prospective satisfaction. In that way, he also no longer just gives way to hunger without knowing it, but he notes, or recognizes, or identifies his own state. It becomes an object for him. His attitude toward it becomes in some degree intelligent. And in such noting of the meaning of the actions of others and of his own state, he is socially directed.

假设有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接住了一个球，然后投给另一个人，这个人接住球，又下意识地投了回去；每个人都会这样做，但他们并

不知道球来自何处或抛向何方。显然，这种行为没有任何意义。从自然规律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是受到控制的，但从社交方面来说，它并没有得到指导。但是，假如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并且对他人的行为产生兴趣，从而会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和别人的行为之间的关联感兴趣，那么每个人的行为就会是理智的行为；就社会方面来说，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是受到指导的。再举一个更显真实的例子。如果一个婴儿饿了，即便有人在他面前准备好了食物，但他还是哭。如果他不会把自己的情况和别人的行为联系起来，也不把别人的行为和自己需求的满足联系起来，那么他只不过是对自己一直增加的不适做出越来越不耐烦的反应。这时，他自然而然应受到自己原有机体状态的控制。但是，如果他能思前想后，那么他的整个态度就会发生改变。正如我们所说，他能感兴趣；他能关注别人在做的事情。他不再只对自己的饥饿感做出反应，而是根据别人的行为来满足他预期的需求而采取行动。这样，他也不再只是自觉地屈服于饥饿感，而是关注、认识或证实自己的想法。这种状况变成了他的对象。他对饥饿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理智的性质。在关注别人的行为意义和自己想法的意义之后，他就在社交方面得到了指导。

It will be recalled that our main proposition had two sides. One of them has now been dealt with: namely, that physical things do not influence mind (or form ideas and beliefs) except as they are implicated in action for prospective consequences. The other point is persons modify one another's dispositions only through the special use they make of physical conditions. Consider first the case of so-called expressive movements to which others are sensitive; blushing, smiling, frowning, clinching of fists, natural gestures of all kinds. In themselves, these are not expressive. They are organic parts of a person's attitude. One does not blush to show modesty or embarrassment to others, but because the capillary circulation alters in response to stimuli. But others use the blush, or a slightly perceptible tightening of the muscles of a person with whom they

are associated, as a sign of the state in which that person finds himself, and as an indication of what course to pursue. The frown signifies an imminent rebuke for which one must prepare, or an uncertainty and hesitation which one must, if possible, remove by saying or doing something to restore confidence.

通过回忆可以发现，我们有两个主要观点，其中之一已经讨论过，即实物并不影响人的思维（或观念和信念），除非它们和实现某种结果的行为有关系。另外一点是，人们只有通过对物质环境的特殊利用，才能改变彼此的性格。首先要考虑的是别人易于察觉到的所谓表情丰富的动作：脸红、微笑、皱眉、握拳，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自然姿势。这些姿势本身并表示什么。它们是表达一个人态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人脸红了并不代表他表现出的羞怯或尴尬，而是因为毛细血管中血液循环因外界刺激而变化。但是别人会把与他们有关联的人的羞怯或从细微处觉察到的肌肉的紧绷，作为那个人处境的信号和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暗示。皱眉表示这个人必须面临即将到来的指责，或者说明这个人犹豫不决的态度，必须通过一定的说明或动作来恢复信心。

A man at some distance is waving his arms wildly. One has only to preserve an attitude of detached indifference, and the motions of the other person will be on the level of any remote physical change which we happen to note. If we have no concern or interest, the waving of the arms is as meaningless to us as the gyrations of the arms of a windmill. But if interest is aroused, we begin to participate. We refer his action to something we are doing ourselves or that we should do. We have to judge the meaning of his act in order to decide what to do. Is he beckoning for help? Is he warning us of an explosion to be set off, against which we should guard ourselves? In one case, his action means to run toward him;

in the other case, to run away. In any case, it is the change he effects i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which is a sign to us of how we should conduct ourselves. Our action is socially controlled because we endeavor to refer what we are to do to the same situation in which he is acting.

远处有一个人，在胡乱地挥舞着手臂。我们只需保持一种完全漠不关心的态度，那么这个人的动作和我们偶尔注意到的任何遥远的物质变化一样。如果我们不感兴趣，那么挥舞手臂对我们来说就像风车的风叶旋转一样，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如果它激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就会开始参与其中的活动。当我们把其行为当成参照物来做我们正在或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就必须判断他的行为意义来决定我们的行为。这个挥舞手臂的人是在招手求助吗？他在警告我们应该远离爆炸吗？如果是前一种情况，他的动作表明我们要向他跑去；后一种情况则表明我们应该逃离躲避。无论哪一种情况，他在自然环境中所引起的变化都是我们应该怎样行动的信号。我们的行为受到社交的限制，因为我们会参照别人行为的相同情境来努力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Language is,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Ante, p. 18) a case of this joint reference of our own action and that of another to a common situation. Hence its unrivaled significance as a means of social direction. But language would not be this efficacious instrument were it not that it takes place upon a background of coarser and more tangible use of physical means to accomplish results. A child sees persons with whom he lives using chairs, hats, tables, spades, saws, plows, horses, money, in certain ways. If he has any share at all in what they are doing, he is led thereby to use things in the same way, or to use other things in a way which will fit in. If a chair is drawn up to a table, it is a sign that he is to sit in it; if a person extends his right hand, he is to extend his; and so on

in a never ending stream of detail. The prevailing habits of using the products of human art and the raw materials of nature constitute by all odds the deepest and the most pervasive mode of social control. When children go to school, they already have 'minds'—they have knowledge and dispositions of judgment which may be appealed to through the use of language. But these 'minds' are the organized habits of intelligent response which they have previously required by putting things to us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ay other persons use things. The control is inescapable; it saturates disposition. The net outcome of the discussion is that the fundamental means of control is not personal but intellectual. It is not 'moral' in the sense that a person is moved by direct personal appeal from others, important as is this method at critical junctures. It consists in the habits of understanding, which are set up in using objects in correspondence with others, whether by way of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or rivalry and competition. Mind as a concrete thing is precisely the power to understand things in terms of the use made of them; a socialized mind is the power to understand them in terms of the use to which they are turned in joint or shared situations. And mind in this sense is the method of social control.

我们在前面提过（参见第16页），语言是我们在共同情境下把自己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加以比较的共同参照物。所以，语言作为社会指导的手段，其重要性无与伦比。但是，如果我们不先用比较粗略，比较实际的方法，通过利用物质工具来达到目的，那么需要加以学习的语言就不能成为有效的工具。当儿童看到和他共同生活的人如何使用椅子、帽子、桌子、铲子、锯子、犁、马、钱币等，如果他能真正参与其中，他就会被引导以相同的方式使用这些东西，或者以恰当的方式使用别的东西。如果有人拿一把椅子靠近桌子，这就表示他要坐这把椅子；如果有人向他伸出右手，他也必须伸出右手；凡事均可依

此类推。利用人类艺术品和天然原料的习惯是如此盛行，这极大地形成了最深刻，也是最普遍的社会制约模式。当儿童入学时，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见解”，即已经有了知识和判断能力。通过使用语言就可以唤起这些评判标准。但是这些“见解”乃是过去他们通过像别人那样使用东西所获得的明智的习惯性反馈。这种制约是无法避免的，它渗透在人的思维倾向之中。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得到最终结论是，制约的主要手段事关智力因素，与个体无关。这种制约方法的“道德”意义在于，它不是通过个人感染力直接激励别人，虽然这种方法在紧要关头也很重要。这种制约方法包括理解习惯，这种习惯是通过和别人共同使用事物，或是通过合作和协助，或者通过竞争来养成的。如果把心智看成一种具体的东西，它恰恰就是一种能力，需要根据事物的使用方法来理解这些事物；社会化的心智也是一种能力，是根据在合作或共同情境中使用事物的方法来理解这些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心智就是社会的制约手段。

3．Imita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y.

三、模仿和社会心理学

We have already noted the defects of a psychology of learning which places the individual mind naked, as it were, in contact with physical objects, and which believes that knowledge, ideas, and beliefs accrue from their interaction. Only comparatively recently has the predominating influence of association with fellow beings in the formation of mental and moral disposition been perceived. Even now it is usually treated as a kind of adjunct to an alleged method of learning by direct contact with things, and as merely supplementing knowledge of the physical world with knowledge of persons. The purport of our discussion is that such a view makes an

absurd and impossible separation between persons and things. Interaction with things may form habits of external adjustment. But it leads to activity having a meaning and conscious intent only when things are used to produce a result. And the only way one person can modify the mind of another is by using physical conditions, crude or artificial, so as to evoke some answering activity from him. Such are our two main conclusions. It is desirable to amplify and enforce them by placing them in contrast with the theory which uses a psychology of supposed direct relationships of human beings to one another as an adjunct to the psychology of the supposed direct relation of an individual to physical objects. In substance, this so-called social psychology has been built upon the notion of imitation. Consequently, we shall discuss the nature and role of imit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mental disposition.

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个学习心理学流派存在的缺陷。这种心理学认为，只要把赤裸裸的个人思维方式和实物进行相互作用，就能产生知识、观念和信念。人们只是在最近才认识到人类的群居生活对智力和道德观的形成具有支配作用。甚至到现在，我们通常还是把这种主导作用归因于和事物直接接触的学习方法，用人类的知识来补充物质世界的知识。我们的讨论表明，这种观点在人和事物之间划出了一条荒谬的分界线。人和事物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养成适应外界环境的习惯。但是，只有当我们通过对事物的利用而产生结果时，这种相互作用才引发有意义的自觉性活动。若要改变他人思维方式，唯一方法就是利用天然或人为的物质条件，引出他人的某种应答性活动。这就是我们得到的两个主要结论。我们最好把这两个结论和另一种理论进行对比，进一步发展和强调这些结论，这种理论把把假定人类之间直接关系的心理学附属于假定个人和事物之间直接关系的心理学。这个所谓的社会心理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建立在模仿概念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要讨论模仿在形成思维倾向中的性质和作用。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social control of individuals rests upon the instinctive tendency of individuals to imitate or copy the actions of others. The latter serve as models. The imitative instinct is so strong that the young devote themselves to conforming to the patterns set by others and reproducing them in their own scheme of behavior. According to our theory, what is here called imitation is a misleading name for partaking with others in a use of things which leads to consequences of common interest. The basic error in the current notion of imitation is that it puts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It takes an effect for the cause of the effect.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individuals in forming a social group are like-minded; they understand one another. They tend to act with the same controlling ideas, beliefs, and intentions, given similar circumstances. Looked at from without, they might be said to be engaged in 'imitating' one another.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re doing much the same sort of thing in much the same sort of way, this would be true enough. But 'imitation' throws no light upon why they so act; it repeats the fact as an explanation of itself. It is an explanation of the same order as the famous saying that opium puts men to sleep because of its dormitive power.

根据该理论，社会对个人的制约在于依靠个人模仿或照搬别人的动作的本能倾向，即把别人的动作作为模板。儿童的模仿本能很强，他们努力模仿别人的行为方式，并在自己的行为系统中加以重现。按照我们的理论，这里所说的模仿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名词，实际上它是指和别人共同使用一些东西时，引发了共同兴趣后的结果。目前对这种模仿概念的错误理解就好像是把车子放在马前面，本末倒置。毫无疑问，许多个体在组成社会群体时，他们具有相同的思想，互相了解。他们在相似的环境中，通常都会按相同的具有制约作用的观念、信念和意向来采取行动。从外部环境看，可以说他们都在彼此“模仿”，意思就是说他们以非常相似的方法，做非常相似的事情，

这种说法也许足够准确了。但是，“模仿”还不足以说明他们采取这种行为的原因；“模仿”二字不过是把重复的事实当作事实本身来进行说明。这让人想起了一句名言：鸦片使人昏昏欲睡，因为它有催眠作用。

Objective likeness of acts and the mental satisfaction found in being in conformity with others are baptized by the name imitation. This social fact is then taken for a psychological force, which produced the likeness.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what is called imitation is simply the fact that persons being alike in structure respond in the same way to like stimuli. Quite independently of imitation, men on being insulted get angry and attack the insulter. This statement may be met by citing the undoubted fact that response to an insult takes place in different ways in groups having different customs. In one group, it may be met by recourse to fisticuffs, in another by a challenge to a duel, in a third by an exhibition of contemptuous disregard. This happens, so it is said, because the model set for imitation is different. But there is no need to appeal to imitation. The mere fact that customs are different means that the actual stimuli to behavior are different. Conscious instruction plays a part; prior approvals and disapprovals have a large influence. Still more effective is the fact that unless an individual acts in the way current in his group, he is literally out of it. He can associate with others on intimate and equal terms only by behaving in the way in which they behave. The pressure that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one is let into the group action by acting in one way and shut out by acting in another way is unremitting. What is called the effect of imitation is mainly the product of conscious instruction and of the selective influence exercised by the unconscious confirmations and ratifications of those with whom one associates.

我们的许多动作具有客观相似性，我们因自己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一致而感到心理上的满足，称之为“模仿”。这个社会事实随后又被认为是产生相似状态的心理学力量。其实，所谓模仿，在很大程度上是条理相似的人以同样方式对相似的刺激做出的反应。人因受侮辱而发怒，要打那个冒犯他的人，这并不是由于模仿才这样做的。对于这种说法，可能会有人引用一件毋庸置疑的事实来加以反驳，声称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他们受到侮辱时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在某一群体里，人们也许用拳头来解决问题，在另一个群体里，他们也许会采用决斗的方式，在其他群体里，人们也许会以轻蔑的态度来漠视这种侮辱。因此，有人说，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模仿的原型不同。我认为无需求助于模仿。不同的风俗习惯说明对行为活动的实际刺激也是不同的。此外，有目的的教学也起到了部分作用；对前人行为的赞同和否决具有巨大的影响。更为现实的是：除非有人按照他所在群体成员所普遍接受的方式行动，否则他就等于脱离了该群体。他的一举一动只有和别人的行为举止一样时，才能和他们处于亲密而平等的地位并联合行动。如果有人以某种行为方式能够被允许加入群体活动，而换成另一种方式时，他会被排除在群体活动之外，这一事实中产生的压力是继续不断的。所谓的模仿效果主要是有目的教学的产物，也是社会群体在无意识情况下表示赞同和认可时产生的有选择性影响的产物。

Suppose that some one rolls a ball to a child; he catches it and rolls it back, and the game goes on. Here the stimulus is not just the sight of the ball, or the sight of the other rolling it. It is the situation —the game which is playing. The response is not merely rolling the ball back; it is rolling it back so that the other one may catch and return it,—that the game may continue. The 'pattern' or model is not the action of the other person. The whole situation requires that each should adapt his action in view of what the other person has done and is to do. Imitation may come in but its role is subordinate.

The child has an interest on his own account; he wants to keep it going. He may then note how the other person catches and holds the ball in order to improve his own acts. He imitates the means of doing, not the end or thing to be done. And he imitates the means because he wishes, on his own behalf, as part of his own initiative, to take an effective part in the game. One has only to consider how completely the child is dependent from his earliest days for successful execution of his purposes upon fitting his acts into those of others to see what a premium is put upon behaving as others behave, and of develop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em in order that he may so behave. The pressure for likemindedness in action from this source is so great that it is quite superfluous to appeal to imitation. As matter of fact, imitation of ends, as distinct from imitation of means which help to reach ends, is a superficial and transitory affair which leaves little effect upon disposition. Idiots are especially apt at this kind of imitation; it affects outward acts but not the meaning of their performance. When we find children engaging in this sort of mimicry, instead of encouraging them (as we would do if it were an important means of social control) we are more likely to rebuke them as apes, monkeys, parrots, or copy cats. Imitation of means of accomplishment is, on the other hand, an intelligent act. It involves close observation, and judicious selection of what will enable one to do better something which he already is trying to do. Used for a purpose, the imitative instinct may, like any other instinct, become a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action.

假使有人把球传给一个儿童，这个儿童接住球之后，又把球传回去，这个游戏就这样进行下去了。此时的生理刺激物不只是所看见的球，或所看见的传球人。正在玩的游戏，也就是整个环境都是生理刺激物。儿童做出的反应不仅仅是把球传回去，而是在于把球传回去之

后，别人可以接住球，并且再把球传回来，这样才能使游戏继续下去。这里的“模式”并不是另一个人的行为。整体情况要求每个人应该根据别人已经做的和要做的事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活动。可能会有模仿的成分，但是它的作用是次要的。儿童有自己的想法；他想把游戏继续下去。他也许会留意别人怎样接球，怎样拿球，以便改进自己的动作。他模仿的是做这个动作的方法，而不是模仿这个动作的结果或要做的动作。他之所以要模仿这种做法是为了他自己。他希望能够实际地参与这个游戏。我们只要考虑一下，儿童从小时候起，为了顺利地达到他的目的，是多么努力想使自己的动作和别人的动作保持一致。他们知道要仿照别人的行为才能得到奖励。他们在弄清楚别人的动作之后，才让自己行动。来自这方面的压力，要求他们在行为方面有共同的想法。这种压力是很大的，因此求助于模仿完全没有必要。事实上，和有助于达到目的的模仿方式不同，对行为结果的模仿是一件浅显，短暂的事情，对性格的影响不大。愚蠢的人特别擅长这种模仿；这种模仿影响外在的行为，但并不影响行为的意义。当我们发现儿童开始这种模仿时，我们并不鼓励他们（如果这种模仿是管理社会的重要途径，我们就要鼓励他们了），反而指责他们像类人猿、猴子、鹦鹉或盲目的模仿者。另一方面，对完成一件事的手段的模仿却是一种智力行为。这种模仿包含了仔细观察和谨慎选择，所选择的方法会帮助模仿者把已经在尝试做的事情做得更好。如果为了达到此目的，人的模仿本能也许和任何其他本能一样，可以加以培养以便取得实际效果。

This excursus should, accordingly, have the effect of reenforcing the conclusion that genuine social control means the formation of a certain mental disposition; a way of understanding objects, events, and acts which enables one to participate effectively in associated activities. Only the friction engendered by meeting resistance from others leads to the view that it takes place by forcing a line of action contrary to natural inclinations. Only failure to take account of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persons are mutually

concerned (or interested in acting responsively to one another) leads to treating imitation as the chief agent in promoting social control.

这样看来，以上的讨论能强化我们的结论，即，真正的社会管理意味着要培养成一定的心理倾向，这是理解事物、事件和动作的一种方法，能让我们真正地参与群体的活动。只有在与别人产生冲突时才会得出这样的观点：只有出现与自然本能强烈冲突的行为时，才会使用社会管理的方法。只有当不在意人们之间的互相关心（或对彼此的反应都有兴趣），我们才倾向于把模仿看作促进社会管理的主要力量。

4．Some Applications to Education.

四、教学中的应用

Why does a savage group perpetuate savagery, and a civilized group civilization? Doubtless the first answer to occur to mind is because savages are savages; beings of low-grade intelligence and perhaps defective moral sense. But careful study has made it doubtful whether their native capacities are appreciably inferior to those of civilized man. It has made it certain that native differences are not sufficient to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ce in culture. In a sense the mind of savage peoples is an effect, rather than a cause, of their backward institutions. Their social activities are such as to restrict their objects of attention and interest, and hence to limit the stimuli to mental development. Even as regards the objects that come within the scope of attention, primitive social customs tend to arrest

observation and imagination upon qualities which do not fructify in the mind. Lack of control of natural forces means that a scant number of natural objects enter into associated behavior. Only a small number of natural resources are utilized and they are not worked for what they are worth. The advance of civilization means that a larger number of natural forces and objects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instrumentalities of action, into means for securing ends. We start not so much with superior capacities as with superior stimuli for evocation and direction of our capacities. The savage deals largely with crude stimuli; we have weighted stimuli.

为什么野蛮群体会永远处于愚昧的状态，而文明群体却能一直延续着文明？我们脑海里理所当然地出现的第一个答案是：野蛮人就是野蛮人，他们智力低下，道德观念也有偏差。但是，通过仔细研究，我们并不认为野蛮人的天赋真的明显低于文明人。这种研究肯定了天赋的差异不足以说明文化修养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野蛮人的智力是其落后制度造成的结果，而不是落后制度本身的原因。有限的社交活动限制了能引起他们注意和让他们感兴趣的事物，因而也限制了对智力开发的刺激。即使有能够引起注意的事物，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也会抑制人们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原始人对自然力的控制不足意味着，在他们开展的合作行动里，只有很少自然资源得到利用，而且这种利用也远非合理的利用。所谓文明的进步就是把众多自然力和事物转化为行动的工具和达到目的的手段。刚开始的时候，与其说是我们有优越的天赋，不如说是我们拥有刺激和培养我们能力的优越条件。野蛮人所接触的大部分是天然的刺激；我们则偏重于利用刺激。

Prior human efforts have made over natural conditions. As they originally existed they were indifferent to human endeavors. Every domesticated plant and animal, every tool, every utensil, every appliance, every manufactured article, every aesthetic decoration,

every work of art means a transformation of conditions once hostile or indifferent to characteristic human activities into friendly and favoring conditions. Because the activities of children today are controlled by these selected and charged stimuli, children are able to traverse in a short lifetime what the race has needed slow, tortured ages to attain. The dice have been loaded by all the successes which have preceded.

从前，人类努力改造自然环境。原本存在的自然环境并不关心人类付出的努力。每一种植物和驯养的动物，每一件工具、用品、器械、工业品、装饰品和艺术品都在把从前对人类活动怀有敌意或漠不关心的环境转化为友好和有利的环境。现在的人类活动都受控于有选择的和有目的的刺激物。早期人类需要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年代才能得到的东西，现在的人们在短短的一生就可以全部获得。人类与自然界的斗争承载了前人取得的一切成就。

Stimuli conducive to economical and effective response, such as our system of roads and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our ready command of heat, light, and electricity, our readymade machines and apparatus for every purpose, do not, by themselves or in their aggregate, constitute a civilization. But the uses to which they are put are civilization, and without the things the uses would be impossible. Time otherwise necessarily devoted to wresting a livelihood from a grudging environment and securing a precarious protection against its inclemencies is freed. A body of knowledge is transmitted, the legitimacy of which is guaranteed by the fact that the physical equipment in which it is incarnated leads to results that square with the other facts of nature. Thus these appliances of art supply a protection, perhaps our chief protection, against a recrudescence of these superstitious beliefs, those fanciful myths

and infertile imaginings about nature in which so much of the best intellectual power of the past has been spent. If we add one other factor, namely, that such appliances be not only used, but used in the interests of a truly shared or associated life, then the appliances become the positive resources of civilization. If Greece, with a scant tithe of our material resources, achieved a worthy and nobl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areer, it is because Greece operated for social ends such resources as it had. But whatever the situation, whether one of barbarism or civilization, whether one of stinted control of physical forces, or of partial enslavement to a mechanism not yet made tributary to a shared experience, things as they enter into action furnish the educative conditions of daily life and direct the formation of mental and moral disposition.

能够唤起经济而有效反应的刺激物很多，如道路系统和运输工具、热能、光能和电能以及机器和仪器等。然而，它们自身或其集合体并不构成文明。但是，我们对它们的使用就是文明。没有它们的存在，使用是无从谈起的。没有它们的存在，我们的时间就要用来与恶劣的环境抗争，抗御严寒。现在这些时间被节省下来，前人积累的知识体系也可以传承下来。知识具体化的实体设备所产生的成果和自然界的其他事实相符，这就保证了知识的合法性。因此，知识工具的使用给我们提供了保护，也许是主要的保护，让我们不再迷信、不再相信怪诞的神话和贫乏的想象。过去我们浪费了太多的精力在这些事情上。如果再添加一个因素，即，我们不但使用这些工具，而且是为了真正共同社会生活来使用之，知识工具就会变成文明进程的积极来源。古希腊仅有我们现在物质资源的十分之一，然而却创造出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是因为她调动了所有的资源用于构筑社会的文明。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不管是野蛮时代，还是文明时代，不管是对大自然只能有限控制，还是仍然要部分听命于不属于共同经验某一机制，只要行动起来，我们就能提供对日常生活有教育意义的环境，影响思维和道德观的形成。

Intentional education signifies,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a specially selected environment, the selection being made on the basis of materials and method specifically promoting growth in the desired direction. Since language represents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that have been subjected to the maximum transformation in the interests of social life—physical things which have lost their original quality in becoming social tools—it is appropriate that language should play a large part compared with other appliances. By it we are led to share vicariously in past human experience, thus widening and enrich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present. We are enabled, symbolically and imaginatively, to anticipate situations. In countless ways, language condenses meanings that record social outcomes and presage social outlooks. So significant is it of a liberal share in what is worthwhile in life that unlettered and uneducated have become almost synonymous.

我们已经说过，有目标的教育代表的是一种特别选择的环境。这种基于特定材料和方法所做出的选择能促使我们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由于语言代表为了社会利益而经过最大程度改造过的物质环境（在沦为社会工具时，物质实体已丧失其特性），与其他知识工具相比，语言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语言，我们共同分享了人类以往的经验，因而拓展并丰富了当前的经验。这使我们能通过符号和想象来期待种种情境。语言能用无数方法浓缩社会成果的记录和社会前景的意义。自由分享有价值的信息非常重要。在当今社会，文盲与未受教育几乎已成为同义词。

The emphasis in school upon this particular tool has, however, its dangers:—dangers which are not theoretical but exhibited in practice. Why is it,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eaching by pouring in,

learning by a passive absorption, are universally condemned, that they are still so intrenched in practice ? That education is not an affair of 'telling' and being told, but an active and constructive process, is a principle almost as generally violated in practice as conceded in theory. Is not this deplorable situation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doctrine is itself merely told? It is preached; it is lectured; it is written about. But its enactment into practice requires that the school environment be equipped with agencies for doing, with tools and physical materials, to an extent rarely attained. It requires that methods of instru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be modified to allow and to secure direct and continuous occupations with things. Not that the use of language as an educational resource should lessen; but that its use should be more vital and fruitful by having its normal connection with shared activities. “These things ought ye to have done, and not to have left the others undone. " And for the school “these things” mean equipment with the instrumentalities of cooperative or joint activity. For when the schools depart from the educational conditions effective in the out-of-school environment, they necessarily substitute a bookish, a pseudo-intellectual spirit for a social spirit. Children doubtless go to school to learn, but it has yet to be proved that learning occurs most adequately when it is made a separate conscious business. When treating it as a business of this sort tends to preclude the social sense which comes from sharing in an activity of common concern and value, the effort at isolated intellectual learning contradicts its own aim. We may secure motor activity and sensory excitation by keeping an individual by himself, but we cannot thereby get him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which things have in the life of which he is a part. We may secure technical specialized ability in algebra, Latin, or botany, but not the kind of intelligence which directs ability to useful ends. Only by engaging in a joint activity, where one person's use of material and tools is consciously referred to the use other persons

are making of their capacities and appliances, is a social direction of disposition attained.

但是，学校强调这一特殊工具的危险性，其危险不体现在理论上，而表现在实践中。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和被动吸收式的学习方法普遍受到人们的谴责，为什么它们在实践中的应用仍旧根深蒂固？教育并不是“告知”和被告知，而是一个主动构建的过程。在理论上，人人都承认这个原理，然而在实践中，大家却任意违反。这种可悲的情况，难道不是由于原理本身仅仅是说说而已所造成的吗？原理被人宣讲、传授，书写。但如果要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就要求学校拥有将其付诸实施的机构、工具和材料，要求我们改变教育和管理方法，使学生能够直接地，持续地利用实物来学习。我们并不是要削弱语言这种教育资源的作用，而是要在语言和共同活动之间建立起正常的联系，使语言的使用更有活力，更有效果。“你们应该把这些事情做好，但也要兼顾其他事情。”对学校来说，应该做的事就是为合作或共同参与的活动准备好各种工具。如果缺少了校外环境中有效的教育条件，学校必然只能用书本知识和伪科学精神替代社会精神。儿童肯定要去学校学习，但是如果学习成为一项专门任务，儿童的学习积极性是否依然饱满就还有待于证明。如果这样来看待学习，就可能排除因参与有共同兴趣和有价值的活动而获得的社会意义，孤立的求知之路与学习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让人保持不动，我们可能获得感官的兴奋并想四处走动，但是我们不能使他理解各种事物在生活中的意义，尽管他是生活的一分子。我们可能会获得代数、拉丁文或植物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不能学会实现专业知识价值的智慧。只有通过参与共同活动，在运用材料和工具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参照别人运用其能力和器材的方法，我们才能获得社会意识。

Summary.

总结

The natural or native impulses of the young do not agree with the life-customs of the group into which they are born. Consequently they have to be directed or guided. This control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physical compulsion; it consists in centering the impulses acting at any one time upon some specific end and in introducing an order of continuity into the sequence of acts. The action of others is always influenced by deciding what stimuli shall call out their actions. But in some cases as in commands, prohibitions, approvals, and disapprovals, the stimuli proceed from persons with a direct view to influencing action. Since in such cases we are most conscious of controlling the action of others, we are likely to exaggerat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sort of control at the expense of a more permanent and effective method. The basic control resides in the nature of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young take part. In social situations the young have to refer their way of acting to what others are doing and make it fit in. This directs their action to a common result, and gives an understanding common to the participants. For all mean the same thing, even when performing different acts. This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s and ends of action is the essence of social control. It is indirect, or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not direct or personal. Moreover it is intrinsic to the disposition of the person, not external and coercive. To achieve this internal control through identity of interest and understanding is the business of education. While books and conversation can do much, these agencies are usually relied upon too exclusively. Schools require for their full efficiency more opportunity for conjoint activities in which those instructed take part, so that they may acquire a social sense of their own powers and of the materials and appliances used.

儿童天生或本能的冲动与其出生后所加入群体的生活习惯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提供指导或疏导。这种教育与强迫他们做事不同，得把在任何时间起作用的冲动归结到某一特殊目的上并把系列动作按先后排列。他人的行为通常受到引发其行为的刺激物的影响。有时人们发出刺激信号，如命令、禁止、赞许和谴责，目的就是想直接影响他人行为。由于非常想控制别人的行动，我们很可能会过分地夸大这种控制的重要性，而对比较持久有效的方法弃之不顾。对儿童的基本控制要适合儿童参与其中的活动。在其生长的社会环境中，儿童必须参照别人的行为方式，使自己的行为与他人合拍。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必须取得共同的结果，并使参与者达成一致的理解。大家从事不同的活动，却都为了同一个目的。这种对活动方式和目的的共同理解才是社会管理的本质所在。这种管理是间接的，或情绪化的，理智的而不是直接的或个人的。而且这种管理对人性格的影响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也不是强迫性的。教育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共同的兴趣和理解来实现这种内在的管理。虽然书籍和对话的作用很大，但是我们通常过分地依赖于这些方法。为了充分发挥学校本身的功效，就要提供更多集体活动的机会，使受教育者参与其中，以便为他们的能力和所使用过的材料和手段赋予社会意义。

Chapter 4 Education as Growth

第四章　教育即成长

1．The Conditions of Growth.

一、成长的条件

In directing the activities of the young, society determines its own future in determining that of the young. Since the young at a given time will at some later date compose the society of that period, the latter's nature will largely turn upon the direction children's activities were given at an earlier period. This cumulative movement of action toward a later result is what is meant by growth.

社会在指导青少年活动的过程中决定了青少年的未来，也因而决定社会自身的未来。由于特定时期内的青少年在今后将构建未来社会，所以未来社会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给予儿童活动的指导。这个旨在产生未来结果的累积运动就是成长。

The primary condition of growth is immaturity. This may seem to be a mere truism—saying that a being can develop only in some point in which he is undeveloped. But the prefix 'im' of the word immaturity means something positive, not a mere void or lack.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terms 'capacity' and 'potentiality' have a double

meaning, one sense being negative, the other positive. Capacity may denote mere receptivity, like the capacity of a quart measure. We may mean by potentiality a merely dormant or quiescent state—a capacity to become something different under external influences. But we also mean by capacity an ability, a power; and by potentiality potency, force. Now when we say that immaturity means the possibility of growth, we are not referring to absence of powers which may exist at a later time; we express a force positively present—the ability to develop.

成长的首要条件是要“未成熟”。我们说一个人只能在他尚未发展的某一点上发展，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未成熟”（immaturity）一词的前缀“未”（im）却含有某种积极意义，不仅仅是一无所有或缺乏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能量”（capacity）和“潜力”（potentiality），这两个名词都有双重意义，一个意义是消极的，另一个是积极的。能力可以仅指接受能力，如一夸脱的能量。我们可以把潜力仅仅理解为蛰伏或休眠的状态——在外部环境影响下发生变化的能力。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能量理解为一种力量，一种影响力；把潜力理解为一种潜在的力量，一种势力。我们说未成熟状态就是指有成长的可能性。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指现在没有，以后才有的能力；我们表示现在就有一种确实存在的势力——即发展的潜能。

Our tendency to take immaturity as mere lack, and growth as something which fills up the gap between the immature and the mature is due to regarding childhood comparatively, instead of intrinsically. We treat it simply as a privation because we are measuring it by adulthood as a fixed standard. This fixes attention upon what the child has not, and will not have till he becomes a man. This comparative standpoint is legitimate enough for some

purposes, but if we make it final, the question arises whether we are not guilty of an overweening presumption. Children, if they could express themselves articulately and sincerely, would tell a different tale; and there is excellent adult authority for the conviction that for certain moral and intellectual purposes adults must become as little children.

我们往往把未成熟视为某种匮乏，把成长当作跨越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的间隙的手段，这是因为我们往往用比较的方法而不是用内在的眼光来看待儿童期。我们把儿童期视为匮乏，是因为我们用成年人的固定标准来衡量它。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儿童现在所没有的和他长大成人之前不会有的东西上。如果是出于某种目的，这种比较的衡量方法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观点看作一成不变的真理，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我们太傲慢武断了。如果儿童能畅所欲言，他们的意见将截然不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出于某种道德和智力层面的考虑，成年人必须变成儿童才行。

The seriousness of the assumption of the negative quality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immaturity is apparent when we reflect that it sets up as an ideal and standard a static end. The fulfillment of growing is taken to mean an accomplished growth: that is to say, an Ungrowth, something which is no longer growing. The futility of the assumption is seen in the fact that every adult resents the imputation of having no further possibilities of growth; and so far as he finds that they are closed to him mourns the fact as evidence of loss, instead of falling back on the achieved as adequate manifestation of power. Why an unequal measure for child and man?

当我们认识到赋予未成熟以贬义色彩是把一个静止的目标作为一种理想和标准时，我们会发现这一看法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成长被视为已经完成的生长，也就是说停止生长（ungrowth），即不再成长。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如果有人告知成年人，他已没有进一步成长的可能性，他就会怨恨；一旦他发现这正在成为事实，他就会悲痛，视之为正在走下坡的证据，而不把已取得的成就作为自己能力的充分展现。为什么我们要对儿童和成年人使用不同的衡量标准呢？

Taken absolutely, instead of comparatively, immaturity designates a positive force or ability,—the power to grow. We do not have to draw out or educe positive activities from a child, as some educational doctrines would have it. Where there is life, there are already eager and impassioned activities. Growth is not something done to them; it is something they do. The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aspect of possibility give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two chief traits of immaturity, dependence and plasticity. (1) It sounds absurd to hear dependence spoken of as something positive, still more absurd as a power. Yet if helplessness were all there were in dependence, no development could ever take place. A merely impotent being has to be carried, forever, by others. The fact that dependence is accompanied by growth in ability not by an ever increasing lapse into parasitism, suggests that it is already something constructive. Being merely sheltered by others would not promote growth. For (2) it would only build a wall around impotence. With reference to the physical world, the child is helpless. He lacks at birth and for a long time thereafter power to make his way physically, to make his own living. If he had to do that by himself, he would hardly survive an hour. On this side his helplessness is almost complete. The young of the brutes are immeasurably his superiors. He is physically weak and not able to

turn the strength which he possesses to coping with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如果不是用对比的观点而是用绝对的观点来看，未成熟状态代表一种积极力量——继续成长的力量。我们不必像有些教育学说所说的那样，一定要从儿童那里诱发或引发积极的活动。哪里有生活，哪里就存在令人渴望和激昂的活动。儿童的成长从来就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一切皆有可能，这是理解未成熟状态的两个主要特征，即依赖性和可塑性的关键。（1）把依赖看成某种积极意义的东西，听来未免觉得可笑；把依赖当作一种力量，则更加荒谬。然而，如果是出于无助的依赖，那么永远不会得到发展。弱者永远需要别人提携。如果依赖能提高人的能力，而不是使人越来越沦入寄生状态，依赖就具有某种正面意义。仅仅靠寄人篱下不会促进成长。因为（2）寄人篱下不过是为软弱无能建造了一堵围墙。在现实世界里，儿童是无依无靠的。在出生之时和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儿童都缺乏行走和维持自己生命的能力。如果他必须自谋生路，他连一小时都难以生存。在这方面，儿童几乎完全无依无靠。动物的幼崽要强得多，尽管动物幼崽也体格虚弱，尚不能独自生存。

1．The thoroughgoing character of this helplessness suggests, however, some compensating power. The relative ability of the young of brute animals to adapt themselves fairly well to physical conditions from an early period suggests the fact that their life is not intimately bound up with the life of those about them. They are compelled, so to speak, to have physical gifts because they are lacking in social gifts. Human infants, on the other hand, can get along with physical incapacity just because of their social capacity. We sometimes talk and think as if they simply happened to be physically in a social environment; as if social forces exclusively existed in the adults who take care of them, they being passive

recipients. If it were said that children are themselves marvelously endowed with power to enlist the cooperative attention of others, this would be thought to be a backhanded way of saying that others are marvelously attentive to the needs of children. But observation shows that children are gifted with an equipment of the first order for social intercourse. Few grown-up persons retain all of the flexible and sensitive ability of children to vibrate sympathetically with the attitudes and doings of those about them. Inattention to physical things (going with incapacity to control them) is accompanied by a corresponding intensification of interest and attention as to the doings of people. The native mechanism of the child and his impulses all tend to facile social responsiveness. The statement that children, before adolescence, are egotistically self-centered, even if it were true, would not contradict the truth of this statement. It would simply indicate that their social responsiveness is employed on their own behalf, not that it does not exist. But the statement is not true as matter of fact. The facts which are cited in support of the alleged pure egoism of children really show the intensity and directness with which they go to their mark. If the ends which form the mark seem narrow and selfish to adults, it is only because adults (by means of a similar engrossment in their day) have mastered these ends, which have consequently ceased to interest them. Most of the remainder of children's alleged native egoism is simply an egoism which runs counter to an adult's egoism. To a grown-up person who is too absorbed in his own affairs to take an interest in children's affairs, children doubtless seem unreasonably engrossed in their own affairs. From a social standpoint, dependence denotes a power rather than a weakness; it involves interdependence. There is always a danger that increased personal independence will decrease the social capacity of an individual. In making him more self-reliant, it may make him more self-sufficient; it may lead to aloofness and indifference. It often

makes an individual so insensitive in his relations to others as to develop an illusion of being really able to stand and act alone—an unnamed form of insanity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a large part of the remediable suffering of the world.

1．然而，这种彻底的无助也补偿给他们别的能力。动物幼崽在很小的时候就能较好地适应周围的环境，这显示他们的生活并非与周围动物的生活紧密相关。也就是说，由于缺乏社会能力，它们被迫拥有强壮的体能。而人类的孩子身体虚弱也能生存是由于拥有社会能力。我们有时谈起儿童，想到儿童，似乎他们只是碰巧来到了这个社会，似乎社会力量完全存在于抚养他们的成年人之中，他们只是被动接受抚养。如果说儿童天生就有超常能力引起别人的注意，有人会认为，这不过是转弯抹角地说成年人非常注意儿童的需要罢了。但是，有观察表明，儿童具有头等的社交能力。儿童具有灵活而又敏感的能力，能根据周围人的态度和行为做出相应反应。成年人很少具有这种能力。儿童对自然界事物的忽视（由于无力控制他们）导致他们对成年人行为产生更大的兴趣和注意。儿童天生具有的秉性和冲动有助于其敏捷的社会反应。儿童在青春期之前以自己我为中心，这种说法即便正确，也不会与我们上面所说的话产生矛盾。这不过表明儿童的社会反应能力是用来增加自己的利益，并不是表明儿童缺乏此种能力。不过，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正确。有些事实被用来辩护所谓儿童的纯利己主义，其实是表明儿童奔向目标的强烈性和直接性。如果在成年人看来，那些目标狭隘自私，那只是因为成年人（通过早年类似的全神贯注）已经追寻到了那些目标，从而不再对其感兴趣。大多数声称儿童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的说法，不过是与成年人利己主义相对立的利己主义。过分关注于自己事物的成年人不会对儿童的事情感兴趣。在他们看来，儿童过分专注自己的事。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依赖性是一种力量而不是软弱；它包含相互依赖。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危险倾向：个人的独立性会降低人的社会能力。独立让人更依靠于自己，使自己变得自以为是，最终可能导致冷漠疏离。在与人共处时，独立时常让人变得冷漠，以致产生出一种能独善其身的幻想——这是一种无

名的癫狂，世界上大部分本可挽救的苦难，皆由此种癫狂所致。

2．The specific adaptability of an immature creature for growth constitutes his plasticity. This i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plasticity of putty or wax. It is not a capacity to take on change of form in accord with external pressure. It lies near the pliable elasticity by which some persons take on the color of their surroundings while retaining their own bent. But it is something deeper than this. It is essentially the ability to learn from experience; the power to retain from one experience something which is of avail in coping 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a later situation. This means power to modify ac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results of prior experiences, the power to develop dispositions. Without it, the acquisition of habits is impossible.

2．成长期的儿童拥有的特殊适应能力构成其可塑性。这和油灰、蜂蜡的可塑性大不相同。这不是受到外部压力就改变形式的能力。可塑性和柔韧的弹性相近，能使有些人只改头换面，却本质依旧。但可塑性又比弹性更为深奥，主要指从经验中获得的能力，即从生活中学到的能应付未来困难的有用经验。没有这种能力，便无法养成习惯。

It is a familiar fact that the young of the higher animals, and especially the human young, have to learn to utilize their instinctive reactions. The human being is born with a greater number of instinctive tendencies than other animals. But the instincts of the lower animals perfect themselves for appropriate action at an early period after birth, while most of those of the human infant are of little account just as they stand. An original specialized power of

adjustment secures immediate efficiency, but, like a railway ticket, it is good for one route only. A being who, in order to use his eyes, ears, hands, and legs, has to experiment in making varied combinations of their reactions, achieves a control that is flexible and varied. A chick, for example, pecks accurately at a bit of food in a few hours after hatching. This means that definite coordinations of activities of the eyes in seeing and of the body and head in striking are perfected in a few trials. An infant requires about six months to be able to gauge with approximate accuracy the action in reaching which will coordinate with his visual activities; to be able, that is, to tell whether he can reach a seen object and just how to execute the reaching. As a result, the chick is limited by the relative perfection of its original endowment. The infant has the advantage of the multitude of instinctive tentative reactions and of the experiences that accompany them, even though he is at a temporary disadvantage because they cross one another. In learning an action, instead of having it given ready-made, one of necessity learns to vary its factors, to make varied combinations of them, according to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A possibility of continuing progress is opened up by the fact that in learning one act, methods are developed good for use in other situations. Still more important is the fact that the human being acquires a habit of learning. He learns to learn.

众所周知，高等动物的幼崽，尤其是人类的幼儿，必须学会利用本能反应。人类生来就比其他动物具有更多的本能趋向。低等动物在出生后不久，就能自我完善，以便行动得当。而大多数人类婴儿的天性自他们学会站立后就变得不重要了。有一种天生就具有的适应能力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正像单程火车票一样，用完就作废了。为了使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双手，以及双腿，儿童必须反复试验，以期学会灵活多样的控制能力。例如，小鸡在被孵化出来几小时

后就能准确啄食。这就是说，眼睛与身体各部位啄食活动的准确协调，只需经过几次试验就能完善。婴儿出生后需要六个月才能准确协调其伸手抓物的动作和他的视觉活动，也就是能够说出他是否能抓到所见之物和知道该怎样去抓。结果，小鸡反而受制于其相对完善的本能。儿童则能反复尝试大量的本能反应，并且从中积累经验，即便这些反应相互交错，使其暂时处于劣势。我们学习一种动作，不是按既有模式去做，必需根据环境的变化加以改变，形成各种组合。想要不断进步，就要在学习一种行为时，找到在其他环境中也能使用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会怎样去学习。

The importance for human life of the two facts of dependence and variable control has been summed up in the doctrin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prolonged infancy. [5_1] This prolongation is significa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adult members of the group as well as from that of the young. The presence of dependent and learning beings is a stimulus to nurture and affection. The need for constant continued care was probably a chief means in transforming temporary cohabitations into permanent unions. It certainly was a chief influence in forming habits of affectionate and sympathetic watchfulness; that constructive interest in the well-being of others which is essential to associated life. Intellectually, this moral development meant the introduction of many new objects of attention; it stimulated foresight and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Thus there is a reciprocal influenc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social life requires a longer period of infancy in which to acquire the needed powers; this prolongation of dependence means prolongation of plasticity, or power of acquiring variable and novel modes of control. Hence it provides a further push to social progress.

依赖性和可控性是人类生活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原理早

就有人在讨论人为何需要一个较长婴儿期时被总结出来。[6_1] 无论从成年人的角度还是从儿童的角度来看，较长的婴儿期都很有必要。面对需要他人照顾和正在学习中的儿童，成年人的爱心就会油然而生。儿童需要成年人持续不断的呵护和照顾，这可能是人类将临时的同居变为永久婚姻的主要原因。儿童的这种需要是人类养成慈爱之心和照顾他人的习惯的主要原因；这种对别人幸福的关心是集体生活所必需的。从智力上讲，这种道德进步意味着要引进许多吸引注意的新事物；它使得人们有远见，为未来谋划。实际上，影响都是相互的。由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因此需要一个较长的婴幼期，以便儿童获得所需要的力量，这种依赖性的延长也就是可塑性的延长，或者说是学会更多各种新的控制能力。因此，这种延长能进一步地促进社会进步。

2．Habits as Expressions of Growth.

二、习惯——成长的表达

We have already noted that plasticity is the capacity to retain and carry over from prior experience factors which modify subsequent activities. This signifies the capacity to acquire habits, or develop definite dispositions. We have now to consider the salient features of habits. In the first place, a habit is a form of executive skill, of efficiency in doing. A habit means an ability to use natural conditions as means to ends. It is an active control of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control of the organs of action. We are perhaps apt to emphasize the control of the body at the expense of control of the environment. We think of walking, talking, playing the piano, the specialized skills characteristic of the etcher, the surgeon, the bridge-builder, as if they were simply ease, deftness, and accuracy on the part of the organism. They are that, of course;

but the measure of the value of these qualities lies in the economical and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environment which they secure. To be able to walk is to have certain properties of nature at our disposal—and so with all other habits.

我们已经说过，可塑性指的是利用过去的经验调控未来活动的能力。这就是说，可塑性乃是获得习惯，或是形成特定习性的能力。我们现在要研究习惯的主要特征。首先，习惯是一种执行能力的表现，是做事效率的表现。习惯也就是利用自然条件作为最终手段的能力，它通常通过控制动作器官而主动地控制环境。我们也许易于强调对身体的控制，而忽略对环境的控制。我们想到走路、交谈、弹钢琴，还有雕刻家、外科医生、桥梁建设者等的技能，好像这些技能不过是这些人行动的流畅、灵巧和精确的体现，当然，他们的确如此。但是，衡量这些特性的价值标准在于它们对环境经济而有效的控制。能够走路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支配某些天赋能力，所有其他习惯也是如此。

Education is not infrequently defined as consisting in the acquisition of those habits that effect an adjustment of an individual and his environment. The definition expresses an essential phase of growth. But it is essential that adjustment be understood in its active sense of control of means for achieving ends. If we think of a habit simply as a change wrought in the organism, ignoring the fact that this change consists in ability to effect subsequent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we shall be lead to think of 'adjustment' as a conformity to environment as wax conforms to the seal which impresses it. The environment is thought of as something fixed, providing in its fixity the end and standard of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organism; adjustment is just fitting ourselves to this fixity of external conditions. [5_2] Habit as habituation is indeed something relatively passive; we get used to our surroundings—to our

clothing, our shoes, and gloves; to the atmosphere as long as it is fairly equable; to our daily associates, etc. Conformity to the environment, a change wrought in the organism without reference to ability to modify surroundings, is a marked trait of such habituations. Aside from the fact that we are not entitled to carry over the traits of such adjustments (which might well be called accommodations, to mark them off from active adjustments) into habits of active use of our surroundings, two features of habituations are worth notice. In the first place, we get used to things by first using them.

人们常常把教育解释为获得能使个人适应环境的种种习惯。这个定义表述了成长中的重要阶段。但是，这个定义中的所谓适应，必须从主动控制达到目的的手段上来理解。如果我们仅把习惯看作是机体内的变化，不注重此种变化将会导致环境的相应变化，那么我们就会把此视为对环境的适应，就好像火漆和印在它上面的印章必须保持一致一样。环境被认作固定不变的东西，在其固定不变的过程中，导致了机体中变化的终结、形成了变化的标准；适应也只是让我们自身适应外部环境的固定性而已。[6_2] 习惯成自然确实是相对消极的事情；我们迎合周边的事物——我们的衣服、鞋子、手套；只要环境尚可接受，我们也会屈从于它；我们还迁就同事，这些都含有被动的性质。对环境一味迎合，只接受机体内的改变而不思改变环境，这是“习以为常”的明显特征。我们不能将这种适应的特征付诸对环境的积极利用中去（这也可以称作迁就，以区别于主动的适应）。除此之外，形成习惯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我们习惯某一事物是从使用它开始的。

Consider getting used to a strange city. At first, there is excessive stimulation and excessive and ill-adapted response. Gradually certain stimuli are selected because of their relevancy,

and others are degraded. We can say either that we do not respond to them any longer, or more truly that we have effected a persistent response to them—an equilibrium of adjustment. This means, in the second place, that this enduring adjustment supplies the background upon which are made specific adjustments, as occasion arises. We are never interested in changing the whole environment; there is much that we take for granted and accept just as it already is. Upon this background our activities focus at certain points in an endeavor to introduce needed changes. Habituation is thus our adjustment to an environment which at the time we are not concerned with modifying, and which supplies a leverage to our active habits.

试想我们如何习惯一个陌生的城市。开始时，我们碰到过多的刺激，会有过度的、消极的反应。渐渐地，一些反应因为更为适当，变得突出，而其余的逐渐退化。我们可以说是已经不再对它们有反应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已经对它们产生过了持续的适应——或称为适应平衡。这意味着，随着情况的变化，这种持续的适应提供了需要特定变化的背景，这就是“习以为常”的第二个特征。我们对改变整个环境毫无兴趣；对很多事情，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安之若素，接受现状。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活动集中在改变环境的某些方面，努力进行必要的改革。“习以为常”就是我们对当时我们还不准备改变的环境的适应，这种环境对我们的主动习惯还具有积极的影响。

Adaptation, in fine, is quite as much adap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o our own activities as of our activities to the environment. A savage tribe manages to live on a desert plain. It adapts itself. But its adaptation involves a maximum of accepting, tolerating, putting up with things as they are, a maximum of passive acquiescence, and a minimum of active control, of subjection to use.

A civilized people enters upon the scene. It also adapts itself. It introduces irrigation ; it searches the world for plants and animals that will flourish under such conditions; it improves, by careful selection, those which are growing there. As a consequence, the wilderness blossoms as a rose. The savage is merely habituated; the civilized man has habits which transform the environment. The significance of habit is not exhausted, however, in its executive and motor phase. It means formation of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disposition as well as an increase in ease, economy, and efficiency of action. Any habit marks an inclination—an active preference and choice for the conditions involved in its exercise. A habit does not wait, Micawber-like, for a stimulus to turn up so that it may get busy; it actively seeks for occasions to pass into full operation. If its expression is unduly blocked, inclination shows itself in uneasiness and intense craving. A habit also marks an intellectual disposition. Where there is a habit, there 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to which action is applied. There is a definite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habit operates. Modes of thought, of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enter as forms of skill and of desire into the habits that make a man an engineer, an architect, a physician, or a merchant. In unskilled forms of labor, the intellectual factors are at minimum precisely because the habits involved are not of a high grade. But there are habits of judging and reasoning as truly as of handling a tool, painting a picture, or conducting an experiment.

总之，所谓适应，既是我们对环境的适应，也是环境对我们适应。比如，野蛮部落若要设法在荒原上生存，它就需要自我适应。但是这一适应过程需要最大限度的接受、包容和忍受，最大限度的被动默许和最小限度的主动控制和利用环境。后来，文明部落出现了，他们同样也要自我适应。但他们要引进灌溉系统，寻找可以在该环境繁

衍生长的动植物；通过审慎的选择，改良正在那里生长的动植物。最终，荒原成为了乐土。野蛮部落只是顺应环境，形成习惯；而文明部落则有着改变环境的习惯。然而，习惯的重要性并不止于习惯的执行和动作的方面。习惯还意味着培养思维和情感倾向，以及增加动作的轻快、经济和效率。无论哪种习惯，都标志着一种能主动选择环境的倾向。习惯并不像米考伯式的人物,静候刺激的出现，然后才忙碌起来。习惯能让我们主动寻找机会，转入全面的运作。如果习惯的表现过分受阻，它就显出不自在的状态和强烈的渴望。习惯也包含智力倾向。哪里有习惯，哪里就有和行为相符的熟悉材料和设备。要了解产生习惯环境，也有特定的方法。思维、观察和反思模式以技能和愿望的方式变成习惯，使人成为工程师、建筑师、医生或商人。在不熟练的劳动中，智力的因素非常少，这正是因为所包含的习惯层次不高。但是，判断和推理的习惯与操纵工具、绘画或进行实验的习惯没有什么不同。

Such statements are, however, understatements. The habits of mind involved in habits of the eye and hand supply the latter with their significance. Above all, the intellectual element in a habit fixes the relation of the habit to varied and elastic use, and hence to continued growth. We speak of fixed habits. Well, the phrase may mean powers so well established that their possessor always has them as resources when needed. But the phrase is also used to mean ruts, routine ways, with loss of freshness, open-mindedness, and originality. Fixity of habit may mean that something has a fixed hold upon us, instead of our having a free hold upon things. This fact explains two points in a common notion about habits: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mechanical and external modes of action to the neglect of mental and moral attitudes, and the tendency to give them a bad meaning, an identification with “bad habits. " Many a person would feel surprised to have his aptitude in his chosen profession called a habit, and would naturally think of his use of

tobacco, liquor, or profane language as typical of the meaning of habit. A habit is to him something which has a hold on him, something not easily thrown off even though judgment condemn it.

但是，这种说法还不能充分表达实情。智力习惯包含了眼和手的习惯，这就使眼和手习惯的意义增加。首先，习惯的智力因素使习惯和各种不同的灵活运用的关系固定下来，因而也就与人的成长发生关系。我们常说的固定习惯也许意指我们所有的能力成为我们固定的资源，需要时可随时利用。但是，固定习惯也可指陈规陋习，缺乏新鲜感、开放性和创造性。固定习惯还可以指我们的思想被牢牢地束缚了，而我们却丧失了束缚力。这一事实说明了通常关于习惯的两点见解：一是把习惯等同于机械的外部行为，忽视智力和道德因素；二是贬低习惯，把它与“坏习惯”等同起来。很多人对他们所选择专业的心理倾向被称为习惯可能感到惊异，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吸烟、喝酒或使用亵渎的语言看作典型的习惯。对这种人来说，习惯是不易摆脱的，即使受到指责也不易丢掉。

Habits reduce themselves to routine ways of acting, or degenerate into ways of action to which we are enslaved just in the degree in which intelligence is disconnected from them. Routine habits are unthinking habits; “bad” habits are habits so severed from reason that they are opposed to the conclusions of conscious deliberation and decision. As we have seen, the acquiring of habits is due to an original plasticity of our natures: to our ability to vary responses till we find an appropriate and efficient way of acting. Routine habits, and habits that possess us instead of our possessing them, are habits which put an end to plasticity. They mark the close of power to vary. There can be no doubt of the tendency of organic plasticity, of the physiological basis, to lessen with growing years. The instinctively mobile and eagerly varying action of childhood,

the love of new stimuli and new developments, too easily passes into a “settling down,” which means aversion to change and a resting on past achievements. Only an environment which secures the full use of intelligence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habits can counteract this tendency. Of course, the same hardening of the organic conditions affects the physiological structures which are involved in thinking. But this fact only indicates the need of persistent care to see to it that the function of intelligence is invoked to its maximum possibility. The short-sighted method which falls back on mechanical routine and repetition to secure external efficiency of habit, motor skill without accompanying thought, marks a deliberate closing in of surroundings upon growth.

习惯可能沦为一成不变的行为方式，或奴役我们，让我们丧失智力。常规性的习惯就是不加思考的习惯；“坏”的习惯就是丧失理智，违反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所做出的决定。我们已经说过，习惯的养成归于我们天生拥有的可塑性，归于我们拥有做出各种反应的能力，直到发现一种有效的方法。一成不变制约我们而非我们可以控制的习惯会终结我们的可塑性，使我们丧失应变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可塑性和生理行为会逐渐衰退，这是不言而喻的。童年时代的本能好动和热衷于变化的倾向，以及对新的刺激和新的发展的爱好，很容易“固定下来”，很容易使人厌恶变革，满足于过去的成绩上。只有在养成习惯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智力才能抵制这种情况的发生。当然，人的逐渐衰老也影响其思维中包含的生理结构。但是，这更加证明需要经常关注最大限度利用智力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目光短浅，仅仅局限于机械的反复训练来获得效率很高的外表习惯或无意识的习惯性动作，那就是蓄意束缚人的成长。

3．The Educational Bearings of the Conception of Development.

三、发展概念上的教育意义

We have had so far but little to say in this chapter about education. We have been occupied with the condi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growth. If our conclusions are justified, they carry with them, however, definite educational consequences. When it is said that education is development, everything depends upon how development is conceived. Our net conclusion is that life is development, and that developing, growing, is life. Translated into its educational equivalents, this means (i) that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has no end beyond itself; it is its own end; and that (ii)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is one of continual reorganizing, reconstructing, transforming.

本章讲到这里，很少涉及教育。我们一直在讨论成长的条件和含义。但是，如果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它就包含明确的教育结果。当我们说教育是发展时，全看我们对发展一词怎样理解。我们的最后结论是，生活就是发展；不断发展，不断成长，就是生活。用教育术语来说，（1）教育的过程在其自身以外没有目的；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2）教育的过程是不断改组、不断改造和不断转化的过程。

1．Development when it is interpreted in comparative terms, that is, with respect to the special traits of child and adult life, means the direction of power into special channels: the formation of habits involving executive skill, definiteness of interest, and specific objects of observation and thought. But the comparative view is not final. The child has specific powers; to ignore that fact is to stunt or

distort the organs upon which his growth depends. The adult uses his powers to transform his environment, thereby occasioning new stimuli which redirect his powers and keep them developing. Ignoring this fact means arrested development, a passive accommodation. Normal child and normal adult alike, in other words, are engaged in grow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no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wth and no growth, but between the modes of growth appropriate to different condi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s devoted to coping with specific scientific and economic problems we may say the child should be growing in manhood. With respect to sympathetic curiosity, unbiased responsiveness, and openness of mind, we may say that the adult should be growing in childlikeness. One statement is as true as the other.

1．当我们用比较的观点，即从成年人和儿童的特性来解释发展时，所谓发展，就是将人的能力引入特别的渠道，如养成各种习惯，包括执行能力、明确的兴趣以及特定的观察和思维对象。但是，比较的观点并不是最终的。儿童具有特别的能力；忽视这个事实，便是阻碍或扭曲儿童成长所依靠的器官的发育。成年人利用其能力改造环境，因而引发许多新的刺激，而这些新的刺激再引导他的各种能力不断发展。忽视这个事实，发展就受阻挠，成为被动的适应。常态的儿童和常态的成年人是相似的，换言之，都在不断成长。他们之间的区别不是成长和不再成长，而是各有适合于不同情况的不同的成长方式。关于发展专门应付特殊的科学和经济问题的能力，我们认为，儿童应该向成年人看齐。关于同情心和好奇心，不偏不倚的反应和坦率的胸怀，我们认为，成年人应该向儿童学习。这两句话都同样正确。

Three ideas which have been criticized, namely, the merely privative nature of immaturity, static adjustment to a fixed

environment, and rigidity of habit, are all connected with a false idea of growth or development,—that it is a movement toward a fixed goal. Growth is regarded as having an end, instead of being an end. The educational counterparts of the three fallacious ideas are first, failure to take account of the instinctive or native powers of the young; secondly, failure to develop initiative in coping with novel situations; thirdly, an undue emphasis upon drill and other devices which secure automatic skill at the expense of personal perception. In all cases, the adult environment is accepted as a standard for the child. He is to be brought up to it.

我们在本章已经批评过三种观点：即把未成熟状态仅仅看作缺乏发展，把发展看作对固定环境的静止适应以及把习惯视为一成不变。这三种观点都与成长或发展的错误观点有关，都认为成长或发展乃是朝着一个固定方向运动，把成长视为有目的性的，而不是目的本身。它们在教育上相应的错误是：忽视儿童的本能的或先天的能力，忽视儿童应付新环境的首创精神，过分强调机械训练等的重要性，以牺牲个人洞察力来培养机械技能，把成年人的环境作为儿童的标准，企图使儿童达到成年人标准。

Natural instincts are either disregarded or treated as nuisances—as obnoxious traits to be suppressed, or at all events to be brought into conformity with external standards. Since conformity is the aim, what is distinctively individual in a young person is brushed aside, or regarded as a source of mischief or anarchy. Conformity is made equivalent to uniformity. Consequently, there are induced lack of interest in the novel, aversion to progress, and dread of the uncertain and the unknown. Since the end of growth is outside of and beyond the process of growing, external agents have to be resorted to induce movement towards it. Whenever a method

of education is stigmatized as mechanical, we may be sure that external pressure is brought to bear to reach an external end.

对于自然，人们不是漠视其本能，就是视之为厌恶之物，认为应该压制其可憎的特性、使之顺从外部的标准。由于把顺从看作目的，青年人的个性容易被忽视，或被看作调皮捣蛋或不守纪律的根源。顺从又被等同于千篇一律，这直接导致年轻人对新鲜事物缺乏兴趣，对进步表示反感，对不确定和未知事情感到恐惧。由于成长的目的在成长过程之外，要想超越不断成长的过程，就不得不借助外部力量。当有人批评某一教育方法为机械方法之时，我们可以肯定，这就是依靠外部压力来达到外部的目的。

2．Since in reality there is nothing to which growth is relative save more growth, there is nothing to which education is subordinate save more education. It is a commonplace to say that education should not cease when one leaves school. The point of this commonplace is that the purpose of school education is to insure the continuance of education by organizing the powers that insure growth. The inclination to learn from life itself and to make the conditions of life such that all will learn in the process of living is the finest product of schooling.

2．既然除了更快的成长，没有别的东西与成长有关，我们也可以说，除了更多的教育，没有别的东西与教育有关。我们常听人说，即使离开了学校，教育也不应该终止。这句话的意思是，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助人成长的组织机构保持教育的持久。学校教育的最好成果就是使人们乐于从生活本身中学习知识，并乐于提升生活条件，使人们在生活中学习。

When we abandon the attempt to define immaturity by means of fixed comparison with adult accomplishments, we are compelled to give up thinking of it as denoting lack of desired traits. Abandoning this notion, we are also forced to surrender our habit of thinking of instruction as a method of supplying this lack by pouring knowledge into a mental and moral hole which awaits filling. Since life means growth, a living creature lives as truly and positively at one stage as at another, with the same intrinsic fullness and the same absolute claims. Hence education means the enterprise of supplying the conditions which insure growth, or adequacy of life, irrespective of age. We first look with impatience upon immaturity, regarding it as something to be got over as rapidly as possible. Then the adult formed by such educative methods looks back with impatient regret upon childhood and youth as a scene of lost opportunities and wasted powers. This ironical situation will endure till it is recognized that living has its own intrinsic quality and that the business of education is with that quality.

当我们不再以成年人的成就来僵化地解释未成熟状态时，我们不得不抛弃成见，不再把未成熟的状态视为缺乏特性。抛弃成见，我们也就不得不放弃一种习惯，即把教学视为把知识灌进有待填充的心理和道德洞穴。生活就是成长，因此人在一个阶段的生活和在另一个阶段的生活是同样真实，同样积极的。这两个阶段的生活，同样丰富，同样重要。教育就是不问年龄大小，能够提供保证人的成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我们刚开始会对未成熟状态不耐烦，希望它愈快过去愈好。于是，在回顾儿童时期和青年时期时，用这种方法教育出来的成年人会感到无限遗憾，悔恨多次错失良机和浪费精力。只有承认生活有自己内在的品质，教育的任务在于提高这种品质，这种讽刺性的情境才不会再现。

Realization that life is growth protects us from that so-called idealizing of childhood which in effect is nothing but lazy indulgence. Life is not to be identified with every superficial act and interest. Even though 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tell whether what appears to be mere surface fooling is a sign of some nascent as yet untrained power, we must remember that manifestations are not to be accepted as ends in themselves. They are signs of possible growth. They are to be turned into means of development, of carrying power forward, not indulged or cultivated for their own sake. Excessive attention to surface phenomena (even in the way of rebuke as well as of encouragement) may lead to their fixation and thus to arrested development. What impulses are moving toward, not what they have been, is the important thing for parent and teacher. The true 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immaturity cannot be better put than in the words of Emerson, “Respect the child. Be not too much his parent. Trespass not on his solitude. But I hear the outcry which replies to this suggestion: Would you verily throw up the reins of public and private discipline; would you leave the young child to the mad career of his own passions and whimsies, and call this anarchy a respect for the child's nature? I answer,—Respect the child, respect him to the end, but also respect yourself…. The two points in a boy's training are, to keep his naturel and train off all but that; to keep his naturel, but stop off his uproar, fooling, and horseplay; keep his nature and arm it with knowledge in the very direction in which it points. " And as Emerson goes on to show this reverence for childhood and youth instead of opening up an easy and easy-going path to the instructors, “involves at once, immense claims on the time, the thought, on the life of the teacher. It requires time, use, insight, event, all the great lessons and assistances of God; and only to think of using it implies character and profoundness. "

认识到生活就是成长，能使我们避免把儿童时代视为无所事事，懒惰成性。不要把生活和一切表面的行为和兴趣混为一谈。尽管我们不能轻易断定，有些看似表面的玩笑是否就是某种未经训练的天生能力的征兆，但是我们必须牢记，不要把表面现象认为就是目的本身。它们只是可能的成长的征兆。我们，我们必须使其变为发展的手段，使能力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不必对之有意纵容或培育。过分注意表面现象（不管是用指责和鼓励的方式）可能使表面现象固化，从而阻碍儿童的发展。对家长和教师来说，重要的是关注儿童的哪些冲动仍在发展，而不是紧盯他们已往的冲动。在谈到尊重儿童的正确方法时，爱默生说得好："我们要尊重儿童。不要对他指手画脚。不要侵犯他独享的生活。但是对于此建议，我却听到有人叫嚷：你真要放弃教育训练的缰绳吗？你真的要让儿童恣意狂想，自得其乐，把这种无约束的状态称为尊重儿童的天性吗？我回答说，尊重儿童就是要完全尊重他的生活方式，但是也要尊重你自己。……关于儿童的训练，有两点需要注意：要保持儿童的天性，但是阻止他的喧嚷、胡闹和干蠢事。要保持儿童的天性，按照它所指出的方向，用知识把儿童的天性武装起来。"爱默生接着说，这种对儿童期和青年期的尊重，并没有为教师开辟一条清闲的道路，"反而立即对教师的时间、思想和生活提出巨大的要求。这需要时间，需要经常实践，需要远见卓识，需要事实的教育，还需要上帝的教诲与帮助。运用这样的教育方法需要高尚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

Summary.

总结

Power to grow depends upon need for others and plasticity. Both of these conditions are at their height in childhood and youth. Plasticity or the power to learn from experience means the

formation of habits. Habits give control over the environment, power to utilize it for human purposes. Habits take the form both of habituation, or a general and persistent balance of organic activities with the surroundings, and of active capacities to readjust activity to meet new conditions. The former furnishes the background of growth; the latter constitute growing. Active habits involve thought, invention, and initiative in applying capacities to new aims. They are opposed to routine which marks an arrest of growth. Since growth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life, education is all one with growing; it has no end beyond itself. The criterion of the value of school education is the extent in which it creates a desire for continued growth and supplies means for making the desire effective in fact.

人的成长要依靠别人的帮助，也有赖于自己的可塑性。这两种情况在儿童期和青年期达到顶点。可塑性或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就是习惯的形成。习惯使我们能控制环境并且能为了人类的利益利用环境。习惯有两种形式，一是习以为常的形式，为人类的活动和环境取得全面的、持久的平衡；另一种需要主动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新的情况。前一种习惯提供人成长的背景；后一种习惯促使人不断地成长。主动的习惯包含思维、发明和使自己的能力应用于新目标的首创精神。这种主动的习惯和以阻碍人的成长为标志的墨守成规正好相反。成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促使人不断成长；除此之外，教育没有别的目的。学校教育的价值标准在于创造持续成长的愿望并为之提供实现手段。

[5_1].Intimations of its significance are found in a number of writers, but John Fiske, in his "Excursions of an Evolutionist," is accredited with its first systematic exposition.

[5_2].This conception is, of course, a logical correlate of the conceptions of the external relation of stimulus and response, considered in the last chapter, and of the

negative conceptions of immaturity and plasticity noted in this chapter.

[6_1].这种意义的暗示在很多作家的作品中都能够发现，但是约翰·费斯克，在他《进化论者涉足的领域》一书中，把这个归结于第一次系统地阐述。

[6_2].当然这种概念与外在刺激和反应的内在概念有逻辑上的相互关联。我们在前一章提到过，在本章中涉及到了未成熟性和可塑性的否定概念。

Chapter 5 Preparation, Unfolding, And Formal Discipline

第五章　准备，展开和形式训练

1．Education as Preparation.

一、教育以做好准备

We have laid it down that the educative process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growth, having as its aim at every stage an added capacity of growth. This conception contrasts sharply with other ideas which have influenced practice. By making the contrast explicit, the meaning of the conception will be brought more clearly to light. The first contrast is with the idea that education is a process of preparation or getting ready. What is to be prepared for is, of course,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privileges of adult life. Children are not regarded as social members in full and regular standing. They are looked upon as candidates; they are placed on the waiting list. The conception is only carried a little farther when the life of adults is considered as not having meaning on its own account, but as a preparatory probation for “another life. " The idea is but another form of the notion of the negative and privative character of growth already criticized; hence we shall not repeat the criticisms, but pass on to the evil consequences which flow from putting education on this basis.

上文已经提到，教育是受教育者不断成长的过程，受教育者要在

各个教育阶段实现增幅成长的目的。可是那些对教育实践已产生深刻影响的理念却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经过对比，这一理念的真正含义也会更加明了。教育就是做准备的过程，准备好去承担成年人的责任，享受成年人的权力。儿童并非享有正式地位的社会成员。只能作为候选人慢慢等待。这一观念延续时间不长，因为人们意识到成年人生活本身意义不大，只是在为“另一种生活”做准备。这种把教育视为准备的观念只是我们曾经批评过的成长消极负面论的翻版，我们将不再重复批判内容，而是进而研究这种教育观念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

In the first place, it involves loss of impetus. Motive power is not utilized. Children proverbially live in the present; that is not only a fact not to be evaded, but it is an excellence. The future just as future lacks urgency and body. To get ready for something, one knows not what nor why, is to throw away the leverage that exists, and to seek for motive power in a vague chanc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re is, in the second place, a premium put on shilly-shallying and procrastination. The future prepared for is a long way off; plenty of time will intervene before it becomes a present. Why be in a hurry about getting ready for it? The temptation to postpone is much increased because the present offers so many wonderful opportunities and proffers such invitations to adventure. Naturally attention and energy go to them; education accrues naturally as an outcome, but a lesser education than if the full stress of effort had been put upon making conditions as educative as possible. A third undesirable result is the substitution of a conventional average standard of expectation and requirement for a standard which concerns the specific powers of the individual under instruction. For a severe and definite judgment based upon the strong and weak points of the individual is substituted a vague and wavering opinion concerning what youth may be expected, upon the average, to become in some more or less remote future;

say, at the end of the year, when promotions are to take place, or by the time they are ready to go to college or to enter upon what, in contrast with the probationary stage, is regarded as the serious business of life. It is impossible to overestimate the loss which results from the deflection of attention from the strategic point to a comparatively unproductive point. It fails most just where it thinks it is succeeding—in getting a preparation for the future.

首先，这将削弱教育的动力，导致教育的原动力得不到利用。众所周知，儿童生活在当今，这不仅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也是件好事。未来只是未来，它没有紧迫感，也不可预见。应该为未来做什么准备，为什么要做准备，人们都不清楚，这就好像是在放弃现有的力量而去追求那些机会渺茫的原动力。于是，这种情况就助长了人们迟疑不定和犹豫不决。精心准备的未来遥不可及，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为现实。既然如此，为何要急于为未来做准备呢？当今有许多大好机会吸引着人们去发现探索，越来越多的诱惑让人不再急于为未来做准备。人们集中精力，自然能够达到良好的教育成果，反之倘若在教育条件上苦费心机则效果欠佳。另一不良后果就是取代传统的期望和要求，要求受教育者达到特殊的标准。基于个人优缺点做出的判断本来就很严谨而明确，现在却代之以模糊不定的观念，奢望年轻人在遥远的未来能做出成就，比如：年终得到提升，顺利升学、开始担任与试用期不同的重要工作等。这种将注意力从战略性层面转到相对狭窄层面所造成的损失显而易见。其实，这种教育理念最失败之处就是自以为成功地为未来做好了准备。

Finally, the principle of preparation makes necessary recourse on a large scale to the use of adventitious motives of pleasure and pain. The future having no stimulating and directing power when severed from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resent, something must be hitched on to it to make it work. Promises of reward and threats of

pain are employed. Healthy work, done for present reasons and as a factor in living, is largely unconscious. The stimulus resides in the situation with which one is actually confronted. But when this situation is ignored, pupils have to be told that if they do not follow the prescribed course penalties will accrue; while if they do, theymay expect, some time in the future, rewards for their present sacrifices. Everybody knows how largely systems of punishment have had to be resorted to by educational systems which neglect present possibilities in behalf of preparation for a future. Then, in disgust with the harshness and impotency of this method, the pendulum swings to the opposite extreme, and the dose of information required against some later day is sugar-coated, so that pupils may be fooled into taking something which they do not care for.

最后，这种“教育是准备”的理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悲痛和快乐所激发的偶然动力。一旦脱离了现实可能性，未来就失去了动力和方向。要让人们重新拾起动力，需要做出另外的努力。比如：许诺奖励，以痛苦作威胁。为了现在的缘故和为了生活的需要而做的有益于健康的工作，大部分是无意识的。然而，动力却隐藏于人们实际所处的环境中。如果忽略这个情境，我们就必须告知学生，如果他们不按规定行事，就会受到惩罚；反之，如果他们按规定的方法做，就可以在将来一定时间获得奖励，以补偿现在的牺牲。人们都清楚，为未来做准备，却忽视现实可能的教育体制依附的就是惩罚手段。然而，在对这种教育方法的残酷无效深感厌恶时，事情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们为未来所需要的知识被包上了糖衣，以便哄骗学生，劝他们学习他们本来厌恶的东西。

It is not of course a question whether education should prepare for the future. If education is growth, it must progressively realize

present possibilities, and thus make individuals better fitted to cope with later requirements. Growing is not something which is completed in odd moments; it is a continuous leading into the future. If the environment, in school and out, supplies conditions which utilize adequately the present capacities of the immature, the future which grows out of the present is surely taken care of. The mistake is not i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preparation for future need, but in making it the mainspring of present effort. Because the need of preparation for a continually developing life is great, it is imperative that every energy should be bent to making the present experience as rich and significant as possible. Then as the present merges insensibly into the future, the future is taken care of.

当然，问题并不是教育应不应该为未来做好准备。倘若说教育是培养人才，它就必须前瞻性地看到现实可能性，从而使受教育者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需要。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时半会儿无法完成。如果校内校外的环境能提供条件来恰当利用儿童现有能力，那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未来自然是有保障的。此教育理念的错误并不在强调为未来做准备，而是将未来视为现实努力的主要动力。由于人们急需做好准备，谋求不断改善今后的生活，他们必须努力让现实的经验尽可能的丰富而有意义。如此，当现实不知不觉地与未来融为一体时，未来便自然有了保障。

2．Education as Unfolding.

二、以教育为发展

There is a conception of education which professes to be based

upon the idea of development. But it takes back with one hand what it proffers with the other. Development is conceived not as continuous growing, but as the unfolding of latent powers toward a definite goal. The goal is conceived of as completion, perfection. Life at any stage short of attainment of this goal is merely an unfolding toward it. Logically the doctrine is only a variant of the preparation theory. Practically the two differ in that the adherents of the latter make much of the practical and professional duties for which one is preparing, while the developmental doctrine speaks of the ideal and spiritual qualities of the principle which is unfolding. The conception that growth and progress are just approximations to a final unchanging goal is the last infirmity of the mind in its transition from a static to a dynamic understanding of life. It simulates the style of the latter. It pays the tribute of speaking much of development, process, progress. But all of these operations are conceived to be merely transitional; they lack meaning on their own account. They possess significance only as movements toward something away from what is now going on. Since growth is just a movement toward a completed being, the final ideal is immobile. An abstract and indefinite future is in control with all which that connotes in depreciation of present power and opportunity.

有一种以发展观为基础的教育理论奉行“一手送出，一手拿回”。发展不再被视作持续不断地成长，而是为了奔向既定目标表现出的潜在力量的爆发。人们设想的这一目标既完整又完美无瑕。即使生命中没有确立这样的目标，也是向着这一目标在发展。从逻辑上来说，该理论为“教育是做好准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实际上，两种理论的区别在于，“教育是做好准备”的追随者重视青年正在准备的实际的和专业的职责，而强调“教育是发展”的人则提到正在展开的原则具有理想的和精神的特性。有人认为成长和进步只不过是一步步接近终极目标，这种观点是人的思想从静止人生观转向能动人生观时表现出的最

后一个弱点。持该观点的人模拟能动的生活方式，鼓励发展，表彰过程和赞扬进步。但是发展和进步被视为过渡性的，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有他们向着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时，才具有意义。成长是为了实现人的完善的运动，最终的理想是不变的。一个抽象不定的将来控制着一切暗含贬低现有能力和机会的观念。

Since the goal of perfection, the standard of development, is very far away, it is so beyond us that, strictly speaking, it is unattainable. Consequently, in order to be available for present guidance it must be translated into something which stands for it. Otherwise we should be compelled to regard any and every manifestation of the child as an unfolding from within, and hence sacred. Unless we set up some definite criterion representing the ideal end by which to judge whether a given attitude or act is approximating or moving away, our sole alternative is to withdraw all influences of the environment lest they interfere with proper development. Since that is not practicable, a working substitute is set up. Usually, of course, this is some idea which an adult would like to have a child acquire. Consequently, by “suggestive questioning” or some other pedagogical device, the teacher proceeds to “draw out” from the pupil what is desired. If what is desired is obtained, that is evidence that the child is unfolding properly. But as the pupil generally has no initiative of his own in this direction, the result is a random groping after what is wanted, and the formation of habits of dependence upon the cues furnished by others. Just because such methods simulate a true principle and claim to have its sanction they may do more harm than would outright “telling,” where, at least, it remains with the child how much will stick.

完美的目标，发展的标准太过遥远，无法企及。所以，要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完美的目标就必须化为另一种替代品。否则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把儿童的任何表现都当成内部品质的发展，神圣不可侵犯。如果我们不确立一种能说明最终理想的标准，借以判断某种态度或行为是在接近还是背离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消除影响环境的因素，以免阻碍正当的发展。实际上，这种办法并不实际，因此取而代之的行动方式便应运而生。通常，大人们希望孩子也能有这样的想法。因此，老师会用“启发性的提问”或其他的教育方法从孩子那里“引出”自己所希望的回答。如果得到了所希望的回答，就意味着孩子发展良好。但一般情况下，学生在这方面都缺乏主动性，最后也只是盲目寻找想要的东西，养成依靠别人发现线索的习惯。由于这一方法效仿正确原则，且自称获得认可，这种方法可能比直截了当地告诉儿童造成更大的危害。采用直接告诉儿童的方法，至少他们可以有自由决定的权利。

Within the sphere of philosophic thought there have been two typical attempts to provide a work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absolute goal. Both start from the conception of a whole—an absolute—which is “immanent” in human life. The perfect or complete ideal is not a mere ideal; it is operative here and now. But it is present only implicitly, “potentially,” or in an enfolded condition. What is termed development is the gradual making explicit and outward of what is thus wrapped up. Froebel and Hegel, the authors of the two philosophic schemes referred to, have different ideas of the path by which the progressive realization or manifestation of the complete principle is effected. According to Hegel, it is worked out through a serie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s which embody the different factors in the Absolute. According to Froebel, the actuating force is the presentation of symbols, largely mathematical, corresponding to the essential traits of the Absolute. When these are presented to the child, the Whole, or perfection, sleeping within him, is awakened. A

single example may indicate the method. Every one familiar with the kindergarten is acquainted with the circle in which the children gather. It is not enough that the circle is a convenient way of grouping the children. It must be used “because it is a symbol of the collective life of mankind in general. "

在哲学界，曾经出现过两次代表性的尝试，要给最终目标塑造实际操作典型。两次尝试都是从整体观念出发，而这种整体观念是生命中内在的一种绝对值。完美无瑕或完整的理想不只是一种梦想，此时此刻它就在起着作用。只不过，这种理想存在的形式是含蓄的，潜在的，或者处于被掩盖状态。所谓发展就是慢慢阐释被掩盖的事情，使其外露。作为两大哲学体系的创始人，福禄培尔和黑格尔对于如何逐步实现这个完美原则的途径看法不同。黑格尔认为，它是通过一系列能够体现绝对中的多种不同因素的历史制度实现的。而福禄培尔则以为，实现这个完善原则的力量是给儿童看到与绝对真理重要特性相对应的数学符号。当这些符号呈现在儿童面前时，潜伏在内心的完美整体的梦会被唤醒。这一点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每一个熟悉幼儿园的人都熟悉儿童围成的圆圈。但不单单是为了将儿童分组我们才提及圆圈。我们必须采用圆圈模式，“因为它是普通人类集体生活的象征”。

Froebel's recogni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ative capacities of children, his loving attention to them, and his influence in inducing others to study them, represent perhaps the most effective single force in modern educational theory in effecting widespread acknowledgment of the idea of growth. But his formulation of the notion of development and his organization of devices for promoting it were badly hampered by the fact that he conceived development to be the unfolding of a ready-made latent principle. He failed to see that growing is growth, developing is development,

and consequently placed the emphasis upon the completed product. Thus he set up a goal which meant the arrest of growth, and a criterion which is not applicable to immediate guidance of powers, save through translation into abstract and symbolic formulae.

现代教育理论里，关于成长的理论中得到普遍认可的，也许莫过于福禄培尔对儿童天赋能力重要性的认可，他对儿童的热情关怀，以及他在劝导他人研究儿童方面所起的作用。但是，福禄培将发展理解为现成潜在原则的展开，这严重妨碍了他对发展概念的阐释，阻碍了他推动发展论的组织工作。他未能看到，不断的成长就是成长，持续的进步就是发展，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最终的梦想上。结果，他树立的目标不利于成长，他确立的标准要转化为抽象符号公式才能间接引导各种能力的发展。

A remote goal of complete unfoldedness is, in technical philosophic language, trancendental. That is, it is something apart from direct experience and perception. So far as experience is concerned, it is empty; it represents a vague sentimental aspiration rather than anything which can be intelligently grasped and stated. This vagueness must be compensated for by some a priori formula. Froebel mad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crete facts of experience and the transcendental ideal of development by regarding the former as symbols of the latter. To regard known things as symbols, according to some arbitrary a priori formula—and every a priori conception must be arbitrary—is an invitation to romantic fancy to seize upon any analogies which appeal to it and treat them as laws. After the scheme of symbolism has been settled upon, some definite technique must be invented by which the inner meaning of the sensible symbols used may be brought home to children. Adults being the formulators of the symbolism are

naturally the authors and controllers of the technique. The result was that Froebel's love of abstract symbolism often got the better of his sympathetic insight; and there was substituted for development as arbitrary and externally imposed a scheme of dictation as the history of instruction has ever seen.

完全发展的目标遥不可及，套用专门的哲学术语，就是先验的。也就是说，这种目标脱离了直接经验和感知。就经验而论，这种目标是空洞的，它只能说明一种模糊的情感渴望，即使有足够的理智也无法领会和说明。所以，该理论要用某种先验公式来弥补这一模糊性。通过将具体的实战经验当作先验发展理想的外显符号，福禄培尔使二者联系到一起。根据无规律的先验公式（每一个先验的概念都是任意的）将已知事物看作某种象征。这一方法容易促发浪漫的奇想，捕捉引起幻想的任何相似的东西，并且把它们当作一般规律。既然象征主义系统已经建立，就有必要探索出一些具体的方法，帮助儿童理解感觉符号的内在意义。成年人作为象征主义的缔造者，自然要负责方法的探索和管理。结果，福禄培尔对抽象象征主义的偏爱，往往胜过他富于同情心的真知灼见，也使得教育史上首次出现了以武断的外部施压的模式取代发展。

With Hegel the necessity of finding some working concrete counterpart of the inaccessible Absolute took an institutional, rather than symbolic, form. His philosophy, like Froebel's, marks in one direction an indispensable contribution to a valid conception of the process of life. The weaknesses of an abstract individualistic philosophy were evident to him; he saw the impossibility of making a clean sweep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s, of treating them as despotisms begot in artifice and nurtured in fraud. In hi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ulminated the efforts of a whole series of German writers—Lessing, Herder, Kant, Schiller, Goethe—to

appreciate the nurturing influence of the great collective institutional products of humanity. For those who learned the lesson of this movement, it was henceforth impossible to conceive of institutions or of culture as artificial. It destroyed completely—in idea, not in fact—the psychology that regarded “mind” as a ready-made possession of a naked individual by showing the significance of “objective mind”—language, government, art, religion—in the formation of individual minds. But since Hegel was haunted by the conception of an absolute goal, he was obliged to arrange institutions as they concretely exist, on a stepladder of ascending approximations. Each in its time and place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because a stage in the self-realizing process of the absolute mind. Taken as such a step or stage, its existence is proof of its complete rationality, for it is an integral element in the total, which is Reason. Against institutions as they are, individuals have no spiritual rights;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nurture, consist in obedient assimilation of the spirit of existing institutions. Conformity, not transformation, is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hange as history shows; but their change,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s, is the work of the “world-spirit. " Individuals, save the great “heroes” who are the chosen organs of the world-spirit, have no share or lot in it. In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 this type of idealism was amalgamated with the doctrine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Evolution” was a force working itself out to its own end. As against it, or as compared with it, the conscious ideas and preference of individuals are impotent. Or, rather, they are but the means by which it works itself out. Social progress is an “organic growth,” not an experimental selection. Reason is all powerful, but only Absolute Reason has any power.

然而，黑格尔认为，要给难以企及的绝对物找到相对应的实体，

得采取制度的形式而非象征的形式。和福禄培尔哲学一样，黑格尔的哲学也是在某一个方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实现了生命过程概念的合理化。一方面，他很清楚抽象个人主义哲学的缺陷；另一方面，他也深知彻底扫除各种历史制度，将历史体制看成生于诡计，长于欺诈的专制主义是不可能的。黑格尔在其历史和社会哲学中，总结了一系列德国作家的努力，例如莱辛、赫尔德、康德、席勒、歌德，高度评价了伟大人类集体制度产物的教育力量。从此，凡是了解此运动的人都不会把制度或文化视为后天人为的创造。通过成功的阐释“客观精神”——包括语言，政府，艺术，宗教，在个人思想形成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该运动从思想而非事实上彻底摧毁了把“精神”看作纯个人所属的哲学。可是，黑格尔深深迷恋于绝对目标的概念，他必须将各种体制按它们的实际状况依次排放，来表明它们接近绝对目标的程度。在时空上，每一级阶梯都是绝对必需的，因为每一级阶梯都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种阶梯的存在说明它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是整体理性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体制中，个人谈不上精神权利，就连个人发展和教化都取决于对现存体制精神的恭顺同化。教育的本质是顺从，而不是改造。历史表明，各种社会体制都会发生变化，不过，制度的变化，国家的兴亡，都属“世界精神”的范畴。个人根本没份儿参与，除非你是伟大的英雄人物，被选为“世界精神”喉舌。19世纪末期，这一唯心论与生物进化论结合在一起。“进化”其实是事物本身达到自我目标的一种力量。与进化的力量相比，个人有意识的观念和喜好根本无能为力。或者，更确切地说，个人只是进化成就自我的工具罢了。社会进步是一种“有机体的发展”，不是实验选择。理性固然很强大，但是，只有绝对理性才有力量。

The recognition (or rediscovery, for the idea was familiar to the Greeks) that great historic institutions are active factors in the intellectual nurture of mind wa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t indicated a genuine advance beyond Rousseau, who had marred his assertion that education must be a natural development and not something forced or grafted upon individuals

from without, by the notion that social conditions are not natural. But in its notion of a complete and all-inclusive end of development, the Hegelian theory swallowed up concrete individualities, though magnifying The Individual in the abstract. Some of Hegel's followers sought to reconcile the claims of the Whole and of individuality by the conception of society as an organic whole, or organism. That social organization is presupposed in the adequate exercise of individual capacity is not to be doubted. But the social organism, interpreted after the relation of the organs of the body to each other and to the whole body, means that each individual has a certain limited place and function, requiring to be supplemented by the place and functions of the other organs. As one portion of the bodily tissue is differentiated so that it can be the hand and the hand only, another, the eye, and so on, all taken together making the organism, so one individual is supposed to be differentiated for the exercise of the mechanical operations of society, another for those of a statesman, another for those of a scholar, and so on. The notion of 'organism' is thus used to give a philosophic sanction to class distinctions in social organization—a notion which in its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again means external dictation instead of growth.

教育哲学的突出贡献在于，人们认识到了伟大的历史制度在对思想进行培养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重新发现，因为这是希腊人熟悉的概念）。这种观念表明它比卢梭进步，因为卢梭强调的观点妨碍了自己的主张，比如他认为社会条件不是天然的，教育不该是外部强加或转移给个人的，应该是自然发展。黑格尔的理论也有缺陷。黑格尔认为，人的发展目的是完整的，且包罗万象，这种理论虽然抽象地夸大个人，却淹没了具体的个性。部分黑格尔理论追随者试图通过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或有机体来平衡整体和个性的要求。社会组织必须以个人能力的适当运用为前提，这是毋庸置疑

的。但是，如果按身体器官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身体器官与整个身体的关系来解释社会有机体，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地位和功能都是有限的，需要利用其他器官的地位和功能来加以补充。譬如身体组织的一部分被区分开来，它可能是手，而且只能是手，另一部分可能是眼睛等，身体各部分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有机体。说到社会，可以让人各司其职，一个人负责社会的机械运行，另一个人管理政治工作，还有人来完成学者的工作等。因而这种“有机体”的概念被借以为社会组织的阶级差别提供哲学认可。此概念在教育上的应用又意味着外来的命令，而不是自然的成长。

3．Education as Training of Faculties.

三、教育即能力的训练

A theory which has had great vogue and which came into existence before the notion of growth had much influence is known as the theory of 'formal discipline. ' It has in view a correct ideal; one outcome of education should be the creation of specific powers of accomplishment. A trained person is one who can do the chief things which it is important for him to do better than he could without training: 'better' signifying greater ease, efficiency, economy, promptness, etc. That this is an outcome of education was indicated in what was said about habits as the product of educative development. But the theory in question takes, as it were, a short cut; it regards some powers (to be presently named) as the direct and conscious aims of instruction, and not simply as the results of growth. There is a definite number of powers to be trained, as one might enumerate the kinds of strokes which a golfer has to master. Consequently education should get directly at the business of

training them. But this implies that they are already there in some untrained form; otherwise their creation would have to be an indirect product of other activities and agencies. Being there already in some crude form, all that remains is to exercise them in constant and graded repetitions, and they will inevitably be refined and perfected. In the phrase 'formal discipline' as applied to this conception, 'discipline' refers both to the outcome of trained power and to the method of training through repeated exercise.

在成长说产生重大影响以前，就已经流行着另外一种理论，叫“形式训练”。该理论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即教育应该赋予人们取得成功的特殊能力。与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相比，受过培训的人从事关乎切身利益的重大事情时应该更为出色。所谓“更为出色”是指做事更加娴熟，更有效率，更加经济，更加敏捷等。早在讨论习惯是教育发展产物时，我们就暗示教育会产生这样效果。不过这一理论好像要取一条捷径：它将发展某些个人能力视为直接且有意识的教学目标，而非仅仅视为成长的结果。人们需要训练培养的能力有好多种，就像高尔夫球手必须掌握多种打法一样。所以教育应该直接以训练这些能力为目的。但这就意味着，能力在培训之前就已经存在，否则，这些能力只可能是其他活动和方法的间接产物。既然这些能力已经存在，只是缺少雕琢训练，教育要做的事就是对这些能力进行分层次不间断的反复锻炼，这必然会使这些能力得到完善。在“形式训练”一词中，所谓“训练”既指对能力训练所得的结果，也指反复练习的训练方法。

The forms of powers in question are such things as the faculties of perceiving, retaining, recalling, associating, attending, willing, feeling, imagining, thinking, etc. , which are then shaped by exercise upon material presented. In its classic form, this theory was expressed by Locke. On the one hand, the outer world presents the material or content of knowledge through passively received

sens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mind has certain ready powers, attention, observation, retention, comparison, abstraction, compounding, etc. Knowledge results if the mind discriminates and combines things as they are united and divided in nature itself. But the important thing for education is the exercise or practice of the faculties of the mind till they become thoroughly established habitudes. The analogy constantly employed is that of a billiard player or gymnast, who by repeated use of certain muscles in a uniform way at last secures automatic skill. Even the faculty of thinking was to be formed into a trained habit by repeated exercises in making and combining simple distinctions, for which, Locke thought, mathematics affords unrivaled opportunity.

我们所说的能力指的是经由训练而形成的感官能力，如知觉、记忆、回忆、联想、注意、意愿、感觉、想象、思维能力等。洛克以经典的形式阐释了这一理论。他认为，一方面，我们深感在被动接收外部世界提供给我们的素材和知识；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头脑中拥有一些与生俱来的能力，比如：注意、观察、记忆、比较、抽象、组合能力等。如果大脑能按照事物自然界的分布状况，对之加以甄别和组合，这就形成了知识。不过，对教育来说，重要的事情是反复训练这些感官功能使之成为固定的习惯。常有人把感官能力的训练与玩弹子游戏或做体操进行类比，只要反复练习，最终就能水到渠成。通过反复的简单拆分与组合训练，人的思维能力也能养成训练有素的习惯。洛克认为，数学对此可以提供无与伦比的机会。

Locke's statements fitted well into the dualism of his day. It seemed to do justice to both mind and matter,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orld. One of the two supplied the matter of knowledge and the object upon which mind should work. The other supplied definite mental powers, which were few in number and which might be

trained by specific exercises. The scheme appeared to give due weight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knowledge, and yet it insisted that the end of education is not the bare reception and storage of information, but the formation of personal powers of attention, memory, observation, abstraction, and generalization. It was realistic in its emphatic assertion that all material whatever is received from without; it was idealistic in that final stress fell upon the formation of intellectual powers. It was objective and impersonal in its assertion that the individual cannot possess or generate any true ideas on his own account; it was individualistic in placing the end of education in the perfecting of certain faculties possessed at the outset by the individual. This kind of distribution of values expressed with nicety the state of opinion in the generations following upon Locke. It became, without explicit reference to Locke, a commonplace of educational theory and of psychology. Practically, it seemed to provide the educator with definite, instead of vague, tasks. It made the elaboration of a technique of instruction relatively easy. All that was necessary was to provide for sufficient practice of each of the powers. This practice consists in repeated acts of attending, observing, memorizing, etc. By grading the difficulty of the acts, making each set of repetitions somewhat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set which preceded it, a complete scheme of instruction is evolved. There are various ways, equally conclusive, of criticizing this conception, in both its alleged foundations and in its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洛克的主张正好顺应了当时流行的二元论，兼顾了意识与物质，个体和世界。其中之一提供思维活动需要的知识素材和物体，而另外一个则提供特定的心理能力。这些心理能力虽然为数不多，却可以通过特别的练习进行训练。该方案似乎注重知识素材，但也强调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和储存，而是在于形成注意、记忆、观

察、抽象和概括等个人能力。该方案因为强调一切素材取之于外界，使其具有现实主义色彩，而另一方面，它也有理想主义色彩，强调最终需要形成智力。该方案具有客观性，不带个人色彩，坚持个体无法单凭个人力量获得真知灼见；但同时它又是个人主义的，主张教育是为了完善个人固有的能力。这种价值分配准确地表达了洛克之后几代人的看法。不必明白地引证洛克，这种看法已成为教育理论和心理学的常识。实际上，这种看法似乎给教师提出了明确无误的任务，使教育方法的制定和研究也变得相对简单。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让每一种个人能力得到足够的训练，这种训练就是使学生反复运用其注意、观察、记忆等能力。当然，我们需要将重复行为按难易程度分级，保证第二次动作比第一次的难度大，这样就催生了一整套完整的教学方案。该方案宣称的基本原则及在教育的应用中遭到了诸多批评。

(1) Perhaps the most direct mode of attack consists in pointing out that the supposed original faculties of observation, recollection, willing, thinking, etc. , are purely mythological. There are no such ready-made powers waiting to be exercised and thereby trained. There are, indeed, a great number of original native tendencies, instinctive modes of action, based on the original connections of neurones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ere are impulsive tendencies of the eyes to follow and fixate light; of the neck muscles to turn toward light and sound; of the hands to reach and grasp; and turn and twist and thump; of the vocal apparatus to make sounds; of the mouth to spew out unpleasant substances; to gag and to curl the lip, and so on in almost indefinite number. But these tendencies (a) instead of being a small number sharply marked off from one another, are of an indefinite variety, interweaving with one another in all kinds of subtle ways, (b) Instead of being latent intellectual powers, requiring only exercise for their perfecting, they are tendencies to respond in certain ways to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so as to bring about other changes. Something in the

throat makes one cough; the tendency is to eject the obnoxious particle and thus modify the subsequent stimulus. The hand touches a hot thing; it is impulsively, wholly unintellectually, snatched away. But the withdrawal alters the stimuli operating, and tends to make them more consonant with the needs of the organism. It is by such specific changes of organic activities in response to specific changes in the medium that that control of the environment of which we have spoken (see ante, p. 29) is effected. Now all of our first seeings and hearings and touchings and smellings and tastings are of this kind. In any legitimate sense of the words mental or intellectual or cognitive, they are lacking in these qualities, and no amount of repetitious exercise could bestow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of observation, judgment, or intentional action (volition) upon them.

（1）最直接的抨击也许在于指出观察、回忆、决心、思维等假定的原始感官能力纯属虚构，根本不存在等待训练的现成能力，更谈不上得到训练。凭借体内中枢神经系统里神经元的原始连接，人类的确拥有很多与生俱来的天赋倾向和各种本能的行为方式。譬如，我们的眼睛会不由自主地追随并定格在光线上，我们的脖子会自动转向发光发声的方向，我们的双手会主动去抓取、旋转、扭曲和锤击物体，我们的发音器官有自动发声的冲动，我们的口会自动吐出不适之物，我们能张嘴，撅嘴等。但是，这些行为倾向并不是数量稀少且彼此存在天壤之别，而是数量繁多，可以通过各种微妙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另外，这些倾向并不是潜在的智能，通过练习就可以加以完善，它们只是以一定的方式来回应环境中产生的变化，从而引起其他的改变。比如，喉咙被东西卡住了，不舒服，人就会咳嗽，就有冲动把它吐出来，因此也会主动改变原来的刺激。再比如，手碰到烫的东西就会反射性地缩回来。但是手一旦缩回，刺激就会发生改变，并与人体的需要更为和谐。正是通过改变人的行为来应对环境中的特定变化，我们实现了环境的控制（请参见原书24页）。我们最初的一切所见、

所闻、触摸、嗅觉和味觉都属此类倾向。由于这类动作不具有精神、理智或认知特性，无论经过多少次的反复练习，也无法赋予它们观察、判断或有意识行为（意志）的智力特性。

(2) Consequently the training of our original impulsive activities is not a refinement and perfecting achieved by 'exercise' as one might strengthen a muscle by practice. It consists rather (a) in selecting from the diffused responses which are evoked at a given time those which ar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utilization of the stimulus. That is to say, among the reactions of the body in general [6_1] and the hand in particular which instinctively occur upon stimulation of the eye by light, all except those which are specifically adapted to reaching, grasping, and manipulating the object effectively are gradually eliminated—or else no training occurs. As we have already noted, the primary reactions, with a very few exceptions, are too diffused and general to be practically of much use in the case of the human infant. Hence the identity of training with selective response. (Compare p. 30.) (b) Equally important is the specific coordination of different factors of response which takes place. There is not merely a selection of the hand reactions which effect grasping, but of the particular visual stimuli which call out just these reactions and no others, and an establishment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But the coordinating does not stop here. Characteristic temperature reactions may take place when the object is grasped. These will also be brought in; later, the temperature reaction may be connected directly with the optical stimulus, the hand reaction being suppressed—as a bright flame, independent of close contact, may steer one away. Or the child in handling the object pounds with it, or crumples it, and a sound issues. The ear-response is then brought into the system of response. If a certain sound (the conventional name) is made by

others and accompanies the activity, response of both ear and the vocal apparatus connected with auditory stimulation will also become an associated factor in the complex response. [6_2]

（2）因此，对原始冲动行为进行训练不同于人们通过练习强壮肌肉，不能单凭训练就能得到完善。这种训练包括：第一，从特定时间产生的各种散漫反应中，选择出那些能特别随机应变利用刺激的反应。比如，眼睛受到光线刺激时，我们的身体 [7_1] 尤其是手会本能地做出反应。我们要在这些反应里选择那些特别能顺势有效地接近、抓住和控制物体的动作，其余不能随机应变的动作则应排除。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训练的目的。前面已经强调过，除了个别例子外，最初的反应都过于散漫，宽泛，对儿童没有什么帮助。因此，训练其实就是选择性的反应。（请参见21页）第二，和选择作用同等重要的，是各种反应组成因素间的特殊协调作用。譬如，我们的眼睛受到光刺激时，我们不但要用手做出反应，以便有效抓住东西，还要选择能恰好引起这些反应，而不引起其他反应的特殊视觉刺激，并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但是，协调作用远非如此。当我们用手抓住物体时还会产生特有的温度反应。所以分析中，也会考虑到这种温度反应。温度反应会直接和光刺激联系起来，而手的反应受到抑制——因为就算没有接触，明亮的火焰也可能让人主动离开。儿童拿着某物件，用它来敲打，或将它折弯，就会发出声响。耳朵反应也由此纳入反应系统。如果别人发出的某种声音伴随着动作，那么与听觉刺激相连的耳朵和发音器官的反应也会成为诸多复杂反应中的联合因素。 [7_2]

(3) The more specialized the adjustment of response and stimulus to each other (for, taking the sequence of activities into account, the stimuli are adapted to reactions as well as reactions to stimuli) the more rigid and the less generally available is the training secured. In equivalent language, less intellectual or educative quality attaches to the training. The usual way of stating

this fact is that the more specialized the reaction, the less is the skill acquired in practicing and perfecting it transferable to other modes of behavior. According to the orthodox theory of formal discipline, a pupil in studying his spelling lesson acquires, besides ability to spell those particular words, an increase of power of observation, attention, and recollection which may be employed whenever these powers are needed. As matter of fact, the more he confines himself to noticing and fixating the forms of words, irrespective of connection with other things (such a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are habitually used, the deriv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verbal form, etc.) the less likely is he to acquire an ability which can be used for anything except the mere noting of verbal visual forms. He may not even be increasing his ability to make accurate distinctions among geometrical forms, to say nothing of ability to observe in general. He is merely selecting the stimuli supplied by the forms of the letters and the motor reactions of oral or written reproduction. The scope of coordination (to use our prior terminology) is extremely limited. The connections which are employed in other observations and recollections (or reproductions) are deliberately eliminated when the pupil is exercised merely upon forms of letters and words. Having been excluded, they cannot be restored when needed. The ability secured to observe and to recall verbal forms is not available for perceiving and recalling other things. In the ordinary phraseology, it is not transferable. But the wider the context—that is to say, the more varied the stimuli and responses coordinated—the more the ability acquired is available for the effective performance of other acts; not, strictly speaking, because there is any 'transfer,' but because the wide range of factors employed in the specific act is equivalent to a broad range of activity, to a flexible, instead of to a narrow and rigid, coordination.

（3）反应和刺激的相互适应越具体（考虑到动作的顺序，反应适应刺激，刺激也适应反应），学生所获得的训练就越机械，越不容易被推广，训练的智力或教育成分也就越少。人们常这样来表述这种事实：反应越专业化，在训练和完善反应过程中获得的技能就越不容易转移应用到其他的行为方式中。根据正统的形式训练理论，小学生学习拼写时，他所获得的不仅是拼写那些特殊单词的能力，而且是增强了自己的观察力、注意力和回忆能力，以备不时之需。事实上，如果学生越注重单词的形式，而不顾该单词和其他事物的联系（比如词义、上下文、词语的派生和分类等），他就越不可能获得广泛应用的能力。他只能注意到单词的视觉形式。他甚至不能用此增强辨别几何图形的能力，更别提提高一般的观察能力了。我们只能说，这个学生仅仅对选择字形所给的刺激以及口读默写的运动反应。因此，其协调的范围极其有限。当学生仅仅练习字母和词的形式时，他会有意识地排除在其他观察和回忆（或重组）中用到的联系。这些联系被排除以后，即使有需要，也无法恢复。学生所获得的观察和回忆词语形式的能力，不能用来观察和回忆其他事物。也就是说，这种能力不能转移应用。不过，语境的范围越大，即被协调的刺激和反应越多样化，学生获得的能力就越能有效完成其他行为。严格地说，这不是因为存在任何“迁移”，而是因为某一个行为中用到的众多因素契合了活动的广泛性，与此相应的是灵活而非狭隘刻板的协调性。

(4) Going to the root of the matter, the fundamental fallacy of the theory is its dualism; that is to say, its separation of activities and capacities from subject matte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n ability to see or hear or remember in general; there is only the ability to see or hear or remember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training a power, mental or physical, in general, apart from the subject matter involved in its exercise, is nonsense. Exercise may react upon circulation, breathing, and nutrition so as to develop vigor or strength, but this reservoir is available for specific ends only by us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material means which

accomplish them. Vigor will enable a man to play tennis or golf or to sail a boat better than he would if he were weak. But only by employing ball and racket, ball and club, sail and tiller, in definite ways does he become expert in any one of them; and expertness in one secures expertness in another only so far as it is either a sign of aptitude for fine muscular coordinations or as the same kind of coordination is involved in all of them. Moreo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raming of ability to spell which comes from taking visual forms in a narrow context and one which takes them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ctivities required to grasp meaning, such as context, affiliations of descent, etc. , may be compared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xercises in the gymnasium with pulley weights to 'develop' certain muscles, and a game or sport. The former is uniform and mechanical; it is rigidly specialized. The latter is varied from moment to moment; no two acts are quite alike; novel emergencies have to be met; the coordinations forming have to be kept flexible and elastic. Consequently, the training is much more 'general'; that is to say, it covers a wider territory and includes more factors. Exactly the same thing holds of special and general education of the mind.

（4）归根结底，形式训练理论的根本谬误就是其二元论。也就是说，它将人的活动和能力与训练主题分离开来。其实，根本不存在宽泛意义的视、听或记忆能力，我们只有视、听或记忆某种具体事物的能力。离开训练的主题，一般的心理和生理能力训练全是废话。身体锻炼固然可以对血液循环、呼吸和营养产生作用，并发展体力；但要使人的体能适用于特殊目的，就只有和完成目的的物质手段加以结合。一个体格健壮者能比身体虚弱者在打网球、高尔夫球和驾驶帆船方面做得更好。但是，只有以特定的方式掌握打网球、高尔夫球和驾船的本领，他才能成为打网球、高尔夫球或驾船的高手。只有当其显示良好的肌肉协调能力或同样的协调能力贯穿始终，某种熟练的技能

才能转为另一种熟练技能。此外，训练拼法能力有两种方法，一种仅注意狭隘的上下文中的视觉形状，另一种则将单词和领会词义所需的活动联系起来，如上下文，词源等等。我们可以把为了“发展”肌肉在健身房练习举重与竞技或运动游戏加以对比。前一种训练一成不变，机械呆板；而后一种则时刻变化，不会重复，还要随时应付突发事件，因此，必须高度协调，高度灵活。因此，这种训练更具有普遍性，换句话说，它涉及方方面面，包含更多的因素。对人的心智的专门教育和普通教育完全与此相似。

A monotonously uniform exercise may by practice give great skill in one special act; but the skill is limited to that act, be it bookkeeping or calculations in logarithms or experiments in hydrocarbons. One may be an authority in a particular field and yet of more than usually poor judgment in matters not closely allied, unless the training in the special field has been of a kind to ramify in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other fields.

单调且一成不变的训练可以使人在某一特别领域获得非凡技能，比如簿记、对数运算、或关于碳氧化合物的试验，使受训者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威。但是，这人将完全丧失对其他不相关的事物的判断力，除非他在该领域的训练与其他领域有关联。

(5) Consequently, such powers as observation, recollection, judgment, aesthetic taste, represent organized results of the occupation of native active tendencies with certain subject-matters. A man does not observe closely and fully by pressing a button for the observing faculty to get to work (in other words by 'willing' to observe); but if he has something to do which can be accomplished successfully only through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use of eye and

hand, he naturally observes. Observation is an outcome, a consequence, of the interaction of sense organ and subject matter. It will vary, accordingly,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employed.

（5）因此，观察、回忆、判断、审美等能力代表的是人天生拥有的热情被有组织地运用到某些特定教学题材的结果。我们并不是要摁下具有观察功能的按钮（或具有观察意愿）才会进行仔细、全面的观察，但是，如果只有通过使用眼睛和手才能成功完成任务时，我们自然会进行观察。观察是感觉器官和特定教学题材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人的观察力将随特定教学题材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It is consequently futile to set up even the ulterior development of faculties of observation, memory, etc. , unless we have first determined what sort of subject matter we wish the pupil to become expert in observing and recalling and for what purpose. And it is only repeating in another form what has already been said, to declare that the criterion here must be social. We want the person to note and recall and judge those things which make him an effective competent member of the group in which he is associated with others. Otherwise we might as well set the pupil to observing carefully cracks on the wall and set him to memorizing meaningless lists of words in an unknown tongue—which is about what we do in fact when we give way to the doctrine of formal discipline. If the observing habits of a botanist or chemist or engineer are better habits than those which are thus formed, it is because they deal with subject matter which is more significant in life. In concluding this portion of the discussion, we note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pecial and general educati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transferability of function or power. In the literal sense, any transfer is miraculous and impossible. But some activities are broad; they

involve a coordination of many factors. Their development demands continuous alteration and readjustment. As conditions change, certain factors are subordinated, and others which had been of minorimportance come to the front. There is constant redistribution of the focus of the action, as is seen in the illustration of a game as over against pulling a fixed weight by a series of uniform motions. Thus there is practice in prompt making of new combinations with the focus of activity shifted to meet change in subject matter. Wherever an activity is broad in scope (that is, involves the coordinating of a large variety of sub-activities), and is constantly and unexpectedly obliged to change direction in its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general education is bound to result. For this is what 'general' means; broad and flexible. In practice, education meets these conditions, and hence is general, in the degree in which it takes accoun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 person may become expert in technical philosophy, or philology, or mathematics or engineering or financiering, and be inept and ill-advised in his action and judgment outside of his specialty. If however his concern with these technical subject matters has been connected with human activities having social breadth, the range of active responses called into play and flexibly integrated is much wider. Isolation of subject matter from a social context is the chief obstruction in current practice to securing a general training of mind. Literature, art, religion, when thus dissociated, are just as narrowing as the technical things which the professional upholders of general education strenuously oppose.

所以，除非事先决定我们希望学生观察和记忆的教学题材是什么，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否则即使要秘而不宣地发展学生的观察和记忆能力也会毫无成效。我们在此又要重复过去说过的话：对学生的教育必须采用社会标准。我们想使学生注意、回忆和判断那些能使其成

为社团有效成员的事情。否则，我们会让学生仔细观察墙上的裂缝，记忆陌生语言中陌生单词。这大概就是我们屈服于形式训练理论时会做的事。如果植物学家、化学家或工程师的观察习惯比这样养成的习惯好，那是因为他们需要关注的事情是生活中比较有意义的东西。在结束本章节讨论之时，我们注意到，专门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区别与功能或能力的可迁移性无关。按字面意义来说，任何迁移都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人的有些活动范围广泛，涉及诸多因素的协调。要开展这些活动，就需要不断地变换和调整。当条件发生变化时，某些因素需要退居从属地位，而原来比较次要的因素会变得更为重要。行动的重心常常会面临重新调整，这在要求我们用一致的动作去拉固定重量的游戏中已经有所阐明。因此，要很快形成新的组合，使行为的重心转移到适应教学题材的变化，这需要训练。哪里的活动涉及的范围广泛（即涉及对许多不同附属活动的协调），并且不得不经常地、突然地改变既定发展的方向，普通教育必然会发生。“普通”一词的含义就是范围广泛，机动灵活。其实，教育符合这些条件，因此，普通教育要考虑的就是社会关系。有人可能擅长哲学、语言学、数学、工程学或金融学，但对于专业以外的东西却是孤陋寡闻。但是，倘若他把自己的专业研究与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人类活动结合起来，那么，因灵活结合而产生积极反应的范围就广阔得多。教学题材与社会背景的脱离是当前进行通识教育的主要障碍。文学，艺术，宗教一旦与社会背景脱离，就会变得专门知识一样狭隘，而这正是主张普通教育的人所极力反对的。

Summary.

总结

The conception that the result of the educative process is capacity for further education stands in contrast with some other

ideas which have profoundly influenced practice. The first contrasting conception considered is that of preparing or getting ready for some future duty or privilege. Specific evil effects were pointed out which result from the fact that this aim diverts attention of both teacher and taught from the only point to which it may be fruitfully directed—namel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needs and possibilities of the immediate present. Consequently it defeats its own professed purpose. The notion that education is an unfolding from within appears to have more likeness to the conception of growth which has been set forth. But as worked out in the theories of Froebel and Hegel, it involves ignoring the interaction of present organic tendencies with the present environment, just as much as the notion of preparation. Some implicit whole is regarded as given ready-mad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growth is merely transitory; it is not an end in itself; but simply a means of making explicit what is already implicit. Since that which is not explicit cannot be made definite use of, something has to be found to represent it. According to Froebel, the mystic symbolic value of certain objects and acts (largely mathematical) stand for the Absolute Whole which is in process of unfolding. According to Hegel, existing institutions are its effective actual representatives. Emphasis upon symbols and institutions tends to divert perception from the direct growth of experience in richness of meaning. Another influential but defective theory is that which conceives that mind has, at birth, certain mental faculties or powers, such as perceiving, remembering, willing, judging, generalizing, attending, etc. , and that education is the training of these faculties through repeated exercise. This theory treats subject matter as comparatively external and indifferent, its value residing simply in the fact that it may occasion exercise of the general powers. Criticism was directed upon this separation of the alleged powers from one another and from the material upon which they act. The

outcome of the theory in practice was shown to be an undue emphasis upon the training of narrow specialized modes of skill at the expense of initiative, inventiveness, and readaptability—qualities which depend upon the broad and consecutive interaction of specific activities with one another.

教育过程的结果是拥有继续教育的能力，此概念与曾经深刻影响教育实践的其他几种观念正好相反。首先讨论的与之相对的第一个概念是把教育看作为将来某种职责或权利做准备。已经有人指出这种教育目的造成的不良影响。教育唯一能被有效引导之处就在于利用现实的需要和可能。而这种不良影响就是因转移教师和学生的注意力所造成的。因此，这个概念击败了它自诩的目的。关于教育是从内部展开的观点似乎和前面提到的教育是成长的观点有更多相似之处。但是，该观点出自福禄培尔和黑格尔理论，它忽略了现代人习性和现代环境的相互影响，正如教育是做好准备的观点有相同的弊病一样。某种隐含的整体被视为现成的，成长的重要性被视为仅仅是暂时的；成长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使已经隐含之物外显的一种手段。由于不能明确利用隐含之物，我们就得寻找其代表。福禄培尔认为，某些物体和动作（主要是数学方面的）的神秘符号代表正在进行过程中的绝对整体。黑格尔则把现存的种种制度视为这种绝对整体的有效代表。对符号和制度的强调会转移我们对经验直接增长的丰富意义的认识。还有一个有影响但也有缺陷的理论认为，人的大脑生来具有一些智能，如观察、记忆、愿望、判断、概括、注意力等。教育就是通过反复练习训练这些能力。该理论把教学题材看作比较外部的东西，无关紧要，其主要价值只在于让一般能力得到训练。对于这一理论的批评是基于它将各种能力以及对能力产生作用的教学题材彼此割裂。实践结果表明，该理论的问题是它过分强调以牺牲主动性，创造性，适应性来训练狭隘的专门性技能。

[6_1].As matter of fact, the interconnection is so great, there are so many paths of construction, that every stimulus brings about some change in all of the organs of

response. We are accustomed however to ignore most of these modifications of the total organic activity, concentrating upon that one which is most specifically adapted to the most urgent stimulus of themoment.

[6_2].This statement should be compared with what was said earlier about the sequential ordering of responses (p. 30). It is merely a more explicit statement of the way in which that consecutive arrangement occurs.

[7_1].事实上，各种反应的相互联系非常密切，建构的途径也很多，只要出现一个刺激，人所有的反应器官上都会发生变化。然而，我们常忽略整个有机体活动的大多数变化，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最适应当时最迫切刺激的反应上。

[7_2].这个说法应该与前面所说的反应顺序和排列相比较（参看原文25页）。我们发现，它只不过是更明确地指出了那种连续安排发生的方法。

Chapter 6 Education as Conservative and Progressive

第六章　保守的教育与进步的教育

1．Education as Formation.

一、教育即塑造

We now come to a type of theory which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faculties and emphasizes the unique role of subject matt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and moral disposition. According to it, education is neither a process of unfolding from within nor is it a training of faculties resident in mind itself. It is rather the formation of mind by setting up certain associations or connections of content by means of a subject matter presented from without. Education proceeds by instruction taken in a strictly literal sense, a building into the mind from without. That education is formative of mind is not questioned; it is the conception already propounded. But formation here has a technical meaning, dependent upon the idea of something operating from without.

我们现在要提到的理论否认人的天赋能力的存在，只强调教学题材在发展智力和道德习性方面所起的独特作用。根据这个理论，教育既非是一个从内部开展的过程，也非是对头脑里的天赋能力的训练，而是通过与外部提供的教学题材内容建立的某种联系来塑造心灵。教育通过严格的教学从外部构筑心灵。没有人会质疑我们曾经提出的概念，即教育是对心灵的塑造。但是，我们所说的“塑造”有其特定意

义，它有赖于从外部起作用的某种思想。

Herbart is the bes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is type of theory. He denies absolutely the existence of innate faculties. The mind is simply endowed with the power of producing various qualities in reaction to the various realities which act upon it. These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reactions are called presentations (Vorstellungen). Every presentation once called into being persists; it may be driven below the “threshold” of consciousness by new and stronger presentations, produced by the reaction of the soul to new material, but its activity continues by its own inherent momentum, below the surface of consciousness. What are termed faculties—attention, memory, thinking, perception, even the sentiments, are arrangements, associations, and complications, form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submerged presentations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new presentations. Perception, for example, is the complication of presentations which result from the rise of old presentations to greet and combine with new ones; memory is the evoking of an old presentation above the threshold of consciousness by getting entangled with another presentation, etc..Pleasure is the result of reenforcement among the independent activities of presentations; pain of their pulling different ways, etc..

迄今为止，赫尔巴特是这种理论最好的代表。他完全否认人的天赋能力的存在。在他看来，人的头脑仅仅是具有能够对各种现实活动做出多种不同程度的反应的能力。这些不同程度的反应称为表象（Vorstellungen）。每一种表象一旦产生，就持续存在。也许由于新材料对心灵的影响而产生的新的、更强大的表象能把旧的表象压制在意识域之下，但是，任何表象都会按其内在动力在意识表层下面持续下去。所谓的感官功能，如注意力、记忆力、思维能力、知觉以及情

操等，都是这些被淹没的表象相互作用以及新表象相互作用所形成种种排列、结合和复杂组合。比如，知觉是旧表象迎接新表象并与之结合而成的复杂表象结构，记忆是新表象通过与另一表象纠缠在一起，激发旧表象，使其上升到意识域之上，等等。又如，快乐是各种表象独立活动强化的结果；痛苦则是各种表象独立活动被多方牵引的结果，等等。

The concrete character of mind consists, then, wholly of the various arrangements formed by the various presentations in their different qualities. The 'furniture' of the mind is the mind. Mind is wholly a matter of “contents. " The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his doctrine are threefold,

因此，心灵的特性完全是由各种不同性质的表象所形成的各种不同安排所组成的。心灵的“配制品”就是心灵。心灵就是完全参与其中的“内容”。这个理论的教育含义有三方面。

(1) This or that kind of mind is formed by the use of objects which evoke this or that kind of reaction and which produce this or that arrangement among the reactions called out. The formation of mind is wholly a matter of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proper educational materials.

（1）不同的心灵是利用能激发不同反应、做出不同安排的事物所形成的。心灵的塑造与能否呈现恰当教学题材密切相关。

(2) Since the earlier presentations constitute the “apperceiving

organs” which control the assimilation of new presentations, their character is all important. The effect of new presentations is to reenforce groupings previously formed. The business of the educator is, first, to select the proper material in order to fix the nature of the original reactions, and, secondly, to arrange the sequence of subsequent presenta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store of ideas secured by prior transactions. The control is from behind, from the past, instead of, as in the unfolding conception, in the ultimate goal.

（2）既然从前的表象构成控制吸收新表象的“统觉器官”，其特性就十分重要。新表象的作用是强化以前形成的组合。教育者的任务首先是选择恰当的材料以固定原有反应的性质，然后根据从先前的事物所获得的观念安排后来表象的顺序。教育管理来自后台，来自过去的经验，正如教育是发展的观念所言，教育管理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

(3) Certain formal steps of all method in teaching may be laid down. Presentation of new subject matter is obviously the central thing, but since knowing consists in the way in which this interacts with the contents already submerged below consciousness, the first thing is the step of 'preparation,'—that is, calling into special activity and getting above the floor of consciousness those older presentations which are to assimilate the new one. Then after the presentation, follow the processes of interaction of new and old; then com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ewly formed content to the performance of some task. Everything must go through this course; consequently there is a perfectly uniform method in instruction in all subjects for all pupils of all ages.

（3）应该为所有教学方法制定某些正式的步骤。新教学题材的展示显然是中心一环。但是，由于知识的获取在于如何与已知内容相互作用，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准备”。所谓准备，就是唤起旧表象的特殊活动，使之上升到意识表面，以吸收新的表象。在展示阶段结束之后，接下来的是各种新旧表象相互作用的过程。然后就是运用新获得的内容，完成某项任务。任何教育都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因此，不论学生年龄的大小，一切科目的教学都需要采用统一的教学方法。

Herbart's great service lay in taking the work of teaching out of the region of routine and accident. He brought it into the sphere of conscious method; it became a conscious business with a definite aim and procedure, instead of being a compound of casual inspiration and subservience to tradition. Moreover, everything in teaching and discipline could be specified, instead of our having to be content with vague and more or less mystic generalities about ultimate ideals and speculative spiritual symbols. He abolished the notion of ready-made faculties, which might be trained by exercise upon any sort of material, and made attention to concrete subject matter, to the content, all-important. Herbart undoubtedly has had a greater influence in bringing to the front questions connected with the material of study than any other educational philosopher. He stated problems of metho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ir connection with subject matter: method having to do with the manner and sequence of presenting new subject matter to insure its proper interaction with old.

赫尔巴特的伟大贡献在于使教学不再墨守成规或发于偶然。他在教学中融入了有意识的方法，使之具有特定目的和过程，而不再是一种偶然灵感和屈从传统的混合物。更进一步讲，他使教育和训练的每一件事都能得到细化，而不必满足于对终极理想和具有思辨意义的精

神符号进行模糊或多少带有神秘性质的空洞推论。赫尔巴特摒弃了认为任何受教育者都可以通过训练来获得现成能力的看法。他更为重视具体的教学题材和教学内容。赫尔巴特比任何其他教育哲学家都更为重视教学题材，这是毫无疑问的。他通过联系教学方法和教学题材来阐明教学方法上的各种问题，指出教学方法必须与推行新教学题材的方法和顺序相关，以确保新旧教学题材的恰当融合。

Th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defect of this view lies in ignoring the existence in a living being of active and specific functions which are developed in the redirection and combination which occur as they are occupied with their environment. The theory represents the Schoolmaster come to his own. This fact expresses at once its strength and its weakness. The conception that the mind consists of what has been taught, an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what has been taught consists in its availability for further teaching, reflects the pedagogue's view of life. The philosophy is eloquent about the duty of the teacher in instructing pupils; it is almost silent regarding his privilege of learning. It emphasizes the influence of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upon the mind; it slurs over the fact that the environment involves a personal sharing in common experiences. It exaggerates beyond reason the possibilities of consciously formulated and used methods, and underestimates the role of vital, unconscious, attitudes. It insists upon the old, the past, and passes lightly over the operation of the genuinely novel and unforeseeable. It takes, in brief, everything educational into account save its essence,—vital energy seeking opportunity for effective exercise. All education forms character, mental and moral, but formation consists in the selec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native activities so that they may utilize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Moreover, the formation is not only a formation of native activities, but it takes place through them. It is a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

reorganization.

这个观点主要的理论缺陷就在于忽视人具有的许多主动和特殊的能力。这些能力都是在他们应付环境时经过改造和结合而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表明教师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个事实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人的头脑能容纳所学的知识，学习知识的意义在于能应用于未来教学，这也反映了教师的人生观。该理论对于教师职责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关于教师的学习权利却只字不提；它强调智力环境对心灵的影响，却避而不谈环境包含个人对共同经验的分享；它过分夸大有意识地利用已经行之有效的老方法的可能性，却低估充满活力的、无意识的教学态度的重要性。该理论坚持认为古旧的和过去的东西是好的，而对新的和未知经验的使用则不予重视。简言之，它考虑到有关教育的一切事情，唯独没有考虑教育的本质，没有注意教育具有寻找机会发挥有效作用的能量。所有的教育都旨在塑造人的智力和道德品质，但是这种塑造在于对人的自然行为的选择和调节，使之能利用社会环境资源。这种塑造不只是对人的自然行为的塑造，而是要通过教育活动进行塑造。这是一个重新改造和重新组合的过程。

2．Education as Recapitulation and Retrospection.

二、教育在于重述要点和追溯

A peculiar combination of the ideas of development and formation from without has given rise to the recapitulation theory of educatio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The individual develops, but his proper development consists in repeating in orderly stages the past evolution of animal life and human history. The former recapitulation occurs physiologically; the latter should be made to

occur by means of education. The alleged biological truth that the individual in his growth from the simple embryo to maturity repeats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life in the progress of forms from the simplest to the most complex (or expressed technically, that ontogenesis parallels phylogenesis) does not concern us, save as it is supposed to afford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cultural recapitulation of the past. Cultural recapitulation says, first, that children at a certain age are in the mental and moral condition of savagery; their instincts are vagrant and predatory because their ancestors at one time lived such a life. Consequently (so it is concluded) the proper subject matter of their education at this time is the material—especially the literary material of myths, folk-tale, and song—produced by humanity in the analogous stage. Then the child passes on to something corresponding, say, to the pastoral stage, and so on till at the time when he is ready to take part in contemporary life, he arrives at the present epoch of culture.

把向终极目标发展和从外部进行塑造的两种思想奇特地组合在一起，这就构成了教育在生物和文化方面的重演论。个体在发展，但是其恰当发展又在于有秩序地重复动物生活和人类历史进化所经历的许多阶段。动物生活的重演是就生理学而言的，而人类历史的重演则应依靠教育完成。在生物学上，有人认为个体从幼小的胚胎到长大成人是重复了动物生活进化的历史，即从最简单的形式进化到最复杂的形式（从专业的角度讲，就是个体发育与种系发育并行），但我们对此并不认同，更不认为它能为历史的文化重演提供科学基础。文化重演论认为，处于一定年龄阶段的儿童的智力和道德水准与野蛮人没有差别；漂泊流浪，四处掠夺是他们的天性，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因此，持文化重演论观点的人认为，在此阶段对儿童施教的合适教学题材就是人类在相似阶段所创作的材料——特别是神话、民间故事和歌谣这一类文学材料。然后，通过经历某种与游牧时代生活方式相应的阶段，直到已做好准备融入现代生活，此时的儿童

就到达了现代文化时代。

In this detailed and consistent form, the theory, outside of a small school in Germany (followers of Herbart for the most part), has had little currency. But the idea which underlies it is that education is essentially retrospective; that it looks primarily to the past and especially to the literary products of the past, and that mind is adequately formed in the degree in which it is patterned upon the spiritual heritage of the past. This idea has had such immense influence upon higher instruction especially, that it is worth examination in its extreme formulation.

德国的一个小流派（多数为赫尔巴特追随者）提出了该理论，但并未广为流传。其基本思想认为，教育在本质上含有追溯性质，教育主要是追溯过去，特别是追溯过去的文学作品。我们的心灵是由过去的精神遗产所塑造的。由于该观点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其极端的主张作一番考察。

In the first place, its biological basis is fallacious. Embryonic growth of the human infant preserves, without doubt, some of the traits of lower forms of life. But in no respect is it a strict traversing of past stages. If there were any strict 'law' of repetition,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would clearly not have taken place. Each new generation would simply have repeated its predecessors' existence. Development, in short, has taken place by the entrance of short-cuts and alterations in the prior scheme of growth. And this suggests that the aim of education is to facilitate such short-circuited growth. The great advantage of immaturity, educationally speaking, is that it enables us to emancipate the young from the

need of dwelling in an outgrown past. The business of education is rather to liberate the young from reviving and retraversing the past than to lead them to a recapitulation of it.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young is constituted by the presence and action of the habits of thinking and feeling of civilized men. To ignore the directive influence of this present environment upon the young is simply to abdicate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A biologist has said: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animals … offers to us . . . a series of ingenious, determined, varied but more or less unsuccessful efforts to escape from the necessity of recapitulating, and to substitute for the ancestral method a more direct method. " Surely it would be foolish if education did not deliberately attempt to facilitate similar efforts in conscious experience so that they become increasingly successful.

首先，其生物学基础是谬误的。人类婴儿胚胎的发育的确保存着低等生物生命形式的一些特性。但是，它绝不是对低等动物过去生活的简单重复。如果说有什么严格的重复“规律”，进化显然不会发生。每一代人都不是在重复前人的生活方式。简而言之，成长就在于修改前人的成长计划和另辟蹊径。这表明教育的目的就是促进和完善成长路线。从实施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们利用儿童未成熟状态的优势去解放儿童，让他们不再走过去的老路。教育的任务就是把儿童从重演过去和重蹈覆辙中解放出来。儿童的社会环境是由文明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行为构成的。忽视当下环境对儿童的影响，就是放弃教育的功能。一位生物学家曾说过：“不同动物发展的历史展现了它们为了避免重演过去，而以更直接的方法去替代祖先的方法，曾做出的一系列聪明、坚决，但不是那么成功的努力。”当然，如果教育没有意识到加强此类努力，促使其获得成功，那将是愚蠢的。

The two factors of truth in the conception may easily be

disentangled from association with the false context which perverts them. On the biological side we have simply the fact that any infant starts with precisely the assortment of impulsive activities with which he does start, they being blind, and many of them conflicting with one another, casual, sporadic, and unadapted to their immediate environment. The other point is that it is a part of wisdom to utilize the products of past history so far as they are of help for the future. Since they represent the results of prior experience, their value for future experience may, of course, be indefinitely great. Literatures produced in the past are, so far as men are now in possession and use of them, a part of the present environment of individuals; but there is an enormous difference between availing ourselves of them as present resources and taking them as standards and patterns in their retrospective character.

重演的概念中有两个正确的要点，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们从歪曲的错误见解中区分开来。第一点是，在生物学方面，我们都知道，任何婴儿刚开始的活动都具有冲动性，这些活动大多互相冲突、偶然发生、零星分散，与其生活环境不相适应。另一点是，只要历史经验有益于将来，我们就可加以利用，这种利用乃是我们智慧的一部分。由于是以往经验的精华，历史经验对未来生活拥有巨大的价值。只要这些经验到现在还被人们掌握并加以利用，那么过去的文献就是人们当前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但是，利用它们作为我们当前的资源与把它当作追溯性质的标准和模式这两者之间存在极大的区别。

(1) The distortion of the first point usually comes about through misuse of the idea of heredity. It is assumed that heredity means that past life has somehow predetermined the main traits of an individual, and that they are so fixed that little serious change can be introduced into them. Thus taken, the influence of heredity

is opposed to tha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fficacy of the latter belittled. But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heredity means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the original endowment of an individual. Education must take the being as he is; that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has just such and such an equipment of native activities is a basic fact. That they were produced in such and such a way, or that they are derived from one's ancestry, is not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the educator, however it may be with the biologist, as compared with the fact that they now exist. Suppose one had to advise or direct a person regarding his inheritance of property. The fallacy of assuming that the fact it is an inheritance, predetermines its future use, is obvious. The advisor is concerned with making the best use of what is there—putting it at work under the most favorable conditions. Obviously he cannot utilize what is not there; neither can the educator. In this sense, heredity is a limit of education. Recognition of this fact prevents the waste of energy and the irritation that ensue from the too prevalent habit of trying to make by instruction something out of an individual which he is not naturally fitted to become. But the doctrine does not determine what use shall be made of the capacities which exist. And, except in the case of the imbecile, these original capacities are much more varied and potential, even in the case of the more stupid, than we as yet know properly how to utilize. Consequently, while a careful study of the native aptitudes and deficiencies of an individual is always a preliminary necessity, the subsequent and important step is to furnish an environment which will adequately function whatever activities are present.

（1）第一点之所以被曲解，通常是源于对遗传概念的误用。有人以为，遗传就是指过去的生活预先决定了个人的主要特性，而这些特性又非常顽固，很难改变。这种看法就是把遗传的影响和环境的影

响对立起来，轻视环境的功效。但是，就教育的目的而言，遗传恰恰就是个人所拥有的禀赋。教育必须以人为本，个人拥有这样或那样的天赋能力，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些天赋能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产生，或者来自祖先的遗传，这对教师来说并是不特别重要，但是比起这些能力的现实存在，上述观点对生物学家来说也许就是很重要的了。假设我们要就继承遗产的问题给出建议或指导一个人，如果假定遗产能决定其未来的用途，这个假设显然是谬论。指导者的任务是充分利用现有条件，让其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起作用。他当然不可能利用根本就不存在的事物，教师也不能。从这点看，遗传是对教育的一种限制。承认这一事实，就可以防止精力的浪费和由好为人师引起的恼羞成怒，因为人们常常试图发指令让一个人成为他显然不适合成为的那样。但是，该理论并不能决定怎样利用人已有的能力。除低能儿以外，即使是比较迟钝的人的天赋能力也比我们懂得如何利用的能力的种类多得多，潜力也大得多。对人的天赋能力和缺陷进行仔细研究是首先必须要做的事情，接下来要做的重要工作就是提供一种无论有什么活动都能恰当发挥作用的环境。

The relation of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is well expressed in the case of language. If a being had no vocal organs from which issue articulate sounds, if he had no auditory or other sense-receptors and no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sets of apparatus, it would be a sheer waste of time to try to teach him to converse. He is born short in that respect, and education must accept the limitation. But if he has this native equipment, its possession in no way guarantees that he will ever talk any language or what language he will talk.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his activities occur and by which they are carried into execution settles these things. If he lived in a dumb unsocial environment where men refused to talk to one another and used only that minimum of gestures without which they could not get along, vocal language would be as unachieved by him as if he had no vocal organs. If the sounds

which he makes occur in a medium of persons speak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activities which make like sounds will be selected and coordinated. This illustration may be applied to the entire range of the educability of any individual. It places the heritage from the past in its right connection with the demand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present.

遗传与环境的关系在语言学习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人没有清晰的发音器官，没有听觉器官，也没有两种器官的有机结合，要教他与人交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某人生来在获取信息上缺陷，教育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但是，就算此人拥有天赋的发音和听觉器官，也不能保证他就能讲话或掌握某种语言。他能否讲话或讲什么语言，依赖于他的活动所处在的环境和实现这些活动的环境。如果有人生活在哑巴社会，人们不愿彼此交谈，仅仅使用很少的手势维持交流，即使有发音器官，他也不会说话。如果他身处讲中国话的环境，他讲的就是中国话，他的行为也会随着语言的使用而有所选择和调节。这个例子适用于所有的个体。这就把过去的遗产与现在的要求和机会恰当地联系在一起。

(2) The theory that the proper subject matter of instruction is found in the culture-products of past ages (either in general, or more specifically in the particular literatures which were produced in the culture epoch which is supposed to correspond with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those taught) affords another instance of that divorce between the process and product of growth which has been criticized. To keep the process alive, to keep it alive in ways which make it easier to keep it alive in the future, is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al subject matter. But an individual can live only in the present. The present is not just something which comes after the past; much less something produced by it. It is what life is in

leaving the past behind it. The study of past products will not help us understand the present, because the present is not due to the products, but to the life of which they were the products. A knowledge of the past and its heritag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when it enters into the present, but not otherwise. And the mistake of making the records and remains of the past the main material of education is that it cuts the vital connection of present and past, and tends to make the past a rival of the present and the present a more or less futile imitation of the pas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culture becomes an ornament and solace; a refuge and an asylum. Men escape from the crudities of the present to live in its imagined refinements, instead of using what the past offers as an agency for ripening these crudities.

（2）适当的教学题材来自过去的文化产物（要么来自于与所教授的学生成长阶段相符的普通文献或专门文献）。该理论提供了成长过程和与成长结果分离的又一案例。我们曾对此进行过批判。让人的成长过程持续下去以及让他能在将来更容易地生活是教育主体应有的功能。但是，人只能活在当下；现在不只是过去的延续；更不是过去的产物，而是忘却过去后的生活。研究过去的产物对我们了解现在没有任何帮助，因为现在并不属于它们，而是属于生活的成果。对过去和过去遗产的认识必须要与现在发生某种联系才会有重大意义，否则将不会有任何意义。把过去的记录和遗物作为教育的主要教学题材，其错误在于割裂了现在和过去的重要联系，把过去当作现在的对手，让现在成为过去的无用模仿。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变成了一种装饰品和慰问品，成为了避难所和庇护所。人们从现实的粗鲁行为中逃避，生活在想象的理想之中，而不是利用过去所提供之物作为推动这些粗鲁行为成熟的一种力量。

The present, in short, generates the problems which lead us to

search the past for suggestion, and which supplies meaning to what we find when we search. The past is the past precisely because it does not include what is characteristic in the present. The moving present includes the past on condition that it uses the past to direct its own movement. The past is a great resource for the imagination; it adds a new dimension to life, but on condition that it be seen as the past of the present, and not as another and disconnected world. The principle which makes little of the present act of living and operation of growing, the only thing always present, naturally looks to the past because the future goal which it sets up is remote and empty. But having turned its back upon the present, it has no way of returning to it laden with the spoils of the past. A mind that is adequately sensitive to the needs and occasions of the present actuality will have the liveliest of motives for interes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esent, and will never have to hunt for a way back because it will never have lost connection.

简言之，要解决当下出现的问题，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寻找启示，同时为我们在寻找中发现之物提供意义。过去之所以是过去，准确来说，正是因为它并不包含现在所具有的特性。前进中的现在却包含过去，条件是它利用过去的经验指导自己的前进。过去是想象的伟大源泉，它给生活增加新的活力，但条件是必须把过去视为现在的过去，而不是与现在没有联系的另一个世界。由于未来目标总是空洞而遥远的，人们现在的生活行为和成长机制是唯一能永远代表现在的东西。对这一原理的忽视自然致使人们指望过去。但是，在背弃了现在之后，人不可能背负着过去的负担回归到现在。对现实需要和机会足够敏感的心灵将对现在的背景产生最大的兴趣，并永远不会走回头路，因为它绝不会与现在失去联系。

3．Education as Reconstruction.

三、教育即改造

In its contrast with the ideas both of unfolding of latent powers from within, and of formation from without, whether by physical nature or by the cultural products of the past, the ideal of growth results in the conception that education is a constant reorganizing or reconstructing of experience. It has all the time an immediate end, and so far as activity is educative, it reaches that end—the direct transformation of the quality of experience. Infancy, youth, adult life,—all stand on the same educative level in the sense that what is really learned at any and every stage of experience constitutes the value of that experience, and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the chief business of life at every point to make living thus contribute to an enrichment of its own perceptible meaning.

教育思想分两种，前者依靠生理机能，主张教育是发展内部潜在能力，后者依靠过去文化遗产，主张教育从外部对人进行塑造。而视教育为成长的理念与这两种思想都不同。它主张教育是对经验的继续重组和改造。教育始终有一个当下最直接的目的，只要具有教育性，它就达到了直接转变为经验的目的。婴儿期、青年期和成年人生活的教育性处于相同的水平，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阶段真正学到的东西都能构成有价值的经验，任何一个阶段生活的主要任务都在于使生活自身丰富并充满意义。

We thus reach a technical definition of education: It is, that reconstruction or re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which adds to the meaning of experience, and which increases ability to direct the course of subsequent experience.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有关教育的专业定义：教育就是对经验的重组或改造，它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指导和提高后续经验的进程。

(1) The increment of meaning corresponds to the increased perception of the connections and continuities of the activities in which we are engaged. The activity begins in an impulsive form; that is, it is blind. It does not know what it is about; that is to say, what are its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activities. An activity which brings education or instruction with it makes one aware of some of the connections which had been imperceptible. To recur to our simple example, a child who reaches for a bright light gets burned. Henceforth he knows that a certain act of touching in connection with a certain act of vision (and vice-versa) means heat and pain; or, a certain light means a source of heat. The acts by which a scientific man in his laboratory learns more about flame differ no whit in principle. By doing certain things, he makes perceptible certain connections of heat with other things, which had been previously ignored. Thus his acts in relation to these things get more meaning; he knows better what he is doing or 'is about' when he has to do with them; he can intend consequences instead of just letting them happen—all synonymous ways of saying the same thing. At the same stroke, the flame has gained in meaning; all that is known about combustion, oxidation, about light and temperature, may become an intrinsic part of its intellectual content.

（1）经验的增长与我们对于所从事活动的相互关联性和连续性认识的提高有关。人的活动开始时都是一种冲动，也就是说，具有盲目性。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即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和其他活动有何

关联。有教育意义的活动能使人认识到过去未曾感觉到的某些联系。回顾一下我们举过的简单例子：一个儿童因伸手去碰烛火而被烫伤。从此以后，他会把某接触活动和某视觉活动联系起来（反过来，某视觉活动和某接触活动联系起来）就意味着烫伤和疼痛；或者，他知道烛火就是热的来源。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通过多种实验可以获得更多有关火焰的知识，但与此例在原理上毫无区别。科学家也是通过做一些实验才能认识到曾被忽略的热和其他事物的联系。因此，他做的与之有关的实验能获得更多的意义。当他必须做这些事情时，对于他正在做什么，他知道得更清楚。他能设计实验以得到预想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让结果发生。这些都是关于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说法。这样一来，火焰获得了意义；所有关于燃烧、氧化作用以及有关光和温度的知识都可以变成有关火焰知识内容的一部分。

(2) The other side of an educative experience is an added power of subsequent direction or control. To say that one knows what he is about, or can intend certain consequences, is to say, of course, that he can better anticipate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hat he can, therefore, get ready or prepare in advance so as to secure beneficial consequences and avert undesirable ones. A genuinely educative experience, then, one in which instruction is conveyed and ability increased, is contradistinguished from a routine activity on one hand, and a capricious activity on the other, (a) In the latter one 'does not care what happens'; one just lets himself go and avoids connecting the consequences of one's act (the evidences of its connections with other things) with the act. It is customary to frown upon such aimless random activity, treating it as willful mischief or carelessness or lawlessness. But there is a tendency to seek the cause of such aimless activities in the youth's own disposition, isolated from everything else. But in fact such activity is explosive, and due to maladjustment with surroundings. Individuals act capriciously whenever they act under external dictation, or from

being told, without having a purpose of their own or perceiving the bearing of the deed upon other acts. One may learn by doing something which he does not understand; even in the most intelligent action, we do much which we do not mean, because the largest portion of the connections of the act we consciously intend are not perceived or anticipated. But we learn only because after the act is performed we note results which we had not noted before. But much work in school consists in setting up rules by which pupils are to act of such a sort that even after pupils have acted, they are not led to se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sult—say the answer—and the method pursued. So far as they are concerned, the whole thing is a trick and a kind of miracle. Such action is essentially capricious, and leads to capricious habits. (b) Routine, action, action which is automatic, may increase skill to do a particular thing. In so far, it might be said to have an educative effect. But it does not lead to new perceptions of bearings and connections; it limits rather than widens the meaning-horizon. And since the environment changes and our way of acting has to be modified in order successfully to keep a balanced connection with things, an isolated uniform way of acting becomes disastrous at some critical moment. The vaunted 'skill' turns out gross ineptitude.

（2）教育经验的另一方面作用是提高后续指导或控制的能力。我们说一个人知道他在做什么，或者说他能设想出某些结果，这就是说，他能预料到将会发生的事情。因此，他可以通过预先准备，以便获得好的结果，并且避免不良后果。这样一种真正经验有教育作用和教育意义、足以提高人的能力，不但与机械行为不同，而且有别于任性的行为。所谓任性的行为指当事者“不顾后果”，只是任性地去做，回避其行为和结果的联系（这种结果就是该行为与其他事情有联系的证明）。对于这种无目的、杂乱无章的行为，人们往往皱眉蹙额，视之为故意捣蛋、漫不经心或无法无天。但是有一种倾向试图孤立地从

年轻人的特性中寻找这种无目的活动的原因。事实上，这种行为是由于不能适应环境而产生的。无论何时，人们受他人指令的行为，或按别人指示行动，没有自己的目的，看不到自己的行动同其他行动有何关系，这种行动就是任性的行动。我们可以通过做一件自己不熟悉的事情有所收获。许多聪明之举都是我们无意而为。我们有意识地想做的事情大部分都未被发觉或预料到。我们只有在做完事情以后，才看出从前没有发觉或预料的结果，因此有所认识。但是，学校的很多情况下只是制订规则，要求学生照着做，甚至在学生做了以后，也不引导他们去发现所用的方法和结果（例如答案）之间的联系。就学生而言，整件事情只是一个把戏或一种奇迹。这种活动本质上是任性的，并且会导致任性的习惯。自动完成的机械动作可能会提高某一特定技能。就此看来，机械动作也许有些教育效果。但是这不能让人对该行为的意义和关联有新的认识。它只是限制而不是开拓意义的领域。由于环境是要改变的，所以我们行为方式也必须改变，以便成功地保持和各种事物的平衡联系。在某些关键时刻，孤立而统一的行动方式会造成惨重的损失。这种自吹自擂的“技能”完全只是愚蠢无能罢了。

The essential contrast of the idea of education as continuous reconstruction with the other one-sided conceptions which have been criticized in this and the previous chapter is that it identifies the end (the result) and the process. This is verbally self-contradictory, but only verbally. It means that experience as an active process occupies time and that its later period completes its earlier portion; it brings to light connections involved, but hitherto unperceived. The later outcome thus reveals the meaning of the earlier, while the experience as a whole establishes a bent or disposition toward the things possessing this meaning. Every such continuous experience or activity is educative, and all education resides in having such experiences.

把教育视为持续性改造的思想与在本章及前一章所批判的其他片面观点有本质的区别。该思想把教育目的（即结果）和过程视为同一件事。这句话表面看似有些矛盾，其实在意思上并不矛盾。这句话的意思是，经验作为一个主动接受的过程是消耗时间的，其后一段时间完成其前一段经历，把经验所包含、但尚未察觉的各种联系一一显露出来。因此，后面的结果揭示前面结果的意义，而整体经验就习惯于偏好具有意义的事物。所有这种继续不断的经验或活动都是有教育作用的。一切教育都存在于这种经验之中。

It remains only to point out (what will receive more ample attention later)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experience may be social as well as personal. For purposes of simplification we have spoken in the earlier chapters somewhat as if the education of the immature which fills them with the spirit of the social group to which they belong, were a sort of catching up of the child with the aptitudes and resources of the adult group. In static societies, societies which make the maintenance of established custom their measure of value, this conception applies in the main. But not in progressive communities. They endeavor to shape the experiences of the young so that instead of reproducing current habits, better habits shall be formed, and thus the future adult society be an improvement on their own. Men have long had some intimation of the extent to which education may be consciously used to eliminate obvious social evils through starting the young on paths which shall not produce these ills, and some idea of the extent in which education may be made an instrument of realizing the better hopes of men. But we are doubtless far from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efficacy of education as a constructive agency of improving society, from realizing that it represents not only a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youth but also of the future society of which they will be the constituents.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经验的改造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这一点以后还要详论）。在前面各章，为简明起见，我们的讨论多少有点把对儿童的教育，即向他们灌输所属社会团体的精神，看作要使他们赶上成年人的智慧和能力。在故步自封、把维护已有风俗习惯作为价值标准的社会里，这种观点可以说代表了主流。但是，这种观点并不适用于力图塑造年轻人的经验，让他们放弃追逐流行习惯的进步社会。而在这样的进步社会里，年轻人能养成更好的习惯，来让将来的社会比现在更为进步。长期以来，人们表示要有意识地利用教育来消除那些明显的社会弊病，让年轻人自一开始就行走在没有社会弊病的道路上。同时，人们还设想把教育打造为人类实现更好希望的工具。但是，我们显然还没有实现教育作为改进社会的建设性媒介的潜在功能。儿童和青年是未来社会的栋梁。我们的目标是使教育成为儿童和青年发展的代表以及未来社会发展的代表，然而，这一目标仍有待我们去实现。

Summary.

总结

Education may be conceived either retrospectively or prospectively. That is to say, it may be treated as process of accommodating the future to the past, or as an utilization of the past for a resource in a developing future. The former finds its standards and patterns in what has gone before. The mind may be regarded as a group of contents resulting from having certain things presented. In this case, the earlier presentations constitute the material to which the later are to be assimilated. Emphasis upon the value of the early experiences of immature beings is most

important, especially because of the tendency to regard them as of little account. But these experiences do not consist of externally presented material, but of interaction of native activities with the environment which progressively modifies both the activitie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defect of the Herbartian theory of formation through presentations consists in slighting this constant interaction and change.

可以从追溯既往和展望未来两方面解释教育，即可以把它视为未来适应过去的过程，也可以视之为利用过去，发展未来的一种力量。前一种教育在已往的事物中寻找其标准模式。心智可以被视为从提示某种事物得来的内容。在此情况下，早期的表象构成了后来被同化的原材料。这点强调了儿童早期经验的价值非常重要，特别是因为现在出现了一种轻视早期经验的倾向。但是这些经验并非由外来材料构成，而是由于先天活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正慢慢改变着先天活动，也改变着环境。赫巴尔特所主张的表象形成心智的理论的缺点在于忽视这种经常的相互作用和变化。

The same principle of criticism applies to theories which find the primary subject matter of study in the cultural products—especially the literary products—of man's history. Isolated from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ent environment in which individuals have to act, they become a kind of rival and distracting environment. Their value lies in their use to increase the meaning of the things with which we have actively to do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idea of education advanced in these chapters is formally summed up in the idea of continuous reconstruction of experience, an idea which is marked off from education as preparation for a remote future, as unfolding, as external formation, and as recapitulation of the past.

同样的批判也可应用于把人类历史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文学作品——视为主要材料的教育理论。这些文化遗产一旦与个人当前活动的环境脱离联系，也就进入了一个敌对的和使人分心的环境。它们的价值在于可以增加我们必须在当前积极去做的那些事情的意义。正式地讲，以上几章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可以概括成经验的继续不断改造的思想。这种思想有别于与把教育视为遥远将来的准备、视为潜在能力的展开和作为外部的塑造以及作为过去的重演等观点。

Chapter 7 The Democratic Conception in Education

第七章　教育中的民主观念

For the most part, save incidentally, we have hitherto been concerned with education as it may exist in any social group. We have now to make explici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pirit, material, and method of education as it operat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y life. To say that education is a social function, securing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immature through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life of the group to which they belong, is to say in effect that education will vary with the quality of life which prevails in a group. Particularly is it true that a society which not only changes but which has the ideal of such change as will improve it, will have different standards and methods of education from one which aims simply at the perpetuation of its own customs. To make the general ideas set forth applicable to our own educational practice,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come to closer quarters with the nature of present social life.

到本章为止，除了特殊情况以外，我们主要讲述的是在任何社会群体中可能存在的教育。在各种不同社会生活中所开展的教育在精神、内容和方法都有所不同，我们必须弄清楚他们的区别。教育具有社会功能，通过让未成年人参与其所在群体的生活，从而使他们得到指引和发展，这实际上指的是教育会因社会群体中生活质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与仅延续自身的风俗习惯的社会相比，一个进行着变革，而且通过变革使自己日臻完善的社会将有完全不同的教育标准和教育方法，这一点显得尤为正确。因此，要想把提出的教育思想应用到自身的教育实践中，我们就必须详细研究当前社会生活的性质。

1．The Implications of Human Association.

一、人类合作的涵义

Society is one word, but many things. Men associate together in all kinds of ways and for all kinds of purposes. One man is concerned in a multitude of diverse groups, in which his associates may be quite different. It often seems as if they had nothing in common except that they are modes of associated life. Within every larger social organization there are numerous minor groups: not only political subdivisions, but industrial, scientific, religious, associations. There are political parties with differing aims, social sets, cliques, gangs, corporations, partnerships, groups bound closely together by ties of blood, and so in endless variety. In many modern states, and in some ancient, there is great diversity of populations, of varying languages, religions, moral codes, and traditions. From this standpoint, many a minor political unit, one of our large cities, for example, is a congeries of loosely associated societies, rather than an inclusive and permeating community of action and thought. [8_1]

社会虽然只是一个名词，却有许多涵义。人们为了不同目标，按照不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个人处于各种社会群体，他在这些群体中的朋友可能大不相同。从表面看，除了享有一些共同的生活模式以外，这些群体毫无共同之处。在每一个较大的社会组织内部都有无数小团体：有政治上的小团体，也有工业、科学和宗教团体；有目标不同的政党、社会派别、小集团、帮派、法人，合股人，也有因血缘关系结成的亲密团体等。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和某些古代国家，人口极

为多样化，因为有着众多不同的语言、宗教、道德准则和传统。由此看来，很多小的政治单位，例如我们的大城市其实只是一松散联合的组织，而不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亲和力的行为和思想的共同体。[9_1]

The terms society, community, are thus ambiguous. They have both a eulogistic or normative sense, and a descriptive sense; a meaning de jure and a meaning de facto. In social philosophy, the former connotation is almost always uppermost. Society is conceived as one by its very nature. The qualities which accompany this unity, praiseworthy community of purpose and welfare, loyalty to public ends, mutuality of sympathy, are emphasized. But when we look at the facts which the term denotes instead of confining our attention to its intrinsic connotation, we find not unity, but a plurality of societies, good and bad. Men banded together in a criminal conspiracy, business aggregations that prey upon the public while serving it, political machines held together by the interest of plunder, are included. If it is said that such organizations are not societies because they do not meet the ideal requirements of the notion of society, the answer, in part, is that the conception of society is then made so “ideal” as to be of no use, having no reference to facts; and in part, that each of these organizations, no matter how opposed to the interests of other groups, has something of the praiseworthy qualities of “Society” which hold it together. There honor among thieves, and a band of robbers has a common interest as respects its members. Gangs are marked by fraternal feeling, and narrow cliques by intense loyalty to their own codes. Family life may be marked by exclusiveness, suspicion, and jealousy as to those without, and yet be a model of amity and mutual aid within. Any education given by a group tends to socialize its members, but the quality and value of the socialization depends upon the habits and aims of the group.

因此，社会、群体这些名词的涵义是含糊不清的。它们既有颂扬性或规范性的意义，也有描述性的意义；既有法律上的意义，也有事实上的意义。在社会哲学中，人们似乎更注重前一种涵义。社会因其特性而被视为一个整体。于是，与之伴随的种种品质，如值得称赞的社区的目标与福利，忠实于公共目标以及相互同情等都得到重视。然而，如果着眼于社会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事实，而忽略社会的内在涵义，我们就找不到统一体，而只有许多社会团体，有好的团体，也有坏的团体。聚众犯罪者、为公众服务却侵害公共利益的商社以及为掠夺财富而组建的政治集团都可以包含在社会含义之内。如果有人说，这些人不能称之为社会，因为他们并不符合社会的理想要求。我们对此的部分回答是，完全不顾事实，过于理想的社会概念是没有用的；另外，以上所说的每个组织，不管与其他群体的利益如何对立，都有使其维系的“社会”的某些值得颂扬的品质。例如，一群小偷有他们自己认同的道义；一群强盗有共同利益；一个帮派有友好的感情；狭隘的小集团十分忠实于自己的准则。家庭生活对家庭以外的人可能表现出排他性、猜疑和嫉妒，但是在家庭内部却能彼此和睦互助。对某一群体所进行的教育能使其成员社会化，但是，社会化的质量和价值需要视群体的习惯和目标而定。

Hence, once more, the need of a measure for the worth of any given mode of social life. In seeking this measure, we have to avoid two extremes. We cannot set up, out of our heads, something we regard as an ideal society. We must base our conception upon societies which actually exist, in order to have any assurance that our ideal is a practicable one. But, as we have just seen, the ideal cannot simply repeat the traits which are actually found. The problem is to extract the desirable traits of forms of community life which actually exist, and employ them to criticize undesirable features and suggest improvement. Now in any social group whatever, even in a gang of thieves, we find some interest held in

common, and we find a certain amount of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ve intercourse with other groups. From these two traits we derive our standard. How numerous and varied are the interests which are consciously shared? How full and free is the interplay with other forms of association? If we apply these considerations to, say, a criminal band, we find that the ties which consciously hold the members together are few in number, reducible almost to a common interest in plunder; and that they are of such a nature as to isolate the group from other groups with respect to give and take of the values of life. Hence, the education such a society gives is partial and distorted. If we take, on the other hand, the kind of family life which illustrates the standard, we find that there are material, intellectual, aesthetic interests in which all participate and that the progress of one member has worth for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members—it is readily communicable—and that the family is not an isolated whole, but enters intimately into relationships with business groups, with schools, with all the agencies of culture, as well as with other similar groups, and that it plays a due part in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in return receives support from it. In short, there are many interests consciously communicated and shared; and there are varied and free points of contact with other modes of association.

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我们需要有一个标准测量现有社会生活方式的价值。在寻找这一测量标准时，我们必须避免两个极端。我们不能单凭脑袋空想出一个理想社会。为了确保理想切实可行，我们的社会概念必须建立在实际存在的社会基础上。但是，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那样，这个理想不能只是重复实际中的特点。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从现存的社会生活形式汲取优良的特点并用于批评不良的特征，提出改进的方法。在任何社会群体，甚至在一伙小偷中，我们都能找到彼此共同的利益，我们还发现它们与其他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合作

和交流。从这两个特点，我们可以推导出自己的标准。群体内成员有意识分享的利益有多少？与其他团体的相互合作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以此为据来考察犯罪团伙，我们就会发现，把一伙罪犯有意识地团结起来的纽带很少，掠夺也许是唯一他们共同的兴趣；由于人生价值观不同，该犯罪团伙自然与许多社会团体格格不入。因此，这种社会所给予的教育反常并且不完整。另一方面，如果以标准的家庭生活为例，我们会发现，家庭有着大家共享的物质、精神和审美利益。同时，一个成员的进步对其他成员的经验也有价值。在这种家庭里，经验容易传授。这种家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群体，它与其他商业团体、学校等文化团体以及其他团体有密切关系，对于社会组织发挥相当的影响，反过来也得到社会组织的支持。总之，在这种家庭里，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在家庭成员中有意识地相互传递，共同参与。家庭成员与其他团体也有多种自由接触。

I . Let us apply the first element in this criterion to a despotically governed state. It is not true there is no common interest in such an organization between governed and governors. The authorities in command must make some appeal to the native activities of the subjects, must call some of their powers into play. Talleyrand said that a government could do everything with bayonets except sit on them. This cynical declaration is at least a recognition that the bond of union is not merely one of coercive force. It may be said, however, that the activities appealed to are themselves unworthy and degrading—that such a government calls into functioning activity simply capacity for fear. In a way, this statement is true. But it overlooks the fact that fear need not be an undesirable factor in experience. Caution, circumspection, prudence, desire to foresee future events so as to avert what is harmful, these desirable traits are as much a product of calling the impulse of fear into play as is cowardice and abject submission. The real difficulty is that the appeal to fear is isolated. In evoking dread

and hope of specific tangible reward—say comfort and ease—many other capacities are left untouched. Or rather, they are affected, but in such a way as to pervert them. Instead of operating on their own account they are reduced to mere servants of attaining pleasure and avoiding pain.

（1）让我们把该标准的第一个要素应用于一个专制国家。硬要说，在这种国家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共同利益，是不正确的。统治当局必须借助于国民的天性来让行使部分权力。塔列朗曾说过，一个政府能用刺刀做任何事情，但不能坐在刺刀上。这句讽刺的话至少认识到管理一个国家不能全靠武力。我们不妨这样说，专制政府的呼吁和所做之事本身是不值得做的，并且是丢人的，这样的政府只能唤起被统治者的恐惧。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恐惧不一定是经验中的不利因素。小心谨慎，希望预见未来事件以避免危害，这些特性与胆怯和卑躬屈膝同样是恐惧本能的产物。真正的困难在于这种求之于恐惧的做法是孤立的。在引起恐惧和希望得到实质性的鼓励（例如安慰和疏导）之时，很多其他能力都未涉及到。或者说，这些能力受到了影响，但用这样的方式来妨碍他们。它们仅仅被用于趋乐避苦，而不是按其功能正常地使用。

This is equivalent to saying that there is no extensive number of common interests; there is no free play back and forth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social group. Stimulation and response are exceedingly one sided. In order to have a large number of values in common, all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must have an equabl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and to take from others. There must be a large variety of shared undertakings and experiences. Otherwise, the influences which educate some into masters, educate others into slaves. And the experience of each party loses in meaning, when the free interchange of varying modes of life-experience is arrested. A

separation into a privileged and a subject-class prevents social endosmosis. The evils thereby affecting the superior class are less material and less perceptible, but equally real. Their culture tends to be sterile, to be turned back to feed on itself; their art becomes a showy display and artificial; their wealth luxurious; their knowledge overspecialized; their manners fastidious rather than humane. Lack of the free and equitable intercourse which springs from a variety of shared interests makes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unbalanced. Diversity of stimulation means novelty, and novelty means challenge to thought. The more activity is restricted to a few definite lines—as it is when there are rigid class lines preventing adequate interplay of experiences—the more action tends to become routine on the part of the class at a disadvantage, and capricious, aimless, and explosive on the part of the class having the materially fortunate position. Plato defined a slave as one who accepts from another the purposes which control his conduct. This condition obtains even where there is no slavery in the legal sense. It is found wherever men are engaged in activity which is socially serviceable, but whose service they do not understand and have no personal interest in. Much is said about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work. It is a narrow view which restricts the science which secures efficiency of operation to movements of the muscles. The chief opportunity for science is the discovery of the relations of a man to his work—including his relations to others who take part—which will enlist his intelligent interest in what he is doing. Efficiency in production often demands division of labor. But it is reduced to a mechanical routine unless workers see the technical,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involved in what they do, and engage in their work because of the motivation furnished by such perceptions. The tendency to reduce such things as efficiency of activity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to purely technical externals is evidence of the one-sided stimulation of thought given to those in control of

industry—those who supply its aims. Because of their lack of all-round and well-balanced social interest, there is not sufficient stimulus for attention to the human factors and relationships in industry. Intelligence is narrowed to the factors concerned with technical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goods. No doubt, a very acute and intense intelligence in these narrow lines can be developed, but the failure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significant social factors means none the less an absence of mind, and a corresponding distortion of emotional life.

这就等于说，社会各成员很少有共同利益，彼此之间也没有自由往来。刺激和反应全是单方面的。为了分享大量共同价值观，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有均等的机会相互帮助，必须有共同的事业和经历。否则，教育会使一些人成为主人，而使另一些人成为奴隶。如果不同的生活经验模式不能自由交流，任何一方的经验都不会有意义。社会被划分为特权阶级和受压迫阶级，由此变得僵化。上层阶级所受到的侵害在物质方面较小，也不易察觉，但同样是实际存在的。他们的文化往往枯燥无味，他们的艺术往往矫揉造作。他们的财富过于奢华，他们的知识过分专门化。他们的仪表过分讲究，却并不高尚。由于对各方的共同利益缺乏自由而平等的交流，智力的刺激作用丧失了平衡。刺激的多样性意味着新奇，新奇则会挑战思维。如果有严格的阶级界限阻止人们交流彼此的经验，人活动的范围就受到限制。越是这样，处于不利地位的阶级的行为就越会墨守成规，而处于物质优越地位的阶级的行为就更加任性、漫无目标和狂躁。柏拉图把奴隶视为愿意接受他人控制的人。尽管法律意义上并没有奴隶制度，但仍旧有这种情况。只要现在有人对自己所做的服务社会的事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他就身处奴役状态。现在有许多人谈到要科学管理工作，却狭隘地把旨在提高效率的管理与肌肉运动相混淆。其实，利用科学的主要机会在于发现人与其工作的关系——包括与参与工作的其他人的关系。了解这种关系能激发他对所做工作浓厚的兴趣。要增加生产效率就需要进行劳动分工。然而，除非工人了解所做工作包含的技术、智力和社会

的种种关系并且有工作动力，否则，他们的工作就变成机械呆板的行为。有人把工作效率和科学管理视为纯技术的外部事情，这只能证明那些管理工业的人在思想上的偏激。由于缺乏全面的和平衡的社会兴趣，这些管理者整天所想的只是关于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因而忽视了人的因素和人际关系。在这种狭隘的范围内，他们也能发展非常敏锐和深邃的智慧。但是，忽视重要的社会因素意味着心灵和情感的扭曲。

II . This illustration (whose point is to be extended to all associations lacking reciprocity of interest) brings us to our second point. The isolation and exclusiveness of a gang or clique brings its antisocial spirit into relief. But this same spirit is found wherever one group has interests 'of its own' which shut it out from full interaction with other groups, so that its prevailing purpose is the protection of what it has got, instead of reorganization and progress through wider relationships. It marks nations in their isolation from one another; families which seclude their domestic concerns as if they had no connection with a larger life; schools when separated from the interest of home and community; the divisions of rich and poor; learned and unlearned. The essential point is that isolation makes for rigidity and formal institutionalizing of life, for static and selfish ideals within the group. That savage tribes regard aliens and enemies as synonymous is not accidental. It springs from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identified their experience with rigid adherence to their past customs. On such a basis it is wholly logical to fear intercourse with others, for such contact might dissolve custom. It would certainly occasion reconstruction. It is a commonplace that an alert and expanding mental life depends upon an enlarging range of contact with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But the principle applies even more significantly to the field where we are apt to ignore it—the sphere of social contacts. Every expansive era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has coincided with the operation of factors which have tended to eliminate distance between peoples and classes previously hemmed off from one another. Even the alleged benefits of war so far as more than alleged, spring from the fact that conflict of peoples at least enforces intercourse between them and thus accidentally enables them to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thereby to expand their horizons. Travel,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tendencies, have at present gone far to break down external barriers; to bring peoples and classes into closer and more perceptible connection with one another. It remains for the most part to secure the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significance of this physical annihilation of space.

（2）以上例子（所有各自为政的小团体都会出现这种情形）引出我们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一个团伙或小集团的孤立状态和排他性质凸显出其反社会精神。但是，在任何私立的社会群体中也能找到同样的反社会精神。这种私利使该团体与其他社会群体隔离，使他们无法相互影响，其主要目标在于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是通过开放的视野求得社会的改造和进步。这样的国家彼此不相来往；这样的家庭只在乎自己的家庭事务，似乎与社会生活毫无联系；这样的学校与家庭和社会的利益完全隔绝。人有了贫富之分，等级之别。关键是，孤立致使生活僵化和形式化，在社会群体内部产生一成不变的自私理念。原始部落把外来者视为仇敌，这不是偶然的。他们把自己的经验和固守过去的习惯视为同一件事，因此惧怕与别人交往。这种接触可能毁灭习惯，也肯定会引发改革。众所周知，活跃和开放的精神生活有赖于与物质环境接触的扩大。把该原理应用到我们容易忽视的领域，即社会接触的领域，显然更为重要。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开拓的时代都与过去各民族和阶级之间从相互封闭到消除隔阂有关。即使所谓战争的利益也得益于各民族之间的冲突。这至少能加强他们之间的交往，从而使他们相互学习，扩大彼此的视野。当今旅游、经济和商业的兴旺已经打破外部的障碍，使各民族和阶级相互联系更为密

切，更为明显。这种空间距离消失在智力和情感方面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于逐步认识。

2．The Democratic Ideal.

二、民主理想

The two elements in our criterion both point to democracy. The first signifies not only more numerous and more varied points of shared common interest, but greater reliance upon the recognition of mutual interests as a factor in social control. The second means not only freer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once isolated so far as intention could keep up a separation) but change in social habit—its continuous readjustment through meeting the new situations produced by varied intercourse. And these two traits are precisely what characterize the democratically constituted society.

我们所提出标准的两个要素都指向民主。第一个要素表明社会存在数量更大和种类更多的共同利益，而且更加依赖对作为社会控制因素的共同利益的认识。第二个要素表示各社会群体之间具有更加自由的相互影响（由于要保持隔离状态，这些社会群体曾是各自孤立的）。只要改变社会习惯，灵活应对由于多方面的交流所产生的新情况，社会习惯就能得到持续地重新调整。这两个要素正是民主社会的特征。

Upon the educational side, we note first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a form of social life in which interests are mutually

interpenetrating, and where progress, or readjustment,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makes a democratic community more interested than other communities have cause to be in deliberate and systematic education. The devotion of democracy to education is a familiar fact. The superficial explanation is that a government resting upon popular suffrage cannot be successful unless those who elect and who obey their governors are educated. Since a democratic society repudiates the principle of external authority, it must find a substitute in voluntary disposition and interest; these can be created only by education. But there is a deeper explanation. A democracy is more than a form of government; it is primarily a mode of associated living, of conjoint communicated experience. The extension in space of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who participate in an interest so that each has to refer his own action to that of others, and to consider the action of others to give point and direction to his own, is equivalent to the breaking down of those barriers of class, race, and national territory which kept men from perceiving the full import of their activity. These more numerous and more varied points of contact denote a greater diversity of stimuli to which an individual has to respond; they consequently put a premium on variation in his action. They secure a liberation of powers which remain suppressed as long as the incitations to action are partial, as they must be in a group which in its exclusiveness shuts out many interests.

在教育方面，我们首先注意到，某种社会生活方式的实现使得民主团体比其他团体更有理由醉心于有意而为之的系统教育。在这种社会中，各种利益相互渗透，进步或重新调整永远是社会的当务之急。民主政治热衷于教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表面的解释是，除非选举人和被统治者都受过教育，否则，依赖于公众投票而产生的政府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民主社会既然否定外部权威，就必须取而代之以

自愿的倾向和兴趣；而也只能通过教育来实现。还有一种更为深刻的解释：民主主义不只是一种政府形式，它还是社会团体共同生活的方式——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所有的人参与具有共同利益的事情，每个人必须参照别人的行为，考虑别人的行为，以使自己的行为有意义和方向。这样的人急剧增多就打破了阶级、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屏障，而这些屏障曾使人在过去看不到他们活动的全部意义。这些数量更大、种类更多的接触表明，每个人都必须对更加多样的刺激做出反应，从而助长其行为的改变。这些接触使人的能力得以自由发展。只要对行为的刺激是不完全的，人的能力就会受到压制，这种不完全的刺激常见于那些忽视社会利益的团体里。

The widening of the area of shared concerns, and the liberation of a greater diversity of personal capacities which characterize a democracy, are not of course the product of deliberation and conscious effort. On the contrary, they were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s of manufacture and commerce, travel, migration, and intercommunication which flowed from the command of science over natural energy. But after greater individualization on one hand, and a broader community of interest on the oth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t is a matter of deliberate effort to sustain and extend them. Obviously a society to which stratification into separate classes would be fatal, must see to it that intellectual opportunities are accessible to all on equable and easy terms. A society marked off into classes need be specially attentive only to the education of its ruling elements. A society which is mobile, which is full of channels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a change occurring anywhere, must see to it that its members are educated to personal initiative and adaptability. Otherwise, they will be overwhelmed by the changes in which they are caught and whose significance or connections they do not perceive. The result will be a confusion in which a few will appropriate to themselves the

results of the blind and externally directed activities of others.

全民参与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具有民主特征的个人能力的解放，显然不是深谋远虑和有意识努力的结果。相反，这是由科学对自然资源的控制而应运而生的制造业、商业、旅游、移民和通信的发展所造成的。但是，在更大个性化和更广泛共同利益出现以后，我们就要做出特别的努力对此加以维持和推广。显然，将社会划分成许多阶级将是致命的。社会必须给其全体成员求得知识的平等和宽厚条件。一个划分成阶级的社会只需特别注意统治者的教育。一个流动的社会有许多渠道把任何地方发生的变化发布出去，它必须教育其成员，使其有首创精神和适应能力。否则，他们将被突如其来的变化所迷惑，看不出这些变化的意义或关联。结果将是一片混乱，人们由外部势力所蛊惑，盲目而为的活动成果将为少数人滥用。

3．The Platonic Educational Philosophy.

三、柏拉图的教育哲学

Subsequent chapters will be devoted to making explicit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democratic ideas in education. In the remaining portions of this chapter, we shall consider the educational theories which have been evolved in three epochs when the social import of education was especially conspicuous. The first one to be considered is that of Plato. No one could better express than did he the fact that a society is stably organized when each individual is doing that for which he has aptitude by nature in such a way as to be useful to others (or to contribute to the whole to which he belongs); and that it is the business of education to discover these

aptitudes and progressively to train them for social use. Much which has been said so far is borrowed from what Plato first consciously taught the world. But conditions which he could not intellectually control led him to restrict these ideas in their application. He never got any conception of the indefinite plurality of activities which may characterize an individual and a social group, and consequently limited his view to a limited number of classes of capacities and of social arrangements.

在接下来的几章，我们将探讨教育民主思想的涵义。在本章余下的篇幅中，我们要研究在三个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教育理论。在这三个历史时期里，教育的社会涵义特别明显。首先要研究的是柏拉图的教育理论。没有谁能比柏拉图更好地表达这样一个事实：当社会中每个人都能按自己的能力去做有益于别人之事时（或对他所属团体有益之事），社会就能稳定。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开发人的能力，循序渐进地加以训练，使之应用于社会。这是柏拉图首次有意识地这样昭示世人，我们以上讨论多是借用于柏拉图的话。但是，柏拉图的视野有限，有很多情况都没有考虑到，因此，其思想的应用也受到限制。他从未意识到个人和社会群体活动的无限多元性。他的观点往往局限于为数不多的几种能力的种类和社会安排。

Plato's starting point is that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depends ultimately upon knowledge of the end of existence. If we do not know its end, we shall be at the mercy of accident and caprice. Unless we know the end, the good, we shall have no criterion for rationally deciding what the possibilities are which should be promoted, nor how social arrangements are to be ordered. We shall have no conception of the proper limits and distribution of activities —what he called justice—as a trait of both individua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But how is the knowledge of the final and permanent

good to be achieved? In dealing with this question we come upon the seemingly insuperable obstacle that such knowledge is not possible save in a just and harmonious social order. Everywhere else the mind is distracted and misled by false valuations and false perspectives. A disorganized and factional society sets up a number of different models and standards. Under such conditions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individual to attain consistency of mind. Only a complete whole is fully self-consistent. A society which rests upon the supremacy of some factor over another irrespective of its rational or proportionate claims, inevitably leads thought astray. It puts a premium on certain things and slurs over others, and creates a mind whose seeming unity is forced and distorted. Education proceeds ultimately from the patterns furnished by institutions, customs, and laws. Only in a just state will these be such as to give the right education; and only those who have rightly trained minds will be able to recognize the end, and ordering principle of things. We seem to be caught in a hopeless circle. However, Plato suggested a way out. A few men, philosophers or lovers of wisdom or truth—may by study learn at least in outline the proper patterns of true existence. If a powerful ruler should form a state after these patterns, then its regulations could be preserved. An education could be given which would sift individuals, discovering what they were good for, and supplying a method of assigning each to the work in life for which his nature fits him. Each doing his own part, and never transgressing, the order and unity of the whole would be maintained.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find in any scheme of philosophic thought a more adequate recognition on one hand of the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arrangements and, on the other, of the dependence of those arrangements upon the means used to educate the young.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find a deeper sense of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in discovering and developing personal capacities, and training them so that they would connect

with the activities of others. Yet the society in which the theory was propounded was so undemocratic that Plato could not work out a solution for the problem whose terms he clearly saw.

柏拉图的出发点是，社会组织最终依赖于对生活目标的认识。如果不知晓生活目标，我们的行为将受偶发事故和一时怪想的支配。除非我们明确自己的生活目标，即从善如流，否则我们将无法理智地决定应该弘扬什么，也无法理智地决定应该做出如何的社会安排。我们对柏拉图称为正义，即将对人的行为的适当限制和分配视为个体和社会特征的概念将毫无知晓。但是，如何才能获得对终极和永恒的“善”的认识呢？要讨论此问题，我们遇到一个似乎不可克服的障碍——除非在社会秩序公正和谐，否则要获得这种认识是不可能的。除了在这种社会秩序以外，心灵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会受到错误的价值评估和观点的迷惑。一个组织不健全、派别林立的社会会提出很多不同的模式和标准。在此情况下，社会成员不可能在心理上保持一致。只有一个健全的整体才能完全始终一致。一个依靠某种优势地位，忽视他人合理诉求的社会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的思想引入歧途。这样的社会鼓励某些事情，而忽视其他事情。它造成一种表面上似乎是统一的心理。但这其实是一种被强加，被歪曲的心理。教育的进行最终是从制度、风俗和法律提供的模式出发。只有在公正的国家，它的制度、习俗和法律才能给人正确的教育；也只有受到正确心灵训练的人才能知晓生活目标和处世原则。我们似乎受困于绝望之中。但是，柏拉图提出了一条出路。他认为，哲学家、智慧或真理的爱好者可以通过学习至少大致了解真实生活的正确模式。如果一个强力统治者按照这样的模式建立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规章就能保存下来。这样，就能提供一种教育，对个体进行筛选，发现其特长所在，然后使每一个人都能根据其能力大小从事适合自己的工作。如果每个人都有所作为，不去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就能维持社会的秩序和统一。柏拉图既充分认识到了社会组织的教育意义，又找到了社会组织教育年轻人所依赖的手段。要想在任何别的哲学体系中找到比柏拉图对此有更为充分认识的人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有人比柏拉图对教育的功能有更为深刻

的认识，教育功能即是在发现和发展个人能力以及训练这些能力使之与他人活动相关联的重要性。由于该理论源自非民主社会，柏拉图即使明知所应解决问题的条件，却不能想出解决的方法。

While he affirmed with emphasis that the place of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y should not be determined by birth or wealth or any conventional status, but by his own nature as discovered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he had no perception of the uniqueness of individuals. For him they fall by nature into classes, and into a very small number of classes at that. Consequently the testing and sifting function of education only shows to which one of three classes an individual belongs. There being no recognition that each individual constitutes his own class, there could be no recognition of the infinite diversity of active tendencies and combinations of tendencies of which an individual is capable. There were only three types of faculties or powers in the individual's constitution. Hence education would soon reach a static limit in each class, for only diversity makes change and progress.

尽管柏拉图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应该由出生、财富或世俗地位来决定，而是应该由在教育过程中所发现的天性来决定，但是柏拉图对个体的独特性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在柏拉图看来，人可以按其特性分成不多的几类。因此，教育的试验和筛选作用仅仅表明某人属于三个种类中哪一类。柏拉图不承认每一个体可以构成自己的种类，也不承认个体可以做出无限多的不同行为以及有能力合成这些行为。他认为，个体只具有三种能力。所以，教育很快会使某一能力达到极限，只有变异才能产生变革和进步。

In some individuals, appetites naturally dominate; they are

assigned to the laboring and trading class, which expresses and supplies human wants. Others reveal, upon education, that over and above appetites, they have a generous, outgoing, assertively courageous disposition. They become the citizen-subjects of the state; its defenders in war; its internal guardians in peace. But their limit is fixed by their lack of reason, which is a capacity to grasp the universal. Those who possess this are capable of the highest kind of education, and become in time the legislators of the state—for laws are the universals which control the particulars of experience. Thus it is not true that in intent, Plato subordinated the individual to the social whole. But it is true that lacking the perception of the uniqueness of every individual, his incommensurability with others, and consequently not recognizing that a society might change and yet be stable, his doctrine of limited powers and classes came in net effect to the idea of the subordination of individuality. We cannot better Plato's conviction that an individual is happy and society well organized when each individual engages in those activities for which he has a natural equipment, nor his conviction that it is the primary office of education to discover this equipment to its possessor and train him for its effective use. But progress in knowledge has made us aware of the superficiality of Plato's lumping of individuals and their original powers into a few sharply marked-off classes; it has taught us that original capacities are indefinitely numerous and variable. It is but the other side of this fact to say that in the degree in which society has become democratic, social organization means utilization of the specific and variable qualities of individuals, not stratification by classes. Although 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was revolutionary, it was none the less in bondage to static ideals. He thought that change or alteration was evidence of lawless flux; that true reality was unchangeable. Hence while he would radically change the existing state of society, his aim was to construct a state

in which change would subsequently have no place. The final end of life is fixed; given a state framed with this end in view, not even minor details are to be altered. Though they might not be inherently important, yet if permitted they would inure the minds of men to the idea of change, and hence be dissolving and anarchic. The breakdown of his philosophy is made apparent in the fact that he could not trust to gradual improvements in education to bring about a better society which should then improve education, and so on indefinitely. Correct education could not come into existence until an ideal state existed, and after that education would be devoted simply to its conservation. For the existence of this state he was obliged to trust to some happy accident by which philosophic wisdom should happen to coincide with possession of ruling power in the state.

在某些个体中，欲望处于支配地位。比如，欲望在劳动阶级和商人阶级，体现出表达人类的需要并满足之的特点。有些人受过教育，不受欲望的控制，具有慷慨、开朗、自信、勇敢的性情。他们成为国家的公民、国家在战时的保卫者和和平时期国家内部的保护人。但是，由于缺乏领会普遍真理的能力，他们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只有那些能够领会普遍真理的人才能够接受最高级的教育，成为国家的立法者，因为法律是形成经验的普遍真理。柏拉图并非有意使个人从属于社会整体。但由于缺乏对个体独特性和个体与众不同特性的认识，不承认社会可能发生变化，但仍能保持稳定，柏拉图关于有限能力和有限种类的主张，最后归结为个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思想。柏拉图指出，如果能从事自己具有天赋的活动，个人就会快乐，社会组织就会完善。他还指出，教育的主要功能在于发现人的天赋并训练他有效地利用这种天赋。我们对他的这两个观点非常佩服。但是，知识的进步使我们认识到，柏拉图把人体及其本身拥有的能力分成为数不多的几类是很肤浅的。知识的进步教导我们，人拥有无限众多和变化多端能力。这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如果社会是民主的，社会组织就要利用个

体特殊和多变的特性，而不是将其分为不同的等级。尽管柏拉图的教育哲学是革命的，但仍然受到其静止理想所束缚。他认为，变革是非法动荡的证明，真正的现实不可改变。因此，柏拉图试图从根本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他的目标却是想建立一个不容变革的国家。他认为，生活的终极目标是固定的，根据这种目标建立起来的国家，即使很小的细节都不应改变。他认为，虽然细节本身无关紧要，但是如果发生改变，就会使人心思变，因而起到破坏作用，甚至引发无政府主义的局面。以下事实可以解释柏拉图哲学的失败，即他不相信教育的逐步改进能使社会更为完善，而这更为完善的社会又能改进教育，如此往复循环。柏拉图认为，在理想国家存在之前不可能产生正确的教育，在理想国家产生以后，教育将仅仅致力于保存这个理想的国家。为了这个理想国家的生存，他被迫依靠某种机遇，使哲学智慧与国家统治权力并行不悖。

4．The “Individualistic “Ideal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四、**18**世纪的“个人主义”理想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we find ourselves in a very different circle of ideas. “Nature” still means something antithetical to existing social organization; Plato exercised a great influence upon Rousseau. But the voice of nature now speaks for the diversity of individual talent and for the need of fre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ty in all its variety. Education in accord with nature furnishes the goal and the method of instruction and discipline. Moreover, the native or original endowment was conceived, in extreme cases, as nonsocial or even as antisocial. Social arrangements were thought of as mere external expedients by which these nonsocial individuals might secure a greater amount of

private happiness for themselves.

在讨论到18世纪哲学时，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很不一样的思想领域。“自然”仍然指某种与现存社会组织相反的东西。柏拉图对卢梭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时期的自然代表的是个人才能的多样化以及个性在不同层面自由发展的需要。顺应自然的教育提供了教学和训练的目标和方法。更有甚者，人的天赋在极端的情况下被视为是非社会的，甚至是反社会的。社会安排仅仅被视为外部紧急措施，能使非社会的个人获得更多的个人幸福。

Nevertheless, these statements convey only an inadequate idea of the true significance of the movement. In reality its chief interest was in progress and in social progress. The seeming antisocial philosophy was a somewhat transparent mask for an impetus toward a wider and freer society—towards cosmopolitanism. The positive ideal was humanity. In membership in humanity, as distinct from a state, man's capacities would be liberated; while in existing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his powers were hampered and distort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and selfish interests of the rulers of the state. The doctrine of extreme individualism was but the counterpart, the obverse, of ideals of the indefinite perfectibility of man and of a social organization having a scope as wide as humanity. The emancipated individual was to become the organ and agent of a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society.

但是，以上这些陈述并未能传达出这场运动的真正意义。实际上，这场运动的主要兴趣是关注社会进步。这个看似反社会的哲学其实是一个有点透明的面具，促使人们走向更广泛、更自由社会，走向世界的大同。其积极的理想是人文主义。与作为国家成员有所不同的

是，作为人类的成员，人的能力将获得解放。而在现存的政治组织中，为了满足国家统治者的要求和私利，人的能力受到了桎梏和歪曲。极端个人主义的主张不过是在与认为人和社会组织能被无限完善的理想唱对台戏。人一旦挣脱枷锁、获得解放，就成为了进步社会的喉舌和代理人。

The heralds of this gospel were acutely conscious of the evils of the social estate in which they found themselves. They attributed these evils to the limitations imposed upon the free powers of man. Such limitation was both distorting and corrupting. Their impassioned devotion to emancipation of life from external restrictions which operated to the exclusive advantage of the class to whom a past feudal system consigned power, found intellectual formulation in a worship of nature. To give “nature” full swing was to replace an artificial, corrupt, and inequitable social order by a new and better kingdom of humanity. Unrestrained faith in Nature as both a model and a working power was strengthened by the advances of natural science. Inquiry freed from prejudice and artificial restraints of church and state had revealed that the world is a scene of law. The Newtonian solar system, which expressed the reign of natural law, was a scene of wonderful harmony, where every force balanced with every other. Natural law would accomplish the same result in human relations, if men would only get rid of the artificial man-imposed coercive restrictions.

个人主义的先驱们敏锐意识到他们所处社会阶层的种种弊端，并把之归咎于对人自由能力的限制。这样的限制既是对人性的扭曲，也是对人性的败坏。他们满怀热情，要使生活从外部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这些限制完全有利于过去封建制度赋予特权的阶级，这种崇奉生活解放理智的表述就是崇拜自然。要让“自然”充分发挥作用，就要用

新的、更好的人文社会替代人为、腐败而且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对大自然完全信任，并视之为典范和工作动力的主张由于自然科学的进步得到加强。不受教会和国家人为限制和偏见所束缚的研究显示，世界乃是一个有规律的景象。代表自然统治规则的牛顿太阳系是一个异常和谐的景象。在太阳系里，各种力量彼此和平共处。如果能排除人为的强制限制，自然规则在人际关系方面也能取得同样的效果。

Education in accord with nature was thought to be the first step in insuring this more social society. It was plainly seen tha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mitations were ultimately dependent upon limitations of thought and feeling. The first step in freeing men from external chains was to emancipate them from the internal chains of false beliefs and ideals. What was called social life, existing institutions, were too false and corrupt to be intrusted with this work. How could it be expected to undertake it when the undertaking meant its own destruction? “Nature” must then be the power to which the enterprise was to be left. Even the extreme sensational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which was current derived itself from this conception. To insist that mind is originally passive and empty was one way of glorify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education. If the mind was a wax tablet to be written upon by objects, there were no limits to the possibility of education by mean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ince the natural world of objects is a scene of harmonious “truth,” this education would infallibly produce minds filled with the truth.

仿效自然的教育被认为是确保社会更有社会精神的第一步。持此看法者清楚认识到，经济和政治的限制最终有赖于思想和感情的限制。要把人们从外部的锁链解放出来，首先需要把他们从内部虚伪的信仰和理想的锁链中解放出来。所谓的当今社会和现存制度都是虚伪

腐败的，无力承担这项任务。承担此项任务意味着自我毁灭，当今社会怎么可能担此重任？必须让“自然”之力担此重任。即使是风行一时的极端感知主义的认识论也是从这个思想派生出来的。颂扬教育的可能性的方式之一就是坚持认为心灵本来是被动的和空洞的。如果人的头脑是一块有待书写的蜡片，利用自然环境进行教育的可能性就是无限的。既然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的真实体，这种教育必定能使头脑充满真理。

5．Education as National and as Social.

五、国家教育与社会教育

As soon as the first enthusiasm for freedom waned, the weakness of the theory upon the constructive side became obvious. Merely to leave everything to nature was, after all, but to negate the very idea of education; it was to trust to the accidents of circumstance. Not only was some method required but also some positive organ, some administrative agency for carrying on the process of instruction. The “complet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all powers,” having as its social counterpart an enlightened and progressive humanity, required definite organization for its realization. Private individuals here and there could proclaim the gospel; they could not execute the work. A Pestalozzi could try experiments and exhort philanthropically inclined persons having wealth and power to follow his example. But even Pestalozzi saw that any effective pursuit of the new educational ideal required the support of the sta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ew education destined to produce a new society was, after all, dependent upon the activities of existing states. The movement for the democratic idea

inevitably became a movement for publicly conducted and administered schools.

最初争取自由的热情一旦消退，该理论在建构方面的弱点马上就会暴露出来。放任一切事情自然发展，实际是否定教育，把教育交由偶然事件支配。要确保教育过程的进行，不仅需要有方法，而且需要行政机关的参与。要实现“一切能力的完全和谐发展”，在社会中，需要拥有开明和进步的人类，也需要有目标明确的组织。个人可以为这个主义摇旗呐喊，但却不能付诸实践。裴斯泰洛齐这样的人尝试种种实验，并且劝告有财产和权力的慈善家追随他的榜样。但是，即使是裴斯泰洛齐也认识到，要有效实行新的教育思想，则需要国家的支持。要实现旨在产生新社会的新教育，最终有赖于当前国家的活动。因而，民主教育运动不可避免地成为由国家指导和管理的学校运动。

So far as Europe was concerned, the historic situation identified the movement for a state-supported education with the nationalistic movement in political life—a fact of incalculable significance for subsequent movemen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erman thought in particular, education became a civic function and the civic function was identified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deal of the national state. The “state” was substituted for humanity; cosmopolitanism gave way to nationalism. To form the citizen, not the “man,” became the aim of education. [8_2] The historic situation to which reference is made is the after-effects of the Napoleonic conquests, especially in Germany. The German states felt (and subsequent events demonstrate the correctness of the belief) that systematic attention to education was the best means of recovering and maintaining their political integrity and power. Externally they were weak and divid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ussian statesmen they made this condition a stimul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 extensive and

thoroughly grounded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纵观欧洲历史，国家支持的教育运动和政治生活中的民族主义运动融为一体，这一事实对后来的运动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在德国思想的影响下，教育变成一种公民的职责，也就是国家理想的实现。于是“国家”代替了人类；世界主义让位于国家主义。教育的目标变成了塑造公民而不是塑造“人”。[9_2] 上面提到的历史情况是拿破仑上台后的成果，这一成果在德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时的德国政府认为，重视系统教育是恢复和保持其政治上的统一和权力的最好手段（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尽管当时的德国从外表看极其虚弱、四分五裂，但是在德国政治家的领导下，他们把这种情况作为一种刺激，发展出一种具有广泛和坚实基础的公共教育制度。

This change in practice necessarily brought about a change in theory.

教育体制变革必然带来理论上的变革。

The individualistic theory receded into the background. The state furnished not only the instrumentalities of public education but also its goal. When the actual practice was such that the school system, from the elementary grades through the university faculties, supplied the patriotic citizen and soldier and the future state official and administrator and furnished the means for military, industrial, and political defense and expansion,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ory not to emphasize the aim of social efficiency. And with the immens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the nationalistic state, surrounded by other competing and more or less hostile states, it was equally impossible

to interpret social efficiency in terms of a vague cosmopolitan humanitarianism. Since the maintenance of a particular national sovereignty required subordination of individuals to the superior interests of the state both in military defense and in struggles for international supremacy in commerce, social efficiency was understood to imply a like subordinatio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was taken to be one of disciplinary training rather than of personal development. Since, however, the ideal of culture as complet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persiste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ttempted a reconciliation of the two ideas. The reconciliation took the form of the conception of the 'organic' character of the state. The individual in his isolation is nothing; only in and through an absorption of the aims and meaning of organized institutions does he attain true personality. What appears to be his subordination to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the demand for sacrifice of himself to the commands of his superiors is in reality but making his own the objective reason manifested in the state—the only way in which he can become truly rational. The notion of development which we have seen to be characteristic of institutional idealism (as in the Hegelian philosophy) was just such a deliberate effort to combine the two ideas of complete realization of personality and thoroughgoing 'disciplinary' subordination to existing institutions. The exten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which occurred in Germany in the generation occupied by the struggle against Napoleon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may be gathered from Kant, who well expresses the earlier individual-cosmopolitan ideal. In his treatise on *Pedagogics* , consisting of lectures given in the later yea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e defines education as the process by which man becomes man. Mankind begins its history submerged in nature—not as Man who is a creature of reason, while nature furnishes only instinct and appetite. Nature offers simply the germs which education is to develop and perfect. The peculiarity of truly

human life is that man has to create himself by his own voluntary efforts; he has to make himself a truly moral, rational, and free being. This creative effort is carried on by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slow generations. Its acceleration depends upon men consciously striving to educate their successors not for the existing state of affairs but so as to make possible a future better humanity. But there is the great difficulty. Each generation is inclined to educate its young so as to get along in the present world instead of with a view to the proper end of education: the promotion of the best possible realization of humanity as humanity. Parents educate their children so that they may get on; princes educate their subjects as instruments of their own purposes.

个人主义的理论退居幕后。国家不仅提出了公共教育的方法，而且提出了公共教育的具体目标。当整个教育系统，从小学各年级到大学各学院，都在培养爱国公民、士兵和未来政府官员，并为军事、工业、政治防御和扩张提供支持之时，在教育理论方面，就不得不强调社会效率的目标。随着国家重要性的增强，一个被竞争对手包围的国家，同样不能用模糊的世界大同的人文主义来解释社会效率。要维护国家主权，就要求个人在军事防御和国际商业竞争方面，服从国家最高利益，因此，社会效率也含有个人服从国家利益的要求。教育过程被视为整顿纪律的过程，而不是个人发展的过程。由于有人继续把文化修养视为人格的全面发展，教育哲学正是用于调和这两种思想。方法是把国家看成一个“有机体”。孤立的个人是毫无意义的，只有遵守组织制定的目标和意义，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人格。表面上看，好像是个人屈从于政治权力，为服从上级命令而牺牲自己。其实，这不过是使他自己的客观理性在国家层面上表现出来。——这是他能够真正变得理性的唯一途径。而为我们视为带有制度化理想主义特色的发展观（如黑格尔的哲学）其实就是有意把完全实现个性与完全依附于现有制度的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可从康德的论述中看出，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反抗拿破仑的时代，教育哲学在德国被改造到什么程度。康德

很好地表达了早期个人的世界主义的理想。在包含了他于18世纪末期所写讲稿的《教育学纲要》一书中，康德把教育定义为把人变成“人”的过程。他认为，人类历史始于自然——人开始时不是作为理性的人，自然只为人提供了本能的欲望。自然只给人以胚芽，必须依靠教育使人得到发展和完善。真正人类生活的特点是：人必须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塑造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有理性的自由人。这种创造性的工作要通过人一代又一代的教育活动来缓慢进行。加快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有赖于人们有意识地努力教育自己的接班人。这种教育不是为了现实需要，而是为了使未来的人类可能变得更好。但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每一个时代都倾向于教育青年在现实世界生存下去，而不是有一个正确的教育目标——尽最大努力实现真正的人性。父母教育子女，目的是让他们能应付人生；君主教育臣民，目的是让他们成为供自己利用的工具。

Who, then, shall conduct education so that humanity may improve? We must depend upon the efforts of enlightened men in their private capacity. “All culture begins with private men and spreads outward from them. Simply through the efforts of persons of enlarged inclinations, who are capable of grasping the ideal of a future better condition, is the gradual approximation of human nature to its end possible…. Rulers are simply interested in such training as will make their subjects better tools for their own intentions. " Even the subsidy by rulers of privately conducted schools must be carefully safeguarded. For the rulers' interest in the welfare of their own nation instead of in what is best for humanity, will make them, if they give money for the schools, wish to draw their plans. We have in this view an express statement of the points characteristic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dividualistic cosmopolitanism.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private personality is identified with the aims of humanity as a whole and with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addition we have an explicit fear of the hampering

influence of a state-conducted and state-regulated education upon the attainment of these ideas. But in less than two decades after this time, Kant's philosophic successors, Fichte and Hegel, elaborated the idea that the chief function of the state is educational; that in particular the regeneration of Germany is to be accomplished by an education carried on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and that the private individual is of necessity an egoistic, irrational being, enslaved to his appetites and to circumstances unless he submits voluntarily to the educative discipline of state institutions and laws. In this spirit, Germany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undertake a public, universal, and compulsory system of education extending from the primary school through the university, and to submit to jealous stat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all private educational enterprises. Two results should stand out from this brief historical survey. The first is that such terms as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al conceptions of education are quite meaningless taken at large, or apart from their context. Plato had the ideal of an education which should equate individual realization and social coherency and stability. His situation forced his ideal into the notion of a society organized in stratified classes, losing the individual in the class.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ucational philosophy was highly individualistic in form, but this form was inspired by a noble and generous social ideal: that of a society organized to include humanity, and providing for the indefinite perfectibility of mankind. The idealistic philosophy of Germany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endeavored again to equate the ideals of a free and complete development of cultured personality with social discipline and political subordination. It made the national state an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realization of private personality on one side and of humanity on the other. Consequently, it is equally possible to state its animating principle with equal truth either in the classic terms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all the powers of personality” or in the more recent

terminology of “social efficiency. " All this reenforces the statement which opens this chapter: The conception of education as a social process and function has no definite meaning until we define the kind of society we have in mind.

那么，应该由谁来主持教育从而让人性得到改进呢？我们必须依靠开明人士私下努力。康德说：“一切文化修养都是在私下开始，然后传播开的。具有博大胸怀的人能够领会未来更好社会的理想，只有通过他们的努力，才能使人类天性逐步地接近其目标。现在的统治者只对将臣民训练成自己想要的工具感兴趣。”康德甚至认为，对于统治者给私立学校津贴的举动，也必须保持戒备。因为，统治者资助学校，其办学计划是基于他们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关切，而不是基于对人类最大利益的关切。这个观点清楚地反映了18世纪个人世界主义所特有的观点。个人人格的充分发展与整个人类的目标以及进步的思想完全一致。此外，我们担心由国家主导和国家调节的教育会阻碍这些思想的实现。然而，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康德哲学的继承人——费希特和黑格尔阐明了这样的思想，即国家的主要职能是教育。德国的复兴只有通过执行国家利益的教育才能完成。个人必然是利己主义、没有理性的。除非自愿服从国家制度和法律的教育训练，否则他必然会受其欲望和环境的奴役。德国是第一个强制普及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公立教育国家，也是第一个将所有私立教育置于国家章程管控之下的国家。从以上简短的历史回顾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如果离开当时的背景，个人教育观和社会教育观这类术语将变得毫无意义。柏拉图的教育理想认为，个性的实现与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应该并行不悖。他的处境使他不得不主张划分社会阶级，把个人淹没在阶级之中。18世纪的教育哲学在形式上体现为高度个人主义，但是这个形式是由一种崇高和慷慨的社会理想所唤起的，这种社会理想提出建立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社会，为人类的无限完善提供机会。19世纪早期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再次试图把视教育为培养个性自由完全发展的观点与视教育为对社会训练和政治的服从的观点同等对待，把国家作为实现个性和实现人文精神的中介。该派哲学的主张同样可以用两种说法

来表达，一是用古典的术语，即“教育是个人能力的和谐发展”；二是用比较新的术语，即“教育要讲究社会效率”。所有这一切都印证本章开头所讲的话：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和社会功能，教育这个概念没有明确的意义，除非我们说明所设想的社会的性质。

These considerations pave the way for our second conclusion. One of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education in and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is set by the conflict of a nationalistic and a wider social aim. The earlier cosmopolitan and 'humanitarian' conception suffered both from vagueness and from lack of definite organs of execution and agencies of administration. In Europe, in the Continental states particularly, the new idea of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for human welfare and progress was captured by national interests and harnessed to do a work whose social aim was definitely narrow and exclusive. The social aim of education and its national aim were identified, and the result was a marked obscuring of the meaning of a social aim. This confusion corresponds to the existing situation of human intercourse. On the one hand, science, commerce, and art transcend national boundaries. They are largely international in quality and method. They involve interdependencies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peoples inhabiting different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idea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has never been as accentuated in politics as it is at the present time. Each nation lives in a state of suppressed hostility and incipient war with its neighbors. Each is supposed to be the supreme judge of its own interests, and it is assumed as matter of course that each has interests which are exclusively its own. To question this is to question the very idea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which is assumed to be basic to political practice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is contradiction (for it is nothing less) between the wider sphere of associated and mutually helpful social life and the

narrower sphere of exclusive and hence potentially hostile pursuits and purposes, exacts of educational theory a clearer conception of the meaning of 'social' as a function and test of education than has yet been attained. Is it possible for an educational system to be conducted by a national state and yet the full social ends of the educative process not be restricted, constrained, and corrupted? Internally, the question has to face the tendencies, due to present economic conditions, which split society into classes some of which are made merely tools for the higher culture of others. Externally, the question is concerned with the reconciliation of national loyalty, of patriotism, with superior devotion to the things which unite men in common ends, irrespective of national political boundaries. Neither phase of the problem can be worked out by merely negative means. It is not enough to see to it that education is not actively used as an instrument to make easier the exploitation of one class by another. School facilities must be secured of such amplitude and efficiency as will in fact and not simply in name discount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inequalities, and secure to all the wards of the nation equality of equipment for their future careers. Accomplishment of this end demands not only adequate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 of school facilities, and such supplementation of family resources as will enable youth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m, but also such mod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ideals of culture, traditional subjects of study and traditional methods of teaching and discipline as will retain all the youth under educational influences until they are equipped to be masters of their own economic and social careers. The ideal may seem remote of execution, but the democratic ideal of education is a farcical yet tragic delusion except as the ideal more and more dominates our public system of education. The same principle has application on the side of the considerations which concern the relations of one nation to another. It is not enough to teach the horrors of war and

to avoid everything which would stimulate international jealousy and animosity. The emphasis must be put upon whatever binds people together in cooperative human pursuits and results, apart from geographical limitations. The secondary and provisional character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in respect to the fuller, freer, and more fruitful association and intercourse of all human beings with one another must be instilled as a working disposition of mind. If these applications seem to be remote from a consider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the impression shows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idea of education previously developed has not been adequately grasped. This conclusion is bound up with the very idea of education as a freeing of individual capacity in a progressive growth directed to social aims. Otherwise a democratic criterion of education can only be inconsistently applied.

这就为我们第二个结论铺平了道路。在民主社会中，教育所遇到的基本问题是由国家主义和更广阔的社会目标的冲突而引起的。从前提出的世界主义和“人文主义”概念的缺陷就在于意义含糊，又缺乏具体的执行者和管理机构。在欧洲各国，对人类福利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的教育成为了国家利益的俘虏，被用来从事社会目标狭隘且具有排他性的事业。把教育的社会目标和教育的国家目标等同起来，其结果就是模糊了教育的社会目标的意义。这种混乱现象反映了当今人际交流的情况。一方面，科学、商业和艺术超越了国界，其性质和方法大多已实现国际化，这要求世界各国人民互相依赖和合作。与此同时，国家主权思想在政治学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各个国家都处在被抑制的敌视和互相戒备的状态。每个国家都自认为是自身利益的最高裁判，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享有绝对属于自己的利益。质疑这种观点就是质疑国家主权思想本身，而国家主权思想又被视为实施政治和政治学的基本思想。一方面是较广范围的联合、互相协助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是范围狭窄的、具有排他性、因而含有敌对性质的事业和目标。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矛盾（的确是矛盾），在教育理论上，要求在

教育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检验标准中所用“社会”一词的意义上，提出比过去更为明确的概念。一种教育制度能否由国家实施，而教育过程的全部社会目标又不受限制、不被约束，不被腐蚀呢？从内部来看，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面对由于经济状况使社会分成若干阶级的现象，其中的一些人不过是把另一些人推向更高文明的工具。从外部来看，此问题涉及对两种忠诚的协调，即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国主义与不问国家和政治分野使人们为共同目标团结起来的更高的忠诚之间的协调。仅仅用消极的方法是不能解决此问题的。而仅仅注意以免教育被某个阶级用作为更易于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也还不够。学校设施必须大量扩充并提高效率，为了不只是在名义上，而是在事实上克服经济不平等的影响，让全国的青年为将来的发展受到同等的教育。要达到此目标，不仅需要有足够的教育设施，还要辅以青年所能够利用的家庭教育，而且需要对传统的文化理想、课程以及教学和训练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使所有青年能受到教育的持续影响，主宰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前途。这一理想也许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除非民主教育思想能在更大程度上主导我们的公共教育制度，否则这一理想只是一种可笑而又可悲的幻想。以上原理同样可以用于探讨两国之间的关系。单纯讲述战争的恐怖和做一些避免可能刺激国际猜忌和仇恨的事情是不够的。凡是能够让人不受地域限制，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之事都必须得到鼓励。与全体人类相互之间进行更充分、更自由和更有成效地交流与合作相比，国家主权居于次要的和临时的地位，必须告诉学生这个观点，并使其牢记在心。如果这方面的应用似乎与教育哲学相距遥远，这表明，前面所阐述的教育观点的意义还没有得以真正领会。这个结论与把教育视为对怀揣社会目标、持续成长的个人能力的解放有密切联系。否则，教育民主标准就得不到贯彻实施。

Summary.

总结

Since education is a social process, and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societies, a criterion for educational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implies a particular social ideal. The two points selected by which to measure the worth of a form of social life are the extent in which the interests of a group are shared by all its members, and the fullness and freedom with which it interacts with other groups. An undesirable society, in other words, is one whic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sets up barriers to free inter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of experience. A society which makes provision for participation in its good of all its members on equal terms and which secures flexible readjustment of its institutions through interaction of the different forms of associated life is in so far democratic. Such a society must have a type of education which gives individuals a personal interest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control, and the habits of mind which secure social changes without introducing disorder.

教育是一种社会过程，而社会又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教育批评和教育建设的标准包含一种特定的社会理想。我们选择了两点用来衡量社会生活的价值，即该团体所有成员共享兴趣的程度和该团体和其他团体交流的充分度和自由度。换言之，一个不良的社会对内对外都有重重阻碍，限制其成员之间以及其成员与外来成员之间的自由往来和经验交流。如果某一个社会中的全体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共享社会利益，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共同生活相互影响，使社会体制得到灵活的重新调整，就可以说这个社会就是民主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很可能进行这样一种教育，使每一个人都对社会关系、社会管理以及能促进社会变化而不致引起社会混乱的心理习惯产生兴趣。

Three typical historic philosophies of education were considered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Platonic was found to have an ideal formally quite similar to that stated, but which was

compromised in its working out by making a class rather than an individual the social unit. The so-called individualism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enlightenment was found to involve the notion of a society as broad as humanity, of whose progress the individual was to be the organ. But it lacked any agency for sec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its ideal as was evidenced in its falling back upon Nature. The institutional idealistic philosoph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upplied this lack by making the national state the agency, but in so doing narrowed the conception of the social aim to those who were members of the same political unit, and reintroduced the idea of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institution.

我们曾根据这个观点研究了历史上三个有代表性的派别的教育哲学。柏拉图的教育哲学理想在形式上与我们所讲的观点很相似，但是在他在把这个理想付诸实施时，却把阶级而非个人视为社会的单位。18世纪启蒙时期的个人主义把社会等同于人类，个人等同于人类进步的工具。但是，这一哲学流派缺乏发展其理想的机构，最终只好求助自然。19世纪制度化的唯心主义哲学把国家作为实现其理想的机构，因而弥补了这个缺陷。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该流派又把社会目标的概念限于同一政治单位的成员，重新引进了个人从属于制度的思想。

[8_1].See *ante* , p. 24.

[8_2].There is a much neglected strain in Rousseau tending intellectually in this direction. He opposed the existing state of affairs on the ground that it formed *neither* the citizen nor the man. Under existing conditions, he preferred to try for the latter rather than for the former. But there are many sayings of his which point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itizen as ideally the higher, and which indicate that his own endeavor, as embodied in the "Emile," was simply the best makeshift the corruption of the times permitted him to sketch.

[9_1].参见原书24页

[9_2].卢梭在思想上有这个倾向，但为人们所忽视。卢梭之所以反对当时的现状，是因为当时既不塑造公民，又不塑造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宁愿尝试塑造人而不去尝试塑造公民。但是，他曾多次指出，塑造公民是更高的理想，而且在《爱弥儿》一书中，表明他自己的努力不过是当时的腐败情况允许他描绘的最好权宜之作。

Chapter 8 Aims In Education

第八章　教育的目标

1．The Nature of an Aim.

一、目标的本质

The account of education given in our earlier chapters virtually anticipated the results reached in a discussion of the purport of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For it assumed that the aim of education is to enable individuals to continue their education—or that the object and reward of learning is continued capacity for growth. Now this idea cannot be applied to all the members of a society except where intercourse of man with man is mutual, and except where there is adequate provis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habits and institutions by means of wide stimulation arising from equitably distributed interests. And this means a democratic society. In our search for aims in education, we are not concerned, therefore, with finding an end outside of the educative process to which education is subordinate. Our whole conception forbids. We are rather concerned with the contrast which exists when aims belong within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y operate and when they are set up from without. And the latter state of affairs must obtain when social relationships are not equitably balanced. For in that case, some portions of the whole social group will find their aims determined by an external dictation; their aims will not arise from the free growth of their own experience, and their nominal aims

will be means to more ulterior ends of others rather than truly their own.

我们在前面对教育的讨论，实际上预示了我们关于民主社会教育意义讨论的结果。我们假设教育的目标在于让个人继续接受教育，或者说，学习的目标或方向是提高生存发展的技能。然而，这一假设并非适用于该社会的全体成员，除非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的交往是你情我愿的，或者所有社会成员兴趣一致并且充分准备好重建社会习惯和和制度。这样的社会就是民主社会。我们在寻找教育目标时，并不是超出教育的范围去寻找，然后使教育服从这个目标。我们的教育观点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所要做的是把属于教育过程内容的目标与从教育过程以外提出的目标进行比较。社会关系不均衡时，后一种情况就可能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团体的某些人将会发现他们的目标是由外来命令决定的，而不是从自己的经验自由发展而来。他们名义上的目标并不是自己真正的目标，只是达到别人隐蔽目标的手段而已。

Our first question is to define the nature of an aim so far as it falls within an activity, instead of being furnished from without. We approach the definition by a contrast of mere results with ends. Any exhibition of energy has results. The wind blows about the sands of the desert; the position of the grains is changed. Here is a result, an effect, but not an end. For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outcome which completes or fulfills what went before it. There is mere spatial redistribution. One state of affairs is just as good as any other. Consequently there is no basis upon which to select an earlier state of affairs as a beginning, a later as an end, and to consider what intervenes as a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realization.

我们首先要给与行为相适应而非外部提供的目标的性质下一定义。把结果与目的进行对比，我们就能得出答案。任何能量的出现都会产生结果。风吹动沙漠的沙，沙子的位置就会改变。这是结果，是影响，而不是目的。在此之前完成的结果并不重要。沙子位置的改变，只是空间的重新分配。沙子在改变位置前后的情况并无差异。因此，没有理由把前一种情况作为起点，后一种情况作为终点，从而把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作为改造和实现的过程。

Consider for example the activities of bees in contrast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sands when the wind blows them about. The results of the bees' actions may be called ends not because they are designed or consciously intended, but because they are true terminations or completions of what has preceded. When the bees gather pollen and make wax and build cells, each step prepares the way for the next. When cells are built, the queen lays eggs in them; when eggs are laid, they are sealed and bees brood them and keep them at a temperature required to hatch them. When they are hatched, bees feed the young till they can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Now we are so familiar with such facts, that we are apt to dismiss them on the ground that life and instinct are a kind of miraculous thing anyway. Thus we fail to note wha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event is; namel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emporal place and order of each element; the way each prior event leads into its successor while the successor takes up what is furnished and utilizes it for some other stage, until we arrive at the end, which, as it were, summarizes and finishes off the process. Since aims relate always to results, the first thing to look to when it is a question of aims, is whether the work assigned possesses intrinsic continuity. Or is it a mere serial aggregate of acts, first doing one thing and then another? To talk about an educational aim when approximately each act of a pupil is dictated by the teacher, when the only order

in the sequence of his acts is that which comes from the assignment of lessons and the giving of directions by another, is to talk nonsense. It is equally fatal to an aim to permit capricious or discontinuous action in the name of spontaneous self-expression. An aim implies an orderly and ordered activity, one in which the order consists in the progressive completing of a process. Given an activity having a time span and cumulative growth within the time succession, and aim means foresight in advance of the end or possible termination. If bees anticipate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vity, if they perceived their end in imaginative foresight, they would have the primary element in an aim. Hence it is nonsense to talk about the aim of education—or any other undertaking—where conditions do not permit of foresight of results, and do not stimulate a person to look ahead to see what the outcome of a given activity is to be.

我们可以蜜蜂的活动为例，与上面风吹沙漠时沙子位置的变化做一对比。蜜蜂活动的结果可以称为目的，不是由于这是预先的计划或有意识的安排，而是由于这是已开始计划的真正结局或完成。蜜蜂采集花粉，制蜂蜡和构筑蜂房时，每一步动作都是为下一步动作准备。蜂房筑成以后，蜂王在蜂房内产卵；产后闭门孵化，并维持孵化所要求的温度。幼蜂孵出以后，蜜蜂就喂养幼蜂，直到它们能照料自己为止。我们很熟悉这些事实，很容易对之不屑一顾，以为生活和本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而，我们没有注意到事情的主要特征，即其每一要素在时间上的位置和次序都有重要意义。前者引出后者，而后者又承接前者提供之物，将其用于下一阶段，直到到达终点，结束整个过程。由于目标总是与结果相联系，在谈及目标时，首先要注意的是其指定的任务是否具有内在连续性，或者，该任务是否需要完成一连串动作，需要先做一件事，然后做另一件事。如果学生的每一个行为都听命于教师，并且他行为的先后顺序来自课堂作业和别人给予的指示，这时谈教育目标，简直就是废话。而在自发的自我表现的名义

下，允许学生任性的或间断的行为，对教育目标而言也是致命伤。目标暗含有序的行为。在这个有序的行为中，秩序是指按部就班完成某一过程。如果某一行为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活动逐渐发展，目标就是预见终点或可能的结局的能力。如果蜜蜂能预见其行为产生的结果，能在想象的预见中看到终点，它们就有了大致的目标。因此，如果不允许预见结果，就不能引发人们对特定行为结果的期望，那么，谈教育目标，或者任何其他事业的目标，都是废话。

In the next place the aim as a foreseen end gives direction to the activity; it is not an idle view of a mere spectator, but influences the steps taken to reach the end. The foresight functions in three ways. In the first place, it involves careful observation of the given conditions to see what are the means available for reaching the end, and to discover the hindrances in the way. In the second place, it suggests the proper order or sequence in the use of means. It facilitates an economical selection and arrangement. In the third place, it makes choice of alternatives possible. If we can predict the outcome of acting this way or that, we can then compare the value of the two courses of action; we can pass judgment upon their relative desirability. If we know that stagnant water breeds mosquitoes and that they are likely to carry disease, we can, disliking that anticipated result, take steps to avert it. Since we do not anticipate results as mere intellectual onlookers, but as persons concerned in the outcome, we are partakers in the process which produces the result. We intervene to bring about this result or that.

其次，作为能预见的结局，目标能指引人的行为。目标不是旁观者无用的观点，它能影响为了达到目的的行为的各个步骤。这种预见能力有三种功能：第一，涉及对特定情况的仔细观察，以便能清楚用何手段达到目的，发现挡路的障碍；第二，暗示运用手段的恰当顺序

并能促成省力的选择和安排；第三，使多种选择成为可能。如果能预测结果，我们就能比较两种行为的价值，判断哪一个办法较为可取。当我们知道静止的水滋生蚊子而且蚊子会传播疾病，我们就会采取措施，防止这个结果发生，因为我们不愿看到这种结果。我们预见结果并不是仅仅作为旁观者。我们是产生结果的过程的参加者。我们进行干预，就是为了取得这种结果或那种结果。

Of course these three points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one another. We can definitely foresee results only as we make careful scrutiny of present condition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outcome supplies the motive for observations. The more adequate our observations, the more varied is the scene of conditions and obstructions that presents itself, and the more numerous are the alternatives between which choice may be made. In turn, the more numerous the recognized possibilities of the situation, or alternatives of action, the more meaning does the chosen activity possess, and the more flexibly controllable is it. Where only a single outcome has been thought of, the mind has nothing else to think of; the meaning attaching to the act is limited. One only steams ahead toward the mark. Sometimes such a narrow course may be effective. But if unexpected difficulties offer themselves, one has not as many resources at command as if he had chosen the same line of action after a broader survey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field. He cannot make needed readjustments readily.

当然，这三种功能密切相关。我们之所以肯定能预见结果，是由于我们仔细观察了当前情况，并且结果的重要性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动机。我们的观察越充分，困难的局面越多变，可供选择的办法也越多。反之，我们所知道的可能出现的情况或可供选择的办法越多，被选择的行为所具有的意义也越多，这种行为就越可以灵活控制。如果

只想到一种结果，我们就想不出其他结果，附加在行为上的意义就有所限制。我们只是朝着目标前进。有时，这种狭窄的路线可能会有效。但是，如果出现意料之外的困难，应对办法就相当有限。如果对情况做过较为广泛的调查，对同样的行为选择的办法就比较多。否则，我们遇到困难时就难以迅速进行必要的调整。

The net conclusion is that acting with an aim is all one with acting intelligently. To foresee a terminus of an act is to have a basis upon which to observe, to select, and to order objects and our own capacities. To do these things means to have a mind—for mind is precisely intentional purposeful activity controlled by perception of fac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o one another. To have a mind to do a thing is to foresee a future possibility; it is to have a plan for its accomplishment; it is to note the means which make the plan capable of execution and the obstructions in the way,—or, if it is really a mind to do the thing and not a vague aspiration—it is to have a plan which takes account of resources and difficulties. Mind is capacity to refer present conditions to future results, and future consequences to present conditions. And these traits are just what is meant by having an aim or a purpose. A man is stupid or blind or unintelligent—lacking in mind—just in the degree in which in any activity he does not know what he is about, namely, the probable consequences of his acts. A man is imperfectly intelligent when he contents himself with looser guesses about the outcome than is needful, just taking a chance with his luck, or when he forms plans apart from study of the actual conditions, including his own capacities. Such relative absence of mind means to make our feelings the measure of what is to happen. To be intelligent we must “stop, look, listen” in making the plan of an activity.

最终的结论是，有目标的行动就是明智的行动。要预见行动的终结，就需要有一个能进行观察、选择以及管理目标对象的基础并充分调动自身能力。要做这几件事，就是要用心，因为这纯属受到所知事实及其相互关系控制的有意识、有目标的行为。用心做事就是要预见未来的可能性，制定实施计划以及注意能使之实现的手段和可能遇到的障碍。或者说，如果真是有心为之，就必须制定出一个顾及各种情况和困难的计划，而不只是一种模糊的愿望。用心思就是一种把当前情况参照未来结果，又把未来结果参照当前情况的能力。所谓有目的、有目标就是具有这些特性。有人之所以被称为愚蠢、盲目、不聪明或没有头脑，这与他完全不了解自己行为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有关。如果满足于对结果的随意推测，或者不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能力来制订计划，这种人的智力绝对是有缺陷的。这种用感情来衡量所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缺乏理智。要做到理智、明智，我们在制订计划时就必须仔细调查，反复斟酌。

To identify acting with an aim and intelligent activity is enough to show its value—its function in experience. We are only too given to making an entity out of the abstract noun 'consciousness. ' We forget that it comes from the adjective 'conscious. ' To be conscious is to be aware of what we are about; conscious signifies the deliberate, observant, planning traits of activity. Consciousness is nothing which we have which gazes idly on the scene around one or which has impressions made upon it by physical things; it is a name for the purposeful quality of an activity, for the fact that it is directed by an aim. Put the other way about, to have an aim is to act with meaning, not like an automatic machine; it is to mean to do something and to perceive the meaning of things in the light of that intent.

把有目标的行为与明智的行为等同起来，足以表明有目标的行为

的价值，表明这种行为在经验中的作用。我们很容易把抽象名词“意识”当作一种实体。我们忘了这个名词来自形容词“有意识的”。我们“有意识”就是我们知道在做什么；“有意识”表示我们的行为具有有意的、观察的和计划的特征。“意识”并非为我们所有，并不是在懒洋洋地凝视周围的情况，也不是外界事物留下的印象。意识意味着有目标的行为，因为该行为是由目标所指引的。换句话说，有目标就是做事要有意义。与自动化机器不同，有目标意味着要做事并根据这个意向来认识事物的意义。

2．The Criteria of Good Aims.

二、良好目标的标准

We may apply the results of our discussion to a consideration of the criteria involved in a correct establishing of aims.

我们可以将讨论的结果用来研究确立正确目标的标准。

(1)The aim set up must be an outgrowth of existing conditions. It must be based upon a consideration of what is already going on; upon the resource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situation. Theories about the proper end of our activities—educational and moral theories—often violate this principle. They assume ends lying outside our activities; ends foreign to the concrete makeup of the situation; ends which issue from some outside source. Then the problem is to bring our activities to bear up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se externally supplied ends. They are something for which we ought to act. In

any case such 'aims' limit intelligence; they are not the expression of mind in foresight, observation, and choice of the better among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They limit intelligence because, given ready-made, they must be imposed by some authority external to intelligence, leaving to the latter nothing but a mechanical choice of means.

（1）所确定的目标必须是现有情况的产物，必须基于已发生情况的研究，还应考虑所处环境的各种困难因素。有关我们行为的恰当目标的某些理论——教育理论和道德理论——往往违背这个原则。这些理论认为，目标在我们活动之外，来自外部，与实际情境无关。因此，问题就在于如何让我们的行为实现这些从外部提供的目标。我们应该为之采取行动。然而，这种“目标”限制人的智力；它们并不代表心智的预见、观察和对几个可能性所做出的选优。这种目标之所以限制智力，因为它们是现成的，由智力以外的某种权威强加的，能留给智力做的事不过是机械选择而已。

(2) We have spoken as if aims could be completely formed prior to the attempt to realize them. This impression must now be qualified. The aim as it first emerges is a mere tentative sketch. The act of striving to realize it tests its worth. If it suffices to direct activity successfully, nothing more is required, since its whole function is to set a mark in advance; and at times a mere hint may suffice. But usually—at least in complicated situations—acting upon it brings to light conditions which had been overlooked. This calls for revision of the original aim; it has to be added to and subtracted from. An aim must, then, be flexible; it must be capable of alteration to meet circumstances. An end established externally to the process of action is always rigid. Being inserted or imposed from without, it is not supposed to have a working relationship to the

concrete conditions of the situation. What happens in the course of action neither confirms, refutes, nor alters it. Such an end can only be insisted upon. The failure that results from its lack of adaptation is attributed simply to the perverseness of conditions, not to the fact that the end is not reason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 value of a legitimate aim, on the contrary, lies in the fact that we can use it to change conditions. It is a method for dealing with conditions so as to effect desirable alterations in them. A farmer who should passively accept things just as he finds them would make as great a mistake as he who framed his plans in complete disregard of what soil. climate, etc. , permit. One of the evils of an abstract or remote external aim in education is that its very inapplicability in practice is likely to react into a haphazard snatching at immediate conditions. A good aim surveys the present state of experience of pupils, and forming a tentative plan of treatment, keeps the plan constantly in view and yet modifies it as conditions develop. The aim, in short, is experimental, and hence constantly growing as it is tested in action.

（2）照此看来，似乎在试图实现目标以前就能完全制定好目标。我们必须弱化这种印象。最初出现的目标不过是一种试验性的草图。把这个目标努力付诸实践才能测验它的价值。如果此目标能成功地指导实践，我们就不再需要别的东西，因为其全部作用就在于事先树立一个标杆，有时只需暗示一下就足够了。但是，通常——至少在复杂情境中——按照目标行动时，往往会使忽略的情况浮出水面。这就要求我们修正原来的目标，对原来的目标有所增减。我们必须灵活制定目标并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加以调整。对行动过程来说，从外部建立的目标总是僵硬的。这种外部强加的目标往往和实际的情况格格不入。在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既不能肯定，也不能推翻和改变这个目标。只能坚持这个目标。而且，该目标因缺乏适应性而造成的失误只能归因于环境的反常，而不能归因于该目标本身的不合理。与

此相反，一个合理目标的价值在于我们能用它改变环境。应对环境，使环境产生有益的变化。农民如果只是被动接受事物的现状，他就会像一个完全不顾土壤、气候等条件而制订农事计划的人一样，犯同样大的错误。教育上的抽象或遥远的外部目标弊端之一就是，这种实际无用的目标很可能被胡乱用来应急。一个好的教育目标可用于调查学生目前的状况，制订出试验性教学计划，并考虑随情况变化修改计划。总之，此目标是实验性的，因而当它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得到发展。

(3) The aim must always represent a freeing of activities. The term end in view is suggestive, for it puts before the mind the termination or conclusion of some process. The only way in which we can define an activity is by putting before ourselves the objects in which it terminates—as one's aim in shooting is the target. But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 object is only a mark or sign by which the mind specifies the activity one desires to carry out. Strictly speaking, not the target but hitting the target is the end in view; one takes aim by means of the target, but also by the sight on the gun. The different objects which are thought of are means of directing the activity. Thus one aims at, say, a rabbit; what he wants is to shoot straight: a certain kind of activity. Or, if it is the rabbit he wants, it is not rabbit apart from his activity, but as a factor in activity; he wants to eat the rabbit, or to show it as evidence of his marksmanship—he wants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 doing with the thing, not the thing in isolation, is his end. The object is but a phase of the active end,—continuing the activity successfully. This is what is meant by the phrase, used above, 'freeing activity. '

（3）我们所定的目标必须保证活动的自由开展。目标这个名词

是有暗示作用的，它让我们始终把某一过程的终点或结局放在心上。我们解释行为的唯一方法，就是先考虑行为的结果。例如，有人练习射击，他的目标就是靶子。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这只是他内心指定他希望进行的活动的标志或符号。严格地说，他的目标并不是靶子，而是击中靶子。射击者通过靶子来瞄准，但是也要看着枪的准心。他在射击时所想到的种种对象都是指导其行为的工具。比如，有人瞄准一只兔子，想一枪毙命，这就是他的某种行为。如果他所要的是这只兔子，这就不是与他的行为无关的兔子，兔子就成他行为的一个因素。要么是他要吃兔子，要么用它来证明自己的射击技术高超，也就是说，他想用兔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做事情，不是孤立去做事，这就是他的目的。目标对象只是主动目标的一个阶段，有了它的存在，行为就能成功继续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活动自由”的含义。

In contrast with fulfilling some process in order that activity may go on, stands the static character of an end which is imposed from without the activity. It is always conceived of as fixed; it is something to be attained and possessed. When one has such a notion, activity is a mere unavoidable means to something else; it is not significant or important on its own account. As compared with the end it is but a necessary evil; something which must be gone through before one can reach the object which is alone worthwhile. In other words, the external idea of the aim leads to a separation of means from end, while an end which grows up within an activity as plan for its direction is always both ends and means, the distinction being only one of convenience. Every means is a temporary end until we have attained it. Every end becomes a means of carrying activity further as soon as it is achieved. We call it end when it marks off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activity in which we are engaged; means when it marks off the present direction. Every divorce of end from means diminishes by that muc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ctivity and tends to reduce it to a drudgery from which one

would escape if he could. A farmer has to use plants and animals to carry on his farming activities. It certainly makes a great difference to his life whether he is fond of them, or whether he regards them merely as means which he has to employ to get something else in which alone he is interested. In the former case, his entire course of activity is significant; each phase of it has its own value. He has the experience of realizing his end at every stage; the postponed aim, or end in view, being merely a sight ahead by which to keep his activity going fully and freely. For if he does not look ahead, he is more likely to find himself blocked. The aim is as definitely a means of action as is any other portion of an activity.

与以上所讲为完成某一过程以便行为可以继续下去的目标相反，从行为之外强加的目标具有静止的性质。这种目标总是被视为一成不变的，能被实现和拥有的。如果我们持此观点，将行为仅仅视为为获得某种东西不可避免的手段；行为自身没有意义，无关紧要。与目标相比较，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坏事，是在达到唯一有价值意义的目标以前必须所做之事。换言之，外部目标导致了手段和目标相分离，而从行为内部产生、指导行为的目标始终既是目标，又是手段，没有必要加以区别。在我们尚未掌握之前，每一个手段都是暂时的目标。每一个目标一旦达到，就会变成下一行为的手段。当它代表我们行为的未来方向时，我们称之为目标；当它标示当下行为的方向时，我们称之为手段。目标和手段的每一次分离都会极大降低行为的意义，使之退化为所有人都想避而远之的苦差事。农民必须利用植物和动物从事农事。他是爱好这些动植物，还是把之视为他必须采取的手段来获得他所感兴趣的其他东西，这对于他的生活来说有很大的区别。在前一种情况下，他的整个行为过程都是有意义的，每一阶段的行为有其价值。他在每一阶段都能获得实现他的目标的经验。被延缓的目标是使其行为全面自由持续下去的远大前景。如果不向前看，他很可能发现自己受阻。正如是行为的任何部分一样，它也肯定是行为的手段。

3．Applications in Education.

三、教育上的应用

There is nothing peculiar about educational aims. They are just like aims in any directed occupation. The educator, like the farmer, has certain things to do, certain resources with which to do, and certain obstacles with which to contend. The conditions with which the farmer deals, whether as obstacles or resources, have their own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independently of any purpose of his. Seeds sprout, rain falls, the sun shines, insects devour, blight comes, the seasons change. His aim is simply to utilize these various conditions; to make his activities and their energies work together, instead of against one another. It would be absurd if the farmer set up a purpose of farming,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these conditions of soil, climate, characteristic of plant growth, etc. His purpose is simply a foresight of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energies connected with those of the things about him, a foresight used to direct his movements from day to day. Foresight of possible consequences leads to more careful and extensive observation of the nature and performances of the things he had to do with, and to laying out a plan—that is, of a certain order in the acts to be performed.

与任何指导性职业的目标一样，教育目标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与前面所说的农民一样，教育者也有一些事情要做、有一些做事情的办法和一些有待排除的障碍。农民所要应付的环境，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有自己的结构和作用，与其任何目的无关。例如，种子发芽，下雨，日照，虫灾，瘟疫，四季更替。农民的目的只不过是利用种种环境，让各种活动与环境的力量共同为他服务，而不是互相对

抗。他如果不考虑土壤、气候以及植物生长的特点等条件盲目规定其农事目标，那便是荒谬的。农民只是想预见他的力量和他周围各种事物的力量结合的结果，并利用这种预见指导他每天的行动。对于可能结果的预见使他对自己所要对付的事情的性质和活动进行更审慎、更广泛的观察，并拟订好有序行动的计划。

It is the same with the educator, whether parent or teacher. It is as absurd for the latter to set up their 'own' aims as the proper objects of the growth of the children as it would be for the farmer to set up an ideal of farming irrespective of conditions. Aims mean acceptanc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bservations, anticipations, and arrangements required in carrying on a function—whether farming or educating. Any aim is of value so far as it assists observation, choice, and planning in carrying on activity from moment to moment and hour to hour; if it gets in the way of the individual's own common sense (as it will surely do if imposed from without or accepted on authority) it does harm.

教育者也是如此，不管是作为家长还是教师。如果家长或教师把“自己”的目标强加给儿童，这与农民无视环境情况提出农事理想，同样荒谬可笑。所谓目标就是承担责任，行使职责——不管是农业还是教育——所要求进行的观察、预测和工作安排。任何目标只要能随时帮助我们观察、选择和计划，使我们的活动顺利进行，它就是有价值的目标；如果该目标有违人的常识（从外面强加的，或是因迫于权势而接受的目标肯定有违人的常识），这个目标就是有害的。

And it is well to remind ourselves that education as such has no aims. Only persons, parents, and teachers, etc. , have aims, not an abstract idea like education. And consequently their purposes are

indefinitely varied, differing with different children, changing as children grow and with the growth of experience on the part of the one who teaches. Even the most valid aims which can be put in words will, as words, do more harm than good unless one recognizes that they are not aims, but rather suggestions to educators as to how to observe, how to look ahead, and how to choose in liberating and directing the energies of the concret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y find themselves. As a recent writer has said: “To lead this boy to read Scott's novels instead of old Sleuth's stories; to teach this girl to sew; to root out the habit of bullying from John's make up; to prepare this class to study medicine,—these are samples of the millions of aims we have actually before us in the concrete work of education. "

我们要提醒自己，教育本身并无目标。作为抽象概念的教育并无目标，只是像家长和教师这样的人才有目标。他们的目标有无穷的变异，因人而异，随着儿童的成长和教育者经验的增长而变化。即使那些不能以文字表达的最有效的目标也将十分有害，除非我们能够认识到它们并不是目标，只是给教育者的建议，只是给教育者在解放和指导他们所遇环境中的各种力量时如何观察，如何展望未来和如何选择的建议。正如一位近代作家所说：“辅导这个男孩读斯科特写的小说，而不读斯留斯写的故事；指导这个女孩缝纫；帮助约翰去除横行霸道的习惯；为这一班学生做好学医准备——这些是我们在无数多的教育目标中实施的具体教育工作的几个例子。”

Bearing these qualifications in mind, we shall proceed to state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found in all good educational aims.

牢记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将进而提出一切良好的教育目标所应具

备的几个特征。

(1) An educational aim must be founded upon the intrinsic activities and needs (including original instincts and acquired habits) of the given individual to be educated. The tendency of such an aim as preparation is, as we have seen, to omit existing powers, and find the aim in some remote accomplishment or responsibility. In general, there is a disposition to take considerations which are dear to the hearts of adults and set them up as ends irrespective of the capacities of those educated. There is also an inclination to propound aims which are so uniform as to neglect the specific powers and requirements of an individual, forgetting that all learning is something which happens to an individual at a given time and place. The larger range of perception of the adult is of great value in observing the abilities and weaknesses of the young, in deciding what they may amount to. Thus the artistic capacities of the adult exhibit what certain tendencies of the child are capable of; if we did not have the adult achievements we should be without assurance as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rawing, reproducing, modeling, coloring activities of childhood. So if it were not for adult language, we should not be able to see the import of the babbling impulses of infancy. But it is one thing to use adult accomplishments as a context in which to place and survey the doings of childhood and youth; it is quite another to set them up as a fixed aim without regard to the concrete activities of those educated.

（1）必须根据受教育者个人的固有行为和需要（包括原始本能和获得的习惯）来制定教育目标。我们前面讲过，这种把教育视为做好准备的倾向，实则忽略了个人现有能力而把某种遥远的成就和职责

作为教育目标。总的来看，成年人提出教育目标时很少考虑受教育者的能力。他们提出的目标，往往忽视人的特殊能力和要求，忘记一切知识都是人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获得的。成年人的见识较广，对观察儿童的能力和缺点，决定儿童未来的走向，具有很大价值。于是，成年人的艺术能力可以告诉我们儿童在艺术方面可能会有多大成就；如果我们没有取得成年人的艺术成就，我们就没有把握评估儿童在绘画、复制、塑造和着色等方面可能取得的成就。同样，如果没有掌握成年人的语言，我们就不能了解婴儿期咿呀学语的冲动有何意义。但是，把儿童和青年的行为放在成年人背景中进行观察，这是一回事；把成年人的成就作为固定目标，而不考虑受教育者的具体行为，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2) An aim must be capable of translation into a method of cooperating with the activities of those undergoing instruction. It must suggest the kind of environment needed to liberate and to organize their capacities. Unless it lends itself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fic procedures, and unless these procedures test, correct, and amplify the aims, the latter is worthless. Instead of helping the specific task of teaching, it prevents the use of ordinary judgment in observing and sizing up the situation. It operates to exclude recognition of everything except what squares up with the fixed end in view. Every rigid aim just because it is rigidly given seems to render it unnecessary to give careful attention to concrete conditions. Since it must apply anyhow, what is the use of noting details which do not count?

（2）教育目标必须能转化为与受教育者行为进行合作的方法，必须提供解放和组织他们能力所需要的环境。除非有助于制订具体的程序，除非这些程序能检验、校正和实现目标，否则这种目标是没有价值的。它不但无益于具体的教学任务，并且阻碍教师应用平常的判

断观察和估量所面临的情境。除了与固定目标相符的事物以外，这种目标概不承认其他事物。每一硬性规定的目标，只是因为它是硬性规定的，似乎就不必注意具体的情况。由于这种目标无论如何必须实施，注意那些不值得考虑的细节又有什么用处呢？

The vice of externally imposed ends has deep roots. Teachers receive them from superior authorities; these authorities accept them from what is current in the community. The teachers impose them upon children. As a first consequence,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teacher is not free; it is confined to receiving the aims laid down from above. Too rarely is the individual teacher so free from the dictation of authoritative supervisor, textbook on methods, prescribed course of study, etc. , that he can let his mind come to close quarters with the pupil's mind and the subject matter. This distrust of the teacher's experience is then reflected in lack of confidence in the responses of pupils. The latter receive their aims through a double or treble external imposition, and are constantly confused b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aims which are natural to their own experience at the time and those in which they are taught to acquiesce. Until the democratic criterion of the intrinsic significance of every growing experience is recognized, we shall be intellectually confused by the demand for adaptation to external aims.

外来强加的教育目标有很深的缺陷。教师从上级机关接收这些目标，上级机关又从社会上流行的目标中接收这些目标。教师然后把这些目标强加于儿童。这样做的第一个结果是教师丧失了自由；他只能接受上级所规定的目标。教师不可避免地受到督学训示、教学法教学题材和规定的课程等的支配，他的思想因此不能与学生的思想以及教学题材紧密相连。这种对于教师经验的不信任的行为，又反映出目标

制定者对学生的反应缺乏信心。学生通过由外面形成的双重或三重的压迫接受教育目标，常处于两种目标的冲突之中，无所适从。一种是符合当时自己经验的目标，另一种是别人要他们默认的目标。每一个人成长的经验都具有内在的意义，除非每一个成长经验的内在意义的民主标准都是公认的，否则我们将会在思想上因盲目适应外来目标的要求而陷于混乱。

(3) Educators have to be on their guard against ends that are alleged to be general and ultimate. Every activity, however specific, is, of course, general in its ramified connections, for it leads out indefinitely into other things. So far as a general idea makes us more alive to these connections. It cannot be too general. But 'general' also means 'abstract' or detached from all specific context. And such abstractness means remoteness, and throws us back, once more, up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s mere means of getting ready for an end disconnected from the means. That education is literally and all the time its own reward means that no alleged study or discipline is educative unless it is worthwhile in its own immediate having. A truly general aim broadens the outlook; it stimulates one to take more consequences (connections) into account. This means a wider and more flexible observation of means. The more interacting forces, for example, the farmer takes into account, the more varied will be his immediate resources. He will see a greater number of possible starting places, and a greater number of ways of getting at what he wants to do. The fuller one's conception of possible future achievements, the less his present activity is tied down to a small number of alternatives. If one knew enough, one could start almost anywhere and sustain his activities continuously and fruitfully.

（3）教育者必须区分所谓一般目标和终极目标。无论怎样特

殊，每一个行为与其他事物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相比都是一般的，因为它能引入无数其他事物。只要一般的观念能使我们更注意这些关系，那么这种一般就没什么不好的。但是，“一般”也意味着“抽象”，即与具体的情境是分离的。这种抽象性又意味着遥远和不切实际，这再次使我们把教和学仅仅作为准备达到与它无关目标的一种手段。我们说教育自身总是有回报的，意思是说，除非学习或训练本身有其直接价值，否则，这种学习或训练就没有教育意义。真正一般意义上的目标能开拓人们的眼界，激发他们考虑更多的结果（即联系）。这就意味着对各种手段进行更广泛、更灵活的观察。例如，一个农民所考虑的相互影响的力量愈多，他的直接应付能力就愈大。他将发现更多可能的出发点和更多的方法，去完成他所要所做之事。如果有人对将来可能成就的认识越全面，他当前的活动就越少束缚于少数可供选择的方法。如果他了解得很透彻，他几乎可以在任何一点开始行动并且可以继续不断地、卓有成效地把活动持续下去。

Understanding then the term general or comprehensive aim simply in the sense of a broad survey of the field of present activities, we shall take up some of the larger ends which have currency in the educational theories of the day, and consider what light they throw upon the immediate concrete and diversified aims which are always the educator's real concern. We premise (as indeed immediately follows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that there is no need of making a choice among them or regarding them as competitors. When we come to act in a tangible way we have to select or choose a particular act at a particular time, but any number of comprehensive ends may exist without competition, since they mean simply different ways of looking at the same scene. One cannot climb a number of different mountains simultaneously, but the views had when different mountains are ascended supplement one another: they do not set up incompatible, competing worlds. Or, putting the matter in a slightly different way,

one statement of an end may suggest certain questions and observations, and another statement another set of questions, calling for other observations. Then the more general ends we have, the better. One statement will emphasize what another slurs over. What a plurality of hypotheses does for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or, a plurality of stated aims may do for the instructor.

所谓一般的或综合性的目标不过是对当今行为的领域进行广泛的观察。我们将选取当代教育理论中几个比较重大的教育目标来加以讨论，并且研究这些目标能否让我们了解教育者真正关切的当前各种具体的目标。综上所述，我们先解释一下，对于这些目标用不着选择，也不必把它们看作互相竞争的对手。必须采取实际行动时，我们必须在特定的时间选择特定的行动，但是任何综合性的目标都可以同时存在，并行不悖，因为它们不过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我们不能同时攀登几个山峰。但是攀登不同的山峰时，各种景色交相辉映：它们所揭示的并非是互不相容、互相竞争的世界。或者，换一种不同的说法，一种目标暗指对某些问题和观察；另一种目标暗指只存在另外一些问题，需要换一角度观察。因此，我们的目标越具有普遍性越好。一种说法可以补充另一种说法所忽略的方面。正如众多的假设能给科学研究工作者以帮助，众多的目标也能对教师有帮助。

Summary.

总结

An aim denotes the result of any natural process brought to consciousness and made a factor in determining present observation and choice of ways of acting. It signifies that an activity has become

intelligent. Specifically it means foresight of the alternative consequences attendant upon acting in a given situation in different ways, and the use of what is anticipated to direct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 A true aim is thus opposed at every point to an aim which is imposed upon a process of action from without. The latter is fixed and rigid; it is not a stimulus to intelligence in the given situation, but is an externally dictated order to do such and such things. Instead of connecting directly with present activities, it is remote, divorced from the means by which it is to be reached. Instead of suggesting a freer and better balanced activity, it is a limit set to activity. In education, the currency of these externally imposed aims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mphasis put upon the notion of preparation for a remote future and for rendering the work of both teacher and pupil mechanical and slavish.

目标所表明的是能被意识到的，并成为决定当前观察和选择行为方式因素的任何自然过程的结果。目标还表明，某一行为已经具有智力因素。具体讲，所谓目标，就是我们在特定情境下有所行动，能够预见不同行动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并将其用于指导观察和实验。因此，真正的目标和从外面强加的目标完全不同。从外面强加的目标是固定的，呆板的。它不过是从外面发出的做这样那样事情的命令，无法激发在特定情境之下的智慧。这种目标是遥远的，并不直接与当今行为发生联系。它与用以达到目标的手段没有关系，非但不能启发更自由、更平衡的行为，反而有碍行为的展开。这些从外面强加的目标在教育领域不断传播，是强调教育要为遥远未来做准备这种思想出现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教师和学生都从事机械的、奴隶性工作的主要原因。

Chapter 9 Natur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Efficiency as Aims

第九章　把自然发展和社会效率作为教育目标

1．Nature as Supplying the Aim.

一、由自然提供目标

We have just pointed out the futility of trying to establish the aim of education—some one final aim which subordinates all others to itself. We have indicated that since general aims are but prospective points of view from which to survey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and estimate their possibilities, we might have any number of them, all consistent with one another. As matter of fact, a large number have been stated at different times, all having great local value. For the statement of aim is a matter of emphasis at a given time. And we do not emphasize things which do not require emphasis—that is, such things as are taking care of themselves fairly well. We tend rather to frame our stat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defects and needs of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we take for granted, without explicit statement which would be of no use, whatever is right or approximately so. We frame our explicit aims in terms of some alteration to be brought about. It is, then, no paradox requiring explanation that a given epoch or generation tends to emphasize in its conscious projections just the things which it has least of in actual fact. A time of domination by authority will call out as response the desirability of great individual freedom; one of disorganized individual activities the need of social control as an

educational aim.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根本无法建立能够统领所有其他目标的唯一终极目标。还有，既然一般的目标只是一些用来预测未来的，或者用以观察环境的现状和估量环境的前景，我们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前后相符的目标。事实上，我们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提出了许多目标，这些目标在当时都具有巨大的价值。因为目标都是试图解决在一定时间内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我们不会强调不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说，有些事情已受到重视，无需再去强调。我们往往针对当时环境条件的不足和匮乏来制定目标，把正确的或近乎正确的都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再加以论述。我们针对某些需要改动的地方来制定明确的目标。在特定时期或年代，我们在有目的的规划中通常只强调实际中最缺乏的东西，这是无需多加解释的矛盾现象。权威当道的时代会充分地唤起的个人自由；充满散漫个人活动的时代则呼吁把社会控制作为教育目标。

The actual and implicit practice and the conscious or stated aim thus balance each other. At different times such aims as complete living, better methods of language study, substitution of things for words, social efficiency, personal culture, social service, complet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encyclopedic knowledge, discipline, aesthetic contemplation, utility, etc. , have served.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takes up three statements of recent influence; certain others have been incidentally discussed in the previous chapters, and others will be considered later in a discussion of knowledge and of the values of studies. We begin with a consideration that education is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 taking Rousseau's statement, which opposed natural to social (See ante, p. 106); and then pass over to the antithetical conception of social efficiency, which often opposes

social to natural.

因此，实际而含蓄的实践与有意识的或特定的目标是相辅相成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目标，如完整的人生、学习语言的良方、少说多做、社会效益、个人修养、社会福利、个性化全面发展、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纪律严明、审美情趣、实效等。下面我们将讨论近来颇具影响力的三种目标，其他一些目标在前几章已经附带讨论过，还有一些目标将在以后讨论知识和科学价值时提及。我们先讨论卢梭提出的把自然与社会相对立的教育目标，该目标视教育为自然发展的过程，（请参见原书第91页）然后再研究与此相对的社会效益概念，这个概念常常把社会与自然对立起来。

(1) Educational reformers disgusted with the conventionality and artificiality of the scholastic methods they find about them are prone to resort to nature as a standard. Nature is supposed to furnish the law and the end of development; ours it is to follow and conform to her ways. The positive value of this conception lies in the forcible way in which it calls attention to the wrongness of aims which do not have regard to the natural endowment of those educated. Its weakness is the ease with which natural in the sense of normal is confused with the physical.The constructive use of intelligence in foresight, and contriving, is then discounted; we are just to get out of the way and allow nature to do the work. Since no one has stated in the doctrine both its truth and falsity better than Rousseau, we shall turn to him.

1．由于厌恶教学方法的因循性和人造性，教育改革者容易把自然作为标准。自然应为儿童的发展提供规律和目标，而我们只需要承认和遵循自然的方法。这种观点的积极意义在于它能引起人们关注，

关注那些不顾受教育者自然本性的目标的片面性，而缺陷在于它很容易让人把自然发展视为正常发展与生理发育混淆。由于智力为谋划未来所起到的建设性作用打了折扣，所以必须由自然去发展教育。既然卢梭对此概念有最深刻的见解，所以让我们先讨论卢梭的观点。

“Education,” he says, “we receive from three sources—Nature, men, and things. The spontaneous development of our organs and capacities constitutes the education of Nature. The use to which we are taught to put this development constitutes that education given us by Men. The acquirement of personal experience from surrounding objects constitutes that of things. Only when these three kinds of education are consonant and make for the same end, does a man tend towards his true goal. . . . If we are asked what is this end, the answer is that of Nature.For since the concurrence of the three kinds of education is necessary to their completeness, the kind which is entirely independent of our control must necessarily regulate us in determining the other two. " Then he defines Nature to mean the capacities and dispositions which are inborn, “as they exist prior to the modification due to constraining habit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opinion of others. "

卢梭说：“教育有三个来源，即自然、人和事物。我们的器官和能力的自然发展就是来自自然的教育。至于教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的，是来自人类的教育，而依靠从周围事物获得的个人经验的，则构成事物的教育。只有这三种教育和谐一致，服务于同一目标时，人才能向着真正的目标迈进。如果有人问这个目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这个目标就是自然。既然三种教育必须协同进行，教育才能完整，否则不为我们所控制的那一种教育必然会控制我们，同时影响其他两种教育。”卢梭进而把自然视为与生俱来的能力和习性，“因为这种能力和习性在受到强制性的习惯和他人意见的影响而改变以前就已

经存在。”

The wording of Rousseau will repay careful study. It contains as fundamental truths as have been uttered about educ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a curious twis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say better what is said in the first sentences. The three factors of educative development are (a) the native structure of our bodily organs and their functional activities; (b) the uses to which the activities of these organs are pu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ther persons; (c) their direct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This statement certainly covers the ground. His other two propositions are equally sound; namely, (a) that only when the three factors of education are consonant and cooperative does adequat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occur, and (b) that the native activities of the organs, being original, are basic in conceiving consonance.

卢梭的说辞值得仔细研究。他的论述包含历史上曾谈到的有关教育的基本真理，但也有些许奇特的偏见。没有人能说出比开篇的那几句更好的话了。影响教育发展有三个因素：第一是身体器官的结构及其机能；第二是在他人影响之下对这些器官机能的使用；第三是身体器官与环境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这段论述确实有其道理。卢梭的另外两段论述同样正确：第一，只有当教育的三个要素相互一致和共同发挥作用时，一个人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第二，身体器官固有的本能行为是孕育和谐的基本条件。

But it requires but little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supplemented by other statements of Rousseau, to perceive that instead of regarding these three things as factors which must work

together to some extent in order that any one of them may proceed educatively, he regards them as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operations. Especially does he believe that there is an independent and, as he says, 'spontaneous' development of the native organs and faculties. He thinks that this development can go on irrespective of the use to which they are put. And it is to this separate development that education coming from social contact is to be subordinated. Now there is an immense difference between a use of native activities in accord with those activities themselves—as distinct from forcing them and perverting them—and supposing that they have a normal development apart from any use, which development furnishes the standard and norm of all learning by use. To recur to our previous illustration, the process of acquiring language is a practically perfect model of proper educative growth. The start is from native activities of the vocal apparatus, organs of hearing, etc. But it is absurd to suppose that these have an independent growth of their own, which left to itself would evolve a perfect speech. Taken literally, Rousseau's principle would mean that adults should accept and repeat the babblings and noises of children not merely as the beginning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iculate speech—which they are—but as furnishing language itself—the standard for all teaching of language.

但是，只要仔细解读卢梭的这几句话，再结合他的一些其他论述，我们会发现，他并没有把这三件事视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合作的因素，以便使其中任何因素都能发挥教育作用，而是将之视为各自独立的行为。卢梭尤其相信，与生俱来的器官和机能可以自发地独立发展。卢梭认为，不论怎样利用这些器官和机能，这种自发的独立发展都能持续下去。从与社会接触中得到的教育必须从属于这种独立发展。按照本能行为的规律行事，而不是强制它或是滥用它，也不应该认为不需使用它，行为就能正常发展并为所有的学习提供标准和规

范，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还是要再提一次我们前面举过的例子，学习语言的过程是恰当教育成长的一个完美模式。语言的学习从发音器官、听觉器官等的本能行为开始。如果认为这些行为有自己独立的发展，自身能发展成完善的言语，那么这种想法就是荒谬的。从字面上理解，卢梭的原则意味着成年人应接受和重复儿童的咿呀学语声和吵闹声，不仅将其作为清晰的语言发展开端，而且作为对语言本身以及语言教学的标准。

The point may be summarized by saying that Rousseau was right, introducing a much-needed reform into education, in holding that the structure and activities of the organs furnish the conditions of all teaching of the use of the organs ; but profoundly wrong in intimating that they supply not only the conditions but also the ends of their development. As matter of fact, the native activities develop, in contrast with random and capricious exercise, through the uses to which they are put. And the office of the social medium is, as we have seen, to direct growth through putting powers to the best possible use. The instinctive activities may be called, metaphorically, spontaneous, in the sense that the organs give a strong bias for a certain sort of operation,—a bias so strong that we cannot go contrary to it, though by trying to go contrary we may pervert, stunt, and corrupt them. But the notion of a spontaneous normal development of these activities is pure mythology. The natural, or native, powers furnish the initiating and limiting forces in all education; they do not furnish its ends or aims. There is no learning except from a beginning in unlearned powers, but learning is not a matter of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the unlearned powers. Rousseau's contrary opinion is doubtless due to the fact that he identified God with Nature; to him the original powers are wholly good, coming directly from a wise and good creator. To paraphrase the old saying about the country and the town, God

made the original human organs and faculties, man makes the uses to which they are put. Consequ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mer furnishes the standard to which the latter must be subordinated. When men attempt to determine the uses to which the original activities shall be put, they interfere with a divine plan. This interference by social arrangements with Nature, God's work, is the primary source of corruption in individuals. Rousseau's passionate assertion of the intrinsic goodness of all natural tendencies was a reaction against the prevalent notion of the total depravity of innate human nature, and has had a powerful influence in modifying the attitude towards children's interests. But it is hardly necessary to say that primitive impulses are of themselves neither good nor evil, but become one or the other according to the objects for which they are employed. That neglect, suppression, and premature forcing of some instincts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are responsible for many avoidable ills, there can be no doubt. But the moral is not to leave them alone to follow their own “spontaneous development,” but to provide an environment which shall organize them.

可以这样来概括这个问题。卢梭引发了一场急迫的教育改革，认为我们器官的结构和机能可以提供一切教人利用器官的条件，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说器官的结构和行为不仅提供了它们发展的条件，还提供了其发展目标，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与本能活动性质相反的偶然性以及随意性的训练行为都是在使用中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社会环境的作用在于通过充分利用这些力量来指引发展方向。打个比方，本能行为是自发进行的，意思是说，器官对某种活动有强烈的影响——强烈到让我们无法违背它；一旦试图违抗它，就可能歪曲它的本质，阻碍它成长，败坏它的存在。但是，如果以为这些活动能自发的、正常的发展，那么这纯粹是一种虚构。自然或天生的能力提供了教育中具有启发作用和限制作用的一切力量。但是，它们并不提供教育目标。除了从不学而知的能力开始学习以外，

便没有学习，但是学习并非不学而知能力的自发溢流。卢梭与此持相反的意见，很可能是因为他把上帝和自然等同起来。在他看来，人的天生能力是完全向善的，直接来自聪明的造物主。作为对有关国家和城市谚语的阐释，人类原有的器官和机能是上帝赋予的，人类则利用了这些器官和能力。因此，前者的发展提供了使用后者时必须遵从的标准。当人们试图决定其先天行为的用处时，他们就干预了一项神圣的计划。社会对大自然的干预也就是对上帝杰作的干预。这是人堕落的主要根源。卢梭关于一切自然倾向具有内在善的慷慨陈词乃是对当时流行的关于人类本性彻底堕落的观念的反动。这对改变对待儿童利益的态度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无需指出的是，人类本能冲动本身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本能冲动的善恶与否在于怎样利用它们。如果我们因为忽视、压抑和过早地迫使某种本能发展，而牺牲别的本能，那么就会产生很多本可避免的错误。但是，从这件事中得到的教训，不是让这些本能“自我发展”，而是提供一种环境，去合理利用这些本能。

Returning to the elements of truth contained in Rousseau's statements, we find that natural development, as an aim, enables him to point the means of correcting many evils in current practices, and to indicate a number of desirable specific aims, (1) Natural development as an aim fixes attention upon the bodily organs and the need of health and vigor. The aim of natural development says to parents and teachers: Make health an aim; normal development cannot be had without regard to the vigor of the body—an obvious enough fact and yet one whose due recognition in practice would almost automatically revolutionize many of our educational practices. “Nature” is indeed a vague and metaphorical term, but one thing that “Nature” may be said to utter is that there are conditions of educational efficiency, and that till we have learned what these conditions are and have learned to make our practices accord with them, the noblest and most ideal of

our aims are doomed to suffer—are verbal and sentimental rather than efficacious.

重新回到卢梭的主张的真理因素上，我们发现，把自然发展作为教育目标，这促使卢梭提出如何纠正目前教育实践中存在的许多弊端的方法，并指出许多可行的具体目标。（1）把自然发展作为教育目标能使人们特别关注儿童的身体器官和健康需要。自然发展的目标告诉了家长和老师这样一个事实：把健康作为目标，如果不顾及身体健康，就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很明显，如果能对它有所认识就能自动地使很多教育实践产生革命性变革。“自然”是一个含糊不清的隐喻性名词。但是，“自然”的确能告诉我们教育效率中的诸多条件。在我们对之有所了解并且知晓如何使实践与之符合以前，我们最崇高，最理想的目标是注定要失败的。它们只不过是，仅凭感情用事而不具有效力的一纸空谈。

(2) The aim of natural development translates into the aim of respect for physical mobility. In Rousseau's words: “Children are always in motion; a sedentary life is injurious. " When he says that “Nature's intention is to strengthen the body before exercising the mind” he hardly states the fact fairly. But if he had said that nature's “intention” (to adopt his poetical form of speech) is to develop the mind especially by exercise of the muscles of the body he would have stated a positive fact. In other words, the aim of following nature means, in the concrete, regard for the actual part played by use of the bodily organs in explorations, in handling of materials, in plays and games.

（2）把自然发展的目标转化为遵从身体活动的目标。用卢梭的话来说：“儿童总是动个不停；静止的生活是有害的。”他又说：“自然

的意思是先强健身体，后磨炼心智。”但这句话很难把事实陈述清楚。如果他说自然的“意图”（用他富有诗意的言语）特别是指通过锻炼身体肌肉来开发智力，他就说明了一个正面的事实。换言之，遵循自然的教育目标就是指关注儿童身体器官在探索、处理各种材料、玩游戏和竞赛中所起的实际作用。

(3) The general aim translates into the aim of regard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mong children. Nobody can take the principle of consideration of native powers into account without being struck by the fact that these powers differ in different individuals. The difference applies not merely to their intensity, but even more to their quality and arrangement. As Rousseau said: “Each individual is born with a distinctivetemperament… We indiscriminately employ children of different bents on the same exercises; their education destroys the special bent and leaves a dull uniformity. Therefore after we have wasted our efforts in stunting the true gifts of nature we see the short-lived and illusory brilliance we have substituted die away, while the natural abilities we have crushed do not revive. "

（3）把一般的目标转化为关注儿童个体差异的目标。凡是考虑到儿童天赋能力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对儿童们天资各异感到惊异。这种差异不仅关乎能力的强弱，甚至在能力水平和组织发挥方面，也因人而异。正如卢梭所说：“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我们通常对具有不同爱好的儿童进行同样的训练；对他们进行的教育破坏了他们特殊的爱好，造成呆板而千篇一律的教育结果。在我们浪费精力去阻碍儿童真正的天赋发展之后，我们发现取而代之的短暂，虚幻的才华正在消退，而为我们所扼杀的儿童的天赋却不可能再生了。”

Lastly, the aim of following nature means to note the origin, the waxing, and waning, of preferences and interests. Capacities bud and bloom irregularly; there is no even four-abreast development. We must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Especially precious are the first dawnings of power. More than we imagine, the ways in which the tendencies of early childhood are treated fix fundamental dispositions and condition the turn taken by powers that show themselves later. Educational concern with the early years of life—as distinct from inculcation of useful arts—dates almost entirely from the time of the emphasis by Pestalozzi and Froebel, following Rousseau, of natural principles of growth. The irregularity of growth and its significance is indicated in the following passage of a student of the growth of the nervous system. “While growth continues, things bodily and mental are lopsided, for growth is never general, but is accentuated now at one spot, now at another… The methods which shall recognize in the presence of these enormous differences of endowment the dynamic values of natural inequalities of growth, and utilize them, preferring irregularity to the rounding out gained by pruning will most closely follow that which takes place in the body and thus prove most effective.“ [10_1]

最后，遵循自然的教育目标就是指要关注儿童的爱好和兴趣的产生、增加和减少。儿童能力的产生和狂热是没有规则的，甚至并没有齐头并进式的发展。我们必须趁热打铁。尤为宝贵的是儿童能力初始阶段的开发。我们对待儿童早期发展趋势的方式能确定儿童今后的基本思维倾向和能力的转变，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教育上对早期儿童的关怀几乎可以追溯到继卢梭之后的裴斯泰洛齐和福禄培尔对自然成长原则的强调。有位研究神经系统发育的学者对成长的不规则性及其重要意义有过如下论述：“在儿童成长发育过程中，其身体和智力方面发展是不平衡的。因其成长从来就不平衡，有时这一点

上更突出，有时在另一点上更突出。面对儿童天资间的巨大差异，不同的教育方法必须认识到成长中自然发展不平衡的能动价值，并加以利用。宁可允许不规则性存在，也不要一刀切。这种方法能在最大程度上适应身体的自然发展，因而也被证明是最有效的。” [11_1]

Observation of natural tendencies is difficult under conditions of restraint. They show themselves most readily in a child's spontaneous sayings and doings,—that is, in those he engages in when not put at set tasks and when not aware of being under observation.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se tendencies are all desirable because they are natural; but it does follow that since they are there, they are operative and must be taken account of. We must see to it that the desirable ones have an environment which keeps them active, and that their activity shall control the direction the others take and thereby induce the disuse of the latter because they lead to nothing. Many tendencies that trouble parents when they appear are likely to be transitory, and sometimes too much direct attention to them only fixes a child's attention upon them. At all events, adults too easily assume their own habits and wishes as standards, and regard all deviations of children's impulses as evils to be eliminated. That artificiality against which the conception of following nature is so largely a protest, is the outcome of attempts to force children directly into the mold of grown-up standards.

在受限制的情况下观察儿童的自然习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些自然习性最容易在儿童的自发性语言和行为中，也就是儿童未做指定的工作且未发觉自己被别人观察时表现出来。但也不能说，因为这些习性是自然产生的，所以都是可取的。但我们可以说，既然存在这些习性，那么它们是能产生作用的，必须加以重视。我们必须让可取的习性有一个适当的环境并保持适当的活跃，这些具有自然习性行为必

须控制其他行为的发展方向，如果不能产生良好效果便弃用它。儿童的许多使父母感到不安的习性出现时，往往是转瞬即逝的；过分密切关注这些倾向，只会使儿童更在意它们。总之，成年人往往把自己的习惯和愿望作为衡量标准，而把儿童冲动带来的所有偏差视为必须消除的祸害。遵循自然的观念主要是对人为造作的反抗；而人为造作是企图迫使儿童完全符合成年人的标准模式。

In conclusion, we note that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idea of following nature combined two factors which had no inherent connection with one another. Before the time of Rousseau educational reformers had been inclined to urge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by ascribing practically unlimited power to it. Al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eoples and between classes and persons among the same people were said to be due to differences of training, of exercise, and practice. Originally, mind, reason, understanding is,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the same in all. This essential identity of mind means the essential equality of all and the possibility of bringing them all to the same level. As a protest against this view, the doctrine of accord with nature meant a much less formal and abstract view of mind and its powers. It substituted specific instincts and impulses and physiological capacities, differing from individual to individual (just as they differ, as Rousseau pointed out, even in dogs of the same litter), for abstract faculties of discernment, memory, and generalization. Upon this side, the doctrine of educative accord with nature has been reenfor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ology,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 It means, in effect, that great as is the significance of nurture, of modif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rough direct educational effort, nature, or unlearned capacities, affords the foundation and ultimate resources for such nurture.

最后，我们注意到，遵循自然观念的早期历史还有两个彼此间并无内在关联的因素。在卢梭之前，教育改革家们几乎都倾向于赋予教育无限的权力，竭力宣扬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同一民族各阶级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源于训练、学习和实践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每个人原本的智力、理性和理解力都是相同的。人在智力上的一致性表明人生而平等，并且可以培养到同等水平。但遵循自然的教育学说反对以上观点，这个学说对智力及其力量的看法，并不那么呆板和抽象。它不主张我们有辨别、记忆和概括等抽象能力，而主张我们有特殊本能和冲动以及生理能力且程度均因人而异。（正如卢梭所说，即使是同一窝里的狗，其本能也是不同的。）在这一方面，随着近代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发展，遵循自然的教育学说得到了补充和加强。这种学说实际上告诉我们，尽管培养、矫正和通过直接教育而进行的改造有其重要性，但是自然或无师自通的能力为这种培养提供了基础和最终资源。

On the other hand, the doctrine of following nature was a political dogma. It meant a rebellion against existing social institutions, customs, and ideals (See ante, p. 107). Rousseau's statement that everything is good as it comes from the hands of the Creator has its signification only in its contrast with the concluding part of the same sentence: “Everything degenerates in the hands of man. " And again he says: “Natural man has an absolute value; he is a numerical unit, a complete integer and has no relation save to himself and to his fellow man. Civilized man is only a relative unit, the numerator of a fraction whose value depends upon its denominator, its relation to the integral body of society. Goo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re those which make a man unnatural. " It is upon this conception of the artificial and harmful character of organized social life as it now exists [10_2] that he rested the notion that nature not merely furnishes prime forces which initiate growth but also its plan and goal. That evil institutions and customs work

almost automatically to give a wrong education which the most careful schooling cannot offset is true enough; but the conclusion is not to educate apart from the environment, but to provide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native powers will be put to better uses.

另一方面，遵循自然的学说也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个信条。这个信条反抗当时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理想（参见原书91页）。卢梭说过，凡是造物主创造的所有东西都是好的。这句话只有与同一句话的结尾部分对比时才有意义，即“凡是经过人之手的所有东西都要退化变质”。卢梭还说过：“自然人有绝对的价值；他是一个数量单位，是一个完全的整数，除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以外，没有别的关系。而文明人只是一个相对的单位，是一个分数的分子，其价值取决于它的分母，以及它和社会整体的关系。所谓良好的政治制度是让人变得不自然的制度。”现存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具有人为矫作的有害特性。有鉴于此，卢梭指出，自然不仅提供促进成长的基本力量，而且提供成长的计划和目标。 [11_2] 腐败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几乎会自动带给儿童一种错误的教育，即使是最谨慎的学校教育也不能补偿这种教育的错误，这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得出的结论不是要脱离环境进行教育，而是要提供一种让儿童天赋能力能够得到更好利用的环境。

2．Social Efficiency as Aim.

二、把社会效率作为目标

A conception which made nature supply the end of a true education and society the end of an evil one, could hardly fail to call out a protest. The opposing emphasis took the form of a doctrine that the business of education is to supply precisely what

nature fails to secure; namely, habituation of an individual to social control; subordination of natural powers to social rules.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find that the value in the idea of social efficiency resides largely in its protest against the points at which the doctrine of natural development went astray; while its misuse comes when it is employed to slur over the truth in that conception. It is a fact that we must look to the activities and achievements of associated life to find what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that is to say, efficiency—means. The error is in implying that we must adopt measures of subordination rather than of utilization to secure efficiency. The doctrine is rendered adequate when we recognize that social efficiency is attained not by negative constraint but by positive use of native individual capacities in occupations having a social meaning.

自然提供真正的教育目标，而社会提供错误的教育目标，这种观念很容易招致人们的不满。反对的一方强调，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提供不能从自然中获得的东西，即个人习惯服从于社会管理，天资能力服从于社会准则。毋庸置疑，我们发现，社会效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反对自然发展学说走入歧途；而它的误用则是由于忽略了自然发展学中的真理。是的，我们必须注意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和成就，寻求提高能力——即效率——的含义。然而，该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暗示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使天赋能力处于附属地位，而不是利用天赋能力获得效率。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获得社会效率不是通过消极限制个人天赋能力，而是通过积极利用其天赋能力去做有社会意义的事，那么这个学说就表达恰当了。

(1) Translated into specific aims, social efficiency ind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competency. Persons cannot live without means of subsistence; the ways in which these means are employed

and consumed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all the relationships of persons to one another. If an individual is not able to earn his own living and that of the children dependent upon him, he is a drag or parasite upon the activities of others. He misses for himself one of the most educative experiences of life. If he is not trained in the right use of the products of industry, there is grave danger that he may deprave himself and injure others in his possession of wealth. No scheme of education can afford to neglect such basic considerations. Yet in the name of higher and more spiritual ideals, the arrangements for higher education have often not only neglected them, but looked at them with scorn as beneath the level of educative concern. With the change from an oligarchical to a democratic society, it is natural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an education which should have as a result ability to make one's way economically in the world, and to manage economic resources usefully instead of for mere display and luxury, should receive emphasis.

（1）把社会效率转化为具体目标，表明了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没有维持生计之物，我们就无法生存；使用和消耗生计之物的方法对人们相互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有着深远影响。如果有谁无法自谋生计，无力抚养子女，那么他就是依仗别人活动的累赘或寄生虫。他就失去了最有教育意义的生活经验。如果有谁没有受过正确训练，不知道正确地利用工业产品，他拥有的财富很可能让自己堕落，并对他人造成伤害。任何教育计划都不能忽视这种基本考量标准。但是，在更为崇高的精神理想的名义下，高等教育不仅常常忽视这些考量标准，而且会对之蔑视，认为它们与教育无关。随着寡头独裁政治社会发展为民主社会，教育的意义应该得到重视，即教育应使受教育者能在经济上自谋生计并有效管理经济资源，而不仅仅是为了炫耀自己和享受奢华。

There is, however, grave danger that in insisting upon this end, existing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standards will be accepted as final. A democratic criterion requires us to develop capacity to the point of competency to choose and make its own career. This principle is violated when the attempt is made to fit individuals in advance for definite industrial callings, selected not on the basis of trained original capacities, but on that of the wealth or social status of parents. As a matter of fact, industry at the present time undergoes rapid and abrupt changes through the evolution of new inventions. New industries spring up, and old ones are revolutionized. Consequently an attempt to train for too specific a mode of efficiency defeats its own purpose. When the occupation changes its methods, such individuals are left behind with even less ability to readjust themselves than if they had a less definite training. But, most of all, the present industrial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is, like every society which has ever existed, full of inequities. It is the aim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 to take part in correcting unfair privilege and unfair deprivation, not to perpetuate them. Wherever social control means subordination of individual activities to class authority, there is danger that industrial education will be dominated by acceptance of the status quo.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then dictate what the future callings of individuals are to be. We have an unconscious revival of the defects of the Platonic scheme (Ante, p. 104) without its enlightened method of selection.

但是，坚持这样的目标也有严重的危险，现有经济状况和标准将被视为没有必要改进的最终结果。民主准则要求我们提高学生的能力，让他们能选择自己的职业，并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如果我们试图先让学生适应一定的职业，而这种职业选择依据的并非学生从训练中获得的能力，而是父母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那么这种做法就违犯了这

个原则。事实上，新的发明创造的涌现正在让我们现有工业经历迅猛突变。新工业快速崛起，旧工业彻底改革。因此，任何试图训练儿童过分追求效率的行为都不可能成功。在某种职业改变其工作方法时，受过训练的人就会落后于发展，甚至比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更缺乏适应的能力。最重要的是，现在社会的结构与过去社会一样充满了不平等。渐进式教育的目标是要纠正不公平的特权和剥削，而不是永久延续这种不公平状况。当社会控制意味着个人活动屈服于阶级权威，工业教育就会陷于被既定现状支配的危险。因此，不同的经济良机决定着个人未来的职业。我们在无意中重蹈了柏拉图计划（参阅第89页）的缺陷，但又缺乏像柏拉图挑选学生那样的开明方法。

(2) Civic efficiency, or good citizenship. It is, of course, arbitrary to separate industrial competency from capacity in good citizenship. But the latter term may be used to indicate a number of qualifications which are vaguer than vocational ability. These traits run from whatever make an individual a more agreeable companion to citizenship in the political sense: it denotes ability to judge men and measures wisely and to take a determining part in making as well as obeying laws. The aim of civic efficiency has at least the merit of protecting us from the notion of a training of mental power at large. It calls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power must be relative to doing something, and to the fact that the things which most need to be done are things which involve one's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2）公民效率或良好的公民意识。当然，分别论述工业生产能力和良好公民意识能力是一种武断的做法。但是，公民意识能力可以代表若干比许多职业能力更加模糊的品质。这包括小到受他人认可，大到具有政治意义的公民意识的广泛范围：比如，理智察人断事等，在制订和服从法律时起决定作用的能力。把公民效率作为教育目标至少能使我们免受整个心理能力训练的观念影响。这种目标让我们注意

到：我们的能力必须和某件事的做法有关；我们最需要做的事乃是涉及我们和别人关系的事。

Here again we have to be on guard against understanding the aim too narrowly. An over-definite interpretation would at certain periods have excluded scientific discoveries,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in the last analysis security of social progress depends upon them. For scientific men would have been thought to be mere theoretical dreamers, totally lacking in social efficiency. It must be borne in mind that ultimately social efficiency means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capacity to share in a give and take of experience. It covers all that makes one's own experience more worthwhile to others, and all that enables one to participate more richly in the worthwhile experiences of others. Ability to produce and to enjoy art, capacity for recreation, the significant utilization of leisure, are more important elements in it than elements conventionally associated oftentimes with citizenship. In the broadest sense, social efficiency is nothing less than that socialization of mind which is actively concerned in making experiences more communicable; in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which make individuals impervious to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When social efficiency is confined to the service rendered by overt acts, its chief constituent (because its only guarantee) is omitted,—intelligent sympathy or good will. For sympathy as a desirable quality is something more than mere feeling; it is a cultivated imagination for what men have in common and a rebellion at whatever unnecessarily divides them. What is sometimes called a benevolent interest in others may be but an unwitting mask for an attempt to dictate to them what their good shall be, instead of an endeavor to free them so that they may seek and find the good of their own choice. Social efficiency, even social service, are hard and metallic things when severed from an

active acknowledgment of the diversity of goods which life may afford to different persons, and from faith in the social utility of encouraging every individual to make his own choice intelligent.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不能把这个目标理解得太过狭隘。尽管事实上最终分析社会进步的安全性取决于对目标的理解，但在某段时期，过度解读的确妨碍了社会进步。科学家可能会被视为缺乏社会效率的理论上的空想家。必须牢记的是，社会效率最终恰好就是参与平等交换经验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使自己的个人经验对别人产生更大的价值，以及使自己能更有效地参与别人经验的能力。创作艺术和欣赏艺术的能力、娱乐能力和有效利用闲暇时间的能力都是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成分，比在通常情况下与公民意识联系在一起的能力更重要。广义上讲，社会效率就是使思维社会化，积极促使经验的相互传授，打破阻碍个人对别人利益漠不关心的社会分化。如果社会效率局限于外表行为的服务，就会忽略效率的主要成分（这是效率的唯一保证）：同情心或善意。作为一种良好的品质，同情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情感，而是一种有修养的想象力，能使我们关心人类共有的事情，反抗对人的无谓划分。有时对别人有仁慈的兴趣可能只是一种假意的面具，企图掌控别人的利益，而不是努力使别人能够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不主动承认生活会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利益，又缺乏鼓励人们做出对社会效用的明智选择，社会效率，甚至社会公益，就会变成生硬的东西。

3．Culture as Aim.

三、把文化修养作为目标

Whether or not social efficiency is an aim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culture turns upon these considerations. Culture means at least something cultivated, something ripened; it is opposed to the raw and crude. When the 'natural' is identified with this rawness, culture is opposed to what is called natural development. Culture is also something personal; it is cultivation with respect to appreciation of ideas and art and broad human interests. When efficiency is identified with a narrow range of acts, instead of with the spirit and meaning of activity, culture is opposed to efficiency. Whether called culture or complet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the outcome is identical with the true meaning of social efficiency whenever attention is given to what is unique in an individual—and he would not be an individual if there were not something incommensurable about him. Its opposite is the mediocre, the average. Whenever distinctive quality is developed, distinction of personality results, and with it greater promise for a social service which goes beyond the supply in quantity of material commodities. For how can there be a society really worth serving unless it is constituted of individuals of significant personal qualities?

社会效率的目标是否和文化修养目标相一致，需要考虑以下因素。与原始和粗糙相对，文化修养至少应该含有某种素养，某种成熟的东西。当“自然”被归为这种原始状态时，修养就与所谓自然发展相对立了。所谓文化修养意指个人的培养观念、艺术鉴赏能力和对人类的广泛兴趣。如果无视行为的精神和意义，视效率为狭隘的行为，这就是把修养与效率对立起来了。不管是所谓的文化修养还是人格的全面发展，其结果都与社会效率的真正意义相一致。如果我们能注意人的独特性，即如果人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测量，他不能称之为人。与个性相反的就是平庸，即平均标准。人的独特性可以发展形成独特的人格并对社会公益做出更大贡献。这种个人的贡献超出供应的物质商品数量。除非构成这个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否则有什么值得为其服务的价值呢？

The fact is that the opposition of high worth of personality to social efficiency is a product of a feudally organized society with its rigid division of inferior and superior. The latter are supposed to have time and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mselves as human beings; the former are confined to providing external products. When social efficiency as measured by product or output is urged as an ideal in a would-be democratic society, it means that the depreciatory estimate of the masses characteristic of an aristocratic community is accepted and carried over. But if democracy has a moral and ideal meaning, it is that a social return be demanded from all and that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of distinctive capacities be afforded all. The separation of the two aims in education is fatal to democracy; the adoption of the narrower meaning of efficiency deprives it of its essential justification.

有人反对人格对社会效率具有重大价值的这一观点，认为这是封建社会严格划分尊卑阶级的产物。在封建社会，高贵者有时间，也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人；卑贱者则受到限制，专为高贵者提供外部产品。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社会仍用产品或产量作为衡量理想社会效率的标准，那就是继承贵族社会中贬低民众的传统，并使之延续下去。但是，如果民主具有道德和理想的含义，它就要求每个人对社会做出贡献，同时也给每个人提供发展特殊才能的机会。个人发展和社会效率这两个教育目标的分离是对民主的致命打击；采用比较狭隘的效率就剥夺了效率的正当理由。

The aim of efficiency (like any educational aim) must be included within the process of experience. When it is measured by tangible external products, and not by the achieving of a distinctively valuable experience, it becomes materialistic. Results

in the way of commodities which may be the outgrowth of an efficient personality are, in the strictest sense, by-products of education: by-products which are inevitable and important, but nevertheless by-products. To set up an external aim strengthens by reaction the false conception of culture which identifies it with something purely 'inner. ' And the idea of perfecting an 'inner' personality is a sure sign of social divisions. What is called inner is simply that which does not connect with others—which is not capable of free and full communication. What is termed spiritual culture has usually been futile, with something rotten about it, just because it has been conceived as a thing which a man might have internally—and therefore exclusively. What one is as a person is what one is as associated with others, in a free give and take of intercourse. This transcends both the efficiency which consists in supplying products to others and the culture which is an exclusive refinement and polish.

必须把效率的目标（像任何其他教育目标一样）包含在经验过程之中。如果我们只用有形的外部产品来估算效率，而不是用可获得价值的经验来衡量，效率的目标就变成物质主义了。我们也许会培养出来效率高的个体或产品，但是严格地说，这种产品只是教育的副产品——虽然这种副产品不可避免的，而且很重要，但它终究还是副产品。建立外部目标会加强把文化修养视为某种纯粹“内在”之物的这种错误观念。“内在”人格的完善是社会分化的确切标志。所谓内在的指的是不能与别人分享、不能完全自由相互交流之物。由于被视为人所专有的内在之物，所谓精神修养一直被看作是一种带有某种腐朽成分的无用之物。要判断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就要看他在与别人的共同生活中，在与别人的自由交往中是什么样的人。有了这种认识，就不再会把效率等同于为别人提供产品，不再会把文化修养理解为少数人所专有的文雅和修饰。

Any individual has missed his calling, farmer, physician, teacher, student, who does not find that the accomplishments of results of value to others is an accompaniment of a process of experience inherently worthwhile. Why then should it be thought that one must take his choice between sacrificing himself to doing useful things for others, or sacrificing them to pursuit of his own exclusive ends, whether the saving of his own soul or the building of an inner spiritual life and personality? What happens is that since neither of these things is persistently possible, we get a compromise and an alternation. One tries each course by turns. There is no greater tragedy than that so much of the professedly spiritual and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world has emphasized the two ideals of self-sacrifice and spiritual self-perfecting instead of throwing its weight against this dualism of life. The dualism is too deeply established to be easily overthrown; for that reason, it is the particular task of education at the present time to struggle in behalf of an aim in which social efficiency and personal culture are synonyms instead of antagonists.

不论是农民、医生、教师或学生，如果他没有认识到所创造出的对别人有价值的东西必须是经验过程中有内在价值的副产品，那他就没有真正了解他的职业。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必须选择牺牲自己去做有益于别人的事情呢？还是牺牲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特定目标呢？实际情况是，由于两种选择均不能够持续进行，于是我们想出一种折中办法，两者交替进行，轮流尝试这两种选择。世界上许多广为散布的精神思想和宗教思想都强调自我牺牲和精神上自我完善的统一，而不是反对这种生活的二元论，因为没有比这更大的悲剧了。这种二元论根深蒂固，难以推翻。由于这个原因，当前教育上的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努力使社会效率和个人修养成为同义词，而不是反义词。

Summary.

总结

General or comprehensive aims are points of view for surveying the specific problems of education. Consequently it is a test of the value of the manner in which any large end is stated to see if it will translate readily and consistently into the procedures which are suggested by another. We have applied this test to three general aims: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nature, social efficiency, and culture or personal mental enrichment. In each case we have seen that the aims when partially stated come into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The partial statement of natural development takes the primitive powers in an alleged spontaneous development as the end-all.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raining which renders them useful to others is an abnormal constraint; one which profoundly modifies them through deliberate nurture is corrupting.

一般或概括性的目标只是有关教育研究中特殊问题的观点。因此，要检验所论述的远大目标的价值，就要看这个目标能否迅速持久地转化为实现另一个目标所需的程序。我们曾检验三种概括性的发展目标：①根据自然规律；②根据社会效率；③根据个人修养或精神财富。在每次的检验过程中，我们发现，如果对目标没有进行全面的论述，目标彼此间就会相互冲突。如果没有全面叙述自然发展的目标，所谓的自发性发展中的原始能力就会成为最终目标。根据这个观点，凡是对别人有用的训练都是变态的强制行为；凡是通过审慎的教育彻底改变这种能力的训练则具有反作用。

But when we recognize that natural activities mean native activities which develop only through the uses in which they are nurtured, the conflict disappears. Similarly a social efficiency which is defined in terms of rendering external service to others is of necessity opposed to the aim of enriching the meaning of experience, while a culture which is taken to consist in an internal refinement of a mind is opposed to a socialized disposition. But social efficiency as an educational purpose should mean cultivation of power to join freely and fully in shared or common activities. This is impossible without culture, while it brings a reward in culture, because one cannot share in intercourse with others without learning—without getting a broader point of view and perceiving things of which one would otherwise be ignorant. And there is perhaps no better definition of culture than that it is the capacity for constantly expanding the range and accuracy of one's perception of meanings.

如果我们认识到，所谓的自然行为就是天赋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得到发展，那么只要在使用中进行教育，冲突才会消失。同样，如果社会效率指的是对他人的外部服务，这种目标必然和具有丰富经验意义的目标相反。如果文化修养指的是心智的内部优化，这就与人的社会化倾向相反。但是作为教育目标的社会效率指的是培养充分参与共同活动的自由能力。虽然这种参与能提高文化修养，但是如果没有文化修养，这种行为则是不可能的。没有学问的人不具有较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未知事物，也就不能和别人交往。文化修养指的是不断扩大人对事物意义的理解范围，加强正确理解的能力。也许没有比这更好的关于文化修养的定义了。

[10_1].Donaldson, "Growth of Brain," p. 357.

[10_2].We must not forget that Rousseau had the idea of a radically different sort of society, a fraternal society whose end should be identical with the good of all

its members, which he thought to be as much better than existing states as these are worse than the state of nature.

[11_1].唐纳森（Donaldson）：《大脑的发育》，英文版，第357页。

[11_2].我们决不能忘记，卢梭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观念，即博爱社会的目标应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一致。他认为，这种社会比当时的状况好得多，正如当时的状况比自然状况坏得多一样。

Chapter 10 Interest and Discipline

第十章　兴趣与训练

1．The Meaning of the Terms.

一、兴趣与训练的意义

We have already notic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attitude of a spectator and of an agent or participant. The former is indifferent to what is going on; one result is just as good as another, since each is just something to look at. The latter is bound up with what is going on; its outcome makes a difference to him. His fortunes are more or less at stake in the issue of events. Consequently he does whatever he can to influence the direction present occurrences take. One is like a man in a prison cell watching the rain out of the window; it is all the same to him. The other is like a man who has planned an outing for the next day which continuing rain will frustrate. He cannot, to be sure, by his present reactions affect to-morrow's weather, but he may take some steps which will influence future happenings, if only to postpone the proposed picnic. If a man sees a carriage coming which may run over him, if he cannot stop its movement, he can at least get out of the way if he foresees the consequence in time. In many instances, he can intervene even more directly. The attitude of a participant in the course of affairs is thus a double one: there is solicitude, anxiety concerning future consequences, and a tendency to act to assure better, and avert worse, consequences.

我们已经讨论过旁观者和代理人与参与者在态度方面存在的差别。前者对当前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不管是何种结果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样，因为他只不过是看客而已；而后者则紧密关注正在发生之事，对于他来说，事情的结果意义重大，与他的命运密切相关。因此，他必须竭尽所能，去影响事情进程的走势。旁观者就像身陷囹圄、正默默注视窗外下雨的囚犯一样，对于他来说，下雨与否都是一样的。而参与者就像一位计划第二天外出的人，持续不断的雨将会阻挠他出游。然而，凭他目前的能力肯定不能改变明天的天气，但只要推迟既定的野炊计划，他便可能改变以后的事态。如果有人看见一辆马车朝他而来，若不加以制止，他很有可能被轧死，但若他能及时预见到后果，那他至少可以给马车让道。在很多情况下，他甚至能更直接地去干涉事情的发展进程。因此，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参与者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带着焦虑的心情去关注事件发展的结果，二是乐观积极地行动，以保证结果趋向良好，并阻止不良倾向。

There are words which denote this attitude: concern, interest. These words suggest that a person is bound up with the possibilities inhering in objects; that he is accordingly on the lookout for what they are likely to do to him; and that, on the basis of his expectation or foresight, he is eager to act so as to give things one turn rather than another. Interest and aims, concern and purpose, are necessarily connected. Such words as aim, intent, end, emphasize the results which are wanted and striven for; they take for granted the personal attitude of solicitude and attentive eagerness. Such words as interest, affection, concern, motivation, emphasize the bearing of what is foreseen upon the individual's fortunes, and his active desire to act to secure a possible result. They take for granted the objective changes. But the difference is but one of emphasis; the meaning that is shaded in one set of words is illuminated in the other. What is anticipated is objective and

impersonal; to-morrow's rain;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run over. But for an active being, a being who partakes of the consequences instead of standing aloof from them, there is at the same time a personal response. The difference imaginatively foreseen makes a present difference, which finds expression in solicitude and effort. While such words as affection, concern, and motive indicate an attitude of personal preference, they are always attitudes toward objects—toward what is foreseen. We may call the phase of objective foresight intellectual, and the phase of personal concern emotional and volitional, but there is no separation in the facts of the situation.

有两个词可以表明这种态度：关心和兴趣。这两个词暗示了他与事件所固有的可能性有密切关系，也暗示他很注意该事件对他有什么影响，同时也暗示，基于他的期盼或远见，他会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对事件发展的走向进行干预。兴趣和目的、关心和意图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目的、意图和结局这样的词汇强调的则是渴望和奋斗的结果；因此它们把对他人的关心和热心视为理所应当。而兴趣、关爱、关心和动机等名词强调的是预见的结果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及为获得某种可能性结果而采取行动的愿望。这几个名词已含有客观变化的含义。这两组词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各自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一组词中隐含的意义在另一组词里得到凸显。预料的一切都是客观的，非个人的，如明天的雨，被马车碾过的可能性。但是对于一个对事物的结果不是置若罔闻而是参与其中的活生生的个体而言，同时应当有自己的反应。想象中预料的不同便会造成实际的不同，这些不同在焦虑和努力当中可以找到相应的迹象。比如关爱，关心和动机这样的词表明了一种个人喜好的态度，同时也是个人对事物，尤其对预料中的事物的态度。我们虽然可能把客观的远见视为理智的表现，而把个人关心视为是情绪化或意气用事的表现。实际上，两者并不能这样断然划分。

Such a separation could exist only if the personal attitudes ran their course in a world by themselves. But they are always responses to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situation of which they are a part, and their successful or unsuccessful expression depends upon their interaction with other changes. Life activities flourish and fail only in connection with changes of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terally bound up with these changes; our desires, emotions, and affections are but various ways in which our doings are tied up with the doings of things and persons about us. Instead of marking a purely personal or subjective realm, separated from the objective and impersonal, they indicate the non-existence of such a separate world. They afford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changes in things are not alien to the activities of a self, and that the career and welfare of the self are bound up with the movement of persons and things. Interest, concern, mean that self and world are engaged with each other in a developing situation.

只有在个人态度最终独自统领一切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对两者做出划分。但是个人态度总是对身在其中的情景变化做出的反应，这种态度乃是情境的一部分，能否成功表达取决于它们与其他变化的交互作用。生命活动只有在与环境变化有关联时才会出现兴衰成败。生命活动确实与这些变化有紧密的联系。我们的欲望，感情，关爱只不过是我们的行为和我们周围的事和人的行为紧密联系的各种不同的方式。生命活动表明，并不存在与非个人的客观领域分离的纯个人的主观领域，如此分崩离析的世界并不存在。它们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事物的变化并非与自我的活动无关，证明自我的幸福和前途与周围人和事物的变化息息相关。兴趣和关心意味着自我和世界在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交融。

The word interest, in its ordinary usage, expresses (i) the whole

state of active development, (ii) the objective results that are foreseen and wanted, and (iii) the personal emotional inclination.

从一般意义上讲，“兴趣”一词表达了三种涵义：（1）积极发展的整体状况（2）所预见到的和希望得到的客观结果（3）个人的情绪倾向。

(i) An occupation, employment, pursuit, business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an interest. Thus we say that a man's interest is politics, or journalism, or philanthropy, or archaeology, or collecting Japanese prints, or banking.

（1）一种工作、职业、追求或者事业常总是被人等同为兴趣。所以，我们会说某人的兴趣是政治学、新闻学、慈善业、考古学、搜集日本印刷品或者银行方面的研究。

(ii) By an interest we also mean the point at which an object touches or engages a man; the point where it influences him. In some legal transactions a man has to prove “interest” in order to have a standing at court. He has to show that some proposed step concerns his affairs. A silent partner has an interest in a business, although he takes no active part in its conduct because its prosperity or decline affects his profits and liabilities.

（2）我们也可以把兴趣称为事物感动或吸引人之处，或事物影响人之处；是事物与某人的一种关系或者事物对人的影响。在法律事务中，某人要想在法庭上站得住脚，就必须证明他有“兴趣”。他必须

表明所建议的步骤与自己的事务有关。匿名股东虽然并不积极参与具体业务，但仍对企业感兴趣，因为企业的兴衰存亡事关他的收益和债务。

(iii) When we speak of a man as interested in this or that the emphasis falls directly upon his personal attitude. To be interested is to be absorbed in, wrapped up in, carried away by, some object. To take an interest is to be on the alert, to care about, to be attentive. We say of an interested person both that he has lost himself in some affair and that he has found himself in it. Both terms express the engrossment of the self in an object.

（3）当我们论及某人对这件事或那件事感兴趣时，我们会把重点直接放在他的个人态度上。对某物感兴趣是指专注或醉心于此，抑或被迷住了。而对某物产生兴趣则指全神贯注，关心和注意其发展。我们说一个人对某事感兴趣有两种说法，或者说他被某物迷住了，或者说他从中找到了自我。这两种说法都表示自我对某物的全神贯注。

When the place of interest in education is spoken of in a depreciatory way, it will be found that the second of the meanings mentioned is first exaggerated and then isolated. Interest is taken to mean merely the effect of an object upon personal advantage or disadvantage, success or failure. Separated from any objective development of affairs, these are reduced to mere personal states of pleasure or pain. Educationally, it then follows that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interest means to attach some feature of seductiveness to material otherwise indifferent; to secure attention and effort by offering a bribe of pleasure. This procedure is properly stigmatized as “soft” pedagogy; as a “soup-kitchen” theory of

education.

关于兴趣在教育上的地位，当人以一种蔑视的态度谈论兴趣时，人们会发现兴趣的第二个意义先是被夸大然后是被孤立了。兴趣仅仅是用来指代某物对个人利弊、成败的影响。当与事情的客观发展隔离开时，兴趣就仅仅成为个人的快乐或痛苦的状态。从教育方面来讲，注重兴趣意味着对以前遭冷落的教学题材增添一些诱人之处，也意味着可以通过提供诱人的快乐，让儿童集中精神和精力。这种方法被恰当地批评为“温情”教育法和“施粥所”教育理论。

But the objection is based upon the fact—or assumption—that the forms of skill to be acquired and the subject matter to be appropriated have no interest on their own account: in other words,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irrelevant to the normal activities of the pupils. The remedy is not in finding fault with the doctrine of interest, any more than it is to search for some pleasant bait that may be hitched to the alien material. It is to discover objects and modes of action, which are connected with present powers. The function of this material in engaging activity and carrying it on consistently and continuously is its interest. If the material operates in this way, there is no call either to hunt for devices which will make it interesting or to appeal to arbitrary, semi-coerced effort.

然而，反对此方法的都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或假设：即儿童对所获得的技能和所用教学题材本身并无兴趣。换言之，它们对儿童的正常行为并无关系。补救方法不是去寻找“兴趣”理论的错误所在，也不是寻找某种诱饵放入陌生的教学题材里，而是在于发现与儿童现阶段能力有关联的事物和行为方式。教学题材使儿童乐于表现，并始终如一、持续坚持下去，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有趣。如果我们的教学题

材有这种作用，就不需寻找使其有趣的方法，也不需诉诸武断的、半强制性的手段。

The word interest suggests, etymologically, what is between,—that which connects two things otherwise distant. In education, the distance covered may be looked at as temporal. The fact that a process takes time to mature is so obvious a fact that we rarely make it explicit. We overlook the fact that in growth there is ground to be covered between an initial stage of process and the completing period;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intervening. In learning, the present powers of the pupil are the initial stage; the aim of the teacher represents the remote limit. Between the two lie means—that is middle conditions:—acts to be performed; difficulties to be overcome; appliances to be used. Only through them, in the literal time sense, will the initial activities reach a satisfactory consummation.

“兴趣”这个词从词源上含有居间的意思，即把两个相距遥远的事物拉近的意思。在教育上，这个距离可以视为时间上的。一个过程的成熟需要时间，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因如此，我们很少把话挑明。我们忽略了在成长过程中，一个过程的起始阶段和完成阶段之间，既有一帆风顺，也有很多曲折。我们忽略了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现有能力是初始阶段；教师的目标代表遥远的终点。在这两者之间是手段即中间条件——要采取的行为、要克服的困难以及要使用的工具。只有通过这种种中间条件，最初的行为才能取得完满的结果。

These intermediate conditions are of interest precisely because the development of existing activities into the foreseen and desired end depends upon them. To be means for the achieving of present

tendencies, to be 'between' the agent and his end, to be of interest, are different names for the same thing. When material has to be made interesting, it signifies that as presented, it lacks connection with purposes and present power: or that if the connection be there, it is not perceived. To make it interesting by leading one to realize the connection that exists is simply good sense; to make it interesting by extraneous and artificial inducements deserves all the bad names which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doctrine of interest in education.

这些中间条件之所以饶有趣味，是因为现有行为要发展成为所预见的结果和期待的目标，全靠它们的存在。称这种中间条件是达到目前趋势的手段，或者称它们是参与者和他的目标之间的“中介”，或者说它们饶有趣味，说法虽然不同，其实都是指同一件事。如果一定要让教学题材引起人的兴趣，那意味着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教学题材与目标和儿童现有能力之间缺乏关联，或者即使有关联，我们也没有觉察到。因此，通过引导学生意识到存在着的联系，从而使教学题材更有趣，这种做法只说明我们有良好的意识。但若通过外界的人为的诱使教学题材变得有趣，那我们则会承担所有被用在教育兴趣原理的坏名声。

So much for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interest. Now for that of discipline. Where an activity takes time, where many means and obstacles lie between its initiation and completion, deliberation and persistence are required. It is obvious that a very large part of the everyday meaning of will is precisely the deliberate or conscious disposition to persist and endure in a planned course of action in spite of difficulties and contrary solicitations. A man of strong will, in the popular usage of the words, is a man who is neither fickle nor half-hearted in achieving chosen ends. His ability is executive; that

is, he persistently and energetically strives to execute or carry out his aims. A weak will is unstable as water.

以上所述都有关“兴趣”的意义。现在我们要阐述“训练”的意义。当某一行为相当耗时，且在完成这项行为的过程中需要众多的手段并且面临诸多困难，我们需要发扬从容镇定，坚持到底的精神。很显然，所谓的意志，意味着要我们深思熟虑或神志清醒，在有计划的活动过程中，尽管面临着很多困难或各种引诱，我们都应当学会坚持和忍耐。通俗地讲，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在努力实现既定目标时，既不会变幻无常，也不会三心二意。他有执行能力，也就是说，他坚持不懈，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意志薄弱者则像水一样变化无常。

Clearly there are two factors in will. One has to do with the foresight of results, the other with the depth of hold the foreseen outcome has upon the person.

显然，意志含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对结果的预见性，另外一个是所预见的结果对人的影响程度。

(i)Obstinacy is persistence but it is not strength of volition. Obstinacy may be mere animal inertia and insensitiveness. A man keeps on doing a thing just because he has got started, not because of any clearly thought-out purpose. In fact, the obstinate man generally declines (although he may not be quite aware of his refusal) to make clear to himself what his proposed end is; he has a feeling that if he allowed himself to get a clear and full idea of it, it might not be worthwhile. Stubbornness shows itself even more in reluctance to criticize ends which present themselves than it does in

persistence and energy in use of means to achieve the end. The really executive man is a man who ponders his ends, who makes his ideas of the results of his actions as clear and full as possible. The people we called weak-willed or self-indulgent always deceive themselves as to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s. They pick out some feature which is agreeable and neglect all attendant circumstances. When they begin to act, the disagreeable results they ignored begin to show themselves. They are discouraged, or complain of being thwarted in their good purpose by a hard fate, and shift to some other line of action. That the primary difference between strong and feeble volition is intellectual, consisting in the degree of persistent firmness and fullness with which consequences are thought out, cannot be over-emphasized.

1．固执只是一种坚持而非意志力。固执可能只是动物的惰性和钝性的表现。有人坚持做一件事情，只是因为他已经开始做了，而不是因为经过深思熟虑后想达到某种目标。实际上，一个固执的人通常不愿意弄清自己所要到达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虽然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为何不愿意）。他有一种感觉，如果让自己完全明确目标，那这个目标可能就不值得为之奋斗了。固执表现为坚持不懈，精神饱满地运用手段以达到目的，从不对所提出的目标进行批评。真正有执行能力的人会考虑他要达到的目标，会尽可能全面清楚地了解自己行为所带来的种种后果。而我们称之为意志薄弱或自我放纵的人往往对自己行为的结果采取自欺欺人的态度。这种人只往好的方面想，对可能出现的坏的结果视而不见。当他们开始行动时，他们曾经忽略掉的不良结果开始暴露出来。然后，他们就垂头丧气，抱怨命运不济，美好目标受到阻挠。然后，又转向干其他事情。意志坚定和薄弱的主要区别是智力上的区别，即对想出的结果抱有多少坚定的成分和多少全面的认识，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ii) There is, of course, such a thing as a speculative tracing out of results. Ends are then foreseen, but they do not lay deep hold of a person. They are something to look at and for curiosity to play with rather than something to achiev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over-intellectuality, bu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a one-sided intellectuality. A person “takes it out” as we say in conside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proposed lines of action. A certain flabbiness of fiber prevents the contemplated object from gripping him and engaging him in action. And most persons are naturally diverted from a proposed course of action by unusual, unforeseen obstacles, or by presentation of inducements to an action that is directly more agreeable.

2．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即靠臆想推测出种种结果。这样一来，虽然结果可以预测出来，但却未必能牢牢抓住人心。结果是用来供人观赏，满足人的好奇心的，而不是鼓励人要去达到的东西。世上没有“超智力”行为，但却有片面的智力行为。人在考虑所假定的行为的结果时，他的智力会“倾巢而出”。但他性格某种软弱性会阻止他朝预期的目标发展。大多数人会因遇到一些事先没有想到的困难或更能直接产生效果的行为的诱惑就偏离原来的目标。

A person who is trained to consider his actions, to undertake them deliberately, is in so far forth disciplined. Add to this ability a power to endure in an intelligently chosen course in face of distraction, confusion, and difficulty, and you have the essence of discipline. Discipline means power at command; mastery of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carrying through the action undertaken. To know what one is to do and to move to do it promptly and by use of the requisite means is to be disciplined, whether we are thinking of an army or a mind. Discipline is positive. To cow the spirit, to

subdue inclination, to compel obedience, to mortify the flesh, to make a subordinate perform an uncongenial task—these things are or are not disciplinary according as they do or do not te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 to recognize what one is about and to persistence in accomplishment.

如果某人经过训练，在考虑行动和实施行动时都能深思熟虑，此人就是一个自律的人。除此之外，如果在面对挫折，困惑和困难时，仍能泰然处之，此人就是训练有素的人。训练意味着掌握支配权，能充分支配现有资源去完成任务。训练有素意味着明白自己要做什么，而且能迅速地运用必需的手段去完成之，军队训练是如此，心智训练也是如此。纪律是一件积极的事情。恐吓人的心灵，压制人的兴趣，逼迫他人服从，压抑人的情欲，迫使下属做不合心意的工作——所有这些是否具有惩戒作用就要看它们能否使人认识到自己在干什么，能否坚持到底，完成任务。

It is hardly necessary to press the point that interest and discipline are connected, not opposed.

兴趣和训练相互关联，而非彼此对立，这一点没有必要再强调了。

(i) Even the more purely intellectual phase of trained power—apprehension of what one is doing as exhibited in consequences—is not possible without interest. Deliberation will be perfunctory and superficial where there is no interest. Parents and teachers often complain—and correctly—that children “do not want to hear, or want to understand. " Their minds are not upon the subject

precisely because it does not touch them; it does not enter into their concerns. This is a state of things that needs to be remedied, but the remedy is not in the use of methods which increase indifference and aversion. Even punishing a child for inattention is one way of trying to make him realize that the matter is not a thing of complete unconcern; it is one way of arousing “interest,” or bringing about a sense of connection. In the long run, its value is measured by whether it supplies a mere physical excitation to act in the way desired by the adult or whether it leads the child “to think”—that is, to reflect upon his acts and impregnate them with aims, (ii) That interest is requisite for executive persistence is even more obvious. Employers do not advertise for workmen who are not interested in what they are doing. If one were engaging a lawyer or a doctor, it would never occur to one to reason that the person engaged would stick to his work more conscientiously if it was so uncongenial to him that he did it merely from a sense of obligation. Interest measures—or rather is—the depth of the grip which the foreseen end has upon one in moving one to act for its realization.

（1）即使要获得更为纯粹的智力能力，如对于所做之事结果的理解能力，也必须有兴趣才行。如没有兴趣，对问题的思考就会草率而肤浅。父母和老师经常抱怨（这种抱怨是对的）孩子“不愿意听也不愿意去了解”。孩子之所以心不在焉，这是因为该话题没有触动他们，不是他们所关注的对象。这种情况是需要补救的，但补救的方法要适当，不应加剧他们的漠然和厌恶。甚至惩罚孩子的不用心也是一种方法，这能使让他意识到这件事并非与他完全无关；这是一种唤起孩子“兴趣”，或唤起他对某件事情关注的方法。从长远来看，这种方法能否奏效要看它是否仅仅是身体上的一种刺激，即按照成年人所期望的方法行事，还是能引导孩子自己去“思考”自己的行为，使其具有目标。（2）显而易见，要想能持之以恒做事，兴趣必不可少。雇主不会雇佣对自己工作没有兴趣的人。如果一位律师或医师在受聘时所

做的事情与自己志趣不合，而是仅仅出于责任感来做此事，很难想象他能认真把事情做好。兴趣能够测量出我们为所预见的目标的实现会付出多大的努力。

2．The Importance of the Idea of Interest in Education.

二、兴趣对于教育的重要性

Interest represents the moving force of objects—whether perceived or presented in imagination—in any experience having a purpose. In the concrete, the value of recognizing the dynamic place of interest in an educative development is that it leads to considering individual children in their specific capabilities, needs, and preferences. One who recogniz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est will not assume that all minds work in the same way because they happen to have the same teacher and textbook. Attitudes and methods of approach and response vary with the specific appeal the same material makes, this appeal itself varying with difference of natural aptitude, of past experience, of plan of life, and so on.

兴趣是任何有目标的经验中事物发展的动力，不管这些事物是能看得见的，还是仅仅是想象出来的。具体而言，承认兴趣在教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能引导我们去考虑每个儿童的特殊能力，需要和爱好。认同兴趣重要性的人不会认为，儿童因为拥有同样的老师，同样的教学题材会有同样思维习惯。相同的教学题材对学生的影响或感染会不同，而在不同影响之下的学生会对教学题材采取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反应。学生所受的影响也因他们的秉性、经历、生活计划等差异而各有不同。

But the facts of interest also supply considerations of general value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Rightly understood, they put us on our guard against certain conceptions of mind and of subject matter which have had great vogue in philosophic thought in the past, and which exercise a serious hampering influence upon the conduct of instruction and discipline. Too frequently mind is set over the world of things and facts to be known; it is regarded as something existing in isolation, with mental states and operations that exist independently. Knowledge is then regarded as an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purely mental existences to the things to be known, or else as a result of the impressions which this outside subject matter makes on mind, or as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Subject matter is then regarded as something complete in itself; it is just something to be learned or known, either by the voluntary application of mind to it or through the impressions it makes on mind.

但是有关兴趣的各种事例可以让我们宏观地去思考教育哲学的价值。如果能正确理解兴趣的精髓，我们就可以抵制有关心智和教学题材的某些观念，这些观念曾在过去的哲学思想中流行一时，也对教学和训练的进行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心智常常被置于有待认识的事物和事实之上，被认为是孤立存在的，其心理状态和行为也是孤立的。知识则被认为是纯思维活动从外部应用到有待认知的事物当中，或者被认为是外界的教学题材作用于心智所造成的种种印象，或者是这两者的结合。而教学题材则被视为自身完善的东西。有待人主动去学习或认识，或者通过作用于心智的种种印象去认知。

The facts of interest show that these conceptions are mythical. Mind appears in experience as ability to respond to present stimuli

on the basis of anticipation of future possible consequences, and with a view to controlling the kind of consequences that are to take place. The things, the subject matter known, consist of whatever is recognized as having a bearing upon the anticipated course of events, whether assisting or retarding it. These statements are too formal to be very intelligible. An illustration may clear up their significance. You are engaged in a certain occupation, say writing with a typewriter. If you are an expert, your formed habits take care of the physical movements and leave your thoughts free to consider your topic. Suppose, however, you are not skilled, or that, even if you are, the machine does not work well. You then have to use intelligence. You do not wish to strike the keys at random and let the consequences be what they may; you wish to record certain words in a given order so as to make sense. You attend to the keys, to what you have written, to your movements, to the ribbon or the mechanism of the machine. Your attention is not distributed indifferently and miscellaneously to any and every detail. It is centered upon whatever has a bearing upon the effective pursuit of your occupation. Your look is ahead, and you are concerned to note the existing facts because and in so far as they are factors in the achievement of the result intended. You have to find out what your resources are, what conditions are at command, and what the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are. This foresight and this survey with reference to what is foreseen constitute mind. Action that does not involve such a forecast of results and such an examination of means and hindrances is either a matter of habit or else it is blind. In neither case is it intelligent. To be vague and uncertain as to what is intended and careless in observation of conditions of its realization is to be, in that degree, stupid or partially intelligent.

关于兴趣的种种事例表明，这些观念都是无稽之谈。心智存在于

经验当中，使一种能够根据所预测结果做出反应的能力，其目的在于控制某种结果的发生。不管起到的是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我们熟知的教学题材都与预期事件发展进程有关。以上的陈述太过抽象，不易理解。举个例子可能会有助于你的理解：你在从事某项工作，比如用打字机写作。如果你是打字能手，你养成的习惯会使你适应周围环境，会使你徜徉在思索的海洋里。假如你打字不熟练，或者即使你打字熟练，但打字机运转不灵。那你就不得不借用你的聪明才智。因为你不愿在键盘上不管不顾地随意敲打，你想把词组成一定的顺序，使其显得有意义。于是，你注意着键盘，注意你所打的内容，注意你手指的运动和打字机上的色带和装置。你的注意力并不是随意或杂乱地分配到某个细节上，而是集中在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的事情上。你目光向前，同时也在关注当前的动态，因为这些都是你取得成功的必要因素。你必须发现自己能力有多大，有哪些可支配的资源，面临何困难和阻碍。这种预见和对所预见的事情做出的全面调查就构成了心智。做事不考虑结果，不考虑方法和将面临的阻碍，这要么是习惯有问题，要么是盲目冲动。不管是何种情况，都是不明智之举。如果对于想做的事情犹豫不定，或对事情发展的条件观察漫不经心，那么这种人不是愚蠢就是智力欠缺。

If we recur to the case where mind is not concerned with the physical manipulation of the instruments but with what one intends to write, the case is the same. There is an activity in process; one is taken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 theme. Unless one writes as a phonograph talks, this means intelligence; namely, alertness in foreseeing the various conclusions to which present data and considerations are tending, together with continually renewed observation and recollection to get hold of the subject matter which bears upon the conclusions to be reached. The whole attitude is one of concern with what is to be, and with what is so far as the latter enters into the movement towards the end. Leave out the direction which depends upon foresight of possible future results, and there is

no intelligence in present behavior. Let there be imaginative forecast but no attention to the conditions upon which its attainment depends, and there is self-deception or idle dreaming—abortive intelligence. If this illustration is typical, mind is not a name for something complete by itself; it is a name for a course of action in so far as that is intelligently directed; in so far, that is to say, as aims, ends, enter into it, with selection of means to further the attainment of aims. Intelligence is not a peculiar possession which a person owns; but a person is intelligent in so far as the activities in which he plays a part have the qualities mentioned. Nor are the activities in which a person engages, whether intelligently or not, exclusive properties of himself; they are something in which he engages and partakes. Other things, the independent changes of other things and persons, cooperate and hinder. The individual's act may be initial in a course of events, but the outcome depends upon the interaction of his response with energies supplied by other agencies. Conceive mind as anything but one factor partaking along with others in the production of consequences, and it becomes meaningless.

我们再回到前面所举的例子，如果有人不关注打字机的操作，只关注他所敲打的内容，情况也会一样。当他在打字时，他得思考如何阐发主题。除非他像留声机一样说话，否则他就得靠聪明才智。也就是说，他一面打字，一面得留心预测目前的资料和思考带来的种种结果，同时还要不断通过观察和回忆来掌握能对结论有影响的主题。他的这种态度说明他在关注着将发生的事情以及是否有利于达到目的。如果不能掌握预测未来的方向，他目前的行为就毫无智力可言。对未来只有想象的预测，而不注意预测所依靠的条件，这就是自欺欺人或是痴心妄想，是发育不全智力的表现。如果这个例子具有典型意义，心智并非指让事物自己去完成，而是要靠智力指导的行为过程。这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要有目的，有结局，并且要选择必要的手段争取

达到这些目的。智力并不是个人特有的财产。如有人参与具备以上所说特征的活动，这个人就是明智的。一个人所参与的各种活动，无论他是否运用智力去参与，也不是他自己的专有财产。这些活动只不过是他加入或参与其中而已。其他事情或人的单独变化或者促进他的参与，或者阻碍他的参与。个人的行动可能是一系列事件的开始，其结果要取决于他的反应与其他事物所代表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不把心智视为影响结果产生的因素，心智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The problem of instruction is thus that of finding material which will engage a person in specific activities having an aim or purpose of moment or interest to him, and dealing with things not as gymnastic appliances but as conditions for the attainment of ends. The remedy for the evils attending the doctrine of formal discipline previously spoken of, is not to be found by substituting a doctrine of specialized disciplines, but by reforming the notion of mind and its training. Discovery of typical modes of activity, whether play or useful occupations, in which individuals are concerned, in whose outcome they recognize they have something at stake, and which cannot be carried through without reflection and use of judgment to select material of observation and recollection, is the remedy. In short, the root of the error long prevalent in the conception of training of mind consists in leaving out of account movements of things to future results in which an individual shares, and in the direction of which observation, imagination, and memory are enlisted. It consists in regarding mind as complete in itself, ready to be directly applied to a present material.

因此，教学的问题就是寻找合适的教学题材，使学生能够参与到一些有目的，有目标和有趣味的具体活动中去，而且这些活动不是机

械式的训练，而是被当作达到目的的条件。我们前面谈到形式训练的缺陷。要补救这些缺陷不在于用特殊训练来替代，而在于改革心智和心智训练的观念。补救的方法是发现一些典型的活动，比如，每个人都会参与游戏或有益的消遣。这样，他们就会意识到活动的结果与自己息息相关，必须经过思考、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去选择观察和回忆的教学题材才能完成任务。简言之，心智训练的错误观念之所以长期存在，其根源在于不考虑事物在未来的发展变化，也不考虑观察、想象和记忆在事物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把心智视为自身完善的东西，随时可以直接用于现存教学题材之中。

In historic practice the error has cut two ways. On one hand, it has screened and protected traditional studies and methods of teaching from intelligent criticism and needed revisions. To say that they are “disciplinary” has safeguarded them from all inquiry. It has not been enough to show that they were of no use in life or that they did not really contribut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elf. That they were 'disciplinary' stifled every question, subdued every doubt, and removed the subject from the realm of rational discussion. By its nature, the allegation could not be checked up. Even when discipline did not accrue as matter of fact, when the pupil even grew in laxity of application and lost power of intelligent self-direction, the fault lay with him, not with the study or the methods of teaching. His failure was but proof that he needed more discipline, and thus afforded a reason for retaining the old methods. The responsibility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educator to the pupil because the material did not have to meet specific tests; it did not have to be shown that it fulfilled any particular need or served any specific end. It was designed to discipline in general, and if it failed, it was because the individual was unwilling to be disciplined. In the other direction, the tendency was towards a negative conception of discipline, instead of an identification of it withgrowth in

constructive power of achievement.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will means an attitude towards the future, towards the production of possible consequences, an attitude involving effort to foresee clearly and comprehensively the probable results of ways of acting, and an active identification with some 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Identification of will, or effort, with mere strain, results when a mind is set up, endowed with powers that are only to be applied to existing material. A person just either will or will not apply himself to the matter in hand. The more indifferent the subject matter, the less concern it has for the habits and preferences of the individual, the more demand there is for an effort to bring the mind to bear upon it—and hence the more discipline of will. To attend to material because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done in which the person is concerned is not disciplinary in this view; not even if it results in a desirable increase of constructive power. Application just for the sake of application, for the sake of training, is alone disciplinary. This is more likely to occur if the subject matter presented is uncongenial, for then there is no motive (so it is supposed) except the acknowledgment of duty or the value of discipline. The logical result is expressed with literal truth in the words of an American humorist: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at you teach a boy so long as he doesn't like it. "

这个错误在历史实践中有两个弊端。一方面，它包庇传统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抵制有见解的批评和必要的修正。所声称的传统课程和教学方法具有“训练”作用，其实是在包庇它们，使之免受质疑。仅仅说明这种课程和教学方法在生活中无用，或者对提高自我修养无用并不足以推翻这个错误的观念。只要说它们具有“训练”作用，就能扼杀任何质疑，遏制任何怀疑，排除对问题进行任何合理讨论的可能性。就其性质而言，这种说法是无从考证的。即使训练实际上并无效果，即使学生在实践中漫不经心，失去自我定向明智的判断力，其错误也

许在于学生，而不在于课程和教学方法。学生的失败只证明他需要更多的训练，从而也继续为以前的教学方法找到了借口。这件事的责任从老师转向了学生，因为教学题材无需特别检验，也无需满足特别的需要，无需达到特定的目标。这种教学题材就是为一般的训练而设计的，即使没有效果，也只是学生不愿接受训练的结果。另一方面，就是倾向于把训练视为消极因素，否认它能增加学生的创造力。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意志就是一种对待未来、对待产生可能结果的态度。这种态度包含着要付出努力，全面清晰预见各种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可能后果，并主动认识某些预期的结果。如果我们的智力被赋予某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只应用于现存教学题材中，那所谓的意志和努力就只是一种负担。学生对于手头的教学题材只有愿意学或不愿意学两种情况。教学题材越是无关紧要，就越与学生的习惯和爱好不相干，也就越要求学生努力学习教学题材，因而也更能锻炼意志。照此说法，学生因为教学题材与自己有关才去关注教学题材，这不算是训练的作用，即使学生的创造力得到了满意提高，也不算是训练的作用。只有为应用而应用，为训练而训练，这才具有训练作用。如果所使用的教学题材与学生志趣不投，这种情况更可能发生。因为，这个时候除了承认教育的义务和训练的价值之外，根本没有动机可言。这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就像一位美国幽默家所说："只要孩子不喜欢你教的东西，无论你教什么，都不会产生效果。"

The counterpart of the isolation of mind from activities dealing with objects to accomplish ends is isolat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to be learned. In the traditional schemes of education, subject matter means so much material to be studied. Various branches of study represent so many independent branches, each having its principles of arrangement complete within itself. History is one such group of facts; algebra another; geography another, and so on till we have run through the entire curriculum. Having a ready-made existence on their own account, their relation to mind is exhausted in what they furnish it to acquire. This idea corresponds to the conventional

practice in which the program of school work, for the day, month, and successive years, consists of “studies” all marked off from one another, and each supposed to be complete by itself—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at least.

与把心智与达到目标而应付事物的行为孤立对待相对应的，也就要把所要学习的教学题材孤立对待。在传统的教育规划中，所谓教学题材就是要学习的材料。各门学科代表许多独立的门类，每一门类有它自己完全独立的编排原则。历史有这样的编排原则，代数有那样的编排原则，地理又有另外的编排原则，所有的课程都是以这样一种组织方式形成的。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它们除了给心智提供材料之外，再无其他联系。这种观念与传统教学实践相吻合。按照这种教学理念，每天，每月乃至以后的几年教学课程都是由相互孤立的科目组成的。至少从教育目标看，每一门科目都应该是自我完善的。

Later on a chapter is devoted to the special conside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instruction. At this point, we need only to say that, in contrast with the traditional theory, anything which intelligence studies represents things in the part which they play in the carrying forward of active lines of interest. Just as one “studies” his typewriter as part of the operation of putting it to use to effect results, so with any fact or truth. It becomes an object of study—that is, of inquiry and reflection—when it figures as a factor to be reckoned with in the completion of a course of events in which one is engaged and by whose outcome one is affected. Numbers are not objects of study just because they are numbers already constituting a branch of learning called mathematics, but because they represent qualities and relations of the world in which our action goes on, because they are factors upon which the accomplishment of our purposes depends. Stated thus broadly, the

formula may appear abstract. Translated into details, it means that the act of learning or studying is artificial and ineffective in the degree in which pupils are merely presented with a lesson to be learned. Study is effectual in the degree in which the pupil realizes the place of the numerical truth he is dealing with in carrying to fruition activities in which he is concerned. This connection of an object and a topic with the promotion of an activity having a purpose is the first and the last word of a genuine theory of interest in education.

随后有一章会专门讲述教学题材的指导意义。现在，我们只需指出，与传统理论不同的是，学生带着兴趣积极主动学习的知识正是他们运用智慧学习的知识。有人因为要使打字机助他达到最佳效果而“研究”它，对于任何事实或真理的学习都是如此。如果某件事情关系到一个人所参与活动的完成和效果，那这件事情就会成为研究的对象，也就是探究和思索的对象。数字之所以成为研究对象，不仅是因为它们构成了学科的一个分支，即数学，还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特性和相互联系，成为完成我们目标所要依靠的重要因素。这样泛泛而谈，也许会很抽象。具体而言，如果老师仅仅针对某一课而教学生，这种学习方式是做作的并且也没有效果。如果学生能意识到他所学的数学知识在他参与活动中的地位，他的学习就是有效的。把学习对象和课题与促进包含目的的活动相联系，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兴趣理论最重要的理念。

3．Some Social Aspects of the Question.

三、教育问题的某些社会因素

While the theoretical errors of which we have been speaking have their expressions in the conduct of schools, they are themselves the outcome of conditions of social life. A change confined to the theoretical conviction of educators will not remove the difficulties, though it should render more effective efforts to modify social conditions. Men's fundamental attitudes toward the world are fixed by the scope and qualities of the activities in which they partake. The ideal of interest is exemplified in the artistic attitude. Art is neither merely internal nor merely external; merely mental nor merely physical. Like every mode of action, it brings about changes in the world. The changes made by some actions (those which by contrast may be called mechanical) are external; they are just shifting things about. No ideal reward, no enrichment of emotion and intellect, accompanies them. Others contribute to the maintenance of life, and to its external adornment and display. Many of our existing social activities, industrial and political, fall in these two classes. Neither the people who engage in them, nor those who are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m, are capable of full and free interest in their work.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ny purpose in the work for the one doing it, or because of the restricted character of its aim, intelligence is not adequately engaged. The same conditions force many people back upon themselves. They take refuge in an inner play of sentiment and fancies. They are aesthetic but not artistic, since their feelings and ideas are turned upon themselves, instead of being methods in acts which modify conditions. Their mental life is sentimental; an enjoyment of an inner landscape. Even the pursuit of science may become an asylum of refuge from the hard conditions of life—not a temporary retreat for the sake of recuperation and clarification in future dealings with the world. The very word art may become associated not with specific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making them more significant for mind, but with stimulations of eccentric fancy and with emotional

indulgences. The separation and mutual contempt of the “practical” man and the man of theory or culture, the divorce of fine and industrial arts, are indications of this situation. Thus interest and mind are either narrowed, or else made perverse. Compare what was said in an earlier chapter about the one-sided meanings which have come to attach to the ideas of efficiency and of culture.

我们在前面讲到的理论错误虽然表现在学校的管理方面，但其本身也是社会生活条件的产物。教育者改变自己的理论观念，虽然不会消除困难，但这种改变对于改善社会条件会起有效作用。人们对于世界的基本态度是由他们参与活动的范围和性质决定的。可以用艺术的态度来解释兴趣观念。艺术既不仅仅属于内部，也不仅仅属于外部，不仅仅是精神的，也不仅仅是物质的。与所有的活动形式一样，艺术也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有些活动所造成的变化（也可称为机械运动）是外在的，只是引起了物体的位移而已。这些变化不会带来理想的报偿，也不会增进人的情感和智力。还有一些变化会有助于维持生计，有助于生活的外部装饰和外部展现。我们现有的很多社会活动，无论是工业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都属于这两类。无论是参与这些活动的人，还是受这些活动影响的人，都对自己的工作缺乏充足自由的兴趣。由于所做工作缺乏目标，或目标存在局限，这导致智力不能充分发挥。相同的情况迫使许多人不得不依靠自己。他们通过内心的情感和幻想来获得安慰。他们的态度给人一种美感，但并不是艺术的美感，因为他们只是寻求自己感情和思想上的安慰，而不是寻求改变周围环境的方法。他们的精神生活感情用事，只是在欣赏内心的美景。甚至科学研究也有可能变成逃避艰苦生活条件的庇护所，而不是为了休养生息，为应付将来世界而做出的暂时退步。艺术这个名词可能跟事物的特殊改造没有关系，不会增加事物对心智的重要性，而是跟古怪的幻想以及感情纵容有关。“实际的”人和爱好理论修养的人彼此分离，并且相互轻视。美术和工艺艺术也是互不相关的。这些都说明了上面所讲的情况。因此，兴趣和心智不是变得狭窄，就是违反常情。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考前一章对于效率和修养的片面含义的论述。

This state of affairs must exist so far as society is organized on a basis of division between laboring classes and leisure classes. The intelligence of those who do things becomes hard in the unremitting struggle with things; that of those freed from the discipline of occupation becomes luxurious and effeminate. Moreover, the majority of human beings still lack economic freedom. Their pursuits are fixed by accident and necessity of circumstance; they are not the normal expression of their own powers interacting with the needs and resources of the environment. Our economic conditions still relegate many men to a servile status. As a consequence, the intelligence of those in control of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is not liberal. Instead of playing freely upon the subjugation of the world for human ends, it is devoted to the manipulation of other men for ends that are non-human in so far as they are exclusive. This state of affairs explains many things in our historic educational traditions. It throws light upon the clash of aims manifested in different portions of the school system; the narrowly utilitarian character of most elementary education, and the narrowly disciplinary or cultural character of most higher education. It accounts for the tendency to isolate intellectual matters till knowledge is scholastic,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ly technical, and for the widespread conviction that liberal education is oppose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n education which shall count in the vocations of life.

只要社会是按照劳动阶级和有闲阶级来划分，那么这种状态就会依然存在。做事情的人，其智力会在与事物的不断斗争中，变得越来越高；而那些没有经过职业训练的人，其智力会变得越来越跑偏和低下。现在，大多数人仍然缺乏经济自由。他们的职业是由偶然事件或者环境的需要而决定的。这种职业没有正确体现他们的能力与环境需

要和资源的相互关系。我们的经济状况仍然使很多人陷于被奴役的地位。结果是，掌权者的智慧并不是自由的。他们的智慧不能自由地用于征服世界，为人类造福，而是用于为了非人道的目的而控制别人。这种状态足以解释历史上传统教育中的很多事情。它使我们了解了学校制度中不同部分所表现出的目标的冲突，使我们了解了大部分初等教育的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性质，也使我们了解了大部分高等教育的狭隘训练和修养的性质。它解释了为什么与智力有关的东西不断受到孤立，知识变成了学院式的，学术性的和专业技术性的，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坚信自由教育与现实职业所要求的教育是相互对立的。

But it also helps define the peculiar problem of present education. The school cannot immediately escape from the ideals set by prior social conditions. But it should contribute through the type of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disposition which it forms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ose conditions. And just here the true conceptions of interest and discipline are full of significance. Persons whose interests have been enlarged and intelligence trained by dealing with things and facts in active occupations having a purpose (whether in play or work) will be those most likely to escape the alternatives of an academic and aloof knowledge and a hard, narrow, and merely “practical” practice. To organize education so that natural active tendencies shall be fully enlisted in doing something, while seeing to it that the doing requires observation, the acquisi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 use of a constructive imagination, is what most needs to be done to improve social conditions. To oscillate between drill exercises that strive to attain efficiency in outward doing without the use of intelligence, and an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that is supposed to be an ultimate end in itself, means that education accepts the present social conditions as final, and thereby takes upon itsel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perpetuating them. A re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so that learning takes plac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telligent carrying forward of purposeful activities is a slow work. It can only be accomplished piecemeal, a step at a time. But this is not a reason for nominally accepting on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accommodating ourselves in practice to another. It is a challenge to undertake the task of reorganization courageously and to keep at it persistently.

但这种状态也有助于解释目前教育的特殊问题。学校不能立刻脱离以前的社会条件所制定的理想。但学校应该从智力和情感方面来改变这种社会条件。只有这样，真正的兴趣和训练的概念会有意义。如果有人积极做一件目的明确的事情（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以应对各种场面，他的兴趣就会提高，智力也会得到训练。这种人最可能避免在学术性的和远离实际的知识与呆板、狭隘、仅仅是“务实”的训练之间做出选择。组织教学的目的就应当是使学生在做事情时充分调动他们天然的积极性，同时要保证他们做事情时要学会观察，学会获得信息，并且要充分运用建构的想象力，这才是改变社会环境最需要的教育。如果我们的教育在不运用智力、只求表面做事效率的机械练习的做法与积累知识、视知识本身为最终目标的做法之间犹豫不定，这就意味着教育接受目前的社会条件，将其视为最终结果，不可更改，并且会采取行动使之永存下去。为了使学生在进行有目的的活动中运用智力去学习，需要对教育进行改造。而这样的改造需要很长的时间，只能一步一个脚印，缓慢完成。但这并不是表面上接受一种教育理念，却在实践中迁就另一教学理念的借口。这是一种挑战，要勇敢地从事改造，而且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Summary.

总结

Interest and discipline are correlative aspects of activity having an aim. Interest means that one is identified with the objects which define the activity and which furnish the means and obstacles to its realization. Any activity with an aim impli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an earlier incomplete phase and later completing phase; it implies also intermediate steps. To have an interest is to take things as entering into such a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situation, instead of taking them in isolation. The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iven incomplete state of affairs and the desired fulfillment exacts effort in transformation; it demands continuity of attention and endurance. This attitude is what is practically meant by will. Discipline or development of power of continuous attention is its fruit.

兴趣和训练是在有目标的行为中息息相关的两个方面。兴趣就是一个人要清楚自己的目标，这目标限定了他的行为，并且在行为实施过程中提供手段和设置障碍。任何有目标的行为都会隐含未完成阶段和未来将完成阶段之间的区别，也隐含了许多中间的步骤。获得兴趣就是要把事物放在这种延续不断的环境中去，而不是把它们孤立开来。在未完成的事情和已经达到满意结果的事情之间，存在时间差，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改造，也要求我们持续的思考和忍耐。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意志。不断训练或发展持续思考能力就是“意志”的体现。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doctrine for the theory of education is twofold. On the one hand it protects us from the notion that mind and mental states are something complete in themselves, which then happen to be applied to some ready-made objects and topics so that knowledge results. It shows that mind and intelligent or purposeful engagement in a course of action into which things enter

are identical. Hence to develop and train mind is to provide an environment which induces such activity.

这个原理对教育理论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使我们避开一种观念：认为心智和心理状态靠自身完善，把它们用于现成的目标和教学题材当中，就能形成知识。该原理表明，心智与运用智慧或有目标地投入某项活动是相似的。因此，发展和训练心智就是要为这样的活动提供一种环境。

On the other side, it protects us from the notion that subject matter on its side is something isolated and independent. It shows that subject matter of learning is identical with all the objects, ideas, and principles which enter as resources or obstacles into the continuous intentional pursuit of a course of action. The developing course of action, whose end and conditions are perceived, is the unity which holds together what are often divided into an independent mind on one side and an independent world of objects and facts on the other.

另外一方面，该原理也使我们避免陷入另外一种观念，即认为教学题材是独立和孤立的。该原理表明，教学题材的学习与把各种目标、思想和规则作为一种资源或阻碍加入到连续的有目的的活动中去完全一致。有了这种目标和条件都被认识的不断发展的行动过程就能将常被分割成独立的心智和独立的物质世界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体。

Chapter 11 Experience and Thinking

第十一章　经验与思维

1．The Nature of Experience.

一、经验的本质

The nature of experience can be understood only by noting that it includes an active and a passive element peculiarly combined. On the active hand, experience is trying—a meaning which is made explicit in the connected term experiment. On the passive, it is undergoing. When we experience something we act upon it, we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n we suffer or undergo the consequences. We do something to the thing and then it does something to us in return: such is the peculiar combination. The connection of these two phases of experience measures the fruitfulness or value of the experience. Mere activity does not constitute experience. It is dispersive, centrifugal, dissipating. Experience as trying involves change, but change is meaningless transition unless it is consciously connected with the return wave of consequences which flow from it. When an activity is continued into the undergoing of consequences, when the change made by action is reflected back into a change made in us, the mere flux is loaded with significance. We learn something. It is not experience when a child merely sticks his finger into a flame; it is experience when the movement is connected with the pain which he undergoes in consequence. Henceforth the sticking of the finger into flame means a burn. Being

burned is a mere physical change, like the burning of a stick of wood, if it is not perceived as a consequence of some other action.

经验的本质可以理解为包含一个积极因素和一个消极因素的统一体，二者以特有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能理解经验的本质。在其积极方面，经验是一种尝试——可以用“实验”这一术语来清楚表达这个意义。在其消极方面，经验是一种承受。我们对事物有所作为，然后它反过来对我们有所影响，这就是一种特殊的结合。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可以衡量经验的成果或价值。单个的行为并不构成经验。它只是分散的、离散的、消耗性的行为。作为尝试的经验包含变化，但是，除非该变化有意识地与变化所产生的一系列结果联系起来，否则它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变化。当某项行为持续进行并产生结果时，当它所造成的变化反映在我们自身所发生的变化中时，这样的变化就具有了意义，我们就学到了一点东西。孩子仅仅把手指伸进火焰，这还不是经验；当这个行为与他遭受的疼痛联系起来时，这才构成经验。从此以后，他知道手指伸进火焰意味着灼伤。如果不能觉察到灼伤是另一行为的结果，它就仅仅是像一根木头燃烧一样的物理变化。

Blind and capricious impulses hurry us on heedlessly from one thing to another. So far as this happens, everything is writ in water. There is none of that cumulative growth which makes an experience in any vital sense of that term. On the other hand, many things happen to us in the way of pleasure and pain which we do not connect with any prior activity of our own. They are mere accidents so far as we are concerned. There is no before or after to such experience; no retrospect nor outlook, and consequently no meaning. We get nothing which may be carried over to foresee what is likely to happen next, and no gain in ability to adjust ourselves to what is coming—no added control. Only by courtesy

can such an experience be called experience. To “learn from experience” is to make a backward and forward connection between what we do to things and what we enjoy or suffer from things in consequence. Under such conditions, doing becomes a trying; an experiment with the world to find out what it is like; the undergoing becomes instruction—discovery of the connection of things.

盲目任性的冲动往往致使我们行事仓促轻率。这种情况出现时，所有事都仅仅是昙花一现，没有丝毫经验的积累成长可言，经验也就没有任何生命力。另一方面，我们碰到很多使人感到快乐和痛苦的事情，但是并没有与我们自己过去的行为联系起来。对我们来说，它们只是偶然性事件。这种经验没有前兆，没有后续；既无回顾，又无展望，因此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得不到任何能预测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的启示，也没有获得丝毫使我们能适应即将发生的事情的能力——没有增加一点掌控能力。之所以还称之为经验，只是出于礼貌。所谓“从经验中学习”，就是在我们对事物有所作为的过程和我们或享受快乐或承受痛苦的结果之间，建立起前后的联系。如此，行为就变成一种尝试，成为一次寻找世界真相的体验。而过程就变成教育，就变成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

Two conclusions important for education follow. (1) Experience is primarily an active-passive affair; it is not primarily cognitive. But (2) the measure of the value of an experience lies in the perception of relationships or continuities to which it leads up. It includes cognition in the degree in which it is cumulative or amounts to something, or has meaning. In schools, those under instruction are too customarily looked upon as acquiring knowledge as theoretical spectators, minds which appropriate knowledge by direct energy of intellect. The very word pupil has almost come to

mean one who is engaged not in having fruitful experiences but in absorbing knowledge directly. Something which is called mind or consciousness is severed from the physical organs of activity. The former is then thought to be purely intellectual and cognitive; the latter to be an irrelevant and intruding physical factor. The intimate union of activity and undergoing its consequences which leads to recognition of meaning is broken; instead we have two fragments: mere bodily action on one side, and meaning directly grasped by 'spiritual' activity on the other.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对教育至关重要的结论。（1）经验是一件主动而又被动的事情，与认知无关。（2）但是，衡量经验价值的标准在于能否认识经验所引起的种种关系或连续性。当经验演变成具备某些价值和意义的积累性经验时，此时的经验才含有认知作用。在学校里，学生往往被过度视为知识的理想受众，直接依靠智力获得知识。一直以来，“学生”一词几乎全是指直接吸收知识的人，而非致力于获取有效经验的人。所谓的心智或意识与实施行为的身体器官分离开来。前者被认为纯智力的和认知的因素；后者则被认为是一个不相关的、起干扰作用的物质因素。这样，行为与认识意义所经历的结果的紧密结合被打破了。我们得到两个断片：一方面是单纯的身体活动，另一方面是靠“精神”活动直接领会的意义。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state adequately the evil results which have flowed from this dualism of mind and body, much less to exaggerate them.

要详细说明这种身心二元论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不太可能，但要夸大其辞就更难。

Some of the more striking effects, may, however, be enumerated, (a) In part bodily activity becomes an intruder. Having nothing, so it is thought, to do with mental activity, it becomes a distraction, an evil to be contended with. For the pupil has a body, and brings it to school along with his mind. And the body is, of necessity, a wellspring of energy; it has to do something. But its activities, not being utilized in occupation with things which yield significant results, have to be frowned upon. They lead the pupil away from the lesson with which his 'mind' ought to be occupied; they are sources of mischief. The chief source of the 'problem of discipline' in schools is that the teacher has often to spend the larger part of the time in suppressing the bodily activities which take the mind away from its material. A premium is put on physical quietude; on silence, on rigid uniformity of posture and movement; upon a machine-like simulation of the attitudes of intelligent interest. The teachers' business is to hold the pupils up to these requirements and to punish the inevitable deviations which occur.

但是，可以列举若干比较突出的影响。（1）身体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种干扰。身体活动被认为和精神活动毫无关系，它会使人分心，应该与之斗争。学生把身体和心智一起带到学校。他的身体必然是其力量的源泉，必须有所作为。但是，学生的身体活动并没有用来做一番重大意义的正经事，所以往往让人不以为然。学生应该全心全意做功课，身体活动却引导学生远离功课，成为学生调皮淘气的根源。学校中“纪律问题”的主要源于教师必须常常花大量时间来抑制学生的身体活动，以防止学生把心思放在教学题材以外的事情上。学校很重视和鼓励安静的环境，鼓励坐姿手势整齐划一，鼓励通过奖惩分明的刺激来开发智力。教师的职责在于使学生遵守这些要求，如有违反就加以惩罚。

The nervous strain and fatigue which result with both teacher and pupil are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the abnormality of the situation in which bodily activity is divorced from the perception of meaning. Callous indifference and explosions from strain alternate. The neglected body, having no organized fruitful channels of activity, breaks forth, without knowing why or how, into meaningless boisterousness, or settles into equally meaningless fooling—both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normal play of children. Physically active children become restless and unruly; the more quiescent, so-called conscientious ones spend what energy they have in the negative task of keeping their instincts and active tendencies suppressed, instead of in a positive one of constructive planning and execution; they are thus educated not int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ignificant and graceful use of bodily powers, but into an enforced duty not to give them free play. It may be seriously asserted that a chief cause for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Greek education was that it was never misled by false notions into an attempted separation of mind and body.

对教师和学生造成神经紧张和疲劳，这是身体活动与意义理解分离的不正常情境的必然结果。由于神经紧张，学生时而冷漠无情，时而激动暴躁。由于缺乏有组织的、有成效的活动渠道，学生被长期忽视的身体会突然爆发出无意义的狂暴行为，或者做出同样无意义的蠢事，而不自知为何这样。此两种情况都与儿童的正常行为大相径庭。好动的孩子变得烦躁不安，不守规矩；而比较安静的，即所谓勤勉认真的孩子，则把精力用在消极压制他们的本能和与生俱来的习性上，而不是用于积极的有建设性的计划和行为。这样一来，教育不是培养学生得体地运用他们的身体力量，而是压制学生，阻止其自由发展。我们可以负责地说，希腊教育之所以取得卓越成就，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希腊教育从来没有被这种企图把身心分割开来的错误观念所误导。

(b) Even, however, with respect to the lessons which have to be learn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mind,' some bodily activities have to be used. The senses—especially the eye and ear—have to be employed to take in what the book, the map, the blackboard, and the teacher say. The lips and vocal organs, and the hands, have to be used to reproduce in speech and writing what has been stowed away. The senses are then regarded as a kind of mysterious conduit through which information is conducted from the external world into the mind; they are spoken of as gateways and avenues of knowledge. To keep the eyes on the book and the ears open to the teacher's words is a mysterious source of intellectual grace. Moreover, reading, writing, and figuring—important school arts—demand muscular or motor training. The muscles of eye, hand, and vocal organs accordingly have to be trained to act as pipes for carrying knowledge back out of the mind into external action. For it happens that using the muscles repeatedly in the same way fixes in them an automatic tendency to repeat.

（2）但是，即便对那些必须用心学习的功课，一定的身体活动也是必要的。像眼和耳等器官主要是用来领会书本上所写、地图上所画、黑板上所写和老师所说的内容的。嘴唇、发音器官和双手则是用来对所学内容口头复述和书面表述。于是有人把人的感官系统看作神秘通道。信息从外部世界通过该通道进入大脑，感官被称为知识的入口和通道。用眼睛注视书本，耳朵倾听老师讲课，这是智力发展的神秘源泉。此外，读、写、算等重要的学科要求必要肌肉或动作训练。因此，眼、手和发音器官的肌肉必须加以训练，以作为把知识从大脑带回到外部的渠道。因为，反复地以同样方式使用肌肉，会使肌肉产生自发重复的倾向。

The obvious result is a mechanical use of the bodily activities

which (in spite of the generally obtrusive and interfering character of the body in mental action) have to be employed more or less. For the senses and muscles are used not as organic participants in having an instructive experience, but as external inlets and outlets of mind. Before the child goes to school, he learns with his hand, eye, and ear, because they are organs of the process of doing something from which meaning results. The boy flying a kite has to keep his eye on the kite, and has to note the various pressures of the string on his hand. His senses are avenues of knowledge not because external facts are somehow 'conveyed' to the brain, but because they are used in doing something with a purpose. The qualities of seen and touched things have a bearing on what is done, and are alertly perceived; they have a meaning. But when pupils are expected to use their eyes to note the form of words, irrespective of their meaning,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em in spelling or reading, the resulting training is simply of isolated sense organs and muscles. It is such isolation of an act from a purpose which makes it mechanical. It is customary for teachers to urge children to read with expression, so as to bring out the meaning. But if they originally learned the sensory-motor technique of reading—the ability to identify forms and to reproduce the sounds they stand for—by methods which did not call for attention to meaning, a mechanical habit was established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read subsequently with intelligence. The vocal organs have been trained to go their own way automatically in isolation; and meaning cannot be tied on at will. Drawing, singing, and writing may be taught in the same mechanical way; for, we repeat, any way is mechanical which narrows down the bodily activity so that a separation of body from mind—that is, from recognition of meaning—is set up. Mathematics, even in its higher branches, when undue emphasis is put upon the technique of calculation, and science, when laboratory exercises are given for their own sake, suffer from the same evil.

虽然身体会对智力活动有阻挠和干预的作用，但是还得多少进行一些体育活动，运动的结果就是对身体的机械性训练。因为，感官和肌肉的运动不是作为有益经验的有机参与者，而是作为心灵外部的进口和出口。儿童上学之前用手、眼和耳来学习，因为他从行为中感知意义，而手、眼和耳是他行为过程中使用的器官。放风筝的男孩必须注视着风筝，还必须感受到风筝线对于手的不同压力以控制风筝。他的感官之所以是知识的渠道，并不是因为外界信息以某种方式“传达”到大脑，而是因为它们被有目的地用来做一些事情。他所见和所接触的事情的性质与所做的事情有关，这些性质很快被理解，也就有了意义。但是，如果要求学生用他们的双眼注意字形而不顾字义，做到能拼能读，这种训练其实是孤立的感觉器官和肌肉的训练。正是这种缺乏目的性的孤立动作使它成为机械的行为。教师习惯于要求学生有表情地朗读，以便显示读物的意义。但是，如果这些学生一开始就不注重字义，学会用感觉—反映阅读法阅读，并养成辨识字形，读出字音的能力，这就养成一种机械的阅读习惯，以后想要理解性阅读就困难了。他们的发音器官被训练为自动地孤立发音，意义不能被随意附加上去。画画、唱歌和写字也同样可以用机械的方法来教。我们再说一遍，任何把身体活动缩小到造成身心分离即身体与意义认知分离的方法都是机械的方法。数学教学如果过分强调计算技术，自然科学教学如果为实验而实验，都会出现这种弊病。

(c) On the intellectual side, the separation of 'mind' from direct occupation with things throws emphasis on things at the expense of relations or connections. It is altogether too common to separate perceptions and even ideas from judgments. The latter are thought to come after the former in order to compare them. It is alleged that the mind perceives things apart from relations; that it forms ideas of them in isolation from their connections—with what goes before and comes after. Then judgment or thought is called upon to combine the separated items of 'knowledge' so that their

resemblance or casual connection shall be brought out. As matter of fact, every perception and every idea is a sense of the bearings, use, and cause, of a thing. We do not really know a chair or have an idea of it by inventorying and enumerating its various isolated qualities, but only by bringing these qualities into connection with something else—the purpose which makes it a chair and not a table; or its difference from the kind of chair we are accustomed to, or the 'period' which it represents, and so on. A wagon is not perceived when all its parts are summed up; it is the characteristic connection of the parts which makes it a wagon. And these connections are not those of mere physical juxtaposition; they involve connection with the animals that draw it, the things that are carried on it, and so on. Judgment is employed in the perception; otherwise the perception is mere sensory excitation or else a recognition of the result of a prior judgment, as in the case of familiar objects.

（3）在智力方面，“心智”与直接从事活动的分离会导致强调事物而不顾事物间的关系或联系。人们把知觉甚至观念与判断分离，这很正常。他们认为，判断在知觉之后，以便对二者进行比较。他们坚称大脑理解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无关；脑中观念的形成与事物前后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分离的。于是，就要求判断或思维来把零碎的“知识”合并起来，揭示出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因果联系。事实上，任何知觉和观念都是对事物的关系、作用和起因的感知。详细盘点列举椅子各种孤立的特性，并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椅子或形成椅子的观念，只有通过把这些特性与某种别的东西联系起来，例如与目的联系起来，表明它是椅子而不是桌子，或者把它与我们常见椅子的区别联系起来，或者把它所代表的“时代”联系起来等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椅子。一辆运货马车并不以各个部件的简单相加；它之所以是马车，在于其各个部件的特有连接。这不仅体现在形体上的连接，还体现在与拉车动物的连接，与所装载的货物的连接，等等。要做出判断首先就要有感知，否则，感知不过是感观的兴奋，或者不过是对已有判断结

果的认识，例如见到熟悉的东西。

Words, the counters for ideas, are, however, easily taken for ideas. And in just the degree in which mental activity is separated from active concern with the world, from doing something and connecting the doing with what is undergone, words, symbols, come to take the place of ideas. The substitution is the more subtle because some meaning is recognized. But we are very easily trained to be content with a minimum of meaning, and to fail to note how restricted is our perception of the relations which confer significance. We get so thoroughly used to a kind of pseudo-idea, a half perception, that we are not aware how half-dead our mental action is, and how much keener and more extensive our observations and ideas would be if we formed them under conditions of a vital experience which required us to use judgment: to hunt for the connections of the thing dealt with. There is no difference of opinion as to the theory of the matter. All authorities agree that that discernment of relationships is the genuinely intellectual matter; hence, the educative matter. The failure arises in supposing that relationships can become perceptible without experience—without that conjoint trying and undergoing of which we have spoken. It is assumed that 'mind' can grasp them if it will only give attention, and that this attention may be given at will irrespective of the situation. Hence the deluge of half-observations, of verbal ideas, and unassimilated 'knowledge' which afflicts the world. An ounce of experience is better than a ton of theory simply because it is only in experience that any theory has vital and verifiable significance. An experience, a very humble experience, is capable of generating and carrying any amount of theory (or intellectual content), but a theory apart from an experience cannot be definitely grasped even as theory. It tends to become a mere

verbal formula, a set of catchwords used to render thinking, or genuine theorizing, unnecessary and impossible. Because of our education we use words, thinking they are ideas, to dispose of questions, the disposal being in reality simply such an obscuring of perception as prevents us from seeing any longer the difficulty.

词是观念的对应物，但很容易被当作观念。如果把心理活动与对外界主动的关注、与做事情和所经历之事相分离，词和符号就会代替观念。这种替代作用比较微妙，因为有些意义是得到认可的。但是，我们很容易满足于微小的意义，而未能注意我们所了解的具有意义的关系是多么有限。我们完全习惯于伪观念、半知觉，而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心理活动是多么缺乏生气。如果我们运用判断力发现事物联系，在基于充满活力经验的条件下进行观察和形成观念，那么我们的观察和观念将会更加敏锐，更加广泛。对于这个理论，各方意见并无分歧。所有权威人士都同意，识别事物的关系是真正有关智力的事情，因而也就是有教育意义的事情。他们的错误在于误以为无需经验，无需我们前面所说的尝试和所经历之事的结合，也能领会事物的关系；误以为只要“心灵”能集中注意力就能掌握事物的关系，但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的。于是，肤浅的观察、空洞的观念、食而不化、贻害世界的“知识”泛滥成灾。“一瓢”经验之所以胜过“一筐”理论，是因为任何理论只有在经验中才具有充满活力和可以被验证的意义。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经验也能产生和包含理论（或知识）内容，但是，离开经验的理论甚至不能肯定被理解为理论。这样的理论往往变成只是一种书面公式，一些流行话语，使我们的思考或真正的理论构建变得没有必要或不可能。由于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用文字来处理问题，以为文字就是观念。这种处理方法实际上只能使我们知觉模糊，无视困难所在。

2．Reflection in Experience.

二、经验中的反思

Thought or reflection,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virtually if not explicitly, is the discernmen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what we try to do and what happens in consequence. No experience having a meaning is possible without some element of thought. But we may contrast two types of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 of reflection found in them. All our experiences have a phase of 'cut and try' in them—what psychologists call the method of trial and error. We simply do something, and when it fails, we do something else, and keep on trying till we hit upon something which works, and then we adopt that method as a rule of thumb measure in subsequent procedure. Some experiences have very little else in them than this hit and miss or succeed process. We see that a certain way of acting and a certain consequence are connected, but we do not see how they are. We do not see the details of the connection; the links are missing. Our discernment is very gross. In other cases we push our observation farther. We analyze to see just what lies between so as to bind together cause and effect, activity and consequence. This extension of our insight makes foresight more accurate and comprehensive. The action which rests simply upon the trial and error method is at the mercy of circumstances; they may change so that the act performed does not operate in the way it was expected to. But if we know in detail upon what the result depends, we can look to see whether the required conditions are there. The method extends our practical control. For if some of the conditions are missing, we may, if we know what the needed antecedents for an effect are, set to work to supply them; or, if they are such as to produce undesirable effects as well, we may eliminate some of the superfluous causes and economize effort.

思维或反思是指对我们所作行为和所产生结果之间关系的识别。这层意思虽然我们在前面虽未明确说出，但已有所表达。没有某种思维因素便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经验所含思维的比例将两种经验进行对比：我们的一切经验都有“试验”的一面——即心理学家所谓的尝试错误法。我们先做一件事，等到失败了，又做另一件事，一直尝试下去，直到在某件事上碰巧成功了。我们以后就采用这个单凭经验来做的方法。有些经验除了含有偶然因素外，本身并没有可取之处。我们发现某一行为和某一结果彼此相连的事实，但却不知彼此如何连接起来的。我们看不到相连接的详细情形，连接脱节了。我们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对于另外一些经验，我们则观察得更为仔细。我们进行分析，以便发现夹在中间的东西，以便把原因与结果、行为与后果联系起来。观察面的扩大使我们对未来的预见更加准确，更加全面。完全根据尝试错误法的行为是受环境支配的；而环境可能变化，以致不能按预期的方式发生。但是，如果详细了解结果依靠的条件，我们就能注意到是否具备所需要的条件。这种方法能扩大我们对环境的控制。如果某些条件没有具备，而我们又知道结果所需要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设法提供这些条件。如果这些条件可能产生不良后果，我们就可以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因素，以节省精力。

In discovery of the detailed connections of our activities and what happens in consequence, the thought implied in cut and try experience is made explicit. Its quantity increases so that its proportionate value is very different. Hence the quality of the experience changes; the change is so significant that we may call this type of experience reflective—that is, reflective par excellence. The deliberate cultivation of this phase of thought constitutes thinking as a distinctive experience. Thinking, in other words, is the intentional endeavor to discover specific connections between something which we do and the consequences which result, so that the two become continuous. Their isolation, and consequently their

purely arbitrary going together, is cancelled; a unified developing situation takes its place. The occurrence is now understood; it is explained; it is reasonable, as we say, that the thing should happen as it does.

当发现我们的行为与所产生结果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时，隐含在试验性经验中的思维就显露出来了。随着经验的增加，经验的价值也相应提高，与以往大相径庭。因此，经验的质量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可以称这种经验为反省的经验、一种典型的反省经验。有意地培养这一方面的思维，就使思维构成一种特异的经验。换言之，思维就是有意识地努力去发现我们的行为与所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具体联系，使两者能持续下去。两者的隔离状态以及纯属偶然碰在一起的情况就此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统一的、不断发展的情境。于是，发生的事情得到了理解、解释，变得合情合理。也就是说，事情理应如此。

Thinking is thus equivalent to an explicit rendering of the intelligent element in our experience. It makes it possible to act with an end in view. It is the condition of our having aims. As soon as an infant begins to expect he begins to use something which is now going on as a sign of something to follow; he is, in however simple a fashion, judging. For he takes one thing as evidence of something else, and so recognizes a relationship. Any future development, however elaborate it may be, is only an extending and a refining of this simple act of inference. All that the wisest man can do is to observe what is going on more widely and more minutely and then select more carefully from what is noted just those factors which point to something to happen. The opposites, once more, to thoughtful action are routine and capricious behavior. The former accepts what has been customary as a full measure of possibility and omit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nnections of the particular things done. The latter makes the momentary act a measure of value, and ignores the connections of our personal action with the energies of the environment. It says, virtually, 'things are to be just as I happen to like them at this instant,' as routine says in effect 'let things continue just as I have found them in the past. ' Both refuse to acknowledg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uture consequences which flow from present action. Reflection is the acceptance of such responsibility.

所以，思维就是把我们经验中的智慧要素突显出来，使有目标的行为成为可能。思维催生了我们的目标。当婴儿开始有所期待时，他就会把正在发生之事作为将要发生之事的信号。虽然他的判断非常简单，但他开始判断了。他把一件事作为另一件事的证据，因而认识到中间所包含的关系。任何未来的发展，无论多么复杂，都只是这个简单推理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智者所能做的就是更广泛、更细致地观察正在发生之事，然后从已经被注意到的事情中更谨慎地选择那些恰恰指向未来要发生之事的因素。这种考虑周到的行为的对立面就是墨守成规和任性胡为。墨守成规的行为把习惯事物作为衡量未来可能发生之事的全部标准，而不考虑与所做之事的种种关联。任性胡为则把一时的行为作为价值的标准，而不考虑个人行为与所处环境的联系。任性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说："我在此刻碰巧想让事情怎么样，它们就得怎么样。"墨守成规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说："任何事情过去怎样，就让它们继续保持原样吧。"这两种行为对目前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都不负责任。反思就是承担起这种责任。

The starting point of any process of thinking is something going on, something which just as it stands is incomplete or unfulfilled. Its point, its meaning lies literally in what it is going to be, in how it is going to turn out. As this is written, the world is filled with the clang of contending armies. For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the war, it

is clear that the momentous thing is the issue, the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is and that happening. He is identified, for the time at least, with the issue; his fate hangs upon the course things are taking. But even for an onlooker in a neutral country, the significance of every move made, of every advance here and retreat there, lies in what it portends. To think upon the news as it comes to us is to attempt to see what is indicated as probable or possible regarding an outcome. To fill our heads, like a scrapbook, with this and that item as a finished and done-for thing, is not to think. It is to turn ourselves into a piece of registering apparatus. To consider the bearing of the occurrence upon what may be, but is not yet, is to think. Nor will the reflective experience be different in kind if we substitute distance in time for separation in space. Imagine the war done with, and a future historian giving an account of it. The episode is, by assumption, past. But he cannot give a thoughtful account of the war save as he preserves the time sequence; the meaning of each occurrence, as he deals with it, lies in what was future for it, though not for the historian. To take it by itself as a complete existence is to take it unreflectively. Reflection also implies concern with the issue—a certain sympathetic identification of our own destiny, if only dramatic, with the outcome of the course of events. For the general in the war, or a common soldier, or a citizen of one of the contending nations, the stimulus to thinking is direct and urgent. For neutrals, it is indirect and dependent upon imagination. But the flagrant partisanship of human nature is evidence of the intensity of the tendency to identify ourselves with one possible course of events, and to reject the other as foreign. If we cannot take sides in overt action, and throw in our little weight to help determine the final balance, we take sides emotionally and imaginatively. We desire this or that outcome. One wholly indifferent to the outcome does not follow or think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at all. From this dependence of the

act of thinking upon a sense of sharing in the consequences of what goes on, flows one of the chief paradoxes of thought. Born in partiality, in order to accomplish its tasks it must achieve a certain detached impartiality. The general who allows his hopes and desires to affect his observ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existing situation will surely make a mistake in calculation. While hopes and fears may be the chief motive for a thoughtful following of the war on the part of an onlooker in a neutral country, he too will think ineffectively in the degree in which his preferences modify the stuff of his observations and reasonings. There is, however, no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fact that the occasion of reflection lies in a personal sharing in what is going on and the fact that the value of the reflection lies upon keeping one's self out of the data. The almost insurmountable difficulty of achieving this detachment is evidence that thinking originates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course of thinking is an actual part of the course of events and is designed to influence the result. Only gradually and with a widening of the area of vision through a growth of social sympathies does thinking develop to include what lies beyond our direct interests: a fact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ducation.

任何思维过程的出发点都是正在发生之事，这种事情，就其现状来看，是不完整的，或是未完成的。这种事情的核心和意义全在于它将产生什么结果以及怎样产生这种结果。在我撰写本书之时，正值世界大战，两军对峙。对这场战争的积极参与者来说，很显然，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发生的各种事件将来会产生什么结果。至少在此期间，参战者的命运已与战争的结果融为一体。但是，即使对一个中立国的旁观者来说，军队的每一次调动、前进和撤退，其意义也在于其预示的结果。我们对听到的战事进行思考，就是试图发现这可能产生什么结果。把我们的头脑弄成剪贴簿一样，把它塞满这样或那样的成品，这并不是思考。这是把我们变成一种记录装置。考虑所发生之事对可能

发生、但尚未发生的事情的关系，这才是思考。如果我们用时间距离替代空间间隔，那么经验的反省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设想，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未来的历史学家要记述这次战争。假定这事发生在过去。除非这位历史学家记得战争的时间顺序，否则，他不可能对战争做出发人深省的叙述。他所叙述的每一件事的意义在于未来会怎么看待此事，而不是历史学家未来的看法会怎样。把这场战争视为自我孤立存在的事件就是不假思索地对待此事。反思也指对事件的关注，把自己的命运与整个事件进程的结果富有同情心地、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对战争中的将军、普通士兵，或者交战国的公民来说，战争对思维的刺激是直接的，紧迫的。对中立国的人来说，战争对他们思维的刺激是间接的，有赖于想象。但是，人类天性具有的派性偏见使我们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把自己和一种可能的结果视为一体，而拒绝另一种结果，认为与己无关。即使我们无法在公开行动上有所偏袒，投入自己哪怕算是微薄的力量，以促成最后的结局，我们也会在情感上、在想象中有所偏袒。我们希望得到这种结果或那种结果。一个对结果完全漠不关心的人，不会注意或者根本不会考虑正在发生之事。思维的矛盾之处来自思维这一行为依赖对事件发展结果的一种参与感。思维天生带有片面性，要完成思维的任务，必须具有一定超脱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如果一位将军听任希望和欲望影响自己对目前形势的观察和解释，他必然会做出错误的估计。一个中立国的旁观者，虽然他的希望和恐惧可能是他对战争动向深入思考的主要动机，但是，如果他的偏爱影响他的观察和推理，他也不能有效地进行思考。但是，反思的时机在于个人对进行中的事情的参与，而反思的价值又在于使自己置身于所观察的对象之外，在这两个事实之间并无矛盾。要做到超然事外有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这证明思维产生于许多情境。此时，思维的进程乃是许多事件进程的一个部分，是用来影响结果的。只有逐步通过社会同情心拓宽我们的眼界，才能使思维的发展包括我们直接兴趣以外的事。这个事实，对教育具有巨大的意义。

To say that thinking occurs with reference to situations which are still going on, and incomplete, is to say that thinking occurs

when things are uncertain or doubtful or problematic. Only what is finished, completed, is wholly assured. Where there is reflection there is suspense. The object of thinking is to help reach a conclusion, to project a possible ter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what is already given. Certain other facts about thinking accompany this feature. Since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inking occurs is a doubtful one, thinking is a process of inquiry, of looking into things, of investigating. Acquiring is always secondary, and instrumental to the act of inquiring. It is seeking, a quest, for something that is not at hand. We sometimes talk as if “original research” were a peculiar prerogative of scientists or at least of advanced students. But all thinking is research, and all research is native, original, with him who carries it on, even if everybody else in the world already is sure of what he is still looking for. It also follows that all thinking involves a risk.

我们说，思维发生在仍在进行而且还不完整的情境中，就是说，思维发生时，事物还不确定或者可疑、或者仍有问题。只有已经了结和完成的事才是完全确定的。哪里有反思，哪里就有悬而未决之事。思维的目的就是帮助得出一个结论，根据已知情况，设计一个可能的结局。当然，除此之外，思维还有其他特点。既然思维发生的情境是可疑的，思维就是一个探究的过程，观察事物的过程和调查研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结果总是次要的，是辅助探究行为的。探究就是要探索不在身边之物。我们时有说起“独创性研究”，似乎这是科学家的特权，或者至少是学者的特权。其实，一切思维活动都是科研。对从事研究的人来说，一切研究（即使在旁人看来，已经知道他在寻求什么）都是具有独创性的。

Certainty cannot be guaranteed in advance. The invasion of the unknown is of the nature of an adventure; we cannot be sure in

advance. The conclusions of thinking, till confirmed by the event, are, accordingly, more or less tentative or hypothetical. Their dogmatic assertion as final is unwarranted, short of the issue, in fact. The Greeks acutely raised the question: How can we learn? For either we know already what we are after, or else we do not know. In neither case is learning possible; on the first alternative because we know already; on the second, because we do not know what to look for, nor if, by chance, we find it can we tell that it is what we were after. The dilemma makes no provision for coming to know, for learning; it assumes either complete knowledge or complete ignorance. Nevertheless the twilight zone of inquiry, of thinking, exists. The possibility of hypothetical conclusions, of tentative results, is the fact which the Greek dilemma overlooked. The perplexities of the situation suggest certain ways out. We try these ways, and either push our way out, in which case we know we have found what we were looking for, or the situation gets darker and more confused—in which case, we know we are still ignorant. Tentative means trying out, feeling one's way along provisionally. Taken by itself, the Greek argument is a nice piece of formal logic. But it is also true that as long as men kept a sharp disjun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ignorance, science made only slow and accidental advance. Systematic advance in invention and discovery began when men recognized that they could utilize doubt for purposes of inquiry by forming conjectures to guide action in tentative explorations, whose development would confirm, refute, or modify the guiding conjecture. While the Greeks made knowledge more than learning, modern science makes conserved knowledge only a means to learning, to discovery.To recur to our illustration. A commanding general cannot base his actions upon either absolute certainty or absolute ignorance. He has a certain amount of information at hand which is, we will assume, reasonably trustworthy. He then infers certain prospective

movements, thus assigning meaning to the bare facts of the given situation. His inference is more or less dubious and hypothetical. But he acts upon it. He develops a plan of procedure, a method of dealing with the situation. The consequences which directly follow from his acting this way rather than that test and reveal the worth of his reflections. What he already knows functions and has value in what he learns. But will this account apply in the case of the one in a neutral country who is thoughtfully following as best he can the progress of events? In form, yes, though not of course in content. It is self-evident that his guesses about the future indicated by present facts, guesses by which he attempts to supply meaning to a multitude of disconnected data, cannot be the basis of a method which shall take effect in the campaign. That is not his problem. But in the degree in which he is actively thinking, and not merely passively following the course of events, his tentative inferences will take effect in a method of procedure appropriate to his situation. He will anticipate certain future moves, and will be on the alert to see whether they happen or not. In the degree in which he is intellectually concerned, or thoughtful, he will be actively on the lookout; he will take steps which although they do not affect the campaign, modify in some degree his subsequent actions. Otherwise his later “I told you so” has no intellectual quality at all; it does not mark any testing or verification of prior thinking, but only a coincidence that yields emotional satisfaction—and includes a large factor of self-deception.

一切思维都会冒着一定的风险。事情发生前，谁也不能保证它一定会发生。研究未知事物具有冒险的性质，我们不能预先得知结果。因此，在事实证明以前，思维的结论多少是试验性的，或是假设性的。事实上，武断地说一种理论是最后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效果的。希腊人尖锐地问道：我们怎样才能学习？因为，要么我

们已经知道寻求的是什么，要么就是毫无知晓。在两种情况下，学习都是不可能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因为我们已经知晓，所以不用学习。在第二种情况下，因为不知道寻找什么，即使我们碰巧找到，也不能说这就是要寻找的东西，所以也不用学习。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对认识和学习没有什么帮助。它假定我们要么无所不知，要么毫无知晓。但是，在无所不知与毫无知晓之间存在着一个探究和思维的中间地带。希腊人忽略了假设性的结论和试验性的结果这一事实。困难其实就暗示一些解决的方法。我们尝试了一些方法，它们或者使我们解脱困难，或使我们已经发现在寻找什么，或者使情况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混乱，让我们知道仍然一无所获。所谓试验性意思就是尝试临时解决的方法。上面提到的希腊人的观点，就其自身看，是一段很好的形式逻辑。显然，只要人们把知识和无知完全分离，科学就只能有缓慢而又偶然的进展。如果人们意识到，为了探究的目的，他们能利用怀疑，构成假设，进行试验性的探索并以此指导行为，如果这种试验的探索能证明、推翻或修改某个起主导作用的假设，科学的发明和发现就会有系统的进步。希腊人重视知识超过学习知识，现代科学则把已有知识作为学习的手段，作为发现的手段。重提一下我们上面举过的例子。一位将军统率军队行动时，不能依据绝对的肯定，也不能依据绝对的无知。他手边有一些情报，假定这些情报比较可靠。然后他根据这些情报推导出未来行动方向，这就给所处环境一定的意义。他的推导是假设性的，多少有些令人怀疑。但是，他据此做出反应，制订了一个应付当时情境的行动计划。他如此行动产生的直接结果检验并揭示了他反思的价值所在。他已有的知识发挥了作用，体现出价值。但是，以上这种说法是否适用于一个非常关心战争进程的中立国人士呢？从形式上说，是适用的；但从内容上说，当然并不适用。显然，他根据现有事实对未来的推测——他试图仅靠推测为一大堆毫无关联的数据赋予意义——作为在战争中产生实际影响的方法的基础。那并不是他的问题。但是，他并不是单纯消极地注意事态的发展，而是主动进行思考。在这个层面上，他的试验性的推测将在与他的情境相适合的行动方法中产生实际影响。他将预期某些未来的行为并保持警觉，注意它们行动是否会发生。只要他在思想上关心，善于思考，他就会主动地注意采取必要的步骤。这些步骤不会影响战争，

也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他后来的行动。否则，他后来所说“我曾告诉过你”这句话毫无睿智品质。它并不标志着对以前思考的任何检验或证实，而只是一种情感满足的巧合，并含有自欺欺人因素。

The case is comparable to that of an astronomer who from given data has been led to foresee (infer) a future eclipse. No matter how great the mathematical probability, the inference is hypothetical—a matter of probability. [12_1] The hypothesis as to the date and position of the anticipated eclipse becomes the material of forming a method of future conduct. Apparatus is arranged; possibly an expedition is made to some far part of the globe. In any case, some active steps are taken which actually change some physical conditions. And apart from such steps and the consequent modification of the situation, there is no completion of the act of thinking. It remains suspended. Knowledge, already attained knowledge, controls thinking and makes it fruitful.

这个例子可以用来和一个天文学家的例子作比较。天文学家根据已知的资料推论出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日食。不管这在数学上概率有多高，该推论也是假设性的，只是一种可能性 [13_1] 。对预测日食日期和位置的推论将变成制定未来行为方法的基础。他将安排仪器，也可能去地球的远方，以便进行观察。无论如何，要主动采取行动，改变一些物质条件。除此之外，思维活动并未完结。这件事仍旧悬而未决。已经获得的知识控制着思维并使思维富有成效。

So much for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a reflective experience. They are (i) perplexity, confusion, doubt, due to the fact that one is implicated in an incomplete situation whose full character is not yet determined; (ii)a conjectural anticipation—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iven elements, attributing to them a tendency to effect certain consequences; (iii) a careful survey (examination, inspection, exploration, analysis) of all attainable consideration which will define and clarify the problem in hand; (iv) a consequent elaboration of the tentative hypothesis to make it more precise and more consistent, because squaring with a wider range of facts; (v) taking one stand upon the projected hypothesis as a plan of action which is applied to the existing state of affairs: doing something overtly to bring about the anticipated result, and thereby testing the hypothesis. It is the extent and accuracy of steps three and four which mark off a distinctive reflective experience from one on the trial and error plane. They make thinking itself into an experience. Nevertheless, we never get wholly beyond the trial and error situation. Our most elaborate and rationally consistent thought has to be tried in the world and thereby tried out. And since it can never take into account all the connections, it can never cover with perfect accuracy all the consequences. Yet a thoughtful survey of conditions is so careful, and the guessing at results so controlled, that we have a right to mark off the reflective experience from the grosser trial and error forms of action.

有关反省经验的一般特征的讨论就到此为止。这些特征是：（1）困惑、迷乱和怀疑，这是由于我们身处不完全的情境中，其全部特性尚未确定；（2）推测预料，即对已知的要素进行试验性的解释，认为这会产生某种结果；（3）对一切能解释和阐明现有问题的考虑后，所做出审慎的调查（考察、审查、探究和分析）；（4）详细阐发试验性的假设，使之更加精确，更加一致，与更多事实相符；（5）把假设作为行动的计划，应用到当前的形势中，做出一些公开行动，达到预期的结果，从而检验假设。以上第3、4步所达到的广度和准确度把特异的反省经验和尝试错误阶段的经验区别开来。它们使思维本身转变为经验。但是，我们从未完全超越尝试错误的情境。我

们最为缜密、最为理性的思维必须在现实世界经过一番试验，经受检验。由于我们的思维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包括一切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对情境进行审慎、周密的调查，对结果进行有控制的推测，我们就可以把反省的经验和比较粗糙的尝试错误的行动方式区别开来。

Summary.

总结

In determining the place of thinking in experience we first noted that experience involves a connection of doing or trying with something which is undergone in consequence. A separation of the active doing phase from the passive undergoing phase destroys the vital meaning of an experience. Thinking is the accurate and deliberate instituting of connections between what is done and its consequences. It notes not only that they are connected, but the details of the connection. It makes connecting links explicit in the form of relationships. The stimulus to thinking is found when we wish to determine the significance of some act, performed or to be performed. Then we anticipate consequences. This implies that the situation as it stands is, either in fact or to us, incomplete and hence indeterminate. The projection of consequences means a proposed or tentative solution. To perfect this hypothesis, existing conditions have to be carefully scrutinized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hypothesis developed—an operation called reasoning. Then the suggested solution—the idea or theory—has to be tested by acting upon it. If it brings about certain consequences, certain determinate changes, in the world, it is accepted as valid. Otherwise it is

modified, and another trial made. Thinking includes all of these steps,—the sense of a problem, the observation of conditions, the formation and rational elaboration of a suggested conclusion, and the active experimental testing. While all thinking results in knowledge, ultimately the value of knowledge is subordinate to its use in thinking. For we live not in a settled and finished world, but in one which is going on, and where our main task is prospective, and where retrospect—and all knowledge as distinct from thought is retrospect—is of value in the solidity, security, and fertility it affords our dealings with the future.

在决定思维在经验中的地位时，我们首先应当注意到，经验涉及行为（或尝试性行为）与所经历之事之间的联系。把主动行为与被动所经历之事割裂开会破坏经验的重要意义。思维就是准确、审慎地把所做之事与其结果之间建立联系。它不仅表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且指出联系的详细情况，使连接的各个环节以关系的形式显露出来。当我们希望决定某一已完成的行为或即将完成的行为的意义时，就产生了对思维的刺激。然后，我们就预期到种种结果。这意味着，目前的环境不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我们眼中，都是不完整的，因而也是不确定的。呈现的结果意味着一种建设性或试验性的解决方案。要使这种假设完善起来，必须对目前情况进行仔细考察并阐发假设的种种含义，这叫做推理。这个假定的解决方案——观念或理论——还必须通过实践进行验证。如果能在实际环境带来某些结果，某些明确变化，它就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否则就要加以修改，再次进行尝试。思维包含所有以上这些步骤——感觉问题所在，观察情况，提出假定结论并推理，进而进行积极检验。尽管所有的思维都会产生知识，但知识的价值最终还是服从它在思维中的应用。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已经定型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仍在发展中的世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展望未来，回顾过去——与思维不同，一切知识都有可回顾的历史——其价值在于能使我们可靠地、安全地和有成效地去应付未来。

[12_1].It is most important for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that men in many cases can calculate the degree of probability and the amount of probable error involved, but that does not alter the features of the situation as described. It refines them.

[13_1].在科学实践方面有许多事例，人们能计算概率度和所包含的错误量，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这样确实改变了这里所描述情境的特征。它能使这些特征更加明确完善。

Chapter 12 Thinking in Education

第十二章　教育中的思维

1．The Essentials of Method.

一、教育方法的要素

No one doubts, theoretically, the importance of fostering in school good habits of thinking. But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the acknowledgment is not so great in practice as in theory, there is not adequate theoretical recognition that all which the school can or need do for pupils, so far as their minds are concerned (that is, leaving out certain specialized muscular abilities), is to develop their ability to think. The parceling out of instruction among various ends such as acquisition of skill (in reading, spelling, writing, drawing, reciting); acquiring information (in history and geography), and training of thinking is a measure of the ineffective way in which we accomplish all three. Thinking which is not connected with increase of efficiency in action, and with learning more about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has something the matter with it just as thought (See ante, p. 172). And skill obtained apart from thinking is not connected with any sense of the purposes for which it is to be used. It consequently leaves a man at the mercy of his routine habits and of the authoritative control of others, who know what they are about and who are not especially scrupulous as to their means of achievement. And information severed from thoughtful action is dead, a mind-

crushing load. Since it simulates knowledge and thereby develops the poison of conceit, it is a most powerful obstacle to further growth in the grace of intelligence. The sole direct path to enduring improvement in the methods of instruction and learning consists in centering upon the conditions which exact, promote, and test thinking. Thinking is the method of intelligent learning, of learning that employs and rewards mind. We speak, legitimately enough, about the method of thinking, but the important thing to bear in mind about method is that thinking is method, the method of intelligent experience in the course which it takes.

理论上，没有人怀疑培养学生优良思维习惯的重要性。但是，在实践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不那么为人所认同。除此之外，就学生的心智而论（某些特别的肌肉能力除外），学校所能做或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在理论上，对于这一点的认识还不够。把整个教学分成技能的获得（如阅读、拼写、写字、画画和背诵）、信息的获取（如历史和地理）和思维的训练等不同的教学目标，这种做法使得这些目标的都不能有效实现。如果思维不与行为效率的提高联系起来，不与增加对我们自身认识和我们置身其中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那么这种思维就存在缺陷。（参见原书147页）由于人所获得的技能与将要使用这种技能的目的没有关联，因此，这种技能使人受常规习惯的支配和权威人士的控制。这些权威人士虽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们做事的方法并不是特别审慎。脱离深思熟虑行为的知识是死知识，是摧残心智的沉重负担。由于它冒充知识，从而产生骄傲自满的毒瘤，是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持续改进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的唯一直接途径在于把精力集中在严格要求思维、促进思维和检验思维的种种条件上。思维就是明智的学习方法。这种学习要使用心智，也使心智获得回报。我们说的是思维方法，的确如此，但是重要的是要牢记思维也是方法，是在智慧经验途中使用的方法。

I . The initial stage of that developing experience which is called thinking is experience. This remark may sound like a silly truism. It ought to be one; but unfortunately it is not. On the contrary, thinking is often regarded both in philosophic theory and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as something cut off from experience, and capable of being cultivated in isolation. In fact,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experience are often urged as the sufficient ground for attention to thinking. Experience is then thought to be confined to the senses and appetites; to a mere material world, while thinking proceeds from a higher faculty (of reason), and is occupied with spiritual or at least literary things. So, oftentimes, a sharp distinction is made between pure mathematics as a peculiarly fit subject matter of thought (since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hysical existence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which has utilitarian but not mental value.

1．发展中的经验被称为思维，思维的最初阶段也就是经验。这道理好像人人都认同，也应该这样，但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在哲学理论与教育实践中，常认为思维可以与经验隔绝，独立地培养。事实上，经验所固有的局限性往往被视为需要重视思维的充分理由。因此，经验就被认为是仅仅局限于感官和欲望，局限于纯粹物质世界；而思维则属于高级智能，属于精神领域或至少属于文学范畴。于是，常常有人把理论数学与应用数学截然分开，认为前者特别适合思维能力的培养（因为它与物质的存在无关），而后者只具有实用价值，没有思维价值。

Speaking generally, the fundamental fallacy in methods of instruction lies in supposing that experience on the part of pupils may be assumed. What is here insisted upon is the necessity of an actual empirical situation as the initiating phase of thought.

Experience is here taken as previously defined: trying to do something and having the thing perceptibly do something to one in return. The fallacy consists in supposing that we can begin with ready-made subject matter of arithmetic, or geography, or whatever, irrespective of some direct personal experience of a situation. Even the kindergarten and Montessori techniques are so anxious to get at intellectual distinctions, without 'waste of time,' that they tend to ignore—or reduce—the immediate crude handling of the familiar material of experience, and to introduce pupils at once to material which expresses the intellectual distinctions which adults have made. But the first stage of contact with any new material, at whatever age of maturity, must inevitably be of the trial and error sort. An individual must actually try, in play or work, to do something with material in carrying out his own impulsive activity, and then note the interaction of his energy and that of the material employed.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a child at first begins to build with blocks, and it is equally what happens when a scientific man in his laboratory begins to experiment with unfamiliar objects.

一般说来，教学方法上的根本错误在于认为学生的经验是可以假定的。我们坚持认为，必须有一个实际的经验情境作为思维的起始阶段。我曾对经验一词有过解释，即这里的经验指有人在尝试做事的过程中，又明显让这事反过来对自己产生了影响。上面所说的错误，在于认为我们的思维无需借鉴某种直接的个人经验，就可以从算术、地理或其他科目的现成教学题材开始。甚至幼儿园和蒙台梭利教育法也急于想“不浪费时间”地让儿童达到成年人的智力成就。他们往往忽略——或减少——直接采用与儿童自己经验有关的教学题材，而立即向他们推介展示成年人智力成就的教学题材。然而，任何年龄阶段的人接触任何新教学题材的初始阶段都属于尝试阶段。不管是在游戏还是工作中，任何人在实施自己本能行为时都必须尝试使用教学题材，然

后观察自己所花精力以及所用教学题材效果之间的相互影响。儿童玩积木时，会发生这种情况。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不熟悉的材料作实验时，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Hence the first approach to any subject in school, if thought is to be aroused and not words acquired, should be as un-scholastic as possible. To realize what an experience, or empirical situation, means, we have to call to mind the sort of situation that presents itself outside of school; the sort of occupations that interest and engage activity in ordinary life. And careful inspection of methods which are permanently successful in formal education, whether in arithmetic or learning to read, or studying geography, or learning physics or a foreign language, will reveal that they depend for their efficiency upon the fact that they go back to the type of the situation which causes reflection out of school in ordinary life. They give the pupils something to do, not something to learn; and the doing is of such a nature as to demand thinking, or the intentional noting of connections; learning naturally results.

因此，如果要激发思维，而不是仅仅学一些词汇，学习任何一门学科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尽可能去除学究气。要实现经验或经验的情境意义，我们必须想到在学校以外会出现的情况，想到吸引日常生活行并使之有趣的事情。细心检查正规教育中始终奏效的教学方法，无论是教授算术、阅读、地理、物理还是外国语，我们发现，这些方法之所以有效，全靠它们始于校外日常生活中引起学生思维的情境。它们让学生做事情，而不是学东西；而这恰好要求学生进行思维或者有意识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结果学生自然学到了东西。

That the situation should be of such a nature as to arouse

thinking means of course that it should suggest something to do which is not either routine or capricious—something, in other words, presenting what is new (and hence uncertain or problematic) and yet sufficiently connected with existing habits to call out an effective response. An effective response means one which accomplishes a perceptible result, in distinction from a purely haphazard activity, where the consequences cannot be mentally connected with what is done. The most significant question which can be asked, accordingly, about any situation or experience proposed to induce learning is what quality of problem it involves.

情境应该唤起思维，这意味着，它建议所做之事既非司空见惯，也非纯属偶然，而应该富有新意（即尚未完成或仍未解决），然而却与现有行为习惯密切相关，足以引起有效的反应。有效的反应就是能产生明显结果的反应。这与无法预料其结果的纯粹偶然发生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能引发学习的有关情境或经验的最重要问题就是该问题属于什么性质。

At first thought, it might seem as if usual school methods measured well up to the standard here set. The giving of problems, the putting of questions, the assigning of tasks, the magnifying of difficulties, is a large part of school work. But it is indispensable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genuine and simulated or mock problem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may aid in making such discrimination. (a)Is there anything but a problem? Does the question naturally suggest itself within some situation of personal experience? Or is it an aloof thing, a problem only for the purposes of conveying instruction in some school topic? Is it the sort of trying that would arouse observation and engage experimentation outside of school?

(b)Is it the pupil's own problem, or is it the teacher's or textbook's problem, made a problem for the pupil only because he cannot get the required mark or be promoted or win the teacher's approval, unless he deals with it? Obviously, these two questions overlap. They are two ways of getting at the same point: Is the experience a personal thing of such a nature as inherently to stimulate and direct observation of the connections involved, and to lead to inference and its testing? Or is it imposed from without, and is the pupil's problem simply to meet the external requirement?

初想起来，似乎教师通常所用方法很符合此处所提出的标准。布置题目、提出问题、指定作业、增加难度等是教师的主要工作。但是，必须区别两种问题，一种是真正的问题，一种是模拟的或虚幻的问题。下面的问题有助我们进行区分这两者。①除了给学生提出问题，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这个问题是从学生个人经历的情境内部自然产生的？还是只是为了讲授某一课题而提出的一个孤立问题？它能否引起学生在校外进行观察和从事实验？②这是学生自己的问题，还是教师或教学题材的问题？是否如果学生不回答此问题，就不能得到所要求的分数、不能升级、或者不能赢得教师的赞许？这两个问题显然互相交织，可谓是针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学生所获经验是能内在刺激或指导他对关联关系的观察或引导其推论并对之检验引导呢？还是说那是由外部强加给学生，学生的问题是不是只不过是满足外界的要求呢？

Such questions may give us pause in deciding upon the extent to which current practices are adapted to develop reflective habits. The physical equipment and arrangements of the average schoolroom are hostile to the existence of real situations of experience. What is there similar to the conditions of everyday life which will generate difficulties? Almost everything testifies to the

great premium put upon listening, reading,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what is told and read. It is hardly possible to overstate the contrast between such conditions and the situations of active contact with things and persons in the home, on the playground, in fulfilling of ordinary responsibilities of life. Much of it is not even comparable with the questions which may arise in the mind of a boy or girl in conversing with others or in reading books outside of the school. No one has ever explained why children are so full of questions outside of the school (so that they pester grown-up persons if they get any encouragement), and the conspicuous absence of display of curiosity about the subject matter of school lessons. Reflection on this striking contrast will throw light upon the question of how far customary school conditions supply a context of experience in which problems naturally suggest themselves. No amount of improvement in the personal technique of the instructor will wholly remedy this state of things. There must be more actual material, more stuff, more appliances, and more opportunities for doing things, before the gap can be overcome. And where children are engaged in doing things and in discussing what arise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doing, it is found, even with comparatively indifferent modes of instruction, that children's inquiries are spontaneous and numerous, and the proposals of solution advanced, varied, and ingenious.

在判断目前的教学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培养学生的思维习惯时，以上问题会让我们暂时冷静思考一下。普通教室里的设备和布置与学生实际经历过情境是不相容的。在教室里有什么能与日常生活的艰难局面相类似呢？在学校，非常强调听力、阅读能力以及背诵能力。教室里的这种情形与学生在家里、在游戏场上、在履行日常生活职责中，与事物和人们主动接触的情形两者差别太大。很多情况甚至不能与儿童在校外和别人交谈或自己阅读时在脑子里所引起的问题相比。

没有人解释为什么儿童在校外会提那么多问题（如果得到鼓励，他们会向成年人打破砂锅问到底），为什么他们对于课堂上的教学题材明显缺乏好奇心。想一想这两者之间惊人的对比，就可以明白学校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学生提供一种自动引发思考的环境。无论教师自身在教学法上有多大改进，都不能完全补救这种情形。要克服这种缺陷，必须有更多生活素材、更多资料，更多教学用具和更多参与事情的机会。我们发现，凡是能让儿童忙着做事情并且讨论做事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即使教学方法比较一般，儿童的问题都是自动提出的，数量会有很多。与此同时，儿童自己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先进的、多种多样的、富有独创性。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absence of the materials and occupations which generate real problems, the pupil's problems are not his; or, rather, they are his only as a pupil, not as a human being. Hence the lamentable waste in carrying over such expertness as is achieved in dealing with them to the affairs of life beyond the schoolroom. A pupil has a problem, but it is the problem of meeting the peculiar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teacher. His problem becomes that of finding out what the teacher wants, what will satisfy the teacher in recitation and examination and outward deportment. Relationship to subject matter is no longer direct. The occasions and material of thought are not found in the arithmetic or the history or geography itself, but in skillfully adapting that material to the teacher's requirements. The pupil studies, but unconsciously to himself the objects of his study are the conventions and standards of the school system and school authority, not the nominal “studies. " The thinking thus evoked is artificially one-sided at the best. At its worst, the problem of the pupil is not how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chool life, but how to seem to meet them—or, how to come near enough to meeting them to slide along without an undue amount of friction. The type of judgment formed by these devices is not a

desirable addition to character. If these statements give too highly colored a picture of usual school methods, the exaggeration may at least serve to illustrate the point: the need of active pursuits, involving the use of material to accomplish purposes, if there are to be situations which normally generate problems occasioning thoughtful inquiry.

由于缺乏与实际问题挂钩的教学题材和作业，学生的问题并不是自己的；或者说，这些问题只是提供给作为学生的“人”，而不是提供给真正的“人”。所以，当学生把其能力转移到应付课堂以外的生活事务上，就造成极大的浪费，这真是令人痛惜。每一个学生都要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满足老师所提出的特殊要求。他的问题变成了发现老师喜欢什么问题、怎样在背诵、考试以及外表行为方面使老师满意。他与教学题材的关系不再是直接的关系。思维的机会不能在算术、历史或地理课里找到，要在巧妙适应老师要求时才能找到。学生虽然在学习，但却没有意识到他所学习的乃是教育系统和教育当局的传统和标准，而不是名义上的“课程”。如此引发的思维至少是人为的和片面的。学生的问题不是如何符合学校生活的要求，而是如何从表面看来符合要求，或者，如何做到差不多符合要求，以便在不引起过多摩擦的情况下应付过去。用这些方法形成的判断力对学生品格成长没有好处。如果以上的陈述对通常的学校教育方法渲染过分，这种夸大其辞至少可以说明一点：积极从事职业的需要在于使用教学题材来达到教学目的，条件是要有能产生发人深省问题的环境。

II．There must be data at command to supply the considerations required in dealing with the specific difficulty which has presented itself. Teachers following a “developing” method sometimes tell children to think things out for themselves as if they could spin them out of their own heads. The material of thinking is not thoughts, but actions, facts, events, and the relations of things.

In other words, to think effectively one must have had, or now have, experiences which will furnish him resources for coping with the difficulty at hand. A difficulty is an indispensable stimulus to thinking, but not all difficulties call out thinking. Sometimes they overwhelm and submerge and discourage. The perplexing situation must be sufficiently like situation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dealt with so that pupils will have some control of the means of handling it. A large part of the art of instruction lies in making the difficulty of new problems large enough to challenge thought, and small enough so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confusion naturally attending the novel elements, there shall be luminous familiar spots from which helpful suggestions may spring.

2．手中必须掌握资料，提供不同方案以应对出现的具体困难。遵循“教育是发展”理念的教师有时会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似乎他们能从头脑里凭空编造出良方。思维的材料不是思想，而是行为、事实、事件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换言之，要想有效进行思维活动，人必须已经拥有或者马上就拥有许多经验，以便对付所遇到的困难。困难是引发思维的不可或缺的刺激物，但并非所有困难都能引发思维活动。有时困难会让人不知所措，垂头丧气。学生在学校中遇到的困难必须与之曾经应付的情况有足够的相似之处，从而使学生在处理困难时能有一定的控制能力。教学的艺术多在于使新问题的难度大到足以激发思想，小到加上自然伴随新奇因素带来的疑惑足以提供为学生熟知但又有启发意义的支点，故而产生有益的建议。

In one sense, it is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by what psychological means the subject matter for reflection is provided. Memory, observation, reading, communication, are all avenues for supplying data. The relative proportion to be obtained from each is a matter of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particular problem in hand.

It is foolish to insist upon observation of objects presented to the senses if the student is so familiar with the objects that he could just as well recall the facts independently. It is possible to induce undue and crippling dependence upon sense-presentations. No one can carry around with him a museum of all the things whose properties will assist the conduct of thought. A well-trained mind is one that has a maximum of resources behind it, so to speak, and that is accustomed to go over its past experiences to see what they yield. On the other hand, a quality or relation of even a familiar object may previously have been passed over, and be just the fact that is helpful in dealing with the question. In this case direct observation is called for.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the use to be made of observation on one hand and of reading and “telling” on the other. Direct observation is naturally more vivid and vital. But it has its limitations; and in any case it is a necessary part of education that one should acquire the ability to supplement the narrowness of his immediately personal experiences by utilizing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s. Excessive reliance upon others for data (whether got from reading or listening) is to be depreciated. Most objectionable of all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others, the book or the teacher, will supply solutions ready-made, instead of giving material that the student has to adapt and apply to the question in hand for himself.

在某种意义上说，采用哪一种心理学手段提供思维素料都是无关紧要的。记忆、观察、阅读和交流都是提供思维素材的途径。从每一种途径获取的素材各占比例的多少，由特定问题的特性所决定。如果学生对某事物很熟悉，能独立地回忆事实，我们还坚持要他通过感官进行观察，这就是愚蠢的。这很可能使人过分依赖感官提示，丧失行为能力。没有人能把整个博物馆的所有收藏品都带在身边，以便利用他们帮助思考。一个训练有素的大脑里装有极其丰富的资料，习惯于追忆以往的经验，以帮助分析结果。另一方面，我们所熟悉的事物，

其性质或关系过去可能被忽略，现在却可以帮助我们对付所遇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进行直接的观察。同样的原则可运用于观察，也可运用于阅读和“讲故事”。直接观察自然更为生动活泼，尽管有其局限性。无论如何，我们应能利用别人的经验，以弥补个人直接经验的不足，这是教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过分依靠别人获得素材（无论是阅读得来的，或是听来的）是不可取的。尤其要反对的是，有的人、书本或教师很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而不是给了学生素材，让他自己去加以整理，解决手头的问题。

There is no inconsistency in saying that in schools there is usually both too much and too little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others. The accumulation and acquisition of information for purposes of reproduction in recitation and examination is made too much of. “Knowledge,” in the sense of information, means the working capital, the indispensable resources, of further inquiry; of finding out, or learning, more things. Frequently it is treated as an end itself, and then the goal becomes to heap it up and display it when called for. This static, cold-storage ideal of knowledge is inimical to educative development. It not only lets occasions for thinking go unused, but it swamps thinking. No one could construct a house on ground cluttered with miscellaneous junk. Pupils who have stored their “minds” with all kinds of material which they have never put to intellectual uses are sure to be hampered when they try to think. They have no practice in selecting what is appropriate, and no criterion to go by; everything is on the same dead static level.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quite open to question whether, if information actually functioned in experience through use in application to the student's own purposes, there would not be need of more varied resources in books, pictures, and talks than are usually at command.

通常，学校里由别人提供的知识太多，有时又太少，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学校过分重视学生积累和获得知识，以便在课堂问答和考试时照搬。就信息意义而言，“知识”意味着可用资本和必不可少的资源，可用于进一步探寻、发现、和学习更多东西。知识常被视为目的本身，于是，学生的目标就是堆积知识，必要时拿出来炫耀一番。这种静止的、冷藏库式的知识理想有碍教育的发展。这种理想不仅阻碍学生利用机会进行思维活动，而且扼杀了人的思维能力。在堆满废弃垃圾的场地上，没有人能建造房屋。学生“头脑”里如果装满了各种他们从不动脑使用的教学题材，他们的思维必然要受到阻碍。他们没有受过训练去选择适当的教学题材，也没有标准可以遵循，一切都处在同一个呆板、静止的水平上。另一方面，如果出于学生自己的需要，知识真的在实践中发挥了作用，学生肯定会要求从书本、图画和谈话中得到更多不同的资源。

III . The correlate in thinking of facts, data, knowledge already acquired, is suggestions, inferences, conjectured meanings, suppositions, tentative explanations:—ideas, in short. Careful observation and recollection determine what is given, what is already there, and hence assured. They cannot furnish what is lacking. They define, clarify, and locate the question; they cannot supply its answer. Projection, invention, ingenuity, devising come in for that purpose. The data arouse suggestions, and only by reference to the specific data can we pass upo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suggestions. But the suggestions run beyond what is, as yet, actually given in experience. They forecast possible results, things to do, not facts (things already done). Inference is always an invasion of the unknown, a leap from the known.

3．在思维中，与已获事实、资料和知识有关联的是暗示、推论、推导出的意义、假设和临时的解释——简言之，就是观念。审慎

的观察和追忆能决定已知之物和已有之物，也就是已确定之物。尽管它们不能提供所缺之物和答案，但能解释问题、阐明问题、确定问题的所在。要找到问题的答案，还要进行设计、发明、创造和筹划。资料能激发暗示，但只有通过参照特别的资料，我们才能判断这些暗示是否恰当。但是暗示的意义却超越当时经验中实际已知之物，暗示预示着未来可能的结果，要去做之事，而不是事情本身（已经做好的事情）。暗示总是从已知事物产生的一个飞跃。推论是对未知之物的入侵，是已知之物产生的一个飞跃。

In this sense, a thought (what a thing suggests but is not as it is presented) is creative,—an incursion into the novel. It involves some inventiveness. What is suggested must, indeed, be familiar in some context; the novelty, the inventive devising, clings to the new light in which it is seen, the different use to which it is put. When Newton thought of his theory of gravitation, the creative aspect of his thought was not found in its materials. They were familiar; many of them commonplaces—sun, moon, planets, weight, distance, mass, square of numbers. These were not original ideas; they were established facts. His originality lay in the use to which these familiar acquaintances were put by introduction into an unfamiliar context. The same is true of every striking scientific discovery, every great invention, every admirable artistic production. Only silly folk identify creative originality with the extraordinary and fanciful; others recognize that its measure lies in putting everyday things to uses which had not occurred to others. The operation is novel, not the materials out of which it is constructed.

在这个意义上，每一种思想（即每一种事物所暗示的，但并非像它所呈现的那样）都是对新事物的创造性尝试。它含有某种发明的性

质。当然，所暗示之物必须在某种背景下为人所熟悉，而自身必须有创新之处，让大家用新眼光看之，用不同方法来使用之。当牛顿在思考其万有引力原理时，他的创见并非体现在所研究的材料上。这些材料是人所共知的；其中许多是平凡的——如太阳、月亮、行星、重量、距离、质量、数的平方。这些都不是有独创性的观念，而是既定的事实。牛顿的创造性在于利用这些人所共知的材料，把它们引导到未知的背景中去。世界上每一惊人科学发现，每一重大发明，每一令人欣羡的艺术成果，也都是如此产生的。只有傻瓜才把创造视为离奇和幻想的事情。其他人则认为，所谓创见就是用别人想不到的方法来使用日常物品。使人新奇的是新的操作方法，而不是所用的材料。

The educational conclusion which follows is that all thinking is original in a projection of considerations which have not been previously apprehended. The child of three who discovers what can be done with blocks, or of six who finds out what he can make by putting five cents and five cents together, is really a discoverer, even though everybody else in the world knows it. There is a genuine increment of experience; not another item mechanically added on, but enrichment by a new quality. The charm which the spontaneity of little children has for sympathetic observers is due to perception of this intellectual originality. The joy which children themselves experience is the joy of intellectual constructiveness—of creativeness, if the word may be used without misunderstanding.

关于教育，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切自己从未想到过的想法都是有创见的。一个三岁的儿童发现了怎么玩积木；或者一个六岁的儿童发现把五分钱和五分钱相加可以组成什么，即使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这样做，他也是一个发现者。这里存在着一种经验真正的增长：不是机械地增加了新的项目，而是一种新品质带来的经验的丰富。对于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来说，幼小儿童自发行为的魅力归结于

他们对这种充满智慧的创造力的领悟。如果创造性一词不被误解的话，儿童自己体验到的快乐，就是理智的创造性带来的快乐。

The educational moral I am chiefly concerned to draw is not, however, that teachers would find their own work less of a grind and strain if school conditions favored learning in the sense of discovery and not in that of storing away what others pour into them; nor that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give even children and youth the delights of personal intellectual productiveness—true and important as are these things. It is that no thought, no idea, can possibly be conveyed as an idea from one person to another. When it is told, it is, to the one to whom it is told, another given fact, not an idea. The communication may stimulate the other person to realize the question for himself and to think out a like idea, or it may smother his intellectual interest and suppress his dawning effort at thought. But what he directly gets cannot be an idea. Only by wrestling with the conditions of the problem at first hand, seeking and finding his own way out, does he think. When the parent or teacher has provided the conditions which stimulate thinking and has taken a sympathetic attitude toward the activities of the learner by entering into a common or conjoint experience, all has been done which a second party can do to instigate learning. The rest lies with the one directly concerned. If he cannot devise his own solution (not of course in isolation, but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teacher and other pupils) and find his own way out he will not learn, not even if he can recite some correct answer with one hundred per cent accuracy. We can and do supply ready-made 'ideas' by the thousand; we do not usually take much pains to see that the one learning engages in significant situations where his own activities generate, support, and clinch ideas—that is, perceived meanings or connection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teacher is to stand off and look on; the alternative to furnishing ready-made subject matter and listening to the accuracy with which it is reproduced is not quiescence, but participation, sharing, in an activity. In such shared activity, the teacher is a learner, and the learner is, without knowing it, a teacher—and upon the whole, the less consciousness there is, on either side, of either giving or receiving instruction, the better.

但是，我主要想谈的教育上的教训并不是说，如果学校支持启发式学习，而不支持学生死记硬背，教师就会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那么辛苦和劳累了；也并不是说，这样就能使儿童和青年享受到个人知识成果的快乐——虽然这种结果的确有，也很重要。我想要说的是：没有任何思想和观念能以观念的形式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当有人把观念告诉别人时，对听到的人来说，已不再是观念，而是一个已知的事实。这种交流也许能刺激听者，让他认清问题所在，提出一个类似的观念；也可能使他丧失智力思考的兴趣，打消了他进行思考的尝试。但是，他直接得到的总不会是一个观念。只有当他亲自考虑问题的种种条件，自己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他才真正在思考。当父母或教师提供了刺激思维的条件，并且通过共同的体验，对学习者的行为采取了同情的态度，这样他们就做到了作为第二方为了鼓动学习者学习所能做的一切。其余的事情要由当事人自己去做。如果他自己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不是与老师、同学隔绝，而是与他们保持联系），自己寻找出路，他就学不到什么。即使他能背出一些百分之百正确的答案，他还是什么也学不到。我们能够向学生提供数以千计的现成“观念”，而且的确这样做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尽力使学生在有意义的环境中学习。在这样的环境，他自己的行为能产生观念、支持观念和坚守观念——即已感知的事物的意义或关联。这并不是意味着要让老师袖手旁观，无所事事。老师虽然不再向学生提供现成教学题材，然后用心听他背诵得是否正确，但这并不是要他保持沉默，而是要共同参与学生的活动。在这种共同参与的活动中，老师是学习者，而学习者不知不觉地则成了老师。总的看来，双方越是意识不到

到自己是在施教或受教，效果就越好。

IV．Ideas, as we have seen, whether they be humble guesses or dignified theories, are anticipations of possible solutions. They are anticipations of some continuity or connection of an activity and a consequence which has not as yet shown itself. They are therefore tested by the operation of acting upon them. They are to guide and organize further observations, recollections, and experiments. They are intermediate in learning, not final. All educational reformers, as we have had occasion to remark, are given to attacking the passivity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They have opposed pouring in from without, and absorbing like a sponge; they have attacked drilling in material as into hard and resisting rock. But it is not easy to secure conditions which will make the getting of an idea identical with having an experience which widens and makes more precise our contact with the environment. Activity, even self-activity, is too easily thought of as something merely mental, cooped up within the head, or finding expression only through the vocal organs.

4．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观念无论是谦卑的猜测还是高贵的理论，都只是在预料可能的解决方法，预料某一行为的某种持续或联系和一个尚未显现的结果。因此，观念是通过行为来检验的。观念将指导和组织进一步的观察、反思和实验。观念是学习的中间物，而不是最后的目标。我们曾经说过，所有教育改革家总是抨击传统教育的被动性。他们反对从外部的注入式教学，即好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反对像钻坚硬的岩石一般将教学题材钻进学生的头脑。但是，创造一种条件，使观念的获得等同于经验的获得，扩大我们与环境的接触并使之更为精确，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人的行为，甚至是自我行为，很容易被看成仅仅是束缚在头脑里的精神上的东西，只有通过发声器

官才能被发现。

While the need of application of ideas gained in study is acknowledged by all the more successful methods of instruction, the exercises in application are sometimes treated as devices for fixing what has already been learned and for getting greater practical skill in its manipulation. These results are genuine and not to be despised. But practice in applying what has been gained in study ought primarily to have an intellectual quality.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thoughts just as thoughts are incomplete. At best they are tentative; they are suggestions, indications. They are standpoints and methods for dealing with situations of experience. Till they are applied in these situations they lack full point and reality. Only application tests them, and only testing confers full meaning and a sense of their reality. Short of use made of them, they tend to segregate into a peculiar world of their own. It may be seriously questioned whether the philosophies (to which reference has been made in section 2 of chapter X) which isolate mind and set it over against the world did not have their origin in the fact that the reflective or theoretical class of men elaborated a large stock of ideas which social conditions did not allow them to act upon and test. Consequently men were thrown back into their own thoughts as ends in themselves.

所有较为成功的教学法虽都承认必须把学到的观念应用于实际，但是，这些强调应用的做法有时被视为强化已学知识和获得更多实际运用知识的技能。这种结果是实在的，不可轻视。但是，这种应用已学知识的行为首先应该带有智力思考的特征。我们说过，思想仅仅作为思想是不完全的，它们顶多是临时性，只是暗示和象征，只是对付经验的观点和方法。在运用于实际环境中以前，思想是缺乏充分的意

义和现实性的。只有应用才能检验思想，只有通过检验才能使思想具有充分的意义和现实性。没有经过检验的思想往往自成一个特殊的世界。显然，那些把心理孤立起来，与物质世界相对立的各个哲学流派（参见本书第10章第2节），都源于一批理论家制造了大量观念，而社会又不允许他们实行和检验这些观念。因此，这些人被推回到他们自己的思想中，视思想为目的本身。

However this may be,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a peculiar artificiality attaches to much of what is learned in schools. It can hardly be said that many students consciously think of the subject matter as unreal; but it assuredly does not possess for them the kind of reality which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ir vital experiences possesses. They learn not to expect that sort of reality of it; they become habituated to treating it as having reality for the purposes of recitations, lessons, and examinations. That it should remain inert for the experiences of daily life is more or less a matter of course. The bad effects are twofold. Ordinary experience does not receive the enrichment which it should; it is not fertilized by school learning. And the attitudes which spring from getting used to and accepting half-understood and ill-digested material weaken vigor and efficiency of thought.

不管怎样，毋庸置疑的是，学校中所学的很多东西都带有特定的人为性质。我们虽然不能说有很多学生意识到自己所学的教学题材是不真实的，但是，这种教学题材肯定无法与生动的经验所具有的现实性相提并论。学生学习这种教学题材，也并不指望这种现实性。他们习惯性地认为教学题材的现实性就在于应付课堂问答、上课和考试。这种教学题材被认为对日常生活的经验毫无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会产生两个不良的后果：一是日常经验得不到应有的营养，学校教育并不能使之变得更加丰富；二是因为学生习惯于对教学题材的一知

半解、生吞活剥。把这种教学题材装到头脑里就削弱了思想的活力和效率。

If we have dwelt especially on the negative side, it is for the sake of suggesting positive measures adapted to the effectual development of thought. Where schools are equipped with laboratories, shops, and gardens, where dramatizations, plays, and games are freely used, opportunities exist for reproducing situations of life, and for acquiring and applying information and ideas in the carrying forward of progressive experiences. Ideas are not segregated, they do not form an isolated island. They animate and enrich the ordinary course of life. Information is vitalized by its function; by the place it occupies in direction of action.

如果说我们过多强调了学校教育消极的方面，这是为了提出积极措施使思想得到有效发展。哪所学校设置了实验室、车间和园地，哪所学校自由开展了戏剧、游戏和运动，哪里就存在机会使实际生活的情境重现于校内，使学生获得有用的知识和观念并加以应用，使进步经验向前发展。在这样的学校，观念不会被隔离，不会形成一个孤岛。它们使日常生活更有生气，更加丰富。知识有了用武之地，能适时指导学生行为，因而得到了激活。

The phrase “opportunities exist” is used purposely. They may not be taken advantage of; it is possible to employ manual and constructive activities in a physical way, as means of getting just bodily skill; or they may be used almost exclusively for “utilitarian,” i. e. , pecuniary, ends. But the disposition on the part of upholders of “cultural” education to assume that such activities are merely physical or professional in quality, is itself a product of the

philosophies which isolate mind from direction of the course of experience and hence from action upon and with things. When the "mental" is regarded as a self-contained separate realm, a counterpart fate befalls bodily activity and movements. They are regarded as at the best mere external annexes to mind. They may be necessary for the satisfaction of bodily needs and the attainment of external decency and comfort, but they do not occupy a necessary place in mind nor enact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completion of thought. Hence they have no place in a liberal education—i. e. , one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interests of intelligence. If they come in at all, it is as a concession to the material needs of the masses. That they should be allowed to invade the education of the elite is unspeakable. This conclusion follows irresistibly from the isolated conception of mind, but by the same logic it disappears when we perceive what mind really is—namely, the purposive and directive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ience.

我们有意说"存在机会"。这种机会也许没有得到利用。可能有人从事手工和建筑劳动，而仅仅是作为训练身体技能的手段。也可能有人利用这种机会几乎完全为了"实利的"，即金钱目的。但是，许多拥护"文化"修养的人有一种倾向，认为这类活动仅仅属于身体的或职业的性质。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观的产物。这种哲学观使心智脱离经验的指导，因而也就脱离对事物的影响。如果把"心理的"视为一个独自存在的领域，身体的行为和活动也遇到了极为相似的命运。身体的活动充其量只是被视为是心理的外部附属品。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达到外表的体面和舒适，也许需要身体的活动，但是身体活动在心理方面并不是必要的，对思想的完善也不起必不可少的作用。因此，身体活动在通识教育，即致力于培养智力的教育里，没有地位。即使身体活动渗入到通识教育，也不过是对民众物质需要的让步。至于说到要让身体活动进入精英教育，那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观点必然受到孤立看待心理的人士的支持。然而，当我们如实地看待心理，即把之视为

经验发展中的有目标的指导性因素时，根据同样的逻辑，这种观点也就消失了。

While it is desirable that al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hould be equipped so as to give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for acquiring and testing ideas and information in active pursuits typifying important social situations, it will, doubtless, be a long time before all of them are thus furnished. But this state of affairs does not afford instructors an excuse for folding their hands and persisting in methods which segregate school knowledge. Every recitation in every subject gives an opportunity for establishing cross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lesson and the wider and more direct experiences of everyday life. Classroom instruction falls into three kinds. The least desirable treats each lesson as an independent whole. It does not put upon the student the responsibility of finding points of contact between it and other lessons in the same subject, or other subjects of study. Wiser teachers see to itthat the student is systematically led to utilize his earlier lessons to help understand the present one, and also to use the present to throw additional light upon what has already been acquired. Results are better, but school subject matter is still isolated. Save by accident, out-of-school experience is left in its crude and comparatively irreflective state. It is not subject to the refining and expanding influences of the more accurate and comprehensive material of direct instruction. The latter is not motivated and impregnated with a sense of reality by being intermingled with the realities of everyday life. The best type of teaching bears in mind the desirability of affecting this interconnection. It puts the student in the habitual attitude of finding points of contact and mutual bearings.

虽然我们希望一切教育机构都有相应的计划让学生在有机会在重要的社会实践中获得观念和知识，并有机会去检验这些观念和知识，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仍任重而道远。但是，这并不能给教师袖手旁观、坚持采用使知识脱离实际的教学提供借口。每一门科目的每一次口头答问都有机会在课堂的教学题材与日常生活更为广阔、更为直接的经验之间建立相互联系。课堂教学可以分成三种。最差的一种是把每堂课看作一个独立的整体。这种课堂教学不要求学生去寻找这堂课和同一科目别的课之间或和别的科目之间有什么关联。比较聪明的教师特意系统地引导学生利用过去的功课来理解目前的功课，并利用目前的功课巩固已经获得的知识。这种教学的效果要好一些，但是学校的教学题材还是与实际相脱节的。除偶尔外，校外经验仍然处于无人问津的粗放状况，不能得到直接教学较为准确、较为全面教学题材的提炼和扩充。由于没有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情况相融合，学校的教学题材使学生丧失学习动机。最好的一种教学牢记学校教学题材和现实生活相互联系的必要性，使学生形成一种惯性，习惯于寻找这两方面的接触点和相互关系。

Summary.

总结

Processes of instruction are unified in the degree in which they center in the production of good habits of thinking. While we may speak, without error, of the method of though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inking is the method of an educative experience. The essentials of method are therefore identical with the essentials of reflection. They are first that the pupil have a genuine situation of experience—that there be a continuous activity in which he is interested for its own sake; secondly, that a genuine problem

develop within this situation as a stimulus to thought; third, that he possess the information and make the observations needed to deal with it; fourth, that suggested solutions occur to him which he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in an orderly way; fifth, that he have opportunity and occasion to test his ideas by application, to make their meaning clear and to discover for himself their validity.

教学的过程在培养学生优良思维习惯方面是统一的。我们需要谈到思考的方法，这固然不错，但是更重要的是，思考才是具有教育经验价值的方法。因此，教学法的要素和思维的要素是相同的。这些要素是：第一，学生要有一个真实的经验的情境——要有一个对行为本身感兴趣的连续行为；第二，要在这个情境内部产生一个真实的问题，作为思维的刺激物；第三，要占有知识，从事必要的观察并解决这个问题；第四，要让学生有条不紊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五，要让学生有机会通过实践检验其想法，使之意义明确，并且让他自己验证是否有效。

Chapter 13 The Nature of Method

第十三章　方法的性质

1．The Unity of Subject Matter and Method.

一、教学题材和方法的统一

The trinity of school topics is subject matter, methods, and administration or government. We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two former in recent chapters. It remains to disentangle them from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have been referred to, and discuss explicitly their nature. We shall begin with the topic of method, since that lies closest to the considerations of the last chapter. Before taking it up, it may be well, however, to call express attention to one implication of our theory; the connection of subject matter and method with each other. The idea that mind and the world of things and persons are two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realms—a theory which philosophically is known as dualism—carries with it the conclusion that method and subject matter of instruction are separate affairs. Subject matter then becomes a ready-made systematized classification of the facts and principles of the world of nature and man. Method then has for its province a considerat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this antecedent subject matter may be best presented to and impressed upon the mind; or, a considerat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the mind may be externally brought to bear upon the matter so as to facilitate its acquisition and possession. In theory, at least, one might deduce from a science

of the mind as something existing by itself a complete theory of methods of learning, with no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s to which the methods are to be applied. Since many who are actually most proficient in various branches of subject matter are wholly innocent of these methods, this state of affairs gives opportunity for the retort that pedagogy, as an alleged science of methods of the mind in learning, is futile;—a mere screen for concealing the necessity a teacher is under of profound and accurate acquaintance with the subject in hand.

有关学校的话题有三个：教学题材、方法和管理控制。我们在前几章已经对教学题材和方法有所涉及。现在，我们要把它们与所处情境剥离，详细论述其性质。鉴于方法与上一章的讨论联系最紧密，我们首先就从方法开始。在讨论之前，还要提请特别注意我们理论的内涵：即教学题材和方法的相互联系。有一种哲学上称为二元论的思想认为，心理、事物以及人的世界是各自独立的领域，并由此得出结论：教学方法和教学题材并不互相关联。因此，教学题材就成为自然界和人类的种种事实和原理的现成系统分类。而方法，则是关心怎样才能妥善地将先行的教学题材介绍给学生，并且在他们大脑中留下深刻印象，或者是考虑如何使学生的心智从外部影响教学题材，促进对教学题材的掌握。至少从理论上，人们可以将心理科学看作独自存在的事物，由此推论出一个关于学习方法的完整理论，即便尚未了解这些方法将用于什么科目。由于很多人对各门学科非常精通，但却对教学方法一无所知，这引来了人们的反驳，认为教育学作为一门所谓指导学习的方法是无用的；它只是让人忽略了对教师必须完全准确熟悉所教学科的要求。

But since thinking is a directed movement of subject matter to a completing issue, and since mind is the deliberate and intentional phase of the process, the notion of any such split is radically false.

The fact that the material of a science is organized is evidence that it has already been subjected to intelligence; it has been methodized, so to say. Zoology as a systematic branch of knowledge represents crude, scattered facts of our ordinary acquaintance with animals after they have been subjected to careful examination, to deliberate supplementation, and to arrangement to bring out connections which assist observation, memory, and further inquiry. Instead of furnishing a starting point for learning, they mark out a consummation. Method means that arrangement of subject matter which makes it most effective in use. Never is method something outside of the material.

但是，既然在任务完成前思维为教学题材提供导向，既然心智是这个运动过程的审慎的和有意识的阶段，任何把教学题材和方法割裂开来的看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一门学科的素材总是组织有序的，这个事实说明，该学科已经经过理性的加工，也就是说，已经方法化了。动物学作为一个系统的知识分支，代表着我们通常对动物了解的原始而分散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经过我们仔细考察、审慎补充和安排，发现有助于观察、记忆和进一步探究的相关联系以后取得的。它们标志着学习的结果，而不是学习的出发点。方法就是为使教学题材发挥最大作用做出的安排。它从来就不是素材以外的东西。

How about metho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n individual who is dealing with subject matter? Again, it is not something external. It is simply an effective treatment of material—efficiency meaning such treatment as utilizes the material (puts it to a purpose) with a minimum of waste of time and energy. We can distinguish a way of acting, and discuss it by itself; but the way exists only as a way-of-dealing-with-material. Method is not antithetical to subject matter; it is the effective direction of subject matter to desired results. It is

antithetical to random and ill-considered action,—ill-considered signifying ill-adapted.The statement that method means directed movement of subject matter towards ends is formal. An illustration may give it content. Every artist must have a method, a technique, in doing his work. Piano playing is not hitting the keys at random. It is an orderly way of using them, and the order is not something which exists ready-made in the musician's hands or brain prior to an activity dealing with the piano. Order is found in the disposition of acts which use the piano and the hands and brain so as to achieve the result intended. It is the action of the piano directed to accomplish the purpose of the piano as a musical instrument. It is the same with 'pedagogical' method.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the piano is a mechanism constructed in advance for a single end; while the material of study is capable of indefinite uses. But even in this regard the illustration may apply if we consider the infinite variety of kinds of music which a piano may produce, and the variations in technique required in the different musical results secured. Method in any case is but an effective way of employing some material for some end.

面对教学题材问题的个人又是如何看待方法的呢？同样，方法不是外在的事物，方法不过是对教学题材的有效处理，即花费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利用教学题材以达到目的。我们能够识别行为的方法并且就此展开专门的讨论。但是，它也仅仅作为处理教学题材的方法而存在。方法和教学题材并不对立，它能有效引导出教学题材所期盼的结果。与方法对立的是考虑不周的行为，所谓考虑不周就是不相适应。方法意味着使教学题材到达目的，这句话过于正式。举个例子就能说清楚，每一位艺术家做事都必须有自己的方法或技巧。弹钢琴不是胡乱点击琴键，而是顺序井然地弹奏音键，这种秩序并不是现成东西，并非在弹琴之前就出现在音乐家的双手和头脑中。这种秩序就是对钢琴、双手和头脑的协调使用，以取得预期结果。弹钢琴的行为就是要

完成钢琴作为一种乐器的使命。教学方法也一样。唯一区别是钢琴是事先为了一个单一的目的而建造音乐装置，而教学题材却可以无限制地使用。但是，鉴于钢琴能够演奏无穷无尽的乐曲，取得不同音乐效果所要求的技术上的种种变化，这个例子也是适用的。总之，方法不过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使用某种教学题材的有效途径。

These considerations may be generalized by going back to the conception of experience. Experience as the perception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omething tried and something undergone in consequence is a process. Apart from effort to control the course which the process takes,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of subject matter and method. There is simply an activity which includes both what an individual does and what the environment does. A piano player who had perfect mastery of his instrument would have no occasion to distinguish between his contribution and that of the piano. In well-formed, smooth-running functions of any sort,—skating, conversing, hearing music, enjoying a landscape,—there is no consciousness of separation of the method of the person and of the subject matter. In whole-hearted play and work there is the same phenomenon.

回到前面讨论的经验概念，可以概括如下：经验是对所尝试之事和所经历之事之间联系的见证，因此，经验是一个过程。撇开控制这个过程的进程需要做的努力不谈，教学题材和方法并无区别。仅仅存在一种行为：它既包括个人所做之事，也包括环境所做之事。一位已经与自己的钢琴融为一体的钢琴家没有必要去区分那是个人还是钢琴的贡献。在任何精心组织并顺利进行的活动中，如溜冰、谈话、听音乐、欣赏风景，不会有人刻意划分个人方法和教学题材方法之间的区别。同样的现象也体现在全身心投入的游戏和工作中。

When we reflect upon an experience instead of just having it, we inevitably distinguish between our own attitude and the objects toward which we sustain the attitude. When a man is eating, he is eating food. He does not divide his act into eating and food. But if he makes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act, such a discrimination is the first thing he would effect. He would examine on the one hand the properties of the nutritive material,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acts of the organism in appropriating and digesting. Such reflection upon experience gives rise to a distinction of what we experience (the experienced) and the experiencing—the how. When we give names to this distinction we have subject matter and method as our terms. There is the thing seen, heard, loved, hated, imagined, and there is the act of seeing, hearing, loving, hating, imagining, etc.

如果我们在获得一种经验的同时进行思考，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态度和我们的对象区分开来。有一个人正在吃食物。他并没有把他的行为分成吃和食物。但如果他对这个行为进行科学的研究，他首先就会这样区分：一方面他会考察食物营养成分，另一方面，他会考察人占有食物和消化食物的行为。出于这种对经验的思考，我们经历了什么和怎样去经历之间的区别就产生了。如果要给这一区别命名，我们就采用教学题材和方法这两个名词。一方面是我们看到、听到、喜爱、憎恨和想象的事物本身，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看、听、喜爱、憎恨和想象等行为。

This distinction is so natural and so important for certain purposes, that we are only too apt to regard it as a separation in existence and not as a distinction in thought. Then we make a division between a self and the environment or world. This separation is the root of the dualism of method and subject matter.

That is, we assume that knowing, feeling, willing, etc. , are things which belong to the self or mind in its isolation, and which then may be brought to bear upon an independent subject matter. We assume that the things which belong in isolation to the self or mind have their own laws of operation irrespective of the modes of active energy of the object. These laws are supposed to furnish method. It would be no less absurd to suppose that men can eat without eating something, or that the structure and movements of the jaws, throat muscles, the digestive activities of stomach, etc. , are not what they are because of the material with which their activity is engaged. Just as the organs of the organism are a continuous part of the very world in which food materials exist, so the capacities of seeing, hearing, loving, imagining are intrinsically connected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world. They are more truly ways in which the environment enters into experience and functions there than they are independent acts brought to bear upon things. Experience, in short, is not a combination of mind and world, subject and object, method and subject matter, but is a single continuous interaction of a great diversity (literally countless in number) of energies.

为了某种目的，这种区别显得如此自然，如此重要，我们很容易把它当成单独存在的东西，而非观念上的区分。于是我们把自我与环境或世界区分开来。这就是产生方法和教学题材二元论的根源。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假定，认知、感觉、意愿等是属于处于孤立状态的自我或心智的事物，能对独立的教学题材施加影响。我们还可以这样假设，这些孤立的自我或心智的事物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与对象所具有的活动能量模式无关。这些规律应当为此提供方法。同样荒谬的是，有些人认为，人可以做吃的动作，但不吃任何东西；或者说，由于它们的行为所涉及的材料的关系，牙床的结构和运动，喉部肌肉、胃的消化活动等并不属于自发行为。正如有机体的器官是食物存在世界的连续体一样，看、听、爱、想象等能力与世界的教学题材也有内在联

系。与其说它们是影响事物的独立行为，不如说是环境介入经验而在经验中起作用的途径。总之，经验并非心智与世界、主体和客体、方法和教学题材的结合，而是多种（数不清的）力量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

For the purpose of controlling the course or direction which the moving unity of experience takes we draw a ment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how and the what. While there is no way of walking or of eating or of learning over and above the actual walking, eating, and studying, there are certain elements in the act which give the key to its more effective control.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se elements makes them more obvious to perception (letting other factors recede for the time being from conspicuous recognition). Getting an idea of how the experience proceeds indicates to us what factors must be secured or modified in order that it may go on more successfully. This is only a somewhat elaborate way of saying that if a man watches carefully the growth of several plants, some of which do well and some of which amount to little or nothing, he may be able to detect the special conditions upon which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a plant depends. These conditions, stated in an orderly sequence, would constitute the method or way or manner of its growth.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wth of a plant and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an experience. It is not easy, in either case, to seize upon just the factors which make for its best movement. But study of cases of success and failure and minute and extensive comparison, helps to seize upon causes. When we have arranged these causes in order, we have a method of procedure or a technique.

为了使统一发展的经验进程或方向得到控制，我们从思想上对怎

样（the how）和什么（the what）进行了划分。虽然在实际的行走、吃和学习之外，没有什么方法而言，但是，动作中的某种要素却是更有效控制动作的关键。要特别注意这些要素，使之更加明显，易于辨认，而使其他因素暂时退居次要地位。了解了经验如何发展，我们就能搞清楚为了使经验取得更大成功所必须具备或必须改变的条件。说得清楚些，如果有人仔细观察几种植物的生长情况，有些植物生长良好，有些植物生长缓慢，或者根本不长，他也许会发现植物顺利生长所需的特殊条件。如果对这些条件依次加以说明，就构成植物生长的方法、途径、或方式。植物的生长与经验的顺利发展之间并无区别。无论上面两者中的哪一个，要抓住其最佳运动状态的因素都不容易。不过，对成功和失败事例的研究和细致广泛的比较将有助于了解各种原因。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因依次排列，就会获得一套程序方法或技术。

A consideration of some evils in education that flow from the isolation of method from subject matter will make the point more definite.

认真考虑在教育中孤立方法和教学题材可能会产生的弊端，会使以上论点更加明确。

(i)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is the neglect (of which we have spoken) of concrete situations of experience. There can be no discovery of a method without cases to be studied. The method is derived from observation of what actually happens, with a view to seeing that it happen better next time. But in instruction and discipline, there is rarely sufficient opportunity for children and youth to have the direct normal experiences from which educators might derive an idea of method or order of best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are had under conditions of such constraint that they throw little or no light upon the normal course of an experience to its fruition. “Methods” have then to be authoritatively recommended to teachers, instead of being an expression of their own intelligent observation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y have a mechanical uniformity, assumed to be alike for all minds. Where flexible personal experiences are promoted by providing an environment which calls out directed occupations in work and play, the methods ascertained will vary with individuals—for it is certain that each individual has something characteristic in his way of going at things.

1．首先，存在对经验具体情境的忽视，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了。没有可供研究的具体实例，就不可能发现方法。可以通过观察实际发生的事情来获得方法，以便下次再遇此事时结果会更好。不过，在教学和训练中，儿童和青年很少有足够的机会去获得直接、正常的经验，使老师能够从中获得有关方法或最佳发展顺序的观念。这些在受束缚条件下中获得的经验难以说明或者根本无法说明成功经验的正常途径。因此，各种“方法”不得不由权威性机构推荐给老师，而不是通过老师自身明智的观察得以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机械性高度统一的方法被认为适用于所有儿童。如果要促进灵活的个人经验，就需要提供一种环境，对在工作和游戏中儿童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提出的方法也将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行为方式。

(ii)In the second place, the notion of methods isolated from subject matter is responsible for the false conceptions of discipline and interest already noted. When the effective way of managing material is treated as something ready-made apart from material, there are just three possible ways in which to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lacking by assumption. One is to utilize excitement, shock of pleasure, tickling the palate. Another is to make the consequences of not attending painful; we may use the menace of harm to motivate concern with the alien subject matter. Or a direct appeal may be made to the person to put forth effort without any reason. We may rely upon immediate strain of “will. "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latter method is effectual only when instigated by fear of unpleasant results.

2．其次，与教学题材脱离的方法是我们曾经提到的对训练和兴趣产生误解的原因。如果把管理教学题材的有效途径看作教学题材之外的现成方法，有三种可能的途径来建立所缺乏的关系：一是利用兴奋快乐的冲击来取悦学生；二是让学习不努力的学生感到后果严重，促使学生关心不相干的教学题材，或者发出直接恳求有可能使他不需任何理由就努力学习；三是依靠“意志”的直接压力。但是，这后一种方法只有在当事人害怕产生不愉快的结果时才有效果。

(iii) In the third place, the act of learning is made a direct and conscious end in itself.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learning is a product and reward of occupation with subject matter. Children do not set out, consciously, to learn walking or talking. One sets out to give his impulses for communication and for fuller intercourse with others a show. He learns inconsequence of his direct activities. The better methods of teaching a child, say, to read, follow the same road. They do not fix his attention upon the fact that he has to learn something and so make his attitude self-conscious and constrained. They engage his activities, and in the process of engagement he learns: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more successful methods in dealing with number or whatever. But when the subject matter is not used in carrying forward impulses and habits to significant results, it is

just something to be learned. The pupil's attitude to it is just that of having to learn it. Conditions more unfavorable to an alert and concentrated response would be hard to devise. Frontal attacks are even more wasteful in learning than in war. This does not mean, however, that students are to be seduced unaware into preoccupation with lessons. It means that they shall be occupied with them for real reasons or ends, and not just as something to be learned. This is accomplished whenever the pupil perceives the place occupied by the subject matter in the fulfilling of some experience.

3．第三，将学习行为变成一个直接的、有意识的目的。一般来说，学习是埋头于教学题材之中所得结果和回报。儿童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学习走路或谈话。首先他要有渴望交流以及与别人充分交流的冲动。他从其直接行为的结果中学习。教育儿童比较好的方法，如教他们阅读的方法，也是这样做的。学生不必一心想着自己必须学习，而造成一种压抑感。他可以从事各种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学到东西。学习数学或其他学科比较成功的方法都是如此。但是，如果教学题材不能将冲动和习惯变成有意义的结果，这种教学题材就只不过是供人学习罢了。学生对这种教学题材的态度也就是不得不消极应付。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难唤起学生活跃度和专心致志反应的情形了。相比于战争，学习中正面的冲突消耗更大。但是，这并不是说要诱使学生不知不觉地认真学习。我们的意思是，学生必须带有真正的理由或目的去学习，而不是为学习而学习。如果学生认识到教学题材在完成某种经验中所起的作用，他就会认真学习。

(iv) In the fourth pla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ion of the separation of mind and material, method tends to be reduced to a cut and dried routine, to following mechanically prescribed steps. No one can tell in how many schoolrooms children reciting in

arithmetic or grammar are compelled to go through, under the alleged sanction of method, certain preordained verbal formulae. Instead of being encouraged to attack their topics directly, experimenting with methods that seem promising and learning to discriminate by the consequences that accrue, it is assumed that there is one fixed method to be followed. It is also naively assumed that if the pupils make their statements and explanations in a certain form of “analysis,” their mental habits will in time conform. Nothing has brought pedagogical theory into greater disrepute than the belief that it is identified with handing out to teachers recipes and models to be followed in teaching. Flexibility and initiative in dealing with problems are characteristic of any conception to which method is a way of managing material to develop a conclusion. Mechanical rigid woodenness is an inevitable corollary of any theory which separates mind from activity motivated by a purpose.

4．最后，在心智与教学题材这一对分离物的概念的影响下，方法往往变成了枯燥的常规，机械地沿袭指定的步骤。没人能知道有多少课堂打着认可教学方法的幌子，在算术或语法课的背诵中，迫使学生按照某种预先规定的程序学习。教师不是鼓励儿童直接投入学习，实验似乎有希望的各种方法并从结果中学习辨别方法的价值，而是认为有一种固定的方法可循。有些人天真地认为，如果学生用分析形式来做报告和说明，他们的心理习惯便会符合要求。有一种观点给教育理论带来了很不好的名声，它认为教学法就是把教学上可遵循的配方和模式传授给教师。方法的特性就是处理问题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方法能运用教学题材得出结论。无论是哪种理论，只要将心智与有目标的行为分离开来，就必然是机械呆板的。

2．Method as General and as Individual.

二、一般方法与个人方法

In brief, the method of teaching is the method of an art, of action intelligently directed by ends. But the practice of a fine art is far from being a matter of extemporized inspirations. Study of the operations and results of those in the past who have greatly succeeded is essential. There is always a tradition, or schools of art, definite enough to impress beginners, and often to take them captive. Methods of artists in every branch depend upon thorough acquaintance with materials and tools; the painter must know canvas, pigments, brushes, and the technique of manipulation of all his appliances. Attainment of this knowledge requires persistent and concentrated attention to objective materials. The artist studies the progress of his own attempts to see what succeeds and what fails. The assumption that there are no alternatives between following ready-made rules and trusting to native gifts, the inspiration of the moment and undirected “hard work,” is contradicted by the procedures of every art.

概括地说，教学法是一门艺术，是受目的指导的智力行为。但是高雅艺术的实践远非一种即兴的灵感，重要的是要学习前人成功的经验和结果。一直以来，都有一种传统，或艺术流派，一定会给初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常使他们着迷。每一流派的艺术家所用的方法都依赖于他所完全熟悉的材料和工具。油画家必须懂得油画布、颜料、画笔和使用这些工具的技巧。要有对客观材料持久深入的关注，才能掌握这些知识。艺术家会去跟踪研究自己的各种尝试，弄清楚哪些是成功的，哪些失败了。有人认为，在遵循现成规则和相信天赋之间，在一时灵感和没有指导的“艰苦工作”之间没有替代物。这种看法与所有艺术的程序都是矛盾的。

Such matters as knowledge of the past, of current technique, of materials, of the ways in which one's own best results are assured, supply the material for what may be called general method. There exists a cumulative body of fairly stable methods for reaching results, a body authorized by past experience and by intellectual analysis, which an individual ignores at his peril. As was pointed out in the discussion of habit-forming (ante, p. 58), there is always a danger that these methods will become mechanized and rigid, mastering an agent instead of being powers at command for his own ends. But it is also true that the innovator who achieves anything enduring, whose work is more than a passing sensation, utilizes classic methods more than may appear to himself or to his critics. He devotes them to new uses, and in so far transforms them.

诸如对历史的了解、当下流行技巧和有关材料以及取得最好成绩途径的知识都成为一般方法的素材。经过长期积累，形成了一套为历史经验和理智分析所认可的取得成果的固定方法，如果有人对其视而不见，就要承担风险。我们在讨论习惯养成时曾经指出（请参见原书第49页），一直存在一种危险，即这些方法会变得机械僵化，阻止人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自由支自我支配。但是，当一个革新家取得不朽的成就时，他的作品并非转瞬即逝的轰动。他引用的经典方法比他自己和他的批评家看来还要多，他赋予这些经典的方法新的用途，同时改造了这些方法。

Education also has its general methods. And if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remark is more obvious in the case of the teacher than of the pupil, it is equally real in the case of the latter. Part of his learning, a very important part, consists in becoming master of the methods which the experience of others has shown to be most efficient in like cases of getting knowledge. [14_1] These general methods are in

no way opposed to individual initiative and originality—to personal ways of doing things.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reinforcements of them. For there is radical difference between even the most general method and a prescribed rule. The latter is a direct guide to action; the former operates indirectly through the enlightenment it supplies as to ends and means. It operates, that is to say, through intelligence, and not through conformity to orders externally imposed. Ability to use even in a masterly way an established technique gives no warranty of artistic work, for the latter also depends upon an animating idea.

教育也有一般方法。如果说比起学生，这种说法在教师身上体现得更明显，那在学生身上也一样适用。学生的一部分学习，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于掌握已经被别人经验所证明是更为有效的那些方法。 [15_1] 这些一般方法与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个人行事方法，根本没有矛盾。相反，一般方法是对个人方法的强化。因为，即使最一般的方法也和既定的规则之间还是有着根本区别。后者直接引导行动，前者则通过它对目的和手段所提供的启发而间接地发挥作用。换言之，它通过智力而不是通过服从外部强加的命令起作用。即便有人能够熟练运用成熟的技巧也不能保证造出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因为艺术作品的诞生有赖于富有活力的创见。

If knowledge of methods used by others does not directly tell us what to do, or furnish ready-made models, how does it operate? What is meant by calling a method intellectual? Take the case of a physician. No mode of behavior more imperiously demands knowledge of established mode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an does his. But after all cases are like, not identical. To be used intelligently, existing practices, however authorized they may be, have to be adapted to the exigencies of particular cases.

Accordingly, recognized procedures indicate to the physician what inquiries to set on foot for himself, what measures to try. They are standpoints from which to carry on investigations; they economize a survey of the features of the particular case by suggesting the things to be especially looked into. The physician's own personal attitudes, his own ways (individual methods) of dealing with the situation in which he is concerned, are not subordinated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procedure, but are facilitated and directed by the latter. The instance may serve to point out the value to the teacher of a knowledge of the psychological methods and the empirical devices found useful in the past. When they get in the way of his own common sense, when they come between him and the situation in which he has to act, they are worse than useless. But if he has acquired them as intellectual aids in sizing up the needs, resource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unique experiences in which he engages, they are of constructive value. In the last resort, just because everything depends upon his own methods of response, much depends upon how far he can utilize, in making his own response, the knowledge which has accrued in the experience of others.

如果从他人运用的方法中看不出我们该怎么做，或没有现成模式可循，那么，对他人方法的了解有什么用呢？方法的智力因素意味着什么呢？以医生为例。可以说，大家公认医生最需要掌握有关诊断和治疗的知识。但是，很多病例只是类似，并非完全相同。现有的治疗方法尽管为大家所公认，但是想要运用得当，必须适应特殊病例的需要。因此，公认的治疗方法只能给医生指明他该独立进行什么研究，尝试什么措施。这些方法是调查研究的立足点。通过提出需要特别考察的问题，对某种特殊病例特征的调查就可以节省不少精力。医生本人的态度、他处理问题的方法（个人方法）并不附属于方法的一般原理。相反，一般方法的原理可以促进和指导个人的方法。这个例子说

明，心理学方法的知识和过去行之有效的经验主义的方法对教师所具有的价值。然而，当这些方法与他的常识相违背，而他又必须做出选择时，这些方法则毫无价值可言。但是，在估量他所从事的独特经验的种种需要、办法和困难时，这些方法如在思想上有所帮助，它们就有了建设性的价值。总之，正因为一切取决于他自己的反应方法，许多事情都依赖于他在做出反应时，能在多大程度上运用他人经验所得来的知识。

As already intimated, every word of this account is directly applicable also to the method of the pupil, the way of learning. To suppose that students, whether in the primary school or in the university, can be supplied with models of method to be followed in acquiring and expounding a subject is to fall into a self-deception that has lamentable consequences. (See ante, p. 199.) One must make his own reaction in any case. Indications of the standardized or general methods used in like cases by others—particularly by those who are already experts—are of worth or of harm according as they make his personal reaction more intelligent or as they induce a person to dispense with exercise of his own judgment. If what was said earlier (See p. 187) about originality of thought seemed overstrained, demanding more of education than the capacities of average human nature permit, the difficulty is that we lie under the incubus of a superstition. We have set up the notion of mind at large, of intellectual method that is the same for all. Then we regard individuals as differing in the quantity of mind with which they are charged. Ordinary persons are then expected to be ordinary. Only the exceptional are allowed to have originality. The measure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verage student and the genius is a measure of the absence of originality in the former. But this notion of mind in general is a fiction. How one person's abilities compare in quantity with those of another is none of the teacher's

business. It is irrelevant to his work. What is required is that every individual shall have opportunities to employ his own powers in activities that have meaning. Mind, individual method, originality (these are convertible terms) signify the quality of purposive or directed action. If we act upon this conviction, we shall secure more originality even by the conventional standard than now develops. Imposing an alleged uniform general method upon everybody breeds mediocrity in all but the very exceptional. And measuring originality by deviation from the mass breeds eccentricity in them. Thus we stifle the distinctive quality of the many, and save in rare instances (like, say, that of Darwin) infect the rare geniuses with an unwholesome quality.

我们已经说过，以上所讲的每句话都可以直接适用于学生学习的方法。如果认为向小学生或大学生提供的方法模式能让他们在获取知识和解释问题时照猫画虎，那就是自欺的行为，会产生可悲的后果。（参见原书169页）遇到任何事，人们都必须自己应对。在类似的事例中他人所采用的标准化的或一般性方法，特别是成名专家所采用的方法，是有益还是有害，要看它们使人应对问题时是更加明智，还是诱使他不使用自己的判断。如果我们前面（参见原书159页）对思维创造性的要求过高，过多强调了教育因素而忽略人的本能因素，原因就在于我们受到了迷信的压力。我们提出了一个人人都适用的一般心智的概念。同时，我们认为每个人的心智在分量上是不同的。我们通常指望平常人做平常的事，只有超常的人才应具有创造能力。一般学生和天才学生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缺乏创造性。但是，这种一般心智的概念纯属虚构。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能力在数量上进行比较，并不是教师应做的事。这种比较和教师的工作无关。教师应该做的事是使每一个学生有机会在有意义的活动中运用自己的力量。心智、个人的方法和创造性（这些都是可以转换的术语）表示有目的的或受引导的行为。如果我们本着这个信念去做，即使按传统的标准我们也将获得更多的创造性。如果我们把所谓统一的一般方法强加给每一个人，

所有的人都要成为庸才（最杰出的人除外）。如果用与众不同来衡量创造性，就会使之沾上怪癖。于是，我们扼杀了很多人的特异品质，又使少数天才染上了不健康的品质，只有少数才能例外（如达尔文）。

3．The Traits of Individual Method.

三、个人方法的特征

The most general features of the method of knowing have been given in our chapter on thinking. They are the features of the reflective situation: Problem,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data, projection and elaboration of suggestions or ideas, experimental application and testing; the resulting conclusion or judgment. The specific elements of an individual's method or way of attack upon a problem are found ultimately in his native tendencies and his acquired habits and interests. The method of one will vary from that of another (and properly vary) as his original instinctive capacities vary, as his past experiences and his preferences vary. Those who have already studied these matters are in possession of information which will help teachers in understanding the responses different pupils make, and help them in guiding these responses to greater efficiency. Child-study, psychology, and a knowledge of social environment supplement the personal acquaintance gained by the teacher. But methods remain the personal concern, approach, and attack of an individual, and no catalogue can ever exhaust their diversity of form and tint.

在有关思维的章节里，我们讨论了认知方法的最一般的特征，即反省思维的情境的特征，其中包括：问题、资料的搜集和分析、暗示或观念的提出和说明、实验应用和检验、结论或判断。至于个人的方法或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特殊要素，最终可以在其天赋倾向和后天的习惯和兴趣中找寻。由于原始本能的能力、以往经验和爱好与别人不同，一个人的方法也不同（这种差别是正当的）。凡是对这些问题有过研究的教师都有这方面的了解，这将有助于他们了解不同学生所做出的反应，帮助他们对这些反应加以指导，以取得更大的效果。有关儿童研究、心理学和社会环境的知识可以增加老师对学生的了解。但是方法永远是个人的事情，个人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无法一一罗列。

Some attitudes may be named, however, which are central in effective intellectual ways of dealing with subject matter.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are directness, open-mindedness, single-mindedness (or whole-heartedness), and responsibility.

但是，我会需要提到明智有效处理教学题材的几种态度。其中最重要是：直截了当、虚怀若谷、专心致志和勇于负责。

1 . It is easier to indicate what is meant by directness through negative terms than in positive ones. Self-consciousness, embarrassment, and constraint are its menacing foes. They indicate that a person is not immediately concerned with subject matter. Something has come between which deflects concern to side issues. A self-conscious person is partly thinking about his problem and partly about what others think of his performances. Diverted energy means loss of power and confusion of ideas. Taking an attitude is by no means identical with being conscious of one's attitude. The

former is spontaneous, naive, and simple. It is a sign of whole-soul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 person and what he is dealing with. The latter is not of necessity abnormal. It is sometimes the easiest way of correcting a false method of approach, and of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ans one is employing,—as golf players, piano players, public speakers, etc. , have occasionally to give especial attention to their position and movements. But this need is occasional and temporary. When it is effectual a person thinks of himself in terms of what is to be done, as one means among others of the realization of an end—as in the case of a tennis player practicing to get the “feel” of a stroke. In abnormal cases, one thinks of himself not as part of the agencies of execution, but as a separate object—as when the player strikes an attitude thinking of the impression it will make upon spectators, or is worried because of the impression he fears his movements give rise to.

1．用负面之词而不是正面之词来直截了当地表明心迹，这显然更为容易。自我意识、窘困和拘束是直截了当的天敌。这表明有人并不直接关心教学题材。有东西介入他和教学题材之间，把他的注意力引向了枝节问题。如果有人一方面思考自己的问题，一方面想着别人会怎样看待他的工作，他的精力就会分散，这也就意味着他能力丧失和思维混乱。有人抱有某种态度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前一种态度是自发，朴素，简单的。这是他全神贯注于他所处理之事的标志。后一种态度并不一定是异常的。有时这种态度是纠正错误方法和提高他所采用手段效率的最简单途径。例如打高尔夫球的人，钢琴演奏者，演说家等等，他们有时必须特别注意自己的姿势和动作。但是，这种需要是偶然的和暂时的。如果有人想自己应该怎么做事，作为达到他目的的一个手段，这种态度是有效的。就像打网球一样，需要先练习练习，体验一下打法。不同的情形是，有人不把自己看作行为方的一部分，而是看作一个孤立的物体。这就像一个打网球的人老想着观众会产生什么印象，或者因害怕动作会给人不良印象

而忧虑重重。

Confidence is a good name for what is intended by the term directness. It should not be confused, however, with self-confidence which may be a form of self-consciousness—or of “cheek. " Confidence is not a name for what one thinks or feels about his attitude; it is not reflex. It denotes the straightforwardness with which one goes at what he has to do. It denotes not conscious trust in the efficacy of one's powers but unconscious faith in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situation. It signifies rising to the needs of the situation.

信心这个名词好，能直截了当地表达所要表达的意义。但是，不应该把信心和自信混淆。自信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信心并不代表一个人看待自己的态度，信心并不是条件反射。信心指人对他应该做的事情抱有的一往无前的态度。它并不表明人对自己能力有意识的信任，而是表明无意识地相信事态有多种可能性，表明人奋起应付环境的需要。

We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See p. 199) the objections to making students emphatically aware of the fact that they are studying or learning. Just in the degree in which they are induced by the conditions to be so aware, they are not studying and learning. They are in a divided and complicated attitude. Whatever methods of a teacher call a pupil's attention off from what he has to do and transfer it to his own attitude towards what he is doing impair directness of concern and action. Persisted in, the pupil acquires a permanent tendency to fumble, to gaze about aimlessly, to look for some clew of action beside that which the subject matter

supplies. Dependence upon extraneous suggestions and directions, a state of foggy confusion, take the place of that sureness with which children (and grown-up people who have not been sophisticated by “education”) confront the situations of life.

我们曾经指出（参见原书第169页），反对让学生明显意识到他们是在学习或研究。一旦学校的环境使学生感到他们是在学习，他们就不再研究和学习了。学生的态度是分裂而复杂的。无论教师采取什么方法让学生的注意力离开他应做之事，而转移到他正在做的事情上去，都会损害学生的注意力和行为的直截了当。如果坚持这样做，学生就会养成一种惯性，永远是在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在教学题材以外寻找行动的线索。如此依赖外部的暗示和指导，学生会处于朦胧迷糊的状态，失去对生活坚定的态度。不仅儿童如此，就连那些未因受“教育”而失去天真的成年人也是如此。

2．Open-mindedness. Partiality is, as we have seen, an accompaniment of the existence of interest, since this means sharing, partaking, taking sides in some movement. All the more reason, therefore, for an attitude of mind which actively welcomes suggestions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all sides. In the chapter on Aims it was shown that foreseen ends ar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changing situation. They are the means by which the direction of action is controlled. They are subordinate to the situation, therefore, not the situation to them. They are not ends in the sense of finalities to which everything must be bent and sacrificed. They are, as foreseen, means of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situation. A target is not the future goal of shooting; it is the centering factor in a present shooting. Openness of mind means accessibility of mind to any and every consideration that will throw light upon the situation that needs to be cleared up, and that will

help determine the consequences of acting this way or that. Efficiency in accomplishing ends which have been settled upon as unalterable can coexist with a narrowly opened mind. But intellectual growth means constant expansion of horizons and consequent formation of new purposes and new responses. These are impossible without an active disposition to welcome points of view hitherto alien; an active desire to entertain considerations which modify existing purposes. Retention of capacity to grow is the reward of such intellectual hospitality. The worst thing about stubbornness of mind, about prejudices, is that they arrest development; they shut the mind off from new stimuli. Open-mindedness means retention of the childlike attitude; closed-mindedness means premature intellectual old age.

2．虚怀若谷。我们曾经说过，偏心是伴随兴趣而来的，因为兴趣就是对某种行为有所分担、有所参与、有所袒护。因此，我们需要抱有这样一种态度，积极欢迎来自各方的建议和有关信息。我们曾在教育目标一章说过，预料到的目标是变化中的形势发展的因素。它们是控制行动方向的手段，隶属于形势，而不是形势从属于它们。它们并不是必须屈从所有的事，并为之牺牲的最后结局。预见到的目标是指导形势发展的手段。比如，靶子是当前射击活动中使注意力集中的因素，而不是射击的未来会射中的目标。虚怀若谷就是能接受各种需要澄清的形势和决定行动结果的考虑因素。有些目标被认为是不可更改的终极目标，想要有效达成目标就要有虚怀若谷的心态。但是，智力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视野，形成新的目标和新的反应。如果没有积极接受那些迄今为止不同于自己的观点，如果没有改变现有目标的积极愿望，这些是不可能实现的。持续成长的能力就是虚心接受意见的一种回报。顽固不化、抱有偏见的最大问题就是会抑制发展，使心灵没有机会受到刺激。所谓虚怀若谷，就是指保持孩子般天真的态度；而胸襟闭塞，就是指在理智上会未老先衰。

Exorbitant desire for uniformity of procedure and for prompt external results are the chief foes which the open-minded attitude meets in school. The teacher who does not permit and encourage diversity of operation in dealing with questions is imposing intellectual blinders upon pupils—restricting their vision to the one path the teacher's mind happens to approve. Probably the chief cause of devotion to rigidity of method is, however, that it seems to promise speedy, accurately measurable, correct results. The zeal for “answers” is the explanation of much of the zeal for rigid and mechanical methods. Forcing and overpressure have the same origin, and the same result upon alert and varied intellectual interest.

过高期待程序保持一致和过分要求迅速取得表面结果，是虚怀若谷的态度在学校遇到的主要对手。教师不允许也不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方法处理所发生的问题，这是给学生的智力发展设置障碍。这就像给学生蒙上眼罩，把他们的注意力限制在教师设定好的道路上。教师热衷于如此呆板的方法，主要原因在于这样做能够迅速取得确切的正确结果。急于得到“答案”是急于采用刻板机械方法的主要原因。出于同样的原因，教师喜欢采用强迫高压的方法。这对学生机灵、多样的智力兴趣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Open-mindedness is not the same as empty-mindedness. To hang out a sign saying “Come right in; there is no one at home” is not the equivalent of hospitality. But there is akind of passivity, willingness to let experiences accumulate and sink in and ripen, which is an essential of development. Results (external answers or solutions) may be hurried; processes may not be forced. They take their own time to mature. Were all instructors to realize that the quality of mental process, not the production of correct answers, is

the measure of educative growth something hardly less than a revolution in teaching would be worked.

虚怀若谷与心中空虚不同。家门口挂出一块牌子，写上“家中无人，请进”，并不等于好客。但是，采取一种被动态度，愿意积累经验并且任其深入和成熟，这就是发展的本质。也许可以立即得到结果（表面的答案或解决方法），但也许强制不了过程。过程的成熟需要时间。如果所有教师认识到教育成长的标准不是给出正确答案而是学生心理成长过程的质量，教学上发生的变化不会亚于一场革命。

3．Single-mindedness. So far as the word is concerned, much that was said under the head of “directness” is applicable. But what the word is here intended to convey is completeness of interest, unity of purpose; the absence of suppressed but effectual ulterior aims for which the professed aim is but a mask. It is equivalent to mental integrity. Absorption, engrossment, full concern with subject matter for its own sake, nurture it. Divided interest and evasion destroy it.

3．专心致志。就字面意思来说，前面有关“直截了当”的讨论，很多适用于专心致志。但是，“专心致志”一词具有兴趣与目标完全一致的意思；不存在许多虽被压制而仍起作用的外部目标，而明确承认的目标不过是外部目标的一个假面具。专心致志就是心智完整。全神贯注、全心全意学习教学题材，就能养成专心致志的习惯。学习时分心，注意力不集中，就会破坏专心致志的习惯。

Intellectual integrity, honesty, and sincerity are at bottom not matters of conscious purpose but of quality of active response. Their

acquisition is fostered of course by conscious intent, but self-deception is very easy. Desires are urgent. When the demands and wishes of others forbid their direct expression they are easily driven-into subterranean and deep channels. Entire surrender, and whole-hearted adoption of the course of action demanded by others are almost impossible. Deliberate revolt or deliberate attempts to deceive others may result. But the more frequent outcome is a confused and divided state of interest in which one is fooled as to one's own real intent. One tries to serve two masters at once. Social instincts, the strong desire to please others and get their approval, social training, the general sense of duty and of authority, apprehension of penalty, all lead to a half-hearted effort to conform,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lesson,” or whatever the requirement is. Amiable individuals want to do what they are expected to do. Consciously the pupil think he is doing this. But his own desires are not abolished. Only their evident exhibition is suppressed. Strain of attention to what is hostile to desire is irksome; in spite of one's conscious wish, the underlying desires determine the main course of thought, the deeper emotional responses. The mind wanders from the nominal subject and devotes itself to what is intrinsically more desirable. A systematized divided attention expressing the duplicity of the state of desire is the result.

健全的智力、诚实和真挚属于人的本能反应，与有意识的目的毫无关系。当然，有意识的目的也可以养成这些品质，但这很容易成为自欺的行为。人的欲望都迫切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别人的要求和愿望妨碍了这些欲望的直接表现，它们就容易被压抑，坠入隐蔽和深层之处。人不可能完全屈服于别人，全心全意按照别人的要求行动。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蓄意反抗，或者有意设法欺骗别人。但是，结果常常使人的兴趣混乱分散，自己也受到愚弄，以致于弄不清楚自己的真实意图。这就好像同时要侍奉两个主人。一方面，学生的社会本能迫切

希望讨好别人并得到赞许；另一方面他所受的社会训练、他的责任感和权威观念以及担心受罚又使他努力服从教师的命令，专心于学校的功课以及学校的一切要求。要成为可爱的学生就是要达到教师的期望。学生也明白他在有意这样做。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欲望，只是他没有将这些欲望表现出来。要学生留意和欲望相对的东西是令人厌烦的。不管他有意识的欲望是什么，他潜在的欲望决定了他主要思想进程和深层次的情感反应。他偏离了名义上的科目，专心于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结果导致注意力始终分散，愿望也往往表里不一。

One has only to recall his own experiences in school or at the present time when outwardly employed in actions which do not engage one's desires and purposes, to realize how prevalent is this attitude of divided attention—double-mindedness. We are so used to it that we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it is necessary. It may be; if so, it is the more important to face its bad intellectual effects. Obvious is the loss of energy of thought immediately available when one is consciously trying (or trying to seem to try) to attend to one matter, while unconsciously one's imagination is spontaneously going out to more congenial affairs. More subtle and more permanently crippling to efficiency of intellectual activity is a fostering of habitual self-deception, with the confused sense of reality which accompanies it. A double standard of reality, one for our own private and more or less concealed interests, and another for public and acknowledged concerns, hampers, in most of us, integrity and completeness of mental action. Equally serious is the fact that a split is set up between conscious thought and attention and impulsive blind affection and desire. Reflective dealings with the material of instruction is constrained and half-hearted; attention wanders. The topics to which it wanders are unavowed and hence intellectually illicit; transactions with them are furtive. The discipline that comes

from regulating response by deliberate inquiry having a purpose fails; worse than that, the deepest concern and most congenial enterprises of the imagination (since they center about the things dearest to desire) are casual, concealed. They enter into action in ways which are unacknowledged. Not subject to rectification by consideration of consequences, they are demoralizing.

任何人只要回忆一下自己在学校时的经验，回想一下现在他表面上从事的一些并不吸引他的欲望和目的的活动，就会认识到这种注意分散即表里不一的态度是多么普遍。对此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这种态度是必要的。也许真是如此。这样的话，正视这种态度在智力方面的不良影响就显得尤为关键。如果有人有意尝试（或者做出尝试的样子）关注某事，而却在无意识中主动在意自己情投意合之事，其直接可用思维能力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对智力活动效率更加微妙、更加持久的削弱会养成自欺的习惯和对现实的模糊认识。对现实的双重标准，一是对于我们个人的隐蔽兴趣的标准，二是对于大家公认的兴趣的标准。对多数人来说，双重标准有碍心理行为的健全和完整，它还造成了有意识的思维和注意与盲目冲动爱好和欲望之间的分裂。学生对教学题材的学习乃是勉强的，心猿意马的，其注意力也是游移不定的。他感兴趣的事情不能公开，因此在智力上是不合法的，所以只能暗地里偷偷学习。学生希望通过有意识从事有目的的探究，以便获得有条理反应的训练，然而他未能如愿。更糟的是，他最关切的事情和最合志趣的想象活动（这些都与欲望密切相关）都变成偶然的和隐蔽的了。这些行为得不到认可。它们不会因考虑到后果而得到纠正，反而会对道德品质的培养产生不良影响。

School conditions favorable to this division of mind between avowed, public,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undertakings, and private, ill-regulated, and suppressed indulgences of thought are not hard to find. What is sometimes called “stem discipline,” i. e. , external

coercive pressure, has this tendency. Motivation through rewards extraneous to the thing to be done has a like effect. Everything that makes schooling merely preparatory (See ante, p. 64) works in this direction, Ends being beyond the pupil's present grasp, other agencies have to be found to procure immediate attention to assigned tasks. Some responses are secured, but desires and affections not enlisted must find other outlets. Not less serious is exaggerated emphasis upon drill exercises designed to produce skill in action, independent of any engagement of thought—exercises having no purpose but the production of automatic skill. Nature abhors a mental vacuum. What do teachers imagine is happening to thought and emotion when the latter get no outlet in the things of immediate activity? Were they merely kept in temporary abeyance, or even only calloused, it would not be a matter of so much moment. But they are not abolished; they are not suspended; they are not suppressed—save with reference to the task in question. They follow their own chaotic and undisciplined course. What is native, spontaneous, and vital in mental reaction goes unused and untested, and the habits formed are such that these qualities become less and less available for public and avowed ends.

心理分裂的表现一方面是大家承认的、对社会负责的公共事业，另一方面是个人的、盲目的和受压制的思想活动。要发现有助于产生这种心理分裂的学校并非难事。有时所谓的“严格训练”，即外在的强制压力，就表现出这种趋势。以与所做之事无关的回报作为动机，也会有类似的结果。一切使学校教育仅仅成为预备工作的做法也会产生这种倾向（参见原书第55页）。学生目前暂时不能理解教育的目标，必须借用其他力量使学生专注于学业。虽然这种做法能得到一些回应，但是未受到重视的学生的欲望和爱好必须寻找其他出路。同样危害严重的是夸大旨在培养自动技能的机械式训练的重要性，因为这种训练不需任何脑力。大自然憎恶头脑的空虚。教师们可以设想一下，

当学生的思想和感情在当前的行为活动中找不到出路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思想和感情可以暂时搁置或冷冻起来，这就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但是，它们不会消失，不会被搁置起来，也不会受到压制，除非是在完成学校任务之时。它们沿着自己混乱无序和毫无章法的道路前进。如果学生智力反应中表现出来天赋的、自发的和有生命力的东西得不到利用和检验，如此养成的习惯会越来越不适用于为大家承认的公众目的。

4．Responsibility. By responsibility as an element in intellectual attitude is meant the disposition to consider in advance the probable consequences of any projected step and deliberately to accept them: to accept them in the sense of taking them into account, acknowledging them in action, not yielding a mere verbal assent. Ideas, as we have seen, are intrinsically standpoints and methods for bringing about a solution of a perplexing situation; forecasts calculated to influence responses. It is only too easy to think that one accepts a statement or believes a suggested truth when one has not considered its implications; when one has made but a cursory and superficial survey of what further things one is committed to by acceptance. Observation and recognition, belief and assent, then become names for lazy acquiescence in what is externally presented. It would be much better to have fewer facts and truths in instruction—that is, fewer things supposedly accepted, —if a smaller number of situations could be intellectually worked out to the point where conviction meant something real—som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elf with the type of conduct demanded by facts and foresight of results. The most permanent bad results of undue complication of school subjects and congestion of school studies and lessons are not the worry, nervous strain, and superficial acquaintance that follow (serious as these are), but the failure to make clear what is involved in really knowing and

believing a thing.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means severe standards in this regard. These standards can be built up only through practice in following up and acting upon the meaning of what is acquired.

4．勇于承担责任。作为理智态度的一个要素，勇于承担责任是指提前考虑计划步骤的可能后果并且有意承受这些后果。所谓承受这些后果，意思是要考虑这些后果，并会在行动中承认它们，而不是只在口头上同意。我们知道，观念实际上是解决困难局面的观点和方法，是足以影响反应对未来的预料。通常，有人同意某个论断或相信别人所暗示的真理，却对此论断或真理的含义不加以考虑；也有时，有人对同意且必须承担的义务仅作过粗略浅显的研究。因此，所谓观察和认识，相信和同意，成了出于惰性默认外部所提事物的代名词。如果能在教学中少讲一些被公认的事实和真理，并能设置少量的情境，使学生运用智力解决问题，并获得一些真实的信念，把自我与事实以及所预期结果所要求的行为联系在一起，那就会好得多。过分复杂的学校科目和过分繁重的课程和功课所产生的最持久的恶果并不是随之而来的忧心忡忡、神经紧张和肤浅的理解（尽管这些后果是严重的），而是不能使学生明白真正认识一件事和真正相信一件事的含义。对学生智力方面的责任心就是在要这方面有严格的标准。只有通过进一步探索所理解的事物的意义并据此付诸行动，这些标准才能建立起来。

Intellectual thoroughness is thus another name for the attitude we are considering. There is a kind of thoroughness which is almost purely physical: the kind that signifies mechanical and exhausting drill upon all the details of a subject. Intellectual thoroughness is seeing a thing through. It depends upon a unity of purpose to which details are subordinated, not upon presenting a multitude of disconnected details. It is manifested in the firmness with which the

full meaning of the purpose is developed, not in attention, however "conscientious" it may be, to the steps of action externally imposed and directed

因此，理智上的彻底性就是我们所讨论的态度的另一个名称。有一种彻底性几乎完全是物质的；它指的是对一门学科细节详尽无遗的机械式训练。理智上的彻底性就是看穿某件事。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依靠细节所从属的目的的统一性，而不是依靠提出众多不关联的细节。不论如何"细心"，这都表现在阐明目的全部意义的坚定性上，而不是表现在注意外部强加的和指导性的行动步骤上。

Summary.

总结

Method is a statement of the way the subject matter of an experience develops most effectively and fruitfully. It is derived, accordingly, from observation of the course of experiences where there is no conscious distinction of personal attitude and manner from material dealt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method is something separate is connected with the notion of the isolation of mind and self from the world of things. It makes instruction and learning formal, mechanical, constrained. While methods are individualized, certain features of the normal course of an experience to its fruition may be discriminated, because of the fund of wisdom derived from prior experiences and because of general similarities in the materials dealt with from time to time. Expressed in terms of the attitude of the individual the traits of good method are

straightforwardness, flexible intellectual interest or open-minded will to learn, integrity of purpose, and acceptanc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one's activity including thought.

方法是经验素材得到最有效和最成功发展的途径。因此，方法是在观察经验的过程中获得的。在这种经验里，个人的态度和举止与所学习教学题材之间并无有意识的区别。有人认为，方法是孤立的存在，这种看法与把心智和自我与世界隔离的观念有关，这也使得教学和学习变得正式、机械和不自然。虽说方法具有个人差异性，不过基于以往经验的智慧储备和有时所学教学题材的普遍相似之处，我们还是可以辨别出完成经验正常进程的若干特征。用个人态度表达，优良的方法具有以下特征：直截了当的态度，灵活的智力兴趣或虚心的学习愿望，健全的目标和勇于负责，敢于承担包括思维在内的个人行为的后果。

[14_1].This point is developed below in a discussion of what are termed psychological and logical methods respectively. See p. 256.

[15_1].这一点在下面分别讨论心理方法和逻辑方法时有所展开。参见原书256页。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民主与教育（下）

John Dewey

约翰·杜威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民主与教育（下）

Democracy and EducatioII

约翰·杜威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Chapter 14 The Nature of Subject Matter 第十四章　教学题材的性质
- Chapter 15 Play and Work in the Curriculum 第十五章　课程中的游戏和工作
- Chapter 16 The Significance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 第十六章　地理和历史的意义
- Chapter 17 Science in the Course of Study 第十七章　课程中的科学
- Chapter 18 Educational Values 第十八章　教育价值
- Chapter 19 Labor and Leisure 第十九章　工作与娱乐
- Chapter 20 Intellectual and Practical Studies 第二十章　知识科目与实用科目
- Chapter 21 Physical and Social Studies: Naturalism and Humanism　第二十一章　自然科目与社会科目：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
- Chapter 22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orld 第二十二章　个体与世界
- Chapter 23 Vocational Aspects of Education 第二十三章　教育的职业观
- Chapter 24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第二十四章　教育哲学
- Chapter 25 Theories of Knowledge 第二十五章　认识论
- Chapter 26 Theories of Morals 第二十六章　道德论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Chapter 14 The Nature of Subject Matter

第十四章　教学题材的性质

1．Subject Matter of Educator and of Learner.

一、教师的题材与学生的题材

So far as the nature of subject matter in principle is concerned, there is nothing to add to what has been said (See ante, p. 158). It consists of the facts observed, recalled, read, and talked about, and the ideas suggested, in course of a development of a situation having a purpose. This statement needs to be rendered more specific by connecting it with the materials of school instruction, the studies which make up the curriculum.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our definition in application to reading, writing, mathematics, history, nature study, drawing, singing, physics, chemistry, modern and foreign languages, and so on?

前面已经论述过教学题材的性质（参见原书第134页），在这里没什么需要补充。题材就是在有目标的情景发展过程中所观察、回忆，阅读和谈论的各种事实以及提出的各种见解。将上述说法同教学材料和组成课程的学科联系起来，可以表达得更具体。我们的定义应用到阅读，写作，数学，历史，自然，绘画，音乐，物理，化学和外语等学科中有何意义呢？

Let us recur to two of the points made earlier in our discussion. The educator's part in the enterprise of education is to furnish the environment which stimulates responses and directs the learner's course. In last analysis, all that the educator can do is modify stimuli so that response will as surely as is possible result in the formation of desirable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dispositions. Obviously studies or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curriculum have intimately to do with this business of supplying an environment. The other point is the necessity of a social environment to give meaning to habits formed. In what we have termed informal education, subject matter is carried directly in the matrix of social intercourse. It is what the persons with whom an individual associates do and say. This fact gives a clew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formal or deliberate instruction. A connecting link is found in the stories, traditions, songs, and liturgies which accompany the doings and rites of a primitive social group. They represent the stock of meanings which have been precipitated out of previous experience, which are so prized by the group as to be identified with their conception of their own collective life. Not being obviously a part of the skill exhibited in the daily occupations of eating, hunting, making war and peace, constructing rugs, pottery, and baskets, etc. , they are consciously impressed upon the young; often, as in the initiation ceremonies, with intense emotional fervor. Even more pains are consciously taken to perpetuate the myths, legends, and sacred verbal formulas of the group than to transmit the directly useful customs of the group just because they cannot be picked up, as the latter can be in the ordinary processes of association.

让我们回到先前讨论的两个论点上来。在教育事业中，教师的任务在于为学生提供一个能够刺激其反应和引导学习进程的环境。教师

所能做的只是改变刺激源，使相应的反应能够最大可能地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智力和情感修养。显然，各门课程的内容或者教学题材主要是为了提供这样的学习环境。另外一点就是需要一个社会环境使养成的习惯有意义。在我们通常所称的“非正规教育”中，教学题材直接用于社交的情境中。社交即是相互联系的个体之间的言行。这种事实为我们理解正规教育或者有意为之的教育中的教学题材提供了线索。在原始社群中，我们会发现和行为仪式相关的各种故事、传统、歌谣和祷文之间紧密相连。它们代表着过去经历沉淀下来的意义的积累，成员们如此珍视它们以至于将其等同于社群的集体生活。这些东西虽然并不明显属于日常生活，如饮食、狩猎、交战和停战、制作地毯、陶瓷和箩筐等技能，它们却深刻影响着年轻一代，通常，正如像在成人仪式上一样，让他们怀有极大的热忱。与直接传播对社会有益的风俗习惯相比，人们甚至更致力于永久保存社会的神话、传说和口口相传的圣语，因为在日常社交过程中，风俗习惯可以慢慢习得，而神话传说却难以习得。

As the social group grows more complex, involving a greater number of acquired skills which are dependent, either in fact or in the belief of the group, upon standard ideas deposited from past experience, the content of social life gets more definitely formulated for purposes of instruction. As we have previously noted, probably the chief motive for consciously dwelling upon the group life, extracting the meanings which are regarded as most important and systematizing them in a coherent arrangement, is just the need of instructing the young so as to perpetuate group life. Once started on this road of selection, formulation, and organization, no definite limit exists.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and of printing gives the operation an immense impetus. Finally, the bonds which connect the subject matter of school study with the habits and ideals of the social group are disguised and covered up. The ties are so loosened that it often appears as if there were none; as if subject matter

existed simply as knowledge on its own independent behoof, and as if study were the mere act of mastering it for its own sake, irrespective of any social values. Since it is highly important for practical reasons to counteract this tendency (See ante, p. 10) the chief purposes of our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re to make clear the connection which is so readily lost from sight, and to show in some detail the social content and function of the chief constituents of the course of study.

随着社会群体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获得了更多的技能。而事实上或者按社会成员的观点，这些技能依赖于过去经验总结出来的规范性理念，于是便更加确切地产生了以教育为目的社会生活内容。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强调那样，有意识地融入群体生活并从中吸取意义，然后使之条理清楚，系统化，这些行为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教育下一代以便延续群体生活。这条选择、表述和组织工作一旦启动，就永无止境了。书写和印刷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工作的开展。最终，连接教学题材和社会群体习惯与理想的纽带被遮蔽和掩盖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如此松散，看起来似乎是毫无关联一样。教学题材似乎只是作为独立的知识而存在，学习也仅仅就是习得这些知识而已，没有任何社会价值。为了某些实际的原因而反对这些趋势，这非常重要（参见原书第8页），进行理论分析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揭示清楚这种行将消失的联系，并且详细阐述学习课程的主要构成部分的社会要旨和功用。

The points need to be consider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nstructor and of student. To the former, the significance of a knowledge of subject matter, going far beyond the present knowledge of pupils, is to supply definite standards and to reveal to him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crude activities of the immature. (i) The material of school studies translates into concrete and detailed terms the meanings of current social life which it is desirable to

transmit. It puts clearly before the instructor the essential ingredients of the culture to be perpetuated, in such an organized form as to protect him from the haphazard efforts he would be likely to indulge in if the meanings had not been standardized. (ii) A knowledge of the ideas which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past as the outcome of activity places the educator in a position to perceive the meaning of the seeming impulsive and aimless reactions of the young, and to provide the stimuli needed to direct them so that they will amount to something. The more the educator knows of music the more he can perceive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inchoate musical impulses of a child. Organized subject matter represents the ripe fruitage of experiences like theirs, experiences involving the same world, and powers and needs similar to theirs. It does not represent perfection or infallible wisdom; but it is the best at command to further new experiences which may, in some respects at least, surpass the achievements embodied in existing knowledge and works of art.

我们需要从教师和学生的角度分别来考虑这个问题。由于教师对某一题材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这就为学生提供明确的标准并向他们揭示幼年时期种种可能的粗鲁行为。（1）学校的教学题材将想要传递的当前社会生活内容转换成具体详细的语言。这种教学题材以一种组织清晰的形式向教师展现要永久保留的文化修养精髓，这样可以避免因为教学题材内容未规范化而造成的无计划且徒然的努力。（2）教师对过去的各种活动产生的思想观念的了解能够帮助他们理解学生表面看起来冲动而无目的的反应，然后提供必要的刺激引导他们有所作为。教师对音乐了解得越多，他便越容易理解儿童幼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对音乐产生的突如其来的想法。组织有序的教学题材代表着和儿童经历相似的很多经历的成熟产物，这些经历所涉及的同一世界、能力和需求均与儿童的相似。这些题材虽然并不意味着完美或者代表万无一失的智慧，但是它最有利于促进新经验形

成。至少在某些方面，这些新经验能超越现有的知识和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成就。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educator, in other words, the various studies represent working resources, available capital. Their remotenes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young is not, however, seeming; it is real.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learner is not, therefore, it cannot be, identical with the formulated, the crystallized, and systematized subject matter of the adult; the material as found in books and in works of art, etc. The latter represents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former; not its existing state. It enters directly into the activities of the expert and the educator, not into that of the beginner, the learner. Failure to bear in mind the difference in subject matter from the respective standpoints of teacher and student is responsible for most of the mistakes made in the use of texts and other expressions of preexistent knowledge.

换句话说，从教师的角度讲，不同的课程代表着各种可用的资源和资本。但是这些课程与儿童的生活经历相去甚远，这并非只是表面如此，而是事实。因此，学生的题材与公式化、定型化和系统化的成年人题材不是相同的，也不可能是相同的；它们与书中的素材和艺术品的素材也不相同。成年人题材代表的是学生的可能情况，而不是其现状。成年人题材与专家和教师的行为直接有关，而与初学者或者学生的行为无关。倘若难以区分从教师和学生这两个角度看待题材的不同，常常会导致在使用教学题材时产生各种错误和表达既定知识内容时发生失误。

The need for a knowledge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functions, in the concrete, of human nature is great just because the teacher's

attitude to subject matter is s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pupil. The teacher presents in actuality what the pupil represents only in posse. That is, the teacher already knows the things which the student is only learning. Hence the problem of the two is radically unlike. When engaged in the direct act of teaching, the instructor needs to have subject matter at his fingers' ends; his attention should be upon the attitude and response of the pupil. To understand the latter in its interplay with subject matter is his task, while the pupil's mind, naturally, should be not on itself but on the topic in hand. Or to state the same point in a somewhat different manner: the teacher should be occupied not with subject matter in itself but in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pupil's present needs and capacities. Hence simple scholarship is not enough. In fact, there are certain features of scholarship or mastered subject matter—taken by itself—which get in the way of effective teaching unless the instructor's habitual attitude is one of concern with its interplay in the pupil's own experience. In the first place, his knowledge extends indefinitely beyond the range of the pupil's acquaintance. It involves principles which are beyond the immature pupil'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est. In and of itself, it may no more represent the living world of the pupil's experience than the astronomer's knowledge of Mars represents a baby's acquaintance with the room in which he stays.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method of organization of the material of achieved scholarship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beginner. It is not true that the experience of the young is unorganized—that it consists of isolated scraps. But it is organized in connection with direct practical centers of interest. The child's home is, for example, the organizing center of his geographical knowledge. His own movements about the locality, his journeys abroad, the tales of his friends, give the ties which hold his items of information together. But the geography of the geographer, of the one who has already develope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smaller experiences, is organiz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hip which the various facts bear to one another—not the relations which they bear to his house, bodily movements, and friends. To the one who is learned, subject matter is extensive, accurately defined, and logically interrelated. To the one who is learning, it is fluid, partial, and connected through his personal occupations. [1_1] The problem of teaching is to keep the experience of the student moving in the direction of what the expert already knows. Hence the need that the teacher know both subject matter and the characteristic needs and capacities of the student.

教师需要具体了解人性的构成和功能，这至关重要，因为教师对待教学题材的态度与学生对待教学题材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教师事实上提出的只是学生潜在可能代表的模式，也就是说，教师已经了解了学生正在学习的知识。所以，二者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在直接从事教学活动时，教师需要彻底熟悉教学题材；他的注意力需要集中在学生的态度和反应上。了解学生与教学题材的互动是教师的职责。同时，学生的思想自然应该集中在正在学习的话题上，而不是集中在它自身上。换个说法即是：教师不能将自己局限于教学题材上，而要关注该题材与学生当前需求和能力的相互作用。因此，光凭教师仅有的学问是不够的。实际上，如果教师不能习惯性地关心教学题材和学生经验的相互作用，教师的学问和他所熟练掌握的题材反而会阻碍教学的有效性。首先，教师的知识大大超出学生的知识范围。它包含的一些原理超出了幼年学生的理解力和兴趣。这种知识本身并不代表儿童所经历的大千世界，就像宇航员对火星的了解并不能代表着幼儿对于他所处的房间的了解一样。第二，学术题材的组织方法与初学者题材的组织方法有所不同。有人认为，儿童的经验是无组织的，只是孤立的经验碎片。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儿童的经验是通过直接与实际兴趣中心相联系而得来的。例如，孩子的家就是他的地理知识的中心。他自己在当地的活动，国外旅行以及朋友的故事为他提供了将各种信息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但是地理学家以及那些已经领会这些经验含义

的人的地理知识则是依据事实之间的关联系而获得的，这与他的房屋、身体运动和朋友无关。对于有学问的人说，教学题材是涉及广泛、表述精确、逻辑上相互关联的。对于正在学习的人来说，教学题材则是不固定的，不完整的，是通过自身的使用和学习才相互联系起来的。[2_1] 教学的问题在于保持学生的经验不断地朝专家已知的东西方向前进。所以，教师不仅需要了解教学题材，也需要了解学生特有的需求和能力。

2．The Development of Subject Matter in the Learner.

二、学生题材的发展

It is possible, without doing violence to the facts, to mark off three fairly typical stages in the growth of subject matter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learner. In its first estate, knowledge exists as the content of intelligent ability—power to do. This kind of subject matter, or known material, is expressed in familiarity or acquaintance with things. Then this material gradually is surcharged and deepened through communicated knowledge or information. Finally, it is enlarged and worked over into rationally or logically organized material—that of the one who, relatively speaking, is expert in the subject.

随着学习者经验的增长，教学题材的发展根据事实可以划分为三个相当典型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学生的知识是关于智力方面的内容，即做事能力。这种类型的教材或已知材料是用于帮助学生熟悉和了解事物。在第二阶段，教学题材的内容通过交流的知识和信息逐渐得到充实和加深。在最后阶段，教学题材进一步扩充，加工成了合理

的或合乎逻辑的且有组织的材料。掌握这种材料的人，相对来说，是该学科的专家。

I . The knowledge which comes first to persons, and that remains most deeply ingrained, is knowledge of how to do; how to walk, talk, read, write, skate, ride a bicycle, manage a machine, calculate, drive a horse, sell goods, manage people, and so on indefinitely. The popular tendency to regard instinctive acts which are adapted to an end as a sort of miraculous knowledge, while unjustifiable, is evidence of the strong tendency to identify intelligent control of the means of action with knowledge. When educ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scholastic conception of knowledge which ignores everything but scientifically formulated facts and truths, fails to recognize that primary or initial subject matter always exists as matter of an active doing, involving the use of the body and the handling of material, the subject matter of instruction is isolated from the needs and purposes of the learner, and so becomes just a something to be memorized and reproduced upon demand. Recognition of the natural course of development, on the contrary, always sets out with situations which involve learning by doing. Arts and occupations form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curriculum, corresponding as they do to knowing how to go about the accomplishment of ends.

1．人们最初获得的知识，即最根深蒂固地保持着的知识，是关于怎样去做的知识。例如，怎样行走、谈话、阅读、书写、滑冰、骑车、操纵机器、演算、骑马、售货、待人接物等。人们通常倾向于把适应于某一目的的本能行为看作是一种神奇的知识。这虽然并不合理，但却证明人们易于把对行为手段的明智控制同知识联系起来。如果教育在忽视其他一切的学究式教育理念影响下，只信奉科学方法论

证的事实和真理，不承认原始或最初的知识总是包含运用身体和处理素材的一种积极主动行为，教学题材就会脱离学习者的需要和目的，变成一种供人死记硬背的复制品。相反，如果认识到教学题材的自然发展过程，知识的学习就会从实践中学习的情境开始。技艺和制作构成课程的最初阶段，这等于告诉学生如何去做才能实现目标。

Popular terms denoting knowledge have always retained the connection with ability in action lost by academic philosophies. Ken and can are allied words. Attention means caring for a thing, in the sense of both affection and of looking out for its welfare. Mind means carrying out instructions in action—as a child minds his mother—and taking care of something—as a nurse minds the baby. To be thoughtful, considerate, means to heed the claims of others. Apprehension means dread of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as well as intellectual grasp. To have good sense or judgment is to know the conduct a situation calls for; discernment is not making distinctions for the sake of making them, an exercise reprobated as hair splitting, but is insight into an affair with reference to acting. Wisdom has never lost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proper direction of life. Only in education, never in the life of farmer, sailor, merchant, physician, or laboratory experimenter, does knowledge mean primarily a store of information aloof from doing.

通常表示知识一词的通俗词语都还保留着经院哲学已经丧失的与行为能力的联系。知（ken）与行（can）是一对同源词。注意（attention）的意思是喜欢某一事物，既包含喜爱，又有照料其福祉的意思。留心（mind）一词有执行指示的意思，例如说一个孩子留心妈妈的话；另一个意思是照料，如保姆照料婴儿。考虑周全（to be thoughtful, considerate）的意思是留意别人的需求。“apprehension”一词有理解的意思，也有忧虑不良后果的意思。

要想很好地理解和把握一个词，就需要了解具体情境下的行为；辨析词义的练习并不像把头发各梳到一边那样为了区分而区分，而是结合行为实例进行有深度的区分。智慧从来不会脱离与生活正确方向之间的联系。只有在教育上，知识才意味着远离实际的信息库；在农民、水手、商人、医生和实验室实验人员的生活中，知识从不会远离实际。

Having to do with things in an intelligent way issues in acquaintance or familiarity. The things we are best acquainted with are the things we put to frequent use—such things as chairs, tables, pen, paper, clothes, food, knives and forks on the commonplace level, differentiating into more special objects according to a person's occupations in life. Knowledge of things in that intimate and emotional sense suggested by the word acquaintance is a precipitate from our employing them with a purpose. We have acted with or upon the thing so frequently that we can anticipate how it will act and react—such is the meaning of familiar acquaintance. We are ready for a familiar thing; it does not catch us napping, or play unexpected tricks with us. This attitude carries with it a sense of congeniality or friendliness, of ease and illumination; while the things with which we are not accustomed to deal are strange, foreign, cold, remote, “abstract. "

明智对待事物的方法需要依据熟悉和了解程度。我们所最为熟悉的事物即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事物——如椅子、桌子、笔、纸、衣服、食物和刀叉等一般物品。根据各人职业的不同，这些物品又可以分为更为特殊的种类。有目的的使用某些词语会使我们熟悉该词，并了解它所代表的事物的感情意义。我们经常与某事物互动或者对其有所举动，就能够预料其如何的动作和反应——这就是熟悉的意义。我们对熟悉的事物已有所准备。它们不会乘人不备，出其不意地捉弄我们。

这种态度包含着意气相投或者友好的感觉，以及有所启发的舒适感觉。而对于自己所不习惯应付的事物，我们则会感觉到陌生、异类、冷漠、遥远和“抽象”。

II．But it is likely that elaborate statements regarding this primary stage of knowledge will darken understanding. It includes practically all of our knowledge which is not the result of deliberate technical study. Modes of purposeful doing includes dealings with persons as well as things. Impulses of communication and habits of intercourse have to be adapted to maintaining successful connections with others; a large fund of social knowledge accrues. As a part of this intercommunication one learns much from others. They tell of their experiences and of the experiences which, in turn, have been told them. In so far as one is interested or concerned in these communications, their matter becomes a part of one's own experience. Active connections with others are such an intimate and vital part of our own concern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draw sharp lines, such as would enable us to say, “Here my experience ends; there yours begins. " In so far as we are partners in common undertakings, the things which others communicate to us a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particular share in the enterprise blend at once into the experience resulting from our own special doings. The ear is as much an organ of experience as the eye or hand; the eye is available for reading reports of what happens beyond its horizon. Things remote in space and time affect the issue of our actions quite as much as things which we can smell and handle. They really concern us, and, consequently, any account of them which assists us in dealing with things at hand falls within personal experience.

2．但是以上对第一阶段的详细阐述可能会让人理解起来更难。

这个阶段的知识实际上包括一切不是通过专门研究学习所获得的知识。有意为之的模式包括待人接物。交流的冲动和交际的习惯应该与维持成功的人际关系相适应，这样自然就会增长大量社会知识。个人作为相互交流沟通的一分子，能够从他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讲述自己的经验，同时，也会讲述听来的经验。我们如果对这种交流感兴趣的话，交流的经验便会成为我们自身经验的一部分。我们同别人的积极联系是自身经验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很难划清界限让我们能说："我的经验到这儿结束，你的经验从那里开始。"在我们与别人同做某事时，别人将其做事的经验同我们分享，这些经验就立刻同我们所从事活动的经验相融合在一起了。同眼睛和双手一样，耳朵同样是经验的器官；眼睛能够看到视野范围以外发生之事的报告。时空遥远的事物同我们亲身感受和接触的事物一样能够影响我们的行动结果。它们都确实与我们相关，因此，任何关于它们帮助我们处理眼前事件的记载都属于个人经验范围。

Information is the name usually given to this kind of subject matter. The place of communication in personal doing supplies us with a criterion for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al material in school. Does it grow naturally out of some question with which the student is concerned? Does it fit into his more direct acquaintance so as to increase its efficacy and deepen its meaning? If it meets these two requirements, it is educative. The amount heard or read is of no importance—the more the better, provided the student has a need for it and can apply it in some situation of his own.

这种类型的材料通常称为信息。交流在个人行为中的地位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评估学校信息材料价值的标准。这些信息材料是否从学生所关心的问题中自然地产生？它是否符合学生更直观的认识，从而增加功效，加深意义呢？假如信息材料满足了以上两个条件，它便有教

育意义。学生听到或者读到的数量的多少并不重要——只要学生需要这种信息资料并能将其应用于实际情境中，那么这种信息就是了解得越多越好。

But it is not so easy to fulfill these requirements in actual practice as it is to lay them down in theory. The extension in modern times of the area of intercommunication; the invention of appliances for securing acquaintance with remote parts of the heavens and bygone events of history; the cheapening of devices, like printing, for recording and distributing information—genuine and alleged—have created an immense bulk of communicated subject matter. It is much easier to swamp a pupil with this than to work it into his direct experiences. All too frequently it forms another strange world which just overlies the world of personal acquaintance. The sole problem of the student is to learn, for school purposes, for purposes of recitations and promotions, the constituent parts of this strange world. Probably the most conspicuous connotation of the word knowledge for most persons today is just the body of facts and truths ascertained by others; the material found in the rows and rows of atlases, cyclopedias, histories, biographies, books of travel, scientific treatises, on the shelves of libraries.

但是，理论上规定这两个条件容易，实际应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现代交流范围的扩大、探索遥远星球和过去历史的仪器的发明、印刷、记录和传播信息——有真有伪——工具的降价都制造了大量相互交流的教学题材。用这些题材去教育学生，使他们应接不暇是很容易的；而要把它们引进他的直接经验中去，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些题材往往很容易形成另一个陌生世界，恰好与个人熟悉的世界相对应。学生唯一的问题便是为了学校，为了背诵和得到提拔，去学习这个陌

生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对如今大多数人来说，知识一词最明晰的含义不过是别人所证实的许多事实和真理；是图书馆里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的地图册、百科全书、历史、传记、游记和科学论文等等各种材料。

The imposing stupendous bulk of this material has unconsciously influenced men's notions of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tself. The statements, the propositions, in which knowledge, the issue of active concern with problems, is deposited, are taken to be themselves knowledge. The record of knowledge, independent of its place as an outcome of inquiry and a resource in further inquiry, is taken to be knowledge. The mind of man is taken captive by the spoils of its prior victories; the spoils, not the weapons and the acts of waging the battle against the unknown, are used to fix the meaning of knowledge, of fact, and truth.

这些给人深刻印象、卷帙浩繁的材料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人们对于知识的性质的看法。各种陈述和命题包含着积极应对问题的知识，但却被当作知识本身。知识的记录是探索的成果，也是进一步探索的资源，但是人们直接把其看作知识。人们的思想为先前胜利的战利品所俘获。这些战利品并没有成为探索未知事物的武器，反而被用来确定知识、事实和真理的意义。

If this identification of knowledge with propositions stating information has fastened itself upon logicians and philosopher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same ideal has almost dominated instruction. The “course of study” consists largely of information distributed into various branches of study, each study being subdivided into lessons presenting in serial cutoff portions of the total sto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store was still small enough so that men set up the ideal of a complete encyclopedic mastery of it. It is now so bulky that the impossibility of any one man's coming into possession of it all is obvious. But the educational ideal has not been much affected. Acquisition of a modicum of information in each branch of learning, or at least in a selected group, remains the principle by which the curriculum,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hrough college, is formed; the easier portions being assigned to the earlier years, the more difficult to the later.

如果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都免不了将知识与陈述信息的命题混为一谈，那么，这种思想占据着教学领域也就不足为怪了。学校的课程主要由分散于各门学科的知识所组成，每门课程又细分为若干课时，把总体知识分割成片段传授给学生。在17世纪，这种学科知识体系还不甚庞大，所以提出了掌握全部知识的百科全书式的理想。而如今，知识体系变得异常庞大，显然任何人都不能掌握其全部内容。但是教育目标却并未受到影响。从小学到大学，教学大纲里都会规定学生对各个学科分支的内容都要略知一二。至少规定了要学习一些学科，比较容易的部分放在前几年来学，相对较难的放在后几年学。

The complaints of educators that learning does not enter into character and affect conduct; the protests against memoriter work, against cramming, against gradgrind preoccupation with “facts,” against devotion to wire-drawn distinctions and ill-understood rules and principles, all follow from this state of affairs. Knowledge which is mainly second-hand, other men's knowledge, tends to become merely verbal. It is no objection to information that it is clothed in words; communication necessarily takes place through words. But in the degree in which what is communicated cannot be organized into the existing experience of the learner, it becomes

mere words: that is, pure sense-stimuli, lacking in meaning.

于是，出现了以下引起教育者抱怨、抗议和反对的情形：他们抱怨知识并没有成为人的品性的一部分，也没有影响到人的行为；反对死记硬背和填鸭式教学；反对热衷于讲授过分细微的区别和令人费解的法则和原理。那些间接的、别人的知识仅仅变成了语言材料。我们并不反对以语言为载体的知识，沟通信息必然要用到语言。但是，如果所交流的知识不能灌输到学生已有的经验中，这种知识就仅仅是纯粹的语言：即纯粹的感官刺激，因而变得没有意义。

Then it operates to call out mechanical reactions, ability to use the vocal organs to repeat statements, or the hand to write or to do “sums. “To be informed is to be posted; it is to have at command the subject matter needed for an effective dealing with a problem, and for giving added significance to the search for solution and to the solution itself. Informational knowledge is the material which can be fallen back upon as given, settled, established, assured in a doubtful situation. It is a kind of bridge for mind in its passage from doubt to discovery. It has the office of an intellectual middleman. It condenses and records in available form the net results of the prior experiences of mankind, as an agency of enhancing the meaning of new experiences. When one is told that Brutus assassinated Caesar, or that the length of the year is three hundred sixty-five and one fourth days, or that the ratio of the diameter of the circle to its circumference is 3. 1415… one receives what is indeed knowledge for others, but for him it is a stimulus to knowing. His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depends upon his response to what is communicated.

这种知识只能激起机械的反应，调动发音器官重复别人的陈述或

者用手写字演算。别人传授给我们的知识是我们所获得的间接知识。教学就是使学生掌握材料的过程；这些材料或有助于有效地处理问题，或使得寻求解答和答案本身更有意义。信息材料是在疑难境况中可以依赖的已知的、确凿可信的材料。它是思想从疑惑通往发现的一座桥梁。它如同一个智力中转站，把人类以往经验的最终成果浓缩精简，以一种可行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作为加强新经验意义的工具。当有人得知布鲁特斯杀死了恺撒，或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或者圆周率是3.1514……他所接收的实际上是别人的知识。这种知识对他来说只是认知刺激物。他获取的知识取决于他对所传达的知识的反应。

3．Science or Rationalized Knowledge.

三、科学或者理性化的知识

Science is a name for knowledge in its most characteristic form. It represents in its degree, the perfected outcome of learning,—its consummation. What is known, in a given case, is what is sure, certain, settled, disposed of; that which we think with rather than that which we think about. In its honorable sense, knowledge is distinguished from opinion, guesswork, speculation, and mere tradition. In knowledge, things are ascertained; they are so and not dubiously otherwise. But experience makes us aware that there is difference between intellectual certainty of subject matter and our certainty. We are made, so to speak, for belief; credulity is natural. The undisciplined mind is averse to suspense and intellectual hesitation; it is prone to assertion. It likes things undisturbed, settled, and treats them as such without due warrant. Familiarity, common repute, and congeniality to desire are readily made

measuring rods of truth. Ignorance gives way to opinionated and current error,—a greater foe to learning than ignorance itself. A Socrates is thus led to declare that consciousness of ignorance is the beginning of effective love of wisdom, and a Descartes to say that science is born of doubting.

科学是以一种最独特形式存在的知识的统称，代表着完美无缺的知识成果——知识的成就。科学的知识表明我们在特定领域所认知的事物是确定且可靠的，正确无误的，是我们用以思考的工具而非我们要考虑的对象。就其高雅的含义来讲，知识不同于意见、推测、假设和单纯的传统。知识体系中，事物都是确定的，是即是，非即非，不会含糊不清。但是经验让我们认识到，事关心智的必然性和我们自身的必然性有所不同。可以说，我们容易相信人，自然很容易轻信。我们未经训练的心灵不喜欢悬而不决和智力上的犹豫，更倾向于武断地下结论。我们喜欢无人打扰、固定不变之物并且无需依据就视其为理所当然。知名度、公信力与兴趣相投很容易被用作衡量真理的标准。无知使人易犯固执己见的流行错误，比起无知本身，这种错误对学习的危害性更大。因此，苏格拉底曾说，意识到无知便是有效热爱智慧的开始。笛卡尔也说，科学产生于怀疑。

We have already dwelt upon the fact that subject matter, or data, and ideas have to have their worth tested experimentally: that in themselves they are tentative and provisional. Our predilection for premature acceptance and assertion, our aversion to suspended judgment, are signs that we tend naturally to cut short the process of testing. We are satisfied with superficial and immediate short-visioned applications. If these work out with moderate satisfactoriness, we are content to suppose that our assumptions have been confirmed. Even in the case of failure, we are inclined to put the blame not on the inadequacy and incorrectness of our data

and thoughts, but upon our hard luck and the hostility of circumstance. We charge the evil consequence not to the error of our schemes and our incomplete inquiry into conditions (thereby getting material for revising the former and stimulus for extending the latter) but to untoward fate. We even plume ourselves upon our firmness in clinging to our conceptions in spite of the way in which they work out.

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这样一个事实：即题材或数据和思想的价值必须经过实验的检验，题材和思想本身都是试探性的和短暂的。我们偏爱不成熟的赞同和武断的结论，嫌恶悬而不决的思考判断，这表明我们自然倾向于缩减检验的过程。我们满足于肤浅的、缺乏远见的直接应用。如果这种应用结果勉强使人满意，我们便心满意足，以为自己的假设得到了证实。即使应用失败了，我们也往往并不将其归咎于数据和思想的不足与失误，而是归咎于运气不佳、环境不好。我们并不把失败结果归咎于计划的失误和未对情况做全面探索（进而掌握更多数据以修订计划并获得更多信息以便对情况有更全面的了解），而是归咎于不幸的命运。我们甚至不顾结果如何，为坚守了自己的观念而感到洋洋得意。

Science represents the safeguard of the race against these natural propensities and the evils which flow from them. It consists of the special appliances and methods which the race has slowly worked out in order to conduct reflection under conditions whereby its procedures and results are tested. It is artificial (an acquired art), not spontaneous; learned, not native. To this fact is due the unique, the invaluable place of science in education, and also the dangers which threaten its right use. Without initiation into the scientific spirit one is not in possession of the best tools which humanity has so far devised for effectively directed reflection. One in that case

not merely conducts inquiry and learning without the use of the best instruments, but fails to understand the full meaning of knowledge. For he does not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he traits that mark off opinion and assent from authorized convi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fact that science marks the perfecting of knowing in highly specialized conditions of technique renders its results, taken by themselves, remote from ordinary experience—a quality of aloofness that is popularly designated by the term abstract. When this isolation appears in instruction,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 even more exposed to the dangers attendant upon presenting ready-made subject matter than are other forms of information.

科学是人类同这些自然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恶果相抗争的工具。科学由人类缓慢设计的特殊工具和方法所构成，在思考的程序和结果可以检验的情况下，人们用这种工具和方法来思考。科学是人为的（可获得的技术），不是自发的；是可习得的，不是先天的。出于这一事实，科学在教育中占据着独特且无可估量的地位，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危险，这些危险正威胁科学的合理使用。如果不具备科学精神，我们就不能掌握人类为有效指导思考所设计出的最好工具。由于不能够区分意见和认可与公认信念的特征，我们不但在探索和求知的过程中难以利用最好的科学工具，而且也不能理解知识的丰富意义。另一方面，科学标志着在高度专门化的技术条件下认知的日趋完善，这个事实使科学研究结果自身远离一般的经验——这种脱离经验的性质通常被称为“抽象”。当这种脱离现象出现在讲授现有教学题材的教学中时，科学知识会比其他形式的知识面临更大的危险。

Science has been defined in terms of method of inquiry and testing. At first sight, this definition may seem opposed to the current conception that science is organized or systematized knowledge. The opposition, however, is only seeming, and

disappears when the ordinary definition is completed. Not organization but the kind of organization effected by adequate methods of tested discovery marks off science. The knowledge of a farmer is systematized in the degree in which he is competent. It is organized on the basis of relation of means to ends—practically organized. Its organization as knowledge (that is, in the eulogistic sense of adequately tested and confirmed) is incidental to its organization with reference to securing crops, live-stock, etc. But scientific subject matter is organized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successful conduct of the enterprise of discovery, to knowing as a specialized undertaking.

科学曾被定义为调查探究和验证的方法。乍一看，这个定义似乎悖于科学是有组织的系统化知识的观念。然而，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现象。当通常的定义完善后，这种对立便会消失。区分出科学的并不是普通的系统组织，而是经过验证发现的恰当方法所产生的系统组织。农民的知识系统化了，他就是一个有能力的农民。农民的知识是基于手段与目的关系、基于实践组织起来的。农民知识的构建（说得好听一些，即经过充分验证和证实的知识）是伴随其确保谷物和家畜等生长的知识组织起来的。但是科学的题材是参照成功的发现和把认知作为特别任务而组织起来的。

Reference to the kind of assurance attending science will shed light upon this statement. It is rational assurance,—logical warranty. The ideal of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is, therefore, that every conception and statement shall be of such a kind as to follow from others and to lead to others.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mutually imply and support one another. This double relation of “leading to and confirming” is what is meant by the terms logical and rational. The everyday conception of water is more available

for ordinary uses of drinking, washing, irrigation, etc. , than the chemist's notion of it. The latter's description of it as H2O is superior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lace and use in inquiry. It states the nature of water in a way which connects it with knowledge of other things, indicating to one who understands it how the knowledge is arrived at and its bearings upon other portions of knowledge of the structure of things. Strictly speaking, it does not indicate the objective relations of water any more than does a statement that water is transparent, fluid, without taste or odor, satisfying to thirst, etc. It is just as true that water has these relations as that it is constituted by two molecules of hydrogen in combination with one of oxygen. But for the particular purpose of conducting discovery with a view to ascertainment of fact, the latter relations are fundamental. The more one emphasizes organization as a mark of science, then, the more he is committed to a recognition of the primacy of method in the definition of science. For method defines the kind of organization in virtue of which science is science.

参照科学所具有的可靠性会有助于理解上面这句话。这是理性可靠的，有逻辑的保证。因此，科学组织的理想是，任何概念和陈述都必须彼此关联，始于别的概念和陈述，而又能引入到别的概念和陈述。各种概念和命题之间相互包含、相互支持。这种“推导和论证”的双重关系就是逻辑性和理性的意义。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水的概念更倾向于是平时饮用、洗涤和灌溉等的用品，但化学家对这个概念则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将其看作H2O。从研究的地位和作用上看，这种说法更科学。化学家以一种能够把知识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方式描述水的性质，向熟知水的人们指出，这种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它与其他有关事物结构知识的联系。严格地说，这跟描述水是透明的、流动的，没有味道或气味，能够止渴等一样，并未指出水的客观关系。把水说成有以上特性与把水说成是由两个氢分子和一个氧分子结合而成，两种

说法同样正确。但是如果是带着为了论证事实而去发现的特定目的，后一种说法才算是揭示了事物的根本。我们越强调系统组织是科学的标志，就越倾向于承认方法在科学定义中的首要地位，因为只有方法能说明科学所以成为科学的那种系统组织。

4．Subject Matter as Social.

四、教学题材的社会性

Our next chapters will take up various school activities and studies and discuss them as successive stages in that evolution of knowledge which we have just been discussing. It remains to say a few words upon subject matter as social, since our prior remarks have been mainly concerned with its intellectual aspect. A difference in breadth and depth exists even in vital knowledge; even in the data and ideas which are relevant to real problems and which are motivated by purposes. For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social scope of purposes and the social importance of problems. With the wide range of possible material to select from, it is important that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all its phases short of the most specialized) should use a criterion of social worth.

接下来的几章将会讲到各种类型的校园活动和课程。我们在论述时将其视为上面我们讨论过的知识发展过程中的连续阶段。由于前面主要讨论的是教学题材的智力因素，我们有必要讲一下其社会性。即使是非常重要的知识也存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差异；甚至是与实际问题相关的并且带有一定目的的数据和观念也是如此。各种目的的社会范围和各种问题的社会重要性是有所不同的。由于可供选择的题材范围

非常之广，所以教育（特别是非专业化的普及教育阶段）应该采取一定的社会价值标准，这非常重要。

All information and systematized scientific subject matter have been worked ou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ocial life and have been transmitted by social means. But this does not prove that all is of equal value for the purposes of forming the disposition and supplying the equipment of members of present society. The scheme of a curriculum must take account of the adaptation of studies to the needs of the existing community life; it must select with the intention of improving the life we live in common so that the future shall be better than the past. Moreover, the curriculum must be planned with reference to placing essentials first, and refinements second. The things which are socially most fundamental, that is, which have to do with the experiences in which the widest groups share, are the essentials. The things which represent the needs of specialized groups and technical pursuits are secondary. There is truth in the saying that education must first be human and only after that professional. But those who utter the saying frequently have in mind in the term human only a highly specialized class: the class of learned men who preserve the classic traditions of the past. They forget that material is humanized in the degree in which it connects with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men as men.

一切信息和系统化的科学题材均是在社会化生活中形成的并且是通过社会手段传播的。但是这并不能够证明这些题材对当代社会成员形成良好情操和掌握知识技能具有同等的价值。在设置课程时应考虑到要适应当前的社会生活需要；选择教学题材时必须以改善我们的共同生活为目的，为了使将来比过去更美好。而且，在规划课程时应将基础内容放在第一位，精品内容次之。基础内容即是最基本的社会内

容，有关大众的共同体验的内容。代表特殊群体和专业追求需要的内容则是第二位的。有一个说法非常好：教育必须首先重视人文教育，然后才是培训职业能力的教育。但是说这句话的人常常认为“人文”一词只代表高度专门化的阶层，即保存过去的经典传统的学者阶层。他们忘记了教学题材必须与人类的共同利益有联系才能使其具有人文精神。

Democratic society is peculiarly dependent for its maintenance upon the use in forming a course of study of criteria which are broadly human. Democracy cannot flourish where the chief influences in selecting subject matter of instruction are utilitarian ends narrowly conceived for the masses, and, for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the few, the traditions of a specialized cultivated class. The notion that the “essentials”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are the three R's mechanically treated, is based upon ignorance of the essentials needed for realization of democratic ideals. Unconsciously it assumes that these ideals are unrealizable; it assumes that in the future, as in the past, getting a livelihood, “making a living,” must signify for most men and women doing things which are not significant, freely chosen, and ennobling to those who do them; doing things which serve ends unrecognized by those engaged in them, carried o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others for the sake of pecuniary reward. For preparation of large numbers for a life of this sort, and only for this purpose, are mechanical efficiency in reading, writing, spelling and figuring, together with attainment of a certain amount of muscular dexterity, 'essentials. ' Such conditions also infect the education called liberal, with illiberality. They imply a somewhat parasitic cultivation bought at the expense of not having the enlightenment and discipline which come from concern with the deepest problems of common humanity. A curriculum which acknowledges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education must present situations where problems are relevant to the problems of living together, and where observation and information are calculated to develop social insight and interest.

民主社会的维持尤其要依靠广泛人文标准来制定课程内容。如果为大众选择教学题材主要出于狭隘的实用目的，而为少数人的高等教育选材则主要按照特别有教养的阶级的传统，民主是不会繁荣发展的。有人认为，初等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机械的读、写、算三门，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实现民主理想所需要的基本内容。这种看法假设民主理想无法实现。他们认为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对于大多数男女来说，维持生计或者谋生必然表明他们所做之事不重要，不是自由选择的，而且不能抬高他们的身份。他们不知道所做之事的目的，只是为了金钱在别人指挥下做个不停。教育要为众多的人预设好这种生活，为此目的去教育他们机械阅读、写作、拼写、计算能力并且锻炼出灵敏矫健的身体素质，这便是教育的“基本内容”。这种情形使得所谓的自由教育沾染上了狭隘的风气。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寄生教育，是通过牺牲由关心人类最深刻的问题得来的启蒙和训练换来的。承认教育社会责任的课程必须提供这样一种环境，在此环境中，所探讨的问题都是有关共同生活的问题，所观察数据和信息可以用来培养学生的社会洞察力和兴趣。

Summary.

总结

The subject matter of education consists primarily of the meanings which supply content to existing social life. The

continuity of social life means that many of these meanings are contributed to present activity by past collective experience. As social life grows more complex, these factors increase in number and import. There is need of special selection, formulation, and organization in order that they may be adequately transmitted to the new generation. But this very process tends to set up subject matter as something of value just by itself, apart from its function in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eanings implied in the present experience of the immature. Especially is the educator exposed to the temptation to conceive his task in terms of the pupil's ability to appropriate and reproduce the subject matter in set statements, irrespective of its organization into his activities as a developing social member. The positive principle is maintained when the young begin with active occupations having a social origin and use, and proceed to a scientific insight in the materials and laws involved, through assimilating into their more direct experience the ideas and facts communicated by others who have had a larger experience.

教育题材主要由提供给现存社会生活内容的各种意义组成。社会生活的连续性意味着这些意义中有许多是过去的集体经验指导了我们当今行为。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这些因素在数量上和意义上也随之增加。这些题材需要经过特别的筛选、规划和组织以便能够恰当地传给新一代。但是，除了在促使我们意识到年轻人现成经验所含意义的作用，这个过程容易使教学题材自身也具有价值。尤其是教育工作者易于走入这样的误区，认为他的任务只是用固定的陈述使学生能够占有和掌握教学题材内容，不必去考虑将其用于正在成长的社会一员的学生行为之中。当学生开始从事具有社会性和社会功用的积极活动，通过把更有经验者传授的观点事实融入其更为直接的经验中，进而科学洞察所学教材和法则，我们所主张的积极原则就能够得以维持。

[1_1].Since the learned man should also still be a learner, it will be understood that these contrasts are relative, not absolute. But in the earlier stages of learning at least they are practically all-important.

[2_1].由于学者应该同时也是一个学习者，所以这些对比应该理解成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但是至少在学习的早期，这些对比事实上是非常重要。

Chapter 15 Play and Work in the Curriculum

第十五章　课程中的游戏和工作

1．The Place of Active Occupations in Education.

一、积极活动在教育中的地位

In consequence partly of the efforts of educational reformers, partly of increased interest in child-psychology, and partly of the direct experience of the schoolroom, the course of study has in the past generation undergone considerable modification. The desirability of starting from and with the experience and capacities of learners, a lesson enforced from all three quarters, has l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forms of activity, in play and work, similar to those in which children and youth engage outside of school. Modern psychology has substituted for the general, ready-made faculties of older theory a complex group of instinctive and impulsive tendencies.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when children have a chance at physical activities which bring their natural impulses into play, going to school is a joy, management is less of a burden, and learning is easier.

在上一代学校的课程经历了巨大的调整变革，部分来自于教育改革者的努力，部分来自于研究儿童心理学兴趣的增长，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教学经验的积累。从这三个方面得出的启示，即教学应从学生的经验和能力出发，在游戏和课业中引入的各种形式的活动应该同青少

年在校外所从事的活动类似。现代心理学已经用一套复杂的本能和冲动倾向代替旧理论里关于笼统、现成的能力的观点。经验证明，当儿童有机会从事各种身体活动，在游戏中调动他们的自然冲动的时，上学便成为一种乐趣，儿童管理也不再是一种负担，学习会变得更轻松。

Sometimes, perhaps, plays, games, and constructive occupations are resorted to only for these reasons, with emphasis upon relief from the tedium and strain of “regular” school work. There is no reason, however, for using them merely as agreeable diversions. Study of mental life has made evident the fundamental worth of native tendencies to explore, to manipulate tools and materials, to construct, to give expression to joyous emotion, etc. When exercises which are prompted by these instincts are a part of the regular school program, the whole pupil is engaged, the artificial gap between life in school and out is reduced, motives are afforded for attention to a large variety of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distinctly educative in effect, and cooperative associations which give information a social setting are provided. In short, the grounds for assigning to play and active work a definite place in the curriculum ar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not matters of temporary expediency and momentary agreeableness. Without something of the kind, it is not possible to secure the normal estate of effective learning; namely, that knowledge-getting be an outgrowth of activities having their own end, instead of a school task. More specifically, play and work correspond, point for point, with the traits of the initial stage of knowing, which consists, as we saw in the last chapter, in learning how to do things and in acquaintance with things and processes gained in the doing. It is suggestive that among the Greeks, till the rise of conscious philosophy, the same word, τεχήυ, was used for art and science. Plato gave his account

of knowledge on the basis of an analysis of the knowledge of cobblers, carpenters, players of musical instruments, etc. , pointing out that their art (so far as it was not mere routine) involved an end, mastery of material or stuff worked upon, control of appliances, and a definite order of procedure—all of which had to be known in order that there be intelligent skill or art.

有时，人们或许仅仅因为上述原因才参与游戏、比赛和各种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旨在使学生从单调沉闷的“正规”课业中得到解脱。然而，没有理由把这些活动仅仅作为愉悦的消遣。对人的心理生活的研究表明，探索、运用工具和材料、建造、表达欢乐情感等天生的倾向具有重要的价值。当这些由本能激起的活动成为学校正规课程的一部分时，学生便能融入学习中，校内外生活产生的人为隔阂就会减小，学生会有足够的动机去关心具有明显教育作用的各种材料和过程，相互合作，主动了解与知识材料有关的社会背景。总之，游戏和积极活动在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既有智力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并非权宜之计或是心血来潮。倘若没有这种游戏和积极的活动，学生就不可能进行正常有效的学习。知识的获得是进行有目的活动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为了应付教学任务。更具体地说，游戏和课业与认知最初阶段的特点是完全对应的，上一章我们已经提到，第一阶段包括学习如何做事并在行事过程中熟悉整个事情和过程。据说在意识哲学兴起之前，希腊人用“τεχήυ”一词来表示艺术和科学。柏拉图通过对修鞋匠、木匠和乐手等的知识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对知识的论述。他认为，他们的技艺（如果不是纯粹的机械劳作）包含着目的，对工作材料的掌握、工具的控制和工序的确定。只有掌握了所有这些，才会具备精湛的技能或技艺。

Doubtless the fact that children normally engage in play and work out of school has seemed to many educators a reason why they should concern themselves in school with things radically

different. School time seemed too precious to spend in doing over again what children were sure to do any way. In some social conditions, this reason has weight. In pioneer times, for example, outside occupations gave a definite and valuable intellectual and moral training. Books and everything concerned with them were, on the other hand, rare and difficult of access; they were the only means of outlet from a narrow and crude environment. Wherever such conditions obtain, much may be said in favor of concentrating school activity upon books. The situation is very different, however, in most communities today. The kinds of work in which the young can engage, especially in cities, are largely anti-educational. That prevention of child labor is a social duty is evidence on this point. On the other hand, printed matter has been so cheapened and is in such universal circulation, and all the opportunities of intellectual culture have been so multiplied, that the older type of book work is far from having the force it used to possess.

很多教育工作者认为，儿童在校外通常已经进行了很多游戏和活动，因此他们在校内应该做完全不同的事情。学校里的时间很宝贵，不必再浪费时间去重复儿童无论如何都要做的事情。在某些社会环境中，这种看法有一定的理由。例如，在探索时期，校外活动能提供明确的、有价值的智力和道德训练。另一方面，书籍以及一切有关书籍的东西都非常稀少，很难获得。在狭隘和原始的环境中，这些书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方式。无论在哪里，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有人主张把学校活动集中在书本上，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当今大多数社会里，环境与那时完全不同。青少年，特别是城市的青少年，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大部分都是反教育的。禁止雇用童工是社会责任，这样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印刷材料如此低廉，流通如此广泛，获取文化知识的机会如此之多，旧式的研习书本的活动远没有过去那么有影响力。

But it must not be forgotten that an educational result is a by-product of play and work in most out-of-school conditions. It is incidental, not primary. Consequently the educative growth secured is more or less accidental. Much work shares in the defects of existing industrial society—defects next to fatal to right development. Play tends to reproduce and affirm the crudities, as well as the excellencies, of surrounding adult life. It is the business of the school to set up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play and work shall be conducted with reference to facilitating desirable mental and moral growth. It is not enough just to introduce plays and games, hand work and manual exercises. Everything depends upon the way in which they are employed.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大多数校外环境中，教育是游戏和工作的副产品。其结果是附属品，并不是主要产物。因此，所得到的教育发展或多或少也是附属品。很多活动都具有现在工业社会的各种缺点，这些缺点几乎是年轻人正常发展的致命伤。游戏往往重现和确定周围成年人生活的优点和不足。学校的任务就是为游戏和工作创造这样一个环境，使其能够促进青少年智力和道德的健康成长。仅仅介绍活动和游戏，手工和劳作，还远远不够。这一切还取决于怎样开展这些活动。

2．Available Occupations.

二、可开展的活动

A bare catalogue of the list of activities which have already found their way into schools indicates what a rich field is at hand.

There is work with paper, cardboard, wood, leather, cloth, yarns, clay and sand, and the metals, with and without tools. Processes employed are folding, cutting, pricking, measuring, molding, modeling, pattern-making, heating and cooling, and the operations characteristic of such tools as the hammer, saw, file, etc. Outdoor excursions, gardening, cooking, sewing, printing, book-binding, weaving, painting, drawing, singing, dramatization, story-tell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s active pursuits with social aims (not as mere exercises for acquiring skill for future use), in addition to a countless variety of plays and games, designate some of the modes of occupation.

只需列出学校已经开展的活动便可以看出我们手边有一个多么丰富的领域。学校里的手工材料有纸、硬纸板、木块、皮革、布料、纱线、黏土和沙等，有些需要工具，有些不用。采用的制作方法有折叠、切割、穿刺、测量、铸型、做模型、制作图案、加热和冷却等，包括锤、锯、锉等制作方法。除了各种各样的游戏和比赛外，还有户外短途旅行、园艺、烹饪、缝制、印刷、书籍装订、编织、油漆、绘画、编剧、讲故事、和阅读、书写等具有社会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练习以获得在将来应用的技能）积极活动。

The problem of the educator is to engage pupils in these activities in such ways that while manual skill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are gained and immediate satisfaction found in the work, together with preparation for later usefulness, these things shall be subordinated to education—that is, to intellectual results and the forming of a socialized disposition. What does this principle signify?

教育者的职责在于引发学生在获取手工技能和技术效率、在活动

中发现即时的满足感，为以后的应用做好准备。同时，所有这些应该从属于教育，即从属于智育的结果和社会化习性的形成。这个原则代表什么呢？

In the first place, the principle rules out certain practices. Activities which follow definite prescription and dictation or which reproduce without modification ready-made models, may give muscular dexterity, but they do not require the perception and elaboration of ends, nor (what is the same thing in other words) do they permit the use of judgment in selecting and adapting means. Not merely manual training specifically so-called but many traditional kindergarten exercises have erred here. Moreover, opportunity for making mistakes is an incidental requirement. Not because mistakes are ever desirable, but because over zeal to select material and appliances which forbid a chance for mistakes to occur, restricts initiative, reduces judgment to a minimum, and compels the use of methods which are so remote from the complex situations of life that the power gained is of little availability. It is quite true that children tend to exaggerate their powers of execution and to select projects that are beyond them. But limitation of capacity is one of the things which has to be learned; like other things, it is learned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consequences. The danger that children undertaking too complex projects will simply muddle and mess, and produce not merely crude results (which is a minor matter) but acquire crude standards (which is an important matter) is great. But it is the fault of the teacher if the pupil does not perceive in due season the inadequacy of his performances, and thereby receive a stimulus to attempt exercises which will perfect his powers. Meantime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keep alive a creative and constructive attitude than to secure an external perfection by engaging the pupil's action in too

minute and too closely regulated pieces of work. Accuracy and finish of detail can be insisted upon in such portions of a complex work as are within the pupil's capacity.

首先，这个原则排除了某些做法。按照明确的规定和指示开展活动，或者原封不动地复制现成的模型，这种做法或许能够锻炼身体的敏捷度，但是并不要求理解和解释目的，换个说法就是，在选择活动方法和使方法适应目的之时，不允许运用判断力。不仅仅是被称为手工训练的活动存在类似错误，很多传统的幼儿园里的训练也类似错误。而且，犯错的机会是一个附带的要求。这并不是因为犯错是可取的，而是因为过度热衷于选择那些不容许有犯错机会的材料和工具，最终会限制学生的首创精神，致使其判断力降至最低，迫使他们采用脱离复杂生活情境的方法，以致所获得的能力毫无用处。诚然，儿童倾向于夸大自己的做事能力，选择力所不逮的活动。但是儿童需要学会认识到自己能力的局限。像其他事情一样，这得通过体验事情的后果才能学到。儿童从事过度复杂的活动，可能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混乱不堪，不仅造成糟糕的结果（这是小事），还会学到糟糕的标准（这倒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种危害非常大。但是，学生若不能在适当的时候察觉自己行为的不足，从而受到刺激去尝试能完善其能力的练习，这便是教师的过错。保持学生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态度比把学生限制在严格规定的活动中以达到外部的完善更为重要。对于一件在学生能力范围内的复杂工作，我们则可以要求他们在某些部分做到精确和细致。

Unconscious suspicion of native experience and consequent overdoing of external control are shown quite as much in the material supplied as in the matter of the teacher's orders. The fear of raw material is shown in laboratory, manual training shop, Froebelian kindergarten, and Montessori house of childhood. The demand is for material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subjected to the

perfecting work of mind: a demand which shows itself in the subject matter of active occupations quite as well as in academic book learning. That such material will control the pupil's operations so as to prevent errors is true. The notion that a pupil operating with such material will somehow absorb the intelligence that went originally to its shaping is fallacious. Only by starting with crude material and subjecting it to purposeful handling will he gain the intelligence embodied in finished material. In practice, overemphasis upon formed material leads to an exaggeration of mathematical qualities, since intellect finds its profit in physical things from matters of size, form, and proportion and the relations that flow from them. But these are known only when their perception is a fruit of acting upon purposes which require attention to them. The more human the purpose, or the more it approximates the ends which appeal in daily experience, the more real the knowledge. When the purpose of the activity is restricted to ascertaining these qualities, the resulting knowledge is only technical.

无意识地猜疑学生的先天性经验，从而过分地进行外部控制，这不仅表现在教师的指令上，还表现在所提供的材料上。学校实验室、手工培训点、福禄培尔式教育法的幼儿园和蒙台梭利式教学法的幼儿之家都害怕向学生提供原始材料。要求所提供给学生的材料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材料。学校中的书本学习有这种要求，现在这种要求也见于积极活动所用的材料上。确实，这种经过加工的材料能控制学生的活动、避免错误。但是，认为学生运用这种现成材料便能获得造就这种材料的那种智慧，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只有从原始素材做起，并且经过有目的地使用，学生才能获得包含在最终材料中的智慧。在学校实践中，对成形材料的过分重视导致了对数学特性的夸大。学生能在实际物体中发现它能给智力带来诸多好处，无论是物体的大小、形状、和比例，还是由此引申的一些关系。但是，只有当学生关注它们、带

有目的地参与进去，进而获得这种感知时，才可了解这些特性。活动的目的越人性化，或者越接近于日常生活中所要求的目的，学生获得的知识就越真实。倘若活动的目的仅限于了解这些特性，那么学生所获得的知识也只限于技术而已。

To say that active occupations should be concerned primarily with wholes is another statement of the same principle. Whole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 are not, however, physical affairs. Intellectually the existence of a whole depends upon a concern or interest; it is qualitative, the completeness of appeal made by a situation. Exaggerated devotion to formation of efficient skill irrespective of present purpose always shows itself in devising exercises isolated from a purpose. Laboratory work is made to consist of tasks of accurate measurement with a view to acquiring knowledge of the fundamental units of physics, irrespective of contact with the problems which make these units important; or of operations designed to afford facility in the manipulation of experimental apparatus. The technique is acquired independently of the purposes of discovery and testing which alone give it meaning. Kindergarten employments are calculated to give information regarding cubes, spheres, etc. , and to form certain habits of manipulation of material (for everything must always be done “just so”), the absence of more vital purposes being supposedly compensated for by the alleged symbolism of the material used. Manual training is reduced to a series of ordered assignments calculated to secure the mastery of one tool after another and technical ability in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construction—like the different joints. It is argued that pupils must know how to use tools before they attack actual making,—assuming that pupils cannot learn how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Pestalozzi's just insistence upon the active use of the senses, as a substitute for memorizing words,

left behind it in practice schemes for “object lessons” intended to acquaint pupils with all the qualities of selected objects. The error is the same: in all these cases it is assumed that before objects can be intelligently used, their properties must be known. In fact, the senses are normally used in the course of intelligent (that is, purposeful) use of things, since the qualities perceived are factors to be reckoned with in accomplishment. Witness the different attitude of a boy in making, say, a kite, with respect to the grain and other properties of wood, the matter of size, angles, and proportion of parts, to the attitude of a pupil who has an object-lesson on a piece of wood, where the sole function of wood and its properties is to serve as subject matter for the lesson.

我们所说积极的活动首先应该顾及整体，这是同一个原则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然而，教育目的的整体性并不是指物质的东西。从心理方面讲，学生能意识到其整体性程度取决于他们对课业活动的兴趣。就其性质而言，整体性指情境中所营造出来的整体感染力。如果不顾当前的目的，过分注重有效技能，在设计练习活动时就会脱离目的。实验室工作的任务不过是准确测量数据，目的在于获得物理基本单位的知识，或者是让学生能够熟练使用实验仪器的操作方法，却不了解那些给基本单位带来重要性的相关问题。技术的获得与发现和实验的目的毫无关系，只有通过发现和试验才能使技术具有意义。幼儿园的活动主要要求教会儿童有关立方体、球体等的知识，从而形成某些使用材料的习惯（因为每件事都必须按照规矩做），至于说缺乏贴近生活经验的目的，有些人认为，这可以通过所用材料里所谓的“象征主义”来弥补。手工训练则变成一系列的指定任务，使学生能够按照步骤依次掌握各种工具的使用方法，并掌握制作的各个步骤要领——例如各种不同的连接。主张上述方法的人认为，学生必须在手工制作之前了解如何使用工具，才能进行实际的制作。他们认为，学生不会在制作中学会怎样使用工具。佩斯特拉齐主张用主动调动感官代替硬背单词，在实践中却推行实物教学的方案，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所

选的实物的特性。上面的例子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假定必须先让学生了解实物的特性，然后才能合理地使用它。事实上，在合理地（即有目的地）应用事物的过程中，通常都会运用各种感官，因为观察到的特性是完成一项活动所需要考虑的因素。先看一下儿童在制作风筝时的态度，他会观察木材的纹理和其他特性，各个部分的大小、角度和比例。而他在学习有关木材的实物课时，对他来说，木材的唯一作用和特性只是作为教学材料而已。以上这两种态度完全不同。

The failure to realize that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a situation alone constitutes a 'whole' for the purpose of mind is the cause of the false notions which have prevailed in instruction concerning the simple and the complex. For the person approaching a subject, the simple thing is his purpose—the use he desires to make of material, tool, or technical process, no matter how complicated the process of execution may be. The unity of the purpose, with the concentration upon details which it entails, confers simplicity upon the elements which have to be reckoned with in the course of action. It furnishes each with a single meaning according to its service in carrying on the whole enterprise. After one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the constituent qualities and relations are elements, each possessed with a definite meaning of its own. The false notion referred to takes the standpoint of the expert, the one for whom elements exist; isolates them from purposeful action, and presents them to beginners as the “simple” things.

情境的功能性发展本身就构成了思想目的的整体性，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关于简单和复杂的教学中就盛行着一些错误观念。对于一个要做某件事的人来说，最简单的东西便是他的目的。无论操作过程可能会多么复杂，他都要利用材料、工具或者技术过程。由于有了统一的目的并且集中注意目的所包含的细节，考虑活动中的很多要

素也就变得相对简单。这样，根据每个环节在整个活动中的作用，它们就会具有一个对应的意义。当完成整个过程后，组成的各种特性和关系就是要素。每个要素都要自己特定的意义。上面提到的错误观念是从专家的立场讲的，他们认为要素是存在的，并且把要素同有目的的活动分离开，然后把这些独立的要素授予初学者，以为这就是“简单”的东西。

But it is time for a positive statement. Aside from the fact that active occupations represent things to do, not studies, their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consists in the fact that they may typify social situations. Men's fundamental common concerns center about food, shelter, clothing, household furnishings, and the appliances connected with produc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Representing both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and the adornments with which the necessities have been clothed, they tap instincts at a deep level; they are saturated with facts and principles having a social quality.

但是，现在要从积极方面进行阐述。积极的活动意味要去做事情，而非研究。除此之外，其意义在于它们能代表社会环境。人类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集中在食、住、穿、家具以及与生产、交换、消费相关的工具。这些东西代表生活的必需品和装点必需品的装饰品。它们能够触碰到本能的深处；它们充满了包含社会性质的各种事实和原理。

To charge that the various activities of gardening, weaving, construction in wood, manipulation of metals, cooking, etc. , which carry over these fundamental human concerns into school resources, have a merely bread and butter value is to miss their

point. If the mass of mankind has usually found in its industrial occupations nothing but evils which had to be endured for the sake of maintaining existence, the fault is not in the occupations, but i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y are carried on. The continually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economic factors in contemporary life makes it the more needed that education should reveal their scientific content and their social value. For in schools, occupations are not carried on for pecuniary gain but for their own content. Freed from extraneous associations and from the pressure of wage-earning, they supply modes of experience which are intrinsically valuable; they are truly liberalizing in quality. Gardening, for example, need not be taught either for the sake of preparing future gardeners, or as an agreeable way of passing time. It affords an avenue of approach to knowledge of the place farming and horticulture have had 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and which they occupy in present social organization. Carried on in an environment educationally controlled, they are means for making a study of the facts of growth, the chemistry of soil, the role of light, air, and moisture, injurious and helpful animal life, etc.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elementary study of botany which cannot be introduced in a vital way in connection with caring for the growth of seeds. Instead of the subject matter belonging to a peculiar study called botany, it will then belong to life, and will find, moreover, its natural correlations with the facts of soil, animal life, and human relations. As students grow mature, they will perceive problems of interest which may be pursued for the sake of discovery, independent of the original direct interest in gardening—problems connected with the germination and nutrition of plants, the reproduction of fruits, etc. , thus making a transition to deliberate intellectual investigations.

对于园艺、编织、木工、冶金和烹饪等各种活动，它们把上述人

类的基本问题引入学校课程中。如果认为这些活动只具有维持生计的价值，那就是误会了。如果大众通常仅在职业活动中发现邪恶的东西，而且为了生存必须要忍受它们，那么错误并不在于活动本身，而在于开展活动所处的环境。当代社会中经济因素日益变得重要，因而教育更有必要揭示出其科学内容和社会价值。因为学校的活动并不是为了金钱的回报，而是为了活动本身。学校活动摆脱了外部的联系和赚钱的压力，提供了各种具有内在价值的经验模式。这种活动确实能使人感到真正的自由。例如，学习园艺并不是为了将来当园丁做准备，也不是为了愉悦的消遣。园艺活动为研究农业和园艺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它们在当今社会组织中的地位提供了一条途径。在一个可以用教育方法控制的环境中进行园艺活动，可以借此研究生长的事实、土壤化学、光线的作用、空气、湿度、有害和有益的动物生活等。在初学植物学时，任何知识都能和关心种子的生长生动地联系起来。这样的材料并不属于植物学这门专业的研究，它属于生活，而且，你会发现它与土壤、动物生活和人类关系等事实有着自然的关联。随着学生越来越成熟，他们逐渐摆脱最初对园艺的单纯兴趣，他们会有目的地发现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如关于植物的萌芽和营养、果实的繁殖等，进而过渡到审慎的知识性调查研究。

The illustration is intended to apply, of course, to other school occupations,—wood-working, cooking, and on through the list. It is pertinent to note that 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the sciences grew gradually out from useful social occupations. Physics developed slowly out of the use of tools and machines; the important branch of physics known as mechanics testifies in its name to its original associations. The lever, wheel, inclined plane, etc. , were among the first great intellectual discoveries of mankind, and they are none the less intellectual because they occurred in the course of seeking for means of accomplishing practical ends. The great advance of electrical science in the last generation was closely associated, as effect and as cause, with application of electric agencies to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ransportation, lighting of cities and houses, and more economical production of goods. These are social ends, moreover, and if they are too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notions of private profit, it is not because of anything in them, bu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deflected to private uses:—a fact which puts upon the school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storing their connection, in the mind of the coming generation, with public scientific and social interests. In like ways, chemistry grew out of processes of dying, bleaching, metal working, etc. , and in recent times has found innumerable new uses in industry.

上述阐述当然也可以应用到其他学校活动中——木工、烹饪以及前面列举的其他活动中。应该可以这样讲，在人类历史上科学都是从有用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物理是从工具和机器的使用中缓慢发展起来的，物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机械学，这个名字本身就证明了它和机械最初的联系。杠杆、车轮、斜面等是人类最早的伟大智慧发明，这些发明虽然是在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过程中发明的，但它们依然是智慧的结晶。上个世代电学科学的巨大发展与电力在通讯交通、城市和居民照明和商品的经济生产等方面的应用有密切联系，电学的发展既是这些应用的前提，也是这些应用的结果。这些应用都是带有社会目的的，如果它们和私利的概念联系太紧的话，这并不是它们自身的原因，而是它们被人留为私用而已。学校应该担负起责任，在年轻一代的思想上恢复科学应用同公众科学社会利益的联系。同样，化学是从染色、漂白、金属加工等制作过程发展而来，近年来，化学在工业上已经有无数新的应用。

Mathematics is now a highly abstract science; geometry, however, means literally earth-measuring: the practical use of number in counting to keep track of things and in measuring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oday than in the times when it was invented for

these purposes. Such considerations (which could be duplicated in the history of any science) are not arguments for a recapitu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or for dwelling long in the early rule of thumb stage. But they indicate the possibilities—greater today than ever before—of using active occupations as opportunities for scientific study. The opportunities are just as great on the social side, whether we look at the life of collective humanity in its past or in its future. The most direct road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into civics and economics is found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place and office of industrial occupations in social life. Even for older students, the social sciences would be less abstract and formal if they were dealt with less as sciences (less as formulated bodies of knowledge) and more in their direct social-matter as that is found in the daily life of the social groups in which the student shares.

现在的数学是一门高度抽象的科学。然而，几何学字面上是指土地测量。实际应用数字来计算以了解事物以及去测量，这在当代比在过去它们因这些目的而被发明时甚至更为重要。这些考虑（任何一门科学史上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为了重演人类历史，或者长期停留在早期单凭经验的阶段。但是，这些考虑表明利用积极活动为科学研究提供机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无论我们从过去或者从未来看人类的集体生活，这种机会在社会方面同样是巨大的。年轻学生学习市政管理学和经济学的最直接途径在于考虑产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使对年龄较长的学生而言，如果他们把社会科学知识更少地作为科学（系统规划的知识体系），更多地看作他们参与的社会团体日常生活的直接材料，社会科学就不会那么抽象了。

Connection of occupations with the method of science is at least as close as with its subject matter. The ages when scientific

progress was slow were the ages when learned men had contempt for the material and processes of everyday life, especially for those concerned with manual pursuits. Consequently they strove to develop knowledge out of general principles—almost out of their heads—by logical reasonings. It seems as absurd that learning should come from action on and with physical things, like dropping acid on a stone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as that it should come from sticking an awl with waxed thread through a piece of leather. But the rise of experimental methods proved that, given control of conditions, the latter operation is more typical of the right way of knowledge than isolated logical reasonings. Experiment develope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succeeding centuries and became the authorized way of knowing when men's interests were centered in the question of control of nature for human uses. The active occupations in which appliances are brought to bear upon physical things with the intention of effecting useful changes is the most vital introduction to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各种活动同科学方法的联系至少跟它们同科学材料的联系同样密切。科学发展缓慢的年代就是学者轻视日常生活的材料和工序的年代，特别是有关手工制作的材料和工序。因此，他们竭力通过逻辑推理，从一般原则——几乎是从他们头脑里——发展知识。知识应该从利用实物并对实物产生的影响中得来，就像把酸滴在石块上观察会发生现象一样，这种观点如同说知识应该“用穿着蜡线的锥子刺穿皮革得来”一样，看似十分荒谬。但是实验方法的发展已经证明，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后者的操作是比孤立的逻辑推理更能代表正确的求知途径。实验方法在17世纪和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得到了发展，并且成为权威的求知方式。在那时，人们的兴趣集中在控制自然以便为人类所利用上。在积极活动中，运用工具来影响实物，以便促使有利的改变，这就是实验方法最重要的入门经验。

3．Work and Play.

三、工作与游戏

What has been termed active occupation includes both play and work. In their intrinsic meaning, play and industry are by no means so antithetical to one another as is often assumed, any sharp contrast being due to undesirable social conditions. Both involve ends consciously entertained and the selection and adaptations of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designed to effect the desired end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largely one of time-span, influencing, the directness of the connection of means and ends. In play, the interest is more direct—a fact frequently indicated by saying that in play the activity is its own end, instead of its having an ulterior result. The statement is correct, but it is falsely taken, if supposed to mean that play activity is momentary, having no element of looking ahead and none of pursuit. Hunting, for example, is one of the commonest forms of adult play, but the existence of foresight and the direction of present activity by what one is watching for are obvious. When an activity is its own end in the sense that the action of the moment is complete in itself, it is purely physical; it has no meaning (See p. 90). The person is either going through motions quite blindly, perhaps purely imitatively, or else is in a state of excitement which is exhausting to mind and nerves. Both results may be seen in some types of kindergarten games where the idea of play is so highly symbolic that only the adult is conscious of it. Unless the children succeed in reading in some quite different idea of their own, they move about either as if in a hypnotic daze, or they respond to a direct excitation.

所谓积极活动既包括游戏也包括工作。从内在意义上看，游戏和勤奋绝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是相互对立的，两者的尖锐对立是由不良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两者都包含有意识地设置的目的，以及对材料和工序的选择和适应，以便达到期望的目的。二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时间跨度上，这影响着手段和目的之间联系的直接程度。在游戏中，兴趣更为直接。下面的话常常证实了这个事实：在游戏中，活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在于它有进一步的结果。这种陈述是对的，但如果认为这就意味着游戏活动是短暂的，没有向前看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例如，打猎是最常见的成年人游戏活动，但是在等待猎物时，显然存在先见之明和目标方向。如果活动的目的是使某一刻的行为本身完备，那么这种活动就只是身体活动，并没有什么意义（参见原书77页）。参与活动的人要么只是纯粹盲目模仿一系列动作，要么就是处于一种精疲力竭的兴奋状态。幼儿园中某些类型的游戏中，游戏的概念具有高度象征性，只有成年人才能意识到，这种游戏就有可能产生以上两种结果。除非儿童对这种游戏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不同理解，不然他们就只会像被催眠了一样迷惑地乱动，或者只是对直接的刺激做出反应。

The point of these remarks is that play has an end in the sense of a directing idea which gives point to the successive acts. Persons who play are not just doing something (pure physical movement); they are trying to do or effect something, an attitude that involves anticipatory forecasts which stimulate their present responses. The anticipated result, however, is rather a subsequent action than the production of a specific change in things. Consequently play is free, plastic. Where some definite external outcome is wanted, the end has to be held to with some persistence, which increases as the contemplated result is complex and requires a fairly long series of intermediate adaptations. When the intended act is another activity, it is not necessary to look far ahead and it is possible to alter it easily and frequently. If a child is making a toy boat, he must hold

on to a single end and direct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acts by that one idea. If he is just “playing boat” he may change the material that serves as a boat almost at will, and introduce new factors as fancy suggests. The imagination makes what it will of chairs, blocks, leaves, chips, if they serve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activity forward.

上面叙述的要点是游戏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即是一个使后续行为有意义的指导性观念。做游戏的人并非是想单纯地做某件事（纯粹的身体活动）；他们正在试图完成某件事，这其中包含着刺激当前反应以预测未来结果的态度。然而，预期的结果是下一个连续的行为，而不是在事物中产生具体的变化。因此，游戏是自由的，具有可塑性。如果想得到某个特定的外部结果，必须要坚持目的，所期待的结果越复杂，则越需要坚持目的，并且需要相当长的一系列调节以适应行为。当想要的是另外一种活动，那么就没有必要考虑地太长远，以便易于经常做出改变。假如一个儿童在做一个玩具船，他必须始终坚持一个目的，并使这个目的指导他的一系列制作活动。如果他只是为了玩“船”，他便可以随意改变制作材料，根据想象引入新的因素。通过想象，椅子、积木、树叶和木片可以变成想要的东西，只要这能够推动活动向前进行。

From a very early age, however,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of exclusive periods of play activity and work activity, but only one of emphasis. There are definite results which even young children desire, and try to bring to pass. Their eager interest in sharing the occupations of others, if nothing else, accomplishes this. Children want to “help”; they are anxious to engage in the pursuits of adults which effect external changes: setting the table, washing dishes, helping care for animals, etc. In their plays, they like to construct their own toys and appliances. With increasing maturity, activity

which does not give back results of tangible and visible achievement loses its interest. Play then changes to fooling and if habitually indulged in is demoralizing. Observable results are necessary to enable persons to get a sense and a measure of their own powers. When make-believe is recognized to be make-believe, the device of making objects in fancy alone is too easy to stimulate intense action. One has only to observe the countenance of children really playing to note that their attitude is one of serious absorption; this attitude cannot be maintained when things cease to afford adequate stimulation.

然而，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游戏和工作这两种活动时期就没有绝对的界限，只是侧重点不同。即使年幼的儿童也会期待一定的结果，并且尽力达到这个结果。他们很有兴趣去分享别人的活动，单凭这一点，就能达到以上结果。儿童乐于“帮助”别人，他们渴望参与成年人的事务，这可以带来外部的变化，如摆桌子、洗碟子、看护小动物等。在儿童的游戏中，他们喜欢制作自己的玩具和工具。随着儿童的成长，他们就会对那些不能产生实际可见的结果和成就的活动失去兴趣。于是游戏就变成了愚弄，如果习惯性地沉迷于此，就会意志消沉。实际可见的结果是必要的，它能让人们感受到自己的能力有多大。当假装被识破时，仅靠幻想的事物很难激起强烈的行为。只有观察真正在做游戏的儿童的表情才会发现他们认真投入的态度。当没有足够的刺激时，这种认真态度是不能维持的。

When fairly remote results of a definite character are foreseen and enlist persistent effort for their accomplishment, play passes into work. Like play, it signifies purposeful activity and differs not in that activity is subordinated to an external result, but in the fact that a longer course of activity is occasioned by the idea of a result. The demand for continuous attention is greater, and more

intelligence must be shown in selecting and shaping means. To extend this account would be to repeat what has been said under the caption of aim, interest, and thinking. It is pertinent, however, to inquire why the idea is so current that work involves subordination of an activity to an ulterior material result.

当能够预见一个相当遥远且有一定特性的结果，并且为了完成这个结果做出持续努力，游戏就变成了工作。工作和游戏一样，都是有目的的活动，不同之处并不在于这种活动从属于一个外部结果，而在于结果这一观念引起了一个较长期的活动。在工作中会要求更多的注意力，在选择和设计工作手段时，会要求更多的智慧。要引申论述的话则要重复在目标、兴趣和思考这几个标题下的内容。工作包含着一个从属较远物质目标的活动，为什么这种观念如此流行？现在探讨这个问题是适宜的。

The extreme form of this subordination, namely drudgery, offers a clew. Activity carried on under conditions of external pressure or coercion is not carried on for any significance attached to the doing. The course of action is not intrinsically satisfying; it is a mere means for avoiding some penalty, or for gaining some reward at its conclusion. What is inherently repulsive is endured for the sake of averting something still more repulsive or of securing a gain hitched on by others. Under unfree economic conditions, this state of affairs is bound to exist. Work or industry offers little to engage the emotions and the imagination; it is a more or less mechanical series of strains. Only the hold which the completion of the work has upon a person will keep him going. But the end should be intrinsic to the action; it should be its end—a part of its own course. Then it affords a stimulus to effort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arising from the thought of results which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intervening action. As already mentioned, the absence of economic pressure in schools supplies an opportunity for reproducing industrial situations of mature life under conditions where the occupation can be carried on for its own sake. If in some cases, pecuniary recognition is also a result of an action, though not the chief motive for it, that fact may well increas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cupation.

这种从属关系的极端形式就是苦工，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人在外部压力或者强制下进行的活动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活动的过程本身并不让人满意，它只是为了在结束时避免惩罚或者得到些许回报。忍受一件可憎之事是为了避免更加可憎之事，或者为了得到别人手里的好处。在非自由经济环境中，必然存在这种情况。工作或者勤奋很难吸引情感和留住想象；它是一系列紧张的机械活动。只有完成工作这一信念才会促使人继续工作。但是目的应该是存在于活动中；它应该是活动的目的，是活动过程的一部分。这种目的会激起人们努力工作，这不同于与活动不相干的散漫目的激起的努力。如上所述，学校活动没有经济压力，这为在纯粹为了活动而进行活动的情况下重现成年生活的就业情境提供了机会。如果在某些情况下，金钱奖励在活动中也是目的，但不是主要目的，这也很有可能增加活动的意义。

Where something approaching drudgery or the need of fulfilling externally imposed tasks exists, the demand for play persists, but tends to be perverted. The ordinary course of action fails to give adequate stimulus to emotion and imagination. So in leisure time, there is an imperious demand for their stimulation by any kind of means; gambling, drink, etc. , may be resorted to. Or, in less extreme cases, there is recourse to idle amusement; to anything which passes time with immediate agreeableness. Recreation, as the

word indicates, is recuperation of energy. No demand of human nature is more argent or less to be escaped. The idea that the need can be suppressed is absolutely fallacious, and the Puritanic tradition which disallows the need has entailed an enormous crop of evils. If education does not afford opportunity for wholesome recreation and train capacity for seeking and finding it, the suppressed instincts find all sorts of illicit outlets, sometimes overt, sometimes confined to indulgence of the imagination. Education has no more serious responsibility than making adequate provision for enjoyment of recreative leisure; not only for the sake of immediate health, but still more if possible for the sake of its lasting effect upon habits of mind. Art is again the answer to this demand.

如果所做的事情几乎是苦差事，或者需要完成额外的强加的任务，这时工作的要求还是那样，不过可能有些扭曲了。一般的活动过程不能给人的情感和想象以足够的刺激。所以在休闲时刻，他们便通过各种手段迫切地寻求刺激；可能会诉求于赌博、饮酒等。或者在不太极端时，便会倾向于无所事事的娱乐；或者进行任何能够打发时间或能获得片刻欢愉的活动。娱乐的英文原意是恢复精力。人类天性中没有什么比需要恢复精力更迫切的了，或者说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可避免的了。认为这种需求可以加以抑制，这种看法是绝对错误的。清教否认了这种需求，结果就产生了大量的恶果。如果教育不能为有益健康的娱乐以及培养锻炼寻求这种娱乐的能力提供机会，那么被抑制的本能就会寻找各种不正当的途径发泄，有时候是表现出来的，有时候仅限于想象。为休闲活动提供足够的条件是教育最为重要的任务。不仅仅是为了当下的健康，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是为了对思想习惯产生持续的影响。艺术便是对这种需求的回应。

Summary.

总结

In the previous chapter we found that the primary subject matter of knowing is that contained in learning how to do things of a fairly direct sort. The educational equivalent of this principle is the consistent use of simple occupations which appeal to the powers of youth and which typify general modes of social activity. Skill and information about materials, tools, and laws of energy are acquired while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n for their own sake. The fact that they are socially representative gives a quality to the skill and knowledge gained which makes them transferable to out-of-school situations.

在前面一章我们了解了认知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习如何去做一件比较直接的事情。这个原则对应在在教育上就是坚持利用简单的活动，这种活动要能锻炼青少年能力且代表社会活动的一般模式。当单纯为开展活动而进行活动时，就会获取有关材料、工具和能量规律的技能和信息。这些活动具有社会代表性，这一事实使得所获得技能和知识能够迁移到校外。

It is important not to confuse the psycholog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play and work with the economic distinction. Psychologically,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play is not amusement nor aimlessness. It is the fact that the aim is thought of as more activity in the same line, without defining continuity of action in reference to results produced. Activities as they grow more complicated gain added meaning by greater attention to specific results achieved. Thus they pass gradually into work. Both are equally free and intrinsically motivated, apart from false economic conditions which tend to make play into idle excitement for the

well to do, and work into uncongenial labor for the poor. Work is psychologically simply an activity which consciously includes regard for consequences as a part of itself; it becomes constrained labor when the consequences are outside of the activity as an end to which activity is merely a means. Work which remains permeated with the play attitude is art—in quality if not in conventional designation.

不能把娱乐和工作在心理学上的区别与在经济上的区别混为一谈，这点非常重要。从心理学上讲，娱乐的确定性特征不是消遣，也不是毫无目标。事实上，娱乐的目标在于进行更多同类的活动，并不会根据产生的结果来确定活动是否继续进行。随着活动越来越复杂，通过更加关注活动所取得的具体结果，活动的意义便会增加。因而，娱乐活动就逐渐转变为工作活动。这二者同样自由，均是由内在动机引起的，除非人为的经济条件使得游戏对富人来说成为无聊的消遣，使得工作对穷人来说成为不喜欢的劳作。从心理学上讲，工作只不过是一种活动，是有意识地把结果作为自身的一部分。当结果在活动之外，成为一种目的，而结果只是一个手段时，工作便成为强迫性的了。始终渗透着游戏的态度的工作是一种艺术，即使不习惯这样的称呼，但在性质上确是如此。

Chapter 16 The Significance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

第十六章　地理和历史的意义

1．Extension of Meaning of Primary Activities.

一、基本活动的意义延伸

Nothing is more striking th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activity as merely physical and the wealth of meanings which the same activity may assume. From the outside, an astronomer gazing through a telescope is like a small boy looking through the same tube. In each case, there is an arrangement of glass and metal, an eye, and a little speck of light in the distance. Yet at a critical moment, the activity of an astronomer might be concerned with the birth of a world, and have whatever is known about the starry heavens as its significant content. Physically speaking, what man has effected on this globe in his progress from savagery is a mere scratch on its surface, not perceptible at a distance which is sligh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reaches even of the solar system. Yet in meaning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measures just the difference of civilization from savagery. Although the activities, physically viewed, have changed somewhat, this change is sligh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anings attaching to the activities. There is no limit to the meaning which an action may come to possess.It all depends upon the context of perceived connections in which it is placed; the reach of imagination in realizing connections is inexhaustible.

同样的活动，有时仅仅是纯粹的物质活动，有时却包含着丰富的意义，二者之间差别巨大。从表面上看，天文学家用望远镜凝望星空与儿童用同样的望远镜凝视远方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两种情况下，都有镜片、金属、眼睛和远方的光点。然而，在关键时刻，天文学家的活动可能关系到一个世界的诞生，所有关于点点繁星的知识都成为它的重要内容。从物质上讲，从原始状态发展到现在，人类对地球产生的影响不过是在其表面留下一些痕迹，这从远处看是难以察觉的，而这若是和太阳系的范围相比却又是微小的。但是，从意义方面讲，人类所取得的成就造就了文明同野蛮的区别。尽管从物质方面看，这些活动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同活动意义的发展相比，这种变化是微小的。某一活动所具有的意义是没有限制的。这完全取决于感知所置身的情境；实现联系的想象力范围是无穷无尽的。

The advantage which the activity of man has in appropriating and finding meanings makes his education something else than the manufacture of a tool or the training of an animal. The latter increase efficiency; they do not develop significance. The final educational importance of such occupations in play and work as were considered in the last chapter is that they afford the most direct instrumentalities for such extension of meaning. Set going under adequate conditions they are magnets for gathering and retaining an indefinitely wide scope of intellectual considerations. They provide vital centers for the recep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information. When information is purveyed in chunks simply as information to be retained for its own sake, it tends to stratify over vital experience. Entering as a factor into an activity pursued for its own sake—whether as a means or as a widening of the content of the aim—it is informing. The insight directly gained fuses with what is told. Individual experience is then capable of taking up and holding in solution the net results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group to

which he belongs—including the results of sufferings and trials over long stretches of time. And such media have no fixed saturation point where further absorption is impossible. The more that is taken in, the greater capacity there is for further assimilation. New receptiveness follows upon new curiosity, and new curiosity upon information gained.

在占有和发现事物意义方面，人类活动所具有的优势让教育不再是单纯的制造工具或者动物性训练。制造工具和训练动物只是为了提高效率，并不会提升活动的意义。上一章提到的娱乐和工作中的各种活动，它们的最终的重要教育性体现在为意义的延伸提供了最直接的方式。在适当条件下，这些活动就像磁石一般能够聚集和保留无限广阔的智力思考范围。他们为知识的接收和吸纳提供了生命中枢。当知识仅仅作为知识本身而被成块批量供应，并加以保留，这种知识往往就会脱离鲜活的现实经验。如果知识成为活动中的一个因素，纯粹为了追求知识，无论是作为一种手段还是作为目标内容的扩展，它都是有教育性的。因而，直接获得的洞察力便与听到的知识融为一体。因此，个人经验能够吸收和容纳他所属的群体的经验结晶，包括长期以来经历的磨难和考验的结晶。通过上述途径获得的知识不会有固定的饱和点，它还能进一步吸收新的知识。容纳的知识越多，进一步吸收的能力就越大。新的好奇心带来新的接收能力，新的知识带来新的好奇心，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更新。

The meanings with which activities become charged, concern nature and man.This is an obvious truism, which however gains meaning when translated into educational equivalents. So translated, it signifies that geography and history supply subject matter which gives background and outlook, intellectual perspective, to what might otherwise be narrow personal actions or mere forms of technical skill. With every increase of ability to place

our own doings in their time and space connections, our doings gain in significant content. We realize that we are citizens of no mean city in discovering the scene in space of which we are denizens, and the continuous manifestation of endeavor in time of which we are heirs and continuers. Thus our ordinary daily experiences cease to be things of the moment and gain enduring substance. Of course if geography and history are taught as ready-made studies which a person studies simply because he is sent to school, it easily happens that a large number of statements about things remote and alien to everyday experience are learned. Activity is divided, and two separate worlds are built up, occupying activity at divided periods. No transmutation takes place; ordinary experience is not enlarged in meaning by getting its connections; what is studied is not animated and made real by entering into immediate activity. Ordinary experience is not even left as it was, narrow but vital. Rather, it loses something of its mobility and sensitiveness to suggestions. It is weighed down and pushed into a comer by a load of unassimilated information. It parts with its flexible responsiveness and alert eagerness for additional meaning. Mere amassing of information apart from the direct interests of life makes mind wooden; elasticity disappears.

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意义关乎自然和人类，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当这个真理体现在教育方面时，它却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如此转换意味着地理和历史为个人行为或技能培训提供了具有历史背景、宽阔视野和理智观点的题材，否则这些个人行为将变得很狭隘，技能培训也将变得很枯燥。随着我们将自己行为与所在时空相联系的能力逐渐增长，我们的行为就有了意义。我们发现：我们生活在这个无意义的城市里，作为市民我们在经历世间的种种，以及作为时代传承人我们进行持续努力和抗争。因此我们寻常的日常经历就不再是当下的附庸，而是获得了一些更为持久的东西。当然，如果仅仅把地理

和历史当作现成的材料，学生只是因为来上学才学习这些内容，那么大多数学习内容很容易成为脱离日常经验的陌生陈述。学生的活动被分割开来，随之产生的两个分离的世界占据着学生活动的不同时期。一切都没有变化；日常经验并没有因为得到联系而扩大其意义；学生所学内容难以融入到活动中，因此难以获得生动和真实的感受。现在的日常经验既狭隘又充满活力，甚至不能像以前那样给学生以教义，更有甚者，它让人不再认真倾听他人的建议。它被未吸收的知识所压倒并被推到角落，不再有灵活的回应，不再对额外意义保持渴望。仅仅靠堆积知识，而不是直接对生活感兴趣，只能使思想迟钝麻木，不再灵活敏捷。

Normally every activity engaged in for its own sake reaches out beyond its immediate self. It does not passively wait for information to be bestowed which will increase its meaning; it seeks it out. Curiosity is not an accidental isolated possession; it is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the fact that an experience is a moving, changing thing, involving all kinds of connections with other things. Curiosity is but the tendency to make these connections perceptible. It is the business of educators to supply an environment so that this reaching out of an experience may be fruitfully rewarded and kept continuously active. Within a certain kind of environment, an activity may be checked so that the only meaning which accrues is of its direct and tangible isolated outcome. One may cook, or hammer, or walk, and the resulting consequences may not take the mind any farther than the consequences of cooking, hammering, and walking in the literal—or physical—sense. But nevertheles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act remain far-reaching. To walk involves a displacement and reaction of the resisting earth, whose thrill is felt wherever there is matter. It involves the structure of the limbs and the nervous system; the principles of mechanics. To cook is to utilize heat and moisture to change the chemical relations of food

materials; it has a bearing upon the assimilation of food and the growth of the body. The utmost that the most learned men of science know in physics, chemistry, physiology is not enough to make all these consequences and connections perceptible. The task of education, once more, is to see to it that such activities are performed in such ways and under such conditions as render these connections as perceptible as possible. To 'learn geography' is to gain in power to perceive the spatial, the natural, connections of an ordinary act; to 'learn history' is essentially to gain in power to recognize its human connections. For what is called geography as a formulated study is simply the body of facts and principles which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other men's experience about the natural medium in which we live, and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the particular acts of our life have an explanation. So history as a formulated study is but the body of known facts about the activities and sufferings of the social groups with which our own lives are continuous, and through reference to which our own customs and institutions are illuminated.

通常，每一个为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活动都会有所延伸，超出自身范围。它并不是被动地等待这知识的降临，增加知识的意义，而是主动地寻求知识。好奇心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经验是不断移动和变化的，并且包含着与其他各种事物的联系。好奇心便是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它只是使这些联系更趋向于易于感知。教师的职责便是提供这样一个环境——使得经验的延伸能够得到有效的回报并保持活跃。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活动可能受阻，以致于所产生的唯一意义乃是活动直接和有形的孤立结果。人们可以进行烹饪、锤击和步行等活动，其结果可能还不如这些身体动作本身产生的结果更能发展心智。然而，这种活动的结果具有深远的影响。比如，步行就包含有位移以及地面的反作用，只要碰到东西，我们就感觉到地面的颤动。步行还涉及四肢及神经系统的构造，这是机械原理。烹饪即是利用热和水汽来改变

食材的化学关系，这依赖于食物的吸收和身体的成长。即使最博学的科学家所拥有的物理、化学和生理等学科的知识也不足以使这些结果和关系易于理解。在此重申一下，教育的职责在于注意这些活动所进行的方式和条件，确保他们尽可能地易于理解和感知。学习地理是要获得感知普通行为空间和自然联系的能力；学习历史则主要是要获得认识人类历史彼此关联的能力。所谓的地理，作为一个知识体系，仅仅是别人在经历中发现的有关我们生存的自然界的事实和原理。通过联系这些原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特殊行为可以得到解释。同样，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则是研究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群体的活动和遭遇的已知事实，通过参考这些事实，我们现行的习俗和制度能够得以阐明。

2．The Complementary Nature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二、历史和地理的互补性

History and geography—including in the latter, for reasons about to be mentioned, nature study—are the information studies par excellence of the schools. Examination of the materials and the method of their use will make clear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netration of this information into living experience and its mere piling up in isolated heaps depends upon whether these studies are faithful to the interdependence of man and nature which affords these studies their justification. Nowhere, however, is there greater danger that subject matter will be accepted as appropriate educational material simply because it has become customary to teach and learn it. The idea of a philosophic reason for it, becaus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material in a worthy transformation of experience, is looked upon as a vain fancy, or as supplying a high-

sounding phraseology in support of what is already done. The words “history” and “geography” suggest simply the matter which has been traditionally sanctioned in the schools. The mass and variety of this matter discourage an attempt to see what it really stands for, and how it can be so taught as to fulfill its mission in the experience of pupils. But unless the idea that there is a unifying and social direction in education is a farcical pretense, subjects that bulk as large in the curriculum as history and geography, must represent a general fun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truly socialized and intellectualized experience. The discovery of this function must be employed as a criterion for trying and sifting the facts taught and the methods used.

历史和地理——后者包括自然研究，后面会给出理由——是学校课程中典型的知识学科。考察一下这两门学科的材料和利用这些材料的方法，从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将知识直接渗透到经验中与孤立地堆积知识的区别，这种区别取决于教学中是否忠实于人和自然的相互依赖性，正是这种依赖性使得这种教学研究合理。然而，如果仅仅出于习惯讲授和学习这些材料就认为这是恰当的教育材料，这种看法危险最大。由于材料具有利于经验转型的作用，思考该作用的哲学原因常常被看作是空想，或者只是为了支持某件已完成之事而产生的高调措辞。历史和地理这两个词仅仅表明这是学校传统上认可的学科。这两个学科体系庞大，种类繁多，让人望而生畏，难以继续探究这究竟代表什么，以及如何教学以便在学生经验中完成使命。但是，除非认为教育应该具有统一的社会指向只是可笑的托词，否则课程中像历史和地理等庞大的学科必须代表真正的社会化和智能化的经验发展中的一般功能。这种功能的发现必须用来作为试验和筛选所教授事实和使用方法的标准。

The function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ubject matter has

been stated; it is to enrich and liberate the more direct and personal contacts of life by furnishing their context, their background and outlook. While geography emphasizes the physical side and history the social, these are only emphases in a common topic, namely, the associated life of men. For this associated life, with its experiments, its ways and means, its achievements and failures, does not go on in the sky nor yet in a vacuum. It takes place on the earth. This setting of nature does not bear to social activities the relation that the scenery of a theatrical performance bears to a dramatic representation; it enters into the very make-up of the social happenings that form history. Nature is the medium of social occurrences. It furnishes original stimuli; it supplies obstacles and resources. Civilization is the progressive mastery of its varied energies. When this interdependence of the study of history, representing the human emphasis, with the study of geography, representing the natural, is ignored, history sinks to a listing of dates with an appended inventory of events, labeled “important”; or else it becomes a literary phantasy—for in purely literary histor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s but stage scenery.

前面已经讲到，历史和地理教材的作用是通过提供与个人生活更为直接相关背景和观点来丰富和解放我们的生活。尽管地理强调物质，而历史强调社会，它们其实都在强调同一个话题，即人类的相关生活。对于这种相关生活，连同它的实验、手段、方法、成功、失败，这些都不会发生在天上或者真空中，而是发生在地球上。自然环境同社会活动的关系并不像舞台剧的布景与舞台剧之间的关系。自然环境直接介入社会活动的构造中，形成历史。自然是社会事件的媒介。它提供原始的刺激，也提供障碍和资源。文明是逐渐控制自然界中的各种力量。历史强调人类活动，地理侧重自然活动。如果忽视历史与地理的相互依赖性，历史就会沦为历史重要事件的时间列表；或者仅仅是一种文学幻想——因为在纯粹的文学历史中，自然环境只是

舞台布景而已。

Geography, of course, has its educative influence in a counterpart connection of natural facts with social event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The classic definition of geography as an account of the earth as the home of man expresses the educational reality. But it is easier to give this definition than it is to present specific geographical subject matter in its vital human bearings. The residence, pursuit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men are the things that give the geographic data their reason for inclusion in the material of instruction. But to hold the two together requires an informed and cultivated imagination. When the ties are broken, geography presents itself as that hodge-podge of unrelated fragments too often found. It appears as a veritable rag-bag of intellectual odds and ends: the height of a mountain here, the course of a river there, the quantity of shingles produced in this town, the tonnage of the shipping in that, the boundary of a county, the capital of a state.

当然，地理通过将自然活动同社会事件及其后果联系起来而产生教育意义。地理的经典定义是阐述地球作为人类的家园，从定义中便可以看出实际的教育意义。但是给出定义很容易，具体指出人类重要活动中的地理内容就不那么容易了。人类的居所、追求、成功与失败，正是这些因素说明为什么教学材料中要包含地理知识。但是将二者联系在一起需要启迪和经过培养的想象。倘若二者之间的纽带中断了，地理本身便会成为经常遇见的毫不相关、支离破碎的大杂烩。它们看起来就是杂乱无章的思想碎片：这边是山峦的高度，那边是河流的流向，这是这个小镇出产的屋顶板数量，那是那个城镇的船舶吨位，这是某一县城的边界，那是某一国家的首都。

The earth as the home of man is humanizing and unified; the earth viewed as a miscellany of facts is scattering and imaginatively inert. Geography is a topic that originally appeals to imagination—even to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 It shares in the wonder and glory that attach to adventure, travel, and exploration. The variety of peoples and environments, their contrast with familiar scenes, furnishes infinite stimulation. The mind is moved from the monotony of the customary. And while local or home geography is the natural starting point in the reconstru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t is an intellectual starting-point for moving out into the unknown, not an end in itself. When not treated as a basis for getting at the large world beyond, the study of the home geography becomes as deadly as do object lessons which simply summarize the properties of familiar objects. The reason is the same. The imagination is not fed, but is held down to recapitulating, cataloguing, and refining what is already known. But when the familiar fences that mark the limits of the village proprietors are signs that introduc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boundaries of great nations, even fences are lighted with meaning. Sunlight, air, running water, inequality of earth's surface, varied industries, civil officers and their duties—all these things are found in the local environment. Treated as if their meaning began and ended in those confines, they are curious facts to be laboriously learned. As instruments for extending the limits of experience, bringing within its scope peoples and things otherwise strange and unknown, they are transfigured by the use to which they are put. Sunlight, wind, stream, commerce, political relations come from afar and lead the thoughts afar. To follow their course is to enlarge the mind not by stuffing it wit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but by remaking the meaning of what was previously a matter of course.

地球作为人类的家园具有人性化和一体化的特点。但是如果把它视为一堆杂物的载体，地球则是杂乱无章且缺乏活力的。地理最初是能够唤起想象，甚至浪漫幻想的话题。它分享着关于冒险、旅行和探索的所有壮美奇观。各国人民和各种环境的变化多样，他们和人们熟悉的情景的对比，构成了无限的刺激。我们的思想逐渐从单一的习俗中脱离出来。乡土地理或者家园地理作为自然环境改造发展的自然出发点的同时，也是通往未知智力的出发点，不能将它视为自身的终点。如果不把乡土地理的学习视为认知本土以外大千世界的基础，学习就会变得死气沉沉，就如同直观的实物教学一样，只是总结熟悉物体特性罢了。教师不但没有培养学生的想象力，相反还抑制了学生的想象力。他们授课内容只是概括、分类和界定已知事物而已。然而，当标志村庄业主界线的篱笆成为伟大民族之间界线的标记时，即使篱笆自身也具有了意义。在乡土环境中可以见到所有这些事物：阳光，空气，流水，地面的高低起伏，各种工业，行政人员及他们的职责。如果仅仅将它们的意义局限在这里，它们就只是学生费力学习的一些千奇百怪的事实而已。如果将其看作扩大经验局限的工具，它就会把看似奇怪和未知的民族和事物带进认知范围内。因为功用的不同，它们也就成为不同的东西了。阳光，风，溪流，商业和政治关系从远处来，也把思想引到远方。追随他们的行程则需要扩充心智，扩充的方法并不是通过增加额外的信息，而是重建从前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的意义。

The same principle coordinates branches, or phases, of geographical study which tend to become specialized and separate, Mathematical or astronomical, physiographic, topographic, political, commercial, geography, all make their claims. How are they to be adjusted? By an external compromise that crowds in so much of each? No other method is to be found unless it be constantly borne in mind that the educational center of gravity is in the cultural or humane aspects of the subject. From this center, any material becomes relevant in so far as it is needed to help

appreciate the significance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relations. The differences of civilization in cold and tropical regions, the special inventions, industrial and political, of peoples in the temperate regions, cannot be understood without appeal to the earth as a member of the solar system. Economic activities deeply influence social intercourse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n one side, and reflect physical conditions on the other. The specializations of these topics are for the specialists; their interaction concerns man as a being whose experience is social.

地理研究的很多分支都趋向于专业化、分裂化。数理地理学，天文地理学，地貌学，地形学，政治地理学，商业地理学都属于地理学的分支。上面所说的原理，可以把地理研究的各个分支协调起来。如何协调各个分支呢？让每个分支都出现外部妥协吗？除非我们一直牢记教育的重心在于学科的文化或者人文部分，否则我们找不到其他的方法。从这个重心来看，任何材料，只要它有助于理解人类活动和人类关系的意义，都可以成为相关材料。只有把地球看作太阳系的一分子才能理解寒带和热带地区的文明差异，温带地区的民族各种有关工业和政治的特殊发明。经济活动一方面对社会交际和政治组织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也反映了自然条件。这些话题的专门化研究是专家的事情，但是它们的相互作用则关系到每一个具有社会化经验的人。

To include nature study within geography doubtless seems forced; verbally, it is. But in educational idea there is but one reality, and it is pity that in practice we have two names: for the diversity of names tends to conceal the identity of meaning. Nature and the earth should be equivalent terms, and so should earth study and nature study. Everybody knows that nature study has suffered in schools from scrappiness of subject matter, due to dealing with a large number of isolated points. The parts of a flower have been

studied, for example, apart from the flower as an organ; the flower apart from the plant; the plant apart from the soil, air, and light in which and through which it lives. The result is an inevitable deadness of topics to which attention is invited, but which are so isolated that they do not feed imagination. The lack of interest is so great that it was seriously proposed to revive animism, to clothe natural facts and events with myths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attract and hold the mind. In numberless cases, more or less silly personifications were resorted to. The method was silly, but it expressed a real need for a human atmosphere. The facts had been torn to pieces by being taken out of their context. They no longer belonged to the earth; they had no abiding place anywhere. To compensate, recourse was had to artificial and sentimental associations. The real remedy is to make nature study a study of nature, not of fragments made meaningless through complete removal from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y are produced and in which they operate. When nature is treated as a whole, like the earth in its relations, its phenomena fall into their natural relations of sympathy and association with human life, and artificial substitutes are not needed.

把自然研究包括在地理学内无疑是勉强的，至少从字面上看是如此。然而，在教育思想中仅仅只有一个现实。遗憾的是，实践中我们却有两个名称：因此名称的多样化趋向于掩盖意义的统一性。自然与地球应该是同义词，地球研究和自然研究亦当如此。众所周知，学校中的自然研究由于论述繁杂的孤立论点导致学科内容凌乱不统一。这如同只研究一朵花的一部分，将其与整个鲜花器官分离开，同样将整朵花与整株植物分离开，将整株植物同它生存所必需的土壤、空气、光照分离开。这样的结果只能是终结话题，学生们投入了注意力，但是由于这些话题的孤立性，它们无法培养学生的想象力。由于如此缺乏生气，于是有人严肃地提出复活泛灵论，用神话的外衣粉饰自然现

象和事实，以便吸引学生的兴趣。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便借助各种荒唐的拟人手法来达到这个目的。这种方法虽然可笑，但却表达出了对人文气氛的真实需要。自然事实却因为脱离真实的环境而被彻底摧毁。它们不再属于地球，并且不再依附于任何地方。作为补偿，人们不得不借助于人为的和情感的联想。实际上，真正的补救办法应该是让自然研究成为纯粹的研究整个大自然的方式，而不是将自然中的各种碎片同它们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分离开来，孤立地进行研究，这样毫无意义。将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好比通过研究地球的种种关系来研究地球一样，那么各种现象自然而然就会与人类生活产生关联，这样就不会需要人为的替代物了。

3．History and Present Social Life.

三、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生活

The segregation which kills the vitality of history is divorce from present modes and concerns of social life. The past just as past is no longer our affair. If it were wholly gone and done with, there would be only one reasonable attitude toward it.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But knowledge of the past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History deals with the past, but this past is 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An intelligent study of the discovery, explorations, colonization of America, of the pioneer movement westward, of immigration, etc. , should be a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it is today: of the country we now live in. Studying it in process of formation makes much that is too complex to be directly grasped open to comprehension. Genetic method was perhaps the chief scientific achievement of the latter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s principle is that the way to get insight into any complex product

is to trace the process of its making,—to follow it through the successive stages of its growth. To apply this method to history as if it meant only the truism that the present social stat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its past, is one-sided. It means equally that past event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living present and retain meaning. The true starting point of history is always some present situation with its problems.

扼杀历史活力的隔离现象就是将历史同当前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事务分离开来。过去作为纯粹的历史不再是我们关心的事务。假如历史真的可以成为过眼云烟的话，那么仅仅只有一种合理的态度对待它。让这烟消云散的历史埋葬那些死者吧。但是对过去的了解是理解现在社会的关键。历史研究过去的事情，但是这种过去是当今社会的历史。在美国，对发现美洲，探索美洲，美国殖民化，美国西部扩张及移民等的缜密研究应该是对美国如何发展成当今这种境况的研究：也就是研究当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通过这种研究形成过程的方法，很多难以直接理解的复杂东西都能呈现出来，变得易于理解。起源法大概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主要的科学成就。它的主要原理是对任何复杂事物的理解的方法应该是追溯它的形成过程，观察它成长中的各个连续阶段。如果认为此种方法应用到历史中仅仅意味着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现今的社会状况不能同过去分割开，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这同样意味着过去的事件也不能同当今的社会分割开，否则，它就失去了意义。历史的出发点通常是从有问题的社会现状着手的。

This general principle may be briefly applied to a consideration of its bearing upon a number of points. The biographical method is generally recommended as the natural mode of approach to historical study. The lives of great men, of heroes and leaders, make concrete and vital historic episodes otherwise abstract and incomprehensible. They condense into vivid pictures complicated

and tangled series of events spread over so much space and time that only a highly trained mind can follow and unravel them. There can be no doubt of the psychological soundness of this principle. But it is misused when employed to throw into exaggerated relief the doings of a few individuals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social situations which they represent. When a biography is related just as an account of the doings of a man isolated from the conditions that aroused him and to which his activities were a response, we do not have a study of history, for we have no study of social life, which is an affair of individuals in association. We get only a sugar coating which makes it easier to swallow certain fragments of information.

或许可以简要地用这个基本原理来考虑它和几个问题的关系。传记方法通常被认为是通往历史研究的自然方式。伟人、英雄和领袖的生活经历给原本抽象、晦涩的历史片段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它们把一系列杂乱的事件浓缩成生动的画面。这些事件散布在广阔的时空中，只有受过高等训练的人才能够理清脉络，领悟来龙去脉。在心理学上，这个原理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把少数人的事业渲染夸大，而且脱离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对上述原理的误用。如果传记仅仅是记载个人行为事迹，脱离引发该行为的环境，那么这不是在研究历史。我们并没有关注与个人行为紧密相连的社会生活。我们只是得到一件糖衣，使得我们比较容易吞咽某些知识碎片。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of late to primitive life as an introduction to learning history. Here also there is a right and a wrong way of conceiving its value. The seemingly ready-made character and the complexity of present conditions, their apparently hard and fast character, is an almost insuperable obstacle to gaining insight into their nature. Recourse to the primitive may furnish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immensely

simplified form. It is like unraveling a cloth so complex and so close to the eyes that its scheme cannot be seen, until the larger coarser features of the pattern appear. We cannot simplify the present situations by deliberate experiment, but resort to primitive life presents us with the sort of results we should desire from an experiment.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modes of organized action are reduced to their lowest terms. When this social aim is overlooked, however, the study of primitive life becomes simply a rehearsing of sensational and exciting features of savagery.

近来，很多人已经开始关注原始生活，将其看作学习历史的开端。关于原始生活的价值，这里也同时有正确和错误的两种理解方式。当今环境看似现成的特点和复杂性以及表面看似严酷的特性几乎成为理解社会本质不可逾越的障碍。追溯原始社会情况能够以一种最简化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当今环境的基本特征。这如同将一块精细复杂的布料摊开在眼前，只有当布料较大较粗的线条出现时，才能认清它的图案。缜密的实验无法简化当今环境，但是求助于原始生活却能提供给我们期待从实验中获得的各种结果。社会关系和有组织的行为模式都是用最简单的词语表达。然而，倘若忽视了这个社会目的，原始生活的研究就会沦为野蛮社会里轰动性特征的重演。

Primitive history suggests industrial history. For one of the chief reasons for going to more primitive conditions to resolve the present into more easily perceived factors is that we may realize how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procuring subsistence, shelter, and protection have been met; and by seeing how these were solved in the earlier days of the human race, form some conception of the long road which has had to be traveled, and of the successive inventions by which the race has been brought forward in culture. We do not need to go into disputes regarding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to realize that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ankind gives insight into two important phases of social life in a way which no other phase of history can possibly do. It presents us with knowledge of the successive inventions by which theoretical science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control of nature in the interests of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of social life. It thus reveals the successive causes of social progress. Its other service is to put before us the things that fundamentally concern all men in common—the occupations and values connected with getting a living. Economic history deals with the activities, the career, and fortunes of the common man as does no other branch of history. The one thing every individual must do is to live; the one thing that society must do is to secure from each individual his fair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ral well being and see to it that a just return is made to him.

远古历史让人联想到工业历史。通过研究更为远古的环境会更容易理解当今社会，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可以领会到古人所面对的获取生存物质，住所和保护等的基本问题。通过观察早期人类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能够理解人类发展所经历的漫长历史道路，以及人类在文化史上所创造的各种发明物。我们无须对历史的经济观进行争论便能够认识到人类的工业历史使我们了解到社会生活的两个重要阶段，这是其他历史阶段所无法做到的。它让我们认识到，人们为了社会生活的稳定和繁荣，利用理论科学来控制自然，进而产生接连而来的各种发明。因此，工业史揭示了社会进步的持续性原因。另一方面，工业史向我们展现了人类共同关心的事情——与谋生相关的各种活动和价值。经济史研究人类的各种活动、职业和财富，历史的其他分支都不研究这个问题。每个人必须要做的事情是生存；社会必须要做的事则是确保每个人对社会福利做出一定贡献，并且使之得到相应的回报。

Economic history is more human, more democratic, and hence more liberalizing than political history. It deals not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 but with the growth of the effective liberties, through command of nature, of the common man for whom powers and principalities exist.

经济史更人性化、更民主化，因而比政治史更自由化。它研究的不是主权和权力的兴衰浮沉，而是普通大众通过驾驭自然而产生的有效自由的发展，而权力和主权是因普通大众而存在的。

Industrial history also offers a more direct avenue of approach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timate connection of man's struggle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with nature than does political history—to say nothing of the military history into which political history so easily runs when reduced to the level of youthful comprehension. For industrial history is essentially an account of the way in which man has learned to utilize natural energy from the time when men mostly exploited the muscular energies of other men to the time when, in promise if not in actuality, the resources of nature are so under command as to enable men to extend a common dominion over her. When the history of work, when the conditions of using the soil, forest, mine, of domesticating and cultivating grains and animals, of manufacture and distribution, are left out of account, history tends to become merely literary—a systematized romance of a mythical humanity living upon itself instead of upon the earth.

同时，与政治史相比，工业史提供了更为直接的途径去实现人类的抗争和成败同自然的密切联系。军事史就更不用说了。在青年的理解中，政治史往往简化成为军事史。工业史主要研究人类如何学会利

用自然力，从早期大多数人剥削他人的体力到后来完全控制自然资源使其为人类所用。如果这现在还没有实现的话，至少是一种期待。如果历史不讲劳动的历史，不讲利用土壤、森林、矿藏，不讲驯养动物和种植谷物，不讲制造和分配，那么历史就变成纸上空谈——一个系统化的虚构的人类依靠自身而不是地球而生存的传奇。

Perhaps the most neglected branch of history in general education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We are only just beginning to realize that the great heroes who have advanced human destiny are not its politicians, generals, and diplomatists, but the scientific discoverers and inventors who have put into man's hands the instrumentalities of an expanding and controlled experience, and the artists and poets who have celebrated his struggles, triumphs, and defeats in such language, pictorial, plastic, or written, that their meaning is rendered universally accessible to others.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industrial history as a history of man's progressive adaptation of natural forces to social uses is the opportunity which it affords for consideration of advance in the methods and results of knowledge. At present men are accustomed to eulogize intelligence and reason in general terms; their fundamental importance is urged. But pupils often come away from the conventional study of history, and think either that the human intellect is a static quantity which has not progressed by the invention of better methods, or else that intelligence, save as a display of personal shrewdness, is a negligible historic factor. Surely no better way could be devised of instilling a genuine sense of the part which mind has to play in life than a study of history which makes plain how the entire advance of humanity from savagery to civilization has been dependent upon intellectual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things which ordinarily figure most largely in historical writings have been side issues, or even obstructions for intelligence to

overcome.

常规教育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历史分支可能就是知识发展史。我们现在才逐渐认识到推动人类进程的伟大英雄不是政治家、军人或者外交官，而是科学家和发明家。他们利用普遍的、受控制的经验给人们创造了工具。同样伟大的是那些艺术家和诗人，他们用绘画、雕塑和文字歌颂着人类的抗争、胜利和征服，使得普通大众能够理解它们的意义。工业史作为人类逐渐支配自然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历史，其一大优点便是有利于知识研究方法和结果的进步。现在，人们习惯于总体上赞颂智力和理智，强调它们的重要作用。但是学生经常脱离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他们或认为人类智慧是静止不变的，不会因为更好的发明而进步，或认为智慧只是个人才能的展示，在历史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因素。要想真正了解心智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最好的方法是学习历史，因为历史清晰地告诉我们人类如何依靠知识发现和发明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通常在历史著作中出现最多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枝节的问题，或者是要用智力去克服的阻碍。

Pursued in this fashion, history would most naturally become of ethical value in teaching. Intelligent insight into present forms of associated life is necessary for a character whose morality is more than colorless innocence. Historical knowledge helps provide such insight. It is an organ for analysis of the warp and woof of the present social fabric, of making known the forces which have woven the pattern. The use of history for cultivating a socialized intelligence constitutes its moral significance. It is possible to employ it as a kind of reservoir of anecdotes to be drawn on to inculcate special moral lessons on this virtue or that vice. But such teaching is not so much an ethical use of history as it is an effort to create moral impressions by means of more or less authentic material. At best, it produces a temporary emotional glow; at worst,

callous indifference to moralizing. The assistance which may be given by history to a more intelligent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situations of the present in which individuals share is a permanent and constructive moral asset.

用这种方式研究历史，历史在教学中自然就具有了伦理价值。只要我们的道德准则不是苍白幼稚的，我们就有必要对当今各种形式的社会生活有所洞察。历史知识能够帮助我们获得这种洞察力。它是分析当今社会结构的本质的工具，是了解造就这种结构的力量的工具。将历史用于培养社会化的智力，这构成了历史的道德意义。把历史作为各种轶闻趣事的合辑，借鉴它对各种美德或者恶行贴上特殊的道德标签，这是可能的。但是这种教育方法并不算是真正利用历史的道德意义，它更像是通过真实的材料努力创建道德标准。它充其量只是产生了暂时性的情感愉悦。最坏的情况是使人们对道德说教冷漠麻木。历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个人所处的各种社会环境，这是一桩永恒的建设性的道德财富。

Summary.

总结

It is the nature of an experience to have implications which go far beyond what is at first consciously noted in it. Bringing these connections or implications to consciousness enhances the meaning of the experience. Any experience, however trivial in its first appearance, is capable of assuming an indefinite richness of significance by extending its range of perceived connections. Normal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s is the readiest way of effecting

this development, for it links up the net results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group and even the race with the immediate experience of an individual. By normal communication is meant that in which there is a joint interest, a common interest, so that one is eager to give and the other to take. It contrasts with telling or stating things simply for the sake of impressing them upon another, merely in order to test him to see how much he has retained and can literally reproduce.

经验具有这样的性质，它具有的隐含意义往往超出最初所注意到的含义。意识到这些关联或者隐含意义会增加经验的意义。任何经验，无论第一眼看起来是如何的琐碎，通过扩大被感知的范围，都能表现出无限丰富的意义。与他人的正常交流是实现这种发展的最直接方式，因为它把一个群体甚至种族的经验产生的最后成果直接同个人的经验相联系起来。正常的交流意味着在交流中双方存在着共同的兴趣，因此，一方急于给予，另一方则急于接纳。这同下面的方法形成对比，即讲述某件事情只是为了让别人印象深刻，仅仅为了测试他记住了多少或能够复述多少。

Geography and history are the two great school resources for bringing about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ignificance of a direct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active occupations described in the previous chapter reach out in space and time with respect to both nature and man. Unless they are taught for external reasons or as mere modes of skill their chief educational value is that they provide the most direct and interesting roads out into the larger world of meanings stated in history and geography. While history makes human implications explicit and geography natural connections, these subjects are two phases of the same living whole, since the life of men in association goes on in nature, not as an

accidental setting, but as the material and medium of development.

地理和历史是扩充直接个人经验的意义的两大教育资源。前面一章谈到的积极活动在人与自然两方面都有时空上的扩展。除非因为外部原因或者仅仅作为技能模式来传授这些活动，这些活动的主要教育价值在于它们为进入历史和地理所讲的广大意义世界提供最直接和最有趣的道路。历史阐明人类之间的微妙关系，地理则研究自然界的关联，这两个学科是同一个鲜活世界的不同方面。人类的社会生活离不开自然环境，自然并不是一个附属的背景，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材料和媒介。

Chapter 17 Science in the Course of Study

第十七章　课程中的科学

1．The Logical and the Psychological.

一、逻辑和心理学的方法

By science is meant, as already stated, that knowledge which is the outcome of methods of observation, reflection, and testing which are deliberately adopted to secure a settled, assured subject matter. It involves an intelligent and persistent endeavor to revise current beliefs so as to weed out what is erroneous, to add to their accuracy, and, above all, to give them such shape that the dependencies of the various facts upon one another may be as obvious as possible. It is, like all knowledge, an outcome of activity bringing about certain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But in its case, the quality of the resulting knowledge is the controlling factor and not an incident of the activity. Both logically and educationally, science is the perfecting of knowing, its last stage.

如前面所述，科学的含义即是通过审慎地运用观察、思考和试验的方法获得稳定和确定的材料。科学包含一种明智和持久的努力，可以用来修正各种流行的信念，去除谬误，提高准确度，使信念尽可能明显地不同于事实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科学像所有知识一样，是一种能够引起环境变化的活动。但是，对科学来说，所获得的知识的质量是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活动的附带产物。从逻辑方面和教育

方面来看，科学是使认知完美的阶段，是认知的最后阶段。

Science, in short, signifies a realization of the logical implications of any knowledge. Logical order is not a form imposed upon what is known; it is the proper form of knowledge as perfected. For it means that the statement of subject matter is of a nature to exhibit to one who understands it the premises from which it follows and the conclusions to which it points (See ante, p. 224). As from a few bones the competent zoologist reconstructs an animal; so from the form of a statement in mathematics or physics the specialist in the subject can form an idea of the system of truths in which it has its place.

科学，简言之，就是意味着一切知识的逻辑含义的实现。逻辑顺序并不是强加于已知事实的形式，而是一种知识完美化的恰当形式。因为逻辑顺序表明了学科内容的一种特性：向了解它的人展示它所遵循的前提和所指出的结论（参见原书190页）。正如一位能干的动物学家仅研究少量的骨头就能重新构造一头动物一样，一位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也能通过数学或物理的一段推理塑造出整个真理体系。

To the non-expert, however, this perfected form is a stumbling block. Just because the material is stat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furtherance of knowledge as an end in itself, its connections with the material of everyday life are hidden. To the layman the bones are a mere curiosity. Until he had mastered the principles of zoology, his efforts to make anything out of them would be random and blin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learner scientific form is an ideal to be achieved, not a starting point from which to set out. It is, nevertheless, a frequent practice to start in instruction with the

rudiments of science somewhat simplified.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 is an isolation of science from significant experience. The pupil learns symbols without the key to their meaning. He acquires a technical body of information without ability to trace its connections with the objects and operations with which he is familiar—often he acquires simply a peculiar vocabulary.

但是，对于一个不是专家的人来说，这种完美化的形式则是一种包袱。由于对材料的叙述以增加知识为目的，知识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被掩盖。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几根骨头仅仅是一些让人好奇的事物。在他精通动物学原理之前，他对这些骨头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随意的和盲目的。从学习者的观点来看，科学的形式是要达到的理想，而非出发点。然而，教育都是从一些简化的科学入门知识的频繁练习开始。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把科学和有意义的实践分割开来。学生学习各种象征符号时，并没有理解它们的含义。他获得了信息知识的主体框架，但却没有能力去追溯信息知识与他所熟悉的事物和活动之间的联系，通常只能获得一些专业词汇。

There is a strong temptation to assume that presenting subject matter in its perfected form provides a royal road to learning. What more natural than to suppose that the immature can be saved time and energy, and be protected from needless error by commencing where competent inquirers have left off? The outcome is written large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Pupils begin their study of science with texts in which the subject is organized into topic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he specialist. Technical concepts, with their definitions, are introduced at the outset. Laws are introduced at a very early stage, with at best a few indications of the way in which they were arrived at. The pupils learn a “science” instead of learning the scientific way of treating the familiar material of

ordinary experience. The method of the advanced student dominates college teaching; the approach of the college is transferred into the high school, and so down the line, with such omissions as may make the subject easier.

人们通常特别倾向于认为，把完美化的学科内容教给学生就能为他们的学习提供一条黄金大道。他们还假设，学生从有能力的研究工作者研究成果开始，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同时也可减少不必要的错误。还有什么比这种假设更自然呢？其结果在教育史上有很多记载。学生从教科书开始学习科学的，所用的教材按照专家编排的顺序把各个学科组织成各种科目。从一开始就介绍专门的概念及定义。在很早的阶段就引入规律，但是却很少讲得到这些规律的方法。学生学习所谓“科学”，而不是学习科学处理日常经验中熟知内容的方法。研究生的学习方法主宰着大学教育，大学的教育方式传递到高中，这样一直向下传递，由于内容不断省略，学习的科目可能会变得简单。

The chronological method which begins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he learner and develops from that the proper modes of scientific treatment is often called the “psychological” method in distinction from the logical method of the expert or specialist. The apparent loss of time involved is more than made up for by the superior understanding and vital interest secured. What the pupil learns he at least understands. Moreover by following, in connection with problems selected from the material of ordinary acquaintance, the methods by which scientific men have reached their perfected knowledge, he gains independent power to deal with material within his range, and avoids the mental confusion and intellectual distaste attendant upon studying matter whose meaning is only symbolic. Since the mass of pupils are never going to become scientific specialists, i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t they should get

some insight into what scientific method means than that they should copy at long range and second hand the results which scientific men have reached. Students will not go so far, perhaps, in the “ground covered,” but they will be sure and intelligent as far as they do go. And 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e few who go on to be scientific experts will have a better preparation than if they had been swamped with a large mass of purely technical and symbolically stated information. In fact, those who do become successful men of science are those who by their own power manage to avoid the pitfalls of a traditional scholastic introduction into it.

这种长期的方法，即从学习者的经验开始，继而从恰当的科学处理模式下发展而来的方法，通常也被称为“心理学”方法，以此来区别专家或者行家的逻辑方法。表面上的时间丢失可以通过获得深刻的理解和生动的兴趣得到补偿，而且绰绰有余。学生所学的知识至少是他能理解的。此外，通过联系从日常相识的人的材料中所挑选的问题，沿用拥有完善知识的科学工作者的方法，他获得了独立处理能力范围内的材料的能力，而且避免了学习象征意义材料所带来的心理困惑和智力上的乏味。由于大部分学生不会成为科学家或专家，他们对科学方法意义的了解比在远距离地间接抄录科学家已有成果要更加重要。学生或许不能完全领悟所有学过的知识，但是对其体验过的知识，他们是确信的、认可的。而且，可以有把握地说，那些最终能够成为科学专家的少数人，与曾被灌输大量纯技术和书面知识的人相比，可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事实上，那些成为成功科学家的人会通过自己的力量，设法去避免那些传统学究式学习方法的陷阱。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men who a generation or two ago strove, against great odds, to secure a place for science in education, and the result generally achieved is

painful. Herbert Spencer, inquiring 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 concluded that from all points of view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most valuable. But his argument unconsciously assumed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could be communicated in a ready-made form. Passing over the methods by which the subject matter of our ordinary activities is transmuted into scientific form, it ignored the method by which alone science is science. Instruction has too often proceeded upon an analogous plan. But there is no magic attached to material stated in technically correct scientific form. When learned in this condition it remains a body of inert information. Moreover its form of statement removes it further from fruitful contact with everyday experiences than does the mode of statement proper to literature. Nevertheless that the claims made for instruction in science were unjustifiable does not follow. For material so taught is not science to the pupil.

在一两代之前，有人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为科学在教育上能获得一席之地而努力，然而，与他们的期望相比，一般达到的结果是令人痛心的。斯宾塞在探究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时，总结道：从所有观点来看，科学知识是最有价值的。但是，他的论点无意识地假定了科学知识可以用现成的形式传授给别人。这种观点忽略了我们日常活动的题材转化为科学形式的方法，忽略了科学唯一赖以成为科学的方法。教育通常也按某种类似的方案进行。但是，并没有魔法依附在以完全正确的科学形式陈述的材料中。当学习这样的材料时，它们仍然是一些没有活力的知识。此外，这些材料的叙述形式比文学上的叙述形式更加远离日常经历。虽然如此，也不能说有助于科学教育的主张不合理，因为对于学生来说，这样的教育材料不是科学。

Contact with things and laboratory exercises, while a great improvement upon textbooks arranged upon the deductive plan, do

not of themselves suffice to meet the need. While they are an indispensable por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 they do not as a matter of course constitute scientific method. Physical materials may be manipulated with scientific apparatus, but the materials may be disassociated in themselves and in the ways in which they are handled, from the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used out of school. The problems dealt with may be only problems of science: problems, that is, which would occur to one already initiated in the science of the subject. Our attention may be devoted to getting skill in technical manipulation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connection of laboratory exercises with a problem belonging to subject matter. There is sometimes a ritual of laboratory instruction as well as of heathen religion. [4_1]

虽然根据演绎方法编排的教科书已经有很大提高，但是与事物和实验室的联系本身还不足以满足要求。虽然后者是科学方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它们并不是必然构成科学的方法。物理材料可以用科学仪器进行处理，但是这些材料本身及其处理方法，可以和校外所用材料和工序分离开来。所处理的问题可能只是科学问题——就是对某科学问已经入门的人会遇到的问题。我们的注意力可能放在了获得技术操作的技巧上，而不是试验练习与教材问题的联系上。有时候实验室的教育有仪式化的倾向，如同异教徒举行仪式一样。 [5_1]

It has been mentioned, incidentally, that scientific statements, or logical form, implies the use of signs or symbols. The statement applies, of course, to all use of language. But in the vernacular, the mind proceeds directly from the symbol to the thing signified. Association with familiar material is so close that the mind does not pause upon the sign. The signs are intended only to stand for things and acts. But scientific terminology has an additional use. It is

designed, as we have seen, not to stand for the things directly in their practical use in experience, but for the things placed in a cognitive system. Ultimately, of course, they denote the things of our common sense acquaintance. But immediately they do not designate them in their common context, but translated into terms of scientific inquiry. Atoms, molecules, chemical formula, the mathematical propositions in the study of physics—all these have primarily an intellectual value and only indirectly an empirical value. They represent instruments for the carrying on of science. As in the case of other tools, their significance can be learned only by use. We cannot procur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meaning by pointing to things, but only by pointing to their work when they are employed as part of the technique of knowledge.

前文偶然提到过，科学的陈述或者逻辑形式蕴含着符号的应用。当然，这种说法适用于所有的语言应用。但是，在本国语中，我们可以直接从符号中了解它所表示的事物。我们见到熟悉的材料就容易产生联想。所以，一看到符号就联想到它所表示的事物。我们以为这些符号只是用来表示事物和动作。但是，科学术语还另有用处。正如同我们看到的一样，它所表示的并不是经验中有直接实际应用的事物，而是表示一些存在于认识系统中的事物。当然，最终这些术语表示的还是我们常识了解的事物。但是，它们在通常的背景下并不是直接代表事物，而是转化为科学探究的术语。原子、分子、化学公式和物理学中的数学命题，所有的这些首先都具有知识价值和间接经验价值。它们代表从事科学探究的工具。和在科学研究中的其他工具一样，它们的意义只有在应用的时候才能够被了解。我们不能在一看到事物就能理解它们的涵义，只有当把之作为技术知识的一部分，通过使用它们，才能理解其涵义。

Even the circle, square, etc. , of geometry exhibit a difference

from the squares and circles of familiar acquaintance, and the further one proceeds in mathematical science the greater the remoteness from the everyday empirical thing. Qualities which do not count for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about spatial relations are left out; those which are important for this purpose are accentuated. If one carries his study far enough, he will find even the properties which are significant for spatial knowledge giving way to those which facilitate knowledge of other things—perhaps a knowledge of the general relations of number. There will be nothing in the conceptual definitions even to suggest spatial form, size, or direction.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unreal mental inventions, but it indicates that direct physical qualities have been transmuted into tools for a special end—the end of intellectual organization. In every machine the primary state of material has been modified by subordinating it to use for a purpose. Not the stuff in its original form but in its adaptation to an end is important. No one would have a knowledge of a machine who could enumerate all the materials entering into its structure, but only he who knew their uses and could tell why they are employed as they are. In like fashion one has a knowledge of mathematical conceptions only when he sees the problems in which they function and their specific utility in dealing with these problems. “Knowing” the definitions, rules, formulae, etc. , is like knowing the names of parts of a machine without knowing what they do. In one case, as in the other, the meaning, or intellectual content, is what the element accomplishes in the system of which it is a member.

甚至几何表示中的圆形、正方形也和我们所熟悉的圆形、正方形不同。如果我们学习的数学越深奥，就会与日常经验事物越遥远。我们会省略与研究空间关系知识无关的特性；而那些对于研究空间关系很重要的特性则受到重视。如果研究再深入下去，我们会发现甚至一

些很重要的空间知识也会让位于那些对其他事物有帮助的知识——也许是一般数理关系的知识。这些对于概念定义一点用处都没有，甚至不能表明空间的形式、大小和方向。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凭空捏造，但是这表明直接的物理特性已经转化为达到特殊目（即知识组织目的）的工具。每一台机器原料的最原始状态都已经改变，以便让它能从属与某个目的的应用。重要的不是原始形式的材料，而是材料是否适应目的。有人能列举机器构造中的所有材料，并不能说他就了解这台机器所有的知识，只有他知道这些材料的用处，并能说明为什么这样使用，他才算了解这台机器所有知识。同样的，只有当他懂得数学概念起作用的那些问题以及在处理这些问题中数学概念的特殊用处，他才能算是一个拥有数学概念知识的人。而仅仅懂得定义、法则、公式等等就如同知道一台机器每个部件的名字却不知道其用途一样。以上两个例子中，意义或者知识的内容，就是懂得要素作为系统成分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

2．Science and Social Progress.

二、科学和社会进步

Assum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rect knowledge gained in occupations of social interest is carried to a perfected logical form, the question arises as to its place in experience. In general, the reply is that science marks the emancipation of mind from devotion to customary purposes and makes possible the systematic pursuit of new ends. It is the agency of progress in action. Progress is sometimes thought of as consisting in getting nearer to ends already sought. But this is a minor form of progress, for it requires only improvement of the means of action or technical advance. More important modes of progress consist in enriching prior

purposes and in forming new ones. Desires are not a fixed quantity, nor does progress mean only an increased amount of satisfaction. With increased culture and new mastery of nature, new desires, demands for new qualities of satisfaction, show themselves, for intelligence perceives new possibilities of action. This projection of new possibilities leads to search for new means of execution, and progress takes place; while the discovery of objects not already used leads to suggestion of new ends.

假设从事有社会兴趣的职业能获得的直接知识发展成为完善的逻辑形式，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种完善的逻辑形式在经验中占有何种的位置。一般来说，对此问题的回答是，科学代表着把人的思想从致力于传统目的中解放出来，使人系统地追求新的目的成为可能。科学是行动中的进步力量。进步往往被认为是存在于越来越接近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但是，这只是一种小的进步，因为它只需要行动手段的进步或者技术的进步。比较重要的进步模式关键在于丰富先前的目的和创造新的目的。人的欲望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进步也不仅仅是一种增加了的满足感。随着文化的增加和对自然界的征服，人产生了新的欲望，要求提高满足感的质量，因为人能看出许多新的行动可能性。新的可能性的诞生导致了人们对新的实践手段的追求，进步也就随之而来。同时，新事物的发现也暗示了新目的的出现。

That science is the chief means of perfecting control of means of action is witnessed by the great crop of inventions which followed intellectual command of the secrets of nature. The wonderful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known 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the fruit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Railways, steamboats, electric motors,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automobiles, aeroplanes and dirigibles are conspicuous evidenc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in life. But none of them would be of

much importance without the thousands of less sensational inventions by means of which natural science has been rendered tributary to our daily life.

科学是完善控制行动工具的主要手段，随着人类知识主宰自然奥秘所带来的大量发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使产品和分配发生巨大转变的工业革命就是科学实验的成果。铁路、轮船、电动机、电话、电报、汽车、飞机和飞船都是科学应用在生活中的显著例子。但是，如果没有那些数以千计的轰动性发明，它们都不会变得很重要，正是通过这些发明，自然科学才得以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做出了贡献。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e progress thus procured has been only technical: it has provided more efficient means for satisfying preexistent desires, rather than modified the quality of human purposes. There is, for example, no modern civilization which is the equal of Greek culture in all respects. Science is still too recent to have been absorbed into imaginative and emotional disposition. Men move more swiftly and surely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ends, but their ends too largely remain what they were prior to scientific enlightenment. This fact places upon educati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using science in a way to modify the habitual attitude of imagination and feeling, not leave it just an extension of our physical arms and legs.

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取得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只是局限于技术方面。技术进步已经为满足人类已有的欲望提供了更有效的手段，但却并没有改变人类目标的质量。例如，没有一种现代文明能在各方面与希腊文明媲美。科学仍然是太新奇，还不能被人们的想象和情感所吸收。人类正迅速而稳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他们的目标很大一

部分仍然处于科学启蒙前的状态。这就要求教育用科学改变对想象和情感习惯的态度，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物质方面的扩充。

The advance of science has already modified men's thoughts of the purposes and goods of life to a sufficient extent to give some idea of the nature of this responsibility and the ways of meeting it. Science taking effect in human activity has broken down physical barriers which formerly separated men; it has immensely widened the area of intercourse. It has brought about interdependence of interests on an enormous scale. It has brought with it an established convic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control of nature in the interests of mankind and thus has led men to look to the future, instead of the past. The coincidence of the ideal of progress with the advance of science is not a mere coincidence. Before this advance men placed the golden age in remote antiquity. Now they face the future with a firm belief that intelligence properly used can do away with evils once thought inevitable. To subjugate devastating disease is no longer a dream; the hope of abolishing poverty is not utopian. Science has familiarized men with the idea of development, taking effect practically in persistent gradual amelioration of the estate of our common humanity.

科学的进步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关于生活目标和生活幸福的看法，使他们对这种责任的性质以及履行责任的方法有所认识。科学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已经打破了以前把人们隔离开来的物理障碍，极大地扩展了交流的领域并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利益的相互依赖。它使得人们对为人类利益而控制自然的可能性深信不疑，从而引导人们展望未来而不是缅怀过去。科学进步和理想进步的一致性并不仅仅是巧合。在科学发展以前，人们以遥远的过去作为黄金时代。现在他们面对未来，坚定认为，正确地应用智力能够破除以前一度被认为不可避

免的灾祸。制服灾难性的疾病不再是梦想，废除贫穷也不再是乌托邦。科学已经使人们熟悉发展的思想，并持久地、逐步地改善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生活。

The problem of an educational use of science is that to create an intelligence pregnant with belief in the possibility of the direction of human affairs by itself. The method of science engrained through education in habit means emancipation from rule of thumb and from the routine generated by rule of thumb procedure. The word empirical in its ordinary use does not mean “connected with experiment,” but rather crude and unrationa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ditions created by the non-existence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experience was opposed in all the ruling philosophies of the past to reason and the truly rational. Empirical knowledge meant the knowledge accumulated by a multitude of past instances without intelligent insight into the principles of any of them. To say that medicine was empirical meant that it was not scientific, but a mode of practice based upon accumulated observations of diseases and of remedies used more or less at random. Such a mode of practice is of necessity happy-go-lucky; success depends upon chance. It lends itself to deception and quackery. Industry that is “empirically” controlled forbids constructive applications of intelligence; it depends upon following in an imitative slavish manner the models set in the past. Experimental science means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past experiences as the servant, not the master, of mind. It means that reason operates within experience, not beyond it, to give it an intelligent or reasonable quality. Science is experience becoming rational. The effect of science is thus to change men's idea of the nature and inherent possibilities of experience. By the same token, it changes the idea and the operation of reason. Instead of being something

beyond experience, remote, aloof, concerned with a sublime region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experienced facts of life, it is found indigenous in experience:—the factor by which past experiences are purified and rendered into tools for discovery and advance.

所以，在教育上利用科学，就是要创造一种智力，深信智力指导人类事务是有可能的。通过教育，用科学方法使学生从根深蒂固的习惯中解放出来，从单凭经验进行判断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经验的”（empirical）这个词平时并不是指“与试验有关联”，而是指粗糙的和非理性的。在不存在实验科学条件的影响下，所有过去居支配地位的哲学都把经验与理性和合理对立起来。经验的知识是指由过去许多实例积累起来的知识，对于产生这些知识的原理没有任何高明的见解。有人说医学是凭经验的，就是指它不是科学的，而是基于对疾病观察积累的多少，就随意地使用药物。这种医疗模式完全是偶然的，它的成功率取决于机遇。这种医学助长了欺骗和自我吹嘘。靠“经验”来控制的行业禁止智力建设性的参与，而是依靠依样画葫芦的方法来模仿过去的模式。经验科学是指使用过去的经验作为思想的仆从，而不是作为思想的主人。这就是说，理性在经验范围之内，而非经验范围之外运作，这使它拥有理智或者合理的性质。科学就是理性的经验。因此，科学的作用就是改变人们关于经验性质和内在可能性的观念。基于同样的原因，科学也改变了理性及其运行的观念。科学并不遥远，并非孤立于经验之外，并非属于与生活中的经验无关的崇高领域。科学是伴随经验而来的，使过去的经验得以纯化，成为人类发现新事物和取得进步的工具。

The term 'abstract' has a rather bad name in popular speech, being used to signify not only that which is abstruse and hard to understand, but also that which is far away from life. But abstrac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trait in reflective direction of activity. Situations do not literally repeat themselves. Habit treats

new occurrences as if they were identical with old ones; it suffices, accordingly, when the different or novel element is negligible for present purposes. But when the new element requires especial attention, random reaction is the sole recourse unless abstraction is brought into play. For abstraction deliberately selects from the subject matter of former experiences that which is thought helpful in dealing with the new. It signifies conscious transfer of a meaning embedded in past experience for use in a new one. It is the very artery of intelligence, of the intentional rendering of one experience available for guidance of another.

“抽象”一词在日常会话中名声一直不好，它不仅被用来表示一些难懂的东西，而且还是远离生活的东西。但是，抽象作用是心智指导行为不可或缺的特征。我们遇到的境遇，并非重复出现。我们凭习惯处理一些新的事件，就如同处理旧的事件一样。因此，当不同的或者新颖的元素对于当前目的无关紧要的时候，习惯仍能满足新的情况。但是，当新的因素需要特别注意的时候，除非抽象起作用，不然，只能求助于随机反应。抽象特意从过去经验题材中挑选出有助于对付新事物的东西。抽象就表示有意识地把蕴含在过去经验中的意义迁移到新的经验中。抽象是智慧的命脉，是使一种可用经验有意识地来指导其他经验。

Science carries on this working over of prior subject matter on a large scale. It aims to free an experience from all which is purely personal and strictly immediate; it aims to detach whatever it has in common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of other experiences, and which, being common, may be saved for further use. It is, thus, an indispensable factor in social progress. In any experience just as it occurs there is much which, while it may be of precious import to the individual implicated in the experience, is peculiar and

unreduplicabl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cience, this material is accidental, while the features which are widely shared are essential. Whatever is unique in the situation, since dependent upo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incidence of circumstance, is not available for others; so that unless what is shared is abstracted and fixed by a suitable symbol, practically all the value of the experience may perish in its passing. But abstraction and the use of terms to record what is abstracted put the net value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 at the permanent disposal of mankind. No one can foresee in detail when or how it may be of further use. The man of science in developing his abstractions is like a manufacturer of tools who does not know who will use them nor when. But intellectual tools are indefinitely more flexible in their range of adaptation than other mechanical tools.

科学大规模进行着对过去经验题材的整理工作。科学的目的是把经验从所有纯粹个人经验和直接的经验中解放出来。凡是与其他经验材料共同的东西都分离开来，保存下来，供未来使用。因此，科学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因素。任何经验刚才开始产生的时候，可能对于个人来说很宝贵，但这种经验有很大部分都是特殊的、不可重复的。从科学观点来说，这种经验题材是偶然的，尽管其共同特性是重要的。无论出于这种情形的经验多么独特，由于它依赖于个人的特性和环境的巧合，因而对别人都没有参考价值。所以，除非能从经验中提取共同之处并用恰当的符号固定下来，否则经验里的一切实用价值可能随着经验的流失而流失。但是，抽象化和用术语记录的抽象之物可以把个人经验的全部价值提供给人类永久使用。没有人能具体预见何时或者如何进一步利用抽象之物。科学家进行发掘时，他就像制造工具的人，不知道是谁在何时使用这些东西。但是，在其适用的范围内，智力工具比其他机械的工具要更加灵活得多。

Generalization is the counterpart of abstraction. It is the functioning of an abstraction in its application to a new concrete experience,—its extension to clarify and direct new situations. Reference to these possible applications is necessary in order that the abstraction may be fruitful, instead of a barren formalism ending in itself. Generalization is essentially a social device. When men identified their interests exclusively with the concerns of a narrow group, their generalizations were correspondingly restricted. The viewpoint did not permit a wide and free survey. Men's thoughts were tied down to a contracted space and a short time,—limited to their own established customs as a measure of all possible values. Scientific abstraction and generalization are equivalent to taking the point of view of any man, whatever his location in time and space. While this emancipation from the conditions and episodes of concrete experiences accounts for the remoteness, the "abstractness," of science, it also accounts for its wide and free range of fruitful novel applications in practice.

概括是与抽象相对应之物。概括是抽象应用于新的具体经验时所起的作用。扩大抽象的作用就能阐明并指导新的情境。为了使抽象发挥作用，而不是流于无结果的形式主义，必须提一下有关抽象的可能应用。概括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手段。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利益只与一个小集团的利益相关，他们的概括就相应地受到限制。他们的观点不容许进行广泛而自由的调查。人们的思想被束缚在狭小空间和短暂时间上，受限于已经建立起来的习俗，把之作为一切可能价值的标准。科学的抽象和概括就是采纳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的观点。科学之所以能远离现实和被"抽象化"，而且能在实践中得到新的、广泛、自由运用，其原因就是科学被从具体经验的条件和情节中解放出来了。

Terms and propositions record, fix, and convey what is

abstracted. A meaning detached from a given experience cannot remain hanging in the air. It must acquire a local habitation. Names give abstract meanings a physical locus and body. Formulation is thus not an after-thought or by-product; it is essential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work of thought. Persons know many things which they cannot express, but such knowledge remains practical, direct, and personal. An individual can use it for himself; he may be able to act upon it with efficiency. Artists and executives often have their knowledge in this state. But it is personal, untransferable, and, as it were, instinctive. To formulate the significance of an experience a man must take into conscious account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s. He must try to find a standpoint which includes the experience of others as well as his own. Otherwise his communication cannot be understood. He talks a language which no one else knows. While literary art furnishes the supreme successes in stating of experiences so that they are vitally significant to others, the vocabulary of science is designed, in another fashion, to express the meaning of experienced things in symbols which any one will know who studies the science. Esthetic formulation reveals and enhances the meaning of experiences one already has; scientific formulation supplies one with tools for constructing new experiences with transformed meanings.

术语和命题把抽象之物记录、固定下来并传播出去。从一个特定的经验中分离出来的意义不能仍然是悬而未决的。它必须有一个对应的说法。名字给了抽象意义一个物理轨迹和主体。因此，意义的表述不是事后的思考或者副产品，而是完成思维的必要条件。人们知道很多自己不能表达的东西，但是这种知识仍然是实在的、直接的和个人的。个人能自己运用这些知识。他能有效按照这些知识行动。艺术家和做事情的人往往有属于这种情况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属于是个人的、不能转移的，而且也是本能的。我们必须有意识地重视别人的

经验，才能精确地表述经验的意义。我们的观点必须同时包含别人的经验和自己的经验，否则，我们的经验就无法被理解，我们的观点就没有人能听懂。当文学艺术在表述经验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时，它对其他方面也是意义重大。科学的语言是以另一种形式设计出来的。它用符号来表述所经历事物的意义，任何研究科学的人都懂得这些符号。美学的表述方式揭示和增强了人们已有经验的意义。科学的表述方式为建立具有经过改造意义的新经验提供了工具。

To sum up: Science represents the office of intelligence, in projection and control of new experiences, pursued systematically, intentionally, and on a scale due to freedom from limitations of habit. It is the sole instrumentality of conscious, as distinct from accidental, progress. And if its generality, its remoteness from individual conditions, confer upon it a certain technicality and aloofness, these qualitie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merely speculative theorizing. The latter are in permanent dislocation from practice; the former are temporarily detached for the sake of wider and freer application in later concrete action. There is a kind of idle theory which is antithetical to practice; but genuinely scientific theory falls within practice as the agency of its expansion and its direction to new possibilities.

总而言之，科学体现智力在规划和控制新经验方面的功能。由于能摆脱习惯的限制，我们能系统地、有意识地获得这些新经验。科学和偶然的不同在于，科学是有意识进步的唯一工具。如果科学的普遍性以及科学和个人情况的隔离使其具有某种专门性和孤立性，这种专门性和孤立性是和纯理论推理的性质大不相同的。后者是永远与实践脱节的；前者则是为了能更广泛和更自由应用于以后具体行动而暂时的脱节。有一种毫无根据的理论与实践对立。但是，真正的科学理论是把实践作为扩充理论和达到新的可能性的手段。

3．Naturalism and Humanism in Education.

三、教育中的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

There exists an educational tradition which opposes science to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curriculum. The quarrel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interests is easily explicable historically.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and a literary philosophy were intrenched in all higher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before experimental science came into being. The latter had naturally to win its way. No fortified and protected interest readily surrenders any monopoly it may possess. But the assumption, from whichever side, that language and literary products are exclusively humanistic in quality, and that science is purely physical in import is a false notion which tends to cripple the educational use of both studies. Human life does not occur in a vacuum, nor is nature a mere stage setting for the enactment of its drama (Ante, p. 247), Man's life is bound up in the processes of nature; his career, for success or defeat, depends upon the way in which nature enters it. Man's power of deliberate control of his own affairs depends upon ability to direct natural energies to use: an ability which is in turn dependent upon insight into nature's processes. Whatever natural science may be for the specialist,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it is knowledge of the conditions of human action. To be aware of the medium in which social intercourse goes on, and of the means and obstacles to its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is to be in command of a knowledge which is thoroughly humanistic in quality. One who is ignoran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s ignorant of the struggles by which mankind has passed from routine and caprice, from

superstitious subjection to nature, from efforts to use it magically, to intellectual self-possession. That science may be taught as a set of formal and technical exercises is only too true. This happens whenev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ld is made an end in itself. The failure of such instruction to procure culture is not, however, evidence of the antithesis of natural knowledge to humanistic concern, but evidence of a wrong educational attitude.

在课程设置中存在着一种把科学同文化、历史对立起来的教育传统。从历史角度看，这两种立场代表人物的争端很容易得到解释。在实验科学出现之前，文学、语言和文学哲学的学习已经在所有高等学校占据了牢固地位。科学必须排除万难向前进。任何筑有堡垒的和防守坚固的势力集团都不会轻易放弃所拥有的垄断地位。但是，无论哪一方面都认为语言和文学作品属于人文主义，科学则纯粹属于自然界的想法是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有削弱这两类学科教育作用的倾向。人类生活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自然界也不仅仅是人生戏剧的舞台（参见原书211页）。人类的生活和自然的进程息息相关。人的职业、成功或者失败都取决于自然参与的方式。人是否有能力控制自己的事务，取决于他指导运用自然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反过来取决于他对自然进程的洞察力。不管自然科学对于专家来说是什么，对于教育的目的来说，自然科学就是有关人类活动环境的知识。要了解社会交流发生的媒介和社会交流前进发展的手段和阻碍，就需要对人文主义性质的知识有彻底的掌握。一个对科学史无知的人不知道人类与自然界所进行的种种斗争，这些斗争经历了从习以为常到随心所欲，从对自然迷信屈从到魔幻般地利用自然，再到理智上的沉着自制等阶段。自然科学的教学可能就是一系列形式的技术的练习，这是千真万确的。当把有关世界的知识作为教学目的本身，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样的自然科学教学不能使学生获得文化，不能证明自然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对立，而恰恰证明了教育态度的错误。

Dislike to employ scientific knowledge as it functions in men's occupations is itself a survival of an aristocratic culture. The notion that “applied” knowledge is somehow less worthy than “pure” knowledge, was natural to a society in which all useful work was performed by slaves and serfs, and in which industry was controlled by the models set by custom rather than by intelligence. Science, or the highest knowing, was then identified with pure theorizing, apart from all application in the uses of life; and knowledge relating to useful arts suffered the stigma attaching to the classes who engaged in them (See below, Ch. XIX). The idea of science thus generated persisted after science had itself adopted the appliances of the arts, using them for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after the rise of democracy. Taking theory just as theory, however, that which concerns humanity is of more significance for man than that which concerns a merely physical world. In adopting the criterion of knowledge laid down by a literary culture, aloof from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mass of men, the educational advocates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put themselves at a strategic disadvantage.

许多人不喜欢使用在工作中有用的科学知识，这本身就是贵族文化的残余。在贵族社会，一切有用的工作都是由奴隶和农奴来做，工业是按习惯建立的模式而不是按智力建立的模式来加以管理的。“实用的”知识和“纯粹的”知识比起来显得没有价值是很正常的。科学或者最高级的认知都是纯粹的理论，与生活无关。与工艺相关的知识都带有从事这种工艺的阶级烙印（参见第19章）。在科学本身已经采用工艺工具生产知识以及民主主义兴起以后，这种科学观念仍旧得以保持下来。但是，仅就理论方面讲，对于人类来说，有关人文主义的事情比仅仅与自然界相关的事情意义更加重大。在采用远离大众实际需要的书面文化所规定的知识标准时，科学教育的倡导者让自己身陷不利地位。

So far as they adopt the idea of science appropriate to its experimental method and to the movements of a democratic and industrial society, they have no difficulty in showing that natural science is more humanistic than an alleged humanism which bases its educational schemes upon the specialized interests of a leisure class.

只要他们接受与科学实验方法以及民主和工业社会运动相符合的科学概念，他们就会承认，自然科学比所谓的根据贵族阶级利益而制定的教育计划的人文主义更具有人文主义的性质。

For, as we have already stated, humanistic studies when set in opposition to study of nature are hampered. They tend to reduce themselves to exclusively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studies, which in turn tend to shrink to “the classics,” to languages no longer spoken. For modern languages may evidently be put to use, and hence fall under the ban. It would be hard to find anything in history more ironical tha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s which have identified the “humanities” exclusively with a knowledge of Greek and Latin. Greek and Roman art and institutions made such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our civilization that there should always be the amplest opportunities for making their acquaintance. But to regard them as par excellence the humane studies involves a deliberate neglect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subject matter which is accessible in education to the masses, and tends to cultivate a narrow snobbery: that of a learned class whose insignia are the accidents of exclusive opportunity. Knowledge is humanistic in quality not because it is about human products in the past, but because of what it does in liberating human intelligence and human sympathy. Any subject matter which accomplishes this result is humane, and any

subject matter which does not accomplish it is not even educational.

因此，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当人文主义的学习处于同自然的学习相对立的位置时，人文主义的学习就会受到阻碍。人们趋向于把它缩减为专门的文学和语言学习，后来又缩减为学习“古典文学”和无人使用的语言。由于现代语言显然仍在使用，因此遭到了禁止。在历史上再难找到任何比把人文学科完全和希腊语与拉丁语知识等同的教育更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了。希腊和罗马的艺术和制度对我们的文明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我们总是应该有足够的机会来了解学习它们。但是，把它们看作典型的人文科目，这是有意忽略了大众在教育上所需学习科目的可能性，因此往往养成知识阶级的狭隘势利行为。这个阶级的标志就是享有专有机会的机遇。知识具有人文主义的品质，不是因为它是关于过去人类的产物，而是因为它在解放人类智力和人类同情心方面起到的作用。能达到这种结果的任何科目都是人文主义的，不能达到这种结果的科目就连教育意义也没有。

Summary.

总结

Science represents the fruition of the cognitive factors in experience. Instead of contenting itself with a mere statement of what commends itself to personal or customary experience, it aims at a statement which will reveal the sources, grounds, and consequences of a belief.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aim gives logical character to the statements. Educationally, it has to be noted that 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ethod, since they belong to subject

matter which has reached a high degree of intellectual elaboration, are different from the method of the learner—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passing from a cruder to a more refined intellectual quality of experience. When this fact is ignored, science is treated as so much bare information, which however is less interesting and more remote than ordinary information, being stated in an unusual and technical vocabulary. The function which science has to perform in the curriculum is that which it has performed for the race: emancipation from local and temporary incidents of experience, and the opening of intellectual vistas unobscured by the accidents of personal habit and predilection. The logical traits of abstraction, generalization, and definite formulation are all associated with this function. In emancipating an idea from the particular context in which it originated and giving it a wider reference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ence of any individual are put at the disposal of all men. Thus ultimately and philosophically science is the organ of general social progress.

科学代表着经验中认知因素的成果。科学不主张仅仅叙述个人或惯例的经验，它的目标是能揭示信念的来源、根据和结果的事物的叙述。这个目标的达到赋予了叙述逻辑的特征。在教育方面，必须注意方法的逻辑特点，因为这些逻辑特点属于已经达到相当智力高度的学科。这里提到的方法不同于学生的方法。学生的方法有时间的顺序，是从粗糙的经验智力特性，到精密的经验智力特性。当这个事实被忽略时，就会把科学视为极其单调的知识。这种用罕见的、专门的术语叙述的知识，比平常的知识更让人缺乏兴趣、更加远离实际。科学在课程中必须履行的功能与它曾经为种族履行过的功能一样——那就是——从局部和暂时的经验产物中解放出来，开辟没有被个人习惯和嗜好所遮蔽的理智的前景。抽象、概括和确定的公式化逻辑特征都与这个功能有联系。把想法从它所产生的特殊背景中解放出来并使它具有更为广泛的涉及面，让所有个体经验的结果都能够供全人类利用。因

此，总而言之，从哲学角度来说，科学乃是社会进步的一般工具。

[4_1].Upon the positive side, the value of problems arising in work in the garden, the shop, etc. , may be referred to (See p. 235). The laboratory may be treated as an additional resource to supply conditions and appliances for the better pursuit of these problems.

[5_1].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在花园中、商场中等工作中所发生生的问题价值问题是可以提一下的（参见第217页）。实验室可能被看作一种为更好地探索那些问题而提供条件和设备的附加资源。

Chapter 18 Educational Values

第十八章　教育价值

The considerations involved in a discussion of educational values have already been brought out in the discussion of aims and interests. The specific values usually discussed in educational theories coincide with aims which are usually urged. They are such things as utility, culture, information, preparation for social efficiency, mental discipline or power, and so on. The aspect of these aims in virtue of which they are valuable has been treated in our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interest, and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speaking of art as an interest or concern and referring to it as a value. It happens, however, that discussion of values has usually been centered about a consideration of the various ends subserved by specific subjects of the curriculum. It has been a part of the attempt to justify those subjects by pointing out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life accruing from their study. An explicit discussion of educational values thus affords an opportunity for reviewing the prior discussion of aims and interests on one hand and of the curriculum on the other, by bringing them into connection with one another.

本书在谈到教育的目的和兴趣时已经涉及有关教育价值的讨论。一般来说，教育理论中探讨的特殊价值与通常提到的教育目的是一致的。通常提到的目的包括实用性、文化、信息、为社会效率做准备、心理训练或者心理能力等方面内容。在分析兴趣的性质时，我们对这些目的有价值的方面已经有所讨论。我们认为，把艺术说成一种兴趣，或者说成一种价值，二者并无区别。然而，我们讨论教育价值时

往往集中在课程具体科目所实现的各种目标上。这些讨论指出各门学科对增加人生经验的重要意义，试图说明课程科目设置的合理性。因此，明确讨论教育价值可以使我们有机会在回顾有关目的和兴趣的论述同时，开展对于课程的讨论，并将二者联系起来。

1．The Nature of Realization or Appreciation.

一、体验或者欣赏的性质

Much of our experience is indirect; it is dependent upon signs which intervene between the things and ourselves, signs which stand for or represent the former. It is one thing to have been engaged in war, to have shared its dangers and hardships; it is another thing to hear or read about it. All language, all symbols, are implements of an indirect experience; in technical language the experience which is procured by their means is 'mediated. ' It stands in contrast with an immediate, direct experience, something in which we take part vitally and at first hand, instead of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representative media. As we have seen, the scope of personal, vitally direct experience is very limited. If it were not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agencies for representing absent and distant affairs, our experience would remain almost on the level of that of the brutes. Every step from savagery to civilization is dependent upon the invention of media which enlarge the range of purely immediate experience and give it deepened as well as wider meaning by connecting it with things which can only be signified or symbolized. It is doubtless this fact which is the cause of the disposition to identify an uncultivated person with an illiterate person—so dependent are we on letters for effective representative

or indirect experience.

我们的经验大多是间接的。这种经验依靠于介于周围事物和我们自身的符号。这些符号象征着各种事物。譬如说，亲历战争，体验其中的危险和困境是一回事，听别人讲述的战争或者从书中读到的战争则是另外一回事。一切语言符号都是间接经验的工具。用专业术语来讲，通过工具所获取的经验乃是“间接经验”。这种经验和直接经验相对立，直接经验是我们亲身参与体验的，而不是通过媒介物的介入而获得。据我们所知，纯粹直接的经验非常有限。若不是引入符号媒介指代不在现场的、遥远的事物，我们的经验可能会仍停留在野蛮人的水平。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每一步都依赖于媒介的发明。这些媒介物扩大了纯粹的直接经验的范围，并且把它与只能用符号表示的事物联系起来，赋予它深刻和更加广泛的意义。这个事实显然就是有人把没有教养的人与文盲等同起来的原因。所以，我们依靠文字获得有效的有代表性的或间接的经验。

At the same time (as we have also had repeated occasion to see) there is always a danger that symbols will not be truly representative; danger that instead of really calling up the absent and remote in a way to make it enter a present experience, the linguistic media of representation will become an end in themselves. Formal education is peculiarly exposed to this danger, with the result that when literacy supervenes, mere bookishness, what is popularly termed the academic, too often comes with it. In colloquial speech, the phrase a “realizing sense” is used to express the urgency, warmth, and intimacy of a direct experience in contrast with the remote, pallid, and coldly detached quality of a representative experience. The terms “mental realization” and “appreciation” (or genuine appreciation) are more elaborate names for the realizing sense of a thing. It is not possible to define these

ideas except by synonyms, like 'coming home to one,' 'really taking it in,' etc. , for the only way to appreciate what is meant by a direct experience of a thing is by having it. But i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ading a technical description of a picture, and seeing it; or between just seeing it and being moved by it; between learning mathematical equations about light and being carried away by some peculiarly glorious illumination of a misty landscape.

同时，正如我们所反复强调的，总有这样一种危险，代表各种事物的符号可能不具备真正的代表性，语言媒介符号不能够以某种方式唤起缺失的、遥远的事物，使其进入当前的经验中，相反，语言媒介本身成为了目的。正规教育所面临的这样的危险尤为明显，随着文字媒介的发展，那些通常被称为学术迂腐学究风气也应运而生。在口语中，“体验性感觉”通常用来表达直接经验中的紧迫性，热情性和亲密性，用来与间接经验中的遥远性、黯淡性和冷漠性作对比。对某事物的体验性感觉可以更确切地用“心理体验”或者“欣赏”（真正的欣赏）等术语来表示。要想定义这种感觉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采用诸如“融入某人心里”或者“真正吸收了它”等近义词，因为欣赏直接经验的唯一方式即是拥有它。譬如说，看一幅图画的技巧性说明与直接看这幅画的差别很大，看这幅画与被这幅画打动也差别很大。同样，学习有关光的数学公式与在朦胧景色中看到特别壮丽的照明而为之神往也有很大区别。

We are thus met by the danger of the tendency of technique and other purely representative forms to encroach upon the sphere of direct appreciations; in other words, the tendency to assume that pupils have a foundation of direct realization of situations sufficient for the superstructure of representative experience erected by formulated school studies. This is not simply a matter of quantity or bulk. Sufficient direct experience is even more a matter of quality; it

must be of a sort to connect readily and fruitfully with the symbolic material of instruction. Before teaching can safely enter upon conveying facts and ideas through the media of signs, schooling must provide genuine situations in which personal participation brings home the import of the material and the problems which it convey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pupil, the resulting experiences are worthwhile on their own accou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teacher, they are also means of supplying subject matter required for understanding instruction involving signs, and of evoking attitudes of open-mindedness and concern as to the material symbolically conveyed.

因此，我们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倾向：技艺和其他纯粹的代表性形式侵占直接欣赏的领域。换言之，正规学校教育倾向于设定学生已具备直接体验情境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代表性经验的上层建筑。这不仅仅是个例或者批量的问题。足够的直接体验更是一个质量问题；它必须迅速地、卓有成效地与指示性教育材料联系起来。教育能够通过符号媒介正确传递事实和思想的前提是，教学过程中必须为学生提供一个真实的情境。学生通过亲身参与能够感受到材料的输入以及它所传递的问题。从学生角度看，所取得的经验本身是有价值的。从教师的观点看，这些经验既是提供了解符号教学所用教材的手段，又是唤起对用符号传达的材料虚心和关心态度的手段。

In the outline given of the theory of educative subject matter, the demand for this background of realization or appreciation is met by the provision made for play and active occupations embodying typical situations. Nothing need be added to what has already been said except to point out that while the discussion dealt explicitly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of primary education, where the demand for the available background of direct experience is most

obvious, the principle applies to the primary or elementary phase of every subject. The first and basic function of laboratory work, for example, in a high school or college in a new field, is to familiarize the student at first hand with a certain range of facts and problems —to give him a 'feeling' for them. Getting command of technique and of methods of reaching and testing generalizations is at first secondary to getting appreciation. As regards the primary school activities, it is to be borne in mind that the fundamental intent is not to amuse nor to convey information with a minimum of vexation nor yet to acquire skill,—though these results may accrue as by-products,—but to enlarge and enrich the scope of experience, and to keep alert and effective the interest in intellectual progress.

在讨论教育题材的理论大纲中，体验性感觉或者欣赏是通过提供体现典型情境的游戏或其他积极的活动来实现的。我们对此已经有所讨论，故无需赘言。不过，还有一点需指出：虽然讨论的话题明显是关于小学教育内容，当然此阶段也是最需要具备直接经验背景的，但是讨论的原则也能够应用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初级阶段。比如说，在高中和大学时，每一个新领域实验工作的主要和基本作用即是让学生直接熟悉这一领域的事实和问题，对这些内容有所“感觉”。掌握得出结论并验证结论的技能和方法最初是次于欣赏的。提到小学的游戏活动，需要铭记于心的是这些游戏活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让学生欣然接受所传授的知识，更不是为了获取技能——当然，学生可能会附带获取一些技能——而是为了扩大和丰富经验范围，保持心智发展中的兴趣活跃有效。

The rubric of appreciation supplies an appropriate head for bringing out three further principles : the nature of effective or real (as distinct from nominal) standards of value; the place of the imagination in appreciative realizations; and the place of the fine

arts in the course of study.

“欣赏”这一标题恰如其分地提供了三个原则：有效的或真实的（与“名义上的”相区别）价值标准的性质；想象在欣赏性体验中的地位；美术在课程中的地位。

1．The nature of standards of valuation. Every adult has acquired, in the course of his prior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certain measures of the worth of various sorts of experience. He has learned to look upon qualities like honesty, amiability, perseverance, loyalty, as moral goods; upon certain classics of literature, painting, music, as aesthetic values, and so on. Not only this, but he has learned certain rules for these values—the golden rule in morals; harmony, balance, etc. , proportionate distribution in aesthetic goods; definition, clarity, system in intellectual accomplishments. These principles are so important as standards of judging the worth of new experiences that parents and instructors are always tending to teach them directly to the young. They overlook the danger that standards so taught will be merely symbolic; that is, largely conventional and verbal. In reality, working as distinct from professed standards depend upon what an individual has himself specifically appreciated to be deeply significant in concrete situations. An individual may have learned that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are conventionally esteemed in music; he may be able to converse with some correctness about classic music; he may even honestly believe that these traits constitute his own musical standards. But if in his own past experience, what he has been most accustomed to and has most enjoyed is ragtime, his active or working measures of valuation are fixed on the ragtime level. The appeal actually made to him in his own personal

realization fixes his attitude much more deeply than what he has been taught as the proper thing to say; his habitual disposition thus fixed forms his real “norm” of valuation in subsequent musical experiences.

1．评价标准的性质。每一位成年人在自己从前的经历或者教育中都或多或少学到对于各种经验价值的衡量方法。他们学会将诚实、和蔼、坚持不懈、忠诚等品质归为美德；将文学、绘画和音乐等经典视为审美价值等。不仅如此，他们还学会了这些价值的某些标准：比如道德上的金科玉律；美学价值中的和谐、平衡及按比例分配等；智力完善中的准确、清晰和系统化。这些原则标准对于判断新经验的价值非常重要，以至于家长和老师都倾向于直接将这些原则标准灌输给孩子。他们忽略了这样的危险：这些标准的理论性如此强，可能对孩子来说纯粹是象征性的，过于抽象，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些条条框框的语句。事实上，以不同于公认的标准从事活动依赖于个人自身在具体情境中所感受到的具有深刻意义的体验。个人可能会认识到音乐中的某些特征是约定俗成并受到尊重的。他与别人聊起古典音乐时，可能会带有一定的正确性。他甚至坦诚地相信，这些特征构成他个人的音乐标准。但是，如果在他过去的经历中，他最熟悉和钟爱的是令人发笑的雷格泰姆音乐，那么他评价音乐的有效标准便定格在拉格泰姆音乐的水准上。他自己亲身感受到的具有吸引力的东西对其态度的固定作用，要比老师要求他应该说的东西更加深刻。在随后的音乐体验中，这种根深蒂固的品味会形成他自己真正的评价标准。

Probably few would deny this statement as to musical taste. But it applies equally well in judgments of moral and intellectual worth. A youth who has had repeated experience of the full meaning of the value of kindliness toward others built into his disposition has a measure of the worth of generous treatment of others. Without this vital appreciation, the duty and virtue of

unselfishness impressed upon him by others as a standard remains purely a matter of symbols which he cannot adequately translate into realities. His 'knowledge' is second-handed; it is only a knowledge that others prize unselfishness as an excellence, and esteem him in the degree in which he exhibits it. Thus there grows up a split between a person's professed standards and his actual ones. A person may be aware of the results of this struggle between his inclinations and his theoretical opinions; he suffers from the conflict between doing what is really dear to him and what he has learned will win the approval of others. But of the split itself he is unaware; the result is a kind of unconscious hypocrisy, an instability of disposition. In similar fashion, a pupil who has worked through some confused intellectual situation and fought his way to clearing up obscurities in a definite outcome, appreciates the value of clarity and definition. He has a standard which can be depended upon. He may be trained externally to go through certain motions of analysis and division of subject matter and may acqui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value of these processes as standard logical functions, but unless it somehow comes home to him at some point as an appreciation of his ow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ogical norms —so-called—remains as much an external piece of information as, say, the names of rivers in China. He may be able to recite, but the recital is a mechanical rehearsal.

很少有人否认以上关于音乐品味的陈述。这同样适用于道德标准和智力价值的判断。如果某年轻人反复体验到友善待人价值的全部含义，并融入自己的性情中，他就具备了宽厚待人的价值衡量标准。假如没有这种重要的体验，别人给他留下的无私美德和责任的深刻印象将会仅仅作为一种标准和象征，他将难以转换成现实。他的“知识”并不是第一手的；这种知识就是别人将无私看作高尚品质，假如他表现出这种品质，别人就会尊重他。因此，一个人宣称的标准与他的实际

标准就会出现分歧。有人可能会注意到个人喜好倾向与理论观点之间的斗争结果。于是，他便会纠结于做自己喜欢之事还是做他所体验到的别人赞许之事的矛盾之中。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分歧的结果会造成自己无意识的虚伪和性情的不稳定。同样的，当某学生摆脱了智力困境，找到消除模糊分歧的方法并得出明确结果时，他便能够体会到清晰和明确的价值，因而获得能够依靠的标准。该学生可能会受到外在的训练，将教材内容依次进行分析和分块，了解这些标准逻辑过程的价值。但是，除非这些逻辑分析为他亲自体验和感受过，否则，这些所谓逻辑规则的意义就仅仅停留在外在知识信息层面。具体举例说，他或许能够背诵中国河流的名称，但是这种背诵只是一种机械地重复。

It is, then, a serious mistake to regard appreciation as if it were confined to such things as literature and pictures and music. Its scope is as comprehensive as the work of education itself. The formation of habits is a purely mechanical thing unless habits are also tastes—habitual modes of preference and esteem, an effective sense of excellence. There are adequate grounds for asserting that the premium so often put in schools upon external 'discipline,' and upon marks and rewards, upon promotion and keeping back, are the obverse of the lack of attention given to lif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meaning of facts, idea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is vitally brought home.

因此，如果认为体验仅仅限于文学、图画和音乐，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体验的范围就像教育活动的范围一样广泛。习惯的形成纯粹是一种机械活动，除非习惯也是一种品位，一种体现个人的偏爱和珍重的习惯性模式，一种对精品事物的敏锐感觉。有人断言说学校如此强调外在的“纪律”，强调分数和奖励，强调升级和留级，这反映出他们不关注能真实地将事实、观点、原则和问题融入其中的生活情境。

这种论断不无道理。

2 . Appreciative realizations are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symbolic or representative experiences. They are not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work of the intellect or understanding. Only a personal response involving imagination can possibly procure realization even of pure “facts. " The imagination is the medium of appreciation in every field. The engagement of the imagination is the only thing that makes any activity more than mechanical. Unfortunately, it is too customary to identify the imaginative with the imaginary, rather than with a warm and intimate taking in of the full scope of a situation. This leads to an exaggerated estimate of fairy tales, myths, fanciful symbols, verse, and some-thing labeled “Fine Art,” as agencies for developing imagination and appreciation; and, by neglecting imaginative vision in other matters, leads to methods which reduce much instruction to an unimaginative acquiring of specialized skill and amassing of load of information. Theory, and—to some extent—practice, have advanced far enough to recognize that play-activity is an imaginative enterprise. But it is still usual to regard this activity as a specially marked-off stage of childish growth, and to overlook the fact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lay and what is regarded as serious employment should be not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imagination, but a difference in the materials with which imagination is occupied. The result is an unwholesome exaggeration of the phantastic and 'unreal' phases of childish play and a deadly reduction of serious occupation to a routine efficiency prized simply for its external tangible results. Achievement comes to denote the sort of thing that a well-planned machine can do better than a human being can, and the main effect of education, the achieving of a life of rich significance, drops by the wayside. Meantime mind-

wandering and wayward fancy are nothing but the unsuppressible imagination cut loose from concern with what is done.

2．欣赏性体验应当与象征性或者代表性经验区别开来。它们却不会同智力活动或者理解相区分。即是对于纯粹的“事实”，也只有包含经验的个人反应，才可能感受到体验性。每个领域里的想象力都是欣赏的媒介。任何活动都必须运用想象力才能使之富有新意。不幸的是，人们习惯于将想象力与虚构等同起来，而不是将其看作对全局的生动领会。这导致对童话、神话、富有想象力的符号、诗歌等一切贴上纯艺术标签事物的过分依赖，把它们视为发展想象力和欣赏水平的手段。另一方面，由于忽视了想象力，教学沦为毫无想象的专业技能的获取和各种知识的积累。我们的教育理论已经发展到足以认识游戏活动是一项富有想象力的活动，并且某种程度上讲，教育实践也是如此。然而，通常人们仍然认为游戏活动是儿童成长的特殊区分阶段，而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游戏和严肃的工作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有想象力，而是在于进行想象材料的不同。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过分夸大儿童游戏幻想和不切实际的一面，另一方面使严肃的工作沦为只注重外在有形结果的常规效率。于是，所谓有成效就是指精心设计的机器能比人做得更好，而教育的主要效果，即成就内涵丰富的人生，却被弃之不顾。同时，学生表现出精神恍惚和胡思乱想，不过是由于不可遏制的想象力没有用在正道上。

An adequate recognition of the play of imagination as the medium of realization of every kind of thing which lies beyond the scope of direct physical response is the sole way of escape from mechanical methods in teaching. The emphasis put in this book, in accord with many tendencies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upon activity, will be misleading if it is not recognized that the imagination is as much a normal and integral part of human activity as is muscular movement. The educative value of manual

activities and of laboratory exercises, as well as of play, depends upon the extent in which they aid in bringing about a sensing of the meaning of what is going on. In effect, if not in name, they are dramatizations. Their utilitarian value in forming habits of skill to be used for tangible results is important, but not when isolated from the appreciative side. Were it not for the accompanying play of imagination, there would be no road from a direct activity to representative knowledge; for it is by imagination that symbols are translated over into a direct meaning and integrated with a narrower activity so as to expand and enrich it. When the representative creative imagination is made merely literary and mythological, symbols are rendered mere means of directing physical reactions of the organs of speech.

充分认识到想象游戏是体验直接身体反应之外各种事物的媒介，是脱离机械式教学的唯一方式。倘若无法认识想象力如同肌肉运动一样，是人类活动正常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正如很多当代教育趋势一样，本书对游戏活动的强调将会容易引起误解。手工活动、实验室活动以及游戏的教育价值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学生了解正在进行事项的意义。实际上，而不是仅在名义上，它们能取得戏剧性的效果。这些活动非常具有实用价值。它们有助于形成能够产生有形结果的各种技能习惯。但是，如果将其与欣赏性相分离，它们的实用价值就会受到影响。倘若没有想象力伴随，直接的活动也无法转换成各种符号代表的知识。只有通过想象力，象征符号才能使人直接了解意义并与狭隘的活动连接起来，扩大和丰富其含义。如果有代表性的创造性想象只用于文学和神话中，那么这些象征符号就仅仅是引导语言器官产生身体反应的手段而已。

3 . In the account previously given nothing was explicitly said about the place of literature and the fine arts in the course of study.

The omission at that point was intentional. At the outset, there is no sharp demarcation of useful, or industrial, arts and fine arts. The activities mentioned in Chapter XV contain within themselves the factors later discriminated into fine and useful arts. As engaging the emotions and the imagination, they have the qualities which give the fine arts their quality. As demanding method or skill, the adaptation of tools to materials with constantly increasing perfection, they involve the element of technique indispensable to artistic produc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roduct, or the work of art, they are naturally defective, though even in this respect when they comprise genuine appreciation they often have a rudimentary charm. As experiences they have both an artistic and an esthetic quality. When they emerge into activities which are tested by their product and when the socially serviceable value of the product is emphasized, they pass into useful or industrial arts. When they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an enhanced appreciation of the immediate qualities which appeal to taste, they grow into fine arts.

3．上述论述并未明确涉及文学和美术在课程学习中的地位。我当时是有意避而不谈的。因为最初的美术同实用或工艺美术并没有明显分界线。第十五章提到的各种活动本身就包含着后来区分美术和工艺美术的一些因素。这些活动在融入情感和想象的同时，也具备了一些能够赋予美术本身品质的特性。由于对方法或技巧的要求，工具对材料的适应性不断趋于完美，这其中包含的工艺因素与艺术创造密不可分。从产品或者工艺的角度看，肯定会具有先天性瑕疵。即便如此，只要它们包含真正的欣赏性，通常都会具备基本的吸引力。作为经验，这些活动既具备艺术性又具备审美性。当这些活动融入通过产品检验价值的各种活动中，并且产品的社会实用价值受到重视时，它们就成为实用或者工艺美术。若它们朝着提高品味修养的欣赏性质发展，就会成为美术。

In one of its meanings, appreciation is opposed to depreciation. It denotes an enlarged, an intensified prizing, not merely a prizing, much less—like depreciation—a lowered and degraded prizing. This enhancement of the qualities which make any ordinary experience appealing, appropriable—capable of full assimilation—and enjoyable, constitutes the prim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music, drawing, painting, etc. , in education. They are not the exclusive agencies of appreciation in the most general sense of that word; but they are the chief agencies of an intensified, enhanced appreciation. As such, they are not only intrinsically and directly enjoyable, but they serve a purpose beyond themselves. They have the office, in increased degree, of all appreciation in fixing taste, in forming standards for the worth of later experiences. They arouse discontent with conditions which fall below their measure; they create a demand for surroundings coming up to their own level. They reveal a depth and range of meaning in experiences which otherwise might be mediocre and trivial. They supply, that is, organs of vision. Moreover, in their fullness they represent the concentration and consummation of elements of good which are otherwise scattered and incomplete. They select and focus the elements of enjoyable worth which make any experience directly enjoyable. They are not luxuries of education, but emphatic expressions of that which makes any education worthwhile.

“欣赏”（appreciation）一词的含义之一就是与“低估”相对立。欣赏指一种扩展的、强化的评估，并不仅仅是评估而已，更非指降低的或贬低的评估。这种强化提升的特性能使任何平常的经验具有吸引力、能够全部吸收、令人愉悦，构成文学、音乐、绘画等的主要功能。这些学科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欣赏的唯一载体。然而，它们是强化和提升欣赏的主要载体。因此，它们不仅能够本质上直接使人赏心悦目，而且能服务于其他目的，为各种欣赏提供空间，以形成独特的

品味，形成以后经验的价值标准。它们会对低于其标准的环境表示不满，要求把环境提高到原有水平。它们揭示出经验中意义的深度和广度，否则，经验可能会平庸琐碎。也就是说，它们能够提供想象的工具。而且，它们代表着善的成分的完美集中，否则这些因素会是分散和不完整的。它们挑选愉悦价值的要素，正是这些要素能使任何经验直接产生乐趣。它们并非教育性的奢侈品，而是使教育更有价值。

2．The Valuation of Studies.

二、课程评价

The theory of educational values involves not only an account of the nature of appreciation as fixing the measure of subsequent valuations, but an account of the specific directions in which these valuations occur. To value means primarily to prize, to esteem; but secondarily it means to apprize, to estimate. It means, that is, the act of cherishing something, holding it dear, and also the act of passing judgment upon the nature and amount of its value as compared with something else. To value in the latter sense is to valuate or evaluate. The distinction coincides with that sometimes made between intrinsic and instrumental values. Intrinsic values are not objects of judgment, they cannot (as intrinsic) be compared, or regarded as greater and less, better or worse. They are invaluable; and if a thing is invaluable, it is neither more nor less so than any other invaluable. But occasions present themselves when it is necessary to choose, when we must let one thing go in order to take another. This establishes an order of preference, a greater and less, better and worse. Things judged or passed upon have to be estimated in relation to some third thing, some further end. With

respect to that, they are means, or instrumental values.

教育价值理论不仅涉及决定未来评价标准时对欣赏性质的阐述，而且涉及对评价时具体用语的阐述。评价首先指的是“珍视和尊重”，其次指“衡量和评估”。也就是说，评价就是珍视某物，同时也是指将其与其他事物比较、判断，对其价值的性质和分量做出判断。从后一种意义来看，评价就是估量价值。这两种意义的区别有时类似于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之间的区别。内在价值不是判断的目标，既然它是内在的，就无法做出比较，无法区分出大小、多少和好坏。内在价值是无价的。既然一个事物无价，那就不能说它跟其他无价事物相比是多还是少。但我们在必要时却不得不做出选择，不得不放弃某个东西才能得到另一东西。这便建立起一个更多或者更少，更好或者更坏的喜好顺序。我们必须与第三方相比较，即进一步的目的来评估或评价已判断过的事物。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三方只是手段，或者说只具备工具价值。

We may imagine a man who at one time thoroughly enjoys converse with his friends, at another the hearing of a symphony; at another the eating of his meals; at another the reading of a book; at another the earning of money, and so on. As an appreciative realization, each of these is an intrinsic value. It occupies a particular place in life; it serves its own end, which cannot be supplied by a substitute.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comparative value, and hence none of valuation. Each is the specific good which it is, and that is all that can be said. In its own place, none is a means to anything beyond itself. But there may arise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y compete or conflict, in which a choice has to be made. Now comparison comes in. Since a choice has to be made, we want to know the respective claims of each competitor. What is to be said for it? What does it offer in comparison with, as balanced over

against, some other possibility? Raising these questions means that a particular good is no longer an end in itself, an intrinsic good. For if it were, its claims would be incomparable, imperative. The question is now as to its status as a means of realizing something else, which is then the invaluable of that situation. If a man has just eaten, or if he is well fed generally and the opportunity to hear music is a rarity, he will probably prefer the music to eating. In the given situation that will render the greater contribution. If he is starving, or if he is satiated with music for the time being, he will naturally judge food to have the greater worth. In the abstract or at large, apart from the needs of a particular situation in which choice has to be mad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degrees or order of value. Certain conclusions follow with respect to educational values. We cannot establish a hierarchy of values among studies. It is futile to attempt to arrange them in an order, beginning with one having least worth and going on to that of maximum value. In so far as any study has a unique or irreplaceable function in experience, in so far as it marks a characteristic enrichment of life, its worth is intrinsic or incomparable. Since education is not a means to living, but is identical with the operation of living a life which is fruitful and inherently significant, the only ultimate value which can be set up is just the process of living itself. And this is not an end to which studies and activities are subordinate means; it is the whole of which they are ingredients. And what has been said about appreciation means that every study in one of its aspects ought to have just such ultimate significance. It is as true of arithmetic as it is of poetry that in some place and at some time it ought to be a good to be appreciated on its own account—just as an enjoyable experience, in short. If it is not, then when the time and place come for it to be used as a means or instrumentality, it will be in just that much handicapped. Never having been realized or appreciated for itself, one will miss something of its capacity as a resource for other

ends.

我们可以想象：某个人在某个时间完全陶醉在与朋友的交谈中，另一时间沉浸在交响乐中，另一时间在享受美食，另一时间在享受阅读的乐趣，另一时间则是享受赚钱的快乐等等。作为欣赏性体验，上述每个情境都具有内在价值，占据着生活的特殊位置。每一个体验都有自身的目的，并且无法替代。这里不存在比较价值的问题，因此也不存在评价的问题。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特殊的好处，此处无需多说。每个事物都有自身目的，并不是其他事物的手段。但是有可能会出现它们相互竞争或冲突的情况，在那时必须得做出选择。此时便要用到比较。既然必须得选择，那么就需要知道各个竞争者的要求。对此应该说些什么呢？这一选择能提供什么可与别的可能性相平衡或者相抗衡的呢？我们提出这些问题表明，某种特殊的“善”不再是自身的目的，不再是内在的善。因为假若是内在的善，那么它的要求将会是不可比拟的，绝对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实现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譬如说一个人刚吃过饭，或者说他能够解决温饱问题，而对他来说，听音乐是非常难得的事，那么他很有可能会更喜欢听音乐。在上述情境中，音乐就更重要。假如他正在挨饿，或者他已经听音乐听得厌烦了，他自然就会认为吃饭比音乐更重要。总而言之，离开具体的情境需求来做选择，是无法判断出价值的高低。从教育的价值方面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们不能在学科中建立出价值的等级。试图将它们排序，从头到尾列出价值最小的和最大的学科是毫无意义的。由于任何学科都具有无法取代的独特功能，并且标志着人生特有的丰厚内容，它们的价值是内在的、无法比拟的。既然教育并非生存手段，而是等同于经营成功而富有意义的人生，那么教育唯一能够确立的最终价值即是生活过程本身。这个生活过程并不是各种学科和活动从属的目的，各种学科和活动乃属整体的一分子。前面提到的有关欣赏的话是指每一学科都有一个方面应该具有这种终极的意义。一个学科在某时某地应该自身具备供人欣赏的善。简单地说，善是作为一种愉快的经验，既适用于算术，也适用于诗歌。否则，当出现要求某学科仅仅用作手段或者工具的情况时，该学科就会出现困难。假如某学

科从未因自身的魅力被学生欣赏过，它就失去能够实现其他目的的潜能。

It equally follows that when we compare studies as to their values, that is, treat them as means to something beyond themselves, that which controls their proper valuation is found in the specific situation in which they are to be used. The way to enable a student to apprehend the instrumental value of arithmetic is not to lecture him upon the benefit it will be to him in some remote and uncertain future, but to let him discover that success in something he is interested in doing depends upon ability to use number.

另外，如果我们根据各学科的价值对它们进行比较，即把这些学科看作实现它们自身以外目的的手段，我们就要在利用这些学科的特殊情境中，寻找正确评价各学科的手段。要让学生了解算术的工具价值，其方法不是向他讲解在遥不可及和充满未知的将来数学将给他带来的好处，而是让他发现他感兴趣的事情能否获得成功，取决于他使用数字的能力。

It also follows that the attempt to distribute distinct sorts of value among different studies is a misguided one, in spite of the amount of time recently devoted to the undertaking. Science for example may have any kind of value, depending upon the situation into which it enters as a means. To some the value of science may be military; it may be an instrument in strengthening means of offense or defense; it may be technological, a tool for engineering; or it may be commercial—an aid in the successful conduct of business; under other conditions, its worth may be philanthropic—

the service it renders in relieving human suffering; or again it may be quite conventional—of value in establishing one's social status as an 'educated' person. As matter of fact, science serves all these purposes, and it would be an arbitrary task to try to fix upon one of them as its 'real' end. All that we can be sure of educationally is that science should be taught so as to be an end in itself in the lives of students—something worthwhile on account of its own unique intrinsic contribution to the experience of life. Primarily it must have 'appreciation value. ' If we take something which seems to be at the opposite pole, like poetry, the same sort of statement applies. It may be that, at the present time, its chief value is the contribution it makes to the enjoyment of leisure. But that may represent a degenerate condition rather than anything necessary. Poetry has historically been allied with religion and morals; it has served the purpose of penetrating the mysterious depths of things. It has had an enormous patriotic value. Homer to the Greeks was a Bible, a textbook of morals, a history, and a national inspiration. In any case, it may be said that an education which does not succeed in making poetry a resource in the business of life as well as in its leisure, has something the matter with it—or else the poetry is artificial poetry.

此外，试图给不同的学科分配各种不同的价值也是误区，尽管近来教育界对此花费了大量时间。例如，科学可能会有各类不同的价值，这取决于它作为一种手段所在的具体情境。对于某些人来说，科学的价值可能体现在军事方面，可能会作为加强进攻或防御的手段；也可能作为某项工程的工具体现在科技方面；或者体现在商业上，作为辅助商业成功运营的工具；或者体现在慈善上，帮助缓解人类苦难；或者体现出它的传统价值，通过教化人来建立个人的社会地位。事实上，科学具有上述所有功能，要想确定其中一个作为科学的“真正”目的，这将是一种武断的做法。从教育上讲，我们所能确信的

是，传授科学时应将科学本身作为目的体现在学生的生活上。倘若想要教学内容能够对生活经验做出独特的内在贡献，科学首先必须具有“欣赏价值”。我们可以举出和科学看似相反的例子，比如诗歌。现阶段，我们可以说，诗歌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对人类休闲娱乐所做的贡献。但是这可能代表的是一种落后的说法，而非必要的情况。历史上诗歌曾经是与宗教和道德相联系。它曾经有深入探索事物的神秘莫测的功能。诗歌也具有巨大的爱国主义价值。对于希腊人来说，荷马史诗是一部圣经，一本道德教科书，一部历史，也是民族的灵感源泉。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说，如果教育不能使诗歌成为生活和闲暇的资源，要么是教育存在问题，要么是由于诗歌属于矫揉造作之物。

The same considerations apply to the value of a study or a topic of a study with reference to its motivating force. Those responsible for planning and teaching the course of study should have grounds for thinking that the studies and topics included furnish both direct increments to the enriching of lives of the pupils and also materials which they can put to use in other concerns of direct interest. Since the curriculum is always getting loaded down with purely inherited traditional matter and with subjects which represent mainly the energy of some influential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in behalf of something dear to them, it requires constant inspection, criticism, and revision to make sure it is accomplishing its purpose. Then there is always the probability that it represents the values of adults rather than those of children and youth, or those of pupils a generation ago rather than those of the present day. Hence a further need for a critical outlook and survey. But these considerations do not mean that for a subject to have motivating value to a pupil (whether intrinsic or instrumental) is the same thing as for him to be aware of the value, or to be able to tell what the study is good for.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某个科目或者科目的某个课题在激发学习动力方面的价值。那些负责制定教学计划和担任教学的老师应该有理由相信这些学科和课题不仅能提供直接丰富学生生活的内容，而且能提供可以运用到其他直接兴趣上的材料。由于课程常常充满纯粹承袭传统教材和少数有影响人士所垂青的科目，这就要求要对课程经常进行检查、批评和修订，以保证它们完成教育目的。因而总是会有这种可能性：课程代表的是成年人的价值而不是儿童和青少年的价值，或者代表的是上一代学生的价值而不是当前学生的价值。因此，还需要对课程有进一步的分析和调查。但这并不是说，要使某一学科对学生具有激发动力的价值（无论是内在价值，还是工具价值），就要使学生意识到这种价值，或者能够说出该学科的用处。

In the first place, as long as any topic makes an immediate appeal, it is not necessary to ask what it is good for. This is a question which can be asked only about instrumental values. Some goods are not good for anything; they are just goods. Any other notion leads to an absurdity. For we cannot stop asking the question about an instrumental good, one whose value lies in its being good for something, unless there is at some point something intrinsically good, good for itself. To a hungry, healthy child, food is a good of the situation; we do not have to bring him to consciousness of the ends subserved by food in order to supply a motive to eat. The food in connection with his appetite is a motive. The same thing holds of mentally eager pupils with respect to many topics. Neither they nor the teacher could possibly foretell with any exactness the purposes learning is to accomplish in the future; nor as long as the eagerness continues is it advisable to try to specify particular goods which are to come of it. The proof of a good is found in the fact that the pupil responds; his response is use. His response to the material shows that the subject functions in his life. It is unsound to urge that, say, Latin has a value per se in the abstract, just as a study, as a

sufficient justification for teaching it. But it is equally absurd to argue that unless teacher or pupil can point out some definite assignable future use to which it is to be put, it lacks justifying value. When pupils are genuinely concerned in learning Latin, that is of itself proof that it possesses value. The most which one is entitled to ask in such cases is whether in view of the shortness of time, there are not other things of intrinsic value which in addition have greater instrumental value.

首先，只要某一课题具有吸引力，就没必要询问它的用处。我们只有询问工具性价值时，才能问有什么用处。某些东西并不会对其他事物有用，它们本身就只是一件东西。任何其他看法都是荒谬的。除非事物在某一点上有内在的好处，即它本身就是有用的，否则我们就不能提出有关工具性用处的问题，说对某一事物有用。对于一个饥饿的健康儿童，食品就是有用的。我们没有必要让他意识到食品的好处，借此给他提供吃的动机。与胃口相联系起来的食品就是动机。对于具有精神渴望的学生来说，对待很多其他话题也会同样如此。学生和老师都无法精准预测学习对今后到底有什么用处。只要学生继续保持热切渴望的态度，就没有必要陈述学习的用处。证明学习有用在于学生的反应；学生有反应就证明他们愿意学习。他们对教材的反应表明这个学科在他们生活中起到一定作用。比如说，断然认定拉丁语作为一门学科，其价值体现在自身的抽象性上，并将此作为教拉丁语的正当依据，这是不合理的。同样，如果认为教师或学生若不能明确指出所学课程在今后有什么具体用处，教学就缺乏合理的价值，这种看法也是荒谬的。如果学生真正关注拉丁语的学习，这本身就表明拉丁语具备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最有资格问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同样具备内在价值的其他事物是否具有更大的工具价值。

This brings us to the matter of instrumental values—topics studied because of some end beyond themselves. If a child is ill and

his appetite does not lead him to eat when food is presented, or if his appetite is perverted so that he prefers candy to meat and vegetables, conscious reference to results is indicated. He needs to be made conscious of consequences as a justification of the positive or negative value of certain objects. Or the state of things may be normal enough, and yet an individual not be moved by some matter because he does not grasp how his attainment of some intrinsic good depend upon active concern with what is presented. In such cases, it is obviously the part of wisdom to establish consciousness of connection. In general what is desirable is that a topic be presented in such a way that it either have an immediate value, and require no justification, or else be perceived to be a means of achieving something of intrinsic value. An instrumental value then has the intrinsic value of being a means to an end. It may be questioned whether some of the present pedagogical interest in the matter of values of studies is not either excessive or else too narrow. Sometimes it appears to be a labored effort to furnish an apologetic for topics which no longer operate to any purpose, direct or indirect, in the lives of pupils. At other times, the reaction against useless lumber seems to have gone to the extent of supposing that no subject or topic should be taught unless some quite definite future utility can be pointed out by those making the course of study or by the pupil himself, unmindful of the fact that life is its own excuse for being; and that definite utilities which can be pointed out are themselves justified only because they increase the experienced content of life itself.

这就引入了工具价值观的问题。这一课题研究的是除自身以外的其他目的。假如某个孩子患病了，没有食欲，不想吃面前的食物；或者他胃口反常，更喜欢吃糖果而不喜欢吃肉和蔬菜，这就要有意识地指出各种后果。他需要意识到吃东西的各种后果，弄清楚各种积极的

或消极的因素。或者情况虽属正常，但是有人并没有做出行动，因为他不了解要获得某种内在的好处全靠积极参与周围的事物中。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要依靠智慧去建立意识联结。一般地说，提出一个题目，要么说明它具有无需证明的内在价值，否则就要把它看作实现某种内在价值的手段，这才可取。所以，工具价值具有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的内在价值。有人可能会质疑当今教育对课程价值方面的兴趣是否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有的时候，有些科目的课题在学生生活中不再有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目的，但人们似乎仍在竭力为保存这些课题辩护。在其他时候，人们对无用材料的反应似乎趋于极端，误以为制订课程的人或者学生本人除非能指出学科或课题十分明确的未来实用价值，否则就不应保存。他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生活就是它本身之所以存在的理由，那些明确的实用价值只是因为增加了生活本身的经验内容，才有存在的理由。

3．The Segreg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Values.

三、价值的划分和组织

It is of course possible to classify in a general way the various valuable phases of life. In order to get a survey of aims sufficiently wide (See ante, p. 128) to give breadth and flexibility to the enterprise of education, there is some advantage in such a classification. But it is a great mistake to regard these values as ultimate ends to which the concrete satisfactions of experience are subordinate. They are nothing but generalizations, more or less adequate, of concrete goods. Health, wealth, efficiency, sociability, utility, culture, happiness itself are only abstract terms which sum up a multitude of particulars. To regard such things as standards for the valuation of concrete topics and process of education is to

subordinate to an abstraction the concrete facts from which the abstraction is derived. They are not in any true sense standards of valuation; these are found, as we have previously seen, in the specific realizations which form tastes and habits of preference. They are, however, of significance as points of view elevated above the details of life whence to survey the field and see how its constituent details are distributed, and whether they are well proportioned.

对生活中各种不同的价值阶段进行大致分类，这当然是可行的。为了能够调查到足够广泛的教育目的（参见原书110页），使教育事业具有足够的广度和灵活性，这样的分类还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但是，将这些价值视为终极目标，并把具体经验的实施归属于终极目标，这是个巨大的错误。这些价值不过是上面提到的可取之处的适当概括。健康、财富、效率、社交、实用性、文化和幸福等只是概括了大量具体事项的抽象名词，它们看作具体课题和教育过程的评价标准，无异于使具体事实从属于抽象名词，而抽象名词正是从具体事实中衍生出来的。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评价标准。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一样，真正的标准存在于具体的体验中，它们会帮助形成品味和喜好习惯。但是，上面举出的各种价值仍然很重要。我们可以将它们视为超越生活细节的观点，然后根据这些观点考察整个领域，看其构成细节是如何分配的，比例是否适当。

No classification can have other than a provisional validity. The following may prove of some help. We may say that the kind of experience to which the work of the schools should contribute is one marked by executive competency in the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and obstacles encountered (efficiency); by sociability, or interest in the direct companionship of others; by esthetic taste or capacity to appreciate artistic excellence in at least some of its

classic forms; by trained intellectual method, or interest in some mode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 and by sensitiveness to the rights and claims of others—conscientiousness. And while these considerations are not standards of value, they are useful criteria for survey, criticism, and better organization of existing methods and subject matter of instruction.

所有分类都有时效性。下面的分析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或许可以说，学校工作提供的经验应该包括行政能力，或管理资源和处理困难的效率；社交能力，或直接与他人建立友谊的兴趣；审美能力，或至少具有能欣赏某些古典艺术珍品的品位；受过训练的智力方法，或对某种科学成就的兴趣；对他人权利和要求的敏感性——良知。尽管以上提到的并非价值标准，但却不失为调查、评估和更好规划现行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有用标准。

The need of such general points of view is the greater because of a tendency to segregate educational values due to the isolation from one another of the various pursuits of life. The idea is prevalent that different studies represent separate kinds of values, and that the curriculum should, therefore, be constituted by gathering together various studies till a sufficient variety of independent values have been cared for. The following quotation does not use the word value, but it contains the notion of a curriculum constructed on the idea that there are a number of separate ends to be reached, and that various studies may be evaluated by referring each study to its respective end. “Memory is trained by most studies, but best by languages and history; taste is trained by the more advanced study of languages, and still better by English literature; imagination by all higher language teaching, but chiefly by Greek and Latin poetry; observation by science work in

the laboratory, though some training is to be got from the earlier stages of Latin and Greek; for expression, Greek and Latin composition come first and English composition next; for abstract reasoning, mathematics stands almost alone; for concrete reasoning, science comes first, then geometry; for social reasoning, the Greek and Roman historians and orators come first, and general history next. Hence the narrowest education which can claim to be at all complete includes Latin, one modern language, some history, som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one science. "

由于志向不同造成彼此隔阂，这使教育价值面临着被分裂的危险，我们更需要坚持对教育概括性分类的观点。当今盛行的观点是不同学科代表不同类型的价值，因此，制订课程时应集合不同的学科以照顾到各类不同的独立价值。下面这段引文没有使用“价值”一词，但却包含着一种制订课程的思想，认为课程有许多各自独立的目的，各个学科可以按各自目的进行评价。“训练记忆力可以通过很多学科进行，但最好是通过语言和历史。品味的训练可以通过高级阶段的语言学习开展，但最好是英国文学。训练想象力可以通过任何高等语言教学进行训练，但主要用希腊文和拉丁文诗歌；训练观察力则可以通过在实验室的科学工作，尽管有些训练能从早期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习中获得；对于表达能力的训练，首先需要用希腊文和拉丁文作文，然后才是英语作文；对于抽象的推理训练，几乎只有数学；对于具体的推理能力，首先是科学，然后是几何；对于社会的推理能力，首先是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和雄辩家，其次是普通历史。因此，狭义的完整教育包括拉丁文、一种现代语言、部分历史知识、部分英国文学和一门理科就足矣。”

There is much in the wording of this passage which is irrelevant to our point and which must be discounted to make it clear. The phraseology betrays the particular provincial tradition

within which the author is writing. There is the unquestioned assumption of “faculties” to be trained, and a dominant interest in the ancient languages; there is comparative disregard of the earth on which men happen to live and the bodies they happen to carry around with them. But with allowances made for these matters (even with their complete abandonment; we find much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hilosophy which parallels the fundamental notion of parceling out special values to segregated studies. Even when some one end is set up as a standard of value, like social efficiency or culture, it will often be found to be but a verbal heading under which a variety of disconnected factors are comprised. And although the general tendency is to allow a greater variety of values to a given study than does the passage quoted, yet the attempt to inventory a number of values attaching to each study and to state the amount of each value which the given study possesses emphasizes an implied educational disintegration.

上述引文的很多措辞与我们的观点不相符合，对此必须加以澄清。引文用语揭示了作者写作时所处的特定地域传统，其中提到各种需要训练的能力，并表达出对古语言的强烈兴趣。相对来说，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以及人的身体则有所忽略。但是，即使暂时不讨论上述引文的问题（甚至对之完全不予考虑），我们还是能从当代教育哲学发现很多问题，这种教育哲学与为各自分离的科目划分特别价值的基本思想极为类似。即使建立起像社会效率或者文化修养等价值标准，我们还是会发现这些标准只不过是空头口号，实质内容还是由各种互不相干的因素组成。虽然总体趋势是允许一门学科具有比引文包含较多的价值，但是为每一学科罗列若干价值并且其价值的分量，这种尝试彰显了潜在的教育价值的分裂状况。

As matter of fact, such schemes of values of studies are largely

but unconscious justifications of the curriculum with which one is familiar. One accepts, for the most part, the studies of the existing course and then assigns values to them as a sufficient reason for their being taught. Mathematics is said to have, for example, disciplinary value in habituating the pupil to accuracy of statement and closeness of reasoning; it has utilitarian value in giving command of the arts of calculation involved in trade and the arts; culture value in its enlargement of the imagination in dealing with the most general relations of things; even religious value in its concept of the infinite and allied ideas. But clearly mathematics does not accomplish such results, because it is endowed with miraculous potencies called values; it has these values if and when it accomplishes these results, and not otherwise. The statements may help a teacher to a larger vision of the possible results to be effected by instruction in mathematical topics. But unfortunately, the tendency is to treat the statement as indicating powers inherently residing in the subject, whether they operate or not, and thus to give it a rigid justification. If they do not operate, the blame is put not on the subject as taught, but on the indifference and recalcitrancy of pupils.

事实上，这种有关科目价值的计划大部分都不知不觉成为大家所熟悉的课程存在的正当理由。人们多半接受现成的课程科目，然后赋予它们一定的价值，作为讲授这些课程的充足理由。例如，数学被认为具有训练价值，能够使学生习惯于表述的准确性和推理的严密性。数学的实用价值在于在贸易或者艺术领域能够掌握演算的本领；数学的文化价值在于处理事务之间的抽象关系时能够扩大想象力。数学甚至具有宗教价值，这表现在它所包含的无限和集合的思想性。然而，数学显然并不是因为被赋予价值这种神奇的力量才实现上述各种价值的。它是因为能够实现上述那些结果，所以才具备了这些价值。上述阐述或许能够扩展教师的视野，认识到在数学教学中其他可能会实现

的结果。但不幸的是，人们倾向于认为，上述阐述表明学科本身就具备这样的能力，无论它是否发生作用，并因而将其奉为圭臬。如果这些价值并没有发挥作用，不应责怪所教的科目，而是应该责怪学生不用心和不顺从。

This attitude toward subjects is the obverse side of the conception of experience or life as a patchwork of independent interests which exist side by side and limit one another. Students of politics are familiar with a check and balance theory of the powers of government. There are supposed to be independent separate functions, like the legislative, executive,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and all goes well if each of these checks all the others and thus creates an ideal balance. There is a philosophy which might well be called the check and balance theory of experience. Life presents a diversity of interests. Left to themselves, they tend to encroach on one another. The ideal is to prescribe a special territory for each till the whole ground of experience is covered, and then see to it each remains within its own boundaries. Politics, business, recreation, art, science, the learned professions, polite intercourse, leisure, represent such interests. Each of these ramifies into many branches: business into manual occupations, executive positions, bookkeeping, railroading, banking, agriculture, trade and commerce, etc. , and so with each of the others. An ideal education would then supply the means of meeting these separate and pigeon-holed interests. And when we look at the schools, it is easy to get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accept this view of the nature of adult life, and set for themselves the task of meeting its demands. Each interest is acknowledged as a kind of fixed institution to which something in the course of study must correspond. The course of study must then have some civics and history politically and patriotically viewed: some utilitarian studies; some science; some

art (mainly literature of course), some provision for recreation; some moral education; and so on. And it will be found that a large part of current agitation about schools is concerned with clamor and controversy about the due meed of recognition to be given to each of these interests, and with struggles to secure for each its due share in the course of study; or, if this does not seem feasible in the existing school system, then to secure a new and separate kind of schooling to meet the need. In the multitude of educations education is forgotten.

以下这些经验和生活观是这种对待各科目的态度的翻版：它把经验或者生活视为单个兴趣的拼凑物，这些兴趣独立存在并相互限制。学习政治学的学生应该熟悉政府权力机关之间的牵制平衡理论。这些职能机关，譬如立法、执法、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等，应该拥有各种独立行使的职能。如果各自相互牵制并建立起理想的平衡，这些职能机关就能够良好运行。有这样一种哲学：我们不妨将其称作经验的牵制平衡理论。生活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兴趣。若不加以控制，这些兴趣会相互妨碍。理想的解决办法是为每种兴趣划分一块专门属地直至覆盖整个经验领域，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确保每个兴趣都在各自的属地之内。政治、商业、娱乐、艺术、科学、学术、礼貌社交和休闲活动等属于这样的兴趣。每种兴趣细分出很多分支：如营业活动可以分为体力工作、行政工作、账务管理、铁路运输、银行业务、农业、商贸等。理想的教育应该能够提供途径，满足多种多样、分门别类的兴趣。当我们看到学校，很容易就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们接受关于成年人生活性质的观点，并为满足他们的需求设置各种任务。每一种兴趣都被认为是某种惯例，课程学习中必须有某些东西与之对应。因此，课程中必须有一些关于政治和爱国主义和政治以及历史之类的内容：实用科目、理科科目、艺术（当然主要是文学）、娱乐、道德教育等。我们发现，时下大部分关于学校教育的争论主要在于吵闹着要使每一种兴趣得到应有的承认，为每一种兴趣在课程中争得一席之地。否则，如果在现行学校制度行不通的话，就要设法创造一种新的学校

教育满足这个需要。在众多的教育之争中，我们却忘记了教育本身的意义。

The obvious outcome is congestion of the course of study, over-pressure and distraction of pupils, and a narrow specialization fatal to the very idea of education. But these bad results usually lead to more of the same sort of thing as a remedy. When it is perceived that after all the requirements of a full life experience are not met, the deficiency is not laid to the isolation and narrowness of the teaching of the existing subjects, and this recognition made the basis of reorganization of the system. No, the lack is something to be made up for by the introduction of still another study, or, if necessary, another kind of school. And as a rule those who object to the resulting overcrowding and consequent superficiality and distraction, usually also have recourse to a merely quantitative criterion: the remedy is to cut off a great many studies as fads and frills, and return to the good old curriculum of the three R's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and the equally good and equally old-fashioned curriculum of the classics and mathematics in higher education.

以上争论带来的明显后果就是课程繁多混杂，使得学生负担过重、精神涣散。狭隘的专业化教育危及其本意。但是这些不良后果通常导致人们增加更多同样的东西作为补救。当认识到终究不能满足完整的生活经验的要求时，他们却不把缺陷归咎于现有的各门学科彼此孤立、范围狭隘。这种认识成为改造教学制度的基础。他们通过引进其他学科来弥补这种缺陷，甚至必要时，还引进其他种类的学校。至于那些反对课程繁多、分散学生注意力的人，他们通常也只追求数量：补救的方法是取缔众多华而不实的学科，让基础教育回归到读、写、算的这些传统课程，使高等教育回归到古典文学和数学等传统课

程中。

The situation has, of course, its historic explanation. Various epochs of the past have ha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 struggles and interests. Each of these great epochs has left behind itself a kind of cultural deposit, like a geologic stratum. These deposits have found their way into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form of studies, distinct courses of study, distinct types of schools. With the rapid change of political, scientif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 last century, provision had to be made for new values. Though the older courses resisted, they have had at least in this country to retire their pretensions to a monopoly. They have not, however, been reorganized in content and aim; they have only been reduced in amount. The new studies, representing the new interests, have not been used to transform the method and aim of all instruction; they have been injected and added on. The result is a conglomerate, the cement of which consists in the mechanics of the school program or time table. Thence arises the scheme of values and standards of value which we have mentioned.

这种情形之所以会出现当然是有历史原因的。过去的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冲突和利益。每个伟大的历史时代都会留下文化的沉淀，就好像地质学中的岩层一样。这些文化遗产以科目、特色课程以及特色学校的形式进入教育制度中。随着上个世纪政治、科学和经济利益的迅速变化，我们必须为新价值的出现做好准备。尽管旧课程还在垂死挣扎，但至少在美国它们不得不放弃其垄断地位。然而，旧课程并没有在内容和目标上进行改进，它们只是对数量进行了删减。新的课程代表新的利益，但是它们并没有用于改变所有的教学方式和目标。它们只是作为增加的部分被嵌入，结果便是一个混合体，混合体的粘合剂就是学校课程或时间表的技巧。因此，我们前文所提到的价

值体系和价值标准就应运而生了。

This situation in education represents the divisions and separations which obtain in social life. The variety of interests which should mark any rich and balanced experience have been torn asunder and deposited in separate institutions with diverse and independent purposes and methods. Business is business, science is science, art is art, politics is politics, social intercourse is social intercourse, morals is morals, recreation is recreation, and so on. Each possesses a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province with its own peculiar aims and ways of proceeding. Each contributes to the others only externally and accidentally. All of them together make up the whole of life by just apposition and addition. What does one expect from business save that it should furnish money, to be used in turn for making more money and for support of self and family, for buying books and pictures, tickets to concerts which may afford culture, and for paying taxes, charitable gifts and other things of social and ethical value? How un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the pursuit of business should be itself a culture of the imagination, in breadth and refinement; that it should directly, and not through the money which it supplies, have social service for its animating principle and be conducted as an enterprise in behalf of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same thing is to be said, mutatis mutandis, of the pursuit of art or science or politics or religion. Each has become specialized not merely in its appliances and its demands upon time, but in its aim and animating spirit. Unconsciously, our course of studies and our theories of the educational values of studies reflect this division of interests.

教育的这种情况代表着社会生活中的分崩离析。兴趣的多样性本

应表明经验的丰富和平衡，但它现在却支离破碎，存在于各种独立的教学体制中，各自具有形形色色独立的目的和方法。例如，商业就是商业，科学就是科学，艺术就是艺术，政治就是政治，社交就是社交，道德就是道德、娱乐就是娱乐。彼此之间相互独立的学科，都拥有各自独立的领域，以及特殊的研究目标和方式。学科之间的相互贡献只是外在的、偶然的。所有这一切只是通过并列和相加来构成整个生活。比如，人们期望商业能够带来资金，然后用这些资金赚更多的钱以养家糊口，能够购买书画、购买提升文化内涵的音乐会门票、缴税、做慈善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道德价值的事情，但是除此之外，人们还能期待什么呢？如果认为经商本身在广度和精度上就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文化修养，经商本不该通过投资的金钱，而是直接地为它富有生命力的原则来服务社会，并为了社会组织而甘愿当作一种事业来进行，这是多么不合情理啊！同样的，对于艺术、科学、政治或是宗教的追求，也有类似的误解。各门学科不仅在实际应用和对时间的要求方面，而且在目的和精神活力方面，都变得专业化。我们的课程和教育价值理论都不知不觉反映出这种对兴趣的分割现象。

The point at issue in a theory of educational value is then the unity or integrity of experience. How shall it be full and varied without losing unity of spirit? How shall it be one and yet not narrow and monotonous in its unity? Ultimately, the question of values and a standard of values is the moral ques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life. Educationally, the question concerns that organization of schools, materials, and methods which will operate to achieve breadth and richness of experience. How shall we secure breadth of outlook without sacrificing efficiency of execution? How shall we secure the diversity of interests, without paying the price of isolation? How shall the individual be rendered executive in his intelligence instead of at the cost of his intelligence? How shall art, science, and politics reenforce one another in an enriched temper of mind instead of

constituting ends pursued at one another's expense? How can the interests of life and the studies which enforce them enrich the common experience of men instead of dividing men from one another? With the questions of reorganization thus suggested, we shall be concerned in the concluding chapters.

因此，教育价值理论的焦点问题在于经验的整合或统一。怎么才能既保证经验完备多样，又不失去精神的统一性呢？怎么使经验统一而在统一性中又不狭隘和单调？最终，价值和价值标准问题要归结到生活中的兴趣的组织这样的道德问题上来。从教育上说，这个问题关系到学校、教材和方法的组织。组织的良好运行能够获得广泛而丰富的经验。如何在不牺牲效率的同时，还能确保广阔的视野？如何在不支付孤立的代价的同时确保兴趣的丰富多样性？如何在确保应用智力的同时不浪费智力？如何是艺术、科学和政治在丰富的思维空间中相互促进而不是以牺牲彼此来实现自身目的？如何让生活兴趣和强化生活兴趣的学科丰富人们的共同经验，而不使人们互相分开？我们将在以后各章中阐述上面提到的各种问题。

Summary.

总结

Fundamentally, the elements involved in a discussion of value have been covered in the prior discussion of aims and interests. But since educational values are generally discuss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laims of the various studies of the curriculum, the consideration of aim and interest is here resum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pecial studies. The term “value” has two quite different

meanings. On the one hand, it denotes the attitude of prizing a thing, finding it worthwhile, for its own sake, or intrinsically. This is a name for a full or complete experience. To value in this sense is to appreciate. But to value also means a distinctively intellectual act—an operation of comparing and judging—to valuate. This occurs when direct full experience is lacking, and the question arises which of the various possibilities of a situation is to be preferred in order to reach a full realization, or vital experience.

总的来说，有关价值的讨论中所包含的原理在前面讨论目的和兴趣时已经提到过了。但由于这里讨论的教育价值主要和各种学科课程相关，因此我们从特殊学科的角度重新提到了目的和兴趣的概念。“value”（价值）一词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一方面，它指发现某事物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并珍视该事物的态度。这是一个丰富或完整的经验的名称。在这个意义上，“value”就是欣赏的意思。但是“value”还可以指另外一种不同的智力活动——比较和判断，即评价或估量的意思。当缺乏直接的丰富的经验时，就要进行估量。于是，就面临一个问题：在一个情境的各种可能性中，选择哪一种才能达到完全的实现，或者获得重要的经验。

We must not, however, divide the studies of the curriculum into the appreciative, those concerned with intrinsic value, and the instrumental, concerned with those which are of value or ends beyond themselves. The formation of proper standards in any subject depends upon a realiza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which it makes to the immediate significance of experience, upon a direct appreciation. Literature and the fine arts are of peculiar value because they represent appreciation at its best—a heightened realization of meaning through selection and concentration. But every subject at some phase of its development should possess,

what is for the individual concerned with it, an aesthetic quality.

但是，我们绝不能将学科课程分成有关内在价值的欣赏性课程和有关帮助实现其他目的和价值的工具性课程两类。任何学科中规范标准的形成取决于该学科对经验的直接意义所做出贡献的大小，取决于直接的欣赏。文学和美术之所以具备特殊的价值，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最好的欣赏，通过筛选和浓缩，提升了意义的实现。但是每门学科在发展过程的某个阶段应该具有对于和它相关的人来说的审美特性。

Contribution to immediate intrinsic values in all their variety in experience is the only criterion for determining the worth of instrumental and derived values in studies. The tendency to assign separate values to each study and to regard the curriculum in its entirety as a kind of composite made by the aggregation of segregated values is a result of the isolation of social groups and classes. Hence it is the business of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al group to struggle against this isolation in order that the various interests may reenforce and play into one another.

对所有各种不同的经验的内在价值做出的贡献，是决定各学科的工具价值和派生价值的唯一标准。分配给每门学科独立的价值，并且将整个课程看作由各种独立价值集合组成的混合体，这种趋势是社会团体和阶级孤立分离造成的。因此，民主社会团体中教育的任务就是同这种孤立分离现象作斗争，使各种兴趣相互促进和融合。

Chapter 19 Labor and Leisure

第十九章　工作与娱乐

1．The Origin of the Opposition.

一、对立的起源

The isolation of aims and values which we have been considering leads to opposition between them. Probably the most deep-seated antithesis which has shown itself in educational history is that between education in preparation for useful labor and education for a life of leisure. The bare terms 'useful labor' and 'leisure' confirm the statement already made that the segregation and conflict of values are not self-inclosed, but reflect a division within social life. Were the two functions of gaining a livelihood by work and enjoying in a cultivated way the opportunities of leisure, distributed equally among the different members of a community, it would not occur to any one that there was any conflict of educational agencies and aims involved. It would be self-evident that the question was how education could contribute most effectively to both. And while it might be found that some materials of instruction chiefly accomplished one result and other subject matter the other, it would be evident that care must be taken to secure as much overlapping as conditions permit; that is, the education which had leisure more directly in view should indirectly reenforc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efficiency and the enjoyment of work, while that aiming at the latter should produce habits of

emotion and intellect which would procure a worthy cultivation of leisure. These general considerations are amply borne out b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e separation of liberal education from professional and industrial education goes back to the time of the Greeks, and was formulated expressly on the basis of a division of classes into those who had to labor for a living and those who were relieved from this necessity. The conception that liberal education, adapted to men in the latter class, is intrinsically higher than the servile training given to the latter class reflected the fact that one class was free and the other servile in its social status. The latter class labored not only for its own subsistence, but also for the means which enabled the superior class to live without personally engaging in occupations taking almost all the time and not of a nature to engage or reward intelligence.

前面我们讲到的教育目标和价值的分离导致了二者的对立。教育史上最严重的对立恐怕是为工作做准备的教育和为娱乐做准备的教育之间的对立。“工作”和“娱乐”这两个词就已经证实了这样的观点：各种价值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并不是自我封闭，而是反映出了社会生活的分化。如果通过工作维持生计与以一种文明方式享受休闲机会这两个功能可以平等地分配到所有社会成员中，就不会有人觉得教育机构与教育目的充满矛盾。接下来的问题是教育如何最有效地兼顾这两个功能。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些教材主要实现一种功能而其他教材则实现另一种功能。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尽量确保这两个结果的重叠。也就是说，侧重休闲的教育应该尽可能间接地加强工作效率和对工作的热爱，而侧重工作的教育应加强培养情感和智力习惯，以促进高雅的闲暇生活。教育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充分证明了上述主要观点。博雅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分离可以追溯到希腊时期。基于当时阶级划分的观点，把社会阶级明确分成必须为谋生而劳动的阶级和免于劳动的贵族阶级。当时人们认为，适用于贵族阶级的博雅教育在本质上比劳动阶级的仆役式训练高出一等。这种观念反映出这

样一个事实：在社会地位上，有些人是完全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则处于被奴役状态。奴隶阶级不仅要为自身的生存资料而劳动，而且要为上等阶级提供生活资料而劳动，使他们不必亲自从事劳动。这种劳作几乎要耗费掉他们全部的时间而且不属于脑力劳动，因而也不可能获得智慧。

That a certain amount of labor must be engaged in goes without saying. Human beings have to live and it requires work to supply the resources of life. Even if we insist that the interests connected with getting a living are only material and hence intrinsically lower than those connected with enjoyment of time released from labor, and even if it were admitted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engrossing and insubordinate in material interests which leads them to strive to usurp the place belonging to the higher ideal interests, this would not—barring the fact of socially divided classes—lead to neglect of the kind of education which trains men for the useful pursuits. It would rather lead to scrupulous care for them, so that men were trained to be efficient in them and yet to keep them in their place; education would see to it that we avoided the evil results which flow from their being allowed to flourish in obscure purlieus of neglect. Only when a division of these interests coincides with a division of an inferior and a superior social class will preparation for useful work be looked down upon with contempt as an unworthy thing: a fact which prepares one for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rigid identification of work with material interests, and leisure with ideal interests is itself a social product. The educational formulations of the social situation made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ago have been so influential and give such a clear and logical recognition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division into laboring and leisure classes, that they deserve especial note. According to them, man occupies the highest place in the scheme of

animate existence. In part, he shares the constitution and functions of plants and animals—nutritive, reproductive, motor or practical. The distinctively human function is reason existing for the sake of beholding the spectacle of the universe. Hence the truly human end is the fullest possible of this distinctive human prerogative. The life of observation, meditation, cogitation, and speculation pursued as an end in itself is the proper life of man. From reason moreover proceeds the proper control of the lower elements of human nature—the appetites and the active, motor, impulses. In themselves greedy, insubordinate, lovers of excess, aiming only at their own satiety, they observe moderation—the law of the mean—and serve desirable ends as they are subjected to the rule of reason.

无需赘言，人们必须要从事一定的劳作。人类要想生存，必须得通过劳动来获取生活资料。即使我们坚持认为与谋生有关的兴趣只属于物质方面，因而在本质上低于贵族阶级享受的兴趣，即使我们承认有些物质方面的兴趣也具有吸引力，并非低下，并努力使其占据属于高级理想兴趣的地位，但是，如果没有阶级的划分，就不会导致我们对实用职业技术教育的忽视，反而会使我们对这些职业格外审慎，使人们训练有素，各司其职。教育会确保我们避免由于任凭忽视之风蔓延而误入歧途。只有当利益的区分和社会对贫民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划分相一致时，为实用劳动所做的准备才会受到轻视，被视为不值得一做的事情。这一事实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和物质兴趣等同，休闲生活和理想兴趣等同，这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两千多年前人们针对当时社会状况所做的教育规划影响力巨大，它让我们清晰明确、富有逻辑性地认识到了劳动阶级和贵族阶级划分的含义，这点特别值得注意。按照这种规划，人类居于一切生灵的最高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与动植物具有相同的营养、生殖、运动和实践构造和功能。人类所特有的功能是理性，它的存在是为了观察奇妙的宇宙万物。因此，人类的真正目的即是最充分实现人类这一独特特性的可能性。以追求观察、反省、冥思和推测的生活为目的，这本身即是人类的固有

生活。另外，理性可以适当控制人性中的低级因素——欲望、冲动等。贪婪、叛逆、放纵这些低级因素本身只在于满足极端的目的，当它们受理性约束时，就会遵循节制和中庸之道，为恰当的目的服务。

Such is the situation as an affair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 and as most adequately stated by Aristotle. But this state of things is reflected in the constitution of classes of men and hence in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Only in a comparatively small number is the function of reason capable of operating as a law of life. In the mass of people, vegetative and animal functions dominate. Their energy of intelligence is so feeble and inconstant that it is constantly overpowered by bodily appetite and passion. Such persons are not truly ends in themselves, for only reason constitutes a final end. Like plants, animals and physical tools, they are means, appliances, for the attaining of ends beyond themselves, although unlike them they have enough intelligence to exercise a certain discretion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tasks committed to them. Thus by nature, and not merely by social convention, there are those who are slaves—that is, means for the ends of others. [6_1] The great body of artisans are in one important respect worse off than even slaves. Like the latter they are given up to the service of ends external to themselves; but since they do not enjoy the intimate association with the free superior class experienced by domestic slaves they remain on a lower plane of excellence. Moreover, women are classed with slaves and craftsmen as factors among the animate instrumentalities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means for a free or rational life.

以上便是理论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亚里士多德已经对此有详细的阐释。然而，这种情况反映在人类阶级组织上，因而也体现在社会组

织上。理性的功能，作为生活法则，只能对相对少数人发挥作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植物性和动物性的功能占主导地位。他们的智力如此微弱且变化无常，往往被肉体的欲望和激情所取代。这些人本身并未实现真正的目的，因为唯有理性才能构建最终的目的。如同植物、动物和有形工具一样，这些人只是实现超越自身这一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尽管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拥有足够的智慧做出一定的判断。因此，不仅仅是从社会习俗上，并且从本质上，有某些人注定作为奴役的对象而存在，是为别人服务的。[7_1] 那些技艺娴熟的工匠们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奴隶的生活还要糟糕。他们像奴隶一样，为别人的目的服务；但由于他们享受不到家庭奴隶和自由的上层阶级之间的亲密联系，他们仍处于更低的地位。此外，女人与奴隶和工人同属为自由或理性生活卖力的有生命的工具。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there is a gulf between merely living and living worthily. In order that one may live worthily he must first live, and so with collective society. The time and energy spent upon mere life, upon the gaining of subsistence, detracts from that available for activities that have an inherent rational meaning; they also unfit for the latter. Means are menial, the serviceable is servile. The true life is possible only in the degree in which the physical necessities are had without effort and without attention. Hence slaves, artisans, and women are employed in furnishing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in order that others, those adequately equipped with intelligence, may live the life of leisurely concern with things intrinsically worthwhile.

无论从个人层面还是从集体层面来说，勉强生存和体面生活之间存在鸿沟。无论谁要想体面地生活，他首先必须能够生存，集体社会同样如此。用在维持生计和获取基本生存资料上的时间和精力削弱了人们从事具有内在理性意义活动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也因而变得不适

应理性思维。被人支配是卑贱的，为别人服务是奴役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当不费努力和心神就能获取必要生活资料时，才可能过上真正的生活。因此，人们雇佣奴隶、工人和女人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以便那些头脑聪明的人能够过舒适的生活，去关注具备内在价值的事物。

To these two modes of occupation, with their distinction of servile and free activities (or “arts”) correspond two types of education: the base or mechanical and the liberal or intellectual. Some persons are trained by suitable practical exercises for capacity in doing things, for ability to use the mechanical tools involved in turning out physical commodities and rendering personal service. This training is a mere matter of habituation and technical skill; it operates through repetition and assiduity in application, not through awakening and nurturing thought. Liberal education aims to train intelligence for its proper office: to know. The less this knowledge has to do with practical affairs, with making or producing, the more adequately it engages intelligence. So consistently does Aristotle draw the line between menial and liberal education that he puts what are now called the “fine” arts, music, painting, sculpture, in the same class with menial arts so far as their practice is concerned. They involve physical agencies, assiduity of practice, and external results. In discussing, for example, education in music he raises the question how far the young should be practiced in the playing of instruments. His answer is that such practice and proficiency may be tolerated as conduce to appreciation; that is, to understanding and enjoyment of music when played by slaves or professionals. When professional power is aimed at, music sinks from the liberal to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ne might then as well teach cooking, says Aristotle. Even a liberal concern with the works of fine art depends upon the existence of a

hireling class of practitioners who have subordin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own personality to attaining skill in mechanical execution. The higher the activity the more purely mental is it; the less does it have to do with physical things or with the body. The more purely mental it is, the more independent or self-sufficing is it.

以上两种情况，即对奴役性工作和自由行为（或“艺术”）的区分对应着两种教育类型：一种是卑下或机械的教育，一种是自由或理智的教育。有些人接受培养做事能力的实践训练，学习使用机械工具，生产出各种物质商品、提供各项个人服务。这属于机械式的技能训练，只需通过反复练习和勤奋应用即可获得，不涉及启发思想、培养思维。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智力，学会恰当思考和了解事物。这种知识与实践和生产的联系越少，就越能充分地培养智力。亚里士多德坚持划清技能教育和博雅教育的界线，甚至把现在的美术、音乐、绘画和雕塑的实践方面归为低下的技艺一类，因为它们涉及体能、勤奋训练和外部结果。例如，在讨论音乐教育时，亚里士多德提出这样的问题：儿童在练习乐器时应该达到什么水平？他认为，儿童练习乐器应该有助于达到欣赏音乐的水平；即能够了解和欣赏仆役或者专业人员所演奏的音乐。如果目的在于培养职业的演奏家，那么音乐就从自由认知水平沦落到谋生水平。亚里士多德说，如果这样的话，人们也可以同样教授烹饪了。甚至像美术作品这种自由创作，也有赖于有一批被雇佣的画师，他们将个性的发挥从属于获得机械的绘画技巧。活动越高级，就越属于纯粹的智力活动；也与各种物质和身体的关联越少。越是纯粹的智力活动，活动本身就越独立或者说越自我满足。

These last words remind us that Aristotle again makes a distinction of superior and inferior even within those living the life of reason. For there is a distinction in ends and in free action, according as one's life is merely accompanied by reason or as it

makes reason its own medium. That is to say, the free citizen who devotes himself to the public life of his community, shar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its affairs and winning personal honor and distinction, lives a life accompanied by reason. But the thinker, the man who devotes himself to scientific inquiry and philosophic speculation, works, so to speak, in reason, not simply by it. Even the activity of the citizen in his civic relations, in other words, retains some of the taint of practice, of external or merely instrumental doing. This infection i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civic activity and civic excellence need the help of others; one cannot engage in public life all by himself. But all needs, all desires, imply, in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a material factor; they involve lack, privation; they are dependent upon something beyond themselves for completion. A purely intellectual life, however, one carries on by himself, in himself; such assistance as he may derive from others is accidental, rather then intrinsic. In knowing, in the life of theory, reason finds its own full manifestation; knowing for the sake of knowing irrespective of any application is alone independent, or self-sufficing. Hence only the education that makes for power to know as an end in itself,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practice of even civic duties, is truly liberal or free.

以上的话提醒我们，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高雅人群中也有优劣之分。由于个人的生活有时仅仅由理性伴随，有时理性却成为生活的媒介，因此人生目标与自由行为之间就存在区别。也就是说，当自由公民全身投入到社区的公共生活中，分担社区事务管理，获得个人荣誉和殊荣时，就可以说他过着理性的生活。但是献身于科学探索和哲学思考的思想家不仅用理性伴随工作始终而且是在理性中工作。换句话说，即使公民在公共关系上的活动也仍保存某些实践色彩或仅属工具性的表面色彩。这种影响体现在这样的事实上：公民的各种活动和成就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人们不可能只身一人参与到公共生活中。但是

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所有的需求和欲望都包含有物质因素。它们本身就含有缺乏的意思，需要依靠自身以外的事物以达到完满。然而，我们却可以独自过纯粹的智力生活，我们能从别人那里得到帮助，但是这种帮助是偶然的，不是固定的。理性在认知和理论生活中得到全面表现。为认知而认知，不考虑任何实用问题，只有这种认知才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因此，只有将认知本身作为目的，甚至不顾及公民义务的实践，只有这种教育，才是真正的博雅教育或者说自由教育。

2．The Present Situation.

二、现实情况

If the Aristotelian conception represented just Aristotle's personal view, it would be a more or less interesting historical curiosity. It could be dismissed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lack of sympathy or the amount of academic pedantry which may coexist with extraordinary intellectual gifts. But Aristotle simply described without confusion and without that insincerity always attendant upon mental confusion, the life that was before him. That, the actual social situation has greatly changed since his day there is no need to say. But in spite of these changes, in spite of the abolition of legal serfdom, and the spread of democracy, with the extension of science and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books, newspapers, travel, and general intercourse as well as in schools), there remains enough of a cleavage of society into a learned and an unlearned class, a leisure and a laboring class, to make his point of view a most enlightening one from which to criticiz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utility in present education. Behind the intellectual and abstract

distinction as it figures in pedagogical discussion, there looms a soci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ose whose pursuits involve a minimum of self-directive thought and 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those who are concerned more directly with things of the intelligence and with the control of the activities of others.

如果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那么这种思想充其量不过是历史趣闻而已，可以把它作为缺乏同情心或者禀赋异常卖弄学问的例子不予理会。但是，亚里士多德只是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没有一丝含糊，也没有因思想混乱而产生不真诚的感觉。自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以来，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并且废除了法定农奴制，还使得民主思想广泛传播，还有科学和大众教育得以普及（包括书籍、报纸、旅行、社交以及学校），单身社会中仍然存在知识精英与文盲阶层、休闲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区别。这使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成为批判当前教育中文化与实用性分隔的最有启迪性的观点。在教育学的讨论中做出理智和抽象区分的背后，隐约折射出社会的分化。有些人追求具有指导自我思想和审美欣赏能力；另一些人则更直接地追求智力，旨在控制他人的行为。

Aristotle was certainly permanently right when he said that “any occupation or art or study deserves to be called mechanical if it renders the body or soul or intellect of free persons unfit for the exercise and practice of excellence. " The force of the statement is almost infinitely increased when we hold, as we nominally do at present, that all persons, instead of a comparatively few, are free. For when the mass of men and all women were regarded as unfree by the very nature of their bodies and minds, there was neither intellectual confusion nor moral hypocrisy in giving them only the training which fitted them for mechanical skill, irrespective of its ulterior effect upon their capacity to share in a worthy life. He was

permanently right also when he went on to say that “all mercenary employments as well as those which degrade the condition of the body are mechanical, since they deprive the intellect of leisure and dignity,“—permanently right, that is, if gainful pursuits as matter of fact deprive the intellect of the conditions of its exercise and so of its dignity. If his statements are false, it is because they identify a phase of social custom with a natural necessity. But a different view of the relations of mind and matter, mind and body, intelligence and social service, is better than Aristotle's conception only if it helps render the old idea obsolete in fact—in the actual conduct of life and education. Aristotle was permanently right in assuming the inferiority and subordination of mere skill in performance and mere accumulation of external products to understanding, sympathy of appreciation, and the free play of ideas. If there was an error, it lay in assuming the necessary separation of the two: in supposing that there is a natural divorce between efficiency in producing commodities and rendering service, and self-directive thought; between significant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 We hardly better matters if we just correct his theoretical misapprehension, and tolerate the social state of affairs which generated and sanctioned his conception. We lose rather than gain in change from serfdom to free citizenship if the most prized result of the change is simply an increase in the mechanical efficiency of the human tools of production. So we lose rather than gain in coming to think of intelligence as an organ of control of nature through action, if we are content that an unintelligent, unfree state persists in those who engage directly in turning nature to use, and leave the intelligence which controls to be the exclusive possession of remote scientists and captains of industry. We are in a position honestly to criticize the division of life into separate functions and of society into separate classes only so far as we are free from responsibility for perpetuating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s which train

the many for pursuits involving mere skill in production, and the few for a knowledge that is an ornament and a cultural embellishment. In short, ability to transcend the Greek philosophy of life and education is not secured by a mere shifting about of the theoretical symbols meaning free, rational, and worthy. It is not secured by a change of sentiment regarding the dignity of labor, and the superiority of a life of service to that of an aloof self-sufficing independence. Important as these theoretical and emotional changes are, their importance consists in their being turned to accou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truly democratic society, a society in which all share in useful service and all enjoy a worthy leisure. It is not a mere change in the concepts of culture—or a liberal mind—and social service which requires an educational reorganization; but the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is needed to give full and explicit effect to the changes implied in social life. The increas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mancipation of the "masses" has shown itself in education; it has e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on school system of education, public and free. It has destroyed the idea that learning is properly a monopoly of the few who are predestined by nature to govern social affairs. But the revolution is still incomplete. The idea still prevails that a truly cultural or liberal education cannot have anything in common, directly at least, with industrial affairs, and that the education which is fit for the masses must be a useful or practical education in a sense which opposes useful and practical to nurture of appreciation and liberation of thought. As a consequence, our actual system is an inconsistent mixture. Certain studies and methods are retained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y have the sanction of peculiar liberality, the chief content of the term liberal being uselessness for practical ends. This aspect is chiefly visible in what is termed the higher education—that of the college and of preparation for it. But it has filtered through into elementary

education and largely controls its processes and aims. But, on the other hand, certain concessions have been made to the masses who must engage in getting a livelihood and to the increased role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modern life. These concessions are exhibited in special schools and courses for the professions, for engineering, for manual training and commerce, in vocational and prevocational courses; and in the spirit in which certain elementary subjects, like the three R's, are taught. The result is a system in which both “cultural” and “utilitarian” subjects exist in an inorganic composite where the former are not by dominant purpose socially serviceable and the latter not liberative of imagination or thinking power.

亚里士多德曾说，“任何工作、艺术或学习，只要会导致自由人的身体、精神或才智不适应优秀品质的发挥和实践，都应该被称为机械式的。”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当然永远正确。如果我们认为，正如当今我们名义上所主张的那样，不仅少数人是自由的，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就更为重要。因为，如果认为大多数男性和所有女子的身心都不是自由的，只能对他们进行机械的技能训练，不用顾及这对他们参与有价值生活的能力有何影响，这种看法既不是思想的混乱，也不是道德上的虚伪。当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所有为金钱而从事的职业和有损身体的职业都是机械性的，因为它们剥夺了智力的自由和尊严”，这番话也永远是正确的。它的正确性还在于，如果有金钱收入的职业剥夺了使用智力的可能，也就剥夺智力的尊严。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错误的，那是因为他把社会习俗等同于自然的必然。如果我们以一种不同的观点对待精神与物质、心理和身体、智力和社会服务的关系，那么只有当这种观点能使旧的观念在事实上，即在实际生活和教育中已被废弃时，才可以说是优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还认为，纯粹的实用技能和外在产品的积累远不如对不同观念的理解、欣赏和自由发挥。他的这个观点也永远是正确的。如果非要说存在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他认为这两个方面必然彼此分离，即在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效率与自我指导

的思想之间，在含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成就之间，彼此自然分离。如果我们只修正他的理论误解，容忍产生和支持他观点的社会状态，这是于事无补的。假如农奴社会转变成自由公民社会的最大成果仅在于提高了人类生产工具的机械效率，这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我们满足于那些直接利用自然的人仍处于冒昧和不自由的状况，而把控制自然的智力让相隔很远的科学家和工业界的巨头所独占，那么我们把智力看作通过行动控制自然的力量，我们也同样只有所失而无所得。只有当教育实践不再负责训练多数人从事纯粹的生产技能性的职业，而用于培养少数人学习美学和文化修养知识时，我们才有资格开诚布公地批评将生活划分为彼此分离的许多功能，把社会划分成彼此隔离的若干阶级。简言之，超越希腊人生哲学和教育哲学的能力，不是简单通过自由、理性和价值这些理论符号的转换而获得的，也不是通过改变对劳动尊严的看法，认为提供服务的人生比自足的独立生活优越而获得的。尽管这些理论和情感的变化很重要，但其重要性还在于它们能被用于发展真正的民主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大家都参与有益的服务，享受有价值的休闲时光。这并不仅仅是文化观念或者自由思想上的转变，也不仅仅是社会服务需要教育改革。我们需要通过教育改革全面深化社会变革。广大“人民”不断增强的政治和经济解放已经在教育方面显现出来：这种解放思想促进了免费的公共学校体制的发展。认为学习是少数天生注定要管理社会事务者的专利，这种思想已经被打破。但是这种改革尚未完全成功。现在仍然盛行这样的思想：真正具有文化的或者说博雅的教育不应当同实务有共同之处，至少不应该有直接的联系。适合大众的教育必须切实有用，然而这里的所说的切实有用与培养欣赏能力和自由思想是对立的。因此，我们实际的教育体制是一个不协调的混合体。有些学科和方法得以保留，是因为假定它们认可特殊的自由，而“自由”一词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实践无用。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即大学和大学预科学校，现在也渗透到基础教育中，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基础教育的进程和目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教育对必须要养家糊口的民众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也让步于经济活动在现代生活中不断扩大的作用。这种让步体现在特殊学校和课程上，如职业类、工程类、操作培训和商业类等，体现在在职和职前教育课程等，也体现在读、写、算等基础学

科。这种让步导致教学体制中“文化性”和“功用性”课程以一种无组织的状态混杂并存，其中文化科目的主要目标并不在于社会服务性，而功用性课程的目标并不在于培养自由想象力或思维能力。

In the inherited situation, there is a curious intermingling, in even the same study, of concession to usefulness and a survival of traits once exclusively attributed to preparation for leisure. The 'utility' element is found in the motives assigned for the study, the 'liberal' element in methods of teaching. The outcome of the mixture is perhaps less satisfactory than if either principle were adhered to in its purity. The motive popularly assigned for making the studies of the first four or five years consist almost entirely of reading, spelling, writing, and arithmetic, is, for example, that ability to read, write, and figure accurately is indispensable to getting ahead. These studies are treated as mere instruments for entering upon a gainful employment or of later progress in the pursuit of learning, according as pupils do not or do remain in school. This attitude is reflected in the emphasis put upon drill and practice for the sake of gaining automatic skill. If we turn to Greek schooling, we find that from the earliest years the acquisition of skill was subordinated as much as possible to acquisition of literary content possessed of esthetic and moral significance. Not getting a tool for subsequent use but present subject matter was the emphasized thing. Nevertheless the isolation of these studies from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ir reduction to purely symbolic devices, represents a survival of the idea of a liberal training divorced from utility. A thorough adoption of the idea of utility would have led to instruction which tied up the studies to situations in which they were directly needed and where they were rendered immediately and not remotely helpful. It would be hard to find a subject in the curriculum within which there are not found evil results of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two opposed ideals. Natural science is recommended on the ground of its practical utility, but is taught as a special accomplishment in removal from appl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music and literature are theoretically justified on the ground of their culture value and are then taught with chief emphasis upon forming technical modes of skill.

在这种承袭的情形中，甚至在同一学科中都出现一种奇怪的交织混合：某些曾经只适用于休闲娱乐的特性向实用性让步。从学科设置动机中可以发现“实用性”的因素，在教学法中则能够发现“自由”的痕迹。交织混合的效果或许还不如各个学科坚持各自的纯粹性更令人满意。比如说，学校最初四、五年的课程通常都是读、拼、写、算，这样设置课程的动机是认为读写和精确计算的能力对于获取成功是必不可缺的。这些学科仅仅作为从工作中赚钱的工具，或今后继续求知的工具，根据学生是否继续留校学习而定。这种态度反映在强调反复的练习和训练上，以便获取机械化的技能。如果回溯到希腊时期的学校教育，我们会发现早在学习初期获取技能已经尽可能地让位于学习具有美学和道德意义的文学作品。需要强调的应该是当前的教学内容，而不是获取以后能够利用的工具。学校课程同实际应用脱离，还原成纯粹的象征符号，这代表同实用主义分离的自由训练教育思想的存活。彻底推行实用主义能使教学与实际所需的情境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所学课程立马派上用处而不是用于以后的可能情境。在课程科目中，这两个对立目标相互妥协的不良后果随处可见。自然科学是因为实用性而设置的，但在教授过程中却脱离实际应用被看作一种特殊的成果。另一方面，音乐和文学在理论上是因其文化价值而合理引入课程的，在教学中却主要强调培养专门技巧模式。

If we had less compromise and resulting confusion, if we analyzed more carefully the respective meanings of culture and utility, we might find it easier to construct a course of study which

should be useful and liberal at the same time. Only superstition makes us believe that the two are necessarily hostile so that a subject is illiberal because it is useful and cultural because it is useless. It will generally be found that instruction which, in aiming at utilitarian results, sacrifices the development of imagination, the refining of taste and the deepening of intellectual insight—surely cultural values—also in the same degree renders what is learned limited in its use. Not that it makes it wholly unavailable but that its applicability is restricted to routine activities carried on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others. Narrow modes of skill cannot be made useful beyond themselves; any mode of skill which is achieved with deepening of knowledge and perfecting of judgment is readily put to use in new situations and is under personal control. It was not the bare fac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utility which made certain activities seem servile to the Greeks but the fact that the activities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getting a livelihood were not, in their days, the expression of a trained intelligence nor carried on because of a personal appreciation of their meaning. So far as farming and the trades were rule-of-thumb occupations and so far as they were engaged in for results external to the minds of agricultural laborers and mechanics, they were illiberal—but only so far.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context has now changed. The elements in industry due to mere custom and routine have become subordinate in most economic callings to elements derived from scientific inquiry. The most important occupations of today represent and depend upon applied mathematics, physics, and chemistry. The area of the human world influenced by economic production and influencing consumption has been so indefinitely widened that geographical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of an almost infinitely wide scope enter in. It was natural for Plato to deprecate the learning of geometry and arithmetic for practical ends, because as matter of fact the practical uses to which they were put were few, lacking in content

and mostly mercenary in quality. But as their social uses have increased and enlarged, their liberalizing or 'intellectual' value and their practical value approach the same limit.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折中和因此造成的混杂，如果更仔细地分析文化和功用的各自含义，我们可能会更容易设置既具备实用性，又弘扬自由思想的课程。盲目迷信使我们认为这两方面是互不兼容的：即某科目因为实用所以就不是文化教育，某科目不实用因而具有文化修养作用。我们通常发现，实用性教育妨碍想象力的发展、审美能力的提升以及具有文化价值洞察力的深化。这不但有损自由教育，同时也限制了所学知识的用途。这并不是说所学的东西完全无法应用，而是应用只局限在别人监督之下进行的常规性的活动。狭隘的技巧模式无法超越自身的应用范围。然而，通过深化知识、完善判断获得的技能模式却能够应用到新的情境中，并受个人的控制。某些活动在希腊人看来具有奴役的性质，并不完全因为它们具有社会和经济的效用，而是因为在当时直接与谋生相关联的活动既不是受过训练的智力的表现，也不是由于个人领悟到活动的意义才从事这些活动的。只要农业和商业是一种承袭传统经验的职业，只要从事这些职业不是为了提高农民和工人的智力，这些职业就与高雅教育无关，然而，这仅限于此范围以内。现在的智力环境和社会背景已经改变了。在大多数经济活动中，那些因袭常规和传统的因素如今都受制于科学研究的影响。当今最重要的职业与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和应用化学等密切相关。人类世界中受经济生产的影响和影响消费的领域无限地拓宽了，地理上和政治上的考虑范围因而也无限地扩大了。柏拉图强烈反对以实用为目的去学习几何和算术，这很好理解，因为它们的实际用处很少，缺乏内容，多数属于实利性质。但是随着其社会用途的增长和扩大，它们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达到了同等的高度。

Doubtless the factor which chiefly prevents our full recognition and employment of this identification is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so much work is still carried on. The invention of machines has extended the amount of leisure which is possible even while one is at work. It is a commonplace that the mastery of skill in the form of established habits frees the mind for a higher order of thinking. Something of the same kind is tru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echanically automatic operations in industry. They may release the mind for thought upon other topics. But when we confine the education of those who work with their hands to a few years of schooling devoted for the most part to acquiring the use of rudimentary symbols at the expense of training in scienc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we fail to prepare the minds of worker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More fundamental is the fact that the great majority of workers have no insight into the social aims of their pursuits and no direct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m. The results actually achieved are not the ends of their actions, but only of their employers. They do what they do, not freely and intelligently,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wage earned. It is this fact which makes the action illiberal, and which will make any education designed simply to give skill in such undertakings illiberal and immoral. The activity is not free because not freely participated in.

我们之所以无法完全认识和利用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一致性，主要是由于工作环境的关系，目前仍有很多的工作在这种环境下展开。机械的发明延长了休闲时间，甚至在工作时人们也有一定的休闲时间。众所周知，熟练掌握技能，将其作为一种习惯，这可以使大脑从事更为高级的思维活动。工业中引入机械化自动生产也是同样的道理。这能够解放思想，使其思考其他内容。但这些体力劳动者的大部分学校教育却仅限于掌握基本符号的使用，它们没有受到科学、文学和历史等科目的训练。我们没有能够训练工人的心智，帮助他们利用受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工人并不知晓他们职业的社会

目的，对自己的职业并没有直接的兴趣。他们所做出的成就并不是他们自身行为的目的，而是他们雇主的目的。他们被动工作，既不是自由选择也不需要用脑，只是为了赚得工资。正是基于这个事实，他们的行动变得不自由，也使得任何纯粹培训技能的教育变得不自由、不道德。任何人们不能自由参与的活动就是不自由的。

Nevertheless, there is already an opportunity for an education which, keeping in mind the larger features of work, will reconcile liberal nurture with training in social serviceableness, with ability to share efficiently and happily in occupations which are productive. And such an education will of itself tend to do away with the evils of the existing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degree in which men have an active concern in the ends that control their activity, their activity becomes free or voluntary and loses its externally enforced and servile quality, even though the physical aspect of behavior remain the same. In what is termed politics, democratic social organization makes provision for this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control: in the economic region, control remains external and autocratic. Hence the split between inner mental action and outer physical action of which the tradition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iberal and the utilitarian is the reflex. An education which should unify the disposition of the members of society would do much to unify society itself.

不过，如果教育能记住工作的主要特征，现在就已经有机会把文化修养的培养和社会服务的训练协调起来，使学生能够愉快高效地参与各种内容丰富的活动。这样的教育自身将消除现行经济环境的缺陷。当人们主动关心控制其行为的目的时，他们的行为也相应地更加自由或具有自发性，不再是由外部强加的或不情愿的，即使这种行为的本身仍然未发生改变。在政治方面，民主社会组织为人们提供直接

参与管理的条件。在经济领域，管理还是外部强加的，独断专行的。因此，传统上自由教育和实用教育的区别，其实是内在精神活动和外部身体活动之间分裂的反映。旨在统一社会成员性情的教育，将会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

Summary.

总结

Of the segregations of educational values discussed in the last chapter, that between culture and utility is probably the most fundamental. While the distinction is often thought to be intrinsic and absolute, it is really historical and social. It originated, so far as conscious formulation is concerned, in Greece, and was based upon the fact that the truly human life was lived only by a few who subsisted upon the results of the labor of others. This fact affected the psychological doctrine of the relation of intelligence and desire, theory and practice. It was embodied in a political theory of a permanent division of human beings into those capable of a life of reason and hence having their own ends, and those capable only of desire and work, and needing to have their ends provided by others. The two distinctions, psychological and political, translated into educational terms, effected a division between a liberal education, having to do with the self-sufficing life of leisure devoted to knowing for its own sake, and a useful, practical training for mechanical occupations, devoid of intellectual and æsthetic content. While the present situation is radically diverse in theory and much changed in fact, the factors of the older historic situation still persist sufficiently to maintain the educational distinction, along with

compromises which often reduce the efficacy of the educational measures.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s to do away with the dualism and to construct a course of studies which makes thought a guide of free practice for all and which makes leisure a reward of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 for service, rather than a state of exemption from it.

在上一章提到的教育价值被区别对待的情况时，文化价值与实用价值之间的区别恐怕是最为主要。虽然常被认为是内在的、绝对的，但这种区别其实有其社会历史的根源。这种有意识的区别起源于希腊，并且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只有少数靠他人劳动成果生存的人能够过真正的人类生活。这一事实影响了智力与欲望、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等心理学理论，并体现在将人类永远划分成两类人的政治理论之中，即一些人能够过理性的生活，因而有自己的目标；另一些人则受欲望和劳动的支配，需要别人为他们设计人生目标。这两种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区分，用教育术语来阐述，导致了自由教育有别于实用的训练。一种是与自给自足休闲生活有关的自由教育，这种教育致力于为认知而认知；另一种是为职业而进行的实用培训教育，这种教育缺乏智力和审美内容。虽然目前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历史遗留的因素仍足以维持教育价值的区别，另外很多折中妥协之处常常降低教育的效果。民主社会的教育问题在于摆脱教育中的二元论，建立一种课程体系，让使思想作为所有人从事自由实践的向导，让休闲作为承担工作责任的奖赏，而非逃避责任的回报。

[6_1].Aristotle does not hold that the class of actual slaves and of natural slaves necessarily coincide.

[7_1].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实际的奴隶阶级与自然的奴隶阶级必然一致。

Chapter 20 Intellectual and Practical Studies

第二十章　知识科目与实用科目

1．The Opposition of Experience and True Knowledge.

一、经验与真知的对立

As livelihood and leisure are opposed, so are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lligence and execution, knowledge and activity. The latter set of oppositions doubtless springs from the same social conditions which produce the former conflict; but certain definite problems of education connected with them make it desirable to discuss explicitly the matter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alleged separation of knowing and doing.

正如生存与休闲是对立的一样，理论与实践、智力与实施，知识与活动也都是对立的。毫无疑问，后面的几组对立来自于产生前一种对立的同样的社会条件。但与这几组对立有关若干特定的教育问题使得我们有必要明确地讨论知与行的关系及知与行的分离问题。

The notion that knowledge is derived from a higher source than is practical activity, and possesses a higher and more spiritual worth, has a long history. The history so far as conscious statement is concerned takes us back to the conceptions of experience and of reason formulated by Plato and Aristotle. Much as these thinkers

differed in many respects, they agreed in identifying experience with purely practical concerns; and hence with material interests as to its purpose and with the body as to its organ. Knowledge, on the other hand, existed for its own sake free from practical reference, and found its source and organ in a purely immaterial mind; it had to do with spiritual or ideal interests. Again, experience always involved lack, need, desire; it was never self-sufficing. Rational knowing, on the other hand, was 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within itself. Hence the practical life was in a condition of perpetual flux, while intellectual knowledge concerned eternal truth.

知识并不是来源于实践活动，而是有其更高级的来源，而且知识有更高以及更多精神方面的价值，这一观点由来已久。历史上对这一问题的明确阐述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经验和理性的定义。尽管两位思想家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同意把经验和纯粹的实际需求等同起来，也就是把物质利益当作经验的目的，把身体当作经验的器官。另一方面，知识独立存在，与实用无关。知识的来源和工具都存在于纯粹非物质的心灵，与人的精神和理想有关。不仅如此，经验经常意味着缺失，需求，欲望，经验永远无法自给自足。而理性知识自身是完整而全面的。因此，实际生活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而理性知识却和终极真理有关。

This sharp antithesis is connected with the fact that Athenian philosophy began as a criticism of custom and tradition as standards of knowledge and conduct. In a search for something to replace them, it hit upon reason as the only adequate guide of belief and activity. Since custom and tradition were identified with experience, it followed at once that reason was superior to experience. Moreover, experience, not content with its proper position of subordination, was the great foe to the acknowledgment

of the authority of reason. Since custom and traditionary beliefs held men in bondage, the struggle of reason for its legitimate supremacy could be won only by showing the inherently unstable and inadequate nature of experience.

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尖锐对立与以下事实有关：这就是雅典哲学始于对把传统习惯作为知识和行为标准的批判。在寻找替代这些标准的过程中，雅典哲学把理性作为信仰和行为的唯一引导者。由于传统习惯与经验等，理性就优于经验。而经验不甘心处于从属地位，因而成为承认理性权威的最大敌人。由于传统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在争取其合法优越地位的过程中，理性只有通过表明经验的不稳定、不充分特征才能获得胜利。

The statement of Plato that philosophers should be kings may best be understood as a statement that r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not habit, appetite, impulse, and emotion should regulate human affairs. The former secures unity, order, and law; the latter signify multiplicity and discord, irrational fluctuations from one estate to another.

当柏拉图说哲学家应该是国王之时，他的意思是应该用理性，而不是习惯、欲望、冲动或是感情来调节人的行为。理性可以确保统一，秩序和法律。而习惯、欲望、冲动和感情只能带来多样性和不和谐以及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不合理性的波动。

The ground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experience with the unsatisfactory condition of things, the state of affairs represented by rule of mere custom, are not far to seek. Increasing trade and travel,

colonizations, migrations and wars, had broadened the intellectual horizon. The customs and beliefs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were found to diverge sharply from one another. Civil disturbance had become a custom in Athens; the fortunes of the city seemed given over to strife of factions. The increase of leisure coinciding with the broadening of the horizon had brought into ken many new facts of nature and had stimulated curiosity and speculation. The situation tended to raise the question as to the existence of anything constant and universal in the realm of nature and society. Reason was the faculty by which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and essence is apprehended; while the senses were the organs of perceiving change,—the unstable and the diverse as against the permanent and uniform. The results of the work of the senses, preserved in memory and imagination, and applied in the skill given by habit, constituted experience.

把经验与不能令人满意的事物状态，或是仅由风俗习惯所代表的状态等同起来，其原因并不难找到。贸易和旅游的日益频繁，殖民地、移民、战争的不断增多扩展了人们的知识视野。不同社会的风俗习惯彼此很不相同。在雅典，内乱已经成为习惯。这座城市的财富似乎已经散落于帮派的纷争中。伴随着视野的扩展，人们的休闲时间也在增多。这些使得自然界的许多事实进入了人的知识范围，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和思想。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是否有永恒和普遍事物的存在。理性是人们理解普遍真理和事物本质的能力，而感官是认识变化的器官。后者是不稳定的、多样的，而前者是永恒的、不变的。感官工作的结果存在于记忆和想象之中，应用于由习惯所形成的技能，进而构成经验。

Experience at its best is thus represented in the various handicrafts—the arts of peace and war. The cobbler, the flute

player, the soldier, have undergone the discipline of experience to acquire the skill they have. This means that the bodily organs, particularly the senses, have had repeated contact with things and that the result of these contacts has been preserved and consolidated till ability in foresight and in practice had been secured. Such was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the term “empirical. " It suggested a knowledge and an ability not based upon insight into principles, but expressing the result of a large number of separate trials. It expressed the idea now conveyed by “method of trial and error,” with especial emphasis upon the more or less accidental character of the trials. So far as ability of control, of management, was concerned, it amounted to rule-of-thumb procedure, to routine. If new circumstances resembled the past, it might work well enough; in the degree in which they deviated, failure was likely. Even today to speak of a physician as an empiricist is to imply that he lacks scientific training, and that he is proceeding simply on the basis of what he happens to have got out of the chance medley of his past practice. Jus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science or reason in 'experience' it is hard to keep it at its poor best. The empiric easily degenerates into the quack. He does not know where his knowledge begins or leaves off, and so when he gets beyond routine conditions he begins to pretend—to make claims for which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and to trust to luck and to ability to impose upon others—to 'bluff. ' Moreover, he assumes that because he has learned one thing, he knows others—as the history of Athens showed that the common craftsmen thought they could manage household affairs, education, and politics, because they had learned to do the specific things of their trades. Experience is always hovering, then, on the edge of pretense, of sham, of seeming, and appearance, in distinction from the reality upon which reason lays hold.

最好的经验体现在各种技能之中，比如，民间工艺和军事技能。补鞋匠、吹笛者、士兵都要经过经验的训练才能获得技能。这就是说，人的身体器官，特别是感官，不断与事物接触，并且使接触的结果得以保存和巩固，直到获得预知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就是“经验”一词的本质含义。它指的不是建立在对原理深入理解上的知识和能力，而是经过多次尝试以后的结果，也就是表明现在的“尝试错误法”所包含的思想特别强调尝试的偶然性。就控制、管理能力而言，这种方法相当于常规方法。如果新旧情况类似，这种方法就行得通。如果新旧情况不同，很可能会失败。即使在今天，当我们谈论一个医生是经验主义者的时候，意思是他缺乏科学的训练，他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所依靠的仅仅是他从过去实践中所偶然获得的方法。正是由于“经验”缺乏科学和理性，所以它难以保持最佳状态。得自于经验的东西很容易变质为招摇行骗之术，就像那些江湖庸医一样。“这种医生根本不知道他的知识来自哪里，到哪里终止。当他碰到超越常规的情况时，就开始作假，做出毫无根据的判断，靠运气和欺骗吓唬人。”此外，他自认为对一件事一知半解就可融会贯通。在当年的雅典就有一些手工匠人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专门的行业技能，因而有能力管理家务，教育和政治。经验总是盘旋在自我陶醉、弄虚作假的边缘，而理性则是建立在刚性事实之上。

The philosophers soon reached certain generalizations from this state of affairs. The senses are connected with the appetites, with wants and desires. They lay hold not on the reality of things but on the relation which things have to our pleasures and pains, to the satisfaction of wants and the welfare of the body. They are important only for the life of the body, which is but a fixed substratum for a higher life. Experience thus has a definitely material character; it has to do with physical things in relation to the body. In contrast, reason, or science, lays hold of the immaterial, the ideal, the spiritual. There is something morally dangerous about experience, as such words as sensual, carnal,

material, worldly, interests suggest; while pure reason and spirit connote something morally praiseworthy. Moreover, ineradicable connection with the changing, the inexplicably shifting, and with the manifold, the diverse, clings to experience. Its material is inherently variable and untrustworthy. It is anarchic, because unstable. The man who trusts to experience does not know what he depends upon, since it changes from person to person, from day to day, to say nothing of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many,' with various particulars, has the same effect, and also carries conflict in its train.

哲学家很快对这种状态做出了一些概括。感官与嗜好、需求及欲望有关。它们不是掌控现实的事物，而是掌控着事物与我们苦乐之间的关系，掌控事物与满足自身需要和身体健康的关系。感官是重要的，只是基于身体的需要，身体才是享受精神生活的固定基础。因此，经验具有明确的物质性特征。它所关心的是物质世界和人的身体之间的关系。相反，理性或科学却掌握着人类非物质的理想和精神世界。从道德上讲，经验中有一些危险的东西，比如说暗含肉欲、好色、物质、世俗利益等；而纯粹的理性和精神却代表在道德上值得赞扬的东西。此外，经验总是与正在发生的改变、无法解释的变更、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经验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它是混乱且不可靠的。信赖经验的人不知道该依靠什么，因为经验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国家而异。经验与“众多”的情况有关联，和各种特殊情况也有关联，关联的结果都相同，因而带来不少冲突。

Only the single, the uniform, assures coherence and harmony. Out of experience come warrings, the conflict of opinions and acts within the individual and between individuals. From experience no standard of belief can issue, because it is the very nature of

experience to instigate all kinds of contrary beliefs, as varieties of local custom proved. Its logical outcome is that anything is good and true to the particular individual which his experience leads him to believe true and good at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Finally practice falls of necessity within experience. Doing proceeds from needs and aims at change. To produce or to make is to alter something; to consume is to alter. All the obnoxious characters of change and diversity thus attach themselves to doing while knowing is as permanent as its object. To know, to grasp a thing intellectually or theoretically, is to be out of the region of vicissitude, chance, and diversity. Truth has no lack; it is untouched by the perturbations of the world of sense. It deals with the eternal and the universal. And the world of experience can be brought under control, can be steadied and ordered, only through subjection to its law of reason.

只有单个的、一致的东西才能确保统一与和谐。经验会导致冲突，导致个人意见和行为的冲突以及个人之间意见和行为的冲突。从经验出发，就没有信仰标准可言，因为经验的本质就是激起各式相反的信仰，这已被不同的地方有不同风俗所证明。由此而得出的逻辑结果是，对于个人来说，任何事情都是好的、真实的，只要他的经验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告诉他，这是好的和真实的。最终，实践必然属于经验范围之内。实践从需要出发，目的在于产生变化。生产和制造某种东西就是要改变某种东西，消费某种东西也是要改变这种东西。变化和多样性的所有这些令人厌烦的特征于是和实践联系在一起，而认知则是实践的永恒目标。认知，即从智力上和理论上熟悉某个事物，就要摆脱变化、偶然性和多样性的约束。真理是没有缺陷的，它不受感官世界的干扰。真理是永恒的、普遍的。经验世界只有服从理性的规律，才能得到控制、变得稳定而有序。

It would not do, of course, to say that all these distinctions persisted in full technical definiteness. But they all of them profoundly influenced men's subsequent thinking and their ideas about education. The contempt for physical as compared with mathematical and logical science, for the senses and sense observation; the feeling that knowledge is high and worthy in the degree in which it deals with ideal symbols instead of with the concrete; the scorn of particulars except as they are deductively brought under a universal; the disregard for the body; the depreciation of arts and crafts as intellectual instrumentalities, all sought shelter and found sanction under this estimate of the respective values of experience and reason—or, what came to the same thing, of the practical and the intellectual. Medieval philosophy continued and reenforced the tradition. To know reality meant to be in relation to the supreme reality, or God, and to enjoy the eternal bliss of that relation. Contemplation of supreme reality was the ultimate end of man to which action is subordinate. Experience had to do with mundane, profane, and secular affairs, practically necessary indeed, but of little import in comparison with supernatural objects of knowledge. When we add to this motive the force derived from the literary character of the Roman education and the Greek philosophic tradition, and conjoin to them the preference for studies which obviously demarcated the aristocratic class from the lower classes, we can readily understand the tremendous power exercised by the persistent preference of the 'intellectual' over the 'practical' not simply in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but in the higher schools.

当然，不能说这些具有明确专门特性的区别仍然持续存在。但是这些区别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后来对于教育的思考和看法。轻视物理而重视数学和逻辑学；轻视感官和感官观察；认为有关理想符号而不是

具体事物的知识才是高尚和有价值的；鄙视特殊情况，除非它们始于普遍原理；鄙视身体；鄙视作为智力工具的艺术和工艺，凡此种种都是从对经验和理性、或是实用和理智各自价值的估量中寻求保护和支持的。中世纪哲学承袭并强化了这一传统。了解现实意味着与最高现实、或者上帝有联系，并且享受这种联系所带来的永恒快乐。对于最高现实的思考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与此相比，人的行为只处于从属地位。经验与世俗的日常事务有关，这些事物的确很有必要，但与超自然的知识对象相比，就显得无关紧要。罗马教育和希腊哲学传统向来偏重文学。当把从中获得的力量结合那些明显区分贵族阶级和下层阶级的科目偏爱现象，在教育哲学，乃至于在高等学校中，长期偏爱“智力”科目而轻视“实用”科目，我们很容易能够理解这种现象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2．The Modern Theory of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二、近代有关经验和认识的理论

As we shall see later,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tion as a method of knowledge makes possible and necessitates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ew just set forth. But before coming to that, we have to note the theory of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develope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general, it presents us with an almost complete reversal of the classic doctrine of the relations of experience and reason. To Plato experience meant habituation, 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net product of a lot of past chance trials. Reason meant the principle of reform, of progress, of increase of control. Devotion to the cause of reason meant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custom and getting at things as they really were. To the modern reformers, the situation was the other

way around. Reason, universal principles, a priori notions, meant either blank forms which had to be filled in by experience, by sense observations, in order to get significance and validity; or else were mere indurated prejudices dogmas imposed by authority, which masqueraded and found protection under august names. The great need was to break way from captivity to conceptions which, as Bacon put it, 'anticipated nature' and imposed merely human opinions upon her, and to resort to experience to find out what nature was like. Appeal to experience marked the breach with authority. It meant openness to new impressions; eagerness in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instead of absorption in tabulating and systematizing received ideas and 'proving' them by means of the relations they sustained to one another. It was the irruption into the mind of the things as they really were, free from the veil cast over them by preconceived ideas.

我们后面会讲到，实验作为一种认识的方法，它的发展有可能而且必然会对我们刚才提出的观点进行彻底改造。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提一下17世纪和18世纪有关经验和认识的理论。总的来说，这些理论几乎彻底颠覆了传统上有关经验和理性关系的经典阐释。对于柏拉图而言，经验意味着习惯的形成，或者是对过去偶然尝试的仅存结果的保留。理性意味着改革、进步和更强的控制。对理性的热衷意味着打破传统的束缚，去探究事物的真相。对于近代的改革家来说，情况却正好相反。理性、普遍原理和先验观念都是空白，等待经验和感官填充后才会有意义和效果，或者是一些顽固的偏见、权威强加的教条，用冠冕堂皇的名称，乔装打扮，借以保护。对于培根称作“期待自然”，即“人类意志强加于自然”的概念，人类需要摆脱对其的迷恋，要依靠经验去发现自然的本质。对经验的追求标志着同权威的决裂。这就意味着对新事物持有开放态度，热衷于发现和创新，而不是沉浸在对已有概念的排列和整理，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支持来证明这些概念。这就是探究事物的真实状态，揭开蒙在事物身

上先入为主的面纱。

The change was twofold. Experience lost the practical meaning which it had borne from the time of Plato. It ceased to mean ways of doing and being done to, and became a name for something intellectual and cognitive. It meant the apprehension of material which should ballast and check the exercise of reasoning. By the modern philosophic empiricist and by his opponent, experience has been looked upon just as a way of knowing. The only question was how good a way it is. The result was an even greater 'intellectualism' than is found in ancient philosophy, if that word be used to designate an emphatic and almost exclusive interest in knowledge in its isolation. Practice was not so much subordinated to knowledge as treated as a kind of tag-end or aftermath of knowledge. The educational result was only to confirm the exclusion of active pursuits from the school, save as they might be brought in for purely utilitarian ends—the acquisition by drill of certain habits.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interest in experience as a means of basing truth upon objects, upon nature, led to looking at the mind as purely receptive. The more passive the mind is, the more truly objects will impress themselves upon it. For the mind to take a hand, so to speak, would be for it in the very process of knowing to vitiate true knowledge—to defeat its own purpose. The ideal was a maximum of receptivity. Since the impressions made upon the mind by objects were generally termed sensations, empiricism thus became a doctrine of sensationalism—that is to say, a doctrine which identified knowledge with the reception and association of sensory impressions. In John Locke,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the empiricists, we find this sensationalism mitigated by a recognition of certain mental faculties, like discernment or discrimination, comparison, abstraction, and generalization which

work up the material of sense into definite and organized forms and which even evolve new ideas on their own account, such a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ions of morals and mathematics. (See ante, p. 71.) But some of his successors, especially in France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rried his doctrine to the limit; they regarded discernment and judgment as peculiar sensations made in us by the conjoint presence of other sensations. Locke had held that the mind is a blank piece of paper, or a wax tablet with nothing engraved on it at birth (a tabula rasa) so far as any contents of ideas were concerned, but had endowed it with activities to be exercised upon the material received. His French successors razed away the powers and derived them also from impressions received.

经验的变化是两方面的。第一，经验失去了它在柏拉图时代就包含的实用意义，不再指行动和受行动影响的途径，而成为具有智力和认知意义的代名词。经验指能感悟阻碍推理实施的材料。近代哲学中的经验主义者和他们的反对者都把经验看作是一种认知的途径。唯一的问题是这种途径到底有多么好。如果用一个词指代对孤立的知识所特有的浓厚兴趣，结果是产生了比古代哲学中更伟大的“唯理论”。实践与其说从属于知识，不如说是知识的尾巴或副产品。教育的结果只是把积极活动排除在学校之外，除非这些活动是出自完全功利的目的，即通过练习获得某种习惯。第二，对经验感兴趣，把经验视为在实物和自然基础之上建立真理的手段，致使人们认为心灵是纯粹的接收器。他们认为，心灵越被动，实物就越能真实地反映在心灵之上。因此，心灵如果太主动，在求知的过程中就会损害真相，而不能达到求知的目的。理想的状态是让心灵成为最大接收器。由于通过实物对心灵产生的印象通常被称作感知，经验主义就变成了感知主义，也就是把知识与感觉印象的接受和重构一体化。约翰•洛克是最有影响的经验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感知主义的地位有所削弱，因为他承认某些心理能力的存在，比如辨别、比较、抽象和概括等能力。这些能力把感知的材料加工成特定的、有组织的形式。它们甚至

可以演变成新的观念，例如道德和数学中的基本概念。（参见原书61页）但是洛克的一些继承者，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的法国，把他的理论发挥到了极端。他们认为，辨别力和判断力是特别的感觉，是由其他感觉组合而成的。洛克认为，就观点的内容而言，人的心灵最初好像是一张白纸或是一块没有雕琢的蜡片，但它本身具有活动能力，能对所刻印的材料产生影响。洛克的法国后辈却抹杀了这些能力，认为这些能力也来自于所接受的对象。

As we have earlier noted, this notion was fostered by the new interest in education as method of social reform. (See ante, p. 108.) The emptier the mind to begin with, the more it may be made anything we wish by bringing the right influences to bear upon it. Thus Helvetius, perhaps the most extreme and consistent sensationalist, proclaimed that education could do anything—that it was omnipotent. Within the sphere of school instruction, empiricism found its directly beneficial office in protesting against mere book learning. If knowledge comes from the impressions made upon us by natural objects, it is impossible to procure knowledge without the use of objects which impress the mind. Words, all kinds of linguistic symbols, in the lack of prior presentations of objects with which they may be associated, convey nothing but sensations of their own shape and color—certainly not a very instructive kind of knowledge. Sensationalism was an extremely handy weapon with which to combat doctrines and opinions resting wholly upon tradition and authority. With respect to all of them, it set up a test: Where are the real objects from which these ideas and beliefs are received? If such objects could not be produced, ideas were explained as the result of false associations and combinations. Empiricism also insisted upon a first-hand element. The impression must be made upon me, upon my mind. The further we get away from this direct, firsthand source of knowledge, the more numerous

the sources of error, and the vaguer the resulting idea.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种观点是把教育当作社会改革的手段来促进感知主义的思想发展（参见原书93页）。在开始时，心灵越是一无所有，就越容易通过施加适当的影响塑造成我们所期望的样子，爱尔维修是最极端和最始终如一的感知主义者。他曾宣称，教育可以做任何事情——教育是无所不能的。在学校教育中，在反对仅仅学习书本知识方面，经验主义发挥了直接有益的作用。他们认为，如果我们的知识来源于自然界的实物留给我们的印象，那么不利用这些实物，我们就无法获得知识。如果不与它们所呈现的事物联系起来，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和一切语言符号将仅能表达无教育知识的自身形状和颜色，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感知主义是反对完全依赖于传统和权威的学说和意见的最便利武器。对于这些学说和意见，感知主义设计了一个测验：使大家接受这些观点和信念的真正实物在何处？如果不能给出这些实物，观念就是错误的联想和结合产生的结果。经验主义还坚持第一手资料。印象必须作用于我，作用于我的心灵。我们离第一手的知识越远，谬误信息就越多，形成的观念就越模糊。

As might be expected, however, the philosophy was weak upon the positive side. Of course, the value of natural objects and first-hand acquaintance was not dependent upon the truth of the theory. Introduced into the schools they would do their work, even if the sensational theory about the way in which they did it was quite wrong. So far, there is nothing to complain of. But the emphasis upon sensationalism also operated to influence the way in which natural objects were employed, and to prevent full good being got from them. “Object lessons” tended to isolate the mere sense-activity and make it an end in itself. The more isolated the object, the more isolated the sensory quality, the more distinct the sense-impression as a unit of knowledge. The theory worked not only in

the direction of this mechanical isolation, which tended to reduce instruction to a kind of physical gymnastic of the sense-organs (good like any gymnastic of bodily organs, but not more so), but also to the neglect of thinking.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there was no need of thinking in connection with sense-observation; in fact, in strict theory such thinking would be impossible till afterwards, for thinking consisted simply in combining and separating sensory units which had been received without any participation of judgment.

但是，正如所预期的一样，哲学在积极方面的力量是渺小的。当然，自然实物的价值和第一手知识并不取决于理论的真实性。即使有关实物和第一手知识如何起作用的感知理论有错误，但是将自然实物和第一手知识引进学校仍然大有用处。到目前为止，这一理论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对感知主义的强调也影响了人们利用自然实物的方式，导致它们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直观教学”通常把感官活动孤立起来，并且把它作为教学的目的。实物越孤立，感知的性质越孤立，感知印象作为知识的单位也就越清晰。该教学理论不仅使教学朝着机械孤立的方向发展，使教学沦为一种感觉器官的运动（也就是身体器官的运动，但不过如此），而且忽视了对思维的训练。根据这个理论，感官观察无需和思维发生联系。事实上，按严格的理论，思维只有在感官观察之后才可能发生，因为思维的作用在于合并和区分所接受的感知信息，而不必进行任何判断。

As a matter of fact, accordingly, practically no scheme of education upon a purely sensory basis has ever been systematically tried, at least after the early years of infancy. Its obvious deficiencies have caused it to be resorted to simply for filling in 'rationalistic' knowledge (that is to say, knowledge of definitions, rules, classifications, and modes of application conveyed through symbols), and as a device for lending greater 'interest' to barren

symbols.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serious defects of sensationalistic empiricism as a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knowledge.

实际上，还没有任何以纯粹的感觉为基础的教育计划被系统地尝试过，至少在婴儿期之后没有。这种教育计划明显的缺陷是：它只用来灌输“理性”知识（也就是说，用符号所表达的有关定义、规则、分类和应用模式的知识），并作为赋予抽象符号更多“兴趣”的工具。作为认知性教育哲学的感知主义经验论存在至少三个严重的缺陷。

(a)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theory was critical; it was a dissolvent of current beliefs about the worl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t was a destructive organ of criticism of hard and fast dogmas. But the work of education is constructive, not critical. It assumes not old beliefs to be eliminated and revised, but the need of building up new experience into intellectual habitudes as correct as possible from the start. Sensationalism is highly unfitted for this constructive task. Mind, understanding, denotes responsiveness to meanings (Ante, p. 35), not response to direct physical stimuli. And meaning exists only with reference to a context, which is excluded by any scheme which identifies knowledge with a combination of sense-impressions. The theory, so far as educationally applied, led either to a magnification of mere physical excitations or else to a mere heaping up of isolated objects and qualities.

（1）这个理论的历史价值在于其批判性。它溶解了当前关于世界和政治制度信仰的，批判了僵化的教条主义。但是，教育的作用应当是建设性的，而非批判性的。教育并没有剔除和修正旧观念的作用，而是需要从一开始就尽可能正确地把新经验建设成理智的习惯。感知主义不适合这种建设性的工作。心灵和理解力是对意义的反应

（参见原书29页），而不是对物质刺激的直接反应。意义只存在于事物的前后关联中，任何把知识和感觉印象的结合等同起来的做法都排除了这种关联。就其在教育上的应用而言，这个理论或者导致对物质刺激作用的夸大，或者导致形成彼此孤立的事物及其特征的堆积。

(b) While direct impression has the advantage of being first hand, it also has the disadvantage of being limited in range. Direct acquaintance with the natural surroundings of the home environment so as to give reality to ideas about portions of the earth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senses, and as a means of arousing intellectual curiosity, is one thing. As an end-all and be-all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t is fatally restricted. In precisely analogous fashion, beans, shoe pegs, and counters may be helpful aids to a realization of numerical relations, but when employed except as aids to thought—the apprehension of meaning—they become an obstacle to the growth of arithmetical understanding. They arrest growth on a low plane, the plane of specific physical symbols. Just as the race developed especial symbols as tools of calculation and mathematical reasonings, because the use of the fingers as numerical symbols got in the way, so the individual must progress from concrete to abstract symbols—that is, symbols whose meaning is realized only through conceptual thinking. And undue absorption at the outset in the physical object of sense hampers this growth.

（2）直接印象的优势在于它是第一手的，但其劣势在于范围有限。直接接触家庭周围自然环境，以便能描绘出自己感官所不能及的地球那部分，并把之作为激起智力好奇心的手段，这是一方面。但是如果把这当作地理知识的全部知识，那是非常有限的。打个比方，豆子、鞋钉和柜台对了解数量关系可能是有用的辅助，但是如果不是用

来辅助思维，理解意义，它们就会有碍提高数学理解力。这些东西往往使儿童的数学理解力局限于具体物质符号的低水平。正如族群发明特殊符号作为计算和数学推理的工具，是源于手指作为计量符号的局限，个人也必须从使用具体符号发展到使用只有通过概念思维才能理解其意义的抽象符号。刚开始时，对于过多地关注实物只会阻碍这一发展。

(c) A thoroughly false psychology of mental development underlay sensationalistic empiricism. Experience is in truth a matter of activities, instinctive and impulsive, in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ings. What even an infant 'experiences' is not a passively received quality impressed by an object, but the effect which some activity of handling, throwing, pounding, tearing, etc. , has upon an object, and the consequent effect of the object upon the direction of activities. (See ante, p. 164.) Fundamentally (as we shall see in more detail), the ancient notion of experience as a practical matter is truer to fact than the modern notion of it as a mode of knowing by means of sensations. The neglect of the deep-seated active and motor factors of experience is a fatal defect of the traditional empirical philosophy. Nothing is more uninteresting and mechanical than a scheme of object lessons which ignores and as far as may be excludes the natural tendency to learn about the qualities of objects by the uses to which they are put through trying to do something with them.

（3）感知主义经验论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关于心理发展的心理学基础之上的。经验实际上就是本能的冲动行为与事物的相互作用。即使是一个婴儿，他的“经验”也不是被动接受有印象的事物的特征，而是来自他的一些行为，比如拿捏、投掷、敲打、撕扯等对实物产生的影响，以及实物对这些行为走向产生的影响（参见原书140页）。

总的来说（后面我们会详细谈到），相比于近代把经验当作基于感觉的一种认知方式，古代把经验当作实际事物的观念更加符合事实。对经验根深蒂固的主动因素和运动因素的忽视，是传统经验哲学的致命缺陷。通过直观教学法学习实物的特征是自然趋势，但是如果该教学计划忽视甚至排除了这一自然趋势，那就过于乏味和机械。

It is obvious, accordingly, that even if the philosophy of experience represented by modern empiricism had received more general theoretical assent than has been accorded to it, it could not have furnished a satisfactory philosophy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Its educational influence was confined to injecting a new factor into the older curriculum, with incidental modifications of the older studies and methods. It introduced greater regard for observation of things directly and through pictures and graphic descriptions, and it reduced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verbal symbolization. But its own scope was so meager that it required supplementation by information concerning matters outside of sense-perception and by matters which appealed more directly to thought. Consequently it left unimpaired the scope of informational and abstract, or 'rationalistic' studies.

显然，即使以近代经验主义为代表的经验哲学得到比过去更多的称赞，它也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关于学习过程的哲学。经验主义对教育的影响仅仅局限在给旧的教学大纲注入一种新因素，偶尔改变一下旧的科目和方法。它强调对事物的直接观察，强调图画或图表的描述，却降低了口头形象化的重要性。但是它本身的范围却很狭小，需要补充感知以外的事物和直接诉诸于思维的事物信息。因此，它并没有削弱知识性，抽象性或是“理性”知识的范围。

3．Experience as Experimentation.

三、经验即实验

It has already been intimated that sensational empiricism represents neither the idea of experience justified by modern psychology nor the idea of knowledge suggested by modern scientific procedure. With respect to the former, it omits the primary position of active response which puts things to use and which learns about them through discovering the consequences that result from use. It would seem as if five minutes' unprejudiced observation of the way an infant gains knowledge would have sufficed to overthrow the notion that he is passively engaged in receiving impressions of isolated ready-made qualities of sound, color, hardness, etc. For it would be seen that the infant reacts to stimuli by activities of handling, reaching, etc. , in order to see what results follow upon motor response to a sensory stimulation; it would be seen that what is learned are not isolated qualities, but the behavior which may be expected from a thing, and the changes in things and persons which an activity may be expected to produce. In other words, what he learns are connections. Even such qualities as red color, sound of a high pitch, have to be discriminated and identified on the basis of the activities they call forth and the consequences these activities effect. We learn what things are hard and what are soft by finding out through active experimentation what they respectively will do and what can be done and what cannot be done with them. In like fashion, children learn about persons by finding out what responsive activities these persons exact and what these persons will do in reply to the children's activiti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what things do to us

(not in impressing qualities on a passive mind) in modifying our actions, furthering some of them and resisting and checking others, and what we can do to them in producing new changes constitutes experience. The methods of science by which the revolution in our knowledge of the world dating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as brought about, teach the same lesson. For these methods are nothing but experimentation carried out under conditions of deliberate control. To the Greek, it seemed absurd that such an activity as, say, the cobbler punching holes in leather, or using wax and needle and thread, could give an adequat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It seemed almost axiomatic that for true knowledge we must have recourse to concepts coming from a reason above experience. Bu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signified precisely that such operations, carried on under conditions of control, are just the ways in which fruitful ideas about nature are obtained and tested. In other words, it is only needed to conduct such an operation as the pouring of an acid on a metal for the purpose of getting knowledge, instead of for the purpose of getting a trade result, in order to lay hold of the principle upon which the science of nature was henceforth to depend. Sense perceptions were indeed indispensable, but there was less reliance upon sense perceptions in their natural or customary form than in the older science. They were no longer regarded as containing within themselves some 'form' or 'species' of universal kind in a disguised mask of sense which could be stripped off by rational thought. On the contrary, the first thing was to alter and extend the data of sense perception: to act upon the given objects of sense by the lens of the telescope and microscope, and by all sorts of experimental devices. To accomplish this in a way which would arouse new ideas (hypotheses, theories) required even more general ideas (like those of mathematics) than were at the command of ancient science. But these general conceptions were no longer taken to give knowledge

in themselves. They were implements for instituting, conducting, interpreting experimental inquiries and formulating their results.

经验主义感知论既不代表近代心理学认为正确的经验观念，也不代表近代科学方法所提出的知识观念，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就前者来说，它忽略了积极反应的主要作用。人通过积极反应来使用事物，并通过探究使用后的结果来发现有关事物的知识。只需要用五分钟去客观观察婴儿获取知识的方式，就足以推翻以下观点：即认为婴儿是被动接受诸如声音、颜色、坚硬等孤立的现存特征留给他们的印象。很明显，婴儿是通过拿捏、伸手等行为对刺激做出反应，以便看到对刺激行为的反应会产生什么结果。很明显，婴儿所学并不是孤立的特征，而是期待发生在某一事物上的行为，以及受某行为影响所导致的事物和人的变化。也就是说，儿童学习的是种种关联。即使是像红色、高音这些特征，也必须基于它们所引起的行为和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才能进行辨别和确认。我们是通过主动实验，即发现这些东西能做什么，能利用它们做什么，不能利用它们做什么，才知道什么是坚硬的，什么是柔软的。同样，儿童要了解人，也需要发现他们会要求做出怎样的反应，特别会对儿童行为有何反应。事物在改变着我们的行为（而不是把其特性铭刻在我们被动的心灵上），对其中的某些行为予以支持，对另外的一些予以制止和抵制；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做事带来的新变化。这两者的结合就构成经验。自从17世纪以来，科学方法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也给了我们同样的教训，因为这些方法只不过是在深思熟虑的控制下所进行的实验。对希腊人来说，鞋匠只是通过在皮革上打孔，或者是使用蜡、针线等活动就能对世界有全面的了解，这似乎很荒谬。必须依靠处于经验之上的理性概念来获得真正的知识，这似乎是一种公理。但是所引入的实验方法明确表明，通过控制条件下所进行的实验正是获得和检验自然的丰硕知识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为了掌握自然科学所依靠的原理，为了获取知识，而非为了获得商业利益，只需要进行一次类似把酸液倒在金属上的实验就可以了。感性知觉不可缺少，但与从前的科学相比，现在已经不那么依赖对自然或习惯性形式的感性知觉。感性

知觉自身已不再被视为感觉的伪装下包含某种普遍性质的“形式”或“种类”，理性的思维可以剥去这层伪装。相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去改变和拓展感性知觉的资料：用望远镜和显微镜以及各种实验设备去影响特定的感官对象。要用唤起新观念（假设、理论）的方法要达到这个目的，甚至比古代科学需要更多的普遍观念（如数学观念）。但这些普遍观念本身不能再给我们提供新知识。它们只是建立、进行、解释实验研究和形成实验结果的工具。

The logical outcome is a new philosophy of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a philosophy which no longer puts experience in opposition to rational 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Experience is no longer a mere summarizing of what has been done in a more or less chance way in the past; it is a deliberate control of what is done with reference to making what happens to us and what we do to things as fertile as possible of suggestions (of suggested meanings) and a means for trying out the validity of the suggestions. When trying, or experimenting, ceases to be blinded by impulse or custom, when it is guided by an aim and conducted by measure and method, it becomes reasonable—rational. When what we suffer from things, what we undergo at their hands, ceases to be a matter of chance circumstance, when it is transformed into a consequence of our own prior purposive endeavors, it becomes rationally significant—enlightening and instructive. The antithesis of empiricism and rationalism loses the support of the human situation which once gave it meaning and relative justification.

由此产生的逻辑结果就是一种关于经验和知识的新哲学，这种哲学不再把经验与理性知识和理性解释对立起来。经验不再仅仅是对我们过去用偶然方法所做之事的总结，而是对我们所做之事一种有意的控制，使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和我们所做的事情尽可能具有暗示

的含义，同时又是检验这些暗示效度的手段。当尝试或实验不再被冲动和习惯所蒙蔽，当它受到目标的指引并伴之以恰当的措施和方法时，它就会变得合乎理性。当我们因之而蒙受的结果不再纯属偶然，当这种结果转换成我们先前有意为之的结果时，它就变得特别合理，特别具有启发意义和教育意义。人们曾经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予以辩护和支持，而今他们对二者的对立不再有任何的热情。

The bearing of this change upon the opposition of purely practical and purely intellectual studies is self-evident. The distinction is not intrinsic but is dependent upon conditions, and upon conditions which can be regulated. Practical activities may be intellectually narrow and trivial; they will be so in so far as they are routine, carried on under the dictates of authority, and having in view merely some external result. But childhood and youth, the period of schooling, is just the time when it is possible to carry them on in a different spirit. It is inexpedient to repeat the discussions of our previous chapters on thinking and on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ve subject matter from childlike work and play to logically organized subject matter. The discussions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prior one should, however, give an added meaning to those results.

这种变化对纯粹实用科目和纯粹知识科目对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两类科目的对立不是内在的，而是有条件的，而条件是可以调节的。实践活动在知识方面可能是狭隘的和琐碎的；只要实践活动是常规性的，在权威命令下进行的，并且只具有一些外部目的，它们就一直会是这样。但是青少年时期是应该受教育的时期，这正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开展实践活动的时期。在此重复前几章讨论过的有关思维、有关教材怎样从儿童的活动和游戏演进到逻辑上严密组织的教育主题，这显然不妥。然而，本章和前一章的讨论应该会给讨论的结果增

添某些意义。

(i) Experience itself primarily consists of the active relations subsisting between a human being and his natural and social surroundings. In some cases, the initiative in activity is on the side of the environment; the human being undergoes or suffers certain checkings and deflections of endeavors. In other cases, the behavior of surrounding things and persons carries to a successful issue the active tendencies of the individual, so that in the end what the individual undergoes are consequences which he has himself tried to produce. In just the degree in which connections are established between what happens to a person and what he does in response, and between what he does to his environment and what it does in response to him, his acts and the things about him acquire meaning. He learns to understand both himself and the world of men and things. Purposive education or schooling should present such an environment that this interaction will effect acquisition of those meanings which are so important that they become, in turn, instruments of further learnings. (Ante, Ch. XI.) As has been repeatedly pointed out, activity out of school is carried on under conditions which have not been deliberately adapted to promoting the function of understanding and formation of effective intellectual dispositions. The results are vital and genuine as far as they go, but they are limited by all kinds of circumstances. Some powers are left quite undeveloped and undirected; others get only occasional and whimsical stimulations; others are formed into habits of a routine skill at the expense of aims and resourceful initiative and inventiveness. It is not the business of the school to transport youth from an environment of activity into one of cramped study of the records of other men's learning; but to transport them from an environment of relatively chance activities (accidental in the

relation they bear to insight and thought) into one of activities selected with reference to guidance of learning. A slight inspection of the improved methods which have already shown themselves effective in education will reveal that they have laid hold, more or less consciously, upon the fact that 'intellectual' studies instead of being opposed to active pursuits represent an intellectualizing of practical pursuits. It remains to grasp the principle with greater firmness.

1．经验本身存在于人类和他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的主动关系中。在某些情况下，人类行为的积极与否与环境有关；有时候人类的努力会受到阻碍或产生偏离。在另一些情况下，周围的事物和人使得个人的积极性得到成功的实现。最后，这个人所经历的结果与他努力得到的结果不谋而合。发生在某人身上的事和他所做出的反应之间就有了关联。他对他的环境所做的事和环境的反应之间也有了关联，正是如此，他的行为和周围有关他的事物才获得了意义。他不但了解了自己，还了解到了其他人和事物。有目的的教育或学校教育应该提供这样一种环境，使这种相互作用获得意义。这些如此重要的意义会变成我们进一步学习的工具。（参见11章）正如前面多次提到的，校外活动经常是在不适合促进了解和形成有效智力开发的情况下进行的。校外活动的结果在其所能达到的范围内是重要的和真实的，但它们受到各种情况的制约。学生的有些能力并没有得到开发和引导；有些能力只得到偶尔的而非正常的刺激；其他能力被培养成了习惯性技能，而丧失了明确的目的，丧失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学校的任务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而是把他们从一个相对来说偶然的活动环境（即与领悟、思维的关系是偶然的）带入一个根据学习需要选择活动的环境。这种改进后的方法已被证明在教育中是有效的。只要稍微检验一下这些方法，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或多或少都有意识地掌握了这个事实，那就是，“知识”科目非但不与积极活动相对立，而且体现了对实用活动的知识化。我们需要坚定地支持这一原则。

(ii) The changes which are taking place in the content of social life tremendously facilitate selection of the sort of activities which will intellectualize the play and work of the school. When one bears in mi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Greeks and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Ages, where such practical activities as could be successfully carried on were mostly of a routine and external sort and even servile in nature, one is not surprised that educators turned their back upon them as unfitted to cultivate intelligence. But now that even the occupations of the household,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ing as well as transportation and intercourse are instinct with applied science, the case stands otherwise. It is true that many of those who now engage in them are not aware of the intellectual content upon which their personal actions depend. But this fact only gives an added reason why schooling should use these pursuits so as to enable the coming generation to acquire a comprehension now too generally lacking, and thus enable persons to carry on their pursuits intelligently instead of blindly.

2．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的变化非常有利于选择促进学校游戏和课业知识化的活动。试想一下古希腊和中世纪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当时进行的实践活动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呆板的，流于表面的或是奴役性的。于是，当听到有教育家对那时的活动嗤之以鼻，认为不适合智力的培养时，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家政业、农业、制造业、运输和社交公关这些行业都充满着应用科学。然而，许多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并不了解他们的工作具有的知识含量。但是，这个事实只给了我们另一个理由，说明学校教育应该利用这些活动使未来一代能够获得我们现在所普遍缺乏的理解力，使人们能够明智地而非盲目地坚持自我追求。

(iii) The most direct blow at the traditional separation of doing

and knowing and at the traditional prestige of purely 'intellectual' studies, however, has been given by the progress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If this progress has demonstrated anything, it is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genuine knowledge and fruitful understanding except as the offspring of doing. The analysis and rearrangement of facts which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and power of explanation and right classification cannot be attained purely mentally—just inside the head. Men have to do something to the things when they wish to find out something; they have to alter conditions. This is the lesson of the laboratory method, and the lesson which all education has to learn. The laboratory is a discovery of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labor may become intellectually fruitful and not merely externally productive. If, in too many cases at present, it results only in the acquisition of an additional mode of technical skill, that is because it still remains too largely but an isolated resource, not resorted to until pupils are mostly too old to get the full advantage of it, and even then is surrounded by other studies where traditional methods isolate intellect from activity.

3．实验科学的进步对传统的知与行的分离以及只重视“知识”科目的做法给予了最直接的打击。如果问这一进步能够说明什么，那就是，除非亲自实践，否则不可能有效地理解真正的知识。对事实的分析和重组对于知识和理解力的增长、正确分类能力的提高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分析和重组能力不可能纯粹地体现在心智方面，也即在大脑之内实现。人类要有所发现，就必须行动起来，改变事物存在的条件。这就是实验室方法给我们的启示，所有的教育都应该遵循这一启示。在实验室就是去发现各种条件，使得劳动不仅在外表看来是多产的，而且具有丰硕的智力成果。如果实验室方法只不过是使人获得了一些额外技能（像当今大多数情况一样），这是因为实验室只不过是一种孤立的资源，直到学生年龄足够大，能够充分利用它时才去

利用。甚至到这时，学生还被其他许多把智力与实践活动相分离的传统科目所包围。

Summary.

总结

The Greeks were induced to philosophize by the increasing failure of their traditional customs and beliefs to regulate life. Thus they were led to criticize custom adversely and to look for some other source of authority in life and belief. Since they desired a rational standard for the latter, and had identified with experience the customs which had proved unsatisfactory supports, they were led to a flat opposition of reason and experience. The more the former was exalted, the more the latter was depreciated. Since experience was identified with what men do and suffer in particular and changing situations of life, doing shared in the philosophic depreciation. This influence fell in with many others to magnify, in higher education, all the methods and topics which involved the least use of sense-observation and bodily activity. The modern age began with a revolt against this point of view, with an appeal to experience, and an attack upon so-called purely rational concepts on the ground that they either needed to be ballasted by the results of concrete experiences, or else were mere expressions of prejudice and institutionalized class interest, calling themselves rational for protection. But various circumstances led to considering experience as pure cognition, leaving out of account its intrinsic active and emotional phases, and to identifying it with a passive reception of isolated 'sensations. ' Hence the educational reform effected by the

new theory was confined mainly to doing away with some of the bookishness of prior methods; it did not accomplish a consistent reorganization.

由于越来越无法利用传统习惯和信仰调节生活，希腊人便被诱导去进行哲学研究。于是，有人引导他们批评传统，寻求生活和信仰权威的一些其他来源。由于希腊人盼望生活和信仰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并且把很少有人支持的习俗等同于经验，他们就倾向于把理性和经验截然对立起来。理性被抬得越高，经验就贬得越低。由于把经验等同于人们在特定和变化的生活环境中的所作所为和所受之苦，做事情在哲学上遭到贬低。在高等教育中，这一影响，和其他势力一起，抬高了那些主张尽量少地利用感官观察和身体活动的方法和话题。近代教育始于对这种观点的反对。近代教育诉诸经验，攻击所谓纯粹的理性概念，理由是这些理性概念要么需要以具体经验结果为基础，要么就是偏见和制度化阶级利益的表现，自称合理，要求得到保护。但是，各种情况使人们把经验视为纯粹的认知，而忽略了经验本身所固有的主动的和情感的方面，并把经验与被动接受孤立的“感觉”相提并论。因此，新理论所引起的教育改革主要局限于消除旧教学法偏重书本知识的缺点，并没有完成彻底的改造。

Meantime, the advance of psychology, of industrial methods, and of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in science makes another conception of experience explicitly desirable and possible. This theory reinstates the idea of the ancients that experience is primarily practical, not cognitive—a matter of doing and undergoing the consequences of doing. But the ancient theory is transformed by realizing that doing may be directed so as to take up into its own content all which thought suggests, and so as to result in securely tested knowledge. 'Experience' then ceases to be empirical and becomes experimental. Reason ceases to be a remote

and ideal faculty, and signifies all the resources by which activity is made fruitful in meaning. Educationally, this change denotes such a plan for the studies and method of instruction as has been developed in the previous chapters.

同时，心理学的进步，产业方法的改善以及科学研究中实验方法的发展使经验的另一概念明显可取而且具有可能性。该理论重申了古人的观点，认为经验主要是实际的，而不是认知的。经验就是行动以及承受行动所产生的结果。但是该古代理论经过改造，认识到行动可以受思维支配，接受思维所提出的一切建议，形成经过检验的牢固知识。这样的“经验”就不再是经验性的，而成为实验性的。理性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能力，而代表了使行为富有意义的一切资源。从教育上说，这个变化表明了前几章所阐述的有关科目和教学方法的计划。

Chapter 21 Physical and Social Studies: Naturalism and Humanism

第二十一章　自然科目与社会科目：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

Allusion as already been made to the conflict of natural science with literary studies for a place in the curriculum. The solution thus far reached consists essentially in a somewhat mechanical compromise whereby the field is divided between studies having nature and studies having man as their theme. The situation thus presents us with another instance of the external adjustment of educational values, and focuses attention up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nnection of nature with human affairs. In general,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educational division finds a reflection in the dualistic philosophies. Mind and the world are regarded as two independent realms of existence having certain points of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t is natural that each sphere of existence should have its own separate group of studies connected with it; it is even natural that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studies should be viewed with suspicion as marking a tendency of materialistic philosophy to encroach upon the domain of spirit. Any theory of education which contemplates a more unified scheme of education than now exists is under the necessity of facing the question of the relation of man to nature.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课程中为争夺地位发生的冲突。至今所采取解决的办法主要是某种机械性妥协，即把教育划分为自然科目和人文科目。这种情况为我们从外部调整教育价值观念提供另一个案例，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自然和人文相联系的哲学上。总的来讲，教育上的划分在二元论哲学中有所体现。精神世界和

物质世界被视为两个独立的存在领域，彼此又有某种联系。根据这个观点，每个现存领域都有与自身相联系的独立科目，这是很自然的，甚至用怀疑观点看待自然科学的发展，视其为唯物主义哲学对精神领域的侵犯，这也是自然的。任何教育理论要想制定一个比现在教育更为统一的计划，必须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1．The Historic Background of Humanistic Study.

一、人文主义研究的历史背景

It is noteworthy that classic Greek philosophy does not present the problem in its modern form. Socrates indeed appears to have thought that science of nature was not attainable and not very important. The chief thing to know is the nature and end of man. Upon that knowledge hangs all that is of deep significance—all moral and social achievement. Plato, however, makes right knowledge of man and society depend upon knowledge of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nature. His chief treatise, entitled the Republic, is at once a treatise on morals, on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on the metaphysics and science of nature. Since he accepts the Socratic doctrine that right achievement in the former depends upon rational knowledge, he is compelled to discuss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Since he accepts the idea that the ultimate object of knowledge is the discovery of the good or end of man, and is discontented with the Socratic conviction that all we know is our own ignorance, he connects the discussion of the good of man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essential good or end of nature itself. To attempt to determine the end of man apart from a knowledge of the ruling end which gives law and unity to nature is impossible. It is

thus quite consistent with his philosophy that he subordinates literary studies (under the name of music) to mathematics and to physics as well as to logic and metaphysics. But on the other hand, knowledge of nature is not an end in itself; it is a necessary stage in bringing the mind to a realization of the supreme purpose of existence as the law of human action, corporate and individual. To use the modern phraseology, naturalistic studies are indispensable, but they are in the interests of humanistic and ideal ends.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古典哲学并没有以现代的形式提出这个问题。事实上，苏格拉底认为，自然科学是无法触及的，也是不太重要的。我们要认识的主要是人的本性和归宿。一切具有深刻意义的道德和社会的成就都基于这种认识。但是，柏拉图认为，对于人和社会的正确认识依赖于对自然本质特征的认识。他的主要著作《理想国》同时论述了道德，社会组织，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既然柏拉图接受苏格拉底关于以往正确的成就都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学说，他就不得不讨论知识的本性问题。柏拉图接受知识的最终目标在于发现人之善或人之归宿这一思想，而又不满足于苏格拉底所称我们所知就是自己无知的观点。于是，他便把人之善的讨论与自然自身的善或归宿联系起来。柏拉图认识到，如果离开给予大自然法则和统一的主宰归宿的知识，要想决定人的归宿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以音乐的名义把文学课排在数学，物理以及逻辑和形而上学之后，这是和他的哲学一致的。但是，另一方面，对自然的认识本身不是终结。自然是认识人类（集体和个人）行为准则存在意义的必经阶段。用现代术语来说，自然科学的科目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们又是为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服务的。

Aristotle goes even farther, if anything, in the direction of naturalistic studies. He subordinates (Ante, p. 298) civic relations to the purely cognitive life. The highest end of man is not human but

divine—participation in pure knowing which constitutes the divine life. Such knowing deals with what is universal and necessary, and finds, therefore, a more adequate subject matter in nature at its best than in the transient things of man. If we take what the philosophers stood for in Greek life, rather than the details of what they say, we might summarize by saying that the Greeks were too much interested in free inquiry into natural fact and in the aesthetic enjoyment of nature, and were too deeply conscious of the extent in which society is rooted in nature and subject to its laws, to think of bringing man and nature into conflict. Two factors conspire in the later period of ancient life, however, to exalt literary and humanistic studies. One is the increasingly reminiscent and borrowed character of culture; the other is the political and rhetorical bent of Roman life.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亚里士多德在自然科学方面走得更远一些。他把公民关系隶属于纯粹的认知生活之下（参见原书第254页）。他认为，人的最高目标是神圣的事业而不是人间琐事，所谓神圣事业就是认识神圣生活构成的要素。这种认识关系到什么是普遍的和必然的。因此，我们需要在处于最佳状态的自然界而不是在人类短暂的历史中寻找合适的材料。如果我们认为两位哲学家代表的就是希腊人，而不去考虑他们所说的细节，我们也许可以概括地说，希腊人太过注重对自然事实的自由研究和对自然的美好享受，过多意识到社会根植于自然并服从自然法则，因此不会认为人和自然会发生冲突。但是在古代生活的后期，有两个因素提升了文学和人文主义的地位。一是当时的文化越来越具有复古和外来特征，二是罗马人政治和修辞倾向有所改变。

Greek achievement in civilization was native;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Alexandrians and Romans was inherited from alien sources.

Consequently it looked back to the records upon which it drew, instead of looking out directly upon nature and society, for material and inspiration. We cannot do better than quote the words of Hatch to indicate the consequences for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Greece on one hand had lost political power, and on the other hand possessed in her splendid literature an inalienable heritage. . . . It was natural that she should turn to letters. It was natural also that the study of letters should be reflected upon speech…. The mass of men in the Greek world tended to lay stress on that acquaintance with the literature of bygone generations, and that habit of cultivated speech, which has ever since been commonly spoken of as education…. Our own comes by direct tradition from it. It set a fashion which until recently has uniformly prevailed over the entire civilized world. We study literature rather than nature because the Greeks did so and because when the Romans and the Roman provincials resolved to educate their sons, they employed Greek teachers and followed in Greek paths.“ [8_1]

希腊人的文明是本土的，但是亚历山大时代和罗马文明是从异域继承来的。所以，亚历山大时代和罗马人的文明总是回顾吸收前人的成就，而不是直接从自然和社会中寻找材料和灵感。我们最好还是引用哈奇的话来说明这件事对教育理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希腊虽然丧失了政治影响力，但她的灿烂文学中却有不可剥夺的遗产。”所以，希腊人转向文学是很自然的事。而文学的研究又反映在演说上，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希腊民众强调熟知古典文学，养成高雅演说习惯的重要性，从那时起，这种演说常常被视为教育。我们的教育就是从希腊直接传承而来的。这种教育开创了一种风气，直到最近还在文明世界里普遍流行。我们研究文学而不是自然，因为希腊人就是这么做的。当罗马人和罗马的外省人决定教育孩子时，他们也雇佣希腊教师，遵循希腊的教育模式。” [9_1]

The so-called practical bent of the Romans work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In falling back upon the recorded ideas of the Greeks, they not only took the short path to attaining a cultural development, but they procured just the kind of material and method suited to their administrative talents. For their practical genius was not directed to the conquest and control of nature but to the conquest and control of men.

所谓的罗马人的实际倾向也是如此。他们在追随希腊人留下的思想时，不仅走了文化发展的捷径，而且还获得了适合他们行政管理天才的材料和方法。他们的天才不是征服和控制自然，而是征服和控制人类。

Mr. Hatch, in the passage quoted, takes a good deal of history for granted in saying that we have studied literature rather than nature because the Greeks, and the Romans whom they taught, did so. What is the link that spans the intervening centuries? The question suggests that barbarian Europe but repeated on a larger scale and with increased intensity the Roman situation. It had to go to school to Greco-Roman civilization; it also borrowed rather than evolved its culture. Not merely for its general ideas and their artistic presentation but for its models of law it went to the records of alien peoples. And its dependence upon tradition was increased by the dominant theological interests of the period. For the authorities to which the Church appealed were literatures composed in foreign tongues. Everything converged to identify learning with linguistic training and to make the language of the learned a literary language instead of the mother speech.

用前面引用的哈奇的话说，历史都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我们学习文学只是因为希腊人和他们所教的罗马人都是这样做的。是什么把彼此间隔的不同世纪连接起来呢？这个问题表明，未开化的欧洲只是以更大规模和更大力度重复了罗马传统。它只能学习希腊罗马的文明，只是有所借鉴并非自我发展。未开化的欧洲不仅在普通概念及其艺术表现方面，而且在法律模式方面都要向异族借鉴。由于当时宗教占据主导地位，这加剧了欧洲对传统的依赖。教会求助的权威是用外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一切的学习都归结于语言训练。是学者的语言而非母语被作为文学语言。

The full scope of this fact escapes us, moreover, until we recognize that this subject matter compelled recourse to a dialectical method. Scholasticism frequently has been used since the time of the revival of learning as a term of reproach. But all that it means is the method of The Schools, or of the School Men. In its essence, it is nothing but a highly effectiv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method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which are appropriate to transmit an authoritative body of truths. Where literature rather than contemporary nature and society furnishes material of study, methods must be adapted to defining, expoun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received material, rather than to inquiry,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And at bottom what is called Scholasticism is the whole-hearted and consistent formu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s which are suited to instruction when the material of instruction is taken ready-made, rather than as something which students are to find out for themselves. So far as schools still teach from textbooks and rely upon the principle of authority and acquisition rather than upon that of discovery and inquiry, their methods are Scholastic—minus the logical accuracy and system of Scholasticism at its best. Aside from laxity of method and statement,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geographies and histories and botanies and astronomies are

now part of the authoritative literature which is to be mastered.

直到我们认识到人文主义教学必须求助于辩证的方法，我们才注意到这个事实所具有的全部内涵。文艺复兴以来，“经院哲学”这个名词常常受到谴责。但是，经院哲学的含义只是“学院”或“学院学者”所采用的方法。本质上，这种方法不过是一种适合于传授权威真理高度有效的系统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如果提供的学习材料是文化典籍，而不是当代的自然和社会，那么所用的方法必须适宜于对之定义、陈述和解释，而不是去探究，发现和发明。实际上，经院哲学不过是当教学内容是现成的，无需学生自己去发现时，聚精会神、始终如一地制定和应用适合于教学的方法。只要学校仍旧照本宣科地进行教学并且依赖权威文本获得知识，而不是依赖发现和探索，其教学方法就是经院主义性质的，充其量不过是缺乏经院哲学逻辑上的精确性和系统性。除了其方法和叙述比较松散，学校教育和经院教育唯一的不同是：地理、历史、植物学和天文学现在都成为学生需要掌握的权威性文献知识的一部分。

As a consequence, the Greek tradition was lost in which a humanistic interest was used as a basis of interest in nature, and a knowledge of nature used to support the distinctively human aims of man. Life found its support in authority, not in nature. The latter was moreover an object of considerable suspicion. Contemplation of it was dangerous, for it tended to draw man away from reliance upon the documents in which the rules of living were already contained. Moreover nature could be known only through observation; it appealed to the senses—which were merely material as opposed to a purely immaterial mind. Furthermore, the utilities of a knowledge of nature were purely physical and secular; they connected with the bodily and temporal welfare of man, while the literary tradition concerned his spiritual and eternal well-being.

因此，希腊的传统就淹没于人文主义兴趣之中，被视为从事自然研究的基础，而自然知识则被用来支持人类所独有的人文目标。生命在权威文学而不是在自然科学得到支持。而且，自然成为引起众多怀疑的东西。仔细想一下，我们会发现自然很可怕，因为它倾向于让人们摆脱对已经包含生存原则记录的依赖。此外，仅仅通过观察就可以了解自然，它所诉诸的是物质，不是纯粹的意识。况且，自然知识是纯粹物质的和现实的，它们和人类现实而短暂的利益是密切相关，而文学则关注人类永恒的精神价值。

2．The Modern Scientific Interest in Nature.

二、近代科学对于自然的兴趣

The movement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hich is variously termed the revival of learning and the renascence was characterized by a new interest in man's present life, and accordingly by a new interest in his relationships with nature. It was naturalistic, in the sense that it turned against the dominant super naturalistic interest.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influence of a return to classic Greek pagan literature in bringing about this changed mind has been overestimated. Undoubtedly the change was mainly a product of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But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educated men, filled with the new point of view, turned eagerly to Greek literature for congenial sustenance and reenforcement. And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is interest in Greek thought was not in literature for its own sake, but in the spirit it expressed. The mental freedom, the sense of the order and beauty of nature, which animated Greek expression, aroused men to think and observe in a

similar untrammeled fashi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shows that the dawning sciences of physical nature largely borrowed their points of departure from the new interest in Greek literature. As Windelband has said, the new science of nature was the daughter of humanism. The favorite notion of the time was that man was in microcosm that which the universe was in macrocosm.

15世纪，在欧洲被称为学术复兴，也被称为文艺复兴的那场运动有一个显著特征：即重新对人们当前的生活感兴趣，因而也重新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感兴趣。这个运动是自然主义的，也就是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超自然主义。对古典希腊异教徒文化的复兴对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但人们对这种影响估计过高。这个变化无疑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但是，毫无疑问，当时受教育的人充满了新想法。为了获得志同道合者的支持，他们才热衷于希腊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对希腊思想的兴趣不是为文学本身，而是在于这种文学所表现的精神。思想的自由，对于自然整齐和美的感受激活了希腊人的表现手法，呼唤人们以同样自由自在的方式进行思维和观察。16世纪的科学史表明，渐露端倪的自然科学主要从对希腊文学新的兴趣来寻找出发点。正如文德尔班所说，新的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当时特别流行的观点是，宇宙是宏观世界，而人间是微观世界。

This fact raises anew the question of how it was that nature and man were later separated and a sharp division made betwee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the physical sciences. Four reasons may be suggested. (a) The old tradition was firmly intrenched in institutions. Politics, law, and diplomacy remained of necessity branches of authoritative literatur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did not develop until the methods of the sciences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to say nothing of biology, were much further advanced. The same is largely true of history. Moreover, the methods used for effective

teaching of the languages were well developed; the inertia of academic custom was on their side. Just as the new interest in literature, especially Greek, had not been allowed at first to find lodgment in the scholastically organized universities, so when it found its way into them it joined hands with the older learning to minimize the influence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The men who taught were rarely trained in science; the men who were scientifically competent worked in private laboratories and through the medium of academies which promoted research, but which were not organized as teaching bodies. Finally, the aristocratic tradition which looked down upon material things and upon the senses and the hands was still mighty.

这个事实重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然和人类是怎样分开的，语言和文学以及自然科学是怎样产生明显的分裂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提出以下四个理由。（1）旧的传统在各种机构体系中根深蒂固。政治，法律和外交必然仍旧是权威文献的组成部分。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科学方法出现很大改进以前，社会科学并没有发展起来。历史学基本上也是这种情况。再者，用于高校语言教学的方法已经有很大发展；而学术惰性又支持这种方法。正如从前对文学特别是希腊文学的新兴趣并没在经院似的大学中找到立足点一样，当新学走进大学的时候，它就和旧学联合起来缩小实验科学的影响。担任教学的人很少受过科学的训练，有科学能力的人在私人实验室或者研究院工作，但是这些研究院并不是教学机构。最终，轻视物质、轻视劳作的贵族传统依然有很大的力量。

(b) The protestant revolt brought with it an immense increase of interest in theological discussion and controversies. The appeal on both sides was to literary documents. Each side had to train men in ability to study and expound the records which were relied upon.

The demand for training men who could defend the chosen faith against the other side, who were able to propagandize and to prevent the encroachments of the other side, was such that it is not too much to say that by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linguistic training of gymnasia and universities had been captured by the revived theological interest, and used as a tool of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ecclesiastical controversy. Thus the educational descent of the languages as they are found in education today is not direct from the revival of learning, but from its adaptation to theological ends.

（2）新教徒的反叛大大增加了人们讨论和质疑神学的兴趣。争论的双方都诉诸文献资料，每一方都不得不训练人才，培养他们研究和阐释文献资料的能力。培养能够捍卫信仰，宣传观点，防御对方侵犯人才的需求十分强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17世纪中叶，欧洲大学和中学语言训练已被复活的神学兴趣所取代，而被用作宗教教育和基督教会争论的工具。所以，当今教育继承的语言教育传统并不直接源于学术复兴，而是源于对神学目的的适应。

(c) The natural sciences were themselves conceived in a way which sharpened the opposition of man and nature. Francis Bacon presents an almost perfect example of the union of naturalistic and humanistic interest. Science,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was to give up the attempt to 'anticipate' nature—to impose preconceived notions upon her—and was to become her humble interpreter. In obeying nature intellectually, man would learn to command her practically. “Knowledge is power. " This aphorism meant that through science man is to control nature and turn her energies to the execution of his own ends. Bacon attacked the old learning and logic as purely controversial, having

to do with victory in argument, not with discovery of the unknown. Through the new method of thought which was set forth in his new logic an era of expansive discoveries was to emerge, and these discoveries were to bear fruit in inventions for the service of man. Men were to give up their futile, never-finished effort to dominate one another to engage in the cooperative task of dominating nature in the interests of humanity.

（3）自然科学本身加剧了人和自然的对立状态。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了一个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完美结合的例子。科学采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就是要抛弃先验主义，使科学成为自然的谦逊的解释者。人类若能够理智服从自然，就可以在实际上指挥自然。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的意思是说，人要通过科学控制自然，用自然的能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培根攻击旧学和逻辑学，认为它们是纯粹的争论，是要在辩论中获胜而不是发现未知。通过运用培根新的逻辑学的方法，一个大规模发现的时代就要来临，这些发现将会结出众多果实，为人类服务。人类若想齐心协力控制自然，就应该抛弃相互争斗和控制彼此的企图。

In the main, Bacon prophesied the direction of subsequent progress. But he 'anticipated' the advance. He did not see that the new science was for a long time to be worked in the interest of old ends of human exploitation. He thought that it would rapidly give man new ends. Instead, it put at the disposal of a class the means to secure their old ends of aggrandizement at the expense of another clas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followed, as he foresaw, upon a revolution in scientific method. But it is taking the revolution many centuries to produce a new mind. Feudalism was doomed by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new science, for they transferred power from the landed nobility to the manufacturing centers. But capitalism rather

than a social humanism took its place. Production and commerce were carried on as if the new science had no moral lesson, but only technical lessons as to economies in prod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avings in self-interest. Naturally, this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science (which was the most conspicuously perceptible one) strengthened the claims of professed humanists that science was materialistic in its tendencies. It left a void as to man's distinctively human interests which go beyond making, saving, and expending money; and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put in their claim to represent the moral and ideal interests of humanity.

总之，培根已经预言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他的预言太过超前。他并没有认识到新的科学在很长时间里将继续为剥削目的所用。他认为，新的科学会很快给人新的目的。然而，新的科学为一个阶级所用，而牺牲另一个阶级以达到他们对外扩张的目的。培根预见到科学方法的革命会引发工业革命。但是这个革命经过几个世纪才会产生新的思想。新科学的应用注定了封建主义的灭亡，因为新科学的应用把权力从土地贵族转移到制造业。但是，替代封建主义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人文主义。人们利用新科学进行生产和从事商业，似乎并没有道德方面的教训，而只有为了节约生产和利用储蓄获取私利方面的技术上的教训。物理科学的应用（这一应用最为显而易见）自然强化了自称为人文主义的主张。这一主张认为科学的趋势是追求物质利益的。这就为赚钱、存钱和花钱等这些显然属于人类利益的行为留下了可以钻的空子，而语言和文学则要求代表人类的道德和理想的利益。

(d) Moreover, the philosophy which professed itself based upon science, which gave itself out as the accredit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t significance of science, was either dualistic in character, marked by a sharp division between mind (characterizing man) and matter,

constituting nature; or else it was openly mechanical, reducing the signal features of human life to illusion. In the former case, it allowed the claims of certain studies to be the peculiar consignees of mental values, and indirectly strengthened their claim to superiority, since human beings would incline to regard human affairs as of chief importance at least to themselves. In the latter case, it called out a reaction which threw doubt and suspicion upon the value of physical science, giving occasion for treating it as an enemy to man's higher interests.

（4）而且，那些自称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自认为能代表科学总精神的哲学，在性质上要么是二元论，要么是机械主义。二元论标志着代表人类特性的精神和构成自然的物质之间有明显的划分，而机械主义则把人类生活的显性特征变为幻想。在前一种情况下，这种哲学容许某种科目成为精神价值的特有的承载者，因为人类倾向于把人类的事物看作至少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哲学引起一种反应，那就是对物理科学价值的疑虑，把它看成是人类高尚兴趣的敌人。

Greek and medieval knowledge accepted the world in its qualitative variety, and regarded nature's processes as having ends, or in technical phrase as teleological. New science was expounded so as to deny the reality of all qualities in real, or objective, existence. Sounds, colors, ends, as well as goods and bads, were regarded as purely subjective—as mere impressions in the mind. Objective existence was then treated as having only quantitative aspects—as so much mass in motion, its only differences being that at one point in space there was a larger aggregate mass than at another, and that in some spots there were greater rates of motion than at others. Lacking qualitative distinctions, nature lacked

significant variety. Uniformities were emphasized, not diversities; the ideal was supposed to be the discovery of a single mathematical formula applying to the whole universe at once from which all the seeming variety of phenomena could be derived. This is what a mechanical philosophy means.

希腊和中世纪的知识承认世界具有质的多样性，认为自然界的各种过程都是有目的的，或者用专门的术语来说就是符合目的论的。人们提出新科学来否认在真实或客观存在中拥有事物的所有特性。声音，色彩，目的以及善恶被认为是纯主观的心理印象。客观存在被认为只有数量的属性。例如，衡量质量的运动，唯一的区别是在空间的某一点比在另一点聚焦的质量更大，在某些点比在另一些点质量有着更大的运动速度。自然界缺乏质的区别，就缺乏有意义的多样性。统一性而不是多样性被得到强调。最理想的是发现一个能够立刻应用于整个宇宙的数学公式，能从中引申出所有外观上的变异现象。这就是机械哲学的涵义。

Such a philosophy does not represent the genuine purport of science. It takes the technique for the thing itself; the apparatus and the terminology for reality, the method for its subject matter. Science does confine its statements to conditions which enable us to predict and control the happening, of events, ignoring the qualities of the events. Hence its mechanical and quantitative character. But in leaving them out of account, it does not exclude them from reality, nor relegate them to a purely mental region; it only furnishes means utilizable for ends. Thus while in fact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was increasing man's power over nature, enabling him to place his cherished ends on a firmer basis than ever before, and also to diversify his activities almost at will, the philosophy I which professed to formulate its accomplishments reduced the world to a

barren and monotonous redistribution of matter in space. Thus the immediate effect of modern science was to accentuate the dualism of matter and mind, and thereby to establish the physical and the humanistic studies as two disconnected groups. Si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tter and worse is bound up with the qualities of experience, any philosophy of science which excludes them from the genuine content of reality is bound to leave out what is most interesting and most important to mankind.

这种哲学并不代表科学的真正意义。它把技术当作事物本身，把所用的器械和术语当作现实，把方法当作主题。科学的确局限于描述我们能够预料和控制的事件发生的条件，而忽略了事件的性质。因此，这种哲学具有机械性和定量性特征。但是，它只是忽略事物的性质，并不把它们排除在现实之外，也不把它们归属于纯粹的精神领域。它只是我们提供对目的有用处的方法。因此，尽管事实上科学的进步在于增加人对自然的控制力，让人们所怀有的目的有比过去更坚实的基础，而且让他们几乎能使活动多样化，但是，自称明确表述科学成就的哲学，却把世界变为在空间上对物质重新空洞而单调的分配。所以，现代科学的直接后果是加强了物质和精神的二元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成为两个互不关联的科学。既然较好和较坏之间的差异和人经验的性质有密切联系，任何科学的哲学如果远离现实，就必然会排除对人类而言最有兴趣和最为重要的东西。

3．The Present Educational Problem.

三、当下的教育问题

In truth, experience knows no division between human

concerns and a purely mechanical physical world. Man's home is nature; his purposes and aims are dependent for execution upon natural conditions. Separated from such conditions they become empty dreams and idle indulgences of fanc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uman experience, and hence of educational endeavor, any distinction which can be justly made between nature and man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onditions which have to be reckoned with in the formation and execution of our practical aims, and the aims themselves. This philosophy is vouched for by the doctrine of biological development which shows that man is continuous with nature, not an alien entering her processes from without. It is reenforced by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of science which shows that knowledge accrues in virtue of an attempt to direct physical energies in accord with ideas suggested in dealing with natural objects in behalf of social uses. Every step forward in the social sciences—the studies termed history, economics, politics, sociology—shows that social questions are capable of being intelligently coped with only in the degree in which we employ the method of collecting data, forming hypotheses, and testing them in action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natural science, and in the degree in which we utilize in behalf of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welfare the technical knowledge ascertained by physics and chemistry. Advanced methods of dealing with such perplexing problems as insanity, intemperance, poverty, public sanitation, city planning,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constructive use of governmental agencies for furthering the public good without weakening personal initiative, all illustrate the direct dependence of our important social concerns upon the methods and results of natural science.

事实上，经验并不知道人类所关心事物的和纯粹机械的物质世界

之间有什么区别。人类的家园是自然界；人要实现其目的，就要依靠自然条件。而一旦离开了这种条件，人类的目的就会变成空想和没有根据的幻想。从人类经验的观点来看，也就是教育努力的观点来看，任何能在自然和人类之间做出的公正区分也就是在我们实际目的形成和实现条件与目的本身之间做出区分。这种哲学是由生物发展学说所证明的。这一哲学原理表明，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从外部进入自然的外来者。科学的试验方法强化了这种哲学，表明知识的增长要依靠根据代表社会功用的自然界物体对物质力量的指导。社会科学——历史，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科目——每向前进一步，都表明只有在应用自然科学所特有的搜集资料、形成假说并在实际行动中加以检验的方法之时，只有在为促进社会福利而利用物理和化学所确定的专门知识之时，我们才能明智应付许多社会问题。我们对于处理诸如精神病、酗酒、贫穷、公共卫生、城市规划、自然资源保护、建设性运用政府机构以促进公共福利而不削弱个体积极性等复杂问题都有先进的方法。这表明我们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都需要直接依赖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成果。

With respect then to both humanistic and naturalistic studies, education should take its departure from this close interdependence. It should aim not at keeping science as a study of nature apart from literature as a record of human interests, but at cross-fertilizing both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various human disciplines such as history, literatur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Pedagogically, the problem is simpler than the attempt to teach the sciences as mere technical bodies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ical forms of physical manipulation, on one side; and to teach humanistic studies as isolated subjects, on the other. For the latter procedure institutes an artificial separation in the pupils' experience. Outside of school pupils meet with natural facts and principles in connection with various modes of human action. (See ante, p. 36.) In all the social activities in which they have shared

they have had to understand the material and processes involved. To start them in school with a rupture of this intimate association breaks the continuity of mental development, makes the student feel an indescribable unreality in his studies, and deprives him of the normal motive for interest in them.

因此，教育应该从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这种密切的依存关系出发，把自然科学与历史、文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人文学科相结合，不再把研究自然的科学与记录人类事业的文学分隔开来。从教学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要比以下的做法简单：即，一方面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知识的载体和物质的操作方式进行传授，另一方面把人文科学看作是在孤立的科目进行讲解。上面这种做法在学生的经验中造成人为的分割。学生在校外碰到的很多自然事实和原则都与人类行动的各种方式相关。（参见原书第36页）在他们参与的社会活动中，他们必须了解这些活动所运用的材料和过程。如果在学校期间就断绝了这种密切的联系，就会破坏学生心理发展的连续性，使学生对他的学习感到难以形容的不真实性，使他们失去学习的正常动机。

There is no doubt, of course, that the opportunities of education should be such that all should have a chance who have the disposition to advance to specialized ability in science, and thus devote themselves to its pursuit as their particular occupation in life. But at present, the pupil too often has a choice only between beginning with a study of the results of prior specialization where the material is isolated from his daily experiences, or with miscellaneous nature study, where material is presented at haphazard and does not lead anywhere in particular. The habit of introducing college pupils into segregated scientific subject matter, such as is appropriate to the man who wishes to become an expert in a given field, is carried back into the high schools. Pupils in the

latter simply get a more elementary treatment of the same thing, with difficulties smoothed over and topics reduced to the level of their supposed ability. The cause of this procedure lies in following tradition, rather than in conscious adherence to a dualistic philosophy. But the effect is the same as if the purpose were to inculcate an idea that the sciences which deal with natur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man, and vice versa. A large part of the comparative in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ing of the sciences, for those who never become scientific specialists, is the result of a separation which is unavoidable when one begins with technically organized subject matter. Even if all students were embryonic scientific specialists, it is questionable whether this is the most effective procedure. Considering that the great majority are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of sciences only for its effect upon their mental habits—in making them more alert, more open-minded, more inclined to tentative acceptance and to testing of ideas propounded or suggested, —and for achiev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daily environment, it is certainly ill-advised. Too often the pupil comes out with a smattering which is too superficial to be scientific and too technical to be applicable to ordinary affairs.

当然，毫无疑问，我们的教育应该为所有对科学具有专门能力的人提供机会、使他们致力于科学研究，使之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专门职业。但是，目前学生往往只能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做出选择：或者一开始就学习前人专门研究的成果，学习的内容脱离他们的日常经验；或者一开始就学习内容杂乱的自然研究，学习材料粗制滥造，达不到任何目的。在大学里习惯于让学生学习封闭的科学题材，其实，这种教学方法只适用于希望成为某领域专家的人。然而，这种教学方法又传到中学。中学学生学习一些类似和大学相同的封闭知识，只是在程度上相对容易一些，把内容降低到假定的水平。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

是因为要沿袭传统，而不是有意识坚持二元论哲学。但是，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效果是相同的，其目的在于反复灌输一种思想：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无关，或者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无关。对于那些绝不会成为科学家的人进行科学教育，其效率之低可想而知，这是学生一上学，就学习专业内容，把科学与人文分开所导致的结果。即使所有的学生在初期都具有科学潜质，这种方法是否有效仍然值得研究。考虑到多数学生学习科学只是因为科学对他们智力的影响，能使他们更机灵、更乐观、更倾向于接受和检验他人所提出的观点、更好地去了解他们所在的日常环境，这样的教学方法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样培养的学生往往一知半解，所得到的知识太肤浅，算不上科学，或过于教条化，难以应用于日常事务。

The utilization of ordinary experience to secure an advance into scientific material and method, while keeping the latter connected with familiar human interests, is easier toda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The usual experience of all persons in civilized communities today is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industrial processes and results. These in turn are so many cases of science in action. The stationary and traction steam engine, gasoline engine, automobile,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the electric motor enter directly into the lives of most individuals. Pupils at an early age are practically acquainted with these things. Not only does the business occupation of their parents depend upon scientific applications, but household pursuits, the maintenance of health, the sights seen upon the streets, embody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and stimulate interest in the connected scientific principles. The obvious pedag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scientific instruction is not to teach things labeled science, but to utilize the familiar occupations and appliances to direct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 until pupils have arrived at a knowledge of som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by understanding them in their familiar practical workings.

在把科学材料和科学方法与人类熟悉的感兴趣的事联系起来的同时，利用日常经验来取得科学材料和科学方法的进步。在今天做到这一点比过去要容易得多。在当今文明社会，所有人的普通经验与工业上的许多程序和结果息息相关。这些反过来又是很多科学技术见诸于实际的例子。例如，固定式蒸汽机和牵引式蒸汽机、汽油机、机动车、电报、电话、电动机等直接进入大多数人的生活。学生实际上很早就熟悉这些东西了。不仅他们的家长所从事的职业依赖科学的应用，而且家务、保健、街道上的景色都体现了科学成就并激发人们对有关原理的兴趣。科学教育教学法新的出发点显然不是教授一些贴有科学标签的东西，而是利用熟悉的器械进行直接的观察和实验，使学生在实践中获得一些基本原理的知识。

The opinion sometimes advanced that it is a derogation from the 'purity' of science to study it in its active incarnation, instead of in theoretical abstraction, rests upon a misunderstanding. As matter of fact, any subject is cultural in the degree in which it is apprehended in its widest possible range of meanings. Perception of meanings depends upon perception of connections, of context. To see a scientific fact or law in its human as well as in its physical and technical context is to enlarge its significance and give it increased cultural value. Its direct economic application, if by economic is meant something having money worth, is incidental and secondary, but a part of its actual connections.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fact be grasped in its social connections—its function in life.

有一种错误的意见认为，在科学的具体实践中学习科学而不是在抽象的理论中学习科学，会有损科学的“纯洁性”。事实上，任何学科在广泛的意义上都具有文化价值。了解各种意义要依靠各种联系，了解事物的背景。我们学习科学事实或科学法则，既要注意科学事实与

物质和技术的联系，也要注意科学事实与人的联系，这样才能扩大科学事实的含义，给予科学事实更大的文化价值。科学事实直接应用于经济。如果所谓的经济是指金钱的价值，那么，这种应用是偶然的，第二位的，它只是科学事实的实际联系的一部分。重要的问题是要与科学事实的社会联系，从它在生活中的作用，来了解科学的事实。

On the other hand, 'humanism' means at bottom being imbued with an intelligent sense of human interests. The social interest, identical in its deepest meaning with a moral interest, is necessarily supreme with man. Knowledge about man, information as to his past, familiarity with his documented records of literature, may be as technical a possession as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details. Men may keep busy in a variety of ways, making money, acquiring facility in laboratory manipulation, or in amassing a store of facts about linguistic matters, or the chronology of literary productions. Unless such activity reacts to enlarge the imaginative vision of life, it is on a level with the busy work of children. It has the letter without the spirit of activity. It readily degenerates itself into a miser's accumulation, and a man prides himself on what he has, and not on the meaning he finds in the affairs of life. Any study so pursued that it increases concern for the values of life, any study producing greater sensitiveness to social well-being and greater ability to promote that well-being is humane study.

另一方面，“人文主义”的实质是指完全理解人类的兴趣。社会兴趣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道德兴趣。对人来说，社会兴趣必然是至高无上的。关于人的知识，关于他过去的消息和过去的历史记录，可能与积累有关物质的知识一样是一种专门财富。人类忙于各种不同的事务，有的忙于赚钱，有的在实验室练习，获得熟练技能，有的研究语言或文学。除非他们所做的事情能扩大人们对于人生的想象力，否则

就与儿童的瞎忙碌一样毫无意义。这样的活动有名无实，容易成为守财奴式的积聚，积聚钱财者为他所拥有的钱财感到骄傲，而不是为在生活悟出的意义而感到骄傲。任何能增加关心人生价值、提高感知人生幸福敏感度以及推进提升社会幸福能力的学习都是人文主义的学习。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the Greeks was native and intense, but it was narrow in scope. Everybody outside the Hellenic circle was a barbarian, and negligible save as a possible enemy. Acute as were the social observations and speculations of Greek thinkers, there is not a word in their writings to indicate that Greek civilization was not self-inclosed and self-sufficient. There was, apparently, no suspicion that its future was at the mercy of the despised outsider. Within the Greek community, the intense social spirit was limited by the fact that higher culture was based on a substratum of slavery and economic serfdom—classes necessary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as Aristotle declared, and yet not genuine parts of i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has produced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ich has brought different peoples in such close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through colonization and commerce that no matter how some nations may still look down upon others, no country can harbor the illusion that its career is decided wholly within itself. The same revolution has abolished agricultural serfdom, and created a class of more or less organized factory laborers with recognized political rights, and who make claims for a responsible role in the control of industry—claims which receive sympathetic attention from many among the well-to-do, since they have been brought into closer connections with the less fortunate classes through the breaking down of class barriers.

希腊人天生就具有很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但是，他们这种精神的视野很狭隘。在希腊文化圈以外的任何人都是不文明的，无足轻重的，而且还很有可能都是敌人。尽管希腊思想家的社会观察和思索很敏锐，但是他们的著作表明希腊文明是自我封闭和自给自足的。很显然，希腊文明的未来要受到被鄙视的外人的支配。在希腊社会内部，激烈的社会精神受到下述事实的限制：即，希腊的高度文化是建立在奴隶制度和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些阶级是国家生存所必需的但又不是国家真正的组成部分。科学的发展催生了工业革命。通过殖民化和商业往来，不同的民族彼此紧密联系。尽管有些民族可能仍轻视其他民族，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怀有幻想，认为它的发展能完全由自己内部决定。工业革命废除了农奴制，产生了一个或多或少有组织的产业劳动者阶级。他们具有公认的政治权利，要求在工业管理方面发挥负责的作用。这种要求得到很多富有者的同情和关注。通过破除阶级障碍，他们已经与贫苦阶级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

This state of affairs may be formulated by saying that the older humanism omitted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conditions from its purview. Consequently, it was one sided. Cultur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inevitably represented the intellectual and moral outlook of the class which was in direct social control. Such a tradition as to culture is, as we have seen (Ante, p. 304), aristocratic; it emphasizes what marks off one class from another, rather than fundamental common interests. Its standards are in the past; for the aim is to preserve what has been gained rather than widely to extend the range of culture.

我们可以据此认为，旧的人文主义没有正视经济和工业条件。因此，旧的人文主义是片面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不可避免地代表直接受社会控制的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观点。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参见

原书第304页），这种文化传统是贵族的文化传统。它强调阶级之间的划分，而不强调基本的共同利益。它的标准在于维系过去的传统，目的在于保存已经拥有的文化，而不在于广泛扩大文化的范围。

The modifications which spring from taking greater account of industry and of whatever has to do with making a living are frequently condemned as attacks upon the culture derived from the past. But a wider educational outlook would conceive industrial activities as agencies for making intellectual resources more accessible to the masses, and giving greater solidity to the culture of those having superior resources. In short, when we consider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and between literary and esthetic cultivation and an aristocratic social organization on the other, we get light on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echnical scientific studies and refining literary studies. We have before us the need of overcoming this separation in education if society is to be truly democratic.

由更多地考虑产业和与谋生有关的问题而引起的各种变革，常常被谴责为攻击过去的文化。但是，更加包容的教育观点将会把产业活动看作一种媒体，使智力资源更易为群众所享用，并使拥有优越资源者文化更为稳固。总之，如果一方面考虑科学和产业发展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考虑文学和审美修养与贵族社会组织的紧密联系，我们就能理解科学技术科目与高雅文学科目之间的对立。如果社会要成为真正民主的社会，我们必须在教育领域革除文理分科。

Summary.

总结

The philosophic dual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reflected in the division of studies between the naturalistic and the humanistic, with a tendency to reduce the latter to the literary records of the past. This dualism is not characteristic (as were the others which we have noted) of Greek thought. It arose partly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the culture of Rome and of barbarian Europe was not a native product, being borrow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Greece, and partly because political and ecclesiastic conditions emphasized dependence upon the authority of past knowledge as that was transmitted in literary documents.

在哲学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论反映在自然科学科目与人文主义科目的划分上，并倾向于将后者削减为过去的文学记录。这种二元论（正如我们所提到其他方面一样）并非希腊思想的特征。二元论的产生，部分由于罗马文化和未开化的欧洲文化都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借自希腊；部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情况和宗教情况都强调依靠文献记录所传递的过去知识的权威性。

At the outset,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prophesied a restoration of the intimate connection of nature and humanity, for it viewed knowledge of nature as the means of securing human progress and well-being. But the more immediate applications of science were in the interests of a class rather than of men in common; and the received philosophic formulations of scientific doctrine tended either to mark it off as merely material from man as spiritual and immaterial, or else to reduce mind to a subjective illusion. In education, accordingly, the tendency was to treat the

sciences as a separate body of studies, consisting of technic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hysical world, and to reserve the older literary studies as distinctively humanistic. The account previously given of 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and of the educational scheme of studies based upon it, are designed to overcome the separation, and to secure recognition of the place occupied by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in human affairs.

从一开始，现代科学的兴起就预示着恢复自然与人文的紧密联系。现代科学把自然知识看作人类进步和获得幸福的手段。但是，对科学的更直接应用符合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符合人类共同的利益。同时，人们所接受的科学原理的哲学表述有一种倾向：要么把科学划为仅仅是物质的，把人划为精神的和非物质的，要么把人的心理变成主观的幻想。因此，在教育上有一种倾向：往往把科学看作包括关于物质世界专门知识独立的科目，而把原有的文学科目作为独特的人文主义科目。我们在此之有关知识的来历和据此制定的课程计划的论述，旨在克服这两方面的分离倾向，承认自然科学在人文学科中所占的位置。

[8_1]."The Influence of Greek Ideas and Usages upon the Christian Church," pp. 43-44.

[9_1].参见《希腊思想和习俗对基督教会的影响》，43-44页。

Chapter 22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orld

第二十二章　个体与世界

1．Mind as Purely Individual.

一、纯粹的个体心智

We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influences which have effected a division between work and leisure, knowing and doing, man and nature. These influences have resulted in splitting up the subject matter of education into separate studies. They have also found formulation in various philosophies which have opposed to each other body and mi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 physical mechanism and ideal purpose. Upon the philosophical side, these various dualisms culminate in a sharp demarcation of individual minds from the world, and hence from one another. While the connection of this philosophical position with educational procedure is not so obvious as is that of the points considered in the last three chapters, there are certain educational considerations which correspond to it; such as the antithesis supposed to exist between subject matter (the counterpart of the world) and method (the counterpart of mind); such as the tendency to treat interest as something purely private, without intrinsic connection with the material studied. Aside from incidental educational bearings, it will be shown in this chapter that the dualistic philosophy of mind and the world implies an erroneous conce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social interests, and between individuality

or freedom, and social control and authority.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mind with the individual self and of the latter with a private psychic consciousness is comparatively modern. In both the Greek and medieval periods, the rule was to regard the individual as a channel through which a universal and divine intelligence operated. The individual was in no true sense the knower; the knower was the 'Reason' which operated through him. The individual interfered at his peril, and only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truth. In the degree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rather than reason 'knew,' conceit, error, and opinion were substituted for true knowledge. In Greek life, observation was acute and alert; and thinking was free almost to the point of irresponsible speculations. Accordingly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theory were only such as were consequent upon the lack of an experimental method. Without such a method individuals could not engage in knowing, and be checked up by the results of the inquiries of others. Without such liability to test by others, the minds of men could not be intellectually responsible; results were to be accepted because of their esthetic consistency, agreeable quality, or the prestige of their authors. In the barbarian period, individuals were in a still more humble attitude to truth; important knowledge was supposed to be divinely revealed, and nothing remained for the minds of individuals except to work it over after it had been received on authority. Aside from the more consciously philosophic aspects of these movements, it never occurs to any one to identify mind and the personal self wherever beliefs are transmitted by custom.

我们一直在关注造成工作与娱乐，知与行，人类与自然分离的影响。这些影响导致教学内容分为彼此独立的学科。这些影响也见诸于把身与心、理论与实践、现实与理想相互对立的各派哲学的构想之中。在哲学范畴内，这些二元对立最终在个体心智与世界之间形成了

一个明显的界限，进而使得个体之间也不相同。与前面三章所论述的要点相比，此处哲学地位与教育过程的关联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的确对应着一些有关教育的考虑。比如，假定在教材内容（与世界相对应）与方法（与心智相对应）之间存在对立；再比如，趋向于将兴趣视为纯粹个人的东西，认为它跟所学习的材料没有本质的联系。除了这些偶然的教育关联，本章还将说明心智与世界之间的二元哲学暗示了关于知识和社会利益、个性或自由与社会控制和权威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将心智等同于个人自我，将后者等同于个人精神意识，这是相对现代的观点。希腊与中世纪时期的思想则是将个体看成是一条渠道，通过这样的渠道，宇宙和神圣思想得以运行。从真正意义上来说，个体不是知者，知者是通过个体起作用的理性。个人冒险干涉，其结果只能是对真理有害。如果知者是个体而非通过个体起作用的理性，自负、错误和成见将取代真理。在当时的希腊，观察是敏锐而活跃的，思想是自由的，几乎可以不负责任地任意推测。因此，希腊人的理论是缺乏实验方法得来的结果。缺乏这样的实验方法，个人无法求知，也无法经受住他人研究结果的检验。没有这种应受别人检验的责任，人类的心智是不可靠的。其研究结果之所以得到承认，是因其在美学上的一致性、令人满意的质量、或是因为作者的声望。在未开化的年代，个人对于真理的态度更为谦卑，重要的知识理应由神明来揭示，个人能做的只是在真理被权威接受之后将其完善。除了这些运动更加具有哲学意识之外，没有人会把心智与自我等同起来，因为信仰是通过传统习俗得以传承的。

In the medieval period there was a religious individualism. The deepest concern of life was the salvation of the individual soul.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this latent individualism found conscious formulation in the nominalistic philosophies, which treated the structure of knowledge as something built up within the individual through his own acts, and mental states. With the rise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dividualism after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testantism, the times were ripe for an emphasis

up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achieving knowledge for himself. This led to the view that knowledge is won wholly through personal and private experiences. As a consequence, mind, the source and possessor of knowledge, was thought of as wholly individual. Thus upon the educational side, we find educational reformers, like Montaigne, Bacon, Locke, henceforth vehemently denouncing all learning which is acquired on hearsay, and asserting that even if beliefs happen to be true, they do not constitute knowledge unless they have grown up in and been tested by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reaction against authority in all spheres of life, and the intensity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great odds, for freedom of action and inquiry, led to such an emphasis upon personal observations and ideas as in effect to isolate mind, and set it apart from the world to be known.

中世纪存在着宗教个人主义。人的一生中最应关注的是个人灵魂的救赎。在中世纪后期，这种潜在的个人主义在唯名论哲学里找到了清晰的陈述，这种哲学认为，知识结构是通过个体行为和精神状态建立在个体之内的。十六世纪后，随着经济和政治上个人主义的兴起以及新教主义的发展，强调个人在为自己获得知识方面的义务和责任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知识完全是通过个人经验获得的。因此，作为知识源泉和拥有者的心智被认为是完全属于个人。因此，我们在教育领域发现诸如蒙田、培根、洛克等改革者强烈抨击一切道听途说的学问。他们认为，即使信念碰巧是正确的，也不能作为知识的构成部分，除非它们来自个人经验并受其检验。在生活各个层面对于权威的质疑，为了争取行动和探索的自由与种种磨难所做的激烈斗争，导致极度重视个人观察和个人观点，使心智受到隔离，与需要被认识的世界相分离。

This isol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that

branch of philosophy known as epistemology—the theory of knowledge. The identification of mind with the self, and the setting up of the self as something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ent, created such a gulf between the knowing mind and the world that it became a question how knowledge was possible at all. Given a subject—the knower—and an object—the thing to be known—wholly separate from one another, it is necessary to frame a theory to explain how they get into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 so that valid knowledge may result. This problem, with the allied one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world acting upon the mind and the mind acting upon the world, became almost the exclusive preoccupation of philosophic thought. The theories that we cannot know the world as it really is but only the impressions made upon the mind, or that there is no world beyond the individual mind, or that knowledge is only a certain association of the mind's own states, were products of this preoccupation. We are not directly concerned with their truth; but the fact that such desperate solutions were widely accepted is evidence of the extent to which mind had been set over the world of realities. The increasing use of the term 'consciousness' as an equivalent for mind, in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re is an inner world of conscious states and processes, independent of any relationship to nature and society, an inner world more truly and immediately known than anything else, is evidence of the same fact. In short, practical individualism, or struggle for greater freedom of thought in action, was translated into philosophic subjectivism.

这种心智的隔离体现在被称为认识论的哲学分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上。将心智等同于自我，并且将自我视为能自给自足的独立个体，这就在认知心智与外部世界之间制造了一个鸿沟，以至于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知识怎么可能产生。假定主体（感知者）与客体（被感知的事物）完全分离，就得有一个理论来解释二者是如何互相联系以产生

可靠的知识的。这个问题与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即世界与心智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几乎成为了哲学思想唯一的当务之急。有的理论认为，我们无法感知世界原有的样子，能感知的只是世界所投射在我们心智上的印象；有的理论认为，个体心智之外并不存在一个世界；还有的理论认为，知识只是自己心智状态特定的结合。这些理论都是当时哲学思考的产物。我们并不直接关注那些理论的真实性，但是这些在绝望中孤注一掷的解决办法被广泛接受。这一事实证明了把心智凌空于现实世界之上的程度。人们越来越把“意识”一词等同于心理而加以使用，并假设存在着一个有意识状态和进程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与自然和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它比其他任何东西能被更加真实，更快地被感知到。这种做法也证明了同一个事实。简言之，功利性的个人主义或者为了在行动中争取更大思想自由的斗争都变成了哲学的主观主义。

2．Individual Mind as the Agent of Reorganization.

二、个体心智是重塑自我的动力

It should be obvious that this philosophic movement misconceiv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actical movement. Instead of being its transcript, it was a perversion. Men were not actually engaged in the absurdity of striving to be free from connection with nature and one another. They were striving for greater freedom in nature and society. They wanted greater power to initiate changes in the world of things and fellow beings; greater scope of movement and consequently greater freedom in observations and ideas implied in movement. They wanted not isolation from the world, but a more intimate connection with it. They wanted to form their beliefs about it at first hand, instead of through tradition. They wanted closer

union with their fellows so that they might influence one another more effectively and might combine their respective actions for mutual aims.

显然，这场哲学运动误解了实践运动的意义。这场哲学运动不是实践运动的再现，而是扭曲。事实上，人类并没有愚蠢到这种程度，人类在竭力摆脱与自然的联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他们只是力求在自然和社会中享有更多自由，渴望有更大的能力在大千世界和同伴中发起变革，渴望有更大的运动规模和更大的自由，以便观察运动，领会运动所带来的观念。人类并非想要与世界分离，反之，他们渴望与之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他们想自己形成有关世界的信念，而非继承传统。他们想与同伴有更亲密的关系，这样便能更有效地互相影响，为了互相的目的协调各自的行动。

So far as their beliefs were concerned, they felt that a great deal which passed for knowledge was merely the accumulated opinions of the past, much of it absurd and its correct portions not understood when accepted on authority. Men must observe for themselves, and form their own theories and personally test them. Such a method was the only alternative to the imposition of dogma as truth, a procedure which reduced mind to the formal act of acquiescing in truth. Such is the meaning of what is sometimes called the substitution of inductive experimental methods of knowing for deductive. In some sense, men had always used an inductive method in dealing with their immediate practical concerns. Architecture, agriculture, manufacture, etc. , had to be based upon observation of the activities of natural objects, and ideas about such affairs had to be checked, to some extent, by results. But even in such things there was an undue reliance upon mere custom, followed blindly rather than understandingly. And

this observational-experimental method was restricted to these 'practical' matters, and a sharp distinction maintained between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or truth. (See Ch. XX.) The rise of free c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travel, exploration, and commerce, the evolution of new methods of producing commodities and doing business, threw men definitely upon their own resources. The reformers of science like Galileo, Descartes, and their successors, carried analogous methods into ascertaining the facts about nature. An interest in discovery took the place of an interest in systematizing and 'proving' received beliefs.

至于他们的信念，他们认为，大量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只是过去积累的观点，其中大部分是荒谬的，而其正确的部分在被权威接受时也并没有真正被领会。人类必须为自己去观察，建立自己的理论，并亲自去检验它们。这是唯一能替代把教条当作真理来强加于人的方法，而这样做就是使人们在心理上正式默认真理。这也就是有时候所说的用感知的归纳试验方法去代替演绎法。在某种意义上，在处理直接实际的问题时，人们总是采用归纳法。有些行业需要建立在对自然界物体的观察活动上，例如建筑业、农业、制造业等。在某些程度上，关于这类事物的观念需要由结果来验证。但是，即使在这些行业中，也存在对传统习俗过度盲目依赖，而非明智地沿用。这种观察实验的方法仅局限于“实际”问题，并且在实践与理论知识或者真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参见第20章）。自由城市的兴起，旅游、探险、商业的发展，生产与贸易新方式的演变，都明确要求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伽利略、笛卡尔等改革家以及他们的后辈将类似的方法用到了探究自然界。人类的兴趣从对所接受的信念加以系统化和进行检验转向了探索发现。

A just philosophic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movements would, indeed, have emphasized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gaining knowledge and personally testing beliefs, no matter by what authorities they were vouched for. But it would not have isolated the individual from the world, and consequently isolated individuals—in theory—from one another. It would have perceived that such disconnection, such rupture of continuity, denied in advance the possibility of success in their endeavors. As matter of fact every individual has grown up, and always must grow up, in a social medium. His responses grow intelligent, or gain meaning, simply because he lives and acts in a medium of accepted meanings and values. (See ante, p. 36.) Through social intercourse, through sharing in the activities embodying beliefs, he gradually acquires a mind of his own. The conception of mind as a purely isolated possession of the self is at the very antipodes of the truth. The self achieves mind in the degree in which knowledge of things is incarnate in the life about him; the self is not a separate mind building up knowledge anew on its own account.

事实上，对于这些运动合理的哲学解释已经强调了个人在获得知识以及亲自检验信念时的权利与责任，不管这些知识和信念被什么权威所证明。但是没有必要将个人与世界分离，并最终从理论上将人与人彼此隔离。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此的隔离和对连续性的破坏已经提前否定了成功的可能性。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在社会环境中成长，而且总是必须在社会环境中成长。他的反应变得理智，或者有意义，这仅仅是因为他生活和行动在一个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环境里（见原书第36页）。通过社会交往，通过参与体现信念的各种活动，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心智。处在真理另一端的正是将心智看成自我纯粹孤立的占有物的想法。自我是这样获得心智的：自我根据事物的知识在其生活中实体化的程度来形成心智。自我并非自己能重新构成知识的独立心智。

Yet there is a valid distinction between knowledge which is objective and impersonal, and thinking which is subjective and personal. In one sense, knowledge is that which we take for granted. It is that which is settled, disposed of, established, under control. What we fully know, we do not need to think about. In common phrase, it is certain, assured. And this does not mean a mere feeling of certainty. It denotes not a sentiment, but a practical attitude, a readiness to act without reserve or quibble. Of course we may be mistaken. What is taken for knowledge—for fact and truth—at a given time may not be such. But everything which is assumed without question, which is taken for granted in our intercourse with one another and nature is what, at the given time, is called knowledge. Thinking on the contrary, starts, as we have seen, from doubt or uncertainty. It marks an inquiring, hunting, searching attitude, instead of one of mastery and possession. Through its critical process true knowledge is revised and extended, and our convictions as to the state of things reorganized. Clearly the last few centuries have been typically a period of revis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beliefs. Men did not really throw away all transmitted beliefs concerning the realities of existence, and start afresh upon the basis of their private, exclusive sensations and ideas. They could not have done so if they had wished to, and if it had been possible general imbecility would have been the only outcome. Men set out from what had passed as knowledge, and critically investigated the grounds upon which it rested; they noted exceptions; they used new mechanical appliances to bring to light data inconsistent with what had been believed; they used their imaginations to conceive a world different from that in which their forefathers had put their trust. The work was a piecemeal, a retail, business. One problem was tackled at a time. The net results of all the revisions amounted, however, to a revolution of prior conceptions of the world. What occurred was a reorganization of

prior intellectual habitudes, infinitely more efficient than a cutting loose from all connections would have been.

然而，在不涉及个人情感的客观知识与个人主观思维之间存在着有效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就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知识指已经确定、经过整理、已被建立和已受控制的东西。对于我们已经完全了解的东西，不必再去思考。直白地讲，知识是确定的和有把握的。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种确定的感觉。它不仅仅表示一种感情，而是一种实际的态度，一种毫无保留或挑剔地去行动的意愿。当然我们也可能犯错。在某一特定时间，被认为是知识——事实或真理的东西，可能不是知识。但是任何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在同别人的交流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事情，所有这些在特定的时间内都是知识。相反，如我们所见，思维则始于怀疑或不确定。它表明一种探求、获取、搜寻的态度，而不是表示精通或者拥有。通过对思维的批判，真正的知识得以修正和充实，我们关于事物状态的信心得到了加强。很明显，过去的几个世纪是对信念修正和重塑的典型时期。人们并没有真正抛弃流传下来的有关现实生活的种种信念，然后基于自己独有的感觉和观念另起炉灶。如果他们想这样做，也做不到。如果做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只能犯傻。人类从那些流传下来的知识开始，批判性地调查这些知识的依据。他们注意有何例外，然后用新的技术工具揭示与人们深信无误的知识不一致的数据。他们运用想象力来分辨世界与其祖先所信赖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工作是零敲碎打的，一次解决一个问题。然而，这些修正的最终结果引发了对之前关于世界概念的一场革命。结果是对以前的思维习惯进行了改造，这种改造比以前快刀斩乱麻的做法更有效果。

This state of affairs suggests a definition of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or the self, in knowledge; namely, the redirection, or reconstruction of accepted beliefs. Every new idea, every conception of things differing from that authorized by current

belief, must have its origin in an individual. New ideas are doubtless always sprouting, but a society governed by custom does not encourage their development. On the contrary, it tends to suppress them, just because they are deviations from what is current. The man who looks at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others is in such a community a suspect character; for him to persist is generally fatal. Even when social censorship of beliefs is not so strict, social conditions may fail to provide the appliances which are requisite if new ideas are to be adequately elaborated; or they may fail to provide any material support and reward to those who entertain them. Hence they remain mere fancies, romantic castles in the air, or aimless speculations. The freedom of observation and imagination involved in the modern scientific revolution were not easily secured; they had to be fought for; many suffered for their 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But, upon the whole, modern European society first permitted, and then, in some fields at least, deliberately encouraged the individual reactions which deviate from what custom prescribes. Discovery, research, inquiry in new lines, inventions, finally came to be either the social fashion, or in some degree tolerable. However, as we have already noted, philosophic theories of knowledge were not content to conceive mind in the individual as the pivot upon which reconstruction of beliefs turned, thus maintaining the continuity of the individual with the world of nature and fellowmen. They regarded the individual mind as a separate entity, complete in each person, and isolated from nature and hence from other minds. Thus a legitimate intellectual individualism, the attitude of critical revision of former beliefs which is indispensable to progress, was explicitly formulated as a moral and social individualism. When the activities of mind set out from customary beliefs and strive to effect transformations of them which will in turn win general conviction, there is no opposi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al. The intellectual variations of

the individual in observation, imagination, judgment, and invention are simply the agencies of social progress, just as conformity to habit is the agency of social conservation. But when knowledge is regarded as originating and developing within an individual, the ties which bind the mental life of one to that of his fellows are ignored and denied.

这种情况要求对个体或自我在知识中的角色加以定义，即对广为接受的信念进行重新定位或重建。每一个新观点，每一个与流行信念所认可的概念相左的看法，必须始自个体。毫无疑问，新思想一直在萌生，但是由传统习俗所掌控的社会并不鼓励新思想的发展。相反，社会之所以会去压制它们，仅仅是因为它们偏离了当下的思想。在这种社会里，如有人与别人看法相左，他必将受到怀疑。他若固执己见，那将给他带来致命的打击。即使社会信念的审查制度没有那么严格，社会环境也不能提供适当阐述新观念的必要条件，或者不能为那些持有新观念的人提供任何物质支持或者奖励。因此，这些新观念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富有浪漫色彩的空中楼阁或者漫无目标的推测。近代科学革命所取得的观察和想象自由来之不易，这必须通过斗争才得以实现。很多有识之士为争取思想的独立而受到迫害。但总地来说，近代欧洲社会先是允许，然后至少在某些领域是刻意鼓励个体背离风俗规定。到了最后，发现、研究、新的探寻和发明，要么成为了社会风尚，要么在某些程度上得到容忍。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注意那样，关于知识的哲学理论不会仅仅满足于将个体的心智看作重塑信念所依靠的枢纽，进而维持个体与自然界以及同伴之间的一致性。它们将个体的心智视为独立的实体，每个独立个体的心智都是完整的，独立于自然，也独立于其他人的心智。因此，真正运用心智的个人主义需要对以前信念持批判修正的态度，这对于进步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个人主义可以明确地表述为道德个人主义和社会个人主义。当心智的活动从传统信念出发，尽力对之加以改造，以赢得大众支持时，个体与社会之间就不存在对立了。正如遵守习惯是维系社会传统的动力一样，个体在观察、想象、判断和发明方面上的智力差别也是

社会进步的动力。但是，如果把知识的发展视为源自个体，就会忽略和否定掉那些维系个体与其同伴的精神生活的纽带。

When the social quality of individualized mental operations is denied, it becomes a problem to find connections which will unite an individual with his fellows. Moral individualism is set up by the conscious separation of different centers of life. It has its roots in the notion that the consciousness of each person is wholly private, a self-inclosed continent, intrinsically independent of the ideas, wishes, purposes of everybody else. But when men act, they act in a common and public world. This is the problem to which the theory of isolated and independent conscious minds gave rise: Given feelings, ideas, desires, which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one another, how can actions proceeding from them be controlled in a social or public interest? Given an egoistic consciousness, how can action which has regard for others take place?

如果个性化心智活动的社会品质被否定，寻找能将个体与同伴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就成为一个问题。道德个人主义是通过有意识地分离生活的不同中心建立起来的。它起源于这样的见解，即每个人的意识是完全私人的，好似一个自我封闭的大陆，与其他任何人的想法、愿望、目的完全无关。但是，当人类行动的时候，他们的活动范围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主张有意识的心智是孤立和独立的理论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感觉、想法和欲望彼此毫无关联，怎么可能根据社会或大众利益控制他们引起的行动呢？如果存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意识，那么为别人着想的行动怎么可能发生？

Moral philosophies which have started from such premisses have developed four typical ways of dealing with the question.

从上述假设衍生出来的道德哲学提出了对付这个问题的四种方法。

(i) One method represents the survival of the older authoritative position, with such concessions and compromises as the progress of events has made absolutely inevitable. The deviations and departures characterizing an individual are still looked upon with suspicion; in principle they are evidences of the disturbances, revolts, and corruptions inhering in an individual apart from external authoritative guidance. In fact, as distinct from principle, intellectual individualism is tolerated in certain technical regions—in subjects like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and astronomy, and in the technical inventions resulting there from. But the applicability of a similar method to morals, social, legal, and political matters, is denied. In such matters, dogma is still to be supreme; certain eternal truths made known by revelation, intuition, or the wisdom of our forefathers set unpassable limits to individual observation and speculation. The evils from which society suffers are set down to the efforts of misguided individuals to transgress thes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physical and the moral sciences, lie intermediate sciences of life, where the territory is only grudgingly yielded to freedom of inquiry under the pressure of accomplished fact. Although past history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possibilities of human good are widened and made more secure by trusting to a responsibility built up within the very process of inquiry, the 'authority' theory sets apart a sacred domain of truth which must be protected from the inroads of variation of beliefs. Educationally, emphasis may not be put on eternal truth, but it is put on the authority of book and teacher, and individual variation is discouraged.

（1）尽管事态的发展要求必须做出如此的让步与妥协，有一种方法仍代表着旧的权威地位仍有所存留。个体所具有的偏离和背离的特征仍然受到怀疑。原则上，这些特征都是远离外部权威指导的个体内部忧虑、挣扎和妥协的证据。事实上，与原则不同的是，某些科技领域是容忍智力个人主义的。比如，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科目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些科技发明。但是把类似的方法应用到道德、社会、法律和政治则是行不通的。在这些学科中，教条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由上天的启示，人的直觉或祖先智慧揭示的一些特定的永恒真理对个体的观察和思索设置了不可逾越的屏障。社会所蒙受的灾难都是误入迷途的个体想越过这些界限所造成的。在物质科学和道德科学之间，存在居中的生命科学，该领域只是迫于既成事实的压力才勉强自由开放。虽然过去的历史证明，人性中的善可能通过依靠在探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责任变得更宽广，更牢固，权威理论留出了一个神圣的真理领域，该领域决不能受到信念变化的侵袭。在教育上，备受重视的也许不是永恒的真理，而是老师和书本的权威。没有人关心个体差异。

(ii)Another method is sometimes termed rationalism or abstract intellectualism. A formal logical faculty is set up in distinction from tradition and history and all concrete subject matter. This faculty of reason is endowed with power to influence conduct directly. Since it deals wholly with general and impersonal forms, when different persons act in accord with logical findings, their activities will be externally consistent. There is no doubt of the services rendered by this philosophy. It was a powerful factor in the negative and dissolving criticism of doctrines having nothing but tradition and class interest behind them; it accustomed men to freedom of discussion and to the notion that beliefs had to be submitted to criteria of reasonableness. It undermined the power of prejudice, superstition, and brute force, by habituating men to reliance upon

argument, discussion, and persuasion. It made for clarity and order of exposition. But its influence was greater in destruction of old falsities tha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ies and associations among men. Its formal and empty nature, due to conceiving reason as something complete in itself apart from subject matter, its hostile attitude toward historical institutions, its disregard of the influence of habit, instinct, and emotion, as operative factors in life, left it impotent in the suggestion of specific aims and methods. Bare logic, however important in arranging and criticizing existing subject matter, cannot spin new subject matter out of itself. In education, the correlative is trust in general ready-made rules and principles to secure agreement, irrespective of seeing to it that the pupil's ideas really agree with one another.

（2）另外一种方法有时候被称为唯理论或抽象唯智论。一个有别于传统、历史和所有特定学科内容的形式逻辑学在此建立起来。这一学科被赋予直接影响行为的力量。由于它研究的完全是客观的形态，在不同的人根据逻辑结果行动时，他们的行动在外表上将是一致的。毫无疑问，该哲学流派所做出的贡献值得肯定的。有些理论学说只重视传统和阶级利益。该哲学流派在对此加以否定和消解的批评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它使人们习惯于自由讨论，并习惯于接受信念必须服从于理性标准。通过让人们习惯于依靠辩论、讨论和说服，该派哲学削弱了偏见、迷信和暴力的影响，实现了解释的明晰有序。然而，该派哲学在破坏从前虚假言辞方面发挥的影响远大于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新纽带和联系的影响。该派哲学天性拘谨和空洞，把理性看作自我完善并独立于学科内容的有机整体。它还敌视历史习俗、漠视习惯、本能和情感等生活积极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它在提供具体目标和方法的建议时，显得苍白无力。纯粹的推理方法无论在安排和批评现有学科内容时有多么重要，却不能从自身产生出新的学科内容。在教育中与此相关的做法是信任现有的规则和原则，以便达成一致，而不去确保学生的观点是否真正相互一致。

(iii) While this rationalistic philosophy was developing in France, English thought appealed to the intelligent self-interest of individuals in order to secure outer unity in the acts which issued from isolated streams of consciousness. Legal arrangements, especially penal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were to be such as to prevent the acts which proceeded from regard for one's own private sensations from interfering with the feelings of others. Education was to instill in individuals a sense that non-interference with others and some degree of positive regard for their welfare were necessary for security in the pursuit of one's own happiness. Chief emphasis was put, however, upon trade as a means of bringing the conduct of one into harmony with that of others. In commerce, each aims at the satisfaction of his own wants, but can gain his own profit only by furnishing some commodity or service to another. Thus in aiming at the increase of his own private pleasurable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he contributes to the consciousness of others. Agai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is view expressed and furthered a heightened perception of the values of conscious life, and a recognition tha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re ultimately to be judged by the contributions which they make to intensifying and enlarging the scope of conscious experience. It also did much to rescue work, industry, and mechanical devices from the contempt in which they had been held in communities founded upon the control of a leisure class. In both ways, this philosophy promoted a wider and more democratic social concern. But it was tainted by the narrowness of its fundamental premiss: the doctrine that every individual acts only from regard for his own pleasures and pains, and that so-called generous and sympathetic acts are only indirect ways of procuring and assuring one's own comfort. In other words, it made explicit the consequences inhering in any doctrine which makes mental life a self-inclosed thing, instead of an

attempt to redirect and readapt common concerns. It made union among men a matter of calculation of externals. It lent itself to the contemptuous assertions of Carlyle that it was a doctrine of anarchy plus a constable, and recognized only a 'cash nexus' among men. The educational equivalents of this doctrine in the uses made of pleasurable rewards and painful penalties are only too obvious.

（3）当这种唯理论在法国有所发展时，英国的思想界呼吁重视个体利益以获得由孤立的意识流产生的各种行动外在的统一。法律安排，尤其是刑罚管理和政府规章，都是用来阻止个人某些自私的且有碍他人感情的行为。教育必须向受教育者灌输这样的观念：不妨碍他人，而且适当地主动去关心他人的福祉，这是谋求自身幸福的前提条件。然而，需要把经商作为个人行为与他人行为协调一致的方式。商人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所需，但是只有在为顾客提供商品或服务之后，商人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因此，商人在为提高自己的有意识生活而努力时，也在为提高别人的有意识生活做贡献。毫无疑问，这个观点表达并且提升了对有意识生活价值的理解，并且认识到各种体制方案的实施最终要取决于它们在加强和扩大有意识经验范围方面所做的贡献。这种观点也有助于使工作、工业和机械设施摆脱在闲暇阶级控制的社会中所遭受的蔑视。这种哲学以这两种方式推动了更为广泛和民主的社会关注。但是，它却受限于基本假设的狭隘性：即认为每个人行为都是出于自身愉悦或痛苦的考虑，所谓慷慨和富有同情心的行为不过是实现和保证自身舒适的间接方式。换句话说，任何哲学如果把精神生活进行自我封闭，而不努力去重新指导和重新适应共同的事业，其固有的后果就会显露出来。该哲学把人们的团结视为基于外在因素的考虑。这就有助于卡莱尔轻蔑的论断，认为这种哲学是无政府主义加警察，只承认人们的“现金交易关系”。这种学说在教育上的对应表现便是令人愉悦的奖励和令人痛苦的处罚，这是显而易见的。

(iv) Typical German philosophy followed another path. It started from what was essentially the rationalistic philosophy of Descartes and his French successors. But while French thought upon the whole developed the idea of reason in opposition to the religious conception of a divine mind residing in individuals, German thought (as in Hegel) made a synthesis of the two. Reason is absolute. Nature is incarnate reason. History is reason in its progressive unfolding in man. An individual becomes rational only as he absorbs into himself the content of rationality in nature and in social institutions. For an absolute reason is not, like the reason of rationalism, purely formal and empty; as absolute it must include all content within itself. Thus the real problem is not that of controlling individual freedom so that some measure of social order and concord may result, but of achieving individual freedom through developing individual convictions in accord with the universal law found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 as objective Reason. While this philosophy is usually termed absolute or objective idealism, it might better be termed,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at least, institutional idealism. (See ante, p. 69.) It idealized historical institutions by conceiving them as incarnations of an immanent absolute mind.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is philosophy was a powerful influence in rescuing philosoph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rom the isolated individualism into which it had fallen in France and England. It served also to mak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 more constructively interested in matters of public concern. It left less to chance, less to mere individual logical conviction, less to the workings of private self-interest. It brought intelligence to bear upon the conduct of affairs; it accentuated the need of nationally organized education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e state. It sanctioned and promoted freedom of inquiry in all technical details of natural and historical phenomena. But in all ultimate moral matters, it tended to reinstate

the principle of authority. It made for efficiency of organization more than did any of the types of philosophy previously mentioned, but it made no provision for free experimental modification of this organization. Political democracy, with its belief in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desire and purpose to take part in re-adapting even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was foreign to it.

（4）典型的德国哲学追寻另一条路。德国哲学本质上起源于笛卡尔及其法国接班人的唯理论。但是，当法国思想家总体上发展理性概念，以否认神圣心灵存在于个体，德国思想家（比如黑格尔）则综合了这两个概念。理性是绝对的。自然是理性的化身。历史是理性在人身上的不断展开。只有在吸收了自然界和社会体制中的理性内容时，个体才会变得理性。如同唯理论的理性一样，绝对理性不是纯粹的形式化和空洞的。既然是绝对的，它自身必须包含所有内容。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控制个人自由，以便维持某种社会秩序和和谐，而是按照客观理性王国发现的普遍规律，发展个人信念，实现个人自由。虽然通常被称为绝对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但是，至少为了教育目的，称它为制度唯心主义更好（见原书59页）。这种哲学通过把历史上的各种制度看作内在的绝对心灵的化身从而把历史体制理想化。毫无疑问，这种哲学对拯救19世纪初已经陷入孤立的个人主义的英国和法国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也促使国家机构更加关注公众焦点问题。它很少听任机遇的摆布，很少依靠个人的逻辑信念，也很少受制于个人的私利。它促使智力影响事务的处理，强调有国家组织的教育代表国家公共利益的必要性，鼓励和推动对一切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的各种技术细节进行自由的研究。但是在所有最终的道德问题上，它趋向于恢复权威的原则。它比以往提到的任何哲学派别都更能促进组织的效率，但是它并不准备对这种组织进行自由的实验性改变。政治民主主义认为，个人有参与改变社会基本组织的权利，这是客观唯心主义所没有提及的。

3．Educational Equivalents.

三、教育上的对应表现

It is not necessary to consider in detail the educational counterparts of the various defects found in these various types of philosophy. It suffices to say that in general the school has been the institution which exhibited with greatest clearness the assumed antithesis between purely individualistic methods of learning and social action, and between freedom and social control. The antithesis is reflected in the absence of a social atmosphere and motive for learning, and the consequent separation, in the conduct of the school, between method of instruction and methods of government; and in the slight opportunity afforded individual variations. When learning is a phase of active undertakings which involve mutual exchange, social control enters into the very process of learning. When the social factor is absent, learning becomes a carrying over of some presented material into a purely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there is no inherent reason why it should give a more socialized direction to mental and emotional disposition. There is tendency on the part of both the upholders and the opponents of freedom in school to identify it with absence of social direction, or, sometimes, with merely physical unconstraint of movement. But the essence of the demand for freedom is the need of conditions which will enable an individual to make his own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a group interest, and to partake of its activities in such ways that social guidance shall be a matter of his own mental attitude, and not a mere authoritative dictation of his acts. Because what is often called discipline and 'government' has to do with the external side of conduct alone, a similar meaning is

attached, by reaction, to freedom. But when it is perceived that each idea signifies the quality of mind expressed in action, the supposed opposition between them falls away. Freedom means essentially the part played by thinking—which is personal—in learning:—it means intellectual initiative, independence in observation, judicious invention, foresight of consequences, and ingenuity of adaptation to them.

对于各派哲学中所发现的各种缺陷，并没有必要详细考虑它们在教育上的对应表现。可以这么说，学校通常是最清晰展现对立的机构，这包括纯粹个人学习方法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对立，自由与社会支配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反映在缺乏社会氛围和学习动机上，最终导致学校活动中教学方法和管理方法的分离，而且个体之间很少有机会表现出差异性和多样性。当学习是一个积极参与、相互交流的过程时，社会支配才能进入学习过程中。在缺少社会因素时，学习仅仅意味着将现成的材料灌输到纯粹的个人意识中去。这时，就不会产生内在的原因使这些材料给心智和情感性格带来社会化的倾向。无论是学校里对自由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他们都趋向于将自由理解为缺乏社会导向，或者把自由仅仅理解成不限制人身自由的活动。但是，学校自由的精髓在于给学生创造环境，使学生能够对群体的利益做出特殊贡献。在参与活动时，社会性指导原则应成为学生自己的一种心理态度，而非支配其行为的权威性教条。由于所谓的“训练”和“管理”仅仅与表面行为有关，类似的意义也通过反应附加在自由上。但是假如这样理解，认为每种思想代表的是表现在行为上的心理特性，那么它们之间的这种假设性对立就不攻自破了。自由主要是思维在学习中所起的作用，这种思维是属个人的。自由意味着智力创造、独立观察、明智的发明、远见卓识以及灵活的调整适应能力。

But because these are the mental phase of behavior, the needed play of individuality—or freedom—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opportunity for free play of physical movements. Enforced physical quietude may be unfavorable to realization of a problem, to undertaking the observations needed to define it, and to performance of the experiments which test the ideas suggested. Much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self-activity' in education, but the conception has too frequently been restricted to something merely internal—something excluding the free use of sensory and motor organs. Those who are at the stage of learning from symbols, or who are engaged in elaborating the implications of a problem or idea preliminary to more carefully thought-out activity, may need little perceptible overt activity. But the whole cycle of self-activity demands an opportunity for investig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for trying out one's ideas upon things, discovering what can be done with materials and appliances. And this is incompatible with closely restricted physical activity. Individual activity has sometimes been taken as meaning leaving a pupil to work by himself or alone. Relief from need of attending to what any one else is doing is truly required to secure calm and concentration. Children, like grown persons, require a judicious amount of being let alone. But the time, place, and amount of such separate work is a matter of detail, not of principle. There is no inherent opposition between working with others and working as an individual. On the contrary, certain capacities of an individual are not brought out except under the stimulus of associating with others. That a child must work alone and not engage in group activities in order to be free and let his individuality develop, is a notion which measures individuality by spatial distance and makes a physical thing of it.

但是，由于这些是行为的心理过程阶段，我们所需要的个性或自由要发挥作用，就离不开身体活动的自由发挥。迫使人安静下来也许不利于认清问题，不利于进行观察以便界定问题，不利于进行实验以

验证假想的观点。有关教育中“自我活动”的重要性已经强调多次，但是这个概念往往被纯粹是内部的东西所束缚，这不包括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的自由运用。对于那些处在学习符号阶段的人，或者对于那些需要在进行比较慎重活动之前阐明问题或观念含义的人，他们可能不需要明显的外部活动。但是，自我活动的整个周期需要有调查和实验的机会，以便尝试不同的思想方法，发现能利用材料和仪器做些什么。这与严格受限制的身体活动是不协调的。有时候，个体活动被理解为让学生单独完成某项任务。要确保镇静和精力集中，就真的需要学生在工作时不关心别人在干什么。儿童像成年人一样，需要一定单独活动的时间。但是，这种单独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工作量的多寡是枝节问题，而非原则问题。与他人一起工作和单独工作之间并不存在固有的对立。相反，个人的某些潜在能力只有在与他人合作时才能得到激发。认为儿童必须单独从事活动，不能参与小组活动，以便得到自由和个性的发挥，这种看法是按空间距离衡量个性并将其物质化。

Individuality as a factor to be respected in education has a double meaning. In the first place, one is mentally an individual only as he has his own purpose and problem, and does his own thinking. The phrase 'think for one's self' is a pleonasm. Unless one does it for one's self, it isn't thinking. Only by a pupil's own observations, reflections, framing and testing of suggestions can what he already knows be amplified and rectified. Thinking is as much an individual matter as is the digestion of food. In the second place, there are variations of point of view, of appeal of objects, and of mode of attack, from person to person. When these variations are suppressed in the alleged interests of uniformity, and an attempt is made to have a single mold of method of study and recitation, mental confusion and artificiality inevitably result. Originality is gradually destroyed, confidence in one's own quality of mental operation is undermined, and a docile subjection to the opinion of others is inculcated, or else ideas run wild. The harm is greater now

than when the whole community was governed by customary beliefs, because the contrast between methods of learning in school and those relied upon outside the school is greater. That systematic advance in scientific discovery began when individuals were allowed, and then encouraged, to utilize their own peculiarities of response to subject matter, no one will deny. If it is said in objection, that pupils in school are not capable of any such originality, and hence must be confined to appropriating and reproducing things already known by the better informed, the reply is twofold. (i) We are concerned with originality of attitude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unforced response of one's own individuality, not with originality as measured by product. No one expects the young to make original discoveries of just the same facts and principles as are embodied in the sciences of nature and man. But it is not un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learning may take place under such conditions tha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learner there is genuine discovery. While immature students will not make discoveri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dvanced students, they make them from their own standpoint, whenever there is genuine learning. (ii) In the normal process of becoming acquainted with subject matter already known to others, even young pupils react in unexpected ways. There is something fresh, something not capable of being fully anticipated by even the most experienced teacher, in the ways they go at the topic, and in the particular ways in which things strike them. Too often all this is brushed aside as irrelevant; pupils are deliberately held to rehearsing material in the exact form in which the older person conceives it. The result is that what is instinctively original in individuality, that which marks off one from another, goes unused and undirected. Teaching then ceases to be an educative process for the teacher. At most he learns simply to improve his existing technique; he does not get new points of view; he fails to experience any intellectual companionship. Hence bo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tend to become conventional and mechanical with all the nervous strain on both sides therein implied.

在教育上将个性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有双层含义。首先，人必须有自己的目标和问题并能独立思考，他才在精神层面算是一个个体。“为自我而思考”是一句发话。除非人为自己思考，否则那不叫思考。学生只有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设计和实验验证，才能够扩大和修正他已有的知识。食物消化是属于个人的事情，思考也是如此。其次，人与人之间在观点视角、喜好和攻击方式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当这种差异性被压制在统一认定的利益中，而且试图给学习和背诵方法建立单一的模式时，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心理混乱和矫揉造作，逐渐摧毁学生的独创力，削弱个人对心理运行特性的自信。如果学生被反复灌输要驯从地接受别人的意见，就会变得毫无想法。这种情况造成的危害甚至比用习俗信仰来管理整个社区的危害还大，因为学校中的学习方法与校外所依赖的方法的差别更为悬殊。科学发现中成体系的进步始于个人被允许，进而被鼓励利用自己对研究对象做出的特殊反应，没人会对此加以否认。如果有反对者认为学生不具备创造性，因此，学习的知识必须限于挪用和再现贤者已知的知识。对此，我们的回答是：（1）我们关注的是态度的创造性，这相当于个人根据自己的个性所做出的自然反应，而不是以产品来衡量创造性。没有人期望年轻人做出像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中包含的原理和事实那样的原创性发现。然而，期待他们在学习中获得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是真正的发现，这种期望是合理的。对于尚不成熟的学生来说，在他们真正求知中，他们的发现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可能算不上真正的发现，但从他们自身的角度讲，却可以这么说。（2）在正常学习已为他人所熟知教材的过程中，甚至年幼的学生也会做出意外的反应。这些学生理解教材内容的方式以及教材唤起他们注意的特殊途径，都有新奇之处，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老师也挥感到始料不及。学生的这些反应通常被搁在一边，被认为与学习不相关。学生必须严格按照成人理解方式去背诵教材。这样的后果是，个性中最具创造性的，能够将个体同他人区分开的那部分潜能未能得到利用和指导。对教师来说，教学不

再是有教育意义的过程。最多他只学到了如何改进他现有的教学手法，并没有学到新的观点，也没有体验到任何智力火花。因此教与学都变得墨守成规，毫无新意，教师和学生在精神上都很紧张。

As maturity increases and as the student has a greater background of familiarity upon which a new topic is projected, the scope of more or less random physical experimentation is reduced. Activity is defined or specialized in certain channels. To the eyes of others, the student may be in a position of complete physical quietude, because his energies are confined to nerve channels and to the connected apparatus of the eyes and vocal organs. But because this attitude is evidence of intense mental concentr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trained person,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it should be set up as a model for students who still have to find their intellectual way about. And even with the adult, it does not cover the whole circuit of mental energy. It marks an intermediate period, capable of being lengthened with increased mastery of a subject, but always coming between an earlier period of more general and conspicuous organic action and a later time of putting to use what has been apprehended.

随着学生的逐渐成熟以及对新话题内容的背景知识越来越熟悉，具有一定随意性的身体体验范围就会缩小。行为在某些领域会被界定或者被专门化。在别人眼里，学生可能在身体上处于完全安静状态，因为他的精神能量都已局限在神经系统以及与用眼和发声的相关器官上。这种态度是受过训练的人在心理上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明证，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学生应该效仿的模式，因为学生仍然在四处探寻其智力存在的方式。即使对于成年人而言，这也并非精神能量的全部。这标志着一个中级阶段，这个阶段可以因为对某一学科越来越熟悉而得以延长。但是，这一阶段总是处于两个阶段之间：一段是早先较为一般

和明显的有机体活动时期；另一段是后来将所理解的道理付诸实践的时期。

When, however, education takes cognizance of the union of mind and body in acquiring knowledge, we are not obliged to insist upon the need of obvious, or external, freedom. It is enough to identify the freedom which is involved in teaching and studying with the thinking by which what a person already knows and believes is enlarged and refined. If attention is centered upon the conditions which have to be met in order to secure a situation favorable to effective thinking, freedom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 The individual who has a question which being really a question to him instigates his curiosity, which feeds his eagerness for information that will help him cope with it, and who has at command an equipment which will permit these interests to take effect, is intellectually free. Whatever initiative and imaginative vision he possesses will be called into play and control his impulses and habits. His own purposes will direct his actions. Otherwise, his seeming attention, his docility, his memorizings and reproductions, will partake of intellectual servility. Such a condition of intellectual subjection is needed for fitting the masses into a society where the many are not expected to have aims or ideas of their own, but to take orders from the few set in authority. It is not adapted to a society which intends to be democratic.

然而，当教育认识到心理和身体在获取知识时的统一性时，我们就不必再强调外在或者外部自由的必要性。将教与学中所包含的自由等同于这样一种思维模式，通过该种思维模式，一个人已知的知识能够得以扩大和精炼，这就已经足够。如果将注意力集中在确保有效思维的有利情境所应满足的条件时，自由就能够自我满足。如果有人存

在疑问，这个疑问激起他的好奇心，使他渴望获取解决这个问题的信息，使他掌握工具，保证自己的兴趣能够有效实施，那么，这个人在心智上就是自由的。他所拥有的任何创新性和富有想象力的想法都将发挥作用，并控制着他的冲动和习惯。他自己的目的会指导着他的行为活动。否则，他表面上的精力集中、百依百顺、背诵、复述等只是运用心智的屈从而已。如果社会并不希望大多数人拥有自己的目标和想法，只是希望他们遵从少数权威力量所设定的规则秩序，那么这样的社会就需要这种运用心智的屈从。这并不适于以民主为意图的社会。

Summary.

总结

True individualism is a product of the relaxation of the grip of the authority of custom and traditions as standards of belief. Aside from sporadic instances, like the height of Greek thought, it is a comparatively modern manifestation. Not but that there have always been individual diversities, but that a society dominated by conservative custom represses them or at least does not utilize them and promote them. For various reasons, however, the new individualism was interpreted philosophically not as meaning development of agencies for revising and transforming previously accepted beliefs, but as an assertion that each individual's mind was complete in isolation from everything else. In the theoretical phase of philosophy, this produced the epistemological problem: the question as to the possibility of any cognitive relationship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world. In its practical | phase, it generated the problem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purely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cting on behalf of general or social interests,—the problem of social direction. While the philosophies which have been elaborated to deal with these questions have not affected education directly, the assumptions underlying them have found expression in the separation frequently made between study and government and between freedom of individuality and control by others. Regarding freedom, the important thing to bear in mind is that it designates a mental attitude rather than external unconstraint of movements, but that this quality of mind cannot develop without a fair leeway of movements in exploration, experimentation, application, etc. A society based on custom will utilize individual variations only up to a limit of conformity with usage; uniformity is the chief ideal within each class. A progressive society counts individual variations as precious since it finds in them the means of its own growth. Hence a democratic society must, in consistency with its ideal, allow for intellectual freedom and the play of diverse gifts and interests in its educational measures.

真正的个人主义乃是放弃将习俗和传统作为权威信仰标准的产物。除了一些零星的例子，例如在希腊思想发展的顶峰时期，真正的个人主义其实是近代的产物。虽然总是存在个人差异，但是被保守风俗所主导的社会总是压制或者不利用个别差异和促进它们的发展。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在哲学上并不是被作为修正和转化先前所接受的信念的发展媒介，而是作为一种论断，认为每个人的心智都是完整的，独立于其他任何外物。在哲学的理论阶段，这就产生了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即个人对于世界认知的可能性问题。在哲学的实践阶段，这产生了社会导向的问题，即纯粹的个体意识代表大众或者社会利益而行动的可能性问题。尽管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产生的各派哲学并没有直接影响教育，但是它们所蕴含的各种假设却在学习与管理以及个体自由和他人控制之间常有的分离上得到体现。至于自由，最重要的一点是，自由是一种心理态度，而非行动不受外部约

束。但是，只有在探索、实验和应用中行动有相当的灵活性，这种自由的心理才能得到发展。基于习俗而建立的社会只在与习俗一致的限度之内利用个体差异，维持内部的统一仍然是各阶级的主要目标。一个进步的社会看重个体的差异，并能在差异中找到社会进步的方式。因此，一个民主的社会必须坚持理想目标，允许思维自由，允许各种才能和兴趣在教育准则中发挥作用。

Chapter 23 Vocational Aspects of Education

第二十三章　教育的职业观

1．The Meaning of Vocation.

一、职业的含义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conflict of philosophic theories focuses in discussion of the proper place and function of vocational factors in education. The bald statement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undamental philosophical conceptions find their chief issue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point may arouse incredulity: there seems to be too great a gap between the remote and general terms in which philosophic ideas are formulated and the practical and concrete detail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a mental review of the intellectual presuppositions underlying the oppositions in education of labor and leisure, theory and practice, body and mind, mental states and the world, will show that they culminate in the antithesis of vocational and cultural education. Traditionally, liberal culture has been linked to the notions of leisure, purely contemplative knowledge and a spiritual activity not involving the active use of bodily organs. Culture has also tended, latterly,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purely private refinement, a cultivation of certain states and attitudes of consciousness, separate from either social direction or service. It has been an escape from the former, and a solace for the necessity of the latter.

目前，各哲学流派理论的冲突集中在对教育中职业因素的适当地位和作用的讨论上。如果大胆承认基本哲学概念的重大分歧在这一问题上显现的主要争论点，可能会引起这样的质疑：我们用来系统阐述哲学观念的那些通用的生僻术语与职业教育中实际具体的细节似乎存在巨大差距。在教育领域存在种种对立，如劳动与休闲的对立、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体力与脑力的对立、心理状态与物质世界的对立。如果我们对此做一番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最终表现为职业教育与文化修养教育的对立。文化教育在传统意义上常与休闲、纯属沉思的知识以及不主动使用身体器官的精神活动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近来，文化教育也趋向于同纯粹个人的修养以及某种意识状态和态度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这种教育既与社会方向背离，也与社会服务无关，它已经脱离了社会方向，对于社会服务的必要性来说，它又是一种安慰。

So deeply entangled are these philosophic dualisms with the whole subjec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the meaning of vocation with some fullness in order to avoid the impression that an education which centers about it is narrowly practical, if not merely pecuniary. A vocation means nothing but such a direction of life activities as renders them perceptibly significant to a person, because of the consequences they accomplish, and also useful to his associates. The opposite of a career is neither leisure nor culture, but aimlessness, capriciousness, the absence of cumulative achievement in experience, on the personal side, and idle display, parasitic dependence upon the others, on the social side. Occupation is a concrete term for continuity. It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f artistic capacity of any kind, of special scientific ability, of effective citizenship, as well as 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occupations, to say nothing of mechanical labor or engagement in gainful pursuits. We must avoid not only limitation of conception of vocation to the occupations where immediately tangible commodities are produced, but also the

notion that vocations are distributed in an exclusive way, one and only one to each person. Such restricted specialism is impossible; nothing could be more absurd than to try to educate individuals with an eye to only one line of activity. In the first place, each individual has of necessity a variety of callings, in each of which he should be intelligently effective;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any one occupation loses its meaning and becomes a routine keeping busy at something in the degree in which it is isolated from other interests.

这种哲学上的二元论与整个职业教育的主题紧紧纠缠在一起。我们有必要把职业的含义解释得更为全面一些，以免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以职业为中心的教育视觉狭隘、强调实用、充满铜臭。职业仅仅只是人生活动的一种导向，这些活动因其取得的结果会让人感到重要，并让其同伴受益。职业的对立面既不是休闲也不是文化修养。在个人层面，它指的是漫无目的、任性善变以及缺乏成功经验的累积，在社会层面，它则指无用的炫耀以及对于他人如寄生虫般的过分依赖。职业是一个表示连续性的具体术语。它既包括专业职业和商业职业，也包括任何艺术才能、特殊科学能力以及公民道德的发展，还包括那些机械劳动和有回报收益的工作。我们不仅要避免将职业的概念狭隘地局限于能直接生产出有形商品的职业，还要避免另一种观念——认为职业具有排他性，每人只能从事一种特定的职业。这种范围受限制的专门化在教育上是行不通的。教育学生只着眼于一种职业实在是太荒谬了。首先，每个人必定会从事多种职业，他必须都能胜任；其次，任何一种职业如果脱离其他兴趣爱好，便会失去其意义并变成机械的忙碌。

(i) No one is just an artist and nothing else, and in so far as one approximates that condition, he is so much the less developed human being; he is a kind of monstrosity. He must, at some period of his life, be a member of a family; he must have friends and

companions; he must either support himself or be supported by others, and thus he has a business career. He is a member of some organized political unit, and so on. We naturally name his vocation from that one of the callings which distinguishes him, rather than from those which he has in common with all others. But we should not allow ourselves to be so subject to words as to ignore and virtually deny his other callings when it comes to a consideration of the vocational phases of education.

（1）没有人纯粹只是一名艺术家，此外一无所能。如果有人几乎就是这样，他便是尚未进化完全的人，是一个怪胎。每一个人在其人生的某个阶段必然是家庭的一员，肯定有朋友和伙伴。他必定是自食其力抑或依赖他人。如此这般，他得有自己的职业，成为某政治团体的一员，等等。我们自然会把他从事的与众不同的工作称为其职业，而不会将他与别人有共同点的工作称为其职业。但是，我们在考虑教育的职业方面时，不应受制于字面的约束，以至于忽略甚至否定其他工作。

(ii)As a man's vocation as artist is but the emphatically specialized phase of his diverse and variegated vocational activities, so his efficiency in it, in the humane sense of efficiency, is determined by its association with other callings. A person must have experience, he must live, if his artistry is to be more than a technical accomplishment. He cannot find the subject matter of his artistic activity within his art; this must be an expression of what he suffers and enjoys in other relationships—a thing which depends in turn upon the alertness and sympathy of his interests. What is true of an artist is true of any other special calling. There is doubtless—in general accord with the principle of habit—a tendency for every distinctive vocation to become too dominant, too exclusive and

absorbing in its specialized aspect. This means emphasis upon skill or technical method at the expense of meaning. Hence it is not the business of education to foster this tendency, but rather to safeguard against it, so that the scientific inquirer shall not be merely the scientist, the teacher merely the pedagogue, the clergyman merely one who wears the cloth, and so on.

（2）艺术家只是众多不同职业活动中特别专业化的一种职业。他在艺术方面的效率，从人文效率的意义上讲，取决于艺术与其他职业的联系。如果艺术家的艺术才能要超越技术成就的范畴，他必须取得经验，实实在在地生活。他不可能仅仅在其艺术中找到艺术活动的创作题材。这种题材必然是他在其他关系中经历的喜怒哀乐的表现——这要依赖于他兴趣爱好的敏锐度与包容度。对艺术家是如此，对于其他职业来说也是如此。按一般习惯原理，无疑有一种倾向：每种职业都过分强调自己的重要，过分排外并专注于自身的专业化。这就意味着强调职业技能和技术方法，而牺牲职业的意义。教育的任务不是助长这种趋势，而是防止这种趋势的产生，使科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教育不仅仅局限于教师，传教不仅仅局限于身着牧师服装的人。

2．The Place of Vocational Aims in Education.

二、职业目标在教育中的地位

Bearing in mind the varied and connected content of the vocation, and the broad background upon which a particular calling is projected, we shall now consider education for the more distinctive activity of an individual.

在牢记职业有许多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内容以及特殊职业有其广阔背景之时，我们将从更为有利个人独特行为的角度来考虑教育。

1．An occupation is the only thing which balances the distinctive capacity of an individual with his social service. To find out what one is fitted to do and to secure an opportunity to do it is the key to happiness. Nothing is more tragic than failure to discover one's true business in life, or to find that one has drifted or been forced by circumstance into an uncongenial calling. A right occupation means simply that the aptitudes of a person are in adequate play, working with the minimum of friction and the maximum of satisfaction. With reference to other members of a community, this adequacy of action signifies, of course, that they are getting the best service the person can render.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for example, that slave labor was ultimately wasteful even from the purely economic point of view—that there was not sufficient stimulus to direct the energies of slaves, and that there was consequent wastage. Moreover, since slaves were confined to certain prescribed callings, much talent must have remained unavailable to the community, and hence there was a dead loss. Slavery only illustrates on an obvious scale what happens in some degree whenever an individual does not find himself in his work. And he cannot completely find himself when vocations are looked upon with contempt, and a conventional ideal of a culture which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for all is maintained. Plato (Ante, p. 102) laid dow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when he asserted that it was the business of education to discover what each person is good for, and to train him to mastery of that mode of excellence, because such development would also secure the fulfillment of social needs in the most harmonious way. His error

was not in his qualitative principle, but in his limited conception of the scope of vocations socially needed; a limitation of vision which reacted to obscure his perception of the infinite variety of capacities found in different individuals.

1．唯有职业才能使个人特殊才能与其提供的社会服务保持平衡。幸福的关键是发现适合自己的职业并且得到从事这一职业的机会。世上最可悲的事情莫过于一生中找不到真正的职业，未能认识到自己随波逐流抑或为环境所迫而从事与自己志趣不合的职业。所谓适合自己的职业就是能在工作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工作得心应手并能得到最大满足。对于社会中其他成员来说，你能充分发挥才能意味着他们能得到你所提供的最好服务。人们普遍认为，即便是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奴隶劳动也是一种浪费。没有足够的刺激指导奴隶能量的释放，结果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此外，由于奴隶受到限制，只能从事某些指定的工作，他们还有许多才能未能应用于社会，这绝对是难以弥补的损失。如果有人不能真正融入自己的工作，奴隶制度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所发生的一切。当职业受人歧视，而大家仍然坚持社会所广泛认可的传统理想时，此人是不可能完全投入工作的。柏拉图（参见原书第88页）制定了教育哲学的基本原则，指出教育的任务应当是发现每个人的特长并训练他发展自己的长处，因为这样的发展能以最和谐的方式满足社会需求。柏拉图的错误并不在他所提出的定性原则，而在于他对于社会需要的职业范围了解甚少；眼光的狭隘导致了他无法看到不同个体的无限潜能。

2．An occupation is a continuous activity having a purpose. Education through occupations consequently combines within itself more of the factors conducive to learning than any other method. It calls instincts and habits into play; it is a foe to passive receptivity. It has an end in view; results are to be accomplished. Hence it appeals to thought; it demands that an idea of an end be steadily

maintained, so that activity cannot be either routine or capricious. Since the movement of activity must be progressive, leading from one stage to another, observation and ingenuity are required at each stage to overcome obstacles and to discover and readapt means of execution. In short, an occupation, pursued under conditions whe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ctivity rather than merely the external product is the aim, fulfills the requirements which were laid down earlie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iscussion of aims, interest, and thinking. (See Chapters VIII, X, XII.)

2．职业是有目的且连续不断的活动。比起其他学习方法，以职业为导向的教育自身最终能产生更多有利于学习的因素。这种教育方式完全不同于被动接受事物的教育模式，它能唤起人的本能和习性，使其发挥作用。另外，这样的教育一直要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取得成就。因此，这就需要人的不断思考，坚定地保持一个目标不放弃，使自己的职业活动不会变得平淡无味或反复无常。由于职业活动的进行必须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而不断发展的，因此每个阶段都需要敏锐的观察和巧妙的构思来克服困难，探索并使自己重新适应行动方法。简而言之，如果我们从事的职业是为了完成某项活动而不仅仅是得到外部产品，那么这项职业是能够满足我们以前在讨论目标、兴趣以及思想时所提出的要求。（参见第8、10、12章）

A calling is also of necessity an organizing principle for information and ideas; for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growth. It provides an axis which runs through an immense diversity of detail; it causes different experiences, facts, items of information to fall into order with one another. The lawyer, the physician, the laboratory investigator in some branch of chemistry, the parent, the citizen interested in his own locality, has a constant working stimulus to note and relate whatever has to do with his concern. He

unconsciously, from the motivation of his occupation, reaches out for all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holds to it. The vocation acts as both magnet to attract and as glue to hold. Such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is vital, because it has reference to needs; it is so expressed and readjusted in action that it never becomes stagnant. No classification, no se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facts, which is consciously worked out for purely abstract ends, can ever compare in solidity or effectiveness with that knit under the stress of an occupation; in comparison the former sort is formal, superficial, and cold.

职业也必须是信息与观念、知识与智力源源不断的来源。它给我们一个轴心，把大量不同的细节贯穿其中，使彼此相异的经验、事实和信息井井有条。律师、医生、埋头于实验室研究化学的学者、父母以及热衷于地方事业的公民，都有一种持续有效的动力源，激发他们关注与自己事业有关的一切事物并与之产生联系。受职业动机的激发，他们会不知不觉地设法寻找所有相关信息并加以保存。职业像磁铁一样吸收信息，又像胶水一样保存信息。这样一种组织知识的模式有生命力的：它与需求密切相关，表现于实际行动中，又在行动中重新调整，永远不会停滞不前。为了纯粹抽象的目的而有意识对事实进行的分类、选择和整理，无论在可靠性上还是在效果上都无法与迫于职业压力而展开的知识整合相比。相较而言，前一种方式是刻板、肤浅和乏味的。

3．The only adequate training for occupations is training through occupations. The principle stated early in this book (see Chapter VI) that the educative process is its own end, and that the only sufficient preparation for later responsibilities comes by making the most of immediately present life applies in full force to the vocational phases of education. The dominant vocation of all

human beings at all times is living—intellectual and moral growth. In childhood and youth, with their relative freedom from economic stress, this fact is naked and unconcealed. To predetermine some future occupation for which education is to be a strict preparation is to injure the possibilities of present development and thereby to reduce the adequacy of preparation for a future right employment. To repeat the principle we have had occasion to appeal to so often, such training may develop a machine-like skill in routine lines (it is far from being sure to do so, since it may develop distaste, aversion, and carelessness), but it will be at the expense of those qualities of alert observation and coherent and ingenious planning which make an occupation intellectually rewarding. In an autocratically managed society, it is often a conscious object to prevent the development of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a few do the planning and ordering, the others follow directions and are deliberately confined to narrow and prescribed channels of endeavor. However much such a scheme may inure to the prestige and profit of a class, it is evident that it limi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class; hardens and confin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through experience of the master class, and in both ways hampers the life of the society as a whole. (See ante, p. 304.)

3．唯一恰当的职业培训是在平时工作中得到的锻炼。本书在前面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原理（参见第6章），即教育的过程就是教育本身的目的，充分利用当下的生活是对未来职责所能做的唯一充分的准备。这一原理完全适用于教育的职业方面。一直以来，人类主要的工作便是生活——即智力和道德的成长。在相对没有经济压力的人类幼儿和青少年时期，这一事实更是显而易见。提前决定年轻人未来的职业，使教育为之做严格的准备，会损害其现阶段发展的可能性，削弱对未来适当职业的充分准备。再次重复我们讲过多次的原理：这样的训练也许能培养机械呆板的技能（这也不一定，因为这种训练可能使

人厌恶、反感以及漫不经心）。但这是以受训者丧失具有智力价值的敏锐职业观察力和条理清晰、构思巧妙的职业规划力为代价的。在专制社会中，统治阶级经常蓄意阻碍自由和责任感的发展。少数人制订计划，发号施令，其余的人则服从指令，并被有意限制于从事少数规定好的职业。不管这制度对统治阶级的声望和利益有多大的好处，它明显地限制了被统治阶级的发展，剥夺和限制了被统治阶级学习统治阶级经验的机会，在两方面束缚了整个社会的生活。（参见原书304页）

The only alternative is that all the earlier preparation for vocations be indirect rather than direct; namely, through engaging in those active occupations which are indicated by the needs and interests of the pupil at the time.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re be on the part of the educator and of the one educated a genuine discovery of personal aptitudes so that the proper choice of a specialized pursuit in later life may be indicated. Moreover, the discovery of capacity and aptitude will be a constant process as long as growth continues. It is a conventional and arbitrary view which assumes that discovery of the work to be chosen for adult life is made once for all at some particular date. One has discovered in himself, say, an interest,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in the things which have to do with engineering and has decided to make that his calling. At most, this only blocks out in outline the field in which further growth is to be directed. It is a sort of rough sketch map for use in direction of further activities. It is the discovery of a profession in the sense in which Columbus discovered America when he touched its shores. Future explorations of an indefinitely more detailed and extensive sort remain to be made. When educators conceive vocational guidance as something which leads up to a definitive, irretrievable, and complete choice, both education and the chosen vocation are likely to be rigid, hampering

further growth. In so far, the calling chosen will be such as to leave the person concerned in a permanently subordinate position, executing the intelligence of others who have a calling which permits more flexible play and readjustment. And while ordinary usages of language may not justify terming a flexible attitude of readjustment a choice of a new and further calling, it is such in effect. If even adults have to be on the lookout to see that their calling does not shut down on them and fossilize them, educators must certainly be careful that the vocational preparation of youth is such as to engage them in a continuous reorganization of aims and methods.

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法就是让所有早期职业准备都是间接进行，而不是与某具体职业直接相关；并让学生从事他们当前感兴趣和需要的活动。只有这样，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才能真正发现个人的天赋和才能，从而对未来的职业做出正确的选择。此外，只要人继续成长，对其才能和天赋的探索与发现将是个持续的过程。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会在某一特定日期一劳永逸地决定成年后的职业。这种观点是迂腐和武断的。例如，有人发现自己对与土木工程相关的事物感兴趣（认为这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社会意义），于是决定从事工程方面的职业。他这样做，最多只是大致规划出自己未来成长的方向。这只是一幅用来指导将来活动的蓝图。这种职业发现就如同哥伦布刚踏上美洲海岸就说发现了美洲大陆。事实上，还有待于对无限的未来进行更为详尽和广泛的探索。当教育者认为，职业指导能使人做出完整的、不可逆转的最终选择，教育本身和所选职业很可能会变得僵化，阻碍人进一步发展。在此情况下所选的职业会使人永远处于从属地位，服从别人指挥，而这些发号施令者却拥有能使其灵活发挥和重新调整的职业。尽管我们平时所用语言不把人们重新调整的灵活态度称为未来新职业的选项，但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如果即使成年人也必须保持警惕以防职业压垮自己，使自己僵化，教育者就必须格外小心，以确保年轻人的职业准备能使他们持续组织规划他们的目标和方法。

3．Present Opportunities and Dangers.

三、当前的机遇和危险

In the past, education has been much more vocational in fact than in name.

过去的教育名称上不叫职业教育，而实际上却更有职业性。

(i) The education of the masses was distinctly utilitarian. It was called apprenticeship rather than education, or else just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The schools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three R's in the degree in which ability to go through the forms of reading, writing, and figuring were common elements in all kinds of labor. Taking part in some special line of work, under the direction of others, was the out-of-school phase of this education. The two supplemented each other; the school work in its narrow and formal character was as much a part of apprenticeship to a calling as that explicitly so termed.

1．大众教育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其说这是教育，不如称之为学徒训练，或者是从经验中学习。学校专门教学生阅读、写作和算术，这是所有劳动所必须掌握的三种能力。在别人指导下从事一些特别的工作是这种教育模式在校外阶段的任务。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辅相成。在校内进行的教育工作内容有限，流于表面，充其量只能算是学徒式职业训练的一部分。

(ii)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e education of the dominant classes was essentially vocational—it only happened that their pursuits of ruling and of enjoying were not called professions. For only those things were named vocations or employments which involved manual labor, laboring for a reward in keep, or its commuted money equivalent, or the rendering of personal services to specific persons. For a long time, for example, the profession of the surgeon and physician ranked almost with that of the valet or barber—partly because it had so much to do with the body, and partly because it involved rendering direct service for pay to some definite person. But if we go behind words, the business of directing social concerns, whether politically or economically, whether in war or peace, is as much a calling as anything else; and where education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under the thumb of tradition, higher schools in the past have been upon the whole calculated to give preparation for this business. Moreover, display, the adornment of person, the kind of social companionship and entertainment which give prestige, and the spending of money, have been made into definite callings. Unconsciously to themselves the higher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have been made to contribute to preparation for these employments. Even at present, what is called higher education is for a certain class (much smaller than it once was) mainly preparation for engaging effectively in these pursuits.

2．统治阶级接受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职业教育——只是他们对权力和物质的追求并不被称为职业。只有那些为了获取报酬维持生计，为了得到相应的金钱等价物，或者为了给特殊人群提供个人服务的体力劳动才被称为职业或工作。例如，长期以来，内外科医生的职业几乎相当于仆人和理发师的职业—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该职业与人的身体密切相关，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医生是为获取报酬向特定人群

提供直接服务。如果进一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管理社会事务这一事业，不管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都和其他任何事业一样，也是一种职业。过去高等院校中的教育并没有完全拘泥于传统习俗，高校从整体上来看是为这种管理社会事务的事业做准备的。此外，能聚集人气的炫耀夸示、个人打扮、社会交际和招待应酬以及如何消费，都已成为明确的职业。高校的存在就是为这些职业做准备的，很多高等教育机构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是现在，所谓高等教育也只是针对某一阶层的人（人数比以前少多了），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为有效从事诸如此类的事做准备。

In other respects, it is largely, especially in the most advanced work, training for the calling of teaching and special research. By a peculiar superstition, education which has to do chiefly with preparation for the pursuit of conspicuous idleness, for teaching, and for literary callings, and for leadership, has been regarded as non-vocational and even as peculiarly cultural. The literary training which indirectly fits for authorship, whether of books, newspaper editorials, or magazine articles, is especially subject to this superstition: many a teacher and author writes and argues in behalf of a cultural and humane education against the encroachments of a specialized practical education, without recognizing that his own education, which he calls liberal, has been mainly training for his own particular calling. He has simply got into the habit of regarding his own business as essentially cultural and of overlooking the cultural possibilities of other employments. At the bottom of these distinctions is undoubtedly the tradition which recognizes as employment only those pursuits where one is responsible for his work to a specific employer, rather than to the ultimate employer, the community.

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高端领域，高等教育主要是提供教学以及专题研究方面的职业训练。有一种奇怪的迷信，即，如果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追求悠闲生活的人物、如教师、作家和领导人等，这样的教育就被视为非职业性的，甚至被认为与特殊的文化修养有关。间接适宜于作家这一职业的文学训练，无论是著书，撰写社论还是为期刊写文章，尤其容易受上述迷信的影响。许多教师和作家写文章为人文主义教育辩护，抵制专业性实用教育的侵入。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口称受到过的自由教育其实主要是为自己特定职业所做的培训。他们已经习惯将自己的职业视为具有文化含量的职业，而忽视其他职业可能也有的文化含量。这些差异很可能源于这样一种传统观念，即只有当受雇于某一特定的雇主，而不是受雇于社会这一最终的雇主，才被认可是从事一种职业。

There are, however, obvious causes for the present conscious emphasis upon vocational education—for the disposition to make explicit and deliberate vocational implications previously tacit. (i)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is an increased esteem, in democratic communities, of whatever has to do with manual labor, commercial occupations, and the rendering of tangible services to society. In theory, men and women are now expected to do something in return for their support—intellectual and economic—by society. Labor is extolled; service is a much-lauded moral ideal. While there is still much admiration and envy of those who can pursue lives of idle conspicuous display, better moral sentiment condemns such liv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use of time and personal capacity is more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n it used to be.

目前有意识地强调职业教育，并且要把过去隐而不露的职业含义显现出来，审慎实施，这是由于以下几个显著原因：首先，民主社会对凡是与体力劳动、商业工作以及向社会提供有形服务等相关的职业

越发尊重。理论上，我们都期望人们无论男女都能有所作为，以回报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智力与经济支持。劳动受人赞美，服务大众是广受称颂的道德理想。尽管仍有人羡慕和嫉妒那些能够追求安逸浮夸生活的人，但更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之不屑一顾。合理利用时间和个人能力担负社会责任已被广为接受。

(ii) In the second place, those vocations which are specifically industrial have gained tremendously in importance in the last century and a half. 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e are no longer domestic and local, and consequently more or less incidental, but are world-wide. They engage the best energies of an increasingly large number of persons. The manufacturer, banker, and captain of industry have practically displaced a hereditary landed gentry as the immediate directors of social affairs.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djustment is openly industrial, having to do with the relations of capital and labor. The great increase in the social importance of conspicuous industrial processes has inevitably brought to the front questions having to do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schooling to industrial life. No such vast social readjustment could occur without offering a challenge to an education inherited from different social conditions, and without putting up to education new problems.

其次，在过去的150年中，与产业相关的职业已经变得极其重要。制造业和商业不再是或多或少纯属偶然的家庭作坊式或地区性产业，而已经成为世界性产业。越来越多的人为之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制造商、银行家以及企业巨头实际上已经取代世袭的地方贵族成为社会事务的直接决策者。社会再调整其实就是产业问题，与劳资关系密切相关。产业过程社会重要性的大幅提高不可避免地使得学校教育与产业生活的关系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如此广泛的社会再调整必然要向从不同社会状况继承下来的教育提出挑战，对教育提出很多新问题。

(iii) In the third place, there is the fact already repeatedly mentioned: Industry has ceased to be essentially an empirical, rule-of-thumb procedure, handed down by custom. Its technique is now technological: that is to say, based upon machinery resulting from discoveries in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bacteriology, etc. The economic revolution has stimulated science by setting problems for solution, by producing greater intellectual respect for mechanical appliances. And industry received back payment from science with compound interest. As a consequence, industrial occupations have infinitely greater intellectual content and infinitely larger cultural possibilities than they used to possess. The demand for such education as will acquaint workers with the scientific and social bases and bearings of their pursuits becomes imperative, since those who are without it inevitably sink to the role of appendages to the machines they operate. Under the old regime all workers in a craft were approximately equals in their knowledge and outlook. Personal knowledge and ingenuity were developed within at least a narrow range, because work was done with tools under the direct command of the worker. Now the operator has to adjust himself to his machine, instead of his tool to his own purposes. While the intellectual possibilities of industry have multiplied, industrial conditions tend to make industry, for great masses, less of an educative resource than it was in the days of hand production for local markets. The burden of realizing the intellectual possibilities inhering in work is thus thrown back on the school.

再者，我们曾反复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现在的工业已经不再是靠惯例相传，由经验主义主导或者单凭经验操作的程序。如今的工业技术已经成为工业科技。也就是说，是以机械为基础，而正是在数学、

物理、化学以及细菌学等领域的发现才造就了机械的产生和发展。经济革命提出了一些问题以寻求解决方法，并为机械装置赢得更多理性的尊重。通过这样的方式，经济革命刺激了科学的发展。得益于科学的发展，工业也得到了成倍的回报。因此，工业职业较之以前拥有了无限多的智力内涵以及无限大的文化空间。教育能使工人了解他们职业的科学与社会基础，以及职业的意义。如今对这种教育的需要变得非常迫切。缺乏教育，工人就会不可避免地沦为他们操作的机器的傀儡。在旧的社会制度之下，同一行业的所有工人掌握的知识以及持有的观点大致相等。他们个人的知识和智慧能够有所发展，尽管空间很小，因为工作是在他们自己直接控制下通过工具完成的。现在的工人必须要调整自己以适应其操作的机器，而不再是调整工具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尽管工业的知识内涵迅速增长，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工业的状况往往使其不再像以前为本地市场从事手工生产的时代那样成为具有教育意义的资源。因此，实现工作内在智力活动可能性的这个任务又转交给了学校。

(iv) In the fourth place,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has become, in science, more experimental, less dependent upon literary tradition, and less associated with dialectical methods of reasoning, and with symbols. As a result, the subject matter of industrial occupation presents not only more of the content of science than it used to, but greater opportunity for familiarity with the method by which knowledge is made. The ordinary worker in the factory is of course under too immediate economic pressure to have a chance to produce a knowledge like that of the worker in the laboratory. But in schools, association with machines and industrial processes may be had under conditions where the chief conscious concern of the students is insight. The separation of shop and laboratory, where these conditions are fulfilled, is largely conventional, the laboratory having the advantage of permitting the following up of any intellectual interest a problem may suggest; the shop the advantage

of emphasizing the social bearings of the scientific principle, as well as, with many pupils, of stimulating a livelier interest.

第四，科学对知识的追求变得更具实验性，更少依赖文学传统，更少与辩证推理方法以及符号发生联系。于是，工业职业这一主题不仅呈现出更多的科学内涵，还为了解知识产生的方式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工厂里的普通工人面临的经济压力很大，他们当然不可能像实验室里的工人那样有机会直接创造知识。但是，在学校，如果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增长见识，就可以让他们接触各种机械和工业制造流程。工厂车间和学校实验室都能满足这些条件（都可以增长见识），将这两者区分开来主要是受传统的约束。学校实验室的优势在于允许对问题所暗含的所有知识兴趣探究到底；工厂车间的优势在于重视科学原理的社会作用，并且能够激发学生更浓厚的兴趣。

(v) Finally, the advances which have been made in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in general and of childhood in particular fall into line with the increased importance of industry in life. For modern psychology emphasizes the radical importance of primitive unlearned instincts of exploring, experimentation, and 'trying on. ' It reveals that learning is not the work of something ready-made called mind, but that mind itself is an organization of original capacities into activities having significance.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Ante, p. 239), in older pupils work is to educative development of raw native activities what play is for younger pupils. Moreover, the passage from play to work should be gradual, not involving a radical change of attitude but carrying into work the elements of play, plus continuous reorganization in behalf of greater control. The reader will remark that these five points practically resume the main contentions of the previous part of the work. Both practically and philosophically, the key to the present

educational situation lies in a gradual reconstruction of school materials and methods so as to utilize various forms of occupation typifying social callings, and to bring out their intellectual and moral content. This reconstruction must relegate purely literary methods—including textbooks—and dialectical methods to the position of necessary auxiliary tools in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consecutive and cumulative activities.

最后，在学习心理学尤其是儿童心理学所取得的成就与工业在人类生活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是一致的。现代心理学强调的是探索，实验以及不断尝试的人类原始本能的重要性。现代心理学揭示，学习并非一种现成的叫做心智的因素在起作用，智力本身是原始能力构成的一种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参见原书第239页），正如游戏对于年幼学生一样，工作对于年龄较大的学生是对其未经训练的本能具有教育意义的拓展。此外，从游戏到工作的转换过程应当是循序渐进的，不包括态度的根本改变，而应当是将游戏元素逐渐融入工作中去，并不断重新组织整理以获得更好的控制力。读者也许会说，上述五点实际上是延续了本书前一部分的主要论点。不管从实际出发还是从哲学意义上讲，解决当前教育状况的关键在于需要逐步改革学校的教材和方法，以便更好地利用代表社会工作的各种职业形式，凸显其知识和道德内容。这种改革必须把纯文学方法——包括教材——以及辩证法归类于连续累积性活动智力发展中必要的辅助工具位置。

But our discussion has emphasized the fact that this educational reorganization cannot be accomplished by merely trying to give a technical preparation for industries and professions as they now operate, much less by merely reproducing existing industrial conditions in the school. The problem is not that of making the schools an adjunct to manufacture and commerce, but of utilizing the factors of industry to make school life more active,

more full of immediate meaning, more connected with out-of-school experience. The problem is not easy of solution. There is a standing danger that education will perpetuate the older traditions for a select few, and effect its adjustment to the newer economic conditions more or less on the basis of acquiescence in the untransformed, unrationalized, and unsocialized phases of our defective industrial regime. Put in concrete terms, there is danger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will be interprete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s trade education: as a means of securing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specialized future pursuits. Education would then become an instrument of perpetuating unchanged the existing industrial order of society, instead of operating as a means of its transformation. The desired transformation is not difficult to define in a formal way. It signifies a society in which every person shall be occupied in something which makes the lives of others better I worth living, and which accordingly makes the ties which bind persons together more perceptible—which breaks I down the barriers of distance between them. It denotes a state of affairs in which the interest of each in his work is uncoerced and intelligent: based upon its congeniality to his own aptitudes.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we are far from such a social state; in a literal and quantitative sense, we may never arrive at it. But in principle, the quality of social changes already accomplished lies in this direction. There are more ample resources for its achievement now than ever there have been before. No insuperable obstacles, given the intelligent will for its realization, stand in the way.

但我们的讨论已经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像现在这样仅仅为工业和职业提供技术上的准备是不可能完成教育改革的。仅仅在学校中复制或模拟现有的工业条件，教育改革实现的可能性则更小。要解决问题就不是要把学校变成制造业与商业的附属品，而是要利用产业因素

将校园生活变得更活跃，更富有现实意义，与校外经验的联系更紧密。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长久以来，一直有这样一种危险，即教育将永远沿袭为少数人而设的旧传统，并在默认我们不完善的工业制度具有未转型、未合理化以及未社会化等缺陷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具体说来，这样的危险就是，职业教育将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被解释为商业教育，被看成作为获得未来专业化职业技术效率的手段。于是，教育就变成维持社会现有工业秩序不变的工具，而不是成为工业改革的手段。对我们渴望的改革做出正式解释并不困难。这样的改革标志着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从事某项职业，使他人的生活更有意义，使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更显而易见，从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这种改革还标志着一种社会形态，即每个人对其工作的兴趣都不是勉强的而是明智的，每个人的工作都与其能力倾向志趣相投。不言而喻，我们离这样的社会形态还有遥远的距离。从字面意义和从数量意义上看，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达到这样的社会形态。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已经完成的社会改革的性质是符合这个方向的。如今我们拥有前所未有充足的资源以达到上述社会形态。如果我们有实现此社会形态的决心，就没有什么不能跨越的障碍。

Success or failure in its realization depends more upon the adoption of educational methods calculated to effect the change than upon anything else. For the change is essentially a change in the quality of mental disposition—an educative chang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can change character and mind by direct instruction and exhortation, apart from a change in industri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Such a conception contradicts our basic idea that character and mind are attitudes of participative response in social affairs. But it does mean that we may produce in schools a projection in type of the society we should like to realize, and by forming minds in accord with it gradually modify the larger and more recalcitrant features of adult society. Sentimentally, it may

seem harsh to say that the greatest evil of the present regime is not found in poverty and in the suffering which it entails, but in the fact that so many persons have callings which make no appeal to them, which are pursued simply for the money reward that accrues. For such callings constantly provoke one to aversion, ill will, and a desire to slight and evade. Neither men's hearts nor their minds are in their work.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ho are not only much better off in worldly goods, but who are in excessive, if not monopolistic, control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many are shut off from equality and generality of social intercourse. They are stimulated to pursuits of indulgence and display; they try to make up for the distance which separates them from others by the impression of force and superior possession and enjoyment which they can make upon others.

能否达到这样的社会形态更多地取决于我们为了完成改革所采用的教育方式。改革在本质上其实是对人精神秉性的改变。这是一种具有教育意义的改革。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在不改变工业与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只通过直接教导与规劝就能改变人的性格与心理。这一看法与我们的基本观点——即人的性格和心理是其参与社会事务态度的反应——背道而驰。但是，我们的确可以在学校创造一个我们想要实现的社会缩影，通过塑造与之符合的心灵，逐渐改变成年社会牵涉范围更大，更难以变更的特征。当前社会制度最大的祸害不在于贫穷以及贫穷所包含的种种苦难，而在于事实上许多人的职业对他们毫无吸引力。他们从事这些职业只是为了获得金钱。从感情角度上讲，说出这样的事实似乎有点残酷。因为这样的职业常常令人反感，使人心存恶意，玩忽职守，逃避职责。他们的心思都没有放在工作上。另一方面，有些人不仅在物质远比他人富有，而且完全掌控着许多人的行为，与平等普通的社会交际活动完全隔离。他们沉溺于花天酒地，放纵奢靡的生活，企图通过炫耀自己的权力、个人财富与物质享受以拉近与他人的距离。

It would be quite possible for a narrowly conceived schem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perpetuate this division in a hardened form. Taking its stand upon a dogma of social predestination, it would assume that some are to continue to be wage earners under economic conditions like the present, and would aim simply to give them what is termed a trade education—that is, greater technical efficiency. Technical proficiency is often sadly lacking, and is surely desirable on all accounts—not merely for the sake of the production of better goods at less cost, but for the greater happiness found in work. For no one cares for what one cannot half do. But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a proficiency limited to immediate work, and a competency extended to insight into its social bearings; between efficiency in carrying out the plans of others and in one forming one's own. At present,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limitation characterizes both the employing and the employed class. While the latter often have no concern with their occupation beyond the money return it brings, the latter's outlook may be confined to profit and power. The latter interest generally involves much greater intellectual initiation and larger survey of conditions. For it involves the direction and combin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diverse factors, while the interest in wages is restricted to certain direct muscular movements. But none the less there is a limitation of intelligence to technical and non-humane, non-liberal channels, so far as the work does not take in its social bearings. And when the animating motive is desire for private profit or personal power, this limitation is inevitable. In fact, the advantage in immediate social sympathy and humane disposition often lies with the economically unfortunate, who have not experienced the hardening effects of a one-sided control of the affairs of others.

狭隘的职业教育计划很有可能会永远沿袭这种划分，使之根深蒂固。基于社会宿命论的教育计划认为，在像现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有些人就应该继续做工薪族。因此，只需简单地给他们灌输商业教育的内容——也就是使他们拥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即可。可悲的是，熟练的专业技术往往极度匮乏，而又十分需要。人们不仅能用它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优的产品，也能在工作中找寻更多的快乐。没有人喜欢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工作。有的人仅限于精通眼前的工作，有的人则具有深刻理解其工作社会影响的能力；有的人能卓有成效地执行他人的计划，有的人则能高效制定自己的计划。这两种人的能力或效率具有很大区别。目前，雇主与雇员都存在着智力与情感方面的局限。雇员往往只关注职业为他们带来的金钱回报，而雇主只重视利润与权力。雇主对利润与权力的追求往往包含了更多的知识创新以及对形势更为全面的调查。要想获得利润与权力，就需要对大量不同的因素进行管控和组合，而工资的获得只需要直接的体力劳动。但是，只要这工作没有承担社会责任，其智力局限就仅限于技术的、非人文、非自由渠道。当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谋取私利或个人权势时，这种局限性就变得不可避免。事实上，真正具有社会同情心、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往往是那些在经济上不幸的人，他们没有单方面控制他人事物这种具有负面影响的经历。

Any schem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take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from the industrial regime that now exists, is likely to assume and to perpetuate its divisions and weaknesses, and thus to become an instrument in accomplishing the feudal dogma of social predestination. Those who are in a position to make their wishes good, will demand a liberal, a cultural occupation, and one which fits for directive power the youth in whom they are directly interested. To split the system, and give to others, less fortunately situated, an education conceived mainly as specific trade preparation, is to treat the schools as an agency for transferring the ol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leisure, culture and service, mind and

body, directed and directive class, into a society nominally democratic. Such a vocational education inevitably discounts the scientific and historic human connections of the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dealt with. To include such things in narrow trade education would be to waste time; concern for them would not be 'practical. ' They ar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have leisure at command—the leisure due to superior economic resources. Such things might even be dangerous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ontrolling class, arousing discontent or ambitions 'beyond the station' of those working under the direction of others. But an education which acknowledges the full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meaning of a vocation would include instruction in the historic background of present conditions; training in science to give intelligence and initiative in dealing with material and agencies of production; and study of economics, civics, and politics, to bring the future worker into touch with the problems of the day and the various methods proposed for its improvement. Above all, it would train power of readaptation to changing conditions so that future workers would not become blindly subject to a fate imposed upon them. This ideal has to contend not only with the inertia of existing educational traditions, but also with the opposition of those who are intrenched in command of the industrial machinery, and who realize that such an educational system if made general would threaten their ability to use others for their own ends. But this very fact is the presage of a more equitable and enlightened social order, for it gives evidence of the dependence of social reorganization upon educational reconstruction. It is accordingly an encouragement to those believing in a better order to undertake the promotion of a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does not subject youth to the demands and standards of the present system, but which utilizes its scientific and social factors to develop a courageous intelligence, and to make intelligence practical and executive.

任何从现存工业制度出发的职业教育计划都有可能会认可并保留其阶级划分和种种缺陷，因而会沦为实现社会宿命论封建教条的工具。那些能够实现自己愿望的人将要求得到一份自由职业、一份能显示文化修养的职业、一份能使他们直接关注的青年拥有管理权力的职业。划分现有的教育制度，给那些处于不幸境地的人提供一种专门的行业预备教育，这种做法就是将学校作为一种机构，把旧时的劳动与休闲，文化修养与社会服务，精神与肉体，被指导阶级与指导阶级等划分方式转移到名义上的民主社会中去。这种职业教育不可避免地会忽视原材料与制造过程中的科学、历史和人文联系。把这些联系融入狭隘的行业教育中是浪费时间；关注这些联系也是不切实际的。这些联系是为那些有空闲时间支配的人准备的——之所以有空闲是因为他们有优越的经济实力。这些东西甚至可能会对统治阶级利益产生威胁，激起那些在他人指挥下工作劳动者的不满，进而产生超越其社会地位的野心。如果认可职业具有完全的知识意义和社会意义，这样的教育就会包含对当前形势历史背景的教学，包含为解决原材料和生产机构的问题提供智力支持与首创精神的科学训练；包含对经济学、公民学以及政治学的学习，以便让未来工人接触当前的问题并提出各种改进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教育将训练未来的工人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的能力，使他们不会盲目地听天由命。这样的教育理念不仅要与现存种种教育传统的惰性做斗争，也要面临那些高高在上地掌控着各种工业机构的人的反对和抵抗。这些人知道，一旦这样的教育制度得以普遍推广，将危及他们利用别人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但是，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预示着一个更为公平、更为开明的社会秩序的到来。事实表明，社会改革还是首先要依赖教育改革。这对于那些坚信一个更好的社会秩序终会到来的人们是一种鼓励，鼓励他们承担起推广职业教育的重任。职业教育让青年人不再受当前制度的规章与标准的限制，而能利用其科学与社会因素以培养青年人的胆识，并将这种胆识变得有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

Summary.

总结

A vocation signifies any form of continuous activity which renders service to others and engages personal powers in behalf of the accomplishment of results. The question of the relation of vocation to education brings to a focus the various problems previously discussed regarding the connection of thought with bodily activity; of individual conscious development with associated life; of theoretical culture with practical behavior having definite results; of making a livelihood with the worthy enjoyment of leisure. In general, the opposition to recognition of the vocational phases of life in education (except for the utilitarian three R's in elementary schooling) accompanies the conservation of aristocratic ideals of the past. But, at the present juncture, there is a movement in behalf of something called vocational training which, if carried into effect, would harden these ideas into a form adapted to the existing industrial regime. This movement would continue the traditional liberal or cultural education for the few economically able to enjoy it, and would give to the masses a narrow technical trade education for specialized callings, carried on under the control of others. This scheme denotes, of course, simply a perpetuation of the older social division, with its counterpart intellectual and moral dualisms. But it means its continuation under conditions where it has much less justification for existence. For industrial life is now so dependent upon science and so intimately affects all forms of social intercourse, that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to utilize it for development of mind and character. Moreover, a right educational use of it would react upon intelligence and interest so as to modify, in connection with legis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the socially obnoxious features of the present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order. It would turn the increasing fund of social sympathy to constructive account, instead of leaving it a somewhat blind philanthropic sentiment.

职业就是指任何形式的持续性活动，这种活动既能为他人提供服务，还能凭借个人力量取得某种成果。职业与教育的关系又使我们聚焦之前讨论过的许多问题，比如，关于思维与身体活动的关系、个体意识发展与相关生活的关系、理论修养与会造成具体结果的实际行为的关系、维持生计与安逸享乐的关系等。一般来说，人们不承认教育存在职业因素（除了小学教学中具有实用性质的阅读、写作、算术以外），是由于保存有从前贵族主义的思想。但是，现在有一项致力于推动职业训练的运动，如果职业训练付诸实施，将会让这些思想观点变得适应于现存的工业制度。这项运动将会继续为少数有经济能力的人提供传统的自由教育或文化修养教育，而给大多数人提供狭义的技术职业教育以胜任某些在他人控制之下完成的专业化工作。当然，这一计划只是沿袭了旧时的社会分工，而与之相对应的便是智力与道德二元论。这就意味着这项计划将会一直进行，即便在它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现今的工业生活十分依赖科学，并且密切影响着各种形式的社会交际活动，因此我们有机会利用工业生活来培养人的心理和性格。此外，工业生活在教育上的正确运用将影响人的智力和兴趣，再加上立法和行政措施，就足以改变现在工商业制度有害于社会的弊端。它能将日益增长的社会同情心变得真正有建设性价值，而不是任由其发展成为一种盲目的仁爱情感。

It would give those who engage in industrial callings desire and ability to share in social control, and ability to become masters of their industrial fate. It would enable them to saturate with meaning the technical and mechanical features which are so marked a feature of our machine system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So much for those who now have the poorer economic opportunities.

With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ore privileged portion of the community, it would increase sympathy for labor, create a disposition of mind which can discover the culturing elements in useful activity, and increase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crucial position of the ques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present is due, in other words, to the fact that it concentrates in a specific issue two fundamental questions:—Whether intelligence is best exercised apart from or within activity which puts nature to human use, and whether individual culture is best secured under egoistic or social conditions. No discussion of details is undertaken in this chapter, because this conclusion but summarizes the discussion of the previous chapters, XV to XXII, inclusive.

这也会带给那些从事工业职业的人分享社会控制力的欲望与能力，并使他们能够主宰自己的职业命运。与此同时，还将使他们了解机器生产和分配制度所特有的技术和机械特征的意义。对于那些因缺乏机遇而在经济上遭遇不幸的人们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对于社会中享有特权的那部分人来说，把工业生活正确地运用在教育上，能引起人们对工人更多的同情，使他们产生一种心理倾向，在有益的活动中发现文化修养的因素，并增加社会责任感。换句话说，如今职业教育问题之所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因为职业教育主要关注两大基本问题：一是人的智力得到最好锻炼之时是在人类利用大自然的活动之外还是人类利用大自然的活动之中？二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条件下还是在社会条件下，最能获得个人修养？本章这一点没有详细讨论，只是对前面章节所讨论的内容（包括第十五章到第二十二章）进行了总结与概括。

Chapter 24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第二十四章　教育哲学

1．A Critical Review.

一、批判性的回顾

Although we are dealing with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no definition of philosophy has yet been given; nor has there been an explicit consideration of the nature of 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This topic is now introduced by a summary account of the logical order implied in the previous discussions, for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out the philosophic issues involved. Afterwards we shall undertake a brief discussion, in more specifically philosophical terms, of the theories of knowledge and of morals implied in different educational ideals as they operate in practice.

尽管我们正在讨论教育哲学，但对于哲学的定义，我们还没有下结论，也还没有详细考虑教育哲学的性质。我们先简要叙述前面讨论中包含的逻辑顺序，以便引出其中的哲学问题。然后，我们将以更加专业的哲学术语，对教育实践中不同的教育理念所包含的认识论和道德论进行简要地讨论。

The prior chapters fall logically into three parts.

前面的章节按逻辑顺序可分为三个部分：

I . The first chapters deal with education as a social need and function. Their purpose is to outline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education as the process by which social groups maintain their continuous existence. Education was shown to be a process of renewal of the meanings of experience through a process of transmission, partly incidental to the ordinary companionship or intercourse of adults and youth, partly deliberately instituted to effect social continuity. This process was seen to involve control and growth of both the immature individual and the group in which he lives. This consideration was formal in that it took no specific accou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social group concerned—the kind of society aiming at its own perpetuation through education. The general discussion was then specified by application to social groups which are intentionally progressive, and which aim at a greater variety of mutually shared interests in distinction from those which aim simply at the preservation of established customs. Such societies were found to be democratic in quality, because of the greater freedom allowed the constituent members, and the conscious need of securing in individuals a consciously socialized interest, instead of trusting mainly to the force of customs operating under the control of a superior class. The sort of education appropria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democratic community was then explicitly taken as the criterion of the further,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f education.

1．最初几章把教育看作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职能，其目的是勾画出教育作为社会群体维持其持续存在过程的一般特征。教育就是通过传递使经验意义得以重建的过程，这种传递过程，一部分是在成年

人和青年之间日常的伙伴关系或交往过程中偶然产生的，一部分是在深思熟虑后建立的，以便实现社会的延续。这个过程既涉及未成年人的管理和成长，也涉及他们所在群体的管理和成长。这是一般性的讨论，它并没有专门考虑有关社会群体的诉求——这些人想通过教育使自身得以永久延续。然后，这种一般性讨论被具体应用到有意识要求进步的社会群体，这些人与那些仅仅想保存已经建立的习俗的群体不同，其目的在于形成广泛多样、相互分享的兴趣。这种社会群体具有民主性质，因为他们容许其成员拥有更大的自由，并且意识到需要使每个人有意识地对社会感兴趣，而不是主要依靠上等阶级的控制让传统势力起作用。我们将把这些适合于民主社会发展的教育作为进一步详细分析教育的标准。

II . This analysis, based upon the democratic criterion, was seen to imply the ideal of a continuous reconstruction or reorganizing of experience, of such a nature as to increase its recognized meaning or social content, and as to increase the capacity of individuals to act as directive guardians of this reorganization. (See Chapters VI—VII.) This distinction was then used to outline the respective characters of subject matter and method. It also defined their unity, since method in study and learning upon this basis is just the consciously directed movement of reorganizat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experienc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main principles of method and subject matter of learning were developed (Chapters XIII-XIV).

2．这种基于民主标准的分析被视为必然包含对经验不断改造或改组的理想，一方面了增加经验的公认意义或社会内容，同时增加了个体作为指导这种改造的保护者的能力。（参见第6章至第7章）这特性被用于概述教材和方法各自的性质，同时也用来说明教材和方法的统一性，因为在此基础上的学习方法正是对经验题材有意识、有指导

的改造运动。有关学习题材和学习方法的主要原则就是基于此发展而来的。（参见第13章至14章）。

III．Save for incidental criticisms designed to illustrate principles by force of contrast, this phase of the discussion took for granted the democratic criter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resent social life. In the subsequent chapters (XVIII-XXIII) we considered the present limitations of its actual realization. They were found to spring from the notion that experience consists of a variety of segregated domains, or interests, each having its own independent value, material, and method, each checking every other, and, when each is kept properly bounded by the others, forming a kind of 'balance of powers' in education. We then proceeded to an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assumptions underlying this segregation. On the practical side, they were found to have their cause in the divisions of society into more or less rigidly marked-off classes and groups—in other words, in obstruction to full and flexibl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intercourse. These social ruptures of continuity were seen to have their intellectual formulation in various dualisms or antitheses—such as that of labor and leisure, practical and intellectual activity, man and nature, individuality and association, culture and vocation. In this discussion, we found that these different issues have their counterparts in formulations which have been made in classic philosophic systems; and that they involve the chief problems of philosophy—such as mind (or spirit) and matter, body and mind, the mind and the world, the individual and his relationships to others, etc. Underlying these various separations we found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 to be an isolation of mind from activity involving physical conditions, bodily organs, material appliances, and natural objects. Consequently, there was indicated a philosophy which recognizes the origin, place, and function of mind

in an activity which controls the environment. Thus we have completed the circuit and returned to the conceptions of the first portion of this book: such as the biological continuity of human impulses and instincts with natural energies; the dependence of the growth of mind upon participation in conjoint activities having a common purpose; the influence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uses made of it in the social medium; the necessity of utilization of individual variations in desire and thinking for a progressively developing society; the essential unity of method and subject matter; the intrinsic continuity of ends and means; the recognition of mind as thinking which perceives and tests the meanings of behavior. These conception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hilosophy which sees intelligence to be the purposive reorganization, through action, of the material of experience; and they are inconsistent with each of the dualistic philosophies mentioned.

3．除了通过对比来阐述的原则而偶然进行批评以外，这个阶段的讨论把民主标准及其在目前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在随后的各章（第18章至23章），我们考虑了目前在实现民主标准时存在的限制。这种限制源于把经验看作包括很多彼此分离的领域或兴趣，每一领域或兴趣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材料和方法，互相牵制。当每个领域都受到其他领域正当的约束时，就形成教育上的“均势”。于是，我们进而对包含在这种分离中的各种假设进行分析。在实践方面，这些分离现象源于社会被分成截然不同的阶级和集团，也就是说，社会之间充分和灵活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流受到阻碍。这种社会连续性的破裂现象在哲学上的表述就是各种各样的二元论或对立，例如，劳动和休闲的对立、实践活动与智力活动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个人与集体的对立、文化修养与职业的对立。我们在讨论中发现，这些争论的问题在各派古典哲学体系中都有相对应的表述。它们包括哲学上的许多主要问题——例如精神与物质，身与心，心理与世

界，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等。这些不同划分的背后，我们发现一个基本的假设，主张心灵与涉及物质环境、身体器官、材料用具以及自然物体的活动彼此独立。因此，有一派哲学承认心灵的起源、地位和作用就存在于控制环境的活动之中。这样，我们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本书第一部分的概念，例如，人类的冲动和本能与自然力在生物学上的连续性；心理成长依赖于参与具有共同目标的集体活动；物质环境通过在社会环境的运用所产生的影响；利用在渐进发展中的社会愿望和思维中的个别差异的必要性；教学方法与教学题材的必要统一；目的与手段的固有联系；承认心灵是理解和检验行为意义的思维。这些概念与把智力看作经验材料通过行动而进行有目的改组的哲学是高度一致的；而与上面所提到的每一种二元论哲学都格格不入。

2．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二、哲学的本质

Our further task is to extract and make explicit the idea of philosophy implicit in these considerations. We have already virtually described, though not defined, philosophy in terms of the problems with which it deals; and we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se problems originate in the conflicts and difficulties of social life. The problems are such things as the relations of mind and matter, body and soul; humanity and physical nature;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al; theory—or knowing, and practice—or doing.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s which formulate these problems record the main lineaments and difficultie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practice. They bring to explicit consciousness what men have come to think, in virtue of the quality of their current experience, about nature, themselves, and the reality they conceive to include or to govern

both. As we might expect, then, philosophy has generally been defined in ways which imply a certain totality, generality, and ultimateness of both subject matter and method. With respect to subject matter, philosophy is an attempt to comprehend—that is, to gather together the varied details of the world and of life into a single inclusive whole, which shall either be a unity, or, as in the dualistic systems, shall reduce the plural details to a small number of ultimate principles. On the side of the attitude of the philosopher and of those who accept his conclusions, there is the endeavor to attain as unified, consistent, and complete an outlook upon experience as is possible. This aspect is expressed in the word 'philosophy'—love of wisdom. Whenever philosophy has been taken seriously, it has always been assumed that it signified achieving a wisdom which would influence the conduct of life. Witness the fact that almost all ancient schools of philosophy were also organized ways of living, those who accepted their tenets being committed to certain distinctive modes of conduct; witness the intimate connection of philosophy with the theology of the Roman church in the middle ages, its frequent association with religious interests, and, at national crises, its association with political struggles. This direct and intimate connection of philosophy with an outlook upon life obviously differentiates philosophy from science. Particular facts and laws of science evidently influence conduct. They suggest things to do and not do, and provide means of execution. When science denotes not simply a report of the particular facts discovered about the world but a general attitude toward it—as distinct from special things to do—it merges into philosophy. For an underlying disposition represents an attitude not to this and that thing nor even to the aggregate of known things, but to the considerations which govern conduct.

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要提炼和总结出有关教育的哲学含义。事实上，虽然我们尚未给哲学下定义，但我们已经按照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对其进行了描述。而且我们已经指出，这些问题都来源于社会生活中的冲突和困难。有这样一些问题，如心与物的关系；身体与灵魂的关系；人性与然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理论与实践或知与行的关系。阐述这些问题的各种哲学体系记载着当代社会实践中的主要面貌和困难。这些哲学体系明确地认识到，人们凭藉他们当时经验的性质已经考虑到了自然、他们自己、他们想包括或控制的自然和他们自己的实现。所以，正如我们所料，一般解释哲学的方式都在材料和方法方面包含一定的总体性、普遍性和终极性。就材料来说，哲学想要理解，即搜集打关世界和生活的千变万化情况。构成一个单一的包罗万象的整体。这个整体必须或者是一个统一体或像在二元论的哲学体系中，必须把很多细节归结为少量终极的原理。在哲学家的态度和接受他的结论的人的态度方面，他们总想尽可能获得一个统一的、前后一致的和完整的经验观。“哲学”——爱智——一词就表现这方面的意义。无论何时，如采我们认真地理解哲学，我们总是假定哲学是要造成彩响人生行为地智慧。试看这样的事实：所有古代的哲学流派几乎都是有组织的生活方式，那些承认各派哲学的信条的人，都信守某些特定的行为方式：再看一下欧洲中世纪时哲学与罗马教会神学的密切联系，哲学与宗教利益的经常的联系，以及在民族危机时刻哲学与政治斗争的联系，即可证明。

Hence philosophy cannot be defined simply from the side of subject matter. For this reason, the definition of such conceptions as generality, totality, and ultimateness is most readily reached from the side of the disposition toward the world which they connote. In any literal and quantitative sense, these terms do not apply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knowledge, for completeness and finality are out of the question. The very nature of experience as an ongoing, changing process forbids. In a less rigid sense, they apply to science rather than to philosophy. For obviously it is to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anthropology, history, etc. that we must go, not to philosophy, to find out the facts of the world. It is for the sciences to say what generalizations are tenable about the world and what they specifically are. But when we ask what sort of permanent disposition of action toward the world the scientific disclosures exact of us we are raising a philosophic question.

因此，哲学不能仅仅从题材这一方面来定义。对于概括性、总体性和终极性这些概念，最好从性格倾向以及性情所包含的世界这个方面来定义。从任何字面或者量化意义上讲，这些概念都不能应用到知识题材中，因为绝对的完整和终极性是无法实现的。经验作为一个永不停止、不断变化的过程，经验的这个性质不容许有所谓完整性和终极性。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这些名词可用于科学，但不能用于哲学。显然，要探寻世界的真相，我们必须求助于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等，而不是求助于哲学。有关世界的种种概括哪些是可以保持的，这些概括具体指的什么，这些都是科学要回答的问题。但是，当询问科学上的种种发现要求我们对世界应永远抱有何种倾向时，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otality' does not mean the hopeless task of a quantitative summation. It means rather consistency of mode of response in reference to the plurality of events which occur. Consistency does not mean literal identity; for since the same thing does not happen twice, an exact repetition of a reaction involves some maladjustment. Totality means continuity—the carrying on of a former habit of action with the readaptation necessary to keep it alive and growing. Instead of signifying a ready-made complete scheme of action, it means keeping the balance in a multitude of diverse actions, so that each borrows and gives significance to every other. Any person who is open-minded

and sensitive to new perceptions, and who has concentr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in connecting them has, in so far, a philosophic disposition. One of the popular senses of philosophy is calm and endurance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y and loss; it is even supposed to be a power to bear pain without complaint. This meaning is a tribut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Stoic philosophy rather than an attribute of philosophy in general. But in so far as it suggests that the wholeness characteristic of philosophy is a power to learn, or to extract meaning, from even the unpleasant vicissitudes of experience and to embody what is learned in an ability to go on learning, it is justified in any scheme. An analogous interpretation applies to the generality and ultimateness of philosophy. Taken literally, they are absurd pretensions; they indicate insanity. Finality does not mean, however, that experience is ended and exhausted, but means the disposition to penetrate to deeper levels of meaning—to go below the surface and find out the connections of any event or object, and to keep at it. In like manner the philosophic attitude is general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averse to taking anything as isolated; it tries to place an act in its context—which constitutes its significance. It is of assistance to connect philosophy with thinking in its distinction from knowledge. Knowledge, grounded knowledge, is science; it represents objects which have been settled, ordered, disposed of rationally. Thinking, on the other hand, is prospective in reference. It is occasioned by an unsettlement and it aims at overcoming a disturbance. Philosophy is thinking what the known demands of us—what responsive attitude it exacts. It is an idea of what is possible, not a record of accomplished fact. Hence it is hypothetical like all thinking. It presents an assignment of something to be done—something to be tried. Its value lies not in furnishing solutions (which can be achieved only in action) but in defining difficulties and suggesting methods for dealing with them. Philosophy might almost be

described as thinking which has become conscious of itself—which has generalized its place, function, and value in experience.

从这个观点看，“总体性”并不是指无法完成的，数量相加的工作，而指的是对发生的许多事件反应方式的一致性。一致性不是指字面上的同一性。既然同一件事不能发生两次，对一种反应的严格重复必然含有某种“失调”。总体性就是连续性——即，对从前的行动习惯加以必要的调整，使之富有生气，不断发展。总体性并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完整的现成计划，而是指很多不同的行动保持着一种平衡，使行动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关联。无论谁，只要能对新观念感觉敏锐，虚心接受，又能集中注意，将新观念联系起来，他就具有哲学的倾向。哲学一个通俗的意义就是在困难和损失面前保持镇静和忍耐；甚至有人认为哲学能力就是毫无怨言地忍受苦难的能力。这个意义与其说是哲学的一般属性，不如说是对斯多葛派哲学影响的歌颂。但是，只要这个意义暗指哲学总体性是一种能从令人不愉快的经验变迁中学习或吸取意义，并能把所学到的东西体现在继续学习的能力，在任何计划中都可证明哲学的总体性是正当的。类似的解释也适用于哲学的普遍性和终极性。从字面上讲，这两点都是荒唐的主张，属于精神失常。但是，终极性并不是指经验的终结或枯竭，而是指深入到事物更深层的意义——深入到表层以下，发现事物的联系，并且锲而不舍。同样，当我们说哲学的态度是普遍的，意思指它反对孤立看待事物。它设法把行动放在其背景中——该背景构成它的意义。把哲学和思维联系起来以别于知识，这样是有益的。知识，有根据的知识，就是科学。它代表已经理性地决定、整理和处理了的事物。另一方面，思维可以用来参照未来。思维的产生是因为有未解决的事情，思维的目标在于克服干扰。哲学就是思考已知事物对我们的要求——已知事物要求我们有何种反应态度。哲学是关于可能事物的观念，不是关于已成事实的记录。因此，和一切思维一样，哲学是假设性的。它提示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要去尝试的事情。它的价值不在于提供解决的办法（这只能在实践中获得），而在于界定困难，并暗示应付困难的方法。哲学几乎可以说是思维已经意识到它自己——思维已经概括出它

在经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

More specifically, the demand for a 'total' attitude arises because there is the need of integration in action of the conflicting various interests in life. Where interests are so superficial that they glide readily into one another, or where they are not sufficiently organized to come into conflict with one another, the need for philosophy is not perceptible. But when the scientific interest conflicts with, say, the religious, or the economic with the scientific or esthetic, or when the conservative concern for order is at odds with the progressive interest in freedom, or when institutionalism clashes with individuality, there is a stimulus to discover some more comprehensive point of view from which the divergencies may be brought together, and consistency or continuity of experience recovered. Often these clashes may be settled by an individual for himself; the area of the struggle of aims is limited and a person works out his own rough accommodations. Such homespun philosophies are genuine and often adequate. But they do not result in systems of philosophy. These arise when the discrepant claims of different ideals of conduct affect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and the need for readjustment is general. These traits explain some things which are often brought as objections against philosophies, such as the part played in them by individual speculation, and their controversial diversity,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philosophy seems to be repeatedly occupied with much the same questions differently stated. Without doubt, all these things characterize historic philosophies more or less. But they are not objections to philosophy so much as they are to human nature, and even to the world in which human nature is set. If there are genuine uncertainties in life, philosophies must reflect that uncertainty. If there are different diagnoses of the cause of a

difficulty, and different proposals for dealing with it; if, that is,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is more or less embodied in different sets of persons, there must be divergent competing philosophies. With respect to what has happened, sufficient evidence is all that is needed to bring agreement and certainty. The thing itself is sure. But with reference to what it is wise to do in a complicated situation, discussion is inevitable precisely because the thing itself is still indeterminate. One would not expect a ruling class living at ease to have the same philosophy of life as those who were having a hard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f the possessing and the dispossessed had the same fundamental disposition toward the world, it would argue either insincerity or lack of seriousness. A community devoted to industrial pursuits, active in business and commerce, is not likely to see the needs and possibilities of life in the same way as a country with high esthetic culture and little enterprise in turning the energies of nature to mechanical account. A social group with a fairly continuous history will respond mentally to a crisis in a very different way from one which has felt the shock of abrupt breaks. Even if the same data were present, they would be evaluated differently. But the different sorts of experience attending different types of life prevent just the same data from presenting themselves, as well as lead to a different scheme of values. As for the similarity of problems, this is often more a matter of appearance than of fact, due to old discussions being translated into the terms of contemporary perplexities. But in certain fundamental respects the same predicaments of life recur from time to time with only such changes as are due to change of social context, including the growth of the sciences.

更具体说，我们所以特别要求“全面”的态度，是因为在人生许多互相冲突的兴趣中，需要行动的一致性。表面上的兴趣容易使彼此相

互糅合在一起，或者兴趣尚未充分组合导致彼此产生冲突，此时看不出对哲学有何需求。但是，如果科学兴趣和宗教信仰发生冲突；或者经济兴趣与科学兴趣或审美兴趣发生冲突；或者对秩序的保守关切与求得自由进步的兴趣发生冲突，或者制度和个性彼此抵触，此时我们就有一种冲动，想去发现某种更为全面的观点，以弥合分歧，恢复经验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个人常能自行解决以上这些冲突。由于斗争范围有限，自身能做出大致地调整。这些朴素的办法是真实的，而且常常是恰当的。但是，它们不能形成哲学体系。如果对不同行为理想的不同诉求影响到整个社会，并且普遍需要调整，哲学体系就会由此产生。以上的特性可以解释通常用来反对哲学的几个问题，例如，个人推测在哲学中所起的作用，各派哲学争论的多样性以及哲学似乎总是反复研究相同的问题，尽管表述不同。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多少能代表历史上各派哲学的特征。但是，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反对哲学，不如说是反对人性；或者说反对形成人性的世界。如果生活中真的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各派哲学必须对此加以反映。如果对产生困难原因有不同的判断，又有应付困难的不同建议，也就是说，如果兴趣的冲突或多或少反映在不同人群中，就必然会产生背道而驰且互相对抗的哲学派别。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只要有足够证据就能取得一致。事实本身是清楚的。但是，面临复杂的环境，怎样做才算明智，这就需要讨论，因为事实事情本身还不清楚。我们并不指望养尊处优的统治阶级和为生存艰苦打拼的人会有同样的人生哲学。如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于世界有相同的看法，这只能证明要么是伪善，要么是不够严肃。一个致力于产业发展、积极经商的社会不可能像具有高度审美文化、却无力把自然力变为机械力的国家那样对生活的需要和可能性持有同样的看法。一个续写多年历史的社会群体与经受过突然变故打击的社会群体在内心对危机的反应是不相同的。即使同样的资料都呈现在眼前，对它们的评价也不会雷同。但是，不同生活方式带来的不同经验一方面阻碍相同资料的出现，另一方面导致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建立。至于提到问题的相似性，这往往是表面现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现时的困惑词语取代了对旧时的讨论。在某些基本方面，同样的生活困境不时重现。仅有一些因社会关系的变动而发生的变化，包括科学上的发展。

The fact that philosophic problems arise because of widespread and widely felt difficulties in social practice is disguised because philosophers become a specialized class which uses a technical language, unlike the vocabulary in which the direct difficulties are stated. But where a system becomes influential, its connection with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calling for some program of social adjustment may always be discovered. At this point, the intimate connec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appears. In fact, education offers a vantage ground from which to penetrate to the human, as distinct from the technical,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ic discussions. The student of philosophy 'in itself' is always in danger of taking it as so much nimble or severe intellectual exercise—as something said by philosophers and concerning them alone. But when philosophic issues are approached from the side of the kind of mental disposition to which they correspond, or the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y make when acted upon, the life-situations which they formulate can never be far from view. If a theory makes no difference in educational endeavor, it must be artificial. The educational point of view enables one to envisage the philosophic problems where they arise and thrive, where they are at home, and where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makes a difference in practice. If we are willing to conceive education as the process of forming fundamental dispositions,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toward nature and fellow men, philosophy may even be defined a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ducation. Unless a philosophy is to remain symbolic—or verbal—or a sentimental indulgence for a few, or else mere arbitrary dogma, its auditing of past experience and its program of values must take effect in conduct. Public agitation, propaganda, legisl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action are effective in producing the change of disposition which a philosophy indicates as desirable, but only in the degree in which they are educative—that is to say, in

the degree in which they modify mental and moral attitudes. And at the best, such methods are compromised by the fact they are used with those whose habits are already largely set, while education of youth has a fairer and freer field of operati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business of schooling tends to become a routine empirical affair unless its aims and methods are animated by such a broad and sympathetic survey of its place in contemporary life as it is the business of philosophy to provide. Positive science always implies practically the ends which the community is concerned to achieve. Isolated from such ends, it is matter of indifference whether its disclosures are used to cure disease or to spread it; to increase the means of sustenance of life or to manufacture war material to wipe life out. If society is interested in one of these things rather than another, science shows the way of attainment. Philosophy thus has a double task: that of criticizing existing aims with respect to the existing state of science, pointing out values which have become obsolete with the command of new resources, showing what values are merely sentimental because there are no means for their realization; and also that of interpreting the results of specialized science in their bearing on future social endeavor. It is impossible that it should have any success in these tasks without educational equivalents as to 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 For philosophic theory has no Aladdin's lamp to summon into immediate existence the values which it intellectually constructs. In the mechanical arts, the sciences become methods of managing things so as to utilize their energies for recognized aims. By the educative arts philosophy may generate methods of utilizing the energies of human beings in accord with serious and thoughtful conceptions of life. Education is the laboratory in which philosophic distinctions become concrete and are tested.

有一被掩盖的事实，那就是，哲学问题的产生源于在社会实践中许多广泛传播和广为感知的困难。哲学家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使用的专门术语不同于陈述直接困难的词汇。但是，当某一哲学体系变得具有影响力时，经常可以发现它与社会利益的冲突有联系，这种利益冲突要求实行某种社会调整。在这一点上，哲学和教育显露出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教育为我们提供一个立足点，从这里可以深入到对人生意义的哲学讨论，这与涉及专门意义的哲学讨论有所不同。研究哲学的学生容易陷入一种危险：他们常常把哲学视为机敏、严酷的智力测试，视为哲学家口中之物，并且仅仅与他们自己相关。然而，倘若从与哲学争论相对应的心理倾向出发，或者从在教育实践中所引起的分歧出发来研究哲学问题，哲学问题所表述的生活情境就会展现在眼前。如果某一理论对教育事业毫无影响，这种理论必然是矫揉造作的。这种教育观点能够使我们正视众多哲学问题，了解它们源自何处，在何处兴旺发达，广受欢迎，在何处对哲学的承认和拒绝会在实践中产生影响。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视为塑造对于自然和人类基本理智和情感倾向的过程，哲学甚至可以被定义为教育的普通理论。除非哲学仍然是象征式的，或者口头上的，仍然是少数人情感的宣泄，或者仅仅是专断的教条，哲学对过去经验的审查和对价值纲领的拟订必然要影响人的行为。群众性鼓动、宣传、立法和行政行为对产生哲学上所认为的良好心理变化虽有效果，但是，这些方法必须具有教育意义才行，也就是说，必须改变人们的心理和道德态度。这些方法至多由于以下的事实而受到连累，即它们被用于习惯已完全定型的成年人，尽管对青年的教育拥有更公平，更自由的运行范围。另外，除非对学校教育在当代生活中的地位进行像哲学所提供的那种广泛和同情的考察，激活教育的目标和方法，否则，学校教育会沦为机械的经验之谈。实证科学实际上总是包含着社会所要达到的种种目标。脱离这些目标，无论是要把科学发现用来医治疾病，还是传播疾病；用来增加维持生命的物资，还是制造军火以消灭生命，都已无关紧要。如果社会只对其中之一的目标有兴趣，科学就指出达到目标的方法。于是，哲学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要根据科学的现状评判现有的目标，指出由于掌握了新的方法哪些目标已经过时，哪些目标因为没有实现的方法，只是感情用事；另一方面要解释专业科学的成果对将来社会

事业的影响。如果没有关于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教育指导，要在这两方面都有所成就，那是不可能的。哲学理论没有能满足人们一切愿望的阿拉丁神灯来立刻实现它在思想上创造的种种价值。在机械艺术方面，科学成为控制事物，利用物力以达到被认可目标的方法。凭借教育的艺术，哲学可以创造按照严肃的和考虑周到的生活概念利用人力的方法。教育乃是使哲学上的特性具体化并接受检验的实验室。

It is suggestive that European philosophy originated (among the Athenians) under the direct pressure of educational questions. The earlier history of philosophy, developed by the Greeks in Asia Minor and Italy, so far as its range of topics is concerned, is mainly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rather than of philosophy as that word is understood today. It had nature for its subject, and speculated as to how things are made and changed. Later the traveling teachers, known as the Sophists, began to apply the results and the methods of the natural philosophers to human conduct.

欧洲哲学是在教育问题的直接压力下产生的（起源于雅典），这一点使我们有所启发。就其研究的题目范围来看，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和意大利所阐发的早期哲学史，与其说是今天所理解的哲学的一章，不如说是科学史的一章。它以自然为题材，推究事物是怎样造成的，又是怎样演变的。只是到了后来，称为诡辩家的演说者才开始把自然哲学家研究的结果和方法应用于人的行为。

When the Sophists, the first body of professional educators in Europe, instructed the youth in virtue, the political arts, and the management of city and household, philosophy began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universal, to some comprehensive class, or to some group; the relation of man and

nature, of tradition and reflec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Can virtue, approved excellence in any line, be learned, they asked? What is learning? It has to do with knowledge. What, then, is knowledge? How is it achieved? Through the senses, or by apprenticeship in some form of doing, or by reason that has undergone a preliminary logical discipline? Since learning is coming to know, it involves a passage from ignorance to wisdom, from privation to fullness, from defect to perfection, from non-being to being, in the Greek way of putting it. How is such a transition possible? Is change, becoming, development really possible and if so, how? And supposing such questions answered, what is the relation of instruction, of knowledge, to virtue?This last question led to opening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 of reason to action, of theory to practice, since virtue clearly dwelt in action. Was not knowing, the activity of reason, the noblest attribute of man? And consequently was not purely intellectual activity itself the highest of all excellences, compared with which the virtues of neighborliness and the citizen's life were secondary? Or, on the other hand, was the vaunted intellectual knowledge more than empty and vain pretense, demoralizing to character and destructive of the social ties that bound men together in their community life? Was not the only true, because the only moral, life gained through obedient habituation to the customary practices of the community? And was not the new education an enemy to good citizenship, because it set up a rival standard to the established traditions of the community?

当这些诡辩家，欧洲第一批职业教育家，把美德、政治艺术、城市和家政管理传授给青年之时，哲学才开始研究个人与宇宙的关系、个人与某一阶级的关系、个人与某一群体的关系、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和反省的关系，以及知识与行动的关系。他们问道：能学会所有行业众所赞许的美德吗？什么是学习？它与知识有关系？什么是

知识？它是怎样获得的？知识的获得是通过感官，通过当学徒，还是通过预先逻辑规律推理呢？既然学习是即将知道，它包含从无知到智慧、从缺乏到充足、从不足到完美的过渡。用希腊人的说法，就是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过渡。这种过渡怎么可能？变化、形成、发展真的可能吗？如果可能，怎样才能做到？假使这些问题都得到解答，教学和道德是什么？知识和道德的关系又是什么？由于道德显然寓于行动之中，最后一个问题又引出推理和行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否认识活动，即推理活动是人类最崇高的特性？是否纯粹智力活动本身就是一切优点中最崇高的优点？与纯粹智力活动相比较，睦邻和公民生活等德行是否居于次要地位？或者，从另一方面说，是否自吹自擂的理性知识要比空洞虚浮的装腔作势更加败坏道德和破坏团结人们的社会纽带？是否由于恭顺适应社会的习惯做法而赢得的生活是唯一道德的生活，所以才是唯一真正的生活？是否因为新教育树立了与社会已有传统对立的标准，它便成了好公民的敌人？

In the course of two or three generations such questions were cut loose from their original practical bearing upon education and were discussed on their own account; that is, as matters of philosophy as an independent branch of inquiry. But the fact that the stream of European philosophical thought arose as a theory of educational procedure remains an eloquent witness to the intimate connection of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s not an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ready-made ideas to a system of practice having a radically different origin and purpose: it is only an explicit formulation of the problems of the formation of right mental and moral habitudes in respect to the difficultie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The most penetrating definition of philosophy which can be given is, then, that it is the theory of education in its most general phases.

在过去两三代里，这些问题脱离了它们以前对教育的实际影响。人们仅讨论这些问题本身；也就是说，把它们作为哲学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分支。但是，欧洲哲学思想潮流作为教育过程理论出现，这一事实仍然是哲学与教育有密切联系的有力见证。“教育哲学”并非把现成的观念从外面用于起源与目的根本不同的实践体系：教育哲学不过是就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困难、对正确的理智和道德习惯问题的一种详尽表述。因此，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定义就是：哲学是最普通的教育理论。

The re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d of social ideals and methods thus go hand in hand. If there is especial need of educational reconstruction at the present time, if this need makes urgent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basic ideas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ic systems, it is because of the thoroughgoing change in social life accompanying the advance of scie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Such practical changes cannot take place without demanding an educational re-formation to meet them, and without leading men to ask what ideas and ideals are implicit in these social changes, and what revisions they require of the ideas And ideals which are inherited from older and unlike cultures. Incidentally throughout the whole book, explicitly in the last few chapters, we have been dealing with just these questions as they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of mind and body, theory and practice, man and nature,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etc. In our concluding chapters we shall sum up the prior discussions with respect first to the philosophy of knowledge, and then to the philosophy of morals.

哲学、教育和社会理想与方法的重建是同步进行的。如果现在特别需要教育改革，如果这一需要迫切要求对于传统哲学体系的基本思想进行重新考虑，这是因为伴随着科学的进步，工业革命和民主主义

的发展，社会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如果没有教育改革来满足实际变革，没有人来问包含在那些社会变迁中的思想和理想是什么，没有人来问该如何对古老的、看似不同的文化所继承下来的观念和理想进行修正，这种实际变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本书各章都或多或少讨论过这些问题。在前面几章，我们已经就它们对人的身心、理论与实践、人与自然、个人和社会等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本书最后两章，我们将对前面的讨论作一番总结，先谈认识哲学，然后再谈道德哲学。

Summary.

总结

After a review designed to bring out the philosophic issues implicit in the previous discussions, philosophy was defined as the generalized theory of education. Philosophy was stated to be a form of thinking, which, like all thinking, finds its origin in what is uncertain in the subject matter of experience, which aims to locate the nature of the perplexity and to frame hypotheses for its clearing up to be tested in action. Philosophic thinking has for its differentia the fact that the uncertainties with which it deals are found in widespread social conditions and aims, consisting in a conflict of organized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al claims. Since the only way of bringing about a harmonious readjustment of the opposed tendencies is through a modification of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disposition, philosophy is at once an explicit formulation of the various interests of life and a propounding of points of view and methods through which a better balance of interests may be effected. Since education i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needed

transformation may be accomplished and not remain a mere hypothesis as to what is desirable, we reach a justification of the statement that philosophy is the theory of education as a deliberately conducted practice.

本章首先回顾了先前的讨论所包含的哲学问题，然后把哲学定义为普通教育理论。哲学是思维的一种形式，它和一切思维一样，起源于经验中的不确定事物，其目的是要找出困惑的本质，制订消除困惑的假设，并在行动中加以检验。哲学的思维有其特殊性：它所处理的不确定性出现在普遍社会情况与目的之中，存在于那种有组织的兴趣和制度上的要求的冲突之中。要实现各种对立趋势和谐的重新调整，唯一方法就是通过改变情绪和智力。所以，哲学是对人生各种兴趣的详尽描述，并提出使各种兴趣实现更好的平衡的观点与方法。教育是一种过程，我们所需要的改造可以通过教育完成，并非仅是依照期待之物做出假设而已。我们有理由提出，哲学乃是一种被有意引导来进行实践的教育理论。

Chapter 25 Theories of Knowledge

第二十五章　认识论

1．Continuity versus Dualism.

一、连续性与二元论

A number of theories of knowing have been criticized in the previous pages. In spite of their differences from one another, they all agree in one fundamental respect which contrasts with the theory which has been positively advanced. The latter assumes continuity; the former state or imply certain basic divisions, separations, or antitheses, technically called dualisms. The origin of these divisions we have found in the hard and fast walls which mark off social groups and classes within a group: like those between rich and poor, men and women, noble and baseborn, ruler and ruled. These barriers mean absence of fluent and free intercourse. This absence is equivalent to the setting up of different types of life-experience, each with isolated subject matter, aim, and standard of values. Every such social condition must be formulated in a dualistic philosophy, if philosophy is to be a sincere account of experience. When it gets beyond dualism—as many philosophies do in form—it can only be by appeal to something higher than anything found in experience, by a flight to some transcendental realm. And in denying duality in name such theories restore it in fact, for they end in a division between things of this world as mere appearances and an inaccessible essence of reality.

我们在前面曾评论过若干认识论。这些理论虽然大相径庭，但却在一个基本点上完全一致，那就是，它们都与我们积极提出的认识论相左。后者认为存在连续性；而前者则声称或暗指存在某些学术上称之为二元论的基本区别、分离、或对立。我们发现，这些区别起源于团体内部壁垒森严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的划分：比如，贫富之别、男女之别、贵贱之别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别。这些壁垒就意味着彼此不再可能有流畅而自由的交往。这就等于彼此会有不同的人生经历，每一种经历都有其独自的主题、目标和价值标准。如果哲学要成为生活的真实写照，每一种这样的社会状况必须用二元论哲学加以表述。如果超越了二元论——许多哲学理论在形式上就是这样——那只能诉诸高于经验的任何体验，这就走到了某种先验领域。这些理论名义否定二元论，事实上却使其死灰复燃。它们最终都导致一种分裂：一面仅仅是世界的表象，另一面是不可抵达的现实本质。

So far as these divisions persist and others are added to them, each leaves its mark upo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until the scheme of education, taken as a whole, is a deposit of various purposes and procedures. The outcome is that kind of check and balance of segregated factors and values which has been described. (See Chapter XVIII.) The present discussion is simply a formulation, in the terminology of philosophy, of various antithetical conceptions involved in the theory of knowing.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is the opposition of empirical and higher rational knowing. The first is connected with everyday affairs, serves the purposes of the ordinary individual who has no specialized intellectual pursuit, and brings his wants into some kind of working connection with the immediate environment. Such knowing is depreciated, if not despised, as purely utilitarian, lacking in cultural significance. Rational knowledge is supposed to be something which touches reality in ultimate, intellectual fashion; to be pursued for its own sake and

properly to terminate in purely theoretical insight, not debased by application in behavior. "Socially, the distinction corresponds to that of the intelligence used by the working classes and that used by a learned class remote from concern with the means of living. Philosophically, the difference turns about the distinction of the particular and universal. Experience is an aggregate of more or less isolated particulars, acquaintance with each of which must be separately made. Reason deals with universals, with general principles, with laws, which lie above the welter of concrete details. In the educational precipitate, the pupil is supposed to have to learn, on one hand, a lot of items of specific information, each standing by itself, and upon the other hand,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a certain number of laws and general relationships. Geography, as often taught, illustrates the former; mathematics, beyond the rudiments of figuring, the latter.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they represent two independent worlds.

只要这些分裂继续存在，并伴有新的分裂出现，它们都会在教育制度上留下其痕迹，直到总的教育方针发生改变，能容纳各种不同目标和过程。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使各种分离现象和价值观互相牵制，保持平衡，这在前面已经描述过（见18章）。目前的讨论仅仅是用哲学术语来探讨认识论中所包含的各种对立概念。首先，存在经验性认识与高级理性认识的对立。经验性认识与日常事物有关系，是为普通人服务的。这些人没有特别的精神追求，他们的要求很实在，总与改善眼前的环境有关。这种认知观即使不受到蔑视，也会被贬低为过于功利，缺乏文化修养。理性知识则被认为是最终在精神层面触及了现实；是为获得理性知识而追求之，并以纯理论的洞察力收尾，不会因为在实际中的应用而降低价值。从社会角度看，这反映的是工人阶级的智慧与不用担心生存的学者阶级智慧之别。从哲学角度看，这种区别就是个别与一般的区别。经验是众多孤立的特殊个体的总和，对于每一个体的认识必须单独进行，亲力而为。理性是凌驾在各种具体细

节之上的共性、普遍原则和规律。在教育领域，学生一方面必须学习许多相互孤立的专门知识；另一方面，还要熟悉一些规则以及学科之间的一般关系。通常所教的地理说明的是前者；超过初级计算的数学说明的是后者。实际上，它们代表两个独立的世界。

Another antithesis is suggested by the two senses of the word 'learning. ' On the one hand, learning is the sum total of what is known, as that is handed down by books and learned men. It is something external, an accumulation of cognitions, as one might store material commodities in a warehouse, Truth exists ready-made somewhere. Study is then the process by which an individual draws on what is in storage. On the other hand, learning means something which the individual does when he studies. It is an active, personally conducted affair. The dualism here is between knowledge as something external, or, as it is often called, objective, and knowing as something purely internal, subjective, psychical. There is, on one side, a body of truth, ready-made, and, on the other, a ready-made mind equipped with a faculty of knowing—if it only wills to exercise it, which it is often strangely loath to do. The separation, often touched upon, between subject matter and method is the educational equivalent of this dualism. Socially the distinction has to do with the part of life which is dependent upon authority and that where individuals are free to advance. Another dualism is that of activity and passivity in knowing. Purely empirical and physical things are often supposed to be known by receiving impressions. Physical things somehow stamp themselves upon the mind or convey themselves into consciousness by means of the sense organs. Rational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of spiritual things is supposed, on the contrary, to spring from activity initiated within the mind, an activity carried on better if it is kept remote from all sullying touch of the senses and external object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ense training and object lessons and laboratory exercises, and pure ideas contained in books, and appropriated—so it is thought—by some miraculous output of mental energy, is a fair expression in education of this distinction. Socially, it reflects a division between those who are controlled by direct concern with things and those who are free to cultivate themselves.

另一种对立是由“学习”（learning）一词的两种不同意义所显现出来的。一方面，学习是书本和学者传下来的知识的总和。这种知识是外在的，是认知的积累，就像堆积在仓库的商品一样。现成的真理就存在于某处。学习就是学习者提取所储存知识的过程。另一方面，学习意味学习者在学的过程中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主动的、亲力而为的事情。在这里，二元论处于某种外在客观知识与某种纯内在的主观精神认知之间。一方面，有现成的真理；另一方面，有拥有认知能力的现成大脑——如果学习者愿意使用的话，大脑随时都可以工作，但奇怪的是，他经常不愿意这样做。我们经常讲的教材和方法的分离，就是这种二元论在教育方面的表现。从社会角度看，这反映的是依靠权威过日子与个体自由选择生活之别。还有一种二元论是存在于认知过程中主动和被动的对立。纯经验和纯物质的东西经常被认为是通过留在头脑的印象而认识的。物质东西设法使自己留在人的印象中或者通过感觉器官使自己传达到人的意识之中。与此相反，理性知识和精神层面的知识被认为是来自大脑内部发起的活动。如果不为感觉器官以及外部事物所玷污，这种活动会进行得更好。感官训练、实物教学和实验室练习，包含在书中的观念和通过神奇精神力量所获得纯粹观念，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它们教育上的清楚表现。从社会角度看，这反映的是那些为事物所困者与自由人士之别。

Another current opposition is that said to exist between the intellect and the emotions. The emotions are conceived to be purely private and personal,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the work of pure

intelligence in apprehending facts and truths,—except perhaps the single emotion of intellectual curiosity. The intellect is a pure light; the emotions are a disturbing heat. The mind turns outward to truth; the emotions turn inward to considerations of personal advantage and loss. Thus in education we have that systematic depreciation of interest which has been noted, plus the necessity in practice, with most pupils, of recourse to extraneous and irrelevant rewards and penalties in order to induce the person who has a mind (much as his clothes have a pocket) to apply that mind to the truths to be known. Thus we have the spectacle of professional educators decrying appeal to interest while they uphold with great dignity the need of reliance upon examinations, marks, promotions and emotions, prizes, and the time-honored paraphernalia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The effect of this situation in crippling the teacher's sense of humor has not received the attention which it deserves.

目前的另一对立存在于智力与情感之间。情感被认为是纯私人的，与了解事实和真相的纯智力工作毫无关系，也许对知识的好奇心可以除外。智力是一道纯粹的光源；情感则是搅动人心的热浪。智力向外寻找真理；情感向内患得患失。我们在教育工作中从来都是对大多数学生显露的兴趣嗤之以鼻，认为有必要求助于不相关的额外奖惩来引导有头脑的人（这就像衣服有口袋一样）用心去追求未知真理。因此，我们看到一些教育专家有意贬低兴趣的重要性，坚持认为教育必须依靠考试、分数、升迁、奖品以及其他一些久负盛名的奖惩手段。这种有损教师幽默感的做法所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All of these separations culminate in one between knowing and doing, theory and practice, between mind as the end and spirit of

action and the body as its organ and means. We shall not repeat what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source of this dualism in the division of society into a class laboring with their muscles for material sustenance and a class which, relieved from economic pressure, devotes itself to the arts of expression and social direction. Nor is it necessary to speak again of the educational evils which spring from the separation. We shall be content to summarize the forces which tend to make the untenability of this conception obvious and to replace it by the idea of continuity.

所有这些分离的终极表现为知与行、理论与实践、作为行为结果和精神的大脑与作为行为器官和手段的身体之间的分离。这种二元论源于对社会阶级的划分，使得我们的社会产生了为维持生计而从事体力劳动的阶级以及摆脱了经济压力而致力于艺术表现和引领社会的阶级。我们不再重复对此已有的阐述，也没有必要再次讲述这种分离现象所造成的种种教育弊端。我们将总结一下抨击二元论的一些重要观点，并用连续性的观念来替代它。

(i) The advance of physiology and the psychology associated with it have shown the connection of mental activity with that of the nervous system. Too often recognition of connection has stopped short at this point; the older dualism of soul and body has been replaced by that of the brain and the rest of the body. But in fact the nervous system is only a specialized mechanism for keeping all bodily activities working together. Instead of being isolated from them, as an organ of knowing from organs of motor response, it is the organ by which they interact responsively with one another. The brain is essentially an organ for effecting the reciprocal adjustment to each other of the stimuli received from the environment and responses directed upon it. Note that the adjusting

is reciprocal; the brain not only enables organic activity to be brought to bear upon any object of the environment in response to a sensory stimulation, but this response also determines what the next stimulus will be. See what happens, for example, when a carpenter is at work upon a board, or an etcher upon his plate—or in any case of a consecutive activity. While each motor response is adjusted to the state of affairs indicated through the sense organs, that motor response shapes the next sensory stimulus. Generalizing this illustration, the brain is the machinery for a constant reorganizing of activity so as to maintain its continuity; that is to say, to make such modifications in future action as are required because of what has already been done. The 'continuity of the work of the carpenter distinguishes it from a routine repetition of identically the same motion, and from a random activity where there is nothing cumulative. What makes it continuous, consecutive, or concentrated is that each earlier act prepares the way for later acts, while these take account of or reckon with the results already attained—the basis of all responsibility. No one who has realized the full force of the facts of the connection of knowing with the nervous system and of the nervous system with the readjusting of activity continuously to meet new conditions, will doubt that knowing has to do with reorganizing activity, I instead of being something isolated from all activity, complete on its own account.

1．生理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心理学的进展表明了心理活动与神经系统活动之间的联系。然而，对于这种联系的承认常常在这一点上突然停止。旧时灵与肉的对立被大脑与身体其他部位的对立所代替。但是，事实上，神经系统只是使身体各个部位能够协同工作的特殊机制。作为来自运动反应器官的认知器官，神经系统并非独立于身体其他部位，而是起到了辅助身体各个器官相互协调反应的作用。大脑本质上是从环境接受刺激和对环境做出反应以及在两者之间相互调节的

器官。请注意，这种调整是相互的；大脑不仅使人体器官对外界事物的刺激做出反应，而且其反应也决定了下一个将会是什么样的刺激。我们来看看一个木工在制作木板或蚀刻者刻画杯盘或从事任何连续性的运动时所发生的事情。当每一运动反应根据感觉器官所表明的状态进行调整时，这个运动反应就决定了下一个感觉刺激会是什么。对这个例子的概括总结如下：大脑要对行为经常加以调整以保持其连续性。换言之，就是要根据过去活动的要求对未来行动做出调整。木工工作的连续性不同于同一动作的例行反复，也不同于毫无累积作用的随意行为。某一动作之所以是连续、不间断或集中的，是因为每一个前面的动作都是为后续动作做准备的，而后续动作也考虑到已经取得的结果——这是一切责任心的基础。如果意识到认识与神经系统的紧密联系，意识到神经系统必须不断调整行为以应付新情况，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认知与行为重组的关系，因为认知不可能脱离人的其他行为，独善其身。

(ii) The development of biology clinches this lesson, with its discovery of evolution. For the philosophic significance of the doctrine of evolution lies precisely in its emphasis upon continuity of simpler and more complex organic forms until we reach man.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forms begins with structures where the adjus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organism is obvious, and where anything which can be called mind is at a minimum. As activity becomes more complex, coordinating a greater number of factors in space and time, intelligence plays a more and more marked role, for it has a larger span of the future to forecast and plan for. The effect upon the theory of knowing is to displace the notion that it is the activity of a mere onlooker or spectator of the world, the notion which goes with the idea of knowing as something complete in itself. For the doctrine of organic development means that the living creature is a part of the world, sharing its vicissitudes and fortunes, and making itself secure in its precarious dependence only as it

intellectually identifies itself with the things about it, and, forecasting the future consequences of what is going on, shapes its own activities accordingly. If the living, experiencing being is an intimate participant in the activities of the world to which it belongs, then knowledge is a mode of participation, valuable in the degree in which it is effective. It cannot be the idle view of an unconcerned spectator.

2．以进化论为标志的生物学的发展解决了这个问题。进化论的哲学意义恰恰在于强调从比较简单的有机体结构直到人类的出现之前的比较复杂有机体结构的连续性。有机体结构的发展始于对环境和有机体本身所做的明显相应调整，初始阶段可以称为智力的因素少之又少。随着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对许多空间和时间的许多因素进行协调，需要预测和计划未来。于是，智力的作用就越发突显。进化论对认知论的影响就在于它取代了认为认识仅仅是旁观者的行为，是可以自行完成，独善其身的观点。有机体发展的理论表明，生物是世界的一部分，见证了其兴衰和机遇。只有当它融入周围环境，并在对未来做出预测的同时调整自己的行为之时，才能在不稳定的依赖状态中变得安全。如果生命体验者是他所在世界活动的亲密参与者，知识就是一种参与的方式，其效果和价值是成正比的。因此，知识不可能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

(ii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as the method of getting knowledge and of making sure it is knowledge, and not mere opinion—the method of both discovery and proof—is the remaining great force in bringing about a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has two sides. (i) On one hand, it means that we have no right to call anything knowledge except where our activity has actually produced certain physical changes in things, which agree with and confirm the

conception entertained. Short of such specific changes, our beliefs are only hypotheses, theories, suggestions, guesses, and are to be entertained tentatively and to be utilized as indications of experiments to be tried. (ii)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of thinking signifies that thinking is of avail; that it is of avail in just the degree in which the anticip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 is made on the basis of thorough observation of present conditions. Experimentation, in other words, is not equivalent to blind reacting. Such surplus activity—a surplus with reference to what has been observed and is now anticipated—is indeed an unescapable factor in all our behavior, but it is not experiment save as consequences are noted and are used to make predictions and plans in similar situations in the future. The more the meaning of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is perceived, the more our trying out of a certain way of treating the material resources and obstacles which confront us embodies a prior use of intelligence. What we call magic was with respect to many things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of the savage; but for him to try was to try his luck, not his ideas. The scientific experimental method is, on the contrary, a trial of ideas; hence even when practically—or immediately—unsuccessful, it is intellectual, fruitful; for we learn from our failures when our endeavors are seriously thoughtful.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is new as a scientific resource—as a systematized means of making knowledge, though as old as life as a practical device. Hence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men have not recognized its full scope. For the most part, its significance is regarded as belonging to certain technical and merely physical matters. It will doubtless take a long time to secure the perception that it holds equally as to the forming and testing of ideas in social and moral matters. Men still want the crutch of dogma, of beliefs fixed by authority, to relieve them of the trouble of thinking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directing their activity by thought. They tend

to confine their own thinking to a consideration of which one among the rival systems of dogma they will accept. Hence the schools are better adapted, as John Stuart Mill said, to make disciples than inquirers. But every advance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is sure to aid in outlawing the literary, dialectic, and authoritative methods of forming beliefs which have governed the schools of the past, and to transfer their prestige to methods which will procure an active concern with things and persons, directed by aims of increasing temporal reach and deploying greater range of things in space. In time the theory of knowing must be derived from the practice which is most successful in making knowledge; and then that theory will be employed to improve the methods which are less successful.

3．作为获取知识和确保这“是知识而不只是意见，是发现又是证明”的方法，实验方法的发展是促使认识论发生改变的为数不多的巨大推力。实验方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权利称任何东西为知识，除非我们的活动真的引起了这种事物某些物理特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与我们已经得到的概念相一致。缺乏这种改变，我们的信念就仅仅是假设、理论、建议和猜想，只能作为尝试实验的标志暂时被接受。另一方面，关于思维的实验方法表示思维的价值。只有当对未来后果的预测是在对当前情况全面观察基础上之时，思维才有价值。换句话说，实验并不等同于盲目反应。这种多余的活动——即已经观察到和被预见到的活动——确实是我们所有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但这并不是实验，除非活动的结果受到关注并且在未来相似的情形中被用于预测和规划。在试图以某种方法对付所面临的物资来源和物资困难时，我们对于实验方法的意义了解越多，就越能体现对智力的超前使用。我们所称的魔法其实是原始人所作的许多尝试。但对于原始人来说，这是只能算是碰运气，而不是验证自己的想法。科学的实验方法乃是对自己想法的一种验证。这种实验即使不能立竿见影地马上取得实效，也还是大有裨益且富有成效的。如果我们

的努力经过认真思考，我们便能吃一堑长一智。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和系统化求知手段，实验方法是时新的；作为指导实践的方法，这种方法则是古而有之。因此，人们还没有认识其全貌，这并不奇怪。很多时候，实验方法的重要性被认为体现在某些技术领域和纯物质领域。实验方法要获得如同人们对社会领域和道德领域思想的形成和检验一样的理解，无疑需要较长时间。人们需要有教义和具有权威性的信仰作为寄托，因为这种寄托可以使他们从思想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也可以使他们从思想指导行为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思想局限于这样的考虑当中：在这个彼此敌对的教条体系中，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因此，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说，学校更适于培养信徒，而不是培养探索者。但是，由于需要增加时间和空间范围，每一次实验方法影响力的扩大肯定都有助于削弱之前主导学校的文学、辩证法和权威信念的方法，并使其让位于主动关心事物和人群的方法。总有一天，认识论必须源自于实践，因为实践是获取知识最佳手段。然后，认识论会用来改进那些不太成功的方法。

2．Schools of Method.

二、方法流派

There are various systems of philosophy with characteristically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the method of knowing. Some of them are named scholasticism, sensationalism, rationalism, idealism, realism, empiricism, transcendentalism, pragmatism, etc. Many of them have been criticiz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iscussion of some educational problem. We are here concerned with them as involving deviations from that method which has proved most effective in achieving knowledge, for a consideration of the deviations may render clearer the true place of knowledge in

experience. In brief, the function of knowledge is to make one experience freely available in other experiences. The word 'freely' mark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knowledge and that of habit. Habit means that an individual undergoes a modification through an experience, which modification forms a predisposition to easier and more effective action in a like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Thus it also has the function of making one experience available in subsequent experiences. Within certain limits, it performs this function successfully. But habit, apart from knowledge, does not make allowance for change of conditions, for novelty. Prevision of change is not part of its scope, for habit assumes the essential likeness of the new situation with the old. Consequently it often leads astray, or comes between a person and the successful performance of his task, just as the skill, based on habit alone, of the mechanic will desert him when something unexpected occurs in the running of the machine. But a man who understands the machine is the man who knows what he is about. He knows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 given habit works, and is in a position to introduce the changes which will re-adapt it to new conditions.

不同哲学体系有其独特的认知方法概念，比如，所谓的经院哲学、感知主义、理性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经验主义、先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等。在讨论教育问题时，我们曾对其中的很多流派提出过批评。在此，我们要探讨这些认知方法与被证实为能够最有效地获得知识方法之间的差异。这可能使知识在经验中占据的真正地位更为突出。简言之，知识的作用是要使某一经验能自由地用于其他经验。“自由地”一词标志着知识原则和习惯原则的区别。习惯意味着个体通过积累经验而产生改变，这种改变形成了一种倾向，使其在未来同样情况下做出的反应更加容易，更加有效。它还能使累积下来的经验用于后来的经历。习惯在一定的范围内成功地起到这个作用。但是，与知识不同的是，习惯不允许条件的改变，也不允许创新。预见

未来的变化不属于习惯的职责范围，因为习惯总是假定新旧情境没有本质区别。习惯经常让人误入歧途，或者不知所措。正如一个全凭习惯来操作机器的技工，一旦机器运行出现不可预料的故障，就会一筹莫展。但是，如果是对机器了如指掌的人，就知道该做怎样的应变，知道习惯在什么条件下能发挥作用，并且能根据新情况随机应变。

In other words, knowledge is a perception of those connections of an object which determine its applicability in a given situation. To take an extreme example; savages react to a flaming comet as they are accustomed to react to other events which threaten the security of their life. Since they try to frighten wild animals or their enemies by shrieks, beating of gongs, brandishing of weapons, etc. , they use the same methods to scare away the comet. To us, the method is plainly absurd—so absurd that we fail to note that savages are simply falling back upon habit in a way which exhibits its limitations. The only reason we do not act in some analogous fashion is because we do not take the comet as an isolated, disconnected event, but apprehend it in its connections with other events. We place it, as we say, in the astronomical system. We respond to its connections and not simply to the immediate occurrence. Thus our attitude to it is much freer. We may approach it, so to speak, from any one of the angles provided by its connections. We can bring into play, as we deem wise, any one of the habits appropriate to any one of the connected objects. Thus we get at a new event indirectly instead of immediately—by invention, ingenuity, resourcefulness. An ideally perfect knowledge would represent such a network of interconnections that any past experience would offer a point of advantage from which to get at the problem presented in a new experience. In fine, while a habit apart from knowledge supplies us with a single fixed method of attack, knowledge means that selection may be made from a much

wider range of habits.

换言之，知识就是感知事物与各方面的各种联系，这些联系决定了知识能否用于特定环境。打个极端的比方：原始人在看见拖着火焰在天空划过的彗星时所做出的反应就与他们对威胁其生命的其他事件所做出的习惯性反应完全相同。由于他们曾用尖声高叫，敲锣打鼓，挥舞武器等方式来吓唬野兽或敌人，但如果他们试图用相同的方法驱走彗星。在我们眼里，这种方法太过荒唐，我们忘记了这些原始人其实完全依靠习惯行事，而这正显示出习惯的局限性。我们不会采取类似做法，因为我们不会把彗星的出现视为与其他事物不相关的孤立事件，而是把之理解为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我们会把它置于整个天文系的运行来考虑，不是仅仅对突然出现的彗星做出反应，而是对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做出反应。因此，我们对彗星出现的态度就自由得多。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与之有关联的角度对其加以研究，可以使任何与其他事物相关联的习惯发挥作用。因此，我们是通过创新思维，巧妙构思，发挥谋略，间接而非直接了解新事物的。理想化的完美知识往往代表一个互为关联的网络：任何过去的经验都能为解决新形势所出现的问题提供有利条件。总之，脱离知识的习惯提供给我们的是一成不变的应付方法，而知识意味着可以从更大的习惯范围进行选择。

Two aspects of this more general and freer availability of former experiences for subsequent ones may be distinguished. (See ante, p. 90.) (i) One, the more tangible, is increased power of control. What cannot be managed directly may be handled indirectly; or we can interpose barriers between us and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or we may evade them if we cannot overcome them. Genuine knowledge has all the practical value attaching to efficient habits in any case. (ii) But it also increases the meaning, the experienced significance, attaching to an experience. A situation to

which we respond capriciously or by routine has only a minimum of conscious significance; we get nothing mentally from it. But wherever knowledge comes into play in determining a new experience there is mental reward; even if we fail practically in getting the needed control we have the satisfaction of experiencing a meaning instead of merely reacting physically.

运用过去经历对未来事件产生影响，主要有较笼统的和较自由的这两种情况。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区分。（见90页）（1）控制能力的提高更为显而易见。对于不能直接控制的事情，我们可以间接处理；或者使自己远离坏的结果。如果实在无法克服，则可以退避三舍。真正的知识都拥有实际价值，这些价值则依附于高效率的习惯。（2）但是，真正的知识也增加了所依附的经验的意义，即体验到的意义。我们用多变的方法或常规的方法去应付某种情境时，很少能意识到这有意义。我们在思想上毫无收获。但是，只要知识在检验某一新经验时发挥了作用，我们就会得到精神上的补偿。即使我们没有在实际中得到所需要的控制能力，我们却体验到了意义，而不仅仅是做出身体方面的反应。对此，我们已心满意足。

While the content of knowledge is what has happened, what is taken as finished and hence settled and sure, the reference of knowledge is future or prospective. For knowledge furnishes the means of understanding or giving meaning to what is still going on and what is to be done. The knowledge of a physician is what he has found out by personal acquaintance and by study of what others have ascertained and recorded. But it is knowledge to him because it supplies the resources by which he interprets the unknown things which confront him, fills out the partial obvious facts with connected suggested phenomena, foresees their probable future, and makes plans accordingly. When knowledge is cut off from use

in giving meaning to what is blind and baffling, it drops out of consciousness entirely or else becomes an object of aesthetic contemplation. There is much emotional satisfaction to be had from a survey of the symmetry and order of possessed knowledge, and the satisfaction is a legitimate one. But this contemplative attitude is esthetic, not intellectual. It is the same sort of joy that comes from viewing a finished picture or a well composed landscape. It would make no difference if the subject matter were totally different, provided it had the same harmonious organization. Indeed, it would make no difference if it were wholly invented, a play of fancy. Applicability to the world means not applicability to what is past and gone—that is out of the question by the nature of the case; it means applicability to what is still going on, what is still unsettled, in the moving scene in which we are implicated. The very fact that we so easily overlook this trait, and regard statements of what is past and out of reach as knowledge is because we assume the continuity of past and future. We cannot entertain the conception of a world in which knowledge of its past would not be helpful in forecasting and giving meaning to its future. We ignore the prospective reference just because it is so irretrievably implied.

尽管知识所包含的内容是已发生和完成之事，因而是已经确定和肯定的事，然而，谈及知识就涉及到未来或前瞻性。知识能提供的是理解手段，或者对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医生的知识来自于其亲力而为的发现和对别人已经确定和记录的知识的研究。但是，这对他来说就是知识。知识能为他提供来源，解释所遇到的未知事物，运用相关的已知现象补充部分明显的事实，预示可能的未来并制定相应的计划。当知识不能用于解释令人茫然和迷惑的事物之时，它就会完全游离在人的意识之外，否则知识就会变成美学思考的对象。观察我们所拥有的和谐有序的知识结构，我们的情感就会得到极大满足，并且这种满足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这属于美学思考，而

非知识思考。这与欣赏一幅已经完成的画或一幅精心制作的风景画所得到的快乐是相同的。即使题材完全不同，只要有同样和谐有序的结构，那也没有关系，仍能使人快乐。即使完全是虚构的，是幻想游戏，也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知识对世界有用，并不是指对已经过去的事情有用。就事情本身而言，这是不成问题的。所谓知识对世界有用，指的是能把它应用于仍在进行之事、仍未解决之事以及我们所处的环境。然而，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特征，并把对过去所发生之事的陈述和对我们不了解之事的陈述视为知识。因为我们认为，过去和将来具有连续性。我们不可能对世界持有这样的看法：认为有关这个世界的过去知识无助于预见和解释世界的未来。我们忽视知识与未来的关联，原因是这种联系是完全隐含其中的。

Yet many of the philosophic schools of method which have been mentioned transform the ignoring into a virtual denial. They regard knowledge as something complete in itself irrespective of its availability in dealing with what is yet to be. And it is this omission which vitiates them and which makes them stand as sponsors for educational methods which an adequate conception of knowledge condemns. For one has only to call to mind what is sometimes treated in schools as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to realize how lacking it is in any fruitful connection with the ongoing experience of the students—how largely it seems to be believed that the mere appropriation of subject matter which happens to be stored in books constitutes knowledge. No matter how true what is learned to those who found it out and in whose experience it functioned, there is nothing which makes it knowledge to the pupils. It might as well be something about Mars or about some fanciful country unless it fructifies in the individual's own life.

但是，我们提到过的许多认识方法的哲学流派都把这种忽视变为

实际的否认。他们把知识视为自身完整的东西，从不考虑知识能否被用于未知领域。正是这种疏忽败坏了这些哲学流派，使他们成为适当知识概念所谴责的教育方法的发起者。只要回忆一下在学校获得知识的经历，我们能意识到，知识的获取与学生经历富有成效的联系是多么匮乏。许多人似乎相信只要将储存在书本中的内容掌握好就学到了知识。其实，无论所学东西对其发现者和对其经历起过作用者来说是如何真实，对学生来说，这些知识一点都不重要。它们也许事关遥远的火星或某个幻想中的国家，对个体生活没有什么影响。

At the time when scholastic method developed, it had relevancy to social conditions. It was a method for systematizing and lending rational sanction to material accepted on authority. This subject matter meant so much that it vitalized the defining and systematizing brought to bear upon it. Under present conditions the scholastic method, for most persons, means a form of knowing which has no especial connection with any particular subject matter. It includes making distinctions, definitions, divisions, and classifications for the mere sake of making them—with no objective in experience. The view of thought as a purely psychical activity having its own forms, which are applied to any material as a seal may be stamped on any plastic stuff, the view which underlies what is termed formal logic is essentially the scholastic method generalized. The doctrine of formal discipline in education is the natural counterpart of the scholastic method.

经院派方法的发展与社会状况有关联。这种方法系统化了权威所认可的题材，并给予明智的支持。这类题材意义重大，它使对其自身定义和系统化有影响的工作充满活力。在当前条件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经院派方法是与任何题材都没有特别联系的一种认知方式。这包括做出区别、定义、区分和分类等工作，并且仅仅是为了工作而工

作，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有人认为，思维纯属生理行为并拥有如同可以印在任何塑料制品上的图章一样的自我形式。这种观点可以作为形式逻辑基础，它其实是广义的经院派方法。教育上的形式训练理论自然就成为经院派方法相对应的理论。

The contrasting theories of the method of knowledge which go by the name of sensationalism and rationalism correspond to an exclusive emphasis upon the particular and the general respectively —or upon bare facts on one side and bare relations on the other. In real knowledge, there is a particularizing and a generalizing function working together. So far as a situation is confused, it has to be cleared up; it has to be resolved into details, as sharply defined as possible. Specified facts and qualities constitute the elements of the problem to be dealt with, and it is through our sense organs that they are specified. As setting forth the problem, they may well be termed particulars, for they are fragmentary. Since our task is to discover their connections and to recombine them, for us at the time they are partial. They are to be given meaning; hence, just as they stand, they lack it. Anything which is to be known, whose meaning has still to be made out, offers itself as particular. But what is already known, if it has been worked over with a view to making it applicable to intellectually mastering new particulars, is general in function. Its function of introducing connection into what is otherwise unconnected constitutes its generality. Any fact is general if we use it to give meaning to the elements of a new experience. 'Reason' is just the ability to bring the subject matter of prior experience to bear to perceiv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a new experience. A person is reasonable in the degree in which he is habitually open to seeing an event which immediately strikes his senses not as an isolated thing but in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common experience of mankind.

感知主义强调的是特殊性，而理性主义则强调普遍性，这就是它们关于知识方法的主要区别。或者说它们中的一个重视光秃秃的事实，另一个则是单纯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而真正的知识是特殊性与普遍性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只要情况仍未搞清楚，就必须予以澄清，必须从细节入手，尽可能做到各部分的界定泾渭分明。具体的事实和特性构成了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我们则通过感觉器官使其具体化。在讨论问题之时，这些事实和特性很可能认为具有特殊性，因为它们本来就是片段状的。既然我们的任务是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然后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对我们来说，此时的它们就是部分的。这些断片部分还需加上意义；因此，就其现状来说，它们还缺乏意义。任何尚未被人了解、其意义有待澄清的事物，都有其特殊性。但是，如果经过一番改造能用于解决新出现的特殊情况，已知事物就具有普遍性的功能。已知事物能使不相关联的东西联系起来，这就构成它的普遍性。如果我们用其解释新经验的组成成分，任何事实都具有普遍性。“理性”其实是一种能力，它能利用过去经验中的题材来认识新经验中题材的重要性。如果有人能把当前感觉到的事情习惯性地宽容对待，视之为与人类共同经历有关，而非孤立事件，这样的人就是理性的人。

Without the particulars as they are discriminated by the active responses of sense organs, there is no material for knowing and no intellectual growth. Without placing these particula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meanings wrought out in the larger experience of the past—without the use of reason or thought—particulars are mere excitations or irritations. The mistake alike of the sensational and the rationalistic schools is that each fails to see that the function of sensory stimulation and thought is relative to reorganizing experience in applying the old to the new, thereby maintaining the continuity or consistency of life.The theory of the method of knowing which is advanced in these pages may be termed

pragmatic. Its essential feature is to maintain the continuity of knowing with an activity which purposely modifies the environment. It holds that knowledge in its strict sense of something possessed consists of our intellectual resources—of all the habits that render our action intelligent. Only that which has been organized into our disposition so as to enable us to adapt the environment to our needs and to adapt our aims and desires to the situation in which we live is really knowledge. Knowledge is not just something which we are now conscious of, but consists of the dispositions we consciously use in understanding what now happens. Knowledge as an act is bringing some of our dispositions to consciousness with a view to straightening out a perplexity, by conceiv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不靠感觉器官的积极反应区分出来的特殊案例，就不会有认知的题材，也不会有知识的增长。如果不把这些特殊案例放在从过去广泛的经验所提炼出来的意义背景之中——不进行推理或者思维——这些特殊案例就仅仅能使人兴奋或者生气，仅此而已。感知主义和理性主义学派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它们未能认识到感觉刺激和思维在应用旧经验于新经验，从而保持生活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时，都与改组经验有关。这几页所要讨论的认识方法论可以被称为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其主要特点就是通过活动有目的地对环境进行改变来保持认知的连续性。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主张，严格意义的知识包括我们的智力资源，以及使我们行为变得明智的所有习惯。只有那些已经归于我们心理倾向的知识，使我们能让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使我们的目的和愿望适应所处环境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知识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意识到的东西，它包含我们在了解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中有意识地运用的心理倾向。知识作为一种行为，把我们的某些倾向带入意识中，以便通过想象我们与所处世界的联系，来解决令人困惑的问题。

Summary.

总结

Such social divisions as interfere with free and full intercourse react to make the intelligence and knowing of members of the separated classes one-sided. Those whose experience has to do with utilities cut off from the larger end they subserve are practical empiricists; those who enjoy the contemplation of a realm of meanings in whose active production they have had no share are practical rationalists. Those who come in direct contact with things and have to adapt their activities to them immediately are, in effect, realists; those who isolate the meanings of these things and put them in a religious or so-called spiritual world aloof from things are, in effect, idealists. Those concerned with progress, who are striving to change received beliefs, emphasize the individual factor in knowing; those whose chief business it is to withstand change and conserve received truth emphasize the universal and the fixed —and so on. Philosophic systems in their opposed theories of knowledge present an explicit formulation of the traits characteristic of these cut-off and one-sided segments of experience —one sided because barriers to intercourse prevent the experience of one from being enriched and supplemented by that of others who are differently situated.

妨碍充分自由交往的社会划分，使得社会各阶级成员的智力和认识都流于片面。有些人把经验与功利相联系，而与他们所服务的远大目标相分离，这些人实际上是经验主义者。有些人沉浸在对一连串意义思考中，而自己并未参与主动创造这些意义，这些人实际上是理性

主义者。有些人直接与事物接触，并且不得不使自己的行为马上与之适应，这些人实际上是现实主义者。有些人把事物的意义孤立起来，把它们归入一个与之隔离的宗教或精神世界，这些人实际上是理想主义者。有些人关心进步，努力改变公认的信仰，强调认知的个人因素；还有一些人，其主要任务是抵制变革，保持公认的真理，强调普遍的和固定的东西等。各派哲学体系在其相互对立的认识论中呈现出所特有的明显特征：一些是与经验相分离，还有一些是片面的经验观——说其片面是因为交往中的障碍使得我们的经历不能被其他不同的经历充实和补充。

In an analogous way, since democracy stands in principle for free interchange, for social continuity, it must develop a theory of knowledge which sees in knowledge the method by which one experience is made available in giving direction and meaning to another. The recent advances in physiology, biology, and the logic of the experimental sciences supply the specific intellectual instrumentalities demanded to work out and formulate such a theory. Their educational equivalent is the connection of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schools with activities, or occupations, carried on in a medium of associated life.

同样的，既然民主原则主张自由交往，保持社会连续性，它必须发展一种认知理论：发现一种认识方法，使得一种经验在方向和意义上对另一经验加以指导。近年来，生理学、生物学以及实验科学的逻辑进展给我们提供了制订和表述这种认识论所要求的专门知识工具。从教育上来说，就是要使学校中知识的获得与在共同生活的环境中所进行的种种活动联系起来。

Chapter 26 Theories of Morals

第二十六章　道德论

1．The Inner and the Outer.

一、内部与外部

Since morality is concerned with conduct, any dualisms which are set up between mind and activity must reflect themselves in the theory of morals. Since the formulations of the separation in the philosophic theory of morals are used to justify and idealize the practices employed in moral training, a brief critical discussion is in place. It is a commonplace of educational theory that the establishing of character is a comprehensive aim of school instruction and discipline. Hence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should be on our guard against a concep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intelligence to character which hamper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im, and on the look-out for the conditions which have to be provided in order that the aim may be successfully acted upon. The first obstruction which meets us is the currency of moral ideas which split the course of activity into two opposed factors, often named respectively the inner and outer, or the spiritual and the physical. This division is a culmination of the dualism of mind and the world, soul and body, end and means, which we have so frequently noted. In morals it takes the form of a sharp demarcation of the motive of action from its consequences, and of character from conduct. Motive and character are regarded as something purely 'inner,' existing

exclusively in consciousness, while consequences and conduct are regarded as outside of mind, conduct having to do simply with the movements which carry out motives; consequences with what happens as a result. Different schools identify morality with either the inner state of mind or the outer act and results, each in separation from the other. Action with a purpose is deliberate; it involves a consciously foreseen end and a mental weighing of considerations pro and con. It also involves a conscious state of longing or desire for the end. The deliberate choice of an aim and of a settled disposition of desire takes time. During this time complete overt action is suspended. A person who does not have his mind made up, does not know what to do. Consequently he postpones definite action so far as possible. His position may be compared to that of man considering jumping across a ditch. If he were sure he could or could not make it, definite activity in some direction would occur. But if he considers, he is in doubt; he hesitates. During the time in which a single overt line of action is in suspense, his activities are confined to such redistributions of energy within the organism as will prepare a determinate course of action. He measures the ditch with his eyes; he brings himself taut to get a feel of the energy at his disposal; he looks about for other ways across, he reflects upon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across. All this means an accentuation of consciousness; it means a turning in upon the individual's own attitudes, powers, wishes, etc.

由于道德与行为有关，任何在心智和行为之间形成的二元对立必须在道德论中得到反映。由于道德论有关划分的论述常被用于证明道德教育实践的合理性并将其理想化，因此，有必要对道德作出简短而审慎的讨论。品德培养是学校教学和教育的综合目标，是教育理论老生常谈的话题。因此，我们应当警惕妨碍该目标实现的有关智力与品德关系的概念，同时要留意成功推动该目标实现所必须提供的条件。

我们面临的第一道障碍是，当今流行的道德观念常常把人的行为划分为两个对立的因素，并分别称之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或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这种划分是我们曾多次指出的有关精神与世界、灵魂与身体、目的与手段等两分法的极致。在道德方面，这种二元对立体现在对动机与后果、性格与行为的截然划分。动机和性格被认为是纯粹“内在的东西”，只存在于意识中，而结果与行为则是在心智之外；行为只与执行动机的活动有关，后果只与产生的结果有关。不同的流派要么把道德视为是内在的心智状态，要么把道德视为外在的行为和结果，彼此相互分离。有目的的行为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包含有意识地预测结局，权衡是赞成还是反对，也包含有意识地对目标的向往或渴求。对目标和确定的期望值的慎重选择，需要时间，在此时间段，完全外显的行动暂时中止。在未下定决心前，人并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因此，他尽可能推迟和延缓明确的行动。他此时的处境就像是一位正在考虑跳过水沟的人。一旦确定能否跳过这条水沟，他就会采取某种确定的行动。但是，如果他还在考虑，那就意味着他仍拿不准，仍在犹豫。当外显的行动暂时中止，他的活动就局限于对体内能量的重新分配，以便为已经确定的行为做准备。他用双眼丈量水沟，绷紧神经以便感受自己的能量，然后探寻跳过水沟的其他方式，思量这件事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他要集中意识，转而注意自己的态度、能力和意愿等。

Obviously, however, this surging up of personal factors into conscious recognition is a part of the whole activity in its temporal development. There is not first a purely psychical process, followed abruptly by a radically different physical one. There is one continuous behavior, proceeding from a more uncertain, divided, hesitating state to a more overt, determinate, or complete state. The activity at first consists mainly of certain tensions and adjustments within the organism; as these are coordinated into a unified attitude, the organism as a whole acts—some definite act is undertaken. We may distinguish, of course, the more explicitly

conscious phase of the continuous activity as mental or psychical. But that only identifies the mental or psychical to mean the indeterminate, formative state of an activity which in its fullness involves putting forth of overt energy to modify the environment.

显然，个人因素涌进有意识的认识是整个活动向前发展中的一部分，而并非最初是一个纯粹的心理过程，然后是突而其来的完全不同的身体进程。这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过程，从较为不确定的、分离的、迟疑的状态发展到较为外显的、确定的或者完整的状态。该行为最初主要体现在身体内部的紧张状态和采取的调节措施。当这些变成为统一态度时，身体的各部分就会融为一体，采取某种明确的行动。当然，我们把持续活动中更为明显有意识的活动区分为心理状态。但是，这种区分仅仅将这种心理状态看作某种行为尚在形成的不确定状态。当这种状态成熟后，就会发出外显的力量，去改变环境。

Our conscious thoughts, observations, wishes, aversions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represent inchoate, nascent activities. They fulfill their destiny in issuing, later on, into specific and perceptible acts. And these inchoate, budding organic readjustments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are our sole escape from the dominion of routine habits and blind impulse. They are activities having a new meaning in process of development. Hence, normally, there is an accentuation of personal consciousness whenever our instincts and ready formed habits find themselves blocked by novel conditions. Then we are thrown back upon ourselves to reorganize our own attitude before proceeding to a definite and irretrievable course of action. Unless we try to drive our way through by sheer brute force, we must modify our organic resources to adapt them to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situation in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The conscious deliberating and desiring which precede overt action are, then, the

methodic personal readjustment implied in activity in uncertain situations. This role of mind in continuous activity is not always maintained, however. Desires for something different, aversion to the given state of things caused by the blocking of successful activity, stimulates the imagination. The picture of a different state of things does not always function to aid ingenious observation and recollection to find a way out and on. Except where there is a disciplined disposition, the tendency is for the imagination to run loose. Instead of its objects being checked up by conditions with reference to their practicability in execution, they are allowed to develop because of the immediate emotional satisfaction which they yield. When we find the successful display of our energies checked by uncongenial surroundings, natural and social, the easiest way out is to build castles in the air and let them be a substitute for an actual achievement which involves the pains of thought. So in overt action we acquiesce, and build up an imaginary world in mind. This break between thought and conduct is reflected in those theories which make a sharp separation between mind as inner and conduct and consequences as merely outer.

我们的意识思维、观察、企盼和憎恶都很重要，它们代表尚未成熟的早期活动，然后，再通过可感知的具体行动来实现其使命。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有机体的早期调节作用很重要。它们是我们摆脱陈规陋习和盲目冲动支配的唯一出路，是发展过程中具有崭新意义的行为。因此，每当我们的本能和日常习惯遇到新的阻碍时，个人意识就得以加强。于是，在采取不可挽回的特定行动之前，我们必须依靠自己重新决定我们的态度。如果不想凭借武力强行通过，我们就必须调整自身，使之适应所处环境的特点。因此，在采取外显行动之前有意识的斟酌和期望，乃是我们对蕴含在不确定情境的活动进行的系统化调整。然而，在连续的活动中，智力的作用并不总是能够得以保持。对新事物的渴望和由于活动受阻而造成的对特定事态的厌恶刺激着想

象。不同事态的图片并非一直都能发挥作用，进而有助于巧妙的观察和回忆，以便找到出路。除非受过专门训练，一般情况下人的想象都是自由散漫的。其想象对象不但没有由于条件局限，无法付诸实现而受阻，反而任由其发展，求得即时的情感满足。当发现不良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妨碍我们成功展现自己的力量之时，最容易的解决办法就是建造空中楼阁，让它们替代需要冥思苦想才能取得的实际成就。因此，在外显的活动中，我们默许在心中建立起一个虚幻世界，把思维和行为的分裂体现在将心智与行为和结果截然划分为内部和外部的理论之中。

For the split may be more than an incident of a particular individual's experience. The social situation may be such as to throw the class given to articulate reflection back into their own thoughts and desires without providing the means by which these ideas and aspirations can be used to reorganize the environment. Under such conditions, men take revenge, as it were, upon the alien and hostile environment by cultivating contempt for it, by giving it a bad name. They seek refuge and consolation within their own states of mind, their own imaginings and wishes, which they compliment by calling both more real and more ideal than the despised outer world. Such periods have recurred in history. In the early centuries of the Christian era, the influential moral systems of Stoicism, of monastic and popular 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us movements of the day, took shap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ch conditions. The more action which might express prevailing ideals was checked, the more the inner possession and cultivation of ideals was regarded as self-sufficient—as the essence of morality. The external world in which activity belongs was thought of as morally indifferent. Everything lay in having the right motive, even though that motive was not a moving force in the world. Much the same sort of situation recurred in Germany in the later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it led to the Kantian insistence upon the good will as the sole moral good, the will being regarded as something complete in itself, apart from action and from the changes or consequences effected in the world. Later it led to any idealization of existing institutions as themselves the embodiment of reason.

这种划分可能绝非某一特定人物经验的偶然事件。社会形势可能会促使习惯清晰反省的阶级回归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却没有提供手段，把这些想法用于改造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报复陌生敌对的环境，蔑视这种环境并给它强加恶名。他们在自己的内心、想象和期望中寻求庇护和安慰，称赞他们的想象和期望比受藐视的外部世界更为真实、也更为理想。这种时期在历史上多次出现。在基督教时期的最初几个世纪，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道德体系、寺院和大众所接受的基督教道德体系，以及其他宗教运动的道德体系，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能表达盛行理想的行为越受到压抑，内心所拥有和培育的理想就越被视为自给自足之物和道德的精髓。行为所属的外部世界则被认为是与道德无关的。一切事物都在于有正确的动机，即使这个动机并非世界的驱动力。同样的情形反复出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德国。这导致康德学派坚持主张，善意是唯一的美德，意志是自身完成的东西，与行动和世界上造成的变化和后果无关。后来，这又导致将现存制度理想化，认为这些制度是理性的化身。

The purely internal morality of 'meaning well,' of having a good disposition regardless of what comes of it, naturally led to a reaction. This is generally known as either hedonism or utilitarianism. It was said in effect that the important thing morally is not what a man is inside of his own consciousness, but what he does—the consequences which issue, the changes he actually effects. Inner morality was attacked as sentimental, arbitrary,

dogmatic, subjective—as giving men leave to dignify and shield any dogma congenial to their self-interest or any caprice occurring to imagination by calling it an intuition or an ideal of conscience. Results, conduct, are what counts; they afford the sole measure of morality. Ordinary morality, and hence that of the schoolroom, is likely to be an inconsistent compromise of both views. On one hand, certain states of feeling are made much of; the individual must 'mean well,' and if his intentions are good, if he had the right sort of emotional consciousness, he may be relieved of responsibility for full results in conduct. But since, on the other hand, certain things have to be done to meet the convenience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others, and of social order in general, there is great insistence upon the doing of certain things,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 individual has any concern or intelligence in their doing. He must toe the mark; he must have his nose held to the grindstone; he must obey; he must form useful habits; he must learn self-control,—all of these precepts being understood in a way which emphasizes simply the immediate thing tangibly done, irrespective of the spirit of thought and desire in which it is done, and irrespective therefore of its effect upon other less obvious doings.

这种不计后果，纯粹出于“善意”和基于善良性格的内在道德观自然产生了一种反作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享乐主义或者功利主义。这实际上是说，在道德方面重要的不是在于一个人的内心意识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在于他做了什么——产生了什么结果，实际上完成了什么任务。人们常抨击内在的道德感情用事，主观武断，自以为是，允许人美化并保护符合自身利益的任何教条或称之为直觉或良心理想的任何怪诞幻想。他们认为，只有结果和行为才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是衡量道德的唯一标准。通常的道德，因而也是学校提倡的道德，很有可能是对这两种观点不协调的状态的妥协。一方面，某些情感状态受到重视，个人必须心怀善意，只要其意图是好的，情感意识

是对的，他就不必对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负责。另一方面，由于不得不做某些事，以便为别人提供便利，满足其要求，同时为社会提供便利，满足社会的要求，因此，有一些事是非做不可，无论个人对这些事是否有兴趣，或是否有能力完成。个人必须遵守规定，埋头苦干，服从指挥，养成有用的习惯，学会自我控制——理解所有这些规定都是强调完成当下的事情，不必顾忌此时的思想状态和欲望，也不必顾忌对于其他不很明显事情的影响。

It is hoped that the prior discussion has sufficiently elaborated the method by which both of these evils are avoided. One or both of these evils must result wherever individuals, whether young or old, cannot engage in a progressively cumulative undertaking under conditions which engage their interest and require their reflection. For only in such cases is it possible that the disposition of desire and thinking should be an organic factor in overt and obvious conduct. Given a consecutive activity embodying the student's own interest, where a definite result is to be obtained, and where neither routine habit nor the following of dictated directions nor capricious improvising will suffice, and there the rise of conscious purpose, conscious desire, and deliberate reflection are inevitable. They are inevitable as the spirit and quality of an activity having specific consequences, not as forming an isolated realm of inner consciousness.

我希望前面的讨论已经充分说明了避免以上两种弊端的方法。任何人，无论年老年少，如果所从事的循序渐进、累积性的工作不能吸引其兴趣并引发相应的思考，这两种弊端中的一种或两种必然产生。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愿望和思维的倾向才能成为外显行为中的有机因素。假如有一个体现学生自身兴趣的连续活动，在那里能得明确的结果，在那里无论遵从日常习惯，或听从别人意旨，或反复无常的即兴

发挥都无济于事。于是，学生就必然会要树立有意识的目的，产生有意识的愿望，进行审慎的思考。这些有意识的目的和愿望以及审慎的思考之所以不可避免，因为这是产生了具体结果的活动的精神和特性，而不是由于形成了一个孤立的内在意识领域。

2．The Opposition of Duty and Interest.

二、职责与兴趣的对立

Probably there is no antithesis more often set up in moral discussion than that between acting from 'principle' and from 'interest. ' To act on principle is to act disinterestedly, according to a general law, which is above all personal considerations. To act according to interest is, so the allegation runs, to act selfishly, with one's own personal profit in view. It substitutes the changing expediency of the moment for devotion to unswerving moral law. The false idea of interest underlying this opposition has already been criticized (See Chapter X), but some moral aspects of the question will now be considered. A clew to the matter may be found in the fact that the supporters of the 'interest' side of the controversy habitually use the term 'self-interest. ' Starting from the premisses that unless there is interest in an object or idea, there is no motive force, they end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even when a person claims to be acting from principle or from a sense of duty, he really acts as he does because there 'is something in it' for himself. The premiss is sound; the conclusion false. In reply the other school argues that since man is capable of generous self-forgetting and even self-sacrificing action, he is capable of acting without interest. Again the premiss is sound, and the conclusion

false. The error on both sides lies in a false notion of the relation of interest and the self.

在有关道德的讨论中，恐怕没有一种对立比按照“原则”行事与按照“兴趣”行事之间的对立更为常见了。按照原则行事即是遵从普遍的准则，无私地行事，这要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有人认为，按照“兴趣”行事是只顾个人私利的行为。这是用目前处于变化中的权宜之计替代始终如一的道德准则。错误的兴趣观念是这一对立的思想基础，我们在此前已做过批判（参见第10章）。然而，我们现在要考虑该问题的某些道德层面。从以下事实可以发现这个问题的线索：在争论中支持“兴趣”的人习惯于使用“自身利益”这个词。他们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认为除非有人对某个对象或者某种思想有兴趣，否则他就不会有动力。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有人声称自己是根据原则或责任感行事的，事实上，他之所以肯这样做，是因为有利可图。这个假设是合理的，但结论却是错误的。另一派人则回应，既然有人能够忘我工作，甚至自我奉献，他也可以做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同样，这个假设是合理的，但结论也是错误的。这两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误解了兴趣和自我的关系。

Both sides assume that the self is a fixed and hence isolated quantity. As a consequence, there is a rigid dilemma between acting for an interest of the self and without interest. If the self is something fixed antecedent to action, then acting from interest means trying to get more in the way of possessions for the self—whether in the way of fame, approval of others, power over others, pecuniary profit, or pleasure. Then the reaction from this view as a cynical depreciation of human nature leads to the view that men who act nobly act with no interest at all. Yet to an unbiased judgment it would appear plain that a man must be interested in what he is doing or he would not do it. A physician who continues

to serve the sick in a plague at almost certain danger to his own life must be interested in the efficient performance of his profession—more interested in that than in the safety of his own bodily life. But it is distorting facts to say that this interest is merely a mask for an interest in something else which he gets by continuing his customary services—such as money or good repute or virtue; that it is only a means to an ulterior selfish end. The moment we recognize that the self is not something ready-made, but something in continuous formation through choice of action, the whole situation clears up. A man's interest in keeping at his work in spite of danger to life means that his self is found in that work; if he finally gave up, and preferred his personal safety or comfort, it would mean that he preferred to be that kind of a self. The mistake lies in making a separation between interest and self, and supposing that the latter is the end to which interest in objects and acts and others is a mere means. In fact, self and interest are two names for the same fact; the kind and amount of interest actively taken in a thing reveals and measures the quality of selfhood which exists. Bear in mind that interest means the active or moving identity of the self with a certain object, and the whole alleged dilemma falls to the ground.

这两种观点都假定自我是固定的，因而也是孤立的。因此，在做感兴趣之事与做不感兴趣的事之间存在着两难的困境。如果自我在行动之前就已经固定下来，那么做感兴趣之事就意味着企图为自己占有更多的东西——这可能是名誉或是别人的赞赏，或是权力超过别人，或是金钱、享乐。作为对这种愤世嫉俗，贬低人性的观点的反驳，有人提出，有高尚行为的人也就是没有个人兴趣的人。然而，如果公正地评断，这就很清楚，人必须对所做之事感兴趣，否则他就不会去做。医生面临瘟疫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为病人服务，这必然是因为他对从事职业的高效行动感兴趣——他对这方面的兴趣胜过考虑自身的生命安全。但是，如果有人说，医生对其职业所谓的兴趣不过是想掩盖

他对其他东西的兴趣，他是想通过服务获得金钱、名誉或美德等，他的所谓兴趣不过是为了达到其不为人知的自私目的的手段——这些说法都是对事实的扭曲。一旦我们承认自我并非现成，而是通过对行动的选择而逐渐形成的，整个情况就会变得明朗。有人不顾生命危险投身到工作中，这说明他在工作中找到自我；假如他最终放弃了，选择自身安全或舒适，这就意味着他喜欢成为过着舒适生活的自我。其错误在于将兴趣和自我区分开了，并假定自我是最终目的，而对事物、行为和他人的兴趣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实际上，自我和兴趣指的都是同一个事实；对一件事感兴趣的程度可以揭示并测量自我的性质。要牢记兴趣就是自我对某一对象的主动认同，所谓的两难困境就会不攻自破。

Unselfishness, for example, signifies neither lack of interest in what is done (that would mean only machine-like indifference) nor selflessness—which would mean absence of virility and character. As employed everywhere outside of this particular theoretical controversy, the term 'unselfishness' refers to the kind of aims and objects which habitually interest a man. And if we make a mental survey of the kind of interests which evoke the use of this epithet, we shall see that they have two intimately associated features. (i) The generous self consciously identifies itself with the full range of relationships implied in its activity, instead of drawing a sharp line between itself and considerations which are excluded as alien or indifferent; (ii) it readjusts and expands its past ideas of itself to take in new consequences as they become perceptible. When the physician began his career he may not have thought of a pestilence; he may not have consciously identified himself with service under such conditions. But, if he has a normally growing or active self, when he finds that his vocation involves such risks, he willingly adopts them as integral portions of his activity. The wider or larger self which means inclusion instead of denial of relationships is

identical with a self which enlarges in order to assume previously unforeseen ties.

比如说，无私并不是指对所做之事缺乏兴趣（这意味着机械式的冷漠），也不是指“忘我”（这意味着缺乏气概和特性）。如果用于这个特殊理论争论以外的地方，“无私”一词就是指使那些使人感兴趣的目的和对象。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引发使用这个名词的兴趣，就会发现它有两个紧密联系的特征。（1）慷慨的自我会有意识地将自己同整个活动中的各种关系等同起来，而不是将自己同一些被标记为“陌生的”或“不相关的”因素清晰地区分开来；（2）慷慨的自我会重新调整和扩充它过去关于自我的观念，吸收可感知的新成果。当医生开始行医之时，他也许没想到会遇到瘟疫，没有意识自己会在这种情形下从事医疗工作。但是，如果他拥有正常的成长以及积极的自我，当发现自己的职业包含危险时，他会主动把这危险视为其职业活动的组成部分。具有更加宽广胸襟的自我愿意容纳而不是否定各种关系。这种自我与扩大胸襟以接受过去未能预见的事物的自我毫无二致。

In such crises of readjustment—and the crisis may be slight as well as great—there may be a transitional conflict of 'principle' with 'interest. ' It is the nature of a habit to involve ease in the accustomed line of activity. It is the nature of a readjusting of habit to involve an effort which is disagreeable—something to which a man has deliberately to hold himself.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a tendency to identify the self—or take interest—in what one has got used to, and to turn away the mind with aversion or irritation when an unexpected thing which involves an unpleasant modification of habit comes up. Since in the past one has done one's duty without having to face such a disagreeable circumstance, why not go on as one has been? To yield to this temptation means to narrow and isolate the thought of the self—to treat it as complete. Any habit, no

matter how efficient in the past, which has become set, may at any time bring this temptation with it. To act from principle in such an emergency is not to act on some abstract principle, or duty at large; it is to act upon the principle of a course of action, instead of upo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have attended it. The principle of a physician's conduct is its animating aim and spirit—the care for the diseased. The principle is not what justifies an activity, for the principle is but another name for the continuity of the activity. If the activity as manifested in its consequences is undesirable, to act upon principle is to accentuate its evil. And a man who prides himself upon acting upon principle is likely to be a man who insists upon having his own way without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what is the better way. He fancies that some abstract principle justifies his course of action without recognizing that his principle needs justification.

在面临重新调整的危急时刻——这种危机可大可小——“原则”和“兴趣”之间可能会发生过渡性的冲突。在习惯性的活动中才能感到悠闲自在，这是习惯的使然。重新调整习惯就得付出令人望而生厌的努力——即必须坚持这么做。换句话说，人们有一种倾向，把自我或兴趣等同于自己所习惯的事情，如果有意外的事发生，要其改变自己不愿意改的习惯，他们就会厌恶或生气，置之不理。既然在过去不必面对这种不愉快的情况，而照样完成任务，为什么不继续按照过去的方式做呢？屈服于这种引诱意味着使自我的思想变得狭隘和孤立——认为自我是完整无缺的。任何习惯，不管在过去如何有效，一旦固定成型，在任何时候都会带来这种引诱。在这种非常情况下按原则办事，其实并非按某种抽象的原则或一般的义务办事，或按照伴随活动的情境办事，而是根据活动进程的原则办事。医生的行为准则在于其激励人心的目标和精神——救死扶伤。该准则并非能将其行为合理化，而只是能使其持续进行的代名词。如果该行为被证明不受欢迎，按原则行动就是突出该行为的弊端。以按原则行动而自豪的人很可能

是一位固执己见者，无法从经验中学习更好的方法。他认为，某种抽象的原则能证明其活动进程的合理性，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原则合理与否还尚待证明。

Assuming, however, that school conditions are such as to provide desirable occupations, it is interest in the occupation as a whole—that is, in its continuous development—which keeps a pupil at his work in spite of temporary diversions and unpleasant obstacles. Where there is no activity having a growing significance, appeal to principle is either purely verbal, or a form of obstinate pride or an appeal to extraneous considerations clothed with a dignified title. Undoubtedly there are junctures where momentary interest ceases and attention flags, and where reenforcement is needed. But what carries a person over these hard stretches is not loyalty to duty in the abstract, but interest in his occupation. Duties are 'offices'—they are the specific acts needed for the fulfilling of a function—or, in homely language, doing one's job. And the man who is genuinely interested in his job is the man who is able to stand temporary discouragement, to persist in the face of obstacles, to take the lean with the fat: he makes an interest out of meeting and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and distractions.

但是，假定学校能提供令人愉悦的活动，使学生忘掉暂时的干扰物和令人生厌的障碍，坚持不懈、持续发展，这样的活动就是有趣的。如果这种活动不具有持续发展的意义，那么一切诉诸原则就仅仅是空谈而已，或仅仅是一种固执的傲慢，披着光鲜的外衣，做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的确，有时候人的兴趣会一时减弱，注意力也会分散，这时就需要对此加以强化。但是，人之所以能克服这些困难，不是由于理论上的忠于职责，而由于他对活动的兴趣。职责就是“任务”，是完成某项任务所需要的特定行动，或者，通俗地讲，就是工

作。如果有谁对工作真正感兴趣，他就能够忍受暂时的挫败，面对困难时能够坚持不懈，勇于吃苦，克服困难和困惑，并从中寻找兴趣。

3．Intelligence and Character.

三、智力和性格

A noteworthy paradox often accompanies discussions of morals.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an identification of the moral with the rational. Reason is set up as a faculty from which proceed ultimate moral intuitions, and sometimes, as in the Kantian theory, it is said to supply the only proper moral motive. On the other hand, the value of concrete, everyday intelligence is constantly underestimated, and even deliberately depreciated. Morals is often thought to be an affair with which ordinary knowledge has nothing to do. Moral knowledge is thought to be a thing apart, and conscience is thought of as something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consciousness. This separation, if valid, is of e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in school is practically hopeless when we set up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as a supreme end, and at the same time treat the acquiring of knowled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standing, which of necessity occupy the chief part of school time, as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character. On such a basis, moral education is inevitably reduced to some kind of catechetical instruction, or lessons about morals. Lessons 'about morals' signify as matter of course lessons in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about virtues and duties. It amounts to something only in the degree in which pupils happen to be already animated by a sympathetic and dignified regard for the sentiments of others.

Without such a regard, it has no more influence on character than information about the mountains of Asia; with a servile regard, it increases dependence upon others, and throws upon those in authority the responsibility for conduct. As a matter of fact, direct instruction in morals has been effective only in social groups where it was a part of the authoritative control of the many by the few. Not the teaching as such but the reenforcement of it by the whole regime of which it was an incident made it effective. To attempt to get similar results from lessons about moral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s to rely upon sentimental magic.

在讨论道德时往往伴随着一个明显的悖论。一方面，有人把道德与理性同等看待，认为理性是一种智慧，能够产生最终的道德直觉。根据康德的理论，据说理性有时甚至能提供唯一正确的道德动机。另一方面，有人常常低估甚至故意贬低具体的、日常智慧的价值，认为道德与普通知识完全无关，道德知识与众不同，良心和意识根本就是两回事。如果这种区分是正确的，对教育就会有特殊意义。如果我们把发展性格作为最高目的，同时又把必然占学校多数时间的获取知识和培养理解力看作与性格无关，学校的道德教育实际上就没有希望。在此基础上，道德教育就不可避免地沦为某种问答式的教学，或者“有关道德”的课程。此类课程讲授的自然是别人对品德和职责的看法。只有当学生以同情和尊敬之情关注别人的思想感情并受到激励时，这样的课程才有效果。如果没有这种对别人感情的关注，这类功课就会像有关亚洲山脉这类知识一样对学生性格的影响无足轻重；如果只有一种奴性的关注，就会增加对别人的依赖，而把行为的责任交给权势者。事实上，直接的道德教育只在少数统治多数的社会群体中才会有效。并非是教学本身使道德教育有效，而是由于整个政府都在强调道德教育，学校的道德教学只不过是顺势而为。在民主社会，企图用“关于道德”的课程中获得类似的效果，这要依赖情感的神奇力量。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scale stands the Socratic-Platonic teaching which identifies knowledge and virtue—which holds that no man does evil knowingly but only because of ignorance of the good. This doctrine is commonly attacked on the ground that nothing is more common than for a man to know the good and yet do the bad: not knowledge, but habituation or practice, and motive are what is required. Aristotle, in fact, at once attacked the Platonic teaching on the ground that moral virtue is like an art, such as medicine; the experienced practitioner is better than a man who has theoretical knowledge but no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disease and remedies. The issue turns, however, upon what is meant by knowledge. Aristotle's objection ignored the gist of Plato's teaching to the effect that man could not attain a theoretical insight into the good except as he had passed through years of practical habituation and strenuous discipline. Knowledge of the good was not a thing to be got either from books or from others, but was achieved through a prolonged education. It was the final and culminating grace of a mature experience of life. Irrespective of Plato's position, it is easy to perceive that the term knowledge is used to denote things as far apart as intimate and vital personal realization,—a conviction gained and tested in experience,—and a second-handed, largely symbolic, recognition that persons in general believe so and so—a devitalized remote information. That the latter does not guarantee conduct, that it does not profoundly affect character, goes without saying. But if knowledge means something of the same sort as our conviction gained by trying and testing that sugar is sweet and quinine bitter, the case stands otherwise. Every time a man sits on a chair rather than on a stove, carries an umbrella when it rains, consults a doctor when ill—or in short performs any of the thousand acts which make up his daily life, he proves that knowledge of a certain kind finds direct issue in conduct.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suppose that the same sort of knowledge of good

has a like expression; in fact 'good' is an empty term unless it includes the satisfactions experienced in such situations as those mentioned. Knowledge that other persons are supposed to know something might lead one to act so as to win the approbation others attach to certain actions, or at least so as to give others the impression that one agrees with them; there is no reason why it should lead to personal initiative and loyalty in behalf of the beliefs attributed to them.

在天平的另一端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学说，他们将知识和美德等同起来，认为人做坏事并不是有意而为之，只是出于对善的无知。这种学说受到普遍抨击，理由是人们更多时候是知善而行恶：人所需要的并非知识，而是习惯或实践以及动机。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立刻抨击了柏拉图学说，理由是道德品质犹如医术一样是一门艺术，有临床经验的医生远胜过那些只拥有医学知识而毫无诊断治疗经验的人。然而，问题取决于何为知识。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但却忽略了柏拉图学说的精髓，即，除非经年累月形成习惯并严格自律，人不可能洞悉善的理论意义。其实，有关善的知识既无法从书本中学到，也无法从他人那里获得，而是通过持久的教育取得的。它是成熟的生活经验给予人的最终，也是最高的恩赐。不论柏拉图的地位如何，很容易辨出知识这个名词用来指两种完全分离的东西：一种是亲切的和富有活力的个人的真知灼见——这是在经验中获得和经过检验的信念；另一种是第二手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抽象的，人们所普遍相信的——一种缺乏生命力的遥远知识。无需多说，第二种知识并不能保证影响行为，因而也无法深远地影响性格。但是，如果知识是通过尝试和检验而获得的，像我们通过尝试和检验而确信糖是甜的而奎宁是苦的一样，那么情况就会不同。每当有人坐在椅子上而非炉灶上，下雨时就打伞，生病时就看医生——简言之，他的任何构成其日常生活的行为，都能证明某种知识直接导致行为结果。我们有充分理由去假定同样关于“善”的知识有类似的表现。事实上，除非“善”包含着在上述提到的情境中体验到的满足感，否则就只是一个空泛的名词而已。知道

别人有所知晓也许能导致我们采取某种行动，以赢得他们对某些活动的认可，或至少给他们造成一种印象，认为我们与他们的意见相同。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显示为何这会导致个人为其信念而显示的主动和忠贞。

It is not necessary, accordingly, to dispute about the proper meaning of the term knowledge. It is enough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to note the different qualities covered by the one name, to realize that it is knowledge gained at first hand through the exigencies of experience which affects conduct in significant ways. If a pupil learns things from books simply in connection with school lessons and for the sake of reciting what he has learned when called upon, then knowledge will have effect upon some conduct—namely upon that of reproducing statements at the demand of others. There is nothing surprising that such 'knowledge' should not have much influence in the life out of school. But this is not a reason for making a divorce between knowledge and conduct, but for holding in low esteem this kind of knowledge. The same thing may be said of knowledge which relates merely to an isolated and technical speciality; it modifies action but only in its own narrow line. In truth, the problem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schools is one with the problem of securing knowledge—the knowledge connected with the system of impulses and habits. For the use to which any known fact is put depends upon its connections. The knowledge of dynamite of a safecracker may be identical in verbal form with that of a chemist; in fact, it is different, for it is knit into connection with different aims and habits, and thus has a different import.

因此，争论“知识”一词的正确含义是不必要的。从教育目的来看，我们只需注意该词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的特性，认识到通过经验的

迫切要求而直接获得的知识会对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足够了。如果学生仅学习与学校课程有关的课本知识，只是为了被提问时能背诵所学习的内容，那么这种知识只会影响某种特定的行为——即，在别人要求时重复别人的话。这种“知识”对学习以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这不足为奇。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分离知识和行为的理由，而只会让人们轻视这种“知识”。对于只与孤立的专业技术有关的知识，情况也是如此；这种知识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内改变行为。事实上，学校道德教育问题就是获得知识的问题——这种知识与冲动和习惯的系统有关。我们要想把任何已知的事实加以应用，取决于它的种种联系。一个窃贼对炸药的了解可能与化学家的炸药知识在表面上是相同的；但是事实上却有差异，因为这种知识与不同的目标及习惯有联系，因此具有不同的含义。

Our prior discussion of subject-matter as proceeding from direct activity having an immediate aim, to the enlargement of meaning found in geography and history, and then to scientifically organized knowledge, was based upon the idea of maintaining a vital 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vity. What is learned and employed in an occupation having an aim and involving cooperation with others is moral knowledge, whether consciously so regarded or not. For it builds up a social interest and confers the intelligence needed to make that interest effective in practice. Just because the studies of the curriculum represent standard factors in social life, they are organs of initiation into social values. As mere school studies, their acquisition has only a technical worth. Acquired under conditions where their social significance is realized, they feed moral interest and develop moral insight. Moreover, the qualities of mind discussed under the topic of method of learning are all of them intrinsically moral qualities. Open-mindedness, single-mindedness, sincerity, breadth of outlook, thoroughness, assumpt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developing the

consequences of ideas which are accepted, are moral traits. The habit of identifying moral characteristics with external conformity to authoritative prescriptions may lead us to ignore the ethical value of these intellectual attitudes, but the same habit tends to reduce morals to a dead and machine-like routine. Consequently while such an attitude has moral results, the results are morally undesirable—above all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where so much depends upon personal disposition.

我们在前面讨论教材时，首先从具有直接目的的直接行为开始，进而讨论在地理和历史中对意义的扩展，然后讨论科学化和系统化的知识。我们这样做是基于一种想法，即保持知识和行为之间的重要联系。在一个有目的，并且包含与人合作的活动中，所学到的和所用到的知识乃是道德知识，无论是否有意识地视其为道德知识。这种道德知识能使人逐步建立社会兴趣，并授予其必需的智慧，以便使这种兴趣能应用于实践中。正因为课程中的各个学科代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标准要素，所以它们就是启迪社会价值的工具。作为纯粹的学校科目，获得这些知识只有专门的价值。当在体现其社会意义的条件下习得这些知识时，它们就能滋养道德兴趣，培养道德洞察力。其实，我们在论述学习方法时讨论到的有关心理的种种特性，本质上都是道德特性。虚心、专心、真诚、视野开阔、考虑周全、勇于承担责任，这些都是道德特性。如果把道德特性等同于表面上服从权威规定，这种习惯可能使我们忽略这些理智态度的伦理价值。但是，同样的，这种习惯也往往使道德沦为沉闷机械的惯例。因此，虽然这种态度产生了道德结果，但是这种结果在道德上并不可取——尤其是在非常尊重个人倾向的民主社会。

4．The Social and the Moral.

四、社会和道德

All of the separations which we have been criticizing—and which the idea of education set forth in the previous chapters is designed to avoid—spring from taking morals too narrowly,—giving them, on one side, a sentimental goody-goody turn without reference to effective ability to do what is socially needed, and, on the other side, overemphasizing convention and tradition so as to limit morals to a list of definitely stated acts. As a matter of fact, morals are as broad as acts which concern our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And potentially this includes all our acts, even though their social bearing may not be thought of at the time of performance. For every act, by the principle of habit, modifies disposition—it sets up a certain kind of inclination and desire.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tell when the habit thus strengthened may have a direct and perceptible influence on our association with others. Certain traits of character have such an obvious connection with our social relationships that we call them 'moral' in an emphatic sense—truthfulness, honesty, chastity, amiability, etc. But this only means that they are, as compared with some other attitudes, central:—that they carry other attitudes with them. They are moral in an emphatic sense not because they are isolated and exclusive, but because they are so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ousands of other attitudes which we do not explicitly recognize—which perhaps we have not even names for. To call them virtues in their isolation is like taking the skeleton for the living body. The bones are certainly important, but their importanc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y support other organs of the body in such a way as to make them capable of integrated effective activity. And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qualities of character which we specifically designate virtues. Morals concern nothing less than the whole character, and the whole character is

identical with the man in all his concrete make-up and manifestations. To possess virtue does not signify to have cultivated a few nameable and exclusive traits; it means to be fully and adequately what one is capable of becoming through association with others in all the offices of life.

我们所批判的各种划分方法——前面各章所阐述的教育概念就是要避免这样的区分——都是由于把道德看得过于狭隘。这样的区分，一方面，给道德一种感情用事的伪善倾向，不顾及社会所需要的有效能力；另一方面，又过分强调习惯和传统，把道德局限于一些明确规定的行为中。事实上，道德的范围与涉及我们与他人关系的行为一样广泛。道德包括我们的一切行为，即使我们在做事时并没有想到我们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社会意义。根据习惯原理，每个行为都能改变性格倾向，建立起某种志趣和愿望。我们很难确认这种强化的习惯何时会对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产生直接可见的影响。我们的某些特性与我们的社会关系有显而易见的联系，我们对此非常重视，称之为“道德”，如诚实、正直、纯洁和友善等。但这只意味着，与其他态度相比，这些特性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带动了其他态度。我们将这些特性强调为道德，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孤立的、唯一的，而是因为它们同成千上万的其他态度有密切的联系，我们明确辨认出这些态度，虽然有的甚至都叫不上名字。把他们独立为美德就如同把骨骼当成个鲜活的躯体一样。骨骼固然重要，但是它的重要性在于能够支撑身体的各个器官，使之能完成完整有效的动作。我们特别称之为美德的性格特征也是同样如此。道德与人的整个性格有关，而人的整个性格又等同于人的全部具体特性和表现。具备美德并不意味着拥有一些叫得出名称的独有特征；而是意味着一个人能够通过在人生各种事务中与别人的交往，充分地展示了自己潜在的特性。

The moral and the social quality of conduct are, in the last analysis, identical with each other. It is then but to restate explicitly

the import of our earlier chapters regarding the social function of education to say that the measure of the worth of the administration, curriculum, and methods of instruction of the school i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are animated by a social spirit. And the great danger which threatens school work is the absence of conditions which make possible a permeating social spirit; this is the great enemy of effective moral training. For this spirit can be actively present only when certain conditions are met.

归根到底，行为的道德特性和社会特性是相同的。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更清晰地重述前面章节提到的教育的社会功能，即衡量学校管理、课程和教学方法的价值标准就是它们被社会精神感染的程度。同时，学校工作最大的威胁是缺少充满社会精神的教学情境；这是进行有效道德培养的最大障碍。只有具备适当的条件时，这种社会精神才能积极融入教学情境中。

(i)In the first place, the school must itself be a community life in all which that implies. Social perceptions and interests can be developed only in a genuinely social medium—one where there is give and take in the building up of a common experience. Informational statements about things can be acquired in relative isolation by any one who previously has had enough intercourse with others to have learned language. But realiz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linguistic signs is quite another matter. That involves a context of work and play in association with others. The plea which has been made for education through continued constructive activities in this book rests upon the fact they afford an opportunity for a social atmosphere. In place of a school set apart from life as a place for learning lessons, we have a miniature social group in which study and growth are incidents of present shared

experience. Playgrounds, shops, workrooms, laboratories not only direct the natural active tendencies of youth, but they involve intercours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all extending the perception of connections.

1．首先，学校生活本身应是一种社会生活，具备社会生活所包含的一切。社会感知力和社会兴趣只有在真正的社会媒介中才能够得到发展。在这里，彼此平等交流，以建立起共同的经验。任何人，只要在先前已和别人有过足够的交往，学会了使用语言，就能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获得有关事物的知识。但是，能否体会到这些语言符号的含义则是另外一回事。这就需要与别人共同工作和游戏。本书呼吁教育中要融入持续的、建设性的活动，基于的事实就是这种活动能提供社会氛围。我们的学校不再是与生活脱节的学习场所，而是一个微型社会，学习和成长只是其成员目前共同参与活动的伴随物。操场、商店、工作室和实验室不仅引导着年轻人自然的主动趋势，还包含着交往、交流和合作，——这一切都扩展了对各种联系的理解。

(ii)The learning in school should be continuous with that out of school. There should be a free interplay between the two. This is possible only when there are numerous points of contact between the social interests of the one and of the other. A school is conceivable in which there should be a spirit of companionship and shared activity, but where its social life would no more represent or typify that of the world beyond the school walls than that of a monastery. Social concern and understanding would be developed, but they would not be available outside; they would not carry over. The proverbial separation of town and gown, the cultivation of academic seclusion, operate in this direction. So does such adherence to the culture of the past as generates a reminiscent social spirit, for this makes an individual feel more at home in the

life of other days than in his own. A professedly cultural education is peculiarly exposed to this danger. An idealized past becomes the refuge and solace of the spirit; present-day concerns are found sordid, and unworthy of attention. But as a rule, the absence of a social environment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learning is a need and a reward is the chief reason for the isolation of the school; and this isolation renders school knowledge inapplicable to life and so infertile in character.

2．校内学习应该与校外学习挂钩。两者之间应当自由地相互影响。只有当其中一方的社会兴趣和另一方的兴趣有无数连接点时，这才有可能实现。试想有这样一种学校，在那里合作精神和共同参与的活动得以提倡，但是，如果学校里的社会生活不能代表学校院墙以外的生活，这种生活与寺庙生活就没有差别。在这里，对社会的兴趣和了解得到了培养，但却无法应用到校外生活中，无法得以持续。众所周知的社会与学校的隔离，以及学究式的封闭生活，就是这样的情形。这种对过去文化的迷恋会衍生出一种怀旧的社会精神，让人感觉与现在的生活相比，自己更中意过去的生活。自称为文化修养的教育尤其面临着这样的危险。理想化的过去成为精神的庇护所和心灵的慰藉，当今的事物则认为是污秽的，不值得关注。但是，通常来讲，学校和社会隔离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社会的环境，有了社会环境，学习就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报酬。学校一旦与社会隔离，学校里的知识就不能应用于生活，也无益于品性的培养。

A narrow and moralistic view of morals is responsible for the failure to recognize that all the aims and values which are desirable in education are themselves moral. Discipline, natural development, culture, social efficiency, are moral traits—marks of a person who is a worthy member of that society which it is the business of education to further. There is an old saying to the effect that it is

not enough for a man to be good; he must be good for something. The something for which a man must be good is capacity to live as a social member so that what he gets from living with others balances with what he contributes. What he gets and gives as a human being, a being with desires, emotions, and ideas, is not external possessions, but a widening and deepening of conscious life—a more intense, disciplined, and expanding realization of meanings. What he materially receives and gives is at most opportunities and means for the evolution of conscious life. Otherwise, it is neither giving nor taking, but a shifting about of the position of things in space, like the stirring of water and sand with a stick. Discipline, culture, social efficiency, personal refinement, improvement of character are but phases of the growth of capacity nobly to share in such a balanced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is not a mere means to such a life. Education is such a life. To maintain capacity for such education is the essence of morals. For conscious life is a continual beginning afresh.

由于对道德概念狭隘和道德化的理解，这导致有些人未能认识到教育合乎需要的所有目标和价值本身就是合乎道德的。智力训练、自然发展、文化修养、社会效率，这些都是道德特征——都是教育所要培养的社会优秀成员的标志。有句老话说得好，一个人仅仅做个好人还不够，他还必须有自身的价值。一个人的价值在于有能力做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从别人那里得到的索取要与自己所做的贡献保持平衡。作为一个有血有肉和个人见解的人，他的索取和贡献不是外部的占有，而是对有意识生活的扩展和加深——他对各种意义的认识更加强烈，更加训练有素，更加开阔。他在物质上所接受和贡献的东西最多只是发展有意识生活的机会和手段。否则，这种行为就既不是给予也不是索取，只是变换物体的空间位置而已，就像是用棍棒搅拌水和泥沙一样。智力训练、文化修养、社会效率、个人教养和性格改善只是个人能力发展的几个阶段，其目的是为了高尚地分享这样一种平衡

的经验。教育不仅仅是这种生活的手段，教育就是这种生活。保持教育的这种能力对道德至关重要。有意识地生活就是接连不断地重新开始。

Summary.

总结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school concerns the relationship of knowledge and conduct. For unless the learning which accrues in the regular course of study affects character, it is futile to conceive the moral end as the unifying and culminating end of education. When there is no intimat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knowledge and moral growth, particular lessons and modes of discipline have to be resorted to: knowledge is not integrated into the usual springs of action and the outlook on life, while morals become moralistic—a scheme of separate virtues.

学校道德教育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知识和行为的关系。除非正规课程学习中累积的知识足以影响性格，否则，即使将道德的目的作为教育统一的最终目的也毫无用处。由于获取知识的方法和素材与道德发展没有密切的有机联系，于是就不得不诉诸于特定的培训课和培养方式：由于知识并没有融入通常的行为动机和人生观，道德就变成了道德说教——成为各不相干的品性的组合。

The two theories chiefly associated with the separation of

learning from activity, and hence from morals, are those which cut off inner disposition and motive—the conscious personal factor—and deeds as purely physical and outer; and which set action from interest in opposition to that from principle. Both of these separations are overcome in an educational scheme where learning is the accompaniment of continuous activities or occupations which have a social aim and utilize the materials of typical social situations. For under such conditions, the school becomes itself a form of social life, a miniature community and one in close interaction with other modes of associated experience beyond school walls. All education which develops power to share effectively in social life is moral. It forms a character which not only does the particular deed socially necessary but one which is interested in that continuous readjustment which is essential to growth. Interest in learning from all the contacts of life is the essential moral interest.

有两种理论主要与学习和行为的分离，也就是学习与道德的分离有关：一种理论把内在的心理倾向和动机——有意识的个人因素——与纯粹物质的和外在的行为分离开来；另一种理论则依兴趣而行事与按原则行事对立起来。有一种教育方案能够克服这两种分离。在这种教育方案中，学习是伴随持续不断的活动或作业而来的，这些活动或作业具有社会目的，并能利用具有典型社会情境的题材。在这种条件下，学校本身就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成为社会的缩影，与校外的其他模式的相关经验彼此密切相互影响。一切旨在培养有效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的教育，都属于道德教育。这种教育塑造的人不但能从事社会所必需的特定行为，而且对成长中必不可少的持续调整感兴趣。对于“从生活的体验中学习”的兴趣乃是最根本的道德兴趣。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

实用主义
——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

William James

威廉·詹姆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

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

威廉·詹姆斯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reface 序
- Lecture I The Present Dilemma in Philosophy 第一讲　哲学当前的困境
- Lecture II What Pragmatism Means 第二讲　实用主义是什么？
- Lecture III Some Metaphysical Problems Pragmatically Considered 第三讲　从实用主义角度来思考几个形而上学问题
- Lecture IV The One and the Many 第四讲　一元与多元
- Lecture V Pragmatism and Common Sense 第五讲　实用主义与常识
- Lecture VI Pragmatism's Conception of Truth 第六讲　实用主义有关真理的概念
- Lecture VII Pragmatism and Humanism 第七讲　实用主义与人本主义
- Lecture VIII Pragmatism and Religion 第八讲　实用主义与宗教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reface

序

The lectures that follow were delivered at the Lowell Institute in Boston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1906, and in January, 1907,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They are printed as delivered, without developments or notes. The pragmatic movement, so-called—I do not like the name, but apparently it is too late to change it—seems to have rather suddenly precipitated itself out of the air. A number of tendencies that have always existed in philosophy have all at once become conscious of themselves collectively, and of their combined mission; and this has occurred in so many countries, and from so many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that much unconcerted statement has resulted. I have sought to unify the picture as it presents itself to my own eyes, dealing in broad strokes, and avoiding minute controversy. Much futile controversy might have been avoided, I believe, if our critics had been willing to wait until we got our message fairly out.

以下内容是我于1906年11月和12月在波士顿洛厄尔研究所和1907年1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做的讲座。此处印刷出版的只包括讲座内容，没有更多的补充或注解。实用主义运动似乎突然降临，尽管我不喜欢这个所谓的名称，但现在改之，显然为时已晚。哲学中久已存在的一些趋势突然之间集体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也意识到了共同使命；这个现象席卷各国，视角众多，导致出现众多不同的论述。我试着对眼前的形势有个整体认识，用粗略的线条来处理，避免出现细节上的争议。我相信，如果批评者愿意耐心等待我们大致说出自己的观点，也许可以避免一些无用的争论。

If my lectures interest any reader in the general subject, he will doubtless wish to read farther. I therefore give him a few references.

如果我的讲座能让读者对实用主义这个大的话题感兴趣，他们无疑会愿意进行进一步的阅读。因此，我将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In America, John Dewey's “Studies in Logical Theory” are the foundation. Read also by Dewey the articles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xv, pp. 113 and 465, in Mind, vol. xv, p. 293, and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iv, p. 197.

在美国，约翰·杜威的《逻辑理论研究》是基础。还可以阅读杜威发表在《哲学评论》（第15卷113页、465页），《思想》（第15卷293页）和《哲学期刊》（第4卷197页）上的文章。

Probably the best statements to begin with however, are F. C. S. Schiller's in his “Studies in Humanism,” especially the essays numbered i, v, vi, vii, xviii and xix. His previous essays and in general the polemic literature of the subject are fully referred to in his footnotes.

但也许对初学者来说，最好的论述来自F. C. S. 席勒。他的《人文主义研究》一书，尤其是书中标号为1、5、6、7、18和19的文章值得一读。他之前的文章和那些有关实用主义的辩论性著述基本都在他的脚注中提到了。

Furthermore, see G. Milhaud:1 le Rationnel, 1898, and the fine articles by Le Roy in the Revue de Metaphysique, vols. 7, 8 and 9. Also articles by Blondel and de Sailly in the Annales de PhilosophieChretienne, 4me Serie, vols. 2 and 3. Papini announces a book on Pragmatism, in the French language, to be published very soon.

此外，也可以阅读G.　米约1898年发表的《理性主义》，勒瑞在《形而上学评论》第7、8、9卷上发表的精彩文章。还有《基督教哲学年刊》第4辑第2、第3卷发表的布隆德尔和德塞利的文章。帕皮尼宣布很快会用法语出版一本有关实用主义的书。

To avoid one misunderstanding at least, let me say that there is no logical connexion between pragmatism, as I understand it, and a doctrine which I have recently set forth as “radical empiricism.” The latter stands on its own feet. One may entirely reject it and still be a pragmatist.

为了至少避免一大误解，请允许我声明，我所理解的实用主义和我最近提出的新学说“激进实证主义”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后者是独立的。你可以彻底否认后者，而不妨还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1907

1907年4月于哈佛大学

Lecture I The Present Dilemma in Philosophy

第一讲　哲学当前的困境

CHESTERTON QUOTED. EVERYONE HAS A PHILOSOPHY. TEMPERAMENT IS A FACTOR IN ALL PHILOSOPHIZING. RATIONALISTS AND EMPIRICISTS.THE TENDER-MINDED AND THE TOUGH-MINDED. MOST MEN WISH BOTH FACTS AND RELIGION. EMPIRICISM GIVES FACTS WITHOUT RELIGION. RATIONALISM GIVES RELIGION WITHOUT FACTS. THE LAYMAN's DILEMMA. THE UNREALITY IN RATIONALISTIC SYSTEMS.LEIBNITZ ON THE DAMNED, AS AN EXAMPLE.M. I. SWIFT ON THE OPTIMISM OF IDEALISTS. PRAGMATISM AS A MEDIATING SYSTEM. AN OBJECTION. REPLY: PHILOSOPHIES HAVE CHARACTERS LIKE MEN, AND ARE LIABLE TO AS SUMMARY JUDGMENTS. SPENCER AS AN EXAMPLE.

引用切斯特顿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在所有哲学化过程中，气质是一种因素。理性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空想派和实际派。大多数人既要事实，又要宗教。实证主义只有事实，没有宗教。理性主义只有宗教，没有事实。普通人的困境。理性主义体系不够真实。用莱布尼茨对那些被诅咒者的观点来当例子。M. I. 斯威夫特对唯心主义者的乐观主义的看法。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折衷体系。一种异议。回答：和人类一样，各哲学流派都有各自的特征，都容易得出笼统草率的结论。以斯宾塞为例。”

In the preface to that admirable collection of essays of his called Heretics, Mr. Chesterton writes these words:

切斯特顿先生有一本文集很让人敬佩，书名是《异教徒》，他在前言里写道：

“There are some people—and I am one of them—who think that the most practical and important thing about a man is still his view of the universe. We think that for a landlady considering a lodger,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his income, but still more important to know his philosophy. We think that for a general about to fight an enemy,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the enemy's numbers, but still more important to know the enemy's philosophy. We think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the theory of the cosmos affects matters, but whether, in the long run, anything else affects them.”

“当前，有些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认为，关于一个人，最实际也最重要的仍然是他的宇宙观。我们觉得，房东太太在考虑能否接受租房者的时候，了解他的收入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他的思想哲学。我们觉得，将军在要与敌人作战的时候，了解敌人的数量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了解敌人的思想哲学。我们觉得，问题不是有关宇宙的理论是否影响万物，而是归根到底，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能够影响万物。”

I think with Mr. Chesterton in this matter. I know that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have a philosophy, each and all of you, and that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thing about you is the way in which it determines the perspective in your several worlds. You know the same of me. And yet I confess to a certain tremor at the audacity of the enterprise which I am about to begin. For the philosophy which is so important in each of us is not a technical

matter; it is our more or less dumb sense of what life honestly and deeply means. It is only partly got from books; it is our individual way of just seeing and feeling the total push and pressure of the cosmos. I have no right to assume that many of you are students of the cosmos in the class-room sense, yet here I stand desirous of interesting you in a philosophy which to no small extent has to be technically treated. I wish to fill you with sympathy with a contemporaneous tendency in which I profoundly believe, and yet I have to talk like a professor to you who are not students. Whatever universe a professor believes in must at any rate be a universe that lends itself to lengthy discourse. A universe definable in two sentences is something for which the professorial intellect has no use. No faith in anything of that cheap kind! I have heard friends and colleagues try to popularize philosophy in this very hall, but they soon grew dry, and then technical, and the results were only partially encouraging. So my enterprise is a bold one. The founder of pragmatism1 himself recently gave a course of lectures at the Lowell Institute with that very word in its title—flashes of brilliant light relieved against Cimmerian darkness! None of us, I fancy, understood ALL that he said—yet here I stand, making a very similar venture.

我赞同切斯特顿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我知道，在座诸位，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我也知道，最有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的哲学如何决定了你们各自的世界观。你们知道，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我承认，对于我马上要讲到的重要问题，我心怀敬畏，惴惴不安。因为，对我们每个人都如此重要的哲学，并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我们对人生真谛的理解，我们对此都多少有些模糊的理解。书本上只能学到哲学的一部分；但哲学更是我们各自对宇宙的整体推动力和压制力的观察和感知。我无权假设，你们中间很多是在课堂学习宇宙的学生。但是，我站在这里，非常渴望让你们了解一

种哲学，它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被当成技术问题来处理。我希望你们能对我所坚信的一种新趋势充分表示认同，虽然你们不是学生，但我又不得不像个教授一样来跟你们讲这个问题。一个教授所坚信的宇宙，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必须是能够让他发表长篇大论的。如果宇宙用两句话就能定义，那它用不着教授所掌握的知识。任何信仰都不可能如此廉价！就在这同一个大厅里，我听过一些朋友和同事的演讲。他们努力普及哲学，但很快讲座就变得枯燥无味，越来越专业，结果也就不怎么令人鼓舞，因而就收效甚微。因此，我今天要讲重要的哲学问题，实际上是相当冒险的。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最近在洛厄尔研究所有过几次演讲，讲的就是实用主义这个题目，这些演讲就像黑暗世界里的阵阵闪光，带给人希望和明亮。我想，我们谁也不能理解他演讲内容的全部。但是，今天，我站在这里，冒着同样的风险做这件事。

I risk it because the very lectures I speak of DREW—they brought good audiences. There is, it must be confessed, a curious fascination in hearing deep things talked about, even tho neither we nor the disputants understand them. We get the problematic thrill, we feel the presence of the vastness. Let a controversy begin in a smoking-room anywhere, about free-will or God's omniscience, or good and evil, and see how everyone in the place pricks up his ears. Philosophy's results concern us all most vitally, and philosophy's queerest arguments tickle agreeably our sense of subtlety and ingenuity.

我冒此风险，是因为我刚才提到的演讲吸引了很多听众。必须承认，听人讲高深的东西，尽管演讲者和争辩者都不是太明白，却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很是奇妙。我们感受到问题带来的刺激，也体会到无限宇宙的存在。人们可以在吸烟室或者任何地方展开一场争论，探讨自由意志或上帝的全知性，或者探讨善与恶。你可以看看，人们会是多么全神贯注。哲学的结论最深切地关系到我们所有人。哲学中

最怪异的论点也能使我们愉悦，引起我们微妙、机敏的感觉。

Believing in philosophy myself devoutly, and believing also that a kind of new dawn is breaking upon us philosophers, I feel impelled, per fasautnefas, to try to impart to you some news of the situation.

我笃信哲学，也相信新的曙光正照在我们这些哲学家前进的路上。不管对与不对，我都感到必须要把这些新东西告诉你们。

Philosophy is at once the most sublime and the most trivial of human pursuits. It works in the minutest crannies and it opens out the widest vistas. It “bakes no bread,” as has been said, but it can inspire our souls with courage; and repugnant as its manners, its doubting and challenging, its quibbling and dialectics, often are to common people, no one of us can get along without the far-flashing beams of light it sends over the world's perspectives. These illuminations at least, and the contrast-effects of darkness and mystery that accompany them, give to what it says an interest that is much more than professional.

哲学是人类追求中最崇高也最平凡的一种。它在最细微的地方发挥作用，却为人类展开了最广阔的前景。正如人们所说的，它不能“烤出面包”供人果腹，但可以鼓舞灵魂，给人勇气；尽管它的方式、它的质疑、它的诘难，它的诡论、它的辩证性常令普通人反感；但是，如果没有它的光芒照耀全世界，我们就难以继续前行。这些光芒，加上与之相随的黑暗与蒙昧世界的反作用的映衬，至少能人产生不仅仅只是出于专业才产生的兴趣。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s to a great extent that of a certain clash of human temperaments. Undignified as such a treatment may seem to some of my colleagues, I shall have to take account of this clash and explain a good many of the divergencies of philosophers by it. Of whatever temperament a professional philosopher is, he tries when philosophizing to sink the fact of his temperament. Temperament is no conventionally recognized reason, so he urges impersonal reasons only for his conclusions. Yet his temperament really gives him a stronger bias than any of his more strictly objective premises. It loads the evidence for him one way or the other, making for a more sentimental or a more hard-hearted view of the universe, just as this fact or that principle would. He trusts his temperament. Wanting a universe that suits it, he believes in any representation of the universe that does suit it. He feels men of opposite temper to be out of key with the world's character, and in his heart considers them incompetent and “not in it,” in the philosophic business, even tho they may far excel him in dialectical ability.

在很大程度上，哲学的历史就是人类各种气质的冲突。尽管有些同事认为我的方法不够严谨，但我还是要讲一讲这些冲突，用它来说明哲学家之间的很多分歧。职业哲学家进行哲学思考时，不管他气质如何，都会努力掩盖自己的气质。个人气质绝非传统所认可的理由，所以，他只能用客观的理由得出结论。但事实上，他的气质又确实让他怀有偏见，程度要强于其他更严格的客观前提。正如这个事实或那个原则一样，他的气质也会或多或少地引导他理解证据，让他对宇宙产生更感性或更理性的认识。他相信自己的气质。因为想要一个适合自己气质的宇宙，他就相信那些适合自己气质的对宇宙的解释。他觉得，那些气质与之相左的人与世界的性格是脱节的。即使这些人在辩术上比他强出许多，他心里也认为他们在哲学上不称职，是“门外

汉”。

Yet in the forum he can make no claim, on the bare ground of his temperament, to superior discernment or authority. There arises thus a certain insincerity in our philosophic discussions: the potentest of all our premises is never mentioned. I am sure it would contribute to clearness if in these lectures we should break this rule and mention it, and I accordingly feel free to do so.

可是在公共场合，他不能仅凭个人气质，就自称拥有高人一等的洞察力或权威性。因此，在我们的哲学讨论中，会出现一种言不由衷的现象：所有前提中最重要的那一个，从来就无人提及。我肯定，如果我们在演讲中打破这个成规，讲到这个最重要的前提，就会让问题清晰许多。因此，我要大胆这么做了。

Of course I am talking here of very positively marked men, men of radical idiosyncracy, who have set their stamp and likeness on philosophy and figure in its history. Plato, Locke, Hegel, Spencer, are such temperamental thinkers. Most of us have, of course, no very definite intellectual temperament, we are a mixture of opposite ingredients, each one present very moderately. We hardly know our own preferences in abstract matters; some of us are easily talked out of them, and end by following the fashion or taking up with the beliefs of the most impressive philosopher in our neighborhood, whoever he may be. But the one thing that has COUNTED so far in philosophy is that a man should see things, see them straight in his own peculiar way, and be dissatisfied with any opposite way of seeing them. There is no reason to suppose that this strong temperamental vision is from now onward to count no

longer in the history of man's beliefs.

当然，我这里谈论的是那些确实非常突出的个人，他们性格独特，形象鲜明，地位崇高，名垂青史。柏拉图、洛克、黑格尔、斯宾塞，他们都是有这样气质的思想家。当然，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非常分明的知性气质，我们是各种不同气质的混合体，每一种气质并不鲜明。我们几乎不知道自己在抽象事物上的倾向性；有些人很容易就被说服，最后随着大众，或者盲从身边那位最吸引人的哲学家的信条，而不管他是谁。但至今为止，哲学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应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观察事物，并且不满于任何与之相反的观察事物的方法。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从此以后，这种具有强烈气质色彩的观察视角在人类信仰史中会不再重要。

Now the particular difference of temperament that I have in mind in making these remarks is one that has counted in literature, art, government and manners as well as in philosophy. In manners we find formalists and free-and-easy persons. In government, authoritarians and anarchists.In literature, purists or academicals, and realists.In art, classics and romantics. You recognize these contrasts as familiar; well, in philosophy we have a very similar contrast expressed in the pair of terms “rationalist” and “empiricist,” “empiricist” meaning your lover of facts in all their crude variety, “rationalist” meaning your devotee to abstract and eternal principles. No one can live an hour without both facts and principles, so it is a difference rather of emphasis; yet it breeds antipathies of the most pungent character between those who lay the emphasis differently; and we shall find it extraordinarily convenient to express a certain contrast in men's ways of taking their universe, by talking of the “empiricist” and of the “rationalist” temper. These terms make the contrast simple and massive.

我一直所讲的气质的特异性在诸多领域都很重要，包括文学、艺术、政府、举止，也包括哲学。举止，有呆板与随意之分；政府，有独裁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分；文学，有纯粹派或者学院派，与现实派之分；艺术，有古典派与浪漫派之分。这些差异耳熟能详；哲学中也有非常相似的差异，可由“理性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这一对术语来表示。“实证主义者”热爱各种未经雕琢的事实，而“理性主义”致力于找寻各种抽象和永恒的原则。抛开事实和原则，无人能生存，哪怕一小时也不行。因此，差别不过是着重点不同罢了；但这确实助长了强调事实和强调原则两派人物之间最强烈的相互厌恶感；我们会发现，用“实证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气质来表述人们对待宇宙的某种差异，非常方便。这两个术语让这些差异变得简单、有力。

More simple and massive than are usually the men of whom the terms are predicated. For every sort of 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is possible in human nature; and if I now proceed to define more fully what I have in mind when I speak of rationalists and empiricists, by adding to each of those titles some secondary qualifying characteristics, I beg you to regard my conduct as to a certain extent arbitrary. I select types of combination that nature offers very frequently, but by no means uniformly, and I select them solely for their convenience in helping me to my ulterior purpose of characterizing pragmatism. Historically we find the terms “intellectualism” and “sensationalism” used as synonyms of “rationalism” and “empiricism.” Well, nature seems to combine most frequently with intellectualism an idealistic and optimistic tendency. Empiricists on the other hand are not uncommonly materialistic, and their optimism is apt to be decidedly conditional and tremulous. Rationalism is always monistic. It starts from wholes and universals, and makes much of the unity of things. Empiricism starts from the parts, and makes of the whole a collection—is not

averse therefore to calling itself pluralistic. Rationalism usually considers itself more religious than empiricism, but there is much to say about this claim, so I merely mention it. It is a true claim when the individual rationalist is what is called a man of feeling, and when the individual empiricist prides himself on being hard-headed. In that case the rationalist will usually also be in favor of what is called free-will, and the empiricist will be a fatalist—I use the terms most popularly current. The rationalist finally will be of dogmatic temper in his affirmations, while the empiricist may be more sceptical and open to discussion.

用这两个名词来对人进行描述就使他们之间的对比往往比这两个名词所表述的人更加简单而有力量。因为，对人性而言，每一种排列组合类型都是可能的；如果我现在加上一些次要特征的描述，以更为全面地定义我所谓的理性主义者与实证主义者，我请求大家能够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我的行为是武断的。我选择自然通常赋予我们的一些性格组合类型，但决不是一概而论，我选择它们，仅仅是因为它们能方便我来描述实用主义的特性，这是我的终极目的。历史上，我们发现“理智主义”和“感觉主义”分别用作“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同义词。但自然似乎最经常把理智主义与唯心主义和乐观主义倾向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实证主义者通常就是唯物的，其乐观性必然是有条件的，不稳定的。理性主义总是一元论的。它从整体性和普遍性出发，更注重事物的统一性。实证主义从局部出发，认为整体是各部分的集中，因此并不反对把自己称为多元论的。理性主义通常认为自己比实证主义更有宗教信仰，但这一点要说的话很多，所以，我就只提一下。如果说理性主义者充满情感，实证主义者会夸耀自己头脑冷静，也都说得过去。这时，理性主义者通常也会赞成自由意志，实证主义者则会相信宿命——我用的都是当下最流行的术语。理性主义的观点最终将带有教条主义的倾向，而实证主义者可能会更具有怀疑精神，愿意探讨各种可能性。

I will write these traits down in two columns. I think you will practically recognize the two types of mental make-up that I mean if I head the columns by the titles 'tender-minded' and 'tough-minded' respectively.

我要把这些特质分两栏列出来。我想，如果我用“空想的”和“实际的”分别作为这两栏的标题，你们都会明白事实上我指的是两类思维结构。

Rationalistic (going by "principles"),	Empiricist (going by "facts"),
Intellectualistic,	Sensationalistic,
Idealistic,	Materialistic,
Optimistic,	Pessimistic,
Religious,	Irreligious,
Free-willist,	Fatalistic,
Monistic,	Pluralistic,
Dogmatical.	Sceptical.

空想的	实际的
理性主义（崇尚“原则”）	实证主义（崇尚“事实”）
理智主义	感觉主义
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
乐观主义	悲观主义
有宗教性	无宗教性
自由意志的	宿命的
一元论	多元论
教条主义	怀疑主义

Pray postpone for a moment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two contrasted mixtures which I have written down are each inwardly coherent and self-consistent or not—I shall very soon have a good deal to say on that point. It suffices for our immediate purpose that tender-minded and tough-minded people, characterized as I have written them down, do both exist. Each of you probably knows some well-marked example of each type, and you know what each example thinks of the examp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line. They have a low opinion of each other. Their antagonism, whenever as individuals their temperaments have been intense, has formed in all

ages a part of the philosophic atmosphere of the time. It forms a part of the philosophic atmosphere today. The tough think of the tender as sentimentalists and soft-heads.The tender feel the tough to be unrefined, callous, or brutal. Their mutual reaction is very much like that that takes place when Bostonian tourists mingle with a population like that of Cripple Creek. Each type believes the other to be inferior to itself; but disdain in the one case is mingled with amusement, in the other it has a dash of fear.

请暂时不要问，我所列出来的两两相对的这些特质是否具有内在统一性而不自相矛盾——我很快会就这一点进行详细的说明。就目前而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有上述特征的空想和实际这两类人群，确实都存在。或许你们每个人都知道，一些人具有鲜明的空想或实际特征，你们也知道他们对彼此的看法。他们互相看不起。每当个性强烈之时，他们的对立就形成了当时哲学氛围的一部分。历来都是如此。它构成了当今哲学问题的一部分。实际派认为空想派感性、软弱。空想派认为实际派粗俗、无情或残忍。他们对彼此的反应，就像你把来自大城市波士顿的游客与来自小镇克里普尔克里克的居民混在一起时会发生的情况一样。双方彼此都认为对方比自己低一等；但是这种蔑视的态度一方面带着取乐的性质，另一方面却含有点害怕的味道。

Now, as I have already insisted, few of us are tender-foot Bostonians pure and simple, and few are typical Rocky Mountain toughs, in philosophy. Most of us have a hankering for the good things on both sides of the line. Facts are good, of course—give us lots of facts. Principles are good—give us plenty of principles. The world is indubitably one if you look at it in one way, but as indubitably is it many, if you look at it in another. It is both one and many—let us adopt a sort of pluralistic monism. Everything of

course is necessarily determined, and yet of course our wills are free: a sort of free-will determinism is the true philosophy. The evil of the parts is undeniable; but the whole can't be evil: so practical pessimism may be combined with metaphysical optimism. And so forth—your ordinary philosophic layman never being a radical, never straightening out his system, but living vaguely in one plausible compartment of it or another to suit the temptations of successive hours.

现在，我还是坚持认为，在哲学上，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是纯粹的未经磨炼的波士顿人那样的空想派，也没有几个人是典型的落基山脉硬汉式的实际派。我们大多数人两方面的好处都想要。事实当然是好的——那就给我们很多事实。原则是好的——那就给我们足够的原则。如果你从一个角度来看世界，世界无疑是单一的；但是，如果你从多个角度来看世界，世界无疑是多元的。它既是一，也是多，我们就采用多元的一元论吧。凡事一定有其必然性，但我们的意志一定是自由的：带有自由意志的决定论才是真正的哲学。部分邪恶是不可否认的；但整体不可能都邪恶：所以实际的悲观主义可以与形而上的乐观主义结合起来。以此类推——普通的哲学上的门外汉绝不会是个激进分子，他永远也理不清自己的哲学体系，而只是稀里糊涂地生活在某种貌似合理的小体系里，以适应各种不断出现的诱惑。

But some of us are more than mere laymen in philosophy. We are worthy of the name of amateur athletes, and are vexed by too much inconsistency and vacillation in our creed. We cannot preserve a good intellectual conscience so long as we keep mixing incompatibles from opposite sides of the line.

但我们有些人不是哲学的门外汉。我们配得上业余运动员的称

号，经常因为信仰中出现的太多不一致性和摇摆性而感到烦恼。只要我们不断地混杂对立双方那些格格不入的东西，我们就不能保持良好的知性良心。

And now I come to the first positively important point which I wish to make. Never were as many men of a decidedly empiricist proclivity in existence as there are at the present day. Our children, one may say, are almost born scientific. But our esteem for facts has not neutralized in us all religiousness. It is itself almost religious. Our scientific temper is devout. Now take a man of this type, and let him be also a philosophic amateur, unwilling to mix a hodge-podge system after the fashion of a common layman, and what does he find his situation to be, in this blessed year of our Lord 1906? He wants facts; he wants science; but he also wants a religion. And being an amateur and not an independent originator in philosophy he naturally looks for guidance to the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s whom he finds already in the field. A very large number of you here present, possibly a majority of you, are amateurs of just this sort.

现在，我要说说我想讲的第一个重要观点。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众多具有绝对实证主义倾向的人。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孩子天生就很讲科学。但我们对事实的尊重，并未抵消我们对宗教的信仰。尊重事实本身就接近信仰了。我们的科学气质是虔诚的。找一个这种类型的人，让他也成为一个业余的哲学家，不愿像普通的门外汉一样使自己的哲学体系五花八门，那么此时此刻，在这公元1906年，他会发现自己是个什么情形呢？他想要事实，他想要科学，他也想要宗教信仰。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他在哲学上并无独立的原创见解，很自然，他会寻求哲学界那些专家和学者的指引。你们在座的很多人，也许大多数人，就是这一类业余哲学家。

Now what kinds of philosophy do you find actually offered to meet your need? You find an empirical philosophy that is not religious enough, and a religious philosophy that is not empirical enough for your purpose. If you look to the quarter where facts are most considered you find the whole tough-minded program in operation,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full blast. Either it is that Rocky Mountain tough of a Haeckel with his materialistic monism, his ether-god and his jest at your God as a “gaseous vertebrate”; or it is Spencer treating the world's history as a redistribution of matter and motion solely, and bowing religion politely out at the front door:—she may indeed continue to exist, but she must never show her face inside the temple. For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past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has seemed to mean the enlargement of the material universe and the diminution of man's importance. The result is what one may call the growth of naturalistic or positivistic feeling. Man is no law-giver to nature, he is an absorber. She it is who stands firm; he it is who must accommodate himself. Let him record truth, inhuman tho it be, and submit to it! The romantic spontaneity and courage are gone, the vision is materialistic and depressing. Ideals appear as inert by-products of physiology; what is higher is explained by what is lower and treated forever as a case of “nothing but”—nothing but something else of a quite inferior sort. You get, in short, a materialistic universe, in which only the tough-minded find themselves congenially at home.

你们发现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哲学满足了需要呢？对你们的目的来说，你们发现实证主义哲学不够宗教性，而宗教哲学又不能提供足够的经验。如果留心一下最崇尚事实的地方，你就会发现整个讲究实际的计划正在运行，“科学与宗教间的交锋”正愈演愈烈。或许是像动物学家海克尔一样的那种落基山脉的硬汉子（实际派），持有唯物主义

一元论的观点，尊以太为上帝，拿你们的上帝开玩笑，说你们的上帝是“气态的脊椎动物”；或许是像斯宾塞一样，认为世界的历史仅是物质和运动的重新分配，因而将宗教很有礼貌地拒之门外——宗教可以继续实际存在，但绝不能在殿堂里露脸。在过去的150年中，科学的进步似乎意味着物质宇宙的扩大和人类重要性的下降。结果可以说是所谓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感觉的增长。人类绝不是自然法则的制定者，人类是接受者。自然是坚定的；人类必须调整、适应。不管真理多么没有人性，就让人类记录真理，服从真理！浪漫的自发性和勇气都不见了，世界是唯物的，是让人压抑的。理想看起来是生理学上没有生命的副产品；高级的事物要由低级的事物来解释，低级的永远“没什么”——不过是一些较为低劣的东西。简而言之，你只有一个物质的宇宙，只有那些讲究实际的人会如鱼得水。

If now, on the other hand, you turn to the religious quarter for consolation, and take counsel of the tender-minded philosophies, what do you find?

但是，如果你现在转向宗教寻求慰藉，转向对空想派哲学进行思考，会有什么发现呢？

Religious philosophy in our day and generation is, among us English-reading people, of two main types. One of these is more radical and aggressive, the other has more the air of fighting a slow retreat. By the more radical wing of religious philosophy I mean the so-called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of the Anglo-Hegelian school, the philosophy of such men as Green, the Cairds, Bosanquet, and Royce. This philosophy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more studious members of our protestant ministry. It is pantheistic, and undoubtedly it has already blunted the edge of the traditional theism in protestantism

at large.

在今天我们这一代英语读者看来，宗教哲学有两大类。一类更加激进，更加咄咄逼人，另一类正在慢慢退却。我所说的宗教哲学的激进派是盎格鲁—黑格尔学派的所谓先验性唯心主义，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格林、凯尔德兄弟、博赞克特和罗伊斯。这种哲学对我们新教牧师中那些好学之人影响巨大。这种哲学是泛神论的，无疑已经使传统新教的一神论失去了锋芒。

That theism remains, however. It is the lineal descendant, through one stage of concession after another, of the dogmatic scholastic theism still taught rigorously in the seminari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For a long time it used to be called among us the philosophy of the Scottish school. It is what I meant by the philosophy that has the air of fighting a slow retreat. Between the encroachments of the hegelians and other philosophers of the "Absolute," on the one hand, and those of the scientific evolutionists and agnostics, on the other, the men that give us this kind of a philosophy, James Martineau, Professor Bowne, Professor Ladd and others, must feel themselves rather tightly squeezed. Fair-minded and candid as you like, this philosophy is not radical in temper. It is eclectic, a thing of compromises, that seeks a modus vivendi above all things. It accepts the facts of darwinism, the facts of cerebral physiology, but it does nothing active or enthusiastic with them. It lacks the victorious and aggressive note. It lacks prestige in consequence; whereas absolutism has a certain prestige due to the more radical style of it.

但一神论还在。虽经过一次次妥协，一神论仍是教条式、经院式

一神论的嫡传，至今仍在天主教的各个神学院里严格传授。人们过去曾长期把它叫做哲学的“苏格兰学派”。它就是我所说的正在退却的哲学。它一方面受到黑格尔学派和其他“绝对”学派的侵蚀，另一方面受到科学进化论和不可知论学派的进攻，因此那些代表人物，如詹姆斯·马蒂诺、鲍恩教授、拉德教授等，一定感到了严重的两面夹攻。如你所想，这种哲学讲究公平正直，气质并不激进。它是折衷的，是妥协的产物，并以找到暂时妥协之道为最高目标。它接受达尔文主义的事实，承认脑生理学的事实，但对这些事实却并不积极或热情。它缺乏一种胜利者或进攻者的姿态。因此，它也缺乏权威色彩；而绝对主义则因为风格激进而具有某种权威性。

These two systems are what you have to choose between if you turn to the tender-minded school. And if you are the lovers of facts I have supposed you to be, you find the trail of the serpent of rationalism, of intellectualism, over everything that lies on that side of the line. You escape indeed the materialism that goes with the reigning empiricism; but you pay for your escape by losing contact with the concrete parts of life. The more absolutistic philosophers dwell on so high a level of abstraction that they never even try to come down. The absolute mind which they offer us, the mind that makes our universe by thinking it, might, for aught they show us to the contrary, have made any one of a million other universes just as well as this. You can deduce no single actual particular from the notion of it. It is compatible with any state of things whatever being true here below. And the theistic God is almost as sterile a principle. You have to go to the world which he has created to get any inkling of his actual character: he is the kind of god that has once for all made that kind of a world. The God of the theistic writers lives on as purely abstract heights as does the Absolute. Absolutism has a certain sweep and dash about it, while the usual theism is more insipid, but both are equally remote and vacuous.

What you want is a philosophy that will not only exercise your powers of intellectual abstraction, but that will make some positive connexion with this actual world of finite human lives.

如果你转向“空想”派，就必须从这两种宗教哲学体系中作出选择。如果像我设想的那样，你热爱事实，你就会首先发现，其实这一派带有理性主义和理智主义的蛛丝马迹。你实际上就脱离了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所具有的唯物性；但代价是失去了与具体生活的接触。更具绝对色彩的哲学家则会呆在高度的抽象层面之上，甚至从来就不想走下来。他们给了我们带有绝对色彩的思想。那种通过思考就形成我们宇宙的思想，也能创造出其他百万个宇宙，就像创造了我们这个宇宙一样，而不管它们给我们提供了什么相反的事实。从这个概念中，你推断不出任何单独的、实际的具体事实。不管宇宙真实存在着什么，它与任何事物的状态都是符合的。有神论的上帝几乎是同样得不出结果的一种理论。你必须进入他所创造的宇宙，理解他的真实性格：他是一次性创造了那样一个宇宙的神。有神论作者笔下的上帝和绝对意志一样，高踞于纯粹抽象之上。绝对论还有一些威风和活力，而一般的有神论就比较枯燥。但二者都让人难以接近，空洞乏物。你想要的哲学，不仅要锻炼你的抽象思辨能力，还要能与有限的人类所生活的真实世界建立某些正面的关联。

You want a system that will combine both things, the scientific loyalty to facts and willingness to take account of them, the spirit of adapta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 short, but also the old confidence in human values and the resultant spontaneity, whether of the religious or of the romantic type. And this is then your dilemma: you find the two parts of your quaesitum hopelessly separated. You find empiricism with inhumanism and irreligion; or else you find a rationalistic philosophy that indeed may call itself religious, but that keeps out of all definite touch with concrete facts

and joys and sorrows.

你想要一个能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体系，既能以科学的态度忠于事实，愿意记录事实，简而言之，具有调整及适应的精神，还能继续相信人类由来已久的不管是宗教型的还是浪漫型的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发性。那么，这就是你的困境所在：你发现你所追求的目标的两个方面不可救药地互相隔离着。你要么发现实证主义不够人道，不够宗教；要么发现了某种理性主义哲学，也许事实上可以说带有宗教色彩，但又拒绝与具体事实、欢乐及悲伤发生任何联系。

I am not sure how many of you live close enough to philosophy to realize fully what I mean by this last reproach, so I will dwell a little longer on that unreality in all rationalistic systems by which your serious believer in facts is so apt to feel repelled.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对哲学足够了解，能够全面理解我上面那句批评的意思。因此，我还是要对一切理性主义体系中的不真实性多说几句，这种不真实性让笃信事实的人很容易产生反感情绪。

I wish that I had saved the first couple of pages of a thesis which a student handed me a year or two ago. They illustrated my point so clearly that I am sorry I cannot read them to you now. This young man, who was a graduate of some Western college, began by saying that he had always taken for granted that when you entered a philosophic class-room you had to open relations with a universe entirely distinct from the one you left behind you in the street. The two were supposed, he said, to have so little to do with each other, that you could not possibly occupy your mind with them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ld of concrete personal experiences to which the street belongs is multitudinous beyond imagination, tangled, muddy, painful and perplexed. The world to which your philosophy-professor introduces you is simple, clean and noble. The contradictions of real life are absent from it. Its architecture is classic. Principles of reason trace its outlines, logical necessities cement its parts. Purity and dignity are what it most expresses. It is a kind of marble temple shining on a hill.

一两年前，有个学生交给我他论文的头几页，我当时要是把它保存下来了就好了。他这几页文章把我的观点阐述得非常清晰。很可惜，我现在没法把这几页文章念给你们听。这个学生毕业于西部某所大学。论文开始就说，他一直想当然地以为，一旦进入一间哲学教室，就必须与开启一种与宇宙的全新的关系，这个宇宙与被遗弃在身后的世俗的宇宙迥然不同。他说，人们认为两种宇宙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它们不太可能同时占据你的思维。个人具体经历的世俗世界纷繁复杂，超乎想象，是纠结、混浊、痛苦和迷茫的。而哲学教授引领你进入的世界是单纯、干净、高尚的。在这里，你看不到实际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它的结构是古典的。理性的原则勾勒出整体框架，逻辑必然性夯实了各个部件。纯洁和尊严是它表达最多的内容。它是山上熠熠闪耀的大理石殿堂。

In point of fact it is far less an account of this actual world than a clear addition built upon it, a classic sanctuary in which the rationalist fancy may take refuge from the intolerably confused and gothic character which mere facts present. It is no EXPLANATION of our concrete universe, it is another thing altogether, a substitute for it, a remedy, a way of escape.

事实上，这个世界与其说是对这个真实世界的记录，还不如说是建立在真实世界之上的一个显著的附加物，是一座古典的圣殿，理性主义者的幻想可以在那里避难，躲开单纯事实所展现出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混乱与粗野的特性。它绝非对我们对具体宇宙的解释，它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是客观宇宙的替代物，是一种补救方法、一种逃避的方式。

Its temperament, if I may use the word temperament here, is utterly alien to the temperament of existence in the concrete. REFINEMENT is what characterizes our intellectualist philosophies. They exquisitely satisfy that craving for a refined object of contemplation which is so powerful an appetite of the mind. But I ask you in all seriousness to look abroad on this colossal universe of concrete facts, on their awful bewilderments, their surprises and cruelties, on the wildness which they show, and then to tell me whether 'refined' is the one inevitable descriptive adjective that springs to your lips.

如果这里我可以用气质这个词的话，它的气质，与具体存在事物的气质完全不同。精致是理智主义哲学的特色。理智主义哲学巧妙地满足了我们心中一种很强烈的渴望，即渴望要有一个精致的沉思对象。但我要非常认真地请求你们往外看，看看这个由具体事实组成的浩大的宇宙，看看这些事实有多么地混乱，看看它们的惊人之处与残忍之处，看看它们展现出来的荒蛮，然后再告诉我，到底“精致的”是不是你们嘴里不可避免说出的一个描写性形容词。

Refinement has its place in things, true enough. But a philosophy that breathes out nothing but refinement will never satisfy the empiricist temper of mind. It will seem rather a

monument of artificiality. So we find men of science preferring to turn their backs on metaphysics as on something altogether cloistered and spectral, and practical men shaking philosophy's dust off their feet and following the call of the wild.

确实，在各种事物中，精致自有它的地位。但是，一门哲学，假若带给我们的只有精致而无其他，将永远也不能满足思维的实证主义倾向。那种哲学，看起来更像是矫揉造作的纪念碑。于是我们发现科学家情愿背离形而上学，把它当作是某种完全封闭的幽灵似的东西，而讲究实际的人则把哲学的尘埃从他们的双脚上抖掉，去听从荒野的呼唤。

Truly there is something a little ghastly in the satisfaction with which a pure but unreal system will fill a rationalist mind. Leibnitz was a rationalist mind, with infinitely more interest in facts than most rationalist minds can show. Yet if you wish for superficiality incarnate, you have only to read that charmingly written Theodicee of his, in which he sought to justify the ways of God to man, and to prove that the world we live in is the best of possible worlds. Let me quote a specimen of what I mean.

确实，理性主义者从一个纯粹但不真实的体系中获得满足感，多少有点让人感到可怕。莱布尼茨是个理性主义者，他对事实的兴趣，比其他大多数理性主义者所表现出来的，要多得多。但如果你只要看肤浅的化身，只需读一读他那引人入胜的《神善论》。他在书里为上帝待人的方式进行辩护，想证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让我引用一段，来表达我的意思。

Among other obstacles to his optimistic philosophy, it falls to Leibnitz to consider the number of the eternally damned. That it is infinitely greater, in our human case, than that of those saved he assumes as a premise from the theologians, and then proceeds to argue in this way. Even then, he says:

除去种种妨碍其乐观主义哲学的其他因素，莱布尼茨感到还有必要考虑被永世诅咒的人数。就人类而言，他从神学家所设的前提出发，假设说那些受到永世诅咒的人的数目要远远大于那些被拯救的人，然后以此进行辩论。即使是那个时候，他还是说：

“The evil will appear as almost noth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e good, if we once consider the real magnitude of the City of God. Coelius Secundus Curio has written a little book, De Amplitudine Regni Coelestis, which was reprinted not long ago. But he failed to compass the extent of the kingdom of the heavens. The ancients had small ideas of the works of God…. It seemed to them that only our earth had inhabitants, and even the notion of our antipodes gave them pause. The rest of the world for them consisted of some shining globes and a few crystalline spheres. But today, whatever be the limits that we may grant or refuse to the Universe we must recognize in it a countless number of globes, as big as ours or bigger, which have just as much right as it has to support rational inhabitants, tho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se need all be men. Our earth is only one among the six principal satellites of our sun. As all the fixed stars are suns, one sees how small a place among visible things our earth takes up, since it is only a satellite of one among them. Now all these suns MAY be inhabited by none but happy creatures; and nothing obliges us to believe that the number of damned persons is very great; for a VERY FEW INSTANCES AND

SAMPLES SUFFICE FOR THE UTILITY WHICH GOOD DRAWS FROM EVIL. Moreover, since there is no reason to suppose that there are stars everywhere, may there not be a great space beyond the region of the stars? And this immense space, surrounding all this region, … may be replete with happiness and glory…. What now becomes of the consideration of our Earth and of its denizens? Does it not dwindle to something incomparably less than a physical point, since our Earth is but a point compared with the distance of the fixed stars. Thus the part of the Universe which we know, being almost lost in nothingness compared with that which is unknown to us, but which we are yet obliged to admit; and all the evils that we know lying in this almost-nothing; it follows that the evils may be almost-noth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e goods that the Universe contains.”

“如果我们一旦考虑上帝之城的宏大，与善相比，恶简直微不足道。科利厄斯·塞昆德斯·库里奥写过一本小书，叫《论天国的广阔》，不久前重新出版。但他没有计算出天堂之国到底有多大。古人对上帝的业绩认识不够……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有我们的地球有人居住，甚至地球还有另一面这个观念都让他们犹豫不决。对他们来说，地球之外的世界就是几个发光的晶状球体。但是今天，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宇宙有没有界限，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有无数的星球，跟地球一般大甚至更大。和地球一样，它们都有权供养理性的居民，尽管这些居民不一定都是人类。我们的地球只是太阳的六大卫星之一。所有恒星都是太阳，可以看出我们的地球在所有可见星球中所占的位置有多小，因为地球只是这众多可见星球中某一个星球的一个卫星而已。所有太阳上可能都住着幸福的生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会有很多该被诅咒的人；因为只需几个例证就足以说明善可以从恶那里得到的好处。而且，既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到处都存在星球，那么星界之外会不会存在一个巨大的空间呢？这个环绕着星界的巨大空间，也许充满幸福和荣耀……那现在该怎么想我们的地球及其居民呢？比起恒星

之间的距离，地球只是一个点，那么它不就比物理学上的质点还要小许多许多吗？因此和我们未知但不得不承认其存在的宇宙相比，我们已知的宇宙，简直就微不足道。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恶都存在于这微不足道之中。与宇宙所包含的善比起来，这恶也就更加微不足道了。”

Leibnitz continues elsewhere: “There is a kind of justice which aims neither at the amendment of the criminal, nor at furnishing an example to others, nor at the reparation of the injury. This justice is founded in pure fitness, which finds a certain satisfaction in the expiation of a wicked deed. The Socinians and Hobbes objected to this punitive justice, which is properly vindictive justice and which God has reserved for himself at many junctures…. It is always founded in the fitness of things, and satisfies not only the offended party, but all wise lookers-on, even as beautiful music or a fine piece of architecture satisfies a well-constituted mind. It is thus that the torments of the damned continue, even tho they serve no longer to turn anyone away from sin, and that the rewards of the blest continue, even tho they confirm no one in good ways. The damned draw to themselves ever new penalties by their continuing sins, and the blest attract ever fresh joys by their unceasing progress in good. Both facts are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 of fitness, … for God has made all things harmonious in perfection as I have already said.”

莱布尼茨在其他地方还说：“有一种正义，它的目的，不为改造罪犯，不为树立榜样，也不为弥补伤害。这种正义以纯粹的适当性为基础，而纯粹的适当性从赎罪中获得满足感。索齐尼派和霍布斯反对这种惩罚性正义，更恰当地讲，它是报复性正义，是上帝在关键时刻为自己保留的正义……它总是以事物的适当性为基础，不仅能让受害一方满足，也能让所有明智的旁观者满足，甚至就像一首美丽的曲子或一件精致的建筑物能让健全的头脑得到满足一样。因此，那些被诅

咒的恶人，依旧受折磨，尽管他们所受的折磨不再起到使他人远离罪恶的作用；那些被祝福的善人，依旧得到奖赏，尽管他们所得到的奖赏没有让人坚定向善。被诅咒的人，因继续行恶而受到更多惩罚；被祝福的人，因不断行善而获得更多新鲜的快乐。两种事实都建立在适当性原则之上……正如我已经所说的那样，上帝让万事万物完美共处。”

Leibnitz's feeble grasp of reality is too obvious to need comment from me. It is evident that no realistic image of the experience of a damned soul had ever approached the portals of his mind. Nor had it occurred to him that the smaller is the number of “samples” of the genus “lost-soul” whom God throws as a sop to the eternal fitness, the more unequitably grounded is the glory of the blest. What he gives us is a cold literary exercise, whose cheerful substance even hell-fire does not warm.

很显然，莱布尼茨对现实的了解太少，无需我评论。很明显，被诅咒的灵魂，其真实的形象，从未接近过莱布尼茨思想的大门。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上帝把“堕落灵魂”的例证作为安慰物抛给永恒适当性，这些例证的数量越少，就越说明那些被祝福之人的荣耀是多么地不公平。他给我们的，是冰冷的文学作品，内容让人愉快，但即使地狱之火也不能将它暖化。

And do not tell me that to show the shallowness of rationalist philosophizing I have had to go back to a shallow wigpated age. The optimism of present-day rationalism sounds just as shallow to the fact-loving mind. The actual universe is a thing wide open, but rationalism makes systems, and systems must be closed. For men in practical life perfection is something far off and still in process of

achievement. This for rationalism is but the illusion of the finite and relative: the absolute ground of things is a perfection eternally complete.

不要告诉我，为了说明理性主义哲学思维的浅薄，我得回溯到那浅薄的戴假发的年代。在热爱事实的头脑看来，当前理性主义的乐观性一样浅薄。真实的宇宙是开放的，但理性主义要创造出体系来，体系必须是封闭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完美遥不可及，需要不断进步。在理性主义看来，这只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幻象：万事万物的绝对依据却是一种永恒完美。

I find a fine example of revolt against the airy and shallow optimism of current religious philosophy in a publication of that valiant anarchistic writer Morrison I. Swift. Mr. Swift's anarchism goes a little farther than mine does, but I confess that I sympathize a good deal, and some of you, I know, will sympathize heartily with hi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idealistic optimisms now in vogue. He begins his pamphlet on Human Submission with a series of city reporter's items from newspapers (suicides, deaths from starvation and the like) as specimens of our civilized regime. For instance:

在那位勇敢的无政府主义作家斯威夫特的作品里，我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反驳当前宗教哲学虚幻浅薄的乐观主义。斯威夫特先生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比我的还要严重，但我承认我对此非常同情，并且我知道在座的各位中也有一些人相当认同他对当前盛行的理想化乐观主义所表示出来的不满。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也衷心认同他的观点。他的《人类投降》一书，开始就是一系列城市记者的报道（内容是自杀、饿死以及类似的事件）。他把这些当作我们文明世界的标本。例如：

“'After trudging through the snow from one end of the city to the other in the vain hope of securing employment, and with his wife and six children without food and ordered to leave their home in an upper east side tenement house because of non-payment of rent, John Corcoran, a clerk, today ended his life by drinking carbolic acid. Corcoran lost his position three weeks ago through illness, and during the period of idleness his scanty savings disappeared. Yesterday he obtained work with a gang of city snow shovelers, but he was too weak from illness and was forced to quit after an hour's trial with the shovel. Then the weary task of looking for employment was again resumed. Thoroughly discouraged, Corcoran returned to his home late last night to find his wife and children without food and the notice of dispossession on the door.' On the following morning he drank the poison.

“‘约翰·科科伦是一位职员，和妻子育有六个孩子，没有食物，也没钱付房租，被勒令从纽约上东区的公寓搬走。他在大雪天里，从城的这头跋涉到那头，没找到工作，于今天喝石碳酸自杀。科科伦三周前因为生病丢掉工作，之后，仅有的一点儿积蓄也花光了。昨天，他找了份扫雪的工作，但身体太虚弱，试着干完了一小时，就被迫放弃这份工作。然后又开始疲倦地寻找工作。但他彻底失望了。很晚回到家，看到妻子和孩子没有饭吃，门上还贴着要赶他们出去的通知。’第二天一早，他就服了毒。

“The records of many more such cases lie before me (Mr. Swift goes on); an encyclopedia might easily be filled with their kind. These few I cite a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iverse. “We are awar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in His world,' says a writer in a recent English Review. (The very presence of ill in the temporal order is

the condition of the perfection of the eternal order, writes Professor Royce (The World and the Individual, II, 385).) 'The Absolute is the richer for every discord, and for all diversity which it embraces,' says F. H. Bradley (Appearance and Reality, 204). He means that these slain men make the universe richer, and that is Philosophy. But while Professors Royce and Bradley and a whole host of guileless thoroughfed thinkers are unveiling Reality and the Absolute and explaining away evil and pain, this is the condition of the only beings known to us anywhere in the universe with a developed consciousness of what the universe is. What these people experience IS Reality. It gives us an absolute phase of the universe. It is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ose most qualified in all our circle of knowledge to HAVE experience, to tell us WHAT is. Now, what does THINKING ABOUT the experience of these persons come to compared with directly, personally feeling it, as they feel it? The philosophers are dealing in shades, while those who live and feel know truth. And the mind of mankind—not yet the mind of philosophers and of the proprietary class—but of the great mass of the silently thinking and feeling men, is coming to this view. They are judging the universe as they have heretofore permitted the hierophants of religion and learning to judge THEM….

（斯威夫特接着说：）“我面前还摆着很多类似的情况；他们的遭遇可以很容易就填满整本百科全书。我引用这些话，是对宇宙的一种解释。‘我们意识到在他的世界里有上帝的存在。’一位作家最近在《英国评论》上这么说。（罗伊斯教授写道，时间秩序上邪恶的存在就是永恒秩序完美的前提。（《世界与个人》，第2卷第385页））F. H.　布拉德利说：‘绝对意志因其所包含的每一种乱象及其多样性而更加丰富。’（《表象与现实》，第204页）他的意思是，这些被杀害的人使宇宙更丰富，而那就是哲学。罗伊斯教授、布拉德利教授，还有其他很多诚实富足的思想家都在揭示“真实”与绝对意志的真相，也为

邪恶和痛苦辩解，而这正是宇宙里我们仅所认识的一些人的状况，他们对宇宙有着成熟的认识。这些人所经历的就是“真实”。真实为我们展示了宇宙绝对的一面。这是我们所知的最有资格的人所拥有的个人经验，只有他们能拥有这种经验，能告诉我们它是什么。如果思考这些人的个人经验，把它与他们的直接亲身感受比较，会有什么结果呢？哲学家思考那些看不见的事物，而那些感受生活的人知道真相。人类思想正向这种看法靠近。人类指的是那些默默思考和感受的大众，不是那些哲学家和有产阶级的思想——他们开始评判宇宙，就像他们一直以来允许宗教祭司和有学识之人来评判他们自己……

“This Cleveland workingman, killing his children and himself (another of the cited cases), is one of the elemental, stupendous facts of this modern world and of this universe. It cannot be glozed over or minimized away by all the treatises on God, and Love, and Being, helplessly existing in their haughty monumental vacuity. This is one of the simple irreducible elements of this world's life after millions of years of divine opportunity and twenty centuries of Christ. It is in the moral world like atoms or sub-atoms in the physical, primary, indestructible. And what it blazons to man is the…imposture of all philosophy which does not see in such events the consummate factor of conscious experience. These facts invincibly prove religion a nullity. Man will not give religion two thousand centuries or twenty centuries more to try itself and waste human time; its time is up, its probation is ended. Its own record ends it. Mankind has not sons and eternities to spare for trying out discredited systems….” (Morrison I. Swift, Human Submission, Part Second, Philadelphia, Liberty Press, 1905, pp. 4-10.)

“这位克利夫兰的工人，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并自杀（所引用的另一个案例），是现代社会和宇宙的重大基本事实之一。关于上帝、

爱、存在的一切论述，在高傲、不朽的虚无缥缈中无能为力地存在，无法掩盖或缩小这样的事实。几百万年过去了，基督也存在了二十个世纪，这种事实是世界生活中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元素。它存在于道德世界中，就像原子或次原子存在于物质的、原始的、不可摧毁的世界中一样。它向人类表明……那些看不到此类事件中意识经验的至高因素的哲学，是骗人的哲学。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宗教的无效性。人类不会再给宗教两千年或二十个世纪，让它再作尝试，浪费人类的时间；它的时间到了，它的试用期满了。它让自己的表现给毁了。人类没有子孙和用不完的时间让一个名誉扫地的体系来做实验……”（M. I. 斯威夫特，《人类投降》第二部分，费城：自由出版社，1905，第4-10页。）

Such is the reaction of an empiricist mind upon the rationalist bill of fare. It is an absolute “No, I thank you.” “Religion,” says Mr. Swift, “is like a sleep-walker to whom actual things are blank.” And such, tho possibly less tensely charged with feeling, is the verdict of every seriously inquiring amateur in philosophy today who turns to the philosophy-professors for the wherewithal to satisfy the fulness of his nature's needs. Empiricist writers give him a materialism, rationalists give him something religious, but to that religion “actual things are blank.” He becomes thus the judge of us philosophers. Tender or tough, he finds us wanting. None of us may treat his verdicts disdainfully, for after all, his is the typically perfect mind, the mind the sum of whose demands is greatest, the mind whose criticisms and dissatisfactions are fatal in the long run.

实证主义者对理性主义者开出的账目单，反应就是这样。就是一句决绝的“不，谢谢”。斯威夫特先生说：“宗教就像一个梦游者，对他来讲，实际事物是空白的。”这一见解，尽管也许没有那么强烈的情感，但它是今天每一个认真求知的哲学业余爱好者的意见，他们转向

哲学教授，来寻求能充分满足他们的自然需求的必要手段。实证主义作家会告诉他唯物主义，理性主义者会给他一些宗教性的思想，但对那种宗教来说，“实际事物是空白的”。他因此成为我们哲学家的评判者。不管我们是实际派还是空想派，他发现我们都缺少一些什么。我们谁也不能轻视他的评判，因为，毕竟他的思维是典型的完美的思维，他的思维需求总量最大，他的批评和不满从长远来看是致命的。

It is at this point that my own solution begins to appear. I offer the oddly-named thing pragmatism as a philosophy that can satisfy both kinds of demand. It can remain religious like the rationalisms, but at the same time, like the empiricisms, it can preserve the richest intimacy with facts. I hope I may be able to leave many of you with as favorable an opinion of it as I preserve myself. Yet, as I am near the end of my hour, I will not introduce pragmatism bodily now. I will begin with it on the stroke of the clock next time. I prefer at the present moment to return a little on what I have said.

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我的解决方案开始出现。我提出的实用主义，在哲学上，这名字有点怪，但是能满足来自两方面的需求。它保留了理性主义的宗教性，同时，又和实证主义一样，能保持和事实最密切的接触。我希望我能让大家跟我一样，赞成实用主义。但是，今天讲座的时间快到了，我就不具体讲实用主义了。下次讲课一开始就讲实用主义。现在，我还是回过头来再讲一讲刚才的话题。

If any of you here are professional philosophers, and some of you I know to be such, you will doubtless have felt my discourse so far to have been crude in an unpardonable, nay, in an almost incredible degree. Tender-minded and tough-minded, what a barbaric disjunction! And, in general, when philosophy is all

compacted of delicate intellectualities and subtleties and scrupulosities, and when every possible sort of combination and transition obtains within its bounds, what a brutal caricature and reduction of highest things to the lowest possible expression is it to represent its field of conflict as a sort of rough-and-tumble fight between two hostile temperaments! What a childishly external view! And again, how stupid it is to treat the abstractness of rationalist systems as a crime, and to damn them because they offer themselves as sanctuaries and places of escape, rather than as prolongations of the world of facts. Are not all our theories just remedies and places of escape? And, if philosophy is to be religious, how can she be anything else than a place of escape from the crassness of reality's surface? What better thing can she do than raise us out of our animal senses and show us another and a nobler home for our minds in that great framework of ideal principles subtending all reality, which the intellect divines? How can principles and general views ever be anything but abstract outlines? Was Cologne Cathedral built without an architect's plan on paper? Is refinement in itself an abomination? Is concrete rudeness the only thing that's true?

如果你们中间有谁是专业哲学家，我知道有几位，你们肯定会感到，到目前为止，我的演讲非常粗浅，不可原谅，不，简直难以置信。空想派和实际派，多么粗野的分类！一般而言，哲学充满了细致的理性、精准和谨慎，里面充满了各种可能的结合与转换，如果把它的各种冲突领域表现成两种敌对气质之间的混战，这是多么无情的讽刺，竟然将最高级的事物用最低级的方法表达出来！多么幼稚肤浅的观点！将理性主义体系的抽象性看作一种罪恶加以谴责，就因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圣殿，是避难所，而不是对事实世界的延续。这又是多么愚蠢！我们所有的哲学理论难道不就是补救方法和避难所吗？如果哲学应该有宗教性，除了作为逃避现实表面粗糙的避难所之外，它还

能是什么呢？它能将我们从动物的感觉中提升出来，在理性所能预见的针对现实世界的种种理想原则框架内，为我们的思想指引另一个更高尚的家园。除此之外，哲学还能做什么呢？而原则和普遍性观点除了是抽象的纲领，还能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建筑师的蓝图，科隆大教堂能建造起来吗？精准本身难道让人憎恶吗？只有具体的粗糙才是唯一的真实吗？

Believe me, I feel the full force of the indictment. The picture I have given is indeed monstrously over-simplified and rude. But like all abstractions, it will prove to have its use. If philosophers can treat the life of the universe abstractly, they must not complain of an abstract treatment of the life of philosophy itself. In point of fact the picture I have given is, however coarse and sketchy, literally true. Temperaments with their cravings and refusals do determine men in their philosophies, and always will. The details of systems may be reasoned out piecemeal, and when the student is working at a system, he may often forget the forest for the single tree. But when the labor is accomplished, the mind always performs its big summarizing act, and the system forthwith stands over against one like a living thing, with that strange simple note of individuality which haunts our memory, like the wraith of the man, when a friend or enemy of ours is dead.

相信我，我感到了这种指责的全部分量。我所描述的画面实际上过于简单化，极其粗糙。但是，和所有的抽象说法一样，它会证明自己的用途的。如果哲学家能用抽象的方式对待宇宙的生命，他们就不应该抱怨别人以抽象的方式来对待哲学的生命。事实上，我所描述的画面，尽管粗糙简略，但却是真实的。气质有自己所渴望及排斥的东西，这些确实决定了人们的哲学观并将一直如此。体系的细节可以从片段中推断出来，学生们在研究一个体系的时候，可能常常会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工作完成后，思想总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总结，体系因此耸立眼前，就像一个生命体，以其简单奇妙的个性，正如我们的朋友或敌人死后的幽灵一样，萦绕在我们的记忆里。

Not only Walt Whitman could write “who touches this book touches a man.” The books of all the great philosophers are like so many men. Our sense of an essential personal flavor in each one of them, typical but indescribable, is the finest fruit of our own accomplished philosophic education. What the system pretends to be is a picture of the great universe of God. What it is—and oh so flagrantly!—is the revelation of how intensely odd the personal flavor of some fellow creature is. Once reduced to these terms (and all our philosophies get reduced to them in minds made critical by learning) our commerce with the systems reverts to the informal, to the instinctive human reaction of satisfaction or dislike. We grow as peremptory in our rejection or admission, as when a person presents himself as a candidate for our favor; our verdicts are couched in as simple adjectives of praise or dispraise. We measure the total character of the universe as we feel it, against the flavor of the philosophy proffered us, and one word is enough.

不只是沃尔特·惠特曼能说出“谁接触到这本书，谁就接触到一个人”。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书如其人。我们对每一本书都有基本的个人品味，这种虽然典型但却无法描述的个人品味，是我们成功的哲学教育的最好结果。体系自以为描述了上帝所创的浩瀚宇宙。它其实——不过是极其明显地——揭示了某位同胞的个人品味是多么怪异。一旦这样归结起来（所有哲学，经过批判性学习，都可以如此归结），我们与体系之间的交流都还原成随意的交流、还原成人类本能的满意或者厌恶的反应。我们在取舍方面，变得很果断，好像对待一个争取别人青睐的候选人；我们的评判是用简单的褒贬来表达的。我

们按照自己的感受，来衡量宇宙的全部特性，不管提供给我们的哲学品味如何，一个词就够了。

“Statt der lebendigen Natur,” we say, “da Gott die Menschen schufhinein”—that nebulous concoction, that wooden, that straight-laced thing, that crabbed artificiality, that musty schoolroom product, that sick man's dream! Away with it. Away with all of them! Impossible! Impossible!

我们说：“上帝没有给人以活泼的天性，而是在人类内部创造了”——那模糊不清的谎言，那古板僵硬的东西，那难懂的矫揉造作，那发霉的课堂产物，那病人的梦呓。走开！全走开！不可能！不可能！

Our work over the details of his system is indeed what gives us our resultant impression of the philosopher, but it is on the resultant impression itself that we react. Expertness in philosophy is measured by the definiteness of our summarizing reactions, by the immediate perceptive epithet with which the expert hits such complex objects off. But great expertness is not necessary for the epithet to come. Few people have definitely articulated philosophies of their own. But almost everyone has his own peculiar sense of a certain total character in the universe, and of the inadequacy fully to match it of the peculiar systems that he knows. They don't just cover HIS world. One will be too dapper, another too pedantic, a third too much of a job-lot of opinions, a fourth too morbid, and a fifth too artificial, or what not. At any rate he and we know offhand that such philosophies are out of plumb and out of key and out of 'whack,' and have no business to speak up in the universe's name.

Plato, Locke, Spinoza, Mill, Caird, Hegel—I prudently avoid names nearer home!—I am sure that to many of you, my hearers, these names are little more than reminders of as many curious personal ways of falling short. It would be an obvious absurdity if such ways of taking the universe were actually true. We philosophers have to reckon with such feelings on your part. In the last resort, I repeat, it will be by them that all our philosophies shall ultimately be judged. The finally victorious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will be the most completely IMPRESSIVE way to the normal run of minds.

我们对哲学家体系细节的学习，就是哲学家给我们留下的最终印象。但就是这最终印象决定了我们的反应。对哲学的精通程度，由我们概括性的反应是否清晰来衡量，也由专家用来描述如此复杂的对象时脑海中立即出现的修饰语来衡量。想出这些形容词，并不需要对哲学非常精通。很少有人清晰说明过自己的哲学理念。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整体宇宙观，也完全意识到自己所了解的所有独特的哲学体系都不能够涵盖整个宇宙。这些哲学体系就是不能涵盖每个人的世界。这些体系，有的太时尚，有的太学究，有的太杂乱，有的太病态，有的太做作，有的太……反正他和我们都立即知道，这些哲学不正确，不协调，不“相称”，根本就不能以宇宙的名义来宣扬自己。柏拉图、洛克、斯宾诺莎、米尔、凯尔德、黑格尔——我尽量小心，不提那些离我们很近的哲学家！我确信，对你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些名字代表的只是许多奇怪的不完整不合格的个人思想。很明显，如果他们的宇宙观是真实正确的话，那会很荒诞。我们哲学家必须预见到你们会有这些情感。最后，我重复一下，我们的哲学观最终是要由这些情感来评判的。最终胜利的将会是那个最能完全打动普通人的观点。

One word more—namely about philosophies necessarily being abstract outlines. There are outlines and outlines, outlines of

buildings that are FAT, conceived in the cube by their planner, and outlines of buildings invented flat on paper, with the aid of ruler and compass. These remain skinny and emaciated even when set up in stone and mortar, and the outline already suggests that result. An outline in itself is meagre, truly,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suggest a meagre thing. It is the essential meagreness of WHAT IS SUGGESTED by the usual rationalistic philosophies that moves empiricists to their gesture of rejection. The case of Herbert Spencer's system is much to the point here. Rationalists feel his fearful array of insufficiencies. His dry schoolmaster temperament, the hurdy-gurdy monotony of him, his preference for cheap makeshifts in argument, his lack of education even in mechanical principles, and in general the vagueness of all his fundamental ideas, his whole system wooden, as if knocked together out of cracked hemlock boards—and yet the half of England wants to bury him in Westminster Abbey.

我再说一句——关于哲学必须是抽象的纲领。纲领多种多样。庞大的建筑物有框架，是设计师用立体图形构思出来的；建筑物也有平面设计图，是用尺子和圆规画出来的。它们即使用石头灰泥堆建起来，也还是不丰满，因为他们的设计大纲就预示了这结果。是的，纲领本身是空洞的，但并不一定就预示一个空洞的东西。正是理性主义哲学通常预示出来的基本空洞性，才让实证主义者对它拒之千里。赫伯特·斯宾塞的体系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理性主义者认为他列举出的种种不足令人可怕。他枯燥的教师气质，声音单调，喜欢用没有价值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连机械原理方面的教育都缺乏，所有的基本观念都模糊不清，他的整个体系是僵硬的，好像是用破裂的铁杉木板造出来的。可是——一半的英国人竟然想让他入葬万人敬仰的威斯敏斯特教堂。

Why? Why does Spencer call out so much reverence in spite of his weakness in rationalistic eyes? Why should so many educated men who feel that weakness, you and I perhaps, wish to see him in the Abbey notwithstanding?

为什么？理性主义眼中的斯宾塞如此不堪一击，他为什么还能如此受人尊敬？为什么许多像你我这样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他的缺点，却还希望他入葬教堂？

Simply because we feel his heart to be IN THE RIGHT PLACE philosophically. His principles may be all skin and bone, but at any rate his books try to mould themselves upon the particular shape of this, particular world's carcase. The noise of facts resounds through all his chapters, the citations of fact never cease, he emphasizes facts, turns his face towards their quarter; and that is enough. It means the right kind of thing for the empiricist mind.

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心在哲学上是正确的。他的原则可能只有骨和皮，但他的著作是以这个特定形状来构建的，以特定世界的框架来发展的。他的作品里，一直都有事实的声音在回荡，对事实的引用也从未停止，他强调事实，看到它们的存在，这就够了。实证主义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的。

The pragmatistic philosophy of which I hope to begin talking in my next lecture preserves as cordial a relation with facts, and, unlike Spencer's philosophy, it neither begins nor ends by turning positive religious constructions out of doors—it treats them cordially as well.

我下次课要开始讲的实用主义哲学，也会保持与事实的密切联系。和斯宾塞的哲学不同，实用主义从头到尾都不会把积极的宗教建构拒之门外。它会对它们一视同仁的。

I hope I may lead you to find it just the mediating way of thinking that you require.

我希望能引导你们发现，实用主义正是你们所想要的一种折衷调和的思想方法。

Lecture II What Pragmatism Means

第二讲　实用主义是什么？

THE SQUIRREL. PRAGMATISM AS A METHOD. HISTORY OF THE METHOD. ITS CHARACTER AND AFFINITIES. HOW IT CONTRASTS WITH RATIONALISM AND INTELLECTUALISM. A “CORRIDOR THEORY.” PRAGMATISM AS A THEORY OF TRUTH, EQUIVALENT TO “HUMANISM.” EARLIER VIEWS OF MATHEMATICAL, LOGICAL, AND NATURAL TRUTH.MORE RECENT VIEWS.SCHILLER's AND DEWEY's “INSTRUMENTAL” VIEW.THE FORMATION OF NEW BELIEFS. OLDER TRUTH ALWAYS HAS TO BE KEPT ACCOUNT OF. OLDER TRUTH AROSE SIMILARLY. THE “HUMANISTIC” DOCTRINE.RATIONALISTIC CRITICISMS OF IT.PRAGMATISM AS MEDIATOR BETWEEN EMPIRICISM AND RELIGION.BARRENNESS OF TRANSCENDENTAL IDEALISM.HOW FAR THE CONCEPT OF THE ABSOLUTE MUST BE CALLED TRUE. THE TRUE IS THE GOOD IN THE WAY OF BELIEF. THE CLASH OF TRUTHS. PRAGMATISM UNSTIFFENS DISCUSSION.

松鼠。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历史。实用主义的特征和属性。实用主义如何区别于理性主义和理智主义。“走廊理论”。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有关真理的理论，与“人本主义”等同。数学、逻辑和自然真理的早期观点。近期观点。席勒和杜威的“工具主义”观点。新信仰的形成。旧的真理必须一直要考虑。旧的真理同样显现。“人本主义”的教义。理性主义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实用主义是实证主义和宗教的中介调解者。先验性唯心主义的无能。绝对意志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必须被当作真理。真理是善，以信仰的方式存在。真理之间

的冲突。实用主义使讨论变得灵活。

Some years ago, being with a camping party in the mountains, I returned from a solitary ramble to find everyone engaged in a ferocious metaphysical dispute. The corpus of the dispute was a squirrel—a live squirrel supposed to be clinging to one side of a tree-trunk; while over against the tree's opposite side a human being was imagined to stand. This human witness tries to get sight of the squirrel by moving rapidly round the tree, but no matter how fast he goes, the squirrel moves as fas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and always keeps the tree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man, so that never a glimpse of him is caught. The resultant metaphysical problem now is this: DOES THE MAN GO ROUND THE SQUIRREL OR NOT? He goes round the tree, sure enough, and the squirrel is on the tree; but does he go round the squirrel? In the unlimited leisure of the wilderness, discussion had been worn threadbare. Everyone had taken sides, and was obstinate; and the numbers on both sides were even. Each side, when I appeared, therefore appealed to me to make it a majority. Mindful of the scholastic adage that whenever you meet a contradiction you must make a distinction, I immediately sought and found one, as follows: “Which party is right,” I said, “depends on what you PRACTICALLY MEAN by “going round” the squirrel. If you mean passing from the north of him to the east, then to the south, then to the west, and then to the north of him again, obviously the man does go round him, for he occupies these successive positions. But if on the contrary you mean being first in front of him, then on the right of him, then behind him, then on his left, and finally in front again, it is quite as obvious that the man fails to go round him, for by the compensating movements the squirrel makes, he keeps his belly turned towards the man all the time, and his back turned away. Make the

distinction, and there is no occasion for any farther dispute. You are both right and both wrong according as you conceive the verb 'to go round' in one practical fashion or the other.”

几年前，我和一群人去山间宿营。一次独自漫步回来，我发现大家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形而上学的争论。争论的中心是一只松鼠——假设一只活的松鼠正趴在树干的一侧，而想象有一个人站在树干的另一侧。这个人绕着树快跑，想看到松鼠，但不管他跑多快，松鼠在树干那面跑得一样快，人和松鼠之间总是隔着树，所以，他永远没能看到松鼠。从而产生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人是否绕着松鼠走？没错，他确实是绕着树走，松鼠是在树上；但他是绕着松鼠走的吗？旷野上，大家无拘无束，讨论非常彻底。每个人的立场或正或反，但都坚持己见，正反两方人数相等。我一出现，双方都来争取我的支持，以便成为多数派。我记得经院哲学有一句格言，一旦遇到对立双方，一定要找出区别来。于是，我马上开始找区别，并找到了一个。“哪一方正确，”我说，“要看你们‘绕着’松鼠跑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如果你们指的是从它的北面跑到东面，然后跑到南面，然后跑到西面，然后又跑到它的北面，很明显，人的确是绕着松鼠跑的，因为他接连跑到了这些地方。但如果正好相反，你指的是先在它前面，后跑到它右面，然后跑到它后面，然后跑到它左面，后来又跑到它前面，很明显，人没有绕着它跑，因为，松鼠也在作相对运动，它的肚子一直对着人，它的背部朝后。找出差别，就不用再争论了。你们两边又对又不对，要看你们对‘绕着跑’这个动词实际上是怎么理解的。”

Altho one or two of the hotter disputants called my speech a shuffling evasion, saying they wanted no quibbling or scholastic hair-splitting, but meant just plain honest English 'round,' the majority seemed to think that the distinction had assuaged the dispute.

尽管他们中间争论比较激烈的一两个人认为我的说法是在逃避问题，说他们不想要什么诡辩或经院哲学的吹毛求疵，只想要“绕着”这个英语词的平实解释，但大多数的人似乎都认为我的区分已经缓和了争论。

I tell this trivial anecdote because it is a peculiarly simple example of what I wish now to speak of as THE PRAGMATIC METHOD. The pragmatic method is primarily a method of settling metaphysical disputes that otherwise might be interminable. Is the world one or many?—fated or free?—material or spiritual?—here are notions either of which may or may not hold good of the world; and disputes over such notions are unending. The pragmatic method in such cases is to try to interpret each notion by tracing its respective practical consequences. What difference would it practically make to anyone if this notion rather than that notion were true? If no practical difference whatever can be traced, then the alternatives mean practically the same thing, and all dispute is idle. Whenever a dispute is serious, we ought to be able to show some practical difference that must follow from one side or the other's being right.

我讲这件小事，因为它是我要讲的实用主义方法的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实用主义方法主要是一种解决形而上学争论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这些争论就会没完没了。世界是一元还是多元的？其命运是注定的，还是自由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些概念都能解释又不能解释这个世界，有关它们的争论也无休无止。这种情况下，实用主义的方法就试图通过追踪各自的实用效果，来解释每一个概念。如果这个概念对，那个概念不对，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将会产生什么实际的区别呢？如果任何实际差别都找不到，那么两种概念实际上都是一回事，所有的争论就没有意义了。一旦争论很激烈，我们就应该能指

出，如有一方是正确的，一定会出现什么实际的区别。

A glance at the history of the idea will show you still better what pragmatism means. The term is derived from the same Greek word pi rho alpha gamma mu alpha, meaning action, from which our words “practice” and “practical” come. It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philosophy by Mr. Charles Peirce in 1878. In an article entitled “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in the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for January of that year (Translated in the Revue Philosophique for January, 1879 (vol. vii).) Mr. Peirce, after pointing out that our beliefs are really rules for action, said that to develope a thought's meaning, we need only determine what conduct it is fitted to produce: that conduct is for us its sole significance. And the tangible fact at the root of all our thought-distinctions, however subtle, is that there is no one of them so fine as to consist in anything but a possible difference of practice. To attain perfect clearness in our thoughts of an object, then, we need only consider what conceivable effects of a practical kind the object may involve—what sensations we are to expect from it, and what reactions we must prepare. Our conception of these effects, whether immediate or remote, is then for us the whole of our conception of the object, so far as that conception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at all.

看一下这个概念的历史，你就会更清楚实用主义的意义。它是希腊语pi rho alpha gamma mu alpha派生出来的，意思是行动，“practice”（实践）和“practical”（实践的）也是这个词派生出来的。查理·皮尔斯在1878年第一次将它引入哲学。1878年一月份的《通俗科学月刊》（《哲学评论》1879年1月刊中译出（第7卷）。）有一篇他的文章，题目是《如何使观念清晰》。他先指出我们的信仰实际上是行动准则，然后说，要找到思想的意义，我们只需

确定该思想适合产生什么行为：对我们来说，这种行为就是它的唯一意义。我们所有思想的差别，不管多么细微，都有一个根本事实，那就是不管这些差别有多么细微，都在实践上存在着可能的区别，而不是在其他方面存在区别。要在思想上获得对一件事物完全清晰的认识，我们就只需思考这个事物可能会产生什么可见的实际效果，我们希望能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应该准备做出什么反应。这些效果，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就这个认识所具有的任何积极意义来说，就是我们对这个事物的认识。

This is the principle of Peirce, the principle of pragmatism. It lay entirely unnoticed by anyone for twenty years, until I, in an address before Professor Howison's philosophical un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rought it forward again and made a special application of it to religion. By that date (1898) the times seemed ripe for its reception. The word 'pragmatism' spread, and at present it fairly spots the pages of the philosophic journals. On all hands we find the 'pragmatic movement' spoken of, sometimes with respect, sometimes with contumely, seldom with clear understanding. It is evident that the term applies itself conveniently to a number of tendencies that hitherto have lacked a collective name, and that it has “come to stay.”

这就是皮尔斯的原理，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原理。有二十年的时间，完全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它。直到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豪伊森教授的哲学学会上发表演讲时，才把它重新提出来，把它特别用到宗教上。那是1898年，看来接受这个原理的时机成熟了。“实用主义”这个词普及开来，现在，它在哲学期刊里占有相当的位置。我们发现人们在谈论到“实用主义运动”的方方面面时，有时尊敬，有时谩骂，几乎没有人能清楚理解它。显然，用这个术语来指至今还缺乏一个统一名称的一些趋势很方便，这个词也“沿用下来”。

To take in the importance of Peirce's principle, one must get accustomed to applying it to concrete cases. I found a few years ago that Ostwald, the illustrious Leipzig chemist, had been making perfectly distinct use of the principle of pragmatism in his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o he had not called it by that name.

要理解皮尔斯原理的重要性，就必须经常把它用到具体事例上。几年前，我发现，莱比锡著名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在自己的科学哲学课上，对实用主义原理一直都有非常明确的运用，不过他没有用这个名词。

“All realities influence our practice,” he wrote me, “and that influence is their meaning for us. I am accustomed to put questions to my classes in this way: In what respects would the world be different if this alternative or that were true? If I can find nothing that would become different, then the alternative has no sense.”

他给我写信说：“所有现实都影响我们的实践，我们认为，那种影响就是现实的意义。我惯常这样向我班上的学生提问：如果这个选项或那个选项为真，世界将会在哪些方面发生变化？如果找不到任何变化，那个选项就没有任何意义。”

That is, the rival views mean practically the same thing, and meaning, other than practical, there is for us none. Ostwald in a published lecture gives this example of what he means. Chemists have long wrangled over the inner constitution of certain bodies called “tautomerous.” Their properties seemed equ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notion that an instable hydrogen atom oscillates inside of them, or that they are instable mixtures of two bodies. Controversy raged; but never was decided. “It would never have begun,” says Ostwald, “if the combatants had asked themselves what particular experimental fact could have been made different by one or the other view being correct. For it would then have appeared that no difference of fact could possibly ensue; and the quarrel was as unreal as if, theorizing in primitive times about the raising of dough by yeast, one party should have invoked a 'brownie,' while another insisted on an 'elf' as the true cause of the phenomenon.” (“Theorie und Praxis,” Zeitsch. des OesterreichischenIngenieur u. Architecten–Vereines, 1905, Nr. 4 u. 6. I find a still more radical pragmatism than Ostwald's1 in an address by Professor W. S. Franklin: “I think that the sickliest notion of physics, even if a student gets it, is that it is 'the science of masses, molecules and the ether.' And I think that the healthiest notion, even if a student does not wholly get it, is that physics is the science of the ways of taking hold of bodies and pushing them!” (Science, January 2, 1903.))

也就是说，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是一回事，对我们来说，除了实践的意义，没有其他。奥斯特瓦尔德在他发表的演讲稿里，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长期以来，化学界都在为某种叫做“互变异构”的物体的内部构成而争论不已。这些物体的属性看起来都符合这样一个概念，即一个不稳定的氢原子在物体内部摇晃不定，或者它们是两种物体的不稳定混合物。争论愈演愈烈，但从无定论。奥斯特瓦尔德说：“假如争论各方问过自己，如果一个或其他观点成立的话，会带来什么特别的实验上的事实呢？这样的话，争论本来可能永远都不会开始的。并且就会发现事实可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场争论也就不真实，就像如果让原始社会的人们去思考酵母发面原理时产生的争论一样不真实，一方认为应该归功于‘棕仙’，而另一方坚持认为有‘精灵’。”（“理论与实践”一文，载于《奥地利工程师建筑师协会会

刊》，1905年，第4期和第6期。我在W. S. 富兰克林教授的讲演中发现一种比奥斯特瓦尔德还要激进的实用主义。他说："我认为，把物理学当成是'质量、分子和以太的科学'的观点，即使学生掌握了，也是最病态的观点。我认为，把物理学当成如何掌控物体并推动他们前进的科学的观点，即使学生没有完全掌握，也是最健康的观点。"（《科学》，1903年1月2日））

It is astonishing to see how many philosophical disputes collapse into insignificance the moment you subject them to this simple test of tracing a concrete consequence. There can BE no difference any-where that doesn't MAKE a difference elsewhere—no difference in abstract truth that doesn't express itself in a difference in concrete fact and in conduct consequent upon that fact, imposed on somebody, somehow, somewhere and somewhen. The whole function of philosophy ought to be to find out what definite difference it will make to you and me, at definite instants of our life, if this world-formula or that world-formula be the true one.

许多哲学争论，一旦被放到这种追踪其具体后果的简单测试中来，就会变得无足轻重。这让人感到很震惊。任何地方的差异，都会在其他地方也带来差异——任何抽象真理的差异，一定会在具体事实上表现出差异，也一定会因为那个事实，在某时，某地，以某种方式迫使某人的行为表现出差异。哲学的全部功能应该是去发现，在我们生命的特定时刻，如果这个世界公式或那个世界公式为真，它将给你我带来某种确切的变化。

There is absolutely nothing new in the pragmatic method. Socrates was an adept at it. Aristotle used it methodically. Locke, Berkeley and Hume made momentous contributions to truth by its

means. Shadworth Hodgson keeps insisting that realities are only what they are “known-as.” But these forerunners of pragmatism used it in fragments: they were preluders only. Not until in our time has it generalized itself, become conscious of a universal mission, pretended to a conquering destiny. I believe in that destiny, and I hope I may end by inspiring you with my belief.

实用主义方法绝对没有任何新东西。苏格拉底对这个方法得心应手。亚里士多德系统地使用了这个方法。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利用这个方法，对真理做出了巨大贡献。沙德沃思沙德沃思·霍奇森一直坚持认为，人们认为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什么”。但是这些实用主义的先驱们对实用主义的使用是零碎的：他们只是前奏曲。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实用主义才开始对自身进行归纳总结，意识到自己有一个普世的使命，自认为有一种征服一切的命运。我相信实用主义具有征服性，我希望最终能用自己的信仰来鼓舞你们。

Pragmatism represents a perfectly familiar attitude in philosophy, the empiricist attitude, but it represents it, as it seems to me, both in a more radical and in a less objectionable form than it has ever yet assumed. A pragmatist turns his back resolutely and once for all upon a lot of inveterate habits dear to professional philosophers. He turns away from abstraction and insufficiency, from verbal solutions, from bad a priori reasons, from fixed principles, closed systems, and pretended absolutes and origins. He turns towards concreteness and adequacy, towards facts, towards action, and towards power. That means the empiricist temper regnant, and the rationalist temper sincerely given up. It means the open air and possibilities of nature, as against dogma, artificiality and the pretence of finality in truth.

实用主义代表了哲学上的一个人们非常熟悉的态度，就是实证主义态度，但对我来说，与之前的假设相比，它所代表的实证主义态度，形式更激进，令人更乐于接受。实用主义者坚决而彻底地背弃了职业哲学家所倚重的许多固有习惯。它避开抽象与不充分，避开字面解决方案，避开站不住脚的先验理由，避开僵硬的原则和封闭的体系，也避开了虚妄的绝对和起源论。它转向具体与充分，转向事实和行动，转向权力。这意味着实证主义的气质占了支配地位，而理性主义的气质被实实在在地放弃了。它意味着开放的气氛和自然的种种可能性，反对教条、造作和自以为是最后定论的真理。

At the same time it does not stand for any special results. It is a method only. But the general triumph of that method would mean an enormous change in what I called in my last lecture the “temperament” of philosophy. Teachers of the ultra-rationalistic type would be frozen out, much as the courtier type is frozen out in republics, as the ultramontane type of priest is frozen out in protestant lands.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would come much nearer together, would in fact work absolutely hand in hand.

同时，它并不代表任何特别的结果。它只是一种方法。但这个方法的大胜利指的是我在上一讲中提到的哲学“气质”的重大变化。极端理性主义类型的学者会遭到排斥，就像宫廷朝臣在共和国遭到排斥，也像主张教皇绝对权力的神父在新教领地上遭到排斥。科学与形而上学就会走的更近，事实上，它们完全会携手并进。

Metaphysics has usually followed a very primitive kind of quest. You know how men have always hankered after unlawful magic, and you know what a great part, in magic, WORDS have always played. If you have his name, or the formula of incantation

that binds him, you can control the spirit, genie, afrite, or whatever the power may be. Solomon knew the names of all the spirits, and having their names, he held them subject to his will. So the universe has always appeared to the natural mind as a kind of enigma, of which the key must be sought in the shape of some illuminating or power-bringing word or name. That word names the universe's PRINCIPLE, and to possess it is, after a fashion, to possess the universe itself. “God,” “Matter,” “Reason,” “the Absolute,” “Energy,” are so many solving names. You can rest when you have them. You are at the end of your metaphysical quest.

形而上学通常追求的是非常原始的东西。你们都知道，人类一直多么渴求不合法的法术，你们也知道，在魔法中，语言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如果你知道他的名字，或者降服他的咒语公式，你就可以控制那个精灵、鬼怪、恶魔，或者任何神奇的力量。所罗门知道所有精灵的名字，因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就能让他们服从他的意志。对自然的头脑来说，宇宙总是显得像个谜，解开谜底的钥匙必须在某种闪亮的或者带给人力量的词语或名称的形式中寻找。词语给宇宙的原理命名，掌握了它，就仿佛掌握了宇宙本身。“上帝”，“物质”，“理性”，绝对意志，“能量”都是这类能解决问题的名字。一旦有了它们，你就可以安心。形而上学的追求也就到了终点。

But if you follow the pragmatic method, you cannot look on any such word as closing your quest. You must bring out of each word its practical cash-value, set it at work within the stream of your experience. It appears less as a solution, then, than as a program for more work, and more particularly as an indicat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existing realities may be CHANGED.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实用主义的方法，你就不能把这些词语当作追求的终点。你必须把每个词语的实际价值表现出来，把它应用到你的经验里。它看起来不太像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更像下一步工作的计划，尤其更像是对改变现存事实的各类方式的说明。

THEORIES THUS BECOME INSTRUMENTS, NOT ANSWERS TO ENIGMAS, IN WHICH WE CAN REST. We don't lie back upon them, we move forward, and, on occasion, make nature over again by their aid. Pragmatism unstiffens all our theories, limbers them up and sets each one at work. Being nothing essentially new, it harmonizes with many ancient philosophic tendencies. It agrees with nominalism for instance, in always appealing to particulars; with utilitarianism in emphasizing practical aspects; with positivism in its disdain for verbal solutions, useless questions, and metaphysical abstractions.

理论因此成为我们可以依赖的工具，而不是谜语的谜底。我们并不就此裹足不前，我们继续前进，而且有时还借助工具重新塑造自然。实用主义使我们所有的理论灵活起来，让它们富有弹性，每一个都发挥作用。因为它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所以它与许多古代的哲学倾向是一致的。比如，它与唯名论观点一致，因为都依赖特定细节；它与功利主义观点一致，因为都强调实际方面；它与实证主义在蔑视字面上的解决方案、无用的问题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方面也拥有一致的观点。

All these, you see, are ANTI-INTELLECTUALIST tendencies. Against rationalism as a pretension and a method, pragmatism is fully armed and militant. But, at the outset, at least, it stands for no particular results. It has no dogmas, and no doctrines save its

method. As the young Italian pragmatist Papini has well said, it lies in the midst of our theories, like a corridor in a hotel. Innumerable chambers open out of it. In one you may find a man writing an atheistic volume; in the next someone on his knees praying for faith and strength; in a third a chemist investigating a body's properties. In a fourth a system of idealistic metaphysics is being excogitated; in a fifth the impossibility of metaphysics is being shown. But they all own the corridor, and all must pass through it if they want a practicable way of getting into or out of their respective rooms.

所有这些，你们可以看到，都具有反理智主义的倾向。针对理性主义自诩为一种主张和方法，实用主义全副武装，全力战斗。但至少一开始，它并不代表任何特定结果。它没有任何教条、任何主义，只有方法。意大利年轻的实用主义者帕皮尼说得好，它就像旅馆里的走廊一样，连接着我们的各种理论。无数的房间都通向它。一个房间里，有人在写无神论著作；隔壁房间里，有人跪在地上祈求信仰和力量；另外一间房里，有位化学家正在考察物体的属性。第四间房里，有人在思考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体系；第五间房里，有人在说明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但是他们都拥有走廊，如果想找到从各自房间出入的可行方法，都必须经过走廊。

No particular results then, so far, but only an attitude of orientation, is what the pragmatic method means. THE ATTITUDE OF LOOKING AWAY FROM FIRST THINGS, PRINCIPLES, “CATEGORIES,” SUPPOSED NECESSITIES; AND OF LOOKING TOWARDS LAST THINGS, FRUITS, CONSEQUENCES, FACTS.

到目前为止，实用主义的方法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果，只是一种导向态度。这态度不是去看原初、原则、“类别”和假设的必须条件，而

是要去看最终、成果、后果、事实。

So much for the pragmatic method! You may say that I have been praising it rather than explaining it to you, but I shall presently explain it abundantly enough by showing how it works on some familiar problems. Meanwhile the word pragmatism has come to be used in a still wider sense, as meaning also a certain theory of TRUTH. I mean to give a whole lecture to the statement of that theory, after first paving the way, so I can be very brief now. But brevity is hard to follow, so I ask for your redoubled attention for a quarter of an hour. If much remains obscure, I hope to make it clearer in the later lectures.

实用主义方法就是这样！你们可能会说，我一直在表扬它，而没有解释它。但我会马上非常详细地解释它，说明它如何看待我们熟悉的一些问题。同时，实用主义这个词已经开始有更广泛的意义，也指关于真理的某种理论。在先做好铺垫后，我打算用一整节讲座，说明这种理论。所以，我现在可以非常简洁。但是，简洁不容易。我请大家在以下十五分钟里，精神要加倍集中。如果还有很多不清楚之处，我希望在以后的讲座里讲得更明白。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ly cultivated branches of philosophy in our time is what is called inductive logic, the study of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our sciences have evolved. Writers on this subject have begun to show a singular unanimity as to what the laws of nature and elements of fact mean, when formulated by mathematicians, physicists and chemists. When the first mathematical, logical and natural uniformities, the first LAWS, were discovered, men were so carried away by the clearness, beauty and

simplification that resulted, that they believed themselves to have deciphered authentically the eternal thoughts of the Almighty. His mind also thundered and reverberated in syllogisms. He also thought in conic sections, squares and roots and ratios, and geometrized like Euclid. He made Kepler's laws for the planets to follow; he made velocity increase proportionally to the time in falling bodies; he made the law of the sines for light to obey when refracted; he established the classes, orders, families and genera of plants and animals, and fixed the distances between them. He thought the archetypes of all things, and devised their variations; and when we rediscover any one of these his wondrous institutions, we seize his mind in its very literal intention.

我们当代哲学最成功、最发达的一个分支就是所谓的归纳逻辑，它研究科学发展演变的条件。对于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所制定的各种自然规律和事实要素的意义，归纳逻辑的众多作者已经开始表现出出奇的一致性。当数学、逻辑和自然科学的一致性以及第一批定律被发现时，人们为由此而来的清晰明确、优美简单而欣喜，他们相信自己已经真正破解了上帝的永恒思想。上帝的思想，也在三段论中轰鸣回响。上帝也用圆锥截面、平方、平方根和比率来思考，也像欧几里德一样依据几何原理工作。他创造了开普勒定律，使行星据此运转；他使下落物体速度的增加和时间成正比；他制定了正弦律，使光据此折射；他确立了动植物的纲、目、科、属，使它们之间的远近关系固定。他想出万物的原型，并设计出它们的各种变种；我们再次发现上帝任何一种神奇创造之时，我们就抓住了他的思想很直接的意图。

But as the sciences have developed farther, the notion has gained ground that most, perhaps all, of our laws are only approximations. The laws themselves, moreover, have grown so

numerous that there is no counting them; and so many rival formulations are proposed in all the branches of science that investigators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the notion that no theory is absolutely a transcript of reality, but that any one of them may from some point of view be useful. Their great use is to summarize old facts and to lead to new ones. They are only a man-made language, a conceptual shorthand, as someone calls them, in which we write our reports of nature; and languages, as is well known, tolerate much choice of expression and many dialects.

但当科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有一种观念就开始占优势，那就是大多数，也许是全部的定律，只是一些近似的东西。这些定律本身也越来越多，不胜枚举；而且在科学的所有分支中，还提出了许多相反的观点，因此研究者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没有一种理论是对现实的绝对描述，但从某个角度来看，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有用的。它们的伟大用处在于总结原有事实，引导新的事物。它们只是人为的语言，有些人称其为概念的简洁表达方式，我们用它写出对自然的报告；而语言，众所周知，容许存在众多表达方式与乡土方言。

Thus human arbitrariness has driven divine necessity from scientific logic. If I mention the names of Sigwart, Mach, Ostwald, Pearson, Milhaud, Poincare, Duhem, Ruyssen, those of you who are students will easily identify the tendency I speak of, and will think of additional names.

因此，人类的武断已经把神的必然性从科学逻辑中赶走。只要我提起西格瓦特、马赫、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米约、庞加莱、迪昂、吕桑这些名字，你们中的学生就会很容易确定我要谈的倾向，也会想到别的名字来。

Riding now on the front of this wave of scientific logic Messrs. Schiller and Dewey appear with their pragmatistic account of what truth everywhere signifies. Everywhere, these teachers say, “truth” in our ideas and beliefs means the same thing that it means in science. It means, they say, nothing but this, THAT IDEAS (WHICH THEMSELVES ARE BUT PARTS OF OUR EXPERIENCE) BECOME TRUE JUST IN SO FAR AS THEY HELP US TO GET INTO SATISFACTORY RELATION WITH OTHER PARTS OF OUR EXPERIENCE, to summarize them and get about among them by conceptual short-cuts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interminable succession of particular phenomena. Any idea upon which we can ride, so to speak; any idea that will carry us prosperously from any one part of our experience to any other part, linking things satisfactorily, working securely, simplifying, saving labor; is true for just so much, true in so far forth, true INSTRUMENTALLY. This is the 'instrumental' view of truth taught so successfully at Chicago, the view that truth in our ideas means their power to 'work,' promulgated so brilliantly at Oxford.

席勒和杜威两位先生站在在科学逻辑的前沿上，用实用主义来说明各种情况下真理的意义。这两位先生说，在各种情况下，我们观念和信仰中的“真理”，和科学上的真理是一个意思。他们说真理的意义就在于此，观念（本身就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只要有助于使我们与我们经验的其他部分形成让人满意的关系，有助于我们通过概念的捷径，而不是遵循特定现象的无限连续性，来总结它，使用它，观念就变成了真理。比如，我们能驾驭的任何观念；让我们很顺利地从一部分经验过渡到另一部分经验，使事物完满地联系在一起，安全地运行，简化并节省劳动力的观念；任何这样的观念，都是真实的，真实到这么多，真实到这种地步，真实的有工具作用。真理的这种“工具”观，在芝加哥讲授得很成功，我们的观念中真理就意味着“起作

用”的能力，在牛津宣传得也非常精彩。

Messrs. Dewey, Schiller and their allies, in reaching this general conception of all truth, have only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geologists, biologists and philologist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se other sciences, the successful stroke was always to take some simple process actually observable in operation—as denudation by weather, say, or variation from parental type, or change of dialect by incorporation of new words and pronunciations—and then to generalize it, making it apply to all times, and produce great results by summating its effects through the ages.

杜威、席勒两位先生和他们的同派学者，在得出所有真理的这种普遍概念的过程中，仅仅是按照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和语文学家的样子去做。在建立这些别的科学时，成功之道总是去记录一些在运行中能观察到的简单过程——如气候对土地的剥蚀，或生物相对于父代的变异，或方言因为吸收了新词新音而发生的变化——然后对过程进行概括，使它能在所有时间都适用，并通过总结其历年的效果得出重大的结论。

The observable process which Schiller and Dewey particularly singled out for generalization is the familiar one by which any individual settles into NEW OPINIONS. The process here is always the same. The individual has a stock of old opinions already, but he meets a new experience that puts them to a strain. Somebody contradicts them; or in a reflective moment he discovers that they contradict each other; or he hears of facts with which they are incompatible; or desires arise in him which they cease to satisfy. The result is an inward trouble to which his mind till then had been

a stranger, and from which he seeks to escape by modifying his previous mass of opinions. He saves as much of it as he can, for in this matter of belief we are all extreme conservatives. So he tries to change first this opinion, and then that (for they resist change very variously), until at last some new idea comes up which he can graft upon the ancient stock with a minimum of disturbance of the latter, some idea that mediates between the stock and the new experience and runs them into one another most felicitously and expediently.

席勒和杜威两位先生特别选择能观察到的过程进行总结，任何一个想要到得出新观点的人对此都非常熟悉。这个过程总是一样的。一个人已经有一套旧观点，但是他遇到了新经验，使旧观点面临考验。有人反对旧观点；或者他反省时发现这些旧观点相互矛盾；或者他听到一些事实，与旧观点不符；或者他产生一些新要求，而旧观点不能满足。结果就会产生一种他至今尚未经历过的内心烦恼，要逃避这种烦恼，他需要修正之前的众多观点。他尽量保留之前的观点，因为在信仰问题上，我们都是极端保守分子。于是，他尝试先改变这个观点，然后那个观点（因为它们抗拒改变的方式十分不同），直到最后出现一些新观点，他把这些新观点加在旧观点上，让旧观点尽量不受干扰，新旧观点和经验调和在一起，使它们很巧妙、很方便地交织起来。

This new idea is then adopted as the true one. It preserves the older stock of truths with a minimum of modification, stretching them just enough to make them admit the novelty, but conceiving that in ways as familiar as the case leaves possible. An outree explanation, violating all our preconceptions, would never pass for a true account of a novelty. We should scratch round industriously till we found something less excentric. The most violent revolutions in an individual's beliefs leave most of his old order standing. Time

and space, cause and effect, nature and history, and one's own biography remain untouched. New truth is always a go-between, a smoother-over of transitions. It marries old opinion to new fact so as ever to show a minimum of jolt, a maximum of continuity. We hold a theory true just in proportion to its success in solving this 'problem of maxima and minima.' But success in solving this problem is eminently a matter of approximation. We say this theory solves it on the whole more satisfactorily than that theory; but that means more satisfactorily to ourselves, and individuals will emphasize their points of satisfaction differently. To a certain degree, therefore, everything here is plastic.

然后，这个新观点就被接纳为真的观点了。它保留了较旧的一套经历了最小程度修正的真理，只是将它们延伸到能够接受新观点的地步，但还是尽可能地用人们熟悉的方法来思想。违背所有我们旧有观念的怪异解释都不能被当作是对新事物的真实描述。我们应该努力到处寻找，直到发现不那么古怪的观点。个人信念发生的最猛烈的变革，还是会保留大多数的旧观点。时间和空间、原因和结果、自然和历史、还有个人的历史，都不会改变。新的真理总是一种媒介，是各种转变的缓和剂。它让旧观点结合新事实，使其表现出最小限度的撼动，最大限度的连续性。我们认为，一个理论的真实程度，跟它解决这种“最小限度和最大限度问题”的成功程度成正比。但是，要成功解决这个问题，明显是一个近似度的问题。我们说总体上这种理论比那种理论解决问题更让人满意；但意思是对我们来说更满意，而个人会以不同方式强调让他们满意的地方。因此，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任何事物都是有弹性的。

The point I now urge you to observe particularly is the part played by the older truths. Failure to take account of it is the source of much of the unjust criticism leveled against pragmatism. Their

influence is absolutely controlling. Loyalty to them is the first principle—in most cases it is the only principle; for by far the most usual way of handling phenomena so novel that they would make for a serious rearrangement of our preconceptions is to ignore them altogether, or to abuse those who bear witness for them.

现在，我强烈要求大家特别注意较旧的真理所起的作用。许多针对实用主义者不公正的批评，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将这一点考虑在内。旧真理的影响起绝对决定作用。忠实于旧真理是第一原则——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唯一原则；因为新现象如此之新，对旧观点要作大幅度的重新调整，处理新现象迄今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完全忽视新现象，或者去辱骂那些见证了新现象的人。

You doubtless wish examples of this process of truth's growth, and the only trouble is their superabundance. The simplest case of new truth is of course the mere numerical addition of new kinds of facts, or of new single facts of old kinds, to our experience—an addition that involves no alteration in the old beliefs. Day follows day, and its contents are simply added. The new contents themselves are not true, they simply COME and ARE. Truth is what we say about them, and when we say that they have come, truth is satisfied by the plain additive formula.

毫无疑问，你们想要这种真理发展过程的实例，唯一的麻烦就是例子实在太多。新真理最简单的例子，当然就是我们经验中新事实种类或旧种类的新的个别事实在数字上的增加——这种增加不涉及对旧信仰的任何改变。一天又一天，它只是内容有所增加。新内容本身并不是真理，它们只是出现了，存在着。真理是我们关于新内容的说法，如果我们说新内容已经出现了，简单的加法就满足了真理。

But often the day's contents oblige a rearrangement. If I should now utter piercing shrieks and act like a maniac on this platform, it would make many of you revise your ideas as to the probable worth of my philosophy. “Radium” came the other day as part of the day's content, and seemed for a moment to contradict our ideas of the whole order of nature, that order having come to be identified with what is called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 The mere sight of radium paying heat away indefinitely out of its own pocket seemed to violate that conservation. What to think? If the radiations from it were nothing but an escape of unsuspected “potential” energy, preexistent inside of the atoms, the principle of conservation would be saved. The discovery of “helium” as the radiation's outcome, opened a way to this belief. So Ramsay's1 view is generally held to be true, because, altho it extends our old ideas of energy, it causes a minimum of alteration in their nature.

但经常的情况是，一天下来的新内容就迫使我们对它们做一次重新调整。如果我现在站在这讲台上，发出尖叫，举动像个疯子，你们许多人对我的哲学可能的价值，就会改变看法。前些天发现的“镭”是一天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乍看之下，它与我们对自然界全部秩序的观点是矛盾的，人们已经认为该秩序就是能量是守恒的。能无限发热的镭，一旦被发现，好像违背了能量守恒。该怎么想呢？如果它发出的辐射，只是原子里面早先存在的未知“潜”能的外泄，那么守恒定律还能保留。发现“氦”是这种放射的结果，为这种信念开辟了道路。因此，人们一般认为，拉姆齐的观点是真实的，因为尽管它扩展了我们有关能量的旧观点，它对旧观念本质的改变是最小的。

I need not multiply instances. A new opinion counts as “true” just in proportion as it gratifies the individual's desire to assimilate

the novel in his experience to his beliefs in stock. It must both lean on old truth and grasp new fact; and its success (as I said a moment ago) in doing this, is a matter for the individual's appreciation. When old truth grows, then, by new truth's addition, it is for subjective reasons. We are in the process and obey the reasons. That new idea is truest which performs most felicitously its function of satisfying our double urgency. It makes itself true, gets itself classed as true, by the way it works; grafting itself then upon the ancient body of truth, which thus grows much as a tree grows by the activity of a new layer of cambium.

我不必举太多的例子。同理，一个新观点的“真实”程度，跟它满足个人把新经验融入到旧信仰的愿望成正比。它必须依靠旧真理，把握新事实；它在这方面的成功（我刚刚讲过）是个人鉴别力的问题。当有了新真理的补充，旧真理有了发展，这是因为主观原因。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服从这些原因。新观念如果能最圆满地发挥作用并满足我们双重的迫切需要，就是最真实的。它用自己的工作方式，使自己真实，让自己被列入真实一类；然后把自己嫁接到旧真理之上，而旧真理的增长就像一棵树因为新生组织的活动而生长一样。

Now Dewey and Schiller proceed to generalize this observation and to apply it to the most ancient parts of truth. They also once were plastic. They also were called true for human reasons. They also mediated between still earlier truths and what in those days were novel observations. Purely objective truth, truth in whose establishment the function of giving human satisfaction in marrying previous parts of experience with newer parts played no role whatever, is nowhere to be found. The reasons why we call things true is the reason why they ARE true, for “to be true” MEANS only to perform this marriage-function.

现在杜威和席勒两位先生开始概括这种现象，把它用到真理最古老的部分上。它们曾经也是弹性的。它们曾经也因为人为原因被叫做真实的。它们曾经也把更早的真理与当时的新现象调和起来。纯粹客观的真理在其建立过程中，如果将旧经验与新经验结合并给人带来满足感的功能没有发挥作用，那么这种真理是无处可寻的。我们之所以认为事物为真的理由，就是他们之所以为真的理由，因为“为真”就只意味着实现这种结合的功能。

The trail of the human serpent is thus over everything. Truth independent; truth that we FIND merely; truth no longer malleable to human need; truth incorrigible, in a word; such truth exists indeed superabundantly—or is supposed to exist by rationalistically minded thinkers; but then it means only the dead heart of the living tree, and its being there means only that truth also has its paleontology and its “prescription,” and may grow stiff with years of veteran service and petrified in men's regard by sheer antiquity. But how plastic even the oldest truths nevertheless really are has been vividly shown in our day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gical and mathematical ideas, a transformation which seems even to be invading physics. The ancient formulas are reinterpreted as special expressions of much wider principles, principles that our ancestors never got a glimpse of in their present shape and formulation.

因此，人类的足迹无处不在，如蛇行一般蜿蜒。独立的真理；我们仅能发现的真理；不能再进行锤炼以适应人类需要的真理；简而言之，不可改动的真理；这种真理实在超多——或者说，这是理性主义思想家认为存在的真理；但它只不过就是活树的枯心，它的存在，只不过就是说真理也有自己的化石期和“时效”，真理也会在多年长期使用后变得僵硬，因为时间古久，人们会认为它已经石化了。但是即使

最古老的真理实际上也可以很灵活，今天逻辑和数学观念的转变就已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种转变好像正影响着物理学。古老的公式被重新拿来，当作是更为广泛原理的一种特别表达方式，而这些原理的当前形式和形成，是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见过的。

Mr. Schiller still gives to all this view of truth the name of “Humanism,” but, for this doctrine too, the name of pragmatism seems fairly to be in the ascendant, so I will treat it under the name of pragmatism in these lectures.

席勒先生还是把所有这些真理观叫做“人本主义”，但是，用实用主义这个名称来称呼这一学说似乎日渐盛行，所以，我在这些讲座里，要用实用主义的名称来称呼它。

Such then would be the scope of pragmatism—first, a method; and second, a genetic theory of what is meant by truth. And these two things must be our future topics.

这些就会是实用主义的范围——首先是方法；其次是关于真理是什么的起源性理论。这两点必须是我们将要讨论的主题。

What I have said of the theory of truth will, I am sure, have appeared obscure and unsatisfactory to most of you by reason of us brevity. I shall make amends for that hereafter. In a lecture on “common sense” I shall try to show what I mean by truths grown petrified by antiquity. In another lecture I shall expatiate on the idea that our thoughts become true in proportion as they

successfully exert their go-between function. In a third I shall show how hard it is to discriminate subjective from objective factors in Truth's development. You may not follow me wholly in these lectures; and if you do, you may not wholly agree with me. But you will, I know, regard me at least as serious, and treat my effort with respectful consideration.

我相信，我已经讲到的真理论，因为太简短，你们中大多数人会觉得不清楚、不满意。随后我会做一些补充。在有关“常识”那一讲，我会试着说明“我所说的古旧真理已经石化”是什么意思。另一讲，我会详细阐释，我们的思想变成真实的程度与它们完成中介作用的成功程度成正比。还有另外一讲，我会说明在“真理”发展过程中，区分主观和客观因素是多么困难。在这些讲座中，你们可能不能完全理解我；即使理解了，也不一定能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知道，你们至少会认为我是认真的，也会尊重我的努力。

You will probably be surprised to learn, then, that Messrs. Schiller's and Dewey's theories have suffered a hailstorm of contempt and ridicule. All rationalism has risen against them. In influential quarters Mr. Schiller, in particular, has been treated like an impudent schoolboy who deserves a spanking. I should not mention this, but for the fact that it throws so much sidelight upon that rationalistic temper to which I have opposed the temper of pragmatism. Pragmatism is uncomfortable away from facts. Rationalism is comfortable only in the presence of abstractions. This pragmatist talk about truths in the plural, about their utility and satisfactoriness, about the success with which they 'work,' etc., suggests to the typical intellectualist mind a sort of coarse lame second-rate makeshift article of truth. Such truths are not real truth. Such tests are merely subjective. As against this, objective truth

must be something non-utilitarian, haughty, refined, remote, august, exalted. It must be an absolute correspondence of our thoughts with an equally absolute reality. It must be what we OUGHT to think, unconditionally. The conditioned ways in which we DO think are so much irrelevance and matter for psychology. Down with psychology, up with logic, in all this question!

听到下面的事情，你们也许会吃惊。那就是席勒先生和杜威先生的理论曾经遭到狂风暴雨般的蔑视与嘲笑。所有的理性主义都群起而攻之。尤其是席勒先生，他在那些有影响力的圈子里，被当成了一个鲁莽该打的孩子。要不是这件事从侧面充分说明了我用实用主义气质来比对的那种理性主义的气质，我本不该提到这些。离开事实，实用主义感到不舒服。而只有在抽象面前，理性主义才感到舒服。实用主义者谈到真理的多元性、用途和令人满意的程度，谈到真理成功地“起作用”等等，从而使典型的理智主义头脑认为，这些关于真理的谈论是粗糙的、不健全的、二流的权宜之计。这些真理不是真正的真理。这些考察不过是主观的。与此相反，客观真理必须是非功利的、高傲的、精致的、遥不可及的、神圣的、尊贵的。它必须是我们的头脑与一个同样绝对现实之间的绝对对应。它必须是我们应当无条件去思考的东西。我们实际上常常用那些有条件的方法去思考，而这些方法是十分不相干的，它们是心理学要考虑的问题。在所有这种问题中，我们不要心理学，我们需要逻辑学！

See the exquisite contrast of the types of mind! The pragmatist clings to facts and concreteness, observes truth at its work in particular cases, and generalizes. Truth, for him, becomes a class-name for all sorts of definite working-values in experience. For the rationalist it remains a pure abstraction, to the bare name of which we must defer. When the pragmatist undertakes to show in detail just WHY we must defer, the rationalist is unable to recognize the

concretes from which his own abstraction is taken. He accuses us of DENYING truth; whereas we have only sought to trace exactly why people follow it and always ought to follow it. Your typical ultra-abstractionist fairly shudders at concreteness: other things equal, he positively prefers the pale and spectral. If the two universes were offered, he would always choose the skinny outline rather than the rich thicket of reality. It is so much purer, clearer, nobler.

看看这些不同思想之间尖锐的对比！实用主义者紧抓事实与具体性，根据具体情况下真理的作用来观察真理，并加以概括。对实用主义者来说，真理成为经验中所有明确起作用的价值的类别名称。对理性主义者来说，真理仍旧是一种纯粹的抽象，单是它的名字，我们也必须敬重。实用主义者详细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敬重真理，而理性主义者却不能认识那产生他们的抽象概念的种种具体情况。他指责我们否认真理；然而，我们不过只是要探个究竟，为什么人们遵循真理，而且要一直遵循真理。你们中，典型的极端抽象主义者相当害怕具体性：在其他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他肯定更愿意要那些苍白的幽灵般的一类。如果给他两个宇宙，他总是挑选那个皮包骨的轮廓，而不要丰富繁茂的现实。那轮廓更纯洁，更清晰，更高尚。

I hope that as these lectures go on, the concreteness and closeness to facts of the pragmatism which they advocate may be what approves itself to you as its most satisfactory peculiarity. It only follows here the example of the sister-sciences, interpreting the unobserved by the observed. It brings old and new harmoniously together. It converts the absolutely empty notion of a static relation of “correspondence” (what that may mean we must ask later) between our minds and reality, into that of a rich and active commerce (that anyone may follow in detail and understand) between particular thoughts of ours, and the great universe of other

experiences in which they play their parts and have their uses.

我希望在讲课过程中，讲座所提倡的实用主义的具体性和它与事实的密切程度，会是你们能看到的它最让人满意的特征。这里，实用主义只是仿照其他兄弟学科，用已经观察到的事物来解释还没有观察到的事物。它把新与旧和谐地结合起来。它改变了我们头脑与现实之间那种静止“对应”关系（稍后我们再追究对应的意义）的绝对而空洞的概念，将它变成我们个别的思想与其他各种经验组成的伟大宇宙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是丰富的，积极的（任何人都能了解细节，领会意义）。在这个伟大宇宙中，我们的个别思想都发挥作用，施展用途。

But enough of this at present? The justification of what I say must be postponed. I wish now to add a word in further explanation of the claim I made at our last meeting, that pragmatism may be a happy harmonizer of empiricist ways of thinking, with the more religious demands of human beings.

但现在就说到这里，好吗？要证明我所讲的是合理的，必须要放到后面了。现在，我想对上一讲里提到的说法再多说一句。在实证主义思想方法和人类更为宗教性的需求之间，实用主义可能是恰当的调和剂。

Men who are strongly of the fact-loving temperament, you may remember me to have said, are liable to be kept at a distance by the small sympathy with facts which that philosophy from the present-day fashion of idealism offers them. It is far too intellectualistic. Old fashioned theism was bad enough, with its notion of God as an

exalted monarch, made up of a lot of unintelligible or preposterous “attributes”; but, so long as it held strongly by the argument from design, it kept some touch with concrete realities. Since, however, darwinism has once for all displaced design from the minds of the “scientific,” theism has lost that foothold; and some kind of an immanent or pantheistic deity working IN things rather than above them is, if any, the kind recommended to our contemporary imagination. Aspirants to a philosophic religion turn, as a rule, more hopefully nowadays towards idealistic pantheism than towards the older dualistic theism,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latter still counts able defenders.

你们也许记得我曾经说过，当下唯心主义哲学对事实表现出的微小同情，让具有强烈的热爱事实气质的人，很容易与它保持一定距离。它太理智主义了。过时的有神论已经够糟糕了，它认为上帝是至高的君主，这种理论具有许多不可理解或者荒唐的“属性”；但是，只要它坚定信奉设计论的观点，它还是会与具体现实保持一定接触。但是，既然达尔文主义已经在“科学”的头脑里彻底取代了设计论观点，有神论就已经失去了那个立足点；而且如果有某种内在论的或泛神论的神在事物内部而不是事物之上起作用，这种神是人们希望我们当代想象中具有的。渴望具有哲学性质的宗教的人，现在通常会满怀希望转向唯心主义的泛神论，而不是较古老的二元论有神论，尽管后者至今还有许多有力的辩护者。

But, as I said in my first lecture, the brand of pantheism offered is hard for them to assimilate if they are lovers of facts, or empirically minded. It is the absolutistic brand, spurning the dust and reared upon pure logic. It keeps no connexion whatever with concreteness. Affirming the Absolute Mind, which is its substitute for God, to be the rational presupposition of all particulars of fact,

whatever they may be, it remains supremely indifferent to what the particular facts in our world actually are. Be they what they may, the Absolute will father them. Like the sick lion in Esop's fable, all footprints lead into his den, but nullavestigiaretrorsum. You cannot redescend into the world of particulars by the Absolute's aid, or deduce any necessary consequences of detail important for your life from your idea of his nature. He gives you indeed the assurance that all is well with Him, and for his eternal way of thinking; but thereupon he leaves you to be finitely saved by your own temporal devices.

但是，如我第一讲所说，对热爱事实或具有实证主义头脑的人来说，他们是很难接受这种泛神论的。它属于绝对主义一派，藐视世间尘埃，建立在纯粹的逻辑之上。它与具体性毫无关联。它肯定绝对意志，也就是上帝的化身，认为它是事实全部细节的理性前提，而不管这些细节是什么，但它对世界各种具体事实的实际情况，仍然高度漠不关心。不管它们是什么，绝对意志都是它们的创造者。就像《伊索寓言》里那只生病的狮子一样，所有的脚印都是朝向狮子洞，没有一个朝外。你不能借助绝对意志重新回归到各种细节的世界，也不能根据你对绝对本质的理解，推断出任何对生活有重要意义的关于细节的必然结果。他实际上向你保证，有了他和他永恒的思维方式，一切都会安好；但他随即离开，就留下你自己，用各种暂时的方法来有限地拯救自己。

Far be it from me to deny the majesty of this conception, or its capacity to yield religious comfort to a most respectable class of minds. But from the human point of view, no one can pretend that it doesn't suffer from the faults of remoteness and abstractness. It is eminently a product of what I have ventured to call the rationalistic temper. It disdains empiricism's needs. It substitutes a pallid outline

for the real world's richness. It is dapper; it is noble in the bad sense, in the sense in which to be noble is to be inapt for humble service. In this real world of sweat and dirt, it seems to me that when a view of things is “noble,” that ought to count as a presumption against its truth, and as a philosophic disqualification. The prince of darkness may be a gentleman, as we are told he is, but whatever the God of earth and heaven is, he can surely be no gentleman. His menial services are needed in the dust of our human trials, even more than his dignity is needed in the empyrean.

我绝不否认这个概念的权威，也不否认它能给那些最可尊敬的一类头脑带来宗教上的安慰。但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人可以假装认为它没有渺茫和抽象的缺点。它很明显就是我所称作理性主义气质的结果。它蔑视实证主义的需要。它用一个苍白的轮廓去代替真实世界的丰富内容。它整齐精干；它高贵，但这个说法有不好的意义，因为要高尚，就不善于提供谦卑的服务。在真实世界的汗水和污垢中，我认为，如果某种关于事物的观点是“高贵”的，那应该算作是对真相的傲慢，是一种哲学上的不合格。如众人所说，魔鬼可能是绅士，但是无论统治天地的上帝是谁，他肯定不是绅士。比起苍天需要上帝的尊严，我们满是人类磨难的尘世中，更多地需要上帝仆人般的服务。

Now pragmatism, devoted tho she be to facts, has no such materialistic bias as ordinary empiricism labors under. Moreover, she has no objection whatever to the realizing of abstractions, so long as you get about among particulars with their aid and they actually carry you somewhere. Interested in no conclusions but those which our minds and our experiences work out together, she has no a priori prejudices against theology. IF THEOLOGICAL IDEAS PROVE TO HAVE A VALUE FOR CONCRETE LIFE, THEY WILL BE TRUE, FOR PRAGMATISM, IN THE SENSE OF BEING

GOOD FOR SO MUCH. FOR HOW MUCH MORE THEY ARE TRUE, WILL DEPEND ENTIRELY ON THEIR RELATIONS TO THE OTHER TRUTHS THAT ALSO HAVE TO BE ACKNOWLEDGED.

现在，实用主义虽致力于事实，但她并没有让普通实证主义苦恼的那些唯物主义偏见。而且，她绝不反对去实现抽象，只要你能利用抽象来处理各种具体事务，把你带到一定的地方。除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共同得出的结论之外，她对其他结论都不感兴趣，她对神学也没有任何先验的偏见。如果神学的各种观念证明对具体生活有价值，实用主义就认为它们在如此范围内是成立的，是真的。至于它们在此外多大范围内还继续为真，要完全取决于它们与其他也必须被承认的真理之间的关系。

What I said just now about the Absolute of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is a case in point. First, I called it majestic and said it yielded religious comfort to a class of minds, and then I accused it of remoteness and sterility. But so far as it affords such comfort, it surely is not sterile; it has that amount of value; it performs a concrete function. As a good pragmatist, I myself ought to call the Absolute true “in so far forth,” then; and I unhesitatingly now do so.

我之前所说的先验唯心主义的绝对意志，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首先，我认为它有权威，能给某类头脑带来宗教上的安慰，然后我又指责它渺茫，没有结果。但只要它能给人如此安慰，它就肯定不是没有结果的；它有那么多的价值；它起到一种具体作用。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实用主义者，我自己应该说“到如此地步”的时候，绝对意志为真；现在，我这么说，毫不犹豫。

But what does TRUE IN SO FAR FORTH mean in this case? To answer, we need only apply the pragmatic method. What do believers in the Absolute mean by saying that their belief affords them comfort? They mean that since in the Absolute finite evil is 'overruled' already, we may, therefore, whenever we wish, treat the temporal as if it were potentially the eternal, be sure that we can trust its outcome, and, without sin, dismiss our fear and drop the worry of our finite responsibility. In short, they mean that we have a right ever and anon to take a moral holiday, to let the world wag in its own way, feeling that its issues are in better hands than ours and are none of our business.

但是这种情况下，真实到如此地步是什么意思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信仰绝对意志的人说他们的信仰给了他们安慰，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的意思是，既然绝对意志有限的恶已经被“压制”住了，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把暂时的看成好像是潜在的永恒，肯定能够相信它的结果，可以毫无罪恶感地打消我们的有限责任带来的恐惧和担心。简而言之，他们的意思是，我们有权时常在道义上休假，让世界以自己的方式摆动，觉得世界的种种问题有比我们更高明的手来处理，与我们无关。

The universe is a system of which the individual members may relax their anxieties occasionally, in which the don't-care mood is also right for men, and moral holidays in order—that, if I mistake not, is part, at least, of what the Absolute is “known-as,” that is the great difference in our particular experiences which his being true makes for us, that is part of his cash-value when he is pragmatically interpreted. Farther than that the ordinary lay-reader in philosophy who thinks favorably of absolute idealism does not venture to sharpen his conceptions. He can use the Absolute for so much, and

so much is very precious. He is pained at hearing you speak incredulously of the Absolute, therefore, and disregards your criticisms because they deal with aspects of the conception that he fails to follow.

宇宙是一个体系，里面的单个成员可以偶尔缓解他们的焦虑，人们有不太在乎的心情也没有错，也可以有道义上的假期——如果我们没弄错的话，这至少是我们所“知道”的绝对意志的一部分；如果绝对意志是真的，那就是它在我们特定经验里给我们造成的巨大差异；如果用实用主义来解释的话，那就是它的部分现金价值。在此之外，那些赞成绝对唯心主义的普通非专业的哲学读者，不会尝试使自己的观念进一步清晰的。他只能把绝对意志用到这种地步，而这是非常珍贵的。他听到你们不相信绝对意志，会觉得很痛苦，而且因为不理解你们的批评里对概念各个方面的处理，他就不理会你们的批评。

If the Absolute means this, and means no more than this, who can possibly deny the truth of it? To deny it would be to insist that men should never relax, and that holidays are never in order. I am well aware how odd it must seem to some of you to hear me say that an idea is “true” so long as to believe it is profitable to our lives. That it is GOOD, for as much as it profits, you will gladly admit. If what we do by its aid is good, you will allow the idea itself to be good in so far forth, for we are the better for possessing it. But is it not a strange misuse of the word “truth,” you will say, to call ideas also “true” for this reason?

如果绝对意志是这个意思，而且只有这个意思，谁能否认它的真实性呢？要否认它，就是坚持人们应该永不休息，永远没有假日。我很清楚，听到我说只要我们相信一个观念对我们生活有好处，它就

是“真”的，你们有些人一定感到很奇怪。你们会很乐意承认，只要它给我们带来好处，它就是善的。如果我们借助它做出来的事是善的，你们就会同意，就此而言，这个观念本身是好的，因为有了它，我们就更好。但你们会说，就凭这个原因，就把这些观念叫做“真”的，难道不是对“真理”一词很奇怪的误用吗？

To answer this difficulty fully is impossible at this stage of my account.

我在讲座的现阶段，不可能全面回答这个难题。

You touch here upon the very central point of Messrs. Schiller's, Dewey's and my own doctrine of truth, which I cannot discuss with detail until my sixth lecture. Let me now say only this, that truth is ONE SPECIES OF GOOD, and not, as is usually supposed, a category distinct from good, and co-ordinate with it. THE TRUE IS THE NAME OF WHATEVER PROVES ITSELF TO BE GOOD IN THE WAY OF BELIEF, AND GOOD, TOO, FOR DEFINITE, ASSIGNABLE REASONS. Surely you must admit this, that if there were NO good for life in true ideas, or if the knowledge of them were positively disadvantageous and false ideas the only useful ones, then the current notion that truth is divine and precious, and its pursuit a duty, could never have grown up or become a dogma. In a world like that, our duty would be to SHUN truth, rather. But in this world, just as certain foods are not only agreeable to our taste, but good for our teeth, our stomach and our tissues; so certain ideas are not only agreeable to think about, or agreeable as supporting other ideas that we are fond of, but they are also helpful in life's practical struggles. If there be any life that it is really better we should lead,

and if there be any idea which, if believed in, would help us to lead that life, then it would be really BETTER FOR US to believe in that idea, UNLESS, INDEED, BELIEF IN IT INCIDENTALLY CLASHED WITH OTHER GREATER VITAL BENEFITS.

你们触及了席勒先生、杜威先生和我自己的有关真理论的中心问题。我要到第六讲才会详细讨论。我现在就只说一点，真理是善的一种，而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与善不同，与善并列。任何从信仰上证明自己是善的，而且因为明确的、可指出的理由是善的东西，就叫做真理。你们肯定必须承认这一点，就是如果真的观念对生活没有任何好处，或者如果对真观念的认识确实没有好处，只有错误观念才有用，那么，目前认为真理神圣宝贵，追求真理是一种责任的观念，就永远不可能发展或成为一种信条。在那种世界里，我们的责任会是回避真理。但在这个世界里，正如有些食物不仅合我们口味，还会对我们的牙齿、胃和身体组织有好处一样；因此某些观点不仅想起来就愉快，或者因为支持我们喜欢的观点而让我们愉快，而且它们也在生活的实际斗争中对我们有帮助。如果确实有一种我们应该过的更好的生活，如果有一种观点，我们信了它，就会帮助我们过上那种生活，那么，我们确实最好去相信那种观点，除非对它的信仰有时会和其他更重大的利益起冲突。

“What would be better for us to believe”! This sounds very like a definition of truth. It comes very near to saying “what we OUGHT to believe”: and in THAT definition none of you would find any oddity. Ought we ever not to believe what it is BETTER FOR US to believe? And can we then keep the notion of what is better for us, and what is true for us, permanently apart?

“我们最好去相信的东西！”听起来非常像真理的定义。差不多就

是说“我们应该去相信的东西”：在这个定义里，你们谁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难道我们不应该去相信我们最好去相信的东西吗？对我们比较好的，对我们是真的，我们能把这两个概念永远分开吗？

Pragmatism says no, and I fully agree with her. Probably you also agree, so far as the abstract statement goes, but with a suspicion that if we practically did believe everything that made for good in our own personal lives, we should be found indulging all kinds of fancies about this world's affairs, and all kinds of sentimental superstitions about a world hereafter. Your suspicion here is undoubtedly well founded, and it is evident that something happens when you pass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that complicates the situation.

实用主义说不能。我完全同意。就抽象的说法而言，大概你们也同意。但你们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我们真去相信给我们生活带来好处的所有一切，我们就会沉溺于对世间万事的各种空想，沉溺于关于未来世界的各种伤感的迷信了。你们的怀疑，毫无疑问，是非常有根据的。而且，很明显，如果你从抽象到具体，就会出现一些使事态复杂的情况。

I said just now that what is better for us to believe is true UNLESS THE BELIEF INCIDENTALLY CLASHES WITH SOME OTHER VITAL BENEFIT. Now in real life what vital benefits is any particular belief of ours most liable to clash with? What indeed except the vital benefits yielded by OTHER BELIEFS when these prove incompatible with the first ones? In other words, the greatest enemy of any one of our truths may be the rest of our truths. Truths have once for all this desperate instinct of self-preservation and of

desire to extinguish whatever contradicts them. My belief in the Absolute, based on the good it does me, must run the gauntlet of all my other beliefs. Grant that it may be true in giving me a moral holiday. Nevertheless, as I conceive it,—and let me speak now confidentially, as it were, and merely in my own private person,—it clashes with other truths of mine whose benefits I hate to give up on its account. It happens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kind of logic of which I am the enemy, I find that it entangles me in metaphysical paradoxes that are inacceptable, etc., etc.. But as I have enough trouble in life already without adding the trouble of carrying these intellectual inconsistencies, I personally just give up the Absolute. I just TAKE my moral holidays; or else as a professional philosopher, I try to justify them by some other principle.

刚才，我说过，最好要去相信的观念就是真的，除非这种信仰有时与其他重大的利益有冲突。现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什么特别的信仰最容易和什么重大利益起冲突呢？如果这些信仰证明与其他信仰相互不容，除了其他信仰所产生的重大利益之外，还能有什么呢？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真理的最大敌人可能就是所有其他真理。真理永远都有这种不顾一切的本能和愿望，去自我保存，消灭任何与它相反的对立面。我相信绝对意志，因为它带给我好处，这信仰也必须受到我其他所有信仰的考验。假设一下，这信仰真的能给我道义上的休假。然而，就我所想——让我现在说几句私密的话，就只当是以个人身份——它和我的其他信仰是有冲突的，而我不愿意为了它去舍弃其他真理带给我的利益。它碰巧和我所反对的一种逻辑有关联，我发现它使我纠缠在不可接受的形而上学的自相矛盾中，等等，等等。但是，即使不给自己增加这些思维前后不一致的烦恼，我在生活中的烦恼就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个人只有放弃这个绝对意志。我只是让自己有道义上的休假；要不然，作为一个职业哲学家，我就试图用其他原理来证明它们的合理性。

If I could restrict my notion of the Absolute to its bare holiday-giving value, it wouldn't clash with my other truths. But we cannot easily thus restrict our hypotheses. They carry supernumerary features, and these it is that clash so. My disbelief in the Absolute means then disbelief in those other supernumerary features, for I fully believe in the legitimacy of taking moral holidays.

如果我认为绝对意志的价值就局限在它能给我带来假期，这不会与我的其他真理观有冲突。但是，我们不能如此轻易地限制我们的假设。它们有其他的特征，而正是这些特征产生冲突。我不相信绝对意志，就意味着我也不相信这些其他的特征，因为我完全相信在道义上休假是合理的。

You see by this what I meant when I called pragmatism a mediator and reconciler and said, borrowing the word from Papini, that he unstiffens our theories. She has in fact no prejudices whatever, no obstructive dogmas, no rigid canons of what shall count as proof. She is completely genial. She will entertain any hypothesis, she will consider any evidence. It follows that in the religious field she is at a great advantage both over positivistic empiricism, with its anti-theological bias, and over religious rationalism, with its exclusive interest in the remote, the noble, the simple, and the abstract in the way of conception.

这样你们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之前把实用主义叫做中介和调解者，我也说过，借用帕皮尼的话，实用主义让我们的理论变得灵活。事实上，实用主义没有任何偏见，没有任何教条障碍，没有任何刻板准则来决定什么可以算作证据。它完全是友善的。它愿意考虑任何假设，任何证据。因此，在宗教领域，它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它胜过实

证实证主义，因为后者有反神学偏见；它胜过宗教理性主义，因为后者感兴趣的只是概念的遥不可及、崇高、简单和抽象。

In short, she widens the field of search for God. Rationalism sticks to logic and the empyrean. Empiricism sticks to the external senses. Pragmatism is willing to take anything, to follow either logic or the senses, and to count the humblest and most personal experiences. She will count mystical experiences if they have practical consequences. She will take a God who lives in the very dirt of private fact—if that should seem a likely place to find him.

简而言之，它拓宽了寻找上帝的路径。理性主义坚持逻辑和苍穹。实证主义坚持各种外在感觉。而实用主义愿意接受任何事物，遵循逻辑或感觉，把最粗陋、最个人的经验都考虑进来。如果神秘经验有任何实际后果的话，实用主义也会加以考虑。它愿意承认那生活在污浊的私人事务里的上帝——如果那儿确实是能找到他的地方。

Her only test of probable truth is what works best in the way of leading us, what fits every part of life best and combines with the collectivity of experience's demands, nothing being omitted. If theological ideas should do this, if the notion of God, in particular, should prove to do it, how could pragmatism possibly deny God's existence? She could see no meaning in treating as “not true” a notion that was pragmatically so successful. What other kind of truth could there be, for her, than all this agreement with concrete reality?

它对可能真理的唯一测试，就是看什么能以最好的方式引领我

们，什么能最适合我们的全部生活，什么能与全部的经验所需结合得最好，而没有省略掉任何东西。如果神学思想这么认为，尤其是有关上帝的观念能证明是这样的话，实用主义如何可能去否认上帝的存在呢？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此成功的概念，如果把它当作“不真实的”，它会认为这种做法毫无意义。除了这种与具体现实的一致性，对它来说，还存在其他什么真理呢？

In my last lecture I shall return again to the relations of pragmatism with religion. But you see already how democratic she is. Her manners are as various and flexible, her resources as rich and endless, and her conclusions as friendly as those of mother nature.

在最后一讲里，我会再回到实用主义和宗教的关系问题上。但你们已经看到实用主义是多么民主。它和大自然母亲一样，有着多种灵活的方法，无限丰富的资源，以及平易近人的结论。

Lecture III Some Metaphysical Problems Pragmatically Considered

第三讲　从实用主义角度来思考几个形而上学问题

THE PROBLEM OF SUBSTANCE. THE EUCHARIST. BERKELEY's PRAGMATIC TREATMENT OF MATERIAL SUBSTANCE. LOCKE's OF PERSONAL IDENTITY. THE PROBLEM OF MATERIALISM. RATIONALISTIC TREATMENT OF IT. PRAGMATIC TREATMENT. “GOD” IS NO BETTER THAN “MATTER” AS A PRINCIPLE, UNLESS HE PROMISE MORE. PRAGMATIC COMPARISON OF THE TWO PRINCIPLES.THE PROBLEM OF DESIGN. “DESIGN” PER SE IS BARREN. THE QUESTION IS WHAT DESIGN. THE PROBLEM OF “FREE-WILL.” ITS RELATIONS TO “ACCOUNTABILITY.” FREE-WILL A COSMOLOGICAL THEORY. THE PRAGMATIC ISSUE AT STAKE IN ALL THESE PROBLEMS IS WHAT DO THE ALTERNATIVES PROMISE.

实体的问题。圣餐。贝克莱对物质实体进行的实用主义思考。洛克对个人身份同一性进行的思考。唯物主义的问题。理性主义的思考。实用主义的思考。就原则而言，“上帝”和“物质”一样，除非上帝给人带来更多希望。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对两种原则进行对比。设计论的问题。“设计论”本身是空洞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由意志”的问题。它与“义务”的关系。自由意志作为一种宇宙哲学理论。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实用主义关心的是其他论点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希望。

I am now to make the pragmatic method more familiar by giving you some illustrations of its application to particular

problems. I will begin with what is driest, and the first thing I shall take will be the problem of Substance. Everyone uses the old distinction between substance and attribute, enshrined as it is in the very structure of human language, 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ammatical subject and predicate. Here is a bit of blackboard crayon. Its modes, attributes, properties, accidents, or affections,—use which term you will,—are whiteness, friability, cylindrical shape, insolubility in water, etc., etc. But the bearer of these attributes is so much chalk, which thereupon is called the substance in which they inhere. So the attributes of this desk inhere in the substance "wood," those of my coat in the substance "wool," and so forth. Chalk, wood and wool, show again, in spite of their differences, common properties, and in so far forth they are themselves counted as modes of a still more primal substance, matter, the attributes of which are space occupancy and impenetrability. Similarly our thoughts and feelings are affections or properties of our several souls, which are substances, but again not wholly in their own right, for they are modes of the still deeper substance "spirit."

我现在要给大家讲几例实用主义在具体问题中的应用，让大家对这个方法更熟悉。开始是最枯燥的部分，我首先要讲实体的问题。每个人都采用了实体与属性之间的传统区分方法。这种区分深藏于人类语言的结构中，也存在于语法上主语和谓语的差异中。这是一只粉笔，可以在黑板上书写。它的形态，属性，特征，偶然性或性质——不管你用哪一个术语——比如白色，易碎，圆柱形，水溶性，等等，等等。但这些属性的载体就是这么一根白垩，白垩就是包含这些属性的实体。这张桌子，包含其属性的实体是"木头"；我穿的大衣，包含其属性的实体是"羊毛"，如此类推。白垩，木头和羊毛，尽管它们有区别，但有一些共同属性。它们本身都被当作是一种能够更为本质的实体——物质——的几种形态，其属性就是空间占有性与封闭性。同

样，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是我们各个灵魂的性质或属性，灵魂也是实体，但又不能算完全独立的实体，因为它们是更为深奥的实体“精神”的形式。

Now it was very early seen that all we know of the chalk is the whiteness, friability, etc., all WE KNOW of the wood is the combustibility and fibrous structure. A group of attributes is what each substance here is known-as, they form its sole cash-value for our actual experience. The substance is in every case revealed through THEM; if we were cut off from THEM we should never suspect its existence; and if God should keep sending them to us in an unchanged order, miraculously annihilating at a certain moment the substance that supported them, we never could detect the moment, for our experiences themselves would be unaltered. Nominalists accordingly adopt the opinion that substance is a spurious idea due to our inveterate human trick of turning names into things.

我们早就明白，白垩的特性是白色、易碎等，我们也都知道，木头易燃，是纤维结构。一系列属性就是这里我们所了解的实体，这些属性形成了我们实际经验中该实体的唯一现金价值。实体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通过这些属性得以显示；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些属性，就永远不会想到实体的存在；如果上帝以不变的顺序把这些属性不断传递给我们，在某一瞬间又神奇地将支撑这些属性的实体消灭，我们就永远也不会察觉到那一瞬间，因为我们的经验本身没有改变。唯名论者因此持有的观点是，因为我们人类根深蒂固的习惯是将名称变成实物，所以实体是一个伪概念。

Phenomena come in groups—the chalk-group, the wood-group,

etc.—and each group gets its name. The name we then treat as in a way supporting the group of phenomena. The low thermometer today, for instance, is supposed to come from something called the "climate." Climate is really only the name for a certain group of days, but it is treated as if it lay BEHIND the day, and in general we place the name, as if it were a being, behind the facts it is the name of. But the phenomenal properties of things, nominalists say, surely do not really inhere in names, and if not in names then they do not inhere in anything. They ADhere, or COhere, rather,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notion of a substance inaccessible to us, which we think accounts for such cohesion by supporting it, as cement might support pieces of mosaic, must be abandoned. The fact of the bare cohesion itself is all that the notion of the substance signifies. Behind that fact is nothing.

现象是分类出现的——白垩类，木头类等，每一类现象都有自己的名称。于是我们认为一个名称某种程度上是支持某一类现象的。比如，今天气温计上显示的温度低，我们就认为是因为一种叫做"气候"的东西。气候实际上只是一组天气的名称，但人们似乎认为天气的后面存在气候。一般而言，我们把名称当成实物，将它放在这个名称所指的事实后面。但是唯名论者说，事物的现象属性，肯定不是名称所固有的，而如果这些属性不是名称所固有的，那它们就不是任何事物所固有的。相反，它们互相依附，相互结合。必须放弃这种观点，即认为存在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实体，这个实体在我们看来能有助于事物属性之间的结合，就像水泥可以粘合一块块马赛克砖一样。仅仅结合本身的这一事实就是实体所指的全部意义。事实背后什么都没有。

Scholasticism has taken the notion of substance from common sense and made it very technical and articulate. Few things would

seem to have fewer pragmatic consequences for us than substances, cut off as we are from every contact with them. Yet in one case scholasticism has prov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ubstance-idea by treating it pragmatically. I refer to certain disputes about the mystery of the Eucharist. Substance here would appear to have momentous pragmatic value. Since the accidents of the wafer don't change in the Lord's supper, and yet it has become the very body of Christ, it must be that the change is in the substance solely. The bread-substance must have been withdrawn, and the divine substance substituted miraculously without altering the immediate sensible properties. But tho these don't alter, a tremendous difference has been made, no less a one than this, that we who take the sacrament, now feed upon the very substance of divinity. The substance-notion breaks into life, then, with tremendous effect, if once you allow that substances can separate from their accidents, and exchange these latter.

经院哲学派从常识中提取了实体的概念，把它变得非常技术化，很清晰。因为我们与实体没有任何接触，所以，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比实体看起来更缺少实用效果了。但经院哲学有一次却用实用主义的办法证明了实体概念的重要性。我指的是有关圣餐之谜的几种争论。实体在这里似乎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既然上帝的晚餐中，圣饼的偶然性没有发生变化，但圣饼却又已转变为基督的肉身，那么就可以肯定，变化就只存在于实体中。面饼实体一定是被取出了，神圣实体奇迹般地取而代之，而未改变其直接可感知的属性。虽然这些属性没变，但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没有什么差别比这个差别更大了，那就是我们这些接受圣餐的人，现在吃的正是神圣的实体。一旦你同意实体可以与自身的偶然性分离，并与这些偶然性交换，实体概念就闯入了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This is the only pragmatic application of the substance-idea with which I am acquainted; and it is obvious that it will only be treated seriously by those who already believe in the “real presence” on independent grounds.

这是我所熟悉的实体——概念唯一一次实用主义的应用；很明显，只有那些因为种种不同的原因已经相信“真在论”的人才会严肃对待它。

MATERIAL SUBSTANCE was criticized by Berkeley with such telling effect that his name has reverberated through all subsequent philosophy. Berkeley's treatment of the notion of matter is so well known as to need hardly more than a mention. So far from denying the external world which we know, Berkeley corroborated it. It was the scholastic notion of a material substance unapproachable by us, BEHIND the external world, deeper and more real than it, and needed to support it, which Berkeley maintained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of all reducers of the external world to unreality. Abolish that substance, he said, believe that God, whom you can understand and approach, sends you the sensible world directly, and you confirm the latter and back it up by his divine authority. Berkeley's criticism of 'matter' was consequently absolutely pragmatistic. Matter is known as our sensations of colour, figure, hardness and the like. They are the cash-value of the term. The difference matter makes to us by truly being is that we then get such sensations; by not being, is that we lack them. These sensations then are its sole meaning. Berkeley doesn't deny matter, then; he simply tells us what it consists of. It is a true name for just so much in the way of sensations.

贝克莱对物质实体的批判影响巨大，所以他的名字在随后所有的哲学学说中如雷贯耳。贝克莱对物质概念的看法，众所周知，无需多说。对我们所知道的外部世界，他远没有否认，反而确证了它。经院哲学的观点是，物质实体是我们无从接近的，是隐藏在外部世界之后的，比外部世界更深奥，更真实，外部世界需要它的支持。贝克莱一直坚持认为，物质实体是把外部世界归结为非现实的所有方法中最有效的一种。他说，废除实体，相信上帝，上帝可以理解，可以接近，可以直接给你能够感知的世界。而你证实这个世界，并利用上帝的神圣权威来支持世界。贝克莱对“物质”的批判因此绝对是实用主义的。物质是我们对颜色、形状、硬度等的感觉。这些感觉是这个术语的价值。物质给我们带来的不同是：它们真实存在，我们就有这些感觉；它们不存在，我们就缺少这些感觉。这些感觉因此就是它的唯一意义。所以，贝克莱并没有否认物质；他只是告诉我们物质是由什么构成的。它就是我们所能感觉到的全部东西的真实名称。

Locke, and later Hume, applied a similar pragmatic criticism to the notion of SPIRITUAL SUBSTANCE. I will only mention Locke's treatment of our “personal identity.” He immediately reduces this notion to its pragmatic value in terms of experience. It means, he says, so much “consciousness,” namely the fact that at one moment of life we remember other moments, and feel them all as parts of one and the same personal history. Rationalism had explained this practical continuity in our life by the unity of our soul-substance. But Locke says: suppose that God should take away the consciousness, should WE be any the better for having still the soul-principle? Suppose he annexed the same consciousness to different souls, should we, as WE realize OURSELVES, be any the worse for that fact? In Locke's day the soul was chiefly a thing to be rewarded or punished. See how Locke, discussing i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keeps the question pragmatic:

洛克，以及后来的休谟，在精神实体的概念上，使用了类似的实用主义批评方法。我就只提一下洛克对我们“个人身份”的看法。他直接就用经验的形式把这个概念归结到它的实用主义价值上。他说，它指的就是这样的“意识”，也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在生命中的某一刻会想起其他时刻，感到它们都是同一个人全部历史的各个组成部分。理性主义曾经通过我们灵魂实体的一致性来解释我们生活中的这种连续性。但洛克说：假设上帝把意识拿走，我们会不会因为还有灵魂原则而可能更好呢？假设他把同样的意识附加到各种不同的灵魂上，我们应不应该在意识自己的时候变得更糟糕呢？在洛克那个时代，灵魂主要是一种需要奖赏或惩罚的东西。看看洛克从这个角度进行的讨论，如何将问题变得很实用主义：

Suppose, he says, one to think himself to be the same soul that once was Nestor or Thersites. Can he think their actions his own any more than the actions of any other man that ever existed? But let him once find himself CONSCIOUS of any of the actions of Nestor, he then finds himself the same person with Nestor…. In this personal identity is founded all the right and justice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It may be reasonable to think, no one shall be made to answer for what he knows nothing of, but shall receive his doom, his consciousness accusing or excusing. Supposing a man punished now for what he had done in another life, whereof he could be made to have no consciousness at all, what difference is there between that punishment and being created miserable?

他说，假设一个人认为自己的灵魂就是从前涅斯托耳或瑟赛蒂兹的同一个灵魂。他可以把他们的行为想象成是他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任何曾经存在过的其他人的行为吗？但是，假设他一旦发现自己意识到了涅斯托耳的任何行为，他就发现自己和涅斯托耳是同一个人了……所有的赏罚，其正当性和公平性都是建立在这种个人身份的同

一性上。也许可以有理由认为，谁也不应该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负责，但不管他的意识是责备他还是原谅他，他都必须接受自己的命运。假设一个人现在由于他世所做的事而受到惩罚，但可以让他对此一无所知，那么这种惩罚和生来受苦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Our personal identity, then, consists, for Locke, solely in pragmatically definable particulars. Whether, apart from these verifiable facts, it also inheres in a spiritual principle, is a merely curious speculation. Locke, compromiser that he was, passively tolerated the belief in a substantial soul behind our consciousness. But his successor Hume, and most empirical psychologists after him, have denied the soul, save as the name for verifiable cohesions in our inner life. They redescend into the stream of experience with it, and cash it into so much small-change value in the way of “ideas” and their peculiar connexions with each other. As I said of Berkeley's matter, the soul is good or “true” for just SO MUCH, but no more.

因此，对洛克来说，我们的个人身份同一性只包含在可以用实用主义来定义的特定事物中。除去这些可以证明的事实，它是否还存在于某种精神原理中还只是一个让人好奇的猜测。他被动地接受了在我们的意识后面隐藏着某种实体性灵魂的观点。但他的继承者休谟以及他之后的大多数实证心理学家都否认灵魂，只是把灵魂当作我们内在精神生活里可以证明的种种内聚力。他们带着它再次降临到经验之流中去，将它兑换成很多价值较小的“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之前提过贝克莱对物质的看法，灵魂只在这种程度上是好的或者是“真的”，别无其他。

The mention of material substance naturally suggests the

doctrine of “materialism,” but philosophical materialism is not necessarily knit up with belief in “matter,” as a metaphysical principle. One may deny matter in that sense, as strongly as Berkeley did, one may be a phenomenalist like Huxley, and yet one may still be a materialist in the wider sense, of explaining higher phenomena by lower ones, and leaving the destinies of the world at the mercy of its blinder parts and forces. It is in this wider sense of the word that materialism is opposed to spiritualism or theism. The laws of physical nature are what run things, materialism says. The highest productions of human genius might be ciphered by one who had complete acquaintance with the facts, out of their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regardless whether nature be there only for our minds, as idealists contend, or not. Our minds in any case would have to record the kind of nature it is, and write it down as operating through blind laws of physics. This is the complexion of present day materialism, which may better be called naturalism. Over against it stands “theism,” or what in a wide sense may be termed “spiritualism.” Spiritualism says that mind not only witnesses and records things, but also runs and operates them: the world being thus guided, not by its lower, but by its higher element.

提到物质实体，很自然就让人联想到“唯物主义”的观点，但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原则并不一定要与对“物质”的信仰联系起来。一个人可以像贝克莱那样，坚决否认这种意义上的物质，也可以像赫胥黎一样，成为一个现象主义者，但一个人还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一个唯物者，用较低的现象来解释较高的现象，让世界的命运由更加未知的部分与力量来支配。正是在这个词更广泛的意义上，唯物主义与唯心论或有神论是相反的。唯物主义认为，自然规律支配万物。人类天才的最高成就，可以由一个完全熟知相关事实的人根据他们的生理状况来推算，不管自然是否像唯心主义者坚持的那样，只是为我们的思维而存在。我们的思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不记

载自然的真实状况，而且记录的是按照未知的自然规律运行的状况。这就是目前唯物主义的情况，把它叫做自然主义可能会更好。与其对立的是“有神论”，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叫做“唯心论”。唯心论认为，思维不仅能够目睹和记录事物，还能支配和运行事物：因此导引世界的，不是它的较低元素，而是它的较高元素。

Treated as it often is, this question becomes little more than a conflict between aesthetic preferences. Matter is gross, coarse, crass, muddy; spirit is pure, elevated, noble; and since it is more consonant with the dignity of the universe to give the primacy in it to what appears superior, spirit must be affirmed as the ruling principle. To treat abstract principles as finalities, before which our intellects may come to rest in a state of admiring contemplation, is the great rationalist failing. Spiritualism, as often held, may be simply a state of admiration for one kind, and of dislike for another kind, of abstraction. I remember a worthy spiritualist professor who always referred to materialism as the “mud-philosophy,” and deemed it thereby refuted.

虽然这个问题经常被这样看待，但其实已经变成了各种审美偏好之间的冲突而已。物质是低劣、粗俗、愚笨和混沌的；精神是纯洁、高尚和尊贵的；既然将似乎更高尚的东西放在宇宙的首位更符合宇宙的尊严，就必须确定精神是主导原则。把抽象原则当作最终定论，认为我们的理智可以止步于对定论的欣赏、沉思上，这是理性主义者的一大缺点。唯心论，正如人们一般看来的那样，只是对一种抽象事物的欣赏，对另一种抽象事物的厌恶而已。我记得一个著名的唯心论教授，他总是把唯物主义叫做“泥浆哲学”，认为它已经因此而被驳倒了。

To such spiritualism as this there is an easy answer, and Mr. Spencer makes it effectively. In some well-written pages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volume of his Psychology he shows us that a “matter” so infinitely subtle, and performing motions as inconceivably quick and fine as those which modern science postulates in her explanations, has no trace of grossness left. He shows that the conception of spirit, as we mortals hitherto have framed it, is itself too gross to cover the exquisite tenuity of nature's facts. Both terms, he says, are but symbols, pointing to that one unknowable reality in which their oppositions cease.

对这样的唯心论来说，只有一个轻而易举的答案，斯宾塞先生表达的很有效果。在他的《心理学》第一卷最后写得很精彩的几页里，他让我们看到“物质”是无比的微妙，正像现代科学对运动的解释所指出的一样，物质的运动是难以想象地快速和精细，没有留下一点粗糙的痕迹。他指出，我们人类迄今所形成的精神概念，本身太粗糙，不能涵盖自然事实的无比细微之处。他说，两个术语都不过是符号，指向一个不可知的现实。在这不可知的现实之中，它们之间的对立不复存在。

To an abstract objection an abstract rejoinder suffices; and so far as one's opposition to materialism springs from one's disdain of matter as something “crass,” Mr. Spencer cuts the ground from under one. Matter is indeed infinitely and incredibly refined. To anyone who has ever looked on the face of a dead child or parent the mere fact that matter COULD have taken for a time that precious form, ought to make matter sacred ever after.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at the PRINCIPLE of life may be, material or immaterial, matter at any rate co-operates, lends itself to all life's purposes. That beloved incarnation was among matter's

possibilities.

对于抽象的反对意见，抽象的答复就足够了；但如果一个人反对唯物主义的原因来自于对物质的蔑视，认为物质是“粗糙的”，那斯宾塞就让他站不住脚了。物质是确确实实无限的和令人不可思议地精致的。一个人，只要他看过已去世的孩子或父母的脸，看到物质可以在某一段时间以那种珍贵的形式出现，这一简单事实就应该使物质从此变得神圣。生命的原理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没有区别，不管怎样，物质总是尽力配合生命的各种目的。那心爱的化身是物质的种种可能性之一。

But now, instead of resting in principles after this stagnant intellectualist fashion, let us apply the pragmatic method to the question. What do we MEAN by matter? What practical difference can it make NOW that the world should be run by matter or by spirit? I think we find that the problem takes with this a rather different character.

现在，让我们不再以这种停滞不前的理智主义方式，停留在原理之中，让我们运用实用主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所说的物质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世界由物质或精神支配，这个问题会带来什么实际的差别呢？我想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具有一个相当不同的性质。

And first of all I call your attention to a curious fact. It makes not a single jot of difference so far as the PAST of the world goes, whether we deem it to have been the work of matter or whether we think a divine spirit was its author.

首先我请大家注意一个奇怪的事实。就过往的世界而言，不管我们认为这世界是物质的作品，还是一个神圣精神的作品，都没有任何区别。

Imagine, in fact, the entire contents of the world to be once for all irrevocably given. Imagine it to end this very moment, and to have no future; and then let a theist and a materialist apply their rival explanations to its history. The theist shows how a God made it; the materialist shows, and we will suppose with equal success, how it resulted from blind physical forces. Then let the pragmatist be asked to choose between their theories. How can he apply his test if the world is already completed? Concepts for him are things to come back into experience with, things to make us look for differences. But by hypothesis there is to be no more experience and no possible differences can now be looked for. Both theories have shown all their consequences and, by the hypothesis we are adopting, these are identical. The pragmatist must consequently say that the two theories, in spite of their different-sounding names, mean exactly the same thing, and that the dispute is purely verbal. (I am opposing, of course, that the theories HAVE been equally successful in their explanations of what is.)

事实上，想象一下，世界的全部内容都是一次性给出的，再也不能推翻。设想世界就在此时此刻终结，再也没有未来；然后让一个有神论者和一个唯物主义者把他们相互对立的解释应用到对历史的说明上。有神论者说明上帝是如何创造世界的；唯物主义者也会同样成功地说明世界是盲目的自然力量造就的。然后让实用主义者从这两个理论中做选择。如果世界已经被创造出来，他如何进行测试呢？对他来说，概念是用来回归经验的东西，是让我们寻找差异的东西。但是根据设想，不再有什么经验了，现在找不到什么可能的差异了。两种理

论都说明了它们的所有后果，根据我们采取的假设，它们是一样的。因此，实用主义者必须指出，两种理论尽管名字听起来不同，其实完全是一回事，争论纯粹是字面上的。（当然，我不认为这两种理论都已经同样成功地对世界做出了说明。）

For just consider the case sincerely, and say what would be the WORTH of a God if he WERE there, with his work accomplished and his world run down. He would be worth no more than just that world was worth. To that amount of result, with its mixed merits and defects, his creative power could attain, but go no farther. And since there is to be no future; since the whole value and meaning of the world has been already paid in and actualized in the feelings that went with it in the passing, and now go with it in the ending; since it draws no supplemental significance (such as our real world draws) from its function of preparing something yet to come; why then, by it we take God's measure, as it were. He is the Being who could once for all do THAT; and for that much we are thankful to him, but for nothing more. But now, on the contrary hypothesis, namely, that the bits of matter following their laws could make that world and do no less, should we not be just as thankful to them? Wherein should we suffer loss, then, if we dropped God as an hypothesis and made the matter alone responsible? Where would any special deadness, or crassness, come in? And how, experience being what is once for all, would God's presence in it make it any more living or richer?

只要认真想一想这种情况，并指出如果存在上帝，他的作品已经完成，但他的世界却终结了，那么，上帝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他的价值不会比那个世界的价值高。他的创造力只能获得那么多成果，优点与缺点共存，但不会有再多成就了。既然没有未来，既然世界的全部

价值和意义都已经在情感中实现了，并且这种情感在其过往中得到付出和实现，现在又伴随着它的结束；既然它没有从为将来做准备的功能中得到任何有意义的补充（就像我们从现实世界中获得补充），那么，我们为什么用它的尺度来衡量上帝。上帝是能够一次性完成那么多创造的主。我们感谢上帝也是因为他有那么多的创作，别无其他。但是现在，相反的假设是，如果点滴物质按照它们自己的规律也能创造出这个世界，并且一点也不少，我们难道不应该一样对它们表示感谢吗？如果我们假设没有上帝，而只有物质单独负责创造世界，会在什么地方遭受损失呢？会在什么地方出现特别的死寂或粗劣呢？既然经验一旦出现就一成不变，那么上帝在经验之中的存在又如何会让它更有生气或者更为丰富呢？

Candidly, it is impossible to give any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The actually experienced world is supposed to be the same in its details on either hypothesis, “the same, for our praise or blame,” as Browning says. It stands there indefeasibly: a gift which can't be taken back. Calling matter the cause of it retracts no single one of the items that have made it up, nor does calling God the cause augment them. They are the God or the atoms, respectively, of just that and no other world. The God, if there, has been doing just what atoms could do—appearing in the character of atoms, so to speak—and earning such gratitude as is due to atoms, and no more. If his presence lends no different turn or issue to the performance, it surely can lend it no increase of dignity. Nor would indignity come to it were he absent, and did the atoms remain the only actors on the stage. When a play is once over, and the curtain down, you really make it no better by claiming an illustrious genius for its author, just as you make it no worse by calling him a common hack.

坦率地讲，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不管哪种假设成立，真实经历的世界应该在细节上是一样的。正如布朗宁所说："我们称赞也好，我们责备也好，都一样。"世界就那样，无法废止：一件不能收回的礼物。把物质说成是世界的原因，不会使构成世界的任何成分减少；把上帝说成是世界的原因，也不会使世界的那些成分增加。它们分别就是那个世界的上帝或原子，而不是别的世界。上帝如果存在，他所做的，也和原子能做的一样——可以说，以原子的特征出现——得到的感谢也和原子得到的一样，别无其他。如果他的存在不能使世界表现出什么不同的转变或结果，那肯定他的存在也不能给世界增加任何尊严。如果他不存在，而原子是舞台上唯一的演员，也不会增加任何尊严。戏终幕落，你再说剧作家是个杰出的天才，不会使这出戏变得更好，你说这个剧作家只是个普通的枪手，也不会使戏变得更糟。

Thus if no future detail of experience or conduct is to be deduced from our hypothesis, the debate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theism becomes quite idle and insignificant. Matter and God in that event mean exactly the same thing—the power, namely,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t could make just this completed world—and the wise man is he who in such a case would turn his back on such a supererogatory discussion. Accordingly, most men instinctively, and positivists and scientists deliberately, do turn their backs on philosophical disputes from which nothing in the line of definite future consequences can be seen to follow. The verbal and empty character of philosophy is surely a reproach with which we are, but too familiar. If pragmatism be true, it is a perfectly sound reproach unless the theories under fire can be shown to have alternative practical outcomes, however delicate and distant these may be. The common man and the scientist say they discover no such outcomes, and if the metaphysician can discern none either, the others certainly are in the right of it, as against him. His science is then

but pompous trifling; and the endowment of a professorship for such a being would be silly.

因此，如果我们的假设不能让我们得出更多未来经验或行为的细节，唯物主义和有神论之间的辩论就变得很无聊和无关紧要了。在这件事上，物质与上帝甚至是一回事——不多不少，都是刚好能使这个世界创造出来的力量。对这种多余争论转身离去的人是聪明人。因此，对于那些将不能得出任何明确结论的哲学论争，大多数人会本能地转身离去，而实证主义者和科学家会有意避开。哲学因为字面性和空洞性而受到的指责，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如果实用主义为真，这种指责是完全合理的，除非可以证明那些受攻击的理论有其他的实用结果，而不管这些结果有多么精妙遥远。普通人和科学家说他们找不到任何这样的结果，如果形而上学者也找不到这样的结果，那么，那些反对他的人，肯定是对的。他的科学不过是华而不实的琐碎，为这样一个人授予教授职位，是愚蠢的。

Accordingly, in every genuine metaphysical debate some practical issue, however conjectural and remote, is involved. To realize this, revert with me to our question, and place yourselves this time in the world we live in, in the world that HAS a future, that is yet uncompleted whilst we speak. In this unfinished world the alternative of “materialism or theism?” is intensely practical; and it is worth while for us to spend some minutes of our hour in seeing that it is so.

因此，每一个真正形而上学的辩论一定会涉及某个实际的问题，不管它是想象的，还是遥远的。要认识这一点，就跟我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这一次，把你自己放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这个世界有未来，在我们说话时，还没有终结。在这个未终结的世界里，“唯物

主义还是有神论”的取舍是个十分实际的问题；值得我们花上几分钟，来看看是不是这样。

How, indeed, does the program differ for us, according as we consider that the facts of experience up to date are purposeless configurations of blind atoms moving according to eternal laws, or tha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re due to the providence of God? As far as the past facts go, indeed there is no difference. Those facts are in, are bagged, are captured; and the good that's in them is gained, be the atoms or be the God their cause. There are accordingly many materialists about us today who, ignoring altogether the future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the question, seek to eliminate the odium attaching to the word materialism, and even to eliminate the word itself, by showing that, if matter could give birth to all these gains, why then matter, functionally considered, is just as divine an entity as God, in fact coalesces with God, is what you mean by God. Cease, these persons advise us, to use either of these terms, with their outgrown opposition. Use a term free of the clerical connotations, on the one hand; of the suggestion of grossness, coarseness, ignobility, on the other. Talk of the primal mystery, of the unknowable energy, of the one and only power, instead of saying either God or matter. This is the course to which Mr. Spencer urges us; and if philosophy were purely retrospective, he would thereby proclaim himself an excellent pragmatist.

如果我们认为至今为止，经验的各种事实都是由按照永恒定律运动的原子盲目随意组合而成，或者相反认为它们是按照上帝的意愿形成的，那么，事实上选择“唯物主义还是有神论”对我们而言会有什么区别吗？就过去的事实而言，确实没有任何区别。那些事实涌现出来，装起来，抓住了；里面的善也得到了，不管它们是源于原子运动

还是上帝。因此，今天我们周围有许多唯物主义者，完全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未来和实际层面，却试图消除人们对唯物主义一词的厌恶，甚至想把这个词都消除掉。他们指出，如果物质能带来所有这些收获，那么，从功能上考虑，物质为什么只是和上帝一样神圣的实体，事实上，他们合二为一，就是人们所称的上帝。他们这些人建议，不要再用这两个过时的对立术语了。一方面，用一个没有宗教含义的术语；另一方面，用一个没有粗糙、低俗与不雅含义的词。不要说上帝，也不要说物质，就谈谈原始之谜，未知的能量，唯一的力量吧。这是斯宾塞督促我们要走的路；如果哲学完全是回顾性的，他会因此而宣称自己为杰出的实用主义者。

But philosophy is prospective also, and, after finding what the world has been and done and yielded, still asks the further question “what does the world PROMISE?” Give us a matter that promises SUCCESS, that is bound by its laws to lead our world ever nearer to perfection, and any rational man will worship that matter as readily as Mr. Spencer worships his own so-called unknowable power. It not only has made for righteousness up to date, but it will make for righteousness forever; and that is all we need. Doing practically all that a God can do, it is equivalent to God, its function is a God's function, and is exerted in a world in which a God would now be superfluous; from such a world a God could never lawfully be missed. “Cosmic emotion” would here be the right name for religion.

但哲学也是前瞻性的。它发现了世界是什么，做了什么，产出了什么，之后，它还要追问：“世界还能带来什么？”给我们一种能带来成功的物质，它受自身规律的约束，引导我们的世界更进一步接近完美，那么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乐意崇拜那物质，都会像斯宾塞先生崇拜他自己的所谓未知力量一样。它至今为止促进了正义，将来还会

永远促进正义，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上帝能做的，它实际上都能做，它就等于上帝，它的功能和上帝一样，在它施展功能的世界里，上帝现在是多余的；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上帝也永远不会感到不合规律。这里，“宇宙的情绪”应该是宗教的正当名称。

But is the matter by which Mr. Spencer's process of cosmic evolution is carried on any such principle of never-ending perfection as this? Indeed it is not, for the future end of every cosmically evolved thing or system of things is foretold by science to be death and tragedy; and Mr. Spencer, in confining himself to the aesthetic and ignoring the practical side of the controversy, has really contributed nothing serious to its relief. But apply now our principle of practical results, and see what a vital significance the question of materialism or theism immediately acquires.

但是，体现斯宾塞先生宇宙进化过程的物质，是否就是这种永不终止的完善过程的原则呢？事实上，不是的。因为按照科学预言，每个宇宙进化的事物或事物的系统，其未来的结局都是死亡和悲剧；斯宾塞先生在争论中把自己局限在美学上，忽略了实际的一面，对解决争论并没有做出什么大的贡献。但是，现在运用我们实际效果的原则来看看唯物主义或有神论的问题立即会得到多么重大的意义。

Theism and materialism, so indifferent when taken retrospectively, point, when we take them prospectively, to wholly different outlooks of experience. For,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mechanical evolution, the laws of redistribution of matter and motion, tho they are certainly to thank for all the good hours which our organisms have ever yielded us and for all the ideals which our minds now frame, are yet fatally certain to undo their work again,

and to redissolve everything that they have once evolved. You all know the picture of the last state of the universe which evolutionary science foresees. I cannot state it better than in Mr. Balfour's words: “The energies of our system will decay, the glory of the sun will be dimmed, and the earth, tideless and inert, will no longer tolerate the race which has for a moment disturbed its solitude. Man will go down into the pit, and all his thoughts will perish. The uneasy, consciousness which in this obscure corner has for a brief space broken the contented silence of the universe, will be at rest. Matter will know itself no longer. 'Imperishable monuments' and 'immortal deeds,' death itself, and love stronger than death, will be as though they had never been. Nor will anything that is, be better or be worse for all that the labour, genius, devotion, and suffering of man have striven through countless generations to effect.” (The Foundations of Belief, p. 30.)

如果回头看，有神论和唯物主义实在无关紧要，如果往前看，它们指向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经验前景。因为，根据机械进化理论，尽管我们需要因为我们的有机体所带给我们的好时光以及我们头脑所能形成的所有理想而一定要感谢物质和运动的再分配规律，但是这些规律注定要再一次废除它们的劳动，再次分解已经演变成功的所有事物。你们都知道进化科学所预测的宇宙末日景象。贝尔福先生比我说得好。他说：“我们系统的各种能量将会衰退，太阳光芒要暗淡，没有潮汐、没有活动的地球会不再容忍这种一度打搅它寂静运行的人类。人类将会掉入深渊，其全部思想将毁灭。不安宁的思想，在这隐秘的角落里，曾经一度打乱宇宙所满足的沉静。这种意识也将平息下来。物质将不再了解自己。‘不朽的纪念碑’和‘不朽的事迹’，死亡本身和比死亡更强大的爱，都会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人类世世代代通过勤劳、智慧、奉献与艰辛，努力奋斗实现的所有东西，不管好坏，也都好像没有存在过一样。”（《信仰的基础》，第30页。）

That is the sting of it, that in the vast driftings of the cosmic weather, tho many a jeweled shore appears, and many an enchanted cloud-bank floats away, long lingering ere it be dissolved—even as our world now lingers, for our joy-yet when these transient products are gone,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remains, of represent those particular qualities, those elements of preciousness which they may have enshrined. Dead and gone are they, gone utterly from the very sphere and room of being. Without an echo; without a memory; without an influence on aught that may come after, to make it care for similar ideals. This utter final wreck and tragedy is of the essence of scientific materialism as at present understood. The lower and not the higher forces are the eternal forces, or the last surviving forces within the only cycle of evolution which we can definitely see. Mr. Spencer believes this as much as anyone; so why should he argue with us as if we were making silly aesthetic objections to the "grossness" of "matter and motion," the principles of his philosophy, when what really dismays us is the disconsolateness of its ulterior practical results?

这就是让人痛苦的地方，在宇宙风云漫无边际的动荡中，虽然出现了许多镶有珠宝的海岸，飘过了许多迷人的云端，它们逗留许久，然后散去，正如我们享乐的世界现在停留着一样，一旦这些短暂的东西消失，就绝对留不下任何东西来表示它们的特质和所可能铭记的那些珍贵元素。它们死了，消失了，从所存在的空间和范围里彻底离开了。没有回声，没有记忆，对后来可能出现的任何事物没有任何影响，以使其能关注类似的理想。这种彻底最终的毁灭和悲剧，就是当今人们所理解的科学唯物主义的实质。较低的力量，而不是较高的力量，才是永恒的力量，或者是我们能确切看到的唯一进化周期里最后存活下来的力量。和大家一样，斯宾塞先生也相信这一点；那他为什么还要跟我们争论呢？就好像我们对他的哲学原则“物质和运动”的“粗糙”所提出的都是愚蠢的美学上的反对意见，其实，真正让我们感到

不安的是它最终的实际效果让人郁闷。

No the true objection to materialism is not positive but negative. It would be farcical at this day to make complaint of it for what it IS, for “grossness.” Grossness is what grossness DOES—we now know THAT. We make complaint of it, on the contrary, for what it is NOT—not a permanent warrant for our more ideal interests, not a fulfiller of our remotest hopes.

其实不然，真正反对唯物主义的理由，不是正面的，而是负面的。今天，如果我们因为知道它是什么和它的“粗糙”而抱怨它，就会很滑稽。粗糙就是粗糙的所作所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一点。相反，我们抱怨的是它不是什么——它不是我们更为理想的利益的永久保障，也不能实现我们最遥远的希望。

The notion of God,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inferior it may be in clearness to those mathematical notions so current in mechanical philosophy, has at least this practical superiority over them, that it guarantees an ideal order that shall be permanently preserved. A world with a God in it to say the last word, may indeed burn up or freeze, but we then think of him as still mindful of the old ideals and sure to bring them elsewhere to fruition; so that, where he is, tragedy is only provisional and partial, and shipwreck and dissolution not the absolutely final things. This need of an eternal moral order is one of the deepest needs of our breast. And those poets, like Dante and Wordsworth, who live on the conviction of such an order, owe to that fact the extraordinary tonic and consoling power of their verse. Here then, in these different emotional and practical appeals, in these adjustments of our

concrete attitudes of hope and expectation, and all the delicate consequences which their differences entail, lie the real meanings of materialism and spiritualism—not in hair-splitting abstractions about matter's inner essence, or about the metaphysical attributes of God. Materialism means simply the denial that the moral order is eternal, and the cutting off of ultimate hopes; spiritualism means the affirmation of an eternal moral order and the letting loose of hope. Surely here is an issue genuine enough, for anyone who feels it; and, as long as men are men, it will yield matter for a serious philosophic debate.

另一方面，上帝的概念，尽管不如机械哲学中现在流行的数学概念那么清晰，但至少拥有这样一个实际的优势，那就是它会确保一个理想的秩序得以永久保存下去。一个有上帝来说出最后话语的世界，的确可能会烧毁或冻结，但是我们认为他还会记得原有的理想，肯定会在别的地方让理想实现；因此，他的所在之处，悲剧只是暂时和局部的，毁灭与解体不是最终的结局。这种对永恒道德秩序的需要是我们心中最深的渴望之一。像但丁和华兹华斯那样的诗人，确信存在这样一种秩序，并以此为其人生的信仰，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诗句才有了那种非凡的振奋和安慰的力量。这里，在这些不同的情感和实际渴求里，在这些对我们对希望和期待的实际态度的调整中，在它们的差异所带来的所有微妙后果中，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真正意义——不是对物质内在实质或上帝形而上学属性的细枝末节的抽象理论。唯物主义就是简单地意味着否认道德秩序的永恒存在，切断最终的希望；而唯心主义意味着承认永恒道德秩序的存在，到处充满希望。确实，对任何一个感受到永恒秩序的人，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只要人类还是人类，它都将给严肃的哲学争论提供话题。

But possibly some of you may still rally to their defence. Even whilst admitting that spiritualism and materialism make different

prophecies of the world's future, you may yourselves pooh-pooh the difference as something so infinitely remote as to mean nothing for a sane mind. The essence of a sane mind, you may say, is to take shorter views, and to feel no concern about such chimaeras as the latter end of the world. Well, I can only say that if you say this, you do injustice to human nature. Religious melancholy is not disposed of by a simple flourish of the word insanity. The absolute things, the last things, the overlapping things, are the truly philosophic concerns; all superior minds feel seriously about them, and the mind with the shortest views is simply the mind of the more shallow man.

但是可能你们有些人还要团结起来，为它们辩护。即使你们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世界未来的预测不同，但是你们自己可能会看不上这些差别，因为它们无限遥远，对头脑正常的人来说毫无意义。你们会说，头脑正常的实质就是看到近的东西，不去关心诸如世界末日这样的一些怪问题。那么，我只能说，如果你们这么说，你们对人性是不公平的。宗教的忧郁不是简单挥动“疯了”一词就能排除掉。绝对的事物，最终的事物，彼此重合的事物，是哲学真正关心的问题；所有优秀的头脑都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那些目光极短的头脑只是更为肤浅之人的头脑。

The issues of fact at stake in the debate are of course vaguely enough conceived by us at present. But spiritualistic faith in all its forms deals with a world of PROMISE, while materialism's sun sets in a sea of disappointment. Remember what I said of the Absolute: it grants us moral holidays. Any religious view does this. It not only incites our more strenuous moments, but it also takes our joyous, careless, trustful moments, and it justifies them. It paints the grounds of justification vaguely enough, to be sure. The exact

features of the saving future facts that our belief in God insures, will have to be ciphered out by the interminable methods of science: we can STUDY our God only by studying his Creation. But we can ENJOY our God, if we have one, in advance of all that labor. I myself believe that the evidence for God lies primarily in inner personal experiences. When they have once given you your God, his name means at least the benefit of the holiday. You remember what I said yesterday about the way in which truths clash and try to 'down' each other. The truth of “God” has to run the gauntlet of all our other truths. It is on trial by them and they on trial by it. Our FINAL opinion about God can be settled only after all the truths have straightened themselves out together. Let us hope that they shall find a modus vivendi!

当然，现在我们对争论中有关事实的问题，认识还非常模糊。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都认为世界充满希望，而唯物主义的日落之处是失望的大海。记住我之前对绝对意志的说法：它给了我们道德上的假期。任何宗教观点都可以这么做。它不仅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奋斗，也给我们带来欢欣鼓舞，无忧无虑，充满信心的时刻，而且它让这些时刻合情合理。当然，宗教为此辩护的理由是非常含糊的。由于我们相信上帝而保证具有的拯救未来事实的能力，将不得不用无数的科学方法计算出来：只有研究上帝的“创造”，我们才可以研究上帝。但是，如果在所有那些劳作之前，相信上帝存在的话，我们就可以享有我们的上帝。我自己相信，上帝存在的证据，主要在于个人的内在经验。如果经验一旦让你相信上帝的存在，他的名字就至少意味着你有假期的好处。你们记得我昨天所说的，各种真理冲突以及它们试图“压制”对方的方式。关于“上帝”的真理，不得不受到所有其他真理的攻击。它受到其他真理的考验，也考验它们。我们对上帝的最终观点，只有在所有真理都清楚之后，才能认定。让我们希望，他们能找到一个暂时的妥协方案！

Let me pass to a very cognate philosophic problem, the QUESTION of DESIGN IN NATURE. God's existence has from time immemorial been held to be proved by certain natural facts. Many facts appear as if expressly designed in view of one another. Thus the woodpecker's bill, tongue, feet, tail, etc., fit him wondrously for a world of trees with grubs hid in their bark to feed upon. The parts of our eye fit the laws of light to perfection, leading its rays to a sharp picture on our retina. Such mutual fitting of things diverse in origin argued design, it was held; and the designer was always treated as a man-loving deity.

让我转到一个非常类似的哲学问题，就是自然界的设计问题。自远古以来，人们就认为上帝的存在可以由一些自然现象来证明。看起来，许多现象就好像非常明确地是为了相互对应而设计的。因此，啄木鸟的嘴、舌、脚、尾等，就非常奇妙，能让它适应各种树木，以树皮里藏着的虫子为食。我们眼睛的各个部分，完美符合光的定律，引导光线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画面。各种来源的事物相互适应，说明有设计存在，而设计师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热爱人类的神。

The first step in these arguments was to prove that the design existed. Nature was ransacked for results obtained through separate things being co-adapted. Our eyes, for instance, originate in intra-uterine darkness, and the light originates in the sun, yet see how they fit each other. They are evidently made FOR each other. Vision is the end designed, light and eyes the separate means devised for its attainment.

这些争论的第一步是证明设计是存在的。人们在自然界彻底搜索，找寻各个不同的事物相互适应的结果。比如，我们的眼睛起源于

胚胎内的黑暗，而光来源于太阳，但是，看看它们彼此是多么适应。它们显然是为了彼此而创造的。视觉是设计的最终目的，光线和眼睛是为了获得视觉而各自设计的两个手段。

It is strange, considering how unanimously our ancestors felt the force of this argument, to see how little it counts for since the triumph of the darwinian theory. Darwin opened our minds to the power of chance-happenings to bring forth “fit” results if only they have time to add themselves together. He showed the enormous waste of nature in producing results that get destroyed because of their unfitness. He also emphasized the number of adaptations which, if designed, would argue an evil rather than a good designer. Here all depends upon the point of view. To the grub under the bark the exquisite fitness of the woodpecker's organism to extract him would certainly argue a diabolical designer.

想到我们的祖先曾经如何一致地意识到这一观点的力量，就会很奇怪，自从达尔文主义理论胜利之后，为什么这个论证又不算什么了。达尔文开拓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看到各种偶然性的力量，只要它们有机会聚和在一起，就能产生“适应”的结果。他指出，自然界产出结果的过程中有巨大浪费，有些结果因为不适应而遭到毁灭。他也强调了相互适应事物的数量，如果是设计的话，就会表明设计师是恶的，而不是善的。这全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对树皮下的虫子来说，啄木鸟的机体神奇地适合它去吸食这些虫子，这正会说明设计师是残暴的。

Theologians have by this time stretched their minds so as to embrace the darwinian facts, and yet to interpret them as still showing divine purpose. It used to be a question of purpose

AGAINST mechanism, of one OR the other. It was as if one should say “My shoes are evidently designed to fit my feet, hence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y should have been produced by machinery.” We know that they are both: they are made by a machinery itself designed to fit the feet with shoes. Theology need only stretch similarly the designs of God. As the aim of a football-team is not merely to get the ball to a certain goal (if that were so, they would simply get up on some dark night and place it there), but to get it there by a fixed MACHINERY OF CONDITIONS—the game's rules and the opposing players; so the aim of God is not merely, let us say, to make men and to save them, but rather to get this done through the sole agency of nature's vast machinery. Without nature's stupendous laws and counterforces, man's creation and perfection, we might suppose, would be too insipid achievements for God to have designed them.

此时，神学家们已经努力扩展自己的思维，以便于接受达尔文所提出的种种事实，但他们仍然认为这些事实体现了神的目的。过去，这常常是一个目的与机械结构对立的问题，二者不能并存。就好像一个人说：“我的鞋很显然是为了合我的脚而设计的，因此，它们不可能是机器做成的。”我们知道两种情况都有：它们是用机械做的，而机械本身就是为了使脚和鞋适应而设计的。神学只需同样地将上帝的设计扩大。足球队的目标不仅仅只是把球带到某个球门（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只需要黑夜起来，把球放在那里就行了），而是通过种种条件限定的固定方法——足球游戏的规则和对抗双方的球员，把球带到那里；因此，我们说，上帝的目标不仅仅只是创造人，拯救人，而是要单凭自然界的宏大机械方法来完成这个工作。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自然界的宏大规律和反作用力，对于设计人的上帝来说，人的创造和完善将成为很乏味的成就。

This saves the form of the design-argument at the expense of its old easy human content. The designer is no longer the old man-like deity. His designs have grown so vast as to be incomprehensible to us humans. The WHAT of them so overwhelms us that to establish the mere THAT of a designer for them becomes of very little consequence in comparison. We can with difficulty comprehend the character of a cosmic mind whose purposes are fully revealed by the strange mixture of goods and evils that we find in this actual world's particulars. Or rather we cannot by any possibility comprehend it. The mere word “design” by itself has, we see, no consequences and explains nothing. It is the barrenest of principles. The old question of WHETHER there is design is idle. The real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world, whether or not it have a designer—and that can be revealed only by the study of all nature's particulars.

这保留了关于设计所产生争论的形式，但失去了它原先让人感到舒服的人性内容。设计者不再是原先那个像人一样的神。他的设计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人类难以理解了。它们是什么，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相比之下，为它们确立一个设计者就显得无关紧要。我们很难去理解一个宇宙头脑的性格特征，我们在这个真实世界的种种细节中所发现的那些善与恶的奇怪混合完全可以说明他的目的。或者不如说，我们根本不可能理解他的性格特征。我们看到，仅仅“设计”一词本身没有什么后果，也解释不了什么。它是各种原理中最无能的。原先那个有没有设计的问题是无聊的。真正的问题是世界是什么，而不管它有没有设计者——只有对自然种种细节进行研究才能揭示这个问题。

Remember that no matter what nature may have produced or may be producing, the means must necessarily have been adequate,

must have been FITTED TO THAT PRODUCTION. The argument from fitness to design would consequently always apply, whatever were the product's character. The recent Mont-Pelee eruption, for example, required all previous history to produce that exact combination of ruined houses, human and animal corpses, sunken ships, volcanic ashes, etc., in just that one hideous configuration of positions. France had to be a nation and colonize Martinique. Our country had to exist and send our ships there. IF God aimed at just that result, the means by which the centuries bent their influences towards it, showed exquisite intelligence. And so of any state of things whatever, either in nature or in history, which we find actually realized. For the parts of things must always make SOME definite resultant, be it chaotic or harmonious. When we look at what has actually come, the conditions must always appear perfectly designed to ensure it. We can always say, therefore, in any conceivable world, of any conceivable character, that the whole cosmic machinery MAY have been designed to produce it.

记住，不管自然已经产生了什么，或者可能正在产生什么，方法必须是适当的，必须适合那种生产。因此，不管产品的性格特征如何，都可以用这个从适合到设计的观点。比如，最近培雷火山爆发，就需要结合先前所有的历史，才能在仅仅这一次可怕的地质构造活动中，准确得出垮塌的房屋，人畜的尸体，沉没的船只，火山灰土等综合的画面。法国那时必须是一个国家，才能把马提尼克开拓为殖民地。我们的国家那时必须存在，才能把船只开向那里。如果上帝只想要这种结果，各个世纪以来对这种结果施加种种影响的方法就表现出奇妙的智慧。自然界中或历史上，我们发现真正成为现实的任何事物，都是这样。因为事物的各个部分必须总是能产生某种确切的结果，不管这结果是无序的还是协调的。我们看真正出现的结果时，肯定总是会出现一些条件，完全是为了确保这个结果而设计的。因此，我们可以总是这么说，不管在任何可以想象的世界里，不管它有何种

可以想象的性格，整个宇宙机器有可能都已经设计好，来产生这种结果。

Pragmatically, then, the abstract word “design” is a blank cartridge. It carries no consequences, it does no execution. What sort of design? and what sort of a designer? are the only serious questions, and the study of facts is the only way of getting even approximate answers. Meanwhile, pending the slow answer from facts, anyone who insists that there is a designer and who is sure he is a divine one, gets a certain pragmatic benefit from the term—the same, in fact which we saw that the terms God, Spirit, or the Absolute, yield us “Design,” worthless tho it be as a mere rationalistic principle set above or behind things for our admiration, becomes, if our faith concretes it into something theistic, a term of PROMISE. Returning with it into experience, we gain a more confiding outlook on the future. If not a blind force but a seeing force runs things, we may reasonably expect better issues. This vague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is the sole pragmatic meaning at present discernible in the terms design and designer. But if cosmic confidence is right not wrong, better not worse, that is a most important meaning. That much at least of possible “truth” the terms will then have in them.

从实用主义来看，“设计”这个抽象的词，是一个空弹筒。它既没带来任何后果，也没有执行任何任务。什么样的设计？什么样的设计者？这些才是严肃的问题，对现象的研究是得到哪怕近似答案的唯一途径。同时，因为从事实得到答案的过程漫长，任何人，如果他坚持认为有一个设计者，并且确信设计者是神，他就会从这个术语得到一些实用主义的好处。这跟我们实际上从上帝、神灵、绝对意志这些术语那里得到的好处一样。它们给我们提供了“设计”，尽管这个词只是

事物之上或之后的理性主义原则，供人们敬仰。如果我们的信仰把它具体化成有神论的，它就成了表示希望的术语了。我们带着它回归经验，就对未来前景获得更大的信心。如果不是一种盲目的力量，而是有洞察力的力量在支配万物，我们会有理由期待更好的结果。目前，这种对未来的模糊信心，就是唯一能从设计和设计者这两个术语中看到的实用主义意义。但是，如果对宇宙的信心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将来是更好，而不是更糟，那信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意义了。这些术语至少会含有那么多可能的“真理”。

Let me take up another well-worn controversy, THE FREE-WILL PROBLEM. Most persons who believe in what is called their free-will do so after the rationalistic fashion. It is a principle, a positive faculty or virtue added to man, by which his dignity is enigmatically augmented. He ought to believe it for this reason. Determinists, who deny it, who say that individual men originate nothing, but merely transmit to the future the whole push of the past cosmos of which they are so small an expression, diminish man. He is less admirable, stripped of this creative principle. I imagine that more than half of you share our instinctive belief in free-will, and that admiration of it as a principle of dignity has much to do with your fidelity.

让我谈谈另一个老生常谈的争议性问题，自由意志问题。大多人按照理性主义的方式来相信他们所谓的自由意志。它是一个原则，是加在人身上的一种积极的能力或品德，有了它，人的尊严就莫名其妙地增加了。因为这个原因，人应该相信它。决定论者认为个人什么都不创造，只是宇宙微不足道的表现，个人只是把过去宇宙的全部推动力传递给未来，因此，决定论者否定自由意志，贬低人的作用。如果失去了这个创造性原则，人就没有那么让人敬仰了。我想你们中的大半都相信我们对自由意志的本能信仰，把它作为一种尊严的原则来敬

仰，与你们的忠诚很有关系。

But free-will has also been discussed pragmatically, and, strangely enough, the same pragmatic interpretation has been put upon it by both disputants. You know how large a part questions of ACCOUNTABILITY have played in ethical controversy. To hear some persons, one would suppose that all that ethics aims at is a code of merits and demerits. Thus does the old legal and theological leaven, the interest in crime and sin and punishment abide with us. “Who's to blame? whom can we punish? whom will God punish?” —these preoccupations hang like a bad dream over man's religious history.

但是自由意志也已经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讨论过了，而且很奇怪，辩论双方都用同样的实用主义解释来对待这问题。你们知道，在伦理论争中，有关责任的种种问题起着多大的作用。听到有些人的说法，一个人可能会认为伦理学的所有目标就是一套优缺点的规则。因此，旧的法律和神学的影响，对犯罪、恶行与惩罚的兴趣，都与我们同在。“怪谁呢？我们能惩罚谁呢？上帝要惩罚谁呢？”——这些让我们专注的问题像噩梦一般笼罩着人类的宗教史。

So both free-will and determinism have been inveighed against and called absurd, because each,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has seemed to prevent the “imputability” of good or bad deeds to their authors. Queer antinomy this! Free-will means novelty, the grafting on to the past of something not involved therein. If our acts were predetermined, if we merely transmitted the push of the whole past, the free-willists say, how could we be praised or blamed for anything? We should be “agents” only, not “principals,” and where

then would be our precious imput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自由意志和决定论都被猛烈抨击过，都被称为是荒诞的，因为在敌人眼里，它们似乎都阻止了行善者或行恶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多么怪异的矛盾！自由意志意味着新事物，就是在旧东西上移植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自由意志者说，如果我们的行为是预先决定的，如果我们只是传递过去的全部推动力，那怎么能因为任何事来表扬或者责备我们呢？我们应该是只是“代理人”，不是“主要当事人”，那么哪里有我们宝贵的责任和义务呢？

But where would it be if we HAD free-will? rejoin the determinists. If a “free” act be a sheer novelty, that comes not FROM me, the previous me, but ex nihilo, and simply tacks itself on to me, how can—I—, the previous I, be responsible? How can I have any permanent CHARACTER that will stand still long enough for praise or blame to be awarded? The chaplet of my days tumbles into a cast of disconnected beads as soon as the thread of inner necessity is drawn out by the preposterous indeterminist doctrine.

但决定论者反对说，如果我们有自由意志的话，它在哪里？如果“自由”的行为是完全的新东西，它不是来自我，那个以前的我，而是凭空出现，只不过把它附加到我身上，我，那个以前的我，如何能负责呢？我如何才能有任何永久的性格，它能够长期稳定，足以接受表扬或责备呢？我的人生是一串珠子，穿起它的内部必然之线，一旦被荒谬的非决定论教条把线给抽掉，它就会散落成为互不联系的珠子。

Messrs. Fullerton and McTaggart have recently laid about them

doughtily with this argument.

富勒顿和麦克塔格特先生最近用这种观点对它们进行了猛烈攻击。

It may be good ad hominem, but otherwise it is pitiful. For I ask you, quite apart from other reasons, whether any man, woman or child, with a sense for realities, ought not to be ashamed to plead such principles as either dignity or imputability. Instinct and utility between them can safely be trusted to carry on the social business of punishment and praise. If a man does good acts we shall praise him, if he does bad acts we shall punish him—anyhow, and quite apart from theories as to whether the acts result from what was previous in him or are novelties in a strict sense. To make our human ethics revolve about the question of “merit” is a piteous unreality—God alone can know our merits, if we have any. The real ground for supposing free-will is indeed pragmatic, bu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contemptible right to punish which had made such a noise in past discussions of the subject.

它可能是很好的对人不对事的争论，不然，它就十分可怜了。我问大家，抛开其他原因，任何人，不论男女，或者不论长幼，如果对现实有感觉的话，去争辩这种尊严或责任的原则，难道不应该感到羞愧吗？可以很安全地利用它们之间的本能和功效来处理社会上有关奖惩的事情。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做好事，我们就奖励他；如果他做坏事，我们就惩罚他——完全抛开争论是他之前内在的原因还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些行为的那些理论。让我们的人类伦理围着“优点”绕圈子是可怜的虚幻。如果我们真有什么优点的话，只有上帝能知道。自由意志假设的真正理由实际上是实用主义的，但是它与

过去热烈讨论过的可鄙的惩罚权是无关的。

Free-will pragmatically means NOVELTIES IN THE WORLD, the right to expect that in its deepest elements as well as in its surface phenomena, the future may not identically repeat and imitate the past. That imitation en masse is there, who can deny? The general “uniformity of nature” is presupposed by every lesser law. But nature may be only approximately uniform; and persons in whom knowledge of the world's past has bred pessimism (or doubts as to the world's good character, which become certainties if that character be supposed eternally fixed) may naturally welcome free-will as a MELIORISTIC doctrine. It holds up improvement as at least possible; whereas determinism assures us that our whole notion of possibility is born of human ignorance, and that necessity and impossibility between them rule the destinies of the world.

自由意志在实用主义上的意义，就是世界出现新事物，有权去期待在世界的最深刻和最表面的现象中，未来不会是对过去一成不变的重复和模仿。但谁能否认，总的来说，这种模仿确实存在？每一个较低的定律都是以具有普遍性的“自然界一致性”为前提。但自然可能只是近似一致；有些人，对世界过去的了解已经使他产生了悲观主义（或者对世界的善良性格产生怀疑，如果假设这种性格是永久不变的，它就变成了必然性）。这些人自然会欢迎自由意志，把它当作世界改良论的一种教义。它认为改进至少是可能的；而决定论让我们相信我们对可能性的全部概念来自于人类的无知，世界的命运由可能性和无知之间的必然性和不可能性支配。

Free-will is thus a general cosmological theory of PROMISE, just like the Absolute, God, Spirit or Design. Taken abstractly, no

one of these terms has any inner content, none of them gives us any picture, and no one of them would retain the least pragmatic value in a world whose character was obviously perfect from the start. Elation at mere existence, pure cosmic emotion and delight, would, it seems to me, quench all interest in those speculations, if the world were nothing but a lubberland of happiness already. Our interest in religious metaphysics arises in the fact that our empirical future feels to us unsafe, and needs some higher guarantee. If the past and present were purely good, who could wish that the future might possibly not resemble them? Who could desire free-will? Who would not say, with Huxley, “let me be wound up every day like a watch, to go right fatally, and I ask no better freedom.” “Freedom” in a world already perfect could only mean freedom to BE WORSE, and who could be so insane as to wish that? To be necessarily what it is, to be impossibly aught else, would put the last touch of perfection upon optimism's universe. Surely the only POSSIBILITY that one can rationally claim i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ings may be BETTER. That possibility, I need hardly say, is one that, as the actual world goes, we have ample grounds for desiderating.

因此，自由意志是关于希望的总体性宇宙理论，与绝对意志、上帝、神灵或设计是一样的。抽象来看，这些术语都没有任何内在的内容，都没有提供任何景象，都没能在世界中包含一点实用主义的价值，而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清楚展现了它的完美性格。如果世界已经全部都是幸福的乐土，在我看来，仅仅因为存在而兴高采烈，单纯的宇宙情感和快乐，会压制对种种猜测的所有兴趣。我们对宗教形而上学的兴趣，来自于我们以实证主义所感受的未来是不安全的，需要某种更高级的保障。如果过去和现在全都是好的，谁能希望将来可能会不一样呢？谁会需要自由意志？谁不想和赫胥黎一样，可以说：“让我每天都像钟表一样，把发条上紧，宿命地往前走，我就不会要更多自由”。在一个已经完美的世界里，“自由”只能意味着变坏的自由，谁

能这么疯狂想要这种自由呢？要一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就是给乐观主义的宇宙画龙点睛。当然，一个人所能理性提出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事情会向好发展。简直不用我说，那种可能性，就是像真实世界一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渴望它。

Free-will thus has no meaning unless it be a doctrine of RELIEF. As such, it takes its place with other religious doctrines. Between them, they build up the old wastes and repair the former desolations. Our spirit, shut within this courtyard of sense-experience, is always saying to the intellect upon the tower: “Watchman, tell us of the night, if it aught of promise bear,” and the intellect gives it then these terms of promise.

因此，除非自由意志是一种解救学说，它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这样，它和其他宗教学说并驾齐驱。它们在古老的废墟上重建，修复之前被荒废的地方。我们的精神，关闭在感官经验的院子里，总是对高塔上的知性说：“看护人啊，如果夜能带来什么希望，请告诉我们吧！”然后，智力便把这些带有希望的术语给了它。

Other than thi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words God, free-will, design, etc., have none. Yet dark tho they be in themselves, or intellectualistically taken, when we bear them into life's thicket with us the darkness THERE grows light about us. If you stop, in dealing with such words, with their definition, thinking that to be an intellectual finality, where are you? Stupidly staring at a pretentious sham! “Deus estEns, a se, extra et supra omne genus, necessarium, unum, infinite perfectum, simplex, immutabile, immensum, aeternum, intelligens,” etc.,—wherein is such a definition really instructive? It means less, than nothing, in its

pompous robe of adjectives. Pragmatism alone can read a positive meaning into it, and for that she turns her back upon the intellectualist point of view altogether. “God's in his heaven; all's right with the world!” —THAT's the heart of your theology, and for that you need no rationalist definitions.

除去这种实际意义，上帝、自由意志、设计等等这些术语，没有别的意义了。它们虽然晦涩难懂，或者被人从理智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但当我们把它们带到生命的树丛中时，那些晦涩难懂就会在那里发光。如果在处理这些术语时，你停留在它们的定义上，认为那就是知识的终点，你会是什么情况呢？你一定会正愚蠢地盯着一个自命不凡的假象！“上帝是实在的，是自身存在的，是在万有之上和之外的，是必然的，唯一的，无限完美的，是纯洁的，永不改变的，是无量的，是永恒的，是智慧的”等等——这样的定义，哪里具有指导性？在形容词堆砌起来的虚妄外衣里，它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实用主义能赋予它积极的意义，正因为此，她完全背离了理智主义的观点。“上帝是在他的天堂里；世界一切都正常！”——那是你们神学的核心，因此，你们不需要任何理性主义的定义。

Why shouldn't we all of us, rationalists as well as pragmatists, confess this? Pragmatism, so far from keeping her eyes bent on the immediate practical foreground, as she is accused of doing, dwells just as much upon the world's remotest perspectives.

理性主义者，还有实用主义者，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承认这一点呢？实用主义远非人们所指责的那样，只是将眼光盯住眼前的实用之处，它同样关注世界最遥远的前景。

See then how all these ultimate questions turn, as it were, up their hinges; and from looking backwards upon principles, upon an erkenntnisstheoretischeIch, a God, a Kausalitaetsprinzip, a Design, a Free-will, taken in themselves, as something august and exalted above facts,—see, I say, how pragmatism shifts the emphasis and looks forward into facts themselves. The really vital question for us all is, What is this world going to be? What is life eventually to make of itself? The centre of gravity of philosophy must therefore alter its place. The earth of things, long thrown into shadow by the glories of the upper ether, must resume its rights. To shift the emphasis in this way means that philosophic questions will fall to be treated by minds of a less abstractionist type than heretofore, minds more scientific and individualistic in their tone yet not irreligious either. It will be an alteration in “the seat of authority” that reminds one almost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And as, to papal minds, protestantism has often seemed a mere mess of anarchy and confusion, such, no doubt, will pragmatism often seem to ultra-rationalist minds in philosophy. It will seem so much sheer trash, philosophically. But life wags on, all the same, and compasses its ends, in protestant countries. I venture to think that philosophic protestantism will compass a not dissimilar prosperity.

然后，让我们看看所有这些终极问题的关键之处如何；回顾那些原理，回顾认识论的自我、上帝，因果关系原理、设计和自由意志，就自身而言，它们是庄严和崇高的，在事实之上——看看吧，实用主义是如何将重点转移、直面事实本身的。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世界将会什么样？生命本身最终会是什么样？因此，哲学的重心点必须改变它的位置。地球万物长期以来被上层苍穹的壮丽所掩盖，必须恢复它们的权利。以这种方式转移重点就意味着哲学的问题将要降格，和从前相比，要由抽象主义色彩较少的头脑来处理，这些头脑在风格上更加科学，更加个人主义，但并非没有宗教性。这

将是“权威性地位”的改变，这差不多会让我们想起新教改革。对天主教的头脑而言，新教常常好像只是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的一团乱麻；毫无疑问，对极端理性主义的头脑而言，实用主义看起来也是这样。从哲学的角度看，它好像全无用处。但是在新教国家里，生活照样，变迁依旧，到达终点。我冒昧设想，哲学上的新教教义也将拥有同样的繁荣。

Lecture IV The One and the Many

第四讲　一元与多元

TOTAL REFLECTION. PHILOSOPHY SEEKS NOT ONLY UNITY, BUT TOTALITY. RATIONALISTIC FEELING ABOUT UNITY. PRAGMATICALLY CONSIDERED, THE WORLD IS ONE IN MANY WAYS. ONE TIME AND SPACE. ONE SUBJECT OF DISCOURSE. ITS PARTS INTERACT. ITS ONENESS AND MANYNESS ARE CO-ORDINATE. QUESTION OF ONE ORIGIN. GENERIC ONENESS. ONE PURPOSE. ONE STORY. ONE KNOWER. VALUE OF PRAGMATIC METHOD. ABSOLUTE MONISM. VIVEKANANDA1. VARIOUS TYPES OF UNION DISCUSSED. CONCLUSION: WE MUST OPPOSE MONISTIC DOGMATISM AND FOLLOW EMPIRICAL FINDINGS.

全反射现象。哲学所探寻的不仅仅是统一性，还包括整体性。有关统一性的纯理性思考。在实用主义看来，世界在许多方面是统一的。统一的时间与空间。统一的话语主题。世界各部分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世界的一元性与多元性并存。有关同一起源的问题。类属统一性。统一的目的。统一的故事。一个知者。实用主义方法的价值。绝对一元论。维韦卡南达。所论统一性的多种类型。结论：我们必须反对一元论教条主义，而接受实证主义的发现。

We saw in the last lecture that the pragmatic method, in its dealings with certain concepts, instead of ending with admiring contemplation, plunges forward into the river of experience with them and prolongs the perspective by their means. Design, free-will, the absolute mind, spirit instead of matter, have for their sole

meaning a better promise as to this world's outcome. Be they false or be they true, the meaning of them is this meliorism. I have sometimes thought of the phenomenon called “total reflexion” in optics as a good symbol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abstract ideas and concrete realities, as pragmatism conceives it. Hold a tumbler of water a little above your eyes and look up through the water at its surface—or better still look similarly through the flat wall of an aquarium. You will then see an extraordinarily brilliant reflected image say of a candle-flame, or any other clear object, situated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vessel. No candle-ray,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gets beyond the water's surface: every ray is totally reflected back into the depths again. Now let the water represent the world of sensible facts, and let the air above it represent the world of abstract ideas. Both worlds are real, of course, and interact; but they interact only at their boundary, and the locus of everything that lives, and happens to us, so far as full experience goes, is the water. We are like fishes swimming in the sea of sense, bounded above by the superior element, but unable to breathe it pure or penetrate it. We get our oxygen from it, however, we touch it incessantly, now in this part, now in that, and every time we touch it we are reflected back into the water with our course re-determined and re-energized. The abstract ideas of which the air consists, indispensable for life, but irrespirable by themselves, as it were, and only active in their re-directing function. All similes are halting but this one rather takes my fancy. It shows how something, not sufficient for life in itself, may nevertheless be an effective determinant of life elsewhere.

在上一讲中，我们看到，实用主义的方法在处理某些概念时，最后的结果不是要让人充满敬仰地沉思，而是携概念一同投入经验之流，并以这些概念为手段，拓展实用主义的视角。设计论、自由意志

论、绝对精神论、精神而非物质，这些理论唯一的意义是使我们这个世界结果更加美好。这些理论，不论对错与否，其意义就是这个社会改良论。我有时想起光学里“全反射”的现象，认为它很形象地反映了实用主义所谓的抽象观念与具体实在之间的关系。举起一个盛了水的玻璃杯，高度略高于双眼，从下往上透过杯子里的水去看水面——或者更好的方法是通过平整的玻璃缸壁去看水面。你会在水杯的另一面看见特别明亮的物体映像，比如蜡烛火焰或其他清晰的可见物的映像。在这种情况下，光线绝不会透过水面，每道光线都会全部反射到杯子的水里面。现在，就由水来代表可感知事物所组成的世界，而水面上的空气代表抽象概念组成的世界。当然，这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并且相互作用；但两者只在交界处存在相互作用，而且一切生命，以及我们所碰到的任何事物，其所在地，就我们的全部经验来说，就是水所代表的那个世界。我们就像在感觉的海洋里游泳的鱼儿一样，上界有较高级的元素空气，但我们无法只呼吸空气，也无法穿越它。可是，我们从空气中获得氧气，并时不时与空气进行接触，有时接触这一部分，有时接触那一部分；每次接触之后，我们仍旧回到水里，我们生命的进程得以重新确定，并再一次获得能量。构成空气的抽象观念，在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但抽象观念本身，可以说，不能供我们呼吸，而只能起到再指导的功用。一切比喻总是有缺陷的，不过，这一比喻我倒相当喜欢。该比喻说明，有些事物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足以维持生命的，但在有些情况下，却是一个有力的决定性因素。

In this present hour I wish to illustrate the pragmatic method by one more application. I wish to turn its light upon the ancient problem of “the one and the many.” I suspect that in but few of you has this problem occasioned sleepless nights, and I should not be astonished if some of you told me it had never vexed you. I myself have come, by long brooding over it, to consider it the most central of all philosophic problems, central because so pregnant. I mean by this that if you know whether a man is a decided monist or a

decided pluralist, you perhaps know more about the rest of his opinions than if you give him any other name ending in IST. To believe in the one or in the many, that is the classification with the maximum number of consequences. So bear with me for an hour while I try to inspire you with my own interest in the problem.

这次讲座，我想再通过一个应用实例，来说明实用主义的方法。我想用实用主义的方法来阐述“一元与多元”这一古老的问题。我估计你们中只有少数人会为了这个问题而失眠；如果你们有人跟我说，这个问题从未让你们烦恼，我也不会吃惊。经历了长久的思考之后，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切哲学问题的核心。说它是核心，因为它蕴含丰富的意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知道某人是个坚定的一元论者，或是个坚定的多元论者，比起你知道他是个其他什么论者来说，你对他的观点的了解可能会更全面一些。是相信一元论者还是相信多元论者，这种分类影响最大。所以在这一个小时里，我试着以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来给你们一些启发，请你们耐心听我道来。

Philosophy has often been defined as the quest or the vision of the world's unity. We never hear this definition challenged, and it is true as far as it goes, for philosophy has indeed manifested above all things its interest in unity. But how about the VARIETY in things? Is that such an irrelevant matter? If instead of using the term philosophy, we talk in general of our intellect and its needs we quickly see that unity is only one of these. Acquaintance with the details of fact is always reckoned, along with their reduction to system, as an indispensable mark of mental greatness. Your “scholarly” mind, of encyclopedic, philological type, your man essentially of learning, has never lacked for praise along with your philosopher. What our intellect really aims at is neither variety nor unity taken singly but totality.(Compare A. Bellanger: Les concepts

de Cause, et l'activiteintentionelle de l'Esprit. Paris, Alcan, 1905, p.79 ff.) In this, acquaintance with reality's diversities is as important as understanding their connexion. The human passion of curiosity runs on all fours with the systematizing passion.

哲学通常被定义为对世界统一性的寻求或发现。我们从未听到有人对此定义表示质疑，就其本身而言，该定义是正确的，因为哲学对统一性的确表现出超乎一切的兴趣。但事物的多样性呢？难道事物的多样性问题就如此无关紧要吗？如果不用哲学这个名词，我们大概谈一谈我们的理智及其要求，我们就能很快明白统一性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要求而已。了解事实的细节，并把细节归结为系统知识，一直被认为是伟大智慧不可或缺的标志。一个百科全书、语言学类型的“博学者”，本来就是个有学问的人，从来都是与哲学家一起饱受人称颂。我们的理智所实际追求的目标，既不是单纯的多样性，也不是单纯的统一性，而是整体性。（参看贝朗热（A. Bellanger）《原因的概念及精神的有意识活动》，巴黎阿尔坎出版社，1905年版，第79页起。）这里，了解实在的多样性与了解其关联性同等重要。人类求知的欲望与对知识系统化的欲望并驾齐驱。

In spite of this obvious fact the unity of things has always been considered more illustrious, as it were, than their variety. When a young man first conceives the notion that the whole world forms one great fact, with all its parts moving abreast, as it were, and interlocked, he feels as if he were enjoying a great insight, and looks superciliously on all who still fall short of this sublime conception. Taken thus abstractly as it first comes to one, the monistic insight is so vague as hardly to seem worth defending intellectually. Yet probably everyone in this audience in some way cherishes it. A certain abstract monism, a certain emotional response to the character of oneness, as if it were a feature of the

world not coordinate with its manyness, but vastly more excellent and eminent, is so prevalent in educated circles that we might almost call it a part of philosophic common sense. Of COURSE the world is one, we say. How else could it be a world at all? Empiricists as a rule, are as stout monists of this abstract kind as rationalists are.

尽管这一事实非常明显，但人们似乎总认为事物的统一性比多样性更耀眼一些。当一个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世界各部分似乎都一致行动并相互结合而成为某一伟大的事实，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拥有了什么真知灼见，并骄傲自大，轻视一切没有这样崇高见解的人。一个人初次拥有这样一种一元论观点的时候，他对此做出了如此抽象的理解，因此，这种一元论的观点是模糊不清的，几乎不值得我们为此进行理性的辩护。然而，也许在座的每一位都多少持有这样的观点。某种抽象的一元论，对于一元特性的某种情感反应，就好像一元乃是世界的一大特点，不仅与多元不能等同，而且一元论要更优秀、更突出，这样的观点在受教育的人群中非常流行，以至于我们几乎可以把它当成一部分哲学常识。我们说世界当然是统一的。否则，怎么还能是一个世界呢？实证主义者通常也像理性主义者一样，是这种抽象一元论坚定的拥护者。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empiricists are less dazzled. Unity doesn't blind them to everything else, doesn't quench their curiosity for special facts, whereas there is a kind of rationalist who is sure to interpret abstract unity mystically and to forget everything else, to treat it as a principle; to admire and worship it; and thereupon to come to a full stop intellectually.

不同之处在于实证主义者的头脑更清醒。统一性并未蒙蔽他们的

眼睛，使他们看不见其他事物，也并未消除他们对特殊事实的好奇心；但是，有一类理性主义者却一定要对抽象的统一性进行神秘地诠释，他们忽视其他一切事物，把抽象的统一性当作一种原则，赞美、崇拜抽象的统一性，从而在理性上停滞不前。

“The world is One!“—the formula may become a sort of number-worship. “Three” and “seven” have, it is true, been reckoned sacred numbers; but, abstractly taken, why is “one” more excellent than “forty-three,” or than “two million and ten”? In this first vague conviction of the world's unity, there is so little to take hold of that we hardly know what we mean by it.

“世界是统一的！”——这一准则有可能转变成一种数字崇拜。事实上，“三”与“七”这两个数字就曾经被当成神圣的数字；但抽象地来看，为什么数字“一”就要优于数字“四十三”或者“二百万零十”呢？在这种对世界统一性最初模糊的信仰过程中，我们能把握的东西很少，几乎都不了解我们所说的世界统一性指的是什么。

The only way to get forward with our notion is to treat it pragmatically. Granting the oneness to exist, what facts will be different in consequence? What will the unity be known-as? The world is one—yes, but HOW one? What i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 oneness for US?

提高我们认识的唯一方法就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假定一元性存在，将会产生什么实际的不同呢？我们所了解的统一性是什么呢？世界是一元的，是的，但世界又是如何具有一元性的呢？一元论对我们而言有什么实用价值呢？

Asking such questions, we pass from the vague to the definite,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Many distinct ways in which oneness predicated of the universe might make a difference, come to view. I will note successively the more obvious of these ways.

随着这些问题的提出，我们的认识逐渐由模糊转向清晰，由抽象变为具体。一元论过去用来表述宇宙的方法，有许多很独特，可能会带来一些改变，让我们来看一看。我将逐一指出其中比较显著的一些方法。

1．First, the world is at least ONE SUBJECT OF DISCOURSE. If its manyness were so irremediable as to permit NO union whatever of its parts, not even our minds could 'mean' the whole of it at once: the world be like eyes trying to look in opposite directions. But in point of fact we mean to cover the whole of it by our abstract term “world” or “universe,” which expressly intends that no part shall be left out. Such unity of discourse carries obviously no farther monistic specifications. A “chaos,” once so named, has as much unity of discourse as a cosmos. It is an odd fact that many monists consider a great victory scored for their side when pluralists say “the universe is many.” “'The universe'!” they chuckle—“his speech bewrayeth him. He stands confessed of monism out of his own mouth.” Well, let things be one in that sense! You can then fling such a word as universe at the whole collection of them, but what matters it? It still remains to be ascertained whether they are one in any other sense that is more valuable.

一、首先，世界至少是一个话语主体。如果世界具有绝对的多元

性，不允许世界各部分之间存在任何统一性，甚至我们的思想也不能同时“指向”整个世界：那么，这世界就好比一双要往相反的方向看东西的眼睛一样。但事实上，我们想要用抽象的名词“世界”或“宇宙”来指代整个世界，来清楚地表明不会有任何部分被遗漏。这种话语上的统一显然不包括任何进一步的有关一元论的详述。“混沌”一词，一旦被冠以这样的名称，就和“宇宙”一词一样具有同样的话语统一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一元论者一听到多元论者说“宇宙是多元的”，就认为自己一方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他说到‘宇宙’了！”他们偷偷笑着说：“他的话露出马脚了。他亲口承认一元论了。”好吧，那就让事物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一元的！那么，你就完全可以用诸如宇宙这样的词来指代事物总的集合，但这有什么用呢？我们还是要搞清楚，从任何其他更有意义的角度来看，事物是否是统一的。

2 . Are they, for example, CONTINUOUS? Can you pass from one to another, keeping always in your one universe without any danger of falling out? In other words, do the parts of our universe HANG together, instead of being like detached grains of sand?

二、例如，事物是连续不断的吗？你能从一个事物过渡到另一个事物，并始终保持在这个统一的宇宙之中，而没有脱离它的危险吗？换句话说，我们宇宙的各部分是粘连在一起的，而不是像一粒粒的散沙吗？

Even grains of sand hang together through the space in which they are embedded, and if you can in any way move through such space, you can pass continuously from number one of them to number two. Space and time are thus vehicles of continuity, by which the world's parts hang together. The practical difference to us, resultant from these forms of union, is immense. Our whole

motor life is based upon them.

即便是沙粒，在所埋置的空间里，它们也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能随意穿越这空间，你就可以不断地从一粒沙到另一粒沙。空间与时间是产生这样的连续性的工具，世界各部分通过时间与空间联系起来。时空的这种统一方式对我们的实际影响极大。我们全部的活动都以此为基础。

3 . There are innumerable other paths of practical continuity among things. Lines of INFLUENCE can be traced by which they together. Following any such line you pass from one thing to another till you may have covered a good part of the universe's extent. Gravity and heat-conduction are such all-uniting influences, so far as the physical world goes. Electric, luminous and chemical influences follow similar lines of influence. But opaque and inert bodies interrupt the continuity here, so that you have to step round them, or change your mode of progress if you wish to get farther on that day. Practically, you have then lost your universe's unity, SO FAR AS IT WAS CONSTITUTED BY THOSE FIRST LINES OF INFLUENCE. There are innumerable kinds of connexion that special things have with other special things; and the ENSEMBLE of any one of these connexions forms one sort of system by which things are conjoined. Thus men are conjoined in a vast network of ACQUAINTANCESHIP. Brown knows Jones, Jones knows Robinson, etc.; and BY CHOOSING YOUR FARTHER INTERMEDIARIES RIGHTLY you may carry a message from Jones to the Empress of China, or the Chief of the African Pigmies, or to anyone else in the inhabited world. But you are stopped short, as by a non-conductor, when you choose one man wrong in this experiment. What may be called love-systems are grafted on the acquaintance-system. A loves

(or hates) B; B loves (or hates) C, etc. But these systems are smaller than the great acquaintance-system that they presuppose.

三、实际上，事物之间还有无数种其他方式来产生连续性。事物之间得以联系起来的感应线路是可以找到的。循着这些线路，你可以由一个事物过渡到另一事物，直至涵盖大部分宇宙。就物质世界而言，重力以及热传导就是这样能联合一切的感应力。电感应、光感应以及化学感应都遵循类似的感应线路。但是非透明体以及惰性物体却打断了这种连续性；因此，如果这一天你要前进，你就必须绕过它们，或改变你的前进方式。实际上，你当时就失去了你的宇宙统一性，在此之前，那些最初的感应线路构成了你的宇宙统一性。特殊事物与特殊事物之间存在无数种相互关系；其中任何一种关系的总体会形成事物得以相互结合的某种体系。这样，人们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庞大的熟人关系网。布朗认识琼斯，琼斯又认识鲁滨逊，依此类推；只要你选择恰当的中间人，你就可以替琼斯捎个口信给中国的皇后，或非洲矮人族的酋长，或世界上任何人。但是，在这个试验里，一旦你选错了一个人，那就好比遇到了一个非传导体一样，你的传递路线就突告中断了。各种所谓爱的体系也都嫁接在这个熟人关系网上。如甲爱（或恨）乙；乙爱（或恨）丙，等等。但是这些爱的体系都要小于庞大的熟人关系网，并以这个庞大的熟人关系网为前提。

Human efforts are daily unifying the world more and more in definite systematic ways. We found colonial, postal, consular, commercial systems, all the parts of which obey definite influences that propagate themselves within the system but not to facts outside of it. The result is innumerable little hangings-together of the world's parts within the larger hangings-together, little worlds, not only of discourse but of operation, within the wider universe. Each system exemplifies one type or grade of union, its parts being strung on that peculiar kind of relation, and the same part may figure in

many different systems, as a man may hold several offices and belong to various clubs. From this “systematic” point of view, therefore, the pragmatic value of the world's unity is that all these definite networks actually and practically exist. Some are more enveloping and extensive, some less so; they are superposed upon each other; and between them all they let no individual elementary part of the universe escape. Enormous as is the amount of disconnexion among things (for these systematic influences and conjunctions follow rigidly exclusive paths), everything that exists is influenced in SOME way by something else, if you can only pick the way out rightly. Loosely speaking, and in general, it may be said that all things cohere and adhere to each other SOMEHOW, and that the universe exists practically in reticulated or concatenated forms which make of it a continuous or “integrated” affair. Any kind of influence whatever helps to make the world one, so far as you can follow it from next to next. You may then say that “the world IS One” —meaning in these respects, namely, and just so far as they obtain. But just as definitely is it NOT one, so far as they do not obtain; and there is no species of connexion which will not fail, if, instead of choosing conductors for it, you choose non-conductors. You are then arrested at your very first step and have to write the world down as a pure MANY from that particular point of view. If our intellect had been as much interested in disjunctive as it is in conjunctive relations, philosophy would have equally successfully celebrated the world's DISUNION.

人类正在不断努力用确定且系统的方式日益统一世界。我们建立了殖民系统、邮政系统、领事系统、商业系统等等；这些系统的各个部分都遵循在系统内部传导的明确感应关系，但并不遵循系统以外的感应关系。其结果是：在大的统一体中存在无数的小统一体；在较广的世界之内有无数的小世界，不但有言论上的，而且也有行动上的。

每一体系都代表某种形式或等级的统一性，该体系各部分之间都以这种特殊的关系相连接，而且同一个部分可以出现在多个不同的体系内，就好比一个人可以担任各种不同职务，或隶属于不同的团体一样。因此，从这个“系统化”的观点看来，世界统一性的实用价值在于：所有这些固定的网络实际和实用地存在着。有的网络内容较多，范围较广；有的则不那么多，不那么广；它们相互交错覆盖，中间绝不会遗漏宇宙的任何基本组成部分。尽管事物之间不存在关联性的成分很大（因为这些系统性的感应与联合，都严格遵循排他性的方式），但是，只要你能找到正确的方法，你就会发现每个存在的事物都会以某种方式与其他事物相感应。如果不那么严格，我们可以说，一切事物一般都在某些程度上互相依附，互相连结；宇宙实际上像一张织得密密的网，相互连接在一起而成为一个连续的或“统一”的事物。任何种类的感应都有助于使世界成为一个统一体，只要你能一个接一个地感应下去。然后，你才可以说“世界‘是统一的’”——也就是说，从这些感应关系的角度，从所获得的感应关系的范围来看，世界是统一的。但是，只要不存在这些感应关系，世界就肯定不是统一的；而且假如你为此选择了非传导体，而不是导体，没有一种关系是不会中断的。那样，你还没迈出第一步就只好止步，而从这个特定的角度来看，你将不得不说这是个纯粹多元的世界。如果我们的理智对于关联性与非关联性怀有同等兴趣的话，哲学就会同样成功地歌颂世界的非统一性了。

The great point is to notice that the oneness and the manyness are absolutely co-ordinate here. Neither is primordial or more essential or excellent than the other. Just as with space, whose separating of things seems exactly on a par with its uniting of them, but sometimes one function and sometimes the other is what come home to us most, so, in our general dealings with the world of influences, we now need conductors and now need non-conductors, and wisdom lies in knowing which is which at the appropriate moment.

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到：在这里，一元与多元是绝对相互协调的。两种哲学观，无所谓先后，无所谓轻重，也无所谓优劣。就像空间一样，其分隔事物的功能似乎与其统一事物的功能同等重要，但我们最了解的有时是这项功能，有时却是另一项功能；因此，在我们与感应世界的一般接触过程中，我们有时需要传导体，有时需要非传导体；而智慧就在于在适当的时候把二者分清楚。

4．All these systems of influence or non-influence may be listed under the general problem of the world's CAUSAL UNITY. If the minor causal influences among things should converge towards one common causal origin of them in the past, one great first cause for all that is, one might then speak of the absolute causal unity of the world. God's fiat on creation's days has figured 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s such an absolute cause and origin.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translating “creation” into “thinking” (or willing to “think”), calls the divine act “eternal” rather than “first”; but the union of the many here is absolute, just the same—the many would not BE, save for the One. Against this notion of the unity of origin of all there has always stood the pluralistic notion of an eternal self-existing many in the shape of atoms or even of spiritual units of some sort. The alternative has doubtless a pragmatic meaning, but perhaps, as far as these lectures go, we had better leave the question of unity of origin unsettled.

四、所有这些感应或非感应系统，都可列入世界的因果统一这一总题之下。如果事物中较小的因果感应都指向一个过去共同的某一个起因，也就是一切事物起初最大的原因，这样，我们就可能谈论到世界的绝对因果统一性了。上帝在创世之初的命令被传统哲学认为是这种绝对的原因及起源。先验唯心主义，把“创造”解释为“思考”（或愿

意去“思考”），把神的行为说成是“永恒的”而不是“最初的”；但这里，多元的统一也还是绝对的，是一回事——如果没有一，也就不会存在多。与这种万物起源统一论的观念一直相对立的是多元论的观念，认为有某种以原子的形式，或者甚至是以某种精神单位的形式而自我存在的永恒的多。这种多元论的见解无疑有其实用主义的意义，但是在本次系列讲座中，我们还是不讨论这个有关起源统一性的问题为好。

5．The most important sort of union that obtains among things, pragmatically speaking, is their GENERIC UNITY. Things exist in kinds, there are many specimens in each kind, and what the “kind” implies for one specimen, it implies also for every other specimen of that kind. We can easily conceive that every fact in the world might be singular, that is, unlike any other fact and sole of its kind. In such a world of singulars our logic would be useless, for logic works by predicating of the single instance what is true of all its kind. With no two things alike in the world, we should be unable to reason from our past experiences to our future ones. The existence of so much generic unity in things is thus perhaps the most momentous pragmatic specification of what it may mean to say “the world is One.” ABSOLUTE generic unity would obtain if there were one summum genus under which all things without exception could be eventually subsumed. “Beings,” “thinkables,” “experiences,” would be candidates for this position. Whether the alternatives expressed by such words have any pragmatic significance or not, is another question which I prefer to leave unsettled just now.

五、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事物间最重要的一体性是它们的类属统一性。事物分类别而存在，每一个类别都有多种实物，而

且，“类别”对某一个实物意味着什么，也对同类别其他实物有同样的意义。我们很容易认为，世界万物的每一种可能都是独特的，也就是说，它不同于其他事物，并自成一类。在这样的一个事物都自成一类的世界里，我们的逻辑推理可能就没有用处了，因为逻辑推理的作用就在于：根据对同类所有事物都成立的情况来推断单个事物的情况。如果世上没有两件事物是类似的，我们就无法根据过去的经验来推断未来。因此，事物中存在如此多的类属统一性，对于解释“世界是统一的”这句话，也许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予以的最重要的说明。如果存在一个总类，一切事物最终都可以无一例外地统摄在其下，那就可以得到绝对的类属统一性。“存在”，“可想象的事物”，“经验”等名词都有可能是这个总类的名称的备选词。至于这些词所表达的其他意义是否含有实用主义的意义，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我暂不解答。

6．Another specification of what the phrase “the world is One” may mean is UNITY OF PURPOSE. An enormous number of things in the world subserve a common purpose. All the man-made systems, administrative, industrial, military, or what not, exist each for its controlling purpose. Every living being pursues its own peculiar purposes. They co-operate,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their development, in collective or tribal purposes, larger ends thus enveloping lesser ones, until an absolutely single, final and climacteric purpose subserved by all things without exception might conceivably be reached. It is needless to say that the appearances conflict with such a view. Any resultant, as I said in my third lecture, MAY have been purposed in advance, but none of the results we actually know in this world have in point of fact been purposed in advance in all their details. Men and nations start with a vague notion of being rich, or great, or good. Each step they make brings unforeseen chances into sight, and shuts out older vistas, and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general purpose have to be daily changed. What is reached in the end may be better or worse than what was

proposed, but it is always more complex and different.

六、对于“世界是统一的”这句话的另外一种解释，也许是目的的统一性。世界上许多事物都服从于某个共同的目的。一切人为的体系，行政的、工业的、军事的或是其他体系，都为自身的主导目的而存在。每一个生物体都要找寻自身的特殊目的。他们根据自身发展的程度，为了集体或小群体的目的相互合作，因此大的目的涵盖了小的目的，也许直至达到某一个绝对独一的、最终的、以及关键性的目的，一切事物都无一例外地服从于该目的。毋庸置疑，表象与这种观点相冲突。我在第三讲中曾讲过，任何结果，也许事先都曾有过设想，但我们真正所了解的世界的结果，没有一个是在所有具体细节上都预先安排好的。个人以及国家一开始都有想要变得富庶、伟大或善良的模糊的想法。每前进一步，都会使他们发现意外的机会，从而屏弃旧有的想法，这样，其总体目标的具体内容，势必每日都有所更新。最终得到的结果可能会比设想的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总会更复杂一些，更加不同一些。

Our different purposes also are at war with each other. Where one can't crush the other out, they compromise; and the result is again different from what anyone distinctly proposed beforehand. Vaguely and generally, much of what was purposed may be gained; but everything makes strongly for the view that our world is incompletely unified teleologically and is still trying to get its unification better organized.

不同目的之间也会相互冲突。一个目的不能推翻另一个目的时，它们便互相妥协；结果就又有别于事先所明确设想的目的。大体上，预设的目的也许大部分尚能达到；不过，一切都强有力地表明：我们的世界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是不完全统一的，世界仍在试图更有序地

表现其统一性。

Whoever claims ABSOLUTE teleological unity, saying that there is one purpose that every detail of the universe subserves, dogmatizes at his own risk. Theologians who dogmalize thus find it more and more impossible, as our acquaintance with the warring interests of the world's parts grows more concrete, to imagine what the one climacteric purpose may possibly be like. We see indeed that certain evils minister to ulterior goods, that the bitter makes the cocktail better, and that a bit of danger or hardship puts us agreeably to our trumps. We can vaguely generalize this into the doctrine that all the evil in the universe is but instrumental to its greater perfection. But the scale of the evil actually in sight defies all human tolerance; and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in the pages of a Bradley or a Royce, brings us no farther than the book of Job did—God's ways are not our ways, so let us put our hands upon our mouth. A God who can relish such superfluities of horror is no God for human beings to appeal to. His animal spirits are too high. In other words the “Absolute” with his one purpose, is not the man-like God of common people.

无论是谁提出了绝对目的论的统一性主张，认为存在一个统一的目的，宇宙每个细节都服从于这个目的，那么这个人就要自行承担武断推理的风险。随着我们对世界各部分利益相冲突的情况越来越熟悉，武断教条的神学家因此会发现越来越难以想象，这个统一的关键性目的会是怎样的一种目的。我们的确看到，某一些恶有助于最终的善；苦的味道会使鸡尾酒更美味，而少许危险或困难会使我们更愉快地接受胜利。我们可以把这些模糊地概括成这样一个理论，即宇宙中所有的恶只是为了使宇宙更加完善的工具。但是，我们所见到的恶的程度，事实上超出了所有人的容忍程度；在一位名叫布拉德利或者罗

伊斯所写的著作里提到的先验唯心主义，对此的解释和《约伯记》一样，也没能使我们更明白一些——上帝的做法不是我们的做法，所以我们还是捂住我们的嘴，不要乱说。一个能喜欢如此多恐怖事物的上帝，不是人类所景仰的上帝。这样的上帝动物性的血气太盛。换言之，只有唯一目的的“上帝”不是普通人心目中类人的上帝。

7．AESTHETIC UNION among things also obtains, and is very analogous to ideological union. Things tell a story. Their parts hang together so as to work out a climax. They play into each other's hands expressively. Retrospectively, we can see that altho no definite purpose presided over a chain of events, yet the events fell into a dramatic form, with a start, a middle, and a finish. In point of fact all stories end; and here again the point of view of a many is that more natural one to take. The world is full of partial stories that run parallel to one another, beginning and ending at odd times. They mutually interlace and interfere at points, but we cannot unify them completely in our minds. In following your life-history, I must temporarily turn my attention from my own. Even a biographer of twins would have to press them alternately upon his reader's attention.

七、事物之间也存在审美统一性，它与意识形态统一性非常相似。事物讲述一个故事。事物的各部分拼在一起，就成为故事的高潮。它们明显地相互帮助。回顾一连串的事件，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统领这一连串事件，但事件却像一出戏，有开场，有过程，还有结局。事实上，所有的故事都会结束；这里还是如此，还是采取多元论的观点会更自然一些。世界充满着互相平行发展的、不完整的故事，每个故事开始与结束的时间都不一样。故事与故事之间会时不时地相互交织、相互冲突，但我们却不能把这些故事在思想里完全统一起来。在听你讲述生活经历的时候，我就必须暂时转

移对自己生活经历的注意。就是为双胞胎写传记的作者，也必须根据读者的兴趣，交替讲述两人的经历。

It follows that whoever says that the whole world tells one story utters another of those monistic dogmas that a man believes at his risk. It is easy to see the world's history pluralistically, as a rope of which each fibre tells a separate tale; but to conceive of each cross-section of the rope as an absolutely single fact, and to sum the whole longitudinal series into one being living an undivided life, is harder. We have indeed the analogy of embryology to help us. The microscopist makes a hundred flat cross-sections of a given embryo, and mentally unites them into one solid whole. But the great world's ingredients, so far as they are beings, seem, like the rope's fibres, to be discontinuous cross-wise, and to cohere only in the longitudinal direction. Followed in that direction they are many. Even the embryologist, when he follows the DEVELOPMENT of his object, has to treat the history of each single organ in turn. ABSOLUTE aesthetic union is thus another barely abstract ideal. The world appears as something more epic than dramatic.

因此，如果谁说这整个世界只讲述了一个故事，那他所说的不过又是一个一元论的教条，相信这一教条就要冒风险。从多元角度来看世界的历史比较容易，把历史看成是一根绳子，其中每股纤维都讲述了一个单独的故事；然而要把绳子的每个横断面看成是一个绝对孤立的事实，并把所有纵向的系列事实都综合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就要困难一些。事实上，我们可以借助胚胎学来进行类比。显微镜操作人员给某一个胚胎制作了一百个平面切片，并在思想上把它们统一成一个坚实的整体。但是这个大千世界的各种成分，只要是存在的物体，就好像绳子的纤维一样，似乎横向不连接，而只是纵向连接。顺着那横的方向来看，世界是多元的。即使是胚胎学家，在分析其研究对象的

发展过程时，也必须对单个器官的发展逐一进行研究。这样说来，绝对的审美统一性，又只是一个抽象的理想。世界与其说像戏剧，不如说更像史诗。

So far, then, we see how the world is unified by its many systems, kinds, purposes, and dramas. That there is more union in all these ways than openly appears is certainly true. That there MAY be one sovereign purpose, system, kind, and story, is a legitimate hypothesis. All I say here is that it is rash to affirm this dogmatically without better evidence than we possess at present.

那么，到此为止，我们分析了世界是如何通过其诸多的体系、类别、目的以及故事统一起来的。在所有这些方式中，统一性当然确实比我们表面看到的多一些。也许可能存在某一个最高的目的、系统、类别以及故事，这是一个正当的假设。这里我要说的是，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比目前所掌握的更好的证据之前，便武断地对此进行肯定，是十分轻率的。

8．The GREAT monistic DENKMITTEL for a hundred years past has been the notion of THE ONE KNOWER. The many exist only as objects for his thought—exist in his dream, as it were; and AS HE KNOWS them, they have one purpose, form one system, tell one tale for him. This notion of an ALL-ENVELOPING NOETIC UNITY in things is the sublimest achievement of intellectualist philosophy.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Absolute, as the all-knower is termed, usually say that they do so for coercive reasons, which clear thinkers cannot evade. The Absolute has far-reaching practical consequences, some of which I drew attention in my second lecture. Many kinds of difference important to us would surely follow from

its being true. I cannot here enter into all the logical proofs of such a Being's existence, farther than to say that none of them seem to me sound. I must therefore treat the notion of an All-Knower simply as an hypothesis, exactly on a par logically with the pluralist notion that there is no point of view, no focus of information extant, from which the entire content of the universe is visible at once. “God's consciousness,” says Professor Royce, (The Conception of God, New York, 1897, p. 292.) “forms in its wholeness one luminously transparent conscious moment”—this is the type of noetic unity on which rationalism insists. Empiricism on the other hand is satisfied with the type of noetic unity that is humanly familiar. Everything gets known by SOME knower along with something else; but the knowers may in the end be irreducibly many, and the greatest knower of them all may yet not know the whole of everything, or even know what he does know at one single stroke:—he may be liable to forget. Whichever type obtained, the world would still be a universe noetically. Its parts would be conjoined by knowledge, but in the one case the knowledge would be absolutely unified, in the other it would be strung along and overlapped.

八、近百年来，一元论思想手段的伟大之处在于提出了唯一知者的概念。多元的概念只是作为这唯一知者的思维对象而存在——似乎只存在于他的梦中；根据他对多的了解，多元性拥有统一的目的，形成统一的体系，并为其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事物中存在无所不包的、纯粹理性的统一性的观念是知性论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那些信奉绝对上帝（也就是所谓的全知者）的人常说，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出于不得已的理由，而思维清晰的人无法不注意这些理由。信奉“绝对上帝”所产生的实际后果非常深远，有些我在第二讲里已经提请大家注意了。如果绝对上帝真的存在，这肯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重大的影响。在此，我无法一一讨论所有有关这样一个绝对的神存在的逻辑证据，此外，所有证据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一项是成立的。因此，

我只好把有关存在一个全知者的观点当成是某种假设，并在逻辑上把这种假设相提并论于多元论者的这样一个观点，即不存在某个视角，或者某个现有的信息中心，能使我们一眼看见宇宙的全部内容。罗伊斯教授（《关于上帝的概念》，纽约，1897年版，第292页。）说："对上帝的感悟使得某个光亮透明、让人顿悟的时刻得以完全产生。"——这是理性主义所坚持的一种纯理性的统一性。但实证主义却满足于人类所熟知的那种理性统一性。每一事物一开始连同其他事物被某一个知者所了解；但最后会有很多人了解这一事物，而且人数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而其中最伟大的知者也不可能全面了解每一件事物，甚至于不可能一下子就了解他现在所知道的事物——因为他有可能会忘记。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理性统一性，世界还是一个纯理性的宇宙。世界各部分可以由知识统一起来，不过，在一种情况下，知识有可能是绝对统一的，但在另一种情况下，知识却有可能是贯穿而重叠在一起的。

The notion of one instantaneous or eternal Knower—either adjective here means the same thing—is, as I said, the great intellectualist achievement of our time. It has practically driven out that conception of "Substance" which earlier philosophers set such store by, and by which so much unifying work used to be done—universal substance which alone has being in and from itself, and of which all the particulars of experience are but forms to which it gives support. Substance has succumbed to the pragmatic criticisms of the English school. It appears now only as another name for the fact that phenomena as they come are actually grouped and given in coherent forms, the very forms in which we finite knowers experience or think them together. These forms of conjunction are as much parts of the tissue of experience as are the terms which they connect; and it is a great pragmatic achievement for recent idealism to have made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in these directly representable ways instead of drawing its unity from the 'inherence'

of its parts—whatever that may mean—in an unimaginable principle behind the scenes.

我曾说过，认为存在一个瞬间或永恒知者的观念——瞬间与永恒这两个形容词在这里指的是一回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性论者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种观念实际上把早期哲学家们如此重视的“实体”的概念一扫而空，过去，许多事物常常借助于实体这个概念得以统一——因为一般实体本身就有存在，并能衍生存在；其中，经验的各项细节只是实体所支持的形式。实体的概念现已向英国学派从实用主义角度对其进行的批判表示服从。现在，实体似乎只是这样一个事实的别名，即现象实际上是按类并以一致的形式出现的；我们这些有限的知者正是以一致的形式对现象进行统一体验或思考。这些统一的形式是经验的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它们统一起来的条件；近来唯心主义在实用主义方面取得的一个伟大成就，即是以这些直接、可表示的方法把世界统一起来，而不是秘密地按照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则来寻找世界各部分“内在的统一性”——不管所谓的内在性指的是什么。

“The world is one,” therefore, just so far as we experience it to be concatenated, one by as many definite conjunctions as appear. But then also NOT one by just as many definite DISjunctions as we find. The oneness and the manyness of it thus obtain in respects which can be separately named. It is neither a universe pure and simple nor a multiverse pure and simple. And its various manners of being one suggest, for their accurate ascertainment, so many distinct programs of scientific work.

因此，“世界是一元的”，其统一的程度只不过是指我们经验所见到的统一而已，其一元性只不过是因为出现了这么多明确的统一现象。但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说世界不是一元的，仅仅因为我们发现还

存在这么多明确的不统一现象。所以，世界的一元性抑或多元性，可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分别命名。世界既不是纯粹的一元宇宙，也不是纯粹的多元宇宙。世界统一起来的方式多种多样，这表明，为了准确查明这些方式，我们有必要进行多种不同的科学研究工作。

Thus the pragmatic question “What is the oneness known-as? What practical difference will it make?” saves us from all feverish excitement over it as a principle of sublimity and carries us forward into the stream of experience with a cool head. The stream may indeed reveal far more connexion and union than we now suspect, but we are not entitled on pragmatic principles to claim absolute oneness in any respect in advance.

因此，实用主义所提出的问题，即“我们所了解的一元性是什么？一元性会产生怎样的实际影响？”能使我们不把一元性看作崇高的理论且狂热激动，并让我们以冷静的头脑走进经验的河流。经验之流确实可能会揭示更多的关联与统一性的存在，关联与统一性之多可能超出了我们目前的想象；但是，根据实用主义的原则，我们无权提前宣称任何方面具有绝对的统一性。

It is so difficult to see definitely what absolute oneness can mean, that probably the majority of you are satisfied with the sober attitude which we have reached. Nevertheless there are possibly some radically monistic souls among you who are not content to leave the one and the many on a par. Union of various grades, union of diverse types, union that stops at non-conductors, union that merely goes from next to next, and means in many cases outer nextness only, and not a more internal bond, union of concatenation, in short; all that sort of thing seems to you a halfway

stage of thought. The oneness of things, superior to their manyness, you think must also be more deeply true, must be the more real aspect of the world. The pragmatic view, you are sure, gives us a universe imperfectly rational. The real universe must form an unconditional unit of being, something consolidated, with its parts co-implicated through and through. Only then could we consider our estate completely rational. There is no doubt whatever that this ultra-monistic way of thinking means a great deal to many minds. “One Life, One Truth, One Love, One Principle, One Good, One God”—I quote from a Christian Science leaflet which the day's mail brings into my hands—beyond doubt such a confession of faith has pragmatically an emotional value, and beyond doubt the word “one” contributes to the value quite as much as the other words. But if we try to realize INTELLECTUALLY what we can possibly MEAN by such a glut of oneness we are thrown right back upon our pragmatistic determinations again. It means either the mere name One, the universe of discourse; or it means the sum total of all the ascertainable particular conjunctions and concatenations; or, finally, it means some one vehicle of conjunction treated as all-inclusive, like one origin, one purpose, or one knower. In point of fact it always means one KNOWER to those who take it intellectually today. The one knower involves, they think, the other forms of conjunction. His world must have all its parts co-implicated in the one logical-aesthetical-teleological unit-picture which is his eternal dream.

要明确了解绝对一元性的意义是如此困难，也许你们大多数人会对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冷静态度感到满意。不过，你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彻底的一元论者，不愿意同等看待一元性与多元性。不同程度的统一，不同类型的统一，在非导体前停止了的统一，只限于从一个事物过渡到另一个事物的统一，在许多情况下指的只是外围的统一，而不

是更内在的统一，简而言之，就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事物的统一性；所有这些，在你们看来，只是一个思想中途站。你们认为，事物的一元性胜过其多元性，也一定更正确，一定是世界更真实的一面。你们确信，实用主义的观点只会给我们一个不完全合理的宇宙。真实的宇宙一定会形成一个无条件的存在单位，某个统一实体，其各部分之间紧密相关。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认为我们所处的宇宙是完全合理的。毫无疑问，这种极端一元论的思想，对许多人有很大的影响。“一个生命，一个真理，一种爱，一个原则，一个善，一个上帝”——我引用今天邮局送来的基督教科学派的一份传单中的一句话——这种信仰告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无疑具有某种感情价值，这里的“一”字对于表达这种情感的作用与其他字一样大。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理性地了解这一大堆的“一”字究竟可能有什么意义，我们就马上又回归到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法了。它可以只指“一”这个专门名词，也就是指论域；或可以指一切可确定的特殊统一性和连贯性的总体；或最后还可以指一个被当成是无所不包的统一性的媒介物，如一个起源，一个目的，或一个知者。事实上，在今天那些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的人们看来，“一”永远指的是一个知者。他们认为，这一个知者就包括其他一些统一形式。这个唯一知者的世界，其各部分一定互相交错在一个合乎逻辑的、美学的、目的论的单元图像里，这是他永恒的梦想。

The character of the absolute knower's picture is however so impossible for us to represent clearly, that we may fairly suppose that the authority which absolute monism undoubtedly possesses, and probably always will possess over some persons, draws its strength far less from intellectual than from mystical grounds. To interpret absolute monism worthily, be a mystic. Mystical states of mind in every degree are shown by history, usually tho not always, to make for the monistic view. This is no proper occasion to enter upon the general subject of mysticism, but I will quote one mystical pronouncement to show just what I mean. The paragon of all monistic systems is the Vedanta philosophy of Hindostan, and the

paragon of Vedantist missionaries was the late Swami Vivekananda who visited our shores some years ago. The method of Vedantism is the mystical method. You do not reason, but after going through a certain discipline YOU SEE, and having seen, you can report the truth. Vivekananda thus reports the truth in one of his lectures here:

但是，这绝对知者的图像特征，我们怎么也无法清楚地进行描绘，因此我们可以设想，绝对一元论对一些人之所以具有权威性，而且可能具有永久权威性，与其说是出于理性的原因，远不如说是出于神秘主义的原因。要恰当地诠释绝对一元论，那就得成为神秘主义者。历史表明，各种不同程度的神秘主义思想，常常——尽管并不总是如此——会导致一元论观点的产生。今天不是讨论神秘主义一般性问题的时候，但我还是想引用一段神秘主义的观点来说明我的意思。所有一元论哲学体系的典范是印度的吠檀多哲学，而吠檀多哲学追随者的典范则是已故的维韦卡南达大师，几年前他曾访问过我国。吠檀多哲学的方法就是神秘主义的方法。按这种方法，你可以不经思辨，只要经过一定修行，你就会有所见，而既然已经有所见，就能传达真理。维韦卡南达在我国所做的一次讲演中，这样传达了真理：

“Where is any more misery for him who sees this Oneness in the Universe…this Oneness of life, Oneness of everything? ….This separation between man and man, man and woman, man and child, nation from nation, earth from moon, moon from sun, this separation between atom and atom is the cause really of all the misery, and the Vedanta says this separation does not exist, it is not real. It is merely apparent, on the surface. In the heart of things there is Unity still. If you go inside you find that Unity between man and man, women and children, races and races, high and low, rich and poor, the gods and men: all are One, and animals too, if you go deep enough, and he who has attained to that has no more

delusion…. Where is any more delusion for him? What can delude him? He knows the reality of everything, the secret of everything. Where is there any more misery for him? What does he desire? He has traced the reality of everything unto the Lord, that centre, that Unity of everything, and that is Eternal Bliss, Eternal Knowledge, Eternal Existence. Neither death nor disease, nor sorrow nor misery, nor discontent is there … in the centre, the reality, there is no one to be mourned for, no one to be sorry for. He has penetrated everything, the Pure One, the Formless, the Bodiless, the Stainless, He the Knower, He the Great Poet, the Self-Existent, He who is giving to everyone what he deserves.”

“一个人要是见到了这个宇宙中的统一体……这个生命的统一体，万物的统一体，他哪里还会有什么苦痛呢？……这种人与人之间、男与女之间、成人与儿童之间、国与国之间、地球与月亮之间、月亮与太阳之间的隔离，这种原子与原子之间的隔离，是一切苦痛的真正原因，吠檀多哲学认为，这种隔离并不存在，并不真实。这种隔离只是外在的、表面的隔离。事物的内部仍然存在‘统一性’。如果你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你会发现人与人、妇女与儿童、种族与种族、高与低、贫与富、神与人之间的统一性：万物都是统一的，如果你足够深入，你会发现兽类也是如此。一个人如果到达了这般境地，就不再会有任何迷惑了……他还会有什么迷惑呢？什么还能迷惑他呢？他明白了万物存在的本质，万物存在的秘密。对他而言，还有什么苦痛呢？他还有什么欲望呢？他把万物存在的本质归结为上帝的存在，归结为那个中心，那个万物的统一体，上帝即是永恒的幸福，永恒的知识，永恒的存在。那里没有死亡、疾病、悲伤、痛苦，也没有不满……在那个中心，即终极实在，我们不需要为别人哀悼，也不需要为别人难过。他渗透在万事万物之中，是纯粹的统一体，无固定的形式，无固定的形体，一尘不染，他是知者，他是伟大的诗人，他独立存在，他给每个人所应得的东西。”

Observe how radical the character of the monism here is. Separation is not simply overcome by the One, it is denied to exist. There is no many. We are not parts of the One; It has no parts; and since in a sense we undeniably ARE, it must be that each of us is the One, indivisibly and totally. AN ABSOLUTE ONE, AND I THAT ONE—surely we have here a religion which, emotionally considered, has a high pragmatic value; it imparts a perfect sumptuosity of security. As our Swami says in another place:

请看，这里一元论的性质是多么彻底。一体不仅仅只是克服了隔离问题，还否认了隔离的存在。多元性绝对不存在。我们不是统一体中的各个部分；统一体不可能分成各个部分；但既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不可否认地属于这个统一体的各个部分，那么我们每个人一定就是这个统一体，不可分割并完全统一。一个绝对的统一体，而我就是那个统一体——当然，这就成了某种宗教，从情感上看，宗教具有高度的实用主义价值；它给我们一种奢侈而且彻底的安全感。正如我们的哲人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在另一处所说的一样：

“When man has seen himself as one with the infinite Being of the universe, when all separateness has ceased, when all men, all women, all angels, all gods, all animals, all plants, the whole universe has been melted into that oneness, then all fear disappears. Whom to fear? Can I hurt myself? Can I kill myself? Can I injure myself? Do you fear yourself? Then will all sorrow disappear. What can cause me sorrow? I am the One Existence of the universe. Then all jealousies will disappear; of whom to be jealous? Of myself? Then all bad feelings disappear. Against whom will I have this bad feeling? Against myself? There is none in the universe but me…. Kill out this differentiation; kill out this superstition that there are many. He who, in this world of many, sees that One; he who in this

mass of insentiency sees that One Sentient Being; he who in this world of shadow catches that Reality, unto him belongs eternal peace, unto none else, unto none else.”

“当一个人把自己当成是宇宙存在的无限统一体时，当一切的隔离都已停止，当所有的男人、所有的女人、所有的天使、所有的神灵、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整个宇宙都融合成一体时，一切恐怖就都消失了。还害怕谁呢？我能让自己痛苦吗？我能杀死自己吗？我能伤害我自己吗？你害怕你自己吗？那么，一切悲伤都将消失。什么还能使我悲伤呢？我是宇宙的统一存在。那么，一切嫉妒都将消失；嫉妒谁呢？嫉妒我自己吗？那么，一切不满都将消失。我会对谁不满呢？对我自己不满吗？整个宇宙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其他人……消除这种区别；消除对于多元性存在的迷信。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谁看到了那个统一体；在这无情的人群中，谁看到了那个有情的统一体；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谁抓住了那个终极实在，永远的安宁就将属于他，决不属于别人，决不属于别人。”

We all have some ear for this monistic music: it elevates and reassures. We all have at least the germ of mysticism in us. And when our idealists recite their arguments for the Absolute, saying that the slightest union admitted anywhere carries logically absolute Oneness with it, and that the slightest separation admitted anywhere logically carries disunion remediless and complete, I cannot help suspecting that the palpable weak places in the intellectual reasonings they use are protected from their own criticism by a mystical feeling that, logic or no logic, absolute Oneness must somehow at any cost be true. Oneness overcomes MORAL separateness at any rate. In the passion of love we have the mystic germ of what might mean a total union of all sentient life. This mystical germ wakes up in us on hearing the monistic

utterances, acknowledges their authority, and assigns to intellectual considerations a secondary place.

这种悦耳的一元论论调，我们都爱听：它不但鼓舞人心，还让人安心。至少，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藏有神秘主义思想的种子。我们的唯心主义者为“绝对上帝”进行反复辩护的时候，说无论在何处，只要承认有一点点的统一性存在，便在逻辑上带有了绝对一元性的意义；无论在何处，只要承认有一点点的隔离存在，便在逻辑带有了不可挽救的、彻底的非统一性的意义。我不禁怀疑，唯心主义者使用的思维推理方法中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弱点，是否因为有了一种神秘主义的感觉——绝对的一元性，即不论其合乎逻辑与否，无论如何总是真的——才使他们免于受到自我的批判。一元性总是能克服道义上的隔离。在这种敬慕上帝的激情里，就孕育了神秘主义的种子，可能意味着一切有情众生的完全统一。听到了一元论者的言论之后，我们心中这个神秘主义的种子就苏醒了，对一元论者的权威性表示认可，并把理性的考虑降到了次要的地位。

I will dwell no longer on these religious and moral aspects of the question in this lecture. When I come to my final lecture there will be something more to say.

对于一元与多元这个问题的宗教以及道德方面，在这一讲里，我不再详谈了。这个问题，在最后一讲我还要谈。

Leave then out of consideration for the moment the authority which mystical insights may be conjectured eventually to possess; treat the problem of the One and the Many in a purely intellectual way; and we see clearly enough where pragmatism stands. With her

criterion of the practical differences that theories make, we see that she must equally abjure absolute monism and absolute pluralism. The world is one just so far as its parts hang together by any definite connexion. It is many just so far as any definite connexion fails to obtain. And finally it is growing more and more unified by those systems of connexion at least which human energy keeps framing as time goes on.

接下来，且不考虑神秘主义观点可能最终具有的权威性，让我们用纯理性的方法来处理一元与多元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足够清楚地看到实用主义所处的位置。根据实用主义的标准，不同的理论应该产生实际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实用主义一定会同时屏弃绝对一元论与绝对多元论。世界是一元的，但只限于指世界各个部分因为任何确定的关系而统一起来。世界是多元的，但只限于指世界各个部分不可能都存在确定的关系。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少是借着人类不断努力而建立的关系网，世界正日益统一起来。

It is possible to imagine alternative universes to the one we know, in which the most various grades and types of union should be embodied. Thus the lowest grade of universe would be a world of mere WITHNESS, of which the parts were only strung together by the conjunction “and.” Such a universe is even now the collection of our several inner lives. The spaces and times of your imagination, the objects and events of your day-dreams are not only more or less incoherent inter se, but are wholly out of definite relation with the similar contents of anyone else's mind. Our various reveries now as we sit here compenetrate each other idly without influencing or interfering. They coexist, but in no order and in no receptacle, being the nearest approach to an absolute 'many' that we can conceive. We cannot even imagine any reason why they

SHOULD be known all together, and we can imagine even less, if they were known together, how they could be known as one systematic whole.

可以想象，除了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宇宙，还存在另外的宇宙，在这些宇宙中所呈现的统一性，都应具有最复杂多样的等级及类型。这样，最低级的宇宙就可能由一个只存在与这种关系的世界组成，那里的各部分之间只用连词“和”来进行连接。这样一个宇宙，即便到现在，也还是我们个别内心精神世界的集合体。你们想象中的空间与时间，白日梦里的对象与发生的事件，不仅彼此之间多少有些不够连贯，而且与他人脑海里想象的相似内容也完全没有一定的关联。现在我们坐在这里，我们的多种幻想只是随意地交错，相互不影响或干涉。这些幻想同时共存，但绝不是有序的，也绝不在同一个空间，这种共存性是用来解释我们所能想象的绝对“多元性”的最佳方法。我们甚至想象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必须把这些幻想当成一个整体来加以了解，我们更加不能想象，即便是把这些幻想当成了一个整体，那么又是如何把它当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呢？

But add our sensations and bodily actions, and the union mounts to a much higher grade. Our auditaet visa and our acts fall into those receptacles of time and space in which each event finds its date and place. They form “things” and are of “kinds” too, and can be classed. Yet we can imagine a world of things and of kinds in which the causal interactions with which we are so familiar should not exist. Everything there might be inert towards everything else, and refuse to propagate its influence. Or gross mechanical influences might pass, but no chemical action. Such worlds would be far less unified than ours. Again there might be complete physico-chemical interaction, but no minds; or minds, but altogether private ones, with no social life; or social life limited to

acquaintance, but no love; or love, but no customs or institutions that should systematize it. No one of these grades of universe would be absolutely irrational or disintegrated, inferior tho it might appear when looked at from the higher grades. For instance, if our minds should ever become “telepathically” connected, so that we knew immediately, or could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know immediately, each what the other was thinking, the world we now live in would appear to the thinkers in that world to have been of an inferior grade.

但是，加上我们的感觉和身体的动作，这种统一性的级别就高出了许多。我们的听觉、视觉，以及行动都归入到时间与空间这两个容器里，每一个事件都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日期与地点。它们成为“事物”，被归为“类别”，并能分成不同的等级。但是我们也能够想象一个事物和类别的世界，其中并不存在我们所熟知的因果关系。在那个世界里，任一事物对另一事物可能都不会产生作用，并且不产生影响。或者有可能会产生粗略的机械影响，但绝不会发生化学作用。这样的世界远不如我们的世界那样统一。同样的，也可能存在充分的理化反应，但绝不存在思想；或者即便存在思想，但都只是个人的思想，不具有社会影响力；或者即便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其社会影响力也只限于熟人之间，但没有爱；或者即便有了爱，也没有一定的习俗或制度来使其系统化。所有这些不同等级的宇宙，自较高等级看来，虽看似较低一等，但没有一个是绝对不合理的或者支离破碎的世界。例如，如果我们的思想能够通过“心灵感应”而彼此联系起来，使我们每人能够立刻知道，或者在某些情形下立刻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对于那个世界的思想家们来说，就是个低级的世界。

With the whole of past eternity open for our conjectures to range in, it may be lawful to wonder whether the various kinds of

union now realized in the universe that we inhabit may not possibly have been successively evolved after the fashion in which we now see human systems evolving in consequence of human needs. If such a hypothesis were legitimate, total oneness would appear at the end of things rather than at their origin. In other words the notion of the “Absolute” would have to be replaced by that of the “Ultimate.” The two notions would have the same content—the maximally unified content of fact, namely—but their time-relations would be positively reversed. (Compare on the Ultimate, Mr. Schiller's essay “Activity and Substance,” in his book entitled Humanism, p. 204.)

既然一切的过往都可供我们的想象去驰骋，那也许对下面这个问题表示疑惑是合理的：我们今天所能看见的人类体系，都是根据人类需要以某种方式发展的，那么我们所处的宇宙里已实现的多种统一是否可能不是按照这种方式继续发展下去的呢？如果这种疑惑是合理的，那么完全的统一就可能出现在事物的终了，而不是事物的起源。换言之，“绝对”的概念必将由“终极”这个概念所替代。这两个概念就会有同样的内涵——即现象内容最大限度的统一——但它们的时间关系却恰恰相反。（参看席勒《人本主义》第204页“活动与本体”一文中“终极”的概念。）

After discussing the unity of the universe in this pragmatic way, you ought to see why I said in my second lecture, borrowing the word from my friend G. Papini, that pragmatism tends to UNSTIFFEN all our theories. The world's oneness has generally been affirmed abstractly only, and as if anyone who questioned it must be an idiot. The temper of monists has been so vehement, as almost at times to be convulsive; and this way of holding a doctrine does not easily go with reasonable discussion and the drawing of

distinctions. The theory of the Absolute, in particular, has had to be an article of faith, affirmed dogmatically and exclusively. The One and All, first in the order of being and of knowing, logically necessary itself, and uniting all lesser things in the bonds of mutual necessity, how could it allow of any mitigation of its inner rigidity? The slightest suspicion of pluralism, the minutest wiggle of independence of any one of its parts from the control of the totality, would ruin it. Absolute unity brooks no degrees—as well might you claim absolute purity for a glass of water because it contains but a single little cholera-germ. The independence, however infinitesimal, of a part, however small, would be to the Absolute as fatal as a cholera-germ.

用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对宇宙的统一性问题进行讨论之后，你们应当可以明白，为什么我要在第二讲里借用我的朋友G. 帕皮尼的话，说实用主义倾向于使我们所有的理论变得灵活了。世界的统一性已经抽象地得到普遍认可，好像如果有人对此表示怀疑，那他一定是个傻子。一元论者的脾气很暴躁，时不时还要发一通脾气，以这样的态度持有一种理论，是很难与他就不同之处进行理性的探讨及分析的。尤其是有关绝对上帝的理论，居然不得不被当成一种信仰，得到武断的、排他性的肯定。“一”与“全”，居于存在及认识的首位，本身在逻辑上具有必要性，并把所有次要事物都统一在相互需要的关系网中，这个“一”与“全”怎能容许其内部的严密性有任何减损呢？多元论的丝毫怀疑，任何一个组成部分要摆脱总体的约束而产生最微小的摇摆，都会毁了这个“一”与“全”。绝对的统一是一丝不苟的——就好像一杯水，只要含有一个小小的霍乱病菌，就不能说它是绝对纯洁的了。一个部分，不论是多么小的一个部分，它的独立，不论是多么微乎其微的独立，对于绝对论来说，就好像霍乱病菌一样，是非常致命的。

Pluralism on the other hand has no need of this dogmatic

rigoristic temper. Provided you grant SOME separation among things, some tremor of independence, some free play of parts on one another, some real novelty or chance, however minute, she is amply satisfied, and will allow you any amount, however great, of real union. How much of union there may be is a question that she thinks can only be decided empirically. The amount may be enormous, colossal; but absolute monism is shattered if, along with all the union, there has to be granted the slightest modicum, the most incipient nascency, or the most residual trace, of a separation that is not 'overcome.'

但是，多元主义却不需要这种专断的、严峻的气质。只要你们允许事物中存在某种隔离，某种独立的颤动，某种部分与部分之间自由的活动，某种真正的创新或机缘，即使是很微小的，多元论便十分满足了，并将允许你们拥有真正的统一，而不管统一的程度有多大。至于究竟该有多大程度的统一，多元论者认为唯有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才能解决。统一的程度也许非常大，异常大；但是，如果一切的统一都得允许有最少量的、最初期的、或者还残留一点痕迹的、未被完全“克服”的隔离，那么绝对一元论便被粉碎了。

Pragmatism, pending the final empirical ascertainment of just what the balance of union and disunion among things may be, must obviously range herself upon the pluralistic side. Some day, she admits, even total union, with one knower, one origin, and a universe consolidated in every conceivable way, may turn out to be the most acceptable of all hypotheses. Meanwhile the opposite hypothesis, of a world imperfectly unified still, and perhaps always to remain so, must be sincerely entertained. This latter hypothesis is pluralism's doctrine. Since absolute monism forbids its being even considered seriously, branding it as irrational from the start, it is

clear that pragmatism must turn its back on absolute monism, and follow pluralism's more empirical path.

事物的统一性与非统一性之间的平衡是什么，在未经最后的实证确定之前，实用主义显然肯定是站在多元论这一边的。实用主义承认，将来有一天，甚至完全的统一——一个知者，一种起源，以及一个千方百计联合成一体的宇宙——也许会成为所有假说中最能被人接受的一种假设。同时，我们也必须真诚地接受那个相反的假设，世界还不是完全统一的，并可能永远保持这种不完全统一的状态。这后一种假设就是多元主义的理论。既然绝对一元论甚至禁止人们对多元性进行严肃的思考，从一开始就说多元论是不合理的，那么，实用主义显然必定会背弃绝对一元论，而走上多元论更具经验成分的道路。

This leaves us with the common-sense world, in which we find things partly joined and partly disjoined. “Things,” then, and their “conjunctions”—what do such words mean, pragmatically handled? In my next lecture, I will apply the pragmatic method to the stage of philosophizing known as Common Sense.

这就使我们归于常识的世界，在那里我们看到，事物部分是一体的，部分是分离的。那么，“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关联”——这样的名词，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怎么把握其意义呢？在下一讲里，我要把实用主义的方法运用到哲学推理所谓的“常识”的阶段。

Lecture V Pragmatism and Common Sense

第五讲　实用主义与常识

NOETIC PLURALISM. HOW OUR KNOWLEDGE GROWS. EARLIER WAYS OF THINKING REMAIN. PREHISTORIC ANCESTORS DISCOVERED THE COMMON SENSE CONCEPTS. LIST OF THEM. THEY CAME GRADUALLY INTO USE. SPACE AND TIME. “THINGS.” KINDS. “CAUSE” AND “LAW.” COMMON SENSE ONE STAGE IN MENTAL EVOLUTION, DUE TO GENIUSES. THE “CRITICAL” STAGES: 1) SCIENTIFIC AND 2) PHILOSOPHIC, COMPARED WITH COMMON SENSE. IMPOSSIBLE TO SAY WHICH IS THE MORE “TRUE.”

纯理智多元论。我们的知识如何增长。早期的思维方式还在。史前的祖先发现了常识性概念。常识的列表。常识逐渐得到应用。时间与空间。“事物”。种类。“原因”与“规律”。常识是思维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归因于天才人物的出现。与常识性阶段相比较，“批判性”阶段有：（1）科学性的，以及（2）哲学性的。不可能说出哪一种思维方式更“真实”。

In the last lecture we turned ourselves from the usual way of talking of the universe's oneness as a principle, sublime in all its blankness, towards a study of the special kinds of union which the universe enfolds. We found many of these to coexist with kinds of separation equally real. “How far am I verified?” is the question which each kind of union and each kind of separation asks us here, so as good pragmatists we have to turn our face towards experience,

towards “facts.”

在上一讲里，我们摒弃了通常把宇宙的一元性作为一种原则的说法（这一说法貌似崇高，但却极其空洞），转而研究宇宙所包含的种种特殊的统一现象。我们发现这些统一现象有许多，与同样真实存在的种种隔离现象并存。“我在多大程度上被证实？”这是每一种类型的统一以及每一种类型的隔离在此都会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因此，作为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我们就得面向经验，面向“事实”。

Absolute oneness remains, but only as an hypothesis, and that hypothesis is reduced nowadays to that of an omniscient knower who sees all things without exception as forming one single systematic fact. But the knower in question may still be conceived either as an Absolute or as an Ultimate; and over against the hypothesis of him in either form the counter-hypothesis that the widest field of knowledge that ever was or will be still contains some ignorance, may be legitimately held. Some bits of information always may escape.

绝对一元性依然存在，但仅仅作为一个假设而存在，而且这一假设现已简化为一个全能知者的假设，这位全能知者认为，一切事物无一例外都可成为一个单一系统化的事实。但是，这里所论的全能知者仍然可能被理解为一个绝对的或终极的知者；针对这种全能知者的假设，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全能知者，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出这样一个反假设：过去或将来最广阔的知识领域中，仍然还有一些人所不知的地方。总有些知识，人们未曾掌握。

This is the hypothesis of NOETIC PLURALISM, which monists

consider so absurd. Since we are bound to treat it as respectfully as noetic monism, until the facts shall have tipped the beam, we find that our pragmatism, tho originally nothing but a method, has forced us to be friendly to the pluralistic view. It MAY be that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are connected so loosely with some other parts as to be strung along by nothing but the copula AND. They might even come and go without those other parts suffering any internal change. This pluralistic view, of a world of ADDITIVE constitution, is one that pragmatism is unable to rule out from serious consideration. But this view leads one to the farther hypothesis that the actual world, instead of being complete "eternally," as the monists assure us, may be eternally incomplete, and at all times subject to addition or liable to loss.

这即是纯理性多元论的假设，而一元论者认为这种假设十分荒谬。既然在事实给出定论之前我们必须像尊重纯理性一元论一样尊重纯理性多元论，我们发现，原本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实用主义，已经迫使我们采取友善的态度来对待多元论的观点。可能的情况是世界某些部分和其他部分之间的关联非常松散，仅用和这个连接词就可表示其间的关联。这些部分甚至可以来去自由，而不使其他那些部分产生任何内部变化。这种多元论观点，即世界是叠加组成的观点，实用主义不能不认真予以考虑。不过，这种观点使我们做出更进一步的假设：真实的世界，并不像一元论者为我们保证的那样是"永远"完整的，真实的世界有可能永远不完整，并随时都可能有所增损。

It IS at any rate incomplete in one respect, and flagrantly so. The very fact that we debate this question shows that our KNOWLEDGE is incomplete at present and subject to addition. In respect of the knowledge it contains the world does genuinely change and grow. Some general remarks on the way in which our

knowledge completes itself—when it does complete itself—will lead us very conveniently into our subject for this lecture, which is “Common Sense.”

真实的世界至少在某一个方面是不完整的，而且显然是不完整的。我们还在为这一问题而争论，这一事实恰恰就说明了我们的知识目前还不完整，有增加的可能。从所包含的知识这一方面来说，世界的确是在变化与增长。对于我们的知识是如何完备起来的问题——在知识的确获得了自身完备的时候——作一些概括性的论述会很顺利地引导我们进入这一讲的主题。这一讲的主题是“常识”。

To begin with, our knowledge grows IN SPOTS. The spots may be large or small, but the knowledge never grows all over: some old knowledge always remains what it was. Your knowledge of pragmatism, let us suppose, is growing now. Later, its growth may involve considerable modification of opinions which you previously held to be true. But such modifications are apt to be gradual. To take the nearest possible example, consider these lectures of mine. What you first gain from them is probably a small amount of new information, a few new definitions, or distinctions, or points of view. But while these special ideas are being added, the rest of your knowledge stands still, and only gradually will you “line up” your previous opinions with the novelties I am trying to instil, and modify to some slight degree their mass.

首先，我们的知识增长是点点滴滴的。知识增长点或大或小，但知识决不会全面增长起来：有些旧知识总是保持不变。让我们设想一下，你们关于实用主义的知识现在在不断增长。随后，这种知识的增长，可能会极大地改变你以前认为是真实的观点。但是这种改变往往

比较缓慢。举个最现成的例子，想想我的这些讲座吧。你们最初从这些讲座中获得的，可能只是少量的新信息，几个新的定义、或者特征、或者观点。但是，当这些特殊的观点不断增加时，你们所拥有的其他知识仍然保持不变，你们只是逐渐把旧有的观点与我所努力灌输的新观点加以“整理”，并在总体上稍加变化而已。

You listen to me now, I suppose, with certain prepossessions as to my competency, and these affect your reception of what I say, but were I suddenly to break off lecturing, and to begin to sing “We won't go home till morning” in a rich baritone voice, not only would that new fact be added to your stock, but it would oblige you to define me differently, and that might alter your opinion of the pragmatic philosophy, and in general bring about a rearrangement of a number of your ideas. Your mind in such processes is strained, and sometimes painfully so, between its older beliefs and the novelties which experience brings along.

我想，你们现在听我演讲的时候，对我的能力带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这些偏见影响了你们对我的演讲的接受；但是，如果我忽然中断演讲，而开始用浑厚的男中音唱起了《我们不到天亮不回家》这首歌，这一新情况不仅会被加入你们已有的知识，而且可能会使你们对我进行不同的定义，这有可能会改变你们对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并大概会使你们对许多已有的观点重新进行整理。在这些过程中，你们的思想比较紧张，有时还非常痛苦，在旧有的信仰与从经验中得来的新观点之间进行挣扎。

Our minds thus grow in spots; and like grease-spots, the spots spread. But we let them spread as little as possible: we keep unaltered as much of our old knowledge, as many of our old

prejudices and beliefs, as we can. We patch and tinker more than we renew. The novelty soaks in; it stains the ancient mass; but it is also tinged by what absorbs it. Our past apperceives and co-operates; and in the new equilibrium in which each step forward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erminates, it happens relatively seldom that the new fact is added RAW. More usually it is embedded cooked, as one might say, or stewed down in the sauce of the old.

我们的思想就是如此一点一点地增长；像油点一样，不断扩大。但我们却尽量限制其扩大的范围：我们尽一切可能保留旧有的知识、偏见及信仰。我们做的修修补补的工作要多于更新的工作。新思想渗入了，它玷污了所有的旧思想，但新思想也被吸收它的旧思想所玷污。我们过去的经验起着统觉与协调的作用；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每向前迈进一步而所达到的新的稳定状态里，新事物很少是生硬地加进去的。可以说更常见的是，新事物是煮熟了之后嵌进去的，或者说是以旧事物为作料煮烂了的。

New truths thus are resultants of new experiences and of old truths combined and mutually modifying one another. And since this is the case in the changes of opinion of today, there is no reason to assume that it has not been so at all times. It follows that very ancient modes of thought may have survived through all the later changes in men's opinions. The most primitive ways of thinking may not yet be wholly expunged. Like our five fingers, our ear-bones, our rudimentary caudal appendage, or our other “vestigial” peculiarities, they may remain as indelible tokens of events in our race-history. Our ancestors may at certain moments have struck into ways of thinking which they might conceivably not have found. But once they did so, and after the fact, the inheritance continues. When you begin a piece of music in a certain key, you

must keep the key to the end. You may alter your house ad libitum, but the ground-plan of the first architect persists—you can make great changes, but you cannot change a Gothic church into a Doric temple. You may rinse and rinse the bottle, but you can't get the taste of the medicine or whiskey that first filled it wholly out.

因此，新的真理是新经验与旧真理相结合，并相互影响的产物。既然今天的观点就是这样改变的，那就没有理由假定以往情况一向不是如此。由此可见，非常古老的思维方式，在经历了后来人们观点的所有变化之后，可能还是保留了下来。最原始的思维方式可能并未完全消除。就像我们的五指、耳骨、阑尾或其他“退化”器官一样，它们可能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不可磨灭的标记。我们的祖先也许在某些时候突然发现了某些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他们原本可能发现不了。但是，一旦他们发现了这些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就会一直传承下来。一旦你按照某种调子开始弹奏一首曲子，你就得按照这个调子弹奏到底。你也许可以对你的房屋进行任意改建，但是最初的建筑师的平面设计会被保留下来——你可以大修大改，但却不可能把一座哥特式的教堂变成一座多利克式的寺院。你可以把一个瓶子洗了又洗，但却无法完全消除最初装在这个瓶子里的药品或威士忌酒的气味。

My thesis now is this, that OUR FUNDAMENTAL WAYS OF THINKING ABOUT THINGS ARE DISCOVERIES OF EXCEEDINGLY REMOTE ANCESTORS, WHICH HAVE BEEN ABLE TO PRESERVE THEMSELVES THROUGHOUT THE EXPERIENCE OF ALL SUBSEQUENT TIME. They form one great stage of equilibrium in the human mind's development, the stage of common sense. Other stages have grafted themselves upon this stage, but have never succeeded in displacing it. Let us consider this common-sense stage first, as if it might be final.

现在，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们对待事物的基本思维方式是远古祖先的发现，这些思维方式在经历了此后所有时代的经验之后还能够保存下来。它们成为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稳定阶段，也就是常识性阶段。其他阶段都紧密嫁接在这个阶段之上，但绝不可能取而代之。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这个常识性阶段，并假定其为最终阶段。

In practical talk, a man's common sense means his good judgment, his freedom from excentricity, his GUMPTION, to use the vernacular word. In philosophy it means something entirely different, it means his use of certain intellectual forms or categories of thought. Were we lobsters, or bees, it might be that our organization would have led to our using quite different modes from these of apprehending our experiences. It MIGHT be too (we cannot dogmatically deny this) that such categories, unimaginable by us today, would have proved on the whole as serviceable for handling our experiences mentally as those which we actually use.

一般说来，一个人的常识是指他良好的判断力，指他没有反常之处——用俗话说，就是指他的精明之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常识的意义完全不同，是指一个人对某种思维形式或者思维类型的运用。假如我们是龙虾或者蜜蜂，那么我们身体的构造可能会使我们采取与这个思维形式或类型十分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我们的经验。此外也许有可能，这样一些思维类型，尽管今天我们觉得难以想象，但以这些思维类型来理解我们的经验，也许会被证明与我们现在实际所运用的思维类型大体上同样有用（这一点我们不能武断地加以否认）。

If this sounds paradoxical to anyone, let him think of analytical geometry. The identical figures which Euclid defined by intrinsic

relations were defined by Descartes by the relations of their points to adventitious co-ordinates, the result being an absolutely different and vastly more potent way of handling curves. All our conceptions are what the Germans call denkmittel, means by which we handle facts by thinking them. Experience merely as such doesn't come ticketed and labeled, we have first to discover what it is. Kant speaks of it as being in its first intention a gewuehl der erscheinungen, a rhapsodie der wahrnehmungen, a mere motley which we have to unify by our wits. What we usually do is first to frame some system of concepts mentally classified, serialized, or connected in some intellectual way, and then to use this as a tally by which we “keep tab” on the impressions that present themselves. When each is referred to some possible place in the conceptual system, it is thereby “understood.” This notion of parallel “manifolds” with their elements standing reciprocally in “one-to-one relations,” is proving so convenient nowadays in mathematics and logic as to supersede more and more the older classificatory conceptions. There are many conceptual systems of this sort; and the sense manifold is also such a system. Find a one-to-one relation for your sense-impressions ANYWHERE among the concepts, and in so far forth you rationalize the impressions. But obviously you can rationalize them by using various conceptual systems.

如果有人觉得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就请他想一想解析几何的情况。同样的图形，欧几里德利用内在关系加以界定，笛卡尔却利用图形的点与外加坐标之间的关系加以界定，其结果是他们处理曲线的方法绝对不同，但笛卡尔的方法却要有效得多。我们的一切概念，就是德国人所谓的denkmittel（思想方法），指的是我们通过思考它们来处理事实。这样的经验出现时，并未贴上标签，因此，我们首先要了解这样的经验是什么。康德说，最初的经验是一种现象的混杂，是一种知觉的散漫，完全是一个杂乱的东西，得通过我们的智慧才能将

其统一。我们通常的做法是：首先建立起某个概念体系，我们在思想上以某种思维方式对这些概念进行分类、使之序列化，并相互关联，然后把这一概念体系当作一个计数器，通过这个计数器，我们“记录”下来我们对事物的印象和看法。如果每种印象和看法在这个概念体系里都可能对应有某个位置，这一看法就算是被“了解”了。这种并行的“集合体”与其互相之间存在“一对一关系”的各要素的概念，如今被证明在数学与逻辑学上十分方便，因而逐渐取代了较旧的分类概念。这种概念体系有很多，感觉的集合体也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在概念中间的任何一点上，给你的感觉-印象找出某种一对一的关系，这样你就能对这些印象看法进行合理化的解释了。但是，很明显，你可以利用各种概念体系使这些印象和看法合理化。

The old common-sense way of rationalizing them is by a set of concepts of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are these:

旧有的常识性方法是通过一套概念来使这些印象和看法合理化，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如下：

Thing;

事物；

The same or different;

同或异；

Kinds;

类别；

Minds;

思想；

Bodies;

物体；

One Time;

统一的时间；

One Space;

统一的空间；

Subjects and attributes;

主体与属性；

Causal influences;

因果影响；

The fancied;

幻想；

The real.

实在。

We are now so familiar with the order that these notions have woven for us out of the everlasting weather of our perceptions that we find it hard to realize how little of a fixed routine the perceptions follow when taken by themselves. The word weather is a good one to use here. In Boston, for example, the weather has almost no routine, the only law being that if you have had any weather for two days, you will probably but not certainly have another weather on the third. Weather-experience as it thus comes to Boston, is discontinuous and chaotic. In point of temperature, of wind, rain or sunshine, it MAY change three times a day. But the Washington weather-bureau intellectualizes this disorder by making

each successive bit of Boston weather EPISODIC. It refers it to its place and moment in a continental cyclone, on the history of which the local changes everywhere are strung as beads are strung upon a cord.

这些概念把我们像天气一样接连不断的众多感觉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了排列。现在，我们对这个排序非常熟悉，因此就很难意识到，如果让感觉自己来排序，感觉几乎都不会遵照什么固定的排列顺序。在这里用天气这个词很好。例如，在波士顿，天气几乎没有什么规律，唯一的规律是：如果你已经连续两天遇上了某种天气，到了第三天你很有可能会，不过也不是一定会，遇上另外一种天气。这样出现在波士顿的天气经验是不连续的、混乱的。若论温度、风、雨、或者日照，一天可能有三次变化。但是华盛顿气象局却把波士顿天气连续片断中的每一段，都看成是戏剧中的一个片断，从而把无序的天气理性化了。把每段天气都指向它在大陆气旋中所处的位置与时间，在这个气旋的历史记录上，每个地方的局部天气变化都被串起来，就像穿在一根绳子上的一串珠子那样。

Now it seems almost certain that young children and the inferior animals take all their experiences very much as uninstructed Bostonians take their weather. They know no more of time or space as world-receptacles, or of permanent subjects and changing predicates, or of causes, or kinds, or thoughts, or things, than our common people know of continental cyclones. A baby's rattle drops out of his hand, but the baby looks not for it. It has “gone out” for him, as a candle-flame goes out; and it comes back, when you replace it in his hand, as the flame comes back when relit. The idea of its being a “thing,” whose permanent existence by itself he might interpolate between its successive apparitions has evidently not occurred to him. It is the same with dogs.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with them. It is pretty evident that they have no GENERAL tendency to interpolate “things.” Let me quote here a passage from my colleague G. Santayana's book.

现在，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小孩子以及低等动物对待他们所有的经验，就好像没有听到天气预报的波士顿人对待天气那样。他们不知道作为世界容器的时间与空间，或永恒的主体与不断变化的属性，或原因、种类、思想、事物等等，正如普通人不知道大陆气旋一样。婴孩手上的拨浪鼓掉了下来，但孩子不会去找掉下来的拨浪鼓。对这个孩子来说，拨浪鼓“消失”了，就像烛光灭了一样；你把拨浪鼓又放回到他手里，玩具又回来了，就像又点燃蜡烛，烛光又重现了一样。拨浪鼓是一个“事物”，在其连续的显现之间他完全可能介入这个独立的恒定存在，这种想法，孩子显然是想不到的。狗也是一样。对狗来说，看不见的事物，他们想不到。很明显，狗一般不会认为“事物”永远独立存在。这里，让我引用我的同事乔治·桑塔亚纳书里的一段话：

“If a dog, while sniffing about contentedly, sees afar off his master arriving after long absence…the poor brute asks for no reason why his master went, why he has come again, why he should be loved, or why presently while lying at his feet you forget him and begin to grunt and dream of the chase—all that is an utter mystery, utterly unconsidered. Such experience has variety, scenery, and a certain vital rhythm; its story might be told in dithyrambic verse. It moves wholly by inspiration; every event is providential, every act unpremeditated. Absolute freedom and absolute helplessness have met together: you depend wholly on divine favour, yet that unfathomable agency is not distinguishable from your own life…. (But) the figures even of that disordered drama have their exits and their entrances; and their cues can be gradually discovered by a being capable of fixing his attention and retaining

the order of events…. In proportion as such understanding advances each moment of experience becomes consequential and prophetic of the rest. The calm places in life are filled with power and its spasms with resource. No emotion can overwhelm the mind, for of none is the basis or issue wholly hidden; no event can disconcert it altogether, because it sees beyond. Means can be looked for to escape from the worst predicament; and whereas each moment had been formerly filled with nothing but its own adventure and surprised emotion, each now makes room for the lesson of what went before and surmises what may be the plot of the whole.“(The Life of Reason: Reason in Common Sense, 1905, p. 59.)

“如果一只狗正在满足地四周嗅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他好久不见的主人来了……这可怜的畜生，绝不会问他的主人为什么离开，为什么又回来了，为什么应该爱它的主人，或者为什么现在躺在主人脚边的时候，又把主人给忘了，而开始哼哼起来，梦想着与别的狗嬉戏追逐了——所有这些对狗来说，完全是个谜，它完全没有考虑过。这样的经验有变化，有场景，还有一定生动的节奏；它的故事可用狂热的诗章讲述出来。这种经验全靠灵感演变；其中每件事都好像有神意，每个动作都并非预设。绝对自由遇上了绝对无助：你完全依靠神恩，但是，那个高深莫测的主体却又无法区别于你自己的生命……（但是）即使是那种杂乱的戏剧中的人物，也有他们上场及下场的时候；一个能够集中注意力，并记住剧情先后顺序的人，就能一步一步发现人物的线索……随着了解的增加，每一时刻的经验相应而生，并能预示其他时刻的经验。生活的平静之处积蓄着力量，而不平静之处则充满了智慧。没有任何情绪能够压倒理智，因为在理智看来，没有一种情绪的由来或情绪的流露会被完全掩盖；没有任何事件能使理智完全困惑，因为理智具有预见性。最坏的窘境是可以设法躲避的；因此每一时刻，原来只不过被这个时刻所发生的惊险的故事以及惊奇的情绪所填满，现在却留出空间去考虑以往得出的教训并对全局情况进行推测。”（《理性的生活：常识中的理性》，1905，第59页。）

Even today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re still laboriously trying to part fancies from realities in our experience; and in primitive times they made only the most incipient distinctions in this line. Men believed whatever they thought with any liveliness, and they mixed their dreams with their realities inextricably. The categories of “thought” and “things” are indispensable here—instead of being realities we now call certain experiences only “thoughts.” There is not a category, among those enumerated, of which we may not imagine the use to have thus originated historically and only gradually spread.

即便是在今天，自然科学以及哲学还在煞费苦心地试图把我们经验中的幻想与实在区分开来；在原始时代，它们仅对两者加以最初步的区分。过去，凡是人们能生动地想起的东西，人们就相信；人们把幻想与实在混淆在一起，难以区分。这里，“思想”与“事物”的分类就必不可少——现在我们把某些经验只称作“思想”而不是实在。在以上所列举的那些概念中，其中没有一项我们不可以想象出其应用在历史上就是如此起源，并逐步推广的。

That one Time which we all believe in and in which each event has its definite date, that one Space in which each thing has its position, these abstract notions unify the world incomparably; but in their finished shape as concepts how different they are from the loose unordered time-and-space experiences of natural men!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to us brings its own duration and extension, and both are vaguely surrounded by a marginal “more” that runs into the dur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next thing that comes. But we soon lose all our definite bearings; and not only do our children mak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yesterday and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the whole past being churned up together, but we adults still do so whenever the times are large. It is the same with spaces. On a map I can distinctly see the relation of London, Constantinople, and Pekin to the place where I am; in reality I utterly fail to FEEL the facts which the map symbolizes. The directions and distances are vague, confused and mixed. Cosmic space and cosmic time, so far from being the intuitions that Kant said they were, are constructions as patently artificial as any that science can show.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human race never use these notions, but live in plural times and spaces, interpenetrant and DURCHEINANDER.

那个我们大家都相信的统一的时间，其中，每件事情都有明确的日期；在那统一的空间里，每件事物都有其位置；这些抽象的概念具有无可比拟的统一世界的力量；但是，以概念这种最终形式出现的时间与空间，与自然人散漫无序的时空经验有多么大的差别啊！我们所碰到的每一件事都有其自身持续的时间与空间，而两者边缘又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多”出来的部分，这多出来的部分便延续到下一个事物所持续的时间及空间里去了。不过，我们很快就失去了所有明确的时空感。不但小孩子区分不清昨天与前天，把所有的过去都搅和在一起，就是我们成年人，时间一长，也一样分不清楚。我们对于空间也是如此。在地图上，我能清楚地看出伦敦、君士坦丁堡以及北京与我现在所在地的关系；但实际上，我完全感觉不到地图所表示的事实。方向与距离都是模糊的、混乱的、交织在一起的。宇宙空间与宇宙时间，远不是康德所说的直觉形式，而是像科学可以表明的任何结构形式一样，明显是人为的构造。人类绝大多数种族从未使用过“统一的时间”与“统一的空间”这些概念，他们生存于多个时间与多个空间之中，时间与空间相互贯穿，杂乱无章。

Permanent “things” again; the “same” thing and its various

“appearances” and “alterations”; the different 'kinds' of thing; with the “kind” used finally as a “predicate,” of which the thing remains the “subject”—what a straightening of the tangle of our experience's immediate flux and sensible variety does this list of terms suggest! And it is only the smallest part of his experience's flux that anyone actually does straighten out by applying to it these conceptual instruments. Out of them all our lowest ancestors probably used only, and then most vaguely and inaccurately, the notion of “the same again.” But even then if you had asked them whether the same were a “thing” that had endured throughout the unseen interval, they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at a loss, and would have said that they had never asked that question, or considered matters in that light.

同样，永恒的“事物”，“同一”事物及其各种“表象”与“变化”，事物各种不同的“类别”，以及最终把“类别”作为“谓语”使用，而事物仍旧为其“主语”——这一系列的名词显然有助于把我们经验中纠结在一起的直接经验与明显不同的经验区分清楚。通过应用这些概念性工具，任何人事实上所区分清楚的，只不过是其经验之流中最小的一个部分而已。在这些概念中，我们最原始的祖先们，大概只能，而且是含糊而不准确地运用了“同一个”这个概念。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如果你问他们，这同一个是否就是他们没有看到时仍持续存在的那个“事物”，他们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只能说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也从来没有从那个角度来考虑事情。

Kinds, and sameness of kind—what colossally useful DENKMITTEL for finding our way among the many! The manyness might conceivably have been absolute. Experiences might have all been singulars, no one of them occurring twice. In such a world logic would have had no application; for kind and sameness of kind

are logic's only instruments. Once we know that whatever is of a kind is also of that kind's kind, we can travel through the universe as if with seven-league boots. Brutes surely never use these abstractions, and civilized men use them in most various amounts.

类别，以及类别的同一性——它们在我们从多中寻找出路时，是多么有用的思想方法啊！多元性看来可能就是绝对的。一切经验可能都是单一的，没有一项经验会重复出现两次。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逻辑学可能就派不上用场了；因为类别以及类别的同一性是逻辑学仅有的工具。一旦我们知道：属于某一类别的东西，同时也属于那个类别所归属的类别，我们就好像穿上了千里靴，可以周游世界了。畜牲当然绝对不会运用这些抽象的概念，而文明人或多或少都会用到它们。

Causal influence, again! This, if anything, seems to have been an antediluvian conception; for we find primitive men thinking that almost everything is significant and can exert influence of some sort. The search for the more definite influences seems to have started in the question: “Who, or what, is to blame?“—for any illness, namely, or disaster, or untoward thing.

再说一说因果影响吧！这种影响，如果有的话，似乎是一个上古时代的概念；因为我们发现原始人认为几乎每一件事物都非常重要，并多少都能产生些影响。对更确切的影响的探索似乎起源于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任何疾病、灾害，或意外事故，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原始人都会问：“谁应当承担责任呢？”

From this centre the search for causal influences has spread. Hume and “Science” together have tried to eliminate the whole

notion of influence, substituting the entirely different DENKMITTEL of “law.” But law is a comparatively recent invention, and influence reigns supreme in the older realm of common sense.

对于因果影响的探索就是从这个中心点扩展开来的。休谟与“科学”都试图去除“影响”这整个概念，而代之以“规律”这一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但规律还是一个相对近期提出的概念，在常识的旧领域里，影响这一概念还是占据着统治地位。

The “possible,” as something less than the actual and more than the wholly unreal, is another of these magisterial notions of common sense. Criticize them as you may, they persist; and we fly back to them the moment critical pressure is relaxed. “Self,” “body,” in the substantial or metaphysical sense—no one escapes subjection to THOSE forms of thought. In practice, the common-sense DENKMITTEL are uniformly victorious. Everyone, however instructed, still thinks of a “thing” in the common-sense way, as a permanent unit-subject that “supports” its attributes interchangeably. No one stably or sincerely uses the more critical notion, of a group of sense-qualities united by a law. With these categories in our hand, we make our plans and plot together, and connect all the remoter parts of experience with what lies before our eyes. Our later and more critical philosophies are mere fads and fancies compared with this natural mother-tongue of thought.

“可能的”事物，作为比实际要少一点、比完全虚构要多一点的东西，是常识另一个权威性的概念。你尽可以批评这些概念，但它们依旧存在；而且只要批评的压力稍有松懈，我们就会迅速回归这些概念。就实体的或形而上学的意义而言，谁也不能逃避“自我”与“身

体”那样一些思维形式的束缚。事实上，常识性的思维方法取得了普遍的胜利。任何人，无论多有学问，他还是依照常识性方法，把某件“事物”当成一个“支持”其各种属性的“永恒的单位主体”，“事物”与“永恒的单位主体”这两个概念可相互替代。对于一组由某一规律统一起来的感觉特征，没有人会坚定地或真心地运用更富于批判性的概念。有了这些概念在我们手中，我们就可以一起制定方案与计划，把经验中所有间接的、较远的部分与我们眼前的直接经验联系起来。我们那些后来更富于批评性的哲学观念，与思维的这种天然语言比较起来，只不过是一时的流行物与幻想而已。

Common sense appears thus as a perfectly definite stage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ngs, a stage that satisfies in an extraordinarily successful way the purposes for which we think. “Things” do exist, even when we do not see them. Their “kinds” also exist. Their “qualities” are what they act by, and are what we act on; and these also exist. These lamps shed their quality of light on every object in this room. We intercept IT on its way whenever we hold up an opaque screen. It is the very sound that my lips emit that travels into your ears. It is the sensible heat of the fire that migrates into the water in which we boil an egg; and we can change the heat into coolness by dropping in a lump of ice. At this stage of philosophy all non-European men without exception have remained. It suffices for all the necessary practical ends of life; and, among our own race even, it is only the highly sophisticated specimens, the minds debauched by learning, as Berkeley calls them, who have ever even suspected common sense of not being absolutely true.

这样，常识在我们了解事物的过程中，似乎是一个完全明确的阶段，这个阶段能格外成功地满足我们思想的各种目的。“事物”的确存在，即使我们看不见它们。事物的“类别”也同样存在。事物的“特

征”是事物行动的依据，还是我们行为的对象；事物的“特征”也同样存在。这些灯把它们的光照射到这间屋子里的每件物体上。只要我们举起一块不透明的幕布，我们就能挡住光的路线。传到你们耳朵里的正是我嘴唇里发出来的声音；传到我们煮鸡蛋的水里的，正是可以感受得到的火的热量；我们在水里放一块冰，就能变热为凉。所有非欧洲人的哲学，无一例外，至今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之上。为了一切必要的实际生活目的，常识就足够了；即便是我们欧洲人，只有极度钻牛角尖的人，正如贝克莱所谓的受学问毒害的人，才会怀疑常识不是绝对真实的。

But when we look back, and speculate as to how the common-sense categories may have achieved their wonderful supremacy, no reason appears why it may not have been by a process just like that by which the conceptions due to Democritus, Berkeley, or Darwin, achieved their similar triumphs in more recent times. In other words, they may have been successfully DISCOVERED by prehistoric geniuses whose names the night of antiquity has covered up; they may have been verified by the immediate facts of experience which they first fitted; and then from fact to fact and from man to man they may have SPREAD, until all language rested on them and we are now incapable of thinking naturally in any other terms. Such a view would only follow the rule that has proved elsewhere so fertile, of assuming the vast and remote to conform to the laws of formation that we can observe at work in the small and near.

但是，当我们回顾过去，思索有关常识性概念为什么可能会取得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的问题时，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常识性概念取得胜利的过程可能有别于后来德谟克利特、贝克莱或达尔文等所提出的概念取得同样的胜利的过程。换句话说，常识性概念可能是史前的天才

人物所成功发现的，不过他们的姓名被久远的年代湮没了；这些常识性概念可能由其最初所适合的直接经验所证实；然后可能由一个事实延及另一个事实，从一个人传及另一个人，直到一切语言都以这些概念为依据，而我们现在也不能以任何别的概念术语进行自然地思考了。这样一种观点可能只遵循一条在别处被认为是十分有效的规则，该规则假定，在大范围且遥远的地方，事物的形成规律与我们在小范围近处所观察到的事物形成规律是一致的。

For all utilitarian practical purposes these conceptions amply suffice; but that they began at special points of discovery and only gradually spread from one thing to another, seems proved by the exceedingly dubious limits of their application today. We assume for certain purposes one “objective” Time that AEQUABILITER FLUIT, but we don't livingly believe in or realize any such equally-flowing time. “Space” is a less vague notion; but “things,” what are they? Is a constellation properly a thing? or an army? or is an ENS RATIONIS such as space or justice a thing? Is a knife whose handle and blade are changed the “same”? Is the “changeling,” whom Locke so seriously discusses, of the human “kind”? Is “telepathy” a “fancy” or a “fact”? The moment you pass beyond the practical use of these categories (a use usually suggested sufficiently by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special case) to a merely curious or speculative way of thinking, you find it impossible to say within just what limits of fact any one of them shall apply.

对于一切功利性的实用目的来说，这些概念就足够了；但这些概念是从其被发现的特定点开始，并只是逐步由一件事物延伸到另一件事物的——这些概念如今应用范围极其不确定，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某些目的，我们采用一个均衡流动的“客观”时间，但我们并不能自然地相信或体会到任何这样均衡流动的时间。“空间”的概念没

有这么含混；但是“事物”，事物到底是什么呢？一个星座真的是一件事物吗？一支军队是吗？理性的存在，如空间、正义是事物吗？一把刀，换了刀柄和刀身以后，还是“同样”的刀吗？洛克认真讨论过的那个“丑孩子”还属于人“类”吗？“心灵感应”是“幻觉”还是“事实”呢？一旦你超越这些概念的实际用途（通常由特定情况所充分指明的一种用途），而过渡到一种仅仅只是好奇或推测的思维方式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可能说出任何一个概念到底在多大的事实范围内适用。

The peripatetic philosophy, obeying rationalist propensities, has tried to eternalize the common-sense categories by treating them very technically and articulately. A “thing” for instance is a being, or ENS. An ENS is a subject in which qualities “inhere.” A subject is a substance. Substances are of kinds, and kinds are definite in number, and discrete. These distinctions are fundamental and eternal. As terms of DISCOURSE they are indeed magnificently useful, but what they mean, apart from their use in steering our discourse to profitable issues, does not appear. If you ask a scholastic philosopher what a substance may be in itself, apart from its being the support of attributes, he simply says that your intellect knows perfectly what the word means.

逍遥派哲学，服从理性主义倾向，试图用极专门化与明晰化的方法对待常识性分类，以使之永恒不变。例如，一件“事物”就是一个存在体，或者叫做ens（抽象的存在）。一个ens就是一个“内在具有”各种特性的主体。一个主体就是一种物质。物质有多种分类，类别的总数确定，但类别之间不相关联。这些区别都是根本的、永恒的区别。这些词作为推论的术语的确非常有用，但除了引导我们的推论得出有利的论点之外，这些词就显不出什么意义来了。要是你问一个经院哲学家，物质本身可能是什么，除了说它是属性所依附的东西之外，他只会说，你的理智完全明白这个词的意义。

But what the intellect knows clearly is only the word itself and its steering function. So it comes about that intellects SIBI PERMISSI, intellects only curious and idle, have forsaken the common-sense level for what in general terms may be called the “critical” level of thought. Not merely SUCH intellects either—your Humes and Berkeleys and Hegels; but practical observers of facts, your Galileos, Daltons, Faradays, have found it impossible to treat the NAIFS sense-termini of common sense as ultimately real. As common sense interpolates her constant “things” between our intermittent sensations, so science EXTRApolates her world of 'primary' qualities, her atoms, her ether, her magnetic fields, and the like, beyond the common-sense world. The 'things' are now invisible impalpable things; and the old visible common-sense things are supposed to result from the mixture of these invisibles. Or else the whole NAIF conception of thing gets superseded, and a thing's name is interpreted as denoting only the law or REGEL DER VERBINDUNG by which certain of our sensations habitually succeed or coexist.

但理智所清楚了解的，不过是这个词本身及其引导功能罢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理智如果听凭其自身，就是好奇而闲散的，它已经放弃了常识性阶段，而转向一般称作“批判性”思维的阶段。不但像休谟、贝克莱、黑格尔这样的理性哲学家，就是像伽利略、道尔顿、法拉第这样一些务实的事实观察家，也发现将常识的朴素感觉境界当成终极的实在是不可能的。常识将其恒定的“事物”概念插入断断续续的各种感觉之间；同样地，科学将科学世界的“基本”特征、其原子、以太、磁场等概念，置于常识性世界以外进行推理。现在，“事物”是看不见的、无形的东西；原来看得见的、常识性的事物，被认为是由这些看不见的事物混合而成的。或者说，整个朴素的事物的概念被取而代之了，一件事物的名称被解释为仅仅表明了事物

的某一项规律或关联法则，根据这项规律或法则，我们的某种感觉得以习惯性地继续存在或与其他感觉并存。

Science and critical philosophy thus burst the bounds of common sense. With science NAIF realism ceases: “Secondary” qualities become unreal; primary ones alone remain. With critical philosophy, havoc is made of everything. The common-sense categories one and all cease to represent anything in the way of BEING; they are but sublime tricks of human thought, our ways of escaping bewilderment in the midst of sensation's irremediable flow.

科学与批判哲学就这样突破了常识的界限。有了科学，朴素实在论就终结了：“第二”性质成为非真实性特征；只有第一性质保留了下来。有了批判哲学，一切事物都被颠覆。常识性分类一概不再指代任何实际存在的事物；它们不过是人类伟大的思维技巧而已，是使我们避免迷失在无可挽回的感觉之流中的方法。

But the scientific tendency in critical thought, tho inspired at first by purely intellectual motives, has opened an entirely unexpected range of practical utilities to our astonished view. Galileo gave us accurate clocks and accurate artillery-practice; the chemists flood us with new medicines and dye-stuffs; Ampere and Faraday have endowed us with the New York subway and with Marconi telegrams. The hypothetical things that such men have invented, defined as they have defined them, are showing an extraordinary fertility in consequences verifiable by sense. Our logic can deduce from them a consequence due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we can then bring about the conditions, and presto, the

consequence is there before our eyes. The scope of the practical control of nature newly put into our hand by scientific ways of thinking vastly exceeds the scope of the old control grounded on common sense. Its rate of increase accelerates so that no one can trace the limit; one may even fear that the BEING of man may be crushed by his own powers, that his fixed nature as an organism may not prove adequate to stand the strain of the ever increasingly tremendous functions, almost divine creative functions, which his intellect will more and more enable him to wield. He may drown in his wealth like a child in a bath-tub, who has turned on the water and who cannot turn it off.

尽管批判性思维中的科学化倾向一开始是在纯理性动力的激发下产生的，但这种倾向却使得一系列实用工具得以出现，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让人惊诧不已。伽利略为我们发明了精确的时钟，还提高了大炮的射击精度；化学家们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新药品与染料；安培与法拉第赐予我们纽约的地下铁路以及马可尼式无线电报。这些科学家发明了原本人们假想中的事物，这些事物就像科学家们所定义的那样，表现了极其丰富的创造力，其结果可以通过我们的感官来证实。在一定条件下，我们的逻辑能根据这些事物推导出相应的结果；因此，如果我们能得到条件和前提，结果就会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新近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所实际掌控的自然范围，大大超过了过去基于常识所能控制的范围。这种范围扩展的速度如此之快，没有人知道其极限在哪里；有人甚至会担心，人类的存在可能会被自身的力量所粉碎。人们还担心，随着人类功能的不断增大，人类作为有机体的固有天性也许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人类的智慧使其越来越有能力来发挥这些功能，但这些创造性功能之巨大几乎只有神才具备。人类可能被淹没在其创造的财富里，就像一个小孩子拧开了水龙头却关不上水龙头，结果被淹死在澡盆里一样。

The philosophic stage of criticism, much more thorough in its negations than the scientific stage, so far gives us no new range of practical power. Locke, Hume, Berkeley, Kant, Hegel, have all been utterly sterile, so far as shedding any light on the details of nature goes, and I can think of no invention or discovery that can be directly traced to anything in their peculiar thought, for neither with Berkeley's tar-water nor with Kant's nebular hypothesis had their respective philosophic tenets anything to do. The satisfactions they yield to their disciples are intellectual, not practical; and even then we have to confess that there is a large minus-side to the account.

批判主义的哲学阶段在否定方面比科学阶段要彻底得多，但至今也未给我们带来任何真正有用的新方法。就阐明自然运行的种种细节而言，洛克、休谟、贝克莱、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都毫无贡献；我想不出有任何发明或发现可以直接追溯到任何属于他们的独特哲学思想的东西，因为无论是贝克莱发明的焦油水还是康德提出的星云假说，都和他们各自的哲学理念毫无关系。他们使其信徒们得到的满足，是理性上的满足，而不是实用性的满足；即便这样，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种理性上的满足还得大打折扣。

There are thus at least three well-characterized levels, stages or types of thought about the world we live in, and the notions of one stage have one kind of merit, those of another stage another kind. It is impossible, however, to say that any stage as yet in sight is absolutely more TRUE than any other. Common sense is the more CONSOLIDATED stage, because it got its innings first, and made all language into its ally. Whether it or science be the more AUGUST stage may be left to private judgment. But neither consolidation nor augustness are decisive marks of truth. If common sense were true,

why should science have had to brand the secondary qualities, to which our world owes all its living interest, as false, and to invent an invisible world of points and curves and mathematical equations instead? Why should it have needed to transform causes and activities into laws of “functional variation”? Vainly did scholasticism, common sense's college-trained younger sister, seek to stereotype the forms the human family had always talked with, to make them definite and fix them for eternity. Substantial forms (in other words our secondary qualities) hardly outlasted the year of our Lord 1600. People were already tired of them then; and Galileo, and Descartes, with his “new philosophy,” gave them only a little later their coup de grace.

因此，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思考，至少存在三种具有鲜明特征的水平、阶段或类型。一个阶段的观点有一种优点，另一个阶段的观点又具有另一种优点。但是，不可能说任何当前的阶段就绝对比其他阶段更真实些。常识是更稳固的阶段，因为它最早得到机会，所以使一切话语都与其结盟。常识与科学，哪一个阶段更有威信，可凭个人的判断。但是稳固性与威信都不是真理决定性的标志。如果常识为真，为什么科学要把决定我们现实世界一切生活兴趣的第二性质归为谬误，反而要发明一个由点、线及数学方程式所组成的无形世界呢？为什么科学必须把原因及活动转化成为“功能性变异”的定律呢？经院哲学是常识接受过经院训练的小妹妹，它寻求把人类家庭通常谈论的形式典型化、固定化，把这些形式永远明确下来，固定下来，但毫无结果。公元1600年之后，实体形式（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性质）的概念就几乎消失了。当时，人们就已经对实体形式十分厌烦了；稍后，伽利略，还有笛卡尔，就以其“新哲学”给了实体形式以致命的一击。

But now if the new kinds of scientific “thing,” the corpuscular

and etheric world, were essentially more “true,” why should they have excited so much criticism within the body of science itself? Scientific logicians are saying on every hand that these entities and their determinations, however definitely conceived, should not be held for literally real. It is AS IF they existed; but in reality they are like co-ordinates or logarithms, only artificial short-cuts for taking us from one part to another of experience's flux. We can cipher fruitfully with them; they serve us wonderfully; but we must not be their dupes.

但是，如果新型科学“事物”，如微粒子世界以及以太世界，从本质上看要是更“真”的话，那么它们为什么又会在科学自身的范围内激起如此多的批评呢？数理逻辑学家们到处说，这些实体以及对这些实体存在的测定，无论构想得有多么明确，也不应被看成是完全真实的。它们似乎存在；但事实上，它们却像坐标或对数一样，不过是引导我们从经验之流的一个部分过渡到另一个部分的人为捷径而已。我们能利用它们进行卓有成效的计算；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服务；但我们一定不能受它们的蒙蔽。

There is no RINGING conclusion possible when we compare these types of thinking, with a view to telling which is the more absolutely true. Their naturalness, their intellectual economy, their fruitfulness for practice, all start up as distinct tests of their veracity, and as a result we get confused. Common sense is BETTER for one sphere of life, science for another, philosophic criticism for a third; but whether either be TRUER absolutely, Heaven only knows. Just now, if I understand the matter rightly, we are witnessing a curious reversion to the common-sense way of looking at physical nature,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favored by such men as Mach, Ostwald and Duhem. According to these teachers no

hypothesis is truer than any other in the sense of being a more literal copy of reality. They are all but ways of talking on our part, to be compared sole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ir USE. The only literally true thing is REALITY; and the only reality we know is, for these logicians, sensible reality, the flux of our sensations and emotions as they pass. “Energy” is the collective name (according to Ostwald) for the sensations just as they present themselves (the movement, heat, magnetic pull, or light, or whatever it may be) when they are measured in certain ways. So measuring them, we are enabled to describe the correlated changes which they show us, in formulas matchless for their simplicity and fruitfulness for human use. They are sovereign triumphs of economy in thought.

当我们对这些思维类型进行比较，想要指出哪一种更绝对真实一些的时候，却根本不可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其自然性，在理性上的经济性，以及实用效果，统统都拿来测试其真实性，但结果却把我们弄糊涂了。对生活的某一个范畴而言，常识性思维方式要更好一些，但对另一个范畴而言，科学性思维方式要好一些；而对第三种生活范畴，哲学批判主义则要好一些；但究竟哪一种要更真一些，只有天知道。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们刚刚目睹了一场奇特的回归到用常识性方法来观察现实自然界的过程，运用了马赫、奥斯特瓦尔德以及迪昂等人所青睐的科学哲学观。根据这些导师的理论，从更真实地模仿实在的角度上来看，没有一种观点会比另外一种观点更真实。它们不过是我们从其功用的角度上来进行比较的一些说法而已。唯一真实的事物就是实在；对于这些逻辑家们来说，我们所了解的唯一的实在就是可感知的实在，就是事物经过时，我们的感觉及情绪所形成的流。按照奥斯特瓦尔德的说法，对于刚刚表现出来的感觉（如，运动、热、磁力、或光，或者任何东西），用一定的方法来进行衡量，可以给它们一个总称，叫做“能量”。这样来衡量它们，我们就能够用对我们人类来说无比简单、无比有效的公式来描绘感觉向我们所呈现的错综复杂的变化。这些公式是思维经济原则的至高胜利。

No one can fail to admire the “energetic” philosophy. But the hypersensible entities, the corpuscles and vibrations, hold their own with most physicists and chemists, in spite of its appeal. It seems too economical to be all-sufficient. Profusion, not economy, may after all be reality's key-note.

没有人不赞赏这种“能量”学说。尽管这种“能量”学说有它的吸引力，但是超感觉的实体、微粒子以及振动，对于大多数物理学家与化学家来说，还是站得住脚的。“能量”学说似乎是太经济，不足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毕竟，充足而非精简，才可能是实在的主旋律。

I am dealing here with highly technical matters, hardly suitable for popular lecturing, and in which my own competence is small. All the better for my conclusion, however, which at this point is this. The whole notion of truth, which naturally and without reflexion we assume to mean the simple duplication by the mind of a ready-made and given reality, proves hard to understand clearly. There is no simple test available for adjudicating offhand between the divers types of thought that claim to possess it. Common sense, common science or corpuscular philosophy, ultra-critical science, or energetics, and critical or idealistic philosophy, all seem insufficiently true in some regard and leave some dissatisfaction.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onflict of these so widely differing systems obliges us to overhaul the very idea of truth, for at present we have no definite notion of what the word may mean. I shall face that task in my next lecture, and will add but a few words, in finishing the present one.

我这里谈论的是高度技术性的东西，不太合适面向大众的讲演，而且我对技术也不太在行。这样，反而更利于我得出结论。此时，我的结论是：我们很自然并且不假思索地假定，真理是在我们脑海中形成的对现成事实的简单复制，但这种真理的全部意义很难理解清楚。各种类型的思想都自称含有真理，对此还没有什么简单的测试方法来加以即时的判断。常识，普通科学或微粒子学说，超批判的科学或唯能论，批判的或唯心的哲学，所有这些学说，似乎多少都不够真实，都难以使人满意。显然，这些十分不同的系统之间的冲突，迫使我们来仔细考察真理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目前对于这个词的意义还不明确。我将在下一讲里谈论这一问题，现在这一讲，再说几句话就完了。

There are only two points that I wish you to retain from the present lecture. The first one relates to common sense. We have seen reason to suspect it, to suspect that in spite of their being so venerable, of their being so universally used and built into the very structure of language, its categories may after all be only a collection of extraordinarily successful hypotheses (historically discovered or invented by single men, but gradually communicated, and used by everybody) by which our forefathers have from time immemorial unified and straightened the discontinuity of their immediate experiences, and put themselves into an equilibrium with the surface of nature so satisfactory for ordinary practical purposes that it certainly would have lasted forever, but for the excessive intellectual vivacity of Democritus, Archimedes, Galileo, Berkeley, and other excentric geniuses whom the example of such men inflamed. Retain, I pray you, this suspicion about common sense.

在这一讲里，只有两点我希望你们能记住。第一点与常识相关。

尽管常识十分古老，尽管常识已被普遍应用并成为语言结构本身的一部分，我们却已有理由对其进行怀疑，怀疑常识性概念可能不过是一些非常成功的理论的集合体（这些理论历史上由个人发明或发现，但逐渐传播开来，并为大家所用）；我们的祖先从远古以来就通过这些理论来统一以及整理其不连贯的直接经验，并以此平衡自身与自然界的表象；从一般实际的用途来看，这种平衡令人非常满意，如果不是因为德谟克利特、阿基米德、伽利略、贝克莱以及在他们的榜样鼓舞下出现的其他一些天才人物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此平衡本应该能永久保持下来。我请你们务必记住这种对于常识的怀疑。

The other point is this. Ought not the existence of the various types of thinking which we have reviewed, each so splendid for certain purposes, yet all conflicting still, and neither one of them able to support a claim of absolute veracity, to awaken a presumption favorable to the pragmatistic view that all our theories are INSTRUMENTAL, are mental modes of ADAPTATION to reality, rather than revelations or gnostic answers to some divinely instituted world-enigma? I expressed this view as clearly as I could in the second of these lectures. Certainly the restlessness of the actual theoretic situation, the value for some purposes of each thought-level, and the inability of either to expel the others decisively, suggest this pragmatistic view, which I hope that the next lectures may soon make entirely convincing. May there not after all be a possible ambiguity in truth?

第二点是这样的：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各种思维类型，对某些目的而言，每一种都十分辉煌，但所有这些思维类型仍然彼此相冲突，而且其中没有一个能称得上是绝对真实的。难道这些思维方式的存在都不能促成这样一种偏向实用主义的观点的诞生吗？这种观点即我们的一切理论都只是工具性的，都是适应现实实在的思维模式，而不是针

对什么神所创造的宇宙之谜的启示或感悟性的答案。我在第二讲里已经把这个观点尽可能说清楚了。当然，实际的理论状况之不稳定，每一种思维方式针对某些目的而言的价值所在，以及每一种思维方式对其它思维方式不可能具有绝对排斥性，这都表明了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我希望后面的讲座会很快证明实用主义的这些观点具有完全的说服力。真理究竟是否可能存在含糊之处呢？

Lecture VI Pragmatism's Conception of Truth

第六讲　实用主义有关真理的概念

THE POLEMIC SITUATION. WHAT DOES AGREEMENT WITH REALITY MEAN? IT MEANS VERIFIABILITY. VERIFIABILITY MEANS ABILITY TO GUIDE US PROSPEROUSLY THROUGH EXPERIENCE.COMPLETED VERIFICATIONS SELDOM NEEDFUL. “ETERNAL” TRUTHS.CONSISTENCY, WITH LANGUAGE, WITH PREVIOUS TRUTHS.RATIONALIST OBJECTIONS. TRUTH IS A GOOD, LIKE HEALTH, WEALTH, ETC. IT IS EXPEDIENT THINKING. THE PAST. TRUTH GROWS. RATIONALIST OBJECTIONS. REPLY TO THEM.

论争的情形。与实在一致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能够被证实的可能性。可证实性意味着能引导我们从经验中得出丰富的结论。很少有必要去彻底证实。“永恒”的真理。与语言、以往真理的一致性。理性主义者的反对观点。真理是一个东西，像健康、财富以及其他东西一样。真理是便利的想法。过去。真理是发展的。理性主义者的反对观点。对理性主义者反对观点的回应。

When Clerk Maxwell was a child it is written that he had a mania for having everything explained to him, and that when people put him off with vague verbal accounts of any phenomenon he would interrupt them impatiently by saying, “Yes; but I want you to tell me the PARTICULAR GO of it!” Had his question been about truth, only a pragmatist could have told him the particular go of it. I believe that our contemporary pragmatists, especially

Messrs.Schiller and Dewey, have given the only tenable account of this subject. It is a very ticklish subject, sending subtle rootlets into all kinds of crannies, and hard to treat in the sketchy way that alone befits a public lecture. But the Schiller-Dewey view of truth has been so ferociously attacked by rationalistic philosophers, and so abominably misunderstood, that here, if anywhere, is the point where a clear and simple statement should be made.

据记载说，在克拉克·麦克斯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有一种怪癖，凡事都要人向他解释得清清楚楚，如果别人搪塞他，用含糊的话语来解释任何现象，他就会很不耐烦地打断人家的话，说："是的，但是我想请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他问的是有关真理的问题，那么只有实用主义者才能告诉他真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当代的实用主义者，特别是席勒和杜威两位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给出的解释是仅有的站得住脚的解释。有关真理的问题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其微妙的根须深入到各个角落，以这种只适合公开演讲的概略式的方式来对此进行解释，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但是，席勒与杜威有关真理的观点受到了理性主义哲学家们猛烈的攻击以及恶毒的误解，因此，这里我必须对这个问题加以简单明了的说明。

I fully expect to see the pragmatist view of truth run through the classic stages of a theory's career. First, you know, a new theory is attacked as absurd; then it is admitted to be true, but obvious and insignificant; finally it is seen to be so important that its adversaries claim that they themselves discovered it. Our doctrine of truth is at present in the first of these three stages, with symptoms of the second stage having begun in certain quarters. I wish that this lecture might help it beyond the first stage in the eyes of many of you.

我充分预料到，实用主义者的真理观要经过一切理论发展必经的各个典型阶段。你们知道，一个新鲜的理论一开始总被斥为荒谬；后来才被承认是真理，但却是浅显而不重要的；最后才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原先的反对者们这时竟然声称这一理论是他们自己发现的。我们的真理论目前正处于这三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在某些地方已带有第二个阶段的迹象。我希望本次讲座，有助于使你们许多人心目中的实用主义真理观超越这第一个阶段。

Truth, as any dictionary will tell you, is a property of certain of our ideas. It means their “agreement,” as falsity means their disagreement, with “reality.” Pragmatists and intellectualists both accept this definition as a matter of course. They begin to quarrel only after the question is raised as to what may precisely be meant by the term “agreement,” and what by the term “reality,” when reality is taken as something for our ideas to agree with.

任何词典都会告诉你们，真理是我们某些观念的一个属性。它意味着与“实在”相“一致”，而谬误则意味着与“实在”不一致。实用主义者和知性论者都把这一定义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只有在问到，“一致”这个词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如果我们认为实在是指我们的观念要与之保持一致的某种东西的话，那么，“实在”这个词的准确含义又是什么？在这些问题提出之后，实用主义者和知性论者才开始有了争执。

In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the pragmatists are more analytic and painstaking, the intellectualists more offhand and irreflective. The popular notion is that a true idea must copy its reality. Like other popular views, this one follows the analogy of the most usual experience. Our true ideas of sensible things do indeed copy them.

Shut your eyes and think of yonder clock on the wall, and you get just such a true picture or copy of its dial. But your idea of its “works” (unless you are a clock-maker) is much less of a copy, yet it passes muster, for it in no way clashes with the reality. Even tho it should shrink to the mere word “works,” that word still serves you truly; and when you speak of the “time-keeping function” of the clock, or of its spring's “elasticity,” it is hard to see exactly what your ideas can copy.

实用主义者在解答这些问题时，更善于分析，也更用心，而理智主义者则比较随意，有欠思考。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一个真观念一定是对实在的模仿。与其他一些流行的观点一样，这一观点是对最平常的经验的类推。我们对于可感知事物的真观念，的确是对这些事物的模仿。闭上你的双眼，想一想那边墙上的挂钟，你所能想到的只是这样一个钟盘的真实的图像或摹本。可是你对钟的“机件”的观念（除非你是一个钟表匠）就不足以成为一个摹本了；但也还说得过去，因为它和实在毫不冲突。即使有关机件的观念可能缩小到仅仅是“机件”这个名词，这个词还是真正为你服务的；在谈到钟的“计时功能”，或者谈到钟的发条的“弹性”时，要看出观念能模仿的东西具体是什么，那就很难了。

You perceive that there is a problem here. Where our ideas cannot copy definitely their object, what does agreement with that object mean? Some idealists seem to say that they are true whenever they are what God means that we ought to think about that object. Others hold the copy-view all through, and speak as if our ideas possessed truth just in proportion as they approach to being copies of the Absolute's eternal way of thinking.

你们察觉到了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观念不能准确地模仿观念的对象，那观念与对象的一致又指的是什么呢？有些唯心主义者似乎是说，我们对那个对象的观念，只要是上帝要我们这样想的，那么这些观念就是真的。另外一些唯心主义者始终坚持模仿观，他们似乎认为，我们的观念越接近于对上帝的永恒思维方式的模仿，观念所拥有的真实性就越大。

These views, you see, invite pragmatistic discussion. But the great assumption of the intellectualists is that truth means essentially an inert static relation. When you've got your true idea of anything, there's an end of the matter. You're in possession; you KNOW; you have fulfilled your thinking destiny. You are where you ought to be mentally; you have obeyed your categorical imperative; and nothing more need follow on that climax of your rational destiny. Epistemologically you are in stable equilibrium.

你瞧，这些观点有必要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进行探讨。但是，理智主义者的伟大假设是：真理本质上指的是一种惰性的静止关系。当你获得了任何事物的真观念，事情就终结了。你已经占有了，你已经懂得了，你已经实现了你的思想的宿命。在思想上，你已经站在你应该站的地方；你已经服从了你的绝对命令；而且在这个理性宿命的最高点上，再也不需要遵循任何东西了。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说，你处于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

Pragmatism, on the other hand, asks its usual question. “Grant an idea or belief to be true,” it says, “what concrete difference will its being true make in anyone's actual life? How will the truth be realized? What experiences will be different from those which would obtain if the belief were false? What, in short, is the truth's

cash-value in experiential terms?”

但是，实用主义却照例要问，它说：“假定一个观念或者一个信念是真的，那么其真实性会给我们的实际生活带来什么具体的差别呢？这种真实性怎样才能实现呢？如果这个信念是错误的，那么什么样的经验会有别于由这个错误的信念产生的经验呢？简而言之，从经验的角度来说，真理的现金价值是什么呢？”

The moment pragmatism asks this question, it sees the answer: TRUE IDEAS ARE THOSE THAT WE CAN ASSIMILATE, VALIDATE, CORROBORATE AND VERIFY. FALSE IDEAS ARE THOSE THAT WE CANNOT. That is the practical difference it makes to us to have true ideas; that, therefore, is the meaning of truth, for it is all that truth is known-as.

实用主义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就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真观念是那些我们能够理解，查验，证实，并确认的观念。假观念是那些我们不能理解，查验，证实，或确认的观念。这就是掌握真观念给我们带来的实际差别；因此，这就是真理的意义，因为我们所了解的真理的全部就是这样。

This thesis is what I have to defend. The truth of an idea is not a stagnant property inherent in it. Truth HAPPENS to an idea. It BECOMES true, is MADE true by events. Its verity is in fact an event, a process: the process namely of its verifying itself, its veri-FICATION. Its validity is the process of its valid-ATION.

这个论点就是我必须捍卫的论点。一个观念的真实性并不是其固有的、一成不变的属性。真理是针对观念而产生的。通过事件，真理成为，或者被变成为真的。其真实性实际上就是一个事件，一个过程：即真理对自身的证实过程，证实行为。其正确性就是对其进行确认的过程。

But what do the words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themselves pragmatically mean? They again signify certain prac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verified and validated idea. It is hard to find any one phrase that characterizes these consequences better than the ordinary agreement-formula—just such consequences being what we have in mind whenever we say that our ideas “agree” with reality. They lead us, namely, through the acts and other ideas which they instigate, into or up to, or towards, other parts of experience with which we feel all the while-such feeling being among our potentialities—that the original ideas remain in agreement. The connexions and transitions come to us from point to point as being progressive, harmonious, satisfactory. This function of agreeable leading is what we mean by an idea's verification. Such an account is vague and it sounds at first quite trivial, but it has results which it will take the rest of my hour to explain.

但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证实与确认这两个词本身又是什么意思呢？它们还是表示被证实以及被确认的观念的某些实际的后果。一致性原则是个很普通的词，但却很难再找出一个能更好地描述这些实际后果特征的词了——这些后果就是我们在说我们的观念与实在“一致”时，我们所想到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行动及其所激起的其他观念，这些后果把我们引进、引上或引向经验的其他部分，就是我们一向感到原来的观念与之一致的那些经验部分。这样的感觉是我们的一种潜能。其间的相互关联与转变一点一点发生时，都是渐进

的、和谐的、令人满意的。这个愉快的引导作用，就是我们所谓的观念的证实过程。这样的解释有些模糊，初听起来颇有些琐碎，但却很有成效，我接下来将对此加以解释。

Let me begin by reminding you of the fact that the possession of true thoughts means everywhere the possession of invaluable instruments of action; and that our duty to gain truth, so far from being a blank command from out of the blue, or a “stunt” self-imposed by our intellect, can account for itself by excellent practical reasons.

首先让我提醒你们：掌握了真实的思想就意味着随处都掌握了极其宝贵的行动工具；另外，我们负有追求真理的责任，但这绝不是凭空出现的空头命令，也不是我们的理智私自强加的一个“创举”，而是可以通过极好的实际理由来进行自我诠释的。

The importance to human life of having true beliefs about matters of fact is a thing too notorious. We live in a world of realities that can be infinitely useful or infinitely harmful. Ideas that tell us which of them to expect count as the true ideas in all this primary sphere of verific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such ideas is a primary human duty. The possession of truth, so far from being here an end in itself, is only a preliminary means towards other vital satisfactions. If I am lost in the woods and starved, and find what looks like a cow-path, it i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that I should think of a human habitation at the end of it, for if I do so and follow it, I save myself. The true thought is useful here because the house which is its object is useful.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rue ideas is thus primarily derived from the practical importance of

their objects to us. Their objects are, indeed, not important at all times. I may on another occasion have no use for the house; and then my idea of it, however verifiable, will be practically irrelevant, and had better remain latent. Yet since almost any object may some day become temporarily important, the advantage of having a general stock of extra truths, of ideas that shall be true of merely possible situations, is obvious. We store such extra truths away in our memories, and with the overflow we fill our books of reference. Whenever such an extra truth becomes practically relevant to one of our emergencies, it passes from cold-storage to do work in the world, and our belief in it grows active. You can say of it then either that “it is useful because it is true” or that “it is true because it is useful.” Both these phrases mean exactly the same thing, namely that here is an idea that gets fulfilled and can be verified. True is the name for whatever idea starts the verification-process, useful is the name for its completed function in experience. True ideas would never have been singled out as such, would never have acquired a class-name, least of all a name suggesting value, unless they had been useful from the outset in this way.

对事实具有真实的信念，其重要性对于人类生活非常明显。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实在组成的世界里，这些实在有可能极其有用，也可能极其有害。如果有一些观念能告诉我们可以预期的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实在，那么，在这整个基本的确认过程中，这些观念就可以算作真观念，而且追求这样的真观念是人类的一项首要职责。掌握真理本身决不是目的，而不过是一个初步的，迈向其他重要的满足的手段而已。如果我在森林里迷了路，快要饿死了，然后发现了一条牧牛小道，这时最重要的是我应当想到小路的尽头一定有人家，如果我想到了，而且顺着小路走了下去，我就得救了。这里，真思想是有用的，因为作为思想对象的房子是有用的。因此，真观念的实际价值基本上是由于观念的对象对于我们的实际重要性而产生的。的确，观念的对

象并非始终都很重要。另外一种情况下，这座房子可能对我就没有任何用处；这样，我对这个房子的观念，尽管是可以证实的，却与实际不相关，还是让它保持潜伏状态比较好。但是，因为几乎任何思想的对象有一天都会变得一时重要起来，那么，建一个总库，把若干额外真理储备起来，把某些只在可能的情况下才会变成真理的观念储备起来，其好处显而易见。我们把这些额外真理储存在记忆里，遇到太多而记不住的时候，则记在我们的参考书中。某一个这样的额外真理，一旦与某些紧急事件实际相关时，它就会离开冷藏库，跑出来发挥作用，而我们对它的信念也就变得活跃起来。那么，你就可以这样解释这个额外真理说："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或者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观念变成了现实，而且是可以进行证实的。真，是任何观念在开始证实过程时的名称，有用，则是它在实际经验中所实现的功能的名称。真观念除非是一开始就这样有用，否则决不会像这样被单挑出来，决不会获得一个类名，更不会成为一个含有价值的名称。

From this simple cue pragmatism gets her general notion of truth as something essentially bound up with the way in which one moment in our experience may lead us towards other moments which it will be worth while to have been led to. Primarily, and on the common-sense level, the truth of a state of mind means this function of A LEADING THAT IS WORTH WHILE. When a moment in our experience, of any kind whatever, inspires us with a thought that is true, that means that sooner or later we dip by that thought's guidance into the particulars of experience again and make advantageous connexion with them. This is a vague enough statement, but I beg you to retain it, for it is essential.

由这个简单的线索，实用主义获得了其关于真理的一般观念：真理主要涉及到经验的一个瞬间是如何引导我们走向经验另外的瞬间的

方式，这种引导将很有价值。从常识性阶段来说，思想状态的真理主要就是指这种有价值的引导功能。当我们经验的某个瞬间，不管是哪种类型的经验，使我们获得了某个真思想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我们迟早会由于这种思想的指导而重新投入到经验的各种细节之中，并与经验的细节发生有益的联系。这是一句够含混的话；但是我请你们记住这句话，因为它很重要。

Our experience meanwhile is all shot through with regularities. One bit of it can warn us to get ready for another bit, can “intend” or be “significant of” that remoter object. The object's advent is the significance's verification. Truth, in these cases, meaning nothing but eventual verification, is manifestly incompatible with waywardness on our part. Woe to him whose beliefs play fast and loose with the order which realities follow in his experience: they will lead him nowhere or else make false connexions.

同时，我们的经验始终贯穿着规律性。经验的某一点可以提醒我们为另一点做好准备，可以“预示”或“表示”更遥远的对象的意义。对象的出现是对其意义的证实。在这些情况下，真理不过意味着对事实最终的证实，这显然不允许我们恣意行事。谁的信念要是将其经验中的各种实在所遵循的秩序当成儿戏，谁就要遭殃；其信念会将他引入迷路，或者给他造成假的关联。

By 'realities' or 'objects' here, we mean either things of common sense, sensibly present, or else common-sense relations, such as dates, places, distances, kinds, activities. Following our mental image of a house along the cow-path, we actually come to see the house; we get the image's full verification. SUCH SIMPLY AND FULLY VERIFIED LEADINGS ARE CERTAINLY THE ORIGINALS

AND PROTOTYPES OF THE TRUTH-PROCESS. Experience offers indeed other forms of truth-process, but they are all conceivable as being primary verifications arrested, multiplied or substituted one for another.

这里的“实在”或者“对象”，指的是常识性事物，就是可现场感知的事物，否则就是指常识性关系，比如日期、地点、距离、种类、活动等等。根据我们脑海中有关牧牛小道边的房子的意象，我们走过去，真正看到了那座房子；这个意象完全得以证实。这样的引导过程，得到了如此简单充分的证实之后，无疑就是真理过程的原本或原型。经验的确还为我们提供了其他一些形式的真理过程，但可想而知，这些形式的真理过程，都是被阻断了的、复杂化的、并且是互相代替了的初步的证实过程。

Take, for instance, yonder object on the wall. You and I consider it to be a “clock,” altho no one of us has seen the hidden works that make it one. We let our notion pass for true without attempting to verify. If truths mean verification-process essentially, ought we then to call such unverified truths as this abortive? No, for they form the overwhelmingly large number of the truths we live by. Indirect as well as direct verifications pass muster. Wher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is sufficient, we can go without eye-witnessing. Just as we here assume Japan to exist without ever having been there, because it WORKS to do so, everything we know conspiring with the belief, and nothing interfering, so we assume that thing to be a clock. We USE it as a clock, regulating the length of our lecture by it.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assumption here means its leading to no frustration or contradiction. VerifiABILITY of wheels and weights and pendulum is as good as verification. For one truth-process completed there are a million in our lives that

function in this state of nascency. They turn us TOWARDS direct verification; lead us into the SURROUNDINGS of the objects they envisage; and then, if everything runs on harmoniously, we are so sure that verification is possible that we omit it, and are usually justified by all that happens.

就拿那边墙上的物体作例子。你我都认为它是一只“钟”，尽管我们谁都没有看见使之成为钟的隐藏在内部的机件。我们就把这个观念当成是真的，没有试图加以证实。如果真理主要是指证实的过程，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说这些未经证实的真理是无效的真理呢？不，因为这些未经证实的真理构成了绝大多数我们赖以生存的真理。间接证实和直接证实都可以。要是有足够的间接证据，即使没有亲眼目睹，也行得通。就像我们未曾到过日本但我们在这里假设日本是存在的一样，因为这个钟也是这样，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事物都符合这个信念，不会受到任何干扰，因此我们认为那个东西是一面钟。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钟来用，用它来调节我们演讲时间的长短。这里，对这个观点进行证实，意味着该观点绝不会引导我们走向挫折或矛盾。那个钟的齿轮、重量以及钟摆等的可证实性实际上等同于证实的过程。要完成一个真理过程，在我们的生活中就要有百万个真理以这种初生态发挥作用。它们使我们趋向直接证实；引导我们进入它们所预想的对象的周围；这样，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话，我们确信真理肯定会被证实，我们就会省略证实的过程；而所发生的一切也往往证明这样是对的。

Truth lives, in fact, for the most part on a credit system. Our thoughts and beliefs “pass,” so long as nothing challenges them, just as bank-notes pass so long as nobody refuses them. But this all points to direct face-to-face verifications somewhere, without which the fabric of truth collapses like a financial system with no cash-basis whatever. You accept my verification of one thing, I yours of another. We trade on each other's truth. But beliefs verified

concretely by SOMEBODY are the posts of the whole superstructure.

事实上，真理多半是靠一种信用制度而存在的。我们的思想与信念，只要没有任何东西对它们表示质疑，它们就可以“成立”；就好像银行的钞票一样，只要没有人拒绝使用它们，它们就可以流通。但是，这全都指向某种直接的面对面的证实，没有了直接证实，真理的结构也就崩溃了，就好像一个没有任何现金基础的金融体系一样。你接受我对某种事物的证实，我接受你对另一事物的证实。我们利用彼此的真理。但是，被某个人具体证实过的信念才是整个上层建筑的支柱。

Another great reason—beside economy of time—for waiving complete verification in the usual business of life is that all things exist in kinds and not singly. Our world is found once for all to have that peculiarity. So that when we have once directly verified our ideas about one specimen of a kind, we consider ourselves free to apply them to other specimens without verification. A mind that habitually discerns the kind of thing before it, and acts by the law of the kind immediately, without pausing to verify, will be a “true” mind in ninety-nine out of a hundred emergencies, proved so by its conduct fitting everything it meets, and getting no refutation.

在处理日常事务时，我们之所以放弃进行完全证实，除了节省时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切事物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分类存在的。我们发现我们的世界总是具有这样一个特性。因此，我们只要曾经直接证实了一个种类里的某一个典型的观念，我们就认为可以自由地把这一观念应用到同类的其他实例上去，而不用再进行证实了。一种思想，如果习惯于区分眼前事物的种类，并立刻依照事物种类的规律行事，而不用停下来对此进行证实，那么，这种思想在

一百次的事变中将有九十九次为“真”——其所以被证明是真的，是因为其行为适合所遇到的每个事物，并从未遭到反对。

INDIRECTLY OR ONLY POTENTIALLY VERIFYING PROCESSES MAY THUS BE TRUE AS WELL AS FULL VERIFICATION-PROCESSES. They work as true processes would work, give us the same advantages, and claim our recognition for the same reasons. All this on the common-sense level of, matters of fact, which we are alone considering.

因此，间接的或者仅仅是潜在的证实过程可以像完全的证实过程一样，具有同样的真实性。间接证实的过程与真实的证实过程一样，给我们带来同样的益处，并以同样的理由要求我们予以承认。这一切都发生在事实的常识性阶段之上，我们来单独考虑一下事实。

But matters of fact are not our only stock in trade. RELATIONS AMONG PURELY MENTAL IDEAS form another sphere where true and false beliefs obtain, and here the beliefs are absolute, or unconditional. When they are true they bear the name either of definitions or of principles. It is either a principle or a definition that 1 and 1 make 2, that 2 and 1 make 3, and so on; that white differs less from gray than it does from black; that when the cause begins to act the effect also commences. Such propositions hold of all possible “ones,” of all conceivable “whites” and “grays” and “causes.” The objects here are mental objects. Their relations are perceptually obvious at a glance, and no sense-verification is necessary. Moreover, once true, always true, of those same mental objects. Truth here has an “eternal” character. If you can find a concrete thing anywhere that is “one” or “white” or “gray,” or an

“effect,” then your principles will everlastingly apply to it. It is but a case of ascertaining the kind, and then applying the law of its kind to the particular object. You are sure to get truth if you can but name the kind rightly, for your mental relations hold good of everything of that kind without exception. If you then, nevertheless, failed to get truth concretely, you would say that you had classed your real objects wrongly.

不过，事实并非我们唯一的惯用手段。纯粹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形成另一个范畴，在这个范畴里可以得到真的或者假的信念，这里信念指的是绝对的或无条件的信念。如果这些信念是真的，它们就可以被称为定义或原则。例如，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一等于三，并依此类推；白色与灰色的差别小于白色与黑色的差别；原因开始起作用时，结果也开始出现——这些不是原则就是定义。对于所有可能的有关“一”的加法、所有可以想象的“白色”、“灰色”以及“原因”，这些命题都成立。这里的对象是指思想对象。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无需感觉的证实。此外，同一思想对象，一旦是真的，也就永远是真的了。真理在此具有一种“永久性”特征。如果在任何地方你发现了一个具体的事物是“一个”，或是“白色的”，或是“灰色的”，或是一个“结果”，那么你的原则将对其永久适用。这不过是一个确定属于什么类别，然后把这一类别的原则应用到特别的对象上去的实例。只要你能正确说出事物的类别，你就一定会获得真理，因为你思想中事物对象的关系对于那个类别的一切事物一律适用，无一例外。那么，如果你却没有获得具体真理，你就可以说你把实际的对象归错了类。

In this realm of mental relations, truth again is an affair of leading. We relate one abstract idea with another, framing in the end great systems of logical and mathematical truth, under the respective terms of which the sensible facts of experience eventually arrange themselves, so that our eternal truths hold good of realities

also. This marriage of fact and theory is endlessly fertile. What we say is here already true in advance of special verification, IF WE HAVE SUBSUMED OUR OBJECTS RIGHTLY. Our ready-made ideal framework for all sorts of possible objects follows from the very structure of our thinking. We can no more play fast and loose with these abstract relations than we can do so with our sense-experiences. They coerce us; we must treat them consistently, whether or not we like the results. The rules of addition apply to our debts as rigorously as to our assets. The hundredth decimal of pi, the ratio of the circumference to its diameter, is predetermined ideally now, tho no one may have computed it. If we should ever need the figure in our dealings with an actual circle we should need to have it given rightly, calculated by the usual rules; for it is the same kind of truth that those rules elsewhere calculate.

在这种思想关系的领域里，真理还是一种具有引导作用的东西。我们把一个抽象观念与另一个抽象观念联系起来，最后形成庞大的逻辑与数学真理体系，经验中可感知的事实终于秩序井然地分别列在各系统名目之下，这样，我们的永久真理对于实在也都适用。这种事实与理论的联姻，演变出的结果无穷无尽。如果我们把对象归对了类，那么在进行特别证实之前，我们所说的在此就已经是真实的了。我们现成的有关各种可能的事物对象的理想的框架体系源自于我们思想所特有的体系构造。就像对待我们的感官经验一样，我们也不能任意对待这些思想中抽象的关系。它们强迫我们，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其结果，都必须始终一致地对待它们。加法的规则严格适用于计算我们的债务，也同样严格地适用于计算我们的财产。圆周与直径的比π的小数点后一百位是什么数，虽然可能没有人对其进行过计算，但我们现在已经以理想的方式将其预先确定下来了。假如我们需要利用π对某个真实的圆周进行计算，我们必须得到正确的π，根据通常的规则进行计算；因为根据这些规则在别处进行计算，运用的就是同样的有关π的真理。

Between the coercions of the sensible order and those of the ideal order, our mind is thus wedged tightly. Our ideas must agree with realities, be such realities concrete or abstract, be they facts or be they principles, under penalty of endless inconsistency and frustration. So far, intellectualists can raise no protest. They can only say that we have barely touched the skin of the matter.

我们的思想就是如此紧紧地楔入在感官秩序与理想秩序的双重压力之间。我们的观念必须与实在一致，不管这些实在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是事实还是原则，都要遭受无尽的矛盾与挫折的惩罚。至此，理智主义还提不出什么反驳意见。他们只会反驳说，我们只接触到事情的表象。

Realities mean, then, either concrete facts, or abstract kinds of things and relations perceived intuitively between them. They furthermore and thirdly mean, as things that new ideas of ours must no less take account of, the whole body of other truths already in our possession. But what now does “agreement” with such three-fold realities mean?—to use again the definition that is current.

因此，实在所指的要么是具体的事实，要么就是事物抽象的分类以及事物之间可以直观感受到的关系。实在还有的第三种含义，作为我们的新观念必须同样予以重视的事物，是指我们已掌握的全部其他真理。但是，与具有这三层含义的实在一致，现在，这“一致”指的是什么呢？——再次借用一下目前流行的定义。

Here it is that pragmatism and intellectualism begin to part

company. Primarily, no doubt, to agree means to copy, but we saw that the mere word “clock” would do instead of a mental picture of its works, and that of many realities our ideas can only be symbols and not copies. “Past time,” “power,” “spontaneity”—how can our mind copy such realities?

正是在这里，实用主义与理智主义开始分道扬镳。首先，毫无疑问地，一致就是指模仿，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仅仅“钟”一个词就行了，我们无需在脑海里想象钟的机件构造，我们的观念只是诸多实在的符号而不是其复制品。“过去的时间”、“力量”、“自发性”——我们的大脑哪能对这些实在进行复制呢？

To “agree” in the widest sense with a reality, CAN ONLY MEAN TO BE GUIDED EITHER STRAIGHT UP TO IT OR INTO ITS SURROUNDINGS, OR TO BE PUT INTO SUCH WORKING TOUCH WITH IT AS TO HANDLE EITHER IT OR SOMETHING CONNECTED WITH IT BETTER THAN IF WE DISAGREED. Better either intellectually or practically! And often agreement will only mean the negative fact that nothing contradictory from the quarter of that reality comes to interfere with the way in which our ideas guide us elsewhere. To copy a reality is, indeed, one very important way of agreeing with it, but it is far from being essential. The essential thing is the process of being guided. Any idea that helps us to DEAL, whether practically or intellectually, with either the reality or its belongings, that doesn't entangle our progress in frustrations, that FITS, in fact, and adapts our life to the reality's whole setting, will agree sufficientl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It will hold true of that reality.

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与某一实在的“一致”，只能表示我们被一直引向该实在本身或该实在的周边；否则就表示与该实在发生实际的接触。这样就能更好地处理该实在或与之相关的事物，好于实在如果与观念不一致的情况。不论从理智上或实际上来说都要更好一些！通常，一致指的将只是这样一种否定的事实，即实在方面没有任何矛盾的东西来干扰我们的观念引导我们走向别处的过程。对实在的模仿的确是与实在保持一致的一种重要方法，但决不是根本方法。基本的问题是被引导的过程。任何观念，只要有助于我们从理智或实际的角度来处理实在或者实在的附属物；只要不使我们的前进过程遭受挫折，只要能使我们的生活实际上适合并适应实在的整个环境，这种观念也就与实在足够一致，符合要求了。这种观念将适用于这种意义上的实在。

Thus, NAMES are just as “true” or “false” as definite mental pictures are. They set up similar verification-processes, and lead to fully equivalent practical results.

这样，名称有“真”或“假”之分，就好像头脑中的一些意象，尽管比较明确，但也有真假之分一样。它们建立了类似的证实过程，并指向完全相同的实际结果。

All human thinking gets discursified; we exchange ideas; we lend and borrow verifications, get them from one another by means of social intercourse. All truth thus gets verbally built out, stored up, and made available for everyone. Hence, we must TALK consistently just as we must THINK consistently: for both in talk and thought we deal with kinds. Names are arbitrary, but once understood they must be kept to. We mustn't now call Abel “Cain” or Cain “Abel.” If we do, we ungear ourselves from the whole book

of Genesis, and from all its connexions with the universe of speech and fact down to the present time. We throw ourselves out of whatever truth that entire system of speech and fact may embody.

人类一切思想都经推理得来；我们交换观念，相互借鉴对观念进行证实的方法，彼此通过社交的方式得到它们。一切真理于是就这样在言语上建立起来，被保存下来，为每个人所用。因此，我们说话要前后一致，就像我们思考问题也要前后一致一样；因为我们在谈话与思考时都涉及到分类。名称是任意的，但一旦被人知道了，就必须一如既往地使用下去。就好比我们现在决不能把“亚伯”叫做“该隐”，或者把“该隐”称作“亚伯”一样。如果我们颠倒了这两个人的名字，我们就和整个《创世记》脱节了，也就脱离了其与自古至今的语言及事实范畴的所有相关性。我们就把自己置于整个语言及事实体系可能体现的任何真理之外了。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our true ideas admit of no direct or face-to-face verification-those of past history, for example, as of Cain and Abel. The stream of time can be remounted only verbally, or verified indirectly by the present prolongations or effects of what the past harbored. Yet if they agree with these verbalities and effects, we can know that our ideas of the past are true. AS TRUE AS PAST TIME ITSELF WAS, so true was Julius Caesar, so true were antediluvian monsters, all in their proper dates and settings. That past time itself was, is guaranteed by its coherence with everything that's present. True as the present is, the past was also.

我们绝大多数的真观念都不可能进行直接的或面对面的证实——例如，以往的历史观念，就好像该隐与亚伯这样的观念一样。时光的流逝只能通过言语来加以回溯，或者通过过去在现在的延续，或者说

是过去对现在产生的效果，来予以间接的证实。如果它们与这些言语及效果相一致，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关于过去的观念是真的。就像过去的时间本身是真实的一样，恺撒大帝是真实的，上古的怪兽也是真实的，都存在于各自相应的时间与环境之中。过去的时间和现在一切事物的符合一致，保证了过去的时间本身的存在。现在是真实的，过去也是真实的。

Agreement thus turns out to be essentially an affair of leading—leading that is useful because it is into quarters that contain objects that are important. True ideas lead us into useful verbal and conceptual quarters as well as directly up to useful sensible termini. They lead to consistency, stability and flowing human intercourse. They lead away from excentricity and isolation, from foiled and barren thinking. The untrammeled flowing of the leading-process, its general freedom from clash and contradiction, passes for its indirect verification; but all roads lead to Rome, and in the end and eventually, all true processes must lead to the face of directly verifying sensible experiences SOMEWHERE, which somebody's ideas have copied.

这样，一致性基本上就演变成为有关引导的问题——而且是有益的引导的问题，因为重要的是要引导到包含事物对象的部分。真观念把我们引向有效的言语及概念部分，并把我们直接引向有效的可感知的目的地。它们指向一贯性、稳定性以及不间断的人际交往。它们引导我们离开反常与孤立的现象，离开虚假以及贫瘠的思想。引导过程没有障碍，一般不存在冲突与矛盾，就形成间接的证实过程；但是，条条大道通罗马，最终，一切真实的过程都必将导向针对某一处可感知经验的直接证实，有人的观念曾经复制过这些经验。

Such is the large loose way in which the pragmatist interprets the word agreement. He treats it altogether practically. He lets it cover any process of conduction from a present idea to a future terminus, provided only it run prosperously. It is only thus that “scientific” ideas, flying as they do beyond common sense, can be said to agree with their realities. It is, as I have already said, as if reality were made of ether, atoms or electrons, but we mustn't think so literally. The term “energy” doesn't even pretend to stand for anything “objective.” It is only a way of measuring the surface of phenomena so as to string their changes on a simple formula.

这就是实用主义者对一致这个词非常宽松的解释。他完全从实际出发来处理这个词。他让这个名词包含任何从现在的某个观念导向未来某个事物对象终点的传导过程，只要这个传导还进行得比较顺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那些正远远超越了常识范畴的“科学”性观念与实在是一致的。实在似乎是由以太、原子或电子构成的，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我们绝不能死抠字眼。“能量”这个名词甚至都不敢夸口说能代表任何“客观”的事物。能量不过是一种度量方法，是对现象表面的度量，从而把现象的系列变化拴在一个简单的公式之上。

Yet in the choice of these man-made formulas we cannot be capricious with impunity any more than we can be capricious on the common-sense practical level. We must find a theory that will WORK; and that means something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our theory must mediate between all previous truths and certain new experiences. It must derange common sense and previous belief as little as possible, and it must lead to some sensible terminus or other that can be verified exactly. To “work” means both these things; and the squeeze is so tight that there is little loose play for

any hypothesis. Our theories are wedged and controlled as nothing else is. Yet sometimes alternative theoretic formulas are equally compatible with all the truths we know, and then we choose between them for subjective reasons. We choose the kind of theory to which we are already partial; we follow “elegance” or “economy.” Clerk Maxwell somewhere says it would be “poor scientific taste” to choose the more complicated of two equally well-evidenced conceptions; and you will all agree with him. Truth in science is what gives us the maximum possible sum of satisfactions, taste included, but consistency both with previous truth and with novel fact is always the most imperious claimant.

但是，在选择这些人为的公式时，我们决不能反复无常，毫无顾忌，就好像在常识性的实际阶段，我们同样也不能反复无常，毫无顾忌。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有效的理论；而这极其困难；因为我们的理论必须在以往一切真理与若干新经验之间进行调和。这个理论必须尽量不打乱常识及以往的信念，同时还必须引导我们到达某个可感知的事物对象终点，或其他能被确切证实的事物终点。理论要“有效”，指的是这两种情况都要满足；两种情况之间的空间很小，任何理论都不能对此疏忽大意。理论所受的压力与控制，其他任何东西都比不上。但是有时候，不同的理论公式，也都符合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真理，这时候，我们就凭主观理由来对它们进行选择。我们偏爱哪种理论，我们就选择哪种理论；我们追求“优美性”或“经济性”。克拉克·麦克斯韦好像在哪儿说过：在两个经过同样充分证实的概念之中，选择较复杂的那一个会是“科学品味较差”；你们都会同意他的说法。科学真理是能给我们带来最大可能的满足的东西，包括品味在内；但既要与以往的真理，又要与新鲜事实保持一致，永远是最迫切的要求。

I have led you through a very sandy desert. But now, if I may be allowed so vulgar an expression, we begin to taste the milk in

the cocoanut. Our rationalist critics here discharge their batteries upon us, and to reply to them will take us out from all this dryness into full sight of a momentous philosophical alternative.

我已经引导你们穿越了一片多沙的沙漠。现在，请允许我用通俗的话语来表述：我们开始尝到椰子里的甜汁了。理性主义批评家们在此向我们开炮了，对他们的回击会使我们彻底走出这片沙漠，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哲学观点尽收眼底。

Our account of truth is an account of truths in the plural, of processes of leading, realized in rebus, and having only this quality in common, that they PAY. They pay by guiding us into or towards some part of a system that dips at numerous points into sense-percepts, which we may copy mentally or not, but with which at any rate we are now in the kind of commerce vaguely designated as verification. Truth for us is simply a collective name for verification-processes, just as health, wealth, strength, etc., are names for other processes connected with life, and also pursued because it pays to pursue them. Truth is MADE, just as health, wealth and strength are made, in the course of experience.

我们所说的真理是复数形式的真理，是多个引导过程的真理，是在事物中实现的真理，而且只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真理会给我们带来好处。真理会给我们带来好处，是由于它们能把我们引入或引向一个体系的某个部分，这一体系在许多点上已经深入到感性知觉，这些感性知觉，不管我们是否在思想里进行复制，至少都与我们有一种被笼统地称为证实的交易关系。对我们来说，真理只是证实过程的一个总称，就好比健康、富裕、强壮等词是表示与生活相关的其他过程的名称一样，我们追求真理也是因为追求真理会给我们带来的

好处。真理是在经验过程中形成的，就好像健康、富裕与强壮也是在经验过程中形成的一样。

Here rationalism is instantaneously up in arms against us. I can imagine a rationalist to talk as follows:

在此，理性主义会立刻武装起来反对我们。我可以想象，理性主义者会这样说：

“Truth is not made,” he will say; “it absolutely obtains, being a unique relation that does not wait upon any process, but shoots straight over the head of experience, and hits its reality every time. Our belief that yon thing on the wall is a clock is true already, altho no one in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world should verify it. The bare quality of standing in that transcendent relation is what makes any thought true that possesses it, whether or not there be verification. You pragmatists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in making truth's being reside in verification-processes. These are merely signs of its being, merely our lame ways of ascertaining after the fact, which of our ideas already has possessed the wondrous quality. The quality itself is timeless, like all essences and natures. Thoughts partake of it directly, as they partake of falsity or of irrelevancy. It can't be analyzed away into pragmatic consequences.”

“真理并非形成于经验；真理是绝对存在的，它表达一种独特的关系，与任何过程无关；但它站在经验之上瞄准射击，而且每次都击中实在。我们相信墙上的那个东西是一面钟，这种观念早已经是真的了，尽管在整个世界历史长河中没人会对此加以证实。无论什么思

想，不管有没有证实的过程，只要处于那种先验的关系之中，这一特性就会使得这种思想成为真理。你们实用主义者对于真理存在于证实过程中的解释是本末倒置了。证实的过程只是真理存在的标记，只是一些蹩脚的方法，事后用来确定我们的哪种观念已经拥有这样奇妙的先验的特性。这一先验的特性本身不受时间的影响，就像一切本性与实质一样。思想直接带有这种特性，就好像思想也可能会带有谬误性或无关性一样。这一特性是无法用实际的结果来分析和界定的。”

The whole plausibility of this rationalist tirade is due to the fact to which we have already paid so much attention. In our world, namely, abounding as it does in things of similar kinds and similarly associated, one verification serves for others of its kind, and one great use of knowing things is to be led not so much to them as to their associates, especially to human talk about them. The quality of truth, obtaining ante rem, pragmatically means, then, the fact that in such a world innumerable ideas work better by their indirect or possible than by their direct and actual verification. Truth ante rem means only verifiability, then; or else it is a case of the stock rationalist trick of treating the NAME of a concrete phenomenal reality as an independent prior entity, and placing it behind the reality as its explanation. Professor Mach quotes somewhere an epigram of Lessing's:

理性主义者这样的长篇大论整体上貌似有理，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此也十分关注。这个事实即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类似或相似的事物大量存在的世界里，一个证实过程可适用于同类其他事物；了解事物的一个最大用处，不只是为了引导到这些事物，而是为了引导到其相关事物，特别是引导到人们对于这些事物的说法上。那么，先于事物而存在的真理，其性质，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指的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有无数观念，用间接的或可能的方法比用直接

的或实际的方法进行证实要更有效些。这样，先于事实的真理仅仅意味着可证实性；否则就又是理性主义者那老一套的把戏：把一个具体能感知的实在的名称当作一个独立的、预先存在的实体，再把这名称放在这个实在之后，作为对其的解释。马赫教授曾引用莱辛的一首讽刺诗说：

SagtHanschen Schlau zu Vetter Fritz, “Wiekommtes, Vetter Fritzen, Dass grad die Reichsten in der Welt, Das meiste Geld besitzen?”

“汉辛·施劳对他的表哥弗里茨说：‘弗里茨表哥，世上最富裕的人正好就是最有钱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Hanschen Schlau here treats the principle “wealth” as something distinct from the facts denoted by the man's being rich. It antedates them; the facts become only a sort of secondary coincidence with the rich man's essential nature.

在此，汉辛·施劳所认为的“富裕”原则，不同于这个人有钱所表示的事实。“富裕”原则先于事实而存在；有钱之事实与富翁本质特征的一致只不过是某种次要的一致性。

In the case of “wealth” we all see the fallacy. We know that wealth is but a name for concrete processes that certain men's lives play a part in, and not a natural excellence found in Messrs. Rockefeller and Carnegie, but not in the rest of us.

在“富裕”这一问题上，我们都看出了谬误之所在。我们知道，富裕不过一种名称，指代某些人的人生所参与的具体过程，而不是一种只有在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两位先生身上才能发现，而我们其他人身上都不能发现的天生的优点。

Like wealth, health also lives in rebus. It is a name for processes, as digestion, circulation, sleep, etc., that go on happily, tho in this instance we are more inclined to think of it as a principle and to say the man digests and sleeps so well BECAUSE he is so healthy.

像富裕一样，健康也存在于事物之中。健康也只是一个名称，用来指代畅通进行的过程，如消化、血液循环、睡眠等过程，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把健康看作某种原则，说这个人之所以胃口好，睡得好，是因为他很健康。

With “strength” we are, I think, more rationalistic still, and decidedly inclined to treat it as an excellence pre-existing in the man and explanatory of the herculean performances of his muscles.

我认为，我们对于“强壮”的看法还更理性主义一些，我们明显地倾向于把它当成早就存在于人身上的某种优点，并借以解释他的身体如何像大力士一样强健有力。

With “truth” most people go over the border entirely, and treat the rationalistic account as self-evident. But really all these words in TH are exactly similar. Truth exists ante rem just as much and as

little as the other things do.

谈到“真理”，大多数人完全跨越了这个界限，认为理性主义者的论述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实际上这几个名词完全相似。真理不是先于事物而存在的，恰如上述其他事物一样。

The scholastics, following Aristotle, made much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abit and act. Health in actual means, among other things, good sleeping and digesting. But a healthy man need not always be sleeping, or always digesting, any more than a wealthy man need be always handling money, or a strong man always lifting weights. All such qualities sink to the status of “habits” between their times of exercise; and similarly truth becomes a habit of certain of our ideas and beliefs in their intervals of rest from their verifying activities. But those activities are the root of the whole matter,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re being any habit to exist in the intervals.

经院哲学家遵循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把习惯与行为分得很开。在行为上，健康的意思，除了别的方面，指的是良好的睡眠与消化。但是一个健康的人不必总是在睡觉，或者总是在消化，就像一个富人不必总是经手金钱，一个强壮的人不必总是举重一样。在活动的间歇时间里，所有这些性质都潜伏到“习惯”状态之中；同样地，在我们的某些观念以及信念无须进行证实的间歇里，真理就成为了这些观念以及信念的习惯。但是，这些证实活动是整个事情的根源，也是在间歇时间里任何习惯得以存在的条件。

“The true,” to put it very briefly, is only the expedient in the

way of our thinking, just as “the right” is only the expedient in the way of our behaving. Expedient in almost any fashion; and expedient in the long run and on the whole of course; for what meets expediently all the experience in sight won't necessarily meet all farther experiences equally satisfactorily. Experience, as we know, has ways of BOILING OVER, and making us correct our present formulas.

用非常简单的话来说，“真理”只是使我们思维便利的方法，恰如“正确”是使我们行为便利的方法一样。几乎是各方面的便利，而且一定是长远性与整体性的便利，因为适合眼前一切经验的便利方法，未必能同样适合未来的一切经验。我们知道，经验有办法超越现有的规则，从而使我们改正现有的规则。

The “absolutely” true, meaning what no farther experience will ever alter, is that ideal vanishing-point towards which we imagine that all our temporary truths will some day converge. It runs on all fours with the perfectly wise man, and with the absolutely complete experience; and, if these ideals are ever realized, they will all be realized together. Meanwhile we have to live today by what truth we can get today, and be ready tomorrow to call it falsehood. Ptolemaic astronomy, euclidean space, aristotelian logic, scholastic metaphysics, were expedient for centuries, but human experience has boiled over those limits, and we now call these things only relatively true, or true within those borders of experience. “Absolutely” they are false; for we know that those limits were casual, and might have been transcended by past theorists just as they are by present thinkers.

“绝对”真理，意味着以后的经验绝不会使其有所改变，它就是我们想象中一切暂时的真理有一天会汇聚在一起的理想终点。它和绝对智者，以及绝对完整的经验完全一致；而且，如果有一天这些理想会实现，它们就会一同实现。与此同时，我们今天只好依靠今天所获得的真理来生活，并要为明天会推翻今天的真理做好准备。托勒密的地心说、欧几里德空间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以及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曾经是长达几个世纪的便利方法，但是人类的经验已经超越了那些界限，我们现在只是说它们是相对真理，或者是经验范围之内的真理。“绝对”而言，这些学说却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学说的适用范围是暂时的，犹如现在的思想家一样，过去的理论家可能已经超越了其范围。

When new experiences lead to retrospective judgments, using the past tense, what these judgments utter WAS true, even tho no past thinker had been led there. We live forwards, a Danish thinker has said, but we understand backwards. The present sheds a backward light on the world's previous processes. They may have been truth-processes for the actors in them. They are not so for one who knows the later revelations of the story.

当新经验用过去时的时态指向以往的观点，这些观点所说的过去一度曾经是真理，尽管以往从未有思想家被引导到这些观点。一个丹麦的思想家曾经说过，我们的生活是向前指向的，但我们对于事物的了解却是向后指向的。现在给我们以启发，使我们了解世界以往的过程。对于过程的参与者来说，以往的过程或者就是真理的过程。但是对于了解事情后来真相的人来说，却并非如此。

This regulative notion of a potential better truth to be established later, possibly to be established some day absolutely,

and having powers of retroactive legislation, turns its face, like all pragmatist notions, towards concreteness of fact, and towards the future. Like the half-truths, the absolute truth will have to be MADE, made as a relation incidental to the growth of a mass of verification-experience, to which the half-true ideas are all along contributing their quota.

这种调整性的观点，认为潜在的更好的真理以后会成立，可能有一天会绝对成立，并且有追溯过去决定真伪的能力，这一观点与所有实用主义的观点一样，是面向事实的具体性，面向未来的。与相对真理一样，绝对真理也只是逐渐形成的，与大量证实性经验的增加偶然相关，相对真理始终在为绝对真理贡献力量。

I have already insisted on the fact that truth is made largely out of previous truths. Men's beliefs at any time are so much experience funded. But the beliefs are themselves parts of the sum total of the world's experience, and become matter, therefore, for the next day's funding operations. So far as reality means experienceable reality, both it and the truths men gain about it are everlastingly in process of mutation–mutation towards a definite goal, it may be—but still mutation.

我一直坚持认为真理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以往的真理。任何时候人们的观念都是这样以经验为基础。但是，这些观念本身又是世界经验总体中的部分，因此，也成为对未来产生影响的因素。只要实在指的是可体验的实在，那么，实在，以及人们所获得的有关实在的真理，就永远处于变化的过程当中——处于趋向于某种明确目标的变化当中，也许是这样的——但总归是在变化中。

Mathematicians can solve problems with two variables. On the Newtonian theory, for instance, acceleration varies with distance, but distance also varies with acceleration. In the realm of truth-processes facts come independently and determine our beliefs provisionally. But these beliefs make us act, and as fast as they do so, they bring into sight or into existence new facts which re-determine the beliefs accordingly. So the whole coil and ball of truth, as it rolls up, is the product of a double influence. Truths emerge from facts; but they dip forward into facts again and add to them; which facts again create or reveal new truth (the word is indifferent) and so on indefinitely. The 'facts' themselves meanwhile are not TRUE. They simply ARE. Truth is the function of the beliefs that start and terminate among them.

数学家们能用两个变量来解决问题。例如，根据牛顿的理论，加速度随着距离而变化，但距离也随着加速度而变化。在真理过程中，事实都是独立出现的，并暂时决定我们的观念。但是，观念促使我们采取行动，而在它们在这样作用的同时，又使新的事实得以出现或存在，新的事实又相应地对这些观念重新加以判定。因此，这样绕起来的整个真理的线球，就是双重影响的产物。真理产生于事实，但又重新浸入到事实之中并加强事实；这些事实又产生或揭示新的真理（这里用什么样的词无关紧要），如此无限类推下去。其间“事实”本身并非真理。它们只是存在而已。真理是起于事实并终于事实的信念的作用。

The case is like a snowball's growth, due as it is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now on the one hand, and to the successive pushes of the boys on the other, with these factors co-determining each other incessantly.

这就像滚雪球一样，雪球变大一方面是因为有雪的分布，另一方面是男孩们不停地推动的缘故；这两个因素不停地相互影响。

The most fateful poi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a rationalist and being a pragmatist is now fully in sight. Experience is in mutation, and our psychological ascertainments of truth are in mutation—so much rationalism will allow; but never that either reality itself or truth itself is mutable. Reality stands complete and ready-made from all eternity, rationalism insists, and the agreement of our ideas with it is that unique unanalyzable virtue in them of which she has already told us. As that intrinsic excellence, their trut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ur experiences. It adds nothing to the content of experience.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o reality itself; it is supervenient, inert, static, a reflexion merely. It doesn't EXIST, it HOLDS or OBTAINS, it belongs to another dimension from that of either facts or fact-relations, belongs, in short, to the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and with that big word rationalism closes the discussion.

理性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最重要的区别，现在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了。经验处于变化之中，我们从心理上对真理的确认也处于变化之中——这些观点，理性主义会承认，但它决不承认实在自身或者真理自身也处于变化之中。理性主义坚持认为，实在是完整的、现成的、直接来源于永恒；他们认为，观念与实在的一致是我们观念中唯一不可分析的特点，这一点理性主义者早已经告诉我们。由于这个内在的优点，理性主义的真理与经验无关。它不会使经验的内容有任何增加。它对实在本身不产生任何影响；它是附加的、惰性的、静止的，只是一个映像而已。它本身并不存在，只会占有或者获得；它属于与事实或事实关系无关的另一方面，简而言之，属于认识论的方面——理性主义便以认识论这样一个大词结束了这场论争。

Thus, just as pragmatism faces forward to the future, so does rationalism here again face backward to a past eternity. True to her inveterate habit, rationalism reverts to “principles,” and thinks that when an abstraction once is named, we own an oracular solution.

因此，实用主义是面向将来的，而理性主义在这里还是面向过去的永恒的。理性主义忠实于其固有的习惯，又回归到“原则”上来，认为只要给抽象的东西一个名称，我们便拥有了一个权威的解决办法。

The tremendous pregnancy in the way of consequences for life of this radical difference of outlook will only become apparent in my later lectures. I wish meanwhile to close this lecture by showing that rationalism's sublimity does not save it from inanity.

两种真理观存在根本的差别，这种差别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巨大，这在我后面的几讲里会交代清楚。同时，我想指出理性主义的崇高性并不能使其免于虚妄，我想以这一点作为本次演讲的结束。

When, namely, you ask rationalists, instead of accusing pragmatism of desecrating the notion of truth, to define it themselves by saying exactly what THEY understand by it, the only positive attempts I can think of are these two:

这就是说，你若要求理性主义者不要指责实用主义糟蹋了真理的概念，而要求他们给真理下一个定义，明确说出他们所理解的真理是什么，我想只可能有如下两种肯定的答复：

1．“Truth is just the system of propositions which have an unconditional claim to be recognized as valid.” (A. E. Taylor,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xiv, p. 288.)

一、“真理就是命题体系，其所包含命题的有效性要求得到无条件的承认。”（A. E. 泰勒，《哲学评论》第14卷，第288页。）

2．Truth is a name for all those judgments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under obligation to make by a kind of imperative duty. (H. Rickert, Der Gegenstand der Erkenntniss, chapter on 'Die Urtheilsnothwendigkeit.')

二、真理是一种名称，用来表示所有那些我们自身觉得责无旁贷，有义务表达出来的观点。（见H. 里克特，《认识的对象》“判断的必要性”一章。）

The first thing that strikes one in such definitions is their unutterable triviality. They are absolutely true, of course, but absolutely insignificant until you handle them pragmatically. What do you mean by “claim” here, and what do you mean by “duty”? As summary names for the concrete reasons why thinking in true ways is overwhelmingly expedient and good for mortal men, it is all right to talk of claims on reality's part to be agreed with, and of obligations on our part to agree. We feel both the claims and the obligations, and we feel them for just those reasons.

这两个定义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们那说不出的琐碎性。它们是绝对正确的定义，这是当然的；但是，在你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量它们之前，它们也是绝对不重要的定义。这里，“要求”指的是什么意思？“义务”又指的是什么意思呢？“要求”与“义务”都是概括性的名称，用来指为什么按照真方式进行思考对于凡人是极其便利的和有利的具体原因；从实在的方面谈到要被承认的要求，以及从我们自身的方面谈到要承认的义务，都是可以的。我们觉得既是要求，也是义务，我们这样认为也仅是因为这些具体的原因而已。

But the rationalists who talk of claim and obligation EXPRESSLY SAY THAT THE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OUR PRACTICAL INTERESTS OR PERSONAL REASONS. Our reasons for agreeing are psychological facts, they say, relative to each thinker, and to the accidents of his life. They are his evidence merely, they are no part of the life of truth itself. That life transacts itself in a purely logical or epistemological,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and its claims antedate and exceed all personal motivations whatsoever. Tho neither man nor God should ever ascertain truth, the word would still have to be defined as that which OUGHT to be ascertained and recognized.

但是，谈到了要求及义务的理性主义者却明确表明，要求和义务与我们的实际利益或个人原因毫无关系。他们说，我们之所以认为既是要求又是义务是心理方面的原因，与每一位思想家相关，与其生活中的偶然因素相关。它们只是思想家的证据，绝不是真理本身生命的一部分。真理的生命在纯逻辑或认识论的范畴内活动，而不是在心理范畴内活动，其要求先于并超过一切个人动机。尽管人和上帝都不应对真理加以断定，但真理这个词仍须作为我们应加以断定以及承认的东西来进行定义。

There never was a more exquisite example of an idea abstracted from the concretes of experience and then used to oppose and negate what it was abstracted from.

说到某个观点，从经验的具体事实概括得来，又被用来反对及否定这些具体的事实，再也没有比这个更经典的例子了。

Philosophy and common life abound in similar instances. The "sentimentalist fallacy" is to shed tears over abstract justice and generosity, beauty, etc., and never to know these qualities when you meet them in the street, because there the circumstances make them vulgar. Thus I read in the privately printed biography of an eminently rationalistic mind: "It was strange that with such admiration for beauty in the abstract, my brother had no enthusiasm for fine architecture, for beautiful painting, or for flowers." And in almost the last philosophic work I have read, I find such passages as the following: "Justice is ideal, solely ideal. Reason conceives that it ought to exist, but experience shows that it cannot…. Truth, which ought to be, cannot be…. Reason is deformed by experience. As soon as reason enters experience, it becomes contrary to reason."

哲学以及平常生活中类似的例子很多。"感伤主义者的谬误"就是面对抽象的正义、慷慨与美等等会撒上大把的眼泪，但在大街上碰到它们时，因为环境使其显得很庸俗，所以就一点也认不出这些优良品质来了。我在一本私人出版的有关某位著名的理性主义者的传记里，曾经读到这样的话："我的哥哥如此欣赏抽象的美，但他对于精巧的建筑、美妙的图画以及花卉却一点也不感兴趣，这真是很奇怪。"在差不多是最近所读到的一本哲学书里，我发现有这样几段话："正义

是理想化的，纯粹理想化的。理性认为正义应当存在，但经验却表明正义不能存在……真理，应当存在，却又不能存在……理性因为经验而变形。理性一旦进入经验，就演变成了理性的对立面。”

The rationalist's fallacy here is exactly like the sentimentalist's. Both extract a quality from the muddy particulars of experience, and find it so pure when extracted that they contrast it with each and all its muddy instances as an opposite and higher nature. All the while it is THEIR nature. It is the nature of truths to be validated, verified. It pays for our ideas to be validated. Our obligation to seek truth is part of our general obligation to do what pays. The payments true ideas bring are the sole why of our duty to follow them.

这里，理性主义者的谬误与感伤主义者的谬误完全一样。两者都从经验之混乱的细节中提炼出某种特征，一经提炼出来之后，他们发现该特征是如此纯洁，于是就把它与所有混乱的细节相对比，认为它具有一种相反的并且更高级的本质特征。这一特征始终都是这些细节的本质特征。它是有待确认与证实的真理的本质特征。它有助于使我们的观念得以确认。我们一般有义务去做有利的事情，而寻求真理的义务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真理带给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义务寻求真理的唯一理由。

Identical whys exist in the case of wealth and health. Truth makes no other kind of claim and imposes no other kind of ought than health and wealth do. All these claims are conditional; the concrete benefits we gain are what we mean by calling the pursuit a duty. In the case of truth, untrue beliefs work as perniciously in the long run as true beliefs work beneficially. Talking abstractly, the

quality “true” may thus be said to grow absolutely precious, and the quality “untrue” absolutely damnable: the one may be called good, the other bad, unconditionally. We ought to think the true, we ought to shun the false, imperatively.

富裕与健康也存在同样的道理。真理所提出的要求和义务无异于健康富裕所提出的要求和义务。所有这些要求都是有条件的；我们得到的具体好处，就是把追求真理称作义务的意义所在。就真理而言，不真的信念终究会起到有害的作用，犹如真信念会起到有益的作用一样。抽象地说，“真”的性质可以说是绝对越来越可贵，“不真”的性质绝对越来越可恶：无条件地，一个可以称作是有益的，一个可以称作是有害的。无可异议，我们应当思考真理，远离谬误。

But if we treat all this abstraction literally and oppose it to its mother soil in experience, see what a preposterous position we work ourselves into.

但是如果我们死板地对待这个抽象概念，并且把它和它在经验中的土壤对立起来，试想我们会把自己置于何等荒谬的地步。

We cannot then take a step forward in our actual thinking. When shall I acknowledge this truth and when that? Shall the acknowledgment be loud?—or silent? If sometimes loud, sometimes silent, which NOW? When may a truth go into cold-storage in the encyclopedia? and when shall it come out for battle? Must I constantly be repeating the truth “twice two are four” because of its eternal claim on recognition? or is it sometimes irrelevant? Must my thoughts dwell night and day on my personal sins and

blemishes, because I truly have them?—or may I sink and ignore them in order to be a decent social unit, and not a mass of morbid melancholy and apology?

这样一来，在实际的思想过程中，我们会寸步难行。我什么时候该承认这个真理，什么时候我该承认那个真理呢？要大声地承认呢？还是默默地承认呢？如果有时候要大声承认，有时候又要默认，那么此时此刻是应当大声地还是默默地承认呢？一个真理什么时候可能被收进百科全书的冷库里去呢？什么时候要把它拿出来作战呢？“二乘二等于四”这个真理要求我们永远承认，我们是否就必须不停地重复这个真理呢？或者是不是有时它也有些不相干呢？因为我的确有一些个人的罪恶与缺点，我就必须日夜凝思这些罪恶与缺点吗？或者为了充当一个体面的社会组成体，而不是一个充满了病态的忧郁与忏悔的人，我是否可以保持沉默而置这些罪恶与缺点于不顾呢？

It is quite evident that our obligation to acknowledge truth, so far from being unconditional, is tremendously conditioned. Truth with a big T, and in the singular, claims abstractly to be recognized, of course; but concrete truths in the plural need be recognized only when their recognition is expedient. A truth must always be preferred to a falsehood when both relate to the situation; but when neither does, truth is as little of a duty as falsehood. If you ask me what o'clock it is and I tell you that I live at 95 Irving Street, my answer may indeed be true, but you don't see why it is my duty to give it. A false address would be as much to the purpose.

很明显，我们有义务承认真理，但这绝不是无条件地承认，而是有很多条件限制的。以大写的T开头的单数形式的真理一词，既然是抽象名词，当然抽象地要求为我们所承认；但是，该词的复数形式所

表示的具体的真理只有在便利的时候才需要我们加以承认。当某个真理与某个谬误都与具体情况相关联时，我们总是更喜欢真理；但是在两者都不与具体情况相关联时，真理以及谬误都与义务无关。你要是问我现在几点钟，而我答复你说，我住在欧文路95号，我的答复可能的确属实，但是你看不出我有什么义务要这样回答。即使我说的地址是错误的，效果也可能完全一样。

With this admission that there are conditions that limi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bstract imperative, THE PRAGMATISTIC TREATMENT OF TRUTH SWEEPS BACK UPON US IN ITS FULNESS. Our duty to agree with reality is seen to be grounded in a perfect jungle of concrete expediencies.

既然承认有许多条件限制了抽象真理的应用，那么实用主义对于真理的诠释就又全副武装地卷土重来了。实用主义认为，我们有义务与实在保持一致，这是以许多具体的便利条件为基础的。

When Berkeley had explained what people meant by matter, people thought that he denied matter's existence.

从前，贝克莱在解释人们所谓的物质一词的意义时，人们认为他否认物质的存在。

When Messrs. Schiller and Dewey now explain what people mean by truth, they are accused of denying ITS existence. These pragmatists destroy all objective standards, critics say, and put foolishness and wisdom on one level. A favorite formula for

describing Mr. Schiller's doctrines and mine is that we are persons who think that by saying whatever you find it pleasant to say and calling it truth you fulfill every pragmatistic requirement.

现在，席勒和杜威两位先生在解释人们所谓真理的意义时，人们则指责他们否认了真理的存在。批评家们说，这些实用主义者们推翻了一切客观标准，把智慧与愚蠢相提并论。人们最喜欢这样来描述席勒先生和我的理论：席勒先生和我认为，通过说些人们感到一吐为快的话，并把所说的话称作真理，就能满足实用主义的一切要求了。

I leave it to you to judge whether this be not an impudent slander. Pent in, as the pragmatist more than anyone else sees himself to be, between the whole body of funded truths squeezed from the past and the coercions of the world of sense about him, who so well as he feels the immense pressure of objective control under which our minds perform their operations? If anyone imagines that this law is lax, let him keep its commandment one day, says Emerson. We have heard much of late of the uses of the imagination in science. It is high time to urge the use of a little imagination in philosophy. The unwillingness of some of our critics to read any but the silliest of possible meanings into our statements is as discreditable to their imaginations as anything I know in recent philosophic history. Schiller says the true is that which “works.” Thereupon he is treated as one who limits verification to the lowest material utilities. Dewey says truth is what gives “satisfaction.” He is treated as one who believes in calling everything true which, if it were true, would be pleasant.

这话是不是一种无礼的诽谤，我留给你们大家去判断。实用主义

者比谁都能更清楚地看到自己被包围在全部从过去所费力获得的固定真理以及周围感官世界的压迫之中；我们在进行思考时所受到的客观控制的压力之大，有谁还能比实用主义者感受得更深刻呢？爱默生说，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律法太松，那就哪一天让他试行遵守这个律法的戒条吧。最近，我们常听人说起在科学中运用想象力的事情。现在也该是力劝人们在哲学中也运用些想象力的时候了。一些批评我们的人一味曲解我们的话，硬说其中只有最糊涂的含意，这种人，就我所知，在近来的哲学史上是最缺乏想象力不过的了。席勒说，凡是“有功用”的东西就是真理。因此，有人就说他把证实限制在最低级的物质功用上。杜威说，真理是使人“满足”的东西。有人就说，他相信一切事物凡是会使人感到愉悦的，就是真理。

Our critics certainly need more imagination of realities. I have honestly tried to stretch my own imagination and to read the best possible meaning into the rationalist conception, but I have to confess that it still completely baffles me. The notion of a reality calling on us to “agree” with it, and that for no reasons, but simply because its claim is “unconditional” or “transcendent,” is one that I can make neither head nor tail of. I try to imagine myself as the sole reality in the world, and then to imagine what more I would “claim” if I were allowed to. If you suggest the possibility of my claiming that a mind should come into being from out of the void inane and stand and COPY me, I can indeed imagine what the copying might mean, but I can conjure up no motive. What good it would do me to be copied, or what good it would do that mind to copy me, if farther consequences are expressly and in principle ruled out as motives for the claim (as they are by our rationalist authorities) I cannot fathom. When the Irishman's admirers ran him along to the place of banquet in a sedan chair with no bottom, he said, “Faith, if it wasn't for the honor of the thing, I might as well have come on foot.” So here: but for the honor of the thing, I might

as well have remained uncopied. Copying is one genuine mode of knowing (which for some strange reason our contemporary transcendentalists seem to be tumbling over each other to repudiate); but when we get beyond copying, and fall back on unnamed forms of agreeing that are expressly denied to be either copyings or leadings or fittings, or any other processes pragmatically definable, the WHAT of the “agreement” claimed becomes as unintelligible as the why of it. Neither content nor motive can be imagined for it. It is an absolutely meaningless abstraction. (I am not forgetting that Professor Rickert long ago gave up the whole notion of truth being founded on agreement with reality. Reality, according to him, is whatever agrees with truth, and truth is founded solely on our primal duty. This fantastic flight, together with Mr. Joachim's candid confession of failure in his book The Nature of Truth, seems to me to mark the bankruptcy of rationalism when dealing with this subject. Rickert deals with part of the pragmatistic position under the head of what he calls “Relativismus.” I cannot discuss his text here. Suffice it to say that his argumentation in that chapter is so feeble as to seem almost incredible in so generally able a writer.)

我们的批评家的确需要对实在有更多的想象力。我曾经诚心想要极大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从最好的方面去理解理性主义的意义，但我必须承认我对理性主义的观点仍然十分困惑。理性主义认为，某个实在要求我们与其保持“一致”，不是因为任何别的原因，而只是因为它提出的要求是“无条件的”或“先验的”；我对此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我试着设想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实在，然后再设想如果允许的话，我还能“要求”些什么。假如你们建议，说我可以要求由空虚愚昧中产生一个思想来模仿我，我的确能够想象到这种模仿将会是怎么一回事——但我却想不出有什么模仿的动机来。对于这一我无法充分理解的要求，其动机是什么，如果显然能基本排除有更多的因素（正如

理性主义的权威们所做的一样），那么，我被模仿对我会有什么好处，对那模仿我的思想又有什么好处呢。当爱尔兰人（贝克莱）的追随者们用一顶没底的轿子抬他去赴宴时，他说："天哪，若不是为了去赴宴，我宁肯走着去。"这里也是如此：若不是为了被模仿，我宁肯不被模仿。模仿是一种真实的认知模式（因为一些很奇怪的原因，当代的先验论者们争先恐后地对此予以否认）；但是，当我们越过模仿，回头再说到未被命名的一致的方式时，这种方式被明确地认为既不是模仿的过程，也不是引导或适应的过程，或其他任何可从实用主义角度进行定义的过程，那么，要求与什么相"一致"，以及为什么要"一致"，都同样无法理解。"模仿"的内容与动机都难以想象。这绝对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过程。（我还记得里克特教授在很久从前就放弃了整个建立在与实在相一致的基础之上的真理观。在他看来，实在是任何与真理一致的东西，而真理只以我们的主要义务为基础。这种异想天开的思想飞跃，再加上约乔基姆先生在其所著的《真理的本性》一书里坦率承认了失败，在我看来都似乎标志着理性主义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彻底失败。里克特在他所谓的"相对论"的标题之下谈到了部分实用主义的观点。在此，我无法讨论他的文章，但我只想说，他在那一章节中所提出的观点是那样站不住脚，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他这样一个一般认为很有能力的作者之手。）

Surely in this field of truth it is the pragmatists and not the rationalists who are the more genuine defenders of the universe's rationality.

毫无疑问，在真理这个领域里，宇宙理性真正的辩护人是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性主义者。

Lecture VII Pragmatism and Humanism

第七讲　实用主义与人本主义

THE NOTION OF THE TRUTH. SCHILLER ON “HUMANISM.” THREE SORTS OF REALITY OF WHICH ANY NEW TRUTH MUST TAKE ACCOUNT. TO “TAKE ACCOUNT” IS AMBIGUOUS. ABSOLUTELY INDEPENDENT REALITY IS HARD TO FIND. THE HUMAN CONTRIBUTION IS UBIQUITOUS AND BUILDS OUT THE GIVEN. ESSENCE OF PRAGMATISM's CONTRAST WITH RATIONALISM. RATIONALISM AFFIRMS A TRANSEMPIRICAL WORLD. MOTIVES FOR THIS. TOUGH-MINDEDNESS REJECTS THEM. A GENUINE ALTERNATIVE. PRAGMATISM MEDIATES.

唯一真理的概念。席勒对“人本主义”的阐述。任何新真理都必须考虑的三种现实。“考虑”是模棱两可的。很难发现绝对独立的现实。人的贡献无处不在并丰富了已知已有。实用主义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实质。理性主义确认世界是超经验的。这种认识的动机。实际头脑的人拒绝这种认识。真正的替代之法。实用主义有调节中介的作用。

What hardens the heart of everyone I approach with the view of truth sketched in my last lecture is that typical idol of the tribe, the notion of THE Truth, conceived as the one answer, determinate and complete, to the one fixed enigma which the world is believed to propound. For popular tradition, it is all the better if the answer be oracular, so as itself to awaken wonder as an enigma of the second order, veiling rather than revealing what its profundities are supposed to contain. All the great single-word answers to the

world's riddle, such as God, the One, Reason, Law, Spirit, Matter, Nature, Polarity, the Dialectic Process, the Idea, the Self, the Oversoul, draw the admiration that men have lavished on them from this oracular role. By amateurs in philosophy and professionals alike, the universe is represented as a queer sort of petrified sphinx whose appeal to man consists in a monotonous challenge to his divining powers. THE Truth: what a perfect idol of the rationalistic mind! I read in an old letter—from a gifted friend who died too young—these words: “In everything, in science, art, morals and religion, there MUST be one system that is right and EVERY other wrong.” How characteristic of the enthusiasm of a certain stage of youth! At twenty-one we rise to such a challenge and expect to find the system. It never occurs to most of us even later that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truth?” is no real question (being irrelative to all conditions) and that the whole notion of THE truth is an abstraction from the fact of truths in the plural, a mere useful summarizing phrase like THE Latin Language or THE Law.

在上一讲中我概要勾画出来的真理观，之所以让每一个人都感到冷酷无情，原因就在于这是那种典型的部落偶像，即唯一真理的概念，它被当作唯一的、决定性的、全面的答案，能解答世界所提出的那唯一固定不变的谜题。按一般的传统来说，如果答案玄妙深奥就更好了，这样，答案本身就能唤醒奇迹，使之成为一个第二级的谜，结果不是揭示而是掩盖了它所包含的种种奥秘。关于宇宙之谜所有的那些由单个词组成的答案，如上帝、一元、理智、规律、精神、物质、自然、极性、辩证过程、观点、自我、超灵等，都因为这种玄妙作用而引发人们的无限敬仰。业余哲学爱好者和职业哲学家一样，把宇宙描绘成一种石化的斯芬克斯的奇异形象，他之所以吸引人，就在于不断受到人们对其神力的挑战。唯一真理：这是理性主义思想多么完美的偶像！一位天才而早逝的朋友在他旧日给我的来信中写道：“在任何事物中，科学、艺术、伦理和宗教，必定有一个体系是正确的，而

其他所有体系都是错的。”这是多么典型的年少狂热！我们21岁时，都愿意应对如此的挑战，期望发现这样的体系。多数人，即使在后来，也从来没有想过：“唯一真理是什么？”的问题，绝不是真正的问题（它无关所有条件），唯一真理的全部概念是从多数真理的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它只是一个有用的概括性短语，就像唯一的拉丁语或唯一的法律一样。

Common-law judges sometimes talk about the law, and school-masters talk about the latin tongue, in a way to make their hearers think they mean entities preexistent to the decisions or to the words and syntax, determining them unequivocally and requiring them to obey. But the slightest exercise of reflexion makes us see that, instead of being principles of this kind, both law and latin are results.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lawful and the unlawful in conduct, or between the correct and incorrect in speech, have grown up incidentally among the interactions of men's experiences in detail; and in no other way do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true and the false in belief ever grow up. Truth grafts itself on previous truth, modifying it in the process, just as idiom grafts itself on previous idiom, and law on previous law. Given previous law and a novel case, and the judge will twist them into fresh law. Previous idiom; new slang or metaphor or oddity that hits the public taste:—and presto, a new idiom is made. Previous truth; fresh facts:—and our mind finds a new truth.

普通法的法官有时谈论法律，学校老师谈论拉丁语，让他们的听众以为他们在做出决定或讲解单词和句法之前，就先期存在着一些法律和语言，使他们做出判决，或要求他们遵守。但稍微反思一下，我们就会看到，法律和拉丁语都是结果，不是这样的原则。行为合法与不合法，或者语言正确与错误，这些区别是人类具体经验在相互作用

中偶然发展起来的；而信仰的真假之分，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就像成语接种在先前的成语之上，法律接种在先前的法律之上，真理也接种在先前的真理之上，在发展成长的过程中，对先前的真理进行修订。利用先前的法律和一个新案子，法官就能把它们融会贯通，形成新法律。对于先前的成语，新俚语或比喻或能迎合大众口味的妙用法——很快，新成语就出来了。对于先前的真理，找到新的事实——我们的头脑就发现了一个新真理。

All the while, however, we pretend that the eternal is unrolling, that the one previous justice, grammar or truth is simply fulgurating, and not being made. But imagine a youth in the courtroom trying cases with his abstract notion of “the” law, or a censor of speech let loose among the theatres with his idea of “the” mother-tongue, or a professor setting up to lecture on the actual universe with his rationalistic notion of “the Truth” with a big T, and what progress do they make? Truth, law, and language fairly boil away from them at the least touch of novel fact. These things MAKE THEMSELVES as we go. Our rights, wrongs, prohibitions, penalties, words, forms, idioms, beliefs, are so many new creations that add themselves as fast as history proceeds. Far from being antecedent principles that animate the process, law, language, truth are but abstract names for its results.

然而，我们一直都自以为永恒的事物在不断展现，先前的法律、语法或真理就是闪现出来的，不是逐步创造出来的。但是想象一下，一个青年法官在法庭上用他这种抽象的法律观念来审理案件，或者一个语言审查者在剧场里大谈他的这种母语观念，或者一个教授用他理性主义的“唯一真理”观来讲解实际的宇宙，而且真理要大写来表示强调，这样的话，他们会带来什么进步呢？他们的真理、法律、语言，只要一接触到新事实，就会蒸发不见了。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发展

过程中，自我创造出来的。我们的权利、错误、禁忌、惩罚、词语、形式、成语、信仰，都是不断自我添加的新的创造，其速度和历史进展的速度一样快。法律、语言、真理绝不是先期存在的原理，来推动发展这个过程，它们只不过是过程所产生的结果的抽象名称。

Laws and languages at any rate are thus seen to be man-made: things. Mr. Schiller applies the analogy to beliefs, and proposes the name of “Humanism” for the doctrine that to an unascertainable extent our truths are man-made products too. Human motives sharpen all our questions, human satisfactions lurk in all our answers, all our formulas have a human twist. This element is so inextricable in the products that Mr. Schiller sometimes seems almost to leave it an open question whether there be anything else. “The world,” he says, “is essentially (u lambda nu), it is what we make of it. It is fruitless to define it by what it originally was or by what it is apart from us; it IS what is made of it. Hence … the world is PLASTIC.” (Personal Idealism, p. 60.) He adds that we can learn the limits of the plasticity only by trying, and that we ought to start as if it were wholly plastic, acting methodically on that assumption, and stopping only when we are decisively rebuked.

因此，无论如何，法律和语言都被看作是人造的事物。席勒先生把这个类比运用到信仰上，提出用“人本主义”来称呼那种认为我们的真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造结果的学说。来自人的动机让我们的所有问题更尖锐，人的满足潜藏在我们所有的答案中，我们所有的原理都有人为的作用。各种结果中，都摆脱不了这个人为因素，以至于席勒先生有时候看起来几乎要把它当成一个开放式问题：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他说：“世界基本上是（一种原料），它就是我们创造的样子。如果从它原本是什么或者独立于我们它会是什么，来给它下定义，是没有结果的；它就是被创造出来的样子。因此……世界是可塑

的。”（《个人理想主义》，第60页。）他补充道，我们只有尝试才能知道这种可塑性有多大，我们应该从认定它是完全可塑的开始，按照这种假设有条有理地去做，直到确实走不通了，才停下。

This is Mr. Schiller's butt-end-foremost statement of the humanist position, and it has exposed him to severe attack. I mean to defend the humanist position in this lecture, so I will insinuate a few remarks at this point.

这是席勒先生对人本主义立场的开门见山的说法。这让他遭受猛烈的攻击。在这次讲座中，我打算为人本主义者的立场进行辩护，所以这里我会拐弯抹角多说几句。

Mr. Schiller admits as emphatically as anyone the presence of resisting factors in every actual experience of truth-making, of which the new-made special truth must take account, and with which it has perforce to “agree.” All our truths are beliefs about “Reality”; and in any particular belief the reality acts as something independent, as a thing FOUND, not manufactured. Let me here recall a bit of my last lecture.

同任何人一样，席勒先生着重承认在创造真理的每一次实际经验中都有抵制因素的存在，而新创造的特定真理必须考虑并“认同”这些因素。我们所有的真理都是关于“现实”的信仰；在任何特定信仰中，现实都是独立存在的，是一个被发现的东西，而不是被创造的。让我回顾一下上一讲的内容。

“REALITY” IS IN GENERAL WHAT TRUTHS HAVE TO TAKE ACCOUNT OF; (Mr. Taylor in his Elements of Metaphysics uses this excellent pragmatic definition.) and the FIRST part of reality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s the flux of our sensations. Sensations are forced upon us, coming we know not whence. Over their nature, order, and quantity we have as good as no control. THEY are neither true nor false; they simply ARE. It is only what we say about them, only the names we give them, our theories of their source and nature and remote relations, that may be true or not.

“现实”通常是真理必须考虑的对象；（泰勒先生在他的《形而上学基本要素》里，使用了这个极好的实用性的定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实的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感觉流。感觉是强加给我们的，我们不知道它的来源。我们对它的性质、顺序及数量都基本上无法控制。它们既不真，也不假；它们就存在着。只有我们对它们的说法，我们给它们的名称，我们对它们来源、性质和各种远距离关系的理论，才有真或假。

The SECOND part of reality, as something that our beliefs must also obediently take account of, is the RELATIONS that obtain between our sensations or between their copies in our minds. This part falls into two sub-parts: 1) the relations that are mutable and accidental, as those of date and place; and 2) those that are fixed and essential because they are grounded on the inner natures of their terms—such as likeness and unlikeness. Both sorts of relation are matters of immediate perception. Both are “facts.” But it is the latter kind of fact that forms the more important sub-part of reality for our theories of knowledge. Inner relations namely are “eternal,” are perceived whenever their sensible terms are compared; and of them our thought—mathematical and logical thought, so-called—

must eternally take account.

现实的第二部分，作为我们的信仰也必须乖乖考虑的某种东西，指的是我们的感觉之间或这些感觉在我们头脑里的复制品之间获得的关系。这一部分分成两个次要部分：（1）可变的和偶然的关系，如日期和地点；（2）固定的和基本的关系，因为它们建立在其条件的内在性质上，如相似性和非相似性。两种关系都是直接知觉的问题。两种关系都是“事实”。但是后一种事实，对我们各种认识理论来说，是现实更为重要的次级部分。内在关系也就是“永恒的”关系，任何时候，只要比较一下它们可感知的条件，就能感受到了。而我们的思想——所谓的数学和逻辑思想，必须永远考虑这些内在关系。

The THIRD part of reality, additional to these perceptions (tho largely based upon them), is the PREVIOUS TRUTHS of which every new inquiry takes account. This third part is a much less obdurately resisting factor: it often ends by giving way. In speaking of these three portions of reality as at all times controlling our belief's formation, I am only reminding you of what we heard in our last hour.

第三部分现实在这些知觉以外（尽管很大程度上以它们为基础），是旧有的真理，而对真理的每一次新探究都要考虑这些旧真理。第三部分的抵制没有那么顽强：它最终通常让步。这里谈到的现实的三个部分永远支配着我们信仰的形成，我只是想让大家想起我们上次讲座的内容。

Now however fixed these elements of reality may be, we still have a certain freedom in our dealings with them. Take our

sensations. THAT they are is undoubtedly beyond our control; but WHICH we attend to, note, and make emphatic in our conclusions depends on our own interests; and, according as we lay the emphasis here or there, quite different formulations of truth result. We read the same facts differently. “Waterloo,” with the same fixed details, spells a “victory” for an englishman; for a frenchman it spells a “defeat.” So, for an optimist philosopher the universe spells victory, for a pessimist, defeat.

然而，不管这些现实元素可能有多固定，我们在处理它们的时候，仍然有一定的自由度。以我们的感觉为例。它们存在着，我们无疑不能控制这个事实；但我们在结论中注意哪个，重视哪个，都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利益；而且因为我们的重点不同，结果出现的真理构成就会大不一样。我们对同样的事实有不同的解读。“滑铁卢”有着同样固定的细节，对英国人来说是“胜利”；对法国人来说则是“失败”。因此，对乐观的哲学家来说，宇宙是胜利；对悲观的哲学家来说，宇宙是失败。

What we say about reality thus depends on the perspective into which we throw it. The THAT of it is its own; but the WHAT depends on the WHICH; and the which depends on US. Both the sensational and the relational parts of reality are dumb: they say absolutely nothing about themselves. We it is who have to speak for them.

因此，我们对现实的说法，取决于我们放置它的角度。它的实际是它自己的；但它是什么取决于角度；而角度则取决于我们。现实的感觉部分和关系部分都是无声的：它们根本不能为自己说话。是我们必须为它们说话。

This dumbness of sensations has led such intellectualists as T. H. Green and Edward Caird to shove them almost beyond the pale of philosophic recognition, but pragmatists refuse to go so far. A sensation is rather like a client who has given his case to a lawyer and then has passively to listen in the courtroom to whatever account of his affairs, pleasant or unpleasant, the lawyer finds it most expedient to give.

感觉的这种失声状态使理智主义者T. H. 格林和爱德华·凯尔德把它们差一点就推出哲学的认知范围之外，但实用主义者拒绝做得这么过分。感觉更像是一个当事人，他把案子交给律师，然后在法庭上被动地听着对自己事件的陈述，好听或者不好听，反正是由着律师按其认为最方便的方式去做。

Hence, even in the field of sensation, our minds exert a certain arbitrary choice. By our inclusions and omissions we trace the field's extent; by our emphasis we mark its foreground and its background; by our order we read it in this direction or in that. We receive in short the block of marble, but we carve the statue ourselves.

因此，即使在感觉领域，我们的头脑仍有一定的独断性。我们通过取舍，找到感觉领域的界限；通过我们的强调，标出它的显著之处及其背景；通过我们的排序，来从这个角度或那个角度解读。简而言之，我们拿到的是大理石块，但是我们要自己去刻出雕像。

This applies to the “eternal” parts of reality as well: we shuffle

our perceptions of intrinsic relation and arrange them just as freely. We read them in one serial order or another, class them in this way or in that, treat one or the other as more fundamental, until our beliefs about them form those bodies of truth known as logics, geometries, or arithmetics, in each and all of which the form and order in which the whole is cast is flagrantly man-made.

这对现实的“永恒”部分也适用：我们对内在关系的知觉，可以随意摆放，也可以随意排序。我们按各种顺序解读它们，用各种方法对它们进行归类，认为某种知觉更为重要，直到我们对于它们的信仰形成了真理的各个体系，如逻辑学、几何学、算术等。在全部及每一个系统中，整体的形式和顺序都极其明显是人为的。

Thus, to say nothing of the new FACTS which men add to the matter of reality by the acts of their own lives, they have already impressed their mental forms on that whole third of reality which I have called “previous truths.” Every hour brings its new percepts, its own facts of sensation and relation, to be truly taken account of; but the whole of our PAST dealings with such facts is already funded in the previous truths. It is therefore only the smallest and recentest fraction of the first two parts of reality that comes to us without the human touch, and that fraction has immediately to become humanized in the sense of being squared, assimilated, or in some way adapted, to the humanized mass already there. As a matter of fact we can hardly take in an impression at all, in the absence of a preconception of what impressions there may possibly be.

因此，我们不用说人类的生活行为给现实增加了新事实，他们已

经把自己的思想方式印刻在现实的整个第三部分上，也就是我称为“旧有的真理”那一部分。每个小时都带来新知觉，有自己的感觉和关系事实，需要认真加以考虑；但是我们过去整体上对这些事实的处理已经是建立在旧有的真理之上。因此，没有经过人的处理而让我们感知到的只有现实前两部分中最细、最新的部分，而那一小部分也立即会经过人的处理，与早已经人处理过的大部分相融合、相适应。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对可能出现的印象预先存在的概念，我们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印象。

When we talk of reality “independent” of human thinking, then, it seems a thing very hard to find. It reduces to the notion of what is just entering into experience, and yet to be named, or else to some imagined aboriginal presence in experience, before any belief about the presence had arisen, before any human conception had been applied. It is what is absolutely dumb and evanescent, the merely ideal limit of our minds. We may glimpse it, but we never grasp it; what we grasp is always some substitute for it which previous human thinking has peptonized and cooked for our consumption. If so vulgar an expression were allowed us, we might say that wherever we find it, it has been already FAKED. This is what Mr. Schiller has in mind when he calls independent reality a mere unresisting (u lambda nu), which IS only to be made over by us.

如果我们说现实“独立”于人类思想之外，那么，这种现实看起来很难找到。它归结为刚刚进入经验的那个尚未定名的概念，或者归结为经验中某些想象的原始存在，而我们还没有对这些存在产生任何信仰，也没有对这些存在进行任何概念化。它是绝对失声的、短暂的，是我们思想的理想极限。我们能瞥见它，但永远抓不住它；我们抓住的总是它的一些替代物，先前的人类思想已经将其消化、烹调以促进

我们的吸收。如果能用一个很粗俗的词语来表达，我们可以说，不管是在哪里发现了它，它都已经被造假了。席勒先生说独立的现实不过是一个不抵抗的（原料），只是让我们随意创造，就是这个意思。

That is Mr. Schiller's belief about the sensible core of reality. We “encounter” it (in Mr. Bradley's words) but don't possess it. Superficially this sounds like Kant's view; but between categories fulminated before nature began, and categories gradually forming themselves in nature's presence, the whole chasm between rationalism and empiricism yawns. To the genuine “Kantianer” Schiller will always be to Kant as a satyr to Hyperion.

这就是席勒先生对可感受到的现实核心的信仰。我们“遭遇”现实（用布拉德利的话），但不拥有它。表面上听起来，这像是康德的观点；但是，在自然开始之前就闪现的范畴，与在自然界里逐渐形成的范畴，这两者之间就彰显了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巨大鸿沟。对真正的“康德派”来说，席勒先生与康德先生总是像萨梯与许伯里翁一样。

Other pragmatists may reach more positive beliefs about the sensible core of reality. They may think to get at it in its independent nature, by peeling off the successive man-made wrappings. They may make theories that tell us where it comes from and all about it; and if these theories work satisfactorily they will be true. The transcendental idealists say there is no core, the finally completed wrapping being reality and truth in one. Scholasticism still teaches that the core is “matter.” Professor Bergson, Heymans, Strong, and others, believe in the core and bravely try to define it.

其他的实用主义者可能会对现实可感知的核心部分有更为积极的信仰。他们可能会认为，剥去层层人造的外在包装，就能够找到现实的独特本质。他们可以创造一些理论，告诉我们现实的起源及其所有情况；如果这些理论让人满意，它们就是真的。先验的唯心主义者说，没有什么核心，最终完成的外在包装就是现实与真理的一体。经院哲学还在教导我们说，那个核心是“物质”。柏格森教授、海曼斯、斯特朗和一些其他人都相信有核心，并勇敢地尝试给核心下定义。

Messrs. Dewey and Schiller treat it as a “limit.” Which is the truer of all these diverse accounts, or of others comparable with them, unless it be the one that finally proves the most satisfactory? On the one hand there will stand reality, on the other an account of it which proves impossible to better or to alter. If the impossibility prove permanent, the truth of the account will be absolute. Other content of truth than this I can find nowhere. If the anti-pragmatists have any other meaning, let them for heaven's sake reveal it, let them grant us access to it!

杜威先生和席勒先生把核心当作一种“界限”。所有这些不同的解释，或者其他类似的解释，除非有一个是能最终证明是最让人满意的，否则，哪一个更真呢？一方面是现实，一方面是对现实的解释，而已经证明这种解释不可能再改进或改变。如果这种不可能性证明是永久的，那么这种解释的真实性就是绝对的。除此之外，我找不到真理还有其他内容。如果那些反实用主义的人还有其他的解释，那就以上天的名义，请他们拿出来，请他们让我们看看吧！

Not BEING reality, but only our belief ABOUT reality, it will contain human elements, but these will KNOW the non-human element, in the only sense in which there can be knowledge of

anything. Does the river make its banks, or do the banks make the river? Does a man walk with his right leg or with his left leg more essentially? Just as impossible may it be to separate the real from the human factors in the growth of our cognitive experience.

因为它不是现实，而只是我们关于现实的信仰，它就包含人的因素，但是，只有在任何事物都可以认识的意义上，这些人的因素才会知道那些非人的因素。是河造就了岸，还是岸造就了河？人走路，是以右腿为主，还是以左腿为主？我们在认知经验的增长过程中，同样无法做到把现实与人的因素隔离开来。

Let this stand as a first brief indication of the humanistic position. Does it seem paradoxical? If so, I will try to make it plausible by a few illustrations, which will lead to a fuller acquaintance with the subject.

我们就把这当作人本主义立场一开始的简单说明吧。它看起来自我矛盾吗？如果是的话，我会用几个例子来说明其可能性，让你们对这个主题有更全面的认识。

In many familiar objects everyone will recognize the human element. We conceive a given reality in this way or in that, to suit our purpose, and the reality passively submits to the conception. You can take the number 27 as the cube of 3, or as the product of 3 and 9, or as 26 PLUS 1, or 100 MINUS 73, or in countless other ways, of which one will be just as true as another. You can take a chessboard as black squares on a white ground, or as white squares on a black ground, and neither conception is a false one. You can

treat the adjoined figure (Figure of a “Star of David”) as a star, as two big triangles crossing each other, as a hexagon with legs set up on its angles, as six equal triangles hanging together by their tips, etc. All these treatments are true treatments—the sensible THAT upon the paper resists no one of them. You can say of a line that it runs east, or you can say that it runs west, and the line per se accepts both descriptions without rebelling at the inconsistency.

在许多熟悉的事物中，大家都能看出人的因素。我们以各种方式来认知特定的现实，来适应我们的目的，而现实被动地接受我们的认知。你可以认为27这个数字是3的立方，或者是3和9的乘积，或者是26加1的和，或者是100减去73的差，或者还有其他无数的方法来得到27，而这些方法都是真的。你也可以看一个棋盘，它是白底黑方块，或者是黑底白方块，两种认知都是对的。你可以把这个附图《大卫星》看作一颗星，或者是两个交叉的大三角形；或者是正六边形的各个补角线延长，或者是六个等边三角形的顶尖相接在一起，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真的看法——纸上的可感知的那个并不排斥其中任何一种看法。一条直线，你可以说它向东，或者向西，而直线本身对两种描述都能毫不拒绝地接受，并没有对这种不一致表示反对。

We carve out groups of stars in the heavens, and call them constellations, and the stars patiently suffer us to do so—tho if they knew what we were doing, some of them might feel much surprised at the partners we had given them. We name the same constellation diversely, as Charles's Wain, the Great Bear, or the Dipper. None of the names will be false, and one will be as true as another, for all are applicable.

我们把天上的星划分成群，称之为星座，而这些星都耐心忍受我

们这么做——尽管它们如果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些星也许会对我们给它们分配的伙伴感到很吃惊。同样一个星座，我们给它不同的名字，可以是“查理的战车”，“大熊星座”，或者是“长柄勺”。这些名称都没错，都一样真，因为它们都一样适用。

In all these cases we humanly make an addition to some sensible reality, and that reality tolerates the addition. All the additions “agree” with the reality; they fit it, while they build it out. No one of them is false. Which may be treated as the more true, depends altogether on the human use of it. If the 27 is a number of dollars which I find in a drawer where I had left 28, it is 28 minus 1. If it is the number of inches in a shelf which I wish to insert into a cupboard 26 inches wide, it is 26 plus 1. If I wish to ennoble the heavens by the constellations I see there, “Charles's Wain” would be more true than “Dipper.” My friend Frederick Myers was humorously indignant that that prodigious star-group should remind us Americans of nothing but a culinary utensil.

所有这些例子里，我们都给一些可感知的现实人为地添加了一些东西，而现实也都容忍了。所有的增加物也都与现实“相符”；它们适应现实，也丰富了现实。没有一个是错的。哪一个可以看作更为真实，完全取决于人怎么用它。如果27是抽屉里的美元数目，而之前放进去的是28元，那它就是28减1的结果。如果它是一个架子的英寸数，而我想往里插入一个26英寸宽的木板，那它就是26加1的结果。如果我想用所看到的星座来使上天更庄严，那“查理的战车”要比“长柄勺”更为真实。我的朋友弗里德里克·迈尔斯曾幽默地表示气愤，说那个惊人的星群为什么让我们美国人只想起了一种烹调用具呢？

What shall we call a THING anyhow? It seems quite arbitrary,

for we carve out everything, just as we carve out constellations, to suit our human purposes. For me, this whole “audience” is one thing, which grows now restless, now attentive. I have no use at present for its individual units, so I don't consider them. So of an “army,” of a “nation.” But in your own ey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o call you “audience” is an accidental way of taking you. The permanently real things for you are your individual persons. To an anatomist, again, those persons are but organisms, and the real things are the organs. Not the organs, so much as their constituent cells, say the histologists; not the cells, but their molecules, say in turn the chemists.

我们究竟把什么称作一个物呢？正像划分星座一样，我们划分所有的事物，来适应人类的需要，所以，这看起来很随意。就我而言，这里的整个“听众”就是一个物，一会儿专心，一会儿躁动。现在我不需要考虑听众中的每个个体，所以，我就不对个体进行考虑。一支“军队”、一个“国家”，也都如此。但是，女士们，先生们，在你们自己眼里，把你们叫做“听众”，是对你们的一种偶然称呼。对你们而言，永恒真正的物是你们每个人。但对一个解剖学家而言，那些人不过是许多机体，而真正的物是各种器官。而对组织学家而言，真正的物还不是器官，是组成器官的各种细胞；再从化学家的眼光来看，真正的物不是细胞，而是细胞的各种分子。

We break the flux of sensible reality into things, then, at our will. We create the subjects of our true as well as of our false propositions.

因此，我们就把可感知的现实流人为地分割成各种物。我们创造了我们各种真假命题的主语部分。

We create the predicates also. Many of the predicates of things express only the relations of the things to us and to our feelings. Such predicates of course are human additions. Caesar crossed the Rubicon, and was a menace to Rome's freedom. He is also an American school-room pest, made into one by the reaction of our schoolboys on his writings. The added predicate is as true of him as the earlier ones.

我们也创造了谓语部分。许多物的谓语部分只表示物与我们及我们情感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些谓语部分是人给附加的。恺撒渡过鲁比肯河，威胁到了罗马共和国的自由。恺撒也是让美国学生讨厌的人，学生对他作品的反应使他成为让人生厌的人。对他来说，这些新增加的谓语部分和之前的谓语部分都是真的。

You see how naturally one comes to the humanistic principle: you can't weed out the human contribution. Our nouns and adjectives are all humanized heirlooms, and in the theories we build them into, the inner order and arrangement is wholly dictated by human considerations, intellectual consistency being one of them. Mathematics and logic themselves are fermenting with human rearrangements; physics, astronomy and biology follow massive cues of preference. We plunge forward into the field of fresh experience with the beliefs our ancestors and we have made already; these determine what we notice; what we notice determines what we do; what we do again determines what we experience; so from one thing to another, altho the stubborn fact remains that there IS a sensible flux, what is true of it seems from first to last to be largely a matter of our own creation.

你看，一个人发现人本主义的原理是多么自然：你根本不可能排除人的贡献。我们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人为处理过后的产物，我们把它们形成理论，理论的内部顺序和排列全受人类思考的支配，理性知识的一致性也是其中之一。数学和逻辑本身，因为人为的重新排列而酝酿改变；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的喜好。我们带着我们先辈和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信仰，投入到新经验的领域之中；这些信仰决定我们注意什么；我们注意到什么，决定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又决定我们经历什么；因此，这些因果相互联系，尽管有一个可感知的现实流一直存在，但它从头至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自创的。

We build the flux out inevitably. The great question is: does it, with our additions, rise or fall in value? Are the additions WORTHY or UNWORTHY? Suppose a universe composed of seven stars, and nothing else but three human witnesses and their critic. One witness names the stars “Great Bear”; one calls them “Charles's Wain”; one calls them the “Dipper.” Which human addition has made the best universe of the given stellar material? If Frederick Myers were the critic, he would have no hesitation in “turning-down” the American witness.

我们不可避免地丰富了现实流。但重要的问题是：有了我们所添加的附加物，现实是升值还是贬值了？我们添加的这些附加物，有没有价值呢？假设一个宇宙有七颗星，除了还有三个观察者及其评论者，别无其他。一个观察者把这些星叫做“大熊”；一个把它们叫做“查理的战车”；第三个把它们叫做“长柄勺”。哪一个人所添加的附加物使这个七颗星星所在的宇宙空间变得最好呢？如果弗里德里克·迈尔斯是那个评论者，他会毫不犹豫地“拒绝”那个美国的观察者。

Lotze has in several places made a deep suggestion. We naively assume, he says, a relation between reality and our minds which may be just the opposite of the true one. Reality, we naturally think, stands ready-made and complete, and our intellects supervene with the one simple duty of describing it as it is already. But may not our descriptions, Lotze asks, be themselves important additions to reality? And may not previous reality itself be there, far less for the purpose of reappearing unaltered in our knowledge, than for the very purpose of stimulating our minds to such additions as shall enhance the universe's total value. “Die erhohung des vorgefundenendaseins” is a phrase used by Professor Eucken somewhere, which reminds one of this suggestion by the great Lotze.

洛策在几个地方已经做了深刻的暗示。他说，我们天真地以为我们的思想和现实之间有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也许和真正的关系正好相反。我们自然地以为，现实是现成的、完整的，我们的理论只有一个简单的任务，就是如实描写已经存在的现实。但洛策问，我们的描写本身，难道不就是对现实的重要附加吗？先前现实的存在，其目的远远不是为了能在我们的知识中未加改变地重现它，而是为了激发我们的思维给出一些将提高宇宙整体价值的附加物，难道这样不可以吗？倭铿教授在什么地方曾经说过“提高已经被发现的存在”，让人想起伟大的洛策所提出的这个说法。

It is identically our pragmatistic conception. In our cognitive as well as in our active life we are creative. We ADD, both to the subject and to the predicate part of reality. The world stands really malleable, waiting to receive its final touches at our hands. Like the kingdom of heaven, it suffers human violence willingly. Man ENGENDERS truths upon it.

它和我们实用主义的概念完全一样。在我们认知世界和行为的生活中，我们具有创造性。我们对现实的主语部分和谓语部分都添加了“附加物”。世界其实是可塑造的，等着我们对它进行最后的修饰。和上帝之城一样，世界甘心情愿忍受人的破坏。人将各种真理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No one can deny that such a role would add both to our dignity and to our responsibility as thinkers. To some of us it proves a most inspiring notion. Signer Papini, the leader of italian pragmatism, grows fairly dithyrambic over the view that it opens, of man's divinely-creative functions.

无可否认，这样一种作用，使我们作为思想家的尊严和责任感都增加了。对我们某些人来说，它证明是一种最鼓舞人心的概念。意大利实用主义的领袖西格娜·帕皮尼，对这个概念带来的前景，对人类这种神圣的创造力，表现得非常狂热。

The import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agmatism and rationalism is now in sight throughout its whole extent. The essential contrast is that for rationalism reality is ready-made and complete from all eternity, while for pragmatism it is still in the making, and awaits part of its complexion from the future. On the one side the universe is absolutely secure, on the other it is still pursuing its adventures.

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差异的重要性，现在能够全部看到了。基本的差别是，理性主义的现实从来都是现成的、完整的，而实用主

义的现实仍然还在创造中，它的一部分面貌需要未来去创造。一方认为宇宙是绝对稳定的，另一方则认为宇宙还在进行各种冒险尝试。

We have got into rather deep water with this humanistic view, and it is no wonder that misunderstanding gathers round it. It is accused of being a doctrine of caprice. Mr. Bradley, for example, says that a humanist, if he understood his own doctrine, would have to “hold any end however perverted to be rational if I insist on it personally, and any idea however mad to be the truth if only some one is resolved that he will have it so.” The humanist view of “reality,” as something resisting, yet malleable, which controls our thinking as an energy that must be taken “account” of incessantly (tho not necessarily merely COPIED) is evidently a difficult one to introduce to novices. The situation reminds me of one that I have personally gone through. I once wrote an essay on our right to believe, which I unluckily called the WILL to Believe. All the critics, neglecting the essay, pounced upon the title. Psychologically it was impossible, morally it was iniquitous. The “will to deceive,” the “will to make-believe,” were wittily proposed as substitutes for it.

这种人本主义观点，让我们陷入很大的麻烦，因此围绕它产生很多误解也毫不奇怪。人们指责它是一种善变的学说。比如，布拉德利先生说，一个人本主义者，如果了解他自己的学说，就一定“坚持认为，任何一个目的，不管有多么扭曲，只要我本人坚持，就一定是理性的；任何一个观点，不管有多么疯狂，只要有人坚决认为它是真理，那它就一定是真理。”人本主义者眼里的“现实”，是有抵抗力的，但还是可以改造的。这种现实像是一种能量，控制我们的思维，必须不断地加以考虑（尽管不一定是单纯去复制）。很明显，这种现实观很难介绍给初学者。这让我想起我个人曾经经历过的情况。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有关我们信仰的权利，很不幸，我把它叫做信仰的意

志。所有的批评家都不管文章内容，却抓住标题不放。他们认为，从心理学上讲，它不可能；从道德上讲，它不公正。他们还打趣地用“欺骗的意志”、“假装的意志”来给文章换名字。

THE ALTERNATIVE BETWEEN PRAGMATISM AND RATIONALISM, IN THE SHAPE IN WHICH WE NOW HAVE IT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 QUESTION I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IT CONCERNS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ITSELF.

在我们现在所有的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到底选择哪一个，这不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是关于宇宙本身结构的问题。

On the pragmatist side we have only one edition of the universe, unfinished, growing in all sorts of places, especially in the places where thinking beings are at work.

在实用主义一方，宇宙只有一个版本，没有完成，各个地方还在成长，尤其是那些有思想的人正在努力工作的地方。

On the rationalist side we have a universe in many editions, one real one, the infinite folio, or edition de luxe, eternally complete; and then the various finite editions, full of false readings, distorted and mutilated each in its own way.

在理性主义一方，一个宇宙有很多版本，一个是真实的、无限

的，或者是精装的、永远完整的版本；然后还有许多有限的版本，各自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误读、歪曲，和残缺。

So the rival metaphysical hypotheses of pluralism and monism here come back upon us. I will develop their differences during the remainder of our hour.

因此，与其对立的形而上学的一元和多元假设又回到我们面前。剩下的时间，我会详细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

And first let me say that it is impossible not to see a temperamental difference at work in the choice of sides. The rationalist mind, radically taken, is of a doctrinaire and authoritative complexion: the phrase “must be” is ever on its lips. The belly-band of its universe must be tight. A radical pragmatist on the other hand is a happy-go-lucky anarchistic sort of creature. If he had to live in a tub like Diogenes he wouldn't mind at all if the hoops were loose and the staves let in the sun.

首先我要说，在选择站在哪一边时，不可能看不到它们有一个气质上的差别。激进的理性主义者带有空谈及专断的色彩：“一定是”这个词从不离口。理性主义的宇宙的“脐带”一定是紧的。而激进的实用主义者则是逍遥自在的无政府主义派。如果他必须像第欧根尼那样住在木桶里，即使是桶箍得不紧，桶缝漏进阳光，他也根本不会介意。

Now the idea of this loose universe affects your typical rationalists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freedom of the press” might

affect a veteran official in the russian bureau of censorship; or as “simplified spelling” might affect an elderly schoolmistress. It affects him as the swarm of protestant sects affects a papist onlooker. It appears as backboneless and devoid of principle as “opportunism” in politics appears to an old-fashioned french legitimist, or to a fanatical believer in the divine right of the people.

现在这种松散的宇宙观震动了典型的理性主义者，就好像“言论自由”会震动俄国出版审查局的资深官员，或者“简化拼写法”会震动一个老年女教师。这也像成群的新教教派会震动天主教旁观者一样。它看起来没有脊梁，没有原则，就像旧式法国正统派或人民神权论的狂热信奉者看待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一样。

For pluralistic pragmatism, truth grows up inside of all the finite experiences. They lean on each other, but the whole of them, if such a whole there be, leans on nothing. All “homes” are in finite experience; finite experience as such is homeless. Nothing outside of the flux secures the issue of it. It can hope salvation only from its own intrinsic promises and potencies.

对多元实用主义来说，真理在一切有限经验里成长。它们相互依赖，但整体上来说，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整体的话，却并不依赖什么。所有“家园”都存在于有限的经验里；有限经验本身无依无靠。除经验流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获得真理。它只有从自身内在的希望和潜力中可以指望获得拯救。

To rationalists this describes a tramp and vagrant world, adrift in space, with neither elephant nor tortoise to plant the sole of its

foot upon. It is a set of stars hurled into heaven without even a centre of gravity to pull against. In other spheres of life it is true that we have got used to living in a state of relative insecurity.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and that of an absolute “moral law,” have resolved themselves into expediencies, and holy church has resolved itself into “meeting-houses.” Not so as yet within the philosophic class-rooms. A universe with such as US contributing to create its truth, a world delivered to OUR opportunisms and OUR private judgments! Home-rule for Ireland would be a millennium in comparison. We're no more fit for such a part than the Filipinos are “fit for self-government.” Such a world would not be RESPECTABLE, philosophically. It is a trunk without a tag, a dog without a collar, in the eyes of most professors of philosophy.

对理性主义者来说，这描述了一个到处流浪、漂浮不定的世界，没有能给大象或乌龟落脚的地方。它就是抛向天空的一群星球，连个重心都没有。在生活的其他范围内，确实我们都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国家”的权威，绝对“道德规范”的权威，都已经将自身转化成各种权宜之计，神圣的教堂也已经将自身转化成“聚会场所”。但在哲学的课堂上，还不是这样。宇宙要有我们这样的人来参与创造真理，世界要由我们这样的机会主义和我们这样的个人来判断！对比之下，爱尔兰自治将会是一个千禧年。就像菲律宾人“配得上自治”一样，我们也配得上管理我们这个地方。在哲学上，这样的世界将不会受人尊敬。在大多数哲学教授的眼里，它就是一个没有标签的箱子，没有项圈的狗。

What then would tighten this loose universe,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ors?

那么，在这些教授看来，什么才能让松散的宇宙紧凑起来呢？

Something to support the finite many, to tie it to, to unify and anchor it. Something unexposed to accident, something eternal and unalterable. The mutable in experience must be founded on immutability. Behind our de facto world, our world in act, there must be a de jure duplicate fixed and previous, with all that can happen here already there in posse, every drop of blood, every smallest item, appointed and provided, stamped and branded, without chance of variation. The negatives that haunt our ideals here below must be themselves negated in the absolutely Real. This alone makes the universe solid. This is the resting deep. We live upon the stormy surface; but with this our anchor holds, for it grapples rocky bottom. This is Wordsworth's “central peace subsisting at the heart of endless agitation.” This is Vivekananda's mystical One of which I read to you. This is Reality with the big R, reality that makes the timeless claim, reality to which defeat can't happen. This is what the men of principles, and in general all the men whom I called tender-minded in my first lecture, think themselves obliged to postulate.

这个东西，能支撑那有限的多，能维系它，统一它，稳定它。某种不受意外因素影响的东西，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经验中可变的部分一定是建立在不变之上的。在我们现实世界、行为世界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法律上的复制版世界，是固定的、先前就存在的。现在能发生的，其实都已经潜藏在那里，每一滴血，每一个最微小的东西，都是已经指定的、准备好的、盖了章且加了印，绝对没有变化的机会。我们在这个下面世界里所不能实现的理想，其本身一定是在绝对现实中被否定的。单凭这个，就能让宇宙坚定稳固。这是让万物安息的大海深处。我们生活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但我们的锚就停靠这深处，

因为它紧紧抓住了海底的岩石。这是华兹华斯所说的“在无穷躁动之中，安居着永恒的平静”。这是维韦卡南达所说的神秘的一，我之前给大家读过。这是大写的现实，永恒的现实，永远胜利的现实。这是那些提倡原则的人，以及那些我在第一讲里叫做空想派的所有人，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做出的假设。

And this, exactly this, is what the tough-minded of that lecture find themselves moved to call a piece of perverse abstraction-worship. The tough-minded are the men whose alpha and omega are FACTS. Behind the bare phenomenal facts, as my tough-minded old friend Chauncey Wright, the great Harvard empiricist of my youth, used to say, there is NOTHING. When a rationalist insists that behind the facts there is the GROUND of the fact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acts, the tougher empiricists accuse him of taking the mere name and nature of a fact and clapping it behind the fact as a duplicate entity to make it possible. That such sham grounds are often invoked is notorious. At a surgical operation I heard a bystander ask a doctor why the patient breathed so deeply. “Because ether is a respiratory stimulant,” the doctor answered. “Ah!” said the questioner, as if relieved by the explanation. But this is like saying that cyanide of potassium kills because it is a “poison,” or that it is so cold to-night because it is “winter,” or that we have five fingers because we are “pentadactyls.” These are but names for the facts, taken from the facts, and then treated as previous and explanatory. The tender-minded notion of an absolute reality is,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ly tough-minded, framed on just this pattern. It is but our summarizing name for the whole spread-out and strung-along mass of phenomena, treated as if it were a different entity, both one and previous.

而这正是那一讲里那些实际派所称呼为荒诞的、抽象崇拜的东西。实际派认为自始自终都要事实。正如我青年时代哈佛大学的老朋友，实际派的实证主义者乔恩西·赖特过去常说的，在裸露的现象事实背后，什么都没有。理性主义者坚持说，事实背后有那些事实的依据和事实的可能性，而更为实际的实证主义者就指责他只是拿一个事实的名称和性质来当作一个复制的实体，贴在事实背后，来使它成为可能。那种用骗人的依据来说明道理，是众人皆知的。一次外科手术时，我听到一个旁观者问医生，为什么病人呼吸那么重。医生回答说："因为乙醚是呼吸刺激剂。"那个旁观者"噢！"了一声，好像解释让他很欣慰。但这就像说，氰化钾杀人，因为它是"毒药"；或者说今晚很冷，因为现在是"冬天"；或者说，我们有五个指头，因为我们是"五指动物"。这些都不过只是事实的名称，从事实中来，然后被当作是事先存在的能解释事实的理由。在激进的实际派看来，空想派这种绝对现实的概念就是按这个模式套出来的。它不过是我们对全部铺开相连的现象整体的一个概括性名称，好像被当作是一个不同的实体，既是一体，又事先存在。

You see how differently people take things. The world we live in exists diffused and distributed, in the form of an indefinitely numerous lot of eaches, coherent in all sorts of ways and degrees; and the tough-minded are perfectly willing to keep them at that valuation. They can stand that kind of world, their temper being well adapted to its insecurity. Not so the tender-minded party. They must back the world we find ourselves born into by "another and a better" world in which the eaches form an All and the All a One that logically presupposes, co-implicates, and secures each EACH without exception.

你们看，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有多么不同。我们生活的世界分散存在，以无限众多的个体形式而分布，以各种方式、各种程度相联系；

实际派的人完全愿意就这么看待它们。他们可以忍受这样的世界，他们的气质非常适应这种不稳定性。但空想派就不是这样了。空想派必须要用“另一个更好”的世界来支持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那另一个更好的世界里，那些个体形成了一个整体，那个整体就是一个个体，它在逻辑上事先假设、相互关联、相互稳定，毫无例外。

Must we as pragmatists be radically tough-minded? or can we treat the absolute edition of the world as a legitimate hypothesis? It is certainly legitimate, for it is thinkable, whether we take it in its abstract or in its concrete shape.

我们作为实用主义者，就必须是实际派吗？或者，我们能够把世界的绝对版本看作是一种合理的假设吗？它当然合理，因为不管我们是抽象去看，还是具体去看，它都是可以想象的。

By taking it abstractly I mean placing it behind our finite life as we place the word “winter” behind to-night's cold weather. “Winter” is only the name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days which we find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by cold weather, but it guarantees nothing in that line, for our thermometer tomorrow may soar into the 70's. Nevertheless the word is a useful one to plunge forward with into the stream of our experience. It cuts off certain probabilities and sets up others: you can put away your straw-hats; you can unpack your arctics. It is a summary of things to look for. It names a part of nature's habits, and gets you ready for their continuation. It is a definite instrument abstracted from experience, a conceptual reality that you must take account of, and which reflects you totally back into sensible realities. The pragmatist is the last person to deny the reality of such abstractions. They are so

much past experience funded.

我说抽象去看，就是把它放到我们有限生活的背后，就像我们把“冬天”一词放到今晚的寒冷天气背后一样。“冬天”只是代表一段日子的名称，这些日子一般以寒冷为特征，但也并不保证一定就会寒冷，因为明天我们的温度计可能会猛升到华氏70度以上。然而，这个词还是有用的，可以让我们投入到我们的经验流程中去。它终止某些可能性，开始其他的可能性：你可以把草帽收起来；你可以拿出冬天用的橡胶套靴。它概括了你要寻找的种种东西。它是自然常态之一的名称，让你为它的后续状态做好准备。它是从经验中提取出来的一种功能明确的工具，是你必须加以考虑的概念化的现实，它把你完全反射回到那些可感知的现实中去。实用主义者最不可能否认这种抽象的现实。它们正是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大量积累之上。

But taking the absolute edition of the world concretely means a different hypothesis. Rationalists take it concretely and OPPOSE it to the world's finite editions. They give it a particular nature. It is perfect, finished. Everything known there is known along with everything else; here, where ignorance reigns, far otherwise. If there is want there, there also is the satisfaction provided. Here all is process; that world is timeless. Possibilities obtain in our world; in the absolute world, where all that is NOT is from eternity impossible, and all that IS is necessary, the category of possibility has no application. In this world crimes and horrors are regrettable. In that totalized world regret obtains not, for “the existence of ill in the temporal order is the very condition of the perfection of the eternal order.”

但是具体去看世界的绝对版本，就意味着一个不同的假设。理性

主义者具体看待它，将它与世界的有限版本对立起来。他们赋予它一个特别的性质。它是完美的，有了结局的。在那个世界里，知一物，就知万物；而这个世界里，蒙昧无所不在，与那个世界完全相反。那里，如果缺少什么，也就一定能有什么让它满足。这里，一切都是过程；那里，世界是永恒的。我们的世界，凡事都讲可能性；在绝对的世界里，凡是没有的，那是因为它本来就永远不可能有，凡是有的，那是必然有的，可能性的范畴根本就不适用。在这个世界里，犯罪和恐惧是令人后悔的。而在那个一体化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因为“邪恶的暂时存在正是永恒秩序完美的条件”。

Once more, either hypothesis is legitimate in pragmatist eyes, for either has its uses. Abstractly, or taken like the word winter, as a memorandum of past experience that orients us towards the future, the notion of the absolute world is indispensable. Concretely taken, it is also indispensable, at least to certain minds, for it determines them religiously, being often a thing to change their lives by, and by changing their lives, to change whatever in the outer order depends on them.

我再说一次，在实用主义者眼里，上面两个假设都是合理的，因为它们都有用处。抽象来看绝对世界的概念，或者就像看冬天这个词，它是对过去经验的一种记录，引导我们向未来看，绝对世界的概念是不可或缺的。具体来看，这个概念也是不可或缺的，至少对一些人来说，因为它决定了这些人的宗教，它经常能改变他们的生活，而且通过改变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一切依赖于他们生活的外界事物。

We cannot therefore methodically join the tough minds in their rejection of the whole notion of a world beyond our finite experience. One misunderstanding of pragmatism is to identify it

with positivistic tough-mindedness, to suppose that it scorns every rationalistic notion as so much jabber and gesticulation, that it loves intellectual anarchy as such and prefers a sort of wolf-world absolutely unpent and wild and without a master or a collar to any philosophic class-room product, whatsoever. I have said so much in these lectures against the over-tender forms of rationalism, that I am prepared for some misunderstanding here, but I confess that the amount of it that I have found in this very audience surprises me, for I have simultaneously defended rationalistic hypotheses so far as these re-direct you fruitfully into experience.

我们不能因此就加入了实际派，也从方法论上拒绝在我们有限经验之外有另一个世界的全部概念。对实用主义的一个误解，就是把它和实证的实际派思想等同起来，认为实用主义蔑视理性主义的每一个概念，认为这些概念含糊不清、装模作样，还认为实用主义热爱理智上的无政府状态，愿意要一种狼性世界，绝对无法无天，野蛮疯狂，没有主人，没有项圈，而不是任何哲学课堂的产物。在这些讲座中，我已经说过很多话，反对过度空想的理性主义，我也对会产生的一些误解有思想准备，但是我承认，在座的听众竟然有这么多误解，还是让我很吃惊，因为我已经同时对理性主义的假设进行过辩护，就是那些能有效指引大家重新回到经验中去的理性主义假设。

For instance I receive this morning this question on a post-card: “Is a pragmatist necessarily a complete materialist and agnostic?” One of my oldest friends, who ought to know me better, writes me a letter that accuses the pragmatism I am recommending, of shutting out all wider metaphysical views and condemning us to the most terre-a-terre naturalism. Let me read you some extracts from it.

比如，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问我：“一个实用主义者必定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吗？”我的一个老朋友，本来他应该更了解我，结果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指责我所推荐的实用主义，说它不能让大家看到所有更宽广的形而上学观点，迫使大家沦落为庸俗的自然主义者。让我选几段给大家读一下。

“It seems to me,” my friend writes, “that the pragmatic objection to pragmatism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might accentuate the narrowness of narrow minds.

我的朋友写道：“在我看来，对实用主义的实用式反驳，就在于它可能会使思想狭隘的人更加狭隘。

“Your call to the rejection of the namby-pamby and the wishy-washy is of course inspiring. But although it is salutary and stimulating to be told that one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immediate issues and bearings of his words and thoughts, I decline to be deprived of the pleasure and profit of dwelling also on remoter bearings and issues, and it is the TENDENCY of pragmatism to refuse this privilege.

“你号召大家反对那些软弱空虚，当然是鼓舞人心的。但是，尽管知道一个人应该对他语言和思想的直接结果和影响负责，是有益的，让人激动，但我还是拒绝被剥夺享有那些较远结果和影响的乐趣，而实用主义的倾向正是要拒绝这种权利。

“In short,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limitations, or rather the

dangers, of the pragmatic tendency, are analogous to those which beset the unwary followers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Chemistry and physics are eminently pragmatic and many of their devotees, smugly content with the data that their weights and measures furnish, feel an infinite pity and disdain for all students of philosophy and meta-physics, whomsoever. And of course everything can be expressed—after a fashion, and 'theoretically'—in terms of chemistry and physics, that is, EVERYTHING EXCEPT THE VITAL PRINCIPLE OF THE WHOLE, and that, they say, there is no pragmatic use in trying to express; it has no bearings—FOR THEM. I for my part refuse to be persuaded that we cannot look beyond the obvious pluralism of the naturalist and the pragmatist to a logical unity in which they take no interest.”

“简而言之，对我来说，实用主义倾向的局限性或者危险，和那些‘自然科学’的盲目追随者面临的局限性和危险一样。化学和物理有非常显著的实用性，许多热爱它们的人，对它们从度量衡方面提供的数据沾沾自喜，而对一切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学习者是无比地怜悯和蔑视。当然，任何事物都——多少可以‘从理论上’——用化学和物理方法来表达，也就是说，除了宇宙整体那至关重要的原则之外的万物都可以。他们还说，去表达这个原则并没有任何实用主义的用途；对他们而言，这个原则没有任何结果。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我们就不能超越自然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那个明显的多元论，而追求一个他们不感兴趣的逻辑统一。”

How is such a conception of the pragmatism I am advocating possible, after my first and second lectures? I have all along been offering it expressly as a mediator between tough-mindedness and tender-mindedness. If the notion of a world ante rem, whether taken abstractly like the word winter, or concretely as the

hypothesis of an Absolute, can be shown to have any consequences whatever for our life, it has a meaning. If the meaning works, it will have SOME truth that ought to be held to through all possible reformulations, for pragmatism.

在我讲完第一讲和第二讲之后，对于我所提倡的实用主义，怎么还会有这样的看法呢？我一直都很明确地把实用主义当作空想派和实际派之间的一个中和调节者。如果“先于事物的世界”这个概念可以表明对我们的生活有任何结果的话，它就有意义，而不用管是像冬天一词那样抽象地去看它，还是像对一个“绝对”的假设那样具体去看它。对实用主义来说，如果这意义起作用，它就会有一些真理，这真理在所有可能的重新表述中就应该得到坚持。

The absolutistic hypothesis, that perfection is eternal, aboriginal, and most real, has a perfectly definite meaning, and it works religiously. To examine how, will be the subject of my next and final lecture.

绝对主义论的假设认为完美是永恒的、本来就有的、最真的，该假设有一种完全确定的意义，而且在宗教上起作用。要考察它如何在宗教上起作用，是我下一讲，也就是最后一讲的主题。

Lecture VIII Pragmatism and Religion

第八讲　实用主义与宗教

UTILITY OF THE ABSOLUTE. WHITMAN's POEM TO YOU. TWO WAYS OF TAKING IT. MY FRIEND's LETTER. NECESSITIES VERSUS POSSIBILITIES. “POSSIBILITY” DEFINED. THREE VIEWS OF THE WORLD's SALVATION. PRAGMATISM IS MELIORISTIC. WE MAY CREATE REALITY. WHY SHOULD ANYTHING BE? SUPPOSED CHOICE BEFORE CREATION. THE HEALTHY AND THE MORBID REPLY. THE “TENDER” AND THE “TOUGH” TYPES OF RELIGION. PRAGMATISM MEDIATES.

绝对意志的功用。惠特曼的诗《给您》。两种理解方式。我朋友的来信。必然性对可能性。定义“可能性”。有关拯救世界的三种观点。实用主义是社会改良论。我们可以创造现实。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创造之前假定的选择。健康和病态的回答。宗教的“空想”和“实际”类型。实用主义起调和中介的作用。

At the close of the last lecture I reminded you of the first one, in which I had opposed tough-mindedness to tender-mindedness and recommended pragmatism as their mediator. Tough-mindedness positively rejects tender-mindedness's hypothesis of an eternal perfect edition of the universe coexisting with our finite experience.

上一讲结束时，我曾提醒过大家，我在第一讲中对比了空想派和

实际派，也建议把实用主义当作它们之间的调和中介。实际派断然拒绝空想派的假设，后者认为宇宙有一个永恒完美的版本与我们有限的经验并存。

On pragmatic principles we cannot reject any hypothesis if consequences useful to life flow from it. Universal conceptions, as things to take account of, may be as real for pragmatism as particular sensations are. They have indeed no meaning and no reality if they have no use. But if they have any use they have that amount of meaning. And the meaning will be true if the use squares well with life's other uses.

按照实用主义原则，任何一个假设，如果其后果对生活有用，我们就不能拒绝它。普遍概念，作为要考虑的事物，对实用主义来说，可以跟具体的感觉一样真实。如果它们没有任何用处，就没有任何意义和任何真实性。但是如果它们有任何用处，它们就有那么多的意义。如果那用处与生活的其他用处能协调一致，它的意义就是真实的。

Well, the use of the Absolute is proved by the whole course of men's religious history. The eternal arms are then beneath. Remember Vivekananda's use of the Atman: it is indeed not a scientific use, for we can make no particular deductions from it. It is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altogether.

绝对意志的用处是由人类宗教史的全部过程来证明的。永恒的臂膀一直在护佑它。还记得维韦卡南达用过宇宙本质一词：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用法，因为我们从这里得不到任何具体的推论。它完全

是感性的、精神的。

It is always best to discuss things by the help of concrete examples. Let me read therefore some of those verses entitled To You by Walt Whitman—“You” of course meaning the reader or hearer of the poem whosoever he or she may be.

讨论事物，最好是借助具体例子。所以，让我读一下惠特曼的《给您》这首诗——“您”当然指的是这首诗的任何一个读者或听者。

Whoever you are, now I place my hand upon you, that you be my poem; I whisper with my lips close to your ear, I have loved many women and men, but I love none better than you.

不论您是谁，我现在，以您为诗；我贴近您的耳，向您低语，我爱过众多男女，但我还是最爱您。

O I have been dilatory and dumb; I should have made my way straight to you long ago; I should have blabb'd nothing but you, I should have chanted nothing but you.

噢！我一直沉默迟疑；我早就该直接找到您；我本不该乱谈别的，应该只谈您；我本不应该歌颂别的，应该只歌颂您。

I will leave all, and come and make the hymns of you; None

have understood you, but I understand you; None have done justice to you—you have not done justice to yourself; None but have found you imperfect—I only find no imperfection in you.

我要抛弃一切，来赞歌您；谁也不曾了解您，唯我了解您；谁也不曾公正对待您——您也没有公正对待自己；谁都说您不完美——唯我发现您完美。

O I could sing such grandeurs and glories about you! You have not known what you are—you have slumber'd upon yourself all your life; What you have done returns already in mockeries.

噢！我为您的光辉与荣耀歌唱！您不曾了解您自己——您一生对自己都如同在梦里；您所做的一切，换来的是嘲笑。

But the mockeries are not you; Underneath them, and within them, I see you lurk; I pursue you where none else has pursued you; Silence, the desk, the flippant expression, the night, the accustom'd routine, if these conceal you from others, or from yourself, they do not conceal you from me; The shaved face, the unsteady eye, the impure complexion, if these balk others, they do not balk me, The pert apparel, the deform'd attitude, drunkenness, greed, premature death, all these I part aside.

但那些嘲笑的并不是您；在嘲笑后面，在嘲笑之间，我隐约看到您；我追寻您，到无人追寻过您的地方；沉默、桌案、轻浮的表情、黑夜、循规蹈矩，如果这些使别人看不到您，或使您也看不到自己，

但它们却不能让我看不到您；刮干净的面孔、不定的眼神、不纯的肤色，如果这些阻挡了别人，它们却阻挡不住我；穿戴无礼、态度不端、醉酒、贪婪、早死，一切我都不管。

There is no endowment in man or woman that is not tallied in you; There is no virtue, no beauty, in man or woman, but as good is in you; No pluck, no endurance in others, but as good is in you; No pleasure waiting for others, but an equal pleasure waits for you.

男女的一切天赋，您无一不有；男女的一切品德、美貌，您都能媲美；别人有的坚毅、勇敢，您同样具备；等候别人的快乐，也同样等候着您。

Whoever you are! claim your own at any hazard! These shows of the east and west are tame, compared to you; These immense meadows—these interminable rivers—you are immense and interminable as they; You are he or she who is master or mistress over them, Master or mistress in your own right over Nature, elements, pain, passion, dissolution.

不管您是谁！您应该不顾一切表现您自己！与您比起来，那些东西方的景物都平淡；那些广袤的草原——那些无尽的江河——您和它们一样宏伟无限；您是它们的男女主人，您自己就是自然、要素、痛苦、激情、灭亡的男女主宰。

The hopples fall from your ankles—you find an unfailing sufficiency; Old or young, male or female, rude, low, rejected by the

rest, whatever you are promulges itself; Through birth, life, death, burial, the means are provided, nothing is scanted; Through angers, losses, ambition, ignorance, ennui, what you are picks its way.

脚栓从您的脚踝掉落——您有始终不变的满足；不为众人接受的男女、老幼、粗鲁、卑微，不管您是什么，总是表明您自己；通过出世、生活、死亡、埋葬，一切方法都有，什么都不缺；通过愤怒、损失、雄心、愚昧、厌倦，人们会清楚您是谁。

Verily a fine and moving poem, in any case, but there are two ways of taking it, both useful.

真是一首优美动人的诗，但可以有两种方法来解读它，两种都有用。

One is the monistic way, the mystical way of pure cosmic emotion. The glories and grandeurs, they are yours absolutely, even in the midst of your defacements. Whatever may happen to you, whatever you may appear to be, inwardly you are safe. Look back, LIE back, on your true principle of being! This is the famous way of quietism, of indifferentism. Its enemies compare it to a spiritual opium. Yet pragmatism must respect this way, for it has massive historic vindication.

一种是一元法，就是对纯粹宇宙情感的神秘看法。那些光辉与荣耀，即使您的外表被污损了，它们还绝对是您的。不管您发生什么，不管您外表如何，就内在而言，您是安全的。回顾并依靠您存在的真

正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寂静主义和冷淡主义的方法。其反对者把它比作精神鸦片。然而，实用主义者必须尊重这个方法，因为历史上有大量为之辩护的证据。

But pragmatism sees another way to be respected also, the pluralistic way of interpreting the poem. The you so glorified, to which the hymn is sung, may mean your better possibilities phenomenally taken, or the specific redemptive effects even of your failures, upon yourself or others. It may mean your loyalty to the possibilities of others whom you admire and love so, that you are willing to accept your own poor life, for it is that glory's partner. You can at least appreciate, applaud, furnish the audience, of so brave a total world. Forget the low in yourself, then, think only of the high. Identify your life therewith; then, through angers, losses, ignorance, ennui, whatever you thus make yourself, whatever you thus most deeply are, picks its way.

但是实用主义认为另一种方法也值得尊重，那就是对这首诗的多元论阐释。诗中的“您”有如此荣耀，被人赞颂，就表面上来说，可以指您有更好的可能性，或者甚至指您的失败给您自己或别人带来的特定赎罪效应。也可能指您对您所敬仰爱戴的其他人种种可能性的忠诚，您乐意接受自己贫苦的一生，因为这样的一生就是那荣耀的伙伴。对这样一个全新美妙的世界，您至少可以欣赏、喝彩、充当听众。忘掉您自己的卑微，只想自己的高尚。让您的生命与那高尚等同起来；这样，愤怒、损失、愚昧、厌倦，无论您因此成为什么，无论您因此内心最深处是什么，都会找到自己的道路。

In either way of taking the poem, it encourages fidelity to ourselves. Both ways satisfy; both sanctify the human flux. Both

paint the portrait of the YOU on a gold-background. B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first way is the static One, while in the second way it means possibles in the plural, genuine possibles, and it has all the restlessness of that conception.

不管用哪一种方法来解读这首诗，它都鼓励我们对自己忠诚。两种方法都让我们满足；都尊崇人性。两种方法都把您的肖像画在了金质背景上。但第一种方法的背景是静态的一，而第二种方法则意味着多种可能性、确实的可能性，它包含这一概念的所有不安定因素。

Noble enough is either way of reading the poem; but plainly the pluralistic way agrees with the pragmatic temper best, for it immediately suggests an infinitely larger number of the details of future experience to our mind. It sets definite activities in us at work. Altho this second way seems prosaic and earthbor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first way, yet no one can accuse it of tough-mindedness in any brutal sense of the term. Yet if, as pragmatists, you should positively set up the second way AGAINST the first way, you would very likely be misunderstood. You would be accused of denying nobler conceptions, and of being an ally of tough-mindedness in the worst sense.

两种解读方法都很高尚；但明显多元法最符合实用主义的气质，因为它立刻让我们想起未来经验细节的数目是无限的。它使我们开始许多具体的活动。虽然跟第一种方法比起来，第二种方法看上去单调平凡，但没有人能指责说它属于实际派里的粗暴一类。但是，作为实用主义者，如果你一定要把第二种方法与第一种方法对立起来，你就很有可能遭到误解。人们会指责你，说你否认更高尚的概念，说你是实际派最糟糕一类的同伙。

You remember the letter from a member of this audience from which I read some extracts at our previous meeting. Let me read you an additional extract now. It shows a vagueness in realizing the alternatives before us which I think is very widespread.

你们还记得，我在上次讲座里曾给大家念过几段某位听众的来信。这里，让我给大家读一读另外一部分。这封信表明，对我们面前的选择，人们的认识是模糊的，而这种现象我认为很普遍。

“I believe,” writes my friend and correspondent, “in pluralism; I believe that in our search for truth we leap from one floating cake of ice to another, on an infinite sea, and that by each of our acts we make new truths possible and old ones impossible; I believe that each man is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 universe better, and that if he does not do this it will be in so far left undone.

和我通信的朋友写道：“我相信多元论；我相信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是在一片无边的大海上，从一块浮冰跳到另一块浮冰上，每一次行动，我们都使新真理成为可能，旧真理变成不可能；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让宇宙变得更加美好，而如果大家不这么做，宇宙就不会向着这一方向发展。

“Yet at the same time I am willing to endure that my children should be incurably sick and suffering (as they are not) and I myself stupid and yet with brains enough to see my stupidity, only on one condition, namely, tha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in imagination and by reasoning, of a RATIONAL UNITY OF ALL THINGS, I can

conceive my acts and my thoughts and my troubles as SUPPLEMENTED: BY ALL THE OTHER PHENOMENA OF THE WORLD, AND AS FORMING—WHEN THUS SUPPLEMENTED—A SCHEME WHICH I APPROVE AND ADOPT AS MY I OWN; and for my part I refuse to be persuaded that we cannot look beyond the obvious pluralism of the naturalist and pragmatist to a logical unity in which they take no interest or stock.”

“但同时，我愿意忍受自己的孩子得了不治之症的痛苦（事实上他们没有），忍受我自己的愚蠢而且还有足够的智力知道自己愚蠢，只是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我要能够在想象中用思维建构出一个所有事物的理性统一，使我能看到我的行为、思想和烦恼被世界上所有其他的现象所补充，而且补充之后，能形成一个我自己所赞成和采用的体系。对我来说，我不相信，在自然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的明显多元论之外，就找不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统一性。尽管对这个统一性，自然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都毫无兴趣。”

Such a fine expression of personal faith warms the heart of the hearer. But how much does it clear his philosophic head? Does the writer consistently favor the monistic, or the plur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ld's poem? His troubles become atoned for WHEN THUS SUPPLEMENTED, he says, supplemented, that is, by all the remedies that THE OTHER PHENOMENA may supply. Obviously here the writer faces forward into the particulars of experience, which he interprets in a pluralistic-melioristic way.

这样一种个人信仰的优美表达，温暖了听众的心。但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让听众有清晰的哲学头脑呢？对这首有关世界的诗，来信者是始终赞成一元论的解释，或者始终赞成多元论的解释呢？他说，如果

有其他现象提供的补救措施来进行补充，他的烦恼就得到了抵偿。很明显，这里来信者是向前看经验的具体内容，并是用多元的社会社会改良论的方法来尽心解读的。

But he believes himself to face backward. He speaks of what he calls the rational UNITY of things, when all the while he really means their possible empirical UNIFICATION. He suppos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pragmatist, because he criticizes rationalism's abstract One, is cut off from the consolation of believing in the saving possibilities of the concrete many. He fails in shor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aking the world's perfection as a necessary principle, and taking it only as a possible terminus ad quem.

但他认为自己是向后看的。他谈到自己所说的事物的理性统一，然而他实际上指的是它们可能在实证之上的统一化进程。他同时还假设，既然实用主义者批评理性主义抽象的一，就得不到因为相信具体众多能带来的拯救机会所给的安慰。简而言之，世界的完美是必然原理，还仅是一种可能的结果，他分不清楚。

I regard the writer of this letter as a genuine pragmatist, but as a pragmatist sans le savoir. He appears to me as one of that numerous class of philosophic amateurs whom I spoke of in my first lecture, as wishing to have all the good things going, without being too careful as to how they agree or disagree. “Rational unity of all things” is so inspiring a formula, that he brandishes it offhand, and abstractly accuses pluralism of conflicting with it (for the bare names do conflict), altho concretely he means by it just the pragmatistically unified and ameliorated world. Most of us remain in this essential vagueness, and it is well that we should; but in the

interest of clear-headedness it is well that some of us should go farther, so I will try now to focus a little more discriminatingly on this particular religious point.

我认为这封信的作者是一个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但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个实用主义者。在我看来，他是我在第一讲中提到的众多哲学业余爱好者的一员，他希望所有好的事情继续进行，而不用太关心它们是否彼此一致。“所有事物的理性统一”是一个如此令人鼓舞的公式，他就随手拿来挥舞使用，而且抽象地指责多元论，说它与这个公式有冲突（光看名称，确实有冲突），尽管他的实际意思就是实用主义所指的统一且向善的世界。对此，我们大多数人基本上还是模糊的，这也很正常；但是，为了让头脑清晰，我们中的一些人再进一步也是应该的，所以，现在我要把重点更多一点地放在在这个特定的宗教问题上。

Is then this you of yous, this absolutely real world, this unity that yields the moral inspiration and has the religious value, to be taken monistically or pluralistically? Is it ante rem or in rebus? Is it a principle or an end, an absolute or an ultimate, a first or a last? Does it make you look forward or lie back? It is certainly worth while not to clump the two things together, for if discriminated, they have decidedly diverse meanings for life.

那么，对这些众多“您”中的“您”，这个绝对真实的世界，这个给我们提供道义上的鼓舞且具有宗教价值的统一性，我们应该是去一元地看待，还是多元地看待呢？它先于事物存在，还是在事物之中存在？它是原理还是目的？是绝对的还是最终的？是最初的还是最后的？它让你往前看，还是往后靠？不把这两件事混成一谈，肯定是有价值的，因为清楚二者的区分，将会发现它们对人生具有截然不同的

意义。

Please observe that the whole dilemma revolves pragmatically about the notion of the world's possibilities. Intellectually, rationalism invokes its absolute principle of unity as a ground of possibility for the many facts. Emotionally, it sees it as a container and limiter of possibilities, a guarantee that the upshot shall be good. Taken in this way, the Absolute makes all good things certain, and all bad things impossible (in the eternal, namely), and may be said to transmute the entire category of possibility into categories more secure. One sees at this point that the great religious difference lies between the men who insist that the world MUST AND SHALL BE, and those who are contented with believing that the world MAY BE, saved. The whole clash of rationalistic and empiricist religion is thus over the validity of possibility. It is necessary therefore to begin by focusing upon that word. What may the word 'possible' definitely mean?

请注意，用实用主义来看，整个困境都以有关世界的种种可能性的概念为核心。从理智上来讲，理性主义提出用其绝对统一性原则来解释许多事实之可能性的理由。从情感上来讲，它把这个绝对统一性原则作为可能性的容器和限制器，一个良好结局的保证。按照这个看法，绝对意志使所有的好事物变得确定，所有坏事物变得不可能（即在永恒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把整个可能性范畴变成了更有稳定性的多个范畴。这里，可以看到两类人之间巨大的宗教差异：一派坚持认为世界必定且将会得救，一派则愿意相信世界可能得救。因此，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宗教的整个冲突，就在这个可能性的有效性上。因此，有必要开始把注意力放到可能性这个词上。“可能的”这个词会有什么确切的意思呢？

To unreflecting men the possible means a sort of third estate of being, less real than existence, more real than non-existence, a twilight realm, a hybrid status, a limbo into which and out of which realities ever and anon are made to pass. Such a conception is of course too vague and nondescript to satisfy us. Here, as elsewhere, the only way to extract a term's meaning is to use the pragmatic method on it. When you say that a thing is possible,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对浅薄的人来说，“可能的”意味着存在的第三种状态，没有存在真实，但比不存在更真实，是一种黄昏世界，一个混合状态，一个临界边缘，现实经常由此出入。当然，这样的概念太模糊、太空洞，差强人意。这里，也和其他地方一样，提取一个术语的定义的唯一途径就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如果你说一个事物是可能的，会带来什么差异呢？

It makes at least this difference that if anyone calls it impossible you can contradict him, if anyone calls it actual you can contradict HIM, and if anyone calls it necessary you can contradict him too. But these privileges of contradiction don't amount to much. When you say a thing is possible, does not that make some farther difference in terms of actual fact?

至少有这么一种差异：如果有人说它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反驳他；如果有人说它是真实的，你可以反驳他；如果有人说它是必然的，你也可以反驳他。但是，这些反驳的权利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如果你说一件事物是可能的，它难道不能在实际事实方面带来一些更进一步的差异吗？

It makes at least this negative difference that if the statement be true, it follows that there is nothing extant capable of preventing the possible thing. The absence of real grounds of interference may thus be said to make things not impossible, possible therefore in the bare or abstract sense.

它至少带来这个差异：如果这句话为真，那么就可以说，任何现存的东西都不能阻止这个可能的事物。因此可以说，不存在真正的干扰理由让事物变得不可能，也就是说在空洞的或抽象的意义上是可能的。

But most possibles are not bare, they are concretely grounded, or well-grounded, as we say. What does this mean pragmatically? It means, not only that there are no preventive conditions present, but that some of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of the possible thing actually are here. Thus a concretely possible chicken means: (1) that the idea of chicken contains no essential self-contradiction; (2) that no boys, skunks, or other enemies are about; and (3) that at least an actual egg exists. Possible chicken means actual egg—plus actual sitting hen, or incubator, or what not. As the actual conditions approach completeness the chicken becomes a better-and-better-grounded possibility. When the conditions are entirely complete, it ceases to be a possibility, and turns into an actual fact.

但是大多数的可能性不是空的，它们有具体的理由，或者如我们所说，它们的理由很充分。这在实用主义上又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不但不存在妨碍的条件，事实上，还有一些产生这个可能事物的条件存在。因此，一个具体的、可能的小鸡就意味着：（1）鸡的概念不存在任何基本的自相矛盾；（2）周围没有任何男孩、黄鼠狼

或其他敌人；（3）至少存在一个真正的鸡蛋。可能的小鸡意味着真正的蛋——加上真正的孵小鸡的母鸡，或孵化器，或其他什么东西。这些实际条件越接近完备，小鸡成为可能性的理由也就越来越充分。如果所有条件都完全具备，它就不再是可能性了，它成为一个真正的事实。

Let us apply this notion to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 What does it pragmatically mean to say that this is possible? It means that some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ld's deliverance do actually exist. The more of them there are existent, the fewer preventing conditions you can find, the better-grounded is the salvation's possibility, the more PROBABLE does the fact of the deliverance become.

让我们把这个概念运用到拯救世界。在实用主义的意义上，如果说世界得救是可能的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世界得救的某些条件确实存在。这些得救的条件存在得越多，而阻碍条件越少，得救的可能性就越高，得救的事实就越很有可能出现。

So much for our preliminary look at possibility.

我们对可能性的初步了解就先到这里。

Now it would contradict the very spirit of life to say that our minds must be indifferent and neutral in questions like that of the world's salvation. Anyone who pretends to be neutral writes himself down here as a fool and a sham. We all do wish to minimize the

insecurity of the universe; we are and ought to be unhappy when we regard it as exposed to every enemy and open to every life-destroying draft. Nevertheless there are unhappy men who think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 impossible. Theirs is the doctrine known as pessimism.

现在，如果有人说我们的思想必须对世界得救一类的问题保持超然和中立，就会违背生活的精神本身。谁要假装中立，谁就表明自己是愚蠢的、虚伪的。我们都真的希望把宇宙的不稳定性降到最低；当我们认为宇宙面对各种敌人，接受各种摧毁生命的打击时，我们会，也应该会，感到不高兴。然而，有一些不快乐的人，他们认为世界不可能得救。他们的哲学就是所谓的悲观主义。

Optimism in turn would be the doctrine that thinks the world's salvation inevitable.

反过来，乐观主义则认为世界一定会得救。

Midway between the two there stands what may be called the doctrine of meliorism, tho it has hitherto figured less as a doctrine than as an attitude in human affairs. Optimism has always been the regnant DOCTRINE in european philosophy. Pessimism was only recently introduced by Schopenhauer and counts few systematic defenders as yet. Meliorism treats salvation as neither inevitable nor impossible. It treats it as a possibility, which becomes more and more of a probability the more numerous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salvation become.

在两者之间的是可以被称作社会改良论的观点，尽管直到现在，它更多地被认为是对人类事件的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主义。乐观主义一向都是欧洲哲学的主流思想。悲观主义只是最近才由叔本华介绍给大家，还没有几个为之做系统辩护的拥护者。社会改良论认为，世界的得救，既非必然，也非不可能。它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如果得救的实际条件越来越多，那得救成为事实就很有可能了。

It is clear that pragmatism must incline towards meliorism. Some conditions of the world's salvation are actually extant, and she cannot possibly close her eyes to this fact: and should the residual conditions come, salvation would become an accomplished reality. Naturally the terms I use here are exceedingly summary. You may interpret the word “salvation” in any way you like, and make it as diffuse and distributive, or as climacteric and integral a phenomenon as you please.

很清楚，实用主义必然倾向于社会改良论。世界得救的一些条件确实已经存在，她不可能看不到这个事实：如果剩余条件也具备了，得救就会成为一个实现了的现实。自然，我在这里使用的这些术语都非常具有概括性。你可以用自己喜欢的各种方法来解释“得救”一词，把它当作散开的、分布的，或者是一个积变的、整体的现象。

Take, for example, any one of us in this room with the ideals which he cherishes, and is willing to live and work for. Every such ideal realized will be one moment in the world's salvation. But these particular ideals are not bare abstract possibilities. They are grounded, they are LIVE possibilities, for we are their live champions and pledges, and if the complementary conditions come and add themselves, our ideals will become actual things. What

now are the complementary conditions? They are first such a mixture of things as will in the fulness of time give us a chance, a gap that we can spring into, and, finally, OUR ACT.

比如，这间教室里的每个人都怀抱理想，愿意为之生活和奋斗。每一个实现的理想，都将是世界得救的一个时刻。但是这些具体的理想不是空洞而抽象的可能性。它们都有根据，他们都是鲜活的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它们活生生的成功者和保证。如果有了一些补足条件，我们的理想就会成为现实。那么，补足条件是什么呢？它们首先是事物的一个混合体，会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们机会，一个我们可以利用的间隙，最终，就是我们的行为。

Does our act then CREATE the world's salvation so far as it makes room for itself, so far as it leaps into the gap? Does it create, not the whole world's salvation of course, but just so much of this as itself covers of the world's extent?

有了机会，有了可以利用的间隙，我们的行动就会使得世界得救吗？我们的行为，当然不能使整个世界得救，但是不是使它所涉及的那部分世界得救了呢？

Here I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and in spite of the whole crew of rationalists and monists, of whatever brand they be, I ask WHY NOT? Our acts, our turning-places, where we seem to ourselves to make ourselves and grow, are the parts of the world to which we are closest, the parts of which our knowledge is the most intimate and complete. Why should we not take them at their face-value? Why may they not be the actual turning-places and growing-

places which they seem to be, of the world—why not the workshop of being, where we catch fact in the making, so that nowhere may the world grow in any other kind of way than this?

现在我要不怕困难，也不管各种流派的众多理性主义者和一元论者，我要问："为什么不呢？"我们的行为，我们自己看起来创造自己并成长的转身之处，是世界与我们最接近的地方，也是我们与世界最密切、最了解它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按照它们的表面价值来看待它们？为什么它们并不像是看到的那样，是真正的世界的转身之处和成长之处呢？为什么它们不是存在的工场，能让我们在那里抓住正在形成之中的事实，从而让世界不在别处按照其他方式成长？

Irrational! we are told. How can new being come in local spots and patches which add themselves or stay away at random, independently of the rest? There must be a reason for our acts, and where in the last resort can any reason be looked for save in the material pressure or the logical compulsion of the total nature of the world? There can be but one real agent of growth, or seeming growth, anywhere, and that agent is the integral world itself. It may grow all-over, if growth there be, but that single parts should grow per se is irrational.

人们说，这太荒谬！新的存在，怎么可能一点一点、一块一块，随意增删，而和其他部分没有任何关联呢？我们的行为必须有理由，而除了世界整体本质所带来的物质上的压力或逻辑上的强迫，我们还能找到什么最终的理由呢？任何地方的成长，或者似乎看起来像成长，只可能有一个真正的主体，那就是完整的世界本身。如果有成长，它可能是整个部分，但是如果说有个别部分单独成长，那是不合理的。

But if one talks of rationality and of reasons for things, and insists that they can't just come in spots, what KIND of a reason can there ultimately be why anything should come at all? Talk of logic and necessity and categories and the absolute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whole philosophical machine-shop as you will, the only REAL reason I can think of why anything should ever come is that someone wishes it to be here. It is DEMANDED, demanded, it may be, to give relief to no matter how small a fraction of the world's mass. This is living reason, and compared with it material causes and logical necessities are spectral things.

但是，如果一个人谈到理性以及事物存在的理由，并且坚持认为它们不可能是一点一点出现的，那任何事物的出现，还可能有哪一种的理由？你尽可以随意谈论逻辑、必然性、范畴、绝对以及整个哲学机器工场，但关于任何事物出现的原因，我能想到的唯一真正的理由就是有人希望它出现并存在。有人要求它存在，这要求，也许只能给世界众生哪怕很小的一部分提供救助。这就是生存的理由，而与此相比，物质原因和逻辑必然性都是幽灵一般虚无的事物。

In short the only fully rational world would be the world of wishing-caps, the world of telepathy, where every desire is fulfilled instanter, without having to consider or placate surrounding or intermediate powers. This is the Absolute's own world. He calls upon the phenomenal world to be, and it IS, exactly as he calls for it, no other condition being required. In our world, the wishes of the individual are only one condition. Other individuals are there with other wishes and they must be propitiated first. So Being grows under all sorts of resistances in this world of the many, and, from compromise to compromise, only gets organized gradually

into what may be called secondarily rational shape. We approach the wishing-cap type of organization only in a few departments of life. We want water and we turn a faucet. We want a kodak-picture and we press a button. We want information and we telephone. We want to travel and we buy a ticket. In these and similar cases, we hardly need to do more than the wishing—the world is rationally organized to do the rest.

简而言之，唯一完全理性的世界将会是那个有求必应、有心灵感应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愿望立即就得到满足，而不用考虑或迁就周围或中间的力量。这就是绝对意志自己的世界。他要求有一个可感知的世界，于是就有了一个可感知的世界，不需要任何其他条件。在我们的世界里，个人的愿望只是一个条件。还有怀有其他愿望的其他人，它们也一定要首先得到满足。因此，在这个多的世界里，存在的成长遇到各种阻力，通过一次次妥协，它才渐渐有了组织，形成所谓的次级理性形态。我们只是在生活的少数范围内靠近有求必应的组织形式。我们需要水，就转水龙头。我们需要一张照片，就按下快门。我们需要信息，就打电话。我们需要旅行，就买票。在这些类似的情况中，我们只需要有个愿望，几乎不需要做其他什么——世界已经有合理的安排，来做其余的事情。

But this talk of rationality is a parenthesis and a digression. What we were discussing was the idea of a world growing not integrally but piecemeal by the contributions of its several parts. Take the hypothesis seriously and as a live one. Suppose that the world's author put the case to you before creation, saying: “I am going to make a world not certain to be saved, a world the perfection of which shall be conditional merely, the condition being that each several agent does its own 'level best.' I offer you the chance of taking part in such a world. Its safety, you see, is

unwarranted. It is a real adventure, with real danger, yet it may win through. It is a social scheme of co-operative work genuinely to be done. Will you join the procession? Will you trust yourself and trust the other agents enough to face the risk?”

但是这个关于合理性的讨论，只是附带说说的题外话。我们一直讨论的观点是，世界的成长不是整体的，而是来自它各个部分的一点一滴的贡献。把这个假设认真想一想，把它当作真的。假设创世者在创世之前问你：“我要创造一个世界，但不能确定它能否得救，这个世界的完美性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它的每一个成员都要‘竭尽全力’。我给你机会，加入这样的一个世界。你知道，它的安全是没有保障的。这是真正的冒险，有真正的危险，但最后可能取得胜利。这是一个真正需要完成的社会合作计划。你愿意参加吗？你对你自己及其他参与者有足够的信心来面对这次风险吗？”

Should you in all seriousness, if participation in such a world were proposed to you, feel bound to reject it as not safe enough? Would you say that, rather than be part and parcel of so fundamentally pluralistic and irrational a universe, you preferred to relapse into the slumber of nonentity from which you had been momentarily aroused by the tempter's voice?

如果有人建议你加入这样的世界，你会确实因为感到不够安全，而不得不严肃地拒绝吗？你会说自己不愿意做一个根本上是多元的、非理性的宇宙的一分子，而更愿意回到那无名的睡梦中，时不时被试探者的声音唤醒吗？

Of course if you are normally constituted, you would do

nothing of the sort. There is a healthy-minded buoyancy in most of us which such a universe would exactly fit. We would therefore accept the offer—“Top! undschlag auf schlag!” It would be just like the world we practically live in; and loyalty to our old nurse Nature would forbid us to say no. The world proposed would seem “rational” to us in the most living way.

当然，如果你的心智正常，你决不会这么做。我们大多数人都头脑健全、充满活力，与这样的宇宙正好匹配。因此，我们会接受这个建议——“好极了！一言为定！”它将与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一样；而且我们对大自然这个古老的养育者的忠诚，会禁止我们说不。对我们来说，这个设想的世界，看起来将是最“合理的”。

Most of us, I say, would therefore welcome the proposition and add our fiat to the fiat of the creator. Yet perhaps some would not; for there are morbid minds in every human collection, and to them the prospect of a universe with only a fighting chance of safety would probably make no appeal. There are moments of discouragement in us all, when we are sick of self and tired of vainly striving. Our own life breaks down, and we fall into the attitude of the prodigal son. We mistrust the chances of things. We want a universe where we can just give up, fall on our father's neck, and be absorbed into the absolute life as a drop of water melts into the river or the sea.

我认为，大多数的人会因此欢迎这个建议，愿意努力帮助创世者。然而，也许有些人就不愿意；因为在每一个人群里，都有一些病态的头脑，在他们看来，只有经过奋斗才能得到安全的宇宙的未来，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们大家都有失落的时刻，那时，我们会厌恶自

己，厌倦做徒劳无功的努力。我们自己的生活失败，就采取一种浪荡子的态度。我们不相信事物带来的机会。我们想要一个宇宙，它可以让我们放弃一切，靠在父亲的肩膀上，像一滴水融入河流成海洋一样，让自己被吸收到那绝对的生命中去。

The peace and rest, the security desiderated at such moments is security against the bewildering accidents of so much finite experience. Nirvana means safety from this everlasting round of adventures of which the world of sense consists. The hindoo and the buddhist, for this is essentially their attitude, are simply afraid, afraid of more experience, afraid of life.

这种时刻最需要安静，也就是能应对有限经验里种种让人困惑事件的安全感。涅磐指的是在这种感觉世界中进行持久冒险时的一种安全感。这是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基本态度，他们就是害怕，害怕更多经验，害怕生活。

And to men of this complexion, religious monism comes with its consoling words: “All is needed and essential—even you with your sick soul and heart. All are one with God, and with God all is well. The everlasting arms are beneath, whether in the world of finite appearances you seem to fail or to succeed.”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when men are reduced to their last sick extremity absolutism is the only saving scheme. Pluralistic moralism simply makes their teeth chatter, it refrigerates the very heart within their breast.

对这种人，宗教一元论有这种抚慰的说法：“一切都是需要的，

一切都是重要的——即使是心灵不健全的你。人人都与上帝是一体的，与上帝一体则皆大欢喜。在有限形态的世界里，不论你看起来是成功还是失败，那永恒的臂膀都在护佑你。”毫无疑问，人们如果被逼到厌倦的极点，绝对主义就是唯一的解救方案。多元论的道德说教只能让他们牙齿打颤，内心冰冷。

So we see concretely two types of religion in sharp contrast. Using our old terms of comparison, we may say that the absolutistic scheme appeals to the tender-minded while the pluralistic scheme appeals to the tough. Many persons would refuse to call the pluralistic scheme religious at all. They would call it moralistic, and would apply the word religious to the monistic scheme alone. Religion in the sense of self-surrender, and moralism in the sense of self-sufficingness, have been pitted against each other as incompatibles frequently enough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

所以，我们就具体看到宗教上大相径庭的两个类别。用我们原有的作比较的术语，我们可以说绝对主义的方案吸引空想派，而多元主义的方案吸引实际派。许多人可能会拒绝承认多元主义的方案有任何宗教性。他们把多元主义的方案称为道德主义的，而把宗教性一词只用到一元论方案上。自我放弃意义上的宗教与自我满足意义上的道德主义，被当作互不相容的东西对立起来，这在人类思想史上相当常见。

We stand here before the final question of philosophy. I said in my fourth lecture that I believed the monistic-pluralistic alternative to be the deepest and most pregnant question that our minds can frame. Can it be that the disjunction is a final one? that only one side can be true? Are a pluralism and monism genuine

incompatibles? So that, if the world were really pluralistically constituted, if it really existed distributively and were made up of a lot of eaches, it could only be saved piecemeal and de facto as the result of their behavior, and its epic history in no wise short-circuited by some essential oneness in which the severalness were already “taken up” beforehand and eternally “overcome”? If this were so, we should have to choose one philosophy or the other. We could not say “yes, yes” to both alternatives. There would have to be a “no” in our relations with the possible. We should confess an ultimate disappointment: we could not remain healthy-minded and sick-minded in one indivisible act.

我们这里就面临着哲学的最后一个问题。在第四讲中我说过，我相信一元和多元的问题是我们头脑所能勾画出的最深刻、最有内涵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分离会是最终的吗？只有一方可能是真的吗？多元论和一元论真的互不相容吗？因此，如果世界是多元组成的话，如果它真的是由众多分散存在的个体组成的，它只能靠这些分散个体的真正行为结果而一点一点地得救。它的历史如诗如歌，绝没有被一些本质上的一元性所缩短，在这些一元性中，多已经被事先“接纳”且永远“克服”了。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这两种哲学中选择其一。我们不可能对两种哲学都说：“对，对”。在我们跟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上，必定有一个“不”字。必须承认，我们最终会失望：在同一个不可分的行为里，我们的心理不可能既健全，又不健全。

Of course as human beings we can be healthy minds on one day and sick souls on the next; and as amateur dabblers in philosophy we may perhaps be allowed to call ourselves monistic pluralists, or free-will determinists, or whatever else may occur to us of a reconciling kind. But as philosophers aiming at clearness and consistency, and feeling the pragmatistic need of squaring truth

with truth, the question is forced upon us of frankly adopting either the tender or the robustious type of thought. In particular THIS query has always come home to me: May not the claims of tender-mindedness go too far? May not the notion of a world already saved in toto anyhow, be too saccharine to stand? May not religious optimism be too idyllic? Must ALL be saved? Is NO price to be paid in the work of salvation? Is the last word sweet? Is all “yes, yes” in the universe? Doesn't the fact of “no” stand at the very core of life? Doesn't the very “seriousness” that we attribute to life mean that ineluctable noes and losses form a part of it, that there are genuine sacrifices somewhere, and that something permanently drastic and bitter always remains at the bottom of its cup?

当然，作为人，我们的心智可以一天健康，一天不健康；作为哲学的业余初学者，我们也许可以把自己叫做一元的多元论者，或者自由意志的决定论者，或者其他任何具有调和色彩的名称。但是作为哲学家，我们的宗旨是清晰性和一致性，也意识到要使真理与真理相一致的实用主义的必要性，我们就被迫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是要坦然接受空想派还是实际派的思想观点。这个问题总是尤其让我深思：空想派的主张，难道没有太过分吗？那个世界已经全部得救的概念，难道不是过分甜美了吗？宗教乐观主义难道不是太理想了吗？必须全部都得救吗？得救难道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吗？最后的定论真的甜美吗？宇宙中，难道只有“对，对”吗？在生活的核心，难道就没有“不”的事实存在吗？我们认为生活是“严肃的”，它的意思难道不是说生活的一部分是由“不”和“损失”构成的，某些地方一定有真正的牺牲，在事物的最深处一定有永远剧烈和痛苦的东西吗？

I can not speak officially as a pragmatist here; all I can say is that my own pragmatism offers no objection to my taking sides with this more moralistic view, and giving up the claim of total

reconcili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is involved in the pragmatistic willingness to treat pluralism as a serious hypothesis. In the end it is our faith and not our logic that decides such questions, and I deny the right of any pretended logic to veto my own faith. I find myself willing to take the universe to be really dangerous and adventurous, without therefore backing out and crying “no play.” I am willing to think that the prodigal-son attitude, open to us as it is in many vicissitudes, is not the right and final attitude towards the whole of life. I am willing that there should be real losses and real losers, and no total preservation of all that is. I can believe in the ideal as an ultimate, not as an origin, and as an extract, not the whole. When the cup is poured off, the dregs are left behind forever, but the possibility of what is poured off is sweet enough to accept.

我在这里不能正式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来说话；我所能说的是，我自己的实用主义并不反对我赞成更倾向于道德主义的观点，并且放弃完全调和的主张。我这么做之所以有可能，与实用主义愿意把多元论当成一个严肃的假设有关。最终，决定这些问题的，是我们的信仰，而不是我们的逻辑。我拒绝把权利给任何假装的逻辑来否定我自己的信仰。我发现自己乐于接受宇宙真的很危险和富有冒险性的看法，但我并没有因此就喊着“不玩了”，然后退出。我愿意认为，虽然我们在许多历史变迁中采取了那种浪荡子的态度，但这种态度并不是对待整个生活正确的、最终的态度。我愿意认为，应该存在真正的损失和真正的失败者，并不是所有的存在都被保留下来。我能相信这样的理想，它是最终的，而不是最初的，它是提炼出来的部分，而不是全部。把杯子倒空时，总会有残渣永远留下，但是，只要有可能把东西倒出来，也就足够甜美、可以接受。

As a matter of fact countless human imaginations live in this moralistic and epic kind of a universe, and find its disseminated and

strung-along successes sufficient for their rational needs. There is a finely translated epigram in the greek anthology which admirably expresses this state of mind, this acceptance of loss as unatoned for, even tho the lost element might be one's self:

事实上，人类的无数想象就寄托在这种道德主义的、史诗般的宇宙上，并且发现其众多分散且持续的成功足以满足他们的理性需求。在希腊文选里，有一首翻译得很好的短诗，精巧地表达了这种思想状况，表明接受这种没有得到补偿的损失，即使损失掉的可能就是人自己：

“A shipwrecked sailor, buried on this coast, Bids you set sail. Full many a gallant bark, when we were lost, Weathered the gale.”

“一个失事的海员，葬身在此岸，他号召大家扬帆。我们虽遇难，但还有许多勇敢的帆船，经受住狂风的考验。”

Those puritans who answered “yes” to the question: “Are you willing to be damned for God's glory?” were in this objective and magnanimous condition of mind. The way of escape from evil on this system is NOT by getting it “aufgehoben,” or preserved in the whole as an element essential but “overcome.” It is by dropping it out altogether, throwing it overboard and getting beyond it, helping to make a universe that shall forget its very place and name.

对于“你愿意为上帝的荣耀而受到诅咒吗？”，那些回答“是”的清教徒就有这种客观、博大的胸怀。根据这种思想，逃避恶的方法不是

放弃，也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基本但“已被克服”的元素整体保留下来。而是要完全把它抛弃掉，扔到外面去，并且超越它，从而有助于创造一个将会忘记“恶”的地位和名字的宇宙。

It is then perfectly possible to accept sincerely a drastic kind of a universe from which the element of “seriousness” is not to be expelled. Whoso does so is, it seems to me, a genuine pragmatist. He is willing to live on a scheme of uncertified possibilities which he trusts; willing to pay with his own person, if need b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deals which he frames.

现在就完全有可能真诚地接受一个猛烈的宇宙，那里不得排除“严肃”的元素。在我看来，不管是谁这么做了，他都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他愿意依靠一种他信赖的、充满各种没有保障的可能性的方案生活；如果需要，他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以实现他所勾画的理想。

What now actually ARE the other forces which he trusts to co-operate with him, in a universe of such a type? They are at least his fellow men, in the stage of being which our actual universe has reached. But are there not superhuman forces also, such as religious men of the pluralistic type we have been considering have always believed in? Their words may have sounded monistic when they said “there is no God but God”; but the original polytheism of mankind has only imperfectly and vaguely sublimated itself into monotheism, and monotheism itself, so far as it was religious and not a scheme of class-room instruction for the metaphysicians, has always viewed God as but one helper, primus inter pares,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shapers of the great world's fate.

那么，在这样一种宇宙里，他可以信赖并与之合作的其他力量究竟是什么呢？至少他还有和他一样的同胞，他们处在我们现实宇宙已经达到的境界。但是，难道没有一些超人的力量吗，比如那些主张多元论的宗教人士所一直信仰的力量？他们说："除了上帝，再没有别的上帝。"这听起来像是一元论；但是人类原有的多神论，虽然进步得不完美、很模糊，也已经升华到了一神论。一神论本身，只要它还是宗教，而不是教室里形而上学学者使用的教案，它就永远把上帝只看作是一个帮助者，是伟大世界的命运的所有创造者中最首要的一位。

I fear that my previous lectures, confined as they have been to human and humanistic aspects, may have left the impression on many of you that pragmatism means methodically to leave the superhuman out. I have shown small respect indeed for the Absolute, and I have until this moment spoken of no other superhuman hypothesis but that. But I trust that you see sufficiently that the Absolute has nothing but its superhumanness in common with the theistic God. On pragmatistic principles, if the hypothesis of God works satisfactorily in the widest sense of the word, it is true. Now whatever its residual difficulties may be, experience shows that it certainly does work, and that the problem is to build it out and determine it, so that it will combine satisfactorily with all the other working truths. I cannot start upon a whole theology at the end of this last lecture; but when I tell you that I have written a book on men's religious experience, which on the whole has been regarded as making for the reality of God, you will perhaps exempt my own pragmatism from the charge of being an atheistic system. I firmly disbelieve, myself, that our human experience is the highest form of experience extant in the universe. I believe rather that we stand in much the same relation to the whole of the universe as our

canine and feline pets do to the whole of human life. They inhabit our drawing-rooms and libraries. They take part in scenes of whose significance they have no inkling. They are merely tangent to curves of history the beginnings and ends and forms of which pass wholly beyond their ken. So we are tangents to the wider life of things. But, just as many of the dog's and cat's ideals coincide with our ideals, and the dogs and cats have daily living proof of the fact, so we may well believe, on the proofs that religious experience affords, that higher powers exist and are at work to save the world on ideal lines similar to our own.

我担心我之前的讲座都限于人和人本主义方面，可能已经给你们许多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实用主义故意不谈超人因素。我确实对绝对意志表现出的敬意不多。直到现在，我除了绝对意志之外，没有谈到任何其他有关超人的假设。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清楚地看到，绝对意志和有神论的上帝，除了都有超人性质以外，没有别的共同点。按照实用主义原则，有关上帝的假设，如果能够在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所起的作用让人满意，那它就是真的。现在，不管它还有其他什么困难，经验显示它肯定起作用，问题是将它建立起来，确立起来，以便它与其他所有起作用的真理以让人满意的方式结合起来。这次是最后一讲，也快要讲完了，我不能谈整套神学问题；但如果我告诉大家，我已经写过一本关于人类宗教经验的书，总体来说，人们认为这本书是赞同上帝的现实存在的，知道这些，你们也许就不会指责我自己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无神论体系了。我自己坚决不相信我们人类的经验是宇宙现存经验的最高形式。但我相信，我们和整个宇宙的关系，就像我们的猫、狗类宠物和整个人类生活的关系一样。它们居住在我们的客厅和书房里。它们参与各种活动，但对活动的意义却全然不知。它们只是历史曲线的一根切线，而历史的起点、终点和形状，它们全都不理解。因此，我们也是事物更宏大生命的切线。但是，正像猫和狗的许多理想和我们的理想是吻合的，猫和狗的日常生活都能提供事实的证明，因此，根据宗教经验所提供的证明，我们大可以去相

信，有更高的力量存在并发挥作用，按照与我们的理想相似的方向来拯救世界。

You see that pragmatism can be called religious, if you allow that religion can be pluralistic or merely melioristic in type. But whether you will finally put up with that type of religion or not is a question that only you yourself can decide. Pragmatism has to postpone dogmatic answer, for we do not yet know certainly which type of religion is going to work best in the long run. The various overbeliefs of men, their several faith-ventures, are in fact what are needed to bring the evidence in. You will probably make your own ventures severally. If radically tough, the hurly-burly of the sensible facts of nature will be enough for you, and you will need no religion at all. If radically tender, you will take up with the more monistic form of religion: the pluralistic form, with its reliance on possibilities that are not necessities, will not seem to afford you security enough.

你看，你可以说实用主义有宗教性，如果你同意这种宗教是多元的或者只是属于向善的一类。但是，你最终能否容忍这种宗教，就只有你自己能决定了。最终哪一种宗教的作用最大，我们还不能确切知道，所以，实用主义的结论必须往后推。事实上，人类的各种过度信仰，他们的几次信仰尝试，都正是搜集证据所需要的。你们很可能会几个人各自去尝试。如果你是激进的实际派，自然界可感知的那些喧嚣的事物对你也就足够了，你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宗教。如果你是激进的空想派，就会接受宗教更为一元论的形式：宗教的多元形式依赖的是非必然的可能性，它不能给你提供足够的安全感。

But if you are neither tough nor tender in an extreme and

radical sense, but mixed as most of us are, it may seem to you that the type of pluralistic and moralistic religion that I have offered is as good a religious synthesis as you are likely to find.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of crude naturalism on the one hand and transcendental absolutism on the other, you may find that what I take the liberty of calling the pragmatistic or melioristic type of theism is exactly what you require.

但是，如果你既非极端激进的实际派，也非极端激进的空想派，而是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你的观点是这两种的混合体，那你可能发现，我所提出的那种多元的、道德主义的宗教，是你们可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种综合性宗教。一方是未经加工的自然主义，一方是先验的绝对主义，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你会发现我所冒昧称为实用主义的有神论或社会改良论的有神论，恰恰正是你所需要的。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Meaning of Truth: A Sequel to "Pragmatism"

真理的意义：《实用主义》续篇

William James

威廉·詹姆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真理的意义：《实用主义》续篇

The Meaning of Truth: A Sequel to “Pragmatism”

威廉·詹姆斯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reface 序
- Chapter I The Function of Cognition 第一章　认知的功能
- Chapter II The Tigers in India 第二章　印度老虎
- Chapter III Humanism and Truth 第三章　人道主义与真理
- Chapter IV The Relation Between Knower and Known 第四章　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的关系
- Chapter V The Essence of Humanism 第五章　人道主义的本质
- Chapter VI A Word More About Truth 第六章　再谈真理
- Chapter VII Professor Pratt on Truth 第七章　普拉特教授论真理
- Chapter VIII The Pragmatist Account of Truth and Its Misunderstanders　第八章　实用主义对真理的阐释及其误解者
- Chapter IX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Truth 第九章　真理一词的意义
- Chapter X The Existence of Julius Caesar 第十章　尤利乌斯·恺撒的存在
- Chapter XI The Absolute and the Strenuous Life 第十一章　绝对与勤勉的生活
- Chapter XII Professor Hébert on Pragmatism 第十二章　赫伯特教授论实用主义
- Chapter XIII Abstractionism and "Relativismus" 第十三章　抽象主义和“相对主义”

- Chapter XIV Two English Critics 第十四章　两位英国批评者
- Chapter XV A Dialogue 第十五章　对话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reface

序

The pivotal part of my book named Pragmatism is its account of the relation called “truth” which may obtain between an idea (opinion, belief, statement, or what not) and its object. “Truth”, I there say, “is a property of certain of our ideas. It means their agreement, as falsity means their disagreement, with reality. Pragmatists and intellectualists both accept this definition as a matter of course.

在我那本名为《实用主义》的书中，核心部分是关于“真理”的阐述，该真理指的是可能存在于一种观念（见解、信念、陈述等诸如此类的概念）及其客体之间的关系。“真理”，我之前所提到的，“是我们某些观念的一种特性。它指这些观念与实在相符，而虚假指的是它们之间不相符。实用主义者和唯智主义者都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个定义。”

“Where our ideas (do) not copy definitely their object, what does agreement with that object mean?… Pragmatism asks its usual question. “Grant an idea or belief to be true,” it says, “what concrete difference will its being true make in any one's actual life? What experiences (may) be different from those which would obtain if the belief were false? How will the truth be realized? What, in short, is the truth's cash-value in experiential terms?” The moment pragmatism asks this question, it sees the answer: TRUE IDEAS ARE THOSE THAT WE CAN ASSIMILATE, VALIDATE, CORROBORATE,

AND VERIFY. FALSE IDEAS ARE THOSE THAT WE CANNOT. That is the practical difference it makes to us to have true ideas; that therefore is the meaning of truth, for it is all that truth is known as.”

“若我们的观念不能确切地摹写其客体，那与客体符合是什么意思？……实用主义提出自己常问的问题。它问道，“假定一个观念或信念是真的，它为真对任何人的实际生活会产生什么具体影响？信念之为真的经验与信念之为假的经验之间可能存在哪些差别？真理如何才能实现呢？简而言之，真理在经验上的兑现价值是什么呢？”实用主义在抛出这个问题的那一刻，就知道了答案：真实的观念是我们能理解、确认、证实、检验的那些观念。虚假的观念就是那些经不起这些考验的观念。这就是拥有真实的观念对我们产生的实际差别；因此这就是真理的意义之所在，因为这就是真理为人所知的全部内容。”

“The truth of an idea is not a stagnant property inherent in it. Truth happens to an idea. It becomes true, is made true by events. Its verity is in fact an event, a process, the process namely of its verifying itself, its verification. Its validity is the process of its validation. [1_1] ”

“真理性并非观念固有的稳定属性。真理发生观念之中。使观念变成真理的正是事件。观念的真实性实际上就是事件或过程，证实和检验自身的过程；其有效性就是其验证自己的过程。” [2_1]

To agree in the widest sense with a reality can only mean to be guided either straight up to it or into its surroundings, or to be put into such working touch with it as to handle either it or something

connected with it better than if we disagreed. Better either intellectually or practically… Any idea that helps us to deal, whether practically or intellectually, with either the reality or its belongings, that doesn't entangle our progress in frustrations, that fits, in fact, and adapts our life to the reality's whole setting, will agree sufficientl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It will be true of that reality.

在广义层面上与某一事实符合，要么指被直接引导到那个实在中或者其周围，要么指被纳入与实在的有效接触中，从而能够比不符合时更好地把握实在或者与之相联系的东西，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把握得更好。……任何一个观念，只要它能够在实践上或理智上帮助我们处理实在或者其从属事物，只要它不使我们的进程受到羁绊，只要它事实上能使我们的生活适合并适应整个实际情境，那么该观念就足以达到要求。它就符合这个事实。

“THE TRUE, to put it very briefly, IS ONLY THE EXPEDIENT IN THE WAY OF OUR THINKING, JUST AS THE RIGHT IS ONLY THE EXPEDIENT IN THE WAY OF OUR BEHAVING. Expedient in almost any fashion, and expedient in the long run and on the whole, of course; for what meets expediently all the experience in sight won't necessarily meet all farther experiences equally satisfactorily. Experience, as we know, has ways of boiling over, and making us correct our present formulas.”

“一言以蔽之，‘真’只是方便我们进行思维的一种方式，正如‘对’只是方便我们行为的一种方式一样。这里包括几乎任何形式的方便，当然也包括从长远来看和从总体上来看的方便；因为能方便地适合所有眼前经验的，不一定能同样适合所有更远的未来经验，并令

人满意。我们知道，经验总是会溢出旧的范围，促使我们修正现有的公式。”

This account of truth, following upon the similar ones given by Messrs. Dewey and Schiller, has occasioned the liveliest discussion.

对真理的这番阐释遵循了杜威（Dewey）和席勒（Schiller）两位先生的类似阐述，它引起了最热烈的讨论。

Few critics have defended it, most of them have scouted it. It seems evident that the subject is a hard one to understand, under its apparent simplicity; and evident also, I think, that the definitive settlement of it will mark a turning-point in the history of epistemology, and consequently in that of general philosophy. In order to make my own thought more accessible to those who hereafter may have to study the question, I have collected in the volume that follows all the work of my pen that bears directly on the truth-question. My first statement was in 1884, in the article that begins the present volume. The other papers follow in the order of their publication. Two or three appear now for the first time.

很少有评论家为之辩护，大多数人对它冷嘲热讽。显然，这个话题表面上看似简单，实则难以理解；而且我认为，似乎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该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将在认识论的历史上——从而也在一般哲学的历史上——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为了让此后可能不得不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更清楚地了解我本人的思想，我把自己所写的与真理问题直接相关的文章汇编成这册书。我在1884年首次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该文就作为本书的开篇，其余文章以发表时间为序紧随其后，其中两三篇是初次刊行。

One of the accusations which I oftenest have had to meet is that of making the truth of our religious beliefs consist in their “feeling good” to us, and in nothing else. I regret to have given some excuse for this charge, by the unguarded language in which, in the book Pragmatism, I spoke of the truth of the belief of certain philosophers in the absolute. Explaining why I do not believe in the absolute myself (p. 78), yet finding that it may secure “moral holidays” to those who need them, and is true in so far forth (if to gain moral holidays be a good), [1_2] I offered this as a conciliatory olive-branch to my enemies. But they, as is only too common with such offerings, trampled the gift under foot and turned and rent the giver. I had counted too much on their good will—oh for the rarity of Christian charity under the sun! Oh for the rarity of ordinary secular intelligence also! I had supposed it to be matter of common observation that, of two competing views of the universe which in all other respects are equal, but of which the first denies some vital human need while the second satisfies it, the second will be favored by sane men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it makes the world seem more rational. To choose the first view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would be an ascetic act, an act of philosophic self-denial of which no normal human being would be guilty. Using the pragmatic test of the meaning of concepts, I had shown the concept of the absolute to mean nothing but the holiday giver, the banisher of cosmic fear. One's objective deliverance, when one says “the absolute exists”, amounted, on my showing, just to this, that “some justification of a feeling of security in presence of the universe”, exists, and that systematically to refuse to cultivate a feeling of security would be to do violence to a tendency in one's emotional life which might well

be respected as prophetic.

我最常遭到的指控之一，就是批评我把宗教信仰的真理性归结为它们能让我们“感觉良好”，而不是其他原因。在《实用主义》一书中，当我谈到某些哲学家对绝对的信念的真理性时，我后悔当时措辞不够严谨，给这种指控留下了把柄。我一方面解释自己为什么不相信绝对（见该书第78页），另一方面又发现它可以给那些需要的人带来“道德上的假日”，并且在这个程度上来说是真的（如果获得“道德上的假日”是件好事的话）[2_2]；我提到这一点，原本是想向我的敌人伸出愿意和解的橄榄枝。但是，他们把这个礼物踩在脚下，并转而攻击馈赠者，这就是这类馈赠通常的命运。我过多地指望他们的善意了——啊，天底下基督的仁慈真是少而又少！啊，平凡的世俗智慧也是少得可怜！我曾以为下列做法只不过是大家的共识：在两种对立的宇宙观中，如果在其他方面二者都相同，但第一种否定了人类的某种重大需求，而第二种却满足了这种需求，那么头脑健全的人会偏爱第二种，原因很简单，它让这个世界看起来理性。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第一种观点是一种禁欲行为，是一种哲学上的自我否定行为，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对此感到心虚。。将概念的意义进行实用主义的检验之后，我曾说明绝对概念不指别的东西，而仅仅指假日提供者，宇宙恐惧的驱逐者。当某人说“绝对存在”的时候，他的这种客观陈述在我看来只是等于说：“为面对宇宙时的安全感所进行的某种辩护”是存在的，而系统地拒绝培育安全感则违背了人们情感生活中存在的一种倾向，而这种倾向被看作是有预见力，本应加以尊崇。

Apparently my absolutist critics fail to see the workings of their own minds in any such picture, so all that I can do is to apologize, and take my offering back. The absolute is true in no way then, and least of all, by the verdict of the critics, in the way which I assigned!

显然，那些批评我的绝对论者没能按这样的方式理解自己的心智作用，因此我所要做的只是道歉，并收回自己的礼物。由此看来，绝对根本不是真的，而且按照那些批评者的论断，它在我所指的方面尤其不是真的。

My treatment of “God”, “freedom”, and “design” was similar. Reducing, by the pragmatic test, the meaning of each of these concepts to its positive experienceable operation, I showed them all to mean the same thing, viz., the presence of “promise” in the world. “God or no God?” means “promise or no promise?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alternative is objective enough, being a question as to whether the cosmos has one character or another, even though our own provisional answer be made on subjective grounds. Nevertheless Christian and non-Christian critics alike accuse me of summoning people to say “God exists”, even when he doesn't exist, because forsooth in my philosophy the “truth” of the saying doesn't really mean that he exists in any shape whatever, but only that to say so feels good.

我对“上帝”、“自由”、“设计”采用了类似的处理方式。通过实用主义的检验，我将其中每一个概念的意义化简为确定的、可经验的操作过程，我想说明这些概念都指向同一个东西，即世界上有“希望”存在。“上帝存不存在？”意味着“希望存不存在？”。这种替代说法是一个涉及宇宙有哪一种性质的问题，它在我看来似乎已经足够客观，即使我们的临时答案可能是在主观的基础上得出的。可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罢，都一律指责我，说我号召人们说“上帝存在”，即便上帝可能并不存在。因为事实上，在我的哲学中，这种说法的“真理性”并非真正是指上帝以任何外形存在，而是指这样说能让人感觉良好。

Most of the pragmatist and anti-pragmatist warfare is over what the word “truth” shall be held to signify, and not over any of the facts embodied in truth-situations; for both pragmatists and anti-pragmatists believe in existent objects, just as they believe in our ideas of them. The difference is that when the pragmatists speak of truth, they mean exclusively some thing about the ideas, namely their workableness; whereas when anti-pragmatists speak of truth they seem most often to mean something about the objects. Since the pragmatist, if he agrees that an idea is “really” true, also agrees to whatever it says about its object; and since most anti-pragmatists have already come round to agreeing that, if the object exists, the idea that it does so is workable; there would seem so little left to fight about that I might well be asked why instead of reprinting my share in so much verbal wrangling, I do not show my sense of “values” by burning it all up.

实用主义者和反实用主义者的论战，多半在于“真理”一词应当作何解释，而不在于真理情景中所包含的任何事实；因为实用主义者和反实用主义者都相信存在的客体，正像他们相信我们有关客体的观念。二者的区别在于：当实用主义者谈到真理时，他们专门指与观念相关的东西，即观念可起的作用；而当反实用主义者谈到真理时，他们似乎最常指与客体相关的东西。因而，如果实用主义者承认一个观念“确实”是真的，他也会认同该观念就其客体所说的一切；大多数反实用主义者也转而承认：如果客体存在，客体存在这一观念就是可以发挥适用性的；既然二者是这样的看法，那就几乎没有剩下什么可争论的余地，以至于有人可能会质问我，为何我还要重印这些文章加入这场白热化的口水战，而不是将它们付之一炬，以此表明我的价值态度。

I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and I will give my answer. I am

interested in another doctrine in philosophy to which I give the name of radical empiricism,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agmatist theory of truth is a step of first-rate importance in making radical empiricism prevail. Radical empiricism consists first of a postulate, next of a statement of fact, and finally of a generalized conclusion.

我理解这种质疑，会给出自己的回答。我对另一个哲学学说也有兴趣，我把它命名为彻底经验主义，我认为建立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对于推行彻底经验主义是头等重要的一步。彻底经验主义首先包含一个假设，接着是事实陈述，最后是概括性的结论。

The postulate is that the only things that shall be debatable among philosophers shall be things definable in terms drawn from experience. (Things of an unexperienceable nature may exist ad libitum, but they form no part of the material for philosophic debate.)

这个假设是：哲学家可争辩论的唯一事物，是那些可以用来自经验的语汇加以界定的事物。（无法从经验中获得的事物也尽可以存在，但它们不构成哲学论辩的素材。）

The statement of fact is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ings, conjunctive as well as disjunctive, are just as much matters of direct particular experience, neither more so nor less so, than the things themselves.

事实陈述是：事物间的关系，无论是结合的关系还是离散的关系，完全与事物本身一样，都是直接的特殊经验的事物。

The generalized conclusion is that therefore the parts of experience hold together from next to next by relations that are themselves parts of experience. The directly apprehended universe needs, in short, no extraneous trans-empirical connective support, but possesses in its own right a concatenated or continuous structure.

概括性结论是：各部分的经验从而藉由关系逐个地连成一体，而这些关系本身又是经验的组成部分。简言之，这个可以直接理解的宇宙不需要外在的、超验的、联系上的支持，它自身就拥有一个链状的或连续的结构。

The great obstacle to radical empiricism in the contemporary mind is the rooted rationalist belief that experience as immediately given is all disjunction and no conjunction, and that to make one world out of this separateness, a higher unifying agency must be there. In the prevalent idealism this agency is represented as the absolute all-witness which “relates” things together by throwing “categories” over them like a net. The most peculiar and unique, perhaps, of all these categories is supposed to be the truth-relation, which connects parts of reality in pairs, making of one of them a knower, and of the other a thing known, yet which is itself contentless experientially, neither describable, explicable, nor reducible to lower terms, and denotable only by uttering the name “truth”.

对彻底经验主义而言，现代人心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是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信念，它认为直接经验都是离散的而不是结合的，要想从这种分离的状态中创造出一个世界，就必须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统一力量。盛行的唯心主义将这一统一力量描述为绝对的全能见证者，它用由各种“范畴”编织成的网把事物“联系”在一起。在所有的范畴中，最特殊、最独一无二的大概要算是真理关系了，它把实体的各个部分成对地联系起来，使其中一个成为认识者，另一个成为被认识者，而它自身却无任何经验内容，既无法被描述和解释，也无法化简为低一级的语汇，只能用“真理”一词来指称它。

The pragmatist view, on the contrary, of the truth-relation is that it has a definite content, and that everything in it is experienceable. Its whole nature can be told in positive terms. The “workableness” which ideas must have, in order to be true, means particular workings, physical or intellectual, actual or possible, which they may set up from next to next inside of concrete experience. Were this pragmatic contention admitted, one great point in the victory of radical empiricism would also be scored,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an object and the idea that truly knows it, is held by rationalists to be nothing of this describable sort, but to stand outside of all possible temporal experience; and on the relation, so interpreted, rationalism is wonted to make its last most obdurate rally.

相反，实用主义对真理关系的看法是：它有确定的内容，其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可经验的。其整体性质可以用确定的语汇来言说。观念的“适用性”，这一所有真的观念所必备的，指的是某些特殊的作用，它们可以是物理的作用或理智的作用，也可以是实际的作用或可能的作用，它们在具体经验内部能够逐个发挥其作用。这个实用主义的主张假如能被接受，彻底经验主义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也将赢得了不起

的一分，因为理性主义者认为，一个客体与真正认识该客体的观念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这种可描述的关系，而是存在于所有可能的世间经验之外；而且，在如此阐释的这种关系上，理性主义通常会固执己见、负隅顽抗。

Now the anti-pragmatist contentions which I try to meet in this volume can be so easily used by rationalists as weapons of resistance, not only to pragmatism but to radical empiricism also (for if the truth-relation were transcendent, others might be so too), that I feel strongly the strategical importance of having them definitely met and got out of the way. What our critics most persistently keep saying is that though workings go with truth, yet they do not constitute it. It is numerically additional to them, prior to them, explanatory of them, and in no wise to be explained by them, we are incessantly told. The first point for our enemies to establish, therefore, is that something numerically additional and prior to the workings is involved in the truth of an idea. Since the object is additional, and usually prior, most rationalists plead IT, and boldly accuse us of denying it. This leaves on the bystanders the impression—since we cannot reasonably deny the existence of the object—that our account of truth breaks down, and that our critics have driven us from the field. Altho in various places in this volume I try to refute the slanderous charge that we deny real existence, I will say here again, for the sake of emphasis,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e object, whenever the idea asserts it “truly” is the only reason, in innumerable cases, why the idea does work successfully, if it work at all; and that it seems an abuse of language, to say the least, to transfer the word “truth” from the idea to the object's existence, when the falsehood of ideas that won't work is explained by that existence as well as the truth of those that will.

我在本书中试图驳斥的各种反实用主义主张极易被理性主义者用作武器，来对抗实用主义和彻底经验主义（因为假如真理关系是超验的，其他关系也莫不如此），因此我深感明确面对并彻底清除这些主张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的批评者最常表达的观点是：虽然各种作用与真理同时存在，它们却并不构成真理。他们不断地告诉我们：真理对各种作用而言，在数量上多于他们，先于它们存在，有助于对它们做出解释，而且根本无需用它们做出解释。因此，我们的反对者要确定的第一点是：一个观念的真理性涉及到某个在数量上超过、在地位上优于各种作用的东西。既然客体是数量上超过的并且通常也是先存的，大多数理性主义者便为之辩护，公然指责我们否认客体。这就给旁观者们造成一个印象：既然我们不能合理地否认客体的存在，我们对真理的阐释就站不住脚了，这样，批评者把我们驱逐出了战场。对于指控我们否认真实存在的谰言，尽管我在本书多处试图予以反驳，为了强调起见，我在此重申：每当一个观念“真正”确认其客体的存在时，在无数情况下，其客体的存在是说明该观念确实能成功地发挥适用性的唯一理由——如果它能发挥适用性的话；当客体的存在既被用来解释具有适用性的观念的真理性，也被用来解释具有适用性的观念的虚假性时，把“真理”这个词从观念转移到其客体的存在上至少可以说是在滥用语言。

I find this abuse prevailing among my most accomplished adversaries. But once establish the proper verbal custom, let the word “truth” represent a property of the idea, cease to make it something mysteriously connected with the object known, and the path opens fair and wide, as I believe, to the discussion of radical empiricism on its merits. The truth of an idea will then mean only its workings, or that in it which by ordinary psychological laws sets up those workings; it will mean neither the idea's object, nor anything “saltatory” inside the idea, that terms drawn from experience cannot describe.

我发现，这种滥用语言的现象在我那些造诣高超的对手中很盛行。但是另一方面，一旦确立恰当的语言习惯，要让“真理”这个词代表观念的一个属性，不再把它看作是与已知客体神秘相关的某个东西，那么我相信，这就为公平而广泛地讨论彻底经验主义的是非曲直敞开了大门。如此说来，一个观念的真仅指其作用，或者观念中按照一般心理规律产生这些作用的东西；它既不指观念的客体，也不会指观念内部“跳跃的”、不能用来自经验的语汇描述的任何东西。

One word more, ere I end this preface. A distinction is sometimes made between Dewey, Schiller and myself, as if I, in supposing the object's existence, made a concession to popular prejudice which they, as more radical pragmatists, refuse to make. As I myself understand these authors, we all three absolutely agree in admitting the transcendency of the object (provided it be an experienceable object) to the subject, in the truth-relation. Dewey in particular has insisted almost ad nauseam that the whole meaning of our cognitive states and processes lies in the way they intervene in the control and revaluation of independent existences or facts. His account of knowledge is not only absurd, but meaningless, unless independent existences be there of which our ideas take account, an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which they work. But because he and Schiller refuse to discuss objects and relations “transcendent” in the sense of being altogether trans-experiential, their critics pounce on sentences in their writings to that effect to show that they deny the existence within the realm of experience of objects external to the ideas that declare their presence there. [1_3]

在结束本序文之前我还要说明一点。人们有时候会在杜威、席勒和我本人之间作一个区分，好像我假定客体的存在就是对世俗的偏见

做了让步，而他们两位作为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拒绝做出这种让步。据我对他二位的了解，我们三人都绝对一致地承认在真理关系中客体（假定它是一个可经验的客体）超越主体而存在。尤其是杜威，他几乎令人生厌地坚持，我们的认知状态和认知过程的全部意义，在于它们参与控制和重估独立存在或事实的方式。如果没有那些我们的观念所解释、并通过观念的作用来改变的独立存在，他对认识的论述就不仅荒谬，而且毫无意义。但是，由于杜威和席勒拒绝在完全超越经验的意义上讨论“超验的”客体和关系，他们的批评者们就揪住他们的著作中相关的只言片语，以证明他们否定经验领域内存在观念之外的客体 [2_3] 。

It seems incredible that educated and apparently sincere critics should so fail to catch their adversary's point of view.

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看起来很有诚意的批评者们竟然无法理解对手的观点，这似乎不可思议。

What misleads so many of them is possibly also the fact that the universes of discourse of Schiller, Dewey, and myself are panoramas of different extent, and that what the one postulates explicitly the other provisionally leaves only in a state of implication, while the reader thereupon considers it to be denied. Schiller's universe is the smallest, being essentially a psychological one. He starts with but one sort of thing, truth-claims, but is led ultimately to the independent objective facts which they assert, inasmuch as the most successfully validated of all claims is that such facts are there. My universe is more essentially epistemological. I start with two things, the objective facts and the claims, and indicate which claims, the facts being there, will work

successfully as the latter's substitutes and which will not. I call the former claims true. Dewey's panorama, if I understand this colleague, is the widest of the three, but I refrain from giving my own account of its complexity. Suffice it that he holds as firmly as I do to objects independent of our judgments. If I am wrong in saying this, he must correct me. I decline in this matter to be corrected at second hand.

有这么多人被误导，原因可能是席勒、杜威和我的论域的范围不同。当一个人明确地作出假定时，另一个人只是暂时做出了暗示，而读者却因此误以为这个东西被否定了。席勒的论域最小，基本上限制在心理学领域。他只从一种东西谈起，那就是真理主张，但最终还是被引导到它们所确认的独立的客观事实上，因为在所有主张中被最成功地证明有效的主张是：这类事实存在。我的论域基本上属于认识论范畴。我从两种东西谈起：客观事实和主张，并指出，假定事实存在的话，哪些主张将替代事实成功地发挥作用，哪些主张则不能。我把前一类主张称为真的。杜威的论域就我所知是我们三人当中范围最广的，但我不想对其复杂性做出自己的阐释。他和我一样，坚持认为客体独立于我们的判断而存在。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如果我说错了，杜威一定会纠正我。我拒绝接受其他人在这一点上对我的纠正。

I have not pretended in the following pages to consider all the critics of my account of truth, such as Messrs. Taylor, Lovejoy, Gardiner, Bakewell, Creighton, Hibben, Parodi, Salter, Carus, Lalande, Mentré, McTaggart, G. E. Moore, Ladd and others, especially not Professor Schinz, who has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of Anti-pragmatisme an amusing sociological romance. Some of these critics seem to me to labor under an inability almost pathetic, to understand the thesis which they seek to refute. I imagine that most of their difficulties have been answered by anticipation elsewhere in

this volume, and I am sure that my readers will thank me for not adding more repetition to the fearful amount that is already there.

在本书中，我并没有佯称要对所有批评我的真理理论的人做出回应，其中包括：泰勒，洛夫乔伊，加德纳，贝克韦尔，克莱顿，希本，帕罗蒂，索尔特，卡勒斯，拉朗德，芒特，麦克塔格特，G. E. 摩尔，莱德等，尤其没有回应欣兹教授，他在名为《反实用主义》的书中发表了一种引人发笑的社会学怪谈。这些批评者中有些人连他们试图驳斥的论点都不理解，这种徒劳的做法在我看来近乎可悲。我想，我在本书中其他地方已经预见性地回答了他们的大部分质疑。既然我之前已经叙述了很多，在此不再赘述，我相信这也是读者所希望的。

95 IRVING ST., CAMBRIDGE (MASS.), August, 1909.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欧文街95号，1909年8月。

[1_1].But "verifiability", I add, "is as good as verification. For one truth-process completed, there are a million in our lives that function in (the) state of nascency. They lead us towards direct verification; lead us into the surroundings of the object they envisage; and then, if everything, runs on harmoniously, we are so sure that verification is possible that we omit it, and are usually justified by all that happens."

[1_2].Op. cit., p. 75.

[1_3].It gives me pleasure to welcome Professor Carveth Read into the pragmatistic church, so far as his epistemology goes. See his vigorous book, The Metaphysics of Nature, 2d Edition, Appendix A. (London, Black, 1908.)The work What is Reality? by Francis Howe Johnson (Boston, 1891), of which I make the acquaintance only while correcting these proofs, contains some striking anticipations of the later pragmatist view. The Psychology of Thinking, by Irving E. Miller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09), which has just appeared, is one of the most convincing

pragmatist document yet published, though it does not use the word "pragmatism" at all. While I am making references, I cannot refrain from inserting one to the extraordinarily acute article by H. V. Knox. in the Quarterly Review for April, 1909.

[2_1].但是，我补充说，“可证实性同证实过程一样有效。因为一个真理过程完成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有上百万个在初生态中发挥适用性的证实过程。它们把我们引向直接的证实过程，把我们引入它们所代表的客体的周围；然后，如果一切事情都和谐地进行，我们会如此深信证实过程是可能的，以至于我们把它省略掉，而所有发生的事情也通常证明我们是对的。”

[2_2].见上引著作，第75页。

[2_3].卡维思·里德教授在认识论中加入了实用主义一派，我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参见其力作《自然的形而上学》，第二版，附录A。（伦敦，Black出版社，1908年。）弗朗西斯·豪·约翰逊所著《什么是实在》一书（波士顿，1891年）是我在修改本书校样时才发现的，其中包含对后来的实用主义观某些卓越的预见。最近出版的欧文·米勒的《思维心理学》（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1909年）一书是已经面世的最具说服力的实用主义文献之一，尽管书中并未使用“实用主义”字眼。在整理参考文献时，我忍不住要插入H. V. 诺克斯发表在1909年4月《每季评论》上的一篇特别精辟的文章。

Chapter I The Function of Cognition

第一章　认知的功能

The following inquiry is (to use a distinction familiar to readers of Mr. Shadworth Hodgson) not an inquiry into the “how it comes”, but into the “what it is” of cognition. What we call acts of cognition are evidently realized through what we call brains and their events, whether there be “souls” dynamically connected with the brains or not. But with neither brains nor souls has this essay any business to transact. In it we shall simply assume that cognition is produced, somehow, and limit ourselves to asking what elements it contains, what factors it implies. [2_1]

下文探究的并不是认知是“怎样来的”，而是它“是什么”（姑且援用读者熟悉的沙德沃思·霍奇逊先生的区别说法加以说明）。我们所谓的认知行为显然借由所谓的大脑及其活动来实现，不论是否存在与大脑动态相连的“灵魂”。但是，大脑或灵魂都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在本文中，我们只是假定认知通过某种方式生产出来；而且，我们只限于探询认知包括哪些元素，隐含着哪些因素。 [3_1]

Cognition is a function of consciousness. The first factor it implies is therefore a state of consciousness wherein the cognition shall take place. Having elsewhere used the word “feeling” to designate generically all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considered subjectively, or without respect to their possible function, I shall then say that, whatever elements an act of cognition may imply besides, it at least implies the existence of a feeling. (If the reader

share the current antipathy to the word “feeling”, he may substitute for it, wherever I use it, the word “idea”, taken in the old broad Lockian sense, or he may use the clumsy phrase “state of consciousness”, or finally he may say “thought” instead.)

认知是一种意识功能。因此，它所隐含的第一个因素便是认知借以发生的意识状态。我在其他地方曾使用“感觉”一词，来统指主观地加以考虑的、或不考虑其潜在功能的所有意识状态，我现在要指出的是，不论某种认知行为可能隐含什么其他要素，它至少隐含一种感觉的存在。（如果读者像其他人一样时下对“感觉”一词有反感，每当我使用它的时候，可以用“观念”来替代它，这里指的是旧的、广义的洛克哲学意义上的“观念”；或者，也可以用“意识状态”这个累赘的词组，或者最终干脆用“思想”代之。）

Now it is to be observed that the common consent of mankind has agreed that some feelings are cognitive and some are simple facts having a subjective, or, what one might almost call a physical, existence, but no such self-transcendent function as would be implied in their being pieces of knowledge. Our task is again limited here. We are not to ask, “How is self-transcendence possible? " We are only to ask, “How comes it that common sense has assigned a number of cases in which it is assumed not only to be possible but actual? And what are the marks used by common sense to distinguish those cases from the rest? “In short, our inquiry is a chapter in descriptive psychology,—hardly anything more.

应该指出，人类已经取得如下共识：有些感觉是认知的，有些则仅是事实，有其主观性的存在，或几乎可以被称为物质的存在，但却没有它们是各种认识所隐含的自我超越功能。我们对这方面的探究也

是有限的。我们不会问："怎么会存在自我超越？"，而只是问："常识何以认定在某些情况下自我超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而且，常识用何标准把这些状况与其他状况区分开来？"简言之，我们的探究乃是描述心理学中的一个章节，舍此无它。

Condillac embarked on a quest similar to this by his famous hypothesis of a statue to which various feelings were successively imparted. Its first feeling was supposed to be one of fragrance. But to avoid all possible complication with the question of genesis, let us not attribute even to a statue the possession of our imaginary feeling. Let us rather suppose it attached to no matter, nor localized at any point in space, but left swinging in *vacuo* , as it were, by the direct creative fiat of a god. And let us also, to escape entanglement with difficulties about the physical or psychical nature of its "object", not call it a feeling of fragrance or of any other determinate sort, but limit ourselves to assuming that it is a feeling of Q. What is true of it under this abstract name will be no less true of it in any more particular shape (such as fragrance, pain, hardness) which the reader may suppose.

孔狄亚克做过与此类似的探究，他提出了把各种感觉连续赋予一尊雕像的著名假设。第一种感觉被认为是对香气的感觉。但是，为了避免可能与起源问题混淆，我们先不要认为即使是塑像也拥有我们想象的感觉。相反，让我们假定感觉既不附着于任何物质，也不停留空间上的任何一点上，而是按神祇直接的创造性命令在真空中飘摆。同时，为避免难以确定其"客体"究竟具有生理属性还是心理属性所造成的麻烦，我们也不称之为香气的感觉或任何其它特定类型的感觉，而仅仅假定它是一种Q感觉。适用于这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感觉的一切东西，将在同样程度上适用于读者能假设的任何更具体的感觉（比如香气、疼痛、硬度）。

Now, if this feeling of Q be the only creation of the god, it will of course form the entire universe. And if, to escape the cavils of that large class of persons who believe that *semper idem sentire ac non sentireare* the same, [2_2] we allow the feeling to be of as short a duration as they like, that universe will only need to last an infinitesimal part of a second. The feeling in question will thus be reduced to its fighting weight, and all that befalls it in the way of a cognitive function must be held to befall in the brief instant of its quickly snuffed-out life,—a life, it will also be noticed, that has no other moment of consciousness either preceding or following it.

如若这种Q感觉是神的唯一创造，它自然构成了整个宇宙。而且，为了不让相信永远感受这样的感觉与无感觉无异 [3_2] 的那一大群人吹毛求疵，假如我们允许这种感觉的持续时间如他们想要的那般短暂，那个宇宙就只需要持续无穷短的一瞬间。这样，我们讨论的这种Q感觉将被减小到临赛重量，而赋予它的认知功能也必须在它迅即泯灭的短暂生命瞬间内降临；还应该指出，在这一生命之前或之后也都不存在其它的意识瞬间。

Well now, can our little feeling, thus left alone in the universe,—for the god and we psychological critics may be supposed left out of the account,—can the feeling, I say, be said to have any sort of a cognitive function? For it to know,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o be known. What is there, on the present supposition? One may reply, “the feeling's content Q.” But does it not seem more proper to call this the feeling's quality than its content? Does not the word “content” suggest that the feeling has already dirempted itself as an act from its content as an object? And would it be quite safe to assume so promptly that the quality Q of a feeling is one and the

same thing with a feeling of the quality Q? The quality Q, so far, is an entirely subjective fact which the feeling carries so to speak endogenously, or in its pocket. If any one pleases to dignify so simple a fact as this by the name of knowledge, of course nothing can prevent him. But let us keep closer to the path of common usage, and reserve the name knowledge for the cognition of “realities”, meaning by realities things that exist independently of the feeling through which their cognition occurs. If the content of the feeling occur nowhere in the universe outside of the feeling itself, and perish with the feeling, common usage refuses to call it a reality, and brands it as a subjective feature of the feeling's constitution, or at the most as the feeling's dream.

我们的微小感觉就这样被孤单地遗留在宇宙中，因为神和我们这些心理批评家们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我想问，我们能否认为这种感觉有一种认知功能呢？若说它有这种认知功能，它就必须要有被认识的东西。依照现有假设，什么东西可被认识呢？有人可能回答说：“感觉的内容Q。”但是，称之为感觉的性质岂不是比感觉的内容更恰当吗？“内容”一词岂不暗示着，感觉已经把作为行为的它与作为客体的内容分割开来了吗？而且，如果我们立刻假定感觉的性质Q与性质Q的感觉完全是一回事，这样做是不是稳妥呢？至此，性质Q是一个完全主观的事实，可以说是感觉所内生的或附带的事实。如果有人乐于给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冠以“认识”的美誉，自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但是，我们还是尽量沿用通俗的用法吧，认识一词专指对“实在”的认知，这里所谓实在，指独立于感觉而存在的事物，而对事物的认知需要通过这种感觉产生。如果感觉的内容不发生在感觉自身之外的宇宙当中，并伴随着感觉而消弭，则我们一般不称其为实在，而只能将之视为感觉构成中的一个主观特征，或至多视之为感觉的幻梦。

For the feeling to be cognitive in the specific sense, then, it must be self-transcendent; and we must prevail upon the god to create a reality outside of it to correspond to its intrinsic quality Q. Thus only can it be redeemed from the condition of being a solipsism. If now the new-created reality resembles the feeling's quality Q, I say that the feeling may be held by us TO BE COGNIZANT OF THAT REALITY.

那么，要使感觉在特定意义上具有认知性，它就必须是自我超越的；我们必须说服神祇创造一个它之外的实在，与其内在的性质Q相对应。只有这样，它才能从唯我论的状态中被解救出来。假如新创造的实在与感觉的性质Q类似，那么我就可以说我们提出的这个感觉认识到了实在。

This first instalment of my thesis is sure to be attacked. But one word before defending it. “Reality” has become our warrant for calling a feeling cognitive; but what becomes our warrant for calling anything reality? The only reply is—the faith of the present critic or inquirer. At every moment of his life he finds himself subject to a belief in some realities, even though his realities of this year should prove to be his illusions of the next. Whenever he finds that the feeling he is studying contemplates what he himself regards as a reality, he must of course admit the feeling itself to be truly cognitive. We are ourselves the critics here; and we shall find our burden much lightened by being allowed to take reality in this relative and provisional way. Every science must make some assumptions. Erkenntnisstheoretiker are but fallible mortals. When they study the function of cognition, they do it by means of the same function in themselves. And knowing that the fountain cannot go higher than its source, we should promptly confess that our

results in this field are affected by our own liability to err. The most we can claim is, that what we say about cognition may be counted as true as what we say about anything else. If our hearers agree with us about what are to be held “realities”, they will perhaps also agree to the reality of our doctrine of the way in which they are known. We cannot ask for more.

我的论点的第一个部分肯定会受到攻击。但是，在为之辩护之前我需要说明一点。“实在”已经成了我们能把一种感觉称为认知性的凭据；可是，我们又凭借什么东西把某个东西称为实在呢？唯一的答案是：当前的批评者或探究者的信念。在他的生活中，他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相信某些实在，哪怕今年的实在来年就被证明是幻想。每当他发现自己探究的感觉有可能与他视为实在的东西相关时，他当然必须承认该感觉本身是真正具有认知性的。在这里我们自己就是批评者；如果被允许用这种相对的、暂时的方式看待实在，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负担减轻了许多。每一门科学都必须做出一些假设。认识论者只不过是容易犯错的凡人。当他们研究认知的功能时，他们借用的是自己身上存在的同样功能。而且，我们知道泉水不会流向高过其源头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我们在这个领域取得的成果难免受到我们可能犯的错误的影响。我们至多可以宣称，我们有关认知的论断与我们有关其他任何事物的论断一样，都可以被看作是真的。如果听众在什么应该被看作是“实在”上与我们看法一致，他们也可能赞同我们认识这些实在的方式所依据的信条的实在性。我们不能要求再多了。

Our terminology shall follow the spirit of these remarks. We will deny the function of knowledge to any feeling whose quality or content we do not ourselves believe to exist outside of that feeling as well as in it. We may call such a feeling a dream if we like; we shall have to see later whether we can call it a fiction or an error.

我们所使用的术语，将遵循这些话语的精神。如果我们认为一种感觉的性质或内容既不存在于此感觉之外，也不存在于此感觉之内，我们将否认此感觉的认识功能。如果我们乐意，可以将这种感觉称为幻梦；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能否将之称为虚构或错误。

To revert now to our thesis. Some persons will immediately cry out, “How can a reality resemble a feeling? " Here we find how wise we were to name the quality of the feeling by an algebraic letter Q. We flank the whole difficulty of resemblance between an inner state and an outward reality, by leaving it free to any one to postulate as the reality whatever sort of thing he thinks can resemble a feeling,—if not an outward thing, then another feeling like the first one,—the mere feeling Q in the critic's mind for example. Evading thus this objection, we turn to another which is sure to be urged.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论点上来。有些人立刻会叫嚷起来：“实在怎么能与感觉类似呢？”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刚才用代数上的字母Q来指称感觉的性质是多么地明智。通过让任何人自由地把他自认为可能类似于一种感觉的任何东西假定为实在——如果那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那就是像第一个感觉一样的另一个感觉——比如批评者头脑中的纯粹感觉Q，我们就避开了内部状态与外部实在之间的相似所带来的整个难题。以这种方式避开这个反对意见之后，让我们转向另外一个必然会提出的强烈质疑。

It will come from those philosophers to whom “thought”, in the sense of a knowledge of relations, is the all in all of mental life; and who hold a merely feeling consciousness to be no better—one would sometimes say from their utterances, a good deal worse—

than no consciousness at all. Such phrases as these, for example, are common to-day in the mouths of those who claim to walk in the footprints of Kant and Hegel rather than in the ancestral English paths: “A perception detached from all others, 'left out of the heap we call a mind', being out of all relation, has no qualities—is simply nothing. We can no more consider it than we can see vacancy. " “It is simply in itself fleeting, momentary, unnameable (because while we name it it has become another), and for the very same reason unknowable, the very negation of knowability.” “Exclude from what we have considered real all qualities constituted by relation, we find that none are left.”

该质疑来自一些哲学家，他们认为从关系认知意义上，把“思想”看作是心智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们还认为，一个仅仅能感觉的意识比根本没有意识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有时甚至会说比没有意识要糟糕得多。例如，今天的一些人自称追随康德与黑格尔的足迹，而不是走传统的英国道路，他们常常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如果一个知觉脱离了其他知觉，即‘被置于我们称之为心灵的范围之外’，脱离了一切关系，那么它就失去了自身特性，变得什么也不是。我们无法认识这样的知觉，只能将其视为虚无。”“它本身就是飞逝的、瞬间的、不可名状的（因为我们给它命名时它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而且，正是由于同样不可知的原因，它成为了可知性的对立面。”“如果从我们认为真实的东西中排除由关系塑造的所有特性，我们会发现不会剩下任何东西。”

Altho such citations as these from the writings of Professor Green might be multiplied almost indefinitely, they would hardly repay the pains of collection, so egregiously false is the doctrine they teach. Our little supposed feeling, whatever it may be, from the cognitive point of view, whether a bit of knowledge or a dream,

is certainly no psychical zero. It is a most positively and definitely qualified inner fact, with a complexion all its own. 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mental facts which it is not. It knows Q, if Q be a reality, with a very minimum of knowledge. It neither dates nor locates it. It neither classes nor names it. And it neither knows itself as a feeling, nor contrasts itself with other feelings, nor estimates its own duration or intensity. It is, in short, if there is no more of it than this, a most dumb and helpless and useless kind of thing.

诸如此类的说法在格林教授的著作中简直是不胜枚举，但它们几乎不值得花功夫去罗列，因为它们所宣扬的信条异乎寻常地荒谬。我们假定的小小感觉无论是什么，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无论它是一点儿认识还是一个幻梦，都肯定在心灵上不等于零。它是一个确定无疑当之无愧的内部事实，有其自身的面貌。当然，在它之外存在很多心智事实。如果Q是一个实在的话，这个感觉就对Q有了最浅显的认识。它既没确定其时间，也没确定其位置。它既没有对它分类，也没有将它命名。而且，它既没有把自己当作一种感觉来认识，也没将自己与其他感觉相对照，也未估算过自己持续的时间或强度。简言之，如果它仅止于此的话，它是一种最愚蠢、最无助、最没用的东西。

But if we must describe it by so many negations, and if it can say nothing about itself or about anything else, by what right do we deny that it is a psychical zero? And may not the “relationists” be right after all?

但是，如果我们必须用众多的否定来描述它，如果它不能说明关于其自身或关于其他事物的任何东西，我们凭什么否认它在心灵上等于零呢？到底那些“关系论者”是对还是不对呢？

In the innocent looking word “about” lies the solution of this riddle; and a simple enough solution it is when frankly looked at. A quotation from a too seldom quoted book, the *Exploratio Philosophica* of John Grote (London, 1865), p. 60, will form the best introduction to it.

该问题的答案就在看似简单的“关于”一词上；而且坦诚地来看，这还是一个足够简单的答案。一段来自约翰·格罗特很少被人引用的著作——《哲学探索》（伦敦，1865年）——中的引文（见该书第60页），能够最好地说明这一点。

“Our knowledge”, writes Grote, “may be contemplated in either of two ways, or, to use other words, we may speak in a double manner of the “object” of knowledge. That is, we may either use language thus: we know a thing, a man, etc.; or we may use it thus: we know such and such things about the thing, the man, etc. Language in general, following its true logical instinct,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se two applications of the notion of knowledge, the one being *yvwvai* , *noscere* , *kennen* , *connaitre* , the other being *eidevai* , *scire* , *wissen* , *savoir* . In the origin, the former may be considered more what I have called phenomenal—it is the notion of knowledge as acquaintance or familiarity with what is known; which notion is perhaps more akin to the phenomenal bodily communication, and is less purely intellectual than the other; it is the kind of knowledge which we have of a thing by the presentation to the senses 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t in picture or type, a Vorstellung. The other, which is what we express in judgments or propositions, what is embodied in Begriffe or concepts without any necessary imaginative representation, is in its origin the more intellectual notion of knowledge. There is no reason, however, why we should not

express our knowledge, whatever its kind, in either manner, provided only we do not confusedly express it, in the same proposition or piece of reasoning, in both. "

格罗特写道，“我们的认识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看待，换言之，我们可以用双重方式来谈论认识的“客体”。即我们可以这样使用语言：我们知道某物、某人等等；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知道关于某物、某人等等的某某方面。语言遵循其真正的逻辑直觉，一般会对这两种认识观的应用做出区分，一种是知觉（yvwvai, noscere, kennen, connaitre），另一种是理解（eidevai, scire, wissen, savoir）。从本源上说，前者可以被认为更接近我所谓现象性的——即把认识看作是对已知事物的熟识或熟悉；这种看法或许更类似于现象的有形交接，它不像后者那么纯属理智上的；这种对事物的认识是通过将事物呈现给感官，或以图片、文字形式再现而获得的，是一种“表象”。后者是我们在判断或命题中所表达的，体现在“观念”或概念中，而不需任何想象性的再现，就其本源而言属于更加理智的认识。然而，只要我们在同一命题或同一推理过程中不至将它们做混淆表述，就没有理由说不能用任何一种方式表达我们的任何一种认识。

Now obviously if our supposed feeling of Q is (if knowledge at all) only knowledge of the mere acquaintance-type, it is milking a he-goat, as the ancients would have said, to try to extract from it any deliverance about anything under the sun, even about itself. And it is as unjust, after our failure, to turn upon it and call it a psychical nothing, as it would be, after our fruitless attack upon the billy-goat, to proclaim the non-lactiferous character of the whole goat-tribe. But the entire industry of the Hegelian school in trying to shove simple sensation out of the pale of philosophic recognition is founded on this false issue. It is always the “speechlessness” of sensation, its inability to make any “statement”, [2_3] that is held to

make the very notion of it meaningless, and to justify the student of knowledge in scouting it out of existence. “Significance”, in the sense of standing as the sign of other mental states, is taken to be the sole function of what mental states we have; and from the perception that our little primitive sensation has as yet no significance in this literal sense, it is an easy step to call it first meaningless, next senseless, then vacuous, and finally to brand it as absurd and inadmissible. But in this universal liquidation, this everlasting slip, slip, slip, of direct acquaintance into knowledge-about, until at last nothing is left about which the knowledge can be supposed to obtain, does not all “significance” depart from the situation? And when our knowledge about things has reached its never so complicated perfection, must there not needs abide alongside of it and inextricably mixed in with it some acquaintance with what things all this knowledge is about?

显然，如果我们假设的感觉Q（如果它能算作认识的话）仅仅是熟识型的认识，那么想从中得出关于天底下任何事物的——甚至是关于其自身的任何陈述，那简直就像古人所说，是试图从公羊身上挤奶。而且，在我们失败后，就转而攻击它，称之为心灵上的虚空，这就像我们在一只公羊身上徒劳地尝试过，然后宣称整个山羊群体不具有产奶的特质，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公平的。但是，整个黑格尔派的企图是将简单的感觉排除于哲学认识的范畴之外，这种做法是基于这一虚假问题之上的。经常是感觉的“不做声”，即它不能做出任何“陈述”[3_3]，被认为使与它有关的观念变得无意义，并为研究认识的人拒斥它的存在找到了理由。作为代表其他心智状态符号的“意义”，被当作我们所拥有的那些心智状态的唯一功能；如果我们那个小小的原始感觉被认为还没有这种基本的意义，那么它很容易先被称作是无意义的，接着被称为无意识的，然后再说它是虚空的，并最终认定它是荒唐的、不可接受的。但是，经过普遍的清算，直接的熟识逐渐地变成“关于的认识”，直到认识所能获取的“关于”的事物最终所剩无几，

这时，所有的“意义”不就都脱离情景了吗？而且，当我们对事物的相关认识达到了空前复杂的完备状态时，难道伴随着它一起存在并与它密不可分的，不应该是我们对这一认识所涉及的那些事物的某种程度的熟识吗？

Now, our supposed little feeling gives a what; and if other feelings should succeed which remember the first, its what may stand as subject or predicate of some piece of knowledge-about, of some judgment, perceiving relations between it and other whats which the other feelings may know. The hitherto dumb Q will then receive a name and be no longer speechless. But every name, as students of logic know, has its “denotation”; and the denotation always means some reality or content, relationless as extra or with its internal relations unanalyzed, like the Q which our primitive sensation is supposed to know. No relation-expressing proposition is possible except on the basis of a preliminary acquaintance with such “facts”, with such contents, as this. Let the Q be fragrance, let it be toothache, or let it be a more complex kind of feeling, like that of the full-moon swimming in her blue abyss, it must first come in that simple shape, and be held fast in that first intention, before any knowledge about it can be attained. The knowledge about it is IT with a context added. Undo IT, and what is added cannot be context. [2_4]

这样，我们假设的小小的感觉给定了一个什么；如果记住第一个感觉的其他感觉接踵而至，这个什么就可以成为某个“关于的认识”或判断的主词或谓词，并感知它与其他感觉可能认识的那些什么之间的关系。于是，迄今一言不发的Q就有了一个名称，而且也不再是无言可发了。但是，正如逻辑研究者所知道的那样，每一个名称都有其“外延”；这个外延总是指无外在关系或其未加分析的内在关系某种

实在或内容，就像我们的原始感觉应该认识的Q一样。除非基于这种“事实”和内容的初步熟识，否则就不可能有表达关系的命题。不管这个Q是香味，是牙痛，还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感觉，比如像满月在深蓝夜空中游弋的那种感觉，在能获得对关于它的认识之前，它一定先以这样的简单形式出现，并被紧紧地包含在那个起初的意图中。关于它的认识就是在认识上面加一个情境。要是没有了认识，加在其上的就不可能是情境了。[3_4]

Let us say no more then about this objection, but enlarge our thesis, thus: If there be in the universe a Q other than the Q in the feeling, the latter may have acquaintance with an entity ejective to itself; an acquaintance moreover, which, as mere acquaintance, it would be hard to imagine susceptible either of improvement or increase, being in its way complete; and which would oblige us (so long as we refuse not to call acquaintance knowledge) to say not only that the feeling is cognitive, but that all qualities of feeling, SO LONG AS THERE IS ANYTHING OUTSIDE OF THEM WHICH THEY RESEMBLE, are feelings of qualities of existence, and perceptions of outward fact.

这里，我们就不必再谈论这个反对意见了，而应该把我们的论点扩展如下：假如宇宙中存在一个Q，而它不是感觉中的那个Q，那么后一个Q可能对一个外显于其本身的实体熟悉；而且，作为单纯的熟识，很难想象它能再有改善或增加的余地，因为它自身已经是完备的；它使我们不得不说（只要我们拒将熟识称为认识）：一方面，这种感觉是认知性的；另一方面，感觉的所有性质，只要在它们之外存在着任何与之类似的东西，都是对存在的性质的感觉以及对外部事实的知觉。

The point of this vindication of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first feeling lies, it will be noticed, in the discovery that Q does exist elsewhere than in it. In case this discovery were not made, we could not be sure the feeling was cognitive; and in case there were nothing outside to be discovered, we should have to call the feeling a dream. But the feeling itself cannot make the discovery. Its own Q is the only Q it grasps; and its own nature is not a particle altered by having the self-transcendent function of cognition either added to it or taken away. The function is accidental; synthetic, not analytic; and falls outside and not inside its being. [2_5]

大家会注意到，对第一感觉的认知功能所做的这种辩护，其目的在于发现Q的确存于它之外的某个地方。假如没有这一发现，我们就不能肯定这种感觉是认知性的；并且，假如没有发现任何外部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将这种感觉称为幻梦。但是，这个感觉自身却无法实现这一发现。它自己的Q就是它能把握的唯一的Q；而且，无论把认知的自我超越功能加在它身上还是从它身上除去，它自身的本质也丝毫不会改变。这种功能是偶然的；它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它居于感觉的存在之外，而非之内。 [3_5]

A feeling feels as a gun shoots. If there be nothing to be felt or hit, they discharge themselves *ins blaue hinein* . If, however, something starts up opposite them, they no longer simply shoot or feel, they hit and know.

感觉的发生就像子弹从枪中发出。假如没有东西被感觉到或被击中，那它们只是在无的放矢。然而，如果有某物起来阻挡它们的话，它们就不仅仅是发射或是感觉了，而是击中和认识。

But with this arises a worse objection than any yet made. We the critics look on and see a real Q and a feeling of Q; and because the two resemble each other, we say the one knows the other. But what right have we to say this until we know that the feeling of Q means to stand for or represent just that same other q? Suppose, instead of one Q, a number of real Q's in the field. If the gun shoots and hits, we can easily see which one of them it hits. But how can we distinguish which one the feeling knows? It knows the one it stands for. But which one does it stand for? It declares no intention in this respect. It merely resembles; it resembles all indifferently; and resembling, per se, is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ing or standing-for at all. Eggs resemble each other, but do not on that account represent, stand for, or know each other. And if you say this is because neither of them is a feeling, then imagine the world to consist of nothing but toothaches, which ARE feelings, feelings resembling each other exactly,—would they know each other the better for all that?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比以往更强烈的反对意见。我们批评者观望并看到一个真实的Q和拥有一个对Q的感觉；由于二者相似，我们就说其中一个认识另一个。可是，在我们知道这个对Q的感觉就代表或再现那一个同样的其他Q之前，我们凭什么能这么说呢？假设靶场上存在的不是一个Q，而是多个实在的Q。如果枪响后击中了目标，我们很容易就能看见它击中的是哪一个。可是，我们如何区分感觉认识了哪一个呢？它认识它所代表的那一个。但是，它究竟代表哪一个呢？对此它并不清楚。它仅仅是类似；不置可否地类似；而类似本身根本不一定等于再现或代表。两个鸡蛋彼此类似，但它们并不因此就再现、代表或认识对方。而且，如果你说这是因为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感觉，那么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仅仅是由牙痛构成的，牙痛的确是感觉，是彼此完全类似的感觉，——如果是那样，它们会因此更好地认识彼此吗？

The case of Q being a bare quality like that of toothache-pain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its being a concrete individual thing. There is practically no test for deciding whether the feeling of a bare quality means to represent it or not. It can do nothing to the quality beyond resembling it, simply because an abstract quality is a thing to which nothing can be done. Being without context or environment or principium individuations, a quiddity with no haecceity, a platonic idea, even duplicate editions of such a quality (were they possible), would be indiscernible, and no sign could be given, no result altered, whether the feeling I meant to stand for this edition or for that, or whether it simply resembled the quality without meaning to stand for it at all.

Q只是像牙痛一样的特性，这一状况与它是一个具体的独立事物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没有什么检验方法能够确定对一个单纯特性的感觉能否代表这种特性。除了类似，它对这个特性别无它用，仅仅是因为人们对抽象的特性束手无策。如果没有情境、环境或个体化原则，那么一个没有个体性的本质，一种柏拉图式的理念，甚至是这种特性的各种版本（如果它们可能存在的话），都是无法分辨的；而且，不管我想要这种感觉去代表这个版本或那个版本，不管它是否仅仅类似这种性质而根本不能代表它，它都不能给出任何暗示，结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If now we grant a genuine pluralism of editions to the quality q, by assigning to each a context which shall distinguish it from its mates, we may proceed to explain which edition of it the feeling knows, by extending our principle of resemblance to the context too, and saying the feeling knows the particular Q whose context it most exactly duplicates. But here again the theoretic doubt recurs:

duplication and coincidence, are they knowledge? The gun shows which Q it points to and hits, by breaking it. Until the feeling can show us which Q it points to and knows, by some equally flagrant token, why are we not free to deny that it either points to or knows any one of the real Q's at all, and to affirm that the word “resemblance” exhaustively describes its relation to the reality?

假如通过为Q特性的每一个版本指定一个情境，使之能相互区别，我们就赋予Q特性一个真正的多元版本，这样，通过把我们的相似原则也扩展到情境上，并且说感觉认识了它最为精确地复制了其情境的那个特殊的Q，我们就可以继续解释这个感觉认识了这个特性的哪一版本。但是，这里再次出现了理论上的疑虑：复制与巧合，它们算是认识吗？枪通过击破某个Q而表明它指向并击中了哪一个Q。在感觉能通过某种同样明显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它指向并认识了哪一个Q之前，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自由地否认它指向或认识了任何一个实在的Q，而且不能自由地断言“相似”一词详尽地描述了它与实在的关系呢？

Well, as a matter of fact, every actual feeling does show us, quite as flagrantly as the gun, which Q it points to; and practically in concrete cases the matter is decided by an element we have hitherto left out. Let us pass from abstractions to possible instances, and ask our obliging *deus ex machina* to frame for us a richer world. Let him send me, for example, a dream of the death of a certain man, and let him simultaneously cause the man to die. How would our practical instinct spontaneously decide whether this were a case of cognition of the reality, or only a sort of marvellous coincidence of a resembling reality with my dream? Just such puzzling cases as this are what 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is busily collecting and trying to interpret in the most reasonable way.

事实上，每一个实际的感觉确实向我们表明它指向了哪一个Q，就像那杆枪一样明确；在具体情况下，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一个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考虑的元素决定的。让我们从各种抽象过渡到可能的实例，祈求眷顾我们的解围之神为我们营造一个更丰富的世界。比如说，让他赐给我一个梦，梦到某人死去，并让他同时使那个人死去。我们的实际本能将如何自发地判定这个例子是对实在的认知，或只不过是某个类似的实在与我的梦之间一种神奇的巧合呢？“心灵研究学会”正忙着收集这类令人困惑的例子，并试图对它们提供最合理的解释。

If my dream were the only one of the kind I ever had in my life, if the context of the death in the dream differed in many particulars from the real death's context, and if my dream led me to no action about the death, unquestionably we should all call it a strange coincidence, and naught besides. But if the death in the dream had a long context, agreeing point for point with every feature that attended the real death; if I were constantly having such dreams, all equally perfect, and if on awaking I had a habit of acting immediately as if they were true and so getting “the start” of my more tardily instructed neighbors,—we should in all probability have to admit that I had some mysterious kind of clairvoyant power, that my dreams in an inscrutable way meant just those realities they figured, and that the word “coincidence” failed to touch the root of the matter. And whatever doubts any one preserved would completely vanish, if it should appear that from the midst of my dream I had the power of interfering with the course of the reality, and making the events in it turn this way or that, according as I dreamed they should. Then at least it would be certain that my waking critics and my dreaming self were dealing with the same.

假如我此生只做过一个这类的梦，假如梦中死亡的情境与实际死亡的情境在很多细节上有所差别，又假如该梦没能使我对死亡采取任何行动，那么，我们毫无疑问应该称它为奇怪的巧合，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假如梦中的死亡有一个很长的情境，与伴随实际死亡过程的每个特征完全符合；如果我不断地做这类梦，其中每一个都完美地与现实符合，而且，假如我一醒来把梦当作真的而习惯于立刻行动起来，比后来才知晓此事的邻居“抢先”行动，我们很有可能得承认：我拥有某种神秘的先知先觉能力，我的梦以一种不可名状的方式指向它们所描绘的那些实在，因此“巧合”这个词没能触及到问题的本质。而且，假如在做梦的过程中我似乎有能力干预实在的进程，并能如梦中所愿使梦里的事件按照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那么，任何人抱有的任何质疑都会统统消失。因此，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我那些醒着的批评者和做梦的自己讨论的是同一个话题。

And thus do men invariably decide such a question. THE FALLING OF THE DREAM'S PRACTICAL CONSEQUENCES into the real world, and the extent of the resemblance between the two worlds are the criteria they instinctively use.[1] All feeling is for the sake of action, all feeling results in action,—to-day no argument is needed to prove these truths. But by a most singular disposition of nature which we may conceive to have been different, MY FEELINGS ACT UPON THE REALITIES WITHIN MY CRITIC'S WORLD. Unless, then, my critic can prove that my feeling does not “point to” those realities which it acts upon, how can he continue to doubt that he and I are alike cognizant of one and the same real world? If the action is performed in one world, that must be the world the feeling intends; if in another world, that is the world the feeling has in mind. If your feeling bear no fruits in my world, I call it utterly detached from my world; I call it a solipsism, and call its world a dream-world. If your toothache does not prompt you to act

as if I had a toothache, nor even as if I had a separate existence; if you neither say to me, “I know now how you must suffer! " nor tell me of a remedy, I deny that your feeling, however it may resemble mine, is really cognizant of mine. It gives no sign of being cognizant, and such a sign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my admission that it is.

而且，人们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决定这种问题。梦对现实世界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两个世界的相似程度，是他们本能地使用的标准。[1] 所有的感觉都是为了行动，所有的感觉都导致行动——今天，这些真理已经无需任何论据来证明。但是，按照我们可能认为不一样的一种非常奇特的自然倾向，对我的批评者而言。他们认为我的感觉作用于实在。那么，除非我的批评者能证明我的感觉没有“指向”它所作用的那些实在，否则，他怎能继续怀疑他和我都认识到的是同一个现实世界呢？如果行动是在一个世界中完成的，那这个世界一定是感觉所指向的那个世界；如果行动是在另一个世界中完成的，那就是感觉想到的世界。如果你的感觉不能在我的世界中产生任何影响，我认为它是与我的世界完全分离的；我称它为唯我论，并将它的世界称作幻梦世界。如果你的牙痛不能促使你像我牙痛时有一样的行为，也不像是我有独立的存在；如果你既没对我说，“我现在知道你有多么痛苦！”也没告知我一种疗法，那么，无论你的感觉和我的有多么类似，我也不承认它真正认知到了我的感觉。它没有给出任何暗示表明它认识到了，而要我承认它是如此，这种暗示则是绝对必要的。

1: The thoroughgoing objector might, it is true, still return to the charge, and, granting a dream which should completely mirror the real universe, and all the actions dreamed in which should be instantly matched by duplicate actions in this universe, still

insist that this is nothing more than harmony, and that it is as far as ever from being made clear whether the dream-world refers to that other world, all of whose details it so closely copies. This objection leads deep into metaphysics. I do not impugn its importance, and justice obliges me to say that but for the teachings of my colleague, Dr. Josiah Royce, I should neither have grasped its full force nor made my own practical and psychological point of view as clear to myself as it is. On this occasion I prefer to stick steadfastly to that point of view; but I hope that Dr. Royce's more fundamental criticism of the function of cognition may ere long see the light. (I referred in this note to Royce's religious aspect of philosophy, then about to be published. This powerful book maintained that the notion of referring involved that of an inclusive mind that shall own both the real Q and the mental Q, and use the latter expressly as a representative symbol of the former. At the time I could not refute this transcendentalist opinion. Later, largely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Professor D. S. Miller (see his essay "The meaning of truth and error",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for 1893, vol. 2 p. 403) I came to see that any definitely experienceable workings would serve as intermediaries quite as well as the absolute mind's intentions would.)

1: 的确，彻底的反对者仍然会回到这一指控，而

且，即使存在一个能完全反映现实世界的梦，而且其中梦到的全部为都能在现实世界中都能立刻找到与之一模一样的行为，反对者仍然坚持认为这不过是和谐，而且仍远远没有弄清楚：梦中的世界是否指它所精确地复制了所有细节的另一个世界。这一反对意见深入地导向了形而上学领域。我并不怀疑这一反对意见的重要性，而且，正义感使得我不得不说，要不是有我同事乔赛亚·罗伊斯博士的教诲，我就不能领悟到这个反对意见的全部力量，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使我实践上的观点和心理上的观点变得如此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坚定地坚持我的这种观点；但我希望，罗伊斯博士对认知功能更重要的批评能很快发表。（我在这个注释中提到的是罗伊斯哲学上的宗教观点，当时它即将出版。这本力作坚持认为，指称的概念涉及包含一切的思想认识，其中既有现实的q，也有心智上的q，并明确地将后者用作前者的表征符号。当时，我没能驳倒这种先验论的观点。后来，主要凭借狄金森·沙金特·米勒教授的影响（见他的文章“真理及谬误的意义”，《哲学评论》，1893年，第二卷，第403页），我开始明白，任何确实可经验的作用都可成为中介成分，很像是相信绝对的人所说的意图一样。

Before I can think you to mean my world, you must affect my world; before I can think you to mean much of it, you must affect much of it; and before I can be sure you mean it as i do, you must affect it just as I should if I were in your place. Then I, your critic, will gladly believe that we are thinking, not only of the same reality, but that we are thinking it alike, and thinking of much of its

extent.

在我能认为你意指我的世界之前，你必须影响它；在我认为你在很大程度上意指我的世界之前，你必须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它；在我确信你像我那样意指它之前，你必须像我那样去影响它，就好像我是你。这样，作为你的批评者的我，将会十分乐意相信，我们所思考的不仅是同一个实在，而且我们对它的想法相似，也同样地在思考该实在的很大一部分。

Without the practical effects of our neighbor's feelings on our own world, we should never suspect the existence of our neighbor's feelings at all, and of course should never find ourselves playing the critic as we do in this article. The constitution of nature is very peculiar. In the world of each of us are certain objects called human bodies, which move about and act on all the other objects there, and the occasions of their action are in the main what the occasions of our action would be, were they our bodies. They use words and gestures, which, if we used them, would have thoughts behind them,—no mere thoughts *überhaupt* , however, but strictly determinate thoughts. I think you have the notion of fire in general, because I see you act towards this fire in my room just as I act towards it,—poke it and present your person towards it, and so forth. But that binds me to believe that if you feel “fire” at all, this is the fire you feel. As a matter of fact, whenever we constitute ourselves into psychological critics, it is not by dint of discovering which reality a feeling “resembles” that we find out which reality it means. We become first aware of which one it means, and then we suppose that to be the one it resembles. We see each other looking at the same objects, pointing to them and turning them over in various ways, and thereupon we hope and trust that all of our

several feelings resemble the reality and each other. But this is a thing of which we are never theoretically sure. Still, it would practically be a case of *grübelsucht* , if a ruffian were assaulting and drubbing my body, to spend much time in subtle speculation either as to whether his vision of my body resembled mine, or as to whether the body he really meant to insult were not some body in his mind's eye, altogether other from my own. The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brushes such metaphysical cobwebs away. If what he have in mind be not my body, why call we it a body at all? His mind is inferred by me as a term, to whose existence we trace the things that happen. The inference is quite void if the term, once inferred, be separated from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body that made me infer it, and connected with another that is not mine at all. No matter for the metaphysical puzzle of how our two minds, the ruffian's and mine, can mean the same body. Men who see each other's bodies sharing the same space, treading the same earth, splashing the same water, making the same air resonant, and pursuing the same game and eating out of the same dish, will never practically believe in a pluralism of solipsistic worlds.

如果周围人的感觉对我们自己的世界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我们绝不应该怀疑其感觉的存在，当然我们也不能像在本文里这样扮演批评者的角色。自然的构成是非常独特的。在我们每个人的世界里都有被称作人体的某种物体，它们四处游走并作用于世界上的所有其他物体。如果它们就是我们的躯体，那么其行动的动因大体上就是我们行动的动因。它们使用言语和手势，假如我们使用这些言语和手势，其背后肯定会有思想，——但是那根本不是纯粹的思想，而是严格限定的思想。我想你有关于火的一般观念，因为我看见你在我屋子里和我一样向着火走了过去，你拨弄它，使自己的躯体靠近它等等。但这迫使我相信，如果你确实感觉到“火”的话，这就是你所感觉到的火。事实上，每当我们把自己当成心理批评者时，我们不是凭借发现某种感

觉“类似”哪个实在来弄清它意指哪个实在。我们先意识到它意指哪个实在，而后再假定那是它类似的那个。我们看见彼此都在看相同的客体，指向它们并以各种方式翻动它们，据此我们希望并相信，我们的几种感觉都与这个实在相似并且彼此相似。但是，这是一个我们在理论上无法肯定的事情。可是，如果一个暴徒正在攻击并殴打我的躯体，而我花很多时间做一些精心的推测，如他对我躯体的看法是否与我自己的看法类似，或者他实际上打算侮辱的躯体并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根本不是我的躯体；我这时做这样的推测简直就是一种质疑癖。现实的考虑会把这种形而上学的杂念排斥在外。假如他心中想的不是我的躯体，那我们为何要称其为躯体呢？我推断他的思想不过是一个词条，我们把所发生的事情追溯到它的存在。如果一旦推断出该词条，那么它就与使我推论出它的躯体分离开来，从而将其与一个根本不是我的躯体的躯体联系起来，那么这个推理就是空的。姑且不考虑暴徒与我想到的怎样可能意指同一个躯体这样的形而上学的难题。如果人看到彼此的躯体同处一个空间，脚踩同一块土地，在同一片水域里游动，使同一片空气发出回声，做同一个游戏，吃同一盘菜，他们实际上就决不会相信多元的唯我论世界的存在。

Where, however, the actions of one mind seem to take no effect in the world of the other, the case is different. This is what happens in poetry and fiction. Every one knows Ivanhoe, for example; but so long as we stick to the story pure and simple without regard to the facts of its production, few would hesitate to admit that there are as many different Ivanhoes as there are different minds cognizant of the story.[2] The fact that all these Ivanhoes resemble each other does not prove the contrary. But if an alteration invented by one man in his version were to reverberate immediately through all the other versions, and produce changes therein, we should then easily agree that all these thinkers were thinking the SAME Ivanhoe, and that, fiction or no fiction, it formed a little world common to them all.

然而，当一个人所采取的行动对另一个人的世界似乎不产生任何影响时，情况就不同了。这就是诗歌与小说中出现的情况。例如，人人都知道艾凡赫；但是，只要我们把它当作单纯的故事来看，而不考虑其创作的各种事实，那么很少有人会不愿意承认，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故事，就会有多少个不同的艾凡赫。[2] 即使这些艾凡赫彼此相似，这一事实也不能证明相反的情况。但是，假如某人对其版本的艾凡赫做出了修改，并立刻在其他所有版本中产生了回响，使之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很容易达成共识，认为这些人想到的都是同一个艾凡赫，而且，不管它是不是小说，它都构成了他们共有的一个小世界。

2: That is, there is no real "Ivanhoe", not even the one in Sir Walter Scott's mind as he was writing the story. That one is only the FIRST one of the Ivanhoe-solipsisms. It is quite true we can make it the real Ivanhoe if we like, and then say that the other Ivanhoes know it or do not know it, according as they refer to and resemble it or no. This is done by bringing in Sir Walter Scott himself as the author of the real Ivanhoe, and so making a complex object of both. This object, however, is not a story pure and simple. It has dynamic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common to the experience of all the readers. Sir Walter Scott's Ivanhoe got itself printed in volumes which we all can handle, and to any one of which we can refer to see which of our versions be the true one, i.e., the original one of Scott himself. We can see the manuscript; in short we can get back to the Ivanhoe in Scott's mind by many an avenue and channel of this real world of

our experience,—a thing we can by no means do with either the Ivanhoe or the Rebecca, either the Templar or the Isaac of York, of the story taken simply as such, and detached from the conditions of its production. Everywhere, then, we have the same test: can we pass continuously from two objects in two minds to a third object which seems to be in both minds, because each mind feels every modification imprinted on it by the other? If so, the first two objects named are derivatives, to say the least, from the same third object, and may be held, if they resemble each other, to refer to one and the same reality.

2: 也就是说，并没有真正的“艾凡赫”，甚至没有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在写这个故事时心目中的那个“艾凡赫”，那不过是艾凡赫各种唯我世界中的第一个而已。确实，只要我们喜欢就可以把它当作真艾凡赫，然后根据其他的艾凡赫是否意指它或类似它，从而判定其他的艾凡赫是否认识它。这是通过把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本人当作真艾凡赫的作者、并因此使二者成为一个复合客体来实现的。然而，这个客体并非一个单纯的故事，它与所有读者共同经验的世界有着动态的联系。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艾凡赫被印在了我们都能解读的书卷上，我们可以提及其中的任何一本，看一看我们的版本中哪一个是真的，即哪一个是司各特自己的原版。我们可以看原稿；总之，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经验的这个真实世界中的种种途径或渠道还原司各特心目中的艾凡赫，——我们决不能这样处理故

事中的艾凡赫或丽贝卡，圣殿骑士或约克的艾萨克，不能简单地这样看待这个故事，不能脱离它产生的条件。那么，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要进行同样的检验：因为每个心灵都感觉到了另一个给它留下的每一次变化，我们能连续地从两个心灵中的两个客体过渡到似乎存在于两个心灵中的第三个客体上吗？如果能，我们至少可以说，这里说的前两个客体就是上述第三个客体的衍生物，而且，如果它们彼此类似，就可以被认为是指同一个实在。

Having reached this point, we may take up our thesis and improve it again. Still calling the reality by the name of Q and letting the critic's feeling vouch for it, we can say that any other feeling will be held cognizant of q, provided it both resemble q, and refer to Q, as shown by its either modifying Q directly, or modifying some other reality, P or R, which the critic knows to be continuous with Q. Or more shortly, thus: the feeling of Q knows whatever reality it resembles, and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perates on. If it resemble without operating, it is a dream; if it operate without resembling, it is an error.[3] It is to be feared that the reader may consider this formula rather insignificant and obvious, and hardly worth the labor of so many pages, especially when he considers that the only cases to which it applies are percepts, and that the whole field of symbolic or conceptual thinking seems to elude its grasp. Where the reality is either a material thing or act, or a state of the critic's consciousness, I may both mirror it in my mind and operate upon it—in the latter case indirectly, of course—as soon as I perceive it. But there are many congitions, universally allowed to be such, which neither mirror nor operate on their realities.

至此，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我们的论点，并进一步完善它。我们仍然把这实在称为Q，并让批评者的感觉对它加以确定，我们可以说：只要任何其他一种感觉类似并意指Q，无论是通过直接改变Q，还是通过改变延续Q的某个其他实在p或r（批评者知道它们之间的连续性），那么这一感觉就被认为是认知了Q。或者更简洁地说：对Q的感觉认识任何与它相似并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其上的实在。假如它只是相似而不产生作用，那它就是一个梦；如果它只是作用于其上而不相似，那它就是一个错误。[3]　我担心，读者会认为这个公式微不足道，太显而易见，不必这般长篇大论地加以阐释，尤其当他认为该公式适用的情况仅仅是各种知觉，而对整个象征性或概念性的思维领域似乎无法做出解释。当实在是一种物质的东西或行为，或者是批评者的一种意识状态时，我一旦知觉到它，就可以将其反映到我的心智中，并可以作用于它——当然只是间接地作用于意识状态。但是，有许多种认知，如大家普遍公认地那样，它们既不反映也不作用于它们的实在。

3: Among such errors are those cases in which our feeling operates on a reality which it does partially resemble, and yet does not intend: as for instance, when I take up your umbrella, meaning to take my own. I cannot be said here either to know your umbrella, or my own, which latter my feeling more completely resembles. I am mistaking them both, misrepresenting their context, etc.

3:　这种错误包括下列情况，在其中我们的感觉作用于与它的确是部分类似却不是它意向的某个实在：比如，当我想拿自己的伞时，却错拿了你的伞。这里不能说我认识你的伞或我自己的伞——我的感觉更完全

地类似后者。我把它们俩都弄错了，错误地理解了它们的情境，等等。

We have spoken in the text as if the critic were necessarily one mind, and the feeling criticised another. But the criticised feeling and its critic may be earlier and later feelings of the same mind, and here it might seem that we could dispense with the notion of operating, to prove that critic and criticised are referring to and meaning to represent the SAME. We think we see our past feelings directly, and know what they refer to without appeal. At the worst, we can always fix the intention of our present feeling and MAKE it refer to the same reality to which any one of our past feelings may have referred. So we need no "operating" here, to make sure that the feeling and its critic mean the same real q. Well, all the better if this is so! We have covered the more complex and difficult case in our text, and we may let this easier one go. The main thing at present is to stick to practical psychology, and ignore metaphysical difficulties.

我们在文中谈论到批评者时好像他只能是一种心态，而被批评的感觉却是另一种。但是，被批评的感觉及其批判者可能是同一个心灵状态中先后产生的感觉，这里我们似乎不需要“作用”这一概念来证明批判者与

被批判者指称并意向于代表同一个东西。我们认为自己能直接看到过去的感觉，并且不用求证就知道它们意指什么。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也总能确定我们当下的感觉的意向，并且让它指我们任何一个过去的感觉所指的同一个实在。因此，我们在这里不需要“作用”这一概念来确保这种感觉及其批评者意指同一个实在的q。那么，要是这样的话一切就好办了！我们在本文中谈到一个更为复杂和困难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不理会这个简单的情况。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坚持实践性的心理学，而忽略形而上学的难题。

One more remark. Our formula contains, it will be observed, nothing to correspond to the great principle of cognition laid down by Professor Ferrier in his Institutes of Metaphysic and apparently adopted by all the followers of Fichte, the principle, namely, that for knowledge to be constituted there must be knowledge of the knowing mind along with whatever else is known: not q, as we have supposed, but Q plus myself, must be the least I can know. It is certain that the common sense of mankind never dreams of using any such principle when it tries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conscious states that are knowledge and conscious states that are not. So that Ferrier's principle, if it have any relevancy at all, must have relevancy to the metaphysical possibility of consciousness at large, and not to the practically recognized constitution of cognitive consciousness.

We may therefore pass it by without further notice here.

再多说一点。可以发现，我们的公式与费里尔教授描述的伟大认知原理毫无共同之处，他在《形而上学原理》中提出了这个原理，显然被费希特的所有追随者所采纳；这个原理是：要形成认识，必须有认识者以及被认识的其他事物：不是我们所假设的q，而是q加上我自己，才是我能认识的最起码的东西。毫无疑问，当人类的常识试图分辨成为认识的某些意识状态和没有成为认识的意识状态时，它从未想过使用这一原理。因此，如果说费里尔的原理有任何相关性的话，那么它一定是与意识在形而上学上的总体可能性有关，而不是与认知意识实际被公认的结构相关。我们因此可以忽略它，不必再进一步讨论它。

In the whole field of symbolic thought we are universally held both to intend, to speak of, and to reach conclusions about—to know in short—particular realities, without having in our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y mind-stuff that resembles them even in a remote degree. We are instructed about them by language which awakens no consciousness beyond its sound; and we know which realities they are by the faintest and most fragmentary glimpse of some remote context they may have and by no direct imagination of themselves. As minds may differ here, let me speak in the first person. I am sure that my own current thinking has words for its almost exclusive subjective material, words which are made intelligible by being referred to some reality that lies beyond the horizon of direct consciousness, and of which I am only aware as of

a terminal more existing in a certain direction, to which the words might lead but do not lead yet. The subject, or topic, of the words is usually something towards which I mentally seem to pitch them in a backward way, almost as I might jerk my thumb over my shoulder to point at something, without looking round, if I were only entirely sure that it was there. The upshot, or conclusion, of the words is something towards which I seem to incline my head forwards, as if giving assent to its existence, tho all my mind's eye catches sight of may be some tatter of an image connected with it, which tatter, however, if only endued with the feeling of familiarity and reality, makes me feel that the whole to which it belongs is rational and real, and fit to be let pass.

在整个象征思维领域，我们被普遍认为既可意指、谈论特殊的实在，也可以就这些实在得出结论——即认识它们，而在我们的主观意识里不必有任何哪怕是一丁点儿类似它们的心智材料。人们用语言向我们描述这些实在，可语言不能唤醒除其声音之外的任何意识；我们之所以认识到了它们是哪种实在，凭借的是向某个遥远的情境投去最模糊、最不完整的一瞥，而不是通过对它们的直接想象。因为人们对此可能有不同看法，我就以第一人称来表述吧。我肯定，我当前的思维能够用语言来表达其几乎独有的主观材料，这些语言能被理解是因为它们指的是直接意识范围之外的某个实在，而且，我只是认为到这些语言更像是存在于某个方向上的终点，词语可能引向却尚未引向的终点。这些语言的主题或话题通常是我在心理上似乎把话语背投向它的某个东西，就像我完全肯定某物在我背后，不必回头我就能用拇指在肩头上方迅速向后指向它一般。这些语言的要点或结论是我似乎点头示意的某个东西，就像是赞同它的存在一般，尽管我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只是与它相联的某个零碎的影象，然而，只要赋予这个零碎的影象熟悉的感觉和实在，它就让我觉得它所归属的整个事物就是合理而真实的，是可以被允许通过的。

Here then is cognitive consciousness on a large scale, and yet what it knows, it hardly resembles in the least degree. The formula last laid down for our thesis must therefore be made more complete. We may now express it thus: a percept knows whatever reality i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perates on and resembles; a conceptual feeling, or thought knows [2_6] a reality, whenever it actually or potentially terminates in a percept that operates on, or resembles that reality, or is otherwise connected with it or with its context. The latter percept may be either sensation or sensorial idea; and when I say the thought must terminate in such a percept, I mean that it must ultimately be capable of leading up thereto,—by the way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if the terminal feeling be a sensation; by the way of logical or habitual suggestion, if it be only an image in the mind.

这就是广义的认知意识，然而它与它所认识的客体却毫无相似之处。因此，上面提出的支持我们论点的公式必须加以完善。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表达我们的论点：知觉可以认识它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与之类似的实在；概念性感觉或思想，每当它实际上或潜在地终止于某个作用于或类似于那个实在的知觉时，或者仅与那个实在或其情境以其他方式相联系时，这个概念性感觉或思想就认识 [3_6] 了那个实在。后一种知觉可能是一种感觉或感觉性的观念；当我说思想必须终止于这种知觉时，我是指它最终必须能导向这种知觉——假定最终知觉是一种感觉的话，就能借由实际经验引导到那里；假如它只是心中的一个影像，就能通过逻辑的或习惯的提示引导到那里。

Let an illustration make this plainer. I open the first book I take up, and read the first sentence that meets my eye: “Newton saw the handiwork of God in the heavens as plainly as Paley in the animal kingdom. " I immediately look back and try to analyze the

subjective state in which I rapidly apprehended this sentence as I read it.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was an obvious feeling that the sentence was intelligible and rational and related to the world of realities. There was also a sense of agreement or harmony between “Newton”, “Paley”, and “God”. There was no apparent image connected with the words “heavens”, or “handiwork”, or “God”; they were words merely. With “animal kingdom” I think there was the faintest consciousness (it may possibly have been an image of the steps) of the Museum of Zoology in the town of Cambridge where I write. With “Paley” there was an equally faint consciousness of a small dark leather book; and with “Newton” a pretty distinct vision of the right-hand lower corner of curling periwig. This is all the mind-stuff I can discover in my first consciousness of the meaning of this sentence, and I am afraid that even not all of this would have been present had I come upon the sentence in a genuine reading of the book, and not picked it out for an experiment. And yet my consciousness was truly cognitive. The sentence is “about realities” which my psychological critic—for we must not forget him—acknowledges to be such, even as he acknowledges my distinct feeling that they ARE realities, and my acquiescence in the general rightness of what I read of them, to be true knowledge on my part.

举个例子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打开拿起的第一本书，映入眼帘的第一句话是：“牛顿清楚地看到了上帝在天空中的杰作，正如佩利同样清楚地看到了上帝在动物界中的杰作。”我立即回忆并试图分析我读这个句子并迅速理解它时的主观状态。首先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即这个句子是可理解的、合理的并且是与现实世界相联系的。在“牛顿”、“佩利”与“上帝”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一致或和谐的感觉。没有与“天空”或“杰作”或“上帝”相联系的外在形象；它们只是单纯的词。我想“动物界”令我极为模糊地意识到了我眼下所在的剑桥市的动

物学博物馆（也可能是模糊地想到了它的台阶）。“佩利”也让我同样模糊地意识到了一本深色皮面小册子；而“牛顿”则让我清楚地联想到了卷曲假发的右下角。这就是起初意识到这句话的意思时我能找到的全部心智材料，而且，假如我是在真正阅读这本书时遇到这个句子，而不是把它挑出来做实验，恐怕我未必能发现所有这些东西。然而，我的意识是真正认知性的。这句话是“有关实在的”，我的心理批评者——我们不能忘掉他——也会承认是这样的；他甚至承认，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它们就是实在，我也默认自己对它们的解读总体上是正确的，这些都是我获得的真知识。

Now what justifies my critic in being as lenient as this? This singularly inadequate consciousness of mine, made up of symbols that neither resemble nor affect the realities they stand for,—how can he be sure it is cognizant of the very realities he has himself in mind?

那么，我的批评者为何变得这般宽容了呢？我的这种特别不充分的意识由一些象征符号构成，这些符号既不类似于也不影响它们代表的实在——这样，我的批评者怎么能确定他自己心中的那些实在已经被认知了呢？

He is sure because in countless like cases he has seen such inadequate and symbolic thoughts, by developing themselves, terminate in percepts that practically modified and presumably resembled his own. By “developing” themselves is meant obeying their tendencies, following up the suggestions nascently present in them, working in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y seem to point, clearing up the penumbra, making distinct the halo, unravelling the fringe, which is part of their composition, and in the midst of which

their more substantive kernel of subjective content seems consciously to lie. Thus I may develop my thought in the Paley direction by procuring the brown leather volume and bringing the passages about the animal kingdom before the critic's eyes. I may satisfy him that the words mean for me just what they mean for him, by showing him in *concreto* the very animals and their arrangements, of which the pages treat. I may get Newton's works and portraits; or if I follow the line of suggestion of the wig, I may smother my critic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tters pertaining to Newton's environment, to show that the word “Newton” has the same locus and relations in both our minds. Finally I may, by act and word, persuade him that what I mean by God and the heavens and the analogy of the handiworks, is just what he means also.

他之所以确信，是因为在无数相似的情况下，他见过这种不充分的、象征性的思想通过自我发展而终止于知觉状态，这些知觉状态实际上会改变并被认为是大致类似于他自己的知觉状态。这里所谓自我“发展”指的是服从它们自身的倾向，遵从它们内生的暗示，朝着它们所指的方向发挥作用，清除阴影，突显光环，破解属于其构成部分的边缘模糊地带，挖掘出似乎故意隐藏其中的重要的主观核心内容。因此，我可以拿起那本褐色的皮封面书，把与动物界相关的内容展现在批评者眼前，这样我可以使自己的思想按照佩利的方向发展。我可以具体地向批评者展示书中涉及到的动物及其排列，这样就能让他相信这些词对我和他来讲意思都是一样的。我可以弄来牛顿的著作和肖像画；或者，如果我遵照假发的暗示，我可以用与牛顿的环境相关的一些17世纪的事情让我的批评者感到目不暇接，让他相信“牛顿”一词在我们两个人心中有着相同的位置与联系。最后，我可以通过行动和语言来说服他，让他相信我意指的上帝和天空以及杰作的类比也与他所认为的意思完全一样。

My demonstration in the last resort is to his senses. My thought makes me act on his senses much as he might himself act on them, were he pursu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 perception of his own. Practically then my thought terminates in his realities. He willingly supposes it, therefore, to be of them, and inwardly to resemble what his own thought would be, were it of the same symbolic sort as mine. And the pivot and fulcrum and support of his mental persuasion, is the sensible operation which my thought leads me, or may lead, to effect—the bringing of Paley's book, of Newton's portrait, etc., before his very eyes.

我最后的证明手段就是诉诸于他的感官。我的思想使我作用于他的感官，正如他若追求自己的某个知觉的效果，也会作用于自己的感官一样。这样，我的思想实际上终止于他的实在上。因此，如果他的思想与我的思想属于同一种象征符号，那么他会欣然假定我的思想是有关他的实在的，并在内心里认为我的思想与他自己的思想类似。他心中之所以产生这种信念，其枢轴、支柱、支点是我的思想引导或可能引导我所施加的合理作用，即把佩利的书或牛顿的肖像等等带到他的眼前。

In the last analysis, then, we believe that we all know and think about and talk about the same world, because WE BELIEVE OUR PERCEPTS ARE POSSESSED BY US IN COMMON. And we believe this because the percepts of each one of us seem to be changed in consequence of changes in the percepts of someone else. What I am for you is in the first instance a percept of your own. Unexpectedly, however, I open and show you a book, uttering certain sounds the while. These acts are also your percepts, but they so resemble acts of yours with feelings prompting them, that you cannot doubt I have the feelings too, or that the book is one book felt in both our

worlds. That it is felt in the same way, that my feelings of it resemble yours, is something of which we never can be sure, but which we assume as the simplest hypothesis that meets the case. As a matter of fact, we never are sure of it, and, as Erkenntnisstheoretiker, we can only say that of feelings that should not resemble each other, both could not know the same thing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ame way. [2_7] If each holds to its own percept as the reality, it is bound to say of the other percept, that, though it may intend that reality, and prove this by working change upon it, yet, if it does not resemble it, it is all false and wrong. [2_8]

因此，我们归根结底相信我们都认识、思考和谈论同一个世界，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共同拥有一些知觉。而且，我们之所以相信这些，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知觉似乎都随着其他人的知觉的变化而改变。我对你来说是什么，首先就是你自己的一种知觉。然而，我出乎意料地打开一本书给你看，同时发出一些声音。这些行为也是你的知觉，但是它们与感觉促成的你自己的行为十分类似，使你不怀疑我也有这种感觉，或者说，这本书就是我们两人的世界中都能感觉到的同一本书。它是否被以同样的方式感觉到，我对它的感觉与你的感觉是否相似，这是我们永远无法确定的事情，但是我们认为这是符合这种情况的最简单的假设。事实上，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这一点，并且作为认识论者我们只能说，两个彼此不应该相似的感觉不可能同时以同样的方式认识同一事物。 [3_7] 如果每个感觉都相信其知觉是实在，那么另一个知觉必然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尽管它可能想要意指那个实在，并且想通过改变实在来证明这一点，但是假如它不与实在相类似，它就完全是虚假和错误的。 [3_8]

If this be so of percepts, how much more so of higher modes of thought! Even in the sphere of sensation individuals are probably different enough.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implest conceptual

elements seems to show a wider divergence still. And when it comes to general theories and emotional attitudes towards life, it is indeed time to say with Thackeray, “My friend, two different universes walk about under your hat and undermine. "

假如知觉是这样，那么更为高级的思维方式就更是这样了！即使在感觉领域，个体之间可能也存在足够大的差别。对最简单的概念成分的比较研究似乎表明个体之间存在更大的差异。而且，当谈到一般理论和对生活的情绪态度时，的确就像萨克雷所说的那样：“我的朋友，在你我的头脑中运行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What can save us at all and prevent us from flying asunder into a chaos of mutually repellent solipsisms? Through what can our several minds commune? Through nothing but the mutual resemblance of those of our perceptual feelings which have this power of modifying one another, which are mere dumb knowledge-of-acquaintance, and which must also resemble their realities or not know them aright at all. In such pieces of knowledge-of-acquaintance all our knowledge-about must end, and carry a sense of this possible termination as part of its content. These percepts, these termini, these sensible things, these mere matters-of-acquaintance, are the only realities we ever directly know, and the whole history of our thought is the history of our substitution of one of them for another, and the reduction of the substitute to the status of a conceptual sign. Contemned though they be by some thinkers, these sensations are the mother-earth, the anchorage, the stable rock, the first and last limits, the *terminus a quo* and the *terminus ad quem* of the mind. To find such sensational termini should be our aim with all our higher thought. They end discussion; they destroy the false conceit of knowledge; and without them we

are all at sea with each other's meaning. If two men act alike on a percept, they believe themselves to feel alike about it; if not, they may suspect they know it in differing ways. We can never be sure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 till we are able to bring the matter to this test. [2_9] This is why metaphysical discussions are so much like fighting with the air; they have no practical issue of a sensational kind. “Scientific” theories, on the other hand, always terminate in definite percepts. You can deduce a possible sensation from your theory and, taking me into your laboratory, prove that your theory is true of my world by giving me the sensation then and there. Beautiful is the flight of conceptual reason through the upper air of truth. No wonder philosophers are dazzled by it still, and no wonder they look with some disdain at the low earth of feeling from which the goddess launched herself aloft. But woe to her if she return not home to its acquaintance; *Nirgends haften dann die unsicheren Sohlen* —every crazy wind will take her, and, like a fire-balloon at night, she will go out among the stars.

究竟什么可以挽救我们，阻止我们各自陷入相互排斥的唯我论的无序状态呢？多个人的心灵凭借什么来沟通呢？单纯凭借我们知觉性感觉之间的相似性，它们具有这种相互改变的能力，只不过是无声的熟识性的认识，而且它们必须与它们的实在相类似，否则就根本不能正确认识实在。我们所有的“关于的认识”必须终止于这种“熟识性认识”，并作为内容的一部分对这种可能的终止有所感觉。这些知觉状态，这些终点，这些可感觉的事物，这些仅仅是“熟识的事物”，它们是我们直接认识的唯一实在，而且，我们思想的整个历史就是用其中的一个来代替另一个，并将这种替代物归结为一个概念符号。尽管这些知觉可能为某些思想者所蔑视，但它们是心灵起源的地方，是停留的居所，是坚固的磐石，是最初和最后的界限，是起点也是终点。找到感觉的这些终点目标，应该是我们全部高级思维的目的。它们能终止争论；它们能破除知识的虚妄；没有它们，我们对彼此的意义就陷

入茫然。如果两个人以同样方式作用于一个知觉，他们相信自己对它有着类似的感觉；如若不然，他们会怀疑自己是以不同的方式认识这个知觉的。在我们没有能力对事物进行这种检验之前，我们根本无法确认我们理解了彼此。[3_9] 这就是为什么形而上学的讨论很像是无的放矢；它们没有可感觉的实际论题。另一方面，“科学”理论总是止于确定的知觉状态。你可以从你的理论中推导出一个可能的感觉，并把我带到你的实验室，通过在彼时彼地给予我这一感觉，证明你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我的世界。让概念性的推理掠过真理的上空，就能产生一幅美丽的景象。难怪哲学家仍然被它弄得眼花缭乱，也难怪他们用不屑一顾的神情看待这些低层的感觉，可这些感觉正是女神升天的出发点。但是，如果她不再回到对这种感觉的熟识中，那将是很悲哀的；她在任何地方都站不稳脚步——随便一阵狂风都能把她掠走，就像是夜空中的热气球一般消失在群星当中。

Note.—The reader will easily see how much of the account of the truth-function developed later in Pragmatism was already explicit in this earlier article, and how much came to be defined later. In this earlier article we find distinctly asserted:—

注释：读者将会很容易地看到，后来在《实用主义》一书中形成的对真理作用的说明，有多少已经明确地出现在这篇早期论文中，又有多少是后来才被阐明的。在这篇早期的文章中，我们明确地提出：

1．The reality, external to the true idea;

1．实在：它是存在于真的观念之外的；

2．The critic, reader, or epistemologist, with his own belief, as warrant for this reality's existence;

2．批评者、读者或认识论学者及其信念：他们是实在存在的凭证；

3．The experienceable environment, as the vehicle or medium connecting knower with known, and yielding the cognitive relation;

3．可经验的环境：它是联接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的工具或媒介，同时产生认知性的联系；

4．The notion of pointing, through this medium, to the reality, as one condition of our being said to know it;

4．指向的概念：即通过这种中介指向实在，这是我们所谓认识该实在的一个条件；

5．That of resembling it, and eventually affecting it, as determining the pointing to it and not to something else.

5．类似实在并最终影响实在的概念：决定了指向的是该现实而非其他什么东西。

6．The elimination of the “epistemological gulf”, so that the whole truth-relation falls inside of the continuities of concrete experience, and is constituted of particular processes, varying with every object and subject, and susceptible of being described in detail.

6．消除“认知论的鸿沟”：这样，整个真理关系就落入具体经验的连续中，并且是由特定的过程所构成，这些过程随着每个客体和主体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可以加以具体描述。

The defects in this earlier account are:—

这些早期的论断也有如下缺陷：

1．The possibly undue prominence given to resembling, which altho a fundamental function in knowing truly, is so often dispensed with;

1．可能过度地强调类似：尽管类似在真正认识上起着基本作用，但它往往不是必需的；

2．The undue emphasis laid upon operating on the object itself, which in many cases is indeed decisive of that being what we refer to, but which is often lacking, or replaced by operations on other things related to the object.

2．过分强调对客体本身的作用：这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决定了我们所指向的客体，但它常常是缺乏作用，或者被对其他与该客体相联系的事物的作用所取代。

3．The imperfect development of the generalized notion of the workability of the feeling or idea as equivalent to that satisfactory adaptation to the particular reality, which constitutes the truth of the idea. It is this more generalized notion, as covering all such specifications as pointing, fitting, operating or resembling, that distinguishes the developed view of Dewey, Schiller, and myself.

3．感觉或观念的适用性这一总体概念的形成存在缺陷：其不完备性在于它被等同于对特定实在的良好适应，这种适应构成了观念的真理性。这一总体概念涵盖了指向、适合、作用、类似等一切具体概念，把杜威、席勒和我本人的成熟观点区分开来。

4．The treatment, on page 39, of percepts as the only realm of reality. I now treat concepts as a co-ordinate realm.

4．在原文第39页，我把知觉当作实在的唯一领域。我现在把概念当作一个并列的领域。

The next paper represents a somewhat broader grasp of the topic on the writer's part.

下一篇文章体现了作者对该主题更为全面的掌握。

[2_1].Read before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December 1, 1884, and first published in Mind, vol. x (1885). —This, and the following articles have received a very slight verbal revision, consisting mostly in the omission of redundancy.

[2_2]."The Relativity of Knowledge", held in this sense, is, it may be observed in passing, one of the oddest of philosophic superstitions. Whatever facts may be cited in its favor are due to the properties of nerve-tissue, which may be exhausted by too prolonged an excitement. Patients with neuralgias that last unremittingly for days can, however, assure us that the limits of this nerve-law are pretty widely drawn. But if we physically could get a feeling that should last eternally unchanged, what atom of logical or psychological argument is there to prove that it would not be felt as long as it lasted, and felt for just what it is, all that time? The reason for the opposite prejudice seems to be our reluctance to think that so stupid a thing as such a feeling would necessarily be, should be allowed to fill eternity with its presence. An interminable acquaintance, leading to no knowledge-about,—such would be its condition.

[2_3].See, for example, Green's Introduction to Hume's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 36.

[2_4].If A enters and B exclaims, "Didn't you see my brother on the stairs?" we all hold that A may answer, "I saw him, but didn't know he was your brother"; ignorance of brotherhood not abolishing power to see. But those who, on account of the unrelatedness of the first facts with which we become acquainted, deny them to be "known" to us, ought in consistency to maintain that if A did not perceiv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man on the stairs to B, it was impossible he should have noticed him at all.

[2_5].It seems odd to call so important a function accidental, but I do not see how we can mend the matter. Just as, if we start with the reality and ask how it may come to be known, we can only reply by invoking a feeling which shall reconstruct it in its own more private fashion; so, if we start with the feeling and ask how it may come to know, we can only reply by invoking a reality which shall reconstruct it in its own more public fashion. In either case, however, the datum we start with remains just what it was. One may easily get lost in verbal mysteries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quality of feeling and feeling of quality, between receiv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knowledge of a reality. But at the end we must confess that the notion of real cognition involves an unmediated dualism of the knower and the known. See Bowne's Metaphysics, New York, 1882, pp. 403–412, and various passages in Lotze, e.g., Logic, Sec. 308. ("Unmediated" is a bad word to have used.—

1909.)

[2_6].Is an incomplete "thought about" that reality is its "topic", etc.

[2_7].Though both might terminate in the same thing and be incomplete thoughts "about" it.

[2_8].The difference between Idealism and Realism is immaterial here. What is said in the text is consistent with either theory. A law by which my percept shall change yours directly is no more mysterious than a law by which it shall first change a physical reality, and then the reality change yours. In either case you and I seem knit into a continuous world, and not to form a pair of solipsisms.

[2_9]."There is no distinction of meaning so fine as to consist in anything but a possible difference of practice. It appears, then, that the rule for attaining the (highest) grade of clearness of apprehension is as follows: Consider what effects, which might conceivably have practical bearings, we conceive the object of our conception to have. Then, our conception of these effects is the whole of our conception of the object." Charles S. Peirce: "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in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New York, January, 1878, p. 293.

[3_1].本文在1884年12月1日宣读于亚里士多德学会，首次刊登在《心灵》，第10卷（1885年）。本文以及随后的文章在措辞上被略作修改，主要删去了冗余文字。

[3_2].不妨顺便说一句，在此意义上的所谓“认识的相对性”是最古怪的一种哲学迷信。无论援引什么样的事实来支持它，均归因于神经组织的特性，而神经组织可能因兴奋过久而衰竭。然而，神经痛持续发作多日的病人的状况却告诉我们，这个神经定律的限度被拉得相当宽。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肉体上获得一种恒久不变的感觉，可有一鳞半爪的逻辑上的或心理学方面的论据，证明它并非持续多久就被感觉多久，并始终是最初的感觉？产生相反偏见的原因似乎是我们不愿认为：像感觉这样一个必然是非常愚蠢的东西，竟然能被允许用自己的存在去填补永恒。它永远是一种熟知，不可能导向“关于的认识”——这就是感觉所处的状态。

[3_3].比如格林的休谟《人性论》导论，第36页。

[3_4].如果甲进屋后乙大声问道，“你没在楼梯上看见我兄弟吗？”我们都认为甲可能回答，“我见到他了，但我不知道他是你兄弟”；对兄弟关系的无知不妨碍他的视力。但是，有些人因为我们熟识的最初事实之间没有联系，从而否认它们为我们所“认识”，那么，这些人就应该相应地认为：如果甲不知道楼梯上的人与乙的关系，甲就根本不可能注意到那个人。

[3_5].将如此重要的作用称作是偶然的似乎有些奇怪，可我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补救办法。就像如果我们从实在出发，问它是如何被认识的，我们只能回答说通过引起一种感觉，该感觉能以更加私密的方式重建这个实在；同样地，如果我们从这个感觉开始，问它是如何认识的，我们只能回答说通过唤起一个实在，该实在能以自己更公开的方式重建此感觉。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开始时用的事物都是一样的。是感觉的性质还是对性质的感觉，是接受还是重建对某个实在的认识，人可能会会因为字面上的难以理解而对他们的区别感到困惑。但是，我们最终必须承认，真正的认知这一概念涉及由认识者与被认识者构成的一个无中介的二元结构。详见鲍恩的《形而上学》（纽约，1882年，第403-412页）；另见洛采的各种著述，如他的《逻辑学纲要》，第308节。（“无中介的”一词用得很不恰当。——1909年注。）

[3_6].是“有关”那个实在的不完全的“想法”，那个实在是其“话题”等等。

[3_7].尽管二者可能都终止于同一事物并且是“有关”该事物的不完全的想法。

[3_8].这里，唯心论与唯实论之间的区别无关紧要，本文所谈论的内容与这两个理论都是一致的。我的知觉直接将改变你的知觉，或者我的知觉将先改变物理的实在，然后这个实在再改变你的知觉，这两种情况所依据的法则都不是神秘的。在两种情况下，你和我似乎都交织到了一个连续的世界中，而不是形成各自唯我的世界。

[3_9].“意义的细微差别不能存在于任何地方，只能体现于实践上可能存在的差别……因此，要取得（最高）清楚程度的理解，就要遵从以下原则：必须考虑我们想要我们的认识客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可以被认为具有实践意义。那么，我们对这些影响的认识，就是我们对这个客体的完整认识。”引自查尔斯·皮尔士“如何使我们的观念变得清晰”《大众科学月刊》，纽约，1878年1月，第293页。

Chapter II The Tigers in India

第二章　印度老虎

There are two ways of knowing things, knowing them immediately or intuitively, and knowing them conceptually or representatively. Altho such things as the white paper before our eyes can be known intuitively, most of the things we know, the tigers now in India, for example, or the scholastic system of philosophy, are known only representatively or symbolically. [3_1]

认识事物有两种途径：直接地或直观地认识，和概念地或表征地认识。虽然诸如眼前的白纸之类的东西可以直观地加以认识，但是大多数我们知道的事物，比如此刻在印度的老虎或经院哲学体系，却只能通过表征的或象征的方式认识。 [4_1]

Suppose, to fix our ideas, that we take first a case of conceptual knowledge; and let it be our knowledge of the tigers in India, as we sit here. Exactly what do we mean by saying that we here know the tigers? What is the precise fact that the cognition so confidently claimed is known-as, to use Shadworth Hodgson's inelegant but valuable form of words?

为了讲明白点，不妨先举一个概念性认识的例子；权且以我们坐在这里对印度老虎的认识为例。当我们说自己知道那里的老虎时，我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此自信地称为“认知”的，不过是“被以为是”，沙德沃思·霍奇森用的这个词有些累赘，但却是一种颇有价值的

措辞。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事态呢？

Most men would answer that what we mean by knowing the tigers is having them, however absent in body, become in some way present to our thought; or that our knowledge of them is known as presence of our thought to them. A great mystery is usually made of this peculiar presence in absence; and the scholastic philosophy, which is only common sense grown pedantic, would explain it as a peculiar kind of existence, called intentional existence of the tigers in our mind. At the very least, people would say that what we mean by knowing the tigers is mentally pointing towards them as we sit here.

多数人会回答说，我们所谓认识老虎是指虽然它们在形体上缺席，我们却能使它们以某种方式呈现于我们的思想中；或者说，我们对它们的认知表现为我们对它们产生了思想。这种形体上缺席，却以特殊方式参与思想的情况，经常会被赋予神秘性；善于将常识转化为深奥学问的经院哲学，会把它解释成一种特殊存在，称之为老虎在我们心智中的意向性存在。起码可以说，所谓我们认识这些老虎，是指我们坐在这里但在思想上指向它们。

But now what do we mean by pointing, in such a case as this? What is the pointing known-as, here?

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谓指向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指向为人所知作什么呢？

To this question I shall have to give a very prosaic answer—one that traverses the prepossessions not only of common sense and scholasticism, but also those of nearly all the epistemological writers whom I have ever read. The answer, made brief, is this: The pointing of our thought to the tigers is known simply and solely as a procession of mental associates and motor consequences that follow on the thought, and that would lead harmoniously, if followed out, into some ideal or real context, or even into the immediate presence, of the tigers. It is known as our rejection of a jaguar, if that beast were shown us as a tiger; as our assent to a genuine tiger if so shown. It is known as our ability to utter all sorts of propositions which don't contradict other propositions that are true of the real tigers. It is even known, if we take the tigers very seriously, as actions of ours which may terminate in directly intuited tigers, as they would if we took a voyage to India for the purpose of tiger-hunting and brought back a lot of skins of the striped rascals which we had laid low. In all this there is no self-transcendency in our mental images taken by themselves. They are one phenomenal fact; the tigers are another; and their pointing to the tigers is a perfectly commonplace intra-experiential relation, if you once grant a connecting world to be there. In short, the ideas and the tigers are in themselves as loose and separate, to use Hume's language, as any two things can be; and pointing means here an operation as external and adventitious as any that nature yields. [3_2]

对此问题我只能给出一个平淡无奇的答案，这个答案不仅与常识和经院哲学的先入观念相对立，而且与我读过的几乎所有认识论哲学家的先入之见相对立。简言之，我的答案如下：所谓思想上指向老虎，可被单纯地看作是一系列心智上的联想以及紧随思想所产生的运动神经结果；并且，如果将这些联想和结果追踪到底，它们将和谐地

将我们引入有关老虎的某种理想的或现实的情境中去，甚至使老虎即刻呈现出来。如果有人用美洲虎冒充印度虎蒙混我们，这种思想的指向就表现为对美洲虎的否定；如果一只真正的印度虎展现在我们面前，它则表现为对印度虎的肯定。这种指向可以表现为我们的一种能力，使我们能说出各种不与有关真印度虎的命题相悖的命题。如果我们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些印度虎的话，这种指向甚至可以表现为我们的行动，这些行动最终导向被直接感知到的老虎，比如我们航行到印度去猎杀老虎，然后带回许多张带斑纹的老虎皮。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我们的心智形象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自我超越。它们是同一个现象事实，而各种老虎是另一个现象事实；如果你曾经承认过世界普遍联系，那么这些形象指向老虎就是一种绝对平常的经验内关系。简言之，用休谟的话来说，观念与虎像其他任何两个事物一样是绝然分开的；这里所谓的指向，同任何自然所带来的运转一样，具有其外在性和偶然性。 [4_2]

I hope you may agree with me now that in representative knowledge there is no special inner mystery, but only an outer chain of physical or mental intermediaries connecting thought and thing. To know an object is here to lead to it through a context which the world supplies. All this was most instructively set forth by our colleague D. S. Miller at our meeting in New York last Christmas, and for re-confirming my sometime wavering opinion, I owe him this acknowledgment. [3_3]

我希望你们现在会同意我的观点，在表征性知识内部并不神秘，不过是有一连串外部的物质或心理中介物在联系思想和事物。这里所谓的认识一个客体就是通过世界所提供的某个情境，引导到客体那里。去年圣诞节在纽约我遇到了同事D. S. 米勒，他极有启发性的提出了上述观点，坚定了我曾一度动摇的观点，我应该向他表示感谢。 [4_3]

Let us next pass on to the case of immediate or intuitive acquaintance with an object, and let the object be the white paper before our eyes. The thought-stuff and the thing-stuff are here indistinguishably the same in nature, as we saw a moment since, and there is no context of intermediaries or associates to stand between and separate the thought and thing. There is no “presence in absence” here, and no “pointing”, but rather an allround embracing of the paper by the thought; and it is clear that the knowing cannot now be explained exactly as it was when the tigers were its object. Dotted all through our experience are states of immediate acquaintance just like this. Somewhere our belief always does rest on ultimate data like the whiteness, smoothness, or squareness of this paper. Whether such qualities be truly ultimate aspects of being, or only provisional suppositions of ours, held-to till we get better informed, is quite immaterial for our present inquiry. So long as it is believed in, we see our object face to face. What now do we mean by “knowing” such a sort of object as this? For this is also the way in which we should know the tiger if our conceptual idea of him were to terminate by having led us to his lair?

下面再谈一下如何直接或直观地熟识一个客体，我们以眼前的白纸这个客体为例。正如我们刚刚所见，这里的思想材料与事物材料本质上相同，难以分辨，而且，也没有任何中介物或联想物的情境居于二者之间将思想和事物分开。这里既不存在“缺席的参与”，也不存在“指向”，只存在思想对白纸全方位的包裹。显然，这里的认识不能完全像以虎为客体时那样来解释。我们的经验中充满了此类直接熟识的各种状态。在某处，我们的信念确实总是基于一些终极信息，比如这张纸的洁白、平滑、方正之类。至于这些属性是否是真正的终极存在，还是仅仅是我们在了解更多情况之前所坚信的临时假设，这对我

们目前的探究无关紧要。只要我们相信这个客体，我们就直接面对它。这里我们所谓“认识”这类客体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我们对印度虎的概念性认识能最终把我们引到虎穴面前的话，这不也是我们认识印度虎的方式吗？

This address must not become too long, so I must give my answer in the fewest words. And let me first say this: So far as the white paper or other ultimate datum of our experience is considered to enter also into some one else's experience, and we, in knowing it, are held to know it there as well as here; so far, again, as it is considered to be a mere mask for hidden molecules that other now impossible experiences of our own might some day lay bare to view; so far it is a case of tigers in India again—the things known being absent experiences, the knowing can only consist in passing smoothly towards them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context that the world supplies. But if our own private vision of the paper be considered in abstraction from every other event, as if it constituted by itself the universe (and it might perfectly well do so, for aught we can understand to the contrary), then the paper seen and the seeing of it are only two names for one indivisible fact which, properly named, is the datum, the phenomenon, or the experience. The paper is in the mind and the mind is around the paper, because paper and mind are only two names that are given later to the one experience, when, taken in a larger world of which it forms a part, its connections are trac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1] In any case, however, it is the same stuff figures in all the sets of lines.

这次讲话不能太长，因此我只能给出尽量简洁的回答。首先我必须说：如果白纸或者我们经验中的其他终极信息也被认为进入了他人的经验中，而且一旦认识了白纸，我们被认为是在彼地和在此地都认

识它；再假如，白纸只被看作是隐藏的分子的面具，这些分子将来或许被现在看来不可能的其他经验揭示出来；如果它与印度老虎的例子如出一辙；那么，被认识的事物是缺席的经验，认识的过程只能是通过世界提供的中介情境平稳地向这些事物过渡。但是，如果把我们看到白纸这件事从所有其他事中抽象出来加以考虑，就好像是白纸自身构成了整个宇宙（它完全可能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相反的情况），那么，所见的白纸与看见白纸的过程就只不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事实的两个名称，该事实的适当称谓是信息、现象或经验。纸存在于人的思想中，而人的思想也围绕包纸进行，因为当把这经验放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它是其中一部分，从不同的方向考察它的联系时，纸和思想只是后来给同一经验赋予的两个名称。[1]

1: What is meant by this is that "the experience" can be referred to either of two great associative systems, that of the experiencer's mental history, or that of the experienced facts of the world. Of both of these systems it forms part, and may be regarded, indeed, as one of their points of intersection. One might let a vertical line stand for the mental history; but the same object, O, appears also in the mental history of different persons, represented by the other vertical lines. It thus ceases to be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one experience, and becomes, so to speak, a shared or public thing. We can track its outer history in this way, and represent it by the horizontal line. (It is also known representatively at other points of the vertical lines, or intuitively there again, so that the line of its outer history would have to be looped and

wandering, but I make it straight for simplicity's sake.) In any case, however, it is the same stuff figures in all the sets of lines.

1: 这指的是，“经验”可以指两大联想系统，一是经验者的心智历史系统，二是世界上被经历的事实系统。在这两个系统里，它都是组成部分，事实上，它可以被看作是二者的交叉点之一。我们可以用一条纵线表示心智历史；但是同一客体O也出现在不同人的心智历史中，这用其他纵线来表示。这样，该客体就不只为一个经验所私有，而成为一个共有或公有的东西。我们可以这样追踪其外部历史，并用横线表示。（它也在纵线的其他点上被表征地认识或再次被直观地认识，这样，表示其外部历史的线应该不得不是迂回曲折的，但为了简单起见，我用直线表示。）但无论如何，线的所有组合中出现的都是同一种图形。

To know immediately, then, or intuitively, is for mental content and object to be identical. This is a very different definition from that which we gave of representative knowledge; but neither definition involves those mysterious notions of self-transcendency and presence in absence which are such essential parts of the ideas of knowledge, both of philosophers and of common men. [3_4]

因此，直接地或直观地认识某物，就是让心智内容与客体合一。这个定义与我们给表征的认识下的定义差别很大，但二者都不牵涉自我超越和缺席上的在场之类的神秘观念，而这些观念构成了哲学家和常人的知识观念中一个重要部分 [4_4] 。

[3_1].Extracts from a presidential address before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ublished in the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ii, p. 105 (1895).

[3_2].A stone in one field may "fit", we say, a hole in another field. But the relation of "fitting", so long as no one carries the stone to the hole and drops it in, is only one name for the fact that such an act MAY happen. Similarly with the knowing of the tigers here and now. It is only an anticipatory name for a further associative and terminative process that MAY occur.

[3_3].See Dr. Miller's articles on Truth and Error, and on Content and Function,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July, 1893, and Nov., 1895.

[3_4].The reader will observe that the text is writte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NA? F realism or common sense, and avoids raising the idealistic controversy.

[4_1].本文节选自作者对美国心理学会所做的一篇主席报告，刊载于《心理学评论》，1895年，第2卷，第105页。

[4_2].我们说，某块田里的一块石头可能“适合”另一块田里的一个洞穴。但是，只要没有人把石头携往那个洞穴并放入其中，这里所谓的“适合”关系只是一个名称，来描述这种行为可能发生这一事实。这同我们这里所说的认识老虎是一个道理。它只是对随后可能发生的关联过程和终止过程的一种预期称谓。

[4_3].参见米勒博士讨论真理与谬误以及内容与功能的文章，载于《哲学评论》1893年7月和1895年11月两期。

[4_4].读者可以看出，本文是从朴素的实在论或常识的角度写的，并避免引起唯心主义的争论。

Chapter III Humanism and Truth

第三章　人道主义与真理

Receiving from the Editor of Mind an advance proof of Mr. Bradley's article on “Truth and Practice”, I understand this as a hint to me to join in the controversy over “Pragmatism” which seems to have seriously begun. As my name has been coupled with the movement, I deem it wise to take the hint, the more so as in some quarters greater credit has been given me than I deserve, and probably undeserved discredit in other quarters falls also to my lot. [4_1]

我收到一份来自《心灵》杂志编辑给布拉德利先生论“真理与实践”一文的校样，我认为这是暗示我加入有关“实用主义”的论战，这场论战似乎已经严肃地开始了。既然我的名字已经跟这场运动联系在了一起，我想接受这个暗示是明智的，再加上，在某些地方我得到了不应该得到的过多的褒奖，而在另一些地方不应有的非议也降临到我的头上。 [5_1]

First, as to the word “pragmatism”, I myself have only used the term to indicate a method of carrying on abstract discussion. The serious meaning of a concept, says Mr. Peirce, lies in the concrete difference to some one which its being true will make. Strive to bring all debated conceptions to that “pragmatic” test, and you will escape vain wrangling: if it can make no practical difference which of two statements be true, then they are really one statement in two verbal forms; if it can make no practical difference whether a given statement be true or false, then the statement has no real meaning.

In neither case is there anything fit to quarrel about: we may save our breath, and pass to more important things.

首先，关于“实用主义”这个词。我个人只是用这个术语来表示一种进行抽象讨论的方法。皮尔士先生说，一个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若为真，能对某人产生具体影响。如果你尽力让全部有争论的观念都接受“实用主义的”检验，就能避免徒劳的口角：如果两个陈述无论哪个是真，都没有实际差别，那么它们实际上就是用两种语言形式表达的同一个陈述；如果不论某个陈述是真是假，都没有实际差别，那么这个陈述就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两种情况中都没有任何适宜争论的东西：我们可以省点儿力气，转而关注更重要的事。

All that the pragmatic method implies, then, is that truths should have practical [4_2] consequences. In England the word has been used more broadly still, to cover the notion that the truth of any statement consists in the consequence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ir being good consequences. Here we get beyond affairs of method altogether; and since my pragmatism and this wider pragmatism are so different, and both are important enough to have different names, I think that Mr. Schiller's proposal to call the wider pragmatism by the name of “humanism” is excellent and ought to be adopted. The narrower pragmatism may still be spoken of as the “pragmatic method”.

那么，实用主义方法的全部含义，就是真理应该具有实际的 [5_2] 效果。在英国，这个词的使用范围更广，包括下述看法：任何陈述的真理都在于其效果上，尤其是好的效果。这里，我们完全超越了方法；既然我的实用主义与这种广义的实用主义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别，二者都很重要，因此应该分别命名。席勒先生建议将广义的实用

主义称为“人道主义”，对此我认为妙不可言，应该予以采纳。更狭义的实用主义仍可以被叫做“实用主义方法”。

I have read in the past six months many hostile reviews of Schiller's and Dewey's publications; but with the exception of Mr. Bradley's elaborate indictment, they are out of reach where I write, and I have largely forgotten them. I think that a free discussion of the subject on my part would in any case be more useful than a polemic attempt at rebutting these criticisms in detail. Mr. Bradley in particular can be taken care of by Mr. Schiller. He repeatedly confesses himself unable to comprehend Schiller's views, he evidently has not sought to do so sympathetically, and I deeply regret to say that his laborious article throws, for my mind, absolutely no useful light upon the subject. It seems to me on the whole an *ignoratio elenchi* , and I feel free to disregard it altogether.

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我看了对席勒与杜威著作的许多负面评论；然而，除了布拉德利先生煞费苦心的指控之外，其余的现在都不在手边，而且大部分我都忘记了。我认为，我个人对这一话题进行自由探讨，比拿出一副论战的架势一一驳斥这些批评，无论如何会更为有效。尤其是布拉德利先生的批评，可以由席勒先生来应对。他反复申明自己不能理解席勒先生的观点，他显然没有试图以赞同的态度去理解，而且我深为遗憾地说，他苦心撰写的文章在我们看来绝对没有对这个话题做出任何有用的阐释。那在我看来总体上是文不对题，我自以为可以完全不予理会。

The subject is unquestionably difficult. Messrs. Dewey's and Schiller's thought is eminently an induction, a generalization working itself free from all sorts of entangling particulars. If true, it

involves much restatement of traditional notions. This is a kind of intellectual product that never attains a classic form of expression when first promulgated. The critic ought therefore not to be too sharp and logic-chopping in his dealings with it, but should weigh it as a whole, and especially weigh it against its possible alternatives. One should also try to apply it first to one instance, and then to another to see how it will work. It seems to me that it is emphatically not a case for instant execution, by conviction of intrinsic absurdity or of self-contradiction, or by caricature of what it would look like if reduced to skeleton shape. Humanism is in fact much more like one of those secular changes that come upon public opinion overnight, as it were, borne upon tides “too deep for sound or foam”, that survive all the crudities and extravagances of their advocates, that you can pin to no one absolutely essential statement, nor kill by any one decisive stab.

这个话题毫无疑问很难。杜威和席勒先生的思想明显是一种归纳，是摆脱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特殊细节而独立发挥适用性的概括。如果它是真的，它涉及对传统观念的很多重述。这是一种理智上的成果，它在首次提出时难以获得经典的表达形式。因此，批评者在应对它时不应该过于苛刻或断章取义，而应该全面考量它，尤其应该对照其他可能的观念加以考量。而且，我们应该试着先把它应用到一个实例上，然后再应有到另一个上，看一看它如何发挥作用。在我看来，我们显然不应该妄断其内在的荒谬性或自相矛盾，或将其肢解化简后讽刺其状貌，并立即给它判刑。人道主义实则更像是一场夜间发生在公共舆论上些世俗变革，它们从“由于太深而没有任何声响与泡沫”的浪潮中生成，能够超越其倡导者的粗鄙与浮夸而得以生存，它们不能被固定于任何绝对的基本陈述，也无法被一击必杀。

Such have been the changes from aristocracy to democracy,

from classic to romantic taste, from theistic to pantheistic feeling, from static to evolutionary ways of understanding life—changes of which we all have been spectators. Scholasticism still opposes to such changes the method of confutation by single decisive reasons, showing that the new view involves self-contradiction, or traverses som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is is like stopping a river by planting a stick in the middle of its bed. Round your obstacle flows the water and "gets there all the same". In reading some of our opponents, I am not a little reminded of those catholic writers who refute darwinism by telling us that higher species cannot come from lower because minus *nequit gignere* plus, or that the notion of transformation is absurd, for it implies that species tend to their own destruction, and that would violate the principle that every reality tends to persevere in its own shape. The point of view is too myopic, too tight and close to take in the inductive argument. Wide generalizations in science always meet with these summary refutations in their early days; but they outlive them, and the refutations then sound oddly antiquated and scholastic. I cannot help suspecting that the humanistic theory is going through this kind of would-be refutation at present.

这是从贵族体制向民主体制，从古典主义的品味向浪漫主义的品味，从有神论的情感向泛神论的情感，从对生命的静态理解向进化式理解的变革——对于这些变革我们都有目共睹。经院哲学仍然在抵制这些变革，他们用单一决定性的理由作为驳斥方法，试图说明新的观点涉及自相矛盾，违背了一些基本原则。这就像在河床中央插根桩子来阻挡水的流动一般。水流绕过你的障碍物，"义无反顾地流向目的地"。在阅读某些反对者的观点时，我经常想起那些信奉天主教的作者，他们驳斥达尔文的学说，告诉我们说高级物种不可能来自低级物种，因为少不能生多，或者说物种演化的观点是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物种有自我毁灭的倾向，同时这违背了每一种实在都倾向于维持其

原有形状的原则。这种观点过于短视，也过于固步自封而不能接受归纳式论证。科学中广泛的概括在其早期总会遭到这些草率的反驳；然而它们能经得住反驳，而那些反驳意见届时也会听起来奇怪而迂腐过时。我不禁怀疑人道主义理论眼下正在经受的也是这种所谓的驳斥过程。

The one condition of understanding humanism is to become inductive-minded oneself, to drop rigorous definitions, and follow lines of least resistance “on the whole”. “In other words”, an opponent might say, “resolve your intellect into a kind of slush.” “Even so”, I make reply, —“if you will consent to use no politer word.” For humanism, conceiving the more “true” as the more “satisfactory” (Dewey's term), has sincerely to renounce rectilinear arguments and ancient ideals of rigor and finality. It is in just this temper of renunciation, s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pyrrhonistic scepticism, that the spirit of humanism essentially consists. Satisfactoriness has to be measured by a multitude of standards, of which some, for aught we know, may fail in any given case; and what is more satisfactory than any alternative in sight, may to the end be a sum of pluses and minuses, concerning which we can only trust that by ulterior corrections and improvements a maximum of the one and a minimum of the other may some day be approached. It means a real change of heart, a break with absolutistic hopes, when one takes up this inductive view of the conditions of belief.

理解人道主义的唯一条件，是使自己转向归纳思维，放弃僵死的定义，并“在总体上”遵循最少抵制的原则。一位反对者可能说，“你的意思是说，把理智化解成一团烂泥。”我的回答是，“即便如此，——如果你不反对用这个不够礼貌的词的话。”对人道主义来说，把更“真”看作是更“满意”（杜威语），就要切实放弃直线型的论证以及

过去重视严谨和终结的理想。正是这种乐于放弃的态度，与皮浪式的绝对怀疑论形成鲜明对比，从根本上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满意度必须由多重标准来衡量，其中一些标准就我们所知可能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得不到满足；所谓一个东西比其他能看得到的东西更让人满意，到头来可能是一些加和减的总和，对此我们只能相信，经过日后的修正和完善，某天能达到最大量的“加”和最少量的“减”。当我们用这种归纳的视角来看待信念的条件时，就意味着真正地改变了内心的想法，与绝对主义的视角实现了决裂。

As I understand the pragmatist way of seeing things, it owes its being to the break-down which the last fifty years have brought about in the older notions of scientific truth. “God geometrizes”, it used to be said; and it was believed that Euclid's elements literally reproduced his geometrizing. There is an eternal and unchangeable “reason”; and its voice was supposed to reverberate in Barbara and Celarent. So also of the “laws of nature”, physical and chemical, so of natural history classifications—all were supposed to be exact and exclusive duplicates of pre-human archetypes buried in the structure of things, to which the spark of divinity hidden in our intellect enables us to penetrate. The anatomy of the world is logical, and its logic is that of a university professor, it was thought. Up to about 1850 almost every one believed that sciences expressed truths that were exact copies of a definite code of non-human realities. But the enormously rapid multiplication of theories in these latter days has well-nigh upset the notion of any one of them being a more literally objective kind of thing than another. There are so many geometries, so many logics, so many physical and chemical hypotheses, so many classifications, each one of them good for so much and yet not good for everything, that the notion that even the truest formula may be a human device and not a literal transcript has dawned upon us. We hear scientific laws now

treated as so much “conceptual shorthand”, true so far as they are useful but no farther. Our mind has become tolerant of symbol instead of reproduction, of approximation instead of exactness, of plasticity instead of rigor. “Energetics”, measuring the bare face of sensible phenomena so as to describe in a single formula all their changes of “level”, is the last word of this scientific humanism, which indeed leaves queries enough outstanding as to the reason for so curious a congruence between the world and the mind, but which at any rate makes our whole notion of scientific truth more flexible and genial than it used to be.

我所理解的实用主义者看待事物的方式，其存在得益于过去五十年来人们对科学真理所持的旧观念的瓦解。过去人们常说“上帝将一切几何化”；人们相信，欧几里得原理忠实地复制了上帝的这种几何化。存在着一种永恒不变的“理性”，其声音被认为是回响在经典的Barbara和Celarent三段论之中。物理的和化学的“自然法则”、博物学分类都是如此，它们都被认为是人类史前原型精确且独有的复制品，这些原型深藏于事物结构中，而隐藏于我们理智中的神性火花使我们得以洞察它们的存在。人们那时认为，世界的结构是合乎逻辑的，它的逻辑就是一个大学教授的逻辑。直到1850年左右，几乎所有人相信，科学表达的真理是一些摹本，它们精准地复制了非人的实在的确切密码。但是，此后迅速激增的理论几乎使人们不再相信，其中的任何一个理论比其他理论更真实客观。有如此多的几何原理，如此多的逻辑方法，如此多的物理学及化学假设，如此多的分类，其中每一个都对如此多的东西适用，但不是对所有的东西都适用，我们继而意识到，即使最真的公式也可能是人类的设计，而不是一个忠实的摹本。我们听说，科学法则现在更多地被当作是“概念速记”，只要有用它们就是真的，但也仅限于此。我们的思想已经能接受象征而不是复制，能接受近似而不是确切，能接受弹性而不是僵化。“能量学”测量可感觉现象的赤裸表面，以便用一个单一的公式描述它们全部的“能级”变化，它是科学人道主义的最新词汇。诚然，对于世界与心灵之间为何

存在如此奇妙的一致，科学人道主义留下了很突出的尚未解决的疑问，但是不管怎样，它使我们对科学真理的整体看法变得比以往更为灵活与亲切。

It is to be doubted whether any theorizer today, either in mathematics, logic, physics or biology, conceives himself to be literally re-editing processes of nature or thoughts of God. The main forms of our thinking, the separation of subjects from predicates, the negative, hypothetic and disjunctive judgments, are purely human habits. The ether, as Lord Salisbury said, is only a noun for the verb to undulate; and many of our theological ideas are admitted, even by those who call them “true”, to be humanistic in like degree.

在数学、逻辑学、物理学或生物学领域，是否还有任何理论建构者认为自己是在忠实地复制自然的进程或上帝的思想，这尚存疑问。我们主要的思维形式，包括主词和谓词的区分，否定的、假设的和选言的判断，都纯粹是人类的习惯。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说，以太只是一个名词，需要动词来促使其波动；我们的神学观念中有很多也在同样程度上被承认是人道主义的，即使那些把它们称为“真”的人也承认这一点。

I fancy that these changes in the current notions of truth are what originally gave the impulse to Messrs. Dewey's and Schiller's views. The suspicion is in the air nowadays that the superiority of one of our formulas to another may not consist so much in its literal “objectivity”, as in subjective qualities like its usefulness, its “elegance” or its congruity with our residual beliefs. Yielding to these suspicions, and generalizing, we fall into something like the

humanistic state of mind. Truth we conceive to mean everywhere, not duplication, but addition; not the constructing of inner copies of already complete realities, but rather the collaborating with realities so as to bring about a clearer result. Obviously this state of mind is at first full of vagueness and ambiguity. “Collaborating” is a vague term; it must at any rate cover conceptions and logical arrangements. “Clearer” is vaguer still. Truth must bring clear thoughts, as well as clear the way to action. “Reality” is the vaguest term of all. The only way to test such a programme at all is to apply it to the various types of truth, in the hope of reaching an account that shall be more precise. Any hypothesis that forces such a review upon one has one great merit, even if in the end it proves invalid: it gets us better acquainted with the total subject. To give the theory plenty of “rope” and see if it hangs itself eventually is better tactics than to choke it off at the outset by abstract accusations of self-contradiction. I think therefore that a decided effort at sympathetic mental play with humanism is the provisional attitude to be recommended to the reader.

我想，正是这些在现行真理观上的变化，最初推动了杜威与席勒先生观点的产生。目前流行着一种怀疑，认为我们的一个公式之所以优于另外一个，与其说在于它真正的“客观性”，不如说在于它的主观特性，比如其有用性和“优雅”，或者它更加符合我们残存的信念。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怀疑并做出概括，我们就落入了某种人道主义的心理状态。我们认为真理在任何地方都不意味着复制，而是添加；不是为已经完善的实在构建内心的摹本，而是与实在协作而得出一个更清晰的结果。显然，这种意识状态起初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协作”是一个含糊的词；它无论如何必须包含概念及逻辑安排。“更清晰”一词却更为模糊。真理必须带给我们清晰的思想，并为行动扫清道路。“实在”是其中最模糊的术语。检验这种方案的唯一办法，是将它应用到各种类型的真理中，以便能够进行更精确的阐述。任何将这

种观点强加给人的假设都有一大优点，即使最后它被证明是无效的：它使我们更为熟悉了整个论题。给这个理论足够多的“绳子”，看它是否最终把自己吊死，跟一开始就抽象地指责它自相矛盾而使其窒息比起来，是一个更好的策略。因此在我看来，决心以同情的心态看待人道主义，是值得推荐读者暂时采取的一种态度。

When I find myself playing sympathetically with humanism, something like what follows is what I end by conceiving it to mean.

当我发现自己同情地看待人道主义时，我最终认识到它的意义大体如下。

Experience is a process that continually gives us new material to digest. We handle this intellectually by the mass of beliefs of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already possessed, assimilating, rejecting, or rearranging in different degrees. Some of the apperceiving ideas are recent acquisitions of our own, but most of them are common-sense traditions of the race. There is probably not a common-sense tradition, of all those which we now live by, that was not in the first instance a genuine discovery, an inductive generalization like those more recent ones of the atom, of inertia, of energy, of reflex action, or of fitness to survive. The notions of one Time and of one Space as single continuous receptacl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oughts and things, matter and mind; between permanent subjects and changing attributes; the conception of classes with sub classes within them; the separation of fortuitous from regularly caused connections; surely all these were once definite conquests made at historic dates by our ancestors in their attempt to get the chaos of their crude individual experiences into a more shareable and manageable

shape. They proved of such sovereign use as *denkmittel* that they are now a part of the very structure of our mind. We cannot play fast and loose with them. No experience can upset them. On the contrary, they apperceive every experience and assign it to its place.

经验是一个过程，它持续地提供给我们新材料来消化。我们通过已经拥有的一整套信念在理智上处理它，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吸收、排斥或者重组。这些统觉观念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最近获得的，但是大多数是人类的常识传统。在我们现在赖以为生的常识传统中，也许没有一个起初不是纯粹的发现，一个归纳性的概括，比如较为近代的原子、惯性、能量、反射作用、适者生存等概念。把一个时间与一个空间看作单一的连续容器，对思想与事物、物质与心灵的区分，对永恒的主体与变化的特性的区分，对类别及其内部的次类别的划分，对偶然关系与常规因果关系的区分，这些无疑都曾经是我们的前辈在特定历史时期取得的确定成就，他们努力将粗陋的个体经验，从混沌状态转化为更加容易分享和管理的状态。作为概念工具，它们被证明有着极其有效的用途，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心智结构中的一部分。对待它们我们不能朝三暮四，任何经验都不能颠覆它们；相反，它们统觉着经验并给予其合适的位置。

To what effect? That we may the better foresee the course of our experiences,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and steer our lives by rule. Also that we may have a cleaner, clearer, more inclusive mental view.

要达到什么效果呢？为了使我们更好地预见我们经验的进程，更好地相互沟通，更好地按规则引导我们的生活；也为了能获得更纯洁、更清晰、更全面的心智视野。

The greatest common-sense achievement, after the discovery of one Time and one Space, is probably the concept of permanently existing things. When a rattle first drops out of the hand of a baby, he does not look to see where it has gone. Non-perception he accepts as annihilation until he finds a better belief. That our perceptions mean beings, rattles that are there whether we hold them in our hands or not, becomes an interpretation so luminous of what happens to us that, once employed, it never gets forgotten. It applies with equal felicity to things and persons, to the objective and to the ejective realm. However a Berkeley, a Mill, or a Cornelius may criticise it, it works; and in practical life we never think of "going back" upon it, or reading our incoming experiences in any other terms. We may, indeed, speculatively imagine a state of "pure" experience before the hypothesis of permanent objects behind its flux had been framed; and we can play with the idea that some primeval genius might have struck into a different hypothesis. But we cannot positively imagine today what the different hypothesis could have been, for the category of trans-perceptual reality is now one of the foundations of our life. Our thoughts must still employ it if they are to possess reasonableness and truth.

在一个时间和一个空间的发现之后，最伟大的常识性成就也许就是永存事物的概念了。当拨浪鼓从一个婴儿手中滑落时，他不会四处看一看它掉到何处去了。在他获得一个更合理的信念之前，无知觉对他来说就等于消失。我们知觉到的东西就是存在的东西，那个拨浪鼓不论是否抓在我们手中都是存在的，这种解释让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如此一目了然，一旦它被使用，就永远不会被忘掉。它同样恰当地适用于物与人、客观的领域与外推的领域。不论一个信奉贝克莱、穆勒或科尼利厄斯的人怎样批评它，它都是有作用的；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从未想过"违背"它，或者用别的语言来解读我们接受到的经验。的确，我们可以用推测方法想象出一种"纯粹"经验状态，然后再

对其流动过程背后隐藏的永恒客体形成假设；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不太严肃的假想，认为某个远古时代的天才完全可能突然想出一个不同的假设。但是，我们今天无法确切地想象出那个不同的假设本来是个什么样子，因为超知觉的实在这一范畴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基础之一。要想使我们的思想具有合理性与真理性，就还得运用这个假设。

This notion of a first in the shape of a most chaotic pure experience which sets us questions, of a second in the way of fundamental categories, long ago wrought into the structure of our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ally irreversible, which define the general frame within which answers must fall, and of a third which gives the detail of the answers in the shapes most congruous with all our present needs, is, as I take it, the essence of the humanistic conception. It represents experience in its pristine purity to be now so enveloped in predicates historically worked out that we can think of it as little more than another, of a that, which the mind, in Mr. Bradley's phrase, “encounters”, and to whose stimulating presence we respond by ways of thinking which we call “true” in proportion as they facilitate our mental or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bring us outer power and inner peace. But whether the Other, the universal that, has itself any definite inner structure, or whether, if it have any, the structure resembles any of our predicated whats, this is a question which humanism leaves untouched. For us, at any rate, it insists, reality is an accumulation of our own intellectual inventions, and the struggle for “truth” in our progressive dealings with it is always a struggle to work in new nouns and adjectives while altering as little as possible the old.

有这样一个概念，它的第一部分，以最混沌的纯粹经验的形式存

在，给我们设定问题；第二部分，以基本范畴的形式存在，在很久之前被植入我们的意识结构，它们实际上是不可撤销的，为我们的答案设定了总体框架；第三部分，以最符合我们目前所有需要的形式给出答案的细节；在我看来，这一概念构成了人道主义概念的实质。它把处于原始纯粹状态的经验看作是为历史上形成的谓词所包裹的事物，以至于我们可以只把它当成他物，这一事物与心灵“相遇”——用布拉德雷先生的话来说，它的存在刺激我们进行各种思维活动，而这些思维活动会促进我们身心活动以及给我们带来外部力量和内心安定，我们根据促进程度来确定哪些为“真”。但是，那个“他物”——普遍的那个——本身是否具有任何确定的内部结构，或者说，假如它有，这一结构是否类似于我们曾断定的某物，这一问题人道主义尚未触及。无论如何，对我们来说，它坚持认为“实在”是我们智慧性发明的一种积累，并且，我们在不断处理它的过程中为寻找“真理”做出的努力，一直是这样的，即引入新的名词和形容词并同时尽可能少地改变旧词。

It is hard to see why either Mr. Bradley's own logic or his metaphysics should oblige him to quarrel with this conception. He might consistently adopt it verbatim et literatim, if he would, and simply throw his peculiar absolute round it, following in this the good example of Professor Royce. Bergson in France, and his disciples, Wilbois the physicist and Leroy, are thoroughgoing humanists in the sense defined. Professor Milhaud also appears to be one; and the great Poincaré misses it by only the breadth of a hair. In Germany the name of Simmel offers itself as that of a humanist of the most radical sort. Mach and his school, and Hertz and Ostwald must be classed as humanists. The view is in the atmosphere and must be patiently discussed.

很难看出，为何布拉德雷先生的逻辑或他的形而上学竟使他不赞同这个概念。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本可以一字不差地、忠实地采纳这

个概念，并在这方面以罗伊斯教授作为好榜样，直接将其特殊的绝对概念应用其中。按照上述定义，法国的柏格森、他的学生物理学家威尔布瓦以及勒卢阿都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米豪教授似乎也是其中之一，而伟大的彭加勒只是差之毫发之间。在德国，西梅尔的大名可以被归入最激进的人道主义者名单。马赫及其学派、赫兹和奥斯特瓦尔德必须归入人道主义者的行列。这个观点已十分流行，必须对它进行耐心的讨论。

The best way to discuss it would be to see what the alternative might be. What is it indeed? Its critics make no explicit statement, Professor Royce being the only one so far who has formulated anything definite. The first service of humanism to philosophy accordingly seems to be that it will probably oblige those who dislike it to search their own hearts and heads. It will force analysis to the front and make it the order of the day. At present the lazy tradition that truth is *adaequatio intellectus et rei* seems all there is to contradict it with. Mr. Bradley's only suggestion is that true thought “must correspond to a determinate being which it cannot be said to make”, and obviously that sheds no new light.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to “correspond”? Where is the “being”? What sort of things are “determinations”, and what is mean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by “not to make”?

讨论人道主义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一看其替代形式可能是什么。那到底是什么呢？它的批评者没有做出明确的陈述，罗伊斯教授是迄今为止唯一形成明确观点的人。因此，人道主义对哲学的第一个贡献，似乎就是它可能迫使讨厌它的人扪心自问。它将把分析置于突出位置，并使它成为常态。目前，主张真理是“知与物的符合”的懒惰传统似乎是与之相矛盾的观点。布拉德雷先生唯一的建议就是，真的思想“必须符合于一个不能说由它创造的确定的存在”，很明显，这没有

带来新的启发。“符合”这一词是什么意思呢？“存在”又在哪里呢？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作“确定的东西”，这里所谓“没有创造”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Humanism proceeds immediately to refine upon the looseness of these epithets. We correspond in some way with anything with which we enter into any relations at all. If it be a thing, we may produce an exact copy of it, or we may simply feel it as an existent in a certain place. If it be a demand, we may obey it without knowing anything more about it than its push. If it be a proposition, we may agree by not contradicting it, by letting it pass. If it be a relation between things, we may act on the first thing so as to bring ourselves out where the second will be. If it be something inaccessible, we may substitute a hypothetical object for it, which, having the same consequences, will cipher out for us real results. In a general way we may simply add our thought to it; and if it suffers the addition, and the whole situation harmoniously prolongs and enriches itself, the thought will pass for true.

人道主义立即着手完善这些不严谨的修饰词。我们以某种方式与我们发生联系的任何事物相符合。如果它是一个事物，我们可以生产出它的一个精确摹本，或者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当成某处的存在物来感觉它。如果它是一项要求，我们也许在不了解它的情况下，只因感觉到了它的强制力而遵守它。如果它是一个命题，我们可以不反驳它、让它通过，以此对它表示赞同。如果它是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作用于第一个事物，从而找出第二个事物存在何处。如果它是不可及的东西，我们可以用一个假设的对象来替换它，因为后者能产生同样的效果，这样就能为我们解出实际的结果。一般来说，我们也许只是把我们的思想加在它的上面；如果它能容纳这个添加，而且整个情形得以协调的延长和丰富，那么这个思想就被当作是真的。

As for the whereabouts of the beings thus corresponded to, although they may be outside of the present thought as well as in it, humanism sees no ground for saying they are outside of finite experience itself. Pragmatically, their reality means that we submit to them, take account of them, whether we like to or not, but this we must perpetually do with experiences other than our own. The whole system of what the present experience must correspond to "adequately" may be continuous with the present experience itself. Reality, so taken as experience other than the present, might be either the legacy of past experience or the content of experience to come. Its determinations for us are in any case the adjectives which our acts of judging fit to it, and those are essentially humanistic things.

至于与之相符的这种存在物所居何处，无论它们可能存在于我们目前的思想之外还是之内，人道主义理论看不出任何理由说它们超出了有限的经验本身。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实在性意味着我们认同它们，考虑它们，无论我们喜欢它们与否；但是，对于我们自身经验以外的经验，我们必须永远这样做。目前的经验必须"充分地"符合的那个东西，其整个体系可能与目前的经验本身是连续的。这样感觉到的目前的经验之外的实在，可能是过去经验留下的遗产，也可能是未来经验的内容。实在中对我们来说存在的确定东西，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的判断行为给这个实在配上的那些修饰词，而且这些词基本上都含有人道主义的意味。

To say that our thought does not "make" this reality means pragmatically that if our own particular thought were annihilated the reality would still be there in some shape, though possibly it might be a shape that would lack something that our thought

supplies. That reality is “independent” mean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in every experience that escapes our arbitrary control. If it be a sensible experience it coerces our attention; if a sequence, we cannot invert it; if we compare two terms we can come to only one result. There is a push, an urgency, within our very experience, against which we are on the whole powerless, and which drives us in a direction that is the destiny of our belief. That this drift of experience itself is in the last resort due to something independent of all possible experience may or may not be true. There may or may not be an extra-experiential “*ding an sich* ” that keeps the ball rolling, or an “absolute” that lies eternally behind all the successive determinations which human thought has made. But within our experience itself, at any rate, humanism says, some determinations show themselves as being independent of others; some questions, if we ever ask them, can only be answered in one way; some beings, if we ever suppose them, must be supposed to have existed previously to the supposing; some relations, if they exist ever, must exist as long as their terms exist.

说我们的思想没有“创造”这一实在，这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意味着：假如我们自己的某个思想被消除，实在仍然会以某种形态存在于那里，尽管这种形态可能会缺乏我们的思想所提供的某个东西。所谓实在是“独立的”，这意味着在每一个经验中都存在着脱离我们任意控制的东西。如果它是一个可感觉的经验，它会迫使我们注意它；如果它是一个序列，我们不能颠倒它；如果我们要比较两个术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果。就在我们的经验内部，存在着一种强制力，一种紧迫性，在它面前我们总的来说是无能为力的，它驱使我们走向我们信念的归宿。经验本身的这种动向归根结底归因于某种独立于一切可能经验之外，这种说法可能是对的，也可能不对。也许有——也许没有一种超验的“自在之物”在推动着事情的发展，或者有一种“绝对”永恒地存在于人类思想所创造的一系列确定的东西背后。但是，人道主义

理论认为，在我们的经验本身内部，某些确定的东西无论如何是以独立于其他确定的东西而存在的；某些问题，如果我们曾经问起过它们的话，只能用一种方式回答；某些存在，如果我们曾经假设过它们的话，必须被认为是先于这个假设已经存在；某些关系，如果它们曾存在过的话，就要跟指称它们的词语存在得同样长久。

Truth thus means, according to humanism, the relation of less fixed parts of experience (predicates) to other relatively more fixed parts (subjects); and we are not required to seek it in a relation of experience as such to anything beyond itself. We can stay at home, for our behavior as exponents is hemmed in on every side. The forces both of advance and of resistance are exerted by our own objects, and the notion of truth as something opposed to waywardness or license inevitably grows up solipsistically inside of every human life.

因此，根据人道主义理论，真理指经验中较不固定的部分（谓词）与其他相对较为固定部分（主词）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必到这种经验与经验本身以外的事物的关系中去寻求真理。我们可以“呆在家里”，因为作为诠释者，我们的行为被四面包围着。前进和阻碍的力量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客体所施加的，作为与反复无常或肆意妄为对立的真理概念，是在每个人生活中独自生长起来的。

So obvious is all this that a common charge against the humanistic authors “makes me tired.” “How can a deweyite discriminate sincerity from bluff?” was a question asked at a philosophic meeting where I reported on Dewey's Studies. “How can the mere [4_3] pragmatist feel any duty to think truly?” is the objection urged by Professor Royce. Mr. Bradley in turn says that if

a humanist understands his own doctrine, “he must hold any idea, however mad, to be the truth, if any one will have it so. " And Professor Taylor describes pragmatism as believing anything one pleases and calling it truth.

这一切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对持人道主义立场的作者的通常指控“使我感到厌倦”。例如，在一次哲学研讨会上，我就杜威的《逻辑理论研究》作了报告，会上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杜威主义者如何区分真心实意与虚情假意呢？”罗伊斯教授提出反对意见说，“单单的 [5_3] 一位实用主义者如何能感到真实思考的责任呢？”布拉德雷先生也说，如果人道主义者明白自己的学说，“他必须把任何一个观念——无论该观念多么疯狂——当作真理，只要有人这么想。”泰勒教授指责实用主义，说它随自己所好相信任何事物，并称之为真理。

Such a shallow sense of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men's thinking actually goes on seems to me most surprising. These critics appear to suppose that, if left to itself, the rudderless raft of our experience must be ready to drift anywhere or nowhere. Even tho there were compasses on board, they seem to say, there would be no pole for them to point to. There must be absolute sailing-directions, they insist, decreed from outside, and an independent chart of the voyage added to the “mere” voyage itself, if we are ever to make a port. But is it not obvious that even tho there be such absolute sailing-directions in the shape of pre-human standards of truth that we ought to follow, the only guarantee that we shall in fact follow them must lie in our human equipment. The “ought” would be a *brutum fulmen* unless there were a felt grain inside of our experience that conspired.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devoutest believers in absolute standards must admit that men fail to obey them. Waywardness is here, in spite of the eternal prohibitions, and

the existence of any amount of reality ante rem is no warrant against unlimited error in rebus being incurred. The only real guarantee we have against licentious thinking is the circum-pressure of experience itself, which gets us sick of concrete errors, whether there be a trans-empirical reality or not. How does the partisan of absolute reality know what this orders him to think? He cannot get direct sight of the absolute; and he has no means of guessing what it wants of him except by following the humanistic clues. The only truth that he himself will ever practically accept will be that to which his finite experiences lead him of themselves. The state of mind which shudders at the idea of a lot of experiences left to themselves, and that augurs protection from the sheer name of an absolute, as if, however inoperative, that might still stand for a sort of ghostly security, is like the mood of those good people who, whenever they hear of a social tendency that is damnable, begin to redden and to puff, and say “Parliament or Congress ought to make a law against it”, as if an impotent decree would give relief.

以这种粗浅的认识来看待人类思维实际进展的状况，很是令我吃惊。这些批评者们似乎在假设，我们的经验就像无舵的木筏，如果放任其自流的话，它必定会漫无目的地四处漂游。他们似乎是说，即使给它装上了罗盘，也没有罗盘能指向的极。他们坚持说，如果我们想要到达一个港湾，必须有外界所规定的绝对的航行方位，必须给“单单的”航行本身附加一张独立的航线图。但是，尽管必须有绝对的航行方位，它们以我们应当遵循的先存真理标准的形式存在，但是，我们实际上将遵循它们的唯一保证，不明摆着也必须存在于人的才智吗？除非在我们的经验中存在共同作用的可感觉到的因素，否则这个“应当”将是虚张声势。事实上，绝对标准最虔诚的信仰者也必须承认人们未能遵循这些标准。反复无常的情况屡禁不止，无论存在多少事前的实在，也不能保障在事物之中不引起无限的错误。我们防止肆意的思维方式的唯一真正保证，是经验自身的周边压力，它让我们厌

弃具体的错误，不管是否存在超验的实在。绝对实在的盲从者怎么知道它命令他想什么呢？他不能直接看到绝对；除了跟随人道主义的线索之外，他也没有办法猜想它要他做什么。他本人能实际接受的唯一真理，就是他那有限的经验自动引领他到达的真理。一想到让许多经验自发起作用就心有余悸，单凭绝对这个空名就觉得受到了保护，仿佛是尽管它没有起任何作用，它仍然能代表一种捕风捉影的安全感，以上心态就像那些好人的心态，他们一听到恶劣的社会风气就气得满脸涨红、呼气急促地说“议会或国会应该对此明令禁止，”就好像仅凭一个软弱无力的法令就能解决问题。

All the sanctions of a law of truth lie in the very texture of experience. Absolute or no absolute, the concrete truth for us will always be that way of thinking in which our various experiences most profitably combine.

真理法则的所有约束力恰恰存在于经验的结构。无论存在绝对与否，对我们而言的具体真理总是那种思维方式，借助这种方式，我们的各种经验能以最有益的方式结合起来。

And yet, the opponent obstinately urges, your humanist will always have a greater liberty to play fast and loose with truth than will your believer in an independent realm of reality that makes the standard rigid. If by this latter believer he means a man who pretends to know the standard and who fulminates it, the humanist will doubtless prove more flexible; but no more flexible than the absolutist himself if the latter follows (as fortunately our present-day absolutists do follow) empirical methods of inquiry in concrete affairs. To consider hypotheses is surely always better than to dogmatise *ins blaue hinein* .

可是，反对者固执地极力主张，你们人道主义者可以用朝三暮四的态度对待真理，比相信实在的独立地位把标准弄得更严格的人有更大的自由。如果反对者所说的后者指的是一个假装知道并叱责这种标准的人，那么人道主义者将无疑证明是更加灵活的；但是，如果后者在具体事务上遵循实证的研究方法（幸运的是，当今的一些绝对论者确实是遵循这种方法），那么人道主义者也不会比绝对论者更为灵活。思考假设当然总是比漫无目的将它们教条化要好。

Nevertheless this probable flexibility of temper in him has been used to convict the humanist of sin. Believing as he does, that truth lies in rebus, and is at every moment our own line of most propitious reaction, he stands forever debarred, as I have heard a learned colleague say, from trying to convert opponents, for does not their view, being their most propitious momentary reaction, already fill the bill? Only the believer in the ante-rem brand of truth can on this theory seek to make converts without self-stultification. But can there be self-stultification in urging any account whatever of truth? Can the definition ever contradict the deed? “Truth is what I feel like saying”—suppose that to be the definition. “Well, I feel like saying that, and I want you to feel like saying it, and shall continue to say it until I get you to agree.” Where is there any contradiction? Whatever truth may be said to be, that is the kind of truth which the saying can be held to carry. The temper which a saying may comport is an extra-logical matter. It may indeed be hotter in some individual absolutist than in a humanist, but it need not be so in another. And the humanist, for his part, is perfectly consistent in compassing sea and land to make one proselyte, if his nature be enthusiastic enough.

然而，存在于人道主义者身上的这种可变通的性情，却被反过来用作指责他的罪过。正因为他相信真理存在于事物之中，而且每时每刻都代表我们最有利的反应的方向，他就如同我的一位学识渊博的同行所说，永远在试图说服他的反对者时受阻：因为，不正是反对者的观点，作为他们最有利的瞬时反应，已经满足了要求吗？根据这种理论，只有相信那种事前的真理的人，才能在试图说服其他人时不自显荒谬。但是，在强烈要求对真理做出任何解释时会自显荒谬吗？定义究竟能否与行为发生矛盾？“真理是我想要说的。”——假设这就是定义。“好吧，我要想说那个，而且我想让你想要说那个，我将一直说那个，直到使你同意为止。”矛盾在哪里呢？无论真理可能被说成是什么，它都是可被这种说法承载的那种真理。言说能适合的性情是超逻辑的事物。的确，某位绝对论者可能比一名人道主义者更为热情，但另外一位绝对论者未必如此。就人道主义者而言，如果他的本性中有足够的热情，他能表现出完美的毅力，不惜跋山涉水去争取某个皈依者。

“But how can you be enthusiastic over any view of things which you know to have been partly made by yourself, and which is liable to alter during the next minute? How is any heroic devotion to the ideal of truth possible under such paltry conditions?”

“但是，当你知道你对事物的看法部分地是由自己炮制，而且下一分钟就可能改变时，你又怎么能对它充满热情呢？在如此微不足道的条件下，怎么可能对真理的理想有义无反顾的忠诚呢？

This is just another of those objections by which the anti-humanists show their own comparatively slack hold on the realities of the situation. If they would only follow the pragmatic method

and ask: “What is truth known-as? What does its existence stand for in the way of concrete goods?“—they would see that the name of it is the inbegriff of almost everything that is valuable in our lives. The true is the opposite of whatever is instable, of whatever is practically disappointing, of whatever is useless, of whatever is lying and unreliable, of whatever is unverifiable and unsupported, of whatever is inconsistent and contradictory, of whatever is artificial and eccentric, of whatever is unre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of no practical account. Here are pragmatic reasons with a vengeance why we should turn to truth—truth saves us from a world of that complexion. What wonder that its very name awakens loyal feeling! In particular what wonder that all little provisional fool's paradises of belief should appear contemptible in comparison with its bare pursuit! When absolutists reject humanism because they feel it to be untrue, that means that the whole habit of their mental needs is wedded already to a different view of reality, in comparison with which the humanistic world seems but the whim of a few irresponsible youths. Their own subjective apperceiving mass is what speaks here in the name of the eternal natures and bids them reject our humanism—as they apprehend it. Just so with us humanists, when we condemn all noble, clean-cut, fixed, eternal, rational, temple-like systems of philosophy. These contradict the dramatic temperament of nature, as our dealings with nature and our habits of thinking have so far brought us to conceive it. They seem oddly personal and artificial, even when not bureaucratic and professional in an absurd degree. We turn from them to the great unpent and unstayed wilderness of truth as we feel it to be constituted, with as good a conscience as rationalists are moved by when they turn from our wilderness into their neater and cleaner intellectual abodes.[1]

这只不过是反人道主义者提出的另一种反对意见，这表明他们自己对那种状况下的各种实在掌握得不够充分。只要他们愿意遵循实用主义的方法并问，“真理为人所知的是什么呢？它的存在代表了什么具体利益呢？”那么他们会发现，真理这个词代表了我们生活中几乎一切宝贵的东西。真就是一切不稳定的、实际上令人失望的、无用处的、虚假和不可靠的、不可证实和无证据的、不一致和矛盾的、人为的和不合常规的、不真实即无实际价值的等等东西的对立面。这就是我们应该彻底地转向真理的实用主义理由——真理把我们从那种状况下的世界中拯救出来。难怪一提到它就能唤起人们的向往！更无怪乎，与对它的直接追求相比，所有那些稍纵即逝的、愚蠢的、狭隘的信仰小天地竟然显得如此可鄙！如果绝对论者拒绝接受人道主义是因为感觉它不真，这意味着他们的心智需要的整个习惯已经与一个对实在的不同看法结合了，与这个看法相比，人道主义的世界似乎只是几个轻狂少年的臆想。他们的主观统觉意识以永恒自然名义在这里说话，促使他们拒绝接受他们所理解的我们的人道主义。当我们人道主义者责难一切高高在上的、泾渭分明的、固定不变的、永恒的、理性的、神秘的哲学体系时，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迄今为止与自然的接触和思维习惯使我们相信，这类哲学体系有违自然的戏剧性特质。它们即便没有僵化、教条到荒谬的地步，却也是过于个性化、不自然。我们厌弃这些体系，而转向自由自在的、未僵化的、我们认定的广袤真理原野，正像理性主义者离开我们的旷野，而进入他们那个更井井有条的理智住所一样，二者都感觉心安理得。[1]

1: I cannot forbear quoting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humanist and rationalist tempers of mind, in a sphere remote from philosophy, these remarks on the Dreyfus "affaire", written by one who assuredly had never heard of humanism or pragmatism. "Autantque la Révolution, 'l'Affaire' est désormaisune de nos 'origines'. Si ellen'a pas fait

ouvrir le gouffre, c'estelle du moins qui a rendu patent et visible le long travail souterrain qui, silencieusement, avaitpreparé la séparation entre nosdeux camps d'aujourd'hui, pour écarterenfin, d'un coup soudain, la France des traditionalistes (poseurs de principes, chercheurs d'unité, constructeurs de systemes à priori) et la France éprise du fait positif et de libreexamen;—la France révolutionnaire et romantiquesil'onveut, celle qui met très haut l'individu, qui ne veut pas qu'unjustepérisse, fut-ce pour sauver la nation, et qui cherche la véritédanstoutesses parties aussi bien que dans une vued'ensemble… Duclaux ne pouvait pas concevoir qu'on preferat quelque chose a la verite. Mais il voyait autour de lui de fort honnetes gens qui, mettant en balance la vie d'un homme et la raison d'Etat, lui avouaient de quel poids leger ils jugeaient une simple existence individuelle, pour innocente qu'elle fut. C'etaient des classiques, des gens a qui l'ensemble seul importe." La Vie de Emile Duclaux, par Mme. Em. D., Laval, 1906, pp. 243, 247-248.

1: 为了将人道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的性情做一个对比，我忍不住要引用对德雷福斯“案件”的一段与哲学无关的评论作为例子，因为写这些话的人肯定没听说过人道主义或实用主义。“同大革命一样，‘这个案件’自此以后将成为我们的‘起源’之一。即使它没有掀开巨大的黑洞，至少也使一项长期、隐蔽的工作变得

明晰可见，这一工作曾经悄悄地为我们今天分化出两个阵营做了准备，突然之间，传统派（指那些自称遵循原则的人、寻求统一的人、建构先验体系的人）的法国，与热衷确定的事实和自由的思考的法国最终分开了——如果我们原意，可以把她称为革命的法国和浪漫的法国，她崇尚个体，只把为拯救祖国献身看作正当的牺牲，她在每一个局部或整体视野中探寻真理……杜克劳无法想象人们会偏爱其他东西而不是真理。但是，他看到周围有一群非常诚实正直的人，他们在个人生活和国家利益之间找到了平衡，并表示自己把单纯的个人存在看得是多么轻于鸿毛，虽然这个存在天真纯洁。这些人是古典主义者，对他们而言，集体是唯一重要的。”《埃米尔·杜克劳传》，D·拉瓦尔夫人，1906年版，第243、247、248页。

This is surely enough to show that the humanist does not ignore the character of objectivity and independence in truth. Let me turn next to what his opponents mean when they say that to be true, our thoughts must “correspond”.

这当然充分表明，人道主义者没有忽视真理的客观性和独立性特征。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当人道主义的反对者说，要是我们的思想是真的，就必须“符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The vulgar notion of correspondence here is that the thoughts must copy the reality—cognitio fit per *assimiliationem cogniti et cognoscentis* ; and philosophy, without having ever fairly sat down to the question, seems to have instinctively accepted this idea:

propositions are held true if they copy the eternal thought; terms are held true if they copy extra-mental realities. Implicitly, I think that the copy-theory has animated most of the criticisms that have been made on humanism.

这里，对符合的世俗看法，是指思想必须摹写实在——认识是认知者与被认知者的类化；哲学虽然从未客观地坐下来考虑这一问题，但似乎是已经本能地接受了下述观念，即如果命题摹写了永恒的思想，它们就被当作是真的；如果词语摹写超意识的实在，它们就被视为真的。我认为其中的含义是：摹写理论激发了对人道主义的大多数批评。

A priori, however, it is not self-evident that the sole business of our mind with realities should be to copy them. Let my reader suppose himself to constitute for a time all the reality there is in the universe, and then to receive the announcement that another being is to be created who shall know him truly. How will he represent the knowing in advance? What will he hope it to be? I doubt extremely whether it could ever occur to him to fancy it as a mere copying. Of what use to him would an imperfect second edition of himself in the new comer's interior be? It would seem pure waste of a propitious opportunity. The demand would more probably be for something absolutely new. The reader would conceive the knowing humanistically, “the new comer”, he would say, “must take account of my presence by reacting on it in such a way that good would accrue to us both. If copying be requisite to that end, let there be copying; otherwise not.” The essence in any case would not be the copying, but the enrichment of the previous world.

然而，从先验的角度来看，心灵与实在的唯一互动方式是不是去摹写它们，这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不妨让读者假定自己暂时构成了宇宙中唯一的实在，然后他接到通知说，另一个能真实地认识他的人将被创造出来。他将事先如何描述这个认识呢？他希望这个认识是什么样子呢？我特别怀疑他是否想到把这个认识想象为只是一个摹写过程。把另一个不完美的自我版本植入新来者，这对他有什么用呢？这似乎纯粹是在浪费良机。所需要的更可能是一种绝对新的东西。如果读者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设想这个认识，他可能会说，“这个新来者必须考虑我的存在，以对双方都好的方式对我的存在做出反应。如果摹写是达到那个目的的先决条件，那就让它存在吧；反之它就不应该存在。”其本质无论如何不应该是摹写，而是丰富原有的世界。

I read the other day, in a book of Professor Eucken's, a phrase, “*Die erhohung des vorgefundenen daseins* “, which seems to be pertinent here. Why may not thought's mission be to increase and elevate, rather than simply to imitate and reduplicate, existence? No one who has read Lotze can fail to remember his striking comment on the ordinary view of the secondary qualities of matter, which brands them as “illusory” because they copy nothing in the thing. The notion of a world complete in itself, to which thought comes as a passive mirror, adding nothing to fact, Lotze says is irrational. Rather is thought itself a most momentous part of fact, and the whole mission of the pre-existing and insufficient world of matter may simply be to provoke thought to produce its far more precious supplement.

我有一天在奥伊肯教授的一本书中读到“提升已发现的存在”这句话，这句话用在这里似乎十分恰切。思想的使命，与其说是简单地模仿和重新复制存在，为什么不说是增加和提升存在呢？任何读过洛采著作的人都不会忘记，他对有关物质第二属性的普通观点发表过的精

彩评论，他称这些属性是“虚幻的”，因为它们没有摹写事物中的任何东西。洛采认为，如果把世界本身看作是完备的，思想对它来说只是一面被动的镜子，对事实没有增添任何东西，那么这种看法是不合理的。相反，思想本身就是事实的重要部分，先存的、不完备的物质世界的全部任务，可能仅仅是激发思想去产生更为珍贵的补充。

“Knowing”, in short, may, for aught we can see beforehand to the contrary, be only one way of getting into fruitful relations with reality whether copying be one of the relations or not.

简而言之，无论我们事先可能看到什么相反的状况，所谓“认识”，可能只不过是一种与实在产生富有成果的联系的方法，无论摹写是不是其中的一个联系。

It is easy to see from what special type of knowing the copy-theory arose. In our dealings with natural phenomena the great point is to be able to foretell. Foretelling, according to such a writer as Spencer, is the whole meaning of intelligence. When Spencer's “law of intelligence” says that inner and outer relations must “correspond”, it mean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erms in our inner time-scheme and space-scheme must be an exact copy of the distribution in real time and space of the real terms. In strict theory the mental terms themselves need not answer to the real terms in the sense of severally copying them, symbolic mental terms being enough, if only the real dates and places be copied. But in our ordinary life the mental terms are images and the real ones are sensations, and the images so often copy the sensations, that we easily take copying of terms as well as of relations to be the natural significance of knowing. Meanwhile much, even of this common

descriptive truth, is couched in verbal symbols. If our symbols fit the world, in the sense of determining our expectations rightly, they may even be the better for not copying its terms.

很容易看出摹写理论产生于何种特殊类型的认识。我们在处理自然现象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预测。斯宾塞写道，预测是理智的全部意义。斯宾塞的“理智法则”认为，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必须相“符合”，这意味着，词语在我们内部的时空格局里的分布，必须是实在的词语在实在的时空中分布状态的精确摹本。从严格的理论上来讲，心理语汇本身不必通过分别摹写实在的语汇来与之对应，如果只是摹写实在的日期和地点，象征性的心理语汇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心理的语汇是形象，实在的语汇是感觉，而这种形象又常常摹写感觉，以致我们很容易将语汇的摹写和关系的摹写当作是认识的自然意义。同时，即使是这种普通的描述性真理，也多用语言符号来表述。如果我们的语言符号在正确地确定我们的期望值这一意义上与这个世界相符合，那么它们不摹写世界的语汇反倒好些。

It seems obvious that the pragmatic account of all this routine of phenomenal knowledge is accurate. Truth here is a relation, not of our ideas to non-human realities, but of conceptual parts of our experience to sensational parts. Those thoughts are true which guide us to beneficial interaction with sensible particulars as they occur, whether they copy these in advance or not.

很明显，实用主义对这种常规性的现象认识的叙述很准确。这里，真理是一个关系，不是我们的观念与非人的实在之间的关系，而是我们经验中的概念部分与感觉部分间的关系。如果思想引导我们与可感觉的具体经验发生有益的互动，那么这些思想就是真的，无论它们事先摹写了这些具体经验与否。

From the frequency of copying in the knowledge of phenomenal fact, copying has been supposed to be the essence of truth in matters rational also. Geometry and logic, it has been supposed, must copy archetypal thoughts in the Creator. But in these abstract spheres there is no need of assuming archetypes. The mind is free to carve so many figures out of space, to make so many numerical collections, to frame so many classes and series, and it can analyze and compare so endlessly, that the very superabundance of the resulting ideas makes us doubt the “objective” pre-existence of their models. It would be plainly wrong to suppose a God whose thought consecrated rectangular but not polar co-ordinates, or Jevons's notation but not Boole's. Yet if, on the other hand, we assume God to have thought in advance of every possible flight of human fancy in these directions, his mind becomes too much like a Hindoo idol with three heads, eight arms and six breasts, too much made up of superfoetation and redundancy for us to wish to copy it, and the whole notion of copying tends to evaporate from these sciences. Their objects can be better interpreted as being created step by step by men, as fast as they successively conceive them.

由于摹写常常出现在对现象事实的认识中，因此摹写也被认为代表理性的事物中真理的实质。有人假定，几何学与逻辑肯定是对造物主原型思想的摹写。但在这些抽象领域，没必要假设原型的存在。人的心灵可以随意刻画出如此多的图形，做出如此多的数字组合，构想出如此多的类别和序列，它能做如此多次无休无止的分析和对比，这样所产生的众多观念致使我们怀疑其模型事先“客观”地存在着。假定有一个上帝，说他的思想只尊崇直角坐标而不是极坐标，或只尊崇杰文斯演算符号而不是布尔演算符号，这种假设显然是错误的。可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上帝事先料想到人们在这些方面产生的各种可

能的奇思异想，那么他的心灵就会很像一个长着三头、八臂、六胸的印度教神像，由如此多异期复孕和多余部位构成，令我们不愿摹写它，因此想摹写的整个想法就会从这些科学中烟消云散。它们的对象最好被解释为由人一步一步创造出来的，其创造速度与他们设想它们的速度同样快。

If now it be asked how, if triangles, squares, square roots, genera, and the like, are but improvised human “artefacts”, their properties and relations can be so promptly known to be “eternal”, the humanistic answer is easy. If triangles and genera are of our own production we can keep them invariant. We can make them “timeless” by expressly decreeing that on the things we mean time shall exert no altering effect, that they are intentionally and it may be fictitiously abstracted from every corrupting real associate and condition. But relations between invariant objects will themselves be invariant. Such relations cannot be happenings, for by hypothesis nothing shall happen to the objects. I have tried to show in the last chapter of my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4_4] that they can only be relations of comparison. No one so far seems to have noticed my suggestion, and I am too ignora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to feel very confident of my own view. But if it were correct it would solve the difficulty perfectly. Relations of comparison are matters of direct inspection. As soon as mental objects are mentally compared, they are perceived to be either like or unlike. But once the same, always the same, once different, always different, under these timeless conditions, which is as much as to say that truths concerning these man-made objects are necessary and eternal. We can change our conclusions only by changing our data first.

假如现在有人问，如果三角形、正方形、平方根、类属等都只不过是即时创造的人造品，那么我们怎么能立刻知道它们的属性和关系是“永恒的”呢？对此，人道主义的答案很简单。如果三角形和类属是我们自己的创造，那么我们可以让它们保持不变。我们可以让它们成为“永恒的”，这需要明确规定：时间对我们所意指的东西不能施加任何改变效果，它们被有意识地——也可以说虚构地——从每一个导致它们腐朽的现实联系和状况中抽离出去。但是，恒定不变的对象间的关系本身将是不变的，这种联系不是偶发的，因为按照假设，这些对象身上什么也不会发生。我已经在《心理学原理》[5_4]一书最后一章中试图说明，它们只能是比较的关系。迄今为止似乎还没人注意到我的意见，而且，由于我对数学的发展情况知之甚少，对自己的观点也就没很大底气。但假如它是正确的，就能完美解决这一难题。比较的关系是能直接检查的东西。一旦把心理对象在大脑中进行比较，就能看出它们相似与否。但在这种永恒的条件下，一旦相同则永远相同，一旦不同则永远不同；这几乎就等于说，涉及这些人造对象的真理是必要的、永恒的。我们只能先改变论据，才能改变结论。

The whole fabric of the a priori sciences can thus be treated as a man-made product. As Locke long ago pointed out, these sciences have no immediate connection with fact. Only if a fact can be humanized by being identified with any of these ideal objects, is what was true of the objects now true also of the facts. The truth itself meanwhile was originally a copy of nothing; it was only a relation directly perceived to obtain between two artificial mental things. [4_5]

因此，这些先验科学的整体结构可能被当作是人造产物。正如洛克很久前指出，这些科学与事实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有当一个事实通过与这些理想对象中的任何一个密切联系而被人性化了的时候，过去适用于这些对象的东西现在才能适用于这些事实。同时，真理本身

原本不是任何东西的摹本；它只是直接知觉到的存在于两种人造心理事物 [5_5] 间的关系。

We may now glance at some special types of knowing, so as to see better whether the humanistic account fits. On the mathematical and logical types we need not enlarge further, nor need we return at much length to the case of our descriptive knowledge of the course of nature. So far as this involves anticipation, tho that may mean copying, it need, as we saw, mean little more than “getting ready” in advance. But with many distant and future objects, our practical relations are to the last degree potential and remote. In no sense can we now get ready for the arrest of the earth's revolution by the tidal brake, for instance; and with the past, tho we suppose ourselves to know it truly, we have no practical relations at all. It is obvious that, altho interests strictly practical have been the original starting-point of our search for true phenomenal descriptions, yet an intrinsic interest in the bare describing function has grown up. We wish accounts that shall be true, whether they bring collateral profit or not. The primitive function has developed its demand for mere exercise. This theoretic curiosity seems to be the characteristically human differentia, and humanism recognizes its enormous scope. A true idea now means not only one that prepares us for an actual perception. It means also one that might prepare us for a merely possible perception, or one that, if spoken, would suggest possible perceptions to others, or suggest actual perceptions which the speaker cannot share. The ensemble of perceptions thus thought of as either actual or possible form a system which it is obviously advantageous to us to get into a stable and consistent shape; and here it is that the common-sense notion of permanent beings finds triumphant use. Beings acting outside of the thinker explain, not only his actual perceptions, past

and future, but his possible perceptions and those of every one else. Accordingly they gratify our theoretic need in a supremely beautiful way. We pass from our immediate actual through them into the foreign and the potential, and back again into the future actual, accounting for innumerable particulars by a single cause. As in those circular panoramas, where a real foreground of dirt, grass, bushes, rocks and a broken-down cannon is enveloped by a canvas picture of sky and earth and of a raging battle, continuing the foreground so cunningly that the spectator can detect no joint; so these conceptual objects, added to our present perceptual reality, fuse with it into the whole universe of our belief. In spite of all berkeleyan criticism, we do not doubt that they are really there. Tho our discovery of any one of them may only date from now, we unhesitatingly say that it not only is, but was there, if, by so saying, the past appears connected more consistently with what we feel the present to be. This is historic truth. Moses wrote the Pentateuch, we think, because if he didn't, all our religious habits will have to be undone. Julius Caesar was real, or we can never listen to history again. Trilobites were once alive, or all our thought about the strata is at sea. Radium, discovered only yesterday, must always have existed, or its analogy with other natural elements, which are permanent, fails. In all this, it is but one portion of our beliefs reacting on another so as to yield the most satisfactory total state of mind. That state of mind, we say, sees truth, and the content of its deliverances we believe.

我们现在可以稍看一看几种特殊的认识类型，以便更好地了解人道主义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它们。关于数学与逻辑型的认识，我们不必再做进一步说明，也不必再详细讨论我们对自然进程的描述性认识。只要它涉及预期，尽管那可能意味着摹写，如我们看见的那样，它也只不过指事先“准备好”而已。但是，就许多遥远的与未来的对象来

讲，它们与我们的实际联系是非常潜在的，遥不可及。比如，我们根本不可能用潮汐制动器来为阻止地球公转做好准备；尽管我们自认为真正认识过去，可我们与之根本没有实际的联系。显然，在寻求真实的现象描述时，虽然我们最初的出发点是完全的实际利益，但我们对纯粹的描述功能也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兴趣。无论它们能否产生附带的利益，我们希望这些叙述是真的。最初的功能已经形成了对纯粹练习的需求。这种理论上的好奇似乎就是人类独有的种属差异，而人道主义认识到这种差异的广泛性。那么，一个真观念不仅指一个让我们为实际的知觉做好准备的观念。它也指一个让我们为仅仅是可能的知觉做好准备的观念，或者指这样一个观念，即它一旦被说出，将为其他人提示各种可能的知觉，或者提示说话者自己不能分享的各种实际的知觉。这样被认为是实际的或可能的各种知觉的总和形成了一个系统，如果这个系统进入稳定的、连贯的形态显然对我们是有利的；在这里，对永恒的存在的常识性看法得到了成功的应用。在思考者之外起作用的存在，不仅解释了思考者过去及未来的实际的知觉，而且也解释了他和每一个其他人的可能的知觉。据此，它们以极好的方式满足了我们的理论需求。通过它们，我们从直接的、实际的知觉进入到陌生的、潜在的知觉，然后又回到未来的、实际的知觉中，只用一个原因对无数个具体事物做出解释。在那些圆形的全景画面中，真正的前景由泥土、草、树丛、岩石和出了故障的大炮组成，这个前景被包裹在天与地之间，画上是一个激战的场面，这个前景延续得如此巧妙，以至于观赏者简直看不出任何接点；这些概念对象也是一样，它们被加在我们目前的感知实在之上，并与之一起融入我们整个的信念宇宙。尽管有贝克莱信奉者的批评，我们并不怀疑这些概念对象的实际存在。尽管我们对其中任何一个的发现仅仅始于现在，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说，它不仅仅现在存在，而且过去也存在，如果这么说意味着过去似乎与我们所感知的现在有了更一致的联系。这就是历史真理。我们认为摩西写了“摩西五书”，因为如果他没写，我们的所有宗教习惯就得被推倒重来。恺撒大帝是真实的，否则我们再也不相信历史了。三叶虫曾经存在过，否则我们的岩层理论就讲不通。镭虽然最近才被发现，但它一定一直都存在，否则它与永久存在的其他自然元素之间的类比就不成立。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只是我们信念中的一部

分作用于另一部分，以便产生最令人满意的总体心理状态。我们说，这种心理状态发现了真理，以及它表达的内容，而我们是相信此内容的。

Of course, if you take the satisfactoriness concretely, as something felt by you now, and if, by truth, you mean truth taken abstractly and verified in the long run, you cannot make them equate, for it is notorious that the temporarily satisfactory is often false. Yet at each and every concrete moment, truth for each man is what that man “troweth” at that moment with the maximum of satisfaction to himself; and similarly, abstract truth, truth verified by the long run, and abstract satisfactoriness, long-run satisfactoriness, coincide. If, in short, we compare concrete with concrete and abstract with abstract, the true and the satisfactory do mean the same thing. I suspect that a certain muddling of matters hereabouts is what makes the general philosophic public so impervious to humanism's claims.

当然，如果你具体地看待这种满意，把它看作你现在感觉到的东西，而且如果你所说的真理指的是被抽象地看待并被最终证实的真理，那么你就不能将它们等同起来，因为众所周知暂时的满意往往是虚假的。可是，在每一个具体时刻，对一个人来说的真理是这个人那一刻“认为”最令他满意的；类似地，抽象真理、被最终证实的真理、抽象的满意、长期的满意都是一致的。简言之，如果我们用具体比较具体，用抽象比较抽象，那么真的和令人满意的确实指同样的东西。我怀疑，这些方面可能存在某种混淆不清的东西，致使哲学领域的一般人对人道主义的主张置之不理。

The fundamental fact about our experience is that it is a

process of change. For the “trower” at any moment, truth, like the visible area round a man walking in a fog, or like what George Eliot calls “the wall of dark seen by small fishes” eyes that pierce a span in the wide Ocean”, is an objective field which the next moment enlarges and of which it is the critic, and which then either suffers alteration or is continued unchanged. The critic sees both the first trower's truth and his own truth, compares them with each other, and verifies or confutes. His field of view is the reality independent of that earlier trower's thinking with which that thinking ought to correspond. But the critic is himself only a trower; and if the whole process of experience should terminate at that instant, there would be no otherwise known independent reality with which his thought might be compared.

我们经验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它是变化的过程。在任何时刻对信仰者来说，真理就像雾中行人能看到的区域，或者像乔治·艾略特所说的“小鱼的眼睛穿过广阔海洋中的一段距离所看到的黑幕”；对信仰者来说，这样的真理是一个下一时刻就会扩大的客观领域，它就是这一领域的批评者，然后这一领域或者经受改变，或者保持不变。批评者既能看到第一个信仰者的真理，也能看到自己的真理，他能比较它们，然后证实或驳倒它们。他的视野是独立于第一个信仰者思想的实在，但这个思想必须与那个实在相符合。但是，批评者本人只是一个信仰者；如果整个经验过程在那一时刻终结的话，就不可能有用其他方式认识的独立实在来与他的思想相比较了。

The immediate in experience is always provisionally in this situation. The humanism, for instance, which I see and try so hard to defend, is the completest truth attained from my point of view up to date. But, owing to the fact that all experience is a process, no point of view can ever be the last one. Every one is insufficient and

off its balance, and responsible to later points of view than itself. You, occupying some of these later points in your own person, and believing in the reality of others, will not agree that my point of view sees truth positive, truth timeless, truth that counts, unless they verify and confirm what it sees.

经验中直接的东西总是暂时处于这种状况。例如，我所理解的且竭力为之辩护的人道主义，是至今从我的观点中获得的最完整的真理。但是，所有经验都是一个过程，鉴于这一事实，没有哪种观点能成为最终的观点。每个观点都是不充分、不平衡的，并且对后来产生的其他观点做出反应。因为你自己占有某些后来的观点，相信其他观点的实在性，你不会同意这一点，即我的观点看到了事实的确定性、永恒性、重要性，除非你的观点证实并确认了我的观点所看到的这些。

You generalize this by saying that any opinion, however satisfactory, can count positively and absolutely as true only so far as it agrees with a standard beyond itself; and if you then forget that this standard perpetually grows up endogenously inside the web of the experiences, you may carelessly go on to say that what distributively holds of each experience, holds also collectively of all experience, and that experience as such and in its totality owes whatever truth it may be possessed-of to its correspondence with absolute realities outside of its own being. This evidently is the popular and traditional position. From the fact that finite experiences must draw support from one another, philosophers pass to the notion that experience *überhaupt* must need an absolute support. The denial of such a notion by humanism lies probably at the root of most of the dislike which it incurs.

你对此进行概括说，任何见解，无论多么令人满意，只要与它本身之外的标准一致，就能确定地、绝对地被看作是真的；如果你因此忘了这个标准永远内在地生长于经验网络内部，你可能漫不经心地接着说，以分散的方式适合每一个经验的，也共同地适合所有经验，而且，像这样的一个经验以及作为整体的经验如果具有什么的真理的话，那也是因为它与超越它自身存在的绝对实在相符合。这显然就是普遍的传统立场。有限的经验必须要相互支持，从这一事实哲学家得出结论：经验总的来说必须得到绝对的支持。人道主义理论否定这一观点，这也许就是它很不招人喜欢的根源。

But is this not the globe, the elephant and the tortoise over again? Must not something end by supporting itself? Humanism is willing to let finite experience be self-supporting. Somewhere being must immediately breast nonentity. Why may not the advancing front of experience, carrying its immanent satisfactions and dissatisfactions, cut against the black inane as the luminous orb of the moon cuts the caerulean abyss? Why should anywhere the world be absolutely fixed and finished? And if reality genuinely grows, why may it not grow in these very determinations which here and now are made?

但是，这不又回到了地球、大象和乌龟的老话题了吗？难道某物不能以支撑它自己结束吗？人道主义十分乐意让有限的经验自我支持。在某些地方，存在必须直接面对非实体。经验的前沿带着自身内在的满意和不满意，它为什么不能像发光的圆月穿越蓝色的苍穹那样，穿越黑暗的太虚勇往直前呢？为什么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应该是固定的、完结的呢？而且，如果实在真正在成长，它为何不在我们此时此地创造的这些确定的东西中成长呢？

In point of fact it actually seems to grow by our mental determinations, be these never so “true”. Take the “great bear” or “dipper” constellation in the heavens. We call it by that name, we count the stars and call them seven, we say they were seven before they were counted, and we say that whether any one had ever noted the fact or not, the dim resemblance to a long-tailed (or long-necked?) animal was always truly there. But what do we mean by this projection into past eternity of recent human ways of thinking? Did an “absolute” thinker actually do the counting, tell off the stars upon his standing number-tally, and make the bear-comparison, silly as the latter is? Were they explicitly seven, explicitly bear-like, before the human witness came? Surely nothing in the truth of the attributions drives us to think this. They were only implicitly or virtually what we call them, and we human witnesses first explicated them and made them “real”. A fact virtually pre-exists when every condition of its realization save one is already there. In this case the condition lacking is the act of the counting and comparing mind. But the stars (once the mind considers them) themselves dictate the result. The counting in no wise modifies their previous nature, and, they being what and where they are, the count cannot fall out differently. It could then always be made. Never could the number seven be questioned, IF THE QUESTION ONCE WERE RAISED.

实际上，它像是通过我们思想决定而成长的，尽管这些决定从来没有那么“真”。以天上的“大熊星座”或“北斗七星”为例。我们用那个名字来称呼它，我们数了星星的个数，然后叫它们七星；我们说，在没数之前它们也是七颗星；我们还说，无论人们注意到了没有，那个微微像一个长尾巴（或长脖子）的动物一直真正地存在于那个地方。但是，这样把人们新近的思维方式投射到过去的永恒中，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真的有一个“绝对”的思考者数过星星的数目，在立着的

记数符木上记录下了它们，并与熊做了比较——虽然这样做很愚蠢？在人类见证它们前，它们就明确地是七颗，明确地像熊了吗？当然，这些归属的真实性中没有任何东西促使我们这样想。它们只是隐含地或实质上是我们称呼它们的样子，我们人类见证者首先对它们做出了说明，并使它们成为“真的”。当一个事实实现的所有条件只缺一个时，该事实实质上就是先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缺少的那个条件就是数的行为及做比较的意识。但是，这些星星（一旦考虑了它们）自身指定了结果。数数根本不能改变它们以前的性质，而且，既然它们是那个样子，处于那个位置，数数也不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计数总是随时可以做。即使有人曾提出过疑问，数字七也是绝对不能受到质疑的。

We have here a quasi-paradox. Undeniably something comes by the counting that was not there before. And yet that something was always true. In one sense you create it, and in another sense you find it. You have to treat your count as being true beforehand, the moment you come to treat the matter at all.

这里看似产生了一个悖论。不可否认，计数带来了某些以前不存在的东西。然而，那个东西总是真的。从一种意义上可以说你创造了它，从另一种意义上可以说你发现了它。一旦你开始处理这个问题，你不得不把你的计数当成事先是真的。

Our stellar attributes must always be called true, then; yet none the less are they genuine additions made by our intellect to the world of fact. Not additions of consciousness only, but additions of “content”. They copy nothing that pre-existed, yet they agree with what pre-existed, fit it, amplify it, relate and connect it with a “wain”, a number-tally, or what not, and build it out. It seems to me

that humanism is the only theory that builds this case out in the good direction, and this case stands for innumerable other kinds of case. In all such cases, odd as it may sound, our judgment may actually be said to retroact and to enrich the past.

这样，星星的属性必须永远都被称作是真的；不过，它们也是我们的理智对事实世界添加的真实东西。这不仅是意识上的添加，也是“内容”上的添加。它们没有摹写先行存在的东西，但它们与先行存在的东西是一致的，适合它，放大它，把它与“战车”和记数符木等相联系，将它建构起来。在我看来，似乎只有人道主义理论才能以正确的趋势建构出这种状况，而这种状况为其他无数情况提供了范例。这虽然可能听起来奇怪，但在所有类似情况下，我们的判断可以被说是反作用于过去与丰富过去。

Our judgments at any rate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future reality by the acts to which they lead. Where these acts are acts expressive of trust,—trust, e.g., that a man is honest, that our health is good enough, or that we can make a successful effort,—which acts may be a needed antecedent of the trusted things becoming true. Professor Taylor says [4_6] that our trust is at any rate untrue when it is made, i. e. , before the action; and I seem to remember that he disposes of anything like a faith in the general excellence of the universe (making the faithful person's part in it at any rate more excellent) as a “lie in the soul”. But the pathos of this expression should not blind us to the complication of the facts. I doubt whether Professor Taylor would himself be in favor of practically handling trusters of these kinds as liars. Future and present really mix in such emergencies, and one can always escape lies in them by using hypothetic forms. But Mr. Taylor's attitude suggests such absurd possibilities of practice that it seems to me to illustrate beautifully

how self-stultifying the conception of a truth that shall merely register a standing fixture may become. Theoretic truth, truth of passive copying, sought in the sole interests of copying as such, not because copying is good for something, but because copying ought schlechthin to be, seems, if you look at it coldly, to be an almost preposterous ideal. Why should the universe, existing in itself, also exist in copies? How can it be copied in the solidity of its objective fulness? And even if it could, what would the motive be? “Even the hairs of your head are numbered.” Doubtless they are, virtually; but why, as an absolute proposition, ought the number to become copied and known? Surely knowing is only one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reality and adding to its effect.

无论怎样，我们的判断通过它们导致的行为改变了未来实在的性质。当这些行为是表示信任的行为时，比如相信某人诚实，相信我们的健康良好，或者相信我们能做出成功的努力，这些行为可能是实现被信任的事情的必要前提。泰勒教授 [5_6] 说，在我们的信任被表达的时候——即在行动之前，它无论如何是不真的；我似乎记得，任何事，就像认为宇宙总体上是卓越的这样的信念（使信任者在其中的作用无论怎样变得更卓越），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心灵的谎言”。但是，这种说法的感染力不应该使我们对事实的复杂性视而不见。我怀疑，泰勒教授自己是否真的会赞成把这类信任者实际上当成说谎者。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中，未来与现在实际上是混在一起的，一个人总能使用假说的形式在这些情况下避免撒谎。但是，泰勒先生的态度暗示着有这样做的荒唐可能性，以至于在我看来这种态度恰如其分地说明：把真理看作只是记录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这种观念是多么的乏味。理论上的真理即被动摹写的真理，探求它只是为了这样的被动摹写，不是因为摹写对某物有益，而是因为摹写绝对是应该的；这种理论上的真理，如果你冷静地看待它的话，看上去像是一个几近荒唐的理想。既然宇宙本身就存在，为什么还要以摹本的形式存在呢？它实实在在的客观丰富性怎能被摹写呢？即使能被摹写，这样做又是出于什么动

机呢？“即使是你的头发也有固定的根数。”它们无疑实质上是这样；但是，作为一个绝对的命题，为什么这个数字应当被摹写与认识呢？毫无疑问，认识只是与实在发生相互作用并增加其效果的一种途径。

The opponent here will ask: “Has not the knowing of truth any substantive value on its own account, apart from the collateral advantages it may bring? And if you allow theoretic satisfactions to exist at all, do they not crowd the collateral satisfactions out of house and home, and must not pragmatism go into bankruptcy, if she admits them at all?” The destructive force of such talk disappears as soon as we use words concretely instead of abstractly, and ask, in our quality of good pragmatists, just what the famous theoretic needs are known as and in what the intellectual satisfactions consist.

反对者在此会问：“除了它可能带来的附带利益之外，认识真理本身就没有什么独立的价值吗？而且，如果你允许理论上的满意存在的话，这种满意不会把附带的满意都扫地出门吗？如果实用主义认可了它们的话，它不就破产了吗？”一旦我们开始做以下的事情，这种谈话的破坏性力量就会消失：我们开始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使用词语，以真正的实用主义者的名义来问，那些所谓人人皆知的理论需要究竟是作为什么为人所知的呢？理智的满足到底存在何处？

Are they not all mere matters of consistency—and emphatically not of consistency between an absolute reality and the mind's copies of it, but of actually felt consistency among judgments, objects, and habits of reacting, in the mind's own experienceable world? And are not both our need of such consistency and our pleasure in it conceivable as outcomes of the natural fact that we are beings that

do develop mental habits—habit itself proving adaptively beneficial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 same objects, or the same kinds of objects, recur and follow “law”? If this were so, what would have come first would have been the collateral profits of habit as such, and the theoretic life would have grown up in aid of these. In point of fact, this seems to have been the probable case. At life's origin, any present perception may have been “true”—if such a word could then be applicable. Later, when reactions became organized, the reactions became “true” whenever expectation was fulfilled by them. Otherwise they were “false” or “mistaken” reactions. But the same class of objects needs the same kind of reaction, so the impulse to react consistently must gradually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a disappointment felt whenever the results frustrated expectation. Here is a perfectly plausible germ for all our higher consistencies. Nowadays, if an object claims from us a reaction of the kind habitually accorded only to the opposite class of objects, our mental machinery refuses to run smoothly. The situation is intellectually unsatisfactory.

这些不都仅仅是一致性问题吗？——明显不是绝对的实在与它的心智摹本之间的一致性，而是在心智自身可经验的世界内，判断、对象和反应习惯之间可以实际感觉到的一致性问题？而且，难道我们对一致性的需要和从中获得的愉悦，不能被相信是以下自然事实的结果吗？这个自然事实是，我们是形成心智习惯的存在——而在相同事物或同类事物反复发生和遵循“规律”的环境下，这种习惯本身证明对适应环境是有利的适应环境且有利。假如能这样看，首先产生的将会是这种习惯的附带利益，而理论生活在助长这些利益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实际上，情况可能原本就是如此。在生命之初，任何眼前的知觉都有可能是“真的”——如果这个词适用于那时的状态的话。稍后，当反应变得有组织时，只要反应能满足期望，它们就是真的。否则，它们就是“假的”或是“错误的”反应。但是，同一类对象需要同一类的反

应，因此做出一致反应的冲动就一定逐渐地建立起来，每当结果与期望发生冲突时，就会感到失望。对我们所有更高级的一致来说，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起源。今天，如果一个对象引起我们的一种反应，而这种反应习惯上只适应于相反的一类对象，那么我们的心智装置就会拒绝顺利地工作。这种情况从理智上来说是令人不满意的。

Theoretic truth thus falls within the mind, being the accord of some of its processes and objects with other processes and objects—“accord” consisting here in well-definable relations. So long as the satisfaction of feeling such an accord is denied us, whatever collateral profits may seem to inure from what we believe in are but as dust in the balance—provided always that we are highly organized intellectually, which the majority of us are not. The amount of accord which satisfies most men and women is merely the absence of violent clash between their usual thoughts and statements and the limited sphere of sense-perceptions in which their lives are cast. The theoretic truth that most of us think we “ought” to attain to is thus the possession of a set of predicates that do not explicitly contradict their subjects. We preserve it as often as not by leaving other predicates and subjects out.

因此，理论上的真理存在于我们的心智内部，是它的某些过程和对象与其他的过程和对象之间的一致，这里的“一致”存在于能明确界定的关系。只要我们不能获得感觉这种一致的满足感，我们从自己所相信的东西中获得的任何附带利益，就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要我们从理智上来说总是井井有条的，但我们大多数人并非是如此。使大多数男人和女人感到满意的一致，其程度仅仅意味着在他们通常的思想和陈述与有限的感觉和知觉范围（他们的生活局限于这个范围）之间没有发生剧烈冲突。因此，我们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应该”获得的理论上的真理，就是拥有一套与主词不发生明显矛盾的谓词。我们往往通

过忽略其他的谓词和主词来保存这种真理。

In some men theory is a passion, just as music is in others. The form of inner consistency is pursued far beyond the line at which collateral profits stop. Such men systematize and classify and schematize and make synoptical tables and invent ideal objects for the pure love of unifying. Too often the results, glowing with “truth” for the inventors, seem pathetically personal and artificial to bystanders. Which is as much as to say that the purely theoretic criterion of truth can leave us in the lurch as easily as any other criterion, and that the absolutists, for all their pretensions, are “in the same boat” concretely with those whom they attack.

有些人对理论充满激情，正像其他人对音乐一样。他们对内部一致性的形式追求，远远超过了附带利益的范围。出于对整齐划一的纯粹爱好，这种人建立体系、类别、图式，做归纳表，创造理想物。虽然得出的结果在创造者看来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但是它们在旁观者看来却经常充满可怜的主观性和矫揉造作。这几乎等于是说，纯粹理论上的真理标准会跟其他标准一样很容易使我们陷入困境，而绝对论者，不管他们如何装模作样，事实上与他们攻击的对象都“同乘一条危船”。

I am well aware that this paper has been rambling in the extreme. But the whole subject is inductive, and sharp logic is hardly yet in order. My great trammel has been the non-existence of any definitely stated alternative on my opponents” part. It may conduce to clearness if I recapitulate, in closing, what I conceive the main points of humanism to be. They are these:

我很清楚，这篇文章东拉西扯到了极致。但是其整个主题是归纳性的，不一定需要严格的逻辑。我的最大障碍是，我的反对者没有明确地陈述可替代的理论。最后，再扼要地总结一下我所认为的人道主义的要点，有助于澄清一些问题。这些要点是：

1．An experience, perceptual or conceptual, must conform to reality in order to be true.

1．无论是知觉的还是概念的经验，都必须与实在相一致才能是真的。

2．By “reality” humanism means nothing more than the other conceptual or perceptual experiences with which a given present experience may find itself in point of fact mixed up. [4_7]

2．人道主义所说的“实在”只不过是指其他概念经验或知觉经验，某个当下的经验可能发现它实际上跟这些经验混合在一起。 [5_7]

3．By “conforming”, humanism means taking account-of in such a way as to gain any intellectually and practically satisfactory result.

3．人道主义所说的“符合”，是指以某种方式做出考虑，以便在理智上和实践上能取得满意的结果。

4．To “take account-of” and to be “satisfactory” are terms that admit of no definition, so many are the ways in which these requirements can practically be worked out.

4．“考虑”和“满意”这两个术语是无法界定的，因为实际满足这些要求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5．Vaguely and in general, we take account of a reality by preserving it in as unmodified a form as possible. But, to be then satisfactory, it must not contradict other realities outside of it which claim also to be preserved. That we must preserve all the experience we can and minimize contradiction in what we preserve, is about all that can be said in advance.

5．笼而统之地讲，我们通过尽量保留实在的原有形式来考虑它。但是，要想令人满意的话，它就不能与同样要求被保留的外在于它的其他实在相矛盾。我们必须保留一切能保存的经验，并在我们保留的东西中尽量减少矛盾，这几乎就是事先所能说的全部东西。

6．The truth which the conforming experience embodies may be a positive addition to the previous reality, and later judgments may have to conform to it. Yet, virtually at least, it may have been true previously. Pragmatically, virtual and actual truth mean the same thing: the possibility of only one answer, when once the question is raised.

6．一致的经验中所体现的真理，可能对先前的实在是一个确定

的添加，其后的判断可能必须与它相符合。可是，至少从实质上来看，这种添加可能以前就是真的。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实质上的真理和事实上的真理指的都是一回事：一旦问题被提出时，答案可能只有一个。

[4_1].Reprinted, with slight verbal revision, from Mind, vol. xiii, N.S., p. 457 (October, 1904). A couple of interpolations from another article in Mind, "Humanism and truth once more", in vol. xiv, have been made.

[4_2]."Practical" in the sense of PARTICULAR, of course, not in the sense that the consequences may not be MENTAL as well as physical.

[4_3].I know of no "mere" pragmatist, if MERENESS here means, as it seems to, the denial of all concreteness to the pragmatist's thought.

[4_4].Vol. ii, pp. 641 ff.

[4_5].Mental things which are realities of course within the mental world.

[4_6].In an article criticising Pragmatism (as he conceives it) in the McGill University Quarterly published at Montreal, for May, 1904.

[4_7].This is meant merely to exclude reality of an "unknowable" sort, of which no account in either perceptual or conceptual terms can be given. It includes of course any amount of empirical reality independent of the knower. Pragmatism is thus "epistemologically" realistic in its account.

[5_1].本文转载自《心灵》杂志，新序号第13卷，第457页，文字略作修改（1904年10月）。采用了同一杂志14卷的另一篇文章“再论人道主义与真理”中的一些内容作为补充。

[5_2].“实际的”这里当然指特殊的，不是说这些效果不能既是物质的又是心理的。

[5_3].如果单单的这里指——像它看上去的样子——对实用主义思想所有具体性的否定，那么我就不知道有任何“单单的”实用主义者存在。

[5_4].原书第二卷，自第641页起。

[5_5].心理事物这里当然指心理世界中的实在。

[5_6].在一篇批评实用主义（他所认为的那种）的文章中，该文登载于《麦吉尔大学季刊》上，蒙特利尔，1904年5月。

[5_7].这只是为了排除“不可认识的”那种实在，对之，无论从知觉上还是从概念上都无法描述。这当然包括独立于认识者之外的任何数量的经验实在。因此，实用主义的描述“在认识论上”是唯实论的。

Chapter IV The Relation Between Knower and Known

第四章　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的关系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e subject and its object have been treated as absolutely discontinuous entities; and thereupon the presence of the latter to the former, or the "apprehension" by the former of the latter, has assumed a paradoxical character which all sorts of theories had to be invented to overcome. Representative theories put a mental "representation", "image", or "content" into the gap, as a sort of intermediary. Commonsense theories left the gap untouched, declaring our mind able to clear it by a self-transcending leap. Transcendentalist theories left it impossible to traverse by finite knowers, and brought an absolute in to perform the saltatory act. All the while, in the very bosom of the finite experience, every conjunction required to make the relation intelligible is given in full. Either the knower and the known are: (1) the self-same piece of experience taken twice over in different contexts; or they are (2) two pieces of actual experience belonging to the same subject, with definite tracts of conjunctive transitional experience between them; or (3) the known is a possible experience either of that subject or another, to which the said conjunctive transitions would lead, if sufficiently prolonged. [5_1]

在整个哲学史中，主体与其客体一直被当作是绝对非连续的实体；因此，后者对前者的呈现，或者前者对后者的"理解"，就带有悖论的特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种各样的理论应运而生。表征理论将一个心理的"表象"、"影像"或者"内容"作为一种中介成分填入二者间的鸿沟中。常识性的理论没有触及这个鸿沟，宣称我们的心灵能够

通过一个自我超越的跳跃来跃过它。先验论的理论认为有限的认识者无法越过这个鸿沟，并引入绝对原则来完成这个跳跃行为。自始至终，就在有限的经验内部，为使关系变得可理解所需的每个连接关系都被完整给定。认识者和被认识者或者是：（1）在不同的情境下被两次看待的完全相同的一个经验；它们或者是：（2）属于同一个主体的两个实际经验，二者之间有连接的、过渡的经验所构成的确定通道；或者是：（3）被认识者是那个主体或另外一个主体可能的经验，如果上面说的连接性的过渡能持续得足够长，它就可能导致这种经验。[6_1]

To discuss all the ways in which one experience may function as the knower of another, would be incompatible with the limits of this essay. I have treated of type 1, the kind of knowledge called perception, in an article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 for September 1, 1904, called “Does consciousness exist?” This is the type of case in which the mind enjoys direct “acquaintance” with a present object. In the other types the mind has “knowledge-about” an object not immediately there. Type 3 can always formally and hypothetically be reduced to type 2, so that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at type will now put the present reader sufficiently at my point of view, and make him see what the actual meanings of the mysterious cognitive relation may be.

本文篇幅有限，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讨论一种经验作为另一种经验的认识者而发挥作用的全部方式。在1904年9月1日《哲学研究》上一篇题为“意识存在吗？”的文章中，我谈到了第一种类型，即被称作知觉的那种认识。在这种情形中，心灵对当前对象产生直接的“熟识”。在其他两种类型中，心灵对不是直接存在于那里的对象有“相关知识”。第3类总是可以从形式上以及假定地归结到第2类，因此，对第三类进行简短的描述很快就能使读者明白我的观点，让他看到神秘

的认知关系的实际意义可能是什么。

Suppose me to be sitting here in my library at Cambridge, at ten minutes' walk from “Memorial Hall”, and to be thinking truly of the latter object. My mind may have before it only the name, or it may have a clear image, or it may have a very dim image of the hall, but such an intrinsic difference in the image makes no difference in its cognitive function. Certain extrinsic phenomena, special experiences of conjunction, are what impart to the image, be it what it may, its knowing office.

假设我坐在剑桥这里我的书房内，它离“纪念堂”有10分钟路程，我确实正在想纪念堂这个对象。我的心里也许仅有“纪念堂”这个名字，或者可能有纪念堂的一个或清晰或非常模糊的影像，但是影像上这种内在差别在认知功能上却没有任何差别。某些外在现象，即特殊的连接经验，把影像的认识职责赋予了它，无论这个影像可能是什么。

For instance, if you ask me what hall I mean by my image, and I can tell you nothing; or if I fail to point or lead you towards the Harvard Delta; or if, being led by you, I am uncertain whether the Hall I see be what I had in mind or not; you would rightly deny that I had “meant” that particular hall at all, even tho my mental image might to some degree have resembled it. The resemblance would count in that case as coincidental merely, for all sorts of things of a kind resemble one another in this world without being held for that reason to take cognizance of one another.

例如，如果你问我的影像指的是什么厅堂，而我什么也告诉不了你；或者如果我未能指向或把你引向哈佛大学的Delta楼；或者如果在你的引领下我不确定我看见的纪念堂是否就是我心中的那个；那么，你可以合理地否认我本来“意指”那个特定的礼堂，即使我心里的影像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它。在这种情况下，相似会被当作仅仅是巧合，因为这个世界上同类的各种东西都互相类似，但它们没有因此被认为是相互认识。

On the other hand, if I can lead you to the hall, and tell you of its history and present uses; if in its presence I feel my idea, however imperfect it may have been, to have led hither and to be now terminated; if the associates of the image and of the felt hall run parallel, so that each term of the one context corresponds serially, as I walk, with an answering term of the other; why then my soul was prophetic, and my idea must be, and by common consent would be, called cognizant of reality. That percept was what I meant, for into it my idea has passed by conjunctive experiences of sameness and fulfilled intention. Nowhere is there jar, but every later moment continues and corroborates an earlier one.

另一方面，如果我能将你带到礼堂，告诉你它的历史及目前的用途；无论我的观念可能是多么不完美，如果在礼堂面前我感到它导向了此处，感觉它现在到终点了；如果这个影像的关联物和被感觉到的厅堂的关联物并行存在，以至于在我行进的过程中，一个情境中的每个用语都与另一个情境中的应答词语依次对应；那么，我的心灵就是先知的，我的观念也必须被看作是认识了实在，一般的共识也会认为如此。那个知觉就是我所意指的，因为凭借对相同和获得满足的意愿的连接性的经验，我的观念已经进入了知觉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不协调，但是后来的每一个时刻都继续并证实着前一个时刻。

In this continuing and corroborating, taken in no transcendental sense, but denoting definitely felt transitions, LIES ALL THAT THE KNOWING OF A PERCEPT BY AN IDEA CAN POSSIBLY CONTAIN OR SIGNIFY. Wherever such transitions are felt, the first experience KNOWS the last one. Where they do not, or where even as possibles they can not, intervene, there can be no pretence of knowing. In this latter case the extremes will be connected, if connected at all, by inferior relations—bare likeness or succession, or by “withness” alone. Knowledge of sensible realities thus comes to life inside the tissue of experience. It is made; and made by relations that unroll themselves in time. Whenever certain intermediaries are given, such that, as they develop towards their terminus, there is experience from point to point of one direction followed, and finally of one process fulfilled, the result is that THEIR STARTING-POINT THEREBY BECOMES A KNOWER AND THEIR TERMINUS AN OBJECT MEANT OR KNOWN. That is all that knowing (in the simple case considered) can be known-as, that is the whole of its nature, put into experiential terms. Whenever such is the sequence of our experiences we may freely say that we had the terminal object “in mind” from the outset, even altho at the outset nothing was there in us but a flat piece of substantive experience like any other, with no self-transcendency about it, and no mystery save the mystery of coming into existence and of being gradually followed by other pieces of substantive experience, with conjunctively transitional experiences between. That is what we mean here by the object's being “in mind”. Of any deeper more real way of its being in mind we have no positive conception, and we have no right to discredit our actual experience by talking of such a way at all.

这个继续和证实过程不能在超验的意义加以理解，而是指确切地感觉到的过渡，其中存在着观念对知觉的认识可能包含或意指的所有东西。在能感觉到这种过渡的任何地方，第一个经验就认识了最后一个经验。在这种过渡不介入，或者甚至作为可能的东西没能介入的地方，就不可能假装认识。在后一种情况中，这些极端如果被连接的话，连接它们的也是低级的关系——即单纯的相似或接续，或者是仅仅通过“在一起”的关系。这样，在经验的结构内，对可感觉的实在的认识就孕育而生。它是被造就的，是由适时自我展现的关系所造就成的。每当某些中介成分被给定时，随着它们向着自己的终点发展，沿着某个被遵循的方向从一点到另一点，从一个被完成过程的一点到另一点，就产生了经验，这时，结果是它们的起点从而成了认识者，并且它们的终点成了被意指或被认识的对象。这就是认识（在这个简单的事例中）可能为人所知的东西，从经验的角度讲，这就是其全部本性。每当这是我们的经验顺序时，我们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在思想中”一开始就有最终的对象，尽管在开始时我们心中除了一个平淡无奇的真实经验外什么都没有，这种经验与其他的并无二致，没有自我超越性，也没有神秘之处，其神秘之处只表现在它开始进入存在的过程，以及被其他真实经验逐步追随的过程，其间存在着连接地过渡的经验。当我们说对象“存在于思想中”时，这就是我们所指的意思。至于其“存在于思想中”更深的、更真实的方式，我们没有确定的概念，而且，我们根本没有权利妄谈这种方法，而怀疑我们的实际经验。

I know that many a reader will rebel at this. “Mere intermediaries”, he will say, “even tho they be feelings of continuously growing fulfilment, only separate the knower from the known, whereas what we have in knowledge is a kind of immediate touch of the one by the other, an 'apprehension' in the etymological sense of the word, a leaping of the chasm as by lightning, an act by which two terms are smitten into one over the head of their distinctness. All these dead intermediaries of yours are out of each other, and outside of their termini still.”

我知道很多读者会对此持排斥态度。他们会说："区区中介成分，即使它们是越来越接近完成状态的感觉，只不过分开了认识者与被认知者，而我们的认识中所存在的却是一个对另一个的那种直接接触，是'理解'这个词在词源上的意义，是一种闪电般地跨越鸿沟，是一种把两个不同的词合二为一的行为。你的所有这些无生气的中介成分，彼此都没有联系，仍旧处于它们的终点之外。"

But do not such dialectic difficulties remind us of the dog dropping his bone and snapping at its image in the water? If we knew any more real kind of union aliunde, we might be entitled to brand all our empirical unions as a sham. But unions by continuous transition are the only ones we know of, whether in this matter of a knowledge-about that terminates in an acquaintance, whether in personal identity, in logical prediction through the copula "is", or elsewhere. If anywhere there were more absolute unions, they could only reveal themselves to us by just such conjunctive results. These are what the unions are worth, these are all that we can ever practically mean by union, by continuity. Is it not time to repeat what Lotze said of substances, that to act like one is to be one? Should we not say here that to be experienced as continuous is to be really continuous, in a world where experience and reality come to the same thing? In a picture gallery a painted hook will serve to hang a painted chain by, a painted cable will hold a painted ship. In a world where both the terms and their distinctions are affairs of experience, conjunctions that are experienced must be at least as real as anything else. They will be "absolutely" real conjunctions, if we have no transphenomenal absolute ready, to derealize the whole experienced world by, at a stroke.

但是，这种辩证上的困难，不也让我们想起了那条丢掉骨头、对着自己水中的影子汪汪叫的狗吗？假如我们知道某种更为真实的其他结合，也许我们就能有权把自己的所有经验性的结合称为骗局。但是，这种通过持续过渡而形成的结合是我们知道的唯一结合，无论在这种止于熟识的相关知识方面，还是在个人认同方面，即在通过连系动词“是”所做的合乎逻辑的预测方面，抑或在其他方面。假如某处存在更为绝对的结合，它们只能通过这种连接的结果显现给我们。这些就是结合的价值，这些就是我们实际上意指的结合、连续性。这里是否应该重述一下洛采对实体的看法，即像某物一样行为就是成为该物呢？难道我们这里不应该说：在经验与实在合为一物的世界里，体验中是连续的就是真正连续的吗？在一个画廊中，被画的一个钩子将用来挂一条被画的链子，被画的一条缆索是用来锁住一艘被画的船。在一个用语及其区别都归结为经验的世界里，体验到的连接必须至少跟其他东西一样真实。它们将是“绝对”真实的连接，藉此使体验的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不真实——如果我们没有超现象的绝对使世界变得如此的话。

So much for the essentials of the cognitive relation where the knowledge is conceptual in type, or forms knowledge “about” an object. It consists in intermediary experiences (possible, if not actual) of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progress, and, finally, of fulfilment, when the sensible percept which is the object is reached. The percept here not only verifies the concept, proves its function of knowing that percept to be true, but the percept's existence as the terminus of the chain of intermediaries creates the function. Whatever terminates that chain was, because it now proves itself to be, what the concept “had in mind”.

有关认知关系的基本要素就谈这么多，在这种关系中，认识属于概念型的，或形成了“有关”某个客体的认识。它存在于对不断发展的

进程的各种中介经验（如果不是实际的经验，也是可能的经验）之中，并最终存在于处在完成状态的各种中介经验——当作为客体的可感觉的知觉对象被触及时。在这里，知觉对象不仅证实了概念，证明了它认识到那个知觉对象为真的功能，而且这个知觉对象作为中介成分链的终点的存在，也创造了此功能。无论什么东西终结了那个链，它都是这个概念“心中”的东西——因为它现在已经证明了自身是这样。

The towering importance for human life of this kind of knowing lies in the fact that an experience that knows another can figure as its representative, not in any quasi-miraculous “epistemological” sense, but in the definite, practical sense of being its substitute in various operations, sometimes physical and sometimes mental, which lead us to its associates and results. By experimenting on our ideas of reality, we may save ourselves the trouble of experimenting on the real experiences which they severally mean. The ideas form related systems, corresponding point for point to the systems which the realities form; and by letting an ideal term call up its associates systematically, we may be led to a terminus which the corresponding real term would have led to in case we had operated on the real world. And this brings us to the general question of substitution.

这种认识对人类生活的突出重要性在于如下事实：一种认识其他经验的经验可以当作其他经验的代表，这不是在近乎奇迹般的认识论意义上来讲，而是在各种运作中作为其代替物的确定的、实际的意义上来讲，这些运作有时是物质上的，有时是精神上的，它们把我们引向这个经验的关联物和结果。通过对实在的观念进行实验，我们可以省去一些麻烦，不必再用这些观念各自代表的实际经验做实验。这些观念形成相互联系的系统，与实在所形成的系统存在点对点的符合；

通过让一个理想的语汇系统地唤起其关联物，我们可以被引导向一个终点，当我们对现实世界施加作用时，相应的实际语汇也可以把我们引向这个终点。而这把我们引向了“代替”这个一般性的问题。

What, exactly, in a system of experiences, does the “substitution” of one of them for another mean?

在一个经验系统内，由其中一个经验来“代替”另一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According to my view, experience as a whole is a process in time, whereby innumerable particular terms lapse and are superseded by others that follow upon them by transitions which, whether disjunctive or conjunctive in content, are themselves experiences, and must in general be accounted at least as real as the terms which they relate. What the nature of the event called “superseding” signifies, depends altogether on the kind of transition that obtains. Some experiences simply abolish their predecessors without continuing them in any way. Others are felt to increase or to enlarge their meaning, to carry out their purpose, or to bring us nearer to their goal. They “represent” them, and may fulfil their function better than they fulfilled it themselves. But to “fulfil a function” in a world of pure experience can be conceived and defined in only one possible way. In such a world transitions and arrivals (or terminations) are the only events that happen, tho they happen by so many sorts of path. The only function that one experience can perform is to lead into another experience; and the only fulfilment we can speak of is the reaching of a certain experienced end. When one experience leads to (or can lead to) the

same end as another, they agree in function. But the whole system of experiences as they are immediately given presents itself as a quasi-chaos through which one can pass out of an initial term in many directions and yet end in the same terminus, moving from next to next by a great many possible paths.

在我看来，经验在整体上看是一个时间上的过程，通过此过程，不计其数的特定术语流逝，被过渡过程中紧随其后的其他语汇所取代，而无论这些过渡过程在内容上是断续的还是接续的，它们本身也是经验，至少在总体上应被解释为与它们相联系的词语一样真实。被称作“取代”的事件的本质意味着什么，这完全取决于所存在的过渡的种类。一些经验只是废止了以前的经验，而不以任何方式延续它们。另外一些则被认为是增加或扩大了以前的经验的意义，执行了它们的目的，或让我们更为接近其目标。它们“代表”以前的经验，而且可能比后者自身能更好地完成其功能。但是，在一个纯经验的世界中所谓“完成一项功能”，只能以一种可能的方式加以设想和定义。在这个世界里，过渡与到达（或终点）是发生的唯一事件，尽管它们发生的途径多种多样。一种经验能发挥的唯一功能就是引入另一种经验；我们能谈论的唯一完成就是到达某个被体验到的终点。当一种经验引向（或能引向）与另一种经验相同的终点，它们在功能上就是一致的。但是，直接体验到的整个经验系统自身表现为一个半混沌状态，通过它人们能够从许多方向超越起初的词语，却终止于相同的终点，通过众多可能的路径从一个点移向下一个点。

Either one of these paths might be a functional substitute for another, and to follow one rather than another might on occasion be an advantageous thing to do. As a matter of fact, and in a general way, the paths that run through conceptual experiences, that is, through “thoughts” or “ideas” that “know” the things in which they terminate, are highly advantageous paths to follow. Not

only do they yield inconceivably rapid transitions; but, owing to the "universal" character [5_2] which they frequently possess, and to their capacity for association with one another in great systems, they outstrip the tardy consecutions of the things themselves, and sweep us on towards our ultimate termini in a far more labor-saving way than the following of trains of sensible perception ever could. Wonderful are the new cuts and the short-circuits the thought-paths make. Most thought-paths, it is true, are substitutes for nothing actual; they end outside the real world altogether, in wayward fancies, utopias, fictions or mistakes. But where they do re-enter reality and terminate therein, we substitute them always; and with these substitutes we pass the greater number of our hours.[1]

其中任何一条路径都可能在功能上替代另一条，而且，遵循一条路径而不是另一条有时可能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那些贯穿概念性经验的路径是能遵循的极为有利的路径，它们也就是那些贯穿了"认识"它们所终结事物的"思想"或"观念"的路径。它们不仅产生了难以想象地快的过渡；而且，由于它们往往具有的一种"普遍的"特性 [6_2] ，由于它们在宏大的系统中能建立互相联系，它们超越了事物本身缓慢的连续，让我们迅速地接近最后的终点，这一方式远比跟随一串串可感的知觉更省力气。这些思想路径创造的近道或捷径真是太精彩了！的确，大多数思想路径并不是实际事物的替代物；它们终结于现实世界之外，可能是以奇思妙想、乌托邦、空想或错误的方式。但是，当它们确实再次进入现实世界并终止于此时，我们总会替代它们；伴着这种替代物我们度过了更多的时间。[1]

1: This is why I called our experiences, taken all together, a quasi-chaos. There is vastly more discontinuity in the sum total of experiences than we commonly suppose. The objective nucleus of

every man's experience, his own body, is, it is true, a continuous percept; and equally continuous as a percept (though we may be inattentive to it) is the material environment of that body, changing by gradual transition when the body moves. But the distant parts of the physical world are at all times absent from us, and form conceptual objects merely, into the perceptual reality of which our life inserts itself at points discrete and relatively rare. Round their several objective nuclei, partly shared and common partly discrete of the real physical world, innumerable thinkers, pursuing their several lines of physically true cogitation, trace paths that intersect one another only at discontinuous perceptual points, and the rest of the time are quite incongruent; and around all the nuclei of shared "reality" floats the vast cloud of experiences that are wholly subjective, that are non-substitutional, that find not even an eventual ending for themselves in the perceptual world—the mere day-dreams and joys and sufferings and wishes of the individual minds. These exist WITH one another, indeed, and with the objective nuclei, but out of them it is probable that to all eternity no inter-related system of any kind will ever be made.

1: 这就是我为什么把我们的全部经验称之为半混沌状态。在全部经验中的中断比我们平常所预想的要多得多。确实，每个人经验的客观核心——即他自己的

身体——是一个连续的知觉对象；同样作为知觉对象而连续的（尽管我们也许没有在意到它），就是那个身体的物质环境，它随着身体的移动而慢慢地发生转变。但是，物质世界的遥远区域对我们来说总是无法触及的，它们仅仅构建了概念上的对象罢了，我们的生活在不连续的且相对稀少的点上进入了这些对象的可知觉的实在中。围绕他们的几个客观核心——这些核心一部分是共同分享的，另一部分是分离于实际的物质世界的，无数的思想者沿着几条在物质上真实的认知路线，循着那些只在不连续的知觉点上才相互交叉、而在其他时候却非常不一致的路径；在全部共享的“实在”的核心周围漂浮着大片经验的云雾，这些经验完全是主观上的，不可替代性的，在知觉世界里甚至无法为自己找到最终的结局——它们仅仅是个体心中的白日梦、欢乐、痛苦和希望罢了。的确，这些经验相互依存，而且与客观核心也是共存的，但是很可能永远无法从它们中产生出任何相互联系的系统。

Whosoever feels his experience to be something substitutional even while he has it, may be said to have an experience that reaches beyond itself. From inside of its own entity it says “more”, and postulates reality existing elsewhere. For the transcendentalist, who holds knowing to consist in a salto mortale across an “epistemological chasm”, such an idea presents no difficulty; but it seems at first sight as if it might be inconsistent with an empiricism like our own. Have we not explained that conceptual knowledge is made such wholly by the existence of things that fall outside of the knowing experience itself—by intermediary experiences and by a terminus that fulfils?

即使在一个人拥有经验时，只要他感觉到自己的经验是某种替代性的东西，人们就可以说他有了一种超越经验自身的经验。从经验自身的实体内它表达出了“更多”，而且假定了其他地方存在实在。对一位先验论者——他认为认识在于越过“认识论鸿沟”的致命一跃，这种观念不会造成任何困难；但乍一看它似乎与我们的经验论是不符的。概念认识被弄成这样，完全是由于认识经验本身之外的那些事物的存在，即由中介经验和到达的终点造成的，对此我们不是已经做出了说明吗？

Can the knowledge be there before these elements that constitute its being have come? And, if knowledge be not there, how can objective reference occur?

在构成知识存在的要素出现之前，它能存在吗？并且，如果认识不存在的话，怎么会产生客观的指称关系呢？

The key to this difficulty lies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knowing as verified and completed, and the same knowing as in transit and on its way. To recur to the Memorial Hall example lately used, it is only when our idea of the Hall has actually terminated in the percept that we know “for certain”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it was truly cognitive of that. Until established by the end of the process, its quality of knowing that, or indeed of knowing anything, could still be doubted; and yet the knowing really was there, as the result now shows. We were virtual knowers of the Hall long before we were certified to have been its actual knowers, by the percept's retroactive validating power. Just so we are “mortal” all the time, by reason of the virtuality of the inevitable event which will make us so when it shall have come.

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区分同一个认识在证实了的、完成了的状态与处于过渡中的、进行中的状态。再回到刚用过的纪念堂的例子，只有当我们对纪念堂的观念实际地终止于知觉对象时，我们才“确定地”知道该观念一开始就真正认知了该事物。直到该观念被过程的终结所确立之前，它认识该事物的性质，或更确切地说它认识任何事物的性质，仍然可能受到怀疑；可是，像结果现在所显示的那样，认识的确已经存在于那里了。知觉对象具有回溯确认力，我们在被这一力量证实为纪念堂的实际认识者之前很久一段时间内，我们是它虚拟的认识者。同样，我们一直都是“不免一死的”，因为必然事件中存在虚拟性，当它到来时总会使我们如此。

Now the immensely greater part of all our knowing never gets beyond this virtual stage. It never is completed or nailed down. I speak not merely of our ideas of imperceptibles like ether-waves or dissociated “ions”, or of “ejects” like the contents of our neighbors” minds; I speak also of ideas which we might verify if we would take the trouble, but which we hold for true altho unterminated perceptually, because nothing says “no” to us, and there is no contradicting truth in sight. To continue thinking unchallenged is, ninety-nine times out of a hundred, our practical substitute for knowing in the completed sense. As each experience runs by cognitive transition into the next one, and we nowhere feel a collision with what we elsewhere count as truth or fact, we commit ourselves to the current as if the port were sure. We live, as it were, upon the front edge of an advancing wave-crest, and our sense of a determinate direction in falling forward is all we cover of the future of our path. It is as if a differential quotient should be conscious and treat itself as an adequate substitute for a traced-out curve. Our experience, inter alia, is of variations of rate and of direction, and lives in these transitions more than in the journey's end. The

experiences of tendency are sufficient to act upon—what more could we have done at those moments even if the later verification comes complete?

我们绝大部分的认识都从未超越这个虚拟阶段。它从未被完成或确定下来。我所说的不仅仅是我们对感觉不到的事物的观念，像以太波或分散的“离子”，或者是像我们邻居的心智内容这样的“外推物”；我所说的还包括一些只要不怕麻烦就能证实的观念，可是，它们尽管从知觉上说还未结束，却被我们认为是真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对我们说“不”，也看不到任何与之相矛盾的真理。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继续不受挑战地思考就是我们完成认识的实际替代。随着每一种经验通过认知上的转变与下一个经验相遇，而且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感觉到它与我们在别处看作是真理或事实的东西相冲突，我们就会紧随当前的水流，似乎港湾就在眼前。我们就像住在一个前行波浪的浪尖上，在涌向前方的过程中，我们对确定方向的感觉是我们对路途的未来所能了解的所有东西。就像是一个微分系数应该有意识，并把自己看作是一条被描绘出的曲线的充分替代物。除了其他特点之外，我们的经验还有速率和方向上的变化，它更多地是处于这种转变过渡之中，而不是处于旅途的终点。对倾向的经验就足以让我们依之去行动——即使事后的证实完成，我们在之前那些时刻还能多做什么呢？

This is what, as a radical empiricist, I say to the charge that the objective reference which is so flagrant a character of our experiences involves a chasm and a mortal leap. A positively conjunctive transition involves neither chasm nor leap. Being the very original of what we mean by continuity, it makes a continuum wherever it appears. Objective reference is an incident of the fact that so much of our experience comes as an insufficient and consists of process and transition. Our fields of experience have no more definite boundaries than have our fields of view. Both are fringed

forever by a MORE that continuously develops, and that continuously supersedes them as life proceeds. The relations, generally speaking, are as real here as the terms are, and the only complaint of the transcendentalist's with which I could at all sympathize would be his charge that, by first making knowledge to consist in external relations as I have done, and by then confessing that nine-tenths of the time these are not actually but only virtually there, I have knocked the solid bottom out of the whole business, and palmed off a substitute of knowledge for the genuine thing. Only the admission, such a critic might say, that our ideas are self-transcendent and “true” already; in advance of the experiences that are to terminate them, can bring solidity back to knowledge in a world like this, in which transitions and terminations are only by exception fulfilled.

作为彻底的经验主义者，这就是我对下述指责做出的回应：这种指责说，客观的指称关系是我们经验的一个彰明昭著的特性，它涉及了一个鸿沟及一个致命的跳跃。一个确定地连接性的过渡既不会涉及鸿沟也不会涉及跳跃。它代表我们说连续时最原始的意思，只要它一出现就会产生连续统一体。客观的指称关系是下述事实的一种表现，即我们的很多经验都是不充分的，它们由过程和转变构成。我们的经验领域与视域一样都没有明确的界限。二者的边缘永远是一个更多，它随着生活的进展而不断地发展，并不断超越这些领域。一般来说，这种关系与词语一样真实，我唯一能表示同情的先验论者的指控就是：如果像我那样先让认识存在于外部联系中，然后再承认这些关系十有八九不是实际存在的，而是虚拟存在的，那么，我已经破坏了整个事情的坚实基础，用认识的替代品欺骗性地代替了真实事物。这类批评者可能会说，只有承认在先于终止观念的经验之前，我们的观念是自我超越的且已经是“真的”，才能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把坚实的基础带回到认识中，因为在这个世界里，过渡和终止都只是在例外情况下才会被完成。

This seems to me an excellent place for applying the pragmatic method. What would the self-transcendency affirmed to exist in advance of all experiential mediation or termination, be known-as? What would it practically result in for us, were it true?

这里，我觉得是应用实用主义方法的绝妙时机。被确认为先于所有经验中介或终点而存在的自我超越，它被认为是什么呢？假如它是真的，它对我们会产生怎样的实际影响呢？

It could only result in our orientation, in the turning of our expectations and practical tendencies into the right path; and the right path here, so long as we and the object are not yet face to face (or can never get face to face, as in the case of ejects), would be the path that led us into the object's nearest neighborhood. Where direct acquaintance is lacking, “knowledge about” is the next best thing, and an acquaintance with what actually lies about the object, and i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it, puts such knowledge within our grasp. Ether-waves and your anger, for example, are things in which my thoughts will never perceptually terminate, but my concepts of them lead me to their very brink, to the chromatic fringes and to the hurtful words and deeds which are their really next effects.

它只能使我们确定方向，把我们的期望和实际倾向转向正确的路径；而只要我们与对象还没有面对面（或者像外推物一样永远不可能面对面），这条正确的路径就是将我们引导向距对象最近的区域的那条路径。在缺乏直接的熟识的地方，“相关认识”就是最佳选择了，而且，熟识对象周围的事物以及与之最密切相关的事物，就等于把这种认识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中。比如以太波和你的愤怒，它们是我的思想

永远不能从知觉上终结的东西，但是我对它们的概念把我引向它们的边缘，引向它们五彩斑斓的缘饰，引向代表它们接下来产生的真实效果的伤人的言行。

Even if our ideas did in themselves possess the postulated self-transcendency, it would still remain true that their putting us into possession of such effects would be the sole cash-value of the self-transcendency for us. And this cash-value, it is needless to say, is *verbatim et liberatim* what our empiricist account pays in. On pragmatist principles therefore, a dispute over self-transcendency is a pure logomachy. Call our concepts of ejective things self-transcendent or the reverse, it makes no difference, so long as we don't differ about the nature of that exalted virtue's fruits—fruits for us, of course, humanistic fruits.

即使我们的观念中确实具有被假定的自我超越，下述论断仍然会是真的：这些观念把我们置于这种效果的掌控中，这正是自我超越对我们唯一的兑现价值。不用说，这种兑现价值完全是我们经验主义者的账户支付的。因此，根据实用主义的原则，有关自我超越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文字游戏。无论把我们对外推物的观念称作自我超越还是与之相反的名称，这都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我们对崇高美德的成果的性质不存在争议——这种成果对我们来说当然都是人道主义的成果。

The transcendentalist believes his ideas to be self-transcendent only because he finds that in fact they do bear fruits. Why need he quarrel with an account of knowledge that insists on naming this effect? Why not treat the working of the idea from next to next as the essence of its self-transcendency? Why insist that knowing is a static relation out of time when it practically seems so much a

function of our active life? For a thing to be valid, says Lotze, is the same as to make itself valid. When the whole universe seems only to be making itself valid and to be still incomplete (else why its ceaseless changing?) why, of all things, should knowing be exempt? Why should it not be making itself valid like everything else? That some parts of it may be already valid or verified beyond dispute, the empirical philosopher, of course, like any one else, may always hope.

先验论者相信他的观念是自我超越的，这仅仅是因为他发现它们实际上确实能产生成果。如果有一种认识坚持对这一效果进行命名，他为何要与对这一认识的描述发生争执呢？为什么不把一个个观念的作用当成它自我超越的本质呢？当认识实际上似乎是我们积极生活的一个重要功能时，为什么却坚持它在时间上是一种静态关系呢？洛采说，让某事物变得有效，就如同使它本身有效。当整个宇宙似乎只在使它自身有效且仍然不完备时（不然的话它为何不断地变化？），为什么只有认识在所有事物中是个例外呢？为什么它不能使自己像其他东西一样变得有效呢？经验主义哲学家，像其他人一样，当然也总是希望：认识的某个部分可能已经是有效的或者被毫无争议地证实了的。

[5_1].Extract from an article entitled "A World of Pure Experience",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 etc., September 29, 1904.

[5_2].Of which all that need be said in this essay is that it also can be conceived as functional, and defined in terms of transitions, or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6_1].节选自一篇题为“纯经验世界”的文章，该文刊登于《哲学研究》（1904年9月29日）等上。

[6_2].对此，这篇文章中需要指出的是，它也可以被当作是功能上的，而且用过渡或过渡的可能性来加以定义。

Chapter V The Essence of Humanism

第五章　人道主义的本质

I

一

Humanism is a ferment that has “come to stay”. It is not a single hypothesis or theorem, and it dwells on no new facts. It is rather a slow shifting in the philosophic perspective, making things appear as from a new centre of interest or point of sight. Some writers are strongly conscious of the shifting, others half unconscious, even though their own vision may have undergone much change. The result is no small confusion in debate, the half-conscious humanists often taking part against the radical ones, as if they wished to count upon the other side. [6_1] If humanism really be the name for such a shifting of perspectiv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whole scene of the philosophic stage will change in some degree if humanism prevails. The emphasis of things, their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distribution, their sizes and values, will not keep just the same. [6_2] If such pervasive consequences be involved in humanism, it is clear that no pains which philosophers may take, first in defining it, and then in furthering, checking, or steering its progress, will be thrown away. [6_3]

人道主义是一个“永久存在”的酵母。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假设或定理，也不驻留于新的事实。相反，它代表哲学视角上的逐渐转变，使事物从新的兴趣中心或视点展现出来。有些作者能强烈地意识到这种转变，而另外一些只是半意识到，尽管他们本人的视野可能已经经历

了很大改变。结果在辩论中产生了不小的混乱，半意识的人道主义者经常参与反对激进的人道主义者，就好像他们希望站到另外一边。[7_1] 如果人道主义真是这一视角转变的代名词，那么，如果它占据了优势，哲学舞台的整个场景显然都将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事物的重心，其前景与背景的分布，其规模与价值，都将不会一成不变。 [7_2] 如果人道主义中涉及如此广泛存在的结果，哲学家们在界定它、完善它、验证它、引导它等方面所花费的心血，显然都不会付诸东流。[7_3]

It suffers badly at present from incomplete definition. Its most systematic advocates, Schiller and Dewey, have published fragmentary programmes only; and its bearing on many vital philosophic problems has not been traced except by adversaries who, scenting heresies in advance, have showered blows on doctrines—subjectivism and scepticism, for example—that no good humanist finds it necessary to entertain. By their still greater reticences, the anti-humanists have, in turn, perplexed the humanists. Much of the controversy has involved the word “truth”. It is always good in debate to know your adversary's point of view authentically. But the critics of humanism never define exactly what the word “truth” signifies when they use it themselves. The humanists have to guess at their view; and the result has doubtless been much beating of the air. Add to all this, grea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both camps, and it becomes clear that nothing is so urgently needed, at the stage which things have reached at present, as a sharper definition by each side of its central point of view.

眼下，人道主义正苦于没有完整的定义。席勒与杜威是它最系统的倡导者，他们只是发表了些支离破碎的纲要；它与许多重大哲学问题的关系还未获得深入探讨，倒是那些反对者，他们似乎事先嗅到了

异端气息，对一些学说展开猛烈的抨击，比如对主观主义与怀疑论，对此，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则认为没有必要给予认同。反人道主义者们则采取了更为缄默的态度，反而使人道主义者们感到困惑。论战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到“真理”一词。在辩论中，能切实了解对手的观点总是有好处的。但是，当人道主义的批评者本人使用“真理”一词时，他们却从来没有确切地界定过它的意思。人道主义者们不得不猜测批评者的观点；其结果毫无疑问很像是无的放矢。更糟糕的是，两个阵营中的个体差别很大；很明显，事情发展到现阶段，当务之急莫过于双方对各自的核心观点做出更清晰的界定。

Whoever will contribute any touch of sharpness will help us to make sure of what's what and who is who. Any one can contribute such a definition, and, without it, no one knows exactly where he stands. If I offer my own provisional definition of humanism now and here, others may improve it, some adversary may be led to define his own creed more sharply by the contrast, and a certain quickening of the crystallization of general opinion may result.

无论是谁，要能使定义变得更清晰，就会帮助我们弄清双方各自在说什么，哪个人属于哪个阵营。任何一个人都能提供这样的定义，不然的话，就没人知道他到底站在哪一边。如果我此时此地提出自己对人道主义的临时定义，其他人可以完善它，反对者也可以通过对照方式把自己的信条界定得更清晰，结果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共识的形成。

The essential service of humanism, as I conceive the situation, is to have seen that tho one part of our experience may lean upon another part to make it what it is in any one of several aspects in which it may be considered, experience as a whole is self-containing

and leans on nothing. Since this formula also expresses the main contention of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it needs abundant explication to make it unambiguous. It seems, at first sight, to confine itself to denying theism and pantheism. But, in fact, it need not deny either; everything would depend on the exegesis; and if the formula ever became canonical, it would certainly develop both right-wing and left-wing interpreters. I myself read humanism theistically and pluralistically. If there be a God, he is no absolute all-experiencer, but simply the experiencer of widest actual conscious span. Read thus, humanism is for me a religion susceptible of reasoned defence, tho I am well aware how many minds there are to whom it can appeal religiously only when it has been monistically translated. Ethically the pluralistic form of it takes for me a stronger hold on reality than any other philosophy I know of—it being essentially a social philosophy, a philosophy of "CO", in which conjunctions do the work. But my primary reason for advocating it is its matchless intellectual economy. It gets rid, not only of the standing "problems" that monism engenders ("problem of evil", "problem of freedom", and the like), but of other metaphysical mysteries and paradoxes as well.

据我对实际情况的看法，人道主义的基本用途就是看到：尽管我们的一部分经验可能依靠另外一部分经验，以便使它在被考虑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现在的样子，但是经验作为一个整体是自足的，不依赖任何东西。既然该公式也表达了先验的唯心主义的主要主张，它需要大量的解释来加以澄清。乍一看，它似乎只局限于否定有神论及泛神论。但事实上，它不必否定其中任何一个理论，一切都取决于解释；假如它想成为有权威的公式，那就肯定会产生右翼和左翼的解释者。我自己给予人道主义以有神论及多元论的解读。假如真有上帝存在，他不是绝对的全经验者，而只是在最广泛的实际意识范围内的经验者。如果这样理解，人道主义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为之做合理辩护的

宗教，尽管我很清楚，只有给它一个一元论的阐释时，它才能对许多人有宗教上的吸引力。从伦理学上看，其多元论的形式在我们看来比我了解的其他任何哲学都更看重实在——因为它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哲学，一种有关“共同”的哲学，其中连接关系起着决定作用。但是，我倡导它的主要理由是它无与伦比的理智上的简约。它不仅摆脱了一元论造成的固有“问题”（如“罪恶问题”、“自由问题”等等），而且摆脱了其他的形而上学的疑团与悖论。

It gets rid, for example, of the whole agnostic controversy, by refusing to entertain the hypothesis of trans-empirical reality at all. It gets rid of any need for an absolute of the bradleyan type (avowedly sterile for intellectual purposes) by insisting that the conjunctive relations found within experience are faultlessly real. It gets rid of the need of an absolute of the roycean type (similarly sterile) by its pragmatic treatment of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As the views of knowledge, reality and truth imputed to humanism have been those so far most fiercely attacked, it is in regard to these ideas that a sharpening of focus seems most urgently required. I proceed therefore to bring the views which I impute to humanism in these respects into focus as briefly as I can.

例如，通过拒绝接受对超经验的实在的假设，它摆脱了整个不可知论的论争。通过坚持认为在经验内发现的连接关系是真实的、无懈可击的，它摆脱对布拉德雷式的绝对的需要（即它对理智的目的明显毫无用处）。通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处理认识问题，它摆脱了对罗伊斯式的绝对的需要（它同样对理智的目的无益）。因为被归咎于人道主义的认识观、实在观和真理观是迄今受到最猛烈抨击的观点，进一步澄清这些方面的观点似乎有迫切必要。那么接下来，我将在这几个方面尽量简明扼要地解释一下我理解的人道主义的观点。

II

二

If the central humanistic thesis, printed above in italics, be accepted, it will follow that, if there be any such thing at all as knowing, the knower and the object known must both be portions of experience. One part of experience must, therefore, either (1) Know another part of experience—in other words, parts must, as Professor Woodbridge says, [6_4] represent one another instead of representing realities outside of “consciousness”—this case is that of conceptual knowledge; or else

如果接受上文斜体部分表述的人道主义的核心论点，这就意味着，假如认识这样的东西是存在的，认识者与被认识对象就一定都是经验的组成部分。这样，经验的一部分必须：或者（1）认识经验的另一部分，换言之，正如伍德布里奇教授所说， [7_4] 这些部分必须彼此互为表征，而不是表征“意识”之外的实在——这种情况属于概念性认识的情况；

(2) They must simply exist as so many ultimate thats or facts of being, in the first instance; and then, as a secondary complication, and without doubling up its entitative singleness, any one and the same that in experience must figure alternately as a thing known and as a knowledge of the thing, by reason of two divergent kinds of context into which, in the general course of experience, it gets woven. [6_5]

（2）或者它们必须首先像许多终极的那个或存在的事实一样存

在；然后，作为一个次一级的难题，且不必对其实体的单一性进行加倍，任何一个和经验中相同的对应事物，必须在被认识的事物与对事物的认识间交替现身，这是在经验的总体进程中它被联系到两种不同的情境中所产生的结果。 [7_5]

This second case is that of sense-perception. There is a stage of thought that goes beyond common sense, and of it I shall say more presently; but the common-sense stage is a perfectly definite halting-place of thought, primarily for purposes of action; and, so long as we remain on the common-sense stage of thought, object and subject FUSE in the fact of “presentation” or sense-perception– the pen and hand which I now SEE writing, for example, ARE the physical realities which those words designate. In this case there is no self-transcendency implied in the knowing. Humanism, here, is only a more comminuted *identitatsphilosophie* .

这第二种情况属于感官——知觉的情况。存在着一个超越常识的思想阶段，稍后我将对之做更多说明；但是，常识阶段却是一个完全明确的思想暂居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行动；而且，只要我们处在常识的思想阶段，客体与主体就会融合在“表现”或感官 - 知觉的事实里，比如我现在看见的正在写作的笔和手，就是那些词指示的物理实在。在这种情况中，认识中并不含有自我超越的意思。这里，人道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更为细分的同一哲学。

In case (1), on the contrary, the representative experience does transcend itself in knowing the other experience that is its object. No one can talk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one by the other without seeing them as numerically distinct entities, of which the one lies beyond the other and away from it, along some direction and with

some interval, that can be definitely named. But, if the talker be a humanist, he must also see this distance-interval concretely and pragmatically, and confess it to consist of other intervening experiences—of possible ones, at all events, if not of actual. To call my present idea of my dog, for example, cognitive of the real dog means that, as the actual tissue of experience is constituted, the idea is capable of leading into a chain of other experiences on my part that go from next to next and terminate at last in vivid sense-perceptions of a jumping, barking, hairy body. Those are the real dog, the dog's full presence, for my common sense. If the supposed talker is a profound philosopher, altho they may not BE the real dog for him, they mean the real dog, are practical substitutes for the real dog, as the representation was a practical substitute for them, that real dog being a lot of atoms, say, or of mind-stuff, that lie WHERE the sense-perceptions lie in his experience as well as in my own.

相反，在第一种情况中，表征的经验在认识作为其对象的另外一个经验时确实超越了它自己。没人能说一种经验为另一种经验所认识，而不把它们看作是数目上有区别的实体，其中一个沿着某一方向、有间隔地居于另一个之外，并与它保持距离，二者都可以被明确地加以命名。但是，如果说话者是一名人道主义者，他一定会具体而实用地看待这一距离——间隔，并且承认它由其他介入性的经验组成——这些经验如果不是实际存在的至少应该是可能的。比如，把我现在对于我的狗的观念称作对一条实际存在的狗的认知，这意味着，正如实际的经验组织所构成的那样，这一观念能在我心中导向一连串其他经验，它们一个接着一个，最终结束于活蹦乱跳、旺旺叫、毛茸茸的身体这些生动的感官——知觉上。对我的常识而言，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狗，是它的完整呈现。如果这位假定的说话者是一位渊博的哲学家，尽管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可能不是实际存在的狗，但其所知的却是那条狗，是那条狗的实际替代物，正像表象是这些东西的实际替代

物一样，比如说，那条实际存在的狗是许多原子（构成的），或者说是心理素材，在他的经验和我的经验中，这些原子和心理素材存在于感官——知觉存在的地方。

III

三

The philosopher here stands for the stage of thought that goes beyond the stage of common sense; and the difference is simply that he “interpolates” and “extrapolates”, where common sense does not. For common sense, two men see the same identical real dog. Philosophy, noting actual differences in their perceptions, points out the duality of these latter, and interpolates something between them as a more real terminus—first, organs, viscera, etc.; next, cells; then, ultimate atoms; lastly, mind-stuff perhaps. The original sense-termini of the two men, instead of coalescing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real dog-object, as at first supposed, are thus held by philosophers to be separated by invisible realities with which, at most, they are conterminous.

这里的哲学家代表了超出常识阶段的思想阶段；两个阶段的区别仅仅在于哲学家既“内插”也“外推”，而常识则不然。从常识判断，两个人看到的是同一条实在的狗。哲学注意到他们在知觉上的实际区别，指出这些知觉的二元性，并在他们之间插入某个东西作为更实在的终点——首先是器官、内脏等，接着是细胞，然后是终极的原子，最后可能是心理素材。两个人原初的感官终点，没有像一开始假设的那样彼此合一，并与实在的狗这个对象合一，而是被哲学家们认为由至多与它们同处一个边界内的不可见的实在分离。

Abolish, now, one of the percipients, and the interpolation changes into “extrapolation”. The sense-terminus of the remaining percipient is regarded by the philosopher as not quite reaching reality. He has only carried the procession of experiences, the philosopher thinks, to a definite, because practical, halting-place somewhere on the way towards an absolute truth that lies beyond.

如果取消其中的一个知觉者，插入就变成了“外推”。在哲学家看来，剩下的那位知觉者的感官终点并不能完全达到实在。哲学家认为，这个知觉者只是把经验的进程带到了一个确定的（因为它是实际的）通往远方绝对真理的道路上的某处暂居地。

The humanist sees all the time, however, that there is no absolute transcendency even about the more absolute realities thus conjectured or believed in. The viscera and cells are only possible percepts following upon that of the outer body. The atoms again, tho we may never attain to human means of perceiving them, are still defined perceptually. The mind-stuff itself is conceived as a kind of experience; and it is possible to frame the hypothesis (such hypotheses can by no logic be excluded from philosophy) of two knowers of a piece of mind-stuff and the mind-stuff itself becoming “confluent” at the moment at which our imperfect knowing might pass into knowing of a completed type. Even so do you and I habitually conceive our two perceptions and the real dog as confluent, tho only provisionally, and for the common-sense stage of thought. If my pen be inwardly made of mind-stuff, there is no confluence now between that mind-stuff and my visual perception of the pen. But conceivably there might come to be such confluence; for, in the case of my hand, the visual sensations and the inward feelings of the hand, its mind-stuff, so to speak, are even

now as confluent as any two things can be.

然而，人道主义者一直认识到，即使在这样推想出或所信仰的更绝对的实在上，也不存在绝对的超验。内脏和细胞只不过是可能的感知对象，伴随身体外部的感知而来。再就是原子，尽管我们无法获得感知到它们的人工手段，却扔然能从知觉上来定义它们。心理素材本身就被看作是一种经验；而且有可能构建出如下假设（这种假设根据任何逻辑都不能被排除在哲学之外）：在我们不完备的认识可能过渡到完备认识的那一刻，一件心理素材的两个认识者与心理素材本身会发生“汇合”。即使这样，你我习惯上把我们两个的知觉和实在的狗看作是汇合的，尽管这只是暂时的看法，是常识思想阶段的看法。假如我的笔从内部来看是由心理素材制成，现在那种心理素材与我对笔的视觉和知觉就没有发生汇合。但是也可以设想后来会产生这种汇合；因为就拿我的手来说，对手的视觉感觉和内在感觉，即其心理素材，即使现在也像任何两个东西一样是汇合的。

There is, thus, no breach in humanistic epistemology. Whether knowledge be taken as ideally perfected, or only as true enough to pass muster for practice, it is hung on one continuous scheme. Reality, howsoever remote, is always defined as a terminus within the general possibilities of experience; and what knows it is defined as an experience that “represents” it, in the sense of being substitutable for it in our thinking because it leads to the same associates, or in the sense of “pointing to it” through a chain of other experiences that either intervene or may intervene.

因此，人道主义认识论并无破绽。无论知识被当作是完美无缺的，或仅仅被认为是真的，足以符合投入实践的标准，它都是依靠同一个连续的设计。实在无论是多么遥远，总是被定义为经验的总体可

能性内部的一个终点；认识它的事物被定义为“表征”它的一种经验，这或者是从下述意义上来说的：该经验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代替它，因为它导向同一些关联物；或者在下述意义上来说的：通过一连串介入的或可能介入的其他经验来“指向它”。

Absolute reality here bears the same relation to sensation as sensation bears to conception or imagination. Both are provisional or final termini, sensation being only the terminus at which the practical man habitually stops, while the philosopher projects a “beyond”, in the shape of more absolute reality. These termini, for the practical and the philosophical stages of thought respectively, are self-supporting. They are not “true” of anything else, they simply are, are real. They “lean on nothing”, as my italicized formula said. Rather does the whole fabric of experience lean on them, just as the whole fabric of the solar system, including many relative positions, leans, for its absolute position in space, on any one of its constituent stars. Here, again, one gets a new *identitats philosophie* in pluralistic form.

这里，绝对的实在与感觉之间的关系，同感知与观念或想象的关系是一样的。两者都可以是暂时的或最后的终点，感觉只是重实践的人习惯性停留的终点，而哲学家则以更绝对实在的形态投射出一个“彼岸”。这两个终点分别对应于思想的实践阶段和哲学阶段，它们都是可以自立的。它们并不是对其他任何事物来说是“真的”，它们只是“存在”，是实在的。它们“不依赖任何东西”，正如我上文用斜体标出的公式所言。相反，整个经验的结构都依靠它们，正如整个太阳系的结构（包括许多相对位置）为了它在空间中的绝对位置，要依赖任何一个构成太阳系的星体。这里，我们再次得到了一个新的、多元论形式的同一哲学。

IV

四

If I have succeeded in making this at all clear (tho I fear that brevity and abstractness between them may have made me fail), the reader will see that the “truth” of our mental operations must always be an intra-experiential affair. A conception is reckoned true by common sense when it can be made to lead to a sensation. The sensation, which for common sense is not so much “true” as “real”, is held to be provisionally true by the philosopher just in so far as it covers (abuts at, or occupies the place of) a still more absolutely real experience, in the possibility of which, to some remoter experient, the philosopher finds reason to believe.

如果我成功地把这些表述清楚了（尽管我担心其中的简洁与抽象可能让我失败），读者将会明白，我们心智作用的“真理”必须总是经验内部的事情。当一个概念能引发某种感觉时，就被常识当作是真的。这种在常识看来与其说是“真的”，不如说是“真实的”感觉，被哲学家认为暂时是真的，只要它涵盖了一个更为绝对真实的经验（毗邻或占据这个经验的位置），对一些更遥远的经验者来说，哲学家有理由相信这一经验存在的可能性。

Meanwhile what actually does count for true to any individual trower, whether he be philosopher or common man, is always a result of his apperceptions. If a novel experience, conceptual or sensible, contradict too emphatically our pre-existent system of beliefs, in ninety-nine cases out of a hundred it is treated as false. Only when the older and the newer experiences are congruous enough to mutually apperceive and modify each other, does what

we treat as an advance in truth result. In no case, however, need truth consist in a relation between our experiences and something archetypal or trans-experiential. Should we ever reach absolutely terminal experiences, experiences in which we all agreed, which were superseded by no revised continuations, these would not be true, they would be real, they would simply BE, and be indeed the angles, corners, and linchpins of all reality, on which the truth of everything else would be stayed. Only such other things as led to these by satisfactory conjunctions would be “true”. Satisfactory connection of some sort with such termini is all that the word “truth” means. On the common-stage of thought sense-presentations serve as such termini. Our ideas and concepts and scientific theories pass for true only so far as they harmoniously lead back to the world of sense.

同时，对任何个体信奉者来说，无论他是哲学家还是普通人，实际上确实算作真的事物永远是其统觉的结果。如果一个新的经验，无论是概念性的还是感性的，与我们先存的信念系统发生过于明显的矛盾，那么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它会被当作是假的。只有当更老、更新的经验有足够的一致，使它们相互统觉和修正时，才能产生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上的进步。然而，在任何情况下，真理都不必存在于我们的经验与某个原型或超验事物的关系中。假如我们能获得绝对终极的经验，我们对这种经验都取得了一致，而且不会有修正后的经验来取代它，那么这些经验就不是真的，它们是实在的，它们只是存在着，并且全部实在的边角及关键部分也的确是存在的，而其他一切事物的真理都仰赖它们。只有被令人满意的连接引导到这些经验的其他事物才是“真的”。同这样的终点实现某种满意的连接，代表了“真理”这个词的核心意思。在思想的常识阶段，感官——呈现就充当这些终点。只有当我们的观念、概念和科学理论能协调地引回到感官的世界时，它们才被当作是真的。

I hope that many humanists will endorse this attempt of mine to trace the mor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at way of viewing things. I feel almost certain that Messrs. Dewey and Schiller will do so.

我试图追溯到人道主义观点的一些更基本特征，希望许多人道主义者赞赏我这种做法。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杜威和席勒两位先生会支持我。

If the attackers will also take some slight account of it, it may be that discussion will be a little less wide of the mark than it has hitherto been.

如果批评者也能对我的解释做稍加考虑，那么相关的讨论也许不会像迄今那样文不对题。

[6_1].Reprinted from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 vol. ii. No. 5, March 2, 1905.

[6_2].Professor Baldwin, for example. His address "Selective Think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January, 1898, reprinted in his volum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seems to me an unusually well written pragmatic manifesto. Nevertheless in "The Limits of Pragmatism" (ibid., January, 1904), he (much less clearly) joins in the attack.

[6_3].The ethical changes, it seems to me, are beautifully made evident in Professor Dewey's series of articles, which will never get the attention they deserve till they are printed in a book. I mean: "The Significance of Emotions",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ii, 13; "The Reflex Arc Concept in Psychology", ibid., iii, 357; "Psychology and Social Practice", ibid., vii, 105; "Interpretation of Savage Mind", ibid., ix, 217; "Green's Theory of the Moral Motiv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i, 593; "Self-realization as the Moral Ideal", ibid., ii, 652; "The Psychology of Effort", ibid., vi, 43; "The Evolutionary Method as Applied to Morality", ibid., xi, 107, 353;

"Evolution and Ethics", Monist, vol. viii, 321; to mention only a few.

[6_4].In Science, November 4, 1904, p. 599.

[6_5].This statement is probably excessively obscure to any one who has not read my two articles "Does Consciousness Exist?" and "A World of Pure Experience"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 vol. i, 1904.

[7_1].重印自《哲学、心理学及科学方法杂志》，第二卷，第5期，1905年3月2日。

[7_2].比如鲍德温教授。在我看来，他题为“选择性的思维”的演讲（载于1898年1月《心理学评论》，也被收入他的选集《发展与进化》一书内）是篇写得特别好的实用主义宣言。然而，在“实用主义的局限”一文中（见上引杂志，1904年1月），他却（不太清楚地）加入了攻击实用主义的行列。

[7_3].在我看来，杜威教授的一系列文章巧妙而清晰地谈到了伦理上的变化，然而在这些文章汇总出版成一本书之前，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中的一小部分包括：“情绪的意义”，《心理学评论》，第2卷，第13页；“心理学的反射弧概念”，同上，第3卷，第357页；“心理学与社会实践”，同上，第7卷，第105页；“野性思维的诠释”同上，第9卷，第217页；“格林道德动机理论”，《哲学评论》，第1卷，第593页；“作为道德理想的自我实现”，同上，第2卷，第652页；“努力心理学”，同上，第6卷，第43页；“进化方法在道德上的应用”，同上，第11卷，第107页、353页；“进化与伦理学”，《一元论者》，第8卷，第321页。

[7_4].见《科学》，1904年11月4日，第599页。

[7_5].对于没读过我的“意识存在吗？”和“纯经验的世界”这两篇文章的人来说，这个陈述可能过于晦涩。两篇文章载于《哲学研究》第1卷，1904年。

Chapter VI A Word More About Truth

第六章　再谈真理

I

一

My failure in making converts to my conception of truth seems, if I may judge by what I hear in conversation, almost complete. An ordinary philosopher would feel disheartened, and a common choleric sinner would curse God and die, after such a reception. But instead of taking counsel of despair, I make bold to vary my statements, in the faint hope that repeated droppings may wear upon the stone, and that my formulas may seem less obscure if surrounded by something more of a “mass” whereby to apperceive them. [7_1]

如果从我听到的言论来判断，在说服别人认同我的真理观上我几乎是完全失败了。受到这样的冷遇之后，一名普通的哲学家将会感到灰心，而一个性情暴戾的罪人将会诅咒上帝，乃至一命呜呼。但是，与其采纳绝望的建议，我大胆地变换了自己的陈述方式，抱着点滴的希望，相信滴水可能穿石，相信如果我的公式周围能有一个类似于“主体”的东西来据此统觉它们，它们就可能看起来不那么费解。[8_1]

For fear of compromising other pragmatists, whoe'er they be, I will speak of the conception which I am trying to make intelligible, as my own conception. I first published it in the year 1885, in the

first article reprinted in the present book. Essential theses of this article were independently supported in 1893 and 1895 by Professor D. S. Miller [7_2] and were repeated by me in a presidential address on “The knowing of things together” [7_3] in 1895. Professor Strong, in an article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 etc. [7_4] entitled “A naturalistic theory of the reference of thought to reality”, called our account “the James–Miller theory of cognition”, and, as I understood him, gave it his adhesion. Yet, such is the difficulty of writing clearly in these penetralia of philosophy, that each of these revered colleagues informs me privately that the account of truth I now give—which to me is but that earlier statement more completely set forth—is to him inadequate, and seems to leave the gist of real cognition out. If such near friends disagree, what can I hope from remoter ones, and what from unfriendly critics?

为了不牵涉其他实用主义者——不管他们是谁，我将只谈及我试图澄清的概念，即我个人的真理观。我在1885年首次发表了这个观点，并重印于本书第一章。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分别在1893年和1895年得到了D. S. 米勒教授 [8_2] 的支持，并且我于1895年在一篇题为“对总体事物的认识” [8_3] 的会长演讲中进行了重申。斯特朗教授在《哲学研究》等 [8_4] 上面发表了一篇题为“有关思想指称实在的自然主义理论”文章，将我们的言论称作“詹姆斯 - 米勒认知理论”，而且我认为他是持赞成态度的。然而，在这些深奥的哲学问题上，清楚地表达自己是如此之困难，以至于每一位我深受尊敬的同事都在私下里告知我，我现在对真理的解释在他们看来是不充分的，似乎漏掉了真正的认知方面的核心问题，虽然对我而言，现在的解释只不过是对早期陈述的更完整的表达。如果连这些亲密的朋友都不赞同的话，我又能从较疏远的朋友和敌对的批评者那里指望什么呢？

Yet I feel so sure that the fault must lie in my lame forms of

statement and not in my doctrine, that I am fain to try once more to express myself. Are there not some general distinctions which it may help us to agree about in advance? Professor Strong distinguishes between what he calls “saltatory” and what he calls “ambulatory” relations. “Difference”, for example, is saltatory, jumping as it were immediately from one term to another, but “distance” in time or space is made out of intervening parts of experience through which we ambulate in succession. Years ago, when T. H. Green's ideas were most influential, I was much troubled by his criticisms of English sensationalism. One of his disciples in particular would always say to me, “Yes! terms may indeed be possibly sensational in origin; but relations, what are they but pure acts of the intellect coming upon the sensations from above, and of a higher nature?” I well remember the sudden relief it gave me to perceive one day that space-relations at any rate were homogeneous with the terms between which they mediated. The terms were spaces, and the relations were other intervening spaces. [7_5] For the Greenites space-relations had been saltatory, for me they became thenceforward ambulatory.

可是，我感觉十分确定的是，问题肯定出在我蹩脚的陈述方式上，而不是我的学说上，因而我愿意再次试着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是否存在有助于我们事先取得一致的一些一般区别呢？斯特朗教授区分了两种关系，他称之为“跳跃的”和“移动的”关系。例如，“差异”属于跳跃的关系，似乎从一个词语直接跳到另一个上去，但时空上的“距离”则是由经验的中介部分造成，通过这些中介部分我们连续的移走。多年前，当T. H. 格林的观念最有影响力的时候，他对英国感觉主义的批评着实令我感到不安。尤其是他的一个信徒，他总是对我说，“是的！词语的确有可能源于感觉；但是是什么关系呢？它们不就是自感觉上来的，并且本质上更为高级的纯理智行为吗？”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当我觉察到空间关系无论如何与它们联系协调的词

语是同质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词语就是空间，而关系是其他的介入空间。 [8_5] 对于格林派来说，空间关系是跳跃的，而对我来说，它们自此之后成为移动的了。

Now the most general way of contrasting my view of knowledge with the popular view (which is also the view of most epistemologists) is to call my view ambulatory, and the other view saltatory; and the most general way of characterizing the two views is by saying that my view describes knowing as it exists concretely, while the other view only describes its results abstractly taken.

现在，把我的认识观与流行的观点（也是大多数认识论学者的观点）进行对照时，最普遍的方式是把我的观点称作是移动的，把他们的观点称作是跳跃的；描述这两种观点的典型特征时，最普遍的方式是说，我的观点把认识描述为具体的存在，而他们的观点仅仅抽象地描述认识的结果。

I fear that most of my recalcitrant readers fail to recognize that what is ambulatory in the concrete may be taken so abstractly as to appear saltatory. Distance, for example, is made abstract by emptying out whatever is particular in the concrete intervals—it is reduced thus to a sole “difference”, a difference of “place”, which is a logical or saltatory distinction, a so-called “pure relation”.

我担心，大多数不服气的读者不能认识到，具体事物中的移动的东西可能被抽象地对待，以至于看起来似乎是跳跃的。例如，如果将具体间隔中特殊的东西清空，距离就被抽象化，它就因此被还原为一个单一的“差异”，即“位置”的差异，而这是一个逻辑上的或跳跃的区

别，是一个所谓的“纯粹关系”。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relation called “knowing”, which may connect an idea with a reality. My own account of this relation is ambulatory through and through. I say that we know an object by means of an idea, whenever we ambulate towards the object under the impulse which the idea communicates. If we believe in so-called “sensible” realities, the idea may not only send us towards its object, but may put the latter into our very hand, make it our immediate sensation. But, if, as most reflective people opine, sensible realities are not “real” realities, but only their appearances, our idea brings us at least so far, puts us in touch with reality's most authentic appearances and substitutes. In any case our idea brings us into the object's neighborhood, practical or ideal, gets us into commerce with it, helps us towards its closer acquaintance, enables us to foresee it, class it, compare it, deduce it,—in short, to deal with it as we could not were the idea not in our possession.

这同样适用于被称作“认识”的关系，它把一个观念与一个实在联系在一起。我对这个关系的解释彻头彻尾是流动式的。我指出，每当我们在一个观念传达的冲动下移向一个对象时，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观念认识该对象。如果我们相信所谓的“可感觉的”实在，这个观念不仅可以把我们带向其对象，也可以把该对象放入我们手中，让它成为我们的直接感觉。但是，如果像大多数善于反思的人认为的那样，可感觉的实在并不是“真实的”实在，而只不过是它们的外表，那么，我们的观念至少把我们带到了这么远，让我们接触到实在的最真实的外表和替代物。无论如何，我们的观念把我们带到对象的周边区域，无论这个区域是实际的还是理想中的，让我们与对象进行交流，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它，使我们能预见它、甄别它、比较它、推断它，简而言之，对它做一些不拥有这个观念就无法做的事情。

The idea is thus, when functionally considered, an instrument for enabling us the better to have to do with the object and to act about it. But it and the object are both of them bits of the general sheet and tissue of reality at large; and when we say that the idea leads us towards the object, that only means that it carries us forward through intervening tracts of that reality into the object's closer neighborhood, into the midst of its associates at least, be these its physical neighbors, or be they its logical congeners only. Thus carried into closer quarters, we are in an improved situation as regards acquaintance and conduct; and we say that through the idea we now know the object better or more truly.

那么，从功能上来看，这个观念就是一个工具，使我们能更好地与对象产生联系并对之采取行动。但是，它与对象都是由总体实在形成的一个总涵盖范围和组织中很小的组成部分；当我们说这个观念将我们导向这个对象时，那仅仅意味着它带我们向前，穿过那个实在的中介地带，进入离对象更近的周边区域，至少进入它的关联物中间，无论这些关联物是其有形的近邻，还只是逻辑上的同类。这样被带入更近的区域后，我们就能处于更好的位置，来了解它并有所行动；我们说，通过这个观念，我们现在更好地或更真地认识了这个对象。

My thesis is that the knowing here is made by the ambulation through the intervening experiences. If the idea led us nowhere, or from that object instead of towards it, could we talk at all of its having any cognitive quality? Surely not, for it is only when take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ntermediate experiences that it gets related to that particular object rather than to any other part of nature. Those intermediaries determine what particular knowing function it exerts. The terminus they guide us to tells us what object it

“means”, the results they enrich us with “verify” or “refute” it. Intervening experiences are thus as indispensable foundations for a concrete relation of cognition as intervening space is for a relation of distance. Cognition, whenever we take it concretely, means determinate “ambulation”, through intermediaries, from a terminus a quo to, or towards, a *terminus ad quem* . As the intermediaries are other than the termini, and connected with them by the usual associative bonds (be these “external” or be they logical, i.e., classificatory, in character), there would appear to be nothing especially unique about the processes of knowing. They fall wholly within experience; and we need use, in describing them, no other categories than those which we employ in describing other natural processes.

我的论点是，这里的认识是经过中介经验造成的。如果这个观念没什么引导作用，或者使我们远离对象而非靠近它，那么我们还能说它具有任何认知性质吗？当然不能，因为只有把这个观念与中介经验联系在一起时，它才能与那个特殊对象发生关联，而不是与自然中的其他部分发生联系。那些中介决定了这种观念发挥哪种特定的认识功能。中介引导我们到达的终点告诉我们这种观念“意指”哪个对象，而丰富我们认知的这些结果则“证实”或“拒斥”这种观念。因此，正如中介空间对距离关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基础一样，中介经验对具体的认知关系来说也是必不可少。具体说来，认知意指一个通过中介成分从一个起点到达或接近一个终点的“移走”过程。由于中介成分并非终点，而且它们是通过通常的连带性关系与终点连接的（无论这些关系在本质上是“外在的”还是逻辑上的，即分类上的），似乎认识过程并没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它们完全属于经验的范围；在描述它们时，我们不需要使用其他范畴，只需使用那些我们用来描述其他自然过程的范畴就够了。

But there exist no processes which we cannot also consider abstractly, eviscerating them down to their essential skeletons or outlines; and when we have treated the processes of knowing thus, we are easily led to regard them as something altogether unparalleled in nature. For we first empty idea, object and intermediaries of all their particularities, in order to retain only a general scheme, and then we consider the latter only in its function of giving a result, and not in its character of being a process. In this treatment the intermediaries shrivel into the form of a mere space of separation, while the idea and object retain only the logical distinctness of being the end-terms that are separated. In other words, the intermediaries which in their concrete particularity form a bridge, evaporate ideally into an empty interval to cross, and then, the relation of the end-terms having become saltatory, the whole hocus-pocus of Erkenntnistheorie begins, and goes on unrestrained by further concrete considerations. The idea, in “meaning” an object separated by an “epistemological chasm” from itself, now executes what Professor Ladd calls a “saltomortale”; in knowing the object's nature, it now “transcends” its own. The object in turn becomes “present” where it is really absent, etc. ; until a scheme remains upon our hands, the sublime paradoxes of which some of us think that nothing short of an “absolute” can explain.

但是，不存在去掉冗余部分，只保留其结果或轮廓，我们仍无法对其抽象地加以思考的过程；当我们处理完认识过程后，很容易把它们看做本质上完全独一无二的事物。因为我们先从观念、对象和中介成分中清除了特殊的东西，以便只保留一个总体的架构，然后，我们只能从这一框架产生结果的功能而不是从它作为一个过程的特征上来考虑该框架。在处理过程中，中介成分萎缩成了一个单纯隔离空间的形式，而观念与对象只保留了被分离的末端的逻辑特征。换言之，这些中介成分以其具体的特殊性构成了一座桥梁，它们在理念中挥发成

一个将被跨越的空虚间隔，然后，由于两端的关系变成了跳跃的，认识论的全部花招就开始了，并不受更多具体考虑的限制而进行下去。这个观念“意指”一个由“认识论的鸿沟”与其自身分离的对象，它现在进行着莱德教授所谓的“致命一跃”；在认识对象本质的过程中，该观念已经“超越”了它自身。这个对象也反过来“出现”在它实际上未出现的地方，等等；直到我们手上仍然掌握有一个架构，我们当中一些人认为，除了“绝对”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解释这个框架中的巨大悖论。

The relation between idea and object, thus made abstract and saltatory, is thenceforward opposed, as being more essential and previous, to its own ambulatory self, and the more concrete description is branded as either false or insufficient. The bridge of intermediaries, actual or possible, which in every real case is what carries and defines the knowing, gets treated as an episodic complication which need not even potentially be there. I believe that this vulgar fallacy of opposing abstractions to the concretes from which they are abstracted, is the main reason why my account of knowing is deemed so unsatisfactory, and I will therefore say a word more on that general point.

观念和对象之间这种被变得抽象的和跳跃的关系，由于更基本也更早些，与其移动的自身对立起来，而更为具体的描述则被斥为错误的或不充分的。中介成分形成的桥梁，无论是实际上的还是可能的，在每一个实际情境下承载并定义着认识，却被当作插曲式的，甚至从潜在性上没有存在的必要。我相信，这种本来产生于具体的抽象与具体对立起来的粗鄙谬论，就是我对认识的论述被认为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因此我将再谈一谈这一普遍观点。

Any vehicle of conjunction, if all its particularities are

abstracted from it, will leave us with nothing on our hands but the original disjunction which it bridged over. But to escape treating the resultant self-contradiction as an achievement of dialectical profundity, all we need is to restore some part, no matter how small, of what we have taken away. In the case of the epistemological chasm the first reasonable step is to remember that the chasm was filled with some empirical material, whether ideational or sensational, which performed some bridging function and saved us from the mortal leap. Restoring thus the indispensable modicum of reality to the matter of our discussion, we find our abstract treatment genuinely useful. We escape entanglement with special cases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falling into gratuitous paradoxes. We can now describe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cognition, tell what on the whole it does for us, in a universal way.

如果任何连接工具的全部特殊性被抽象掉，那么除了最初桥接的分离状态，它不会给我们手上留下任何东西。但是，为了避免将最终产生的自相矛盾看成是实现了辩证上的深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复原我们拿走的某些部分，不管它们多么小。就认识论上的鸿沟而言，第一步明智的做法就是记住，这一鸿沟曾经由某种观念上的或是感觉上的经验材料填充，这些材料发挥着某种桥梁作用，使得我们不去做致命一跳。这样，通过将一点不可或缺的现实恢复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抽象处理很有用。我们避免了陷入特殊情况的纠结中，同时也没有陷入不必要的悖论中。我们现在能描述认知的一般特征了，从普遍性上来说明它总体上为我们做了什么。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is whole inquiry into knowing grows up on a reflective level. In any real moment of knowing, what we are thinking of is our object, not the way in which we ourselves are momentarily knowing it. We at this moment, as it happens, have

knowing itself for our object; but I think that the reader will agree that his present knowing of that object is included only abstractly, and by anticipation, in the results he may reach. What he concretely has before his mind, as he reasons, is some supposed objective instance of knowing, as he conceives it to go on in some other person, or recalls it from his own past. As such, he, the critic, sees it to contain both an idea and an object, and processes by which the knower is guided from the one towards the other. He sees that the idea is remote from the object, and that, whether through intermediaries or not, it genuinely has to do with it. He sees that it thus works beyond its immediate being, and lays hold of a remote reality; it jumps across, transcends itself. It does all this by extraneous aid, to be sure, but when the aid has come, it has done it and the result is secure. Why not talk of results by themselves, then, without considering means? Why not treat the idea as simply grasping or intuiting the reality, of its having the faculty anyhow, of shooting over nature behind the scenes and knowing things immediately and directly? Why need we always lug in the bridging? —it only retards our discourse to do so.

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对认识的整体探究是在反思的层次上构建起来的。在认识的任何实际瞬间，我们所思考的是我们的认识对象，而不是我们自己瞬间认识它的方式。此刻，我们恰好把认识本身当成了对象；但我认为读者会同意，他目前对那个对象的认识，仅仅是被抽象地预期包括在他能获得的结果中。当他推理时，他头脑中具体出现的是认识的某个假想的客观事例，他认为在其他人身上也会发生同样过程，或者自己回想过去时也是如此。批评者认为，这样的认识包含了观念、对象以及过程，通过这些过程认识者被从观念导向对象。他看到，观念远离对象，而且，无论通过中介成分与否，它确实要与对象产生联系。他看到，观念超越了其直接存在而发挥作用，并且控制了一个远处的实在；它就跳过、超越了自己。它做这一切当然是靠外

界的帮助，但是当援助到来时，它已经做完了这一切，结果已成定局。那么，为什么不忽略手段来谈论结果本身呢？为什么不把观念当成对实在的简单把握或直觉认识呢？即把它看作是已经有了某种能力，能直击事物背后的本质，然后立刻、直接地认识事物？我们为何总是要费力拽进来一座桥梁呢？——这样做只会妨碍我们的论述。

Such abstract talk about cognition's results is surely convenient; and it is surely as legitimate as it is convenient, SO LONG AS WE DO NOT FORGET OR POSITIVELY DENY, WHAT IT IGNORES. We may on occasion say that our idea meant always that particular object, that it led us there because it was of it intrinsically and essentially. We may insist that its verification follows upon that original cognitive virtue in it—and all the rest—and we shall do no harm so long as we know that these are only short cuts in our thinking. They are positively true accounts of fact as far as they go, only they leave vast tracts of fact out of the account, tracts of fact that have to be reinstated to make the accounts literally true of any real case. But if, not merely passively ignoring the intermediaries, you actively deny them [7_6] to be even potential requisites for the results you are so struck by, your epistemology goes to irremediable smash. You are as far off the track as an historian would be, if, lost in admiration of Napoleon's personal power, he were to ignore his marshals and his armies, and were to accuse you of error in describing his conquests as effected by their means. Of such abstractness and one-sidedness I accuse most of the critics of my own account.

这样有关认知结果的抽象讨论当然是方便的；而且它当然是既方便也正当，只要我们不忘记或坚决否认它所忽视的东西。我们可能偶尔会说，我们的观念意指的总是那个特殊对象，观念把我们带到那个

对象那里，因为它在本质上内在地含有这个对象。我们可以坚持认为，观念的证实过程基于其自身原有的认知价值——以及其他所有的，只要知道这些只不过是我们思维中的捷径，我们就不会做任何有害的事。就它们的现状来说，它们肯定是对事实的真实描述，只是它们未把大量事实考虑在内，这些事实必须加以复原，才能保证这些描述对任何实际情况来说是确切为真的。但是，如果你不仅消极地忽视中介成分，而且主动否定它们 [8_6] 是你所为之触动的结果的潜在必要条件，那么你的认识论就被击破了，无法拯救。你和下述这类历史学家一样都远远偏离了正轨：如果历史学家沉迷于对拿破仑个人权力的崇拜，而忽视了他的元帅和军队，他会指责你错误地将他的征服描述为是下属的策略造成的。我认为，大多批评我的理论的人都犯有这种抽象性与片面性的错误。

In the second lecture of the book *Pragmatism* , I used the illustration of a squirrel scrambling round a tree-trunk to keep out of sight of a pursuing man: both go round the tree, but does the man go round the squirrel? It all depends, I said, on what you mean by “going round.” In one sense of the word the man “goes round”, in another sense he does not. I settled the dispute by pragmatically distinguishing the senses. But I told how some disputants had called my distinction a shuffling evasion and taken their stand on what they called “plain honest English going-round.”

在《实用主义》的第二讲中，我举了松鼠绕着树干攀缘以躲避追踪人视线的例子：两者都绕着树转，但是这个人是在围着松鼠转吗？我在那里说，这完全取决于你所谓“绕着转”是什么意思。从一种意义上说，这个人“绕着转”了，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并没有。我通过对意义做出实用主义的区分解决了这个争论。但是我说过，有些争论者把我的区分称为搪塞逃避，而坚持他们所谓的“朴素诚实的英国式的绕着转”的立场。

In such a simple case few people would object to letting the term in dispute be translated into its concreter equivalents. But in the case of a complex function like our knowing they act differently. I give full concrete particular value for the ideas of knowing in every case I can think of, yet my critics insist that “plain honest English knowing” is left out of my account. They write as if the minus were on my side and the plus on theirs.

在这简单的例子中，很少有人会反对将这个处于争论中的词语转换成其更为具体的同义词。但是，对认识这样的复杂功能，他们的反应就不同了。在我能想到的任何情形中，我都赋予认识的观念以完整而具体的特殊价值，然而，我的批评者们却坚持认为，“朴素诚实的英国式认识”被我的解释忽略了。从他们写的东西来看，似乎缺点都是我的，而优点都是他们的。

The essence of the matter for me is that altho knowing can be both abstractly and concretely described, and altho the abstract descriptions are often useful enough, yet they are all sucked up and absorbed without residuum into the concreter ones, and contain nothing of any essentially other or higher nature, which the concrete descriptions can be justly accused of leaving behind. Knowing is just a natural process like any other. There is no ambulatory process whatsoever, the results of which we may not describe, if we prefer to, in saltatory terms, or represent in static formulation. Suppose, e.g., that we say a man is “prudent. " Concretely, that means that he takes out insurance, hedges in betting, looks before he leaps. Do such acts constitute the prudence? Are they the man qua prudent?

对我来说事情的本质是，尽管认识既可以被抽象地也可以被具体地描述，尽管抽象的描述经常很有用，可是它们被毫无剩留地被吸收进了更具体的描述之中，不包含任何本质上具有其他性质或更高级性质的东西，而人们完全可以指责具体描述遗漏了这种东西。认识只是像其他过程一样的一个自然进程。无论什么移走过程，如果我们原意，其结果都能用跳跃式的术语加以描述，或者用静止的公式来表述。比如我们说一个人是“谨慎的”。具体地讲，那是指他办理保险，避免作明确表态，三思而后行。这些行为构成了谨慎吗？它们是作为这个人小心谨慎的条件吗？

Or is the prudence something by itself and independent of them? As a constant habit in him, a permanent tone of character, it is convenient to call him prudent in abstraction from any one of his acts, prudent in general and without specification, and to say the acts follow from the pre-existing prudence. There are peculiarities in his psycho-physical system that make him act prudently; and there are tendencies to association in our thoughts that prompt some of them to make for truth and others for error. But would the man be prudent in the absence of each and all of the acts? Or would the thoughts be true if they had no associative or impulsive tendencies? Surely we have no right to oppose static essences in this way to the moving processes in which they live embedded.

或者说，谨慎本身就是由自身控制的并独立于这些行为？如果谨慎是一个人恒久的习惯，是永久性的性格特点，我们可以抽象于他的任何行为之外方便地称他为谨慎的，即说他一般来讲是谨慎的而不加任何具体说明，并且方便地说他的行为是由先存的谨慎态度造成的。他的心理 - 生理系统中有一些特殊的东西，使得他行为谨慎；我们的思想中有联想的倾向，促使它们某些被导向真理，而另一些则被导向错误。但是，所有这些行为或其中的任何一种行为均不考虑在内，我

们能说这个人是谨慎的吗？或者是，如果没有联想的或内在冲动的倾向，这些思想能是真的吗？当然，我们没有权利用这种方式将静态的本质与本质嵌入其中的移动过程对立起来。

My bedroom is above my library. Does the “aboveness” here mean aught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crete spaces which have to be moved-through in getting from the one to the other? It means, you may say, a pure topographic relation, a sort of architect's plan among the eternal essences. But that is not the full aboveness, it is only an abbreviated substitute that on occasion may lead my mind towards truer, i.e., fuller, dealings with the real aboveness.

我的卧室在我的图书室上面。这里“上面”指的是不是与你从卧室走向图书室的时候不得不穿越的空间不同的具体空间呢？你可能会说，它意指的是一个纯粹的地形上的关系，有点像在永恒的本质中建筑师的某种计划。但是那并不是“上面”的全部意义，它只是一个被缩略的替代物，这个替代物偶尔能把我的思想导向与真实的“上面”更真——即更完整地交流。

It is not an aboveness ante rem, it is a post rem extract from the aboveness in rebus. We may indeed talk, for certain conveniences, as if the abstract scheme preceded, we may say “I must go up stairs because of the essential aboveness”, just as we may say that the man “does prudent acts because of his ingrained prudence”, or that our ideas “lead us truly because of their intrinsic truth.” But this should not debar us on other occasions from using completer forms of description. A concrete matter of fact always remains identical under any form of description, as when we say of a line, now that it runs from left to right, and now that it runs from

right to left. These are but names of one and the same fact, one more expedient to use at one time, one at another. The full facts of cognition, whatever be the way in which we talk about them, even when we talk most abstractly, stand inalterably given in the actualities and possibilities of the experience-continuum. [7_7] But my critics treat my own more concrete talk as if it were the kind that sinned by its inadequacy, and as if the full continuum left something out.

这不是一个事前的“上面”，而是从事物中的“上面”里抽取出来的事后的东西。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的确可能说话时听起来好像某个抽象的架构先行存在着，我们可以说“由于这个存在着的上面，我必须上楼”，正如我们可能说这个人“由于其根深蒂固的谨慎倾向，这个人行事谨慎”，或者可以说，我们的观念“由于其内在的真理性而引领我们走向真”。但是，这不应该阻碍我们在其他情况下使用更完整的描述形式。无论以何种形式来描述，具体事实总是一样的，正如我们说一条直线，时而说它是自左向右，时而说它是自右向左。这些不过是同一事实的不同名称罢了，有时使用其中一个名称更方便，而有时使用另一个更方便。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来谈论认知的完整事实，即便是以最为抽象的方式，这些事实也是不可改变的，在经验连续体的诸多现实和可能性中是给定的 [8_7] 。但对我更具体的谈论方式，批评者们似乎认为它犯了不充分的过错，似乎整个连续体中漏掉了什么东西。

A favorite way of opposing the more abstract to the more concrete account is to accuse those who favor the latter of “confounding psychology with logic”. Our critics say that when we are asked what truth means, we reply by telling only how it is arrived-at. But since a meaning is a logical relation, static, independent of time, how can it possibly be identified, they say,

with any concrete man's experience, perishing as this does at the instant of its production? This, indeed, sounds profound, but I challenge the profundity. I defy any one to show any difference between logic and psychology here. The logical relation stands to the psycho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idea and object only as saltatory abstractness stands to ambulatory concreteness. Both relations need a psychological vehicle; and the “logical” one is simply the “psychological” one disemboweled of its fulness, and reduced to a bare abstractional scheme.

将更抽象的描述与更具体的描述对立起来的一个常见做法，是指责支持后者的人“混淆了逻辑学与心理学”。我们的批评者们说，当被问及真理意指什么时，我们仅回答了它是怎么获得的。但是，既然意义是一种静止的、独立于时间的逻辑联系，他们质问说，它又怎么能被人的任何具体经验确认呢？因为经验在产生的瞬间也就消失了。这听起来的确很深奥，但是我要挑战这种深奥。在这里，我挑战任何想要证明逻辑学与心理学有何不同的人。观念与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心理关系的联系，就像跳跃式的抽象与移动式的具体之间的联系一样。两种关系都需要一个心理上的工具；而且这个“逻辑的”关系就是“心理上的”关系，只不过它被抽取了其丰富的内容，仅仅被简化为抽象的架构。

A while ago a prisoner, on being released, tried to assassinate the judge who had sentenced him. He had apparently succeeded in conceiving the judge timelessly, had reduced him to a bare logical meaning, that of being his “enemy and persecutor”, by stripping off all the concrete conditions (as jury's verdict, official obligation, absence of personal spite, possibly sympathy) that gave its full psychological character to the sentence as a particular man's act in time. Truly the sentence was inimical to the culprit; but which idea

of it is the truer one, that bare logical definition of it, or its full psychological specification? The anti-pragmatists ought in consistency to stand up for the criminal's view of the case, treat the judge as the latter's logical enemy, and bar out the other conditions as so much inessential psychological stuff.

不久以前，一个罪犯刚一被释放，就企图行刺给他判刑的法官。很显然，他成功地在把这位法官设想为超越时间的存在，把他简化为纯逻辑的意义，即法官是其“敌人和迫害者”，他剥去了一切具体条件（比如陪审团的裁决、官方义务、无个人恶意、可能存在同情心），这些具体条件将完整的心理特征赋予作为某人在时间上的行为的判决。判决的确是对罪犯有敌意；但是对判决的哪种观念更为真呢，对它纯粹逻辑上的定义，还是对它在心理上所做的完整的具体说明呢？反实用主义者应该是一贯地支持罪犯对这个案件的视角，把法官当作罪犯逻辑上的敌人，将其他条件看作是非常无足轻重的心理材料予以排除。

II

二

A still further obstacle, I suspect, stands in the way of my account's acceptance. Like Dewey and like Schiller, I have had to say that the truth of an idea is determined by its satisfactoriness. But satisfactoriness is a subjective term, just as idea is; and truth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objective.” Readers who admit that satisfactoriness is our only mark of truth, the only sign that we possess the precious article, will still say that the objective relation between idea and object which the word “truth” points to is left out of my account altogether. I fear also that the association of my poor

name with the “will to believe” (which “will”, it seems to me, ought to play no part in this discussion) works against my credit in some quarters. I fornicate with that unclean thing, my adversaries may think, whereas your genuine truth-lover must discourse in huxleyan heroics, and feel as if truth, to be real truth, ought to bring eventual messages of death to all our satisfactions. Such divergences certainly prove the complexity of the area of our discussion; but to my mind they also are based on misunderstandings, which (tho with but little hope of success) I will try to diminish by a further word of explanation.

我怀疑，还有一个障碍在妨碍我的论述被人接受。像杜威与席勒一样，我不得不说一个观念的真理是由它的满意度决定的。但是，正如观念是一个主观术语一样，满意也是主观的；而真理一般被看作是“客观的”。承认满意是真理的唯一标志、是我们拥有这珍贵物品的唯一标志的读者们，仍然会说“真理”一词所指向的观念与对象间的客观联系，在我的论述中被完全漏掉了。我还担心，把我可怜的名字与“信仰的意志”（其中“意志”在我看来不应该在这场讨论中占据任何角色）联系起来，这在某些章节会降低我的可信度。我的对手们可能会认为，我与那个不干净的东西私通，而你们纯粹的真理热爱者必须以赫胥黎式的豪言壮语来讲话，感觉好像是真理——为了成为真正的真理——应该给我们全部的满意带来最终的死亡信息。这些分歧当然证明了我们所讨论的领域的复杂性；但在我看来，它们也是基于误解，对此，我将通过进一步的解释来加以消除（尽管成功机会渺茫）。

First, then, I will ask my objectors to define exactly what sort of thing it is they have in mind when they speak of a truth that shall be absolute, complete and objective; and then I will defy them to show me any conceivable standing-room for such a kind of truth

outside the terms of my own description. It will fall, as I contend, entirely within the field of my analysis.

那么，首先我要让我的反对者们精确地定义，当他们谈论绝对的、完整的和客观的真理时，他们心中想到的是何种东西；然后我将向他们提出挑战，要求他们在我描述真理时使用的词语之外，向我展示这种真理所占据的任何可想象的立足点。我认为，它将完全地落入到我所分析的领域。

To begin with, it must obtain between an idea and a reality that is the idea's object; and, as a predicate, it must apply to the idea and not to the object, for objective realities are not true, at least not in the universe of discourse to which we are now confining ourselves, for there they are taken as simply being, while the ideas are true of them. But we can suppose a series of ideas to be successively more and more true of the same object, and can ask what is the extreme approach to being absolutely true that the last idea might attain to.

首先，真理必须产生于一个观念与一个成为观念对象的实在之间；而且，作为一个谓词，它必须被应用于观念而不是对象，因为客观实在无所谓真的，至少在我们当前限定自己的论域中无所谓真，因为它们在那里仅仅被当成存在，而观念对它们来说可以是真的。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系列的观念对同一个对象来说一个比一个更真，然后我们可以问，什么终极方式能帮助获取最后一个观念达到的绝对真的状态。

The maximal conceivable truth in an idea would seem to be

that it should lead to an actual merging of ourselves with the object, to an utter mutual confluence and identification. On the common-sense level of belief this is what is supposed really to take place in sense-perception. My idea of this pen verifies itself through my percept; and my percept is held to be the pen for the time being—percepts and physical realities being treated by common sense as identical. But the physiology of the senses has criticised common sense out of court, and the pen "in itself" is now believed to lie beyond my momentary percept. Yet the notion once suggested, of what a completely consummated acquaintance with a reality might be like, remains over for our speculative purposes. Total conflux of the mind with the reality would be the absolute limit of truth, there could be no better or more satisfying knowledge than that.

观念中最大可设想的真理，似乎是它应该导向我们自己与对象实现实际的合并，实现完全的相互融合及同一。在信念的常识层面上，这就是在感官知觉中被认为真实发生的情况。我对这只笔的观念通过我的知觉对象而得到证实；而我的知觉对象目前被认为就是这支笔——知觉对象和物理的实在被常识当作是同一的。但是，感官的机能毫无理由地对常识进行了批评，而且这支笔"本身"现在被认为是超越了我的瞬间知觉。然而，对实在的彻底完备的熟知可能是什么样的这个观念一旦被提出，便为了我们思辨的目的而存留下来。心智与实在的完全汇合将是真理的绝对极限，没有比这更完善或更令人满意的认识了。

Such total conflux, it is needless to say, is already explicitly provided for, as a possibility, in my account of the matter. If an idea should ever lead us not only towards, or up to, or against, a reality, but so close that we and the reality should melt together, it would be made absolutely true, according to me, by that performance.

毋庸赘言，这种完全汇合作为一种可能，已经在我对这问题的论述中明确地提出了。如果一个观念居然不仅引领我们走向、来到或靠近一个实在，而且非常地接近，以至于我们跟这个实在融合在一起，我认为完成这一过程后，该观念就被变成绝对真的。

In point of fact philosophers doubt that this ever occurs. What happens, they think, is only that we get nearer and nearer to realities, we approximate more and more to the all-satisfying limit; and the definition of actually, as distinguished from imaginably, complete and objective truth, can then only be that it belongs to the idea that will lead us as close up against the object as in the nature of our experience is possible, literally next to it, for instance.

事实上，哲学家们怀疑这种情况会发生。他们认为，实际所发生的只是我们越来越接近实在，我们越来越接近令人完全满意的极限；那么对实际上（而不是想象中）完整的、客观的真理定义只能是，它属于那个观念，该观念在经验的本质范围内将将把我们导向尽量离对象最近的处所，比如说几乎是紧贴它。

Suppose, now, there were an idea that did this for a certain objective reality. Suppose that no further approach were possible, that nothing lay between, that the next step would carry us right into the reality; then that result, being the next thing to conflux, would make the idea true in the maximal degree that might be supposed practically attainable in the world which we inhabit.

现在假定有一个观念紧贴了某个客观实在。假定它不可能贴得更

近了，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东西，下一步就会将我们带入实在；那么，那个下一个将要汇合的结果将会使这个观念在最大程度上成为是真的，而这种程度在我们居住的世界上被认为是实际上可达到的。

Well, I need hardly explain that that degree of truth is also provided for in my account of the matter. And if satisfactions are the marks of truth's presence, we may add that any less true substitute for such a true idea would prove less satisfactory. Following its lead, we should probably find out that we did not quite touch the terminus. We should desiderate a closer approach, and not rest till we had found it.

那种真理的程度也在我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之中提到了，对此我几乎不用加以说明。而且，如果满意就是真理存在的标志，我们可以补充说，对这个真观念的任何不那么真的替代物，都将证明不能那么令人满意。跟随观念的导引，我们很可能会发现我们还没完全触及终点。我们渴望距离它更近，而且在发现它之前不能停下来。

I am, of course, postulating here a standing reality independent of the idea that knows it. I am also postulating that satisfactions grow *pari passu* with our approximation to such reality. [7_8] If my critics challenge this latter assumption, I retort upon them with the former. Our whole notion of a standing reality grows up in the form of an ideal limit to the series of successive termini to which our thoughts have led us and still are leading us. Each terminus proves provisional by leaving us unsatisfied. The truer idea is the one that pushes farther; so we are ever beckoned on by the ideal notion of an ultimate completely satisfactory terminus. I, for one, obey and accept that notion. I can conceive no other objective content to the

notion of ideally perfect truth than that of penetration into such a terminus, nor can I conceive that the notion would ever have grown up, or that true ideas would ever have been sorted out from false or idle ones, save for the greater sum of satisfactions, intellectual or practical, which the truer ones brought with them. Can we imagine a man absolutely satisfied with an idea and with all its relations to his other ideas and to his sensible experiences, who should yet not take its content as a true account of reality? The matter of the true is thus absolutely identical with the matter of the satisfactory. You may put either word first in your ways of talking; but leave out that whole notion of satisfactory working or leading (which is the essence of my pragmatistic account) and call truth a static logical relation, independent even of possible leadings or satisfactions, and it seems to me you cut all ground from under you.

当然，我在这里假定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实在，它独立于认识它的观念而存在。我也在假定满意程度会随着我们接近这种实在而同步增长 [8_8] 。如果我的批评者们质疑这后一种假设，那么我就用第一种假设来反驳他们。我们的思想已经并且仍然在引导我们走向一系列连续的终点，我们对一个长期存在的实在的整个认识，以一种对这些终点的理想限度的形式发展起来。每个终点都证明是临时性的，因为它不能令我们满意。更真的观念就是推向更前方的那个；因此我们心中有一个最终的、令人彻底满意的终点，对它的理想认识召唤着我们继续向前。我就是听从且接受这种认识的一个人。除了深入进这样一个终点这种观念之外，我想不出理想的完美真理这一观念还有什么其他客观内容；我也想不出这种观念能发展，或者说真的观念能被从假的或无聊的观念区分开来，除非诉诸于满意度的更大总和，这种满意可以是理智上的也可以是实践上的，它们是更真的观念带来的。一个人对一个观点绝对满意，也对这一观念与自己的其他观念和感知经验的一切关系感到满意，但却仍然不将它的内容当作是对实在的真实描述，对此你能想象吗？因此，真的问题与令人满意的问题是绝对同一的。

你可以在说话时把二词中任意一个放在前面；但是，如果你漏掉了起作用或者引领的令人满意的整个观念（这是我实用主义理论的精髓），而把真理称为静态的逻辑关系，甚至独立于可能的引导或者满意之外，那么在我看来你似乎就切断了脚下的整个根基。

I fear that I am still very obscure. But I respectfully implore those who reject my doctrine because they can make nothing of my stumbling language, to tell us in their own name—*und zwar* very concretely and articulately! —just how the real, genuine and absolutely “objective” truth which they believe in so profoundly, is constituted and established. They mustn't point to the “reality” itself, for truth is only our subjective relation to realities. What is the nominal essence of this relation, its logical definition, whether or not it be “objectively” attainable by mortals?

我担心自己仍然解释得非常模糊不清。但是，因为那些拒绝接受我的学说的人不能理解我那蹩脚的语言，我恭敬地恳请他们以他们个人的名义告诉我们——而且是非常具体地、清晰地告诉我们！——他们那深信不移的、实在的、真正的、绝对“客观的”真理是如何构成和确立的。他们务必不能指向“实在”本身，因为真理只是我们与实在的主观联系。不论这种关系是否是普通人能“客观地”获得的，它名义的本质——即其逻辑定义是什么呢？

Whatever they may say it is, I have the firmest faith that my account will prove to have allowed for it and included it by anticipation, as one possible case in the total mixture of cases. There is, in short, no room for any grade or sort of truth outside of the framework of the pragmatic system, outside of that jungle of empirical workings and leadings, and their nearer or ulterior

terminations, of which I seem to have written so unskilfully.

不管他们说它什么，我坚定地相信，我的阐释将被证明已经考虑到了它，而且也作为各种可能情况中一种可能的情况预先包含了它。简言之，在实用主义体系的框架之外，在基于经验的作用和引导的领域以及它们更近的或更远的终点之外，任何程度或种类的真理都没有存在的余地。在说明这一观点时，我的论述似乎相当拙劣。

[7_1].Reprint from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 July 18, 1907.

[7_2].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ii, p. 408, and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ii, p. 533.

[7_3].The relevant parts of which are printed above, p. 43.

[7_4].Vol. i, p. 253.

[7_5].See my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ii, pp. 148–153.

[7_6].This is the fallacy which I have called "vicious intellectualism" in my book A Pluralistic Universe, Longmans, Green & Co., 1909.

[7_7].The ultimate object or terminus of a cognitive process may in certain instances lie beyond the direct experience of the particular cognizer, but it, of course, must exist as part of the total universe of experience whose constitution, with cognition in it, the critic is discussing.

[7_8].Say, if you prefer to, that DIS satisfactions decrease *pari passu* with such approximation. The approximation may be of any kind assignable—approximation in time or in space, or approximation in kind, which in common speech means "copying."

[8_1].重印自《哲学研究》，1907年7月18日。

[8_2].《哲学评论》，第二卷，第408页，以及《心理学评论》，第二卷，第533页。

[8_3].其相关部分见前文第43页。

[8_4].第一卷，第253页。

[8_5].见拙作《心理学原理》，第二卷，第148-153页。

[8_6].我在《多元的宇宙》一书中将这种谬误称为“恶性的理智主义”，该书1909年由Longmans, Green & Co. 出版。

[8_7].认知过程的终极对象或终点，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超越特定认识者的直接经验，可是，它当然必须作为整个经验领域的一部分而存在，这个经验领域的结构以及蕴含于其中的认知，正是批评者所讨论的。

[8_8].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不满意度随着这种接近同步递减。这种接近可以是可指定的任何一种——比如时间或空间上的接近，或者种类上的接近，即日常语言所谓的“摹写”。

Chapter VII Professor Pratt on Truth

第七章　普拉特教授论真理

I

一

Professor J. B. Pratt's paper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for June 6, 1907, is so brilliantly written that its misconception of the pragmatist position seems doubly to call for a reply. [8_1]

1907年6月6日，J. B. 普拉特教授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非常出色的论文，他对实用主义立场的误解似乎非常有必要给予回应。 [9_1]

He asserts that, for a pragmatist, truth cannot be a relation between an idea and a reality outside and transcendent of the idea, but must lie “altogether within experience”, where it will need “no reference to anything else to justify it”—no reference to the object, apparently. The pragmatist must “reduce everything to psychology”, aye, and to the psychology of the immediate moment. He is consequently debarred from saying that an idea that eventually gets psychologically verified was already true before the process of verifying was complete; and he is equally debarred from treating an idea as true provisionally so long as he only believes that he can verify it whenever he will.

他断言，对实用主义者来说，真理不可能是观念与外在并超越于该观念的实在之间的关系，相反，真理必须“完全存在于经验之内”，在那里，它“不需要指称其他任何事物来证明自己”——显然，也不需要指对象。实用主义者必须“把一切还原到心理学”，而且是此时此刻的心理学。结果，他不能说一个最终在心理学上得到证实的观念，在证明过程完成之前就已经是真的了；同样地，只要他只相信他可以随时能证明一个观念，他也不能把该观念看作暂时是真的。

Whether such a pragmatist as this exists, I know not, never having myself met with the beast. We can define terms as we like; and if that be my friend Pratt's definition of a pragmatist, I can only concur with his anti-pragmatism. But, in setting up the weird type, he quotes words from me; so, in order to escape being classed by some reader along with so asinine a being, I will reassert my own view of truth once more.

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实用主义者是否存在，我还从没碰见过这类“野兽”。我们可以随意给术语下定义；假如那是我朋友普拉特对实用主义者的定义，我只能同意他的反实用主义立场。但是，在设定这种奇怪的实用主义者时，他引用了我的话。所以，为避免某位读者把我归入这类蠢人之列，我将再次重申自己的真理观。

Truth is essentially a relation between two things, an idea, on the one hand, and a reality outside of the idea, on the other. This relation, like all relations, has its fundamentum, namely, the matrix of experiential circumstance, psychological as well as physical, in which the correlated terms are found embedded. In the cas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heir” and “legacy” the fundamentum is a world in which there was a testator, and in which there is now a will and

an executor; in the case of that between idea and object, it is a world with circumstances of a sort to make a satisfactory verification process, lying around and between the two terms. But just as a man may be called an heir and treated as one before the executor has divided the estate, so an idea may practically be credited with truth before the verification process has been exhaustively carried out—the existence of the mass of verifying circumstance is enough. Where potentiality counts for actuality in so many other cases, one does not see why it may not so count here. We call a man benevolent not only for his kind acts paid in, but for his readiness to perform others; we treat an idea as “luminous” not only for the light it has shed, but for that we expect it will shed on dark problems. Why should we not equally trust the truth of our ideas? We live on credits everywhere; and we use our ideas far oftener for calling up things connected with their immediate objects, than for calling up those objects themselves. Ninety-nine times out of a hundred the only use we should make of the object itself, if we were led up to it by our idea, would be to pass on to those connected things by its means. So we continually curtail verification-processes, letting our belief that they are possible suffice.

真理本质上是指两种事物间的关系，关系的一方是观念，另一方是观念之外的实在。跟所有的关系一样，这种关系也有其根基，即心理的和物理的经验状况的基体，相关联的词语被发现嵌入其中。比如“继承人”与“遗产”之间的关系，其根基就是一个曾经有立遗嘱者的世界，现在又有了一份遗嘱和执行者的世界；如果是观念与对象间的关系，那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即它拥有存在于这两个词语周围和之间的某种状况，能令人满意地完成证实过程。但是，正如一个人可以被称为继承人，而且在执行者分配财产前被当作继承人，同样，在证实过程被详尽地执行完毕之前，一个观念也可以在实践上被看作是真理

——大量证实状态的存在足够了。既然潜在性在很多其他情况下被当作现实性，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不能这样做。我们称一个人是慈善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已完成的善行，而且因为他乐意去做其他善行；我们把一个观念当作是“明白易懂的”，不仅因为它已经带来的启发，而且我们期望它在不为人知的问题上将给人以启发。我们为什么就不应该同样地相信我们观念的真理性呢？我们处处都仰赖信用；我们使用观念时，更经常的是为了唤起与它们的直接对象相连的事物，而不是唤起这些对象本身。假如我们被观念引导向一个对象，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对象本身对我们的唯一用途是借助其手段过渡到那些与之相联系的事物。这样，我们不断地缩减证实过程，相信这些过程是可能的就足够了。

What constitutes the relation known as truth, I now say, is just the existence in the empirical world of this fundamentum of circumstance surrounding object and idea and ready to be either short-circuited or traversed at full length. So long as it exists, and a satisfactory passage through it between the object and the idea is possible, that idea will both be true, and will have been true of that object, whether fully developed verification has taken place or not. The nature and place and affinities of the object of course play as vital a part in making the particular passage possible as do the nature and associative tendencies of the idea; so that the notion that truth could fall altogether inside of the thinker's private experience and be something purely psychological, is absurd. It is between the idea and the object that the truth-relation is to be sought and it involves both terms.

我现在说，构成了被认为是真理的关系的，恰恰是经验世界中这一围绕对象和观念的状况根基，它随时可能发生短路，或被全程跨越。只要它存在，而且在对象与观念之间可能存在一个令人满意的通

路，那个观念就是真的，并且已经与此对象相符，无论这是否已被完全证实过。当然，像观念的本质与关联倾向一样，对象的本质、位置及密切关系在使特定的通道成为可能时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认为真理可以完全属于思想者的个人经验范围，是一种纯心理的东西，这种观念是荒唐的。真理关系只能到观念与对象之间去寻求，两者都有涉及。

But the “intellectualistic” position, if I understand Mr. Pratt rightly, is that, altho we can use this fundamentum, this mass of go-between experience, for testing truth, yet the truth-relation in itself remains as something apart. It means, in Mr. Pratt's words, merely “THIS SIMPLE THING THAT THE OBJECT OF WHICH ONE IS THINKING IS AS ONE THINKS IT.”

但是，如果我正确理解了普拉特教授的想法的话，“理智主义的”立场就是，尽管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根基——即这种大量的中间经验——来检验真理，可是真理关系本身仍是某个分离的东西。用普拉特教授的话说，它仅仅是指“这种简单的东西，即一个人正在思考其对象的东西，就像他所认为的样子”。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word “as”, which qualifies the relation here, and bears the whole “epistemological” burden, is anything but simple. What it most immediately suggests is that the idea should be like the object; but most of our ideas, being abstract concepts, bear almost no resemblance to their objects. The “as” must therefore, I should say, be usually interpreted functionally, as meaning that the idea shall lead us into the same quarters of experience as the object would. Experience leads ever on and on, and objects and our ideas of objects may both lead to the same

goals. The ideas being in that case shorter cuts, we substitute them more and more for their objects; and we habitually waive direct verification of each one of them, as their train passes through our mind, because if an idea leads as the object would lead, we can say, in Mr. Pratt's words, that in so far forth the object is as we think it, and that the idea, verified thus in so far forth, is true enough.

在我看来，“像”这个词根本不简单，它使这里的关系成立，承载着整个“认识论的”重负。它最直接表明的是，观念应该像其对象；但是我们大部分的观念都是抽象的概念，几乎与它们的对象毫无相似之处。因此我要说，这个“像”通常必须从功能上加以解释，它意味着这个观念像对象一样，也将把我们导向同样的经验领域。经验不断引领我们向前，对象以及我们对它们的观念可能通向同样的目标。观念在那种情况下成为捷径，我们越来越多地用它们来代替它们的对象；并且当这些观念连续穿过我们的心灵时，我们习惯性地放弃逐个地直接证实它们，因为如果一个观念像其对象一样引导我们，我们就可以借用普拉特先生的话说，那么在这种范围内对象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在这种范围内证实的观念也是足够真的。

Mr. Pratt will undoubtedly accept most of these facts, but he will deny that they spell pragmatism. Of course, definitions are free to every one; but I have myself never meant by the pragmatic view of truth anything different from what I now describe; and inasmuch as my use of the term came earlier than my friend's, I think it ought to have the right of way. But I suspect that Professor Pratt's contention is not solely as to what one must think in order to be called a pragmatist. I am sure that he believes that the truth-relation has something more in it than the fundamentum which I assign can account for. Useful to test truth by, the matrix of circumstance, he thinks, cannot found the truth-relation in se, for

that is trans-empirical and “saltatory”.

普拉特先生将无疑接受这些事实中的大部分，但他会否认它们带有实用主义特征。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下定义；但是我的实用主义真理观，从来都不会有别于我现在描述的样子；而且因为我比我的朋友更早地使用了这个术语，我认为它应享有先行权。但是我怀疑，普拉特教授的主张并不仅仅涉及一个人必须怎样想才能被称作实用主义者。我确信，他认为真理关系中包含更多的东西，超出了我所说的根基能解释的范围。他认为，虽然状况的基体对检验真理是有用的，但它却不能建立真理关系本身，因为它是超验的且是“跳跃式的”。

Well, take an object and an idea, and assume that the latter is true of the former—as eternally and absolutely true as you like. Let the object be as much “as” the idea thinks it, as it is possible for one thing to be “as” another. I now formally ask of Professor Pratt to tell what this “as”-ness in itself consists in—for it seems to me that it ought to consist in something assignable and describable, and not remain a pure mystery, and I promise that if he can assign any determination of it whatever which I cannot successfully refer to some specification of what in this article I have called the empirical fundamentum, I will confess my stupidity cheerfully, and will agree never to publish a line upon this subject of truth again.

比如有一个对象和一个观念，假设后者与前者是一致的——你完全可以说它是永恒地和绝对地一致。既然一个东西可以“像”另外一个东西，让我们假定这个对象尽量“像”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我现在正式请求普拉特教授告诉我，这种“像”本身存在于何处，因为在我看来它似乎应该存在于某些可指定的和可描述的东西中，而不应该依旧是个

纯粹的秘密；我保证，如果他能为这个东西指定任何确定范围，我不能成功地将这一范围归为我在本文中称作经验的根基的具体体现，那么我将欣然地承认自己的愚蠢，而将同意永远不再发表任何与真理这个话题有关的文字。

II

二

Professor Pratt has returned to the charge in a whole book, [8_2] which for its clearness and good temper deserves to supersede all the rest of the anti-pragmatistic literature. I wish it might do so; for its author admits all my essential contentions, simply distinguishing my account of truth as “modified” pragmatism from Schiller's and Dewey's, which he calls pragmatism of the “radical” sort. As I myself understand Dewey and Schiller, our views absolutely agree, in spite of our different modes of statement; but I have enough trouble of my own in life without having to defend my friends, so I abandon them provisionally to the tender mercy of Professor Pratt's interpretations, utterly erroneous tho I deem these to be. My reply as regards myself can be very short, for I prefer to consider only essentials, and Dr. Pratt's whole book hardly takes the matter farther than the article to which I retort in Part I of the present paper.

普拉特教授在他的一整本书中再次回到类似指控 [9_2] ，他的书思路清晰，态度温和，理应被看作超出了其他反实用主义的文献。我希望它可能是这样；因为它的作者承认我的全部基本主张，仅仅把我对真理的论述称之为“改良后的”席勒与杜威的实用主义，而后者则被他称为“激进的”实用主义类型。根据我自己对杜威与席勒的理解，尽管

我们的陈述方式不同，可我们的观点是绝对一致的；但是不用为朋友们辩护，我自已生活中的麻烦就已经够多的了，因此我就暂时任由普拉特教授去善意地解释他们的主张吧，尽管我认为这些解释都是完全错误的。涉及我个人的观点，我的回答可以是相当简短，因为我宁愿只涉及一些基本问题，而且，我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对他的那篇文章做出了反驳，普拉特教授的整本书几乎没有超越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谈的东西。

He repeats the “as”-formula, as if it were something that I, along with other pragmatists, had denied, [8_3] whereas I have only asked those who insist so on its importance to do something more than merely utter it—to explicate it, for example, and tell us what its so great importance consists in. I myself agree most cordially that for an idea to be true the object must be “as” the idea declares it, but I explicate the “as”-ness as meaning the idea's verifiability.

他重复了那种“像”的公式，似乎那是我和其他实用主义者所否认的东西 [9_3] ，而我仅仅是要求那些在其重要性上坚持这样认为的人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表述它——比如去详细阐述它，告诉我们它如此大的重要性存在何处。我个人很乐意承认，一个观念要是真的，其对象就必须“像”其观念所宣称的那样，但是我把“像”解释为这一观念的可证实性。

Now since Dr. Pratt denies none of these verifying “workings” for which I have pleaded, but only insists on their inability to serve as the fundamentum of the truth-relation, it seems that there is really nothing in the line of fact about which we differ, and that the issue between us is solely as to how far the notion of workableness or verifiabilit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notion of

“trueness”—“trueness” being Dr. Pratt's present name for the character of as-ness in the true idea. I maintain that there is no meaning left in this notion of as-ness or trueness if no reference to the possibility of concrete working on the part of the idea is made.

对于我提出的起证实作用的各种“作用”，普拉特博士并没有作任何否定，他只是坚持认为它们不能被用作真理关系的根基，既然如此，在事实方面我们似乎真的没有任何分歧，我们之间的分歧只是涉及可起作用或可证实性这个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性”这一概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真实性”是普拉特博士目前对真观念中“像”的特性一种称呼。我坚持认为，如果不提及观念起具体作用的可能性，那么“像”或真实性这一概念就没有任何意义。

Take an example where there can be no possible working. Suppose I have an idea to which I give utterance by the vocable “skrkl”, claiming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 is true. Who now can say that it is false, for why may there not be somewhere in the unplumbed depths of the cosmos some object with which “skrkl” can agree and have trueness in Dr. Pratt's sense? On the other hand who can say that it is true, for who can lay his hand on that object and show that it and nothing else is what I mean by my word? But yet again, who can gainsay any one who shall call my word utterly irrelative to other reality, and treat it as a bare fact in my mind, devoid of any cognitive function whatever. One of these three alternatives must surely be predicated of it. For it not to be irrelevant (or not-cognitive in nature), an object of some kind must be provided which it may refer to. Supposing that object provided, whether “skrkl” is true or false of it, depends, according to Professor Pratt, on no intermediating condition whatever. The trueness or the falsity is even now immediately, absolutely, and positively there.

举一个不涉及可能的作用的例子。假如我有一个观念，我用skrkl这个词称呼它，并同时声称它是真的。谁现在能说它是假的呢？在宇宙无法测度的某个深处，为什么就不会存在某个与skrkl相符合的对象，而且有普拉特教授所说的真实性呢？另一方面，谁又能说它是真的呢？因为谁又能将手放在那个对象上，并证明那个对象，而不是其他东西，是我的词所指的东西呢？但是，我们再问一句，如果有人说我用的词与另外的实在完全不相关，并把它当成是仅仅存在于我心中的一个事实，不具备任何认知功能，那么谁能反驳这个人呢？这三种情况中必然有一种是对那个词的表述。要使这个词不是不相关（或者在性质上不是认知性的），就必须提供某种它能指称的对象。假定被提供的对象，无论skrkl对它来说是真还是假，像普拉特教授所说的那样不取决于任何中介条件。真或假即使现在也是直接地、绝对地和肯定地存在于那里。

I, on the other hand, demand a cosmic environment of some kind to establish which of them is there rather than utter irrelevancy. [8_4] I then say, first, that unless some sort of a natural path exists between the “skrkl” and that object, distinguishable among the innumerable pathways that run among all the realities of the universe, linking them promiscuously with one another, there is nothing there to constitute even the possibility of its referring to that object rather than to any other.

另一方面，我需要某种宇宙环境，来确定它们中哪个存在于那里，而不是完全不相关 [9_4] 。然后我会说，首先，除非在skrkl与那个对象之间存在某种自然路径，它区别于穿越宇宙中所有实在的无数个其他的路径，把它们杂乱地连接在一起，否则那里就没有任何东西，来甚至构成它指称那个对象而不是其他对象的可能性。

I say furthermore that unless it have some tendency to follow up that path, there is nothing to constitute its intention to refer to the object in question.

其次我想说，除非它有某种遵循那条路径的倾向，否则就没有任何东西能构成它指称该对象的意图。

Finally, I say that unless the path be strown with possibilities of frustration or encouragement, and offer some sort of terminal satisfaction or contradiction, there is nothing to constitute its agreement or disagreement with that object, or to constitute the as-ness (or “not-as-ness”) in which the trueness (or falseness) is said to consist.

最后我想说，除非这条路径可能充满了挫折或鼓励，并提供某种最终的满足或矛盾，否则就没有东西能构成它与该对象的符合或不符合，或者能构成其真实性（或虚假性）被认为所依托的“像”（或“不像”）。

I think that Dr. Pratt ought to do something more than repeat the name “trueness”, in answer to my pathetic question whether that there be not some constitution to a relation as important as this. The pathway, the tendency, the corroborating or contradicting progress, need not in every case be experienced in full, but I don't see, if the universe doesn't contain them among its possibilities of furniture, what logical material for defining the trueness of my idea is left. But if it do contain them, they and they only are the logical material required.

在回答我那个可怜的问题——即像这样一个重要的关系中是否不存在某种结构时，我想普拉特博士不能仅仅通过重复“真实性”这个词来回答我。路径、倾向、证实或矛盾的进程不一定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能被完整地体验到，可是，如果宇宙在其各种可能的装置中不包含它们，我看不出还剩什么样的逻辑材料来界定我的观念的真实性。但是，如果它的确包含它们，它们——并且只有它们——才是所需要的逻辑材料。

I am perplexed by the superior importance which Dr. Pratt attributes to abstract trueness over concrete verifiability in an idea, and I wish that he might be moved to explain. It is prior to verification, to be sure, but so is the verifiability for which I contend prior, just as a man's “mortality” (which is nothing but the possibility of his death) is prior to his death, but it can hardly be that this abstract priority of all possibility to its correlative fact is what so obstinate a quarrel is about. I think it probable that Dr. Pratt is vaguely thinking of something concreter than this. The trueness of an idea must mean SOMETHING DEFINITE IN IT THAT DETERMINES ITS TENDENCY TO WORK, and indeed towards this object rather than towards that. Undoubtedly there is something of this sort in the idea, just as there is something in man that accounts for his tendency towards death, and in bread that accounts for its tendency to nourish. What that something is in the case of truth psychology tells us: the idea has associates peculiar to itself, motor as well as ideational; it tends by its place and nature to call these into being, one after another;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m in succession is what we mean by the “workings” of the idea. According to what they are, does the trueness or falseness which the idea harbored come to light. These tendencies have still earlier conditions which, in a general way, biology, psychology and

biography can trace. This whole chain of natural causal conditions produces a resultant state of things in which new relations, not simply causal, can now be found, or into which they can now be introduced,—the relations namely which we epistemologists study, relations of adaptation, of substitutability, of instrumentality, of reference and of truth.

普拉特博士赋予观念中的抽象真实性——而不是具体的可证实性——以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使我非常困惑，我希望我能促使他对此作出解释。当然，它先于证实过程，但我所主张的可证实性也同样先于证实过程，正如一个人的“必死性”（这只不过是指他死亡的可能性）先于他的死亡，但是几乎不可能的情况是：所有可能性对其相应事实拥有的这种抽象的先存性，是一场持续的争论的焦点。我想，普拉特博士可能正在隐约思考比这更具体的东西。一种观念的真实性必须意指其内部能决定其作用倾向的明确的东西，并且确实是倾向于这个对象而不是其他对象。毫无疑问，观念中有某种这样的东西存在，正如人体中有某种东西使他产生死亡的倾向，面包中有某些东西使它产生滋养的倾向。那个东西从真理心理学上来看所成为的东西告诉我们：观念有其独有的关联物，无论是与运动神经有关的关联物，还是观念上的关联物；就其位置和本质而言，它倾向于将这些关联物逐个地激活；而它们的连续出现就是我们所说的观念的“作用”。根据它们本来的样子，观念中所内含真实性或虚假性就真相大白了。这些倾向还有更早的条件，一般来讲，可以从生物学、心理学和其发展历程上追溯这些条件。这整个自然的因果条件链条产生了一种必然的事态，在其中新的关系（不仅指因果关系）现在能被找到，或被引入其中，这些关系即我们认知论者研究的关系，包括适应关系、可替换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指称关系和真理关系。

The prior causal conditions, altho there could be no knowing of any kind, true or false, without them, are but preliminary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makes the ideas true or false when once their tendencies have been obeyed. The tendencies must exist in some shape anyhow, but their fruits are truth, falsity, or irrelevancy, according to what they concretely turn out to be. They are not "saltatory" at any rate, for they evoke their consequences contiguously, from next to next only; and not until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whole associative sequence, actual or potential, is in our mental sight, can we feel sure what its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if it have any, may be. True knowing is, in fine, not substantially, in itself, or "as such", inside of the idea from the first, any more than mortality as such is inside of the man, or nourishment as such inside of the bread. Something else is there first, that practically makes for knowing, dying or nourishing, as the case may be. That something is the "nature" namely of the first term, be it idea, man, or bread, that operates to start the causal chain of processes which, when completed, is the complex fact to which we give whatever functional name best fits the case. Another nature, another chain of cognitive workings; and then either another object known or the same object known differently, will ensue.

虽然没有先存的因果条件可能就不存在任何类型的认知——不论它是真或是假，但这些条件对下述问题来说仅仅是初步的：一旦遵从观念的这些倾向，到底什么东西使得观念成为真的还是假的。这些倾向无论如何必须以某种形态存在，但是根据它们最终具体成为的样子，它们的结果可以是真理、谬误、或是不相关。它们无论如何不是“跳跃的”，因为它们只是一个接一个地连续产生结果；而且直到整个联想串的最终结果——不管它是实际的或是潜在的——出现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才能确定它在认识论上的意义可能是什么——如果它有这种意义的话。总而言之，真正的认识从本质上来说，即从其本身或“真正意义”上来讲，并非从一开始便存在于观念之中，正如真正意义上的必死性并非存在于人体内，或者真正意义上的营养并非存在于

面包之中。某个其他东西先存在于那里，根据具体情况，这个东西实际上走向认识、衰亡或营养。那种东西即是第一个词的“本质”，它可能是开启了这一连串因果过程的观念、人或者面包，当这个因果链完成时，它形成一个复杂的事实，我们赋予这个事实一个最贴切其状况的功能名称。另外一个本质开启另外一连串认知作用；继而要么是被认识的另外一个对象，要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被认识的同一个对象。

Dr. Pratt perplexes me again by seeming to charge Dewey and Schiller [8_5] (I am not sure that he charges me) with an account of truth which would allow the object believed in not to exist, even if the belief in it were true. “Since the truth of an idea”, he writes, “means merely the fact that the idea works, that fact is all that you mean when you say the idea is true” (p. 206). “When you say the idea is true”—does that mean true for you, the critic, or true for the believer whom you are describing? The critic's trouble over this seems to come from his taking the word “true” irrelatively, whereas the pragmatist always means “true for him who experiences the workings”. “But is the object really true or not?“—the critic then seems to ask,—as if the pragmatist were bound to throw in a whole ontology on top of his epistemology and tell us what realities indubitably exist. “One world at a time”, would seem to be the right reply here.

另外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普拉特博士似乎指责杜威和席勒（我不确定他是否也指责我）[9_5]，说他们对真理的解释会使得为人所信的对象消失，即使对对象的信念是真的。他写道，“既然一个观念的真理性仅仅意指该观念起作用这一事实，那个事实就是你说该观念为真时所表达的全部意思（见第206页）。”“当你说该观念为真时”——批评者，这是说对你来说为真？还是对你描述的信任者为真呢？在这方面，批评者的麻烦似乎源自于他没有在联系中看待“真”这个词，而实

用主义者总是指“对经历那些作用的人来说为真”。“可是，这个对象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呢？”批评者似乎又要问，好像是实用主义者注定要将整个本体论投放到其认知论之上，并告诉我们何种是毋庸置疑地存在着。对此，恰当的回答似乎是：“一次只谈同一个领域里的问题”。

One other trouble of Dr. Pratt's must be noticed. It concerns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object. When our ideas have worked so as to bring us flat up against the object, next to it, “is our relation to it then ambulatory or saltatory?” Dr. Pratt asks. If your headache be my object, “my experiences break off where yours begin”, Dr. Pratt writes, and “this fac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it bars out the sense of transition and fulfilment which forms so important an element in the pragmatist description of knowledge—the sense of fulfilment due to a continuous passage from the original idea to the known object. If this comes at all when I know your headache, it comes not with the object, but quite on my side of the “epistemological gulf”. The gulf is still there to be transcended.” (p. 158).

普拉特博士的另一个麻烦也应给予注意，它涉及到对象的“超越”。当我们的观念已经起作用，使我们在对象近旁直面它时，普拉特博士会问，“那时，我们与它的关系是移动的还是跳跃的呢？”如果你的头痛就是我的对象，“我的经验从你的经验开始处停下来”，普拉特博士写道，而且“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因为它阻止了过渡和完成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实用主义对认识的描述中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这种完成的感觉归因于从原初的观念向被认识对象的持续过渡。如果在我认识你的头痛时能产生这种感觉的话，它不是与对象一起出现的，而是处于‘认知论鸿沟’的我这边。这个鸿沟仍然有待跨越”。（第158页）

Some day of course, or even now somewhere in the larger life of the universe, different men's headaches may become confluent or be “co-conscious”. Here and now, however, headaches do transcend each other and, when not felt, can be known only conceptually. My idea is that you really have a headache; it works well with what I see of your expression, and with what I hear you say; but it doesn't put me in possession of the headache itself. I am still at one remove, and the headache “transcends” me, even tho it be in nowise transcendent of human experience generally. But the “gulf” here is that which the pragmatist epistemology itself fixes in the very first words it uses, by saying there must be an object and an idea. The idea however doesn't immediately leap the gulf, it only works from next to next so as to bridge it, fully or approximately. If it bridges it, in the pragmatist's vision of his hypothetical universe, it can be called a “true” idea. If it only might bridge it, but doesn't, or if it throws a bridge distinctly at it, it still has, in the onlooking pragmatist's eyes, what Professor Pratt calls “trueness”. But to ask the pragmatist thereupon whether, when it thus fails to coalesce bodily with the object, it is really true or has real trueness,—in other words whether the headache he supposes, and supposes the thinker he supposes, to believe in, be a real headache or not,—is to step from his hypothetical universe of discourse into the altogether different world of natural fact

当然，在某天——甚至在现在，在宇宙中更为广阔的生活中的某处，不同人的头痛可能成为汇合的或者是“共意识的”。然而，此时此刻，头痛的确超越了彼此，而且当我们感觉不到它的时候，就只能从概念上认识它。我的观念是你真的患有头痛；我从你的表情上和你说的话中可以看出它的作用；但是它却不能让我占有头痛本身。尽管头痛不能总体上超越人类的经验，我还是离它有一段距离，它“超越”了我。但是，这里的“鸿沟”是实用主义认识论本身以最初用的词语所固

定好的东西：它说一定有一个对象和一个观念存在。然而，这个观念并不直接跃过鸿沟，它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发挥作用，以便能以完整地或近似地的方式在这个鸿沟上架起桥梁。如果它能架起这座桥梁，根据实用主义者对其假想的论域的看法，它就能被称作一个“真”观念。如果它只是有可能而实际上没有架起这座桥梁，或者只是明显地把一座桥梁抛向这道鸿沟，那么在旁观的实用主义者眼中，它仍然只是有普拉特教授所说的“真实性”。但是，如果你因此问实用主义者说：当观念不能与对象实现有形结合时，它是否实际上是真的或有实际的真实性，即实用主义者所假设的并且他假定那个他所假定的思想者所相信的头痛是否是真的，问实用主义者这样的问题就等于走出他假想的论域，而迈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自然事实的世界中。

[8_1].Reprinted from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 etc., August 15, 1907 (vol. iv, p. 464).

[8_2].J. B. Pratt: *What is Pragmatism* .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9. —The comments I have printed were written in March, 1909, after some of the articles printed later in the present volume.

[8_3].Op. cit., pp. 77–80.

[8_4].Dr. Pratt, singularly enough, disposes of this primal postulate of all pragmatic epistemology, by saying that the pragmatist "unconsciously surrenders his whole case by smuggling in the idea of a conditioning environment which determines whether or not the experience can work, and which cannot itself be identified with the experience or any part of it" (pp. 167–168). The "experience" means here of course the idea, or belief; and the expression "smuggling in" is to the last degree diverting. If any epistemologist could dispense with a conditioning environment, it would seem to be the antipragmatist, with his immediate saltatory trueness, independent of work done. The mediating pathway which the environment supplies is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pragmatist's explanation.

[8_5].Page 200.

[9_1].原载于《哲学研究》等，1907年8月15日，第4卷，第464页。

[9_2].见J. B. 普拉特：《什么是实用主义》。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09年——

我所发表的评论写于1909年3月，在本书后面的一些文章之后。

[9_3].前引书，第77-80页。

[9_4].足够奇怪的是，普拉特博士摒弃了一切实用主义认识论中这种最初的假定，他说实用主义者“偷偷地引入条件性的环境这一概念，认为它决定经验是否起作用，但它本身不能等同于经验或经验的任何部分，当实用主义者这样做时，就等于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第167-168页）．“经验”在这里当然指这个观念或信念；而且“偷偷地引入”这个说法极其可笑。如果哪位认识论学者能够舍弃条件性的环境这一概念，那他似乎就是反实用主义者，因他那直接的、跳跃性的真实性是独立于实际作用之外的。环境提供的中介路径正是实用主义理论的精髓。

[9_5].第200页。

Chapter VIII The Pragmatist Account of Truth and Its Misunderstanders

第八章　实用主义对真理的阐释及其误解者

The account of truth given in my volume entitled Pragmatism, continues to meet with such persistent misunderstanding that I am tempted to make a final brief reply. My ideas may well deserve refutation, but they can get none till they are conceived of in their proper shape. The fantastic character of the current misconceptions shows how unfamiliar is the concrete point of view which pragmatism assumes. Persons who are familiar with a conception move about so easily in it that they understand each other at a hint, and can converse without anxiously attending to their P's and Q's. I have to admit, in view of the results, that we have assumed too ready an intelligence, and consequently in many places used a language too slipshod. We should never have spoken elliptically. The critics have boggled at every word they could boggle at, and refused to take the spirit rather than the letter of our discourse. This seems to show a genuine unfamiliarity in the whole point of view. It also shows, I think, that the second stage of opposition, which has already begun to express itself in the stock phrase that “what is new is not true, and what is true not new”, in pragmatism, is insincere. If we said nothing in any degree new, why was our meaning so desperately hard to catch? The blame cannot be laid wholly upon our obscurity of speech, for in other subjects we have attained to making ourselves understood. But recriminations are tasteless; and, as far as I personally am concerned, I am sure that some of the misconception I complain of is due to my doctrine of truth being surrounded in that volume of popular lectures by a lot of other

opinions not necessarily implicated with it, so that a reader may very naturally have grown confused. For this I am to blame,—likewise for omitting certain explicit cautions, which the pages that follow will now in part supply. [9_1]

我在名为《实用主义》一书中对真理的解释继续遭遇到持续的误解，我在此忍不住要对此做出最后的简短回应。我的观念也许应该遭到批驳，但是如果它们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它们就不能得到合理的批评。目前的误解有一个怪异的特点，它表明人们对于实用主义采取的具体立场是多么不熟悉。熟悉一个概念的人会在其中游刃有余，一个暗示就能使他们彼此会意，谈话时也不必处处小心。从结果来看，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过于相信人们的智慧，结果在很多地方用词不慎。我们本不应该表达得太简略。批评者对我们使用的每一个词吹毛求疵，只关注我们的话语中使用的词，而拒绝体会其精神实质。这似乎表明他们对我们的整个观点纯粹不熟悉。我认为这也表明，第二个阶段的反对意见不够诚恳；这种反对意见表达在这样一句陈腐的话中，即实用主义的“新的不是真的，而真的不新”。如果我们没有在任何程度上说出新的东西，我们的意思为什么又是如此极度难以理解呢？不能完全归因于我们的含混话语，因为在其他话题上别人能够理解我们。但是，报复性的指责是没什么趣味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肯定我提到的这些误解是下述原因造成的，即在我那本由通俗的演讲汇编而成的书里，真理学夹杂在许多其他见解中，但这些见解未必和真理学说有牵连，结果读者很自然地感到困惑。我对此应该承担责任，还同样应该对遗漏一些明显的告诫负责，对此下文现在将作出部分补充。 [10_1]

First misunderstanding: pragmatism is only a re-editing of positivism.

误解一：实用主义只不过是实证主义的翻版。

This seems the commonest mistake. Scepticism, positivism, and agnosticism agree with ordinary dogmatic rationalism in presupposing that everybody knows what the word “truth” means, without further explanation. But the former doctrines then either suggest or declare that real truth, absolute truth, is inaccessible to us, and that we must fain put up with relative or phenomenal truth as its next best substitute. By scepticism this is treated as an unsatisfactory state of affairs, while positivism and agnosticism are cheerful about it, call real truth sour grapes, and consider phenomenal truth quite sufficient for all our “practical” purposes.

这似乎是最常见的错误。怀疑论、实证主义、不可知论在以下方面与普通的教条式的理性主义是一致的，即它们都预先假定，每个人都知道“真理”这个词的意思，它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但是这样的话，前几种学说或者是暗示或者是宣称，真正的真理，即绝对的真理，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知的，我们只能欣然接受相对的或现象的真理作为次好的替代物。这被怀疑论当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态，而实证主义和不可知论却对此很满足，把真正的真理称作酸葡萄，认为现象真理足以满足我们所有的“实际”目的。

In point of fact, nothing could be farther from all this than what pragmatism has to say of truth. Its thesis is an altogether previous one. It leaves off where these other theories begin, having contented itself with the word truth's definition. “No matter whether any mind extant in the universe possess truth or not”, it asks, “what does the notion of truth signify ideally?” “What kind of things would true judgments be in case they existed?” The answer which pragmatism offers is intended to cover the most complete truth that can be conceived of, “absolute” truth if you like, as well

as truth of the most relative and imperfect description. This question of what truth would be like if it did exist, belongs obviously to a purely speculative field of inquiry. It is not a theory about any sort of reality, or about what kind of knowledge is actually possible; it abstracts from particular terms altogether, and defines the nature of a possible relation between two of them.

事实上，没有比实用主义对真理的阐述离所有这些更远的了。它的论点完全是以前就有的。它满足于对真理一词的定义，在那些其他理论开始的地方停了下来。它问道："无论宇宙中存在的心灵拥有真理与否，真理的观念理想地说到底指什么意思？""万一真的判断存在的话，它们是什么样的东西？"实用主义提供的答案旨在涵盖能想象出的最完备的真理，你可以称之为"绝对"真理，以及最相对和不完美描述的真理。假如真理的确存在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显然属于一个纯粹思辨的探究领域。它不是一个关于某种实在的理论，也不是有关什么样的认识实际上是可能的理论；它完全从特殊词语中抽象而出，对其中两个可能存在的关系的本质进行界定。

As Kant's question about synthetic judgments had escaped previous philosophers, so the pragmatist question is not only so subtile as to have escaped attention hitherto, but even so subtile, it would seem, that when openly broached now, dogmatists and sceptics alike fail to apprehend it, and deem the pragmatist to be treating of something wholly different. He insists, they say (I quote an actual critic), "that the greater problems are insoluble by human intelligence, that our need of knowing truly is artificial and illusory, and that our reason, incapable of reaching the foundations of reality, must turn itself exclusively towards action". There could not be a worse misapprehension.

正如康德关于综合判断的问题是以前的哲学家没有想到的一样，实用主义者的问题非常微妙，迄今为止还没有引起注意，而且它是如此微妙，以至于现在公开讨论它的时候，那些教条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似乎都没能理解它，他们认为实用主义者正在探讨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指出（我在引用一位批评者的原话），实用主义者坚持认为，“更大的问题是人类的智慧无法解决的，我们对真正认识的需要是虚假的、空幻的，我们的理性不能深入到实在的根基，因此不得不完全转向行动。”没有比这种误解再糟糕的了。

Second misunderstanding: pragmatism is primarily an appeal to action.

误解二：实用主义主要是对行动的诉求。

The name “pragmatism”, with its suggestions of action, has been an unfortunate choice, I have to admit, and has played into the hands of this mistake. But no word could protect the doctrine from critics so blind to the nature of the inquiry that, when Dr. Schiller speaks of ideas “working” well, the only thing they think of is their immediate workings i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heir enabling us to make money, or gain some similar “practical” advantage. Ideas do work thus, of course, immediately or remotely; but they work indefinitely inside of the mental world also. Not crediting us with this rudimentary insight, our critics treat our view as offering itself exclusively to engineers, doctors, financiers, and men of action generally, who need some sort of a rough and ready weltanschauung, but have no time or wit to study genuine philosophy. It is usually described as a characteristically American movement, a sort of bobtailed scheme of thought, excellently fitted

for the man on the street, who naturally hates theory and wants cash returns immediately.

我不得不承认，“实用主义”这个词暗示着行动，这个名称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误解。可是，什么样的词都不能保护这一个学说免受这样一群批评者的指责：他们并不清楚研究的本质，因此当席勒博士谈起观念的有效“作用”时，批评者想到的唯一事情是它们在物质环境下的直接作用：它们能使我们挣到钱，或者获取类似的“实际”利益。当然，观念的确能这样起作用，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但是它们也在心灵世界里不确定地起作用。我们的批评者忽视了这一基本见解，他们认为我们的观点总体上只适用于工程师、医生、金融家和行动者，这些人需要某种粗糙的、现成的世界观，但却没有时间和智慧去研究纯哲学。这通常被描述为典型的美国运动，是一种被剪短尾巴的思想体系，对大街上的普通人极其适合，因为他们天生痛恨理论，想立即得到金钱上的回报。

It is quite true that, when the refined theoretic question that pragmatism begins with is once answered, secondary corollaries of a practical sort follow.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in the function called truth, previous realities are not the only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 a certain extent our ideas, being realities, are also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just as they follow other reality and fit it, so, in a measure, does other reality follow and fit them. When they add themselves to being, they partly redetermine the existent, so that reality as a whole appears incompletely definable unless ideas also are kept account of. This pragmatist doctrine, exhibiting our ideas as complemental factors of reality, throws open (since our ideas are instigators of our action) a wide window upon human action, as well as a wide license to originality in thought. But few things could be sillier than to ignore the prior epistemological

edifice in which the window is built, or to talk as if pragmatism began and ended at the window. This, nevertheless, is what our critics do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They ignore our primary step and its motive, and make the relation to action, which is our secondary achievement, primary.

当然，实用主义起初的高雅理论问题一旦被解答，一些次级的实际结果就会接踵而至。研究表明，在称作真理的这一函数中，以前的实在不是唯一的自变量。由于我们的观念是实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变量，而且，正像它们遵从并适合其他实在，其他实在也在一定程度上遵从并适合它们。当它们把自己添加于存在之上，它们部分地重新决定了存在物，结果，实在作为一个整体看上去不能被完整地加以界定，除非观念也一直被考虑在内。这种实用主义的学说把我们的观念展示为实在的补充要素，它为人的行动打开了一个宽阔的窗口（既然思想是行动的促动者），也为思想上的独创性创造了丰富的机会。但是，没有比忽视先前的认识论大厦更愚蠢的做法了，因为这些大厦就是窗口所在之处；认为实用主义开始并结束于这个窗口也同样愚蠢。然而，我们的批评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这样做了。他们忽视了我们首要的一步及其动机，把与行动的联系看作是首要的，而这只不过是我们的次要成就。

Third misunderstanding: pragmatists cut themselves off from the right to believe in ejective realities.

误解三：实用主义者放弃了信奉外显实在的权利。

They do so, according to the critics, by making the truth of our beliefs consist in their verifiability, and their verifiability in the way

in which they do work for us. Professor Stout, in his otherwise admirable and hopeful review of Schiller in *Mind* for October, 1897, considers that this ought to lead Schiller (could he sincerely realize the effects of his own doctrine) to the absurd consequence of being unable to believe genuinely in another man's headache, even were the headache there. He can only “postulate” it for the sake of the working value of the postulate to himself. The postulate guides certain of his acts and leads to advantageous consequences; but the moment he understands fully that the postulate is true only (!) in this sense, it ceases (or should cease) to be true for him that the other man really has a headache. All that makes the postulate most precious then evaporates: his interest in his fellow-man “becomes a veiled form of self-interest, and his world grows cold, dull, and heartless.”

在批评者看来，为了使我们信念的真理性取决于其可证实性，可证实性确实通过这种方式对我们起到了作用，实用主义者放弃了信奉外显实在的权利。斯托特教授在1897年10月的《心灵》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本来应该倍受赞赏和令人鼓舞的评论，但是它批评席勒说，这种对真理的看法可能引导席勒（如果他真正意识到其学说的效果的话）走向荒唐的后果，使他不能真正相信另外一个人患有头痛，即使头痛真正存在于那个人身上。席勒只能“假定”头痛的存在，而这样做是为了这个假设对他自己具有的操作价值。这个假设引导者他的某些行为，并导向有利的结果；但是他一旦完全明白这个假设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是真的，那个他人真正患有头痛这个事实对他来说就不再（或不应该再）是真的。使得这个假设极其珍贵的一切然后都会消失：他对其同伴的兴趣“变成伪装下的自私自利，他的世界变得冷酷、无趣、无情”。

Such an objection makes a curious muddle of the pragmatist's

universe of discourse. Within that universe the pragmatist finds some one with a headache or other feeling, and some one else who postulates that feeling. Asking on what condition the postulate is “true” the pragmatist replies that, for the postulator at any rate, it is true just in proportion as to believe in it works in him the fuller sum of satisfactions. What is it that is satisfactory here? Surely to believe in the postulated object, namely, in the really existing feeling of the other man. But how (especially if the postulator were himself a thoroughgoing pragmatist) could it ever be satisfactory to him not to believe in that feeling, so long as, in Professor Stout's words, disbelief “made the world seem to him cold, dull, and heartless”? Disbelief would seem, on pragmatist principles, quite out of the question under such conditions, unless the heartlessness of the world were made probable already on other grounds. And since the belief in the headache, true for the subject assumed in the pragmatist's universe of discourse, is also true for the pragmatist who for his epitemologizing purposes has assumed that entire universe, why is it not true in that universe absolutely? The headache believed in is a reality there, and no extant mind disbelieves it, neither the critic's mind nor his subject's! Have our opponents any better brand of truth in this real universe of ours that they can show us?[1]

这种反对意见给实用主义的论域带来了奇怪的混乱。在那个论域里，实用主义者发现了患有头痛或其他感觉的人，也发现了假定那种感觉存在的另外一个人。问到在什么条件下这个假设是“真的”时，实用主义者回答说，至少对假设者来说，该假设的真只与相信它在他身上产生的满意度的更大总和成正比。这里令人满意的是什么东西呢？当然是指相信假设对象的存在，即相信另一个人的真正存在的感觉。但是，只要不信“使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变得冷酷、无趣、无情”（用斯托特教授的话来说），那么不相信那种感觉的存在如何能令他满意呢

（尤其是如果假设者本人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的话）？根据实用主义的原则，不信在这种条件下是相当不可能的，除非世界已经因其他理由可能被弄得冷酷无情。而且，相信头痛对实用主义者的论域所假定的主体来说是真的，既然这种信念对为了认识论目的而假定这整个论域存在的实用主义者来说也是真的，那么它在那个论域中为什么不是绝对真的？被相信的头痛是那里的一个实在，没有任何存在的心灵会不相信它，无论是批评者的心灵还是其批评对象的心灵。在我们的这个现实世界里，我们的批评者还能拿出对真理的更好解释呈现给我们吗？[1]

1: I see here a chance to forestall a criticism which some one may make on Lecture III of my Pragmatism, where, on pp. 96-100, I said that 'God' and 'Matter' might be regarded as synonymous terms, so long as no differing future consequences were deducible from the two conceptions. The passage was transcribed from my address at the California Philosophical Union, reprinted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i, p. 673. I had no sooner given the address than I perceived a flaw in that part of it; but I have left the passage unaltered ever since, because the flaw did not spoil its illustrative value. The flaw was evident when, as a case analogous to that of a godless universe, I thought of what I called an 'automatic sweetheart,' meaning a soulless body which should be absolute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a spiritually animated maiden, laughing, talking, blushing, nursing us, and performing all feminine offices as

tactfully and sweetly as if a soul were in her. Would any one regard her as a full equivalent? Certainly not, and why? Because, framed as we are, our egoism craves above all things inward sympathy and recognition, love and admiration. The outward treatment is valued mainly as an expression,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accompanying consciousness believed in. Pragmatically, then, belief in the automatic sweetheart would not work, and is point of fact no one treats it as a serious hypothesis. The godless universe would be exactly similar. Even if matter could do every outward thing that God does, the idea of it would not work as satisfactorily, because the chief call for a God on modern men's part is for a being who will inwardly recognize them and judge them sympathetically. Matter disappoints this craving of our ego, so God remains for most men the truer hypothesis, and indeed remains so for definite pragmatic reasons.

1: 此处，我看到一个阻断一种批评的机会，有些人可能批评《实用主义》第三讲的内容，在第96 - 100页我曾说，“上帝”和“物质”可以被看作是同义词，只要没有不同的未来效果能从这两个概念中推导出。文章由我在加州哲学协会的讲话整理而成，重印于《哲学研究》第一卷，第673页。刚刚做完这次演讲我就觉察到那部分中存在一个缺陷；但是，我此后并没有修正过这篇东西，因为这个错误并不损害它的解释价值。这一缺陷在下列情况下就变得一目了然：为了与

> 无神的宇宙做一个类比，我曾设想一个我称作“自动爱人”东西，那时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与一个栩栩如生的少女绝对难以区分，她笑谈、害羞、看护我们，能机智、甜美地履行女性的各种职责，就好像她是有灵魂的。会有人把她看作完全等同于少女吗？当然不会；为什么？因为根据我们先天的造化，我们的个人倾向使我们首先会向往内在的同情、认可、爱和羡慕。外部的待遇主要被当作是一种表现而加以珍视，一种对被相信的伴随意识的展示。这样，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对自动爱人的信念是不能产生作用的，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严肃的假设而对待。无神的宇宙会是完全相似的。即使物质能做上帝所做的每一件外部的事情，有关它的观念也不会能令人满意地产生作用，因为现代人对上帝的需要主要是为了获得一个存在，这个存在将在内心中承认他们，并同情地评判他们。物质会让我们自我的这种向往失望，因此上帝对大多数人来说继续是更真实的假设，而且为了特定的实用目的永远是如此。

So much for the third misunderstanding, which is but one specification of the following still wider one.

第三个误解就讲到这里，它只不过是下一个更广泛误解的具体表现。

Fourth misunderstanding: no pragmatist can be a realist in his epistemology.

误解四：实用主义者在认识论上都不可能是实在论者。

This is supposed to follow from his statement that the truth of our beliefs consists in general in their giving satisfaction. Of course satisfaction per se is a subjective condition; so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truth falls wholly inside of the subject, who then may manufacture it at his pleasure. True beliefs become thus wayward affections, severed from all responsibility to other parts of experience.

这被认为是产生于实用主义的一个论断，即我们信念的真理性一般来说在于信念能带来满意。当然，满意本身是一个主观条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真理整个都存在于主体之中，主体随后可以随意制造真理。这样，真信念就变成了随意的偏好，割断了对经验的其他部分应负的所有责任。

It is difficult to excuse such a parody of the pragmatist's opinion, ignoring as it does every element but one of his universe of discourse. The terms of which that universe consists positively forbid any non-re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knowledge defined there. The pragmatizing epistemologist posits there a reality and a mind with ideas. What, now, he asks, can make those ideas true of that reality? Ordinary epistemology contents itself with the vague statement that the ideas must “correspond” or “agree”; the pragmatist insists on being more concrete, and asks what such “agreement” may mean in detail. He finds first that the ideas must point to or lead towards that reality and no other, and then that the pointings and leadings must yield satisfaction as their result. So far the pragmatist is hardly less abstract than the ordinary slouchy

epistemologist; but as he defines himself farther, he grows more concrete. The entire quarrel of the intellectualist with him is over his concreteness, intellectualism contending that the vaguer and more abstract account is here the more profound. The concrete pointing and leading are conceived by the pragmatist to be the work of other portions of the same universe to which the reality and the mind belong, intermediary verifying bits of experience with which the mind at one end, and the reality at the other, are joined. The “satisfaction”, in turn, is no abstract satisfaction *überhaupt* , felt by an unspecified being, but is assumed to consist of such satisfactions (in the plural) as concretely existing men actually do find in their beliefs. As we humans are constituted in point of fact, we find that to believe in other men's minds, in independent physical realities, in past events, in eternal logical relations, is satisfactory. We find hope satisfactory. We often find it satisfactory to cease to doubt. Above all we find consistency satisfactory,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present idea and the entire rest of our mental equipment, including the whole order of our sensations, and that of our intuitions of likeness and difference, and our whole stock of previously acquired truths.

很难原谅对实用主义见解的这种拙劣解释，因为除了论域之外它忽略了其他所有元素。构成该论域的语汇肯定不允许对那里所定义的认识的功能做出非实在论的解释。在那里，采取实用主义的立场的认识论者设定了一个实在和一个拥有观念的头脑。现在他问，什么能使得这些观念符合那个实在呢？一般的认识论满足于一种模糊的陈述，它会说观念必须要“符合”或“一致”；而实用主义者则坚持更具体的东西，他会问这种“符合”可能具体意味着什么。他首先发现，观念必须指向或导向那个实在，而不是其他；他然后发现，这些指向和导向必须带来满意作为结果。至此，实用主义者几乎与那位无精打采的普通认识论者同样抽象；但是随着他进一步界定自己的观点，他变得更加

具体。理智主义者与他的整个争论涉及这个具体性，理智主义主张，更含混、更抽象的解释在这里是更深刻的解释。具体的指向和导向被实用主义者看作是实在和心灵归属的同一个世界的其他部分的作用，充当中介并起证实作用的这些经验片段，使居于一端的心灵和居于另一端的实在结合在一起。至于“满意”，它根本不是指由某个不确指的存在所感觉到的一般意义上抽象的满意，而被认为是由具体存在的人实际上在他们的信念中确实找到的各种满意（注意这个词是复数形式）组成。由于人天生习惯于事实，我们发现相信其他人的心智、独立的物质实在、过去的事件、永恒的逻辑关系能令人满意。我们发现希望令人满意。我们经常发现停止怀疑令人满意。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一致性令人满意，这种一致是目前的观念与我们心理才智的整个其他部分之间的一致，包括我们的所有感觉，对于像与不像的直观感觉，以及我们以前获取的所有真理。

The pragmatist, being himself a man, and imagining in general no contrary lines of truer belief than ours about the “reality” which he has laid at the base of his epistemological discussion, is willing to treat our satisfactions as possibly really true guides to it, not as guides true solely for us. It would seem here to be the duty of his critics to show with some explicitness why, being our subjective feelings, these satisfactions can not yield “objective” truth. The beliefs which they accompany “posit” the assumed reality, “correspond” and “agree” with it, and “fit” it in perfectly definite and assignable ways, through the sequent trai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which form their verification, so merely to insist on using these words abstractly instead of concretely is no way of driving the pragmatist from the field,—his more concrete account virtually includes his critic's. If our critics have any definite idea of a truth more objectively grounded than the kind we propose, why do they not show it more articulately? As they stand, they remind one of Hegel's man who wanted “fruit”, but rejected cherries, pears, and

grapes, because they were not fruit in the abstract. We offer them the full quart-pot, and they cry for the empty quart-capacity.

实用主义者也是人，一般来说，他也会想象自己对“实在”的信念比反对者的更真，这种信念构成了他讨论认识论的基础，因此，他愿意把我们的各种满意当作导向实在的可能真正真实的向导，而不是仅对我们来说真实的向导。他的反对者似乎在此有义务明确地说明，既然这些满意是我们的主观感受，它们为何不能产生“客观的”真理。满意所伴随的信念“设定”了假设的实在，与它相“符合”并“一致”，以完全确定和可指派的方式“适合”于它，这一切都要通过构成其证实过程的一连串思想和行动实现；因此，仅仅靠坚持抽象地而不是具体地使用这些词语，根本不能将实用主义者赶出战场——他更具体的解释实质上包括了其批评者的解释。如果我们的批评者对某个真理有什么确定的观念，比我们提出的那种真理观有更客观的基础，他们为什么不能更雄辩地把它表达出来呢？从他们的立场来看，他们令人想起黑格尔所说的一个人，那个人想要“水果”，但拒绝接受樱桃、梨子和葡萄，因为它们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水果。我们给他们一满罐一夸脱的东西，而他们却嚷嚷着要空洞的一夸脱容量。

But here I think I hear some critic retort as follows: “If satisfactions are all that is needed to make truth, how about the notorious fact that errors are so often satisfactory? And how about the equally notorious fact that certain true beliefs may cause the bitterest dissatisfaction? Isn't it clear that not the satisfaction which it gives, but the relation of the belief to the reality is all that makes it true? Suppose there were no such reality, and that the satisfactions yet remained: would they not then effectively work falsehood? Can they consequently be treated distinctively as the truth-builders? It is the inherent relation to reality of a belief that gives us that specific truth-satisfaction, compared with which all

other satisfactions are the hollowest humbug. The satisfaction of knowing truly is thus the only one which the pragmatist ought to have considered. As a psychological sentiment, the anti-pragmatist gladly concedes it to him, but then only as a concomitant of truth, not as a constituent. What constitutes truth is not the sentiment, but the purely logical or objective function of rightly cognizing the reality, and the pragmatist's failure to reduce this function to lower values is patent.”

可是，我此处听到某个批评者反驳如下：“如果各种满意是产生真理所需要的一切，那么对于错误经常令人满意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你做何解释呢？再者，另外一个同样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某些真信念可能导致最痛苦的不满，你又对此做何解释呢？可见，不是信念所带来的满意，而是信念与实在的关系，是决定它真的一切，这不是明摆着吗？假如不存在这种实在，而满意仍然存在：那么这些满意不就有效地产生假了吗？这样，它们能被明确地当作真理的创造者吗？正是一个信念与实在的固有关系，给我们带来了那种特定的真理 - 满意，与之相比，所有其他满意都是最空洞的谎言。因此，真正地认识带来的满意是实用主义者应该考虑的唯一东西。实用主义的反对者很乐意承认满意是一种心理情绪，但是，它他仅承认它是真理的伴生物，而不是其构成部分。构成真理的不是情绪，而是正确地认知实在的纯逻辑或客观功能，实用主义者显然没能将这一功能降低到更低的价值。”

Such anti-pragmatism as this seems to me a tissue of confusion. To begin with, when the pragmatist says “indispensable”, it confounds this with “sufficient”. The pragmatist calls satisfactions indispensable for truth-building, but I have everywhere called them insufficient unless reality be also incidentally led to. If the reality assumed were cancelled from the pragmatist's universe of discourse, he would straightway give the name of falsehoods to the beliefs

remaining, in spite of all their satisfactoriness. For him, as for his critic, there can be no truth if there is nothing to be true about. Ideas are so much flat psychological surface unless some mirrored matter gives them cognitive lustre. This is why as a pragmatist I have so carefully posited “reality” *ab initio* , and why, throughout my whole discussion, I remain an epistemological realist. [9_2]

像这样的反实用主义论调在我看来是一连串混淆。首先，当实用主义者说“不可或缺的”时，他弄混了这个词与“充分的”。实用主义者说各种满意对真理的确立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在各处都说过它们是不充分的，除非也附带导向实在。如果假定的实在被从实用主义者的论域里取消，他会直接给剩余的信念冠以虚假之名，而不顾它们带来的所有满意。无论对他还是对他的批评者来说，如果不存在能判定真的东西，就无所谓真理。除非某个被反映的物质给观念以认知上的光耀，否则观念只不过是平淡无奇心理的平面。这解释了我作为实用主义者为什么从一开始如此小心翼翼地设定“实在”这个概念，以及为什么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一直在认识论上是一名实在论者。 [10_2]

The anti-pragmatist is guilty of the further confusion of imagining that, in undertaking to give him an account of what truth formally means, we are assuming at the same time to provide a warrant for it, trying to define the occasions when he can be sure of materially possessing it. Our making it hinge on a reality so “independent” that when it comes, truth comes, and when it goes, truth goes with it, disappoints this naive expectation, so he deems our description unsatisfactory. I suspect that under this confusion lies the still deeper one of not discriminating sufficiently between the two notions, truth and reality. Realities are not true, they are; and beliefs are true of them. But I suspect that in the anti-pragmatist mind the two notions sometimes swap their attributes.

The reality itself, I fear, is treated as if “true” and conversely. Who so tells us of the one, it is then supposed, must also be telling us of the other; and a true idea must in a manner BE, or at least yield without extraneous aid, the reality it cognitively is possessed of.

反实用主义者还犯了另一个混淆错误：当我们着手向他解释真理的正式意义时，他错误地想象我们同时想为它提供一个保证，试图定义出他能有把握地在物质上占有真理的场合。我们让真理依赖于如此“独立的”一个实在，以至于当它存在时，真理才能产生，当它消失时，真理也会随之消失，这令反实用主义者这种幼稚的期望落了空，所以他判定我们的描述是不令人满意的。我怀疑，在这种混淆背后存在着更深刻的混乱，即不能充分区分真理和实在这两个概念。实在不是真的，它们只存在；信念对它们来说才能为真。但是我怀疑，在反实用主义者的心目中，这两个概念有时互换了它们的特性。我担心，实在本身被当作是“真的”，而真的被当作了实在。然后他们假定，只要你告诉了我们其中一个，就等于是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真观念必须以某种方式成为，或者至少不靠外来帮助就能产生，它在认知上拥有的那个实在。

To this absolute-idealistic demand pragmatism simply opposes its non possumus. If there is to be truth, it says, both realities and beliefs about them must conspire to make it; but whether there ever is such a thing, or how anyone can be sure that his own beliefs possess it, it never pretends to determine. That truth-satisfaction par excellence which may tinge a belief unsatisfactory in other ways, it easily explains as the feeling of consistency with the stock of previous truths, or supposed truths, of which one's whole past experience may have left one in possession.

对这种绝对唯心主义的要求，实用主义只能用其无可奈何的态度表示反对。实用主义认为，如果存在真理，实在和有关实在的信念必须协力去创造它；但是，实用主义绝不会自以为能确定是否存在真理，或者确定一个人怎样确保自己的信念拥有真理。那种卓越的真理满意——它可能使一个信念在其他方面令人不满，被实用主义者简单地解释为对一致状态的一种感觉，这种一致指与从前的真理或假定的真理之间的一致，而个人全部的过去经验可能使他拥有了这些真理。

But are not all pragmatists sure that their own belief is right? Their enemies will ask at this point; and this leads me to the fifth misunderstanding: what pragmatists say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ir saying so.

但是，此处实用主义者的敌人会问：所有的实用主义者难道不都确定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吗？这使我们过渡到误解五：实用主义者所说的跟他们这样说的不一致。

A correspondent puts this objection as follows: “When you say to your audience, 'pragmatism is the truth concerning truth,' the first truth is different from the second. About the first you and they are not to be at odds; you are not giving them liberty to take or leave it according as it works satisfactorily or not for their private uses. Yet the second truth, which ought to describe and include the first, affirms this liberty. Thus the intent of your utterance seems to contradict the content of it.”

一个与我通信的人表达其反对意见如下，“当你对听众们说‘实用主义是有关真理的真理’时，第一个真理有别于第二个真理。有关第一

个真理，你和听众之间不存在分歧；你没有给听众自由，听凭他们根据真理对他们各自的使用是否满意地产生作用，对真理进行取舍。可是，应该描述并包括第一个真理的第二个真理却肯定了这种自由。因此，你说话的意图似乎与内容之间存在矛盾。”

General scepticism has always received this same classic refutation. “You have to dogmatize”, the rationalists say to the sceptics, “whenever you express the sceptical position; so your lives keep contradicting your thesis.” One would suppose that the impotence of so hoary an argument to abate in the slightest degree the amount of general scepticism in the world might have led some rationalists themselves to doubt whether these instantaneous logical refutations are such fatal ways, after all, of killing off live mental attitudes. General scepticism is the live mental attitude of refusing to conclude. It is a permanent torpor of the will, renewing itself in detail towards each successive thesis that offers, and you can no more kill it off by logic than you can kill off obstinacy or practical joking. This is why it is so irritating. Your consistent sceptic never puts his scepticism into a formal proposition, —he simply chooses it as a habit. He provokingly hangs back when he might so easily join us in saying yes, but he is not illogical or stupid, —on the contrary, he often impresses us by his intellectual superiority. This is the real scepticism that rationalists have to meet, and their logic does not even touch it.

一般的怀疑论总是会受到这种典型的诘难。理性主义者对怀疑论者说，“每当你们表达怀疑的立场时，你不得不将之教条化；于是，你的生活总是不断与你的论点发生矛盾。”人们可以料想，如此陈腐的论点根本无力消解一般怀疑论在世界上的影响，这种状况很可能使某些理性主义者自身开始怀疑，这类即时的逻辑反驳究竟在扼杀鲜活

的思想态度上是否是致命的方式。一般怀疑论是一种拒绝得出结论的活生生的思想态度。它是意志的永久冬眠，在对连续出现的每一个论题的反应中一点一点地觉醒，你无法用逻辑消灭它，正像你不能消除固执或恶作剧一样。这是它特别恼人的原因。持一贯怀疑立场的人从不会把自己的怀疑态度表述为形式化的命题：他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习惯。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跟我们一起说“是”，而他却带着挑战的姿态退缩回去，但是他又不是没有逻辑的或愚蠢的；相反，他经常以其理智上的优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这是理性主义者不得不面对的真正怀疑论，而他们的逻辑甚至没有触及到它。

No more can logic kill the pragmatist's behavior: his act of utterance, so far from contradicting, accurately exemplifies the matter which he utters. What is the matter which he utters? In part, it is this, that truth, concretely considered, is an attribute of our beliefs, and that these are attitudes that follow satisfactions. The ideas around which the satisfactions cluster are primarily only hypotheses that challenge or summon a belief to come and take its stand upon them. The pragmatist's idea of truth is just such a challenge. He finds it ultra-satisfactory to accept it, and takes his own stand accordingly. But, being gregarious as they are, men seek to spread their beliefs, to awaken imitation, to infect others. Why should not you also find the same belief satisfactory? thinks the pragmatist, and forthwith endeavors to convert you. You and he will then believe similarly; you will hold up your subject-end of a truth, which will be a truth objective and irreversible if the reality holds up the object-end by being itself present simultaneously. What there is of self-contradiction in all this I confess I cannot discover. The pragmatist's conduct in his own case seems to me on the contrary admirably to illustrate his universal formula; and of all epistemologists, he is perhaps the only one who is irreproachably self-consistent.

逻辑也不再能消除实用主义者的行为：他说话的行为远远没有发生矛盾，而是准确地为他谈论的事情提供了例证。他谈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其中的一部分是：当具体看待真理时，它是我们信念的一种性质，而这些信念又是伴随各种满意而产生的各种态度。周围聚集着满意的那些观念主要只是一些假设，这些假设挑战或召唤即将产生并以假设为基础的信念。实用主义者的真理观就是这样一种挑战。他发现接受这一挑战是令他极度满意的，并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尽管人是善于交际的，他们仍试图传播自己的信念，引起模仿，影响他人。实用主义者想，你为什么不觉得这个信念也是令人满意的呢？并立刻努力改变你的信念。这样，你和他将产生同样的信念；你站在真理的主观性一端，如果实在同时存在并站在真理的客观性一端，那么你的一端将成为客观的、不可颠覆的真理。我必须承认，我在这一切中没有发现任何自相矛盾。在我看来，恰恰相反，实用主义者表达自己观点的行为令人羡慕地展示了他的普遍准则；在所有认识论者中，他也许是唯一一位无可指责的前后一致的人。

Sixth misunderstanding: pragmatism explains not what truth is, but only how it is arrived at.

误解六：实用主义并不解释真理是什么，而是只解释如何达成真理。

In point of fact it tells us both, tells us what it is incidentally to telling us how it is arrived at, —for what is arrived at except just what the truth is? If I tell you how to get to the railroad station, don't I implicitly introduce you to the what, to the being and nature of that edifice? It is quite true that the abstract word “how” hasn't the same meaning as the abstract word “what”, but in this universe

of concrete facts you cannot keep hows and whats asunder. The reasons why I find it satisfactory to believe that any idea is true, the how of my arriving at that belief, may be among the very reasons why the idea IS true in reality. If not, I summon the anti-pragmatist to explain the impossibility articulately.

事实上，实用主义对二者都做出解释，告诉我们如何达到真理时也附带着告诉了我们真理是什么，因为，如果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它怎样被达到呢？如果我告诉你如何到达火车站，我不是也隐含地告诉了你什么——即那个建筑物的存在和性质了吗？当然，“如何”这个抽象的词与同样抽象的“什么”这个词不是同一个意思，但是在具体事实的论域，你不可能将“如何”与“什么”分割开来。我发现相信任何观念为真能令我满意的理由，即我如何达到了那个真理，可能恰恰是这个观念实际上是真的一些理由。如果不是这样，就请反实用主义者向我清楚地解释一下其中的不可能性。

His trouble seems to me mainly to arise from his fixed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how a concrete statement can possibly mean as much, or be as valuable, as an abstract one. I said above that the main quarrel between us and our critics was that of concreteness versus abstractness. This is the place to develop that point farther.

在我看来，他的麻烦似乎主要产生于他已有的无能：他不能理解一个具体的陈述如何可能像一个抽象陈述那样有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我在上文说，我们和批评者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具体之于抽象的争论。现在是进一步展开这一讨论的时候了。

In the present question, the links of experience sequent upon an

idea, which mediate between it and a reality, form and for the pragmatist indeed are, the concrete relation of truth that may obtain between the idea and that reality. They, he says, are all that we mean when we speak of the idea “pointing” to the reality, “fitting” it, “corresponding” with it, or “agreeing” with it, —they or other similar mediating trains of verification. Such mediating events make the idea “true”. The idea itself, if it exists at all, is also a concrete event: so pragmatism insists that truth in the singular is only a collective name for truths in the plural, these consisting always of series of definite events; and that what intellectualism calls the truth, the inherent truth, of any one such series is only the abstract name for its truthfulness in act, for the fact that the ideas there do lead to the supposed reality in a way that we consider satisfactory.

就目前的问题来看，由观念引起的经验的联系在观念和实在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些联系构成了——并且对实用主义者来说就是——观念与那个实在之间可能产生的具体真理关系。实用主义者指出，当我们说观念“指向”实在、“适合”它、与它“相符合”或“一致”时，我们指的就是这些联系——这些联系或其他类似起中介作用的各种系列的证实过程。这些中介事件使观念成为“真的”。如果观念存在的话，它本身也是一个具体的事件：因此实用主义者坚持认为，单数的真理对复数的真理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集合名称，后者总是由各种系列确定的事件组成；他认为，理智主义所说的任何一种这类系列的真理——即内在的真理，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名称，用来指它实际的真实性，指这样一个事实：那里的观念以我们认为满意的方式确实导向了所假定的实在。

The pragmatist himself has no objection to abstractions. Elliptically, and “for short”, he relies on them as much as any one,

finding upon innumerable occasions that their comparative emptiness makes of them useful substitutes for the overfulness of the facts he meets with. But he never ascribes to them a higher grade of reality. The full reality of a truth for him is always some process of verification, in which the abstract property of connecting ideas with objects truly is workingly embodied. Meanwhile it is endlessly serviceable to be able to talk of properties abstractly and apart from their working, to find them the same in innumerable cases, to take them “out of time”, and to treat of their relations to other similar abstractions. We thus form whole universes of platonic ideas ante rem, universes in posse, tho none of them exists effectively except in rebus. Countless relations obtain there which nobody experiences as obtaining, —as, in the eternal universe of musical relations, for example, the notes of Aennchen von Tharau were a lovely melody long ere mortal ears ever heard them. Even so the music of the future sleeps now, to be awakened hereafter. Or, if we take the world of geometrical relations, the thousandth decimal of “pi” sleeps there, tho no one may ever try to compute it. Or, if we take the universe of “fitting”, countless coats “fit” backs, and countless boots “fit” feet, on which they are not practically fitted; countless stones “fit” gaps in walls into which no one seeks to fit them actually. In the same way countless opinions “fit” realities, and countless truths are valid, tho no thinker ever thinks them.

实用主义者本人并不反对抽象。粗略地讲，或“简而言之”，他像其他人一样依赖抽象，在无数情况下他发现，抽象东西的相对空洞使它们成为他所遇到的太多事实的有用替代品。但是他从不赋予它们更高层次的实在性。对他来说，真理的完全实在性总是某种证实的过程，其中真正连接观念和对象的抽象属性以起作用的形式得以体现。同时，能抽象地并脱离其作用来谈论其属性，发现它们在无数情况下是相同的，使它们“脱离时间限制”，谈论它们与其他类似的抽象东西

之间的关系，这些做法也是永远有用的。因此，我们就形成了事前的柏拉图式理念的整个世界，一些可能的世界，虽然它们都只有在事物中才有效地存在着。那里存在着每个人都经验不到的无数种关系，例如，在音乐关系的无限世界里，安肯·冯·塔罗的音符早在普通人的耳朵听到它们之前就是一个优美动人的旋律了。未来的音乐现在也这样沉睡在那里，等待着事后被唤醒。或者说，如果我们看一看几何关系的世界，π的第1000位数就沉睡在那里，虽然还没有人试图计算出它来。或者说，如果我们举出“适合”的世界作为例子，有无数件外衣“适合”人的臂膀，有无数双靴子“适合”人的脚，虽然它们实际上并不一定被试穿过；有无数块石头“适合”墙上的洞，虽然没有人实际上曾经将它们塞入其中。同样地，有无数见解“适合”实在，有无数真理是有效的，虽然还没有人思考它们。

For the anti-pragmatist these prior timeless relations are the presupposition of the concrete ones, and possess the profounder dignity and value. The actual workings of our ideas in verification-processes are as naugh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btainings” of this discarnate truth within them.

对反实用主义者来说，这些先验的永恒关系都是对具体关系的预设，拥有意义深刻的尊严和价值。我们的观念在证实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与在这些关系中这种无形真理的“获得”相比，简直就是一钱不值。

For the pragmatist, on the contrary,—all discarnate truth is static, impotent, and relatively spectral, full truth being the truth that energizes and does battle. Can any one suppose that the sleeping quality of truth would ever have been abstracted or have received a name, if truths had remained forever in that storage-

vault of essential timeless “agreements” and had never been embodied in any panting struggle of men's live ideas for verification? Surely no more than the abstract property of “fitting” would have received a name, if in our world there had been no backs or feet or gaps in walls to be actually fitted. Existential truth is incidental to the actual competition of opinions. Essential truth, the truth of the intellectualists, the truth with no one thinking it, is like the coat that fits tho no one has ever tried it on, like the music that no ear has listened to. It is less real, not more real, than the verified article; and to attribute a superior degree of glory to it seems little more than a piece of perverse abstraction-worship. As well might a pencil insist that the outline is the essential thing in all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and chide the paint-brush and the camera for omitting it, forgetting that their pictures not only contain the whole outline, but a hundred other things in addition. Pragmatist truth contains the whole of intellectualist truth and a hundred other things in addition. Intellectualist truth is then only pragmatist truth in posse. That on innumerable occasions men do substitute truth in posse or verifiability, for verification or truth in act, is a fact to which no one attributes more importance than the pragmatist: he emphasizes the practical utility of such a habit. But he does not on that account consider truth in posse,—truth not alive enough ever to have been asserted or questioned or contradicted, to be the metaphysically prior thing, to which truths in act are tributary and subsidiary. When intellectualists do this, pragmatism charges them with inverting the real relation. Truth in posse means only truths in act; and he insists that these latter take precedence in the order of logic as well as in that of being.

相反，对实用主义者来说，所有这些无形的真理是静止的、苍白无力的、相当空洞的，而充分的真理是给人以活力、富有战斗力的真

理。假如真理永远处于那种以基本的、超越时间的“一致”为特点的储藏库里，从来没有体现在人的活生生的观念为证实自身而开展的奋力搏斗中，那么，人们能否设想真理的沉睡性质已经被抽象或冠以名称呢？当然，假如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臂膀、脚或墙洞去被适合，“适合”的抽象属性也不会被冠以任何名称。存在的真理是伴随见解之间的实际竞争而产生的。基本的真理，即理智主义者所说的真理，也就是那些没有人思想的真理，就像一件适合的外衣，虽然还没有人试穿过它，就像尚没有耳朵听过的音乐一样。它不如被证实的东西更真实，而不是比它更真实；把更高程度的荣耀赋予它似乎无异于一种不近情理的抽象崇拜。同样地，一支铅笔也可能坚持认为，外部轮廓在所有图形描述中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它指责油画笔或照相机忽略了轮廓，忘记了它们的画不仅包含整个轮廓，也包括上百个其他东西。实用主义的真理包含了理智主义真理的全部和上百个其他的东西。可见，理智主义的真理只不过是可能的实用主义真理。在无数情况下，人会用可能的真理或可证实性代替证实过程或实际的真理，对于这一事实，除了实用主义者之外其他人不会过于看重：因为他强调这一习惯的实际效用。但是，他并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认为可能的真理（这种真理不够有活力，还没有被确认、被质疑或被驳斥）在形而上学上是先验的东西，而实际的真理对它来说只是派生的和从属的，当理智主义者这样做的时候，实用主义者指责他们颠倒了真实的关系。可能的真理仅仅意味着实际的真理；实用主义者坚持认为，实际的真理在逻辑次序上以及在存在的次序上都处于优先地位。

Seventh misunderstanding: pragmatism ignores the theoretical interest.

误解七：实用主义忽视了理论兴趣。

This would seem to be an absolutely wanton slander, were not

a certain excuse to be found in the linguistic affinities of the word “pragmatism”, and in certain offhand habits of speech of ours which assumed too great a generosity on our reader's part. When we spoke of the meaning of ideas consisting in their “practical” consequences, or of the “practical” differences which our beliefs make to us; when we said that the truth of a belief consists in its “working” value, etc.; our language evidently was too careless, for by “practical” we were almost unanimously held to mean opposed to theoretical or genuinely cognitive, and the consequence was punctually drawn that a truth in our eyes could have no relation to any independent reality, or to any other truth, or to anything whatever but the acts which we might ground on it or the satisfactions they might bring. The mere existence of the idea, all by itself, if only its results were satisfactory, would give full truth to it, it was charged, in our absurd pragmatist epistemology. The solemn attribution of this rubbish to us was also encouraged by two other circumstances. First, ideas are practically useful in the narrow sense, false ideas sometimes, but most often ideas which we can verify by the sum total of all their leadings, and the reality of whose objects may thus be considered established beyond doubt. That these ideas should be true in advance of and apart from their utility, that, in other words, their objects should be really there, is the very condition of their having that kind of utility, —the objects they connect us with are so important that the ideas which serve as the objects' substitutes grow important also. This manner of their practical working was the first thing that made truths good in the eyes of primitive men; and buried among all the other good workings by which true beliefs are characterized, this kind of subsequential utility remains.

如果不是因为使用“实用主义”这个词时的语言倾向，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即兴的语言习惯过多地指望读者的宽宏大量，这种指责绝对是

肆意的诽谤。当我们说观念的意义在于它们“实际的”结果时，或者提到我们的信念给我们带来的“实际的”不同时；当我们说一个信念的真理性在于其“作用”价值等等时，我们使用的语言显然有些太粗心，因为我们用“实际的”这个词时几乎被一致地认为它与理论的或纯认知的是对立的，人们如期地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眼中的真理与任何独立的实在、其他任何真理或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关系，它们只与我们可能视为基础的行为有关，或者与它们可能带来的满意有关。我们被指责说，根据我们荒唐的实用主义认识论，假如观念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仅仅它本身的存在就能证明其完全的真理性。把这种垃圾观点郑重地扣到我们头上，还源于两个其他状况。首先，观念从狭义上来讲确实是有实际用途，这有时包括假的观念，但是最常包括我们能用其全部引导的总数加以证实的那些观念，以及其对象的实在性可因此被认为是确定无疑的那些观念。这些观念应该先于并独立于其效用而是真的，或者说它们的对象应该真正存在于那里，这恰恰是这些观念有那种效用的条件：它们连接我们的对象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充当对象替代物的观念也变得重要起来。观念的这种实际作用方式是促使原始人在心目中喜欢真理的第一个原因；而这种后继的效用埋藏于真信念所典型地表现出的所有其他好的作用中。

The second misleading circumstance was the emphasis laid by Schiller and Dewey on the fact that, unless a truth be relevant to the mind's momentary predicament, unless it be germane to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meaning by this the quite particular perplexity, —it is no good to urge it. It doesn't meet our interests any better than a falsehood would under the same circumstances. But why our predicaments and perplexities might not be theoretical here as well as narrowly practical, I wish that our critics would explain. They simply assume that no pragmatist can admit a genuinely theoretic interest. Having used the phrase “cash-value” of an idea, I am implored by one correspondent to alter it, “for every one thinks you mean only pecuniary profit and loss.” Having said

that the true is “the expedient in our thinking”, I am rebuked in this wise by another learned correspondent:

第二个导向误解的状况是席勒和杜威对下述事实的强调：除非真理与心灵的暂时困境相关，除非真理与“实际的”情境密切相关——这里指的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困惑，否则极力促使该真理产生就没有任何意义。它与同样状况下的假一样都不能有效地满足我们的兴趣。可是，我们的困境和困惑为什么在此不能是理论上的且同时也是狭义地实际上的呢？我希望我们的批评者能对此做出解释。他们仅仅是假定实用主义者都对纯理论不感兴趣。我使用过观念的“兑现价值”这个词，一个给我写信的人请求我放弃这种用法，“因为每一个都认为你仅仅指金钱上的得失”。我说过真是“方便的思维方式”，对此，另外一位学识渊博的写信人做出下述反驳：

“The word expedient has no other meaning than that of self-interest. The pursuit of this has ended by landing a number of officers of national banks in penitentiaries. A philosophy that leads to such results must be unsound. "

“方便这个词没有别的意思，仅指自利。对它的追求最终以全国银行的一些官员进入监狱而告终。一种导向这种结果的哲学肯定是不健全的。”

But the word “practical” is so habitually loosely used that more indulgence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When one says that a sick man has now practically recovered, or that an enterprise has practically failed, one usually means just the opposite of practically in the literal sense. One means that, altho untrue in strict practice,

what one says is true in theory, true virtually, certain to be true. Again, by the practical one often means the distinctively concrete, the individual, particular, and effective, as opposed to the abstract, general, and inert. To speak for myself, whenever I have emphasized the practical nature of truth, this is mainly what has been in my mind. “Pragmata” are things in their plurality; and in that early California address, when I described pragmatism as holding that the meaning of any proposition can always be brought down to some particular consequence in our future practical experience, whether passive or active, expressly added these qualifying words: the point lying rather in the fact that the experience must be particular than in the fact that it must be active, —by “active” meaning here “practical” in the narrow literal sense.

[9_3] But particular consequences can perfectly well be of a theoretic nature. Every remote fact which we infer from an idea is a particular theoretic consequence which our mind practically works towards. The loss of every old opinion of ours which we see that we shall have to give up if a new opinion be true, is a particular theoretic as well as a particular practical consequence. After man's interest in breathing freely, the greatest of all his interests (because it never fluctuates or remits, as most of his physical interests do), is his interest in consistency, in feeling that what he now thinks goes with what he thinks on other occasions. We tirelessly compare truth with truth for this sole purpose. Is the present candidate for belief perhaps contradicted by principle number one? Is it compatible with fact number two? And so forth. The particular operations here are the purely logical ones of analysis, deduction, comparison, etc.; and altho general terms may be used ad libitum, the satisfactory practical working of the candidate-idea consists in the consciousness yielded by each successive theoretic consequence in particular. It is therefore simply idiotic to repeat that pragmatism takes no account of purely theoretic interests. All it insists on is that

verity in act means verifications, and that these are always particulars. Even in exclusively theoretic matters, it insists that vagueness and generality serve to verify nothing.

但是，“实际的”这个词习惯上用起来很松散，以至于使用它时有更大的随意性也是意料之中的。当人说一个病人现在实际上已经康复了，或者说一个事业实际上已经失败了，这个人通常的意思跟“实际上”的字面意思恰好相反。他的意思是，虽然在严格的实际意义上他说的话不是真的，但在理论上它却是真的，它实质上是真的，并且肯定是真的。所谓实际的，他通常指明显具体的、个体的、特殊的、有效的，这与抽象的、一般的、无效的形成鲜明对比。至于我自己，每当我强调真理的实践性质时，我心里主要就是这样想的。“实用”是复数的东西；在前面提到的那次加州的讲座中，我把实用主义描述为持下述观点，即任何命题的意义总是能被归结为我们未来的实际经验（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经验）中的某个特定结果，我又特意附加了下述限定性的话：重要的是在于经验必须是具体的这样一个事实，而不在于经验必须是主动的这样一个事实——这里“主动的”指狭义的字面意义上的“实际的”。 [10_3] 但是特殊的结果完全可能是具有理论性质。我们从观念中推理出的每一个遥远的事实，都是我们的心灵实际上在向着它摸索的一个特定的理论结果。如果一个新的见解为真，我们知道自己将不得不放弃我们以前的见解，每一个旧见解的丢弃都是一个特殊的理论结果，也是一个特殊的实际结果。除了对自由呼吸的兴趣之外，人最大的兴趣（因为像其他的生物兴趣一样它可能浮动或减弱）是他对一致性的兴趣，这使他感觉到，他现在所想的跟他在其他场合下想的是一致的。我们不厌其烦地为这一个目的把真理比来比去。目前可供选择的信念可能与第一原则相矛盾吗？它同第二事实相适应吗？等等。这里，特殊的操作过程涉及纯逻辑上的分析、演绎、比较等过程，而且，虽然一般术语可以被随意使用，但是备选观念令人满意的实际作用，却存在于每一个连续的具体理论结果所产生的意识中。因此，如果反复说实用主义不考虑纯理论兴趣，这简直就是白痴。实用主义所要坚持的就是，实际的真实意味着证实，而证实

总是特殊的。即使在纯理论的问题上，它坚持认为，含糊性和一般性都用来证实不了任何东西。

Eighth misunderstanding: pragmatism is shut up to solipsism.

误解八：实用主义对唯我论关上大门

I have already said something about this misconception under the third and fourth heads, above, but a little more may be helpful. The objection is apt to clothe itself in words like these: “You make truth to consist in every value except the cognitive value proper; you always leave your knower at many removes (or, at the uttermost, at one remove) from his real object; the best you do is to let his ideas carry him towards it; it remains forever outside of him”, etc.

在上文提到第三、四个误解时我已经谈到了这一误解，但是这里做些补充是有帮助的。“你们让真理存在于除了认知价值本身以外的每一种价值中；你们总是让认识者远离实在的对象很多步（或至少也是一步之遥）；你们尽力所能做的只是让认识者的观念把他带向对象；而这个对象永远外在于他，”等等。这类言辞很容易隐藏着反对意见。

I think that the leaven working here is the rooted intellectualist persuasion that, to know a reality, an idea must in some inscrutable fashion possess or be it. [9_4] For pragmatism this kind of coalescence is inessential. As a rule our cognitions are only

processes of mind off their balance and in motion towards real termini; and the reality of the termini, believed in by the states of mind in question, can be guaranteed only by some wider knower[2]. But if there is no reason extant in the universe why they should be doubted, the beliefs are true in the only sense in which anything can be true anyhow: they are practically and concretely true, namely. True in the mystical mongrel sense of an Identitatsphilosophie they need not be; nor is there any intelligible reason why they ever need be true otherwise than verifiably and practically. It is reality's part to possess its own existence; it is thought's part to get into “touch” with it by innumerable paths of verification.

我认为，这里起发酵作用的是根深蒂固的理智主义信条，即为了认识一个实在，一个观念必须以某种神秘莫测的方式拥有它或成为它。 [10_4] 对实用主义来说，这种合二为一是无关紧要的。通常，我们的认知只是失去平衡并向着真正的目标移动的心智过程；目标的实在性是这类心智状态所相信的，它只能由某个更广博的认识者才能保证。[2] 但是，如果根本没有现存的理由怀疑某些信念，那么只有从任何东西都可能无论如何是真的这一意义上来讲，这些信念才是真的，即它们实际上、具体地为真。它们没有必要在某种同一哲学的神秘混杂意义上是真的；也没有任何可理解的理由，说明它们除了可证实地和实际地真之外还需要什么其他方式的真。拥有其存在是实在的本分；而思想的本分是通过无数种证实路径与实在发生“接触”。

2: The transcendental idealist thinks that, in some inexplicable way, the finite states of mind are identical with the transfinite all-knower which he finds himself obliged to postulate in order to supply

a *fundamentum* for the relation of knowing, as he apprehends it. Pragmatists can leave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open; but they cannot do without the wider knower any more than they can do without the reality, if they want to prove a case of knowing. They themselves play the part of the absolute knower for the universe of discourse which serves them as material for epistemologizing. They warrant the reality there, and the subject's true knowledge, there, of it. But whether what they themselves say about that whole universe is objectively true, i.e., whether the pragmatic theory of truth is true really, they cannot warrant,—they can only believe it. To their hearers they can only propose it, as I propose it to my readers, as something to be verified *ambulando* , or by the way in which its consequences may confirm it.

2: 先验唯心主义者认为，有限的心智状态以某种难以解释的方式与无限的全知者获得同一，他发现，自己不得不设定这样一个全知者，以便为他所理解的认识关系提供一个根基。实用主义者可以对同一性问题保持开放的心态；但是如果他们想证明一个认识的实例，他们不能没有更广博的认识者，正像他们不能没有实在一样。对成为他们认识论的材料的论域来说，他们本人扮演了绝对认识者的角色。他们确保实在的存在，也确保主体对该实在的认识存在于那里。但是，他们自己说的有关那个论域的话在客观上是不是真的，即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是否确实为真，这却是

他们不能保证的——他们只是相信它。他们只能作为有待证实的、不确定的东西或者根据其结果可能确认它的方式向他们的听众提出它，正像我向我的读者提出它一样。

I fear that the “humanistic” developments of pragmatism may cause a certain difficulty here. We get at one truth only through the rest of truth; and the reality, everlastingly postulated as that which all our truth must keep in touch with, may never be given to us save in the form of truth other than that which we are now testing. But since Dr. Schiller has shown that all our truths, even the most elemental, are affected by race-inheritance with a human coefficient, reality per se thus may appear only as a sort of limit; it may be held to shrivel to the mere place for an object, and what is known may be held to be only matter of our psyche that we fill the place with.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pragmatism, worked in this humanistic way, is compatible with solipsism. It joins friendly hands with the agnostic part of kantism, with contemporary agnosticism, and with idealism generally. But worked thus, it is a metaphysical theory about the matter of reality, and flies far beyond pragmatism's own modest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the knowing function, which analysis may just as harmoniously be combined with less humanistic accounts of reality. One of pragmatism's merits is that it is so purely epistemological. It must assume realities; but it prejudges nothing as to their constitution, and the most diverse metaphysics can use it as their foundation. It certainly has no special affinity with solipsism.

我担心，实用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进展在这里可能遭遇某种困难。我们只有通过真理的其他部分才能达到一个真理；实在被永久地

假定为我们的全部真理必须与之保持接触的东西，它可能从来不会被给予我们，除非以我们目前正在检验的真理形式以外的形式。但是，既然席勒博士已经证明，我们所有的真理，即使最基本的真理，都受到了带有人类协同因素的种族遗传影响，因此实在本身可能仅仅作为一种限制而出现；它可能被认为萎缩成只是一个对象的处所，被认识的东西被认为仅仅是我们填充这个处所所用的心灵物质。必须承认，受这种人道主义方式驱动的实用主义，与唯我论是相容的。它与康德哲学的不可知论部分、与当代的不可知论、与一般的唯心主义也是相处融洽的。但是，在这种方式的驱使下，它就是有关实在问题的一种形而上学理论，远远脱离了实用主义对认识功能的本质的适度分析，因为这种分析可以同样协调地与对实在的非人道主义解释结合在一起。实用主义优点之一是其纯粹的认识论性质。它必须假定实在的存在；但是它对实在的构成没有任何先入之见，最多样化的形而上学也能把它用作自己的基础。它肯定跟唯我论没有任何特殊的密切联系。

As I look back over what I have written, much of it gives me a queer impression, as if the obvious were set forth so condescendingly that readers might well laugh at my pomposity. It may be, however, that concreteness as radical as ours is not so obvious. The whole originality of pragmatism, the whole point in it, is its use of the concrete way of seeing. It begins with concreteness, and returns and ends with it. Dr. Schiller, with his two “practical” aspects of truth, (1) relevancy to situation, and (2) subsequential utility, is only filling the cup of concreteness to the brim for us. Once seize that cup, and you cannot misunderstand pragmatism. It seems as if the power of imagining the world concretely might have been common enough to let our readers apprehend us better, as if they might have read between our lines, and, in spite of all our infelicities of expression, guessed a little more correctly what our thought was. But alas! This was not on fate's programme, so we can only think, with the German ditty:—

我回顾自己写下的东西时，感到其中很多东西都能奇怪，好像最显而易见的东西都是以一种屈就的态度写成的，以至于读者很可能嘲笑我虚夸的言辞。然而，这也许是因为我们这种彻底的具体性还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实用主义的整个独创性，即其整个论点，在于它使用了看待事物的具体方式。它开始于具体，回到具体，终于具体。席勒博士提到真理有两个“实际的”特点：（1）与情境相关联，（2）后继的效用；他这样做只是在为我们向具体性的杯子倒满水。一旦你拿起那只杯子，就不会误解实用主义。具体地想象世界的能力似乎本来应该是一种很平常的能力，足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就好像是他们本来能够读懂我们的字里行间意思，并能更正确地猜测我们的思想是什么，尽管我们在表达上用了很多不妥的言辞。但是天啊！既然不能天遂人愿，我们只能像德国小调里所唱的那样想：

Es waer' zu schoen gewesen, Es hat nicht sollen sein .

“真实太糟了，本来不应该是这样。”

[9_1].Reprint from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January, 1908 (vol. xvii, p.1).

[9_2].I need hardly remind the reader that both sense-percepts and percepts of ideal relation (comparisons, etc.) should be classed among the realities. The bulk of our mental "stock" consists of truths concerning these terms.

[9_3].The ambiguity of the word "practical" comes out well in these words of a recent would-be reporter of our views: "Pragmatism is an Anglo–Saxon reaction against the intellectualism and rationalism of the Latin mind... Man, each individual man is the measure of things. He is able to conceive none but relative truths, that is to say, illusions. What these illusions are worth is revealed to him, not by general theory, but by individual practice. Pragmatism, which consists in experiencing these illusions of the mind and obeying them by acting them out, is a PHILOSOPHY WITHOUT WORDS, a philosophy of GESTURES AND OF ACTS, which abandons what is general and holds only to what is particular." (Bourdeau, in Journal des

Débats, October 29, 1907.)

[9_4].Sensations may, indeed, possess their objects or coalesce with them, as common sense supposes that they do; and intuited differences between concepts may coalesce with the "eternal" objective differences; but to simplify our discussion here we can afford to abstract from these very special cases of knowing.

[10_1].重印自《哲学评论》1908年1月（17卷，第一页）。

[10_2].我几乎无需提醒读者，感官-知觉和理想关系（如对比等）的知觉都应该被归为实在。我们心智“存货”的总量由涉及这些词语的各种真理组成。

[10_3].“实际的”这个词的歧义性清楚地表现在最近的一个人的下述话语中，他自称是我们观点的报告人：“实用主义是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思想传统对拉丁人思想传统中的理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应……人，作为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是事物的尺度。他能设想的仅仅是相对真理，也就是幻觉。这些幻觉的价值是由个人的实践而不是由一般的理论显现给他。实用主义在于经验这些心灵的幻觉，并通过把它们付诸实践来遵守它们，这样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没有语言的哲学，是手势和行为的哲学，它摈弃了一般，而只坚持特殊。”（见布尔多，《论坛杂志》，1907年10月29日）

[10_4].的确，感觉可能拥有它们的对象或者与它们合并，常识会做出这样的假设；概念之间在直觉上的差别可能与“永恒的”客观差别合并；但是为了简化我们的讨论，这里我们能对这些非常特殊的认识实例进行抽象。

Chapter IX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Truth

第九章　真理一词的意义

My account of truth is realistic, and follows the epistemological dualism of common sense. Suppose I say to you “The thing exists”—is that true or not? How can you tell? Not till my statement has developed its meaning farther is it determined as being true, false, or irrelevant to reality altogether. But if now you ask “what thing?” and I reply “a desk”; if you ask “where?” and I point to a place; if you ask “does it exist materially, or only in imagination?” and I say “materially”; if moreover I say “I mean that desk” and then grasp and shake a desk which you see just as I have described it, you are willing to call my statement true. But you and I are commutable here; we can exchange places; and, as you go bail for my desk, so I can go bail for yours. [10_1]

我对真理的阐述是一种实在论立场，而且在认识论上遵循了常识性的二元论。假设我对你说“事物存在”——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呢？你怎么判断呢？只有当该陈述进一步展开其意义的时候，它才能被确定为真的、假的或与实在完全无关。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是什么事物？”我回答说“是一张桌子”；如果你问“在哪里？”，我指向一个地方；如果你问“它是物质上的存在，还是想象中的存在？”，我回答说“物质上的存在”；如果我进而说“我指的是那张桌子”，然后抓住一张桌子摇晃，就是那张你看到我描绘的桌子；那么，你就乐意把我的陈述称为真的。但是，你和我在这里是可以转换的；我们可以变换位置；你证实我的桌子存在，我也可以证实你的桌子存在。 [11_1]

This notion of a reality independent of either of us, taken from ordinary social experience, lies at the base of the pragmatist definition of truth. With some such reality any statement, in order to be counted true, must agree. Pragmatism defines “agreeing” to mean certain ways of “working”, be they actual or potential. Thus, for my statement “the desk exists” to be true of a desk recognized as real by you, it must be able to lead me to shake your desk, to explain myself by words that suggest that desk to your mind, to make a drawing that is like the desk you see, etc. Only in such ways as this is there sense in saying it agrees with that reality, only thus does it gain for me the satisfaction of hearing you corroborate me. Reference then to something determinate, and some sort of adaptation to it worthy of the name of agreement, are thus constituent elements in the definition of any statement of mine as “true”.

这种独立于你我之外、取自普通社会经验的对实在的观念，是以实用主义对真理的定义为基础的。要想被算作是真的，任何陈述就必须与某个这类实在相符合。实用主义把“符合”定义为某些“作用”方式，无论这些方式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因此，为了让我的陈述“桌子存在”成为对你确认为实在的一张桌子的真实描述，它必须能引导我去摇晃你的桌子，用能使这张桌子进入你的思想的语言去解释我的话，画一张像你看到的那张桌子一样的图，等等。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说该陈述符合那个实在才有意义；只有这样，它才能给我听到你确认我的说法时的满足。因此，指称某种确定的东西，并且对它具有称得上是符合的某种适应，都是把我的陈述定义为“真”的构成要素。

You cannot get at either the reference or the adaptation without using the notion of the workings. That the thing is, what it is, and which it is (of all the possible things with that what) are

points determinable only by the pragmatic method. The “which” means a possibility of pointing, or of otherwise singling out the special object; the “what” means choice on our part of an essential aspect to conceive it by (and this is always relative to what Dewey calls our own “situation”); and the “that” means our assumption of the attitude of belief, the reality-recognizing attitude. Surely for understanding what the word “true” means as applied to a statement, the mention of such workings is indispensable. Surely if we leave them out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of the cognitive relation float—in the same universe, it's true—but vaguely and ignorantly and without mutual contact or mediation.

不使用作用这一概念，你就无法达到指称关系或适应。事物存在这个状况，该事物是什么，它是（那个什么中所有可能的事物中的）哪一个，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实用主义的方法才能确定。“哪一个”指的是指向的可能性，或者也可以说是单挑出那个特殊对象的可能性；“什么”指的是我们为了构想该对象而对它的一个基本方面做出的选择（这总是与杜威所说的我们自己的“情境”相关）；“状态”指的是我们采纳的信念态度，即承认实在的态度。当然，为了理解“真的”这个词被应用于一个陈述时是什么意思，就必须要提到这些作用。当然，如果不谈这些作用，认知关系中的主体和客体会飘摇——不错，它们是漂浮在同一个宇宙中，但是那是一种茫然无知的、没有彼此接触或协调作用的飘摇。

Our critics nevertheless call the workings inessential. No functional possibilities “make” our beliefs true, they say; they are true inherently, true positively, born “true” as the Count of Chambord was born “Henri-Cinq”. Pragmatism insists, on the contrary, that statements and beliefs are thus inertly and statically true only by courtesy: they practically pass for true; but you cannot

define what you mean by calling them true without referring to their functional possibilities. These give its whole logical content to that relation to reality on a belief's part to which the name “truth” is applied, a relation which otherwise remains one of mere coexistence or bare withness.

但是，我们的批评者们说这些作用并非必不可少。他们说，任何功能上的可能性都不能“使”我们的信念成为真的；信念内在地为真，确定地为真，生而为真，就像尚博尔伯爵生来就是“亨利五世”一样。相反，实用主义者则坚持认为，陈述和信念只是按惯例才成为惰性的、静态的真理：它们在实际上被当成了真的；但是，当你称它们为真时，若不提及它们在功能上的可能性，你就无法为这一说法下定义。这些可能性代表被冠以“真理”名称的信仰，将整个逻辑内容赋予与实在的那种关系，否则这种关系就只能是一种共存、相随的关系。

The foregoing statements reproduce the essential content of the lecture on Truth in my book *Pragmatism* . Schiller's doctrine of “humanism”, Dewey's “Studies in logical theory”, and my own “radical empiricism”, all involve this general notion of truth as “working”, either actual or conceivable. But they envelop it as only one detail in the midst of much wider theories that aim eventually at determining the notion of what “reality” at large is in its ultimate nature and constitution.

上述话语概述了我在《实用主义》一书中关于真理的讲座的基本内容。席勒的“人道主义”学说、杜威的“逻辑理论研究”和我自己的“彻底经验主义”，都包含“作用”作为理解真理的一般概念，无论这种作用是真实的还是可设想的。但是，他们仅仅将这种真理观作为一个细节安置在更宽广的理论之中，这些理论的最终目的是确定“实在”在总体

上的基本性质和结构究竟是什么。

[10_1].*Remarks at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 Cornell University, December, 1907.

[11_1].本文为1907年12月在康奈尔大学美国哲学学会会议上的讲话。

Chapter X The Existence of Julius Caesar

第十章　尤利乌斯·恺撒的存在

My account of truth is purely logical and relates to its definition only. I contend that you cannot tell what the word “true” means, as applied to a statement, without invoking the concept of the statements workings. [11_1]

我对真理的阐释是纯逻辑上的，只与它的定义相关。我认为，如果不借助陈述的作用这一概念，你无法说清“真的”这个词用于一段陈述中时有何含义。 [12_1]

Assume, to fix our ideas, a universe composed of two things only: imperial Caesar dead and turned to clay, and me, saying “Caesar really existed”. Most persons would naively deem truth to be thereby uttered, and say that by a sort of *actio in distans* my statement had taken direct hold of the other fact.

为了准确说明我们的观点，让我们假定一个只由两个事物组成的论域：已故并化为尘土的罗马帝王恺撒，以及宣称“恺撒真正存在”的我。大多数人会天真地认为真理就是这样被言说的，并会说，我的陈述通过一种超距作用直接把握住了另一个事实。

But have my words so certainly denoted that Caesar? —or so certainly connoted his individual attributes? To fill out the

complete measure of what the epithet “true” may ideally mean, my thought ought to bear a fully determinate and unambiguous “one-to-one-relation” to its own particular object. In the ultrasimple universe imagined the reference is uncertified. Were there two Caesars we shouldn't know which was meant. The conditions of truth thus seem incomplete in this universe of discourse so that it must be enlarged.

但是，我用的词确定地指向那个恺撒吗？或者说是确定地隐含他的个人品性吗？为了充分地说明“真的”这个修饰词在理想的状态下可能有的含义，我的思想应该与所思考的特殊对象有一种完全确定且清晰的“一对一关系”。在一个高度简化的虚构的世界里，这个所指关系是未经证明的。假如有两个凯恺撒，我们就不会知道所指的是哪一个。因此，这个论域中的真理条件似乎是不完备的，所以必须要加以扩大。

Transcendentalists enlarge it by invoking an absolute mind which, as it owns all the facts, can sovereignly correlate them. If it intends that my statement shall refer to that identical Caesar, and that the attributes I have in mind shall mean his attributes, that intention suffices to make the statement true.

先验论者通过援引一个绝对精神来扩大这一论域，因为绝对精神包含一切事实，能居高临下地建立事实间的相互关系。如果绝对精神的意图是，我的陈述指的就是那个恺撒，而且我心里想到的品性就是恺撒的品性，那么这种意图足以使我的陈述成为真的。

I, in turn, enlarge the universe by admitting finite

intermediaries between the two original facts. Caesar had, and my statement has, effects; and if these effects in any way run together, a concrete medium and bottom is provided for the determinate cognitive relation, which, as a pure *actio in distans* , seemed to float too vaguely and unintelligibly.

反过来，我通过承认存在于这两个原初事实之间的有限中介，扩大了这一论域。恺撒曾有过效果，我的陈述也有；如果这些效果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就为确定的认知关系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媒介和基础。这种认知关系作为一种纯超距作用时似乎太过含糊晦涩。

The real Caesar, for example, wrote a manuscript of which I see a real reprint, and say “the Caesar I mean is the author of that”. The workings of my thought thus determine both its denotative and its connotative significance more fully. It now defines itself as neither irrelevant to the real Caesar, nor false in what it suggests of him. The absolute mind, seeing me thus working towards Caesar through the cosmic intermediaries, might well say: “Such workings only specify in detail what I meant myself by the statement being true. I decree the cognitiv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original facts to mean that just that kind of concrete chain of intermediaries exists or can exist.”

例如，我看见真恺撒的手稿重印本，然后说，“我所指的恺撒就是那份手稿重印本的作者。”我思想的作用因此更全面地确定了其内涵和外延的意义，以此表明它与真的恺撒并非毫无关联，它所暗指的恺撒也不是假的。当看到我通过宇宙的中介向恺撒展开作用时，绝对精神很可能说，“这些作用只不过是详述了我的观点，具体说明了这个陈述的真实之处。我对这两个原初事实之间的认知关系做出判定，

意在表明，只有或只可能有那种具体的中介链存在。”

But the chain involves facts prior to the statement the logical conditions of whose truth we are defining, and facts subsequent to it; and this circumstance, coupled with the vulgar employment of the terms truth and fact as synonyms, has laid my account open to misapprehension. “How”, it is confusedly asked, “can Caesar's existence, a truth already 2000 years old, depend for its truth on anything about to happen now? How can my acknowledgment of it be made true by the acknowledgment's own effects? The effects may indeed confirm my belief, but the belief was made true already by the fact that Caesar really did exist.”

但是，这个中介链涉及到先于这个陈述（我们正在界定的就是该陈述的逻辑条件的真理性）存在的事实，以及后继于这个陈述的事实。这种状况，再加上把真理和事实混为同义词使用的通俗做法，使我的解释特别容易受到误解。有人不无困惑地问，“恺撒的存在是一个2000年前的真理，其真理性怎么能依赖现在要发生的事情来断定呢？我对这一真理的承认，如何因这承认的效果而变为真呢？或许效果确能证实我的信念，但这个信念早就被恺撒的真正存在证实为真了。”

Well, be it so, for if there were no Caesar, there could, of course, be no positive truth about him—but then distinguish between “true” as being positively and completely so established, and “true” as being so only “practically”, elliptically, and by courtesy, in the sense of not being positively irrelevant or UN-true. Remember also that Caesar's having existed in fact may make a present statement false or irrelevant as well as it may make it true,

and that in neither case does it itself have to alter. It being given, whether truth, untruth, or irrelevancy shall be also given depends on something coming from the statement itself. What pragmatism contends for is that you cannot adequately define the something if you leave the notion of the statement's functional workings out of your account. Truth meaning agreement with reality, the mode of the agreeing is a practical problem which the subjective term of the relation alone can solve.[1]

好的，就算这样吧，因为假如没有恺撒，当然也不可能有关于他的确定的真理——但是，然后要区分两个“真的”，一个是被明确地、完全地这样确立的“真的”，另一个“真的”是指它只在“实际上”、简略地、勉强地是这样，不是确定地不相关或不真。也请记住，恺撒真实存在过，事实上既可使现在的某个陈述是错误的或不相关的，也可使其为真。无论是哪种情况，它自身都不必改变。陈述是给定的，而其真实、虚假或者不相关，是否也是给定的，取决于陈述自身的某个东西。实用主义者认为，如果不考虑陈述的功能作用这一概念，就不能充分地定义这个东西。真理意味着与实在相符合，符合的方式是一个实际问题，只需要关系的主观术语就可解决。[1]

1: Note. This paper was originally followed by a couple of paragraphs meant to conciliate the intellectualist opposition. Since you love the word "true" so, and since you despise so the concrete working of our ideas, I said, keep the word "truth" for the saltatory and incomprehensible relation you care so much for, and I will say of thoughts that know their objects in an intelligible sense that they are "truthful".

Like most offerings, this one has been spurned, so I revoke it, repenting of my generosity. Professor Pratt, in his recent book, calls any objective state of facts "a truth," and uses the word "trueness" in the sense of "truth" as proposed by me. Mr. Hawtrey uses "correctness" in the same sense. Apart from the general evil of ambiguous vocabularies, we may really forsake all hope, if the term "truth" is officially to lose its status as a property of our beliefs and opinions, and become recognized as a technical synonym for "fact".

1: 注释：本文本来还有几段，用来调和与理智主义者的对立关系。既然你们如此喜欢“真的”这个词，且如此鄙视我们观念的具体作用，我于是说，那就把“真理”这个词留给你们所热衷的跳跃的、不可理解的关系，至于能以可理解的方式认识其对象的思想，我将称其为“真实的”。
示好大多遭拒，这次也不例外，所以我只好将它收回，对自己的大度后悔不已。普拉特教授在他新近出版的书中，把事实的任何客观状态叫作“真理”，他所用的“真实”与我提出的“真理”意义相同。霍特里先生用的“正确性”亦表达同样意思。如果“真理”这个术语正式丢掉它作为信念和见解属性的地位，并被看作“事实”的专业同义词，那么除了含混的词汇所带有的一般坏处外，我们可能真的会放弃所有希望了。

[11_1].Originally printed under the title of "Truth versus Truthfulness",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

[12_1].原文题目是《真理与真实性》，载于《哲学杂志》。

Chapter XI The Absolute and the Strenuous Life

第十一章　绝对与勤勉的生活

Professor W. A. Brown, in the *Journal* for August 15, approves my pragmatism for allowing that a belief in the absolute may give holidays to the spirit, but takes me to task for the narrowness of this concession, and shows by striking examples how great a power the same belief may have in letting loose the strenuous life. [12_1]

我在实用主义中承认，对绝对的信仰可以给予灵魂假日。W.　A.布朗教授在8月15日的《哲学杂志》上载文对此表示赞同，但又批评我的这一让步仍旧狭隘。他用鲜明的事例来说明，这一信仰可能有巨大的力量，能使勤勉的生活得到释放。。 [13_1]

I have no criticism whatever to make upon his excellent article, but let me explain why “moral holidays” were the only gift of the absolute which I picked out for emphasis. I was primarily concerned in my lectures with contrasting the belief that the world is still in process of making with the belief that there is an “eternal” edition of it ready-made and complete. The former, or “pluralistic” belief, was the one that my pragmatism favored. Both beliefs confirm our strenuous moods. Pluralism actually demands them, since it makes the world's salvation depend upon the energizing of its several parts, among which we are. Monism permits them, for however furious they may be, we can always justify ourselves in advance for indulging them by the thought that they will have been expressions of the absolute's perfect life. By escaping from your finite

perceptions to the conception of the eternal whole, you can hallow any tendency whatever. Tho the absolute dictates nothing, it will sanction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after the fact, for whatever is once there will have to be regarded as an integral member of the universe's perfection. Quietism and frenzy thus alike receive the absolute's permit to exist. Those of us who are naturally inert may abide in our resigned passivity; those whose energy is excessive may grow more reckless still. History shows how easily both quietists and fanatics have drawn inspiration from the absolutistic scheme. It suits sick souls and strenuous ones equally well.

对这篇优秀的文章我不敢妄加批评，但是请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道德假日”是我所强调的绝对概念的唯一礼物。在我的讲座中，我主要关注的是两个信念的对比，其一是世界仍然处于创造过程中，其二是世界有一个现成且完备的“永恒的”版本。前者是“多元论的”信念，是我的实用主义所支持的。两个信念都证实了我们勤勉的心态。事实上，多元论需要它们，因为它使得拯救世界取决于给这个世界的若干部分——包括我们在内——注入活力。一元论也容许这两种信念，因为无论它们多么强烈，当想到它们将表述出绝对概念下的完美生活时，我们总能提前找到容许它们的理由。当你逃离有限的知觉，进入对永恒的整体的认识时，你可以神化任何可能性。绝对虽不发出任何指令，却将事后准许任何东西以及所有东西，因为宇宙中存在过的任何东西都必将被看作宇宙完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寂静主义和狂热行为都获得了绝对的允许，得以存在。那些天性懒惰的人可能继续保持一种顺从的被动态度，而精力旺盛的人可能变得更加肆意妄为。历史证明，寂静主义者和狂热份子都从绝对论的框架中汲取了灵感。它对病态的人和勤勉的人同等适用。

One cannot say thus of pluralism. Its world is always vulnerable, for some part may go astray; and having no “eternal”

edition of it to draw comfort from, its partisans must always feel to some degree insecure. If, as pluralists, we grant ourselves moral holidays, they can only be provisional breathing-spells, intended to refresh us for the morrow's fight. This forms one permanent inferiority of pluralism from the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It has no saving message for incurably sick souls. Absolutism, among its other messages, has that message, and is the only scheme that has it necessarily. That constitutes its chief superiority and is the source of its religious power. That is why, desiring to do it full justice, I valued its aptitude for moral-holiday giving so highly. Its claims in that way are unique, whereas its affinities with strenuousness are less emphatic than those of the pluralistic scheme.

多元论就不是这样。它的世界总是脆弱的，因为其中的某个部分可能偏离正道；因为无法从中找到“永恒的”版本以获得安慰，其信仰者必定总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如果作为多元论者的我们给自己一些道德假日，这些假日只可能是暂时的喘息机会，使我们为明天的战斗振作起来。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说，这使多元论永远处于一种次等的地位。它没有为那些无可救药的病人带来拯救的信息。而绝对论在带有其他信息的同时也带有这种信息，它是必须拥有这一信息的唯一框架。这构成其优越感，成为其宗教力量的来源。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公正地评判绝对论的价值，如此高度重视它给予道德假日的能力。绝对论的这种主张是独一无二的，而它与勤勉的相似度却不如多元论的框架与勤勉的相似度更为一目了然。

In the last lecture of my book I candidly admitted this inferiority of pluralism. It lacks the wide indifference that absolutism shows. It is bound to disappoint many sick souls whom absolutism can console. It seems therefore poor tactics for absolutists to make little of this advantage. The needs of sick souls

are surely the most urgent; and believers in the absolute should rather hold it to be great merit in their philosophy that it can meet them so well.

在我的书的最后一讲中，我坦率地承认多元论的这种次等地位。它缺乏绝对论的那种广泛的漠然态度。许多病人注定要对它失望，却能从绝对论中找到安慰。因此，如果绝对论者不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似乎就是策略不当。病人的需要肯定是最紧要的；相信绝对的人应该认为，能有效地满足这些需要是这种哲学中的一大优势。

The pragmatism or pluralism which I defend has to fall back on a certain ultimate hardihood, a certain willingness to live without assurances or guarantees. To minds thus willing to live on possibilities that are not certainties, quietistic religion, sure of salvation anyhow, has a slight flavor of fatty degeneration about it which has caused it to be looked askance on, even in the church. Which side is right here, who can say? Within religion, emotion is apt to be tyrannical; but philosophy must favor the emotion that allies itself best with the whole body and drift of all the truths in sight. I conceive this to be the more strenuous type of emotion; 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its inability to let loose quietistic raptures is a serious deficiency in the pluralistic philosophy which I profess.

我所辩护的实用主义或多元论不得不依靠一种极大的刚毅品格，愿意在没有保障或保证的情况下生活。对那些甘愿这样靠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生活的人来说，确信能带来某种拯救信息的寂静主义宗教，微微带有一种油腻的腐败味道，这使它招来了怀疑的目光，即使在教堂里也是如此。到底哪一方是对的，谁知道呢？在宗教中，情感容易变得专横；但是哲学必须偏爱那种把自己与视野之内所有真理的整体

和全部意义完美结合起来的情感。我认为这是一种更坚韧的情感，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它不能产生寂静主义的欣喜若狂，这是我所宣讲的多元论哲学的一个严重缺陷。

[12_1].Reprinted from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 etc., 1906.

[13_1].重印自《哲学杂志》等，1906年。

Chapter XII Professor Hébert on Pragmatism

第十二章　赫伯特教授论实用主义

Professor Marcel Hébert is a singularly erudite and liberal thinker (a seceder, I believe, from the Catholic priesthood) and an uncommonly direct and clear writer. His book *Le Divin* is one of the ablest reviews of the general subject of religious philosophy which recent years have produced; and in the small volume the title of which is copied above he has, perhaps, taken more pains not to do injustice to pragmatism than any of its numerous critics. Yet the usual fatal misapprehension of its purposes vitiates his exposition and his critique. His pamphlet seems to me to form a worthy hook, as it were, on which to hang one more attempt to tell the reader what the pragmatist account of truth really means. [13_1]

马塞尔·赫伯特教授是一位特别博学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我相信他放弃了天主教教士的职务），他的写作风格非常直白清晰。他的书《神性》是近年来出版的对宗教哲学的一般话题最富才智的评论书籍之一。在这本小册子里，他也许比许多其他批评家更竭力地想公正地评判实用主义。可是，对实用主义宗旨惯常的致命误解，扭曲了他的解释与评论。这本小册子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有价值的陷阱，让我再次尝试向读者说明实用主义对真理的阐释到底有何含义。 [14_1]

M. Hébert takes it to mean what most people take it to mean, the doctrine, namely, that whatever proves subjectively expedient in the way of our thinking is “true” in the absolute and unrestricted sense of the word, whether it corresponds to any objective state of

things outside of our thought or not. Assuming this to be the pragmatist thesis, M. Hébert opposes it at length. Thought that proves itself to be thus expedient may, indeed, have every other kind of value for the thinker, he says, but cognitive value, representative value, *valeur de connaissance proprement dite* , it has not; and when it does have a high degree of general utility value, this is in every case derived from its previous value in the way of correctly representing independent objects that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our lives. Only by thus representing things truly do we reap the useful fruits. But the fruits follow on the truth, they do not constitute it; so M. Hébert accuses pragmatism of telling us everything about truth except what it essentially is. He admits, indeed, that the world is so framed that when men have true ideas of realities, consequential utilities ensue in abundance; and no one of our critics, I think, has shown as concrete a sense of the variety of these utilities as he has; but he reiterates that, whereas such utilities are secondary, we insist on treating them as primary, and that the *connaissance objective* from which they draw all their being is something which we neglect, exclude, and destroy. The utilitarian value and the strictly cognitive value of our ideas may perfectly well harmonize, he says—and in the main he allows that they do harmonize—but they are not logically identical for that. He admits that subjective interests, desires, impulses may even have the active "primacy" in our intellectual life. Cognition awakens only at their spur, and follows their cues and aims; yet, when it IS awakened, it is objective cognition proper and not merely another name for the impulsive tendencies themselves in the state of satisfaction. The owner of a picture ascribed to Corot gets uneasy when its authenticity is doubted. He looks up its origin and is reassured. But his uneasiness does not make the proposition false, any more than his relief makes the proposition true, that the actual Corot was the painter. Pragmatism, which, according to M. Hébert, claims that our

sentiments make truth and falsehood, would oblige us to conclude that our minds exert no genuinely cognitive function whatever.

与大多数人一样，赫伯特先生也将实用主义理解为如下一种信条：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中，任何证明主观上可取的都是绝对且无限制意义上的“真的”，不管它是否符合我们思想之外事物的任何客观状态。赫伯特先生假定这是实用主义的论点，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他说，能证明可取的思想可能确实对思想者来说有其他任何一种价值，可是它没有认知价值、表征价值或认识自身的价值；当它确有很大的一般实用价值时，也总是源自其先在的价值，这种先在价值是它正确地表征了影响我们生活的独立对象后所取得的。只有这样真实地表征事物，我们才能收获有用的成果。但是，成果随真理产生，而不构成真理；因此赫伯特先生指责实用主义，认为它告诉了我们有关真理的一切，唯独没有告诉我们真理的实质意义。他确实承认，世界是这样构成的，所以当人拥有对实在的真观念时，所产生的效用会接踵而至。我认为，我们的批评者都没有像他那样具体地说明了这些效用的多样性特征。但是他又重申，虽然这些效用是次要的，但我们却坚持把它们看作是主要的，我们所忽视、排除和毁坏的正是效用赖以存在的客观认识。他说，我们观念的功利价值和严格意义上的认知价值完全可能协调存在——他总体上承认它们确实能协调在一起——但是它们在逻辑上不会因此而同一。他承认，主观兴趣、欲望、冲动在我们的理智生活中甚至可能占据积极的“首要地位”。认知只有在它们的促动下才苏醒，追随它们的提示和目标；但是，当它被唤醒后，它就是客观认知本身，而不仅仅是某些冲动倾向处于满意状态时的别称。一个拥有科罗画作的人，若这幅画被怀疑是赝品，他会感到不安，需查明其真伪后才能放心。但无论画主是不安还是宽慰，“实际的科罗就是这幅画的创作者”这个命题都不会随之为假或为真。在赫伯特先生看来，实用主义主张情绪创造真理和谬误，迫使我们推断出我们的心灵没有实施任何纯认知的功能。

This subjectivist interpretation of our position seems to follow from my having happened to write (without supposing it necessary to explain that I was treating of cognition solely on its subjective side) that in the long run the true is the expedient in the way of our thinking, much as the good is the expedient in the way of our behavior! Having previously written that truth means “agreement with reality”, and insisted that the chief part of the expediency of any one opinion is its agreement with the rest of acknowledged truth, I apprehended no exclusively subjectivistic reading of my meaning. My mind was so filled with the notion of objective reference that I never dreamed that my hearers would let go of it; and the very last accusation I expected was that in speaking of ideas and their satisfactions, I was denying realities outside. My only wonder now is that critics should have found so silly a personage as I must have seemed in their eyes, worthy of explicit refutation.

对我们立场的这种主观主义的解释，似乎产生于我偶然写过的以下话语（但我没有假设有必要说明，当时我只是从主观的一面来谈论认知的）：从长远来看，真就是我们可取的思维方式，正如“好”是我们可取的行为方式！正如前文所述，真理指“与实在相符合”，并坚持认为，任何一个见解的可取之处主要在于它与其他公认的真理相符，因此我不能容许对我的意思做出纯主观主义的解读。我满脑子都是客观指称的观念，所以从来没有想过听众们会对此置若罔闻，也从未预料到有人会指责说，我在谈论观念及对观念的满意时否认了外部的实在。我唯一不解的是，在批评家眼里，我定是个愚蠢至极的家伙，而他们居然认为值得明确地反驳我的观点。

The object, for me, is just as much one part of reality as the idea is another part. The truth of the idea is one relation of it to the reality, just as its date and its place are other relations. All three

relations consist of intervening parts of the universe which can in every particular case be assigned and catalogued, and which differ in every instance of truth, just as they differ with every date and place.

对我来说，对象是实在的一部分，正如观念是实在的另一部分。观念的真理性是它与实在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其时间和地点属于其他的关系。三种关系都由宇宙的中介成分组成，这些成分在每一种特定情况下都是可以被指定和归类的，它们不仅随时间和地点而不同，并且在真理的每一个实例中都有差异。

The pragmatist thesis, as Dr. Schiller and I hold it,—I prefer to let Professor Dewey speak for himself,—is that the relation called "truth" is thus concretely definable. Ours is the only articulate attempt in the field to say positively what truth actually consists of. Our denouncers have literally nothing to oppose to it as an alternative. For them, when an idea is true, it is true, and there the matter terminates; the word "true" being indefinable. The relation of the true idea to its object, being, as they think, unique, it can be expressed in terms of nothing else, and needs only to be named for anyone to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it. Moreover, it is invariable and universal, the same in every single instance of truth, however diverse the ideas, the realities, and the other relations between them may be.

席勒博士和我持有的实用主义论点是——杜威教授的论点最好由他本人表述，被称作"真理"的关系可以这样具体地界定。在这个领域中，唯有我们的论点是清楚地表明要对真理的实际构成做出明确的回答。指责我们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可替代的东西来反对我们的论点。对

他们来说，若一个观念是真的，它就是真的，其他不必再去探究；“真的”这个词是无法定义的。在他们看来，真的观念与其对象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不能用任何其他东西加以表述，只需要加以命名，让每一个人都能辨认并理解它。而且，这种关系是恒定且普遍的，在每一个真理实例中都始终一样，不管观念、实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其他关系多么多样化。

Our pragmatist view, on the contrary, is that the truth-relation is a definitely experienceable relation, and therefore describable as well as namable; that it is not unique in kind, and neither invariable nor universal. The relation to its object that makes an idea true in any given instance, is, we say, embodied in intermediate details of reality which lead towards the object, which vary in every instance, and which in every instance can be concretely traced. The chain of workings which an opinion sets up IS the opinion's truth, falsehood, or irrelevancy, as the case may be. Every idea that a man has works some consequences in him, in the shape either of bodily actions or of other ideas. Through these consequences the man's relations to surrounding realities are modified. He is carried nearer to some of them and farther from others, and gets now the feeling that the idea has worked satisfactorily, now that it has not. The idea has put him into touch with something that fulfils its intent, or it has not.

相反，我们实用主义的观点是，真理关系是一种确定可体验的关系，因此可以加以描述和命名；它在性质上不是独一无二的，既不恒定，也不普遍。观念与其对象的关系在某个特定情况下使这一观念成为真，这种关系在我们看来存在于实在的中介成分中，这些成分导向观念的对象，且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各有不同，但总能被具体地探索到。一个见解所设定的一系列作用，根据具体情况可能是那个见解是真理、谬误或不相关。一个人持有的每一个观念都会在其身上产生某

些结果，这结果可能是身体行为上的，也可能是其他观念上的。通过这些结果，人与周围的实在之间的关系被改变。他被带到离这些实在更近的地方，而远离其他实在，他时而认为观念满意地起了作用，时而认为没有充分地起作用。这个观念或者使他触及到某个实现了观念意图的东西，或者并没有。

This something is the man's object, primarily. Since the only realities we can talk about are such objects-believed-in, the pragmatist, whenever he says “reality”, means in the first instance what may count for the man himself as a reality, what he believes at the moment to be such. Sometimes the reality is a concrete sensible presence. The idea, for example, may be that a certain door opens into a room where a glass of beer may be bought. If opening the door leads to the actual sight and taste of the beer, the man calls the idea true. Or his idea may be that of an abstract relation, say of that between the sides and the hypothenuse of a triangle, such a relation being, of course, a reality quite as much as a glass of beer is. If the thought of such a relation leads him to draw auxiliary lines and to compare the figures they make, he may at last, perceiving one equality after another, see the relation thought of, by a vision quite as particular and direct as was the taste of the beer. If he does so, he calls that idea, also, true. His idea has, in each case, brought him into closer touch with a reality felt at the moment to verify just that idea. Each reality verifies and validates its own idea exclusively; and in each case the verification consists in the satisfactorily-ending consequences, mental or physical, which the idea was able to set up. These “workings” differ in every single instance, they never transcend experience, they consist of particulars, mental or sensible, and they admit of concrete description in every individual case. Pragmatists are unable to see what you can possibly mean by calling an idea true, unless you

mean that between it as a *terminus a quo* in some one's mind and some particular reality as a *terminus ad quem* , such concrete workings do or may intervene. Their direction constitutes the idea's reference to that reality, their satisfactoriness constitutes its adaptation thereto, and the two things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truth” of the idea for its possessor. Without such intermediating portions of concretely real experience, the pragmatist sees no materials out of which the adaptive relation called truth can be built up.

这个东西主要是人的对象。既然我们唯一能谈论的实在是指被相信的对象，那么，每当实用主义者说“实在”时，他首先指的是那种被人本身算作实在的东西，即他当时认为是实在的东西。有时，实在是一种具体的、可感觉的存在。例如，观念可能是通往某个房间的一扇门，进入这个房间能买一杯啤酒喝。如果开启这扇门可导向对啤酒的实际视觉和味觉，那个人就认为这一观念是真的。或者，他的观念可能与一种抽象关系有关，比如说一个三角形的边和直角斜边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像一杯啤酒一样，肯定也是一种实在。如果有关这种关系的概念能引导他画出辅助的线条，比较线条所构成的图形，他在相继察觉到一个个相等关系之后，能通过像啤酒的味道一样特殊而直接的视觉最终看到被想出的关系。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也称那个观念为真。在每一个情况下，他的观念都使他更接近当时所感知到的实在，从而证实那个观念。每一个实在都仅仅证实其观念并使之生效；在每一种情况下，对观念的证实在于满意地结束观念所设定的结果，无论这些结果是思想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这些“作用”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所不同，它们从不超越经验，并由精神的或可感觉的细节组成，在每一种个别情况下都能被具体描述。实用主义者不能理解，你称一个观念为真时可能是什么意思，除非你的意思是：在某人心中作为起点的这个观念，与某个作为终点的特殊实在之间，可能或确实有这类具体的作用介入。它们的方向构成了观念对那个实在的所指，它们的满意度构成了对那个实在的适应，对持有这个观念的人来说，此二者

一起构成了该观念的“真理”。如果没有这种具体实在的经验中的中介成分，实用主义者看不出任何材料，能被用来建构被称作真理的适应关系。

The anti-pragmatist view is that the workings are but evidences of the truth's previous inherent presence in the idea, and that you can wipe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them out of existence and still leave the truth of the idea as solid as ever. But surely this is not a counter-theory of truth to ours. It is the renunciation of all articulate theory. It is but a claim to the right to call certain ideas true anyhow; and this is what I meant above by saying that the anti-pragmatists offer us no real alternative, and that our account is literally the only positive theory extant. What meaning, indeed, can an idea's truth have save its power of adapting us either mentally or physically to a reality?

反实用主义的观点是，作用不过是证明真理已经事先内在于观念中的证据，而且，即便你将产生作用的可能性排除于存在之外，你仍然能确定地证实观念的真理性。但是，这肯定不是对抗我们的真理观的一个理论。它是对所有雄辩理论的摒弃。它只不过是声称有权利把某些观念称为真。我上文提到，反实用主义者没有提出任何实际的替代论点，我们的解释几乎是现存的唯一确切理论，我这样说也是这个意思。的确，观念的真理性除了使我们在身心上能适应一个实在，它还能有什么含义呢？

How comes it, then, that our critics so uniformly accuse us of subjectivism, of denying the reality's existence? It comes, I think, from the necessary predominance of subjective language in our analysis. However independent and elective realities may be, we

can talk about them, in framing our accounts of truth, only as so many objects believed-in. But the process of experience leads men so continually to supersede their older objects by newer ones which they find it more satisfactory to believe in, that the notion of an absolute reality inevitably arises as a *grenzbegriff* , equivalent to that of an object that shall never be superseded, and belief in which shall be *endgültig* . Cognitively we thus live under a sort of rule of three: as our private concepts represent the sense-objects to which they lead us, these being public realities independent of the individual, so these sense-realities may, in turn, represent realities of a hypersensible order, electrons, mind-stuff, God, or what not, existing independently of all human thinkers. The notion of such final realities, knowledge of which would be absolute truth, is an outgrowth of our cognitive experience from which neither pragmatists nor anti-pragmatists escape. They form an inevitable regulative postulate in every one's thinking. Our notion of them is the most abundantly suggested and satisfied of all our beliefs, the last to suffer doub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our critics use this belief as their sole paradigm, and treat anyone who talks of human realities as if he thought the notion of reality “in itself” illegitimate. Meanwhile, reality-in-itself, so far as by them talked of, is only a human object; they postulate it just as we postulate it; and if we are subjectivists they are so no less. Realities in themselves can be there for anyone, whether pragmatist or anti-pragmatist, only by being believed; they are believed only by their notions appearing true; and their notions appear true only because they work satisfactorily. Satisfactorily, moreover, for the particular thinker's purpose. There is no idea which is THE true idea, of anything. Whose is THE true idea of the absolute? Or to take M. Hébert's example, what is THE true idea of a picture which you possess? It is the idea that most satisfactorily meets your present interest. The interest may be in the picture's place, its age, its “tone,” its subject, its dimensions, its

authorship, its price, its merit, or what not. If its authorship by Corot has been doubted, what will satisfy the interest aroused in you at that moment will be to have your claim to own a Corot confirmed; but, if you have a normal human mind, merely calling it a Corot will not satisfy other demands of your mind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m to be satisfied, what you learn of the picture must make smooth connection with what you know of the rest of the system of reality in which the actual Corot played his part. M. Hébert accuses us of holding that the proprietary satisfactions of themselves suffice to make the belief true, and that, so far as we are concerned, no actual Corot need ever have existed. Why we should be thus cut off from the more general and intellectual satisfactions, I know not; but whatever the satisfactions may be, intellectual or proprietary, they belong to the subjective side of the truth-relation. They found our beliefs; our beliefs are in realities; if no realities are there, the beliefs are false; but if realities are there, how they can even be known without first being believed; or how believed except by our first having ideas of them that work satisfactorily, pragmatists find it impossible to imagine. They also find it impossible to imagine what makes the anti-pragmatists" dogmatic "ipse dixit" assurance of reality more credible than the pragmatists" conviction based on concrete verifications. M. Hébert will probably agree to this, when put in this way, so I do not see our inferiority to him in the matter of *connaissance proprement dite* .

那么，我们的批评者为什么如此一致地指责我们是主观主义，指责我们否认实在的存在呢？我认为，这归因于主观语言在我们的分析中必要的显著地位。无论实在是多么独立和选择性的，我们在解释真理时，只能把实在当作许多被相信的对象来谈论。但是，经验过程引导人不断用他们更愿意去相信的新对象超越旧对象，以至于绝对实在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作为一个界限概念而产生，等同于对一个将永远不

能被超越的对象的观念，对它的信念也将是终极的。从认知的角度来讲，我们因此生活在一种三合一的规则中：正如我们的个人概念表征它们引导我们走向的“感觉与对象”一样——这些对象是独立于个体的公共实在，那些“感觉与实在”可能反过来表征一个极其可感的秩序的实在，如电子、心灵材料、上帝等其他任何东西，它们都独立于所有人类思想者而存在。对于这些最终实在的观念——对这些实在的认识将成为绝对真理——是我们认知经验的一个自然结果，无论是实用主义者还是反实用主义者都不能从中逃避。它们在每一个人的思维中形成一个不可避免的调整性的假设。我们对它们的认识是我们所有信念中最丰富地提出和满足的，是最不可能被怀疑的。不同的是，我们的反对者用这一信念作为他们的唯一的范式，他们对待谈论人类实在的任何人时，就好像这个人认为有关实在“本身”的观念是不合法的。同时，他们所谈论的实在本身也只不过是一个人类对象。他们假定它的方式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我们是主观主义者，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实在本身只要被相信就可以是存在于那里的，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不管是实用主义者还是反实用主义者；只有在对它们的观念看起来真时，它们才被相信；而只有当它们令人满意地起作用时，对它们的观念才能呈现为真。而且，这里所谓令人满意地，是对特定思想者的目的而言。没有哪个观念对任何事物来说都是真观念。对绝对的那个真观念到底是谁的观念呢？或者援引赫伯特先生的例子，对你拥有的一幅画的那个真观念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你目前兴趣的观念。这可能是对这幅画的位置、年代、“色调”、话题、尺寸、作者、价格、价值等等的兴趣。如果这幅画被怀疑并非出自科罗之手，能满足你当时的内心兴趣的事，就是确认你拥有一幅科罗的真品。但是，如果你心理正常，仅仅称之为科罗作品将不能同时满足你心智的其他要求。为了满足这些要求，你对这幅画的了解必须与你所了解的实在系统（科罗本人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其他部分有顺利的联系。赫伯特先生指责我们持有以下观点：占有它们本身所获得的满足足以使信念成为真的，而且，就我们而言，真正的科罗不必曾经存在过。我们为什么应该这样与更一般的理性满足切割开来，我不得而知；但是无论这些满足是什么，是理智的也好，还是占有性的也好，它们都属于真理关系的主观一面。它们发现了我们的信

念；我们的信念存在于实在上面；如果实在不存在，信念也是假的。但如果实在是存在的，它们又如何在没有被相信之前为人所知；或者说，除了首先被我们获得有关它们满意地起作用的观念，它们是如何被相信的。对于这些问题，实用主义者们发现很难想象。他们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与实用主义者基于具体证实过程的信念相比，反实用主义者对实在的教条式的武断把握为什么更可信。当这样来表达时，赫伯特先生也许将赞同这一点，因此在认识本身这个问题上，我看不出我们哪里不如他。

Some readers will say that, altho I may possibly believe in realities beyond our ideas, Dr. Schiller, at any rate, does not. This is a great misunderstanding, for Schiller's doctrine and mine are identical, only our exposition follow different directions. He starts from the subjective pole of the chain, the individual with his beliefs, as the more concrete and immediately given phenomenon. “An individual claims his belief to be true,” Schiller says, “but what does he mean by true? and how does he establish the claim?” With these questions we embark on a psychological inquiry. To be true, it appears, means, for that individual, to work satisfactorily for him; and the working and the satisfaction, since they vary from case to case, admit of no universal description. What works is true and represents a reality, for the individual for whom it works. If he is infallible, the reality is “really” there; if mistaken it is not there, or not there as he thinks it. We all believe, when our ideas work satisfactorily; but we don't yet know who of us is infallible; so that the problem of truth and that of error are *ebenbürtig* and arise out of the same situations. Schiller, remaining with the fallible individual, and treating only of reality-for-him, seems to many of his readers to ignore reality-in-itself altogether. But that is because he seeks only to tell us how truths are attained, not what the content of those truths, when attained, shall be. It may be that the truest of all

beliefs shall be that in transsubjective realities. It certainly seems the truest for no rival belief is as voluminously satisfactory, and it is probably Dr. Schiller's own belief; but he is not required, for his immediate purpose, to profess it. Still less is he obliged to assume it in advance as the basis of his discussion.

一些读者会说，虽然我可能相信我们的观念之外的实在，席勒博士无论如何是不相信的。这是一个大误解，因为席勒和我的学说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的解释沿着不同的方向。他从这个链的主观一极开始，即带有信念的个体，作为更具体、更直接给定的现象。席勒说，“当个体断言其信念是真的时，他说的‘真的’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他是怎样确立这一断言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登上了心理探寻的征程。所谓真的，对那个个体来说似乎意味着能满意地发挥作用；而发挥作用和令人满意不能接受普遍的描述，因为它们在不同情况下各有不同。对于个体来说，凡是在自己看来起作用的就是真的，并表征一个实在。如果他是万无一失的，实在就会“真正”存在于那里；如果他错了，实在就不存在，或不像他认为的那样存在于那里。当我们的观念满意地起作用时，我们都会相信。但是我们尚不知我们中有谁是万无一失的；因此真理的问题和错误的问题是对等的，产生于同样的情境。席勒站在可能犯错的个体一边，只谈论对这种个体来说的实在，对他的读者来说，他似乎完全忽视了实在本身。但是，这是因为他只试图告诉我们真理是如何获得的，而不是将获得的那些真理的内容是什么。所有信念中最真的，或许就是对超主观的实在的信念。它肯定看起来是最真的，因为没有任何对立的信念能如此令人满意。这也许就是席勒博士自己的信念，但是他没有因自己的直接目的而必须来宣讲这种信念。他更没有被迫事先假定这种信念是其讨论的基础。

I, however, warned by the ways of critics, adopt different tactics. I start from the object-pole of the idea-reality chain and

follow i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Schiller's. Anticipating the results of the general truth-processes of mankind, I begin with the abstract notion of an objective reality. I postulate it, and ask on my own account, I vouching for this reality, what would make anyone else's idea of it true for me as well as for him. But I find no different answer from that which Schiller gives. If the other man's idea leads him, not only to believe that the reality is there, but to use it as the reality's temporary substitute, by letting it evoke adaptive thoughts and acts similar to those which the reality itself would provoke, then it is true in the only intelligible sense, true through its particular consequences, and true for me as well as for the man.

然而，我从批评者的行为得到警示，而采用了不同的策略。我从“观念与实在”链条的对象一极出发，沿着与席勒相反的方向推进。我预料到了人类的普遍真理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因此我从一个客观实在的抽象观念开始。我假定它的存在，而且，因为我为这个实在作保，我会自问：什么使得某个人对这个实在的观念不仅于他而且于我也是真的？但是，我发现的答案跟席勒提供的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另一个人的观念引导他不仅相信那个实在存在于那里，而且把它用作那个实在的临时替代物，让它引起类似于实在本身能引起的一些适应性的思想和行为，那么，这个观念在只是可理解的意义上是真的，它的特殊结果证明了它是真的，它对于那个人和我来说都是真的。

My account is more of a logical definition; Schiller's is more of a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 Both treat an absolutely identical matter of experience, only they traverse it in opposite ways.

我的阐释更多地是一个逻辑定义；席勒的更多地是一种心理学描述。二者谈的都是一个绝对相同的经验问题，只是从两种相反的方向

来考察。

Possibly these explanations may satisfy M. Hébert, whose little book, apart from the false accusation of subjectivism, gives a fairly instructive account of the pragmatist epistemology.

这些解释也许能满足赫伯特先生，他的那本小册子虽然错误地指责我们是主观主义，但仍然对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做出了相当有教益的解释。

[13_1].Reprint from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for December 3, 1908 (vol. v, p. 689), of a *review of Le pragmatisme et ses diverses formes Anglo-Américaines,* by Marcel Hébert. (Paris: Librairie ritique Emile Nourry, 1908. p. 105.)

[14_1].重印自1908年12月3日《哲学杂志》（第5卷，第689页），评《实用主义及其各种英美形式》，马塞尔·赫伯特著，巴黎：Librairie critique Emile Nourry出版，1908年，第105页。

Chapter XIII Abstractionism and “Relativismus”

第十三章　抽象主义和“相对主义”

Abstract concepts, such as elasticity, voluminousness, disconnectedness, are salient aspects of our concrete experiences which we find it useful to single out. Useful, because we are then reminded of other things that offer those same aspects; and, if the aspects carry consequences in those other things, we can return to our first things, expecting those same consequences to accrue.

像弹性、广博、不连续性这些抽象概念都是我们具体经验的一些显著方面，我们发现将这些方面分离出来很有益。之所以有益，是因为我们由此就会知道其他事物也拥有这些方面。而且，如果这些方面在这些事物上产生结果，我们就能回到起初的事物，期望这些同样的结果将不断增加。

To be helped to anticipate consequences is always a gain, and such being the help that abstract concepts give us, it is obvious that their use is fulfilled only when we get back again into concrete particulars by their means, bearing the consequences in our minds, and enriching our notion of the original objects therewithal.

接受帮助来预想结果总是一份收获，而且，因为这是抽象概念给予我们的帮助，显然，我们只有以它们为手段重新回到具体的特殊事物上，心中记住这些结果，并因此丰富我们对于原初对象的概念，这样才能完成对抽象概念的使用。

Without abstract concepts to handle our perceptual particulars by, we are like men hopping on one foot. Using concepts along with the particulars, we become bipedal. We throw our concept forward, get a foothold on the consequence, hitch our line to this, and draw our percept up, travelling thus with a hop, skip and jump over the surface of life at a vastly rapider rate than if we merely waded through the thickness of the particulars as accident rained them down upon our heads. Animals have to do this, but men raise their heads higher and breathe freely in the upper conceptual air.

如果没有抽象概念来处理我们知觉上的特殊事物，我们就像用一条腿走路的人。当把概念与特殊事物一起使用时，我们就变成两条腿走路。我们把概念投向前，在结果上站稳脚步，用一根线套住它，拽起我们的知觉，就这样以很快的速度跳过、蹦过、跃过生活的平面，比我们仅仅蹚过偶然性之雨降落到我们头上的一层厚厚的特殊事物时的速度要快得多。动物不得不在这层特殊事物中跋涉，但是人高扬其首，在更高层的概念空气中自由地呼吸。

The enormous esteem professed by all philosophers for the conceptual form of consciousness is easy to understand. From Plato's time downwards it has been held to be our sole avenue to essential truth. Concepts are universal, changeless, pure; their relations are eternal; they are spiritual, while the concrete particulars which they enable us to handle are corrupted by the flesh. They are precious in themselves, then, apart from their original use, and confer new dignity upon our life.

所有哲学家给予意识的概念形式以崇高的敬意，这容易理解。从

柏拉图时代以来，这被认为是我们接近基本真理的唯一途径。概念是普遍的、不变的、纯粹的；它们的关系是永恒的；它们是精神的，而概念使我们能处理的具体的特殊事物是可以被其形体腐化的。可见，它们本身非常有价值，可以脱离其原初的用途而存在，给予我们的生活以新的尊严。

One can find no fault with this way of feeling about concepts so long as their original function does not get swallowed up in the admiration and lost. That function is of course to enlarge mentally our momentary experiences by adding to them the consequences conceived; but unfortunately, that function is not only too often forgotten by philosophers in their reasonings, but is often converted into its exact opposite, and made a means of diminishing the original experience by denying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all its features save the one specially abstracted to conceive it by.

只要概念的原初功能不会在这种溢美之词中被吞噬或消失，我们对于这种对概念的感觉也无可厚非。那个原初的功能当然就是：通过把所设想到的结果添加在瞬间经验之上，在心智上扩大我们的瞬间经验。但不幸的是，这个功能不仅经常在哲学家的推理过程中被遗忘，而且经常被转化为其对立面，结果它成为一种手段，除了被专门抽象出来构想它的那个特点之外，它（隐含地或明确地）否认所有特点，以此来贬损原初的经验。

This itself is a highly abstract way of stating my complaint, and it needs to be redeemed from obscurity by showing instances of what is meant. Some beliefs very dear to my own heart have been conceived in this viciously abstract way by critics. One is the “will to believe,” so called; another is the indeterminism of certain

futures; a third is the notion that truth may vary with the standpoint of the man who holds it. I believe that the perverse abuse of the abstracting function has led critics to employ false arguments against these doctrines, and often has led their readers to false conclusions. I should like to try to save the situation, if possible, by a few counter-critical remarks.

这本身也是表达我们的苦楚的一种高度抽象的方式，需要通过列举出我们的意图的具体事例，把它从含混不清中拯救出来。我非常珍视的一些信念被我的批评者以这种恶性的抽象方式加以设想。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信仰的意志”；另外一个是某些未来的非决定论；第三个是真理可能根据其拥有者的立场而有所不同这一思想。我相信，过分滥用抽象功能使批评者使用了虚假的论据来批驳这些学说，这经常致使读者得出虚假的结论。我想提出一些反批评意见，以求在可能的范围内纠正这一事态。

Let me give the name of “vicious abstractionism” to a way of using concepts which may be thus described: We conceive a concrete situation by singling out some salient or important feature in it, and classing it under that; then, instead of adding to its previous characters all the positive consequences which the new way of conceiving it may bring, we proceed to use our concept privatively; reducing the originally rich phenomenon to the naked suggestions of that name abstractly taken, treating it as a case of “nothing but” that concept, and acting as if all the other characters from out of which the concept is abstracted were expunged. [14_1] Abstraction, functioning in this way, becomes a means of arrest far more than a means of advance in thought. It mutilates things; it creates difficulties and finds impossibilities; and more than half the trouble that metaphysicians and logicians give themselves over the

paradoxes and dialectic puzzles of the universe may, I am convinced, be traced to this relatively simple source. The viciously privative employment of abstract characters and class names is, I am persuaded, one of the great original sins of the rationalistic mind.

对于以下列方式使用概念的做法，我称之为“恶性的抽象主义”：我们在设想某个具体情境时的做法是，挑选出其中的某个突出的或重要的特点，并对它照此归类；然后，我们没有把看待它的新方式可能带来的所有确定结果添加到它以前的特点之上，而是继续以剥夺其特点的方式使用我们的概念；我们把原初丰富的现象缩减为仅仅是那个被抽象地看待的名称的含义，把它看作“无非是”那个概念，却表现得仿佛这个概念被从中抽象出来的所有其他特点都被剔除了。 [15_1] 这样进行的抽象过程成为阻碍思想的手段，而远没有推动思想发展。它肢解了事物；它创造了难题，找到的是不可能性。我深信，在宇宙的悖论和辩证的难题上，形而上学者和逻辑学家遇到的一半麻烦可以追溯到这种相对简单的根源。我也相信，对抽象特点和归类名称恶意地剥夺性使用，是理性主义者犯下的最大原罪之一。

To proceed immediately to concrete examples, cast a glance at the belief in “free will”, demolished with such specious persuasiveness recently by the skilful hand of Professor Fullerton. [14_2] When a common man says that his will is free, what does he mean? He means that there are situations of bifurcation inside of his life in which two futures seem to him equally possible, for both have their roots equally planted in his present and his past. Either, if realized, will grow out of his previous motives, character and circumstances, and will continue uninterruptedly the pulsations of his personal life. But sometimes both at once are incompatible with physical nature, and then it seems to the naive observer as if he

made a choice between them now, and that the question of which future is to be, instead of having been decided 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were decided afresh at every passing moment in which fact seems livingly to grow, and possibility seems, in turning itself towards one act, to exclude all others.

让我们接下来过渡到具体例子，看一看对“自由意志”的信念。最近，富勒顿教授用他娴熟的手法，以似是而非的言论对这种信念进行了批驳。 [15_2] 当普通人说自己的意志是自由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在他的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分岔的情境，其中两种未来对他来说似乎是同样可能的，因为二者都植根于他的现在和过去之中。二者之一如果得以实现，将产生于他以前的动机、性格和境况，将不间断地继续他个人生活的脉动。但是，二者有时同时与自然本性不相容，这时，在一位天真的观察者眼里好像他现在在二者之间做选择，而且，对于哪一个未来将被选定，这个问题没有在世界的创立时决定，而是在每一个即逝的瞬间被重新决定。在这些瞬间内，事实似乎在充满活力地成长，可能性在转向一个行为时似乎排斥了所有其他行为。

He who takes things at their face-value here may indeed be deceived. He may far too often mistake his private ignorance of what is predetermined for a real indetermination of what is to be. Yet, however imaginary it may be, his picture of the situation offers no appearance of breach between the past and future. A train is the same train, its passengers are the same passengers, its momentum is the same momentum, no matter which way the switch which fixes its direction is placed. For the indeterminist there is at all times enough past for all the different futures in sight, and more besides, to find their reasons in it, and whichever future comes will slide out of that past as easily as the train slides by the switch. The world, in

short, is just as continuous with itself for the believers in free will as for the rigorous determinists, only the latter are unable to believe in points of bifurcation as spots of really indifferent equilibrium or as containing shunts which there—and there only, not before—direct existing motions without altering their amount.

只看到事物的表面价值的人确实可能被蒙骗。他可能过于经常地把自己对先定之物的无知，误当作是对将来的真正不确定性。可是，无论他对形势的看法多么具有想象力，这种看法表面上并没有指示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断裂。无论决定列车方向的扳道岔被设定在哪条路线，列车还是那辆列车，乘客还是那些乘客，其动量还是同样的动量。对非决定论者来说，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足够多的过去，让能预见到的各种未来——以及周边更多的未来——从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正像列车很容易地滑过那个扳道岔一样，无论产生什么样的未来，它都会从那个过去中轻松地滑出。简言之，对相信自由意志的人以及严格的决定论者来说，这个世界自身是连续的，只是决定论者无法相信分岔点就是真正中立的平衡点，或者其中含有转轨器。这一转轨器在那里——只是在那里而不是以前在那里——导引着现在的运动，而不改变其运动量。

Were there such spots of indifference, the rigorous determinists think, the future and the past would be separated absolutely, for, abstractly taken, the word “indifferent” suggests disconnection solely. Whatever is indifferent is in so far forth unrelated and detached. Take the term thus strictly, and you see, they tell us, that if any spot of indifference is found upon the broad highway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then no connection of any sort whatever, no continuous momentum, no identical passenger, no common aim or agent, can be found on both sides of the shunt or switch which there is moved. The place is an impassable chasm.

严格的决定论者认为，假如存在这种中立的平衡点，未来和过去就绝对是分离的，因为如果抽象地看待“中立的”这个词，它只意味着不相连。凡是中立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相关的、分离的。他们说，假如这样严格地看待这个词，你就会看到，如果任何中立点在过去和未来的宽广大道上被发现，那么，在能被移动的转轨器或扳道岔的两侧，就不能找到任何类型的联系、连续的动量、同一位乘客、共同的目的或动因。那是一个不能逾越的鸿沟。

Mr. Fullerton writes—the italics are mine—as follows:—

富勒顿先生这样写道（黑体为我所加）：

> In so far as my action is free, what I have been, what I am, what I have always done or striven to do, what I most earnestly wish or resolve to do at the present moment—these things can have *no more to do with its future realization than if they had no existence* . The possibility is a hideous one; and surely even the most ardent free-willist will, when he contemplates it frankly, excuse me for hoping that if I am free I am at least not very free, and that I may reasonably expect to find some degree of consistency in my life and actions. Suppose that I have given a dollar to a blind beggar. Can I, if it is really an act of free-will, be properly said to have given the money? Was it given because I was a man of tender heart, etc., etc.? What has all this to do with acts of free-will? If they are free, they must

not be conditioned by antecedent circumstances of any sort, by the misery of the beggar, by the pity in the heart of the passer-by. They must be causeless, not determined. They must drop from a clear sky out of the void, for just in so far as they can be accounted for, they are not free. [14_3]

“鉴于我的行动是自由的，我从前是什么，我现在是什么，我经常做的或努力去做的事情，我在此时此刻最急于希望做或决定做的事情，未来去实现这些事情或者这些事情均不存在都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性是一个可憎的东西；我希望，如果我是自由的，我至少不要太自由，而且我可以有理由地期望在我的生活和行动上发现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如果我有这样的愿望，即使最热情地信仰自由意志的人肯定也会原谅我，如果他坦诚地看待这种可能性。假设我给了一个失明的乞丐一美元。如果这算作真正的自由意志行为，是否可以合理地说钱是我给的呢？给钱是否因为我心地善良等等原因呢？这一切与自由意志行为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这些行为是自由的，它们肯定不是由任何类型的先行环境条件制约的，不受乞丐的苦难制约，也不受过路人的怜悯之心制约。它们必须是无原因的，不受任何东西的决定。它们肯定是上天无故落下的，因为只要它们是能解释的，它们就不是自由的。” [15_3]

Heaven forbid that I should get entangled here in a controversy about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the free-will question at large, for I am only trying to illustrate vicious abstractionism by the conduct of some of the doctrine's assailants. The moments of bifurcation, as the

indeterminist seems to himself to experience them, are moments both of re-direction and of continuation. But because in the “either-or” of the re-direction we hesitate, the determinist abstracts this little element of discontinuity from the superabundant continuities of the experience, and cancels in its behalf all the connective characters with which the latter is filled. Choice, for him, means henceforward disconnection pure and simple, something undetermined in advance in any respect whatever, and a life of choices must be a raving chaos, at no two moments of which could we be treated as one and the same man. If Nero were “free” at the moment of ordering his mother's murder, Mr. McTaggart [14_4] assures us that no one would have the right at any other moment to call him a bad man, for he would then be an absolutely other Nero.

我竟然卷入了一场有关自由意志的一般问题的是非论战中，但愿老天能原谅我，因为我只是在试图用恶性的抽象主义的某些攻击者的行为来说明这种学说。非决定论者似乎亲身经验过的那种分岔的时刻，是重新设定方向并继续向前的时刻。但是，因为我们改变方向时在“这个或那个”两者中产生犹豫，决定论者从经验的超大量的连续中抽取了这个微量的不连续元素，并为了这一元素把经验中充满的所有连续特点去除。对他来说，选择意味着此后纯粹而简单的不连接，某个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事先决定的东西，而且，有多种选择的生活肯定是非常混乱无序，处于其中两个时刻的我们不能被看作是同一个人。麦克塔格特先生 [15_4] 告诉我们，如果尼禄在命令杀死母亲的那一刻是“自由的”，处于其他时刻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称他是坏人，因为他那时绝对已经成了另一个尼禄。

A polemic author ought not merely to destroy his victim. He ought to try a bit to make him feel his error—perhaps not enough to convert him, but enough to give him a bad conscience and to

weaken the energy of his defence. These violent caricatures of men's beliefs arouse only contempt for the incapacity of their authors to see the situations out of which the problems grow. To treat the negative character of one abstracted element as annulling all the positive features with which it coexists, is no way to change any actual indeterminist's way of looking on the matter, tho it may make the gallery applaud.

参与辩论的作者不应该仅仅是为了毁灭自己的对手。他应该稍作努力，让对手感觉到自己的错误，这也许不足以改变对手，但足以让他感到内疚，由此来削弱他辩护的热情。对人类信念的这些强烈讽刺，只能引起对讽刺者无力看到问题产生的情境的蔑视。将某个抽象出的元素的负面特征看作是对所有与之共存的正面特点的抵销，这根本不是一种有效方法，不能改变任何实际的非决定论者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虽然它可能起到哗众取宠的效果。

Turn now to some criticisms of the “will to believe,” as another example of the vicious way in which abstraction is currently employed. The right to believe in things for the truth of which complete objective proof is yet lacking is defended by those who apprehend certain human situations in their concreteness. In those situations the mind has alternatives before it so vast that the full evidence for either branch is missing, and yet so significant that simply to wait for proof, and to doubt while waiting, might often in practical respects be the same thing as weighing down the negative side. Is life worth while at all? Is there any general meaning in all this cosmic weather? Is anything being permanently bought by all this suffering? Is there perhaps a transmundane experience in Being, something corresponding to a “fourth dimension,” which, if we had access to it, might patch up some of this world's *zerrissenheit* and

make things look more rational than they at first appear? Is there a superhuman consciousness of which our minds are parts, and from which inspiration and help may come? Such are the questions in which the right to take sides practically for yes or no is affirmed by some of us, while others hold that this is methodologically inadmissible, and summon us to die professing ignorance and proclaiming the duty of every one to refuse to believe.

让我们现在转向对“信仰的意志”的某些批评，作为另外一个例子，看一看抽象过程目前是如何被恶意滥用的。某些东西的真理性还缺乏完备的客观证据，相信这些东西的权利受到了以具体方式理解某些人类情境的人的维护。在这些情境下，心智面临的选择太多，因此支持任何一个选择的完整证据都不存在，可是这些选择又意义重大，如果仅仅等待证据并且在等待的过程中怀疑，从某些实践方面来看常常可能就等于压制其负面的特点。生活到底值得过吗？所有这种宇宙气象到底有没有普遍意义呢？这所有的苦难是不是能永久性地换取某个东西呢？存在是否也许有某种超凡的经验，那种与“第四维”相对应的东西，假如我们接触到它，它就能拯救这个世界的一些分崩离析，使事物看上去比它们起初的样子更理性吗？我们心灵中是否存在超人的意识，使我们从中获得灵感和帮助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中有些人通过表达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实际维护了自己的权利，而其他人则认为这在方法论上难以接受，并号召我们表明自己的无知，公开声明每一个人有拒绝相信的义务，让我们自毙。

I say nothing of the personal inconsistency of some of these critics, whose printed works furnish exquisite illustrations of the will to believe, in spite of their denunciations of it as a phrase and as a recommended thing. Mr. McTaggart, whom I will once more take as an example, is sure that “reality is rational and righteous” and “destined *sub specie temporis* to become perfectly good”; and his

calling this belief a result of necessary logic has surely never deceived any reader as to its real genesis in the gifted author's mind. Mankind is made on too uniform a pattern for any of us to escape successfully from acts of faith. We have a lively vision of what a certain view of the universe would mean for us. We kindle or we shudder at the thought, and our feeling runs through our whole logical nature and animates its workings. It can't be that, we feel; it must be this. It must be what it ought to be, and ought to be this; and then we seek for every reason, good or bad, to make this which so deeply ought to be, seem objectively the probable thing. We show the arguments against it to be insufficient, so that it may be true; we represent its appeal to be to our whole nature's loyalty and not to any emaciated faculty of syllogistic proof. We reinforce it by remembering the enlargement of our world by music, by thinking of the promises of sunsets and the impulses from vernal woods. And the essence of the whole experience, when the individual swept through it says finally “I believe”, is the intense concreteness of his vision, the individuality of the hypothesis before him,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various concrete motives and perceptions that issue in his final state.

有关其中某些批评者个人的前后矛盾我只字未提，他们出版的著作为信仰的意志提供了精妙的解释，尽管他们将它公开斥责为一个空洞的词组，说它是一个被推荐的东西。这里再以麦克塔哥特先生为例。他肯定地说，“实在是理性的和正当的”，而且“从时间方面来看注定将成为完美无缺的东西”。他将这个信念称作是必要逻辑的结果，但是至于这位天才的作者心里知道的有关这种信念的真实来源，他当然从来没有能骗过任何读者。人类被创造时依照的模式千篇一律，因此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成功地摆脱信仰行为。我们鲜明地认识到某种宇宙观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听到这种观点时我们受到激励或震动，我们的情感穿过我们整个逻辑本性，刺激它产生作用。我们感觉到，

它不可能是那样，它必须是这样。它必须是它本该有的样子，它应该是这样；然后我们寻找各种理由，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使这个从其深处都应该是这样的东西看起来从客观上是非常可能的东西。我们证明反对它的论点都是不充分的，这样它就可能成为真的；我们把它描述为对我们整个自然的忠诚的诉求，而不是对三段论证据的任何孱弱的机能的诉求。我们记住音乐扩大了我们这个世界，想起日落的许诺、春季森林的脉动，以此来强化这种思想。当个体穿过整个经验的实质后最终说“我相信”时，这个实质就是他的观点的集中具体表现，是他面前的假设的个性特征，也是导向其最终状态的各种具体动机和知觉的复杂性。

But see now how the abstractionist treats this rich and intricate vision that a certain state of things must be true. He accuses the believer of reasoning by the following syllogism:—

事物的某个状态肯定是真的，这一观点丰富而复杂。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抽象主义者是如何评判这一观点的。他指责信仰者犯了以下三段论的推理错误：

All good desires must be fulfilled;

“所有好的欲望必须加以满足；

The desire to believe this proposition is a good desire;

相信这个命题的欲望是一个好的欲望；

Ergo, this proposition must be believed.

因此这个命题必须被相信。”

He substitutes this abstraction for the concrete state of mind of the believer, pins the naked absurdity of it upon him, and easily proves that anyone who defends him must be the greatest fool on earth. As if any real believer ever thought in this preposterous way, or as if any defender of the legitimacy of men's concrete ways of concluding ever used the abstract and general premise, “All desires must be fulfilled”! Nevertheless, Mr. McTaggart solemnly and laboriously refutes the syllogism in sections 47 to 57 of the above-cited book. He shows that there is no fixed link in the dictionary between the abstract concepts “desire”, “goodness” and “reality”; and he ignores all the links which in the single concrete case the believer feels and perceives to be there! He adds:—

他用这种抽象代替了信仰者的具体心理状态，把其中明显的荒唐成分加在他的身上，很容易地证明了：每一个他辩护的人肯定是地球上最大的傻瓜。就好像每一位真正的信仰者都曾用这种滑稽可笑的方式思维，或者，就好像如果你为得出结论的具体方式的合法性而辩护，你使用的就是“所有欲望都必须加以满足”这个抽象的、一般的前提。然而，在上面引用的书中的第47-57节，麦克塔格特先生严肃而不辞辛苦地驳斥了这种三段论推理。他证明，在词典中，“欲望”、“好”和“实在”这些抽象概念之间不存在固定联系。而他忽视了在某个单一的具体情况下，信仰者感觉并察觉到存在于那里的所有联

系！他补充说：

> When the reality of a thing is uncertain, the argument encourages us to suppose that our approval of a thing can determine its reality. And when this unhallowed link has once been established, retribution overtakes us. For when the reality of the thing is independently certain, we (then) have to admit that the reality of the thing should determine our approval of that thing. I find it difficult to imagine a more degraded position.

> “当一个事物的实在性不确定的时候，争论会鼓励我们假设我们对某个事物的赞许能决定它的实在。而且，这种不圣洁的联系一旦被确立，报应就会降临到我们头上。因为，当那个事物的实在性是独立而确定的时候，我们（然后）就不得不承认，该事物的实在性应该决定我们对这个事物的赞许。我发现，难以想象一个比这更堕落的立场。”

One here feels tempted to quote ironically Hegel's famous equation of the real with the rational to his English disciple, who ends his chapter with the heroic words:—

这里让人忍不住要讽刺性地向麦克塔格特先生引用黑格尔的著名等式：实在等同于理性。这位黑格尔的英国信徒用下列振振有词的话语结束了他那一章的讨论：

> For those who do not pray, there remains the resolve that, so far as their strength may permit, neither the pains of death nor the pains of life shall drive them to any comfort in that which they hold to be false, or drive them from any comfort (discomfort?) in that which they hold to be true.

> “对那些不祈祷的人来说，仍然存在着下列解决方式：只要他们的力量允许，死亡之痛苦或生活之痛苦都不能驱使他们在他们认为假的东西中找到慰藉，或者驱使他们远离他们认为真的东西给他们带来的慰藉（或不适？）。”

How can so ingenious-minded a writer fail to see how far over the heads of the enemy all his arrows pass? When Mr. McTaggart himself believes that the universe is run by the dialectic energy of the absolute idea, his insistent desire to have a world of that sort is felt by him to be no chance example of desire in general, but an altogether peculiar insight-giving passion to which, in this if in no other instance, he would be stupid not to yield. He obeys its concrete singularity, not the bare abstract feature in it of being a “desire”. His situation is as particular as that of an actress who resolves that it is best for her to marry and leave the stage, of a priest who becomes secular, of a politician who abandons public life. What sensible man would seek to refute the concrete decisions of such persons by tracing them to abstract premises, such as that “all actresses must marry”, “all clergymen must be laymen”, “all politicians should resign their posts?” Yet this type of refutation, absolutely unavailing though it be for purposes of conversion, is spread by Mr. McTaggart through many pages of his book. For the

aboundingness of our real reasons he substitutes one narrow point. For men's real probabilities he gives a skeletonized abstraction which no man was ever tempted to believe.

如此具有创造性的作者怎么没有看到，他的羽箭在距离其敌人脑袋很远的上方滑过了呢？当麦克塔格特先生自己相信宇宙受到绝对观念的辩证能量驱动时，他对拥有那种世界的持续欲望，被他感觉到根本不是一般的欲望的偶然例子，而是一个完全特殊的、能带来洞见的激情。在这种情况下，他若不屈服于这种激情就是愚蠢的，即使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不必如此。他遵守其具体的独特性，而不是它那种作为“欲望”的纯抽象特色。他面临的状况十分特殊，像一名决定最好是结婚并退出舞台的女演员一样，抑或像一个还俗的教士，或一名放弃政治生涯的政治家。什么样的理性之人会将这些人的具体决定追溯到其抽象的前提，比如“所有女演员都必须结婚”、“所有教士都必须还俗”、“所有政治家都应该辞职”，以此来驳斥这些具体决定呢？可是，这种驳斥遍布于麦克塔格特先生书的很多地方，虽然这对于改变人的信念绝对没有任何效果。对于我们无限多真实的理由，他只用一个狭隘的观点来代替。他用一个框架化的抽象代替了人们各种真实的可能性，虽然没有人会挡不住诱惑去相信这种抽象。

The abstraction in my next example is less simple, but is quite as flimsy as a weapon of attack. Empiricists think that truth in general is distilled from single men's beliefs; and the so-called pragmatists “go them one better” by trying to define what it consists in when it comes. It consists, I have elsewhere said, in such a working on the part of the beliefs as may bring the man into satisfactory relations with objects to which these latter point. The working is of course a concrete working in the actual experience of human beings, among their ideas, feelings, perceptions, beliefs and acts, as well as among the physical things of their environment, and

the relations must be understood as being possible as well as actual. In the chapter on truth of my book *Pragmatism* I have taken pains to defend energetically this view. Strange indeed have been the misconceptions of it by its enemies, and many have these latter been. Among the most formidable-sounding onslaughts on the attempt to introduce some concreteness into our notion of what the truth of an idea may mean, is one that has been raised in many quarters to the effect that to make truth grow in any way out of human opinion is but to reproduce that Protagorean doctrine that the individual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which Plato in his immortal dialogue, the *Theætetus,* is unanimously said to have laid away so comfortably in its grave two thousand years ago. The two cleverest brandishers of this objection to make truth concrete, Professors Rickert and Münsterberg, write in German, [14_5] and "relativismus" is the name they give to the heresy which they endeavor to uproot.

在我下一个例子中的抽象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但是把它作为进攻武器却同样是软弱无力的。经验主义者认为，一般真理是从单独的人的信念提炼而来；自称实用主义者的人只是在对产生的一般真理下定义时才"胜人一筹"。我在其他地方说过，一般真理存在于信念的作用中，这种作用可能使人进入与这些信念指向的对象的满意关系。作用当然指人类实际经验中的具体作用，如在人类的观念、情感、知觉、信念和行为上的作用，也包括对人类环境中的自然事物的作用；而关系必须被理解为可能的和实际的。在《实用主义》有关真理的那一章中，我竭力为这一观点做出了有力的辩护。而很多反对这一观点的人后来对它产生的误解确实很奇怪。一个观念的真理性意味着什么，在认识这个问题时我们试图引进某种具体性，这一努力遭到了最可怖的攻击，其中一个攻击发起于多个领域，造成了下列后果：让真理以任何方式从人的见解中生长出来，只不过是重复普罗塔哥拉的信条，即个体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众所周知，柏拉图2,000年前在其不朽的

对话《泰阿泰德》篇中已经使这种观点寿终正寝。反对将真理具体化的两位最聪明的舞文弄墨者是李凯尔特教授和明斯特贝格教授，他们用德文写作 [15_5] ，用“相对主义”这个词指称他们竭力想根除的那种异端邪说。

The first step in their campaign against “relativismus” is entirely in the air. They accuse relativists—and we pragmatists are typical relativists—of being debarred by their self-adopted principles, not only from the privilege which rationalist philosophers enjoy, of believing that these principles of their own are truth impersonal and absolute, but even of framing the abstract notion of such a truth, in the pragmatic sense, of an ideal opinion in which all men might agree, and which no man should ever wish to change. Both charges fall wide of their mark. I myself, as a pragmatist, believe in my own account of truth as firmly as any rationalist can possibly believe in his. And I believe in it for the very reason that I have the idea of truth which my learned adversaries contend that no pragmatist can frame. I expect, namely, that the more fully men discuss and test my account, the more they will agree that it fits, and the less will they desire a change. I may of course be premature in this confidence, and the glory of being truth final and absolute may fall upon some later revision and correction of my scheme, which later will then be judged untrue in just the measure in which it departs from that finally satisfactory formulation. To admit, as we pragmatists do, that we are liable to correction (even tho we may not expect it) involves the use on our part of an ideal standard. Rationalists themselves are, as individuals, sometimes sceptical enough to admit the abstract possibility of their own present opinions being corrigible and revisable to some degree, so the fact that the mere notion of an absolute standard should seem to them so important a thing to

claim for themselves and to deny to us is not easy to explain. If, along with the notion of the standard, they could also claim its exclusive warrant for their own fulminations now, it would be important to them indeed. But absolutists like Rickert freely admit the sterility of the notion, even in their own hands. Truth is what we ought to believe, they say, even though no man ever did or shall believe it, and even tho we have no way of getting at it save by the usual empirical processes of testing our opinions by one another and by facts. Pragmatically, then, this part of the dispute is idle. No relativist who ever actually walked the earth [14_6] has denied the regulative character in his own thinking of the notion of absolute truth. What is challenged by relativists is the pretence on anyone's part to have found for certain at any given moment what the shape of that truth is. Since the better absolutists agree in this, admitting that the proposition “There is absolute truth” is the only absolute truth of which we can be sure, [14_7] further debate is practically unimportant, so we may pass to their next charge.

在进攻“相对主义”的战役中，他们的第一步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指责相对主义者——我们实用主义者是典型的相对主义者，说他们所采取的原则使他们不仅无法享受到理性主义哲学家们拥有的特权，即有权相信自己的这些原则是客观的、绝对的真理，而且甚至没有权力形成对这种真理的抽象认识——从实用主义的意义上来说，这是对一个理想见解的认识，其中所有人都能取得共识，谁也不希望去改变它。这两种指控根本就是无的放矢。作为实用主义者，我本人与任何理性主义者一样坚信我对真理的阐释。我相信它，恰恰是因为我拥有的真理观念被我们那些博学的敌人认为是实用主义者无法形成的。也就是说，我预计，人们对我的阐释进行越全面的讨论和检验，就越会同意它是适当的，因而越不想改变它。当然，我可能过早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心，成为最终的、绝对的真理的殊荣，可能会落在我后来对自己的架构的修正和校正上，而它后来又可能被判定为不真，因

为依据我们设定的尺度来判定，它偏离了那个最终令人满意的阐释。如果像我们实用主义者那样承认我们可能被校正（即使我们不期望如此），这涉及到我们所使用的一个理想标准。作为个体，理性主义者本人有时持怀疑主义的态度，使他们不愿承认，他们目前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有被校正和修正的抽象可能性，因此，很难解释下列事实：仅仅是对某个绝对标准的认识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一个如此重要的东西，他们想个人占有，不想把它给予我们。除了对这个标准的认识外，如果他们也为自己的严词谴责找到符合该标准的专门根据，那对他们来说肯定是重要的。但是，像李凯尔特这样的绝对论者可以随意承认这一认识的无效性，即使它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说，真理是我们应该相信的东西，即使没有人曾经或将要相信它，即使我们达到真理的途径唯有通常的经验主义过程，也即用另外一个真理和事实来检验它。。因此，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争论是无益的。生活在地球上的任何相对主义者 [15_6] ，都不会否定在他们的思想里绝对真理这一概念有调节性的特点。相对主义者真正质疑的，是任何人假装已经在某个时刻确切地发现了那个真理的形态。既然有更多的绝对论者对此持一致态度，承认“存在绝对真理”这个命题是我们有把握的唯一绝对真理 [15_7] ，那么进一步的争论实际上并不重要，因此我们可以过渡到他们的另一个指控。

It is in this charge that the vicious abstractionism becomes most apparent. The antipragmatist, in postulating absolute truth, refuses to give any account of what the words may mean. For him they form a self-explanatory term. The pragmatist, on the contrary, articulately defines their meaning. Truth absolute, he says, means an ideal set of formulations towards which all opinions may in the long run of experience be expected to converge. In this definition of absolute truth he not only postulates that there is a tendency to such convergence of opinions, to such ultimate consensus, but he postulates the other factors of his definition equally, borrowing them by anticipation from the true conclusions expected to be

reached. He postulates the existence of opinions, he postulates the experience that will sift them, and the consistency which that experience will show. He justifies himself in these assumptions by saying that they are not postulates in the strict sense but simple inductions from the past extended to the future by analogy; and he insists that human opinion has already reached a pretty stable equilibrium regarding them, and that if its future development fails to alter them, the definition itself, with all its terms included, will be part of the very absolute truth which it defines. The hypothesis will, in short, have worked successfully all round the circle and proved self-corroborative, and the circle will be closed.

正是在这个指控中，恶性的抽象主义表现得最明显。在假定绝对真理时，反实用主义者拒绝解释他们使用的词语可能是什么意思。对他来说，这些词是不言自明的。相反，实用主义者清晰地定义了词语的意思。他说，绝对真理指一套理想的系统陈述，从经验的长远眼光来看，所有的见解可能被期望向这些陈述汇合。在对绝对真理的这一定义中，他不仅假定存在见解的这种汇合的倾向，或形成这种最终的共识的倾向，而且他还同样假定了其定义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是他事先从预期达成的真实结论中借来的。他假定了见解的存在，假定了筛选见解的经验，以及该经验将证明的一致性。他用这些设想来为自己辩护，他说，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假设，而是通过类比把过去延伸到未来做出的简单归纳；他坚持认为，人的见解已经就它们达成了相当稳定的平衡状态，而且，如果其未来的发展不能改变它们，定义本身——也包括它使用的所有术语——都将恰恰是它界定的绝对真理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假设将围绕这个圈成功地起作用，并将获得自我确证，然后这个圈将关闭。

The anti-pragmatist, however, immediately falls foul of the word “opinion” here, abstracts it from the universe of life, and uses

it as a bare dictionary-substantive, to deny the rest of the assumptions which it coexists withal. The dictionary says that an opinion is “what some one thinks or believes”. This definition leaves every one's opinion free to be autogenous, or unrelated either to what any one else may think or to what the truth may be. Therefore, continue our abstractionists, we must conceive it as essentially thus unrelated, so that even were a billion men to sport the same opinion, and only one man to differ, we could admit no collateral circumstances which might presumptively make it more probable that he, not they, should be wrong. Truth, they say, follows not the counting of noses, nor is it only another name for a majority vote. It is a relation that antedates experience, between our opinions and an independent something which the pragmatist account ignores, a relation which, tho the opinions of individuals should to all eternity deny it, would still remain to qualify them as false. To talk of opinions without referring to this independent something, the anti-pragmatist assures us, is to play *Hamlet* with Hamlet's part left out.

然而，反实用主义者立刻对这里的“见解”一词产生了异议，将它从生活领域中抽象出来，只把它用作是一个词典里的实词，否定与它共存的其他假设。词典上说，见解是“某个人认为或相信的东西”。这个定义使得每一个人的见解都随意地成为自生的，或者既不与任何其他人的想法相关，也不与真理可能是什么相关。因此，抽象主义者继续说，我们必须把见解看作基本上是这样不相关的，所以，假如有10亿人表达同样的见解，而只有一个人有不同见解，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附加的情况，虽然这些情况很可能更能证明他——而不是他们——是错的。他们说，真理的产生跟人数没关系，它也不是多数票的代名词。它是一种先于经验的关系，存在于我们的见解和实用主义的解释所忽视的某个独立东西之间，虽然个体的见解永远否定了这个关系，但它仍然被用来证明个体见解的虚假。反实用主义者确定地告诉我

们，谈论见解而不提到这个独立的东西，就像是上演《哈姆雷特》时把哈姆雷特这个角色排除在外。

But when the pragmatist speaks of opinions, does he mean any such insulated and unmotived abstractions as are here supposed? Of course not, he means men's opinions in the flesh, as they have really formed themselves, opinions surrounded by their causes and the influences they obey and exert, and along with the whole environment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of which they are a part and out of which they take their rise. Moreover the “experience” which the pragmatic definition postulates is the independent something which the anti-pragmatist accuses him of ignoring. Already have men grown unanimous in the opinion that such experience is of an independent reality, the existence of which all opinions must acknowledge, in order to be true. Already do they agree that in the long run it is useless to resist experience's pressure; that the more of it a man has, the better position he stands in, in respect of truth; that some men, having had more experience, are therefore better authorities than others; that some are also wiser by nature and better able to interpret the experience they have had; that it is one part of such wisdom to compare notes, discuss, and follow the opinion of our betters; and that the more systematically and thoroughly such comparison and weighing of opinions is pursued, the truer the opinions that survive are likely to be. When the pragmatist talks of opinions, it is opinions as they thus concretely and livingly and interactingly and correlatively exist that he has in mind; and when the anti-pragmatist tries to floor him because the word “opinion” can also be taken abstractly and as if it had no environment, he simply ignores the soil out of which the whole discussion grows. His weapons cut the air and strike no blow. No one gets wounded in the war against caricatures of belief and

skeletons of opinion of which the German onslaughts upon “relativismus” consists. Refuse to use the word “opinion” abstractly, keep it in its real environment, and the withers of pragmatism remain unwrung. That men do exist who are “opinionated”, in the sense that their opinions are self-willed, is unfortunately a fact that must be admitted, no matter what one's notion of truth in general may be. But that this fact should make it impossible for truth to form itself authentically out of the life of opinion is what no critic has yet proved. Truth may well consist of certain opinions, and does indeed consist of nothing but opinions, tho not every opinion need be true. No pragmatist needs to dogmatize about the consensus of opinion in the future being right—he need only postulate that it will probably contain more of truth than anyone's opinion now.

但是，当实用主义者谈到见解时，他是不是指这里所假设的那种与世隔绝的、没有动因的抽象呢？当然不是，他指的是人的具体见解，那种真实地形成的见解，那种被原因以及它们所遵从和施加的影响所围绕着的见解，这些见解的周围还有整个社会交往环境，它们是这个环境的一部分，并且产生于这个环境。而且，实用主义的定义所假定的“经验”，就是反实用主义者指责他忽视的那个独立的东西。人们已经对以下见解达成了一致：这样的经验具有一个独立的实在，为了使所有见解成为真的，它们必须承认这个独立实在的存在。人们还一致认为，从长远来看，抵制经验的压力是徒劳无益的；一个人拥有的压力越多，他在真理方面所处的地位越好。因此，一些有更多经验的人比其他人更具有权威地位；某些人生来更聪明，更能够解释他们的经验；其中的一些智慧被用来比较记录、讨论和遵从比我们更聪明的人的见解；对见解的这种比较和评价越系统、越彻底，剩下来的见解就可能越真。当实用主义者谈论见解时，他指的是他们心中以具体、生动、互动和相关的方式存在的见解；当反实用主义者试图击败实用主义者时——因为“见解”这个词也可以被抽象地看待好像它没有情境一样，他只是忽视了整个讨论生长的土壤。他在空中挥舞着武

器，却没有击中任何东西。德国人对“相对主义”的攻击包括对信念和见解的框架的讽刺，在对抗这些讽刺的战争中谁也没有受伤。拒绝抽象地使用“见解”这个词，坚持在真实情境下使用它，那么实用主义者的情绪就不会受到扭曲。执着于自己的见解的“顽固”之人确实存在，，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不管你的真理观总体上是什么样的。但是，这一事实也使得真理不可能真正从见解体内衍生出来，至今没有批评者证明这一点。真理很可能由某些见解组成，且确实除了见解之外不由其他东西构成，虽然不是每一种见解都是真的。任何实用主义者都没有必要教条化地强调人们应该在见解的未来正确性上达成一致，他只需要假定：与任何其他人现在的见解相比，它将可能包含更多的真理。

[14_1].Let not the reader confound the fallacy here described with legitimately negative inferences such as those drawn in the mood "celarent" of the logic-books.

[14_2].*Popular Science Monthly* , N. Y., vols. lviii and lix.

[14_3].*Loc. cit* ., vol. lviii, pp. 189, 188.

[14_4].*Some Dogmas of Religion* , p. 179.

[14_5].Münsterberg's book has just appeared in an English version: *The Eternal Values* , Boston, 1909.

[14_6].Of course the bugaboo creature called "the sceptic" in the logic-books, who dogmatically makes the statement that no statement, not even the one he now makes, is true, is a mere mechanical toy-target for the rationalist shooting-gallery—hit him and he turns a summersault—yet he is the only sort of relativist whom my colleagues appear able to imagine to exist.

[14_7].Compare Rickert's *Gegenstand der Erkentniss* , pp. 137, 138. Münsterberg's version of this first truth is that "Es gibt eine Welt,"—see his *Philosophie der Werte* , pp. 38 and 74. And, after all, both these philosophers confess in the end that the primal truth of which they consider our supposed denial so irrational is not properly an insight at all, but a dogma adopted by the will which anyone who turns his back on duty may disregard! But if it all reverts to "the will to believe," pragmatists have that privilege as well as their critics.

[15_1].请读者不要把这里描述的谬论与合理的否定推理混淆，比如根据逻辑学书中Celarent三段论法而得出的那些推理。

[15_2].《大众科学月刊》，纽约，第58卷和第59卷。

[15_3].同上书，第58卷，第189、188页。

[15_4].见《一些宗教教条》，第179页。

[15_5].明斯特贝格的书已经出版了英文译本：《永恒的价值》，波士顿，1909年。

[15_6].当然，在逻辑学书中被称作“怀疑论者”的怪物武断地声称，任何陈述都不是真的，即使是他现在正在做的陈述。这个怪物只不过是理性主义靶场上一个机械的玩具靶子——只要击中他一下他就会翻一个筋斗，可是，他似乎是我的同僚们的想象中唯一存在的相对主义者。

[15_7].比较李凯尔特的《认识的对象》，第137、138页。明斯特贝格对这个第一真理的表述是“存在一个世界”，见他的《价值的哲学》，第38、74页。毕竟，这两位哲学家最终承认：原初的真理——他们认为我们所谓对这种真理的否定是不理智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根本不是一种洞见，而是意志所采用的一种教条，任何不顾自己义务的人都可以忽视它！但是，如果它完全回归到“信仰的意志”，实用主义者与他们的批评者一样都有那种特权。

Chapter XIV Two English Critics

第十四章　两位英国批评者

Mr. Bertrand Russell's article entitled “Transatlantic Truth”, [15_1] has all the clearness, dialectic subtlety, and wit which one expects from his pen, but it entirely fails to hit the right point of view for apprehending our position. When, for instance, we say that a true proposition is one the consequences of believing which are good, he assumes us to mean that anyone who believes a proposition to be true must first have made out clearly that its consequences are good, and that his belief must primarily be in that fact,—an obvious absurdity, for that fact is the deliverance of a new proposition,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one and is, moreover, a fact usually very hard to verify, it being “far easier”, as Mr. Russell justly says, “to settle the plain question of fact: “Have popes always been infallible?” than to settle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effects of thinking them infallible are on the whole good.”

伯特兰·罗素先生题为《跨越大西洋的真理》的文章 [16_1] 体现了他惯有的清晰、论证上的缜密和智慧，但对我们立场的理解却不得要领。例如，当我们说一个真的命题是相信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好的时，他假定我们的意思是任何一个相信某个命题为真的人肯定首先已经弄清楚了以下事实：这个命题的结果是好的，而且，那个人的信念肯定首先是对那个事实的信念。这显然是荒唐的，因为那个事实是对一个新命题的表述，它与第一个命题相当不一样，而且是一个非常难以证实的事实，正如罗素的公正之言，“显而易见的事实问题，如‘教皇永远是不谬的吗？’，比认为教皇不谬是否在总体上有好的效果，更容易确定。”

We affirm nothing as silly as Mr. Russell supposes. Good consequences are not proposed by us merely as a sure sign, mark, or criterion, by which truth's presence is habitually ascertained, though they may indeed serve on occasion as such a sign; they are proposed rather as the lurking motive inside of every truth-claim, whether the “trower” be conscious of such motive, or whether he obey it blindly. They are proposed as the *causa existendi* of our beliefs, not as their logical cue or premise, and still less as their objective deliverance or content. They assign the only intelligible practical meaning to that difference in our beliefs which our habit of calling them true or false comports.

我们不曾断言过罗素先生假定的那种愚蠢东西。我们提到好结果，不仅仅是把它们作为一个确定的标志、标记或标准，真理的存在通常据此来加以确定，虽然这些结果确实可能有时被用作这样的标记；毋宁说，它们是作为每一个真理主张内部潜藏的动机而被提出的，无论信奉者意识到了这种动机，还是盲目地遵从它。它们被作为我们信念的存在原因被提出，而不是作为其逻辑线索或前提被提出，更不是作为其客观陈述或内容被提出。它们把唯一可理解的实际意义附加于我们信念具有的那种差别，即我们称这些信念为真为假的习惯所产生的差别。

No truth-claimer except the pragmatist himself need ever be aware of the part played in his own mind by consequences, and he himself is aware of it only abstractly and in general, and may at any moment be quite oblivious of it with respect to his own beliefs.

除了实用主义者本人以外，任何主张真理的人都没必要意识到结

果在他的心灵中起到的作用，他本人只是对它有抽象的和一般的意识，而且就其信念来讲，他可能随时对这种作用置若罔闻。

Mr. Russell next joins the army of those who inform their readers that according to the pragmatist definition of the word “truth” the belief that A exists may be “true” even when A does not exist. This is the usual slander repeated to satiety by our critics. They forget that in any concrete account of what is denoted by “truth” in human life, the word can only be used relatively to some particular trower. Thus, I may hold it true that Shakespeare wrote the plays that bear his name, and may express my opinion to a critic. If the critic be both a pragmatist and a Baconian, he will in his capacity of pragmatist see plain that the workings of my opinion, I being who I am, make it perfectly true for me, while in his capacity of Baconian he still believes that Shakespeare never wrote the plays in question. But most anti-pragmatist critics take the wont “truth” as something absolute, and easily play on their readers readiness to treat his own truths as the absolute ones. If the reader whom they address believes that A does not exist, while we pragmatists show that those for whom the belief that it exists works satisfactorily will always call it true, he easily sneers at the naivete of our contention, for is not then the belief in question “true”, tho what it declares as fact has, as the reader so well knows, no existence? Mr. Russell speaks of our statement as an “attempt to get rid of fact” and naturally enough considers it “a failure”. “The old notion of truth reappears,” he adds—that notion being, of course, that when a belief is true, its object does exist.

然后，罗素先生加入由下列人员组成的大军，他们告诉自己的读者，根据实用主义者对“真理”一词的定义，即使当A不存在时，A存在

这种信念可能也是“真的”。这是一种常见的诽谤，已经被我们的批评者重复到令人厌腻的程度。他们忘了，在具体解释“真理”在人类生活中所指的意思时，这个词只能相对地使用于某个特定的信奉者。因此，我可以相信，莎士比亚写了载有他名字的那些剧本，这种说法是真的，并可以向批评者表达我的见解。如果批评者是一名实用主义者，并相信培根是莎士比亚剧本的真正作者，他会在其实用主义者能力之内清楚地看到，我的见解的作用使得我的见解对我来说完全成为真的，而因为他相信培根是作者，他仍然相信莎士比亚从未写过这些剧本。但是，大多数反对实用主义的批评家把习惯的“真理”当成是绝对的东西，并容易利用读者的心理，让他们乐于接受他自己的真理作为绝对真理。如果他们的目标读者相信A不存在，而我们实用主义者证明，当A存在这个信念对某些人来说令人满意地起作用时，这些人总是称其为真，那么，这位读者会轻易地嘲笑我们的主张的幼稚，因为虽然这个信念所宣布为事实的东西像读者所熟知的那样根本不存在，但是这个信念难道就不是“真的”了吗？罗素先生把我们的陈述说成是一个“摆脱事实的尝试”，并自然而然地认为它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他补充说，“旧的真理观又出现了”，这一真理观当然就是：当一个信念为真时，其对象确实存在。

It is, of course, bound to exist, on sound pragmatic principles. Concepts signify consequences. How is the world made different for me by my conceiving an opinion of mine under the concept “true”? First, an object must be findable there (or sure signs of such an object must be found) which shall agree with the opinion. Second, such an opinion must not be contradicted by anything else I am aware of. But in spite of the obvious pragmatist requirement that when I have said truly that something exists, it shall exist, the slander which Mr. Russell repeats has gained the widest currency.

当然，它肯定是存在的，而且依据可靠的实用主义原则而存在。

概念指示结果。如果我用“真的”这个概念来看待我的某个见解，世界对我来说产生了什么不同呢？首先，一个对象必须能在那里被找到（或者必须找到这个对象存在的确切标志），它将符合我的见解。其次，这一见解不能与我所意识到的其他事物相矛盾。但是，尽管实用主义者明显地提出，当我真正说某事物存在时，它就存在，但是罗素先生所重复的诽谤已经得到最广泛的流传。

Mr. Russell himself is far too witty and athletic a ratiocinator simply to repeat the slander dogmatically. Being nothing if not mathematical and logical, he must prove the accusation *secundum artem* , and convict us not so much of error as of absurdity. I have sincerely tried to follow the windings of his mind in this procedure, but for the life of me I can only see in it another example of what I have called vicious abstractionism. The abstract world of mathematics and pure logic is so native to Mr. Russell that he thinks that we describers of the functions of concrete fact must also mean fixed mathematical terms and functions. A mathematical term, as a, b, c, x, y, sin., log., is self-sufficient, and terms of this sort, once equated, can be substituted for one another in endless series without error. Mr. Russell, and also Mr. Hawtrey, of whom I shall speak presently, seem to think that in our mouth also such terms as “meaning”, “truth”, “belief”, “object”, “definition”, are self-sufficient with no context of varying relation that might be further asked about. What a word means is expressed by its definition, isn't it? The definition claims to be exact and adequate, doesn't it? Then it can be substituted for the word—since the two are identical—can't it? Then two words with the same definition can be substituted for one another, *n'est-ce pas* ? Likewise two definitions of the same word, *nicht wahr* , etc., etc., till it will be indeed strange if you can't convict some one of self-contradiction and absurdity.

罗素先生自己是一位非常机智敏捷的推理者，不会仅仅教条地重复那种诽谤。他如果不使用数学和逻辑的方法就不是他自己了，他必须在技术上证明这一指控，证明我们是荒唐的，而不是错误的。我曾经恳切地试图遵循其推理过程中的复杂心理思路，但是我竭尽全力也只能看出，它只不过是我称为邪恶的抽象主义的一个例子。数学和纯逻辑的抽象世界非常符合罗素先生的天性，以至于他认为我们这些描述具体事实的功能的人也必须有固定的数学术语和功能。像a、b、c、x、y、正弦、对数这样的数学术语是自足的，而且，这类术语一旦进入等式，就能被用来以无限数列形式准确地互相代替。罗素先生，还有我马上谈到的霍特里先生，似乎都认为，我们口中使用的“意义”、“真理”、“信念”、“对象”和“定义”等这些词语也是自足的，没有必要再进一步探寻各种关系的语境。词的意思是由其定义表达的，不是吗？定义自以为是确切的、充分的，不是吗？这样，既然二者是同一的，定义就能被用来代替一个词，不是吗？这样，拥有同一定义的两个词就可以互相代替，不是吗？同一个词的两个定义也是如此，不是吗……到最后，如果你不能判定某人自相矛盾且荒唐，反而会令人感到奇怪。

The particular application of this rigoristic treatment to my own little account of truth as working seems to be something like what follows. I say “working” is what the “truth” of our ideas means, and call it a definition. But since meanings and things meant, definitions and things defined, are equivalent and interchangeable, and nothing extraneous to its definition can be meant when a term is used, it follows that who so calls an idea true, and means by that word that it works, cannot mean anything else, can believe nothing but that it does work, and in particular can neither imply nor allow anything about its object or deliverance. “According to the pragmatists,” Mr. Russell writes, “to say “it is true that other people exist” means “it is useful to believe that other people exist.” But if so, then these two phrases are merely different

words for the same proposition; therefore when I believe the one, I believe the other". (Logic, I may say in passing, would seem to require Mr. Russell to believe them both at once, but he ignores this consequence, and considers that "other people exist" and "it is useful to believe that they do even if they don't" must be identical and therefore substitutable propositions in the pragmatist mouth.)

将这种严格的处理方式具体应用于我借助作用对真理所做的简单解释，似乎就会得到下列结论。我指出，“作用”是我们观念的“真理”所指的东西，我称之为定义。但是，既然意义和被指称的东西、定义和被定义的东西都是等值和可互换的，而且当一个术语被使用时，它不能指任何外在于其定义的东西，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是：一个人若称一个观念为真，并用“真”这个词指那个观念，那他不会有其他所指，会只相信它确实起作用而不相信别的，并且尤其不能暗指也不能允许有关这个观念的对象和表述的任何东西。罗素先生写道，“根据实用主义者的观点，如果你说‘其他人确实存在’，这意味着‘相信其他人存在是有用的’。但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两句话只是表达同一个命题的不同措辞；因此当我相信其中一个时，就等于相信另一个。”（顺便提一下，逻辑似乎要求罗素先生同时相信它们，但是他忽视这种结果，而认为“其他人存在”，以及“即使其他人不存在，相信他们存在也是有用的”，这两种说法肯定是一样的，因此在实用主义者口中成为可替代的命题。）

But may not real terms, I now ask, have accidents not expressed in their definitions? and when a real value is finally substituted for the result of an algebraic series of substituted definitions, do not all these accidents creep back? Beliefs have their objective "content" or "deliverance" as well as their truth, and truth has its implications as well as its workings. If anyone believe that other men exist, it is both a content of his belief and an implication

of its truth, that they should exist in fact. Mr. Russell's logic would seem to exclude, “by definition”, all such accidents as contents, implications, and associates, and would represent us as translating all belief into a sort of belief in pragmatism itself—of all things! If I say that a speech is eloquent, and explain “eloquent” as meaning the power to work in certain ways upon the audience; or if I say a book is original, and define “original” to mean differing from other books, Russell's logic, if I follow it at all, would seem to doom me to agreeing that the speech is about eloquence, and the book about other books. When I call a belief true, and define its truth to mean its workings, I certainly do not mean that the belief is a belief about the workings. It is a belief about the object, and I who talk about the workings am a different subject, with a different universe of discourse, from that of the believer of whose concrete thinking I profess to give an account.

但是，我现在想问，真术语难道不会包括其定义没有表述的偶然吗？当一个真值被最终用来代替一个代数系列的被代替的定义的结果时，这些偶然不都悄悄地回来了吗？信念有其客观“内容”或“表述”，也有其真理性，而真理有其意义，也有其作用。如果一个人相信其他人存在，他们就应该事实上存在，这就是其信念的内容及其真理性的意义。罗素先生的逻辑似乎“从定义上”排除了作为内容、意义和关联物的所有这类偶然，它把我们首先描述为将所有信念转化成一种对实用主义本身的信念的人！如果我说某个讲演很雄辩，并把“雄辩”解释为以某种方式在听众身上产生的影响力；或如果我说某本书是原创的，并把“原创”定义为不同于其他书，那么，遵照罗素的逻辑，我似乎就注定是同意了如下说法，即演讲是有关雄辩的，书是有关其他书的。当我把一个信念称作真，并按照其作用定义其真理性的时候，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个信念是有关作用的一个信念。它是有关对象的一个信念，谈论其作用的我是一个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论域，跟我自称所描述的那些拥有具体思维的信仰者的论域有所差别。

The social proposition “other men exist” and the pragmatist proposition “it is expedient to believe that other men exist” come from different universes of discourse. One can believe the second without being logically compelled to believe the first; one can believe the first without having ever heard of the second; or one can believe them both. The first expresses the object of a belief, the second tells of one condition of the belief's power to maintain itself. There is no identity of any kind, save the term “other men” which they contain in common, in the two propositions; and to treat them as mutually substitutable, or to insist that we shall do so, is to give up dealing with realities altogether.

“其他人存在”这一社会命题以及实用主义的“相信其他人存在是方便的”这一命题，分别来自不同论域。人们可以相信第二个命题，而不必从逻辑上被迫相信第一个；他们可以在没有听说第二个的情况下相信第一个；或者他们可以两个都信。第一个表达信念的对象，第二个描述信念自我维系能力的一个条件。这两个命题不涉及任何类型的同一，除了共同含有“其他人”这个词语；把它们当作是可相互替换的，或者坚持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就等于完全放弃了对实在的处理。

Mr. Ralph Hawtrey, who seems also to serve under the banner of abstractionist logic, convicts us pragmatists of absurdity by arguments similar to Mr. Russell's. [15_2]

拉尔夫·霍特里先生也似乎打着抽象主义逻辑的旗帜，用类似于罗素先生的论调指责我们实用主义者荒唐。 [16_2]

As a favor to us and for the sake of the argument, he abandons the word “true” to our fury, allowing it to mean nothing but the fact that certain beliefs are expedient; and he uses the word “correctness” (as Mr. Pratt uses the word “trueness”) to designate a fact, not about the belief, but about the belief's object, namely that it is as the belief declares it. “When therefore,” he writes, “I say it is correct to say that Caesar is dead, I mean 'Caesar is dead.' This must be regarded as the definition of correctness.” And Mr. Hawtrey then goes on to demolish me by the conflict of the definitions. What is “true” for the pragmatist cannot be what is “correct”, he says, for the definitions are not logically interchangeable; or if we interchange them, we reach the tautology: “Caesar is dead” means “it is expedient to believe that Caesar is dead.” But what is it expedient to believe? Why, “that Caesar is dead.” A precious definition indeed of “Caesar is dead”.”

作为对我们的恩典，也为了争论的目的，他对“真的”这个词的解释引起了我们的愤怒，认为它只不过是指某些信念是方便的这一事实；他用“正确”（像普拉特先生使用“真实”这个词一样）来指称一个事实，不是有关信念的一个事实，而是有关信念对象的事实，即事实就是信念所宣称的样子。他写道，“因此当我说恺撒死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恺撒死了’。这应该被看作是对正确的定义。”然后，霍特里先生继续通过定义之间的冲突来推翻我的理论。他说，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是“真的”，并非就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定义从逻辑上来说是不能互换的；或者说，如果我们将它们互换，我们就犯了同义反复的错误：‘恺撒死了’意味着‘相信恺撒死了是可取的’。但是，相信什么是可取的呢？当然是相信‘恺撒死了’。这果然是对“恺撒死了”最有价值的定义啊！”

Mr. Hawtrey's conclusion would seem to be that the pragmatic

definition of the truth of a belief in no way implies—what?—that the believer shall believe in his own belief's deliverance? —or that the pragmatist who is talking about him shall believe in that deliverance? The two cases are quite different. For the believer, Caesar must of course really exist; for the pragmatist critic he need not, for the pragmatic deliverance belongs, as I have just said, to another universe of discourse altogether. When one argues by substituting definition for definition, one needs to stay in the same universe.

霍特里先生的结论似乎是：对某个信念的真理性所做出的实用主义定义，绝对不意味着——你说什么？——信仰者相信对自己信念的表述？或者说不意味着正在谈论他的实用主义者会相信那种表述？这两种情况大相径庭。对信仰者来说，恺撒当然必须真正存在；但是对实用主义的批评者来说他不必存在，因为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实用主义的表述完全属于另外一个论域。当我们试图通过用一个定义代替另外一个定义来展开讨论时，我们需要停留在同一个论域。

The great shifting of universes in this discussion occurs when we carry the word “truth” from the subjective into the objective realm, applying it sometimes to a property of opinions, sometimes to the facts which the opinions assert. A number of writers, as Mr. Russell himself, Mr. G.E.Moore, and others, favor the unlucky word “proposition,” which seems expressly invented to foster this confusion, for they speak of truth as a property of “propositions”. But in naming propositions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not to use the word “that”.

当我们把“真理”这个词从主观领域带入客观领域，把它有时用来

指见解的某种属性，或有时用来指见解所断言的事实时，这场讨论的论域就会发生巨大转变。像罗素先生自己以及G. E. 穆尔先生等许多作者喜欢“命题”这个倒霉的词（该词似乎专门被创造出来助长这种混乱状态），因为他们把真理看作是“命题”的一种属性。但是在提起命题时，不用“that”这个引导词几乎是不可能的。

That Caesar is dead, that virtue is its own reward, are propositions.

恺撒死了，美德就是对美德的奖赏，这些都是命题。

I do not say that for certain logical purposes it may not be useful to treat propositions as absolute entities, with truth or falsehood inside of them respectively, or to make of a complex like “that—Caesar—is—dead” a single term and call it a “truth”. But the “that” here has the extremely convenient ambiguity for those who wish to make trouble for us pragmatists, that sometimes it means the fact that, and sometimes the belief that, Caesar is no longer living. When I then call the belief true, I am told that the truth means the fact; when I claim the fact also, I am told that my definition has excluded the fact, being a definition only of a certain peculiarity in the belief—so that in the end I have no truth to talk about left in my possession.

把命题看作是绝对实体，其中分别存在着真理或谬误，或者把“恺撒 - 死 - 了”这样的复合体合并为单一的术语并称之为“真理”，我不想说这两种做法可能对实现某些逻辑目的没用。但是，对那些想为我们实用主义者制造麻烦的人来说，“that”在这里引导的内容具有

极其方便的歧义性，它有时指恺撒不再活着这一事实，有时指恺撒不再活着这一信念。当我们把一个信念称作真的时，我被告知真理意味着事实；当我也断言这一事实时，又被告知我的定义排除了事实，因为它不过是对该信念的某个特性的定义——结果我最终根本不掌握任何可谈论的真理。

The only remedy for this intolerable ambiguity is, it seems to me, to stick to terms consistently. “Reality”, “idea” or “belief”, and the “truth of the idea or belief”, which are the terms I have consistently held to, seem to be free from all objection.

在我看来，对于这种难以容忍的歧义，唯一的弥补方式是坚持术语使用的一致性。“实在”、“观念”或“信念”、“观念或信念的真理性”，这些词都是我坚持一贯使用的术语，似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对意见。

Whoever takes terms abstracted from all their natural settings, identifies them with definitions, and treats the latter more *algebraico* , not only risks mixing universes, but risks fallacies which the man in the street easily detects. To prove “by definition” that the statement “Caesar exists” is identical with a statement about “expediency” because the one statement is “true” and the other is about “true statements”, is like proving that an omnibus is a boat because both are vehicles. A horse may be defined as a beast that walks on the nails of his middle digits. Whenever we see a horse we see such a beast, just as whenever we believe a “truth” we believe something expedient. Messrs. Russell and Hawtrey, if they followed their antipragmatist logic, would have to say here that we see that it is such a beast, a fact which notoriously no one sees who is not a

comparative anatomist.

如果一个人把术语从它们的自然情境下抽象出来，把它们等同于定义，又把定义看作是更具有代数性质，他不仅冒着混淆论域的危险，而且极可能产生连普通的路人都很容易察觉的谬误。“恺撒存在”这一陈述与有关“可取”的某个陈述是同一的，因为一个陈述是“真的”，而另一个是有关“真的陈述”的，“用定义”来证明二者的同一性就像是证明一辆公共汽车与一只船无异，因为二者都是交通工具。马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用中间足趾的趾甲行走的牲畜。每当我们看到一匹马时，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只牲畜，正像我们每当相信一个“真理”，就相信了某个可取的东西一样。罗素和霍特里先生如果遵循其反实用主义的逻辑，在此必须会说，我们看到它是这样的一只牲畜，不是比较解剖学家的人显然不会看到这一事实。

It almost reconciles one to being no logician that one thereby escapes so much abstractionism. Abstractionism of the worst sort dogs Mr. Russell in his own trials to tell positively what the word “truth” means. In the third of his articles on Meinong, in *Mind* , vol. xiii, p. 509 (1904), he attempts this feat by limiting the discussion to three terms only, a proposition, its content, and an object, abstracting from the whole context of associated realities in which such terms are found in every case of actual knowing. He puts the terms, thus taken in a vacuum, and made into bare logical entities, through every possible 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tortures them on the rack until nothing is left of them, and after all this logical gymnastic, comes out with the following portentous conclusion as what he believes to be “the correct view: that there is no problem at all in truth and falsehood, that some propositions are true and some false, just as some roses are red and some white, that belief is a certain attitude towards propositions, which is called knowledge

when they are true, error when they are false”—and he seems to think that when once this insight is reached the question may be considered closed forever!

只有说服一个人不成为逻辑学家，他似乎才能因此躲避开严重的抽象主义倾向，当罗素先生确定地说“真理”一词的意思时，那种最糟糕的抽象主义总是尾随在他的身边。在第三篇论迈农的文章中（见《心灵》第八卷，第509页，1904年），他试图通过把讨论只限制在三个术语（即命题、命题的内容、对象）内来界定“真理”的意思，把它们从与相关联的实在的整个情境中抽象出来，而在这种情境下每一个实际的认识都离不开这些术语。这些术语就这样被放置在真空中，并被转变成纯粹的逻辑实体。他让它们经过各种可能的排列组合，在酷刑架上折磨它们，直到它们所剩无几，在所有这些逻辑表演之后，他得出了下列装腔作势的结论，他认为这是“正确的观点：真理和谬误本身没有问题；某些命题是真的，某些是假的，正像有些玫瑰是红的，有些是白的；信念是对命题的一种态度，当命题为真时，这种态度就被称作认识，当命题为假时，则态度就被称作错误”——而且他似乎是认为，一旦达成这种洞见，问题就可以被认为是永远画上了句号！

In spite of my admiration of Mr. Russell's analytic powers, I wish, after reading such an article, that pragmatism, even had it no other function, might result in making him and other similarly gifted men ashamed of having used such powers in such abstraction from reality. Pragmatism saves us at any rate from such diseased abstractionism as those pages show.

尽管我赞赏罗素先生的分析能力，在读完该文之后，我希望实用主义即使没有别的功能，也能使他和其他像他一样的天才感到羞愧，

因为他们把这种能力用在脱离实在的抽象上。正如该文所证明的，实用主义无论如何都把我们从这种病态的抽象中拯救了出来。

P. S. Since the foregoing rejoinder was written an article on Pragmatism which I believe to be by Mr. Russell has appeared in the *Edinburgh Review* for April, 1909. As far as his discussion of the truth-problem goes, altho he has evidently taken great pains to be fair, it seems to me that he has in no essential respect improved upon his former arguments. I will therefore add nothing further, but simply refer readers who may be curious to pp. 272–280 of the said article.

附笔：自上述回应写完之后，我知道罗素先生写了一篇有关实用主义的文章，登载在1909年4月的《爱丁堡评论》上。就他对真理问题的讨论而言，尽管他显然尽了最大努力保持公平，但在我看来，他没有在任何重要方面对他以前的论点做出改进。因此，这里我不再赘述，只是提醒可能有好奇心的读者去阅读该文（见第272 - 280页）。

[15_1].In the *Albany Review* for January, 1908.

[15_2].See *The New Quarterly* , for March, 1908.

[16_1].见《奥尔巴尼评论》，1908年1月。

[16_2].见《新季刊》，1908年3月。

Chapter XV A Dialogue

第十五章　对话

After correcting the proofs of all that precedes I imagine a residual state of mind on the part of my reader which may still keep him unconvinced, and which it may be my duty to try at least to dispel. I can perhaps be briefer if I put what I have to say in dialogue form. Let then the anti-pragmatist begin:

在纠正了前面提到的所有论证之后，我想读者仍然感觉自己没有被彻底说服，也许我至少有责任努力消除这种不信服。如果用对话形式来表达我要说的话，我或许能更简洁些。就让反实用主义者先说吧：

Anti-Pragmatist: You say that the truth of an idea is constituted by its workings. Now suppose a certain state of facts, facts for example of antediluvian planetary history, concerning which the question may be asked: “Shall the truth about them ever be known?” And suppose (leaving the hypothesis of an omniscient absolute out of the account) that we assume that the truth is never to be known. I ask you now, brother pragmatist, whether according to you there can be said to be any truth at all about such a state of facts. Is there a truth, or is there not a truth, in cases where at any rate it never comes to be known?

反实用主义者：你说一个观念的真理在于它的作用。现在，假定

一种事实状态，比如有关大洪水前行星历史的事实，涉及这段历史时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有关它们的真理将能被认识吗？"而且，假定（姑且把对某个无所不知的绝对的假设搁置在一边）我们认为真理根本是不可知的。现在我来问你，实用主义兄弟，在你看来，是否可以说存在有关这种事实状态的任何真理。在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认识这种状态的情况下，究竟有真理存在，还是没有真理呢？

Pragmatist: Why do you ask me such a question?

实用主义者：你为什么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呢？

Anti-Prag.: Because I think it puts you in a bad dilemma.

反实用主义者：因为这个问题使你左右为难。

Prag.: How so?

实用主义者：为什么会这样呢？

Anti-Prag.: Why, because if on the one hand you elect to say that there is a truth, you thereby surrender your whole pragmatist theory. According to that theory, truth requires ideas and workings to constitute it; but in the present instance there is supposed to be no knower, and consequently neither ideas nor workings can exist. What then remains for you to make your truth of?

反实用主义者：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一方面选择说有真理存在，你就因此放弃了实用主义的整个理论。根据那种理论，真理需要由观念和作用构成；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认识者被认为是不存在的，因而观念和作用都不可能存在。那么你的真理又产生于什么地方呢？

Prag.: Do you wish, like so many of my enemies, to force me to make the truth out of the reality itself? I cannot: the truth is something known, thought or said about the reality, and consequently numerically additional to it. But probably your intent is something different; so before I say which horn of your dilemma I choose, I ask you to let me hear what the other horn may be.

实用主义者：难道你像我的众多批评者一样，想强迫我从实在本身中创造真理吗？我不能：真理是对实在的认识、思考或言说，因而它在数量上对实在来说是附加的。但是，你的意图也许有所不同。因此，在我说我选择你所谓的两难的哪一难之前，请你让我听一听你说的另一难是什么。

Anti-Prag.: The other horn is this, that if you elect to say that there is no truth under the conditions assumed, because there are no ideas or workings, then you fly in the face of common sense. Doesn't common sense believe that every state of facts must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be truly statable in some kind of a proposition, even tho in point of fact the proposition should never be propounded by a living soul?

反实用主义者：另外一难是这样的，如果你选择说在假定的条件

下没有真理存在，因为根本没有观念或作用存在，那么你就是公然违背常识。每一个事实状态就事情的本质来说必须是可以用某个命题真正加以陈述，即使这个命题实际上应该是任何有生命的个体根本无法提出的，这难道不是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的吗？

Prag.: Unquestionably common sense believes this, and so do I. There have been innumerable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lanet of which nobody ever has been or ever will be able to give an account, yet of which it can already be said abstractly that only one sort of possible account can ever be true. The truth about any such event is thus already generically predetermined by the event's nature; and one may accordingly say with a perfectly good conscience that it virtually pre-exists. Common sense is thus right in its instinctive contention.

实用主义者：常识毫无疑问是这样认为，并且我也这样认为。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历史上，有数不胜数的事件没有人曾经或将能做出解释，但是我们可以抽象地说，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最终可能是真的。所以，有关任何这类事件的真理已经总体上由事件的性质预先决定了；相应地，人们可以完全心安理得地说，它实质上是先行存在的。如此看来，常识的本能主张是正确的。

Anti-Prag.: Is this then the horn of the dilemma which you stand for? Do you say that there is a truth even in cases where it shall never be known?

反实用主义者：那么，这就是在二难状况下你所选择的那一难吗？你是不是说真理即使在根本不可知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呢？

Prag.: Indeed I do, provided you let me hold consistently to my own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do not ask me to abandon it for something which I find impossible to comprehend. —You also believe, do you not, that there is a truth, even in cases where it never shall be known?

实用主义者：我确实这样认为，只要你允许我一贯坚持我对真理的认识，不要求我为了我发现不可能理解的东西而放弃它。你也相信真理即使在根本不可知的情况下也是存在的，不是这样吗？

Anti-Prag.: I do indeed believe so.

反实用主义者：我也确实这样认为。

Prag.: Pray then inform me in what, according to you, this truth regarding the unknown consists.

实用主义者：那么请告诉我，在你看来，关于这个不可知物的真理究竟存在于什么呢？

Anti-Prag.: Consists? —pray what do you mean by “consists”? It consists in nothing but itself, or more properly speaking it has neither consistence nor existence, it obtains, it holds.

反实用主义者：在于？请告诉我你所谓的“在于”是什么意思呢？真理除了其本身外不在于任何东西；更准确地说，它既没有“在于”也没有“存在”，它产生，它把握。

Prag.: Well, what relation does it bear to the reality of which it holds?

实用主义者：那么，它与它把握的实在是什么关系呢？

Anti-Prag.: How do you mean, “what relation”? It holds of it, of course; it knows it, it represents it.

反实用主义者：“什么关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它当然把握着实在；它认识它，表征它。

Prag.: Who knows it? What represents it?

实用主义者：谁认识它？什么表征它？

Anti-Prag.: The truth does; the truth knows it; or rather not exactly that, but any one knows it who possesses the truth. Any true idea of the reality represents the truth concerning it.

反实用主义者：是真理，真理认识它。或更确切地说也不完全如

此，而是任何拥有真理的人都认识它。有关实在的任何真观念都表征涉及它的真理。

Prag.: But I thought that we had agreed that no knower of it, nor any idea representing it was to be supposed.

实用主义者：但是我原以为我们一致认为无论是它的认识者，还是表征它的任何观念，都不能被假定是存在的。

Anti-Prag.: Sure enough!

反实用主义者：那是当然的。

Prag.: Then I beg you again to tell me in what this truth consists, all by itself, this *tertium quid*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facts per se, on the one hand, and all knowledge of them, actual or potential, on the other. What is the shape of it in this third estate? Of what stuff, mental, physical, or "epistemological", is it built? What metaphysical region of reality does it inhabit?

实用主义者：那么请你再告诉我，这个真理本身，这个处于一方面是事实本身，另一方面是对事实的所有知识——无论是实际的认识还是潜在的认识——之间的第三者，它到底存在于何处呢？处于第三等级的它又是什么样子呢？它到底由什么材料构成，是精神的，物质的，还是"认识论的"呢？它究竟居于实在的什么形而上学领域呢？

Anti-Prag.: What absurd questions! Isn't it enough to say that it is true that the facts are so-and-so, and false that they are otherwise?

反实用主义者：这些问题太荒唐了！只要说如果事实是如此如此就是真的，如果不是如此如此就是假的，这不就够了吗？

Prag.: “It” is true that the facts are so-and-so—I won't yield to the temptation of asking you what is true; but I do ask you whether your phrase that “it is true that” the facts are so-and-so really means anything really additional to the bare being so-and-so of the facts themselves.

实用主义者：如果事实是如此如此，“这”就是真的——我可不能屈服于诱惑去问你什么是真的；但是我确实想问你：你的话——如果事实是如此如此“它就是真的”，是不是指任何真正增加到事实本身只是如此如此上的东西呢？

Anti-Prag.: It seems to mean more than the bare being of the facts. It is a sort of mental equivalent for them, their epistemological function, their value in noetic terms.

反实用主义者：它似乎不仅是指事实只是如此如此。它对事实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等同物，是事实的认识论功能，是其理智上的价值。

Prag.: A sort of spiritual double or ghost of them, apparently! If so, may I ask you where this truth is found?

实用主义者：这明显是事实在精神上的对应物，是它们的幻影！如果是这样，我可否问你这个真理是在何处找到的呢？

Anti-Prag.: Where? where? There is no “where”—it simply obtains, absolutely obtains.

反实用主义者：何处？何处？没有什么“何处”——它只是存在，绝对地存在着。

Prag.: Not in anyone's mind?

实用主义者：不是在任何人的心灵中吗？

Anti-Prag.: No, for we agreed that no actual knower of the truth should be assumed.

反实用主义者：不是。因为我们已经一致认为不应该假定真理的实际认识者存在。

Prag.: No actual knower, I agree. But are you sure that no notion of a potential or ideal knower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forming this strangely elusive idea of the truth of the facts in your mind?

实用主义者：我同意，不存在实际的认识者。但是，在你心里，任何对于一个潜在的或理想的认识者的概念，与形成对事实真相的这种莫名其妙地难以把握的观念之间是毫不相干的，你对此真的有把握吗？

Anti-Prag.: Of course if there be a truth concerning the facts, that truth is what the ideal knower would know. To that extent you can't keep the notion of it and the notion of him separate. But it is not him first and then it; it is it first and then him, in my opinion.

反实用主义者：当然，如果有关事实的真理存在，那个真理就是理想的认识者会认识的。你不能在那个程度上将真理的观念与认识者的观念分割开来。但是，并不是首先有认识者然后才有真理；在我看来，首先有后者然后才有前者。

Prag.: But you still leave me terribly puzzled as to the status of this so-called truth, hanging as it does between earth and heaven, between reality and knowledge, grounded in the reality, yet numerically additional to it, and at the same time antecedent to any knower's opinion and entirely independent thereof. Is it as independent of the knower as you suppose? It looks to me terribly dubious, as if it might be only another name for a potential as distinguished from an actual knowledge of the reality. Isn't your truth, after all, simply what any successful knower would have to know in case he existed? And in a universe where no knowers were

even conceivable would any truth about the facts there as something numerically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facts themselves, find a place to exist in? To me such truth would not only be non-existent, it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conceivable.

实用主义者：可是，有关这个所谓的真理的地位，你仍然让我感觉极其困惑。它悬于天地间，悬于实在和认识之间，植根于实在，但是在数量上又是对实在的增加，并同时先行于任何认识者的见解，且完全独立于它。它果真像你假定的那样是独立于认识者吗？它在我看来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好像它可能仅仅是一个代名词，指对实在的潜在认识，区别于对实在的实际认识。毕竟，假如存在一位成功的认识者，你所说的真理不就是他将必须认识的吗？而且，在一个甚至无法设想认识者的世界里，任何有关那里的事实的真理——作为在数量上区别于事实本身的东西，能找到一个存身之地吗？对我来说，这种真理不仅是不存在的，而且也是无法想像、无法设想的。

Anti-Prag.: But I thought you said a while ago that there is a truth of past events, even tho no one shall ever know it.

反实用主义者：但是我想你刚才说过，即使没有人能认识过去事件的真理，它也是存在的。

Prag.: Yes, but you must remember that I also stipulated for permission to define the word in my own fashion. The truth of an event, past, present, or future, is for me only another name for the fact that if the event ever does get known, the nature of the knowledge is already to some degree predetermined. The truth which precedes actual knowledge of a fact means only what any

possible knower of the fact will eventually find himself necessitated to believe about it. He must believe something that will bring him into satisfactory relations with it, that will prove a decent mental substitute for it. What this something may be is of course partly fixed already by the nature of the fact and by the sphere of its associations. This seems to me all that you can clearly mean when you say that truth pre-exists to knowledge. It is knowledge anticipated, knowledge in the form of possibility merely.

实用主义者：是的，但是你必须记住，我也曾请你允许以我的方式来定义这个词。一个事件的真理性，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事件，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下列事实的一个代名词：如果这个事件确实能被认识的话，这一认识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是先决的。先于对某个事实的实际认识的真理，仅仅指那个事实可能的认识者最终发现自己必须相信的有关该事实的东西。他必须相信把他带入与它的满意关系的东西，相信将证明是它合意的心理替代物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什么，当然部分地是由这个事实的本质及其相关事物的范围所确定的。当你说真理先于认识存在时，这在我看来显然就是你能指的意思。这是一种预期到的认识，只是以可能性的形式存在。

Anti-Prag.: But what does the knowledge know when it comes? Doesn't it know the truth? And, if so, mustn't the truth be distinct from either the fact or the knowledge?

反实用主义者：但是，当认识产生时，它究竟认识了什么？它不是认识了真理吗？而且，如果是这样，真理肯定就是既不同于事实也不同于认识，不是吗？

Prag.: It seems to me that what the knowledge knows is the fact itself, the event, or whatever the reality may be. Where you see three distinct entities in the field, the reality, the knowing, and the truth, I see only two. Moreover, I can see what each of my two entities is known-as, but when I ask myself what your third entity, the truth, is known-as, I can find nothing distinct from the reality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ways in which it may be known on the other. Are you not probably misled by common language, which has found it convenient to introduce a hybrid name, meaning sometimes a kind of knowing and sometimes a reality known, to apply to either of these things interchangeably? And has philosophy anything to gain by perpetuating and consecrating the ambiguity? If you call the object of knowledge “reality”, and call the manner of its being cognized “truth”, cognized moreover on particular occasions, and variously, by particular human beings who have their various businesses with it, and if you hold consistently to this nomenclature, it seems to me that you escape all sorts of trouble.

实用主义者：在我看来，认识所认识的是事实本身、事件或任何可能是实在的东西。你在这个领域里看到三个截然不同的实体：实在、认识和真理，而我只看到两个。而且，我能看到我的两个实体各自以什么为人所知，但是当我问自己你的第三个实体真理以什么为人所知时，我既没有发现任何与实在的区别，也没有发现它可能为人所知的方式。日常语言发现引进一个混合名称很方便，这个名称有时指一种认识，有时指一个被认识的实在，它在指这两种东西时可以互用，你是不是可能被这种日常语言误导了？让这种模棱两可持续下去并把它神圣化，对哲学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把认识的对象称作“实在”，把认识它的方式称作“真理”——而且是在特殊情况下，由与实在有各种关系的特殊人从各种角度认识它的方式。而且，如果你一贯坚持这种称呼，我认为你就能避开各种麻烦。

Anti-Prag.: Do you mean that you think you escape from my dilemma?

反实用主义者：你是说你认为自己摆脱了我说的两难境地了吗？

Prag.: Assuredly I escape; for if truth and knowledge are terms correlative and interdependent, as I maintain they are, then wherever knowledge is conceivable truth is conceivable, wherever knowledge is possible truth is possible, wherever knowledge is actual truth is actual. Therefore when you point your first horn at me, I think of truth actual, and say it doesn't exist. It doesn't; for by hypothesis there is no knower, no ideas, no workings. I agree, however, that truth possible or virtual might exist, for a knower might possibly be brought to birth; and truth conceivable certainly exists, for, abstractly taken,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nature of antediluvian events that should make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to them inconceivable. Therefore when you try to impale me on your second horn, I think of the truth in question as a mere abstract possibility, so I say it does exist, and side with common sense. Do not these distinctions rightly relieve me from embarrassment? And don't you think it might help you to make them yourself?

实用主义者：我确实摆脱了。因为，如果真理和知识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术语——我坚持认为它们是这样，那么，只要认识是可以设想的，真理也是可以设想的；只要认识是可能的，真理也是可能的；只要认识是实际存在的，真理也是实际存在的。因此，当你把第一难指向我的时候，我想到了实际存在的真理，并且说它不存在。它不存在；因为依据假设，根本没有认识者，没有观念，没有作用。然而我赞同，可能的或实质上的真理可能存在，因为认识者可能会诞

生；可设想的真理肯定是存在的，因为抽象地说，大洪水前的事件的本质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它们对认识的应用变得无法设想。因此，当你试图把我钉在第二难上时，我把你提到的真理仅仅看作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所以我说它确实存在，这与常识是一致的。这些区分难道没有把我合理地从困境中解放出来吗？而且，你不认为自己做这些区分也对你是有帮助的吗？

Anti-Prag.: Never! —so avaunt with your abominable hair-splitting and sophistry! Truth is truth; and never will I degrade it by identifying it with low pragmatic particulars in the way you propose.

反实用主义者：绝对不会！让你这些可恶的吹毛求疵和诡辩术见鬼去吧！真理就是真理。我绝不会把它等同于你所主张的那种低俗的实用主义的特殊事物，不会去那样贬低它。

Prag.: Well, my dear antagonist, I hardly hoped to convert an eminent intellectualist and logician like you; so enjoy, as long as you live, your own ineffable conception. Perhaps the rising generation will grow up more accustomed than you are to that concrete and empi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erms in which the pragmatic method consists. Perhaps they may then wonder how so harmless and natural an account of truth as mine could have found such difficulty in entering the minds of men far more intelligent than I can ever hope to become, but wedded by education and tradition to the abstractionist manner of thought.

实用主义者：那么，我亲爱的对手，我本来就没指望说服你这样

一位杰出的理智主义者和逻辑学家。所以，在你有生之年好好地享受你自己那无法言表的概念吧！也许，正在成长的一代长大成人后比你更习惯于对实用主义方法所依赖的术语所做出的具体的、经验主义的解释。也许，他们那时可能不明白，我对真理的阐释是如此无害、如此自然，为什么它那样难以进入那些聪明程度我无法企及的人的思想中，而这些聪明之人却因所接受的教育和传统而陷于绝对主义的思想方式不能自拔。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语言：言语研究导论

Edward Sapir

爱德华·萨皮尔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语言：言语研究导论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爱德华·萨皮尔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reface 前言
- Chapter 1 Introductory: Language Defined 第一章　引言：语言的定义
- Chapter 2 The Elements of Speech 第二章　言语的成分
- Chapter 3 The Sounds of Language 第三章　语言的音
- Chapter 4 Form in Language: Grammatical Processes 第四章　语言里的形式：语法程序
- Chapter 5 Form in Language: Grammatical Concepts 第五章　语言中的形式：语法概念
- Chapter 6 Type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第六章　语言结构的类型
- Chapter 7 Language as a Historical Product: Drift 第七章　作为历史产物的语言：沿流
- Chapter 8 Language as a Historical Product: Phonetic Law 第八章　作为历史产物的语言：语音规律
- Chapter 9 How Languages Influence Each Other 第九章　语言怎样相互影响
- Chapter 10 Language, Race and Culture 第十章　语言、种族和文化
- Chapter 11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第十一章　语言与文学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reface

前言

This little book aims to give a certain perspective on the subject of language rather than to assemble facts about it. It has little to say of the ultimat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speech and gives only enough of the actual descriptive or historical facts of particular languages to illustrate principles. Its main purpose is to show what I conceive language to be, what is its variability in place and time, and what are its relations to other fundamental human interests—the problem of thought, the nature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race, culture, art.

这本小书旨在为语言这一话题提供一个视角，而不是汇聚有关语言的事实。书中很少讨论言语最根本的心理基础，在引用具体语言的描述性或历史性事实时也仅以能阐明原则为度。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我认为语言是什么，语言怎样因地因时而变化，以及语言与人类关心的其他基本问题（如思维问题、历史进程的性质、种族、文化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The perspective thus gained will be useful, I hope, both to linguistic students and to the outside public that is half inclined to dismiss linguistic notions as the private pedantries of essentially idle minds. Knowledge of the wider relations of their science is essential to professional students of language if they are to be saved from a sterile and purely technical attitude. Among contemporary writers of influence on liberal thought Croce is one of the very few who have gaine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of language. He has pointed out its close relation to the problem of art. I am deeply indebted to him for this insight. Quite aside from their intrinsic interest, linguistic forms and historical processes have the greatest possible diagnostic valu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some of the more difficult and elusive problems in the psychology of thought and in the strange, cumulative drift in the life of the human spirit that we call history or progress or evolution. This value depends chiefly on the unconscious and unrationalized natur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我希望由此获得的视角不仅对语言学者来说是有益的，而且对多半倾向于将语言学概念斥为纯粹无聊之辈的咬文嚼字的普通读者来说也是有益的。了解语言科学与其他学科的广泛关系对专业的语言学者是必要的，如果他们不想落入贫乏的和纯技术性看法的窠臼的话。在能够影响自由思想的当代作者中，克罗齐是少有的几位能理解语言的根本意义的人士之一。他指出了语言与艺术问题的密切关系，我从中受益匪浅。语言的形式和历史进程不仅具有内在的意义，而且无论是对于理解思维心理学中某些比较难懂和难以捉摸的问题，还是对于理解人类的精神生活中那种奇怪的、日积月累的沿流（我们称之为历史，或者进步，或者进化），都具有极大的诊断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依赖语言结构的无意识性质和未理智化性质。

I have avoided most of the technical terms and all of the technical symbols of the linguistic academy. There is not a single diacritical mark in the book. Where possible, the discussion is based on English material. It was necessary, however, for the scheme of the book, which includes a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tean forms in which human thought has found expression, to quote some exotic instances. For these no apology seems necessary. Owing to limitations of space I have had to leave out many ideas or principles

that I should have liked to touch upon. Other points have had to be barely hinted at in a sentence or flying phrase. Nevertheless, I trust that enough has here been brought together to serve as a stimulus for the more fundamental study of a neglected field.

我避免了语言学领域的大多数术语和所有专业符号。书中没有一个变音符号。只要有可能，我的讨论都基于英语语料展开。不过，由于本书的架构涉及人类用于表达思想的多变的形式，所以举一些外语的例子也是必要的。我想我无需为此道歉。限于篇幅，我不得不略去了很多原本想提及的想法或原则，而另一些观点也只能用一句话或一个仓促的短语轻轻带过。尽管如此，我相信陈列于此书中的已经足够激发大家对一个被忽略的领域——即语言学进行更彻底的研究。

I desire to express my cordial appreciation of the friendly advice and helpful suggestions of a number of friends who have read the work in manuscript, notably Profs. A. L. Kroeber and R. H. Lowi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of. W. D. Wallis of Reed College, and Prof. J. Zeitlin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多位朋友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友好且有益的建议，我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尤其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的A. L. 克罗伯教授和R. H. 洛伊教授，里德学院的W.D. 沃利斯教授以及伊利诺伊大学的J. 柴特林教授。

Edward Sapir.

爱德华·萨丕尔

Ottawa, Ont.,

渥太华，安大略省

April 8, 1921.

1921年4月8日

Chapter 1 Introductory: Language Defined

第一章　引言：语言的定义

Speech is so familiar a feature of daily life that we rarely pause to define it. It seems as natural to man as walking, and only less so than breathing. Yet it needs but a moment's reflection to convince us that this naturalness of speech is but an illusory feeling. The process of acquiring speech is, in sober fact, an utterly different sort of thing from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o walk. In the case of the latter function, culture, in other words, the traditional body of social usage, is not seriously brought into play. The child is individually equipped, by the complex set of factors that we term biological heredity, to make all the needed muscular and nervous adjustments that result in walking. Indeed, the very conformation of these muscles and of the appropriate parts of the nervous system may be said to be primarily adapted to the movements made in walking and in similar activities. In a very real sense the normal human being is predestined to walk, not because his elders will assist him to learn the art, but because his organism is prepared from birth, or even from the moment of conception, to take on all those expenditures of nervous energy and all those muscular adaptations that result in walking. To put it concisely, walking is an inherent, biological function of man.

言语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如此习以为常的特征，以至于我们很少会想到为它下定义。言语对人类的自然程度如同走路，仅次于呼吸。但是，只需稍加思索，我们就会明白，言语的这种自然性不过是一种错觉。事实上，习得言语的过程与学习走路的过程截然不同。在学习后

一种本领的过程中，文化，或者说社会活动中约定俗成的部分，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每个儿童都具备我们称之为“生物遗传”的一系列复杂因素，能够胜任走路所需的所有肌肉和神经调节。甚至可以说这些肌肉和相应的神经系统之间的协同构造主要就是为了适应走路以及类似活动中的各种动作。严格说来，正常人都注定会走路，不是因为大人将帮助他学会这门技艺，而是因为从他出生、甚至是从受孕的那一刻起，他的生理结构就做好了准备，以担负起他日后走路所需的所有的神经能量及肌肉调节。简言之，走路是人类的一种遗传的生物功能。

Not so language. It is of course true that in a certain sense the individual is predestined to talk, but that is due entirely to the circumstance that he is born not merely in nature, but in the lap of a society that is certain, reasonably certain, to lead him to its traditions. Eliminate society and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he will learn to walk, if, indeed, he survives at all. But it is just as certain that he will never learn to talk, that is, to communicate ideas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a particular society. Or, again, remove the new-born individual from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to which he has come and transplant him to an utterly alien one. He will develop the art of walking in his new environment very much as he would have developed it in the old. But his speech will be completely at variance with the speech of his native environment. Walking, then, is a general human activity that varies only within circumscribed limits as we pass from individual to individual. Its variability is involuntary and purposeless. Speech is a human activity that varies without assignable limit as we pass from social group to social group, because it is a purely historical heritage of the group, the product of long-continued social usage. It varies as all creative effort varies—not as consciously, perhaps, but none the less as truly as do the religions, the beliefs, the customs,

and the arts of different peoples. Walking is an organic, an instinctive, function (not, of course, itself an instinct); speech is a non-instinctive, acquired, “cultural” function.

语言则并非如此。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也注定会说话，但是这全然取决于他不仅降生在自然环境中，而且降生在社会怀抱里，而社会一定会，至少是在相当程度上会，引导他习得自己的各项传统。就算没有社会，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人终将学会走路，如果他真的能生存下来的话。而同样肯定的是，在没有社会的情况下一个人永远无法学会说话，即永远无法遵照某个社会约定俗成的系统来交流思想。又或者，将新生儿带离他出生的社会环境，将他置于与出生环境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在这个新环境里，他仍然会掌握走路的本领，就像他在旧环境里一样。但是，他的言语却将与本土环境下的言语完全不同。所以说，走路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它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是有限的，而且它的差异性是不自觉的和无目的的。而言语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在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差异则没有确定的限度，因为言语纯粹是某个社会团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持续的社会使用的产物。言语的差异如同所有创造性行为的差异——也许不像后者那样有意识，但却实实在在地存在，就像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艺术之间的差异一样。总之，走路是一种器官性的、本能的本领（当然，走路本身并不是一种本能），而言语是一种非本能的、后天习得的、“文化性”的本领。

There is one fact that has frequently tended to prevent the recognition of language as a merely conventional system of sound symbols, that has seduced the popular mind into attributing to it an instinctive basis that it does not really possess. This is the well-known observation that under the stress of emotion, say of a sudden twinge of pain or of unbridled joy, we do involuntarily give utterance to sounds that the hearer interprets as indicative of the

emotion itself. But there i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between such involuntary expression of feeling and the normal type of communication of ideas that is speech. The former kind of utterance is indeed instinctive, but it is non-symbolic; in other words, the sound of pain or the sound of joy does not, as such, indicate the emotion, it does not stand aloof, as it were, and announce that such and such an emotion is being felt. What it does is to serve as a more or less automatic overflow of the emotional energy; in a sense, it i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emotion itself. Moreover, such instinctive cries hardly constitute communication in any strict sense. They are not addressed to any one, they are merely overheard, if heard at all, as the bark of a dog, the sound of approaching footsteps, or the rustling of the wind is heard. If they convey certain ideas to the hearer, it is only in the very general sense in which any and every sound or even any phenomenon in our environment may be said to convey an idea to the perceiving mind. If the involuntary cry of pain which is conventionally represented by “Oh!” be looked upon as a true speech symbol equivalent to some such idea as “I am in great pain,” it is just as allowable to interpret the appearance of clouds as an equivalent symbol that carries the definite message “It is likely to rain.” A definition of language, however, that is so extended as to cover every type of inference becomes utterly meaningless.

有一种现象往往妨碍人们看清楚语言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声音符号系统，并诱导大众赋予语言某种它自身并不具有的本能的基础。这便是广为人知的下述现象：在强烈的情感驱使下，例如突发的疼痛或者按捺不住的喜悦，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声音，而听者会把这些声音理解为情感本身的标示。但是这些情不自禁的情感流露和正常的思想交流（即言语）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确是出于本能，但它不具有符号性；换言之，疼痛或喜悦时发出的声响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能表达情

感，不能像独立一旁似的宣告当事人正在感受到某种情绪。那些声响只是情感能量或多或少的自发流露；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情感自身的重要部分。更进一步说，那些本能的叫唤在任何严格意义上都难以构成交流。它们并不针对任何人，即使被人听到，也只是出于无意，就像狗叫声、渐近的脚步声和风声被听到一样。如果说它们传达了某些信息给听者，那也只是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在这个宽泛的意义上我们所处的环境中的每一种声音，甚至任何一种现象，都可以说向体察到该声音或现象的人传达了某种信息。如果我们把因疼痛而情不自禁发出的叫唤（英语中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是“噢”）视为真正的言语符号，与诸如“我很痛”之类的意思等同，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把云朵的出现理解为传达了以下明确信息的对等符号——“好像要下雨了”。可是，如果语言的定义被如此延展到能覆盖所有推断，那么它也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The mistake must not be made of identifying our conventional interjections (our *oh!* and *ah!* and *sh!*) with the instinctive cries themselves. These interjections are merely conventional fixations of the natural sounds. They therefore differ widely in various languag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 phonetic genius of each of these. As such they may be considered an integral portion of speech, in the properly cultural sense of the term, being no more identical with the instinctive cries themselves than such words as “cuckoo” and “kill-deer” are identical with the cries of the birds they denote or than Rossini's treatment of a storm in the overture to “*William Tell* ” is in fact a storm. In other words, the interjections and sound—imitative words of normal speech are related to their natural prototypes as is art, a purely social or cultural thing, to nature. It may be objected that, though the interjections differ somewhat as we pass from language to language, they do nevertheless offer striking family resemblances and may therefore be looked upon as having grown up out of a common instinctive

base. But their case is nowise different from that, say, of the varying national modes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A Japanese picture of a hill both differs from and resembles a typical modern European painting of the same kind of hill. Both are suggested by and both “imitate” the same natural feature.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is the same thing as, or, in any intelligible sense, a direct outgrowth of, this natural feature. The two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are not identical because they proceed from differing historical traditions, are executed with differing pictorial techniques. The interjections of Japanese and English are, just so, suggested by a common natural prototype, the instinctive cries, and are thus unavoidably suggestive of each other. They differ, now greatly, now but little, because they are builded out of historically diverse materials or techniques, the respective linguistic traditions, phonetic systems, speech habits of the two peoples. Yet the instinctive cries as such are practically identical for all humanity, just as the human skeleton or nervous system is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a “fixed,” that is, an only slightly and “accidentally” variable, feature of man's organism.

我们不要错误地将约定俗成的感叹词（比如“噢”、“啊”和“嘘”）等同于本能的叫唤本身。这些感叹词只是对自然的声音约定俗成的固化。因此，在不同语言的感叹词之间存在着与各语言的语音特征相应的巨大差异。在严格的文化意义上，感叹词就其自身而言可被视为言语的一个内在部分，与各种本能的叫唤本身不是一回事，就如同cuckoo和kill-deer [3_1] 等拟声词与它们所模拟的鸟叫声不是一回事，而罗西尼在歌剧《威廉·泰尔》的序曲中对暴风雨的再现其实也不是暴风雨本身一样。换句话说，普通言语中的感叹词和拟声词与它们的自然原型之间的关系，就如同艺术作为一种纯粹的社会和文化事物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样。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虽然感叹词因语言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们都表现出显著的家族相似性，因此可以被视为来自一种共同的本能基础。然而，它们即不同语言的感叹词

的情况与诸如各民族不同的图画表征方式并无任何不同。日本绘画中的山岳与典型的现代欧洲绘画中的同类山岳既有差别，也有相似。两者都取材于并都“模仿”相同的自然特征。但两者又都不等同于该自然特征；在任何可理解的意义上，也都不是该自然特征的直接产物。两种表征方式之所以有差别，是因为它们来自不同的历史传统，并且是用不同的绘画技法创作出来的。日语和英语中的感叹词也是如此：源自共同的自然原型，即本能的叫唤，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使人联想到彼此。但是，它们也有差别，有时很大，有时微小，因为它们建立在历史上不同的素材或技法之上，包括两个民族各自的语言传统、语音系统以及言语习惯。然而，本能的叫唤本身对于全人类来说则几乎毫无差别，正如人类的骨骼或者神经系统实际上是人类生理结构的“固定”特征，只有微小且“偶发”的差异一样。

Interjections are among the least important of speech elements. Their discussion is valuable mainly because it can be shown that even they, avowedly the nearest of all language sounds to instinctive utterance, are only superficially of an instinctive nature. Were it therefore possible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whole of language is traceable, in its ultimate historical and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to the interjections, it would still not follow that language is an instinctive activity.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all attempts so to explain the origin of speech have been fruitless. There is no tangible evidence, historical or otherwise, tending to show that the mass of speech elements and speech processes has evolved out of the interjections. These are a very small and functionally in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 vocabulary of language; at no time and in no linguistic province that we have record of do we see a noticeable tendency towards their elaboration into the primary warp and woof of language. They are never more, at best, than a decorative edging to the ample, complex fabric.

感叹词不过是最不重要的言语成分之一。它们之所以值得讨论，主要是因为借此可以说明，即使是在所有语音中被公认为最接近本能叫唤的感叹词也只是表面上具有本能的特征而已。因此，即使能够从终极的历史和心理源头上证明语言的所有成分都可追溯到感叹词，也仍然不能说语言是一种本能的活动。而事实上，所有试图这样来解释言语起源的努力都是徒劳。没有确凿的历史或其他方面的证据能够证明各种言语成分和言语过程是从感叹词演化而来。感叹词只是语言词汇中一个很小的且功能上无关紧要的部分；在有记录的所有时代和语言领域，我们都看不到感叹词发展成为语言的主要经纬结构的显著趋势。它们充其量都从来不过是语言这件宏大而繁复的织物的花边。

What applies to the interjections applies with even greater force to the sound—imitative words. Such words as “whippoorwill,” “to mew,” “to caw” are in no sense natural sounds that man has instinctively or automatically reproduced. They are just as truly creations of the human mind, flights of the human fancy, as anything else in language. They do not directly grow out of nature, they are suggested by it and play with it. Hence the onomatopoetic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speech, the theory that would explain all speech as a gradual evolution from sounds of an imitative character, really brings us no nearer to the instinctive level than is language as we know it to—day. As to the theory itself, it is scarcely more credible than its interjectional counterpart. It is true that a number of words which we do not now feel to have a sound—imitative value can be shown to have once had a phonetic form that strongly suggests their origin as imitations of natural sounds. Such is the English word “to laugh.” For all that, it is quite impossible to show, nor does it seem intrinsically reasonable to suppose, that more than a negligible proportion of the elements of speech or anything at all of its formal apparatus is derivable from an onomatopoetic source. However much we may be disposed on general principles to assign

a fundamental importance in the languages of primitive peoples to the imitation of natural sounds, the actual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hese languages show no particular preference for imitative words. Among the most primitive peoples of aboriginal America, the Athabaskan tribes of the Mackenzie River speak languages in which such words seem to be nearly or entirely absent, while they are used freely enough in languages as sophisticated as English and German. Such an instance shows how little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spee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mere imitation of things.

感叹词如此，拟声词更是如此。Whippoorwill、to mew和to caw [3_2] 之类的词都绝非人类本能地或自发地再生出来的自然声音。它们和语言的所有其他成分一样，完全是人类头脑的创造物，是人类想象力的迸发。它们不是从自然中直接生发出来，而是受了自然的启发，并与其相嬉戏。所以，关于言语起源的拟声理论——该理论把所有的言语要素都解释为从模拟性的声音逐渐演化而来——实际上并不能使我们达到比我们今日所认识的语言更接近本能水平的地步，而该理论本身也并不比与其相应的感叹词理论更可信。诚然，确有一些现在我们感觉不到其拟声性的词曾经拥有某种语音形式，能够有力地证明它们起源于对自然声音的模拟。英语中的to laugh（大笑）一词就是如此。 [3_3] 但即使是这样，仍然无法完全证实，也没有内在的理由认为言语成分或者言语的任何形式特征源自拟声性的源头，除了可以忽视的一小部分。无论我们多么愿意在普遍意义上把模拟自然声音视作原始民族语言的基本特征，事实都是这些语言并未表现出对拟声词的特别偏好。作为美洲原住民中最原始的民族之一，麦肯齐河畔的阿萨巴斯卡部落所说的语言几乎、甚至完全不含拟声词；相反，像英语和德语这样复杂的语言却相当随性地使用拟声词。这样的例子说明，言语的本质与纯粹的事物模拟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微乎其微。

The way is now cleared for a serviceable definition of language.

Language is a purely human and non-instinctive method of communicating ideas, emotions, and desires by means of a system of voluntarily produced symbols. These symbols are, in the first instance, auditory and they are produced by the so-called “organs of speech.” There is no discernible instinctive basis in human speech as such, however much instinctive expression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may serve as a stimul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ertain elements of speech, however much instinctive tendencies, motor and other, may give a predetermined range or mold to linguistic expression. Such human or animal communication, if “communication” it may be called, as is brought about by involuntary, instinctive cries is not, in our sense, language at all.

至此，道路已经扫清，我们可以为语言下一个可用的定义了。语言是一种人类特有的、非本能的交流方式，这种方式通过一套自发生成的符号系统来交流思想、情感和欲望。这些符号首先是听觉上的，由所谓的“言语器官”生成。究其实，人类的言语并没有明显的本能基础，无论本能的表达和自然环境为某些言语成分的产生提供了多大的刺激，也无论种种本能的趋势——诸如运动或其他——在多大程度上为语言表达预设了范围或模式。人类或动物通过不自觉的、本能的叫喊所进行的那种交流——如果它们可以被称为“交流”的话——在我们的定义里，根本算不上语言。

I have just referred to the “organs of speech,” and it would seem at first blush that this is tantamount to an admission that speech itself is an instinctive, biologically predetermined activity. We must not be misled by the mere term. There are, properly speaking, no organs of speech; there are only organs that are incidentally useful in the production of speech sounds. The lungs, the larynx, the palate, the nose, the tongue, the teeth, and the lips,

are all so utilized, but they are no more to be thought of as primary organs of speech than are the fingers to be considered as essentially organs of piano—playing or the knees as organs of prayer. Speech is not a simple activity that is carried on by one or more organs biologically adapted to the purpose. It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and ever-shifting network of adjustments—in the brain, in the nervous system, and in the articulating and auditory organs—tending towards the desired end of communication. The lungs developed, roughly speak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e necessary biological function known as breathing; the nose, as an organ of smell; the teeth, as organs useful in breaking up food before it was ready for digestion. If, then, these and other organs are being constantly utilized in speech, it is only because any organ, once existent and in so far as it is subject to voluntary control, can be utilized by man for secondary purposes. Physiologically, speech is an overlaid function, or, to be more precise, a group of overlaid functions. It gets what service it can out of organs and functions, nervous and muscular, that have come into being and are maintained for very different ends than its own.

刚刚我提到了“言语器官”，乍看起来，这种说法等于承认言语本身是一种本能的、生理上先天决定的活动。但我们千万不要被区区一个术语误导。严格地说，并没有言语器官这种东西，只是有些器官附带地也能用来发出言语声音而已。肺、喉头、上腭、鼻子、舌头、牙齿和嘴唇都被用来发声，但是不要认为它们的首要功能就是说话，就像手指的首要功能不是弹钢琴，膝盖的首要功能也不是祈祷一样。言语不是由某一个或某几个生理上专用于言语目的的器官所执行的一种简单活动。它是一套极其复杂且不停变化的调节网络——存在于大脑、神经系统、发声器官和听觉器官中——以趋向预期的交际目的。粗略说来，肺的进化与呼吸这一必要的生理功能相关，鼻子是作为嗅觉器官而进化的，牙齿则是作为咀嚼食物以便于消化的器官而进化

的。所以，就算这些器官以及其他器官一直被用于说话，那也只是因为任何器官一旦存在且受制于人类的自觉意识，就都可以被用来承担首要功能之外的次要功能。从生理角度讲，言语是一种附加功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组附加功能。它对各种器官和机能——比如神经系统的和肌肉系统的——善加利用，尽管这些器官和机能的存在及运行是为了其他非常不同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说话。

It is true that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sts speak of the localization of speech in the brain. This can only mean that the sounds of speech are localized in the auditory tract of the brain, or in some circumscribed portion of it, precisely as other classes of sounds are localized; and that the motor processes involved in speech (such as the movements of the glottal cords in the larynx, the movements of the tongue required to pronounce the vowels, lip movements required to articulate certain consonants, and numerous others) are localized in the motor tract precisely as are all other impulses to special motor activities. In the same way control is lodged in the visual tract of the brain over all those processes of visual recognition involved in reading. Naturally the particular points or clusters of points of localization in the several tracts that refer to any element of language are connected in the brain by paths of association, so that the outward, or psycho—physical, aspect of language, is of a vast network of associated localizations in the brain and lower nervous tracts, the auditory localizations being without doubt the most fundamental of all for speech. However, a speechsound localized in the brain, even when associated with the particular movements of the “speech organs” that are required to produce it, is very far from being an element of language. It must be further associated with some element or group of elements of experience, say a visual image or a class of visual images or a feeling of relation, before it has even rudimentary

linguistic significance. This “element” of experience is the content or “meaning” of the linguistic unit; the associated auditory, motor, and other cerebral processes that lie immediately back of the act of speaking and the act of hearing speech are merely a complicated symbol of or signal for these “meanings,” of which more anon. We see therefore at once that language as such is not and cannot be definitely localized, for it consists of a peculiar symbolic relation—physiologically an arbitrary one—between all possible elements of consciousness on the one hand and certain selected elements localized in the auditory, motor, and other cerebral and nervous tracts on the other. If language can be said to be definitely “localized” in the brain, it is only in that general and rather useless sense in which all aspects of consciousness, all human interest and activity, may be said to be “in the brain.” Hence, we have no recourse but to accept language as a fully formed functional system within man's psychic or “spiritual” constitution. We cannot define it as an entity in psycho—physical terms alone, however much the psycho—physical basis is essential to its functioning in the individual.

的确，生理心理学家有提及言语在大脑中所占据的区域。但是，这仅仅意味着言语的声音位于大脑的听觉神经束，或者其中的某个限定部位，就像其他类别的声音也处于限定部位一样；言语涉及的运动过程（例如位于喉头的声带运动，发出元音所需的舌头的运动，发出某些辅音所需的嘴唇的运动，以及其他诸多运动）则位于运动神经束，就像完成特定运动所需的所有其他神经冲动一样。同理，对阅读所涉及的所有视觉识别过程的控制位于大脑的视觉神经束。自然，不同神经束中与语言成分相关的特定的位置点或者位置点构成的簇在大脑中由各种联系通道连在一起，由此，语言的外在层面，或者说心理-物理层面，是由大脑中相互联系的分区和底层神经束构成的一个巨大的网络，其中听觉分区对言语来说无疑是最根本的。然而，定位于大

脑中特定分区的某个言语声音，即使与发出该声音所需的“言语器官”的某些特定运动相关，它也远非一个语言成分。它还必须与某个或者某组经验成分建立起联系，比如，一个视觉图像或者一类视觉图像或者对某种关系的感觉，才能具有最初级的语言意义。这个经验“成分”就是该语言单位的内容或者说“意义”；而说话动作和聆听动作背后紧紧相随的听觉、运动及其他大脑活动仅仅是这些“意义”的一个复杂符号或者信号，我们稍后会详谈。由此可见，语言本身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被明确地限定在大脑中的某个区域，因为它包括一种独特的符号关系——一种生理上的任意关系——一方面是所有可能的意识成分，另一方面是那些被用到的位于听觉、运动及其他大脑部位和神经束的成分。如果非要说语言明确地“位于”大脑中的某个区域，那也只能是在笼统的、没有多大用处的意义上说说而已，在这种意义上意识的所有方面，人类的所有兴趣和活动，都可以说是“在大脑里”。因此，我们别无他法，只能接受如下事实：语言是人类心理或者“心灵”结构中一个已充分形成的功能系统。我们不能只将语言视为一件心理-物理的实体来为其下定义，无论心理-物理基础对于语言在个体身上发挥作用是多么必要。

From the physiologist's or psychologist's point of view we may seem to be making an unwarrantable abstraction in desiring to handle the subject of speech without constant and explicit reference to that basis. However, such an abstraction is justifiable. We can profitably discuss the intention, the form, and the history of speech, precisely as we discuss the nature of any other phase of human culture-say art or religion—as an institutional or cultural entity, leaving the organic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back of it as something to be taken for granted. Accordingly, it must be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thi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is not concerned with those aspects of physiology and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that underlie speech. Our study of language is not to be one of the genesis and operation of a concrete mechanism; it is,

rather, to be an inquiry into the function and form of the arbitrary systems of symbolism that we term languages.

从生理学家或者心理学家的角度看，我们希望研究言语这个话题，却不经常地、明确地提及心理-物理基础，这似乎是在做毫无道理的抽象论述。但是这种抽象是有道理的。我们尽可以讨论言语的目的、形式和历史，恰如我们讨论人类文化其他任何方面的本质一样——比如艺术或宗教——将它们视为一种制度实体或者文化实体，而把背后的器官和心理机制抛开，视其为理所当然。所以读者务必明了，这一部言语研究导论不会论及言语底层的生理学和生理心理学层面。我们对语言的研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机制的起源和运行的研究，而是针对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任意符号系统的功能和形式的探究。

I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that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consists in the assigning of conventional, voluntarily articulated, sounds, or of their equivalents, to the diverse elements of experience. The word “house” is not a linguistic fact if by it is meant merely the acoustic effect produced on the ear by its constituent consonants and vowels, pronounced in a certain order; nor the motor processes and tactile feelings which make up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word; nor the visual perception on the part of the hearer of this articulation; nor the visual perception of the word “house” on the written or printed page; nor the motor processes and tactile feelings which enter into the writing of the word; nor the memory of any or all of these experiences. It is only when these, and possibly still other, associated experiences are automatic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image of a house that they begin to take on the nature of a symbol, a word, an element of language. But the mere fact of such an association is not enough. One might have heard a particular word spoken in an individual house under such impressive circumstances

that neither the word nor the image of the house ever recur in consciousness without the other becoming present at the same time. This type of association does not constitute speech. The association must be a purely symbolic one; in other words, the word must denote, tag off, the image, must have no other significance than to serve as a counter to refer to it whenever it is necessary or convenient to do so. Such an association, voluntary and, in a sense, arbitrary as it is, demands a considerable exercise of self—conscious attention. At least to begin with, for habit soon makes the association nearly as automatic as any and more rapid than most.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语言的本质体现在将各种约定俗成的、自主发出的声音，或其对等物，分派给不同的经验成分。比如，如果英语单词house（房子）仅仅是用来表示构成这个词的辅音和元音按照一定顺序发出之后在耳朵上产生的音响效果，或者发出该词的运动过程和触觉体验，或者听到该词的听者所产生的视觉感知，或者对书写或印刷的house一词的视觉感知，或者书写该词所包含的运动过程和触觉体验，或者对任何或所有上述经验的回忆，那么它都不能算是一个语言事实。只有当这些（可能还有其他）相关经验与一个房子的意象建立起自动的联系时，它们才开始具有一个符号、一个词、一个语言成分的属性。然而，仅仅存在这样的联系还是不够的。比如，某人可能在某栋房子里听过某个特定的词，而当时的情景给他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只要这个词和这栋房子的意象中的任何一个出现在他的意识中，另一个必定同时出现。但这种联系并不构成言语。构成言语的联系必须是单纯的符号性的；换言之，词必须代表和标示意象，并且除了在必要或者方便的时候用作筹码来指称该意象之外，不得有其他意义。这种联系具有自发性，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任意性，要求高度的自觉性的注意。至少在一开始是如此，因为习惯很快就会使这种联系变得和其他联系几乎一样自动，甚至比大多数其他联系更为迅捷。

But we have traveled a little too fast. Were the symbol "house"—whether an auditory, motor, or visual experience or image—attached but to the single image of a particular house once seen, it might perhaps, by an indulgent criticism, be termed an element of speech, yet it is obvious at the outset that speech so constituted would have little or no value for purposes of communication. The world of our experiences must be enormously simplified and generalized before it is possible to make a symbolic inventory of all our experiences of things and relations; and this inventory is imperative before we can convey ideas. The elements of language, the symbols that ticket off experience, must therefore be associated with whole groups, delimited classes, of experience rather than with the single experiences themselves. Only so is communication possible, for the single experience lodges in an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is, strictly speaking, incommunicable. To be communicated it needs to be referred to a class which is tacitly accepted by the community as an identity. Thus, the single impression which I have had of a particular house must be identified with all my other impressions of it. Further, my generalized memory or my "notion" of this house must be merged with the notions that all other individuals who have seen the house have formed of it. The particular experience that we started with has now been widened so as to embrace all possible impressions or images that sentient beings have formed or may form of the house in question. This first simplification of experience is at the bottom of a large number of elements of speech, the so-called proper nouns or names of single individuals or objects. It is, essentially, the type of simplification which underlies, or forms the crude subject of, history and art. But we cannot be content with this measure of reduction of the infinity of experience. We must cut to the bone of things, we must more or less arbitrarily throw whole masses of experience together as similar enough to warrant their being looked

upon—mistakenly, but conveniently—as identical. This house and that house and thousands of other phenomena of like character are thought of as having enough in common, in spite of great and obvious differences of detail, to be classed under the same heading. In other words, the speech element “house” is the symbol, first and foremost, not of a single perception, nor even of the notion of a particular object, but of a “concept,” in other words, of a convenient capsule of thought that embraces thousands of distinct experiences and that is ready to take in thousands more. If the single significant elements of speech are the symbols of concepts, the actual flow of speech may be interpreted as a record of the setting of these concepts into mutual relations.

但是，我们走得过于快了一点。如果house这个符号，无论作为听觉的、运动的还是视觉的经验或意象，仅仅附着在使用者某次见过的某个特定房子的单个意象之上，那么，按照某种宽容的意见，它或可被称为一个言语成分。但是，很显然，从一开始，如此构造的言语对于交流的目的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甚至根本没有价值。我们的经验世界必须被极大地简化和概括，才有可能为我们对各种事物和关系的所有经验开列出一个符号清单；而这种清单是我们能够表达思想的先决条件。总之，语言成分，作为表达经验的符号，应该与整体的一组一组的经验相联系，与界限明确的一类一类的经验相联系，而不是与单个的经验本身相联系。只有这样，交流才成为可能，因为单个的经验存在于个体的意识中，严格地说，是无法传达的。要想传达个体的经验，就必须将其归于一个被某个社团默认为具有同一性的类别。这就是说，我对于某所特定房子的个别印象必须与我对它的所有其他印象参同。更进一步地说，我对该房子的一般化的记忆或我对该房子的“理念”还必须与其他所有见过该房子的人对它形成的理念相融合。至此，我们最开始的个别经验便扩展开来，包容了有情众生对这所房子已经形成或可能形成的所有印象或者意象。对经验的这第一步简化是众多言语成分（即个体的人或物的所谓专有名词或名称）的基础。

从本质上讲，这种简化也潜存于历史或艺术之下，或者说构成了历史或艺术的素材。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仅对无限的经验做这样的简化。我们必须一简到底，必须或多或少有些任意地将一堆一堆的经验放到一起，认为它们足够相似，可被视为同类——这种做法虽然是错误的，却很方便。这所房子、那所房子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类似现象，都被视为具有足够的相似性，可以被划分到同一个类别之下，尽管它们在细节上存在着巨大而且明显的差异。换句话说，作为言语成分的house首要的并不是某个单一感知体验的符号，甚至也不是关于某个物体的理念的符号，而是一个“概念”的符号；换言之，是一个合用的思维胶囊的符号，其中囊括了成千上万的独特经验，并随时可以吸收更多。如果说单个的、有意义的言语成分是概念的符号，那么自然的言语流就可被理解为把这些概念排列起来、构成相互关系的记录。

The question has often been raised whether thought is possible without speech; further, if speech and thought be not but two facets of the same psychic process. The question is all the more difficult because it has been hedged about by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well to observe that whether or not thought necessitates symbolism, that is speech, the flow of language itself is not always indicative of thought. We have seen that the typical linguistic element labels a concept. It does not follow from this that the use to which language is put is always or even mainly conceptual. We are not in ordinary life so much concerned with concepts as such as with concrete particularities and specific relations. When I say, for instance, “I had a good breakfast this morning,” it is clear that I am not in the throes of laborious thought, that what I have to transmit is hardly more than a pleasurable memory symbolically rendered in the grooves of habitual expression. Each element in the sentence defines a separate concept or conceptual relation or both combined, but the sentence as a whole has no conceptual significance whatever. It is somewhat as though a dynamo capable of generating

enough power to run an elevator were operated almost exclusively to feed an electric door-bell. The parallel is more suggestive than at first sight appears. Language may be looked upon as an instrument capable of running a gamut of psychic uses. Its flow not only parallels that of the inner content of consciousness, but parallels it on different levels, ranging from the state of mind that is dominated by particular images to that in which abstract concepts and their relations are alone at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nd which is ordinarily termed reasoning. Thus the outward form only of language is constant; its inner meaning, its psychic value or intensity, varies freely with attention or the selective interest of the mind, also, needless to say, with the mind's gene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language, thought may be defined as the highest latent or potential content of speech, the content that is obtained by interpreting each of the elements in the flow of language as possessed of its very fullest conceptual value. From this it follows at once that language and thought are not strictly coterminous. At best language can but be the outward facet of thought on the highest, most generalized, level of symbolic expression. To put our viewpoint somewhat differently, language is primarily a pre-rational function. It humbly works up to the thought that is latent in, that may eventually be read into, its classifications and its forms; it is not, as is generally but naïvely assumed, the final label put upon, the finished thought.

常有人问：没有言语，思维还有可能吗？进一步说，言语和思维是不是同一个心理过程的两个方面？由于多个误解的遮蔽，这个问题变得难上加难。首先，不妨指出，无论思维是否必须使用符号，即言语，语言流本身并不总是昭示着思维。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典型的语言成分标示一个概念。然而，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语言的用途总是或者主要是概念性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概念本身的关注并不如

我们对各种具体物件和特定关系的关注。例如，当我说“我今天早上早饭吃得不错”时，很显然，我并没有经过多少费力的思考，我想表达的无非是一段愉快的记忆，而我用习惯性的说法中规中矩地将它符号化地表达出来了而已。该句中的每个成分都定义了一个单独的概念或者概念关系或者二者的结合，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这个句子并没有什么概念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如同一台发电功率足以带动电梯的发电机，却几乎被专门用于给一个电门铃供电。这个类比乍看并无深意，其实不然。语言可被视为一架可以全面表现心理活动的乐器。语言的流动不仅与意识的内在内容的流动相平行，而且还在不同层面与后者相平行：从被具体意象主导的心理状态，到仅以抽象概念及其关系为注意力焦点的心理状态，后者通常被称为“推理”。因此，只有语言的外在形式是不变的；其内在意义，其心理价值或强度，都会因注意力或者心智的选择性关注而自由变化，当然，也会因心智的整体发展而变化。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思维可被定义为言语的最高的、潜在或者可能的内容，这些内容通过解读语言流中每个具有最充分的概念价值的成分而获得。由此可知：语言和思维在严格意义上并不重合。语言最多不过是在最高和最概括的符号表达层面上的思维的外表。从一个稍稍不同的角度来说，语言主要是一种前理性的功能。它谦卑地努力接近潜藏于——而且最终可能被解读出的——其分类和形式里的思维；它不是贴在成品思维上的最终的标签，如人们普遍然而却是天真地假想的那样。

Most people, asked if they can think without speech, would probably answer, “Yes, but it is not easy for me to do so. Still I know it can be done.” Language is but a garment! But what if language is not so much a garment as a prepared road or groove? It is, indeed, in the highest degree likely that language is an instrument originally put to uses lower than the conceptual plane and that thought arises as a refined interpretation of its content. The product grows, in other words, with the instrument, and thought may be no more conceivable, in its genesis and daily

practice, without speech than is mathematical reasoning practicable without the lever of an appropriate mathematical symbolism. No one believes that even the most difficult mathematical proposition is inherently dependent on an arbitrary set of symbols,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suppose that the human mind is capable of arriving at or holding such a proposition without the symbolism. The writer, for one, is strongly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feeling entertained by so many that they can think, or even reason, without language is an illusion. The illusion seems to be due to a number of factors. The simplest of these is the failur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imagery and thought. As a matter of fact, no sooner do we try to put an image into conscious relation with another than we find ourselves slipping into a silent flow of words. Thought may be a natural domain apart from the artificial one of speech, but speech would seem to be the only road we know of that leads to it. A still more fruitful source of the illusive feeling that language may be dispensed with in thought is the common failure to realize that language is not identical with its auditory symbolism. The auditory symbolism may be replaced, point for point, by a motor or by a visual symbolism (many people can read, for instance, in a purely visual sense, that is, without the intermediating link of an inner flow of the auditory images that correspond to the printed or written words) or by still other, more subtle and elusive, types of transfer that are not so easy to define. Hence the contention that one thinks without language merely because he is not aware of a coexisting auditory imagery is very far indeed from being a valid one. One may go so far as to suspect that the symbolic expression of thought may in some cases run along outside the fringe of the conscious mind, so that the feeling of a free, nonlinguistic stream of thought is for minds of a certain type a relatively, but only a relatively, justified one. Psycho—physically, this would mean that the auditory or equivalent visual or motor centers in the brain, together with the appropriate paths of

association, that are the cerebral equivalent of speech, are touched off so lightly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ought as not to rise into consciousness at all. This would be a limiting case—thought riding lightly on the submerged crests of speech, instead of jogging along with it, hand in hand. The modern psychology has shown us how powerfully symbolism is at work in the unconscious mind. It is therefore easier to understand at the present time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twenty years ago that the most rarefied thought may be but the conscious counterpart of an unconscious linguistic symbolism.

多数人在被问到是否可以不用言语进行思考时，可能会这样回答："可以，但是这么做不太容易，不过我觉得还是能做到。"在他们看来语言仅仅是一件衣服！但是，如果语言并不是一件衣服，而是更像一条备好的道路或者沟渠呢？实际上，最可能的情况也许是，语言是一种原本在概念层面之下被使用的工具，而思维源自对语言内容的精细解读。换句话说，产品随着工具的改善而改善；没有言语，思维的产生和日常应用是不可想象的，就像没有适当的数学符号作为工具就无法进行数学推理一样。没有人相信即使最艰深的数学命题在本质上也要依赖一组任意的符号，但是无法设想人的心智能在没有符号体系的情况下得出或者持有这样的命题。就本书作者而言，我深以为很多人觉得自己可以不使用语言来进行思考甚至推理不过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似乎由数个因素导致。其中最简单的一个是没能区分意象和思维。事实上，在我们力图使一个意象与另一个意象产生有意识的关系时，会即刻发现自己无声地说出了一连串的词。思维可能是一个自然领域，有别于言语所属的人工领域，但是言语似乎是我们所知的通往思维的唯一途径。另一个更能让人产生"思维无需语言"这一幻觉的因素是人们一般不会认识到语言并不等同于它的听觉符号体系。听觉符号可能被运动或者视觉符号逐一替换（例如，很多人可以在纯粹的视觉意义上进行阅读，即无需与印刷文字或手写文字对应的一连串的内在的听觉意象作为中间环节），或者被更微妙而且难以捉摸、难以

界定的其他迁移方式替换。因此，仅仅因为一个人没有意识到进行思考时有声音意象与思维共存，就认为可以不用语言进行思考，那是大谬不然的。有人甚至可能怀疑思维的符号性表达在某些情况下会跑到意识的边缘之外，所以对某种类型的心智而言，感觉存在一种自由的、非语言的思维流倒是相对说得通的，但也只是相对而已。在心理-物理方面，这意味着言语在大脑中的相应区域，即大脑中的听觉中枢或者相应的视觉或运动中枢，以及适宜的联系路径，在思维过程中受到的触动非常之轻微，以至于根本没有进入意识。这可能是一个极限的情况——思维轻轻地骑在隐现的言语的背脊上，而不是与言语手拉着手一起缓缓向前。现代心理学已经告诉我们符号在无意识心理中的作用是多么强大。因此，与二十年前相比，今天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一点，即最精妙的思维可能也只是无意识的语言符号的有意识的对应物。

One word more as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thought. The point of view that we have developed does not by any means pre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growth of speech being in a high degree depend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We may assume that language arose pre-rationally—just how and on what precise level of mental activity we do not know—but we must not imagine that a highly developed system of speech symbols worked itself out before the genesis of distinct concepts and of thinking, the handling of concepts. We must rather imagine that thought processes set in, as a kind of psychic overflow, almost at the beginning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 further, that the concept, once defined, necessarily reacted on the life of its linguistic symbol, encouraging further linguistic growth. We see this complex proces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thought actually taking place under our eyes. The instrument makes possible the product, the product refines the instrument. The birth of a new concept is invariably foreshadowed by a more or less strained or extended use

of old linguistic material; the concept does not attain to individual and independent life until it has found a distinctive linguistic embodiment. In most cases the new symbol is but a thing wrought from linguistic material already in existence in ways mapped out by crushingly despotic precedents. As soon as the word is at hand, we instinctively feel, with something of a sigh of relief, that the concept is ours for the handling. Not until we own the symbol do we feel that we hold a key to the immediate knowledge o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Would we be so ready to die for “liberty,” to struggle for “ideals,” if the words themselves were not ringing within us? And the word, as we know, is not only a key; it may also be a fetter.

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我想再多说几句。我们上面阐述的观点绝对不是想排除言语的发展高度依赖思维的发展这一可能性。我们可以假定语言先于理性出现——至于以何种方式并具体在何种心理活动层面上出现我们并不知晓——但是我们不应该想象一个高度发达的言语符号系统是在明确的概念和处理概念的思维出现之前就独立生发出来了。我们更应该这样设想：几乎在语言表达刚出现时，思维过程作为一种心理外溢就参与进来了；而且，一个概念一旦被界定，必然会反过来影响其语言符号的生命，促成进一步的语言增长。我们看到这一语言和思维互动的复杂过程就切实地发生在我们眼前。工具即语言使产品即思维成为可能，产品又使工具得以改良。一个新概念产生之前，无一例外会有对旧的语言材料多少有些牵强或延展的使用；这个概念在找到一个独有的语言体现之后才能获得个体的、独立的生命。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新的语言符号不过是按照老规矩所勾勒的严苛范式，从已有的语言材料中锻造出来的一个东西。手里一旦握有一个词，我们就好像松了一口气，本能地感到它所承载的概念可以为我们所用了。直到拥有了符号，我们才会感觉已经掌握了直接认识或理解其所承载的概念的钥匙。比如，如果“自由”和“理想”这样的词语本身不在我们内心回响，我们会愿意为自由而死，为理想而抗争么？而词语，我们都知道，不仅是钥匙；它还可以是桎梏。

Language is primarily an auditory system of symbols. In so far as it is articulated it is also a motor system, but the motor aspect of speech is clearly secondary to the auditory. In normal individuals the impulse to speech first takes effect in the sphere of auditory imagery and is then transmitted to the motor nerves that control the organs of speech. The motor processes and the accompanying motor feelings are not, however, the end, the final resting point. They are merely a means and a control leading to auditory perception in both speaker and hearer. Communication, which is the very object of speech, is successfully effected only when the hearer's auditory perceptions are translated into the appropriate and intended flow of imagery or thought or both combined. Hence the cycle of speech, in so far as we may look upon it as a purely external instrument, begins and ends in the realm of sounds. The concordance between the initial auditory imagery and the final auditory perceptions is the social seal or warrant of the successful issue of the process.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the typical course of this process may undergo endless modifications or transfers into equivalent systems without thereby losing its essential formal characteristics.

语言从根本上是一个听觉符号系统。它是说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个运动系统，但是与其听觉性相比，言语的运动性显然是次要的。对正常人来说，说话的冲动首先发生在听觉意象范围，然后才传输至控制言语器官的运动神经。但是，运动过程和相伴的运动感觉并非终点，也并非最后停止的地方。它们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操控装置，会引起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听觉感知。交流，作为言语的目的，只有当听话人的听觉感知转换为恰当的、预期的意象流或思维流或二者兼有时，才得以成功实现。因此，若我们把言语视为一种纯粹的外在工具，那么它循环的起始和终结都发生在声音领域。最初的听觉意象和最终的听觉感知之间的一致是这一过程成功完成的社会印鉴或保

证。如我们所见，这一过程的典型路径可能经历无数的修改，或者迁移至相应的系统，但不会因此失去其根本的形式特征。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modifications is the abbreviation of the speech process involved in thinking. This has doubtless many forms,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al or functional peculiarities of the individual mind. The least modified form is that known as “talking to one's self” or “thinking aloud.” Here the speaker and the hearer are identified in a single person, who may be said to communicate with himself. More significant is the still further abbreviated form in which the sounds of speech are not articulated at all. To this belong all the varieties of silent speech and of normal thinking. The auditory centers alone may be excited; or the impulse to linguistic expression may be communicated as well to the motor nerves that communicate with the organs of speech but be inhibited either in the muscles of these organs or at some point in the motor nerves themselves; or, possibly, the auditory centers may be only slightly, if at all, affected, the speech process manifesting itself directly in the motor sphere. There must be still other types of abbreviation. How common is the excitation of the motor nerves in silent speech, in which no audible or visible articulations result, is shown by the frequent experience of fatigue in the speech organs, particularly in the larynx, after unusually stimulating reading or intensive thinking.

在这些修改中，最重要的是思维所包括的言语过程的紧缩。根据个体心理的结构或功能特征，紧缩无疑有多种形式。修改最少的形式是所谓的“自言自语”或“有声思考”。在这种形式下，说话人和听话人是同一个人，可以说他是在和自己交流。更有意义的是被进一步紧缩的形式，其中的语音根本没有被发出。各种默语和正常思维都属于这

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可能只有听觉中枢被激发；或者语言表达的冲动也被传输至与言语器官交流的运动神经，但是却被抑制在这些器官的肌肉上，或者被抑制在运动神经本身的某个点上；还有可能听觉中枢只受到轻微的影响（假如有影响的话），言语过程自己直接进入了运动领域。肯定还有其他类型的紧缩。比如，在十分刺激的阅读或紧张的思考之后，言语器官，尤其是喉头，常常感到疲劳，默语中运动神经的激活有多么普遍，由此可见一斑，虽然默语不会产生任何听得见或看得到的发音效果。

All the modifications so far considered are directly patterned on the typical process of normal speech. Of very great interest and importance is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ferring the whole system of speech symbolism into other terms than those that are involved in the typical process. This process, as we have seen, is a matter of sounds and of movements intended to produce these sounds. The sense of vision is not brought into play. But let us suppose that one not only hears the articulated sounds but sees the articulations themselves as they are being executed by the speaker. Clearly, if one can only gain a sufficiently high degree of adroitness in perceiving these movements of the speech organs, the way is opened for a new type of speech symbolism—that in which the sound is replaced by the visual image of the articulations that correspond to the sound. This sort of system has no great value for most of us because we are already possessed of the auditory-motor system of which it is at best but an imperfect translation, not all the articulations being visible to the eye. However, it is well known what excellent use deaf-mutes can make of “reading from the lips” as a subsidiary method of apprehending speech.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visual speech symbolisms is, of course, that of the written or printed word, to which, on the motor side, corresponds the system of delicately adjusted movements which result in the writing or

typewriting or other graphic method of recording speech. The significant feature for our recognition in these new types of symbolism,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they are no longer a by-product of normal speech itself, is that each element (letter or written word) in the system corresponds to a specific element (sound or sound-group or spoken word) in the primary system. Written language is thus a point-to-point equivalence, to borrow a mathematical phrase, to its spoken counterpart. The written forms are secondary symbols of the spoken ones-symbols of symbols—yet so close is the correspondence that they may, not only in theory but in the actual practice of certain eye-readers and, possibly, in certain types of thinking, be entirely substituted for the spoken ones. Yet the auditory-motor associations are probably always latent at the least, that is, they are unconsciously brought into play. Even those who read and think without the slightest use of sound imagery are, at last analysis, dependent on it. They are merely handling the circulating medium, the money, of visual symbols as a convenient substitute for the economic goods and services of the fundamental auditory symbols.

至此，我们所探讨的所有修改都是直接以正常言语的典型过程为底版的。还有一种可能性很有意思也十分重要，即把整个言语符号系统迁移至言语的典型过程所不包括的其他方式里去。如前所述，这一典型过程只涉及声音和用来发出这些声音的运动。视觉并没有牵扯其中。但是，假设一个人不仅听到发出的声音，而且在说话人发音时看到了发音的过程。显然，只要他能足够熟练地感知言语器官的这些发音动作，那么通向一种新的言语符号系统的大门就被打开了——在这一新的符号系统中，声音被与其对应的发音动作的视觉形象所取代。这种系统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价值并不大，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听觉运动系统，而它即这种新系统最多只是对听觉-运动系统的不完美的翻译，因为不是所有的发音动作都是肉眼可见的。但是，众多周知，聋

哑人可以娴熟地使用“读唇术”，作为理解他人言语的辅助手段。当然，所有视觉言语符号中最重要的是手写或印刷的文字；在运动方面，与之对应的则是能完成手写或打字或其他记录言语的书写方法的精细调节的动作系统。在这些新型符号里，我们除了认识到它们不再是正常言语自身的副产品，还认识到一个重要特征，即新系统中的每个成分（字母或手写词语）都对应着原来系统即听觉运动系统中的特定成分（单音或音群或口说词语）。不妨借用一个数学术语：书面语言就是口头语言的点对点的对等物。书面形式是口头形式的二级符号——符号的符号——但是二者之间的一致性极高，以至于书面形式可以完全替代口头形式，不仅在理论上如此，在某些纯粹用眼睛阅读的读者的实践中，甚至可能在某些思维类型中，也是如此。不过，听觉-运动的联系大概至少总还是潜在的，也就是说它们总是潜意识地在发挥作用。如果穷根究底，即使是那些阅读和思考时丝毫不使用声音意象的人，也还是要依赖它即声音意象的。他们不过是将视觉符号当作流通媒介，即货币，方便地用它来替代基本听觉符号，即经济商品和服务。

The possibilities of linguistic transfer are practically unlimited. A familiar example is the Morse telegraph code, in which the letters of written speech are represented by a conventionally fixed sequence of longer or shorter ticks. Here the transfer takes place from the written word rather than directly from the sounds of spoken speech. The letter of the telegraph code is thus a symbol of a symbol of a symbol. It does not, of course, in the least follow that the skilled operator, in order to arrive at an understanding of a telegraphic message, needs to transpose the individual sequence of ticks into a visual image of the word before he experiences its normal auditory image. The precise method of reading off speech from the telegraphic communication undoubtedly varies widely with the individual. It is even conceivable, if not exactly likely, that certain operators may have learned to think directly, so far as the

purely conscious part of the process of thought is concerned, in terms of the tick—auditory symbolism or, if they happen to have a strong natural bent toward motor symbolism, in terms of the correlated tactile-motor symbolism developed in the sending of telegraphic messages.

语言迁移的可能性可以说是无限的。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是莫尔斯电码，该电码使用约定俗成的或长或短的滴答声序列来代表书面语中的字母。在这个例子中，迁移发生自书面文字，而不是直接来自口语的声音。因此，电码的字母就是符号的符号的符号。当然，这绝不是说娴熟的电报员为了理解一份电报的信息需要将一串串滴答声转换成相应词语的视觉形象才能感受它正常的听觉形象。从电报交流中读取言语的具体方法无疑会因人而有很大差异。甚至可以想象（虽然也许并非完全可能），对于思维过程中纯粹的有意识的部分而言，有些电报员可能已经学会使用滴答声-听觉符号之间的关联直接进行思考，或者，如果他们恰好天生就十分倾向于使用运动符号系统，还可能使用发报时形成的相应的触觉-运动符号系统直接进行思考。

Still another interesting group of transfers are the different gesture languages, developed for the use of deaf-mutes, of Trappist monks vowed to perpetual silence, or of communicating parties that are within seeing distance of each other but are out of earshot. Some of these systems are one-to-one equivalences of the normal system of speech; others, like military gesture-symbolism or the gesture language of the Plains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 (understood by tribes of mutually unintelligible forms of speech) are imperfect transfers, limiting themselves to the rendering of such grosser speech elements as are an imperative minimum under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In these latter systems, as in such still more imperfect symbolisms as those used at sea or in the woods, it may

be contended that language no longer properly plays a part but that the ideas are directly conveyed by an utterly unrelated symbolic process or by a quasi—instinctive imitativeness. Such an interpretation would be erroneous. The intelligibility of these vaguer symbolisms can hardly be due to anything but their automatic and silent translation into the terms of a fuller flow of speech.

还有一组有趣的迁移是各种不同的手语，包括为聋哑人使用而开发的手语，发誓永不说话的特拉普派修道士使用的手语，交流双方彼此能看见但是不能听见时使用的手语。在这些手语系统中，有些是正常言语系统的点对点的对等物；其他的，比如军队的手势符号或北美大草原印第安人的手语（为言语不通的部落所互晓），则是不完全迁移，仅限于表达一些比较粗俗的言语成分，比如困难环境下的最低的迫切需求的表达。有人可能会说，在后几种系统中，就如在海上或森林里使用的更不完全的符号系统中一样，语言已不再发挥应有的作用，思想通过一个完全不相关的符号过程或者一种半本能的模仿被直接传递。这种解释未免错谬。这些较为模糊的符号系统之所以能被理解，不是因为别的，恰恰是因为它们能够被自动地、无声地翻译成更完整的言语流形式。

We shall no doubt conclude that all voluntary communication of ideas, aside from normal speech, is either a transfer, direct or indirect, from the typical symbolism of language as spoken and heard or, at the least, involves the intermediary of truly linguistic symbolism. This is a fact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Auditory imagery and the correlated motor imagery leading to articulation are, by whatever devious ways we follow the process, the historic fountain—head of all speech and of all thinking. One other point is of still greater importance. The ease with which speech symbolism

can be transferred from one sense to another, from technique to technique, itself indicates that the mere sounds of speech are not the essential fact of language, which lies rather in the classification, in the formal patterning, and in the relating of concepts. Once more, language, as a structure, is on its inner face the mold of thought. It is this abstracted language, rather more than the physical facts of speech, that is to concern us in our inquiry.

我们无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除了正常的言语之外，所有自发的思想的交流都要么是口说耳闻的语言的典型符号的直接或间接迁移，要么起码会用到真正的语言符号作媒介。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促成发音的听觉意象和相应的运动意象，无论我们采用何种曲折的方式追溯这一过程，都是所有言语和所有思维的历史源头。还有一点更加重要。言语符号可以很容易地在不同感官、不同表达方式之间迁移，这本身说明，单纯的语音并不是语言的本质内容，语言的本质更在于概念的分类，在于概念的形式构造，在于概念之间的关系。再说一遍，语言，作为一种结构，就其内在而言是思维的模具。我们要探讨的正是这种抽象出来的语言，而不是言语的物理事实。

There is no more striking general fact about language than its universality. One may argue as to whether a particular tribe engages in activities that are worthy of the name of religion or of art, but we know of no people that is not possessed of a fully developed language. The lowliest South African Bushman speaks in the forms of a rich symbolic system that is in essence perfectly comparable to the speech of the cultivated Frenchman.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more abstract concepts are not nearly so plentifully represente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avage, nor is there the rich terminology and the finer definition of nuances that reflect the higher culture. Yet the sort of linguistic development that

parallels the historic growth of culture and which, in its later stages, we associate with literature is, at best, but a superficial thing. The fundamental groundwork of language—the development of a clear—cut phonetic system, the specific association of speech elements with concepts, and the delicate provision for the formal expression of all manner of relations—all this meets us rigidly perfected and systematized in every language known to us. Many primitive languages have a formal richness, a latent luxuriance of expression, that eclipses anything known to the language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Even in the mere matter of the inventory of speech the layman must be prepared for strange surprises. Popular statements as to the extreme poverty of expression to which primitive languages are doomed are simply myths. Scarcely less impressive than the universality of speech is its almost incredible diversity. Those of us that have studied French or German, or, better yet, Latin or Greek, know in what varied forms a thought may run. The formal divergences between the English plan and the Latin plan, however, are comparatively slight in the perspective of what we know of more exotic linguistic patterns. The universality and the diversity of speech lead to a significant inference. We are forced to believe that language is an immensely ancient heritage of the human race, whether or not all forms of speech are the historical outgrowth of a single pristine form. It is doubtful if any other cultural asset of man, be it the art of drilling for fire or of chipping stone, may lay claim to a greater age. I am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it antedated even the lowliest developments of material culture, that these developments, in fact, were not strictly possible until language, the tool of significant expression, had itself taken shape.

关于语言的最引人注目的一般事实莫过于它的普遍性。对于某个特定部落是否从事能称得上宗教或艺术的活动，有人可能会有异议，

但是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不具备一种充分发展的语言。最原始的南非布须曼族所说的言语即是一个丰富的符号系统，在本质上完全可以与文雅的法兰西人的言语媲美。不用说，蛮族的语言对较为抽象的概念的表征不那么充分，也没有丰富的术语以及对反映高雅文化的种种细微差别的精细界定。但是，与文化的历史进程相平行且在后期与文学挂钩的那种语言发展，充其量只是一种表象的东西。语言的根本基础——清楚的语音系统的发展，言语成分与概念之间的特定联系，以及对所有关系种类的形式表达的精细准备——在我们已知的所有语言中都已高度固定化和系统化。很多原始语言拥有丰富的形式和丰饶的表达潜力，令所有现代文明的语言都黯然失色。即使只开列一个言语的清单，也会让外行人大吃一惊。通俗的观点认为原始语言的表达肯定是极为贫乏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言语的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也是惊人的，并不次于它的普遍性。我们当中学过法语或德语的人，或者更好一些学过拉丁语或希腊语的人，都会知道同一个想法可以有多少种不同的表达形式。不过，相对于我们所知的更陌生的言语模式，英语的章法和拉丁语的章法在形式上的差异其实是比较细微的。言语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引出了一个重要的推论。我们不得不相信，无论所有的言语形式是否都从一个单一的原始形式经历史发展而来，语言都是人类极其古老的一份遗产。人类的其他文化遗产，比如钻木取火或者削凿石器的技艺，是否比语言更古老，颇可怀疑。我倾向于相信，语言甚至比最低等的物质文化还要古老；事实上，在语言这种重要的表达工具形成以前，这些发展严格说来都是不可能的。

[3_1].译者注：cuckoo和kill-deer分别是英语中描述布谷鸟和北美小水鸟叫声的词。

[3_2].译者注：whippoorwill、mew和caw分别是模仿北美夜鹰、猫和乌鸦叫声的拟声词。

[3_3].译者注：英语动词laugh来源于古日耳曼语hlahhan，后者有拟声成分。

Chapter 2 The Elements of Speech

第二章　言语的成分

We have more than once referred to the “elements of speech,” by which we understood, roughly speaking, what are ordinarily called “words.” We must now look more closely at these elements and acquaint ourselves with the stuff of language. The very simplest element of speech—and by “speech” we shall hence—forth mean the auditory system of speech symbolism, the flow of spoken words—is the individual sound, though, as we shall see later on, the sound is not itself a simple structure but the resultant of a series of independent, yet closely correlated, adjustments in the organs of speech. And yet the individual sound is not, properly considered, an element of speech at all, for speech is a significant function and the sound as such has no significance. It happens occasionally that the single sound is an independently significant element (such as French *a* “has” and *à* “to” or Latin *i* “go!“), but such cases are fortuitous coincidences between individual sound and significant word. The coincidence is apt to be fortuitous not only in theory but in point of actual historic fact; thus, the instances cited are merely reduced forms of originally fuller phonetic groups—Latin *habet* and *ad* and Indo—European *ei* respectively. If language is a structure and if the significant elements of language are the bricks of the structure, then the sounds of speech can only be compared to the unformed and unburnt clay of which the bricks are fashioned. In this chapter we shall have nothing further to do with sounds as sounds.

此前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言语的成分”，粗略地讲，我们是把它们理解为通常所说的“词”。现在我们有必要更仔细地考察这些成分，以熟悉语言的素材。最简单的言语成分——自此我们所说的“言语”都是指言语符号的听觉系统，即说出来的词语流——是单个的声音；不过，之后我们会发现，声音本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构，而是言语器官中一系列独立但紧密相连的调节的结果。而且，确切地说，单个的声音根本不是言语的成分，因为言语是一种表意功能，而单音本身并没有意义。虽然单音偶尔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成分，比如法语中的*a*（第三人称单数的“有”）和*à*（介词“向”）或拉丁语中的*i*（“去！”），但是这些情况只是单音和有意义的词之间偶然的巧合。这种巧合不仅在理论上应属偶然，从史实的角度看也是如此；比如前面举的三个例子都不过是从原本更丰富的语音组简化而来的形式——它们分别来自拉丁语的*habet* 和*ad* 以及原始印欧语的*ei* 。如果把语言比作一栋大厦，把语言的有意义的成分比作这栋大厦的砖块，那么语音就只能被比作制造砖块用的没有成型、未经烧制的黏土。本章我们将不再就语音来论语音。

The true, significant elements of language are generally sequences of sounds that are either words, significant parts of words, or word groupings. What distinguishes each of these elements is that it is the outward sign of a specific idea, whether of a single concept or image or of a number of such concepts or images definitely connected into a whole. The single word may or may not be the simplest significant element we have to deal with. The English words *sing, sings, singing, singer* each conveys a perfectly definite and intelligible idea, though the idea is disconnected and is therefore functionally of no practical value. We recognize immediately that these words are of two sorts. The first word, *sing* , is an indivisible phonetic entity conveying the notion of a certain specific activity. The other words all involve the same fundamental notion but, owing to the addition of other phonetic elements, this

notion is given a particular twist that modifies or more closely defines it. They represent, in a sense, compounded concepts that have flowered from the fundamental one. We may, therefore, analyze the words *sings* , *singing* , and *singer* as binary expressions involving a fundamental concept, a concept of subject matter *(sing)* , and a further concept of more abstract order—one of person, number, time, condition, function, or of several of these combined.

语言中真正有意义的成分一般是声音的序列，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中有意义的部分或者词群。使这些成分区别于其他无意义的成分的是，每个成分都是一个特定观念的外在符号，这个观念可以是单个的概念或意象，也可以是数个这种概念或意象明确地连接而成的整体。单个的词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们要探讨的最简单的有意义的成分。英语词sing（唱）、sings（s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singing（sing的现在分词）和singer（歌唱者）各表达一个非常确定和明晰的观念，虽然该观念是分离的，因此在功能上没有实际价值。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几个词可以分为两类。第一个词sing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语音实体，表达的是某个特定行为的意念。另外三个词都包含同一个基本意念，但是由于添加了其他语音成分，这个意念被施以某种改变，被修饰或进一步限定。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代表从基本概念sing发展而来的复合概念。因此，我们可以把sings、singing和singer这几个词当作二重表达式来分析，它们包含一个基本概念，即关于主题（sing）的概念，还包含另一个抽象度更高的概念——即关于人称、数、时间、条件、功能或者这其中几者的结合体的概念。

If we symbolize such a term as *sing* by the algebraic formula A, we shall have to symbolize such terms as *sings* and *singer* by the formula A + b. [3_1] The element A may be either a complete and independent word *(sing)* or the fundamental substance, the so-called root or stem [3_2] or “radical element” *(sing-)* of a word. The element

b *(-s,-ing,-er)* is the indicator of a subsidiary and, as a rule, a more abstract concept; in the widest sense of the word "form," it puts upon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a formal limitation. We may term it a "grammatical element" or affix. As we shall see later on, the grammatical element or the grammatical increment, as we had better put it, need not be suffixed to the radical element. It may be a prefixed element (like the*un-* of*unsingable*), it may be inserted into the very body of the stem (like the *n* of the Latin *vinco* "I conquer" as contrasted with its absence in *vici* "I have conquered"), it may be the complete or partial repetition of the stem, or it may consist of some modification of the inner form of the stem (change of vowel, as in *sung* and *song* ; change of consonant as in *dead* and *death* ; change of accent; actual abbreviation).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se types of grammatical element or modification has this peculiarity, that it may not,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cases, be used independently but needs to be somehow attached to or welded with a radical element in order to convey an intelligible notion. We had better, therefore, modify our formula, A + b, to A + (b), the round brackets symbolizing the incapacity of an element to stand alone. The grammatical element, moreover, is not only non-existent except as associated with a radical one, it does not even, as a rule, obtain its measure of significance unless it is associated with a particular class of radical elements. Thus, the *-s* of English *he hits* symbolizes an utterly different notion from the *-s* of *books* , merely because *hit* and *book* are differently classified as to function. We must hasten to observe, however, that while the radical element may, on occasion, be identical with the word,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it may always, or even customarily, be used as a word. Thus, the *hort* — "garden" of such Latin forms as *hortus, horti,* and *horto* is as much of an abstraction, though one yielding a more easily apprehended significance, than the *-ing* of *singing* . Neither exists as an independently intelligible and satisfying element of speech. Both

the radical element, as such, and the grammatical element, therefore, are reached only by a process of abstraction. It seemed proper to symbolize *sing-er* as A + (b);*hort-us* must be symbolized as (A) + (b).

如果我们用代数公式A代表sing这样的词项，那么我们就必须用公式A + b来代表sings和singer这样的词项。[4_1] 成分A可能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词（比如sing），也可能是词的基本材质，即所谓的词根或词干[4_2] 或“根本成分”（比如sing-）。成分b（比如-s、-ing和-er）指示的是一个附加物，通常也是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在“形式”一词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它即成分b在基本概念之上添加了一个形式上的限制。我们可以称其为“语法成分”或词缀。之后我们会看到，语法成分，或者不如称作语法增量，不一定非得加在根本成分的后面。它可以是一个前置的成分（比如unsingable唱不出的中的un-），可以插入词干之中（比如拉丁语*vinco* “我征服”中的*n* ，与其形成对比，*n* 在*vici* “我已经征服”中就没有出现），可以是对词干的全部或部分重复，还可以包含词干内部形式的某种变异（元音的改变，比如sing的过去分词sung和song歌曲；辅音的改变，比如“死”的形容词dead和“死”的名词death；重音的改变；实际的省略）。这些类型的语法成分或变异中的每一类都有如下特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不能单独使用，而是必须以某种方式附加于一个根本成分之上或与之相结合，才能表达一个明晰的意念。因此，我们最好把公式A + b改为A +（b），圆括号表示其中的成分无法单独使用。进一步而言，语法成分不仅必须和根本成分相结合才能存在，而且一般来说，它甚至必须和某类根本成分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作用。比如，英语句子hehits（他击打）中的-s与books（多本书）中的-s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意念，而这只是因为hit（击打）和book（书）在功能上的分类不同。[4_3] 但是，这里我们有必要即刻指出，虽然一个词的根本成分有时可能与这个词相同，但并不能由此推衍说它总是，甚至不能说它通常可以被当作一个词来使用。比如，*hortus* 、*horti* 和*horto* 这几个拉丁语形式中的*hort-* “花园”虽然能产生比较容易理解的意义，但它和

英语词singing中的-ing是同样抽象的东西。二者皆不能作为一个可被独立理解的、令人满意的言语成分而存在。总之，根本成分就其自身而言和语法成分一样，都只能通过一个抽象过程而获得。sing-er用公式A＋（b）表示似乎是合适的，而*hort-us* 则必须用（A）＋（b）来表示。

So far, the first speech element that we have found which we can say actually “exists” is the word. Before defining the word, however, we must look a little more closely at the type of word that is illustrated by *sing* . Are we, after all, justified in identifying it with a radical element? Does it represent a simpl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oncept and linguistic expression? Is the element sing-, that we have abstracted from *sings* , *singing,* and *singer* and to which we may justly ascribe a general unmodified conceptual value, actually the same linguistic fact as the word *sing* ? It would almost seem absurd to doubt it, yet a little reflection only is needed to convince us that the doubt is entirely legitimate. The word *sing* cannot, as a matter of fact, be freely used to refer to its own conceptual content. The existence of such evidently related forms as *sang* and *sung* at once shows that it cannot refer to past time, but that, for at least an important part of its range of usage, it is limited to the pres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e of *sing* as an “infinitive” (in such locutions as *to sing* and *he will sing*) doe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 fairly strong tendency for the word *sing* to represent the full, untrammeled amplitude of a specific concept. Yet if *sing* were, in any adequate sense, the fixed expression of the unmodified concept, there should be no room for such vocalic aberrations as we find in *sang* and *sung* and *song* , nor should we find *sing* specifically used to indicate present time for all persons but one (third person singular *sings*).

至此，我们已发现的、可以说实际“存在”的第一个言语成分是词。但是在给词下定义之前，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sing所代表的词的类型。我们把它等同于一个根本成分，这说到底是否能站得住脚？它代表概念和语言表达之间一种简单的对应么？而且sing-这个成分是我们从sings、singing和singer中抽象出来的，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赋予它一个一般的、未经修改的概念值，但是它和sing这个词真的是一样的语言事实么？怀疑这一点几乎像是荒谬的，但是只需稍作思考我们就会相信，这种怀疑是完全合理的。事实上，sing这个词并不能被随意用于指示其自身的概念内容。sang（sing的过去式）和sung这类与sing明显相关的形式的存在即可说明，它即sing无法指示过去时，而是仅限于现在时，至少在它的使用范围的主要部分如此。另一方面，sing作为“不定式”的用法（比如to sing唱和he will sing他将唱这种表达式）又的确表明，该词有相当强烈的趋势指代一个特定概念的全部的、不受限的内容。可是，假如sing在任何充分的意义上可被视作一个未经修饰的概念的固定表达，那么就不应该有元音变异的空间了，比如sing变为sang、sung和song，而且sing也不会被专门用于指代除了一个人称（第三人称单数的sings）之外的所有人称的现在时了。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sing* is a kind of twilight word, trembling between the status of a true radical element and that of a modified word of the type of *singing* . Though it has no outward sign to indicate that it conveys more than a generalized idea, we do feel that there hangs about it a variable mist of added value. The formula A does not seem to represent it so well as A + (0). We might suspect *sing* of belonging to the A + (b) type, with the reservation that the (b) had vanished. This report of the “feel” of the word is far from fanciful, for historical evidence does, in all earnest, show that *sing* is in origin a number of quite distinct words, of type A + (b), that have pooled their separate values. The (b) of each of these has gone as a tangible phonetic element; its force,

however, lingers on in weakened measure. The *sing* of *I sing* is the correspondent of the Anglo-saxon*singe* ; the infinitive *sing* , of singan; the imperative *sing* of *sing* . Ever since the breakdown of English forms that set in about the time of the Norman Conquest, our language has been straining towards the creation of simple concept-words, unalloyed by formal connotations, but it has not yet succeeded in this, apart, possibly, from isolated adverbs and other elements of that sort. Were the typical unanalyzable word of the language truly a pure concept-word (type A) instead of being of a strangely transitional type (type A + [0]), our *sing* and *work* and *house* and thousands of others would compare with the genuine radical-words of numerous other languages. [3_3] Such a radical-word, to take a random example, is the Nootka [3_4] word *hamot* "bone." Our English correspondent is only superficially comparable. *Hamot* means "bone" in a quite indefinite sense; to our English word clings the notion of singularity. The Nootka Indian can convey the idea of plurality, in one of several ways, if he so desires, but he does not need to; *hamot* may do for either singular or plural, should no interest happen to attach to the distinction. As soon as we say "bone" (aside from its secondary usage to indicate material), we not merely specify the nature of the object but we imply, whether we will or no, that there is but one of these objects to be considered. And this increment of value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事情的真相是sing是一种朦胧的词，在真正的根本成分和singing之类的被修饰的词这两种身份之间闪烁不定。虽然没有外在迹象表明它表达的东西比一个一般化的观念要多，但是我们的确能感觉到有附加值像一团缥缈的薄雾围绕在它四周。用公式A来表征它似乎不如A +（0）。我们可以猜想sing属于A +（b）类型，只不过（b）已经消失了。我们在这里讨论关于词的"感觉"绝非异想天开，因为历史证据的确表明，sing最初是数个相对独立的A +（b）类型的词，它们后来把

各自的概念值汇聚到了一起。所有这些词的（b）部分作为一个有形的语音成分都已经消失了；而其语力却式微地残存下来。I sing（我唱）中的sing对应的是盎格鲁-撒克逊语的*singe*；不定式的sing对应的是盎格鲁-撒克逊语的*singan*；祈使形式的sing对应的是盎格鲁-撒克逊语的*sing*。英语形式的消解大约从诺曼征服[4_4]之时开始，至今我们的语言——即英语——一直朝着创造简单的、未掺杂形式涵义的概念-词的方向努力，但是大概除了个别的副词和其他的类似成分之外，迄今尚未成功。如果英语的典型的不可再分的词真的是单纯的概念-词（即A类），而不是奇怪的过渡类型（即A + 0类），那么我们的sing、work和house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词就可以与众多其他语言中的真正的根本词相比了[4_5]。不妨任举一例，努特卡语[4_6]中的*hamot* “bone”（骨）就是这样一个根本词。而相对应的英语词bone只是表面上与其具有可比性。*Hamot* 所表达的“骨”的意义是相当不确定的；而英语词bone则附着了单数的意念。努特卡族的印第安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使用几种方式之一表达复数的概念，但是他们并不需要这么做；如果说话人没有区分单复数的兴趣，那么*hamot* 既可以表示单数，也可以表示复数。而作为说英语者，我们只要一说bone（除了它指称材料的次要用法），就不仅在指明某个物体的性质，而且还在暗示只有一个这种物体，不管我们愿意与否。这点附加的价值造成了两种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

We now know of four distinct formal types of word: A (Nootka *hamot*); A + (0) (*sing, bone*); A + (b) (*singing*); (A) + (b) (Latin*hortus*). There is but one other type that is fundamentally possible: A + B, the union of two (or more) independently occurring radical elements into a single term. Such a word is the compound *fire-engine* or a Sioux form equivalent to *eat-stand* (i.e., “to eat while standing”). It frequently happens, however, that one of the radical elements becomes functionally so subordinated to the other that it takes on the character of a grammatical element. We may symbolize this by A + b, a type that may gradually, by loss of

ex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ubordinated element b and its independent counterpart B merge with the commoner type A + (b). A word like *beautiful* is an example of A + b, the -fulbarely preserving the impress of its lineage. A word like *homely* , on the other hand, is clearly of the type A + (b), for no one but a linguistic student is aware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y* and the independent word *like* .

现在我们知道了四种不同的词形：A（如努特卡语的*hamot* ）；A +（0）（如英语的sing、bone）；A +（b）（如英语的singing）；（A）+（b）（如拉丁语的*hortus* ）。除此之外，只有一种类型基本上是可能的：A + B，即两个（或多个）独立存在的根本成分结合为一个单一单位。复合词fireengine（救火车）或与eat-stand（即“站着吃”）对应的苏语形式都属此类。但是，常有这种情况：这些复合词的根本成分中的一个在功能上变得高度依附于另一个，以至于发展出语法成分的特征。我们可以用A + b来代表这种情况；由于附属成分b和其独立的对应物B之间外部联系的流失，这一类型可能逐渐与更常见的A +（b）类型合并。像beautiful（美丽的）这样的词就是A + b的例子，其中-ful（表示“充满……的”的后缀）勉强保留了其前身（即full“充满的”）的痕迹。而像homely（像家一样的）这样的词，则明显属于A +（b）类型，因为除了语言学者之外，不会有人知晓-ly（表示“像……一样”的后缀）和独立词like（像……一样）之间的联系。

In actual use, of course, these five (or six) fundamental types may be indefinitely complicated in a number of ways. The (0) may have a multiple value; in other words, the inherent formal modification of the basic notion of the word may affect more than one category. In such a Latin word as cor “heart,” for instance, not only is a concrete concept conveyed, but there cling to the form,

which is actually shorter than its own radical element (*cord* -), the three distinct, yet intertwined, formal concepts of singularity, gender classification (neuter), and case (subjective-objective). The complete grammatical formula for *cor* is, then, A + (0) + (0) + (0), though the merely external, phonetic formula would be (A)-, (A) indicating the abstracted “stem” *cord* -, the minus sign a loss of material. The significant thing about such a word as*cor* is that the three conceptual limitations are not merely expressed by implication as the word sinks into place in a sentence; they are tied up, for good and all, within the very vitals of the word and cannot be eliminated by any possibility of usage.

当然，在实际使用中，这五种（或六种）基本类型可以多种方式变得无限复杂。比如，（0）这一成分可以拥有多重价值；换言之，A ＋（0）型词的基本意念的固有形式改变可能涉及不止一个范畴。例如，*cor* “心”这样一个拉丁语词不但表达了一个具体概念，而且有三个独立而又相互交织的形式概念附着于这个形式之上，即单数、性别（中性）和格（主格-宾格），尽管它实际上比其根本成分（*cord-* ）要短。这样一来，*cor* 的完整的语法公式就应该是A＋（0）＋（0）＋（0），虽然它的纯外在的语音公式是（A）-，其中（A）代表的是抽象出来的“词干”*cord-* ，负号代表内容的流失。对于*cor* 这样的词，重要的一点是，那三个概念性的限制不是只有在这个词出现在句子中时才被含蓄地表达出来；它们是被永久地固结于这个词的脏腑，任何可能的用法都无法将其去除。

Other complications result from a manifolding of parts. In a given word there may be several elements of the order A (we have already symbolized this by the type A + B), of the order (A), of the order b, and of the order (b). Finally, the various types may be combined among themselves in endless ways. A comparatively

simple language like English, or even Latin, illustrates but a modest proportion of these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But if we take our examples freely from the vast storehouse of language, from languages exotic as well as from those that we are more familiar with, we shall find that there is hardly a possibility that is not realized in actual usage. One example will do for thousands, one complex type for hundreds of possible types. I select it from Paiute, the language of the Indians of the arid plateaus of southwestern Utah. The word *wii-to-kuchum-punku-rügani-yugwi-va-ntü-m(ü*) [3_5] is of unusual length even for its own language, but it is no psychological monster for all that. It means "they who are going to sit and cut up with a knife a black cow (*or* bull)," or, in the order of the Indian elements, "knife-black-buffalo-pet-cut up-sit(plur.)-future-participle-animate plur." The formula for this word, in accordance with our symbolism, would be (F) + (E) + C + d + A + B + (g) + (h) + (i) + (0). It is the plural of the future participle of a compound verb "to sit and cut up" -A + B. The elements (g)-which denotes futurity-, (h)-a participial suffix-, and (i)-indicating the animate plural—are grammatical elements which convey nothing when detached. The formula (0) is intended to imply that the finished word conveys, in addition to what is definitely expressed, a further relational idea, that of subjectivity; in other words, the form can only be used as the subject of a sentence, not in an objective or other syntactic relation. The radical element A ("to cut up"), before entering into combination with the coordinate element B ("to sit"), is itself compounded with two nominal elements or element-groups—an instrumentally used stem (F) ("knife"), which may be freely used as the radical element of noun forms but cannot be employed as an absolute noun in its given form, and an objectively used group—(E) + C + d ("black cow or bull"). This group in turn consists of an adjectival radical element (E) ("black"), which cannot be independently employed (the

absolute notion of “black” can be rendered only as the participle of a verb: “black—be-ing”), and the compound noun C + d (“buffalo-pet”). The radical element C properly means “buffalo,” but the element d, properly an independently occurring noun meaning “horse” (originally “dog” or “domesticated animal” in general), is regularly used as a quasi-subordinate element indicating that the animal denoted by the stem to which it is affixed is owned by a human being. It will be observed that the whole complex (F) + (E) + C + d + A + B is functionally no more than a verbal base, corresponding to the *sing-* of an English form like *singing* ; that this complex remains verbal in force on the addition of the temporal element (g)—this (g), by the way, must not be understood as appended to B alone, but to the whole basic complex as a unit-; and that the elements (h) + (i) + (0) transform the verbal expression into a formally well-defined noun.

其他的复杂状态产生于各部分的重复。在一个词中，可能有数个A级成分（我们此前已将其表示为A + B型），数个（A）级成分，数个b级成分，以及数个（b）级成分。最后，各种类型可能以无限的方式互相组合。像英语这样相对简单的语言，甚或拉丁语，只体现了这些理论上的组合可能性中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从巨大的语言仓库中随意抽取例子——既有来自陌生语言的，也有来自我们较为熟悉的语言的——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种可能性未曾在实际应用中被实现。举一例即可抵数千例，举一个复杂类型即可抵数百种可能的类型。我从派尤特语（犹他州西南部干旱高原上的印第安人的语言）中选了这样一个例子。*wii-to-kuchum-punku-rügani-yugwi-va-ntü-m*（*ü*） 一词 [4_7] 的长度甚至在派尤特语中也很罕见，不过它倒并没有因此成为人们心理上难以接受的怪物。它的意思是“将要坐着用刀子切割一头黑色母牛（或公牛）的他们”，或者，按照印第安语成分的顺序，“刀子-黑色的-野牛-家养-切碎-坐（复数）-将来-分词-有生命复数”。根据我们的符号系统，这个词的公式应该是（F）+（E）+C

+ d + A + B + （g）+（h）+（i）+（0）。这是一个A + B型复合动词“坐着切碎”的将来时分词的复数形式。指示将来时的成分（g），分词后缀（h）和表示有生命的复数的（i）都是孤立状态下不表达任何意义的语法成分。成分（0）旨在暗指整个词除了传达明确表达的意思之外，还传达另一个关系性的观念，即主语性；换言之，该词的这个形式只能用作句子的主语，不能用于宾格或其他句法关系。根本成分A（切碎）在与并列成分B（坐）组合之前，本身已经与两个名词成分或成分组相结合——一个是用作工具格的词干（F）（刀子），这个词干可以作为名词形式的根本成分自由使用，但是不能以其在此例中的给定形式用作绝对名词；另一个是用作宾格的成分组——（E）+ C + d（黑色的母牛或公牛）。这一成分组又包括一个形容词根本成分（E）（黑色的）——这个（E）是无法独立使用的（black“黑色的”的绝对概念只能用动词的分词来表示：black-be-ing是黑色的）——和一个复合名词C + d（野牛-家养）。根本成分C的准确意思为“野牛”，而成分d虽然完全可以作为名词独立出现，意为“马”（本来泛指“狗”或“家畜”），但一般用作准从属成分，表示其附着的词根所指的动物归某人所有。这里不妨指出：（F）+（E）+ C + d + A + B这整个复合体在功能上只不过是一个动词词基，对应于像singing这样的英语词中的sing-；这个复合体在加上了时间因素（g）之后在表达力上仍然是动词性的——顺便说一句，这个（g）不能理解为单独附着于B，而是附着于整个基本复合体；（h）+（i）+（0）这几个成分则将这个动词性的表达转变为一个形式上明确界定的名词。

It is high time that we decided just what is meant by a word. Our first impulse, no doubt, would have been to define the word as the symbolic, linguistic counterpart of a single concept. We now know that such a definition is impossible. In truth it is impossible to define the word from a functional standpoint at all, for the word may be anything from the expression of a single concept-concrete or abstract or purely relational (as in *of* or *by* or *and*)—to the

expression of a complete thought (as in Latin *dico* “I say” or, with greater elaborateness of form, in a Nootka verb form denoting “I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eat twenty round objects [e.g., apples] while engaged in [doing so and so]“). In the latter case the word becomes identical with the sentence. The word is merely a form, a definitely molded entity that takes in as much or as little of the conceptual material of the whole thought as the genius of the language cares to allow. Thus it is that while the single radical elements and grammatical elements, the carriers of isolated concepts, are comparable as we pass from language to language, the finished words are not. Radical (or grammatical) element and sentence—these are the primary *functional* units of speech, the former as an abstracted minimum, the latter as the esthetically satisfying embodiment of a unified thought. The actual *formal* units of speech, the words, may on occasion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either of the two functional units; more often they mediate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embodying one or more radical notions and also one or more subsidiary ones. We may put the whole matter in a nutshell by saying that the radical and grammatical elements of language, abstracted as they are from the realities of speech, respond to the conceptual world of science, abstracted as it is from the realities of experience, and that the word, the existent unit of living speech, responds to the unit of actually apprehended experience, of history, of art. The sentence is the logical counterpart of the complete thought only if it be felt as made up of the radical and grammatical elements that lurk in the recesses of its words. It is the psychological counterpart of experience, of art, when it is felt, as indeed it normally is, as the finished play of word with word. As the necessity of defining thought solely and exclusively for its own sake becomes more urgent, the word becomes increasingly irrelevant as a means. We can therefore easily understand why the mathematician and the symbolic logician are driven to discard the

word and to build up their thought with the help of symbols which have, each of them, a rigidly unitary value.

现在是确定词是什么的时候了。不用说，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是把词定义为一个概念的符号性的语言对应物。不过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定义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根本不可能从功能的角度给词下定义，因为词的范围很广，小到一个概念的表达——具体的、抽象的或纯关系性的（比如of、by或and）——大到一个完整想法的表达（比如拉丁语的*dico* “我说”，或者形式更复杂的努特卡语的一个动词形式，意思是“我已经习惯在忙着做某事时吃20个圆东西比如苹果”）。在后一个例子中，词变得和句子无异了。词只是一个形式，一个被明确模铸的实体，在语言特征允许的范围内，或者多或者少地包容进整个想法的概念材质。因此，虽然单个的根本成分和语法成分，作为孤立概念的载体，在不同语言之间是可比的，但是成形的词却不然。根本成分（或语法成分）和句子——这些是言语中主要的功能性单位，前者是抽象出来的最小单位，后者是一个统一的思想的美满体现。言语实际的形式性单位，即词，有时可能与上述两种功能性单位之一相等同；但是在更多情况下，词这两个极端——即上述两种功能性单位——之间斡旋，体现一个或几个根本概念，以及一个或几个辅助概念。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这一现象：从言语事实中抽象出来的语言的根本成分和语法成分，对应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科学的概念世界；而词作为活的言语的存在单位，对应实际感受到的经验的单位，历史的单位，艺术的单位。而句子，只有当我们感觉它是由深藏在词的内部的根本成分和语法成分构成之时，才是一个完整思想的逻辑对应物。但是一般而言，我们的确感觉句子就是由词和词构成的成品，这样理解的句子是经验和艺术的心理对应物。随着单独地、专门地界定思维本身的必要性变得越来越迫切，词作为一种手段就越发不相干。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数学家和数理逻辑学家都被迫放弃了词，转而借助各自具有严格的单一概念价值的符号来构建他们的思维。

But is not the word, one may object, as much of an abstraction as the radical element? Is it not as arbitrarily lifted out of the living sentence as is the minimum conceptual element out of the word? Some students of language have, indeed, looked upon the word as such an abstraction, though with very doubtful warrant, it seems to me. It is true that in particular cases, especially in some of the highly synthetic languages of aboriginal America, 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say whether a particular element of language is to be interpreted as an independent word or as part of a larger word. These transitional cases, puzzling as they may be on occasion, do not, however, materially weaken the case for the psychological validity of the word. Linguistic experience, both as expressed in standardized, written form and as tested in daily usage, indicates overwhelmingly that there is not, as a rule, the slightest difficulty in bringing the word to consciousness as a psychological reality. No more convincing test could be desired than this, that the naïve Indian, quite unaccustomed to the concept of the written word, has nevertheless no serious difficulty in dictating a text to a linguistic student word by word; he tends, of course, to run his words together as in actual speech, but if he is called to a halt and is made to understand what is desired, he can readily isolate the words as such, repeating them as units. He regularly refuses, on the other hand, to isolate the radical or grammatical element, on the ground that it “makes no sense.“ [3_6] What, then, is the objective criterion of the word? The speaker and hearer feel the word, let us grant, but how shall we justify their feeling? If function is not the ultimate criterion of the word, what is?

但是，有人可能会反驳，难道词不是和根本成分一样的抽象物吗？难道词不是从鲜活的句子中人为提取出来，就像最小概念成分是从词中人为提取出来的一样吗？的确，有些语言学者是将词视为这样

的抽象物的，不过在我看来，理由相当不可靠。诚然，在某些特定情形下，特别是在美洲原住民的一些高度综合的语言中，判断某个特定的语言成分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独立的词还是一个更大的词的一部分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然而此类过渡性的例子，虽然有时令人费解，但是并没有从实质上削弱词的心理真实性。语言经验，无论是以标准的书面形式表达的，还是日常使用中体验到的，都充分表明，人们通常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词作为一个心理现实带入意识。对此，没有比下面的试验更令人信服的了：一个相当不熟悉书面词概念的质朴的印第安人，却可以不费多大力气地把一段话一个词一个词地口述给语言学者；当然，他倾向于像正常讲话时那样把词连在一起说出来，但是如果让他停下来，如果让他明白学者需要他做的是什么，他是可以轻松地按照要求将每个词分离出来，将它们当作一个个的单位重复出来的。但是，他通常会拒绝将根本成分或者语法成分分离出来，因为那样“讲不通”。 [4_8] 那么，词的客观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妨认定说话人和听话人都感觉到了词，可是我们该如何证实这种感觉呢？如果功能不是词的最终标准，那么什么才是呢？

It is easier to ask the question than to answer it.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is to say that the word is one of the smallest, completely satisfying bits of isolated “meaning” into which the sentence resolves itself. It cannot be cut into without a disturbance of meaning, one or the other or both of the severed parts remaining as a helpless waif on our hands. In practice this unpretentious criterion does better service than might be supposed. In such a sentence as*It is unthinkable* , it is simply impossible to group the elements into any other and smaller “words” than the three indicated. *Think* or *thinkable* might be isolated, but as neither *un-* nor-ablenor *isun-* yields a measurable satisfaction, we are compelled to leave *unthinkable* as an integral whole, a miniature bit of art. Added to the “feel” of the word are frequently, but by no means invariably, certain external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Chief of these is accent. In

many, perhaps in most, languages the single word is marked by a unifying accent, an emphasis on one of the syllables, to which the rest are subordinated. The particular syllable that is to be so distinguished is dependent, needless to say, on the special genius of the language. The importance of accent as a unifying feature of the word is obvious in such English examples as *unthinkable, characterizing* . The long Paiute word that we have analyzed is marked as a rigid phonetic unit by several features, chief of which are the accent on its second syllable (*wii'* -“knife”) and the slurring (“unvoicing,” to use the technical phonetic term) of its final vowel *(-mü* , animate plural). Such features as accent, cadence, and the treatment of consonants and vowels within the body of a word are often useful as aids in the external demarcation of the word, but they must by no means be interpreted, as is sometimes done, as themselves responsible for its psychological existence. They at best but strengthen a feeling of unity that is already present on other grounds.

这个问题问起来容易，回答起来难。我们最多只能说词是最小的、令人完全满意的孤立的“意思”片段之一，是从句子分解而来的。词一旦再细分，其意思就势必会被扰乱，被切开的其中一部分或者另一部分或者两个部分都变成滞留我们手中的无助的流浪儿。事实上，这一朴素的标准是能派上出乎意料的大用场的。在It is unthinkable（这是不可想象的）这类句子中，我们只能分离出如句所示的这三个词，而根本不可能将各个成分再归为其他任何更小的“词”。Think（想）或者thinkable（可想象的）也许可以从unthinkable中分离出来，但是无论是un-，还是-able，还是isun-，都无法让人满意，所以我们只能把unthinkable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件缩微艺术品。某些外部的语音特征也经常强化人们对词的“感觉”，不过并非总是如此。其中主要的特征是重音。在许多语言中，也可能是在大多数语言中，单个的词是用一个统领全局的重音来

标记的，即对其中一个音节进行强调，其他音节从属于它。那个被如此突出的音节，不用说，取决于语言的具体特征。重音作为词的统领全局的特征，其重要性在诸如unthinkable（不可想象的）和characterizing（塑造……的形象）之类的英语词上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之前分析过的派尤特语的那个长词 [4_9] 由几个特征标示为一个固定的语音单位，其中主要的特征是第二个音节（*wii'*　，意思是“刀”）上的重音和最后一个元音（*-mü*　，表示有生命的复数）的模糊化（语音学的专业说法是“清音化”）。像重音、声调以及词内辅音和元音的安排等特征常常可以帮助我们划出一个词的外部边界，但是千万不能像有些人的做法那样，将词的心理存在解释为是依赖于这些特征。这些特征充其量只是加强了一种因其他因素业已存在的词的统一感。

We have already seen that the major functional unit of speech, the sentence, has, like the word, a psychological as well as a merely logical or abstracted existence. Its definition is not difficult. It is the linguistic expression of a proposition. It combines a subject of discourse with a statement in regard to this subject. Subject and “predicate” may be combined in a single word, as in Latin*dico* ; each may be expressed independently, as in the English equivalent, I *say* ; each or either may be so qualified as to lead to complex propositions of many sorts. No matter how many of these qualifying elements (words or functional parts of words) are introduced, the sentence does not lose its feeling of unity so long as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falls in place as contributory to the definition of either the subject of discourse or the core of the predicate [3_7] . Such a sentence as *The mayor of New York is going to deliver a speech of welcome in French* is readily felt as a unified statement, incapable of reduction by the transfer of certain of its elements, in their given form, to the preceding or following sentences. The contributory ideas of *of New York, of welcome,* and *in French* may be eliminated without hurting the idiomatic flow of the sentence. *The mayor is*

going to deliver a speech is a perfectly intelligible proposition. But further than this we cannot go in the process of reduction. We cannot say, for instance, *Mayor is going to deliver* . [3_8] The reduced sentence resolves itself into the subject of discourse—*the mayor* —and the predicate—*is going to deliver a speech* . It is customary to say that the true subject of such a sentence is *mayor* , the true predicate *is going* or even*is* , the other elements being strictly subordinate. Such an analysis, however, is purely schematic and is without psychological value. It is much better frankly to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either or both of the two terms of the sentence-proposition may be incapable of expression in the form of single words. There are languages that can convey all that is conveyed by *The -mayor is-going-to-deliver-a-speech* in two words, a subject word and a predicate word, but English is not so highly synthetic. The point that we are really making here is that underlying the finished sentence is a living sentence type, of fixed formal characteristics. These fixed types or actual sentence-groundworks may be freely overlaid by such additional matter as the speaker or writer cares to put on, but they are themselves as rigidly “given” by tradition as are the radical and grammatical elements abstracted from the finished word. New words may be consciously created from these fundamental elements on the analogy of old ones, but hardly new types of words. In the same way new sentences are being constantly created, but always on strictly traditional lines. The enlarged sentence, however, allows as a rule of considerable freedom in the handling of what may be called “unessential” parts. It is this margin of freedom which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of individual style.

如前所述，作为言语的主要功能单位，句子不仅具有纯粹逻辑的或抽象的存在感，而且，像词一样，具有心理存在感。为其下定义并不困难。句子就是一个命题的语言表达。它结合了话语的主题和就这

个主题所做的陈述。主题和“谓语”既可以结合成一个单词，如拉丁语的*dico*（我说）；也可以各自独立表达出来，如该拉丁语词对应的英语形式I say（我说）；主题和谓语二者或其一都可以被添加修饰成分，从而引发多种复杂命题。无论引入多少这样的修饰成分（词或者词的功能部分），只要每个成分都处于一定的位置，要么有助于限定话语的主题，要么有助于限定谓语的核心，句子就不会失去其统一感。[4_10] 比如，像The mayor of New York is going to deliver a speech of welcome in French（纽约市长将用法语致欢迎辞）这样的句子可以很自然地让人感到是一个整体的陈述，我们无法通过将其中一些成分原样迁移到之前或者之后的句子中来对其予以紧缩。of New York（纽约的）、of welcome（欢迎的）和in French（用法语）等辅助信息是可以被删掉的，而无损于句子的流畅和符合习惯。由此得到的The mayor is going to deliver a speech（市长将致辞）是一个完全可理解的命题。但是，我们在紧缩方面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比如，我们不能说Mayorisgoingtodeliver（无冠词市长将致）[4_11]。紧缩后的句子可分解为两部分，即话语的主题the mayor（市长）和谓语is going to deliver a speech（将致辞）。人们习惯上会说这样一句话的真正的主语是mayor（市长），真正的谓语是is going（将）甚或is，其他成分则处于严格的从属地位。但是这样的分析完全是图式性的，并不具有心理上的价值。更好的做法是坦率地承认如下事实：句子-命题这两项或者其中之一可能无法以单词的形式来表达。有的语言只用两个词就能表达The mayor is-going-to-deliver-a-speech（市长／将致辞）的全部意思，即一个主语词和一个谓语词，但英语没有如此高的综合性。我们在这里真正想陈述的一点是，在成品的句子背后是一个具有固定形式特征的鲜活的句子类型。人们说话或写作时可以往这些固定类型或者实际的句子-基层结构上随意覆盖额外的东西，但是它们——即固定类型——本身是由传统所严格“赋予”的，如同根本成分和语法成分是从成品的词中抽象出来的一样。人们可以比照旧词，利用这些基本成分有意识地创造新词，却很少能创造新类型。同样，人们在不断地创造出新句子，但是却始终严格地遵循传统路线。不过，扩展的句子则赋予了我们在处理所谓的“非核心”部分时相当多的自由。正是这点自由给了我们表现个人风格的机会。

The habitual association of radical elements, grammatical elements, words, and sentences with concepts or groups of concepts related into wholes is the fact itself of language.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re is in all languages a certain randomness of association. Thus, the idea of “hide” may be also expressed by the word “conceal,” the notion of “three times” also by “thrice.” The multiple expression of a single concept is universally felt as a source of linguistic strength and variety, not as a needless extravagance. More irksome is a random correspondence between idea and linguistic expression in the field of abstract and relational concepts, particularly when the concept is embodied in a grammatical element. Thus, the randomness of the expression of plurality in such words as *books, oxen, sheep,* and *geese* is felt to be rather more, I fancy, an unavoidable and traditional predicament than a welcome luxuriance. It is obvious that a language cannot go beyond a certain point in this randomness. Many languages go incredibly far in this respect, it is true, but linguistic history shows conclusively that sooner or later the less frequently occurring associations are ironed out at the expense of the more vital ones. In other words, all languages have an inherent tendency to economy of expression. Were this tendency entirely inoperative, there would be no grammar. The fact of grammar, a universal trait of language, is simply a generalized expression of the feeling that analogous concepts and relations are most conveniently symbolized in analogous forms. Were a language ever completely “grammatical,” it would be a perfect engine of conceptual expression. Unfortunately, or luckily, no language is tyrannically consistent. All grammars leak.

语言的本质其实就是根本成分、语法成分、词和句子与概念或者

概念组连成的整体之间的习惯性联合。需要注意的是在所有的语言中这种联合都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比如，hide（隐藏）的意思也可以用conceal这个词来表达，而three times（三次）的意思也可以用thrice来表达。用多种方式来表达一个概念，这被公认为语言的力量和多样性的来源，而不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比较讨厌的是在抽象概念和关系概念领域里思想和语言表达之间随意的对应关系，特别是用语法成分来体现概念的时候。因此，我猜想，体现在books（“书”book的复数）、oxen（“牛”ox的复数）、sheep（“羊”sheep的复数）和geese（“鹅”goose的复数）等词中的复数表达的随意性会叫人感到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传统窘境，而不是一种讨喜的丰富华美。很显然，语言的这种随意性不可能超越一定限度。许多语言在这方面确实已经走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但是语言的历史毫无争议地证明，各种不常见的组合迟早会消失，以让位于更有活力的组合。换言之，所有的语言都有一种追求表达简洁的内在趋势。如果这种趋势完全不起作用，就不会有语法了。语法，作为语言的普遍特点，其本质只是概括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感觉：用类似的形式表征类似的概念和关系是最便捷的。如果某种语言完全“合乎语法”，那么它将是一个完美的概念表达引擎。不幸的是，或者说，万幸的是，没有任何语言是专横地强求一致的。所有语法都有漏洞。

Up to the present we have been assuming that the material of language reflects merely the world of concepts and, on what I have ventured to call the “pre-rational” plane, of images, which are the raw material of concepts. We have, in other words, been assuming that language moves entirely in the ideational or cognitive sphere. It is time that we amplified the picture. The volitional aspect of consciousness also is to some extent explicitly provided for in language. Nearly all languages have special means for the expression of commands (in the imperative forms of the verb, for example) and of desires, unattained or unattainable (*Would he might come! or Would he were here* !) The emotions, on the whole, seem to

be given a less adequate outlet. Emotion, indeed, is proverbially inclined to speechlessness. Most, if not all, the interjections are to be put to the credit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also, it may be, a number of linguistic elements expressing certain modalities, such as dubitative or potential forms, which may be interpreted as reflecting the emotional states of hesitation or doubt—attenuated fear. On the whole,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ideation reigns supreme in language, that volition and emotion come in as distinctly secondary factors. This, after all, is perfectly intelligible. The world of image and concept, the endless and ever-shifting picture of objective reality, is the unavoidable subject-matter of human communication, for it is only, or mainly, in terms of this world that effective action is possible. Desire, purpose, emotion are the personal color of the objective world; they are applied privately by the individual soul and are of relatively little importance to the neighboring one. All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volition and emotion are not expressed. They are, strictly speaking, never absent from normal speech, but their expression is not of a truly linguistic nature. The nuances of emphasis, tone, and phrasing, the varying speed and continuity of utterance, the accompanying bodily movements, all these express something of the inner life of impulse and feeling, but as these means of expression are, at last analysis, but modified forms of the instinctive utterance that man shares with the lower animals, they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forming part of the essential cultural conception of language, however much they may be inseparable from its actual life. And this instinctive expression of volition and emotion is, for the most part, sufficient, often more than sufficient,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cation.

至此我们一直在假定语言的材料只反映概念世界以及意象世界——在我斗胆称之为意象的“前理性”层面上，而意象是概念的素材。

换言之，我们一直在假定语言完全是在观念或者认知的世界里游移。现在，我们该扩展这幅画面了。语言也在一定程度上明显地为意识的意志层面的表达提供了方便。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有特殊的手段来表达命令（例如，使用动词的祈使形式）以及没有实现的或者无法实现的愿望（例如，Would he might come!他要是能来多好哇！或者Would he were here!他要是在这儿多好哇！）。但整体而言，情感的表达则似乎没有这么充分的出口。当然，众所周知，情感往往是沉默不表的。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感叹词都应当记在情感表达的账上；此外，一些表达某种情态的语言成分也可以被视为情感表达，比如表示怀疑或者可能性的形式可被理解为反映犹豫或者疑虑的情感状态——即弱化的恐惧。总体而言，我们必须承认思维在语言中占有主宰地位，意志和情感显然只是次要因素。这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意象和概念的世界，作为客观现实的不断变换的图景，是人类的交流中不可避免的主题，因为只有在或者主要在这个世界里才可能存在有效的行为。欲望、目的和情感是客观世界的个人色彩；它们由个体的灵魂悄然支配，对周围的人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这并不是说人们不表达意志和情感。严格说来，正常的言语中从不缺失这两样东西，只是它们的表达并不是真正语言性的。轻重、语调和遣词方面的细微差别，变化的语速和说话的连续性，以及伴随的身体动作，所有这些都传达着说话者内心的某种冲动和感觉；但是如果穷根究底，这些表达手段只不过是人类和低等动物共有的本能呼喊的变形，所以无论它们与语言的实际生命多么密不可分，都不能在文化意义上被视为构成语言的关键部分。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意志和情感的本能表达足以实现甚至常常超出交流的目的。

There are, it is true, certain writers on 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 [3_9] who deny its prevailingly cognitive character but attempt, on the contrary, to demonstrate the origin of most linguistic elements within the domain of feeling. I confess that I am utterly unable to follow them. What there is of truth in their contentions may be summed up, it seems to me, by saying that most

words, like practically all elements of consciousness, have an associated feeling-tone, a mild, yet none the less real and at times insidiously powerful, derivative of pleasure or pain. This feeling-tone, however, is not as a rule an inherent value in the word itself; it is rather a sentimental growth on the word's true body, on its conceptual kernel. Not only may the feeling-tone change from one age to another (this, of course, is true of the conceptual content as well), but it varies remarkably from individual to individual according to the personal associations of each, varies, indeed, from time to time in a single individual's consciousness as his experiences mold him and his moods change. To be sure, there are socially accepted feeling-tones, or ranges of feeling-tone, for many words over and above the force of individual association, but they are exceedingly variable and elusive things at best. They rarely have the rigidity of the central, primary fact. We all grant, for instance, that *storm, tempest,* and *hurricane* , quite aside from their slight differences of actual meaning, have distinct feeling-tones, tones that are felt by all sensitive speakers and readers of English in a roughly equivalent fashion. *Storm* , we feel, is a more general and a decidedly less “magnificent” word than the other two; *tempest* is not only associated with the sea but is likely, in the minds of many, to have obtained a softened glamour from a specific association with Shakespeare's great play; *hurricane* has a greater forthrightness, a director ruthlessness than its synonyms. Yet the individual's feeling-tones for these words are likely to vary enormously. To some *tempest* and *hurricane* may seem “soft,” literary words, the simpler *storm* having a fresh, rugged value which the others do not possess (think of *storm and stress*). If we have browsed much in our childhood days in books of the Spanish Main, *hurricane* is likely to have a pleasurably bracing tone; if we have had the misfortune to be caught in one, we are not unlikely to feel the word as cold, cheerless, sinister.

确实，某些语言心理学方面的作者 [4_12] 否认语言彻底的认知属性，反而试图证明多数语言成分源于情感领域。我得承认我完全无法认同他们的说法。在我看来，他们的观点中不多的正确部分可被归纳为一句话：大多数词，就像几乎所有的意识成分一样，都附带着一种情感基调，一种快乐或者痛苦的衍生物，温和而不减真实，有时还会突然变得强烈。然而，这种情感基调并不总是词本身的内在价值，而是长在词的真身上，是词的概念核心上的一种感情赘生物。情感基调不仅可能因时代而异（当然，概念内容也是如此），而且因各人的联想的不同而不同，甚至在同一个人的意识中也会因其经验的塑造和情绪的变化而随时变化。当然，对于许多词来说，社会公认的情感基调或者情感基调范围凌驾于个人联想的力量之上，但是它们充其量仍是变幻无穷、不可捉摸的东西。它们很少具有中心的、基本的事实的固定性。例如，我们都承认，storm（风暴）、tempest（暴风雨）和hurricane（飓风）这三个词除了实际意思上的细微差别之外，还有各自独特的情感基调，这些情调是所有敏感的说英语的人和阅读英文的人都可以感觉到的，而且他们的感觉大体一致。我们会觉得storm比较普通，明显不如另外两个词“华丽”；tempest不仅与海洋有关，而且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由于与莎士比亚的名作《暴风雨》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关联而很可能获得了一种和缓的魅力；hurricane则比较直率，比它的两个近义词更直接且残酷。然而，这些词在每个人心中产生的情感基调却可以千差万别。对某些人来说，tempest和hurricane可能是“柔和”而带有书卷气的词汇，而更质朴的storm则具有一种新鲜但粗糙的质感，是另两个近义词所不具备的（试想storm and stress大动荡、暴风骤雨这一说法）。如果我们在孩提时代浏览过很多有关西班牙美洲 [4_13] 的书籍，那么对我们而言hurricane一词就可能具有一种愉快而令人振奋的基调；如果我们不幸遭遇过飓风，就很可能会感觉这个词是冰冷、凄惨而险恶的。

The feeling-tones of words are of no use, strictly speaking, to science; the philosopher, if he desires to arrive at truth rather than

merely to persuade, finds them his most insidious enemies. But man is rarely engaged in pure science, in solid thinking. Generally his mental activities are bathed in a warm current of feeling and he seizes upon the feeling-tones of words as gentle aids to the desired excitation. They are naturally of great value to the literary artist.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however, that even to the artist they are a danger. A word whose customary feeling-tone is too unquestioningly accepted becomes a plushy bit of furniture, a *cliché* . Every now and then the artist has to fight the feeling-tone, to get the word to mean what it nakedly and conceptually should mean, depending for the effect of feeling on the creative power of an individual juxtaposition of concepts or images.

严格说来，词的情感基调对于科学而言毫无用处；哲学家如果想要领悟真理，而不是仅仅为了说服他人，会发现词的情感基调是最阴险的敌人。但是，人是很少耽于纯粹的科学和扎实的思考的。通常，他的心智活动浸润在情感的暖流中，他会抓住词语的情感基调以为温和的助手，来获得自己想要的激感。不消说，词的情感基调对于艺术家而言是大有用处的。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甚至对艺术家来说，它们也是一种危险。如果某个词的惯常情感基调被人们毫不犹豫地接受，它就会变成一件浮华的家什，一种陈词滥调。艺术家必须不时地与词的情感基调做斗争，才能使词还原其赤裸的概念意义，并凭借以独特方式组合概念或意象的创造力，实现其感情效果。

[3_1].We shall reserve capitals for radical elements.

[3_2].These words are not here used in a narrowly technical sense.

[3_3].It is not a question of the general isolating character of such languages as Chinese (see Chapter VI). Radical-words may and do occur in languages of all varieties, many of them of a high degree of complexity.

[3_4].Spoken by a group of Indian tribes in Vancouver Island.

[3_5].In this and other examples taken from exotic languages I am forced by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to simplify the actual phonetic forms. This should not matter perceptibly, as we are concerned with form as such, not with phonetic content.

[3_6].These oral experiences, which I have had time and again as a field student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are very neatly confirmed by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another sort. Twice I have taught intelligent young Indians to write their own languages according to the phonetic system which I employ. They were taught merely how to render accurately the sounds as such. Both had some difficulty in learning to break up a word into its constituent sounds, but none whatever in determining the words. This they both did with spontaneous and complete accuracy. In the hundreds of pages of manuscript Nootka text that I have obtained from one of these young Indians the words, whether abstract relational entities like English *that* and *but* or complex sentence-words like the Nootka example quoted above, are, practically without exception, isolated precisely as I or any other student would have isolated them. Such experiences with naïve speakers and recorders do more to convince one of the definitely plastic unity of the word than any amount of purely theoretical argument.

[3_7]."Coördinate sentences" like *I shall remain but you may go* may only doubtfully be considered as truly unified predications, as true sentences. They are sentences in a stylistic sense rather than from the strictly formal linguistic standpoint. The orthography *I shall remain . But you may go* is as intrinsically justified as *I shall remain . Now you may go.* The closer connection in sentiment between the first two propositions has led to a conventional visual representation that must not deceive the analytic spirit.

[3_8].Except, possibly, in a newspaper headline. Such headlines, however, are language only in a derived sense.

[3_9].E.g., the brilliant Dutch writer, Jac van Ginneken.

[4_1].在公式中大写字母专门用于表示根本成分。

[4_2].这些词在这里并不是狭义的技术层面的意思。

[4_3].译者注：-s在动词hit后表示“第三人称单数”，在名词book后表示“复数”。

[4_4].译者注：诺曼征服是指公元1066年法国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对英格兰的军事征服。

[4_5].这不是诸如汉语等语言的普遍的孤立属性问题（详见第六章）。根本词可能而且确实存在于所有语言中，其中很多是非常复杂的。

[4_6].温哥华岛的一些印第安部落所讲的语言。

[4_7].在这个例子以及来自陌生语言的其他例子当中，我不得不出于现实的考虑简化了实际的语音形式。这应当不会有什么大碍，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形式本身，而不是语音内容。

[4_8].作为一名美洲印第安语言的田野调查学者，我有很多这类口述经验，这些经验还可被我的另外一种个人经验非常妥帖地印证。我曾经两次教过聪明的印第安青年按照我使用的语音体系书写他们自己的语言。我只教他们如何将语音本身准确地写出来。两人在学习将一个词切分为它赖以组成的音方面都有些困难，但是在划分词方面却毫无障碍。这[后]一点他们做得自发而且完全准确。我从这两个印第安青年中的一位那里收集到数百页努特卡语的文本，其中的词，无论是像英语的that和but这样的抽象的关系成分，还是像前文引用的努特卡语示例那样的复杂的句-词，都毫无例外地被他精确地分离出来，与我或其他任何一位研究者可能做的一模一样。与质朴的说话人和记录者的这种交往经验比任何长篇大论的纯理论争辩更让人相信，词的确是一个可塑的统一体。

[4_9].译者注："派尤特语的那个长词"指本章第八段所举的派尤特语的例子wii-to-kuchum-punku-rügani-yugwi-va-ntü-m(ü)，wii在这个词中应是第一个音节而不是第二个音节，疑为原文错误。

[4_10].像I shall remain but you may go（我留下但是你可以走了）这样的"并列句"是否可被视为真正的统一的陈述，真正的句子，是值得怀疑的。从风格的角度它们算是句子，在严格的形式语言学意义上则不是。写成"I shall remain. But you may go"（我留下。但是你可以走了）和写成"I shall remain. Now you may go"（我留下。现在你可以走了），有同样的内在合理性。 前两个命题[即含有but的两个句子]之间的感情联系更加密切，导致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联]写法，但是[我们]不要被此蒙蔽了分析精神。

[4_11].除了可能用于报纸大标题中。但此类大标题只是在引申意义上才算语言。

[4_12].例如，杰出的荷兰作家约克·凡·金尼根（译者注：约克·凡·金尼根的全名为Jacobus Joannes Antonius van Ginneken，是荷兰的语言学家、神父和耶稣会会士。）

[4_13].译者注：西班牙美洲指今天南美洲的北海岸地区，大致包括从巴拿马地峡到奥利诺科河三角洲的地区。旧时海盗小说中，该地名还包括加勒比海和附近水域。

Chapter 3 The Sounds of Language

第三章　语言的音

We have seen that the mere phonetic framework of speech does not constitute the inner fact of language and that the single sound of articulated speech is not, as such, a linguistic element at all. For all that, speech is so inevitably bound up with sounds and their articulation that we can hardly avoid giving the subject of phonetics some general consideration.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neither the purely formal aspects of a language nor the course of its history can be fully understood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sounds in which this form and this history are embodied. A detailed survey of phonetics would be both too technical for the general reader and too loosely related to our main theme to warrant the needed space, but we can well afford to consider a few outstanding facts and ideas connected with the sounds of language.

如前所述，仅仅有言语的语音框架尚不足以构成语言的内在事实，而有声言语中的单个的音本身根本不能算是语言成分。尽管如此，言语与声音以及发音动作仍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还是免不了要大致讲一讲语音学的话题。经验证明，如果不参照语音，那么无论是一种语言的纯形式特征，还是它的历史进程，我们都无法完全理解，因为正是语音使语言的形式和历史变得有形。详尽地介绍语音学，不但对普通读者来说过于专业，而且与我们的主题相去甚远，不值得我们花费太多篇幅。不过，探讨几个与语言的声音相关的突出事实和观点还是可以的。

The feeling that the average speaker has of his language is that it is built up, acoustically speaking, of a comparatively small number of distinct sounds, each of which is rather accurately provided for in the current alphabet by one letter or, in a few cases, by two or more alternative letters. As for the languages of foreigners, he generally feels that, aside from a few striking differences that cannot escape even the uncritical ear, the sounds they use are the same as those he is familiar with but that there is a mysterious "accent" to these foreign languages, a certain unanalyzed phonetic character, apart from the sounds as such, that gives them their air of strangeness. This naïve feeling is largely illusory on both scores. Phonetic analysis convinces one that the number of clearly distinguishable sounds and nuances of sounds that are habitually employed by the speakers of a language is far greater than they themselves recognize. Probably not one English speaker out of a hundred has the remotest idea that the *t* of a word like *sting* is not at all the same sound as the *t* of *teem* , the latter *t* having a fullness of "breath release" that is inhibited in the former case by the preceding *s* ; that the *eat* of *meat* is of perceptibly shorter duration than the *ea* of *mead* ; or that the final *s* of a word like *heads* is not the full, buzzing *z* sound of the *s* in such a word as *please* . It is the frequent failure of foreigners, who have acquired a practical mastery of English and who have eliminated all the cruder phonetic shortcomings of their less careful brethren, to observe such minor distinctions that helps to give their English pronunciation the curiously elusive "accent" that we all vaguely feel. We do not diagnose the "accent" as the total acoustic effect produced by a series of slight but specific phonetic errors for the very good reason that we have never made clear to ourselves our own phonetic stock in trade. If two languages taken at random, say English and Russian, are compared as to their phonetic systems, we are more apt than not to find that very few of the phonetic elements of the

one find an exact analogue in the other. Thus, the *t* of a Russian word like *tam* “there” is neither the English *t* of *sting* nor the English t of *teem* . It differs from both in its “dental” articulation, in other words, in being produced by contact of the tip of the tongue with the upper teeth, not, as in English, by contact of the tongue back of the tip with the gum ridge above the teeth; moreover, it differs from the *t* of *teem* also in the absence of a marked “breath release” before the following vowel is attached, so that its acoustic effect is of a more precise, “metallic” nature than in English. Again, the English *l* is unknown in Russian, which possesses, on the other hand, two distinct *l* -sounds that the normal English speaker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exactly to reproduce—a “hollow,” guttural-like *l* and a “soft,” palatalized *l* -sound that is only very approximately rendered, in English terms, as *ly* . Even so simple and, one would imagine, so invariable a sound as *m* differs in the two languages. In a Russian word like *most* “bridge” the *m* is not the same as the *m* of the English word *most* ; the lips are more fully rounded during its articulation, so that it makes a heavier, more resonant impression on the ear. The vowels, needless to say, differ completely in English and Russian, hardly any two of them being quite the same.

从听觉的角度来讲，普通说话者会感觉自己的语言是由相对少量的独立的音构成的，每个音都相当准确地由通用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来标示，在少数情况下，也可以由两个或多个字母轮替标示。至于外国人的语言，普通说话者一般会觉得，除了少数几个连不敏感的耳朵都能分辨出来的明显差异外，外语的音与他所熟悉的母语的音是一样的，只是这些外语在此类单音之外还有一种神秘的“口音”，一种分析不出来的语音特征，正是这种特征赋予了外语一种陌生感。这种天真的感觉从两个方面来说基本上都是错觉。语音学分析使我们确信，说某种语言的人惯常使用的、可明确区分的音以及仅有细微差别的音，其数量之大是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认识的。也许在一百个说英语的人

当中都不会有一个人对下面的这些情况有些微的了解：sting这类词里的t和teem里的t根本不是同一个音，因为第二个t的“送气”是充分的，而第一个t的“送气”受到前面的s的抑制；meat里的ea比mead里的ea听起来要短一些；heads这类词末尾的s并不像please等词里的s一样发充分的z音。有些外国人已经基本掌握了英语，也已经全然去掉了他们那些较为粗心的同胞所具有的比较粗糙的发音问题，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上述这类细微差异，正是这一点使我们都能模糊地感受到他们的英语发音里有一种奇怪的、难以捉摸的“口音”。但是我们不能诊断说这种“口音”是一系列细微而具体的语音错误造成的整体听觉效果，原因就在于我们从来都没弄清楚自己手头的母语的语音材料。如果随机挑选两种语言，比如英语和俄语，然后比较它们的语音体系，我们多半会发现其中一种语言的语音成分很少能在另一种语言里找到完全对应的成分。比如，*tam* “那里”等俄语词里的*t* 既不是英语词sting里的t，也不是英语词teem里的t。它的差异首先体现在它作为“齿音”的发音位置上；换言之，它是由舌尖和上齿接触发出来的，而在英语中t是由舌尖后部和牙齿之上的齿龈接触发出来的；而且，俄语的*t* 与teem中的t还有一点不同，即在与后面的元音连接之前，它没有明显的“送气”，所以它的音响效果比在英语中更加清晰，更加有“金属”质感。再比如，俄语里没有英语的l音，而是有两个不同的l音，一般说英语的人很难准确地把它们发出来——一个是“空的”、像喉音的l，另一个是“软的”、腭音化的l，后者只能大致记作英语里的ly。甚至像m这样简单的、人们很难想象出有任何变化的音在英俄两种语言中也有差异。*most* “桥”等俄语词里的m和英语词most里的m并不相同；前者发音时双唇更圆，因此听起来更厚重、更响亮。至于元音，不用说，在英语和俄语中是完全不同的，几乎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元音。

I have gone into these illustrative details, which are of little or no specific interest for us, merely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thing of an experimental basis to convince ourselves of the tremendous variability of speech sounds. Yet a complete inventory of the acoustic resources of all the European languages, the languages

nearer home, while unexpectedly large, would still fall far short of conveying a just idea of the true range of human articulation. In many of the languages of Asia, Africa, and aboriginal America there are whole classes of sounds that most of us have no knowledge of.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more difficult of enunciation than sounds more familiar to our ears; they merely involve such muscular adjustments of the organs of speech as we have never habituated ourselves to. It may be safely said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possible sounds is greatly in excess of those actually in use. Indeed, an experienced phonetician should have no difficulty in inventing sounds that are unknown to objective investigation. One reason why we find it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the range of possible speech sounds is indefinitely large is our habit of conceiving the sound as a simple, unanalyzable impression instead of as the resultant of a number of distinct muscular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simultaneously. A slight change in any one of these adjustments gives us a new sound which is akin to the old one, because of the continuance of the other adjustments, but which is acoustically distinct from it, so sensitive has the human ear become to the nuanced play of the vocal mechanism. Another reason for our lack of phonetic imagination is the fact that, while our ear is delicately responsive to the sounds of speech, the muscles of our speech organs have early in life become exclusively accustomed to the particular adjustments and systems of adjustment that are required to produce the traditional sounds of the language. All or nearly all other adjustments have become permanently inhibited, whether through inexperience or through gradual elimination. Of course the power to produce these inhibited adjustments is not entirely lost, but the extreme difficulty we experience in learning the new sounds of foreign languages is sufficient evidence of the strange rigidity that has set in for most people in the voluntary control of the speech organs. The point may be brought home by contrasting the

comparative lack of freedom of voluntary speech movements with the all but perfect freedom of voluntary gesture. [4_1] Our rigidity in articulation is the price we have had to pay for easy mastery of a highly necessary symbolism. One cannot be both splendidly free in the random choice of movements and selective with deadly certainty. [4_2]

我列举的这些细节对我们的用处其实不大，甚至毫无用处，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提供一些感性基础，让大家相信不同语言的语音是存在巨大的差异性的。即使列出所有欧洲语言——即邻近我们的语言——的语音资源的完整清单，虽然长得惊人，也仍然远远无法真实地反映人类发音的实际范围。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土著的很多语言里，有成套的语音是我们大多数人所不知晓的。它们倒并不见得比我们相对熟悉的音难发，只是所涉及的发音器官的肌肉调节是我们从未习惯的而已。可以妥当地说，人可能发出的音的总数远远超出实际使用的语音总数。事实上，有经验的语音学家应该不难虚构出实际调查中未曾发现的音。我们之所以很难相信人可能发出的音的范围是无限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习惯于认为音是简单的、不可分析的，而其实它是一系列不同的肌肉调节同时发生的结果。只要其中的任何一个调节发生细小的变化，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音；这个音与原来的音很接近，因为其他的调节都保持着，但是听起来却是一个不同的音——人类的耳朵对发音系统的细微活动已变得如此敏感。我们之所以缺乏对语音的想象力，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我们的耳朵对言语的声音极其敏感，但是我们的言语器官的肌肉在我们幼年时就已变得只习惯于发母语的传统语音所需的调节和调节系统。其他的所有或几乎所有调节都被永久地抑制了，或者因为未被操练，或者因为被逐渐淘汰。当然，进行这些被抑制的调节所需的能力并未完全消失，但是我们在学习外语的陌生发音时所遭遇的极大困难足以证明，大多数人对发音器官的自主控制已经出奇地僵化了。自主的发音动作相对缺乏自由，而自主的手势动作则几乎是完全自由的，这两者之间的反差可以帮助我们充分理解这一点。 [5_1] 我们在发音上的僵化是我们为了轻松掌握一套极为必要的母

语的符号系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不可能既随心所欲地任意选择动作，同时又选择得绝对准确。[5_2]

There are, then, an indefinitely large number of articulated sounds available for the mechanics of speech; any given language makes use of an explicit, rigidly economical selection of these rich resources; and each of the many possible sounds of speech is conditioned by a number of independent muscular adjustments that work together simultaneously towards its production. A full account of the activity of each of the organs of speech—in so far as its activity has a bearing on language—is impossible here, nor can we concern ourselves in a systematic way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of sounds on the basis of their mechanics. [4_3] A few bold outlines are all that we can attempt. The organs of speech are the lungs and bronchial tubes; the throat, particularly that part of it which is known as the larynx or, in popular parlance, the “Adam's apple”; the nose; the uvula, which is the soft, pointed, and easily movable organ that depends from the rear of the palate; the palate, which is divided into a posterior, movable “soft palate” or velum and a “hard palate”; the tongue; the teeth; and the lips. The palate, lower palate, tongue, teeth, and lips may be looked upon as a combined resonance chamber, whose constantly varying shape, chiefly due to the extreme mobility of the tongue, is the main factor in giving the outgoing breath its precise quality [4_4] of sound.

总之，言语机制可以产出的音的数量是无限的；所有语言都从这些丰富的资源中明确且极为经济地选取一些音为己所用；这许多可能的语音皆由一些独立的肌肉调节所控制，这些调节同时发挥作用，完成发音动作。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充分介绍每个发音器官的活动——确切地说是和语言有关的活动——也不可能按照它们的发音机制对其进

行系统的分类。 [5_3] 我们只能尝试做几点大胆的概括。言语器官包括：肺和气管；喉部，特别是被称为喉头的部分，俗称“亚当的苹果”（即喉结）；鼻子；小舌，即挂在腭后部的那个又软又尖、可以灵活活动的部位；腭，分为“软腭”（位于后部，能活动）和“硬腭”；舌头；牙齿；以及双唇。腭、下腭、舌头、牙齿和双唇可以被视为一个拼合起来的共鸣室；主要因为舌头的高度灵活性，这个共鸣室的形状不停地变化，这是赋予呼出的气流以精确音质 [5_4] 的主要因素。

The lungs and bronchial tubes are organs of speech only in so far as they supply and conduct the current of outgoing air without which audible articulation is impossible. They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specific sound or acoustic feature of sounds except, possibly, accent or stress. It may be that differences of stress are due to slight differences in the contracting force of the lung muscles, but even this influence of the lungs is denied by some students, who explain the fluctuations of stress that do so much to color speech by reference to the more delicate activity of the glottal cords. These glottal cords are two small, nearly horizontal, and highly sensitive membranes within the larynx, which consists, for the most part, of two large and several smaller cartilages and of a number of small muscles that control the action of the cords.

肺和气管被称为发音器官只是因为它们供应并传输呼出的气流；没有气流，是不可能发出听得见的音的。它们并不负责任何具体的音或音的声学特征，只有重音或重音或可除外。重音的差异可能源自肺部肌肉收缩力的细微差异，但是肺的这一影响甚至也被某些学者否认，他们用声带的更精细的活动来解释为言语增添了丰富色彩的重音的波动。声带位于喉头，是两张近乎水平的高度敏感的小膜，而喉头的主要构成是两块大软骨、几块小软骨和几块控制声带活动的小肌肉。

The cords, which are attached to the cartilages, are to the human speech organs what the two vibrating reeds are to a clarinet or the strings to a violin. They are capable of at least three distinct types of movement, each of which i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for speech. They may be drawn towards or away from each other, they may vibrate like reeds or strings, and they may become lax or tens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ir length. The last class of these movements allows the cords to vibrate at different "lengths" or degrees of tenseness an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variations in pitch which are present not only in song but in the more elusive modulations of ordinary speech. The two other types of glottal action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the voice, "voice" being a convenient term for breath as utilized in speech. If the cords are well apart, allowing the breath to escape in unmodified form, we have the condition technically known as "voicelessness." All sounds produced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re "voiceless" sounds. Such are the simple, unmodified breath as it passes into the mouth, which is, at least approximately, the same as the sound that we write *h* , also a large number of special articulations in the mouth chamber, like *p* and *s* . On the other hand, the glottal cords may be brought tight together, without vibrating. When this happens, the current of breath is checked for the time being. The slight choke or "arrested cough" that is thus made audible is not recognized in English as a definite sound but occurs nevertheless not infrequently. [4_5] This momentary check, technically known as a "glottal stop," is an integral element of speech in many languages, as Danish, Lettish, certain Chinese dialects, and nearly all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of voicelessness, that of completely open breath and that of checked breath, lies the position of true voice. In this position the cords are close together, but not so tightly as to prevent the air from streaming through; the cords are set vibrating and a

musical tone of varying pitch results. A tone so produced is known as a “voiced sound.” It may have an indefinite number of qualities according to the precise position of the upper organs of speech. Our vowels, nasals (such as m and n), and such sounds as *b, z,* and *l* are all voiced sounds. The most convenient test of a voiced sound is the possibility of pronouncing it on any given pitch, in other words, of singing on it. [4_6] The voiced sounds are the most clearly audible elements of speech. As such they are the carriers of practically al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ress, pitch, and syllabification. The voiceless sounds are articulated noises that break up the stream of voice with fleeting moments of silence. Acoustically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freely unvoiced and the voiced sounds are a number of other characteristic types of voicing, such as murmuring and whisper. [4_7] These and still other types of voice are relatively unimportant in English and most other European languages, but there are languages in which they rise to some prominence in the normal flow of speech.

声带附着在软骨上，它们之于人的言语器官，就如两片振簧之于竖琴，或者琴弦之于小提琴。声带能做至少三种不同类型的动作，每一种对言语都至关重要。具体地说，两条声带可以互相靠近或远离，可以像振簧或琴弦一样颤动，还可以沿着其长度方向变得松弛或紧张。最后这种动作可以让声带以不同的“长度”或紧张度颤动，由此产生了音高的变化。这不仅出现在歌唱中，而且也出现在普通言语里更难捕捉的抑扬微调中。另外两种声门运动决定了声响的性质，这里“声响”是一个方便的说法，指的是言语中使用的气流。-如果两条声带分得很开，让气流得以不改变形式地通过，就会产生专业说法所称的“不带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发出的所有的音都是“不带声”的音。简单的、在进入口腔时未经改变的气流都属于这种音，它们至少大体上跟记作h的音一样；在口腔里完成的大量特殊发音也是如此，比如p和s。另外，声带也可以紧闭起来，不颤动。这时，气流会被暂

时阻断。由此听到的轻微的阻塞声或者“忍住的咳嗽声”在英语里并不被视为一个确定的音，但是却时常能遇到。[5_5] 这种暂时的阻断，专业的说法是“喉塞音”，是很多语言的内在言语成分，比如丹麦语、列托语[5_6]、汉语的某些方言以及几乎所有的美洲印第安语言。真正的声响处在不带声的两个极端——完全开放的气流造成的不带声和被阻断的气流造成的不带声——之间。在这个位置上，两条声带彼此合拢，但是并非紧闭，不会阻断气流通过；声带因气流通过而振动，由此产生不同音高的乐音。以这种方式发出的音被称为“带声的音”。根据上部的言语器官的准确位置，这种带声的音可以有无定量的音质。我们英语的元音、鼻音（如m和n）以及b、z和l等音都是带声的音。要测试一个音是否带声，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看发这个音时能否任意变换音高，换言之就是能否把这个音唱出来。[5_7] 带声的音是言语中最清楚响亮的成分。因此，它们承载了重音、音高和音节划分上的几乎所有重要差异。不带声的音是发出来的噪音，它们用刹那的无声打断声响的音流。在听觉上，完全不带声和带声的音之间还有一些其他的独特声响，比如低语声和耳语声。[5_8] 这些以及其他类型的声响在英语和大多数其他欧洲语言里是相对不重要的，但是在有些语言里它们在正常言语流中可以提升至一定的显著位置。

The nose is not an active organ of speech, but it is highly important as a resonance chamber. It may be disconnected from the mouth, which is the other great resonance chamber, by the lifting of the movable part of the soft palate so as to shut off the passage of the breath into the nasal cavity; or, if the soft palate is allowed to hang down freely and unobstructively, so that the breath passes into both the nose and the mouth, these make a combined resonance chamber. Such sounds as *b* and *a* (as in *father*) are voiced “oral” sounds, that is, the voiced breath does not receive a nasal resonance. As soon as the soft palate is lowered, however, and the nose added as a participating resonance chamber, the sounds *b* and *a* take on a peculiar “nasal” quality and become, respectively,

m and the nasalized vowel written *an* in French (e.g., *sang, tant*). The only English sounds [4_8] that normally receive a nasal resonance are *m, n,* and the *ng* sound of *sing* . Practically all sounds, however, may be nasalized, not only the vowels-nasalized vowels are common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but such sounds as *l* or *z* . Voiceless nasals are perfectly possible. They occur, for instance, in Welsh and in quite a number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鼻子算不上一个活跃的言语器官，但是作为一个共鸣室，它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和另一个重要的共鸣室——口腔——隔开，即抬起软腭可移动的部分，从而阻隔气流通向鼻腔；或者，如果让软腭自然下垂，不起阻隔的作用，那么气流就可以进入鼻腔和口腔，二者合成一个共鸣室。像b和（father中的）a这样的音就是带声的“口腔”音，也就是说带声的气流未获得鼻腔共鸣。但是，只要垂下软腭，让鼻腔作为共鸣室也参与进来，那么b和a这两个音就都会带上一种独特的“鼻腔”音质，分别变成m和法语中书写为*an* 的鼻化元音（比如*sang* 和*tant* ）。在英语里，通常带有鼻腔共鸣的音只有m、n和sing里的ng。 [5_9] 但是，实际上所有的音都可以被鼻化，不只是元音——鼻化元音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还包括l或z等辅音。不带声的鼻音也是完全可能的。比如，它们存在于威尔士语和多种美洲印第安语言中。

The organs that make up the oral resonance chamber may articulate in two ways. The breath, voiced or unvoiced, nasalized or unnasalized, may be allowed to pass through the mouth without being checked or impeded at any point; or it may be either momentarily checked or allowed to stream through a greatly narrowed passage with resulting air friction. There are also transitions between the two latter types of articulation. The unimpeded breath takes on a particular color or qual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arying shape of the oral resonance chamber.

This shape is chiefly determined by the position of the movable parts—the tongue and the lips. As the tongue is raised or lowered, retracted or brought forward, held tense or lax, and as the lips are pursed ("rounded") in varying degree or allowed to keep their position of rest, a large number of distinct qualities result. These oral qualities are the vowels. In theory their number is infinite, in practice the ear can differentiate only a limited, yet a surprisingly large, number of resonance positions. Vowels, whether nasalized or not, are normally voiced sounds; in not a few languages, however, "voiceless vowels" [4_9] also occur.

构成口腔共鸣室的器官可以两种方式发音。无论带声的还是不带声的气流，抑或鼻化的还是不鼻化的气流，都可以不经过任何阻隔或妨碍而顺利通过口腔；或者，气流也可以受到暂时的阻断或流经一条极窄的通道从而造成空气摩擦。后两种发音之间还存在过渡类型。未经阻碍的气流，与口腔共鸣室的形状变化相应，会带上特别的色彩或音质。这个形状主要取决于可移动部分——舌头和双唇——的位置。随着舌头的起落、伸缩和松紧，以及双唇缩拢（"圆唇"）到不同程度或者维持其静止的位置，就会产生大量不同音质的音。这些口腔音质就是元音。在理论上它们的数量是无限的，而实际上耳朵只能分辨有限数量的共鸣位置，不过这个数量仍然大得惊人。无论是否鼻化，元音一般都是带声的音；不过在不少语言里，也有"不带声的元音"。[5_10]

The remaining oral sounds are generally grouped together as "consonants." In them the stream of breath is interfered with in some way, so that a lesser resonance results, and a sharper, more incisive quality of tone. There are four main types of articulation generally recognized within the consonantal group of sounds. The breath may be completely stopped for a moment at some definite

point in the oral cavity. Sounds so produced, like *t* or *d* or *p* , are known as “stops” or “explosives.“ [4_10] Or the breath may be continuously obstructed through a narrow passage, not entirely checked. Examples of such “spirants” or “fricatives,” as they are called, are *s* and *z* and *y* . The third class of consonants, the “laterals,” are semi-stopped. There is a true stoppage at the central point of articulation, but the breath is allowed to escape through the two side passages or through one of them. Our English *d* , for instance, may be readily transformed into *l* , which has the voicing and the position of *d,* merely by depressing the sides of the tongue on either side of the point of contact sufficiently to allow the breath to come through. Laterals are possible in many distinct positions. They may be unvoiced (the Welsh *ll* is an example) as well as voiced. Finally, the stoppage of the breath may be rapidly intermittent; in other words, the active organ of contact—generally the point of the tongue, less often the uvula [4_11] —may be made to vibrate against or near the point of contact. These sounds are the “trills” or “rolled consonants,” of which the normal English *r* is a none too typical example. They are well developed in many languages, however, generally in voiced form, sometimes, as in Welsh and Paiute, in unvoiced form as well.

其余的口腔音通常被归为一类，即“辅音”。辅音的气流受到某种形式的干扰，因而共鸣较少，音质比较锋利尖锐。在辅音群中，一般认为有四种主要的发音方式。首先，气流可在口腔中某个确定的点上被暂时完全阻住。这样发出的音，如t、d或p，被称为“塞音”或者“爆破音”。 [5_11] 或者，气流可以被持续地阻塞，但没有完全被堵死，而是流经狭窄的通道。这类音被称为“擦音”或者“摩擦音”，比如s、z和y。第三类辅音，即“边音”，则是半阻塞的。在发音的中心点有真正的阻挡，但是气流可以从两侧通道或者其中的一侧通道流出。例如，英语的d可以轻松地转化为与它一样带声响、发音位置也相同的l，只

要在接触点的任何一边压低舌侧，使气流足以通过即可。边音可以有多种不同的位置。它们可以是不带声的（威尔士语中的*ll* 就是一例），也可以是带声的。最后，气息的阻塞也可以是快速地间歇性的；换言之，产生接触的活跃器官——通常是舌尖，其次是小舌 [5_12] ——可以抵着或者贴近接触点颤动。这类音就是“颤音”或者“滚音”，英语中正常的r音是个不太典型的例子。不过颤音在很多语言中都很发达，且一般都是以带声形式出现，有时也可不带声，比如在威尔士语和派尤特语中。

The oral manner of articulation is naturally not sufficient to define a consonant. The place of articulation must also be considered. Contacts may be formed at a large number of points, from the root of the tongue to the lips. It is not necessary here to go at length into this somewhat complicated matter. The contact is either between the root of the tongue and the throat, [4_12] some part of the tongue and a point on the palate (as in *k* or*ch* or *l*), some part of the tongue and the teeth (as in the English *th* of *thick* and *then*), the teeth and one of the lips (practically always the upper teeth and lower lip, as in *f*), or the two lips (as in *p* or English *w*). The tongue articulations are the most complicated of all, as the mobility of the tongue allows various points on its surface, say the tip, to articulate against a number of opposed points of contact. Hence arise many positions of articulation that we are not familiar with, such as the typical “dental” position of Russian or Italian *t* and *d* ; or the “cerebral” position of Sanskrit and other languages of India, in which the tip of the tongue articulates against the hard palate. As there is no break at any point between the rims of the teeth back to the uvula nor from the tip of the tongue back to its root, it is evident that all the articulations that involve the tongue form a continuous organic (and acoustic) series. The positions grade into each other, but each language selects a

limited number of clearly defined positions as characteristic of its consonantal system, ignoring transitional or extreme positions. Frequently a language allows a certain latitude in the fixing of the required position. This is true, for instance, of the English *k* sound, which is articulated much further to the front in a word like *kin* than in *cool* . We ignore this difference, psychologically, as a non-essential, mechanical one. Another language might well recognize the difference, or only a slightly greater one, as significant, as paralleling the distinction in position between the *k* of *kin* and the *t* of *tin* .

口腔中的发声方式自然不足以定义辅音。要定义辅音我们还须考虑发声的部位。从舌根到嘴唇，许多个点上都可以形成接触。这里没有必要详谈这个有些复杂的话题。接触的两个部位要么是舌根和喉咙[5_13]，要么是舌头的某个部位和腭部的某个点（如k、ch或者l），要么是舌头的某个部位和牙齿（如英语单词thick和then中的th），要么是牙齿和双唇之一（实际上总是上齿和下唇，如f），要么是双唇（如p或英语的w）。舌音是所有发音中最为复杂的，因为舌头的移动性使舌面上的多个点——比如舌尖——可以抵着若干个接触点发出声音。因此出现了很多我们不熟悉的发音位置，比如俄语或者意大利语中*t*和*d*的典型“齿”位；或者梵语及印度其他语言中的“腭”位，即发音时舌尖抵着硬腭。因为从齿缘向后直到小舌，从舌尖向后直到舌根，任何一点上都不存在间断，所以很显然所有涉及舌头的发音构成了一个器官上的（以及听觉上的）连续体。各个位置依次排列，但是每种语言只根据自己辅音系统的特征，选择其中有限的一些明确界定的位置，而忽略各种过渡位置或者极端位置。不过，一种语言在固定其所需的发音位置时往往允许一定的伸缩性。例如，英语的k音就是如此，它在kin等词中比在cool中的发音位置要靠前得多。我们在心理上会忽略这种差别，视其为非本质的、机械性的。但另一种语言则完全有可能将这种差别或者比其稍大一点的差别视为显著差别，如同kin中的k与tin中的t的位置差别一样。

The organic classification of speech sounds is a simple matter after what we have learned of their production. Any such sound may be put into its proper place by the appropriate answer to four main questions:—What is the position of the glottal cords during its articulation? Does the breath pass into the mouth alone or is it also allowed to stream into the nose? Does the breath pass freely through the mouth or is it impeded at some point and, if so, in what manner? What are the precise points of articulation in the mouth? [4_13] This fourfold classification of sounds, worked out in all its detailed ramifications, [4_14] is sufficient to account for all, or practically all, the sounds of language. [4_15]

我们已经了解了语音是如何产生的，接下来按照器官划分语音就很简单了。只要恰当地回答以下四个主要问题，任何语音均可归入适当的类别：一，发音过程中声带处于什么位置？二，气流是只进入口腔，还是也被允许流入鼻腔？三，气流是自由地从口腔通过，还是在某个点上被阻塞？如果是后者，如何被阻塞？四，口腔中的精确发音点是什么？ [5_14] 语音的这个四重分类法，如果将其所有的细节都拓展出来 [5_15] ，是足以描述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语音的。 [5_16]

The phonetic habits of a given language are not exhaustively defined by stating that it makes use of such and such particular sounds out of the all but endless gamut that we have briefly surveyed. There remains the important question of the dynamics of these phonetic elements. Two languages may, theoretically, be built up of precisely the same series of consonants and vowels and yet produce utterly different acoustic effects. One of them may not recognize striking variations in the lengths or “quantities” of the phonetic elements, the other may note such variations most

punctiliously (in probably the majority of languages long and short vowels are distinguished; in many, as in Italian or Swedish or Ojibwa, long consonants are recognized as distinct from short ones). Or the one, say English, may be very sensitive to relative stresses, while in the other, say French, stress is a very minor consideration. Or, again, the pitch differences which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actual practice of language may not affect the word as such, but, as in English, may be a more or less random or, at best, but a rhetorical phenomenon, while in other languages, as in Swedish, Lithuanian, Chinese, Siamese, and the majority of African languages, they may be more finely graduated and felt as integ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ds themselves. Varying methods of syllabifying are also responsible for noteworthy acoustic differences. Most important of all, perhaps, are the very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of combining the phonetic elements. Each language has its peculiarities. The*ts* combination, for instance, is found in both English and German, but in English it can only occur at the end of a word (as in *hats*), while it occurs freely in German as the psychological equivalent of a single sound (as in*Zeit, Katze*). Some languages allow of great heapings of consonants or of vocalic groups (diphthongs), in others no two consonants or no two vowels may ever come together. Frequently a sound occurs only in a special position or under special phonetic circumstances. In English, for instance, the z-sound of *azure* cannot occur initially, while the peculiar quality of the *t* of *sting* is dependent on its being preceded by the *s* . These dynamic factors, in their totality, are as important for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onetic genius of a language as the sound system itself, often far more so.

仅仅说某种语言从我们刚刚简短介绍过的几乎无穷无尽的全音域里抽取了某些个具体的音，我们还无法全面界定这种语言的语音习

惯。我们还须回答这些语音成分的动态变化这一重要问题。从理论上说，两种语言可以建立在完全相同的辅音和元音序列之上，却产生完全不同的听觉效果。其中一种语言可能并不认可语音成分在长度或者“音量”方面的显著变化，另一种语言则可能非常严谨地注意此类变化（大多数语言可能都区分长元音和短元音；在许多语言中，如意大利语、瑞典语或奥吉布瓦语[5_17]，长辅音也被视为有别于短辅音）。或者，一种语言（如英语）可能对相对重音非常敏感，而在其他语言（如法语）中重音只是个非常次要的因素。又或者，与语言的实际使用密不可分的音高差别可以对词本身没有影响，比如在英语里它可能只是一种多少有些随机的现象或者最多是一种修辞现象；而在其他语言中，如瑞典语、立陶宛语、汉语、暹罗语以及多数非洲语言，音高可以有更细微的划分，而且被视为词本身的内在特征。不同的音节划分方法也可以导致显著的听觉差异。最重要的也许是语音成分组合的各种非常不同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的特点。例如，ts组合在英语和德语中都存在，但是在英语中，它只能出现在词尾（如hats），而在德语里它可以自由出现，在心理上相当于一个单音（如*Zeit* 和*Katze* ）。有的语言允许辅音或者元音组合（双元音）的大量堆积，而在其他语言中，两个辅音或者两个元音从不一起出现。一个音往往只出现在某个特殊的位置上或者某些特殊的语音环境下。例如，在英语中，azure一词里的z音不可以出现在词首，而sting一词中的t音的特殊音质也取决于它的位置，即位于s之后。总体上，对于正确理解一种语言的语音特点而言，上述动态因素和语音系统本身一样重要，甚至往往比后者还要重要。

We have already seen, in an incidental way, that phonetic elements or such dynamic features as quantity and stress have varying psychological “values.” The English *ts* of*hats* is merely a *t* followed by a functionally independent *s* , the *ts* of the German word*Zeit* has an integral value equivalent, say, to the *t* of the English word *tide* . Again, the *t* of *time* is indeed noticeably distinct from that of *sting* , but the difference, to the consciousness of an

English-speaking person, is quite irrelevant. It has no “value.” If we compare the *t* -sounds of Haida, the Indian language spoken in the Queen Charlotte Islands, we find that precisely the same difference of articulation has a real value. In such a word as *sting* “two,” the t is pronounced precisely as in English, but in *sta* “from” the *t* is clearly “aspirated,” like that of *time* . In other words, an objective difference that is irrelevant in English is of functional value in Haida; from its own psychological standpoint the *t* of *sting* is 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sta as, from our standpoint, is the *t* of *time* from the *d* of *divine* . Further investigation would yield the interesting result that the Haida ear find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nglish *t* of *sting* and the *d* of *divine* as irrelevant as the naïve English ear finds that of the *t* -sounds of *sting* and *time* . The objective comparison of sounds in two or more languages is, then, of no psychological o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unless these sounds are first “weighted,” unless their phonetic “values” are determined. These values, in turn, flow from the general behavior and functioning of the sounds in actual speech.

我们已经附带提到，语音成分或者诸如数量和重音之类的动态特征都具有不同的心理“价值”。比如，英语词hats中的ts只是t后面跟着一个功能上独立的s，而德语词*Zeit* 中的*ts* 则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如同英语词tide中的t。再者，time中的t虽然确实明显有别于sting中的t，但是在讲英语人士的意识中，这一差别并不怎么相干。换言之，它不具有“价值”。如果我们比较海达语（加拿大西部夏洛特皇后群岛上的一种印第安语言）中的各种*t* 音，我们会发现与英语一模一样的发音差异在海达语中却具有真实的价值。在海达语的*sting* “二”等词中，*t* 的发音方法与在英语中一模一样，但是在*sta* “从……”一词中，*t* 则很明显是“送气”的，与time中的t相同。换言之，同样一个客观差异，在英语中无关紧要，在海达语中却具有功能上的价值；从海达语自己的心理角度来看，*sting* 中的*t* 不同于*sta* 中的*t* ，就像从我们的角度来

看time中的t不同于divine中的d一样。进一步调查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结果：说海达语的人认为英语词sting中的t和divine中的d之间的差别无关紧要，正如天真的说英语的人认为sting中的t和time中的t之间的差别无关紧要一样。因此，对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音进行客观比较并不具有心理或者历史意义，除非这些音首先被“赋予权重”，除非我们能确定它们的语音“价值”，而这些价值都来自各个语音在实际言语中的一般表现与功能。

These considerations as to phonetic value lead to an important conception. Back of the purely objective system of sounds that is peculiar to a language and which can be arrived at only by a painstaking phonetic analysis, there is a more restricted “inner” or “ideal” system which, while perhaps equally unconscious as a system to the naïve speaker, can far more readily than the other be brought to his consciousness as a finished pattern, a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The inner sound-system, overlaid though it may be by the mechanical or the irrelevant, is a real and an immensely important principle in the life of a language. It may persist as a pattern, involving number, relation, and functioning of phonetic elements, long after its phonetic content is changed. Two historically related languages or dialects may not have a sound in common, but their ideal sound-systems may be identical patterns. I would not for a moment wish to imply that this pattern may not change. It may shrink or expand or change its functional complexion, but its rate of change is infinitely less rapid than that of the sounds as such. Every language, then, is characterized as much by its ideal system of sounds and by the underlying phonetic pattern (system, one might term it, of symbolic atoms) as by a definite grammatical structure. Both the phonetic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s show the instinctive feeling of language for form. [4_16]

上述有关语音价值的探讨导向一个重要的认识：在只有通过艰苦的语音分析才能得到的、为某种语言所独有的纯客观语音系统的背后，有一个更加局限的“内在”的或者“理想”的系统；与前者纯客观语音系统相比，这一理想系统对天真的说话人而言或许同样是无意识的，但是却远较前者更易作为一个完整的模式或者一个心理机制而被说话人所认识。这个内在的语音系统，尽管可能被机械的或者无关的事物所遮蔽，却是一种语言的生命中真实存在且极为重要的原则。甚至在它的语音内容被改变之后，这个系统仍可以作为一种模式长久地继续存在，包括语音成分的数、关系和功能。两种历史上有关联的语言或者方言可能连一个共同的音都没有，但是它们的理想语音系统却可以遵循相同的模式。我绝没有暗示这种模式会一成不变的意思。事实上，它可能会缩减或扩展或改变其功能的面貌，但是它的变化速度远远不及语音本身那样快。总之，每种语言皆可以用其语音的理想系统和背后的语音模式（也可以称其为“符号原子的系统”）来描述，就像可以用确切的语法结构来描述语言一样。语音结构和概念结构都显示出语言对于形式的本能感觉。 [5_18]

[4_1].Observe the "voluntary." When we shout or grunt or otherwise allow our voices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s we are likely to do when alone in the country on a fine spring day, we are no longer fixing vocal adjustments by voluntary control.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we are almost certain to hit on speech sounds that we could never learn to control in actual speech.

[4_2].If speech, in its acoustic and articulatory aspect, is indeed a rigid system, how comes it, one may plausibly object, that no two people speak alike? The answer is simple. All that part of speech which falls out of the rigid articulatory framework is not speech in idea, but is merely a superadded, more or less instinctively determined vocal complication inseparable from speech in practice. All the individual color of speech—personal emphasis, speed, personal cadence, personal pitch—is a non-linguistic fact, just as the incidental expression of desire and emotion are, for the most part, alien to linguistic expression. Speech, like all elements of culture, demands conceptual selection, inhibition of the randomness of instinctive behavior. That its "idea" is never realized as such in practice, its carriers being instinctively animated organisms, is of course true of each and every aspect of culture.

[4_3].Purely acoustic classifications, such as more easily suggest themselves to a first attempt at analysis, are now in less favor among students of phonetics than organic classifications. The latter have the advantage of being more objective. Moreover, the acoustic quality of a sound is dependent on the articulation, even though in linguistic consciousness this quality is the primary, not the secondary, fact.

[4_4].By "quality" is here meant the inherent nature and resonance of the sound as such. The general "quality" of the individual's voice is another matter altogether. This is chiefly determined by the individual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rynx and is of no linguistic interest whatever.

[4_5].As at the end of the snappily pronounced no! (sometimes written nope!) or in the over-carefully pronounced at all, where one may hear a slight check between the *t* and the *a* .

[4_6]."Singing" is here used in a wide sense. One cannot sing continuously on such a sound as b or d, but one may easily outline a tune on a series of b's or d's in the manner of the plucked "pizzicato" on stringed instruments. A series of tones executed on continuant consonants, like m, z, or l, gives the effect of humming, droning, or buzzing. The sound of "humming," indeed, is nothing but a continuous voiced nasal, held on one pitch or varying in pitch, as desired.

[4_7].The whisper of ordinary speech is a combination of unvoiced sounds and "whispered" sounds, as the term is understood in phonetics.

[4_8].Aside from the involuntary nasalizing of all voiced sounds in the speech of those that talk with a "nasal twang."

[4_9].These may be also defined as free unvoiced breath with varying vocalic timbres. In the long Paiute word quoted on page 31 the first u and the final ü are pronounced without voice.

[4_10].Nasalized stops, say m or n, can naturally not be truly "stopped," as there is no way of checking the stream of breath in the nose by a definite articulation.

[4_11].The lips also may theoretically so articulate. "Labial trills," however, are certainly rare in natural speech.

[4_12].This position, known as "faucal," is not common.

[4_13]."Points of articulation" must be understood to include tongue and lip positions of the vowels.

[4_14].Including, under the fourth category, a number of special resonance adjustments that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take up specifically.

[4_15].In so far, it should be added, as these sounds are expiratory, i.e., pronounced with the outgoing breath. Certain languages, like the South African Hottentot and Bushman, have also a number of inspiratory sounds, pronounced by sucking in the breath at various points of oral contact. These are the so-called "clicks."

[4_16].The conception of the ideal phonetic system, the phonetic pattern, of a language is not as well understood by linguistic students as it should be. In this respect the unschooled recorder of language, provided he has a good ear and a genuine instinct for language, is often at a great advantage as compared with the minute phonetician, who is apt to be swamped by his mass of observations. I have already employed my experience in teaching Indians to write their own language for its testing value in another connection. It yields equally valuable evidence here. I found that it was difficult or impossible to teach an Indian to make phonetic distinctions that did not correspond to "points in the pattern of his language," however these differences might strike our objective ear, but that subtle, barely audible, phonetic differences, if only they hit the "points in the pattern," were easily and voluntarily expressed in writing. In watching my Nootka interpreter write his language, I often had the curious feeling that he was transcribing an ideal flow of phonetic elements which he heard, inadequately from a purely objective standpoint, as the intention of the actual rumble of speech.

[5_1].注意“自主”这个词。我们喊叫或者咕哝或者以其他方式随意发声（比如我们在晴朗的春日独自走在乡间就可能这么做）时，就不再是通过自主的控制来进行语音调节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乎一定会碰巧发出我们在实际言语中从未学会操控的语音。

[5_2].如果就其听觉和发声属性而言言语确实是个刚性的系统，那么人们可以貌似合理地提出质疑：为什么没有两个人说话一个样？答案很简单。所有不属于这个刚性的发音框架的言语成分都不是表达观念的言语成分，而只是额外添加的、或多或少由本能决定的复合声响效果，无法与实际的言语分离开来。言语的所有个性色彩——个人的强调、语速、个人的节奏、个人的音高——都是非语言事实，如同偶发的欲望表达和情感表达大多数都与语言表达无关一样。言语，像所有的文化成分一样，需要概念的选择，需要抑制本能行为的随意性。因其承载者是受本能驱使的生物有机体，故

其“观念”在实践中从未得以真正实现。当然，文化的每一个层面皆是如此。

[5_3].纯粹的听觉性质的分类，例如在初期的分析中比较容易显现出来的分类，现在不如基于器官的分类更受语音学者青睐。后者的优势在于更加客观。再者，一个语音的音响性质取决于发声的方式，尽管在语言意识中，这种音质是主要事实，而非次要事实。

[5_4].这里的“音质”指的是语音本身的内在属性和共鸣。个人声音的一般“音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主要由个人喉头的解剖属性决定，不具有任何语言学意义。

[5_5].比如在断然说出的no!（有时写作nope!）的尾部，或者在过分认真地发出的at all中。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可以听到t和a之间有个轻微的阻塞。

[5_6].译者注：列托语即拉脱维亚语。

[5_7].在这里“唱”取其宽泛的意义。人无法连续不断地唱b或d等音，但是却可以很容易地像在弦乐器上用“拨弦”手法那样用一连串b音或者d音构成一段曲调。用可以持续的辅音（如m、z或者l）作出的一连串乐音会产生嗡嗡、隆隆或者嗞嗞的效果。“嗡嗡”声说到底只是一个持续的带声响的鼻音，其音高可以随意保持一致，也可以变化。

[5_8].日常言语中的耳语是不带声的音和语音学中所说的“耳语”音的组合。

[5_9].那些讲话带有鼻音的人士把所有带声的语音都不由自主地鼻音化了，这种现象这里不予讨论。

[5_10].这些[不带声的元音]也可以被定义为带有不同程度的元音音色的、自由而且不带声的气流。本书第31页所引的那个长长的派尤特语词中的第一个u音和最后的ü音都不带声。

[5_11].鼻化塞音，例如m或n，自然不可能真的被“阻塞”，因为我们无法用一个确定的发声方式来阻挡鼻腔里的气流。

[5_12].在理论上，双唇也可以如此发音。但“唇颤音”在自然言语中肯定是很少见的。

[5_13].这个位置的发音被称为“咽喉软腭音”，不常见。

[5_14].我们必须明白，“发音点”包括元音的舌位和唇位。

[5_15].第四类中包括一些特殊的、我们还未能进行专门讨论的共鸣调节。

[5_16].应该补充一句，前提是这些音是呼气音，即通过向外呼出气流而发出的音。有些语言，如南非的霍屯督语和布须曼语，也有一些吸气音，在多个口腔接触点上通过吸气来发声。这些就是所谓的“咂音”。

[5_17].译者注：奥吉布瓦语是北美印第安语的一种。

[5_18].对语言的理想语音系统、或者说语音模式的认知，语言学者们的理解并不到位。
在这一点上，没有经过学校训练的语言记录者，只要具有良好的听力和真正的语言天分，往往会比琐碎的语音学家更具优势，因为后者容易被淹没在海量的观察里。
我曾把自己教印第安人书写其本族语言的经验运用到其他方面，来验证其价值。
这种经验在这里也提供了同样有价值的证据。
我发现，很难、甚至不可能教印第安人辨别与“其母语模式中的[发音]点”不对应的语音差别，无论这些差别对我们这些客观听者而言多么明显，但是他们却能轻松自主地用书面形式来表现那些微妙的、几乎难以觉察的语音差别，只要那些差别碰到了“模式中的发音点”。
看着我那位努特卡口译员书写他的语言，我经常萌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是在转写一种他所听到的、作为实际的言语洪流意图的、理想的语音成分流，尽管从纯客观的角度看，他所听到的并不充分。

Chapter 4 Form in Language: Grammatical Processes

第四章　语言里的形式：语法程序

The question of form in language presents itself under two aspects. We may either consider the formal methods employed by a language, its “grammatical processes,” or we may ascertain the distribution of concepts with reference to formal expression. What are the formal patterns of the language? And what types of concepts make up the content of these formal patterns? The two points of view are quite distinct. The English word *unthinkingly* is, broadly speaking, formally parallel to the word *reformers* , each being built up on a radical element which may occur as an independent verb (*think, form*), this radical element being preceded by an element *(un-, re—)* that conveys a definite and fairly concrete significance but that cannot be used independently, and followed by two elements *(-ing,-ly;-er,-s)* that limi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adical concept in a relational sense. This formal pattern—(b) + A + (c) + (d) [5_1] —is a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the language. A countless number of functions may be expressed by it; in other words, all the possible ideas conveyed by such prefixed and suffixed elements, while tending to fall into minor groups, do not necessarily form natural, functional systems. There is no logical reason, for instance, why the numeral functionof -s should be formally expressed in a manner that is analogous to the expression of the idea conveyed by-ly. It is perfectly conceivable that in another language the concept of manner (*-ly*) may be treated according to an entirely different pattern from that of plurality. The former might have to be expressed by an independent word (say, *thus unthinking*), the latter by a prefixed element (say, *plural* [5_2] *-reform-er*). There are, of

course, an unlimited number of other possibilities. Even within the confines of English alone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of form and function can be made obvious. Thus, the negative idea conveyed by *un-* can be just as adequately expressed by a suffixed element *(-less)* in such a word as *thoughtlessly*. Such a twofold formal expression of the negative function would be inconceivable in certain languages, say Eskimo, where a suffixed element would alone be possible. Again, the plural notion conveyed by the *-s* of *reformers* is just as definitely expressed in the word *geese* , where an utterly distinct method is employed. Furthermore, the principle of vocalic change (*goose -geese*) is by no means confined to the expression of the idea of plurality; it may also function as an indicator of difference of time (e.g., *sing-sang, throw-threw*). But the expression in English of past time is not by any means always bound up with a change of vowel. In the great majority of cases the same idea is expressed by means of a distinct suffix *(die-d, work-ed)* . Functionally, *died* and *sang* are analogous; so are *reformers* and *geese* . Formally, we must arrange these words quite otherwise. Both die-d and *re-form-er-s* employ the method of suffixing grammatical elements; both *sang and geese* have grammatical form by virtue of the fact that their vowels differ from the vowels of other words with which they are closely related in form and meaning *(goose; sing, sung)* .

语言里的形式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我们既可以考察某种语言使用的形式手段，即其“语法程序”，也可以探究与形式表达相对应的概念分布。语言的形式格局有哪些？又是哪些类型的概念构成了这些形式格局的内容？这两个视角是相当不同的。广义地讲，英语词unthinkingly（不假思索地）在形式上与reformers（改革者们）一词平行：二者都基于一个可以作为独立动词出现的根本成分（think思索和form形成）；这个根本成分之前都有一个先行成分（un-和re-），该先行成分有明确的且相当具体的意思，但是不能独立使用；根本成

分之后都跟着两个成分（-ing和ly；-er和-s），在关系上限制着根本概念的使用。这种形式格局——（b）+A+（c）+（d）[6_1]——是英语的一种典型特征。它可以表达无数的功能；换言之，此类前缀和后缀成分可能表达的所有观念，虽有分成小类别的趋势，但未必构成自然的功能系统。例如，为什么-s的数量功能与-ly所传递的观念在形式上用的是类似的表达方式？对此并没有符合逻辑的理由。完全可以想象，在另一种语言里，“方式”概念（-ly）的表达可能依据完全不同于“复数”概念-s的格局来处理。前者可能必须用一个独立的词来表达（如thus unthinking这样不假思索），后者则由一个前缀成分来表达（如plural [6_2] -reform-er复数-改革-者）。当然，还有无数其他的可能。即使仅仅在英语的范围内，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形式和功能是相对独立的。例如，在thoughtlessly（欠思量地）等词里，由un-表达的否定意义可凭借后缀成分-less同样充分地表达出来。像这样用两种形式表达否定功能在某些语言（如爱斯基摩语）里是无法想象的，在这些语言里只能采用后缀成分。再如，reformers中-s表达的复数观念在geese（“鹅”goose的复数）一词里也同样确定地表达出来了，但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而且，元音变化（从goose到geese）的原则绝非仅限于复数观念的表达；它还可以用于指示时间的差别（如sing—sang“唱”和“唱”的过去式，throw—threw“扔”和“扔”的过去式）。但是英语中过去时的表达绝非总是与元音变化绑缚在一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观念都通过一个特定的后缀来表达（die-d“死”die的过去式，work-ed“工作”work的过去式）。从功能上说，died和sang相类；reformers和geese也相类。从形式上说，我们则必须将这些词区别对待。die-d和re-form-er-s都采用了添加后缀语法成分的方法；而sang和geese之所以具有语法形式，则是因为它们的元音不同于跟它们在形式和意义上密切相关的其他词的元音（goose；sing，sung——sing的过去分词）。

Every language possesses one or more formal methods for indicating the relation of a secondary concept to the main concept of the radical element. Some of these grammatical processes, like

suffixing, are exceedingly wide-spread; others, like vocalic change, are less common but far from rare; still others, like accent and consonantal change, are somewhat exceptional as functional processes. Not all languages are as irregular as English in the assignment of functions to its stock of grammatical processes. As a rule, such basic concepts as those of plurality and time are rendered by means of one or other method alone, but the rule has so many exceptions that we cannot safely lay it down as a principle. Wherever we go we are impressed by the fact that pattern is one thing, the utilization of pattern quite another. A few further examples of the multiple expression of identical functions in other languages than English may help to make still more vivid this idea of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of form and function.

每一种语言都具有一种或多种形式方法来指示根本成分的次要概念与主要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些语法程序中，有的非常普遍，例如添加后缀；有的则不甚普遍，但也并不罕见，例如元音变化；还有的作为功能程序颇有些例外，例如重音和辅音变化。在将功能指派给语言所拥有的语法程序方面，并非所有语言都像英语这样不规则。通常，复数和时间等基本概念由这种或那种方式单独表达，但是这条规则的例外相当多，以至于我们无法稳妥地将其确立为一条原则。无论我们去到哪种语言里，都会惊讶地发现，格局是一回事，而格局的使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再从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中举出几个同一功能对应多种表达的例子，来帮助我们更生动地阐明形式和功能相对独立这一观念。

In Hebrew, as in other Semitic languages, the verbal idea as such is expressed by three, less often by two or four, characteristic consonants. Thus, the group *sh-m-r* expresses the idea of “guarding,” the group *g-n-b* that of “stealing,” *n-t-n* that of “giving.” Naturally

these consonantal sequences are merely abstracted from the actual forms. The consonants are held together in different forms by characteristic vowels that vary according to the idea that it is desired to express. Prefixed and suffixed elements are also frequently used. The method of internal vocalic change is exemplified in *shamar* “he has guarded,” *shomer* “guarding,” *shamur* “being guarded,” *shmor* “(to) guard.” Analogously, *ganab* “he has stolen,” *goneb* “stealing,” *ganub* “being stolen,” *gnob* “(to) steal.” But not all infinitives are formed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shmor* and *gnob* or of other types of internal vowel change. Certain verbs suffix a *t* -element for the infinitive, e.g., *ten-eth* “to give,” *heyo-th* “to be.” Again, the pronominal ideas may be expressed by independent words (e.g., *anoki* “I”), by prefixed elements (e.g., *e-shmor* “I shall guard”), or by suffixed elements (e.g., *shamar-ti* “I have guarded”). In Nass, an Indian language of British Columbia, plurals are formed by four distinct methods. Most nouns (and verbs) are reduplicated in the plural, that is, part of the radical element is repeated, e.g., *gyat* “person,” *gyigyat* “people.” A second method is the use of certain characteristic prefixes, e.g., *an'on* “hand,” *ka-an'on* “hands”; *wai* “one paddles,” *lu-wai* “several paddle.” Still other plurals are formed by means of internal vowel change, e.g., *gwula* “cloak,” *gwila* “cloaks.” Finally, a fourth class of plurals is constituted by such nouns as suffix a grammatical element, e.g., *waky* “brother,” *wakykw* “brothers.”

比如，与其他闪米特语一样，希伯来语中的动词性观念本身是用三个特殊辅音表达的，少数时候也用两个或者四个特殊辅音表达。例如，sh-m-r组合表达“守卫”的意思，g-n-b组合表达“偷”，n-t-n组合表达“给”。自然，这些辅音串只是从实际形式中抽象出来的。根据要表达的意思，这些辅音被特定的元音用不同的形式连接起来。前缀和后缀成分也是经常用到的。内部元音变化这一方法体现在如下四个形式

中：*shamar* “他已经守卫了”，*shomer* “正在守卫”，*shamur* “被守卫”，和*shmor* “（不定式）守卫”。与此相类的是：*ganab* “他已经偷了”，*goneb*“正在偷”，*ganub*“被偷”，和*gnob*“（不定式）偷”。但是并非所有不定式都是按照*shmor* 和*gnob* 的类型或者其他的内部元音变化类型构成的。有些动词将一个*t-* 成分加在词尾来表示不定式，例如*ten-eth* 是“给”的不定式，*heyo-th* 是“是”的不定式。此外，表达代词性观念可以借助独立的词（如*anoki* “我”）、前缀成分（如*e-shmor* “我将守卫”）或者后缀成分（如*shamar-ti* “我已守卫过”）。在纳斯语（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种印第安语）中，复数形式是通过四种不同的方法构成的。多数名词（以及动词）用重复表示复数形式，即重复根本成分的一部分，例如*gyat* “人（单数）”和*gyigyat* “人（复数）”。第二种方法是使用某些特殊前缀，如*an'on* “手（单数）”和*ka-an'on* “手（复数）”，*wai* “一人划桨”和*lu-wai* “数人划桨”。还有些复数是通过内部元音变化形成的，如*gwula* “斗篷（单数）”和*gwila* “斗篷（复数）”。最后，第四类复数由名词加上一个后缀语法成分构成，如*waky* “哥哥／弟弟（单数）”和*wakykw* “哥哥／弟弟（复数）”。

From such groups of examples as these—and they might be multiplied *adnauseam* —we cannot but conclude that linguistic form may and should be studied as types of patterning, apart from the associated functions. We are the more justified in this procedure as all languages evince a curious instin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ne or more particular grammatical processes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tending always to lose sight of any explicit functional value that the process may have had in the first instance, delighting, it would seem, in the sheer play of its means of expression. It does not matter that in such a case as the English *goose-geese, foul-defile, sing-sang-sung* we can prove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historically distinct processes, that the vocalic alternation of *sing* and *sang* , for instance, is centuries older as a specific type of grammatical process than the

outwardly parallel one of *goose* and *geese* . It remains true that there is (or was) an inherent tendency in English, at the time such forms as *geese* came into being, for the utilization of vocalic change as a significant linguistic method. Failing the precedent set by such already existing types of vocalic alternation as *sing-sang-sung* , it is highly doubtful if the detailed conditions that brought about the evolution of forms like *teeth* and *geese* from *tooth* and *goose* would have been potent enough to allow the native linguistic feeling to win through to an acceptance of these new types of plural formation as psychologically possible. This feeling for form as such, freely expanding along predetermined lines and greatly inhibited in certain directions by the lack of controlling types of patterning, should be more clearly understood than it seems to be. A general survey of many diverse types of languages is needed to give us the proper perspective on this point. We saw in the preceding chapter that every language has an inner phonetic system of definite pattern. We now learn that it has also a definite feeling for patterning on the level of grammatical formation. Both of these submerged and powerfully controlling impulses to definite form operate as such, regardless of the need for expressing particular concepts or of giving consistent external shape to particular groups of concepts.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se impulses can find realization only in concrete functional expression. We must say something to be able to say it in a certain manner.

同样的例子可以多得令人作呕，而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结论：语言形式可以而且应该被作为格局类型来研究，而不涉及连带的功能。我们这么做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所有语言都展示出一种奇怪的本能，即牺牲其他语法程序，来发展某一种或几种语法程序，并且总是倾向于无视该程序最初可能具备的任何明确的功能价值，而似乎仅仅陶醉于它的表现手法。就goose—geese、foul—defile（脏—弄脏）和sing

—sang—sung等例子而言，我们可以证明它们在历史上是不同的语法程序，例如，sing和sang之间的元音变化，作为一种特定的语法程序，要比看似平行的goose和geese之间的元音变化早好几个世纪。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不管怎样，还是不可否认在geese等形式产生之时，英语中就有（或曾经有）一种内在趋势，将元音变化用作一种有意义的语言手段。如果没有sing—sang—sung这种业已存在的元音变化作为先例，我很怀疑那些促成tooth（牙单数）和goose演变为teeth（牙复数）和geese的具体条件会足够强大，能让本族语情感贯彻至终，直至人们接受这些新的复数构成类型，认为它们在心理上是可能的。这种对形式本身的情感——即一方面按照预定的线路自由地展开，另一方面被约束性格局类型的缺失在某些方向上极大地抑制——是应该被更加清晰地理解的，但我们似乎还没有做到。我们需要全面考察多种不同类型的语言才能很好地观照这一点。在上一章我们看到，每种语言都有一个具有确定格局的内在语音系统。现在我们又了解到，每种语言在语法构造层面上也有一种对格局的确定的感受。这两种对确定形式的潜在的且具有强大约束力的冲动就这样发挥着作用，而无视表达具体概念或赋予特定概念群一致的外在形状的需求。不用说，这两种冲动只有在具体的功能表达中才能得以实现。因为我们必须先说点什么，才谈得上以某种方式来说它。

Let us now take up a little more systematically, however briefly, the various grammatical processes that linguistic research has established. They may be grouped into six main types: word order; composition; affixation, including the use of prefixes, suffixes, and infixes; internal modification of the radical or grammatical element, whether this affects a vowel or a consonant; reduplication; and accentual differences, whether dynamic (stress) or tonal (pitch). There are also special quantitative processes, like vocalic lengthening or shortening and consonantal doubling, but these may be looked upon as particular sub-types of the process of internal modification. Possibly still other formal types exist, but

they are not likely to be of importance in a general survey. It is important to bear in mind that a linguistic phenomenon cannot be looked upon as illustrating a definite “process” unless it has an inherent functional value. The consonantal change in English, for instance, of *book-s* and *bag-s (s* in the former, *z* in the latter) is of no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It is a purely external, mechanical change induced by the presence of a preceding voiceless consonant, *k* , in the former case, of a voiced consonant, *g* , in the latter. This mechanical alternation is objectively the same as that between the noun *house* and the verb *tohouse* . In the latter case, however, it has an important grammatical function, that of transforming a noun into a verb. The two alternations belong, then, to entirely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categories. Only the latter is a true illustration of consonantal modification as a grammatical process.

现在，让我们略微系统地——尽管仍是简短地——讨论几种业已为语言研究所证实的语法程序。它们可分为六大类：［1］词序；［2］复合；［3］添加词缀，包括前缀、后缀和中缀；［4］根本成分或语法成分的内部变化，可以涉及元音，也可以涉及辅音；［5］重叠；以及［6］重音差别，包括动态（重音）和声调（音高）上的差别。还有一些特殊的量的变化程序，如元音变长或变短以及辅音叠加，但是这些可被视为内部变化这一程序的特殊的子类别。可能还存在其他的形式类型，但是在我们现在所做的一般性论述中它们可能并不重要。有必要记住的是，不能将一个语言现象视为展示了某个确定的语法“程序”，除非它具有内在的功能价值。例如，英语词book-s和bag-s（前者的发音是s，后者的发音是z）的辅音变化就没有功能价值。它纯粹是一个外在的、机械性的变化：前者由前面不带声的辅音k引起，后者由前面带声的辅音g引起。客观上讲，这种机械变化跟名词house（房子）和动词to house（提供住房）之间的变化 [6_3] 是一样的。但是，后一种情况下的变化有一个重要的语法功能，即把名词转换为动词。因此，这两种变化属于完全不同的心理范畴。只有后者

才真正体现了作为语法程序的辅音变化。

The simplest, at least the most economical, method of conveying some sort of grammatical notion is to juxtapose two or more words in a definite sequence without making any attempt by inherent modification of these words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Let us put down two simple English words at random, say *sing praise.* This conveys no finished thought in English, nor does it clearly establish a relation between the idea of singing and that of praising. Nevertheless, it is psychologically impossible to hear or see the two words juxtaposed without straining to give them some measure of coherent significance. The attempt is not likely to yield an entirely satisfactory result, but what is significant is that as soon as two or more radical concepts are put before the human mind in immediate sequence it strives to bind them together with connecting values of some sort. In the case of *sing praise* different individuals are likely to arrive at different provisional results. Some of the latent possibilities of the juxtaposition, expressed in currently satisfying form, are: *sing praise (to him)!* or*singing praise, praise expressed in a song* or *to sing and praise* or *one who sings a song of praise* (compare such English compounds as *killjoy,* i.e., *one who kills joy)* or *he sings a song of praise (to him)* . The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in the way of rounding out these two concepts into a significant group of concepts or even into a finished thought are indefinitely numerous. None of them will quite work in English, but there are numerous languages where one or other of these amplifying processes is habitual. It depends entirely on the genius of the particular language what function is inherently involved in a given sequence of words.

［1］要表达某种语法观念，最简单、至少是最经济的方法是按照确定的次序把两个或多个词组合起来，而绝不尝试改变这些词本身，以在它们之间建立某种联系。我们不妨随手写下两个简单的英语词，比如sing　praise（唱赞）。在英语中，这个组合并不传达什么完整的思想，也没有在“唱”和“夸”这两个观念之间明确地建立起联系。然而，我们听到或者看到这两个词被放在一起的时候，在心理上不可能不努力为它们赋予某种程度上的连贯意义。这种努力不太可能产生完全令人满意的结果，但重要的是，人的心智只要接触到两个或者多个相邻出现的根本概念，就会尽力用某种关联值把它们连结在一起。就sing　praise而言，不同的人可能得出不同的临时结果。在该组合可能被赋予的意义中，有的用现成的令人满意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是：“赞美（他）！”，或者“唱出来的赞美”，即“用歌曲表达的赞美”，或者“且唱且赞”，或者“唱赞歌的人”（试与某些英语复合词作比，如killjoy，即“煞风景的人”[6_4]），或者“他（对他）唱一首赞歌”。理论上讲，将“唱”和“赞”这两个概念圆融为一个有具体所指的概念集甚至一个完整的思想，有无数种可能的方式。在英语中，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完全行得通，但是在很多其他语言里，这些引申过程中会有这一种或那一种是惯常使用的。某一串词语包含什么内在功能，完全取决于具体语言的禀赋。

Some languages, like Latin, express practically all relations by means of modifications within the body of the word itself. In these, sequence is apt to be a rhetorical rather than a strictly grammatical principle. Whether I say in Latin *hominem feminavidet* or*femina hominem videt* or *hominem videtfemina* or *videtfemina hominem* makes little or no difference beyond, possibly, a rhetorical or stylistic one. *The woman sees the man* is the identical significance of each of these sentences. In Chinook, an Indian language of the Columbia River, one can be equally free,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verb and the two nouns is as inherently fixed as in Lat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is that, while Latin allows the nouns to establish

their relation to each other and to the verb, Chinook lays the formal burden entirely on the verb, the full content of which is more or less adequately rendered by *she—him-sees* . Eliminate the Latin case suffixes *(-a and -em)* and the Chinook pronominal prefixes (*she-him* -) and we cannot afford to be so indifferent to our word order. We need to husband our resources. In other words, word order takes on a real functional value. Latin and Chinook are at one extreme. Such languages as Chinese, Siamese, and Annamite, in which each and every word, if it is to function properly, falls into its assigned place, are at the other extreme. But the majority of languages fall 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s. In English, for instance, it may make little grammatical difference whether I say *yesterday the man saw the dog* or *the man saw the dog yesterday* , but it is not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whether I say *yesterday the man saw the dog* or *yesterday the dog saw the man* or whether I say *he is here* or *is he here?* In the one case, of the latter group of examples, the vital distinc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depends entirely on the placing of certain words of the sentence, in the latter a slight difference of sequence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tatement and question.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in these cases the English principle of word order is as potent a means of expression as is the Latin use of case suffixes or of an interrogative particle. There is here no question of functional poverty, but of formal economy.

有些语言，如拉丁语，通过词本身的内部变化来表达几乎所有的关系。在这些语言中，词序往往是一种修辞原则，而不是严格的语法原则。无论我用拉丁语说*hominem femina videt* ，还是*femina hominem videt* ，还是*hominem videt femina* ，亦或*videt femina hominem* [6_5] ，除了可能的修辞或者风格上的差异之外，鲜有或者没有其他差别。这几句话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即“那女人看到那男人”。在奇努克语（哥伦比亚河流域的一种印第安语言）中，人们的

表达可以同样自由，因为动词“看到”和两个名词“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在拉丁语中一样，是被内在地固定了的。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在于，拉丁语允许两个名词彼此建立关系，也允许它们与动词建立关系，而奇努克语则将所有的形式负担都放到了动词身上，其全部内容可以大致充分地表述为she-him-sees（她主格-他宾格-看见）。如果去掉拉丁语表示格的后缀（*-a* 和*-em* ）和奇努克语的代词前缀（she-him-），我们就无法如此漠视词序了。我们需要节约利用我们的资源。换句话说，如此一来词序就具有了真正的功能价值。拉丁语和奇努克语属于一个极端，它们的词序没有功能价值。汉语、暹罗语和安南语等语言则属于另一个极端，在这些语言中，每个词如果要正常地发挥作用，就必须被放到指定位置。不过大多数语言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例如，在英语中，无论我说yesterday the man saw the dog（昨天这个人看见这只狗），还是说the man saw the dog yesterday（这个人看见这只狗昨天），在语法上可能都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说yesterday the man saw the dog（昨天这个人看见这只狗）和说yesterday the dog saw the man（昨天这只狗看见这个人，以及说he is here（他在这里）和说is he here?（他在这里吗？），就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了。对于后面这两对例子，在第一对中，主语和宾语的关键区别完全依赖于句中某些词的位置；在第二对中，词序上的微调便产生了陈述句和疑问句之间的全部差别。在这些例子中，不用说，英语的词序原则是一种有力的表达手段，跟拉丁语的格后缀或者疑问小品词的使用一样。这不是功能匮乏的问题，而是形式经济的问题。

We have already seen something of the process of composition, the uniting into a single word of two or more radical elements. Psychologically this process is closely allied to that of word order in so far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lements is implied, not explicitly stated. It differs from the mere juxtaposition of words in the sentence in that the compounded elements are felt as constituting but parts of a single word—organism. Such languages as Chinese

and English, in which the principle of rigid sequence is well developed, tend not infrequently also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pound words. It is but a step from such a Chinese word sequence as*jintak* “man virtue,” i.e., “the virtue of men,” to such more conventionalized and psychologically unified juxtapositions as *t'ientsz* “heaven son,” i.e., “emperor,” or*shuifu* “water man,” i.e., “water carrier.” In the latter case we may as well frankly write *shui-fu* as a single word, the meaning of the compound as a whole being as divergent from the precise etymological values of its component elements as is that of our English word *typewriter* from the merely combined values of *type* and *writer* . In English the unity of the word *typewriter* is further safeguarded by a predominant accent on the first syllable and by the possibility of adding such a suffixed element as the plural-s to the whole word. Chinese also unifies its compounds by means of stress. However, then, in its ultimate origins the process of composition may go back to typical sequences of words in the sentence, it is now, for the most part, a specialized method of expressing relations. French has as rigid a word order as English but does not possess anything like its power of compounding words into more complex units. On the other hand, classical Greek, in spite of its relative freedom in the placing of words, has a very considerable bent for the formation of compound terms.

[2] 我们已经接触过一点复合程序，就是把两个或多个根本成分组合成一个词。在心理上，就各成分之间的关系是暗示而非明示这一点而言，复合程序是与词序密切相关的。它和句中词的单纯组合不同，因为人们觉得被复合的成分不过是某个单词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像汉语和英语这样严格的词序原则很发达的语言，也经常倾向于发展复合词。在汉语中 [6_6] ，从“人德”（人的美德）这类词序到“天子”（皇帝）和“水夫”（担水的人）这种更加约定俗成而且在心理上更

具统一性的组合，不过一步之遥。在后一种情况中，我们甚至可以干脆将“水夫”写作一个复合词，其整体意思与其各个成分的精确的词源价值不同，就如英语词typewriter（打字机）的意思与type（打字）和writer（作者）的价值的简单相加不同一样。在英语中，typewriter一词的统一性还得到两个因素的进一步保护，即第一个音节上的主要重音和给整个词添加复数-s等后缀成分的可能性。汉语也用重音来统一复合词。所以，虽然复合程序的本源可以追溯到句子中的典型词序，但它现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种表达关系的专门方法。法语和英语一样，都有严格的词序，但是法语远没有像英语那样把几个词合成为更复杂单位的能力。相反，在古希腊语中，尽管词的放置相对自由，该语言却相当喜欢构成复合词。

It is curious to observe how greatly languages differ in their ability to make use of the process of composition. One would have thought on general principles that so simple a device as gives us our *typewriter* and *blackbird* and hosts of other words would be an all but universal grammatical process. Such is not the case. There are a great many languages, like Eskimo and Nootka and, aside from paltry exceptions, the Semitic languages, that cannot compound radical elements. What is even stranger is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se languages are not in the least averse to complex word—formations, but may on the contrary effect a synthesis that far surpasses the utmost that Greek and Sanskrit are capable of. Such a Nootka word, for instance, as “when, as they say, he had been absent for four days” might be expected to embody at least three radical eleme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concepts of “absent,” “four,” and “da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Nootka word is utterly incapable of composition in our sense. It is invariably built up out of a single radical element and a greater or less number of suffixed elements, some of which may have as concrete a significance as the radical element itself. Inthe particular case we have cited, the radical

element conveys the idea of “four,” the notions of “day” and “absent” being expressed by suffixes that are as inseparable from the radical nucleus of the word as is an English element like-erfrom the *sing* or *hunt* of such words as *singer* and *hunter* . The tendency to word synthesis is, then, by no means the same thing as the tendency to compounding radical elements, though the latter is not infrequently a ready means for the synthetic tendency to work with.

观察语言在运用复合程序的能力上的巨大差异，会令人颇感惊异。按照一般的原则，我们会觉得，为我们造出typewriter和blackbird（画眉）以及许多其他复合词的这么简单的一个机制应该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语法程序。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语言，如爱斯基摩语和努特卡语以及闪米特语族（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例外），都不能把根本成分复合起来。更奇怪的是，许多这类语言丝毫不排斥复杂的构词方法，相反，它们可能实现的综合程度远超希腊语和梵语之所能及。例如，我们也许会觉得“当他，如他们所说，已四天不在家”这个努特卡词应该包含至少三个根本成分，分别对应于“不在家”、“四”和“天”的概念。但事实上，努特卡词完全无法进行我们所说的复合。它总是由一个简单的根本成分和或多或少的后缀成分构成，有些后缀可能拥有像根本成分自身一样的具体意义。在我们所引用的这个具体例子中，根本成分传递“四”的观念，而“天”和“不在家”则由后缀表达。这些后缀与词的根本核心不可分割，就像在英语词singer（歌手）和hunter（猎人）里，后缀成分-er与根本成分sing和hunt不可分离一样。所以说对单词进行综合的趋势与对根本成分进行复合的趋势完全不是一回事，尽管后者作为一种现成的手段，常常与综合趋势共同发挥作用。

There is a bewildering variety of types of composition. These types vary according to function, the nature of the compounded elements, and order. In a great many languages composition is

confined to what we may call the delimiting function, that is, of the two or more compounded elements one is given a more precisely qualified significance by the others, which contribute nothing to the formal build of the sentence. In English, for instance, such compounded elements as *red* in *redcoat* or *over* in *overlook* merely modif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ominant *coat* or *look* without in any way sharing, as such, in the predication that is expressed by the sentence. Some languages, however, such as Iroquois and Nahuatl, [5_3] employ the method of composition for much heavier work than this. In Iroquois, for instance, the composition of a noun, in its radical form, with a following verb is a typical method of expressing case relations, particularly of the subject or object. I—*meat*—*eat* for instance, is the regular Iroquois method of expressing the sentence *Iam eating meat* . In other languages similar forms may express local or instrumental or still other relations. Such English forms as *killjoy* and *marplot* also illustrate the compounding of a verb and a noun, but the resulting word has a strictly nominal, not a verbal, function. We cannot say *hemarplots* . Some languages allow the composition of all or nearly all types of elements. Paiute, for instance, may compound noun with noun, adjective with noun, verb with noun to make a noun, noun with verb to make a verb, adverb with verb, verb with verb. Yana, an Indian language of California, can freely compound noun with noun and verb with noun, but not verb with verb. On the other hand, Iroquois can compound only noun with verb, never noun and noun as in English or verb and verb as in so many other languages. Finally, each language has its characteristic types of order of composition. In English the qualifying element regularly precedes; in certain other languages it follows. Sometimes both types are used in the same language, as in Yana, where “beef” is “bitter-venison” but “deer-liver” is expressed by “liver-deer.” The compounded object of a verb precedes the verbal element in Paiute, Nahuatl, and Iroquois,

follows it in Yana, Tsimshian, [5_4] and the Algonkin languages.

复合的类型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乱。这些类型在功能上、复合成分的性质上和顺序上都有差别。在许多语言中，复合局限于可被称为限制性的功能，即在两个或多个复合成分中，其中一个成分被其他成分赋予了更精确限定的意义，而其他成分对句子的形式结构毫无影响。例如，在英语中，如redcoat（红衫军）[6_7] 中的red（红色）和overlook（忽视）中的over（在……之上）这样的复合成分仅仅修饰处于统辖位置的coat（上衣）和look（看），它们本身毫不参与句子所表达的断言。然而，有些语言，如易洛魁语和纳瓦特语 [6_8] ，却使用复合法来承担更重的任务。例如，在易洛魁语中，将名词以根本成分形式与后面的动词复合起来是一种表示格关系的典型方法，尤其用于表示主格和宾格。例如，“我-肉-吃”是易洛魁语表达“我正在吃肉”的常规方法。在其他语言中，类似的形式可以表达处所、工具乃至其他关系。killjoy和marplot（捣乱的人） [6_9] 等英语词也体现了动词和名词的复合，但是由此产生的新词却承担严格的名词而非动词功能。所以我们不能说he marplots（他捣乱的人）。有些语言允许对所有或几乎所有类型的成分进行复合。例如，在派尤特语中，名词和名词、形容词和名词、动词和名词都可以复合为名词，名词和动词可以复合为动词，而副词和动词、动词和动词也可以复合。雅纳语（加利福尼亚的一种印第安语言）可以自由地复合名词和名词、动词和名词，但是不能复合动词和动词。相反，易洛魁语只能复合名词和动词，而不能像英语那样复合名词和名词，或者像很多其他语言那样复合动词和动词。最后，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独特的复合顺序类型。在英语中，限定成分通常放在前面，在某些其他语言中则放在后面。有时，同一种语言会同时使用这两种类型，例如在雅纳语中，“牛肉”是“苦的-鹿肉”，但是“鹿肝”却被表述为“肝-鹿”。在派尤特语、纳瓦特语以及易洛魁语中，动词的复合宾语放在动词成分前面，在雅纳语、茨姆锡安语 [6_10] 和阿尔贡金语支中则放在动词成分后面。

Of all grammatical processes affixing is incomparably the most frequently employed. There are languages, like Chinese and Siamese, that make no grammatical use of elements that do not at the same time possess an independent value as radical elements, but such languages are uncommon. Of the three types of affixing—the use of prefixes, suffixes, and infixes-suffixing is much the commonest. Indeed, it is a fair guess that suffixes do more of the formative work of language than all other methods combined.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re are not a few affixing languages that make absolutely no use of prefixed elements but possess a complex apparatus of suffixes,Such are Turkish, Hottentot, Eskimo, Nootka, and Yana. Some of these, like the three last mentioned, have hundreds of suffixed elements, many of them of a concreteness of significance that would demand expression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languages by means of radical elements. The reverse case, the use of prefixed elements to the complete exclusion of suffixes, is far less common. A good example is Khmer (or Cambodgian), spoken in French Cochin-China, though even here there are obscure traces of old suffixes that have ceased to function as such and are now felt to form part of the radical element.

［３］在所有语法程序中，词缀法的使用最频繁，其他方法难与其匹敌。有些语言，比如汉语和暹罗语，不把那些不像根本成分一样同时拥有独立价值的成分用于语法用途，但是这类语言并不多见。在三种词缀法（加前缀、加后缀和加中缀）当中，加后缀应该说是最常见的。事实上，要说后缀担负的语言构词任务比其他所有方法之和还要多，也并不为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词缀的语言当中，有不少完全不用前缀成分，却拥有复杂的后缀体系，比如土耳其语、霍屯督语、爱斯基摩语、努特卡语和雅纳语。其中有些语言，如刚刚提到的最后三种，拥有数百个后缀成分，其中很多都有具体的意义，这些意义在绝大多数语言里都是需要用根本成分来表达的。相反的情况，即

使用前缀成分而完全排斥后缀，则罕见得多。法属交趾支那 [6_11] 地区的高棉语（又称柬埔寨语）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不过即使在该语言中仍留有一些古老后缀的模糊痕迹，它们不再承担后缀的功能，给人的感觉已是根本成分的组成部分了。

A considerable majority of known languages are prefixing and suffixing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but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two groups of affixed elements naturally varies enormously. In some languages, such as Latin and Russian, the suffixes alone relate the word to the rest of the sentence, the prefixes being confined to the expression of such ideas as delimit the concrete significance of the radical element without influencing its bearing in the proposition. A Latin form like *remittebantur* “they were being sent back” may serve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is type of distribution of elements. The prefixed element *re-* “back” merely qualifi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inherent significance of the radical element *mitt-* “send,” while the suffixes-*eba-,-nt-,* and *-ur* convey the less concrete, more strictly formal, notions of time, person, plurality, and passivity.

在已知的语言中，相当多数同时使用前缀和后缀，不过这两组词缀成分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语言中的差别自然是很大的。有些语言，如拉丁语和俄语，只用后缀将词和句子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前缀则仅用于表达某些限定根本成分的具体意义等观念，而不影响根本成分在命题中的地位。像*remittebantur* “他们那时正被送回”这样的拉丁语形式即可以说明这种成分分布类型。其中的前缀成分*re-* “回”只在一定程度上修饰根本成分*mitt-* “送”的内在意义，而后缀-*eba-* 、-*nt-* 和-*ur-* 表达的则是不那么具体的、更严格的形式性的观念，即时间、人称、复数和被动态。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languages, like the Bantu group of Africa or the Athabaskan languages [5_5] of North America, in which the grammatically significant elements precede, those that follow the radical element forming a relatively dispensable class. The Hupa word *te-s-e-ya-te* "I will go," for example, consists of a radical element-*ya-* "to go," three essential prefixes and a formally subsidiary suffix. The element *te-* indicates that the act takes place here and there in space or continuously over space; practically, it has no clear-cut significance apart from such verb stems as it is customary to connect it with. The second prefixed element,-*s-,* is even less easy to define. All we can say is that it is used in verb forms of "definite" time and that it marks action as in progress rather than as beginning or coming to an end. The third prefix,-*e-* , is a pronominal element, "I," which can be used only in "definite" tenses. It is highl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use of -*e-* is conditional on that of -s- or of certain alternative prefixes and that*te-* also is in practice linked with-s- . The group *te-s-e-ya* is a firmly knit grammatical unit. The suffix-*te* , which indicates the future, is no more necessary to its formal balance than is the prefixed *re* —of the Latin word; it is not an element that is capable of standing alone but its function is materially delimiting rather than strictly formal. [5_6]

相反，在有些语言中，比如非洲的班图语系或北美的阿萨巴斯卡语支 [6_12] ，有语法意义的词缀成分在前，根本成分之后的词缀成分则是相对可有可无的一类。比如，胡帕语的*te-s-e-ya-te* "我将去"一词包含一个根本成分-*ya-* "去"、三个必要的前缀和一个形式上的次要后缀。前缀成分*te-* 表明该行为发生在空间上的某处或者持续地发生在某区域；实际上，这个词缀除了它惯常连接的动词词干，并没有明确的意义。第二个前缀成分-*s-* 还要难定义一些。我们只能说它用在"有定的"时间的动词形式里，表示动作在进行中而不是刚刚开始或将要结

束。第三个前缀*-e-* 是一个代词性成分，即“我”，只能用在“有定的”时态中。需要提请注意的是，*-e-* 的使用是以*-s-* 或某些能代替*-s-* 的前缀的使用为前提条件的，而且*te-* 实际上也与*-s-* 相连。合起来，*te-s-e-ya* 这一组合是一个联系紧密的语法单位。后缀*-te* 指示将来，它对于该词的形式平衡并不比前面提到的拉丁词*remittebantur* 中的前缀*re-* 更必要；它不是一个能独立使用的成分，但是它的功能实质上是限定性的，而不是严格的形式性的。[6_13]

It is not always, however, that we can clearly set off the suffixes of a language as a group against its prefixes. In probably the majority of languages that use both types of affixes each group has both delimiting and formal or relational functions. The most that we can say is that a language tends to express similar functions in either the one or the other manner. If a certain verb expresses a certain tense by suffixing, the probability is strong that it expresses its other tenses in an analogous fashion and that, indeed, all verbs have suffixed tense elements. Similarly, we normally expect to find the pronominal elements, so far as they are included in the verb at all, either consistently prefixed or suffixed. But these rules are far from absolute. We have already seen that Hebrew prefixes its pronominal elements in certain cases, suffixes them in others. In Chimariko, an Indian language of California, the position of the pronominal affixes depends on the verb; they are prefixed for certain verbs, suffixed for others.

然而，我们并非永远都能将一种语言的后缀作为一组，与前缀截然区分开来。在两类词缀并用的大多数语言中，每一类词缀都很可能既有限定功能，又有形式性的或关系性的功能。我们至多只能说一种语言倾向于用这种或那种词缀方式来表达相似的功能。如果某个动词通过添加后缀来表示某个时态，那么它极有可能以类似的方式表示其

他时态，而且甚至所有动词都会有添加后缀的时态成分。同样，如果代词性成分被包括在动词中，那么我们一般会期待看到它们要么总是用作前缀，要么总是用作后缀。但是这些规则远非绝对。之前我们已经看到，希伯来语在某些情况下将代词性成分用作前缀，在其他情况下则用作后缀。 [6_14] 而在契马里科语（加利福尼亚的一种印第安语言）中，代词性词缀的位置取决于动词：对于某些动词它们被用作前缀，对于其他动词则被用作后缀。

It will not be necessary to give many further examples of prefixing and suffixing. One of each category will suffice to illustrate their formative possibilities. The idea expressed in English by the sentence *I came to give it to her* is rendered in Chinook [5_7] by *i-n-i-a-l-u-d-am* . This word-and it is a thoroughly unified word with a clear-cut accent on the first *a* —consists of a radical element,-*d*- “to give,” six functionally distinct, if phonetically frail, prefixed elements, and a suffix. Of the prefixes, *i*- indicates recently past time; *n*- , the pronominal subject “I”;-*i*- , the pronominal object “it”; [5_8] -*a*- , the second pronominal object “her”;-*l*- , a prepositional element indicating that the preceding pronominal prefix is to be understood as an indirect object (-*her-to*- , i.e., “to her”); and -*u*- , an element that it is not easy to define satisfactorily but which, on the whole, indicates movement away from the speaker. The suffixed-*am* modifies the verbal content in a local sense; it adds to the notion conveyed by the radical element that of “arriving” or “going (or coming) for that particular purpose.” It is obvious that in Chinook, as in Hupa,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grammatical machinery resides in the prefixes rather than in the suffixes.

关于添加前缀和后缀无需更多的例子了。每一类只需一例就足以说明它们在构形上的可能。英语通过句子I came to give it to her（我

来把它给她）来表达的意思在奇努克语 [6_15] 中表述为*i-n-i-a-l-u-d-am*。这是一个完全统一的词，它有一个清晰的重音落在第一个*a* 上。这个词包括一个根本成分，即*-d-* “给”，六个语音上也许微弱但功能明确的前缀成分，还有一个后缀。在几个前缀中，*i-* 表示刚过去不久的时间；*n-* 表示代词性的主语“我”；*-i-* 表示代词性的宾语“它” [6_16] ；*-a-* 为第二个代词性的宾语“她”；*-l-* 是一个介词性成分，表示它之前的代词性前缀应被理解为间接宾语（-她-给，即“给她”）；*-u-* 是一个不容易恰当定义的成分，只能说它大体上表示离说话人而去的运动。后缀*-am* 在处所意义上修饰动词的内容；它在根本成分所传递的意思之上增加了“到达”或“为那个特定目的而去（或来）”的意思。很明显，奇努克语和胡帕语一样，将语法机制的较大一部分放在了前缀而不是后缀上。

A reverse case, one in which the grammatically significant elements cluster, as in Latin, at the end of the word is yielded by Fox, one of the better known Algonkin languages of the Mississippi Valley. We may take the form *eh-kiwi-n-a-m-oht-ati-wa-ch(i)* “then they together kept (him) in flight from them.” The radical element here is *kiwi-* , a verb stem indicating the general notion of “indefinite movement round about, here and there.” The prefixed element *eh-* is hardly more than an adverbial particle indicating temporal subordination; it may be conveniently rendered as “then.” Of the seven suffixes included in this highly-wrought word,*-n-s* eems to be merely a phonetic element serving to connect the verb stem with the following*-a-* ; [5_9] *-a-* is a “secondary stem” [5_10] denoting the idea of “flight, to flee”;*-m-* denotes causality with reference to an animate object; [5_11] *-o(ht)-* indicates activity done for the subject (the so-called “middle” or “medio-passive” voice of Greek);*-(a)ti-* is a reciprocal element, “one another”;*-wa-ch(i)* is the third person animate plural (*-wa-* , plural;*-chi* , more properly personal) of so-called “conjunctive” forms. The word may be

translated more literally (and yet only approximately as to grammatical feeling) as “then they (animate) caused some animate being to wander about in flight from one another of themselves.” Eskimo, Nootka, Yana, and other languages have similarly complex arrays of suffixed elements, though the functions performed by them and their principles of combination differ widely.

相反的情形，即具有语法意义的成分像在拉丁语中一样聚集在词尾，可在福克斯语中见到。福克斯语是密西西比河流域阿尔贡金语支中较著名的一种。我们可以看看它的*eh-kiwi-n-a-m-oht-ati-wa-ch(i)* 这一表达形式，意为“然后他们一起使（他）不断逃离他们”。这里的根本成分是*kiwi-* ，这是一个动词词干，表示“无定向地这里那里四处移动”这一一般意思。前缀成分*eh-* 最多算一个副词性的小品词，表示时间上的从属；为方便起见可将其理解为“然后”。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词所包含的七个后缀中，*-n-* 似乎只是一个语音性的成分，其作用只是将动词词干与随后的*-a-* 连接起来；*-a-* 是一个“次要词干” [6_17] ，表达“逃跑（名词和动词）”的意思；*-m-* 表示针对有生命物体的因果关系 [6_18] ；*-o(ht)-* 表示为主语所做的活动（即希腊语中所谓的“中间”或“中间-被动”语态）；*-(a)ti-* 是一个相互成分，表达“互相”的意思；*-wa-chi(i)* 是所谓的“连词”形式的第三人称有生命体复数（其中*-wa-* 表示复数；*-chi* 更明确地表示人称）。这个词可以比较拘泥地译为（但是在语法感觉上只是接近原文而已）“然后（有生命的）他们／它们使某个生命体四处游荡，逃离他们／它们彼此。”爱斯基摩语、努特卡语、雅纳语和其他一些语言拥有同样复杂的后缀成分排列，虽然它们的后缀所行使的功能及其组合原则都有很大差异。

We have reserved the very curious type of affixation known as “infixing” for separate illustration. It is utterly unknown in English, unless we consider the *-n-* of *stand* (contrast *stood*) as an infixed element. The earli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such as Latin, Greek

and Sanskrit, made a fairly considerable use of infixed nasals to differentiate the present tense of a certain class of verbs from other forms (contrast Latin *vinc-o* “I conquer” with *vic-i* “I conquered”; Greek *lamb-an-o* “I take” with *e-lab-on* “I took”). There are, however, more striking examples of the process, examples in which it has assumed a more clearly defined function than in these Latin and Greek cases. It is particularly prevalent in many languages of southeastern Asia and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 Good examples from Khmer (Cambodgian) are *tmeu* “one who walks” and *daneu* “walking” (verbal noun), both derived from *deu* “to walk.” Further examples may be quoted from Bontoc Igorot, a Filipino language. Thus, an infixed-*in-* conveys the idea of the product of an accomplished action, e.g.,*kayu* “wood,” *kinayu* “gathered wood.” Infixes are also freely used in the Bontoc Igorot verb. Thus, an infixed—*um* —is characteristic of many intransitive verbs with personal pronominal suffixes, e.g., *sad-* “to wait,” *sumid-ak* “I wait”; *kineg* “silent,” *kuminek-ak* “I am silent.” In other verbs it indicates futurity, e.g., *tengao-* “to celebrate a holiday,” *tumengao-ak* “I shall have a holiday.” The past tense is frequently indicated by an infixed-*in-* ; if there is already an infixed-*um-* , the two elements combine to-*in-m-* , e.g., *kinminek-ak* “I was silent.” Obviously the infixing process has in this (and related) languages the same vitality that is possessed by the commoner prefixes and suffixes of other languages. The process is also found in a number of aboriginal American languages. The Yana plural is sometimes formed by an infixed element, e.g., *k'uruwi* “medicine-men,” *k'uwi* “medicine-man”; in Chinook an infixed-*l-* is used in certain verbs to indicate repeated activity, e.g., *ksik'ludelk* “she keeps looking at him,” *iksik'lutk* “she looked at him” (radical element-*tk*). A peculiarly interesting type of infixation is found in the Siouan languages, in which certain verbs insert the pronominal elements into the very body of the radical element, e.g., Sioux *cheti* “to build a fire,”

chewati “I build a fire”; *shuta* “to miss,” *shuunta-pi* “we miss.”

我们把被称为“中缀”的这种非常奇怪的加缀类型留到这里做单独说明。中缀在英语里是完全没有的，除非我们把stand中的-n-（与stood相对）视为一个中缀成分。早期印欧语系的语言，比如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还比较多地使用中缀鼻音来区分某类动词的现在时和其他形式（试对比拉丁语的*vinc-o* “我征服”和*vic-i* “我曾征服”，希腊语的*lamban-o* “我拿”和*e-lab-on* “我拿了”）。不过，中缀这一语法程序还有更特异的例子，在这些例子里中缀所承担的功能比在刚刚提到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例子里更加明确。中缀在东南亚和马来群岛的很多语言中尤其普遍。高棉语（柬埔寨语）中就有很好的例子，如*tmeu* “走路的人”和*daneu* “走”（动词性名词），两者都源自*deu* “走”（动词）。我们还可以从菲律宾的一种叫做蓬托克-伊果罗脱的语言中再引几个例子。比如，中缀*-in-* 表达的意思是一个动作完成后的结果，如*kayu* 是“木头”，*kinayu* 则是“收集的木头”。中缀在蓬托克-伊果罗脱语的动词里也被随意使用。比如，中缀*-um-* 是很多带有人称代词性后缀的不及物动词的特征，如*sad-* “等待”，*sumid-ak* “我等待”；*kineg* “沉默的”，*kuminek-ak* “我沉默”。在其他动词里，这一中缀表示将来时，如*tengao-* “庆祝节日”，*tumengao-ak* “我将庆祝节日”。过去时则常用中缀*-in-* 表示；如果已经有中缀-um-，则两个成分合为*-in-m-* ，比如*kinminek-ak* “我曾经沉默”。很显然，在这种（及相关的）语言里，添加中缀的程序拥有和其他语言更惯常使用的前后缀一样的活力。添加中缀在美洲原住民的一些语言里也能看到。比如，雅纳语的复数有时用中缀成分构成，如*k'uruwi* “医药-人（复数）”，*k'uwi* “医药-人（单数）”；在奇努克语里，中缀-l-被用在某些动词里表示重复的活动，如*ksik'ludelk* 是“她一直看着他”，而*iksik'lutk* 则是“她曾看着他”（根本成分是*-tk* ）。苏语语支里有一种极为有趣的中缀类型，即将代词性成分插入某些动词的根本成分之中，比如苏语的*cheti* 是“生火”，*chewati* 是“我生火”；*shuta* 是“错过”，*shuunta-pi* 则是“我们错过”。

A subsidiary but by no means unimportant grammatical process is that of internal vocalic or consonantal change. In some languages, as in English *(sing, sang, sung, song; goose, geese)* , the former of thes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methods of indicating fundamental changes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At any rate, the process is alive enough to lead our children into untrodden ways. We all know of the growing youngster who speaks of having *brung* something, on the analogy of such forms as *sung* and *flung* . In Hebrew, as we have seen, vocalic change is of even greater significance than in English. What is true of Hebrew is of course true of all other Semitic languages. A few examples of so-called "broken" plurals from Arabic [5_12] will supplement the Hebrew verb forms that I have given in another connection. The noun *balad* "place" has the plural form *bilad* ; [5_13] *gild* "hide" forms the plural *gulud; ragil* "man," the plural *rigal; shibbak* "window," the plural *shababik* . Very similar phenomena are illustrated by the Hamitic languages of Northern Africa, e.g., Shilh [5_14] *izbil* "hair," plural*izbel; a-slem* "fish," plural *i-slim-en; sn* "to know," *sen* "to be knowing"; *rmi* "to become tired," *rumni* "to be tired"; *ttss* [5_15] "to fall asleep," *ttoss* "to sleep." Strikingly similar to English and Greek alternations of the type *sing-sang* and *leip-o* "I leave," *leloip-a* "I have left," are such *Somali* [5_16] cases as *al* "I am," *il* "I was"; *i-dah-a* "I say," *i—di* "I said," *deh* "say!"

[4] 内部的元音或辅音变化是次一级的语法程序，但绝非无关紧要。在有些语言中，比如英语（sing，sang，sung，song；goose，geese），这两种变化中的前者，即元音变化已成为表示语法功能的基本变化的主要方法之一。不管怎么说，这一程序现在还有足够的活力，能引导我们的后辈走出新路子。比如，我们都知道，半大的孩子会说"*brung* 了什么东西来"，这个*brung* 就是从*sung* 和*flung* 等形式类推出来的。 [6_19] 在希伯来语中，如前所述，元音变化甚至比

在英语中更加重要。希伯来语如此，其他所有的闪米特语言当然也如此。我们可以举几个阿拉伯语 [6_20] 中的所谓“破裂”复数的例子，来补充我在别处讨论过的希伯来语动词形式。比如，名词*balad* “地方”的复数形式是*bilad* [6_21] ；*gild* “兽皮”的复数形式是*gulud* ；*ragil* “人”的复数形式是*rigal* ；*shibbak* “窗户”的复数形式是*shababik* 。北非的含米特语支也展示了十分类似的现象，比如希尔语 [6_22] 的*izbil* “毛发”和*izbel* （复数）；*a-slem* “鱼”和*i-slim-en* （复数）；*sn* “知道”和*sen* “正知道”；*rmi* “变累”和*rumni* “累”；*ttss* [6_23] “入睡”和*ttoss* “睡”。在索马里语 [6_24] 中，*al* 是“我是”，*il* 是“我曾经是”；*i-dah-a* 是“我说”，*i-di* 是“我曾经说”，而*deh* 是“说！”，这与英语（sing-sang）及希腊语（*leip-o* “我离开”和*leloip-a* “我已离开）中的变形惊人地相似。

Vocalic chang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lso in a number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In the Athabaskan group many verbs change the quality or quantity of the vowel of the radical element as it changes its tense or mode. The Navaho verb for “I put (grain) into a receptacle” is *bi-hi-sh-ja* , in which-*ja* is the radical element; the past tense, *bi-hi-ja'* , has a long *a* -vowel, followed by the “glottal stop” [5_17] ; the future is *bi-h-de-sh-ji* with complete change of vowel. In other types of Navaho verbs the vocalic changes follow different lines, e.g., *yah-a-ni-ye* “you carry (a pack) into (a stable)“; past, *yah-i-ni-yin* (with long *i* in-*yin* ;-*n* is here used to indicate nasalization); future, *yah-a-di-yehl* (with long *e*). In another Indian language, Yokuts [5_18] , vocalic modifications affect both noun and verb forms. Thus, *buchong* “son” forms the plural*bochang-i* (contrast the objective *buchong-a*); *enash* “grandfather,” the plural*inash-a* ; the verb *engtyim* “to sleep” forms the continuative *ingetym-ad* “to be sleeping” and the past *ingetym-ash* .

元音变化在一些美洲印第安语言中也非常重要。在阿萨巴斯卡语支中，很多动词在改变时态或语态时，会改变其根本成分里的元音的质量或数量。纳瓦霍语中“我放（谷物）入容器”这一动词是*bi-hi-sh-ja*，其中*-ja* 是根本成分；过去式*bi-hi-ja'* 有一个长*a* 元音，其后是“喉塞音”[6_25]；将来式是*bi-h-de-sh-ji*，其中的元音已完全改变。在其他类型的纳瓦霍语动词中，元音变化走的是几条不同的路线，比如*yah-a-ni-ye* “你带（一包）去（马棚）”，过去式是*yah-i-ni-yin*（*-yin* 中有一个长i音，*-n* 在这里用于表示鼻音化）；将来式是*yah-a-di-yehl*（有一个长*e* 音）。在另一种印第安语言约克茨语[6_26]中，元音变化既影响到名词形式，也影响到动词形式。比如，*buchong* “儿子”的复数形式是*bochang-i*（宾格则是*buchong-a*）；*enash* “祖父”的复数形式是*inash-a*；动词*engtyim* “睡”的持续体是*ingetym-ad* “正在睡”，过去式则是*ingetym-ash*。

Consonantal change as a functional process is probably far less common than vocalic modifications, but it is not exactly rare.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group of cases in English, certain nouns and corresponding verbs differing solely in that the final consonant is voiceless or voiced. Examples are *wreath* (with *th* as in *think*), but *to wreathe* (with *th* as in *then*); *house* , but *to house* (with *s* pronounced like *z*). That we have a distinct feeling for the interchange as a means of distinguishing the noun from the verb is indicated by the extension of the principle by many Americans to such a noun as *rise* (e.g., *the rise of democracy*)—pronounced like *rice* —in contrast to the verb to *rise* (*s* like *z*).

作为一个功能性程序的辅音变化比元音变化可能要少得多，不过也并不罕见。英语中就有一组有趣的例子，即某些名词和对应的动词只在最后一个辅音带声与否上有区别。比如名词是wreath（th的发音同think里的th不带声），而动词是to wreathe（th的发音同then里的

th带声）；名词是house，而动词是to house（s发z音）。我们对这种以辅音互换来区分名词和动词的方式是有独特的感情的，这体现在很多美国人将这一原则扩展至其他名词上，比如把名词rise（如the rise of democracy民主的崛起）读成rice，以区别于动词to rise（s发z音）。[6_27]

In the Celtic languages the initial consonants undergo several types of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grammatical relation that subsists between the word itself and the preceding word. Thus, in modern Irish, a word like *bo* “ox” may under the appropriate circumstances, take the forms *bho* (pronounce *wo*) or *mo* (e.g., *an bo* “the ox,” as a subject, but*tirnamo* “land of the oxen,” as a possessive plural). In the verb the principle has as one of its most striking consequences the “aspiration” of initial consonants in the past tense. If a verb begins with *t* , say, it changes the *t* to *th* (now pronounced *h*) in forms of the past; if it begins with *g* , the consonant changes, in analogous forms, to *gh* (pronounced like a voiced spirant [5_19] *g* or like *y* ,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following vowel). In modern Irish the principle of consonantal change, which began in the oldest period of the language as a secondary consequence of certain phonetic conditions, has become one of the primary grammatical processes of the language.

在凯尔特语族中，根据某个词自身和前一个词之间存在的语法关系，开头的辅音会经历几种变化。比如，在现代爱尔兰语中，像*bo* “牛”这样的词在适宜的情况下可能变成*bho*（发音为*wo*）或*mo*（如作主语时的*anbo* “那头牛”，作所有格复数时的*tir na mo* “众牛之乡”）。在动词中，辅音变化这一原则产生的最显著的结果之一是过去式里首辅音的“送气”。比如，如果一个动词以*t* 开头，那么它在过去式中会把*t* 变为*th*（现在发*h* 音）；与此相类，如果一个动词以*g* 开

头，则辅音会变为*gh*（根据后面的元音的性质，发音如带声的摩擦音[6_28] *g*，或如*y*）。辅音变化的原则在最早期的爱尔兰语中本是某些语音条件的次要结果，在现代爱尔兰语中则已然变为主要的语法程序之一。

Perhaps as remarkable as these Irish phenomena are the consonantal interchanges of Ful, an African language of the Soudan. Here we find that all nouns belonging to the personal class form the plural by changing their initial *g, j, d, b, k, ch, and p to y (or w), y, r, w, h, s* and *f* respectively; e.g., *jim-o* “companion,” *yim-ʼbe* “companions”; *pio-o* “beater,” *fio-ʼbe* “beaters.” Curiously enough, nouns that belong to the class of things form their singular and plural in exactly reverse fashion, e.g., *yola-re* “grass-grown place,” *jola-je* “grass-grown places”; *fitan-du* “soul,” *pital-i* “souls.” In Nootka, to refer to but one other language in which the process is found, the *t* or*tl* [5_20] of many verbal suffixes becomes *hl* in forms denoting repetition, e.g., *hita-ʼato* “to fall out,” *hita-ʼahl* “to keep falling out”; *mat-achisht-utl* “to fly on to the water,” *mat-achisht-ohl* “to keep flying on to the water.” Further, the *hl* of certain elements changes to a peculiar h-sound in plural forms, e.g., *yak-ohl* “sore-faced,” *yak-oh* “sore-faced (people).”

和爱尔兰语的此类现象可堪一比的也许是苏丹的一种非洲语言富尔语的辅音互换。在这种语言里，我们发现所有属于人称类的名词均通过改变首音来构成复数，即把首音*g*、*j*、*d*、*b*、*k*、*ch* 和*p* 分别变为*y*（或*w*）、*y*、*r*、*w*、*h*、*s* 和*f*；比如，“伴侣”的单数是*jim-o*，复数是*yim-ʼbe*；“敲打者”的单数是*pio-o*，复数是*fio-ʼbe*。颇为有趣的是，属于事物类的名词在变换单复数形式时则依照完全相反的方式，比如“长草的地方”单数是*yola-re*，复数是*jola-je*；“灵魂”的单数是*fitan-du*，复数是*pital-i*。再举一个也使用这一程序的语言：在努特

卡语中，很多动词后缀中的*t* 或*tl* [6_29] 会变为*hl* 以表达重复，比如*hita-'ato* 是“掉出来”，*hita-'ahl* 是“不断掉出来”；*mat-achisht-utl* 是“向水上飞去”，*mat-achisht-ohl* 是“不停地向水上飞去”。再如，在复数形式中某些成分的*hl* 会变成一个奇怪的*h* 音，如*yak- ohl* “苦脸的”和*yak-oh* “苦脸的（人）”。

Nothing is more natural than the prevalence of reduplic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repetition of all or part of the radical element. The process is generally employed, with self-evident symbolism, to indicate such concepts as distribution, plurality, repetition, customary activity, increase of size, added intensity, continuance. Even in English it is not unknown, though it is not generally accounted one of the typical formative devices of our language. Such words as *goody-goody* and *to pooh-pooh* have become accepted as part of our normal vocabulary, but the method of duplication may on occasion be used more freely than is indicated by such stereotyped examples. Such locutions as *a big big man* or *Let it cool till it's thick thick* are far more common, especially in the speech of women and children, than our linguistic text-books would lead one to suppose. In a class by themselves are the really enormous number of words, many of them sound-imitative or contemptuous in psychological tone, that consist of duplications with either change of the vowel or change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words of the type *sing-song, riff-raff, wishy-washy, harum-skarum, roly-poly* . Words of this type are all but universal. Such examples as the Russian *Chudo-Yudo* (a dragon), the Chinese *ping-pang* “rattling of rain on the roof,“ [5_21] the Tibetan *kyang-kyong* “lazy,” and the Manchu*porponparpan* “blear-eyed” are curiously reminiscent, both in form and in psychology, of words nearer home. But it can hardly be said that the duplicative process is of a distinctively grammatical significance in English. We must turn to other languages for

illustration. Such cases as Hottentot *go-go* “to look at carefully” (from *go* “to see”), Somali *fen-fen* “to gnaw at on all sides” (from *fen* “to gnaw at”), Chinook *iwi iwi* “to look about carefully, to examine” (from *iwi* “to appear”), or Tsimshian *am'am* “several (are) good” (from *am* “good”) do not depart from the natural and fundamental range of significance of the process. A more abstract function is illustrated in Ewe, [5_22] in which both infinitives and verbal adjectives are formed from verbs by duplication; e.g.,*yi* “to go,” *yiyi* “to go, act of going”; *wo* “to do,” *wowo* [5_23] “done”; *mawomawo* “not to do” (with both duplicated verb stem and duplicated negative particle). Causative duplications are characteristic of Hottentot, e.g., *gam-gam* [5_24] “to cause to tell” (from *gam* “to tell”). Or the process may be used to derive verbs from nouns, as in Hottentot *khoe-khoe* “to talk Hottentot” (from *khoe-b* “man, Hottentot”), or as in Kwakiutl *metmat* “to eat clams” (radical element *met-* “clam”).

[5]重叠，换言之，根本成分全部或部分的重复，其流行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一程序有不言自明的符号性，被广泛用于表示分布、复数、重复、习惯性活动、体积增大、强度增加和持续等概念。这一程序甚至在英语里也不是没有，虽然它一般不被视为英语的一种典型的构造方式。像goody-goody（好好先生）和to pooh-pooh（呸呸）等词已经作为我们常用词汇的一部分而被接受，但是重叠方法的应用有时比这些已定型的例子所显示的更加自由。比如a big big man（一个大大人）和Let it cool till it's thick thick（让它凉得稠稠的）这样的惯用表达是相当常见的，比语言学课本叫我们所以为的要常见得多，尤其是在女性和儿童的言语中。还有一些自成一类且数量着实惊人的词，其中很多是拟声的或带有心理上的轻蔑意味的，它们都包含重叠，要么是改变元音的重叠，要么是改变首辅音的重叠。这类词有sing-song（声音单调的），riff-raff（流氓），wishy-washy（软弱无力的），harum-skarum（草率的）和rolypoly（矮胖

的）。这类词几乎在所有语言中都普遍存在。比如，俄语有*Chudo-Yudo*（龙），汉语有*ping-pang* 乒乓“雨滴打在屋顶上的声音”[6_30]，藏语有*kyang-kyong*“懒惰的”，满语有*porpon parpan*“烂眼的”。奇怪的是，这些词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心理上都会叫我们想起家乡话里的词语。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说重叠程序在英语中有明显的语法意义。我们必须到其他语言中寻找例子。比如，非洲西南部的霍屯督语的*go-go*“仔细看”（源自*go*“看”），索马里语的*fen-fen*“到处啃”（源自*fen*“啃”），奇努克语的*iwi iwi*“四处细看、检查”（源自*iwi*“出现”），茨姆锡安语一种印第安语的*am'am*“有几个是好的”（源自*am*“好”），这些词都没有脱离重叠程序的自然的和基本的意义范围。非洲的埃维语[6_31]则体现了一种更抽象的功能，该语言中的不定式和动词性形容词都是通过重叠从动词变来的，比如，*yi*“走”和*yiyi*“走，走的动作”；*wo*“做”和*wowo*[6_32]“已做”；*mawomawo*“不做”（既重叠动词词干，也重叠否定小品词）。表达使役的重叠是霍屯督语的特色，比如*gam-gam*[6_33]“使告诉”（源自*gam*“告诉”）。这一程序也可用于从名词派生动词，比如霍屯督语的*knoe-knoe*“说霍屯督话”（源自*knoe-b*“霍屯督人”），还有夸扣特尔语的*metmat*“吃蛤蜊”（根本成分是*met-*“蛤蜊”）。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examples of reduplication are such as repeat only part of the radical element.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demonstrate the existence of a vast number of formal types of such partial duplication,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process makes use of one or more of the radical consonants, preserves or weakens or alters the radical vowel, or affects the beginning, the middle, or the end of the radical element. The functions are even more exuberantly developed than with simple duplication, though the basic notion, at least in origin, is nearly always one of repetition or continuance. Examples illustrating this fundamental function can be quoted from all parts of the globe. Initially reduplicating are, for instance, Shilh*ggen* “to be sleeping” (from *gen* “to sleep”);

Ful*pepeu-'do* “liar” (i.e., “one who always lies”), plural*fefeu-'be* (from *fewa* “to lie”); Bontoc Igorot *anak* “child,” *ananak* “children”; *kamu-ek* “I hasten,” *kakamu-ek* “I hasten more”; Tsimshian *gyad* “person,” *gyigyad* “people”; Nass*gyibayuk* “to fly,” *gyigyibayuk* “one who is flying.” Psychologically comparable, but with the reduplication at the end, are Somali*ur* “body,” plural *urar* ; Hausa *suna* “name,” plural *sunana-ki* ; Washo [5_25] *gusu* “buffalo,” *gususu* “buffaloes”; Takelma [5_26] *himi-d-* “to talk to,” *himim-d-* “to be accustomed to talk to.” Even more commonly than simple duplication, this partial duplication of the radical element has taken on in many languages functions that seem in no way related to the idea of increase. The best known examples are probably the initial reduplication of our old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which helps to form the perfect tense of many verbs (e.g., Sanskrit *dadarsha* “I have seen,” Greek *leloipa* “I have left,” Latin *tetigi* “I have touched,” Gothic*lelot* “I have let”). In Nootka reduplication of the radical element is often employed in association with certain suffixes; e.g., *hluch-* “woman” forms*hluhluch-'ituhl* “to dream of a woman,” *hluhluch-k'ok* “resembling a woman.” Psychologically similar to the Greek and Latin examples are many Takelma cases of verbs that exhibit two forms of the stem, one employed in the present or past, the other in the future and in certain modes and verbal derivatives. The former has final reduplication, which is absent in the latter; e.g., *al-yebeb-i'n* “I show (or showed) to him,” *al-yeb-in* “I shall show him.”

在重叠的例子中，最有特色的是只重复根本成分的一部分。按照以下标准，这种部分重叠是可以被分为很多不同的形式类型的，即：该重叠程序是使用一个还是多个根本辅音，是保留、弱化还是更换根本元音，以及是影响根本成分的头部、中部还是尾部。部分重叠的功能甚至发展得比简单重叠更为复杂，虽然其基本意念差不多总是重复或延续，至少在源起时如此。世界各地都可以举出这一基本功能的例

证。重复词首的例子有希尔语的*ggen*“正在睡”（源自*gen*“睡”）；富尔语的*pepeu-'do*“说谎者”（即“总是说谎的人”），复数是*fefeu-'be*（源自*fewa*“说谎”）；蓬托克-伊果罗脱语的*anak*“孩子”，复数是*ananak*“孩子们”；*kamu-ek*“我急忙”，*kakamu-ek*“我更急忙”；茨姆锡安语的*gyad*“人”，复数是*gyigyad*“人们”；纳斯语的*gyibayuk*“飞”，*gyigyibayuk*“正在飞的人”。心理上具有可比性但是重叠位于词尾的例子有索马里语的*ur*“身体”，复数是*urar*；非洲豪萨语的*suna*“名称”，复数是*sunana-ki*；瓦肖语[6_34]的*gusu*“野牛”，复数是*gususu*；塔克尔马语[6_35]的*himi-d-*“跟……说”和*himim-d-*“总是跟……说”。在很多语言中，根本成分的这种部分重叠甚至比简单重叠更常见，而且已然承担了和“增加”这个概念似乎毫不相关的功能。最有名的例子大概要数古印欧语言的词首重叠，用于构成很多动词的完成式（比如梵语的*dadarsha*“我已看到”，希腊语的*leloipa*“我已离开”，拉丁语的*tetigi*“我已触到”，哥特语的*lelot*“我已让”）。在努特卡语中，根本成分重叠的使用常常和某些后缀相关，比如*hluch-*“女人”可以构成*hluhluch-'ituhl*“梦到一个女人”和*hluhluchk'ok*“像一个女人”。塔克尔马语中的很多动词与希腊语及拉丁语的例子在心理上很相似，都表现出两种词干形式，一种用于现在时或过去时，另一种用于将来时和某些语态及动词派生词。前一种有词尾重叠，后一种则没有，比如*al-yebeb-i'n*“我给他看”（或者“我曾经给他看”），*al-yebin*“我将给他看”。

We come now to the subtlest of all grammatical processes, variations in accent, whether of stress or pitch. The chief difficulty in isolating accent as a functional process is that it is so often combined with alternations in vocalic quantity or quality or complicated by the presence of affixed elements that its grammatical value appears as a secondary rather than as a primary feature. In Greek, for instance,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true verbal forms that they throw the accent back as far as the general accentual rules will permit, while nouns may be more freely

accented. There is thus a striking accentual difference between a verbal form like*eluthemen* “we were released,” accented on the second syllable of the word, and its participial derivative *lutheis* “released,” accented on the last. The presence of the characteristic verbal elements *e-* and *-men* in the first case and of the nominal-s in the second tends to obscure the inherent value of the accentual alternation. This value comes out very neatly in such English doublets as *to refund* and *a refund, to extract* and *an extract, to come down* and *a come down, to lack luster* and *lack-luster eyes* , in whic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erb and the noun is entirely a matter of changing stress. In the Athabaskan languages there are not infrequently significant alternations of accent, as in Navaho *ta-di-gis* “you wash yourself” (accented on the second syllable), *ta-di-gis* “he washes himself” (accented on the first). [5_27]

现在我们要讨论所有语法程序中最微妙的一种了——重音的变化，无论是重音上的还是音高上的。把重音作为一种功能性的程序单独研究，主要的困难在于重音常常和元音数量或质量的改变结合在一起，或者由于词缀成分的存在而变得复杂，以至于其语法价值看起来像是次要的而非主要的特征。比如，在希腊语中，真正的动词形式有一个特点，即在一般的重音规则允许的前提下，它们会将重音尽可能往后放，而名词的重音则可以更加自由。因此，动词性形式*eluthemen* “我们被释放了”和其派生分词*lutheis* “被释放”在重音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的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后者的则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不过前者有特殊的动词性成分*e-* 和*-men* ，后者有名词性成分-s，这容易使重音变化的内在价值变得模糊。这种价值在一些成对的英语词中则显露无疑，如to refund“偿还（动词）”和are fund“还款（名词）”，to extract“提取（动词）”和an extract“提取物（名词）”，to come down“下来（动词）”和a come down“下跌（名词）”，to lackluster“没有光泽”和lack-luster eyes“没有光泽的眼睛” [6_36] ，这四对例子中动词和名词的差异都完全在于重音的变化。在阿萨巴斯卡

语支中，有意义的重音变化也不少见，比如纳瓦霍语的*ta-di-gis*“你自己洗”（重音在第二个音节）和*ta-di-gis*“他自己洗”（重音在第一个音节）[6_37]。

Pitch accent may be as functional as stress and is perhaps more often so. The mere fact, however, that pitch variations are phonetically essential to the language, as in Chinese (e.g., *feng* “wind” with a level tone, *feng* “to serve” with a falling tone) or as in classical Greek (e.g., *lab-on* “having taken” with a simple or high tone on the suffixed participial-*on* , *gunaik-on* “of women” with a compound or falling tone on the case suffix-*on*) does not necessarily constitute a functional, or perhaps we had better say grammatical, use of pitch. In such cases the pitch is merely inherent in the radical element or affix, as any vowel or consonant might be. It is different with such Chinese alternations as *chung* (level) “middle” and *chung* (falling) “to hit the middle”;*mai* (rising) “to buy” and *mai* (falling) “to sell”; *pei* (falling) “back” and *pei* (level) “to carry on the back.” Examples of this type are not exactly common in Chinese and the language cannot be said to possess at present a definite feeling for tonal differences as symbolic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noun and verb.

音高重音可以和重音一样起功能作用，甚至可能更经常如此。不过，音高变化虽然对某些语言的语音必不可少，比如汉语（如阴平声调的*feng* “风”和去声的*feng* “奉”）和古希腊语（如*lab-on* “已经拿了”在后缀分词-*on* 上有一个简单的或高的音调，而*gunaik-on* “女人的”在格后缀-*on* 上有一个复合的或下降的音调），但是仅此一点不一定说明音高的应用是功能性的，或者说得更好一点是语法性的。在这些例子中，音高只是根本成分或词缀所固有的，像任何元音或辅音一样。这和汉语中的声调变化不同，如*chung* （阴平）“中”和*chung*

（去声）“命中的中”；*mai*　（上声）“买”和*mai*　（去声）“卖”；*pei*（去声）“背部”和*pei*　（阴平）“背负”。汉语中这类例子并不是很常见，所以不能说汉语现在对将声调差异作为区分名词和动词的符号有什么明确的感情。

There are languages, however, in which such differences ar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grammatical importance. They are particularly common in the Soudan. In Ewe, for instance, there are formed from *subo* “to serve” two reduplicated forms, an infinitive *subosubo* “to serve,” with a low tone on the first two syllables and a high one on the last two, and an adjectival *subosubo* “serving,” in which all the syllables have a high tone. Even more striking are cases furnished by Shilluk, one of the languages of the headwaters of the Nile. The plural of the noun often differs in tone from the singular, e.g., *yit* (high) “ear” but*yit* (low) “ears.” In the pronoun three forms may be distinguished by tone alone; *e* “he” has a high tone and is subjective,-*e* “him” (e.g., *a chwol-e* “he called him”) has a low tone and is objective,-*e* “his” (e.g., *wod-e* “his house”) has a middle tone and is possessive. From the verbal element *gwed-* “to write” are formed *gwed-o* “(he) writes” with a low tone, the passive *gwet* “(it was) written” with a falling tone, the imperative *gwet* “write!” with a rising tone, and the verbal noun *gwet* “writing” with a middle tone. In aboriginal America also pitch accent is known to occur as a grammatical process. A good example of such a pitch language is Tlingit, spoken by the Indians of the southern coast of Alaska. In this language many verbs vary the tone of the radical element according to tense;*hun* “to sell,” *sin* “to hide,” *tin* “to see,” and numerous other radical elements, if low-toned, refer to past time, if high-toned, to the future. Another type of function is illustrated by the Takelma forms*hel* “song,” with falling pitch, but *hel* “sing!” with a rising inflection; parallel to these forms are *sel*

(falling) “black paint,” *sel* (rising) “paint it!” All in all it is clear that pitch accent, like stress and vocalic or consonantal modifications, is far less infrequently employed as a grammatical process than our own habits of speech would prepare us to believe probable.

但是，在有些语言中这些差异是具有最根本的语法重要性的，在苏丹语中尤其常见。比如，在埃维语中，*subo* “侍候”通过重叠可变为两种形式，一个是不定式*subosubo* “侍候”，该形式的前两个音节声调低，后两个音节声调高；另一个是形容词*subosubo* “侍候人的”，该形式里的所有音节都是高声调。希卢克语（尼罗河源头的几种语言之一）所提供的例子更加突出。在该语言中，名词的复数和单数常常只在声调上有所不同，比如*yit* “耳朵”（单数，高声调）和*yit* （复数，低声调）。在该语言的代词中，仅靠声调就可以区分三种形式：*e* “他”是高声调，主格；*-e* “他”（如*a chwol-e* “他叫他”）是低声调，宾格；*-e* “他的”（如*wod-e* “他的房子”）是中声调，所有格。动词性成分*gwed* “写”可以构成四种形式：第三人称单数形式*gwed-o* “（他）写”，低声调；被动语态形式*gwet* “（它）被写”，降调；命令形式*gwet* “写！”，升调；动词性名词*gwet* “写”，中声调。在美洲原住民的语言中，音高重音也是一种语法程序。阿拉斯加南海岸的印第安人所说的特林基特语就是这种音高语言的一个好例子。在这个语言里，很多动词会根据时态改变其根本成分的声调，如*hun* “卖”、*sin* “藏”、*tin* “看到”以及大量的其他根本成分，若是低声调，指的是过去时，若是高声调，则指将来时。声调变化还有一种功能，可以用塔克尔马语中的形式来说明：*hel* “歌曲”是降调，而*hel* “唱！”则是上升曲折调；与此平行的是*sel* （降调）“黑漆”和*sel* （升调）“给它刷漆！”。总而言之，很显然，音高重音像重音以及元音或辅音的变化一样，其被用作语法程序，远较我们根据自己的言语习惯所认定的为多。

[5_1].For the symbolism, see Chapter II.

[5_2]."Plural" is here a symbol for any prefix indicating plurality.

[5_3].The language of the Aztecs, still spoken in large parts of Mexico.

[5_4].Indian language of British Columbia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ss already cited.

[5_5].Including such languages as Navaho, Apache, Hupa, Carrier, Chipewyan, Loucheux.

[5_6].This may seem surprising to an English reader. We generally think of time as a function that is appropriately expressed in a purely formal manner. This notion is due to the bias that Latin grammar has given u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English future (*I shall go*) is not expressed by affixing at all; moreover, it may be expressed by the present, as in *to-morrow I leave this place* , where the temporal function is inherent in the independent adverb. Though in lesser degree, the Hupa -te is as irrelevant to the vital word as is *tomorrow* to the grammatical "feel" of *I leave* .

[5_7].Wishram dialect.

[5_8].Really "him," but Chinook, like Latin or French, possesses grammatical gender. An object may be referred to as "he," "she," or "i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form of its noun.

[5_9].This analysis is doubtful. It is likely that -n- possesses a function that still remains to be ascertained. The Algonkin languages are unusually complex and present many unsolved problems of detail.

[5_10]."Secondary stems" are elements which are suffixes from a formal point of view, never appearing without the support of a true radical element, but whose function is as concrete,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as that of the radical element itself. Secondary verb stems of this type a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Algonkin languages and of Yana.

[5_11].In the Algonkin languages all persons and things are conceived of as either animate or inanimate, just as in Latin or German they are conceived of as masculine, feminine, or neuter.

[5_12].Egyptian dialect.

[5_13].There are changes of accent and vocalic quantity in these forms as well, but the requirements of simplicity force us to neglect them.

[5_14].A Berber language of Morocco.

[5_15].Some of the Berber languages allow consonantal combinations that seem unpronounceable to us.

[5_16].One of the Hamitic languages of eastern Africa.

[5_17].See page 41.

[5_18].Spoken in the south-central part of California.

[5_19].See page 43.

[5_20].These orthographies are but makeshifts for simple sounds.

[5_21].Whence our *ping-pong*.

[5_22].An African language of the Guinea Coast.

[5_23].In the verbal adjective the tone of the second syllable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first.

[5_24].Initial "click" (see page 55, note 15) omitted.

[5_25].An Indian language of Nevada.

[5_26].An Indian language of Oregon.

[5_27].It is not unlikely, however, that these Athabaskan alternations are primarily tonal in character.

[6_1].关于符号系统，详见第二章。

[6_2].这里的“复数”是一个符号，代表任何表示复数概念的前缀。

[6_3].译者注：名词house的s发/s/音，而动词to house的s发/z/音。

[6_4].译者注：kill joy作为动名短语字面意思是“杀欢乐”，killjoy引申为“煞风景的人”。

[6_5].译者注： hominem是“男人”的宾格，femina是“女人”的主格，videt表示“看见”。

[6_6].译者注：原文的拼音是按照粤语发音标注的。

[6_7].译者注：redcoat直译为红衫军，指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国军人。当时，英国军人着红色上衣，美国独立军人着蓝色上衣。

[6_8].阿兹特克人的语言，仍然通行于墨西哥的广大地区。

[6_9].译者注： mar plot作为动名短语字面意思是“破坏计划”，marplot引申为“捣乱的人”。

[6_10].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印第安语言，与之前提到的纳斯语关系很近。

[6_11].译者注：交趾支那是越南南方一部分的旧称，1945年被日本占领前为法属殖民地。1921年本书出版时，该地仍为法属。

[6_12].包括纳瓦霍语、阿帕切语、胡帕语、开里尤语、奇佩维安语和鲁丘克斯语等语言。

[6_13].这对英语读者来说可能有些奇怪。我们一般认为，时间，作为一种功能，适合以纯形式的方式来表达。这一观念源于拉丁语法给予我们的偏见。其实，英语中的将来时（I shall leave [我将走]）根本不是用加词缀的方法表达的；而且，它甚至可以用现在时表达，比如在to-morrow I leave this place（明天我离开此地）这个句子中，时间功能就是暗含在独立的副词里的。胡帕语的-te与核心词并不相干，就像tomorrow与I leave的语法“感觉”不相干一样，只是程度上轻一点而已。

[6_14].译者注：详见本章第三段。

[6_15].唯希拉姆语的方言。

[6_16].其实是宾格的“他”，但是奇努克语跟拉丁语和法语一样，有语法上的性别。一个物体，视其名词的特有形式，可被称为“他”、“她”或“它”。

[6_17].“次要词干”从形式的角度来看是后缀成分，若没有真正的根本成分的支持是不会出现的，但是它们的功能在各个方面都和根本成分自身一样实在。这种次要动词词干是阿尔衮琴语支和雅纳语的特点。

[6_18].在阿尔衮琴语支中，所有的人和物都被设想为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正如

在拉丁语和德语中人和物都被设想为阳性、阴性或中性一样。

[6_19].译者注：sung和flung分别是sing（唱）和fling（掷）的过去分词，孩子依此类推brung是bring（带）的过去分词，但是bring的过去分词实为brought。

[6_20].埃及的方言。

[6_21].这些形式也有重音和元音数量上的变化，但是出于简洁性的考虑，我们只得从略。

[6_22].摩洛哥的一种柏柏尔语。

[6_23].柏柏尔语族中有些语言的辅音组合在我们看来是发不出来的。

[6_24].非洲东部含米特语的一种。

[6_25].详见第32页。

[6_26].使用于加利福尼亚中南部。

[6_27].译者注：rise（崛起）无论做名词还是动词词尾辅音一般都是z，rice（米）词尾的辅音是s。

[6_28].详见第50页。

[6_29].这些表音符号只是单音的权宜写法。

[6_30].英语的ping-pong即源于此。

[6_31].几内亚湾的一种非洲语言。

[6_32].在动词性形容词中，第二个音节的声调与第一个不同。

[6_33].省略了词首的“咂音”（详见第55页，注15）。

[6_34].内华达州的一种印第安语。

[6_35].俄勒冈州的一种印第安语。

[6_36].译者注：lack luster为动词短语，lack-lust复合为形容词。

[6_37].不过，也有可能阿萨巴斯卡语中的这些变化在本质上主要是声调性的。

Chapter 5 Form in Language: Grammatical Concepts

第五章　语言中的形式：语法概念

We have seen that the single word expresses either a simple concept or a combination of concepts so interrelated as to form a psychological unity. We have, furthermore, briefly reviewed from a strictly formal standpoint the main processes that are used by all known languages to affect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those embodied in unanalyzable words or in the radical elements of words—by the modifying or formative influence of subsidiary concepts. In this chapter we shall look a little more closely into the nature of the world of concepts, in so far as that world is reflected and systematized in linguistic structure.

我们已经看到，单个的词所表达的要么是一个简单概念，要么是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心理实体的概念的组合。我们还从严格的形式立场出发，简要考察了所有已知语言通过次要概念的限定或构形影响力使用哪些主要程序来影响基本概念，即那些体现在不可分析的词或词的根本成分中的概念。本章我们将稍进一步来观察由语言结构所反映和所系统化的概念世界的本质。

Let us begin with a simple sentence that involves various kinds of concepts—*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 . A rough and ready analysis discloses here the presence of three distinct and fundamental concepts that are brought into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 in a number of ways. These three concepts are “farmer” (the subject of discourse), “kill” (defining the nature of the activity

which the sentence informs us about), and “duckling” (another subject [6_1] of discourse that takes an important though somewhat passive part in this activity). We can visualize the farmer and the duckling and we have also no difficulty in constructing an image of the killing. In other words, the elements *farmer, kill,* and *duckling* define concepts of a concrete order.

让我们从一个包含几种不同概念的简单句开始——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这农夫宰这小鸭）。现成的粗略分析就可以揭示，这个句子里有三个不同的基本概念，它们以几种方式相互联系。这三个概念是farmer（“农夫”，这句话的主题）、kill（“宰”，定义这个句子传达给我们的活动的性质）和duckling（“小鸭”，这句话的另一个主题 [7_1] ，在这个活动中占据着重要但是有些被动的地位）。我们能在头脑中想象出农夫和小鸭，也不难构造出“宰”的意象。换言之，farmer、kill和duckling这三个成分都界定一个具体层面的概念。

But a more careful linguistic analysis soon brings us to see that the two subjects of discourse, however simply we may visualize them, are not expressed quite as directly, as immediately, as we feel them. A “farmer” is in one sense a perfectly unified concept, in another he is “one who farms.” The concept conveyed by the radical element *(farm-)* is not one of personality at all but of an industrial activity *(to farm)* , itself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 particular type of object *(a farm)* . Similarly, the concept of *duckling* is at one remove from that which is expressed by the radical element of the word, *duck* . This element, which may occur as an independent word, refers to a whole class of animals, big and little, while *duckling* is limited in its application to the young of that class. The word *farmer* has an “agentive” suffix-*er* that performs the function of indicating the one that carries out a given activity, in

this case that of farming. It transforms the verb *to farm* into an agentive noun precisely as it transforms the verbs *to sing, to paint, to teach* into the corresponding agentive nouns *singer, painter, teacher.* The element-*ling* is not so freely used, but its significance is obvious. It adds to the basic concept the notion of smallness (as also in *gosling, fledgeling*) or the somewhat related notion of "contemptible" (as in *weakling, princeling, hireling*). The agentive-*er* and the diminutive-*ling* both convey fairly concrete ideas (roughly those of "doer" and "little"), but the concreteness is not stressed. They do not so much define distinct concepts as mediate between concepts. The -erof *farmer* does not quite say "one who (farms)"; it merely indicates that the sort of person we call a "farmer" is closely enough associated with activity on a farm to be conventionally thought of as always so occupied. He may, as a matter of fact, go to town and engage in any pursuit but farming, yet his linguistic label remains "farmer." Language here betrays a certain helplessness or, if one prefers, a stubborn tendency to look away from the immediately suggested function, trusting to the imagination and to usage to fill in the transitions of thought and the details of application that distinguish one concrete concept *(to farm)* from another "derived" one *(farmer)* .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any language to express every concrete idea by an independent word or radical element. The concreteness of experience is infinite, the resources of the richest language are strictly limited. It must perforce throw countless concepts under the rubric of certain basic ones, using other concrete or semi-concrete ideas as functional mediators. The ideas expressed by these mediating elements—they may be independent words, affixes, or modifications of the radical element—may be called "derivational" or "qualifying." Some concrete concepts, such as *kill,* are expressed radically; others, such as *farmer* and *duckling* , are expressed derivatively. Corresponding to these two modes of expression we have two types of concepts and

of linguistic elements, radical *(farm, kill, duck)* and derivational *(-er,-ling)* . When a word (or unified group of words) contains a derivational element (or word), the concrete significance of the radical element *(farm-, duck-)* tends to fade from consciousness and to yield to a new concreteness *(farmer, duckling)* that is synthetic in expression rather than in thought. In our sentence the concepts of *farm* and *duck* are not really involved at all; they are merely latent, for formal reasons, in the linguistic expression.

但是，如果进行更仔细的语言分析，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无论我们可以多么轻易地想象这句话的两个主题，它们的表达都绝非我们感觉的那样直白，那样直接。一个farmer（农夫）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概念，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one who farms（一个种地的人）。其中，根本成分（farm-）所传达的概念完全无关人，而是指一种生产活动（to farm种地），其本身又基于一个特定的物体类型的概念（a farm农场）。类似地，duckling（小鸭）的概念和这个词的根本成分duck（鸭子）所表达的概念之间也隔了一层。duck这个成分可以作为独立的词出现，指整个一类动物，有大有小；而duckling仅限于指该类动物的幼雏。farmer一词有一个“施事格”后缀-er，它行使的功能是指示实施某项既定活动的人，在这里就是种地的人。它将动词to farm转化为施事性名词，正如它将动词to sing（唱）、to paint（画）和to teach（教）转化为相应的施事性名词singer（歌者）、painter（画家）和teacher（教师）一样。-ling这一成分的使用没有这么自由，不过它的意义还是很明显的。它在基本概念之上添加了“小”的意思（在gosling小鹅和fledgeling小鸟中也是如此）或与此有点关联的“可轻视的”意思（比如在weakling弱者、princeling小王子和hireling雇工中）。施事后缀-er和指小后缀-ling传达的意思都比较具体（大致是doer做事的人和little小的的意思），但是其具体性并没有被强调。与其说它们界定了不同的概念，不如说它们是在概念之间做媒介。farmer中的-er并非直接表示one who (farms)（种地的人），它只不过指出我们称为farmer（农夫）的这类人与农田里的活

计之间有足够紧密的联系，以至于他们习惯性地被认为总是从事这项活计。其实，农夫也可能进城去做些种地以外的其他营生，但是他的语言标签仍旧是farmer。在这里，语言暴露出一种无可奈何，或者不妨说一种固执倾向，即忽视直接交付于它的功能，而宁可依靠想象和习惯来填补区分一个具体概念（to farm）和另一个“派生”概念（farmer）的思维过渡和应用细节。任何语言都不可能把每一个具体观念皆用独立的词或根本成分表达出来。经验的具体性是无限的，而即使是最丰富的语言其资源也是有严格限制的。它必须将无数的概念归到某些基本概念的类项之下，而用其他的具体或半具体的观念作为功能性的媒介。这些媒介性成分——可能是独立的词、词缀或者根本成分的变体——所表达的观念可被称为“派生性的”或“修饰性的”。有些具体概念，如kill，是用根本方式表达的；其他的，如farmer和duckling，则是用派生方式表达的。与这两种表达方式相对应，我们有两种概念和语言成分，即根本的（farm、kill、duck）和派生的（-er、-ling）。如果一个词（或一个统一的词群）包含一个派生成分（或词），其根本成分（farm-、duck-）的具体意思就会倾向于从意识中隐退，让位给一个新的具体意思（farmer、duckling），后者在表达上是综合性的，在思维上则不然。在我们的例句中，farm和duck的概念并没有被真正包括进来；它们只是由于形式的原因潜藏于语言表达之中。

Returning to this sentence, we feel that the analysis of *farmer* and *duckling* are practically irrelevant to an understanding of its content and entirely irrelevant to a feeling for the structure of the sentence as a whol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sentence the derivational elements-erand *-ling* are merely details in the local economy of two of its terms *(farmer, duckling)* that it accepts as units of expression. This indifference of the sentence as such to some part of the analysis of its words i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if we substitute such radical words as *man* and *chick* for *farmer* and *duckling,* we obtain a new material content, it is true, but not in the

least a new structural mold. We can go further and substitute another activity for that of “killing,” say “taking.” The new sentence, *the man takes the chick* ,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sentence in what it conveys, not in how it conveys it. We feel instinctively, without the slightest attempt at conscious analysis, that the two sentences fit precisely the same pattern, that they are really the same fundamental sentence, differing only in their material trappings. In other words, they express identical relational concepts in an identical manner. The manner is here threefold—the use of an inherently relational word *(the)* in analogous positions, the analogous sequence (subject; predicate, consisting of verb and object) of the concrete terms of the sentence, and the use of the suffixed element-s in the verb.

现在再看这个句子，我们会感觉拆解成farm + er，duck + ling这种对farmer和duckling的分析，与对全句内容的理解实际上并不相干，与对句子结构的整体性的感受更是完全不相干。从句子的角度看，派生成分-er和-ling只不过是两个被其接纳为表达单位的词（farmer、duciling）在局部构造上的细节。句子本身对词的分析的某些部分并不在意，这可以由下述事实来证明：如果把farmer和duckling替换成man（男人）和chick（小鸡）等根本词，我们诚然会得到新的素材内容，但是却丝毫没有得到新的结构模型。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将killing（宰）替换成另一活动，比如taking（拿）。这个新句子，the man takes the chick（这男人拿这小鸡），所传达的内容和第一句完全不同，但是传达的方式却没有区别。我们无需进行任何有意识的分析，就可以本能地感觉到这两个句子完全符合同一个格局，它们其实是同一个基本句子，只是在素材的装饰上有所不同。换言之，它们是以同样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关系性概念。这里的方式包括三个方面：在相同的位置使用本身是关系性的词（the），句子的具体成分遵照相同的顺序（主语；谓语，包括动词和宾语），以及动词中使用后缀成分-s。

Change any of these features of the sentence and it becomes modified, slightly or seriously, in some purely relational, non-material regard. If *the* is omitted *(farmer kills duckling, man takes chick),* the sentence becomes impossible; it falls into no recognized formal pattern and the two subjects of discourse seem to hang incompletely in the void. We feel that there is no relation established between either of them and what is already in the minds of the speaker and his auditor. As soon as a *the* is put before the two nouns, we feel relieved. We know that the farmer and duckling which the sentence tells us about are the same farmer and duckling that we had been talking about or hearing about or thinking about some time before. If I meet a man who is not looking at and knows nothing about the farmer in question, I am likely to be stared at for my pains if I announce to him that “the farmer [what farmer?]kills the duckling [didn't know he had any, whoever he is].” If the fact nevertheless seems interesting enough to communicate, I should be compelled to speak of “*a farmer* up my way” and of “*a duckling* of his.” These little words, *the* and*a* , have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establishing a definite or an indefinite reference.

改变句子的上述特征中的任何一个，它就会在某种纯关系（而非素材）方面发生或轻微或严重的变化。如果the被省去（farmer kills duckling农夫宰小鸭，man takes chick男人拿小鸡），句子就变成不可能的了；它无法归入任何一种公认的形式格局，它的两个话语主题似乎残缺地悬在空中。我们会感觉两者之中没有一个能与说话人及听话人头脑中已有的东西建立起任何联系。把一个the往两个名词前一放，我们就即刻感觉踏实了。我们知道，这个加了the的句子告诉我们的这个农夫和这只小鸭就是我们不久前谈到或听到或想到的那个农夫和那只小鸭。假如我遇到一个人，他既没有在看这个农夫，对其也一无所知，我如果还对他说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这农夫

（哪个农夫？）宰这小鸭（不管是谁，我不知道他有小鸭子啊！）），他很可能会瞪着我看我白费唾沫。不过假如这事儿足够有趣，值得一谈，我可能就不得不说a farmer up my way（我那儿的一个农夫）和a duckling of his（他的一只小鸭子）。the和a这类小词承担着建立确定指称或不确定指称的重要功能。

If I omit the *first* the and also leave out the suffixed-s, I obtain an entirely new set of relations. *Farmer, kill the duckling* implies that I am now speaking to the farmer, not merely about him; further, that he is not actually killing the bird, but is being ordered by me to do so. The subjective relation of the first sentence has become a vocative one, one of address, and the activity is conceived in terms of command, not of statement. We conclude, therefore, that if the farmer is to be merely talked about, the little *the* must go back into its place and the *-s* must not be removed. The latter element clearly defines, or rather helps to define, statement as contrasted with command. I find, moreover, that if I wish to speak of several farmers, I cannot say *the farmers kills the duckling,* but must say *the farmers kill the duckling* . Evidently-*s* involves the notion of singularity in the subject. If the noun is singular, the verb must have a form to correspond; if the noun is plural, the verb has another, corresponding form. [6_2] Comparison with such forms as *I kill* and *you kill* shows, moreover, that the *-s* has exclusive reference to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speaker or the one spoken to. We conclude, therefore, that it connotes a personal relation as well as the notion of singularity. And comparison with a sentence like *the farmer killed the duckling*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implied in this overburdened-s a distinct reference to present time. Statement as such and personal reference may well be looked upon as inherently relational concepts. Number is evidently felt by those who speak English as involving a necessary relation, otherwise there would be

no reason to express the concept twice, in the noun and in the verb. Time also is clearly felt as a relational concept; if it were not, we should be allowed to say *the farmer killed-s* to correspond to *the farmer kill-s* . Of the four concepts inextricably interwoven in the -s suffix, all are felt as relational, two necessarily s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 truly relational concept and one that is so felt and treated, though it need not be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will receive further attention in a moment.

如果我省去第一个the，也删掉后缀的-s，就会得到一组全新的关系。这样出来的句子Farmer, kill the duckling（农夫，宰这小鸭）暗示的是我正在和该农夫讲话，而不仅仅是在谈与他有关的事情；而且，他并没有在宰那只小鸭子，而是正被我命令着去这么做。原句的主格关系变成了呼格关系，即称呼关系，动作也被设想为命令，而不是陈述。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如果那个农夫只是被谈及，那么那个小小的the就必须回到原位，-s也不能省去。后一个成分即-s清楚地界定了（或者说帮助界定了）陈述句而不是命令句。我们还注意到，如果我想谈论几个农夫，就不能说the farmers kills the duckling，而必须说the farmers kill the duckling。很明显，-s含有主语是单数的意思。如果主语名词是单数，动词必须有与其相应的形式；如果主语名词是复数，动词则有另一种相应的形式。[7_2] 与I kill（我宰）和you kill（你宰）等形式进行比较，可以进一步看出-s专门指既非说话人也非说话对象的另一个人。因此，我们推断，它除了指示单数的意思，还指示人称关系。再与the farmer killed the duckling（这农夫宰了这小鸭）这样一个句子做个比较，还可以看出这个已经超负荷的-s还清楚地指示现在时。我们尽可以把陈述本身以及人称都视为原本即为关系性的概念。而数这个概念，说英语的人显然感觉它涉及一种必要的关系，否则就没有理由将它表达两次，一次在名词里，一次在动词里。时间概念我们也明显地感觉是一种关系性的概念；若非如此，我们就应该可以说the farmer killed-s，以与the farmer kill-s相对应。总之，后缀-s上交织着的四个不可分割的概念（即陈述、人称、数和时

间），我们都感觉是关系性的，其中两个肯定是关系性的。真正关系性的概念，以及被感觉如此、并被当作关系性的、但实质上不一定如此的概念，这二者间的区别，下文将进一步讨论。

Finally, I can radically disturb the relational cut of the sentence by changing the order of its elements. If the positions of *farmer* and *kills* are interchanged, the sentence reads *kills the farmer the duckling* , which is most naturally interpreted as an unusual but not unintelligible mode of asking the question, *does the farmer kill the duckling?* In this new sentence the act is not conceived as necessarily taking place at all. It may or it may not be happening, the implication being that the speaker wishes to know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and that the person spoken to is expected to give him the information. 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 possesses an entirely different "modality" from the declarative one and implies a markedly different attitude of the speaker towards his companion. An even more striking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s effected if we interchange *the farmer* and *the duckling* . *The duckling kills the farmer* involves precisely the same subjects of discourse and the same type of activity as our first sentence, but the rôles of these subjects of discourse are now reversed. The duckling has turned, like the proverbial worm, or, to put it in grammatical terminology, what was "subject" is now "object," what was object is now subject.

最后，我还可以通过改变句子各成分的顺序来彻底打乱它的关系格局。如果将farmer和kills的位置互换，句子就变成kills the farmer the duckling（宰-s这农夫这小鸭），这很自然地会被理解为一种虽然不寻常但也并非不可解的提问方式，即does the farmer kill the duckling?（这农夫宰这小鸭吗？）在这个新句子中，"宰"的动作并没有被设想为一定发生。它可能正在发生，也可能没有。其含义是说话

人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并希望说话对象提供这一信息。这一疑问句的“语气”与陈述句的完全不同，暗示了说话人对同伴的一种明显不同的态度。如果我们把the farmer和the duckling互换，还可以实现人称关系上更突出的改变。The duckling kills the farmer（这小鸭宰这农夫）包含的话语主题和动作类型与我们的第一个句子完全一致，但是现在这些话语主题的角色被颠倒了。小鸭子的身份变了，就像谚语[7_3] 里说的虫子，或者，用语法术语来说，原本是“主语”的现在成了“宾语”，原本是宾语的现在成了主语。

The following tabular statement analyzes the sentenc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oncepts expressed in it and of the grammatical processes employed for their expression.

下面的表格从所表达的概念和表达所使用的语法程序这两个角度对句子进行了分析。

Concrete Concepts:

具体概念

First subject of discourse: *farmer*

第一话语主题：farmer

Second subject of discourse: *duckling*

第二话语主题：duckling

Activity: *kill*

动作：kill

—— analyzable into:

—可分析为：

Radical Concepts:

根本概念：

Verb: *(to) farm*

动词： (to) farm

Noun: *duck*

名词：duck

Verb: *kill*

动词：kill

Derivational Concepts:

派生性概念：

Agentive: expressed by suffix–*er*

施事的：由后缀-er表达

Diminutive: expressed by suffix–*ling* Relational Concepts:

指小的：由后缀-ling表达关系性概念：

Reference:

指称：

Definiteness of reference to first subject of discourse: expressed

by first *the* , which has preposed position

对第一话语主题的确定指称：由第一个the表达，位S在主题之前

Definiteness of reference to second subject of discourse: expressed by second *the* , which has preposed position

对第二话语主题的确定指称：由第二个tlie表达，位S在主题之前

Modality:

语气

Declarative: expressed by sequence of “subject” plus verb; and implied by suffixed–*s*

陈述性的：由“主语”加动词的顺序表达，并由后缀-s暗指

Personal relations:

人称关系：

Subjectivity of *farmer* : expressed by position of *farmer* before *kills* ; and by suffixed *–s*

farmer的主语性质：由farmei在kills之前的位置表达，并由后缀-s暗指

Objectivity of *duckling* : expressed by position of *duckling* after *kills*

duckling的宾语性质：由duckling在kills之后的位置表达

Number:

数：

Singularity of first subject of discourse: expressed by lack of plural suffix in *farmer* ; and by suffix-sin following verb

第一话语主题的单数：由farmer不带复数后缀来表达，并由其后的动词带后缀-s暗指

Singularity of second subject of discourse: expressed by lack of plural suffix in *duckling*

第二话语主题的单数：由duckling不带复数后缀来表达

Time:

时间：

Present: expressed by lack of preterit suffix in verb; and by suffixed–*s*

现在时：由动词不带过去时后缀来表达，并由后缀-s暗指

In this short sentence of five words there are expressed, therefore, thirteen distinct concepts, of which three are radical and concrete, two derivational, and eight relational.Perhaps the most striking result of the analysis is a renewed realization of the curious lack of accord in our language between function and form.The method of suffixing is used both for derivational and for relational elements; independent words or radical elements express both concrete ideas (objects, activities, qualities) and relational ideas (articles like *the* and *a* ; words defining case relations, like *of, to, for, with, by* ; words defining local relations, like *in, on, at*); the same relational concept may be expressed more than once (thus, the singularity of *farmer* is both negatively expressed in the noun and positively in the verb); and one element may convey a group of interwoven concepts rather than one definite concept alone (thus the -sof *kills* embodies no less than four logically independent relations).

可以看出，这个只有五个词的短句表达了十三个不同的概念，其中三个是根本的和具体的，两个是派生性的，八个是关系性的。或许，这一分析的最显著的结果是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在我们的语言中功能与形式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奇怪的不一致。添加后缀的方法既被用于派生性成分，也被用于关系性成分；独立的词或根本成分既表达具体的意思（物体、动作和性质），也表达关系性的意思（冠词，如the和a；界定格关系的词，如of、to、for、with和by；界定方位关系的词，如in、on和at）；同一个关系性概念可被表达多次（比如，farmer的单数性质既以隐性方式在名词中表达，又以显性方式在动词中表达）；而且一个成分可能传达一组相互交织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确定的单一概念（比如，kills中的-s包含至少四种逻辑上独立的关系）。

Our analysis may seem a bit labored, but only because we are so accustomed to our own well-worn grooves of expression that they have come to be felt as inevitable. Yet destructive analysis of the familiar is the only method of approach to an understanding of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modes of expression. When one has learned to feel what is fortuitous or illogical or unbalanced in the structure of his own language, he is already well on the way towards a sympathetic grasp of the expression of the various classes of concepts in alien types of speech. Not everything that is “outlandish” is intrinsically illogical or far—fetched. It is often precisely the familiar that a wider perspective reveals as the curiously exceptional. From a purely logical standpoint it is obvious that there is no inherent reason why the concepts expressed in our sentence should have been singled out, treated, and grouped as they have been and not otherwise. The sentence is the outgrowth of historical and of unreasoning psychological forces rather than of a logical synthesis of elements that have been clearly grasped in their

individuality. This is the case, to a greater or less degree, in all languages, though in the forms of many we find a more coherent, a more consistent, reflection than in our English forms of that unconscious analysis into individual concepts which is never entirely absent from speech, however it may be complicated with or overlaid by the more irrational factors.

我们的分析可能显得有点太费劲了，但这只是因为我们过于习惯自己陈年老套的表达方式，以至于感觉非如此不可。但是对熟悉的东西进行解构分析是了解各种具有本质差异的表达方式的唯一方法。如果一个人学会了在自己的语言结构中感受偶然的或不合逻辑的或不协调的东西，那么他就已经做好准备去理解和掌握外语中各种概念的表达了。并非所有“外国腔”的东西都是本质上不合逻辑的或牵强的。放宽眼界，我们就会发现，熟悉的东西往往恰是出奇别扭的东西。从纯逻辑的角度看，我们的例句所表达的概念为什么要像现在这样被遴选出来，像现在这样被处理和组合，而不是另外一个样子，显然并没有内在的理由。句子是历史的力量和盲目的心理力量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将一个个清楚掌握的成分进行逻辑合成的结果。所有的语言或多或少都是如此，虽然我们会发现，与英语的形式相比，很多语言的形式更连贯、更一致地反映出那种无意识地理出单个概念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言语中从未完全消失，只是被更加非理性的因素所遮蔽或复杂化了。

A cursory examination of other languages, near and far, would soon show that some or all of the thirteen concepts that our sentence happens to embody may not only be expressed in different form but that they may be differently grouped among themselves; that some among them may be dispensed with; and that other concepts, not considered worth expressing in English idiom, may be treated as absolutely indispensable to the intelligible rendering of

the proposition. First as to a different method of handling such concepts as we have found expressed in the English sentence. If we turn to German, we find that in the equivalent sentence *(Der Bauer tötet das Entelein)* the definiteness of reference expressed by the English *the* is unavoidably coupled with three other concepts-number (both *der* and *das* are explicitly singular), case (*der* is subjective; *das* is subjective or objective, by elimination therefore objective), and gender, a new concept of the relational order that is not in this case explicitly involved in English (*der* is masculine, *das* is neuter). Indeed, the chief burden of the expression of case, gender, and number is in the German sentence borne by the particles of reference rather than by the words that express the concrete concepts *(Bauer, Entelein)* to which these relational concepts ought logically to attach themselves. In the sphere of concrete concepts too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German splits up the idea of "killing" into the basic concept of "dead" *(tot)* and the derivational one of "causing to do (or be) so and so" (by the method of vocalic change,*töt-*); the German *töt-et* (analytically *tot-* ＋vowel change＋*-et*) "causes to be dead" is, approximately, the formal equivalent of our *dead-en-s* , though the idiomatic application of this latter word is different. [6_3]

粗略考察一下或近或远的其他语言，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上文的例句碰巧涵盖的十三个概念当中，有些，甚至全部，不但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而且它们之间还可以有不同的组合方式；有些概念可以被省略；还有些虽然按照英语的习惯不值得表达，但是在其他语言中却被视为对理解命题绝对不可或缺。我们先来看一种处理我们的英语句子所表达的那些概念的不同方法。如果走进德语，我们会发现在相对应的句子（*Der Bauer tötet das Entelein* ）中，英语的the所表达的指称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和另外三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数（*der* 和*das* 都明确指示单数）、格（*der* 是主格；*das* 是主格或宾格，按照

淘汰法在这里是宾格）和性（表示关系性秩序的一个新概念，此例中英语没有明确指示；*der* 是阳性，*das* 是中性）。事实上，在这个德语句子中，表达格、性和数的重任主要是由指称虚词来承担的，而不是表达具体概念的词（*Bauer*，*Entelein*），虽然从逻辑上来说这些关系性概念应当附着于具体概念。在具体概念的范围内，也有两点值得注意：德语（通过元音变化的方式，即*töt-*）将“宰”的意思分解为基本概念“死”（*tot*）和派生概念“使做某事或使成为某物”；德语的*töt-et*（“致死”，可分析为*tot-* + 元音变化 + *-et*）在形式上大概相当于英语的*dead-en-s*（死-使-第三人称单数），不过后面这个词的习惯用法在英语中是不同的。[7_4]

Wandering still further afield, we may glance at the Yana method of expression. Literally translated, the equivalent Yana sentence would read something like “kill-s he farmer [6_4] he to duck-ling,” in which “he” and “to” are rather awkward English renderings of a general third personal pronoun *(he, she, it, or they)* and an objective particle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following noun is connected with the verb otherwise than as subject. The suffixed element in “kill-s” corresponds to the English suffix with the important exceptions that it makes no reference to the number of the subject and that the statement is known to be true, that it is vouched for by the speaker. Number is only indirectly expressed in the sentence in so far as there is no specific verb suffix indicating plurality of the subject nor specific plural elements in the two nouns. Had the statement been made on another's authority, a totally different “tense-modal” suffix would have had to be used. The pronouns of reference (“he”) imply nothing by themselves as to number, gender, or case. Gender, indeed, is completely absent in Yana as a relational category.

再走得远一点，我们可以看看雅纳语的表达方法。如果直译的话，与我们的英语句子对应的雅纳语句子会有点像kill-she farmer [7_5] he to duck-ling；其中的he和to都是勉强的英语翻译，分别对应一个总的第三人称代词（he、she、it或they）和一个宾格分词，这个分词指的是其后的名词不是相连动词的主语。kill-s中的后缀成分对应英语的后缀，但是有两点重要的差异：一是它不指示主语的数，二是它表示本陈述已知为真，说话人可以担保。在这个雅纳语句子中，数的概念只是被间接表达出来，因为既没有明确的动词后缀指示主语的复数，两个名词中也没有明确的复数成分。假如这句话是转述自他人，那就必须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时态-语气”后缀。指称代词（he）本身并不暗指数、性或格。事实上，性作为一个关系性范畴，在雅纳语中完全不存在。

The Yana sentence has already illustrated the point that certain of our supposedly essential concepts may be ignored; both the Yana and the German sentence illustrate the further point that certain concepts may need expression for which an English-speaking person, or rather the English-speaking habit, finds no need whatever. One could go on and give endless examples of such deviations from English form, but we shall have to content ourselves with a few more indications. In the Chinese sentence “Man kill duck,” which may be looked upon as the practical equivalent of “The man kills the duck,” there is by no means present for the Chinese consciousness that childish, halting, empty feeling which we experience in the literal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three concrete concepts—two objects and an action—are each directly expressed by a monosyllabic word which is at the same time a radical element; the two relational concepts-“subject” and “object”-are expressed solely by the position of the concrete words before and after the word of action. And that is all. Definiteness or indefiniteness of reference, number, personality as an inherent

aspect of the verb, tense, not to speak of gender—all these are given no expression in the Chinese sentence, which, for all that, is a perfectly adequate communication-provided, of course, there is that context, that background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that is essential to the complete intelligibility of all speech. Nor does this qualification impair our argument, for in the English sentence too we leave unexpressed a large number of ideas which are either taken for granted or which have been developed or are about to be developed in the course of the conversation. Nothing has been said, for example, in the English, German, Yana, or Chinese sentence as to the place relations of the farmer, the duck, the speaker, and the listener. Are the farmer and the duck both visible or is one or the other invisibl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peaker, and are both placed within the horizon of the speaker, the listener, or of some indefinite point of reference "off yonder"? In other words, to paraphrase awkwardly certain latent "demonstrative" ideas, does this farmer (invisible to us but standing behind a door not far away from me, you being seated yonder well out of reach) kill that duckling (which belongs to you)? or does that farmer (who lives in your neighborhood and whom we see over there) kill that duckling (that belongs to him)? This type of demonstrative elaboration is foreign to our way of thinking, but it would seem very natural, indeed unavoidable, to a Kwakiutl Indian.

这个雅纳语句子也已说明，某些我们认为必要的概念是可以忽视的；而雅纳语和德语句子还都进一步说明，某些在说英语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说英语的习惯——看来根本不需要表达的概念，在其他语言中可能需要表达出来。我们可以继续举出无数的例子，说明其他语言与英语形式的差异，但是这里我们只好再举有限的几个。汉语句子"人宰鸭"直译即Man kill duck差不多可以被视为与英语的The man kills the duck对等，但是在说汉语的人的意识中完全没有我们从

直译的英语句子中所感受到的幼稚、迟疑和空洞。三个具体概念——两个物体和一个动作——各由一个单音节词表达，每个词同时又是一个根本成分；两个关系性概念——“主语”和“宾语”——只由具体的词位于动作词之前或之后来表达。如此而已。指称的确定性或不确定性、数、作为动词固有特征的人称、时态，当然还有性，这些在汉语句子中都没有被表达出来；尽管如此，这个句子仍然构成完全足量的交流——当然，前提是有相应的语境，有共享的背景，不过这些是充分理解任何言语都不可少的。这种限制并没有削弱我们的论点，因为在英语句子中，我们也留了大量的意思没有表达出来，要么是心照不宣的，要么是已经说清或将在谈话过程中说清的。比如，在英语、德语、雅纳语和汉语句子中，都没有提到农夫、鸭子、说话人和听话人的方位关系。从说话人的视角出发，农夫和鸭子都能看得见么？还是其中有一个看不见？二者都位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视野之内么？还是位于“远方”某个不确定的参照点范围之内？换言之，若用别扭的方式把某些隐性的“指示性”意思表达出来，那么是这个农夫（我们看不见，但是站在离我不远的一扇门后，你则坐在远得够不到的地方）宰那只（属于你的）小鸭子呢？还是那个农夫（住在你附近，我们能看见他在那边）宰那只（属于他的）小鸭子呢？这种指示性上的铺张对我们的思维方式而言是陌生的，但是对夸扣特尔部落的印第安人来说，却似乎很自然，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What, then, are the absolutely essential concepts in speech, the concepts that must be expressed if language is to be a satisfactory means of communication? Clearly we must have, first of all, a large stock of basic or radical concepts, the concrete wherewithal of speech. We must have objects, actions, qualities to talk about, and these must have their corresponding symbols in independent words or in radical elements. No proposition, however abstract its intent, is humanly possible without a tying on at one or more points to the concrete world of sense. In every intelligible proposition at least two of these radical ideas must be expressed, though in exceptional

cases one or even both may be understood from the context. And, secondly, such relational concepts must be expressed as moor the concrete concepts to each other and construct a definite, fundamental form of proposition. In this fundamental form there must be no doubt as to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 that obtain between the concrete concepts. We must know what concrete concept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lated to what other, and how. If we wish to talk of a thing and an action, we must know if they are coordinat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e.g., “He is fond of *wine and gambling* “); or if the thing is conceived of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doer” of the action, or, as it is customary to say, the “subject” of which the action is predicated; or if, on the contrary, it is the end point, the “object” of the action. If I wish to communicate an intelligible idea about a farmer, a duckling, and the act of killing, it is not enough to state the linguistic symbols for these concrete ideas in any order, higgledy-piggledy, trusting that the hearer may construct some kind of a relational pattern out of the general probabilities of the case. The fundamental syntactic relations must be unambiguously expressed. I can afford to be silent on the subject of time and place and number and of a host of other possible types of concepts, but I can find no way of dodging the issue as to who is doing the killing. There is no known language that can or does dodge it, any more than it succeeds in saying something without the use of symbols for the concrete concepts.

那么，语言中绝对不可少的概念，语言作为一种合格的交流方式必须表达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呢？首先，很明显，我们必须有大量的基础的或根本的概念，作为言语的具体家当。我们必须有可资谈论的物体、动作和品质，而这些都必须有各自的相应符号，即独立的词或者根本成分。一个命题，无论其内容多么抽象，如果不能和具体的感官世界在某一个或某几个点上发生联系，那么它对人类来说就是不可

能的。每个可理解的命题都必须至少表达上述根本概念中的两个，尽管在例外的情况下，其中的一个甚至两个都可以借助语境来理解。其次，有些关系性概念必须表达出来，它们把各个具体概念连在一起，构成一个确定的、基本的命题形式。在这个基本形式中，具体概念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的性质是应该不容置疑的。我们必须知道哪个具体概念以何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与另外哪个具体概念相连。我们若想谈论一件东西和一个动作，就必须知道它们是否平等地联系在一起（比如He is fond of *wine and gambling* 他嗜好酒和赌博）；或者这件东西被视为出发点，是动作的“从事者”，即通常所说的“主语”，动作是它的谓项；又或者正好相反，这件东西是终点，是动作的“宾语”。如果我想就一个农夫、一只小鸭和宰的动作传递一个可理解的意思，那么我不能只是以某种顺序胡乱地将代表这些具体意思的语言符号说出来，而轻信听话人可以从各种泛泛的可能性中构建出某种关系格局。基本的句法关系是必须毫不含糊地表达出来的。我可以不谈时间、地点和数的话题，也可以不谈很多其他可能的概念类型，但是我无法躲开“谁在实施宰杀动作”这一问题。没有一种已知的语言能够躲开或真的躲开了这一点，正如语言若不使用表示具体概念的符号，就什么都说不了。

We are thus once more reminded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ssential or unavoidable relational concepts and the dispensable type. The former are universally expressed, the latter are but sparsely developed in some languages, elaborated with a bewildering exuberance in others. But what prevents us from throwing in these “dispensable” or “secondary” relational concepts with the large, floating group of derivational, qualifying concepts that we have already discussed? Is there, after all is said and done,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a qualifying concept like the negative in *unhealthy* and a relational one like the number concept in *books* ? If *unhealthy* may be roughly paraphrased as *not healthy* , may not *books* be just as legitimately paraphrased, barring the

violence to English idiom, as *several book* ? There are, indeed, languages in which the plural, if expressed at all, is conceived of in the same sober, restricted, one might almost say casual, spirit in which we feel the negative in *unhealthy* . For such languages the number concept has no syntactic significance whatever, is not essentially conceived of as defining a relation, but falls into the group of derivational or even of basic concepts. In English, however, as in French, German, Latin, Greek—indeed in all the languages that we have most familiarity with—the idea of number is not merely appended to a given concept of a thing. It may have something of this merely qualifying value, but its force extends far beyond. It infects much else in the sentence, molding other concepts, even such as have no intelligible relation to number, into forms that are said to correspond to or "agree with" the basic concept to which it is attach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If "a man falls" but "men fall" in English, it is not because of any inherent change that has taken place in the nature of the action or because the idea of plurality inherent in "men" must, in the very nature of ideas, relate itself also to the action performed by these men. What we are doing in these sentences is what most languages, in greater or less degree and in a hundred varying ways, are in the habit of doing—throwing a bold bridge between the two basically distinct types of concept, the concrete and the abstractly relational, infecting the latter, as it were, with the color and grossness of the former. By a certain violence of metaphor the material concept is forced to do duty for (or intertwine itself with) the strictly relational.

由此，我们再一次意识到必要的或不可少的关系概念与可省略的关系概念之间的区别。前者是被普遍地表达出来的，后者在有些语言中只是被零星地表述，而在另外一些语言中则被铺陈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是什么阻止我们把那些“可省略的”或“次要的”关系性概念

与我们已讨论过的大宗的、浮动的派生性和修饰性概念混为一谈呢？尽管上文对此已做过反复陈述，这里还是要再问一句，修饰性的概念——比如unhealthy（不健康的）中的否定——和关系性的概念——比如books（“书”的复数）中的数，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根本的差异？如果unhealthy可以大致转述为not healthy，那么不考虑英语习惯的话，books是不是也可以同样有理由转述为several book（几本书）？事实上，在有些语言中，复数概念即使被表达，也是以冷静、克制、甚至可以说随意的态度来对待的，就如我们对unhealthy中否定的感觉。对这些语言来说，数的概念没有任何句法意义，并不被视为界定了某种关系，而是被归为派生概念甚至基本概念。但是，在英语中，就如在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中——说白了就如在我们最熟悉的所有语言中一样——数的观念都不只是被附着在一件东西的既有概念之上。它可能有一点那种纯粹修饰性的价值，但是它的势力所及则远不止此。它还影响句子里很多别的东西，将其他概念，甚至是与数没有可理解的关系的概念，铸造成与其最初附着的基础概念据称是对应或“一致”的形式。在英语中，a man falls（一人倒下-s），而men fall（人们倒下），这不是因为fall这个动作本质上发生了任何内在的变化，也不是因为就观念的性质而论，men所内含的复数观念本身也必须与这些men所实施的动作联系起来。我们在这两个句子中所做的正是大多数语言在不同程度上、以上百种不同的方式习惯于做的——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概念类型之间大胆地架起一座桥梁，一边是具体概念，一边是抽象的关系性概念，后者因此被晕染上前者的颜色和光泽。如此一来，通过某种隐喻手法的强用，实质的概念被迫为纯关系性的概念服务，或者与其交织在一起。

The case is even more obvious if we take gender as our text. In the two English phrases, “The white woman that comes” and “The white men that come,” we are not reminded that gender, as well as number, may be elevated into a secondary relational concept. It would seem a little far—fetched to make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crassly material, philosophically accidental concepts

that they are, a means of relating quality and person, person and action, nor would it easily occur to us, if we had not studied the classics, that it was anything but absurd to inject into two such highly attenuated relational concepts as are expressed by “the” and “that” the combined notions of number and sex. Yet all this, and more, happens in Latin. *white* -doer feminine-doing-one-*woman which* -one-feminine-doer other [6_6] -one-now-*come* ; and: *that* -several-masculine-doer several-masculine-*white* -doer masculine-doing-several-*man which* -several-masculine-doer other-several-now-*come.* Each word involves no less than four concepts, a radical concept (either properly concrete—*white, man, woman, come* —or demonstrative—*that, which*) and three relational concepts, selected from the categories of case, number, gender, person, and tense. Logically, only case [6_7] (the relation of *woman* or *men* to a following verb, of *which* to its antecedent, of *that* and *white* to *woman* or *men,* and of *which to come*) imperatively demands expression, and that onl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cepts directly affected (there is, for instance, no need to be informed that the whiteness is a doing or doer's whiteness [6_8]

one-feminine-*white* -doer feminine-doing-one-*woman which* -one-feminine-doer other [6_6] -one-now-*come* ; and: *that* -several-masculine-doer several-masculine-*white* -doer masculine-doing-several-*man which* -several-masculine-doer other-several-now-*come.* Each word involves no less than four concepts, a radical concept (either properly concrete—*white, man, woman, come* —or demonstrative—*that, which*) and three relational concepts, selected from the categories of case, number, gender, person, and tense. Logically, only case [6_7] (the relation of *woman* or *men* to a following verb, of *which* to its antecedent, of *that* and *white* to *woman* or *men,* and of *which to come*) imperatively demands expression, and that onl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cepts directly affected (there is, for instance, no need to be informed that the

whiteness is a doing or doer's whiteness [6_8]). The other relational concepts are either merely parasitic (gender throughout; number in the demonstrative, the adjective, the relative, and the verb) or irrelevant to the essential syntactic form of the sentence (number in the noun; person; tense). An intelligent and sensitive Chinaman, accustomed as he is to cut to the very bone of linguistic form, might well say of the Latin sentence, “How pedantically imaginative!” It must be difficult for him, when first confronted by the illogical complexities of our European languages, to feel at home in an attitude that so largely confounds the subject—matter of speech with its formal pattern or, to be more accurate, that turns certain fundamentally concrete concepts to such attenuated relational uses.

如果我们将性纳入讨论范围，情况就更明显了。在The white woman that comes（来的那个白种女人）和The white men that come（来的那些白种男人）这两个英语短语中，我们不会想到性和数一样可以被提高到次要关系概念的层次。把阳性和阴性这两个极端物质的、在哲学上只是偶然的概念用作一种联系品质和人、人和动作的手段，似乎有点牵强；而且，如果我们没有研读过经典作品，也不太容易想到，在the和that所表达的两个被如此高度虚化的关系性概念中插入数和性的综合理念其实一点也不荒诞。拉丁语恰是如此，甚至不止于此。比如，*Illa alba femina quae venit* 和*illi albi homines qui veniunt* 按照概念来翻译相当于：that-one-feminine-doer [7_6] one-feminine-*white* -doer feminine-doing-one-*woman* *which* -one-feminine-doer other [7_7] -one-now-*come* 那-阴性的-从事者／-阴性的-白的-从事者／阴性的-从事的-女人／那（关系代词）-阴性的-从事者／别的-现在-来；*that* -several-masculine-doer/several-masculine-*white* -doer/masculine-doing-several-*man/which* -several-masculine-doer other-several-now-*come* 那-几个-阳性的-从事者／几个-阳性的-白的-从事者／阳性的-从事的-几个-男人／那（关系代词）-几个-阳性的-从事者／别的-几个-现在-来。上面的每个词都包含不少于四种概

念：一个核心概念（要么是真正具体的：white、man、woman、come;要么是指称性的：that、which）和三个关系性概念，选自格、数、性、人称和时态等范畴。从逻辑上来说，只有格 [7_8] （woman或men与后面的动词的关系，which与其先行词的关系，that和white与woman或men的关系，以及which与come的关系）必须被表达出来，而且只在与直接被影响的概念有关系时才如此（比如，没有必要说明白色是从事的白色还是从事者的白色 [7_9] ）。其余的关系性概念要么只是寄生的（所有的性；指称词、形容词、关系词和动词里的数），要么与句子的核心句法形式无关（名词的数；人称；时态）。一个聪明而敏感的、惯于直击要害地使用语言形式的中国人很可能会如此评价我们的拉丁语句子："太迂腐玄虚了吧！"初次面对我们欧洲语言中不合逻辑的复杂性时，中国人一定很难自在地接受这样一种态度，即把言语的素材与形式格局如此混为一谈，或者更确切地说，把某些本质上是具体的概念转化为如此虚幻的关系性的应用。

I have exaggerated somewhat the concreteness of our subsidiary or rather non-syntactical relational concepts in order that the essential facts might come out in bold relief.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a Frenchman has no clear sex notion in his mind when he speaks of*unarbre* ("a—masculine tree") or of*unepomme* ("a—feminine apple"). Nor have we, despite the grammarians, a very vivid sense of the present as contrasted with all past and all future time when we say *He comes* . [6_9] This is evident from our use of the present to indicate both future time ("He comes to-morrow") and general activity unspecified as to time ("Whenever he comes, I am glad to see him," where "comes" refers to past occurrences and possible future ones rather than to present activity). In both the French and English instances the primary ideas of sex and time have become diluted by form—analogy and by extensions into the relational sphere, the concepts ostensibly indicated being now so vaguely delimited that it is rather the tyranny of usage than the

need of their concrete expression that sways us in the selection of this or that form. If the thinning—out process continues long enough, we may eventually be left with a system of forms on our hands from which all the color of life has vanished and which merely persist by inertia, duplicating each other's secondary, syntactic functions with endless prodigality. Hence, in part, the complex conjugational systems of so many languages, in which differences of form are attended by no assignable differences of function. There must have been a time, for instance, though it antedates our earliest documentary evidence, when the type of tense formation represented by *drove* or *sank* differed in meaning, in however slightly nuanced a degree, from the type *(killed, worked)* which has now become established in English as the prevailing preterit formation, very much as we recognize a valuable distinction at present between both these types and the "perfect" *(has driven, has killed)* but may have ceased to do so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6_10] Now form lives longer than its own conceptual content. Both are ceaselessly changing, but, on the whole, the form tends to linger on when the spirit has flown or changed its being. Irrational form, form for form's sake—however we term this tendency to hold on to formal distinctions once they have come to be—is as natural to the life of language as is the retention of modes of conduct that have long outlived the meaning they once had.

我有点夸大了次要的或者说非句法性的关系性概念的具体性，为的是使核心事实更加凸显。不用说，一个法国人在说*un arbre*（一棵阳性的树）或*une pomme*（一个阴性的苹果）时，脑子里并没有清晰的性别观念。同样，除了语法学家，我们在说He comes（他来）时，也没有非常明确的现在时意识以与所有的过去时和将来时相区分 [7_10]。这从下述现象中可以显见：我们使用现在时指示将来时（He comes tomorrow他明天来）和时间不确定的一般活动（Whenever he

comes, I am glad to see him无论他什么时候来，我都乐意见他，其中comes指的是过去发生过的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事，而不是现在的动作）。在上述法语和英语例子中，性别和时间的基本观念已经被形式类推和向关系领域的扩展所稀释，它们表面上所指的概念现在已经界限模糊，以至于左右我们选择这一种或那一种形式的与其说是具体表达的需要，毋宁说是习惯用法的苛求。如果这种稀释过程持续下去，假以时日，最后我们手头也许只剩下一个语言形式的系统，其中所有的生命色彩都已消失，形式只是由于惰性留存下来，在无止境的浪费中重复彼此的次要的句法功能。其结果之一就是众多语言都拥有的复杂的词形变化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形式的各种变化并未伴随任何相应的功能上的不同。比如，一定有过某个时期（尽管这个时期比我们最古老的文献还要早），在这个时期里drove和sank（drive和sink的过去式）所代表的时态构型与英语中现在通行的、业已固定的过去式构型（killed和workedkill和work的过去式）在意义上是有区别的，哪怕只是微小的区别，就如我们现在认为这两种类型的过去式与“完成式”（has driven、has killed）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但是将来某个时期可能就不再这么认为了。 [7_11] 须知形式比其自身的概念内容更长寿。两者都在不断地变化，但是总体而言，当精神已经消失或变样时，形式还趋于苟延残喘。不合理的形式，为形式而形式——不管我们怎么称呼这种形式上的区别一旦产生就会被抓住不放的趋势——对语言的生命来说是很自然的，正如风俗习惯在失去意义后仍然能长久地留存一样。

There is another powerful tendency which makes for a formal elaboration that does not strictly correspond to clear—cut conceptual differences. This is the tendency to construct schemes of classification into which all the concepts of language must be fitted. Once we have made up our minds that all things are either definitely good or bad or definitely black or white, it is difficult to get into the frame of mind that recognizes that any particular thing may be both good and bad (in other words, indifferent) or both

black and white (in other words, gray), still more difficult to realize that the good—bad or black—white categories may not apply at all. Language is in many respects as unreasonable and stubborn about its classifications as is such a mind. It must have its perfectly exclusive pigeon—holes and will tolerate no flying vagrants. Any concept that asks for expression must submit to the classificatory rules of the game, just as there are statistical surveys in which even the most convinced atheist must perforce be labeled Catholic, Protestant, or Jew or get no hearing. In English we have made up our minds that all action must be conceived of in reference to three standard times. If, therefore, we desire to state a proposition that is as true to—morrow as it was yesterday, we have to pretend that the present moment may be elongated fore and aft so as to take in all eternity. [6_11] In French we know once for all that an object is masculine or feminine, whether it be living or not; just as in many American and East Asiatic languages it must be understood to belong to a certain form—category (say, ring—round, ball—round, long and slender, cylindrical, sheet—like, in mass like sugar) before it can be enumerated (e.g., "two ball—class potatoes," "three sheet—class carpets") or even said to "be" or "be handled in a definite way" (thus, in the Athabaskan languages and in Yana, "to carry" or "throw" a pebble is quite another thing than to carry or throw a log, linguistically no less than in terms of muscular experience). Such instances might be multiplied at will. It is almost as though at some period in the past the unconscious mind of the race had made a hasty inventory of experience, committed itself to a premature classification that allowed of no revision, and saddled the inheritors of its language with a science that they no longer quite believed in nor had the strength to overthrow. Dogma, rigidly prescribed by tradition, stiffens into formalism. Linguistic categories make up a system of surviving dogma—dogma of the unconscious. They are often but half real as concepts; their life tends ever to languish

away into form for form's sake.

还有一种有力的趋势也导致形式上的繁复与明晰的概念差异不能严格地对应。这便是构建分类格局、把语言的所有概念都塞入其中的趋势。我们一旦在头脑中打定主意，认为所有的东西必定非好即坏，或非黑即白，就很难在思维框架里承认某个东西可能好且坏（换言之，无所谓的）或者黑且白（换言之，灰色的），更难认识到好坏或黑白的范畴可能根本不适用。在分类上，语言在很多方面也是顽固的、不讲理的，跟上面所讲的头脑一样。它必须有彼此完全隔断的鸽巢，不容许乱飞的流浪鸟。任何概念，若想得以表达，就必须遵守分类上的游戏规则，正如在有些统计调查中，即使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也必须被贴上天主教徒、新教徒或犹太教徒的标签一样，要么就无人理睬。在英语中，我们业已认定要根据三种标准时制来表达所有的动作。因此，如果我们想表述一个昨天为真、明天也同样为真的命题，就不得不假装现在时可以向前后延伸，以致包括永恒。 [7_12] 在法语中，我们永远知道一个东西是阳性的还是阴性的，无论它有没有生命；正如在美洲和东亚的很多语言里，必须先把一个东西归入某个形状范畴（如环形的、球形的、细长的、圆柱形的、片状的、像糖一样的堆状的），然后才能对它计数（比如两颗土豆、三张地毯），甚至才能说它“是什么样子的”或“被如何处理的”（比如，在阿萨巴斯卡语支和雅纳语里，“带”或“扔”一颗卵石和带或扔一段圆木是两回事，在这里语言上的差异不比肌肉体验上的差异小）。这样的例子可以随意举出很多。就好像在过去某个时期，一个民族无意识地拟就了一张草率的经验清单，并坚守一种不成熟的且不允许任何修改的分类，使继承语言的后人背负了一套他们不再全然相信却又无力推翻的知识。由传统所硬性规定的教条僵化为形式主义。语言范畴就构成了一个遗存的教条系统——一个无意识的教条系统。作为概念，它们往往只是半真实的；它们的生命逐渐枯萎，变成了为形式而形式。

There is still a third cause for the rise of this non-significant

form, or rather of non-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form. This is the mechanical operation of phonetic processes, which may bring about formal distinctions that have not and never had a corresponding functional distinction. Much of the irregularity and general formal complexity of our declensional and conjugational systems is due to this process. The plural of *hat* is*hats* , the plural of *self* is *selves* . In the former case we have a true-*s* symbolizing plurality, in the latter a *z-s* ound coupled with a change in the radical element of the word of *f* to *v*. Here we have not a falling together of forms that originally stood for fairly distinct concepts—as we saw was presumably the case with such parallel forms as *drove* and *worked* —but a merely mechanical manifolding of the same formal element without a corresponding growth of a new concept. This type of form development, therefore, while of the greatest interest for the general history of language, does not directly concern us now in our effort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grammatical concepts and their tendency to degenerate into purely formal counters.

促成这种无意义的形式、或者说形式的无意义差异的，还有第三个因素。这就是语音程序的机械式运作。这种运作可能导致现在没有且从未有过对应的功能差别的形式差别。我们的名词变格系统和动词变形系统所具有的不规则性和总体的形式复杂性，大多就是出于这一程序。比如，hat（帽子）的复数是hats，self（自己）的复数是selves。在前一个词里，有一个真正的象征复数的-s；在后一个词里，则是z-音加上词的根本成分中的f变为v。这并不是两种原本代表相当不同概念的形式归到了一起——前面提到的平行形式drove和worked大约就是这种情况——而只是同一种形式成分的机械性分化，并无与之对应的新概念产生。因此，这种形式发展尽管对一般的语言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对我们了解语法概念的性质以及它们退化为纯形式筹码的趋势却没有直接的干系。

We may now conveniently revise our first classification of concepts as expressed in language and suggest the following scheme:

现在我们可以对前文就语言表达的概念所做的分类进行适当修改，并提出以下方案了：

I . Basic *(Concrete) Concepts* (such as objects, actions, qualities): normally expressed by independent words or radical elements; involve no relation as such [6_12]

I．基本（具体）概念（如物体、动作、性质）：正常情况下由独立的词或根本成分表达；本身不涉及关系 [7_13]

II . *Derivational Concepts* (less concrete, as a rule, than I, more so than III): normally expressed by affixing non-radical elements to radical elements or by inner modification of these; differ from type

II．派生概念（一般说来其体性低于I，高于III）：正常情况下由在根本成分上附加非根本成分或者由根本成分的内部变化表达；与I类不同，II类概念界定的观念与整体命题不相关，但是为根本成分添加了某种意义，因此与I类概念其有一种内在的特定关系 [7_14]

III . I in defining ideas that are irrelevant to the proposition as a whole but that give a radical element a particular increment of significance and that are thus inherently related in a specific way to

concepts of type I [6_13] *Concrete Relational Concepts* (still more abstract, yet not entirely devoid of a measure of concreteness): normally expressed by affixing non-radical elements to radical elements, but generally at a greater remove from these than is the case with elements of type II, or by inner modification of radical elements; differ fundamentally from type II in indicating or implying relations that transcend the particular word to which they are immediately attached, thus leading over to

III．具体的关系性概念（更加抽象，但是并非完全没有一点具体性）：正常情况下由在根本成分上附加非根本成分表达，但是一般而言，与II类成分相比，III类的非根本成分离根本成分要更远一些，或者由根本成分的内部变化表达；与II类有本质差异，指示或暗示超越它们所直接依附的特定词的关系，因此过渡到下一类

IV．*Pure Relational Concepts* (purely abstract): normally expressed by affixing non-radical elements to radical elements (in which case these concepts are frequently intertwined with those of type III) or by their inner modification, by independent words, or by position; serve to relate the concrete elements of the proposition to each other, thus giving it definite syntactic form.

IV．纯关系性概念（完全抽象的）：正常情况下由在根本成分上附加非根本成分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概念常常与III类概念交织在一起），或者由其内部变化、由独立的词或由词的位置来表达；其功能是将命题里的具体成分互相联系起来，从而给命题一个确定的句法形式。

The nature of these four classes of concepts as regards their concreteness or their power to express syntactic relations may be thus symbolized:

这四类概念的性质，就其具体性或者表达句法关系的能力而言，可以这样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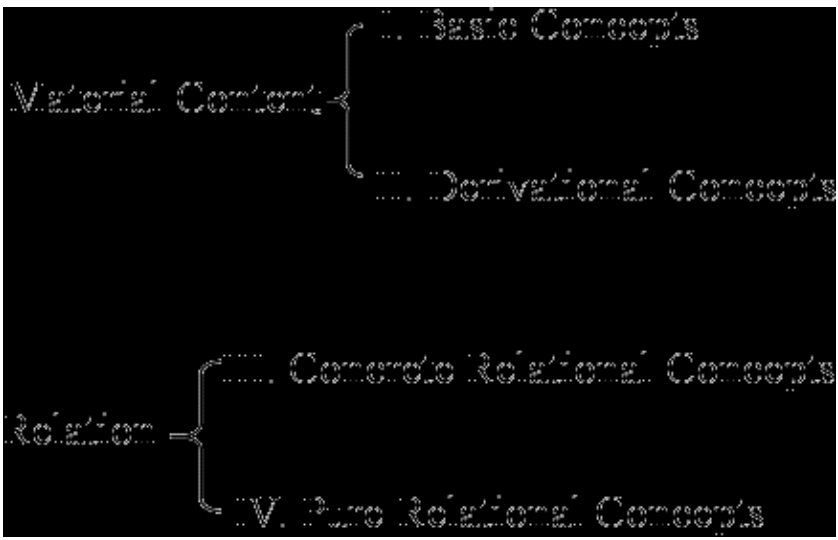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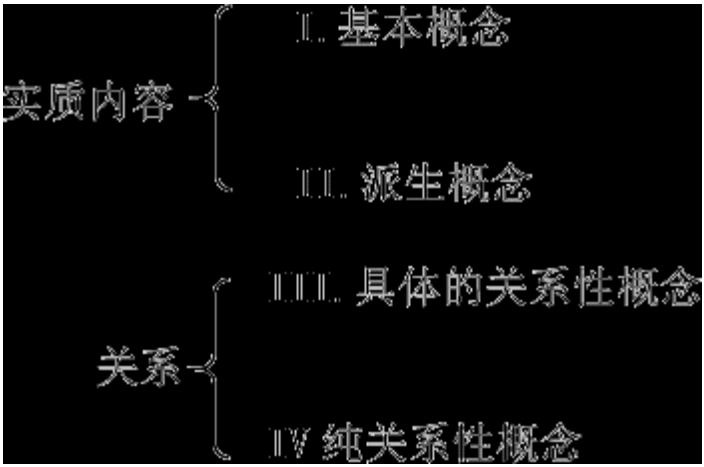

These schemes must not be worshipped as fetiches. In the actual work of analysis difficult problems frequently arise and we may well be in doubt as to how to group a given set of concepts. This is particularly apt to be the case in exotic languages, where we may be quite sure of the analysis of the words in a sentence and yet not succeed in acquiring that inner “feel” of its structure that enables us to tell infallibly what is “material content” and what is “relation.” Concepts of class I are essential to all speech, also concepts of class IV. Concepts II and III are both common, but not essential; particularly group III, which represents, in effect, a psychological and formal confusion of types II and IV or of types I and IV, is an avoidable class of concepts. Logically there is an impassable gulf between I and IV, but the illogical, metaphorical genius of speech has wilfully spanned the gulf and set up a continuous gamut of concepts and forms that leads imperceptibly from the crudest of materialities (“house” or “John Smith”) to the most subtle of relations. It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that the unanalyzable independent word belongs in most cases to either group I or group IV, rather less commonly to II or III. It is possible for a concrete concept, represented by a simple word, to lose its

material significance entirely and pass over directly into the relational sphere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losing its independence as a word. This happens, for instance, in Chinese and Cambodgian when the verb “give” is used in an abstract sense as a mere symbol of the “indirect objective” relation (e.g., Cambodgian “We make story this give all that person who have child,” i.e., “We have made this story *for* all those that have children”).

上述提案万不可被当作神圣的东西来崇拜。在实际分析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难题，而且对于某组概念如何分类，我们也很可能存有疑惑。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对外国语言的分析中，因为我们对外语句子中词的分析也许颇有信心，却无法获得对其结构的内在“感觉”，那种能帮助我们准确判断哪些是“实质内容”、哪些是“关系”的感觉。I类概念对所有言语都是必要的，IV类概念也是如此。II类和III类概念都是常见的，但都不是必要的；尤其是III类，它实际上代表着II类和IV类或者I类和IV类在心理和形式上的混淆，是可有可无的一类概念。从逻辑上讲，I类和IV类之间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非逻辑的、隐喻性的言语特征却任性地跨越了这道鸿沟，建立起一套连续的概念和形式，暗地里将最粗陋的实质内容（如“房子”或“张三”）引申至各种最微妙的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多数情况下，不可分析的独立词不是属于I类就是属于IV类，而较少属于II类或III类。一个由简单词表达的具体概念可能完全丧失其实质意义，直接进入关系性领域，但同时并不失去其作为一个词的独立性。例如，在汉语和柬埔寨语中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即动词“给”被用作抽象意思，仅仅是表示间接客观关系的符号（比如柬埔寨语句子“我们-编-故事-这-给-所有人-有孩子的”，即“我们为所有有孩子的人编了这个故事”）。

There are, of course, also not a few instances of transitions between groups I and II and I and III, as well as of the less radical one between II and III. To the first of these transitions belongs that

whole class of examples in which the independent word, after passing through the preliminary stage of functioning as the secondary or qualifying element in a compound, ends up by being a derivational affix pure and simple, yet without losing the memory of its former independence. Such an element and concept is the *full* of *teaspoonfull* , which hovers psychologically between the status of an independent, radical concept (compare *full*) or of a subsidiary element in a compound (cf. *brim-full*) and that of a simple suffix (cf. *dutiful*) in which the primary concreteness is no longer felt. In general, the more highly synthetic our linguistic type, the more difficult and even arbitrary it becomes to distinguish groups I and II.

当然，也有不少I类和II类之间以及I类和III类之间过渡的例子，II类和III类之间的过渡也有，但根本性更逊一些。属于上述第一种过渡的有一整类例子，即一个独立的词首先在复合词中担任次要或修饰性成分，最终变成纯粹的、简单的派生性词缀，但是仍能叫人忆起它原有的独立性。teaspoonfull（一满茶匙）中的full就是这样一种成分和概念，它在心理上徘徊于独立的根本概念（试比较full满的）或复合词中的附属成分（参照brim-full满到边的）和已感觉不到原有具体性的简单后缀（参照dutiful充满责任感的）之间。总体而言，我们的语言类型越是高度综合，I类和II类之间的区分就越难，甚至是任意的。

Not only is there a gradual loss of the concrete as we pass through from group I to group IV, there is also a constant fading away of the feeling of sensible reality within the main groups of linguistic concepts themselves. In many languages it becomes almost imperative, therefore, to make various sub—classifications, to segregate, for instance, the more concrete from the more abstract concepts of group II. Yet we must always beware of reading into

such abstracter groups that purely formal, relational feeling that we can hardly help associating with certain of the abstracter concepts which, with us, fall in group III, unless, indeed, there is clear evidence to warrant such a reading in. An example or two should make clear these all—important distinctions. [6_14] In Nootka we have an unusually large number of derivational affixes (expressing concepts of group II). Some of these are quite material in content (e.g., "in the house," "to dream of"), others, like an element denoting plurality and a diminutive affix, are far more abstract in content. The former type are more closely welded with the radical element than the latter, which can only be suffixed to formations that have the value of complete words. If, therefore, I wish to say "the small fires in the house"—and I can do this in one word—I must form the word "fire-in-the -house," to which elements corresponding to "small," our plural, and "the" are appended. The element indicating the definiteness of reference that is implied in our "the" comes at the very end of the word. So far, so good. "Fire-in-the -house-the" is an intelligible correlate of our "the house-fire." [6_15] But is the Nootka correlate of "the small fires in the house" the true equivalent of an English "*the house-firelets* "? [6_16] By no means. First of all, the plural element precedes the diminutive in Nootka: "fire-in-the -house-plural-small-the," in other words "the house-fires-let," which at once reveals the important fact that the plural concept is not as abstractly, as relationally, felt as in English. A more adequate rendering would be "the house-fire-several-let," in which, however, "several" is too gross a word, "—let" too choice an element ("small" again is too gross). In truth we cannot carry over into English the inherent feeling of the Nootka word, which seems to hover somewhere between "the house-firelets" and "the house-fire-several-small." But what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cuts off all possibility of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nglish-s of "house-firelets" and the "-several-small" of the Nootka word is this, that in Nootka

neither the plural nor the diminutive affix corresponds or refers to anything else in the sentence. In English “the house-firelets burn” (not “burns”), in Nootka neither verb, nor adjective, nor anything else in the proposition is in the least concerned with the plurality or the diminutiveness of the fire. Hence, while Nootka recognizes a cleavage between concrete and less concrete concepts within group II, the less concrete do not transcend the group and lead us into that abstracter air into which our plural-s carries us. But at any rate, the reader may object, it is something that the Nootka plural affix is set apart from the concreter group of affixes; and may not the Nootka diminutive have a slenderer, a more elusive content than our—let or—ling or the German-*chen* or-*lein*? [6_17]

我们从I类过渡到IV类，不但会发现具体性逐渐消失，还可以在语言概念的主要类型本身的范围之内感受到真实性的逐渐减弱。因此，在很多语言中，几乎不得不进行各种再分类，比如把II类里较具体的概念和较抽象的概念区分开来。不过，我们必须随时留意，不要从这些较抽象的类别中读出那种纯形式的、关系性的感觉，那种我们总是禁不住与在我们看来属于III类的某些较抽象的概念相联系的感觉，除非有明确的证据保证我们可以这样比附。举一两个例子，我们就能分清这些重要的区别了。 [7_15] 努特卡语中有多得异乎寻常的派生性词缀（表达II类概念）。其中有些在内容上有较高的实质性（比如“在房子里”、“梦到”），有些，像表示复数的成分和指小词缀，在内容上则要抽象得多。前一种比后一种与根本成分结合得更紧，后一种只能附加在具有完整词价值的形式后面。因此，如果我想说the small fires in the house（房子里的小火）——我可以只用一个词说出来——就必须构造出fire-in-the-house（房子里的火）这个词，然后再附加上相当于英语中的“小”、复数和the的成分。相当于英语的the、表示指称确定性的成分出现在该词的末尾。至此一切都算顺当。Fire-in-the-house-the是可以理解的，相当于我们的the house-fire（家-火）。 [7_16] 但是对应于the small fires in the house的努特卡语表达与英语的

the house firelets其中let是指小词缀真的对等么？[7_17] 绝对不是。首先，努特卡语的复数成分在指小成分之前：fire-in-the-house-plural-small-the，换言之，即the house-fires-let，这立刻显出重要的一点：努特卡语的复数概念没有英语中的感觉那么抽象，那么关系性强。更充分的翻译可能是the house-fireseveral-let，但是其中several一词太笨重，-let这一成分太矫情（small又太笨重）。事实上，我们无法把这个努特卡词的内在感觉译进英语里，它似乎在the house-firelets和the house-fire-several-small之间的某个地方徘徊。但是英语词house-firelets中的-s之所以根本不能和努特卡词中的-severalsmall进行比较，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努特卡语的复数和指小词缀都不对应或指示句子中的任何东西。在英语中，the house-firelets burn（而不是burns），但在努特卡语中这个命题里的动词、形容词或其他任何成分与fire的复数性或指小性都没有丝毫关系。所以，虽然努特卡语认可II类概念中具体的和不那么具体的概念之间的区别，但较不具体的概念并没有超出II类这一类别，不会像英语的复数后缀-s那样把我们带入那种更抽象的氛围。但是读者可能提出异议：无论如何，努特卡语的复数词缀与较具体的词缀类别有所不同总归是个事实；而且，难道努特卡语的指小成分就不能比英语的-let和-ling或德语的-*chen* 和-*lein* 拥有更细微、更飘忽的内容么？[7_18]

Can such a concept as that of plurality ever be classified with the more material concepts of group II? Indeed it can be. In Yana the third person of the verb makes no formal distinction between singular and plural. Nevertheless the plural concept can be, and nearly always is, expressed by the suffixing of an element (-*ba*-) to the radical element of the verb. “It burns in the east” is rendered by the verb *ya-hau-si* “burn-east-s.“ [6_18] “They burn in the east” is*ya-ba-hau-si* . Note that the plural affix immediately follows the radical element (*ya*-), disconnecting it from the local element (-*hau*-). It needs no labored argument to prove that the concept of plurality is here hardly less concrete than that of location “in the east,” and

that the Yana form corresponds in feeling not so much to our “They burn in the east” (*arduntoriente*) as to a “Burn-several-east-s, it plurally burns in the east,” an expression which we cannot adequately assimilate for lack of the necessary form—grooves into which to run it.

像复数这样的概念可以和II类中更具体的概念归在一起么？的确可以。在雅纳语中，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和复数之间没有形式上的差别。但是，复数概念可以而且几乎总是通过在动词根本成分后附加一个成分（*-ba-* ）来表达。It burns in the east（它在东方燃烧）可译为动词*yahau-si* ，即burn-east-s。[7_19] Theyburnintheeast（它们在东方燃烧）则是*ya-bahau-si* 。请注意，复数词缀紧接在根本成分（*ya-* ）之后，把它和处所成分（*-hau-* ）分开。不需多费口舌就可以证明，在这里复数概念未必不如处所概念in the east具体，而且这个雅纳语形式在感觉上对应的英语形式与其说是They burn in the east（拉丁语*ardunt oriente* ），不如说是Burn-severaleast-s (it plurally burns in the east)，这后一种表达我们无法充分地吸收进英语，因为英语中缺少可让它运行的必要的形式轨道。

But can we go a step farther and dispose of the category of plurality as an utterly material idea, one that would make of “books” a “plural book,” in which the “plural,” like the “white” of “white book,” falls contentedly into group I? Our “many books” and “several books” are obviously not cases in point. Even if we could say “many book” and “several book” (as we can say “many a book” and “each book”), the plural concept would still not emerge as clearly as it should for our argument; “many” and “several” are contaminated by certain notions of quantity or scale that are not essential to the idea of plurality itself. We must turn to central and eastern Asia for the type of expression we are seeking. In Tibetan,

for instance, *nga-s mi mthong* [6_19] “I—by man see, by me a man is seen, I see a man” may just as well be understood to mean “I see men,” if there happens to be no reason to emphasize the fact of plurality. [6_20] If the fact is worth expressing, however, I can say *nga-s mi rnamsmthong* “by me man plural see,” where*rnams* is the perfect conceptual analogue of *-s* in *books* , divested of all relational strings. *Rnams* follows its noun as would any other attributive word—“man plural” (whether two or a million) like “man white.” No need to bother about his plurality any more than about his whiteness unless we insist on the point.

但是，我们能不能更进一步，把复数范畴处理为完全具体的概念呢？这样一来，books就可以说成plural book（复数的书），其中的plural（复数的）像white books（白色的书）中的white（白色的）一样，可以被安心地归为I类。英语中的many books（很多书）和several books（好几本书）显然不属此类。即使我们能说many book和several book（就像我们能说many a book和each book），复数概念还是没有清楚地显现出来，无法在这里被引为论据；many和several都沾染了对复数意思本身来说并无必要的关乎数量和程度的某些理念。我们必须转向中亚和东亚去寻找我们所要的表达类型。比如，藏语的*nga-s mi mthong* [7_20] “我-被人看见，被我一个人被看见，我看见一个人”也可以理解为“我看见人们”，如果碰巧没有理由来强调复数的话。 [7_21] 但是，如果复数这事值得表达，那么我可以说*nga-s mi rnams mthong* “被／我／人／复数／看”，其中*rnams* 完全相当于books中的-s，只是摆脱了所有关系性的纠葛。*Rnams* 跟在它所修饰的名词后面，和所有其他的定语词一样，即man plural（“人／复数的”，不管是两个还是一百万个），就像man white（人／白的）。除非我们想强调，否则没有必要啰嗦人的复数性，就像没有必要啰嗦他的白。

What is true of the idea of plurality is naturally just as true of a great many other concepts.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belong where we who speak English are in the habit of putting them. They may be shifted towards I or towards IV, the two poles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 Nor dare we look down on the Nootka Indian and the Tibetan for their material attitude towards a concept which to us is abstract and relational, lest we invite the reproaches of the Frenchman who feels a subtlety of relation in *femme blanche* and *homme blanc* that he misses in the coarser—grained *white woman* and *white man* . But the Bantu Negro, were he a philosopher, might go further and find it strange that we put in group II a category, the diminutive, which he strongly feels to belong to group III and which he uses, along with a number of other classificatory concepts, [6_21] to relate his subjects and objects, attributes and predicates, as a Russian or a German handles his genders and, if possible, with an even greater finesse.

复数观念如此，很多其他的概念自然也如此。它们不一定属于我们说英语的人习惯把它们放置的地方。它们可以向语言表达的两极，I类概念和IV类概念，移动。我们可不敢因为努特卡印第安人和藏族人把我们视为抽象的和关系性的概念看作具体的，就轻视他们，除非我们想招致法国人的责难。法国人能感觉到femme blanche（女人／白-阴性）和homme blanc（男人／白-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这关系在比较粗糙的英语形式white woman和white man里是找寻不到的。但是一个班图黑人，如果他是哲学家的话，可能会更进一步，觉得我们将指小范畴归为II类很奇怪，他强烈地感觉应归为III类；他将指小范畴和其他很多类别概念 [7_22] 一起用于联系主语和宾语、定语和谓语，就像俄国人和德国人对待性的概念一样，而且，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更加细微。

It is because our conceptual scheme is a sliding scale rather than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experience that we cannot say in advance just where to put a given concept. We must dispense, in other words, with a well-ordered classification of categories. What boots it to put tense and mode here or number there when the next language one handles puts tense a peg "lower down" (towards I), mode and number a peg "higher up" (towards IV)? Nor is there much to be gained in a summary work of this kind from a general inventory of the types of concepts generally found in groups II, III, and IV. There are too many possibilities.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show what are the most typical noun-forming and verb—forming elements of group II; how variously nouns may be classified (by gender; personal and non-personal; animate and inanimate; by form; common and proper); how the concept of number is elaborated (singular and plural; singular, dual, and plural; singular, dual, trial, and plural; single, distributive, and collective); what tense distinctions may be made in verb or noun (the "past," for instance, may be an indefinite past, immediate, remote, mythical, completed, prior); how delicately certain languages have developed the idea of "aspect" [6_22] (momentaneous, durative, continuative, inceptive, cessative, durative—inceptive, iterative, momentaneous —iterative, durative—iterative, resultative, and still others); what modalities may be recognized (indicative, imperative, potential, dubitative, optative, negative, and a host of others [6_23]); what distinctions of person are possible (is "we," for instance, conceived of as a plurality of "I" or is it as distinct from "I" as either is from "you" or "he"?—both attitudes are illustrated in language; moreover, does "we" include you to whom I speak or not? —"inclusive" and "exclusive" forms); what may be the general scheme of orientation, the so-called demonstrative categories ("this" and "that" in an endless procession of nuances); [6_24] how frequently the form expresses the source or nature of the speaker's

knowledge (known by actual experience, by hearsay, [6_25] by inference); how the syntactic relations may be expressed in the nou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gentive, instrumental, and person affected; [6_26] various types of “genitive” and indirect relations) and, correspondingly, in the verb (active and passive; active and static; transitive and intransitive; impersonal, reflexive, reciprocal, indefinite as to object, and many other special limitations on the starting—point and end—point of the flow of activity). These details, important as many of them are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ner form” of language, yield in general significance to the more radical group—distinctions that we have set up. It is enough for the general reader to feel that language struggles towards two poles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material content and relation—and that these poles tend to be connected by a long series of transitional concepts.

我们的概念结构是一个活动标尺，而不是对经验的哲学分析。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预判某个概念该放在什么地方。换言之，我们必须放弃井然有序的范畴分类。为什么非得把时态和语态放在这里，把数放在那里呢？说不定我们接触到的下一种语言会把时态（向I类）降低一级，而把语态和数（向IV类）升高一级。再说，为一般而言属于II、III和IV类的概念类型列一个总清单，对我们这种概述性工作也没多少好处。可能性太多了。不过讲一讲下面的内容可能还是会比较有意思：1、II类中最典型的名词构形和动词构形成分是什么；2、名词可以有哪些不同的分类方式（按照性别，人称和非人称，有生命和无生命，按照形式，或通名和专名）；3、数的概念可以怎样发挥（单数和复数，单数、双数和复数，单数、双数、三数和复数，抑或单数、列举和集合）；4、对动词或名词可进行哪些时态上的区分（比如“过去时”可能是不确定的、直接的、遥远的、神话的、完成的、在先的）；5、有些语言把“体” [7_23] 发展到怎样精细的程度（瞬时的、即时的、持续的、开始的、终止的、即时-开始的、反复的、瞬时-重复的、即时-重复的、结果的，等等）；6、哪些语气是可以被识别的

（陈述的、命令的、可能的、怀疑的、希求的、否定的以及许多其他的语气[7_24]）；7、哪些人称区别是可能的（比如，“我们”是被视为“我”的复数，还是被视为有别于“我”，正如二者皆有别于“你”和“他”？——这两种态度在语言里都有例证；再者，“我们”包括我说话的对象“你”吗？换言之，是“包括形式”还是“排除形式”？）；8、方向，即所谓的指称性范畴，其普遍结构是什么（“这”和“那”有无穷无尽的不同用法）[7_25]；9、形式经常被用来表达说话人知识的来源和性质（从实际经验获得的、听说的[7_26]、推知的）；10、句法关系在名词中可以如何表达（主格和宾格，施事格、工具格和所涉及的人[7_27]，各种类型的“所有格”和间接关系），相应地，在动词中又可以如何表达（主动的和被动的，动态的和静态的，及物的和不及物的，非人称的、反身的、相互的、不确定对象的以及关于活动过程起点和终点的许多别的特殊限制）。这些细节中尽管有许多对了解语言的“内在形式”很重要，但是在一般意义上它们却不及我们之前确立的更根本的类别区分。对一般读者来说，能感受到语言向着语言表达的两极——实质内容和关系——挣扎，而这两极由一长串过渡性的概念连接起来，就足够了。

In dealing with words and their varying forms we have had to anticipate much that concerns the sentence as a whole. Every language has its special method or methods of binding words into a larger unity.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methods is apt to vary with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dividual word. The more synthetic the language, in other words, the more clearly the status of each word in the sentence is indicated by its own resources, the less need is there for looking beyond the word to the sentence as a whole. The Latin *agit* “(he) acts” needs no outside help to establish its place in a proposition. Whether I say *agitdominus* “the master acts” or *sic feminaagit* “thus the woman acts,” the net result as to the syntactic feel of the *agit* is practically the same. It can only be a verb, the predicate of a proposition, and it can only be conceived as a

statement of activity carried out by a person (or thing) other than you or me. It is not so with such a word as the English *act* . *Act* is a syntactic waif until we have defined its status in a proposition—one thing in “they act abominably,” quite another in “that was a kindly act.” The Latin sentence speaks with the assurance of its individual members, the English word needs the prompting of its fellows. Roughly speaking, to be sure. And yet to say that a sufficiently elaborate word-structure compensates for external syntactic methods is perilously close to begging the question. The elements of the word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a specific way and follow each other in a rigorously determined sequence. This is tantamount to saying that a word which consists of more than a radical element is a crystallization of a sentence or of some portion of a sentence, that a form like *agit* is roughly the psychological [6_27] equivalent of a form like *age is* “act he.” Breaking down, then, the wall that separates word and sentence, we may ask: What, at last analysis, are the fundamental methods of relating word to word and element to element, in short, of passing from the isolated notions symbolized by each word and by each element to the unified proposition that corresponds to a thought?

我们在前文讨论词及其各种形式时，不得不预先说了不少关于整个句子的情况。每种语言都有其特殊的一种或几种方法，将词组合成更大的单位。这些方法的重要性常常因单个词的复杂程度而不同。一种语言越综合，换言之，每个词在句子中的地位由其自身指示得越清楚，就越不需要超出词的范围来顾及整个句子。拉丁语中的*agit* “（他）行动”不需要借助外力就能确定它在一个命题里的位置。不管我说*agit dominus* “主人行动”还是*sic femina agit* “于是女人行动”，agit在句法感觉上的最终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它只能是一个动词，一个命题的谓语，而且只能被视为对你我之外另一个人（或东西）所做动作的陈述。英语的act一词就不是这样。act是一个句法上的流浪

儿，直到我们确定它在命题里的地位——在they act abominably（他们恶劣地行动）里是一回事，在that was a kindly act（那是一个善意的行动）里又是另一回事。拉丁语的句子说出来，它的各个成员可以独当一面，而英语词则需要其伙伴的扶持。当然，这只是就大体上说的。非要说一个足够详尽的构词法可以弥补外在的造句法，那就近乎诡辩了。词的成分以特定的方式彼此联结，按照严格规定的顺序一一排列。这相当于说，由不止一个根本成分构成的词是一个句子或句子的一部分的结晶，而像*agit* 这样的形式在心理上 [7_28] 大致等同于*age is* “行动／他”这样的句子形式。因此，在打破词和句子之间的隔阂之后，我们可以问一问：分析到最后，究竟是什么基本方法把词和词、成分和成分联结起来了？简言之，从由各个词和各个成分象征的孤立观念过渡到对应于一次思维的统一命题，用的是什么基本方法？

The answer is simple and is implied in the preceding remarks.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the most powerful of all relating methods is the method of order. Let us think of some more or less concrete idea, say a color, and set down its symbol-*red* ; of another concrete idea, say a person or object, setting down its symbol-*dog* ; finally, of a third concrete idea, say an action, setting down its symbol-*run* . It is hardly possible to set down these three symbols-*red dog run*- without relating them in some way, for example *(the) red dog run(s)* . I am far from wishing to state that the proposition has always grown up in this analytic manner, merely that the very process of juxtaposing concept to concept, symbol to symbol, forces some kind of relational “feeling,” if nothing else, upon us. To certain syntactic adhesions we are very sensitive, for example, to the attributive relation of quality *(red dog)* or the subjective relation *(dog run)* or the objective relation *(kill dog)* , to others we are more indifferent, for example, to the attributive relation of circumstance *(to-day red dog run* or *red dog to-day run* or *red dog run to-day,* all of which are equivalent propositions or propositions in embryo).

Words and elements, then, once they are listed in a certain order, tend not only to establish some kind of relation among themselves but are attracted to each other in greater or in less degree. It is presumably this very greater or less that ultimately leads to those firmly solidified groups of elements (radical element or elements plus one or more grammatical elements) that we have studied as complex words. They are in all likelihood nothing but sequences that have shrunk together and away from other sequences or isolated elements in the flow of speech. While they are fully alive, in other words, while they are functional at every point, they can keep themselves at a psychological distance from their neighbors. As they gradually lose much of their life, they fall back into the embrace of the sentence as a whole and the sequence of independent words regains the importance it had in part transferred to the crystallized groups of elements. Speech is thus constantly tightening and loosening its sequences. In its highly integrated forms (Latin, Eskimo) the “energy” of sequence is largely locked up in complex word formations; it becomes transformed into a kind of potential energy that may not be released for millennia. In its more analytic forms (Chinese, English) this energy is mobile, ready to hand for such service as we demand of it.

答案很简单，而且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有暗示：所有的联结方法中最基本、最有力的就是顺序法。让我们想一个相对具体的观念，比如一种颜色，并记下它的符号——red（红）；再想另一个具体观念，比如一个人或一件东西，也记下它的符号——dog（狗）；最后再想第三个具体观念，比如一个动作，还记下它的符号——run（跑）。仅仅记下这三个符号——red dog run——却不以某种方式把它们联结起来，比如(the) red dog run(s)，那是几乎不可能的。我当然不是想说命题总是以这种分析型的方式形成，我只是想说把概念和概念、符号和符号并置起来的过程本身就会迫使我们产生某种关系性的“感

觉”，且不论别的。我们对某些句法性粘附非常敏感，比如品质的修饰关系（red dog红狗）或主语性关系（dog run狗跑）或宾语性关系（kill dog宰狗）；对别的关系则会冷漠一些，比如条件性的修饰关系（to-day red dog run今天红狗跑或red dog to-day run红狗今天跑或red dog run to-day红狗跑今天，都是等价的命题或命题雏形）。因此，词和成分一旦以某种顺序排列起来，它们之间就不仅会建立某种关系，而且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互相吸引。大概正是这种或大或小的程度最终导致了此前被我们当作复杂词来研究的紧密凝结的成分组（一个或多个根本成分加上一个或多个语法成分）。它们很有可能只是紧缩在一起的序列，和话语流中的其他序列或孤立成分分离开来。当它们拥有充分的生命力的时候，换言之，当它们在每个关节均发挥作用的时候，它们会与邻居保持心理上的距离。当它们逐渐失去大部分生命力，就会退回到整个句子的怀抱，独立词序列由此重获此前部分地移交给成分结晶组的重要性。言语就是这样不断收紧和放松它的序列。在高度综合的语言形式里（如拉丁语、爱斯基摩语），序列的“能量”大都被紧锁在复杂的词的结构中；它转化为一种潜能，可能上千年都得不到释放。而在分析性较强的语言形式里（如汉语、英语），这种能量是灵活的，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拿来使用。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stress has frequently played a controlling influence in the formation of element-groups or complex words out of certain sequences in the sentence. Such an English word as *withstand* is merely an old sequence *with stand* , i.e., “against [6_28] stand,” in which the unstressed adverb was permanently drawn to the following verb and lost its independence as a significant element. In the same way French futures of the type *irai* “(I) shall go” are but the resultants of a coalescence of originally independent words: *ir* [6_29] *a'i* “to-go I-hav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unifying accent. But stress has done more than articulate or unify sequences that in their own right imply a syntactic relation. Stress is the most natural means at our disposal to emphasize a linguistic

contrast, to indicate the major element in a sequence. Hence we need not b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accent too, no less than sequence, may serve as the unaided symbol of certain relations. Such a contrast as that of *go' between* ("one who goes between") and to *go between'* may be of quite secondary origin in English, but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analogous distinctions have prevailed at all times in linguistic history. A sequence like *see' man* might imply some type of relation in which *see* qualifies the following word, hence "a seeing man" or "a seen (or visible) man," or is its predication, hence "the man sees" or "the man is seen," while a sequence like *see man'* might indicate that the accented word in some way limi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irst, say as direct object, hence "to see a man" or "(he) sees the man." Such alternations of relation, as symbolized by varying stresses, are important and frequent in a number of languages. [6_30]

毋庸置疑，重音常常在句子里的某些序列构成成分组或复杂词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像withstand（抵住）这样的英语词原本只是一个古老的序列with stand，即against [7_29] stand（对着／站），其中不带重音的副词被后面的动词永久性地拉了过去，从而失去了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成分的独立性。同样，法语的将来时类型*irai*“（我）要去”不过是原本的独立词*ir* [7_30] *a'i*“要-去／我-得”在统一重音的影响下合并起来的产物。但是重音所做的不仅仅是连接或统一本身暗示句法关系的序列，重音还是我们可支配的最自然的手段，可以强调语言上的对比，指示一个序列中的主要成分。因此，我们如果发现重音也像词的序列一样，可以独自成为某些关系的符号，也无需奇怪。比如go' between（“中间介绍人”重音在go上）和to go between'（“在中间走”重音在between上）之间的差异在英语中也许是相当次生的，但是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类似的区别在语言史上一直很普遍。see' man重音在see上这样一个序列可能暗含某种关系，其中see修饰后面的词，意为a seeing man（一个正在看的人）或a seen

(or visible) man（一个被看见或可看见的人），或者see是该序列的谓语，意为the man sees（那人看见）或the man is seen（那人被看见）；而see man'重音在man上这样一个序列就可能指被重读的词以某种方式限制第一个词的使用，比如作为直接宾语，意为to see a man（看见一人）或(he) sees the man（他看见那人）。这种由不同重音象征的关系上的变化，在不少语言里都是重要且常见的。[7_31]

It is a somewhat venturesome and yet not an altogether unreasonable speculation that sees in word order and stress the primary methods for the expression of all syntactic relations and looks upon the present relational value of specific words and elements as but a secondary condition due to a transfer of values. Thus, we may surmise that the Latin-*m* of words like *feminam, dominum* , and *civem* did not originally [6_31] denote that “woman,” “master,” and “citizen” were objectively related to the verb of the proposition but indicated something far more concrete, [6_32] that the objective relation was merely implied by the position or accent of the word (radical element)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m* , and that gradually, as its more concrete significance faded away, it took over a syntactic function that did not originally belong to it. This sort of evolution by transfer is traceable in many instances. Thus, the *of* in an English phrase like “the law of the land” is now as colorless in content, as purely a relational indicator as the “genitive” suffix-*is* in the *Latin lexurbis* “the law of the city.” We know, however, that it was originally an adverb of considerable concreteness of meaning, [6_33] “away, moving from,” and that the syntactic relation was originally expressed by the case form [6_34] of the second noun. As the case form lost its vitality, the adverb took over its function. If we are actually justified in assuming that the expression of all syntactic relations is ultimately traceable to these two unavoidable, dynamic features of speech-sequence and stress

[6_35] -an interesting thesis results:-All of the actual content of speech, its clusters of vocalic and consonantal sounds, is in origin limited to the concrete; relations were originally not expressed in outward form but were merely implied and articulated with the help of order and rhythm. In other words, relations were intuitively felt and could only “leak out” with the help of dynamic factors that themselves move on an intuitional plane.

把词序和重音视为表达所有句法关系的原始方法，而把某些词和成分现有的关系性价值视为由价值转移引起的次生情况，这样的推论有点冒险，但并非全无道理。比如，我们可以推测，拉丁词*feminam*（女人）、*dominum*（主人）和*civem*（公民）中的*-m* 最初 [7_32] 并不表示“女人”、“主人”和“公民”与命题中动词的关系是宾语性的，而是指示具体得多的内容 [7_33] ，宾格关系则仅仅通过紧接在*-m* 之前的词（根本成分）的位置或重音暗示；后来随着其较具体的意义逐渐消退，*-m* 才承担了原本不属于它的句法功能。这种通过转移而发生的演变在很多例子中都可窥见端倪。比如，the law of the land（本地的法律）等英语短语中的of现在内容上已没有色彩，是纯关系性的指示词，跟拉丁词*lex urbis* “城市的法律”中的“所有格”后缀*-is* 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它，即of原本是一个意义颇为具体的副词 [7_34] ，相当于away（离开）和moving from（从……移开），而它所承载的句法关系最初是由第二个名词的格的形式 [7_35] 来表达的。随着格的形式失去其活力，副词of就接过了格的功能。如果我们确有理由认为所有句法关系的表达最终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个不可避免的语言动态因素——顺序和重音 [7_36] ——就会得到一个有趣的观点：言语所有的实际内容，它的元音和辅音的组合，原本都仅限于具体内容；关系原本不用外在的形式表达，而只是借助顺序和节奏来暗示并说出来。换言之，关系是凭直觉感受到的，只有借助本身在直觉平面上活动的动力因素才会“泄露出来”。

There is a special method for the expression of relations that has been so often evolved in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that we must glance at it for a moment. This is the method of “concord” or of like signaling. It is based on the same principle as the password or label. All persons or objects that answer to the same counter-sign or that bear the same imprint are thereby stamped as somehow related. It makes little difference, once they are so stamped, where they are to be found or how they behave themselves. They are known to belong together. We are familiar with the principle of concord in Latin and Greek. Many of us have been struck by such relentless rhymes as *vidi ilium bonumdominum* “I saw that good master” or *quarumdearumsaevarum* “of which stern goddesses.” Not that sound-echo, whether in the form of rhyme or of alliteration [6_36] is necessary to concord, though in its most typical and original forms concord is nearly always accompanied by sound repetition. The essence of the principle is simply this, that words (elements) that belong together, particularly if they are syntactic equivalents or are related in like fashion to another word or element, are outwardly marked by the same or functionally equivalent affix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varies considerably according to the genius of the particular language. In Latin and Greek, for instance, there is concord between noun and qualifying word (adjective or demonstrative) as regards gender, number, and case, between verb and subject only as regards number, and no concord between verb and object.

语言史上还时常发展出另一种表达关系的特殊方法，我们有必要提一提。这就是“一致”法或使用同类符号的方法。它所依据的是与密码或标签相同的原则。任何人或东西，只要能回答同样的密令，或者具有同样的印记，就会因此被印上某种关系。一旦被这样印上，无论它们出现在什么地方或做何种表现，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它们会被认

为属于一伙。我们都熟悉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的一致原则。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惊异于*vidi ilium bonum dominum* “我看见了那好主人”或*quarum dearum saevarum* “那些严厉的女神的”等拉丁语表达中执拗的押韵。倒不是说声音-呼应——以尾韵的形式也好，以头韵 [7_37] 的形式也罢——必须保持一致，不过最典型的和最原始的形式的一致几乎总是伴随着声音的重复。这一原则的本质很简单：属于一伙的词（成分），尤其是句法上对等的、或者以类似方式与另一个词或成分相连的，外表上也要由同样的或者功能对等的词缀进行标示。这一原则的应用随各语言的特点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比如，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名词和修饰词（形容词或指示词）在性、数和格上一致，动词和主语只在数上一致，动词和宾语之间则不存在一致。

In Chinook there is a more far—reaching concord between noun, whether subject or object, and verb. Every noun is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five categories—masculine, feminine, neuter, [6_37] dual, and plural. “Woman” is feminine, “sand” is neuter, “table” is masculine. If, therefore, I wish to say “The woman put the sand on the table,” I must place in the verb certain class or gender prefixes that accord with corresponding noun prefixes. The sentence reads then, “The (fem.)-woman she (fem.)-it (neut.)-it (masc.)-on-put the (neut.)-sand the (masc.)-table.” If “sand” is qualified as “much” and “table” as “large,” these new ideas are expressed as abstract nouns, each with its inherent class-prefix (“much” is neuter or feminine, “large” is masculine) and with a possessive prefix referring to the qualified noun. Adjective thus calls to noun, noun to verb. “The woman put much sand on the large table,” therefore, takes the form: “The (fem.)-woman she (fem.)-it (neut.)-it (masc.)-on-put the (fem.)-thereof (neut.)-quantity the (neut.)-sand the (masc.)-thereof (masc.)-largeness the (masc.)-table.” The classification of “table” as masculine is thus three times insisted on—in the noun, in the adjective, and in the verb. In the Bantu languages, [6_38] the

principle of concord works very much as in Chinook. In them also nouns are classified into a number of categories and are brought into relation with adjectives, demonstratives, relative pronouns, and verbs by means of prefixed elements that call off the class and make up a complex system of concordances. In such a sentence as “That fierce lion who came here is dead,” the class of “lion,” which we may call the animal class, would be referred to by concording prefixes no less than six times,—with the demonstrative (“that”), the qualifying adjective, the noun itself, the relative pronoun, the subjective prefix to the verb of the relative clause, and the subjective prefix to the verb of the main clause (“is dead”). We recognize in this insistence on external clarity of reference the same spirit as moves in the more familiar*illumbonumdominum* .

在奇努克语中，有一种更加广泛的一致存在于名词（不管是主语还是宾语）和动词之间。每个名词都按照五个范畴进行分类：阳性、阴性、中性 [7_38] 、双数和复数。“女人”是阴性的，“沙子”是中性的，“桌子”是阳性的。因此，如果我想说“这女人放这沙子在这桌上”，就必须给动词加上一定的类别或性别前缀，来和相应的名词前缀保持一致。这样一来，这个句子就成了“这（阴）-女人／她（阴）-它（中）-它（阳）-在上面-放／这（中）-沙子／这（阳）-桌子”。如果“沙子”被形容为“多”，“桌子”被形容为“大”，这两个新观念就会被表达为抽象名词，各有其内在的类别前缀（“多”是中性或阴性的，“大”是阳性的）和指示被修饰名词的所有格前缀。如此一来，形容词和名词相呼应，名词和动词相呼应。因此“这女人放很多沙子在大桌子上”就成了下面的形式：“这（阴）-女人／她（阴）-它（中）-它（阳）-在上面-放／这（阴）-关于（中）-量／这（中）-沙子／这（阳）-关于（阳）-大／这（阳）-桌子”。也就是说，“桌子”的归类为阳性被强调了三次——在名词里，在形容词里，和在动词里。在班图语系中，一致原则的应用和奇努克语非常相像。在班图语系 [7_39] 里，名词也被分为几类，通过能标识类别的前缀成分与形容词、指示

词、关系代词以及动词产生联系，构成一个复杂的一致系统。在That fierce lion who came here is dead（来到这里的那头凶猛的狮子死了）这样一个句子里，“狮子”的类别（可称之为动物类）会被一致的前缀提到不下六次——指示词（那）、修饰性形容词、名词本身、关系代词、定语从句动词的主格前缀以及主句动词（is dead）的主格前缀。从这种对外在清晰指称的坚持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精神，一种与行走在我们更熟悉的拉丁语例子*illum bonum dominum* 里的一样的精神。

Psychologically the methods of sequence and accent lie at the opposite pole to that of concord. Where they are all for implication, for subtlety of feeling, concord is impatient of the least ambiguity but must have its well-certificated tags at every turn. Concord tends to dispense with order. In Latin and Chinook the independent words are free in position, less so in Bantu. In both Chinook and Bantu, however, the methods of concord and order are equally important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as the classifying verb prefixes refer to subject, object, or indirect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relative position they occupy. These examples again bring home to us the significant fact that at some point or other order asserts itself in every language as the most fundamental of relating principles.

在心理上，顺序法和重音法与一致法处于对立的两极。虽然它们都可用于暗指，用于表达微妙的感觉，但是一致法对哪怕最细微的模糊也不能容忍，它的每一步都必须有确凿无误的标签。一致法倾向于摆脱顺序法。在拉丁语和奇努克语中，独立词在位置上是自由的，在班图语中则稍逊。但是，在奇努克和班图语中，一致法和顺序法对于区分主语和宾语同样重要，因为分类动词词缀是根据它们占据的相对位置来指称主语、宾语或间接宾语的。这些例子再次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每一种语言里，顺序都会在某个节点上维护其作为最基

本的关系原则的地位。

The observant reader has probably been surprised that all this time we have had so little to say of the time-honored “parts of speech.” The reason for this is not far to seek. Our conven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words into parts of speech is only a vague, wavering approximation to a consistently worked out inventory of experience. We imagine, to begin with, that all “verbs” are inherently concerned with action as such, that a “noun” is the name of some definite object or personality that can be pictured by the mind, that all qualities are necessarily expressed by a definite group of words to which we may appropriately apply the term “adjective.” As soon as we test our vocabulary, we discover that the parts of speech are far from corresponding to so simple an analysis of reality. We say “it is red” and define “red” as a quality-word or adjective. We should consider it strange to think of an equivalent of “is red” in which the whole predication (adjective and verb of being) is conceived of as a verb in precisely the same way in which we think of “extends” or “lies” or “sleeps” as a verb. Yet as soon as we give the “durative” notion of being red an inceptive or transitional turn, we can avoid the parallel form “it becomes red, it turns red” and say “it reddens.” No one denies that “reddens” is as good a verb as “sleeps” or even “walks.” Yet “it is red” is related to “it reddens” very much as is “he stands” to “he stands up” or “he rises.” It is merely a matter of English or of general Indo—European idiom that we cannot say “it reds” in the sense of “it is red.” There are hundreds of languages that can. Indeed there are many that can express what we should call an adjective only by making a participle out of a verb. “Red” in such languages is merely a derivative “being red,” as our “sleeping” or “walking” are derivatives of primary verbs.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感到奇怪了：说了半天，我们居然没怎么提及历史悠久的“词性”问题。这么做的原因无需远求。我们传统上将词分为各种词性的做法只是模糊且摇摆地力求得出一份有条理的经验清单而已。我们首先想象所有的“动词”天生就是关于动作本身的，“名词”就是大脑中可以想象的某个确定的物或人的名字，而所有的品质一定是由某个特定类别的词汇来表达的，这些词汇可被恰当地称为“形容词”。但是一考查我们的词汇，我们就会发现词性与这样一种对现实的简单分析完全不相符。我们说it is red（它是红色的），而且将red（红色的）定义为品质词或者形容词。如果构想一个is red（是红色的）的对应物，其中整个谓语部分（由形容词和动词being是构成）被视为一个动词，跟我们认为extends（延伸）或者lies（躺）或者sleeps（睡）是动词一个样，我们会觉得很奇怪。然而，我们一旦赋予being red（是红色的）这个“持续的”概念一种初始的或者过渡性的意味，就能避免采用其平行形式it becomes red（它成为红色的）或者it turns red（它变成红色的），而可以直接说it reddens（它变红）了。没有人会否认reddens（变红）与sleeps甚至walks（走）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动词。其实it is red和it reddens的关联与he stands（他站）和he stands up（他站起来）或he rises（他起来）的关联非常相似。不能用it reds（它红）来表示“它是红色的”意思不过是英语或者一般印欧语言的习惯罢了。有数百种语言是可以这样做的。事实上，有很多语言只能通过把动词变为分词来表达我们称之为形容词的概念。在这样的语言里，red不过是派生的being red，就像英语的sleeping（正在睡觉）或walking（正在行走）是动词原形的派生词一样。

Just as we can verbify the idea of a quality in such cases as “reddens,” so we can represent a quality or an action to ourselves as a thing. We speak of “the height of a building” or “the fall of an apple” quite as though these ideas were parallel to “the roof of a building” or “the skin of an apple,” forgetting that the nouns

(height, fall) have not ceased to indicate a quality and an act when we have made them speak with the accent of mere objects. And just as there are languages that make verbs of the great mass of adjectives, so there are others that make nouns of them. In Chinook, as we have seen, “the big table” is “the—table its—bigness”; in Tibetan the same idea may be expressed by “the table of bigness,” very much as we may say “a man of wealth” instead of “a rich man.”

正如我们可以在类似reddens的例子中将品质的观念动词化一样，我们也可以径自将一种品质或者一个动作表述为一件东西，即名词化。我们会说起the height of a building（大楼的高度）或者the fall of an apple（苹果的坠落），似乎这样的观念与the roof of a building（大楼的屋顶）或者the skin of an apple（苹果的皮）一样；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两个名词（高度、坠落）在被我们打上纯物件即名词的腔调时，并没有停止表示品质和动作。并且，就像有些语言将大量的形容词变成动词一样，另有一些语言则将它们即形容词变成名词。在奇努克语中，我们已经看到，the big table（这／大／桌子）被表达为the-table its-bigness（这-桌子／它的-大）；在藏语中，相同的意思可被表述为the table of bigness（这／桌子／的／大），很像我们说a man of wealth（一／人／的／财富，即“一个有财富的人”），而不说a rich man（一／富／人）。

But are there not certain idea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render except by way of such and such parts of speech? What can be done with the “to” of “he came to the house”? Well, we can say “he reached the house” and dodge the preposition altogether, giving the verb a nuance that absorbs the idea of local relation carried by the “to.” But let us insist on giving independence to this idea of local relation. Must we not then hold to the preposition? No, we can

make a noun of it. We can say something like “he reached the proximity of the house” or “he reached the house—locality.” Instead of saying “he looked into the glass” we may say “he scrutinized the glass—interior.” Such expressions are stilted in English because they do not easily fit into our formal grooves, but in language after language we find that local relations are expressed in just this way. The local relation is nominalized. And so we might go on examining the various parts of speech and showing how they not merely grade into each other but are to an astonishing degree actually convertible into each other. The upshot of such an examination would be to feel convinced that the “part of speech” reflects not so much our intuitive analysis of reality as our ability to compose that reality into a variety of formal patterns. A part of speech outside of the limitations of syntactic form is but a will o' the wisp. For this reason no logical scheme of the parts of speech—their number, nature, and necessary confines—is of the slightest interest to the linguist. Each language has its own scheme. Everything depends on the formal demarcations which it recognizes.

可是，难道就没有某些意思只能用某几种特定的词性来表达吗？he came to the house（他来到了这房子）里的to该怎么分析呢？我们固然可以说he reached the house（他到达了这房子），从而完全回避这个介词to；这样给动词添加些微差异，就把to携带的处所意思吸收进来了。但是，假设我们坚持要给这个方位关系的观念一种独立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能使用介词了呢？不，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名词。我们可以这样说：he reached the proximity of the house（他到达了这房子的附近）或者he reached the house-locality（他到达了这房子的所在）。同样，我们可以不说he looked in to the glass（他朝镜子里看），而说he scrutinized the glass-interior（他端详了镜子里面）。这类表达法在英语里显得不自然是因为它们很难嵌进我们的

形式体系，但是在很多语言里，我们都可以发现方位关系就是这样表达的，即方位关系被名词化了。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审视各类词性，证明它们不仅彼此交融，而且实际上以惊人的程度相互转化。这样审视的结果是我们相信“词性”反映的不是我们对现实的直觉分析，而是我们将现实组织成各种形式格局的能力。在句法形式边界之外的任何词性都不过是荧荧鬼火。因此，有关词性的逻辑分类——无论是数量、性质还是必要的限制——对语言学家来说都毫无意义。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分类法。一切都有赖于它所认可的形式界限。

Yet we must not be too destructive. It is well to remember that speech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propositions.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and something must be said about this subject of discourse once it is selected. This distinction is of such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languages have emphasized it by creating some sort of formal barrier between the two terms of the proposition. The subject of discourse is a noun. As the most common subject of discourse is either a person or a thing, the noun clusters about concrete concepts of that order. As the thing predicated of a subject is generally an activity in the widest sense of the word, a passage from one moment of existence to another, the form which has been set aside for the business of predicating, in other words, the verb, clusters about concepts of activity. No language wholly fails to distinguish noun and verb, though in particular cases the nature of the distinction may be an elusive one. It is different with the other parts of speech. Not one of them is imperatively required for the life of language. [6_39]

不过我们也不应该过度解构。要记住言语是由一系列命题构成的。要张嘴说话必然得说点什么事情，而一旦选定了话语的主题，就必须围绕这个主题说点儿什么。这个区别具有如此根本的重要性，以

至于绝大多数语言都通过在命题的这两项之间划出某种形式边界来予以强调。话语的主题是名词。由于话语中最常见的主题要么是人要么是事，所以名词聚集在此类具体概念的周围。又由于针对主题所作的陈述通常是某个活动（这里取该词最宽泛的意义），是从一个存在时刻到另一个存在时刻的过渡，所以专门用于陈述的形式，即动词，就聚集在各种活动概念的周围。没有一种语言完全无法区分动词和名词，尽管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动词和名词的差别可能飘忽不定。其他词性则不是如此，它们当中没有一类是语言生存所不可或缺的。[7_40]

[6_1].Not in its technical sense.

[6_2].It is, of course, an "accident" that -s denotes plurality in the noun, singularity in the verb.

[6_3]."To cause to be dead" or "to cause to die" in the sense of "to kill" is an exceedingly wide-spread usage. It is found, for instance, also in Nootka and Sioux.

[6_4].Agriculture was not practised by the Yana. The verbal idea of "to farm" would probably be expressed in some such synthetic manner as "to dig-earth" or "to grow-cause." There are suffixed elements corresponding to -er and -ling.

[6_5]."Doer," not "done to." This is a necessarily clumsy tag to represent the "nominative" (subjective) in contrast to the "accusative" (objective).

[6_6].I.e., not you or I.

[6_7].By "case" is here meant not only the subjective-objective relation but also that of attribution.

[6_8].Except in so far as Latin uses this method as a rather awkward, roundabout method of establishing the attribution of the color to the particular object or person. In effect one cannot in Latin directly say that a person is white, merely that what is white is identical with the person who is, acts, or is acted upon in such and such a manner. In origin the feel of the Latin *illaalbafemina* is really "that-one, the-white-one, (namely) the-woman"—three substantive ideas that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by a juxtaposition intended to convey an identity. English and Chinese express the attribution directly by means of order. In Latin the *illa* and *alba* may occupy almost any position in the sentence. It is important to observe that the

subjective form of *illa* and *alba* , does not truly define a relation of these qualifying concepts to *femina* . Such a relation might be formally expressed via an attributive case, say the genitive (*woman of whiteness*). In Tibetan both the methods of order and of true case relation may be employed: *woman white* (i.e., "white woman") or *white-of woman* (i.e., "woman of whiteness, woman who is white, white woman").

[6_9].Aside, naturally, from the life and imminence that may be created for such a sentence by a particular context.

[6_10].This has largely happened in popular French and German, where the difference is stylistic rather than functional. The preterits are more literary or formal in tone than the perfects.

[6_11].Hence, "the square root of 4 is 2," precisely as "my uncle is here now." There are many "primitive" languages that are more philosophical and distinguish between a true "present" and a "customary" or "general" tense.

[6_12].Except, of course, the fundamental selection and contrast necessarily implied in defining one concept as against another. "Man" and "white" possess an inherent relation to "woman" and "black," but it is a relation of conceptual content only and is of no direct interest to grammar.

[6_13].Thus, the -er of farmer may he defined as indicating that particular substantive concept (object or thing) that serves as the habitual subject of the particular verb to which it is affixed. This relation of "subject" (*a farmer farms*) is inherent in and specific to the word; it does not exist for the sentence as a whole. In the same way the *-ling* of *duckling* defines a specific relation of attribution that concerns only the radical element, not the sentence.

[6_14].It is precisely the failure to feel the "value" or "tone," as distinct from the outer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expressed by a given grammatical element that has so often led students to mis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languages profoundly alien to their own. Not everything that calls itself "tense" or "mode" or "number" or "gender" or "person" is genuinely comparable to what we mean by these terms in Latin or French.

[6_15].Suffixed articles occur also in Danish and Swedish and in numerous other languages. The Nootka element for "in the house" differs from our "house-" in that it is suffixed and cannot occur as an independent word; nor is it related to the Nootka word for "house."

[6_16].Assuming the existence of a word "firelet."

[6_17].The Nootka diminutive is doubtless more of a feeling-element, an element of nuance, than our -ling. This i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it may be used with verbs as well as with nouns. In speaking to a child, one is likely to add the diminutive to any word in the sentenc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re is an inherent diminutive meaning in the word or not.

[6_18].*-si* is the third person of the present tense. *-hau-* "east" is an affix, not a compounded radical element.

[6_19].These are classical, not modern colloquial, forms.

[6_20].Just as in English "He has written books" makes no commitment on the score of quantity ("a few, several, many").

[6_21].Such as person class, animal class, instrument class, augmentative class.

[6_22].A term borrowed from Slavic grammar. It indicates the lapse of action, its natur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ontinuity. Our "cry" is indefinite as to aspect, "be crying" is durative, "cry out" is momentaneous, "burst into tears" is inceptive, "keep crying" is continuative, "start in crying" is durative-inceptive, "cry now and again" is iterative, "cry out every now and then" or "cry in fits and starts" is momentaneous-iterative. "To put on a coat" is momentaneous, "to wear a coat" is resultative. As our examples show, aspect is expressed in English by all kinds of idiomatic turns rather than by a consistently worked out set of grammatical forms. In many languages aspect is of far greater formal significance than tense, with which the naïve student is apt to confuse it.

[6_23].By "modalities" I do not mean the matter of fact statement, say, of negation or uncertainty as such, rather their implication in terms of form. There are languages, for instance, which have as elaborate an apparatus of negative forms for the verb as Greek has of the optative or wish-modality.

[6_24].Compare page 97.

[6_25].It is because of this classification of experience that in many languages the verb forms which are proper, say, to a mythical narration differ from those commonly used in daily intercourse. We leave these shades to the context or content ourselves with a more explicit and roundabout mode of expression, e.g., "He is dead,

as I happen to know," "They say he is dead," "He must be dead by the looks of things."

[6_26].We say "I sleep" and "I go," as well as "I kill him," but "he kills me." Yet *me* of the last example is at least as close psychologically to *I* of " *I* sleep" as is the latter to I of "I kill him." It is only by form that we can classify the "I" notion of "I sleep" as that of an acting subject. Properly speaking, I am handled by forces beyond my control when I sleep just as truly as when some one is killing me. Numerous languages differentiate clearly between active subject and static subject (*I go* and *I kill him* as distinct from *I sleep* , *I am good* , *I am killed*) or between transitive subject and intransitive subject (*I kill him* as distinct from *I sleep* , *I am good* , *I am killed* , *I go*). The intransitive or static subjects may or may not be identical with the object of the transitive verb.

[6_27].Ultimately, also historical—say, *age to* "act that (one)."

[6_28].For *with* in the sense of "against," compare German *wider* "against."

[6_29].Cf. Latin *ire* "to go"; also our English idiom "I have to go," i.e., "must go."

[6_30].In Chinese no less than in English.

[6_31].By "originally" I mean, of course, some time antedating the earliest period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that we can get at by comparative evidence.

[6_32].Perhaps it was a noun-classifying element of some sort.

[6_33].Compare its close historical parallel *off* .

[6_34]."Ablative" at last analysis.

[6_35].Very likely pitch should be understood along with stress.

[6_36].As in Bantu or Chinook.

[6_37].Perhaps better "general." The Chinook "neuter" may refer to persons as well as things and may also be used as a plural. "Masculine" and "feminine," as in German and French, include a great number of inanimate nouns.

[6_38].Spoken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outhern half of Africa. Chinook is

spoken in a number of dialects in the lower Columbia River valley. It is impressive to observe how the human mind has arrived at the same form of expression in two such historically unconnected regions.

[6_39].In Yana the noun and the verb are well distinct, though there are certain features that they hold in common which tend to draw them nearer to each other than we feel to be possible. But there are, strictly speaking, no other parts of speech. The adjective is a verb. So are the numeral,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 (e.g., "to be what?"), and certain "conjunctions" and adverbs (e.g., "to be and" and "to be not"; one says "and-past-I go," i.e., "and I went"). Adverbs and prepositions are either nouns or merely derivative affixes in the verb.

[7_1].并非专业含义。

[7_2].当然，-s在名词中表示复数，在动词中表示单数，实属“偶然”。

[7_3].译者注：这里的谚语指Even a worm will turn（就算虫子也会变），意为狗急跳墙，人急必反。

[7_4].用to cause to be dead（使死亡）或to cause to die（致死）表示to kill（宰）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用法，比如，在努特卡或苏语中也都有发现。

[7_5].雅纳人不从事农业。to farm（种地）这个动词性的观念可能要用类似下面的合成方式来表达：to dig-earth（掘-土）或to grow-cause（生长-使）。雅纳语中有相当于-er和-ling的后缀成分。

[7_6].“从事者”，而不是“受事”。这里只能用一个笨拙的标记来代表“主格”（主语的），以和“宾格”（宾语的）区分开来。

[7_7].即，不是我或你。

[7_8].“格”在这里不仅指主格-宾格关系，也指属性关系。

[7_9].除了拉丁语用这种方法以一种别扭的、绕弯子的方式建立起颜色对某物或某人的从属性之外。事实上，在拉丁语里不能直接说一个人是白的，只能说白的东西等同于某个人，这个人是这样或那样的，这样或那样行事，或这样或那样受事。拉丁语的illa alba femina原来的感觉其实是“那-一/这-白-一/（即）这-女人”——三个名词性的观念通过并置彼此产生联系，表达等同的意思。英语和汉语直接通过顺序来表达从属性。而在拉丁语中，illa和alba可以占据句子里的几乎任何位置。需要注意的是，illa和alba的主格形式并不真正界定这两个修饰性概念与femina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

从属格得到形式上的表达，比如所有格（woman of whiteness [属于白色的女人]）。在藏语中，顺序法和真正的格关系法都可以使用：woman white（“女人/白”，即“白女人”）或white-of woman（“白-的/女人”，即“属于白色的女人、那个白的女人、白女人”）。

[7_10].当然，不包括特定语境可能为这样一个句子添加的生动而迫切的意思。

[7_11].这种情况已经大体出现在通俗的法语和德语里，在这两种语言里[过去时和完成时的]差异只是风格上的，而非功能上的。过去时比完成时在语气上更文雅或正式一些。

[7_12].因此，我们说]the square root of 4 is 2 （4的平方根是2），正如我们说my uncle is here now （我叔叔现在是在这里）。很多“原始”语言更有哲学味道，区分真正的“现在时”和“习惯时”或“一般时”。

[7_13].当然，不包括在界定一个概念以与另一概念对立时所必然暗含的基本的选择和对比。“男人”和“白的”与“女人”和“黑的”之间[分别]具有内在的联系，但这只是概念内容上的关系，没有直接的语法意义。

[7_14].比如，farmer中的-er可被定义为：指出某个实体概念（物或人），这个概念是其附着的某个特定动词的惯常的主语。这种“主语”关系（a farmer farms [种地的人种地]）是farmer一词内含且独有的；它不是为了整个句子而存在。同样，duckling中的-ling所界定的具体的从属关系只涉及根本成分，而与句子无关。

[7_15].正是由于感受不到一个特定的语法成分所表达的概念有区别于其外在意义的“价值”或“色彩”，很多学者才常常误解了与自己的语言迥异的语言的性质。并不是所有自称为“时态”或“语气”或“数”或“性”或“人称”的东西都是真正可以和这些术语在拉丁语或法语中的意思相比的。

[7_16].后缀冠词也见于丹麦语、瑞典语以及很多其他语言。对应于in the house（在房子里）的努特卡语成分与英语的house-不同，它附加在后面，不能作为独立的词出现，而且和对应于house的努特卡词没有关系。

[7_17].假定英语中有firelet这个词。

[7_18].与英语的-ling相比，努特卡语的指小词无疑更是一个情感成分，一个色彩成分。这一点可被以下事实证明：它不仅可以和名词合用，也可以和动词合用。跟小孩子说话时，[努特卡人]很可能会将这个指小词加在句子中的每一个词后，不管那个词本身是否有指小的意思。

[7_19].-si是现在时的第三人称。-hau-“东方”是个词缀，不是复合的根本成分。

[7_20].这些是古典形式，而非现代的口语形式。

[7_21].正如在英语中He has written books（他写过书[复数]）不说明具体的数量（两三本，好几本，很多本）一样。

[7_22].比如人称类、动物类、工具类、指大类。

[7_23].从斯拉夫语法借来的一个术语。它指示动作的延续，即从连续性的角度看动作的性质。英语cry（哭）在体的方面是不确定的，be crying（正在哭）是即时的，cry out（哭出来）是瞬时的，burst into tears（迸出眼泪来）是开始的，keep crying（一直哭）是持续的，start in crying（开始哭起来）是即时-开始的，cry now and again（不时地哭）是反复的，cry out every now and then（常常哭出来）或cry in fits and starts（一阵阵地哭出来）是瞬时-反复的。to put on a coat（穿上一件衣服）是瞬时的，wear a coat（穿着一件衣服）是结果的。如这些例子所示，在英语中体是通过各种习惯性说法来表达的，而不是一套炮制出来的一致的语法形式。在很多语言中，体远比时态更有形式上的意义，没有经验的学者很容易弄混。

[7_24].我说的“语气”不是指就事论事的陈述，例如否定或不确定之类，而是指通过[语法]形式的暗指。比如，在有的语言里，动词有一套详细的否定形式，就像希腊语的祈愿或希望语气一样。

[7_25].参照97页。

[7_26].正因为这种经验分类，所以在很多语言里，适用于比如说神话故事的动词形式会有别于日常谈话中惯用的动词形式。我们[在英语中]把这种细微差别交付于语境，或者满足于使用一种更加明白和婉转的表达方式，比如“他死了，我偶然听说”，“人家说他死了”，“看样子他一定死了”。

[7_27].英语说I sleep（我睡觉），I go（我去），也说I kill him（我杀他），但是要说he kills me（他杀我）。不过最后一个例子中的me和I sleep中的I在心理上的接近程度至少不亚于后者[即I sleep中的I]和I kill him中的I在心理上的接近程度。只有借助形式，我们才能把I sleep中的I在观念上归为动作主语。严格来说，我睡觉的时候和有人杀我的时候，我是处在同样无能为力的状况中的。很多语言清楚地区分动态主语和静态主语（I go [我走]和I kill him有别于I sleep、I am good [我很好]以及I am killed [我被杀]），或者区分及物主语和不及物主语（I kill him有别于I sleep、I am good、I am killed以及I go）。不及物主语或静态主语可能和及物动词的宾语相同，也可能不同。

[7_28].归根结底，在历史上也[大致相当]，比如age to“行动／那（一）”。

[7_29].关于with取“对着”的意思，试对比德语中的wider“对着”。

[7_30].参照拉丁语的ire“去”以及英语习语I have to go（我不得不去），即must go（必须去）。

[7_31].汉语不少于英语。

[7_32].当然，我所说的“最初”先于我们用比较语言学的证据可以追溯的印欧语系的最早阶段。

[7_33].也许它曾是某种对名词进行分类的成分。

[7_34].参照历史上跟它接近且平行的off（离）。

[7_35].分析到最后是“离格”。

[7_36].极有可能音高应和重音并提。

[7_37].如在班图语和奇努克语中。

[7_38].更好的叫法可能是“普遍的。”奇努克语的“中性”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事，还可以用来表示复数。“阳性”和“阴性”，跟德语和法语的情况一样，包括大量的无生命名词。

[7_39].该语言分布在非洲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奇努克语则分布在哥伦比亚河下游河谷，包括几种方言。在历史上如此不相关的两个地区，人的头脑竟然想出了同样的表达方式，这令人印象深刻。

[7_40].在雅纳语中，名词和动词的区别很鲜明，虽然二者共享的某些特征使它们趋近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但是，严格意义上说，[该语言中]没有其他词性。形容词就是动词。数词、疑问代词（如“是什么？”）、某些“连接词”和副词（如“是和”和“是不”，可以说“而且-过去时-我走”，意思是“而且我走了”）也是如此。副词和介词要么是名词，要么只是动词的派生词缀。

Chapter 6 Type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第六章　语言结构的类型

So far, in dealing with linguistic form, we have been concerned only with single words and with the relations of words in sentences. We have not envisaged whole languages as conforming to this or that general type. Incidentally we have observed that one language runs to tight—knit synthesis where another contents itself with a more analytic, piece-meal handling of its elements, or that in one language syntactic relations appear pure which in another are combined with certain other notions that have something concrete about them, however abstract they may be felt to be in practice. In this way we may have obtained some inkling of what is meant when we speak of the general form of a language. For it must be obvious to any one who has thought about the question at all or who has felt something of the spirit of a foreign language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a basic plan, a certain cut, to each language. This type or plan or structural "genius" of the language is something much more fundamental, much more pervasive, than any single feature of it that we can mention, nor can we gain an adequate idea of its nature by a mere recital of the sundry facts that make up the grammar of the language. When we pass from Latin to Russian, we feel that it is approximately the same horizon that bounds our view, even though the near, familiar landmarks have changed. When we come to English, we seem to notice that the hills have dipped down a little, yet we recognize the general lay of the land. And when we have arrived at Chinese, it is an utterly different sky that is looking down upon us. We can translate these metaphors and say that all languages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but that certain ones differ far

more than others. This is tantamount to saying that it is possible to group them into morphological types.

至此，在讨论语言形式时，我们只关注了单个的词以及句子里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看各语言整体上属于这种还是那种总的类型。我们间或提到，有些语言趋向于严密的综合性，而另一些语言则喜欢零碎地、分析性地处理各种成分；还提到有些语言的句法关系显得纯粹，而在另一些语言里这些关系却与其他一些多少带有具体意义的概念相结合，无论它们在实际运用中感觉多么抽象。这样，我们对所谓语言的总的类型究竟是什么意思可能略微有了一点了解。只要稍稍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或者稍稍体会到一门外语的精神的人，都一定会明白：每种语言都存在一种基本的规划，或者说一种体裁。语言的这种类型、规划或者结构“本性”比我们所能举出的它的任何单一特征都更根本、更普遍。单凭罗列构成其语法的纷杂事实，我们是无法充分理解一种语言的本质的。从拉丁语过渡到俄语，我们感觉，目力所及，景象大体相同，尽管近处的、熟悉的地标已经发生了变化。转向英语，我们发现山峰似乎下行少许，可是依然能认出地貌的整体轮廓。到了汉语，则连我们头顶的天空都彻底改变了。我们可以把上述比喻改说一下：所有的语言都彼此不同，但是其中有些语言的差别远远大于另一些语言。这就等于说，语言是可以分为各种形态类型的。

Strictly speaking, we know in advance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set up a limited number of types that would do full justice to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thousands of languages and dialects spoken on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Like all human institutions, speech is too variable and too elusive to be quite safely ticketed. Even if we operate with a minutely subdivided scale of types, we may be quite certain that many of our languages will need trimming before they fit. To get them into the scheme at all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ov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or that feature or to ignore, for

the time being, certain contradictions in their mechanism. Does the difficulty of classification prove the uselessness of the task? I do not think so. It would be too easy to relieve ourselves of the burden of constructive thinking and to take the standpoint that each language has its unique history, therefore its unique structure. Such a standpoint expresses only a half truth. Just as similar social, economic,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 have grown up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from distinct historical antecedents, so also languages, traveling along different roads, have tended to converge toward similar forms. Moreover,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language has proven to us beyond all doubt that a language changes not only gradually but consistently, that it moves unconsciously from one type towards another, and that analogous trends are observable in remote quarters of the globe. From this it follows that broadly similar morphologies must have been reached by unrelated languages, independently and frequently. In assuming the existence of comparable types, therefore, we are not gainsaying the individuality of all historical processes; we are merely affirming that back of the face of history are powerful drifts that move language, like other social products, to balanced patterns, in other words, to types. As linguists we shall be content to realize that there are these types and that certain processes in the life of language tend to modify them. Why similar types should be formed, just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forces that make them and dissolve them—these questions are more easily asked than answered. Perhaps the psychologists of the future will be able to give us the ultimat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linguistic types.

严格地说，我们可以预知，试图建立几个有限的类型来充分照顾到地球上数千种语言及方言的独特性是不可能的。就像所有的人类制度一样，言语变化多端，难以捉摸，很难被妥帖地附上标签。可以相

当确信的是，即使我们按照一个有精密细分尺度的分类来运作，还是会有很多语言需要裁剪才能符合。仅仅是把各种语言都放进这个分类体系中，都必定要高估这个或那个特征的重要性，或者暂时忽视语言机制内的某些矛盾之处。那么分类的难度是不是就证明分类是徒劳的呢？我想不是。扔下建设性思考的负担，认定每种语言都有其独一无二的历史，因此也有其独一无二的结构，这么做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但是这种观点只道出了一半的真相。正如相似的社会、经济和宗教制度能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从不同的历史源头繁衍出来，语言也一样，依循不同的道路，趋向于朝着相似的形式汇聚。再者，语言的历史研究已毋庸置疑地向我们证明：语言的变化不仅是渐进的，而且是一贯的；语言无意识地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在地球上相距甚远的地方，可以观察到相似的趋势。由此可以推论，大体相似的形态当是由互不相干的语言独立且频繁地抵达的。因此，在假设存在可比较的语言类型时，我们并不是否认所有历史进程的个性；我们只是强调，在历史表象的背后存在一些强有力的沿流，像推动其他社会产物一样推动着语言走向稳定的格局，换句话说，走向各个类型。作为语言学家，认识到这些类型的存在，认识到语言生命中的某些过程往往会改变这些类型，我们就可以满足了。至于为什么会产生相似的类型？造就这些类型又使它们消逝于无形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这些问题提出来并不难，回答起来却不容易。或许，未来的心理学家们能告诉我们形成语言类型的终极原因。

When it comes to the actual task of classification, we find that we have no easy road to travel. Various classifications have been suggested, and they all contain elements of value. Yet none proves satisfactory. They do not so much enfold the known languages in their embrace as force them down into narrow, straight—backed seats. The difficulties have been of various kinds. First and foremost, it has been difficult to choose a point of view. On what basis shall we classify? A language shows us so many facets that we may well be puzzled. And is one point of view sufficient? Secondly,

it is dangerous to generalize from a small number of selected languages. To take, as the sum total of our material, Latin, Arabic, Turkish, Chinese, and perhaps Eskimo or Sioux as an afterthought, is to court disaster. We have no right to assume that a sprinkling of exotic types will do to supplement the few languages nearer home that we are more immediately interested in. Thirdly, the strong craving for a simple formula [7_1] has been the undoing of linguists. There is something irresistible about a method of classification that starts with two poles, exemplified, say, by Chinese and Latin, clusters what it conveniently can about these poles, and throws everything else into a “transitional type.” Hence has arisen the still popular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s into an “isolating” group, an “agglutinative” group, and an “inflective” group. Sometimes the languages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are made to straggle along as an uncomfortable “polysynthetic” rear—guard to the agglutinative languages. There is justification for the use of all of these terms, though not perhaps in quite the spirit in which they are commonly employed. In any case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assign all known languages to one or other of these groups, the more so as they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A language may be both agglutinative and inflective, or inflective and polysynthetic, or even polysynthetic and isolating, as we shall see a little later on.

临到实际分类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捷径可走。已经有多种分类方法被提出来，而且都不乏可取之处，但是没有一种方法令人满意。它们与其说是把所有已知的语言都包括进去，不如说是把语言强行按在窄小的直背椅上。分类的困难有许多种。首先，分类的视角很难选择。我们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分类？语言所表现出的方面如此之多，我们很可能被迷惑。而且，一个视角够吗？第二，根据挑选出的少数几种语言来推而广之是危险的。比如，只以拉丁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汉语作为我们分类的全部素材，也许再追加上爱斯基摩语

或苏语，这是在自找麻烦。我们无权假定添加一星半点的几种异域语言类型就足以弥补跟我们更相近的、也是我们更直接感兴趣的几种语言在类型上的不足。第三，贪求一个简单的公式 [8_1] 也拆了语言学家的台。有一种分类方法颇有些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即从比如以汉语和拉丁语为代表的两极出发，围绕这两极聚集起那些可以方便地归拢的语言，然后把剩下的语言都归为“过渡类别”。至今仍然流行的把语言划分为“孤立”类、“黏着”类和“屈折”类的分类方法就是这样产生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有时被拖拽在黏着语后面，充当一个别扭的“多式综合语”后卫。上述所有术语的使用都有其道理，只是含义上未必等同于通常的用法。不管怎么说，都很难将所有已知语言归入上述类型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而且因为类型本身并非互相排斥，所以归类就更加困难。稍后我们将看到，一种语言可能既具黏着性，又具屈折性；或者既具屈折性，又具多式综合性；或者既具多式综合性，又具孤立性。

There is a fourth reason why the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s has generally proved a fruitless undertaking. It is probably the most powerful deterrent of all to clear thinking. This is the evolutionary prejudice which instilled itself into the social sciences towards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which is only now beginning to abate its tyrannical hold on our mind. Intermingled with this scientific prejudice and largely anticipating it was another, a more human one. The vast majority of linguistic theorists themselves spoke languages of a certain type, of which the most fully developed varieties were the Latin and Greek that they had learned in their childhood. It was not difficult for them to be persuaded that these familiar languages represented the “highest” development that speech had yet attained and that all other types were but steps on the way to this beloved “inflective” type. Whatever conformed to the pattern of Sanskrit and Greek and Latin and German was accepted as expressive of the “highest,” whatever departed from it

was frowned upon as a shortcoming or was at best an interesting aberration. [7_2] Now any classification that starts with preconceived values or that works up to sentimental satisfactions is self-condemned as unscientific. A linguist that insists on talking about the Latin type of morphology as though it were necessarily the high-water mark of linguistic development is like the zoologist that sees in the organic world a huge conspiracy to evolve the race-horse or the Jersey cow. Language in its fundamental forms is the symbolic expression of human intuitions. These may shape themselves in a hundred ways, regardless of the material advancement or backwardness of the people that handle the forms, of which, it need hardly be said, they are in the main unconscious. If, therefore, we wish to understand language in its true inwardness we must disabuse our minds of preferred "values" [7_3] and accustom ourselves to look upon English and Hottentot with the same cool, yet interested, detachment.

对语言进行分类之所以一般都以无果告终，还有第四个原因。这个原因对清晰思维的妨碍很可能是最大的。这就是进化论的偏见。它在上世纪中叶渗透进社会科学，它对我们思想的禁锢只是最近才开始减弱。与这一科学偏见混杂在一起并且大体上比该偏见还要早的是另一种更具人情色彩的偏见。绝大多数语言理论家都说某种类型的语言，其中发展得最完善的是他们自孩提时代就学习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使他们容易相信，这些熟悉的语言代表着言语业已达到的"最高"发展阶段，而其他所有语言类型都还处在迈向这种心爱的"屈折"类型的途中。一切符合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模式的语言都被视为"最高级"的展现，而一切偏离该模式的语言都被蹙眉以待，认为是有缺陷的，或者最多是一种有趣的畸变。 [8_2] 然则任何源于预设价值观的分类或者为了追求情感满足的分类都自我注定了是不科学的。一个语言学家坚称拉丁语的形态一定标志着语言发展的高潮线，就像一个动物学家在生物界里看到一场要进化出赛马或者泽西奶牛 [8_3] 的大

阴谋。语言，在其根本的形式上，是人类直觉的符号表达。这些形式可能以上百种方式表现出来，而与使用形式的人群在物质上是进步还是落后无关；更不用说，人们对这些形式大体上并没有意识。因此，如果我们想理解语言真正的内在，就必须清除头脑中的“价值”[8_4] 偏好，必须习惯用同样冷静而关切的超然态度去看待英语和霍屯督语。

We come back to our first difficulty. What point of view shall we adopt for our classification? After all that we have said about grammatical form in the preceding chapter, it is clear that we cannot now mak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orm languages and formless languages that used to appeal to some of the older writers. Every language can and must express the fundamental syntactic relations even though there is not a single affix to be found in its vocabulary. We conclude that every language is a form language. Aside from the expression of pure relation a language may, of course, be “formless”—formless, that is, in the mechanical and rather superficial sense that it is not encumbered by the use of non-radical elements. The attempt has sometimes been made to formulate a distinction on the basis of “inner form.” Chinese, for instance, has no formal elements pure and simple, no “outer form,” but it evidences a keen sense of relation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attribute and predicate, and so on. In other words, it has an “inner form” in the same sense in which Latin possesses it, though it is outwardly “formless” where Latin is outwardly “formal.”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supposed to be languages [7_4] which have no true grasp of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 but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the more or less minute expression of material ideas, sometimes with an exuberant display of “outer form,” leaving the pure relations to be merely inferred from the context. I am strongly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this supposed “inner formlessness” of certain languages is an illusion. It

may well be that in these languages the relations are not expressed in as immaterial a way as in Chinese or even as in Latin, [7_5] or that the principle of order is subject to greater fluctuations than in Chinese, or that a tendency to complex derivations relieves the language of the necessity of expressing certain relations as explicitly as a more analytic language would have them expressed. [7_6] All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languages in question have not a true feeling for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 We shall therefore not be able to use the notion of "inner formlessness," except in the greatly modified sense that syntactic relations may be fused with notions of another order. To this criterion of classification we shall have to return a little later.

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个困难，即分类时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视角？经过上一章有关语法形式的讨论，很显然，我们不能再把语言区分为有形式的和无形式的两种，尽管这一划分很受早期作者们的青睐。每一种语言都能够而且必须表达根本的句法关系，即使在该语言的词汇中一个词缀都找不出来。我们的结论是每一种语言都是有形式的语言。当然，在表达纯粹的关系之外，语言是可以"没有形式"的——这个"没有形式"指的是在机械且相当肤浅的意义上，语言未受到非根本成分使用的牵累。还有的时候，人们试图根据"内在形式"提出一种分类标准。例如，汉语没有纯粹而简单的形式成分，即没有"外在形式"，但是汉语对各种关系、对主语和宾语、定语和谓语的差别等都表现出强烈的敏感。换言之，汉语像拉丁语一样具有"内在形式"，虽然从外表看，汉语"没有形式"，而拉丁语"有形式"。另一方面，有人认为有些语言 [8_5] 没有真正掌握根本关系，只满足于或多或少地细微表达实质概念，有时也炫耀一下"外在形式"，而将纯粹的关系留待人们从语境中推导。我很倾向于认为，某些语言的这种所谓的"内在无形式"不过是一种幻觉。在这些语言中，很可能关系不是像在汉语甚至拉丁语中那样用非实质的方式表达 [8_6] ；或者，它们的顺序原则所面临的波动比汉语中要大；又或者，这些语言倾向于使用复

杂的派生手段，这使它们不需要像分析性较强的语言那样外在地表达某些关系。 [8_7] 但是，这些都并不意味着这类语言对根本关系没有真实的感情。因此，我们不能使用“内在无形式”这个说法，除非大大改变它的意思，即句法关系可能与另一种概念融合了。这种分类标准我们只能稍后再谈。

More justifiable would be a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formal processes [7_7] most typically developed in the language. Those languages that always identify the word with the radical element would be set off as an “isolating” group against such as either affix modifying elements (affixing languages) or possess the power to chang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adical element by internal changes (reduplication; vocalic and consonantal change; changes in quantity, stress, and pitch). The latter type might be not inaptly termed “symbolic” languages. [7_8] The affixing languages would naturally subdivide themselves into such as are prevailingly prefixing, like Bantu or Tlingit, and such as are mainly or entirely suffixing, like Eskimo or Algonkin or Latin. There are two serious difficulties with this fourfold classification (isolating, prefixing, suffixing, symbolic). In the first place, most languages fall into more than one of these groups. The Semitic languages, for instance, are prefixing, suffixing, and symbolic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classification in its bare form is superficial. It would throw together languages that differ utterly in spirit merely because of a certain external formal resemblance. There is clearly a world of difference between a prefixing language like Cambodgian, which limits itself, so far as its prefixes (and infixes) are concerned, to the expression of derivational concepts, and the Bantu languages, in which the prefixed elements have a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as symbols of syntactic relations. The classification has much greater value if it is taken to refer to the expression of relational concepts

[7_9] alone. In this modified form we shall return to it as a subsidiary criterion. We shall find that the terms “isolating,” “affixing,” and “symbolic” have a real value. But instead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prefixing and suffixing languages, we shall find that it is of superior interest to make another distinction, one that is based on the relative firmness with which the affixed elements are united with the core of the word. [7_10]

按照各种语言里发展得最典型的形式程序 [8_8] 进行分类可能更合理。那些总是将词等同于根本成分的语言可以被归为“孤立语”一类，与之相对的是那些给修饰成分附加词缀的语言（词缀语言），以及那些能够通过内部变化（重叠；元音变化和辅音变化；音量、重音和音高上的变化）来改变根本成分意义的语言。将后一类称为“象征”语言也许并无不妥。 [8_9] 自然，词缀语言可再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使用前缀，如班图语或特林基特语；另一类主要或全部使用后缀，如爱斯基摩语、阿尔贡金语或拉丁语。这种四分法（孤立的、加前缀的、加后缀的和象征的）面临两个严重的困难。第一，多数语言可归属不止一个类别。例如，闪米特语同时兼具前缀语言、后缀语言和象征语言的特点。第二，这一分类的粗略样式未免流于肤浅。它会仅仅因为某种外在形式上的类似就把一些气质上完全不同的语言扔到一起。比如，同为前缀语言的柬埔寨语和班图语显然存在天壤之别：在柬埔寨语中前缀（以及中缀）仅仅局限于派生概念的表达，而在班图语中前缀成分作为句法关系的符号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这种分类只是被用于关系概念 [8_10] 的表达，它的价值会大得多。下文我们将再次提及这种修改后的分类样式，把它作为一个辅助标准。我们会发现，“孤立的”、“加词缀的”和“象征的”这些说法都具有真实的价值。但是，前缀和后缀语言则不必区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会发现另一种更有意思的区分，它建立在词缀成分与词的核心相结合的牢固程度上。 [8_11]

There is another very useful set of distinctions that can be

made, but these too must not be applied exclusively, or our classification will again be superficial. I refer to the notions of "analytic," "synthetic," and "polysynthetic." The terms explain themselves. An analytic language is one that either does not combine concepts into single words at all (Chinese) or does so economically (English, French). In an analytic language the sentence is always of prime importance, the word is of minor interest. In a synthetic language (Latin, Arabic, Finnish) the concepts cluster more thickly, the words are more richly chambered, but there is a tendency, on the whole, to keep the range of concrete significance in the single word down to a moderate compass. A polysynthetic language, as its name implies, is more than ordinarily synthetic. The elaboration of the word is extreme. Concepts which we should never dream of treating in a subordinate fashion are symbolized by derivational affixes or "symbolic" changes in the radical element, while the more abstract notions, including the syntactic relations, may also be conveyed by the word. A polysynthetic language illustrates no principles that are not already exemplified in the more familiar synthetic languages. It is related to them very much as a synthetic language is related to our own analytic English. [7_11] The three terms are purely quantitative—and relative, that is, a language may be "analytic" from one standpoint, "synthetic" from another. I believe the terms are more useful in defining certain drifts than as absolute counters. It is often illuminating to point out that a language has been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nalytic in the course of its history or that it shows signs of having crystallized from a simple analytic base into a highly synthetic form. [7_12]

还有一组非常有用的区分是我们可以做的，不过这组区分也不能单独使用，否则我们的分类又会流于肤浅。我指的是"分析的"、"综合

的”和“多式综合的”。这些术语皆可顾名思义。分析性语言要么完全不把多个概念复合为一个词（比如汉语），要么即使如此，也是经济地进行复合（比如英语和法语）。在分析性语言中，最重要的总是句子，词则是次要的。在综合性语言中（比如拉丁语、阿拉伯语和芬兰语），概念更加紧密地聚集在一起，词内的间隔也更丰富，但是整体而言有一种趋势把单个词的具体意义限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多式综合语，如其名字所示，不止一般的综合。在多式综合语中，词的复杂程度达到极致。我们做梦都不会想到可以放在从属位置的概念都用派生词缀或者根本成分的“象征”变化来表达，而更为抽象的概念——包括句法关系——也可以用词来表达。多式综合语并未表现出那些在我们更熟悉的综合性语言中没有例示的原则。它与综合性语言的关系很像综合性语言与我们的分析性英语的关系。 [8_12] 这三个术语都是纯粹量化性的——而且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从这个视角看，一种语言可能是“分析的”，从那个视角看，则可能是“综合的”。我认为这些术语更适合定义某些沿流，而不适合用做绝对筹码。指出一种语言在其历史进程中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分析性，或者表现出在简单的分析性基础上凝结为高度综合的形式的迹象，往往具有启示意义。 [8_13]

We now come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inflective” and an “agglutinative” language. As I have already remarked, the distinction is a useful, even a necessary, one, but it has been generally obscured by a number of irrelevancies and by the unavailing effort to make the terms cover all languages that are not, like Chinese, of a definitely isolating cast. The meaning that we had best assign to the term “inflective” can be gained by considering very briefly what are some of the basic features of Latin and Greek that have been looked upon as peculiar to the inflective languages. First of all, they are synthetic rather than analytic. This does not help us much. Relatively to many another language that resembles them in broad structural respects, Latin and Greek are not notably synthetic;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modern descendants, Italian and

Modern Greek, while far more analytic [7_13] than they, have not departed so widely in structural outlines as to warrant their being put in a distinct major group. An inflective language, we must insist, may be analytic, synthetic, or polysynthetic.

现在我们来看“屈折”语和“黏着”语的区别。正如我上文所说，这一区分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它通常被一些不相关的东西所遮蔽，被一种徒劳所混淆，即企图用屈折和黏着这两个术语来涵盖所有不像汉语那样具有明显孤立外观的语言。我们只要简短地思考一下拉丁语和希腊语中被视为屈折语所独有的一些基本特征究竟是什么，就能领会应该给“屈折”一词赋予什么意义。首先，它们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这一点对我们帮助不大。与许多具有类似宏观结构的其他语言相比，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综合性未见得多么显著；另一方面，它们的现代后裔，意大利语和现代希腊语，虽然在分析性上远胜其先祖 [8_14] ，但是在结构轮廓上的偏离并没有达到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类别的程度。必须强调一句，屈折语可以是分析的、综合的或者多式综合的。

Latin and Greek are mainly affixing in their method, with the emphasis heavily on suffixing. The agglutinative languages are just as typically affixing as they, some among them favoring prefixes, others running to the use of suffixes. Affixing alone does not define inflection. Possibly everything depends on just what kind of affixing we have to deal with. If we compare our English words *farmer* and *goodness* with such words as *height* and *depth* , we cannot fail to be struck by a notable difference in the affixing technique of the two sets. The -erand *-ness* are affixed quite mechanically to radical elements which are at the same time independent words *(farm, good)* . They are in no sense independently significant elements, but they convey their meaning (agentive, abstract quality) with

unfailing directness. Their use is simple and regular and we should have no difficulty in appending them to any verb or to any adjective, however recent in origin. From a verb *to camouflage* we may form the noun *camouflager* “one who camouflages,” from an adjective *jazzy* proceeds with perfect ease the noun *jazziness* . It is different with *height* and *depth* . Functionally they are related to *high* and *deep* precisely as is *goodness* to *good* , but the degree of coalescence between radical element and affix is greater. Radical element and affix, while measurably distinct, cannot be torn apart quite so readily as could the *good* and *-ness* of *goodness* . The *-t* of *height* is not the typical form of the affix (compare *strength, length, filth, breadth, youth*), while *dep-* is not identical with *deep* . We may designate the two types of affixing as “fusing” and “juxtaposing.” The juxtaposing technique we may call an “agglutinative” one, if we like.

拉丁语和希腊语主要采用词缀法，尤其偏重使用后缀。黏着语也像它们一样，是典型的加词缀的，有的偏爱前缀，有的则倾向于使用后缀。单凭词缀法并不能定义屈折性。或许，一切都取决于我们面对的是哪一种词缀法。只要比较一下英语词farmer（农夫）和goodness（好）与height（高度）和depth（深度），我们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两组词在词缀添加的方法上存在一个显著差异。-er和-ness被相当机械地附着在根本成分之后，而那些根本成分同时也是独立的词（farm农场和good好）。这两个词缀完全不是可以独立表达意义的成分，但是它们都准确直白地表达出各自的意思（即施事和抽象性质）。这两个词缀的用法简单而有规律，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将它们附着于任何动词或者形容词之后，无论那些词是多么新近才产生的。比如，从动词to camouflage（伪装），我们可以构成名词camouflager“伪装者”，从形容词jazzy（花哨的）则可以轻轻松松地产生名词jaziness（花哨）。height和depth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从功能上说，它们与high（高的）和deep（深的）之间的关系恰似

goodness和good之间的关系，但是根本成分和词缀之间的结合程度更高。对height和depth而言，根本成分和词缀尽管也有明显的区别，但是不能像goodness中的good和-ness那样被轻易地分开。height中的-t并不是其词缀的典型形式（试比较strength力量、length长度、filth污秽、breadth呼吸和youth青年），而dep-与deep也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可以把这两类词缀法分别称为“融合”和“并置”。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把并置法称为黏着法。

Is the fusing technique thereby set off as the essence of inflection? I am afraid that we have not yet reached our goal. If our language were crammed full of coalescences of the type of *depth*, but if, on the other hand, it used the plural independently of verb concord (e.g., *the books falls* like *the book falls,* or *the book fall* like *the books fall*), the personal endings independently of tense (e.g., *the book fells* like *the book falls,* or *the book fall* like *the book fell*), and the pronouns independently of case (e.g., *I see he* like *he sees me,* or *him see the man* like *the man sees him*), we should hesitate to describe it as inflective. The mere fact of fusion does not seem to satisfy us as a clear indication of the inflective process. There are, indeed, a large number of languages that fuse radical element and affix in as complete and intricate a fashion as one could hope to find anywhere without thereby giving signs of that particular kind of formalism that marks off such languages as Latin and Greek as inflective.

那么，能否就此把融合法单独出来视为屈折的本质呢？恐怕我们离此目标还有些距离。即便英语里充斥着depth之类的结合体，但是，如果另一方面英语使用复数无需与动词一致（例如，可以说the books falls，而不拘于the book falls；或者可以说the book fall，而不拘于the books fall），使用人称词尾无需考虑时态（例如，可以说

the book fells，而不拘于the book falls；或者可以说the book fall，而不拘于the book fell），使用代词也无需考虑格（例如，可以说I see he，而不拘于he sees me；或者可以说him see the man，而不拘于the man sees him），那么我们还是会犹豫是否称英语为屈折语。单凭融合似乎并不足以清晰地表明一种语言具有屈折程序。的确，有很多语言融合了根本成分和词缀，而且融合的方式在穷尽性和复杂性上都恰如我们所能奢望的，但是它们却没有就此表现出那种令拉丁语和希腊语等语言成为屈折语的形式特征的迹象。

What is true of fusion is equally true of the "symbolic" processes. [7_14] There are linguists that speak of alternations like *drink* and *drank* as though they represented the high—water mark of inflection, a kind of spiritualized essence of pure inflective form. In such Greek forms, nevertheless, as *pepomph-a* "I have sent," as contrasted with *pemp-o* "I send," with its trebly symbolic change of the radical element (reduplicating *pe* —, change of *e* to *o* , change of *p* to *ph*), it is rather the peculiar alternation of the first person singular-*a* of the perfect with the -*o* of the present that gives them their inflective cast. Nothing could be more erroneous than to imagine that symbolic changes of the radical element, even for the expression of such abstract concepts as those of number and tense, is always associated with the syntactic peculiarities of an inflective language. If by an "agglutinative" language we mean one that affixes according to the juxtaposing technique, then we can only say that there are hundreds of fusing and symbolic languages—non-agglutinative by definition—that are, for all that, quite alien in spirit to the inflective type of Latin and Greek. We can call such languages inflective, if we like, but we must then be prepared to revise radically our notion of inflective form.

融合是这样，“象征”程序也同样是这样。 [8_15] 有些语言学家谈及英语中drink（喝）和drank（drink的过去式）之类的变化，好像视其为屈折法的最高水准的代表，视其为一种纯粹的屈折形式的精髓。不过，像希腊语的*pemp-o* “我派出”这样的形式，与*pepomph-a* “我已经派出”相比，虽然根本成分发生了三重象征变化（即重复*pe-* ，变*e* 为*o* ，变*p* 为*ph* ），但给予其屈折性外观的似乎只是从第一人称单数完成时的-*a* 到现在时的-*o* 的独特变化。最错误的莫过于认为根本成分的象征变化，即使是为了表达诸如数和时态等抽象概念，也总是与屈折语言的句法特征有关。如果我们所说的“黏着”语特指采用并置法来添加词缀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只好说存在数百种融合性语言和象征性语言了（按照定义它们是非黏着性的）；不过，尽管如此，它们与拉丁语和希腊语所代表的屈折语类型在气质上仍然相当不同。如果愿意，我们是可以把这些语言称作“屈折语”的，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必须做好准备彻底修正屈折形式这一概念。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at fusion of the radical element and the affix may be taken in a broader psychological sense than I have yet indicated. If every noun plural in English were of the type of *book* : *books* , if there were not such conflicting patterns as *deer: deer, ox: oxen, goose: geese* to complicate the general form picture of plurality,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 fusion of the elements *book* and-*s* into the unified word *books* would be felt as a little less complete than it actually is. One reasons, or feels, unconsciously about the matter somewhat as follows:—If the form pattern represented by the word *books* is identical, as far as use is concerned, with that of the word *oxen* , the pluralizing elements-s and-*en* cannot have quite so definite, quite so autonomous, a value as we might at first be inclined to suppose. They are plural elements only in so far as plurality is predicated of certain selected concepts. The words *books* and *oxen* are therefore a little other than mechanical combinations of the symbol of a thing *(book, ox)* and a

clear symbol of plurality. There is a slight psychological uncertainty or haze about the juncture in *book-s* and *ox-en* . A little of the force of-s and-*en* is anticipated by, or appropriated by, the words *book* and *ox* themselves, just as the conceptual force of-*th* in *dep-th* is appreciably weaker than that of-*ness* in *good-ness* in spite of the functional parallelism between *depth* and *goodness* . Where there is uncertainty about the juncture, where the affixed element cannot rightly claim to possess its full share of significance, the unity of the complete word is more strongly emphasized. The mind must rest on something. If it cannot linger on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it hastens all the more eagerly to the acceptance of the word as a whole. A word like *goodness* illustrates “agglutination,” *books* “regular fusion,” *depth* “irregular fusion,” *geese* “symbolic fusion” or “symbolism.“ [7_15]

我们必须明白，根本成分和词缀的融合可以比我上面所讲的具有更广阔的心理意义。如果英语中每一个名词的复数都是book：books这种类型，如果没有deer：deer（鹿）、ox：oxen（牛）、goose：geese（鹅）等与之冲突的类型使复数的总体形式格局复杂化，那么我们无疑会觉得将book和-s融合成这个统一的词books，其完整性比其实际拥有的稍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会无意识地产生如下理解或感觉：如果就其使用而言，books一词所代表的形式格局与oxen一词所代表的相同，那么，复数词缀成分-s和-en就不太可能像我们最初倾向于认为的那样拥有如此明确而独立的价值。它们仅仅是因为某些选定的概念被复数化才成为复数成分。因此，books和oxen不只是一件东西的符号（book和ox）与一个明确的复数符号的机械组合。在book-s和ox-en的结合中，存在着一种轻微的心理上的不确定性或者疑惑感。-s和-en的一小部分力量分别被book和ox这两个词本身预支或挪用了，正如depth中-th的概念力量明显比goodness中的-ness弱，尽管depth和goodness在功能上是平行的。既然这种结合存在不确定性，既然附加的词缀成分不能理直气壮地宣称拥有全部的意义，那么整个

词的整体性就更被强调了。须知人的思想必须停留在什么东西上面。它如果不能在组成成分上停留，就会更急切地把整个词作为整体来接受。goodness这样的词体现了“黏着”，books体现了“规则的融合”，depth体现了“不规则的融合”，geese则体现了“象征融合”或“象征性”。[8_16]

The psychological distinctness of the affixed elements in an agglutinative term may be even more marked than in the *-ness* of *goodness* . To be strictly accu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ss* is not quite as inherently determined, as autonomous, as it might be. It is at the mercy of the preceding radical element to this extent, that it requires to be preceded by a particular type of such element, an adjective. Its own power is thus, in a manner, checked in advance. The fusion here, however, is so vague and elementary, so much a matter of course in the great majority of all cases of affixing, that it is natural to overlook its reality and to emphasize rather the juxtaposing or agglutinative nature of the affixing process. If the *-ness* could be affixed as an abstractive element to each and every type of radical element, if we could say*fightness* (“the act or quality of fighting”) or *waterness* (“the quality or state of water”) or *awayness* (“the state of being away”) as we can say *goodness* (“the state of being good”), we should have moved appreciably nearer the agglutinative pole. A language that runs to synthesis of this loose-jointed sort may be looked upon as an example of the ideal agglutinative type, particularly if the concepts expressed by the agglutinated elements are relational or, at the least, belong to the abstracter class of derivational ideas.

黏着词中的词缀成分在心理上的独特性甚至可能比goodness中的-ness更明显。严格而且准确地说，在goodness中，-ness的意义的内在

确定性和自主性并没有尽可能地表现出来。它受到前面的根本成分的支配：它的前面必须是一个特定类型的成分，即形容词。因此，它自己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事先就被限制了。然而，这里的融合是如此的模糊和初级，在绝大多数用到词缀法的场合又是如此的理所当然，以至于人们很自然地忽视了它的真实性，反而强调添加词缀过程中的并置性和黏着性。如果-ness可以作为一个抽象成分附着到每一种根本成分上，例如，如果我们可以说fightness（“fight的行为或者属性”）或者waterness（“water的属性或者状态”）或者awayness（“away的状态”），就像我们可以说goodness（“good的状态”）一样，那么我们就显然更接近黏着语这一端。倾向于使用这类松散连接的合成结构的语言可被视为理想的黏着类型的范例，特别是当黏着成分表达的是关系概念或者至少是派生概念中较抽象的类型时。

Instructive forms may be cited from Nootka. We shall return to our “fire in the house.“ [7_16] The Nootka word *inikw-ihl* “fire in the house” is not as definitely formalized a word as its translation, suggests. The radical element *inikw-* “fire” is really as much of a verbal as of a nominal term; it may be rendered now by “fire,” now by “burn,” according to the syntactic exigencies of the sentence. The derivational element-*ihl* “in the house” does not mitigate this vagueness or generality; *inikw-ihl* is still “fire in the house” or “burn in the house.” It may be definitely nominalized or verbalized by the affixing of elements that are exclusively nominal or verbal in force. For example, *inikw-ihl-'i* , with its suffixed article, is a clear-cut nominal form: “the burning in the house, the fire in the house”; *inikw-ihl-ma* , with its indicative suffix, is just as clearly verbal: “it burns in the house.” How weak must be the degree of fusion between “fire in the house” and the nominalizing or verbalizing suffix is apparent from the fact that the formally indifferent *inikwihl* is not an abstraction gained by analysis but a full-fledged word,

ready for use in the sentence. The nominalizing-*'i* and the indicative *-ma* are not fused form-affixes, they are simply additions of formal import. But we can continue to hold the verbal or nominal nature of *inikwihl* in abeyance long before we reach the *-'i* or-*ma* . We can pluralize it: inikw-ihl-'minih; it is still either “fires in the house” or “burn plurally in the house.” We can diminutivize this plural: *inikw-ihl-'minih-'is* , “little fires in the house” or “burn plurally and slightly in the house.” What if we add the preterit tense suffix-*it* ? Is not inikw-*ihl-'minih-'is-it* necessarily a verb: “several small fires were burning in the house”? It is not. It may still be nominalized; *inikwihl'minih'isit-'i* means “the former small fires in the house, the little fires that were once burning in the house.” It is not an unambiguous verb until it is given a form that excludes every other possibility, as in the indicative *inikwihl-minih'isit-a* “several small fires were burning in the house.” We recognize at once that the elements-*ihl,-'minih,-'is,* and *-it,* quite aside from the relatively concrete or abstract nature of their content and aside, further, from the degree of their outer (phonetic) cohesion with the elements that precede them, have a psychological independence that our own affixes never have. They are typically agglutinated elements, though they have no greater external independence, are no more capable of living apart from the radical element to which they are suffixed, than the *-ness* and *goodness* orthe -s *of books.*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an agglutinative language may not make use of the principle of fusion, both external and psychological, or even of symbolism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It is a question of tendency. Is the formative slant clearly towards the agglutinative method? Then the language is “agglutinative.” As such, it may be prefixing or suffixing, analytic, synthetic, or polysynthetic.

从努特卡语中可以找到一些有启发性的形式。我们回到上一章

中“房子里的火”这个例子。[8_17] 在努特卡语中，*inikw-ihl* “房子里的火”一词并不像它的英语译文所暗示的那样，是一个明确地形式化的词。根本成分*inikw-* “火”其实既是名词性的，也是动词性的，有时可译为“火”，有时又可译为“燃烧”，视句子的句法状态而定。派生成分*-ihl* “在房子里”并未削弱这种模糊性或者一般性，*inikw-ihl* 仍然可以是“房子里的火”或“在房子里燃烧”。加上专门表示名词性或动词性的词缀成分，该词才可以被明确地名词化或者动词化。例如，*inikw-ihl-'i* ，因为加了一个后缀的冠词*-'i* ，就变成了一个明确的名词形式，表示“房子里的燃烧，屋子里的房”；*inikw-ihl-ma* ，因为加了一个指示性的后缀*-ma* ，就变成了一个同样明确的动词形式，意思是“它在房子里燃烧”。“房子里的火”与名词性后缀或动词性后缀之间的融合程度之微弱由下述事实可见一斑：形式上无所谓即不分动词性或名词性的*inikwihl* 并不是一个通过分析而得出的抽象事物，而是一个羽翼丰满的词，随时可以用在句子中。名词化的*-'i* 和指示性的*-ma* 并不是与*inikwihl* 融合的词缀形式，而只是形式上的额外添加。但是在用到*-'i* 或*-ma* 之前，我们可以一直让*inikwihl* 的动词或名词性长久地处于待定状态。我们可以将它变成复数：*inikw-ihl-'minih* ，它仍然可以表示“房子里的几处火”或者“在房子里多处燃烧”。我们也可以用指小后缀使这个复数结构小称化：*inikwihl-'minih-'is* ，“房子里的几处小火”或者“在房子里多处轻微地燃烧”。如果我们加上过去时后缀*-it* 又会怎样呢？*inikw-ihl-'minih-'is-it* 应该一定是个动词了吧？“在房子里几处小火曾经在燃烧”？但它不是。它还是可以被名词化，*inikwihl'minih'isit-'i* ，意思是“房子里原来的几处小火，房子里曾经燃烧的几处小火”。只有在添加一个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的形式之后，这个努特卡语词才变成一个确定的动词，例如在陈述结构*inikwihlminih'isit-a* 里，意思是“在房子里几处小火曾经在燃烧”。我们立刻就能发现：*-ihl* 、*-'minih* 、*-'is* 和*-it* 等成分，除了内容上具有或多或少的具体性或者抽象性之外，更进一步说，除了与先行成分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外在（语音上）的凝聚性之外，还具有我们英语词缀所不具有的心理独立性。它们是典型的黏着成分，尽管比起goodness中的-ness或books中的-s，它们并不具有更大的外在独立性，离开所附着的根本成分也一样无法存活。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推论：黏着语

不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用外部的或心理上的融合原则，甚或不会使用象征原则。这是个趋势问题。一种语言在形式上是明显趋向黏着法吗？如果是，那么这种语言就是“黏着”语。作为黏着语，它可以是前缀语言或后缀语言，也可以是分析语、综合语或多式综合语。

To return to inflection. An inflective language like Latin or Greek uses the method of fusion, and this fusion has an inner psychological as well as an outer phonetic meaning. But it is not enough that the fusion operate merely in the sphere of derivational concepts (group II), [7_17] it must involve the syntactic relations, which may either be expressed in unalloyed form (group IV) or, as in Latin and Greek, as “concrete relational concepts” (group III). [7_18] As far as Latin and Greek are concerned, their inflection consists essentially of the fusing of elements that express logically impure relational concepts with radical elements and with elements expressing derivational concepts. Both fusion as a general method and the expression of relational concepts in the word are necessary to the notion of “inflection.”

下面回来讨论屈折问题。拉丁语或希腊语之类的屈折语使用融合法，这种融合兼具外在的语音意义和内在的心理意义。但是融合仅仅发生在派生概念（II类） [8_18] 范围内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涉及句法关系，可以表现为纯粹的形式（IV类），或者像拉丁语和希腊语一样，表现为“具体关系概念”（III类）。 [8_19] 就拉丁语和希腊语而言，它们的屈折变化主要包括的是表达逻辑上不纯粹的关系概念的成分与根本成分以及与表达派生概念的成分之间的融合。对于“屈折”观念来说，作为一种一般方法的融合和作为一个词中对关系概念的表达的融合，都是必不可少的。

But to have thus defined inflection is to doubt the value of the term as descriptive of a major class. Why emphasize both a technique and a particular content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Surely we should be clear in our minds as to whether we set more store by one or the other. “Fusional” and “symbolic” contrast with “agglutinative,” which is not on a par with “inflective” at all. What are we to do with the fusional and symbolic languages that do not express relational concepts in the word but leave them to the sentence? And are we no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gglutinative languages that express these same concepts in the word—in so far inflective—like—and those that do not? We dismissed the scale: analytic, synthetic, polysynthetic, as too merely quantitative for our purpose. Isolating, affixing, symbolic—this also seemed insufficient for the reason that it laid too much stress on technical externals. Isolating, agglutinative, fusional, and symbolic is a preferable scheme, but still skirts the external. We shall do best, it seems to me, to hold to “inflective” as a valuable suggestion for a broader and more consistently developed scheme, as a hint for a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the nature of the concepts expressed by the language. The other two classifications, the first based on degree of synthesis, the second on degree of fusion, may be retained as intercrossing schemes that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to subdivide our main conceptual types.

但是这样定义屈折就是在质疑这个术语描述一大类语言的价值。为什么要强调融合同时是一种方法和一种特殊内容的表达呢？我们头脑中当然应该搞清楚，二者之中到底侧重哪一个。“融合的”和“象征的”都与“黏着的”对立，而“黏着的”绝非与“屈折的”等同。我们该怎样处理那些不在词内表达关系概念而是将其交付于句子的融合性语言和象征性语言呢？另外，难道我们不准备区分那些在词内表达这些关系概念的黏着语（在这一点上类似屈折语）和那些不这么做的黏着语了

吗？我们已经抛弃了分析的、综合的和多式综合的这个三分法，认为它太拘泥于量化的考虑，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孤立的、加词缀的和象征的——这个三分法似乎也有不足，因为它太强调外在的技法。孤立的、黏着的、融合的和象征的这个分类法更可取一些，但是它仍然流于外在。在我看来，最好的做法是留着“屈折”，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有用的启示，据此可建立一个更广泛、发展更一致的方案，再以此方案为线索，基于语言所表达的概念的性质进行分类。另外两种分类方法，一个基于综合的程度，一个基于融合的程度，可以保留下来作为交叉的分类法，为我们进一步划分主要概念类型提供可能。

It is well to recall that all languages must needs express radical concepts (group I) and relational ideas (group IV). Of the two other large groups of concepts—derivational (group II) and mixed relational (group III)—both may be absent, both present, or only one present. This gives us at once a simple, incisive, and absolutely inclusive method of classifying all known languages. They are:

不妨回忆一下：所有语言都必须表达根本概念（I类）和关系概念（IV类）。其他两大类概念——派生概念（II类）和混合关系概念（III类）——可以都不出现，可以都出现，也可以只出现一类。这就即刻给了我们一个简单、深刻而且绝对无所不包的方法，来给所有已知的语言分类。它们可分为：

[A] Such as express only concepts of groups I and IV; in other words, languages that keep the syntactic relations pure and that do not possess the power to modif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radical elements by means of affixes or internal changes. [7_19] We may call these *Pure-relational non-deriving languages* or, more tersely, *Simple Pure-relational languages* . These are the languages that cut most to

the bone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

A.只表达I类和IV类概念的语言；换言之，这些语言保持句法关系的纯粹性，不具备通过加词缀或内部变化来改变根本成分意义的能力。 [8_20] 我们可以称之为“纯关系的非派生语言”，或者简称为“简单的纯关系语言”。这类语言在语言表达上最直击要害。

[B] Such as express concepts of groups I, II, and IV; in other words, languages that keep the syntactic relations pure and that also possess the power to modif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radical elements by means of affixes or internal changes. These are the *Pure-relational deriving languages* or *Complex Pure-relational languages.*

B.表达I类、II类和IV类概念的语言；换言之，这些语言保持了句法关系的纯粹性，同时也具备通过加词缀或内部变化来改变根本成分意义的能力。这些可称为“纯关系的派生语言”，或者“复杂的纯关系语言”。

[C] Such as express concepts of groups I and III; [7_20] in other words, languages in which the syntactic relations are expressed in necessary connection with concepts that are not utterly devoid of concrete significance but that do not, apart from such mixture, possess the power to modif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radical elements by means of affixes or internal changes. [7_21] These are the *Mixed-relational non-deriving languages* or *Simple Mixed-relational languages* .

C.表达I类和III类概念的语言； [8_21] 换言之，这些语言表达句法关系时需要连带并非完全没有具体意义的概念，但是除了这种混合，这些语言不具备通过加词缀或内部变化来改变根本成分意义的能力。[8_22] 这些就是“混合关系的非派生语言”，或称“简单的混合关系语言”。

[D] Such as express concepts of groups I, II, and III; in other words, languages in which the syntactic relations are expressed in mixed form, as in C, and that also possess the power to modif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radical elements by means of affixes or internal changes. These are the *Mixed-relational deriving languages* or *Complex Mixed-relational languages* . Here belong the “inflective” languages that we are most familiar with as well as a great many “agglutinative” languages, some “polysynthetic,” others merely synthetic.

D.表达I类、II类和III类概念的语言；换言之，这些语言和C类一样，表达句法关系时用混合形式，同时也具备通过加词缀或内部变化来改变根本成分意义的能力。这些就是“混合关系的派生语言”，或称“复杂的混合关系语言”。属于这一类的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屈折”语以及众多的“黏着”语，其中有些是“多式综合的”，有些只是综合的。

This conceptual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s, I must repeat, does not attempt to take account of the technical externals of language. It answers, in effect, two fundamental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translation of concepts into linguistic symbols. Does the language, in the first place, keep its radical concepts pure or does it build up its concrete ideas by an aggregation of inseparable elements (types A and C *versus* types B and D)?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does it

keep the basic relational concepts, such as are absolutely unavoidable in the ordering of a proposition, free of an admixture of the concrete or not (types A and B *versus* types C and D)? The second question, it seems to me, is the more fundamental of the two. We can therefore simplify our classification and present it in the following form:

我必须重申，这样从概念上对语言进行分类并没有试图将语言的外在技法考虑进去。其实，这种分类只回答了关于将概念转化为语言符号的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一种语言是保持其根本概念的纯粹性，还是通过聚合不可分割的成分来建立它的具体概念（A类和C类相对于B类和D类）？第二，语言在安排一个命题时，对于那些绝不可少的基本关系概念，是否允许具体概念的搀杂（A类和B类相对于C类和D类）？在我看来，第二个问题在两者当中更加根本。因此，我们可以简化上述分类，将其以下面的形式呈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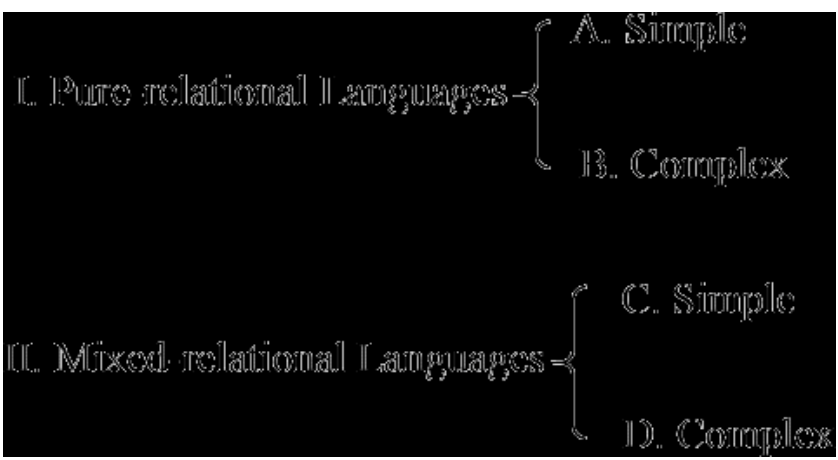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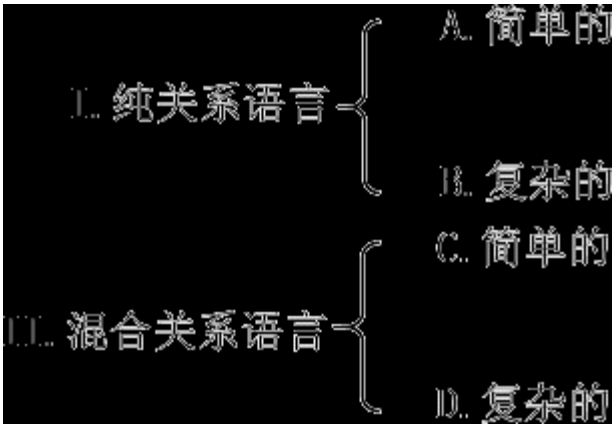

The classification is too sweeping and too broad for an easy, descriptive survey of the many varieties of human speech. It needs to be amplified. Each of the types A, B, C, D may be subdivided into an agglutinative, a fusional, and a symbolic sub-type, according to the prevailing method of modification of the radical element. In type A we distinguish in addition an isolating sub-type, characterized by the absence of all affixes and modifications of the radical element. In the isolating languages the syntactic relations are expressed by the position of the words in the sentence. This is also true of many languages of type B, the terms “agglutinative,” “fusional,” and “symbolic” applying in their case merely to the treatment of the derivational, not the relational, concepts. Such languages could be termed “agglutinative-isolating,” “fusional-isolating” and “symbolic-isolating.”

要想简便地对人类言语的各种变体作一个描写性的概述，这个分类还是太笼统、太宽泛了。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扩充。A、B、C、D中的每一类都可以根据其最常用的改变根本成分的方法细分为黏着的、融合的和象征的语言这三个亚类。在A类中，我们还可以分出一个孤立语亚类，其特点是没有任何词缀，根本成分也没有任何变化。在孤

立语中，句法关系是由句子中各个词的位置来表达的。B类中的很多语言也是如此，它们被贴上“黏着的”、“融合的”和“象征的”的标签只是针对它们对派生概念而非关系性概念的处理。这些语言可以称为“黏着-孤立语”、“融合——孤立语”和“象征——孤立语”。

This brings up the important general consideration that the method of handling one group of concepts need not in the least be identical with that used for another. Compound terms could be used to indicate this difference, if desired, the first element of the compound referring to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cepts of group II, the second to that of the concepts of groups III and IV. An “agglutinative” language would normally be taken to mean one that agglutinates all of its affixed elements or that does so to a preponderating extent. In an “agglutinative-fusional” language the derivational elements are agglutinated, perhaps in the form of prefixes, while the relational elements (pure or mixed) are fused with the radical element, possibly as another set of prefixes following the first set or in the form of suffixes or as part prefixes and part suffixes. By a “fusional-agglutinative” language we would understand one that fuses its derivational elements but allows a greater independence to those that indicate relations. All these and similar distinctions are not merely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they can be abundantly illustrated from the descriptive facts of linguistic morphology. Further, should it prove desirable to insist on the degree of elaboration of the word, the terms “analytic,” “synthetic,” and “polysynthetic” can be added as descriptive terms.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languages of type A are necessarily analytic and that languages of type C also are prevailingly analytic and are not likely to develop beyond the synthetic stage.

这就引出一个重要的一般性的看法，即处理一类概念的方法根本不需要与处理另一类的方法等同。如有需要，可以用复合式名称来表示这种差异，复合式名称的第一个成分用来指II类概念的处理方法，第二个成分用来指III类和IV类概念的处理方法。“黏着”语一般是指把所有词缀成分黏合在一起的语言，或者这种做法占绝对优势的语言。在“黏着-融合”语中，派生成分是黏着的，可能以前缀的形式；而（简单的或混合的）关系成分则与根本成分融合，可能是作为另一组前缀加在第一组之后，或者以后缀的形式出现，又或者一部分是前缀，一部分是后缀。我们说的“融合-黏着”语是指那些融合派生成分、但是允许指示关系的成分拥有较大独立性的语言。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区别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在语言形态学的描写性资料中也可以找到很多实例。进一步说，若真的需要强调词的复杂程度，可以加上“分析的”、“综合的”和“多式综合的”等描述性说法。不用说，A类语言肯定是分析性的，C类语言主要也是分析性的，不大可能发展到超越综合的阶段。

But we must not make too much of terminology. Much depends on the relative emphasis laid on this or that feature or point of view. The method of classifying languages here developed has this great advantage, that it can be refined or simplified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a particular discussion. The degree of synthesis may be entirely ignored; “fusion” and “symbolism” may often be combined with advantage under the head of “fusion”; eve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gglutination and fusion may, if desired, be set aside as either too difficult to draw or as irrelevant to the issue. Languages, after all, are exceedingly complex historical structures. It is of less importance to put each language in a neat pigeon-hole than to have evolved a flexible method which enables us to place it, from two or three independent standpoints, relatively to another language. All this is not to deny that certain linguistic types are more stable and frequently represented than others that are just as possible from a

theoretical standpoint. But we are too ill-informed as yet of the structural spirit of great numbers of languages to have the right to frame a classification that is other than flexible and experimental.

但是，我们切不可过分强调名称。很多事情都取决于重点相对放在哪里，是这个还是那个特征，或者这个还是那个视角。我们这里提出的语言分类法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可以根据具体讨论的需要分得精细一点或简单一点。比如，综合的程度可以完全忽略；“融合”和“象征”常常可以更方便地合并到“融合”项下；如果需要，甚至黏着和融合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搁置一旁，因为太难区分，或者因为与议题无关。毕竟语言是极为复杂的历史建构。相比把每种语言放进一个整齐的方格的做法，制定一个灵活的方法其实更为重要，这样就能从两三个独立的视角归置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这一切并非否认某些语言类型比其他类型更稳定，更经常被表现出来，虽然那些其他类型从理论视角来看是同样可能的。可惜我们对大量语言的结构特质仍然知之甚少，所以只能权且制定一个灵活的、试验性的分类方法。

The reader will gain a somewhat livelier idea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linguistic morphology by glancing down the subjoined analytical table of selected types. The columns II, III, IV refer to the groups of concepts so numbered in the preceding chapter. The letters *a, b, c, d* refer respectively to the processes of isolation (position in the sentence), agglutination, fusion, and symbolism. Where more than one technique is employed, they are put in the order of their importance. [7_22]

本章所附的分析表选取了一些类型，读者浏览一番，就会对语言形态的可能性有更生动一点的印象。II、III、IV栏指的是上一章里这样编号的概念类型。字母a、b、c、d分别指孤立（在句子中的位

置）、黏着、融合和象征这四种程序。若某种语言使用了不止一种方法，则按照其重要性对那些方法进行排序。 [8_23]

Fundamental Type	*I*	*II*	*III*	*Technique*	*Synthesis*	*Examples*
A (Simple Pure relational)			a	Isolating	Analytic	Chinese; Annamite
	(d)		a, b	Isolating (weakly agglutinative)	Analytic	Ewe (Guinea Coast)
	(b)		a, b, c	Agglutinative (mildly agglutinative fusional)	Analytic	Modern Tibetan
B (Complex Pure relational)	b, (d)		a	Agglutinative isolating	Analytic	Polynesian
	b		a, (b)	Agglutinative isolating	Polysynthetic	Haida
	c		a	Fusional isolating	Analytic	Cambodgian
	b		b	Agglutinative	Synthetic	Turkish
	b, d	(b)	b	Agglutinative (symbolic type)	Polysynthetic	Yana (N. California)
	c, d, (b)		a, b	Fusional agglutinative(symbolic type)	Synthetic (mildly)	Classical Tibetan
	b		c	Agglutinative fusional	Synthetic (mildly polysynthetic)	Sioux
	c		c	Fusional	Synthetic	Salinan (S.W. California)
	d, c	(d)	d, c, a	Symbolic	Analytic	Shilluk (Upper Nile)

基本类型	II	III	IV	方法	综合程度	例子
A（简单纯关系的）	—	—	a	孤立的	分析的	汉语；安南语
	(d)	—	b	孤立的（弱度黏着的）	分析的	埃维语（几内亚海岸）
	(b)	—	a，b，c	黏着的（轻度黏着 融合的）	分析的	现代藏语
B（复杂纯关系的）	b.(d)	—	a	黏着 孤立的		波利尼西亚语
	b	—	a.(b)	黏着 孤立的	多式综合的	海达语
	c	—	a	融合 孤立的	分析的	柬埔寨语
	b	—	b	黏着的	综合的	土耳其语
	b, d	(b)	b	黏着的（符号性色彩）	多式综合的	雅纳语（加利福尼亚北部）
	c，d.(b)	—	a，b	融合 黏着的（符号性色彩）	综合的（轻度）	古藏语
	b	—	c	黏着 融合的	综合的（轻度多式综合的）	苏族语
	c	—	c	融合的	综合的	萨利纳语（加利福尼亚西南部）
	d，c	(d)	d，c，a	符号性的	分析的	希卢克语（尼罗河上游）

Fundamental Type	*I*	*II*	*III*	*Technique*	*Synthesis*	*Examples*
C (Simple Mixed relational)	(b)	b	. .	Agglutinative	Synthetic	Bantu
	(c)	c, (d)	a	Fusional	Analytic (mildly synthetic)	French[1]
D (Complex Mixed relational)	b, c, d	b	b	Agglutinative (symbolic tops)	Polysynthetic	Nootka (Vancouver Island)[2]
	c, (d)	b	. .	Fusional agglutinative	Polysynthetic (mildly)	Chinook (lower Columbia R.)
	c, (d)	c, (d), (b)	. .	Fusional	Polysynthetic	Algonkin
	c	c, d	a	Fusional	Analytic	English
	c, d	c, d	. .	Fusional (symbolic tops)	Synthetic	Latin, Greek, Sanskrit
	c, b, d	c, d	(a)	Fusional (strongly symbolic)	Synthetic	Takelma (S.W. Oregon)
	d, c	c, d	(a)	Symbolic fusional	Synthetic	Semitic (Arabic, Hebrew)

基本类型	II	III	IV	方法	综合程度	例子
C（简单混合关系的）	(b)	b	—	黏着的	综合的	班图语
	(c)	c, (d)	a	融合的	分析的（轻度综合的）	法语[1]
D（复杂混合关系的）	b, c, d	b	b	黏着的（符号性色彩）	多式综合的	努特卡语（温哥华岛）[2]
	c, (b)	b	—	融合 黏着的	多式综合的（轻度）	奇努克语（哥伦比亚河下游）
	c, (d)	c, (d), (b)	—	融合的	多式综合的	阿尔衮琴语
	c	c, d	a	融合的	分析的	英语
	c, d	C, d	—	融合的（符号性色彩）	综合的	拉丁语，希腊语，梵语
	c, b, d	c, d	(a)	融合的（强度符号性的）	综合的	塔克尔马语（俄勒冈州西南部）
	d, c	c, d	(a)	符号性的 融合的	综合的	闪米特语支（阿拉伯语、希伯来语）

1 Might nearly as well have come under D

1　归入D类大概也无不可。

2 Very nearly complex pure-relational.

2　很接近复杂的纯关系性的。

NOTE. —Parentheses indicate a weak development of the process in question.

注：括号表示相关的租序处于弱度发展阶段。

I need hardly point out that these examples are far from exhaust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Nor that the fact that two languages are similarly classified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y present a great similarity on the surface. We are here concerned with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generalized features of the spirit, the technique, and the degree of elaboration of a given language. Nevertheless, in numerous instances we may observe this highly suggestive and remarkable fact, that languages that fall into the same class have a way of paralleling each other in many details or in structural features not envisaged by the scheme of classification. Thus, a most interesting parallel could be drawn on structural lines between Takelma and Greek, [7_23] languages that are as geographically remote from each other and as unconnected in a historical sense as two languages selected at random can well be. Their similarity goes beyond the generalized facts registered in the table. It would almost seem that linguistic features that are easily thinkable apart from each other, that seem to have no necessary connection in theory, have nevertheless a tendency to cluster or to follow together in the wake of some deep, controlling impulse to form that dominates their drift. If, therefore, we can only be sure of the intuitive similarity of two given languages, of their possession of the same submerged form—feeling, we need not be too much surprised to find that they seek and avoid certain linguistic developments in common. We are at present very far from able to define just what these fundamental form intuitions are. We

can only feel them rather vaguely at best and must content ourselves for the most part with noting their symptoms. These symptoms are being garnered in our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grammars of diverse languages. Some day, it may be, we shall be able to read from them the great underlying ground—plans.

我几乎无需指出，表中的例子远未穷尽语言结构的可能性，也无需指出归入同一类的两种语言在外表上不一定就非常相似。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某种语言在气质、方法和复杂程度上最根本、最普遍的特征。但是，在很多例子中，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很具启发性的显著事实：属于同一类的几种语言会在许多细节方面或上述分类表未涵盖的结构特征方面彼此平行。比如，塔克尔马语和希腊语 [8_24] 在结构上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平行，虽然这两种语言在地理上的距离和历史上的隔绝不亚于随机选出来的任何两种语言。它们的相似之处超出了上面的表格所记录的普遍事实。一些不必相提并论的语言特征，一些在理论上似乎没有必然联系的语言特征，竟然好像会跟随某种深层的、约束性的、主导语言沿流形式的推动力而趋于聚拢或汇合。因此，就算我们仅仅确知两种语言有直觉上的相似以及相同的潜在的形式感，也不必惊讶于发现它们同样追求或规避某些语言发展趋势。目前我们还远远无法确定这些基本的形式直觉究竟是什么。我们至多只能相当模糊地感受到它们，所以很大程度上只好满足于发现它们的一些征兆。这些征兆在各种语言的描写语法或历史语法中随时都可搜罗出来。或许有一天我们将能够通过它们发现那些基层的设计蓝图。

Such a purely technical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s as the current one into “isolating,” “agglutinative,” and “inflective” (read “fusional”) cannot claim to have great value as an entering wedge into the discovery of the intuitional forms of language. I do not know whether the suggested classification into four conceptual groups is likely to drive deeper or not. My own feeling is that it

does, but classifications, neat constructions of the speculative mind, are slippery things. They have to be tested at every possible opportunity before they have the right to cry for acceptance. Meanwhile we may take some encouragement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a rather curious, yet simple, historical test. Languages are in constant process of change, but it is only reasonable to suppose that they tend to preserve longest what is most fundamental in their structure. Now if we take great groups of genetically related languages, [7_24] we find that as we pass from one to another or trace the course of their development we frequently encounter a gradual change of morphological type. This is not surprising, for there is no reason why a language should remain permanently true to its original form. It is interesting, however, to note that of the three intercrossing classifications represented in our table (conceptual type, technique, and degree of synthesis), it is the degree of synthesis that seems to change most readily, that the technique is modifiable but far less readily so, and that the conceptual type tends to persist the longest of all.

像现在这种纯技法的分类，即把语言分为“孤立的”、“黏合的”和“屈折的”（可理解为“融合的”），作为发掘语言直观形式的切入点并没有多大价值。我不知道这里提出的概念四分法能否挖得更深入一些。我个人的感觉是有这种可能，但是分类作为头脑中设想的整齐的架构，总归是不可靠的东西。需得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对其进行检验，然后才有权力让别人接受它们。同时，我们亦可使用一种相当奇妙但又简便易行的历史检验法，从中得到些许鼓励。语言总是在不断变化，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假定，语言会把其结构中最基本的东西保留得最长久。如果选几大组在起源上有相关性的语言 [8_25] ，从这一组过渡到那一组，或者追溯它们的发展历程，我们会时常遭遇形态类型上的渐变。这不足为奇，因为一种语言没有理由恒久固守它原本的形式。但是，有一点很有趣——在我们的表格所呈现的三种相互

交错的分类指标（概念类型、技法和综合程度）中，最易发生变化的似乎是综合程度，技法也可改变，但是不那么容易，而概念类型在三者中最趋于长久。

The illustrative material gathered in the table is far too scanty to serve as a real basis of proof, but it is highly suggestive as far as it goes. The only changes of conceptual type within groups of related languages that are to be gleaned from the table are of B to A (Shilluk as contrasted with Ewe; [7_25] Classical Tibetan as contrasted with Modern Tibetan and Chinese) and of D to C (French as contrasted with Latin [7_26]). But types A : B and C : D are respectiv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s a simple and a complex form of a still more fundamental type (pure-relational, mixed-relational). Of a passage from a pure-relational to a mixed-relational type or *vice versa* I can give no convincing examples.

上面的表格所收集的例证资料太稀疏，不足以构成坚实的论据，但是即便如此也还是具有很高的启发性。在表格中呈现的有渊源关系的语言组中，能发现的概念变化仅限于从B到A（希卢克语对应于埃维语 [8_26] ；古藏语对应于现代藏语和汉语）和从D到C（法语对应于拉丁语 [8_27] ）。但是A和B、C和D分别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更基本的类型的简单形式和复杂形式（即纯关系的和混合关系的）。至于从纯关系语言到混合关系语言的过渡，或者反向的过渡，我则举不出令人信服的例子。

The table shows clearly enough how little relative permanence there is in the technical features of language. That highly synthetic languages (Latin; Sanskrit) have frequently broken down into analytic forms (French; Bengali) or that agglutinative languages

(Finnish) have in many instances gradually taken on “inflective” features are well-known facts, but the natural inference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often drawn that possibly the contrast between synthetic and analytic or agglutinative and “inflective” (fusional) is not so fundamental after all. Turning to the Indo-Chinese languages, we find that Chinese is as near to being a perfectly isolating language as any example we are likely to find, while Classical Tibetan has not only fusional but strong symbolic features (e.g., *g-tong-ba* “to give,” past *b-tang,* future*gtang,* imperative *thong*); but both are pure-relational languages. Ewe is either isolating or only barely agglutinative, while Shilluk, though soberly analytic, is one of the most definitely symbolic languages I know; both of these Soudanese languages are pure-relation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ynesian and Cambodgian is remote, though practically certain; while the latter has more markedly fusional features than the former, [7_27] both conform to the complex pure-relational type. Yana and Salinan are superficially very dissimilar languages. Yana is highly polysynthetic and quite typically agglutinative, Salinan is no more synthetic than and as irregularly and compactly fusional (“inflective”) as Latin; both are pure-relational, Chinook and Takelma, remotely related languages of Oregon, have diverged very far from each other, not only as regards technique and synthesis in general but in almost all the details of their structure; both are complex mixed-relational languages, though in very different ways. Facts such as these seem to lend color to the suspicion that in the contrast of pure-relational and mixed-relational (or concrete-relational) we are confronted by something deeper, more far—reaching, than the contrast of isolating, agglutinative, and fusional. [7_28]

上面的表格足够清晰地表明，语言的技法特征相对来说是多么不

持久。高度综合的语言（如拉丁语、梵语）频频分解为分析语（如法语、孟加拉语），以及黏着语（如芬兰语）在很多情况下逐渐带上了“屈折的”特征，这些都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是人们好像很少据此得出综合性和分析性之间的差别或者黏着性和“屈折性”（融合性）之间的差别并非那么根本的自然推论。转向印度支那语系，我们发现汉语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接近完全孤立语的语言，而古藏语不仅具有融合性特征，还具有很强的象征性特征（例如，*g-tong-ba*“给”的过去式是*b-tang*，将来式是*gtang*，祈使形式是*thong*），但是二者都是纯关系语言。埃维语可以算作孤立语，亦可勉强算作黏着语；而希卢克语尽管是正儿八经的分析性语言，却又是我所知的最明确的象征性语言；而这两种苏丹语又都是纯关系语言。波利尼西亚语和柬埔寨语之间的关系虽然疏远，但是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后者较前者具有更明显的融合特点[8_28]，二者都符合复杂的纯关系性类型的标准。表面上看，雅纳语和萨利纳语是两种很不同的语言。雅纳语具有高度的多式综合性，并且是很典型的黏着语，萨利纳语的综合性则并不超过拉丁语，其不规则性和紧凑的融合性（“屈折性”）也与拉丁语相仿，但是雅纳语和萨利纳语都是纯关系性语言。奇努克语和塔克尔马语是关系比较疏远的俄勒冈州的语言，二者不仅在总的技法和综合程度上已经相去甚远，而且在几乎所有的结构细节方面也有很大区别；但是二者都是复杂的混合关系语言，尽管方式非常不同。这类事实似乎给如下猜想增添了理由：在纯关系语言和混合关系语言（或者具体关系语言）的对比中，我们遇到的是比孤立语、黏着语和融合语之间的差别更深更远的东西。[8_29]

[7_1].If possible, a triune formula.

[7_2].One celebrated American writer on culture and language delivered himself of the dictum that, estimable as the speakers of agglutinative languages might be, it was nevertheless a crime for an inflecting woman to marry an agglutinating man. Tremendous spiritual values were evidently at stake. Champions of the "inflective" languages are wont to glory in the very irrationalities of Latin and Greek, except when it suits them to emphasize their profoundly "logical" character. Yet the sober logic of Turkish or Chinese leaves them cold. The glorious irrationalities and formal complexities of many "savage" languages they have no stomach for. Sentimentalists

are difficult people.

[7_3].I have in mind valuations of form as such. Whether or not a language has a large and useful vocabulary is another matter. The actual size of a vocabulary at a given time is not a thing of real interest to the linguist, as all languages have the resources at their disposal for the creation of new words, should need for them arise. Furthermore, we are not in the least concerned with whether or not a language is of great practical value or is the medium of a great culture. All these considerations, important from other standpoint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form value.

[7_4].E.g., Malay, Polynesian.

[7_5].Where, as we have seen, the syntactic relations are by no means free from an alloy of the concrete.

[7_6].Very much as an English *cod-liver oil* dodges to some extent the task of explicitly defining the relations of the three nouns. Contrast French *huile de foie de morue* "oil of liver of cod."

[7_7].See Chapter IV.

[7_8].There is probably a real psycho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symbolism and such significant alternations as *drink, drank, drunk* or Chinese *mai* (with rising tone) "to buy" and *mai* (with falling tone) "to sell." The unconscious tendency toward symbolism is justly emphasized by recent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Personally I feel that the passage from *sing* to *sang* has very much the same feeling as the alternation of symbolic colors—e.g., green for safe, red for danger. But we probably differ greatly as to the intensity with which we feel symbolism in linguistic changes of this type.

[7_9].Pure or "concrete relational." See Chapter V.

[7_10].In spite of my reluctance to emphasi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refixing and a suffixing language, I feel that there is more involved in this difference than linguists have generally recognized. It seems to me that there is a rather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a language that settles the formal status of a radical element before announcing it—and this, in effect, is what such languages as Tlingit and Chinook and Bantu are in the habit of doing—and one that begins with the concrete nucleus of a word and defines the status of this nucleus by successive limitations, each curtailing in some degree the generality of all that precedes. The

spirit of the former method has something diagrammatic or architectural about it, the latter is a method of pruning afterthoughts. In the more highly wrought prefixing languages the word is apt to affect us as a crystallization of floating elements, the words of the typical suffixing languages (Turkish, Eskimo, Nootka) are "determinative" formations, each added element determining the form of the whole anew. It is so difficult in practice to apply these elusive, yet important, distinctions that an elementary study has no recourse but to ignore them.

[7_11].English, however, is only analytic in tendency. Relatively to French, it is still fairly synthetic, at least in certain aspects.

[7_12].The former process is demonstrable for English, French, Danish, Tibetan, Chinese, and a host of other languages. The latter tendency may be proven, I believe, for a number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e.g., Chinook, Navaho. Underneath their present moderately polysynthetic form is discernible an analytic base that in the one case may be roughly described as English-like, in the other, Tibetan-like.

[7_13].This applies more particularly to the Romance group: Italian, Spanish, Portuguese, French, Roumanian. Modern Greek is not so clearly analytic.

[7_14].See pages 133, 134.

[7_15].The following formulae may prove useful to those that are mathematically inclined. Agglutination: $c = a + b$; regular fusion: $c = a + (b - x) + x$; irregular fusion: $c = (a - x) + (b - y) + (x + y)$; symbolism: $c = (a - x) + x$. I do not wish to imply that there is any mystic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fusion. It is quite likely to have developed as a purely mechanical product of phonetic forces that brought about irregularities of various sorts.

[7_16].See page 110.

[7_17].See Chapter V.

[7_18].If we den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rm "inflective" to fusing languages that express the syntactic relations in pure form, that is, without the admixture of such concepts as number, gender, and tense, merely because such admixture is familiar to us in Latin and Greek, we make of "inflection" an even more arbitrary concept than it need b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true that the method of fusion itself tends to break down the wall between our conceptual groups II and IV, to create group III. Yet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inflective" languages should not be denied. In modern Tibetan,

for instance, in which concepts of group II are but weakly expressed, if at all, and in which the relational concepts (e.g., the genitive, the agentive or instrumental) are expressed without alloy of the material, we get many interesting examples of fusion, even of symbolism. *Mi di* , e.g., "man this, the man" is an absolutive form which may be used as the subject of an intransitive verb. When the verb is transitive (really passive), the (logical) subject has to take the agentive form. *Mi di* then becomes *mi di* "by the man," the vowel of the demonstrative pronoun (or article) being merely lengthened. (There is probably also a change in the tone of the syllable.) This, of course, is of the very essence of inflection. It is an amusing commentary on the insufficiency of our current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which considers "inflective" and "isolating" as worlds asunder, that modern Tibetan may be not inaptly described as an isolating language, aside from such examples of fusion and symbolism as the foregoing.

[7_19].I am eliminating entirely the possibility of compounding two or more radical elements into single words or word-like phrases (see pages 67-70). To expressly consider compounding in the present survey of types would be to complicate our problem unduly. Most languages that possess no derivational affixes of any sort may nevertheless freely compound radical elements (independent words). Such compounds often have a fixity that simulates the unity of single words.

[7_20].We may assume that in these languages and in those of type D all or most of the relational concepts are expressed in "mixed" form, that such a concept as that of subjectivity, for instance, cannot be expressed without simultaneously involving number or gender or that an active verb form must be possessed of a definite tense. Hence group III will be understood to include, or rather absorb, group IV. Theoretically, of course, certain relational concepts may be expressed pure, others mixed, but in practice it will not be found easy to make the distinction.

[7_21].The line between types C and D cannot be very sharply drawn. It is a matter largely of degree. A language of markedly mixed-relational type, but of little power of derivation pure and simple, such as Bantu or French, may be conveniently put into type C, even though it is not devoid of a number of derivational affixes. Roughly speaking, languages of type C may be considered as highly analytic ("purified") forms of type D.

[7_22].In defining the type to which a language belongs one must be careful not to be misled by structural features which are mere survivals of an older stage, which have no productive life and do not enter into the unconscious patterning of the language. All languages are littered with such petrified bodies. The English *-ster* of

spinster and *Webster* is an old agentive suffix, but, as far as the feeling of the present English-speaking generation is concerned, it cannot be said to really exist at all; *spinster* and *Webster* have been completely disconnected from the etymological group of *spin* and of *weave* (web). Similarly, there are hosts of related words in Chinese which differ in the initial consonant, the vowel, the tone, or i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a final consonant. Even where the Chinaman feels the etymological relationship, as in certain cases he can hardly help doing, he can assign no particular function to the phonetic variation as such. Hence it forms no live feature of the language-mechanism and must be ignored in defining the general form of the language. The caution is all the more necessary, as it is precisely the foreigner, who approaches a new language with a certain prying inquisitiveness, that is most apt to see life in vestigial features which the native is either completely unaware of or feels merely as dead form.

[7_23].Not Greek specifically, of course, but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Indo-European.

[7_24].Such, in other words, as can be shown by documentary or comparative evidence to have been derived from a common source. See Chapter VII.

[7_25].These are far-eastern and far-western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oudan" group recently proposed by D. Westermann.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we and Shilluk is exceedingly remote at best.

[7_26].This case is doubtful at that. I have put French in C rather than in D with considerable misgivings. Everything depends on how one evaluates elements like *-al* in *national, -té* in *bonté* , or *re-* in *retourner* . They are common enough, but are they as alive, as little petrified or bookish, as our English *-ness* and *-ful* and *un-* ?

[7_27].In spite of its more isolating cast.

[7_28].In a book of this sort it is naturally impossible to give an adequate idea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in its varying forms. Only a few schematic indications are possible. A separate volume would be needed to breathe life into the scheme. Such a volume would point out the salient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 number of languages, so selected as to give the reader an insight into the formal economy of strikingly divergent types.

[8_1].如果可能，是一种三合一的公式。

[8_2].有一位著名的美国作家论及文化和语言时说过一句名言：尽管说黏着语的人也许值得尊敬，但是一个屈折女人嫁给一个黏着男人实在是犯罪。这显然是拿巨大的精神价值观来打赌。鼓吹“屈折”语的人习惯于以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种种不合理处为荣，只有当他们觉得宜乎强调这两种语言的超凡“逻辑”性时才不这么做。然而对土耳其语或者汉语的严密逻辑性，他们却不理不睬。很多“野蛮”语言中耀眼的不合理之处和形式上的复杂之处又不合他们的胃口。感情用事的人真是难缠。

[8_3].译者注：泽西奶牛所产牛奶的含脂率很高。

[8_4].我这里指的是对语言形式的此类评价。语言有没有巨大的、有用的词汇量，那是另外一回事。语言学家对一种语言在某一时期的词汇实际有多少并不真的感兴趣，因为所有语言都握有制造新词的资源，只要有必要，就能产出新词。此外，一种语言是否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是否承载伟大的文化，也根本不是我们所关注的。这类考虑从其他角度看可能很重要，但是与[语言的]形式价值毫不相干。

[8_5].例如马来语和波利尼西亚语。

[8_6].如我们所见，在拉丁语里句法关系并非完全没有掺杂具体成分。

[8_7].很像英语的cod-liver oil （鳕鱼-肝油）在一定程度上躲避了明确界定三个名词之间的关系的任务。试比较法语的huile de foie de morue“鳕鱼的肝脏的油”。

[8_8].见第四章。

[8_9].象征性与drink-drank-drunk或者汉语里的“买”（升调）-“卖”（降调）等有意义的变化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真正的心理联系。最近的心理学文献合理地强调了朝着象征性发展的无意识趋势。我个人感觉，从sing到sang的变化很像颜色符号的变化——如绿色象征安全，红色象征危险。但是对于这种语言变化中的象征性，各人感觉的强度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

[8_10].纯关系性的或者“具体关系性的”。见第五章。

[8_11].尽管我不愿意强调前缀语言和后缀语言的差别，但是我感觉这一差别所包含的东西比语言学家普遍认可的要多。在我看来，那些在说出根本成分之前就已确定其形式地位的语言——特林基特语、奇努克语和班图语就是习惯于这么做的——和那些从词的具体核心出发，通过一连串限制（每种限定成分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之前成分的一般性）来定义其身份的语言，在心理上存在一种相当重要的差别。前者的方法具有某种图表性或者建筑性的气质，后者则是一种事后修剪的方法。在更繁复的前缀语言中，于我们而言，词更像是漂浮成分的结晶；在典型的后缀语言中（如土耳其语、爱斯基摩语和努特卡语），词则是“限定性”的结构，每次添加的成分都把整个形式

重新限定一次。在实践中，这些飘忽又重要的区别运用起来十分困难，以至于[本书这样的]初级研究只能忽略它们。

[8_12].然而，英语只是趋向于分析语。与法语相比，英语至少在某些方面仍然具有相当的综合性。

[8_13].前一种过程在英语、法语、丹麦语、藏语、汉语和许多其他语言中都可见到。后一种趋势我认为可在一些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中得到证明，例如奇努克语和纳瓦霍语。在它们目前的轻度多式综合的形式之下，可以看到分析性的基础。奇努克语的分析性基础可以大致地说类似英语，纳瓦霍语的则类似藏语。

[8_14].这种说法尤其特别适于罗曼语族：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和罗马尼亚语。现代希腊语的分析性则没有这么明显。

[8_15].详见第133、134页。

[8_16].对于喜欢数学的读者，以下公式可能有用。黏着：c＝a＋b；规则的溶合：c＝a＋(b-x)＋x；不规则的融合：c＝(a-x)＋(b-y)＋(x＋y)；象征性：c＝(a-x)＋x。我并不想暗示融合过程中有任何神秘性。它很可能是导致各种不规则现象的语音力量的纯粹机械性的产物。

[8_17].详见第110页。

[8_18].见第五章。

[8_19].如果我们仅仅因为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习见数、性和时态等概念与句法关系的混杂，就拒绝把那些以纯粹的形式（而不混杂这些概念）来表达句法关系的融合语称为“屈折”语，那么我们对“屈折”概念的理解就更是毫无必要的专断了。与此同时，融合方法本身的确倾向于拆除II类概念和IV类概念之间的藩篱，以构成III类概念。然而，此类使用纯粹形式来表达句法关系的“屈折”语存在的可能是不应被否定的。例如，在现代藏语中，II类概念即使被表达出来也是微弱的，而关系概念（例如属格、施事格或工具格）的表达也不掺杂实质性内容，但是我们可以从藏语中获得许多有趣的溶合的例子，甚至还能得到象征性的例子。例如，mi　di“男人／这，这男人”是一个绝对形式，可以用作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当动词是及物动词时（其实是被动的），（逻辑）主语必须采用施事格。于是mi di就变成了mi di “被这男人”，不过把指示代词（或者冠词）的元音拉长了而已。（该音节的声调或许也发生了变化。）而这正是屈折的本质。我们当前的语言分类认为“屈折”和“孤立”分属两个分裂的世界。但是除了上述融合和象征的例子，现代藏语完全可被视为一种孤立语。这就算是对我们的分类体系所存在的缺陷的一条有趣的批注吧。

[8_20].我完全没有考虑将两个或多个根本成分复合为单词或类似词的短语的可能性（详见第67-70页）。在本章对语言类型的综述中，如果特意考虑复合过程，会使问题变得过于复杂。须知大多数不具备任何派生词缀的语言都可以自由地复合根本成分（即独立词）。这种复合结构往往具有一种类似单词的统一性的稳定性。

[8_21].我们可以假定：在这些语言以及D类语言中，所有的或大多数的关系概念都以“混合”形式表达；比如，要表达主格这个概念，就不能不同时牵连数或者性；再如，一个主动动词必须归属某个明确的时态。因此，III类[概念]可被理解为包含，或者不如说吸收了IV类[概念]。当然，从理论上说，有些关系概念可以表达为纯关系性的，其他的则是混合关系性的，但是在实践中要区分它们并不容易。

[8_22].C类和D类之间无法划出明确的界线。这主要是一个程度问题。像班图语或法语这类语言明显属于混合关系类型，且几乎没有纯粹而简单的派生能力，是可以方便地归入C类的，尽管它们并非一点派生词缀都没有。大体上说，可以将C类语言视为D类语言的高度分析的（“纯化了的”）形式。

[8_23].要确定一门语言属于哪种类型，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受某些结构特征的误导，[因为]它们只是[这种语言]古老阶段的遗留，已没有生成能力，也不进入该语言的无意识格局。所有语言中都散布着这种石化了的遗体。英语词spinster（“老姑娘”，原意为“纺纱者”）和Webster（姓氏“韦伯斯特”，首字母小写的原意为“编织者”）中的-ster是一个古老的施事后缀，但是就当今这一代说英语的人的感受而言，这个后缀是根本不存在的；spinster和Webster已经与它们的同源词spin（纺纱）和weave（web)（编织[织网]）完全脱节了。类似地，在汉语中有一组一组的相关词，在声母、元音、声调或有无结尾辅音上有所区别。但即便是在中国人能感受到词源关系的地方——某些情况下他们很难不感受到——他们也说不清这种发变异本身有什么具体功能。所以，它无法构成语言机制中有生命的特征，在界定语言的一般形式时，应该被忽略。这种谨慎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恰恰是外国人在接触一种新语言时会有一种深究的倾向，最容易把残存的现象视为有生命的，而本族人对此或者熟视无睹，或者只是将其视为已死的形式。

[8_24].当然，不单单是希腊语，希腊语不过是印欧语言的典型代表。

[8_25].换言之，可以用文献资料或比较性的证据证明其同源性的语言。详见第七章。

[8_26].这些是D.　威斯特曼最近提出的“苏丹”语族最东端和最西端的代表。埃维语和希卢克语之间的遗传关系最多只能说是极为遥远的。

[8_27].这个例子颇为可疑。我将法语归入C类，而不是D类，是相当忐忑的。一切取决于如何看待[法语词]　national（民族的）中的-al、bonté（善意）中的-té或者

retourner（返回）中的re-等成分。它们[在法语中]足够普通，但是它们跟英语中的-ness、-ful和un-一样有活力、不僵化、不书卷气么？

[8_28].尽管它的外表更孤立。

[8_29].在这样一本书里，自然不可能充分阐述语言结构的不同形式，而只可能做一些概要性的说明。要想赋予这样的概要以生命力，需得单独写一卷书。在那样一卷书里，可以挑出一些语言，指出它们显性的结构特征，让读者洞悉具有显著差异的各种语言类型的形式格局。

Chapter 7 Language as a Historical Product: Drift

第七章　作为历史产物的语言：沿流

Every one knows that language is variable. Two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generation and locality, speaking precisely the same dialect and moving in the same social circles, are never absolutely at one in their speech habits. A minute investigation of the speech of each individual would reveal countless differences of detail—in choice of words, in sentence structure, in the relative frequency with which particular forms or combinations of words are used,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particular vowels and consonants and of combinations of vowels and consonants, in all those features, such as speed, stress, and tone, that give life to spoken language. In a sense they speak slightly divergent dialects of the same language rather than identically the same language.

众所周知，语言是富于变化的。两个来自同一地方、属于同一辈分的人，即使说着完全相同的方言，并且游走于相同的社交圈子，他们的言语习惯也绝不会完全相同。如果仔细地考察这两个人的言语，我们会发现无数细节上的差异——选词，句子的结构，某些词汇形式或者组合被使用的相对频率，某些元音和辅音以及元音和辅音组合的发音，以及语速、重音和语调等所有赋予口语以生命力的那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讲的是同一种语言的略有差异的方言，而不是完全相同的一种语言。

There is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however, between individual and dialectic variations. If we take two closely related dialects, say

English as spoken by the “middle classes” of London and English as spoken by the average New Yorker, we observe that, however much the individual speakers in each cit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the body of Londoners forms a compact, relatively unified group in contrast to the body of New Yorkers. The individual variations are swamped in or absorbed by certain major agreements-say of pronunciation and vocabulary—which stand out very strongly when the language of the group as a whole is contrasted with that of the other group. This mean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like an ideal linguistic entity dominating the speech habits of the members of each group, that the sense of almost unlimited freedom which each individual feels in the use of his language is held in leash by a tacitly directing norm. One individual plays on the norm in a way peculiar to himself, the next individual is nearer the dead average in that particular respect in which the first speaker most characteristically departs from it but in turn diverges from the average in a way peculiar to himself, and so on. What keeps the individual's variations from rising to dialectic importance is not merely the fact that they are in any event of small moment—there are well-marked dialectic variations that are of no greater magnitude than individual variations within a dialect—it is chiefly that they are silently “corrected” or canceled by the consensus of usage. If all the speakers of a given dialect were arranged in ord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gree of their conformity to average usage,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y would constitute a very finely intergrading series clustered about a well-defined center or nor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ny two neighboring speakers of the series [8_1] would be negligible for any but the most microscopic linguistic researc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uter—most members of the series are sure to be considerable, in all likelihood considerable enough to measure up to a true dialectic variation. What prevents us from saying that these untypical individuals speak distinct dialects is that their

peculiarities, as a unified whole, are not referable to another norm than the norm of their own series.

不过，个人言语变异和方言变异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如果以两种关系紧密的方言为例，比如伦敦“中产阶级”所讲的英语和普通纽约人所讲的英语，我们会发现，无论每个城市里个体说话者之间的差别有多么大，与纽约人群体相比，伦敦人群体还是会形成一个紧凑而且相对统一的整体。如果将某个群体的语言视为一个整体，与另外一个群体的语言进行对比，那么个体变异就会被某些强烈地突显出来的主要的一致性——例如发音和词汇——所淹没或吸收。这就意味着存在某种类似理想的语言实体的东西，它统治着每个群体中各成员的言语习惯，而每一个个体在使用语言时所感受到的几乎无限的自由其实都受制于某种沉默地起指导作用的规范。甲可以其特有的方式来逗弄这规范，而乙却在甲最突出地偏离规范的某个方面墨守成规，但是乙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其他方面偏离规范，丙、丁、戊亦复如是。个人变异之所以无法荣升到方言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不管怎样它们都只是小打小闹——有些明显的方言变异并不比方言中的个人变异大——而主要是因为它们在不知不觉中被用法上的共识“修正”或者消除了。如果把讲某种方言的人都按照他们遵守平均用法的程度进行排序，无疑会形成一个非常细致的渐变序列，围绕一个界定明确的中心或者规范分布开来。在这个序列中，任何两个相邻说话人 [9_1] 的差别都是微不足道的，除非为了进行最微观的语言学研究。而序列两端的说话人的差别则一定非常大，很可能比得上真正的方言变异。我们之所以不宣称这些非典型的个体说的是不同的方言，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特点，总加起来，仍然归属其所在序列的规范，而不是另一种规范。

If the speech of any member of the series could actually be made to fit into another dialect series, [8_2] we should have no true barriers between dialects (and languages) at all. We should merely have a continuous series of individual variations extending over the

whole range of a historically unified linguistic area, and the cutting up of this large area (in some cases embracing parts of several continents) into distinct dialects and languages would be an essentially arbitrary proceeding with no warrant save that of practical convenience. But such a conception of the nature of dialectic variation does not correspond to the facts as we know them. Isolated individuals may be found who speak a compromise between two dialects of a language, and if their number and importance increases they may even end by creating a new dialectic norm of their own, a dialect in which the extreme peculiarities of the parent dialects are ironed out. In course of time the compromise dialect may absorb the parents, though more frequently these will tend to linger indefinitely as marginal forms of the enlarged dialect area. But such phenomena—and they are common enough in the history of language—are evidently quite secondary. They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such social developments as the rise of nationality, the formation of literatures that aim to have more than a local appeal, the movement of rural populations into the cities, and all those other tendencies that break up the intense localism that unsophisticated man has always found natural.

如果一个方言序列中任何成员的言语都确实可以被放入另一个方言序列 [9_2] ，那么方言之间（以及语言之间）就没有真正的界限可言了。那样的话，我们将只会看到由个人变异构成的一个连续序列，它覆盖了历史上统一起来的一整个语言区域；将这个大区域（有些情况下包括来自几个大陆的不同地区）划分为界限明确的方言区和语言区不过是一个纯粹任意的过程，除了操作便利之外，毫无根据。但是，对方言变异性质的这种认识与我们所了解的事实并不相符。我们会发现，有些孤立的个体说的是某种语言的两种方言之间的折中方言；如果这类人的数量和重要性逐渐提升，他们甚至可能最终创造出自己的新的方言规范，在这种新方言里，双亲方言的极端特点皆被熨平。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折中方言可能会把双亲方言吸收。不过更常见的是，双亲方言会无定期地存留下来，成为扩大了的方言区域的边缘形式。但是这些现象——尽管在语言历史上很常见——很显然是相当次要的。它们与各种社会发展密切关联，比如民族的兴起、力图超越地域情趣的文学的形成、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以及其他所有打破强烈的地方观念的趋势——那些地方观念在未开化的人看来是习以为常的。

The explanation of primary dialectic differences is still to seek. It is evidently not enough to say that if a dialect or language is spoken in two distinct localities or by two distinct social strata it naturally takes on distinctive forms, which in time come to be divergent enough to deserve the name of dialects. This is certainly true as far as it goes. Dialects do belong, in the first instance, to very definitely circumscribed social groups, homogeneous enough to secure the common feeling and purpose needed to create a norm. But the embarrassing question immediately arises, If all the individual variations within a dialect are being constantly leveled out to the dialectic norm, if there is no appreciable tendency for the individual's peculiarities to initiate a dialectic schism, why should we have dialectic variations at all? Ought not the norm, wherever and whenever threatened, automatically to reassert itself? Ought not the individual variations of each locality, even in the absence of intercourse between them, to cancel out to the same accepted speech average?

最初的方言差异的产生还有待解释。下面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种方言或者语言在两个不同的地区或者被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所使用，就会自然地产生不同的形式，尔后差别逐渐扩大，最终足以被称为不同的方言。若只是泛泛而论，这样说当然也对。首先，

方言的确属于界限分明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有足够的相似性，能确保为创造规范所需的共同情感和目的。但是令人尴尬的问题随即产生了：如果一个方言中所有的个人变异都不断地被抹平以趋近方言规范，如果没有明显的趋势让个人的特点开启一个新的方言派别，那么到底为什么还会有方言变异呢？无论何时何地受到威胁，方言规范难道不应该自动地重振雄风吗？两地的个人变异，即使在彼此间没有交流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相互抵消，同归双方共同接受的言语平均值吗？

If individual variations “on a flat” were the only kind of variability in language, I believe we should be at a loss to explain why and how dialects arise, why it is that a linguistic prototype gradually breaks up into a number of mutually unintelligible languages. But language is not merely something that is spread out in space, as it were—a series of reflections in individual minds of one and the same timeless picture. Language moves down time in a current of its own making. It has a drift. If there were no breaking up of a language into dialects, if each language continued as a firm, self—contained unity, it would still be constantly moving away from any assignable norm, developing new features unceasingly and gradually transforming itself into a language so different from its starting point as to be in effect a new language. Now dialects arise not because of the mere fact of individual variation but because two or more groups of individuals have become sufficiently disconnected to drift apart, or independently, instead of together. So long as they keep strictly together, no amount of individual variation would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dialects. In practice, of course, no language can be spread over a vast territory or even over a considerable area without showing dialectic variations, for it is impossible to keep a large population from segregating itself into local groups, the language of each of which tends to drift

independently. Under cultural conditions such as apparently prevail to—day, conditions that fight localism at every turn, the tendency to dialectic cleavage is being constantly counteracted and in part "corrected" by the uniformizing factors already referred to. Yet even in so young a country as America the dialectic differences are not inconsiderable.

如果"平面上的"个人变异是语言中唯一的变异现象，那么我认为我们就无法解释方言为什么产生以及如何产生，为什么一种语言原型会逐渐分裂成许多彼此互不相通的语言。但是，事实上，语言并不是只在空间上展开的东西，不是同一幅无始无终的景象在个人头脑中的一系列反映。语言在时间的维度上沿着自造的潮流滚滚而下，自有其沿流。即使一种语言不分裂为若干方言，即使每种语言一直都是一个稳定而自足的整体，它仍然会不停地偏离任何可确定的规范，不断地发展出新特征，逐渐蜕变成一种迥异于最初形态的语言，一种切切实实的新语言。所以方言的兴起不是因为单纯的个人变异，而是因为两个或者多个群体渐行渐远，以至分流开去，或者说独立地而不是共同地分流而下。若是这些群体紧紧地聚在一起，再多的个人变异也不会导致方言的产生。然而，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够覆盖广阔的疆土或者甚至是一片稍大的地区却不表现出方言变异，因为众多的人口不可能不分割成若干个地域群体，而每个群体的语言都会趋于独立分流。处在像时下蔚然盛行的这种文化环境中，地域观念处处受阻，方言的分化趋势被上文提到的统一因素不断地抵消并部分地"修正"。然而，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年轻国家，方言差别也不容小觑。

Under primitive conditions the political groups are small, the tendency to localism exceedingly strong. It is natural, therefore, that the languages of primitive folk or of non-urban populations in general are differentiated into a great number of dialects. There are parts of the globe where almost every village has its own dialect.

The life of the geographically limited community is narrow and intense; its speech is correspondingly peculiar to itself. It is exceedingly doubtful if a language will ever be spoken over a wide area without multiplying itself dialectically. No sooner are the old dialects ironed out by compromises or ousted by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the one dialect which is culturally predominant when a new crop of dialects arises to undo the leveling work of the past. This is precisely what happened in Greece, for instance. In classical antiquity there were spoken a large number of local dialects, several of which are represented in the literature. As the cultural supremacy of Athens grew, its dialect, the Attic, spread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st, until, in the so-called Hellenistic period following the Macedonian conquest, the Attic dialect, in the vulgarized form known as the "Koine," became the standard speech of all Greece. But this linguistic uniformity [8_3] did not long continue. During the two millennia that separate the Greek of to—day from its classical prototype the Koine gradually split up into a number of dialects. Now Greece is as richly diversified in speech as in the time of Homer, though the present local dialects, aside from those of Attica itself, are not the lineal descendants of the old dialects of pre-Alexandrian days. [8_4] The experience of Greece is not exceptional. Old dialects are being continually wiped out only to make room for new ones. Languages can change at so many points of phonetics, morphology, and vocabulary that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once the linguistic community is broken it should slip off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It would be too much to expect a locally diversified language to develop along strictly parallel lines. If once the speech of a locality has begun to drift on its own account, it is practically certain to move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its linguistic fellows. Failing the retarding effect of dialectic interinfluences, which I have already touched upon, a group of dialects is bound to diverge on the whole, each from all of the

others.

在原始环境下，政治团体很小，产生地域观念的趋势非常强烈。因此，原始人群或者一般非城市人群的语言都会很自然地分为许多种方言。在世界上的有些地方，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方言。地理上受到局限的社团，其生活是狭隘而交往密集的，因此其言语也是自己独有的。一种语言能在广大地区通行却不孳生出若干种方言，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旧方言还没来得及被折中方言熨平，或者被占据文化统治地位的某个方言的扩展和影响所取代，新一代的方言就产生了，抵消了之前拉平差异的努力。例如，在希腊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在古典时期，希腊存在大量的地方方言，其中的几种有文献可考。随着雅典的文化优势不断增长，它的方言，阿提卡语，得以传播，并取代了其他方言，直到马其顿征服之后所谓的希腊化时期，阿提卡方言以其被称为“共同语”的世俗化形式成为整个希腊的标准语言。但是这种语言上的统一 [9_3] 并没有持续多久。从古典原型到当代希腊语所跨越的2000多年里，共同语逐渐分化为多种方言。今天的希腊在言语上的丰富性堪比荷马时期，虽然除了阿提卡本地的几种方言之外，现在的各地方言已经都不是前亚历山大时期 [9_4] 古老方言的直系后代了。[9_5] 希腊的这一经历并非孤例。古老的方言在不断地被消除，却不过是为新生的方言腾出空间而已。语言在语音、形态、词汇的许多节点上都可以发生变化，因此某个语言社团一旦解体，其语言就会滑向不同的方向实在不足为奇。指望一种拥有不同地域方言的语言严格地按照平行的路线来发展未免不切实际。一旦某个地方的言语开始自顾自地漂流，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它与它的方言伙伴的距离将越来越远。如果没有前文提到的方言间相互影响的阻滞作用，一组方言大体上注定会分化，彼此渐行渐远。

In course of time each dialect itself splits up into sub-dialects, which gradually take on the dignity of dialects proper while the primary dialects develop into mutually unintelligible languages.

And so the budding process continues, until the divergences become so great that none but a linguistic student, armed with his 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with his comparative or reconstructive method, would infer that the languages in question were genealogically related, represented independent lines of development, in other words, from a remote and common starting point. Yet it is as certain as any historical fact can be that languages so little resembling each other as Modern Irish, English, Italian, Greek, Russian, Armenian, Persian, and Bengali are but end-points in the present of drifts that converge to a meeting-point in the dim past. There is naturally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is earliest "Indo-European" (or "Aryan") prototype which we can in part reconstruct, in part but dimly guess at, is itself other than a single "dialect" of a group that has either become largely extinct or is now further represented by languages too divergent for us, with our limited means, to recognize as clear kin. [8_5]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种方言自身又会分化为若干子方言，这些子方言逐渐取得方言的身份，而原来的方言则演变成互不相通的语言。这种萌芽过程就这样持续下去，直到差别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只有掌握了文献证据和比较方法或者重构方法的语言学者才能推断出这些语言在谱系上是有关联的，代表了独立的发展路线，换言之，这些语言皆来自某个久远的共同起点。须知，与任何史实一样确凿无疑的是，像现代爱尔兰语、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俄语、亚美尼亚语、波斯语和孟加拉语这样彼此少有相似之处的语言都不过是各言语支流现今抵达的终点，它们皆可以上溯到遥远古代的某个汇聚点。自然，我们也没有理由不相信，这种我们可以部分地重构、部分地模糊猜测的最早的"印欧语"（或"雅利安语"）原型本身不过是某个语言组群的一种"方言"。这一组群已大抵消失，或进一步发展成了另一些与我们的语言差别很大的语言，用我们有限的手段已无法认清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9_6]

All languages that are known to be genetically related, i.e., to be divergent forms of a single prototype, may be considered as constituting a "linguistic stock." There is nothing final about a linguistic stock. When we set it up, we merely say, in effect, that thus far we can go and no farther. At any point in the progress of our researches an unexpected ray of light may reveal the "stock" as but a "dialect" of a larger group. The terms dialect, language, branch, stock—it goes without saying—are purely relative terms. They are convertible as our perspective widens or contracts. [8_6] It would be vain to speculate as to whether or not we shall ever be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all languages stem from a common source. Of late years linguists have been able to make larger historical syntheses than were at one time deemed feasible, just as students of culture have been able to show histor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culture areas or institutions that were at one time believed to be totally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The human world is contracting not only prospectively but to the backward—probing eye of culture—history. Nevertheless we are as yet far from able to reduce the riot of spoken languages to a small number of "stocks." We must still operate with a quite considerable number of these stocks. Some of them, like Indo-European or Indo-Chinese, are spoken over tremendous reaches; others, like Basque, [8_7] have a curiously restricted range and are in all likelihood but dwindling remnants of groups that were at one time more widely distributed. As for the single or multiple origin of speech, it is likely enough that language as a human institution (or, if one prefers, as a human "faculty") developed but o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that all the complex history of language is a unique cultural event. Such a theory constructed "on general principles" is of no real interest, however, to linguistic science. What lies beyond the demonstrable must be left to the philosopher or the romancer.

所有已知的在遗传上相关的语言，即来自某个单一原型的不同的语言形式，都可以被视为构成一个“语系”。但语系并非终结。我们在确立一个语系的时候，其实不过是说我们可追溯至此，无法再远。在我们的研究进程中，任何一个点上都可能出现一束意想不到的光亮，向我们揭示所谓的“语系”不过是一个更大的语言组群的一种“方言”。毋庸赘言，方言、语言、语支和语系等术语都是纯粹相对的名称。随着我们视野的扩展或者缩小，它们可以相互转换。[9_7] 去揣测我们究竟能否证明所有语言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是徒劳的。近年来，语言学家得以进行更广泛的历史整合，其规模超过了过去认为可行的限度，就像文化学者得以证明之前被认为彼此完全孤立的文化区域或者制度之间存在历史联系一样。人类世界正在缩小，不仅向前展望时如此，回顾文化历史时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迄今为止还是远不能将纷繁芜杂的口头语言归为少数几个“语系”，而是仍然必须面对相当数量的语系。它们当中有一些，比如印欧语系或者印支语系，使用范围极广；而另一些，比如巴斯克语系[9_8]，使用范围则小得出奇，很可能只是一些曾经分布较广的语群不断萎缩的残余。至于言语的发源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情形很可能是这样的：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机制（或者，有人可能更愿意称之为人类的一种“官能”）在这个族群的历史上只发展过一次，整部复杂的语言历史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事件。但是，这样一个基于“一般原则之上”的理论对于语言科学来说并不具有真实的意义。无法被证实的东西应该留给哲学家或者传奇小说作家去演绎。

We must return to the conception of “drift” in language. If the historical changes that take place in a language, if the vast accumulation of minute modifications which in time results in the complete remodeling of the language, are not in essence identical with the individual variations that we note on every hand about us, if these variations are born only to die without a trace, while the equally minute, or even minuter, changes that make up the drift are

forever imprint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are we not imputing to this history a certain mystical quality? Are we not giving language a power to change of its own accord over and above the involuntary tendency of individuals to vary the norm? And if this drift of language is not merely the familiar set of individual variations seen in vertical perspective, that is historically, instead of horizontally, that is in daily experience, what is it? Language exists only in so far as it is actually used-spoken and heard, written and read. What significant changes take place in it must exist, to begin with, as individual variations. This is perfectly true, and yet it by no means follows that the general drift of language can be understood [8_8] from an exhaustive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se variations alone. They themselves are random phenomena, [8_9] like the waves of the sea, moving backward and forward in purposeless flux. The linguistic drift has direction. In other words, only those individual variations embody it or carry it which move in a certain direction, just as only certain wave movements in the bay outline the tide. The drift of a language is constituted by the unconscious selection on the part of its speakers of those individual variations that are cumulative in some special direction. This direction may be inferred, in the main, from the past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In the long run any new feature of the drift become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common, accepted speech, but for a long time it may exist as a mere tendency in the speech of a few, perhaps of a despised few. As we look about us and observe current usage, it is not likely to occur to us that our language has a “slope,” that the changes of the next few centuries are in a sense prefigured in certain obscure tendencies of the present and that these changes, when consummated, will be seen to be but continuations of changes that have been already effected. We feel rather that our language is practically a fixed system and that what slight changes are destined to take place in it are as likely to move in one direction as another.

The feeling is fallacious. Our very uncertainty as to the impending details of change makes the eventual consistency of their direction all the more impressive.

我们还是回来接着讨论语言“沿流”这个概念的好。如果一种语言当中所发生的历史变化，以及最终导致这一语言彻底改变面貌的各种细微变化的大量堆积，在本质上不同于我们周遭随处可见的个人变异，如果这些个人变异即生即灭，不留痕迹，而构成语言沿流的那些同样细微或者甚至更加细微的变异却将永远地留在语言历史上，那么，我们岂不是赋予了这部语言史某种神秘属性？岂不是在个体不由自主地改变语言规范的趋势之上，又赋予了语言一种自行变化的力量？再则，如果语言的这种沿流不只是从纵向视角（即从历史角度）而非横向视角（即根据日常经验）所观察到的那些熟悉的个人变异集合，那它又是什么呢？语言之存在就在于它被实际地使用——说、听、写和读。其中发生的所有重要变化必定是以个人变异的方式开始存在的。这一点确凿无疑，可是绝不能据此认为单凭对这些个人变异的详尽描述就可以理解[9_9]语言总的流向。这些变异本身是随机现象[9_10]，如同海水的波涛，漫无目的地涨落。而语言的沿流是有方向的。换言之，只有以某种方向运动的个人变异才能体现或者带动语言沿流，正如在海湾里只有某些波涛的运动才能勾勒出海潮的轮廓。语言的沿流是由说话者无意识地选择了沿某个特定方向积累的个人变异而造成的。这个方向大体上可以通过这一语言过去的历史推断出来。长远地看，沿流的任何新特征都会变成共同接受的言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新特征也许仅仅是作为少数人——很可能是受鄙视的少数人——言语中的趋势而存在。当我们环顾四周，观察当前的语言用法时，不大可能想到我们的语言有个“坡度”；不会想到未来几个世纪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孕育在今天的某些模糊趋势里；也不会想到，这些变化一旦完成，我们就能看出它们不过是先前已经发生的变化的延续。我们倒是会觉得，我们的语言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系统，那些注定要发生的细微变化可能向任何方向发展。这种感觉是错误的。我们并不确知即将发生的变化细节，正

因为如此，它们最终的方向一致才使人更加印象深刻。

Sometimes we can feel where the drift is taking us even while we struggle against it. Probably the majority of those who read these words feel that it is quite “incorrect” to say “Who did you see?” We readers of many books are still very careful to say “Whom did you see?” but we feel a little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y proud, it may be) in the process. We are likely to avoid the locution altogether and to say “Who was it you saw?” conserving literary tradition (the “whom”) with the dignity of silence. [8_10] The folk makes no apology. “Whom did you see?” might do for an epitaph, but “Who did you see?” is the natural form for an eager inquiry. It is of course the uncontrolled speech of the folk to which we must look for advance information as to the general linguistic movement. It is safe to prophesy that within a couple of hundred years from to—day not even the most learned jurist will be saying “Whom did you see?” By that time the “whom” will be as delightfully archaic as the Elizabethan “his” for “its.“ [8_11] No logical or historical argument will avail to save this hapless “whom.” The demonstration “I: me = he: him = who: whom” will be convincing in theory and will go unheeded in practice.

有时我们能感觉到沿流将把我们带往哪里，甚至在我们与之抗争时也是如此。阅读我这段文字的多数人可能会觉得说Who did you see?（“你看见谁了？”）是相当“错误的”。我们这些饱读之士还是会小心翼翼地说Whom did you see?， [9_11] 但是说的过程中也会稍感别扭（可能是一种骄傲的别扭吧）。我们也可能干脆避开这个表达，改为说Who was it you saw?（“你看见的人是谁？”），用庄严的沉默来维护文学传统（whom）。 [9_12] 老百姓可不吃这一套。Whom did you see?用作墓志铭大约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迫切的询问而言，Who

did you see?则是更自然的形式。我们当然应该从老百姓不受约束的言语中寻找语言一般变化的先兆信息。可以大胆地预测，过不了几百年，即使最有学问的法官也不会再说Whom did you see?了。到那时，whom可能会变成可爱的古玩，就像伊丽莎白时代用来表示its的his一样。 [9_13] 任何基于逻辑或者历史的辩护都将无法拯救这个可怜的whom。I: me = he: him = who: whom这一公式在理论上还是会有说服力的，但是在现实中却将不被理会。

Even now we may go so far as to say that the majority of us are secretly wishing they could say “Who did you see?” It would be a weight off their unconscious minds if some divine authority, overruling the lifted finger of the pedagogue, gave them *carte blanche* . But we cannot too frankly anticipate the drift and maintain caste. We must affect ignorance of whither we are going and rest content with our mental conflict—uncomfortable conscious acceptance of the “whom,” unconscious desire for the “who.“ [8_12] Meanwhile we indulge our sneaking desire for the forbidden locution by the use of the “who” in certain twilight cases in which we can cover up our fault by a bit of unconscious special pleading. Imagine that some one drops the remark when you are not listening attentively, “John Smith is coming to—night.” You have not caught the name and ask, not “Whom did you say?” but “Who did you say?” There is likely to be a little hesitation in the choice of the form, but the precedent of usages like “Whom did you see?” will probably not seem quite strong enough to induce a “Whom did you say?” Not quite relevant enough, the grammarian may remark, for a sentence like “Who did you say?” is not strictly analogous to “Whom did you see?” or “Whom did you mean?” It is rather an abbreviated form of some such sentence as “Who, did you say, is coming to—night?” This is the special pleading that I have referred to, and it has a certain logic on its side. Yet the case is more hollow

than the grammarian thinks it to be, for in reply to such a query as “You're a good hand at bridge, John, aren't you?” John, a little taken aback, might mutter “Did you say me?” hardly “Did you say I?” Yet the logic for the latter (“Did you say I was a good hand at bridge?“) is evident. The real point is that there is not enough vitality in the “whom” to carry it over such little difficulties as a “me” can compass without a thought. The proportion “I:me＝he:him＝who:whom” is logically and historically sound, but psychologically shaky. “Whom did you see?” is correc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false about its correctness.

即使是现在，我们也敢说，大部分人私下里都希望能说Who did you see?。如果某个神祇推翻学究的教条，给予人们自由说话的权利，大家在无意识里恐怕都会有如释重负之感。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公开地走在语言沿流之前，同时又维护身份。我们只能假装不知道将去往哪里，而甘于忍受心理上的冲突——有意识地、不自在地接受whom，又无意识地希望使用who。[9_14] 与此同时，我们会在某些模糊状态下使用who，来纵容我们内心对这禁用话语的隐匿愿望，因为在那些状态下我们可以用少许无意识的特别辩护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试想一下，有人在你没注意听的时候随口说了句John Smith is coming tonight（约翰·史密斯今晚要来）。你没有听清楚名字，便追问一句，但问的不是Whom did you say?（你说是谁？），而是Who did you say?在选择这个形式时，你可能会有一丝犹豫，但是像Whom did you see?这样的先例似乎没有强大到引发你在此处问Whom did you say?。语法学家可能会说二者的相关性不够，因为在严格意义上，Who did you say?这样的句子与Whom did you see?或者Whom did you mean?（你是指谁？）并不相类。它其实是Who, did you say, is coming to-night?（你是说谁今晚要来？）这个句子的缩略形式。这就是我上文说的特别辩护，而且它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不过这一情况比语法学家想象的要空洞一些，因为在回答You're a good hand at bridge, John, aren't you?（你是桥牌高手，约翰，是

不是？）这样的问题时，约翰有些没准备好，可能嘟囔出一句Did you say me?（你是说我么？），而不会是Did you say I?。但后者（Did you say I was a good hand at bridge? 你是说我是桥牌高手？）显然是符合逻辑的。关键还在于whom的活力不足以带着它跨越这类小障碍，不像me那样不费思量就能做到。I: me = he: him = who: whom这个比例式在逻辑上和历史上是立得住的，但是在心理上却有些摇摆。Whom did you see?固然正确，但是它的正确里隐藏着某种虚假。

It is worth looking into the reason for our curious reluctance to use locutions involving the word “whom” particularly in its interrogative sense. The only distinctively objective forms which we still possess in English are *me, him, her* (a little blurred because of its identity with the possessive *her), us, them,* and *whom* . In all other cases the objective has come to be identical with the subjective—that is, in outer form, for we are not now taking account of position in the sentence. We observe immediately in looking through the list of objective forms that *whom* is psychologically isolated. *Me, him, her, us,* and *them* form a solid, well-integrated group of objective personal pronouns parallel to the subjective series *I, he, she, we, they* . The forms *who* and *whom* are technically “pronouns” but they are not felt to be in the same box as the personal pronouns. *Whom* has clearly a weak position, an exposed flank, for words of a feather tend to flock together, and if one strays behind, it is likely to incur danger of life. Now the other interrogative and relative pronouns *(which, what, that),* with which *whom* should properly flock, do not distinguish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orms. It is psychologically unsound to draw the line of form cleavage between *whom* and the personal pronouns on the one side, the remaining interrogative and relative pronouns on the other. The form groups should be symmetrically related to, if not

identical with, the function groups. Had *which, what,* and *that* objective forms parallel to *whom* , the position of this last would be more secure. As it is, there is something unesthetic about the word. It suggests a form pattern which is not filled out by its fellows. The only way to remedy the irregularity of form distribution is to abandon the whom altogether for we have lost the power to create new objective forms and cannot remodel our *which-what-that* group so as to make it parallel with the smaller group *who-whom.* Once this is done, *who* joins its flock and our unconscious desire for form symmetry is satisfied. We do not secretly chafe at “Whom did you see?” without reason. [8_13]

我们很奇怪地不愿使用包含whom的说法—特别是whom用于疑问意思的时候，这一现象的原因值得探究。英语中仅存的几个明显的宾格形式是me、him、her（有点模糊，因为跟所有格her相同）、us、them和whom。在其他所有情况下，宾格已经变得和主格相同——就外在形式而言，因为我们在这里不考虑句内的位置。审视一下宾格形式的清单，我们即刻会发现whom在心理上是孤立的。Me、him、her、us和them构成了一个稳固而完整的人称代词宾格群体，与I、he、she、we和they这一主格序列相平行。从术语上讲，who和whom这两个形式都是“代词”，可是我们却感觉它们跟人称代词格格不入。Whom显然处于弱势，是一个被暴露的侧翼。须知词以类聚，若某一个被落下，就可能有性命之虞。说起来whom应该跟which、what和that等其他疑问代词和关系代词归为一类才算恰当，但是这些词却不分主格和宾格形式。依据形式把whom和人称代词划在一边，把剩下的疑问代词和关系代词留在另一边，在心理上说不通。按照形式划分的群体与按照功能划分的群体即使不完全相同，也该保持对称才是。如果which、what和that具有与whom平行的宾格形式，那么最后这个词whom的地位就会更安全一点。就现在而言，whom这个词有些不符合审美。它暗示了一个形式格局，却没有同伴来填充。要弥补这一形式分布的不规则，唯一的办法是彻底放弃whom，因为我

们已经失去了创造新的宾格形式的能力，无法重塑which-what-that组群，使之与较小的who-whom组群保持平行。果真如此，who就归位了，而我们潜意识中对形式对称的追求也得到了满足。我们私下里对Whom did you see?感到不满不是没有道理的。[9_15]

But the drift away from *whom* has still other determinants. The words *who* and *whom* in their interrogative sense are psychologically related not merely to the pronouns *which* and *what* , but to a group of interrogative adverbs—*where, when, how* —all of which are invariable and generally emphatic. I believe it is safe to infer that there is a rather strong feeling in English that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 or adverb, typically an emphatic element in the sentence, should be invariable. The inflective-*m* of *whom* is felt as a drag upon the rhetorical effectiveness of the word. It needs to be eliminated if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 is to receive all its latent power. There is still a third, and a very powerful, reason for the avoidance of *whom.*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eries of personal pronouns *(I, he, she, we, they: me, him, her, us, them)* is in English associated with a difference of position. We say *I see the man* but *the man sees me; he told him,* never *him he told* or *him told he.* Such usages as the last two are distinctly poetic and archaic; they are opposed to the present drift of the language. Even in the interrogative one does not say *Him did you see?* It is only in sentences of the type *Whom did you see?* that an inflected objective before the verb is now used at all. On the other hand, the order in*Whom did you see?* is imperative because of its interrogative form;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 or adverb normally comes first in the sentence *(What are you doing?When did he go?Where are you from?).* In the “whom” of *Whom did you see?* there is concealed, therefore, a conflict between the order proper to a sentence containing an inflected objective and the order natural to a sentence

with an interrogative pronoun or adverb. The solution*Did you see whom?* or *You saw whom?* [8_14] is too contrary to the idiomatic drift of our language to receive acceptance. The more radical solution *Who did you see?* is the one the language is gradually making for.

不过使语言沿流离开whom的还有其他决定因素。用作疑问词的who和whom在心理上不仅与代词which和what相关，而且与一组疑问副词where、when和how相关，而这些词都没有格的变化，一般用于表达强调。我以为据此可以稳妥地推论，英语里有一种相当强烈的情感需求，令在句子里通常扮演强调成分的疑问代词或副词不变格。我们会感觉whom中的屈折成分-m拖累了该词的修辞效果。要使这个疑问代词承载其全部的潜力，-m就必须被去掉。让我们规避whom的还有第三条十分强大的理由。在英语中，人称代词的主格系列和宾格系列之间的对立（I、he、she、we、they：me、him、her、us、them）与位置上的差异相关。我们说I see the man，可是the man sees me；说he told him，但是从来不会说him he told或者him told he。类似后两种表达的用法是十分诗意而古雅的，与英语现在的沿流相反。即使在疑问句里，我们现在也不会说Him did you see?。如今只有在Whom did you see?这类句子中，才会有屈折的宾格出现在动词前面。另一方面，Whom did you see?的词序因其疑问形式所以是必须的，因为疑问代词或副词通常出现在句子的开头（例如What are you doing?，When did he go?和Where are you from?）。因此，Whom did you see?中的whom一词潜藏着一种冲突，冲突的一方是带有屈折宾格的句子的正常顺序即whom应放在动词后面，另一方是带有疑问代词或副词的句子的自然顺序即whom应放在句首。Did you see whom?或You saw whom? [9_16] 等解决方案与英语惯有的沿流太过相悖，难以接受。更激进的解决方案Who did you see?遂逐渐成为英语的倾向。

These three conflicts—on the score of form grouping, of

rhetorical emphasis, and of order—are supplemented by a fourth difficulty. The emphatic *whom* , with its heavy build (half—long vowel followed by labial consonant), should contrast with a lightly tripping syllable immediately following. In *whom did* , however, we have an involuntary retardation that makes the locution sound “clumsy.” This clumsiness is a phonetic verdict, quite apart from the dissatisfaction due to the grammatical factors which we have analyzed. The same prosodic objection does not apply to such parallel locutions as *what did* and *when did* . The vowels of *what* and *when* are shorter and their final consonants melt easily into the following *d,* which is pronounced in the same tongue position as *t* and *n* . Our instinct for appropriate rhythms makes it as difficult for us to feel content with *whom did* as for a poet to use words like *dreamed* and *hummed* in a rapid line. Neither common feeling nor the poet's choice need be at all conscious. It may be that not all are equally sensitive to the rhythmic flow of speech, but it is probable that rhythm is an unconscious linguistic determinant even with those who set little store by its artistic use. In any event the poet's rhythms can only be a more sensitive and stylicized application of rhythmic tendencies that a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daily speech of his people.

除了这三种冲突——形式分组上的、修辞强调上的和语序上的——之外，还有第四个难点。表达强调的whom，体形笨重（半长元音后面跟着一个唇辅音），应该有一个轻快的音节紧随其后，形成对比。然而，在说whom did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情不自禁的迟滞，让这个表达听起来很“笨拙”。这种笨拙是从语音上下的判断，与我们之前分析过的语法因素导致的对whom的不满并不怎么相关。在what did和when did等平行表达中则不存在这种音韵上的不适。what和when的元音较短，末尾的辅音也很容易融入后面的d音，后者的发音舌位与t和n相同。我们对适切节奏的本能需求让我们很难对whom

did感到满意，正如诗人不喜欢在快节奏的诗句中使用dreamed和hummed等词一样。无论是普通人的感受还是诗人的选择，都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也许并非所有的人都对语流的节奏同样敏感，但是节奏很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语言制约因素，即使对那些不怎么重视节奏的艺术性运用的人也是如此。不管怎么说，诗人的节奏不过是更敏感、更有风格地运用了他的同胞日常说话中典型的节奏趋势而已。

We have discovered no less than four factors which enter into our subtle disinclination to say “Whom did you see?” The uneducated folk that says “Who did you see?” with no twinge of conscience has a more acute flair for the genuine drift of the language than its students. Naturally the four restraining factors do not operate independently. Their separate energies, if we may make bold to use a mechanical concept, are “canalized” into a single force. This force or minute embodiment of the general drift of the language is psychologically registered as a slight hesitation in using the word *whom.* The hesitation is likely to be quite unconscious, though it may be readily acknowledged when attention is called to it. The analysis is certain to be unconscious, or rather unknown, to the normal speaker. [8_15] How, then, can we be certain in such an analysis as we have undertaken that all of the assigned determinants are really operative and not merely some one of them? Certainly they are not equally powerful in all cases. Their values are variable, rising and falling 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 and the locution. [8_16] But that they really exist, each in its own right, may sometimes be tested by the method of elimination. If one or other of the factors is missing and we observe a slight diminution in the corresponding psychological reaction (“hesitation” in our case),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factor is in other uses genuinely positive. The second of our four factors applies only to the interrogative use of *whom,* the fourth factor applies with more force

to the interrogative than to the relative. We can therefore understand why a sentence like *Is he the man whom you referred to?* though not as idiomatic as *Is he the man (that) you referred to?* (remember that it sins against counts one and three), is still not as difficult to reconcile with our innate feeling for English expression as *Whom did you see?* If we eliminate the fourth factor from the interrogative usage, [8_17] say in *Whom are you looking at?* where the vowel following *whom* relieves this word of its phonetic weight, we can observe, if I am not mistaken, a lesser reluctance to use the *whom.Who are you looking at?* might even sound slightly offensive to ears that welcome *Who did you see?*

我们已经发现了不下四种因素，导致我们微妙地不愿意说Whom did you see?。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会毫无顾忌地说Who did you see?，他们对于真正的语言沿流表现出比语言学者更敏锐的直觉。自然，这四种制约因素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分散的能——这里不妨斗胆借用一个力学概念——“被汇聚”为同一股力。这股力，或者说这个语言总沿流的细微体现，在心理上表现为使用whom一词时轻微的迟疑。这种迟疑可能是相当无意识的，但是我们稍加注意就能很快感受到。对于正常的说话人，这种分析肯定是无意识的，或者不如说是不知道的。 [9_17] 那么，如何确定在我们所做的这种分析中，我们提到的所有决定因素真的都在起作用，而不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在起作用呢？它们当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具有同样的效力。它们的赋值是变化的，视说话人和所说的话而起落。 [9_18] 但是它们的确存在，且各凭实力，有时可以通过排除法来检测。当其中某个因素缺失，而我们在对应的心理反应中观察到轻微的减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迟疑”）时，我们就可以断定该因素在其他用到它的场合是真正起作用的。四个因素中的第二个只适用于whom的疑问用法，第四个在whom用作疑问代词时比用作关系代词时作用更大。如此一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Is he the man whom you referred to?（他是你提到的那个人么？）这样的句子，虽然不像Is he the man (that) you referred to?那

样地道（别忘了前者中的whom违反了因素一和三），但是它仍然不像Whom did you see?那样难以与我们对英语表达的内在情感相调和。如果我们从whom的疑问用法 [9_19] 中排除第四个因素，比如在Whom are you looking at?（你在看谁？）中，紧跟whom的元音免除了whom的发音负担，我们会发现——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人们就没有那么不情愿使用whom了。甚至那些喜欢听Who did you see?的人也许都会觉得Who are you looking at?有些刺耳了。

We may set up a scale of “hesitation values” somewhat after this fashion: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式建立一种“迟疑值”尺度。

Value 1: factors 1, 3.

价值1：因素1、3

“The man whom I referred to.”

The man whom I referred to.

Value 2: factors 1, 3, 4.

价值2：因素1、3、4

“The man whom they referred to.”

The man whom they referred to.

Value 3: factors 1, 2, 3.

价值3：因素1、2、3

“Whom are you looking at?”

Whom are you looking at?

Value 4: factors 1, 2, 3, 4.

价值4：因素1、2、3、4

“Whom did you see?”

Whom did you see?

We may venture to surmise that while *whom* will ultimately

disappear from English speech, locutions of the type *Whom did you see?* will be obsolete when phrases like *The man whom I referred to* are still in lingering use. It is impossible to be certain, however, for we can never tell if we have isolated all the determinants of a drift. In our particular case we have ignored what may well prove to be a controlling factor in the history of *who* and *whom* in the relative sense. This is the unconscious desire to leave these words to their interrogative function and to concentrate on *that* or mere word order as expressions of the relative (e.g., *The man that I referred to* or *The man I referred to*). This drift, which does not directly concern the use of *whom* as such (merely of *whom* as a form of *who*), may have made the relative *who* obsolete before the other factors affecting relative *whom* have run their course. A consideration like this is instructive because it indicates that knowledge of the general drift of a language is insufficient to enable us to see clearly what the drift is heading for. We need to know something of the relative potencies and speeds of the components of the drift.

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尽管whom最终会从英语口语中消失，但是当The man whom I referred to之类的短语仍在苟延残喘时，Whom did you see?之类的说法会先已绝迹。但这是无法确定的，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知晓我们是否已经找出了一种语言沿流的所有决定因素。在上述案例中，我们就忽略了一个因素，它极有可能在who和whom作为关系代词的历史上起控制作用。这就是那种无意识的将whom和who仅用于其疑问功能的愿望，而把表达关系的功能集中到that上，或者仅依赖词序（例如：The man that I referred to或者The man I referred to）。这一沿流并不与whom本身的用法直接相关（它只关涉作为who的一种变形的whom），但是在影响关系代词whom的其他因素发挥作用之前，它可能已将关系代词who淘汰。这一考虑是有启示意义的，因为它表明，对语言总沿流的了解并不足以让我们看清沿流的方向。我们需要多少了解一点沿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

效力和速度。

It is hardly necessary to say that the particular drifts involved in the use of *whom* are of interest to us not for their own sake but as symptoms of larger tendencies at work in the language. At least three drifts of major importance are discernible. Each of these has operated for centuries, each is at work in other parts of our linguistic mechanism, each is almost certain to continue for centuries, possibly millennia. The first is the familiar tendency to level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ive and the objective, itself but a late chapter in the steady reduction of the old Indo—European system of syntactic cases. This system, which is at present best preserved in Lithuanian, [8_18] was already considerably reduced in the old Germanic language of which English, Dutch, German, Danish, and Swedish are modern dialectic forms. The seven Indo—European cases (nominative, genitive, dative, accusative, ablative, locative, instrumental) had been already reduced to four (nominative, genitive, dative, accusative). We know this from a careful comparison of and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oldest Germanic dialects of which we still have records (Gothic, Old Icelandic, Old High German, Anglo-saxon). In the group of West Germanic dialects, for the study of which Old High German, Anglo-saxon, Old Frisian, and Old Saxon are our oldest and most valuable sources, we still have these four cases, but the phonetic form of the case syllables is already greatly reduced and in certain paradigms particular cases have coalesced. The case system is practically intact but it is evidently moving towards further disintegration. Within the Anglo-saxon and early Middle English period there took place further chang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phonetic form of the case syllables became still further reduced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accusative and the dative finally disappeared. The new

“objective” is really an amalgam of old accusative and dative forms; thus, *him* , the old dative (we still say *I give him the book,* not “abbreviated” from *I give to him* ; compare Gothic *imma,* modern German *ihm*), took over the functions of the old accusative (Anglo-saxon*hine* ; compare Gothic *ina,* Modern German *ihn*) and dativ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nominative and accusative was nibbled away by phonetic processes and morphological levelings until only certain pronouns retained distinctiv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orms.

毋庸赘言，我们对whom的用法所涉及的各个沿流感兴趣，不是因为这些沿流本身，而是因为它们是在英语里发挥作用的更大趋势的征兆。至少有三种颇为重要的沿流是可以识别出来的。每一种都已经发挥了数百年的作用，每一种都影响着我们的语言机制的其他部分，每一种都几乎可以肯定会再延续数百年，很可能上千年。第一种是我们熟悉的抹平主格和宾格之间差异的趋势，这一趋势本身只是印欧语言古老的句子变格系统持续简化过程后期的一个篇章。该系统目前在立陶宛语 [9_20] 里保存得最好，在古日耳曼语中已经被大大简化，英语、荷兰语、德语、丹麦语和瑞典语都是古日耳曼语的现代方言形式。在古日耳曼语中，印欧语的七个格（主格、属格、与格、宾格、离格、方位格、具格）已经被简化为四个（主格、属格、与格、宾格）。我们的这一认识来自对记录犹存的最古老的日耳曼语方言（哥特语、古冰岛语、古高地德语、盎格鲁-撒克逊语）的细致比较和重建。对于研究西日耳曼方言群而言，最古老、最有价值的资源是古高地德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古弗里斯兰语和古撒克逊语。在该方言群中我们还能找到上述四个格，但是格音节的语音形式已经大大简化，在有些词形变化表中，有的格已经被合并了。该方言群的格系统虽然大体完整，但是显然已经趋于进一步的解体。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早期中古英语时期，沿这一方向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格音节的语音形式被进一步简化，宾格和与格之间的区别终于消失。新的“宾格”实际上是旧的宾格和与格形式的混合物；比如，旧的与格形式him（我们

现在还说I give him the book，这不是I give to him的“省略”形式；试比较哥特语的*imma* 和现代德语的*ihm* ）承继了旧的宾格（盎格鲁-撒克逊语的*hine* ；试比较哥特语的*ina* 和现代德语的*ihn* ）和与格的功能。语音程序和形态上的拉平使主格和宾格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结果只剩几个代词保留了不同的主格和宾格形式。

In later medieval and in modern times there have been comparatively few apparent changes in our case system apart from the gradual replacement of *thou—thee* (singular) and subjective *ye* —objective *you* (plural) by a single undifferentiated form *you.* All the while, however, the case system, such as it is (subjective—objective, really absolutive, and possessive in nouns; subjective, objective, and possessive in certain pronouns) has been steadily weakening in psychological respects. At present it is more seriously undermined than most of us realize. The possessive has little vitality except in the pronoun and in animate nouns. Theoretically we can still say *the moon's phases* or *a newspaper's vogue* ; practically we limit ourselves pretty much to analytic locutions like *the phases of the moon* and *the vogue of a newspaper* . The drift is clearly toward the limitation, of possessive forms to animate nouns. All the possessive pronominal forms except *its* and, in part, *their* and *theirs,* are also animate. It is significant that *theirs* is hardly ever used in reference to inanimate nouns, that there is some reluctance to so use *their* , and that *its* also is beginning to give way to *of it* . *Theappearance of it* or *the looks of it* is more in the current of the language than *its appearance.* It is curiously significant that *its young* (referring to an animal's cubs) is idiomatically preferable to *the young of it.* The form is only ostensibly neuter, in feeling it is animate; psychologically it belongs with *his children* , not with *the pieces of it.* Can it be that so common a word as*its* is actually beginning to be difficult? Is it too doomed to disappear? It would be

rash to say that it shows signs of approaching obsolescence, but that it is steadily weakening is fairly clear. [8_19] In any event, it is not too much to say that there is a strong drift towards the restriction of the inflected possessive forms to animate nouns and pronouns.

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英语的格系统中明显的变化相对较少，只有thou—thee（单数）和主格ye—宾格you（复数） [9_21] 逐渐被一个无差别的单一形式you所取代。不过，在同一时期，格系统本身（名词的主格-宾格，其实是通格，还有所有格；某些代词的主格、宾格和所有格）在心理方面一直在削弱。到如今它被严重削弱的程度超过了我们大多数人的认识。除了在代词和有生命名词中，所有格几乎没有什么活力了。理论上我们仍然可以说the moon's phases（月亮的盈亏）或者a newspaper's vogue（一家报纸的风行）；但是实际上我们差不多只限于使用类似the phases of the moon和the vogue of a newspaper之类的分析性表达。这一沿流很明显地趋向将所有格形式限于有生命名词。所有格的代词形式，除了its，以及their和theirs的部分用法，也都是有生命的。有意思的是我们几乎从不用theirs来指示无生命的名词，也不情愿这么用their，而its也已开始让位于of it。所以，the appearance of it或者the looks of it都比its appearance更符合英语的趋势。耐人寻味的是its young（指动物的幼仔）却比the young of it更符合表达习惯。这个形式即its young只是在表面上是中性的，在情感上则是有生命的；在心理上它与his children（他的孩子们），而不是the pieces of it（它的碎片），同类。这是不是说像its这么普通的一个词也开始变得麻烦了呢？莫非它也难逃消失的命运？要说它已表现出趋于退化的迹象，可能有点轻率，但是它正不断弱化却是相当明显的。 [9_22] 无论如何，我们说有一种很强的沿流将有屈折变化的所有格形式限于有生命的名词和代词，并不为过。

How is it with the alternation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 the pronoun? Granted that *whom* is a weak sister, that the two cases

have been leveled in *you* (in *it, that,* and *what* they were never distinct, so far as we can tell [8_20]), and that *her* as an objective is a trifle weak because of its formal identity with the possessive *her* , is there any reason to doubt the vitality of such alternations as *I see the man* and *the man sees me?* Sure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ubjective *I* and objective *me* , between subjective *he* and objective *him,* and correspondingly for other personal pronouns, belongs to the very core of the language. We can throw *whom* to the dogs, somehow make shift to do without an *its,* but to level *I* and *me* to a single case—would that not be to un-English our language beyond recognition? There is no drift toward such horrors as *Me see him* or *I see he.* True, the phonetic disparity between *I* and *me, he* and *him, we* and *us,* has been too great for any serious possibility of form leveling.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 case distinction as such is still vital. One of the most insidious peculiarities of a linguistic drift is that where it cannot destroy what lies in its way it renders it innocuous by washing the old significance out of it. It turns its very enemies to its own uses. This brings us to the second of the major drifts, the tendency to fixed position in the sentence, determined by the syntactic relation of the word.

那么代词的主格和宾格的轮替又该当何论呢？诚然，whom相比who是娇弱的，you的主格和宾格也已经扯平（据我们所知，it、that和what从未有过主格宾格之分 [9_23] ），而作为宾格的her也有些弱小，因为它在形式上与所有格her相同，但是，我们因此就有理由怀疑I see the man（我看到那人）和the man sees me（那人看到我）这类轮替说法的活力了吗？主格I和宾格me之间的区别，主格he和宾格him之间的区别，以及其他人称代词的相应区别，当然属于英语的绝对核心。我们可以把whom扔去喂狗，也可以费点力气不使用its，但是把I和me拉平为一个单一的格，那岂不是把英语弄得不像英语，叫人无从辨认了么？目前倒是没有趋向Me see him或者I see he之类骇

人说法的沿流。的确，I和me、he和him、we和us之间的语音差别太大，不大可能在形式上拉平。但是这并不是说格的区别本身仍然有活力。语言沿流最阴险的特点之一就是，在路上遇到不能消灭的障碍时，它会冲刷掉这个障碍原有的意义，使其变得无关痛痒。它会令敌人为己所用。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二种主要的沿流身边，即根据词的句法关系固定其在句子中的位置的趋势。

We need not go into the history of this all—important drift. It is enough to know that as the inflected forms of English became scantier, as the syntactic relations were more and more inadequately expressed by the forms of the words themselves, position in the sentence gradually took over functions originally foreign to it. The *man* in *the man sees the dog* is subjective; in *the dog sees the man,* objective. Strictly parallel to these sentences are *he sees the dog* and *the dog sees him* . Are the subjective value of *he* and the objective value of *him* entirely, or even mainly, dependent on the difference of form? I doubt it. We could hold to such a view if it were possible to say *the dog sees he* or*him sees the dog* . It was once possible to say such things, but we have lost the power. In other words, at least part of the case feeling in *he* and *him* is to be credited to their position before or after the verb. May it not be, then, that *he* and *him* , *we* and *us* , are not so muc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orms as pre-verbal and post—verbal [8_21] forms, very much as *my* and *mine* are now pre-nominal and post—nominal forms of the possessive *(my father* but *father mine; it is my book* but *the book is mine)* ? That this interpretation corresponds to the actual drif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again indicated by the language of the folk. The folk says *it is me,* not *it is I,* which is “correct” but just as falsely so as the *whom did you see?* that we have analyzed. *I'm the one, it's me; we're the ones, it's us that will win out* -such are the live parallelisms in English to-day.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it is* I will

one day be as impossible in English as *c'est je,* for*c'estmoi* , is now in French.

我们不必深入这一极其重要的沿流的历史，只要知道下面这些就够了：随着英语的屈折变化形式越来越少，随着词本身的形式越来越不足以表达句法关系，词在句中的位置逐渐接管了原本不属于它的功能。在the man sees the dog（那人看见那狗）里，man是主格；在the dog sees the man（那狗看见那人）里则是宾格。和这两个句子完全平行的是he sees the dog和the dog sees him。he的主格意义和him的宾格意义是完全地，或者退一步说主要地，取决于形式上的不同么？我很怀疑。如果能说the dog see she或者him sees the dog，我们或许能持这一观点。我们曾经是能够这样说的，但是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一能力。换言之，he和him的格的感觉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它们在动词前或后的位置。那么，是否可以说，he和him、we和us与其说是主格和宾格形式，不如说是动词前和动词后 [9_24] 的形式呢？正如my和mine现在分别是所有格在名词前和名词后的形式一样（my father我爸爸和father mine爸爸，我的；it is my book这是我的书和the book is mine这书是我的）。这一解释是符合英语的实际沿流的，这一点已被老百姓的言语再次映证。老百姓说it is me，而不说it is I；后者虽然“正确”，却未免虚伪，和我们分析过的whom did you see?一样。I'm the one，it's me（我是那人，那是我）；we're the ones, it's us that will win out（我们是那些人，最后胜出的会是我们）——这些都是当今英语中鲜活的平行表达。无需多疑，有一天it is I在英语中会变得像*c'estje* 这是我在法语中一样不可能，因为现在法语说*c'est moi* 。

How differently our *I: me* feels than in Chaucer's day is shown by the Chaucerian *it am I.* Here the distinctively subjective aspect of the *I* was enough to influence the form of the preceding verb in spite of the introductory *it* ; Chaucer's locution clearly felt more like

a Latin *sumego* than a modern *it is I* or colloquial *it is me* . We have a curious bit of further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English personal pronouns have lost some share of their original syntactic force. Were *he* and *she* subjective forms pure and simple, were they not striving, so to speak, to become caseless absolutives, like *man* or any other noun, we sh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coin such compounds as *he-goat* and *she-goat* , words that are psychologically analogous to *bull-moose* and *mother—bear.* Again, in inquiring about a new-born baby, we ask *Is it a he or a she?* quite as though *he* and *she* were the equivalents of *male* and *female* or *boy* and *girl.* All in all, we may conclude that our English case system is weaker than it looks and that, in one way or another, it is destined to get itself reduced to an absolutive (caseless) form for all nouns and pronouns but those that are animate. Animate nouns and pronouns are sure to have distinctive possessive forms for an indefinitely long period.

我们对I: me的感觉与乔叟时代有多么不同，从乔叟式的it am I中可见一斑。在这个表达里，I明显的主格形态足以影响前面动词的形式，尽管句首有it；乔叟的说法感觉显然更像拉丁语的*sumego* ，而不是现代英语的it is I或者口语的it is me。我们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证据来证明英语的人称代词已经失去了一部分最初的造句能力。假如he和she真的是纯粹简单的主格形式，而不是在挣扎着变成没有格的绝对形式，就像man或其他名词一样，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造出he-goat（公羊）和she-goat（母羊）这样的复合词了，这些词在心理上与bull-moose（公麋鹿）和mother-bear（母熊）是同类的。再者，我们在问起新生儿的性别时，会问Is it a he or a she？（是个他还是她？），就好像he和she等同于male（男性）和female（女性）或boy（男孩）和girl（女孩）一样。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英语的格系统比它表面看起来的要薄弱，而且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它注定会简化成（无格的）绝对形势，对所有名词和代词都是如此，只除了有生命的。有生命的名词和代词一定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

期内保持明确的所有格形式。

Meanwhile observe that the old alignment of case forms is being invaded by two new categories—a positional category (pre-verbal, post-verbal) and a classificatory category (animate, inanimate). The facts that in the possessive animate nouns and pronouns are destined to be more and more sharply distinguished from inanimate nouns and pronouns (*the man's,* but *of the house; his,* but *of it*) and that, on the whole, it is only animate pronouns that distinguish pre-verbal and post-verbal forms [8_22] are of the greatest theoretical interest. They show that, however the language strive for a more and more analytic form, it is by no means manifesting a drift toward the expression of “pure” relational concepts in the Indo-Chinese manner. [8_23] The insistence on the concreteness of the relational concepts is clearly stronger than the destructive power of the most sweeping and persistent drifts that we know of in the history and prehistory of our language.

同时要注意的是，旧的格形式序列正被两个新范畴侵袭——一个位置范畴（动词前的，动词后的）和一个分类范畴（有生命的，无生命的）。在所有格上，有生命的名词和代词与无生命的名词和代词的差别注定会越来越大（试比较the man's那人的和of the house那房子的；his他的和of it它的）；而且，整体而言，只有有生命的代词才区分动词前和动词后的形式，这两点在理论上是最有意思的。 [9_25] 它们说明，尽管英语越来越迈向分析性的形式，它却丝毫没有显现出趋于印度支那语式的“纯”关系性概念表达的沿流。 [9_26] 英语在保持关系概念的具体性上的坚决明显胜过我们已知的英语史上和史前时期最强大、最持久的沿流的破坏力。

The drift toward the abolition of most case distinctions and the correlative drift toward position as an all-important grammatical method are accompanied, in a sense dominated, by the last of the three major drifts that I have referred to. This is the drift toward the invariable word. In analyzing the "whom" sentence I pointed out that the rhetorical emphasis natural to an interrogative pronoun lost something by its form variability (*who, whose, whom*). This striving for a simple, unnuance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idea and word, as invariable as may be, is very strong in English. It accounts for a number of tendencies which at first sight seem unconnected. Certain well-established forms, like the present third person singular-*s* of *works* or the plural-*s* of *books* , have resisted the drift to invariable words, possibly because they symbolize certain stronger form cravings that we do not yet fully understand.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derivations that get away sufficiently from the concrete notion of the radical word to exist as independent conceptual centers are not affected by this elusive drift. As soon as the derivation runs danger of being felt as a mere nuancing of, a finicky play on, the primary concept, it tends to be absorbed by the radical word, to disappear as such. English words crave spaces between them, they do not like to huddle in clusters of slightly divergent centers of meaning, each edging a little away from the rest. *Goodness* , a noun of quality, almost a noun of relation, that takes its cue from the concrete idea of "good" without necessarily predicating that quality (e.g., *I do not think much of his goodness*) is sufficiently spaced from *good* itself not to need fear absorption. Similarly, *unable* can hold its own against *able* because it destroys the latter's sphere of influence; *unable* is psychologically as distinct from *able* as is *blundering* or *stupid.* It is different with adverbs in-*ly*. These lean too heavily on their adjectives to have the kind of vitality that English demands of its words. *Do it quickly!* drags psychologically. The nuance expressed by *quickly* is too close to that

of *quick* , their circles of concreteness are too nearly the same, for the two words to feel comfortable together. The adverbs in-*ly* are likely to go to the wall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for this very reason and in face of their obvious usefulness. Another instance of the sacrifice of highly useful forms to this impatience of nuancing is the group *whence, whither, hence, hither, thence, thither* . They could not persist in live usage because they impinged too solidly upon the circles of meaning represented by the words *where, here* and *there* . In saying *whither* we feel too keenly that we repeat all of *where.* That we add to *where* an important nuance of direction irritates rather than satisfies. We prefer to merge the static and the directive (*Where do you live?* like *Where are you going?*) or, if need be, to overdo a little the concept of direction (*Where are you running to?*).

废除大多数变格区别的沿流，以及相应的把位置作为最重要的语法手段的沿流，是有第三个前文提及的主要沿流相伴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最后一个沿流主导着前面两个沿流。这就是趋向无变化词的沿流。在分析含whom的例句时，我曾指出，疑问代词自然具有的修辞力度，由于其形式的变化（比如who、whose和whom）而有所减损。这种对观念和词之间简单纯粹的对应的追求——能不变就不变——在英语中非常执著。它能够解释几种乍看起来互不相关的趋势。某些根基稳固的形式，比如works中的第三人称单数-s或者books中的复数-s，抵抗住了趋向不变的词的沿流，可能是因为它们象征着某些更强烈的对形式的渴求，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充分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派生词充分脱离根本词的具体概念，成为独立的概念核心后，就不会受到这一难以捉摸的沿流的影响了。而派生词一旦落入被人觉得只是基本概念上的细枝末节的险境，或者说只是在基本概念上玩点小花样，就容易被根本词吸收而消失，不再成其为派生词了。英语词渴望彼此之间保持距离，它们不喜欢挤成一簇簇的只有细微差别的意义核心，彼此间只有狭窄的缝隙。比如，作为一个表示品质的名词，goodness也差不多算是一个表示关系的名词，它从good这个具体观念

中引申出来，但是不一定陈述这一品质（比如I donot think much of his goodness我对他的善意不抱太大希望），它与good之间就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不必害怕被吸收。同样，unable可以独立于able之外，因为它打破了后者的势力范围；在心理上，unable之不同于able，就像blundering或stupid不同于able一样。带-ly的副词就不是这样了。它们太依赖各自的形容词，不具备英语要求它的词所应具有的那种活力。比如，Do it quickly!快点做！在心理上有些拖拉，quickly表达的细微意义和quick太接近，它们的具体性的幅度也太一致，因此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会感到别扭。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带-ly的副词很可能因为这个原因碰壁，纵然它们分明是有用的。因为不耐烦细微差异而牺牲非常有用的形式还有一组例子，即whence、whither、hence、hither、thence和thither。这一组词无法在使用中存活下来，因为它们过度侵犯了where、here和there等词所代表的意义范围。在说whither时，我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是在重复where的一切。通过whither我们固然为where添加了一个指示方向的重要色彩，但这不仅没有令人满意，反倒叫人厌烦。我们更喜欢把静态的和方向性的表达合起来（Where do you live?你住哪儿？跟Where are you going?你去哪儿？一样），或者，如有需要，也喜欢稍微强调方向的概念（Where are you running to?你要跑去哪儿？）

Now it is highly symptomatic of the nature of the drift away from word clusters that we do not object to nuances as such, we object to having the nuances formally earmarked for us. As a matter of fact our vocabulary is rich in near-synonyms and in groups of words that are psychologically near relatives, but these near-synonyms and these groups do not hang together by reason of etymology. We are satisfied with *believe* and *credible* just because they keep aloof from each other. *Good* and *well* go better together than *quick* and *quickly* . The English vocabulary is a rich medley because each English word wants its own castle. Has English long been peculiarly receptive to foreign words because it craves the

staking out of as many word areas as possible, or, conversely, has the mechanical imposition of a flood of French and Latin loan-words, unrooted in our earlier tradition, so dulled our feeling for the possibilities of our native resources that we are allowing these to shrink by default? I suspect that both propositions are true. Each feeds on the other. I do not think it likely, however, that the borrowings in English have been as mechanical and external a process as they are generally represented to have been. 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the English drift as early as the period following the Norman Conquest that welcomed the new words. They were a compensation for something that was weakening within.

我们并不反对词义上的细微差别本身，我们反对的是在形式上把这些细微差别标记出来，这是规避词簇这一沿流的高度标志性的特质。其实，英语词汇在相近的同义词和心理上彼此接近的词群方面是很丰富的，但是这些相近的同义词和词群不会因词源而纠缠在一起。我们接受believe和credible恰是因为它们彼此疏离。 [9_27] Good和well也比quick和quickly更合得来。英语的词汇是一个丰富的混合体，因为每个英语词都想拥有自己的城堡。长期以来，英语都特别善于吸收外来词，这是因为它总是渴求在尽可能多的词域上划出界标呢，还是反过来说，是因为一大批法语和拉丁语外来词（它们在早期传统中并未生根）被机械地强加于英语，使我们对母语资源的可能性失去敏感，任凭它们因不被使用而萎缩呢？我以为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没错，它们互为依赖。但是，我不认为英语对外来词的借用是像一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是一个机械的、外在的过程。早在诺曼征服之后，英语的沿流就发生了点什么，愿意欢迎新词。新词补充了英语内部正在削弱的什么东西。

[8_1].In so far as they do not fall out of the normal speech group by reason of a marked speech defect or because they are isolated foreigners that have acquired the language late in life.

[8_2].Observe that we are speaking of an individual's speech as a whole.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isolating some particular peculiarity of pronunciation or usage and noting its resemblance to or identity with a feature in another dialect.

[8_3].It is doubtful if we have the right to speak of linguistic uniformity even during the predominance of the Koine. It is hardly conceivable that when the various groups of non-Attic Greeks took on the Koine they did not at once tinge it with dialectic peculiarities induced by their previous speech habits.

[8_4].The Zaconic dialect of Lacedaemon is the sole exception. It is not derived from the Koine, but stems directly from the Doric dialect of Sparta.

[8_5].Though indications are not lacking of what these remoter kin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may be. This is disputed ground, however, and hardly fit subject for a purely general study of speech.

[8_6]."Dialect" in contrast to an accepted literary norm is a use of the term that we are not considering.

[8_7].Spoken in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region of the Pyrenees.

[8_8].Or rather apprehended, for we do not, in sober fact, entirely understand it as yet.

[8_9].Not ultimately random, of course, only relatively so.

[8_10].In relative clauses too we tend to avoid the objective form of "who." Instead of "The man whom I saw" we are likely to say "The man that I saw" or "The man I saw."

[8_11]."Its" was at one time as impertinent a departure as the "who" of "Who did you see?" It forced itself into English because the old cleavage between masculine, feminine, and neuter was being slowly and powerfully supplemented by a new one between thing-class and animate-class. The latter classification proved too vital to allow usage to couple males and things ("his") as against females ("her"). The form "its" had to be created on the analogy of words like "man's," to satisfy the growing form feeling. The drift was strong enough to sanction a grammatical blunder.

[8_12].Psychoanalysts will recognize the mechanism. The mechanisms of "repression of impulse" and of its symptomatic symbolization can be illustrated in the

most unexpected corners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psychology. A more general psychology than Freud's will eventually prove them to be as applicable to the groping for abstract form, the logical or esthetic ordering of experience, as to the life of the fundamental instincts.

[8_13].Note that it is different with *whose* . This has not the support of analogous possessive forms in its own functional group, but the analogical power of the great body of possessives of nouns (man's, boy's) as well as of certain personal pronouns (his, its; as predicated possessive also hers, yours, theirs) is sufficient to give it vitality.

[8_14].Aside from certain idiomatic usages, as when *You saw whom?* is equivalent to *You saw so and so and that so and so is who* ? In such sentences whom is pronounced high and lingeringly to emphasize the fact that the person just referred to by the listener is not known or recognized.

[8_15].Students of language cannot be entirely normal in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heir own speech. Perhaps it would be better to say "naïve" than "normal."

[8_16].It is probably this variability of value in the significant compounds of a general linguistic drift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rise of dialectic variations. Each dialect continues the general drift of the common parent, but has not been able to hold fast to constant values for each component of the drift. Deviations as to the drift itself, at first slight, later cumulative, are therefore unavoidable.

[8_17].Most sentences beginning with interrogative *whom* are likely to be followed by *did* or *does* , *do* . Yet not all.

[8_18].Better, indeed, than in our oldest Latin and Greek records.The old Indo-Iranian languages alone (Sanskrit, Avestan) show an equally or more archaic status of the Indo-European parent tongue as regards case forms.

[8_19].Should *its* eventually drop out, it will have had a curious history. It will have played the rôle of a stop-gap between *his* in its non-personal use (see footnote 11, page 167) and the later analytic of *it* . Transcriber's Note: This footnote has been renumbered as Footnote 132.

[8_20].Except in so far as that has absorbed other functions than such as originally belonged to it. It was only a nominative-accusative neuter to begin with.

[8_21].Aside from the interrogative: am I? is he? Emphasis counts for something. There is a strong tendency for the old "objective" forms to bear a stronger stress than the "subjective" forms. This is why the stress in locutions like He didn't go, did he? and isn't he? is thrown back on the verb; it is not a matter of logical emphasis.

[8_22].They: them as an inanimate group may be looked upon as a kind of borrowing from the animate, to which, in feeling, it more properly belongs.

[8_23].See page 155.

[9_1].只要他们不是因为某种明显的言语缺陷，或者因为是年纪大了才学会这一语言的单个的外国人，而被排除在正常言语群体之外。

[9_2].注意，我们讲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个人言语，而不是将某个具体发音或者用法上的独特性分离出来，看它与另一种方言的某个特征是否相似或雷同。

[9_3].即使是共同语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能不能说当时存在语言统一也是存有疑问的。很难想象，非阿提卡的各希腊族群在接受共同语的时候，不会马上令其沾染上他们之前言语习惯所招致的方言特色。

[9_4].译者注：亚历山大大帝是马其顿人的国王，曾经横扫希腊，打败大流士，开疆拓土，成就了历史上所说的“马其顿征服”。

[9_5].拉栖第梦人的拉哥尼亚方言是唯一的例外。它不是从共同语派生出来的，而是直接来自斯巴达的多利斯方言。

[9_6].当然，这些印欧语言的远亲是什么，我们并非一无所知。不过这是个存有争议的领域，不太适合做纯粹通论性质的言语研究的课题。

[9_7].与广为接受的文学规范对立的“方言”——这一用法我们在这里不予考虑。

[9_8].通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地区。

[9_9].或者不如说是“领会”，因为事实上，我们对其尚未完全理解。

[9_10].当然，最终并非随机，只是相对如此而已。

[9_11].译者注：who是主格，whom是宾格，按照传统的严格语法规定，此处应该用宾格whom。

[9_12].在关系从句中，我们也倾向于避免使用who的宾格形式。相比The man whom I saw，我们更有可能说The man that I saw或者The man I saw。

[9_13].Its一度被视为一种粗鲁的僭越，跟Who did you see?中的who一样。它挤进英语，是因为当其时在阳性、阴性和中性的古老差别之外，无生命类和有生命类的新差别正在缓慢而有力地补充进来。这后一种分类太过强大，它无法容忍将阳性和无生命物合并（用his表达）以别于阴性（her）的用法。于是不得不依据man’s这样的表达创造出its这一形式，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形式感觉。这一沿流已经强大到足以批准一个语法错误。

[9_14].心理分析家们能辨认出这种机制。“冲动压抑”及其诊断特征的机制能在个人和群体心理中最出人意料的角落找到例证。将来会有一个比弗洛伊德学派更普适的心理学最终证明，这类机制不仅适用于生命的基础本能，而且适用于人类对抽象形式的摸索，以及对经验的逻辑或审美排序。

[9_15].注意它不同于whose。whose一词在其功能群组中没有类似的属格形式的支持，但是大量的名词属格（man’s，boy’s）以及某些人称代词（his，its；以及扮演谓语的所有格的hers，yours，theirs）的类推势力足以赋予它活力。

[9_16].除了某些约定俗成的用法，如You saw whom?等同于You saw so and so and that so and so is who?时。在这类句子中，whom一词被高调且延长地说出，以强调[问话人]并不知道或者认识听话人刚才提到的人。

[9_17].语言学者对自己的言语不可能持有完全正常的态度。或许，更合适的说法是“天真”而不是“正常”。

[9_18].或许，正是因为语言总沿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赋值上的变化，才有了方言变异的兴起。每种方言继续着共同母语的总沿流，但是却未能保持每个沿流成分的固定值。对总沿流自身而言，偏离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开始比较轻微，渐渐积小成大。

[9_19].大多数以疑问词whom开头的句子后面都可能跟着did或者does和do。可是并不尽然。

[9_20].说实在的，比在最古老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文献里保存得还要好。就格形式而言，只有古印度-伊朗语族（梵语和阿维斯陀语）和它一样接近印欧祖语，或者比它更古老。

[9_21].译者注：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thou和thee分别是“你”的主格和宾格，ye和you分别是“你们”的主格和宾格。

[9_22].假如its最终被淘汰，它也算经历了一段传奇的历史。它扮演了填补空缺的角色，上承非人称用法的his（见167页的脚注11 ），下启分析性的of it。

[9_23].除非that在它原本拥有的功能之外又吸收了其他功能。它一开始只是一个中性的主格-宾格。

[9_24].除了疑问形式am I?（是我吗？），is he?（是他吗？）。重音也有影响。有一种很强的趋势让古老的“宾格”形式比“主格”形式承受更强的重音。正因为如此，He didn't go，did he?和isn't he?等说法中的重音被扔回到动词上；这不是一个逻辑强调的问题。

[9_25].They: them用作无生命代词时，可被视为向有生命[代词]的一种借用，在感情上它们更应属于后一类。

[9_26].见155页。

[9_27].译者注：believe（相信）来源于英语本身，credible（可信的）来源于拉丁语。

Chapter 8 Language as a Historical Product: Phonetic Law

第八章　作为历史产物的语言：语音规律

I have preferred to take up in some detail the analysis of our hesitation in using a locution like “Whom did you see?” and to point to some of the English drifts, particular and general, that are implied by this hesitation than to discuss linguistic change in the abstract. What is true of the particular idiom that we started with is true of everything else in language. Nothing is perfectly static. Every word, every grammatical element, every locution, every sound and accent is a slowly changing configuration, molded by the invisible and impersonal drift that is the life of language. The evidence is overwhelming that this drift has a certain consistent direction. Its speed varies enormously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that 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define. We have already seen that Lithuanian is to—day nearer its Indo—European prototype than was the hypothetical Germanic mother—tongue five hundred or a thousand years before Christ. German has moved more slowly than English; in some respects it stands roughly midway between English and Anglo-saxon, in others it has of course diverged from the Anglo-saxon line. When I pointed out in the preceding chapter that dialects formed because a language broken up into local segments could not move along the same drift in all of these segments, I meant of course that it could not move along identically the same drift. The general drift of a language has its depths. At the surface the current is relatively fast. In certain features dialects drift apart rapidly. By that very fact these features betray themselves as less fundamental to the genius of the language than the more slowly modifiable features in which the dialects keep together long after

they have grown to be mutually alien forms of speech. But this is not all. The momentum of the more fundamental, the pre-dialectic, drift is often such that languages long disconnected will pass through the same or strikingly similar phases. In many such cases it is perfectly clear that there could have been no dialectic interinfluencing.

我在前文不愿对语言变化做泛泛之论，而宁愿比较详细地分析我们在使用Whom did you see?这类说法时所表现出的迟疑，并指出这种迟疑暗含了英语的一些特殊和普遍的沿流。不仅这句我们开启讨论的话有自己的沿流，语言中的其他一切也都有各自的沿流。没有什么是完全静止的。每一个词、每一种语法成分、每一句话以及每一个语音和声调，都是一个缓慢变化的结构，被看不见的且无关个人意志的沿流所模铸，这恰是语言的生命。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样的沿流具有某种恒定的方向。它的速度因种种有时不易界定的情况而有极大的变化。比如，我们已经注意到，今天的立陶宛语比我们所构拟的公元前500年或1000年的日耳曼母语更接近印欧语的原型。再如，德语变动的速度比英语慢；在某些方面，它大致介于英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之间；当然，在另外一些方面，它已经偏离了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路线。在上一章我曾经指出，方言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一种分裂成诸多区域性片段的语言无法在其所有片段上都沿着同一个沿流发展下去；我的意思当然是说语言无法沿着完全相同的一种沿流流动。一种语言的总沿流有它的深度。表层流动相对较快。在某些特征上，方言会迅速地分流开来。正是这一点揭示了这些特征对语言的本质而言并非那么根本，比不上那些变化较慢的特征，那些是在方言已然发展成互不相识的言语形式之后还能长久地共同维系的。但是，不仅如此。更基本的、早于方言产生的沿流，其势头之猛，常常使早已失联的语言经历同样的或惊人地相似的阶段。在很多此类情况里，方言之间很显然并不存在交互影响。

These parallelisms in drift may operate in the phonetic as well as in the morphological sphere, or they may affect both at the same time. Here is an interesting example. The English type of plural represented by *foot: feet* , *mouse: mice* is strictly parallel to the German *Fuss: Füsse, Maus: Mäuse.* One would be inclined to surmise that these dialectic forms go back to old Germanic or West-Germanic alternations of the same type. But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shows conclusively that there could have been no plurals of this type in primitive Germanic. There is no trace of such vocalic mutation ("umlaut") in Gothic, our most archaic Germanic language. More significant still is the fact that it does not appear in our oldest Old High German texts and begins to develop only at the very end of the Old High German period (circa 1000 A.D.). In the Middle High German period the mutation was carried through in all dialects. The typical Old High German forms are singular*fuoss* , plural *fuossi* ; [9_1] singular*mus* , plural*musi.* The corresponding Middle High German forms are *fuoss, füesse; mus, müse* . Modern German *Fuss: Füsse, Maus: Mäuse* are the regular developments of these medieval forms. Turning to Anglo-saxon, we find that our modern English forms correspond to*fot, fet; mus, mys.* [9_2] These forms are already in use in the earliest English monuments that we possess, dating from the eighth century, and thus antedate the Middle High German forms by three hundred years or more. In other words, on this particular point it took German at least three hundred years to catch up with a phonetic—morphological drift [9_3] that had long been under way in English. The mere fact that the affected vowels of related words (Old High German *uo* , Anglo-saxon *o*) are not always the same shows that the affection took place at different periods in German and English. [9_4] There was evidently some general tendency or group of tendencies at work in early Germanic, long before English and German had developed as such, that eventually drove both of these dialects along closely

parallel paths.

沿流上的这种平行现象既可以发生在形态层面，也可以发生在语音层面，还可以同时影响二者。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foot: feet（“脚”的单数和复数）和mouse: mice（“老鼠”的单数和复数）所代表的英语复数类型与德语的*Fuss: Füsse*（“脚”的单数和复数）和*Maus: Mäuse*（“老鼠”的单数和复数）完全平行。有人可能会猜测这些方言形式源自同一类型的古日耳曼语或西日耳曼语的变形。但是文献证据确凿地证明，在原始日耳曼语中不可能有这种复数形式。在最古老的日耳曼语哥特语里，未见这种元音变化（umlaut）的痕迹。更重要的是，它也并未出现在最古老的古高地德语文本中，而是迟至古高地德语时代最末期（大约公元1000年）才开始发展。在中古高地德语时代，这种变化在所有的方言中均被贯彻。古高地德语的典型单复数形式是：单数*fuoss*，复数*fuossi* [10_1]；单数*mus*，复数*musi*。与之对应的中古高地德语的单复数形式是：单数*fuoss*，复数*füesse*；单数*mus*，复数*müse*。现代德语的*Fuss: Füsse*和*Maus: Mäuse*是从上述中古形式规范地演化而来的。转向盎格鲁-撒克逊语，我们发现，现代英语的形式foot: feet和mouse: mice与古代的*fot: fet*和*mus:mys* [10_2]相对应。这些形式在现存最早的英语碑文中就已被使用，而那些碑文可以上溯至公元8世纪，因此比中古高地德语的形式早了300年甚至更久。换句话说，在这一点上，德语至少用了300年才赶上一种在英语中行进已久的语音-形态沿流。[10_3] 在相关的词中，被改变的元音并不总是相同的（古高地德语中是uo，盎格鲁-撒克逊语中是o），这一事实本身即说明该变化在德语和英语中发生于不同时期。[10_4] 很显然，早在英语和德语演化为英语和德语之前，早期日耳曼语中就已存在某个或某组总的趋势，迫使这两个方言最终沿着紧密平行的路径前进。

How did such strikingly individual alternations as*fot: fet, fuoss: füesse* develop? We have now reached what is probably the most

central problem in linguistic history, gradual phonetic change. “Phonetic laws” make up a large and fundamental share of the subject—matter of linguistics. Their influence reaches far beyond the proper sphere of phonetics and invades that of morphology, as we shall see. A drift that begins as a slight phonetic readjustment or unsettlement may in the course of millennia bring about the most profound structural changes. The mere fact, for instance,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tendency to throw the stress automatically on the first syllable of a word may eventually change the fundamental type of the language, reducing its final syllables to zero and driving it to the use of more and more analytical or symbolic [9_5] methods. The English phonetic laws involved in the rise of the words *foot, feet, mouse* and *mice* from their early West-Germanic prototypes *fot, foti, mus, musi* [9_6] may be briefly summarized as follows:

像从*fot* 到*fet* 和从*fuoss* 到*füesse* 这样非常独特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就触及到也许是语言历史上最核心的问题——语音的渐变。“语音规律”在语言学研究课题中占了很大的而且是根本的一部分。它们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语音学本身的范围，而侵入形态学疆界，我们下面就会看到。一个起初只是语音上的细微调整或摆动的沿流，却可能在数千年的历程中带来最深远的结构性变化。例如，如果某语言中有一个渐趋明朗的趋势将单词重音自动地放到第一个音节上，仅此一点就可能最终改变该语言的根本类型，将其末尾音节压缩为零，并驱使它越来越多地使用分析性或者象征性 [10_5] 方法。从早先的西日耳曼语原型*fot* 、*foti* 、*mus* 和*musi* [10_6] 生发出foot、feet、mouse和mice，所动用的英语语音规律可简单概括如下：

1 . In *foti* “feet” the long *o* was colored by the following *i* to long *ö* , that is, *o* kept its lip—rounded quality and its middle height of tongue position but anticipated the front tongue position of the *i;*

ö is the resulting compromise. This assimilatory change was regular, i.e., every accented long *o* followed by an *i* in the following syllable automatically developed to long *ö* ; hence *tothi* “teeth” became*töthi* , *fodian* “to feed” became *födian* . At first there is no doubt the alternation between *o* and *ö* was not felt as intrinsically significant. It could only have been an unconscious mechanical adjustment such as may be observed in the speech of many to—day who modify the “oo” sound of words like *you* and *few* in the direction of German *ü* without, however, actually departing far enough from the “oo” vowel to prevent their acceptance of *who* and *you* as satisfactory rhyming words. Later on the quality of the *ö* vowel must have departed widely enough from that of *o* to enable *ö* to rise in consciousness [9_7] as a neatly distinct vowel. As soon as this happened, the expression of plurality in*föti, töthi* , and analogous words became symbolic and fusional, not merely fusional.

1．在*foti* （“脚”的复数）一词中，长音o受到后面的i的影响，变成了长音ö，也就是说o保留了它的圆唇属性和中高舌位，但是它也在为舌位靠前的i提前摆位，ö是这一折中的结果。这种同化是规则的，即每个带重音的长音o，如果其后的音节中有一个i，都会自动演化成长音ö，因此*tothi* （“牙齿”的复数）变成*töthi* ，而*fodian* “喂食”变成了*födian* 。毫无疑问，一开始人们不会觉得o和ö之间的这种变化有什么本质上的重要性。它只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机械性调整，就像我们今天在很多人的言语中可以观察到的一种情形：他们把you和few等词中的oo音变得趋向德语中的*ü* ，但是又并未过于远离oo元音，不至于让人无法接受who和you是很好的押韵词。后来元音ö在性质上一定远离了o，距离之大足以让人意识到 [10_7]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元音。这事一经发生，*föti* 和*töthi* 以及与之同类的词的复数表达就兼具了象征性和融合性，而不止是融合性了。

2．In *musi* “mice” the long *u* was colored by the following *i* to long *ü* . This change also was regular; *lusi* “lice” became*lüsi, kui* “cows” became küi (later simplified to *kü* ; still preserved as *ki* —in kine), *fulian* “to make foul” became*fülian* (still preserved as—*file* in *defile*). The psychology of this phonetic law is entirely analogous to that of 1.

2．在*musi* （“老鼠”的复数）一词中，长音u受到后面的i的影响，变成了长音ü。这一变化也是规则的：*lusi* （“虱子”的复数）变成*lüsi* ，*kui* （“母牛”的复数）变成*küi* （后来简化为*kü* ；在现在的kine雌牛中仍然保留为*ki-* ），*fulian* “弄脏”变成*fülian* （在现在的defile污损中仍然保留为-file）。这条语音规律的心理机制与1完全同类。

3．The old drift toward reducing final syllables, a rhythmic consequence of the strong Germanic stress on the first syllable, now manifested itself. The final—*i* , originally an important functional element, had long lost a great share of its value, transferred as that was to the symbolic vowel change *(o: ö)*. It had little power of resistance, therefore, to the drift. It became dulled to a colorless—*e; föti* became*föte* .

3．这时，一种趋于减弱词尾音节的古老沿流出现了，它是日耳曼语把强重音置于第一个音节在节奏上产生的后果。词尾的-i原本是重要的功能成分，此时早已丧失了一大部分价值，而转移给了从o到ö的象征性的元音变化。因此，它对这个沿流几乎无招架之力。它被钝化为一个苍白的-e，*föti* 也就变成了*föte* 。

4．The weak—*e* finally disappeared. Probably the forms *föte*

and *föt* long coexisted as prosodic variants according to the rhythmic requirements of the sentence, very much as*Füsse* and*Füss'* now coexist in German.

4．这个虚弱的-e最终也消失了。也许，*föte* 和*föt* 这两个形式，作为韵律上的变体，遵照句子的节奏要求共存了很久，很像今天德语中*Füsse* 和*Füss'* 的共存。

5．The *ö* of *föt* became “unrounded” to long *e* (our present a of fade). The alternation of*fot: foti* , transitionally *fot: föti, föte, föt,* now appears as *fot: fet.* Analogously, *töth* appears as *teth, födian* as*fedian,* later *fedan.* The new long *e* —vowel “fell together” with the older *e* —vowel already existent (e.g., *her* “here,” *he* “he”). Henceforward the two are merged and their later history is in common. Thus our present *he* has the same vowel as *feet, teeth,* and *feed.* In other words, the old sound pattern *o, e,* after an interim of *o, ö, e,* reappeared as *o, e,* except that now the *e* had greater “weight” than before.

5．*föt* 的ö经“非圆唇化”，变成了长音e（即我们今天fade中的a）。*fot: foti* 的变化，经过*fot: föti, föte, föt* ，现在呈现为*fot: fet* 。类似地，*töth* 变为*teth* ，*födian* 变为*fedian* ，后来又变为*fedan* 。这个新的长e元音与已经存在的较古老的e元音（例如*her* “here"这里、*he* “he"他）“结合”了。从此以后，两者合并，之后就拥有了共同的历史。于是，我们今天的he就拥有了与feet、teeth以及feed相同的元音。换句话说，古老的o、e语音格局，在经历了o、ö、e的过渡状态后，重新表现为o、e格局，只是现在e较之前占有了更大的“权重”。

6 . *Fot: fet, mus: müs* (written *mys*) are the typical forms of Anglo-saxon literature. At the very end of the Anglo-saxon period, say about 1050 to 1100 A.D., the *ü,* whether long or short, became unrounded to *i* . *Mys* was then pronounced *mis* with long*i* (rhyming with present *niece*). The change is analogous to 5, but takes place several centuries later.

6 . *Fot: fet* 与*mus: müs* （写作*mys* ）是盎格鲁-撒克逊文献中的典型形式。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最末期，大约公元1050至1100年，ü，无论长短，都非圆唇化为i。彼时，*mys* 被读作带长i的*mis* （与今天的niece侄女押韵）。这一变化与5类似，但是晚了数百年。

7 . In Chaucer's day (circa 1350—1400 A.D.) the forms were still *fot: fet* (written *foot, feet*) and *mus: mis* (written very variably, but *mous, myse* are typical). About 1500 all the long*i* —vowels, whether original (as in *write, ride, wine*) or unrounded from Anglo-saxon *ü* (as in *hide, bride, mice, defile*), became diphthongized to*ei* (i.e., *e* of *met* + short *i*). Shakespeare pronounced *mice* as *meis* (almost the same as the present Cockney pronunciation of *mace*).

7 . 在乔叟时代（大约公元1350至1400年），这些形式依然作*fot: fet* （写作*foot* 和*feet* ）和*mus: mis* （有多种写法，但是典型的是*mous* 和*myse* ）。在公元1500年前后，所有的长i元音，无论是旧有的（如write写、ride骑和wine酒中的i）还是从盎格鲁-撒克逊语的ü经过非圆唇变化而来的（如hide藏、bride新娘、mice和defile中的i），都变成了双元音ei（即met中的e + 短i）。所以莎士比亚会把*mice* 读作*meis* （和今天伦敦东区方言中mace权杖的读法几乎一样）。

8．About the same time the long *u* —vowels were diphthongized to*ou* (i.e., *o* of present Scotch *not* + *u* of *full*). The Chaucerian*mus: mis* now appears as the Shakespearean*mous: meis.* This change may have manifested itself somewhat later than 7; all English dialects have diphthongized old Germanic long*i* ，[9_8] but the long undiphthongized*u* is still preserved in Lowland Scotch, in which *house* and *mouse* rhyme with our *loose* . 7 and 8 are analogous developments, as were 5 and 6; 8 apparently lags behind 7 as 6, centuries earlier, lagged behind 7.

8．大约在同一时期，长u元音变成了双元音ou（即今天苏格兰方言*not* 中的o + full中的u）。乔叟时代的*mus: mis* 此时变成了莎士比亚时代的*mous: meis* 。这一变化可能比7出现得稍晚；在所有的英语方言里，古日耳曼语的长i都变成了双元音 [10_8] ，但是低地苏格兰方言仍然保留了未变成双元音的长u，他们的*house* （房子）和*mouse* 与我们的loose（松的）押韵。7和8是同类的变化，5和6也是如此；8很显然落在7后面，正如数百年前6落在7后面。

9．Some time before 1550 the long *e* of *fet* (written *feet*) took the position that had been vacated by the old long *i* , now diphthongized (see 7), i.e., e took the higher tongue position of*i* . Our (and Shakespeare's) “long *e* ” is, then, phonetically the same as the old long*i* . *Feet* now rhymed with the old *write* and the present *beat* .

9．公元1550年之前的某个时段，*fet* （写作*feet* ）的长e占据了古老的长i腾出的位置（i此时已变成双元音，详见7），即e占据了i的较高舌位。因此，我们的（也是莎士比亚的）“长e”在发音上和古老的长i一样。此时的*feet* 与古代的*write* “写”以及今天的beat（击打）都

押韵。

10 .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long *o* of *fot* (written *foot*) took the position that had been vacated by the old long *u* , now diphthongized (see 8), i.e., *o* took the higher tongue position of *u* . Our (and Shakespeare's) “long *oo* ” is phonetically the same as the old long *u* . *Foot* now rhymed with the old *out* and the present *boot* . To summarize 7 to 10, Shakespeare pronounced *meis, mous, fit, fut,* of which *meis* and *mous* would affect our ears as a rather “mincing” rendering of our present *mice* and *mouse, fit* would sound practically identical with (but probably a bit more “drawled” than) our present *feet,* while *foot,* rhyming with *boot,* would now be set down as “broad Scotch.”

10．大约在同一时期，*fot* （写作*foot* ）的长o占据了古老的长u腾出的位置（u此时已变成双元音，详见8），即o占据了u的较高舌位。我们的（也是莎士比亚的）“长oo”在发音上和古老的长u一样。此时的*foot* 与古代的*out* “外面的”以及今天的boot“靴子”都押韵。从7到10可概括如下：莎士比亚说的是*meis* 、*mous* 、*fit* 和*fut* ，其中*meis* 和*mous* 听起来会有点像“装腔作势地”读今天的mice和mouse；*fit* 和今天的feet几乎一样（可能稍微“拽”一点）；而*foot* 与*boot* 押韵，现在会被认为是“土气的苏格兰腔”。

11 . Gradually the first vowel of the diphthong in *mice* (see 7) was retracted and lowered in position. The resulting diphthong now varies in different English dialects, but*ai* (i.e., *a* of*father* , but shorter, + short *i*) may be taken as a fairly accurate rendering of its average quality. [9_9] What we now call the “long *i* ” (of words like *ride, bite, mice*) is, of course, an *ai* —diphthong. *Mice* is now

pronounced *mais.*

11．*mice* 的双元音中的第一个元音（详见7）在位置上逐渐退后并降低。由此而产生的双元音现今在英语方言中各不相同，但是ai（即father中的a，但是短一些，＋短i）可被视为较精确地表达了它的平均音质。[10_9] 我们今天称为“长i”的音（如ride骑、bite咬和mice等词）当然是个ai双元音。*mice* 现在被读作*mais* 。

12．Analogously to 11, the first vowel of the diphthong in *mouse* (see 8) was unrounded and lowered in position. The resulting diphthong may be phonetically rendered *au* , though it too varies considerably according to dialect. *Mouse* , then, is now pronounced *maus.*

12．与11类似，*mouse* 的双元音中的第一个元音（详见8）变成了非圆唇音，并降低了位置。因此而产生的双元音在发音上可说是变成了au，尽管它在不同方言中也是各不相同。所以*mouse* 现在被读作*maus* 。

13．The vowel of *foot* (see 10) became “open” in quality and shorter in quantity, i.e., it fell together with the old short *u* —vowel of words like *full, wolf, wool.* This change has taken place in a number of words with an originally long *u* (Chaucerian long close *o*), such as *forsook, hook, book, look, rook, shook,* all of which formerly had the vowel of *boot.* The older vowel, however, is still preserved in most words of this class, such as *fool, moon, spool, stoop.* It is highly significant of the nature of the slow spread of a “phonetic law” that there is local vacillation at present in several

words. One hears *roof, soot,* and *hoop,* for instance, both with the "long" vowel of *boot* and the "short" of *foot.* It is impossible now, in other words, to state in a definitive manner what is the "phonetic law" that regulated the change of the older *foot* (rhyming with *boot*) to the present *foot.* We know that there is a strong drift towards the short, open vowel of *foot* , but whether or not all the old "long *oo* " words will eventually be affected we cannot presume to say. If they all, or practically all, are taken by the drift, phonetic law 13 will be as "regular," as sweeping, as most of the twelve that have preceded it. If not, it may eventually be possible, if past experience is a safe guide, to show that the modified words form a natural phonetic group, that is, that the "law" will have operated under certain definable limiting conditions, e.g., that all words ending in a voiceless consonant (such as *p, t, k, f*) were affected (e.g., *hoof, foot, look, roof*), but that all words ending in the *oo* —vowel or in a voiced consonant remained unaffected (e.g., *do, food, move, fool*). Whatever the upshot, we may be reasonably certain that when the "phonetic law" has run its course, the distribution of "long" and "short" vowels in the old oo-words will not seem quite as erratic as at the present transitional moment. [9_10] We learn, incidentally, the fundamental fact that phonetic laws do not work with spontaneous automatism, that they are simply a formula for a consummated drift that sets in at a psychologically exposed point and gradually worms its way through a gamut of phonetically analogous forms.

13．*foot* 的元音（详见10）在音质上变"开"了，在长度上变短了，即与古老的短u元音（如full满的、wolf狼和wool羊毛等词）合并了。这一变化发生在不少原来带有长u（乔叟时代的长而闭的o）的词里，如forsook（forsake"放弃"的过去式）、hook（鱼钩）、book（书）、look（看）、rook（欺骗）和shook（shake"摇晃"的过去式），这些词以前都带有boot中的元音。然而，先前的u元音仍然

保留在绝大多数这类词中，如fool（傻子）、moon（月亮）、spool（缠绕）和stoop（弯腰）。现代方言中几个词在发音上的摇摆不定对于揭示“语音规律”的缓慢扩展性是非常有意义的。例如，我们既可以听到带boot中的长元音的roof（屋顶）、soot（煤烟）和hoop（铁环），也可以听到带foot中的短元音的roof、soot和hoop。换句话说，现在无法确切地说清究竟是什么“语音规律”规约着古老的*foot*（与boot押韵）向当代的foot的转变。我们知道，有一种强有力的沿流趋向foot中短而开的元音，但是我们不能推定所有带古老的“长oo”的词最终都会或不会被影响。设若它们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被这一沿流裹挟，那么这第13条语音规律就将像前述十二条中的大多数一样“规则”，一样席卷一切。设若不是，那么最终也许可以证明——如果过去的经验能够提供可靠的指引的话——那些改变了发音的词在语音上自然地成为一组，即该“语音规律”是在某些可确定的限制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例如，所有以不带声的辅音（如p、t、k、f）结尾的词都被影响（如hoof、foot、look、roof），但是所有以*oo*元音结尾的词或者以带声的辅音结尾的词都未被影响（如do、food、move、fool）。无论结果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有理由相信，当这条“语音规律”走到尽头时，在含oo的古老词汇里，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分布就不会像现在这个过渡时期这样飘忽不定了。[10_10] 这里我们还顺便了解到一个根本事实，即语音规律并不是自发地起作用的，它们只是一个沿流完成后的公式，这个沿流发源于心理上某个暴露的点，然后钻进一系列类似的语音形式中。

It will be instructive to set down a table of form sequences, a kind of gross history of the words *foot, feet, mouse, mice* for the last 1500 years: [9_11]

下面列出一个形式顺序表，大致梳理一下foot、feet、mouse和mice等词在过去1500年的历史，应该不无裨益：[10_11]

I． *fot: foti; mus: musi* (West Germanic)

一、fot:foti;mus:musi（西日耳曼语）

II．/u＞ *fot: föti; mus: müsi*

二、fot:föti;mus:müsi

III． *fot: föte; mus: muse*

三、fot:föte;mus:müse

IV． *fot: föt; mus: müs*

四、fot:föt;mus:müs

V． *fot: fet; mus: müs* (Anglo-saxon)

五、fot:fet;mus:müs（盎格鲁-撒克逊语）

VI． *fot: fet; mus: mis* (Chaucer)

六、fot:fet;mus:mis（乔叟时代）

VII． *fot: fet; mous: meis*

七、fot:fet;mous:meis

VIII． *fut* (rhymes with *boot*): *fit; mous: meis* (Shakespeare)

八、fut（与boot押韵）：fit;mous;meis（莎士比亚时代）

IX． *fut: fit; maus: mais*

九、fut:fit;maus:mais

X． *fut* (rhymes with *put*): *fit; maus: mais* (English of 1900)

十、fut（与put押韵）：fit;maus:mais（1900年的英语）

It will not be necessary to list the phonetic laws that gradually differentiated the modern German equivalents of the original West Germanic forms from their English cognates. The following table gives a rough idea of the form sequences in German: [9_12]

至于是哪些语音规律使现代德语中与原来的西日耳曼语形式相对应的形式渐渐区别于它们在英语中的同源词，这里没有必要列举。德语中的形式序列从下表可见一斑：[10_12]

I．*fot: foti; mus: musi* (West Germanic)

一、fot:foti;mus:musi（西日耳曼语）

II．*foss:* [9_13] *fossi; mus: musi*

二、foss [10_13] :fossi;mus:musi

III．*fuoss: fuossi; mus: musi* (Old High German)

三、fuoss:fuossi;mus:musi（古高地德语）

IV．*fuoss: füessi; mus: müsi*

四、fuoss:füessi;mus:müsi

V．*fuoss: füesse; mus: müse* (Middle High German)

五、fuoss:füesse;mus:müse（中古高地德语）

VI．*fuoss: füesse; mus: müze* [9_14]

六、fuoss:füessi;mus:müze [10_14]

VII．*fuos: füese; mus: müze*

七、fuos:füese;mus:müze

VIII．*fuos: füese; mous: möüze*

八、fuos:füese;mous:möüze

IX．em＞fus: füse; mous: möüze(Luther)

九、fus:füse;mous:möüze（路德时代）

X．*fus: füse; maus: moize* (German of 1900)

十、fus:füse;mous:moize（1900年的德语）

We cannot even begin to ferret out and discuss all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hat are concealed behind these bland tables. Their general parallelism is obvious. Indeed we might say that to—day the English and German forms resemble each other more than does either set the West Germanic prototypes from which each is independently derived. Each table illustrates the tendency to reduction of unaccented syllables, the vocalic modification of the radical ele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ollowing vowel, the rise in tongue position of the long middle vowels (English *o* to *u, e* to*i;* German *o* to *uo* to *u, üe* to *ü*), the diphthongizing of the old high vowels (English*i* to*ei* to *ai* ; English and German *u* to *ou* to *au* ; German *ü* to *öü* to *oi*). These dialectic parallels cannot be accidental. They are rooted in a common, pre-dialectic drift.

我们甚至无从开始搜寻和讨论隐藏在这两个乏味的列表背后的所有心理问题。它们之间总体的平行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固然可以说今天英语和德语形式之间的相似程度大于其中任何一方与西日耳曼语原型的相似程度，尽管它们都是从这个原型独立演化而来的。两个列表都体现出以下趋势：无重音音节减弱，根本成分受到后续元音的影响而发生元音变化，长的中元音抬升舌位（英语中o变成u，e变成i；德语中o变成uo又变成u，üe变成ü），古老的高元音变成双元音（英语中i变成ei又变成ai，两种语言中u都变成ou又变成au；德语中ü变成öü又变成oi）。这些方言平行现象不可能是偶然的。它们都植根于一个共同的、早于方言的沿流。

Phonetic changes are “regular.” All but one (English table, X.), and that as yet uncompleted, of the particular phonetic laws represented in our tables affect all examples of the sound in question or, if the phonetic change is conditional, all examples of the same sound that are analogously circumstanced. [9_15] An

example of the first type of change is the passage in English of all old long*i* —vowels to diphthongal *ai* via*ei* . The passage could hardly have been sudden or automatic, but it was rapid enough to prevent an irregularity of development due to cross drifts. The second type of change is illustra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glo-saxon long *o* to long *e* , via *ö* ,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following *i*. In the first case we may say that *au* mechanically replaced long *u* , in the second that the old long *o* “split” into two sounds—long *o* , eventually *u* , and long *e* , eventually*i* . The former type of change did no violence to the old phonetic pattern, the formal distribution of sounds into groups; the latter type rearranged the pattern somewhat. If neither of the two sounds into which an old one “splits” is a new sound, it means that there has been a phonetic leveling, that two groups of words, each with a distinct sound or sound combination, have fallen together into one group. This kind of leveling is quite frequent in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In English, for instance, we have seen that all the old long *ü* —vowels, after they had become unrounded, we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mass of long*i* —vowels. This meant that the long*i* —vowel became a more heavily weighted point of the phonetic pattern than before. It is curious to observe how often languages have striven to drive originally distinct sounds into certain favorite positions, regardless of resulting confusions. [9_16] In Modern Greek, for instance, the vowel*i* is the historical resultant of no less than ten etymologically distinct vowels (long and short) and diphthongs of the classical speech of Athens. There is, then, good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re are general phonetic drifts toward particular sounds.

语音变化是“规则的”。除了一个例外（英语列表中的第十项）——且这个例外还尚未完成——我们列在表中的所有具体的语音规律都影响着相关语音的所有例子；或者，如果该语音变化是有条件的，

则影响着该语音处于同类条件下的所有例子。 [10_15] 第一类变化的一个实例是，英语中所有古老的长i元音都经过ei的过渡，变成了双元音ai。这一过程不大可能是突然的或者自发的，但是它的速度之快足以防止交叉沿流产生不规则变化。第二类变化从盎格鲁-撒克逊语的一个例子可见一斑：受紧随的*i* 的影响，长o经过ö的过渡变为长e。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au机械地取代了长u；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古老的长o“分裂”成两个音——长o（最终变成u）和长e（最终变成i）。前一种变化没有破坏原有的语音格局，即把语音按照形式进行归类；后一种变化则多少调整了这一格局。如果由某个旧音“分裂”而成的两个音都不是新音，就说明发生了语音上的拉平，即具有不同语音或语音组合的两组词已经合并为一组。这种拉平在语言的历史上并不罕见。例如，在英语中，我们发现所有古老的长ü元音，在非圆唇化后，与大量使用的长i元音都没有差别了。这意味着长i元音在语音格局中的权重较之前增加。奇怪的是，语言常常竞相把原本不同的语音驱赶到某几个偏爱的位置上，而无视因此产生的混乱。例如，在现代希腊语中，元音i是不下10个古雅典语中不同源的元音（有长有短）和双元音经历史演化的产物。总之，我们有很好的证据证明，语言中存在着趋向某些特定语音的普遍沿流。

More often the phonetic drift is of a more general character. It is not so much a movement toward a particular set of sounds as toward particular types of articulation. The vowels tend to become higher or lower, the diphthongs tend to coalesce into monophthongs, the voiceless consonants tend to become voiced, stops tend to become spirants. As a matter of fact, practically all the phonetic laws enumerated in the two tables are but specific instances of such far—reaching phonetic drifts. The raising of English long *o* to *u* and of long *e* to*i,* for instance, was part of a general tendency to raise the position of the long vowels, just as the change of *t* to*ss* in Old High German was part of a general tendency to make voiceless spirants of the old voiceless stopped consonants.

A single sound change, even if there is no phonetic leveling, generally threatens to upset the old phonetic pattern because it brings about a disharmony in the grouping of sounds. To reestablish the old pattern without going back on the drift the only possible method is to have the other sounds of the series shift in analogous fashion. If, for some reason or other, *p* becomes shifted to its voiced correspondent *b* , the old series *p, t, k* appears in the unsymmetrical form *b, t, k.* Such a series is, in phonetic effect, not the equivalent of the old series, however it may answer to it in etymology. The general phonetic pattern is impaired to that extent. But if *t* and *k* are also shifted to their voiced correspondents *d* and *g,* the old series is reestablish in a new form: *b, d, g.* The pattern as such is preserved, or restored. *Provided* that the new series *b, d, g* does not become confused with an old series *b, d, g* of distinct historical antecedents. If there is no such older series, the creation of a *b, d, g* series causes no difficulties. If there is, the old patterning of sounds can be kept intact only by shifting the old *b, d, g* sounds in some way. They may become aspirated to *bh, dh, gh* or spirantized or nasalized or they may develop any other peculiarity that keeps them intact as a series and serves to differentiate them from other series. And this sort of shifting about without loss of pattern, or with a minimum loss of it, is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tendency in the history of speech sounds. Phonetic leveling and “splitting” counteract it to some extent but, on the whole, it remains the central unconscious regulator of the course and speed of sound changes.

语音沿流往往更加具有一般性。与其说它趋向某组特定的发音，不如说它趋向某几类发音方式。比如，元音倾向于抬高或降低，双元音倾向于变成单元音，不带声的辅音倾向于变成带声的，塞音倾向于变成擦音。事实上，前面两个表格所列的几乎所有语音规律都只是这

些影响深远的语音沿流的具体体现。例如，英语中的长o升至u，长e升至i等变化，是长元音位置抬升这一总趋势的一部分，正如古高地德语中t到ss的变化是古代不带声的促音变成不带声的擦音这一总趋势的一部分。即使没有语音抹平现象，一个单独的语音变化往往也会搅乱旧的语音格局，因为它给语音分组带来了不和谐。为了重建旧格局，又不至于逆沿流而上，唯一的方法是让同一语音系列中的其他语音按照类似的方式移动。比如，如果出于某种原因，p移动了，变成与之对应的带声的b，那么旧的p、t和k系列就会变成不对称的b、t和k。这一新系列在语音效果上与旧系列不对等，尽管在词源上可能与之相应。总的语音格局就此受损。但是，如果t和k也移动了，变成与之对应的带声的d和g，那么旧系列就以新的形式得以重建：b、d和g。这样整个格局就保住了，或者说被恢复了。前提是这个新的b、d、g系列不会与具有不同历史渊源的某个旧的b、d、g系列相混淆。如果原本就没有这样一个旧系列，那么创造出一个b、d、g系列不会带来什么麻烦。但是如果有，那就只能以某种方式移动这旧有的b、d和g音来维护原来的语音格局了。它们可以变成送气的bh、dh和gh，或者变成擦音、鼻音，也可以发展出其他任何特点，只要能继续作为一个系列存在，并有别于其他系列。这种无损格局、或者只是微损格局的移动，很可能是语音历史上最重要的趋势。语音的抹平和“分裂”在一定程度上与之抗衡，但是总体而言，该趋势仍然是调节语音变化路线和速度的无意识的核心因素。

The desire to hold on to a pattern, the tendency to “correct” a disturbance by an elaborate chain of supplementary changes, often spread over centuries or even millennia—these psychic undercurrents of language are exceedingl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n terms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though there can be no denial of their historical reality. What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the unsettling of a phonetic pattern and what is the cumulative force that selects these or those particular variations of the individual on which to float the pattern readjustments we hardly know. Many linguistic

students have made the fatal error of thinking of sound change as a quasi-physiological instead of as a strictly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or they have tried to dispose of the problem by bandying such catchwords as “the tendency to increased ease of articulation” or “the cumulative result of faulty perception” (on the part of children, say, in learning to speak). These easy explanations will not do. “Ease of articulation” may enter in as a factor, but it is a rather subjective concept at best. Indians find hopelessly difficult sounds and sound combinations that are simple to us; one language encourages a phonetic drift that another does everything to fight. “Faulty perception” does not explain that impressive drift in speech sounds which I have insisted upon. It is much better to admit that we do not yet understand the primary cause or causes of the slow drift in phonetics, though we can frequently point to contributing factors. It is likely that we shall not advance seriously until we study the intuitional bases of speech. How can we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drift that frays and reforms phonetic patterns when we have never thought of studying sound patterning as such and the “weights” and psychic relations of the single elements (the individual sounds) in these patterns?

坚守格局的意愿，即通过一串繁复的补充变化来“纠正”某次扰乱的趋势，经常跨越数百年甚至数千年——语言的这些心理潜流从个人心理的角度是极难理解的，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它们的历史真实性。扰乱语音格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又是什么力量累积起来选择了这些或那些个体变异来承载格局的重整，对这些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很多语言学者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视语音变化为准心理变化，而不是严格的心理现象；或者把“发音更容易的趋势”、“错误感知累积的结果”（比如孩子学说话时的情况）等口号挂在嘴边，企图把问题敷衍过去。这些轻巧的解释是说不通的。“发音容易”也许算一个因素，但它充其量只是个相当主观的概念。我们觉得容易的语音和语音组合，

印第安人可能觉得无比困难；一种语言所乐见的语音沿流，另一种语言却可能竭力抵制。“错误的感知”也无法解释我在上文坚称的那条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语音沿流。不如承认我们尚不理解是哪个或哪些主要原因导致缓慢的语音沿流的好，尽管我们常常能指出一些起作用的因素。也许在对言语的直觉基础进行研究之前，我们不大会有明显的进步。如果我们从未想过研究语音格局本身，以及这些格局中的个体成分（单个语音）所占的“权重”和它们的心理关系，我们如何能够理解那种扰乱并重塑语音格局的沿流的性质呢？

Every linguist knows that phonetic change is frequently followed by morphological rearrangements, but he is apt to assume that morphology exercises little or no influence on the course of phonetic history. I am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our present tendency to isolate phonetics and grammar as mutually irrelevant linguistic provinces is unfortunate. There are likely to be fundamental relations between them and their respective histories that we do not yet fully grasp. After all, if speech sounds exist merely because they are the symbolic carriers of significant concepts and groupings of concepts, why may not a strong drift or a permanent feature in the conceptual sphere exercise a furthering or retarding influence on the phonetic drift? I believe that such influences may be demonstrated and that they deserve far more careful study than they have received.

语言学者都知道，形态上的重组经常继语音变化而发生，但是他们乐于假定形态对语音的历史进程没有影响或者影响甚微。我倾向于认为，现在这种将语音和语法作为彼此无关的语言领域割裂开来的趋势是不幸的。二者之间以及二者各自的历史之间都很可能存在重大关联，只是我们尚未完全了解。毕竟，如果语音的存在只是因为它们是有意义的概念和概念集合的符号载体，那么为什么不会有一个概念领

域里的强大沿流或者永久特征对语音沿流起到促进或阻滞的作用呢？我认为这类影响的存在是可以证明的，而且我们应当对其进行较之以往更仔细的研究。

This brings us back to our unanswered question: How is it that both English and German developed the curious alternation of unmodified vowel in the singular *(foot, Fuss)* and modified vowel in the plural *(feet, Füsse)* ? Was the pre-Anglo-saxon alternation of *fot* and *föti* an absolutely mechanical matter, without other than incidental morphological interest? It is always so represented, and, indeed, all the external facts support such a view. The change from *o* to *ö* , later *e* , is by no means peculiar to the plural. It is found also in the dative singular *(fet),* for it too goes back to an older*foti.* Moreover, *fet* of the plural applies only to the nominative and accusative; the genitive has *fota,* the dative*fotum.* Only centuries later was the alternation of *o* and *e* reinterpreted as ameans of distinguishing number; *o* was generalized for the singular, *e* for the plural. Only when this reassortment of forms took place [9_17] was the modern symbolic value of the *foot: feet* alternation clearly established. Again,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o* was modified to *ö (e)* in all manner of other grammatical and derivative formations. Thus, a pre-Anglo-saxon*hohan (later hon)* “to hang” corresponded to a *höhith, hehith (later hehth)* “hangs”; to *dom* “doom,” *blod* “blood,” and *fod* “food” corresponded the verbal derivatives *dömian (later deman)* “to deem,” *blödian (later bledan)* “to bleed,” and *födian (later fedan)* “to feed.” All this seems to point to the purely mechanical nature of the modification of *o* to *ö* to *e* . So many unrelated functions were ultimately served by the vocalic change that we cannot believe that it was motivated by any one of them.

这就把我们又带回了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英语和德语是如何演化出那种奇怪的变化的，即从单数（foot和*Fuss*）中不变的元音到复数（feet和*Füsse*）中要变的元音？先盎格鲁-撒克逊语从*fot* 到*föti* 的变化是纯机械性的、只有偶然的形态意义的吗？一直以来大家都这么认为，而且所有的外在事实都支持这一观点。从o到ö后来又到e的变化绝不仅限于复数。它还见于与格单数（*fet*），因为*fet* 也源自一个更古老的*foti* 。不仅如此，复数的*fet* 仅用于主格和宾格；属格是*fota*，与格是*fotum* 。几百年之后，o和e的这种变化才被重新解读，成为一种区别单复数的手段；o被广泛用于表示单数，e则表示复数。只有当这样的形式重组发生[10_16] 之后，foot: feet这一变化的现代符号价值才得以清晰地确立。再者，我们不该忘记，在所有其他的语法和派生结构的方式里，o都变成了ö（e）。因此，先盎格鲁-撒克逊语的*hohan*（后来变成*hon*，“吊起来”）与*höhith* 和*hehith*（后来变成*hehth*，“吊起来”的第三人称单数）对应；*dom*（“厄运”）、*blod*（“血液”）和*fod*（“食物”）分别与派生动词*dömian*（后来变成*deman*，“思考”）、*blödian*（后来变成*bledan*，“流血”）以及*födian*（后来变成*fedan*，“喂食”）对应。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指向从o到ö又到e这一语音变化的纯机械性。这么多互不相关的功能最终都由元音变化来实现，这使我们无法相信元音变化是由其中任何一种功能促成的。

The German facts are entirely analogous. Only la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was the vocalic alternation made significant for number. And yet consider the following facts. The change of *foti* to*föti antedated* that of *föti* to*föte, föt* . This may be looked upon as a “lucky accident,” for if *foti* had become*fote, fot* before the—*i* had had the chance to exert a retroactive influence on the *o* ,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ingular and the plural. This would have been anomalous in Anglo-saxon for a masculine noun. But was the sequence of phonetic changes an “accident”? Consider two further facts. All the Germanic languages were

familiar with vocalic change as possessed of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Alternations like *sing, sang, sung* (Anglo-saxon*singan, sang, sungen*) were ingrained in the linguistic consciousness. Further, the tendency toward the weakening of final syllables was very strong even then and had been manifesting itself in one way and another for centuries. I believe that these further facts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sequence of phonetic changes. We may go so far as to say that the *o* (and *u*) could afford to stay the change to *ö* (and *ü*) until the destructive drift had advanced to the point where failure to modify the vowel would soon result in morphological embarrassment. At a certain moment the—*i* ending of the plural (and analogous endings with *i* in other formations) was felt to be too weak to quite bear its functional burden. The unconscious Anglo-saxon mind, if I may be allowed a somewhat summary way of putting the complex facts, was glad of the opportunity afforded by certain individual variations, until then automatically canceled out, to have some share of the burden thrown on them. These particular variations won through because they so beautifully allowed the general phonetic drift to take its course without unsettling the morphological contours of the language. And the presence of symbolic variation *(sing, sang, sung)* acted as an attracting force on the rise of a new variation of similar character. All these factors were equally true of the German vocalic shift. Ow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destructive phonetic drift was proceeding at a slower rate in German than in English, the preservative change of *uo* to*üe (u* to *ü)* did not need to set in until 300 years or more after the analogous English change. Nor did it. And this is to my mind a highly significant fact. Phonetic changes may sometimes be unconsciously encouraged in order to keep intact the psychological spaces between words and word forms. The general drift seizes upon those individual sound variations that help to preserve the morphological balance or to lead to the new balance that the

language is striving for.

德语的情况与此完全相类。只是到了该语言的历史的后期，元音变化才被用于表示数。但是也请看看以下事实。从*foti* 到*föti* 的变化早于从*föti* 到*föte* 和*föt* 的变化。这或可被视为一种“幸运的偶然”，因为假如在-i有机会对o施加反向影响之前，*foti* 就已经变成*fote* 和*fot* ，那么单数和复数就不会有差别了。这对盎格鲁-撒克逊语的阳性名词而言太不寻常了。但是，语音变化的顺序果真是一个“偶然”吗？不妨看看另外两个事实。具有功能意义的元音变化在所有的日耳曼语中都很常见。sing、sang和sung（盎格鲁-撒克逊语的*singan* 、*sang* 和*sungen* ）之类的变化在日耳曼语的语言意识中根深蒂固。再者，即便在那时，削弱末尾音节的趋势也非常强大，数百年来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现出来。我认为这些进一步的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语音变化的实际顺序。我们甚至可以说，o（和u）本来是能够挺住而不变成ö（和ü）的，直到破坏性的沿流发展到一定程度，再不改变元音将很快招致形态上的尴尬。有那么一个时期，复数的-i结尾（以及其他形式中类似的-i结尾）被认为太虚弱了，不足以承担其功能重荷。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无意识思维（请允许我以如此概括地方式表述复杂的事实）是乐得利用某些个体变异带来的机会、让它们承担甩过来的一部分重荷的，而此前这些变异都被自动抹掉了。这些特定变异的胜出是因为它们优雅地让语音总沿流继续向前，且不至搅乱语言的形态轮廓。象征性变异（如sing、sang和sung）的存在就像一种吸引力，促进了类似性质的新变异的产生。所有这些因素同样见于德语的元音移动。由于破坏性的语音沿流在德语中的行进速度比在英语中慢，所以在英语发生同类变化之后的300多年间德语都不需要从uo到üe（从u到ü）的保护性变化的介入。该变化也的确没有介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具有非凡意义的事实。为了保持词之间以及词形之间的心理空间，语音变化有时会被无意识地鼓励。总沿流会抓住某些个体语音变异，因为它们有助于保护形态平衡或导向语言极力争取的新平衡。

I would suggest, then, that phonetic change is compacted of at least three basic strands: (1) A general drift in one direction,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which we know almost nothing but which may be suspected to be of prevailingly dynamic character (tendencies, e.g., to greater or less stress, greater or less voicing of elements); (2) A readjusting tendency which aims to preserve or restore the fundamental phonetic pattern of the language; (3) A preservative tendency which sets in when a too serious morphological unsettlement is threatened by the main drift. I do not imagine for a moment that it is always possible to separate these strands or that this purely schematic statement does justice to the complex forces that guide the phonetic drift. The phonetic pattern of a language is not invariable, but it changes far less readily than the sounds that compose it. Every phonetic element that it possesses may change radically and yet the pattern remain unaffected. It would be absurd to claim that our present English pattern is identical with the old Indo-European one, yet it is impressive to note that even at this late day the English series of initial consonants:

所以我想说语音变化至少由三股基本势力组成：（1）一个有定向的总沿流，我们对它的性质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可以猜想它具有超凡的动力特性（比如加重或减轻重音的趋势，增加或减少某些成分的声响的趋势）；（2）一种重新调整的趋势，其目的是保持或重建语言的基本语音格局；（3）一种保护性的趋势，它会在面临主沿流过分严重地动摇语言形态的威胁时介入。我从未妄想我们总是能够把这几股力量分离开来，或者这种纯概要性的表述能充分阐明引导语音沿流的复杂力量。一种语言的语音格局并非不可改变，但是它的改变要比组成它的语音慢得多。它所含的每一个语音成分都可能彻底改变，而格局依然故我。若说现在的英语格局与古印欧语的一模一样，那是荒谬的，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迟至今日，英语词首辅音的系列：

p t k

p t k

b d g

b d g

f th h

f th h

corresponds point for point to the Sanskrit series:

仍然与梵语系列一一对应：

b d g

b d g

bh dh gh

bh dh gh

p t k

p t k

The relation between phonetic pattern and individual sound is roughly parallel to that which obtains between the morphologic type of a language and one of its specific morphological features. Both phonetic pattern and fundamental type are exceedingly conservative, all superficial appearances to the contrary notwithstanding. Which is more so we cannot say. I suspect that they hang together in a way that we cannot at present quite understand.

语音格局与单个语音之间的关系大致平行于一种语言的形态类型和它的某个具体形态特征之间的关系。语音格局和基本类型都是极为保守的，尽管所有的表象都貌似相反。很难说两者中哪个更保守。我怀疑它们是以一种我们至今尚不全然了解的方式摽在一起的。

If all the phonetic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phonetic drift were allowed to stand, it is probable that most languages would present such irregularities of morphological contour as to lose touch with their formal ground-plan. Sound changes work mechanically. Hence they are likely to affect a whole morphological group here—this does not matter—, only part of a morphological group there—

and this may be disturbing. Thus, the old Anglo-saxon paradigm:

如果语音沿流导致的所有语音变化都被允许保留下来，那么很可能大多数语言的形态轮廓都会呈现出如此众多的不规则，以至于和它们的形式底图失去了联系。语音变化是机械地进行的。所以，它们可能在此处影响某个形态组的全部——这倒没什么大碍——在彼处则只影响另一形态组的一部分——这就可能有些麻烦了。比如，古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词形变化表：

	Sing.	Plur.
N. Ac.	*fot*	*fet (older foti)*
G.	*foiex*	*foia*
D.	*fet (older foti)*	*foium*

	单数	复数
主格、宾格	fot	fot （更古老的是 foti）
生格	foies	foia
与格	fot （更古老的是 foti）	foium

could not long stand unmodified. The *o-e* alternation was welcome in so far as it roughly distinguished the singular from the plural. The dative singular *fet* , however, though justified historically, was soon felt to be an intrusive feature. The analogy of simpler and more numerously represented paradigms created the form *fote* (compare, e.g., *fisc* “fish,” dative singular*fisce*). *Fet* as a

dative becomes obsolete. The singular now had *o* throughout. But this very fact made the genitive and dative *o* - forms of the plural seem out of place. The nominative and accusative *fet* was naturally far more frequently in use than were the corresponding forms of the genitive and dative. These, in the end, could not but follow the analogy of*fet*.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Middle English period, therefore, we find that the old paradigm has yielded to a more regular one:

不可能长期保持不变。o—e这一变化之所以受欢迎只是因为它能大致区分单数和复数。而与格单数*fet* 虽然从历史上看是合理的，但是很快就让人感到别扭。比照更加简单常见的词形变化类推，就造出了*fote* 这一形式（试比较*fisc* “鱼”和其与格单数*fisce* ）。于是与格的*fet* 就被废弃了。这样一来单数就全部都有了o。但恰是这一点使得带o的生格和与格复数显得格格不入。主格和宾格的*fet* 自然比对应的生格和与格形式用得多得多。它俩最后也只好遵循*fet* 的类推。因此，在中古英语的最初期，我们发现旧的词形变化已经让位给一个更规则的词形变化：

	Sing.	Plur.
N. Ac	* *fot*	* *fet*
G.	* *foies*	*fete*
D.	*fote*	*feten*

	单数	复数
主格、宾格	*fot	*fot
生格	*fotos	foto
与格	foto	foton

The starred forms are the old nucleus around which the new paradigm is built. The unstarred forms are not genealogical kin of their formal prototypes. They are analogical replacements.

加星号的是古老的核心形式，新的词形变化围绕它们建立起来。不加星号的形式并非其形式原型的直系后裔，而是类推置换。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teems with such levelings or extensions. *Elder* and *eldest* were at one time the only possible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forms of *old* (compare German *alt, älter, der älteste* ; the vowel following the *old-, alt-* was originally an *i,* which modified the quality of the stem vowel). The general analogy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English adjectives, however, has caused the replacement of the forms *elder* and *eldest* by the forms with unmodified vowel, *older* and *oldest* . *Elder* and *eldest* survive only as somewhat archaic terms for the older and oldest brother or sister. This illustrates the tendency for words that are psychologically disconnected from their etymological or formal group to preserve traces of phonetic laws that have otherwise left no recognizable trace or to preserve a vestige of a morphological process that has long lost its vitality. A careful study of these survivals or atrophied forms is not without valu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rlier history of a language or for suggestive hints as to its remoter affiliations.

英语的历史充斥着这种拉平和延展。比如，elder（更老）和eldest（最老）一度曾是old（老）唯一可能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试比较德语的*alt* 、*älter* 和*derälteste* ；*old-* 和*alt-* 之后的元音原本是一个i，它改变了词干元音的音质）。但是，参照绝大多数英语形容词的总类推，导致elder和eldest被未改变元音的older和oldest替代。Elder和eldest只是作为有点古风的形式残留下来，被用来称呼哥哥和姐姐或长兄和长姊。这说明了一种趋势，即在心理上脱离了其词源或形式群体的词会保留他处已无迹可寻的语音规律的痕迹，或者保留早已失去活力的形态程序的残迹。仔细研究这些遗存或萎缩了的形式对于重构一种语言较早期的历史或探寻其远亲的踪迹都是不无价值的。

Analogy may not only refashion forms within the confines of a related cluster of forms (a “paradigm”) but may extend its influence far beyond. Of a number of functionally equivalent elements, for instance, only one may survive, the rest yielding to its constantly widening influence. This is what happened with the English-splural. Originally confined to a particular class of masculines, though an important class, the -splural was gradually generalized for all nouns but a mere handful that still illustrate plural types now all but extinct *(foot: feet, goose: geese, tooth: teeth, mouse: mice, louse: lice; ox: oxen; child: children; sheep: sheep, deer: deer)*. Thus analogy not only regularizes irregularities that have come in the wake of phonetic processes but introduces disturbances, generally in favor of greater simplicity or regularity, in a long established system of forms. These analogical adjustments are practically always symptoms of the general morphological drift of the language.

类推不仅能在同一簇相关的形式（如“词形变化表”）范围内重塑某些形式，其影响力还可能远远超过这一范围。比如，在几个功能上等同的成分之中，只有一个可以存活下来，其余的都屈服于它持续扩

散的影响力。英语的复数-s就是如此。它最初仅限于一小组特定的阳性名词，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组，后来被逐渐推广至除一小撮词以外的所有名词，这一小撮词展示了现已几近灭绝的几种复数类型（foot: feet脚，goose: geese鹅，tooth: teeth牙，mouse: mice老鼠，louse: lice虱子；ox: oxen牛；child: children孩子；sheep: sheep羊，deer: deer鹿）。可见，类推不仅规约着伴随语音程序产生的不规则现象，而且会给久已形成的形式系统带来干扰，这种干扰一般说来都是有益于简单化和规律化的。这些类推式调整几乎总是兆示着语言的总的形态沿流。

A morphological feature that appears as the incidental consequence of a phonetic process, like the English plural with modified vowel, may spread by analogy no less readily than old features that owe their origin to other than phonetic causes. Once the *e-* vowel of Middle English *fet* had become confined to the plural, there was no theoretical reason why alternations of the type *fot: fet* and *mus: mis* might not have become established as a productive type of number distinction in the noun. As a matter of fact, it did not so become established. The *fot: fet* type of plural secured but a momentary foothold. It was swept into being by one of the surface drifts of the language, to be swept aside in the Middle English period by the more powerful drift toward the use of simple distinctive forms. It was too late in the day for our language to be seriously interested in such pretty symbolisms as *foot: feet.* What examples of the type arose legitimately, in other words via purely phonetic processes, were tolerated for a time, but the type as such never had a serious future.

一种看似某个语音程序的偶然结果的形态特征，比如英语复数的改变元音，可以通过类推轻易地扩散开来，不亚于语音之外的因素导

致的旧有特征。中古英语中*fet* 的e元音一旦只限于表示复数，从理论上说*fot: fet* 和*mus: mis* 这类变化就没有理由不成为区分名词单复数的能产类型了。但是事实上，它并没有变成这样。*fot: fet* 这一复数类型只是暂时保住了立足点。它是被英语的一条表层沿流冲进来的，在中古英语时期又被另一条更有力的、趋向使用简单的区别形式的沿流冲到一边。其时已晚，我们的语言已经很难对foot: feet这样漂亮的象征用法提起真正的兴趣了。这一类型的例子是合法产生的，换句话说，是借助纯语音程序而兴起的，它们被暂时容忍，但是作为一种类型则从未有过像样的前途。

It was different in German. The whole series of phonetic changes comprised under the term “umlaut,” of which *u: ü* and *au: oi (* written*äu)* are but specific examples, struck the German language at a time when the general drift to morphological simplification was not so strong but that the resulting formal types (e.g., *Fuss: Füsse; fallen* “to fall”: *fällen* “to fell”; *Horn* “horn”: *Gehörne* “group of horns”;*Haus* “house”: *Häuslein* “little house”) could keep themselves intact and even extend to forms that did not legitimately come within their sphere of influence. “Umlaut” is still a very live symbolic process in German, possibly more alive to-day than in medieval times. Such analogical plurals as *Baum* “tree”:*Bäume* (contrast Middle High German *boum: boume*) and derivatives as *lachen* “to laugh”: *Gelächter* “laughter” (contrast Middle High German *gelach*) show that vocalic mutation has won through to the status of a productive morphologic process. Some of the dialects have even gone further than standard German, at least in certain respects. In Yiddish, [9_18] for instance, “umlaut” plurals have been formed where there are no Middle High German prototypes or modern literary parallels, e.g., *tog “day”: teg* “days” (but German *Tag: Tage*) on the analogy of *gast* “guest”: *gest* “guests” (German *Gast: Gäste*), *shuch* [9_19] “shoe”:*shich* “shoes” (but German

Schuh: Schuhe) on the analogy of *fus* “foot”: *fis* “feet.” It is possible that “umlaut” will run its course and cease to operate as a live functional process in German, but that time is still distant. Meanwhile all consciousness of the merely phonetic nature of “umlaut” vanished centuries ago. It is now a strictly morphological process, not in the least a mechanical phonetic adjustment. We have in it a splendid example of how a simple phonetic law, meaningless in itself, may eventually color or transform large reaches of the morphology of a language.

德语则与此不同。“元音变音”这一名称概括了一整个系列的语音变化，u: ü和au: oi（写作äu）只是其中具体的例子；它们侵入德语时，形态简化的总沿流还不是很强，所以形成的形式类型（如*Fuss: Füsse* ；*fallen* “跌倒”：*fällen* “使跌倒”；*Horn* “号角”：*Gehörne* “号角组”；*Haus* “房子”：*Häuslein* “小房子”）能完整地保留下来，甚至扩展到按理不在它们影响范围之内的形式。“元音变音”至今仍是德语中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象征性程序，其活力也许比中世纪尤甚。类推产生的复数形式，如*Baum* “树”：*Bäume* （对比中古高地德语的*boum: boume* ），以及派生词，如*lachen* “笑”：*Gelächter* “笑声”（对比中古高地德语的*gelach* ），都说明元音变化已经胜出，成为能产的形态程序。有些方言甚至比标准德语走得更远，至少在某些方面如此。比如，意第绪语 [10_17] 中“元音变音”复数的形成并没有中古高地德语的原型或现代文学语言的平行形式，如从*gast* “客人”：*gest* “客人的复数”（德语是*Gast: Gäste* ）类推出*tog* “天”：*teg* “天的复数”（而德语是*Tag: Tage* ），从*fus* “脚”：*fis* “脚的复数”类推出*shuch* [10_18] “鞋”：*shich* “鞋的复数”（而德语是*Schuh: Schuhe* ）。也许“元音变音”在德语中会走到尽头，不再是一个有活力的功能性程序，但是那一天还相当遥远。而早在几百年前人们对“元音变音”的单纯的语音特性就已全然意识不到了。现在它是一个严格的形态程序，而一点都不是一个机械的语音调整。我们可以用它很好地说明，一个简单的语音规律，尽管本身没有意义，最终却可能影响或改变一种语言的大片的形态。

[9_1].I have changed the Old and Middle High German orthography slightly in order to bring it into accord with modern usage. These purely orthographical changes are immaterial. The *u* of *mus* is a long vowel, very nearly like the *oo* of English *moose* .

[9_2].The vowels of these four words are long; *o* as in *rode* , *e* like *a* of *fade* , *u* like *oo* of *brood,y* like German *ü* .

[9_3].Or rather stage in a drift.

[9_4].Anglo-Saxon *fet* is "unrounded" from an older *föt* , which is phonetically related to *fot* precisely as is *mys* (i.e., *müs*) to *mus* . Middle High German *ue* (Modern German *u*) did not develop from an "umlauted" prototype of Old High German *uo* and Anglo-Saxon *o* , but was based directly on the dialectic *uo* . The unaffected prototype was long *o* . Had this been affected in the earliest Germanic or West-Germanic period, we should have had a pre-German alternation *fot: föti* ; this older *ö* could not well have resulted in *ue* . Fortunately we do not need inferential evidence in this case, yet inferential comparative methods, if handled with care, may be exceedingly useful. They are indeed indispensable to the historian of language.

[9_5].See page 133.

[9_6].Primitive Germanic *fot(s)* , *fotiz* , *mus* , *musiz* ; Indo-European *pods* , *podes* , *mus* , *muses* . The vowels of the first syllables are all long.

[9_7].Or in that unconscious sound patterning which is ever on the point of becoming conscious. See page 57.

[9_8].As have most Dutch and German dialects.

[9_9].At least in America.

[9_10].It is possible that other than purely phonetic factors are also at work in the history of these vowels.

[9_11].The orthography is roughly phonetic. Pronounce all accented vowels long except where otherwise indicated, unaccented vowels short; give continental values to vowels, not present English ones.

[9_12].After I. the numbers are not meant to correspond chronologically to those

of the English table. The orthography is again roughly phonetic.

[9_13].I use *ss* to indicate a peculiar long, voiceless *s*- sound that was etymologically and phonetically distinct from the old Germanic *s* . It always goes back to an old *t* . In the old sources it is generally written as a variant of *z* , though it is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the modern German *z* (= *ts*). It was probably a dental (lisped) *s* .

[9_14].*Z* is to be understood as French or English *z* , not in its German use. Strictly speaking, this "z" (intervocalic -s-) was not voiced but was a soft voiceless sound, a sibilant intermediate between our s and *z* . In modern North German it has become voiced to *z* . It is important not to confound this s—z with the voiceless intervocalic s that soon arose from the older lisped *ss* . In Modern German (aside from certain dialects), old *s* and *ss* are not now differentiated when final (*Maus* and *Fuss* have identical sibilants), but can still be distinguished as voiced and voiceless s between vowels (*Mäuse* and *Füsse*).

[9_15].In practice phonetic laws have their exceptions, but more intensive study almost invariably shows that these exceptions are more apparent than real. They are generally due to the disturbing influence of morphological groupings or to special psychological reasons which inhibit the normal progress of the phonetic drift. It is remarkable with how few exceptions one need operate in linguistic history, aside from "analogical leveling" (morphological replacement).

[9_16].These confusions are more theoretical than real, however. A language has countless methods of avoiding practical ambiguities.

[9_17].A type of adjustment generally referred to as "analogical leveling."

[9_18].Isolated from other German dialects in the late fifteenth and early sixteenth centuries. It is therefore a good test for gauging the strength of the tendency to "umlaut," particularly as it has developed a strong drift towards analytic methods.

[9_19].*Ch* as in German *Buch* .

[10_1].我略微改动了古高地德语和中古高地德语的拼写法，以便与现代用法保持一致。这些纯属拼写改动，无碍大体。mus的u是一个长元音，非常接近英语moose（麋鹿）的oo。

[10_2].这四个词的元音都是长的；o如rode（ride“骑”的过去式）中的o，e如fade（褪色）中的a，u如brood（孵）中的oo，y如德语中的ü。

[10_3].或者毋宁说是沿流的一个阶段。

[10_4].盎格鲁-撒克逊语的fet是从一个更古老的föt经过非圆唇化发展而来的，后者与fot的语音关系恰如mys（即müs）与mus的关系。中古高地德语的ue（现代德语的u）并不是从古高地德语经“元音变音”的原型uo和盎格鲁-撒克逊语的o演化而来，而是直接从方言中的uo演化而来。未经变化的原型是长o。如果在日耳曼语或西日耳曼语的最早期发生了这个变化，我们就该拥有一个先德语的fot: föti变化；而这个更古老的ö是不大可能变成ue的。幸好，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不需要推论性证据，但是如果小心使用，推论比较法也是可以非常有用的。对于语言历史学家来说，它们简直不可或缺。

[10_5].详见第133页。

[10_6].原始日耳曼语的fot(s)、fotiz、mus和musiz；印欧语的pods、podes、mus和muses。第一个音节的元音都是长的。

[10_7].或者在那个无意识的、却随时可能转变成有意识的语音格局中。详见第57页。

[10_8].大多数荷兰语和德语方言也是如此。

[10_9].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10_10].在这些元音的历史上，除了纯粹的语音因素，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

[10_11].这里的写法大致依照发音。所有带重音的元音都要发得长，除非另有标注；不带重音的元音都要发得短；元音参照[欧洲]大陆音值（5），而不是现在的英语音值。

[10_12].除一之外，[表格中的]编号并不是要与英语表格中的编号在时间上对应。这里的写法也大致依照发音。

[10_13].我用ss表示一个独特的、不带声的长s音，在词源上和语音上都与古日耳曼语的s不同。它总是可以追溯到一个古老的t。在古老的文献中，它通常被写做z的一个变体，但是我们不应该将其与现代德语的z（等于ts）混淆。它很可能是一个齿音（咬舌的）s。

[10_14].Z应作法语或者英语的z看，而不是德语的z。严格地说，这个z（出现在两个元音中间时是-s-）并不是带声的，而是一个柔软的不带声的音，一个介于我们的s和z之间的齿擦音。在现代北方德语中，它已经变成了带声的z。重要的是，不要将这对s—z与不带声的元音间的s混为一谈，后者是随后不久从较古老的咬舌齿音ss演化而来的。在现代德语（除了某些方言之外）中，古老的s和ss出现在词尾时已经没有区别（[比如，]Maus与Fuss带有相同的齿擦音）；但是当它们出现在元音之间时，还是可以分辨出带声与不带声（如Mäuse和Füsse）。

[10_15].实际上，语音规律有其例外，但是如果更透彻地研究它们，几乎总能发现这些例外只是表象，而非真的例外。它们通常源于形态分类的干扰或者阻止语音沿流正常行进的特殊心理原因。除了“类推拉平”（形态替换）之外，语言历史的运转所需的例外如此之少，实在值得一提。

[10_16].这类调整一般被称为“类推拉平”。

[10_17].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从其他德语方言中孤立出来。因此，它很适合测量“元音变音”这一趋势的力度，特别是因为它已发展出一个趋于分析法的强大沿流。

[10_18].如德语Buch中的ch。

Chapter 9 How Languages Influence Each Other

第九章　语言怎样相互影响

Languages, like cultures, are rarely sufficient unto themselves. The necessities of intercourse bring the speakers of one language into direct or indirect contact with those of neighboring or culturally dominant languages. The intercourse may be friendly or hostile. It may move on the humdrum plane of business and trade relations or it may consist of a borrowing or interchange of spiritual goods—art, science, religion.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point to a completely isolated language or dialect, least of all among the primitive peoples. The tribe is often so small that intermarriages with alien tribes that speak other dialects or even totally unrelated languages are not uncommon. It may even be doubted whether intermarriage, intertribal trade, and general cultural interchanges are not of greater relative significance on primitive levels than on our own. Whatever the degree or nature of contact between neighboring peoples, it is generally sufficient to lead to some kind of linguistic interinfluencing. Frequently the influence runs heavily in one direction. The language of a people that is looked upon as a center of culture is naturally far more likely to exert an appreciable influence on other languages spoken in its vicinity than to be influenced by them. Chinese has flooded the vocabularies of Corean, Japanese, and Annamite for centuries, but has received nothing in return. In the western Europe of medieval and modern times French has exercised a similar, though probably a less overwhelming, influence. English borrowed an immense number of words from the French of the Norman invaders, later also from the court French of Isle de France, appropriated a certain number of

affixed elements of derivational value (e.g.,*-ess* of *princess,-ard* of *drunkard,-ty* of *royalty*), may have been somewhat stimulated in its general analytic drift by contact with French, [10_1] and even allowed French to modify its phonetic pattern slightly (e.g., initial *v* and *j* in words like *veal* and *judge;* in words of Anglo-saxon origin *v* and *j* can only occur after vowels, e.g., *over, hedge*). But English has exerted practically no influence on French.

语言，与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流的必要性令说某种语言的人与说相邻语言或文化上处于支配地位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这种交流可以是友好的，也可以是敌对的；可以在商贸关系这一单调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包括各种精神产品——如艺术、科学和宗教——的借用或交换。很难指出一种完全孤立的语言或者方言，在原始民族中尤其如此。原始部落往往很小，所以与说其他方言甚至完全无关的语言的陌生部落通婚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通婚、部落间的贸易以及一般的文化交流在原始人的层面上比在我们的层面上更重要。无论相邻民族之间的交流处于何种程度，具有何种性质，一般说来都足以导致某种语言上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往往倚重一个方向。被视为文化中心的民族所讲的语言很自然地更可能对其他的临近语言施加显著的影响，而不是被后者所影响。几个世纪以来，汉语在朝鲜语、日语和安南语的词汇中泛滥，但是反过来却并未从后者吸收什么。在中世纪和现代的西欧，法语也产生过类似的影响，虽然其势头可能没有汉语那么猛烈。英语先是从诺曼入侵者的法语、继而从法兰西岛的宫廷法语中借用了大量词汇；英语还吸收了一些具有派生价值的词缀成分（如princess公主中的-ess，drunkard酒鬼中的-ard，royalty皇室中的-ty）；与法语的接触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语趋向分析性的总沿流 [11_1] ；英语甚至允许法语轻微地改变了自己的语音格局（例如，veal小牛肉和judge法官这类词词首的v和j；在源自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词汇中，v和j是只能出现在元音后面的，如over越过和hedge篱笆）。可是，英语却几乎没有对法语产生什么影响。

The simplest kind of influence that one language may exert on another is the “borrowing” of words. When there is cultural borrowing there is always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associated words may be borrowed too. When the early Germanic peoples of northern Europe first learned of wine-culture and of paved streets from their commercial or warlike contact with the Romans, it was only natural that they should adopt the Latin words for the strange beverage (*vinum,* English *wine,* German *Wein*) and the unfamiliar type of road (*strata [via],* English *street,* German *Strasse*). Later, when Christianity was introduced into England, a number of associated words, such as *bishop* and *angel,* found their way into English. And so the process has continued uninterruptedly down to the present day, each cultural wave bringing to the language a new deposit of loan-words. The careful study of such loan-words constitutes an interesting commentary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One can almost estimate the rôle which various peoples have play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cultural ideas by taking note of the extent to which their vocabularies have filtered into those of other peoples. When we realize that an educated Japanese can hardly frame a single literary sentence without the use of Chinese resources, that to this day Siamese and Burmese and Cambodgian bear the unmistakable imprint of the Sanskrit and Pali that came in with Hindu Buddhism centuries ago, or that whether we argue for or against the teaching of Latin and Greek our argument is sure to be studded with words that have come to us from Rome and Athens, we get some inkling of what early Chinese culture and Buddhism and classical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 have meant in the world's history. There are just five languages that have had an overwhelming significance as carriers of culture. They are classical Chinese, Sanskrit, Arabic, Greek, and Latin. In comparison with these even such culturally important languages as Hebrew and

French sink into a secondary position. It is a little disappointing to learn that the general cultural influence of English has so far been all but negligible. The English language itself is spreading because the English have colonized immense territories. But there is nothing to show that it is anywhere entering into the lexical heart of other languages as French has colored the English complexion or as Arabic has permeated Persian and Turkish. This fact alone is significant of the power of nationalism, cultural as well as political,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There are now psychological resistances to borrowing, or rather to new sources of borrowing, [10_2] that were not greatly alive in the Middle Ages or during the Renaissance.

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可能产生的最简单的影响是词的“借用”。当发生文化借用时，相关的词汇总是有可能也被借用。比如，北欧的早期日耳曼民族在与罗马人的商业以及军事接触中初次了解到葡萄酒文化和铺设道路，所以他们采用拉丁词语来指称这种奇怪的饮料（*vinum*，英语是wine，德语是*Wein*）和这种陌生的道路（*stratavia*，英语是street，德语是*Strasse*）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后来，当基督教传入英国，一些相关的词，例如bishop（主教）和angel（天使），也进入了英语。就这样，这个过程延绵不断，直至今日，每一次文化浪潮都为英语积淀了新一层借词。仔细研究这些借词相当于对文化史做一次有趣的注疏。留意一下各民族的词汇在多大程度上渗透进其他民族的词汇，就差不多可以判断出他们在文化思想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当我们意识到一个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不使用汉语资源就几乎连一句文言也作不出来；意识到直到今天，暹罗语、缅甸语和柬埔寨语仍然保留着数百年前随印度佛教传来的梵文和巴利语的鲜明印记；意识到无论我们赞成还是反对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学，我们的论证中都必然遍布着来自罗马和雅典的词汇，我们就会对早期中国文化、佛教和古典地中海文明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意义有所领悟了。只有五种语言曾经作为文化的载体拥有过巨大的意义，它们是古汉语、梵语、阿拉伯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与它们相比，即使是希伯

来语和法语等在文化上非常重要的语言也要退居其次。英语的总体文化影响到今天为止都微乎其微，这难免令人有些扫兴。英语本身在各处传播是因为英国人开拓了广大的殖民地。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英语在什么地方进入了其他语言的词汇核心，就像法语改变英语的面貌或者阿拉伯语渗入波斯语和土耳其语那样。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上个世纪民族主义在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影响。现在人们对借用、或者毋宁说对各种可资借用的新源头都存有心理上的抗拒 [11_2] ，而这种心理在中世纪或者文艺复兴时期并不怎么活跃。

Are there resistances of a more intimate nature to the borrowing of words? It is generally assumed that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borrowing depend entirely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culture relation; that if German, for instance, has borrowed less copiously than English from Latin and French it is only because Germany has had less intimate relations than England with the culture spheres of classical Rome and France. This is true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but it is not the whole truth. We must not exaggerate the physical importance of the Norman invasion nor under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act that Germany's central geographical position made it peculiarly sensitive to French influences all through the Middle Ages, to humanistic influences in the latter fifteenth and early sixteenth centuries, and again to the powerful French influences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t seems very probable that the psychological attitude of the borrowing language itself towards linguistic material has much to do with its receptivity to foreign words. English has long been striving for the completely unified, unanalyzed word,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is monosyllabic or polysyllabic. Such words as *credible, certitude, intangible* are entirely welcome in English because each represents a unitary, well-nuanced idea and because their formal analysis (*cred-ible, cert-itude, in-tang-ible*) is not a necessary act of

the unconscious mind (*cred-, cert-,* and *tang-* have no real existence in English comparable to that of *good* —in *goodness*). A word like *intangible,* once it is acclimated, is nearly as simple a psychological entity as any radical monosyllable (say *vague, thin, grasp*). In German, however, polysyllabic words strive to analyze themselves into significant elements. Hence vast numbers of French and Latin words, borrowed at the height of certain cultural influences, could not maintain themselves in the language. Latin-German words like*kredibel* “credible” and French-German words like*reussieren* “to succeed” offered nothing that the unconscious mind could assimilate to its customary method of feeling and handling words. It is as though this unconscious mind said: “I am perfectly willing to accept*kredibel* if you will just tell me what you mean by *kred-* .” Hence German has generally found it easier to create new words out of its own resources, as the necessity for them arose.

在抗拒借词方面，有没有更贴近本质的原因呢？人们通常认为借用的性质和程度完全取决于文化亲疏等历史事实；例如，如果说德语向拉丁语和法语借词不如英语借的那么多，那也只是因为德国在文化领域与古罗马和法国的关系不如英格兰密切。这么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它并非全部真相。我们不应夸大诺曼入侵在物质层面的重要性，也不应低估德国地处欧洲中部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因为这使德国在整个中世纪对法国的影响都极为敏感，在十五世纪后半叶到十六世纪初对人文主义的影响以及十七和十八世纪对法国的巨大影响也都极为敏感。一种语言对外来词的接受能力看起来很可能与该语言本身对语言材料的心理态度密切相关。长久以来，英语都在致力于寻求完全统一的、不具有分析性的词，不管它是单音节的还是多音节的。credible（可信的）、certitude（确信）和intangible（无形的）这样的词在英语中大受欢迎，因为它们每个都代表一个统一的、精确的意思，而且因为对它们进行形式分析（即分为cred-ible、cert-itude和in-tang-ible）未必是无意识的心智会做的事情（cred-、cert-和tang-并

不像goodness善中的good-那样实际存在于英语中）。像intangible这样的词，一旦说顺了口，差不多就会像任何一个根本的单音节词（如vague模糊的、thin薄的和grasp抓住）那样，成为一个简单的心理实体。但是在德语中，多音节的词都努力把自己分析成多个有意义的成分。因此，在几次文化影响的顶峰时期借入德语的大量法语和拉丁语词都无法在德语中长久地存活。*kredibel* “可信的”等拉丁-德语词以及*reussieren* “成功”等法语-德语词皆无法被无意识心智吸收进它感知和处理词语的惯常方式中。这个无意识的心智似乎在说：“我完全愿意接受*kredibel* ，只要你告诉我*kred-* 的意思是什么。”因此，在需要新词的时候，德语一般会觉得利用自身的资源创造新词来得更为轻松。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st between English and German as regards the treatment of foreign material is a contrast that may be studied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The Athabaskan languages of America are spoken by peoples that have had astonishingly varied cultural contacts, yet nowhere do we find that an Athabaskan dialect has borrowed at all freely [10_3] from a neighboring language. These languages have always found it easier to create new words by compounding afresh elements ready to hand. They have for this reason been highly resistant to receiving the linguistic impress of the external cultural experiences of their speakers. Cambodgian and Tibetan offer a highly instructive contrast in their reaction to Sanskrit influence. Both are analytic languages, each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highly-wrought, inflective language of India. Cambodgian is isolating, but, unlike Chinese, it contains many polysyllabic words whose etymological analysis does not matter. Like English, therefore, in its relation to French and Latin, it welcomed immense numbers of Sanskrit loan-words, many of which are in common use to-day. There was no psychological resistance to them. Classical Tibetan literature was a slavish adaptation of Hindu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nowhere has Buddhism implanted itself

more firmly than in Tibet, yet it is strange how few Sanskrit words have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language. Tibetan was highly resistant to the polysyllabic words of Sanskrit because they could not automatically fall into significant syllables, as they should have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Tibetan feeling for form. Tibetan was therefore driven to translating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se Sanskrit words into native equivalents. The Tibetan craving for form was satisfied, though the literally translated foreign terms must often have done violence to genuine Tibetan idiom. Even the proper names of the Sanskrit originals were carefully translated, element for element, into Tibetan; e.g., *Suryagarbha* “Sun-bosomed” was carefully Tibetanized into *Nyi-maisnying-po* “Sun-of heart—the, the heart (or essence) of the sun.” The study of how a language reacts to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words—rejecting them, translating them, or freely accepting them—may throw much valuable light on its innate formal tendencies.

英语和德语在对待外来语言材料上的心理反差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观察到。在美洲，使用阿萨巴斯卡语支的各种语言的民族之间有过多得惊人的各类文化接触，但是我们却未在任何地方发现有哪个阿萨巴斯卡方言从临近的语言中自由地 [11_3] 借用了语言材料。阿萨巴斯卡语言总是觉得通过重新组合现成的成分创造新词来得更容易。因此，一直以来它们都顽强地拒不接受其使用者的外来文化体验所带来的语言印记。柬埔寨语和藏语在对待梵语的影响上表现出的反差对我们很有启发性。两者都是分析性语言，都迥异于来自印度的高度复杂且带有屈折变化的梵语。柬埔寨语是孤立语，但是与汉语不同，它包含很多不讲究词源分析的多音节词。因此，像英语与法语和拉丁语的关系一样，柬埔寨语乐于接受大量的梵语借词——其中很多至今仍在普遍使用——对它们没有心理上的抵触。古典西藏文学是对印度佛教经典的虔诚模仿，佛教在西藏扎根之深甚于任何其他地方，然而奇怪的是，却鲜有梵语词汇进入藏语。藏语对梵语的多音节词表现出高度的

抵制，因为这些词无法自动地拆分为有意义的音节，而要满足藏语对形式的感觉，这是必须的。因此，藏语被迫将大多数这类梵语词翻译成对应的藏语词。这样一来藏语对形式的渴求得以满足，不过那些直译的外来术语一定常常破坏了藏语真正的习惯表达。甚至是梵语原文中的专有名词也被细心地、逐个成分相对应地译成藏语，例如，*Suryagarbha* “太阳-胸怀的”被认真地藏语化，译成*Nyi-maisnying-po* “太阳-的心-这”，意思是“太阳的心（或精华）”。研究一种语言对外来词的反应——拒绝，翻译，或自在地接受——可以很好地揭示该语言内在的形式倾向。

The borrowing of foreign words always entails their phonetic modification. There are sure to be foreign sounds or accentual peculiarities that do not fit the native phonetic habits. They are then so changed as to do as little violence as possible to these habits. Frequently we have phonetic compromises. Such an English word as the recently introduced *camouflage* , as now ordinarily pronounced, corresponds to the typical phonetic usage of neither English nor French. The aspirated *k* , the obscure vowel of the second syllable, the precise quality of the *l* and of the last *a* , and, above all, the strong accent on the first syllable, are all the results of unconscious assimilation to our English habits of pronunciation. They differentiate our *camouflage* clearly from the same word as pronounced by the French. On the other hand, the long, heavy vowel in the third syllable and the final position of the “zh” sound (like *z* in *azure*) are distinctly un-English, just as, in Middle English, the initial *j* and *v* [10_4] must have been felt at first as not strictly in accord with English usage, though the strangeness has worn off by now. In all four of these cases-initial *j* , initial *v* , final “zh,” and unaccented*a* of*father* —English has not taken on a new sound but has merely extended the use of an old one.

外来词的借入总不免伴随语音的改变。外来词中一定存在与本族语音习惯不相符的外来语音或者重音特点。于是，它们会被改变，以尽可能少地破坏本族语音习惯。语音的折中是很常见的。比如，新近进入英语的法语词camouflage（伪装），现在通常的读法与英语或法语的典型发音都不对应。送气的k音，第二个音节中的模糊元音，l音和最后一个a音的清晰音质，尤其是第一个音节上的强重音，都是无意识地与英语发音习惯同化的结果。它们将英语的camouflage与法语的对等词在读音上清晰地区别开来。但是，第三个音节里长而重的元音以及位于词尾的zh音（像azure天蓝色中的z）显然是非英语的，这就像中古英语中位于词首的j和v [11_4] ，起初也一定会被认为没有严格遵守英语习惯，不过这种异样感现在已被消磨殆尽了。在上述四例中——词首的j、词首的v、词尾的zh以及发音如在father（父亲）中但不带重音的a——英语都没有吸收新的语音，只是扩展了旧语音的使用范围而已。

Occasionally a new sound is introduced, but it is likely to melt away before long. In Chaucer's day the old Anglo-saxon *ü* (written *y*) had long become unrounded to *i* , but a new set of *ü* —vowels had come in from the French (in such words as *due, value, nature*). The new *ü* did not long hold its own; it became diphthongized to *iu* and was amalgamated with the native*iw* of words like *new* and *slew* . Eventually this diphthong appears as *yu* , with change of stress—*dew* (from Anglo-saxon*deaw*) like *due* (Chaucerian *dü*). Facts like these show how stubbornly a language resists radical tampering with its phonetic pattern.

偶尔会有新语音被介绍进来，但是很可能不久就消融掉。在乔叟时代，古盎格鲁-撒克逊语的ü音（写为y）早已变成非圆唇的i音，但是一组新的ü元音业已从法语传入（如在due到期、value价值和nature性质等词中）。新ü音没能坚持多久；它变成了双元音iu，并与

new（新的）和slew（转向）等本土词汇的iw音相混。最终，这个双元音变成了yu，重音也发生了变化——dew（“露珠”，源自盎格鲁-撒克逊语的*deaw*）就变得和due（乔叟时期的*dü*）一样了。从这类事实可以看出语言是多么顽强地抵制对其语音格局的根本改变。

Nevertheless, we know that languages do influence each other in phonetic respects, and that quite aside from the taking over of foreign sounds with borrowed words. One of the most curious facts that linguistics has to note is the occurrence of striking phonetic parallels in totally unrelated or very remotely related languages of a restricted geographical area. These parallels become especially impressive when they are seen contrastively from a wide phonetic perspective. Here are a few examples. The Germanic languages as a whole have not developed nasalized vowels. Certain Upper German (Suabian) dialects, however, have now nasalized vowels in lieu of the older vowel + nasal consonant *(n)* . Is it only accidental that these dialects are spoken in proximity to French, which makes abundant use of nasalized vowels? Again, there are certain general phonetic features that mark off Dutch and Flemish in contrast, say, to North German and Scandinavian dialects. One of these is the presence of unaspirated voiceless stops *(p, t, k)* , which have a precise, metallic quality reminiscent of the corresponding French sounds, but which contrast with the stronger, aspirated stops of English, North German, and Danish. Even if we assume that the unaspirated stops are more archaic, that they are the unmodified descendants of the old Germanic consonants, is it not perhaps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fact that the Dutch dialects, neighbors of French, were inhibited from modifying these consonants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seems to have been a general Germanic phonetic drift? Even more striking than these instances is the peculiar resemblance, in certain special phonetic respects, of

Russian and other Slavic languages to the unrelated Ural-Altaic languages [10_5] of the Volga region. The peculiar, dull vowel, for instance, known in Russian as “yeri” [10_6] has Ural-Altaic analogues, but is entirely wanting in Germanic, Greek, Armenian, and Indo-Iranian, the nearest Indo-European congeners of Slavic. We may at least suspect that the Slavic vowel is not historically unconnected with its Ural—Altaic parallels. One of the most puzzling cases of phonetic parallelism is afforded by a large number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spoken west of the Rockies. Even at the most radical estimate there are at least four totally unrelated linguistic stocks represented in the region from southern Alaska to central California. Nevertheless all, or practically all, the languages of this immense area have some important phonetic features in common. Chief of these is the presence of a “glottalized” series of stopped consonants of very distinctive formation and of quite unusual acoustic effect. [10_7]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area all the languages, whether related or not, also possess various voiceless *l-s* ounds and a series of “velar” (back-guttural) stopped consonants which are etymologically distinct from the ordinary *k-s* eries. It is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three such peculiar phonetic features as I have mentioned could have evolved independently in neighboring groups of languages.

尽管如此，但我们知道语言在语音方面的确是相互影响的，而且与吸收借入词的外国语音并不怎么相关。语言学不得不关注的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就是在某个局促的地区，完全没有关系或者关系非常遥远的语言之间出现惊人的语音平行。若从一个广阔的语音视角进行对比考察，这类平行会变得格外醒目。这里有几个例子：日耳曼语系总体而言没有演化出鼻化元音，但是某些上日耳曼语（士瓦本）方言现在却拥有鼻化元音，并以之取代了更古老的元音 + 鼻辅音（n）。这些方言紧邻说法语的地区，而法语大量使用鼻化元音，这仅仅是偶然

吗？另外，有些共同的语音特征将荷兰语和佛兰芒语与北日耳曼语和斯堪的纳维亚方言等其他的日耳曼语区别开来。其中之一就是不送气且不带声的塞音（p、t和k）的存在，这些塞音具有一种清晰的、金属般的音质，会让人想到对应的法语语音，但是与英语、北日耳曼语和丹麦语中较强的送气塞音则形成反差。即使我们假定这些不送气的塞音更加古老，假定它们是古日耳曼语辅音未经修改的后裔，但是紧邻法语的荷兰语方言却未能遵照貌似日耳曼语音的总沿流来改变这些辅音，这难道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历史事实吗？还有比这些例子更加惊人的——俄语和其他斯拉夫语与毫不相关的伏尔加地区的乌拉尔-阿尔泰语 [11_5] 在某些特殊的语音特征方面具有奇怪的相似性。例如，俄语中被称为yeri [11_6] 的独特的干涩元音在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中也能找到同类，但是它却全然不见于日耳曼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和印度-伊朗语等距离斯拉夫语最近的印欧同源语言。我们至少可以猜想，这个斯拉夫语元音与其在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中的平行元音之间并非没有历史渊源。最令人困惑的语音平行案例之一见于落基山脉以西的大量美洲印第安语言。即使按照最严格的估算，在从阿拉斯加南部到加利福尼亚中部的地区，也至少存在四个完全不相关的语系。但是这片广袤大地上的所有或几乎所有语言都共享几个重要的语音特征。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存在一系列“喉音化”的塞音，这些塞音具有非常独特的构造和相当特别的声响效果。 [11_7] 在该地区北部，所有语言，无论彼此是否相关，还都具有各种不带声的l音和一系列（后喉部的）“小舌”塞音，它们在源起上有别于普通的k系列辅音。很难相信上述三个如此独特的语音特征会是从相邻的语言群组中独立演化而来的。

How are we to explain these and hundreds of similar phonetic convergences? In particular cases we may really be dealing with archaic similarities due to a genetic relationship that it is beyond our present power to demonstrate. But this interpretation will not get us far. It must be ruled entirely out of court, for instance, in two of the three European examples I have instanced; both nasalized

vowels and the Slavic “yeri” are demonstrably of secondary origin in Indo—European. However we envisage the process in detail, we cannot avoid the inference that there is a tendency for speech sounds or certain distinctive manners of articulation to spread over a continuous area in somewhat the same way that elements of culture ray out from a geographical center. We may suppose that individual variations arising at linguistic borderlands—whether by the unconscious suggestive influence of foreign speech habits or by the actual transfer of foreign sounds into the speech of bilingual individuals—have gradually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phonetic drift of a language. So long as its main phonetic concern is the preservation of its sound patterning, not of its sounds as such, there is really no reason why a language may not unconsciously assimilate foreign sounds that have succeeded in worming their way into its gamut of individual variations,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se new variations (or reinforced old variations) ar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native drift.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以及类似的数以百计的语音趋同现象呢？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我们面对的可能的确是由遗传关系所致的古老的相似性，只不过我们现在无法证明而已。但是这种解释无法深入。例如，对于前述三个欧洲语例子中的两个，这一解释都是必须被完全排除的；鼻化元音和斯拉夫语的yeri都可被证明在印欧语中是次生的。无论我们如何仔细地审视这一过程，都免不了这样推论：语音或者某些特定的发声方式有传遍某个连续地区的趋势，有点像文化成分从某个地理中心向外辐射开来。我们可以认为，在语言的疆界上出现的个体差异——无论是外来发音习惯带来无意识的暗示影响，还是外来语音实际迁入双语者的言语——已经逐渐被纳入语言的语音沿流中。就语音而论，只要一种语言主要关心的是保持其语音格局，而非单个的语音本身，那么的确没有理由认为该语言不会无意识地同化那些成功地钻入其个体变异系列的外来语音，当然前提总是这些新变异（或者

被强化了的旧变异）与本土沿流的方向一致。

A simple illustration will throw light on this conception. Let us suppose that two neighboring and unrelated languages, A and B, each possess voiceless *l-s* ounds (compare Welsh *ll*). We surmise that this is not an accident. Perhaps comparative study reveals the fact that in language A the voiceless *l-s* ounds correspond to a sibilant series in other related languages, that an old alternation *s: sh* has been shifted to the new alternation *l* (voiceless): *s.* [10_8] Does it follow that the voiceless *l* of language B has had the same history? Not in the least. Perhaps B has a strong tendency toward audible breath release at the end of a word, so that the final *l* , like a final vowel, was originally followed by a marked aspiration. Individuals perhaps tended to anticipate a little the voiceless release and to “unvoice” the latter part of the final *l-s* ound (very much as the *l* of English words like *felt* tends to be partly voiceless in anticipation of the voicelessness of the *t*). Yet this final *l* with its latent tendency to unvoicing might never have actually developed into a fully voiceless *l* had not the presence of voiceless *l-s* ounds in A acted as an unconscious stimulus or suggestive push toward a more radical change in the line of B's own drift. Once the final voiceless *l* emerged, its alternation in related words with medial voiced *l* is very likely to have led to its analogical spread. The result would be that both A and B have an important phonetic trait in common. Eventually their phonetic systems, judged as mere assemblages of sounds, might even become completely assimilated to each other, though this is an extreme case hardly ever realized in practice. The highly significant thing about such phonetic interinfluencings is the strong tendency of each language to keep its phonetic pattern intact. So long as the respective alignments of the similar sounds is different, so long as they have differing “values”

and “weights” in the unrelated languages, these languages cannot be said to have diverged materially from the line of their inherent drift. In phonetics, as in vocabulary, we must be careful not to exaggerate the importance of interlinguistic influences.

一个简单的例证就能说明这一设想。假设有两种相邻但无关的语言A和B，各自都有一些不带声的l音（试比较威尔士语的ll音）。我们猜想这不是偶然的。对比研究也许会揭示这样的事实：A语言中不带声的l音与其他相关语言中的咝音系列相对应，原来的s: sh替换变成了新的（不带声的）l: s替换。[11_8] 能否就此认为B语言中不带声的l音具有相同的历史呢？完全不能。也许B语言有一种强烈的在词尾发可听到的送气声的倾向，因此词尾的l音，就像词尾的元音一样，后面本来紧跟着一个明显的送气过程。有些人也许会把不带声的送气稍微提前，把词尾l音的后半部分变成不带声的（很像felt等英语词中的l音，出现在不带声的t之前时倾向于部分地变成不带声的）。但是，如果不是A语言中不带声的l音的存在无意识地刺激或暗地推动了B语言沿自身沿流发生更彻底的变化，那么这个有潜在不带声倾向的词尾l音可能永远都不会实际演化成一个完全不带声的l音。不带声的词尾l音一经出现，就会在相关词里与中间的带声的l音交替使用，这很可能使其以类推的方式传播。结果就是A语言和B语言拥有了一个重要的共同的语音特征。长此以往，A和B的语音系统，只作为语音的集合来看的话，甚至可能完全彼此同化，尽管这在现实中是几乎从未被实现的极端案例。对于语音的这类交互影响而言，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每种语言都有保全其语音格局的强烈倾向。在不相关的语言中，只要相似的音各有不同的归属，只要这些音具有不同的“赋值”和“权重”，就不能说这些语言在实质上偏离了它们内在的沿流路线。在语音领域，就像在词汇领域一样，我们必须小心行事，避免夸大语言间交互影响的重要性。

I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in passing that English has taken over a certain number of morphological elements from French.

English also uses a number of affixes that are derived from Latin and Greek. Some of these foreign elements, like the *-ize* of *materialize* or the *-able* of *breakable* , are even productive to-day. Such examples as these are hardly true evidences of a morphological influence exerted by one language on another. Setting aside the fact that they belong to the sphere of derivational concepts and do not touch the central morphological problem of the expression of relational ideas, they have added nothing to the structural peculiarities of our language. English was already prepared for the relation of *pity* to *piteous* by such a native pair as *luck* and *lucky; material* and *materialize* merely swelled the ranks of a form pattern familiar from such instances as *wide* and *widen.* In other words, the morphological influence exerted by foreign languages on English, if it is to be gauged by such examples as I have cited, is hardly different in kind from the mere borrowing of word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uffix-*ize* made hardly more difference to the essential build of the language than did the mere fact that it incorporated a given number of words. Had English evolved a new future on the model of the synthetic future in French or had it borrowed from Latin and Greek their employment of reduplication as a functional device (Latin *tango: tetigi;* Greek*leipo: leloipa*), we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speak of true morphological influence. But such far—reaching influences are not demonstrable. Within the whole course of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we can hardly point to one important morphological change that was not determined by the native drift, though here and there we may surmise that this drift was hastened a little by the suggestive influence of French forms. [10_9]

我在上文已顺便提到英语从法语中吸收了一定数量的形态成分。英语还使用一些衍生自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缀。这些外来成分中，有

一些至今仍很多产，如materialize（物质化）中的-ize和breakable（易碎的）中的-able。但这类例子并不能算作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施加形态影响的真凭实据。它们属于衍生概念领域，并未触及关系概念的表达这一核心的形态问题；把这些搁置一边的话，它们其实并没有给英语添加什么结构上的特点。luck（运气）和lucky（幸运的）等本土词对已使英语早就做好准备接受pity（怜悯）与piteous（可怜的）的关系；而material（物质）和materialize（物质化）也不过是扩充了因wide（宽的）和widen（加宽）等例子在英语中已经习用的形式模式的行列而已。换句话说，外语对英语形态的影响，如果以我上述的例子来衡量的话，与单纯的借词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后缀-ize的引入并不比只是吸收几个外来词给英语的基本结构带来更多的变化。如果英语模仿法语的复合将来时演化出一种新的将来时，或者借鉴拉丁语和希腊语把重叠法用作功能手段（如拉丁语的*tango: tetigi* “我接触到”和“我已经接触到”；希腊语的*leipo: leloipa* “我离开”和“我已经离开”），那样的话我们才有理由谈论真正的形态影响。但是这样深远的影响无迹可寻。在整个英语史中，我们几乎找不出一次不是由英语本身的沿流所决定的重要的形态变化，尽管在有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猜测某个沿流在法语形式的暗示影响下加快了一点步伐。[11_9]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e continuous, self—contained morp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English and the very modest extent to which its fundamental build has been affected by influences from with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has sometimes been represented as though it relapsed into a kind of chaos on the arrival of the Normans, who proceeded to play nine-pins with the Anglo-saxon tradition. Students are more conservative today. That a far-reaching analytic developmen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such external foreign influence as English was subjected to is clear from the history of Danish, which has gone even further than English in certain leveling tendencies. English may be conveniently used as an

afortiori test. It was flooded with French loan-words during the later Middle Ages, at a time when its drift toward the analytic type was especially strong. It was therefore changing rapidly both within and on the surface. The wonder, then, is not that it took on a number of external morphological features, mere accretions on its concrete inventory, but that, exposed as it was to remolding influences, it remained so true to its own type and historic drift. The experience gained from the stud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strengthened by all that we know of documented linguistic history. Nowhere do we find any but superficial morphological interinfluencings. We may infer one of several things from this:—That a really serious morphological influence is not, perhaps, impossible, but that its operation is so slow that it has hardly ever had the chance to incorporate itself in the relatively small portion of linguistic history that lies open to inspection; or that there are certain favorable conditions that make for profound morphological disturbances from without, say a peculiar instability of linguistic type or an unusual degree of cultural contact, conditions that do not happen to be realized in our documentary material; or, finally, that we have not the right to assume that a language may easily exert a remolding morphological influence on another.

我们应该认识到，英语的形态演化具有连续性和自足性，而且其根本结构所受的外来影响非常有限。英语的历史有时被这样描述：似乎诺曼人一到，它就回到一种混乱局面，而诺曼人则着手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较上了劲。如今学者们变得比较慎重了。即使没有英语曾经历过的外来影响，一种深远的、趋向分析性的发展也会在英语中发生；这从丹麦语的历史中就能清晰地看到，后者在某些拉平的趋势上走得比英语还要远。英语也许可以被方便地用作一个加强例证。在中世纪后期，英语中充斥着法语借词，而那时英语朝着分析性类型发展的沿流格外强大。因此，彼时英语在内部和外部的变化都很迅速。但

令人称奇的并不是它吸收了一些外在的形态特征，在具体的资源库存上有了单纯的进账，而是像它那样暴露在外来的重塑影响之下，它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类型和历史沿流。我们从语言历史文献中所获知的一切强化了我们从英语研究中所得的经验。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只能发现浅层的语言形态上的交互影响。我们可以据此得出以下推论之一：1、真正严重的形态影响也许并非不可能，可是它的作用太慢，以至几乎没有机会将自己融入可供今人研究的相对短暂的这一部分语言历史中；2、某些能导致来自外部的、深刻的形态变动的有利条件是存在的，比如某种语言类型特别不稳定，或者某些文化接触的程度极不寻常，但是我们的文献恰好未记录这些条件；3、最后，或者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种语言能够轻易地对另一种语言施加重塑形态的影响。

Meanwhile we are confronted by the baffling fact that important traits of morphology are frequently found distributed among widely differing languages within a large area, so widely differing, indeed, that it is customary to consider them genetically unrelated. Sometimes we may suspect that the resemblance is due to a mere convergence, that a similar morphological feature has grown up independently in unrelated languages. Yet certain morphological distributions are too specific in character to be so lightly dismissed. There must be some historical factor to account for them. Now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the concept of a “linguistic stock” is never definitive [10_10] in an exclusive sense. We can only say, with reasonable certainty, that such and such languages are descended from a common source, but we cannot say that such and such other languages are not genetically related. All we can do is to say that the evidence for relationship is not cumulative enough to make the inference of common origin absolutely necessary. May it not be, then, that many instances of morphological similarity between divergent languages of a

restricted area are merely the last vestiges of a community of type and phonetic substance that the destructive work of diverging drifts has now made unrecognizable? There is probably still enough lexical and morphological resemblance between modern English and Irish to enable us to make out a fairly conclusive case for their genetic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the present-day descriptive evidence alone. It is true that the case would seem weak in comparison to the case that we can actually make with the help of the historical and the comparative data that we possess. It would not be a bad case nevertheless. In another two or three millennia, however, the points of resemblance are likely to have become so obliterated that English and Irish, in the absence of all but their own descriptive evidence, will have to be set down as “unrelated” languages. They will still have in common certain fundamental morphological features, but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know how to evaluate them. Only in the light of the contrastive perspective afforded by still more divergent languages, such as Basque and Finnish, will these vestigial resemblances receive their true historic value.

同时，我们还面对另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重要的形态特征往往分布在一个广大地区里差别很大的语言中，这些语言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通常会认为它们在起源上没有关联。有时我们会猜想这种相似性仅仅是一种不谋而合，是不相关的几种语言独立生发出了一种类似的形态特征。但是有些形态的分布太独特了，不容我们这样草率地将其丢开。要解释它们，一定需要某种历史因素。这里我们应该谨记：“语系”的概念从来不是明确的 [11_10] 、不具有排他性的。我们只能相对确定地说某些个语言源自一个共同的源头，但是我们不能说另外的某些个语言在起源上是不相关的。我们只能说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未积累足够的证据，不足以使我们绝对必然地得出同源的推断。那么，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不同语言之间的诸多形态相似

之处会不会不过是一个共同的类型和共同的语音物质的最后遗迹呢？而分歧沿流的破坏作用现在已令这些遗迹难以辨认？现代英语和爱尔兰语之间可能仍然存在足够的词汇和形态相似性，足以让我们仅凭今天的描述性证据就相当确定地推论它们在起源上的关系。诚然，比起我们凭借所掌握的历史资料和比较性资料可以实际做出的推断，这个推论似乎有些羸弱，但还不算牵强。然而，再过两三千年，英语和爱尔兰语之间的相似性可能已被磨蚀殆尽，以至于仅凭它们自身的描述性证据，它们将不得不被认定为“不相关的语言”。那时，它们仍将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形态特征，但是人们将很难知道如何对它们作出评判了。只有借助差异更大的语言——比如巴斯克语和芬兰语——提供的对比视角，这些残余的相似点才能体现出它们真正的历史价值。

I cannot but suspect that many of the more significant distributions of morphological similarities are to be explained as just such vestiges. The theory of “borrowing” seems totally inadequate to explain those fundamental features of structure, hidden away in the very core of the linguistic complex, that have been pointed out as common, say, to Semitic and Hamitic, to the various Soudanese languages, to Malayo-Polynesian and Mon—Khmer [10_11] and Munda, [10_12] to Athabaskan and Tlingit and Haida. We must not allow ourselves to be frightened away by the timidity of the specialists, who are often notably lacking in the sense of what I have called “contrastive perspective.”

我不能不设想，许多更加重要的形态相似点的分布都将被解释为这种残余。“借用”理论似乎完全不足以解释隐藏在语言这一复合体核心里的那些被指认为共享的、根本的结构特点，比如闪米特语和含米特语之间，各个苏丹语之间，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和孟高棉语 [11_11] 及蒙达语 [11_12] 之间，以及阿萨巴斯卡语和特林基特语及海达语之间。我们千万不要被专家的谨小慎微吓倒，他们经常明显地欠缺我所说

的“对比视角”。

Attempts have sometimes been made to expla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fundamental structural features by the theory of diffusion. We know that myths, religious ideas, typ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dustrial devices, and other features of culture may spread from point to point, gradually making themselves at home in cultures to which they were at one time alien. We also know that words may be diffused no less freely than cultural elements, that sounds also may be “borrowed,” and that even morphological elements may be taken over. We may go further and recognize that certain languages have, in all probability, taken on structural features owing to the suggestive influence of neighboring languages. An examination of such cases, [10_13] however, almost invariably reveals the significant fact that they are but superficial additions on the morphological kernel of the language. So long as such direct historical testimony as we have gives us no really convincing examples of profound morphological influence by diffusion, we shall do well not to put too much reliance in diffusion theories. On the whole, therefore, we shall ascribe the major concordances and divergences in linguistic form—phonetic pattern and morphology—to the autonomous drift of language, not to the complicating effect of single, diffused features that cluster now this way, now that. Language is probably the most self-contained, the most massively resistant of all social phenomena. It is easier to kill it off than to disintegrate its individual form.

人们有时会尝试用扩散理论来解释这些根本结构特征的分布。我们知道，神话、宗教思想、社会组织的类型、工业设施以及其他文化特征都可以从一个点传播到另一个点，并逐渐在各种原本陌生的文化

中扎下根。我们还知道，词汇可以自由地扩散，其程度不亚于文化成分，语音也能被“借用”，甚至形态成分也能被接收。再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由于临近语言的暗示影响，有些语言很可能已经吸收了一些外来的结构特征。然而，对这些案例的研究 [11_13] 几乎总会不可避免地揭示一个重要的事实：它们仅仅是附着在语言形态核心上的表层的添加物。只要我们所掌握的直接历史证据无法为我们提供真正有说服力的例子，证明扩散对形态具有深刻的影响力，我们就还是不要过度依赖扩散理论的好。因此，整体而言，我们应把语言形式——语音格局和形态——的主要一致性和分歧性归因于自主的语言沿流，而不是归因于某些单一的、扩散开来的、忽聚于此、忽聚于彼的特征所产生的复杂化效应。语言很可能是所有社会现象中自足性最强、抵抗力也最强的。消灭它比瓦解它的个体形式还要来得容易一些。

[10_1].The earlier students of English, however, grossly exaggerated the general "disintegrating" effect of French on middle English. English was moving fast toward a more analytic structure long before the French influence set in.

[10_2].For we still name our new scientific instruments and patent medicines from Greek and Latin.

[10_3].One might all but say, "has borrowed at all."

[10_4].See page 206.

[10_5].Ugro-Finnic and Turkish (Tartar)

[10_6].Probably, in Sweet's terminology, high-back (or, better, between back and "mixed" positions)-narrow-unrounded. It generally corresponds to an Indo-European long *u* .

[10_7].There seem to be analogous or partly analogous sounds in certain languages of the Caucasus.

[10_8].This can actually be demonstrated for one of the Athabaskan dialects of the Yukon.

[10_9].In the sphere of syntax one may point to certain French and Latin

influences, but it is doubtful if they ever reached deeper than the written language. Much of this type of influence belongs rather to literary style than to morphology proper.

[10_10].See page 163.

[10_11].A group of languages spoken in southeastern Asia, of which Khmer (Cambodgian) is the best known representative.

[10_12].A group of languages spoken in northeastern India.

[10_13].I have in mind, e.g., the presence of postpositions in Upper Chinook, a feature that is clear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neighboring Sahaptin languages; or the use by Takelma of instrumental prefixes, which are likely to have been suggested by neighboring "Hokan" languages (Shasta, Karok).

[11_1].然而，早期的英语研究者过分夸大了法语对中古英语的总体“瓦解”效应。事实上，早在法语开始施加影响之前，英语已经在朝着更具有分析性的结构快速发展了。

[11_2].要知道，我们至今仍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来为新的科学仪器和专利药物命名。

[11_3].几乎可以说：“根本没借过。”

[11_4].参见第206页。

[11_5].乌格罗-芬兰语和土耳其语（鞑靼语）

[11_6].照斯威特的说法，可能是高-后（或者更准确地说，介于后部和“混合”位置之间）-窄-非圆唇的。一般说来，它与印欧语中的长u音相对应。

[11_7].在高加索地区的某些语言中，似乎存在着类似或者部分类似的音。

[11_8].这可以在育空河地区的一种阿萨巴斯卡方言中得到证实。

[11_9].在句法领域可以找到某些法语和拉丁语的影响，但是它们是否曾达到比书面语更深刻的地步，是值得怀疑的。这类影响大多属于文学风格，而不是形态本身。

[11_10].详见第163页。

[11_11].东南亚的一组语言，其中高棉语（柬埔寨语）是最有名的代表。

[11_12].印度东北部的一组语言。

[11_13].我想到的有上奇努克语中存在的后置成分，这个特征很显然受到邻近的萨哈泼丁语的影响；又比如，塔克尔马语中表示工具格的前缀很可能受了邻近的“霍卡”语（莎士达语和卡罗克语）的影响。

Chapter 10 Language, Race and Culture

第十章　语言、种族和文化

Language has a setting. The people that speak it belong to a race (or a number of races), that is, to a group which is set off by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from other groups. Again, language does not exist apart from culture, that is, from the socially inherited assemblage of practices and beliefs that determines the texture of our lives. Anthropologists have been in the habit of studying man under the three rubrics of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ey do with a natural area like Africa or the South Seas is to map it out from this threefold point of view. These maps answer the questions: What and where are the major divisions of the human animal, biologically considered (e.g., Congo Negro, Egyptian White; Australian Black, Polynesian)? What are the most inclusive linguistic groupings, the “linguistic stocks,” and what is the distribution of each (e.g., the Hamitic languages of northern Africa, the Bantu languages of the south; the 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s of Indonesia, Melanesia, Micronesia, and Polynesia)? How do the peoples of the given area divide themselves as cultural beings? what are the outstanding “cultural areas” and what are the dominant ideas in each (e.g., the Mohammedan north of Africa; the primitive hunting, non-agricultural culture of the Bushmen in the south; the culture of the Australian natives, poor in physical respects but richly developed in ceremonialism; the more advanced and highly specialized culture of Polynesia)?

语言有其存在的环境。首先，说一种语言的人归属一个种族（或

几个种族），也就是说归属一个在生理特征上有别于其他群体的群体。再者，语言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也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传承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行为和信仰的集合。人类学家一直习惯于按照种族、语言和文化这三个纲目来研究人。在研究非洲或南太平洋这样的自然区域时，他们首先做的几件事之一就是按照这个三分视角对其进行绘图。绘出的地图回答如下问题：从生物学上看，人这种动物有哪几大类？分布在哪里（如非洲的刚果黑人、埃及白人；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黑人、波利尼西亚人）？范围最广的语言分组，即“语系”，是什么？每个分组怎样分布（如非洲北部的含米特语系、南部的班图语系；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某个区域内的民族，作为文化的人，如何进行分类？有哪些显著的“文化区”？每个文化区的主导思想是什么（比如非洲北部的伊斯兰教文化，南部布希曼人的原始狩猎、非农业文化；澳大利亚土著的物质贫乏但是礼仪高度发达的文化；波利尼西亚的比较先进且高度专门化的文化）？

The man in the street does not stop to analyze his position in the general scheme of humanity. He feels that he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some strongly integrated portion of humanity—now thought of as a “nationality,” now as a “race”—and that everything that pertains to him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is large group somehow belongs together. If he is an Englishman, he feels himself to be a member of the “Anglo-saxon” race, the “genius” of which race has fashioned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the “Anglo-saxon” culture of which the language is the expression. Science is colder. It inquires if these three types of classification—racial, linguistic, and cultural—are congruent, if their association is an inherently necessary one or is merely a matter of external history. The answer to the inquiry is not encouraging to “race” sentimentalists. Historians and anthropologists find that race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re not distributed in parallel fashion, that

their areas of distribution intercross in the most bewildering fashion, and that the history of each is apt to follow a distinctive course. Races intermingle in a way that languages do not. On the other hand, languages may spread far beyond their original home, invading the territory of new races and of new culture spheres. A language may even die out in its primary area and live on among peoples violently hostile to the persons of its original speakers. Further, the accidents of history are constantly rearranging the borders of culture areas without necessarily effacing the existing linguistic cleavages. If we can once thoroughly convince ourselves that race, in its only intelligible, that is biological, sense, is supremely indifferent to the histor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at these are no more directly explainable on the score of race than on that of the laws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we shall have gained a viewpoint that allows a certain interest to such mystic slogans as Slavophilism, Anglo-saxondom, Teutonism, and the Latin genius but that quite refuses to be taken in by any of them. A careful study of linguistic distributions and of the history of such distributions is one of the driest of commentaries on these sentimental creeds.

普通老百姓不会去分析在人类的总谱系上自己所处的位置。他只是觉得自己代表着人类某个紧密结合的部分——有时被视为“民族”，有时又被视为“种族”——而且使他成为这个大群体的典型代表的所有东西都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如果他是英国人，他会觉得自己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一员，这个种族的“天才”创造出了英语以及英语所表达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科学则比较冷静。它会探究这三种分类法——种族的、语言的和文化的——是否一致，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有内在必要的还是只是一种历史表象。科学探究得出的答案对于“种族”狂热者未免扫兴。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发现，种族、语言和文化并不是平行分布的，它们分布的区域纵横交错，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各自的历史也倾向于按照不同的路线前进。语言不会以种族混合

的方式混合；反过来说，语言也可能远离祖籍，散播四方，侵入新种族和新文化范畴的领地。一种语言甚至可能在原产地绝迹，却继续存活在十分敌视该语言最初的母语者的人群中。再者，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在不断重划文化区域的疆界，却不一定抹掉已有的语言分界。一旦我们能完全确信，种族，在其唯一可解的意义即生物学意义上，对语言和文化的历史毫无兴趣；确信这些不能直接用种族来解释，正如不能用物理和化学的定律来解释一样，那么我们就会获得这样一种视角，会对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条顿民族优越论[12_1] 和拉丁天才等神秘口号产生一定的兴趣，却又不至于被其中任何一个所蒙骗。对语言的分布和语言分布的历史做一番仔细研究便是对上述狂热信条的一种最平实的注解。

That a group of languages need not in the least correspond to a racial group or a culture area is easily demonstrated. We may even show how a single language intercrosses with race and culture lines.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not spoken by a unifie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everal millions of negroes who know no other language. It is their mother—tongue, the formal vesture of their inmost thoughts and sentiments. It is as much their property, as inalienably “theirs,” as the King of England's. Nor do the English-speaking whites of America constitute a definite race except by way of contrast to the negroes. Of the three fundamental white races in Europe generally recognized by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the Baltic or North European, the Alpine, and the Mediterranean—each has numerous English-speaking representatives in America. But does not the historical core of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those relatively “unmixed” populations that still reside in England and its colonies, represent a race, pure and single? I cannot see that the evidence points that way. The English people are an amalgam of many distinct strains. Besides the old “Anglo-saxon,” in other words North German, element which is conventionally represented as the basic

strain, the English blood comprises Norman French, [11_1] Scandinavian, “Celtic,“ [11_2] and pre-Celtic elements. If by “English” we mean also Scotch and Irish, [11_3] then the term “Celtic” is loosely used for at least two quite distinct racial elements—the short, dark-complexioned type of Wales and the taller, lighter, often ruddy-haired type of the Highlands and parts of Ireland. Even if we confine ourselves to the Saxon element, which, needless to say, nowhere appears “pure,” we are not at the end of our troubles. We may roughly identify this strain with the racial type now predominant in southern Denmark and adjoining parts of northern Germany. If so, we must content ourselves with the reflection that while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historically most closely affiliated with Frisian, in second degree with the other West Germanic dialects (Low Saxon or “Plattdeutsch,” Dutch, High German), only in third degree with Scandinavian, the specific “Saxon” racial type that overran England in the fifth and sixth centuries was largely the same as that now represented by the Danes, who speak a Scandinavian language, while the High German-speaking population of central and southern Germany [11_4] is markedly distinct.

一组语言完全不需要与一个种族群体或一个文化区域相对应，这是很容易证明的。我们甚至可以指出一种语言如何与种族和文化的脉络相互交错。比如，说英语的人就不构成一个统一的种族。在美国，有数百万黑人不会说别的语言。英语就是他们的母语，是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和情感的形式外衣。英语是“他们的”财产，是不可剥夺的，就像对于英格兰国王一样。说英语的美国白人也并不构成一个确定的种族，除了相对于黑人而言。为人体人类学家所普遍承认的欧洲的三个基本的白人种族——波罗的海或北欧族、阿尔卑斯山族和地中海族——每一个在美国都拥有大量的说英语的代表。但是，说英语的民族的历史核心，即那些仍然居住在英国及其殖民地、相对“未混

种”的人群，难道不是代表一个纯粹、单一的种族么？我看不出证据是指向这一点。英国人是很多不同支系的混合体。除了传统上被视为基本支系的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成分，换言之即北日耳曼成分，英国人的血统里还包括诺曼法国人 [12_2] 、斯堪的纳维亚人、“凯尔特人” [12_3] 和先凯尔特人等成分。如果我们说的“英国人”把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也算了进来 [12_4] ，那么“凯尔特人”这个名称还被宽泛地用于指代至少两个差异颇大的种族成分——身材矮小、肤色较深的威尔士类型，和身材较高、肤色较浅、多为红发的苏格兰高地和爱尔兰部分地区的类型。即使我们只讨论撒克逊成分——不用说也绝不是“纯粹的”——我们也无法摆脱困扰。我们可以大致把这一支系等同为现在主要分布在丹麦南部和毗邻的德国北部的那个种族类型。果真如此，我们就只能这么想了：虽然在历史上和英语关系最近的首先是弗里斯兰语，其次是其他的西日耳曼语方言（低地撒克逊语或“低地德语”、荷兰语和高地德语），再其次才是斯堪的纳维亚语，但是在公元五世纪和六世纪横行英格兰的那个“撒克逊”种族类型居然和现在说斯堪的纳维亚语、以丹麦人为代表的种族类型大体一样，而德国中部和南部说高地德语的人 [12_5] 反倒与他们有明显的区别。

But what if we ignore these finer distinctions and simply assume that the “Teutonic” or Baltic or North European racial type coincided in its distribution with that of the Germanic languages? Are we not on safe ground then? No, we are now in hotter water than ever. First of all, the mass of the German-speaking population (central and southern Germany, German Switzerland, German Austria) do not belong to the tall, blond-haired, long-headed [11_5] “Teutonic” race at all, but to the shorter, darker-complexioned, short-headed [11_6] Alpine race, of which the central population of France, the French Swiss, and many of the western and northern Slavs (e.g., Bohemians and Poles) are equally good representativ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Alpine” populations corresponds in part to that of the old continental “Celts,” whose language has

everywhere given way to Italic, Germanic, and Slavic pressure. We shall do well to avoid speaking of a “Celtic race,” but if we were driven to give the term a content, it would probably be more appropriate to apply it to, roughly, the western portion of the Alpine peoples than to the two island types that I referred to before. These latter were certainly “Celticized,” in speech and, partly, in blood, precisely as, centuries later, most of England and part of Scotland was “Teutonized” by the Angles and Saxons. Linguistically speaking, the “Celts” of to-day (Irish Gaelic, Manx, Scotch Gaelic, Welsh, Breton) are Celtic and most of the Germans of to-day are Germanic precisely as the American Negro, Americanized Jew, Minnesota Swede, and German-American are “English.” But, secondly, the Baltic race was, and is, by no means an exclusively Germanic-speaking people. The northernmost “Celts,” such as the Highland Scotch, are in all probability a specialized offshoot of this race. What these people spoke before they were Celticized nobody knows, but there is nothing whatever to indicate that they spoke a Germanic language. Their language may quite well have been as remote from any known Indo-European idiom as are Basque and Turkish to-day. Again, to the east of the Scandinavians are non-Germanic members of the race—the Finns and related peoples, speaking languages that are not definitely known to be related to Indo-European at all.

但是，如果我们忽视这些细枝末节的差异，偏要假定“条顿”或波罗的海或北欧的种族类型在分布上与各日耳曼语言一致，那又如何呢？那样我们不就安稳了么？其实不然，那样我们的处境反而更糟。首先，大多数说德语的人（德国中部和南部、瑞士德语区、奥地利德语区）根本不属于身材高大、金发、长头 [12_6] 的“条顿”人种，而是属于身材较矮、肤色较深、短头 [12_7] 的阿尔卑斯人种，法国中部的居民、说法语的瑞士人以及欧洲西部和北部的很多斯拉夫人（如波希

米亚人和波兰人）都是后面这一人种的同样典型的代表。这些“阿尔卑斯”人群的分布部分地与古代欧洲大陆“凯尔特人”的分布一致，后者的语言在各处都已屈服于意大利语、日耳曼语和斯拉夫语的压力。我们最好避免提什么“凯尔特种族”，但是如果非要给这个名称赋予一点内容的话，那么更恰当的做法或许是用它泛指西部的阿尔卑斯人群，而不是此前提到的两个岛屿类型即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这后两种类型，在言语上，以及部分地在血统上，当然已被“凯尔特化”了，恰如几百年后英格兰大部和苏格兰的一部分被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条顿化”了一样。从语言上来说，今天的“凯尔特人”（爱尔兰的盖尔人、马恩岛人、苏格兰的盖尔人、威尔士人和布列塔尼人）是凯尔特的，而今天的大多数德国人则完全是日耳曼的，正如美国黑人、美国化了的犹太人、明尼苏达州的瑞典人和德裔美国人是“英吉利的”一样。但是，随即而来的问题是，波罗的海人种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个只说日耳曼语的人群。最北部的“凯尔特人”，如高地苏格兰人，十之八九是这个种族一个高度分化的分支。没有人知道这些人在被凯尔特化之前说什么语言，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说的是一种日耳曼语。他们的语言很可能与任何已知的印欧话都相去甚远，就像今天的巴斯克语和土耳其语一样。此外，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东边还有该人种的非日耳曼语成员——芬兰人和相关人群，他们说的语言与印欧语究竟有没有关系现在还无法确定。

We cannot stop here.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the Germanic languages is such [11_7] as to make it highly probable that they represent but an outlying transfer of an Indo—European dialect (possibly a Celto-Italic prototype) to a Baltic people speaking a language or a group of languages that was alien to Indo-European. [11_8] Not only, then, is English not spoken by a unified race at present but its prototype, more likely than not, was originally a foreign language to the race with which English is more particularly associated. We need not seriously entertain the idea that English or the group of languages to which it belongs is in any intelligible

sense the expression of race, that there are embedded in it qualities that reflect the temperament or “genius” of a particular breed of human beings.

我们不能就此打住。日耳曼语的地理位置 [12_8] 让人猜测它们很可能只是代表一种印欧语方言（可能是凯尔特-意大利语的一种原型）在外围地区向某个波罗的海人群的迁移，后者原来说的是不同于印欧语的一种或一组语言。 [12_9] 所以，不仅现在说英语的不是一个统一的种族，而且英语的原型对于现在与英语特别联系在一起的种族来说最初也很可能是一门外语。对下面这一观点我们无需认真咂摸：英语或者它所归属的语群在任何可理解的意义上是种族的表达，英语所蕴含的某些特质能反映人类某个特殊血统的气质或“天赋”。

Many other, and more striking, examples of the lack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ace and language could be given if space permitted. One instance will do for many. The 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s form a well-defined group that takes in the southern end of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the tremendous island world to the south and east (except Australia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New Guinea). In this vast region we find represented no less than three distinct races—the Negro—like Papuans of New Guinea and Melanesia, the Malay race of Indonesia, and the Polynesians of the outer islands. The Polynesians and Malays all speak languages of the Malayo—Polynesian group, while the languages of the Papuans belong partly to this group (Melanesian), partly to the unrelated languages (“Papuan”) of New Guinea. [11_9]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greatest race cleavage in this region lies between the Papuans and the Polynesians, the major linguistic division is of Malayan on the one side, Melanesian and Polynesian on the other.

如果篇幅允许，我可以举出很多别的更加突出的例子，来证明种族和语言之间并无对应。现在再举一例就够了。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构成一个界限分明的语系，覆盖马来半岛南端以及半岛以南和以东巨大的岛屿世界（除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大部）。我们发现住在这片辽阔地区的人群至少代表了三个不同的种族——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的像黑人的巴布亚人、印度尼西亚的马来人种和外围诸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和马来人说的都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语言，而巴布亚人的语言一部分属于这一语族（美拉尼西亚语），一部分则属于新几内亚的不相关的语族（“巴布亚语”）。 [12_10] 尽管这个地区最主要的种族界线划在巴布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之间，但是主要的语言分界却是马来语为一方，美拉尼西亚语和波利尼西亚语为另一方。

As with race, so with culture. Particularly in more primitive levels, where the secondarily unifying power of the “national” [11_10] ideal does not arise to disturb the flow of what we might call natural distributions, is it easy to show that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not intrinsically associated. Totally unrelated languages share in one culture, closely related languages—even a single language—belong to distinct culture spheres. There are many excellent examples in aboriginal America. The Athabaskan languages form as clearly unified, as structurally specialized, a group as any that I know of. [11_11] The speakers of these languages belong to four distinct culture areas—the simple hunting culture of western Canada and the interior of Alaska (Loucheux, Chipewyan), the buffalo culture of the Plains (Sarcee), the highly ritualized culture of the southwest (Navaho), and the peculiarly specialized culture of northwestern California (Hupa). The cultural adaptability of the Athabaskan-speaking peoples is in the strangest contrast to the inaccessibility to foreign influences of the languages themselves. [11_12] The Hupa Indians are very typical of the culture area to

which they belong. Culturally identical with them are the neighboring Yurok and Karok. There is the liveliest intertribal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Hupa, Yurok, and Karok, so much so that all three generally attend an important religious ceremony given by any one of them. It is difficult to say what elements in their combined culture belong in origin to this tribe or that, so much at one are they in communal action, feeling, and thought. But their languages are not merely alien to each other; they belong to three of the major American linguistic groups, each with an immense distribution on the northern continent. Hupa, as we have seen, is Athabaskan and, as such, is also distantly related to Haida (Queen Charlotte Islands) and Tlingit (southern Alaska); Yurok is one of the two isolated Californian languages of the Algonkin stock,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which lies in the region of the Great Lakes; Karok is the northernmost member of the Hokan group, which stretches far to the south beyond the confines of California and has remoter relatives along the Gulf of Mexico.

种族是这样，文化亦复如是。尤其是在较原始的层面上——“民族”[12_11] 理想这种次生的统一力量还未兴起，不至干扰我们可称为自然分布的语言和文化潮流——很容易证明语言和文化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完全不相关的语言可能共享同一种文化，而密切相关的语言——甚至同一种语言——却属于不同的文化圈。这方面土著美洲有很多绝佳的例子。阿萨巴斯卡语言形成了一个明确统一且结构上特殊化的语族，不亚于我所知的任何其他语族。[12_12] 但是，说阿萨巴斯卡语的人属于四个不同的文化区——加拿大西部和阿拉斯加内陆简单的狩猎文化（鲁丘克斯人和奇佩维安人）、平原地区的野牛文化（萨尔西人）、西南地区高度礼仪化的文化（纳瓦霍人）以及加利福尼亚西北部极为独特的文化（胡帕人）。说阿萨巴斯卡语的人群对文化的适应性与阿萨巴斯卡语言本身对外来影响的抗拒性形成了最奇怪的对比。[12_13] 胡帕印第安人在他们所属的文化区是非常典型的。邻近的尤罗

克人和卡罗克人在文化上与他们相同。胡帕人、尤罗克人和卡罗克人的部落间交流非常活跃，以至于其中任何一个部落举行重大宗教仪式时，另外两个部落一般都会参加。很难说他们的联合文化中哪些成分来源于哪个部落，因为他们在集体行动、感情和思想上是如此如出一辙。但是，他们的语言不仅互不相同，而且分属三个主要的美洲语族，每一个在北美洲都有广泛的分布。如前所述，胡帕语是一种阿萨巴斯卡语，因此是（夏洛特皇后群岛上的）海达语以及（阿拉斯加南部的）特林基特语的远亲；尤罗克语是阿尔贡金语支在加利福尼亚的两个孤立的语言之一，该语支的引力中心位于五大湖区；卡罗克语则是霍卡语族最北部的成员，该语族跨越加利福尼亚，一直延伸至南部，沿墨西哥湾都有其更远的亲族。

Returning to English, most of us would readily admit, I believe, that the community of language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far from arguing a like community of culture. It is customary to say that they possess a common “Anglo-saxon” cultural heritage, but are not m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ife and feeling obscured by the tendency of the “cultured” to take this common heritage too much for granted? In so far as America is still specifically “English,” it is only colonially or vestigially so; its prevailing cultural drift is partly towards autonomous and distinctive developments, partly towards immersion in the larger European culture of which that of England is only a particular facet. We cannot deny that the possession of a common language is still and will long continue to be a smoother of the way to a mutual cultur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England and America, but it is very clear that other factors, some of them rapidly cumulative, are working powerfully to counteract this leveling influence. A common language cannot indefinitely set the seal on a common culture when the geographi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he culture are no longer the same throughout its area.

回来说英语。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乐意承认，英国和美国拥有共同的语言远不能作为它们拥有共同文化的论据。我们常说这两国拥有一个共同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有文化的人”把这种共同的传统视为当然，但是难道这一倾向没有掩盖很多生活上和感情上的重要差异么？即使说美国仍然是特别“英吉利式的”，那也只是在殖民意义或残余意义上；美国的文化主流一部分趋向自治和独特的发展，一部分趋向与泛欧洲文化的融合，而英国文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否认，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在现在和将来都会长久地为英国和美国在文化上的互谅铺平道路，但显而易见的是其他因素正有力地抗击这一拉平趋势，且其中有些因素正在快速地累积。如果决定文化的地理、政治和经济因素在整个地区不再相同，那么共同的语言也不能无限期地印证文化的共享。

Language, race, and culture are not necessarily correlated.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never are. There is some tendency, as a matter of fact, for racial and cultural lines of cleavage to correspond to linguistic ones, though in any given case the latter may not be of the same degree of importance as the others. Thus, there is a fairly definite line of cleavage between the Polynesian languages, race, and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and those of the Melanesians on the other, in spite of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overlapping. [11_13] The racial and cultural division, however, particularly the former, are of major importance, while the linguistic division is of quite minor significance, the Polynesian languages constituting hardly more than a special dialectic subdivision of the combined Melanesian-Polynesian group. Still clearer—cut coincidences of cleavage may be found. The language, race, and culture of the Eskimo are markedly distinct from those of their neighbors; [11_14] in southern Africa the language, race, and culture of the Bushmen offer an even stronger contrast to those of their Bantu neighbors. Coincidences of

this sort are of the greatest significance, of course, but this significance is not one of inherent psycho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three factors of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coincidences of cleavage point merely to a readily intelligibl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If the Bantu and Bushmen are so sharply differentiated in all respects, the reason is simply that the former are relatively recent arrivals in southern Africa. The two peoples developed in complete isolation from each other; their present propinquity is too recent for the slow process of cultural and racial assimilation to have set in very powerfully. As we go back in time, we shall have to assume that relatively scanty populations occupied large territories for untold generations and that contact with other masses of population was not as insistent and prolonged as it later became. The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isolation that brought about race differentiations was naturally favorable also to far-reaching variations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very fact that races and cultures which are brought into historical contact tend to assimilate in the long run, while neighboring languages assimilate each other only casually and in superficial respects [11_15] ,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no profound causal 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nd the specific development of race and of culture.

语言、种族和文化不一定互相关联。这并不是说它们从不互相关联。实际上，种族及文化的分界线的确有跟语言的分界线相呼应的趋势，虽然后者可能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前两者同样重要。例如，波利尼西亚人的语言、种族和文化与美拉尼西亚人的语言、种族和文化之间有一条相当明确的分界线，尽管重合之处也着实不少。 [12_14] 但是，种族和文化的区分，尤其是前者，更加重要，而语言上的区分则比较次要；波利尼西亚人的语言最多只是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联合语族的一个特殊的方言分支。我们还能找到更加清晰的种族、文化和语言界线偶合的例子。爱斯基摩人的语言、种族和文化与他们的邻居

截然不同[12_15]；而非洲南部布须曼人的语言、种族和文化与他们的邻居班图人甚至形成了更加强烈的对比。这种偶合当然具有极大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并不关涉种族、语言和文化这三个因素之间内在的心理关系。分界线的偶合不过指向一种容易理解的历史联系。如果说班图人和布须曼人在各方面都截然不同，那么原因只是前者来到非洲南部的时间相对较晚而已。这两个民族在彼此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发展，他们现在的毗邻发生得太晚，以至于文化和种族同化的缓慢过程还来不及产生有力的影响。我们如果在时间上往前倒推，就不得不假定相对稀少的人口世世代代占据着广袤的土地，他们与其他人口聚落的接触并不像后世那样急切和持久。地理和历史上的隔绝带来了种族上的区分，自然也有利于语言和文化上的深远差异。历史上产生接触的种族和文化久而久之倾向于同化，而邻近的语言只是偶然在表面上互相同化[12_16]，这一事实本身即说明语言的发展与种族及文化的特定发展之间并没有深刻的因果关系。

But surely, the wary reader will object, there must be som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between language and at least that intangible aspect of race that we call “temperament”. Is it not inconceivable that the particular collective qualities of mind that have fashioned a culture are not precisely the same a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growth of a particular linguistic morphology? This question takes us into the heart of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s of social psychology. It is doubtful if any one has yet attained to sufficient clarity on the nature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on the ultimate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volved i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rifts to answer it intelligently. I can only very briefly set forth my own views, or rather my general attitude.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prove that “temperament”, the general emotional disposition of a people[11_16], is basic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slant and drift of a culture, however much it may manifest itself in an individual's handling of the elements of that culture. But granted that

temperament has a certain value for the shaping of culture, difficult though it be to say just how,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it has the same value for the shaping of language. It is impossible to show that the form of a language has the slightest connection with national temperament. Its line of variation, its drift, runs inexorably in the channel ordained for it by its historic antecedents; it is as regardless of the feelings and sentiments of its speakers as is the course of a river of the atmospheric humors of the landscape. I am convinced that it is futile to look in linguistic structure for differences corresponding to the temperamental variations which are supposed to be correlated with race.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well to remember that the emotional aspect of our psychic life is but meagerly expressed in the build of language [11_17] .

但是，机警的读者肯定要反驳了：语言和文化之间，以及语言和种族之间——至少是跟那个不可捉摸的、被称为“气质”的种族方面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形成一种文化的特殊的集体心理品质竟然不是完全等同于生成一种特殊语言形态的集体心理品质，这岂不是不可思议？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社会心理学的最大难题的中心。我很怀疑迄今为止有什么人已经充分理解了语言和文化沿流所涉及的历史进程的性质和最终的心理因素，从而能够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简单地说一说我自己的观点，或者不如说我的大致态度。很难证明“气质”，即一个民族总的情感倾向 [12_17] ，基本上决定了一个文化的走向和沿流，不论在个人处理文化成分时气质会怎样多地显露出来。即使气质对文化的形成确有一定的作用——虽然很难说它究竟是如何作用的——也不能就此声称它对语言的形成产生了同样的作用。我们无法证明一种语言的形式与民族气质有任何些微的联系。语言的变异之线，语言的沿流，顺着历史先例为它划定的渠道无情地奔流；它毫不在乎使用者的感情和情绪，正如一条河的河道毫不在乎沿途的大气湿度。我相信，在语言结构中寻找差异以便与据说和种族有关的气质差异相对应，那是徒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最好记住：我们精神

生活的情绪方面很少在语言的架构中得以表现 [12_18] 。

Language and our thought—grooves are inextricably interwoven, are, in a sense, one and the same. As there is nothing to sh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racial differences in the fundamental conformation of thought, it follows that the infinite variability of linguistic form, another name for the infinite variability of the actual process of thought, cannot be an index of such significant racial differences. This is only apparently a paradox. The latent content of all languages is the same—the intuitive *science* of experience. It is the manifest form that is never twice the same, for this form, which we call linguistic morphology, is nothing more nor less than a collective *art* of thought, an *art* denuded of the irrelevancies of individual sentiment. At last analysis, then, language can no more flow from race as such than can the sonnet form.

语言和我们的思路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是一回事。既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基本的思维结构上存在重要的种族差异，那么语言形式的无穷变异，换言之实际思维过程的无穷变异，也同样不能昭示如此重要的种族差异。这样说只在表面上是诡辩。所有语言的潜在内容都是相同的——都是经验的直觉科学。从来不会相同的是语言的外在形式，因为这个形式，即我们所说的语言形态，不多不少恰是一种思维的集体艺术，一种脱掉了不相干的个人情绪的艺术。所以，分析到最后，语言不可能是从种族本身流淌出来的，就像十四行诗的形式不可能是从种族本身流淌出来的一样。

Nor can I believe that culture and language are in any true sense causally related. Culture may be defined as *what* a society

does and thinks. Language is a particular *how* of thought. It is difficult to see what particular causal relations may be expected to subsist between a selected inventory of experience (culture, a significant selection made by society) and the particular manner in which the society expresses all experience. The drift of culture, another way of saying history, is a complex series of changes in society's selected inventory—additions, losses, changes of emphasis and relation. The drift of language is not properly concerned with changes of content at all, merely with changes in formal expression. It is possible, in thought, to change every sound, word, and concrete concept of a language without changing its inner actuality in the least, just as one can pour into a fixed mold water or plaster or molten gold. If it can be shown that culture has an innate form, a series of contours, quite apart from subject—matter of any description whatsoever, we have a something in culture that may serve as a term of comparison with and possibly a means of relating it to language. But until such purely formal patterns of culture are discovered and laid bare, we shall do well to hold the drifts of language and of culture to be non-comparable and unrelated processes. From this it follows that all attempts to connect particular types of linguistic morphology with certain correlated stage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re vain. Rightly understood, such correlations are rubbish. The merest *coup d'oeil* verifies our theoretical argument on this point. Both simple and complex types of language of an indefinite number of varieties may be found spoken at any desired level of cultural advance. When it comes to linguistic form, Plato walks with the Macedonian swineherd, Confucius with the head—hunting savage of Assam.

我也不相信文化和语言之间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文化可以定义为一个社会做什么和思考什么。语言则是指具体如何思考。

很难想象一个社会挑选出的经验清单（即文化，社会所做的重要选择）与其表达所有经验的具体方式即语言之间会有什么特殊的因果关系。文化的沿流，换言之就是历史，是社会择取的经验清单里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增添，丢失，以及重点和关系上的变化。语言的沿流根本不关涉内容的变化，而只关涉形式表达的变化。在臆想中，我们可以改变一种语言的每一个声音、单词和具体概念，却丝毫不改变其内在的现实，就像我们可以往一个固定的模子里注入水或石膏或金水一样。如果可以证明文化有一种内在的形式，一套范式，独立于一切种类的具体内容之外，那么我们就在文化里找到了某种东西，可以作为跟语言进行类比的条件，以及一种可能和语言建立起关系的手段。但是，在发现和揭示这些纯形式性的文化模式之前，我们还是把语言和文化的沿流当作不可比、不相关的过程的好。由此可推知，所有试图把语言形态的某些类型与文化发展的某些相关阶段联系起来的努力都是徒劳。公平地说，这些联系都是无稽之谈。匆匆一瞥就能证明我们在这一点上的理论推论。在任何可拟想的文化进程的水平上都可以发现无数形形色色的简单或复杂的语言类型。就语言形式而言，柏拉图和马其顿的牧猪奴同行，而孔子和阿萨姆的野蛮食人族同行。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mere content of language is intimately related to culture. A society that has no knowledge of theosophy need have no name for it; aborigines that had never seen or heard of a horse were compelled to invent or borrow a word for the animal when they made his acquaintance. In the sense that the vocabulary of a language more or less faithfully reflects the culture whose purposes it serves it is perfectly true that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and the history of culture move along parallel lines. But this superficial and extraneous kind of parallelism is of no real interest to the linguist except in so far as the growth or borrowing of new words incidentally throws light on the formal trends of the language. The linguistic student should never make the mistake of

identifying a language with its dictionary.

不用说，语言内容本身是和文化密切相关的。不懂得通神论[12_19] 的社会就无需通神论这个名称；而从未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著人在初次见到这种动物时，只能发明或借用一个词为其命名。如果说一种语言的词汇或多或少忠实反映了它所服务的文化，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肤浅、外在的平行对语言学者来说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只除了新词的产生和借用偶尔会照射出语言形式上的趋势。语言学者切不可错把一种语言和一种语言的词典混为一谈。

If both this and the preceding chapter have been largely negative in their contentions, I believe that they have been healthily so. There is perhaps no better way to learn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speech than to realize what it is not and what it does not do. Its superficial connections with other historic processes are so close that it needs to be shaken free of them if we are to see it in its own right.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so far seen to be true of language points to the fact that i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colossal work that the human spirit has evolved—nothing short of a finished form of expression for all communicable experience. This form may be endlessly varied by the individual without thereby losing its distinctive contours; and it is constantly reshaping itself as is all art. Language is the most massive and inclusive art we know, a mountainous and anonymous work of unconscious generations.

也许本章和前一章的观点多是负面的，但我认为这些负面观点是有益的。要想了解言语的根本性质，最好的方式大概莫过于弄清楚它不是什么，不做什么。它与其他历史进程在表面上的纠葛如此紧密，

以至于我们若想看清它的真实面目就必须摆脱这些纠葛。我们迄今看到的真正属于语言的一切都指向一点：语言是人类精神演化出的最重要、最伟大的成果——它不啻一个完满的表达形式，可用于所有可交流的经验。这个形式可以在个体的使用中产生无穷的变化，却不会因此失去其独特的架构；而且它还像所有艺术一样，在不断地重塑自身。语言是我们已知的最宏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的无名氏无意识的努力创造出的伟大成果。

[11_1].Itself an amalgam of North "French" and Scandinavian elements.

[11_2].The "Celtic" blood of what is now England and Wales is by no means confined to the Celtic-speaking regions—Wales and, until recently, Cornwall.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invading Germanic tribes (Angles, Saxons, Jutes) did not exterminate the Brythonic Celts of England nor yet drive them altogether into Wales and Cornwall (there has been far too much "driving" of conquered peoples into mountain fastnesses and land's ends in our histories), but simply intermingled with them and imposed their rule and language upon them.

[11_3].In practice these three peoples can hardly be kept altogether distinct. The terms have rather a local-sentimental than a clearly racial value. Intermarriage has gone on steadily for centuries and it is only in certain outlying regions that we get relatively pure types, e.g., the Highland Scotch of the Hebrides. In America, English, Scotch, and Irish strands have become inextricably interwoven.

[11_4].The High German now spoken in northern Germany is not of great age, but is due to the spread of standardized German, based on Upper Saxon, a High German dialect, at the expense of "Plattdeutsch."

[11_5]."Dolichocephalic."

[11_6]."Brachycephalic."

[11_7].By working back from such data as we possess we can make it probable that these languages were originally confined to a comparatively small area in northern Germany and Scandinavia. This area is clearly marginal to the total area of distribution of the Indo-European-speaking peoples. Their center of gravity, say 1000 B.C., seems to have lain in southern Russia.

[11_8].While this is only a theory, the technical evidence for it is stronger than one might suppose. There are a surprising number of common and characteristic Germanic words which cannot be connected with known Indo-European radical elements and which may well be survivals of the hypothetical pre-Germanic language; such are *house* , *stone* , *sea* , *wife* (German *Haus* , *Stein* , *See* , *Weib*).

[11_9].Only the easternmost part of this island is occupied by Melanesian-speaking Papuans.

[11_10].A "nationality" is a major, sentimentally unified, group. The historical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feeling of national unity are various—political, cultural, linguistic, geographic, sometimes specifically religious. True racial factors also may enter in, though the accent on "race" has generally a psychological rather than a strictly biological value. In an area dominated by the national sentiment there is a tendency for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become uniform and specific, so that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at least tend to coincide. Even at best, however, the linguistic unification is never absolute, while the cultural unity is apt to be superficial, of a quasi-political nature, rather than deep and far-reaching.

[11_11].The Semitic languages, idiosyncratic as they are, are no more definitely ear-marked.

[11_12].See page 209.

[11_13].The Fijians, for instance, while of Papuan (negroid) race, are Polynesian rather than Melanesian in their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affinities.

[11_14].Though even here there is some significant overlapping. The southernmost Eskimo of Alaska were assimilated in culture to their Tlingit neighbors. In northeastern Siberia, too, there is no sharp cultural line between the Eskimo and the Chukchi.

[11_15].The supersession of one language by another is of course not truly a matter of linguistic assimilation.

[11_16]."Temperament" is a difficult term to work with. A great deal of what is loosely charged to national "temperament" is really nothing but customary behavior,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ideals of conduct. In a culture, for instance, that does not look kindly upon demonstrativeness, the natural tendency to the display of emotion becomes more than normally inhibited. It would be quite misleading to argue from

the customary inhibition, a cultural fact, to the native temperament. But ordinarily we can get at human conduct only as it is culturally modified. Temperament in the raw is a highly elusive thing.

[11_17].See pages 39, 40.

[12_1].译者注：条顿是古代日耳曼人中的一个分支，常以条顿人泛指日耳曼人及其后裔，或是直接以此称呼德国人。

[12_2].它本身又是北“法兰西”和斯堪的纳维亚成分的混合。

[12_3].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凯尔特”血统绝不限于说凯尔特语的地区——威尔士以及直到近期的康沃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入侵的日耳曼部落（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并没有把英格兰的布立吞（译者注：布立吞语是古凯尔特语的一支，布立吞意为“古不列颠人”)。凯尔特人赶尽杀绝，也没有把他们全部赶到威尔士和康沃尔（在我们的历史上已经有太多把被征服民族赶到山间地角去的事情了），而只是与他们混居，并把自己的统治和语言强加于他们。

[12_4].实际上很难把这三个民族完全分开。这几个名称更多携带的是地域情感意义，而非清晰的种族意义。民族间的通婚已稳定地持续了数百年，现在只在某些偏远地区才能找到相对纯粹的人种，比如赫布里底群岛的高地苏格兰人。在美国，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已经不可分解地交融在一起。

[12_5].现在德国北部所说的高地德语年代并不久远，它不过源于以“低地德语”为代价进行推广的标准德语；后者的基础是上撒克逊语，高地德语的一种方言。

[12_6].Dolichocephalic。

[12_7].Brachycephalic。

[12_8].从我们掌握的这些资料上溯，大概可以推知这些语言最初仅限于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相对于说印欧语的民族分布的整个区域来说，这一地区显然是边缘的。公元前1000年左右，他们的引力中心似乎位于俄罗斯南部。

[12_9].虽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但是支持它的专业证据比我们设想的要强大。有一批数量惊人的常用且典型的日耳曼词与已知的印欧语根本成分联系不上，很可能是我们假想的先日耳曼语的残余，比如[英语的]house（房子）、stone（石头）、sea（海）和wife（妻子）（[对应的]德语是Haus、Stein、See和Weib）。

[12_10].说美拉尼西亚语的巴布亚人只居住在这个岛屿的最东端。

[12_11].“民族”是一个感情上统一起来的重要群体。带来民族统一感的历史因素是多样的——政治的、文化的、语言的、地理的，有时会特别是宗教的。真正的种族因素也可能介入，虽然对“种族”的强调一般是在心理意义上，而不是在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在一个民族感情占主导地位的地区，语言和文化会倾向于统一化和特殊化，因此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至少会趋于重合。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语言的统一也从来不是绝对的，而文化的统一则容易流于肤浅，是半政治性的，而不是深远的。

[12_12].闪米特语族虽然与众不同，也并没有被更明确地标注出来。

[12_13].请见第209页。

[12_14].例如斐济人，虽然属于巴布亚（黑人）种族，在文化和语言归属上却是波利尼西亚的而不是美拉尼西亚的。

[12_15].即使在这里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重合。阿拉斯加最南端的爱斯基摩人在文化上与邻近的特林吉特人同化了。在西伯利亚东北，爱斯基摩人和楚克其人之间也没有清晰的文化分界线。

[12_16].一种语言被另一种取代当然不算真正的语言同化。

[12_17].“气质”是个不好对付的名称。被随意计在民族“气质”帐上的很多东西其实不过是习惯性的行为，是传统的德行理想的结果。比如，在一个不待见情感外露的文化里，表露情绪的自然趋势就会被超乎寻常地抑制。从作为一种文化产物的习惯性抑制来推论当地人的气质，很可能误入歧途。但是一般说来我们所能感触到的人类行为都是受过文化熏陶的。自然状态的气质是极难捕捉的东西。

[12_18].请见第39、40页。

[12_19].译者注：通神论是认为可以神秘地洞察神性的哲学或宗教思想。

Chapter 11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第十一章　语言与文学

Languages are more to us than systems of thought—transference. They are invisible garments that drape themselves about our spirit and give a predetermined form to all its symbolic expression. When the expression is of unusual significance, we call it literature. [12_1] Art is so personal an expression that we do not like to feel that it is bound to predetermined form of any sort. The possibilities of individual expression are infinite, language in particular is the most fluid of mediums. Yet some limitation there must be to this freedom, some resistance of the medium. In great art there is the illusion of absolute freedom. The formal restraints imposed by the material—paint, black and white, marble, piano tones, or whatever it may be—are not perceived; it is as though there were a limitless margin of elbow—room between the artist's fullest utilization of form and the most that the material is innately capable of. The artist has intuitively surrendered to the inescapable tyranny of the material, made its brute nature fuse easily with his conception. [12_2] The material “disappears” precisely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artist's conception to indicate that any other material exists. For the time being, he, and we with him, move in the artistic medium as a fish moves in the water, oblivious of the existence of an alien atmosphere. No sooner, however, does the artist transgress the law of his medium than we realize with a start that there is a medium to obey.

语言对我们而言，不仅仅是传递思想的系统，还是看不见的衣

衫，披挂在我们的精神之上，为其所有的符号表达赋予一个预先设定的形式。当这种表达的意义非同寻常的时候，我们便称其为文学。[13_1] 艺术是非常个性化的表达，以致我们不愿意感受到它受制于任何一种预先设定的形式。个人表达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在各种媒介中，语言尤其具有最大的流动性。然而，对这种自由必须有所限制，即来自媒介的一些阻力。伟大的艺术里会有一种绝对自由的幻觉，让人感觉不到材料——黑色或白色的油彩、大理石、钢琴的音色、或者任何别的材料——所施加的形式上的约束；艺术家对形式的最充分的运用和材料本身所能提供的极限这二者之间似乎有无限的回旋空间。艺术家直觉地降服在材料不可避免的专制之下，使其蛮横的本性与自己的构想轻松地融合。 [13_2] 材料的“消失”正是因为在艺术家的构想中没有任何迹象暗示有其他材料的存在。当其时，艺术家自己，带着我们，如鱼得水一般游走在艺术媒介里，忘却了周遭陌生环境的存在。但是，艺术家一旦违反了媒介的法则，我们立刻就会惊觉原来还有一个媒介需要遵从。

Language is the medium of literature as marble or bronze or clay are the materials of the sculptor. Since every language has its distinctive peculiarities, the innate formal limitations—and possibilities—of one literature are never quite the same as those of another. The literature fashioned out of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a language has the color and the texture of its matrix. The literary artist may never be conscious of just how he is hindered or helped or otherwise guided by the matrix, but when it is a question of translating his work into another language, the nature of the original matrix manifests itself at once. All his effects have been calculated, or intuitively felt, with reference to the formal “genius” of his own language; they cannot be carried over without loss or modification. Croce [12_3] is therefore perfectly right in saying that a work of literary art can never be translated. Nevertheless literature does get itself translated, sometimes with astonishing adequacy.

This brings up the question whether in the art of literature there are not intertwined two distinct kinds or levels of art—a generalized, non-linguistic art, which can be transferred without loss into an alien linguistic medium, and a specifically linguistic art that is not transferable. [12_4] I believe the distinction is entirely valid, though we never get the two levels pure in practice. Literature moves in language as a medium, but that medium comprises two layers, the latent content of language—our intuitive record of experience—and the particular conformation of a given language—the specific how of our record of experience. Literature that draws its sustenance mainly—never entirely—from the lower level, say a play of Shakespeare's, is translatable without too great a loss of character. If it moves in the upper rather than in the lower level—a fair example is a lyric of Swinburne's—it is as good as untranslatable. Both types of literary expression may be great or mediocre.

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正如大理石、青铜或粘土是雕塑家的材料。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个性，所以一种文学内在的形式上的限制——以及可能性——从来都不会和另一种文学完全相同。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和材质塑成的文学总是具有其模具的颜色和质地。文学艺术家也许从未意识到这个模具对自己的阻碍、帮助或其他方式的指引，但是一旦要将他的作品译成其他语言，原有模具的性质就会即刻显现出来。文学家的所有效果都是他根据自己的语言的形式“特质”谋划出来的，或者直觉地体会到的，不可能毫无损失或修改地照搬到别的语言。因此，克罗齐 [13_3] 说得一点没错，文学作品从来都是无法翻译的。然而，文学的确被翻译了，有时还译得相当充分。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在文学艺术里，是否有两个不同的艺术种类或层次交织在一起——一个是普遍的、非语言艺术，可以无损地转移到另一种不同的语言媒介里；另一个则是特殊的语言艺术，无法转移。 [13_4] 我相信这种区分是完全有道理的，虽然我们在实践中从来都无法把这两个层次清楚地分开。文学在语言这个媒介中游走，而这个媒介包括两个层

面：一个是较低层面的语言的潜性内容，即我们对经验的直觉记录；一个是较高层面的某种语言的特有构造，即我们记录经验的具体方式。主要（从来不可能全部）是从较低层面汲取材质的文学，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可以被翻译且不会流失太多特性的。但是，如果文学在较高层面而不是较低层面游走——史文朋 [13_5] 的抒情诗就是个不错的例子——那就基本上无法翻译了。这两类文学表达都可以伟大或平庸。

There is really no mystery in the distinction. It can be clarified a little by comparing literature with science. A scientific truth is impersonal, in its essence it is untinctured by the particular linguistic medium in which it finds expression. It can as readily deliver its message in Chinese [12_5] as in English. Nevertheless it must have some expression, and that expression must needs be a linguistic one. Indeed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scientific truth is itself a linguistic process, for thought is nothing but language denuded of its outward garb. The proper medium of scientific expression is therefore a generalized language that may be defined as a symbolic algebra of which all known languages are translations. One can adequately translate scientific literature because the original scientific expression is itself a translation. Literary expression is personal and concrete,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its significance is altogether bound up with the accidental qualities of the medium. A truly deep symbolism, for instance, does not depend on the verbal associations of a particular language but rests securely on an intuitive basis that underlies all linguistic expression. The artist's “intuition,” to use Croce's term, is immediately fashioned out of a generalized human experience—thought and feeling—of which his own individual experience is a highly personalized selection. The thought relations in this deeper level have no specific linguistic vesture; the rhythms are free, not

bound, in the first instance, to the traditional rhythms of the artist's language. Certain artists whose spirit moves largely in the non-linguistic (better, in the generalized linguistic) layer even find a certain difficulty in getting themselves expressed in the rigidly set terms of their accepted idiom. One feels that they are unconsciously striving for a generalized art language, a literary algebra, that is related to the sum of all known languages as a perfect mathematical symbolism is related to all the roundabout reports of mathematical relations that normal speech is capable of conveying. Their art expression is frequently strained, it sounds at times like a translation from an unknown original—which, indeed, is precisely what it is. These artists—Whitmans and Brownings—impress us rather by the greatness of their spirit than the felicity of their art. Their relative failure is of the greatest diagnostic value as an index of the pervasive presence in literature of a larger, more intuitive linguistic medium than any particular language.

这种区分实在没什么神秘可言。比较一下文学和科学就能让它更清楚一点。科学真理是非个人的，本质上不会受到表达它的具体语言媒介的熏染，在汉语 [13_6] 和英语中都能同样方便地传递自己的信息。但是，它总得有某种表达，而且这个表达必须是语言性的。甚至对科学真理的理解本身也是一个语言过程，因为思维只不过是脱去了外衣的语言。因此，科学表达的正当媒介应该是一种一般化了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定义为一种符号性的代数，所有的已知语言都是对它的翻译。我们能充分地翻译科学文献是因为原来的科学表达本身就是一种翻译。文学表达则是个人的、具体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意义和媒介的偶然特征被完全捆绑在一起。比如，真正深入的符号体系并不依赖某种具体语言的词语联想，而是安稳地栖息在所有语言表达背后的直觉基础之上。用克罗齐的话说，艺术家的“直觉”直接形成于一般化了的人类经验，也即思想或感觉，而他个人的经验是其中高度私人化了的摘选。在这个更深的层面上，思维关系没有具体的语言

服装；它的节奏是自由的，一开始并不受缚于艺术家自己的语言的传统节奏。有些艺术家的精神主要在非语言层面（更确切地说是一般化了的语言层面）上游走，他们甚至很难用被普遍接受的习语的严格限定的语词来表达自己。人们会觉得这类艺术家在无意识地追求一种一般化了的艺术语言，一种文学的代数；这种代数与所有已知语言的总和相关联，正如一套完美的数学符号与普通言语所能够作出的关于数学关系的所有冗长陈述相关联一样。这类艺术家的艺术表达往往流于牵强，有时像是译自一个未知的来源——事实的确如此。这些艺术家——如惠特曼们或勃朗宁们——打动我们的与其说是他们艺术的精妙，不如说是他们精神的伟大。他们相对失败的地方有着极大的诊断价值，能让人看出文学中遍布着一种比任何具体语言更大、更直觉的语言媒介。

Nevertheless, human expression being what it is, the greatest—or shall we say the most satisfying—literary artists, the Shakespeares and Heines, are those who have known subconsciously to fit or trim the deeper intuition to the provincial accents of their daily speech. In them there is no effect of strain. Their personal “intuition” appears as a completed synthesis of the absolute art of intuition and the innate, specialized art of the linguistic medium. With Heine, for instance, one is under the illusion that the universe speaks German. The material “disappears.”

尽管如此，尽管人类的表达就是这样，但最伟大的——或者毋宁说最让人满意的——文学艺术家，比如莎士比亚们和海涅们，正是那些下意识地懂得根据自己日常言语的本土风格修改或剪裁其深层直觉的人。他们的作品里没有牵强感。他们的个人“直觉”以直觉的绝对艺术和语言媒介内在的特殊艺术的完美综合呈现出来。比如，读海涅的作品我们会有一种幻觉，仿佛整个宇宙都是说德语的。在他那里材

料“消失”了。

Every language is itself a collective art of expression. There is concealed in it a particular set of esthetic factors-phonetic, rhythmic, symbolic, morphological—which it does not completely share with any other language. These factors may either merge their potencies with those of that unknown, absolute language to which I have referred—this is the method of Shakespeare and Heine—or they may weave a private, technical art fabric of their own, the innate art of the language intensified or sublimated. The latter type, the more technically “literary” art of Swinburne and of hosts of delicate “minor” poets, is too fragile for endurance. It is built out of spiritualized material, not out of spirit. The successes of the Swinburnes are as valuable for diagnostic purposes as the semi-failures of the Brownings. They show to what extent literary art may lean on the collective art of the language itself. The more extreme technical practitioners may so over—individualize this collective art as to make it almost unendurable. One is not always thankful to have one's flesh and blood frozen to ivory.

每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特有的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与任何其他语言都不会完全共享的。这些因素可能把力量融在上文所说的那种未知的、绝对的语言力量之中——这是莎士比亚和海涅的方法——也可能编织一种自己独有的技术性的艺术织品，强化或升华其所属语言的内在艺术。这后一种，如史文朋或众多纤巧的“小”诗人的较为技巧性的“文学”艺术，甚是脆弱，难以维系。它取材于精神化了的材料，而非精神本身。史文朋们的成功像勃朗宁们的部分失败一样具有诊断价值。它们都显示了文学艺术对语言这一集体艺术本身的依赖程度。更极端的玩弄技术的人可能会使这一集体艺术过分个性化而几乎让人无

法承受。人们并不总是愿意将自己的血肉凝成象牙。

An artist must utilize the native esthetic resources of his speech. He may be thankful if the given palette of colors is rich, if the springboard is light. But he deserves no special credit for felicities that are the language's own. We must take for granted this language with all its qualities of flexibility or rigidity and see the artist's work in relation to it. A cathedral on the lowlands is higher than a stick on Mont Blanc. In other words, we must not commit the folly of admiring a French sonnet because the vowels are more sonorous than our own or of condemning Nietzsche's prose because it harbors in its texture combinations of consonants that would affright on English soil. To so judge literature would be tantamount to loving “Tristan und Isolde” because one is fond of the timbre of horns.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that one language can do supremely well which it would be almost vain for another to attempt. Generally there are compensations. The vocalism of English is an inherently drabber thing than the vowel scale of French, yet English compensates for this drawback by its greater rhythmical alertness. It is even doubtful if the innate sonority of a phonetic system counts for as much, as esthetic determinant, a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unds, the total gamut of their similarities and contrasts. As long as the artist has the wherewithal to lay out his sequences and rhythms, it matters little what are the sensuous qualities of the elements of his material.

艺术家必须利用自己本土言语中的美学资源。如果这块现成的调色板色彩丰富，或者如果这块跳板轻灵合用，他大概会感到幸运。但是，语言自身的巧妙则不能归功于他。我们必须接受一种语言所有的灵活或僵硬，并据此来判断艺术家的作品。平地上的大教堂要比勃朗

峰上的木棍高。换言之，我们不能犯傻，不能因为法语十四行诗的元音比英语的悦耳就赞美它，或者因为尼采散文里的辅音组合让英国人惊骇就谴责它。这样品评文学就如同因为喜欢号角的音色而爱听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一样。有些事一种语言能做得极好，另一种语言却望尘莫及。但是，一般都有补偿。比如，英语的元音系统生来就比法语单调，但是这一不足被英语在节奏上的灵动所弥补。我们甚至可以怀疑，作为审美的决定因素，一个语音系统先天的悦耳程度是否像语音之间的关系、像它们彼此间的全部相似或相异之集合一样重要？只要艺术家有办法布置他的语音序列和节奏，材料的各个成分的感官特征就无关紧要了。

The phonetic groundwork of a language, however, is only one of the features that give its literature a certain direction. Far more important are its morphological peculiarities. It makes a great deal of dif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yle if the language can or cannot create compound words, if its structure is synthetic or analytic, if the words of its sentences have considerable freedom of position or are compelled to fall into a rigidly determined sequence.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style, in so far as style is a technical matter of the building and placing of words, are given by the language itself, quite as inescapably, indeed, as the general acoustic effect of verse is given by the sounds and natural accents of the language. These necessary fundamentals of style are hardly felt by the artist to constrain his individuality of expression. They rather point the way to those stylistic developments that most suit the natural bent of the language. It is not in the least likely that a truly great style can seriously oppose itself to the basic form patterns of the language. It not only incorporates them, it builds on them. The merit of such a style as W.H. Hudson's or George Moore's [12_6] is that it does with ease and economy what the language is always trying to do. Carlylese, though individual and vigorous, is yet not

style; it is a Teutonic mannerism. Nor is the prose of Milton and his contemporaries strictly English; it is semi-Latin done into magnificent English words.

但是，语音基础只是一种语言能给予其文学某种方向的众多特征之一。语言的形态特点要重要得多。一种语言能否创造复合词，是综合性结构还是分析性结构，句子中的词汇在位置上相对自由还是必须排成严格限定的顺序，都会极大地影响风格的发展。风格若仅限于构词和词序这类技术问题，那么其主要特点就是不可避免地由语言本身赋予的，颇似诗歌的一般音响效果是由语言的声音和自然重音赋予的一样。风格的这些必要因素艺术家甚少感受到，不至束缚他在表达上的个性。它们只不过指出了最适应语言习性的风格发展的途径。一个真正伟大的风格绝不可能严重违反语言的基本形式格局。它不但吸收这些格局，而且以它们为基础奠定自己。像W.H.赫德森或乔治·摩尔[13_7]的风格[13_8]之妙就在于它轻松简洁地做到了英语一直努力在做的事。而卡莱尔式[13_9]虽然有个性，有力道，但不成其为风格，只是条顿式的装腔作势。米尔顿及同时期作家的散文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英语，而只是用华丽的英语词写成的半拉丁文。

It is strange how long it has taken the European literatures to learn that style is not an absolute, a something that is to be imposed on the language from Greek or Latin models, but merely the language itself, running in its natural grooves, and with enough of an individual accent to allow the artist's personality to be felt as a presence, not as an acrobat. We understand more clearly now that what is effective and beautiful in one language is a vice in another. Latin and Eskimo, with their highly inflected forms, lend themselves to an elaborately periodic structure that would be boring in English. English allows, even demands, a looseness that would be insipid in Chinese. And Chinese, with its unmodified words and rigid

sequences, has a compactness of phrase, a terse parallelism, and a silent suggestiveness that would be too tart, too mathematical, for the English genius. While we cannot assimilate the luxurious periods of Latin nor the pointilliste style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we can enter sympathetically into the spirit of these alien techniques.

奇怪的是，欧洲各国的文学历经弥久才弄明白，风格不是一种绝对的东西，不是可以根据希腊文或拉丁文范本强加到某种语言之上的玩意；风格不过是语言本身而已，它在自己的天然河道里奔流，拥有足够的个人色彩，让人感觉艺术家的个性是自然的存在，而非刻意的做作。现在我们比较明白，一种语言认为感人的和美妙的，在另一种语言里却可能是拙劣的。比如，拉丁语和爱斯基摩语有高度屈折的形式，倾向于使用繁复的掉尾结构，这在英语里却会招人厌烦。而英语允许甚至要求使用散漫的结构，这在汉语里却会索然无味。而汉语，由于词不会变形且词序严格，会有密集的词组、简练的骈体和无声的言外之意，这对英语的气质而言又未免太尖刻、太刻板。我们虽然不能吸收拉丁语繁复的掉尾结构或古汉语的集点法风格，但还是能以善解之心去体悟这些异国技法的精髓。

I believe that any English poet of to—day would be thankful for the concision that a Chinese poetaster attains without effort. Here is an example: [12_7]

我相信，当今的任一位英国诗人都会羡慕一位中国业余诗人信手拈来的洗练。这里有一个例子： [13_10]

Wu-river [12_8] stream mouth evening sun sink,

吴淞江 [13_11] 口夕阳斜，

North look Liao-Tung, [12_9] not see home.

北望辽东 [13_12] 不见家。

Steam whistle several noise,

汽笛数声天地阔，

sky-earth boundless, Float float one reed out Middle-Kingdom.

飘飘一苇出中华。

These twenty-eight syllables may be clumsily interpreted: “At the mouth of the Yangtsze River, as the sun is about to sink, I look north toward Liao-Tung but do not see my home. The steam-whistle shrills several times on the boundless expanse where meet sky and earth. The steamer, floating gently like a hollow reed, sails out of the Middle Kingdom.“ [12_10] But we must not envy Chinese its terseness unduly. Our more sprawling mode of expression is capable of its own beauties, and the more compact luxuriance of Latin style has its loveliness too. There are almost as many natural ideals of literary style as there are languages. Most of these are merely potential, awaiting the hand of artists who will never come. And yet

in the recorded texts of primitive tradition and song there are many passages of unique vigor and beauty. The structure of the language often forces an assemblage of concepts that impresses us as a stylistic discovery. Single Algonkin words are like tiny imagist poems. We must be careful not to exaggerate a freshness of content that is at least half due to our freshness of approach, but the possibility is indicated none the less of utterly alien literary styles, each distinctive with its disclosure of the search of the human spirit for beautiful form.

这28个音节可以蹩脚地译为："在吴淞江口，太阳正要落下，我朝北望向辽东，却看不到家。天地相接处一片辽阔，汽笛响了数声。轮船像一片芦苇轻轻飘荡，驶出了中华。"[13_13] 但是我们切勿过分羡慕汉语的简练。我们更加凌乱散漫的表达方式自有它的美妙，而拉丁语紧凑华丽的风格也自有它的可爱。有多少种语言，差不多就有多少种自然的、理想的文学风格。其中很多都只是一种可能，等待着永远都不会到来的艺术家的妙手。然而在文献记录的远古传说和歌谣中，不乏有着独特的力量和美感的段落。语言的结构常常促成概念的集合，让我们感觉发现了新的风格。比如，阿尔贡金语的单个词就像一首首印象派小诗。但是，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夸大了内容的新颖，这至少有一半是因为我们在用新颖的视角观察它；不过这毕竟说明可能存在完全陌生的文学风格，每一种在显示人的精神对形式美的追求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Probably nothing better illustrates the formal dependence of literature on language than the prosodic aspect of poetry. Quantitative verse was entirely natural to the Greeks, not merely because poetry grew up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hant and the dance, [12_11] but because alternations of long and short syllables were keenly live facts in the daily economy of the language. The

tonal accents, which were only secondarily stress phenomena, helped to give the syllable its quantitative individuality. When the Greek meters were carried over into Latin verse, there was comparatively little strain, for Latin too was characterized by an acute awareness of quantitative distinctions. However, the Latin accent was more markedly stressed than that of Greek. Probably, therefore, the purely quantitative meters modeled after the Greek were felt as a shade more artificial than in the language of their origin. The attempt to cast English verse into Latin and Greek molds has never been successful. The dynamic basis of English is not quantity, [12_12] but stress, the alternation of accented and unaccented syllables. This fact gives English verse an entirely different slant and has determine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poetic forms, is still responsible for the evolution of new forms. Neither stress nor syllabic weight is a very keen psychologic factor in the dynamics of French. The syllable has great inherent sonority and does not fluctuate significantly as to quantity and stress. Quantitative or accentual metrics would be as artificial in French as stress metrics in classical Greek or quantitative or purely syllabic metrics in English. French prosody was compelled to develop on the basis of unit syllable-groups. Assonance, later rhyme, could not but prove a welcome, an all but necessary, means of articulating or sectioning the somewhat spineless flow of sonorous syllables. English was hospitable to the French suggestion of rhyme, but did not seriously need it in its rhythmic economy. Hence rhyme has always been strictly subordinated to stress as a somewhat decorative feature and has been frequently dispensed with. It is no psychologic accident that rhyme came later into English than in French and is leaving it sooner. [12_13] Chinese verse has developed along very much the same lines as French verse. The syllable is an even more integral and sonorous unit than in French, while quantity and stress are too uncertain to form the basis of a metric

system. Syllable—groups-so and so many syllables per rhythmic unit—and rhyme are therefore two of the controlling factors in Chinese prosody. The third factor, the alternation of syllables with level tone and syllables with inflected (rising or falling) tone, is peculiar to Chinese.

大概没有什么比诗的韵律性更能说明文学在形式上对语言的依赖了。音量诗对希腊人来说是完全自然的，这不仅因为在希腊诗的形成与歌谣及舞蹈有关[13_14]，而且因为长短音节的交替在希腊语的日常使用中是活生生的事实。声调虽然只是次要的重音现象，却能帮助赋予音节以音量个性。把希腊诗的韵律迁移到拉丁韵文中相对不那么勉强，因为拉丁语也有对音量差别极为敏感的特征。不过，拉丁语的重音比希腊语更显著。因此，用拉丁语模仿希腊语的纯音量韵律会让人觉得比在希腊语里多了一层刻意。用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模子来铸造英语诗歌的尝试则从来没有成功过。英语的动力基础不是音量[13_15]，而是重音，是轻重音节的交替。这一事实赋予了英语诗完全不同的倾向，曾经决定了英语诗体的发展，现在也仍在影响着新诗体的演化。在法语的动力里，重音和音节的权重都不是多么深刻的心理因素。法语音节非常响亮，不会因音量和重音而有显著的波动。音量或重音性的韵律在法语中会显得不自然，就像重音韵律在古希腊语中，或者音量或纯音节性的韵律在英语中会不自然一样。法语的声律不得不在单位音节组的基础上发展。同位元音，以及后来的押韵，不能不成为受欢迎的、几乎是必要的手段，用来发出或切分一串有些散落的响亮音节。英语对于受法语启发的押韵是乐于接受的，但是在其节奏系统中并不真正需要它。因此，在英语里，押韵作为一个多少有些装饰性的特征，一直严格地从属于重音，并且常常被省略。押韵进入英语比法语晚，现在又要更早地离开，这绝非心理上的偶然。[13_16] 汉语诗的发展道路与法语诗相差无几。与法语相比，汉语音节是更加完整、响亮的单位，而汉语的音量和重音又太不确定，无法形成韵律系统的基础。因此，音节组——每个节奏单位有一定数量的音节——以及押韵就成了汉语韵律里的两个控制因素。第三个因素，即平声音节和仄声

（升或降）音节的交替，则是汉语特有的。

To summarize, Latin and Greek verse depends on the principle of contrasting weights; English verse, on the principle of contrasting stresses; French verse, on the principles of number and echo; Chinese verse, on the principles of number, echo, and contrasting pitches. Each of these rhythmic systems proceeds from the unconscious dynamic habit of the language, falling from the lips of the folk. Study carefully the phonetic system of a language, above all its dynamic features, and you can tell what kind of a verse it has developed—or, if history has played pranks with its phychology, what kind of verse it should have developed and some day will.

简言之，拉丁语诗歌和希腊语诗歌依靠音量对比原则；英语诗依靠重音对比原则；法语诗依靠音节数和呼应即押韵原则；汉语诗则依靠音节数、呼应和声调对比原则。这些节奏系统的每一个都产生于语言无意识的动力习惯，都是从老百姓的嘴里掉出来的。仔细研究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尤其是它的动力特征，你就会知道它曾经发展出何种诗体——或者，如果历史曾跟它的心理开过玩笑，你还会知道它本该发展出何种诗体以及将来会发展出何种诗体。

Whatever be the sounds, accents, and forms of a language, however these lay hands on the shape of its literature, there is a subtle law of compensations that gives the artist space. If he is squeezed a bit here, he can swing a free arm there. And generally he has rope enough to hang himself with, if he must. It is not strange that this should be so. Language is itself the collective art of expression, a summary of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individual intuitions. The individual goes lost in the collective creation, but his

personal expression has left some trace in a certain give and flexibility that are inherent in all collective works of the human spirit. The language is ready, or can be quickly made ready, to define the artist's individuality. If no literary artist appears, it is not essentially because the language is too weak an instrument, it is because the culture of the people is not favorable to the growth of such personality as seeks a truly individual verbal expression.

无论一种语言的声音、重音和形式如何，无论它们对文学的外形施加了怎样的影响，总有一种微妙的补偿规律为艺术家保留了用武之地。他若在此处被束缚了手脚，那么在彼处必能一展身手。即使他非要上吊，也总有足够的绳子。事实就是如此，不足为怪。语言本身是一种表达的集体艺术，是千千万万个体直觉的总结。个体在集体创造里消失了，但是他的个人表达却在语言的弹性和灵活性里留下些许痕迹，这是人类精神的所有集体成果所固有的。语言随时整装待发，或者很快即可整装待发，来框定艺术家的个性。如果没有文学艺术家出现，从根本上来说这不是因为该语言作为工具太薄弱，而是因为该民族的文化不利于产生追求真正个性化的言辞表达的人格。

[12_1].I can hardly stop to define just what kind of expression is "significant" enough to be called art or literature. Besides, I do not exactly know. We shall have to take literature for granted.

[12_2].This "intuitive surrender"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ubservience to artistic convention. More than one revolt in modern art has been dominated by the desire to get out of the material just what it is really capable of. The impressionist wants light and color because paint can give him just these; "literature" in painting, the sentimental suggestion of a "story," is offensive to him because he does not want the virtue of his particular form to be dimmed by shadows from another medium. Similarly, the poet, as never before, insists that words mean just what they really mean.

[12_3].See Benedetto Croce, "Aesthetic."

[12_4].The question of the transferability of art productions seems to me to be of genuine theoretic interest. For all that we speak of the sacrosanct uniqueness of a given art work, we know very well, though we do not always admit it, that not all productions are equally intractable to transference. A Chopin étude is inviolate; it moves altogether in the world of piano tone. A Bach fugue is transferable into another set of musical timbres without serious loss of esthetic significance. Chopin plays with the language of the piano as though no other language existed (the medium "disappears"); Bach speaks the language of the piano as a handy means of giving outward expression to a conception wrought in the generalized language of tone.

[12_5].Provided, of course, Chinese is careful to provide itself with the necessary scientific vocabulary. Like any other language, it can do so without serious difficulty if the need arises.

[12_6].Aside from individual peculiarities of diction, the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particular words as such.

[12_7].Not by any means a great poem, merely a bit of occasional verse written by a young Chinese friend of mine when he left Shanghai for Canada.

[12_8].The old name of the country about the mouth of the Yangtsze.

[12_9].A province of Manchuria.

[12_10].I.e., China.

[12_11].Poetry everywhere is inseparable in its origins from the singing voice and the measure of the dance. Yet accentual and syllabic types of verse, rather than quantitative verse, seem to be the prevailing norms.

[12_12].Quantitative distinctions exist as an objective fact. They have not the same inner, psychological value that they had in Greek.

[12_13].Verhaeren was no slave to the Alexandrine, yet he remarked to Symons, à propos of the translation of Les Aubes, that while he approved of the use of rhymeless verse in the English version, he found it "meaningless" in French.

[13_1].我在这里很难定义究竟什么样的表达才足够“有意义”，能被称为艺术或文学。再说，对这一点我也并不确知。我们只能默认文学就是文学。

[13_2].这种“直觉的投降”与对艺术传统的屈从毫无关系。现代艺术中发生过不止一次反叛，主导它们的都是一种从材料中获得它能切实提供的东西的欲望。印象派画家想要光和色，因为这恰是油彩能提供给他的；他厌恶绘画里的“文学”，厌恶煽情的“故事”的暗示，因为他不愿意另一种媒介的阴影遮蔽了他的艺术所特有的形式美。同样，诗人也不再似从前，他们坚持词的意义切实就是词的意义。

[13_3].详见意大利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的《美学》。

[13_4].在我看来，艺术作品能否转移的问题是有真正的理论意义的。无论我们如何谈论一件艺术品的神圣特性，我们都很明白（虽然有时不承认），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同样地不可转移。比如，肖邦的练习曲是不可侵犯的，只游走在钢琴音色的世界里。巴赫的遁走曲[却]可转换为另一套音色，而不致严重丧失其审美价值。肖邦用钢琴的语言演奏，似乎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其他的[音乐]语言（媒介“消失”了）；巴赫则只是把钢琴的语言当作一件顺手的工具，用来表达由一般的音乐语言编织的构想。

[13_5].译者注：史文朋，又译为“斯温伯恩”，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诗人和剧作家，其抒情诗的特点是风格华丽且用词注重韵律而非意义。

[13_6].当然，前提是汉语得认真准备好必要的科学词汇。和任何其他语言一样，只要有需要，它就能不太费力地做到这一点。

[13_7].译者注：W.H.赫德森是英国作家，乔治·摩尔是爱尔兰作家，都属自然主义流派。

[13_8].措辞上的个人特点（即对某些词的选择和判断）除外。

[13_9].译者注：卡莱尔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作家和评论家，风格犀利、繁复。

[13_10].这完全谈不上是一首伟大的诗，不过是我的一个年轻的中国朋友在离开上海前往加拿大时顺手写下的。

[13_11].位于长江口的古国名，即吴国。

[13_12].中国东北满洲的一个省。

[13_13].即中国。

[13_14].无论在哪里，诗在源头上都是和歌唱的声音以及舞蹈的步伐分不开的。可是，通行的范式似乎是讲究重音和音节的诗，而不是音量诗。

[13_15].音量差别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它们在英语里不具备在希腊语里的那种内在的心理价值。

[13_16].范哈伦（译者注：范哈伦全名埃米尔·范哈伦（Emile Verhaeren），是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诗人，《黎明》是他的作品，由英国诗人亚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译成英文。亚历山大体是法语诗体的一种，一律使用十二音节的诗句写成，因用这种诗体写成的《亚历山大的故事》而得名。)绝不是亚历山大体的奴隶，但是谈及[从法语向英语]翻译《黎明》时，他曾对西蒙斯说，虽然他赞成英译本使用非韵文，但是他发现这在法语里“毫无意义”。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学术的进展

Francis Bacon

弗朗西斯·培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学术的进展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弗朗西斯·培根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BOOK 1. 第一卷
- BOOK 2. 第二卷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BOOK 1.

第一卷

To the king

致国王陛下

There were under the law, excellent King, both daily sacrifices and freewill offerings; the one proceeding upon ordinary observance, the other upon a devout cheerfulness: in like manner there belongeth to kings from their servants both tribute of duty and presents of affection. In the former of these I hope I shall not live to be wanting, according to my most humble duty and the good pleasure of your Majesty's employments: for the latter, I thought it more respective to make choice of some oblation which might rather refer to the propriety and excellency of your individual person, than to the business of your crown and state. Wherefore, representing your Majesty many times unto my mind, and beholding you not with the inquisitive eye of presumption, to discover that which the *Scripture* telleth me is inscrutable, but with the observant eye of duty and admiration, leaving aside the other parts of your virtue and fortune, I have been touched—yea, and possessed—with an extreme wonder at those your virtues and faculties, which the philosophers call intellectual; the largeness of your capacity, the faithfulness of your memory, the swiftness of your apprehension, the penetration of your judgment, and the facility and order of your elocution: and I have often thought that of

all the persons living that I have known, your Majesty were the best instance to make a man of Plato's opinion, that all knowledge is but remembrance, and that the mind of man by Nature knoweth all things, and hath but her own native and original notions (which by the strangeness and darkness of this tabernacle of the body are sequestered) again revived and restored: such a light of Nature I have observed in your Majesty, and such a readiness to take flame and blaze from the least occasion presented, or the least spark of another's knowledge delivered. And as the *Scripture* saith of the wisest king, “That his heart was as the sands of the sea;” which, though it be one of the largest bodies, yet it consisteth of the smallest and finest portions; so hath God given your Majesty a composition of understanding admirable, being able to compass and comprehend the greatest matters, and nevertheless to touch and apprehend the least; whereas it should seem an impossibility in Nature for the same instrument to make itself fit for great and small works. And for your gift of speech, I call to mind what Cornelius Tacitus saith of Augustus Cæsar: Augusto profluens, et quæ principem deceret, eloquentia fuit. For if we note it well, speech that is uttered with labour and difficulty, or speech that savoureth of the affectation of art and precepts, or speech that is framed after the imitation of some pattern of eloquence, though never so excellent; all this hath somewhat servile, and holding of the subject. But your Majesty's manner of speech is, indeed, prince-like, flowing as from a fountain, and yet streaming and branching itself into Nature's order, full of facility and felicity, imitating none, and inimitable by any. And as in your civil estate there appeareth to be an emulation and contention of your Majesty's virtue with your fortune; a virtuous disposition with a fortunate regiment; a virtuous expectation (when time was) of your greater fortune, with a prosperous possession thereof in the due time; a virtuous observation of the laws of marriage, with most blessed and happy

fruit of marriage; a virtuous and most Christian desire of peace, with a fortunate inclination in your neighbour princes thereunto: so likewise in these intellectual matters there seemeth to be no less contention between the excellency of your Majesty's gifts of Nature and the universality and perfection of your learning. For I am well assured that this which I shall say is no amplification at all, but a positive and measured truth; which is, that there hath not been since Christ's time any king or temporal monarch which hath been so learned in all literature and erudition, divine and human. For let a man seriously and diligently revolve and peruse the succession of the Emperors of Rome, of which Cæsar the Dictator (who lived some years before Christ) and Marcus Antoninus were the best learned, and so descend to the Emperors of Græcia, or of the West, and then to the lines of France, Spain, England, Scotland, and the rest, and he shall find this judgment is truly made. For it seemeth much in a king if, by the compendious extractions of other men's wits and labours, he can take hold of any superficial ornaments and shows of learning, or if he countenance and prefer learning and learned men; but to drink, indeed, of the true fountains of learning —nay, to have such a fountain of learning in himself, in a king, and in a king born—is almost a miracle. And the more, because there is met in your Majesty a rare conjunction, as well of divine and sacred literature as of profane and human; so as your Majesty standeth invested of that triplicity, which in great veneration was ascribed to the ancient Hermes: the power and fortune of a king, the knowledge and illumination of a priest, and the learning and universality of a philosopher. This propriety inherent and individual attribute in your Majesty deserveth to be expressed not only in the fame and admiration of the present time, nor in the history or tradition of the ages succeeding, but also in some solid work, fixed memorial, and immortal monument, bearing a character or signature both of the power of a king and the difference and perfection of such a king.

Therefore I did conclude with myself that I could not make unto your Majesty a better oblation than of some treatise tending to that end, whereof the sum will consist of these two parts: the former concerning the excellency of learning and knowledge, and the excellency of the merit and true glory in the augmentation and propagation thereof; the latter, what the particular acts and works are which have been embraced and undertake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and again, what defects and undervalues I find in such particular acts: to the end that though I cannot positively or affirmatively advise your Majesty, or propound unto you framed particulars, yet I may excite your princely cogitations to visit the excellent treasure of your own mind, and thence to extract particulars for this purpose agreeable to your magnanimity and wisdom.

圣明的陛下，根据法律我们要对神灵供奉日常的祭品和资源的贡品；前者是因为通行的做法，而后者是出于虔诚的欢喜。对于君王，臣子们要尽忠于他们的职责，以呈现其忠心。就我个人而言，对于前者，我希望我通过履行最卑贱的职责，来以最崇高的荣耀来为陛下效忠；对于后者，我觉得相比于您的王位和社稷而言，如果能对陛下的德行和美德有所贡献那是比什么都强的。此外，您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注视着您，不是冒昧地想寻求什么，也不是为了证实您是否如《圣经》中所言的那样深不可测，而是满怀崇敬和臣子的责任来瞻仰您。暂且不提您的美德和财富，我已经为您身上那哲学家的口中德行和才能所触动——不，是倾慕；能力之强、记忆之好、思维之快、判断之准还有您那熟练而逻辑井然的雄辩术：以致于我常常觉得我认识的所有人之中，您是最能完美体现柏拉图的对人的观点的。柏拉图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记忆，人的大脑天生就了解所有的事情，人们只需把天赋的、固有的观念唤醒或重建就可以了（人类的身体，作为这些观念的临时居所，因为陌生和黑暗拘禁着这些观念），我发现陛下身上正是有这种天赋之光，哪怕受到外界一点点的

触动或是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点点的启发，您就能发散出耀眼的光芒。正如《圣经》中那位最富有智慧的国王所言：“他的心如同沙海一般”，虽然其形巨大，却都是由最细微、最美好部分构成的。上帝给予陛下的也是同样深广的领悟力，既能把握重大的事情，又能感受和理解细小的事物，这多么让人羡慕；而在自然界中要找出同您一样的——既能度量巨大的物体又能衡量细小的物体——是不可能的。说到陛下您的口才，我想到了塔西陀对奥古斯都大帝形容，“奥古斯都言谈流利顺畅，尽显王者风范”。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有些人说起话来嗫嚅不清，有些人则矫揉造作，有些人模仿那些并不高明的辩论模式并将其复杂化，所有的这些做法都显得奴颜婢膝，泄露其低下的地位。陛下的言谈举止的确有君王之威，您的用语措辞十分自然，就像是高山上的流水汩汩而下又分成众多支流，条理井然。同时，您的言谈中又充满了条理和机敏，无任何矫揉造作之处，所以其他人都难以企及。至于陛下您的地位，可以说您的美德和财富势均力敌、互相弥补。陛下您天性良善，又受到上帝无限的祝福；您昔日胸怀大志，如今终登王位，得享太平。您合法的美满婚姻中收到了无限的祝福以及爱情的结晶；因为您遵从正教的和平心愿，就连邻邦也积极响应。在智慧学识方面，陛下您才学兼备，天赋秉异，博学多才，融会贯通。自从基督降生以来，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位国君或世俗国王像您这样在文学、博学、神学以及人类学方面都表现出无以伦比的学识和见识。我这样说，并非故意夸大事实，因为我相信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是我经过审慎考虑得出的结论，我对此深信不疑。假如有人去翻检和阅读罗马帝国执政者的历史，可以明白在基督降生以前，独裁者恺撒、马可·安东尼都是非常博学的人物；然后是希腊或者西方的君王，随后是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苏格兰及其他各地的君王，人们会发现我的论断是确实可信的。对于一个君王来说，只需随意地将他人的才智和劳动为己所用，就可以用来装饰自己，显出有学问的样子。如果一个君王喜爱并赞助学问和研究学问的人，真正吸取学问的精华，甚至于自己本身就是学问的源泉，这对一位君王，一位生在帝王之家的君王来说简直是一种奇迹。而且无论神圣的典籍还是世俗的学问您都融会贯通，所以您同时具备了广为人所推崇的赫尔墨斯具有的三种奇才：王者的权势和幸运，教士的知识和睿智，哲学家的求知

欲和广博。陛下天生的禀赋和独特的品德不仅值得当代及后世宣扬，而且需要用不朽的著作、坚固的纪念物和传世的纪念碑来铭记，让陛下的威严和圣德永世流传。所以臣以为，臣所能献出自己绵薄之力的地方只是一篇有助于上述目的的论述。这篇论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的是为了知识的发展所采取的方法、所做的工作。在第二部分还探讨了过去工作中的缺陷和不足。在这本书里，虽然臣不能为陛下提供正面建议或是具体意见，不过臣希望能够引发您的思考，搜寻内心的宝库，择取有用的信息，用于实现与您的仁心和智慧相配的伟业。

CHAPTER I

第一章

(1) In the entrance to the former of these—to clear the way and, as it were, to make silence, to have the true testimonies concerning the dignity of learning to be better heard, without the interruption of tacit objections—I think good to deliver it from the discredits and disgraces which it hath received, all from ignorance, but ignorance severally disguised; appearing sometimes in the zeal and jealousy of divines, sometimes in the severity and arrogancy of politics, and sometimes in the errors and imperfections of learned men themselves.

（1）作为开篇，为排除障碍，也可以说为了让我们静下心来对于学问尊严加以论证，以便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所接受，不致暗中受到各种非议，我认为最好要从学问遭受的质疑与屈辱说起。这些质疑和屈辱主要源于无知，而这种无知通常带有伪装性：有时体现在神学家的狂热与嫉妒的情绪中，有时又体现在政治家的严苛与狂傲的态度上，还体现在学者自身的错误与缺陷里。

(2) I hear the former sort say that knowledge is of those things which are to be accepted of with great limitation and caution; that the aspiring to overmuch knowledge was the original temptation and sin whereupon ensued the fall of man; that knowledge hath in it somewhat of the serpent, and, therefore, where it entereth into a man it makes him swell; *Scientia inflat* ; that Solomon gives a censure, “That there is no end of making books, and that much reading is weariness of the flesh;” and again in another place, “That in spacious knowledge there is much contristation, and that he that increaseth knowledge increaseth anxiety;” that Saint Paul gives a caveat, “That we be not spoiled through vain philosophy;” that experience demonstrates how learned men have been arch-heretics, how learned times have been inclined to atheism, and how the contemplation of second causes doth derogate from our dependence upon God, who is the first cause.

（2）据我了解，前人认为学习知识有诸多限制，须倍加小心；因为渴求过量的知识是人类最原始的诱惑与罪恶，并最终导致了人类的堕落；知识本身如同毒蛇，因此，一旦它进入人类思维，人便会自我膨胀，即“知识膨胀”。所罗门就曾警示道，“知识会让人自我膨胀。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在另一处他又提到，“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愁；知识越多，烦愁越多。”圣保罗也曾告诫道，“你们要谨防有人用他虚空的哲学扰乱内心。”经验显示，学者往往容易发展成极端的异教徒，学术昌明的时代也常倾向于无神论，而对第二动因的沉思又削弱了我们对于第一动因——上帝的信赖。

(3) To discover, then, the ignorance and error of this opinion, and the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grounds thereof, it may well appear these men do not observe or consider that it was not the

pure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universality, a knowledge by the light whereof man did give names unto other creatures in Paradise as they were brought before him according unto their proprieties, which gave the occasion to the fall; but it was the proud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with an intent in man to give law unto himself, and to depend no more upon God's commandments, which was the form of the temptation. Neither is it any quantity of knowledge, how great soever, that can make the mind of man to swell; for nothing can fill, much less extend the soul of man, but God and the contemplation of God; and, therefore, Solomon, speaking of the two principal senses of inquisition, the eye and the ear, affirmeth that the eye is never satisfied with seeing, nor the ear with hearing; and if there be no fulness, then is the continent greater than the content: so of knowledge itself and the mind of man, whereto the senses are but reporters, he defineth likewise in these words, placed after that calendar or ephemerides which he maketh of the diversities of times and seasons for all actions and purposeqs, and concludeth thus: “God hath made all things beautiful, or decent, in the true return of their seasons. Also He hath placed the world in man's heart, yet cannot man find out the work which God worketh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declaring not obscurely that God hath framed the mind of man as a mirror or glass, capable of the image of the universal world, and joyful to receive the impression thereof, as the eye joyeth to receive light; and not only delighted in beholding the variety of things and vicissitude of times, but raised also to find out and discern the ordinances and decrees which throughout all those changes are infallibly observed. And although he doth insinuate that the supreme or summary law of Nature (which he calleth “the work which God worketh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is not possible to be found out by man, yet that doth not derogate from the capacity of the mind; but may be referred to the impediments, as of shortness of life, ill conjunction of labours,

ill tradition of knowledge over from hand to hand, and many other inconveniences, whereunto the condition of man is subject. For that nothing parcel of the world is denied to man's inquiry and invention, he doth in another place rule over, when he saith, “The spirit of man is as the lamp of God, wherewith He searcheth the inwardness of all secrets.” If, then, such be the capacity and receipt of the mind of man, it is manifest that there is no danger at all in the proportion or quantity of knowledge, how large soever, lest it should make it swell or out-compass itself; no, but it is merely the quality of knowledge, which, be it in quantity more or less, if it be taken without the true corrective thereof, hath in it some nature of venom or malignity, and some effects of that venom, which is ventosity or swelling. This corrective spice, the mixture whereof maketh knowledge so sovereign, is charity, which the Apostle immediately addeth to the former clause; for so he saith, “Knowledge bloweth up, but charity buildeth up;” not unlike unto that which he deilvereth in another place: “If I spake,” saith he, “with the tongues of men and angels, and had not charity, it were but as a tinkling cymbal.” Not but that it is an excellent thing to speak with the tongues of men and angels, but because, if it be severed from charity, and not referred to the good of men and mankind, it hath rather a sounding and unworthy glory than a meriting and substantial virtue. And as for that censure of Solomon concerning the excess of writing and reading books, and the anxiety of spirit which redoundeth from knowledge, and that admonition of St. Paul, “That we be not seduced by vain philosophy,” let those places be rightly understood; and they do, indeed, excellently set forth the true bounds and limitations whereby human knowledge is confined and circumscribed, and yet without any such contracting or coarctation, but that it may comprehend all the universal nature of things; for these limitations are three: the first, “That we do not so place our felicity in knowledge, as we forget our mortality;” the

second, “That we make application of our knowledge, to give ourselves repose and contentment, and not distaste or repining;” the third, “That we do not presume by the contemplation of Nature to attain to the mysteries of God.” For as touching the first of these, Solomon doth excellently expound himself in another place of the same book, where he saith: “I saw well that knowledge recedeth as far from ignorance as light doth from darkness; and that the wise man's eyes keep watch in his head, whereas this fool roundeth about in darkness: but withal I learned that the same mortality involveth them both.” And for the second, certain it is there is no vexation or anxiety of mind which resulteth from knowledge otherwise than merely by accident; for all knowledge and wonder (which is the seed of knowledge) is an impression of pleasure in itself; but when men fall to framing conclusions out of their knowledge, applying it to their particular, and ministering to themselves thereby weak fears or vast desires, there groweth that carefulness and trouble of mind which is spoken of; for then knowledge is no more Lumen siccum, whereof Heraclitus the profound said, Lumen siccum optima anima; but it becometh Lumen madidum, or maceratum, being steeped and infused in the humours of the affections. And as for the third point, it deserveth to be a little stood upon, and not to be lightly passed over; for if any man shall think by view and inquiry into these sensible and material things to attain that light, whereby he may reveal unto himself the nature or will of God, then, indeed, is he spoiled by vain philosophy; for the contemplation of God's creatures and works produceth (having regard to the works and creatures themselves) knowledge, but having regard to God no perfect knowledge, but wonder, which is broken knowledge. And, therefore, it was most aptly said by one of Plato's school, “That the sense of man carrieth a resemblance with the sun, which (as we see) openeth and revealeth all the terrestrial globe; but then, again, it obscureth and concealeth

the stars and celestial globe: so doth the sense discover natural things, but it darkeneth and shutteth up divine." And hence it is true that it hath proceeded, that divers great learned men have been heretical, whilst they have sought to fly up to the secrets of the Deity by this waxen wings of the senses. And as for the conceit that too much knowledge should incline a man to atheism, and that the ignorance of second causes should make a more devout dependence upon God, which is the first cause; first, it is good to ask the question which Job asked of his friends: "Will you lie for God, as one man will lie for another, to gratify him?" For certain it is that God worketh nothing in Nature but by second causes; and if they would have it otherwise believed, it is mere imposture, as it were in favour towards God, and nothing else but to offer to the Author of truth the unclean sacrifice of a lie. But further, it is an assured truth, and a conclusion of experience, that a little or superficial knowledge of philosophy may incline the mind of men to atheism, but a further proceeding therein doth bring the mind back again to religion. For in the entrance of philosophy, when the second causes, which are next unto the senses, do offer themselves to the mind of man, if it dwell and stay there it may induce some oblivion of the highest cause; but when a man passeth on further and seeth the dependence of causes and the works of Providence; then, according to the allegory of the poets, he will easily believe that the highest link of Nature's chain must needs he tied to the foot of Jupiter's chair. To conclude, therefore, let no man upon a weak conceit of sobriety or an ill-applied moderation think or maintain that a man can search too far, or be too well studied in the book of God's word, or in the book of God's works, divinity or philosophy; but rather let men endeavour an endless progress or proficience in both; only let men beware that they apply both to charity, and not to swelling; to use, and not to ostentation; and again, that they do not unwisely mingle or confound these learnings together.

（3）要找出这类观点的无知与错误之处，指出对它根本上的误解，我们便需意识到，那些人并未认真观察，细心思虑，人之所以会堕落，并不是因为关于自然与宇宙的纯粹知识，也不是因为一种能在伊甸园中根据其他生物的特性对其加以命名的知识，而是因为人类过于骄傲，自满于自身拥有的有关善恶的知识，并企图恣意妄为，不再遵从上帝的戒律，这也是一种诱惑。无论知识如何丰富，人类都不能自我膨胀。因为除了上帝和对上帝的冥思，一切都无法填充人类的心灵，更别提令其膨胀。因此，所罗门在提及眼、耳这两种人类探知世界的主要感官时曾明确指出，“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只要容器大于内容，便永无充盈之时。知识本身与人类心灵亦复如此，而感官仅仅是向心灵汇报其所感知到的一切。所罗门在其编写的一部历书或称为编年史的后面也有类似表达，制定这部历书的目的在于区别不同时间和季节应从事的活动。他在书中总结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显得美好。又将世界万物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自始至终上帝的行为，人不能参透。”无疑这句话是在表明，上帝塑造了人类的心灵，使其如镜子或玻璃一般，感知宇宙万物的影像，并如眼睛乐于接收光亮一样欣然接受由此产生的印象。人类心灵不仅乐于接受万象万物，也喜于洞悉各类变迁所一贯遵循的规律与法则。尽管所罗门已暗示了至高无上总领一切的自然法则（他称为“上帝自始至终所做的工作”）不可能为人类所发现，但这并没有贬低人类的心智，只是说明其中存在着阻碍，如生命的短暂、精力分配不当、不良传统的传承及其他许多烦扰因素，而人类便是受制于这些条件。所罗门说：“人类的灵魂尤如上帝的明灯，上帝便是通过它来探索万物的奥秘。”于是，世上一切都不可能逃过人类的探寻与发掘，在某些方面人类甚至起着支配作用。如果人类心灵确实具有这些能力与容量，显然知识的范围与总数不论有多庞大，都不会产生任何危险，从而使其免于自我膨胀或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然而事实上，不论知识本身的数量多少，如不经任何纠正而全盘接受，那么这些知识之中便会混入一些毒素，造成不良影响，发酵、繁殖，以致过分浮夸或者膨胀。而可以纠正错误、解除毒素的调和剂便是仁爱，它可使知识显示出至高无上的一面。使徒在之前所引的话后又即刻附上：“知识令人傲慢自大，惟有

爱心能造就人”。在另一处，又提到相似的内容：“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这并不是说懂得人类话语和天使语言不是件好事，只是说如若言辞中缺乏仁爱，不利于大众公益、人类事业，那么，它就谈不上是具有实质价值的美德，只不过是空洞浮夸的吹嘘罢了。至于所罗门提到的对著述、阅读过度的谴责和知识带来的精神烦忧，以及圣保罗的警告，“我们不要被空虚的哲学所迷惑，”此类种种，人们需细细解读。诚然，它们很好地阐释了人类知识所受到的真正约束与限制，未经得任何压缩，但是却能够领会万物的普遍性质。因为知识所受的限制有三类：第一，“我们不能把幸福过多依赖于知识，而忽略人的死亡宿命；”第二，“我们运用知识获得宁静与满足，而不是厌烦与抱怨；”第三，“我们不可擅自观察自然以窥得上帝的秘密。”对于第一点，所罗门在书中另一处有极好的阐述：“我看得清楚，智慧远离无知，如同光明远离黑暗；聪明人睁大眼睛用心观察，愚蠢的人在黑暗中跌跌撞撞。但是我认为无论是智者还是愚者都有死亡大限。”至于第二点，知识偶尔会给心灵带来烦扰与忧虑，但仅是偶尔；因为所有知识和疑惑（这便是知识的萌芽）本身就能产生愉悦感，但当人类用自己的知识过度揣测，将其应用于自身个例，为自己服务，用来降低恐惧，满足欲望时，那么之前提及的心灵的烦扰与忧虑便会增加。到那时，知识不再是学识渊博的赫拉克利特所谓的“干燥的光，最佳的灵魂”，而是成为了情感浸透下的湿润之光。最后一点值得鞭辟近里地进行探讨，我们不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如有人认为可以通过观察与探究感性的物质世界来获得这一束光，从而窥得上帝的本性或意愿，那么，他的确是被虚空的哲学扰乱了内心。知识产生于对上帝创造的万物与作品的沉思（对这些创造物本身而言），但上帝自身并不能产生完美的知识，有的只是各种疑惑，也可称作是零散的知识。柏拉图学派的一名学者对此有恰如其分的表述：“人的感知如同旭日，它向我们展示了大地万物，却又掩藏了天空与星辰。人的感知也是如此，它能发现自然万物，却弱化并隐藏了神的一切。”因此，他在后面提到，因而各领域高深学者均成了异教徒，企图凭借自己脆弱的感官之翼飞向神的领域，探求其奥秘。有人认为，过多知识使人自傲，令人趋向无神论，对第二动因的无知则使人更为虔诚地依赖上帝这一第一动因。

针对这一观点，首先，我们不妨提及约伯问他朋友的话，“你会为讨好上帝而撒谎吗，就像人类为取悦他人而说谎那样？”上帝通过第二动因支配万物，这点是毫无异议的。若有人并不这么认为，那只是为取悦上帝，实则是一种欺骗，是对真理之主的不洁献祭。进一步来说，对哲学的一知半解可将人类引向无神论，但继续深究又可将其拉回宗教领域，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经验之谈。因为在哲学入门之时，距离感官较近的第二动因即刻进入人们思想。若令其在此长时逗留，则可能致使人类遗忘至高动因；但如果继续前行，看到各动因之间的依存性，领会到上帝的伟大创造，那么，根据诗人的喻意，人们便很容易相信，自然链的最高连接点必须系在丘比特座椅的脚上。因此，总而言之，不要让人们对清醒抱以少许自负心态，也不要让人们误用了缓和的思想，还不能让人类认为自己可以记录上帝话语和作品，即神学和哲学的书籍中进行深入探索，彻底揣摩，相反，人们应当在两个方面都进行不懈努力，以取得不断进步。只有当人们意识到他们把这两方面都应用到获得仁慈宽厚而非自我膨胀中，以运用为目的，而非炫耀，而且，人们不可不明智地将这些学问错综糅杂，混为一谈。

CHAPTER II

第二章

(1) And as for the disgraces which learning receiveth from politics, they be of this nature: that learning doth soften men's minds, and makes them more unapt for the honour and exercise of arms; that it doth mar and pervert men's dispositions for matter of government and policy, in making them too curious and irresolute by variety of reading, or too peremptory or positive by strictness of rules and axioms, or too immoderate and overweening by reason of the greatness of examples, or too incompatible and differing from the times by reason of the dissimilitude of examples; or at least, that

it doth divert men's travails from action and business, and bringeth them to a love of leisure and privateness; and that it doth bring into states a relaxation of discipline, whilst every man is more ready to argue than to obey and execute. Out of this conceit Cato, surnamed the Censor, one of the wisest men indeed that ever lived, when Carneades the philosopher came in embassage to Rome, and that the young men of Rome began to flock about him, being allured with the sweetness and majesty of his eloquence and learning, gave counsel in open senate that they should give him his despatch with all speed, lest he should infect and enchant the minds and affections of the youth, and at unawares bring in an alteration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state. Out of the same conceit or humour did Virgil, turning his pen to the advantage of his country and the disadvantage of his own profession, make a kind of separation between policy and government, and between arts and sciences, in the verses so much renowned, attributing and challenging the one to the Romans, and leaving and yielding the other to the Grecians: *Tu regere imperio popules, Romane, memento, Hae tibi erunt artes, &c* . So likewise we see that Anytus, the accuser of Socrates, laid it as an article of charge and accusation against him, that he did, with the variety and power of his discourses and disputatious, withdraw young men from due reverence to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their country, and that he did profess a dangerous and pernicious science, which was to make the worse matter seem the better, and to suppress truth by force of eloquence and speech.

（1）至于政治使学问蒙受的屈辱，其主要表现如下：学问会软化人类的思想，让他们不再习惯于军队的荣耀与锤炼；并破坏了人们对政府和政策所持的冷静态度，博览群书之后，人类会变得或过分好奇和犹豫，或许会对规则和公理的严格性过分决断，或因模仿榜样而变得过度自负且毫无节制，或者又与榜样背道而驰，或者学问至少能

够让人们不再专注于武力和商业，且让他们流连于安逸与私利。但同时也造成了人们纪律松散的状态，取代服从和执行的，是乐于争吵和辩论的心理。在哲学家卡尼亚德斯出使罗马时，当地年轻人簇拥前后，为他时而雄辩时而温善的口才及渊博的学识所叹服。而当时被冠以监察官名号的年轻人加图，可以说是史上最明智的人之一，正是出于此种自负心理，他在公开议会中提出忠告，应尽快将这位哲学家遣出罗马，以免其影响和迷惑年轻人的心智与情感，并在不知不觉中颠覆整个国家的行为和习俗。同样，出于此种自负或情绪，维尔吉尔在用他的笔赞颂自己的国家同时贬低自己的职业时，在政治与政府，艺术与科学之间加上了分隔符。在他的著名诗篇中，维尔吉尔将前者归于罗马人所乐于挑战的，而后者则是希腊人所追求的。他如是写道："伟哉，罗马，统领万国，实乃尔图。"同样，曾控告苏格拉底的阿尼图斯将此作为指控苏格拉底的证词，认为他通过演说和辩论的多样性与影响力使得年轻人缺少了对自己国家的律法和习俗应有的敬畏，同时，他妄自宣扬了一种危险而又有害的科学，这种科学将使得低劣的事物看起来愈加美好，又通过雄辩与演说的力量将真理取缔。

(2) But these and the like imputations have rather a countenance of gravity than any ground of justice: for experience doth warrant that, both in persons and in times, there hath been a meeting and concurrence in learning and arms, flourishing and excelling in the same men and the same ages. For as 'for men, there cannot be a better nor the hike instance as of that pair,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Julius Cæsar, the Dictator; whereof the one was Aristotle's scholar in philosophy, and the other was Cicero's rival in eloquence; or if any man had rather call for scholars that were great generals, than generals that were great scholars, let him take Epaminondas the Theban, or Xenophon the Athenian; whereof the one was the first that abated the power of Sparta, and the other was the first that made way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monarchy of Persia. And this concurrence is yet more visible in times than in persons,

by how much an age is greater object than a man. For both in Egypt, Assyria, Persia, Graecia, and Rome, the same times that are most renowned for arms are, likewise, most admired for learning, so that the greatest authors and philosophers, and the greatest captains and governors, have lived in the same ages. Neither can it otherwise he: for as in man the ripeness of strength of the body and mind cometh much about an age, save that the strength of the body cometh somewhat the more early, so in states, arms and learning, whereof the one correspondeth to the body, the other to the soul of man, have a concurrence or near sequence in times.

（2）然而，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责难看似振振有词，实则缺少合理的根基支撑。经验警示人们，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一个时代，学问与武力总有一定交集，可在同一人身上或同一时代相辅相成。对个人而言，亚历山大大帝和独裁官尤里乌斯·恺撒这一对是最好的例子。前者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上颇有造诣，后者的雄辩才能则可与西塞罗相匹敌。如需要将才学者的例子，而非博学的将军，那么，可以以底比斯的伊巴密浓达和雅典的色诺芬为例。前者是撤除斯巴达势力的第一人，后者同样是颠覆波斯帝国统治的首要功臣。与在个人身上的体现相比，此种交集在一个时代上的表现更是显而易见，其程度也正好是时代大于个人。在埃及、亚述、波斯、希腊和罗马等国，军事强大的时代往往也是学术颇得尊崇的时代，因而最优秀的作家、哲学家和最伟大的领袖、统治者通常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事实也只能如此，因为人的身体和心理成熟基本发生在同一时期，只不过身体成熟稍早一点而已。因此对于国家而言，武力与学问，就如人的身体与心理，要么同时发生，要么前后相继发生。

(3) And for matter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 that learning, should rather hurt, than enable thereunto, is a thing very improbable; we see it is accounted an error to commit a natural

body to empiric physicians, which commonly have a few pleasing receipts whereupon they are confident and adventurous, but know neither the causes of diseases, nor the complexions of patients, nor peril of accidents, nor the true method of cures; we see it is a like error to rely upon advocates or lawyers which are only men of practice, and not grounded in their books, who are many times easily surprised when matter falleth out besides their experience, to the prejudice of the causes they handle: so by like reason it cannot be but a matter of doubtful consequence if states be managed by empiric statesmen, not well mingled with men grounded in learning. But contrariwise, it is almost without instance contradictory that ever any government was disastrous that was in the hands of learned governors. For howsoever it hath been ordinary with politic men to extenuate and disable learned men by the names of *pedantes* ; yet in the records of time it appeareth in many particulars that the governments of princes in minority (notwithstanding the infinite disadvantage of that kind of state)—have nevertheless excelled the government of princes of mature age, even for that reason which they seek to traduce, which is that by that occasion the state hath been in the hands of *pedantes* : for so was the state of Rome for the first five years, which are so much magnified, during the minority of Nero, in the hands of Seneca, a pedenti; so it was again, for ten years' space or more, during the minority of Gordianus the younger, with great applause and contentation in the hands of Misitheus, a *pedanti* : so was it before that, in the minority of Alexander Severus, in like happiness, in hands not much unlike, by reason of the rule of the women, who were aided by the teachers and preceptors. Nay, let a man look in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Bishops of Rome, as by name, into the government of Pius Quintus and Sextus Quintus in our times, who were both at their entrance esteemed but as pedantical friars, and he shall find that such Popes do greater things, and proceed upon

truer principles of state, than those which have ascended to the papacy from an education and breeding in affairs of state and courts of princes; for although men bred in learning are perhaps to seek in points of convenience and accommodating for the present, which the Italians call *ragioni di stato* , whereof the same Pius Quintus could not hear spoken with patience, terming them inventions against religion and the moral virtues; yet on the other side, to recompense that, they are perfect in those same plain grounds of religion, justice, honour, and moral virtue, which if they be well and watchfully pursued, there will be seldom use of those other, no more than of physic in a sound or well-dieted body. Neither can the experience of one man's life furnish examples and precedents for the event of one man's life. For as it happeneth sometimes that the grandchild, or other descendant, resembleth the ancestor more than the son; so many times occurrences of present times may sort better with ancient examples than with those of the later or immediate times; and lastly, the wit of one man can no more countervail learning than one man's means can hold way with a common purse.

（3）对于政治和政府，有这样一种说法，学问与其说赋予其能力，不如说对其造成损害。这种观点未必正确。把一个完好的人交到江湖郎中手中，可以说是错误的。那些郎中往往凭借仅有的几个有效处方，在不明病因，不知病情，也没预见医疗事故的情况下，很有可能造成危险，而且他们更是在不懂得真正的治疗方式的情况下仍旧自信满满，冒险医治。同样，完全仅凭经验，不寻求根据的辩护律师也是一种错误，每当事件与他们的经验背道而驰，他们的目的无法达到时，他们就会惊讶万分，不知所措。因此，出于同样的道理，如国家为只靠经验行事的政治家所掌控，而无博学之人的辅佐，那结果往往是令人忧心的。反之，几乎没有博学的统治者掌控的政府遭致灾难。政治家常将学者贬低为空谈学问的迂腐学究，然而纵观历史，总有那么多特例表明少主执政的政府，虽存在较多弊端，却比成年君王执政

要成功得多，这便得益于他们试图诋毁的迂腐学究的有力辅佐。罗马帝国初始五年统治颇受褒扬，而当时年少的尼禄执政，政权实为学究塞内加所掌握。同样，在年幼的小戈尔迪安掌政的十多年间，获得学究米西特修斯的鼎力相助，赢得广泛称颂。此前亦有亚历山大·塞维鲁的例子。在其年少时，同样国强民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是妇人当政，但她们实际上也是得到了良师的指导和协助。再来看看罗马教皇的政府，就按名字命名，看看当代的庇护五世和塞克斯特斯五世政府。这两位修士刚上任时，之所以受人尊敬仅仅因为他们学识渊博，学究气十足。然而他们在政治上也成就了一番伟业。比起那些受尽国事和宫廷教化，通过受教而成为教皇的人，他们实行了更为合理的治国政策，政绩卓著。虽然饱学之士常被认为倾向于为寻求方便追溯已有经验寻找现实治国方针，即意大利人所谓的“理性状态”，庇护五世从不耐心听取这一说法，他宣称这些只是违背宗教和道德的捏造之辞。其实换个角度看，如能在宗教、正义、尊荣、品德等方面坚持不懈，追求至善至美，就根本不会有那些所谓的治国方针的用武之地，正如一个完美健康之人无需额外医疗一样。一个人的经验永远不可能完全为另一个人所经历的所有事提供范例或先例。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起儿女，孙子辈或其他后代与祖父辈更为相似。同样的，很多时候当下发生的事件和古时的事例更加类似，而非与稍后或者近期的事情。最后，我们应当承认，一个人的智慧不可能与经久积累的系统学问匹敌，正如一个人的钱包无法装下所有的财富一样。

(4) And as for those particular seducements or indispositions of the mind for policy and government, which learning is pretended to insinuate; if it be granted that any such thing be, it must be remembered withal that learning ministereth in every of them greater strength of medicine or remedy than it offereth cause of indisposition or infirmity. For if by a secret operation it make men perplexed and irresolute, on the other side by plain precept it teacheth them when and upon what ground to resolve; yea, and how to carry things in suspense, without prejudice, till they resolve.

If it make men positive and regular, it teacheth them what things are in their nature demonstrative, and what are conjectural, and as well the use of distinctions and exceptions, as the latitude of principles and rules. If it mislead by disproportion or dissimilitude of examples, it teacheth men the force of circumstances, the errors of comparisons, and all the cautions of application; so that in all these it doth rectify more effectually than it can pervert. And these medicines it conveyeth into men's minds much more forcibly by the quickness and penetration of examples. For let a man look into the errors of Clement VII., so lively described by Guicciardini, who served under him, or into the errors of Cicero, painted out by his own pencil in his Epistles to Atticus, and he will fly apace from being irresolute. Let him look into the errors of Phocion, and he will beware how he be obstinate or inflexible. Let him but read the fable of Ixion, and it will hold him from being vaporous or imaginative. Let him look into the errors of Cato II., and he will never be one of the Antipodes, to tread opposite to the present world.

（4）至于那些说学问暗诱人们内心对政府和政策的嫌恶和盲从的说法，即使这样，人们也不能忘记学问对自身治疗与完善功效，远比他们造成的危害大的多。如果说，学问通过一种隐秘手术使人迷乱、彷徨，那么，另一方面，它也明确地教导人们在何时、因何种缘由可以如何解决问题，告诉人们怎样不抱偏见地搁置不确定的事情，直至得以确定。如果说，学问使人变得固执武断、墨守成规，那它同时也告诉人们哪些事物展现了它们的本质特征，哪些又只是人们的推测，也教会人们如何了解原则和规律的适用范围，如何对待例外事件和存在的差异。如果学问应用失衡，例证产生误导，这也教导了人们应注意客观环境的重要性，要留心比较对照时易犯的错误以及应用时须谨慎行事。因此，在所有这些方面学问带来的改进效果远比它造成的阻碍深远得多。学问的疗效还深入人的心智。其传递效果通过以下几个例子会更加迅速、全面而有力展现出来。如果人们了解克莱门特

七世所犯错误（在他的朝臣圭恰迪尼的生动描述中历历可见）或西塞罗的过失（在致阿提库斯的书信中他亲自指出），他们便会立刻振作，迅速行动，决不踌躇不定。如果人们知道福基翁的过错，便会时时提防自己的顽固执拗。就算人们只是读了伊克西翁的寓言，也会在浮夸虚幻面前悬崖勒马。看到加图二世的错误，人们就必定不会立足于世界一端，却想要踏入另一端的世界。

(5) And for the conceit that learning should dispose men to leisure and privateness, and make men slothful: it were a strange thing if that which accustometh the mind to a perpetual motion and agitation should induce slothfulness, whereas, contrariwise, it may be truly affirmed that no kind of men love business for itself but those that are learned; for other persons love it for profit, as a hireling that loves the work for the wages; or for honour, as because it beareth them up in the eyes of men, and refresheth their reputation, which otherwise would wear; or because it putteth them in mind of their fortune, and giveth them occasion to pleasure and displeasure; or because it exerciseth some faculty wherein they take pride, and so entertaineth them in good-humour and pleasing conceits towards themselves; or because it advanceth any other their ends. So that as it is said of untrue valours, that some men's valours are in the eyes of them that look on, so such men's industries are in the eyes of others, or, at least, in regard of their own designments; only learned men love business as an action according to nature, as agreeable to health of mind as exercise is to health of body, taking pleasure in the action itself, and not in the purchase, so that of all men they are the most indefatigable, if it be towards any business which can hold or detain their mind.

（5）至于学问引导人追求安逸和私人生活，从而趋于怠惰，这

种幻觉也是无据可查的。既然学问使人的心智处于不断运动和焦虑之中，又怎会日趋怠惰？相反，我们可以肯定，没有人像学者那样因为工作本身而热爱工作。有人喜欢工作，因为工作可以获利，像雇员就是为获得工资而工作；有人则是为了荣誉，因为工作能抬高身价，增添名誉，这是不增即减的；也有人把工作当成自己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消遣娱乐，同时感受悲伤；也有人工作是为了锻炼才能，从而他们可以引以为傲，心情愉悦，自信满满；还有些人则把工作当成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正如虚伪的英勇是为了做给他人看，一些人的勤奋也是伪装给旁人看的，或者至少他们的动机如此。只有学者热爱工作是因为工作这一行为本身。对他们而言，工作对于心智就如同锻炼对于身体一样。他们愉悦于工作本身，并不是它带来的结果。所以，一旦有事情让他们专注心智，那么学者可谓是最孜孜不倦的人了。

(6) And if any man be laborious in reading and study, and yet idle in business and action, it groweth from some weakness of body or softness of spirit, such as Seneca speaketh of: *Quidam tam sunt umbratiles, ut putent in turbido esse quicquid in luce est* ; and not of learning: well may it be that such a point of a man's nature may make him give himself to learning, but it is not learning that breedeth any such point in his nature.

（6）如有人勤于阅读钻研，却怠于工作行动，这是由身体或精神的脆弱引起的。正如塞内加所言的那样，“人们如久居阴暗地，一旦身处光明，仍会觉得自己麻烦遍身。”而学问却并非如此。人们天性中存在的脆弱面可以引导他们着手研究学问，但绝非学问造成了他们天性中的这种缺陷。

(7) And that learning should take up too much time or leisure: I answer, the most active or busy man that hath been or can be, hath

(no question) many vacant times of leisure while he expecteth the tides and returns of business (except he be either tedious and of no despatch, or lightly and unworthily ambitious to meddle in things that may be better done by others), and then the question is but how those spaces and times of leisure shall be filled and spent; whether in pleasure or in studies; as was well answered by Demosthenes to his adversary Æschines, that was a man given to pleasure, and told him “That his orations did smell of the lamp. " “Indeed,” said Demosthenes,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ings that you and I do by lamp-light.” So as no man need doubt that learning will expel business, but rather it will keep and defend the possession of the mind against idleness and pleasure, which otherwise at unawares may enter to the prejudice of both.

（7）有人说，做学问会占据太多时间，令人不得空闲，对此我却这样认为，最活跃忙碌的人在工作和休闲之间，安排得当，有松有驰，因而往往有大量的闲暇时间（除非他做事迟缓拖延，又或乐于包揽或插手他人事务）。这样一来，问题就仅仅在于如何利用这些空闲时间，是该用来娱乐还是学习。狄摩西尼在和其对手埃斯基涅斯的一次对话中对此有十分巧妙的回答。埃斯基涅斯是个贪图享乐之人，他曾对狄摩西尼说他的演讲“充斥着油灯的味道”，尽是迂腐之言。对此，狄摩西尼如是回答：“确实，我们同处灯光下，做的事却截然不同。”因此，人们无需怀疑学问将占据工作时间。相反，它可以使人保持头脑清醒，不受慵懒与享乐的诱惑，从而避免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入侵大脑，不仅影响工作，同样侵害到学问的作为。

(8) Again, for that other conceit that learning should undermine the reverence of laws and government, it is assuredly a mere depravation and calumny, without all shadow of truth. For to say that a blind custom of obedience should be a surer obligation

than duty taught and understood, it is to affirm that a blind man may tread surer by a guide than a seeing man can by a light. And it is without all controversy that learning doth make the minds of men gentle, generous, manageable, and pliant to government; whereas ignorance makes them churlish, thwart, and mutinous: and the evidence of time doth clear this assertion, considering that the most barbarous, rude, and unlearned times have been most subject to tumults, seditious, and changes.

（8）有人则认为学问弱化了人们对律法与政府的敬畏之情。这无疑也是对学问的诋毁，毫无真实性可言。其理由在于，若盲目服从是一种比明白事理后作出的负责行为更为可靠的职责体现，那也就是说，盲人在别人带领下踏出的步伐较之明眼人光天化日之下的步伐更加稳健。学问使人优雅大方，善于自控，尊重政府，而无知则令人蛮横狂妄，信心受挫，刚愎自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最为野蛮无知的年代就充斥着各种动乱和变化，缺乏稳定因素。

(9) And as to the judgment of Cato the Censor, he was well punished for his blasphemy against learning, in the same kind wherein he offended; for when he was past threescore years old, he was taken with an extreme desire to go to school again, and to learn the Greek tongue, to the end to peruse the Greek authors; which doth well demonstrate that his former censure of the Grecian learning was rather an affected gravity, than according to the inward sense of his own opinion. And as for Virgil's verses, though it pleased him to brave the world in taking to the Romans the art of empire, and leaving to others the arts of subjects, yet so much is manifest—that the Romans never ascended to that height of empire till the time they had ascended to the height of other arts. For in the

time of the two first Cæsars, which had the art of government in greatest perfection, there lived the best poet, Virgilius Maro; the best historiographer, Titus Livius; the best antiquary, Marcus Varro; and the best or second orator, Marcus Cicero, that to the memory of man are known. As for the accusation of Socrates, the time must be remembered when it was prosecuted; which was under the Thirty Tyrants, the most base, bloody, and envious persons that have governed; which revolution of state was no sooner over but Socrates, whom they had made a person criminal, was made a person heroical, and his memory accumulate with honours divine and human; and those discourses of his which were then termed corrupting of manners, were after acknowledged for sovereign medicines of the mind and manners, and so have been received ever since till this day. Let this, therefore, serve for answer to politiques, which in their humorous severity, or in their feigned gravity, have presumed to throw imputations upon learning; which redargution nevertheless (save that we know not whether our labours may extend to other ages) were not needful for the present, in regard of the love and reverence towards learning which the example and countenance of two so learned princes, Queen Elizabeth and your Majesty, being as Castor and Pollux, *lucida sidera* , stars of excellent light and most benign influence, hath wrought in all men of place and authority in our nation.

（9）监察官加图曾因亵渎学问而受到严厉惩罚，即投身于他所冒犯的学问。在其耳顺之年，他极度热切求学，学习希腊语言，钻研希腊文学。这充分表明，他过去对希腊学问的责难仅是故作郑重，其实并非内心真实观点。在维尔吉尔的诗歌中，他热心于看到罗马帝国为世界展示的帝王之术，而不提国民之术。但事实并非如此，显然，罗马帝国只有在其他艺术层面达到巅峰之时才使其帝国登顶。在初期两位恺撒执政期间，政治艺术堪称完美。而同一时期也涌现了大批伟

大人物，包括杰出诗人维尔吉尔，优秀的历史学家泰特斯·利维乌斯，古文物学家马库斯·瓦罗，还有鼎鼎大名的演说家西塞罗。西塞罗是继那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伟人之后最优秀演说家。至于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我们必须考虑其发生的时代背景。那是在寡头政府三十僭主统治期间，君主残暴野蛮，血腥多妒。暴政一旦被推翻，苏格拉底这一昔日的罪犯便成了英雄，他各种神圣和人性化的荣耀随时间的推移愈加为人们所深深怀念。同时，他那些曾被指责为伤风败俗的言论也已成为指导人类心智与举止的金玉良言，直至今日其影响有增无减。国家的政治总是故作严苛，伪装庄重，政客们倾向于把这些都归罪于学问。我认为，以上种种例证就是对此很好的回答。不过这种辩驳在当今根本不需要（如果不考虑我们的努力是否能流传下来的话），因为我们拥有两位贤明博学的君主，伊丽莎白女王还有陛下您，您二位尊崇学问，以身作则，实是全民的楷模，正如天上的明星骑术之神卡斯托和拳术之神波吕丢克斯一般，光彩普照大地，仁爱遍及人间，对所有国民，包括拥有权位之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HAPTER III

第三章

(1) Now therefore we come to that third sort of discredit or diminution of credit that groweth unto learning from learned men themselves, which commonly cleaveth fastest: it is either from their fortune, or from their manners, or from the nature of their studies. For the first, it is not in their power; and the second is accidental; the third only is proper to be handled: but because we are not in hand with true measure, but with popular estimation and conceit, it is not amiss to speak somewhat of the two former. The derogations therefore which grow to learning from the fortune or condition of learned men, are either in respect of scarcity of means, or in respect of privateness of life and meanness of employments.

（1）现在我们来讨论学问所遭受的第三种质疑和贬低，这主要来源于学者自身对学问的误解，这种情况下，质疑的传播速度也是最快的：可能是由他们的际遇，行为又或是他们研究的性质所导致的。第一种原因并不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内，第二种又是偶然事件，只有第三种是可以进行适当讨论研究的。由于我们在此并不是来研究实质方法的，只是来讨论当今普遍存在的一些观点和猜想，因而对前两种情况不加探讨也合情合理。总之，学者际遇或环境影响造成的对学问的贬低往往是由于其或一文不名，徒有四壁，或形单影只，孤芳自赏，又或被投置闲散，不得重用。

(2) Concerning want, and that it is the case of learned men usually to begin with little, and not to grow rich so fast as other men, by reason they convert not their labours chiefly to lucre and increase, it were good to leave the commonplace in commendation of povery to some friar to handle, to whom much was attributed by Machiavel in this point when he said, “That the kingdom of the clergy had been long before at an end, if the reputation and reverence towards the poverty of friars had not borne out the scandal of the superfluities and excesses of bishops and prelates.” So a man might say that the felicity and delicacy of princes and great persons had long since turned to rudeness and barbarism, if the poverty of learning had not kept up civility and honour of life; but without any such advantages, it is worthy the observation what a reverent and honoured thing poverty of fortune was for some ages in the Roman state, which nevertheless was a state without paradoxes. For we see what Titus Livius saith in his introduction:*Cœterum aut me amor negotii suscepti fallit aut nulla unquam respublica nec major, nec sanctior, nec bonis exemplis ditior fuit; nec in quam tam sero avaritia luxuriaque immigraverint; nec ubi tantus ac tam diu paupertati ac parsimoniæ honos fuerit.* We see

likewise, after that the state of Rome was not itself, but did degenerate, how that person that took upon him to be counsellor to Julius Cæsar after his victory where to begin his restoration of the state, maketh it of all points the most summary to take away the estimation of wealth: *Verum hæc et omnia mala pariter cum honore pecuniæ desinent; si neque magistratus, neque alia vulgo cupienda, venalia erunt.* To conclude this point: as it was truly said that *Paupertas est virtutis fortuna* , though sometimes it come from vice, so it may be fitly said that, though some times it may proceed from misgovernment and accident. Surely Solomon hath pronounced it both in censure, *Qui festinat ad divitias non erit insons* ; and in precept, “Buy the truth, and sell it not; and so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judging that means were to be spent upon learning, and not learning to be applied to means. And as for the privateness or obscureness (as it may be in vulgar estimation accounted) of life of contemplative men, it is a theme so common to extol a private life, not taxed with sensuality and sloth, in comparison and to the disadvantage of a civil life, for safety, liberty, pleasure, and dignity, or at least freedom from indignity, as no man handleth it but handleth it well; such a consonancy it hath to men's conceits in the expressing, and to men's consents in the allowing. This only I will add, that learned men forgotten in states and not living in the eyes of men, are like the images of Cassius and Brutus in the funeral of Junia, of which, not being represented as many others were, Tacitus saith, *Eo ipso præfulgebant quod non visebantur.*

（2）学者常常出身微寒，又不会花大量精力在财富积累上，因而不像容易其他人那样发家致富。他们投入的主要精力并不在于敛财，或许可以用修道士推崇贫贱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来解释。马基雅弗利就曾对修道士大加褒扬，说道：“如不是修道士克勤克俭的声名在外，大受尊重而掩盖了那些主教和高位神职者骄奢放逸的真面目，

宗教制度早就土崩瓦解，不复存在了。”因此可以说，如果不是贫困的学者维持着社会的礼仪与高雅，生命的尊荣与意义，那么，那些王公贵族所谓的雅致生活早已沦陷至粗蛮和愚昧之中。就算没有这些益处，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在罗马帝国这个不存在悖论的国度，物质上的贫困在很多时代也是一件值得引以为荣的事。在《罗马史》的前言中，泰特斯·利维乌斯曾说：“如果不受我对所从事工作的热情的蒙蔽，我可以说，罗马较之其他所有国家都更加伟大，公正，更能充当表率。罗马人也比其他国家的臣民更少贪婪和奢侈，他们长期尊崇贫穷和节俭。”同样，当罗马开始失去其本质，变得腐败堕落之时，尤里乌斯·恺撒夺得大权，准备重整国家，他的一名顾问指出，最首要的任务是摒除人们金钱至上的观念，“如果人们不再崇拜金钱，官位和民众渴望的其他利益也不能依赖于钱财，那么，罪恶便会销声匿迹。”古人云，贫困乃道德之神，尽管有时也源于罪行。我们在此还可以增添一句，有时它也源于治国无方或意外因素。所罗门也曾谴责世人，“人有恶眼急着想要快点发财，却不知贫乏必临他身”。同时他训诫民众，“真理可买不可卖，才智与学识亦是如此。”也就是说，人们应该用财富求学，而非以学问致富。至于说学者沉思寡言，遁世离群，捉摸不定（普通民众抱有这样的看法），这其实是对独居生活的颂扬和赞美。与平民的社会生活相比，这样的日子不再耽于声色，也远离了怠惰，充满安定、自由、恬淡而又不失尊严，至少能免遭欺辱。只要独居，必能做到如此。人们不仅称颂，也向往这样的生活，言行一致。在此仅补充一点，学者虽默默无闻，却如犹尼亚葬礼上卡西乌斯和布鲁图的形象一样，虽未像其他形象一样被刻画出来，但塔西陀说，“他们虽没出现，光辉胜过他人。”

(3) And for meanness of employment, that which is most traduced to contempt i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youth is commonly allotted to them; which age, because it is the age of least authority, it is transferred to the disesteeming of those employments wherein youth is conversant, and which are conversant about youth. But how unjust this traducement is (if you will reduce things from

popularity of opinion to measure of reason) may appear in that we see men are more curious what they put into a new vessel than into a vessel seasoned; and what mould they lay about a young plant than about a plant corroborate; so as this weakest terms and times of all things use to have the best applications and helps. And will you hearken to the Hebrew rabbins? “Your young men shall see visions, and your old men shall dream dreams:” say they, youth is the worthier age, for that visions are nearer apparitions of God than dreams?And let it be noted that howsoever the condition of life of pedantes hath been scorned upon theatres, as the ape of tyranny; and that the modern looseness or negligence hath taken no due regard to the choice of schoolmasters and tutors; yet the ancient wisdom of the best times did always make a just complaint, that states were too busy with their laws and too negligent in point of education: which excellent part of ancient discipline hath been in some sort revived of late times by the colleges of the Jesuits; of whom, although in regard of their superstition I may say, *Quo meliores, eo deteriores* ; yet in regard of this, and some other points concerning human learning and moral matters, I may say, as Agesilaus said to his enemy Pharnabazus, *Talis quum sis, utunam noster esses.* And that much touching the discredits drawn from the fortunes of learned men.

（3）至于职位卑微，不得重用，这是学者受到最大的诽谤就是被轻视，主要是政府倾向于让他们去教育年轻人，因为这一群体最无权力可言，所以他们所做的工作或者与青年有关的工作也自然不受尊重。但如能理性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我们就能发现，这样的蔑视极不公平。人们往往对新生事物较为好奇，比起久置不用的容器，对新容器中的事物更感兴趣；相较于成熟植株，会更精心扶植幼小植物。弱势的事物或事物的弱势期总会得到最为周到的扶持与呵护。听说过希伯来拉比的话吗？他们说：“少年人要见希望，老年人要做异

梦。”也就是说，年轻时期更有价值，因与梦幻相比，希望更接近上帝创造的幻象。戏剧总爱把学究式人物搬上舞台，把他们刻画成暴君身边的伶人一般，大加嘲弄。同时在当今社会，大家挑选导师时出现了不应有的松懈与轻率，这样的问题在古代盛世则不曾有过。当时的智者总会表达合理的不满，批评国家重律法而轻教育。这一训诫最精彩的部分在之后的耶稣会学派中得到了一定的复兴。从迷信的观点上说，该学派容易令人“愈精愈糟”，然在教育这方面，和其他有关学问与道德的观点上，我可以说，正如阿格西劳斯对其敌人法纳巴祖所言，“你实为良才，却无法为我所用”。我们对学者因财富与地位问题造成学问受到误解的讨论就到底结束。

(4) As touching the manners of learned men, it is a thing personal and individual: and no doubt there be amongst them, as in other professions, of all temperatures: but yet so as it is not without truth which is said, that *Abeunt studua in mores* , studies have an influence and operation upon the manners of those that are conversant in them.

（4）至于学者的礼仪作风，这仅仅是个人问题。与其他行业一样，学者也包含形形色色的人物。但值得肯定的是，学问必然对学者内在根深蒂固的行为习惯产生一定的影响。“学问变成一种习惯”，这样说并不是没有道理。

(5) But upon an attentive and indifferent review, I for my part cannot find any disgrace to learning can proceed from the manners of learned men; not inherent to them as they are learned; except it be a fault (which was the supposed fault of Demosthenes, Cicero, Cato II., Seneca, and many more) that because the times they read of are commonly better than the times they live in, and the duties

taught better than the duties practised, they contend sometimes too far to bring things to perfection, and to reduce the corruption of manners to honesty of precepts or examples of too great height. And yet hereof they have caveats enough in their own walks. For Solon, when he was asked whether he had given his citizens the best laws, answered wisely, “Yea, of such as they would receive:” and Plato, finding that his own heart could not agree with the corrupt manners of his country, refused to bear place or office, saying, “That a man's country was to be used as his parents were, that is, with humble persuasions, and not with contestations. " And Cæsar's counsellor put in the same caveat, *Non ad vetera instituta revocans quae jampridem corruptis moribus ludibrio sunt;* and Cicero noteth this error directly in Cato II. when he writes to his friend Atticus, *Cato optime sentit, sed nocet interdum reipublicæ; loquitur enim tanquam in republica Platonis, non tanquam in faece Romuli.* And the same Cicero doth excuse and expound the philosophers for going too far and being too exact in their prescripts when he saith,*Isti ipse præceptores virtutis et magistri videntur fines officiorum paulo longius quam natura vellet protulisse, ut cum ad ultimum animo contendissemus, ibi tamen, ubi oportet, consisteremus:* and yet himself might have said,*Monitis sum minor ipse meis;* for it was his own fault, though not in so extreme a degree.

（5）根据客观的细致观察，我个人着实找不到任何因学者行为来蔑视学问的依据。这些行为并不是学问导致的，除非出现这样的问题（通常也被世人用来指谪狄摩西尼、西塞罗、加图二世、塞内加和其他众多学者的问题），即由于人们认识他们的时代优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书中教导的职责总比现实实行情况好，因而他们过于理想化，过分追求完美，期望通过正直的训诫或过于高尚的范例来改善行为的腐败现象。但实际上，学者在这方面对自己的言行也有所警示。当梭伦被问及是否为他的国民制定了最好的律法，他的回答十分精

辟："当然，我给予的就是他们该得到的。"当柏拉图发现自己内心与他所处国家的腐败现象相抵触时，便拒绝担任任何官职，说道："对待国家就如同对待父母一般，应该谦恭劝诫，而不能据理力争。"同样，恺撒的顾问也曾提出相同的告诫："远古制度的优越性，早已因不受重视，民风不古而不可复制。"西塞罗在写给其友人阿提库斯的书信中明确指出了加图二世的过失。他写道："加图总想至善至美，却不知已损害到国家臣民，他以为自己身处柏拉图的理想国，殊不知周围仍是普通罗马大众。"对于哲人过于规范与严苛的要求，西塞罗也为其进行了一定的辩护。他说："这些贤者的高标准虽看似强人所难，实则意在勉励他人勤勉奋进，百炼成钢。"当然他自己也曾说过，"有时我的行为也不是完全发自我的内心"。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的过失，虽然不至于那么极端。

(6) Another fault likewise much of this kind hath been incident to learned men, which is, that they have esteemed the preservation, good, and honour of their countries or masters before their own fortunes or safeties. For so saith Demosthenes unto the Athenians: "If it please you to note it, my counsels unto you are not such whereby I should grow great amongst you, and you become little amongst the Grecians; but they be of that nature as they are sometimes not good for me to give, but are always good for you to follow." And so Seneca, after he had consecrated that Quinquennium Neronis to the eternal glory of learned governors, held on his honest and loyal course of good and free counsel after his master grew extremely corrupt in his government. Neither can this point otherwise be, for learning endueth men's minds with a true sense of the frailty of their persons, the casualty of their fortunes, and the dignity of their soul and vocation, so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esteem that any greatness of their own fortune can be a true or worthy end of their being and ordainment, and therefore are desirous to give their account to God, and so

likewise to their masters under God (as kings and the states that they serve) in those words, *Ecce tibi lucrefeci* , and not *Ecce mihi lucrefeci* ; whereas the corrupter sort of mere politiques, that have not their thoughts established by learning in the love and apprehension of duty, nor never look abroad into universality, do refer all things to themselves, and thrust themselves into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as if all lines should meet in them and their fortunes, never caring in all tempests what becomes of the ship of state, so they may save themselves in the cockboat of their own fortune; whereas men that feel the weight of duty and know the limits of self-love, use to make good their places and duties, though with peril; and if they stand in seditious and violent alterations, it is rather the reverence which many times both adverse parts to give to honesty, than any versatile advantage of their own carriage. But for this point of tender sense and fast obligation of duty which learning doth endue the mind withal, howsoever fortune may tax it, and many in the depth of their corrupt principles may despise it, yet it will receive an open allowance, and therefore needs the less disproof or excuse.

（6）学者身上还有一种通病，即将国家和君主的生存、利益和尊荣放在更高的位置，而不顾自身的安全与命运。狄摩西尼就曾对雅典人这样说道："烦请注意，我向你们提出忠告并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使你们在希腊人中越发渺小。有时候这些忠告对我而言毫无益处，但如果你们能够听取，则受益无穷。"塞内加也曾一直劝谏尼禄做一名博学的君主，以便流芳千古，名垂青史。即使在尼禄政府腐败当道之际，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诚挚劝导，衷心进谏。事实上，他们也只能做到如此。学问使他们真正体会到了人性的脆弱，命途的多舛以及灵魂与使命的庄严。因此他们不会把自身命运的高度作为他们一生的使命，而是乐于向上帝，或是上帝指派的统治者（包括他们所侍奉的国王和国家）奉献所有。他们总会说"我为国家谋得了福利"而

非“我自己获得了好处”。然而，那些腐化的政客根本没有受过学问的熏陶，意识不到仁爱与责任的重要性，也从来不懂顾全大局，一贯自私自利，以为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所有的一切都是为自己服务的。他们从不在乎国家这艘方舟能否历经暴风雨的摧残，只顾着为自己的利益备好小艇。然而那些懂得责任的重要性，明白自爱的局限性的人，能够很好地巩固自己的地位，完成自己的使命，虽然有时要承担一些风险。但是如果他们放荡叛逆，优柔寡断，将会给他们的诚信更多不利的影响，而不会为自身的风度带来任何的优势。学问影响着学者的内心，令他们温良俭让，恪尽职守，不管命运如何不公，如何被腐败的现实所压制，他们是真正值得大加赞许的，并不需要过多理由来辩驳。

(7) Another fault incident commonly to learned men, which may be more properly defended than truly denied, is that they fail sometimes in applying themselves to particular persons, which want of exact application ariseth from two causes—the one, because the largeness of their mind can hardly confine itself to dwell in the exquisite observation or examination of the nature and customs of one person, for it is a speech for a lover, and not for a wise man, *Satis magnum alter alteri theatrum sumus.* Nevertheless I shall yield that he that cannot contract the sight of his mind as well as disperse and dilate it, wanteth a great faculty. But there is a second cause, which is no inability, but a rejection upon choice and judgment. For the honest and just bounds of observation by one person upon another extend no further but to understand him sufficiently, whereby not to give him offence, or whereby to be able to give him faithful counsel, or whereby to stand upon reasonable guard and caution in respect of a man's self. But to be speculative into another man to the end to know how to work him, or wind him, or govern him, proceedeth from a heart that is double and cloven, and not entire and ingenuous; which as in friendship it is want of integrity,

so towards princes or superiors is want of duty. For the custom of the Levant, which is that subjects do forbear to gaze or fix their eyes upon princes, is in the outward ceremony barbarous, but the moral is good; for men ought not, by cunning and bent observations, to pierce and penetrate into the hearts of kings, which the *Scripture* hath declared to be inscrutable.

（7）学者的另一个过失在于与人相处中不懂得体察入微。对于这点，我们应该加以合理辩护，而不能全盘否认。这种情况往往由两种因素造成，其一是由于他们眼界宽广，无法时时注意或细心体察一个人的特征习惯等，有人说，“人生不过是一座大戏台”，对爱情是这样，但对智者来说，却并非如此。但有一点需要承认，如果学者不能体察入微，还无法做到胸襟豁达，那确实是一种能力的缺失。其二，学者有时拒绝作出选择和判断，这并非因为他们无能为力。因为我们对人的观察是受一定限制的，我们坦诚相对，互作观察，目的是为充分了解他人又不至于有所冒犯，或为其提供由衷的建议，又或是处于自身安全考虑保持适度的警惕。然而，有些人乐于揣测他人心思，目的在于使唤与控制他们，这些人内心阴险虚伪，不够坦率，作为朋友缺乏诚信，对君王和尊长又缺乏责任心。在黎凡特有这样一种习俗，臣民不能直视他们的贵族。从外在礼节形式上看，这似乎过于粗蛮，但其道德动机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人们的确不该以一种狡诈的扭曲心理观察君王，意图窥探他们的心思。《圣经》里说过，君王是神圣而高深莫测的。

(8) There is yet another fault (with which I will conclude this part) which is often noted in learned men, that they do many times fail to observe decency and discretion in their behaviour and carriage, and commit errors in small and ordinary points of action, so as the vulgar sort of capacities do make a judgment of them in greater matters by that which they find wanting in them in smaller.

But this consequence doth oft deceive men, for which I do refer them over to that which was said by Themistocles, arrogantly and uncivilly being applied to himself out of his own mouth, but, being applied to the general state of this question, pertinently and justly, when, being invited to touch a lute, he said, “He could not fiddle, but he could make a small town a great state.” So no doubt many may be well seen in the passages of government and policy which are to seek in little and punctual occasions. I refer them also to that which Plato said of his master Socrates, whom he compared to the gallipots of apothecaries, which on the outside had apes and owls and antiques, but contained within sovereign and precious liquors and confections; acknowledging that, to an external report, he was not without superficial levities and deformities, but was inwardly replenished with excellent virtues and powers. And so much touching the point of manners of learned men.

（8）学者还有一种过错常被提起，就是他们经常无法做到言行得体，行事谨慎，在行为上常犯一些细节性的低级错误（讨论完这一点我们就结束本节）。正因如此，普通民众就倾向于根据小事上显示的不足来判断他们做大事的能力。但是以此得出的判断确能蒙蔽他人。塞米斯托克利斯在被邀请弹琴时，他这样回答：“弹琴我不会，但我能让一个小城邦成为一个强国。“这样的话语出自他本人之口，似乎过于傲慢失礼，但用来论证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就再恰当不过了。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处理国家政事时能谋善断，拥有雄才大略，但在小事上却是一再犯错，不得要领，这也就不足为怪了。柏拉图对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形容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把他的老师比作药剂师的药罐，外观上到处是猿猴，猫头鹰还有其他稀奇古怪的图案，但内里却装满了极其珍贵的灵丹妙药。这说明，虽对外人而言，他的老师看起来轻佻浮夸，存在种种不足，但其内心却拥有着高尚的节操与无穷的力量。至此我们就结束了对学者行事问题的讨论。

(9) But in the meantime I have no purpose to give allowance to some conditions and courses base and unworthy, wherein divers professors of learning have wronged themselves and gone too far; such as were those trencher philosophers which in the later age of the Roman state were usually in the houses of great persons, being little better than solemn parasites, of which kind, Lucian maketh a merry description of the philosopher that the great lady took to ride with her in her coach, and would needs have him carry her little dog, which he doing officiously and yet uncomely, the page scoffed and said, “That he doubted the philosopher of a Stoic would turn to be a Cynic.” But, above all the rest, this gross and palpable flattery whereunto many not unlearned have abased and abused their wits and pens, turning (as Du Bartas saith) Hecuba into Helena, and Faustina into Lucretia, hath most diminished the price and estimation of learning. Neither is the modern dedication of books and writings, as to patrons, to be commended, for that books (such as are worthy the name of books) ought to have no patrons but truth and reason. And the ancient custom was to dedicate them only to private and equal friends, or to entitle the books with their names; or if to kings and great persons, it was to some such as the argument of the book was fit and proper for; but these and the like courses may deserve rather reprehension than defence.

（9）但是，我无意为某些学者低劣的行径找借口。他们以资深学者自居，却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行事恶劣，肆无忌惮。例如罗马帝国晚期的一些哲人不过是王公贵族家里故作庄重的寄食者而已。对于这类人，卢西恩曾戏谑地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贵妇带着一名哲学家坐马车出门，要他帮忙照顾小狗，这名哲学家殷勤应允，却笨手笨脚，不知所措，侍从见状嘲笑道：”我觉得他应该是犬儒主义者而不是斯多葛学派的。“不过，最应该指出的是，很多学者滥用笔墨和自己的才智，堂而皇之地粗鄙谄媚（正如杜·巴尔塔斯所说那样）。

他们竟将赫卡柏说成海伦娜，福斯蒂娜当作卢克雷蒂娅，彻底贬低了学问的价值与尊严。当今人们常将自己的作品献给赞助者，这种做法也是不应提倡的。因为作品本身（如果名副其实的话）并不存在赞助人，其本质在于阐明理性与真理。古时学者的著作只会献给自己的密友，或直接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书籍。如果存在献书给君王或王公贵族的情况，也是因为作品的主题与他们的身份相吻合。但对于这类事情，或是其他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强烈反对，而不是加以辩护。

(10) Not that I can tax or condemn the morigeration or application of learned men to men in fortune. For the answer was good that Diogenes made to one that asked him in mockery, “How it came to pass that philosophers were the followers of rich men, and not rich men of philosophers?” He answered soberly, and yet sharply, “Because the one sort knew what they had need of, and the other did not.” And of the like nature was the answer which Aristippus made, when having a petition to Dionysius, and no ear given to him, he fell down at his feet, whereupon Dionysius stayed and gave him the hearing, and granted it; and afterwards some person, tender on the behalf of philosophy, reproved Aristippus that he would offer the profession of philosophy such an indignity as for a private suit to fall at a tyrant's feet; but he answered, “It was not his fault, but it was the fault of Dionysius, that had his ears in his feet.” Neither was it accounted weakness, but discretion, in him that would not dispute his best with Adrianus Cæsar, excusing himself, “That it was reason to yield to him that commanded thirty legions.” These and the like, applications, and stooping to points of necessity and convenience, cannot be disallowed; for though they may have some outward baseness, yet in a judgment truly made they are to be accounted submissions to the occasion and not to the person.

（10）针对学者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情况，我们也很难对其过多的指责。有人讥讽地问第欧根尼，“为何哲学家总是紧随富人身后，而不是富人跟随哲学家左右？”第欧根尼非常冷静却十分尖锐的答道：“因为一个了解自己所需，另一个却一无所知。”同样，当亚里斯提卜向君王狄奥尼西请愿之时，狄奥尼西置若罔闻。于是他扑倒在君王的脚边，这时狄奥尼西才停了下来听他陈情，并最终应允。后来有些看重哲学声誉的人不认同亚里斯提卜的做法，他们认为他因自己的私事而伤害了哲学的尊严。针对这些责备，亚里斯提卜说道：“我没有过错，错在狄奥尼西，他的耳朵长在脚上了。”曾有学者在与阿德里安大帝争论自己没有使出浑身解数时，这样辩解道：“向统领30军团的人低头是明智之举。”的确，这并不是自己懦弱，而是懂得深思熟虑，谨言慎行。类似这些因生活和方便而不得不让步的做法，并不该遭受过多的责难。因为表面看来虽不那么光彩，但深入了解后我们能够判断出，他们仅仅是屈从于环境，而非个人。

CHAPTER IV

第四章

(1) Now I proceed to those errors and vanities which have intervened amongst the studies themselves of the learned, which is that which is principal and proper to the present argument; wherein my purpose is not to make a justification of the errors, but by a censure and separation of the errors to make a justification of that which is good and sound, and to deliver that from the aspersion of the other. For we see that it is the manner of men to scandalise and deprave that which retaineth the state and virtue, by taking advantage upon that which is corrupt and degenerate, as the heathens in the primitive Church used to blemish and taint the Christians with the faults and corruptions of heretics. But nevertheless I have no meaning at this time to make any exact

animadversion of the errors and impediments in matters of learning, which are more secret and remote from vulgar opinion, but only to speak unto such as do fall under or near unto a popular observation.

（1）接下来我们来谈论在治学过程中学者本身显现的浮华与过失，这是最主要也是最应该探讨的。我的用意并不在于为这些过失辩护，而是希望通过责难这些过失，剖析其中可取之处，而加以弘扬，同时摒除不足之处。不难看到，就初兴教会的异教徒总将离经叛道者的堕落腐化归咎于基督教徒一样，人们通常因看到一些腐败沉沦现象而诋毁和怪罪那些德行高尚、守卫国家之人。然而我不再对学问上的过错与障碍逐一责难，这些对普通大众而言太过遥远粗俗，我们只来探讨一般人们都能看到了解的现象。

(2) There be therefore chiefly three vanities in studies, whereby learning hath been most traduced. For those things we do esteem vain which are either false or frivolous, those which either have no truth or no use; and those persons we esteem vain which are either credulous or curious; and curiosity is either in matter or words: so that in reason as well as in experience there fall out to be these three distempers (as I may term them) of learning—the first, fantastical learning; the second, contentious learning; and the last, delicate learning; vain imaginations, vain altercations, and vain affectations; and with the last I will begin. Martin Luther, conducted, no doubt, by a higher Providence, but in discourse of reason, finding what a province he had undertaken against the Bishop of Rome and the degenerate traditions of the Church, and finding his own solitude, being in nowise aided by the opinions of his own time, was enforced to awake all antiquity, and to call former times to his succours to make a party against the present

time. So that the ancient authors, both in divinity and in humanity, which had long time slept in libraries, began generally to be read and revolved. This, by consequence, did draw on a necessity of a more exquisite travail in the languages original, wherein those authors did write, for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ose authors, and the better advantage of pressing and applying their words. And thereof grew, again, a delight in their manner of style and phrase, and an admiration of that kind of writing, which was much furthered and precipitated by the enmity and opposition that the propounders of those primitive but seeming new opinions had against the schoolmen, who were generally of the contrary part, and whose writings were altogether in a differing style and form; taking liberty to coin and frame new terms of art to express their own sense, and to avoid circuit of speech, without regard to the pureness, pleasantness, and (as I may call it) lawfulness of the phrase or word. And again, because the great labour then was with the people (of whom the Pharisees were wont to say,*Execrabilis ista tu* rba,*quæ non novit legem*), for the winning and persuading of them, there grew of necessity in chief price and request eloquence and variety of discourse, as the fittest and forciblest access into the capacity of the vulgar sort; so that these four causes concurring—the admiration of ancient authors, the hate of the schoolmen, the exact study of languages, and the efficacy of preaching—did bring in an affectionate study of eloquence and copy of speech, which then began to flourish. This grew speedily to an excess; for men began to hunt more after words than matter—more after the choiceness of the phrase, and the round and clean composition of the sentence, and the sweet falling of the clauses, and the varying and illustration of their works with tropes and figures, than after the weight of matter, worth of subject, soundness of argument, life of invention, or depth of judgment. Then grew the flowing and watery vein of Osorius, the Portugal bishop, to be in price. Then did

Sturmius spend such infinite and curious pains upon Cicero the Orator and Hermogenes the Rhetorician, besides his own books of *Periods* and *Imitation* , and the like. Then did Car of Cambridge and Ascham with their lectures and writings almost deify Cicero and Demosthenes, and allure all young men that were studious unto that delicate and polished kind of learning. Then did Erasmus take occasion to make the scoffing echo, *Decem annos consuumpsi in legendo Cicerone;* and the echo answered in Greek, One, Asine. Then grew the learning of the schoolmen to be utterly despised as barbarous. In sum, the whole inclination and bent of those times was rather towards copy than weight.

（2）这样一来，研究中主要存在三种浮华现象，令学问的声誉大受诋毁。这三种情况分别指虚伪乏味，违背真理或无实用价值的研究；还有些学者或过于轻信又或过分探求真相，这种好奇心不仅体现在他的处事上，也体现在他的言辞中。根据我们的理性和经验可以得出三种病异之症（如果我可以这么称呼的话），首先是空想的学问，其次是激辩的学问，最后是精细的学问。也可以分别称作虚伪的假象，无谓的争执和徒然的做作。我们的讨论就从最后一种情况开始。马丁·路德的壮举自然是蒙受天意，但理性的讨论与思索令他将对抗罗马主教和教会中早已腐化的传统视为己任。当时的他孤立无援，更无人拥戴，只能孤军奋战，搬出古代遗训与经验来援助自己抗争当代势力。因而那些在图书馆隐居多年的神学和人文学科著作得以重见天日，得到反复研读。为求深入了解这些作品，有效利用他们的话语，花费更多精力研读作者的原文本存在一定的迫切性。在阅读过程中，古代学者的行文风格与精妙辞藻常令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人们总是钦佩赞赏旧时著作，因为那些作者总能提出一些看似粗陋，却标新立异的观点。作为他的对立面，经院学者的写作风格与形式特点则截然不同。他们恣意创新，捏造术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对此乐此不疲。他们不喜言辞迂回，为直截表意完全不顾语言的明确性，文句的愉悦性和文法的合理性。另外，要想赢得民心（法利赛人通常称民众

为无知的群氓），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因此，雄辩之才和多样化的演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演说是最合适也最强有力的说服民众的方式。于是，对古时学者的钦佩，对经院学者的仇视，对古代语言的深入研究和对布道效果的注重，这四种因素集于一体，便引发了学习雄辩才能和模仿精彩演说的高度热忱，这种风气也逐渐盛行于世。不过，这也很快走向极端。人们开始过分追求辞藻而忽视内容。他们注重文章的措辞与句法，钻研句尾的悦耳程度，修辞手法的多样化，却不顾及内容的份量，主题的意义，论证的合理性，发现与创新的生命力以及评价的深度等。于是，葡萄牙主教俄若修斯清新淡雅的文风便显得难能可贵。此外，除了撰写《句法》与《模仿》及类似著作外，斯图米尔乌斯还大费周章，刻苦钻研演说家西塞罗和修辞学家希蒙占尼斯的著作。剑桥的卡尔和阿谢姆在讲演和书作中将西塞罗和狄摩西尼奉为神明，引得大批好学的年轻人刻苦钻研他们这种精妙的学问。伊拉莫斯则曾写一句嘲讽性的仿句："我已钻研西塞罗十年之久。"这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就两个字，"蠢驴"。至此，经院学者的学问学识就成了粗鄙低贱的代名词，人们频频嗤之以鼻。简而言之，这些时代总体而言都好模仿而轻内容。

(3) Here therefore [is] the first distemper of learning, when men study words and not matter; whereof, though I have represented an example of late times, yet it hath been and will be *secundum majus et minus* in all time. And how is it possible but this should have an operation to discredit learning, even with vulgar capacities, when they see learned men's works like the first letter of a patent or limited book, which though it hath large flourishes, yet it is but a letter?It seems to me that Pygmalion's frenzy is a good emblem or portraiture of this vanity; for words are but the images of matter, and except they have life of reason and invention, to fall in love with them is all one as to fall in love with a picture.

（3）这便是学问的第一种弊病，即语言重于内容。我于上文所举的例子是近期发生的，而事实上，这一弊端在各个时代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而且，这同样成为世人蔑视学问的原因之一。在民众眼中，学者的著作就如同专利证书和法律文书一样，虽然文采飞扬，但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连串字母。在我看来，皮格马利翁的狂暴就是这种虚浮的最好见证。语言本身只是事物的表现形式，除非它充满理性的光辉，亦或创新的活力，否则，对文字的眷恋无异于对图像的依恋。

(4) But yet notwithstanding it is a thing not hastily to be condemned, to clothe and adorn the obscurity even of philosophy itself with sensible and plausible elocution. For hereof we have great examples in Xenophon, Cicero, Seneca, Plutarch, and of Plato also in some degree; and hereof likewise there is great use, for surely, to the severe inquisition of truth and the deep progress into philosophy, it is some hindrance because it is too early satisfactory to the mind of man, and quencheth the desire of further search before we come to a just period. But then if a man be to have any use of such knowledge in civil occasions, of conference, counsel, persuasion, discourse, or the like, then shall he find it prepared to his hands in those authors which write in that manner. But the excess of this is so justly contemptible, that as Hercules, when he saw the image of Adonis, Venus' minion, in a temple, said in disdain, *Nil sacri es* ; so there is none of Hercules' followers in learning—that is, the more severe and laborious sort of inquirers into truth—but will despise those delicacies and affectations, as indeed capable of no divineness. And thus much of the first disease or distemper of learning.

（4）但是，我们并不该妄加非难那些用合乎情理的巧辩来掩饰

哲学的隐晦。很多伟大哲人都是有力的证据，如色诺芬，西塞罗，塞内加和普卢塔赫等，在某种程度上，柏拉图也是如此。当然，对真理的严格探究和对这些的深入探讨必然能让人受益匪浅，不过在探知过程中，人们的欲望总是过早得到满足，以至于驻足不前，阻碍求知之路。然而，如果有人想要在日常事务，比如会议、商讨、劝说和演讲中运用这类知识，他就会发现，学者们早已在他们的书作中以自己的方式为他准备一切。不过，这种方法一旦使用过度就会趋向卑鄙。当赫尔克里士在圣殿中看到令维纳斯魂牵梦绕的美男阿多尼斯的塑像时，他轻蔑地说："你不是神。"所以赫尔克里士那些学术上的追随者——他们非常勤奋严格探索真知——但是他们都杜绝精细与造作，这些与神性毫无关系。学问的第一种病异之症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5) The second which followeth is in nature worse than the former: for as substance of matter is better than beauty of words, so contrariwise vain matter is worse than vain words: wherein it seemeth the reprehension of St. Paul was not only proper for those times, but prophetical for the times following; and not only respective to divinity, but extensive to all knowledge: *Devita profanas vocum novitates, et oppositiones falsi nominis scientiæ.* For he assigneth two marks and badges of suspected and falsified science: the one, the novelty and strangeness of terms; the other, the strictness of positions, which of necessity doth induce oppositions, and so questions and altercations. Surely, like as many substances in nature which are solid do putrefy and corrupt into worms;—so it is the property of good and sound knowledge to putrefy and dissolve into a number of subtle, idle, ounwholesme, and (as I may term them) vermiculate questions, which have indeed a kind of quickness and life of spirit, but no soundness of matter or goodness of quality. This kind of degenerate learning did chiefly reign amongst the schoolmen, who having sharp and strong wits, and abundance of leisure, and small variety of reading, but their wits

being shut up in the cells of a few authors (chiefly Aristotle their dictator) as their persons were shut up in the cells of monasteries and colleges, and knowing little history, either of nature or time, did out of no great quantity of matter and infinite agitation of wit spin out unto us those laborious webs of learning which are extant in their books. For the wit and mind of man, if it work upon matter, which is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creatures of God, worketh according to the stuff and is limited thereby; but if it work upon itself, as the spider worketh his web, then it is endless, and brings forth indeed cobwebs of learning, admirable for the fineness of thread and work, but of no substance or profit.

（5）第二类弊病的性质比第一种更严重。事物的本质优于华丽的言辞，反之，空洞的内容比虚浮的语言糟糕得多。圣保罗曾说过，“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他的非难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适用，更为后人起到预言作用，不仅针对神学，更涉及到知识的方方面面。他指出，存在两个区分可疑虚假学问的标志，一个是所用术语的新奇和古怪程度，另一个则是论题的严密性，这必然产生对立观点，引发质疑与争论。当然，如同自然界许多坚固的物质会分解腐化最终变为蠕虫一样，知识的合理可靠度也会逐渐被摧毁，令知识分化得不堪一击、索然无味、满是漏洞而遭受蠹蛀（我就这样来形容），虽看起来灵敏尖锐，颇有气势，但实质上内容空洞，抑或是品质低劣。这一类学问腐败问题通常发生在经院学者身上，他们拥有敏锐的洞察力，过人的才智，又有较多的闲余时间，读书涉猎也有一定的广度。但是，就如他们只会置身于修道院和学院一样，他们研究的范围仅仅局限于部分学者（主要就是他们唯一的准绳——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同时，他们对自然或时代的历史知之甚少，只懂得运用少量的事实和无限的智慧，以热忱的心态辛勤地编制学术之网，这在他们的作品中是有目共睹的。人的头脑和才智如果用来探索上帝创造物的冥想，那必然只能研究事物本身，从而受到限制。不过，如果学者能够用自己的才智探求自身，就像蜘蛛结网为己所用一

般，那么，这种探索就永无止境，对学问这张巨网而言，虽耗费大量精力值得肯定，但其实质欠缺，百无一用。

(6) This same unprofitable subtility or curiosity is of two sorts: either in the subject itself that they handle, when it is a fruitless speculation or controversy (whereof there are no small number both in divinity and philosophy), or in the manner or method of handling of a knowledge, which amongst them was this—upon every particular position or assertion to frame objections, and to those objections, solutions; which solutions were for the most part not confutations, but distinctions: whereas indeed the strength of all sciences is, as the strength of the old man's faggot, in the bond. For the harmony of a science, supporting each part the other, is and ought to be the true and brief confutation and suppression of all the smaller sort of objections. But, on the other side, if you take out every axiom, as the sticks of the faggot, one by one, you may quarrel with them and bend them and break them at your pleasure: so that, as was said of Seneca,*Verborum minutiis rerum frangit pondera,* so a man may truly say of the schoolmen, *Quæstionum minutiis scientiarum frangunt soliditatem.* For were it not better for a man in fair room to set up one great light, or of lights, than to go about with a small watch-candle into every corner?And such is their method, that rests not so much upon evidence of truth proved by arguments, authorities, similitudes, examples, as upon particular confutations and solutions ofevery scruple, cavillation, and objection; breeding for the most part one question as fast as it solveth another; even as in the former resemblance, when you carry the light into one corner, you darken the rest; so that the fable and fiction of Scylla seemeth to be a lively image of this kind of philosophy or knowledge; which was transformed into a comely virgin for the upper parts; but then Candida succinctam latrantibus

inguina monstris: so the generalities of the schoolmen are for a while good and proportionable; but then when you descend into their distinctions and decisions, instead of a fruitful womb for the use and benefit of man's life, they end in monstrous altercations and barking questions. So as it is not possible but this quality of knowledge must fall under popular contempt, the people being apt to contemn truths upon occasion of controversies and altercations, and to think they are all out of their way which never meet; and when they see such digladiation about subtleties, and matters of no use or moment, they easily fall upon that judgment of Dionysius of Syracusa, *Verba ista sunt senum otiosorum* .

（6）这种徒劳无益的精工细作存在两种奇特情况，一种是所研究的学问本身就是枉费心机的思辨（神学和哲学中很多论题都是如此）；另一种是学者治学的方式方法存在问题。他们对每个特定论题或主张都提出异议，并指出解决方案，而那样的解决方案通常不是对原主张的辩驳，而是另起炉灶，与众不同。事实上，任何学科的力量，如同老者砍柴一样，是需要不断积累的。一门学科的和谐是通过各部分相互倚仗和支持而实现的，任何微小的争议都应该得到简要而真切的辩驳和压制。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把定理一条一条分开，就像每一条柴火一样，就可以加以任意争辩、驳斥甚至推翻它们。正如人们说塞内加“过多的语言弱化了思考与探索”，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形容经院学者，“过分的拷问危害到学科坚固的基础。”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点亮一盏明灯或一个大烛台，不比手拿单支蜡烛走在房间角落更好吗？经院学者的治学方法也是这样，他们注重的不是由论据、权威、事物相似性、例证等构成的真实证据，而是乐于辩驳和解决每个细微的疑虑、不足和异议。这样一来，他们一旦解决一个问题，其他问题又会接踵而来。就如上述的类比中，当你拿着蜡烛照亮房间某个角落时，其他地方就处于黑暗之中。海怪斯库拉的神话似乎就是此类哲学和学问的生动写照。他的上身变成了一个清新动人的少女，下半身却被侵蚀成了凶狂的妖兽。因此，经院学者的概论初步看来会觉得

完全合乎情理，一旦深入探究其特性和论断，就会发现它根本无法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任何益助，相反，这些只不过是荒诞的争执，狂躁的呐喊。学问的这一问题本不可能、但确实导致了普通民众对学问的蔑视。在争执和辩论时，人们经常会藐视真理，认为它与生活毫无关联。而当他们看到学者埋头钻研一些琐碎又无价值的小事时，他们很容易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与叙拉古君王狄奥尼西的感受一样，认为学问就是“无用老人的絮叨”。

(7) Notwithstanding, certain it is that if those schoolmen to their great thirst of truth and unwearied travail of wit had joined variety and universality of reading and contemplation, they had proved excellent lights, to the great advancement of al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but as they are, they are great undertakers indeed, and fierce with dark keeping. But as in the inquiry of the divine truth, their pride inclined to leave the oracle of God's word, and to vanish in the mixture of their own inventions; so in the inquisition of nature, they ever left the oracle of God's works, and adored the deceiving and deformed images which the unequal mirror of their own minds, or a few received authors or principles, did represent unto them. And thus much for the second disease of learning.

（7）尽管如此，如果经院学者能在对真理的渴望和不懈追求的同时，附以广泛的阅读与沉思，他们必然能够为学问的进步作出巨大贡献，为人们照亮知识之光。但事实上，他们的确是伟大的学究，然而却只懂得在阴暗的角落狂吠不止。在追求神圣真理过程中，他们的傲气往往使他们偏离上帝的谕旨近而沉浸在自己的幻象中不能自拔。在探究自然时，同样地，他们不顾上帝创造的万物，崇尚着虚假扭曲的影像，这些影像或是对他们内心扭曲的反映，又或来自一些知名学者呈现的论断或原理。以上就是关于学问第二种病异之症的讨论。

(8) For the third vice or disease of learning, which concerneth deceit or untruth, it is of all the rest the foulest; as that which doth destroy the essential form of knowledge, which is nothing but a representation of truth: for the truth of being and the truth of knowing are one, differing no more than the direct beam and the beam reflected. This vice therefore brancheth itself into two sorts; delight in deceiving and aptness to be deceived; imposture and credulity; which, although they appear to be of a diverse nature, the one seeming to proceed of cunning and the other of simplicity, yet certainly they do for the most part concur: for, as the verse noteth —*"Percontatorem fugito, nam garrulus idem est,"* an inquisitive man is a prattler; so upon the like reason a credulous man is a deceiver: as we see it in fame, that he that will easily believe rumours will as easily augment rumours and add somewhat to them of his own; which Tacitus wisely noteth, when he saith, *Fingunt simul creduntque:* so great an affinity hath fiction and belief.

（8）学问的第三类弊病与虚假和欺骗有关，这是最为严重的。这种病症破坏了知识的基本构架，也就是真理的表现形式。因为真理的存在与被感知是统一的，其区别仅仅在于光线是直射还是反射的。这一弊病可分为两类，即欺骗的愉悦感和易受骗的倾向性。欺诈与轻信，虽然形式多样，但欺骗源于狡诈，而轻信始于单纯，但两者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一致性。古诗有云，“好问者多言。”同样道理，轻信之人本身也是个欺骗者。我们经常看到，轻信谣言的人通常还会添油加醋继续传播。塔西陀对此曾有睿智的见解，他说：“谣言与轻信寸步不离。”因此，谎言与相信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9) This facility of credit and accepting or admitting things weakly authorised or warranted is of two kinds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 for it is either a belief of history, or, as the lawyers speak,

matter of fact; or else of matter of art and opinion. As to the former, we see the experience and inconvenience of this error i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which hath too easily received and registered reports and narrations of miracles wrought by martyrs, hermits, or monks of the desert, and other holy men, and their relics, shrines, chapels and images: which though they had a passage for a time by the ignorance of the people, the superstitious simplicity of some and the politic toleration of others holding them but as divine poesies, yet after a period of time, when the mist began to clear up, they grew to be esteemed but as old wives' fables, impostures of the clergy, illusions of spirits, and badges of Antichrist, to the great scandal and detriment of religion.

（9）这种轻信和接受不确切信息的行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历史，也就是法学家口中的事实的全盘接受，另一种则是对技艺和见解的轻易认同。对于前者，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就看到这种病症及其造成的麻烦。对于殉道士、修道者、沙漠中的僧侣及其他圣人还有他们的遗物、圣地、教堂和肖像，人们常常对这些奇迹的记录和故事不加考证就轻易接受并予以传扬。人们的无知、部分人的愚蠢迷信以及另一些人对政治的宽容，这些可能被当作神圣事物而暂时蒙蔽世人，但一段时间之后，笼罩这些事物的迷雾便会逐渐散开，就会被当成是老妇人的寓言故事，牧师的欺骗，精神的幻觉，反基督者的徽章，极大地损害了宗教的威严和声誉。

(10) So in natural history, we see there hath not been that choice and judgment used as ought to have been; as may appear in the writings of Plinius, Cardanus, Albertus, and divers of the Arabians, being fraught with much fabulous matter, a great part not only untried, but notoriously untrue, to the great derogation of the credit of natural philosophy with the grave and sober kind of wits:

wherein the wisdom and integrity of Aristotle is worthy to be observed, that, having made so diligent and exquisite a history of living creatures, hath mingled it sparingly with any vain or feigned matter; and yet on the other side hath cast all prodigious narrations, which he thought worthy the recording, into one book, excellently discerning that matter of manifest truth, such whereupon observation and rule was to be built, was not to be mingled or weakened with matter of doubtful credit; and yet again, that rarities and reports that seem uncredible are not to be suppressed or denied to the memory of men.

（10）对于自然历史，我们看到其选择和判断同样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普利纽斯、卡达努斯、阿尔伯图斯和阿拉伯众多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就充满着荒诞无稽的论述，很多都未经证实，饱含虚假成分，对于自然哲学而言，严肃思考和冷静分析是必然要求，因此，这样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危害了自然哲学的声望。在此，我们有必要提及亚里士多德的睿智和正直。他耗尽心力极为细致地撰写了一本关于生命发展史的著作，其中极少掺杂虚假捏造成分，但在另一本巨著中，他把认为值得记载的内容记录了下来，从而有力印证了我们的观点，即应仔细辨识依据观察和自然规则建立起来的真实事物，将它们从虚假中分离出来，而不该被其削弱。另外，对于那些看起来难以置信的稀罕之物和报道，不能仅凭人们的记忆而加以压制和否认。

(11) And as for the facility of credit which is yielded to arts and opinions, it is likewise of two kinds; either when too much belief is attributed to the arts themselves, or to certain authors in any art. The sciences themselves, which have had better intelligence and confederacy with the imagination of man than with his reason, are three in number: astrology, natural magic, and alchemy; of which sciences, nevertheless, the ends or pretences are noble. For

astrology pretendeth to discover that correspondence or concatenation which is between the superior globe and the inferior; natural magic pretendeth to call and reduce natural philosophy from variety of speculations to the magnitude of works; and alchemy pretendeth to make separation of all the unlike parts of bodies which in mixtures of natures are incorporate. But the derivations and prosecutions to these ends, both in the theories and in the practices, are full of error and vanity; which the great professors themselves have sought to veil over and conceal by enigmatical writings, and referring themselves to auricular traditions and such other devices, to save the credit of impostures. And yet surely to alchemy this right is due, that it may be compared to the husbandman whereof AEsop makes the fable; that, when he died, told his sons that he had left unto them gold buried underground in his vineyard; and they digged over all the ground, and gold they found none; but by reason of their stirring and digging the mould about the roots of their vines, they had a great vintage the year following: so assuredly the search and stir to make gold hath brought to light a great number of good and fruitful inventions and experiments, as well for the disclosing of nature as for the use of man's life.

（11）对技艺和见解的轻易认同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对技艺本身太过信任，二是对技艺的某些创始人过分信赖。比起理性，与人们想象力联系更为密切的学科有三门：占星术、自然巫术和炼金术。这些学科的目的，或者说是借口，都是非常高贵而宏大的。占星术声称能够发现外在更为高级的天体与相对低级的天体之间的联系；自然巫术扬言可以通过种种推测思辨来召唤并削弱自然哲学，从而降低工作的难度；炼金术则宣称身体是各种自然成分的混合体，他们能将其不同成分拆分开来。然而，这些学科在践行所谓的目的过程中，不论是通过理论还是实践，到处都充满过错和虚浮。而那些大学者通过模棱两

可、晦涩难懂的文字来掩藏这些弊病，还宣称都是自己所见所闻，以免遭欺骗的罪名。不过，对炼金术而言，这种情况也属合理。可拿《伊索寓言》里的农夫作类比，他临死前告诉自己的儿子他在自己的葡萄园里埋下了很多金子。于是，在他去世后，他们就园子里奋力挖掘，整个园子翻了个遍，却什么都没找到。但也正因如此，葡萄园得到了彻底的松土，第二年获得了大丰收。炼金术也是如此。探寻炼金材料的过程包含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实验和创新，不仅揭示了自然的奥秘，同时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

(12) And as for the overmuch credit that hath been given unto authors in sciences, in making them dictators, that their words should stand, and not consuls, to give advice; the damage is infinite that sciences have received thereby, as the principal cause that hath kept them low at a stay without growth or advancement. For hence it hath come, that in arts mechanical the first deviser comes shortest, and time addeth and perfecteth; but in sciences the first author goeth furthest, and time leeseth and corrupteth. So we see artillery, sailing, printing, and the like, were grossly managed at the first, and by time accommodated and refined; but contrariwise, the philosophies and sciences of Aristotle, Plato, Democritus, Hippocrates, Euclides, Archimedes, of most vigour at the first, and by time degenerate and imbased: whereof the reason is no other, but that in the former many wits and industries have contributed in one; and in the latter many wits and industries have been spent about the wit of some one, whom many times they have rather depraved than illustrated; for, as water will not ascend higher than the level of the first spring-head from whence it descendeth, so knowledge derived from Aristotle, and exempted from liberty of examination, will not rise again higher than the knowledge of Aristotle. And, therefore, although the position be good, *Oportet discentem credere,* yet it must be coupled with this, *Oportet edoctum*

judicare; for disciples do owe unto masters only a temporary belief and a suspension of their own judgment till they be fully instructed, and not an absolute resignation or perpetual captivity; and therefore, to conclude this point, I will say no more, but so let great authors have their due, as time, which is the author of authors, be not deprived of his due—which is, further and further to discover truth. Thus have I gone over these three diseases of learning; besides the which there are some other rather peccant humours than formed diseases, which, nevertheless, are not so secret and intrinsic, but that they fall under a popular observation and traducement, and, therefore, are not to be passed over.

（12）另外一种情况是对一些学科技艺创造者的过分信赖，把他们尊为权威，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而不仅仅只是导向作用。这种盲从可以说是令科学驻足不前，妨碍其进步的元凶，其危害是无穷尽的。机械工艺中，最初的发明设计通常存在缺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便能得到不断的完善。不过在科学领域，往往学科的首创者所作的研究最为深入，时间越久，就越腐化。在炮术、航海术、印刷术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总是非常粗糙的，其后才会逐渐得到完善和细化。但相反的，诸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德谟克利特、希波克拉底、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这些哲人的哲学在最开始的时候都充满活力，到后来却渐渐走向衰败。其原因很简单，在第一种情况中，大家的智慧和努力都集中于完善某一事物，但对于后者，学者的才智和努力都只为研究一个人的智慧。其实更多时候，他们非但没有阐明其才智，反而败坏了他的名声，就如泉水自源头流出，就不可能达到泉水最初从地底喷涌而出的高度。因此，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识，如不能得到自由发散的探究，是不可能超越亚里士多德的。有这样一种说法，“学习必须心存信赖”，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后面应再加一句，“学习应教人学会判断”。因为弟子们对老师的信任只是暂时的，那时他们暂且放下自己的判断力，直到得到老师的悉心教导，而不能绝对地顺从，永久地抑制自己的决断力。关于这点我不想再多说什么，就让

那些伟大的创造者享受他们应得的荣誉吧，因为时间作为这些创造者的创造者，也能拥有它该有的荣耀，并且一步一步揭示真相。至此学问的三种病异之症我们都有所阐述。当然，除了这些根深蒂固的弊端，还有一些不那么隐蔽且本质的弊端，也会被发现而令学问遭受质疑。因此，这类弊端我们也不能避而不谈。

CHAPTER V

第五章

(1) The first of these is the extreme affecting of two extremities: the one antiquity, the other novelty; wherein it seemeth the children of time do take after the nature and malice of the father. For as he devoureth his children, so one of them seeketh to devour and suppress the other; while antiquity envieth there should be new additions, and novelty cannot be content to add but it must deface; surely the advice of the prophet is the true direction in this matter, *State super vias antiquas, et videte quænam sit via recta et bona et ambulate in ea.* Antiquity deserveth that reverence, that men should make a stand thereupon and discover what is the best way; but when the discovery is well taken, then to make progression. And to speak truly,*Antiquitas sæculi juventus mundi.* These times are the ancient times, when the world is ancient, and not those which we account ancient *ordine retrogrado* , by a computation backward from ourselves.

（1）第一种弊端是过激地痴迷于两个极端，即古旧与新奇。似乎时间之子确实遗传了他们父亲的本性与歹心。当时间吞噬自己的孩子时，孩子们也企图相互遏制与吞食。泥古非今者不喜添加新生事物，而厚今薄古者又根本不满足于创造新事物，更想摒弃旧事物。先

知的忠告无疑是正确的，耶和华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其间。”古代遗产值得受到如此尊崇，人们的确应该驻足观察，探索最为理想的道路。一旦发现，就应昂首阔步，奋勇向前。说实话，古代仅仅是我们所处世界的幼年期。它是指那些远古时代，并不是从我们今天往前推算那些过去的年代。

(2) Another error induced by the former is a distrust that anything should be now to be found out, which the world should have missed and passed over so long time: as if the same objection were to be made to time that Lucian maketh to Jupiter and other the heathen gods; of which he wondereth that they begot so many children in old time, and begot none in his time; and asketh whether they were become septuagenary, or whether the law Papia, made against old men's marriages, had restrained them. So it seemeth men doubt lest time is become past children and generation; wherein contrariwise we see commonly the levity and unconstancy of men's judgments, which, till a matter be done, wonder that it can be done; and as soon as it is done, wonder again that it was no sooner done: as we see in the expedition of Alexander into Asia, which at first was prejudged as a vast and impossible enterprise; and yet afterwards it pleaseth Livy to make no more of it than this, *Nil aliud quàm bene ausus vana contemnere.* And the same happened to Columbus in the western navigation. But in intellectual matters it is much more common, as may be seen in most of the propositions of Euclid; which till they be demonstrate, they seem strange to our assent; but being demonstrate, our mind accepteth of them by a kind of relation (as the lawyers speak), as if we had known them before.

（2）第一种不常见弊端所引起的另一种状况就是，认为迄今为

止，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人们错过的一切事物都已为人所知，世上再无任何不曾触及的领域。卢西恩就曾对丘比特和其他异教之神提出过这样的异议。他不明白这些神祇在过去有那么多的孩子，但为何当时却一个都没有生。是因为他们已近耄耋之年，还是因为巴比亚法规定老人不得结婚对他们造成了约束？人们似乎对超过生育年纪有所担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常可以看到人们观点的多变与不确定。在做事之前，他们总会怀疑事情能否完成；而当真正完成之时，又抱怨怎么不早点完成。亚历山大远征亚洲之前，人们预断这是一项浩大而不可能完成的伟业，而当他完成之后，李维只不过轻描淡写道："他这样做，仅仅是因为鄙视虚无的探险而想证明自己的果敢罢了。"同样，哥伦布在西方的航海探险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而在知识领域，这样的状况更为普遍。欧几里得的多数命题都有此遭遇。在它们得到证明之前，人们总觉得那是些怪异的想法，根本不能接纳。但一旦得以证明，就欣然接受，开始追根溯源（律师是这么称呼的），好像这是早前就已经了解的事实。

(3) Another error, that hath also some affinity with the former, is a conceit that of former opinions or sects after variety and examination the best hath still prevailed and suppressed the rest; so as if a man should begin the labour of a new search, he were but like to light upon somewhat formerly rejected, and by rejection brought into oblivion; as if the multitude, or the wisest for the multitude's sake, were not ready to give passage rather to that which is popular and superficial than to that which is substantial and profound for the truth is, that time seemeth to be of the nature of a river or stream, which carrieth down to us that which is light and blown up, and sinketh and drowneth that which is weighty and solid.

（3）第二种弊端与第一种存在一定的关联，认为既然之前的观

念或教派经历长时变迁和各种考验仍能盛行于世，压制其他观念或教派，那么，这些就是最具权威性的。按这样的说法，人们只有在致力于一项新的研究时，才可能接触到之前遭反对而早已被遗弃无闻的事物。又或者是，群众或是代表群众利益的贤明们，比起流行肤浅的观念，更乐于传扬可靠深刻的观点。然而事实却是，时间如同流水一般，将轻浮空夸之物带到了我们面前，却将坚实重要之物沉入水底，不得复见。

(4) Another error, of a diverse nature from all the former, is the over-early and peremptory reduction of knowledge into arts and methods; from which time commonly sciences receive small or no augmentation. But as young men, when they knit and shape perfectly, do seldom grow to a further stature, so knowledge, while it is in aphorisms and observations, it is in growth; but when it once is comprehended in exact methods, it may, perchance, be further polished, and illustrate and accommodated for use and practice, but it increaseth no more in bulk and substance.

（4）第三种弊端与之前提及的具有不同的性质，是指过早或断然将学问简化成技艺或方法，往往阻碍甚至抑制学科的发展与进步。如果一个年轻人身体完全发育，那么他的身形也就不会再继续发展了。学问也是如此。当它还是以格言警句的形式出现，或是还处在人们观察验证时期，那么，它还在不断成长壮大；一旦有了精确的方法来理解知识学问，就可能难逃精雕细琢，将其具化以利于生活实践的命运。但实际上，这种形式对学问的实质和范围没有任何积极扩展作用。

(5) Another error which doth succeed that which we last mentioned is, that after the distribution of particular arts and

sciences, men have abandoned universality, or *philosophia prima* , which cannot but cease and stop all progression. For no perfect discovery can be made upon a flat or a level; neither is it possible to discover the more remote and deeper parts of any science if you stand but upon the level of the same science, and ascend not to a higher science.

（5）紧接着，就会产生我们在前文提到的另外一种弊端，即在技艺与科学分化之后，人们就不再追求万物的普遍性或第一哲学，从而令一切进步发展成为泡影。仅局限于某一层面的研究不可能获得任何完美的发现。而如果只立身于同一学科层面上，而不往更高的科学攀登，那么这门科学也无法获得更加深刻细致的成果。

(6) Another error hath proceeded from too great a reverence, and a kind of adoration of the mind and understanding of man; by means whereof, men have withdrawn themselves too much from the contemplation of nature, and the observations of experience, and have tumbled up and down in their own reason and conceits. Upon these intellectualists, which are notwithstanding commonly taken for the most sublime and divine philosophers, Heraclitus gave a just censure, saying:” Men sought truth in their own little worlds, and not in the great and common world;” for they disdain to spell, and so by degrees to read in the volume of God's works; and contrariwise by continual meditation and agitation of wit do urge and, as it were, invocate their own spirits to divine and give oracles unto them, whereby they are deservedly deluded.

（6）第五种弊端源自过分敬畏之心以及对人类心智和理解力的崇拜。出于这一原因，人们远离自然的意旨，细心的观察和亲身的体

验，而在自己编织的理念和幻象中摸爬滚打。这些唯理主义者虽通常被尊为最令人肃然起敬的神圣哲人，但赫拉克利特却提出了义正言辞的责难，他说："他们只不过是在自己狭隘的天地里寻求着真理，却不曾跨足到浩渺的大千世界。"小到文字拼写，大到上帝神作，他们都不屑一顾，只是一味沉浸在沉思冥想之中，似乎他们的才智敦促并推进着他们的灵魂通向神域，聆听圣典。于是他们受到蒙骗，但也是他们咎由自取。

(7) Another error that hath some connection with this latter is, that men have used to infect their meditations, opinions, and doctrines with some conceits which they have most admired, or some sciences which they have most applied, and given all things else a tincture according to them, utterly untrue and improper. So hath Plato intermingled his philosophy with theology, and Aristotle with logic; and the second school of Plato, Proclus and the rest, with the mathematics; for these were the arts which had a kind of primogeniture with them severally. So have the alchemists made a philosophy out of a few experiments of the furnace; and Gilbertus our countryman hath made a philosophy out of the observations of a loadstone. So Cicero, when reciting the several opinions of the nature of the soul, he found a musician that held the soul was but a harmony, saith pleasantly, *Hic ab arte sua non recessit, &c.* But of these conceits Aristotle speaketh seriously and wisely when he saith, *Qui respiciunt ad pauca de facili pronunciant.*

（7）第六种弊端与第五种的有一定的联系，就是人们惯于用他们最崇拜的幻想，或最常应用的科学，来影响他们的冥想、观点及教义，并认为其他事物着上毫无真实合理性。于是，柏拉图将自己的哲学与神学相融合，亚里士多德则结合了逻辑学，而新柏拉图学派的普罗克罗斯及其他人又综合了数学知识。这些学科对他们而言，就如同

是各自的长子一般。同样，炼金术士仅仅依据几次熔炉试验就轻易建立了他们的哲学，我们的同胞吉伯特则根据对一块天然磁石的观察创出了自己的哲学。西塞罗在列述探讨灵魂本质的观点时，发现一名音乐家认为灵魂就是一种和谐感。于是他很开心地说："他对他的艺术倒很忠实。"不过，亚里士多德对这种狂妄的幻想却似有微词，他严正却又睿智地说道："如果只根据自己关心的极少的事发表见解，那是非常容易的。"

(8) Another error is an impatience of doubt, and haste to assertion without due and mature suspension of judgment. For the two ways of contemplation are not unlike the two ways of action commonly spoken of by the ancients: the one plain and smooth in the beginning, and in the end impassable; the other rough and troublesome in the entrance, but after a while fair and even. So it is in contemplation: if a man will begin with certainties, he shall end in doubts; but if he will be content to begin with doubts, he shall end in certainties.

（8）此外，学问的第七种不常见弊端在于对疑问缺乏耐性，不经深思熟虑便妄下论断。沉思的两种方式与古人论及行为的两种形式是一致的。一种在初始时一马平川，而后却是穷途末路；另一种一开始坎坷不平，但不久便成了康庄大道。沉思也是如此，如果人们开始时已有断言，到最后就会身陷囹圄；如在初期欣然抱以疑虑，思索之后便能豁然开朗。

(9) Another error is in the manner of the tradition and delivery of knowledge, which is for the most part magistral and peremptory, and not ingenuous and faithful; in a sort as may be soonest believed, and not easiest examined. It is true, that in compendious

treatises for practice that form is not to be disallowed; but in the true handling of knowledge men ought not to fall either on the one side into the vein of Velleius the Epicurean, *Nil tam metuens quam ne dubitare aliqua de revideretur* : nor, on the other side, into Socrates, his ironical doubting of all things; but to propound things sincerely with more or less asseveration, as they stand in a man's own judgment proved more or less.

（9）第八种是关于学识的继承与传递方式，这通常独断而强制，而不能坦率而忠实，从而使其最易被接受，而不是被检验和证实。当然，在实用性较强的简明协议中，这种形式也是被允许的。但在真正求学过程中，一方面，人们不应像伊壁鸠鲁学派的维莱乌斯那样，担心人们看出自己对所有事物心存怀疑；另一方面，也不该和苏格拉底一样，怀疑一切，还加以冷嘲热讽。事实上，我们应该根据自身的判断，不论多少诚挚说明能够证实和肯定的部分。

(10) Other errors there are in the scope that men propound to themselves, whereunto they bend their endeavours; for, whereas the more constant and devote kind of professors of any science ought to propound to themselves to make some additions to their science, they convert their labours to aspire to certain second prizes: as to be a profound interpreter or commentor, to be a sharp champion or defender, to be a methodical compounder or abridger, and so the patrimony of knowledge cometh to be sometimes improved, but seldom augmented.

（10）另外一种是有关学者自身竭力从事，精诚投入的研究的范围。持之以恒投身学问的学者应立志拓展本学科的知识，但事实上，他们往往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追求次要的成就上，或成为了颇有造诣

的注解员或评论员，或成了机敏能干的拥护者或辩护人，又或条理清晰地将两者结合起来，成为终止起诉者或编译员。这样一来，他们有时的确使得学问得到继承和发展，但其领域极少能得到拓展。

(11) But the greatest error of all the rest is the mistaking or misplacing of the last or furthest end of knowledge. For men have entered into a desire of learning and knowledge, sometimes upon a natural curiosity and inquisitive appetite; sometimes to entertain their minds with variety and delight; sometimes for ornament and reputation; and sometimes to enable them to victory of wit and contradiction; and most times for lucre and profession; and seldom sincerely to give a true account of their gift of reason to the benefit and use of men: as if there were sought in knowledge a couch whereupon to rest a searching and restless spirit; or a terrace for a wandering and variable mind to walk up and down with a fair prospect; or a tower of state, for a proud mind to raise itself upon; or a fort or commanding ground, for strife and contention; or a shop, for profit or sale; and not a rich storehouse for the glory of the Creator and the relief of man's estate. But this is that which will indeed dignify and exalt knowledge, if contemplation and action may be more nearly and straitly conjoined and united together than they have been: a conjunction like unto that of the two highest planets, Saturn, the planet of rest and contemplation; and Jupiter, the planet of civil society and action, howbeit, I do not mean, when I speak of use and action, that end before-mentioned of the applying of knowledge to lucre and profession; for I am not ignorant how much that diverteth and interrupteth the prosecution and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like unto the golden ball thrown before Atalanta, which, while she goeth aside and stoopeth to take up, the race is hindered, *“Declinat cursus, aurumque volubile tollit.“* Neither is my meaning, as was spoken of Socrates, to call philosophy down

from heaven to converse upon the earth—that is, to leave natural philosophy aside, and to apply knowledge only to manners and policy. But as both heaven and earth do conspire and contribute to the use and benefit of man, so the end ought to be, from both philosophies to separate and reject vain speculations, and whatsoever is empty and void, and to preserve and augment whatsoever is solid and fruitful; that knowledge may not be as a courtesan, for pleasure and vanity only, or as a bond-woman, to acquire and gain to her master's use; but as a spouse, for generation, fruit, and comfort.

（11）不过，最严重的错失和弊病在于误解或错置了学问最终也是最深远的目的。人们对求知的渴望，有时是出于天生的好奇心和探究真相的热忱，有时只是为了愉悦身心，有时是用学识武装自己以获得声望，有时则是想要通过才智解决内心的矛盾以取得成功。不过在更多时候，还是出于对钱财和职业的追求，极少人真正希望将自己的智慧用于帮助人们追求利益和谋求福祉。人们探求学问，似乎是在探寻一张睡椅，能让自己孜孜求索而疲惫不堪的灵魂得到安歇；或者是一处阳台，能让彷徨漂泊的心灵有个安身之处，同时辉煌美景尽收眼底；又或是一座国之高塔，让高傲之心昂首天外；又或是一座堡垒或一处防御阵地，用以辩论与争斗；或者是一个商店，好让人们获得生意和利润。但是，他们并不渴望获得一座贮藏充裕的仓库，来展现造物主的无上荣耀和人们生活得以改善的境况。如与之前相比，如果我们的思考与行为能更切实严格地紧密结合，如同两个最高的行星，土星这一休息与思索之星和负责公众社会与行为的木星的连结一般，我们才能够真正尊崇与光大学问。不过，我所说的益处和行为，并非指之前所提的获得钱财和职位的目的，因为我知道，以这种目的求学，必然会干扰求学之路，阻碍学问进展，就像阿塔兰忒因弯腰拾起掉在她面前的金球，放慢了速度，输了赛跑。赛跑途中利欲起，速把黄金球拾起。我也没有苏格拉底所说的意思，即哲学是上天安排到世间与人交谈的，也就是撇开自然哲学，仅把知识应用于礼节与政治上。上

天与尘世协力合作，共同为人类谋福祉，因此，两类哲学都应以区分和摒除人类虚无的幻想，维护并扩展坚实而有利的事物为最终目标。学识不像妓女那样，只需满足人的愉悦和虚荣，也不像女奴那样，只为其主人服务。它更像是人的配偶，可以繁衍生息、开花结果、抚慰心灵。

(12) Thus have I described and opened, as by a kind of dissection, those peccant humours (the principal of them) which have not only given impediment to the proficience of learning, but have given also occasion to the traducement thereof: wherein, if I have been too plain, it must be remembered, *fidelia vulnera amantis, sed dolosa oscula malignantis.* This I think I have gained, that I ought to be the better believed in that which I shall say pertaining to commendation; because I have proceeded so freely in that which concerneth censure. And yet I have no purpose to enter into a laudative of learning, or to make a hymn to the Muses (though I am of opinion that it is long since their rites were duly celebrated), but my intent is, without varnish or amplification justly to weigh the dignity of knowledge in the balance with other things, and to take the true value thereof by testimonies and arguments, divine and human.

（12）经过如上剖析，学问的过失和弊病（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已得以描绘和展现。它们不但阻碍了学问的进步，也使其蒙受了屈辱和诋毁。或许我说的过于直白，但请一定记住，“朋友加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都是多余”。上面对学问所受责难的讨论显得有点无所顾忌，现在我觉得有必要称颂一下学问，对于这方面，人们应该更容易相信。不过我的用意不在于一味的褒扬，或像对缪斯女神大献赞歌那样（尽管我觉得这种仪式早已不流行），我的目的在于通过与其他事物相比较，公正地权衡学问的尊严，不偏不倚，不缀饰，不

夸大。同时，通过神学和世人的证据和论证探索知识真正的价值。

CHAPTER VI

第六章

(1) First, therefore, let us seek the dignity of knowledge in the archetype or first platform, which is in the attributes and acts of God, as far as they are revealed to man and may be observed with sobriety; wherein we may not seek it by the name of learning, for all learning is knowledge acquired, and all knowledge in God is original, and therefore we must look for it by another name, that of wisdom or sapience, as the *Scriptures* call it.

（1）首先，我们根据知识的原型或初始状态来寻找其尊严，这通常孕育于上帝的品性与行为中，并逐渐向人类展示出来，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就可以发现。但是，我们不能以学问的名义来探寻，因为所有学问本身就是获得的知识，而所有上帝的知识才是最根本的。因此，我们应该换一种名称，就按《圣经》中所言，称为睿智。

(2) It is so, then, that in the work of the creation we see a double emanation of virtue from God; the one referring more properly to power, the other to wisdom; the one expressed in making the subsistence of the matter, and the other in disposing the beauty of the form. This being supposed, it is to be observed that for anything which appeareth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eation, the confused mass and matter of heaven and earth was made in a moment, and the order and disposition of that chaos or mass was

the work of six days; such a note of difference it pleased God to put upon the works of power, and the works of wisdom; wherewith concurreth, that in the former it is not set down that God said, “Let there be heaven and earth,” as it is set down of the works following; but actually, that God made heaven and earth: the one carrying the style of a manufacture, and the other of a law, decree, or counsel.

（2）在创造万物的过程中，上帝的美德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中一个可以恰当地描述为权力，另一个则是智慧。前者表现在万物的创造上，后者呈现在赋予万物形态美感上。根据这一推测，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史上，天地万物都创造于一瞬间，当时万物混杂，对其秩序的安排与规范则用了六天时间。这也体现出上帝对待权力和智慧的区别，上帝并不像创造后来的万物那样，以一句“要有天和地”就出现了天地，事实上，天地是上帝自己创造的，颇有制造的意味，不同于创造万物，创造权利和智慧是通过制定各种规律、法令和决策来完成的。

(3) To proceed, to that which is next in order from God, to spirits: we find, as far as credit is to be given to the celestial hierarchy of that supposed Dionysius, the senator of Athens, the first place or degree is given to the angels of love, which are termed seraphim; the second to the angels of light, which are termed cherubim; and the third, and so following places, to thrones, principalities, and the rest, which are all angels of power and ministry; so as this angels of knowledge and illumination are placed before the angels of office and domination.

（3）接着，我们来谈谈其他的神灵，他们的地位仅次于上帝。相传雅典的元老院议员狄奥尼西曾为天神划分级别，最高位的是爱之

天使，叫做六翼天使，其次是光明天使，叫做小天使，第三级和之后的级别分别是君主、公侯及其他权力和政治天使。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和启明的地位要高于权位和政治。

(4) To descend from spirits and intellectual forms to sensible and material forms, we read the first form that was created was light, which hath a relation and correspondence in nature and corporal things to knowledge in spirits and incorporal things.

（4）神灵和知识形态的讨论之后，我们来看看可感知的物质形态。我们知道首先被创造出来的物质是光，它将自然、有形物质与精神、无形知识相连通。

(5) So in the distribution of days we see the day wherein God did rest and contemplate His own works was blessed above all the days wherein He did effect and accomplish them.

（5）从创世时间的分配上，我们看到，上帝安歇并凝思自己作品的那一天，比起所有付诸实际的创造时间，更为人们所崇敬。

(6) After the creation was finished, it is set down unto us that man was placed in the garden to work therein; which work, so appointed to him, could be no other than work of contemplation; that is, when the end of work is but for exercise and experiment, not for necessity; for there being then no reluctation of the creature, nor sweat of the brow, man's employment must of consequence have been matter of delight in the experiment, and not matter of

labour for the use. Again, the first acts which man performed in Paradise consisted of the two summary parts of knowledge; the view of creatures, and the imposition of names. As for the knowledge which induced the fall, it was, as was touched before, not the natural knowledge of creatures, but the moral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wherein the supposition was, that God's commandments or prohibitions were not the originals of good and evil, but that they had other beginnings, which man aspired to know, to the end to make a total defection from God and to depend wholly upon himself.

（6）在创世完成之后，人类就被安排在伊甸园工作。但吩咐他做的事仅仅是冥想，目的只是为了练习和尝试新事物，而不是生活所需。那时候人类不必做任何违背内心意愿之事，不必迫于生计而去流血流汗，因此他们的工作也就只为了在各种尝试中获得愉悦，而不是为了生计而操劳。而人类在伊甸园中最初的工作也构成了知识的两个方面，观察万物和给万物命名。至于说知识让人堕落，这一点前面就有所提及，这指的并不是关乎万物的自然知识，而是用以辨别善恶的道德知识。这类知识的形成是建立在这样的推测上，即善恶的本源不在于上帝的诫命和禁例，而是始于其他地方。人类正是热切渴望探求其源头才完全背离上帝，以自己为支撑。

(7) To pass on: in the first event or occurrence after the fall of man, we see (as the *Scriptures* have infinite mysteries, not violating at all the truth of this story or letter) an image of the two estates, the contemplative state and the active state, figured in the two persons of Abel and Cain, and in the two simplest and most primitive trades of life; that of the shepherd (who, by reason of his leisure, rest in a place, and lying in view of heaven, is a lively image of a contemplative life), and that of the husbandman, where

we see again the favour and election of God went to the shepherd, and not to the tiller of the ground.

（7）在人类堕落之后发生的第一件事（《圣经》中有很多神秘事件，但完全不影响这件事的真实性）中，我们看到，在《圣经》中，沉思和行动两种状态分别呈现在两个人物——亚伯和该隐之中。两人的工作也是最为简单原始的，一个是牧羊人（由于他工作清闲，常在一处身躺大地，仰望天空，这生动表现了沉思者的形象），另一个则是农夫。从这一点，我们再一次看到，比起农人，上帝对牧羊人偏爱有加。

(8) So in the age before the flood, the holy records within those few memorials which are there entered and registered have vouchsafed to mention and honour the name of the inventors and authors of music and works in metal. In the age after the flood, the first great judgment of God upon the ambition of man was the confusion of tongues; whereby the open trade and intercourse of learning and knowledge was chiefly imbarred.

（8）大洪水来临之前，在《圣经》为数甚少的记录中，提及并纪念了一些音乐的创作者和金属制品的发明者。而在大洪水之后，上帝对人类疯狂野心的第一次审判就是语言的分化混淆，从而使得学问和知识的交流与传播出现了障碍。

(9) To descend to Moses the lawgiver, and God's first pen: he is adorned by the *Scriptures* with this addition and commendation, “That he was seen in all the learning of the Egyptians,” which nation we know was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schools of the world:

for so Plato brings in the Egyptian priest saying unto Solon, “You Grecians are ever children; you have no knowledge of antiquity, nor antiquity of knowledge.” Take a view of the ceremonial law of Moses; you shall find, besides the prefiguration of Christ, the badge or difference of the people of God, the exercise and impression of obedience, and other divine uses and fruits thereof, that some of the most learned Rabbins have travailed profitably and profoundly to observe, some of them a natural, some of them a moral sense, or reduction of many of the ceremonies and ordinances. As in the law of the leprosy, where it is said, “If the whiteness have overspread the flesh, the patient may pass abroad for clean; but if there be any whole flesh remaining, he is to be shut up for unclean;” one of them noteth a principle of nature, that putrefaction is more contagious before maturity than after; and another noteth a position of moral philosophy, that men abandoned to vice do not so much corrupt manners, as those that are half good and half evil. So in this and very many other places in that law, there is to be found, besides the theological sense, much aspersion of philosophy.

（9）紧接着我们就讲到摩西，作为立法者和上帝的第一位执笔人，《圣经》对他宠爱夸赞有加，“埃及人的所有学问中都有他的身影。”据我们所知，埃及曾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的学派之一，柏拉图在请来埃及教士时，曾对梭伦说：“你们希腊人永远都是孩子，你们对远古一无所知，对知识的起源也毫无概念。”我们来看一下摩西法典，其内容涉及甚广，包括耶稣降临的征兆，辨别上帝子民的标志和差异，顺服的执行与影响及其他神圣的用途和功效，还有一些最为博学的拉比深入观察、艰苦探索的累累硕果，他们有些探索自然，有些研究道德，有些则专注于仪式和法令的简化。比如针对麻风病，法典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浅色斑遍布全身，病人可以随意外出，因为他是洁净的；但如果有任何一块完整的皮肉还没受到侵染，那他就是不洁净的，应该将他隔离。”有人就从自然法规的角度解释道，溃烂在

完全成型之前比之后更易传染。同时也有人从道德哲学的层面来说明，他认为，比起十恶不赦之人，亦正亦邪的人更容易破坏社会风气。因此，根据这一例子和其他各类例证可知，法典中不仅具有巨大的神学意义，同时也闪烁着哲学的光辉。

(10) So likewise in that excellent hook of *Job* , if it be revolved with diligence, it will be found pregnant and swelling with natural philosophy; as for example, cosmography, and the roundness of the world, *Qui extendit aquilonem super vacuum, et appendit terram super nihilum* ; wherein the pensileness of the earth, the pole of the north, and the finiteness or convexity of heaven are manifestly touched. So again, matter of astronomy:*Spiritus ejus ornavit cœlos, et obstetricante manu ejus eductus est Coluber tortuoses.* And in another place, *Nunquid conjungere valebis micantes stellas Pleiadas, aut gyrum Arcturi poteris dissipare?* Where the fixing of the stars, ever standing at equal distance, is with great elegancy noted. And in another place, *Qui facit Arcturum, et Oriona, et Hyadas, et interiora Austri;* where again he takes knowledge of the depression of the southern pole, calling it the secrets of the south, because the southern stars were in that climate unseen. Matter of generation:*Annon sicut lac mulsisti me, et sicut caseum coagulasti me?&c.* Matter of minerals: *Habet argentum venarum suarum principia; et auro locus est in quo conflatur, ferrum de terra tollitur, et lapis solutus calore in æsvertitur;* and so forwards in that chapter.

（10）同样，在神作《约伯记》中，如果我们细心思量，就会发现自然哲学的萌芽与孕育，如宇宙学，其中提到世界是圆的，“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这充分说明，地球悬于空中，北极是极点，天空是一个有限的凸面体。又比如天文学，《约伯记》中提到，“借他的灵使天有妆饰，他的手刺杀快蛇。”另一处又说，“你能

系住昴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恒星的位置是固定的，与我们始终保持相等的距离，这一点早已蕴含在这些优美的诗句之中。书中另一处还说道：“他造北斗、参星、昴星，并南方的密宫。”这表明，南极是一处洼地，因那边看不到南部的星群，因而就被称作南方的密宫。此外，还有关于繁育方面的论述，“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以及关于矿物的述说：“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类似的叙述还有很多。

(11) So likewise in the person of Solomon the king, we see the gift or endowment of wisdom and learning, both in Solomon's petition and in God's assent thereunto, preferred before all other terrene and temporal felicity. By virtue of which grant or donative of God Solomon became enabled not only to write those excellent parables or aphorisms concerning divine and moral philosophy, but also to compile a natural history of all verdure, from the cedar upon the mountain to the moss upon the wall (which is but a rudiment between putrefaction and an herb), and also of all things that breathe or move. Nay, the same Solomon the king, although he excelled in the glory of treasure and magnificent buildings, of shipping and navigation, of service and attendance, of fame and renown, and the like, yet he maketh no claim to any of those glories, but only to the glory of inquisition of truth; for so he saith expressly, “The glory of God is to conceal a thing, but the glory of the king is to find it out;” as if, according to the innocent play of children, the Divine Majesty took delight to hide His works, to the end to have them found out; and as if kings could not obtain a greater honour than to be God's playfellows in that game; considering the great commandment of wits and means, whereby nothing needeth to be hidden from them.

（11）对于所罗门王，在他的祈求和上帝的应允之下，得到了智慧与才学的恩赐，这远比土地和短暂的快乐重要的多。凭借上帝的恩赐与馈赠，所罗门不仅著述了关于神学和道德哲学的寓言警句，更汇编出一部自然历史著作，搜罗了从高山雪松到墙上青苔（一种介于腐烂与药草之间的雏形物质）的各类草木植物，同时还包括所有能呼吸和运动的生物。不过，虽然所罗门王坐拥无尽宝藏与华丽宫殿，拥有强大的海军舰队，受万人拥戴，声名大噪，但他从不为此骄狂自喜，只有对真理的探索才令他引以为傲，他明确表示，“上帝的荣耀在于隐藏真相，而君王的荣耀就是揭示真相。”这就如同孩子的嬉戏玩闹，上帝乐于隐藏他的作品，目的就在于让人类能够找到。在这场游戏中，君王只能作为上帝的玩伴，他们统领举国智者，享尽一切财富，自然无需掩饰自己的欲求。

(12) Neither did the dispensation of God vary in the times after our Saviour came into the world; for our Saviour himself did first show His power to subdue ignorance, by His conference with the priests and doctors of the law, before He showed His power to subdue nature by His miracles. And the coming of this Holy Spirit was chiefly figured and expressed in the similitude and gift of tongues, which are but *vehicula scientiæ.*

（12）在我们的救世主基督耶稣降世之后，上帝的这种做法也没有任何改变。耶稣首先通过与教士与博学者的交谈来征服无知，显现自己的能力，之后才运用自己奇迹般的力量征服自然。而圣灵的降临主要体现在语言的赋予和相通性上，“人们都会说同一种语言似的”，正是通过这一渠道知识才得以传播。

(13) So in the election of those instruments, which it pleased God to use for the plantation of the faith, notwithstanding that at

the first He did employ persons altogether unlearned, otherwise than by inspiration, more evidently to declare His immediate working, and to abase all human wisdom or knowledge; yet nevertheless that counsel of His was no sooner performed, but in the next vicissitude and succession He did send His divine truth into the world, waited on with other learnings, as with servants or handmaids: for so we see St. Paul, who was only learned amongst the Apostles, had his pen most used in the *Scriptures* of the New Testament.

（13）上帝在选择培养和传播信仰的方式时，一开始挑选了那些无知的但一开始接受了神启的子民，从而更直接宣布自己的权势，贬低人类的一切智慧与学识。不过，很快这种方法就不再使用，在历经一次社会变迁之后，上帝转而利用各类学问向世界传递自己的神圣真理，如同让仆人和侍从服侍一般。于是，十二使徒中最有学问的圣保罗，执笔完成了《新约》的多数篇幅。

(14) So again we find that many of the ancient bishops and fathers of the Church were excellently read and studied in all the learning of this heathen; insomuch that the edict of the Emperor Julianus (whereby it was interdicted unto Christians to be admitted into schools, lectures, or exercises of learning) was esteemed and accounted a more pernicious engine and machination against the Christian Faith than were all the sanguinary prosecutions of his predecessors; neither could the emulation and jealousy of Gregory, the first of that name, Bishop of Rome, ever obtain the opinion of piety or devotion; but contrariwise received the censure of humour, malignity, and pusillanimity, even amongst holy men; in that he designed to obliterate and extinguish the memory of heathen antiquity and authors. But contrariwise it was the Christian Church,

which, amidst the inundations of the Scythians on the one side from the north-west, and the Saracens from the east, did preserve in the sacred lap and bosom thereof the precious relics even of heathen learning, which otherwise had been extinguished, as if no such thing had ever been.

（14）同时，古时候的很多主教和神父都是学识渊博的人，对异教也颇有研究。尤里乌斯皇帝颁布的法令（基督徒禁止进入任何学校、参与讲座和学术研究活动等），比起之前所有的残酷控诉，对基督信仰而言是一种危害更大的阴谋诡计。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一世的仿效和嫉妒的心态也从来没有得到虔诚或忠实的好名声，相反地，人们对他发出了责难，认为他轻率、狠毒、优柔寡断，就连贤明之人也指出，他设计摒除销毁异教流传下来的遗物和著作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相反地，在西北部塞西亚人和东部撒拉森人蜂拥而至的时候，正是基督教徒们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古时珍贵的遗迹，其中也包括异教文化，要不是他们，这些东西必然消失殆尽，不复存在。

(15) And we see before our eyes, that in the age of ourselves and our fathers, when it pleased God to call the Church of Rome to account for their degenerate manners and ceremonies, and sundry doctrines obnoxious and framed to uphold the same abuses;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it was ordained by the Divine Providence that there should attend withal a renovation and new spring of all other knowledges. And on the other side we see the Jesuits, who partly in themselves, and partly by the emulation and provocation of their example, have much quickened and strengthened the state of learning; we see (I say) what notable service and reparation they have done to the Roman see.

（15）在我们及我们祖父辈所处的年代，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上帝要求罗马教会为他们的堕落行为，腐败的仪式典礼以及为袒护罪恶而花样百出引人反感的教条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他传授神旨，革新迫在眉睫，各类知识需应运而生。另一方面，耶稣会士也大大促进了学问的发展，他们一半是依靠自己，一半则是源自对榜样的效仿并受他们的激发。可以说他们对罗马教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和补偿。

(16) Wherefore, to conclude this part, let it be observed, that there be two principal duties and services, besides ornament and illustration, which philosophy and human learning do perform to faith and religion. The one, because they are an effectual inducement to the exaltation of the glory of God. For as the Psalms and other Scriptures do often invite us to consider and magnify the great and wonderful works of God, so if we should rest only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exterior of them as they first offer themselves to our senses, we should do a like injury unto the majesty of God, as if we should judge or construe of the store of some excellent jeweller by that only which is set out toward the street in his shop. The other, because they minister a singular help and preservative against unbelief and error. For our Saviour saith, “You err, not knowing the *Scriptures* , nor the power of God;” laying before us two books or volumes to study, if we will be secured from error: first the Scriptures, revealing the will of God, and then the creatures expressing His power; whereof the latter is a key unto the former: not only o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to conceive the true sense of the *Scriptures* by the general notions of reason and rules of speech, but chiefly opening our belief, in drawing us into a due meditation of the omnipotency of God, which is chiefly signed and engraven upon His works. Thus much therefore for divine testimony and evidence concerning the true dignity and value of learning.

（16）因此，作为这部分的结束，我们应该注意到，除了装饰和诠释，哲学和人类知识对信仰和宗教还具有两种主要的责任和义务。第一，知识是宣扬上帝荣耀的有效促因。《诗篇》和《圣经》中其他叙述通常教导我们虔诚思考和赞美上帝的大作，如果仅仅探知我们所能看到感知到的表面现象，那便是对上帝威严的亵渎，就像是我们仅仅根据陈列在橱窗的珠宝来分析判断珠宝商的收藏一样。第二，知识是唯一能对无信仰和过失发挥助益和防护作用。我们的救世主曾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如要避免过错，就应该刻苦钻研我们面前的两部大作，一是揭示上帝旨意的《圣经》，一是展现上帝权力的他的创造物。后者是通往前者的钥匙，不仅使我们能够通过常规观念和言语规则理解《圣经》的真正要义，更主要的是让我们通过信仰，深入沉思上帝的全能，而这一点又充分体现并铭刻在他的所创造的作品中。以上便是我们对神学在证实学问尊严和价值方面的作用的讨论。

CHAPTER VII

第七章

(1) As for human proofs, it is so large a field, as in a discourse of this nature and brevity it is fit rather to use choice of those things which we shall produce, than to embrace the variety of them. First, therefore, in the degrees of human honour amongst the heathen, it was the highest to obtain to a veneration and adoration as a God. This unto the Christians is as the forbidden fruit. But we speak now separately of human testimony, according to which—that which the Grecians call apotheosis, and the Latins *relatio inter divos* —was the supreme honour which man could attribute unto man, specially when it was given, not by a formal decree or act of state (as it was used among the Roman Emperors), but by an inward assent and

belief. Which honour, being so high, had also a degree or middle term; for there were reckoned above human honours, honours heroical and divine: in the attribu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hich honours we see antiquity made this difference; that whereas founders and uniters of states and cities, lawgivers, extirpers of tyrants, fathers of the people, and other eminent persons in civil merit, were honoured but with the titles of worthies or demigods, such as were Hercules, Theseus, Minus, Romulus, and the like; on the other side, such as were inventors and authors of new arts, endowments, and commodities towards man's life, were ever consecrated amongst the gods themselves, as was Ceres, Bacchus, Mercurius, Apollo, and others. And justly; for the merit of the former is confined within the circle of an age or a nation, and is like fruitful showers, which though they be profitable and good, yet serve but for that season, and for a latitude of ground where they fall; but the other is, indeed, like the benefits of heaven, which are permanent and universal. The former again is mixed with strife and perturbation, but the latter hath the true character of Divine Presence, coming in *aura leni* , without noise or agitation.

（1）至于人类社会中的证据，更是不胜枚举。在这样小篇幅的论述中，我们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只能选取其中一部分例子加以阐述。在异教徒中得到像神一样的敬奉和崇拜就是人类的至高荣耀。但在基督徒中这就如同禁果一般。我们现在分别来讨论关于人类能够赋予自身的至高荣耀的证据，希腊文中称为“神化”而拉丁文中称为 " 尊为神明 " 。这种荣耀通常不是由国家正式法令或法案授予的（虽然罗马君王常使用这种做法），而在于人们内心的认可和信赖。这种荣耀似乎有点高不可攀，但也有一个中间层次，或者说是中期阶段。在人类荣耀之上，就加上了英雄的和神圣的荣耀。古人对这两种荣耀的归属和分类上作了这样的区分：一方面，国家或城池的创立者或统一者、立法者、除暴安良者、教父及其他有名望为社会做贡献之人，被

授予英雄或半神的称号，如赫尔克里士、忒修斯、米纳斯、罗穆卢斯等；另一方面，创新技艺、才能和利于人类生活的物品的发明发现者都被列为神明，诸如刻瑞斯、巴克斯、默库里乌斯、阿波罗等等。公正地说，前者的贡献往往仅限于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就如天降甘霖一般，尽管让人受尽恩泽，但仅仅局限于那个时节，那一片土地。后者则不同，他们带来的恩惠如同我们头顶的一片天，是广袤无垠而又无穷无尽的。此外，前者总会伴随着冲突和骚动，而后者却拥有着上帝的品性，犹如微风，徐徐而来，不引发任何喧嚣和骚动。

(2) Neither is certainly that other merit of learning, in repressing the inconveniences which grow from man to man, much inferior to the former, of relieving the necessities which arise from nature, which merit was lively set forth by the ancients in that feigned relation of Orpheus' theatre, where all beasts and birds assembled, and, forgetting their several appetites—some of prey, some of game, some of quarrel—stood all sociably together listening unto the airs and accords of the harp, the sound whereof no sooner ceased, or was drowned by some louder noise, but every beast returned to his own nature; wherein is aptly described the nature and condition of men, who are full of savage and unreclaimed desires, of profit, of lust, of revenge; which as long as they give ear to precepts, to laws, to religion, sweetly touched with eloquence and persuasion of books, of sermons, of harangues, so long is society and peace maintained; but if these instruments be silent, or that sedition and tumult make them not audible，all things dissolve into anarchy and confusion.

（2）此外，知识还有另一个贡献，与之前所论述的不分轩轾，即它能够压制人们之间日益扩大的纷扰，缓解人类天性的不足。古时流传的一个虚构的故事生动诠释了知识的这一贡献。相传这个故事与

俄耳甫斯神有关，当他在剧场表演时，所有的飞禽走兽齐聚一堂，完全忘却了自己的原始欲望——有为了捕食的，为了玩耍的，还有想要挑衅的——他们都和善地站在那里，倾听着竖琴优美的曲调和旋律。但音乐一旦停止，或者被其他噪音盖过，它们就恢复了本性。这恰如其分地描绘了人类的本性与局限，他们暴戾恣睢、贪婪无度、自私自利、报复心强，只有在被慷慨激昂的著述、布道或演说触动心灵时，他们才会听从训诫、法令和教义，从而维持社会的安定。不过，若没有这些净化心灵的乐器，又或淹没于社会的骚乱暴动之中，那么，万物都会出于混乱之中。

(3) But this appeareth more manifestly when kings themselves, or persons of authority under them, or other governors in commonwealths and popular estates, are endued with learning. For although he might be thought partial to his own profession that said “Then should people and estates be happy when either kings were philosophers, or philosophers kings;” yet so much is verified by experience, that under learned princes and governors there have been ever the best times: for howsoever kings may have their imperfections in their passions and customs, yet, if they be illuminate by learning, they have those notions of religion, policy, and morality, which do preserve them and refrain them from all ruinous and peremptory errors and excesses, whispering evermore in their ears, when counsellors and servants stand mute and silent. And senators or counsellors, likewise, which be learned, to proceed upon more safe and substantial principles, than counsellors which are only men of experience; the one sort keeping dangers afar off, whereas the other discover them not till they come near hand, and then trust to the agility of their wit to ward or avoid them.

（3）如果君王，或他手下的当权者及其他公众利益财产的掌管

者学识渊博，那么上述的贡献就更显而易见。柏拉图说，“如国王是哲学家，或哲学家成为国王，那就是国家和臣民的福祉。”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是他因自身职业原因而过分片面，但大量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博学的国君或统治者总能创造盛世。无论他们在情感还是行为习惯上有任何不足，只要他们沐浴在学问的阳光下，就必能对宗教、政治和道德有所了解，从而防止他们犯下无可挽回的毁灭性过失。就算他们的顾问和大臣默不吭声，也能听到那些观点萦绕耳畔。如果元老院的议员或顾问们同样学富五车，比起那些仅靠经验行事之人，他们做事更为可靠实在，在行事之前会参照大量更为保险的准则。前者懂得深谋远虑、规避风险，后者却要等到危机迫在眉睫，才会意识到其紧迫性，又全凭自己的机敏来躲避危险。

(4) Which felicity of times under learned princes (to keep still the law of brevity, by using the most eminent and selected examples) doth best appear in the age which passed from the death of Domitianus the emperor until the reign of Commodus; comprehending a succession of six princes, all learned, or singular favourers and advancers of learning, which age for temporal respects was the most happy and flourishing that ever the Roman Empire (which then was a model of the world) enjoyed—a matter revealed and prefigured unto Domitian in a dream the night before he was slain: for he thought there was grown behind upon his shoulders a neck and a head of gold, which came accordingly to pass in those golden times which succeeded; of which princes we will make some commemoration; wherein, although the matter will be vulgar, and may be thought fitter for a declamation than agreeable to a treatise infolded as this is, yet, because it is pertinent to the point in hand—*Neque semper arcum tendit Apollo* —and to name them only were too naked and cursory, I will not omit it altogether. The first was Nerva, the excellent temper of whose government is by a glance in Cornelius Tacitus touched to the life:

Postquam divus Nerva res oluim insociabiles miscuisset, imperium et libertatem. And in token of his learning, the last act of his short reign left to memory was a missive to his adopted son, Trajan, proceeding upon some inward discontent at the ingratitude of the times, comprehended in a verse of Homer's—*“Telis, Phœbe, tuis, lacrymas ulciscere nostras.“*

（4）自图密善逝世至康茂德掌权，这段时期是博学君主创造太平盛世的最好例证（同样为简明起见，我们只挑选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这期间相继有六位君王，都颇有学识，或者说是学问的单纯爱好者和发扬者。那个时期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国泰民安的巅峰表现（当时也是整个世界的典范）。这点在图密善被杀害前一晚的梦中就有所预示。据他所述，他在梦中看到他身后升起了一个金脖子和金脑袋，果然，继他之后就迎来了黄金盛世。因此，这一时代的君主值得我们的褒扬和纪念。也许你们会认为这样的粗俗小事根本不该出现在像我这样一本正经的论述中，而更适合于一些朗诵诗篇中，不过，这个故事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阿波罗不总是手持弓箭的——尽管将它们一一列举显得过于直白和仓促，而我不会将其全部略过。第一位是古罗马皇帝内尔瓦，他的温良与贤明在科尔纳里乌斯·塔西陀的描述中可见一斑，他说道：“神圣的内尔瓦将漠不相关的两者，即权力与自由结合在一起。”他在位的短短几年时间即将成为过去时，他写给他养子图拉真的一封信充分展现了他的学识。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当时人们忘恩负义的风气的深深不满，主要体现在他所引用的荷马史诗诗句中：“福柏凭尔箭，雪我涕泪恨。”

(5) Trajan, who succeeded, was for his person not learned; but if we will hearken to the speech of our Saviour, that saith, “He that receiveth a prophet in the name of a prophet shall have a prophet's reward,” he deserveth to be placed amongst the most learned princes; for there was not a greater admirer of learning or

benefactor of learning, a founder of famous libraries, a perpetual advancer of learned men to office, and familiar converser with learned professors and preceptors who were noted to have then most credit in court. On the other side how much Trajan's virtue and government was admired and renowned, surely no testimony of grave and faithful history doth more lively set forth than that legend tale of Gregorius Magnum, Bishop of Rome, who was noted for the extreme envy he bare towards all heathen excellency; and yet he is reported, out of the love and estimation of Trajan's moral virtues, to have made unto God passionate and fervent prayers for the delivery of his soul out of hell, and to have obtained it, with a caveat that he should make no more such petitions. In this prince's time also the persecutions against the Christians received intermission upon the certificate of Plinius Secundus, a man of excellent learning and by Trajan advanced.

（5）继任的图拉真并不博学，但我们的救赎主说过，“以先知的名义来对待先知的人理应得到先知的恩赐。”所以，图拉真应该列入学识最为渊博的贤主之列。世上没有哪位君主作为学问的推崇者和资助人，能做到他那样，建立众多知名图书馆，不断提拔贤德之人，与朝廷中备受尊崇的教授或老师频频对话交流。至于图拉真的功德与统治如何受世人推崇和景仰，严正无虚的历史不可能有十分确切的证据来证明，不过在关于罗马教皇格列高利的传说中就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格列高利以其对异教优势的极度嫉恨而闻名于世，但据传他对图拉真的美德爱慕有加，十分尊重，于是他向上帝虔诚祷告，希望能将图拉真的灵魂从地狱释放出来。这一祈求得到实现，不过上帝警告他下不为例。图拉真统治期间，对基督徒的迫害一度停止，这主要得益于普利纽斯·塞昆德斯的力挺与保证，他博学多才，获得图拉真的赏识提拔。

(6) Adrian, his successor, was the most curious man that lived, and the most universal inquirer: insomuch as it was noted for an error in his mind that he desired to comprehend all things, and not to reserve himself for the worthiest things, falling into the like humour that was long before noted in Philip of Macedon, who, when he would needs overrule and put down an excellent musician in an argument touching music, was well answered by him again "God forbid, sir," saith he, "that your fortune should be so bad as to know these things better than I." It pleased God likewise to use the curiosity of this emperor as an inducement to the peace of His Church in those days; for having Christ in veneration, not as a God or Saviour, but as a wonder or novelty, and having his picture in his gallery matched with Apollonius (with whom in his vain imagination he thought its had some conformity), yet it served the turn to allay the bitter hatred of those times against the Christian name, so as the Church had peace during hAnd for his government civil, although he did not attain to that of Trajan's in glory of arms or perfection of justice, yet in deserving of the weal of the subject he did exceed him. For Trajan erected many famous monuments and buildings, insomuch as Constantine the Great in emulation was wont to call him *Parietaria* , "wall-flower," because his name was upon so many walls; but his buildings and works were more of glory and triumph than use and necessity. But Adrian spent his whole reign, which was peaceable, in a perambulation or survey of the Roman Empire, giving order and making assignation where he went for re-edifying of cities, towns, and forts decayed, and for cutting of rivers and streams, and for making bridges and passages, and for policing of cities and commonalties with new ordinances and constitutions, and granting new franchises and incorporations; so that his whole time was a very restoration of all the lapses and decays of former times.

（6）图拉真的继位者阿德里安是一名好奇心最为强烈广泛的探索者。但他在思想上却有一个缺陷：他渴望无所不知，却不愿为有价值的事情多花一点精力，这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的性情如出一辙。当他与一位音乐家争论关于音乐的事情并试图压制对方时，那位音乐家说道："上帝不会让您的运气那么差，连这方面事情都比我通晓。"同样，上帝利用并引导这位君王的好奇心来维持当时宗教的和平安宁。阿德里安虽尊崇基督耶稣，但并不把他视作上帝或我们的救赎者，而是一个奇迹或新奇事件，并将他的画像与阿波罗的画像并列摆放在他的画廊里（在他无谓的想象中，两者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这也足以缓解当时人们对基督徒的满腔敌意，令基督教在他执政期间维持着祥和状态。在治国上，虽比起图拉屡建军功和完善司法之举稍有逊色，但在改善民生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图拉真建造了很多举世闻名的纪念碑和建筑，君士坦丁大帝讽称他为"壁花"，即"墙上之花"，因在这些建筑物的墙上几乎都刻有他的大名。不过，这些作品实用性不强，更多的是为了纪念胜利与荣耀。然而，阿德里安在其安定祥和的统治时期，对整个罗马帝国进行了巡视探访，所到之处必号令群臣，分配任务，以重建城镇、修复堡垒、开源引流、修筑道桥，并颁布新的法令章程监管社会治安，赋予民众更多公民权，同时允许他们自由结社。可以说，阿德里安一生都在为修复旧时代残留的腐朽与衰败而操劳。

(7) Antoninus Pius, who succeeded him, was a prince excellently learned, and had the patient and subtle wit of a schoolman, insomuch as in common speech (which leaves no virtue untaxed) he was called *Cymini Sector* , a carver or a divider of cummin seed, which is one of the least seeds. Such a patience he had and settled spirit to enter into the least and most exact differences of causes, a fruit no doubt of the exceeding tranquillity and serenity of his mind, which being no ways charged or encumbered, either with fears, remorses, or scruples, but having been noted for a man of the purest goodness, without all fiction or

affectation, that hath reigned or lived, made his mind continually present and entire. He likewise approached a degree nearer unto Christianity, and became, as Agrippa said unto St. Paul, “half a Christian,” holding their religion and law in good opinion, and not only ceasing persecution, but giving way to the advancement of Christians.

（7）继任阿德里安的是安东尼·皮乌，他是位博学的君主，具备学者治学的耐性与敏锐洞察力，在世人的叙述中（通常是很刻薄的），他就是个“小茴香子切分者”，对像最小的植物种子一般的细微事物都能慎思明辨，再微小的东西也要细细辨别。他能做到如此境界，无疑源自内心的平静祥和，不受恐惧、懊悔、疑虑等任何干扰。他拥有最纯净的善心，不夹杂丝毫虚伪做作，令他的心境贯而如一，这一点使他在统治者和民众之间颇有声望。他的言行与基督徒类似，就如阿古利巴评价圣保罗的那样，是“半个基督徒”。他们都很赞同基督教的教义，不仅不对基督徒造成迫害，反而给了基督教一定的发展空间。

(8) There succeeded him the first *Divi fratres* , the two adoptive brethren—Lucius Commodus Verus, son toÆlius Verus, who delighted much in the softer kind of learning, and was wont to call the poet Martial his Virgil; and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whereof the latter, who obscured his colleague and survived him long, was named the “Philosopher,” who, as he excelled all the rest in learning, so he excelled them likewise in perfection of all royal virtues; insomuch as Julianus the emperor, in his book entitled *Caersares* , being as a pasquil or satire to deride all his predecessors, feigned that they were all invited to a banquet of the gods, and Silenus the jester sat at the nether end of the table and bestowed a scoff on everyone as they came in; but when Marcus Philosophus

came in, Silenus was gravelled and out of countenance, not knowing where to carp at him, save at the last he gave a glance at his patience towards his wife. And the virtue of this prince, continued with that of his predecessor, made the name of Antoninus so sacred in the world, that though it were extremely dishonoured in Commodus, Caracalla, and Heliogabalus, who all bare the name, yet, when Alexander Severus refused the name because he was a stranger to the family, the Senate with one acclamation said, *Quomodo Augustus, sic et Antoninus.* In such renown and veneration was the name of these two princes in those days, that they would have had it as a perpetual addition in all the emperors' style. In this emperor's time also the Church for the most part was in peace; so as in this sequence of six princes we do see the blessed effects of learning in sovereignty, painted forth in the greatest table of the world.

（8）安东尼的继任者是最早的一对被收养的神之子。一位是卢修斯·康茂德·韦鲁斯，他是艾利乌斯·韦鲁斯的儿子，他喜欢轻松柔和的知识，常常把诗人马提亚尔称作他的维尔吉尔。另一位是马库斯·奥勒留·安东尼，他的成就高于前者，又更为长寿，被称为“哲学家”。在学问方面，他的造诣是最高的，在王室美德上也完美无缺，无可比拟。尤里乌斯大帝曾著《恺撒传》一书，意在暗讽嘲弄他之前的历代君王。书中他捏造了这样一个故事，历代君王被邀请参加众神的宴会，经常插科打诨的赛勒诺斯坐于宴桌下位，每位君王入席时都要被其愚弄一番。但当哲学家马库斯进去时，赛勒诺斯遇到挑战，大为困窘，因为他找不出马库斯任何可挑剔之处，于是只好以一句马库斯对妻子太有耐心草草了事。这位君王继承并延续了他前任君王的美德，令安东尼成了全世界最神圣的名字。尽管康茂德、卡拉卡拉和埃拉伽巴路斯也同样拥有这个名字令其蒙受了耻辱，但当亚历山大·塞维鲁声称不属于这一家族而拒绝使用这一名字时，元老院议员一致拥护通过：“让安东尼与奥古斯丁齐名吧。”在当时，这两位君王都是德高望

重，受人景仰的典范，因此那些议员非常赞成将这两个名字冠于所有君王的称呼上，万世流传。马库斯统治期间，宗教基本也处于和平阶段。因此，从这六位君王相继执政的时期可以看出，学问为国家的统治和人民的福祉带来了极大的贡献，这在罗马这一世上最大的版图之上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9) But for a tablet or picture of smaller volume (not presuming to speak of your Majesty that liveth), in my judgment the most excellent is that of Queen Elizabeth, your immediate predecessor in this part of Britain; a prince that, if Plutarch were now alive to write lives by parallels, would trouble him, I think, to find for her a parallel amongst women. This lady was endued with learning in her sex singular, and rare even amongst masculine princes—whether we speak of learning, of language, or of science, modern or ancient, divinity or humanity—and unto the very last year of her life she accustomed to appoint set hours for reading, scarcely any young student in a university more daily or more duly. As for her government, I assure myself (I shall not exceed if I do affirm) that this part of the island never had forty-five years of better tines, and yet not through the calmness of the season, but through the wisdom of her regiment. For if there be considered, of the one side, the truth of religion established, the constant peace and security, the good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e temperate use of the prerogative, not slackened, nor much strained; the flourishing state of learning, sortable to so excellent a patroness; the convenient estate of wealth and means, both of crown and subject; the habit of obedience, and the moderation of discontents; and there be considered, on the other side, the differences of religion, the troubles of neighbour countries, the ambition of Spain, and opposition of Rome, and then that she was solitary and of herself; these things, I say, considered, as I could not have chosen an instance so recent and so proper, so I

suppose I could not have chosen one more remarkable or eminent to the purpose now in hand, which is concerning the conjunction of learning in the prince with felicity in the people.

（9）在较小的国家版图上，在我看来最出色的当属不列颠的伊丽莎白女王（我不敢擅自评论当今执政的君王），也就是您的前任君主。如果普卢塔赫仍在世并撰写传记，我想他肯定会为找不到女性中能和她媲美者而烦恼。这位女王，不论是学识、语言、还是科学，不论古代还是现在，神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她的学问在女性之中已属卓绝，在男性君主中也是罕见。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她还抽出固定时间花在阅读上，对大学学生而言也很难做到如此持之以恒。至于她的政绩，我确信（这点我毫不夸张），在这片岛国之上，还没有比这四十五年更好的时光。而这样的盛世，并非由于世态安宁，而是全凭她英明的领导和统治。细细想来，我们就能够发现，在她的统治下，宗教的真义得以确立，国家长治久安，司法公正严明，王权使用得当、松弛有道；学术昌明，获得普遍热心赞助；君王与民众之间财产分配适当；人们乐于顺从，不满情绪趋缓。而在另一个大环境下，面对宗教之间激烈的纷争，邻国繁多的动乱，西班牙的狼子野心和罗马的仇视敌对，她孤身奋战，统领大局。用来阐释君王的学问与民生的密切联系，我想没有比这个更近更恰当，又更为卓著的例子了。

(10) Neither hath learning an influence and operation only upon civil merit and moral virtue, and the arts or temperature of peace and peaceable government; but likewise it hath no less power and efficacy in enablement towards martial and military virtue and prowess, as may be notably represented in the exampl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Cæsar the Dictator (mentioned before, but now in fit place to be resumed), of whose virtues and acts in war there needs no note or recital, having been the wonders of time in that kind; but of their affections towards learning and perfections in

learning it is pertinent to say somewhat.

（10）学问不仅在处理国内事务上颇有价值，对弘扬美德、维持国家稳定等具有较大的贡献，在军事和战争方面，它同样功效卓著。亚历山大大帝和独裁者恺撒就是很好的例子（前面已经有提到过他们，这里我们继续加以讨论）。他们在战争中展现的英姿与雄风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奇迹，无需赘述，至于他们对学问的热衷和精通我们需要在这稍加阐述。

(11) Alexander was bred and taught under Aristotle, the great philosopher, who dedicated divers of his books of philosophy unto him; he was attended with Callisthenes and divers other learned persons, that followed him in camp, throughout his journeys and conquests. What price and estimation he had learning in doth notably appear in these three particulars: first, in the envy he used to express that he bare towards Achilles, in this, that he had so good a trumpet of his praises as Homer's verses; secondly, in the judgment or solution he gave touching that precious cabinet of Darius, which was found among his jewels (whereof question was made what thing was worthy to be put into it, and he gave his opinion for Homer's works); thirdly, in his letter to Aristotle, after he had set forth his books of nature, wherein he expostulateth with him for publishing the secrets or mysteries of philosophy; and gave him to understand that himself esteemed it more to excel other men in learning and knowledge than in power and empire. And what use he had of learning doth appear, or rather shine, in all his speeches and answers, being full of science and use of science, and that in all variety.

（11）亚历山大曾经师从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也曾将自己多本哲学著作传授于他。在他征战途中，他让卡利斯提尼斯和其他众多学者全程陪伴。他对学问的重视和推崇在以下三个事例中显而易见。第一例是他曾表达内心对阿希莱斯的嫉妒之意，因为荷马在其诗篇中对阿希莱斯不吝笔墨，大加褒扬。第二例体现在他对在大流士发现的珍奇宝盒中存放物品的判断上。（当这一宝盒在众多珠宝中脱颖而出时，人们询问什么样的贵重物品能配得上如此精致的宝盒，他认为会是荷马的作品。）第三例是在亚里士多德出版了一部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籍后，亚历山大曾致信劝诫他不应揭示哲学的奥秘，同时告诉他，在他看来，比起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学问方面胜于他人更应获得敬重。当然，学问的功效早已在他的言谈之中熠熠生辉，令其话语富于科学知识及其应用，内容包罗万象，精彩纷呈。

(12) And herein again it may seem a thing scholastical, and somewhat idle to recite things that every man knoweth; but yet, since the argument I handle leadeth me thereunto, I am glad that men shall perceive I am as willing to flatter (if they will so call it) an Alexander, or a Cæsar, or an Antoninus, that are dead many hundred years since, as any that now liveth; for it is the displaying of the glory of learning in sovereignty that I propound to myself, and not a humour of declaiming in any man's praises. Observe, then, the speech he used of Diogenes, and see if it tend not to the true state of one of the greatest ques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 whether the enjoying of outward things, or the contemning of them, be the greatest happiness; for when he saw Diogenes so perfectly contented with so little, he said to those that mocked at his condition, “were I not Alexander, I would wish to be Diogenes.” But Seneca inverteth it, and saith, *“Plus erat, quod hic nollet accipere,quàm quod ille posset dare.“* There were more things which Diogenes would have refused than those were which Alexander could have given or enjoyed.

（12）尽管列举一些众所周知的事似乎有些学究的味道，又显得无所事事，不过，既然因为之前的论题讨论到此，我很乐于接受人们认为我是在恭维（如果人们这么称呼的话）亚历山大、恺撒和安东尼这些几百年前的伟人，就如恭维今人一般。我这样做只是在证明我之前提出的论点，论述君王治国过程中体现的学问的荣耀，并不是在为颂扬任何一位君王而慷慨成词。接着我们来看看亚历山大对第欧根尼说的话，思考下这句话是否能揭示道德哲学一大重要问题的真谛，即最大的快乐在于享受外在事物还是诋毁它们？看到第欧根尼对任何细微的快乐都深感满足，亚历山大便对那些嘲笑第欧根尼的人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那但愿我能成为第欧根尼。"不过，塞内加又将这句话颠倒过来，说："第欧根尼不希望接受的事物，比亚历山大能够给予或享受的更多。"

(13) Observe, again, that speech which was usual with him, —"That he felt his mortality chiefly in two things, sleep and lust;" and see if it were not a speech extracted out of the depth of natural philosophy, and liker to have come out of the mouth of Aristotle or Democritus than from Alexander.

（13）亚历山大还常说："主要在两件事，睡觉和贪欲上，我感受到了死亡宿命。"我们看到，这样的话语是否更像提取自自然哲学的深处，又更像是出自亚里士多德或德谟克利特，而不是出自亚历山大之口？

(14) See, again, that speech of humanity and poesy, when, upon the bleeding of his wounds, he called unto him one of his flatterers, that was wont to ascribe to him divine honour, and said, "Look, this is very blood; this is not such a liquor as Homer

speaketh of, which ran from Venus' hand when it was pierced by Diomedes.”

（14）同时，亚历山大的话语还非常人性化又富有诗意。一次他受伤流血，便叫来一名将他奉为神明的奉承者，说道：“你看，这是鲜血，并不是荷马笔下维纳斯被狄俄墨得斯刺伤时流出的液体。”

(15) See likewise his readiness in reprehension of logic in the speech he used to Cassander, upon a complaint that was made against his father Antipater; for when Alexander happened to say, “Do you think these men would have come from so far to complain except they had just cause of grief?” and Cassander answered, “Yea, that was the matter, because they thought they should not be disproved;” said Alexander, laughing, “See the subtleties of Aristotle, to take a matter both ways, pro et contra, &c.”

（15）同样，在与卡桑德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亚历山大的敏捷思维和对逻辑的责难。针对有人抱怨卡桑德父亲安提帕特的事情，亚历山大偶然提到：“如果那些人没有遭受悲痛，怎么会大老远跑来控诉呢？”对此卡桑德回答道：“对，这就是问题，他们觉得自己千里迢迢跑来就没人会驳斥他们了。”于是亚历山大笑着说道：“我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式的精明，一件事的正反面都被你说了。”

(16) But note, again, how well he could use the same art which he reprehended to serve his own humour: when bearing a secret grudge to Callisthenes, because he was against the new ceremony of his adoration, feasting one night where the same Callisthenes was at the table, it was moved by some after supper, for entertainment

sake, that Callisthenes, who was an eloquent man, might speak of some theme or purpose at his own choice; which Callisthenes did, choosing the praise of the Macedonian nation for his discourse, and performing the same with so good manner as the hearers were much ravished; whereupon Alexander, nothing pleased, said, “It was easy to be eloquent upon so good a subject; but,” saith he, “turn your style, and let us hear what you can say against us;” which Callisthenes presently undertook, and did with that sting and life that Alexander interrupted him, and said, “The goodness of the cause made him eloquent before, and despite made him eloquent then again.”

（16）不过，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亚历山大本人有时也会运用他所指责的这一技巧。卡利斯提尼斯曾反对他提出的新的祭神仪式，他因此心存芥蒂。一天举行盛宴，卡利斯提尼斯也在场，在宴会结束时，一些人提议，既然卡利斯提尼斯善于雄辩，他可以自选主题来一个演讲，作为饭后娱乐。于是，卡利斯提尼斯以颂扬马其顿王国为主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令人如痴如醉。只有亚历山大听了丝毫不开心，说道：“对于这样的题目夸夸其谈自然容易，你应该颠覆你的风格，来讲讲对我们不利的话。”卡利斯提尼斯当即应允，开始演讲，仍然绘声绘色，滔滔不绝。但那些明讥暗讽的言辞令亚历山大不是滋味，即刻打断道：“他之前的善辩是因为事业的崇高与美好，现在又是出于他对我们的怨恨。”

(17) Consider further, for tropes of rhetoric, that excellent use of a metaphor or translation, wherewith he taxeth Antipater, who was an imperious and tyrannous governor; for when one of Antipater's friends commended him to Alexander for his moderation, that he did not degenerate as his other lieutenants did into the Persian pride, in uses of purple, but kept the ancient habit

of Macedon, of black. “True,” saith Alexander; “but Antipater is all purple within.” Or that other, when Parmenio came to him in the plain of Arbela and showed him the innumerable multitude of his enemies, specially as they appeared by the infinite number of lights as it had been a new firmament of stars, and thereupon advised him to assail them by night; whereupon he answered, “That he would not steal the victory.”

（17）此外，亚历山大说话讲究修辞，善于运用比喻和引用。有一次，他就用这样的手法控诉了安提帕特，这个专横跋扈的地方官员。安提帕特的一个朋友曾向亚历山大赞扬他做事合情合理，很有分寸，说他不像其他官员那样有着波斯民族的那股傲气，身着紫色服装，安提帕特并没有跟随着堕落，仍然坚持马其顿的传统，一身黑色。于是亚历山大回答道：“的确是这样，不过安提帕特的内心可全是紫色的。”还有一次，在阿贝拉平原作战期间，部将帕米尼奥来到亚历山大身边，向他指明敌人成千上万，铺天盖地，特别是那不计其数的灯火，犹如另一片星空，浩瀚庞大。于是，他提议晚上进行偷袭，但亚历山大却回答道：“我不会窃取胜利。”

(18) For matter of policy, weigh that significant distinction, so much in all ages embraced, that he made between his two friends Hephaestion and Craterus, when he said, “That the one loved Alexander, and the other loved the king:” describing the principal difference of princes' best servants, that some in affection love their person, and other in duty love their crown.

（18）在政策策略上，我们可以来看看亚历山大对他的两个朋友，赫费斯提翁和克拉特罗斯之间所作的区分。他说：“一个热爱亚历山大，一个则热爱国王。”这表明了君王最忠实仆从之间的主要差

别，即一种是针对个人的情感，另一种是对国王这个身份的拥护。这种差别在历朝历代都普遍存在。

(19) Weigh also that excellent taxation of an error, ordinary with counsellors of princes, that they counsel their masters 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their own mind and fortune, and not of their masters. When upon Darius' great offers Parmenio had said, “Surely I would accept these offers were I as Alexander;” saith Alexander, “So would I were I as Parmenio.”

（19）再来看看君王的顾问们经常犯的一种错误，他们在与君王共商大计时，提出的建议往往以自身的想法和命运为原型，而不是根据他们君主的想法和命运。有一次，大流士献上大量贡品，帕米尼奥说：“如果我是亚历山大，我一定接受这些礼品。”而亚历山大说：“如果我是帕米尼奥，我也必定接受。”

(20) Lastly, weigh that quick and acute reply which he made when he gave so large gifts to his friends and servants, and was asked what he did reserve for himself, and he answered, “Hope.” Weigh, I say, whether he had not cast up his account aright, because hope must be the portion of all that resolve upon great enterprises; for this was Cæsar's portion when he went first into Gaul, his estate being then utterly overthrown with largesses. And this was likewise the portion of that noble prince, howsoever transported with ambition, Henry Duke of Guise, of whom it was usually said that he was the greatest usurer in France, because he had turned all his estate into obligations.

（20）亚历山大经常将大量礼物馈赠给他的朋友和仆从，当有人问他给自己留下了什么时，他回答：“希望。”这是多么敏锐的回答。在这一回答中，我们看到，他的理由非常恰如其分，希望正是成就伟业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恺撒踏足高卢时，便将所有自己的财产分给手下，正是他的这种慷慨赠予为他赢得了胜利。野心勃勃的吉斯公爵亨利也是如此。据称，他在法国是最大的高利贷债主，因为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花在了借贷上。

(21) To conclude, therefore, as certain critics are used to say hyperbolically, “That if all sciences were lost they might be found in Virgil,” so certainly this may be said truly, there are the prints and footsteps of learning in those few speeches which are reported of this prince, the admiration of whom, when I consider him not as Alexander the Great, but as Aristotle's scholar, hath carried me too far.

（21）总而言之，就像一些评论家曾夸张的言论那样：“即使一切科学都销声匿迹，我们也能在维尔吉尔的作品中找到。”同样我们可以说，在至今流传的记录亚历山大的言辞中，总能寻得学问的踪影。在这里我并不是把他看作伟大的帝王，而是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我对他如此敬仰以至于花了很多篇幅来继续他的事迹。

(22) As for Julius Cæsar, the excellency of his learning needeth not to be argued from his education, or his company, or his speeches; but in a further degree doth declare itself in his writings and works: whereof some are extant and permanent, and some unfortunately perished. For first, we see there is left unto us that excellent history of his own wars, which he entitled only a *Commentary* , wherein all succeeding times have admired the solid

weight of matter, and the real passages and lively images of actions and persons, expressed in the greatest propriety of words and perspicuity of narration that ever was; which that it was not the effect of a natural gift, but of learning and precept, is well witnessed by that work of his entitled *De Analogia* , being a grammatical philosophy, wherein he did labour to make this same *Vox ad placitum* to become *Vox ad licitum* , and to reduce custom of speech to congruity of speech; and took as it were the pictures of words from the life of reason.

（22）对于尤里乌斯·恺撒的博学多识，我们没有必要通过他所受的教育、接触的人群及他的言谈来论证，因为他的著作更深入地展现了这一点，当然一些作品流传至今，而有一些已消失殆尽。在幸存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有他对自己经历的战争的精彩叙述，这类作品他仅仅称作《随记》，但却得到后世人们的大力推崇。因为这些著述记述的内容充实，人物生动，事件真实，而语言简练程度和叙述内容的明晰度又是以往作品所无法匹敌的。这样的成就并非源于恺撒的天赋，而是他认真求学，积极感知世界的结果，《论类比》一书就是极好的例子。这是一本讨论语法的著作，书中，他花费大量精力阐述将惯用的语法转变成合乎规则的语法，调和语言用法，使其保持一致性，并提出根据理性活动选择适当语言。

(23) So we receive from him, as a monument both of his power and learning, the then reformed computation of the year; well expressing that he took it to be as great a glory to himself to observe and know the law of the heavens, as to give law to men upon the earth.

（23）另外，他还对历法作出了改革，这部历法流传至今，不仅

是对他权势的纪念，也是对他博学的缅怀，同时这也体现了他将观察了解天象运行法则视作一种极大的荣耀，如同他为自己的臣民立法那样。

(24) So likewise in that book of his, *Anti-Cato* , it may easily appear that he did aspire as well to victory of wit as victory of war: undertaking therein a conflict against the greatest champion with the pen that then lived, Cicero the orator.

（24）同样，在其著述《反加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才智上获得胜利的渴望与对战争取胜的渴望同样非常强烈。于是才在书中与当时最为著名的演说家和雄辩家西塞罗相提并论。

(25) So, again, in his book of *Apophthegms* , which he collected, we see that he esteemed it more honour to make himself but a pair of tables, to take the wise and pithy words of others, than to have every word of his own to be made an apophthegm or an oracle, as vain princes, by custom of flattery, pretend to do. And yet if I should enumerate divers of his speeches, as I did those of Alexander, they are truly such as Solomon noteth, when he saith, *Verba sapientum tanquam aculei, et tanquam clavi in altum defixi* : whereof I will only recite three, not so delectable for elegancy, but admirable for vigour and efficacy.

（25）在他汇编的《格言集》中，我们看到，他更乐意把自己比作写字板，用以记录他人睿智精炼的言辞，而不是把他每句话语都当成圣言或神谕，就如那些虚荣狂妄的君王那样，习惯于手下的恭维奉承，才慌称自己的话语就是至理格言。如果我像记叙亚历山大时那样

列举他的话语，可以看到，他的话就如同所罗门说的那样，“睿智的语言如同针刺一般。”这里我们只列举三个事例，听来并不优雅，却显得锐气逼人、功效显著。

(26) As first, it is reason he be thought a master of words, that could with one word appease a mutiny in his army, which was thus: The Romans, when their generals did speak to their army, did use the word Milites, but when the magistrates spake to the people they did use the word Quirites. The soldiers were in tumult, and seditiously prayed to be cashiered; not that they so meant, but by expostulation thereof to draw Cæsar to other conditions; wherein he being resolute not to give way, after some silence, he began his speech, Ego Quirites, which did admit them already cashiered—wherewith they were so surprised, crossed, and confused, as they would not suffer him to go on in his speech, but relinquished their demands, and made it their suit to be again called by the name of Milites.

（26）首先，如果说恺撒是一个语言大师，这是师出有名的，他能够仅用一个词就平息一场叛乱。事情是这样的，在罗马，将军对士兵说话都用“士兵”一词，而称呼地方长官与民众为“市民”。当将士们发生骚乱，纷纷煽动请求弃甲归田，当然这并非他们的真正意图，只是希望通过威胁令恺撒答应他们的其他条件。恺撒毅然坚守，决不让步，沉默片刻后，他开始说道，“市民们”，这表明他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他们已是自由之身。那些将士听后非常诧异、恼怒而又疑惑。这样的话他们已经听不下去，所以只好放弃所提的条件，更提出让恺撒继续以“士兵”称呼他们。

(27) The second speech was thus: Cæsar did extremely affect

the name of king; and some were set on as he passed by in popular acclamation to salute him king. Whereupon, finding the cry weak and poor, he put it off thus, in a kind of jest, as if they had mistaken his surname: *Non Rex sum, sed Cæsar* ; a speech that, if it be searched, the life and fulness of it can scarce be expressed. For, first, it was a refusal of the name, but yet not serious; again, it did signify an infinite confidence and magnanimity, as if he presumed Cæsar was the greater title, as by his worthiness it is come to pass till this day. But chiefly it was a speech of great allurement toward his own purpose, as if the state did strive with him but for a name, whereof mean families were vested; for Rex was a surname with the Romans, as well as King is with us.

（27）第二个故事是说，恺撒特别钟情于国王这一称呼，他曾暗中派人在他经过时，热烈欢呼迎接，并向他致以对国王的问候。当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消失时，他便以开玩笑的口吻将这件事平息下去。他说："我不是国王，我是恺撒。"说的好像是人们把他的姓氏搞错了。细细推敲这句话，无论气势还是内涵，都溢于言表。首先，这是在拒绝国王这一称呼，但又不是严肃对待。其次，这意味着他的自信与宽宏，好像他认为恺撒是一个比国王更高级的头衔。不过确实，他的伟大功绩令恺撒这一称呼至今流传。但最为主要的是，这句话利于恺撒达成自己的目的，引导人们认为，国王好像仅仅在和他争夺一个来自贫寒家庭的姓氏，就像君王雷克斯就是来自普通罗马姓氏，正如姓氏金（King）在我们国家一样。

(28) The last speech which I will mention was used to Metellus, when Cæsar, after war declared, did possess himself of this city of Rome; at which time, entering into the inner treasury to take the money there accumulate, Metellus, being tribune, forbade him. Whereto Cæsar said, "That if he did not desist, he would lay him

dead in the place." And presently taking himself up, he added, "Young man, it is harder for me to speak it than to do it—Adolescens, durius est mihi hoc dicere quam facere." A speech compounded of the greatest terror and greatest clemency that could proceed out of the mouth of man.

（28）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恺撒对梅特卢斯所说的话。战时，恺撒仍待在罗马城内。一次，他想到内部的国库取些累积的钱财，但遭到作为护民官的梅特卢斯的反对。于是恺撒对他说："如果你继续这样，我就将你就地处决。"不久后，他又说："年轻人，对我来说，说起来比做起来要难得多。"这句话既是威严的震慑，又带有极大的宽厚仁慈，可以说，这是能从一个人口中听到的将两者融合得最完美的表达。

(29) But to return and conclude with him, it is evident himself knew well his own perfection in learning, and took it upon him, as appeared when upon occasion that some spake what a strange resolution it was in Lucius Sylla to resign his dictators, he, scoffing at him to his own advantage, answered, "That Sylla could not skill of letters, and therefore knew not how to dictate."

（29）再看看恺撒本人，他显然对自己的渊博学识非常了解，并引以为荣。当卢修斯·西拉辞去独裁官一职时，不少人表示非常奇怪，不可理解，而恺撒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嘲笑他道："西拉不擅措辞，因而不懂如何发令。"

(30) And here it were fit to leave this point, touching the concurrence of military virtue and learning (for what example

should come with any grace after those two of Alexander and Cæsar?), were it not in regard of the rareness of circumstance, that I find in one other particular, as that which did so suddenly pass from extreme scorn to extreme wonder: and it is of Xenophon the philosopher, who went from Socrates' school into Asia in the expedition of Cyrus the younger against King Artaxerxes. This Xenophon at that time was very young, and never had seen the wars before, neither had any command in the army, but only followed the war as a voluntary, for the love and conversation of Proxenus, his friend. He was present when Falinus came in message from the great king to the Grecians, after that Cyrus was slain in the field, and they, a handful of men, left to themselves in the midst of the king's territories, cut off from their country by many navigable rivers and many hundred miles. The message imported that they should deliver up their arms and submit themselves to the king's mercy. To which message, before answer was made, divers of the army conferred familiarly with Falinus; and amongst the rest Xenophon happened to say, “Why, Falinus, we have now but these two things left, our arms and our virtue; and if we yield up our arms, how shall we make use of our virtue?” Whereto Falinus, smiling on him, said, “If I be not deceived, young gentleman, you are an Athenian, and I believe you study philosophy, and it is pretty that you say; but you are much abused if you think your virtue can withstand the king's power.” Here was the scorn; the wonder followed: which was that this young scholar or philosopher, after all the captains were murdered in parley by treason, conducted those ten thousand foot, through the heart of all the king's high countries, from Babylon to Graecia in safety, in despite of all the king's forces, to the astonishment of the world, 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Grecians in times succeeding to make invasion upon the kings of Persia, as was after purposed by Jason the Thessalian, attempted by Agesilaus the Spartan, and achieved by Alexander the Macedonian,

all upon the ground of the act of that young scholar.

（30）关于军事功德与学问的一致性的讨论，我们本该就此结束（还有什么例子能比亚历山大和恺撒这两位君王的例子更加贴切的呢？）不过，我们还是找到另一个例子，虽然举世罕见，但的确存在着，那就是哲学家色诺芬。他曾一度遭人鄙视，却一夜之间成了奇迹般的人物。他曾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之后参加了希腊雇佣军助小居鲁士到亚洲讨伐波斯王阿尔塔薛西斯。那时的色诺芬还十分年轻，从没经历战争，更别说号令军队，他只不过是出于对好友普鲁先努斯的深厚友情而志愿参与这场战争。居鲁士战死沙场之后，剩下一小部分将士也陷入波斯帝国腹地，距离自己的国家几百里之远，更被条条江河层层隔断。其后，国王阿尔塔薛西斯派来使者法里诺斯，当时色诺芬也在场。法里诺斯向他们传达国王的旨意，劝他们上缴武器，请求国王的宽恕。在回答国王之前，一些将士开始与法里诺斯亲密协商起来。而色诺芬不经意说了一句："法里诺斯，我们现在仅剩两件东西，一件是我们的武器，另一件就是我们的品德。如果我们交出了武器，那我们该怎么利用我们的品德呢？"对此，法里诺斯笑道："年轻的先生，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雅典人，而且是学哲学的。你说得很好，不过要是你觉得你们的品德能够战胜我们国王的权威，那就是妄想了。"这就是之前所提的遭人鄙视之处，紧接着便是创造奇迹的时刻。在谈判之际，所有将领被波斯军以谋反罪一一诱捕杀害。那时，这位年轻的学者或哲学家，率领那剩下的一万士兵，突破重重障碍，穿越波斯帝国腹地，历经千难万险，终于从巴比伦成功返回希腊。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更鼓舞了他们的后代入侵波斯帝国，比如塞萨利人詹森曾谋划进攻，斯巴达人阿格西莱斯尝试侵略，而马其顿人亚历山大更是成功征服了波斯帝国。所有这些，都是这位年轻的学者为他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CHAPTER VIII

第八章

(1) To proceed now from imperial and military virtue to moral and private virtue; first, it is an assured truth, which is contained in the verses: *“Scilicet ingenuas didicisse fideliter artesEmollit mores nec sinit esse feros.“* It taketh away the wildness and barbarism and fierceness of men's minds; but indeed the accent had need be upon *fideliter* ; for a little superficial learning doth rather work a contrary effect. It taketh away all levity, temerity, and insolency, by copious suggestion of all doubts and difficulties, and acquainting the mind to balance reasons on both sides, and to turn back the first offers and conceits of the mind, and to accept of nothing but examined and tried. It taketh away vain admiration of anything, which is the root of all weakness. For all things are admired, either because they are new, or because they are great. For novelty, no man that wadeth in learning or contemplation thoroughly but will find that printed in his heart,*Nil novi super terram* . Neither can any man marvel at the play of puppets, that goeth behind the curtain, and adviseth well of the motion. And for magnitude, as Alexander the Great, after that he was used to great armies, and the great conquests of the spacious provinces in Asia, when he received letters out of Greece, of some fights and services there, which were commonly for a passage or a fort, or some walled town at the most, he said:—“It seemed to him that he was advertised of the battles of the frogs and the mice, that the old tales went of.” So certainly, if a man meditate much upon the universal frame of nature, the earth with men upon it (the divineness of souls except) will not seem much other than an ant-hill, whereas some ants carry corn, and some carry their young, and some go empty, and all to and fro a little heap of dust. It taketh away or mitigateth fear of death or adverse fortune, which is one of the greatest impediments of virtue and imperfections of manners. For if a man's mind be deeply

seasoned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mortality and corruptible nature of things, he will easily concur with Epictetus, who went forth one day and saw a woman weeping for her pitcher of earth that was broken, and went forth the next day and saw a woman weeping for her son that was dead, and thereupon said, *“Heri vidi fragilem frangi, hodie vidi mortalem mori.“* And, therefore, Virgil did excellently and profoundly couple the knowledge of causes and the conquest of all fears together, as concomitantia. *“Felix, qui potuit rerum cognoscere causas, Quique metus omnes, et inexorabile fatum Subjecit pedibus, strepitumque Acherontis avari.“*

（1）讨论完学问对帝业和军功的裨益，我们再来谈谈它对个人道德品行的助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古诗有云：“精究文艺，品端德和。”学问可以消解人们内心的狂野与凶残，但应该强调的是诗中“精”字，些许肤浅的学问就可能导致负面的效果。同时，学问能够答疑解惑，平衡正反两方面的思考，压制内心轻率狂妄的想法，并引导人们只接受反复尝试得到验证的事物，因此可以说，学问还可消解轻浮、蛮勇与傲慢。另外，学问可以消除人们内心虚无的钦羡，这正是人类软弱的根源所在。人们钦羡的事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新生事物，另一类是伟大的事物。对于新生事物，所有终日倾注于探究学问冥思苦想的人终会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那句话，“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表演木偶戏时，如果人们走到帘幕后，观察木偶一举一动的来源，那他们对木偶戏就不会如此唏嘘赞叹了。对于伟大事物，就以亚历山大为例，那时他已习惯了强大的军队，统领大军占领了亚洲大片土地，不过常收到来自希腊的战报，告知他们的战事和军役状况，通常就是占领了一个河道或堡垒，最多也就是攻下了一个城池。亚历山大便说道：“我感觉是有人通知我青蛙和老鼠在斗勇，尽是些老掉牙的故事。”因此，如果人们深入探索自然的普遍结构，他们就会发现，人类生活的地球（不包括圣灵）不过就是个蚁丘之地，其中，一些蚂蚁搬运谷物，一些哺育幼蚁，一些则无所事事，蚂蚁们熙攘往复，卑微地就如一堆尘土。学问还能消除或缓解人们对噩运与死亡的

恐惧。这样的恐惧往往是妨碍个人品德与礼节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人们的内心总因万物易逝人生无常而感慨万千，那他们一定会赞同爱比克泰德的说法。一天，爱比克泰德外出时，看到一名妇女为了一个打破的泥水罐而掩面哭泣。第二天出门，又看到一名妇女为死去的儿子失声痛哭，于是他说："昨天我看到一件易碎的物品摔碎了，今天又看到一个人死了。"维尔吉尔曾用诗句极为深入而有效地将了解起因与战胜恐惧联系在一起，即一种伴随关系。他这样写道："达人观众相，了知一切因；纷纷尘世虑，何足动其心？厄运肆凶残，大壑溢吼声；屹立无所怖，巍然称大雄。"

(2) It were too long to go over the particular remedies which learning doth minister to all the diseases of the mind: sometimes purging the ill humours, sometimes opening the obstructions, sometimes helping digestion, sometimes increasing appetite, sometimes healing the wounds and exulcerations thereof, and the like; and, therefore, I will conclude with that which hath *rationem totius* —which is, that it dispose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mind not to be fixed or settled in the defects thereof, but still to be capable and susceptible of growth and reformation. For the unlearned man knows not what it is to descend into himself, or to call himself to account, nor the pleasure of that *suavissima vita, indies sentire se fieri meliorem* . The good parts he hath he will learn to show to the full, and use them dexterously, but not much to increase them. The faults he hath he will learn how to hide and colour them, but not much to amend them; like an ill mower, that mows on still, and never whets his scythe. Whereas with the learned man it fares otherwise, that he doth ever intermix the correction and amendment of his mind with the use and employment thereof. Nay, further, in general and in sum, certain it is that *Veritas and Bonitas* differ but as the seal and the print; for truth prints goodness, and they be the clouds of error which descend in the storms of passions

and perturbations.

（2）学问对人类心智的弊病具有一定的辅助缓解作用。它或可消除不良情绪，或能助人解开心中郁结，或有助于人们消化知识，又或可提高人们的求知欲，或者治愈人们内心的伤痛。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功效。如果一一进行阐述，必然耗去大量篇幅，因此我们不再赘述，仅以简练的话语进行概括，作为小结。学问能够重新构建我们的心智，令其不致为本身的缺陷所困，无法自拔，同时，让我们的大脑有能力也易于接受发展与革新。学识浅薄之人不了解自己继承了先人的哪些品质，或应该考虑些什么，更觉察不到自己每天都在进步，也不懂得享受生活的甜蜜。他们会将自己的才能完全展现出来，并加以巧妙利用，但不会在乎怎样优化它们。对于自己的劣势，他们会选择隐藏或是掩护，而不愿去改正它们，就如不合格的割草者一样，只顾一味割草，从不会将镰刀磨得锋利些。对于学识渊博之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总能运用自己的大脑，并对其不断修正与完善。进一步而言，真理与善思的区别就如同印章与印记一般，真理印出善思，而谬误之云便在激荡狂躁的暴风雨中诞生。

(3) From moral virtue let us pass on to matter of power and commandment, and consider whether in right reason there be any comparable with that wherewith knowledge investeth and crowneth man's nature. We see the dignity of the commandment is according to the dignity of the commanded; to have commandment over beasts as herdmen have, is a thing contemptible; to have commandment over children as schoolmasters have, is a matter of small honour; to have commandment over galley-slaves is a disparagement rather than an honour. Neither is the commandment of tyrants much better, over people which have put off the generosity of their minds; and, therefore, it was ever holden that honours in free monarchies and commonwealths had a sweetness

more than in tyrannies, because the commandment extendeth more over the wills of men, and not only over their deeds and services. And therefore, when Virgil putteth himself forth to attribute to Augustus Cæsar the best of human honours, he doth it in these words:“*Victorque volentesPer populos dat jura, viamque affectat Olympo.*“ But yet the commandment of knowledge is yet higher than the commandment over the will; for it is a commandment over the reason, belief, and understanding of man, which is the highest part of the mind, and giveth law to the will itself. For there is no power on earth which setteth up a throne or chair of estate in the spirits and souls of men, and in their cogitations, imaginations, opinions, and beliefs, but knowledge and learning. And therefore we see the detestable and extreme pleasure that arch-heretics, and false prophets, and impostors are transported with, when they once find in themselves that they have a superiority in the faith and conscience of men; so great as if they have once tasted of it, it is seldom seen that any torture or persecution can make them relinquish or abandon it. But as this is that which the author of the Revelation calleth the depth or profoundness of Satan, so by argument of contraries, the just and lawful sovereignty over men's understanding, by force of truth rightly interpreted, is that which approacheth nearest to the similitude of the divine rule.

（3）以上所谈是学问对道德的裨益，现在我们来讨论权力和掌控的问题，看看还有什么在赋予人类本性与权力的问题上能与知识一较高下。掌控的威严源于被掌控者的尊贵程度。像牧人那样控制一群牲畜的权力是可鄙的；像老师控制孩子那样，这只是一种微小的尊荣；如是掌管一群苦役犯，与其说这是种荣耀，还不如说这本就应该遭人蔑视。暴君的统治也一样是可鄙的，因为他的民众丧失了宽宏的心智。于是人们认为，在自由的君主国度或共和国度，民众获得的尊重要比暴政之下更多更好，因为这样的统治不仅掌控着他们的行为与

服务，同时还把控他们的意愿。因此，维尔吉尔曾用这样的语言赋予奥古斯丁·恺撒以尘世间最大的荣耀：“大王长驱战功雄，人民爱戴法严明，尘世已立无双德，上帝自开登天程。”不过，掌控知识比掌控人们的意愿更加高尚，因为掌控知识就是把握人们的理性、信仰和理解力，这是人类心智最高级的部分，控制着人们意愿本身。在这世上，除了知识和学问，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在人类的精神和灵魂中，在他们的思索、想象、观点和信仰之中位列至高无上的王者之席。因此，当那些极端异教徒、假先知和诈骗者发现自己能够控制他人的信念和良知时，便会产生一种可憎的极端愉悦感。这种快乐令人沉醉，一旦尝到这种甜头，即使遭受酷刑或迫害，也很少有人会放手。《启示录》中将这种现象称为“撒旦深奥之理”。通过这些反面的论证，我们看到，如果能正确阐明真理，合理合法掌控人们的理解与信任，就必能最接近神圣的法则。

(4) As for fortune and advancement, the beneficence of learning is not so confined to give fortune only to states and commonwealths, as it doth not likewise give fortune to particular persons. For it was well noted long ago, that Homer hath given more men their livings, than either Sylla, or Cæsar, or Augustus ever did, notwithstanding their great largesses and donatives, and distributions of lands to so many legions. And no doubt it is hard to say whether arms or learning have advanced greater numbers. And in case of sovereignty we see, that if arms or descent have carried away the kingdom, yet learning hath carried the priesthood, which ever hath been in some competition with empire.

（4）学问带来的好运和促进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国家与政府的层面，它同样可以为个人谋得福利。早前我们已注意到，西拉、恺撒和奥古斯丁曾将自己的财产慷慨赠予自己的部将，并将大片土地分发给他们。但是，荷马向人们馈赠了更多，用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同时，

军事和学问究竟何者能促进更多人类的进步，这点无疑是很难界定的。在统治权问题上，如果军队或世袭血统负责维持王国的延续，那么学问就维持着神职，这与君权统治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竞争。

(5) Again, for the pleasure and delight of knowledge and learning, it far surpasseth all other in nature. For, shall the pleasures of the affections so exceed the pleasure of the sense, as much as the obtaining of desire or victory exceedeth a song or a dinner?and must not of consequence the pleasures of the intellect or understanding exceed the pleasures of the affections?We see in all other pleasures there is satiety, and after they be used, their verdure departeth, which showeth well they be but deceits of pleasure, and not pleasures; and that it was the novelty which pleased, and not the quality. And, therefore, we see that voluptuous men turn friars, and ambitions princes turn melancholy. But of knowledge there is no satiety, but satisfaction and appetite are perpetually interchangeable; and, therefore, appeareth to be good in itself simply, without fallacy or accident. Neither is that pleasure of small efficacy and contentment to the mind of man, which the poet Lucretius describeth elegantly:” *Suave mari magno, turbantibus æquora ventis, &c.“* “It is a view of delight,” saith he, “to stand or walk upon the shore side, and to see a ship tossed with tempest upon the sea; or to be in a fortified tower, and to see two battles join upon a plain. But it is a pleasure incomparable, for the mind of man to be settled, landed, and fortified in the certainty of truth; and from thence to descry and behold the errors, perturbations, labours, and wanderings up and down of other men.

（5）至于知识和学问带来的欣喜与愉悦，本质上是其他任何事

都远不能比的。情感的快乐胜过感官的愉悦，不就和实现愿望或取得胜利比听歌或吃饭更快乐一样吗？因而才智上获得的愉快不就胜过情感上的快乐吗？同时，对其他乐趣往往会产生厌腻情绪，慢慢习惯之后，新鲜感就不复存在了，这表明，他们的这种快乐仅仅是虚假的幻觉，并不是真正的快乐。他们的快乐源于事物的新鲜感，并非事物本身的品质。于是我们经常见到，骄奢淫逸之人能成为修道士，壮志雄心的君王也会变得郁郁寡欢。然而，知识并不存在令人厌烦的情况，在治学过程中，满足感和求知欲永久处于相互交替的状态。因此，学问带给人们的只是纯粹的愉悦，不存在任何谬误与意外。当然，学问产生的愉悦感给予人们内心的满足与功效绝不是无足轻重的，诗人卢克莱修就曾十分典雅的描述道："于海边驻足或漫步，望着暴风雨中颠簸摇晃的小船，又或伫立在坚固的堡垒上，观看前方平原上两支军队的会战，这是何等的乐事。不过，当人们对真理确信无疑，他们的内心就能在真理中真正稳定、安定和强大，自此，他们能发现和批评他人心中的谬误、不安、操劳与彷徨。这样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

(6) Lastly, leaving the vulgar arguments, that by learning man excelleth man in that wherein man excelleth beasts; that by learning man ascendeth to the heavens and their motions, where in body he cannot come; and the like: let us conclude with the dignity and excellency of knowledge and learning in that whereunto man's nature doth most aspire, which is immortality, or continuance; for to this tendeth generation, and raising of houses and families; to this tend buildings, foundations, and monuments; to this tendeth the desire of memory, fame, and celebration; and in effect the strength of all other human desires. We see then how far the monuments of wit and learning are more durable than the monuments of power or of the hands. For have not the verses of Homer continued twenty-five hundred years, or more, without the loss of a syllable or letter; during which the infinite palaces, temples, castles, cities, have been decayed and demolished?It is not

possible to have the true pictures or statues of Cyrus, Alexander, Cæsar, no nor of the kings or great personages of much later years; for the originals cannot last, and the copies cannot but leese of the life and truth. But the images of men's wits and knowledges remain in books, exempted from the wrong of time and capable of perpetual renovation. Neither are they fitly to be called images, because they generate still, and cast their seeds in the minds of others, provoking and causing infinite actions and opinions in succeeding ages. So that if the invention of the ship was thought so noble, which carrieth riches and commodities from place to place, and consociateth the most remote regions in participation of their fruits, how much more are letters to be magnified, which as ships pass through the vast seas of time, and make ages so distant to participate of the wisdom, illuminations, and inventions, the one of the other?Nay, further, we see some of the philosophers which were least divine, and most immersed in the senses, and denied generally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yet came to this point, that whatsoever motions the spirit of man could act and perform without the organs of the body, they thought might remain after death, which were only those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not of the affection; so immortal and incorruptible a thing did knowledge seem unto them to be. But we, that know by divine revelation that not only the understanding but the affections purified, not only the spirit but the body changed, shall be advanced to immortality, do disclaim in these rudiments of the senses. But it must be remembered, both in this last point, and so it may likewise be needful in other places, that in probation of the dignity of knowledge or learning, I did in the beginning separate divine testimony from human, which method I have pursued, and so handled them both apart.

（6）我们对一些粗俗的论据不作展开讨论，比如好学之人优于

普通大众就如同人类优于牲畜，又如他们能够升至天堂，观察天界活动，而人类的身体不可能到达那里，等等。作为最后总结，我们说，知识和学问的尊荣和优势在于让人们实现内心最大的渴望，即永恒，或者说是延续。正是出于这种渴望，人们繁衍生息，组建家庭以及修造建筑、地基和纪念碑，与此同时，还产生了对记忆、名望和赞颂的渴望。事实上，人类其他所有的欲望都是来源于这一最大的渴望。由此我们看到，比起权力和人工建造的纪念碑，智慧与学问树立的丰碑更为持久。在过去的岁月中，无数的皇宫、神殿、城堡和城市早已成为断壁残垣，而荷马的诗篇，历经两千五百多年，却未曾丢失一个音节和字母，这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同样，要看到诸如居鲁士、亚历山大和恺撒这样的伟人的真实画像或雕塑已不可能，就连之后君王或名人的画像和雕塑也很难见到，这是因为原作无法历经岁月的摧残，后世的仿品又缺少了一丝生气和客观真相。但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形象却能在书中完好无损的保存下来，能承受时间的摧残，历久弥新。当然将它们称作形象并不恰当，因为知识仍能不断拓展和完善，在人们的大脑中播下有待萌发的种子，从而激励后世的人们进行无尽的体验，并引导他们萌发无穷的观点和行为。轮船的发明促进了地区之间商品的交换和财富的流通，为偏远地区与外界联系分享他们的成果提供了便利，因此，这被认为是一项伟大的发明。那么，文字的发明就更是一项人类史上卓越的成就。就如轮船一样，文字穿越广袤无边的时间海域，为时代相隔遥远的人们分享智慧、启发和发明提供了可能。我们也看到，有些哲学家不顾神谕，沉浸于自己的感知，否定灵魂的永恒，不过，在谈到不需要人体器官参与的精神活动时，他们同样认为，即使人们逝世之后，这样的活动仍能继续。在他们看来，这种活动只是种认知行为，不包括情感活动。因此，对人类而言，知识似乎是永恒不朽的。但是，我们从神谕中了解到，无论是我们的认知还是净化后的情感，无论是精神还是变化后的身体，都可以成就永恒。因此，对他们那种一知半解的想法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当然，在本章结尾及其他必要之处，我们应该注意，从一开始我就将神学的证据与尘世区分开来，并进行分别论述，目的就是为了查验知识与学问的尊荣。

(7) Nevertheless I do not pretend, and I know it will be impossible for me, by any pleading of mine, to reverse the judgment, either of Æsop's cock, that preferred the barleycorn before the gem; or of Midas, that being chosen judge between Apollo, president of the Muses, and Pan, god of the flocks, judged for plenty; or of Paris, that judged for beauty and love against wisdom and power; or of Agrippina, *occidat matrem, modo imperet* , that preferred empire with any condition never so detestable; or of Ulysses, *qui vetulam prætulit immortalitati* , being a figure of those which prefer custom and habit before all excellency, or of a number of the like popular judgments. For these things must continue as they have been; but so will that also continue whereupon learning hath ever relied, and which faileth not: *Justificata est sapientia a filiis suis.*

（7）但是我不会佯装能够推翻别人的判断，我也深知自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比如《伊索寓言》中的公鸡舍弃宝石而选择了大麦；弥达斯在被邀请作为缪斯女神裁决阿波罗和畜牧之神潘之间比赛的裁判时，判决胜出的是富足的一方；帕里斯为了美貌和爱情放弃了智慧和权势；阿格里品娜为助其儿子登上王位，任何可鄙的条件都能接受，结果却被自己的儿子杀害；尤利西斯“为了一个老妇人而放弃了永生”，成为了将风俗习惯列于其他任何优秀品质之前的典型。类似著名的判断还有很多，这些都不是以我的辩论所能推翻的。这样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但同时，学问所依赖的事物也会得到延续，从不间断，而且“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

BOOK 2.

第二卷

To the King.

致国王陛下

1 . It might seem to have more convenience, though it come often otherwise to pass (excellent King), that those which are fruitful in their generations, and have in themselves the foresight of immortality in their descendants, should likewise be more careful of the good estate of future times, unto which they know they must transmit and commend over their dearest pledges. Queen Elizabeth was a sojourner in the world in respect of her unmarried life, and was a blessing to her own times; and yet so as the impression of her good government, besides her happy memory, is not without some effect which doth survive her. But to your Majesty, whom God hath already blessed with so much royal issue, worthy to continue and represent you for ever, and whose youthful and fruitful bed doth yet promise many the like renovations, it is proper and agreeable to be conversant not only in the transitory parts of good government, but in those acts also which are in their nature permanent and perpetual. Amongst the which (if affection do not transport me) there is not any more worthy than the further endowment of the world with sound and fruitful knowledge. For why should a few received authors stand up like Hercules' columns, beyond which there should be no sailing or discovering, since we have so bright

and benign a star as your Majesty to conduct and prosper us?To return therefore where we left, it remaineth to consider of what kind those acts are which have been undertaken and performed by kings and others for the increase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wherein I purpose to speak actively, without digressing or dilating.

（1）那些子孙满堂而又深知自己后代延绵不绝的人，通常会更加注重未来的财产利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终究要将自己的至爱交付于未来。这样似乎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便利，尽管有时会与这些人的想法背道而驰。伊丽莎白女王终身未嫁，仅是这世上的匆匆过客，只是对她所处的时代而言，这是一件幸事。除了她留给世人的美好印象之外，在她统治下的政府的好名声同样令她名垂青史。但对于您，尊敬的陛下，上帝已赐予您众多王室子孙，足以代表您的家族，并得到永世流传，他们的年轻气盛与卓著绩效预示着将来的频频革新。因此，对您而言，不仅应该精通掌管政府的短期政策，更应探究永世适用的治国良方。其中（如果我没被自己的感情冲昏头脑），比起带给世界的深远裨益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识，没有什么具有更大的价值了。我们已经拥有了陛下您这样聪慧而仁爱的君主，犹如明星一般引导着我们，为我们带来繁荣的生活。不过，为何还有一些知名学者像赫尔克里士的柱子一般矗立在那里，阻挡了人们探索与发现的道路？我们接着之前的话题，来探讨国王和其他人采用了怎样的方法来促进学术的进展。我将直入主题，不再拖泥带水。

2 . Let this ground therefore be laid, that all works are over common by amplitude of reward, by soundness of direction, and by the conjunction of labours. The first multiplieth endeavour, the second preventeth error, and the third supplieth the frailty of man. But the principal of these is direction, for *claudus in via antevertit cursorem extra viam* ; and Solomon excellently setteth it down, “If the iron be not sharp, it requireth more strength, but wisdom is that

which prevaileth," signifying that the invention or election of the mean is more effectual than any enforcement or accumulation of endeavours. This I am induced to speak, for that (not derogating from the noble intention of any that have been deservers towards the state of learning), I do observe nevertheless that their works and acts are rather matters of magnificence and memory than of progression and proficience, and tend rather to augment the mass of learning in the multitude of learned men than to rectify or raise the sciences themselves.

（2）所有的工作首先需要奠定这样三个基础，一为丰厚的奖励，二为合理的指导，三为密切的配合。第一点可以激发人们的斗志，第二点帮助人们避免错误，第三点则能够填补人们薄弱的意志。在这些基础条件之中，合理的指导是最重要的。因为“跛足者只要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同样能将偏离正道的善跑者抛于身后”。所罗门也有精彩的叙述：“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必然就会多费力气，但智慧指教，便有益处。”这意味着，合理方法的探求和选择往往比花费蛮力更为有效。我只是想说明（并非意在贬低学者们出于发展学术这一高尚的目的所作的任何努力），他们的作为通常只是气势宏大，重在缅怀过去，对学问的发展与进步无所裨益，同时，他们的努力常常趋于增加求学者的数量，而不是完善或提升科学本身。

3．The works or acts of merit towards learning are conversant about three objects—the places of learning, the books of learning, and the persons of the learned. For as water, whether it be the dew of heaven or the springs of the earth, doth scatter and leese itself in the ground, except it be collected into some receptacle where it may by union comfort and sustain itself; and for that cause the industry of man hath made and framed springheads, conduits, cisterns, and pools, which men have accustomed likewise to beautify and adorn

with accomplishments of magnificence and state, as well as of use and necessity; so this excellent liquor of knowledge, whether it descend from divine inspiration, or spring from human sense, would soon perish and vanish to oblivion, if it were not preserved in books, traditions, conferences, and places appointed, as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schools, for the receipt and comforting of the same.

（3）能够体现学问价值的作为通常与三个客体相关，分别是：治学场所、学术书籍以及学者。对水滴而言，不管是天上甘露还是地下清泉，如果不能在同一容器中汇合，团结一致，相互扶持，就必然四处流散，终消失殆尽。于是，人们挖掘泉源、开凿沟渠、建造水池与池塘，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们不仅关注其实用性，通常还会加以美化和装饰，令它们变得壮美华丽。同样，对于知识甘露，不论是源于神谕，还是源于人类感知，如果不将其记录于书籍、传统、谈话或特定的场所如大学、学院和学校之中，得到同样的支持与力量，就难逃湮没无闻的厄运。

4．The works which concern the seats and places of learning are four—foundations and buildings, endowments with revenues, endowments with franchises and privileges, institutions and ordinances for government—all tending to quietness and privateness of life, and discharge of cares and troubles; much like the stations which Virgil prescribeth for the hiving of bees: *“Principio sedes apibus statioque petenda, Quo neque sit ventis aditus, &c.“*

（4）与治学场所相关的作为可分为以下四类：构筑房屋、投入资金、赋予特权及为政府设立机构、颁布法令法规。这些努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学者生活安定，享有足够的私人空间，不受侵扰，这

与维尔吉尔所描绘的蜂巢的状态十分类似。他写道：“先寻僻地后养蜂，首求避雨还避风。”

5．The works touching books are two—first, libraries, which are as the shrines where all the relics of the ancient saints, full of true virtue, and that without delusion or imposture, are preserved and reposed; secondly, new editions of authors, with more correct impressions, more faithful translations, more profitable glosses, more diligent annotations, and the like.

（5）与书籍相关的行为主要有两种，一是建造图书馆。图书馆就如存放先哲遗体的神龛一样，只有那些真正有德行且不掺杂任何虚假与欺骗的圣人才能安息在这里。二是印刷古人著作的新版本，力求做到更优的印刷效果，更准确的翻译，更详细而有益的注解等等。

6．The works pertaining to the persons of learned men (besides the advancement and countenancing of them in general) are two—the reward and designation of readers in sciences already extant and invented; and the reward and designation of writers and inquirers concerning any parts of learning not sufficiently laboured and prosecuted.

（6）针对学者本身（除了一般性的提拔和支持），可以作两项工作，即奖赏和任命现有或已被创造的知识的教授者以及那些对未知领域或一知半解的知识的作家探索者。

7．These are summarily the works and acts wherein the merits

of many excellent princes and other worthy personages, have been conversant. As for any particular commemorations, I call to mind what Cicero said when he gave general thanks, *Difficile non aliquem, ingratum quenquam prœterire.* Let us rather,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 look unto that part of the race which is before us, than look back to that which is already attained.

（7）以上便是为促进和发展学问可以作出的努力和工作的概述。很多杰出王者或贤能在这方面用心竭力，功绩卓著。至于事例的列举，我想到西塞罗在致谢时说的话："很难把要感谢的所有人一一列举，对任何一个的疏忽都会让我深感抱歉。"那么，我们就根据《圣经》的旨意，来看看我们面前的道路，而不是回顾之前跑过的路。

8．First, therefore, amongst so many great foundations of colleges in Europe, I find strange that they are all dedicated to professions, and none left free to arts and sciences at large. For if men judge that learning should be referred to action, they judge well; but in this they fall into the error described in the ancient fable, in which the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did suppose the stomach had been idle, because it neither performed the office of motion, as the limbs do, nor of sense, as the head doth; but yet notwithstanding it is the stomach that digesteth and distributeth to all the rest. So if any man think philosophy and universality to be idle studies, he doth not consider that all professions are from thence served and supplied. And this I take to be a great cause that hath hindered the progression of learning, because these fundamental knowledges have been studied but in passage. For if you will have a tree bear more fruit than it hath used to do, it is not anything you can do to the boughs, but it is the stirring of the earth

and putting new mould about thee roots that must work it. Neither is it to be forgotten, that this dedicating of foundations and dotations to professory learning hath not only had a malign aspect and influence upon the growth of sciences, but hath also been prejudicial to states, and governments. For hence it proceedeth that princes find a solitude in regard of able men to serve them in causes of estate, because there is no education collegiate which is free, where such as were so disposed might give themselves in histories, modern languages, books of policy and civil discourse, and other the like enablements unto service of estate.

（8）首先，我奇怪地发现，欧洲众多大型学院都致力于专业学术的探究，没有一处研究普遍性的技艺与学科知识。人们如果认为学问应以功效为目标，他们的看法很合理，但这也陷入到古代寓言中的一个错误之中，那个寓言是这样描述的，身体的其他部位认为胃太过闲散，既不能像肢臂那样运动，也不像大脑那样感知世界。但事实上，正是胃消化了剩下的物质，分配到身体各处，使身体得以运行。因此，如果有人认为哲学和普适性研究是一种闲散的学问，那他不曾想到，任何专业学习都是从这里获得响应与支撑的。我认为，这一偏误观导致了基本性知识的学习成为学术探究的附属品，从而极大的阻碍了学术的发展。这正如，想要果树结出更多的果实，处理枝条无任何帮助，只有松动泥土、用新的沃土覆盖根部，才能产生效果。还有一点不能忘记，将治学机构和赠与都贡献于专业学术的学习，这不仅对科学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对国家政府而言也是不利。因为如此发展，君王便很难找到能人辅佐自己管理国家。原因在于，学院的教育缺乏自由发展的风气，也就无法令学者自由徜徉于历史的海洋，现代语言世界，政策与民论著述及其他利于为国家效力的学问之中。

9 . And because founders of colleges do plant, and founders of lectures do water, it followeth well in order to speak of the defect

which is in public lectures; namely, in the smallness, and meanness of the salary or reward which in most places is assigned unto them, whether they be lectures of arts, or of professions. For it is necessary to the progression of sciences that readers be of the most able and sufficient men; as those which are ordained for generating and propagating of sciences, and not for transitory use. This cannot be, except their condition and endowment be such as may content the ablest man to appropriate his whole labour and continue his whole age in that function and attendance; and therefore must have a proportion answerable to that mediocrity or competency of advancement, which may be expected from a profession or the practice of a profession. So as, if you will have sciences flourish, you must observe David's military law, which was, “That those which stayed with the carriage should have equal part with those which were in the action;” else will the carriages be ill attended. So readers in sciences are indeed the guardians of the stores and provisions of sciences, whence men in active courses are furnished, and therefore ought to have equal entertainment with them; otherwise if the fathers in sciences be of the weakest sort or be ill maintained, *“Et patrum invalidi referent jejunia nati.“*

（9）创立学院的人是栽培者，而讲学之人是耕耘灌溉者。在提到公开讲演的不足之处时，也是遵循了这一观点。那些讲学者，不论是讲解技艺，还是专业知识，往往会存在薪酬过低，待遇不公的现象。为促进科学的发展，讲学者理应成为最能干、最合格的学者，就像那些专门致力于创造和传播科学的人一样，而不能像关注科学临时应用的人那般。只有保证这些最有能力的人在薪酬和待遇上得到改善，令其全心全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自己的事业，这样的目标才能实现。因此，他们的薪酬应不低于其他职业的平均工资，或者至少能够确保他在这一岗位上衣食无忧。要想实现科学的繁荣发展，就必须遵循大卫的军规：“留下来照顾马车的人和征战沙场的人得到的奖赏

是一样的。”否则，马车便不能得到悉心的照料。讲学之人其实就是科学贮藏库的守护者，为人们的活动供应必要的知识储备，因此他们也应当得到和其他人相同的款待。否则，如果这些科学领域的前辈疲惫无力，无法维持生计，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父辈的缺陷将在子孙身上再现。”

10．Another defect I note, wherein I shall need some alchemist to help me, who call upon men to sell their books, and to build furnaces; quitting and forsaking Minerva and the Muses as barren virgins, and relying upon Vulcan. But certain it is, that unto the deep, fruitful, and operative study of many sciences, specialty natural philosophy and physic, books be not only the instrumentals; wherein also the beneficence of men hath not been altogether wanting. For we see spheres, globes, astrolabes, maps, and the like, have been provided as appurtenances to astronomy and cosmography, as well as books. We see likewise that some places instituted for physic have annexed the commodity of gardens for simples of all sorts, and do likewise command the use of dead bodies for anatomies. But these do respect but a few things. In general, there will hardly be any main proficience in the disclosing of nature, except there be some allowance for expenses about experiments; whether they be experiments appertaining to Vulcanus or Daedalus, furnace or engine, or any other kind. And therefore as secretaries and spials of princes and states bring in bills for intelligence, so you must allow the spials and intelligencers of nature to bring in their bills; or else you shall be ill advertised.

（10）此外，我还发现了另一个缺点，不过需要借用炼金术士的做法来加以阐释。他们号召民众出售书籍，铸造熔炉，离弃处女神密涅瓦和缪斯，转而信仰火神和火神伏尔甘。的确，要想对各类科学，

特别是自然哲学和医学，进行深入细致、卓有成效的研究，书籍不能是唯一的工具，而在这方面，人类的功德并不总是欠缺的。我们看到，和书籍一样，各种仪器，如天体仪、地球仪、观象仪和地图等，都是人类发明出来用以辅助研究天文学和宇宙论的工具。同样，一些医学院设有花圃，种植各类蔬草，同时还实施尸体解剖。这些都应得到称誉，不过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多见的。通常情况下，要想揭示自然的奥秘，必然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推动实验的开展，不论是类似伏尔甘还是代达罗斯进行的实验，也不管与熔炉还是机械相关，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实验。因此，正如君王和国家需要部臣和眼线搜集情报，我们也应该容许自然的情报员向我们提供信息，否则，我们只能陷入一堆失实的讯息中。

11 . And if Alexander made such a liberal assignation to Aristotle of treasure for the allowance of hunters, fowlers, fishers, and the like, that he might compile a history of nature, much better do they deserve it that travail in arts of nature.

（11）如果亚历山大能够慷慨给予亚里士多德财力支持，补助给那些猎户、捕野禽者和渔夫等，那么，亚里士多德所编纂的自然史的成效会更加卓著，而在自然造化中辛勤劳作的人们也理应得到这样的款待。

12 . Another defect which I note is an intermission or neglect in those which are governors in universities, of consultation, and in princes or superior persons, of visitation: to enter into account and consideration, whether the readings, exercises, and other customs appertaining unto learning, anciently begun and since continued, be well instituted or no; and thereupon to ground an amendment or reformation in that which shall be found inconvenient. For it is one

of your Majesty's own most wise and princely maxims, “That in all usages and precedents, the times be considered wherein they first began; which if they were weak or ignorant, it derogateth from the authority of the usage, and leaveth it for suspect.” And therefore inasmuch as most of the usages and orders of the universities were derived from more obscure times, it is the more requisite they be re-examined. In this kind I will give an instance or two, for example sake, of things that are the most obvious and familiar. The one is a matter, which though it be ancient and general, yet I hold to be an error; which is, that scholars in universities come too soon and too unripe to logic and rhetoric, arts fitter for graduates than children and novices. For these two, rightly taken, are the gravest of sciences, being the arts of arts; the one for judgment, the other for ornament. And they be the rules and directions how to set forth and dispose matter: and therefore for minds empty and unfraught with matter, and which have not gathered that which Cicero calleth *sylva* and *supellex* , stuff and variety, to begin with those arts (as if one should learn to weigh, or to measure, or to paint the wind) doth work but this effect, that the wisdom of those arts, which is great and universal, is almost made contemptible, and is degenerate into childish sophistry and ridiculous affectation. And further, the untimely learning of them hath drawn on by consequence the superficial and unprofitabl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them, as fitteth indeed to the capacity of children. Another is a lack I find in the exercises used in the universities, which do snake too great a divorce between invention and memory. For their speeches are either premeditate, in *verbis conceptis* , where nothing is left to invention, or merely extemporal, where little is left to memory. Whereas in life and action there is least use of either of these, but rather of intermixtures of premeditation and invention, notes and memory. So as the exercise fitteth not the practice, nor the image the life; and it is ever a true rule in exercises, that they be framed as

near as may be to the life of practice; for otherwise they do pervert the motions and faculties of the mind, and not prepare them. The truth whereof is not obscure, when scholars come to the practices of professions, or other actions of civil life; which when they set into, this want is soon found by themselves, and sooner by others. But this part, touching the amendment of the institutions and orders of universities, I will conclude with the clause of Cæsar's letter to Oppius and Balbes, *Hoc quemadmodum fieri possit, nonnulla mihi in mentem veniunt, et multa reperiri possunt: de iis rebus rgo vos ut cogitationem suscipiatis.*

（12）另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大学管理者经常中断或完全忽略咨询与协商，君王或高官则不重视探访与视察。他们不考虑古代流传下来的，今后会一直发展下去的文本、活动及其他与学问相关的习惯是否得到合理设置和维系，是否有困难之处应进行适当修正和革新。陛下您曾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对于所有的惯例和前例，我们需要对它产生的年代进行考察，如果当时是个软弱乏力或愚昧无知的时代，这些通例的权威性便会逐渐受到质疑。"而现代大学的大部分惯例和常规都源于无证可考的远古时期，因而很有必要进行再次检验。对于这方面我将列举一两个最为显著和熟悉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大学的学者过早地教授学生以逻辑学和修辞学的知识，其实当时时机并未成熟，这些知识更加适合毕业后的研究者，而不是孩童和初学者。尽管这一现象由来已久，非常普遍，我仍然觉得是不妥的。因为确切地说，这两门学科是所有学科中最庄重的，堪称技艺中的技艺；其中，一门旨在教人学会判断，另一门则教人学会修饰。它们是指导人们陈述观点、安排内容的规则和方向。如果人们脑中无物，没有如西塞罗所说的"素材与各种样式"，就贸然接触这两门学科（就像教人称量、权衡或画风一般），虽然可行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令这些精妙而普遍的技艺堕入可鄙的行列，沦为幼稚的诡辩或荒谬的虚饰。而且，如要学生过早接触这类知识，就必然需要根据孩童的接受程度，讲授书写一些浅薄而无益的内容。另一个例子是大学的活动中存在的

问题。我发现，这类活动将创新发明与知识储备完全割裂开来。教师的演讲不是条条框框都事先预设好的，没有创新空间，就是毫无准备，信口开河，根本与储备的知识无关。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形式都无所裨益，只有将预设与创新，个人准备与知识储备有效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极大的功效。而这样的活动既不实用，也不能反映生活。因此，学习活动应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尽可能接近实践，讲求实用，否则便会导致人们滥用脑力，耗费能量，却又不让大脑获得应有的准备。其实，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当那些学生真正进入某个领域，或从事社会其他方面的实践，很快他就能发现自身的缺陷，紧接着就会被旁人察觉。不过，这一章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大学制度和章程的修正，我就用恺撒写给欧比乌斯和巴尔波斯信中的一句话来做总结："对于完成这件事，我已有一定的想法，你们可以再考虑考虑，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方法。"

13 . Another defect which I note ascendeth a little higher than the precedent. For as the proficience of learning consisteth much in the orders and institutions of universities in the same states and kingdoms, so it would be yet more advanced, if there were more intelligence mutual between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than now there is. We see there be many orders and foundations, which though they be divided under several sovereignties and territories, yet they take themselves to have a kind of contract, fraternity, and correspondence one with the other, insomuch as they have provincials and generals. And surely as nature createth brotherhood in families, and arts mechanical contract brotherhoods in communalties, and the anointment of God superinduceth a brotherhood in kings and bishops, so in like manner there cannot but be a fraternity in learning and illumination, relating to that paternity which is attributed to God, who is called the Father of illuminations or lights.

（13）我将要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比之前所提的更为严重。在同一个国家或王国中，学问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大学的规章制度中。因此，如果欧洲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与讨论能够比当下更频繁一些，学问的进展就会更加迅速。我们看到，虽然很多团体和机构存在于不同的国家和领土，但它们却仍能达成共识、友爱互助、互通信息。因此可以说，它们既有地域特色，又不乏普适特征。自然创造了家庭中的兄弟情谊，机械技艺在团体中产生了同业会，而上帝的涂油礼又在国王与主教之间架构起了一份手足之情。因此，上帝作为光明之父，赋予人们手足之情，人们理应将这份手足之情运用到学问和启发上，做到团结友爱，互帮互助。

14 . The last defect which I will note is, that there hath not been, or very rarely been, any public designation of writers or inquirers concerning such parts of knowledge as may appear not to have been already sufficiently laboured or undertaken; unto which point it is an inducement to enter into a view and examination what parts of learning have been prosecuted, and what omitted. For the opinion of plenty is amongst the causes of want, and the great quantity of books maketh a show rather of superfluity than lack; which surcharge nevertheless is not to be remedied by making no more books, but by making more good books, which, as the serpent of Moses, might devour the serpents of the enchanters.

（14）最后一种缺陷在于，著作家和探索者尚未或者说很少被引导去探寻那些未得到足够挖掘的知识领域。在讨论这一缺陷之前，有必要思考和检查学问的哪些方面已经得到充分研究，哪些则被人遗漏。如果人们觉得大部分知识已为我们所知，这是源于深入研究的匮乏。如今大量的书籍让人产生过剩而不是缺乏的错觉，想要校正这一误解，并不是不再著书，而是写出更多优秀作品，正如只有摩西的蛇才能吞灭巫师的蛇一样。

15 . The removing of all the defects formerly enumerate, except the last, and of the active part also of the last (which is the designation of writers), are *opera basilica* ; towards which the endeavours of a private man may be but as an image in a crossway, that may point at the way, but cannot go it. But the inducing part of the latter (which is the survey of learning) may be set forward by private travail. Wherefore I will now attempt to make a general and faithful perambulation of learning, with an inquiry what parts thereof lie fresh and waste, and not improved and converted by the industry of man, to the end that such a plot made and recorded to memory may both minister light to any public designation, and, also serve to excite voluntary endeavours. Wherein, nevertheless, my purpose is at this time to note only omissions and deficiences, and not to make any redargution of errors or incomplete prosecutions. For it is one thing to set forth what ground lieth unmanured, and another thing to correct ill husbandry in that which is manured.

（15）想要弥补以上所提的缺陷，（除了最后一种，不过其中的主动作为，即引导著作家和探索者部分还是包括在内）主要职责在于君王。在这项工作上，个人的努力仅仅像是在十字路口为人指路，却不可能替人走完眼前那段路程。不过最后一种缺陷所引出的部分（即检查学问的研究程度）可由个人的辛勤努力得以实现。在此我想尝试对学问进行大致的如实勘查，从而发掘未经人类开垦的新鲜或已被废弃的知识领域，并将其勾勒并记录下来，一方面方便国家引导研究者前往，另一方面也能激发人们自愿致力于这些领域的探索和研究。但这一次我的目的仅仅是让人们注意遭受疏忽和存在不足之处，并不想驳斥人们的失误和有欠完备的实践行为。因为指出未经耕作之处是一回事，纠正耕作不当之处又是另一回事了。

In the handling and undertaking of which work I am not ignorant what it is that I do now move and attempt, nor insensible of mine own weakness to sustain my purpose. But my hope is, that if my extreme love to learning carry me too far, I may obtain the excuse of affection; for that “It is not granted to man to love and to be wise.” But I know well I can use no other liberty of judgment than I must leave to others; and I for my part shall be indifferently glad either to perform myself, or accept from another, that duty of humanity—*Nam qui erranti comiter monstrat viam, &c* . I do foresee likewise that of those things which I shall enter and register as deficiences and omissions, many will conceive and censure that some of them are already done and extant; others to be but curiosities, and things of no great use; and others to be of too great difficulty, and almost impossibility to be compassed and effected. But for the two first, I refer myself to the particulars. For the last, touching impossibility, I take it those things are to be held possible which may be done by some person, though not by every one; and which may be done by many, though not by any one; and which may be done in the succession of ages, though not within the hourglass of one man's life; and which may be done by public designation, though not by private endeavour. But, notwithstanding, if any man will take to himself rather that of Solomon, *“Dicit piger, Leo est in via,“* than that of Virgil, *“Possunt quia posse videntur,“* I shall be content that my labours be esteemed but as the better sort of wishes; for as it asketh some knowledge to demand a question not impertinent, so it requireth some sense to make a wish not absurd.

着手这项工作时，我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要用到哪些方法；当然我也明白自己在这方面的缺点。不过，如果我因为对学问过分热爱而感情用事，偏离正题，我希望能得到人们的谅解，因

为“人本无法做到热爱与智慧并存。”我明白，我所运用的判断自由度无异于他人。我也并不在乎这一人类职责是由我完成还是直接接受他人的成果，因为每个人都有责任“把正路指给游人”。同时，我料想，针对我所提出的被人疏忽或缺乏研究的地方，会有人提出其中一些已经有所涉及，成果也留存于世，另一些则太不寻常，无实用价值，还有一些因为研究太过困难，几乎不可能接近或深入探索。针对前面两种责难，我想通过例证来说明。对于最后关于不可能性的想法，我认为，的确，不是所有人都能完成那样的任务，但还是会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人做不到，许多人齐心协力也可能做到；一个人终其一生无法完成，几代人前赴后继也可以完成；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做到，国家指派各方配合也许就能够做到。如果人们宁可听信所罗门说的，“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也不愿相信维尔吉尔所说的，“他们能是因为他们想他们能”，而只是把我的辛勤劳动看作一种美好的愿望，那我也心满意足了。正如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需要一定的知识那样，提出一个美好而不荒诞愿望也要求有一定的认知。

CHAPTER I

第一章

(1) The parts of human learning have reference to the three parts of man's understanding, which is the seat of learning: history to his memory, poesy to his imagination, and philosophy to his reason. Divine learning receiveth the same distribution; for, the spirit of man is the same, though the revelation of oracle and sense be diverse. So as theology consisteth also of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parables, which is divine poesy; and of holy doctrine or precept. For as for that part which seemeth supernumerary, which is prophecy, it is but divine history, which hath that prerogative over human, as the narration may be before the fact as well as after.

（1）人类的理解力是人类知识的源泉，而知识的三个部分又分别对应理解力的三个方面：历史之于记忆，诗歌之于想象，哲学之于理性。尽管神谕的启示和人类的感知存在差异性，但人的灵魂是相同的，因此，神学的区分与人类知识是一致的。于是，神学也包含三个方面：教会历史；神圣诗歌，即寓言；神圣教义或训诫。还有一部分看似不属于这三个方面，即预言。但事实上，它就是一种神圣的历史，与人类相比它的优越性在于不仅能够记叙已经发生的史实，还能告知将要发生的事件。

(2) History is natural, civil, ecclesiastical, and literary; whereof the first three I allow as extant, the fourth I note as deficient. For no man hath propounded to himself the general state of learning to be described and represented from age to age, as many have done the works of Nature, and the stat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without which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seemeth to me to be as the statue of Polyphemus with his eye out, that part being wanting which doth most show the spirit and life of the person. And yet I am not ignorant that in divers particular sciences, as of the jurisconsults, the mathematicians, the rhetoricians, the philosophers, there are set down some small memorials of the schools, authors, and books; and so likewise some barren relations touching the invention of arts or usages. But a just story of learning, containing the antiquities and originals of knowledges and their sects, their inventions, their traditions, their diverse administrations and managings, their flourishings, their oppositions, decays, depressions, oblivions, removes, with the causes and occasions of them, and all other events concerning learning, throughout the ages of the world, I may truly affirm to be wanting; the use and end of which work I do not so much design for curiosity or satisfaction of those that are the lovers of learning, but chiefly for a more serious and grave purpose, which is this in few words, that it will make learned men wise in

the use and administration of learning. For it is not Saint Augustine's nor Saint Ambrose's works that will make so wise a divine a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horoughly read and observed, and the same reason is of learning.

（2）其中，历史主要包括自然史、公民史、教会史及文学史。前三者确实已有现存史料记载，但至于第四种，我认为还是有所欠缺的。从没有人做到将学问的基本状态记叙和描绘出来，并代代相传，如同人们对自然、国家、公民和教会所作的研究那样。对我来说，没有文学史，整个世界的历史就像波吕斐摩斯的塑像缺少一只眼睛一样，缺乏了最能展现人类精神和活力的部分。当然我也发现，在某些学科领域，如法学、数学、修辞学和哲学，已经出现少量涉及学派、编著者和书籍的作品，并对一些技艺或惯例的产生有空泛的记载。不过，一部公正合理的学术史应涉及学术的起源和历史遗迹，学派的分类，学术的创造与传统，管理与实施的不同方法，繁荣的境况，反对的声音，腐败、萧条、没落与变迁的原因和过程，以及人类历史上所有与学术相关的事件。必须承认的是，这样的学术史至今尚未出现。这一工作并非为了满足学问爱好者的好奇心或满足感，其主要价值在于通过寥寥数语令学者在应用和管理学术的过程中能更加英明睿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庄重的目的。阅读圣奥古斯丁和圣安布罗斯的作品并不能像通读教会历史那样让人成为睿智的神学家。学术的研究也是这个道理。

(3) History of Nature is of three sorts; of Nature in course, of Nature erring or varying, and of Nature altered or wrought; that is, history of creatures, history of marvels, and history of arts. The first of these no doubt is extant, and that in good perfection; the two latter are bandied so weakly and unprofitably as I am moved to note them as deficient. For I find no sufficient or competent collection of the works of Nature which have a digression and

deflexion from the ordinary course of generations, productions, and motions; whether they be singularities of place and region, or the strange events of time and chance, or the effects of yet unknown properties, or the instances of exception to general kinds. It is true I find a number of books of fabulous experiments and secrets, and frivolous impostures for pleasure and strangeness; but a substantial and severe collection of the heteroclites or irregulars of Nature, well examined and described, I find not, specially not with due rejection of fables and popular errors. For as things now are, if an untruth in Nature be once on foot, what by reason of the neglect of examination, and countenance of antiquity, and what by reason of the use of the opinion in similitudes and ornaments of speech, it is never called down.

（3）自然史可分为三类：常规史、变异史和改造史；也可称为生物史、奇异史和技艺史。显然，第一类自然史早已存在，也非常完善。后两类则是非常脆弱、且是徒劳无益的，我只能将它们看作是缺乏研究的。自然界的一些生物在繁殖、生产和运动上存在着偏离常规的现象，它们或具有明显地域性，或是独特的时机导致的结果，或受一些未知特性的影响，又或是这一物种的变异。对于这类自然现象，还没有充分进行搜集整理。一些书籍出于消遣目的和猎奇心理，记叙了许多荒诞无稽的实验和秘密，以及一些为了突显趣味和奇特而设置的无聊的骗局，这样的现象的确存在。但是，我尚未发现大量对大自然中非常规现象的严格收集、严谨检验和细致描述。特别是能彻底抵制无稽之谈和盛行的谬误的记述，至今尚不存在。现在的情况是，不管是因为缺乏验证，依循旧说，还是言语矫饰，掩盖真相，关于自然的谎言一旦成形，就从不会遭受责难。

(4) The use of this work, honoured with a precedent in Aristotle, is nothing less than to give contentment to the appetite of

curious and vain wits, as the manner of *Mirabilaries* is to do; but for two reasons, both of great weight: the one to correct the partiality of axioms and opinions, which are commonly framed only upon common and familiar examples; the other because from the wonders of Nature is the nearest intelligence and passage towards the wonders of art, for it is no more but by following and, as it were, hounding Nature in her wanderings, to be able to lead her afterwards to the same place again. Neither am I of opinion, in this history of marvels, that superstitious narrations of sorceries, witchcrafts, dreams, divinations, and the like, where there is an assurance and clear evidence of the fact, be altogether excluded. For it is not yet known in what cases and how far effects attributed to superstition do participate of natural causes; and, therefore, howsoever the practice of such things is to be condemned, yet from the specul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m light may be taken, not only for the discerning of the offences, but for the further disclosing of Nature. Neither ought a man to make scruple of entering into these things for inquisition of truth, as your Majesty hath showed in your own example, who, with the two clear eyes of religion and natural philosophy, have looked deeply and wisely into these shadows, and yet proved yourself to be of the nature of the sun, which passeth through pollutions and itself remains as pure as before. But this I hold fit, that these narrations, which have mixture with superstition, be sorted by themselves, and not to be mingled with the narrations which are merely and sincerely natural. But as for the narrations touching the prodigies and miracles of religions, they are either not true or not natural; and, therefore, impertinent for the story of Nature.

（4）对自然中的奇异现象的研究，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虚荣心智，就像《珍奇录》一样。不过，这一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而且两者同等重要，一是校正人们对一些原理和观点的成见，这些成见通常是由仅依据常见熟知的例证而造成的；二是由于自然的奇迹是通往技艺奇迹的捷径，只有遵循自然，追随它的脚步，才能跟随自然回到相同的地方。在这一层面，我们在亚里士多德身上早有前例可循。同时，我认为在这部奇异史中，一些迷信记述，比如巫术、魔法、幻象和占卜等，如能明确举证，就不应完全排除在外。因为我们还不了解，在这些所谓的迷信中，有多少可归因于自然，又起着怎样的作用。所以，不论这类事件遭受多大抨击，只要仔细考量，总能受到一定启示，不仅有助于辨别其冒犯之处，更能进一步揭示自然的奥秘。陛下独具慧眼，在宗教和自然哲学的辅助下，对这些隐晦朦胧的事物进行深入审慎的研究，从而证明了自己犹如太阳那样光芒万丈，穿透所有鄙陋污秽，自身仍能纯净如初。因此，人们应以陛下为榜样，无所顾虑地钻研这类事物，探求事实真相。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些掺杂了迷信成分的记叙应该加以分类，不应与纯粹绝对的自然现象混杂在一起。至于那些有关宗教的奇观和异象的记叙，或只是假象，或与自然无关，因而不适于出现在这部自然史中。

(5) For history of Nature, wrought or mechanical, I find some collections made of agriculture, and likewise of manual arts; but commonly with a rejection of experiments familiar and vulgar; for it is esteemed a kind of dishonour unto learning to descend to inquiry or meditation upon matters mechanical, except they be such as may be thought secrets, rarities, and special subtleties; which humour of vain and supercilious arrogancy is justly derided in Plato, where he brings in Hippias, a vaunting sophist, disputing with Socrates, a true and unfeigned inquisitor of truth; where, the subject being touching beauty, Socrates, after his wandering manner of inductions, put first an example of a fair virgin, and then of a fair horse, and then of a fair pot well glazed, whereat Hippias was offended, and said, “More than for courtesy's sake, he did think much to dispute with any that did allege such base and sordid

instances.” Whereunto Socrates answereth, “You have reason, and it becomes you well, being a man so trim in your vestments,” &c.,and so goeth on in an irony. But the truth is, they be not the highest instances that give the securest information, as may be well expressed in the tale so common of the philosopher that, while he gazed upwards to the stars, fell into the water; for if he had looked down he might have seen the stars in the water, but looking aloft he could not see the water in the stars. So it cometh often to pass that mean and small things discover great, better than great can discover the small; and therefore Aristotle noteth well, “That the nature of everything is best seen in his smallest portions. " And for that cause he inquireth the nature of a commonwealth, first in a family, and the simple conjugations of man and wife, parent and child, master and servant, which are in every cottage. Even so likewise the nature of this great city of the world, and the policy thereof, must be first sought in mean concordances and small portions. So we see how that secret of Nature, of the turning of iron touched with the loadstone towards the north, was found out in needles of iron, not in bars of iron.

（5）接着我们来讨论锻造加工或机械的自然史。我发现存在一些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编著，但并没有记叙任何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并为他们所熟知的粗浅易懂的实验。因为如果退而研究或思索与机械相关的事物，就会被认为是对学问的亵渎。除非他们研究的是一些不为人知的奥秘，罕见事物或事物的奇特精妙之处。柏拉图就曾在他的著述中对这种目空一切、虚荣自负的傲慢性情进行了一番恰到好处的嘲弄。他提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傲慢的诡辩家希庇亚斯，一个是真实不做作的真相探索者苏格拉底。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辩论，辩论的主题与美相关。苏格拉底在对方迂回游离的诱导下，首先以一名窈窕淑女为例，接着又提到漂亮的马匹，然后又举出了上釉精致的壶罐。然而，希庇亚斯听了很不愉快，说道：“若不是出于礼貌，我倒要好

好想想要不要与使用如此粗鄙例子的人辩论。”对此，苏格拉底回答：“有道理，你穿着如此齐整，理应说这样的话。”他在这样的讽刺中继续着辩论。其实，并不是例证越高级，提供的信息就越可靠，这在关于哲学家的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中就有很好的体现。一名哲学家在抬头仰望星空时，不慎落入水中。如果他低头观望，他也可以看到水中的群星，不过一抬起头，他就看不到群星中的水域了。通常，卑微细小的事物之中总能发掘出伟大之处，但伟大事物却无法显现细微之处。亚里士多德说的很有道理：“任何事物的本质总在最细小的部分得到最完满的体现。”因此，他在研究共和国的性质时，首先从家庭入手，考察夫妻、父母与子女、主仆等这些随处可见的关系。甚至是研究世界上我们的这个伟大城市及其政策的特性，也应从细微的关联和微小的组成部分着手。因此我们看到，铁遇磁石便会转向北方，像这样的自然奥秘是在铁针上发现的，而并不是铁棒。

(6) But if my judgment be of any weight, the use of history mechanical is of all others the most radical and fundamental towards natural philosophy; such natural philosophy as shall not vanish in the fume of subtle, sublime, or delectable speculation, but such as shall be operative to the endowment and benefit of man's life. For it will not only minister and suggest for the present many ingenious practices in all trades, by a connection and transferring of the observations of one art to the use of another, when the experiences of several mysteries shall fall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one man's mind; but further, it will give a more true and real illumination concerning causes and axioms than is hitherto attained. For like as a man's disposition is never well known till he be crossed, nor Proteus ever changed shapes till he was straitened and held fast; so the passages and variations of nature cannot appear so fully in the liberty of nature as in the trials and vexations of art.

（6）如果我的论述有任何可取之处，那么，机械史的功效，相较于其他所有历史，对自然哲学而言是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它能使自然哲学不致在扑朔迷离的尘烟，又或在庄严愉悦的幻想中逐渐消亡。相反，它能令其为谋得人类的福祉提供实效。一个人在懂得将各种奥秘联系起来加以思索时，他便得以触类旁通，将不同技艺相互联结，相互参考应用，从而得到各行业新颖绝妙的尝试或启发。进一步而言，通过这样的研究，人们能获得更多关于起因和原理的真实启示，达到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的高度。人们只有在历经挫折时才会了解自己的真性情，普洛透斯也只有在被紧紧拽住时才会改变外形用以逃脱。同样，自然的进程和变化无法在自由状态下完全显现，只有在天性解放，通过人类技艺的反复磨练下才得以全面呈现。

CHAPTER II

第二章

(1) For civil history, it is of three kinds; not unfitly to be compared with the three kinds of pictures or images. For of pictures or images we see some are unfinished, some are perfect, and some are defaced. So of histories we may find three kinds: memorials, perfect histories, and antiquities; for memorials are history unfinished, or the first or rough drafts of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are history defaced, or some remnants of history which have casually escaped the shipwreck of time.

（1）公民史也分为三类，可与图画或意象的三种状态相对应。这三种状态分别为，或尚未完成，或臻于完美，或部分遭受污损。而公民史的三种分类就是，记事杂录、完美历史及旷古逸史。记事杂录是尚未完成的历史，或是初步粗糙的历史草图；旷古逸史则是有所损毁的历史，或是碰巧不曾淹没于时间洪流，得以留存的残迹。

(2) Memorials, or preparatory history, are of two sorts; whereof the one may be termed commentaries, and the other registers. Commentaries are they which set down a continuance of the naked events and actions, without the motives or designs, the counsels, the speeches, the pretexts, the occasions, and other passages of action. For this is the true nature of a commentary (though Cæsar, in modesty mixed with greatness, did for his pleasure apply the name of a commentary to the best hist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s are collections of public acts, as decrees of council, judicial proceedings, declarations and letters of estate, orations, and the like, without a perfect continuance or contexture of the thread of the narration.

（2）记事杂录，或叫做初阶历史，又可分成两类，一类可称为随记，另一类则称为文件。随记是根据时间先后直陈事实或行为，不涉及任何与事件动机、策划、商议、话语、托辞、场合及其他过程相关的内容，平铺直叙，简洁明了。这就是随记的本质所在（虽然恺撒如此伟大而又如此谦逊，乐于将自己最优秀最精彩的史作仅仅称为随记）。文件是对公法的收集与整理，包括议会颁布的法令、法院诉讼的程序、国家的公告公文和享有盛名的演说词等等。这些文件并不存在严格的时间顺序，也不讲求叙述的思路。

(3) Antiquities, or remnants of history, are, as was said, *tanquam tabula naufragii* : when industrious persons, by an exact and scrupulous diligence and observation, out of monuments, names, words, proverbs, traditions, private records and evidences, fragments of stories, passages of books that concern not story, and the like, do save and recover somewhat from the deluge of time.

（3）旷古逸史或历史残迹，如同之前所提的，是时间洪流中沉没船只的船板。这是勤勉的人们通过谨慎观察和不懈努力，从碑文、名字、言语、格言、传统、私人记录、事件片段、书作残文等等中去除类似故事叙述的部分，并将这些残存的片段从时间洪流中解救出来，加以复原。

(4) In these kinds of unperfect histories I do assign no deficience, for they are *tanquam imperfecte mista* ; and therefore any deficience in them is but their nature. As for the corruptions and moths of history, which are epitomes, the use of them deserveth to be banished, as all men of sound judgment have confessed, as those that have fretted and corroded the sound bodies of many excellent histories, and wrought them into base and unprofitable dregs.

（4）我认为，这些不完善的历史并不存在任何缺陷，因为它们本身的来源就是不完善的，这种缺陷只不过是它们的本质体现。然而，这些腐败蛀蚀的历史，只能说是历史的一个残败缩影，应提倡将其废除。因为所有能够合理判断的人都坦承，这些历史的残余侵蚀磨损了大量优秀历史作品，并使它们沦为了粗鄙无益的渣滓。

(5) History, which may be called just and perfect history, is of three kinds, according to the object which it propoundeth, or pretendeth to represent: for it either representeth a time, or a person, or an action. The first we call chronicles, the second lives, and the third narrations or relations. Of these, although the first be the most complete and absolute kind of history, and hath most estimation and glory, yet the second excelleth it in profit and use, and the third in verity and sincerity. For history of times representeth the magnitude of actions, and the public faces and

deportments of persons, and passeth over in silence the smaller passages and motions of men and matters. But such being the workmanship of God, as He doth hang the greatest weight upon the smallest wires,*maximaè minimis, suspendens* , it comes therefore to pass, that such histories do rather set forth the pomp of business than the true and inward resorts thereof. But lives, if they be well written, propounding to themselves a person to represent, in whom actions, both greater and smaller, public and private, have a commixture, must of necessity contain a more true, native, and lively representation. So again narrations and relations of actions, as the war of Peloponnesus, the expedition of Cyrus Minor, the conspiracy of Catiline, cannot but be more purely and exactly true than histories of times, because they may choose an argument comprehensible within the notice and instructions of the writer: whereas he that undertaketh the story of a time, specially of any length, cannot but meet with many blanks and spaces, which he must be forced to fill up out of his own wit and conjecture.

（5）完美历史或称正史，根据其描述或伪称描述的对象，同样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描述时间、人物和事件。第一种称为编年史，第二种是人物传记，第三种称纪事。尽管第一种最为完整严格，最受人们尊崇，但第二种的功效和实用性以及第三种的真实性都优于第一种。编年史记载的通常是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公开形象与举止，极少涉及普通民众和事件。然而，上帝总能将最重的事物悬挂于最细的丝线之上，这便是他的技艺精湛之处。因此，编年史目的在于记录丰功伟业，而不是真实记录其过程和方法。优秀的人物传记旨在描绘一个人的生平，阐述他的所有行为活动，无论大小，公开还是私下的，都力求真实自然、生动形象。同样，纪事也有同样的要求。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小居鲁士的远征、喀提林的阴谋等，这些记叙与编年史相比，必定更加纯粹而准确。因为纪事的著述者完全可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想法选择自身非常了解的主题进行记述。而编年史往往有一定的时

间跨度，作者在记述时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时间的空白，此时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揣测加以填补。

(6) For the history of times, I mean of civil history, the providence of God hath made the distribution. For it hath pleased God to ordain and illustrate two exemplar states of the world for arms, learning, moral virtue, policy, and laws; the state of Graecia and the state of Rome; the histories whereof occupying the middle part of time, have more ancient to them histories which may by one common name be termed the antiquities of the world; and after them, histories which may be likewise called by the name of modern history.

（6）对于公民历史中的编年史，上帝早已下达神旨将其进行合理分配。上帝欣然指定了两个国家，希腊和罗马，作为全世界的榜样，通过阐明其军事、学术、道德、政治和法律各方面的作为，告诫人们如何仿效。这一段历史被置于时间长河的中段，在它之前的历史被统一称作世界古代史，而其后的历史称为近代史。

(7) Now to speak of the deficiences. As to the heathen antiquities of the world it is in vain to note them for deficient. Deficient they are no doubt, consisting most of fables and fragments; but the deficience cannot be holpen; for antiquity is like fame, *caput inter nubila condit,* her head is muffled from our sight. For the history of the exemplar states, it is extant in good perfection. Not but I could wish there were a perfect course of history for Graecia, from Theseus to Philopoemen (what time the affairs of Graecia drowned and extinguished in the affairs of Rome), and for Rome from Romulus to Justinianus, who may be truly said

to be ultimus Romanorum. In which sequences of story the text of Thucydides and Xenophon in the one, and the texts of Livius, Polybius, Sallustius, Cæsar, Appianus, Tacitus, Herodianus in the other, to be kept entire, without any diminution at all, and only to be supplied and continued. But this is a matter of magnificence, rather to be commended than required; and we speak now of parts of learning supplemental, and not of supererogation.

（7）现在来谈谈历史的缺陷问题。至于异教的古代史，说它们存在缺陷徒劳无益。它们基本由寓言和碎片构成，必然是有缺陷的。不过，古代史就如传言一般，蒙住了自己的头脑，令人不得而见，因此，这些缺陷根本无法弥补。至于两个榜样国家，它们的历史得到了完好无损的保存。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两个国家能有各自一部完备的历史，充分记录它们的发展进程。希腊的历史就该从忒修斯延续到斐洛波门（至此希腊没落，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罗马历史应从罗穆卢斯开始记载，止于查士丁尼（查士丁尼真正可谓是最后一个罗马人）。这样一来，希腊历史修昔底德与色诺芬的作品和罗马史中李维、波里比阿、萨鲁斯特、恺撒、阿庇安、塔西陀与赫罗狄安的著述都能完好留存下来，而不必进行任何缩减，只需提供原文，代代流传下来。这样一幅宏伟蓝图，并不要求一定实现，但我们着实应该大力推行。我们所提的并不是要额外加工，只不过是对学问的完善。

(8) But for modern histories, whereof there are some few very worthy, but the greater part beneath mediocrity, leaving the care of foreign stories to foreign states, because I will not be curiosus in aliena republica, I cannot fail to represent to your Majesty the unworthiness of the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main continuance thereof, and the partiality and obliquity of that of Scotland in the latest and largest author that I have seen: supposing that it would be honour for your Majesty, and a work very memorable, if this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as it is now joined in monarchy for the ages to come, so were joined in one history for the times passed,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sacred history, which draweth down the story of the ten tribes and of the two tribes as twins together. And if it shall seem that the greatness of this work may make it less exactly performed, there is an excellent period of a much smaller compass of time, as to the story of England; that is to say, from the uniting of the Roses to the uniting of the kingdoms; a portion of time wherein, to my understanding, there hath been the rarest varieties that in like number of successions of any hereditary monarchy hath been known. For it beginneth with the mixed adoption of a crown by arms and title; an entry by battle, an establishment by marriage; and therefore times answerable, like waters after a tempest, full of working and swelling, though without extremity of storm; but well passed through by the wisdom of the pilot, being one of the most sufficient kings of all the number. Then followeth the reign of a king, whose actions, howsoever conducted, had much intermixture with the affairs of Europe, balancing and inclining them variably; in whose time also began that great alteration in the state ecclesiastical, an action which seldom cometh upon the stage. Then the reign of a minor; then an offer of a usurpation (though it was but as *febris ephemera*). Then the reign of a queen matched with a foreigner; then of a queen that lived solitary and unmarried, and yet her government so masculine, as it had greater impression and operation upon the states abroad than it any ways received from thence. And now last, this most happy and glorious event, that this island of Britain, divided from all the world, should be united in itself, and that oracle of rest given to ÆNeas, *antiquam exquirite matrem* , should now be performed and fulfilled upon the nations of England and Scotland, being now reunited in the ancient mother name of Britain, as a full period of all instability and peregrinations. So that as it cometh to pass in massive bodies, that they have

certain trepidations and waverings before they fix and settle, so it seemeth that by the providence of God this monarchy, before it was to settle in your majesty and your generations (in which I hope it is now established for ever), it had these prelusive changes and varieties.

（8）近代史中并没有多少值得记叙的事件，大部分都不值一提，至于国外的历史就留给他们的国人去探讨，我本来就不关心其他国家的事务。但是，我必须向陛下指出，最近的一位知名作家所著的英格兰史总体上一无是处，另一部苏格兰史也充满偏颇，缺乏公正。如今，大不列颠岛已联结为同一君主政体，今后也如是。那么，过去的历史也应该合而为一，作为一个政体来记述。这将是一项值得纪念的功绩，更体现出陛下您的荣耀。事实上，神的历史早已为我们提供了典范。《圣经》中就将十个犹太部落和两个以色列部落如双生子般并列呈现。如果说，这项工程过于浩大，会影响所记事件的准确性，我们可以先记叙英国历史其中的一个时间段，也是其中最辉煌的一段历史，那就是从玫瑰王朝的统一到联合王国的形成。据我说知，相较于相同数量君王传承的其他任何时段，这段历史是最安定、变革最少的。在当时，王位的继承通常是武力与头衔的共同结果，从战争开始，以联姻确立。因此，统治初期就像刚刚历经暴风雨的水域，虽无狂乱侵袭，却仍波涛汹涌。而最具资格的国王就像那片水域中的领航员一样，用自己的智慧安然度过了暗潮涌动的开端。之后一位国王的举动都与欧洲休戚相关，牵动着整个欧洲的局势。期间，国家宗教经历了重大变革，其程度史上少有。随后继位的是一位幼主，很快就有人图谋篡位（不过很快被镇压下去，如同热症一般）。接着，一位与外国人通婚的女王继承了王位。其后继位的女王，虽终身未婚，但气宇非凡，她掌管的政府毫不亚于男性国王，可以说，她对国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所受的外来影响。最后就是不列颠岛的统一，这片地域上与世隔绝的岛屿终能联结在一起，这是最快活最光荣的事情。埃涅阿斯获得的神谕“寻找你的母亲”，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这片土地上得到实现。它们在年老的母亲不列颠的怀抱中重聚，经过长时的漂泊终

于安定下来。就如厚重的身体需要经过一定的战栗和动摇才能安定，遵照上帝的旨意，我们国家在陛下和您的后代的统治中安定下来之前（我希望可以获得永世安宁），作为序曲，已经历经了一些变革。

(9) For lives, I do find strange that these times have so little esteemed the virtues of the times, as that the writings of lives should be no more frequent. For although there be not many sovereign princes or absolute commanders, and that states are most collected into monarchies, yet are there many worthy personages that deserve better than dispersed report or barren eulogies. For herein the invention of one of the late poets is proper, and doth well enrich the ancient fiction. For he feigneth that at the end of the thread or web of every man's life there was a little medal containing the person's name, and that Time waited upon the shears, and as soon as the thread was cut caught the medals, and carried them to the river of Lathe; and about the bank there were many birds flying up and down, that would get the medals and carry them in their beak a little while, and then let them fall into the river. Only there were a few swans, which if they got a name would carry it to a temple where it was consecrate. And although many men, more mortal in their affections than in their bodies, do esteem desire of name and memory but as a vanity and ventosity, “*Animi nil magnæ laudis egentes* ;” which opinion cometh from that root, *Non prius laudes contempsimus, quam laudanda facere desivimus* : yet that will not alter Solomon's judgment, *Memoria justi cum laudibus, at impiorum nomen putrescet* : the one flourisheth, the other either consumeth to present oblivion, or turneth to an ill odour. And therefore in that style or addition, which is and hath been long well received and brought in use, *felicis memoriæ, piæ memoriæ, bonæ memoriæ* , we do acknowledge that which Cicero saith, borrowing it from Demosthenes, that *bona fama propria possessio defunctorum* ;

which possession I cannot but note that in our times it lieth much waste, and that therein there is a deficience.

（9）我发现近代的人物传记的数量少之又少，看来人们对美德缺乏尊重，对于这一点我感到非常惊讶。尽管如今没有那么多至高无上的君王和专制的指挥官，而且很多国家也合并成了君主政体，不过，还是有很多德高望重的名士值得人们为其写书立传，而不是进行零散的报导或空洞的颂扬。最近有位诗人虚构了一个故事，使古代寓言更加丰富。他勾勒了这样一种情形，每个人类生命之线或网的终端都有一枚勋章，上面刻有各自的名字。时间拥有一把大剪刀，在它将丝线剪断的那一刻，就一把抓住那枚勋章，将其带到莱斯河畔。岸边四处飞舞的鸟群会将其衔在嘴里，不久后便丢入河中。河上只有少数天鹅，当它们看到某个名字，就会将其衔入神殿受人供奉。然而世上很多人的思想腐朽比身体腐朽更加致命，他们认为，对名誉与流芳的渴望只不过是一种虚荣和浮夸。他们是“不渴求名望的智者”。这种观点来源于这样一种思想，“自己没有做值得称道的事情，便蔑视世人的赞美”。不过，这种想法并没有影响所罗门的判断，“忠义之士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这就意味着，善者享有盛名、流芳百世，恶名湮没无闻，又或遗臭万年。这种美名和盛名素来为人们所推崇并加以运用。西塞罗曾借用狄摩西尼的话说，“好名声是死者的正当财产”。我发现，这一财产在现世遭到大量的荒废，因此我们说在人物传记上存在缺陷。

(10) For narrations and relations of particular actions, there were also to be wished a greater diligence therein; for there is no great action but hath some good pen which attends it. And because it is an ability not common to write a good history, as may well appear by the small number of them; yet if particularity of actions memorable were but tolerably reported as they pass, the compiling of a complete history of times might be the better expected, when a

writer should arise that were fit for it: for the collection of such relations might be as a nursery garden, whereby to plant a fair and stately garden when time should serve.

（10）虽然一些对重大事件已有记录，我认为在具体事件的纪事上还需投入更多的努力。这是因为，拥有撰写纪事的才能与写作一部优秀史书不尽相同，这从其作品的寥寥无几中就可看出。不过，如果能对一些值得纪念的特定事件进行详细记录，那么，当出现大作家能担当重任撰写完整的编年史时，就会更值得人们期待。因为对纪事的汇总就像是一个苗圃，时机成熟时，便能栽培出一个美轮美奂的大花园。

(11) There is yet another partition of history which Cornelius Tacitus maketh, which is not to be forgotten, specially with that application which he accoupleth it withal, annals and journals: appropriating to the former matters of estate, and to the latter acts and accidents of a meaner nature. For giving but a touch of certain magnificent buildings, he addeth, *Cum ex dignitate populi Romani repertum sit, res illustres annalibus, talia diurnis urbis actis mandare.* So as there is a kind of contemplative heraldry, as well as civil. And as nothing doth derogate from the dignity of a state more than confusion of degrees, so it doth not a little imbase the authority of a history to intermingle matters of triumph, or matters of ceremony, or matters of novelty, with matters of state. But the use of a journal hath not only been in the history of time, but likewise in the history of persons, and chiefly of actions; for princes in ancient time had, upon point of honour and policy both, journals kept, what passed day by day. For we see the chronicle which was read before Ahasuerus, when he could not take rest, contained matter of affairs, indeed, but such as had passed in his own time and very lately

before. But the journal of Alexander's house expressed every small particularity, even concerning his person and court; and it is yet a use well received in enterprises memorable, as expeditions of war, navigations, and the like, to keep diaries of that which passeth continually.

（11）我们不应忘记，塔西陀曾对历史作了另一种划分，特别是将其与各自用途联系起来。他将历史划分为两种，年鉴与日志。年鉴通常记录国家大事，而日志则记叙相对较小的作为或偶然事件。当提到某些雄伟建筑时，他补充道："罗马人应在历史中记载辉煌的伟业，而把日常琐事留给城中的日志。这样才能维护罗马人的尊严。"正如经营国家要讲求地位等级，思想层面也有一定的区分。没有什么比等级的混乱更能贬低国家的尊严。同样，将丰功伟绩、仪式大典、新奇事物与国家事务掺杂在一起也是对历史权威性的贬损。日志不仅可用来记录时代的变迁，同样可用以描述人物，主要记录他们的行为等。古时的君王就因享受尊荣和政治需要，记录每天发生的事。亚哈随鲁失眠时，就命人阅读编年史给他听。这类史作涉及的内容通常只是在他那个时代或是近期才发生的事件。而亚历山大的家族记载史记叙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事情，这些琐事包括他个人和国家相关的事。但对于伟大的事业，如征伐、远航等，人们很好地利用了日志这一形式，将这些事件持续记录下来。

(12) I cannot likewise be ignorant of a form of writing which some grave and wise men have used, containing a scattered history of those actions which they have thought worthy of memory, with politic discourse and observation thereupon: not incorporate into the history, but separately, and as the more principal in their intention; which kind of ruminated history I think more fit to place amongst books of policy, whereof we shall hereafter speak, than amongst books of history. For it is the true office of history to

represent the events themselves together with the counsels, and to leave the observations and conclusions thereupon to the liberty and faculty of every man's judgment. But mixtures are things irregular, whereof no man can define.

（12）同样，我应注意到另一种著作类型，这类著作通常出自严谨而睿智的学者之手，零星记载了一些他们认为值得纪念的事件，并对其进行了政治评论。但这类评论脱离了特定历史，只是独立的议论。根据其主要目的，这类加入思考的史作应归到政治类书籍中，而不是历史类书籍，之后我们还会谈论到这类作品。历史的真正职责在于呈现事件本身，并提出相关建议，但对事件的评议和推论应留给每个人自身，人们可根据自己的能力自由判断思考。但是，尽管历史和评论的混杂并不规范，人们却无法进行明确界定。

(13) So also is there another kind of history manifoldly mixed, and that is history of cosmography: being compounded of natural history, in respect of the regions themselves; of history civil, in respect of the habitations, regiments, and manners of the people; and the mathematics, in respect of the climates and configurations towards the heavens: which part of learning of all others in this latter time hath obtained most proficience. For it may be truly affirmed to the honour of these times, and in a virtuous emulation with antiquity, that this great building of the world had never through-lights made in it, till the age of us and our fathers. For although they had knowledge of the antipodes, *“Nosque ubi primus equis Oriens afflavit anhelis, Illic sera rubens accendit lumina Vesper,“* yet that might be by demonstration, and not in fact; and if by travel, it requireth the voyage but of half the globe. But to circle the earth, as the heavenly bodies do, was not done nor enterprised till these later times: and therefore these times may justly bear in their

word, not only *plus ultra* , in precedence of the ancient *non ultra* , and *imitabile fulmen* , in precedence of the ancient *non imitabile fulmen* , *"Demens qui nimbos et non imitabile fulmen," &c.* but likewise *imitabile cœlum* ; in respect of the many memorable voyages after the manner of heaven about the globe of the earth.

（13）另外还有一类多方混杂的史作，那就是宇宙志。这类作品记载了一些地域地理知识，因而包含了自然史；又记录了人们的居所、社会组织和风俗礼仪等内容，从而包括了公民史；同时，它还涉及到气候和天象，又能归入数理研究。这类史作在所有学问研究中可算是走在前列。直到我们和我们父辈的时代，世界这座伟岸的高楼才透出一点光线，这便是宇宙志的功劳，它无疑是我们时代的光荣，真正与古代学问不相上下。尽管古人对地球这个对映体有所了解，"一地启明现东方，一地长庚夜灯上。"不过，这或许只是一种思考，并不是事实呈现。如要通过远行观察这一现象，就至少需要远渡半个地球。直至近代，人们才开始实行或规划像天体那样环行地球。因此，这些时代可理直气壮地说"还能更远"，而不是古人所说的"没有更远"，说应"模仿雷电"，而不是古代的"不能模仿"，"模仿雷电风暴的行为是疯狂的。"同样，我们模仿天体，已像天体一样环绕地球进行了多次值得纪念的远航。

(14) And this proficience in navigation and discoveries may plant also an expectation of the further proficience and augmentation of all sciences; because it may seem they are ordained by God to be coevals, that is, to meet in one age. For so the prophet Daniel speaking of the latter times foretelleth, *Plurimi pertransibunt, et multiplex erit scientia:* as if the openness and through-passage of the world and the increase of knowledge were appointed to be in the same ages; as we see it is already performed in great part: the learning of these later times not much giving place

to the former two periods or returns of learning, the one of the Grecians, the other of the Romans.

（14）我们在航海这一活动和其过程中的发现中实现的突破，同样为所有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可能，这似乎是上帝的安排，让这两者出现在同一时期。先知丹尼尔预言其后几个时代时这样说道："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似乎也说明了世界的开放与互通与丰富知识必然在同一时期发生。其实这种情况已得到很大程度的实现。我们近代的学术研究及成果已经堪比希腊和罗马时期。

CHAPTER III

第三章

(1) History ecclesiastical receiveth the same divisions with history civil: but further in the propriety thereof may be divided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by a general name; history of prophecy; and history of providence. The first describeth the times of the militant Church, whether it be fluctuant, as the ark of Noah, or movable, as the ark in the wilderness, or at rest, as the ark in the Temple: that is, the state of the Church in persecution, in remove, and in peace. This part I ought in no sort to note as deficient; only I would that the virtue and sincerity of it were according to the mass and quantity. But I am not now in hand with censures, but with omissions.

（1）教会史的区分与公民史相同，但为了更加得体恰当，将它表述为常规教会史、预言史和天意史。第一种描述的是好战教会的历史，包括像诺亚方舟那样动乱中的教会，如炎炎沙漠中犹太教徒携带

的藏经箱一般活动中的教会，或像圣殿中的藏经箱一样静态中的教会。三类教会分别对应教会的三种状态，即遭迫害、受调动、得安宁。这部分我不会提出任何缺陷，只是希望作品中表现的德行与诚意能与其著述之多相适应。在此我并不是发出责难，只是想指出其中存在一定疏漏。

(2) The second, which is history of prophecy, consisteth of two relatives—the prophecy and the accomplishment; and, therefore, the nature of such a work ought to be, that every prophecy of the *Scripture* be sorted with the event fulfilling the same throughout the ages of the world, both for the better confirmation of faith and for the better illumination of the Church touching those parts of prophecies which are yet unfulfilled: allowing, nevertheless, that latitude which is agreeable and familiar unto divine prophecies, being of the nature of their Author, with whom a thousand years are but as one day, and therefore are not fulfilled punctually at once, but have springing and germinant accomplishment throughout many ages, though the height or fulness of them may refer to some one age. This is a work which I find deficient, but is to be done with wisdom, sobriety, and reverence, or not at all.

（2）至于第二种预言史，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预言及其应验。因此，这类作品的本质就是寻找《圣经》中的每个预言，并将其与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实现的事件一一对应，从而不仅证实人们信仰的可靠性，更利于教会对那些尚未应验的预言进行阐释。通常，神圣预言的自由度非常大，正如创造它们的上帝一般。对上帝而言，千年犹如一日。因此，预言不可能及时应验，而是需要历经多个时代的萌芽与孕育，终在某个时期充分展现其辉煌。不过在这类作品中，我发现了一定的缺陷。要想著述这样的著作，要么就必须具备智慧的头脑、冷静的思考和虔诚的态度，要么就干脆什么都不要做。

(3) The third, which is history of Providence, containeth that excellent correspondence which is between God's revealed will and His secret will; which though it be so obscure, as for the most part it is not legible to the natural man—no, nor many times to those that behold it from the tabernacle—yet, at some times it pleaseth God, for our better establishment and the confuting of those which are as without God in the world, to write it in such text and capital letters, that, as the prophet saith, “He that runneth by may read it”—that is, mere sensual persons, which hasten by God's judgments, and never bend or fix their cogitations upon them, are nevertheless in their passage and race urged to discern it. Such are the notable events and examples of God's judgments, chastisements, deliverances, and blessings; and this is a work which has passed through the labour of many, and therefore I cannot present as omitted.

（3）第三种，天意史主要记述上帝向我们呈现的意愿与隐秘不言的安排之间的精妙对应。尽管这种对应显得深奥晦涩，普通民众根本无法辨识，甚至那些关注上帝意旨的教徒也经常困惑不解。有时，上帝为了坚定人们的信仰，驳斥那些无上帝论者，会写一些非常醒目的文字，如先知所说，“让跑来的人都能看到”。这就是说，那些世俗感性之人，尽管意识到上帝的意愿，却从不深入思考，上帝通过那些提醒，敦促着他们能够领悟自己的意旨。这些重要事件和例证充分体现了上帝的审判、惩罚、拯救和恩赐。事实上，天意史的著述是人们殚精竭虑共同努力的结果，因而我并没有找到任何疏漏之处。

(4) There are also other parts of learning which are appendices to history. For all the exterior proceedings of man consist of words and deeds, whereof history doth properly receive and retain in

memory the deeds; and if words, yet but as inducements and passages to deeds; so are there other books and writings which are appropriate to the custody and receipt of words only, which likewise are of three sorts—orations, letters, and brief speeches or sayings. Orations are pleadings, speeches of counsel, laudatives, invectives, apologies, reprehensions, orations of formality or ceremony, and the like. Letters are according to all the variety of occasions, advertisements, advises, directions, propositions, petitions, commendatory, expostulatory, satisfactory, of compliment, of pleasure, of discourse, and all other passages of action. And such as are written from wise men, are of all the words of man, in my judgment, the best; for they are more natural than orations and public speeches, and more advised than conferences or present speeches. So again letters of affairs from such as manage them, or are privy to them, are of all others the best instructions for history, and to a diligent reader the best histories in themselves. For apophthegms, it is a great loss of that book of Cæsar's; for as his history, and those few letters of his which we have, and those apophthegms which were of his own, excel all men's else, so I suppose would his collection of apophthegms have done; for as for those which are collected by others, either I have no taste in such matters or else their choice hath not been happy. But upon these three kinds of writings I do not insist, because I have no deficiences to propound concerning them.

（4）另外，还有一部分学问可称为历史的附录。人们所有的外部行为由言辞和行为构成，而历史通常只合理接收或记录人类的行为，即使出现言辞，也只不过为了引出行为或贯穿行为进程。因此需要另一种书籍或作品专门用以记录保存人们的言辞，这类书作分三类：演说辞、书信、简洁的妙语或格言。演说辞或用来辩论，或用于商议、赞美、抨击、辩解、责难，又或用在仪式和典礼上等类似的情

境中。书信根据场合的不同，可用于广告、劝言、指示、提议、请求、推荐、训诫、赎罪、问候，也可用来表达愉悦，发表评论等等。我认为，有才学之人所写的书信是所有记录言辞的作品的精华所在。因为相较于演讲和公开致辞，这些书信的内容更加自然，而比起协商讨论或即兴演说，则更加细致审慎。而那些关于如何处理某些事务，或知情和参与一些事务的书信，与其他书信相比，对了解历史具有最有力的指导作用。同时，对于勤勉的读者，它们本身就是最好的历史。至于格言，恺撒收录的格言集的失传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本人著述的史作、现存的书信和他自己的一些格言都是无与伦比的，因而我觉得，他收集的格言也必定非同一般。他人收集的格言，或是我不感兴趣，又或者他们筛选的格言还是欠缺的。不过，对于这三种作品我不会强求什么，因为我并没找出这些作品中的缺陷。

(5) Thus much therefore concerning history, which is that part of learning which answereth to one of the cells, domiciles, or offices of the mind of man, which is that of the memory.

（5）所以，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学问，它与人们大脑中的一个单元、一处居所或一处办工场所，即记忆相对应。

CHAPTER IV

第四章

(1) Poesy is a part of learning in measure of words, for the most part restrained, but in all other points extremely licensed, and doth truly refer to the imagination; which, being not tied to the laws of matter, may at pleasure join that which nature hath severed, and sever that which nature hath joined, and so make

unlawful matches and divorces of things—*Pictoribus atque poetis, &c.* It is taken in two senses in respect of words or matter. In the first sense, it is but a character of style, and belongeth to arts of speech, and is not pertinent for the present. In the latter, it is—as hath been said—one of the principal portions of learning, and is nothing else but feigned history, which may be styled as well in prose as in verse.

（1）作为学问的一部分，诗歌与人类语言相关，是一种语言形式与技巧。它在很多时候是受到限制的，但在其他方面又享有绝对自由，又可完全依赖于想象力。诗歌并不一定要遵守事物的规律，可将自然中存在的事物任意联系起来，或将本来存在联系的事物又分割开来，从而实现无规律匹配和拆分事物。根据语言和内容，诗歌也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方面是诗歌的风格特征，这属于言辞艺术，与我们当前的论题没有关联。至于另一方面，正如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它是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仅仅是种虚构的历史。它可以是诗歌的形式，也可用散文的形式呈现。

(2) The use of this feigned history hath been to give some shadow of satisfaction to the mind of man in those points wherein the nature of things doth deny it, the world being in proportion inferior to the soul; by reason whereof there is, agreeable to the spirit of man, a more ample greatness, a more exact goodness, and a more absolute variety, than can be found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Therefore, because the acts or events of true history have not that magnitude which satisfieth the mind of man, poesy feigneth acts and events greater and more heroical. Because true history propoundeth the successes and issues of actions not so agreeable to the merits of virtue and vice, therefore poesy feigns them more just in retribution, and more according to revealed Providence. Because

true history representeth actions and events more ordinary and less interchanged, therefore poesy endueth them with more rareness and more unexpected and alternative variations. So as it appeareth that poesy serveth and conferreth to magnanimity, morality and to delectation. And therefore, it was ever thought to have some participation of divineness, because it doth raise and erect the mind, by submitting the shows of things to the desires of the mind; whereas reason doth buckle and bow the mind unto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we see that by these insinuations and congruities with man's nature and pleasure, joined also with the agreement and consort it hath with music, it hath had access and estimation in rude times and barbarous regions, where other learning stood excluded.

（2）当人们无法在自然事物中获得内心的满足时，便会从诗歌中得到虚幻的慰藉，这就是这种虚构历史的效用。这种历史中，人类灵魂总是高于物质世界，与自然事物相比，人类的心灵更加伟岸宽广、善良纯粹而又富足多样。因此，当真正历史事件或行为的意义无法满足人们的内心时，他们就在诗歌中创造出更加伟大的英雄事件。而当真正历史中事件的成功与过程叙述与人们的是非善恶观念有所不符时，他们又付诸诗歌，虚构出更为公正、更迎合天意的惩罚。同时，真正历史事件的叙述通常趋于平淡，形式单一，诗歌使它们变得更为稀奇罕见，更加出乎意料而又变幻莫测。因此，诗歌可用来呈现宏伟气势，弘扬社会美德，并为人们提供精神享受。有人曾推测，神灵参与了诗歌的创作，因为诗歌呈现的事物迎合了人们的意愿与期望，让他们的内心得到支撑与提升，而理性只会让人们屈从于自然。在荒蛮的年代和地区，当其他学问还不曾萌芽之时，诗歌就已崭露头角，进而盛行于世。这主要是因为诗歌迎合了人们的天性与意愿，又与音乐相融合，使人们获得巨大的满足。

(3) The division of poesy which is aptest in the propriety thereof (besides those divisions which are common unto it with history, as feigned chronicles, feigned lives, and the appendices of history, as feigned epistles, feigned orations, and the rest) is into poesy narrative, representative, and allusive. The narrative is a mere imitation of history, with the excesses before remembered, choosing for subjects commonly wars and love, rarely state, and sometimes pleasure or mirth. Representative is as a visible history, and is an image of actions as if they were present, as history is of actions in nature as they are (that is) past. Allusive, or parabolical, is a narration applied only to express some special purpose or conceit; which latter kind of parabolical wisdom was much more in use in the ancient times, as by the fables of AEsop, and the brief sentences of the seven, and the use of hieroglyphics may appear. And the cause was (for that it was then of necessity to express any point of reason which was more sharp or subtle than the vulgar in that manner) because men in those times wanted both variety of examples and subtlety of conceit. And as hieroglyphics were before letters, so parables were before arguments; and nevertheless now and at all times they do retain much life and rigour, because reason cannot be so sensible nor examples so fit.

（3）除了根据历史的分类法，将诗歌分为虚构编年史、虚构传记、虚构历史附录、虚构书信、虚构演说和其他，对诗歌的类型比较恰当的分法是：叙事诗、体验诗和隐喻诗。叙事诗仅仅是对历史的模仿，通常是对战争、爱情，偶尔也有国家、娱乐等题材的相关事件进行夸大和渲染。体验诗可以说是一种可视的历史，它所刻画的行为能使人们切身感受，身临其境，如同真实历史事件是过去人们亲身体验的一般。隐喻诗，或寓言式诗歌，只是用来表达某些特定的目的或想法。寓言式的智慧在古代的应用更为广泛，如伊索寓言、七位哲人的至理名言、象形符号的应用等等。那时的人们采用寓言形式进行表达

（当通俗语言不足以表达更加尖锐精妙的道理时，就必须借助于寓言），原因在于缺乏丰富多样的例证以及敏锐精妙的构思。就如象形符号产生于文字之前，寓言的产生也早于论证。在如今及所有时代，再也找不到比寓言阐释的道理更加明了，所用的例子更加贴切的了。因此寓言式诗歌仍维持着它巨大的活力与严谨的特性。

(4) But there remaineth yet another use of poesy parabolical, opposite to that which we last mentioned; for that tendeth to demonstrate and illustrate that which is taught or delivered, and this other to retire and obscure it—that is, when the secrets and mysteries of religion, policy, or philosophy, are involved in fables or parables. Of this in divine poesy we see the use is authorised. In heathen poesy we see the exposition of fables doth fall out sometimes with great felicity: as in the fable that the giants being overthrown in their war against the gods, the earth their mother in revenge thereof brought forth Fame:—*"Illam terra parens, ira irritat Deorum, Extremam, ut perhibent, Cœo Enceladoque soroem, Progenuit."* Expounded that when princes and monarchs have suppressed actual and open rebels, then the malignity of people (which is the mother of rebellion) doth bring forth libels and slanders, and taxations of the states, which is of the same kind with rebellion but more feminine. So in the fable that the rest of the gods having conspired to bind Jupiter, Pallas called Briareus with his hundred hands to his aid: expounded that monarchies need not fear any curbing of their absoluteness by mighty subjects, as long as by wisdom they keep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who will be sure to come in on their side. So in the fable that Achilles was brought up under Chiron, the centaur, who was part a man and part a beast, expounded ingeniously but corruptly by Machiavel, that it belongeth to the education and discipline of princes to know as well how to play the part of a lion in violence, and the fox in guile, as of the man in

virtue and justice. Nevertheless, in many the like encounters, I do rather think that the fable was first, and the exposition devised, than that the moral was first, and thereupon the fable framed; for I find it was an ancient vanity in Chrysippus, that troubled himself with great contention to fasten the assertions of the Stoics upon the fictions of the ancient poets; but yet that all the fables and fictions of the poets were but pleasure and not figure, I interpose no opinion. Surely of these poets which are now extant, even Homer himself (notwithstanding he was made a kind of *scripture* by the later schools of the Grecians), yet I should without any difficulty pronounce that his fables had no such inwardness in his own meaning. But what they might have upon a more original tradition is not easy to affirm, for he was not the inventor of many of them.

（4）同时，寓言式诗歌还存在另一种功用，且与上述的功用恰好相反。上文讲到的是它希望将所隐含的道理或想法展现出来，而另外一种则试图将其隐匿。宗教、政治或哲学的秘密或奥秘就通常隐藏于隐喻或寓言之中。在描写神灵的诗歌中，我们看到，这种用法是被认可的。在异教诗歌中，我们有时也会看到非常有趣美妙的寓言作品。例如一则寓言中讲到，在与诸神的抗战中，巨人们遭受痛击，而此时，他们的大地之母为了复仇，生出“谣传”：“大地之母非常愤怒，生出‘谣传’，她是巨人希埃和恩克拉多斯的妹妹，也是地神家族最后一位成员。”其寓意在于，当君主和帝王在成功镇压眼前的公开叛乱之后，那些人的怨恨（也就是叛乱之母）便会带来中伤诽谤，造谣生事，贬损国家。这也是一种翻盘，只不过稍微柔性一点罢了。另一寓言讲到，其他天神共同谋划将丘比特捆绑起来，帕拉斯便呼唤百臂巨人布里亚柔斯前来协助。这告诉我们，君王在遇到臣民强有力的反叛威胁时，不必惊慌担忧，因为只要以智慧赢得了民心，民众们都会站在君王的一边，和他共同抗敌。还有一则寓言提到，阿喀琉斯是由人马怪喀戎抚养长大的。对于其寓意，马基雅弗利的解释精辟而又腐化。他认为，这表明君王的教育和训导不仅应包括正义与品德的培

养，还应包含凶猛如狮，诡诈如狐的训诫。不过，在观察了很多类似故事后，我认为寓言的产生先于其道德内涵，对寓言的阐释都是后来进行的，而不是先有道德涵义，再来虚构寓言。我发现，古代的克律西波斯曾耗费不少精力试图将斯多葛学派的主张与古代诗人虚构的故事结合起来，最终仍一无所获。但由于诗人们所写的寓言和故事不过是出于乐趣而不是象征，因此我也就不对此发表任何评论了。流传至今的诗歌作品也是同样的情况。即使是荷马本人的诗作（尽管在后世希腊学派眼里，他的作品堪比《圣经》），我也会绝不迟疑地说，他讲述的寓言并没有多少深度。不过，至于这些寓言在创作之初的内涵与意义，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因为很多都不是荷马原创的。

(5) In this third part of learning, which is poesy, I can report no deficience; for being as a plant that cometh of the lust of the earth, without a formal seed, it hath sprung up and spread abroad more than any other kind. But to ascribe unto it that which is due, for the expressing of affections, passions, corruptions, and customs, we are beholding to poets more than to the philosophers' works; and for wit and eloquence, not much less than to orators' harangues. But it is not good to stay too long in the theatre. Let us now pass on to the judicial place or palace of the mind, which we are to approach and view with more reverence and attention.

（5）诗歌作为第三种学问的形式而存在，我觉得不存在什么缺陷。它如同未经播种全凭土地意念而自身自长的植株，比起其他任何植物，它的生命力更加顽强，散布速度更加迅速。诗歌的作用不可忽视。我们认为诗人在表达情感、抒发激情、控诉腐败和展现风俗等方面的功用远比哲学家的作品有效。同时，它包含的智慧与辩才也绝不亚于演说家的高谈阔论。不过我们在剧院逗留的时间不能太长。现在，我们就以更加虔诚和专心的态度直接进入大脑中的审判地或思维殿堂。

CHAPTER V

第五章

(1) The knowledge of man is as the waters, some descending from above, and some springing from beneath: the one informed by the light of nature, the other inspired by divine revelation. The light of nature consisteth in the notions of the mind and the reports of the senses; for as for knowledge which man receiveth by teaching, it is cumulative and not original, as in a water that besides his own spring-head is fed with other springs and streams. So then, according to these two differing illuminations or originals, knowledge is first of all divided into divinity and philosophy.

（1）正如清水，一些从天而降，一些源于地下，知识的来源也主要有两个，或受自然之光的启发，或来源于神的启示。自然之光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观念和感官反馈。而人们通过受教育获得的知识是可以累积的，但却不是本原的，就如一片水域，除了自己的泉源，仍需其他清泉或流水的供给。所以，根据这两种不同的启发与泉源，知识首先被分为神学和哲学两种。

(2) In philosophy the contemplations of man do either penetrate unto God, or are circumferred to nature, or are reflected or reverted upon himself. Out of which several inquiries there do arise three knowledges—divine philosophy, natural philosophy, and human philosophy or humanity. For all things are marked and stamped with this triple character—the power of God, the difference of nature and the use of man. But because the distributions and partitions of knowledge are not like several lines

that meet in one angle, and so touch but in a point, but are like branches of a tree that meet in a stem, which hath a dimension and quantity of entireness and continuance before it come to discontinue and break itself into arms and boughs; therefore it is good, before we enter into the former distribution, to erect and constitute one universal science, by the name of *philosophia prima* , primitive or summary philosophy, as the main and common way, before we come where the ways part and divide themselves; which science whether I should report as deficient or no, I stand doubtful. For I find a certain rhapsody of natural theology, and of divers parts of logic; and of that part of natural philosophy which concerneth the principles, and of that other part of natural philosophy which concerneth the soul or spirit—all these strangely commixed and confused; but being examined, it seemeth to me rather a depredation of other sciences, advanced and exalted unto some height of terms, than anything solid or substantive of itself. Nevertheless I cannot be ignorant of the distinction which is current, that the same things are handled but in several respects. As for example, that logic considereth of many things as they are in notion, and this philosophy as they are in nature—the one in appearance, the other in existence; but I find this difference better made than pursued. For if they had considered quantity, similitude, diversity, and the rest of those extern characters of things, as philosophers, and in nature, their inquiries must of force have been of a far other kind than they are. For doth any of them, in handling quantity, speak of the force of union, how and how far it multiplieth virtue?Doth any give the reason why some things in nature are so common, and in so great mass, and others so rare, and in so small quantity?Doth any, in handling similitude and diversity, assign the cause why iron should not move to iron, which is more like, but move to the loadstone, which is less like?Why in all diversities of things there should be certain participles in nature

which are almost ambiguous to which kind they should be referred? But there is a mere and deep silence touching the nature and operation of those common adjuncts of things, as in nature; and only a resuming and repeating of the force and use of them in speech or argument. Therefore, because in a writing of this nature I avoid all subtlety, my meaning touching this original or universal philosophy is thus, in a plain and gross description by negative: “That it be a receptacle for all such profitable observations and axioms as fall not within the compass of any of the special parts of philosophy or sciences, but are more common and of a higher stage.”

（2）哲学中，人类的沉思或能洞察上帝旨意，或只在自然世界徘徊，又或反映于人类自身。根据这三类探索，三种知识油然而生：神学、自然哲学与人文哲学也被称为人类学。世上万物都铭刻了这三种特征：上帝的权威、自然的差异与人类的用途。知识的分布不像数条直线在某一角上相遇，并重合于一点，而是像一个树干上的树枝，继续分枝之前，在维度和数量上都保持着完整性与连续性。因此，在我们对之前的知识分类进行深入探究之前，最好能对一种通用科学进行探讨，这种科学可称作基础或综合哲学。我们可将其作为到达知识分岔口之前的共通之路。至于这类科学是否存在缺陷，我还无法确定。因为我发现一些关于自然神论的狂热记载，还有各种逻辑学的论述，一些自然哲学中的记述与法则相关，而另外一些叙述则与人类精神和灵魂相关。不过，所有这些都莫名其妙地混杂在一起，令人困惑。我在仔细考查后发现，这些内容似乎只是掠夺其他科学的知识成果，将其夸大抬升，造成高深的假象，但其本质却是虚空而不可靠的。不过，我了解到当今人们处事的特性，即同一事物可从不同方面进行探讨。比如，逻辑学研究的是各类事物在人们观念中的反应，而哲学则关注事物的自然存在状态。前者探究外观，后者探究实物。不过我发现，这种研究方向的不同虽能区分，但很难做到。如果人们像哲学家一样，研究事物自然状态下的分量、相似性、多样性及其他外

在特性，正如哲学家一样，他们的研究必定会有质的飞跃。他们在研究分量时，是否考虑到合力？它是如何增加事物的功效，又有多大的功效？是否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自然界有些事物非常常见而繁多，但另一些又那么稀有呢？在考察相似性和多样性时，又是否有人找到原因，阐释为何铁跟铁很相似，却不能相互吸引，而铁与磁石不类同，却能被它吸引？事物是如此多种多样，但为何总有一些物质让我们无从归类，不知道它们该属于哪一类呢？对这些自然事物中常见的伴随属性，人们做的只不过是保持沉默，根本不探究它们的特性与作用方式。只是在一些演说或辩论中反复提及它们的效力和用途。在这类性质的作品中，我尽量避免细节描述，因此，对于这类原始或普遍的哲学，我就从反面进行简单归纳，即“任何哲学或科学的特殊部分都可能无法用有效的观察和公理来解释，它们属于较普通或较高级的范畴”。

(3) Now that there are many of that kind need not be doubted. For example: Is not the rule, *Si inœqualibus œqualia addas, omnia erunt inœqualia* , an axiom as well of justice as of the mathematics? and is there not a true coincidence between commutative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arithmetical and geometrical proportion?Is not that other rule, *Quœ in eodem tertio conveniunt, et inter se conveniunt* , a rule taken from the mathematics, but so potent in logic as all syllogisms are built upon it?Is not the observation, *Omnia mutantur, nil interit* , a contemplation in philosophy thus, that the quantum of nature is eternal?in natural theology thus, that it requireth the same omnipotency to make somewhat nothing, which at the first made nothing somewhat?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 *Didici quod omnia opera,* quœ *fecit Deus, perseverent in perpetuum; non possumus eis quicquam addere nec auferre.* Is not the ground, which Machiavel wisely and largely discourseth concerning governments, that the way to establish and preserve them is to reduce them *ad principia* —a rule in religion and nature, as well as in civil

administration?Was not the Persian magic a reduction or correspondence of the principles and architectures of nature to the rules and policy of governments?Is not the precept of a musician, to fall from a discord or harsh accord upon a concord or sweet accord, alike true in affection?Is not the trope of music, to avoid or slide from the close or cadence, common with the trope of rhetoric of deceiving expectation?Is not the delight of the quavering upon a stop in music the same with the playing of light upon the water? "*Splendet tremulo sub lumine pontus.*" Are not the organs of the senses of one kind with the organs of reflection, the eye with a glass, the ear with a cave or strait, determined and bounded? Neither are these only similitudes, as men of narrow observation may conceive them to be, but the same footsteps of nature, treading or printing upon several subjects or matters. This science therefore (as I understand it) I may justly report as deficient; for I see sometimes the profounder sort of wits, in handling some particular argument, will now and then draw a bucket of water out of this well for their present use; but the spring-head thereof seemeth to me not to have been visited, being of so excellent use both for the disclosing of nature and the abridgment of art.

（3）当然，这类哲学中还是有着很多确定无疑的事物。例如，“等量加不等量，仍为不等量”，这条规则无论在数学还是司法领域不都是自明之理吗？交换分配的公正和数学几何中的等比，两者不是都存在着真实的对应性吗？另外还有一条规则，“与一事物等量的各事物也相等”。这条规则源自数学，不过这在逻辑学中不也十分奏效吗？所有三段论不也都以此为基础吗？“万物不断变化，却从不消失。”这样的观察不是应用于哲学思考，得出了自然总量守恒的结论吗？在自然神论中，想要让一些事物消失，不也需要当初那种在虚无中创造事物的全能力量吗？《圣经》就记载着：“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添加，无所减少。”马基雅弗利曾多次针对政府发表明智

见解，他说，建立与维持政府的方式就是将它们还原至本原状态。民政、宗教与自然等方面不都建立在这一基本法则吗？波斯的巫术不是体现了政府的规定、政策是自然法则、结构的对应或缩影吗？音乐家有这样一个规则，就是要把不谐或刺耳的音韵转化为协调悦耳的音乐。人们的感情不也正是这样吗？同样，音乐中的附加句要避开结束音或中止音节，这点不正与修辞学中的转义要出其不意是一样的道理吗？音乐中止时的颤音产生的愉悦感不也与玩弄水面的点点波光是一样的吗？古语就曾说，“阳光洒向大海，海面波光粼粼。”感觉器官与反射器官不正属于同一类别吗？眼睛之于镜子，耳朵之于洞穴或峡谷，两者不都注定相联结吗？短见薄识之人可能会认为，上述例证只不过是凑巧看起来相似而已。事实上，自然界中存在很多同样的迹象，而且涉及多种事物。对于这类科学（据我所理解），我说它存有缺陷并不为过。有时候，我看到一些颇有造诣的学者在针对某些特定问题进行辩论时，会时不时从这口知识之井中攫出一桶水以作临时之用。但是，我从未发现有谁去探寻其泉源，而正是这一泉源，能够充分揭示自然的本性，降低技艺的旁枝末节。

CHAPTER VI

第六章

(1) This science being therefore first placed as a common parent like unto Berecynthia, which had so much heavenly issue, *omnes cœlicolas, omnes supera alta tenetes;* we may return to the former distribution of the three philosophies—divine, natural, and human. And as concerning divine philosophy or natural theology, it is that knowledge or rudiment of knowledge concerning God which may be obtained by the contemplation of His creatures; which knowledge may be truly termed divine in respect of the object, and natural in respect of the light. The bounds of this knowledge are, that it sufficeth to convince atheism, but not to inform religion; and

therefore there was never miracle wrought by God to convert an atheist, because the light of nature might have led him to confess a God; but miracles have been wrought to convert idolaters and the superstitious, because no light of nature extendeth to declare the will and true worship of God. For as all works do show forth the power and skill of the workman, and not his image, so it is of the works of God, which do show the omnipotency and wisdom of the Maker, but not His image. And therefore therein the heathen opinion differeth from the sacred truth: for they supposed the world to be the image of God, and man to be an extract or compendious image of the world; but the *Scriptures* never vouchsafe to attribute to the world that honour, as to be the image of God, but only THE WORK OF HIS HANDS; neither do they speak of any other image of God but man. Wherefore by the contemplation of nature to induce and enforce the acknowledgment of God, and to demonstrate His power, providence, and goodness, is an excellent argument, and hath been excellently handled by divers, but on the other side, out of the contemplation of nature, or ground of human knowledges, to induce any verity or persuasion concerning the points of faith, is in my judgment not safe; *Da fidei quæ fidei sunt* . For the heathen themselves conclude as much in that excellent and divine fable of the golden chain, “That men and gods were not able to draw Jupiter down to the earth; but, contrariwise, Jupiter was able to draw them up to heaven.” So as we ought not to attempt to draw down or submit the mysteries of God to our reason, but contrariwise to raise and advance our reason to the divine truth. So as in this part of knowledge, touching divine philosophy, I am so far from noting any deficience, as I rather note an excess; whereunto I have digressed because of the extreme prejudice which both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hath received and may receive by being commixed together; as that which undoubtedly will make an heretical religion, and an imaginary and fabulous philosophy.

（1）这类科学可谓是一切知识共同的父母，就如母神贝拉辛西亚拥有众多神子，创造了天上所有居民，还有众多高高在上的神灵。我们现在就回到最初对哲学的三种分类，即神圣哲学、自然哲学和人文科学。神圣哲学或自然神论，是关于上帝的基本知识，可以通过观察思索上帝的创造物获得。根据它所涉及的对象，我们可将这类知识命名为神圣知识；而根据它的研究角度，我们又可说它是自然知识。这类知识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虽然足以让无神论者信服上帝的主宰，却无法传扬宗教。上帝从未创造任何奇迹令无神论者改变信仰，因为自然之光或许能让他们承认上帝的存在，却不能传达上帝的意旨与表明该怎样崇拜上帝。所以，如果要让那些偶像崇拜者或迷信人士改变他们的信仰，上帝应该创造出令他们信服的奇迹。就像一名工匠的实力和技艺展现在他的作品中，而不是他的形象上，上帝的全能和智慧也并非体现在他的映像中，而是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于是，异教徒的观点与神圣真理产生背离的原因在于，他们把世界当成了上帝的映像，而人类成了世界的缩影。不过，《圣经》中从未赋予世界这一荣耀。世界并非上帝的映像，只不过是上帝的手工作品罢了。而且，除了人类，《圣经》也没提及其他任何上帝的映像。对自然的思考能引导和加强人们承认上帝，并展现他的权威、意旨与仁慈，这是一个极好的论点，且已经为各类人所应用。不过，在另一方面我认为，通过思考自然或利用人类知识基础来引发各类真理或探讨信仰问题，这并不可靠，因为“信仰无法建立于信仰之外的事物”。异教徒就曾在一个精妙的金链神话故事中表明了他们的观点。这个故事说道，人类与众神不可能用一条金链将丘比特拖下尘世，相反，丘比特却能将他们全都拉向天堂。因此，我们不该企图将上帝的神秘一并拉入我们的理性；相反地，我们应提升和发展我们的理性，使之更接近于神圣真理。对于学问中与神圣哲学相关的部分，我根本发现不了任何缺陷，不过倒有些过度现象。在这点的论述中我稍有偏离主题，因为宗教与哲学相互混杂，已经遭受并还会遭受人们的偏见与侵害，这样一来，无疑会产生一些异端宗教和幻象哲学。

(2) Otherwise it is of the nature of angels and spirits, which is an appendix of theology, both divine and natural, and is neither inscrutable nor interdicted. For although the *Scripture* saith, “Let no man deceive you in sublime discourse touching the worship of angels, pressing into that he knoweth not,” &c., yet notwithstanding if you observe well that precept, it may appear thereby that there be two things only forbidden—adoration of them, and opinion fantastical of them, either to extol them further than appertaineth to the degree of a creature, or to extol a man's knowledge of them further than he hath ground. But the sober and grounded inquiry, which may arise out of the passages of Holy *Scriptures* , or out of the gradations of nature, is not restrained. So of degenerate and revolted spirits, the conversing with them or the employment of them is prohibited, much more any veneration towards them; but the contemplation or science of their nature, their power, their illusions, either by *Scripture* or reason, is a part of spiritual wisdom. For so the apostle saith, “We are not ignorant of his stratagems.” And it is no more unlawful to inquire the nature of evil spirits, than to inquire the force of poisons in nature, or the nature of sin and vice in morality. But this part touching angels and spirits I cannot note as deficient, for many have occupied themselves in it; I may rather challenge it, in many of the writers thereof, as fabulous and fantastical.

（2）同时，作为神学的附属，天使与精灵的性质也应得到我们的关注。它们既是神圣又是自然的，而且并不是神秘莫测而又不可接近的。《圣经》中提到，不要让那些一无所知的人向你高谈阔论自己对天使多么崇拜。仔细思量这条训令，就会发现，它只禁止了两件事情，一是对天使的崇拜，二是对它的荒诞空想。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或过度赞美天使，完全超越了它们的地位；或夸大人类对天使的了解，达到了荒谬的境地。不过，据《圣经》提示或自然等级的体现，对它

们进行冷静严肃而又凭借真凭实据的研究是被允许的。但是，人类是被禁止与堕落和反叛的天使或精灵进行交谈或者利用它们的，更不用提对其的尊崇了。至于这些天使的本性、能力和幻象，我们应在《圣经》或理性引导下，进行深入思考探察，这也是宗教智慧的一部分。正如使徒所说："我们不应该不了解他的诡计。"就如查究自然界毒物的效力或道德上罪恶的本质一般，研究邪恶精灵的本性是非常合理的。然而，关于天使与精灵，我并不提出什么缺陷，因为已有很多人致力于相关研究。我只是质疑一点，很多关于这类知识的著述是否过于虚幻和荒谬了。

CHAPTER VII

第七章

(1) Leaving therefore divine philosophy or natural theology (not divinity or inspired theology, which we reserve for the last of all as the haven and sabbath of all man's contemplations) we will now proceed to natural philosophy. If then it be true that Democritus said, "That the truth of nature lieth hid in certain deep mines and caves;" and if it be true likewise that the alchemists do so much inculcate, that Vulcan is a second nature, and imitateth that dexterously and compendiously, which nature worketh by ambages and length of time, it were good to divide natural philosophy into the mine and the furnace, and to make two professions or occupations of natural philosophers—some to be pioneers and some smiths; some to dig, and some to refine and hammer. And surely I do best allow of a division of that kind, though in more familiar and scholastical terms: namely, that these be the two parts of natural philosophy—the inquisition of caus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effects; speculative and operative; natural science, and natural prudence. For as in civil matters there is a

wisdom of discourse, and a wisdom of direction; so is it in natural. And here I will make a request, that for the latter (or at least for a part thereof) I may revive and reintegrate the misapplied and abused name of natural magic, which in the true sense is but natural wisdom, or natural prudence; taken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acception, purged from vanity and superstition. Now although it be true, and I know it well, that there is an intercourse between causes and effects, so as both these knowledges, speculative and operative, have a great connection between themselves; yet because all true and fruitful natural philosophy hath a double scale or ladder, ascendent and descendent, ascending from experiments to the invention of causes, and descending from causes to the invention of new experiments; therefore I judge it most requisite that these two parts be severally considered and handled.

（1）我们暂且抛开神圣哲学或自然神学不谈（并非真正神学或受启神学，这一称呼我们要留待最后表示人类沉思的最终安息地），来讨论自然哲学。德谟克利特曾说："自然的真相藏于某些矿山或洞穴深处。"炼金术士也向人们反复阐述，伏尔甘是第二自然，自然花费大量心血和时间所作的作品，伏尔甘都能轻易而精妙地模仿。如果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就可以把自然哲学分为矿山和熔炉两类，而自然哲学家便有了两种职业，开拓者和手艺匠。前者开山掘地，后者锤炼琢磨。当然，我们还应提到另一种人们较为熟悉、又较有学术气息的分类方法，也就是将自然哲学分为探究原因与获得效果两部分，前者是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后者则注重自然知识的应用。在政治上，有一种说话的智慧，还有一种实际管理的智慧。同样，自然哲学也有这样的区分。针对后者（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在此我希望能得到允许，来重建和复兴一个被人们误用滥用的名称，即自然巫术。这一名称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的智慧，或是对自然的审慎思考。根据古时的理解，它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不掺杂虚浮与迷信。因果联系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我深知这一道理。因此，思考层面和应用层面这两

类知识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关联。但是，由于所有真正而有效的自然哲学往往具有双重标准或用途，或上升或下降，上升就是将实验发现上升至原理，下降则指从原理出发，向下指导新实验的创设。我认为，自然哲学的这两部分都必须得到全面的探讨。

(2) Natural science or theory is divided into physic and metaphysic; wherein I desire it may be conceived that I use the word metaphysic in a differing sense from that that is received. And in like manner, I doubt not but it will easily appear to men of judgment, that in this and other particulars, wheresoever my conception and notion may differ from the ancient, yet I am studious to keep the ancient terms. For hoping well to deliver myself from mistaking, by the order and perspicuous expressing of that I do propound, I am otherwise zealous and affectionate to recede as little from antiquity, either in terms or opinions, as may stand with truth and the proficience of knowledge. And herein I cannot a little marvel at the philosopher Aristotle, that did proceed in such a spirit of difference and contradiction towards all antiquity; undertaking not only to frame new words of science at pleasure, but to confound and extinguish all ancient wisdom; insomuch as he never nameth or mentioneth an ancient author or opinion, but to confute and reprove; wherein for glory, and drawing followers and disciples, he took the right course. For certainly there cometh to pass, and hath place in human truth, that which was noted and pronounced in the highest truth: *Veni in nomine partis, nec recipits me; si quis venerit in nomine suo eum recipietis.* But in this divine aphorism (considering to whom it was applied, namely, to antichrist, the highest deceiver), we may discern well that the coming in a man's own name, without regard of antiquity or paternity, is no good sign of truth, although it be joined with the fortune and success of an *eum recipietis* . But for this excellent

person Aristotle, I will think of him that he learned that humour of his scholar, with whom it seemeth he did emulate; the one to conquer all opinions, as the other to conquer all nations. Wherein, nevertheless, it may be, he may at some men's hands, that are of a bitter disposition, get a like title as his scholar did:—*“Felix terrarum prædo, non utile mundo Editus exemplum, &c.“* So, *“Felix doctrinæ prædo.“* But to me, on the other side, that do desire as much as lieth in my pen to ground a sociable intercourse between antiquity and proficience, it seemeth best to keep way with antiquity *usque ad aras* ; and, therefore, to retain the ancient terms, though I sometimes alter the uses and definitions, according to the moderate proceeding in civil government; where, although there be some alteration, yet that holdeth which Tacitus wisely noteth, *eadem magistratuum vocabula.*

（2）自然科学或理论分为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两类。我在这里提到的“形而上学”，希望人们能注意到它的意义与一般意义有所不同。在这里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我提出的概念和观点与古代的有些许出入，不过我尽量保持一些术语的旧有用法。我相信有良好判断力的人都是能够看到这点的。我真心希望自己能条理清晰地表达想法，少犯错误。于是，我热衷于沿用古时的术语和观点，尽量不偏离，这也是为了坚持真理，从而促进学问的发展。在这方面，我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抱以万分的惊讶。他质疑所有古代事物，不但随意创造科学术语，而且厌恶、压制所有古代智慧。除非他要驳斥和责难那些古代学者或某个旧时的观点，否则他从不会提及这些人。如果是出于创造荣耀，吸引更多追随者和弟子，他的做法也是很合理的。至高真理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且在人类真理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在这一神圣的警语中（考虑到这句话是针对最大的骗子，也就是反基督徒说的），我们清楚看到，一个人以自己的名义前来，不在乎祖先流传下来的遗产或其先祖的身份，即使有幸成

功，成了“受接待的人”，对真理而言是没有益处的。而对于这位伟大的学者亚里士多德，他似乎了解并效仿了他的学生亚历山大的性情。于是，一个征服了所有的观点，一个占领了所有的国家。不过，不过，在一些刁钻刻薄之人的笔下，得到了一些如亚历山大所获得的那一类的的头衔：“领土上的幸运强盗，为世界树立了反面榜样”，亚里士多德也被称为“学问上的幸运强盗”。我希望在我的作品中，能对古代遗产与学术创新进行有效贯通，最好能做到在不妨碍学问发展的情况下依循古例。虽然有时我会对一些术语的用法和定义稍作改变，但在多数情况下我还是保留古代术语。这也与政府温和行事的特点相吻合，政府改革虽有变动，但塔西陀却精明地发现，“官名如旧”。

(3) To return, therefore, to the use and acception of the term metaphysic as I do now understand the word; it appeareth, by that which hath been already said, that I intend *philosophia prima* , summary philosophy and metaphysic, which heretofore have been confounded as one, to be two distinct things. For the one I have made as a parent or common ancestor to all knowledge; and the other I have now brought in as a branch or descendant of natural science. It appeareth likewise that I have assigned to summary philosophy the common principles and axioms which are promiscuous and indifferent to several sciences; I have assigned unto it likewise the inquiry touching the operation or the relative and adventive characters of essences, as quantity, similitude, diversity, possibility, and the rest, with this distinction and provision; that they be handled as they have efficacy in nature, and not logically. It appeareth likewise that natural theology, which heretofore hath been handled confusedly with metaphysic, I have enclosed and bounded by itself. It is therefore now a question what is left remaining for metaphysic; wherein I may without prejudice preserve thus much of the conceit of antiquity, that physic should contemplate that which is inherent in matter, and therefore

transitory; and metaphysic that which is abstracted and fixed. And again, that physic should handle that which supposeth in nature only a being and moving; and metaphysic should handle that which supposeth further in nature a reason, understanding, and platform. But the difference, perspicuously expressed, is most familiar and sensible. For as we divided natural philosophy in general into the inquiry of causes and productions of effects, so that part which concerneth the inquiry of causes we do subdivide according to the received and sound division of causes. The one part, which is physic, inquireth and handleth the material and efficient causes; and the other, which is metaphysic, handleth the formal and final causes.

（3）言归正传，我们再来谈谈我对“形而上学”这一术语的运用与认识。之前也有提到，我使用这一术语是为了表达第一哲学或综合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别。人们都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但事实上，它们截然不同。前者我称为所有学问的共同父母或祖先，对于后者，我认为它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或后代。同样，我将综合哲学作为很多学科的共同规则和原理，这些规则和原理相互混杂又各自保持中立。根据这一条件，我将综合哲学分为两方面，一为探究事物的应用，二为研究其本质中的异同特点，比如数量、相似性、多样性、概率等，其余的都依据这个区分方法和规定。不过，在研究中，我们不应根据逻辑推理来区分两者，而是要根据它们在自然中的功效。迄今为止，自然神学与形而上学的研究似乎一直混合在一起，不过我已经对其研究范围进行了划分和限定。现在的问题在于，留给形而上学的是什么。对此，我将毫无偏见地保留古人的想法，即物理学应研究的是事物的内在因而也是短暂的属性，而形而上学研究的则是事物抽象而绝对的属性。同时，物理学的研究基于自然界只有存在和运动两种形式，而形而上学的研究假定除了这些，还有理性、理解与思维平台。如经清晰表述，两者的区别是十分常见而又能够被感知的。我们将自然哲学总体分为原因的探索和效用的研究，而针对原因探索部分，我们还能

根据原因的合理分类进行细分。一方面，物理学探究事物的质料因和动力因；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研究的是事物的形式因和目的因。

(4) Physic (taking it according to the derivation, and not according to our idiom for medicine) is situate in a middle term or distance between natural history and metaphysic. For natural history describeth the variety of things; physic the causes, but variable or respective causes; and metaphysic the fixed and constant causes. *“Limus ut hic durescit, e* t hæc ut *cera liquescit, Uno eodemque igni.“* Fire is the cause of induration, but respective to clay; fire is the cause of colliquation, but respective to wax. But fire is no constant cause either of induration or colliquation; so then the physical causes are but the efficient and the matter. Physic hath three parts, whereof two respect nature united or collected, the third contemplateth nature diffused or distributed. Nature is collected either into one entire total, or else into the same principles or seeds. So as the first doctrine is touching the contexture or configuration of things, as *de mundo, de universitate rerum* . The second is the doctrin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r originals of things. The third is the doctrine concerning all variety and particularity of things; whether it be of the differing substances, or their differing qualities and natures; whereof there needeth no enumeration, this part being but as a gloss or paraphrase that attendeth upon the text of natural history. Of these three I cannot report any as deficient. In what truth or perfection they are handled, I make not now any judgment; but they are parts of knowledge not deserted by the labour of man.

（4）医学（作为这一词语的引申义，而不是我们惯用的医学本义）介于自然历史与形而上学两者的中间。自然历史描绘各类事物，

物理学阐释其可变或个别的原因，形而上学研究其恒久不变的原因。古诗有云："陶土遇火而坚，石蜡经火融化。"如果说，火是固结的原因，那只针对陶土而言的；说它是融化的原因，那也只对于石蜡而言。事实上，火并非令物质固结或融化的不变因素。因此，物理学原因是只关乎质料和动力的。医学分为三个部分，其中两部分探讨联结或集中的自然，另一部分研究分散的自然。自然可以集中成一个整体，或令所有事物拥有相同的原则或根基。因此，第一部分的学说就是关于世上所有事物的结构与构成。第二部分与事物的原理与根源相关。第三个则涉及事物的多样性与特殊性，无论是不同的物质构成，还是事物的不同特性与本质，都包括其中。不过，这部分仅仅是对自然历史文本的注解或释义，在此我们就无需列举细述。至于这三部分知识，我并没发现什么缺陷。至于这类研究揭示真相或完善知识的程度如何，我现在不作任何评断。但值得肯定的是，人们在这三部分研究都有付出努力。

(5) For metaphysic, we have assigned unto it the inquiry of formal and final causes; which assignation, as to the former of them, may seem to be nugatory and void, because of the received and inveterate opinion, that the inquisition of man is not competent to find out essential forms or true differences; of which opinion we will take this hold, that the invention of forms is of all other parts of knowledge the worthiest to be sought, if it be possible to be found. As for the possibility, they are ill discoverers that think there is no land, when they can see nothing but sea. But it is manifest that Plato, in his opinion of ideas, as one that had a wit of elevation situate as upon a cliff, did descry that forms were the true object of knowledge; but lost the real fruit of his opinion, by considering of forms as absolutely abstracted from matter, and not confined and determined by matter; and so turning his opinion upon theology, wherewith all his natural philosophy is infected. But if any man shall keep a continual watchful and severe eye upon action,

operation, and the use of knowledge, he may advise and take notice what are the forms, the disclosures whereof are fruitful and important to the state of man. For as to the forms of substances (man only except, of whom it is said, *Formavit hominem de limo terræ, et spiravit in faciem ejus spiraculum vitæ, and not as of all other creatures, Producant aquæ, producat terra*), the forms of substances I say (as they are now by compounding and transplanting multiplied) are so perplexed, as they are not to be inquired; no more than it were either possible or to purpose to seek in gross the forms of those sounds which make words, which by composition and transposition of letters are infinite. But, on the other side, to inquire the form of those sounds or voices which make simple letters is easily comprehensible; and being known induceth and manifesteth the forms of all words, which consist and are compounded of them. In the same manner to inquire the form of a lion, of an oak, of gold; nay, of water, of air, is a vain pursuit; but to inquire the forms of sense, of voluntary motion, of vegetation, of colours, of gravity and levity, of density, of tenuity, of heat, of cold, and all other natures and qualities, which, like an alphabet, are not many, and of which the essences (upheld by matter) of all creatures do consist; to inquire, I say, the true forms of these, is that part of metaphysic which we now define of. Not but that physic doth make inquiry and take consideration of the same natures; but how?Only as to the material and efficient causes of them, and not as to the forms. For example, if the cause of whiteness in snow or froth be inquired, and it be rendered thus, that the subtle intermixture of air and water is the cause, it is well rendered; but, nevertheless, is this the form of whiteness?No; but it is the efficient, which is ever but *vehiculum formæ* . This part of metaphysic I do not find laboured and performed; whereat I marvel not; because I hold it not possible to be invented by that course of invention which hath been used; in regard that men (which is the root of all error) have made too

untimely a departure, and too remote a recess from particulars.

（5）至于形而上学，我们已将它归入形式因与目的因的研究。对形式因的研究似乎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即人类的探究能力根本无法探知事物的本质形式或真正差别。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与其他所有知识相比，事物形式的构造是最值得我们追求和探索的，如果它能被人们所发现的话。至于概率问题，如果人们在只看得见海而看不到其他事物时，就断言世上没有陆地，那么，他们就是不合格的发现者。柏拉图在表达他对概念的想法时，充分展现了其才智的高度，犹如处于高崖俯瞰世界。他认为，形式是知识的真正课题。但是，他认为形式是从物质中绝对抽离出来的部分，不由物质决定，也不受其限制，这只能说明，他的这一想法并未结出真正的果实。而当他将观点转向神学领域时，他所有的自然哲学研究便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有人能持续严格地观察知识的活动、运行和应用，那他或许会注意到什么是形式，对人们的状态而言，这样的发现必然至关重要又富有成效。所有物质（人类除外，因为“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但在创造其他事物时，只是说“让水生出来，让地生出来”）的形式如今因组合与移植等方式而增加迅速，类型繁多，常令人大为不解。于是，这样的研究就像研究构成单词的词音时，由于字母的组合与转换无穷无尽，研究的目的不可能达到。不过，如果换个角度，研究这些声音的构成或简单字母的发音，这倒是易于了解的。而且，这一研究可引出和反映所有单词的构成，因为它们都是通过字母组合或单词合成起来的。同样，如果要探究诸如狮子、橡树、金子、水、空气这类事物的形式，也必然一无所获。但如果我们转而研究感觉、自发运动、植物、颜色、重力、浮力、密度、稀薄度、冷热度及其他所有本质或特性的形式，就会发现，它们虽如字母表一样，为数不多，却是一切创造物实质（由物质支撑）的构成体。研究这类属性的真正形式，便是我们所定义的形而上学的内容之一。物理学不也是研究探察这些属性吗？怎么又成了形而上学的内容了呢？其实，物理学研究的只是这些属性的质料因和动力因，并不考虑其形式因。比如研究为什么雪或泡沫呈现白色，如果

我们提出这是因空气与水的微妙组合而造成的，理由很合理，不过，这就是白色这种颜色的形式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这只表明了令其生效的因素，是传递形式的媒介罢了。我发现，关于形而上学这方面的内容并没有多少研究，又或是尚未取得成果，对此我并不惊奇。因为人类（一切错误的根源）总是过早终止其研究，又过于疏远非寻常事物，以这种惯用方式创立这类知识本身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6) But the use of this part of metaphysic, which I report as deficient, is of the rest the most excellent in two respects: the one, because it is the duty and virtue of all knowledge to abridge the infinity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 as much as the conception of truth will permit, and to remedy the complaint of *vita brevis, ars longa* ; which is performed by uniting the notions and conceptions of sciences. For knowledges are as pyramids, whereof history is the basis. So of natural philosophy, the basis is natural history; the stage next the basis is physic; the stage next the vertical point is metaphysic. As for the vertical point,*opus quod operatur Deus à principio usque ad finem,* the summary law of nature, we know not whether man's inquiry can attain unto it. But these three be the true stages of knowledge, and are to them that are depraved no better than the giants' hills: *“Ter sunt conati imponere Pelio Ossam, Scilicet atque Ossæ frondsum involvere Olympum.“* But to those which refer all things to the glory of God, they are as the three acclamations, *Sante, sancte, sancte* !holy in the description or dilatation of His works; holy in the connection or concatenation of them; and holy in the union of them in a perpetual and uniform law. And, therefore, the speculation was excellent in Parmenides and Plato, although but a speculation in them, that all things by scale did ascend to unity. So then always that knowledge is worthiest which is charged with least multiplicity, which appeareth to be metaphysic; as that which considereth the simple forms or differences of things, which are few

in number, and the degrees and co-ordinations whereof make all this variety. The second respect, which valueth and commendeth this part of metaphysic, is that it doth enfranchise the power of man unto the greatest liberty and possibility of works and effects. For physic carrieth men in narrow and restrained ways, subject to many accidents and impediments, imitating the ordinary flexuous courses of nature. But *latæ undique sunt sapientibus viae* ; to sapience (which was anciently defined to be *rerum divinarum et humanarum scientia*) there is ever a choice of means. For physical causes give light to new invention in *simili materia* . But whosoever knoweth any form, knoweth the utmost possibility of superinducing that nature upon any variety of matter; and so is less restrained in operation, either to the basis of the matter, or the condition of the efficient; which kind of knowledge Solomon likewise, though in a more divine sense, elegantly describeth: *non arctabuntur gressus tui, et currens non habebis offendiculum* . The ways of sapience are not much liable either to particularity or chance.

（6）但是，虽然我说形而上学的这部分知识运用有所欠缺，但与其他科学研究相比，其功效在这两方面可谓是最卓绝的。第一，一切知识的职责与效用在于，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压缩个人经验的无限性，并通过实现个人观念与既定科学概念之间的联结，弥补“人生短暂、知识无涯”的遗憾。知识如同金字塔，历史就是其基石。因而对自然哲学来说，它的基石就是自然历史。基石的上一层是物理学，而最接近顶端的就是形而上学。至于这座金字塔的顶端，那是“上帝自始至终的工作”，是自然的最高法则。我们无法知道人类的探究能否助我们到达那一顶端。不过这三者真真切切是知识的三个阶段。对堕落者而言，它们犹如巨人族的山岭一般高不可攀，正如诗中所写“重重山峦，高不可攀”。不过对于视万物为上帝荣耀的人们来说，这三个阶段成了他们的三次喝彩：神圣！神圣！神圣！神圣在上帝创造物的描绘与详述上；神圣在对这些事物的连通和联结上；神圣

在找出永恒一致的法则将它们相结合上。巴门尼德和柏拉图认为，万物无论如何分散，都终将合而为一。他们的这种见解，虽只是推测，却是精妙至极的。因此，最简化的知识总是最具价值的，而这类知识似乎就是形而上学。一方面，它研究事物的简单形式或差异，这类事物往往为数不多；另一方面，它探究构成事物多样性的程度范围及相互调和方式等。形而上学应获推崇的第二方面原因在于它可以释放人类的能量，极大地发掘他们工作的自由度和获得成效的可能性。物理学将人们引向狭隘受限的区域，经受众多突发情况与障碍的搅扰，就如自然中常见的蜿蜒道路一般，曲折前行，难以到达终点。不过，“聪明人眼里到处都是畅通无阻”（古时把这种人称为精通神性与人性知识的人）。对他们来说，这只是方法的选择问题。物理性原因有助于引导人们对相似物质进行新的研究与探索。如果人们认识了形式，也就知道了物质任何变化形式的性质。而且无论在探讨物质的基础还是其效用上，也都能受到较少的约束。所罗门曾对这类知识曾有绝妙的描述，尽管神学气息浓厚，他这样说道：“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智者的道路是不易于受特定事件或偶然际遇的妨碍的。

(7) The second part of metaphysic is the inquiry of final causes, which I am moved to report not as omitted, but as misplaced. And yet if it were but a fault in order, I would not speak of it; for order is matter of illustration, but pertaineth not to the substance of sciences. But this misplacing hath caused a deficience, or at least a great improficience in the sciences themselves. For the handling of final causes, mixed with the rest in physical inquiries, hath intercepted the severe and diligent inquiry of all real and physical causes, and given men the occasion to stay upon these satisfactory and specious causes, to the great arrest and prejudice of further discovery. For this I find done not only by Plato, who ever anchoreth upon that shore, but by Aristotle, Galen, and others which do usually likewise fall upon these flats of discoursing causes.

For to say that “the hairs of the eyelids are for a quickset and fence about the sight;” or that “the firmness of the skins and hides of living creatures is to defend them from the extremities of heat or cold;” or that “the bones are for the columns or beams, whereupon the frames of the bodies of living creatures are built;” or that “the leaves of trees are for protecting of the fruit;” or that “the clouds are for watering of the earth;” or that “the solidness of the earth is for the station and mansion of living creatures;” and the like, is well inquired and collected in metaphysic, but in physic they are impertinent. Nay, they are, indeed, but remoras and hindrances to stay and slug the ship from further sailing; and have brought this to pass, that the search of the physical causes hath been neglected and passed in silence. And, therefore, 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Democritus and some others, who did not suppose a mind or reason in the frame of things, but attributed the form thereof able to maintain itself to infinite essays or proofs of Nature, which they term fortune, seemeth to me (as far as I can judge by the recital and fragments which remain unto us) in particularities of physical causes more real and better inquired than that of Aristotle and Plato; whereof both intermingled final causes, the one as a part of theology, and the other as a part of logic, which were the favourite studies respectively of both those persons; not because those final causes are not true and worthy to be inquired, being kept within their own province, but because their excursions into the limits of physical causes hath bred a vastness and solitude in that tract. For otherwise, keeping their precincts and borders, men are extremely deceived if they think there is an enmity or repugnancy at all between them. For the cause rendered, that “the hairs about the eyelids are for the safeguard of the sight,” doth not impugn the cause rendered, that “pilosity is incident to orifices of moisture—*muscosi fontes, &c* . " Nor the cause rendered, that “the firmness of hides is for the armour of the body against extremities of heat or

cold," doth not impugn the cause rendered, that "contraction of pores is incident to the outwardest parts, in regard of their adjacence to foreign or unlike bodies;" and so of the rest, both causes being true and compatible, the one declaring an intention, the other a consequence only. Neither doth this call in question or derogate from Divine Providence, but highly confirm and exalt it. For as in civil actions he is the greater and deeper politique that can make other men the instruments of his will and ends, and yet never acquaint them with his purpose, so as they shall do it and yet not know what they do, than he that imparteth his meaning to those he employeth; so is the wisdom of God more admirable, when Nature intendeth one thing and Providence draweth forth another, than if He had communicated to particular creatures and motions the characters and impressions of His Providence. And thus much for metaphysic; the latter part whereof I allow as extant, but wish it confined to his proper place.

（7）形而上学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对目的因的探究。它并没有缺乏什么，只不过是被错置了。若只是顺序上的过失，我是不会提及的，因为顺序仅是阐释上的问题，无关乎科学实质。但事实上，这种错置已经遭致缺陷的产生，至少对科学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在物理学的探索中，目的因与其他三种原因混合在一起，将人类所有严格而辛勤的探索阻隔于真正物理学原因之外，从而令他们满足于一些似是而非的原因，并有了借口驻足不前，导致人类的进一步探索遭受重大妨害。不仅柏拉图长时停靠于这片海滨之上，亚里士多德、盖伦及其他学者也常逗留于此。有这样一些说法，"睫毛是视觉的篱笆与栅栏"；"动物坚实的外皮是为了抵御极端的冷与热"；"骨骼架构起整个框架，动物就在这一骨架的基础上形成了身体"；"树叶的作用是保护果实"；"云是为了灌溉大地"以及"大地的坚固是为了利于生物栖息生活"等等。这些说法都能在形而上学之中得到深入搜集和研究，但它们与物理学毫不相关。将它们归入物理学研究，只能成为科学之船扬

帆前行的障碍。而且，这一做法已然于无声中导致了对物理性原因研究的忽视。德谟克利特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自然哲学认为事物的构架里不存在任何智力或理智，他们认为，形式的产生与维持源于对自然的无限尝试与验证，他们称之为机缘。在我看来（就保留至今的陈述与碎片作出判断），在探究物理性原因的特征方面，德谟克利特的研究比起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要更加实际有效。后两者总是将这类原因与目的因相混合，亚里士多德把它们纳入神学领域，柏拉图将它们作为逻辑学的内容，这两类学科分别是他们最热衷的研究领域。我这样说并非因为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得出的目的因不够真实或不值得探究，而是因为，当他们广泛探索物理性原因时，目的因领域就成了一片荒芜之地。若将目的因与物理因加以分离，界定各自的范围，人们还是认为这两者是格格不入的矛盾体，这是最大的误解和蒙蔽。至于说“睫毛是视力的保障”，这一原因并不与“毛与排泄水分的通道相伴相随，像长了苔藓的源泉……”存在矛盾；“动物坚实的外皮是为了抵御极端的冷和热”也不与“毛孔收缩与它们接触的外界的异类物质有关”这一原因相冲突。其他情形也一样，这两类原因都是真实而同时存在的，一类阐明了目的，另一类却只是解释了效果。而且，研究两类原因不仅不会令上帝的意旨受到质疑或减损，反而能令其得到更有力地证实与弘扬。在政治上，如果一个政治家能让他人成为自己意愿与目的的执行者，又从不让他们发觉自己的真实意图，使得他们为自己办事，却不了解真正做的是什么事，那么，比起那些将自己意图传达给下属的政治家，这类人无疑更加能干、更加高深。上帝也是运用了这一智慧。当自然想要达成某一目的时，上帝的意旨能从中引导另一目的的实现，这比他直接将自己的意愿施加于特定创造物或行为之上令受人尊崇。关于形而上学的讨论就到这里。它的第二部分内容可以说已经存在，只不过我希望它能被界定在合适的范围之内。

CHAPTER VIII

第八章

(1) Nevertheless, there remaineth yet another part of natural philosophy, which is commonly made a principal part, and holdeth rank with physic special and metaphysic, which is mathematic; but I think it more agreeable to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to the light of order, to place it as a branch of metaphysic. For the subject of it being quantity, not quantity indefinite, which is but a relative, and belongeth to *philosophia prima* (as hath been said), but quantity determined or proportionable, it appeareth to be one of the essential forms of things, as that that is causative in Nature of a number of effects; insomuch as we see in the schools both of Democritus and of Pythagoras that the one did ascribe figure to the first seeds of things, and the other did suppose numbers to be the principles and originals of things. And it is true also that of all other forms (as we understand forms) it is the most abstracted and separable from matter, and therefore most proper to metaphysic; which hath likewise been the cause why it hath been better laboured and inquired than any of the other forms, which are more immersed in matter.For it being the nature of the mind of man (to the extreme prejudice of knowledge) to delight in the spacious liberty of generalities, as in a champaign region, and not in the inclosures of particularity, the mathematics of all other knowledge were the goodliest fields to satisfy that appetite. But for the placing of this science, it is not much material: only we have endeavoured in these our partitions to observe a kind of perspective, that one part may cast light upon another.

（1）自然哲学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我们尚未提及，那就是数学。数学普遍被认为是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并驾齐驱。不过我认为，如果将其纳入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似乎更加符合事物的性质与法则。数学的研究主题在于数量，这种数量并不是不确定的、相对的且隶属于第一哲学的（之前我们已经提到），

而是一种绝对或均衡的量。它是事物的一种基本形式，与自然中其他能产生效果的原因是一样的。这在德谟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中就能看到。前者将数字作为万物的原始种子，后者则推测数字是万物的根源与准则。与其他所有形式（就我们所理解的形式）相比，数学是最抽象，也是最能抽离事物本身的，因而最应该归入形而上学的范围，这也是它也比其他形式获得了更多关注与研究的原因，因为其他形式更注重事物本身。人们乐于随意自如地概述普遍现象，就如驰骋在一马平川之上，而不愿徘徊于特定现象的描述上，这是人类心智的特性所引起的。比起其他所有学科，数学是满足人们这一欲望的最适合的旷原。至于这门学科的归属，这并不重要。只要我们在研究中能从同一个角度出发进行学科归类，让各部分相互映照，不致疏漏。

(2) The mathematics are either pure or mixed. To the pure mathematics are those sciences belonging which handle quantity determinate, merely severed from any axioms of natural philosophy; and these are two, geometry and arithmetic, the one handling quantity continued, and the other dissevered. Mixed hath for subject some axioms or parts of natural philosophy, and considereth quantity determined, as it is auxiliary and incident unto them. For many parts of Nature can neither be invented with sufficient subtlety, nor demonstrated with sufficient perspicuity, nor accommodated unto use with sufficient dexterity, without the aid and intervening of the mathematics, of which sort are perspective, music, astronomy, cosmography, architecture, engineery, and divers others. In the mathematics I can report no deficience, except it be that men do not sufficiently understand this excellent use of the pure mathematics, in that they do remedy and cure many defects in the wit and faculties intellectual. For if the wit be too dull, they sharpen it; if too wandering, they fix it; if too inherent in the sense, they abstract it. So that as tennis is a game of no use in itself, but of

great use in respect it maketh a quick eye and a body ready to put itself into all postures, so in the mathematics that use which is collateral and intervenient is no less worthy than that which is principal and intended. And as for the mixed mathematics, I may only make this prediction, that there cannot fail to be more kinds of them as Nature grows further disclosed. Thus much of natural science, or the part of Nature speculative.

（2）数学既是纯粹的，又是混合的。纯粹数学是研究绝对数量的，与自然哲学的任何公理毫无关联。这类研究主要包括两种：几何学与算术。前者研究连续的数量，后者探讨分离的数量。混合数学涉及探究自然哲学的一些公理或其他部分内容。它同样研究绝对数量，但只是作为前者的辅助或伴随现象出现。如果没有数学的介入和辅助，包括透视法、音乐学、天文学、宇宙学、建筑学和工程学等等，自然的很多方面都不能得以精妙呈现，得不到清晰地阐释，也不能灵活地应用。在数学领域我没有发现什么缺陷。不过，人们对纯粹数学的重大效用没有完全理解，尚未发现它在纠正和完善人们智力与才能上的众多缺点。数学可让才智愚钝者变得敏锐，让才智游离者变得专注，也能令过分注重具体感受之人略趋抽象。网球作为一项运动，本身并无多大用处。不过，它能锻炼眼力、舒活筋骨，从这方面说，它益处多多。同样，数学也存在这种附加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绝不低于数学本身的主要和预期效用。至于复杂数学，我只能作出这样的预测，随着自然的特性被不断揭示，混合数学的种类也会逐渐增加。至此我们结束了对自然科学或对自然的思索部分的讨论。

(3) For natural prudence, or the part operative of natural philosophy, we will divide it into three parts—experimental, philosophical, and magical; which three parts active have a correspondence and analogy with the three parts speculative, natural history, physic, and metaphysic. For many operations have

been invented, sometimes by a casual incidence and occurrence, sometimes by a purposed experiment; and of those which have been found by an intentional experiment, some have been found out by varying or extending the same experiment, some by transferring and compounding divers experiments the one into the other, which kind of invention an empiric may manage. Again, by the knowledge of physical causes there cannot fail to follow many indications and designations of new particulars, if men in their speculation will keep one eye upon use and practice. But these are but coastings along the shore, *premendo littus iniquum* ; for it seemeth to me there can hardly be discovered any radical or fundamental alterations and innovations in Nature, either by the fortune and essays of experiments, or by the light and direction of physical causes. If, therefore, we have reported metaphysic deficient, it must follow that we do the like of natural magic, which hath relation thereunto. For as for the natural magic whereof now there is mention in books, containing certain credulous and superstitious conceits and observations of sympathies and antipathies, and hidden proprieties, and some frivolous experiments, strange rather by disguisement than in themselves, it is as far differing in truth of Nature from such a knowledge as we require as the story of *King Arthur of Britain* , or *Hugh of Bourdeaux* , differs from *Cæsar's Commentaries* in truth of story; for it is manifest that Cæsar did greater things *de vero* than those imaginary heroes were feigned to do. But he did them not in that fabulous manner. Of this kind of learning the fable of Ixion was a figure, who designed to enjoy Juno, the goddess of power, and instead of her had copulation with a cloud, of which mixture were begotten centaurs and chimeras. So whosoever shall entertain high and vaporous imaginations, instead of a laborious and sober inquiry of truth, shall beget hopes and beliefs of strange and impossible shapes. And, therefore, we may note in these sciences which hold so much of imagination and belief, as this degenerate natural magic,

alchemy, astrology, and the like, that in their proposition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eans is ever more monstrous than the pretence or end. For it is a thing more probable that he that knoweth well the natures of weight, of colour, of pliant and fragile in respect of the hammer, of volatile and fixed in respect of the fire, and the rest, may superinduce upon some metal the nature and form of gold by such mechanic as longeth to the production of the natures afore rehearsed, than that some grains of the medicine projected should in a few moments of time turn a sea of quicksilver or other material into gold. So it is more probable that he that knoweth the nature of arefaction, the nature of assimilation of nourishment to the thing nourished, the manner of increase and clearing of spirits, the manner of the depredations which spirits make upon the humours and solid parts, shall by ambages of diets, bathings, anointings, medicines, motions, and the like, prolong life, or restore some degree of youth or vivacity, than that it can be done with the use of a few drops or scruples of a liquor or receipt. To conclude, therefore, the true natural magic, which is that great liberty and latitude of operation which dependeth upon the knowledge of forms, I may report deficient, as the relative thereof is. To which part, if we be serious and incline not to vanities and plausible discourse, besides the deriving and deducing the operations themselves from metaphysic, there are pertinent two points of much purpose, the one by way of preparation, the other by way of caution. The first is, that there be made a calendar, resembling an inventory of the estate of man, containing all the inventions (being the works or fruits of Nature or art) which are now extant, and whereof man is already possessed; out of which doth naturally result a note what things are yet held impossible, or not invented, which calendar will be the more artificial and serviceable if to every reputed impossibility you add what thing is extant which cometh the nearest in degree to that impossibility; to the end that

by these optatives and potentials man's inquiry may be the more awake in deducing direction of works from the speculation of causes. And secondly, that these experiments be not only esteemed which have an immediate and present use, but those principally which are of most universal consequence for invention of other experiments, and those which give most light to the invention of causes; for the invention of the mariner's needle, which giveth the direction, is of no less benefit for navigation than the invention of the sails which give the motion.

（3）自然慎虑或自然哲学中的实际应用部分，主要可分成实验的、哲学的和奇幻的三方面内容。这三个方面的活动又分别对应了思索部分的三个方面，即自然历史、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很多应用已经得到探索和创造，其结果有时是在一些偶发事件中产生的，有时是通过有计划的实验实现的。在刻意的实验中，自然哲学的应用又可能来源于同一实验的反复尝试与延伸，或者来自于不同实验的合成与迁移，后者是经验主义者常用于探究的方式。在物理性原因的知识基础上，如果人们思考时将部分精力投入到效用和实践上，必能发现新生事物的一些迹象和表征。但是，这只不过是“沿岸浅行”罢了，因为我觉得，仅仅依靠偶然现象和尝试性实验，又或物理性原因的引导，人们很难发现自然根本性的变化或创新。如果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形而上学是存在缺陷的，与之相关的自然巫术便也不可能是完善的。书中记载的自然巫术通常包含一些蒙蔽人的迷信妄想，对感应和反感现象的观察，事物隐藏的性质和一些无聊的实验。与其说是内容本身的奇特，倒不如说是这层伪装令人诧异。自然巫术与自然真理的距离，就如英国的《亚瑟王》或《波尔多人休》的奇幻故事与《恺撒纪事》中记录的真正史实之间的距离一样。恺撒的事迹明显比那些幻想中的英雄的虚构故事伟大得多，而且他的所作所为并无任何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幻色彩。关于学问的这一方面，伊克西翁的寓言故事便是很好的例子。伊克西翁费尽心机想要得到权力之神朱诺，结果却勾搭上一片云彩，生出了人首马身的怪物和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怪。这表明，如果

人们一味异想天开，追求幻象，而不静下心来踏实地探索真知，只会产生一堆不切实际的妄想和希望。出于这一原因，我们看到，在那些过分依赖于想象和信念的科学中，如堕落的自然巫术、炼金术和占星术等，在对它们的构想中人们阐述的方法甚至比他们的借口或目标还要荒谬。人们在了解了黄金的重量、颜色、锤击下的柔韧度、铸烧时的稳定度等特性之后，就可通过诸如合成等机械方法将黄金的属性和形式添加到其他金属上，使其具有以上所提的属性。这种方法，比起类似将一些药物洒向地面瞬间变成一片水银，又或用另一些药物将其他物质变成黄金的事情，是更加可能实现的。同样，如果人们懂得了除湿的实质，食物在身体中的同化作用的本质，精力消长的方式，精力消耗人的精神和身体的方式，那么，他们就会通过饮食、沐浴、涂油、用药、运动等方式来延长寿命或恢复青春与活力。这种方法必然比轻信一张药方，或服食一点药水药丸的效果明显得多。最后，对于真正的自然巫术，其发挥效用的自由度之大和涉及范围之广，都是通过对形式的了解来实现的。而形式的探究是存在缺陷的，因此自然巫术也是有缺陷的。对这一方面知识，如果我们能避免空谈和妄语，认真严肃对待，就会发现，除应从形而上学中推论出一些实际效用，还应注意两点，一是做准备，二是作警示之用。为了实现第一点，我们应该制作一个类似于财产清单那样的列表，记录下所有现存的、人类已拥有的发明创造（包括自然和人工创造的一切作品或成果）。这张列表可清晰显示，哪些事人们还是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哪些还没有被创造。如果能在所有普遍认为不可能的事下面列上现存的、与之最接近的发明，那这张列表就更加精细而实用了。通过展现这些愿望和存在的可能性，人们便更能意识到应该通过思考原因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要做到第二点，我们不但应尊重具有直接现时效用的实验，且不能忽视其他一些实验。这些实验通常用于得出普遍性推论，从而指导其他实验的设计，或是用于引导揭示事物的原因等。例如，用来指明方向的罗盘针与给予船只动力的风帆，两者对航海的效用绝对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4) Thus have I passed through natural philosophy and the

deficiences thereof; wherein if I have differed from the ancient and received doctrines, and thereby shall move contradiction, for my part, as I affect not to dissent, so I purpose not to contend. If it be truth, "*Non canimus surdis, respondent omnia sylvæ* ," the voice of Nature will consent, whether the voice of man do or no. And as Alexander Borgia was wont to say of the expedition of the French for Naples, that they came with chalk in their hands to mark up their lodgings, and not with weapons to fight; so I like better that entry of truth which cometh peaceably with chalk to mark up those minds which are capable to lodge and harbour it, than that which cometh with pugnacity and contention.

（4）以上就是我们对自然哲学及其缺陷的讨论。如果其中有些表述与古时或者公认的学说有出入，我也已经对矛盾之处稍作解释。不过对我来说，我并不想另辟蹊径，也不想争论些什么。古诗有云："人歌百木应。"如若真是如此，那么无论人们是否同意我的说法，自然都会给予我肯定的回应。亚历山大·博尔贾谈及法国远征那不勒斯的事件时，经常会说，他们并没有带上武器去征战，只不过拿着粉笔在他们的住所作标记。同样，我希望真理能以温和的方式前来，只用一支粉笔在它们能够栖息停靠的人类大脑中做上标记，而不用引发辩论与争斗。

(5) But there remaineth a division of natural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the inquiry, and nothing concerning the matter or subject: and that is positive and considerative, when the inquiry reporteth either an assertion or a doubt. These doubts or *non liquets* are of two sorts, particular and total. For the first, we see a good example thereof in Aristotle's Problems which deserved to have had a better continuance; but so nevertheless as there is one point whereof warning is to be given and taken. The registering of

doubts hath two excellent uses: the one, that it saveth philosophy from errors and falsehoods; when that which is not fully appearing is not collected into assertion, whereby error might draw error, but reserved in doubt; the other, that the entry of doubts are as so many suckers or sponges to draw use of knowledge; insomuch as that which if doubts had not preceded, a man should never have advised, but passed it over without note, by the suggestion and solicitation of doubts is made to be attended and applied. But both these commodities do scarcely countervail and inconvenience, which will intrude itself if it be not debarred; which is, that when a doubt is once received, men labour rather how to keep it a doubt still, than how to solve it, and accordingly bend their wits. Of this we see the familiar example in lawyers and scholars, both which, if they have once admitted a doubt, it goeth ever after authorised for a doubt. But that use of wit and knowledge is to be allowed, which laboureth to make doubtful things certain, and not those which labour to make certain things doubtful. Therefore these calendars of doubts I commend as excellent things; so that there he this caution used, that when they be thoroughly sifted and brought to resolution, they be from thenceforth omitted, discarded, and not continued to cherish and encourage men in doubting. To which calendar of doubts or problems I advise be annexed another calendar, as much or more material which is a calendar of popular errors: I mean chiefly in natural history, such as pass in speech and conceit, and are nevertheless apparently detected and convicted of untruth, that man's knowledge be not weakened nor embased by such dross and vanity. As for the doubts or*non liquets* general or in total, I understand those differences of opinions touching the principles of nature, and the fundamental points of the same, which have caused the diversity of sects, schools, and philosophies, as that of Empedocles, Pythagoras, Democritus, Parmenides, and the rest. For although Aristotle, as though he had been of the race of the

Ottomans, thought he could not reign except the first thing he did he killed all his brethren; yet to those that seek truth and not magistrality, it cannot but seem a matter of great profit, to see before them the several opinions touching the foundations of nature. Not for any exact truth that can be expected in those theories; for as the same phenomena in astronomy are satisfied by this received astronomy of the diurnal motion, and the proper motions of the planets, with their eccentrics and epicycles, and likewise by the theory of Copernicus, who supposed the earth to move, and the calculations are indifferently agreeable to both, so the ordinary face and view of experience is many times satisfied by several theories and philosophies; whereas to find the real truth requireth another manner of severity and attention. For as Aristotle saith, that children at the first will call every woman mother, but afterward they come to distinguish according to truth, so experience, if it be in childhood, will call every philosophy mother, but when it cometh to ripeness it will discern the true mother. So as in the meantime it is good to see the several glosses and opinions upon Nature, whereof it may be everyone in some one point hath seen clearer than his fellows, therefore I wish some collection to be made painfully and understandingly *de antiquis philosophiis* , out of all the possible light which remaineth to us of them: which kind of work I find deficient. But here I must give warning, that it be done distinctly and severedly; the philosophies of everyone throughout by themselves, and not by titles packed and faggoted up together, as hath been done by Plutarch. For it is the harmony of a philosophy in itself, which giveth it light and credence; whereas if it be singled and broken, it will seem more foreign and dissonant. For as when I read in Tacitus the actions of Nero or Claudius, with circumstances of times, inducements, and occasions, I find them not so strange; but when I read them in Suetonius Tranquillus, gathered into titles and bundles and not in order of time, they seem more

monstrous and incredible: so is it of any philosophy reported entire, and dismembered by articles. Neither do I exclude opinions of latter times to be likewise represented in this calendar of sects of philosophy, as that of Theophrastus Paracelsus, eloquently reduced into an harmony by the pen of Severinus the Dane; and that of Tilesius, and his scholar Donius, being as a pastoral philosophy, full of sense, but of no great depth; and that of Fracastorius, who, though he pretended not to make any new philosophy, yet did use the absoluteness of his own sense upon the old; and that of Gilbertus our countryman, who revived, with some alterations and demonstrations, the opinions of Xenophanes; and any other worthy to be admitted.

（5）根据人们的研究成果，自然哲学还有另一种分类方法，这种方法与内容和主题完全无关。它将自然哲学分为确定的和留待思考的两类。如果研究的结果是一个主张、观点，那就是确定的；但如果是提出了疑问，那就是留待思考的。这些疑问或尚不明确的结果又可分为特殊的和一般的两种。针对第一种疑问，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疑问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问题都是值得持续探讨的。只是有一点我需要指出，以作警示。记录疑问有两种极好的用途。一方面，它使哲学避免错误和虚假。如果将没有完全得到证实的事物当成确定无疑的，错误就会接踵而至。但如果能作为疑问留待思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疑问就像吸管和海绵一般，它的存在能引发人们充分应用已有知识来解答它们。如不曾有任何疑问，人们必然忽略这些问题，永远不会认真思考提出见解。正是这些疑问引导他们深入探究相关事物和知识。但是，这两种有利产物的抵抗力非常弱，在毫无防备之下，不利因素便有机可乘。也就是说，当疑问被普遍接受之后，人们就煞费苦心地将其作为疑问保留下来，而不是思考该怎样解决这个疑问，从而妨碍了他们智慧的提升。在律师和学者身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类似的现象。他们一旦承认了事物存有疑问，这些疑问便永远成了一种权威性的存在。我们应提倡运用我们的才智把不确

定的事变成确定的，而不是把确定的事变得令人生疑。因此，我所提议的疑问列表绝对是十分有用的。当人们看到这一警示时，就会进行彻底细查，极力解决疑问。问题得到解决时，就能将它们删除、丢弃，以免后人继续将它们视作疑问珍藏起来。在疑问或问题列表之后，我建议添加一张附表，专门记录人们普遍会犯的错误。这里我指的错误主要是自然历史方面的。比如一些言论和观念上的错误早已被觉察和证实是明显违背真理的，这样的错误就该被记录下来，从而使人类的知识不致被这类无用的残渣所害。至于一般性或整体性的错误或不确定事物，我认为，有关自然法则的观点和基准点的不同性，引发了宗派、学派和哲学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以恩培多克勒、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巴门尼德等等为代表的不同流派。比如亚里士多德虽然像是有着奥斯曼血统一样认为只有首先杀尽所有兄弟才能主宰天下。不过，对于那些追求真理而不是权势之人，看到面前罗列着关于自然基础的纷繁见解，便觉得再没有比这更有益更令人充实的事了。当然，在这些观点理论中，我们不可能找到绝对的真理。同一个天文现象就可用不同的理论来阐述，根据传统的地心说，所有行星围绕地球日转一周；但根据哥白尼学说，地球是运动的。然而，天文计算的结果同时支持了这两种学说。因此，很多日常经验可能印证了多种理论或哲学，要了解哪个才是绝对的真理仍需严谨而专注的持续探索。亚里士多德曾说，婴儿在初期视所有妇女为自己的母亲，但渐渐地，他们知道了真相，懂得了区分。因此，对经验来说，在它的幼年期，将所有哲学视作母亲，一旦长大成熟，它就能识别自己真正的母亲了。同时，对自然的见解和观点存在多样性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些人在某一点上可能比别人看得更加真切清楚。因此，我希望人们能不遗余力地收集古代哲学作品，它们之中很可能存在能够启发我们的闪光点，而这也是人们现在所欠缺的。不过在此我必须告诫人们，进行这项工作时必须做到思路清晰，态度谨慎。所有哲学应根据体系分门别类，而不能像希腊作家普卢塔赫那样，只是根据标题就把它们捆绑在一起。一切哲学自身都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这样才能照亮前方道路，赢取人们的信任。如果将它们拆分，变得支离破碎，人们只会觉得越发陌生，越发不协调。我在阅读塔西陀笔下的尼禄或克劳迪乌的行为时，由于作者交代了时代背景、行为动机和事件场合，对他的行

为也不至于感到奇怪了。但同样的事件，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却只是将各种行为堆集在一起，再冠上标题，完全不按时间先后记叙，读来让人觉得发生的一切都荒谬无比，不可思议。所以，所有哲学应保持其完整性，并按照体系来分类。除了古代哲学作品，近代不同哲学流派的观点也应包含在这一列表之上。例如，泰奥弗拉斯托斯·帕拉切尔苏斯的哲学理论经丹麦人西弗瑞勒斯的悉心整理之后，已然成为一种和谐的理论。泰勒斯和他的学生多尼于斯的哲学理论虽然深度不够，但作为一种田园哲学，见解独到。弗拉卡斯托留斯从未想过创造新的哲学流派，但却恣意运用才智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古代哲学之上。我们的同胞吉伯特则通过适当修改并增添实证等方式，复兴了色诺芬的学说。其他还有很多意义重大的理论学说，都不能忽视。

(6) Thus have we now dealt with two of the three beams of man's knowledge; that is *radius directus* , which is referred to nature,*radius refractus* , which is referred to God, and cannot report truly because of the inequality of the medium. There resteth*radius reflexus,* whereby man beholdeth and contemplateth himself.

（6）至此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人类三种知识之光中的两种，一是源于自然的直射光线；二是源于上帝的折射光线。由于介质的地位较低，第二种知识并不能得到完全真实的展现。剩下的还有一种反射光线，是人们对自身的反视与审思。

CHAPTER IX

第九章

(1) We come therefore now to that knowledge whereunto the ancient oracle directeth us, which is the knowledge of ourselves;

which deserveth the more accurate handling, by how much it toucheth us more nearly. This knowledge, as it is the end and term of natural philosophy in the intention of man, so notwithstanding it is but a portion of natural philosophy in the continent of Nature. And generally let this be a rule, that all partitions of knowledges be accepted rather for lines and veins than for sections and separations; and that the continuance and entireness of knowledge be preserved. For the contrary hereof hath made particular sciences to become barren, shallow, and erroneous, while they have not been nourished and maintained from the common fountain. So we see Cicero, the orator, complained of Socrates and his school, that he was the first that separated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whereupon rhetoric became an empty and verbal art. So we may see that the opinion of Copernicus, touching the rotation of the earth, which astronomy itself cannot correct, because it is not repugnant to any of the phenomena, yet natural philosophy may correct. So we see also that the science of medicine if it be destituted and forsaken by natural philosophy, it is not much better than an empirical practice. With this reservation, therefore, we proceed to human philosophy or humanity, which hath two parts: the one considereth man segregate or distributively, the other congregate or in society; so as human philosophy is either simple and particular, or conjugate and civil. Humanity particular consisteth of the same parts whereof man consisteth: that is, of knowledges which respect the body, and of knowledges that respect the mind. But before we distribute so far, it is good to constitute. For I do take the consideration in general, and at large, of human nature to be fit to be emancipate and made a knowledge by itself, not so much in regard of those delightful and elegant discourses which have been made of the dignity of man, of his miseries, of his state and life, and the like adjuncts of his common and undivided nature; but chiefly in regard of the knowledge concerning the sympathies and concordances between

the mind and body, which being mixed cannot be properly assigned to the sciences of either.

（1）我们现在来探讨人们在古代神谕引导下所获得的知识，也就是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这部分知识与我们最接近，关系最密切，因而需要进行最精确的研究。人们希望这类知识能作为自然哲学的目的与终结。但是，在自然这片广袤的地域里，它只能成为自然哲学的其中一部分。我们应该清楚这样一条基本规则，所有对知识的划分并不是为了将其分割成不同片段，各自为营、互不相干，而是为了划定界限、厘清条理，因此，知识的完整性与持续性是必须得到保留的。如果不能实现知识的完整性与持续性，那么某些特定学科便得不到共同源泉的滋养和供给，从而变得贫瘠、粗浅、荒谬。演说家西塞罗就曾抱怨过苏格拉底和他的学派，认为从他们开始哲学与修辞学就被分割开来，导致修辞学变成了一种空无意义的语言技巧。至于哥白尼有关地球运转的学说，从天文学角度是无法得到纠正的，因为这一观点并不违背任何观察到的现象，不过，自然哲学可以纠正他的错误。同样，如果医学遭到自然哲学抛弃，得不到它的给养，便也沦为仅靠经验行事的实践活动了。讨论了这些预设条件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人类哲学或人文科学。它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将人类割裂成个体进行研究；而是将其作为整体或社会群体进行研究。因此，人类哲学要么是简单的、独特的，要么就是集中的、社会的。独特的人文科学的分类源于人类自身组成部分，分为注重人类身体或心智两部分的知识。不过，在继续细分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进行综合。我觉得，通常情况下对人类本性的研究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受束缚。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学者们讨论人类的尊严、苦难、生活状态及其他普遍又不可分割的性质引发的附属特性时的言辞优雅，令人愉悦，而主要是因为，人类身体与心智之间的知识相互调和，紧密结合，很难作出正确的区分，将其归结为其中任意一类。

(2) This knowledge hath two branches: for as all leagues and

amities consist of mutual intelligence and mutual offices, so this league of mind and body hath these two parts: how the one discloseth the other, and how the one worketh upon the other; discovery and impression. The former of these hath begotten two arts, both of prediction or prenotion; whereof the one is honoured with the inquiry of Aristotle, and the other of Hippocrates. And although they have of later time been used to be coupled with superstitions and fantastical arts, yet being purged and restored to their true state, they have both of them a solid ground in Nature, and a profitable use in life. The first is physiognomy, which discovereth the disposition of the mind by the lineaments of the body. The second is the exposition of natural dreams, which discovereth the state of the body by the imaginations of the mind. In the former of these I note a deficience. For Aristotle hath very ingeniously and diligently handled the factures of the body, but not the gestures of the body, which are no less comprehensible by art, and of greater use and advantage. For the lineaments of the body do disclose the disposition and inclination of the mind in general; but the motions of the countenance and parts do not only so, but do further disclose the present humour and state of the mind and will. For as your majesty saith most aptly and elegantly, “As the tongue speaketh to the ear so the gesture speaketh to the eye.” And, therefore, a number of subtle persons, whose eyes do dwell upon the faces and fashions of men, do well know the advantage of this observation, as being most part of their ability; neither can it be denied, but that it is a great discovery of dissimulations, and a great direction in business.

（2）这类知识主要有两个分支。就如所有的联盟具有共同的智力支持和办事机构一样，心智和身体的联结也包含了两个部分：发现与影响。一部分揭示另一部分的特征，一部分又作用于另一部分。前

者又引出了两种预知艺术，一种因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而受人尊崇，一种则因希波克拉底的见解而倍感荣光。尽管后世的人们在这两种艺术中混入了迷信和虚幻的成分，但如果能将其净化和复原，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着坚实的自然基础，同时能在人类生活中发挥一定的效用。这两种艺术分别是观相术和解梦术。观相术根据人体特征探知人的性情。解梦术是对人们梦境的解说，它是根据人们大脑的想象来分析他们的身体状况。我于前者中发现了一点缺陷。亚里士多德花费不少心血，对身体的构造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但他从未涉及身体的姿态，这在艺术领域同样是可被理解的，并且具有更大的优势和效用。人体特征的确能揭示心智的总体倾向与性情特征，不过，人们的面部表情与身体动作不仅能反应这些特点，还能透露人们当前的内心的情绪、心理状态与意愿等。陛下您曾说过一句非常雅致而又精当的话："语言说给耳朵听，姿态说给眼睛听。"因此，一些体察入微之人常常注意观察人们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因为他们懂得这种观察的益处，并把它看作自己的优势。不能否认的是，这种观察能帮助人们去伪存真，并能引导我们的行事作为。

(3) The latter branch, touching impression, hath not been collected into art, but hath been handled dispersedly; and it hath the same relation or *antistrophe* that the former hath. For the consideration is double—either， how and how far the humours and affects of the body do alter or work upon the mind, or, again, how and how far the passions or apprehensions of the mind do alter or work upon the body. The former of these hath been inquired and considered as a part and appendix of medicine, but much more as a part of religion or superstition. For the physician prescribeth cures of the mind in frenzies and melancholy passions, and pretendeth also to exhibit medicines to exhilarate the mind, to control the courage, to clarify the wits, to corroborate the memory, and the like; but the scruples and superstitions of diet and other regiment of the body in the sect of the Pythagoreans, in the heresy of the

Manichees, and in the law of Mahomet, do exceed. So likewise the ordinances in the ceremonial law, interdicting the eating of the blood and the fat, distinguishing between beasts clean and unclean for meat, are many and strict; nay, the faith itself being clear and serene from all clouds of ceremony, yet retaineth the use of fastlings, abstinences, and other macerations and humiliations of the body, as things real, and not figurative. The root and life of all which prescripts is (besides the ceremony) the consideration of that dependency which the affections of the mind are submitted unto upon the state and disposition of the body. And if any man of weak judgment do conceive that this suffering of the mind from the body doth either question the immortality, or derogate from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oul, he may be taught, in easy instances, that the infant in the mother's womb is compatible with the mother, and yet separable; and the most absolute monarch is sometimes led by his servants, and yet without subjection. As for the reciprocal knowledge, which is the operation of the conceits and passions of the mind upon the body, we see all wise physicians, in the prescriptions of their regiments to their patients, do ever consider *accidentia animi* , as of great force to further or hinder remedies or recoveries: and more specially it is an inquiry of great depth and worth concerning imagination, how and how far it altereth the body proper of the imaginant; for although it hath a manifest power to hurt, it followeth not it hath the same degree of power to help. No more than a man can conclude, that because there be pestilent airs, able suddenly to kill a man in health, therefore there should be sovereign airs, able suddenly to cure a man in sickness. But the inquisition of this part is of great use, though it needeth, as Socrates said, “*a Delian diver,* " being difficult and profound. But unto all this knowledge*de communi vinculo* , of the concordances between the mind and the body, that part of inquiry is most necessary which considereth of the seats and domiciles which the several faculties of

the mind do take and occupate in the organs of the body; which knowledge hath been attempted, and is controverted, and deserveth to be much better inquired. For the opinion of Plato, who placed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brain, animosity (which he did unfitly call anger, having a greater mixture with pride) in the heart, and concupiscence or sensuality in the liver, deserveth not to be despised, but much less to be allowed. So, then, we have constituted (as in our own wish and advice) the inquiry touching human nature entire, as a just portion of knowledge to be handled apart.

（3）这类知识的第二个分支，也就是关于影响的研究，尚未列入艺术行列，只是一些零散的研究。不过和第一个分支一样，它的研究对象具有关联或对应关系。这一研究的内容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身体的体液和刺激反应是如何且在何种程度上改变或影响人的心智；另一方面，心智上的激情或忧惧又是如何且在何种程度上改变或影响人的身体的。前一方面可作为医学的一部分或附属进行研究，不过更多时候还是被当作了宗教或迷信的一部分。医师会为狂躁和抑郁的心灵开列处方进行治疗，还会伪称能提供药物来让心智获得愉悦，情绪得到控制，智力得以净化，记忆得到增强等等。而且，毕达哥拉斯学派、摩尼教派和默罕默德提出的教规中对饮食或其他身体节制上的顾虑和迷信就显得更加过头了。同样，庆典法律中的规定对各方面限制甚多，又十分严格，如不得饮血和食用肥腻食物，必须区分干净与不干净的肉品等。虽然基督教的信念非常纯粹，将典礼仪式看得淡然，但还是保留着诸如禁食、戒酒和其他抑制与羞辱身体的戒条。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并不是仅仅装装样子而已。这样规定提出的根源（除了作为仪式）在于，人们的情感往往寄托并服从于身体的状态。一些缺乏判断力的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身体对心智的影响将引发对心智永恒性的质疑，或是造成至高无上的灵魂的贬损。我们就用几个简单的例子来回答他们。婴儿在母体中时与母亲是一个联结体，但同时又是分离开来的；最专制的君王也有听他侍臣话的时候，但这并不表示他服从于他们。与之对应的另一部分知识就是大脑中的观念和激

情对身体的影响和作用。我们看到，聪明的医生在开处方时，都会考虑到其对病患心理的影响，因为这对推进还是阻碍病情的治疗与康复具有很大的作用。更具体地说，这部分研究它关注的是心理想象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身体状况。尽管它具有明显的妨碍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积极作用也具有同样的效力。就像人们不能因为有害气体能瞬间剥夺一个健康之人的生命，就认为同样存在一种尊贵的气体，可瞬时治愈病人一样。由于这部分知识非常精深难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需要“一名得洛斯的潜水者”。然而，这类研究的效用是非常巨大的。在所有关于心智与身体的关联与对应的知识中，最应该探讨的是心智的各种官能与身体的那些器官分别对应并起作用。这方面已有一些尝试，也引发了不少争论，不过还是值得继续深究的。柏拉图将理解作为大脑活动，憎恶（他称其为愤怒，这并不恰当，因为这种情绪很大程度上混合了骄傲情绪）作为心灵的活动，而色欲或肉欲在肝脏中产生。这种观点我们不应忽视，但也不加认同。至此，我们已将人性作为知识的一个分支进行独立的研究，也为其建构了完整的研究框架（就如我们所期望和建议的那样）。

CHAPTER X

第十章

(1) The knowledge that concerneth man's body is divided as the good of man's body is divided, unto which it referreth. The good of man's body is of four kinds—health, beauty, strength, and pleasure: so the knowledges are medicine, or art of cure; art of decoration, which is called cosmetic; art of activity, which is called athletic; and art voluptuary, which Tacitus truly calleth *eruditus luxus* . This subject of man's body is, of all other things in nature, most susceptible of remedy; but then that remedy is most susceptible of error; for the same subtlety of the subject doth cause large possibility and easy failing, and therefore the inquiry ought to

be the more exact.

（1）至于人类身体知识的分类，与身体的良好状况的分类一致。身体的良好状况分四种情形，分别是健康、美丽、力量和愉悦。因而对应的知识就分为医学或医疗技术，修饰艺术或称美容，活动艺术或称体育运动，享乐艺术或塔西陀所称的“极致的奢华”。相较于自然中其他事物，人类身体是最容易进行补救的，但在补救过程中也是最容易犯错的。身体的精妙在带来巨大可能性的同时，也会导致更多的过失。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应力求更精密准确。

(2) To speak, therefore, of medicine, and to resume that we have said, ascending a little higher: the ancient opinion that man was microcosmus—an abstract or model of the world—hath been fantastically strained by Paracelsus and the alchemists, as if there were to be found in man's body certain correspondences and parallels, which should have respect to all varieties of things, as stars, planets, minerals, which are extant in the great world. But thus much is evidently true, that of all substances which nature hath produced, man's body is the most extremely compounded. For we see herbs and plants are nourished by earth and water; beasts for the most part by herbs and fruits; man by the flesh of beasts, birds, fishes, herbs, grains, fruits, water, and the manifold alterations, dressings, and preparations of these several bodies before they come to be his food and aliment. Add hereunto that beasts have a more simple order of life, and less change of affections to work upon their bodies, whereas man in his mansion, sleep, exercise, passions, hath infinite variations: and it cannot be denied but that the body of man of all other things is of the most compounded mass. The soul, on the other side, is the simplest of substances, as is well expressed:” *Purumque reliquitÆthereum sensum*

atque aurai simplicis ignem. ” So that it is no marvel though the soul so placed enjoy no rest, if that principle be true, that *Motus rerum est rapidus extra locum, placidus in loco* . But to the purpose. This variable composition of man's body hath made it as an instrument easy to distemper; and, therefore, the poets did well to conjoin music and medicine in Apollo, because the office of medicine is but to tune this curious harp of man's body and to reduce it to harmony. So, then, the subject being so variable hath made the art by consequent more conjectural; and the art being conjectural hath made so much the more place to be left for imposture. For almost all other arts and sciences are judged by acts or masterpieces, as I may term them, and not by the successes and events. The lawyer is judged by the virtue of his pleading, and not by the issue of the cause; this master in this ship is judged by the directing his course aright, and not by the fortune of the voyage; but the physician, and perhaps this politique, hath no particular acts demonstrative of his ability, but is judged most by the event, which is ever but as it is taken: for who can tell, if a patient die or recover, or if a state be preserved or ruined, whether it be art or accident?And therefore many times the impostor is prized, and the man of virtue taxed. Nay, we see [the] weakness and credulity of men is such, as they will often refer a mountebank or witch before a learned physician. And therefore the poets were clear-sighted in discerning this extreme folly when they made Æsculapius and Circe, brother and sister, both children of the sun, as in the verses—“*Ipse repertorem medicinæ talis et artisFulmine Phœbigenam Stygias detrusit ad undas* .” And again—“*Dives inaccessos ubi Solis filia lucos,&c.* " For in all times, in the opinion of the multitude, witches and old women and impostors, have had a competition with physicians. And what followeth?Even this, that physicians say to themselves, as Solomon expresseth it upon a higher occasion, “If it befall to me as befalleth to the fools, why should I labour to be more wise?” And therefore I

cannot much blame physicians that they use commonly to intend some other art or practice, which they fancy more than their profession; for you shall have of them antiquaries, poets, humanists, statesmen, merchants, divines, and in every of these better seen than in their profession; and no doubt upon this ground that they find that mediocrity and excellency in their art maketh no difference in profit or reputation towards their fortune: for the weakness of patients, and sweetness of life, and nature of hope, maketh men depend upon physicians with all their defects.But, nevertheless, these things which we have spoken of are courses begotten between a little occasion and a great deal of sloth and default; for if we will excite and awake our observation, we shall see in familiar instances what a predominant faculty the subtlety of spirit hath over the variety of matter or form. Nothing more variable than faces and countenances, yet men can bear in memory the infinite distinctions of them; nay, a painter, with a few shells of colours, and the benefit of his eye, and habit of his imagination, can imitate them all that ever have been, are, or may be, if they were brought before him. Nothing more variable than voices, yet men can likewise discern them personally: nay, you shall have a *buffon* or *pantomimus* will express as many as he pleaseth. Nothing more variable than the differing sounds of words; yet men have found the way to reduce them to a few simple letters. So that it is not the insufficiency or incapacity of man's mind, but it is the remote standing or placing thereof that breedeth these mazes and incomprehensions; for as the sense afar off is full of mistaking, but is exact at hand, so is it of the understanding, the remedy whereof is, not to quicken or strengthen the organ, but to go nearer to the object; and therefore there is no doubt but if the physicians will learn and use the true approaches and avenues of nature, they may assume as much as the poet saith:—"*Et quoniam variant morbi, variabimus artes; Mille mali species, mille salutis erunt* ." Which that

they should do, the nobleness of their art doth deserve: well shadowed by the poets, in that they made AEsculapius to be the son of [the] sun, the one being the fountain of life, the other as the second-stream; but infinitely more honoured by the example of our Saviour, who made the body of man the object of His miracles, as the soul was the object of His doctrine. For we read not that ever He vouchsafed to do any miracle about honour or money (except that one for giving tribute to Cæsar), but only about the preserving, sustaining, and healing the body of man.

（2）接着之前的话题，我们继续来谈论医学，不过需提升一定的高度。古时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人本身就是一个微观世界，是外部世界的抽象化或缩小模型。然而，这一观念却被帕拉切尔苏斯和炼金术士们过分夸大，说得像是自然世界中的所有事物，包括恒星、行星、矿物等，都能在人体中找出对应或相似物质。不过在自然世界的所有物质中，人的身体显然是最为复杂的。我们看到，草木的生长依靠土壤和水分，动物的生存大部分依靠草木和果实，人则需兽类、鸟类、鱼类的肉体和草木、谷物、果实、水分等的供养。不仅如此，它们在成为人类的食物和养料前，还需经过一系列改造、加工和配制。同时我们知道，动物的生命形态趋于简单，情感变化较少，对身体的影响也不多。然而人类在居住、睡眠、运动、激情等方面都是变化不定的。比起其他任何事物，人类的身体是最复杂的组合。但另一方面，人类的灵魂在所有物质中又是最简单的。古诗中就有精妙的表达："独有'以太'明明在，天光之英照终古。""一切事物在外部环境中都是急速运动的，但内部却保持着平静。"如果这一原理是正确的，那么人们的灵魂虽处在这样的位置，却不能获得平静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目的。人类身体构成的多变性使其易于出现动乱现象。诗人们曾将音乐和医药在阿波罗身上实现结合，因为医药的职能在于调和人类身体这一稀奇的竖琴，令其归于和谐。身体这一主体的多变性同时导致了医学技艺充满推测意味。而这种推测性又给虚伪和欺骗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对所有其他技艺和科学的评判几乎都

是建立在分析它们的作为或作品（如果能这么称呼的话）上，而不是取决于它们获得的成功或结果。对律师的评价并不是根据案件的结果，而是他在期间的辩护能力；对船长的评价并不是看航程的景况如何，而是根据他指引航道的正确性。不过，对于医生，或许还有政治家，他们的能力无法通过某些具体事件展现出来，通常只能根据事件的结果来评判，似乎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们造成的。但谁又知道，一个病患死亡或是痊愈，一个政体被保住或被摧毁，这样的结果究竟是人为还是意外？于是，很多时候，骗子获得人们的赞美，真正有德行的人却备受指责。同时，人们患病时，通常宁可相信江湖郎中或女巫的骗术，也不去向精通医术的医师求助。人类的软弱与轻信竟到如此地步。诗人眼光敏锐，早已看穿这种荒唐至极的想法。他们将医神爱斯库拉皮厄斯与女巫喀耳刻塑造成太阳神的子女，他们便是兄妹。诗中说道："维彼名医，日神之男；天神雷震，投于阴间。"同时，他们提到："日神之女，富有的喀耳刻，转眼即逝，身后歌声不绝。"自古以来，在民众眼里，女巫、老妇和骗子都与医师存在着竞争关系。接下来如何？在这样的处境下，医师们就会自问，就像所罗门在一重大场合中所说的那样，"愚昧人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因此，他们经常有意尝试其他技术或工作，还抱以比自己的职业更大的热诚，对此我们也不能过于指责他们了。这些医师还往往兼任如古物研究者、诗人、人文学者、政治家、商人、牧师等各类身份，而且在各行业中的成就远远大于本身的职业。正因如此，他们认为医术如何并不影响他们的收益和名声。病人患病虚弱之时，便会感到生活的美好，自然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医师身上，无论他们存在多少不足都不会成为问题。这些现象部分是由环境造成的，最大的因由仍在于医师自身的怠惰与过失。如果我们敏锐观察，便可在很多常见的例子中发现，人类的精神十分微妙，它能产生卓绝的力量，远远胜过各类外在的物质或形式。人类的面容与表情是最变化无常的，但人们还是能一一辨别和记住它们。画家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只需一点颜料，就能描摹出眼前的或曾经出现过的任何表情。人类的嗓音也是最丰富多变的，但人们照样能辨识出不同人的声音，一些舞台剧表演者甚至还能任意发出不同的声音。单词的发音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却还是找到了简化的方法，将它们用几个简单字母来表

示。所以，人们的这些茫然与不解并非由于人类心智缺乏能力，而是在于他们不愿接近，只懂远观。事物离得远了，人们的感觉就会有很多偏差，但十分接近时，就能准确感知了。人们对事物的理解也一样。因此，要想解开这些茫然，应该接近尝试了解的对象，而不是强化我们的人体器官。如果医师能掌握并运用了解自然的真正途径与方法，他们就能实现诗人所说的："疾病多变化，治法自不同；你有千种病，我有千法攻。"事实上，他们应该做到如此。这一技艺享受的尊贵地位也值得他们这样做。诗人在其作品中就有精妙的暗示，他们将爱斯库拉皮厄斯作为太阳神的儿子，太阳神是一切生命的起源，医神便成了生命的支流。而医师的地位在我们的救世主的做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更受到人们的推崇。他把人类的身体作为他所创奇迹的载体，把人类的灵魂作为他传输教义的媒介。不过，我们的救世主从来不创造奇迹以赐予人们荣耀或财富（除了为向恺撒表示敬意而显示了一次奇迹），他只是通过奇迹来保护、维持和治愈人们的身体。

(3) Medicine is a science which hath been (as we have said) more professed than laboured, and yet more laboured than advanced; the labour having been, in my judgment, rather in circle than in progression. For I find much iteration, but small addition. It considereth causes of diseases, with the occasions or impulsions; the diseases themselves, with the accidents; and the cures, with the preservations. The deficiences which I think good to note, being a few of many, and those such as are of a more open and manifest nature, I will enumerate and not place.

（3）医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中（我们之前就提到过）浮夸的成分多过踏实作为，而踏实的作为又比发展程度来得多。我认为，所有的精力投入都徘徊于原地，并没有向前迈进。因为我发现，很多研究内容都是相互交叉糅合，却少有新的发现。要想推动医学的发展，应该在研究病因时，考虑其发病时机或诱因；研究疾病本身时，考虑其

偶发状况；探索治疗方法时，又应充分考虑长远效用。这部分存在的缺陷很多，在此我认为有几点必须指出来。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我并不多加阐述，只稍作列举。

(4) The first is the discontinuance of the ancient and serious diligence of Hippocrates, which used to set down a narrative of the special cases of his patients, and how they proceeded, and how they were judged by recovery or death. Therefore having an example proper in the father of the art, I shall not need to allege an example foreign, of the wisdom of the lawyers, who are careful to report new cases and decisions, for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judgments. This continuance of medicinal history I find deficient; which I understand neither to be so infinite as to extend to every common case, nor so reserved as to admit none but wonders: for many things are new in this manner, which are not new in the kind; and if men will intend to observe, they shall find much worthy to observe.

（4）首先，古人希波克拉底那种勤奋严谨的态度已经不见踪影。按照希波克拉底的做法，特殊病例及其病情的发展、诊断康复或死亡的标准等都需一一记录。这一医学之父已是一个完美例证，我就无需再列举其他行业的例子了，比如聪明的律师懂得将所有新案例及其结果记录备案，以指导今后的判断。医学史的这一传统并没有得到延续，这便是一大缺憾。我认为，我们无需长篇累牍地记录每个普通的病例，也不能过于保留，只将稀奇古怪的病例记录在案，因为有些病症并非新的类型，但在表现形式上较新颖，这样的情况也是值得记录的。如果人们悉心观察，便会发现，这样的观察工作都是十分值得的。

(5) In the inquiry which is made by anatomy, I find much

deficience: for they inquire of the parts, and their substances, figures, and collocations; but they inquire not of the diversities of the parts, the secrecies of the passages, and the seats or nestling of the humours, nor much of the footsteps and impressions of diseases. The reason of which omission I suppose to be, because the first inquiry may be satisfied in the view of one or a few anatomies; but the latter, being comparative and casual, must arise from the view of many. And as to the diversity of parts, there is no doubt but the facture or framing of the inward parts is as full of difference as the outward, and in that is the cause continent of many diseases; which not being observed, they quarrel many times with the humours, which are not in fault; the fault being in the very frame and mechanic of the part, which cannot be removed by medicine alterative, but must be accommodated and palliated by diets and medicines familiar. And for the passages and pores, it is true which was anciently noted, that the more subtle of them appear not in anatomies, because they are shut and latent in dead bodies, though they be open and manifest in life: which being supposed, though the inhumanity of *anatomia vivorum* was by Celsus justly reproved; yet in regard of the great use of this observation, the inquiry needed not by him so slightly to have been relinquished altogether, or referred to the casual practices of surgery; but might have been well diverted upon the dissection of beasts alive, which notwithstanding the dissimilitude of their parts may sufficiently satisfy this inquiry. And for the humours, they are commonly passed over in anatomies as purgaments; whereas it is most necessary to observe, what cavities, nests, and receptacles the humours do find in the parts, with the differing kind of the humour so lodged and received. And as for the footsteps of diseases, and their devastations of the inward parts, impostumations, exulcerations, discontinuations, putrefactions, consumptions, contractions, extensions, convulsions, dislocations, obstructions, repletions, together with all preternatural

substances, as stones, carnosities, excrescences, worms, and the like; they ought to have been exactly observed by multitude of anatomie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men's several experiences, and carefully set down both historically according to the appearances, and artificially with a reference to the diseases and symptoms which resulted from them, in case where the anatomy is of a defunct patient; whereas now upon opening of bodies they are passed over slightly and in silence.

（5）我在解剖学研究领域发现了不少缺陷。解剖学研究的是身体的局部，包括它们的构成物质、形状和组合方式等。但是，这些局部的差异性、通路的隐秘性和体液的聚集场所等并没有研究，疾病的迹象也没受到应有的关注。在我看来，出现这种疏漏的原因在于，初步的研究只需解剖少量尸体就能实现；但在之后往往需进行比较研究或探知各种偶然现象，因而必须进行多次解剖。至于身体局部的差异性，需要肯定的是，人体内部的构成或框架与外部形态一样，是千差万别的。而那里正是很多疾病的发源地。然而，人们非但不进行慎重检查，反而经常埋怨是体液的过错。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病因恰恰是在身体局部的结构和运转上。这样的疾病无法通过旨在改善体质的药物来治疗，只能依靠日常饮食和常见药物的调理与缓解。古人在解释人体的通路和细孔时曾说过，它们的精细复杂程度并非体现在解剖学上，因为很多精细的孔道在活体中是开放的、明显的，但在人死亡之后，它们就闭合并隐藏了起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观点，尽管人们义正言辞地谴责塞尔苏斯解剖活人的不合乎人道，但考虑到这种方式带来的巨大功效，我们也不能轻易放弃这种探索，或可以在偶然的外科手术中得到实现。我们如果把解剖活人转移到对动物的活体解剖，这或许也是一种较好的办法，因为动物的构造虽与人类的存在差别，但足以满足研究的需要。体液在解剖学中普遍被当成是一种排泄物而受到忽略。对体液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不仅应了解它们存在于身体哪些部位的腔体、孔穴和贮所，还应探究同一部位体液的差异性与种类。至于疾病的迹象以及它们对身体内

部的损毁，如脓肿、溃疡、断裂、腐烂、肺结核、挛缩、肌肉扩张、抽搐、脱臼、栓塞、过剩以及产生的所有异常物质如结石、赘肉、毒瘤及蠕虫等，这些需要经过大量解剖实验得到充分的研究，同时结合人们的亲身经历，根据它们的病状和被发现的顺序仔细记录，并添加上各自导致的疾病及病症，这些可通过解剖尸体观察得到。但如今的现状是，自打开尸体那一刻，这些现象都被轻易略过，无人观察，也无人提及。

(6) In the inquiry of diseases, they do abandon the cures of many, some as in their nature incurable, and others as past the period of cure; so that Sylla and the Triumvirs never proscribed so many men to die, as they do by their ignorant edicts: whereof numbers do escape with less difficulty than they did in the Roman prescriptions. Therefore I will not doubt to note as a deficience, that they inquire not the perfect cures of many diseases, or extremities of diseases; but pronouncing them incurable do enact a law of neglect, and exempt ignorance from discredit.

（6）在疾病诊治中，医师对很多病状都放弃治疗，一些是由于本身就是不治之症，还有一些则是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阶段。比起那些被西拉和罗马三执政所处死的人，这种愚蠢至极的宣告所害死的人要多得多。但事实是，他们逃离死亡的可能性比起被那些君王宣判死刑的人要大多了。因此，对于医师从不尽心研究和治疗大量疾病或疾病的绝境状态，我不得不说这是个极大的缺陷。宣告不治就等于颁布了忽略法规，让他们不必因无知而丧失名誉。

(7) Nay further, I esteem it the office of a physician not only to restore health, but to mitigate pain and dolors; and not only when such mitigation may conduce to recovery, but when it may serve to

make a fair and easy passage. For it is no small felicity which Augustus Cæsar was wont to wish to himself, that same *Euthanasia* ; and which was specially noted in the death of Antoninus Pius, whose death was after the fashion, and semblance of a kindly and pleasant sheep. So it is written of Epicurus, that after his disease was judged desperate, he drowned his stomach and senses with a large draught and ingurgitation of wine; whereupon the epigram was made, *Hinc Stygias ebrius hausit aquas* ; he was not sober enough to taste any bitterness of the Stygian water. But the physicians contrariwise do make a kind of scruple and religion to stay with the patient after the disease is deplored; whereas in my judgment they ought both to inquire the skill, and to give the attendances, for the facilitating and assuaging of the pains and agonies of death.

（7）而且，我认为医师的职责并不仅限于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还应缓解他们的疼痛与忧伤。这种缓解不仅局限于对恢复健康有好处时，即使在人们大限将至时，也要减轻其痛苦，帮助他们轻松上路。毫无痛苦的走完人生，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奥古都斯·恺撒就常希望在他的人生尽头能没有痛苦。这在安东尼·皮乌身上就更加明显了。他也是安乐中去世的，当时，他的面容就像一只温和快乐的绵羊那样安详。据记载，伊壁鸠鲁也是这样的情况。当他被诊断出绝症时，便痛饮美酒，填满腹部，也麻醉了感官。人们非常精辟地做诗说道，他醉到连冥河的苦味都尝不出来了。然而，在病人被确诊时，医师们却开始对他们有所顾忌，不愿和他们待在一起。我认为，医师不仅不该如此，更应该一面探索新的治疗方法，一面照料病人，缓解他们的疼痛，抚慰他们面临死亡的哀伤。

(8)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ures of diseases, I find a deficience in the receipts of propriety, respecting the particular cures of diseases: for the physicians have frustrated the fruit of

tradition and experience by their magistralities, in adding and taking out and changing *quid pro qua* in their receipts, at their pleasures; commanding so over the medicine, as the medicine cannot command over the disease. For except it be treacle and *mithridatum* , and of late *diascordium* , and a few more, they tie themselves to no receipts severely and religiously. For as to the confections of sale which are in the shops, they are for readiness and not for propriety. For they are upon general intentions of purging, opening, comforting, altering, and not much appropriate to particular diseases. And this is the cause why empirics and old women are more happy many times in their cures than learned physicians, because they are more religious in holding their medicines. Therefore here is the deficience which I find, that physicians have not, partly out of their own practice, partly out of the constant probations reported in books, and partly out of the traditions of empirics, set down and delivered over certain experimental medicines for the cure of particular diseases, besides their own conjectural and magistral descriptions. For as they were the men of the best composition in the state of Rome, which either being consuls inclined to the people, or being tribunes inclined to the senate; so in the matter we now handle, they be the best physicians, which being learned incline to the traditions of experience, or being empirics incline to the methods of learning.

（8）至于疾病疗法，我认为在处方的合理性上存有缺陷，特定的病症并不一定运用了最恰当的处方来治疗。医师在开列处方时，经常随意添加或删减或更换其中的某些药物，使得它们无法真正对抗疾病。他们的这种独断做法无疑损害了传统与经验带来的效果。除非是一些像盖伦丸以及后来出现的名为达尔斯括迪尔木的解毒剂，否则他们从不真诚信赖或严格遵从任何配方。至于药店中的药剂，它们只是为方便起见而提前配制的，并不能对症下药。它们的疗效通常只是顺

肠、消化、缓解疼痛、调理身体等，对特定疾病是没有针对性的。这就是为何庸医与老妇常常比医师更信赖的原因。与医师不同，庸医和老妇对自己的药物都是非常虔诚和信赖的。因此，医师不仅要根据推测得出对病症的独断描述，更应遵循自己的实践经验和书中记载的试验良方，甚至结合庸医的常规用药，在此基础上为特定疾病的治疗开列处方，运用药物，查看效果。但是，当今的医师做不到这一点，这便是他们的缺陷。在罗马，各阶层的人们有着最佳的组合。执政官偏向于维护民众，护民官则偏向于元老院。在我们所探讨的话题上，同样可有这样的组合。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师，本身博学者就该偏向于学习古时的传统与经验，本身实践经验丰富的就该多关注研究方法问题。

(9) In preparation of medicines I do find strange, specially considering how mineral medicines have been extolled, and that they are safer for the outward than inward parts, that no man hath sought to make an imitation by art of natural baths and medicinable fountains: which nevertheless are confessed to receive their virtues from minerals; and not so only, but discerned and distinguished from what particular mineral they receive tincture, as sulphur, vitriol, steel, or the like; which nature, if it may be reduced to compositions of art, both the variety of them will be increased, and the temper of them will be more commanded.

（9）对于药物的配制，我感到非常惊讶，特别是对于人们对矿物质药物的过分推崇。根据他们的说法，这类药物用于外科疾病比内科会更加安全。然而，人们虽然已经了解到，很多自然浴场或药用泉水的效用都是矿物质在起作用，但他们并不曾仿制类似药物。不但如此，他们还辨别出了哪些矿物质会影响水的颜色，如硫磺、硫酸盐和铁质等。如果能对这些特性进行浓缩与合成，不但能拓展它们的种类，同时也能提升其性能。

(10) But lest I grow to be more particular than is agreeable either to my intention or to proportion, I will conclude this part with the note of one deficience more, which seemeth to me of greatest consequence: which is, that the prescripts in use are too compendious to attain their end; for, to my understanding, it is a vain and flattering opinion to think any medicine can be so sovereign or so happy, as that the receipt or miss of it can work any great effect upon the body of man. It were a strange speech which spoken, or spoken oft, should reclaim a man from a vice to which he were by nature subject. It is order, pursuit, sequence, and interchange of application, which is mighty in nature; which although it require more exact knowledge in prescribing, and more precise obedience in observing, yet is recompensed with the magnitude of effects. And although a man would think, by the daily visitations of the physicians, that there were a pursuance in the cure, yet let a man look into their prescripts and ministrations, and he shall find them but inconstancies and every day's devices, without any settled providence or project. Not that every scrupulous or superstitious prescript is effectual, no more than every straight way is the way to heaven; but the truth of the direction must precede severity of observance.

（10）以免我对自己的目的愈发挑剔，对各部分的均衡性愈发苛刻，我只再阐述一个最重要的缺陷，便结束这部分的讨论。这一缺陷就是，如今的处方都太过简单，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我看来，那种认为所有药物都是非常有效的，一旦服用或者停用，都对身体产生很大的影响的想法，是一种自负而虚妄的。这就如我们仅用一句话，或经常重复一句话，就能令一个本性堕落之人改邪归正一样不可思议。从本质上说，真正发挥强大作用的是用药的次序、持续性、连续性与交替性。尽管要达到这一要求，需要在开列药方时结合更为严密科学

的知识，并在诊治研究中更加严格遵循，但这样的付出必然会报以最大的效用。或许经常求医之人觉得，医师在悉心治疗他的病情，但如果仔细察看开具的药方和提供的照顾，不难发现，医师的做法一日一换，日异月殊，缺乏固定的方案与计划。不过，正如并非所有阳关大道都通向天堂，并不是一切严谨或盲目推崇的药方都具有实效，但只有先把握了正确的方向，继而才能严格遵循和实行。

(11) For cosmetic, it hath parts civil, and parts effeminate: for cleanness of body was ever esteemed to proceed from a due reverence to God, to society, and to ourselves. As for artificial decoration, it is well worthy of the deficiences which it hath; being neither fine enough to deceive, nor handsome to use, nor wholesome to please.

（11）美容包含礼节性的美容和针对女性的美容两类。从前者的角度来说，洁净的身体是对上帝、社会和自身应有的一种礼节。后者是一种人为的修饰，这种修饰既不能完全遮掩瑕疵，也无法增加美观功效，又无益于身体健康。说它存在巨大缺陷一点都不为过。

(12) For athletic, I take the subject of it largely, that is to say, for any point of ability whereunto the body of man may be brought, whether it be of activity, or of patience; whereof activity hath two parts, strength and swiftness; and patience likewise hath two parts, hardness against wants and extremities, and endurance of pain or torment; whereof we see the practices in tumblers, in savages, and in those that suffer punishment.Nay, if there be any other faculty which falls not within any of the former divisions, as in those that dive, that obtain a strange power of containing respiration, and the like, I refer it to this part. Of these things the practices are known,

but the philosophy that concerneth them is not much inquired; the rather, I think, because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obtained, either by an aptness of nature, which cannot be taught, or only by continual custom, which is soon prescribed which though it be not true, yet I forbear to note any deficiences; for the Olympian games are down long since, and the mediocrity of these things is for use; as for the excellency of them it serveth for the most part but for mercenary ostentation.

（12）体育运动，广义上说，包括任何提高人们身体活跃度或忍耐力的活动。我们就从这一广义层面进行探讨。活跃度包括力量与敏捷度两种。忍耐力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欲求和极端行为的抵御力，二是对苦难和折磨的承受力。我们可以在杂技演员、野蛮人和那些遭受惩罚的人身上看到这些能力。如果还存在其他能力没有包括在上述分类中，比如潜水中屏住呼吸，我们都将它们列入到忍耐力之中。这些能力得到了广泛的实践，但与之相关的哲学研究却并不多见。或许在人们看来，这些或是天赋使然，无法传授；或是历久产生的习性，可迅速获得，这种想法无疑是错误的。但这方面的缺陷我还是不再提及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已长久被禁，如今人们尚在运用的只不过是一些平庸的技能，而那些精妙卓绝的能力通常却沦为利益驱使下的卖弄行径。

(13) For arts of pleasure sensual, the chief deficience in them is of laws to repress them. For as it hath been well observed, that the arts which flourish in times while virtue is in growth, are military; and while virtue is in state, are liberal; and while virtue is in declination, are voluptuary: so I doubt that this age of the world is somewhat upon the descent of the wheel. With arts voluptuary I couple practices joculary; for the deceiving of the senses is one of the pleasures of the senses. As for games of recreation, I hold them

to belong to civil life and education. And thus much of that particular human philosophy which concerns the body, which is but the tabernacle of the mind.

（13）至于享乐艺术，其主要缺陷在于缺乏约束它们的法规。我们看到，在道德成长阶段，最盛行的技艺在军事领域；道德成形阶段，技艺的发展不受拘束，如百花齐放；而在道德衰落时，最活跃的技艺沉迷于酒色享乐之中。不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否已是江河日下了。在此，我将滑稽表演与享乐艺术结合起来，因为蒙骗感官也是感官享乐方式之一。至于娱乐活动，我觉得它们更适合列入民众生活与教育的范围。与身体这一灵魂寄居地相关的人类哲学部分的讨论就到此为止。

CHAPTER XI

第十一章

(1) For human knowledge which concerns the mind, it hath two parts; the one that inquireth of the substance or nature of the soul or mind, the other that inquireth of the faculties or functions thereof. Unto the first of these, the considerations of the original of the soul, whether it be native or adventive, and how far it is exempted from laws of matter, and of the immortality thereof, and many other points, do appertain: which have been not more laboriously inquired than variously reported; so as the travail therein taken seemeth to have been rather in a maze than in a way. But although I am of opinion that this knowledge may be more really and soundly inquired, even in nature, than it hath been, yet I hold that in the end it must be hounded by religion, or else it will be subject to deceit and delusion. For as the substance of the soul in

the creation was not extracted out of the mass of heaven and earth by the benediction of a *producat* , but was immediately inspired from God, so it is not possible that it should be (otherwise than by accident) subject to the laws of heaven and earth, which are the subject of philosophy; and therefore the true knowledge of the nature and state of the soul must come by the same inspiration that gave the substance. Unto this part of knowledge touching the soul there be two appendices; which, as they have been handled, have rather vapoured forth fables than kindled truth: divination and fascination.

（1）与心智相关的人类知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灵魂或心智的本质，二是关于其功能。前者的研究关注灵魂的来源，探究灵魂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产生的，在何种程度上不受自然法则的控制，又是否永生等相关问题。这部分研究虽有广泛多样的记载，却没有得到勤勉尽心的探索。花费的精力似乎只是徘徊于迷茫混沌之中，并没有找到前行的通路。我认为，这部分知识仍需得到更彻底而可靠的探索，即使在自然界中也一样。但是，它们的最终还是归属于宗教之中，否则必会受到虚伪与欺骗的侵扰。构成灵魂的物质并非来源于创世时上帝恩赐的天空与大地，而是直接在上帝的启示下产生的。因此，灵魂无需受到（偶然情况除外）任何天空和大地的法则制约，这些法则也就是哲学研究的范围。真正关于灵魂本质和状态的知识与其构成物质得到的是同一种神谕。关于灵魂的这部分知识存在两类附属，预言术和蛊惑术。它们只不过是从古代神话中幻化出来的产物，充满荒诞虚无，并无任何真理的光芒。

(2) Divination hath been anciently and fitly divided into artificial and natural: whereof artificial is, when the mind maketh a prediction by argument, concluding upon signs and tokens; natural is, when the mind hath a presention by an internal power, without

the inducement of a sign. Artificial is of two sorts: either when the argument is coupled with a derivation of causes, which is rational; or when it is only grounded upon a coincidence of the effect, which is experimental: whereof the latter for the most part is superstitious, such as were the heathen observations upon the inspection of sacrifices, the flights of birds, the swarming of bees; and such as was the Chaldean astrology, and the like. For artificial divination, the several kinds thereof are distributed amongst particular knowledges. The astronomer hath his predictions, as of conjunctions, aspects, eclipses, and the like. The physician hath his predictions, of death, of recovery, of the accidents and issues of diseases. The politique hath his predictions; *O urbem venalem, et cito perituram, si emptorem invenerit* !which stayed not long to be performed, in Sylla first, and after in Cæsar: so as these predictions are now impertinent, and to be referred over. But the divination which springeth from the internal nature of the soul is that which we now speak of; which hath been made to be of two sorts, primitive and by influxion. Primitive is grounded upon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mind, when it is withdrawn and collected into itself, and not diffused into the organs of the body, hath some extent and latitude of prenotion; which therefore appeareth most in sleep, in ecstasies, and near death, and more rarely in waking apprehensions; and is induced and furthered by those abstinences and observances which make the mind most to consist in itself. By influxion, is grounded upon the conceit that the mind, as a mirror or glass, should take illumination from the foreknowledge of God and spirits: unto which the same regiment doth likewise conduce. For the retiring of the mind within itself is the state which is most susceptible of divine influxions; save that it is accompanied in this case with a fervency and elevation (which the ancients noted by fury), and not with a repose and quiet, as it is in the other.

（2）预言术自古就被恰如其分地划分为人为的和自然的两个方面。人为的预言指的是大脑通过对迹象和前兆的分析总结作出的预测；自然的预言是指没有任何迹象引导，大脑仅凭内在的力量就展现出一种预示。人为预言又分两种。一种在分析迹象时结合了原因的引出，这是理性的预言；另一种仅仅依靠这些迹象产生的效应的偶合，这是经验性的预言。这种经验性的预言往往充满迷信色彩，如异教徒对圣餐仪式、鸟类飞行和蜜蜂分蜂等的观察，或是迦勒底人的占星术等等都是迷信行为。各类型的人为预言分别散布于不同的知识领域。天体学家对诸如星辰的会合、相位及日蚀月蚀等现象作出预测。医师对病患的死亡、康复及疾病的偶发状况和产生结果等作出预测。政治家也会进行预测。“这座城要出售，只要找到买家，便会即刻灭亡。”不久，这一预测就首先在西拉，后又在恺撒身上应验。当然，这些预言与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关联并不大，就不再赘述了。现在，我们来探讨依靠灵魂内在力量展现的预言。它已被分为两类，原始的和倾注的。人们在聚精会神时，头脑中便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预想，原始预言就是基于这种推测之上的。它们通常在睡眠、入神和临死之时出现，有时也会在清醒状态下显现，但这种情况十分少见。它的诱发和推动可依靠禁食及奉行其他令大脑专注的规定来实现。人们的头脑如同镜子或玻璃一般，能受启于上帝和神灵的预知，并在自身大脑中形成相应的预想。倾注性预言就是根据这种想法而产生的。而上述的节制方式对倾注性预言的促发同样有效。大脑在全神贯注之时，最易接受神圣预知的倾注，除非脑中充溢了炽热而激昂的情绪（古人称之为狂热），无法安定平静下来。

(3) Fascination is the power and act of imagination intensive upon other bodies than the body of the imaginant, for of that we spake in the proper place. Wherein the school of Paracelsus, and the disciples of pretended natural magic, have been so intemperate, as they have exalted the power of the imagination to be much one with the power of miracle-working faith. Others, that draw nearer to probability, calling to their view the secret passages of things,

and specially of the contagion that passeth from body to body, do conceive it should likewise be agreeable to nature that there should be some transmissions and operations from spirit to spirit without the mediation of the senses; whence the conceits have grown (now almost made civil) of the mastering spirit, and the force of confidence, and the like. Incident unto this is the inquiry how to raise and fortify the imagination; for if the imagination fortified have power, then it is material to know how to fortify and exalt it. And herein comes in crookedly and dangerously a palliation of a great part of ceremonial magic. For it may be pretended that ceremonies, characters, and charms do work, not by any tacit or sacramental contract with evil spirits, but serve only to strengthen the imagination of him that useth it; as images are said by the Roman Church to fix the cogitations and raise the devotions of them that pray before them. But for mine own judgment, if it be admitted that imagination hath power, and that ceremonies fortify imagination, and that they be used sincerely and intentionally for that purpose; yet I should hold them unlawful, as opposing to that first edict which God gave unto man, *In sudore vultus comedes panem tuum* . For they propound those noble effects, which God hath set forth unto man to be bought at the price of labour, to be attained by a few easy and slothful observances. Deficiences in these knowledges I will report none, other than the general deficience, that it is not known how much of them is verity, and how much vanity.

（3）蛊惑术是一种精深的想象能力与想象行为，施展的想象都是作用于他人身体而非自身，这点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帕拉塞尔苏斯学派和伪自然巫术的信徒们却把想象的力量吹捧得如信仰神迹的力量一般，这简直荒谬至极。有些人则利用概率原理，在观察到事物之间存在秘密通路，特别是身体与身体之间容易相互传染之后，便认为，

便认为这一现象同样符合自然本性，没有感官的间接作用，灵魂与灵魂之间照样能够实现某种相互传输而相互作用。于是，一些控制灵魂、强加信念等妄想便油然而生。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和增强想象力。如果增强后的想象具有更大的力量，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探究如何才能增强这种能力。不过这样一来，可能会出现一种非常危险而又邪恶的状况，即间接为那些典礼上的巫术找到了辩驳的借口。人们会妄言，那些典礼、符咒与咒语的效力并不在于和邪恶神灵进行无言而神圣的对话，而仅仅是增强巫术针对的对象的想象力，正如罗马教会所说，在祈祷者面前摆放偶像，是为了使他们更加专注，更加虔诚。然而，即使承认这些说法，认为想象具有一定能效，典礼仪式能增强想象力，人们也能够真诚地利用想象力来实现某种目的，我仍然坚持，这些做法都是不合法规的。因为上帝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蛊惑术就违背了这条法令。在蛊惑术中，人们仅仅通过一些简单懒散的仪式，就宣称取得了上帝要求人们辛勤劳作才能换来的高级效益。对于以上这部分知识，我只提出一种普遍存在的缺陷，即我们无法知道，这些知识中真实的成分有多少，又有多少是虚幻的。

CHAPTER XII

第十二章

(1) The knowledge which respecteth the faculties of the mind of man is of two kinds—the one respecting his understanding and reason, and the other his will, appetite, and affection; whereof the former produceth position or decree, the latter action or execution. It is true that the imagination is an agent or nuncius in both provinces, both the judicial and the ministerial. For sense sendeth over to imagination before reason have judged, and reason sendeth over to imagination before the decree can be acted. For imagination ever precedeth voluntary motion. Saving that this Janus of

imagination hath differing faces: for the face towards reason hath the print of truth, but the face towards action hath the print of good; which nevertheless are faces, *"Quales decet esse sororum."* Neither is the imagination simply and only a messenger; but is invested with, or at least wise usurpeth no small authority in itself, besides the duty of the message. For it was well said by Aristotle, "That the mind hath over the body that commandment, which the lord hath over a bondman; but that reason hath over the imagination that commandment which a magistrate hath over a free citizen," who may come also to rule in his turn. For we see that, in matters of faith and religion, we raise our imagination above our reason, which is the cause why religion sought ever access to the mind by similitudes, types, parables, visions, dreams. And again, in all persuasions that are wrought by eloquence, and other impressions of like nature, which do paint and disguise the true appearance of things, the chief recommendation unto reason is from the imagination. Nevertheless, because I find not any science that doth properly or fitly pertain to the imagination, I see no cause to alter the former division. For as for poesy, it is rather a pleasure or play of imagination than a work or duty thereof. And if it be a work, we speak not now of such parts of learning as the imagination produceth, but of such sciences as handle and consider of the imagination. No more than we shall speak now of such knowledges as reason produceth (for that extendeth to all philosophy), but of such knowledges as do handle and inquire of the faculty of reason: so as poesy had his true place. As for the power of the imagination in nature, and the manner of fortifying the same, we have mentioned it in the doctrine *De Anima* , whereunto most fitly it belongeth. And lastly, for imaginative or insinuative reason,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rhetoric, we think it best to refer it to the arts of reason. So therefore we content ourselves with the former division, that human philosophy, which respecteth

the faculties of the mind of man, hath two parts, rational and moral.

（1）关于人类心智能力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涉及人们的理解与理性，另一种与人类的意愿、欲求和情感相关。第一种产生了观点或法令；第二种则产生了行动或执行。需要肯定的是，在法令和执行这两个领域，想象力都起到了媒介或使节的作用。因为在理性判断之前，感觉就被传达到想象，而在法令实施之前，理性判断也被传达至想象。此外，想象还会在自发行为之前进行。罗马门神雅努斯有着两副面孔，面向理性的一面有着真理的象征，面向行动的一面印着正直的标志。但这两个面孔却十分相似，如姐妹一般。想象不仅仅只是一名使节，在履行信息传递这一职责的同时，它还被赋予、至少是精明地为自己霸占了不少威望。亚里士多德就对此有较精辟的说法，他说，“心灵是身体的掌控，如同主人对奴隶的掌控；而理性对想象的掌控，却如同官员对自由民众的掌控。”那么，自由民众是有机会转而掌控他人的。在信仰和宗教问题上，我们将想象的高度提升于理性之上。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宗教想方设法通过比拟、榜样、寓言、幻象和憧憬等形式影响人们的心灵。在所有富于雄辩的劝服性演说或其他类似性质的行为中，事物的真实面目的确可以被描绘出来，也可以被掩藏起来，因为它们对人们动用理性的要求主要还是寄托在想象之上的。然而，由于我并没有发现任何学科对想象进行合理恰当的研究，因此，我也无需更改之前的分类。在诗歌中，想象只是为了获得愉悦或闲趣，并不是将诗歌作为它的任务或职责。即使将其称为任务，我们现在探讨的这部分学问也并非想象的产物，只不过是对想象进行思考研究的一门学科罢了。我们现在谈及的知识也不是理性的产物（这样会扩展至所有哲学知识），只是研究理性力量的那部分知识而已。这与诗歌的真正地位是一样的。至于想象在自然界中的力量及增强想象力的方法等，我们已经在《论灵魂》一书的观点中有所阐明，那里才是最适合探讨的地方。最后，关于想象的或暗示的推理，作为修辞学的论题，我认为最好是将它列入推理技巧的范围进行研究。由此，我们还是可以维持之前的分类方式，将对人类心智能力的哲学研究分为理性的和道德的两类。

(2) The part of human philosophy which is rational， is of all knowledges, to the most wits, the least delightful, and seemeth but a net of subtlety and spinosity. For as it was truly said, that knowledge is*pabulum animi* ; so in the nature of men's appetite to this food most men are of the taste and stomach of the Israelites in the desert, that would fain have returned*ad ollas carnium* , and were weary of manna; which, though it were celestial, yet seemed less nutritive and comfortable. So generally men taste well knowledges that are drenched in flesh and blood, civil history, morality, policy, about the which men's affections, praises, fortunes do turn and are conversant. But this same *lumen siccum* doth parch and offend most men's watery and soft natures. But to speak truly of things as they are in worth, rational knowledges are the keys of all other arts, for as Aristotle saith aptly and elegantly, “That the hand is the instrument of instruments, and the mind is the form of forms;” so these be truly said to be the art of arts. Neither do they only direct, but likewise confirm and strengthen; even as the habit of shooting doth not only enable to shoot a nearer shoot, but also to draw a stronger bow.

（2）对大部分智者而言，所有知识中，人类哲学的理性部分是最枯燥无味的，它就像一张由无数个捉摸不定的带刺事物结成的网。知识是心灵的食粮，这是非常正确的。从本质上而言，人类对这一食物的欲求如同以色列人处于沙漠时的口味和食欲，吃厌了吗哪，欣欣然愿想着回到豪华的餐馆大饱口福吃到炖肉。尽管吗哪是上天赐予的圣食，但在那时，似乎就缺乏营养，也不合胃口了。因而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浸润于身体血肉中的知识，如公民史、道德、政治等具有较大的兴趣。他们将自身的情感、荣誉及命运都倾注于这类知识之中，并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束干燥的光线令人们焦渴难耐，也违背了他们柔润的本性。但事实上，根据事物的价值来判断，

这类理性知识是所有其他技艺的关键所在。亚里士多德就曾精妙地说道："手是一切工具的工具，心是一切形式的形式。"那么，理性知识就是一切技艺的技艺。它们不但对其他技艺具有引导作用，还能对其进行巩固和强化。这就好比经常射箭的习惯，不但有助于击中目标，还能赋予射箭者更大的力量拉开更为强硬的弓弩。

(3) The arts intellectual are four in number,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ends whereunto they are referred—for man's labour is to invent that which is sought or propounded; or to judge that which is invented; or to retain that which is judged; or to deliver over that which is retained. So as the arts must be four—art of inquiry or invention; art of examination or judgment; art of custody or memory; and art of elocution or tradition.

（3）对于智力方面的技艺，人们的努力通常存在四种目的，第一是为了在研究领域中有新的拓展；第二是对这些新拓展进行评价；第三是对经评价的新拓展的保留；第四是将保留的新拓展进行传达。根据这四类目的，智力方面的技艺也分为四种：研究或创新、检验或评价、保管或存储、演说或传授。

CHAPTER XIII

第十三章

(1) Invention is of two kinds much differing—the one of arts and sciences, and the other of speech and arguments. The former of these I do report deficient; which seemeth to me to be such a deficience as if, in the making of an inventory touching the state of a defunct, it should be set down that there is no ready money. For

as money will fetch all other commodities, so this knowledge is that which should purchase all the rest. And like as the West Indies had never been discovered if the use of the mariner's needle had not been first discovered, though the one be vast regions, and the other a small motion; so it cannot be found strange if sciences be no further discovered, if the art itself of invention and discovery hath been passed over.

（1）创新可分为迥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是技艺与学科的创新，一类是言辞与论辩的创新。对于前者，我认为存在的缺陷是比较严重的，就好像一名死者的财产清单中没有任何可用的现钱一样。正如现钱可以用来换取一切商品，第一类创新知识也能换得其他任何知识。同样，如果没有发明罗盘针，就不可能发现西印度群岛，尽管一个只是细微的转动，一个却是广袤无垠的大地。因此，如果人们忽略创新与发现的技艺本身，那么科学没有新的进展和突破也就不足为奇了。

(2) That this part of knowledge is wanting, to my judgment standeth plainly confessed; for first, logic doth not pretend to invent sciences, or the axioms of sciences, but passeth it over with a *cuique in sua arte credendum* . And Celsus acknowledgeth it gravely, speaking of the empirical and dogmatical sects of physicians, “That medicines and cures were first found out, and then after the reasons and causes were discoursed; and not the causes first found out, and by light from them the medicines and cures discovered.” And Plato in his “Theaetetus” noteth well, “That particulars are infinite, and the higher generalities give no sufficient direction; and that the pith of all sciences, which maketh the artsman differ from the inexpert, is in the middle propositions, which in every particular knowledge are taken from tradition and experience.” And therefore we see, that they which discourse of the inventions and originals of things

refer them rather to chance than to art, and rather to beasts, birds, fishes, serpents, than to men. "*Dictamnum genetrix Cretæa carpit ab Ida, Puberibus caulem foliis et flore camantem Purpureo; non illa feris incognita capris Gramina, cum tergo volucres hæsere sagittæ.* " So that it was no marvel (the manner of antiquity being to consecrate inventors) that the Egyptians had so few human idols in their temples, but almost all brute:" *Omnigenumque Deum monstra, et latrator Anubis, Contra Neptunum, et Venerem, contraque Minervam, &c.* " And if you like better the tradition of the Grecians, and ascribe the first inventions to men, yet you will rather believe that Prometheus first stroke the flints, and marvelled at the spark, than that when he first stroke the flints he expected the spark; and therefore we see the West Indian Prometheus had no intelligence with the European, because of the rareness with them of flint, that gave the first occasion. So as it should seem, that hitherto men are rather beholden to a wild goat for surgery, or to a nightingale for music, or to the ibis for some part of physic, or to the pot-lid that flew open for artillery, or generally to chance or anything else than to logic for the invention of arts and sciences. Neither is the form of invention which Virgil describeth much other:" *Ut varias usus meditande extunderet artes Paulatim* ." For if you observe the words well, it is no other method than that which brute beasts are capable of, and do put in ure; which is a perpetual intending or practising some one thing, urged and imposed by an absolute necessity of conservation of being. For so Cicero saith very truly, *Usus uni rei deditus et naturam et artem sæpe vincit* . And therefore if it be said of men, "*Labor omnia vincitImprobus, et duris urgens in rebus egestas* ," it is likewise said of beasts,*Quis psittaco docuit suum* χαιρε ? Who taught the raven in a drought to throw pebbles into a hollow tree, where she spied water, that the water might rise so as she might come to it?Who taught the bee to sail through such a vast sea or air, and to find the way from a field in a flower a great way off to her

hive?Who taught the ant to bite every grain of corn that she burieth in her hill, lest it should take root and grow?Add then the word*extundere* , which importeth the extreme difficulty, and the word *paulatim* , which importeth the extreme slowness, and we are where we were, even amongst the Egyptians' gods; there being little left to the faculty of reason, and nothing to the duty or art, for matter of invention.

（2）在我看来，这类知识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逻辑学并未宣称自己能创造新的学科或公理，而是以一句“让有这样信念的学科去发现”就此避开。塞尔苏斯在论及那类仅凭经验武断行事的医师时，严肃说道：“药物和治疗方法的出现先于病因的诊断，并非先有病因，再据此寻找发现药物和疗法。”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也记载道：“特殊的事物是无穷无尽的，一般概论无法对其进行全面指导。一切科学的核心在于中期的各类命题，在各类知识中，这些命题都来源于传统与经验。而这一核心又将拥有技艺之人与外行人区别开来。”因此，在谈到事物的创新与起源时，人们通常将其归功于运气，而不是技艺；归功于兽、鸟、鱼、蛇等，而不是人类自身。正如诗中所言：山羊有灵智，受伤可自疗，从那克里特，衔来白鲜苗，粗枝多绒叶，叶同紫花交，以此拔针铁，以此疗忧焦。因此，埃及人极少在神殿中供奉人类偶像，几乎全是禽兽，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也不必诧异了（古时发明者就是这样被奉为神圣的），不必惊讶为什么“埃及人崇拜安钮和神怪”。如果更乐于接受希腊传说，那我可以说，他们把最原始的发明都归功于人们。普罗米修斯被认为是第一个敲击燧石，并惊叹于产生的火花的，但并非在他敲击时就料到了火花的出现。西印度的普罗米修斯并没有欧洲的这样聪慧，那是因为那里缺少燧石，便也没有了第一次的尝试。因此，我们应感激野山羊，是它激发了人类外科手术的灵感；感激夜莺，它启发了人们的歌唱艺术；感激朱鹮，因为它启迪了人们制作某些药品；还要感激飞开的锅盖，是它启发人们运用火炮。总之，我们应该感激一切机遇和其他事物为各类技艺和学科的创新作出贡献，仅有逻辑学并不在我们的感激范围之

内。至于创新的形式，维尔吉尔在其诗歌中有同样的描述："实习费锤炼，积久生技巧。"细心体会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出于求生需求，反复计划或尝试同一件事的做法，狂兽也能做到，而且正在这样做着。西塞罗也有很好的描述："专注从事一件事，取得的成绩可以超过任何自然和技艺。"谈到人类时，又说："努力付出必战胜一切。"谈及禽兽时，说道："谁教鹦鹉来学舌？"当口渴的乌鸦发现树洞中的积水，便将石子衔入树洞，抬高水面，就够到了里面的水。这种填石喝水的方法又是谁教给乌鸦的呢？蜜蜂飞洋过海，穿越大片地域，却仍能在远方的花丛中找到回巢之路，这又是谁传授给它们的呢？蚂蚁会将蚁丘中储藏的所有谷粒都咬上一口，防止其生根发芽，这样的方法它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再回到维尔吉尔的诗中，"费锤炼"意指经受极端困境，"积久"则预示着过程的极度缓慢。我们就和从前一样，一直置身于古代，甚至在埃及诸神之中。这样的处境并没为推理能力、职责或技艺的运用留下多少空间，更没有创新技艺的任何位置。

(3) Secondly, the induction which the logicians speak of, and which seemeth familiar with Plato, whereby 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s may be pretended to be invented, and so the middle propositions by derivation from the principles; their form of induction, I say, is utterly vicious and incompetent; wherein their error is the fouler, because it is the duty of art to perfect and exalt nature; but they contrariwise have wronged, abused, and traduced nature. For he that shall attentively observe how the mind doth gather this excellent dew of knowledge, like unto that which the poet speaketh of, *Aërei mellis cœlestia dona,* distilling and contriving it out of particulars natural and artificial, as the flowers of the field and garden, shall find that the mind of herself by nature doth manage and act an induction much better than they describe it. For to conclude upon an enumeration of particulars, without instance contradictory, is no conclusion, but a conjecture; for who can assure (in many subjects) upon those particulars which appear of a side,

that there are not other on the contrary side which appear not?As if Samuel should have rested upon those sons of Jesse which were brought before him, and failed of David which was in the field. And this form (to say truth), is so gross, as it had not been possible for wits so subtle as have managed these things to have offered it to the world, but that they hasted to their theories and dogmaticals, and were imperious and scornful toward particulars; which their manner was to use but as *lictores* and *viatores* , for sergeants and whifflers, *ad summovendam turbam* , to make way and make room for their opinions, rather than in their true use and service. Certainly it is a thing may touch a man with a religious wonder, to see how the footsteps of seducement are the very same in divine and human truth; for, as in divine truth man cannot endure to become as a child, so in human, they reputed the attending the inductions (whereof we speak), as if it were a second infancy or childhood.

（3）第二点不足之处在于，对于逻辑学家所说的、似乎也是柏拉图所熟悉的归纳法，人们或许会宣称，它是创造各学科原理的基础，从这些原理中，又能衍生出学科的中期命题。然而我认为，这种归纳法的形式存在重大的谬误和缺陷。这种错误更加严重，因为人类发展技艺的目的与职责在于完善和提升自然的地位，但相反地，归纳法却损害、辱没和中伤了自然。人们应该留心观察，人类的大脑如何从自然和人为的特定事物中汲取这一知识甘露，就如诗人所说的“就好比从田野和花园中采集鲜花”。在此基础上，人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大脑天生具有归纳能力，但这种能力远远超过他们所描述的归纳力。仅仅对列举的特定例子进行归纳，且不提及任何反例，并不能成为结论，只是一种推测。这些一边倒的例子或许只是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谁能肯定（很多学科中都这样）没有另一方面的例证的存在呢？这就好像先知塞缪尔以为带到他面前的就是耶西的所有儿子，殊不知田野上的大卫也是其中一个。说实话，这种归纳形式过于粗略，

对敏锐精细的学者而言，这种方式不足以向世界完全展现它所处理的事物，只不过草率地编出一堆理论和教条，这些理论教条对特殊事物表现出不屑与鄙视，认为它们只不过是研究者的扈从或信使，充当警卫官或开道者的角色，用来驱散众人，为他们的观点扫清障碍，腾出空间。而没有使它们的功能得到真正的利用。在神圣真理与尘世真理之中，人们受到的诱惑是完全一致的，这或许能触动那些对信仰将信将疑的人。在神圣真理中，人们无法忍受变得如同婴儿，而在世俗真理中，他们又认为（我们所说的这种）归纳法就像是人们的又一婴儿期或幼年期。

(4) Thirdly, allow some principles or axioms were rightly induced, yet, nevertheless, certain it is that middle propositions cannot be deduced from them in subject of nature by syllogism—that is, by touch and reduction of them to principles in a middle term. It is true that in sciences popular, as moralities, laws, and the like, yea, and divinity (because it pleaseth God to apply Himself to the capacity of the simplest), that form may have use; and in natural philosophy likewise, by way of argument or satisfactory reason, *Quæ assensum parit operis effæta est* ; but the subtlety of nature and operations will not be enchained in those bonds. For arguments consist of propositions, and propositions of words, and words are but the current tokens or marks of popular notions of things; which notions, if they be grossly and variably collected out of particulars, it is not the laborious examination either of consequences of arguments, or of the truth of propositions, that can ever correct that error, being (as the physicians speak) in the first digestion. And, therefore, it was not without cause, that so many excellent philosophers became sceptics and academics, and denied any certainty of knowledge or comprehension; and held opinion that the knowledge of man extended only to appearances and probabilities. It is true that in Socrates it was supposed to be but a

form of irony, *Scientiam dissimulando simulavit* ; for he used to disable his knowledge, to the end to enhance his knowledge; like the humour of Tiberius in his beginnings, that would reign, but would not acknowledge so much. And in the later academy, which Cicero embraced, this opinion also of *acatalepsia* (I doubt) was not held sincerely; for that all those which excelled in copy of speech seem to have chosen that sect, as that which was fittest to give glory to their eloquence and variable discourses; being rather like progresses of pleasure than journeys to an end. But assuredly many scattered in both academies did hold it in subtlety and integrity. But here was their chief error: they charged the deceit upon the senses; which in my judgment (notwithstanding all their cavillations) are very sufficient to certify and report truth, though not always immediately, yet by comparison, by help of instrument, and by producing and urging such things as are too subtle for the sense to some effect comprehensible by the sense, and other like assistance. But they ought to have charged the deceit upon the weakness of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and upon the manner of collecting and concluding upon the reports of the senses. This I speak, not to disable the mind of man, but to stir it up to seek help; for no man, be he never so cunning or practised, can make a straight line or perfect circle by steadiness of hand, which may be easily done by help of a ruler or compass.

（4）第三点不足就是，即使推导得出的原理或公理都是正确的，关于自然的一些中期命题，还是无法从三段论的方式中推论得到，也就是说，将中期阶段的命题进行简化，并与一般原理联系起来，仍然不能推衍出这些命题。在常见的普通学科，如道德、法律，甚至还有神学（因为上帝希望头脑简单之人也能了解他）中，这种归纳形式或许有一定用途。在自然哲学中，如果希望通过争辩或充分的推理获得认同，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但是，自然与实践的微妙性是

不会受到这一形式的束缚的。争辩由命题构成，命题由单词构成，而单词又只是关于事物的一些流行观念的记号或标志。如果这些观念仅仅粗略而杂乱地取自特定事物，那么，它们就不是对论证推理结论或命题真实性的辛勤检验，因而也无法纠正其中的错误，即那些（如医师们所说）在消化的初始阶段出现的错误。所以，许多优秀的哲学家变成怀疑论者和学院派学者，否认所有知识与学问的确定性，认为人类知识只能拓展到理解表面现象和事物可能性之上，这些都是事出有因的。有人认为，苏格拉底说自己“藉着愚昧的饰词冒充有知识”只是一种反语，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苏格拉底贬抑自己的学识，目的是为了宣扬他的博才。提比略的性情也是这样，登基初期他虽乐于继承王位，但却不肯承认。在西塞罗所拥护的后期学园派中，我担心，这种怀疑论并非是他们真正推崇的，因为他们也不是真诚地相信。那些擅长抄袭他人言论的人选择这一学派仅仅是因为这里能给予他们花样百出的长篇大论以最大的荣耀。他们来这里，似乎只是为了享乐而信步漫游，而并非把这里当成了旅程的终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类学园派别中还是存在一些学者是真正拥护怀疑论的。然而他们认为，欺骗与谎言的罪魁祸首是人类的感官，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在我看来（尽管他们百般挑剔），通过比较，借助工具，以及令那些过于微妙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为感官所感知，再辅以其他方式，虽并不一定非常及时，但感官还是能够充分证明和报告真相的。事实上，这种欺骗更应怪罪于人们智力的不足，怪罪于他们收集感官报告并据此推论的方式不当。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贬损人类的心智，而是希望激发人们寻找措施来加以改善。因为再灵巧熟练的人也无法仅凭一只手就画出一条直线或一个正圆，但如果借助直尺或圆规，我们就能轻易做到。

(5) This part of invention, concerning the invention of sciences, I purpose (if God give me leave) hereafter to propound, having digested it into two parts: whereof the one I term experientia literata, and the other interpretatio naturae; the former being but a degree and rudiment of the latter. But I will not dwell too long, nor

speak too great upon a promise.

（5）关于科学领域的创新，我打算（如果上帝允许的话）在今后再来探讨，当前只对其进行分类，一类我称作记录的经验；另一类则称作对自然的解释。前者只是后者的初始阶段。不过我不对这一承诺多作阐释，也不想夸夸其谈。

(6) The invention of speech or argument is not properly an invention; for to invent is to discover that we know not, and not to recover or resummon that which we already know; and the use of this invention is no other but, out of the knowledge whereof our mind is already possessed to draw forth or call before us that which may be pertinent to the purpose which we take into our consideration. So as to speak truly, it is no invention, but a remembrance or suggestion, with an application; which is the cause why the schools do place it after judgment, as subsequent and not precedent. Nevertheless, because we do account it a chase as well of deer in an enclosed park as in a forest at large, and that it hath already obtained the name, let it be called invention; so as it be perceived and discerned, that the scope and end of this invention is readiness and present use of our knowledge, and not addition or amplification thereof.

（6）其实，言辞与论辩的创新并不能称之为创新，因为创新就是发现不为人们所知的事物，并不是找回或唤起已经知道的事物。而言辞与论辩的创新，无非是根据人们大脑中已经存在的知识引出或唤回能为我们当前目的服务的相关内容。所以，这的确不是创新，只不过是记忆或暗示的实际应用而已。也正因如此，学校将它置于人们的判断之后，而不是先于判断。但是，和在广阔的森林中追捕鹿群一

样，在封闭的园林中的追捕同样都称为追捕，这已经被冠以创新的名号，因而我们还是保留这种说法，姑且将其称为创新。但我们应认识到，这类创新涉及的范围是我们已有的知识，其目的只是为了即刻的应用，并没有添加或扩大任何知识。

(7) To procure this ready use of knowledge there are two courses, preparation and suggestion. The former of these seemeth scarcely a part of knowledge, consisting rather of diligence than of any artificial erudition. And herein Aristotle wittily, but hurtfully, doth deride the sophists near his time, saying, “They did as if one that professed the art of shoemaking should not teach how to make up a shoe, but only exhibit in a readiness a number of shoes of all fashions and sizes.” But yet a man might reply, that if a shoemaker should have no shoes in his shop, but only work as he is bespoken, he should be weakly customed. But our Saviour, speaking of divine knowledge, saith, “That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a good householder, that bringeth forth both new and old store;” and we see the ancient writers of rhetoric do give it in precept, that pleaders should have the places, whereof they have most continual use, ready handled in all the variety that may be; as that, to speak for the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against equity, and contrary; and to speak for presumptions and inferences against testimony, and contrary. And Cicero himself, being broken unto it by great experience, delivereth it plainly, that whatsoever a man shall have occasion to speak of (if he will take the pains), he may have it in effect premeditate and handled *in thesi* . So that when he cometh to a particular he shall have nothing to do, but to put to names, and times, and places, and such other circumstances of individuals. We see likewise the exact diligence of Demosthenes; who, in regard of the great force that the entrance and access into causes hath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had ready framed a number of prefaces for

orations and speeches. All which authorities and precedents may overweigh Aristotle's opinion, that would have us change a rich wardrobe for a pair of shears.

（7）两种途径可以实现对现成知识的应用，一是准备，二是暗示。第一种很难将其称为知识的一部分，它体现的只是一种用功勤勉的态度，并不是任何努力获得的学识。亚里士多德也曾就这一点机智而尖锐地讽刺了比他早些年代的诡辩家，他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是声称自己制鞋技艺高超的人不懂得讲解鞋子的制作过程，却只会展示款式尺寸各异的成品鞋子。"可能有人会这样回答，如果制鞋匠的店铺里没有展示成品鞋子，只在接受订单之后才着手制鞋，那他的生意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的救世主在谈到神圣知识时，说道："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地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我们看到，古时的修辞学家制定了这样的规则，辩论者需准备一些惯常使用的基本套路，用来自如地应对各类不同情况。比如，可以通过对法律的字面释义来反对公平法，或反过来反对法律；又比如通过推定或推断的方式驳斥证言，或反过来驳斥推定。西塞罗辩论经验十足，他坦言，如果人们想随时提出任何话题（如果他们不辞辛苦的话），他们可以预先思考并记录下来。这样一来，当他们碰到特定事情时，只需将名字、时间、地点及其他个别因素相应补充，无需再做其他事情。狄摩西尼严谨而勤奋，为了在引入话题和导出原因时做到强劲有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事先设计了很多引语为演说和致辞做准备。所有这些权威和前人的观点足以压倒亚里士多德的言论，让我们无需将款式繁多的壁橱换成一把剪刀。

(8) But the nature of the collection of this provision or preparatory store, though it be common both to logic and rhetoric, yet having made an entry of it here, where it came first to be spoken of, I think fit to refer over the further handling of it to rhetoric.

（8）在逻辑学和修辞学中，这种预先收集储备的本质是相同的。但是，我们现在只是稍作提及，具体还是等到讨论修辞学时再进行深入探讨。

(9) The other part of invention, which I term suggestion, doth assign and direct us to certain marks, or places, which may excite our mind to return and produce such knowledge as it hath formerly collected, to the end we may make use thereof. Neither is this use (truly taken) only to furnish argument to dispute, probably with others, but likewise to minister unto our judgment to conclude aright within ourselves. Neither may these places serve only to apprompt our invention, but also to direct our inquiry. For a faculty of wise interrogating is half a knowledge. For as Plato saith, “Whosoever seeketh, knoweth that which he seeketh for in a general notion; else how shall he know it when he hath found it?” And, therefore, the larger your anticipation is, the more direct and compendious is your search. But the same places which will help us what to produce of that which we know already, will also help us, if a man of experience were before us, what questions to ask; or, if we have books and authors to instruct us, what points to search and revolve; so as I cannot report that this part of invention, which is that which the schools call topics, is deficient.

（9）对于创新的另一种形式，也就是我所称的暗示，它会给予某些标记或空间触发我们的大脑回忆或导出我们已有的知识，从而为我们所用。如果好好利用的话，这种用途不但在与人辩论时能强化自己的论点，还有助于我们自身作出正确的评判。同样，这种形式不仅能推动我们的创新，还能引导我们进行研究。因为能够精明提问的人已获得了一半的知识。柏拉图曾说：“探求事物之人首先应对这一事

物有个总体概念，否则当他发现之时又怎能认出它来？”因此，预测越充分，探究过程就会越简单明了。同时，这一形式不仅有助于我们根据已有的知识储备创造新的知识，还能让我们在面对经验丰富之人时，可以进行恰当的提问，或是在阅读他人作品以从中获得启示时，可以找出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因此，关于创新的这部分内容，也就是各学院所称的论题，并不存在什么缺陷。

(10) Nevertheless, topics are of two sorts, general and special. The general we have spoken to; but the particular hath been touched by some, but rejected generally as inartificial and variable. But leaving the humour which hath reigned too much in the schools (which is, to be vainly subtle in a few things which are within their command, and to reject the rest), I do receive particular topics; that is, places or directions of invention and inquiry in every particular knowledge, as things of great use, being mixtures of logic with the matter of sciences. For in these it holdeth *ars inveniendi adolescit cum inventis* ; for as in going of a way, we do not only gain that part of the way which is passed, but we gain the better sight of that part of the way which remaineth, so every degree of proceeding in a science giveth a light to that which followeth; which light, if we strengthen by drawing it forth into questions or places of inquiry, we do greatly advance our pursuit.

（10）论题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两类。一般的论题我们已经有所讨论，特殊的论题虽曾有人涉及，但由于普遍被认为不受人为控制又变化无常，就被拒于门外了。但是，如果我们摒弃学院中那种主导的治学风气（即只对自己能掌控的极少事物进行精细却徒劳的研究，把其他事物丢在一边），我认为，特殊论题是应该受到欢迎的。在所有能发挥巨大用处的特殊知识领域，也就是逻辑学与其他学科的混合交叉领域，创新与探究的方式与引导的功效是不容忽视的。“发明的技

艺与发明共同成长。”前行时，我们不仅仅走过了一段路程，还为前方未行之路开拓了更好的视野。同样，在一门学科中，每次进步都能启发未来的研究。如果我们能够探索应该研究的问题或方式，使得这种启示获得更大的力量，那么，我们就向自己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CHAPTER XIV

第十四章

(1) Now we pass unto the arts of judgment, which handle the natures of proofs and demonstrations, which as to induction hath a coincidence with invention; for all inductions, whether in good or vicious form, the same action of the mind which inventeth, judgeth—all one as in the sense. But otherwise it is in proof by syllogism, for the proof being not immediate, but by mean, the invention of the mean is one thing, and the judgment of the consequence is another; the one exciting only, the other examining. Therefore, for the real and exact form of judgment, we refer ourselves to that which we have spoken of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1）现在，我们来讨论判断的技艺。这种技艺处理的是证据与论证的本质问题。在归纳的方式中，它与创新是如影随形的。因为在所有归纳中，无论正确与否，创新与判断在大脑中是同一种活动，产生的感觉也是一致的。然而，判断与创新的证据在三段论中却不尽相同。因为三段论中，证据不能直接作出证明，而需借助中项。于是，创建中项是一回事，判断结果又是另一回事。前者仅为激发引导作用，后者则是对事实的检验考察。关于真确的判断形式，我们可以参考前面阐释自然的章节。

(2) For the other judgment by syllogism, as it is a thing most agreeable to the mind of man, so it hath been vehemently end excellently laboured. For the nature of man doth extremely covet to have somewhat in his understanding fixed and unmovable, and as a rest and support of the mind. And, therefore, as Aristotle endeavoureth to prove, that in all motion there is some point quiescent; and as he elegantly expoundeth the ancient fable of Atlas (that stood fixed, and bare up the heaven from falling) to be meant of the poles or axle-tree of heaven, whereupon the conversion is accomplished, so assuredly men have a desire to have an Atlas or axle-tree within to keep them from fluctuation, which is like to a perpetual peril of falling. Therefore men did hasten to set down some principles about which the variety of their disputatious might turn.

（2）三段论非常符合人们的大脑思维，因而得到了人们热诚地探索，并取得了优异的成果。人们热切期盼在自己的思想中存在一些确定不变的事物，作为大脑的支撑和休憩地，这是人类的本性使然。因此，亚里士多德曾致力于证实，一切运动之中总会存在静止不动的点。他还绝妙地解释古代神话中的阿特拉斯（静止站立，支撑天空以免其塌落）就是天空的轴心或轮轴。正是因为有他，天空才有昼夜轮替。因此，人类渴望自己的思想也拥有一个阿特拉斯或轮轴，使他们不再起伏波动，不再受如天空坠落般无尽无休的威胁。于是，人们急于确立各类原理，让大量存在争议性的事物都归属于这些原理之中。

(3) So, then, this art of judgment is but the reduction of propositions to principles in a middle term. The principles to be agreed by all and exempted from argument; the middle term to be elected at the liberty of every man's invention; the reduction to be of two kinds, direct and inverted: the one when the proposition is

reduced to the principle, which they term a probation ostensive; the other, when the contradictory of the proposition is reduced to the contradictory of the principle, which is that which they call *per incommodum* , or pressing an absurdity; the number of middle terms to be as the proposition standeth degrees more or less removed from the principle.

（3）判断的技艺其实就是将各类命题转化为中项的原理。这类原理为所有人接受，不存在任何争议。中项则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创立的。这种转化主要分两种，直接转化和反向转化。第一种是直接将命题转化为原理，称为直接论证；第二种是将矛盾的命题转化为对立的论断，即所谓的归谬法。中项的数量是由命题与原理之间的差距来确定的。

(4) But this art hath two several methods of doctrine, the one by way of direction, the other by way of caution: the former frameth and setteth down a true form of consequence, by the variations and deflections from which errors and inconsequences may be exactly judged. Toward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which form it is incident to handle the parts thereof, which are propositions, and the parts of propositions, which are simple words. And this is that part of logic which is comprehended in the *Analytics* .

（4）这一技艺由两种教条式的方式构成，一种作为指导，一种作为警示。前者根据变化与偏差架构确定出原理的正确形式，从而可以准确判断推理过程中的谬误与矛盾。这种命题形式的组成与结构可以用来处理命题本身，同时也包括命题的各个部分，也就是简单的词语。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中所包含的一部分逻辑学。

(5) The second method of doctrine was introduced for expedite use and assurance sake, discovering the more subtle forms of sophisms and illaqueations with their redargutions, which is that which is termed *elenches* . For although in the more gross sorts of fallacies it happeneth (as Seneca maketh the comparison well) as in juggling feats, which, though we know not how they are done, yet we know well it is not as it seemeth to be; yet the more subtle sort of them doth not only put a man besides his answer, but doth many times abuse his judgment.

（5）第二种方式，即警示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确信自己的推理，并快速有效地运用，从而发现各种狡猾的诡辩与荒谬演绎，对其加以驳斥，也就是所谓的反驳。辩论中如果出现比较粗劣的谬误（塞内加曾对各类谬误有较完善的比较），在我们看来就像杂耍一般，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谬误是怎样造成的，但我们地知道，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推论。不过，一些较为狡猾的诡辩，往往使人不知如何应对，很多时候甚至还会瞒骗人们的判断。

(6) This part concerning *elenches* is excellently handled by Aristotle in precept, but more excellently by Plato in example; not only in the persons of the sophists, but even in Socrates himself, who, professing to affirm nothing, but to infirm that which was affirmed by another, hath exactly expressed all the forms of objection, fallace, and redargution. And although we have said that the use of this doctrine is for redargution, yet it is manifest the degenerate and corrupt use is for caption and contradiction, which passeth for a great faculty, and no doubt is of very great advantage, though the difference be good which was made between orators and sophisters, that the one is as the greyhound, which hath his

advantage in the race, and the other as the hare, which hath her advantage in the turn, so as it is the advantage of the weaker creature.

（6）关于反驳，亚里士多德对其规则进行了极好的阐述，而柏拉图所提供的丰富例证更是精妙绝伦。他不但列举诡辩者的实例，甚至还将苏格拉底作为有力的例证。苏格拉底声称从不认可任何事物，只一味向得到他人肯定的事物提出质疑，这一过程充分展现了他的各种异议、谬论与批驳。尽管我们说过，这一方式只用来驳斥谬论，然而很多时候，它的用途显然有所变质。它被人们用作强词夺理、对立一切事物之用，展现人们的才能，又具有极大的优势。但是，关于雄辩家与诡辩者的差别，还是有必要作区分的。前者犹如猎狗，在奔跑中占尽优势；后者犹如野兔，在折转瞬间占据有利条件，只有弱者具有这一长处。

(7) But yet further, this doctrine of *elenches* hath a more ample latitude and extent than is perceived; namely, unto divers parts of knowledge, whereof some are laboured and other omitted. For first, I conceive (though it may seem at first somewhat strange) that that part which is variably referred, sometimes to logic, sometimes to metaphysic, touching the common adjuncts of essences, is but an *elenche* ; for the great sophism of all sophisms being equivocation or ambiguity of words and phrase, specially of such words as are most general and intervene in every inquiry, it seemeth to me that the true and fruitful use (leaving vain subtleties and speculations) of the inquiry of majority, minority, priority, posteriority, identity, diversity, possibility, act, totality, parts, existence, privation, and the like, are but wise cautions against ambiguities of speech. So, aga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ings into certain tribes, which we call categories or predicaments, are but cautions against the confusion

of definitions and divisions.

（7）此外，这种反驳涉及的范围与程度比我们认为的更为宽泛，包括知识的方方面面，有些已得到我们的研究，但还有一些则被我们所忽略。首先，那些事物本质的常见附属属性有时被列入逻辑学的研究，有时又作为形而上学的内容，但我认为（尽管初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它们应该归属反驳的领域。诡辩术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利用词汇与措辞的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特别是利用那些各研究领域都普遍涉及的词汇。在我看来，如果能切实有效利用（去除徒劳的舍本逐末和妄加推测的成分）多数、少数、居先、置后、相同、差异、概率、举动、整体、局部、存在、匮乏等词汇，人们便能谨言慎行，警惕话语中的含糊成分。同样，对事物分门别类，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分类或区分，也只是为了警惕对事物的界定与划分混淆不清的状况出现。

(8) Secondly, there is a seducement that worketh by the strength of the impression, and not by the subtlety of the illaqueation—not so much perplexing the reason, as overruling it by power of the imagination. But this part I think more proper to handle when I shall speak of rhetoric.

（8）其次，除了荒谬演绎诱骗人们的思想，印象虽也能诱惑人，但它对人们理性的扰乱作用不及想象。不过这一部分更适合在谈论修辞学时再作详述。

(9) But lastly, there is yet a much more important and profound kind of fallacies in the mind of man, which I find not observed or inquired at all, and think good to place here, as that

which of all others appertaineth most to rectify judgment, the force whereof is such as it doth not dazzle or snare the understanding in some particulars, but doth more generally and inwardly infect and corrupt the state thereof. For the mind of man is far from the nature of a clear and equal glass, wherein the beams of things should reflect according to their true incidence; nay, it is rather like an enchanted glass, full of superstition and imposture, if it be not delivered and reduced. For this purpose, let us consider the false appearances that are imposed upon us by the general nature of the mind, beholding them in an example or two; as first, in that instance which is the root of all superstition, namely, that to the nature of the mind of all men it is consonant for the affirmative or active to affect more than the negative or privative. So that a few times hitting or presence countervails ofttimes failing or absence, as was well answered by Diagoras to him that showed him in Neptune's temple the great number of pictures of such as had escaped shipwreck, and had paid their vows to Neptune, saying, “Advise now, you that think it folly to invocate Neptune in tempest. " “Yea, but,” saith Diagoras, “where are they painted that are drowned?” Let us behold it in another instance, namely, that the spirit of man, being of an equal and uniform substance, doth usually suppose and feign in nature a greater equality and uniformity than is in truth. Hence it cometh that the mathematicians cannot satisfy themselves except they reduce the motions of the celestial bodies to perfect circles, rejecting spiral lines, and labouring to be discharged of eccentrics. Hence it cometh that whereas 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Nature as it were *monodica* , *sui juris* , yet the cogitations of man do feign unto them relatives, parallels, and conjugates, whereas no such thing is; as they have feigned an element of fire to keep square with earth, water, and air, and the like. Nay, it is not credible, till it be opened, what a number of fictions and fantasies the similitude of human actions and arts, together with the making of man *communis*

mensura , have brought into natural philosophy; not much better than the heresy of the Anthropomorphites, bred in the cells of gross and solitary monks, and the opinion of Epicurus, answerable to the same in heathenism, who supposed the gods to be of human shape. And, therefore, Velleius the Epicurean needed not to have asked why God should have adorned the heavens with stars, as if He had been an *ædilis* , one that should have set forth some magnificent shows or plays. For if that great Work-master had been of a human disposition, He would have cast the stars into some pleasant and beautiful works and orders like the frets in the roofs of houses; whereas one can scarce find a posture in square, or triangle, or straight line, amongst such an infinite number, so differing a harmony there is between the spirit of man and the spirit of Nature.

（9）最后，人们头脑中存在一种更为严重的根深蒂固的谬误，这种谬误从没得到关注和研究，我觉得有必要在此进行阐述。比起其他所有谬误，它与校正判断的关系更为密切。其效力并不在于蒙蔽人们对某些特定事物的理解，而是从整体上感染人们的内心，腐化他们的心智。人类的大脑并不是一面平静清澈的镜子，不能令所有的事物得到真实的反射。事实上，它更像一面被施了魔法的镜子，如果不破除魔法，还原其本来面貌，便会充满迷信与欺骗。我们列举一两个例子，来看看大脑的这种一般特性如何制造假象影响我们的判断。第一个例子是关于人类大脑的一种普遍倾向，即相较于肯定、积极的事物，消极、否定事物的影响力更为强大，这不可不谓是一切迷信产生的根源。因此，假象的极少几次奏效就足以抵消其缺席或失败的时候。古人航海时，常向海神尼普顿祈祷，如遭遇海难而得以幸存，便将这些幸存者的画像挂于海神神殿之中，并向尼普顿还愿。当人们向狄亚哥拉斯展示展示这些画像时，说道："你现在还觉得在暴风雨中向尼普顿祈祷很愚蠢吗？""是啊，"狄亚哥拉斯回答道，"不过那些淹死的人的画像去哪了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例子。人类的灵魂是一种均衡又贯而如一的实体，因而经常会误以为自然中同样存在很多

均衡性与一致性，其数量往往超过其真实存在。因此，数学家无法接受天体的螺旋运动，尽力排除偏离圆周的运转轨迹，只为将天体的运动轨迹都归纳为完美的圆周运动，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安心。同样地，尽管自然中存在许多单一独立的事物，人们还是会苦思冥想建立各种关联性、相似性和共轭性，而事实上这些是根本不存在的。例如，为保持事物的关联与共轭性，人们捏造出火这一元素，与土、水、气一起作为万物的基本组成元素。如果还是难以相信，我们再来看看，人类为了追求行为技艺等各方面的相似性，为了制定事物的普遍准则，在自然哲学中掺入了多少虚幻与假想，简直可与诸如孤陋粗鄙的修道士所提倡的“神人同形同性论”这样的异端学说相提并论。伊壁鸠鲁与这类邪说的观点一致，认为神灵显人形，这种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因而伊壁鸠鲁学派的维莱乌斯实在无需询问为何上帝要以星辰点缀天空，说得好像上帝就是罗马的一个市政官，应该上演一出壮美华丽的大戏。如果伟大的造物主确实具有人的禀性，就会将满天繁星布置地如屋顶的回纹饰一般，令人赏心悦目。但事实上，天空星罗密布，却很难发现任何像方形、三角形或直线这样的规则形态。因此，人类灵魂与自然精神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10) Let us consider again the false appearances imposed upon us by every man's own individual nature and custom in that feigned supposition that Plato maketh of the cave; for certainly if a child were continued in a grot or cave under the earth until maturity of age, and came suddenly abroad, he would have strange and absurd imaginations. So, in like manner, although our persons live in the view of heaven, yet our spirits are included in the caves of our own complexions and customs, which minister unto us infinite errors and vain opinions if they be not recalled to examination. But hereof we have given many examples in one of the errors, or peccant humours, which we ran briefly over in our first book.

（10）我们继续来探讨人们根据自己的本性和习惯所造成的假象。柏拉图关于洞穴的设想能很好地阐释这种假象。如果一个孩子长期穴居于地下岩洞，成人之后，突然走出洞穴，必会产生大量古怪荒诞的想象。同样的道理，尽管人们身处同一片天空之下，但各自的灵魂却穴居于自己的本性和习惯之中，如不审慎查验，并会产生无穷的谬误。我们在第一卷中就对这种谬误或堕落本性作了简单论述。在此，我们对其中的一类又进行了大量例证。

(11) And lastly, let us consider the false appearances that are imposed upon us by words, which are framed and applied according to the conceit and capacities of the vulgar sort; and although we think we govern our words, and prescribe it well *loquendum ut vulgus sentiendum ut sapientes* , yet certain it is that words, as a Tartar's bow, do shoot back up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isest, and mightily entangle and pervert the judgment. So as it is almost necessary in all controversies and disputations to imitate the wisdom of the mathematicians, in setting down in the very beginning the definitions of our words and terms, that others may know how we accept and understand them, and whether they concur with us or no. For it cometh to pass, for want of this, that we are sure to end there where we ought to have begun, which is, in questions and differences about words. To conclude, therefore,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to divorce ourselves from these fallacies and false appearances because they are inseparable from our nature and condition of life; so yet, nevertheless, the caution of them (for all *elenches* , as was said, are but cautions) doth extremely import the true conduct of human judgment. The particular *elenches* or cautions against these three false appearances I find altogether deficient.

（11）最后，我们来探讨在普通大众理解和使用范围内的词汇是如何缔造假象的。尽管我们认为言语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并称要“像智者那样思考，像凡人那样说话”，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言语就像鞑靼人的弓箭一般威力巨大，能反向击中最为聪明的人的理解力，从而极度扰乱和扭曲了我们的判断。因此，在所有的论争与辩驳之中，我们似乎有必要仿效数学家的智慧，一开始就明确所用词汇和术语的定义，这样一来，别人就能认识到我们的理解，也能了解到自己的理解是否与我们有出入。如果没有事先明确，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结束表达时，我们还在阐述一开始就应该表明的事情，也就是大家对用词的不同理解。总之，我们无法摆脱这些谬误与假象，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们已是我们本性和生活环境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不过，如能慎重对待这些警示（我们已经说过，所有的反证都是起到警示作用），它们必能引导人们作出准确的判断。不过我发现，并不存在任何能够反证和防范这三类假象的措施，这是完全匮乏的。

(12) There remaineth one part of judgment of great excellency which to mine understanding is so slightly touched, as I may report that also deficient; which i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iffering kinds of proofs to the differing kinds of subjects. For there being but four kinds of demonstrations, that is, by the immediate consent of the mind or sense, by induction, by syllogism, and by congruity, which is that which Aristotle calleth demonstration in orb or circle, and not *a notioribus* , every of these hath certain subjects in the matter of sciences, in which respectively they have chiefest use; and certain others, from which respectively they ought to be excluded; and the rigour and curiosity in requiring the more severe proofs in some things, and chiefly the facility in contenting ourselves with the more remiss proofs in others, hath been amongst the greatest causes of detriment and hindrance to knowledge. The distributions and assignations of demonstrations according to the analogy of

sciences I note as deficient.

（12）还有一类卓绝的判断方式，不过据我了解，并没有多少人研究过它，所以我觉得也是存在缺陷的。这类判断就是用不同类型的证据分别论证不同类型的学科。论证的方式只有四种，即心理或感觉的直接赞同、归纳论证、三段论证明、类比论证。第四种又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循环证明，并不产生新的论断。这四种方式都有各自相应的学科领域，令其作用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而换成其他学科，它们就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因此就应该被排除在外。不过，人们在为某些事物寻找更为有利的证据时十分热忱而又严苛，但对其他事物却满足于一些粗陋草率的证据，这可以说是妨害知识进步的罪魁祸首之一。根据论证与各类科学的关联性来分配和指派论证方式，这一方面我认为还是存有缺憾的。

CHAPTER XV

第十五章

(1) The custody or retaining of knowledge is either in writing or memory; whereof writing hath two parts, the nature of the charac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entry. For the art of characters, or other visible notes of words or things, it hath nearest conjugation with grammar, and, therefore, I refer it to the due place; for the disposition and collocation of that knowledge which we preserve in writing, it consisteth in a good digest of common-places, wherein I am not ignorant of the prejudice imputed to the use of common-place books, as causing a retardation of reading, and some sloth or relaxation of memory. But because it is but a counterfeit thing in knowledges to be forward and pregnant, except a man be deep and full, I hold the entry of common-places to be a matter of great use

and essence in studying, as that which assureth copy of invention, and contracteth judgment to a strength. But this is true, that of the methods of common-places that I have seen, there is none of any sufficient worth, all of them carrying merely the face of a school and not of a world; and referring to vulgar matters and pedantical divisions, without all life or respect to action.

（1）知识可以保存于书面作品，也能存储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作品的保存包括两方面，一是文字的性质，二是记录的顺序。文字或其他表示词语或事物的可见符号与语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我将在最恰当的地方来讨论它们。至于要使作品中保存的知识安排合理，配置得当，就需对备忘札记进行充分消化与融会贯通。我们注意到，有些人对备忘札记的使用存在一定偏见，认为这会延缓阅读进程，疏于记忆存储。除非是才学满腹、拥有真知灼见的人，否则所有的进步和博学都只不过是一种伪装。因此我认为，备忘札记在求学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但可以确保创新思想得以传播，还能令人们的判断更加集中有力。不过，就我所见过的备忘札记而言，其记录方式确没有多少可取之处。它们记载的不过都是某一学派的表面，并没有纵观世界的全面记载；还有些粗俗小事和学究式的内容分类，毫无活力，也无关乎任何效能。

(2) For the other principal part of the custody of knowledge, which is memory, I find that faculty in my judgment weakly inquired of. An art there is extant of it; but it seemeth to me that there are better precepts than that art, and better practices of that art than those received. It is certain the art (as it is) may be raised to points of ostentation prodigious; but in use (as is now managed) it is barren, not burdensome, nor dangerous to natural memory, as is imagined, but barren, that is, not dexterous to be applied to the serious use of business and occasions. And, therefore, I make no

more estimation of repeating a great number of names or words upon once hearing, or the pouring forth of a number of verses or rhymes *extempore* , or the making of a satirical simile of everything, or the turning of everything to a jest, or the falsifying or contradicting of everything by cavil, or the like (whereof in the faculties of the mind there is great copy, and such as by device and practice may be exalted to an extreme degree of wonder), than I do of the tricks of tumblers, funambuloes, baladines; the one being the same in the mind that the other is in the body, matters of strangeness without worthiness.

（2）至于知识的另一种主要存储方式——也就是记忆，我发现并没有多少研究。现实中的确存在记忆技巧，但在我看来，应该有比这些技巧更加有用的规则，以及对这些技巧更加有效的应用。按照现在的情况，记忆的技巧或许已经到达可以夸耀的高度。不过，在实践应用中（就目前的应用而言）却无多少实效，并不是由于太过纷繁累赘，也不是因为如人们认为的那样存在危害正常记忆力的危险，仅仅就是徒劳无益。这也就是说，并不能灵活应用于重要事务和场合。所以，或许人们对一连串名字或词汇耳闻则诵，大量古诗或韵文能脱口而出，对任何事物都能随时作比讽刺，所有事情都能说得幽默诙谐，又或者对所有事物都能挑出诟病，证明其虚假矛盾，等等（人类大脑具有强大的复制能力，通过一定方法和反复练习能产生惊人的效果）。不过，对于所有这些能力，我都视它们如翻筋斗者、走绳索者和街头艺人的杂耍而已，一个是头脑中的把戏，一个是身体上的花招，但都只是不同寻常的技能，并无多少实际价值。

(3) This art of memory is but built upon two intentions; the one prenotion, the other emblem. Prenotion dischargeth the indefinite seeking of that we would remember, and directeth us to seek in a narrow compass, that is, somewhat that hath congruity with our

place of memory. Emblem reduceth conceits intellectual to images sensible, which strike the memory more; out of which axioms may be drawn much better practice than that in use; and besides which axioms, there are divers more touching help of memory not inferior to them. But I did in the beginning distinguish, not to report those things deficient, which are but only ill managed.

（3）这种记忆的技巧出于两个目的，一为预想，一为象征。预想可以避免记忆的无目的性，同时能引导我们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寻找记忆的内容，这个范围是与我们记忆区域相吻合的。象征是将理智的想法简化为可感知的形象，从而深化记忆。从这两个原理中，我们能引出较现在更为有效的练习实践。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帮助记忆的方式，其效果也毫不逊色。不过一开始我就说过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缺陷，只不过是运用不当罢了。

CHAPTER XVI

第十六章

(1) There remaineth the fourth kind of rational knowledge, which is transitive, concerning the expressing or transferring our knowledge to others, which I will term by the general name of tradition or delivery. Tradition hath three parts: the first concerning the organ of tradition; the second concerning the method of tradition; and the third concerning the illustration of tradition.

（1）接着我们将谈论第四类理性知识。这类知识是可传递的，主要关于如何向他人表达或传递我们的知识。我就将它们通称为传授或传递。传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与传授工具有关，第二与传授方法

有关，第三则与对传授的阐释相关。

(2) For the organ of tradition, it is either speech or writing; for Aristotle saith well, “Words are the images of cogitations, and letters are the images of words.” But yet it is not of necessity that cogitations be expressed by the medium of words. For whatsoever is capable of sufficient differences, and those perceptible by the sense, is in nature competent to express cogitations. And, therefore, we see in the commerce of barbarous people that understand not one another's language, and in the practice of divers that are dumb and deaf, that men's minds are expressed in gestures, though not exactly, yet to serve the turn. And we understand further, that it is the use of China， and the kingdoms of the High Levant to write in characters real, which express neither letters nor words in gross, but things or notions; insomuch as countries and provinces which understand not one another's language can nevertheless read one another's writings, because the characters are accepted more generally than the languages do extend; and, therefore, they have a vast multitude of characters, as many, I suppose, as radical words.

（2）传授工具分为语言和文字两种。亚里士多德曾说：“语言是观念的映像，文字是语言的映像。”但这并不意味着观念必须通过文字这一介质才得以传达。任何事物，只要存在足够的差异，并能令感官接收，从本质上而言就足以用来表达观念了。我们看到，原始人类不懂对方的语言，贸易却仍能正常进行；聋哑人照样可以通过手势等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不那么准确，但足以表意。而且我们知道，中国和东方一些国家使用形象化的字符来表达事物或观念，而并不是大概的字母或词汇。这类符号往往比语言使用范围更加广泛，因而一些国家或地区虽然语言不通，却能读懂对方的文字符号。当然，文字符号的种类也非常繁多，我猜想应该和他们的基础词汇差不多。

(3) These notes of cogitations are of two sorts: the one when the note hath some similitude or congruity with the notion; the other*ad placitum* , having force only by contract or acceptation. Of the former sort are hieroglyphics and gestures. For as to hieroglyphics (things of ancient use and embraced chiefly by the Egyptians,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nations), they are but as continued impresses and emblems. And as for gestures, they are as transitory hieroglyphics, and are to hieroglyphics as words spoken are to words written, in that they abide not; but they have evermore, as well as the other, an affinity with the things signified. As Periander, being consulted with how to preserve a tyranny newly usurped, bid the messenger attend and report what he saw him do; and went into his garden and topped all the highest flowers, signifying that it consisted in the cutting off and keeping low of the nobility and grandees. *Ad placitum* , are the characters real before mentioned, and words: although some have been willing by curious inquiry, or rather by apt feigning, to have derived imposition of names from reason and intendment; a speculation elegant, and, by reason it searcheth into antiquity, reverent, but sparingly mixed with truth, and of small fruit. This portion of knowledge touching the notes of things and cogitations in general, I find not inquired, but deficient. And although it may seem of no great use, considering that words and writings by letters do far excel all the other ways; yet because this part concerneth, as it were, the mint of knowledge (for words are the tokens current and accepted for conceits, as moneys are for values, and that it is fit men be not ignorant that moneys may be of another kind than gold and silver), I thought good to propound it to better inquiry.

（3）这种表达观念的符号也分为两类，一是与表达的观念存在

相似或一致性，二是传统型的，也就是约定俗成的用法。第一类是指象形符号和手势。象形符号（用于古代，主要盛行于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埃及）是一种延续的记号或标志。手势则是暂时的象形符号，它们对象形符号来说就如同语言对文字一样，都无法延续，但与表达的事物都非常十分接近。当佩里安德被前来问询的信使问及如何维系新夺取的专制政权时，他吩咐这名信使跟随他，看他的作为，回去后上报。接着，他走入自己的花园，摘下了所有位于最高的花朵，也就意味着，维系政权的方法就是摘除和贬抑王公贵族的地位。约定俗成的符号就是文字以及前面所提的形象化的字符。一些学者通过精细的研究或只是合理的想象，凭借理性与真实意义推断这些符号的起源，但这不过都是精妙的推断而已。由于研究的是古代遗产，我们应抱以诚挚的敬意，不过，这些研究着实与真理关联不大，也并未收获多少成效。总体而言，这类关于事物的符号与观念的知识总体来说我认为并未得到研究，所以是存有缺陷的。或许在人们看来，语言与文字的作用远比其他形式更加有效，因而研究这类知识也并无多大用处。但事实上，这一部分涉及到知识的来源（因为文字是象征概念的通用记号，就如货币象征价值，人们应视它为另一种形式的类似金银的货币），因而我认为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4) Concerning speech and words,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m hath produced the science of grammar. For man still striveth to reintegrate himself in those benedictions, from which by his fault he hath been deprived; and as he hath striven against the first general curse by the invention of all other arts, so hath he sought to come forth of the second general curse (which was the confusion of tongues) by the art of grammar; whereof the use in a mother tongue is small, in a foreign tongue more; but most in such foreign tongues as have ceased to be vulgar tongues, and are turned only to learned tongues. The duty of it is of two natures: the one popular, which is for the speedy and perfect attaining languages, as well for intercourse of speech as for understanding of authors; the other

philosophical, examining the power and nature of words, as they are the footsteps and prints of reason: which kind of analogy between words and reason is handled *sparsim* , brokenly though not entirely; and, therefore, I cannot report it deficient, though I think it very worthy to be reduced into a science by itself.

（4）在语言和文字的研究中，文法学应运而生。人类虽因自己的过错被剥夺了来自上帝的赐福，却仍在为重新获得这些恩赐而奋斗。为了应对第一次诅咒，人类努力发明了各类技艺；为应对第二次诅咒（即打乱语言），人类又创造了文法。较之母语，在运用外语时文法的作用更为明显，特别是那些不再作为土语，转而称为学术用语的外国语言。文法的职责根据其性质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的职责，用以加快和完善语言的习得，使人们不仅能读懂书面作品，还能进行话语交流。另一类是哲学上的职责。作为理性的足迹与印记，语言可用于检验文字的力量和特性。这种语言与理性之间的类比并没有得到全面的研究，不过断断续续的零星研究还是存在的。因此，我并不能称其是有缺陷的，但我还是认为它更应该作为一门单独学科进行研究。

(5) Unto grammar also belongeth, as an appendix,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accidents of words; which are measure, sound, and elevation or accent, and the sweetness and harshness of them: whence hath issued some curious observations in rhetoric, but chiefly poesy, as we consider it, in respect of the verse and not of the argument. Wherein though men in learned tongues do tie themselves to the ancient measures, yet in modern languages it seemeth to me as free to make new measures of verses as of dances; for a dance is a measured pace, as a verse is a measured speech. In these things this sense is better judge than the art:” *Coenae fercula nostraeMallem convivis quam placuisse cocis* .” And of the servile

expressing antiquity in an unlike and an unfit subject, it is well said, "*Quod tempore antiquum videtur, id incongruitate est maxime novum* ."

（5）文法学还有一种附属知识，就是对词语的非主要特性的研究，包括音步、声调、重音、发音的悦耳或刺耳程度等。于是我们看到，在修辞学，特别是在诗学中，比起内容，人们对韵律形式更为好奇，也更为关注。学者通常运用学术语言，又完全遵循古代音步。对此我认为，人们可以运用现代语言创造新的音步，这就如创造新的舞步一样，是完全不受拘束的。舞蹈与韵文，一个是有节奏的步法，一个是有节奏的话语，两者是十分相似的。在这类事情上，这样的感受比起技艺更适合做评判员。古诗也有云："盘餐供客享，不为庖丁计。"至于在不伦不类的主题之下效仿古人的韵律，人们已作出很好的评论，"古旧的物品如果在当今运用不当，似乎就成了新型而不协调的物品。"

(6) For ciphers, they are commonly in letters or alphabets, but may be in words. The kinds of ciphers (besides the simple ciphers, with changes, and intermixtures of nulls and non-significants) are many,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r rule of the infolding, wheel-ciphers, key-ciphers, doubles, &c. But the virtues of them, whereby they are to be preferred, are three; that they be not laborious to write and read; that they be impossible to decipher; and, in some cases, that they be without suspicion. The highest degree whereof is to write *omnia per omnia* ; which is undoubtedly possible, with a proportion quintuple at most of the writing infolding to the writing infolded, and no other restraint whatsoever. This art of ciphering hath for relative an art of deciphering, by supposition unprofitable, but, as things are, of great use. For suppose that ciphers were well managed, there be multitudes of them which exclude the decipherer. But in regard of the rawness and unskilfulness of the

hands through which they pass, the greatest matters are many times carried in the weakest ciphers.

（6）密码通常由字母或字母表组成，有些还会运用词语。密码的种类（除了简单密码及其简单变换，以及混入无意义符号的密码）多种多样。根据其性质和编写规则，可分为回环密码、密钥密码、双重密码等。密码的优点，也就是人们乐于应用密码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编码与读码无需花费太多精力；其次，密码很难为他人所破解；最后，某些情况下，不易遭人怀疑。创设密码的最高境界是“将一切隐藏于无形”。其实，只要在编制密码时用五倍的比例编入其他材料，这一境界无疑是可以实现的，并不需要其他任何限制。解码技艺与编码技艺是紧密相连的。有时，人们觉得解码并无多少价值，但事实上，它们有着很大的用途。因为虽然精妙的编码，会使很多密码令译码者束手无策。不过，编码者往往技术生疏，手法笨拙，很多时候大量重要信息就会从他们的手中通过这些拙劣的编码泄露出去。

(7) In the enumeration of these private and retired arts it may be thought I seek to make a great muster-roll of sciences, naming them for show and ostentation, and to little other purpose. But let those, which are skilful in them, judge whether I bring them in only for appearance, or whether in that which I speak of them (though in few words) there be not some seed of proficience. And this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as there be many of great account in their countries and provinces, which, when they come up to the seat of the estate, are but of mean rank and scarcely regarded; so these arts, being here placed with the principal and supreme sciences, seem petty things: yet to such as have chosen them to spend their labours and studies in them, they seem great matters.

（7）我们列举了很多私密的、不再常用的技艺，或许有人会认为，我的目的只是为了罗列一个学科清单，并借此卖弄和夸耀自己的学识，并没有其他用途。还是让这些技艺的精通者来做评价吧，看看我到底只是做足了表面功夫，还是在论述中（尽管篇幅不多）也存在些许进步的萌芽。有一点必须记住，很多人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赫赫有名，但走出那一地区来到汇集各种显赫名人的地方后，便成了不为人知的泛泛之辈。同样的道理，这些技艺如果与至关重要的学科放于一起，就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于那些辛勤研究这些技艺的人而言，它们是至关重要的。

CHAPTER XVII

第十七章

(1) For the method of tradition, I see it hath moved a controversy in our time. But as in civil business, if there be a meeting, and men fall at words, there is commonly an end of the matter for that time, and no proceeding at all; so in learning, where there is much controversy, there is many times little inquiry. For this part of knowledge of method seemeth to me so weakly inquired as I shall report it deficient.

（1）至于传授知识的方法，在当今已经引发了各方争论。在公共事务上，如果人们集会商讨时出现争论，事情往往就停滞在争论不休中。同样，在学问方面，很多时候一旦出现大量争议，便极少作进一步研究。这部分关于传授方法的知识内容，涉及的研究非常少见，因而我只能说，它的研究是存在不足的。

(2) Method hath been placed, and that not amiss, in logic, as a

part of judgment. For as the doctrine of syllogisms comprehendeth the rules of judgment upon that which is invented, so the doctrine of method containeth the rules of judgment upon that which is to be delivered; for judgment precedeth delivery, as it followeth invention. Neither is the method or the nature of the tradition material only to the use of knowledge, but likewise to the progression of knowledge: for since the labour and life of one man cannot attain to perfection of knowledge, the wisdom of the tradition is that which inspireth the felicity of continuance and proceeding. And therefore the most real diversity of method is of method referred to use, and method referred to progression: whereof the one may be termed magistral, and the other of probation.

（2）事实上，这种方法并没有缺失，而是被归入了逻辑学，作为判断的一部分。三段论的原理包含了新创的判断规则，而传授方法包括了需要传授的判断规则。因此，判断先于传授，创新又先于判断。传授方法或性质不仅有助于知识的运用，同样利于知识的发展。个人的毕生努力无法令知识得以完善，传授知识的效用就是激发人们促进知识的延续和发展。因此，知识传授方法最实际的区分就在于，一个是应用型的，也可称为独断的方法，另一个是发展型的，也叫做试验的方法。

(3) The latter whereof seemeth to be *via deserta et interclusa* . For as knowledges are now delivered, there is a kind of contract of error between the deliverer and the receiver. For he that delivereth knowledge desireth to deliver it in such form as may be best believed, and not as may be best examined; and he that receiveth knowledge desireth rather present satisfaction than expectant inquiry; and so rather not to doubt, than not to err: glory making

the author not to lay open his weakness, and sloth making the disciple not to know his strength.

（3）第二种方法似乎已是一条“荒芜衰败之路”。就目前知识传授情况而言，传授者和接收者之间存在着某种错误的约定。知识传授者希望接收者能全盘相信所传授的知识，而不是令知识得到最有力的验证。另一方面，知识接收者也只是想要满足当前的求知欲望，并不期待进一步的研究。对他们而言，宁肯出错，也不可怀疑。通常，学者的傲气令他们不肯暴露自己的弱点，而他们的弟子由于怠惰也无法发觉自己的优势。

(4) But knowledge that is delivered as a thread to be spun on ought to be delivered and intimated, if it were possible, in the same method wherein it was invented: and so is it possible of knowledge induced. But in this same anticipated and prevented knowledge, no man knoweth how he came to the knowledge which he hath obtained. But yet, nevertheless, *secundum majus et minus* , a man may revisit and descend unto the foundations of his knowledge and consent; and so transplant it into another, as it grew in his own mind. For it is in knowledges as it is in plants: if you mean to use the plant, it is no matter for the roots—but if you mean to remove it to grow, then it is more assured to rest upon roots than slips: so the delivery of knowledges (as it is now used) is as of fair bodies of trees without the roots; good for the carpenter, but not for the planter. But if you will have sciences grow, it is less matter for the shaft or body of the tree, so you look well to the taking up of the roots. Of which kind of delivery the method of the mathematics, in that subject, hath some shadow: but generally I see it neither put in use nor put in inquisition, and therefore note it for deficient.

（4）如果把知识比作丝线，那么传授知识就好比传递丝线以继续纺织的过程。所以可能的话，人们应采用与创造知识同样的方法进行传授和阐述。对于归纳产生的知识，这种方法是可以实现的。不过，人们获得了这类可以预期的知识，却往往不知道是如何获得的。但或多或少，他们还是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知识和认同感的基础，然后将知识在自己大脑中的孕育方法，移植到其他人的头脑中。知识和植物具有共通之处。如果我们要利用一株植物，并不需要它的根部；但如果想要将它移植，比起枝条根部无疑更为重要。知识的传授（根据现在采用的方法）就如同去除根部的优美树身，适合于木匠，但对栽培者来说，是没有益处的。如果想要发展科学，人们就该多多关注树木的根部，而无需过多留意树枝或树身。这种传授方法似乎在数学中隐约残存着些许影子。但总体而言，这一方法并没得到应用，也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只能说是有缺陷的。

(5) Another diversity of method there is, which hath some affinity with the former, used in some cases by the discretion of the ancients, but disgraced since by the impostures of many vain persons, who have made it as a false light for their counterfeit merchandises; and that is enigmatical and disclosed. The pretence whereof is, to remove the vulgar capacities from being admitted to the secrets of knowledges, and to reserve them to selected auditors, or wits of such sharpness as can pierce the veil.

（5）第三种方法就是揭示深奥秘密的方法。这种方法与上一种关系密切，本是古人审慎行事而采用的方法，却被许多虚荣之人荒谬地作为虚假的光亮，用以掩饰虚假事物。为此，他们还替自己找了借口，声称这是为了避免那些泛泛之辈窥得知识的奥秘。这些奥秘应该保留给经过精选认为值得拥有这些奥秘的听众，或是能揭开层层掩饰的睿智之人。

(6) Another diversity of method, whereof the consequence is great, is the delivery of knowledge in aphorisms, or in methods; wherein we may observe that it hath been too much taken into custom, out of a few axioms or observations upon any subject, to make a solemn and formal art, filling it with some discourses, and illustrating it with examples, and digesting it into a sensible method. But the writing in aphorisms hath many excellent virtues, whereto the writing in method doth not approach.

（6）第四种方法是通过格言或条理来传授知识，这种方法的意义重大。我们看到，针对任何主题，人们已习惯于仅凭某一主题的几条格言或些许观察就创造出正式而庄严的长篇大论，既包含推理论述，又有详细例证，细加整理，便成为条理清晰、合情合理的作品。不过格言式写作的优点确实不少，条理式写作根本无法企及。

(7) For first, it trieth the writer, whether he be superficial or solid: for aphorisms, except they should be ridiculous, cannot be made but of the pith and heart of sciences; for discourse of illustration is cut off; recitals of examples are cut off; discourse of connection and order is cut off; descriptions of practice are cut off. So there remaineth nothing to fill the aphorisms but some good quantity of observation; and therefore no man can suffice, nor in reason will attempt, to write aphorisms, but he that is sound and grounded. But in methods, "*Tantum series juncturaque pollet,Tantum de medio sumptis accedit honoris* ," as a man shall make a great show of an art, which, if it were disjointed, would come to little. Secondly, methods are more fit to win consent or belief, but less fit to point to action; for they carry a kind of demonstration in orb or circle, one part illuminating another, and therefore satisfy. But particulars being dispersed do best agree with dispersed directions.

And lastly, aphorisms, representing a knowledge broken, do invite men to inquire further; whereas methods, carrying the show of a total, do secure men, as if they were at furthest.

（7）首先，格言式写作可检验作者的知识水平，看出其是浅薄之辈还是渊博学者。除了一些荒谬的表述，格言基本无法任意编造，而是所有学科精髓的体现。因此，运用格言进行写作，无需详细论述，也无大量例证，不涉及叙述间的联系和顺序，也没有了对实践的描述。剩下的只有一些细致可靠的观察作为格言的补充。因此，只有那些拥有可靠合理依据的人才够资格、才有理由尝试格言式写作。但是，在条理式写作中，正如诗中所言："井然有序，条理分明，化粗为细，翻旧为新。"一个人的技艺表演可能精彩万分，但一一分解，却发现毫无意义。其次，条理式写作方法更适合用于赢取他人的赞同和信任，但在指导行为方面并不适用。因为这种方法的阐释是循环的，以一部分内容来阐释另一部分，从而达到目的。不过，不同导向的内容还是最适合分点来详述。最后，作为零散的知识，格言引导人们进一步探索；而条理写作展现的是一个整体，让人们以为已经处于研究的终点，从而安定下来。

(8) Another diversity of method, which is likewise of great weight, is the handling of knowledge by assertions and their proofs, or by questions and their determinations. The latter kind whereof, if it be immoderately followed, is as prejudicial to the proceeding of learning as it is to the proceeding of an army to go about to besiege every little fort or hold. For if the field be kept, and the sum of the enterprise pursued, those smaller things will come in of themselves: indeed a man would not leave some important piece enemy at his back. In like manner, the use of confutation in the delivery of sciences ought to be very sparing; and to serve to remove strong preoccupations and prejudgments, and not to minister and excite

disputatious and doubts.

（8）用于传授的另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断言及其证据，或者自问自答的形式传递知识，这种方式同样也很重要。对于第二种形式，如果运用过度，其对学问发展的不利影响就如同浩浩荡荡的军队只顾包抄一些不起眼的堡垒或据点一般。如果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完成作战目标，那么，那些小堡垒自然收入囊中，因为人们不会在自己背后给敌人留下反击的空间。同样，在传授各学科知识时，反驳的方法也应慎用。它们只能用于消除一些偏见和预断，并不能用来辅助和激起争论和质疑。

(9) Another diversity of method is,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 or matter which is handled. For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in delivery of the mathematics, which are the most abstracted of knowledges, and policy, which is the most immersed. And howsoever contention hath been moved, touching a uniformity of method in multiformity of matter, yet we see how that opinion, besides the weakness of it, hath been of ill desert towards learning, as that which taketh the way to reduce learning to certain empty and barren generalities; being but the very husks and shells of sciences, all the kernel being forced out and expulsed with the torture and press of the method. And, therefore, as I did allow well of particular topics for invention, so I do allow likewise of particular methods of tradition.

（9）根据传授知识的主题或内容，还能总结出另一种传授方法的分类。在所有学科中，数学是最抽象的，政治是最贴近生活的，两者的传授方法截然不同。有一种颇受争议的观点，认为纷繁多样的学科能用统一的方法进行教授。我们暂且抛开其本身的缺点，来看看它对学问的不利影响。它将学问简化为一种空泛无益的概论，包含的只

不过是各个学科的外壳而已，所有的精髓在这种统一方法的压迫和排挤下被驱除殆尽。因此，正如我提倡创新的多样化一样，我认为，各学科知识的传授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

(10) Another diversity of judgment in the delivery and teaching of knowledge is, according unto the light and presuppositions of that which is delivered. For that knowledge which is new, and foreign from opinions received, is to be delivered in another form than that that is agreeable and familiar; and therefore Aristotle, when he thinks to tax Democritus, doth in truth commend him, where he saith “If we shall indeed dispute, and not follow after similitudes,” &c. For those whose conceits are seated in popular opinions need only but to prove or dispute; but those whose conceits are beyond popular opinions, have a double labour; the one to make themselves conceived, and the other to prove and demonstrate. So that it is of necessity with them to have recourse to similitudes and translations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therefore in the infancy of learning, and in rude times when those conceits which are now trivial were then new, the world was full of parables and similitudes; for else would men either have passed over without mark, or else rejected for paradoxes that which was offered, before they had understood or judged. So in divine learning, we see how frequent parables and tropes are, for it is a rule, that whatsoever science is not consonant to presuppositions must pray in aid of similitudes.

（10）在知识的教授以及传递上，还可以根据对教授内容的了解程度和预先假定判断不同的传授方法。对于全新的、与普遍认为的观点不一致的知识，我们采用的传授方法就应不同于一般熟知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在意欲驳斥德谟克利特时说道：“如果我们想进行真正的

辩论，就不应通过比喻来争辩。”然而这实际上是对德谟克利特的赞扬。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观点始终不摆脱普遍流行的观点范围，就只需加以证明或抗辩；但如果他的想法超脱于大众观点，就需付出双倍的努力，一方面让人们了解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又需要进行证明和阐述。因此，他就需要借助比喻和转换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学问发展初期和原始时期，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普通的观点却被认为是无比新奇的，那时候学问就是一个充满寓言和比喻的世界。如果脱离了比喻，人们便不会关注这些观点，或者在了解和判断这些观点之前，就被当成悖论而拒于千里之外了。神学领域同样充满了比喻和转义的应用。这是因为，任何科学知识如果与人们的预先假定不符，就需借助比喻的方式进行传授，这已然成为一条普遍的规则。

(11) There be also other diversities of methods vulgar and received: as that of resolution or analysis, of constitution or systasis, of concealment or cryptic, &c., which I do allow well of, though I have stood upon those which are least handled and observed. All which I have remembered to this purpose, because I would erect and constitute one general inquiry (which seems to me deficient) touching the wisdom of tradition.

（11）当然，还有其他很多通俗流行的传授方式，如分解或分析、组成或综合、掩藏或隐晦等。我很赞同这些方法，不过我还是需要提及那些很少被人们所研究和观察的传授方法。我提到所有这些传授的方法，是希望构建一个关于知识传授技艺的综合研究体系（以我所见这是存在缺陷的）。

(12) But unto this part of knowledge, concerning method, doth further belong not only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whole frame of a work, but also the several beams and columns thereof; not as to

their stuff, but as to their quantity and figure. And therefore method considereth not only the disposition of the argument or subject, but likewise the propositions: not as to their truth or matter, but as to their limitation and manner. For herein Ramus merited better a great deal in reviving the good rules of propositions—Καθολον πρωτον, κυτα παντος &c.—than he did in introducing the canker of epitomes; and yet (as it is the condition of human things that,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fables, “the most precious things have the most pernicious keepers”) it was so, that the attempt of the one made him fall upon the other. For he had need be well conducted that should design to make axioms convertible, if he make them not withal circular, and non-promovent, or incurring into themselves; but yet the intention was excellent.

（12）不过，关于传授方法的知识，不但包括这项工程的整个体系结构，且不能忽视其中的横梁与支柱，并不仅要关注它们的原材料，而且要关注它们的数量和形状。因此，传授的方法不仅应考虑论点和主题的安排与配置，同样不能忽视了命题。并不是考虑命题的真实性与实质，而是它们的局限性和呈现方式。拉姆斯在这方面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为他成功地复兴了关于命题的有效法则，如“智慧律”“真理律”等。比起他引入的迂腐的摘要法，他的这一作为功绩显著。不过，这其实是拉姆斯在研究其他问题时的偶然所得（人类的事情就是这样，正如古代寓言所言，最珍贵的东西总有最险恶的看守员）。如果他不曾将这些法则定为循环论证，原处回旋，或是自我解证，他还会有更出色的作为。不过，他的出发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13) The other considerations of method, concerning propositions, are chiefly touching the utmost propositions, which limit the dimensions of sciences: for every knowledge may be fitly said, besides the profundity (which is the truth and substance of it,

that makes it solid), to have a longitude and a latitude; accounting the latitude towards other sciences, and the longitude towards action; that is, from the greatest generality to the most particular precept. The one giveth rule how far one knowledge ought to intermeddle within the province of another, which is the rule they call Καθαυτο; the other giveth rule unto what degree of particularity a knowledge should descend: which latter I find passed over in silence, being in my judgment the more material. For certainty there must be somewhat left to practice; but how much is worthy the inquiry?We see remote and superficial generalities do but offer knowledge to scorn of practical men; and are no more aiding to practice than an Ortelius' universal map is to direct the way between London and York. The better sort of rules have been not unfitly compared to glasses of steel unpolished, where you may see the images of things, but first they must be filed: so the rules will help if they be laboured and polished by practice. But how crystalline they may be made at the first, and how far forth they may be polished aforehand, is the question, the inquiry whereof seemeth to me deficient.

（13）在研究传授方法时，就要涉及到到命题，我们主要涉及的是两个极端的命题，正是这些命题限定了各个学科的范围。知识除了具有深度外（这是一门学科用以自我支撑的真理和实质），还有经度和纬度。纬度是针对与其他学科的界限而言的，经度则是根据学科自身的发展情况而定。也就是说，一门学科既包含最具概括性的总论，也涵盖了最详细的特定规则。纬度限定了一门学科的知识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另一门知识相交叉，即所谓的“公正律”原则。经度则规定了学科中的知识特殊性的程度。我认为这一点比纬度更为重要，但却遭到了人们的忽视。当然，有些知识是需要通过实践来获得，但又有多少知识是值得我们付出这类研究呢？我们看到，那些粗略肤浅又几无关联的概论只不过能引来实践经验丰富者的蔑视，它们的实际辅助作用

小得可怜，就和奥特柳斯绘制的世界地图对伦敦通往约克的道路指示作用差不多。另一些稍有用处的规则被人们比作未磨光的钢镜，这也算是个恰当的比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事物的些许映像，但在这之前，镜子须经抛光打磨。同样，那些规则是存在益处的，但其发挥效用之前，需经得我们的修磨精润。不过，这些规则在制定初期如何清晰光亮，之前又曾打磨到何种程度，这仍然是个未解之题，所以我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尚有不足。

(14) There hath been also laboured and put in practice a method, which is not a lawful method, but a method of imposture: which is, to deliver knowledges in such manner as men may speedily come to make a show of learning, who have it not. Such was the travail of Raymundus Lullius in making that art which bears his name; not unlike to some books of typocosmy, which have been made since; being nothing but a mass of words of all arts, to give men countenance, that those which use the terms might be thought to understand the art; which collections are much like a fripper's or broker's shop, that hath ends of everything, but nothing of worth.

（14）此外，还有一种传授知识的方法，人们对其进行了一定研究，同样也应用于实践。不过这并不算合乎法则，而只是一种欺骗。这种方法只是让人尽快领略点知识的皮毛，用以炫耀自己学问高深，事实上，他们并无任何真才实学。拉里斯·卢利就是用这种方法致力于创造一种以自己命名的技术。这就如沿用至今的排字册子一般，没有实质内容，只不过是一堆各类技艺的术语，给人们造成假象，认为运用这些术语的人真正了解那些技艺。但事实上，这些组合就像旧衣商或旧货铺子一样，零星物品应有尽有，却都一文不值。

CHAPTER XVIII

第十八章

(1) Now we descend to that part which concerneth the illustration of tradition, comprehended in that science which we call rhetoric, or art of eloquence, a science excellent, and excellently well laboured. For although in true value it is inferior to wisdom (as it is said by God to Moses, when he disabled himself for want of this faculty, "A*aron shall be thy speaker, and thou shalt be to him as God* "), yet with people it is the more mighty; for so Solomon saith, *Sapiens corde appellabitur prudens, sed dulcis eloquio majora reperiet* , signifying that profoundness of wisdom will help a man to a name or admiration, but that it is eloquence that prevaileth in an active life. And as to the labouring of it, the emulation of Aristotle with the rhetoricians of his time, and the experience of Cicero, hath made them in their works of rhetoric exceed themselves.Again, the excellency of examples of eloquence in the orations of Demosthenes and Cicero, added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precepts of eloquence, hath doubled the progression in this art; and therefore the deficiences which I shall note will rather be in some collections, which may as handmaids attend the art, than in the rules or use of the art itself.

（1）现在我们来讨论关于阐述的传授方法。这种方法被归于我们所称的修辞学或雄辩术之中，这门学科本身出类拔萃，其研究也成效卓著。尽管从真正价值上看，雄辩术还是无法与智慧匹敌（当摩西对上帝坦言自己缺乏这一技能时，上帝回答说，“你以他当作借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但对普通大众来说，这已是更为有力的技能。所罗门曾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这就意味着，智慧的深度为人们赢得美名和钦慕，但在生活

中真正起效用的却是雄辩。至于对修辞学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曾多次要与他同时代的修辞学家竞争，西塞罗又富于雄辩经验，这些使得他们在自己的修辞学著作中的形象比平时显示得自我更加睿智。此外，狄摩西尼和西塞罗在其演说中展示的雄辩的典型范例，又进一步完善了修辞的规范，与修辞学著作一起，共同促进了雄辩术的发展。至于说到缺陷，我觉得其存在于一些演说作品集中，它们或许只能被当作这门技艺的侍仆。但这一技艺本身的规则或应用却没有什么不足。

(2) Notwithstanding, to stir the earth a little about the roots of this science, as we have done of the rest, the duty and office of rhetoric is to apply reason to imagination for the better moving of the will. For we see reason is disturbed in the administration thereof by three means—by illaqueation or sophism, which pertains to logic; by imagination or impression, which pertains to rhetoric; and by passion or affection, which pertains to morality. And as in negotiation with others, men are wrought by cunning, by importunity, and by vehemency; so in this negotiation within ourselves, men are undermined by inconsequences, solicited and importuned by impressions or observations, and transported by passions. Neither is the nature of man so unfortunately built, as that those powers and arts should have force to disturb reason, and not to establish and advance it. For the end of logic is to teach a form of argument to secure reason, and not to entrap it; the end of morality is to procure the affections to obey reason, and not to invade it; the end of rhetoric is to fill the imagination to second reason, and not to oppress it; for these abuses of arts come in but ex oblique, for caution.

（2）不过，正如我们探讨其他学科时那样，稍稍掀起修辞学根

部的泥土，我们就会发现，修辞学的责任和职能是将理性应用于想象，从而使我们的意愿获得更有效的调动。在这一过程中，理性会受到三种方式的搅扰，第一种是与逻辑学相关的荒谬演绎或诡辩，第二种是与修辞学相关的想象或印象，第三种是与道德相关的激情或情感。在与人谈判时，人们会受对方的狡诈欺骗、胡搅蛮缠、热烈情绪等影响。同样，我们在与自己交涉时，也会因内心的矛盾受损害，被印象或观察所引诱，受满腔的激情所诱惑。不过，人类的天性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会放任这些因素搅扰我们的理性，相反，它能安定理性，并促进其发展。其实，逻辑旨在教人论辩的形式以维系、而不是诱骗理性；道德旨在引导情感服从、而不是侵犯理性；而修辞学旨在充实想象以辅佐、而不是压迫理性。对这些技艺的滥用都是间接产生的，我们只需谨慎防范。

(3) And therefore it was great injustice in Plato, though springing out of a just hatred to the rhetoricians of his time, to esteem of rhetoric but as a voluptuary art, resembling it to cookery, that did mar wholesome meats, and help unwholesome by variety of sauces to the pleasure of the taste. For we see that speech is much more conversant in adorning that which is good than in colouring that which is evil; for there is no man but speaketh more honestly than he can do or think; and it was excellently noted by Thucydides, in Cleon, that because he used to hold on the bad side in causes of estate, therefore he was ever inveighing against eloquence and good speech, knowing that no man can speak fair of courses sordid and base. And therefore, as Plato said elegantly, “That virtue, if she could be seen, would move great love and affection;” so seeing that she cannot be showed to the sense by corporal shape, the next degree is to show her to the imagination in lively representation; for to show her to reason only in subtlety of argument was a thing ever derided in Chrysippus and many of the Stoics, who thought to thrust virtue upon men by sharp disputations

and conclusions, which have no sympathy with the will of man.

（3）柏拉图对修辞学的阐释是极不公平的，尽管这是他对同时代的修辞学家的正当仇视。他视修辞学为一种享乐艺术，就如烹饪似的，一味毁损健康完好的食物，又用各种调料为有害身体的事物调味，以满足人们的口舌之欲。言辞多用于点缀善意，而不是掩盖罪恶。因为比起行为和思想，人们的言辞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内心。在评价克莱翁时，修昔底德就曾精当地描述道，由于克莱翁总是维护恶行昭著的权贵，才强烈抨击雄辩之术和善意的言辞，因为他明白，没人能为卑鄙的恶行辩护。对此，柏拉图也有极好的阐述，他说："如果美德能被人们所看到，必能引来极大的爱戴与欢喜。"因此，既然我们的身体无法感知美德，那就换一种方法，也就是利用我们的想象将其生动的展现出来。因为美德并不是通过精锐的理性争辩就能展露无遗的。克律西波斯和许多斯多葛学派的学者就不顾人们的意愿，试图通过激烈的辩驳和决绝的论断强加美德于人们身上，最终招致人们的轻蔑和嘲弄。

(4) Again, if the affections in themselves were pliant and obedient to reason, it were true there should be no great use of persuasions and insinuations to the will, more than of naked proposition and proofs; but in regard of the continual mutinies and seditious of the affections—"*Video meliora, proboque,Deteriora sequor*," reason would become captive and servile, if eloquence of persuasions did not practise and win the imagination from the affections' part, and contract a confederacy between the reason and imagination against the affections; for the affections themselves carry ever an appetite to good, as reason doth.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affection beholdeth merely the present; reason beholdeth the future and sum of time. And, therefore, the present filling the imagination more, reason is commonly vanquished; but after that

force of eloquence and persuasion hath made things future and remote appear as present, then upon the revolt of the imagination reason prevaileth.

（4）如果人们的情感易受理性影响，又乐于服从于理性，那么它对人们意愿的说服和暗示作用的确不会很明显，就和直白的提议和证据没什么两样。不过，对于情感持续的反叛和煽动性，诗中说道：”嘉行虽心赏，执意要行恶。“如果雄辩的说服无法将想象从情感中夺取过来，并令想象和理性结为同盟共同对抗情感，那么，理性同样受到控制，失去自由变得屈从。与理性一样，情感本身也是乐善好施的。但两者是有区别的。情感只是专注于当前，但理性还会延伸至将来甚至整个历史。因此，如果想象占据了当前的事物，理性便受到抑制。不过，如能通过雄辩和说服，令今后的事物，不管近期的还是遥远的，都展现在眼前，然后凭借想象的反击，理性便能赢得胜利。

(5) We conclude, therefore, that rhetoric can be no more charged with the colouring of the worst part, than logic with sophistry, or morality with vice; for we know the doctrines of contraries are the same, though the use be opposite. It appeareth also that logic differeth from rhetoric, not only as the fist from the palm—the one close, the other at large—but much more in this, that logic handleth reason exact and in truth, and rhetoric handleth it as it is planted in popular opinions and manners. And therefore Aristotle doth wisely place rhetoric as between logic on the one side, and moral or civil knowledge on the other, as participating of both; for the proofs and demonstrations of logic are toward all men indifferent and the same, but the proofs and persuasions of rhetoric ought to differ according to the auditors:“*Orpheus in sylvis, inter delphinas Arion* .” Which application in perfection of idea ought to extend so far that if a man should speak of the same thing to several

persons, he should speak to them all respectively and several ways; though this politic part of eloquence in private speech it is easy for the greatest orators to want: whilst, by the observing their well-graced forms of speech, they leese the volubility of application; and therefore it shall not be amiss to recommend this to better inquiry, not being curious whether we place it here or in that part which concerneth policy.

（5）总之，我们不能因粉饰消极事物来控诉修辞学，就如不能因诡辩控诉逻辑学，或因罪恶谴责道德一样。这些对立面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人们在应用时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同时，逻辑学与修辞学的差别不仅体现在两者的掌形不同，一个牢牢紧握，一个充分伸展，更为重要的是，逻辑学研究的是在真理范围内对绝对理性准确而真实的运用，修辞学研究的理性则根植于流行的观念和方式之中。亚里士多德对修辞学的划归就非常明智，他将其置于逻辑学与道德或社会知识之间，认为其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参与。因为逻辑学上的证据与证明对所有人来说都不存在差别，但修辞学的证据与辩辞则因人而异。“森林中是俄耳甫斯，在海豚中间就成了阿里翁。”这种因人而异传递观念的做法应该得到广泛应用。如果人们要对不同的人讲述同一件事，就应运用不同的方法分别向他们讲述。不过，即使那些最伟大的演说家在私人交流中也缺乏这种精明的做法。因为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言辞的优雅形式，而忽略了因人而异的方法。因此，我们并不必花费心思考虑应把修辞学放在这里讨论，还是归入政治学，重要的是，我们应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6) Now therefore will I descend to the deficiences, which, as I said, are but attendances; and first, I do not find the wisdom and diligence of Aristotle well pursued, who began to make a collection of the popular signs and colours of good and evil, both simple and comparative, which are as the sophisms of rhetoric (as I touched

before). For example*“Sophisma. Quod laudatur, bonum: quod vituperatur, malum. Redargutio. Laudat venales qui vult extrudere merces.” Malum est, malum est (inquit emptor): sed cum recesserit, tum gloriabitur!* The defects in the labour of Aristotle are three—one, that there be but a few of many; another, that there elenches are not annexed; and the third, that he conceived but a part of the use of them: for their use is not only in probation, but much more in impression. For many forms are equal in signification which are differing in impression, as the difference is great in the piercing of that which is sharp and that which is flat, though the strength of the percussion be the same. For there is no man but will be a little more raised by hearing it said, “Your enemies will be glad of this”—“*Hoc Ithacus velit, et magno mercentur Atridae* .” than by hearing it said only, “This is evil for you.”

（6）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修辞学的一些缺陷，这些其实都是些附带性的，非主要的缺陷。首先，亚里士多德曾收集了关于善恶的常见迹象和特征，或是简单描述，又或通过比较呈现，但是后人并没有追随他的脚步，继承这种才智和勤勉。关于修辞学上的诡辩（已有所提及）特征，则有一下例证：有这样的诡辩：凡受称赞的就是好的，凡遭谴责的就是恶的。其反证为：商人赞美商品，是为了获得利润。另一方面，买主虽在购买时口里喊着“没什么用处”，一旦离开，便口口声声大赞这一物品。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辛劳存在三种缺陷，一为例子不够充分；二为例子缺少反证；而第三，他对反证的效用理解片面，它们不仅仅用于验证，更在于让人印象深刻。有些反证虽然形式相同，给人的印象却存在出入，这就如同用尖锐和迟钝的工具来穿孔，虽然施加的力量一样，但产生的效果是迥然不同的。一个人如果听到类似“你对手一定会喜欢这样的”或者“伊萨卡可要开心了，阿特柔斯的儿子们正想方设法得到这一结果呢”这样的话，定会比“这样做对你有害”更能触动内心。

(7) Secondly, I do resume also that which I mentioned before, touching provision or preparatory store for the furniture of speech and readiness of invention, which appeareth to be of two sorts: the one in resemblance to a shop of pieces unmade up, the other to a shop of things ready made up; both to be applied to that which is frequent and most in request. The former of these I will call antitheta, and the latter formulae.

（7）其如果人们希望言谈中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就必须事先有一定储备。这在之前已经谈到，现在我们继续这一话题。这种储备就好似两类商店，一类售卖零件，一类则出售现货。两者都是经常需要用到的。我们把第一类称为对照，第二类称为套语。

(8) Antitheta are theses argued pro et contra, wherein men may be more large and laborious; but (in such as are able to do it) to avoid prolixity of entry, I wish the seeds of the several arguments to be cast up into some brief and acute sentences, not to be cited, but to be as skeins or bottoms of thread, to be unwinded at large when they come to be used; supplying authorities and examples by reference. "*Pro verbis legis. Non est interpretatio, sed divinatio, quae recedit a litera:Cum receditur a litera, judex transit in legislatorem. Pro sententia legis. Ex omnibus verbis est eliciendus sensus qui interpretatur singula* ."

（8）对照就是对论点的正反两方面阐述，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广征博引，潜心阐释，不过（如果可以做到的话），我还是希望人们在引入话题时能避免冗长拖沓，尽量先将各论点的梗概用简明精炼的语句加以表述。这并不是为了便于他人引述，而是如丝线的端点一般，在使用时方便展开。同时，还可以提供大量权威例证以作参考。

比如，“有关法律的语句，如果脱离字面意思进行诠释，就只能成为一种推测。如果法官脱离字面意思来解释，他便成了立法者。关于其语句的意义，它们是词语组合而成的，其意义不止于每个词语的单独释义。”

(9) Formulae are but decent and apt passages or conveyances of speech, which may serve indifferently for differing subjects; as of preface, conclusion, digression, transition, excusation, &c. For as in buildings there is great pleasure and use in the well casting of the staircases, entries, doors, windows, and the like; so in speech, the conveyances and passages are of special ornament and effect. “A conclusion in a deliberative. So may we redeem the faults passed, and prevent the inconveniences future.”

（9）套语是恰当而易于使用的言语的通道或传送带，适用于任何主题，包括引语、结论、话题转换、过渡、致歉等。在房屋建筑中，如楼梯、入口、门窗等构筑合理，不仅令人愉悦，还有很大的功用。同样，在言辞时，套语这一通道和传送带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装饰，同时也具有实际效用。例如在商议时，可以运用这样的结束语：“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既能补救之前的过失，又能防范今后可能造成的麻烦。”

CHAPTER XIX

第十九章

(1) There remain two appendices touching the tradition of knowledge, the one critical, the other pedantical. For all knowledge is either delivered by teachers, or attained by men's proper

endeavours: and therefore as the principal part of tradition of knowledge concerneth chiefly writing of books, so the relative part thereof concerneth reading of books; whereunto appertain incidently these considerations. The first is concerning the true correction and edition of authors; wherein nevertheless rash diligence hath done great prejudice. For these critics have often presumed that that which they understand not is false set down: as the priest that, where he found it written of St. Paul *Demissus est per sportam* , mended his book, and made it *Demissus est per portam* ; because *sporta* was a hard word, and out of his reading: and surely their errors, though they be not so palpable and ridiculous, yet are of the same kind. And therefore, as it hath been wisely noted, the most corrected copies are commonly the least correct. The second is concerning the exposition and explication of authors, which resteth in annotations and commentaries: wherein it is over usual to blanch the obscure places and discourse upon the plain. The third is concerning the times, which in many cases give great light to true interpretations. The fourth is concerning some brief censure and judgment of the authors; that men thereby may make some election unto themselves what books to read. And the fifth is concerning the syntax and disposition of studies; that men may know in what order or pursuit to read.

（1）关于知识传授，还需提到两个附属方面，一个是评论性的，一个是学究式的。一切知识的获得来源只有两个，一是教师的传授，二是个人的努力。因此，知识的传授以书籍写作为主，同时辅以作品的阅读。在这一方面，还需留意几点。第一点与作品的修正和版本有关，人们轻率鲁莽的勤奋投入对这一点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一些批评家经常擅自认为，他们不理解的地方就是记载有误的。曾经一位牧师读到这样一句话，圣保罗“被人用篮子放下城墙”，他从来没见过“篮子”的这一用法，无法理解这句话，于是便修改为“被人从城门放

下来”。尽管其他人的做法并没有那么明显和荒谬，但性质都是一样的。因此，正如人们所说，修改越多的副本通常是越不准确的。第二点是关于作品的阐述，这主要依赖于注解和评注。人们应该详细阐释晦涩难懂之处，但对清晰明了的内容无需多加注释，应把握好度。第三点与作品年代相关，很多情况下，联系时代背景对真实解读作品具有极大的效用。第四点是要对作品有一个简明的责难和评判，以帮助人们选择适合自己的阅读作品。第五点是关于研究的条理安排，这有助于人们了解按照怎样的顺序或流程来阅读。

(2) For pedantical knowledge, it containeth that difference of tradition which is proper for youth; whereunto appertain divers considerations of great fruit. As first, the timing and seasoning of knowledges; as with what to initiate them, and from what for a time to refrain them. Secondly, the consideration where to begin with the easiest, and so proceed to the more difficult; and in what courses to press the more difficult, and then to turn them to the more easy; for it is one method to practise swimming with bladders, and another to practise dancing with heavy shoes. A third is the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according unto the propriety of the wits; for there is no defect in the faculties intellectual, but seemeth to have a proper cure contained in some studies: as, for example, if a child be bird-witted, that is, hath not the faculty of attention, the mathematics giveth a remedy thereunto; for in them, if the wit be caught away but a moment, one is new to begin. And as sciences have a propriety towards faculties for cure and help, so faculties or powers have a sympathy towards sciences for excellency or speedy profiting: and therefore it is an inquiry of great wisdom, what kinds of wits and natures are most apt and proper for what sciences. Fourthly, the ordering of exercises is matter of great consequence to hurt or help: for, as is well observed by Cicero, men in exercising their faculties, if they be not well advised, do exercise their faults

and get ill habits as well as good; so as there is a great judgment to be had in the continuance and intermission of exercises. It were too long to particularise a number of other considerations of this nature, things but of mean appearance, but of singular efficacy. For as the wronging or cherishing of seeds or young plants is that that is most important to their thriving, and as it was noted that the first six kings being in truth as tutors of the state of Rome in the infancy thereof was the principal cause of the immense greatness of that state which followed, so the culture and manurance of minds in youth hath such a forcible (though unseen) operation, as hardly any length of time or contention of labour can countervail it afterwards. And it is not amiss to observe also how small and mean faculties gotten by education, yet when they fall into great men or great matters, do work great and important effects: whereof we see a notable example in Tacitus of two stage players, Percennius and Vibulenus, who by their faculty of playing put the Pannonian armies into an extreme tumult and combustion. For there arising a mutiny amongst them upon the death of Augustus Cæsar, Blaesus the lieutenant had committed some of the mutineers, which were suddenly rescued; whereupon Vibulenus got to be heard speak, which he did in this manner:—"These poor innocent wretches appointed to cruel death, you have restored to behold the light; but who shall restore my brother to me, or life unto my brother, that was sent hither in message from the legions of Germany, to treat of the common cause?and he hath murdered him this last night by some of his fencers and ruffians, that he hath about him for his executioners upon soldiers. Answer, Blaesus, what is done with his body?The mortalest enemies do not deny burial. When I have performed my last duties to the corpse with kisses, with tears, command me to be slain besides him; so that these my fellows, for our good meaning and our true hearts to the legions, may have leave to bury us." With which speech he put the army into an

infinite fury and uproar: whereas truth was he had no brother, neither was there any such matter; but he played it merely as if he had been upon the stage.

（2）学究式的知识传授是主要针对青少年的传授方法。关于这种方法，我们同样来探讨几点非常有用的想法。第一点是关于知识传授的时间与进程安排，包括什么内容适用于启蒙阶段，应该在哪个阶段暂停学习等。第二点是关于哪些知识最容易入手，可循序渐进至较难的知识；较难的知识又可通过怎样的进程来传授，继而转向较简单的知识。学习游泳我们要使用气囊，学习舞蹈我们要穿上笨重的鞋子，两者的方法是不同的。第三点是根据学习者的不同特性来传授知识。人类的智力是不存在缺陷的，任何不足都能通过适当的学习得到弥补。比如，一个孩子心浮气躁，心思无法集中，那么，学习数学就有很好的疗效。因为在数学学习过程中，一旦晃神，就需要从头开始。各学科对人们的智力具有不同的治疗和辅助效果，同样，人们的智力或才能也会与各学科产生共鸣，从而成长为全才或极大地促进该学科的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索什么类型的才能或特性适合哪类学科，这样的研究是十分英明的。第四点关于运用所学知识的顺序问题，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其产生的结果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西塞罗对此就有很好的观察，他说道，如果人们在运用自己的才能时没有得到很好的指导，在养成良好习惯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错误，继而形成坏习惯。因此，对于运用操练这些能力的持续时间与中断间隔，我们需要进行审慎的判断。如果我们要详述这一类研究，必然要占用大量篇幅，因而只能简略带过。总之，有些事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效用非凡。植物的种子或幼株能否茁壮成长，关键看能否得到良好的照料。此外，我们注意到，罗马帝国初期的六位君王更像是该帝国幼年时期的监护人，正是他们的保驾护航，才使罗马帝国在之后开创出辉煌的伟绩。因此，年轻人心智的修养与培育往往具有强有力（虽无法看见）的实际效用。错过这段时期，无论花费多长时间，耗费多少精力，都难以抵消这种效用。同时，我们注意到，虽然通过教育获得的才能可能只是平庸普通的，但如果是一些伟

大人物获得了这些能力，或是将这些能力应用到重大事件上，往往能产生异乎寻常的重大功效。塔西陀就列举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两个戏剧演员，潘森尼耶和维布伦努斯，利用他们的表演才能将潘森尼耶军队搅得混乱不堪。奥古斯丁·恺撒逝世后，其军队便出现了兵变。副官布拉埃苏斯羁押了一些叛变者，但很快就被营救，根本无济于事。维布伦努斯碰巧听到了这一消息，便说了这样一番话："你解救了那些无辜可怜的死刑犯，让他们重见天日，可谁来解救我的兄弟，让他得以重生呢？他从日耳曼军团捎来消息，来和我一起践行我们的共同伟业。可就在昨晚，布拉斯苏斯派了他的剑客和凶徒把我的兄弟暗杀了，这些人就是他所养的刽子手，专门用来杀害士兵。布拉埃苏斯，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处置我兄弟的尸首？即使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也不会不允许埋葬死者的。请允许我含泪亲吻我兄弟的遗体，尽到我最后的职责。在那之后，就在他的身旁，你把我也杀了吧。这样一来，我的同伴们看到我们坚守意志，对军团忠诚不二，或许就会将我们埋葬。"就是这样一番言辞，激得全军士兵怒气冲天，喧嚣不断。但事实却是，维布伦努斯根本没有什么兄弟，更没有他所说的整个事件，他只不过是演了一出戏而已。

(3) But to return: we are now come to a period of rational knowledges; wherein if I have made the divisions other than those that are received, yet would I not be thought to disallow all those divisions which I do not use. For there is a double necessity imposed upon me of altering the divisions. The one, because it differeth in end and purpose, to sort together those things which are next in nature, and those things which are next in use. For if a secretary of estate should sort his papers, it is like in his study or general cabinet he would sort together things of a nature, as treaties, instructions, &c. But in his boxes or particular cabinet he would sort together those that he were like to use together, though of several natures. So in this general cabinet of knowledge it was necessary for me to follow the divisions of the nature of things;

whereas if myself had been to handle any particular knowledge, I would have respected the divisions fittest for use. The other, because the bringing in of the deficiences did by consequence alter the partitions of the rest. For let the knowledge extant (for demonstration sake) be fifteen. Let the knowledge with the deficiences be twenty; the parts of fifteen are not the parts of twenty; for the parts of fifteen are three and five; the parts of twenty are two, four, five, and ten. So as these things are without contradiction, and could not otherwise be.

（3）我们对理性知识的讨论已经接近尾声，如果期间我作出的分类与人们所熟悉的不一致，请别认为我并不认同我所没有采用的分类方式。我改变分类方式，因为我觉得有必要考虑两点。其一，如果根据事物的性质或用途进行总体划分，其目的和结果都会是不同的。如果一位国家大臣整理文件，在自己的书房或普通储柜中，他会将文件根据性质进行归类，分为条约、指令等等。但在特定盒子或柜子中，他会按照用途来划分，同时将要用到的文件放到一起，尽管它们的性质各异。因此，在这个普通的知识储柜中，我认为有必要按照事物的性质进行分类。如果我自己需要探究某一特定知识，我便会按照最方便使用的方法来分类。其二，指出知识存在的缺陷也会引起现有知识划分的变动。如果说，我们把现有知识分为15份（只是为了说明问题），存有缺陷的知识分为20份，那么，这15份知识中的每一部分与20分中的每一部分就是不同的。15份知识还能归为3类或5类，而20份的知识可归为2类、4类、5类和10类。所以，这些分类并不矛盾，且只能这样分类。

CHAPTER XX

第二十章

(1) We proceed now to that knowledge which considereth of the appetite and will of man: whereof Solomon saith, Ante omnia, fili, custodi cor tuum: nam inde procedunt actiones vitae. In the handling of this science, those which have written seem to me to have done as if a man, that professed to teach to write, did only exhibit fair copies of alphabets and letters joined, without giving any precepts or directions for the carriage of the hand and framing of the letters. So have they made good and fair exemplars and copies, carrying the draughts and portraitures of good, virtue, duty, felicity; propounding them well described as the true objects and scopes of man's will and desires. But how to attain these excellent marks, and how to frame and subdue the will of man to become true and conformable to these pursuits, they pass it over altogether, or slightly and unprofitably. For it is not the disputing that moral virtues are in the mind of man by habit and not by nature, or the distinguishing that generous spirits are won by doctrines and persuasions, and the vulgar sort by reward and punishment, and the like scattered glances and touches, that can excuse the absence of this part.

（1）接着，我们来讨论与人类的欲求和意愿相关的知识。所罗门说过；“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我看来，现存的关于这门学科的著述就如同一个擅长书法教学的人，只懂得向人们展示字母表书写和字母连写的美观，并不教人怎样运用手部力量和字母结构安排等方面的任何规则或指导。同样，那些著述也只是展现了一些美好鲜明的样例和范本，只是传达了善意、美德、责任、幸福等的干瘪轮廓。在这些作者看来，描绘的这些轮廓足以表现人们意愿与期望的真正目标和活动范围。不过，这些卓越的品质该如何获得，人们的意愿又应如何进行建构或抑制，才能真正忠于这些追求？这些他们基本忽略，或只是一笔带过，毫无教益。需要承认的是，著述中也有提及，人类内心的美德源于习俗，而

非本性。高尚人士的这种美德主要通过信条或劝导获得，而平民百姓的美德则是通过实行赏罚来实现的。另有一些类似的表述分散于各种作品中。不过，这些并不能为这类知识的不足进行申辩。

(2) The reason of this omission I suppose to be that hidden rock whereupon both this and many other barks of knowledge have been cast away; which is, that men have despised to be conversant in ordinary and common matters, the judicious direction whereof nevertheless is the wisest doctrine (for life consisteth not in novelties nor subtleties), but contrariwise they have compounded sciences chiefly of a certain resplendent or lustrous mass of matter, chosen to give glory either to the subtlety of disputatious, or to the eloquence of discourses. But Seneca giveth an excellent check to eloquence, *Nocet illis eloquentia, quibus non rerum cupiditatem facit, sed sui.* Doctrine should be such as should make men in love with the lesson, and not with the teacher; being directed to the auditor's benefit, and not to the author's commendation. And therefore those are of the right kind which may be concluded as Demosthenes concludes his counsel, *Quae si feceritis, non oratorem dumtaxat in praesentia laudabitis, sed vosmetipsos etiam non ita multo post statu rerum vestraram meliore* .

（2）我认为，这类疏忽是由知识海域中的暗礁所导致的。它们不仅令这艘知识之舟失事，还引发了其他知识之舟的事故。这种暗礁就是人们对常见的普通事物的鄙视，殊不知，这类事物中体现的智慧才是最睿智的道理（因为生活并非由新奇或微妙的事物构成的）。但相反的，人们用光鲜华丽的事物糅合混杂出各类学科，目的在于为精妙的论辩或者雄辩的言辞赢得荣耀。塞内加在对雄辩术进行深入审视后说道："如果人们贪于雄辩之术，却不顾及论辩的内容，这样的雄辩是存在危害的。"一切教诲都应引导人们热爱得到的启示，而不是

热爱教授的老师；应引导他们获得教益，而不是赞扬教授者。狄摩西尼在提出忠告时，在最后这样说道：“如果你们能够照做，你们不仅会在今后赞美演讲者，还会为自己的进步而自我称赞。”这正好可以作为这一部分的总结。

(3) Neither needed men of so excellent parts to have despaired of a fortune, which the poet Virgil promised himself, and indeed obtained, who got as much glory of eloquence, wit, and learning in the expressing of the observations of husbandry, as of the heroical acts of AEneas:“*Nec sum animi dubius, verbis ea vincere magnum Quam sit, et angustis his addere rebus honorem* .” And surely, if the purpose be in good earnest, not to write at leisure that which men may read at leisure, but really to instruct and suborn action and active life, these Georgics of the mind, concerning the husbandry and tillage thereof, are no less worthy than the heroical descriptions of virtue, duty, and felicity. Wherefore the main and primitive division of moral knowledge seemeth to be into the exemplar or platform of good, and the regiment or culture of the mind: the one describing the nature of good, the other prescribing rules how to subdue, apply, and accommodate the will of man thereunto.

（3）如果人们拥有卓绝才能，根本无需对命运感到无望。维尔吉尔曾对自己发誓要功成名就，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他的记叙大到埃涅阿斯的英雄壮举，小到对田地耕作的观察，这些记述成就了他事业，为他赢得了雄辩、睿智和博学的美名。吾题本平凡，立意扬其光，端为庄严计，不惜辛苦偿，既无堂皇旨，复少华美质，挥洒壮丽句，庶几可文饰。当然，如果学者不是闲来无事随便写写，让读者消磨时光随便看看，而是抱以至诚之心潜心写作，真正用以指导人们的行为和现实生活。这些描绘内心的田园诗，描写了心灵的耕耘与栽培之术，这和关于美德、责任和幸福的史诗般描绘同等重要。因此，对

道德类知识的主要的、原始的划分，似乎是在善性的模范或榜样与心灵的支配或陶冶之间。一个描述善性的本质，一个制定征服、运用和调节人们意愿的规则。

(4) The doctrine touching the platform or nature of good considereth it either simple or compared; either the kinds of good, or the degrees of good; in the latter whereof those infinite disputatious which were touching the supreme degree thereof, which they term felicity, beatitude, or the highest good, the doctrines concerning which were as the heathen divinity, are by the Christian faith discharged. And as Aristotle saith, “That young men may be happy, but not otherwise but by hope;” so we must all acknowledge our minority, and embrace the felicity which is by hope of the future world.

（4）关于善性的模范或本质，既可进行简单研究，关注善性的类型，也可通过比较研究，涉及善性的程度。在对善性程度的研究中，关于善性的至高境界，也就是所谓的幸福、至福、至善，人们进行着无止尽的论辩。有关这一方面的学说，也被人们视作异教神学，排除于基督教信仰之外。亚里士多德曾说，“年轻人可能会感到幸福，这种幸福源于希望，无他。”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幼稚，以及我们的幸福感就是来源于我们的未来世界的期许。

(5) Freed therefore and delivered from this doctrine of the philosopher's heaven, whereby they feigned a higher elevation of man's nature than was (for we see in what height of style Seneca writeth, *Vere magnum, habere fragilitatem hominis, securitatem Dei*), we may with more sobriety and truth receive the rest of their inquiries and labours. Wherein for the nature of good positive or

simple, they have set it down excellently in describing the forms of virtue and duty, with their situations and postures; in distributing them into their kinds, parts, provinces, actions, and administrations, and the like: nay further, they have commended them to man's nature and spirit with great quickness of argument and beauty of persuasions; yea, and fortified and entrenched them (as much as discourse can do) against corrupt and popular opinions. Again, for the degrees and comparative nature of good, they have also excellently handled it in their triplicity of good, in the comparisons between a contemplative and an active life,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virtue with reluctation and virtue secured, in their encounters between honesty and profit, in their balancing of virtue with virtue, and the like; so as this part deserveth to be reported for excellently laboured.

（5）哲学家将人类的本性提升到一个高于实际的虚设的高度（这从塞内加虚夸的笔触中就能看出，他写道，“真正的伟大源自人的脆弱和神的安详的结合”）。如果我们暂时摆脱这类善性学说，那么我们就能以更清醒的头脑，更真切的态度来审视其他研究和努力。对于善性积极或单纯的本质，学者们已经做了细致的研究，并记录保存了下来。他们完美地描述了美德和责任的各类形式，及它们出现的情形和局面，并将根据其类型、构成、领域、行为及实施等进行了分类。此外，学者运用机智的论辩和精妙的劝导，说服人们相信这种善性与人类的天性与灵魂保持了一致。同时，他们对这一美德进行了加强和巩固（尽可能达到论述的最大功效），令其能够抵御普遍存在的腐朽观点。至于善性的程度及其比较，学者同样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他们提出了善性的三位一体说，比较和区分了思维活动和行为活动，施加的美德和自发的美德等，思索对正直与利益的碰撞，协调了各类美德之间的平衡，等等。可以说，这部分知识已经得到了充分而深入的研究。

(6) Notwithstanding, if before they had come to the popular and received notions of virtue and vice, pleasure and pain, and the rest, they had stayed a little longer upon the inquiry concerning the roots of good and evil, and the strings of those roots, they had given, in my opinion, a great light to that which followed; and specially if they had consulted with nature, they had made their doctrines less prolix and more profound: which being by them in part omitted and in part handled with much confusion, we will endeavour to resume and open in a more clear manner.

（6）不过，如果他们在研究善恶、苦乐和其他一些公认观点之前，能多花费一点精力探究善恶的根源及由此生发的各分支，那么在我看来，他们必能为之后的善恶研究带来深刻的启发。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向自然讨教，他们的学说就会更加精炼而深刻。关于这一方面，学者的研究是存在疏漏的，即使有某些相关的叙述，也是紊乱不清的。因此，我们应采用更加清晰的形式，努力重新加以论述。

(7) There is formed in everything a double nature of good—the one, as everything is a total or substantive in itself; the other, as it is a part or member of a greater body; whereof the latter is in degree the greater and the worthier, because it tendeth to the conservation of a more general form. Therefore we see the iron in particular sympathy moveth to the loadstone; but yet if it exceed a certain quantity, it forsaketh the affection to the loadstone, and like a good patriot moveth to the earth, which is the region and country of massy bodies; so may we go forward, and see that water and massy bodies move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but rather than to suffer a divulsion in the continuance of nature, they will move upwards from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forsaking their duty to the earth in regard of their duty to the world. This double nature of

good, and the comparative thereof, is much more engraven upon man, if he degenerate not, unto whom the conservation of duty to the public ought to be much more precious than the conservation of life and being; according to that memorable speech of Pompeius Magnus, when being in commission of purveyance for a famine at Rome, and being dissuaded with great vehemency and instance by his friends about him, that he should not hazard himself to sea in an extremity of weather, he said only to them, *Necesse est ut eam, non ut vivam* . But it may be truly affirmed that there was never any philosophy, religion, or other discipline, which did so plainly and highly exalt the good which is communicative, and depress the good which is private and particular, as the Holy Faith; well declaring that it was the same God that gave the Christian law to men, who gave those laws of nature to inanimate creatures that we spake of before; for we read that the elected saints of God have wished themselves anathematised and razed out of the book of life, in an ecstasy of charity and infinite feeling of communion.

（7）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善性都具有两重特性。一方面，任何事物都以一个整体或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另一个更大团体中的成员或组成部分。从程度上而言，由于善性的第二种特性试图维持一种更为综合普遍的形式，因而也更为重要，更有价值。于是我们看到，铁在受到磁力吸引时会移向磁石，但如果铁的数量超过某一限度，就不再受到磁石的吸引了，而是像一名忠诚的爱国者一样，向着庞大物体的归属和故土——大地紧紧靠拢。我们进一步观察，就能发现，水和庞大物体都趋向于地心移动，不过，为避免破坏自然的连续性，它们又从中心向上移动。这是它们为了履行对全世界的职责，而舍弃了对地球的责任。善性的这两种特性以及它们之间的比较，在人类身上更为显著深刻。如果一个人不致堕落，那他必会将对公众的责任看得比自己的生存和生命更为重要。当庞培·马格努斯被委派到罗马赈济灾荒时，他的朋友极力劝阻，认为他不该在天气极度

恶劣的情况下赶赴海边，让自己身处险境。然而庞培只是说道：“我必须去，并非必须活着。”这句值得人们永久纪念的话正是最好的例证。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史上从没有任何哲学、宗教或其他学科做到基督信仰那样，对面向社会的善进行直白而高度的赞扬，对私人和特定的善行给予极大的压抑。同时，它还明确声明，创造基督教戒律的上帝就是我们之前所提的制定无生命物质自然法则的上帝。我们还从书中了解到，上帝的圣徒陶醉于仁爱和圣餐的无尽感触中，他们愿得到上帝的诅咒，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众生赎罪。

(8) This being set down and strongly planted, doth judge and determine most of the controversies wherein moral philosophy is conversant. For first, it decideth the question touching the preferment of the contemplative or active life, and decideth it against Aristotle. For all the reasons which he bringeth for the contemplative are private, and respecting the pleasure and dignity of a man's self (in which respects no question the contemplative life hath the pre-eminence), not much unlike to that comparison which Pythagoras made for the gracing and magnifying of philosophy and contemplation, who being asked what he was, answered, “That if Hiero were ever at the Olympian games, he knew the manner, that some came to try their fortune for the prizes, and some came as merchants to utter their commodities, and some came to make good cheer and meet their friends, and some came to look on; and that he was one of them that came to look on.” But men must know, that in this theatre of man's life it is reserved only for God and angels to be lookers on. Neither could the like question ever have been received in the Church, notwithstanding their *Pretiosa in oculis Domini mors sanctorum ejus* , by which place they would exalt their civil death and regular professions, but upon this defence, that the monastical life is not simple contemplative, but performeth the duty either of incessant prayers and supplications, which hath been truly

esteemed as an office in the Church, or else of writing or taking instructions for writing concerning the law of God, as Moses did when he abode so long in the mount. And so we see Enoch, the seventh from Adam, who was the first contemplative and walked with God, yet did also endow the Church with prophecy, which Saint Jude citeth. But for contemplation which should be finished in itself, without casting beams upon society, assuredly divinity knoweth it not.

（8）在确定并承认这一点之后，很多道德哲学领域的争论就迎刃而解了。首先，关于思维活动和行为活动何者优先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其结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正好相反。亚里士多德推崇思维活动，但他提出的相关理由都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基于个人的享乐与尊严（这方面思维活动无疑更加优越）。这类理由与毕达哥拉斯出于美化和夸耀哲学与冥想的目的所作的比较如出一辙。当被问及他的职业时，他回答说："如果耶罗曾来到奥林匹克赛场，他必然知道人们来此的目的，有人是冲着奖品来碰碰运气，有人来推销他们的商品，有人是来喝彩加油并会会朋友，还有一些就是来观看比赛的。而他就是特地前来观赛的。"但是，人们应该知道，在整个人类生活舞台上，只有上帝和天神可以作为真正的观众。类似的问题在宗教上也未曾得到解决。尽管"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但这样的话语只不过是教会用来颂扬圣徒的无私献身和虔诚信仰。但教会或许会找理由辩护，认为神院的修行并不只是单纯的冥想，还需履行其教会中的职责。他们须不断地祈求与祷告，这已然成为教会的一大职能。此外，他们还须撰写书籍，传授上帝的戒律，正如摩西在山上常住时所做的那样。同样，亚当的七世孙以诺虽是第一个终日冥想，又与上帝同行的人，但他还是向教会透露了一则预言，这在《犹大书》中有所引述。由此，作为一种自足的思维活动，无法对社会产生任何启示的冥想，甚至连神学都是不知情的。

(9) It decideth also the controversies between Zeno and Socrates, and their schools and successions, on the one side, who placed felicity in virtue simply or attended, the actions and exercises whereof do chiefly embrace and concern society; and on the other side, the Cyrenaics and Epicureans, who placed it in pleasure, and made virtue (as it is used in some comedies of errors, wherein the mistress and the maid change habits) to be but as a servant, without which pleasure cannot be served and attended; and the reformed school of the Epicureans, which placed it in serenity of mind and freedom from perturbation; as if they would have deposed Jupiter again, and restored Saturn and the first age, when there was no summer nor winter, spring nor autumn, but all after one air and season; and Herillus, which placed felicity in extinguishment of the disputes of the mind, making no fixed nature of good and evil, esteeming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clearness of the desires, or the reluctation; which opinion was revived in the heresy of the Anabaptists, measuring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motions of the spirit, and the constancy or wavering of belief: all which are manifest to tend to private repose and contentment, and not to point of society.

（9）其次，两个学派之间长期存在的争论也能得到解决。一方面，芝诺与苏格拉底及他们两个学派和后继者认为，幸福来源于美德。不管是单纯的美德还是努力培养的美德，在应用和实行之时总是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另一方面，昔兰尼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则认为，幸福源自快乐，而把美德视作其奴仆（这就像是在故意出错引人发笑的喜剧中，主仆调换装扮一样），快乐就是在美德的服侍和照顾下实现的。而改革后的伊壁鸠鲁学派又将人们内心的平静安详，不受侵扰作为幸福的源泉。他们似乎有意再次罢免丘比特，令其让位于农业之神，回到那个不分四季，浑然一体的时代。此外，赫利勒斯将幸福归因于内心挣扎的清除，认为善恶不存在特定性质，对事物的善恶评价

来源于内心的欲求或反抗。这一观点在再洗礼派的异端中得到复兴，他们也是根据精神活动和信仰的坚守和动摇程度来判断事物。总之，这一类学说都将个人内心的安逸作为幸福的源泉，完全不考虑社会层面。在确立了善的双重性质之后，这两类观点之间的争端便也不复存在。

(10) It censureth also the philosophy of Epictetus, which presupposeth that felicity must be placed in those things which are in our power, lest we be liable to fortune and disturbance; as if it were not a thing much more happy to fail in good and virtuous ends for the public, than to obtain all that we can wish to ourselves in our proper fortune: as Consalvo said to his soldiers, showing them Naples, and protesting he had rather die one foot forwards, than to have his life secured for long by one foot of retreat. Whereunto the wisdom of that heavenly leader hath signed, who hath affirmed that “a good conscience is a continual feast;” showing plainly that the conscience of good intentions, howsoever succeeding, is a more continual joy to nature than all the provision which can be made for security and repose.

（10）此外，善的双重性学说对爱比克泰德的哲学发出了责难。爱比克泰德哲学假定幸福必然来源于人们的能力可控的事物之中，唯恐人们受到命运和骚动的侵扰。这好像是说，放弃履行面向社会公众的善行并不能让人幸福，只有在依靠自己的运气实现所有自己的意愿时，人们才会感到幸福。孔萨沃尔征战意大利时，曾指着那不勒斯对他的士兵们发誓说，他宁可前进一步赴死，也不愿撤退一步保命。这似乎闪烁着那位神圣导师的智慧，他就曾庄严宣称：“心中欢畅的，常享丰筵席。”这显然意味着，只要拥有善性，无论带来怎样的效果，都是人们源源不断的快乐之源，一切为生活的安定和平和所作的准备都无法与之相比。

(11) It censureth likewise that abuse of philosophy which grew general about the time of Epictetus, in converting it into an occupation or profession; as if the purpose had been, not to resist and extinguish perturbations, but to fly and avoid the causes of them, and to shape a particular kind and course of life to that end; introducing such a health of mind, as was that health of body of which Aristotle speaketh of Herodicus, who did nothing all his life long but intend his health; whereas if men refer themselves to duties of society, as that health of body is best which is ablest to endure all alterations and extremities, so likewise that health of mind is most proper which can go through the greatest temptations and perturbations. So as Diogenes' opinion is to be accepted, who commended not them which abstained, but them which sustained, and could refrain their mind in praecipitio, and could give unto the mind (as is used in horsemanship) the shortest stop or turn.

（11）同样，这一学说对爱比克泰德同时代对哲学的滥用现象也提出了谴责。在那一时代，哲学被转化为一种职业或专业，似乎哲学的目的不在于抵制和消除人们的烦扰，而是远离和逃避造成这些烦扰的原因，并打造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安排特定的生活路线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方式与亚里士多德描述的希罗蒂卡的保持身体健康的方式是一致的。希罗蒂卡一生除了维持自己的健康状态，不做任何事情。不过，如果人们希望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正如健康身体能够容忍所有变化和极限那样，他们最健康的心理也应是能经受一切诱惑和侵扰的。在这方面，第欧根尼的观点理应为人们所接受。他称道那些能经受欲望的人，而不是禁欲之人。因为他认为，能经受欲望的人可以在重要关头控制自己的心智，令其戛然而止或迅速转向（就如骑术的技巧一般）。

(12) Lastly, it censureth the tenderness and want of application in some of the most ancient and reverend philosophers and philosophical men, that did retire too easily from civil business, for avoiding of indignities and perturbations; whereas the resolution of men truly moral ought to be such as the same Consalvo said the honour of a soldier should be, *e tela crassiore* , and not so fine as that everything should catch in it and endanger it.

（12）最后，我们所提的善性学说对远古一些受人尊崇的哲学家或贤明人士的纤细情感和应用能力的缺乏也是一种贬抑。他们为了逃避侮辱和烦忧，轻易引退，不理公共事务。事实上，真正德行高尚之人的坚定果断应如孔萨沃尔所提出的士兵的荣耀那样，如粗糙的兵器，不至于纤细到任何事物都能影响或危及到它。

CHAPTER XXI

第二十一章

(1) To resume private or particular good, it falleth into the division of good active and passive; for this difference of good (not unlike to that which amongst the Romans was expressed in the familiar or household terms of *promus* and *condus*) is formed also in all things, and is best disclosed in the two several appetites in creatures; the one to preserve or continue themselves, and the other to dilate or multiply themselves, whereof the latter seemeth to be the worthier; for in nature the heavens, which are the more worthy, are the agent, and the earth, which is the less worthy, is the patient. In the pleasures of living creatures, that of generat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food. In divine doctrine, *beatius est dare quam accipere* . And in life, there is no man's spirit so soft, but esteemeth the

effecting of somewhat that he hath fixed in his desire, more than sensuality, which priority of the active good is much upheld by the consideration of our estate to be mortal and exposed to fortune. For if we might have a perpetuity and certainty in our pleasures, the state of them would advance their price. But when we see it is but *magni aestimamus mori tardius, and ne glorieris de crastino, nescis partum diei* , it maketh us to desire to have somewhat secured and exempted from time, which are only our deeds and works; as it is said, *Opera eorum sequuntur eos* . The pre-eminence likewise of this active good is upheld by the affection which is natural in man towards variety and proceeding, which in the pleasures of the sense, which is the principal part of passive good, can have no great latitude. *Cogita quamdiu eadem feceris; cibus, somnus, ludus per hunc circulum curritur; mori velle non tantum fortis, aut miser, aut prudens, sed etiam fastidiosus potest* . But in enterprises, pursuits, and purposes of life, there is much variety; whereof men are sensible with pleasure in their inceptions, progressions, recoils, reintegrations, approaches and attainings to their ends. So as it was well said, *Vita sine proposito languida et vaga est* . Neither hath this active good an identity with the good of society, though in some cases it hath an incidence into it. For although it do many times bring forth acts of beneficence, yet it is with a respect private to a man's own power, glory, amplification, continuance; as appeareth plainly, when it findeth a contrary subject. For that gigantine state of mind which possesseth the troublers of the world, such as was Lucius Sylla and infinite other in smaller model, who would have all men happy or unhappy as they were their friends or enemies, and would give form to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ir own humours (which is the true theomachy), pretendeth and aspireth to active good, though it recedeth furthest from good of society, which we have determined to be the greater.

（1）我们现在接着来讨论个人的或特定的善性，这主要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这一分类（类似于罗马人用于表述熟悉或家庭相关的事物时所用的“promus”和“condus”一样）同样涉及所有事物，更充分体现于创造物的两种欲求之上，一为维持或延续自身，二为扩展或繁衍自身。第二种欲求较之第一种更有价值，因为在自然之中，上天是施动者，更有价值；大地是受动者，价值不及上天。对生物而言，繁衍比食物更能令其快乐。神圣的教义也告诉我们，“给予比接受更为有福”。在人类生活中，人们的精神并不软弱，他们都更加重视内心的愿望，而不是耽于声色。再加上人生有限，命运无常，积极善意的重要性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如果我们的快乐中存在确定而永恒的部分，这种状态可令其更有价值。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中说道，“我们把晚死一会儿当作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由此我们看到，这句话的翻译好像理解上有出入：我们应该追求一些可靠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事物，那就是我们的行为和工作。正如古人说的，“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积极善性的优越性同样体现于人们对多样化和进步性的钟爱。而作为消极善意的主体内容，感官愉悦的多样化和进步性的延展范围并没有如此之广。“回想一下，你已经多久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吃饭、睡觉、玩乐，每天都是如此周而复始。对于这样的生活，不仅那些勇敢的人、不开心的人、有见识的人，甚至那些喜欢暴饮暴食的人也厌倦至极。”然而在人生事业和目标的追求之中，到处都充满着千变万化。在这过程中，人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开创、进展、畏缩、重整、接近目标、取得成就等多样的快乐。于是，人们说得好，“无目的的生活是慵懒而含糊的”。尽管积极的善有时与社会上的善行相契合，但它们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很多时候，虽然积极的善的确能带来各种善行，但它注重的只是个人内在的权势、荣耀、扩展和延续。当出现与其相对立的目的时，这些主旨就显得更为清晰了。一些意欲扰乱世界之人，内心是扭曲且遭受过腐蚀的。这些人中包括了卢修斯·西拉和无数其他小角色。他们奉行顺昌逆亡，同时根据自己的心情任意改变世界（这才算是真正的诸神之战）。他们伪装成极力追求个人的积极善性的样子，但却与社会的善行背道而驰，而后者是我们认为更加重要的。

(2) To resume passive good, it receiveth a subdivision of conservative and effective. For let us take a brief review of that which we have said: we have spoken first of the good of society, the intention whereof embraceth the form of human nature, whereof we are members and portions, and not our own proper and individual form; we have spoken of active good, and supposed it as a part of private and particular good. And rightly, for there is impressed upon all things a triple desire or appetite proceeding from love to themselves: one of preserving and continuing their form; another of advancing and perfecting their form; and a third of multiplying and extending their form upon other things: whereof the multiplying, or signature of it upon other things, is that which we handled by the name of active good. So as there remaineth the conserving of it, and perfecting or raising of it, which latter is the highest degree of passive good. For to preserve in state is the less, to preserve with advancement is the greater. So in man,"*Igneus est ollis vigor, et cœlestis origo* ." His approach or assumption to divine or angelical nature is the perfection of his form; the error or false imitation of which good is that which is the tempest of human life; while man, upon the instinct of an advancement, formal and essential, is carried to seek an advancement local. For as those which are sick, and find no remedy, do tumble up and down and change place, as if by a remove local they could obtain a remove internal, so is it with men in ambition, when failing of the mean to exalt their nature, they are in a perpetual estuation to exalt their place. So then passive good is, as was said, either conservative or perfective.

（2）消极的善性可细分为维持的和有效的两种。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之前的论述。首先我们讲到了社会的善

行，这类善行意图体现的并非是我们个人的独特形式，而是人类本性的所有形式，我们只不过是其中的个体或部分而已。之后我们还提到了积极的善性，认为它是个人的、特定的善性的组成部分。这样的区分是合理的，出于对自己的热爱，所有生物都存在三种愿望或欲求。第一是维持和延续自己的形式；第二是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形式；第三是借助其他事物繁衍和扩展自己的形式。至于借助其他事物来繁衍，或在其他事物上打上关于其繁衍的标志，我们已经在关于积极的善这一部分进行了讨论。这里我们只剩下如何维持以及完善或提升自己的形式这一方面未加阐述。在消极善性中，完善和提升是最高的境界。因为与维持原有状态相比，维持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是更有价值的。对人类而言，“火热之力自天成，驱使鼓舞人一生。”维尔吉尔靠近或设想自己具有神圣的或天使的本质，这就是他对自己生命形式的完善。不过，如果人们对这种善性的实行出现错误，或是进行虚假的模仿，便会对人类生活造成极大的骚动。而人们受谋求发展的天性的驱使，不管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的，便会主动寻找发展的契机。病患在找不到治疗方法时，就会上下翻滚，改换位置，似乎移动地点就能移除疾病一样。心怀抱负的人类也是如此。他们在无法提升自己的品性时，便慷慨激昂地驱使着自己不断提升他们的地位。因此，消极的善就如我们以上所提，分为维持原状和趋于完善的两种。

(3) To resume the good of conservation or comfort, which consisteth in the fruition of that which is agreeable to our natures; it seemeth to be most pure and natural of pleasures, but yet the softest and lowest. And this also receiveth a difference, which hath neither been well judged of, nor well inquired; for the good of fruition or contentment is placed either in the sincereness of the fruition, or in the quickness and vigour of it; the one superinduced by equality, the other by vicissitude; the one having less mixture of evil, the other more impression of good. Whether of these is the greater good is a question controverted; but whether man's nature may not be capable of both is a question not inquired.

（3）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维持的或安逸的善，这主要在于享受那些符合我们本性的事物。这似乎是最纯粹最自然的快乐，但同时也是最脆弱最低下的。这种善性同样存在一种差异，但人们并未曾仔细划分，也不曾充分研究。这种给予享受和满足的善意或是注重享受的纯粹，或是注重享受的活力。一个累积于均衡，一个增添于多变；一个少有恶的掺和，一个多存善的印象。至于这两类善性何者更有价值，尚且存有争议。不过，人们的本性是否能同时兼备两者，这还未曾有任何研究。

(4) The former question being debated between Socrates and a sophist, Socrates placing felicity in an equal and constant peace of mind, and the sophist in much desiring and much enjoying, they fell from argument to ill words: the sophist saying that Socrates' felicity was the felicity of a block or stone; and Socrates saying that the sophist's felicity was the felicity of one that had the itch, who did nothing but itch and scratch. And both these opinions do not want their supports. For the opinion of Socrates is much upheld by the general consent even of the epicures themselves, that virtue beareth a great part in felicity; and if so, certain it is, that virtue hath more use in clearing perturbations then in compassing desires. The sophist's opinion is much favoured by the assertion we last spake of, that good of advancement is greater than good of simple preservation; because every obtaining a desire hath a show of advancement, as motion though in a circle hath a show of progression.

（4）对于前一个问题，即两类善性的优越性问题，苏格拉底与某一诡辩者就曾展开辩论。苏格拉底认为人类的幸福来自内心恒久延续的安详状态，而诡辩者则认为幸福是源于众多的欲望和享乐。两人

愈辩愈烈，最后恶语相向。诡辩者讽刺苏格拉底所言的幸福就是木块和石头的幸福，而苏格拉底则嘲笑诡辩家口中的幸福就是一个发痒人的幸福，他终日只知抓痒，却感到幸福满足。不过，两者的观点都不缺乏证据。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在人们的幸福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观点甚至得到了那些伊壁鸠鲁派的大体支持。根据这一观点，美德无疑在净化人们内心的骚动方面比实现人们的愿望更为有效。我们之前提到，推动发展的善性比简单维系的善性更加有效，这一论断更加佐证了诡辩者的观点。因为任何欲望的获得都是一种进展，正如哪怕人们只是围着圆圈运动，但也似于前进。

(5) But the second question, decided the true way, maketh the former superfluous. For can it be doubted, but that there are some who take more pleasure in enjoying pleasures than some other, and yet, nevertheless, are less troubled with the loss or leaving of them? So as this same, *Non uti ut non appetas, non appetere ut non metuas, sunt animi pusilli et diffidentis* . And it seemeth to me that most of the doctrines of the philosophers are more fearful and cautious than the nature of things requireth. So have they increased the fear of death in offering to cure it. For when they would have a man's whole life to be but a discipline or preparation to die, they must needs make men think that it is a terrible enemy, against whom there is no end of preparing. Better saith the poet:—“*Qui finem vitae extremum inter munera ponat Naturæ* .” So have they sought to make men's minds too uniform and harmonical, by not breaking them sufficiently to contrary motions; the reasons whereof I suppose to be, because they themselves were men dedicated to a private, free, and unapplied course of life. For as we see, upon the lute or like instrument, a ground, though it be sweet and have show of many changes, yet breaketh not the hand to such strange and hard stops and passages, as a set song or voluntary; much after the same manner was the diversity between a philosophical and civil life. And, therefore, men

are to imitate the wisdom of jewellers: who, if there be a grain, or a cloud, or an ice which may be ground forth without taking too much of the stone, they help it; but if it should lessen and abate the stone too much, they will not meddle with it: so ought men so to procure serenity as they destroy not magnanimity.

（5）但如果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我们能否兼具两种善性得到正确的解答，那前一个问题就是完全多余的。有些人在享乐时比其他人更为愉悦，但在失去快乐时却也比其他人少了更多烦恼，这会有人怀疑吗？同样，“狭隘之人不敢享乐是出于对失去渴求的担心，不敢渴求又是出于对失去享乐的恐惧。”我认为，哲学家的大部分学说都是出于过分的担心和慎重，已然超出了事物自身的要求。因此，他们虽意欲缓解人们的对死亡的恐惧，却反而加剧了这种恐慌。当他们提出人的一生就是为了受尽磨练为死亡做准备，他们便是在告诉人们，死亡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人们的抵御工作永远不可能完备。诗人对此有更好的表述：“他把生命的终结算作自然的恩惠之一。”于是，哲学家们力图避免人们的心智朝着对立面发展，令其达到一贯如一，高度和谐。我料想，这正是因为这些哲学家自身就将所有精力投入于个人的、自由的、安逸的生活之中。我们看到，在演奏鲁特琴或类似乐器时，一段背景音乐尽管可能旋律优美又不失变化，但到底不能像一首完整歌曲或即兴乐曲，演奏时手指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种奇怪而高难度的停顿和乐章。哲学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差别，也类似于这样。因此，人们应借鉴珠宝商的精明行为。如果宝石存在稍许斑点或瑕疵，磨除之后不至于对整粒宝石产生过多影响，他们就会设法补救。但如果磨除之后宝石会明显受到损减，那他们就不再管它了。人们也应该这样，在追求内心的安详之时也不能破坏了心中的宽仁。

(6) Having therefore deduced the good of man which is private and particular, as far as seemeth fit, we will now return to that good of man which respecteth and beholdeth society, which we

may term duty; because the term of duty is more proper to a mind well framed and disposed towards others, as the term of virtue is applied to a mind well formed and composed in itself; though neither can a man understand virtue without some relation to society, nor duty without an inward disposition. This part may seem at first to pertain to science civil and politic; but not if it be well observed. For it concerneth the regiment and government of every man over himself, and not over others. And as in architecture the direction of framing the posts, beams, and other parts of building, is not the same with the manner of joining them and erecting the building; and in mechanicals, the direction how to frame an instrument or engine is not the same with the manner of setting it on work and employing it; and yet, nevertheless, in expressing of the one you incidently express the aptness towards the other; so the doctrine of conjugation of men in society differeth from that of their conformity thereunto.

（6）对于个人的、特定的善性，我们的追溯和论述似乎已经足够了，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到面向社会的善性。这种善性我们或许可称为责任，正如美德一词用以指代构建组织完备的心智，责任一词则用以指称对待他人时建立配置完好的心智。不过，如果与社会脱离关系，人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美德；如果没有内在的合理配置，人们也无法真正领悟责任的真谛。在这点上，两者也是相通的。这一部分乍一看似乎与社会政治学相关，但深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两者是没有关联的。因为这类研究关注的是个人对自身，而非对他人的控制与管理，这就像在建筑学上，对梁柱和其他框架结构的安排与将各部分联结起来构建起整个建筑并不是同一回事。又如在机械工程上，对某一仪器或工具的设计与对其的实际启动和操作也不是一回事。不过，人们在表述某一事物时，便会附带性地涉及其他事物。因此，人们与社会的关系理论与人们对社会规范的遵守同样不是一回事。

(7) This part of duty is sub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common duty of every man, as a man or member of a state; the other, the respective or special duty of every man in his profession, vocation, and place. The first of these is extant and well laboured, as hath been said. The second likewise I may report rather dispersed than deficient; which manner of dispersed writing in this kind of argument I acknowledge to be best. For who can take upon him to write of the proper duty, virtue, challenge, and right of every several vocation, profession, and place?For although sometimes a looker on may see more than a gamester, and there be a proverb more arrogant than sound, “That the vale best discovereth the hill;” yet there is small doubt but that men can write best and most really and materially in their own professions; and that the writing of speculative men of active matter for the most part doth seem to men of experience, as Phormio's argument of the wars seemed to Hannibal, to be but dreams and dotage. Only there is one vice which accompanieth them that write in their own professions, that they magnify them in excess. But generally it were to be wished (as that which would make learning indeed solid and fruitful) that active men would or could become writers.

（7）责任可以再次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将个人作为国家的一份子，需承担的共同责任；第二是人们在自己的职务、行业和地位上应承担的相应的、特定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个别的，特殊的责任。我们已经谈到，对第一部分责任的研究现已存在，且已比较充分。而对于第二部分的研究，我认为并没有缺乏，只是过于分散。不过，虽记叙散乱，但对这部分的论述我认为却是最优秀的。谁能对各个行业、职业和地位的人群划分特定而恰当的责任、美德、任务和权利，谁能担此重任呢？尽管有时候，旁观者比那些竞技者自身更清楚全局形势，还有一句傲慢的格言这样说道，“山谷最能令山冈清晰显露”，不过，人们对自己的行业作出的描述往往是最精确、最能窥得实质的。

而那些依靠揣摩推理的人，写出关于实际事务的作品，这对于实践经验丰富的人来说，很多时候就像是汉尼拔眼中福米奥的战争观念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昏话。人们对自身职业的描述，只存在一点缺陷，就是时常会过分夸耀。但总体而言，人们还是希望（这可以真正巩固学问，令其富有成效）富于实践经验的人能同时成为著书者。

(8) In which kind I cannot but mention, *honoris causa* , your Majesty's excellent book touching the duty of a king; a work richly compounded of divinity, morality, and policy, with great aspersion of all other arts; and being in some opinion one of the most sound and healthful writings that I have read: not distempered in the heat of invention, nor in the coldness of negligence; not sick of dizziness, as those are who leese themselves in their order, nor of convulsions, as those which cramp in matters impertinent; not savouring of perfumes and paintings, as those do who seek to please the reader more than nature beareth; and chiefly well disposed in the spirits thereof, being agreeable to truth and apt for action; and far removed from that natural infirmity, whereunto I noted those that write in their own professions to be subject—which is, that they exalt it above measure. For your Majesty hath truly described, not a king of Assyria or Persia in their extern glory, but a Moses or a David, pastors of their people. Neither can I ever leese out of my remembrance what I heard your Majesty in the same sacred spirit of government deliver in a great cause of judicature, which was, “That kings ruled by their laws, as God did by the laws of nature; and ought as rarely to put in use their supreme prerogative as God doth His power of working miracles.” And yet notwithstanding in your book of a free monarchy, you do well give men to understand, that you know the plenitude of the power and right of a king, as well as the circle of his office and duty. Thus have I presumed to allege this excellent writing of your Majesty, as a prime or eminent example of

tractates concerning special and respective duties; wherein I should have said as much, if it had been written a thousand years since. Neither am I moved with certain courtly decencies, which esteem it flattery to praise in presence. No, it is flattery to praise in absence—that is, when either the virtue is absent, or the occasion is absent; and so the praise is not natural, but forced, either in truth or in time. But let Cicero be read in his oration *pro Marcello* , which is nothing but an excellent table of Cæsar's virtue, and made to his face; besides the example of many other excellent persons, wiser a great deal than such observers; and we will never doubt, upon a full occasion, to give just praises to present or absent.

（8）提到这点，我万分钦佩提到陛下那部论述国王职责的精良著作。这部作品充分结合了神学、道德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内容，同时借鉴了其他各学科的精妙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说，陛下的这部著作可谓是我所读过的最具智慧、最有裨益的作品之一，因为它既没有对创新的过度狂热，又没有对疏忽冷漠以待。不像一些作者条理混乱、内容杂糅，令人产生反感情绪，也不像他们纠缠于一些不切题的事物，扰乱人们的思绪，更不同于一些作者为取悦读者，一味地使用天花乱坠的华丽辞藻，您的著述清晰切题，尽展事物真相，同时富有实用价值。我说过，人们对自己职业的描述往往过度夸大，而您的作品却根本不存在这种缺陷。陛下描绘的并不是诸如亚述或波斯国王那样的外在荣耀，而是真切展现了如摩西、大卫那样作为众生导师的荣光。我永远不会忘记，陛下就一次重大的司法案件发表的言论中，同样展现出了您在政权统治上的崇高精神。您说道："国王的统治依靠法律，就如上帝的主宰借助自然法则；国王应尽少利用他们的至高君权，就如上帝极少展现他创造奇迹的全能。"不过，在陛下关于自由君主制的书作中，您让人们清楚了解到，您不仅深知君权的势力之大责任之重，更完全懂得作为国王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因此，我自作主张地宣称在关于特殊的、个别的责任方面，您的这部书作是最典型最杰出的。即使这一作品早一千年问世，我还是认为如此。我对陛下的

赞美并非出于庄重的礼节。或许有人认为，这种当面的赞美就是一种奉承。其实，人后的赞美才是奉承。如果受赞美者不具备这种美德，或根本没必要进行赞美时，人们还在背后赞美他，这无论在真实性还是在时机上，都是不自然的，是被迫的。西塞罗在一次题为《为马赛罗辩护》的演说中，尽是对恺撒的美德的完美概括，而且这一演说就是在恺撒的面前进行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优秀人士，可能比受赞美者英明千百倍，同样当面称赞过那些人。由此，我们毫无疑问地说，在时机恰当之时，不管当事人是否在场，我们都该给予他们公正合理的赞美。

(9) But to return; there belongeth further to the handling of this part, touching the duties of professions and vocations, a relative or opposite, touching the frauds, cautels, impostures, and vices of every profession, which hath been likewise handled; but how? rather in a satire and cynically, than seriously and wisely; for men have rather sought by wit to deride and traduce much of that which is good in professions, than with judgment to discover and sever that which is corrupt. For, as Solomon saith, he that cometh to seek after knowledge with a mind to scorn and censure shall be sure to find matter for his humour, but no matter for his instruction: *Quaerenti derisori scientiam ipsa se abscondit; sed studioso fit obviam* . But the managing of this argument with integrity and truth, which I note as deficient, seemeth to me to be one of the best fortifications for honesty and virtue that can be planted. For, as the fable goeth of the basilisk—that if he see you first, you die for it; but if you see him first, he dieth—so is it with deceits and evil arts, which, if they be first espied they leese their life; but if they prevent, they endanger. So that we are much beholden to Machiavel and others, that write what men do, and not what they ought to do. For it is not possible to join serpentine wisdom with the columbine innocency, except men know exactly all the conditions of the serpent; his

baseness and going upon his belly, his volubility and lubricity, his envy and sting, and the rest—that is, all forms and natures of evil. For without this, virtue lieth open and unfenced. Nay, an honest man can do no good upon those that are wicked, to reclaim them,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knowledge of evil. For men of corrupted minds presuppose that honesty groweth out of simplicity of manners, and believing of preachers, schoolmasters, and men's exterior language. So as, except you can make them perceive that you know the utmost reaches of their own corrupt opinions, they despise all morality. *Non recipit stultus verba prudentiae, nisi ea dixeris quæ, versantur in corde ejus* .

（9）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在各职业和行业的责任方面，还包括一部分相关的或对立的研究，主要论及各行业中的欺诈与恶行。人们对此已经作了相关研究，但又是怎样开展的呢？他们更多的是以一种嘲讽的态度进行论述，完全缺乏严肃和审慎。人们向来乐于运用自己的才智来嘲弄和中伤各职业中的有益方面，却不运用自己的判断来发现和摒除其中的腐败一面。所罗门说过，如果人们以轻蔑和责难的心理追求知识，必然能找到适合他的知识，但却是无所教益的知识。对于这一方面的完整而真实的研究，我认为是有所缺乏的。但同时，在我看来，这一类研究又是巩固诚实与美德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一则关于蛇怪的寓言讲道，如果蛇怪先见到你，你就得死；如果你先见到它，它就会死去。欺骗与邪恶的诡计也是如此。如果人们先窥得它们，它们就会消逝殆尽；但如果它们隐蔽良好，未被发现，受到危害的就是人们自身。因此，我们应该感激马基雅弗利和其他一些人，因为他们只是记述了人们的行为，而不是人们应该做的事，人们是不会将毒蛇般的阴险与鸽子般的纯洁结合起来的，除非人们完全掌握毒蛇的所有情况，包括它的地下活动、如何用腹部运动、缠绕方式、以及它的狡诈，妒忌、毒性等等。这些也就是邪恶的所有形式与特性。没有这些了解，美德就是完全开放，毫无防御力的。一个正直之人，如果对邪恶的一无所知，便不可能帮助那些缺乏道德的人改邪归正。

而内心邪恶之人，往往认为诚实是由于人们行事简单，过分信从传道者、教授者和人们的表面的语言。于是，除非能让这些邪恶的人认识到，我们对他们内心深处的恶念了如指掌，否则，他们必然藐视一切道德。“愚昧的人不喜欢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

(10) Unto this part, touching respective duty, doth also appertain the duties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parent and child, master and servant. So likewise the laws of friendship and gratitude, the civil bond of companies, colleges, and politic bodies, of neighbourhood, and all other proportionate duties; not as they are parts of government and society, but as to the framing of the mind of particular persons.

（10）至于各自相应的责任，还包含了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以及主仆之间的责任。此外，还有友情与感恩的准则，商号、学院、政治团体、邻里的社会义务，以及其他相应的责任等。这些责任的产生并不在于它们是政府和社会的一部分，而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心灵的经营与调整。

(11) The knowledge concerning good respecting society doth handle it also, not simply alone, but comparatively; whereunto belongeth the weighing of duties between person and person, case and case, particular and public. As we see in the proceeding of Lucius Brutus against his own sons, which was so much extolled, yet what was said? “Infelix, utcunque ferent ea fata minores.” So the case was doubtful, and had opinion on both sides. Again, we see when M. Brutus and Cassius invited to a supper certain whose opinions they meant to feel, whether they were fit to be made their associates, and cast forth the question touching the killing of a

tyrant being a usurper, they were divided in opinion; some holding that servitude was the extreme of evils, and others that tyranny was better than a civil war: and a number of the like cases there are of comparative duty. Amongst which that of all others is the most frequent, where the question is of a great deal of good to ensue of a small injustice. Which Jason of Thessalia determined against the truth: Aliqua sunt injuste facienda, ut multa juste fieri possint. But the reply is good: Auctorem praesentis justitiae habes, sponsorem futurae non habes. Men must pursue things which are just in present, and leave the future to the Divine Providence. So then we pass on from this general part touching the exemplar and description of good.

（11）关于面向社会的善的知识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个体研究，还需进行比较研究，需权衡个人之间，事件之间，以及个别与公众之间的各种善意。在卢修斯·布鲁图亲自审判并处决了自己的儿子时，人们给予了高度赞扬，不过，也有人说道："真是不幸的人，尽管你的作为会获得后人的赞美。"所以，这样的事例是难以判定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是并存的。马库斯·布鲁图与卡西乌斯曾宴请一部分人共享晚餐，企图试探他们的想法，看是否能发展为自己的同党。于是他们询问道，篡位的暴君是否该杀？在座的人们意见不一。一些人认为，屈从于暴君就是最大的罪恶，也有人觉得，暴政总好过内战。还有不少事例，都是有关善的比较的。在这一类问题中，当涉及大善引发较小的不公时，更是容易引起极大的争论。色萨利的詹森断言真理是可以违背的，他说道："为行大善，可执小恶。"对此的回应十分精妙："现在能做的善事，不能保证将来是否为善。"因此，人们应努力追求当下的善举，将未来交给神圣的天意。我们已经对善性的模范与类型进行了总体的描述，之后我们要开始新的话题。

CHAPTER XXII

第二十二章

(1) Now, therefore, that we have spoken of this fruit of life, it remaineth to speak of the husbandry that belongeth thereunto, without which part the former seemeth to be no better than a fair image or statue, which is beautiful to contemplate, but is without life and motion; whereunto Aristotle himself subscribeth in these words: *Necesse est scilicet de virtute dicere, et quid sit, et ex quibus gignatur. Inutile enum fere fuerit virtutem quidem nosse, acquirendae autem ejus modos et vias ignorare. Non enum de virtute tantum, qua specie sit, quærendum est, sed et quomodo sui copiam faciat: utrumque enum volumeus, et rem ipsam nosse, et ejus compotes fieri: hoc autem ex voto non succedet, nisi sciamus et ex quibus et quomodo* . In such full words and with such iteration doth he inculcate this part. So saith Cicero in great commendation of Cato the second, that he had applied himself to philosophy, *Non ita disputandi causa, sed ita vivendi* . And although the neglect of our times, wherein few men do hold any consultations touching the reformation of their life (as Seneca excellently saith, De partibus vitae quisque deliberat, de summa nemo), may make this part seem superfluous; yet I must conclude with that aphorism of Hippocrates, *Qui gravi morbo correpti dolores non sentiunt, iis mens ægrotat* . They need medicine, not only to assuage the disease, but to awake the sense. And if it be said that the cure of men's minds belongeth to sacred divinity, it is most true; but yet moral philosophy may be preferred unto her as a wise servant and humble handmaid. For as the Psalm saith, “That the eyes of the handmaid look perpetually towards the mistress,” and yet no doubt many things are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handmaid to discern of the mistress' will; so ought moral philosophy to give a constant attention to the doctrines of divinity, and yet so as it may yield of herself (within due limits) many sound and profitable directions.

（1）我们已经讨论了善性这一生活的收获，现在再来谈谈善性的运用。没有关于运用的知识，前面的部分与秀美的画像或雕塑没有两样，想起来美妙无比，却完全没有活力，也无法运行。对此，亚里士多德也表示认同，他说："我们需要知道美德是什么，还需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不了解获取美德的方法和途径，仅仅列举美德的表现形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当我们知道美德的来源、类型以及获取的途径等，才能拥有美德。"这些话语完整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而且他反复强调，谆谆教导人们这一点。西塞罗也曾对加图二世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之所以致力于哲学研究，并不是为了与人论辩，只是纯粹想过这样的生活。在当今时代，尽管人们并不重视这一类知识，也很少有人试图从这类知识中寻找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途径（塞内加对此有极好的表述，"人人都着意于生活的局部，但没有人关心生活的全局"），这不免使其显得多余，但是，我必须引用希波克拉底的格言来做一个结尾，他说："一些人身患重病却不感到痛苦，他们的心理也出了毛病。"他们需要服用减轻疾病的药物，还需要能唤起他们感觉的药物。如果说治愈人们的心灵属于神学范畴，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不过，道德哲学也可以成为神学聪明的仆人和恭顺的侍女。圣诗曾说："侍女的眼神永远落在女主人身上。"很多事情都是侍女在洞察主人意愿的基础上自行决定的。因此，道德哲学不仅要随时关注神圣的教义，同时还需自主提供（在适当范围内）许多合理有效的指导。

(2) This part, therefore, because of the excellency thereof, I cannot but find exceeding strange that it is not reduced to written inquiry; the rather, because it consisteth of much matter, wherein both speech and action is often conversant; and such wherein the common talk of men (which is rare, but yet cometh sometimes to pass) is wiser than their books. It is reasonable, therefore, that we propound it in the more particularity, both for the worthiness, and because we may acquit ourselves for reporting it deficient, which

seemeth almost incredible, and is otherwise conceived and presupposed by those themselves that have written. We will, therefore, enumerate some heads or points thereof, that it may appear the better what it is, and whether it be extant.

（2）这部分知识本身是非常优越的，但非常奇怪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任何著述记载。确切地说，由于这一部分涉及内容较广，包括人们熟知的言行等，因而甚至人们之间普通的谈话（虽较罕见，但偶尔确实如此）都比他们的著作更有见地。因此，为了展现这部分知识的价值，也为了使得我所提出的缺陷有理有据，我们要对这部分知识进行更为详细的论述，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认为这方面存在缺陷，或许很多人根本难以置信，甚至那些作出相关著述的人与我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将列举一些关键的主题或要点，更好地呈现这类知识，看看是否已经真实存在。

(3) First, therefore, in this, as in all things which are practical we ought to cast up our account, what is in our power, and what not; for the one may be dealt with by way of alteration, but the other by way of application only. The husbandman cannot command neither the nature of the earth nor the seasons of the weather; no more can the physicia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atient nor the variety of accidents. So in the culture and cure of the mind of man, two things are without our command: points of Nature, and points of fortune. For to the basis of the one, 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 other, our work is limited and tied. In these things, therefore, it is left unto us to proceed by application "*Vincenda est omnis fertuna ferendo* :" and so likewise, "*Vincenda est omnis Natura ferendo* ." But when that we speak of suffering, we do not speak of a dull and neglected suffering, but of a wise and industrious suffering, which draweth and contriveth use and advantage out of that which

seemeth adverse and contrary; which is that properly which we call accommodating or applying. Now the wisdom of application resteth principally in the exact and distinct knowledge of the precedent state or disposition, unto which we do apply; for we cannot fit a garment except we first take measure of the body.

（3）首先，和讨论其他具有实效的知识一样，对于这方面知识，我们应有一个综合的列表，看看哪些是我们能力所及，哪些则不是。对于前者我们可以适当交互转化，但后者我们只能选择顺从。这就如农夫无法掌控土质与天气，医师不能改变病患的体质与各类偶发病症一样。同样，在人类心智的磨练与疗养中，有两件事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一是天性，二是命运。天性的根基深固，而命运又捉摸不定，因此，我们的研究是有限的，是受到牵制和束缚的。对于这类事物，我们能做的只能是顺从。“用忍受征服一切命运”，以及“用忍受征服一切天性”。不过，我们所说的忍受并非是单调而盲目的，而是明智且勤奋的，能在不利或反向的条件中提取出有利因素，这才是我们所称的迎合或顺应。顺应的智慧主要依赖于对事物先前呈现的，也是我们所要顺应的情形或倾向有一个清晰明确的了解，这就如我们必须先测量身体，才能制作出合身的服装一样。

(4) So, then, the first article of this knowledge is to set down sound and true distribution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 several characters and tempers of men's natures and dispositions, specially having regard to those differences which are most radical in being the fountains and causes of the rest, or most frequent in concurrence or commixture; wherein it is not the handling of a few of them in passage, the better to describe the mediocrities of virtues, that can satisfy this intention. For if it deserve to be considered, that there are minds which are proportioned to great matters, and others to small (which Aristotle handleth, or ought to

have bandied, by the name of magnanimity), doth it not deserve as well to be considered that there are minds proportioned to intend many matters, and others to few?So that some can divide themselves: others can perchance do exactly well, but it must be but in few things at once; and so there cometh to be a narrowness of mind, as well as a pusillanimity. And again, that some minds are proportioned to that which may be dispatched at once, or within a short return of time; others to that which begins afar off, and is to be won with length of pursuit:—"*Jam tum tenditqus fovetque* ." So that there may be fitly said to be a longanimity, which is commonly also ascribed to God as a magnanimity. So further deserved it to be considered by Aristotle, "That there is a disposition in conversation (supposing it in things which do in no sort touch or concern a man's self) to soothe and please, and a disposition contrary to contradict and cross;" and deserveth it not much better to be considered. "That there is a disposition, not in conversation or talk, but in matter of more serious nature (and supposing it still in things merely indifferent),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good of another; and a disposition contrariwise, to take distaste at the good of another?" which is that properly which we call good nature or ill nature, benignity or malignity; and, therefore, I cannot sufficiently marvel that this part of knowledge, touching the several characters of natures and dispositions, should be omitted both in morality and policy, considering it is of so great ministry and suppeditation to them both. A man shall find in the traditions of astrology some pretty and apt divisions of men's natures, according to the predominances of the planets: lovers of quiet, lovers of action, lovers of victory, lovers of honour, lovers of pleasure, lovers of arts, lovers of change, and so forth. A man shall find in the wisest sort of these relations which the Italians make touching conclaves, the natures of the several cardinals handsomely and lively painted forth. A man shall meet with in every day's conference the

denominations of sensitive, dry, formal, real, humorous, certain, *huomo di prima impressione* , *huomo di ultima impressione* , and the like; and yet, nevertheless, this kind of observations wandereth in words, but is not fixed in inquiry. For the distinctions are found (many of them), but we conclude no precepts upon them: wherein our fault is the greater, because both history, poesy, and daily experience are as goodly fields where these observations grow; whereof we make a few posies to hold in our hands, but no man bringeth them to the confectionary that receipts might be made of them for use of life.

（4）因此，这部分知识的第一要点就是对人类天性和性情的特征与倾向进行真实合理的区分与描绘，特别需考虑那些作为其他特征源泉与根据的根本性特征与那些同时出现或混合着出现的伴随性特征之间的差异。为达到这方面的研究目的，仅仅列举少量例证，或稍好一点描述一些美德常见的特性，都是不足以说明问题。人们认为，部分人适合被分派去从事伟大的事业，另一部分则适合处理一些小事（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崇高性时就对此有所论述），如果这种观点值得考虑，那我们是不是同样可以认为，研究一些人适合被分配处理很多事务，而另一些则只适合分配极少事务不也是值得研究的吗？于是，一些人可以一心多用，而其他人或许可以做得非常出色，但同一时间仅限于处理极少量的事情。因此，人类的心理除了怯懦之外，还可能是狭隘的。同样，有些人适合能迅速在短时间内处理事务，而另一些人更适于处理那些早早着手，需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才能完成的事务。“早已心怀目标。”所以恰当地说，人们还可能存在一种忍耐心理，通常都被归因于上帝的宽仁。此外，亚里士多德曾说，“在交谈中（假定谈论内容不涉及自身利益），人们会存在一种安慰和取悦对方的心态，还会有一种抵触与反驳对方的心理。”如果这一观点应受重视，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在一些更为严肃的事情上，而不是日常言谈中（仍假定不存在利害关系），人们乐于成人之美，但同时，又见不得别人的好。”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善性或恶性，仁慈或恶

毒。这类知识关乎人类本质与倾向的特征，无论在道德与政治上都裨益良多，但令我无比惊讶的是，在这两个领域中，这类知识都完全遭到了忽视。在传统的占星术中，人们会发现，依据各行星所在宫位，人类的性格被精当地进行了区分，包括内敛文静、活泼好动、争强好胜、喜好荣誉、贪图享乐、爱好文艺、乐于变动等等。星相与性格的这些关联，人们可以在意大利人对红衣主教的性格所作的精致生动的描述中得到清晰的了解。同样我们看到，在日常交谈中，人们对各种人类特性进行了命名，包括敏感、冷漠、拘谨、真诚、轻佻、可靠、第一印象、最终印象等等。不过，所有这些观察都只是停留在命名层面，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研究。于是，我们发现了很多特性的差别，但却根本无法从中获得任何规律规则。对此，我们的过失更为严重。历史、诗歌与日常经验等领域都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观察园地，而我们只是采摘三两花朵置于手中，并不交于甜食店进行加工，生产出能为生活所用的产品。

(5) Of much like kind are those impressions of Nature, which are imposed upon the mind by the sex, by the age, by the region, by health and sickness, by beauty and deformity, and the like, which are inherent and not extern; and again, those which are caused by extern fortune, as sovereignty, nobility, obscure birth, riches, want, magistracy, privateness, prosperity, adversity, constant fortune, variable fortune, rising *per saltum, per gradus* , and the like. And, therefore, we see that Plautus maketh it a wonder to see an old man beneficent, *benignitas hujis ut adolescentuli est* . Saint Paul concludeth that severity of discipline was to be used to the Cretans, *increpa eos dure* , upon the disposition of their country, *Cretensus semper mendaces, malæ bestiæ, ventres* . Sallust noteth that it is usual with kings to desire contradictories: *Sed plerumque regiæ voluntates, ut vehementes sunt, sic mobiles, sæpeque ipsæ sibi advers* . Tacitus observeth how rarely raising of the fortune mendeth the disposition: *solus Vespasianus mutatus in melius* . Pindarus maketh an

observation, that great and sudden fortune for the most part defeateth men *qui magnam felicitatem concoquere non possunt* . So the Psalm showeth it is more easy to keep a measure in the enjoying of fortune, than in the increase of fortune; *Divitiæ si affluant, nolite cor apponere* . These observations and the like I deny not but are touched a little by Aristotle as in passage in his Rhetorics, and are handled in some scattered discourses; but they were never incorporate into moral philosophy, to which they do essentially appertain; as the knowledge of this diversity of grounds and moulds doth to agriculture,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diversity of complexions and constitutions doth to the physician, except we mean to follow the indiscretion of empirics, which minister the same medicines to all patients.

（5）与此十分相似的还有自然本性的印记，也就是性别、年龄、地域、健康和疾病、美丑等这些内在特性对人类心理的影响，它们是内在而不是外来的。同时，外在的命运同样能对人类心理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类命运因素包括君权、贵族、寒微、财富、贫穷、为官、官职、成功、逆境、源源好运、起伏人生、一夜成名、缓步成功等。当普劳图斯见到一个老人行善，感到非常诧异，说道："老人就如年轻人一样善良。"圣保罗严厉斥责了"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由此，他竭力主张在克里特岛严格执行教规。塞勒斯特也曾注意到国王意愿的矛盾性，他说："国王的欲望在通常情况下都是非常强烈，反复无常，且又自相矛盾的。"塔西陀观察得出，命运的提升几乎改变不了人的性格，"只有维斯帕西安性格稍微好转了点"。品达也注意到，对于那些"消受不起洪福"的人来说，突如其来的幸运常常能摧毁一个人。圣歌则表明，比起提升运势，人类在享受幸运时更易把握一定的度，希望人们"若财宝加赠，不要放在心上"。对于这些及其他类似的观点，我不否认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一书以及其他一些零散的记述中都有所提及。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它的论述与道德哲学结合起来，而它们无疑又是道德哲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除非我们想和江湖郎中一样轻率，以一种药治百病，不然，它们就应与道德哲学紧密融合，这正如土壤土质的差异与农业的关联，也如面色体质的不同对医师诊治疾病的影响。

(6) Another article of this knowledge is the inquiry touching the affections; for as in medicining of the body, it is in order first to know the divers complexions and constitutions; secondly, the diseases; and lastly, the cures: so in medicining of the mind, after knowledge of the divers characters of men's natures, it followeth in order to know the diseases and infirmities of the mind, which are no other than the perturbations and distempars of the affections. For as the ancient politiques in popular estates were wont to compare the people to the sea, and the orators to the winds; because as the sea would of itself be calm and quiet, if the winds did not move and trouble it; so the people would be peaceable and tractable if the seditious orators did not set them in working and agitation: so it may be fitly said, that the mind in the nature thereof would be temperate and stayed, if the affections, as winds, did not put it into tumult and perturbation. And here again I find strange, as before, that Aristotle should have written divers volumes of *Ethics* , and never handled the affections which is the principal subject thereof; and yet in his *Rhetorics* , where they are considered but collaterally and in a second degree (as they may be moved by speech), he findeth place for them, and handleth them well for the quantity; but where their true place is he pretermitteth them. For it is not his disputations about pleasure and pain that can satisfy this inquiry, no more than he that should generally handle the nature of light can be said to handle the nature of colours; for pleasure and pain are to the particular affections as light is to particular colours. Better travails, I suppose, had the Stoics taken in this argument, as far as I can gather by that which we have at second hand. But yet it

is like it was after their manner, rather in subtlety of definitions (which in a subject of this nature are but curiosities), than in active and ample descriptions and observations. So likewise I find some particular writings of an elegant nature, touching some of the affections: as of anger, of comfort upon adverse accidents, of tenderness of countenance, and other. But the poets and writers of histories are the best doctors of this knowledge; where we may find painted forth, with great life, how affections are kindled and incited; and how pacified and refrained; and how again contained from act and further degree; how they disclose themselves; how they work; how they vary; how they gather and fortify: how they are enwrapped one within another; and how they do fight and encounter one with another; and other the like particularities. Amongst the which this last is of special use in moral and civil matters; how, I say, to set affection against affection, and to master one by another; even as we used to hunt beast with beast, and fly bird with bird, which otherwise percase we could not so easily recover: upon which foundation is erected that excellent use of *præmium and pœna* , whereby civil states consist: employing the predominant affections of fear and hope, for the suppressing and bridling the rest. For as in the government of states it is sometimes necessary to bridle one faction with another, so it is in the government within.

（6）这部分知识的第二个要点是对人类情感的研究。在医治身体疾病时，我们要循序渐进，首先需观察面色、判断体质，其次是诊断病情，最后才是实施治疗。同样，在治疗心理疾病时，我们也需遵循一定顺序。我们先应清楚人类天性的种种特征，在此基础上才能分析确定心理疾病的类型，这类疾病的产生的原因无外乎情感的波动与紊乱。古时一些出身民间的政客常将民众比作海，演说家就是海上的风。如果没有风的吹动搅扰，大海就一片宁静安详，同样，如果演说

家不煽风点火，民众也是同样祥和温顺的。因此我们说，如果情感不能像风一样动荡搅扰，人的内在本质就是温和平静的。说到这，我又再次感到诧异，亚里士多德写下多卷《伦理学》，却从来没有论及人类的情感，而这正是伦理学的首要内容。而在他的另一著述《修辞学》中，情感本应只是附随的次要内容（由于它们可通过言辞来推动），他却用很大的篇幅来详细论述，而在真正应该研究它们的地方却置之不理。亚里士多德对快乐和痛苦的论辩并不能满足情感研究的需求，这就如对光的特性的总体研究并不能满足对颜色特性的研究要求。而快乐与痛苦对特定情感来说和光对特定颜色来说是一样的。据我搜集的间接材料显示，斯多葛学派在这方面花费了更多的精力。不过，他们的研究还是运用了他们惯用的手法，即讲求精细的定义（用在这类研究上未免过于追根究底了），而不是充分积极地描绘与评述。此外，我倒是发现了一些对情感的精妙论述，主要涉及其中某些情感，包括愤怒、面对变故的坦然、面容的温和等等。然而，诗人和历史著述者才是这方面最优秀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极其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情感的激发与煽动、平息与克制、再次压抑不致发作与恶化、显露与发泄、改变与积蓄加强、相互缠结与对抗以及其他类似细节的发展过程。其中，最后一类，也就是情感之间的对抗，在道德和社会事务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效用。我们需懂得如何用一种情感对峙或控制另一种情感，就如利用野兽捕获野兽，利用飞鸟追捕飞鸟一样，否则，我们的情感很难恢复如初。社会安定的维持就是基于赏罚制度的精妙运用，而这种运用又是基于情感间的对抗，主要便是利用恐惧和希望这两种主导情感来压制和约束其他所有情感。正如国家统治中有时必须通过一个派系来镇压另一个派系，人们内心的统治也需要运用这样的方法。

(7) Now come we to those points which are within our own command, and have force and operation upon the mind, to affect the will and appetite, and to alter manners: wherein they ought to have handled custom, exercise, habit, education, example, imitation, emulation, company, friends, praise, reproof, exhortation,

fame, laws, books, studies: these as they have determinate use in moralities, from these the mind suffereth, and of these are such receipts and regiments compounded and described, as may serve to recover or preserve the health and good estate of the mind, as far as pertaineth to human medicine: of which number we will insist upon some one or two, as an example of the rest, because it were too long to prosecute all; and therefore we do resume custom and habit to speak of.

（7）现在我们来探讨另外一些要点，包括哪些情感在我们掌控范围内，能影响我们的心理、意愿和欲求，改变我们的行为等。为此，我们本该研究的是人们的习俗、仪式、习惯、教育、典范、效法、竞争、陪伴、友情、赞美、责备、规劝、名誉、法律、书籍、研究等，所有这些都在道德中具有明确的功效，人们的内心又必须经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同时，为了恢复或者保持心理健康，人们同样需要融合这些因素配置出良方，就如人们的药品一样，用以恢复或保持心理健康状态。如果我们对这些因素逐一详述，必然会花费过多篇幅，因而只能选择一两个例子用以说明问题。在此，我们就其中的习俗与习惯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8) The opinion of Aristotle seemeth to me a negligent opinion, that of those things which consist by Nature, nothing can be changed by custom; using for example, that if a stone be thrown ten thousand times up it will not learn to ascend; and that by often seeing or hearing we do not learn to see or hear the better. For though this principle be true in things wherein Nature is peremptory (the reason whereof we cannot now stand to discuss), yet it is otherwise in things wherein Nature admitteth a latitude. For he might see that a strait glove will come more easily on with use; and that a wand will by use bend otherwise than it grew; and

that by use of the voice we speak louder and stronger; and that by use of enduring heat or cold we endure it the better, and the like: which latter sort have a nearer resemblance unto that subject of manners he handleth, than those instances which he allegeth. But allowing his conclusion, that virtues and vices consist in habit, he ought so much the more to have taught the manner of superinducing that habit: for there be many precepts of the wise ordering the exercises of the mind, as there is of ordering the exercises of the body, whereof we will recite a few.

（8）亚里士多德认为，习俗对于由自然本性所决定的本性没有任何效用。比如，一块石头即使被向上抛出一万次，照样不会自发地向上运动；又比如，经常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我们的视力和听力也不可能更加敏锐。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比较粗糙的。只有对那些受自然绝对支配的事物而言，这条原理才是正确合理的（其中原因我们暂且无法解释），但是，对于那些经自然认可，具有一定变动余地的事物，情况也并非如此了。亚里士多德或许也注意到，紧窄的手套戴久之后就变得方便穿戴；棍棒用久之后易于弯曲；嗓子运用多了，说话声音也越发响亮有力；多次经受严寒或酷暑之后，我们的耐力就会增强，等等。比起他所陈述的事例，上述最后一个例子更为接近他所论述的习俗这一话题。即使我们认可他得出的结论，相信道德与罪恶都源于习惯，那么他更应当致力于教授如何强化这一习惯。其实，与身体锻炼一样，在心理训练上也已存在很多绝妙的规则来引导和指点人们。在此，我们仅列举其中几条规则。

(9) The first shall be, that we beware we take not at the first either too high a strain or too weak: for if too high, in a diffident nature you discourage, in a confident nature you breed an opinion of facility, and so a sloth; and in all natures you breed a further expectation than can hold out, and so an insatisfaction in the end: if

too weak, of the other side, you may not look to perform and overcome any great task.

（9）第一条规则就是，我们应谨防起的调子过高或过低。如果太高，缺乏自信的人会产生负面心理，自信满满的人又会生发蔑视的心态，并伴随怠惰的行为，而人们又通常会期望高于实际，最终失落倍增。但如果起调过低，人们也就不可能肩负起或胜任任何重大使命。

(10) Another precept is to practise all things chiefly at two several times, the one when the mind is best disposed, the other when it is worst disposed; that by the one you may gain a great step, by the other you may work out the knots and stonds of the mind, and make the middle times the more easy and pleasant.

（10）第二条规则是，所有的训练主要在两个时间段内进行，一是内心最乐于做事的时候，二是内心最排斥做事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段的训练有助于我们突飞猛进，第二个时间段则能帮助我们克服内心的纠结，而在处于中间的时间段里令人更加轻松愉悦。

(11) Another precept is that which Aristotle mentioneth by the way, which is to bear ever towards the contrary extreme of that whereunto we are by nature inclined; like unto the rowing against the stream, or making a wand straight by bending him contrary to his natural crookedness.

（11）对于第三条规则亚里士多德就曾附带提及过，即永远向人

类天性的另一端努力，这就如逆水行舟，或反向扳直自然弯曲的棍棒一样。

(12) Another precept is that the mind is brought to anything better, and with more sweetness and happiness, if that whereunto you pretend be not first in the intention, but *tanquam aliud agendo*, because of the natural hatred of the mind against necessity and constraint. Many other axioms there are touching the managing of exercise and custom, which being so conducted doth prove indeed another nature; but, being governed by chance, doth commonly prove but an ape of Nature, and bringeth forth that which is lame and counterfeit.

（12）第四条规则是，如果我们不是认定目标，单刀直入，而是通过其他事情迂回实现，那么，我们的心理就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同时令我们身心愉悦。这是由于人们天生排斥强制与束缚。当然，关于训练和管理习惯的规则还有很多。如果我们对这一习惯进行适当引导，确能成就我们的第二天性。不过，当其掌握在命运手中时，很可能就沦为了对自然的仿效，产生各类残缺虚假的事物。

(13) So if we should handle books and studies, and what influence and operation they have upon manners, are there not divers precepts of great caution and direction appertaining thereunto?Did not one of the fathers in great indignation call poesy vinum daemonum, because it increaseth temptations, perturbations, and vain opinions?Is not the opinion of Aristotle worthy to be regarded, wherein he saith, “That young men are no fit auditors of moral philosophy, because they are not settled from the boiling heat of their affections, nor attempered with time and experience” ?

And doth it not hereof come, that those excellent books and discourses of the ancient writers (whereby they have persuaded unto virtue most effectually, by representing her in state and majesty, and popular opinions against virtue in their parasites' coats fit to be scorned and derided), are of so little effect towards honesty of life, because they are not read and revolved by men in their mature and settled years, but confined almost to boys and beginners?But is it not true also, that much less young men are fit auditors of matters of policy, till they have been thoroughly seasoned in religion and morality; lest their judgments be corrupted, and made apt to think that there are no true differences of things, but according to utility and fortune, as the verse describes it, *Prosperum et felix scelus virtus vocatur* ; and again, *Ille crucem pretium sceleris tulit, hic diadema* : which the poets do speak satirically and in indignation on virtue's behalf; but books of policy do speak it seriously and positively; for so it pleaseth Machiavel to say, “That if Cæsar had been overthrown, he would have been more odious than ever was Catiline;” as if there had been no difference, but in fortune, between a very fury of lust and blood, and the most excellent spirit (his ambition reserved) of the world?Again, is there not a caution likewise to be given of the doctrines of moralities themselves (some kinds of them), lest they make men too precise, arrogant, incompatible; as Cicero saith of Cato, *In Marco Catone haec bona quae videmus divina et egregia, ipsius scitote esse propria; quæ nonunquam requirimus ea sunt omnia non a natura, sed a magistro* ?Many other axioms and advices there are touching those proprieties and effects, which studies do infuse and instil into manners. And so, likewise, is there touching the use of all those other points, of company, fame, laws, and the rest, which we recited in the beginning in the doctrine of morality.

（13）我们如果阅读书籍，努力研究，探讨情感对行为举止的影响与效用，又怎会忽视那些对我们有着极大的训诫和指导作用的规则呢？不是有一位神父认识到诗歌加增了人类的诱惑，骚动和虚空的想法，愤怒地称其为“恶魔的酒浆”吗？亚里士多德曾说：“年轻人热情洋溢，激情四射，又未经得时间的沉淀和阅历的调和，根本不适合聆听道德哲学。”难道这样的观点不值得深入探讨吗？古时的作者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和记述（将道德描绘地庄严无比，让人们彻底信服，而对于那些违背道德却又打着道德幌子的通俗观念，随时给予嘲讽和揶揄）对生活中的诚实却几无效果，这不就是因为它们仅仅被作为少年期和初学者的读物，而没有引起成熟稳重的人的精读和考量吗？年轻人在通晓宗教和道德之前，不是更加不适宜旁观政治事务吗？这是为了不致损害他们的判断，令他们倾向于认为，除了实用与运数的差别，适合事物都是没有实质性区别的。诗中曾说，“成功后的犯罪成了美德。”此外，诗人又为维护道德而义愤填膺地讽刺道，“累累恶行助其登顶”。不过，政治类书籍却是严正积极地阐述着这些观点，马基雅弗利就曾说，“即使恺撒的政府被推翻，他还是比卡蒂利纳更为可憎。”这不是意味着，欲念熏心者与世上最伟大的灵魂（排除其雄心抱负）之间是不存在差别的，只不过是运气的好坏而已吗？不是还有一种对遵循某些道德准则的警示，以免人们受其约束变得过于刻板、自负及互不相容吗？西塞罗在评价加图时说过，“在马可·卡托内身上，我们看到了优异神圣的品质，这些必然是天生的；但在一些场合中受到人们蔑视的表现，却并非来自天性，而是源于教育。”此外，很多其他原则和忠告也都有涉及礼仪与效用等，这方面的研究正逐步渗入人们的行为之中。同样，我们在讨论道德教义的初期列举的其他方面，如商号、名誉、法律等等，也都具有类似的效果。

(14) But there is a kind of culture of the mind that seemeth yet more accurate and elaborate than the rest, and is built upon this ground; that the minds of all men are at some times in a state more perfect, and at other times in a state more depraved. The purpose, therefore, of this practice is to fix and cherish the good hours of the

mind, and to obliterate and take forth the evil. The fixing of the good hath been practised by two means, vows or constant resolutions, and observances or exercises; which are not to be regarded so much in themselves, as because they keep the mind in continual obedience. The obliteration of the evil hath been practised by two means, some kind of redemption or expiation of that which is past, and an inception or account de novo for the time to come. But this part seemeth sacred and religious, and justly; for all good moral philosophy (as was said) is but a handmaid to religion.

（14）有一种磨练心智的方法，相较于其他任何方法，似乎更为合理而精致。人类的心理状态时而完美，时而颓废，而这种方法就是以这种现象为基础的。其目的就在于巩固珍惜人们心理的良好状态，摒除内心的邪念和颓废。巩固良好状态的方式有两种，一为立下誓言或坚定决心，二为遵守或践行规则习惯和锻炼。这两种方法本身并没有多少值得关注的，但它们对维持心理的持续性顺服具有极大的功效。摒除邪念同样有两种方式，一是回顾过错，进行赎救，二是自此翻篇，重整旗鼓。不过，公正地说，这部分内容似乎较为神圣，具有宗教性质，因为一切美好的道德哲学（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只不过是宗教的仆从罢了。

(15) Wherefore we will conclude with that last point, which is of all other means the most compendious and summary, and again, the most noble and effectual to the reducing of the mind unto virtue and good estate; which is, the electing and propounding unto a man's self good and virtuous ends of his life, such as may be in a reasonable sort within his compass to attain. For if these two things be supposed, that a man set before him honest and good ends, and again, that he be resolute, constant, and true unto them; it will

follow that he shall mould himself into all virtue at once. And this indeed is like the work of nature; whereas the other course is like the work of the hand. For as when a carver makes an image, he shapes only that part whereupon he worketh; as if he be upon the face, that part which shall be the body is but a rude stone still, till such times as he comes to it. But contrariwise when nature makes a flower or living creature, she formeth rudiments of all the parts at one time. So in obtaining virtue by habit, while a man practiseth temperance, he doth not profit much to fortitude, nor the like but when he dedicateth and applieth himself to good ends, look, what virtue soever the pursuit and passage towards those ends doth commend unto him, he is invested of a precedent disposition to conform himself thereunto. Which state of mind Aristotle doth excellently express himself, that it ought not to be called virtuous, but divine. His words are these: *Immanitati autem consentaneum est opponere eam, quæ supra humanitatem est, heroicam sive divinam virtutem; and a little after, Nam ut feræ neque vitium neque virtus est, swic neque Dei: sed hic quidem status altius quiddam virtute est, ille aluid quiddam a vitio* . And therefore we may see what celsitude of honour Plinius Secundus attributeth to Trajan in his funeral oration, where he said, “That men needed to make no other prayers to the gods, but that they would continue as good lords to them as Trajan had been;” as if he had not been only an imitation of divine nature, but a pattern of it. But these be heathen and profane passages, having but a shadow of that divine state of mind, which religion and the holy faith doth conduct men unto, by imprinting upon their souls charity, which is excellently called the bond of perfection, because it comprehendeth and fasteneth all virtues together. And as it is elegantly said by Menander of vain love, which is but a false imitation of divine love, *Amor melior Sophista lævo ad humanam vitam* —that love teacheth a man to carry himself better than the sophist or preceptor; which he calleth left-handed, because, with all

his rules and preceptions, he cannot form a man so dexterously, nor with that facility to prize himself and govern himself, as love can do: so certainly, if a man's mind be truly inflamed with charity, it doth work him suddenly into greater perfection than all the doctrine of morality can do, which is but a sophist in comparison of the other. Nay, further, as Xenophon observed truly, that all other affections, though they raise the mind, yet they do it by distorting and uncomeliness of ecstasies or excesses; but only love doth exalt the mind, and nevertheless at the same instant doth settle and compose it: so in all other excellences, though they advance nature, yet they are subject to excess. Only charity admitteth no excess. For so we see, aspiring to be like God in power, the angels transgressed and fell; *Ascendam, et ero similis altissimo* : by aspiring to be like God in knowledge, man transgressed and fell; *Eritis sicut Dii, scientes bonum et malum* : but by aspiring to a similitude of God in goodness or love, neither man nor angel ever transgressed, or shall transgress. For unto that imitation we are called: *Diligite inimicos vestros, benefacite eis qui oderunt vos, et orate pro persequentibus et calumniantibus vos, ut sitis filii Patris vestri qui in cœlis est, qui solem suum oriri facit super bonos et malos, et pluit super justos et injustos* . So in the first platform of the divine nature itself, the heathen religion speaketh thus, *Optimus Maximus* : and the sacred Scriptures thus, *Miscericordia ejus super omnia opera ejus* .

（15）最后，我们再提出一种磨练心智的方法作为总结，即在人们的能力范围内，合理选择或提出内在美德和生活中德行的发展目标。较之其他所有方法，这种方法是最为简明扼要的，在还原内心美德和良好状态方面也是最高尚最卓有成效的。如果一个人既为自己设定了切实善良的目标，又能下定决心忠于目标，不屈不挠地果断履行，那么，他必会立刻运用所有道德标准来塑造自身。这与自然产生的功效十分类似，而其他方法则更像是人为的。这就像雕刻家雕塑肖

像一样，只有他雕刻的地方才会显示出一定的形状。如果他雕刻面部，那么身体部位便仍然只是未经加工的原始石块，只有在他着手雕刻时才会显示出形状来。然而，自然创造诸如鲜花等各类生物时，也同时打造出了其他各部分的雏形。因此，依赖习惯获取美德时，人们虽节制节欲，对坚韧意志或其他美德的培养却并无多少裨益。但如果人们积极致力于美德培养目标，我们就会看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论需要怎样的美德，他都会产生一种预设的倾向，协调自身去顺应这些美德。亚里士多德在论述这种心理倾向时，非常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种倾向不应称为有德的，而是神圣的。他说，“能与野性相对抗的是高于人类的英勇或神圣的美德。”不久后又说，“对于野兽来说，不存在美德或罪恶的概念，对于神灵也是如此。因为神灵处于一种高于美德的状态，就如野性不同于罪恶一般。”同时我们看到，小普利纽斯在图拉真的葬礼致辞中，赋予了图拉真至高的荣耀。他说道：“人们只需向神明祈祷一件事情，别无其他，那就是希冀神明能如图拉真那样继续做人们的仁慈救主。”这似乎表明，图拉真不仅仅是对神性的效仿，其本身就是神灵的典范。不过，这些都是异教徒们亵渎神灵的表述，只是从中多少影射出了神圣的心理状态。但这种心理只能依赖宗教和圣洁的信仰在人们内心铭刻仁爱才能实现。这种仁爱综合并联络了一切美德，因而被绝妙地称作完美的黏合剂。愚蠢的爱只是对神圣之爱的虚假模仿，对于这一种爱，米南德精当地表述道，“在人类生活中，爱比笨拙的诡辩家更好一些”。也就是说，比起诡辩家或训导师，爱能够更好地教会人们做更完善的自己。他之所以认为诡辩家笨拙，是因为他们尽管教给人们一堆法则与概念，却无法像爱那样让人们变得灵活敏捷，也不可能让人们拥有珍视自己、管理自身的才能。因此，当一个人的心智真正受到仁爱的激励，就立刻产生非凡的功效，获得更加全面的美德，而一切道德原理就如那些诡辩家一样收效甚微了。此外，色诺芬曾真切注意到，其他情感虽也能提升心智，却是通过过度扭曲狂喜和大喜大悲的情感而实现的。只有爱在提升心智的同时，又令人心境平和。因此，其他情感虽同样能改善人的本性，却易出现过度的情况。只有仁爱不会过度。我们了解到，一些天使因渴求上帝的权能，违犯天规而堕落成魔；恶魔说道，“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而人类则因窥探

到上帝的知识，才会犯罪作恶，颓堕委靡；恶魔也曾诱惑人类，“你们会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但是，如果只是向往并效仿上帝的宽厚与仁爱，不论人类还是天使，都不可能作恶，将来也绝对不会。对于这种仿效，《圣经》是这样表述的：“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由此我们看到，对于神性的第一类要义，异教徒称为“至上的优异与伟大”，而《圣经》则称道，“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

(16) Wherefore I do conclude this part of moral knowledge, concerning the culture and regiment of the mind; wherein if any man, considering the arts thereof which I have enumerated, do judge that my labour is but to collect into an art or science that which hath been pretermitted by others, as matter of common sense and experience, he judgeth well. But as Philocrates sported with Demosthenes, “You may not marvel (Athenians) that Demosthenes and I do differ; for he drinketh water, and I drink wine;” and like as we read of an ancient parable of the two gates of sleep —“*Suntgeminæ somni portæ: quarum altera fertur Cornea, qua veris facilis datur exitus umbris: Altera candenti perfecta nitens elephanto, Sed falsa ad coelum mittunt insomnia manes* :” so if we put on sobriety and attention, we shall find it a sure maxim in knowledge, that the more pleasant liquor (“of wine”) is the more vaporous, and the braver gate (“of ivory”) sendeth forth the falser dreams.

（16）对于磨练与支配心理的这部分道德知识，我们就讨论至此为止。如果有人留意到我所列举的技巧，便判定我的所有付出只为将他人看作常识和常规经验而受到忽略的内容汇集整理出一种技艺或学科，这也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菲洛克拉底在调侃狄摩西尼时说过，“我和狄摩西尼之间思想的不同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是雅典

人，喝的是水，而我喝的是酒。”还有一则古代寓言讲述了寝宫两扇门的故事：“寝宫静复静，双门美奂仑。一为象牙雕，一为犀角篆。角质本透明，真相因以传；象牙虽文采，所传尽谎言。”因此，我们如保持清醒的头脑，专注的态度，就不难发现知识中的一条至理箴言，这便是，越是讨喜的饮剂（酒），就越发使人产生虚无缥缈的幻觉；越是华丽的大门（象牙门），就越是虚空梦幻。

(17) But we have now concluded that general part of human philosophy, which contemplateth man segregate, and as he consisteth of body and spirit. Wherein we may further note, that there seemeth to be a relation or conformity between the good of the mind and the good of the body. For as we divided the good of the body into health, beauty, strength, and pleasure, so the good of the mind, inquired in rational and moral knowledges, tendeth to this, to make the mind sound, and without perturbation; beautiful, and graced with decency; and strong and agile for all duties of life. These three, as in the body, so in the mind, seldom meet, and commonly sever. For it is easy to observe, that many have strength of wit and courage, but have neither health from perturbations, nor any beauty or decency in their doings; some again have an elegancy and fineness of carriage which have neither soundness of honesty nor substance of sufficiency; and some again have honest and reformed minds, that can neither become themselves nor manage business; and sometimes two of them meet, and rarely all three. As for pleasure, we have likewise determined that the mind ought not to be reduced to stupid, but to retain pleasure; confined rather in the subject of it, than in the strength and vigour of it.

（17）我们对人类哲学中关于个体的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类身体和心灵的研究，也作了最后总结。不过，我们还需注意一点，即心

理善性和身体善性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的联系或一致性。我们将身体善性分为健康、美丽、力量和愉悦，因而在理性与道德知识研究领域，也可将心理善性进行类似的划分，分为健康，无扰，美丽优雅，坚强机灵，能担起一切生活责任等方面。类似于身体的善性，心理上的这三个方面品性总是聚少离多。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虽然拥有过人的智慧和胆量，却缺乏应对烦扰的健康心态，行为举止也颇不体面；而有些人虽然举止风雅，却常常虚情假意，且实力平平；还有一些人固然诚信善良，却时常迷失自我，而又处事无方。有时，其中的两种品性可能结合于同一人上，但极少出现三者合一的情况。至于愉悦，我们不能使得我们的内心变得乏味无聊，因而还是需要维持愉悦的。只不过这种愉悦应该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不能任其尽展活力。

CHAPTER XXIII

第二十三章

(1) Civil knowledge is conversant about a subject which of all others is most immersed in matter, and hardliest reduced to axiom. Nevertheless, as Cato the Censor said, “That the Romans were like sheep, for that a man were better drive a flock of them, than one of them; for in a flock, if you could get but some few go right, the rest would follow:” so in that respect moral philosophy is more difficile than policy. Again, moral philosophy propoundeth to itself the framing of internal goodness; but civil knowledge requireth only an external goodness; for that as to society sufficeth. And therefore it cometh oft to pass that there be evil times in good governments: for so we find in the Holy story, when the kings were good, yet it is added, *Sed adhuc poulus non direxerat cor suum ad Dominum Deum patrum suorum* . Again, states, as great engines, move slowly, and are not so soon put out of frame: for as in Egypt the seven good

years sustained the seven bad, so governments for a time well grounded do bear out errors following; but the resolution of particular persons is more suddenly subverted. These respects do somewhat qualify the extreme difficulty of civil knowledge.

（1）与其他所有知识相比，社会知识涉及的对象是最为具体，也最难以用任何公理涵盖。监察官加图曾说，“罗马人就和绵羊一样，驾驭羊群比驾驭单独一只羊容易得多，因为绵羊成群行动时，只需掌控其中的带头羊，其余的就会紧随其后。”从这方面而言，道德哲学比政治学更难以驾驭。同时，道德哲学关注内在善性的建构，而社会知识仅重视外在的善性，因为这足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使国家治理良好，罪恶仍然时有出现。在《圣经》之中，我们同样发现，在遇到仁爱的国王时，“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神。”另外，国家就像一个巨型引擎，缓慢运行，却不会迅速散架。例如，埃及的七个丰年就支撑起了其后的七个荒年，而根基良好稳固的政府同样经得起随后出现的一些过失。不过，个人的决心却更容易在顷刻间崩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方面着实可以适当缓和社会知识的高难度。

(2) This knowledge hath three parts, according to the three summary actions of society; which are conversation, negotiation, and government. For man seeketh in society comfort, use, and protection; and they be three wisdoms of divers natures which do often sever—wisdom of the behaviour, wisdom of business, and wisdom of state.

（2）根据三类概要性的社会行为，社会知识可分为三个部分，即交际、协商和统治。因为人们渴望在社会中寻求安慰、效益和保护，其对应的三种智慧就是行为的智慧、事务的智慧以及统治的智

慧，这三种智慧的性质完全不同，又时常相互分离。

(3) The wisdom of conversation ought not to be over much affected, but much less despised; for it hath not only an honour in itself, but an influence also into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The poet saith, *Nec vultu destrue verba tuo* : a man may destroy the force of his words with his countenance; so may he of his deeds, saith Cicero, recommending to his brother affability and easy access; *Nil interest habere ostium apertum, vultum clausum* : it is nothing won to admit men with an open door, and to receive them with a shut and reserved countenance. So we see Atticus, before the first interview between Cæsar and Cicero, the war depending, did seriously advise Cicero touching the composing and ordering of his countenance and gesture. And i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enance be of such effect, much more is that of the speech, and other carriage appertaining to conversation; the true model whereof seemeth to me well expressed by Livy, though not meant for this purpose: *Ne aut arrogans videar, aut obnoxius; quorum alterum estàlienæ libertatis obliti, alterum suæ* : the sum of behaviour is to retain a man's own dignity, without intruding upon the liberty of others. On the other side, if behaviour and outward carriage be intended too much, first it may pass into affectation, and then *Quid deformius quam scenam in vitam transferre* —to act a man's life?But although it proceed not to that extreme, yet it consumeth time, and employeth the mind too much. And therefore as we use to advise young students from company keeping, by saying, *Amici fures temporis* : so certainly the intending of the discretion of behaviour is a great thief of meditation. Again, such as are accomplished in that form of urbanity please themselves in it, and seldom aspire to higher virtue; whereas those that have defect in it do seek comeliness by reputation; for where reputation is, almost everything becometh; but where that is not, it must be

supplied by puntos and compliments. Again, there is no greater impediment of action than an over-curious observance of decency, and the guide of decency, which is time and season. For as Solomon saith, *Qui respicit ad ventos, non seminat; et qui respicit ad nubes, non metet* : a man must make his opportunity, as oft as find it. To conclude, behaviour seemeth to me as a garment of the mind, and to have the conditions of a garment. For it ought to be made in fashion; it ought not to be too curious; it ought to be shaped so as to set forth any good making of the mind and hide any deformity; and above all, it ought not to be too strait or restrained for exercise or motion. But this part of civil knowledge hath been elegantly handled, and therefore I cannot report it for deficient.

（3）针对交际上的智慧，我们不必过分重视，但也不应加以轻视。因为这种智慧不仅本身值得尊重，而且它对社会事务和国家统治都具有影响力。诗人曾说，“勿以容貌污言辞”，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可以摧毁他言辞的力量。在行为上也是一样，西塞罗就曾劝告他的友人要待人和善、平易近人，他说，敞开大门迎接客人，却面容紧绷，默而不语，这会让客人索然无味。在恺撒和西塞罗第一次会面（这次会面直接关系到战争的局势）之前，阿提库斯就曾严肃地劝告西塞罗在会面时注意表情与姿态的镇定与得当。如果表情的管理具有如此效用，言辞以及交际过程中的其他举止的功效就更为非凡了。李维曾说：“我唯恐显得傲慢不逊，或者卑躬屈膝。一个不顾他人自由，一个不顾自身自由。”这意味着，人的一切行为旨在维护自身的尊严，同时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尽管李维说话的用意与我们讨论的主题并不一致，不过，这着实可作为这一方面的真正典范。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太过注意自己的行为及外部姿态，不仅会变得矫揉造作，是否还会“将丑陋的舞台表演转移到现实生活”，一生都在演戏呢？虽然人们还不至于如此极端，但这种做法太过费时费力。我们在劝告年轻的学生不要交际过密时，常说，“朋友是时间的窃贼”。当然，对行为过分慎重同样也是沉思的重大窃贼。对于那些举止文雅，娴熟有度的

人，他们往往对于自己的成就洋洋自得，极少再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美德。而那些举止笨拙的人便通过追求名誉来增添魅力，因为拥有名声，便拥有一切。但如无法享得名誉，就只能通过礼节与恭维加以弥补。其实，如果过分追求举止得体，谨守各类行为规范，便会错失良机，这才是最大的行为障碍。所罗门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因此，人们应当学会相机而动。总之，对我来说，行为是人们心理的外衣，应该具有外衣的特征。它应该剪裁时兴，但又不能太过奇特。它还应制作合身，足以呈现美好的心理，又能掩藏其中的缺陷。最重要的是，它不该过于紧绷或束缚，影响人们的活动或姿态。不过，这一方面的社会知识已经得到了精当的研究，因而我无法说它们是存在缺陷的。

(4) The wisdom touching negotiation or business hath not been hitherto collected into writing, to the great derogation of learning and the professors of learning. For from this root springeth chiefly that note or opinion, which by us is expressed in adage to this effect, that there is no great concurrence between learning and wisdom. For of the three wisdoms which we have set down to pertain to civil life, for wisdom of behaviour, it is by learned men for the most part despised, as an inferior to virtue and an enemy to meditation; for wisdom of government, they acquit themselves well when they are called to it, but that happeneth to few; but for the wisdom of business, wherein man's life is most conversant, there be no books of it, except some few scattered advertisements, that have no proportion to the magnitude of this subject. For if books were written of this as the other, I doubt not but learned men with mean experience would far excel men of long experience without learning, and outshoot them in their own bow.

（4）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著述中发现对协商或社会事务相

关的智慧的搜集，这对学问和学者而言都具有极大的损害。因为由此人们引发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学问与智慧之间并不存在一致性。这种观点甚至被明确呈现于一些格言之中。我们上文提出了三种有关社会知识的智慧。其中，行为的智慧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学者的鄙薄，他们认为，这样的智慧次于道德，又危害沉思。至于统治的智慧，当学者需要运用的时候，也能很好地表现，不过极少人能这样做。而事务上的智慧虽最接近人们的生活，但除了些许零散短小的记述之外，并没有相关著作，与这一主题的重要程度是完全不相称的。如果在这一方面也跟在其他方面一样具有相应的著述，我确信，比起那些阅历丰富却才疏学浅之人，缺乏经验的学者必定会比他们优秀得多，他们能运用自己的弓将箭射得更准。

(5) Neither needeth it at all to be doubted, that this knowledge should be so variable as it falleth not under precept; for it is much less infinite than science of government, which we see is laboured and in some part reduced. Of this wisdom it seemeth some of the ancient Romans in the saddest and wisest times were professors; for Cicero reporteth, that it was then in use for senators that had name and opinion for general wise men, as Coruncanius, Curius, Laelius, and many others, to walk at certain hours in the Place, and to give audience to those that would use their advice; and that the particular citizens would resort unto them, and consult with them of the marriage of a daughter, or of the employing of a son, or of a purchase or bargain, or of an accusation, and every other occasion incident to man's life. So as there is a wisdom of counsel and advice even in private causes, arising out of a universal insight into the affairs of the world; which is used indeed upon particular causes propounded, but is gathered by general observation of causes of like nature. For so we see in the book which Q. Cicero writeth to his brother, *De petitione consulatus* (being the only book of business that I know written by the ancients), although it concerned a particular

action then on foot, yet the substance thereof consisteth of many wise and politic axioms, which contain not a temporary, but a perpetual direction in the case of popular elections. But chiefly we may see in those aphorisms which have place amongst divine writings, composed by Solomon the king, of whom the *Scriptures testify* that his heart was as the sands of the sea, encompassing the world and all worldly matters, we see, I say, not a few profound and excellent cautions, precepts, positions, extending to much variety of occasions; whereupon we will stay a while, offering to consideration some number of examples.

（5）还有一点我们无需怀疑，那就是尽管这部分知识无法纳入任何规则之内，它们是变化无常的。相较于政治这一门已经得到研究且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简化的学科，这类知识根本不算复杂。对于这方面的智慧，一些古代最糟糕且最通明时期的罗马人堪称专家。西塞罗记述道，那时，元老院议员普遍享有智者的美誉，如科伦卡尼乌斯、库里乌斯、拉埃柳斯等等，他们会在特定时间来到特定地点，接待那些前来寻求他们建议的人。民众们纷纷向他们咨询，请教关于女儿成婚、儿子择业、交易买卖或讨价还价、法律诉讼及其他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由此我们看到，如果人们能够普遍洞悉世界事态，对个人琐事便也能提供明智的建议和忠告。这种智慧虽应用于特定事务，却是观察综合类似性质的事件的结果。我们在昆图斯·西塞罗写给他哥哥的书信《论竞选执政官》（据我所知，这是古人唯一一部关于社会事务的专著）中看到，尽管它谈论的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特定行为，却仍充满了睿智的政治箴言，这对公众选举的指导作用绝非昙花一现，而是永无止尽的。在所罗门王所著的《圣经·箴言》中，这种智慧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圣经》向人们昭示，所罗门的心如大海之沙，包罗了世界万物。可以说，所罗门给我们呈现了众多深刻精辟的警示、训诫和观念，涵盖各类时机场合。对此，我们有必要稍作停留，列举其中一些例子，从而引发人们的思考。

(6) *Sed et cunctis sermonibus qui dicuntur ne accommodes aurem tuam, ne forte audias servum tuum maledicentem tibi* . Here is commended the provident stay of inquiry of that which we would be loth to find: as it was judged great wisdom in Pompeius Magnus that he burned Sertorius' papers unperused. *Vir sapiens, si cum stulto contenderit, sive irascatur, sive rideat, non inveniet requiem* . Here is described the great disadvantage which a wise man hath in undertaking a lighter person than himself; which is such an engagement as, whether a man turn the matter to jest, or turn it to heat, or howsoever he change copy, he can no ways quit himself well of it. *Qui delicate a pueritia nutrit servum suum, postea sentiet eum contumacem* . Here is signified, that if a man begin too high a pitch in his favours, it doth commonly end in unkindness and unthankfulness. *Vidisti virum velocem in opere suo?coram regibus stabit, nec erit inter ignobiles* . Here is observed, that of all virtues for rising to honour, quickness of despatch is the best; for superiors many times love not to have those they employ too deep or too sufficient, but ready and diligent. *Vidi cunctos viventes qui ambulant sub sole, cum adolescente secundo qui consurgit pro eo* . Here is expressed that which was noted by Sylla first, and after him by Tiberius. *Plures adorant solem orientem quam occidentem vel meridianum* . *Si spiritus potestatem habentis ascenderit super te, locum tuum ne demiseris; quia curatio faciet cessare peccata maxima* . Here caution is given, that upon displeasure, retiring is of all courses the unfittest; for a man leaveth things at worst, and depriveth himself of means to make them better. *Erat civitas parva, et pauci in ea viri: venit contra eam rex magnus, et vallavit eam, instruxitque munitones per gyrum, et perfecta est obsidio; inventusque est in ea vir pauper et sapiens, et liberavit eam per sapientiam suam; et nullus deinceps recordatus est huminis illius pauperis* . Here the corruption of states is set forth, that esteem not virtue or merit longer than they have use of it. *Mollis responsio frangit iram* . Here is noted that silence or

rough answer exasperateth; but an answer present and temperate pacifieth. *Iter pigrorum quasi sepes spinarum* . Here is lively represented how laborious sloth proveth in the end; for when things are deferred till the last instant, and nothing prepared beforehand, every step findeth a briar or impediment, which catcheth or stoppeth. *Melior est finis orationis quam principium* . Here is taxed the vanity of formal speakers, that study more about prefaces and inducements, than upon the conclusions and issues of speech. *Qui cognoscit in judicio faciem, non bene facit; iste et pro buccella panis deseret veritatem* . Here is noted, that a judge were better be a briber than a respecter of persons; for a corrupt judge offendeth not so lightly as a facile. *Vir pauper calumnians pauperes simils est imbri vehementi, in quo paratur fames* . Here is expressed the extremity of necessitous extortions, figured in the ancient fable of the full and the hungry horseleech. *Fons turbatus pede, et vena corrupta, est justus cadens coram impio* . Here is noted, that one judicial and exemplar iniquity in the face of the world doth trouble the fountains of justice more than many particular injuries passed over by connivance. *Qui subtrahit aliquid a patre et a matre, et dicit hoc non esse peccatum, particeps est homicidii* . Here is noted that, whereas men in wronging their best friends use to extenuate their fault, as if they might presume or be bold upon them, it doth contrariwise indeed aggravate their fault, and turneth it from injury to impiety. *Noli esse amicus homini iracundo, nec ambulato cum homine furioso* . Here caution is given, that in the election of our friends we do principally avoid those which are impatient, as those that will espouse us to many factions and quarrels. *Qui conturbat domum suam, possidebit ventum* . Here is noted, that in domestical separations and breaches men do promise to themselves quieting of their mind and contentment; but still they are deceived of their expectation, and it turneth to wind. *Filius sapiens lætificat patrem: filius vero stultus mæstitia est matri suæ.* Here is distinguished, that fathers have most

comfort of the good proof of their sons; but mothers have most discomfort of their ill proof, because women have little discerning of virtue, but of fortune.*Qui celat delictum, quæritamicitiam; sed qui altero sermone repetit, separat fœderatos* . Here caution is given, that reconcilement is better managed by an amnesty, and passing over that which is past, than by apologies and excuses. *In omni opere bono erit abundantia; ubi autem verba sunt plurima, ibi frequenter egestas* . Here is noted, that words and discourse aboundeth most where there is idleness and want. *Primus in sua causa justus: sed venit altera pars, et inquiret in eum* . Here is observed, that in all causes the first tale possesseth much; in sort, that the prejudice thereby wrought will be hardly removed, except some abuse or falsity in the information be detected. V*erba bilinguis quasi simplicia, et ipsa perveniunt ad interiora ventris* . Here is distinguished, that flattery and insinuation, which seemeth set and artificial, sinketh not far; but that entereth deep which hath show of nature, liberty, and simplicity. *Qui erudit derisorem, ipse sibi injuriam facit; et qui arguit impium, sibi maculam generat* . Here caution is given how we tender reprehension to arrogant and scornful natures, whose manner is to esteem it for contumely, and accordingly to return it. *Da sapienti occasionem, et addetur ei sapientia* . Here is distinguished the wisdom brought into habit, and that which is but verbal and swimming only in conceit; for the one upon the occasion presented is quickened and redoubled, the other is amazed and confused. *Quomodo in aquis resplendent vultus prospicientium, sic corda hominum manifesta sunt prudentibus* . Here the mind of a wise man is compared to a glass, wherein the images of all diversity of natures and customs are represented; from which representation proceedeth that application, “Qui sapit, innumeris moribus aptus erit.”

（6）所罗门曾说，“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

见你的仆人诅咒你”。这句箴言教导人们，对于不感兴趣的事情，就无需深入探究。庞培大帝未经翻阅塞多留的书信就曾将其烧为灰烬，人们一直认为这是明智之举。“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这表明，智者在与较自己愚笨的人交往时，往往处于劣势。其间，不论智者是笑着表述，还是激情洋溢地描绘，又或是模仿对方的方式改变其他策略，他都不可能占得上风。“人将仆人从小娇养，这仆人终久必成了他的儿子”这一箴言的意思是，如果人们在一开始就给予某人过分的厚爱，对方终将以怨报德。“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为人们赢得尊重的美德中，迅捷的动作是最主要的。很多时候，上级钟爱的不是那些博学多才、精明能干的人，而是那些机敏灵活，勤奋刻苦的人。“我看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这一观点与西拉和提比略相继指出的见解是一样的。“人们对于初升之日的赞美超过了对于落日或正午之日的赞美。”“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以为内柔和能免大过。”这是在警示人们，在触怒上级时，退却是最不恰当的，因为一旦离开，就把最糟的事情留于他人，同时又剥夺了自身改善状况的机会。“就是有一个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记念那穷人。”人们的美德或价值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他们受到尊重便会戛然而止，这就是国家的腐败。“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这一箴言指出，沉默或粗鲁的回答使人恼怒，即时温和的回答才能抚慰心灵。“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这句话生动地阐释了怠惰的人终将面对重重困难。因为如果一味拖延至最后一刻，没有一点前期准备，当下就会受到重重障碍，令人步履维艰。“言辞的结尾比言辞的开端要好。”这一箴言是对那些浮夸的公开发言者的谴责，他们花费大量心思研究引言和开场白，却对演说的结论和尾声漠不关心。“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这表明，一个法官就算行贿受贿也好过趋炎附势，因为势利徇私者对法律的冒犯比起贪赃者更加严重。“穷人欺压贫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这句话清晰地描绘出了贫穷的人在强取豪夺时的穷凶极恶，古代寓言中那只吃饱喝足却仍饥饿难耐的蚂蝗就

是很好的例子。“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趟浑之泉，弄浊之井。”这一箴言指出，比起对罪恶的纵容放任，很多时候，公然呈现枉法典型，树立负面榜样，对司法基础的损害更加巨大。“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一些人对朋友不义，还要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好像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理所应当似的。事实上，他们寻找借口的做法只会加剧他们的过失，本来仅仅是一种伤害，现在却成了不敬。“常常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这句话告诫人们，择友要注意避免结交性急焦躁之人，因为他们会挑起大量纷争，还把我们牵连其中。“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这就是说，把家庭弄得支离破碎的人或许会向自己承诺，要平息内心，获得满足，然而他们仍会背叛自己的诺言，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使母亲担忧。”这表明，父亲和母亲在孩子上的关注点是存在差别的。父亲会孩子的优秀感到欣慰，而母亲则会因孩子不成器而忧心忡忡。这是由于在女人眼里，没有美德，只有命运。“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这警示人们，比起致歉和辩解，对过去的释怀更容易令双方和解。“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致穷乏。”这是在告诉人们，滔滔不绝之人通常就是懒散而穷困之人。“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就察出实情。”也就是说，对于一切事件，第一个叙述版本最能摆布人们的思维，只有看穿其中的浮夸虚假信息，才可能避免对其的偏见。“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谄媚巴结的言辞显然虚伪做作，无法深入人心；而那些看起来自然、随性又质朴的话语才最能够打动人心。“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这是在警示人们，如果人们对妄自尊大、傲慢无礼的人发出责难，他们便会争锋相对进行回击。“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这一话语是对已成为习惯的真聪明与口头卖弄、光说不做的假聪明之间的区分。前一种智慧在遇到机会时时，必然得到活跃和倍增，而后者只会处于困惑和窘迫的境地。“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这句话中，智者被比作了镜子，一切天性与习性的形象都在其中得以呈现。根据这些形象，智者便可以将这些特性应用于实践。也就是说，“聪明人能让自己适应一切行为。”

(7) Thus have I stayed somewhat longer upon these sentences politic of Solomon than is agreeable to the proportion of an example; led with a desire to give authority to this part of knowledge, which I noted as deficient, by so excellent a precedent; and have also attended them with brief observations, such as to my understanding offer no violence to the sense, though I know they may be applied to a more divine use: but it is allowed, even in divinity, that some interpretations, yea, and some writings, have more of the eagle than others; but taking them as instructions for life, they might have received large discourse, if I would have broken them and illustrated them by deducements and examples.

（7）我们对所罗门这些精辟的名言警句为例的阐述似乎花费了太多的篇幅，甚至超过了其本身所应花费的时间。我如此详述，旨在通过这些绝妙的先例为这部分尚有欠缺的知识赢得些许权威。我在每句箴言之后都有简短的评述，都是出于我个人的理解，且没有脱离原意，尽管我知道它们在其他领域还可以有更为神圣的用途。不过，即使是在神学领域，某些阐述或是著述比起其他阐释也更加精辟深刻，但要利用它们指导人们的生活，我们就需将它们一一分解，运用推导和例证等方式细加阐述，这必然又要耗费大量篇幅了。

(8) Neither was this in use only with the Hebrews, but it is generally to be found in the wisdom of the more ancient times; that as men found out any observation that they thought was good for life, they would gather it and express it in parable or aphorism or fable. But for fables, they were vicegerents and supplies where examples failed: now that the times abound with history, the aim is better when the mark is alive. And therefore the form of writing which of all others is fittest for this variable argument of

negotiation and occasions is that which Machiavel chose wisely and aptly for government; namely, discourse upon histories or examples. For knowledge drawn freshly and in our view out of particulars, knoweth the way best to particulars again. And it hath much greater life for practice when the discourse attendeth upon the example, than when the example attendeth upon the discourse. For this is no point of order, as it seemeth at first, but of substance. For when the example is the ground, being set down in a history at large, it is set down with all circumstances, which may sometimes control the discourse thereupon made, and sometimes supply it, as a very pattern for action; whereas the examples alleged for the discourse's sake are cited succinctly, and without particularity, and carry a servile aspect towards the discourse which they are brought in to make good.

（8）对格言的运用并不仅限于希伯来人，在远古时代，人们也用这种形式来承载智慧。当人们观察到对生活有益的现象时，就会将其加以汇集总结，并通过格言、警语或寓言等形式加以传达。不过，寓言只是在缺乏实例时的替代和补充。在当今时代，我们已经拥有悠远的历史，如果能运用一些鲜活的例证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马基雅弗利在谈论政权统治时采用借助历史或实例表达观点的形式。无疑，他的选择是非常明智而恰当的。而与其他表达形式相比，针对协商和场合这类变化多端的主题，这种形式也是最恰当的。因为从我们视野范围内新近的特定事件中获取的知识，最了解其他特定事件的发生进程。同时，如果我们用实例引发议论，而不是用论述来引出例子，这种方式能赋予实践以更大的生命力。或许从表面看来，问题出在先后顺序上，其实不然，真正的差异在于内容。如果以实例为根据，将其置于源远的历史长河之中，那么，我们同样确定了与其相关的整个环境。有时，人们可根据这些环境因素核实或者补充所阐发的议论，从而成为对行为有所助益的另一特定形式。如果只是为了引证论述，所列举的例子就会非常简略，并不包含特定因素。这样一来，

虽这些例证的本意在于补充议论，结果却只是被迫屈从于这些论述，而没有其他任何益处。

(9) But this difference is not amiss to be remembered, that as history of times is the best ground for discourse of government, such as Machiavel handleth, so histories of lives is the most popular for discourse of business, because it is more conversant in private actions. Nay, there is a ground of discourse for this purpose fitter than them both, which is discourse upon letters, such as are wise and weighty, as many are of Cicero ad Atticum, and others. For letters have a great and more particular representation of business than either chronicles or lives. Thus have we spoken both of the matter and form of this part of civil knowledge, touching negotiation, which we note to be deficient.

（9）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对于政治上的论述，时代历史是最有力的基础，就如马基雅弗利所运用的那样。但针对社会事务，个人历史是最流行的方式，因为个人历史通常与个人行为联系密切。不过，还有一种方式更适合论述人们的这些智慧，那就是书信。西塞罗与阿提喀斯的很多书信及其他人的书信往来中都有着重要的论述，充满着智慧的分量。这是因为，相较于年代记和人物传记，书信对事件的针对性更强，记述更为详实。我们提过，关于协商的这部分社会知识是存在缺陷的，现在我们已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了论述。

(10) But yet there is another part of this part, which differeth as much from that whereof we have spoken as sapere and sibi sapere, the one moving as it were to the circumference, the other to the centre. For there is a wisdom of counsel, and again there is a wisdom of pressing a man's own fortune; and they do sometimes

meet, and often sever. For many are wise in their own ways that are weak for government or counsel; like ants, which is a wise creature for itself, but very hurtful for the garden. This wisdom the Romans did take much knowledge of: *Nam pol sapiens* (saith the comical poet) *fingit fortunam sibi* ; and it grew to an adage, *Faber quisquefortunæ propriæ* ; and Livy attributed it to Cato the first, *In hoc viro tanta vis animi et ingenii inerat, ut quocunque loco natus esset sibi ipse fortunam facturus videretur* .

（10）在这一部分知识中，还存在另一类知识，这与我们之前讨论的完全不同。前面的一类知识我们可称为“智慧”与“自我着想的智慧”。一类是向外扩展的，一类是向内集中的。我们可以有出谋划策的智慧，同样也存在追求自身福利的智慧。有时，两者可以相辅相成，但更多时候是相互独立、互不相干的。许多人在处理自己的事务上精明强干，但在政治或商议方面却显得无勇无谋。这就像蚂蚁一样，它们本身非常聪明，但对花园而言，却是非常不利的。罗马人十分重视这类智慧，一位喜剧诗人就曾说，“为自己谋得幸福，这是明智的做法”。这句话逐渐演变成一句格言，即“每个人都是自身幸福的创造者”。李维也曾评价老加图说，“这人的心境和性情都是如此强大，无论他出生何地，都会成就非凡的命运。”

(11) This conceit or position, if it be too much declared and professed, hath been thought a thing impolitic and unlucky, as was observed in Timotheus the Athenian, who, having done many great services to the state in his government, and giving an account thereof to the people as the manner was, did conclude every particular with this clause, “And in this fortune had no part.” And it came so to pass, that he never prospered in anything he took in hand afterwards. For this is too high and too arrogant, savouring of that which Ezekiel saith of Pharaoh, *Dicis, Fluvius est neus et ego feci*

memet ipsum ; or of that which another prophet speaketh, that men offer sacrifices to their nets and snares; and that which the poet expresseth, "*Dextra mihi Deus, et telum quod missile libro, Nunc adsint* !" For these confidences were ever unhallowed, and unblessed; and, therefore, those that were great politiques indeed ever ascribed their successes to their felicity and not to their skill or virtue. For so Sylla surnamed himself Felix, not Magnus. So Cæsar said to the master of the ship, *Cæsarem portas et fortunam ejus.*

（11）这一观点如加以过度宣扬和夸大，便被认为是不明智而又不幸的。雅典人提谟修斯就是这样，他为国家尽心尽力，功绩卓著，也出于礼貌将这些成就归功于民众，不过，他在总结述职时，每每都以一句"这绝非凭借运气"来结束。结果，他再也没有建立什么功勋。这都是他的过分高傲和自负所导致的，与先知以西结记叙的法老所说的话一样，"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另一位先知也曾说过，人们只是向那些罗网与圈套贡献祭品。对此，诗人也表示："右手及长矛，便是我上帝。"这样的自信无疑是对神灵的亵渎，必将受到诅咒。因此，伟大的政治家始终将他们的功绩归因于幸运，而非自身的能力或美德。西拉称自己为"幸运的西拉"，而不是"伟大的西拉"。恺撒在一次渡河时，对船主说："你的船不仅载着恺撒，还载着恺撒的运气。"

(12) But yet, nevertheless, these positions, *Faber quisquefortunæ suæ: Sapiens dominabitur astris: Invia virtuti null est via* , and the like, being taken and used as spurs to industry, and not as stirrups to insolency, rather for resolution than for the presumption or outward declaration, have been ever thought sound and good; and are no question imprinted in the greatest minds, who are so sensible of this opinion as they can scarce contain it within. As we see in Augustus Cæsar (who was rather diverse from his uncle than inferior in

virtue), how when he died he desired his friends about him to give him a *plaudite* , as if he were conscious to himself that he had played his part well upon the stage. This part of knowledge we do report also as deficient; not but that it is practised too much, but it hath not been reduced to writing. And, therefore, lest it should seem to any that it is not comprehensible by axiom, it is requisite, as we did in the former, that we set down some heads or passages of it.

（12）至于类似于“每个人都是自身幸福的创造者”，“聪明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及“没有美德行不通的路”这样的观点，如果仅仅用来鞭策人们勤勉上进，而不是作为狂傲自大的借口，用来勉励人们坚定意志，而不是为放肆炫耀者推波助澜，这不失为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在很多伟人心中也有这样的状况，他们深深了解这种观点，以至于难以克制将其表达出来。奥古斯丁·恺撒（他的美德可以说不同于其叔父，但却不是不如他）曾希望，在他去世之后，他的朋友能为他欢呼喝彩，这似乎意味着他自觉在人生舞台上的表演非常满意。同样，我们认为这方面的知识是存有缺陷的，并不是说很少有人应用这部分知识，而是在于人们仍没有将其分析综合并记录下来。因此，为避免人们难以理解那些空泛的原则公理，我们有必要和之前那样，记下这部分知识的纲要。

(13) Wherein it may appear at the first a new and unwonted argument to teach men how to raise and make their fortune; a doctrine wherein every man perchance will be ready to yield himself a disciple, till he see the difficulty: for fortune layeth as heavy impositions as virtue; and it is as hard and severe a thing to be a true politique, as to be truly moral. But the handling hereof concerneth learning greatly, both in honour and in substance. In honour, because pragmatical men may not go away with an opinion

that learning is like a lark, that can mount and sing, and please herself, and nothing else; but may know that she holdeth as well of the hawk, that can soar aloft, and can also descend and strike upon the prey. In substance, because it is the perfect law of inquiry of truth, that nothing be in the globe of matter, which should not be likewise in the globe of crystal or form; that is, that there be not anything in being and action which should not be drawn and collected into contemplation and doctrine. Neither doth learning admire or esteem of this architecture of fortune otherwise than as of an inferior work, for no man's fortune can be an end worthy of his being, and many times the worthiest men do abandon their fortune willingly for better respects: but nevertheless fortune as an organ of virtue and merit deserveth the consideration.

（13）初看起来，教授人们提升和创造幸运的方式似乎是一个全新而罕见的论题。也许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样的教导自己就可以做到，但在困难面前，他们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其实，幸运与美德一样，向人们强加了不少负担。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政治家，就和做一名真正德行高尚的人一样，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无论在荣誉上还是实质上，对幸运的管理与学问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荣誉上，实用主义者或许会认为，学问如云雀一般，只会飞舞歌唱，自得其乐，别无他用。不过，如果有了幸运的陪伴，他们就会发现，学问同样可以成为一只猎鹰，可翱翔于天际，又可自天而降捕食猎物。从实质上讲，对真理的探求存在一种绝对法则，即物质世界中的一切都能在晶体或形式世界中得以呈现。也就是说，对于一切的存在和活动都能加以沉思，形成原理。同时，学问并未将这座称为幸运的建筑当成低劣的作品。没人将幸运作为人生目标，很多时候一些可敬可仰的人还自愿舍弃幸运来追求更有意义的事物。尽管如此，作为美德与成就的应用工具，幸运是值得我们进行探讨的。

(14) First, therefore, the precept which I conceive to be most summary towards the prevailing in fortune, is to obtain that window which Momus did require; who seeing in the frame of man's heart such angles and recesses, found fault there was not a window to look into them; that is, to procure good informations of particulars touching persons, their natures, their desires and ends, their customs and fashions, their helps and advantages, and whereby they chiefly stand, so again their weakness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where they lie most open and obnoxious, their friends, factions, dependences; and again their opposites, enviers, competitors, their moods and times, *Sola viri molles aditus et tempora noras* ; their principles, rules, and observations, and the like: and this not only of persons but of actions; what are on foot from time to time, and how they are conducted, favoured, opposed, and how they import, and the like. For the knowledge of present actions is not only material in itself, but without it also the knowledge of persons is very erroneous: for men change with the actions; and whilst they are in pursuit they are one, and when they return to their nature they are another. These informations of particulars, touching persons and actions, are as the minor propositions in every active syllogism; for no excellency of observations (which are as the major propositions) can suffice to ground a conclusion, if there be error and mistaking in the minors.

（14）首先我相信，希望获得幸运眷顾的最简易的方法就是求得莫摩斯所指示的那扇窗。莫摩斯看到人们内心架构的凹凸不平，就挑剔为何不开一扇能直视内心的窗户。也就是说，人们应通过这样的方法获取一切个人特定的详细信息，包括他们的性格、欲求与目标、习惯与风格、长处与优势（即安身立命之本）、弱点与劣势（即最易受伤害的地方），还有他们的朋友、派系、依赖的人，他们的敌对者、嫉妒者、竞争者，以及他们的情绪和时间安排（“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容易接近他的时间”），他们奉行的原则、标准和规范等等。我们不仅应了解个人的特性，还需了解他们的行为，清楚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做什么，又是怎么做的；受到了怎样的欢迎或者反对；他们这样做的效用是什么，等等。对人们当前行为的了解，不仅对明确行为本身非常重要，而且，没有这种了解，我们对个人特性的认识也会出现偏差。这是因为，人们通过行为会慢慢改变自己。当他们在从事某事时会表现出一个样子，而在他们恢复本性时，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这些关于个人与行为的详细信息，就如三段论中的小命题一般，如果这些小命题存在误差和过失，无论观察多细致（这就如同大命题），都不足以推理得出可靠的结论。

(15) That this knowledge is possible, Solomon is our surety, who saith, *Consilium in corde viri tanquam aqua profunda; sed vir prudens exhauriet illud* . And although the knowledge itself falleth not under precept because it is of individuals, yet the instructions for the obtaining of it may.

（15）这部分知识是可能被实现的，所罗门就可为我们作保。他说：“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惟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尽管这些知识关注的是单独个体，不能纳入统一的原理之中，不过，至于如何获取这类知识，我们还是可以给予统一的指导的。

(16) We will begin, therefore, with this precept,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opinion, that the sinews of wisdom are slowness of belief and distrust; that more trust be given to countenances and deeds than to words; and in words rather to sudden passages and surprised words than to set and purposed words. Neither let that be feared which is said, *Fronti nulla fides* , which is meant of a general outward behaviour, and not of the private and subtle motions and

labours of the countenance and gesture; which, as Q. Cicero elegantly saith, is *Animi janua* , “the gate of the mind.” None more close than Tiberius, and yet Tacitus saith of Gallus, *Etenim vultu offensionem conjectaverat* . So again, noting the differing character and manner of his commending Germanicus and Drusus in the Senate, he saith, touching his fashion wherein he carried his speech of Germanicus, thus: *Magis in speciem adornatis verbis, quam ut penitus sentire crederetur* ; but of Drusus thus: *Paucioribus sed intentior, et fida oratione* ; and in another place, speaking of his character of speech when he did anything that was gracious and popular, he saith, “That in other things he was *velut eluctantium verborum* ;” but then again, *solutius loquebatur quando subveniret* . So that there is no such artificer of dissimulation, nor no such commanded countenance (*vultus jussus*), that can sever from a feigned tale some of these fashions, either a more slight and careless fashion, or more set and formal, or more tedious and wandering, or coming from a man more drily and hardly.

（16）我们就从古人的一条训诫开始我们的讨论。古人曾说，智慧的力量源自不急于相信与怀疑。这是在告诫人们，比起言辞，更应该相信人的表情和行为；而比起有准备有计划的言辞，更应相信即兴的、意料之外的言辞。虽然有人说“不可相信面孔”，不过，这是针对一般的外部行为而言的，并不适用于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隐约微妙的变动，因此我们不必担心。昆图斯·西塞罗赋予了这种变动一个雅致的名称，叫做“心之门”。提比略可谓比任何人都谨小慎微，不动声色，不过，塔西陀在谈到高卢人时说道，“我看到了提比略不快的神情。”同时，塔西陀还注意到，提比略在元老院称赞格马尼库斯和德鲁苏斯时，其神色和言语风格也是完全不同的。提及提比略称赞格马尼库斯时，塔西陀说道，“他的言语用词华丽，以此表达内心情感”。在提到提比略称赞德鲁苏斯时，塔西陀则说，“他言语不多，却真诚可靠。”在另一处，塔西陀又提到提比略在从事一切受人欢迎的慈善

活动时的言语风格，他说，“从事其他事情时，他便支支吾吾了。”因此可以说，没有所谓的掩饰能手，或是可控的表情，可以在捏造谎言时不露半点破绽，这种破绽可能是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僵硬拘谨的表达，不切正题的乏味陈词，又或是说话者淡漠严厉的态度等。

(17) Neither are deeds such assured pledges as that they may be trusted without a judicious consideration of their magnitude and nature: *Fraus sibi in parvis fidem præstruit ut majore emolumento fallat* ; and the Italian thinketh himself upon the point to be bought and sold, when he is better used than he was wont to be without manifest cause. For small favours, they do but lull men to sleep, both as to caution and as to industry; and are, as Demosthenes calleth them, *Alimenta socordiæ* . So again we see how false the nature of some deeds are, in that particular which Mutianus practised upon Antonius Primus, upon that hollow and unfaithful reconcilement which was made between them; whereupon Mutianus advanced many of the friends of Antonius, *Simul amicis ejusprœfecturas et tribunatus largitur* : wherein, under pretence to strengthen him, he did desolate him, and won from him his dependents.

（17）人们的行为也并非可靠的保障，因为人们会在没有审慎思考其重要程度和本质的情况下就轻易地相信它们。古人就曾说，“骗子只有在小事上哄得人们的信任，才能实施更大的骗局”。对于意大利人，如果他们在没有鲜明理由的情况下受到非比寻常的礼遇，他们就会担心自己是否会被出卖。类似这些的小恩小惠，只不过是哄人入睡的安眠曲，使人放松警惕，怠于勤奋。狄摩西尼就称其为“懒人的食物”。由此我们看到，一些行为的本质是多么虚伪。穆齐安努斯对待安东尼·普里穆斯的行为更是如此。他表面与安东尼达成和解，还提拔他的朋友担任提督和保民官，不过，就在这层看似扩大安东尼势力

的伪装之下，穆齐安努斯实则通过讨好收买他的随从，使他最终孤立无援。

(18) As for words, though they be like waters to physicians, full of flattery and uncertainty, yet they are not to be despised specially with the advantage of passion and affection. For so we see Tiberius, upon a stinging and incensing speech of Agrippina, came a step forth of his dissimulation when he said, “You are hurt because you do not reign;” of which Tacitus saith, *Audita hæc raram occulti pectoris vocem elicuere: correptamque Græco versu admonuit, ideo lædi quia non regnaret* . And, therefore, the poet doth elegantly call passions tortures that urge men to confess their secrets:“*Vino torus et ira* .” And experience showeth there are few men so true to themselves and so settled but that, sometimes upon heat, sometimes upon bravery, sometimes upon kindness, sometimes upon trouble of mind and weakness, they open themselves; specially if they be put to it with a counter-dissim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overb of Spain, *Di mentira, y sacar as verdad* : “Tell a lie and find a truth.”

（18）至于言辞，尽管就像医师眼中的体液一样，充满恭维奉承和不确定性，但我们却无法轻视它们，特别不可轻视那些在高昂情绪影响下迸发的言辞。在听到阿格丽品娜尖锐的讽刺时，提比略便褪去了平日的伪装，进行了尖刻的反击。对此，塔西陀这样记述道：“听到这些话，他的内心迸出一句不寻常的话来，就用一句希腊诗句警告她，‘当不成王后你当然觉得痛心’。”诗人就把这种激情称为“折磨”，这是这种“折磨”促使人们坦承内心的秘密。他说：“受到酒和怒气的折磨”。人们的经验表明，几乎没人可以做到完全忠于自我，沉稳坚定。有时候，他们会受情绪支配，又或勇气爆发，或善心激励，或头脑发昏，从而将自己的本性展露无遗。尤其在他们的伪装被人识破时，他们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正如西班牙的一句谚语所言，“说一

个谎，寻得一个真相。”

(19) As for the knowing of men which is at second hand from reports: men's weaknesses and faults are best known from their enemies, their virtues and abilities from their friends, their customs and times from their servants, their conceits and opinions from their familiar friends, with whom they discourse most. General fame is light, and the opinions conceived by superiors or equals are deceitful; for to such men are more masked: *Verior fama e domesticis emanat* .

（19）如想通过他人评论间接地去了解一个人，我们可以从他的对手那里全面了解他的弱点和过失，从他的朋友那里充分认识他的美德与才能，从他的仆从那里知晓他的习惯与活动安排，从他的密友，也就是那些交谈甚密的人那里得知他的想法与观念。普遍的传闻可信度不高，长者或同辈人的观点也有虚伪的成分，因为他们的伪装功力更加深厚，因此，“较真实的报告来自奴仆”。

(20) But the soundest disclosing and expounding of men is by their natures and ends, wherein the weakest sort of men are best interpreted by their natures, and the wisest by their ends. For it was both pleasantly and wisely said (though I think very untruly) by a nuncio of the Pope, returning from a certain nation where he served as lidger; whose opinion being asked touching the appointment of one to go in his place, he wished that in any case they did not send one that was too wise; because no very wise man would ever imagine what they in that country were like to do. And certainly it is an error frequent for men to shoot over, and to suppose deeper ends and more compass reaches than are: the Italian proverb being

elegant, and for the most part true:“*Di danari, di senno, e di fede, C'ène manco che non credi* .” “There is commonly less money, less wisdom, and less good faith than men do account upon.”

（20）不过，最能展现人们真实的一面的途径在其本性和目标。人们应该通过观察其性格了解软弱的人，而要了解那些聪明的人应该观察其目标。一位罗马教廷大使在出任某国使节期满回国时，被问及谁可以继任他的职位，他的回答得非常和善也非常明智（尽管我认为非常不合常理），他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要指派太过聪明的人去，因为在那个国度，聪明人是猜不透他们想要做什么的。当然，人们往往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过高，预期的结果更遥远，期间的进程更艰巨，这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错误。一句意大利谚语就在很大程度上精彩地呈现了这种情形：“人们的金钱、智慧和善意往往比人们预想的少。”

(21) But princes, upon a far other reason, are best interpreted by their natures, and private persons by their ends. For princes being at the top of human desires, they have for the most part no particular ends whereto they aspire, by distance from which a man might take measure and scale of the rest of their actions and desires; which is one of the causes that maketh their hearts more inscrutable. Neither is it sufficient to inform ourselves in men's ends and natures of the variety of them only, but also of the predominancy, what humour reigneth most, and what end is principally sought. For so we see, when Tigellinus saw himself outstripped by Petronius Turpilianus in Nero's humours of pleasures, *metus ejus rimatur* , he wrought upon Nero's fears, whereby he broke the other's neck.

（21）不过，根据其他截然不同的缘由，要了解君王我们需看他

们的本性，要了解个人则应该观察他们的目标。因为君王已经达到人类欲求的顶端，通常已无需渴求其他任何目标，也就不必根据目标的遥远程度确定与衡量其他行为和欲求，这也成为了君王内心神秘莫测的一大原因。仅仅了解人们目标和本性的类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清楚这些类型中那些是占主导的，明确哪种性情占据优势，哪个目标最为重要。尼禄贪图享乐，当提格利努斯注意到佩特罗尼乌斯·图尔比亚鲁斯奉承得尼禄龙颜大悦，占尽上风时，他便设下阴谋刺激并利用尼禄的恐惧心理，从而成功扭断了佩特罗尼乌斯的脖子。

(22) But to all this part of inquiry the most compendious way resteth in three things; the first, to have general acquaintance and inwardness with those which have general acquaintance and look most into the world; and specially according to the diversity of business, and the diversity of persons, to have privacy and conversation with some one friend at least which is perfect and well-intelligenced in every several kind. The second is to keep a good mediocrity in liberty of speech and secrecy; in most things liberty; secrecy where it importeth; for liberty of speech inviteth and provoketh liberty to be used again, and so bringeth much to a man's knowledge; and secrecy on the other side induceth trust and inwardness. The last is the reducing of a man's self to this watchful and serene habit, as to make account and purpose, in every conference and action, as well to observe as to act. For as Epictetus would have a philosopher in every particular action to say to himself, *Et hoc volo, et etiam institutum servare* ; so a politic man in everything should say to himself, *Et hoc volo, ac etiam aliquid addiscere* . I have stayed the longer upon this precept of obtaining good information because it is a main part by itself, which answereth to all the rest. But, above all things, caution must be taken that men have a good stay and hold of themselves, and that this much knowing do not draw on much meddling; for nothing is

more unfortunate than light and rash intermeddling in many matters. So that this variety of knowledge tendeth in conclusion but only to this, to make a better and freer choice of those actions which may concern us, and to conduct them with the less error and the more dexterity.

（22）为研究这部分知识，主要有三种最为简明的方式。其一，广泛结交和熟悉见多识广、深谙世故的人。特别对于每个领域，每个类型的人群，我们至少要与其中一些精明老练的人结下私交，能够畅聊。其二，在吐露和保守秘密方面要做到张弛有度。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尽情谈论，但某些事却需三缄其口。这是因为，坦诚的言辞可以赢得对方的坦诚相待，从而了解到更多知识。而对一些事的缄默不语又可加强他人的信任，增添彼此间亲密度。最后，培养谨慎稳重的习惯，从而在言谈举止上，既能析微察异，又做到落落大方，继而从中获益，实现目标。爱比克泰德表示，所有哲学家在从事任一特定的行为时，都应对自己说，“我希望做这件事，但同时也希望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样，一个精明的人在做每件事时，也应对自己说，“我希望做这件事，但同时也希望学到新的东西”。对获取充分有利的信息这一部分，我们谈论的似乎更加详细，这是因为其主体部分与其他所有部分都能相互呼应。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警惕，要坚定内心，维持平和，不要对他人生活横加干涉，没有比经常鲁莽草率干预他人事务更为尴尬的事了。这部分知识式样繁多，涉及面广，不过最终目标都归于一点，即辅助我们在与自身相关的行为中作出更加自主而有效的选择，并在行为过程中少一点失误，多一份熟练。

(23) The second precept concerning this knowledge is, for men to take good information touching their own person, and well to understand themselves; knowing that, as St. James saith, though men look oft in a glass, yet they do suddenly forget themselves; wherein as the divine glass is the Word of God, so the politic glass

is the state of the world, or times wherein we live, in the which we are to behold ourselves.

（23）圣詹姆斯曾说，人们虽时常从镜中看到自己，有时却仍会突然忘记自己的模样。因此，这部分知识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人们应该对自身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可以将上帝的言语作为一面神圣的镜子，而将世间的情态或是我们生活的年代作为另一面世俗的镜子，我们就是用这面镜子来观察自身。

(24) For men ought to take an impartial view of their own abilities and virtues; and again of their wants and impediments; accounting these with the most, and those other with the least; and from this view and examination to frame the considerations following.

（24）对于自身的才能和美德，以及弱点和缺陷，人们应积极予以正视，要做到不偏不倚。对于自己的长处人们不应自夸，但对于自己的弱点也不应轻视。通过这些观察和检验，我们就可以考虑以下几点问题了。

(25) First, to consider how the constitution of their nature sorteth with the general state of the times; which if they find agreeable and fit, then in all things to give themselves more scope and liberty; but if differing and dissonant, then in the whole course of their life to be more close retired, and reserved; as we see in Tiberius, who was never seen at a play, and came not into the senate in twelve of his last years; whereas Augustus Cæsar lived ever in men's eyes, which Tacitus observeth, *alia Tiberio morum via* .

（25）第一，思考自身的性格构成是否与当下的一般情形保持一致。如果两者非常相符，那么做任何事时都可自由发挥；如果两者存在差异，人们在一生之中都应隐逸缄默，有所保留。在提比略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一点。人们从没见过他开玩笑，在他执政的最后12年，也从没进过元老院。而奥古斯丁·恺撒却总在人们的视线之内。对此塔西陀说道，“提比略的生活方式总是不一样。”

(26) Secondly, to consider how their nature sorteth with professions and courses of life, and accordingly to make election, if they be free; and, if engaged, to make the departure at the first opportunity; as we see was done by Duke Valentine, that was designed by his father to a sacerdotal profession, but quitted it soon after in regard of his parts and inclination; being such, nevertheless, as a man cannot tell well whether they were worse for a prince or for a priest.

（26）第二，思考自身的性格是否与相关职业和道路保持一致。如果还有选择的余地，便可据此进行重新调整；如果已经参与其中，一有机会就该选择离开。瓦伦丁公爵就是这样做的。他按照父亲的意愿从事神职工作，当他发现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这一工作时，很快便放弃了。不过，虽然如此，人们还是无法判断他的性格是更不适合做君王还是牧师。

(27) Thirdly, to consider how they sort with those whom they are like to have competitors and concurrents; and to take that course wherein there is most solitude, and themselves like to be most eminent; as Cæsar Julius did, who at first was an orator or pleader; but when he saw the excellency of Cicero, Hortensius,

Catulus, and others for eloquence, and saw there was no man of reputation for the wars but Pompeius, upon whom the state was forced to rely, he forsook his course begun towards a civil and popular greatness, and transferred his designs to a martial greatness.

（27）第三，思考自己是否与自己的竞争对手相当，并据此选择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也是最容易让自己出类拔萃的道路。恺撒大帝最初只是一名演说家或辩论者，但他看到，诸如西塞罗、霍尔腾西乌斯、卡图卢斯等很多人拥有精湛的雄辩才能，而在军事上，除了庞培，便没人拥有显赫声望，也没人再可称为国家不可或缺的栋梁之才。于是，他摒弃了原先希望称为社会大众之中的伟人的目标，转而追求军事上的盛名。

(28) Fourthly, in the choice of their friends and dependents, to proceed according to 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own nature; as we may see in Cæsar, all whose friends and followers were men active and effectual, but not solemn, or of reputation.

（28）第四，要根据自身的特性选择合适的友人和随从。我们看到，恺撒的所有朋友和部下或许并不是庄重严肃或是声名显著的，但他们都是积极活跃且各有所长的。

(29) Fifthly, to take special heed how they guide themselves by examples, in thinking they can do as they see others do; whereas perhaps their natures and carriages are far differing. In which error it seemeth Pompey was, of whom Cicero saith that he was wont often to say, *Sylla potuit, ego non potero* ?Wherein he was much

abused, the natures and proceedings of himself and his example being the unlikest in the world; the one being fierce, violent, and pressing the fact; the other solemn, and full of majesty and circumstance, and therefore the less effectual. But this precept touching the politic knowledge of ourselves hath many other branches, whereupon we cannot insist.

（29）第五，在仿效典范时，要特别小心谨慎，不能认为别人能做的事自己一定能做到，或许自己的天性和行为和那些典范是天差地别的。庞培似乎就犯过这样的错误。西塞罗曾说，庞培经常念叨着，“西拉能做，难道我就不能吗？”事实上，这一想法是非常虚妄的，因为他的天性和行为与他的仿效对象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乖张暴戾、强人所难；一个庄重沉稳、威严凛然，也因此成功较慢。不过，个人的处世策略和原则还有很多分支，我们不可能一一考虑周全。

(30) Next to the well understanding and discerning of a man's self, there followeth the well opening and revealing a man's self; wherein we see nothing more usual than for the more able man to make the less show. For there is a great advantage in the well setting forth of a man's virtues, fortunes, merits; and again, in the artificial covering of a man's weaknesses, defects, disgraces; staying upon the one, sliding from the other; cherishing the one by circumstances, gracing the other by exposition, and the like. Wherein we see what Tacitus saith of Mutianus, who was the greatest politique of his time, *Omnium quæ dixerat feceratque arte quadam ostentator* , which requireth indeed some art, lest it turn tedious and arrogant; but yet so, as ostentation (though it be to the first degree of vanity) seemeth to me rather a vice in manners than in policy; for as it is said, *Audacter calumniare, semper aliquid hæret* ; so, except it be in a ridiculous degree of deformity, *Audacter te*

vendita, semper aluquid hæret . For it will stick with the more ignorant and inferior sort of men, though men of wisdom and rank do smile at it and despise it; and yet the authority won with many doth countervail the disdain of a few. But if it be carried with decency and government, as with a natural, pleasant, and ingenious fashion; or at times when it is mixed with some peril and unsafety (as in military persons); or at times when others are most envied; or with easy and careless passage to it and from it, without dwelling too long, or being too serious; or with an equal freedom of taxing a man's self, as well as gracing himself; or by occasion of repelling or putting down others' injury or insolency; it doth greatly add to reputation: and surely not a few solid natures, that want this ventosity and cannot sail in the height of the winds, are not without some prejudice and disadvantage by their moderation.

（30）在人们清晰地认识自身之后，紧接着就应思考如何更好地展现自己。这方面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能力越强的人越不愿展示自己。如果人们能全面展现自己的美德、幸运和功绩，悉心掩盖自己的弱点、缺陷和耻辱，多多展示美好的一面，少显露自己的缺点，对自己的长处要详加叙述，尽量避开不利的一面，并多加粉饰，这是大有裨益的。塔西陀在评论穆齐安努斯这位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时写道，“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显得非常巧妙”。这的确需要一定的技巧，以避免单调乏味和妄自尊大。但就我看来，这种卖弄虚饰（尽管这已是虚荣的开端）只是行为上的一种缺陷，而非策略上的失误。有这样一种说法，“肆意谩骂，必能留存些许印象”。因此，若非荒唐到极致的话语，那就“勇敢地赞美自己，总能留存些许印象”。对于这样的自我赞美，尽管那些位睿智博才、高权重之人只会付之一笑，不当一回事，但对于那些较为愚昧、地位低下的人，确实具有一定的效用。一旦在大多数人中树立威信，少数人的轻蔑也就无足轻重了。如果人们在自我赞美时，能温和自恃，以一种自然宜人、精心巧妙的方式呈现出来；有时将这种赞美融入一些危险事件之中（比如军人就常

这样做）；有时在他人遭人妒忌时赞美自己；有时在称赞前后添加一些漫不经心的话语，不能太长，也不能太严肃；有时则可在美化自己的同时，适当责备自己的不是；有时还可以在抵制他人的诋毁和无礼时，多加赞美自己，这些做法对于提升自己的美名都是有卓著成效的。当然，还有很多人生性刻板，缺乏自我夸耀的能力，无法乘风破浪，奋勇向前，这种温和中庸的性格终将为他们带来一些伤害和损失。

(31) But for these flourishes and enhancements of virtue, as they are not perchance unnecessary, so it is at least necessary that virtue be not disvalued and imbased under the just price, which is done in three manners—by offering and obtruding a man's self, wherein men think he is rewarded when he is accepted; by doing too much, which will not give that which is well done leave to settle, and in the end induceth satiety; and by finding too soon the fruit of a man's virtue, in commendation, applause, honour, favour; wherein if a man be pleased with a little, let him hear what is truly said: *Cave ne insuetus rebus majoribus videaris, si hæc te res parva sicuti magna delectat* .

（31）这种装饰和增进美德的方法，或许并不是完全没必要的，至少为了美德不被贬低或轻视，从而使其失去合理的评价，我们就须用到这种方法来维护美德应有的价值。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通常采用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毛遂自荐，这样一来，人们会觉得只有接受你才是对你最好的奖赏；第二种是做很多事，但这并不能给人以处事迅捷有效的感觉，反而容易让人产生厌腻感；第三种是过早获得自身美德的成果，比如赞赏、掌声、荣誉、厚爱等。如果人们对只得到一丁点收获就感到心满意足，就来看看这句真切的话语，“不要因为一些小事情就欢天喜地，好像没见过大场面似的。”

(32) But the covering of defects is of no less importance than the valuing of good parts; which may be done likewise in three manners—by caution, by colour, and by confidence. Caution is when men do ingeniously and discreetly avoid to be put into those things for which they are not proper; whereas contrariwise bold and unquiet spirits will thrust themselves into matters without difference, and so publish and proclaim all their wants. Colour is when men make a way for themselves to have a construction made of their faults or wants, as proceeding from a better cause or intended for some other purpose. For of the one it is well said," *Sæpe latet vitium proximitate boni* ," and therefore whatsoever want a man hath, he must see that he pretend the virtue that shadoweth it; as if he be dull, he must affect gravity; if a coward, mildness; and so the rest. For the second, a man must frame some probable cause why he should not do his best, and why he should dissemble his abilities; and for that purpose must use to dissemble those abilities which are notorious in him, to give colour that his true wants are but industries and dissimulations. For confidence, it is the last but the surest remedy—namely, to depress and seem to despise whatsoever a man cannot attain; observing the good principle of the merchants, who endeavour to raise the price of their own commodities, and to beat down the price of others. But there is a confidence that passeth this other, which is to face out a man's own defects, in seeming to conceive that he is best in those things wherein he is failing; and, to help that again, to seem on the other side that he hath least opinion of himself in those things wherein he is best: like as we shall see it commonly in poets, that if they show their verses, and you except to any, they will say, "That that line cost them more labour than any of the rest;" and presently will seem to disable and suspect rather some other line, which they know well enough to be the best in the number. But above all, in this righting and helping of a man's self in his own carriage, he

must take heed he show not himself dismantled and exposed to scorn and injury, by too much dulceness, goodness, and facility of nature; but show some sparkles of liberty, spirit, and edge. Which kind of fortified carriage, with a ready rescussing of a man's self from scorns, is sometimes of necessity imposed upon men by somewhat in their person or fortune; but it ever succeedeth with good felicity.

（32）掩饰自身的缺陷与珍视优点同等重要，也可以分为三种方式，一为谨慎，二为粉饰，三为自信。谨慎就是小心巧妙地避开一些不适合从事的事情。不能像那些鲁莽而又不安分的人一样，横冲直撞，搅入一切事务，结果就将自己所有的缺陷都昭然若揭。粉饰就是设法为自己的缺陷和过失寻找辩解的理由，可以说是出于更好的动机，或是预期达到其他目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关于动机，诗人说得好："恶以德为邻，潜伏于其荫。"无论人们存在何种缺陷，都应该当其处于美德遮荫之下，可以用美德加以掩盖。因此，愚钝的人就该佯装严肃，怯懦的人应该假装淡定，等等。对于这第二种方式，人们必须构想出一些可信的理由，用来解释为何自己没有竭尽全力，又为何要掩饰自己的才能。为增加可信度，他必须真正掩饰自己身上尽人皆知的一些才能，从而误导人们确信他那些不足其实是一种掩饰和伪装。自信是最后一种方式，但它的补救功效无疑是最为管用的。也就是说，如果无法获得，那就全盘贬抑，使人说服自己根本瞧不上眼。商家就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方式，他们为了抬高自己商品的价格，便极力贬低他人的商品。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自信，即直面自己的缺陷，无耻地将这种不足看成是自己的长处似的。为了加强这种效果，他们还将自己真正的优势不当一回事。在诗人的身上，我们经常见到这种现象。如果他们向你展示自己的作品，你对其中任何一行提出异议，他们就会说，"这行诗花费的精力是最多的。"当即他们就会故意指摘起其他诗句，而心里却十分清楚，那些诗句是整个诗篇中最完美的。不过，最重要的是，人们在对自身行为进行补救时，必须留神，不能过分优雅、善良、温顺，给予人们奚落和伤害的机会；反之，他

们应该焕发出一些独立、魄力和锋利的光芒。对于一些因个人或运气问题造成的缺陷，人们不得不采用这种强化自身的方式，以避免他人的轻蔑对待。如果运用得当，这总能成功。

(33) Another precept of this knowledge is by all possible endeavour to frame the mind to be pliant and obedient to occasion; for nothing hindereth men's fortunes so much as this: *Idem manebat, neque idem decebat* —men are where they were, when occasions turn: and therefore to Cato, whom Livy maketh such an architect of fortune, he addeth that he had *versatile ingenium* . And thereof it cometh that these grave solemn wits, which must be like themselves and cannot make departures, have more dignity than felicity. But in some it is nature to be somewhat vicious and enwrapped, and not easy to turn. In some it is a conceit that is almost a nature, which is, that men can hardly make themselves believe that they ought to change their course, when they have found good by it in former experience. For Machiavel noted wisely how Fabius Maximus would have been temporising still, according to his old bias, when the nature of the war was altered and required hot pursuit. In some other it is want of point and penetration in their judgment, that they do not discern when things have a period, but come in too late after the occasion; as Demosthenes compareth the people of Athens to country fellows, when they play in a fence school, that if they have a blow, then they remove their weapon to that ward, and not before. In some other it is a lothness to lose labours passed, and a conceit that they can bring about occasions to their ply; and yet in the end, when they see no other remedy, then they come to it with disadvantage; as Tarquinius, that gave for the third part of Sibylla's books the treble price, when he might at first have had all three for the simple. But from whatsoever root or cause this restiveness of mind proceedeth, it is a thing most prejudicial; and nothing is more

politic than to make the wheels of our mind concentric and voluble with the wheels of fortune.

（33）这类知识还有另一个原则，即尽一切可能调节自身心理，使其适应顺从各种环境。人类幸福的最大妨碍就是“不同场合仍保持一成不变”，即环境不断改变，人们却仍千篇一律，不知变动。于是，就有李维将加图刻画成“幸运的缔造者”，又说他是“适应力极强的全才”。有些才子庄重严肃，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行事，固步自封，不作丝毫变动，这样的人虽显端庄威严，却失百样玲珑。有些人则是生性恶劣顽固，不懂变通。还有一些人持有一种缪想，认为人们根本无需说服自己去改变行为，因为在过往经验中，同样的做法都产生了良好的结果。这种想法几乎成了他们的天性。马基雅弗利就曾精明地指出，费比乌斯·马克西姆斯在战争形势大变，急需强烈追击时，仍偏执己见，因循守旧，按兵不动。另一些人由于本身缺乏深邃敏锐的判断力，常常无法及时察觉事情的转变，后知后觉，为时已晚。雅典人在练习击剑时，总是在受到对方击打时才知道运用佩剑自我防守，却不懂得事先防备。于是，狄摩西尼就将雅典人比作乡下人。还有些人，他们不愿浪费先前付出的精力，又自负地认为事情可以朝着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结果却事与愿违，补救无益，不得不接受由此造成的损失。塔奎尼乌斯本可轻而易举买到女巫西比拉提供的所有书卷，却一意孤行，结果却用三倍价钱买到其中的三分之一。对于这种固步自封的心理，无论其根源或缘由是什么，都具有极大的损害作用。我们应令自身的心理转盘与幸运转盘同轴旋转，协调流利，这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34) Another precept of this knowledge, which hath some affinity with that we last spoke of, but with difference, is that which is well expressed, *Fatis accede deisque* , that men do not only turn with the occasions, but also run with the occasions, and not strain their credit or strength to over-hard or extreme points; but choose

in their actions that which is most passable: for this will preserve men from foil, not occupy them too much about one matter, win opinion of moderation, please the most, and make a show of a perpetual felicity in all they undertake: which cannot but mightily increase reputation.

（34）还有另一个原则，与上文所提的最后一个原则有一定关联，但也存在差别。这一原则就是，人们应“屈从命运和神灵”。人们不但要根据时机作出调整，更要懂得利用时机，不能将自身的信誉和精力尽数用于极端艰难的事情之上，而应选择最可行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不致碌碌无功，而又避免过分专注于同一事情，这样能留于人温和适度的印象，从而赢得大众的肯定，并透露出自己做任何事都有好运相伴，由此便能声名大噪。

(35) Another part of this knowledge seemeth to have some repugnancy with the former two, but not as I understand it; and it is that which Demosthenes uttereth in high terms: *Et quemadmodum receptum est, ut exercitum ducat imperator, sic et a cordatis viris res ipsœ ducendœ; ut quœipsis videntur, ea gerantur, et non ipsi eventus persequi cogantur* . For if we observe we shall find two differing kinds of sufficiency in managing of business: some can make use of occasions aptly and dexterously, but plot little; some can urge and pursue their own plots well, but cannot accommodate nor take in; either of which is very imperfect without the other.

（35）这类知识还包括另一部分内容，这些内容看似与前面两部分稍有出入，但据我理解并非如此。狄摩西尼就曾高度推崇这一点，他说道：“聪明人统筹事情就如将军指挥军队，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实施这些事，而不是随着事情团团转。”如果细心观察，我们就能发

现，妥善处理事务需要两种不同的能力。一些人懂得恰当巧妙地利用时机，却缺少精心的谋略；一些人积极追求和执行自己的谋划，却不懂适应和吸收外在因素。这两种能力是缺一不可的。

(36) Another part of this knowledge is the observing a good mediocrity in the declaring or not declaring a man's self: for although depth of secrecy, and making way (*qualis est via navis in mari* , which the French calleth sourdes menées, when men set things in work without opening themselves at all), be sometimes both prosperous and admirable; yet many times *dissimulatio errores parit, qui dissimulatorem ipsum illaqueant* . And therefore we see the greatest politiques have in a natural and free manner professed their desires, rather than been reserved and disguised in them. For so we see that Lucius Sylla made a kind of profession, “that he wished all men happy or unhappy, as they stood his friends or enemies.” So Cæsar, when he went first into Gaul, made no scruple to profess “that he had rather be first in a village than second at Rome.” So again, as soon as he had begun the war, we see what Cicero saith of him, Alter (meaning of Cæsar) *non recusat, sed quodammodo postulat, ut (ut est) sic appelletur tyrannus* . So we may see in a letter of Cicero to Atticus, that Augustus Cæsar, in his very entrance into affairs, when he was a darling of the senate, yet in his harangues to the people would swear, *Ita parentis honores consequi liceat* (which was no less than the tyranny), save that, to help it, he would stretch forth his hand towards a statue of Cæsar's that was erected in the place: and men laughed and wondered, and said, “Is it possible?” or, “Did you ever hear the like?” and yet thought he meant no hurt; he did it so handsomely and ingenuously. And all these were prosperous: whereas Pompey, who tended to the same ends, but in a more dark and dissembling manner as Tacitus saith of him, *Occultior non melior* , wherein Sallust concurreth, *Ore probo,*

animo inverecundo , made it his design, by infinite secret engines, to cast the state into an absolute anarchy and confusion, that the state might cast itself into his arms for necessity and protection, and so the sovereign power be put upon him, and he never seen in it: and when he had brought it (as he thought) to that point when he was chosen consul alone, as never any was, yet he could make no great matter of it, because men understood him not; but was fain in the end to go the beaten track of getting arms into his hands, by colour of the doubt of Cæsar's designs: so tedious, casual, and unfortunate are these deep dissimulations: whereof it seemeth Tacitus made this judgment, that they were a cunning of an inferior form in regard of true policy; attributing the one to Augustus, the other to Tiberius; where, speaking of Livia, he saith, *Et cum artibus mariti simulatione filii bene compostia* : for surely the continual habit of dissimulation is but a weak and sluggish cunning, and not greatly politic.

（36）还有一个原则，即人们在是否展现本性的问题上应持中庸态度。尽管深藏不露，隐秘行事（就如海中小舟若隐若现，法国人称其为秘密谋划，意即人们从事某些事情，却并不完全展露自己）有时效果非凡，值得赞美，但很多时候，虚伪容易造成过失，唯欺瞒者自食恶果。因此，那些伟大的政治家总能以一种自然直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欲望，从不选择沉默或掩饰。卢修斯·西拉就是这样，他曾声称，“我希望我的朋友都获得幸福，我的敌人只能迎来不幸。”恺撒第一次踏足高卢时，也肆无忌惮地宣称，“我宁愿在乡村做第一，也不愿在罗马成第二。”后来，在恺撒开始征战之后，西塞罗这样描述他，“那人不仅不反对，在某种意义上还希望人们如实称呼他为专制君王”。西塞罗在写给阿提库斯的书信中提到，奥古斯丁·恺撒初涉政坛时，元老院对其倍加宠爱，但他却在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中宣誓，“希望得到父亲那样的荣耀（这无异于成为专制君王）”。为加以辩释，他便手指广场上那尊恺撒的塑像，于是民众都大笑起来，并诧异道，“这可能吗？”“你有听到过类似的事吗？”不过，人们都认为奥

古斯丁无心令他们受到伤害。由此我们看到，奥古斯丁在表达自己的欲望时是多么巧妙和坦率。所有这些人最终都取得了成功。然而，庞培虽有同样的追求，却采用了更加阴暗和虚饰的方式，正如塔西陀所说的，“更加矜持，性情乖戾”。对此说法，塞勒斯特也表示赞同，认为庞培“口蜜腹剑”。庞培就是运用这种隐秘方式，密谋将国家置于无尽的混乱与骚动之中，令国家不得不向他寻求保护，交付大权于其手中。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从不曾露面。结果他得偿所愿，当选全国唯一的执政官，这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他却并没有就此大展宏图，因为人们根本猜不透他的心思。最后，他只能悻悻而返，在恺撒图谋不轨的幌子下，再次把握军权。这些深度的伪装是多么腻烦，多么随意而荒唐，又是多么地不幸。对此，塔西陀似乎曾这样判断道，相较于坦率的策略，这无疑是一种低劣狡诈的奸计。奥古斯丁是前者的典范，而提比略就是后者的代表。对于利维娅，塔西陀曾写道，“她不仅像她儿子一样虚伪，还像她丈夫一样有手段。”但说实话，长期保持一种虚伪的态度只是一种脆弱懒散的伎俩，算不上一种大智慧。

(37) Another precept of this architecture of fortune is to accustom our minds to judge of the proportion or value of things, as they conduce and are material to our particular ends; and that to do substantially and not superficially. For we shall find the logical part (as I may term it) of some men's minds good, but the mathematical part erroneous; that is, they can well judge of consequences, but not of proportions and comparison, preferring things of show and sense before things of substance and effect. So some fall in love with access to princes, others with popular fame and applause, supposing they are things of great purchase, when in many cases they are but matters of envy, peril, and impediment. So some measure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labour and difficulty or assiduity which are spent about them; and think, if they be ever moving, that they must needs advance and proceed; as Cæsar saith in a despising manner of Cato the second, when he describeth how laborious and indefatigable he

was to no great purpose,*Hæc omnia magno studio agebat* . So in most things men are ready to abuse themselves in thinking the greatest means to be best, when it should be the fittest.

（37）在幸运这座建筑之中，另一个原则就是，努力让自己的心理对事情的均衡度和价值有良好的判断，这种判断有益于实现我们的特定目标，这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而且，我们需要进行实质上的判断，而非停留于表面的。我们会发现，一些人具有较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但数学能力却非常薄弱。这就是说，他们对事情的影响能作出有效判断，但对其中各部分的协调与比较却比较薄弱，他们总是更加关注事物表面的现象与感知，却忽略其实质与效果。有些人热衷与君权贵族交往，另一些则追求民间的声望与赞美，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不过很多时候，他们只会招来他人的嫉妒，让自己处于障碍重重险境和阻碍之中。另有一些人根据自己在某件事情上所花费的辛苦和努力来加以权衡，认为只要这些方面有所推进，就必会伴随一些进步和效益。恺撒在论及小加图时，曾非常轻蔑地说道，“他做一切事情都抱以极大的热忱”。这就描绘出，小加图虽艰苦勤奋，不屈不挠，却成就平平。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以为最有名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殊不知最适合的才最好。

(38) As for the true marshalling of men's pursuits towards their fortune, as they are more or less material, I hold them to stand thus. First the amendment of their own minds. For the removal of the impediments of the mind will sooner clear the passages of fortune than the obtaining fortune will remove the impediments of the mind. In the second place I set down wealth and means; which I know most men would have placed first, because of the general use which it beareth towards all variety of occasions. But that opinion I may condemn with like reason as Machiavel doth that other, that

moneys were the sinews of the wars; whereas (saith he) the true sinews of the wars are the sinews of men's arms, that is, a valiant, populous, and military nation: and he voucheth aptly the authority of Solon, who, when Croesus showed him his treasury of gold, said to him, that if another came that had better iron, he would be master of his gold. In like manner it may be truly affirmed that it is not moneys that are the sinews of fortune, but it is the sinews and steel of men's minds, wit, courage, audacity, resolution, temper, industry, and the like. In the third place I set down reputation, because of the peremptory tides and currents it hath; which, if they be not taken in their due time, are seldom recovered, it being extreme hard to play an after-game of reputation. And lastly I place honour, which is more easily won by any of the other three, much more by all, than any of them can be purchased by honour. To conclude this precept, as there is order and priority in matter, so is there in time, the preposterous placing whereof is one of the commonest errors: while men fly to their ends when they should intend their beginnings, and do not take things in order of time as they come on, but marshal them according to greatness and not according to instance; not observing the good precept, *Quod nunc instat agamus* .

（38）在追求幸运过程中，人们应根据其重要程度，进行合理的分配和安排。对于幸运的重要程度，我认为可以这样排序。首要的是对内心的完善。在摒除内心的障碍之后，幸运之路便也清晰明了，这比先获得幸运再摒除障碍更加迅捷。其次是财富和资产。我知道，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一项是首要的，因为它们在各种场合都有广泛的用途。然而，我并不赞同这一观点。我的理由和马基雅弗利反对钱财是战争的动力来源这一观点的理由是一样的。他曾说，战争的原动力其实在于人们的军事力量，即一个国家是否英勇强健、人口众多、军事强硬等。他还巧妙地利用梭伦的权威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一次，克利

萨斯向梭伦展示自己的金库，梭伦就告诉他，如果来了个握有更强大武器的人，他就会成为这些金子的主人。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钱财并不是幸运的原动力，而是推动和巩固人们的心理、智慧、勇气、胆量、决心、韧性、勤勉等等的力量。位于第三的是声誉。个人的名声就如潮水般随意来去，不可阻挡。如果人们无法在适当的时机加以把握，想要再重新获得美名就难上加难了。第四点我认为就是荣耀。如果获得前三种幸运中的任何一种，那么想要拥有荣耀就并非难事。如果有幸兼备三者，那就更为轻松了。相比之下，要想通过荣耀获得前面任何一种，就没那么容易了。总之，就像事情区分先后顺序，时机也有先后之分。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次序安排上的失误。有时候，人们本该着手从事，却迫不及待地草草收场，完全不按先后时机安排相应的事情，不是依据事件的紧急程度，而是根据它们的重大程度安排先后，这与古人的训诫——“先做手头的事”相违背。

(39) Another precept of this knowledge is not to embrace any matters which do occupy too great a quantity of time, but to have that sounding in a man's ears, *Sed fugit interea fugit irreparabile tempus* : and that is the cause why those which take their course of rising by professions of burden, as lawyers, orators, painful divines, and the like, are not commonly so politic for their own fortune, otherwise than in their ordinary way, because they want time to learn particulars, to wait occasions, and to devise plots.

（39）这类知识还有一个原则，即切勿从事旷日持久的事务。我们应该听听古人说的话，“在此期间时光飞逝，无可挽回”。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必须负担繁重工作才可能获得晋升的职业，如律师、演说家、辛勤的牧师等，比起其他常规事务，更难获得幸运。因为他们需要更多时间认识特定环境，等待合适时机，制定恰当谋略。

(40) Another precept of this knowledge is to imitate nature, which doth nothing in vain; which surely a man may do if he do well interlace his business, and bend not his mind too much upon that which he principally intendeth. For a man ought in every particular action so to carry the motions of his mind, and so to have one thing under another, as if he cannot have that he seeketh in the best degree, yet to have it in a second, or so in a third; and if he can have no part of that which he purposed, yet to turn the use of it to somewhat else; and if he cannot make anything of it for the present, yet to make it as a seed of somewhat in time to come; and if he can contrive no effect or substance from it, yet to win some good opinion by it, or the like. So that he should exact an account of himself of every action, to reap somewhat, and not to stand amazed and confused if he fail of that he chiefly meant: for nothing is more impolitic than to mind actions wholly one by one. For he that doth so loseth infinite occasions which intervene, and are many times more proper and propitious for somewhat that he shall need afterwards, than for that which he urgeth for the present; and therefore men must be perfect in that rule, *Hæc oportet facere, et illa non imittere* .

（40）另一个原则是，人们应效法自然。自然所做的任何事都有其意义，人们同样可以做到如此，只要他们懂得将所从事的事情进行合理的交织组合，而非集中过多精力在主要目的之上。在每一特定行为中，人们的内心都应积极响应，将不同的目标进行排列，这样一来，即使他不能达成最理想的目标，也可以退而求其次，甚至是更低的程度；即使与所预期的目标相差甚远，也可以转而达到其他目标；即使这件事情在当下没有任何价值，也可以为将来做准备；即使从中得不到任何意义和实效，也不妨利用这件事在人们中间赢得一些美好的印象。因此，人们应要求自己对每个行为都有详细的盘算，争取能有所收获，即便没有实现主要目标也无需惊讶彷徨。要知道，将所有

事情隔离开来一一解决是最不可取的。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便会错失大量交互出现的时机。很多时候，这些机会对当前竭力完成的事情百无一用，却可能对将来的某些事非常适用，而且大有裨益。因此，人们应严格遵循这一规则，即“这些必须要做，但也不能忽略其他事”。

(41) Another precept of this knowledge is, not to engage a man's self peremptorily in anything, though it seem not liable to accident; but ever to have a window to fly out at, or a way to retire: following the wisdom in the ancient fable of the two frogs, which consulted when their plash was dry whither they should go; and the one moved to go down into a pit, because it was not likely the water would dry there; but the other answered, “True, but if it do, how shall we get out again?”

（41）针对这部分知识的还有一个原则——不要太执着于某一件事情之中，即使这件事看似不可能产生任何意外。这就意味着，人们总应打开一扇窗户，方便随时抽离，或是预留一条道路，方便随时撤退。这一原则是根据古代两只青蛙的寓言产生的。在栖息的水洼干涸之后，那两只青蛙开始商量搬去哪里。一只青蛙提议搬去一个深坑，因为那里不容易干涸，但另外一只回答道：“是的，不过万一那里水也干了，我们又怎么离开呢？”

(42) Another precept of this knowledge is that ancient precept of Bias, construed not to any point of perfidiousness, but to caution and moderation, *Et ama tanquam inimicus futurus et odi tanquam amaturus* . For it utterly betrayeth all utility for men to embark themselves too far into unfortunate friendships, troublesome spleens, and childish and humorous envies or emulations.

（42）另一个原则就是古代的拜厄斯提出的训诫，“爱你的朋友时，要想到将来他可能成为你的敌人；恨你的敌人时，也要考虑将来他可能成为你的朋友”。这并非让人背信弃义，而是希望人们要有所节制，并随时保持警惕。因为如果人们过分沉浸在交友不慎、怒气萦绕的烦恼，或是任性幼稚的嫉妒或竞争之中，就完全背弃了一切应有的实效。

(43) But I continue this beyond the measure of an example; led, because I would not have such knowledges, which I note as deficient, to be thought things imaginative or in the air, or an observation or two much made of, but things of bulk and mass, whereof an end is more hardly made than a beginning. It must be likewise conceived, that in these points which I mention and set down, they are far from complete tractates of them, but only as small pieces for patterns. And lastly, no man I suppose will think that I mean fortunes are not obtained without all this ado; for I know they come tumbling into some men's laps; and a number obtain good fortunes by diligence in a plain way, little intermeddling, and keeping themselves from gross errors.

（43）在论述这些知识时，我并不止于举例简单阐述，这是因为我不希望这部分在我看来有待完善的知识被当成是虚幻不真实的，或是只有只言片语。我希望人们能认识到，这部分知识是充实而丰富的，但知易行难，要对其深入研究并非易事。同样，人们需要注意，我所提的几点内容，只是这类知识的冰山一角，因而只能作为这一知识模式的一些碎片。最后，我想没人会认为，我主张幸运必须费劲周折才能获得。因为我了解，有时幸运也会突然降临到某些人身上。还有少数人则依靠庸碌的勤奋，少管闲事，避免犯大错等最终迎来了幸运的光临。

(44) But as Cicero, when he setteth down an idea of a perfect orator, doth not mean that every pleader should be such; and so likewise, when a prince or a courtier hath been described by such as have handled those subjects, the mould hath used t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art, and not according to common practice: so I understand it, that it ought to be done in the description of a politic man, I mean politic for his own fortune.

（44）西塞罗在记述该如何做一名完美的演说家时说道，并非每个辩论者都应以此作为目标。同样，当描绘君王或侍臣的一些作为时，往往不是依据常规的实践来表述的，而是根据理想情形套用特定模板实现的。因此我觉得，描绘一个精于寻求自身幸运的人时，这样的方式是可行的。

(45) But it must be remembered all this while, that the precepts which we have set down are of that kind which may be counted and called *Bonæ Artes* . As for evil arts, if a man would set down for himself that principle of Machiavel, “That a man seek not to attain virtue itself, but the appearance only thereof; because the credit of virtue is a help, but the use of it is cumber:” or that other of his principles, “That he presuppose that men are not fitly to be wrought otherwise but by fear; and therefore that he seek to have every man obnoxious, low, and in straits,” which the Italians call seminar spine, to sow thorns: or that other principle, contained in the verse which Cicero citeth, *Cadant amici, dummodo inimici intercidant* , as the triumvirs, which sold every one to other the lives of their friends for the deaths of their enemies: or that other protestation of L. Catilina, to set on fire and trouble states, to the end to fish in droumy waters, and to unwrap their fortunes, *Ego si quid in fortunis meis excitatum sit incendium, id non aqua sed ruina restinguam* : or

that other principle of Lysander, “That children are to be deceived with comfits, and men with oaths:” and the like evil and corrupt positions, whereof (as in all things) there are more in number than of the good: certainly with these dispensations from the laws of charity and integrity, the pressing of a man's fortune may be more hasty and compendious. But it is in life as it is in ways, the shortest way is commonly the foulest, and surely the fairer way is not much about.

（45）不过，人们应回想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一切，包括那些原则都属于所谓的“善的技艺”。至于恶的技艺，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可以采用马基雅弗利的一个原则，即“人们无需追求道德本身，只需追求道德的外表。因为道德美名有所助益，但真正的运用却是一种妨碍”。还有他制定的另外一条准则，“人们应预先假定除恐惧外，不存在任何因素影响自身，由此，使得每个人都令人生厌、消沉沮丧、困境重重”。意大利人将这一原则称为“播种荆棘”。西塞罗在其作品中也引用了一个诗篇中的原则，“如果仇敌会因朋友之死而死，就让朋友死吧”。古罗马的三执政官就是这样，为消灭敌人，可将自己的朋友出卖给任何人。卡蒂利纳也曾当众声明，他将燃放一把烈火，令国家骚乱不断，从而浑水摸鱼，满足一己私欲。他说道：“如果我的好运被点燃，我不会用水，而是用毁灭来扑灭它。”此外，莱桑德也有一条原则，即“孩童可用糖果来欺骗，成人可用誓言来欺骗。”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邪恶而堕落的主张。从数量上看，这些不好的主张比好的主张要多（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如此）。确实，如果人们抛弃仁慈和正直的准则，他们追求财富过程将更加快速便捷。人生犹如行路，越便捷的道路往往就越是肮脏污浊，干净平坦的往往是那些康庄大道。

(46) But men, if they be in their own power, and do bear and sustain themselves, and be not carried away with a whirlwind or tempest of ambition, ought in the pursuit of their own fortune to set

before their eyes not only that general map of the world, “That all things are vanity and vexation of spirit,” but many other more particular cards and directions: chiefly that, that being without well-being is a curse, and the greater being the greater curse; and that all virtue is most rewarded and all wickedness most punished in itself: according as the poet saith excellently:—*“Quæ vobis,quædigna, viri pro laudibus istis Præmia posse rear solvi? pulcherrima primum Dii moresque dabunt vestri* .” And so of the contrary. And secondly they ought to look up to the Eternal Providence and Divine Judgment, which often subverteth the wisdom of evil plots and imaginations, according to that *scripture* , “He hath conceived mischief, and shall bring forth a vain thing.” And although men should refrain themselves from injury and evil arts, yet this incessant and Sabbathless pursuit of a man's fortune leaveth not tribute which we owe to God of our time; who (we see) demandeth a tenth of our substance, and a seventh, which is more strict, of our time: and it is to small purpose to have an erected face towards heaven, and a perpetual grovelling spirit upon earth, eating dust as doth the serpent, *Atque affigit humo divinae particulam auræ* . And if any man flatter himself that he will employ his fortune well, though he should obtain it ill, as was said concerning Augustus Cæsar, and after of Septimius Severus, “That either they should never have been born, or else they should never have died,” they did so much mischief in the pursuit and ascent of their greatness, and so much good when they were established; yet these compensations and satisfactions are good to be used, but never good to be purposed. And lastly, it is not amiss for men, in their race towards their fortune, to cool themselves a little with that conceit which is elegantly expressed by the Emperor Charles V., in his instructions to the king his son, “That fortune hath somewhat of the nature of a woman, that if she he too much wooed she is the farther off.” But this last is but a remedy for those whose tastes are

corrupted: let men rather build upon that foundation which is as a corner-stone of divinity and philosophy, wherein they join close, namely that same *Primum quærite* . For divinity saith, *Primum quærite regnum Dei, et ista omnia adjicientur vobis* : and philosophy saith, *Primum quærite bona animi; cætera aut aderunt, aut non oberunt* . And although the human foundation hath somewhat of the sands, as we see in M. Brutus, when he broke forth into that speech, "*Te colui (Virtus) ut rem; ast tu nomen inane es* ;" yet the divine foundation is upon the rock. But this may serve for a taste of that knowledge which I noted as deficient.

（46）人们在追求自身的幸运时，如还在自己的能力可控范围内，能承受和维持自己的本性，不受欲望旋风的动摇，那么，他们不仅仅应在自己的眼前展现一幅粗略的世界全景，即"一切事物皆为虚幻，皆是心灵的烦扰"，更应探索更多特定的方法和指示。其中最主要的是，不幸的人生是一种诅咒，越是伟大的人，诅咒就越深重；而且，所有的美德本身就是最好的奖赏，所有的罪恶本身就是最大的惩罚。诗人说得好："祝君属英俊，功德世所钦，纵欲致答谢，何物能相称？上有诸神灵，内有光明心，欲求真报酬，当于彼处寻。"至于其对立面，也是如此。其次，人们应尊崇永恒的天意和神圣的审判。正是它们经常搅乱罪恶的阴谋和虚幻的妄想。《圣经》中就说，"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尽管人们应克制自己，不伤害他人，不施展恶的伎俩，但如果人们不守安息日，夜以继日追求自身的幸运，就会把我们应该给予上帝的贡献抛诸脑后。上帝要求我们贡献自己十分之一的财物，更为严格地要求我们放弃自己七分之一的时间。平日里，人们都卑躬屈膝匍匐于大地，如蛇一般啃食地上的尘土，"把一点点的神圣本质也固定在尘土里"，因而这第七天的休息也是要求人们直面天空，仰望上帝。有些人非常自以为是，认为虽然他的幸运是通过不良手段获得的，但他会有效利用自己的这份幸运。人们在评价奥古斯丁·恺撒和之后的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时，也曾说，"他们两人要么不该出生，要么就不该死去"。这是因为他们在追

求和提升自己的伟大时，犯下不少滔天大罪，但在他们稳固政权之后，又非常乐善好施。不过，这些补偿和赎罪在事后实施是可行的，但切不可事前谋划。最后，在追求幸运途中，人们不可忘记需保持稍许冷静，应该将查尔斯五世对其为王的儿子所说的绝妙教导铭记在心，即“运气与女人的脾气颇为相似，追求越热烈，她跑得越远。”不过这最后一点只是针对那些品味腐浊之人的补救措施。对大多数人而言，更应该立足于“首要追求”的基础之上，这一基础也是神学和哲学的基石，两者就在这一基础上交汇融合。神学上说，“首要追求上帝之国，其他一切东西都跟着有了”。而哲学上说，“首要追求心中的美好事物，其他事物也就跟着来了，即使没有也无所期盼。”尽管人性的根基多少有些像沙粒，布鲁图就曾突然感叹道，“我把你（美德）当作实物来尊崇，而你却只有一个虚名”。但是，神性的根基却是牢牢建立在磐石之上。不过，我说过这部分知识是存在缺陷的，而我的这些论述或许只能作为这些知识的些许经验之谈。

(47) Concerning government, it is a part of knowledge secret and retired in both these respects in which things are deemed secret; for some things are secret because they are hard to know, and some because they are not fit to utter. We see all governments are obscure and invisible:” *Totamque infusa per artusMens agitat molem, et magno se corpore miscet* .” Such is the description of governments. We see the government of God over the world is hidden, insomuch as it seemeth to participate of much irregularity and confusi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ul in moving the body is inward and profound, and the passages thereof hardly to be reduced to demonstration. Again, the wisdom of antiquity (the shadows whereof are in the poets) in the description of torments and pains, next unto the crime of rebellion, which was the giants' offence, doth detest the offence of futility, as in Sisyphus and Tantalus. But this was meant of particulars: nevertheless even unto the general rules and discourses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 there is due a reverent and

reserved handling.

（47）至于统治的智慧，这是一种神秘而隐蔽的知识，这种隐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有些事情因不易让人理解而保持隐秘，另一些事情则是因为不适合表露而加以隐蔽。我们看到，所有政府都深藏不露，“心力一发动，全体受支配，一肢复一节，都在管辖中”。这就是诗人对政府的描述。同样我们看到，上帝对世界的统治也是隐晦暗藏的，从而令我们看来似乎也掺杂了不少无规律的混乱现象。灵魂对身体的推动和支配也是内在的、深奥的，其运作机理也很难加以阐释。此外，古人的智慧（从诗人的作品中可见一斑）在描绘烦恼和苦难之中就表达出，在巨人的反叛之罪之后，最痛恨的事莫过于言行轻浮，就如西西弗斯和坦塔罗斯那样。不过，这些都是对一些特定事例而言的，至于政策和统治上的一般规则和著述，我们还是需要谦恭谨慎地进行研究。

(48) But contrariwise in the governors towards the governed, all things ought as far as the frailty of man permitteth to be manifest and revealed. For so it is expressed in the *Scriptures* touching the government of God, that this globe, which seemeth to us a dark and shady body, is in the view of God as crystal: *Et in conspectu sedis tanquam mare vitreum simile crystallo* . So unto princes and states, and specially towards wise senates and councils, the natures and dispositions of the people, their conditions and necessities, their factions and combinations, their animosities and discontents, ought to be, in regard of the variety of their intelligences, the wisdom of their observations, and the height of their station where they keep sentinel, in great part clear and transparent. Wherefore, considering that I write to a king that is a master of this science, and is so well assisted, I think it decent to pass over this part in silence, as willing to obtain the certificate

which one of the ancient philosophers aspired unto; who being silent, when others contended to make demonstration of their abilities by speech, desired it might be certified for his part, “That there was one that knew how to hold his peace.”

（48）然而，从统治者的角度看待被统治者，一切处于人性的弱点范围内的事物，都应彰彰在目。《圣经》在描绘上帝的统治时就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在我们看来，地球是神秘隐晦的，但在上帝眼中，它就如水晶般透明。因此，对于君王和国家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睿智的元老院和议会成员，在看待民众的天性与性情、处境与需求、派别与联盟、怨恨与不满时，应利用多方情报，充分调动自身的智慧和敏锐的观察力，并有效利用所处的高位审慎巡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这些情况的清晰明澈，一目了然。考虑到我的这本书是献给陛下的，而陛下完全精通这门知识，又得到了很好的辅佐，因而我觉得，这部分知识我最好还是避而不谈了，这样做也是期望证实古时一位哲学家所期待的状况。当其他人拼命运用言辞展现自己的才能时，他却一言不发，他想通过这一举动证明“至少还有一个人懂得如何保持缄默”。

(49) Notwithstanding, for the more public part of government, which is laws, I think good to note only one deficiency; which is, that all those which have written of laws have written either as philosophers or as lawyers, and none as statesmen. As for the philosophers, they make imaginary laws for imaginary commonwealths, and their discourses are as the stars, which give little light because they are so high. For the lawyers, they write according to the states where they live what is received law, and not what ought to be law; for the wisdom of a law-maker is one, and of a lawyer is another. For there are in nature certain fountains of justice whence all civil laws are derived but as streams; and like

as waters do take tinctures and tastes from the soils through which they run, so do civil laws vary according to the regions and governments where they are planted, though they proceed from the same fountains. Again, the wisdom of a law-maker consisteth not only in a platform of justice, but in the application thereof;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by what means laws may be made certain, and what are the causes and remedies of the doubtfulness and uncertainty of law; by what means laws may be made apt and easy to be executed, and what are the impediments and remedies in the execution of laws; what influence laws touching private right of *meum* and *tuum* have into the public state, and how they may be made apt and agreeable; how laws are to be penned and delivered, whether in texts or in Acts, brief or large, with preambles or without; how they are to be pruned and reformed from time to time, and what is the best means to keep them from being too vast in volume, or too full of multiplicity and crossness; how they are to be expounded, when upon causes emergent and judicially discussed, and when upon responses and conferences touching general points or questions; how they are to be pressed, rigorously or tenderly; how they are to be mitigated by equity and good conscience, and whether discretion and strict law are to be mingled in the same courts, or kept apart in several courts; again, how the practice, profession, and erudition of law is to be censured and governed; and many other points touching the administration and (as I may term it) animation of laws. Upon which I insist the less, because I purpose (if God give me leave), having begun a work of this nature in aphorisms, to propound it hereafter, noting it in the meantime for deficient.

（49）至于政府统治中相对公开的部分，也就是法律，我认为只需提出一点缺陷，即所有撰写法律的人不是从哲学家的角度，就是从

律师的角度来写作，却从来没有从政治家的层面进行考虑。对哲学家而言，他们仅仅是为虚构的民主国度编写假想的法律，而他们的论述就如天上的繁星，总是由于相距遥远而只能散发微弱的光芒。对律师而言，他们根据自己国家得到公认的法律进行写作，完全不考虑哪些应当成为法律。毕竟，立法者的才智与律师的才智是无法等同的。自然界存在一些正义的源泉，所有的社会法律都是从中衍生的支流。流水在经过一地时，便会沾染当地土壤的气息与味道。同样，所有的法律在各个地区和国家扎根时，都不尽相同，尽管它们的源头是一致的。立法者的智慧不仅在于弘扬正义，还在于履行正义。他们应反复斟酌，如何才能完全确立法律；导致法律含糊不明确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补救；如何令法律适于也便于执行；执行法律途中的障碍是什么，该如何清除；关乎个人权利的法律对国家和社会有什么影响，如何使其恰当贴切为人们所接受；如何撰写和颁布法律，将其作为条例还是法令，该简明还是详细，又是否需要序言；在不同时期如何作出调整和修正，避免法律数量庞大、纷繁复杂的最有效措施是什么；在出现新的诉讼案例需要依法裁决时，或是人们对普遍的观点和问题作出回应或商议时，该如何阐述法律；该如何执行法律，必须严格执行还是可以适当缓和；该如何借助正义和良心来缓和法律的严苛；自行决定的自由和严格的法律是否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次审判庭上，还是说必须分开出现在不同法庭上；还有包括法律的实践、法律职业、法律的传授应如何得到评价和管理；以及其他涉及行政（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和赋予法律活力方面的问题。在此，针对这些问题我都不加详述，因为这部分知识还有很多缺陷，当前我只是运用格言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上帝允许的话，深入探讨就留与今后了。

(50) And for your Majesty's laws of England, I could say much of their dignity, and somewhat of their defect; but they cannot but excel the civil laws in fitness for the government, for the civil law was *nonhos quœsitum munus in usus* ; it was not made for the countries which it governeth. Hereof I cease to speak because I will not intermingle matter of action with matter of general learning.

（50）陛下颁布的英国法律无疑是非常高贵威严的，但也存在一些瑕疵。比起罗马法，我们的英国法律更加适合政府统治，因为罗马法是“别种用途所制的赠品”，并不是为其统治的国家而制定的。我不希望将特定措施问题与一般的学问混为一谈，因此，对于这点我就不再多言。

CHAPTER XXIV

第二十四章

Thus have I concluded this portion of learning touching civil knowledge; and with civil knowledge have concluded human philosophy; and with human philosophy, philosophy in general. And being now at some pause, looking back into that I have passed through, this writing seemeth to me (*si nunquam fallit imago*), as far as a man can judge of his own work, not much better than that noise or sound which musicians make while they are in tuning their instruments, which is nothing pleasant to hear, but yet is a cause why the music is sweeter afterwards. So have I been content to tune the instruments of the Muses, that they may play that have better hands. And surely, when I set before me the condition of these times, in which learning hath made her third visitation or circuit in all the qualities thereof; as the excellency and vivacity of the wits of this age; the noble helps and lights which we have by the travails of ancient writers; the art of printing, which communicateth books to men of all fortunes; the openness of the world by navigation, which hath disclosed multitudes of experiments, and a mass of natural history; the leisure wherewith these times abound, not employing men so generally in civil business, as the states of Graecia did, in respect of their popularity, and the state of Rome, in respect of the

greatness of their monarchy; the present disposition of these times at this instant to peace; the consumption of all that ever can be said in controversies of religion, which have so much diverted men from other sciences; the perfection of your Majesty's learning, which as a phoenix may call whole volleys of wits to follow you; and the inseparable propriety of time, which is ever more and more to disclose truth; I cannot but be raised to this persuasion, that this third period of time will far surpass that of the Grecian and Roman learning; only if men will know their own strength and their own weakness both; and take, one from the other, light of invention, and not fire of contradiction; and esteem of the inquisition of truth as of an enterprise, and not as of a quality or ornament; and employ wit and magnificence to things of worth and excellency, and not to things vulgar and of popular estimation.As for my labours, if any man shall please himself or others in the reprehension of them, they shall make that ancient and patient request, Verbera, sed audi: let men reprehend them, so they observe and weigh them. For the appeal is lawful (though it may be it shall not be needful) from the first cogitations of men to their second, and from the nearer times to the times further off. Now let us come to that learning, which both the former times were not so blessed as to know, sacred and inspired divinity, the Sabbath and port of all men's labours and peregrinations.

对社会知识的讨论我们已告一段落，这也意味着我们结束了对人类哲学的探讨，同时，我们对于一般的哲学讨论也到此为止。在此我们稍作停顿，回顾一下我们所探讨的内容，如果要对自己的作品作个评价（如果镜子反映出的是真实的图像），我认为我的著述类似于乐师为乐器调音时发出的声响，虽不悦耳，却为之后的美妙音乐打下了基础。我也满足于校准缪斯女神的乐器，留待之后的音乐能手弹奏优美的曲子。当然，就当今时代而言，学问已全面到达它的第三次巅

峰。出类拔萃、活力充沛的贤明人士络绎不绝；古人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巨大助益和启迪；印刷术令各阶层人们阅读书籍成为可能；航海术令整个世界都展现在我们眼前，出现各式各样的新事物，以及自然界不计其数的新发现。此外，不像出名的希腊或伟大君主专制统治下的罗马人民，现在的人们闲暇时间越来越多，投放在国家事务上的时间则越来越少了。在这一时代，人们一片祥和安乐，性情平和；宗教纷争曾一度耗费了许多时间，令人们无法专心于学问，但如今这一状况已有很大的改进。陛下的博学就如凤凰一般，吸引众多贤达人士齐聚一堂，追随于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真相得以揭露。我不得不相信，如果人们能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弱点，互相传递创新之光而不是矛盾之火，将尊崇对学问的探究看成是一项事业，而不是一种才能或装饰，把他们的才智和天赋发挥到有价值和优秀的事物，而不是粗俗和流行的事物中去，那么学问的第三次繁荣一定会大大超越希腊和罗马时期的荣耀。至于我所花的这些心血，如果人们出于悦己或悦人的目的而加以责难，请先听听古人提出的耐心请求："你可以鞭笞我，但需先听我说完。"就让人们对我的论述尽情责难吧，这样说明他们在审慎思考和斟酌我提出的想法。人们在第一次审思之后会请求第二次思考，近代的人们会求助于后代的人们，这些请求都是正当合理的（尽管并非是必需的）。现在就让我们来谈论前人无福了解的这部分知识，即神圣庄严、受神启示的神学。它是所有人类的安息日，也是他们一切辛劳与远行的港湾。

CHAPTER XXV

第二十五章

(1) The prerogative of God extendeth as well to the reason as to the will of man: so that as we are to obey His law, though we find a reluctation in our will, so we are to believe His word, though we find a reluctation in our reason. For if we believe only that which is agreeable to our sense we give consent to the matter, and not to the

author; which is no more than we would do towards a suspected and discredited witness; but that faith which was accounted to Abraham for righteousness was of such a point as whereat Sarah laughed, who therein was an image of natural reason.

（1）上帝的至上特权不但囊括人类的意愿，还包括人类的理性。因此，尽管有时人们不是非常情愿，还是会遵循上帝的法则；有时人们的理性不肯服从，但还是会笃信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仅仅相信与我们理智相符合的事物，那么我们只是认同了事物本身，而不是这些事物的创造者。这一做法与我们对待一名遭受质疑、不可信的证人是没有差别的。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但他的妻子撒拉却嘲笑他对上帝的这份虔诚信仰。其中，撒拉就是自然理性的典型。

(2) Howbeit (if we will truly consider of it) more worthy it is to believe than to know as we now know. For in knowledge man's mind suffereth from sense: but in belief it suffereth from spirit, such one as it holdeth for more authorised than itself and so suffereth from the worthier agent. Otherwise it is of the state of man glorified; for then faith shall cease, and we shall know as we are known.

（2）然而，如果我们真正切实地细加思虑，便能发现，信仰比知识更有价值。因为人们的心理在获取知识时受理性支配，而在虔诚信仰中受精神的操控。精神对心理的操纵力比起心理自身更具有权威，因此，在信仰方面，我们的心理获得了更有价值的动因。但对于一个享有荣耀的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一旦获得荣耀，便不再信仰上帝，就会像上帝了解人类那样，了解一切。

(3) Wherefore we conclude that sacred theology (which in our idiom we call divinity) is grounded only upon the word and oracle of God, and not upon the light of nature: for it is written, *Cœli enarrant gloriam Dei; but it is not written, Cœli enarrant voluntatem Dei: but of that it is said, Ad legem et testimonium: si non fecerint secundum verbum istud, &c.* This holdeth not only in those points of faith which concern the great mysteries of the Deity, of the creation, of the redemption, but likewise those which concern the law moral, truly interpreted: “Love your enemies: do good to them that hate you; be like to your heavenly Father, that suffereth His rain to fall upon the just and unjust.” To this it ought to be applauded, *Nec vox hominem sonat* : it is a voice beyond the light of nature. So we see the heathen poets, when they fall upon a libertine passion, do still expostulate with laws and moralities, as if they were opposite and malignant to nature: *Et quod natura remittit, invida jura negant* . So said Dendamis the Indian unto Alexander's messengers, that he had heard somewhat of Pythagoras, and some other of the wise men of Graecia, and that he held them for excellent men: but that they had a fault, which was that they had in too great reverence and veneration a thing they called law and manners. So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a great part of the law moral is of that perfection whereunto the light of nature cannot aspire: how then is it that man is said to have, by the light and law of nature, some notions and conceits of virtue and vice, justice and wrong, good and evil?Thus, because the light of nature is used in two several senses: the one, that which springeth from reason, sense, induction, argument,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heaven and earth; the other, that which is imprinted upon the spirit of man by an inward instinct,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conscience, which is a sparkle of the purity of his first estate: in which latter sense only he is participant of some light and discerning touching the perfection of the moral law; but how?sufficient to check the vice but not to

inform the duty. So then the doctrine of religion, as well moral as mystical, is not to be attained but by inspiration and revelation from God.

（3）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宗教神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神学）完全建立在上帝的话语和神谕之上，而非自然之上。《圣经》说，“诸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并没有说，“诸天述说神的意志”。对此，《圣经》是这样阐述的，“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这一原则不仅可用在对上帝、创世和救赎的巨大奥秘的信仰上，还适用于道德法则。于是就有这样精辟的阐释：“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对此，我们应该大加褒扬，因为这“不像人类发出的声音”，而是一种超越自然之光的声音。我们看到，那些异教诗人在彻底放纵思想和激情时仍然不忘抗议各种法则和道德，好像它们与自然是相对立的，又是具有危害的。就好像“自然允许的事，法律因妒忌而拒绝。”印度人丹达米斯曾对亚历山大的使节说过，他闻得毕达哥拉斯及其他希腊贤士的一些观点，觉得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不过他们普遍存在一个缺点，即对所谓的律法和规矩过分敬畏和尊崇。因而必须承认的是，大部分道德法则非常完美，无法透过自然之光得到。不过为何又有这样的说法，在自然光亮和法则的引导下，人们获得了诸如美德、罪恶、正义、不公、善恶等方面的一些观念和想法？其原因在于，自然之光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为根据天地法则从理性、感知、归纳、论辩中获得的启示，其二为在良知法则，也就是人们在原始状态下散发出的纯粹洁净的光芒的引导下，人们的内在本能在自身灵魂上刻下的印记。只有在第二层含义上，人们才能获取道德法则的些许光亮，领悟其中的绝妙奥秘。不过，如何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点？这些光亮可充分用来检验罪恶，却无法教导责任。因此，宗教的教义，不论是玄妙的还是道德的，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和感召，都是无法获得的。

(4) The use notwithstanding of reason in spiritual things, and the latitude thereof, is very great and general: for it is not for nothing that the apostle calleth religion “our reasonable service of God;” insomuch as the very ceremonies and figures of the old law were full of reason and signification, much more than the ceremonies of idolatry and magic, that are full of non-significants and surd characters. But most specially the Christian faith, as in all things so in this, deserveth to be highly magnified; holding and preserving the golden mediocrity in this point between the law of the heathen and the law of Mahomet, which have embraced the two extremes. For the religion of the heathen had no constant belief or confession, but left all to the liberty of agent; and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on the other side interdicteth argument altogether: the one having the very face of error, and the other of imposture; whereas the Faith doth both admit and reject disputation with difference.

（4）理性在精神上的效用是非常巨大的，其应用范围也十分广泛。传道者将宗教称为“对上帝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也不无道理。因此，长久流传的戒律的仪式和形象充满理性与意义，而偶像崇拜和巫术的仪式则充溢着毫无意义的特质。在这里我们尤其需要提到基督教的信仰，跟所有其他方面一样，它的理性价值应得到高度颂扬。在理性上，它保持着绝好的中庸，将自己置于异教的原则和穆罕默德的戒律这两个极端中间。异教不存在固定的信仰或信念，一切的自由都在传播者的手中。而穆罕默德的宗教禁止一切异议和争论。一个完全暴露谬误的面孔，一个则全然是欺诈的面容。然而，基督教的信仰既容许争论，又抵制争论，具体要看争论内容的差异性。

(5) The use of human reason in religion is of two sorts: the former, in the conception and apprehension of the mysteries of God

to us revealed; the other, in the inferring and deriving of doctrine and direction thereupon. The former extendeth to the mysteries themselves; but how?by way of illustration, and not by way of argument. The latter consisteth indeed of probation and argument. In the former we see God vouchsafeth to descend to our capacity, in the expressing of His mysteries in sort as may be sensible unto us; and doth graft His revelations and holy doctrine upon the notions of our reason, and applieth His inspirations to open our understanding, as the form of the key to the ward of the lock. For the latter there is allowed us a use of reason and argument, secondary and respective, although not original and absolute. For after the articles and principles of religion are placed and exempted from examination of reason, it is then permitted unto us to make derivations and inferences from and according to the analogy of them, for our better direction. In nature this holdeth not; for both the principles are examinable by induction, though not by a medium or syllogism; and besides, those principles or first positions have no discordance with that reason which draweth down and deduceth the inferior positions. But yet it holdeth not in religion alone, but in many knowledges, both of greater and smaller nature, namely, wherein there are not only *posita* but *placita* ; for in such there can be no use of absolute reason. We see it familiarly in games of wit, as chess, or the like. The draughts and first laws of the game are positive, but how?merely *adplacitum* , and not examinable by reason; but then how to direct our play thereupon with best advantage to win the game is artificial and rational. So in human laws there be many grounds and maxims which are *placita juris* , positive upon authority, and not upon reason, and therefore not to be disputed: but what is most just, not absolutely but relatively, and according to those maxims, that affordeth a long field of disputation. Such therefore is that secondary reason, which hath place in divinity, which is grounded upon the *placets* of God.

（5）人类理性在宗教中的效用主要分两类，一是理解上帝向我们透露的奥秘，二是从这些奥秘中推理相应的教义和指引。第一类只是关于上帝的奥秘本身，是通过直接阐释的方式，而非论辩的方式实现的。第二类则的确由论证和辩争的方式构成。在第一类中我们看到，上帝依据我们的能力，将他的奥秘以一种我们可感知的方式传达给我们，将他的启示和神圣教义移植于我们理性概念之上，并以启示的方式开发我们的理解力，就如钥匙插入锁孔一般。第二类允许运我们用自身的理性与论辩，尽管并非原始而绝对的，而是次要的，是特殊的。宗教的教条和原则一旦植入我们脑中，就不再接受理性的检验，不过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是可以根据这些原则以及由它们引发的类比，推引出更为有效的指导。然而在自然中就不能运用这一方式。尽管两类命题不一定需要通过中项或三段论的验证，却必须经受归纳法的检验。同时，首要命题与推论次级命题的理性之间并不存在相互不协调的状况。不过，这样的情况并不只限于宗教领域，在其他众多知识领域中，多少都有所涉及。也就是说，在一些既有既定规则，又允许适当辩争的领域，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因为对这些领域而言，绝对理性是一无可取的。我们在诸如象棋等益智游戏中，就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棋类游戏的首要规则都是确定的，至于其确立方式，那完全是大家协商而定的，经不起理性的验证。但至于如何运用这些规则使我们在游戏中占据优势，赢得胜利，这便需要理性和技巧的参与。在人类法则中，同样存在许多依据和公理不是依靠理性，而全靠权力确立的，这便也是无可争议的。不过，至于在这些公理的基础上，哪些可以称为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公义，这倒经得起长时的论辩。以上便是对神学中的理性的论述，神学以上帝的意愿为基础，而其中的理性则是位于第二的。

(6) Here therefore I note this deficiency, that there hath not been, to my understanding, sufficiently inquired and handled the true limits and use of reason in spiritual things, as a kind of divine dialectic: which for that it is not done, it seemeth to me a thing

usual, by pretext of true conceiving that which is revealed, to search and mine into that which is not revealed; and by pretext of enucleating inferences and contradictories, to examine that which is positive. The one sort falling into the error of Nicodemus, demanding to have things made more sensible than it pleaseth God to reveal them, *Quomodo possit homo nasci cum sit senex* ?The other sort into the error of the disciples, which were scandalised at a show of contradiction, *Quid est hoc quod dicit nobis?Modicum et non videbitis me; et iterum, modicum, et videbitis me, &c* .

（6）在我看来，在精神领域中，理性作为一种神圣的逻辑论证，其真正效用和限度并没有得到充分地研究与运用，因而可谓存在缺陷。正因这一缺陷，人们常以真正领悟上帝的启示为借口，去探索和挖掘那些并未透露的事物；或是打着阐明各类推理和矛盾的幌子，去验证那些毋庸置疑的事物。第一种做法深陷尼科迪默斯式的错误，尼科迪默斯要求事物比起上帝愿意给予的启示来，更易为人们所感知，对此他说，“人已经老了，人生如何能重来一次呢？”第二种做法则是信徒式的错误，信徒在遇到矛盾时便会一脸愕然，彼此相问：“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

(7) Upon this I have insisted the more, in regard of the great and blessed use thereof; for this point well laboured and defined of would in my judgment be an opiate to stay and bridle not only the vanity of curious speculations, wherewith the schools labour, but the fury of controversies, wherewith the Church laboureth. For it cannot but open men's eyes to see that many controversies do merely pertain to that which is either not revealed or positive; and that many others do grow upon weak and obscure inferences or derivations: which latter sort, if men would revive the blessed style

of that great doctor of the Gentiles, would be carried thus, *ego, non dominus* ; and again, *secundum consilium meum* , in opinions and counsels, and not in positions and oppositions. But men are now over-ready to usurp the style, *non ego, sed dominus* ; and not so only, but to bind it with the thunder and denunciation of curses and anathemas, to the terror of those which have not sufficiently learned out of Solomon that “The causeless curse shall not come.”

（7）鉴于理性的效用如此卓著而神圣，我坚持认为，这方面知识应得到其更为深入的研究。据我判断，如能做到如此，理性便可作为一剂镇静剂，用以平息和抑制经院中费尽心机从事的虚妄推测，以及教会中盛行的激烈论争。理性可令人们真切地看到，很多争论所涉及的不是未得上帝透露，就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还有许多论争则是基于含糊薄弱的推理或衍生。对于后者，如果人们要再现异教徒中杰出学者的风采，就会说，“是我，不是主”；在表达自身看法和提供建议时又说，“根据我的意见”，将自己的想法当成一种观点和建议，而不是一种相左的意见和立场。然而在当今时代，人们却总是迫不及待地强用这种方式宣称：“不是我，是主”。不仅如此，他们一边说着，一边还不忘强烈地谴责和诅咒，用以恐吓那些没有充分领悟所罗门那句箴言的人，也就是，“无故的诅咒也必不临到”。

(8) Divinity hath two principal parts: the matter informed or revealed, and the nature of the information or revelation; and with the latter we will begin, because it hath most coherence with that which we have now last handled. The nature of the information consisteth of three branches: the limits of the information, the sufficiency of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acquiring or obtaining the information. Unto the limits of the information belong these considerations: how far forth particular persons continue to be inspired; how far forth the Church is inspired; and how far forth

reason may be used; the last point whereof I have noted as deficient. Unto the sufficiency of the information belong two considerations: what points of religion are fundamental, and what perfective, being matter of further building and perfection upon one and the same foundation; and again, how the gradations of light according to the dispensation of times are material to the sufficiency of belief.

（8）神学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那些被赋予或启示的事物，二是赋予的信息或启示的性质。我们的讨论就从第二部分开始，因为这部分与我们最新近谈论的问题密切相关。信息的性质又可分为三类，一是信息的限度，二是信息的充分性，三是信息的获取。对于信息的限度，我们需考虑一下几个问题：个人受到启示的程度如何；教会受到启示的程度如何；理性运用的程度又是如何。其中，我认为最后一点是存有缺陷的。关于信息的充分性，我们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点是宗教的哪些教义是根本性的，哪些又是有所完善的，能在同一也是唯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第二点是不同时期神圣之光的变化对信仰充分性的影响有多大。

(9) Here again I may rather give it in advice than note it as deficient, that the points fundamental, and the points of further perfection only, ought to be with piety and wisdom distinguished; a subject tending to much like end as that I noted before; for as that other were likely to abate the number of controversies, so this is likely to abate the heat of many of them. We see Moses when he saw the Israelite and the Egyptian fight, he did not say, “Why strive you?” but drew his sword and slew the Egyptian; but when he saw the two Israelites fight, he said, “You are brethren, why strive you?” If the point of doctrine be an Egyptian, it must be slain by the sword of the Spirit, and not reconciled; but if it be an Israelite,

though in the wrong, then, “Why strive you?” We see of the fundamental points, our Saviour penneth the league thus, “He that is not with us is against us;” but of points not fundamental, thus, “He that is not against us is with us.” So we see the coat of our Saviour was entire without seam, and so is the doctrine of the *Scriptures* in itself; but the garment of the Church was of divers colours and yet not divided. We see the chaff may and ought to be severed from the corn in the ear, but the tares may not be pulled up from the corn in the field. So as it is a thing of great use well to define what, and of what latitude, those points are which do make men mere aliens and disincorporate from the Church of God.

（9）这里，我并想不提出任何缺陷，只是提出一个建议，即对于那些根本性的及有所完善的教义，我们需要虔诚而精明地加以区分。这一工作的目的类似于我们之前划分理性的目的。一个是为了缓减争议的数量，还有一个则是为了削弱大部分争议。面对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相互斗争，摩西并没有问“你们为什么斗争？”，而是直接拔剑刺死了埃及人。但在看到两个以色列人斗争时，他就问道：“为什么要与自己的同胞斗争？”同样，如果教义的要点如那位埃及人一样，则必须用神灵之剑加以毁灭，而不是加以调和；如果它只是像以色列人，尽管有错，也只需询问，“你们为什么斗争？”我们看到，对于那些根本性的教义，我们的救世主立下盟约：“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而对于非根本性教义，他又说：“不反对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还看到，我们救世主的衣服是无缝的、一体的，《圣经》的教义也如这般。教会的外衣虽然色彩丰富，不过也都是无法分割的。谷壳可以也应当从谷穗上的谷粒分离开来，但稗子却可能无法从地里的谷物中剔除。如果我们能准确定义各种教义，了解它们应用的范围有哪些，又是哪些教义令人们成为彻底的异教徒完全脱离上帝的教会，那将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

(10) For the obtaining of the information, it resteth upon the true and sou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ures* , which are the fountains of the water of life.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are of two sorts: methodical, and solute or at large. For this divine water, which excelleth so much that of Jacob's well, is drawn forth much in the same kind as natural water useth to be out of wells and fountains; either it is first forced up into a cistern, and from thence fetched and derived for use; or else it is drawn and received in buckets and vessels immediately where it springeth. The former sort whereof, though it seem to be the more ready, yet in my judgment is more subject to corrupt. This is that method which hath exhibited unto us the scholastical divinity; whereby divinity hath been reduced into an art, as into a cistern, and the streams of doctrine or positions fetched and derived from thence.

（10）《圣经》是生命之泉的源头，而信息的获得就在于对《圣经》准确而全面的解读。这种解读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井然有序的，一种则是分散笼统的。这种圣泉的价值是雅各的井水远不能比的，不过，对这种泉水的汲取却与获取普通井水或泉水是十分类似的。两者或者都是先将水引入水池，再从之取水利用，或者从源头处直接用水桶或其他容器取水。第一种方法尽管看似更方便于使用，但在我看来却是更易腐臭。而这正是经院神学向我们呈现的方法。依照这种方法，神学已然沦为一门技艺，就像被注入水池之中，而教义或原则的各支流就是从中获取和衍生出来的。

(11) In this men have sought three things, a summary brevity, a compacted strength, and a complete perfection; whereof the two first they fail to find, and the last they ought not to seek. For as to brevity, we see in all summary methods, while men purpose to abridge, they give cause to dilate. For the sum or abridgment by

contraction becometh obscure; the obscurity requireth exposition, and the exposition is deduced into large commentaries, or into commonplaces and titles, which grow to be more vast than the original writings, whence the sum was at first extracted. So we see the volumes of the schoolmen are greater much than the first writings of the fathers, whence the master of the sentences made his sum or collection. So in like manner the volumes of the modern doctors of the civil law exceed those of the ancient jurisconsults, of which Tribonian compiled the digest. So as this course of sums and commentaries is that which doth infallibly make the body of sciences more immense in quantity, and more base in substance.

（11）在这第一种解读方法中，人们主要追求三种状态，一为扼要的简略，二为坚实的力量，三为绝对的完美。对于前两种，人们并没有成功，至于第三种人们则根本不该追求。对于简略，我们看到在一切概略的方法中，人们一旦决意精简，却为扩张详述找到了理由。因为通过缩减内容实现的概括或摘要容易造成意义含糊不清，一旦模糊便需要阐释，这种阐释又要根据大量注释、备忘札记或篇目才能导出。于是，意在精简概述的作品比起原作更加宽泛浩大。那些被称为“句子大师”的经院学者的著述虽只是对先人著作的归纳或收集，却比那些原作的内容繁琐得多。同样，比起古代法学家，现代学者关于罗马法的著述更加庞杂。而特里波尼安早已为这些法典编纂了精要的汇集。因此，概略和注释必然令科学的主体愈加庞大，而其实质则愈加拙劣。

(12) And for strength, it is true that knowledges reduced into exact methods have a show of strength, in that each part seemeth to support and sustain the other; but this is more satisfactory than substantial, like unto buildings which stand by architecture and compaction, which are more subject to ruin than those that are

built more strong in their several parts, though less compacted. But it is plain that the more you recede from your grounds, the weaker do you conclude; and as in nature, the more you remove yourself from particulars, the greater peril of error you do incur; so much more in divinity, the more you recede from the *Scriptures* by inferences and consequences, the more weak and dilute are your positions.

（12）至于坚实的力量，如果说知识可以简化为精准的方法，便可从中展现出一种力量，令各个部分似乎都能相互支撑和支持。不过，这种力量与其说是内容充实的，不如说它有着令人愉悦的外在。这正如一座各部分依靠排列堆积建造起的建筑，比起那些各部分都更为牢固，却没有紧密结合的建筑，它是更易于彻底崩塌的。距离根基越远，作出的论断就越脆弱，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在自然界中，人们越是远离特定事物，就越有犯错的危险。同样，在神学领域，越是运用推论远离《圣经》，人们的观点就越发脆弱。

(13) And as for perfection or completeness in divinity, it is not to be sought, which makes this course of artificial divinity the more suspect. For he that will reduce a knowledge into an art will make it round and uniform; but in divinity many things must be left abrupt, and concluded with this: *O altitudo sapientiæ et scientiæDei!quam incomprehensibilia sunt juducua ejus, et non investigabiles viæ ejus* . So again the apostle saith, Ex parte scimus: and to have the form of a total, where there is but matter for a part, cannot be without supplies by supposition and presumption. And therefore I conclude that the true use of these sums and methods hath place in institutions or introductions preparatory unto knowledge; but in them, or by deducement from them, to handle the main body and substance of a knowledge is in all sciences prejudicial, and in

divinity dangerous.

（13）至于绝对的完美，这并不是用来追求的，否则便会使得那种非自然的神性变得愈加不可信。这是因为，如要将一类知识简化为技艺，就需实现知识的完善和统一；但在神学领域，有着太多不连贯的事物，我们只能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信徒也曾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因此，仅用部分材料架构一个整体，便必须通过假设与推测加以填补。总之，概略与条理的真正效用在知识的初学阶段得到发挥，可作为入门的引导。然而，通过这些概略与条理，或由其推引而出的论断来探索一门知识的主体和实质，这对于所有科学而言都是具有危害的，对神学来说则是充满危险的。

(14) A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ures* solute and at large, there have been divers kinds introduced and devised; some of them rather curious and unsafe than sober and warranted. Notwithstanding, thus much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e *Scriptures* , being given by inspiration and not by human reason, do differ from all other books in the Author, which by consequence doth draw on some difference to be used by the expositor. For the Inditer of them did know four things which no man attains to know; which are—the mysteries of the kingdom of glory, the perfection of the laws of nature, the secrets of the heart of man, and the future succession of all ages. For as to the first it is said, “He that presseth into the light shall be oppressed of the glory.” And again, “No man shall see my face and live.” To the second, “When He prepared the heavens I was present, when by law and compass He enclosed the deep.” To the third, “Neither was it needful that any should bear witness to Him of man, for He knew well what was in man.” And to the last, “From the beginning are known to the Lord all His works.”

（14）至于对《圣经》分散笼统的解读，人们已经介绍和提出了各种方法。其中一些显得十分古怪而无凭无据，距离严谨和可靠甚远。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圣经》是通过启示而非理性传达意义的，它的作者与其他所有著作的作者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对于《圣经》的解说者而言，采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圣经》撰述者了解人们无法知道的四项内容，也就是荣誉天国的神秘、自然法则的完美、人类内心的奥秘、未来时代的演替。对于第一项内容，《圣经》说道，“如果人要强挤入光明之中，他要被荣耀压倒”。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对于第二项内容，《圣经》说，“他立高天，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对于第三点，则说，“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而对最后一点，又说，“从开天辟地以来，上帝的一切工作都是上帝所知道的”。

(15) From the former two of these have been drawn certain senses and expositions of *Scriptures* , which had need be contained within the bounds of sobriety—the one anagogical, and the other philosophical. But as to the former, man is not to prevent his time: *Videmus nunc per speculum inænigmate, tunc autem facie ad faciem* ; wherein nevertheless there seemeth to be a liberty granted, as far forth as the polishing of this glass, or some moderate explication of this enigma. But to press too far into it cannot but cause a dissolution and overthrow of the spirit of man. For in the body there are three degrees of that we receive into it—aliment, medicine, and poison; whereof aliment is that which the nature of man can perfectly alter and overcome; medicine is that which is partly converted by nature, and partly converteth nature; and poison is that which worketh wholly upon nature, without that nature can in any part work upon it. So in the mind, whatsoever knowledge reason cannot at all work upon and convert is a mere

intoxication, and endangereth a dissolution of the mind and understanding.

（15）根据前两项内容，《圣经》已得到了一定的解读和阐释，一种是神秘解释，一种是哲学阐释。人们都应以冷静的头脑适当进行这两种解读，切不可过度。对于第一种，人们不应事前妄加推测，“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这方面具有一定自由度，人们可以磨光镜子，也可以对万物的奥秘给予适当的解说。不过，如果人们过度追究，就只会导致精神的彻底颠覆与瓦解。人类身体可接收三类物品，即食物、药物和毒品。食物可彻底为人的特性所转变和制服；药物可以部分为人的特性所转化，部分改变人的特性；毒品则对人的特性产生全面影响，但人的特性对其却无丝毫作用。至于人类头脑，任何知识如无法运用理性施加影响和加以转变，那便仅是一种毒物，将遭致人类心智和理解的崩溃。

(16) But for the latter, it hath been extremely set on foot of late time by the school of Paracelsus, and some others, that have pretended to find the truth of all natural philosophy in the *Scriptures* ; scandalising and traducing all other philosophy as heathenish and profane. But there is no such enmity between God's Word and His works; neither do they give honour to the *Scriptures* , as they suppose, but much embase them. For to seek heaven and earth in the Word of God, whereof it is said, “Heaven and earth shall pass, but My word shall not pass,” is to seek temporary things amongst eternal: and as to seek divinity in philosophy is to seek the living amongst the dead, so to seek philosophy in divinity is to seek the dead amongst the living: neither are the pots or lavers, whose place was in the outward part of the temple, to be sought in the holiest place of all where the ark of the testimony was seated. And again,

the scope or purpose of the Spirit of God is not to express matters of nature in the *Scriptures* , otherwise than in passage, and for application to man's capacity and to matters moral or divine. And it is a true rule, *Auctoris aliud agentis parva auctoritas* . For it were a strange conclusion, if a man should use a similitude for ornament or illustration sake, borrowed from nature or history according to vulgar conceit, as of a basilisk, a unicorn, a centaur, a Briareus, a hydra, or the like, that therefore he must needs be thought to affirm the matter thereof positively to be true. To conclude therefore these two interpretations, the one by reduction or enigmatical, the other philosophical or physical, which have been received and pursued in imitation of the rabbins and cabalists, are to be confined with a *noli akryn sapere, sed time* .

（16）对于第二种，即哲学阐释，它的盛行主要依赖于后来的帕拉塞尔苏斯及其他学派。他们自称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一切自然哲学的真理，同时又诋毁中伤其他所有学科，称它们为异教，是对神明的亵渎。然而，上帝的圣书与他的作品之间并不存在如此深重的敌意。另一方面，这些学派也未曾令《圣经》得到他们期望的荣耀，反而使其遭受了巨大的贬低。《圣经》中提到，“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么，人们如在《圣经》中寻觅天与地，就等于在永恒事物中寻求短暂的存在。同样，在哲学中寻求神学就意味着在死者之中寻觅活人，而在神学中寻找哲学也等同于在活人中间寻求死者。这正如水罐与洗礼盆应当放于神殿的外部，是不可能在神殿中最神圣的位置找到的，那里是专门用来存放藏经箱的圣地。此外，上帝的神灵并非旨在通过《圣经》透露自然的事物，只不过略带提及，便于人们理解，或是解释一些道德或神学的内容。而且，作者随意带过的一些事，是没有影响力的。这是一条确切不移的准则。如果人们出于修饰或阐述的目的而运用比喻的手法，借用自然或历史中一些通俗的想法，如蛇怪、独角兽、半人马座、百手巨人、九头蛇等等，那他们就必须证实这些事物都是确实存在的，这样得出的结论会多么不可思

议。综上所述，对《圣经》的这两种解读，一种是还原或神秘化，一种是哲学或物理学的阐释。这样的解读都是模仿犹太拉比和秘术家们的做法，然而这样的做法具有局限性，它“不能用来了解深奥之物，只能让人产生畏惧”。

(17) But the two latter points, known to God and unknown to man, touching the secrets of the heart and the successions of time, doth make a just and sou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nner of the exposition of the *Scriptures* and all other books. For it is an excellent observation which hath been made upon the answers of our Saviour Christ to many of the questions which were propounded to Him, how that they are impertinent to the state of the question demanded: the reason whereof is, because not being like man, which knows man's thoughts by his words, but knowing man's thoughts immediately, He never answered their words, but their thoughts. Much in the like manner it is with the *Scriptures* , which being written to the thoughts of men, and to the succession of all ages, with a foresight of all heresies, contradictions, differing estates of the Church, yea, and particularly of the elect, are not to be interpreted only according to the latitude of the proper sense of the place, and respectively towards that present occasion whereupon the words were uttered, or in precise congruity or contexture with the words before or after, or in contemplation of the principal scope of the place; but have in themselves, not only totally or collectively, but distributively in clauses and words, infinite springs and streams of doctrine to water the Church in every part. And therefore as the literal sense is, as it were, the main stream or river, so the moral sense chiefly, and sometimes the allegorical or typical, are they whereof the Church hath most use; not that I wish men to be bold in allegories, or indulgent or light in allusions: but that I do much condemn that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ure which is only after the manner as men use to interpret a profane book.

（17）至于后两项内容，即人心的奥秘和时代的演替，这些信息都是人类无法获得的，唯有上帝一清二楚。在这两点上，《圣经》的解说方式与其他著作存在着正当合理的差别。人们已精明地观察到，我们的救世主基督耶稣在回答问题时，经常答非所问，这是由于他不同于一般人，一般人只能通过对方的言辞了解他的想法，但基督耶稣却能一眼看穿对方心思。因此，他从来不回答人们的言辞，而是回应他们的内心想法。同样，《圣经》也是是针对人们的思想和各时代的接替延续而作的。在这些方面，它预见到了一切的异端、矛盾、教会的不同状态，特别是上帝的选民。因此，对《圣经》的解读并不仅仅依赖于文辞的固有意义，言辞的特定语境，文章脉络的精确结构与一致，以及对主要论述内容的思索；而且，人们应在了解《圣经》整体意义的同时，注意其中单独的句子或短语，从中寻找教义的无尽源泉，用来浇灌教会的方方面面。从字面意思理解，这的确指主要的溪流与河道，不过在教会之中，最常运用的主要是其道德含义，有时还有其寓意或象征性的意义。我并不是希望人们乱用寓言，滥用暗指，只是对于仅用解读世俗作品的方式阐释《圣经》这种做法，我必须进行谴责。

(18) In this part touching the exposition of the *Scriptures* , I can report no deficiency; but by way of remembrance this I will add. In perusing books of divinity I find many books of controversies, and many of commonplaces and treatises, a mass of positive divinity, as it is made an art: a number of sermons and lectures, and many prolix commentaries upon the *Scriptures* , with harmonies and concordances. But that form of writing in divinity which in my judgment is of all others most rich and precious is positive divinity, collected upon particular texts of *Scriptures* in brief observations;

not dilated into commonplaces, not chasing after controversies, not reduced into method of art; a thing abounding in sermons, which will vanish, but defective in books which will remain, and a thing wherein this age excelleth. For I am persuaded, and I may speak it with an *absit invidia verbo* , and nowise in derogation of antiquity, but as in a good emulation between the vine and the olive, that if the choice and best of those observations upon texts of Scriptures which have been made dispersedly in sermons within this your Majesty's Island of Brittany by the space of these forty years and more (leaving out the largeness of exhortations and applications thereupon) had been set down in a continuance, it had been the best work in divinity which had been written since the Apostles' times.

（18）在《圣经》的解读上，我并没有发现什么缺陷，但是我还是要凭借记忆来补充几句。在研读一些神学作品后，我发现很多作品记述各类辩争，很多则是一些札记和条约，还充斥着大量神谕，这似乎希望将神学转化为一门技艺，其中充满啰嗦的说教和训诫，对《圣经》冗长的注解，包括各种对照和索引等。不过依我判断，在所有神学作品中，启示神学是内容最丰富，也是最珍贵的一种形式。它们集中对《圣经》中的特定经文进行简洁评述，但并不会扩充至一部札记，也不会追求各种论辩，更不会将神学简化为一门技艺。如果是一部充满冗长说教的作品，最终无法逃脱销声匿迹的命运，不像撰写成书那样，可以永世流传。当今时代便善于运用这样的形式。我已然相信，撇开那些广博的训导与劝诫，在过去四十多年间陛下统治下的不列颠岛上，人们对《圣经》的文本进行了筛选和出色的评述，分散于各种布道说教之中，如这些评述能加以整合连贯，必然成为自早期使徒时代以来最优秀的神学作品。我这样说绝对无意冒犯他人，也毫无贬损古人作品的意思，只不过是葡萄与橄榄之间的良性竞争而已。

(19) The matter informed by divinity is of two kinds: matter of belief and truth of opinion, and matter of service and adoration; which is also judged and directed by the former—the one being as the internal soul of religion, and the other as the external body thereof. And, therefore, the heathen religion was not only a worship of idols, but the whole religion was an idol in itself; for it had no soul; that is, no certainty of belief or confession: as a man may well think, considering the chief doctors of their church were the poets; and the reason was because the heathen gods were no jealous gods, but were glad to be admitted into part, as they had reason. Neither did they respect the pureness of heart, so they might have external honour and rites.

（19）神学向我们展现了两方面内容，一为信仰与信念，二为侍奉与崇拜。前者是宗教的内在灵魂，后者是宗教的外在躯体，而后者又受到前者的鉴定和引导。因此，异教不仅仅是崇拜偶像，其宗教本身就是一个偶像。它没有灵魂，没有固定的信仰或教义。对于其中的权威神学家，人们完全可称其为诗人，因为异教的神灵并不爱嫉妒，他们乐于和众神共享尊荣，好像他们具有理性似的。同样，异教徒并不尊崇内心的纯粹，尽管他们也可能具有外在的荣耀与礼法。

(20) But out of these two do result and issue four main branches of divinity: faith, manners, liturgy, and government. Faith containeth the doctrine of the nature of God, of the attributes of God, and of the works of God. The nature of God consisteth of three persons in unity of Godhead. The attributes of God are either common to the Deity, or respective to the persons. The works of God summary are two, that of the creation and that of the redemption; and both these works, as in total they appertain to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so in their parts they refer to the three

persons: that of the creation, in the mass of the matter, to the Father; in the disposition of the form, to the Son; and in the continuance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being, to the Holy Spirit. So that of the redemption, in the election and counsel, to the Father; in the whole act and consummation, to the Son; and in the application, to the Holy Spirit; for by the Holy Ghost was Christ conceived in flesh, and by the Holy Ghost are the elect regenerate in spirit. This work likewise we consider either effectually, in the elect; or privately, in the reprobate; or according to appearance, in the visible Church.

（20）根据以上两方面内容，神学可生发四个主要分支，即信仰、礼法、礼拜仪式、管理。信仰涵盖了上帝本性、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工作这三方面的教义。上帝的本性即三位一体。上帝的属性或是神灵共有的，或是个体所特有的。上帝的工作可概括为两类，一为创造，二为救赎。从整体上而言，这两类工作都统一于上帝，但拆分开来，则成为三个独立的个体。其中，圣父创造万物，圣子安排万物的形式，圣灵则延续和维持万物。在救赎方面，圣父负责选择与建议，圣子负责完成整体救赎，圣灵则负责实行救赎。同时，圣灵孕育了耶稣基督的肉身，又令上帝选民的灵魂得以重生。我们认为，这样的工作对选民而言，是行之有效的，但对被神遗弃的人而言，作用是无法显露的。而其外在形态便体现于有形的教会之中。

(21) For manners, the doctrine thereof is contained in the law, which discloseth sin. The law itself is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edition thereof, into the law of nature, the law moral, and the law positive; and according to the style, into negative and affirmative, prohibitions and commandments. Sin, in the matter and subject thereof, is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commandments; in the form thereof it referreth to the three persons in Deity: sins of infirmity

against the Father, whose more special attribute is power; sins of ignorance against the Son, whose attribute is wisdom; and sins of malice against the Holy Ghost, whose attribute is grace or love. In the motions of it, it either moveth to the right hand or to the left; either to blind devotion or to profane and libertine transgression; either in imposing restraint where God granteth liberty, or in taking liberty where God imposeth restraint. In the degrees and progress of it, it divideth itself into thought, word, or act. And in this part I commend much the deducing of the law of God to cases of conscience; for that I take indeed to be a breaking, and not exhibiting whole of the bread of life. But that which quickeneth both these doctrines of faith and manners is the elevation and consent of the heart; whereunto appertain books of exhortation, holy meditation, Christian resolution, and the like.

（21）礼法方面的教义包含在揭露罪恶的戒律之中。依据其来源，这些戒律可分为自然的、道德的和纯粹绝对的三个方面；依据其类型，又可分为否定与肯定，或者禁止与戒律两个方面。罪恶的实质和内容根据戒律进行划分，而其形式则分别对应于三位一体中的三个位格。圣父象征着权力，因而懦弱是对圣父的不敬；圣子代表着智慧，无知便是违背了圣子；圣灵意味着慈悲与仁爱，因此怨恨就是对圣灵犯下的罪恶。罪恶的实施不是偏离右侧，就是偏离左侧；或是盲目的奉献，或是不敬的忤逆和放纵；有时在上帝赋予自由之处强加限制，有时又在上帝禁止之处肆意妄为。罪恶的程度和发展可分为思想、言辞和行为三个方面。在这一方面，我强烈推荐运用自身的良心来推知上帝的戒律。因为在我看来，上帝的戒律其实只是一种启迪，无法全面展现生活的一切需求。要赋予有关信仰和礼法的教义以更多的活力，人们就应致力于心灵的升华与和谐。为实现这一点，人们可以学习有关训诫的著述，进行圣洁的冥想，或是立下基督徒的决心等等。

(22) For the liturgy or service, it consisteth of the reciprocal acts between God and man; which, on the part of God, are the preaching of the word, and the sacraments, which are seals to the covenant, or as the visible word; and on the part of man, invocation of the name of God; and under the law, sacrifices; which were as visible prayers or confessions: but now the adoration being *in spiritu et veritate* , there remaineth only *vituli labiorum* ; although the use of holy vows of thankfulness and retribution may be accounted also as sealed petitions.

（22）礼拜仪式或侍奉由上帝与人类之间交互的行为构成。一方面，上帝要求宣扬教义，并用圣礼象征双方的圣约，又或作为看得见的承诺；另一方面，人类需向上帝祈愿，并遵循戒律向上帝献祭，这也可称为一种看得见的祈祷或忏悔。但如今，尽管这些神圣的誓约仍然用来感恩和惩罚等，而且这种方式还是可称为明确的祈愿，但这种崇拜已全然成为一种精神和诚意，只剩下口头的牛犊了。

(23) And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Church, it consisteth of the patrimony of the Church, the franchises of the Church, and the offices and jurisdictions of the Church, and the laws of the Church directing the whole; all which have two considerations, the one in themselves, the other how they stand compatible and agreeable to the civil estate.

（23）教会的管理主要包括教会财产、特权、各部门与权限分配、管理整个教会的法律等。对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是对这些方面本身的研究，第二则是探讨它们如何与整个社会的状态相调或适应。

(24) This matter of divinity is handled either in form of instruction of truth, or in form of confutation of falsehood. The declinations from religion, besides the privative, which is atheism and the branches thereof, are three—heresies, idolatry, and witchcraft: heresies, when we serve the true God with a false worship; idolatry, when we worship false gods, supposing them to be true; and witchcraft, when we adore false gods, knowing them to be wicked and false. For so your Majesty doth excellently well observe, that witchcraft is the height of idolatry. And yet we see though these be true degrees, Samuel teacheth us that they are all of a nature, when there is once a receding from the Word of God; for so he saith, *Quasi peccatum ariolandi est repugnare, et quasi scelus idololatriæ nolle acquiescere* .

（24）研究神学可采用两种形式，一为教授真理，二为驳斥谬误。除了彻底否定的无神论及其分支之外，背离宗教的形式还有三种，即宗教异端、偶像崇拜和巫术崇拜。宗教异端是指对真正上帝的虚伪崇拜；偶像崇拜是指崇拜虚假的神明，将它们视作真正的神明；巫术崇拜则是明知那些神明是邪恶而虚假的，仍然把它们奉为神明并加以崇拜。陛下非常明智，早已察觉巫术就是极端的偶像崇拜。不过我们看到，尽管这些对宗教的背离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但正如先知撒母耳教导我们的那样，只要偏离了《圣经》，其性质都是一样的。塞缪尔是这样说的："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25) These things I have passed over so briefly because I can report no deficiency concerning them: for I can find no space or ground that lieth vacant and unsown in the matter of divinity, so diligent have men been either in sowing of good seed, or in sowing of tares. Thus have I made as it were a small globe of the

intellectual world, as truly and faithfully as I could discover; with a note and description of those parts which seem to me not constantly occupate, or not well converted by the labour of man. In which, if I have in any point receded from that which is commonly received, it hath been with a purpose of proceeding *in melius* , and not *in aliud* ; a mind of amendment and proficiency, and not of change and difference. For I could not be true and constant to the argument I handle if I were not willing to go beyond others; but yet not more willing than to have others go beyond me again: which may the better appear by this, that I have propounded my opinions naked and unarmed, not seeking to preoccupate the liberty of men's judgments by confutations. For in anything which is well set down, I am in good hope that if the first reading move an objection, the second reading will make an answer. And in those things wherein I have erred, I am sure I have not prejudiced the right by litigious arguments; which certainly have this contrary effect and operation, that they add authority to error, and destroy the authority of that which is well invented. For question is an honour and preferment to falsehood, as on the other side it is a repulse to truth. But the errors I claim and challenge to myself as mine own. The good, it any be, is due *tanquam adeps sacrificii* , to be incensed to the honour, first of the Divine Majesty, and next of your Majesty, to whom on earth I am most bounden.

（25）这些问题我并不细加阐述，因为这些方面并不存在缺陷。在神学领域，并不存在未经开垦的荒芜之地，不论人们播下的是优质种子还是稗子，人们都在勤勤恳恳地劳作。至此，我已经尽我所能，忠实诚恳地为知识世界营造了一个小球体。其中，有对人们不常涉及的知识，还有对人们辛勤开垦却没有彻底改变的部分的描述。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我的任何观点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存在差异，那是因为我的目的在于做得更好，并非标新立异；在于修正和完善，并非改

革与出奇。如我无意超越他人，那我便不会忠实坚定地进行论述。但我更希望之后又有人能超越于我。我这样说或许会更加清楚明白，我提出的观点都是非常直白、不加掩饰和防备的，也没有运用驳斥的方式先入为主影响人们的判断。在人们在首次阅读我所论述的所有有效内容时，如果存在异议，我衷心希望他们在第二遍阅读之后就能找到答案。同时，对于其中存在的错误，我着实未曾心有不甘，意欲运用大量论争来驳斥正确的观点。这样做就是为错误开脱，又有损现有正确理论的权威性，因而只会产生反向作用。为错误的观点辩护就是对其的推崇和偏爱，这就如同对真理的质疑是对其的驳斥一样。不过，文责自负，对于该书中出现的错误我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书中有任何有用内容，就应如献祭的油脂一般，首先献给上帝，同时也献于陛下，您是世上给我最大恩宠的人。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人口论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英]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人口论（英汉对照）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马尔萨斯 著

张大川 译

目 录

- PREFACE 序言
- CHAPTER 1 第一章
- CHAPTER 2 第二章
- CHAPTER 3 第三章
- CHAPTER 4 第四章
- CHAPTER 5 第五章
- CHAPTER 6 第六章
- CHAPTER 7 第七章
- CHAPTER 8 第八章
- CHAPTER 9 第九章
- CHAPTER 10 第十章
-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 CHAPTER 14 第十四章
- CHAPTER 15 第十五章
- CHAPTER 16 第十六章
- CHAPTER 17 第十七章
- CHAPTER 18 第十八章
- CHAPTER 19 第十九章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REFACE

序言

The following Essay owes its origin to a conversation with a friend, on the subject of Mr. Godwin's Essay on avarice and profusion, in his Enquirer. The discussion started the general question of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and the Author at first sat down with an intention of merely stating his thoughts to his friend, upon paper, in a clearer manner than he thought he could do in conversation. But as the subject opened upon him, some ideas occurred, which he did not recollect to have met with before; and as he conceived, that every, the least light, on a topic so generally interesting, might be received with candour, he determined to put his thoughts in a form for publication.

本书缘起于与一位朋友的谈话，话题是戈德温先生所著《探求者》谈贪欲和奢侈的文章。我们首先谈到了今后完善社会这个大问题。笔者最初伏案执笔，只是觉得谈话时自己口头表达未能尽意，不如形诸纸上，把想法向朋友讲述清楚。但是，当主题展开时，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思绪和想法纷纷跃入脑际。笔者想，既然这个话题大家很感兴趣，个人的见解即便微不足道，也许还是会受到真诚的欢迎，于是决意把自己的想法连缀成册，公之于众。

The Essay might, undoubtedly, have been rendered much more complete by a collection of a greater number of facts in elucidation of the general argument. But a long and almost total interruption, from very particular business, joined to a desire (perhaps

imprudent) of not delaying the publication much beyond the time that he originally proposed, prevented the Author from giving to the subject an undivided attention. He presumes, however, that the facts which he has adduced, will be found, to form no inconsiderable evidence for the truth of his opinion respecting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mankind. As the Author contemplates this opinion at present, little more appears to him to be necessary than a plain statement, in addition to the most cursory view of society, to establish it.

如果能多收集一些事实来阐明主旨，想必本书会比现在完备得多。但因杂事缠身，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完全搁笔，而笔者又不愿将原定的发表时间推迟太久（也许这样做不够慎重），致使笔者对本课题的钻研用心不够。不过笔者以为，在此引证的事实足以证明笔者关于人类未来进步的观点是正确的。笔者现在审视这个观点，感觉在对社会有了粗略的观察之后，只要平铺直叙地证实它就够了。

It is an obvious truth, which has been taken notice of by many writers, that population must always be kept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but no writer that the Author recollects, has inquired particularly into the means by which this level is effected: and it is a view of these means, which forms, to his mind, the strongest obstacle in the way to any very great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He hopes it will appear that, in the discussion of this interesting subject, he is actuated solely by a love of truth; and not by any prejudices against any particular set of men, or of opinions. He professes to have read some of the speculations on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in a temper very different from a wish to find them visionary; but he has not acquired that command over his understanding which would enable

him to believe what he wishes, without evidence, or to refuse his assent to what might be unpleasing, when accompanied with evidence.

许多作家已经注意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人口必须控制在生活资料的许可水平之内。可是，对于这一水平是如何形成的问题，笔者发现迄今尚未有著述者做过详尽的研究，而笔者以为该问题正是社会未来进步的最大障碍。因而笔者希望读者能够体会到，笔者讨论这个有趣的话题仅仅是因为热爱真理，而非对任何特定的人群或观点抱有偏见。笔者坦言曾看过一些有关社会未来进步的预测。笔者本无意证明其空想性，可看完后发现自己怎么也无法理解“即使无凭无据，也相信自己的愿望；抑或即使证据确凿，若可能令人不快，也矢口否认”的做法。

The view which he has given of human life has a melancholy hue; but he feels conscious, that he has drawn these dark tints, from a conviction that they are really in the picture; and not from a jaundiced eye, or an inherent spleen of disposition. The theory of mind which he has sketched in the two last chapters, accounts to his own understanding, in a satisfactory manner, for the existence of most of the evils of life; but whether it will have the same effect upon others must be left to the judgement of his readers.

笔者虽然对人类生活抱有一丝悲观色彩，但却明白自己绘画出暗黑色调是因为坚信它们确实存在于现实这幅画图之中，而不是因为愤世嫉俗或生性忧郁。本书最后两章概述了精神理论，清楚地叙述了笔者对生活中所存弊病的浅陋之见。他人是否有同感，还须留待读者雅鉴。

If he should succeed in drawing the attention of more able men, to what he conceives to be the principal difficulty in the way to th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and should, in consequence, see this difficulty removed, even in theory, he will gladly retract his present opinions, and rejoice in a conviction of his error.

倘若笔者能使更多的俊才能人注意到其所想见的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困难，并且由此看到这种困难得以解决，哪怕是理论上的解决，笔者会欣然撤回现在的看法，乐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June7, 1798

1798年6月7日

CHAPTER 1

第一章

Question stated.—Little prospect of a determination of it, from the enmity of the opposing parties.—The principal argument against 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 and of society has never been fairly answered.—Nature of the difficulty arising from population.—Outline of the principal argument of the Essay.

问题的提出——对立双方针锋相对，使该问题几乎没有一锤定音的可能——人与社会有可完善性这一基本论点尚未得到恰当回应——人口问题产生的难题的性质——本书基本论点的简述。

The great and unlooked for discoveri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of late years in natural philosophy; the increasing diffusion of general knowledge from the extension of the art of printing; the ardent and unshackled spirit of inquiry that prevails throughout the lettered, and even unlettered world; the new and extraordinary lights that have been thrown on political subjects, which dazzle, and astonish the understanding; and particularly that tremendous phenomenon in the political horiz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which, like a blazing comet, seems destined either to inspire with fresh life and vigour, or to scorch up and destroy the shrinking inhabitants of the earth, have all concurred to lead many able men into the opinion, that we were touching on a period big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changes, changes that would in some measure be decisive of the future fate of mankind.

近年来自然哲学的伟大发现出人意料、层出不穷，印刷术的普及加快了一般知识的传播，而锐意执著、挣脱枷锁的探索精神也在整个知识界乃至非知识界蔚然成风。在政治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令头晕目眩、振聋发聩的新奇见解，尤其是政治领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法国大革命，它犹如一颗炽热的彗星，似乎注定要给地球上畏缩不前的栖居者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或者将他们烧尽焚毁。所有这一切让许多有识之士一致认为，我们正在跨入一个充满重大变革的时期，这些变革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类的未来命运。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great question is now at issue, whether man shall henceforth start forwards with accelerated velocity towards illimitable, and hitherto unconceived improvement; or be condemned to a perpetual oscillation between happiness and misery, and after every effort remain still at an immeasurable distance from the wished-for goal.

据说，当前议论的重大问题是：人类今后是将加速前进、奔向无限的且迄今尚无人想见的美好前景呢，还是注定要始终徘徊在幸福和痛苦之间，即使在做出各种努力后仍然距离希望实现的目标无限遥远？

Yet, anxiously as every friend of mankind must look forwards to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painful suspense; and eagerly as the inquiring mind would hail every ray of light that might assist its view into futurity, it is much to be lamented that the writers on each side of this momentous question still keep far aloof from each other. Their mutual arguments do not meet with a candid examination. The question is not brought to rest on fewer points,

and even in theory scarcely seems to be approaching to a decision.

然而，尽管每一位人类朋友都急切地盼望结束这种令人痛苦的悬而未决的状态，尽管苦苦求索的人会热切地为每一缕有利于洞悉未来的光亮而欢呼，但让人哀叹的是，对这一重大议题各执己见的两派文人墨客们仍然水火不容。他们从未心平气和地思考对方的论点。对该问题的几点见解尚未达成一致，即便从理论角度看，好像也没有得出结论的迹象。

The advocate for the present order of things, is apt to treat the sect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ers, either as a set of artful and designing knaves, who preach up ardent benevolence, and draw captivating pictures of a happier state of society, only the better to enable them to destroy the present establishments, and to forward their own deep-laid schemes of ambition; or, as wild and mad-headed enthusiasts, whose silly speculations, and absurd paradoxes, are not worthy the attention of any reasonable man.

拥护现存秩序的一方往往把思辨哲学家一派当成一群耍阴谋诡计的无赖，认定他们鼓吹乐善好施，描绘一幅幅迷人的美好社会图景，只是为了便于他们摧毁现有的制度，便于实现其不可告人的野心计划；或者，把他们看作疯狂的、头脑有毛病的狂热分子，认为他们愚昧的推测和荒谬的悖论不值得理性之人去关注。

The advocate for 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 and of society, retorts on the defender of establishments a more than equal contempt. He brands him as the slave of the most miserable and narrow prejudices; or, as the defender of the abuses of civil society

only because he profits by them. He paints him either as a character who prostitutes his understanding to his interest; or as one whose powers of mind are not of a size to grasp any thing great and noble; who cannot see above five yards before him; and who must therefore be utterly unable to take in the views of the enlightened benefactor of mankind.

拥护人与社会具有可完善性的一方以眼还眼，还以更蔑视的态度。他们用更轻蔑的言词予以反击，骂他们作了最为可鄙、最为狭隘的偏见的奴隶，骂他们为社会弊端辩护是因为从那些弊端里捞到了好处；还说他们或是为了一己之利而自辱其智，或是原本就智力低下无法理解伟大高尚的事物，由于目光短浅都看不到五码以外的地方，也就绝对不能接受博学多识人士的见解。

In this unamicable contest, the cause of truth cannot but suffer. The really good arguments on each side of the question are not allowed to have their proper weight. Each pursues his own theory, little solicitous to correct, or improve it, by an attention to what is advanced by his opponents.

在这种充满敌意的争论中，真理事业只会受到伤害。争论双方即使有真知灼见，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各方都固执己见，不肯认真了解对手提出的观点和看法，遑论借以修正和改进自己的理论。

The friend of the present order of things condemns all political speculations in the gross. He will not even condescend to examine the grounds from which the perfectibility of society is inferred. Much less will he give himself the trouble in a fair and candid

manner to attempt an exposition of their fallacy.

现行秩序的盟友不分青红皂白，谴责一切政治思辨，甚至不肯屈尊研究一下社会可完善理论的根据，更不愿意本着一种公平坦诚的态度，花一些工夫，揭露它们的荒谬之处。

The speculative philosopher equally offends against the cause of truth. With eyes fixed on a happier state of society, the blessings of which he paints in the most captivating colours, he allows himself to indulge in the most bitter invectives against every present establishment, without applying his talents to consider the best and safest means of removing abuses, and without seeming to be aware of the tremendous obstacles that threaten, even in theory, to oppose the progress of man towards perfection.

思辨哲学家同样做着有悖于求真求是的事情。他们两眼只盯着美好社会，用最迷人的色彩描绘着美好社会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同时用最恶毒的语言肆无忌惮地谩骂一切现有秩序，而不屑动用自己的才智去思考消除弊端最佳的且最稳妥的方法，似乎也没有意识到有一些巨大的障碍阻挡着人类的自我完善进程，甚至在理论上也存在这些障碍。

It is an acknowledged truth in philosophy, that a just theory will always be confirmed by experiment. Yet so much friction, and so many minute circumstances occur in practice, which it is next to impossible for the most enlarged and penetrating mind to foresee, that on few subjects can any theory be pronounced just, till all the arguments against it, have been maturely weighed, and clearly and

consistently refuted.

哲学上有一条公认的真理：正确的理论总是要靠实验加以验证。但实际之中的矛盾冲突如此之多，琐碎小事如此纷繁复杂，这些就连学识最广博、最富有洞察力的人也几乎不可能预见到，因而只有充分斟酌各种反对论据并给予条理清晰、逻辑连贯的驳斥之后，才能说某一主题的理论是正确的。

I have read some of the speculations on 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 and of society, with great pleasure. I have been warmed and delighted with the enchanting picture which they hold forth. I ardently wish for such happy improvements. But I see great, and, to my understanding, unconquerable difficulties in the way to them. These difficulties it is my present purpose to state; declaring, at the same time, that so far from exulting in them, as a cause of triumph over the friends of innovation, nothing would give me greater pleasure than to see them completely removed.

我曾怀着极大的兴趣研读过一些关于人与社会的可完善性的论述。这些论述描绘的图景十分诱人，令我颇为兴奋和愉快。我热切希望这些令人幸福的改善能够实现。不过在我看来，在实现改善的路途上还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正是本文旨在说明的，但同时我还要声明：虽然这些困难是摧垮革新派的一个因素，但我对之并无丝毫欣喜，恰恰相反，看到这些困难被全部消除才是最让我高兴的。

The most important argument that I shall adduce is certainly not new.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it depends have been explained in part by Hume, and more at large by Dr. Adam Smith. It has been

advanced and applied to the present subject, though not with its proper weight, or in the most forcible point of view, by Mr. Wallace: and it may probably have been stated by many writers that I have never met with. I should certainly therefore not think of advancing it again, though I mean to place it in a point of view in some degree different from any that I have hitherto seen, if it had ever been fairly and satisfactorily answered.

当然，我要提出的最重要的论点并不新鲜。它的原理依据一部分已经由大卫·休谟做出阐释，更有亚当·斯密博士提出了详论。华莱士先生也曾提出过这个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尽管用得不是恰到好处，或者说没有站在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角度去应用它。也许还有许多著述者都提出过这个论点，只是我不曾结识他们。所以，如果有人已经就这个问题做出公正圆满的回答，我便不再考虑旧话重提，虽然我打算从一个与我以往所见略有不同的角度来提出。

The cause of this neglect on the part of the advocates for 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kind is not easily accounted for. I cannot doubt the talents of such men as Godwin and Condorcet. I am unwilling to doubt their candour. To my understanding, and probably to that of most others, the difficulty appears insurmountable. Yet these men of acknowledged ability and penetration, scarcely deign to notice it, and hold on their course in such speculations, with unabated ardour, and undiminished confidence. I have certainly no right to say that they purposely shut their eyes to such arguments. I ought rather to doubt the validity of them, when neglected by such men, however forcibly their truth may strike my own mind. Yet in this respect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at we are all of us too prone to err. If I saw a glass of wine repeatedly presented to a man, and he took no notice of it, I should be apt to think that he was blind or

uncivil. A juster philosophy might teach me rather to think that my eyes deceived me, and that the offer was not really what I conceived it to be.

人类可完善性的拥护者为何会忽略这个论点，这不大容易解释清楚。我不能怀疑像葛德文和孔多塞这样的人的才智，也不愿怀疑他们的真诚。我以为这种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也许其他大多数人也这么看。不过，这些被公认为才智超群、目光犀利的人并不屑于理会这一困难，他们在思考时坚持自己的思路，热情不衰，信心不减。我当然无权说他们是有意对这种论点视而不见。反之，如果连这些人都忽视这种论点的话，则无论它们的真实性多么打动我，我都应该怀疑它们的正确性。不过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大家都很容易犯错。如果我看见有人频频向一个人敬酒，这个人却没有注意到的话，那我自然会认为他是个瞎子或者不懂礼貌。但比较公正的哲学也许会告诫我要相信是自己的眼睛欺骗了自己，那奉上的酒其实并不是我想象的敬酒。

In entering upon the argument I must premise that I put out of the question, at present, all mere conjectures: that is, all suppositions, the probable realization of which cannot be inferred upon any just philosophical grounds. A writer may tell me that he thinks man will ultimately become an ostrich. I cannot properly contradict him. But before he can expect to bring any reasonable person over to his opinion, he ought to shew, that the necks of mankind have been gradually elongating; that the lips have grown harder and more prominent; that the legs and feet are daily altering their shape; and that the hair is beginning to change into stubs of feathers. And till the probability of so wonderful a conversion can be shewn, it is surely lost time and lost eloquence to expatiate on the happiness of man in such a state; to describe his powers, both of

running and flying; to paint him in a condition where all narrow luxuries would be contemned; where he would be employed only in collecting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and where, consequently, each man's share of labour would be light, and his portion of leisure ample.

在讨论这一论点之前，我必须预先声明，目前我不可能提出所有纯粹的推测，意即所有的假设，这些猜想的实现无法根据任何正确的哲学基础推断出来。某个作者也许会对我说，他认为人最终将变成鸵鸟。我无法恰当地反驳他。但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看法，除非他能证明人类的脖子在逐渐变长，嘴唇在逐渐变硬且越来越突出，腿和脚的形状每天都在改变，头发开始变成毛管。在能证明人类有可能发生如此奇异的转变之前，就细说他们变成鸵鸟会多么幸福，描述他们奔跑和飞翔的力量，描绘他们所处的环境鄙视一切琐碎小气的奢侈品，个人只需采集生活必需品，这样每个人承担的劳动量会比较小，所享受的闲暇也会比较充裕，那这一切肯定都是浪费时间，白费唇舌。

I think I may fairly make two postulata.

我认为我可以适当提出两条公理。

First, that food is necessary to the existence of man.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Secondly, that the passion between the sexes is necessary, and will remain nearly in its present state.

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要的，并且会基本保持现状。

These two laws ever since we have had any knowledge of mankind, appear to have been fixed laws of our nature; and, as we have not hitherto seen any alteration in them, we have no right to conclude that they will ever cease to be what they now are, without an immediate act of power in that being who first arranged the system of the universe; and for the advantage of his creatures, still executes, according to fixed laws, all its various operations.

自从我们对人类有所了解以来，这两条法则似乎一直是人类本性的法则。既然迄今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两条法则发生任何改变，也就无权断言它们日后将会发生变化，除非最初安排宇宙体系的上帝即刻施展神力进行干预，而眼下上帝为了其创造物的利益，仍然按照固定法则操纵着宇宙的一切动静行止。

I do not know that any writer has supposed that on this earth man will ultimately be able to live without food. But Mr. Godwin has conjectured that the passion between the sexes may in time be extinguished. As, however, he calls this part of his work, a deviation into the land of conjecture, I will not dwell longer upon it at present, than to say, that the best arguments for 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 are drawn from a contemplation of the great progress that he has already made from the savage state, and the difficulty of saying where he is to stop. But towards the extinction of the passion

between the sexes, no progress whatever has hitherto been made. It appears to exist in as much force at present as it did two thousand or four thousand years ago. There are individual exceptions now as there always have been. But, as these exceptions do not appear to increase in number, it would surely be a very unphilosophical mode of arguing, to infer merely from the existence of an exception, that the exception would, in time, become the rule, and the rule the exception.

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位著述者设想过地球上的人类不吃食物最终也能存活下去。但是葛德文先生推测，两性之间的情欲总有一天会消除。不过，他称自己的这一部分著述偏离到了想象猜测的境地，目前我不会对此多做评论，我只想说人类可完善性的最好论据是由两点思考得来的：一是人类已摆脱野蛮状态，取得了巨大进步；二是很难说人类将会发展到何种状态。至于消除两性间的情欲，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进展。如今，两性间的情欲依然像两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样有效地存在着。个例一直存在，现在也不例外。但是，这些个例的数量似乎并没有增加，因而仅仅根据现存的某一例外就推断假以时日个例会变成规则而规则也会变成个例，那肯定是一种非常欠缺哲学意识的论辩方式。

Assuming then my postulata as granted, I say, that the power of population is indefinitely greater than the power in the earth to produce subsistence for man.

倘若上述两条公理得到认可，我可以说，人口的繁育力绝对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

Population, when unchecked, increases in a geometrical ratio. Subsistence increases only in an arithmetical ratio. A slight acquaintance with numbers will shew the immensity of the first power in comparison of the second.

人口若不加以约束，就会以几何比率增长，而生活资料只会按算术比率增长。稍通算术就能算出来，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是多么巨大。

By that law of our nature which makes food necessary to the life of man, the effects of these two unequal powers must be kept equal.

人类本性法则规定食物是人类的生活必需品。根据这一法则，上述两种不对等的力量所产生的效应必须保持对等。

This implies a strong and constantly operating check on population from the difficulty of subsistence. This difficulty must fall somewhere; and must necessarily be severely felt by a large portion of mankind.

这意味着，生存困难始终会对人口构成一种很强的抑制作用。世界某处肯定会感受到生存的困难，而大部分人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

Through the animal and vegetable kingdoms, nature has scattered the seeds of life abroad with the most profuse and liberal

hand. She has been comparatively sparing in the room, and the nourishment necessary to rear them. The germs of existence contained in this spot of earth, with ample food, and ample room to expand in, would fill millions of worlds in the course of a few thousand years. Necessity, that imperious all pervading law of nature, restrains them within the prescribed bounds. The race of plants and the race of animals shrink under this great restrictive law. And the race of man cannot, by any efforts of reason, escape from it. Among plants and animals its effects are waste of seed, sickness, and premature death. Among mankind, misery and vice. The former, misery, is an absolutely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it. Vice is a highly probable consequence, and we therefore see it abundantly prevail; but it ought not, perhaps, to be called an absolutely necessary consequence. The ordeal of virtue is to resist all temptation to evil.

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在动物界和植物界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在给予培养种子所需的空间和养分时却相对吝啬。地球所包含的生命菌种，如果有充足的食物和空间供其繁殖，经过几千年之后，想必会填满几百万个天体。但是，自然规律——这个专横的、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将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植物类和动物类都会被这个伟大的约束性法则限制；人类虽付出理性的努力，却也无法逃脱这一法则的制约。对植物类和动物类而言，这个自然法则会造成种子不发芽、害病和早夭；而对人类来说，自然法则表现为苦难与罪恶。前者苦难是自然法则造成的绝对而必然的后果；而罪恶则是自然法则极可能造成的后果，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罪恶横行，但是它也许不应该被称为“绝对而必然的后果”。道德的磨砺可以抵制一切罪恶的诱惑。

This natural inequality of the two powers of population; and of production in the earth, and that great law of our nature which

must constantly keep their effects equal, form the great difficulty that to me appears insurmountable in the way to the perfectibility of society. All other arguments are of slight and subordinate consideration in comparison of this. I see no way by which man can escape from the weight of this law which pervades all animated nature. No fancied equality, no agrarian regulations in their utmost extent, could remove the pressure of it even for a single century. And it appears, therefore, to be decisive against the possible existence of a society, all the members of which; should live in ease, happiness, and comparative leisure; and feel no anxiety about providing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for themselves and families.

人口的繁殖力和土地的生产力是天然不对等的，而自然法则却一定要让它们的效力保持对等，我认为这是社会完善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与之相比，其他一切争论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这个法则渗透着整个生物界，人类无论如何也不能挣脱它的制约。任何空想出来的平等，任何做到极致的土地管理都无法消除该法则的制约力，即便只消除一个世纪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让全体社会成员过上怡然自得、幸福快乐、悠闲从容的生活，一点也不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资料问题焦虑，这肯定是违背社会存在的可能性的。

Consequently, if the premises are just, the argument is conclusive against the perfectibility of the mass of mankind.

因此，如果这个前提正确，那么结论必然是否定全体人类的可完善性。

I have thus sketched the general outline of the argument, but I

will examine it more particularly; and I think it will be found that experience, the true source and foundation of all knowledge, invariably confirms its truth.

以上我已简述了论点的梗概，不过我还将进一步进行分析。我相信经验作为一切知识的真正源泉和基础，肯定会证实该论点的真实性。

CHAPTER 2

第二章

The different ratios in which population and food increase.—The necessary effects of these different ratios of increase.—Oscillation produced by them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ower classes of society.—Reasons why this oscillation has not been so much observed as might be expected.—Three propositions on which the general argument of the Essay depends.—The different states in which mankind have been known to exist proposed to be examined with reference to these three propositions.

人口和食物增长的比率不同——两种增长比率带来的必然结果——两种比率经常给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境况造成波动——这种波动为何不像预期的那么明显——本书基本论点所依据的三个命题——根据这三个命题考察人类迄今经历的若干状态。

I said that population, when unchecked, increased in a geometrical ratio; and subsistence for man in an arithmetical ratio.

我在第一章说过，人口不加抑制会按几何比率增长，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比率增长。

Let us examine whether this position be just.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观点是否正确。

I think it will be allowed, that no state has hitherto existed (at least that we have any account of) where the manners were so pure and simple, and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so abundant, that no check whatever has existed to early marriages;among the lower classes, from a fear of not providing well for their families; or among the higher classes, from a fear of lowering their condition in life. Consequently in no state that we have yet known, has the power of population been left to exert itself with perfect freedom.

我想，大家都会承认，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至少我们记录在案的国家）风俗如此淳朴，生活资料如此充裕，以致对早婚不作任何限制——下层阶级不必担心家用不足，上层阶级也不必担心生活水平下降。因此据我们所知，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充分自由地发挥过人口繁殖力的作用。

Whether the law of marriage be instituted, or not, the dictate of nature and virtue, seems to be an early attachment to one woman. Supposing a liberty of changing in the case of an unfortunate choice; this liberty would not affect population till it arose to a height greatly vicious; and we are now supposing the existence of a society where vice is scarcely known.

无论制定婚姻法与否，天性与道德似乎驱使男子早早爱恋上一个女子。即便择偶不成功，也有重新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要没发展到滥无节制的罪恶程度，就不会对人口造成影响；况且现在我们是在假设这社会中的人们几乎不知道罪恶为何物。

In a state therefore of great equality and virtue, where pure and simple manners prevailed, and where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were so abundant, that no part of the society could have any fears about providing amply for a family, the power of population being left to exert itself unchecked, the increase of the human species would evidently be much greater than any increase that has been hitherto known.

因此，在一个高度平等且道德良好的国家里，淳朴风俗大行其道，生活资料非常充足，没有谁为养家糊口担忧，人口繁殖力可以不受制约地发挥作用，那么，该国人口的增长速度一定会大大超过迄今已知的人口增长速度。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ere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have been more ample, the manners of the people more pure, and consequently the checks to early marriages fewer, than in any of the modern states of Europe,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found to double itself in twenty-five years.

和任何一个现代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生活资料相对充裕，民风也更为淳朴，因而对早婚的限制也较少，于是我们发现，该国的人口在25年间翻了一番。

This ratio of increase, though short of the utmost power of population, yet as the result of actual experience, we will take as our rule; and say, That population, when unchecked, goes on doubling itself every twenty-five years or increases in a geometrical

ratio.

这种增长率虽说尚未达到人口的最高繁殖力，但作为实际观察的结果，我们权且把它视作一条规则，也就是说：如果不加限制，人口会每25年增加一倍，或者将以几何比率增长。

Let us now take any spot of earth, this Island for instance, and see in what ratio the subsistence it affords can be supposed to increase. We will begin with it under its present state of cultivation.

现在，让我们选取地球上的任一地区点进行观察，比如这个岛国，看看它提供的生活资料能以什么比率增长。我们先来考察该岛国的农耕现状。

If I allow that by the best possible policy, by breaking up more land, and by great encouragements to agriculture, the produce of this Island may be doubled in the first twenty-five years, I think it will be allowing as much as any person can well demand.

譬如我说，通过执行尽可能最好的政策，开垦更多的土地，大规模鼓励农业发展，该岛国的农业产量可以在第一个25年里增加一倍。个人认为，这应该是任何人所能提出的最乐观的假设了。

In the next twenty-five years, it is impossible to suppose that the produce could be quadrupled. It would be contrary to all our knowledge of the qualities of land. The very utmost that we can

conceive, is,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second twenty-five years might equal the present produce. Let us then take this for our rule, though certainly far beyond the truth; and allow that, by great exertion, the whole produce of the Island might be increased every twenty-five years, by a quantity of subsistence equal to what it at present produces. The most enthusiastic speculator cannot suppose a greater increase than this. In a few centuries it would make every acre of land in the Island like a garden.

到第二个25年，我们绝对不能设想产量会增加到原来的四倍，这样的假设是同我们对土地特性的全部认识相矛盾的。我们能想见的最大增幅是，第二个25年的增产量可能与原产量相等。我们权且将这视为是一条规则——虽然它肯定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继而假定，通过巨大努力，该岛国每25年的农业总产量都可以按照它现在产出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增加。就算是最激情澎湃的思辨家也不敢想象比这幅度更大的增量了。以这样的幅度增长，几百年后这岛国的每一英亩土地都会被整治得和菜园一样。

Yet this ratio of increase is evidently arithmetical.

但这种增长比率显然是算术比率。

It may be fairly said, therefore, that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increase in an arithmetical ratio.

故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生活资料是按算术比率增长的。

Let us now bring the effects of these two ratios together.

现在，让我们把这两种增长比率造成的结果放在一起看一看。

The population of the Island is computed to be about seven millions; and we will suppose the present produce equal to the support of such a number. In the first twenty-five years the population would be fourteen millions; and the food being also doubled,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would be equal to this increase. In the next twenty-five years the population would be twenty-eight millions, and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only equal to the support of twenty-one millions. In the next period, the population would be fifty-six millions, and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just sufficient for half that number. And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first century; the population would be one hundred and twelve millions and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only equal to the support of thirty-five millions; which would leave a population of seventy-seven millions totally unprovided for.

据计算，现在该岛国的人口约为700万，我们假定现在的农业产量刚好能养活这么多人。经过第一个25年后，人口将增长到1400万，所需粮食总量增加一倍，生活资料也要与人口增长相当。经过第二个25年，人口增长至2800万，但生活资料仅能养活2100万人口。在第三个25年之后，人口将增长到5600万，而生活资料只够养活一半人口。在第一个100年结束时，人口将达到11200万，而生活资料只能养活3500万人，这将使其余7700万人得不到任何生活资料供应。

A great emigration necessarily implies unhappiness of some kind or other in the country that is deserted. For few persons will leave their families, connections, friends, and native land, to seek a settlement in untried foreign climes, without some strong subsisting causes of uneasiness where they are, or the hope of some great advantages in the place to which they are going.

如果有大量人口移居国外，则可以肯定被离弃的国家发生了某种或其他不幸。因为，除非移出国有一些无法抵抗的生存因素让他们不能安居，或者他们在移入国有望获得巨大的好处，不然，绝少有人会离弃家族、亲戚、朋友和故土，去异国他乡定居。

But to make the argument more general and less interrupted by the partial views of emigration, let us take the whole earth, instead of one spot, and suppose that the restraints to population were universally removed. If the subsistence for man that the earth affords was to be increased every twenty-five years by a quantity equal to what the whole world at present produces,;this would allow the power of production in the earth to be absolutely unlimited, and its ratio of increase much greater than we can conceive that any possible exertions of mankind could make it.

为了使论点更具普遍性，少受关于移民现象的片面认识的影响，让我们来通观一下整个地球而不是一个地区的情况，并认定人口所受的制约已被普遍消除了。如果地球提供给人类的生活资料每25年都有增长，且增长量相当于目前整个世界的产量，那么这个等于承认了地球的生产力是绝对无限的，并且其增长率要远远大于我们能想象到的人类极尽努力所能达到的增长率。

Taking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at any number, a thousand millions, for instance, the human species would increase in the ratio of—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etc. and subsistence as—1, 2, 3, 4, 5, 6, 7, 8, 9, 10, etc. In two centuries and a quarter, the population would be to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as 512 to 10: in three centuries as 4096 to 13; and in two thousand years the difference would be almost incalculable, though the produce in that time would have increased to an immense extent.

假设世界人口为任一数目，比如说十亿，则人口将按1、2、4、8、16、32、64、128、256、512这样的比率增长，而生活资料将按1、2、3、4、5、6、7、8、9、10这样的比率增长。那么在225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为512：10，300年后，该比率为4096：13，而两千年后，两者的差距将大得几乎无法计算，即便到那时农产品产量会有极大的增长。

No limits whatever are placed to the productions of the earth; they may increase for ever and be greater than any assignable quantity; yet still the power of population being a power of a superior order, the increase of the human species can only be kept commensurate to the increase of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by the constant operation of the strong law of necessity acting as a check upon the greater power.

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所以产量可以不断增长，超出任一可指定的数量。但是人口繁殖力增幅更大，要使人口的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长保持平衡，只能依靠强有力的自然法则不断发挥作用，来制约强大的人口繁殖力。

The effects of this check remain now to be considered.

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种制约力的效力。

Among plants and animals the view of the subject is simple. They are all impelled by a powerful instinct to the increase of their species; and this instinct is interrupted by no reasoning, or doubts about providing for their offspring. Wherever therefore there is liberty, the power of increase is exerted; and the superabundant effects are repressed afterwards by want of room and nourishment, which is common to animals and plants; and among animals, by becoming the prey of others. The effects of this check on man are more complicated.

就植物和动物而言，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它们的数量增长全是由物种繁衍这一强烈本能所支配的，而这种本能没有受到理性的妨碍，或者说因为担心后代的供养问题而受到妨碍。因而无论在何处它们都可尽享自由，增殖力都得以发挥，而随后其造成的过剩效果又会因为缺乏空间和营养而受到抑制。这对于动物和植物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且在动物中还要受到弱肉强食的抑制。

Impelled to the increase of his species by an equally powerful instinct, reason interrupts his career, and asks him whether he may not bring beings into the world, for whom he cannot provide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In a state of equality, this would be the simple question.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society, other considerations occur. Will he not lower his rank in life? Will he not subject himself to greater difficulties than he at present feels? Will he not be

obliged to labourharder? And if he has a large family, will his utmost exertions enable him to support them? May he not see his offspring in rags and misery, and clamouring for bread that he cannot give them? And may he not be reduced to the grating necessity of forfeiting his independence, and of being obliged to the sparing hand of charity for support?

这种制约对人类的影响则更为复杂。人类同样受到强大的本能驱使而不断繁衍，但理性经常干预他的繁衍行为，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无力供养子女，是否可以不生育？在平等状态下，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而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人们自然要考虑其他一些事情。如果生养孩子，他本人的生活地位是否会降低？生活遭遇的困难会不会比现在的更多？是否必须更卖力地干活？要是家里人口多，他极尽努力是不是能养活他们？他会不会眼看着子女衣衫褴褛、嗷嗷待哺、饱受痛苦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会不会沦落到不能自食其力的贫困境地而不得不靠他人的施舍过活？

These considerations are calculated to prevent, and certainly do prevent, a very great number in all civilized nations from pursuing the dictate of nature in an early attachment to one woman. And this restraint almost necessarily, though not absolutely so, produces vice. Yet in all societies, even those that are most vicious, the tendency to a virtuous attachment is so strong, that there is a constant effort towards an increase of population. This constant effort as constantly tends to subject the lower classes of the society to distress, and to prevent any great permanent amelioration of their condition.

在所有文明国家，这些考量会阻止而且也确实阻止了许多人追求

过早地爱恋一个女子的天性。而这种限制，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也几乎必然会产生罪恶。不过，在一切社会里，甚至在道德最为败坏的社会里，合乎道德地爱恋一个女子的倾向非常强烈，致使人们努力不懈地促进人口持续增长。这种不懈的努力常使社会的下层阶级陷于窘困，使他们的境况无法获得巨大而持久的改善。

The way in which, these effects are produced seems to be this. We will suppose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in any country just equal to the easy support of its inhabitants. The constant effort towards population, which is found to act even in the most vicious societies,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people before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are increased. The food therefore which before supported seven millions, must now be divided among seven millions and a half or eight millions. The poor consequently must live much worse, and many of them be reduced to severe distress. The number of labourers also being above the proportion of the work in the market, the price of labour must tend toward a decrease; while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would at the same time tend to rise. The labourer therefore must work harder to earn the same as he did before. During this season of distress, the discouragements to marriage, and the difficulty of rearing a family are so great that population is at a stand. In the mean time the cheapness of labour, the plenty of labourers, and the necessity of an increased industry amongst them, encourage cultivators to employ more labour upon their land; to turn up fresh soil, and to manure and improve more completely what is already in tillage; till ultimately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become in the same proportion to the population as at the period from which we set out. The situation of the labourer being then again tolerably comfortable, the restraints to population are in some degree loosened; and the same retrograde and progressive movements with respect to happiness are repeated.

上述后果产生的方式似乎就是这样。我们假设任一国家的生活资料刚好足够让该国的居民生活安乐。这种促使人口增长的不懈努力，即便是在道德最为败坏的社会里也可以见到，它还没等生活资料增长就先使人口增长了。所以，以前养活700万人口的食物，现在必须分配给750万或800万人口。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大大恶化，很多还要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由于劳动者数量也多于市场提供的工作机会，劳动力价格必然呈下降趋势，而同时供给品的价格则趋于上升。故而，劳动者要挣得和以前相同的工资，就必须更卖力地工作。处在这样的艰苦时期，结婚成家将遭遇多重阻碍，养家糊口也难上加难，人口因此处于停滞不增的状态。在此期间，劳动力价格低廉，劳动者人数充足，劳动者不得不更勤勉地工作，这些会对耕作有鼓励之效，因为耕作者会雇用更多的劳动者，开垦新土地，为已耕种的土地施肥并进行更全面的改良，直到生活资料和人口的比例同人类初始阶段的比例相一致。届时，劳动者的境况再度好转，人口受到的制约会有所放松，劳动者的生活境遇就这样时好时坏周而复始地上演着。

This sort of oscillation will not be remarked by superficial observers; and it may be difficult even for the most penetrating mind to calculate its periods. Yet that in all old states some such vibration does exist; though from various transverse causes, in a much less marked, and in a much more irregular manner than I have described it, no reflecting man who considers the subject deeply can well doubt.

肤浅的观察者是不会注意这种起伏波动的，即便是最有洞察力的人也很难计算出它的周期。然而，在所有历史悠久的国家，这样的起伏波动确确实实存在；尽管由于有各种反制因素的作用，摆动的幅度没有我描述的那么明显，也更没有规则，但凡是勤于思考又深入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不怀疑存在这样的起伏波动。

Many reasons occur why this oscillation has been less obvious, and less decidedly confirmed by experience, than might naturally be expected.

这种波动之所以不像预想的那么明显，之所以不那么容易用经验来证实，原因很多。

One principal reason is, that the histories of mankind that we possess, are histories only of the higher classes. We have but few accounts that can be depended upon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at part of mankind, where these retrograde and progressive movements chiefly take place. A satisfactory history of this kind, of one people, and of one period, would require the constant and minute attention of an observing mind during a long life. Some of the objects of inquiry would be, in what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adults was the number of marriages, to what extent vicious customs prevailed in consequence of the restraints upon matrimony, what was the comparative mortality among the children of the most distressed part of the community and those who lived rather more at their ease, what were the variations in the real price of labour, and what were the observable differences in the state of the lower classes of society, with respect to ease and happiness, at different times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主要原因是，我们掌握的人类历史仅仅是上层阶级的历史。而上上文所述的那种起伏波动主要是发生在另一部分人身上，关于这些人的风俗习惯的记载少之又少。而要完好地记录一类人在一段时期内的这类历史，观察者必须长寿，而且要作不间断的细致观察。考察的内

容包括：结婚人数与成年人数的比例，婚姻制约在何种程度上使恶习盛行，社会中生活境遇最悲惨阶层和生活较优裕阶层的儿童死亡率有何差异，实际的劳动力价格是如何变动的，以及在某一时期的不同时间，社会下层阶级的安乐幸福状况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Such a history would tend greatly to elucidate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onstant check upon population acts; and would probably prove the existence of the retrograde and progressive movements that have been mentioned; though the times of their vibrations must necessarily be rendered irregular, from the operation of many interrupting causes; such as the introduction or failure of certain manufactures, a greater or less prevalent spirit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years of plenty, or years of scarcity, wars and pestilence, poor laws, the invention of processes for shortening labour without the proportional extension of the market for the commodity, and, particular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minal and real price of labour, a circumstance which has perhaps more than any other contributed to conceal this oscillation from common view.

这样一部历史非常有助于说明持久抑制是如何影响人口的，并且大致也能证明上述波动起伏的存在。不过由于有许多因素干扰，这些起伏波动的节奏必然是不规则的，这些因素包括某些制造业的兴衰，农业开拓精神的强弱，年成的好坏，战争和瘟疫，《济贫法》的实施，减少劳动而不会相应地扩大商品市场的方法的发明，特别是劳动力的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差异，一般来说，这种差异也许比其他任何因素更容易掩盖劳动者生活境况的这种跌宕起落。

It very rarely happens that the nominal price of labour universally falls; but we well know that it frequently remains the

same, while the nominal price of provisions has been gradually increasing. This is, in effect, a real fall in the price of labour; an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ondition of the lower orders of the community must gradually grow worse and worse. But the farmers and capitalists are growing rich from the real cheapness of labour. Their increased capitals enable them to employ a greater number of men. Work therefore may be plentiful; and the price of labour would consequently rise. But the want of freedom in the market of labour, which occurs more or less in all communities, either from parish laws, or the more general cause of the facility of combination among the rich, and its difficulty among the poor, operates to prevent the price of labour from rising at the natural period, and keeps it down some time longer; perhaps till a year of scarcity, when the clamour is too loud, and the necessity too apparent to be resisted.

劳动力的名义价格很少普遍下降，可是我们都知道，食物的名义价格一直是逐渐上升的，而劳动力的名义价格却常常保持不变。实际上，这就等于劳动力的价格降低了。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境况肯定趋于恶化。劳动力价格确实很低廉，但是农场主和资本家却借之发财致富。资本的增加使他们能够雇用更多的人手，于是工作机会可能会增多，劳动力价格也随之上升。但是，在所有社会中，劳动力市场都缺乏自由，这种情况要么是教区法造成的，要么是富人容易团结而穷人不容易团结这一更普遍的因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缺少自由会抑制劳动力价格按自然周期上升，这种抑制状态会持续较长时间，也许会一直持续到劳力荒年，等提高劳动力价格的呼声太高且提价的要求明显无法拒绝时再提价。

The true cause of the advance in the price of labour is thus concealed; and the rich affect to grant it as an act of compassion

and favour to the poor, in consideration of a year of scarcity; and when plenty returns, indulge themselves in the most unreasonable of all complaints, that the price does not again fall; when a little rejection would shew them, that it must have risen long before, but from an unjust conspiracy of their own.

劳动力价格上升的真正原因就这样被掩盖了。富人们故作姿态，把顾虑劳力荒年而提高劳动力价格当作对穷人表示同情、施予恩惠。一旦劳动力再次充足，他们便大肆抱怨劳动价格没有回落，而其实稍加辩驳就会使他们明白，要不是他们合起伙来做手脚压低劳动价格，劳动价格早就上升了。

But though the rich by unfair combinations, contribute frequently to prolong a season of distress among the poor; yet no possible form of society could prevent the almost constant action of misery upon a great part of mankind, if in a state of inequality, and upon all, if all were equal.

但是，虽说富人不正当的相互勾结延长了穷人受苦的时间，却没有哪一种社会形态能在不平等的国度里使大部分人免于经常遭受贫困，或者能在平等的国度里使所有人免于经常遭受贫困。

The theory, on which the truth of this position depends, appears to me so extremely clear that I feel at a loss to conjecture what part of it can be denied.

这一观点的真实性的理论依据在我看来非常清楚明白，所以我想

不出它的哪个部分可以被驳倒。

That population cannot increase without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is a proposition so evident, that it needs no illustration. That population does invariably increase where there are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the history of every people that have ever existed will abundantly prove.

没有生活资料人口就无法增长，这个命题是显而易见、无需说明的。有了生活资料，人口就一定会增长，所有民族的历史会充分证明这一点。

And that the superior power of population cannot be checked without producing misery or vice, the ample portion of these too bitter ingredients in the cup of human life and the continuance of the physical causes that seem to have produced them bear too convincing a testimony.

人口的繁殖力是强大的，一旦受到抑制就会造成贫困和罪恶。人生的酒杯里饱含着这两种苦涩成分，而产生这两种苦涩成分的物质原因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这一切都为上述命题提供了最为令人信服的证据。

But, in order more fully to ascertain the validity of these three propositions, let us examine the different states in which mankind have been known to exist. Even a cursory review will, I think, be sufficient to convince us that these propositions are incontrovertible

truths.

但是，为了更加充分地证实这三个命题的正确性，让我们考察一下人类迄今为止所经历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状态。我认为只要粗略考察一下，我们便足以相信这几个命题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CHAPTER 3

第三章

The savage or hunter state shortly reviewed.—The shepherd state, or the tribes of barbarians that overran the Roman Empire.—The superiority of the power of population to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the cause of the great tide of Northern Emigration.

简要回顾野蛮或狩猎状态——游牧状态或蹂躏罗马帝国的蛮族——人口繁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北迁大潮的原因。

In the rudest state of mankind, in which hunting is the principal occupation, and the only mode of acquiring food;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being scattered over a large extent of territory, the comparative population must necessarily be thin. It is said that the passion between the sexes is less ardent among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than among any other race of men. Yet, notwithstanding this apathy, the effort towards population, even in this people, seems to be always greater than the means to support it. This appears, from the comparatively rapid population that takes place, whenever any of the tribes happen to settle in some fertile spot, and to draw nourishment from more fruitful sources than that of hunting; and it has been frequently remarked that when an Indian family has taken up its abode near any European settlement, and adopted a more easy and civilized mode of life, that one woman has reared five or six, or more children; though in the savage state, it rarely happens that above one or two in a family

grow up to maturity. The same observation has been made with regard to the Hottentots near the Cape. These facts prove the superior power of population to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in nations of hunters; and that this power always shews itself the moment it is left to act with freedom.

狩猎是人类最原始状态下的主要职业，也是获取食物的唯一方式。生活资料分布于广大地区，因而人口数量必然是相对稀少的。据说，北美印第安人两性间的情欲比其他种族都弱。但是尽管情欲冷淡，这一种族为人口增长付出的努力也比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努力多。不管是印第安人的哪支部落，只要定居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有了比狩猎更为丰富的营养来源，人口就会有较为迅速增加。人们常常注意到，一个印第安人家庭只要在欧洲人的定居地附近安家，采取舒适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活，那么一个女人常会生养五六个或更多孩子，而在野蛮状态下，一个家庭多于一两个孩子能长大成人的情况极为少见。好望角附近的霍屯督族也是这样。上述事实证明，狩猎民族的人口繁殖力要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人的繁殖力一旦可以自由发挥效力，便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It remains to inquire whether this power can be checked, and its effects kept equal to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without vice, or misery.

能否在不产生罪恶或贫困的条件下抑制人口的繁殖力，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对等呢？这个问题尚待研究。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considered as a people, cannot justly be called free and equal. In all the accounts we have of them,

and, indeed, of most other savage nations, the women are represented as much more completely in a state of slavery to the men, than the poor are to the rich in civilized countries. One half the nation appears to act as Helots to the other half;, and the misery that checks population falls chiefly, as it always must do, upon that part whose condition is lowest in the scale of society. The infancy of man in the simplest state requires considerable attention, but this necessary attention the women cannot give, condemned as they are, to the inconveniences and hardships of frequent change of place, and to the constant and unremitting drudgery of preparing everything for the reception of their tyrannic lords. These exertions, sometimes during pregnancy or with children at their backs, must occasion frequent miscarriages, and prevent any but the most robust infants from growing to maturity. Add to these hardships of the women, the constant war that prevails among savages, and the necessity which they frequently labour under of exposing their aged and helpless parents, and of thus violating the first feelings of nature; and the picture will not appear very free from the blot of misery. In estimating the happiness of a savage nation, we must not fix our eyes only on the warrior in the prime of life: he is one of a hundred: he is the gentleman, the man of fortune, the chances have been in his favour; and many efforts have failed ere this fortunate being was produced, whose guardian genius should preserve him through the numberless dangers with which he would be surrounded from infancy to manhood. The true points of comparison between two nations seem to be the ranks in each which appear nearest to answer to each other. And in this view, I should compare the warriors in the prime of life with the gentlemen; and the women, children, and aged, with the lower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in civilized states.

北美的印第安人，如果被看成是一个民族，也不能说是自由平等的民族。有关他们以及大多数未开化民族的记载表明，妇女被男人奴役的情况比在文明国家里穷人被富人奴役的情况严重得多。这个民族的一半人把另一半人当奴隶。而制约人口增长的贫困，照例主要落在社会最下层阶级的身上。即便是在最简陋的环境里，婴儿也是需要细心照看的，但是印第安妇女却不能给予这种必要的照看，她们命中注定要承受经常迁徙带来的种种不便和困苦，注定要不停地干苦活重活，为暴虐的主人准备好一切。有时她们做这些苦活重活时是在怀孕期间或者身后还背着孩子，所以经常造成流产，而且除了最强壮的婴孩，其他孩子都难以被抚养成人。除了上述苦难，妇女还要承受野蛮人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常常因为干活而不得不置年老无助的父母于不顾，故此违逆了最基本的自然亲情；整个这幅画面上都少不了贫困这块污迹。我们在估计一个未开化民族的生活幸福程度时，眼睛一定不要只盯着年富力强的武士，因为武士都是百里挑一的：他是绅士，是财主，又是幸运儿，千万努力流于空，才产生了这么一个幸运儿；他的守护神保佑他从小到大历尽无数危险而安然无恙。做两国比较时，真正需要比较的是两国非常近似的阶层。因此，笔者将把年富力强的武士同绅士比较，把妇女、儿童、老人和文明国家的下层阶级作比较。

May we not then fairly infer from this short review, or rather, from the accounts that may be referred to of nations of hunters; that their population is thin from the scarcity of food; that it would immediately increase if food was in greater plenty; and that, putting vice out of the question among savages, misery is the check that represses the superior power of population and keeps its effects equal to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Actual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tell us that this check, with a few local and temporary exceptions, is constantly acting now upon all savage nations; and the theory indicates that it probably acted with nearly equal strength a thousand years ago, and it may not be much greater a

thousand years hence.

由以上简短的考察，或者更确切地说，由狩猎民族的历史记录，我们可以恰当地推论：食物缺乏时，狩猎民族的人口会减少；食物充裕时，其人口会立即增加；如果撇开野蛮人的罪恶不论，那么正是贫困抑制了较强的人口繁殖力，使其增减效果与生活资料保持相当。实际的观察和经验告诉我们：除了个别地点和时间出现例外，这种抑制目前对所有未开化民族都一直在起作用；而我们的理论表明，一千年前这种抑制力的大小同现在相差无几，而再过一千年，它也不见得会比现在强大很多。

Of the manners and habits that prevail among nations of shepherds, the next state of mankind, we are even more ignorant than of the savage state. But that these nations could not escape the general lot of misery arising from the want of subsistence, Europe, and all the fai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ear ample testimony. Want was the goad that drove the Scythian shepherds from their native haunts, like so many famished wolves in search of prey. Set in motion by this all powerful cause, clouds of Barbarians seemed to collect from all point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Gathering fresh darkness and terror as they rolled on, the congregated bodies at length obscured the sun of Italy and sunk the whole world in universal night. These tremendous effects, so long and so deeply felt throughout the fairest portions of the earth, may be traced to the simple cause of the superior power of population, to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游牧民族乃是人类发展的第二期阶段，关于游牧民族盛行的风俗习惯，我们了解的情况甚至比了解未开化民族的情况还要少。但欧洲

各国以及世界上所有最富有国家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游牧民族也不能逃脱生活资料匮乏造成贫困的普遍命运。生活资料匮乏像一根棍子，驱赶着塞西亚牧民离开原住地，他们像一群群饿狼一般，四处寻找食物。在这股强大的力量驱动下，野蛮人宛如乌云从北半球各地聚拢起来，滚滚向前，搅得天昏地暗，最终遮蔽了意大利的太阳，使整个世界陷于黑暗。这些可怕的后果长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上最富饶美丽的地方。追根溯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人口的繁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

It is well known that a country in pasture cannot support so many inhabitants as a country in tillage; but what renders nations of shepherds so formidable is the power which they possess of moving all together, and the necessity they frequently feel of exerting this power in search of fresh pasture for their herds. A tribe that was rich in cattle had an immediate plenty of food. Even the parent stock might be devoured in a case of absolute necessity. The women lived in greater ease than among nations of hunters. The men bold in their united strength and confiding in their power of procuring pasture for their cattle by change of place, felt, probably, but few fears about providing for a family. These combined causes soon produced their natural and invariable effect, an extended population. A more frequent and rapid change of place became then necessary. A wider and more extensive territory was successively occupied. A broader desolation extended all around them. Want pinched the less fortunat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and, at length, the impossibility of supporting such a number together became too evident to be resisted. Young scions were then pushed out from the parent-stock and instructed to explore fresh regions and to gain happier seats for themselves by their swords. 'The world was all before them where to choose.' Restless from present distress, flushed with the hope of fairer prospects, and animated with the spirit of

hardy enterprise, these daring adventurers were likely to become formidable adversaries to all who opposed them. The peaceful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ies on which they rushed could not long withstand the energy of men acting under such powerful motives of exertion. And when they fell in with any tribes like their own, the contest was a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nd they fought with a desperate courage, inspired by the rejection that death was the punishment of defeat and life the prize of victory.

众所周知，游牧国家养活的人口不如农耕国家养活的人口多，但是游牧民族令人畏惧之处在于他们的集体迁徙能力，而且他们经常感觉有必要动用这种能力，为畜群寻找新的牧场。一个部落有很多牲畜的话，短期内食物就是充足的。在万不得已时，母畜甚至也可以被宰杀。因而游牧民族的妇女要比狩猎民族的妇女生活得好。男人们因团结协力而勇猛无畏，确信经过迁徙，一定能为畜群找到新牧场；他们基本不会为养家糊口担心发愁。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很快就产生了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人口膨胀。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更为频繁地、迅速地变换驻地。越来越广阔的土地相继被他们占领，而他们周围的荒野也渐渐扩大。匮乏折磨着社会中不太幸运的成员；最后，不可能养活社会所有成员这一现实变得十分明显，到了无法抗拒的地步。于是，老部落逼迫年轻的后辈离开，告诉他们去开辟疆土，靠手中的剑为自己挣得更好的地盘。“世界任他们驰骋”。这些勇敢的冒险者因为眼前的困苦而躁动不安，心头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艰苦立业的意志令他们跃跃欲试，他们要让一切与他们为敌者认识到他们是可怕的对手。在这种强烈的拼搏动机支配下他们行动了，被他们席卷的那些国土上的和平居民无法长时间承受他们的力量。如果遇到与其相似的部落，必然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他们以殊死的勇气作战，内心激荡着一个念头：死是对战败的惩罚，生是对胜利的奖励。

In these savage contests many tribes must have been utterly exterminated. Some, probably, perished by hardship and famine. Others, whose leading star had given them a happier direction, became great and powerful tribes; and, in their turns, sent off fresh adventurers in search of still more fertile seats. The prodigious waste of human life occasioned by this perpetual struggle for room and food was more than supplied by the mighty power of population, acting, in some degree, unshackled from the constant habit of emigration. The tribes that migrated towards the South, though they won these more fruitful regions by continual battles, rapidly increased in number and power, from the increased means of subsistence. Till at length the whole territory, from the confines of China to the shores of the Baltic, was peopled by a various race of Barbarians, brave, robust, and enterprising, inured to hardship, and delighting in war. Some tribes maintained their independence. Others ranged themselves under the standard of some barbaric chieftain who led them to victory after victory, and what was of more importance, to regions abounding in corn, wine, and oil, the long wished for consummation, and great reward of their labours. An Alaric, an Attila, or a Zingis Khan, and the chiefs around them, might fight for glory, for the fame of extensive conquests; but the true cause that set in motion the great tide of northern emigration, and that continued to propel it till it rolled at different periods against China, Persia, Italy, and even Egypt, was a scarcity of food, a population extended beyond the means of supporting it.

在惨烈的争斗中，许多部落都灭绝了。有些部落可能是由于艰苦和饥饿消亡的；另一些部落由英明的头领指引光明的方向，逐渐强大起来，继而他们派遣新的冒险者寻求更多富饶的地盘。这种为争夺地盘和食物进行的持久争斗耗费了大量的生命，但经常不断的迁徙使人口的增殖力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毫无羁绊地发挥作用，对生命耗费作出

补充。迁徙南方的部落一方面通过连续不断的征战赢得了这些比较富庶的地区，而另一方面由于生活资料增多，其人口在迅速增多，实力也在迅速增强。最后，从中国边境至波罗的海沿岸的广大地区，被各种勇猛彪悍、爱冒险、能吃苦又好战的野蛮民族占领。一些部落保持着自身的独立，而另一些部落则聚集在某个蛮族酋长的麾下，由酋长带领他们取得一次次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酋长把他们带到了盛产玉米、美酒和香油的地区，这些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是对艰辛劳顿的最好奖赏。一位阿拉里克、阿提拉，或者成吉思汗式的酋长，还有其身边的首领们，也许是为了荣耀，为了赢得大征服者的英名而征战不息，但是造成北方民族大迁徙，推动他们在不同时期挥师南下，侵扰中国的中原地区、波斯、意大利乃至埃及的真正原因，是食物的匮乏，是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

The absolute population at any one period,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territory, could never be great, on account of the unproductive nature of some of the regions occupied; but there appears to have been a most rapid succession of human beings; and as fast as some were mowed down by the scythe of war or of famine, others rose in increased numbers to supply their place. Among these bold and improvident Barbarians, population was probably but little checked, as in modern states, from a fear of future difficulties. A prevailing hope of bettering their condition by change of place, a constant expectation of plunder, a power even, if distressed, of selling their children as slaves, added to the natural carelessness of the barbaric character, all conspired to raise a population which remained to be repressed afterwards by famine or war.

任意一个时期的绝对人口相对于领土面积绝不会很大，因为总有一些被占领的地区是不毛之地。但人口的更替似乎更为迅速，一部分

人被战争或饥馑的镰刀消灭了，而另一部分人的数量大大增多，会群起填补这个空缺。在这些骁勇无忌的游牧民族中间，人口可能很少因为担心未来的困难而受到抑制，这和现代国家的情形相似。游牧民族普遍希望通过迁徙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总是期待掠夺别人，在贫困难耐时甚至有卖儿卖女给人做奴隶的权力，所有这些均促进了人口增加，增加之后再由饥馑或战争来抑制。

Where there is any inequality of conditions, and among nations of shepherds this soon takes place, the distress arising from a scarcity of provisions must fall hardest upon the least fortunat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This distress also must frequently have been felt by the women, exposed to casual plunder in the absence of their husbands, and subject to continual disappointments in their expected return.

哪里的生活条件不平等（在游牧民族中间这种不平等很快就出现了），哪里由食物匮乏产生的沉重苦难就一定会落在最不幸的社会成员身上。妇女也一定常常体会到这种苦难，丈夫不在家时，她们常常遭人掳掠，对丈夫归家的期盼总是化作一次次的失望。

But without knowing enough of the minute and intimate history of these people, to point out precisely on what part the distress for want of food chiefly fell, and to what extent it was generally felt, I think we may fairly say, from all the accounts that we have of nations of shepherds, that population invariably increased among them whenever, by emigration or any other cause,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were increased, and that a further population was checked, and the actual population kept equal to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by misery and vice.

游牧民族的详尽历史我们了解不多，不能确切地指出食物匮乏造成的苦难主要落在哪一部分人身上，也不能确切地说出普遍感受到这种苦难的程度有多大，但我认为依据现有的关于游牧民族的记载，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每当迁徙或其他原因使生活资料增加的时候，游牧民族的人口就一定会增多，而随后，贫困和恶行又会抑制人口进一步增长，使实际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

For, independently of any vicious customs that might have prevailed amongst them with regard to women, which always operate as checks to population,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I think, that the commission of war is vice, and the effect of it misery; and none can doubt the misery of want of food.

游牧民族的妇女可能有一些恶习，它们抑制着人口的增长。撇开这点不谈，我想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那就是发动战争就是罪恶，战争会造成贫困，而且毫无疑问，这种贫困的根源是食物匮乏。

CHAPTER 4

第四章

State of civilized nations.—Probability that Europe is much more populous now than in the time of Julius Caesar.—Best criterion of population.—Probable error of Hume in one the criterions that he proposes as assisting in an estimate of population.—Slow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t present in most of the states of Europe.—The two principal checks to population.—The first, or preventive check examined with regard to England.

文明国家的状态——现在欧洲的人口可能比恺撒时代多得多——估算人口的最佳标准——休谟提出的一套估算人口的标准中有一条可能有错——目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口增长缓慢——人口增长的两大抑制因素——结合英国的情况考察第一种或者说预防性抑制因素。

In examining the next state of mankind with relation to the question before us, the state of mixed pasture and tillage, in which, with some variation in the proportions, the most civilized nations must always remain, we shall be assisted in our review by what we daily see around us, by actual experience, by facts that come within the scope of every man's observation.

接下来结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来考察人类的又一种状态，也就是畜牧和耕种混合的状态。现今大多数文明国家仍处于这一状态，虽然两者混合的比例在各国有所不同。考察这种状态时，我们可以借助

日常所见、实际经验和人人都能观察到的事实。

Notwithstanding the exaggerations of some old historians, there can remain no doubt in the mind of any thinking man that the population of the principal countries of Europe, France, England, Germany, Russia, Poland, Sweden, and Denmark is much greater than ever it was in former times. The obvious reason of these exaggerations is the formidable aspect that even a thinly peopled nation must have, when collected together and moving all at once in search of fresh seats. If to this tremendous appearance be added a succession at certain intervals of similar emigrations, we shall not be much surprised that the fears of the timid nations of the South represented the North as a region absolutely swarming with human beings. A nearer and juster view of the subject at present enables us to see that the inference was as absurd, as if a man in this country, who was continually meeting on the road droves of cattle from Wales and the North, was immediately to conclude that these countries were the most productive of all the parts of the kingdom.

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波兰、瑞典以及丹麦等主要欧洲国家的人口现在要比过去多得多，凡有思想的人都不会质疑这一点。有些古代历史学家的夸张说法并不足信，他们夸张的原因显然是：一个民族虽然人口稀少，但为寻找新地盘迁移陡然聚集起来时，也会显得非常壮观可怕。有了这种壮观可畏的外表，再加上类似的迁移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无怪乎南方胆小的国家常常惶恐不安，认为北方人多势众。现今在，对这一问题做过更为直接、理据更为充分的考察之后，我们知道这种推论是荒谬可笑的，就像本国某人常在路上看见从威尔士和北方跑来一群群牛羊，就断言那些地方是大不列颠王国最富庶的地区一样荒谬可笑。

The reason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is more populous now than it was in former times, is that the industry of the inhabitants has made these countries produce a greater quantity of human subsistence. For I conceive that it may be laid down as a position not to be controverted, that, taking a sufficient extent of territory to include within it exportation and importation, and allowing some variation for the prevalence of luxury, or of frugal habits, that population constantly bears a regular proportion to the food that the earth is made to produce. In the controversy concerning the populousness of ancient and modern nations, could it be clearly ascertained that the average produce of the countries in question, taken altogether, is greater now than it was in the times of Julius Caesar, the dispute would be at once determined.

现今欧洲很多国家的人口比过去多，其原因是当地居民辛勤劳作，使这些地方生产出了更多的生活资料。如果一国的领土足够大，产品的输出和输入均在其内部完成，允许奢侈或节俭的习惯有所变化，则该国人口与土地生产出的食物的比例也会保持不变；我认为，可以把这一点视作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在争论古代和现代国家的人口孰多孰少时，如果能确凿无疑地断定目前所有相关国家的平均农业产量要多于恺撒时代，那么争论的是非对错也就即刻分明了。

When we are assured that China is the most fertile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almost all the land is in tillage; and that a great part of it bears two crops every year; and further, that the people live very frugally, we may infer with certainty that the population must be immense, without busying ourselves in inquiries into the manners and habits of the lower classes and the encouragements to early marriages. But these inquiries are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and a minute history of the customs of the lower Chinese would be

of the greatest use in ascertaining in what manner the checks to a further population operate; what are the vices, and what are the distresses that prevent an increase of numbers beyond the ability of the country to support.

如果我们确定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国家，几乎全部土地都在耕种，其中很大一部分一年两收，人民生活得很节俭，于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断中国的人口是很多的，不用费心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有无鼓励早婚的条件。其实，用心考察这些也极其重要的，因为详细了解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特别有助于弄清制约因素是如何阻止人口增长的，究竟是哪些罪恶、哪些苦难阻止了人口增长超过土地的供养能力。

Hume, in his essay on the populousness of ancient and modern nations, when he intermingles, as he says, an inquiry concerning causes with that concerning facts, does not seem to see with his usual penetration how very little some of the causes he alludes to could enable him to form any judgement of the actual population of ancient nations. If any inference can be drawn from them, perhaps it should be directly the reverse of what Hume draws, though I certainly ought to speak with great diffidence in dissenting from a man who of all others on such subjects was the least likely to be deceived by first appearances. If I find that at a certain period in ancient history, the encouragements to have a family were great, that early marriages were consequently very prevalent, and that few persons remained single, I should infer with certainty that population was rapidly increasing, but by no means that it was then actually very grea;, rather; indeed, the contrary, that it was then thin and that there was room and food for a much greater number. On the other hand, if I find that at this period the difficulties

attending a family were very great, that, consequently, few early marriages took place, and that a great number of both sexes remained single, I infer with certainty that population was at a stand; and, probably, because the actual population was very great in proportion to the fertility of the land and that there was scarcely room and food for more. The number of footmen, housemaids, and other persons remaining unmarried in modern states, Hume allows to be rather an argument against their population. I should rather draw a contrary inference and consider it an argument of their fullness, though this inference is not certain, because there are many thinly inhabited states that are yet stationary in their population. To speak, therefore, correctly, perhaps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number of unmarried persons in proportion to the whole number, existing at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same or different states will enable us to judge whether population at these periods was increasing, stationary, or decreasing, but will form no criterion by which we can determine the actual population.

休谟曾撰文讨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人口多寡问题，他说他是把有关原因的研究同有关事实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按说他素来目光锐利、思想深邃，但是此次他好像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洞察力，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列举的原因几乎不能令他判断古代国家实际人口的多寡。即使能从其中得出推论，恐怕也是和休谟得出的推论截然相反。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中，休谟是最不可能被表面现象蒙骗的，但我还是发表了与他不同的观点，虽然这样做我的心里并无太多底气。假如我发现在古代历史的某一时期，对结婚成家的有利条件很多，因而早婚之风盛行，独身的人很少，我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说，当时人口在迅速增加，但是决不能推论说那时人口已经很多了。实际上，我完全可以做相反的推论，即当时人口稀少，尚有空间和食物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我发现该时期养家糊口困难很多，因而很少有人早婚，很多男女独身，我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

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很可能是因为实际人口相对于土地的生产力而言非常庞大，所以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和食物供养更多的人口。一些现代国家有相当数量的男仆、女仆，还有其他人未婚，休谟便拿这类人的数量来证明这些国家的人口不多。而我由此得出的推论却正好相反，我认为这正说明那些国家的人口已经很稠密了。不过，我的推论也不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很多人口稀少的国家，人口增长也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同一国家或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单身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人口在这些不同时期是在增加、处于停滞状态还是在减少，但是不能据此断定实际人口的多寡。

There is, however, a circumstance taken notice of in most of the accounts we have of China that it seems difficult to reconcile with this reasoning. It is said that early marriages very generally prevail through all the ranks of the Chinese. Yet Dr. Adam Smith supposes that population in China is stationary. These two circumstances appear to be irreconcilable. It certainly seems very little probable that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is fast increasing. Every acre of land has been so long in cultivation that we can hardly conceive there is any great yearly addition to the average produce. The fact, perhaps, of the universality of early marriages may not be sufficiently ascertained. If it be supposed true, the only way of accounting for the difficulty, with our present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appears to be that the redundant population, necessarily occasioned by the prevalence of early marriages, must be repressed by occasional famines, and by the custom of exposing children, which, in times of distress, is probably more frequent than is ever acknowledged to Europeans. Relative to this barbarous practice, it is difficult to avoid remarking, that there cannot be a stronger proof of the distresses that have been felt by mankind for want of food, than the existence of a custom that thus violates the most natural

principle of the human heart. It appears to have been very general among ancient nations, and certainly tended rather to increase population.

不过，关于中国的大部文献记载都提到了一种情况；我们似乎很难把它和上述推理协调起来。据说，早婚盛于中国的各个阶层，而亚当·斯密博士认为中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两种情形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中国的人口确实不大可能迅速增加，它的每亩土地都已经耕种了很长时间，很难想象土地的平均产量每年还会有很大增长。普遍早婚的记述可能并不确切。如果早婚情况属实，则依据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现有了解，似乎只能这样来解释上述矛盾，那就是：盛行早婚必然造成人口过剩，但过剩的人口一定会受到间或发生的饥荒和弃婴习惯的抑制，弃婴现象在荒年屡屡发生，这是欧洲人想象不到的。关于这种野蛮的做法，我们不能不说，要证明食物匮乏给人类带来的种种苦难，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竟然有这种违逆人类最自然感情的习俗。这种习俗在古代民族中很常见，确实有助于减少人口。

In examining the principal states of modern Europe, we shall find that though they have increased very considerably in population since they were nations of shepherds, yet that at present their progress is but slow; and instead of doubling their numbers every twenty-five years, they require three or four hundred years, or more, for that purpose. Some, indeed, may be absolutely stationary, and others even retrograde. The cause of this slow progress in population cannot be traced to a decay of the passion between the sexes. We have sufficient reason to think that this natural propensity exists still in undiminished vigour. Why then do not its effects appear in a rapid increase of the human species? An intimate view of the state of society in any one country in Europe, which may serve equally for all, will enable u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and to say that a foresight of the difficulties attending the rearing of a family, acts as a preventive check; and the actual distresses of some of the lower classes, by which they are disabled from giving the proper food and attention to their children, act as a positive check to the natural increase of population.

我们看一下现代欧洲主要国家的情况就会发现，虽然这些国家在成为畜牧国家以来人口大量增加，但是目前人口增长缓慢；照此每25年人口增加一倍是不可能的，要增加一倍需要三、四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实际上，有些国家的人口处于绝对停滞状态，而另一些国家的人口甚至还在减少。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不能归结为两性间情欲的衰退。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种自然习性依然强烈，并未衰减。那么，它为什么没有能够让人口迅速增加呢？仔细看看欧洲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随便哪一国都可以代表所有国家），便可以回答这一问题。答案是：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阻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长。预防性抑制是指人们对供养家庭所必经的种种困难的洞察力，积极抑制是指一些下层阶级遭遇到困难从而不能给予子女以适当的食物和照料。

England, as one of the most flourishing states of Europe, may be fairly taken for an example, and the observations made will apply with but little variation to any other country where the population increases slowly.

英国是欧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不妨拿它作例子。对它的观察评论几乎不加修改便可适用于其他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

The preventive check appears to operate in some degree through all the ranks of society in England. There are some men,

even in the highest rank, who are prevented from marrying by the idea of the expenses that they must retrench, and the fancied pleasures that they must deprive themselves of, on the supposition of having a family. These considerations are certainly trivial; but a preventive foresight of this kind has objects of much greater weight for its contemplation as we go lower.

预防性抑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英国的所有社会阶层。甚至一些社会地位极高的人，考虑到成家后必须节俭度日，必须放弃自己渴望享受的快乐，也会在结婚成家问题上驻足不前。当然，这些顾虑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社会阶层越是低下，这类预防性的洞察力在斟酌损益时所占的分量也越大。

A man of liberal education, but with an income only just sufficient to enable him to associate in the rank of gentlemen, must feel absolutely certain that if he marries and has a family, he shall be obliged, if he mixes at all in society, to rank himself with moderate farmers and the lower class of tradesmen. The woman that a man of education would naturally make the object of his choice, would be one brought up in the same tastes and sentiments with himself and used to the familiar intercourse of a society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she must be reduced by marriage. Can a man consent to place the object of his affection in a situation so discordant, probably, to her tastes and inclinations? Two or three steps of descent in society, particularly at this round of the ladder, where education ends and ignorance begin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by the generality of people as a fancied and chimerical, but a real and essential evil. If society be held desirable, it surely must be free, equal, and reciprocal society, where benefits are conferred as well as received;, and not such as the dependent finds with his patron, or

the poor with the rich.

一个男子受过普通教育，但收入刚刚够他加入绅士阶层，他肯定会觉得，如果自己结婚成家，又要在社会上与人交往，就不得不与经济水平中等的农民和下等商人为伍。受过教育的男子自然会选择和自己志趣相同、感情相近、有共同熟悉的社交圈子的女子为妻，可是婚后经济地位下降，妻子不得不出入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子。一个男人能忍心让自己心爱之人生活在一种与她的旨趣性情迥然不同的环境里吗？社会地位连降两三级，特别是落到了人生阶梯的这么一档，眼见得自己周围是一群无知愚昧的人，这情形在大多数人看来可不是空想虚构出来的苦难，而是实实在在、必会发生的不幸。如果大家认为社会状态是令人满意的，那这个社会必须是自由、平等、互利的社会，利益的给予和索取是相互的，绝不是扈从与恩主或者穷人与富人那样的关系。

These considerations undoubtedly prevent a great number in this rank of life from following the bent of their inclinations in an early attachment. Others, guided either by a stronger passion, or a weaker judgement, break through these restraints; and it would be hard indeed, if the gratification of so delightful a passion as virtuous love, did not, sometimes, more than counterbalance all its attendant evils. But I fear it must be owned that the more general consequences of such marriages are rather calculated to justify than to repress the forebodings of the prudent.

上述种种顾虑无疑迫使该阶层的许多人不屈从早恋的自然倾向。另一些人则由于情欲较强或者判断力较弱冲破了这些限制，如果从高尚爱情的甜蜜情欲里获得的乐趣不足以抵消随之而来的痛苦的话，冲破限制肯定是很艰难的。不过有时并非如此。但我觉得必须承认，这

种婚姻带来的较宽泛的结果并未抑制谨慎者的远见，而是恰恰证明了他们的远见是有道理的。

The sons of tradesmen and farmers are exhorted not to marry, and generally find it necessary to pursue this advice till they are settled in some business or farm that may enable them to support a family. These events may not, perhaps, occur till they are far advanced in life. The scarcity of farms is a very general complaint in England. And the competition in every kind of business is so great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that all should be successful.

常有人劝告商贾和农民的子弟不要急于结婚，这些子弟在俯身以从事农商为固定职业养家糊口之前，普遍认为应该遵从这一劝告。上述这类事情也许不到一定岁数是体验不到的。在英国，人们普遍抱怨农场太少，各行各业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所有人都获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The labourer who earns eighteen pence a day and lives with some degree of comfort as a single man, will hesitate a little before he divides that pittance among four or five, which seems to be but just sufficient for one. Harder fare and harder labour he would submit to for the sake of living with the woman that he loves; but he must feel conscious, if he thinks at all, that should he have a large family, and any ill luck whatever, no degree of frugality, no possible exertion of his manual strength could preserve him from the heart-rending sensation of seeing his children starve, or of forfeiting his independence, and being obliged to the parish for their support. The love of independence is a sentiment that surely none would wish to be erased from the breast of man, though the

parish law of England, it must be confessed, is a system of all others the most calculated gradually to weaken this sentiment, and in the end may eradicate it completely.

每天挣18便士的劳动者，过单身生活也许还比较舒服；但如果把这点钱分给四、五个人用，他就不免有些犹豫，因为这点钱刚够一个人用。为了和自己所爱的人共同生活，他必须过苦日子，必须更卖力地干活。但是，只要稍稍动动脑子他就会意识到，一旦他要养活一大家子或者遭遇了什么不幸，无论怎么节俭，怎么卖力干活，他也难免要眼巴巴地看着孩子们挨饿，或者眼巴巴地失去自立地位，靠教区救济为生，这一切都令人痛心。热爱自立是一种情感，每个男人想必都不希望失去自立能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据预测英国的教区法是所有教区法中最能伤害这种感情的法律，先是逐渐削弱它，最后完全消灭它。

The servants who live in gentlemen's families have restraints that are yet stronger to break through in venturing upon marriage. They possess the necessaries, and even the comforts of life, almost in as great plenty as their masters. Their work is easy and their food luxurious compared with the class of labourers. And their sense of dependence is weakened by the conscious power of changing their masters, if they feel themselves offended. Thus comfortably situated at present, what are their prospects in marrying? Without knowledge or capital, either for business, or farming, and unused and therefore unable to earn a subsistence by daily labour, their only refuge seems to be a miserable alehouse, which certainly offers no very enchanting prospect of a happy evening to their lives. By much the greater part, therefore, deterred by this uninviting view of their future situation,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remaining single where they are.

生活在绅士家里的仆人，在结婚成家方面承受了更强劲、更难冲破的制约。他们不仅拥有生活必需品，甚至享受了舒适安逸的生活条件，数量之多几乎和他们的主人不相上下。同劳动阶级相比，他们的工作是轻松的，食物是丰盛的。他们感觉不称心时，可以更换主家，他们自知这种权力，因而对主人的依附感被削弱了。现在生活得还比较舒适，结婚之后会怎么样呢？不论做生意还是务农，他们既不懂行，也无资本，也不适应，因而也没有能力靠日常劳动谋生，唯一的避难所恐怕就是简陋的小酒馆，那里肯定不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诱人的前景。所以，这种黯淡的生活前景令大部分仆人望而却步，甘心安于现状，继续过单身生活。

If this sketch of the state of society in England be near the truth, and I do not conceive that it is exaggerated, it will be allowed that the preventive check to population in this country operates, though with varied force, through all the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The same observation will hold true with regard to all old states. The effects, indeed, of these restraints upon marriage are but too conspicuous in the consequent vices that are produced in almost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vices that are continually involving both sexes in inextricable unhappiness.

如果以上关于英国社会状况的简要描述基本属实（我认为描述并无夸张），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在这个国家这种对人口的预防性抑制影响着英国社会的一切阶层，只是影响的力度有所不同而已。经考察所有古老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实际上，这些婚姻限制的影响力是十分显著的，由其后在世界各地造成的种种罪恶可见其影响之盛，这些罪恶让男女两性一再陷入无以解脱的不幸之中。

CHAPTER 5

第五章

The second, or positive check to population examined, in England.—The true cause why the immense sum collected in England for the poor does not better their condition.—The powerful tendency of the poor laws to defeat their own purpose.—Palliative of the distresses of the poor proposed.—The absolute impossibility, from the fixed laws of our nature, that the pressure of want can ever be completely removed from the lower classes of society.—All the checks to population may be resolved into misery or vice.

以英国为例，考察人口所受的第二种或者说积极性抑制——英国为穷人征缴了巨额资金却没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原因究竟何在——济贫法本身就有让济贫目标落空的强烈倾向——提出减轻穷人痛苦的办法——由人类本性的既定法则可知，让社会下层阶级彻底摆脱匮乏的压力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人口的所有制约可以分为贫困和罪恶两类。

The positive check to population, by which I mean the check that represses an increase which is already begun, is confined chiefly, though not perhaps solely, to the lowest orders of society.

我所说的积极抑制，是指对已经开始增长的人口的抑制，主要是（但不完全是）社会的最底层受到的制约。

This check is not so obvious to common view as the other I have mentioned, and, to prove distinctly the force and extent of its operation would require, perhaps, more data than we are in possession of. But I believe it has been very generally remarked by those who have attended to bills of mortality that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who die annually, much too great a proportion belongs to those who may be supposed unable to give their offspring proper food and attention, exposed as they are occasionally to severe distress and confined, perhaps, to unwholesome habitations and hard labour. This mortality among the children of the poor has been constantly taken notice of in all towns. It certainly does not prevail in an equal degree in the country, but the subject has not hitherto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enable anyone to say that there are not more deaths in proportion among the children of the poor, even in the country, than among those of the middling and higher classes. Indeed, it seems difficult to suppose that a labourer's wife who has six children, and who is sometimes in absolute want of bread, should be able always to give them the food and attention necessary to support life.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peasants will not be found such rosy cherubs in real life as they are described to be in romances. It cannot fail to be remarked by those who live much in the country that the sons of labourers are very apt to be stunted in their growth, and are a long while arriving at maturity. Boys that you would guess to be fourteen or fifteen are, upon inquiry, frequently found to be eighteen or nineteen. And the lads who drive plough, which must certainly be a healthy exercise, are very rarely seen with any appearance of calves to their legs: a circumstance which can only be attributed to a want either of proper or of sufficient nourishment.

一般人对这种抑制的感觉不像对我前面提到的另一种抑制的感觉

那么明显。要说明这种制约作用的强度和范围，可能需要较多的数据资料，而我们现在拥有的资料还不够。不过我觉得，凡是留意死亡报告单的人一般都会这样说：在每年死亡的儿童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父母不能给予一定量的食物和适当的照料而死亡的，有时他们甚至还要承受深重的苦难，也许还不得不住在卫生条件恶劣的环境里，还要干很重的活儿。在所有城镇，人们会经常看到穷人家的孩子大批死亡。农村的情况当然没这么严重，但迄今这个问题还未受到足够的关注，所以谁也不能说穷人家——即便是农村的穷人家——的儿童死亡率不比中上等阶级家庭的儿童死亡率高。有一点的确是很难想象的：一个农民的妻子养了六个孩子，粮食缺口极大，竟然总有办法给予孩子们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食物和照料。现实生活里，农家儿女不会像传奇故事所描写的那样，个个者是红颜小天使。住在农村的人肯定会这样说：农家子弟易患发育不良，成熟得也晚。看上去才十四五岁的孩子，一问才知道已经十八九岁了。还有扶犁耕地的小伙子，按说扶犁是一项有益于健康的活动，但是你很少能看见扶犁的小伙子有腿肚子。这类情况只能归于营养匮乏，不管是适当的营养，还是充足的营养。

To remedy the frequent distresses of the common people, the poor laws of England have been instituted; but it is to be feared, that though they may have alleviated a little the intensity of individual misfortune, they have spread the general evil over a much larger surface. It is a subject often started in conversation and mentioned always as a matter of great surprise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immense sum that is annually collected for the poor in England, there is still so much distress among them. Some think that the money must be embezzled; others that the church-wardens and overseers consume the greater part of it in dinners. All agree that somehow or other it must be very ill-managed. In short, the fact that nearly three millions are collected annually for the poor and yet that their distresses are not removed is the subject of

continual astonishment. But a man who sees a little below the surface of things would be very much more astonished if the fact were otherwise than it is observed to be, or even if a collection universally of eighteen shillings in the pound instead of four, were materially to alter it. I will state a case which I hope will elucidate my meaning.

为了减轻百姓经常遭受的困苦，英国制定了济贫法。济贫法也许稍微减轻了个别人的不幸，但在总体上却让更多人遭了殃。虽然英国每年为穷人征缴巨额钱款，但穷人的痛苦依然如故，这个问题经常成为人们交谈议论的话题，每每提及此事，总觉得不可思议。有些人认为征来的钱款一定是被贪污了，另一些人则认为一大部分是被教会执事和监管员大吃大喝耗费了。大家一致认为，反正钱款管理太混乱。每年为穷人征收近300万英镑钱款，穷人的困苦却不见消减，总之，这个事实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但是，只要我们透过现象表面往深里看一下，恐怕就不会为眼前的情况感到惊讶，而要为另一种情形惊愕不已了，或者这么说吧，如果每英镑征收18先令而不是现在的4先令，穷人的状况是否能大为改观都成问题。我且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

Suppose that by a subscription of the rich, the eighteen pence a day which men earn now was made up five shillings, it might be imagined, perhaps, that they would then be able to live comfortably and have a piece of meat every day for their dinners. But this would be a very false conclusion. The transfer of three shillings and sixpence a day to every labourer would not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meat in the country. There is not at present enough for all to have a decent share. What would then be the consequence? The competition among the buyers in the market of meat would rapidly raise the price from sixpence or sevenpence, to two or three

shillings in the pound; and the commodity would not be divided among many more than it is at present. When an article is scarce, and cannot be distributed to all, he that can shew the most valid patent, that is, he that offers most money becomes the possessor. If we can suppose the competition among the buyers of meat to continue long enough for a greater number of cattle to be reared annually, this could only be done at the expense of the corn, which would be a very disadvantageous exchange, for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country could not then support the same population; and when subsistence is scarce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people, it is of little consequence whether the lowest members of the society possess eighteen pence or five shillings. They must at all events be reduced to live upon the hardest fare and in the smallest quantity.

假设靠富人捐助，每天能挣18便士的人现在可以得到了5先令，也许有人会认为他们的日子会过得比较舒服，每顿饭都有肉吃，但这是个结论大错特错。每天转送给每个劳动者3先令6便士，并不会增加我国的肉类总量。目前，我国并没有那么多肉可以保证每个人都能享用到可观的份额。那么结果会怎样呢？肉类市场上出现买家竞争，会迅速把肉价从每磅六七便士抬高到每磅两三先令，因而分享到肉类商品的人数并不会比现在多。当一种物品稀少，不可分配给每个人的时候，谁持有最高效力的专有权，也就是说谁出价最高，谁就会占有该物品。我们可以设想，肉类买家之间的竞争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每年饲养的肉牛数量因此增加了，但是这种增加也只能以损耗谷物为代价，是一种很不合算的交换。因为很显然，届时国家就供养不起同样多的人口了，而当食物相对于人口数量而言处于匮乏状态时，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每天能否得到18便士或者5先令也就无关紧要了，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得过最苦最紧的日子。

It will be said, perhaps, that the increased number of

purchasers in every article would give a spur to productive industry, and that the whole produce of the island would be increased. This might in some degree be the case. But the spur that these fancied riches would give to population would more than counterbalance it, and the increased produce would be to be divided among a more than proportionably increased number of people. All this time I am supposing that the same quantity of work would be done as before. But this would not really take place. The receipt of five shillings a day, instead of eighteen pence, would make every man fancy himself comparatively rich and able to indulge himself in many hours or days of leisure. This would give a strong and immediate check to productive industry; and in a short time, not only the nation would be poorer, but the lower classes themselves would be much more distressed than when they received only eighteen pence a day.

有人会说，每种物品的购买人数增加了，一定会刺激生产，这样我国的生产总量也会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讲是这样。但是，财富增加对人口增长的刺激会抵消掉财富的增加，因为人口会不按比例快速增多，增加后的总产量须要分配给更多的人。况且我在此假设的条件是：人们完成的工作量和以前一样多，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每天得到5先令而不是18便士，会让大家幻想自己比较富裕了，可以花费许多时间去消遣了。这会即刻影响到生产活动，而且十分严重，要不了多久，不仅整个国家会比以前穷，下层阶级也会比每天只得到18便士时生活得更悲惨。

A collection from the rich of eighteen shillings in the pound, even if distributed in the most judicious manner, would have a little the same effect as that resulting from the supposition I have just made; and no possible contributions or sacrifices of the rich,

particularly in money, could for any time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distress among the lower members of society, whoever they were. Great changes might, indeed, be made. The rich might become poor, and some of the poor rich; but a part of the society must necessarily feel a difficulty of living, and this difficulty will naturally fall on the least fortunate members.

如果按每英镑18先令向富人征收济贫款，即便是按最明智的方式来分配这笔钱，结果也不会和我上面假设的情况有什么差别。富人无论怎么捐献，怎么牺牲，特别是捐钱捐款，也挡不住社会下层阶级（无论他们是谁）一再陷于苦难。的确，这可能引发巨变，富人变穷，一些穷人变富，但还是有一部分社会成员肯定会感受到生活的艰难，这种艰难理所当然地要落在最不幸的社会成员身上。

It may at first appear strange, but I believe it is true, that I cannot by means of money raise a poor man and enable him to live much better than he did before, without proportionably depressing others in the same class. If I retrench the quantity of food consumed in my house, and give him what I have cut off, I then benefit him, without depressing any but myself and family, who, perhaps, may be well able to bear it. If I turn up a piece of uncultivated land, and give him the produce, I then benefit both him and all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because what he before consumed is thrown into the common stock, and probably some of the new produce with it. But if I only give him money, supposing the produce of the country to remain the same, I give him a title to a larger share of that produce than formerly, which share he cannot receive without diminishing the shares of others. It is evident that this effect, in individual instances, must be so small as to be totally imperceptible; but still it must exist, as many other effects do, which, like some of the insects

that people the air, elude our grosser perceptions.

拿钱来抬高一个穷人的地位，让他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同时又不相应降低同一阶层的其他人的生活水平，我是做不到的。此言听起来怪异，但我认为就是这样。如果我减少了家人消耗的食物量，把省下来的食物送给穷人，我就让这个穷人得到了好处，受苦的也只是我自己和家人，也许我和家人能受得了这种苦。如果我开出一块荒地，把生产的东西给予某个穷人，那我是让他和社会全体成员都受益，因为他从前要消耗的粮食变成了社会的共有物资，很有可能连开荒生产的一部分粮食也含在其中。但是，如果我只给他钱，假定我国的粮食总量保持不变的话，那我是给他一种权利，凭此他可以获得比从前更大的粮食份额，而这势必要减少他人的粮食份额。显然，如果是个案，这种此增彼减的影响肯定是很小的，人们根本感觉不到，但它肯定还是存在的，和其他很多影响一样，比如空气里尽是微生物，我们完全感知不到，但它们却依然存在。

Supposing the quantity of food in any country to remain the same for many years together, it is evident that this food must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value of each man's patent, or the sum of money that he can afford to spend on this commodity so universally in request. (Mr. Godwin calls the wealth that a man receives from his ancestors a mouldy patent. It may, I think, very properly be termed a patent, but I hardly see the propriety of calling it a mouldy one, as it is an article in such constant use.) It is a demonstrative truth, therefore, that the patents of one set of men could not be increased in value without diminishing the value of the patents of some other set of men. If the rich were to subscribe and give five shillings a day to five hundred thousand men without retrenching their own tables, no doubt can exist, that as these men would naturally live more at their ease and consume a greater

quantity of provisions, there would be less food remaining to divide among the rest; and consequently each man's patent would be diminished in value, or the same number of pieces of silver would purchase a smaller quantity of subsistence.

假如一个国家的粮食总量许多年保持不变，那么很显然，这些粮食的就必须按每个人拥有的专有权的价值来分配，也就是说，就必须按照每个人为购买这种普遍需要的商品而支付的钱款金额进行分配。（葛德文先生说一个人从祖上继承的财富是发霉的专有权。我觉得，称之为专有权很恰当，但说它发霉了，我不敢苟同，分明是一件经常使用的东西，怎么会发霉。）因此，有一个事实是显见的：一些人的专有权价值要增加，必然以减少另一些人的专有权价值为条件。富人不减少自己饭桌上的食物，每天又要捐给50万穷人每人5先令，那么毫无疑问的是，由于这些穷人自然会比以前生活得舒适，比以前消费的食物更多，所以剩下来分给其他穷人的食物就要减少，这样每个人的专有权价值必将降低，也就是说，相同数量的银子能购买到的生活资料比以前少了。

An increase of population without a proportional increase of food will evidently have the same effect in lowering the value of each man's patent. The food must necessarily be distributed in smaller quantities, and consequently a day's labour will purchase a smaller quantity of provisions. An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would arise, either from an increase of population faster than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or from a different distribution of the money of the society. The food of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long occupied, if it be increasing, increases slowly and regularly and cannot be made to answer any sudden demands; but variation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oney of a society are not infrequently occurring, and are undoubtedly among the causes that occasion the continual

variations which we observe in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人口增长而食物却未能按比例增加，显然会造成相同的结果，即降低了每个人的专有权价值。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数量必然减少，一天劳动所能购买的食物量也将随之减少。食物价格上涨要么是因为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要么是因为社会的财富分配发生了变化。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即便食物仍在增加，也是在缓慢地、逐步地增加，它无法应对突现的需求，而社会的财富分配却经常发生变动，这无疑是食物价格持续变化的原因之一。

The poor laws of England tend to depress the general condition of the poor in these two ways. Their first obvious tendency is to increase population without increasing the food for its support. A poor man may marry with little or no prospect of being able to support a family in independence. They may be said therefore in some measure to create the poor which they maintain; and as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untry must, in consequence of the increased population, be distributed to every man in smaller proportion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labour of those who are not supported by parish assistance will purchase a smaller quantity of provisions than before, and consequently, more of them must be driven to ask for support.

英国的济贫法在两个方面使穷人的总体境况趋于恶化。首先，济贫法只增加人口，不增加供养人口的粮食。一个穷人穷到几乎无力或根本无力养家糊口的地步，却可以结婚成家。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济贫法是在创造它要养活的穷人。由于人口增加，英国分给每个人的食物必然减少，不用说在生活上不靠教区救济的劳动者用劳动所得购买到的食物量要比以前少，他们当中一定有更多的人迫不得已要请

求教区帮困了。

Secondly, the quantity of provisions consumed in workhouses upon a part of the society that cannot in general be considered as the most valuable part, diminishes the shares that would otherwise belong to more industrious and more worthy members; and thus in the same manner forces more to become dependent. If the poor in the workhouses were to live better than they now do, this new distribution of the money of the society would tend more conspicuously to depress the condition of those out of the workhouses by occasioning a rise in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其次，济贫院收容的人整体而言不会被视为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他们要消耗食物，而这会减少比他们勤劳且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如果让济贫院里的穷人比现在生活得好，就须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这必将使食物价格上涨，让济贫院外穷人的生活境况更加艰难。

Fortunately for England, a spirit of independence still remains among the peasantry. The poor laws are strongly calculated to eradicate this spirit. They have succeeded in part; but had they succeeded as completely as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their pernicious tendency would not have been so long concealed.

农民尚存自立精神，这本是英国的幸运。而济贫法却千方百计地要图根除这种精神。在一定程度讲，济贫法做到了这一点，但没有完全做到；如果完全做到，其祸害的苗头就不会被掩盖这么长时间。

Hard as it may appear in individual instances, dependent poverty ought to be held disgraceful. Such a stimulus seems to be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happiness of the great mass of mankind, and every general attempt to weaken this stimulus, however benevolent its apparent intention, will always defeat its own purpose. If men are induced to marry from a prospect of parish provision, with little or no chance of maintaining their families in independence, they are not only unjustly tempted to bring unhappiness and dependence upon themselves and children; but they are tempted, without knowing it, to injure all in the same class with themselves. A labourer who marries without being able to support a family may in some respects be considered as an enemy to all his fellow-labourers.

国民当以贫困又靠人救济为耻，尽管这对于个人而言可能是残酷的，但为了促进人类幸福，这种刺激应该是十分必要的，任何试图削弱这种刺激的做法，不论其用意多么善良，总是事与愿违。有些人如果根本没有可能自立，没有可能养家糊口，若凭教区的施舍诱使他们结婚成家，那么他们是受了不正当的诱惑，不仅会让自己和子女不幸，使其无法自立，而且还会不知不觉地伤害到同阶层的所有成员。一个不能养家而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就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

I feel no doubt whatever that the parish laws of England have contributed to raise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and to lower the real price of labour. They have therefore contributed to impoverish that class of people whose only possession is their labour. It is also difficult to suppose that they have not powerfully contributed to generate that carelessness and want of frugality observable among the poor, so contrary to the disposition frequently to be remarked

among petty tradesmen and small farmers. The labouring poor, to use a vulgar expression, seem always to live from hand to mouth. Their present wants employ their whole attention, and they seldom think of the future. Even when they have an opportunity of saving they seldom exercise it, but all that is beyond their present necessities goes, generally speaking, to the ale-house. The poor laws of England may therefore be said to diminish both the power and the will to save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us to weaken one of the strongest incentives to sobriety and industry, and consequently to happiness.

我深信，英国的教区法是粮价上涨、劳动力实际价格下跌的原因，因此也是造成只拥有劳动力的那个阶级陷于贫困的原因。而且，我们不得不说，教区法大大助长了穷人常见的那种随随便便、大手大脚的习气，这与小商人和小农场主特有的谨慎小心、克勤克俭的品格迥然不同。说得粗俗一点，这些靠卖力气过活的穷人，常常现挣现吃，吃了这顿不管下顿。他们把全部心思都用在满足现时需要上，很少考虑未来。即便有机会攒钱，他们也很少这样做，满足现时需要之后，剩下的钱基本上都下馆子喝酒了。由此可以说，英国的济贫法削弱了普通百姓储蓄的能力和意愿，人们节制勤勉、追求幸福的最强烈一个动机被它弱化了。

It is a general complaint among master manufacturers that high wages ruin all their workmen; but it is difficult to conceive that these men would not save a part of their high wages for the future support of their families, instead of spending it in drunkenness and dissipation, if they did not rely on parish assistance for support in case of accidents. And that the poor employed in manufactures consider this assistance as a reason why they may spend all the wages they earn and enjoy themselves while they can, appears to be

evident from the number of families that, upon the failure of any great manufactory, immediately fall upon the parish, when perhaps the wages earned in this manufactory while it flourished were sufficiently above the price of common country labour to have allowed them to save enough for their support till they could find some other channel for their industry.

大制造商普遍抱怨高工资让所有工人堕落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发生意外事故，又不能指望教区救助，工人们一定会把一部分高工资存起来，供将来养家，而不是拿去酗酒、挥霍。工厂招来干活的穷工人之所以花掉全部工资及时行乐，一个原因是他们可以得到教区的救助。由下述情况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点：大工厂刚一倒闭，马上有很多家庭向教区求援。其实，工厂生意兴隆时，工人挣得的工资比一般农村的劳动价格高很多，他们完全可以攒下足够的钱在厂子倒闭之后维持家用，直至找到另一份工作。

A man who might not be deterred from going to the ale-house from the consideration that on his death, or sickness, he should leave his wife and family upon the parish might yet hesitate in thus dissipating his earnings, if he were assured that, in either of these cases, his family must starve or be left to the support of casual bounty. In China, where the real as well as nominal price of labour is very low, sons are yet obliged by law to support their aged and helpless parents. Whether such a law would be advisable in this country, I will not pretend to determine. But it seems at any rate highly improper, by positive institutions, which render dependent poverty so general, to weaken that disgrace, which for the best and most humane reasons ought to attach to it.

一个男人想到自己生病或死后，妻子儿女可以靠教区救济为生，他去酒馆吃酒就不会有什么顾虑。如果他知道一旦自己生病或死了，妻子儿女要么饿死，要么沿街乞讨，那他要乱花钱时，就会犹豫再三。在中国，劳动的实际价格和名义价格都很低，而且依照法律规定，做儿子的还要赡养年老无助的父母。英国是否也应该制定这样的法律，我不敢妄加断言。但在我看来，积极法规制度让那么多人陷于贫困、丧失了自立能力，还淡化了人们对此的羞耻感，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出于至善至仁的理由，我们都应该对丧失自立、陷于贫困抱有羞耻感。

The mass of happiness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cannot but be diminished when one of the strongest checks to idleness and dissipation is thus removed, and when men are thus allured to marry with little or no prospect of being able to maintain a family in independence. Every obstacle in the way of marriage must undoubtedly be considered as a species of unhappiness. But as from the laws of our nature some check to population must exist, it is better that it should be checked from a foresight of the difficulties attending a family and the fear of dependent poverty, than that it should be encouraged, only to be repressed afterwards by want and sickness.

对懒惰和挥霍自有最强有力的制约因素，当某种制约因素消除之时，当男子们在根本没有独立供养家庭的可能的情况下不胜诱惑、结婚成家之时，普通百姓的幸福总体上只会减少。无疑，人们一定把阻碍结婚的每一个障碍视为一种不幸。但是，既然按照自然法则，人口的增长总会受到某种制约，那么，与其鼓励人口增长，而后等着匮乏和疾病来抑制它，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让前瞻和担忧来抑制它，让人们预先知道养家糊口困难重重，担心陷于贫困又无法自立。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always that there is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food and those wrought commodities, the raw materials of which are in great plenty. A demand for these last will not fail to create them in as great a quantity as they are wanted. The demand for food has by no means the same creative power. In a country where all the fertile spots have been seized, high offers are necessary to encourage the farmer to lay his dressing on land, from which he cannot expect a profitable return for some years. And before the prospect of advantage is sufficiently great to encourage this sort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and while the new produce is rising, great distresses may be suffered from the want of it. The demand for an increased quantity of subsistence is, with few exceptions, constant everywhere, yet we see how slowly it is answered in all those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long occupied.

我们应该时刻记住，食物和制造品是有本质区别的：制造品的原料非常充裕。制造品是需要多少就能制出多少，但对食物的需求却没有同样的创造力来满足。在肥沃土地已全部开垦耕种的国家，需要出高价才能刺激农民改良贫瘠的土地，因为他需要操持若干年才能从这种土地里获得收益。在有利可图的前景足以刺激农民从事这类农耕活动之前，在新产的粮食在增加但尚未成规模之时，粮食的匮乏很可能已经让人们深受其苦了。无一例外，各国的食物需求量一直在增加，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在所有历史悠久的国家，满足该需求的能力增长得非常缓慢。

The poor laws of England were undoubtedly instituted for the most benevolent purpose, but there is great reason to think that they have not succeeded in their intention. They certainly mitigate some cases of very severe distress which might otherwise occur; yet the state of the poor who are supported by parishes, considered in

all its circumstances, is very far from being free from misery. But one of the principal objections to them is that for this assistance which some of the poor receive, in itself almost a doubtful blessing, the whole class of the common people of England is subjected to a set of grating, inconvenient, and tyrannical laws, total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genuine spirit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whole business of settlements, even in its present amended state, is utterly contradictory to all ideas of freedom. The parish persecution of men whose families are likely to become chargeable, and of poor women who are near lying-in, is a most disgraceful and disgusting tyranny. And the obstructions continually occasioned in the market of labour by these laws have a constant tendency to add to the difficulties of those who are struggling to support themselves without assistance.

英国制定济贫法当然是出于最仁慈的目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济贫法并未实现其意图。该法固然减少了赤贫的个案，但从各方面看，靠教区救济为生的贫民根本无法摆脱贫困。不过，反对济贫法的一个主要理由却是，为了让一些穷人得到这种救济（其本身未必是好事），全英国的百姓不得不忍受一整套令人生厌的、繁琐又专横的法律，而这法律却是与宪法的精神实质背道而驰的。这套扶贫济困的办法，即便是现在的修正版，也同一切自由的理念格格不入。教区迫害那些有可能将家人托给教区照管的男人，迫害要待产的贫苦妇女，这是一种极可耻、极可恶的暴政。另外，济贫法还不断在劳动市场上设置障碍，给那些不靠救济、尽量自食其力的人添麻烦、出难题。

These evils attendant on the poor laws are in some degree irremediable. If assistance be to be distributed to a certain class of people, a power must be given somewhere of discriminating the proper objects and of managing the concerns of the institutions that

are necessary; but any great interference with the affairs of other people is a species of tyranny; and in the common course of things the exercise of this power may be expected to become grating to those who are driven to ask for support. The tyranny of Justices, Churchwardens, and Overseers, is a common complaint among the poor;, but the fault does not lie so much in these persons, who probably, before they were in power, were not worse than other people, but in the nature of all such institutions.

这些与济贫法伴生的弊病，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要救济某一类人，就必须向另一些人授权，一方面弄清楚谁是救济对象，另一方面处理必要的制度问题，但是凡是过多干预他人事务的行为都算是一种暴政。一般而言，行使这种权力可能给被迫要求救济的人带来烦恼。穷人常常责怨法官、教会执事和救济款管理员，这些人是有错，但没那么大，他们未上任时也许不比其他人坏，错是由济贫制度的本质造成的。

The evil is perhaps gone too far to be remedied; but I feel little doubt in my own mind that if the poor laws had never existed, though there might have been a few more instances of very severe distress, yet that the aggregate mass of happiness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would have been much greater than it is at present.

也许是积重难返吧，不过我确信，如果没有济贫法，贫苦难堪的个案也许会多一些，但普通百姓的整体幸福程度要比现在强得多。

Mr. Pitt's Poor Bill has the appearance of being framed with benevolent intentions, and the clamour raised against it was in

many respects ill directed, and unreasonable. But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it possesses in a high degree the great and radical defect of all systems of the kind, that of tending to increase population without increasing the means for its support, and thus to depress the condition of those that are not supported by parishes, and, consequently, to create more poor.

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给人的印象是处处以慈善为目的，反对该法案的声音虽然喧嚷，却在许多方面没有切中要害，显得荒唐可笑。但是必须承认，该法案和相类的法案一样，有一个根本性的大缺陷，那就是有利于增加人口却不利于增加养活人口的生活资料，由此使不靠教区救济的人的生活境况恶化，最终制造更多的穷困。

To remove the wants of the lower classes of society is indeed an arduous task. The truth is that the pressure of distress on this part of a community is an evil so deeply seated that no human ingenuity can reach it. Were I to propose a palliative, and palliatives are all that the nature of the case will admit, it should be, in the first place, the total abolition of all the present parish-laws. This would at any rate give liberty and freedom of action to the peasantry of England, which they can hardly be said to possess at present. They would then be able to settle without interruption, wherever there was a prospect of a greater plenty of work and a higher price for labour. The market of labour would then be free, and those obstacles removed, which as things are now, often for a considerable time prevent the price from rising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消除社会下层阶级的贫困，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压在社会这

部分人身上的困苦早已是一种顽疾，人类智慧无法克服它，这是事实。如果让我提出一种缓解困苦的办法（按该病的性质，也只能用缓解的办法），那么首先要彻底废除现行的教区法。此举绝对能让英国农民获得行动自由，可以说他们现在几乎没有行动自由。这样，他们能够不受妨碍，择地而居，哪里工作机会多，劳动价格高，就住在哪里。届时，劳动市场处于自由状态，那些像当前这样使劳动力价格长期不能随着劳动需求上涨的各种障碍也就消除了。

Secondly, premiums might be given for turning up fresh land, and all possible encouragements held out to agriculture above manufactures, and to tillage above grazing. Every endeavour should be used to weaken and destroy all those institutions relating to corporations, apprenticeships, etc., which cause the labours of agriculture to be worse paid than the labours of trade and manufactures. For a country can never produce its proper quantity of food while these distinctions remain in favour of artisans. Such encouragements to agriculture would tend to furnish the market with an increasing quantity of healthy work, and at the same time, by augmenting the produce of the country, would raise the comparative price of labour and ameliorate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er. Being now in better circumstances, and seeing no prospect of parish assistance, he would be more able, as well as more inclined, to enter into associations for providing against the sickness of himself or family.

第二，鼓励人们开垦土地。要尽可能采取措施鼓励农业、鼓励耕种，农业先于制造业，耕种先于畜牧。要尽力削弱并废除所有和同业公会、学徒制等有关的制度，因为这些制度致使农业劳动报酬低于工商业的劳动报酬。一个国家有这类报酬差异，让手工业者得利，就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这类兴农措施既能为市场提供愈来愈多的健

康职业，还可以通过增加全国的农业产量，提高劳动的相对价格，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生活境遇转好了，又不能指望教区的救济，劳动者自会更愿意也更有能力加入协会组织，防备自己或家人遭遇艰难。

Lastly, for cases of extreme distress, county workhouses might be established, supported by rates upon the whole kingdom, and free for persons of all counties, and indeed of all nations. The fare should be hard, and those that were able obliged to work. It would be desirable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comfortable asylums in all difficulties, but merely as places where severe distress might find some alleviation. A part of these houses might be separated, or others built for a most beneficial purpose, which has not been infrequently taken notice of, that of providing a place where any person, whether native or foreigner, might do a day's work at all times and receive the market price for it. Many cases would undoubtedly be left for the exertion of individual benevolence.

最后，各郡可以为特困者设立济贫院，由大不列颠王国统一征缴的税金提供经费，收容各郡乃至各国的贫民。那里的生活应该是艰苦的，凡有能力工作的人必须工作。济贫院不应该被当作困难时期过舒服日子的避难所，而只能是可以稍稍缓解极端困苦的地方，这一点很重要。可以把一部分济贫院单独分出来，或者本着最有益的目的另建一些济贫院（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在这些济贫院里，任何人，不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全天工作，并按市场价取酬。如果有人想行善，机会还是很多的。

A plan of this kind, the preliminary of which should be an

abolition of all the present parish laws, seems to be the best calculated to increase the mass of happiness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of England.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misery, is, alas, beyond the power of man. In the vain endeavour to attain what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is impossible, we now sacrifice not only possible but certain benefits. We tell the common people that if they will submit to a code of tyrannical regulations, they shall never be in want. They do submit to these regulations. They perform their part of the contract, but we do not, nay cannot, perform ours, and thus the poor sacrifice the valuable blessing of liberty and receive nothing that can be called an equivalent in return.

这类计划应该最能增加英国普通百姓的幸福质量，而实施计划的第一步便是废除一切现行的教区法。可叹，防止贫穷乃人力所不及之事！我们徒劳地努力着，想做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不仅牺牲了可能获得的利益，还牺牲了确定能得到的利益。我们对百姓们说，如果愿意服从一套专横的规章，就能永远不受匮乏之苦。他们确实是服从了这套法规，他们履行了应尽的义务，但我们却没有甚至也不能履行我们的义务。这样，穷人是奉献了宝贵的天赋自由，却未得到等价的回报。

Notwithstanding, then, the institution of the poor laws in England, I think it will be allowed that considering the state of the lower classes altogether, both in the towns and in the country, the distresses which they suffer from the want of proper and sufficient food, from hard labour and unwholesome habitations, must operate as a constant check to incipient population.

尽管英国制定了济贫法，但从城镇和农村下层阶级的整体状况

看，由于食物不足、劳动艰辛、居住条件不卫生，他们遭受了种种困苦，这些困苦必然会继续制约人口增长，这一点我认为是可以肯定的。

To these two great checks to population, in all long occupied countries, which I have called the preventive and the positive checks, may be added vicious customs with respect to women, great cities, unwholesome manufactures, luxury, pestilence, and war.

在一切历史悠久的国家，除了上述制约人口的两大因素，也就是我说的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之外，还有针对妇女的恶俗、大城市、有碍健康的制造行业、奢侈浪费、瘟疫、战争等制约因素。

All these checks may be fairly resolved into misery and vice.

所有这些制约因素可分作贫困和罪恶两类。

And that these are the true causes of the slow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n all the states of modern Europe, will appear sufficiently evident from the comparatively rapid increase that has invariably taken place whenever these causes have been in any considerable degree removed.

它们是现代欧洲所有国家人口增长缓慢的真正原因，这一点非常清楚地表现在每当这些因素被大大削弱时，人口就迅速增长。

CHAPTER 6

第六章

New colonies.—Reasons for their rapid increase—North American Colonies.—Extraordinary instance of increase in the back settlements.—Rapidity with which even old states recover the ravages of war, pestilence, famine, or the convulsions of nature.

新殖民地——其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北美殖民地——美洲腹部殖民地人口增加的惊人实例——古老的国家也会从战争、时疫、饥馑的摧残或大自然的破坏中迅速恢复过来。

It has been universally remarked that all new colonies settled in healthy countries, where there was plenty of room and food, have constantly increased with astonishing rapidity in their population. Some of the colonies from ancient Greece, in no very long period, more than equalled their parent states in numbers and strength. And not to dwell on remote instances, the European settlements in the new world bear ample testimony to the truth of a remark, which, indeed, has never, that I know of, been doubted. A plenty of rich land, to be had for little or nothing, is so powerful a cause of population as to overcome all other obstacles. No settlements could well have been worse managed than those of Spain in Mexico, Peru, and Quito. The tyranny, superstition, and vices of the mother-country were introduced in ample quantities among her children. Exorbitant taxes were exacted by the Crown. The most arbitrary restrictions were imposed on their trade. And

the governors were not behind hand in rapacity and extortion for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eir master. Yet, under all these difficulties, the colonies made a quick progress in population. The city of Lima, founded since the conquest, is represented by Ulloa as containing fifty thousand inhabitants near fifty years ago. Quito, which had been but a hamlet of indians, is represented by the same author as in his time equally populous. Mexico is said to contain a hundred thousand inhabitants, which, notwithstanding the exaggerations of the Spanish writers, is supposed to be five times greater than what it contained in the time of Montezuma.

人们普遍注意到，位于幅员辽阔、衣食丰足、健康卫生的国度里的所有新殖民地，其人口在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古希腊的一些殖民地，没用多久就超过了母国的人数和国力。且不必详说年代久远的实例，就建在新大陆上的欧洲殖民地这一事实，已足以证实一种说法（据我所知，其真实性还从未受到怀疑）。只需付出少许的代价或不付任何代价就可以获得大片肥沃的土地，是人们能够克服其他一切障碍而使人口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位于墨西哥、秘鲁和基多境内的西班牙殖民地，管理得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殖民地都糟糕。母国的暴政、迷信以及恶习在殖民地大肆盛行。国王从其殖民地勒索高额赋税，极其专横地限制殖民地贸易。地方长官也不甘落后，贪婪地为其主子和个人进行敲诈掠夺。在这样的重重困难之下，殖民地的人口依然迅速增长。据乌洛亚说，征服后建立的利马市，大约在50年前就已拥有5万居民。他还指出，基多以前只不过是印第安人的一个小村庄，其人口密度大体与他生活的时代相当。据说，墨西哥有10万居民，虽然西班牙的一些著述者有点言过其实，但那时的人口也应是蒙特祖马时代的五倍。

In the Portuguese colony of Brazil, governed with almost equal tyranny, there were supposed to be, thirty years since, six hundred

thousand inhabitants of European extraction.

巴西境内的葡萄牙殖民地，几乎处在同样的专制统治之下，据估计30年来，当地已有60万居民拥有欧洲血统。

The Dutch and French colonies, though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exclusive companies of merchants, which, as Dr. Adam Smith says very justly, is the worst of all possible governments, still persisted in thriving under every disadvantage.

尽管处在商人独资公司的统治下（亚当·斯密博士公正地评说，那是所有可能存在的统治中最恶劣的一种），荷兰和法国的殖民地，在各种不利条件下仍然欣欣向荣。

But the English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now the powerful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de by far the most rapid progress. To the plenty of good land which they possessed in common with the Spanish and Portuguese settlements, they added a greater degree of liberty and equality. Though not without some restrictions on their foreign commerce, they were allowed a perfect liberty of managing their own internal affairs.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at prevailed were favourable to the alienation and division of property. Lands that were not cultivated by the proprietor within a limited time were declared grantable to any other person. In Pennsylvania there was no right of primogeniture; and in the provinces of New England the eldest had only a double share. There were no tithes in any of the States, and scarcely any taxes. And on account of the extreme cheapness of good land, a

capital could not be more advantageously employed than in agriculture, which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 supplies the greatest quantity of healthy work affords much the most valuable produce to the society.

但发展最为迅速的，还是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现已是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除了拥有和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一样肥沃的土地，它们还在更大程度上享有自由和平等。尽管它们的对外贸易也受到某些限制，但却完全享有处理自己内部事务的自由。当时盛行的政治制度有利于财产的转让和分割，若地主的土地不在规定的期限内耕种，则由官方宣告转让给其他任何人。在宾夕法尼亚州没有长子继承权，而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些州郡，长子仅享有双份财产的权利。任何州都不征收什一税，且几乎不征收任何赋税。由于土地肥沃又极其廉价，将资本投入到农业是最有利不过了，农业能够提供数量最多又益于健康的工作，同时，还可以向社会提供许多最有价值的农产品。

The consequence of these 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united was a rapidity of increase probably without parallel in history. Throughout all the northern colonies, the population was found to double itself in twenty-five years. The original number of persons who had settled in the four provinces of new England in 1643 was 21,200. (I take these figures from Dr. Price's two volumes of Observations; not having Dr. Styles' pamphlet, from which he quotes, by me.) Afterwards, it is supposed that more left them than went to them. In the year 1760, they were increased to half a million. They had therefore all along doubled their own number in twenty-five years. In New Jersey the period of doubling appeared to be twenty-two years; and in Rhode island still less. In the back settlements, where the inhabitants applied themselves solely to agriculture, and luxury was not known, they were found to double

their own number in fifteen years, a most extraordinary instance of increase. Along the sea coast, which would naturally be first inhabited, the period of doubling was about thirty-five years; and in some of the maritime towns, the population was absolutely at a stand.

这些有利的情况结合起来，促使人口以史上无与伦比的速度增长。人们发现，所有北美殖民地的人口在25年内就增加了一倍。1643年，在新英格兰的四个州定居下来的最初人口为21200人。（由于没有斯泰勒博士所编的小册子，我的这些数据引自普赖斯博士的调查报告的两卷本，他又援引自斯泰尔斯博士所编的小册子）后来，据说移出的人数多于去定居的。1760年，那里的人口增长到50万。因此，一直以来，那里的人口每25年就增加一倍。在新泽西州，每22年人口就增加一倍；而在罗德岛，22年都用不了。在腹部殖民地，居民只是一门心思从事农业，不知奢华为何物，因而其人口每15年就增长一倍，这种人口增长的实例极不寻常。人们最先定居的沿海地区，那里的人口每35年才增长一倍；而一些沿海城镇的人口则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In instances of this kind the powers of the earth appear to be fully equal to answer it the demands for food that can be made upon it by man. But we should be led into an error if we were thence to suppose that population and food ever really increase in the same ratio. The one is still a geometrical and the other an arithmetical ratio, that is, one increases by multiplication, and the other by addition. Where there are few people, and a great quantity of fertile land, the power of the earth to afford a yearly increase of food may be compared to a great reservoir of water, supplied by a moderate stream. The faster population increases, the more help will be got to draw off the water, and consequently an increasing

quantity will be taken every year. But the sooner, undoubtedly, will the reservoir be exhausted, and the streams only remain. When acre has been added to acre, till all the fertile land is occupied, the yearly increase of food will depend upon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land already in possession; and even this moderate stream will be gradually diminishing. But population, could it be supplied with food, would go on with unexhausted vigour, and the increase of one period would furnish the power of a greater increase the next, and this without any limit.)

（就此类状况而言，土地的产出力似乎能够充分满足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但如果我们由此认为，人口和食物实际上是以相同的比例增加，那就错了。人口仍是按几何比率增加，而食物则是按算术率比增加，即人口以乘法递增，而食物是以加法递增。在地广人稀、土壤肥沃的地方，土地年增产食物的能力可被比作由涓涓细流汇聚而成的大水库。人口增长越快，去取水的人手也越多，因而每年的取水量也在增加。毫无疑问，水库很快就会枯竭，只剩下涓涓细流。耕地一亩一亩地增加，直到所有肥沃的土地都被占用，食物的年增加量将取决于已占有的土地的改良情况；就连这涓涓细流也会逐渐减少。但人口只要能得到食物供给，就会以无穷的活力不断增加，而某一时期的人口增长，又会为下个时期人口更大的增长提供动力，如此绵延不绝。）

These facts seem to shew that population increases exactly in the proportion that the two great checks to it, misery and vice, are removed; and that there is not a truer criterion of the happiness and innocence of a people than the rapidity of their increase. The unwholesomeness of towns, to which some persons are necessarily driven from the nature of their trades, must be considered as a species of misery; and every the slightest check to marriage, from a prospect of the difficulty of maintaining a family, may be fairly

classed under the same head. In short it is difficult to conceive any check to population which does not come under the description of some species of misery or vice.

这些事实似乎表明，人口增长恰好是同其两大障碍（贫困和邪恶）被消除的程度成比例的，而且，再没有什么标准比人口增长速度更能如实地衡量人民的幸福和纯真程度了。城市（因职业的性质，一些人被迫进城）的卫生状况不好，应被视为一种贫困；因难于养家糊口而在婚姻中遭遇的各种微小阻碍，也理当归入此类。总之，很难想出有哪种阻碍人口增长的因素不属于贫困或邪恶的范畴的。

The population of the thirteen American States before the war was reckoned at about three millions. Nobody imagines that Great Britain is less populous at present for the emigration of the small parent stock that produced these numbers. On the contrary, a certain degree of emigration is known to be favourable to the population of the mother country.It has been particularly remarked that the two Spanish provinces from which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eople emigrated to America, became in consequence more populous. Whatever was the original number of British emigrants that increased so fast in the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let us ask, why does not an equal number produce an equal increase in the same time in Great Britain? The great and obvious cause to be assigned is the want of room and food, or, in other words, misery; and that this is a much more powerful cause even than vice appears sufficiently evident from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even old states recover the desolations of war, pestilence, or the accidents of nature. They are then for a short time placed a little in the situation of new states; and the effect is always answerable to what might be expected. If the industry of the inhabitants be not destroyed by fear

or tyranny, subsistence will soon increase beyond the wants of the reduced numbers; and the invariable consequence will be that population which before, perhaps, was nearly stationary, will begin immediately to increase.

据估计，独立战争前，美国13个州的人口约为300万。谁也无法想到，大不列颠母国的少数移民竟然在那繁衍出这么多的人口，而如今它本国却人口稀少。相反，我们知道，一定程度的对外移民对母国的人口增长也是有利的。人们特别注意到，西班牙移居美洲人数最多的两个省，后来竟成了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不管导致北美殖民地人口增长如此迅速的不列颠移民有多少，我们会问，为什么在同时代的大不列颠，同样的人口怎么没有得到同样的增长？其重要又显著的原因是空间和食物的缺乏，换句话说，是贫困。同恶习相比，它更有说服力，这主要体现在：一些古老的国家都能迅速地从战争的蹂躏下、瘟疫或自然灾害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当时这些古老的国家的状况有点像新兴国家，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是结果也往往在人们的预料之中了。如果居民的辛勤劳动没有受到恐惧或暴政的破坏，生活资料就会很快地超过已减少的人口的需求，而其必然的结果应当是，过去几乎静止不变的人口也许会立即开始增长。

The fertile province of Flanders, which has been so often the seat of the most destructive wars, after a respite of a few years, has appeared always as fruitful and as populous as ever. Even the Palatinate lifted up its head again after the execrable ravages of Louis the Fourteenth. The effects of the dreadful plague in London in 1666were not perceptible fifteen or twenty years afterwards. The traces of the most destructive famines in China and Indostan are by all accounts very soon obliterated. It may even be doubted whether Turkey and Egypt are upon an average much less populous for the plagues that periodically lay them waste. If the number of people

which they contain be less now than formerly, it is, probably, rather to be attributed to the tyranny and oppression of the government under which they groan, and the consequent discouragements to agriculture, than to the loss which they sustain by the plague. The most tremendous convulsions of nature, such as volcanic eruptions and earthquakes, if they do not happen so frequently as to drive away the inhabitants, or to destroy their spirit of industry, have but a trifling effect on the average population of any state. Naples, and the country under Vesuvius, are still very populous, notwithstanding the repeated eruptions of that mountain. And Lisbon and Lima are now, probably, nearly in the same state with regard to population as they were before the last earthquakes.

在弗兰德斯州的肥沃土地上，常常会爆发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经过几年的休整后，这片土地又恢复了以往硕果累累、人口众多的景象。就连遭遇了路易十四的凶残掠夺之后的巴拉丁人都已再次兴旺起来。1666年伦敦市骇人的黑死病阴影，在过了15年或20年后也已感觉不到了。据记载，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的毁灭性大饥荒的痕迹也很快被抹去了。甚至有人怀疑，土耳其和埃及两国是否是由于遭受土地周期性荒废的灾害而人口锐减。如果现有人口比过去少，那么很可能归咎于人们所抱怨的政府的专制和压迫，还有后来对农业发展的抑制措施，而不是灾害所带来的损失。除非是极其巨大的自然灾变（如火山喷发和地震）频繁发生迫使居民迁移或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勤勉精神，否则这些是不会对任何国家的平均人口产生太大影响的。那不勒斯以及位于维苏威火山山下的村庄，虽然经常遇到火山爆发，人口却依然极为稠密。现在，里斯本和利马市的人口也许同与上次地震前几乎相同。

CHAPTER 7

第七章

A probable cause of epidemics.—Extracts from Mr. Suessmilch's tables.—Periodical returns of sickly seasons to be expected in certain cases.—Proportion of births to burials for short periods in any country an inadequate criterion of the real average increase of population.—Best criterion of a permanent increase of population.—Great frugality of living one of the causes of the famines of China and Indostan.—Evil tendency of one of the clauses in Mr. Pitt's Poor Bill.—Only one proper way of encouraging population.—Causes of the Happiness of nations.—Famine, the last and most dreadful mode by which nature represses a redundant population.—The three propositions considered as established.

流行病蔓延的可能原因之一——摘自苏斯米尔奇先生的表格——可以预测疫情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周期性回归——任一国家在短期内的出生人数与埋葬人数的比例并非衡量实际的人口平均增长的合适标准——衡量人口持续增长的最佳标准——生活十分节俭是中国和印度发生大饥荒的原因之一——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中的一项条款具有有害倾向——鼓励人口增长唯一的妥当方式——国民幸福的原因——饥荒是大自然为抑制人口过剩而采用的最后也是最可怕的方式——可以认为这三个命题成立。

By great attention to cleanliness, the plague seems at length to be completely expelled from London. But it is not improbable that among the secondary causes that produce even sickly seasons and

epidemics ought to be ranked a crowded population and unwholesome and insufficient food. I have been led to this remark, by looking over some of the tables of Mr. Suessmilch, which Dr. Price has extracted in one of his notes to the postscript on the controversy respecting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 and Wales. They are considered as very correct, and if such tables were general, they would throw great light on the different ways by which population is repressed and prevented from increasing beyond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in any country. I will extract a part of the tables, with Dr. Price's remarks.

由于十分重视清洁卫生，伦敦似乎最终彻底驱除了黑死病。但是，人口密集，食物不足又以及不讲卫生，也许应是导致疾病多发季节和各种流行病出现的次要原因之一。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查看过苏斯米尔奇先生的一些表格，普赖斯博士在为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论战作跋文的一个注释中曾摘录过这些表格。这些表格的正确性已得到认可，如果这些表格内容具有普遍性，那就能够阐明各国为抑制和防止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而进行的各种尝试。我将从这些表格中摘录一部分并附上普赖斯博士的标注。

Inthe Kingdomof Prussia, and Dukedom of Lithuania

普鲁士王国和立陶宛公国

Annual Average.	Births.	Burials.	Marriages.	Proportion of Births to Marriages.	Proportion of Births to Burials.
10 Yrs to 1702	21963	14718	5928	37 to 10	150 to 100
5 Yrs to 1716	21602	11984	4968	37 to 10	180 to 100
5 Yrs to 1756	28392	19154	5599	50 to 10	148 to 100

		出生数与结婚数		出生数与埋葬数	
年平均	出生数	埋葬数	结婚数	比例	比例
到1702年的10年间	21963	14718	5928	37/10	150/100
到1716年的5年间	21602	11984	4968	37/10	180/100
到1756年的5年间	28392	19154	5599	50/10	148/100

"N.B. In 1709 and 1710, a pestilence carried off 247,733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country, and in 1736 and 1737, epidemics prevailed, which again checked its increase."

"注：在1709年和1710年，瘟疫夺去了该国247733人的生命；在1736年和1737年，传染病肆虐，又一次阻碍了该国的人口增长。"

It may be remarked, that the greatest proportion of births to burials, was in the five years after the great pestilence.

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出生数与埋葬数之间的最大比值出现在大瘟疫发生后的5年内。

Duchy of Pomrania

波美拉尼亚的荷兰人

Annual Average.	Births.	Burials.	Marriages.	Proportion of Births to Marriages.	Proportion of Births to Burials.
6 Yrs. to 1702	6540	4647	1810	36 to 10	140 to 100
6 Yrs. to 1708	7455	4208	1875	39 to 10	177 to 100
6 Yrs. to 1726	8432	5627	2131	39 to 10	150 to 100
4 Yrs. to 1756	12767	9281	2957	43 to 10	137 to 100

		出生数与结婚数		出生数与埋葬数	
年平均	出生数	埋葬数	结婚数	比例	比例
到1702年的6年间	6540	4647	1810	36/10	140/100
到1708年的6年间	7455	4208	1875	39/10	177/100
到1726年的6年间	8432	5627	2131	39/10	150/100
到1756年的6年间	12767	9281	2957	43/10	137/100

“In this instance the inhabitants appear to have been almost doubled in fifty-six years, no very bad epidemics having once interrupted the increase, but the three year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last period (to 1759) were so sickly that the births were sunk to 10,229, and the burials raised to 15,068.”

“就这一实例而言，居民人口似乎在56年内增长了近一倍。在此期间，人口的增长未曾受到严重传染病的干扰，但紧随着最后一个时期（直到1759年）的三年里，疾病盛行导致出生数下降至10229人，

埋葬数上升至15068人。”

Is it not probable that in this case the number of inhabitants had increased faster than the food and the accommodations necessary to preserve them in health? The mass of the people would, upon this supposition, be obliged to live harder, and a greater number would be crowded together in one house; and it is not surely improbable that these were among the natural causes that produced the three sickly years. These causes may produce such an effect, though the country, absolutely considered, may not be extremely crowded and populous. In a country even thinly inhabited, if an increase of population take place, before more food is raised, and more houses are built, the inhabitants must be distressed in some degree for room and subsistence. Were the marriages in England, for the next eight or ten years, to be more prolifick than usual, or even were a greater number of marriages than usual to take place, supposing the number of houses to remain the same, instead of five or six to a cottage, there must be seven or eight, and this, added to the necessity of harder living, would probably have a very unfavourable effect on the health of the common people.

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居民人数不会比维持他们身体健康的食宿资料增长更快吗？基于这个假设，大多数人们不得不过着更加艰辛的生活，更多的人将挤在一间屋子，这种情况也必然是造成三年瘟疫盛行的自然原因之一。尽管这个国家绝对不会出现人口过度拥挤或过度稠密的情形，上述原因也会造成这样一种结果。在一个人口甚为稀少的国家，如果在食物增加和房屋增建以前就出现了人口增长，那么它的居民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因缺少房屋和生活资料而陷入痛苦之中。如果在接下来的八年十年里，英格兰的结婚生子者多于以往，甚至结婚

人数大大多于以往，而假设住房数量不变，那么一间小屋就要住七八个人了，而不是五六个人，再加上人们还要更艰苦地维持生活，那么这很可能会对人民大众的健康状况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Neumark of Brandenburgh

勃兰登堡的诺伊马克

Annual Average.	Births.	Burials.	Marriages.	Proportion of Births to Marriages.	Proportion of Births to Burials.
5 yrs to 1701	5433	3483	1436	37 to 10	155 to 100
5 yrs to 1726	7012	4254	1713	40 to 10	164 to 100
5 yrs to 1756	7978	5567	1891	42 to 10	143 to 100

		出生数与结婚数		出生数与埋葬数	
年平均	出生数	埋葬数	结婚数	比例	比例
到1701年的5年间	5433	3483	1436	37/10	155/100
到1726年的5年间	7012	4254	1713	40/10	164/100
到1756年的5年间	7978	5567	1891	42/10	143/100

“Epidemics prevailed for six years, from 1736, to 1741, which checked the increase.”

“1736——1741的6年间，传染病流行，阻碍了人口增长。”

Dukedom of Magdeburgh

马格德堡公国

Annual Average.	Births.	Burials.	Marriages.	Proportion of Births to Marriages.	Proportion of Births to Burials.
5 yrs to 1702	6431	4103	1681	38 to 10	156 to 100
5 yrs to 1717	7590	5335	2076	36 to 10	142 to 100
5 yrs to 1756	8,850	8,069	2,193	40 to 10	109 to 100

		出生数与结婚数		出生数与埋葬数	
年平均	出生数	埋葬数	结婚数	比例	比例
到1702年的5年间	6431	4103	1681	38/10	156/100
到1717年的5年间	7590	5335	2076	36/10	142/100
到1756年的5年间	8850	8069	2193	40/10	109/100

“The years 1738, 1740, 1750, and 1751, were particularly sickly.”

“其中1738年、1740年、1750年和1751年疾病异常流行。”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is subject, I refer the reader to Mr. Suessmilch's tables. The extracts that I have made are sufficient to

shew the periodical, though irregular, returns of sickly seasons; and it seems highly probable that a scantiness of room and food was one of the principal causes that occasioned them.

想要获得更多详细资料，请参阅苏斯米尔奇先生的表格。我所摘录的上述内容充分地证明了疾病反复流行的周期性（尽管这些周期不太有规律性），而房屋和食物缺乏似乎很可能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It appears from the tables that these countries were increasing rather fast for old states, notwithstanding the occasional seasons that prevailed. Cultivation must have been improving, and marriages, consequently, encouraged. For the checks to population appear to have been rather of the positive, than of the preventive kind. When from a prospect of increasing plenty in any country, the weight that represses population is in some degree removed; it is highly probable that the motion will be continued beyond the operation of the cause that first impelled it. Or, to be more particular, when the increasing produce of a country,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labour, so far ameliorate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er as greatly to encourage marriage,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custom of early marriages will continue till the 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 has gone beyond the increased produce, and sickly seasons appear to be the natural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 I should expect, therefore, that those countries where subsistence was increasing sufficiently at times to encourage population but not to answer all its demands, would be more subject to periodical epidemics than those where the population could more completely accommodate itself to the average produce.

从这几个表格看，历史悠久的国家，虽然时有疾病流行，但人口却增加得相当迅速。耕作水平的不断改良使结婚得到鼓励。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与其说是预防性的，不如说是积极的举措。从增加任一国家人口的角度出发，当遏制人口增长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被消除时，这种动机很可能会超越最初的推动力而持续不断地发生作用。或者，更具体点说，当一个国家生产的资料不断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改善到能鼓励结婚的程度时，早婚的习俗可能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该国的人口增长超过生产物的增加，那么季节性流行病的发生似乎就成了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我认为，生活资料的充分增加偶尔能鼓励人口增长却又不能完全满足人口所需的那些国家，会比人口增长更能完全适应平均产量的那些国家，更易频繁地遭受周期性流行病的打击。

An observation the converse of this will probably also be found true. In those countries that are subject to periodical sicknesses,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or the excess of births above the burials, will be greater in the intervals of these periods than is usual, caeteris paribus, in the countries not so much subject to such disorders. If Turkey and Egypt have been nearly stationary in their average population for the last century, in the intervals of their periodical plagues, the births must have exceeded the burials in a greater proportion than in such countries as France and England.

如果是相反的情况，其观察结果也会是正确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遭受各种周期性疾病的国家，其人口的增长数，或出生数超出埋葬数的人口，在这些周期的间隔期内往往高于那些不太受周期性疾病干扰的国家。如果土耳其和埃及在上世纪的平均人口几乎固定不变的话，在周期性疫情的间歇期里，其出生数超出埋葬数的人口比例必定会大大高于法国和英格兰等国。

The average proportion of births to burials in any country for a period of five to ten years, will hence appear to be a very inadequate criterion by which to judge of its real progress in population. This proportion certainly shews the rate of increase during those five or ten years; but we can by no means thence infer what had been the increase for the twenty years before, or what would be the increase for the twenty years after. Dr. Price observes that Sweden, Norway, Russia, and the kingdom of Naples, are increasing fast; but the extracts from registers that he has given are not for periods of sufficient extent to establish the fact. It is highly probable, however, that Sweden, Norway, and Russia, are really increasing their population, though not at the rate that the proportion of births to burials for the short periods that Dr. Price takes would seem to shew. [8_1]

因此，把任何国家在5年或10年内的人口出生数与埋葬数之间的平均比例，作为衡量其人口实际增长的标准，似乎都很不恰当。虽然这个比例的确表明了这5年或1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但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其20年以前或者20年以后的增长情况。普赖斯博士注意到，瑞典、挪威、俄国和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增长很快。但是，他从户籍登记簿里所摘录的资料还不能充分证明这一事实。然而，瑞典、挪威和俄国的人口确实是在增长，尽管并非是按照短时期内出生数与埋葬数（普赖斯博士摘录中所示）的比例而增长的 [9_1] 。

For five years, ending in 1777, the proportion of births to burials in the kingdom of Naples was 144 to 100, but there is reason to suppose that this proportion would indicate an increase much greater than would be really found to have taken place in that kingdom during a period of a hundred years.

到1777年为止的5年间，那不勒斯王国的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为144/100，但是，我们可以推断，这个比例所表示的人口增长率，比该王国在100年间的实际人口增长率要高得多。

Dr. Short compared the registers of many villages and market towns in England for two periods; the first, from Queen Elizabeth to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the second, from different years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the present. And from a comparison of these extracts, it appears that in the former period the births exceeded the burials in the proportion of 124 to 100, but in the latter, only in the proportion of 111 to 100. Dr. Price thinks that the registers in the former period are not to be depended upon; but, probably, in this instance they do not give incorrect proportions. At least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expecting to find a greater excess of births above the burials in the former period than in the latter. In the natural progress of the population of any country, more good land will, caeteris paribus [8_2] , be taken into cultivation in the earlier stages of it than in the later.

肖特博士将英国许多村庄和集镇在两个时期内的户籍登记簿作了对比。第一个时期是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到上世纪中叶，第二个时期是从上世纪末期到本世纪中叶。对比这些摘录内容可以看出，在前一时期内，出生数超过埋葬数，比例为124/100，而在后一时期，其比例仅为以111/100。普赖斯博士认为，前一时期的户籍登记簿是不可靠的，但就这种情况而言，它所给出的比例是不会有误的。至少，许多理由已表明，前一时期内，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幅度是远远高于后一时期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9_2] ，在任何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过程中，前一时期用于耕作的肥沃土地总是多于后一时期。

And a greater proportional yearly increase of produce will almost invariably be followed by a greater proportional increase of population. But, besides this great cause, which would naturally give the excess of births above burials greater at the end of Queen Elizabeth's reign than in the middl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I cannot help thinking that the occasional ravages of the plague in the former period must have had some tendency to increase this proportion. If an average of ten years had been taken in the intervals of the returns of this dreadful disorder, or if the years of plague had been rejected as accidental, the registers would certainly give the proportion of births to burials too high for the real average increase of the population. For some few years after the great plague in 1666, it is probable that there was a more than usual excess of births above burials, particularly if Dr. Price's opinion be founded, that England was more populous at the revolution (which happened only twenty-two years afterwards) than it is at present.

年增产率逐年提高，人口数量总是会相应地大幅度增长。这一重大原因导致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年出生数超出埋葬数的人口大大多于本世纪中叶，除此之外，我不禁想起，前一时期内瘟疫的间歇性破坏，也可能有加大这一比例的趋势。如果从出现这种恐怖混乱的间歇期中选取10年作为平均数，或者将瘟疫的发生视为偶发事件而不把其流行年份计算在内，那么户籍登记簿所给出的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就必然会偏高，而不能反映出人口的实际平均增长情况。在1666年发生严重的黑死病后的数年里，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幅度可能大于以往，尤其是，如果普赖斯博士的观点有据可查，那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1666年黑死病爆发的22年后）时期的人口要比现在稠密得多。

Mr. King, in 1693, stated the proportion of the births to the burials throughout the Kingdom, exclusive of London, as 115 to

100. Dr. Short makes it, in the middl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111 to 100, including London. The proportion in France for five years, ending in 1774, was 117 to 100. If these statements are near the truth; and if there are no very great variations at particular periods in the proportions, it would appear that the population of France and England has accommodated itself very nearly to the average produce of each country. The discouragements to marriage, the consequent vicious habits, war, luxury, the silent though certain depopulation of large towns, and the close habitations, and insufficient food of many of the poor, prevent population from increasing beyond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and, if I may use an expression which certainly at first appears strange, supercede the necessity of great and ravaging epidemics to repress what is redundant. Were a wasting plague to sweep off two millions in England, and six millions in France, there can be no doubt whatever that, after the inhabitants had recovered from the dreadful shock, the proportion of births to burials would be much above what it is in either country at present.

金先生在1693年说过，除伦敦外，全英国的人口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为115/100。本世纪中叶，肖特博士认为，包括伦敦在内，这一比例为110/100。到1774年为止的5年间，法国的这一比例为117/100。如果这些说法接近事实，且如果这一比例在某些特定时期内未出现很大的变动，那么法国和英国的人口就似乎与本国各自的平均生产量基本相符了。结婚受到阻挠以及随之而来的恶习、战争、奢侈享受，加上大城镇必然出现的人口悄然减少、住房拥挤和许多穷人的食物匮乏等，都阻碍着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而且还替代了具有破坏性的流行病来遏制过剩的人口（如果我一开始这么说，人们乍一听，肯定会感到这说法很奇怪）。如果一场破坏性的黑死病使英格兰200万人丧生，使法国600万人丧生，那么这两国的居民在从这种可怕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以后，其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毫无疑问会

大大高于现有比例。

In New Jersey, the proportion of births to deaths on an average of seven years, ending in 1743, was as 300 to 100. In France and England, taking the highest proportion, it is as 117 to 100. Great and astonishing as this difference is, we ought not to be so wonder-struck at it as to attribute it to the miraculous interposition of heaven. The causes of it are not remote, latent and mysterious; but near us, round about us, and open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every inquiring mind. It accords with the most liberal spirit of philosophy to suppose that not a stone can fall, or a plant rise, without the immediate agency of divine power. But we know from experience that these operations of what we call nature have been conducted almost invariably according to fixed laws. And since the world began, the causes of population and depopulation have probably been as constant as any of the laws of nature with which we are acquainted.

在新泽西，截止到1743年，7年间出生数与死亡数的比例平均为300/100。在法国和英国，其最高比例仅为117/100。对于如此巨大而令人吃惊的差异，我们不必大惊小怪地把它归因于上天奇迹般的干涉。其原因并没有那么遥不可及、隐秘而不可捉摸；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周围，每一个充满求知欲的人只要探索都能发现。要是没有神力的直接作用，石头就不能落下，植物就不能长大，这是与最自由的哲学精神相符的。但是，我们从经验中得知，这些被我们称之为“自然”的运化过程几乎总在遵循着固定的法则。自开天辟地以来，人口增加或减少的原因，可能同我们所熟知的任何自然法则一样恒定不变。

The passion between the sexes has appeared in every age to be so nearly the same that it may always be considered, in algebraic language, as a given quantity. The great law of necessity which prevents population from increasing in any country beyond the food which it can either produce or acquire, is a law so open to our view, so obvious and evident to our understandings, and so completely confirmed by the experience of every age, that we cannot for a moment doubt it. The different modes which nature takes to prevent or repress a redundant population do not appear, indeed, to us so certain and regular; but though we cannot always predict the mode we may with certainty predict the fact. If the proportion of births to deaths for a few years indicate an increase of numbers much beyond the proportional increased or acquired produce of the country, we may be perfectly certain that unless an emigration takes place, the deaths will shortly exceed the births; and that the increase that had taken place for a few years cannot be the real average increase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 Were there no other depopulating causes, every country would, without doubt, be subject to periodical pestilences or famines.

两性之间的情欲似乎在每个时代都大致相同，因而，借代数语言来表述的话，它常常被当成已知量。阻碍着各国人口增长超过其所能生产或获取的食物数量的这种伟大的必然法则，对于我们来说是可见的、易于理解的，而且是已为历代经验所充分证实的，容不得我们存有片刻怀疑。自然用以防止或抑制人口过剩的各种方式，在我们看来是那么的不确定、不规则，不过虽然我们并不能总是预知其方式，但是却能够确切地预测其事实。如果几年内的出生数与死亡数之比表明该国人口增长大大超过按比例增加的生产物或获得物，那么我们可以确信的是，除非向外移民，否则死亡数很快会超过出生数。某些年内的人口增长量不能作为该国人口的实际平均增长量。如果没有造成人口减少的其他原因，那么每个国家都无疑会遭受周期性瘟疫或饥荒。

The only true criterion of a real and permanent increase in the population of any country is the increase of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But even this criterion is subject to some slight variations, which are, however, completely open to our view and observations. In some countries population appears to have been forced; that is, the people have been habituated by degrees to live almost upon the smallest possible quantity of food. There must have been periods in such counties when population increased permanently, without an increase in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China seems to answer to this description. If the accounts we have of it are to be trusted, the lower classes of people are in the habit of living almost upon the smallest possible quantity of food, and are glad to get any putrid offals that European labourers would rather starve than eat. The law in China which permits parents to expose their children has tended principally thus to force the population. A nation in this state must necessarily be subject to famines. Where a country is so populous in proportion to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that the average produce of it is but barely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lives of the inhabitants, any deficiency from the badness of seasons must be fatal.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very frugal manner in which the Gentoos are in the habit of living contributes in some degree to the famines of indostan.

衡量任何国家人口真实而持续增长的唯一正确标准，是生活资料的增加。但是，就连这样的一个标准也会发生些许变动，不过这种变动是直观的，我们可以看得到、察觉到。在某些国家，人口增长似乎受了外力推动，换句话说，它们的人民已经逐渐习惯了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存。这类国家很可能多次经历人口持续增长但生活资料却没有增加的时期。中国似乎符合这一描述。如果我们所有的记载都可信的话，那么中国下层阶级习惯于依靠最少的食物过活，也乐

意食用腐烂的杂碎（而欧洲劳动者宁愿挨饿也不会吃）。中国的法律允许父母抛弃孩子，因此倾向于对人口施加强力。处在这种状态的国家肯定会遭受饥荒。在一个人口众多、人口同生活资料比例失衡的国家，其平均生产量仅够维持居民活命，那么因时令不好而造成的任何匮乏都会是致命的。印度人如巴布亚企鹅般节俭的生活习惯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印度的大饥荒。

In America, where the reward of labour is at present so liberal, the lower classes might retrench very considerably in a year of scarcity without materially distressing themselves. A famine therefore seems to be almost impossible. It may be expected that in the progress of the population of America, the labourers will in time be much less liberally rewarded. The numbers will in this case permanently increase without a proportional increase in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在美国，如今劳动者的酬劳丰厚，就算遇到荒年，下层阶级只要节俭度日就不会在物质上陷入困苦。因此，那里几乎不可能发生饥荒。可以预料，随着美国人口的增长，劳动者的酬劳最后将会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将会持续增长，而生活资料却不会按比例增加。

In the different States of Europe there must be some variations in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inhabitants and the quantity of food consumed, arising from the different habits of living that prevail in each state. The labourers of the South of England are so accustomed to eat fine wheaten bread that they will suffer themselves to be half starved before they will submit to live like the Scotch peasants. They might perhaps in time, by the

constant operation of the hard law of necessity, be reduced to live even like the Lower Chinese; and the country would then, with the same quantity of food, support a greater population. But to effect this must always be a most difficult, and, every friend to humanity will hope, an abortive attempt. Nothing is so common as to hear of encouragements that ought to be given to population. If the tendency of mankind to increase be so great as I have represented it to be, it may appear strange that this increase does not come when it is thus repeatedly called for. The true reason is that the demand for a greater population is made without preparing the funds necessary to support it. Increase the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labour by promoting cultivation, and with it consequently increase the produce of the country, and ameliorate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er, and no apprehensions whatever need be entertained of the proportional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n attempt to effect this purpose in any other way is vicious, cruel, and tyrannical, and in any state of tolerable freedom cannot therefore succeed. It may appear to be the interest of the rulers, and the rich of a State, to force population, and thereby lower the price of labour, and consequently the expense of fleets and armies, and the cost of manufactures for foreign sale; but every attempt of the kind should be carefully watched and strenuously resisted by the friends of the poor, particularly when it comes under the deceitful garb of benevolence, and is likely, on that account, to be cheerfully and cordially received by the common people.

在欧洲，因各国盛行的生活习惯差异，居民人数与食物消耗量之间的比例必然有所不同。英格兰南部的劳动者极其习惯食用精制的小麦面包，因而他们只会在被饿得半死不活时才愿意过苏格兰农民那样的生活。由于严酷的自然规律在恒定地发挥效力，也许最后他们不得不像中国下层阶级那样生活，而那时他们国家将用和以往一样的食物

量，来维持更多人口的生存。但是这实施起来，必然是一种极其困难的事情，而且人类的每一个朋友都希望这是徒劳的尝试。我们经常听到“应该鼓励人口增长”这种说法。如果人口的增长趋势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显著，那么人口增长被反复要求那么多次却没能实现，这就似乎有些奇怪了。其真正的原因是，人口增长的需求是在还未准备好其供养基金的情况下提出的。通过鼓励耕作来增加对农业劳力的需求，进而增加农村的生产量，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这样一来就完全不必担心人口会按比例增长了。以其他任何方式来实现这种目的的尝试都是错误的、残忍的、暴虐的，因而在任何拥有适度自由的国度里都是不可能成功的。控制人口增长、降低劳动力的价格进而降低海陆军费用以及在国外销售成品的成本，似乎都是为了国家统治者和富人的利益。可对于这方面的种种尝试，尤其是当这种尝试打着仁慈的骗人招牌而被人民大众高高兴兴、诚心诚意地接受的时候，广大贫民朋友就要留心注意并强力反抗。

I entirely acquit Mr. Pitt of any sinister intention in that clause of his poor bill which allows a shilling a week to every labourer for each child he has above three. I confess, that before the bill was brought into Parliament, and for some time after, I thought that such a regulation would be highly beneficial; but further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 has convinced me that if its object be to better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 it is calculated to defeat the very purpose which it has in view. It has no tendency that I can discover to increase the produce of the country; and if it tends to increase the population, without increasing the produce, the necessary and inevitable consequence appears to be that the same produce must be divided among a greater number, and consequently that a day's labour will purchase a smaller quantity of provisions, and the poor therefore in general must be more distressed.

对于皮特先生《济贫法案》中“拥有三个以上子女的每位劳动者，每周可为各子女领取一先令救济金”的条款，我绝对相信他毫无恶意。我坦言，在该法案提交国会以前及提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还认为这个规定是大有裨益的，但深思之后我才确信，如果该法案旨在改善贫民的状况，那么要挫败这一目的显然是计划好的。我看不出它有任何促进国家生产的倾向，倘若它倾向于增加人口而不增加生产，那么其必然结果似乎就是把总量未增加的生产物分配给已增长的人口，其结果是一天的劳动只能买到更少的食物，因此贫民通常会更为贫穷。

I have mentioned some cases where population may permanently increase without a proportional increase in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But it is evident that the variation in different states, between the food and the numbers supported by it, is restricted to a limit beyond which it cannot pass. In every country, the population of which is not absolutely decreasing, the food must be necessarily sufficient to support, and to continue, the race of labourers.

我已提到“人口会持续增长而生活资料未按比例增加”的情况。但很显然，食物与其所能养活的人数虽因国别不同而有所差异，却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限度。在每一个国家，如果它的人口不是在绝对地减少，那么它们的食物就必须充足，以供养并延续劳动者一族。

Other circumstances being the same, it may be affirmed that countries are populous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y of human food which they produce, and happy according to the liberality with which that food is divided, or the quantity which a day's labour will purchase. Corn countries are more populous than pasture countries, and rice countries more populous than corn countries. The lands in

England are not suited to rice, but they would all bear potatoes; and Dr. Adam Smith observes that if potatoes were to become the favourite vegetable food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if the same quantity of land was employed in their culture, as is now employed in the culture of corn, the country would be able to support a much greater population, and would consequently in a very short time have it.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可以断言，国家的人口密度取决于他们所生产的食物数量，而人民的幸福程度则取决于食物分配的宽裕程度，或取决于一天的劳动所能购买到的食物量。种谷物的国家比畜牧国家的人口稠密，种水稻的国家又比种谷物的国家人口稠密。英格兰的土地不宜种稻，却都可以产马铃薯。因而亚当·史密斯博士认为，如果马铃薯成为广大人民最喜爱的植物性食物，而且将种谷物的土地来栽培相同面积的马铃薯，那么英格兰就能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还会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一增长。

The happiness of a country does not depend, absolutely, upon its poverty or its riches, upon its youth or its age, upon its being thinly or fully inhabited, but upon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it is increasing, upon the degree in which the yearly increase of food approaches to the yearly increase of an unrestricted population. This approximation is always the nearest in new colonies, where the knowledge and industry of an old State operate on the fertile unappropriated land of a new one. In other cases, the youth or the age of a State is not in this respect of very great importance.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food of Great Britain is divided in as great plenty to the inhabitants, at the present period, as it was two thousand, three thousand, or four thousand years ago. And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poor and thinly inhabited tracts of the Scotch

Highlands are as much distressed by an overcharged population as the rich and populous province of Flanders.

一个国家的幸福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贫富、历史的长短和人口的疏密，而取决于其发展速度，取决于食物年增加量与人口无限制地年增长量相接近的程度。在一些新开拓的殖民地，食物的增加和人口的增长常常是最接近的，因为在那里，旧国的知识和产业可用于它们新国那肥沃且未被占用的土地。在其他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历史长短并不见得十分重要。大不列颠居民现在分配到的食物可能同两千年、三千年或四千年以前一样充足。我们有理由认为，苏格兰高地上那贫瘠而人烟稀少的广地，同弗兰德斯那富饶而人口稠密的地区一样，都饱受人口过多之苦。

Were a country never to be overrun by a people more advanced in arts, but left to its own natural progress in civilization; from the time that its produce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n unit, to the time that it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million, during the lapse of many hundred years, there would not be a single period when the mass of the people could be said to be free from distres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or want of food. In every State in Europe, since we have first had accounts of it,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human existences have been repressed from this simple cause; though perhaps in some of these States an absolute famine has never been known.

假如一个国家未被一个比较文明先进的民族征服，而任其文明自然发展，从其生产物可被看作一个单位的时候起，到其生产物达到100万个单位时为止，那么在过去的这么几百年里，也许不会有任何一个时期的人民可以直接或间接摆脱因食物缺乏而带来的困苦。在欧洲各国，自有史料记载以来，已有数亿万的人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而

未能出世，尽管其中的一些国家可能从未见识过极端严重的饥荒。

Famine seems to be the last, the most dreadful resource of nature. The power of population is so superior to the power in the earth to produce subsistence for man, that premature death must in some shape or other visit the human race. The vices of mankind are active and able ministers of depopulation. They are the precursors in the great army of destruction; and often finish the dreadful work themselves. But should they fail in this war of extermination, sickly seasons, epidemics, pestilence, and plague, advance in terrific array, and sweep off their thousands and ten thousands. Should success be still incomplete, gigantic inevitable famine stalks in the rear, and with one mighty blow levels the population with the food of the world.

饥荒大概是自然最后的、最具破坏性的本领。人口增长力远远高于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以至于早夭必定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造访人类。人类的各种罪恶积极而有力地减少着人口。它们是毁灭大军的先锋，经常独立完成这种可怕的任务。但如果它们在这场人口消灭战中失败了，那么疾病流行季节、时疫、传染病和瘟疫就会排着可怕的队形进攻，杀人无数。如果还不能大功告成，不可避免的大饥荒就会从后面悄悄掩杀过来，而后一记重击，将人口打回到和全世界的食物配比相平衡的数量。

Must it not then be acknowledged by an attentive examiner of the histories of mankind, that in every age and in every State in which man has existed, or does now exist, That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s necessarily limited by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由此，细心考察过人类历史的人想必都会承认：在人类生存过或正在其间生活的一切时代和社会状态里，人口的增长必然受到生活资料的制约。

That population does invariably increase when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increase. And, That the superior power of population is repressed, and the actual population kept equal to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by misery and vice.

生活资料增加了，人口必然会增加。人口的增殖力虽然占优势，但受制于贫困和邪恶，因而实际人口与生活资料是保持平衡的。

[8_1].See Dr. Price's Observations, Vol.ii, postscript to the controversy on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 and Wales.

[8_2].I say 'caeteris paribus', because the increase of the produce of any country will always very greatly depend on the spirit of industry that prevails, and the way in which it is directed. The knowledge and habits of the people, and other temporary causes, particularly the degree of civil liberty and equality existing at the time, must always have great influence in exciting and directing this spirit.

[9_1].参见普赖斯博士的《意见书》，第二卷，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论战的附录。

[9_2].之所以要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是因为任何国家生产物的增加，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时所盛行的勤勉精神及这种精神的引导方式。人们的知识和习惯及其他暂时性的因素，特别是当时民众的自由和平等程度，总能对这种精神的激发和引导产生极大的影响。

CHAPTER 8

第八章

Mr. Wallace.—Error of supposing that the difficulty arising from population is at a great distance.—Mr. Condorcet's sketch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Period when the oscillation, mentioned by Mr. Condorcet, ought to be applied to the human race.

华莱士先生——认为人口增加造成困难还很遥远，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孔多塞先生概述了人类精神的发展历程——孔多塞先生所说的波动阶段应在何时适用于人类。

To a person who draws the preceding obvious inferences, from a view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mankind, it cannot but be a matter of astonishment that all the writers on 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 and of society who have noticed the argument of an overcharged population, treat it always very slightly and invariably represent the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it as at a great and almost immeasurable distance. Even Mr. Wallace, who thought the argument itself of so much weight as to destroy his whole system of equality, did not seem to be aware that any difficulty would occur from this cause till the whole earth had been cultivated like a garden and was incapable of any further increase of produce. Were this really the case, and were a beautiful system of equality in other respects practicable, I cannot think that our ardour in the pursuit of such a scheme ought to be damped by the contemplation of so remote a difficulty. An event at such a distance might fairly be left

to providence, but the truth is that if the view of the argument given in this Essay be just, the difficulty so far from being remote, would be imminent and immediate. At every period during the progress of cultivation, from the present moment to the time when the whole earth was become like a garden, the distress for want of food would be constantly pressing on all mankind, if they were equal. Though the produce of the earth might be increasing every year, population would be increasing much faster, and the redundancy must necessarily be repressed by the periodical or constant action of misery or vice.

所有著述家在论述人类和社会的可完善性时，已经注意到关于人口过多的论证，却常常对它掉以轻心，总觉得这种困难还是遥不可测的，这在一个考察过人类过去和现状后作出明确推测的人看来，真是件令人惊讶的事。甚至连认为该论证的分量足以摧毁他的整个平等制度的华莱士先生，似乎都未曾意识到，等到所有的土地被开垦得像菜园一样直到再也无法增加任何出产物时，所有困难便会接踵而至。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而极好的平等制度又能在其他方面得以实行，我认为我们追求这种制度的热情就不应该因为这么遥远的困难而减弱。如此遥远的一件事大可听天由命，可事实是，如果本文提出的论点刚好是这一困难的话，那么它就不再遥远，而是近在眼前，即刻会发生。在耕作发展的各个时期，从现在到所有的土地都变得像菜园一样时，因食物缺乏而引起的不幸将会持续不断地压在全体人类的身上（如果人人平等的话）。尽管土地的产出物每年都会增加，可人口的增长要比它快得多，因而过剩的人口必须由痛苦和邪恶的周期性、持续性的作用来加以遏制。

Mr. Condorcet's Esquisse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es de l'EspritHumain, was written, it is said,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at cruel proscription which terminated in his death. If he had no hopes

of its being seen during his life and of its interesting France in his favour, it is a singular instance of the attachment of a man to principles, which every day's experience was so fatally for himself contradicting. To see the human mind in one of the most enlightened nations of the world, and after a lapse of some thousand years, debased by such a fermentation of disgusting passions, of fear, cruelty, malice, revenge, ambition, madness, and folly as would have disgraced the most savage nation in the most barbarous age must have been such a tremendous shock to his ideas of the necessary and inevitabl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 that nothing but the firmest conviction of the truth of his principles, in spite of all appearances, could have withstood.

孔多塞先生所写的《人类精神进步史概要》一书，据说是他在临死前，顶着公民权被残酷剥夺的重压完成的。如果他对此书在其有生之年的面世不抱希望，对它受到法国的欢迎也不抱希望，那么他对与日常经验有着致命冲突的原理所表现出的那种信念，确实有些非同寻常。要是他看到世界上一个最文明国家的人类精神，历经几千年的衰退后，因各种令人厌恶的欲望、恐惧、残忍、恶意、报复、野心、狂热和愚蠢的膨胀而堕落，竟然堕落到连最野蛮时代的最野蛮部落也会感到羞耻的程度时，那么他那些关于人类精神进步的思想定会受到巨大冲击，以至于唯有凭着自己对原理的最坚定信念（排除一切表象）才能承受住这种冲击。

This posthumous publication is only a sketch of a much larger work, which he proposed should be executed. It necessarily, therefore, wants that detail and application which can alone prove the truth of any theory. A few observations will be sufficient to shew how completely the theory is contradicted when it is applied to the real, and not to an imaginary, state of things.

这本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作品只是个梗概，是他本打算完成的一部巨著的概要。因此，它必然缺乏能够独立证明某一理论真实性的细节和应用情况。稍作观察就会发现，这种理论应用于现实的而非想象的情形时，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In the last division of the work, which treats of the future progress of man towards perfection, he says, that comparing, in the different civilized nations of Europe, the actual population with the extent of territory, and observing their cultivation, their industry, their divisions of labour, and their means of subsistence, we shall see tha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preserve the same means of subsistence, and, consequently, the same population, without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who have no other means of supplying their wants than their industry. Having allowed the necessity of such a class of men, and adverting afterwards to the precarious revenue of those families that would depend so entirely on the life and health of their chief, he says, very justly,

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探讨了人类走向尽善尽美的未来发展过程。他说，将欧洲各个文明国度的实际人口和国土面积加以比较，考察下各国的耕作、产业、劳动分工以及生活资料，我们会发现，要保持相同的生活资料是不可能的，而许多个体别无他法，仅能靠勤勉劳动来满足自身需要，因而要养活相同数量的人口也是不可能的。他承认这个阶级存在的必然性，随后又谈到这种家庭收入很不稳定，因为它完全依靠一家之主的寿命和健康，他合理地说到道：

'There exists then, a necessary cause of inequality, of dependence, and even of misery, which menaces, without ceasing,

the most numerous and active class of our societies.' [9_1]

“因此，必然存在造成不平等、依赖、甚至不幸的原因，它时刻威胁着我们社会中人数最多、活动性最强的阶级。” [10_1]

The difficulty is just and well stated, and I am afraid that the mode by which he proposes it should be removed will be found inefficacious. By the application of calculations to the probabilities of life and the interest of money, he proposes that a fund should be established which should assure to the old an assistance, produced, in part, by their own former savings, and, in part, by the savings of individuals who in making the same sacrifice die before they reap the benefit of it. The same, or a similar fund, should give assistance to women and children who lose their husbands, or fathers, and afford a capital to those who were of an age to found a new family, sufficient for the proper development of their industry. These establishments, he observes, might be made in the name and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society. Going still further, he says that, by the just application of calculations, means might be found of more completely preserving a state of equality, by preventing credit from being the exclusive privilege of great fortunes, and yet giving it a basis equally solid, and by rendering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and the activity of commerce, less dependent on great capitalists.

这种困难已得到充分说明，不过他提议要消除苦难的办法恐怕难以奏效。根据对人的寿命的或然率和货币利息的计算，他提议设立一种基金，保证老年人得到资助，而这种基金一部分来自老年人自己以前的积蓄，另一部分来自其他人的积蓄，这些人作出了同样的牺牲，但是在享用该项基金之前就去世了。同样的或类似的基金也用于帮助

失去丈夫的妇女或失去父亲的儿童，向已经够成家年龄的人提供一笔充裕的资金，帮助他们适当地发展其事业。他说，这类基金可以以社会的名义筹集，并受到社会的保护。他进一步说，通过合理的计算，可以防止信贷被富人独占，并给信贷提供一个同样稳固的基础，使产业发展和商业活动较少依赖大资本家，从而更完满地维持一种平等状态。

Such establishments and calculations may appear very promising upon paper, but when applied to real life they will be found to be absolutely nugatory. Mr. Condorcet allows that a class of people which maintains itself entirely by industry is necessary to every state. Why does he allow this? No other reason can well be assigned than that he conceives that the labour necessary to procure subsistence for an extended population will not be performed without the goad of necessity. If by establishments of this kind,this spur to industry be removed, if the idle and the negligent are placed upon the same footing with regard to their credit, and the future support of their wives and families, as the active and industrious, can we expect to see men exert that animated activity in bettering their condition which now forms the master spring of public prosperity? If an inquisition were to be established to examine the claims of each individual 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he had or had not exerted himself to the utmost, and to grant or refuse assistance accordingly, this would be little else than a repetition upon a larger scale of the English poor laws and would be completely destructive of the true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equality.

理论上，这类基金和运算似乎十分诱人，可一旦应用于现实生活，就毫无价值了。孔多塞先生认为，完全靠勤劳维持生计的阶级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他为什么这么看？因为他认为，为增加

的人口获取生活资料必须进行劳动，而缺少必要的刺激，这种劳动就无法开展；除此之外，想不出其他理由。如果废除为鼓励勤勉而建立的上述制度，如果在信贷和在今后供养妻子和家庭方面，将懒汉和没有责任心的人同积极勤奋的人置于同样的地位对待，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人们把旺盛的活力用于改善自身生活境况（如今这已经成为社会繁荣的主要动力）吗？如果建立一个审查机构来审查每个人的要求，判定每个人是否尽了最大努力，既而酌情批准或拒绝提供援助，那就只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再度实施了的英国济贫法，完全破坏了真正的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

But independent of this great objection to these establishments, and supposing for a moment that they would give no check to productive industry, by far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remains yet behind.

即便不谈对上述制度的强烈异议，姑且假设它不妨碍生产性劳动，后面还有一个极大的困难在等着。

Were every man sure of a comfortable provision for a family, almost every man would have one; and were the rising generation free from the 'killing frost' of misery, population must rapidly increase. Of this, Mr. Condorcet seems to be fully aware himself; and after having described further improvements, he says,

如果每个男子都能确保为家庭提供舒适的生活资料，那么几乎所有男子都会成家；如果下一代能够避开贫困的“严霜”，人口必定会迅速增加。孔多塞先生似乎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对深入改良作了一番描述后说：

But in this progress of industry and happiness, each generation will be called to more extended enjoyments, and in consequence, by the physical constitution of the human frame, to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Must not there arrive a period then, when these laws, equally necessary, shall counteract each other? When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men surpassing their means of subsistence, the necessary result must be either a continual diminution of happiness and population, a movement truly retrograde, or, at least, a kind of oscillation between good and evil? In societies arrived at this term, will not this oscillation be a constantly subsisting cause of periodical misery? Will it not mark the limit when all further amelioration will become impossible, and point out that term to the perfectibility of the human race which it may reach in the course of ages, but can never pass?

“但在产业发展和幸福感增强的进程中，每一代都将追求更多的享受，结果，人口数量也会因为体格的增强而增加。既如此，难道同样必然的规律之间不会存在一个相互抵消的时期吗？当人数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时，其必然结果要么是幸福感和人口都持续减少，这是一种真正的倒退，要么是在善恶之间摇摆不定，至少是这样。在进入这一时期的社会里，摇摆不定难道不会是周期性贫困持续存在的原因吗？当所有更高级的改良都不可能实现时，这种摇摆不定难道不会标出一切深入的改良不可逾的界限，指明人类自我可完善的时期在历经长久岁月之后一定会到来，但却无法超越吗？”

He then adds,

随后，他补充说，

“There is no person who does not see how very distant such a period is from us, but shall we ever arrive at it? It is equally impossible to pronounce for or against the future realization of an event which cannot take place but at an era when the human race will have attained improvements, of which we can at present scarcely form a conception.”

“每个人都明白，这样一个时期离我们是多么的遥远，可我们是否总有一天会到达呢？同样，谁也不能肯定或否定，在人类进步到我们现在几乎无法想象的时代才会发生的某一事件，会在将来成为现实。”

Mr. Condorcet's picture of what may be expected to happen when the number of men shall surpass the means of their subsistence is justly drawn. The oscillation which he describes will certainly take place and will, without doubt, be a constantly subsisting cause of periodical misery. The only point in which I differ from Mr. Condorcet with regard to this picture is the period when it may be applied to the human race. Mr. Condorcet thinks that it cannot possibly be applicable but at an era extremely distant. If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natural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nd food which I have given be in any degree near the truth, it will appear, on the contrary, that the period when the number of men surpass their means of subsistence has long since arrived, and that this necessary oscillation, this constantly subsisting cause of periodical misery, has existed ever since we have had any histories of mankind, does exist at present, and will forever continue to exist, unless some decided change takes place in the physical constitution of our nature.

孔多塞先生对当人口数量超过生活资料时可能发生的情形作了描述，这个描述是恰当的。他描述的摇摆不定现象的确会发生，而且毫无疑问是周期性贫困持续存在的原因。关于这样一幅图景，我和孔多塞先生唯一的分歧是他的描述在何时可适用于人类。孔多塞先生认为，它只能适用于极其遥远的时代。不过，好像正相反，如果我举出的人口自然增长和食物自然增加之间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事实，则人口超过生活资料的时期早就到来了，这种必然的摇摆不定，也就是周期性贫困持续存在的原因，自有人类史以来一直存在，现在依然存在，而且，除非人类的物质本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否则还将永远存在下去。

Mr. Condorcet, however, goes on to say that should the period, which he conceives to be so distant, ever arrive, the human race, and the advocates for 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 need not be alarmed at it. He then proceeds to remove the difficulty in a manner which I profess not to understand. Having observed, that the ridiculous prejudices of superstition would by that time have ceased to throw over morals a corrupt and degrading austerity, he alludes, either to a promiscuous concubinage, which would prevent breeding, or to something else as unnatural. To remove the difficulty in this way will, surely, in the opinion of most men, be to destroy that virtue and purity of manners, which the advocates of equality, and of 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 profess to be the end and object of their views.

孔多塞先生继续说，如果他构想的那个很遥远的时期真的到来了，人类还有那些主张人类可完善性的人士们也不必惊恐不安。随后他又提出采用一种方法消除苦难，对于这种方法，我承认我不太理解。他注意到，届时迷信的荒谬偏见将不再对道德原则横加贬斥，于

是提及男女乱交——这样可以避免生育，以及其他一些非正常行为。在大多数人看来，按这种方式消除上述困难，肯定会破坏社会风俗习惯的美好与纯洁，而在主张平等及人类可完善性的人士眼里，风俗习惯之美好与纯洁却是他们思想观念中的目的和目标。

[9_1].To save time and long quotations, I shall here give the substance of some of Mr. Condorcet's sentiments, and hope I shall not misrepresent them. But I refer the reader to the work itself, which will amuse, if it does not convince him.

[10_1].为了节省时间、缩减引述的长度，我在这里只列出孔多塞先生部分观点的要旨，希望没有曲解他的意思。但我还是要请读者参考原著，它即便不能说服你，也会让你消遣一下。

CHAPTER 9

第九章

Mr. Condorcet's conjecture concerning the organic perfectibility of man, and the indefinite prolongation of human life.—Fallacy of the argument, which infers an unlimited progress from a partial improvement, the limit of which cannot be ascertained, illustrated in the breeding of animal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plants.

孔多塞先生以动物繁殖和植物栽培为例,对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和人类寿命的无限延长作出推测，说明由未能确定的局部改善而推论出无止境的进步，是一个谬误。

The last question which Mr. Condorcet proposes for examination is the organic perfectibility of man. He observes that if the proofs which have been already given and which, in their development will receive greater force in the work itself, are sufficient to establish the indefinite perfectibility of man upon the supposition of the same natural faculties and the same organization which he has at present, what will be the certainty, what the extent of our hope, if this organization, these natural faculties themselves, are susceptible of amelioration?

孔多塞先生提到要考察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人类机体的可完善性。他说，如果已知的证据，以及在今后发展过程中汲取更大力量的证据，在假设人类今后拥有的天赋和身体构造与现在一样的条件下，足

以说明人类具有无限可完善性。那么如果这种身体构造、天赋本身可以自我完善，那将会怎样？人们又可以抱多大的希望呢？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medicine; from the use of more wholesome food and habitations; from a manner of living which will improve the strength of the body by exercise without impairing it by excess; from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wo great causes of the degradation of man, misery, and too great riches; from the gradual removal of transmissible and contagious disorders by the improvement of physical knowledge, rendered more efficacious by the progress of reason and of social order, he infers that though man will not absolutely become immortal, yet that the duration between his birth and natural death will increase without ceasing, will have no assignable term, and may properly be expressed by the word 'indefinite'. He then defines this word to mean either a constant approach to an unlimited extent, without ever reaching it, or an increase in the immensity of ages to an extent greater than any assignable quantity.

他认为随着理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医学会进步；人们的饮食和居住环境会更加健康卫生；人们会改变较好的生活动式，不再过劳而伤害身体，而是通过锻炼来增强体质；令世人堕落的两大因素——贫困和极富——被消除；随着物理知识的发展，遗传疾病和传染病被逐步消灭。由这些他作出预测：人虽然不能长生不老，但从出生到自然死亡的时间将不断延长，没有确定期限，可以用“无限”一词来表达。随后，他对“无限”一词作了诠释：它既指向无限程度不断逼近却永远无法到达，又指增加。也就是寿命的无限延长，远远大于任一可以确定的量。

But surely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rm in either of these senses to the duration of human life is in the highest degree unphilosophical and totally unwarranted by any appearances in the laws of nature. Variations from different causes are essentially distinct from a regular and unretrograde increase.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human life will, to a certain degree, vary from healthy or unhealthy climates, from wholesome or unwholesome food, from virtuous or vicious manners, and other causes; but it may be fairly doubted whether there is really the smallest perceptible advance in the natural duration of human life since first we had any authentic history of man. The prejudices of all ages have indeed been directly contrary to this supposition, and though I would not lay much stress upon these prejudices, they will in some measure tend to prove that there has been no marked advance in an opposite direction.

但是，在任一意义上使用该词来论说人的寿命长短，无疑都是极其缺乏哲学思维的，在自然法则上不会找到任何根据。种种原因造成的变寿命动；其性质与有规则的、有进无退的寿命延长有着本质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平均寿命因气候对健康有益还是有害、食品卫生与否、社会风俗的善恶及其他各种原因而有不同，但是，自从我们有真实可靠的人类历史以来，人的自然寿命是否确有稍稍可以觉察到的延长，颇为可疑。一切时代的成见都与这个假设背道而驰，虽然我不愿意过分强调这些成见，但它们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人类的自然寿命并没有明显增加。

It may perhaps be said that the world is yet so young, so completely in its infancy, that it ought not to be expected that any difference should appear so soon.

也许有人会说，世界尚在幼年，处于婴儿期，期望它很快有变化是不应该的。

If this be the case, there is at once an end of all human science. The whole train of reasonings from effects to causes will be destroyed. We may shut our eyes to the book of nature, as it will no longer be of any use to read it. The wildest and most improbable conjectures may be advanced with as much certainty as the most just and sublime theories, founded on careful and reiterated experiments. We may return again to the old mode of philosophising and make facts bend to systems, instead of establishing systems upon facts. The grand and consistent theory of Newton will be placed upon the same footing as the wild and eccentric hypotheses of Descartes. In short, if the laws of nature are thus fickle and inconstant, if it can be affirmed and be believed that they will change, when for ages and ages they have appeared immutable, the human mind will no longer have any incitements to inquiry, but must remain fixed in inactive torpor, or amuse itself only in bewildering dreams and extravagant fancies.

如果确实如此，人类的一切科学马上就会完结。由果及因的整个推理顺序都会被破坏。我们大可闭上眼睛，不再阅读自然这本书，因为读它将不会有任何用处。最不切实际、最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推测，可以和理据充分且卓越无比的理论一样——这些理论以小心细致的反复试验为基础，被堂而皇之地提出来。我们也就可以重新采用陈旧的推理方法，让事实屈从于体系，而不是根据事实来建立体系。牛顿的前后一致的伟大理论也就同笛卡尔的盲目古怪的假说平起平坐了。总之，如果自然法则如此变化无常，如果有人敢断言并坚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将有所改变，那么将不再有任何刺激鼓励人类精神去探究，人类精神必然会处于怠惰麻木的状态，或者仅以眼花缭乱的梦想和放

浪不羁的幻想来自娱。

The constancy of 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effects and causes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human knowledge, though far be it from me to say that the same power which framed and executes the laws of nature may not change them all 'in a moment,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Such a change may undoubtedly happen. All that I mean to say i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infer it from reasoning. If without any previous observable symptoms or indications of a change, we can infer that a change will take place, we may as well make any assertion whatever and think it as unreasonable to be contradicted in affirming that the moon will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 earth tomorrow, as in saying that the sun will rise at its usual time.

自然法则的恒定性和因果的恒定性是一切人类知识的基础，不过，我并不是说形成和执行自然法则的力量不能“在一刹那，在转瞬间”完全改变它们。这种变化无疑是可以发生的。我只是说，我们不可能通过推理而得出它。如果没有任何显著的先兆或迹象表明某种变化会发生，我们作出任何判断都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就像确定明天月球将与地球相撞，和明天太阳将照常升起一样是合理的。

With regard to the duration of human life, there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existed, from the earliest ages of the world to the present moment, the smallest permanent symptom or indication of increasing prolongation. The observable effects of climate, habit, diet, and other causes, on length of life have furnished the pretext for asserting its indefinite extension; and the sandy foundation on which the argument rests is that because the limit of human life is undefined; because you cannot mark its precise term, and say so far

exactly shall it go and no further; that therefore its extent may increase for ever, and be properly termed indefinite or unlimited. But the fallacy and absurdity of this argument will sufficiently appear from a slight examination of what Mr. Condorcet calls the organic perfectibility, or degeneration, of the race of plants and animals, which he says may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general laws of nature.

至于人的寿命，从远古及今，没有一点永久性征兆或者迹象表明人类寿命是在不断延长的。气候、习惯、饮食及其他因素对人类寿命造成的显著影响，为断言寿命能无限延长提供了理由。但这种立论的基础并不坚固，因为人类寿命的年限是不确定的，由于你无法精确划定它的期限，无法确切说它不会再延长，因此它的长度也许会一直增加下去，并且可以认为是无定限或无限的。然而，这种议论之荒谬，只需对孔多塞先生所说的各种植物和动物机体的可完善性或退化（他说这可以视为普遍的自然法则之一）略加考察，就可以充分看出。

I am told that it is a maxim among the improvers of cattle that you may breed to any degree of nicety you please, and they found this maxim upon another, which is that some of the offspring will possess the desirable qualities of the parents in a greater degree. In the famous Leicestershire breed of sheep, the object is to procure them with small heads and small legs. Proceeding upon these breeding maxims, it is evident that we might go on till the heads and legs were evanescent quantities; but this is so palpable an absurdity that we may be quite sure that the premises are not just, and that there really is a limit, though we cannot see it or say exactly where it is. In this case, the point of the greatest degree of improvement, or the smallest size of the head and legs, may be said to be undefined, but thi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unlimited, or from

indefinite, in Mr. Condorcet's acceptation of the term. Though I may not be able, in the present instance, to mark the limit at which further improvement will stop, I can very easily mention a point at which it will not arrive. I should not scruple to assert that were the breeding to continue for ever, the head and legs of these sheep would never be so small as the head and legs of a rat.

据说，家畜改良家有这样一条准则：你想要多么优良的家畜，就可以培育出多么优良的家畜；不过这一准则是以另一准则为依据的，即有些牲畜后代身上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其父体或母体的优良品质。以培育著名的莱斯特绵羊为例，培育目标就是要养出头小腿短的羊。依照上述培育箴言，显然我们可以一直培育下去，直到羊的头和腿近乎消失，但这显然太荒唐了，因而我们可以断定前提是不正确的，而且它绝对是有限度的，虽然我们看不到也不能准确说出这个限度。以此为例，最大的改良限度或者最小的头和最短的腿应该说是难以确定的，但这和孔多塞先生所说的无定限或无限制是两码事。尽管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界定改良无法逾越的限度，但我可以轻易地指出改良无法达到的一点。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就算这种品种改良持续地进行下去，莱斯特绵羊的脑袋和腿也绝不会像老鼠的头和腿那样小。

It cannot be true, therefore, that among animals, some of the offspring will possess the desirable qualities of the parents in a greater degree, or that animals are indefinitely perfectible.

因此，有关动物的后代会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其父母的优良品性的说法，或者说动物可以无限完善的说法，都不是正确的。

The progress of a wild plant to a beautiful garden flower is

perhaps more marked and striking than anything that takes place among animals, yet even here it would be the height of absurdity to assert that the progress was unlimited or indefinite.

由野生植物变成花园里的美丽花朵，也许是比动物界的任何变化都更为明显和惊人的进步。但即便在这一点上，断言这种进步是无所限制的或无定限的，也是极其荒谬的。

One of the most obvious features of the improvement is the increase of size. The flower has grown gradually larger by cultivation. If the progress were really unlimited it might be increased ad infinitum, but this is so gross an absurdity that we may be quite sure that among plants as well as among animals there is a limit to improvement, though we do not exactly know where it is.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gardeners who contend for flower prizes have often applied stronger dressing without success. At the same time it would be highly presumptuous in any man to say that he had seen the finest carnation or anemone that could ever be made to grow. He might however assert without the smallest chance of being contradicted by a future fact, that no carnation or anemone could ever by cultivation be increased to the size of a large cabbage; and yet there are assignable quantities much greater than a cabbage. No man can say that he has seen the largest ear of wheat, or the largest oak that could ever grow; but he might easily, and with perfect certainty, name a point of magnitude at which they would not arrive. In all these cases therefore, a careful distinction should be made, between an unlimited progress, and a progress where the limit is merely undefined.

品种改良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尺寸的增加。花朵通过培植会逐渐变大。如果这个过程真是无限的，那么它的尺寸也会无限增大，但这显然很荒谬，因为我们十分肯定，植物界与动物界的改良一样都有其限度，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个限度在哪里。这也许是争夺花卉奖项的园丁们时常施用强效肥料但都没有成效的原因。同样，要是有人说他曾见过最美的石竹或银莲花，那他也太自以为是了。但他断言石竹或银莲花就算经过培育也永远长不到甘蓝那么大，这想必不会违背未来的事实，尽管还有比甘蓝大得多的可定量。谁都不能说自己见过长得最大的麦穗或最大的橡树，谁都可以很容易且非常肯定地指出它们不能长到的大小尺度。因此，在所有上述情况下，应该对无限进步和有限但限度还不明确的进步作出细致的区分。

It will be said, perhaps, that the reason why plants and animals cannot increase indefinitely in size is, that they would fall by their own weight. I answer, how do we know this but from experience?—from experience of the degree of strength with which these bodies are formed. I know that a carnation, long before it reached the size of a cabbage, would not be supported by its stalk, but I only know this from my experience of the weakness and want of tenacity in the materials of a carnation stalk. There are many substances in nature of the same size that would support as large a head as a cabbage.

或许有人会说，动植物的大小不能无限增长，是因为那样它们自身的重量会把自己压倒。我回答说，没有亲身体验，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我们要了解构成它们身体的力量有多大才会知道。我知道，石竹根本长不到甘蓝那样大，因为它的茎秆支撑不了它了，而这一点只是在我感知过石竹茎秆之脆弱且缺乏韧性之后才了解到的。自然界中有许多和石竹的茎秆同样粗细的东西可以支撑甘蓝那么大的头部。

The reasons of the mortality of plants are at present perfectly unknown to us. No man can say why such a plant is annual, another biennial, and another endures for ages. The whole affair in all these cases, in plants, animals, and in the human race, is an affair of experience; and I only conclude that man is mortal because the invariable experience of all ages has proved the mortality of those materials of which his visible body is made.

植物死亡的原因，现在我们还完全不知道。谁也无法说清为什么这种植物是一年生的，那种是两年生的，而另一种是多年生的。在所有这类情形中，不管是植物、动物还是人类，一切皆属于一种经验，我只是作这样的概括：人是会死的，因为历代的经验都已证明有形人体的那些构成物质是会消亡的。

“What can we reason, but from what we know?”

不从我们已知的出发，我们能推想出什么呢？

Sound philosophy will not authorize me to alter this opinion of the mortality of man on earth, till it can be clearly proved that the human race has made, and is making, a decided progress towards an illimitable extent of life. And the chief reason why I adduced the two particular instances from animals and plants was to expose and illustrate, if I could, the fallacy of that argument which infers an unlimited progress, merely because some partial improvement has taken place, and that the limit of this improvement cannot be precisely ascertained.

论据确凿的哲学是不会允许我改变世人都会死亡这一观点的，除非某天能清晰地证明人类已经并且正在朝着永生取得决定性的进步。而我举出动物界和植物界的两个特殊事例，主要是为了揭露和说明（如果我可以的话）一种论点的谬误，这种论点仅仅因为看到了无法确定限度的某些局部的改进，就推论这种进步是无限的。

The capacity of improvement in plants and animals, to a certain degree, no person can possibly doubt. A clear and decided progress has already been made; and yet, I think, it appears that it would be highly absurd to say that this progress has no limits. In human life, though there are great variations from different causes, it may be doubted whether, since the world began, any organic improvement whatever in the human frame can be clearly ascertained. The foundations, therefore, on which the arguments for the organic perfectibility of man rest, are unusually weak, and can only be considered as mere conjectures. It does not, however, by any means, seem impossible that by an attention to breed, a certain degree of improvement, similar to that among animals, might take place among men. Whether intellect could be communicated may be a matter of doubt: but size, strength, beauty, complexion, and perhaps even longevity are in a degree transmissible. The error does not seem to lie in supposing a small degree of improvement possible, but in not discriminating between a small improvement, the limit of which is undefined, and an improvement really unlimited. As the human race, however, could not be improved in this way, without condemning all the bad specimens to celibacy, it is not probable that an attention to breed should ever become general; indeed, I know of no well-directed attempts of this kind, except in the ancient family of the Bickerstaffs, who are said to have been very successful in whitening the skins and increasing the height of their race by prudent marriages, particularly by that very

judicious cross with Maud, the milk-maid, by which some capital defects in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family were corrected.

植物和动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决定性的进步，但我认为，说这种进步是无限的，似乎非常荒谬。尽管人的寿命由于各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但能否清晰地确认人类的机体自世界存在以来有了改良，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关于人类机体可完善性的立论基础是很脆弱的，它只能被当作一种推测。不过，人类如果重视生育，也许可以有类似于动物界的一定程度的改良。这似乎又不是不可能的。智力能否遗传还是个疑问，但身材、力气、美貌、肤色其至长寿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遗传的。不过错误之处并不在于假定一小部分的改良是可能的，而在于没有把尚未明确限度的小规模改良和真正的无限改良区分开来。不过，要用这种方法改良人类，就必须禁止劣等人结婚，但人们却不可能普遍重视生育。实际上，我听说过古代的毕克斯达夫族曾通过谨慎的婚配、尤其是通过与穆德族挤奶女工杂交这一精明之举，成功地使族人皮肤变白、身高增加，从而矫正族人体格上的重要缺陷，除此之外，我还真不知道这类目的明确的婚育之道。

It will not be necessary, I think, in order more completely to shew the improbability of any approach in man towards immortality on earth, to urge the very great additional weight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duration of life would give to the argument of population.

我认为，不必为了更充分地说明人人总有一死，而强调寿命延长会给人口问题立论增加的分量。

Many, I doubt not, will think that the attempting gravely to controvert so absurd a paradox as the immortality of man on earth, or indeed, even 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 and society, is a waste of time and words; and that such unfounded conjectures are best answered by neglect. I profess, however, to be of a different opinion. When paradoxes of this kind are advanced by ingenious and able men, neglect has no tendency to convince them of their mistakes. Priding themselves on what they conceive to be a mark of the reach and size of their own understandings, of the extent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ir views; they will look upon this neglect merely as an indication of poverty, and narrowness, in the mental exertions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and only think that the world is not yet prepared to receive their sublime truths.

我确信，许多人会认为试图郑重驳斥“地球人长生不老”或者“人与社会具有可完善性”之类的荒谬悖论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浪费时间、白费口舌。对于这种毫无根据的推测，最好的回答是置之不理。然而，我的看法与此不同。如果这种悖论是由有创意又有才能的人提出来的，置之不理不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正是以自己见多识广、观点涉及面广阔、内涵丰富而自夸，如果置之不理，他们会把这看成是同时代人精神匮乏、思想狭隘的一种表现，并且认为世人尚未就接受他们的崇高真理做好准备。

On the contrary, a candid investigation of these subjects, accompanied with a perfect readiness to adopt any theory warranted by sound philosophy, may have a tendency to convince them that in forming improbable and unfounded hypotheses, so far from enlarging the bounds of human science, they are contracting it; so far from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human mind, they are obstructing it; they are throwing us back again almost into the

infancy of knowledge and weaken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at mode of philosophising, under the auspices of which science has of late made such rapid advances. The present rage for wide and unrestrained speculation seems to be a kind of mental intoxication, arising, perhaps, from the great and unexpected discoveries which have been made of late years, in various branches of science. To men elate and giddy with such successes, everything appeared to be within the grasp of human powers; and, under this illusion, they confounded subjects where no real progress could be proved with those where the progress had been marked, certain, and acknowledged. Could they be persuaded to sober themselves with a little severe and chastised thinking, they would see, that the cause of truth, and of sound philosophy, cannot but suffer by substituting wild flights and unsupported assertions for patient investigation, and well authenticated proofs.

相反，坦率地考察这些问题，并做好充分准备，采用由健全的哲学证明了的理论，也许能使他们相信：他们所作的假设是不可能且没有根据的，不但不会扩大人类科学的范围，反而会缩小它；不但不会推动人类精神的进步，反而会妨碍它。这种假设还会将我们再度置于知识的幼稚阶段，不断削弱哲学探讨方法的基础，然而近年来，正是这种探讨方法使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人们热衷于轻率而随便的推测，似乎已经到了痴迷状态，这也许源自近年来科学各学科获得的伟大而意外的发现。在那些为科学成就得意洋洋、忘乎所以的人看来，一切似乎都掌控在人力范围之内。在这种错觉的支配下，他们将尚无证据证实其进步的学科，同那些著名的、确定无疑的并且得到公认的学科混为一谈。要是他们能以些许严谨而纯洁的思维接受劝告，让自己清醒，他们便会知道，用随兴的浮想和不加举证的断言来代替兢兢业业的调查研究和确凿的证据，只能使真理和健全哲学的高尚事业受损害。

Mr. Condorcet's book may be considered not only as a sketch of the opinions of a celebrated individual, but of many of the literary men in Fra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volution. As such, though merely a sketch, it seems worthy of attention.

孔多塞先生的书不仅可看作是某位名人个性见解的概述，也可看作是大革命初期法国许多文人的观点概述。因此，它虽然是一个概述，但也是值得重视的。

CHAPTER 10

第十章

Mr. Godwin's system of equality.—Error of attributing all the vices of mankind to human institutions.—Mr. Godwin's first answer to the difficulty arising from population totally insufficient.—Mr. Godwin's beautiful system of equality supposed to be realized.—Its utter destruction simply from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in so short a time as thirty years.

葛德文先生的平等制度——将人类的一切罪恶归咎于人类制度是错误的——葛德文先生对人口增长造成的困难所作的第一个回答很不充分——假设葛德文先生的美好平等制度会实现——仅仅由于人口原理，该制度就会在短短*30*年间彻底垮掉。

In reading Mr. Godwin's ingenious and able work on Political Justice, it is impossible not to be struck with the spirit and energy of his style, the force and precision of some of his reasonings, the ardent tone of his thoughts, and particularly with that impressive earnestness of manner which gives an air of truth to the whole. At the same time,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he has not proceeded in his inquiries with the caution that sound philosophy seems to require. His conclusions are often unwarranted by his premises. He fails sometimes in removing the objections which he himself brings forward. He relies too much on general and abstract propositions which will not admit of application. And his conjectures certainly far outstrip the modesty of nature.

在阅读葛德文先生别出心裁、才智激扬的《论政治正义》的著作时，看到他的笔势雄浑有力，某些思维论辩缜密而有说服力，感觉到他思想的炽烈热忱，特别是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诚挚态度，让全书洋溢着真理的气息，读者很难不为之感动。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他没有以求真求实的哲学所必需的严谨态度来开展研究。他的前提时常不能证明他的结论，有时连自己前文提到过的异议都无法排除。他过于依赖那些经不起应用的一般的、抽象的命题。他的推测当然也远远超出了自然的质朴特性。

The system of equality which Mr. Godwin proposes is, without doubt, by far the most beautiful and engaging of any that has yet appeared. An amelioration of society to be produced merely by reason and conviction wears much more the promise of permanence than any change effected and maintained by force. The unlimited exercise of private judgement is a doctrine inexpressibly grand and captivating and has a vast superiority over those systems where every individual is in a manner the slave of the public. The substitution of benevolence as the master-spring and moving principle of society, instead of self-love, is a consummation devoutly to be wished. In short, it is impossible to contemplate the whole of this fair structure without emotions of delight and admiration, accompanied with ardent longing for the period of its accomplishment. But, alas, that moment can never arrive. The whole is little better than a dream, a beautiful phantom of the imagination. These 'gorgeous palaces' of happiness and immortality, these 'solemn temples' of truth and virtue will dissolve, 'like the baseless fabric of a vision', when we awaken to real life and contemplate the true and genuine situation of man on earth.

葛德文先生所提倡的平等制度无疑比现存的任何制度都更为美好、更令人向往。仅凭借理性与信念实现的社会改良，比凭借武力所实现和维持的变革更为持久。无限使用个人判断是一种无以言表的伟大且极具魅力的原则，远远优于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个体都是社会奴隶的制度。以仁爱代替自爱作为社会的主要动力和活动原则，是人们虔诚向往的一种夙愿。总之，一想到这一美好的制度，人们就万分喜悦、赞叹不已，热切盼望有朝一日这一切都会实现。但是，可叹啊！这一刻永远不会到来。这一切不过是场梦，是想象出来的美好幻影。这些容纳了幸福和永生的“辉煌宫殿”，这些真理与美德的“庄严庙宇”，会在我们清醒地认识现实之时，在我们思考人类在地球上的真实处境之时，像“空中楼阁”一样消失。葛德文先生在他第八部著作的第三章的结尾谈到人口问题，他说：

Mr. Godwin,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third chapter of his eighth book, speaking of population, says: “There is a principle in human society, by which population is perpetually kept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Thus among the wandering tribes of America and Asia, we never find through the lapse of ages that population has so increased as to render necessary the cultivation of the earth.” Thisprinciple, which Mr. Godwin thus mentions as some mysterious and occult cause and which he does not attempt to investigate, will be found to be the grinding law of necessity, misery, and the fear of misery.

“人类社会有一条定律，根据它，人口将永远被控制在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譬如，我们发现，在美洲和亚洲的游牧部落里，不管经过多少世代，人口从来没有增加到必须开垦耕地的地步。”

The great error under which Mr. Godwin labours throughout

his whole work is the attributing almost all the vices and misery that are seen in civil society to human institutions. Political regulations and the established administration of property are with him the fruitful sources of all evil, the hotbeds of all the crimes that degrade mankind. Were this really a true state of the case, it would not seem a hopeless task to remove evil completely from the world; and reason seems to be the proper and adequate instrument for effecting so great a purpose. But the truth is, that though human institutions appear to be the obvious and obtrusive causes of much mischief to mankind; yet in reality they are light and superficial, they are mere feathers that float on the surface,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deeper seated causes of impurity that corrupt the springs and render turbid the whole stream of human life.

这一原理葛德文先生当作某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原因，但他并不打算进行探讨。今后大家会明白，这是一条折磨人的自然法则——贫困和对贫困的畏惧。

Mr. Godwin, in his chapter on the benefits attendant on a system of equality, says:

葛德文先生在全书中所犯的一个大错是，他几乎把文明社会中所有看到的罪恶和贫困都归咎于人类制度。政治规章和现存的财产管理制，在他看来是一切罪恶泛滥的源泉，是造成人类一切堕落罪行的温床。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要彻底消除世间的罪恶应该不是一件毫无希望完成的任务，而理性似乎就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合适而足用的工具。可事实是，尽管人类制度似乎是造成许多人类灾祸的突出原因，但它们其实是轻量的、表面的原因，同起那些污染人类源泉并使人类生活的整条溪流变得浑浊不洁的深层原因相比，它们只是浮在水

面上的羽毛。

“The spirit of oppression, the spirit of servility, and the spirit of fraud, these are the immediate growth of the established administration of property. They are alike hostile to intellectual improvement. The other vices of envy, malice, and revenge are their inseparable companions. In a state of society where men lived in the midst of plenty and where all shared alike the bounties of nature, these sentiments would inevitably expire. The narrow principle of selfishness would vanish. No man being obliged to guard his little store or provide with anxiety and pain for his restless wants, each would lose his individual existence in the thought of the general good. No man would be an enemy to his neighbour, for they would have no subject of contention; and, of consequence, philanthropy would resume the empire which reason assigns her. Mind would be delivered from her perpetual anxiety about corporal support, and free to expatiate in the field of thought, which is congenial to her. Each would assist the inquiries of all.”

葛德文先生在论述平等制度所带来的福利的那一章里提到，压迫、奴役和欺诈习气，都是现行财产管理制度的直接产物，它们都妨害智力的提高。与上述习气密不可分的是嫉妒、怨恨和报复等其他恶行。在一种人人过富裕的日子、人人都共享自然恩赐的社会状态下，上述那些情绪必将消失，狭隘的利己原则也将会消失。人人都无须小心看守自己那一点点储备，焦虑又辛苦地去满足自身无休无止的需求，每人都会牺牲个人利益来满足公共利益。人人都不会以邻为敌，因为他们之间没有要争夺的东西，由是，博爱将重新获得理性所授予的统治权。精神会从满足肉体需求的永久焦虑中解放出来，畅游在令她惬意的思想海洋里。人人助我，我助人人。

This would, indeed, be a happy state. But that it is merely an imaginary picture, with scarcely a feature near the truth, the reader, I am afraid, is already too well convinced.

这的确是一种幸福的状态。但它只是一幅虚构的景象，与真实几乎毫不相干，这一点我想读者早就意识到了。

Man cannot live in the midst of plenty. All cannot share alike the bounties of nature. Were there no established administration of property, every man would be obliged to guard with force his little store. Selfishness would be triumphant. The subjects of contention would be perpetual. Every individual mind would be under a constant anxiety about corporal support; and not a single intellect would be left free to expatiate in the field of thought.

人类不可能生活在富裕殷实中。不是人人都能同等分享自然的恩赐。如果没有现行的财产管理制度，那么每个人都不得不尽力守护自己那点财产。自私自利将会大获全胜。你争我夺将永远存在。每个人都将经常为肉体需求操心，而没有一个智者能够在思想领域里自由地漫游。

How little Mr. Godwin has turned the attention of his penetrating mind to the real state of man on earth will sufficiently appear from the manner in which he endeavours to remove the difficulty of an overcharged population. He says:

葛德文先生思想敏锐而深刻，却竟然没有注意地球上人类的真实

状况，看看他试图消除人口过多这一困难的方式就知道他确实对此未加注意。他说：

“The obvious answer to this objection, is, that to reason thus is to foresee difficulties at a great distance. Three fourths of the habitable globe is now uncultivated. The parts already cultivated are capable of immeasurable improvement. Myriads of centuries of still increasing population may pass away, and the earth be still found sufficient for the subsistence of its inhabitants.”

“对这种异议的明确答复是：现在设想困难未免过早。地球上适合居住的地方还有四分之三未被开垦。已经开垦的土地还可以进行无限改良。人口的增加也许会在无数个世纪后停止，可大地仍足以养活它的居民。”

I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the error of supposing that no distress and difficulty would arise from an overcharged population before the earth absolutely refused to produce any more. But let us imagine for a moment Mr. Godwin's beautiful system of equality realized in its utmost purity, and see how soon this difficulty might be expected to press under so perfect a form of society. A theory that will not admit of application cannot possibly be just.

笔者已经指出，设想直到地球再也无法增加产品之后，才会出现因人口过多而造成的贫困和困难，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过，姑且假设葛德文先生设计的美好平等制度完美无瑕地实现了，我们可以来看看在这个完美的社会形态下，上述困难是如何迅速地威压上来的吧。一种理论如果经不起应用，便不可能是正确的。

Let us suppose all the causes of misery and vice in this island removed. War and contention cease. Unwholesome trades and manufactories do not exist. Crowds no longer collect together in great and pestilent cities for purposes of court intrigue, of commerce, and vicious gratifications. Simple, healthy, and rational amusements take place of drinking, gaming, and debauchery. There are no towns sufficiently large to have any prejudicial effects on the human constitutio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happy inhabitants of this terrestrial paradise live in hamlets and farmhouses scattered over the face of the country. Every house is clean, airy, sufficiently roomy, and in a healthy situation. All men are equal. The labours of luxury are at end. And the necessary labours of agriculture are shared amicably among all. The number of persons, and the produce of the island, we suppose to be the same as at present. The spirit of benevolence, guided by impartial justice, will divide this produce among all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ir wants. Though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hat they should all have animal food every day, yet vegetable food, with meat occasionally, would satisfy the desires of a frugal people and would be sufficient to serve them in health, strength, and spirits.

假设造成这个岛国贫困和罪恶的所有因素都已消除，战争和争斗也停止了，有害身心健康的职业和工厂也不复存在了。人们不再因宫廷的阴谋、商业目的和邪恶目的而聚集于病患成灾的大城市。单纯、健康又适度的娱乐取代了喝酒、赌博和放荡。没有哪个城镇会大得对人体造成不利影响。这个人间天堂的幸福居民，大多居住在遍布于各地的小村庄和农场里。每座房子都很干净、通风且足够宽敞，坐落在有益于健康的位置。人与人都是平等的。奢侈品的生产也停止了。而必要的农业劳动由大家本着友善的态度共同分担。假设这个岛国的人口及其产品和现在一样多。人们本着在公平正义指引下的仁爱精神，

会将产品按需分配给社会的所有成员。尽管他们不可能每天吃肉，但植物性食物加上偶尔分配的肉食，已能满足一个勤俭节约的民族的需要，也足以使他们保持身体健康、体力强盛以及精神愉悦。

Mr. Godwin considers marriage as a fraud and a monopoly. Let us suppose the commerce of the sexes established upon principles of the most perfect freedom. Mr. Godwin does not think himself that this freedom would lead to a promiscuous intercourse; and in this I perfectly agree with him. The love of variety is a vicious, corrupt, and unnatural taste and could not prevail in any great degree in a simple and virtuous state of society. Each man would probably select himself a partner, to whom he would adhere as long as that adherence continued to be the choice of both parties. It would be of little consequence, according to Mr. Godwin, how many children a woman had or to whom they belonged. Provisions and assistance would spontaneously flow from the quarter in which they abounded, to the quarter that was deficient. [11_1] And every man would be ready to furnish instruction to the rising generation according to his capacity.

葛德文先生认为婚姻是一种欺骗和独占。我们暂且假设性交是建立在完全自由的原则之上的。葛德文先生并不认为这种自由会导致男女乱交，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用情不专是种堕落的、腐败的和不合情理的癖好，因而在一个单纯而有道德的社会里不可能很普遍。每个男人都会为自己选择一个伴侣，而且只要双方都愿意，他就会坚守这种关系。在葛德文先生看来，一个女人生多少子女、子女属于谁都是无关紧要的。充裕的地方自然会从给匮乏的地方提供食物和援助 [12_1] 。而且人人都会乐于依其所能教育年轻一代。

I cannot conceive a form of society so favourable upon the whole to population. The irremediableness of marriage, as it is at present constituted, undoubtedly deters many from entering into that state. An unshackled intercourse on the contrary would be a most powerful incitement to early attachments, and as we are supposing no anxiety about the future support of children to exist, I do not conceive that there would be one woman in a hundred, of twenty-three, without a family.

我想象不出还有整体上比这更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社会形态。就像目前的婚姻构成状况一样，婚姻具有不可补救性，这无疑令许多人对它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不受约束的性交会成为早婚的最强动因，而如果我们又假设人们不必为儿童未来的抚养问题担忧的话，那么我可以断定，100个23岁的妇女中恐怕找不到一个尚未成家的女子。

With these extraordinary encouragements to population, and every cause of depopulation, as we have supposed, removed, the numbers would necessarily increase faster than in any society that has ever yet been known. I have mentioned, on the authority of a pamphlet published by a Dr. Styles and referred to by Dr. Price, that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ack settlements of America doubled their numbers in fifteen years. England is certainly a more healthy country than the back settlements of America; and as we have supposed every house in the island to be airy and wholesome, and the encouragements to have a family greater even than with the back settlers, no probable reason can be assigned why the population should not double itself in less, if possible, than fifteen years. But to be quite sure that we do not go beyond the truth, we will only suppose the period of doubling to be twenty-five years, a ratio of increase which is well known to have taken place

throughout all the Northern States of America.

有了上述这些激励人口增加的因素，而我们又假定减少人口的种种原因已经消除，人口增加必然会快于任何已知社会。我前边提到，根据斯泰尔斯博士发表的、曾被普赖斯博士引用的一本小册子所述，美洲腹部殖民地的居民人口在15年间翻了一番。比起美洲腹部殖民地，英国显然是个更加益于健康的国家，按我们的假设，这个岛国的每座房屋都是既通风又卫生，对人们成家的鼓励又大于美洲殖民地的居民，因而没有什么理由能说明其本土人口为何不会在少于15年（如果有可能）的时间里增加一倍。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会脱离事实，我们只是假定人口增长一倍的时间为25年，而众所周知的是，这种增长率曾在美国北部各州出现过。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the equalization of property which we have supposed, added to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labour of the whole community being directed chiefly to agriculture, would tend greatly to augment the produce of the country. But to answer the demands of a population increasing so rapidly, Mr. Godwin's calculation of half an hour a day for each man would certainly not be sufficient.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half of every man's time must be employed for this purpose. Yet with such, or much greater exertions, a person who is acquainted with the nature of the soil in this country, and who reflects on the fertility of the lands already in cultivation, and the barrenness of those that are not cultivated, will be very much disposed to doubt whether the whole average produce could possibly be doubled in twenty-five years from the present period. The only chance of success would be the ploughing up all the grazing countries and putting an end almost entirely to the use of animal food. Yet a part of this scheme might defeat itself. The soil of England will not produce much without

dressing, and cattle seem to be necessary to make that species of manure which best suits the land. In China, it is said that the soil in some of the provinces is so fertile as to produce two crops of rice in the year without dressing. None of the lands in England will answer to this description.

无可怀疑，我们所假设的财产均等化，加上全社会的劳动主要用于农业，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生产物的增加。但是，要满足如此迅速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葛德文先生所估算的每人每天劳动半小时肯定是不够的。很可能每个人要把一半时间用于达到这一目的。可是，即使作出这样的甚至更多的努力，了解我国土壤性质并考虑过已耕土地的肥力和未耕土地的贫瘠程度的人，也会对今后25年间平均总产量能否增加一倍心存疑虑。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全部畜牧土地用于耕种，从今以后基本不再吃肉。但这个方案有一部分本身就行不通。英国的土地如果不施肥是生产不出大量食物的，而要造出最适合英国土地的肥料，牲畜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据说在中国，某些省份的土壤十分肥沃，不施肥也能一年收获两次作物。英格兰根本没有这样的土地。

Difficult, however, as it might be to double the average produce of the island in twenty-five years, let us suppose it effected. At the expiration of the first period therefore, the food, though almost entirely vegetable, would be sufficient to support in health the doubled population of fourteen millions.

尽管这个岛国的平均产量很难在25年间增加一倍，但是我们姑且假定它能够实现。在第一个阶段期满时，食物——虽然几乎全是植物类的——足够养活增加一倍后的人口（1400万），并使他们保持健康。

During the next period of doubling, where will the food be found to satisfy the importunate demands of the increasing numbers? Where is the fresh land to turn up? Where is the dressing necessary to improve that which is already in cultivation? There is no person with the smallest knowledge of land but would say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hat the average produce of the country could be increased during the second twenty-five years by a quantity equal to what it at present yields. Yet we will suppose this increase, however improbable, to take place. The exuberant strength of the argument allows of almost any concession. Even with this concession, however, there would be seven millions at the expiration of the second term unprovided for. A quantity of food equal to the frugal support of twenty-one millions, would be to be divided among twenty-eight millions.

第二阶段是人口倍增期，此间去哪能找到食物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的迫切需要呢？哪里有新地可以开垦呢？从哪里获得必需的肥料来改良耕地呢？有点土地知识的人都会说，英国的平均产量不可能在第二个25年间按现有的产量增加一倍。不管这样增加多么不现实，我们仍假定它发生了。这样论证有极强的说服力，几乎允许我们作任何让步假设。然而，就算我们退一步，在第二个阶段期满时仍会有700万人吃不上饭，只够2100万人糊口的粮食将会分配给2800万人。

Alas!what becomes of the picture where men lived in the midst of plenty, where no man was obliged to provide with anxiety and pain for his restless wants, where the narrow principle of selfishness did not exist, where mind was delivered from her perpetual anxiety about corporal support and free to expatiate in the field of thought which is congenial to her. This beautiful fabric of imagination vanishes at the severe touch of truth. The spirit of benevolence,

cherished and invigorated by plenty, is repressed by the chilling breath of want. The hateful passions that had vanished reappear. The mighty law of self-preservation expels all the softer and more exalted emotions of the soul. The temptations to evil are too strong for human nature to resist. The corn is plucked before it is ripe, or secreted in unfair proportions; and the whole black train of vices that belong to falsehood are immediately generated. Provisions no longer flow in for the support of the mother with a large family. The children are sickly from insufficient food. The rosy flush of health gives place to the pallid cheek and hollow eye of misery. Benevolence, yet lingering in a few bosoms, makes some faint expiring struggles, till at length self-love resumes his wonted empire and lords it triumphant over the world.

天啊！人人生活在富裕中，人人都无须焦虑而辛苦地满足自己无休止的需求，也没有了狭隘的自私利己原则，精神从肉体供养的绵绵不断的焦虑中解脱出来，畅游在与性情相宜的精神领域，这样的景象又从何说起啊！这种华丽的想象物在现实的苛刻检验下会倏然全无踪影。由富裕培育并激发出来的仁爱精神，被匮乏的凛凛之气压抑着。曾消失的憎恨情绪会重新出现。自我保护的法则会驱散人类灵魂中一切柔美而高尚的情感。作恶的诱惑过于强烈，非人类的本性所能抵制。谷物不等成熟前就被拔掉，或被不公平地私吞，而一连串撒谎骗人的丑恶行为马上就会产生。操持着大家庭的母亲再也拿不到充足的食物。儿童因食物不足而体弱多病。健康的红润脸颊被贫苦而致的苍白的脸颊和凹陷的眼睛所取代。萦绕在少数人心头的仁爱，作了几次无力的挣扎之后渐淡渐息，最终利己之心又恢复了以往的绝对统治，以胜利的姿态在全世界称王称霸。

No human institutions here existed, to the perverseness of which Mr. Godwin ascribes the original sin of the worst men. [11_2]

No opposition had been produced by them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good. No monopoly had been created of those advantages which reason directs to be left in common. No man had been goaded to the breach of order by unjust laws. Benevolence had established her reign in all hearts: and yet in so short a period as within fifty years, violence, oppression, falsehood, misery, every hateful vice, and every form of distress, which degrade and sadden the present state of society, seem to have been generated by the most imperious circumstances, by laws inherent in the nature of man, and absolutely independent of it human regulations.

葛德文先生将最坏的人的原始罪恶归咎于人类制度的腐败，但这种制度在这里已不存在 [12_2] 。也不存在这种制度产生的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对立。理性指定要留给公众的那些利益还未被独占。也没有谁受不公正的法律驱使去破坏秩序。仁爱已深深地扎根于所有人的心中。不过，在短短50年里，令社会现状堕落和晦暗的暴力、压迫、虚伪、苦难、各种可憎的罪恶以及各种形式的贫困，似乎已经从这种最迫切的情形和人类本性的内在规律中产生，但是同人类的制度绝然不相干。

If we are not yet too well convinced of the reality of this melancholy picture, let us but look for a moment into the next period of twenty-five years; and we shall see twenty-eight millions of human beings without the means of support; and before the conclusion of the first century, the population would be one hundred and twelve millions, and the food only sufficient for thirty-five millions, leaving seventy-seven millions unprovided for. In these ages want would be indeed triumphant, and rapine and murder must reign at large: and yet all this time we are supposing the produce of the earth absolutely unlimited, and the yearly

increase greater than the boldest speculator can imagine.

如果大家仍不太相信这种悲凄情景的现实性，我们不妨看一看下一个25年的情况。我们会看到，那时将有2800万人没有生活资料，在第一个世纪末时，人口会达到11200万，而食物则仅够养活3500万人，剩下7700万人没有饭吃。到那时，缺衣少食真的会大行其道，掠夺和谋杀必将泛滥成灾。尽管我们一直在假设土地的产出是绝对无限制的，而且每年的增量要远远超过最大胆的推想家所能想象的量。

This is undoubtedly a very different view of the difficulty arising from population from that which Mr. Godwin gives, when he says, “Myriads of centuries of still increasing population may pass away, and the earth be still found sufficient for the subsistence of its inhabitants.”

毫无疑问，这种“人口增长会带来困难”的观点，与葛德文先生的大不相同，他曾说过：“人口的增加也许在多少世纪后会停止，可大地仍足以养活它的居民。”

I am sufficiently aware that the redundant twenty-eight millions, or seventy-seven millions, that I have mentioned, could never have existed. It is a perfectly just observation of Mr. Godwin, that, “There is a principle in human society, by which population is perpetually kept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The sole question is, what is this principle? Is it some obscure and occult cause? Is it some mysterious interference of heaven which, at a certain period, strikes the men with impotence, and the women with barrenness? Or is it a cause, open to our researches, within our

view, a cause, which has constantly been observed to operate, though with varied force, in every state in which man has been placed? Is it not a degree of misery, the necessary and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laws of nature, which human institutions, so far from aggravating, have tended considerably to mitigate, though they never can remove?

我充分意识到，我所提到的那过剩的2800万人或7700万人，是不可能存在的。葛德文先生说："人类社会有一条规律，根据这条规律，人口总是保持在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上。"这个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唯一的问题是，这条规律是什么？是某种晦涩而神秘的原因吗？是不是上天神秘的干预令男子在某个时期性无能、妇女不能受孕？或者是不是一种我们看得见又有待我们深入研究的原因？人们注意到，它在人类所处的任何状态下都持续地发生作用，只是强度有所不同而已。这不正是一定程度的贫困吗？这种贫困是自然法则造成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虽然这种贫困永远不能被消除，但人类制度根本没使之有加剧，而是大大减轻了它。

It may be curious to observe, in the case that we have been supposing, how some of the laws which at present govern civilized society, would be successively dictated by the most imperious necessity. As man, according to Mr. Godwin, is the creature of the impressions to which he is subject, the goadings of want could not continue long, before some violations of public or private stock would necessarily take place. As these violations increased in number and extent, the more active and comprehensive intellects of the society would soon perceive, that while population was fast increasing, the yearly produce of the country would shortly begin to diminish. The urgency of the case would suggest the necessity of some mediate measures to be taken for the general safety. Some

kind of convention would then be called, and the dangerous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stated in the strongest terms. It would be observed, that while they lived in the midst of plenty, it was of little consequence who laboured the least, or who possessed the least, as every man was perfectly willing and ready to supply the wants of his neighbour. But that the question was no longer whether one man should give to another that which he did not use himself, but whether he should give to his neighbour the food which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his own existence. It would be represented, that the number of those that were in want very greatly exceeded the number and means of those who should supply them; that these pressing wants, which from the state of the produce of the country could not all be gratified, had occasioned some flagrant violations of justice; that these violations had already checked the increase of food, and would, if they were not by some means or other prevented, throw the whole community in confusion; that imperious necessity seemed to dictate that a yearly increase of produce should, if possible, be obtained at all events; that in order to effect this first, great, and indispensable purpose, it would be advisable to make a more complete division of land, and to secure every man's stock against violation by the most powerful sanctions, even by death itself.

在我们假设的情况下，现在支配着文明社会的一些规律接二连三地服从于最迫切需要的情形，这或许令人感到奇怪。葛德文先生认为，人是遵从于印象的产物，匮乏的驱使持续不了多久就必然会发生侵犯公私财产的行为。随着这类侵害行为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社会上比较活跃又博学的人士很快会觉察到，国家的年产出量将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而迅速减少。这种紧急状况会提醒人们必须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确保全社会的安全。紧接着会召开某种会议，用最有力的措辞来说明国家的危险境况。可以说，在人们过着富裕生活之时，谁干

得少，谁占得多都无关紧要，因为人人都十分愿意并随时可以满足邻人的需要。但问题已不再是一个人该不该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别人，而是他该不该把自己赖以生存的食物送给邻人。应当指出：缺乏食物的人数大大超过了那样供养他们的人数和手段，而这种按国家的生产状况不可能全部得到满足的迫切需要，就会引发某些公然违背正义的暴力行为。这种行为已经妨碍了粮食的增加，如不采取某些措施加以制止，还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最紧迫的需要似乎在命令，如果可能的话，无论如何都要使生产量逐年增加。为了实现这一首要的、重大的且无可替代的目的，应更彻底地分配土地，并以最有效的制裁甚至是死刑来保障每个人的财产都不受侵犯。

It might be urged perhaps by some objectors that, as the fertility of the land increased, and various accidents occurred, the share of some men might be much more than sufficient for their support, and that when the reign of self-love was once established, they would not distribute their surplus produce without some compensation in return. It would be observed, in answer, that this was an inconvenience greatly to be lamented; but that it was an evil which bore no comparison to the black train of distresses that would inevitably be occasioned by the insecurity of property; that the quantity of food which one man could consume was necessarily limited by the narrow capacity of the human stomach; that it was not certainly probable that he should throw away the rest; but that even if he exchanged his surplus food for the labour of others, and made them in some degree dependent on him, this would still be better than that these others should absolutely starve.

一些反对者也许会提出，由于土地肥力的增加和各种偶然事件的发生，一些人得到的份额可能大大超过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数量，而利己心一旦占了上风，如果没有某种补偿作为报酬，这些人绝不会

把自己剩余的生产物拿出来分配。可以这样回答：这是一个很令人悲叹的麻烦，但它是因为财产不安全而不可避免地带来的恶果，是一系列有害的困难所无法比拟的。一个人所能消费的食物量必然要受到人类有限的胃容量的限制，他肯定不会把剩余的部分扔掉，可如果他以剩余的食物来换取别人的劳动，进而使别人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他，这样要好过让别人活活饿死。

It seems highly probable, therefore, that an administration of property, not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which prevails in civilized States at present, would be established, as the best, though inadequate, remedy for the evils which were pressing on the society.

因此，要建立一种类似于目前在文明国家盛行的财产管理制度——一种虽不完善但能处理好困扰社会上的各种罪恶的最好制度，还是很有可能的。

The next subject that would come under discussion,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preceding, is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sexes. It would be urged by those who had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true cause of the difficulties under which the community laboured, that while every man felt secure that all his children would be well provided for by general benevolence, the powers of the earth would be absolutely inadequate to produce food for the population which would inevitably ensue; that even if the whole attention and labour of the society were directed to this sole point, and if, by the most perfect security of property, and every other encouragement that could be thought of, the greatest possible increase of produce were yearly obtained; yet still, that the increase of food would by no

means keep pace with the much more rapid increase of population; that some check to population therefore was imperiously called for; that the most natural and obvious check seemed to be to make every man provide for his own children; that this would operate in some respect as a measure and guide in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s it might be expected that no man would bring beings into the world, for whom he could not find the means of support; that where this notwithstanding was the case, it seemed necessary, for the example of others, that the disgrace and inconvenience attending such a conduct should fall upon the individual, who had thus inconsiderately plunged himself and innocent children in misery and want.

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与前一问题紧密相连，也就是两性的交往。那些已注意到社会受苦受难真正原因的人会强调：如果每个人都确信他的所有子女可以靠普遍的仁爱而得到很好的抚养，那么土地的生产能力将绝对生产不出足够的食物来供养随后增加的人口；他们还强调即使社会的全部注意力和劳动都指向这唯一目的，而且由于财产受到完善的保障以及各种可能想到的鼓励措施，每年都能达到生产物最大的增加量；但食物的增加仍旧无法与更快增长的人口保持同步，因此对人口进行某种控制势在必行。最自然又最明显的控制似乎是让每个人都抚养他自己的子女，从某个方面来讲，这是对人口增长的一种衡量和指导。可以料想，人们如果无法维持生计，就不会生儿育女，但即使如此，也很有必要以儆效尤，让作出这种行为的个人遭受耻辱和承受麻烦，因为是他的轻率致使自己及其无辜的子女陷于苦难和贫困。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or at least, of some express or implied obligation on every man to support his own children, seems to be the natural result of these reasonings in a community under

the difficulties that we have supposed.

婚姻制度，或者至少是每个男人要承担抚养自己子女（明示或暗示的）的义务的制度，在我们所设想的困难重重的社会里，似乎是上述推理得出的自然结论。

The view of these difficulties presents us with a very natural origin of the superior disgrace which attends a breach of chastity in the woman than in the man. It could not be expected that women should have resources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ir own children. When therefore a woman was connected with a man, who had entered into no compact to maintain her children, and, aware of the inconveniences that he might bring upon himself, had deserted her, these children must necessarily fall for support upon the society, or starve. And to prevent the frequent recurrence of such an inconvenience, as it would be highly unjust to punish so natural a fault by personal restraint or infliction, the men might agree to punish it with disgrace. The offence is besides more obvious and conspicuous in the woman, and less liable to any mistake. The father of a child may not always be known, but the same uncertainty cannot easily exist with regard to the mother. Where the evidence of the offence was most complete, and the inconvenience to th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 greatest, there it was agreed that the large share of blame should fall. The obligation on every man to maintain his children, the society would enforce, if there were occasion; and the greater degree of inconvenience or labour, to which a family would necessarily subject him, added to some portion of disgrace which every human being must incur who leads another into unhappiness,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sufficient punishment for the man.

考察这些困难让我们看到了“坏了贞操的女人比男人更蒙羞”这一观念的自然起源。不能指望妇女会有足够的能力养活子女。因而，一位女子同一位男子结合，这位男子又没有和她约定抚养其子女，当男子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自找麻烦故而将她抛弃时，这些子女必然要依靠社会供养，否则会饿死。而为了防止上述麻烦反复发生，人们可能同意用耻辱来惩罚这种过失，因为采用限制自由或肉刑来惩罚这样一种再自然不过的错误是很不公正的。另外，这种错误在女子身上发生得更明显、更引人注目，少有其他的犯错情况。一个孩子也许常常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但他很容易确切知道谁是他的母亲。人们认为，只要这一罪错的证据是非常充分的，给社会造成的妨害又最大，那男人就应当承担大部分的罪责。如果必要的话，社会可以强制每个男子履行抚养子女的义务。家庭必然使他承受较多的麻烦和劳动，加之因个人造成别人不幸而必须蒙受的几分耻辱（每个人都是这样），便可以认为他受到了足量惩罚。

That a woman should at present be almost driven from society for an offence which men commit nearly with impunity, seems to be undoubtedly a breach of natural justice. But the origin of the custom, as the most obvious and effectual method of preventing the frequent recurrence of a serious inconvenience to a community, appears to be natural, though not perhaps perfectly justifiable. This origin, however, is now lost in the new train of ideas which the custom has since generated. What at first might be dictated by state necessity is now supported by female delicacy, and operates with the greatest force on that part of society where, if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custom were preserved, there is the least real occasion for it.

现在妇女犯罪几乎要被赶出社会，而男人犯罪却基本不受惩罚，

这无疑是对自然正义的违背。但是，这种习俗作为防止严重妨害社会的事件频繁发生的最明显而有效的方法，其起因虽说不是完全合理，却也是自然的。不过，这种起因现已消失在由习俗产生的一系列新观念中了。原本因国家需要而必行之事，现在要靠女性的温柔体贴来维持；而且它对社会的那一部分人产生极其有力的影响，如果该习俗的原初意图尚存的话，根本不会有它的用武之地。

When these two fundamental laws of society, the security of property, and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were once established, inequality of conditions must necessarily follow. Those who were born after the division of property would come into a world already possessed. If their parents, from having too large a family, could not give them sufficient for their support, what are they to do in a world where everything is appropriated? We have seen the fatal effects that would result to a society, if every man had a valid claim to an equal share of the produce of the earth. The members of a family which was grown too large for the original division of land appropriated to it could not then demand a part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others, as a debt of justice. It has appeared, that from the inevitable laws of our nature some human beings must suffer from want. These are the unhappy persons who, in the great lottery of life, have drawn a blank. The number of these claimants would soon exceed the ability of the surplus produce to supply. Moral merit is a very difficult distinguishing criterion, except in extreme cases. The owners of surplus produce would in general seek some more obvious mark of distinction. And it seems both natural and just that, except upon particular occasions, their choice should fall upon those who were able, and professed themselves willing, to exert their strength in procuring a further surplus produce; and thus at once benefiting the community, and enabling these proprietors to afford assistance to greater numbers. All who were in want of food

would be urged by imperious necessity to offer their labour in exchange for this article so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existence. The fund appropriated to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would be the aggregate quantity of food possessed by the owners of land beyond their own consumption. When the demands upon this fund were great and numerous, it would naturally be divided in very small shares. Labour would be ill paid. Men would offer to work for a bare subsistence, and the rearing of families would be checked by sickness and misery. On the contrary, when this fund was increasing fast, when it was great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claimants, it would be divided in much larger shares. No man would exchange his labour without receiving an ample quantity of food in return. Labourers would live in ease and comfort, and would consequently be able to rear a numerous and vigorous offspring.

社会的这两个基本规则，财产安全和婚姻制度一经确立，条件的不平等必然会随之而来。凡是在财产分割后出生的人，踏进的是一个已经被别人据有的世界。如果他们的双亲因子女多没能很好地养育他们，他们在一切东西全被别人据有的世界上该怎么办呢？我们已看到，要是人人都有权从土地生产物中索取相等的份额，将会给社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一个家庭人口增加太多，超过原本分得的那份土地的生产量，他们不能从别人的剩余的农产品中分取一部分，这是一种公平债。显然，由于我们本性的必然法则，有些人肯定要遭受匮乏之苦。这些不幸的人在生活的大型抽彩抽了空彩。这类索取者的人数很快就会超过剩余生产物的供应能力。道德品质是一个很难操作的区分标准，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除外。剩余产品的所有者一般会努力找出更明显的区分标志。除在某些特殊场合外，他们会选择有能力并且愿意尽力获取更多剩余产品的人，这应该是自然的，也是正当的；而这样做既有利于社会，又能让这些业主们帮助更多的人。所有缺少食物的人会迫于需要，提供他们的劳动，来换取这种维持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用于维持劳动的资金相当于土地所有者拥有的、超过他们

自己消费所需的食物总量。当对这种资金的需求很大，数量又多时，它自然会被分成若干很小的份儿。这样劳动报酬将会降低。人们会为获取最低的生活资料提供劳动，而疾病和贫困会妨碍他们养活家人。相反，当这笔资金迅速增加，且相对于索取资金的人数又很充裕时，它就会被分成较大的份额。如果得不到足量的食物作为报酬，没有劳动者会交换劳动。劳动者会过得安逸又舒适，因而也有能力抚养许多健壮的子女。

On the state of this fund, the happiness, or the degree of misery, prevailing among the lower classes of people in every known State at present chiefly depends. And on this happiness, or degree of misery, depends the increase, stationariness, or decrease of population.

在当今已知的国家里，下层阶级的幸福或者说痛苦的程度，主要取决于这种资金的状况。而人口是增加、静止不变或是减少，又取决于这种幸福或痛苦的程度。

And thus it appears, that a society constituted according to the most beautiful form that imagination can conceive, with benevolence for its moving principle, instead of self-love, and with every evil disposition in all its members corrected by reason and not force, would, from the inevitable laws of nature, and not from any original depravity of man, in a very short period, degenerate into a society constructed upon a plan not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which prevails in every known State at present; I mean, a society divided into a class of proprietors, and a class of labourers, and with self-love the main-spring of the great machine.

因此，很明显，一个按照人们所能想象出的最美形式建立的、以仁爱作为其活动原则、靠理性而非势力来纠正其成员的有害倾向的社会，很快就会按照人类本性的必然规律（而非由于人类的任何原初的堕落）蜕变为一种与我们目前所知的一切国家毫无本质区别的社会，也就是说，蜕变为一种划分所有者和劳动阶级，并以利己之心作为社会这台大机器主要动力。

In the supposition I have made, I have undoubtedly taken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smaller, and the increase of produce greater, than they really would be. No reason can be assigned wh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 have supposed, population should not increase faster than in any known instance. If then we were to take the period of doubling at fifteen years, instead of twenty-five years, and reflect upon the labour necessary to double the produce in so short a time, even if we allow it possible, we may venture to pronounce with certainty that if Mr. Godwin's system of society was established in its utmost perfection, instead of myriads of centuries, not thirty years could elapse before its utter destruction from the simpl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在我所作的假设中，我无疑是把人口增长设定得较小，生产总量设定得较大，这和两者的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在我假设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不应当快过任一个已知实例的人口增长。这其中的原因现在还无法认定。如果我们现在把人口增长一倍的时间定为15年，而不是25年，并且考虑到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使生产量增加一倍所必需的劳动（即使我们承认有此可能），那么我们可以大胆断言，即便葛德文先生设想的社会制度以最完美的形式建立起来，不消说要许多世纪，甚至用不了30年，整个社会就会在这条简单的人口原理的作用下而彻底毁灭。

I have taken no notice of emigration for obvious reasons. If such societies were instituted in other parts of Europe, these countries would be under the same difficulties with regard to population, and could admit no fresh members into their bosoms. If this beautiful society were confined to this island, it must have degenerated strangely from its original purity, and administer but a very small portion of the happiness it proposed; in short, its essential principle must be completely destroyed, before any of its members would voluntarily consent to leave it, and live under such governments as at present exist in Europe, or submit to the extreme hardships of first settlers in new regions. We well know, from repeated experience, how much misery and hardship men will undergo in their own country, before they can determine to desert it; and how often the most tempting proposals of embarking for new settlements have been rejected by people who appeared to be almost starving.

因某些明显的原因，我没有提到对外移民。如果这种社会在欧洲其他一些地方得以建立，那么涉及的国家在人口方面将会遭遇同样的困难，也不能容纳新的成员。如果这种美好的社会局限于这个岛国，那么它一定是由原来的纯洁状态经历了怪异的退化，也只能实现它想要的极小一部分幸福。总之，在该社会的成员自愿离开并生活在目前欧洲现存的这类政体中之前，或者在甘愿经受初次在新地方落脚定居的极端困苦之前，该社会的根本原则一定是被彻底破坏掉了。我们从日常经验中看得很清楚：人们只有在苦难极其深重时才会下决心离开祖国，开拓新殖民地的计划即便极为诱人，也常被那些饿得半死的人拒绝。

[11_1].See Bk VIII, ch. 8; in the third edition, Vol II, p. 512.

[11_2].Bk VIII, ch. 3; in the third edition, Vol. II, p. 462.

[12_1].参见《政治正义论》第八章，第三版，第二卷，512页。

[12_2].《政治正义论》第三章，第三版，第二卷，462页。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Mr. Godwin's conjecture concerning the future extinction of the passion between the sexes.—Little apparent grounds for such a conjecture.—Passion of love not inconsistent either with reason or virtue.

葛德文先生针对未来两性情欲消失的猜想——这一猜想并无太多明显根据——爱的激情要么合乎理性，要么合乎美德。

We have supported Mr. Godwin's system of society once completely established. But it is supposing an impossibility. The same causes in nature which would destroy it so rapidly, were it once established, would prevent the possibility of its establishment. And upon what grounds we can presume a change in these natural causes, I am utterly at a loss to conjecture. No move towards the extinction of the passion between the sexes has taken place in the five or six thousand years that the world has existed. Men in the decline of life have in all ages declaimed against a passion which they have ceased to feel, but with as little reason as success. Those who from coldness of constitutional temperament have never felt what love is, will surely be allowed to be very incompetent judges with regard to the power of this passion to contribute to the sum of pleasurable sensations in life. Those who have spent their youth in criminal excesses and have prepared for themselves, as the comforts of their age, corporal debility and mental remorse may well inveigh against such pleasures as vain and futile, and unproductive of

lasting satisfaction. But the pleasures of pure love will bear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most improved reason, and the most exalted virtue. Perhaps there is scarcely a man who has once experienced the genuine delight of virtuous love, however great his intellectual pleasure may have been, that does not look back to the period as the sunny spot in his whole life, where his imagination loves to bask, which he recollects and contemplates with the fondest regrets, and which he would most wish to live over again. The superiority of intellectual to sensual pleasures consists rather in their filling up more time, in their having a larger range, and in their being less liable to satiety, than in their being more real and essential.

葛德文先生的社会制度一旦完全建立，我们便会予以支持。但这种假定是无法实现的。该制度一旦建立，自然原因便会迅速将其摧毁。同样的原因也将抑制这种制度建立的可能性。至于要根据何种理由假定这些自然原因会发生改变，我无法猜度。自世界存在五六千年以来，还尚未出现两性情欲消失的任何趋向。从古至今，垂暮之年的老者都激烈抨击那种他们再也无法感知的情欲，但却毫无道理，也总是以失败告终。对于那些生性冷淡、不知情爱为何物之人，当然没有资格评断情欲的力量对于构成生命快感之和有多大的贡献。那些因年轻时极度纵欲而导致年老时体衰且满心懊悔的人，很可能指责这种愉悦是空虚无益的，且无法带来永久的满足感。然而纯粹爱情所生发的愉悦，同上善的理性和崇高的德性并不矛盾。那些曾在纯洁的爱情中体验到真正快乐的人，无论其理智的愉悦有多大，都会不禁深情地回忆并沉浸在往昔那段令人心往神驰的快乐时光，他还会追忆并沉思那时最美好的遗憾，并希望能够重温旧梦。理智的快乐超越肉体快感之处，与其说在于它更为真实、不可或缺，还莫不如说它持续时间较长、涉猎范围更广，且更不容易使人满足。

Intemperance in every enjoyment defeats its own purpose. A

walk in the finest day through the most beautiful country, if pursued too far, ends in pain and fatigue. The most wholesome and invigorating food, eaten with an unrestrained appetite, produces weakness instead of strength. Even intellectual pleasures, though certainly less liable than others to satiety, pursued with too little intermission, debilitate the body, and impair the vigour of the mind. To argue against the reality of these pleasures from their abuse seems to be hardly just. Morality, according to Mr. Godwin, is a calculation of consequences, or, as Archdeacon Paley very justly expresses it, the will of God, as collected from general expediency. According to either of these definitions, a sensual pleasure not attended with the probability of unhappy consequences does not offend against the laws of morality, and if it be pursued with such a degree of temperance as to leave the most ample room for intellectual attainments, it must undoubtedly add to the sum of pleasurable sensations in life. Virtuous love, exalted by friendship, seems to be that sort of mixture of sensual and intellectual enjoyment particularly suited to the nature of man, and most powerfully calculated to awaken the sympathies of the soul, and produce the most exquisite gratifications.

任何享乐，若放纵无度，都会有违其初衷。响晴的日子散步在最美的乡间，若过远地跋涉，结果也会劳累、疲惫不堪。最卫生、最营养的食物，若贪吃无度，非但不能增强体魄，反而有害于健康。甚至是理智的快乐，虽然确实比其他快乐更难于满足，但若毫无休止地追求，也会使身体衰弱，损害心智。但是，如果因为有人纵欲无度就反对这些快乐的现实性，似乎也有失公允。按葛德文先生所说，道德即是结果的算计，或者像副主教帕里非常恰当地表述的那样，道德就是上帝的意旨，由普遍的权宜之法集合而成。根据这两个定义的任何一个，肉体快乐如果不带来不当的后果的话，就不算违反道德律。若能稍加节制地追求肉体之乐，为理智的修炼留有足够的空间，那么肉体

快乐无疑会增加生命中总的愉悦感。经友谊升华出的真爱，应该是那种特别符合人类本性的肉体享乐与理智享乐的结合体，它特别能唤起人类灵魂的共鸣，激发出强烈的满足感。

Mr. Godwin says, in order to shew the evident inferiority of the pleasures of sense, “Strip the commerce of the sexes of all its attendant circumstances, and it would be generally despised” (Bk. I, ch. 5; in the third edition, Vol. I, pp. 71-72). He might as well say to a man who admired trees: strip them of their spreading branches and lovely foliage, and what beauty can you see in a bare pole? But it was the tree with the branches and foliage, and not without them that excited admiration. One feature of an object may be as distinct, and excite as different emotions, from the aggregate as any two things the most remote, as a beautiful woman, and a map of Madagascar. It is 'the symmetry of person, the vivacity, the voluptuous softness of temper, the affectionate kindness of feelings,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wit of a woman that excite the passion of love, and not the mere distinction of her being female. Urged by the passion of love, men have been driven into acts highly prejudicial to the general interests of society, but probably they would have found no difficulty in resisting the temptation, had it appeared in the form of a woman with no other attractions whatever but her sex. To strip sensual pleasures of all their adjuncts, in order to prove their inferiority, is to deprive a magnet of some of its most essential causes of attraction, and then to say that it is weak and inefficient.

为了突显感官快乐的低下，葛德文先生说：“如果把两性性交伴随的一切情况都排除掉，人们会普遍鄙视它的。”（《政治正义论》第三版，第一卷，第五章71-72页）。他当然还可以对一个观赏树木的人说：如果把伸展的枝条和美丽的叶子都去掉，那光秃的树干何美

之有？可是，树木总是有枝叶的，正因为有了枝叶，人们才会观赏树木。一个物体的某一特点可能不同于两种相去甚远的事物的组合，譬如貌美如花的女子和一幅马达加斯加岛的地图，所以可以让人产生不同的情感。真正激起男人们爱欲的不单单是因为她身为女人，而是因为女性“身材匀称、活泼、性感温柔、有爱心、富于想象、有才智等等”。受爱欲的驱使，男人可能被迫做出有损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然而若除了女性的性别之外没有其他魅力的吸引，恐怕他们并不难抵挡这种诱惑。若为了证明其低劣性而剥夺肉体快乐的一切附属物，就相当于去掉了磁石里产生吸力的最基本的要素，而后却说它没有什么效用。

In the pursuit of every enjoyment, whether sensual or intellectual, reason, that faculty which enables us to calculate consequences, is the proper corrective and guide. It is probable therefore that improved reason will always tend to prevent the abuse of sensual pleasures, though it by no means follows that it will extinguish them.

对于任何一种享乐的追求，无论是肉体的还是智力的，理性，即我们估算结果的能力，都是合适的矫正者和引导者。因此，较高的理性往往可能防止过度纵欲，但绝不会消除这种感观快乐。

I have endeavoured to expose the fallacy of that argument which infers an unlimited progress from a partial improvement, the limits of which cannot be exactly ascertained. It has appeared,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in which a decided progress has been observed, where yet it would be a gross absurdity to suppose that progress indefinite. But towards the extinction of the passion between the sexes, no observable progress whatever has

hitherto been made. To suppose such an extinction, therefore, is merely to offer an unfounded conjecture, unsupported by any philosophical probabilities.

我曾试图揭示这样一种论证是荒谬的，即从一种无法精准确定其限度的局部改良推论出进步是没有限制的。我觉得似乎很多例子中都体现了明显的进步，但若认为那种进步是无限的则是荒谬十足。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任何明显的进展足以说明两性的情欲会消失。因此，设定其消失，仅仅是提出了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想，并不能得到任何哲学或然性的支持。

It is a truth, which history I am afraid makes too clear, that some men of the highest mental powers have been addicted not only to a moderate, but even to an immoderate indulgence in the pleasures of sensual love. But allowing, as I should be inclined to do, notwithstanding numerous instances to the contrary, that great intellectual exertions tend to diminish the empire of this passion over man; it is evident that the mass of mankind must be improved more highly than the brightest ornaments of the species at present before any difference can take place sufficient sensibly to affect population. I would by no means suppose that the mass of mankind has reached its term of improvement; but the principal argument of this essay tends to place in a strong point of view the improbability that the lower classes of people in any country should ever be sufficiently free from want and labour to obtain any high degree of intellectual improvement.

恐怕历史已经明晰一个事实，那就是往往一些智力超群的人士不仅醉心于有节制的肉体快乐，甚至会沉溺于这种快乐而毫无节制。然

而，即便承认（虽有诸多反例，我仍倾向于承认）智力上的巨大努力往往易于减少情欲对人的控制，但很显然，只有大多数人的进步超过人类现今最为光耀的典型人物时，才能对人口产生明显的影响。我绝不认为大多数人已经达到进步的极限，但本文的主要论证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即任何国家的下层人民永远无法彻底摆脱贫困与劳动，继而获得高度的智力发展。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Mr. Godwin's conjecture concerning the indefinite prolongation of human life.—Improper inference drawn from the effects of mental stimulants on the human frame, illustrated in various instances.—Conjectures not founded on any indications in the past not to be considered as philosophical conjectures.—Mr. Godwin's and Mr. Condorcet's conjecture respecting the approach of man towards immortality on earth, a curious instance of the inconsistency of scepticism.

葛德文先生有关人类寿命无限延长的猜想——以各种实例说明通过大脑刺激对人体结构构成影响所得出的错误推断——不以过去迹象为根据而做出的猜想，不能被划入哲学猜想的范畴——葛德文先生与孔多塞先生关于人类在世趋于永生的猜想，也是怀疑主义自相矛盾的一个新奇例子。

Mr. Godwin's conjecture respecting the future approach of man towards immortality on earth seems to be rather oddly placed in a chapter which professes to remove the objection to his system of equality from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Unless he supposes the passion between the sexes to decrease faster than the duration of life increases, the earth would be more encumbered than ever. But leaving this difficulty to Mr. Godwin, let us examine a few of the appearances from which the probable immortality of man is inferred.

葛德文先生有关未来世上人类趋于永生的猜想，被安排在宣称要消除人口原理对其平等制度的阻碍作用的那一章，似乎有些奇怪。除非他假定两性情欲的减弱较之寿命的增加要更为迅速，否则地球将比以往更加拥挤。但是，我们与其把这个难题留给葛德文先生，不如暂且研究一下据以推知人类或然永生的几种表象。

To prove the power of the mind over the body, Mr. Godwin observes, “How often do we find a piece of good news dissipating a distemper? How common is the remark that those accidents which are to the indolent a source of disease are forgotten and extirpated in the busy and active? I walk twenty miles in an indolent and half determined temper and am extremely fatigued. I walk twenty miles full of ardour, and with a motive that engrosses my soul, and I come in as fresh and as alert as when I began my journey. Emotion excited by some unexpected word, by a letter that is delivered to us, occasions the most extraordinary revolutions in our frame, accelerates the circulation, causes the heart to palpitate, the tongue to refuse its office, and has been known to occasion death by extreme anguish or extreme joy. There is nothing indeed of which the physician is more aware than of the power of the mind in assisting or reading convalescence.”

为了证明精神对肉体的支配力量，葛德文先生说：“我们是不是常常遇到一条好消息就能治好一场小病的事例？是不是常听人说那些致使怠惰之人患病的意外遭遇，却被勤勉劳碌之人忘得一干二净？我要是懒懒散散、三心二意地走二十英里，我就会疲惫不堪。但如果我意气风发、目的明确地走上二十英里，我到达时会和出发时一样精神饱满。由某一突如其来的消息或寄来的信件而激起的情绪，会引起身体极为异常的变化，加速血液循环，导致心悸或结舌，有时极度的痛

苦或高兴还能致人暴毙。医生也最常注意精神对促进或阻碍病人康复的作用。”

The instances here mentioned are chiefly instances of the effects of mental stimulants on the bodily frame. No person has ever for a moment doubted the near, though mysterious, connection of mind and body. But it is arguing totally without knowledge of the nature of stimulants to suppose, either that they can be applied continually with equal strength, or if they could be so applied, for a time, that they would not exhaust and wear out the subject. In some of the cases here noticed, the strength of the stimulus depends upon its novelty and unexpectedness. Such a stimulus cannot, from its nature, be repeated often with the same effect, as it would by repetition lose that property which gives it its strength.

此处所举之例主要在于说明精神刺激对人类身体的影响。至于精神与肉体的紧密联系，虽然难以理解，却未曾有人产生过片刻的质疑。但是，如果假设精神刺激能以同等强度不断应用，或假设其短时间内可以如此应用，之后便说它可以用之不竭，那就表明持该假设的人对精神刺激的本质全然不知。此处所举的一些例子中，刺激的强度要依赖于其新奇性及意外性。这种刺激的本质决定其无法以同等效力反复使用，如果反复使用，会使其产生刺激强度的特性逐渐消失。

In the other cases, the argument is from a small and partial effect, to a great and general effect, which will in numberless instances be found to be a very fallacious mode of reasoning. The busy and active man may in some degree counteract, or what is perhaps nearer the truth, may disregard those slight disorders of frame which fix the attention of a man who has nothing else to

think of; but this does not tend to prove that activity of mind will enable a man to disregard a high fever, the smallpox, or the plague.

在其他例子中，推论是从细微、局部的影响推及到较大的、一般的影响，从无数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推理方式是极其荒谬的。勤勉劳碌之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身体轻微不适的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讲，可能不在乎这些小病；而无所思虑之人却会专注于此。但这无从证明精神活动能够让人忽视高烧、天花或瘟疫等重大疾病。

The man who walks twenty miles with a motive that engrosses his soul does not attend to his slight fatigue of body when he comes in; but double his motive, and set him to walk another twenty miles, quadruple it, and let him start a third time, and so on; and the length of his walk will ultimately depend upon muscle and not mind. Powell, for a motive of ten guineas, would have walked further probably than Mr. Godwin, for a motive of half a million. A motive of uncommon power acting upon a frame of moderate strength would, perhaps, make the man kill himself by his exertions, but it would not make him walk a hundred miles in twenty-four hours. This statement of the case shews the fallacy of supposing that the person was really not at all tired in his first walk of twenty miles, because he did not appear to be so, or, perhaps, scarcely felt any fatigue himself. The mind cannot fix its attention strongly on more than one object at once. The twenty thousand pounds so engrossed his thoughts that he did not attend to any slight soreness of foot, or stiffness of limb. But had he been really as fresh and as alert, as when he first set off, he would be able to go the second twenty miles with as much ease as the first, and so on, the third, etc. which leads to a palpable absurdity. When a horse of spirit is nearly half tired, by the stimulus of the spur, added to the

proper management of the bit, he may be put so much upon his mettle, that he would appear to a stander-by, as fresh and as high spirited as if he had not gone a mile. Nay, probably, the horse himself, while in the heat and passion occasioned by this stimulus, would not feel any fatigue; but it would be strangely contrary to all reason and experience, to argue from such an appearance that, if the stimulus were continued, the horse would never be tired. The cry of a pack of hounds will make some horses, after a journey of forty miles on the road, appear as fresh, and as lively, as when they first set out. Were they then to be hunted, no perceptible abatement would at first be felt by their riders in their strength and spirits, but towards the end of a hard day, the previous fatigue would have its full weight and effect, and make them tire sooner. When I have taken a long walk with my gun, and met with no success, I have frequently returned home feeling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uncomfortableness from fatigue. Another day, perhaps, going over nearly the same extent of ground with a good deal of sport, I have come home fresh, and alert. The difference in the sensation of fatigue upon coming in, on the different days, may have been very striking, but on the following mornings I have found no such difference. I have not perceived that I was less stiff in my limbs, or less footsore, on the morning after the day of the sport, than on the other morning.

目标明确的人走上20英里，到达终点的时候不会注意到身体的轻微疲劳；但若将目标增加一倍让他再走上20英里，或让目标增加三倍再走20英里，以此类推，那么他所行走路程的长度将最终取决于其体力，而非精神。鲍威尔为得到10畿尼，可能比为得到50万畿尼的葛德文先生走得更远。一个体力一般的人在十分强烈的动因作用下，可能会极尽努力、受尽痛苦，却还是无法在24小时内行走100英里。该例子表明，如果因为他看起来不累，或者他自身几乎感觉不到疲惫，就

认为他最初行走20英里毫不疲倦，这是错误的。人的大脑无法同时将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一种以上的事物。2万英镑已经足以使他全神贯注，以至他不会注意到轻微的脚部疼痛或肢体发僵。但是，如果他行走了20英里后确实仍然精神饱满，机敏活跃，如同刚出发时那样，就认为他能够同样轻松地再走20英里、40英里等等，那显然是十分荒唐的。一匹良马几乎疲惫不堪时，在踢马刺的驱策下，配以嚼子的适当操纵，它可能依然奋蹄奔腾。在旁观者看来，它精力旺盛，生气勃勃，恰如刚刚起步。不仅如此，沉浸于这种刺激所引发的热情与激情中，这匹马自己或许都感觉不到丝毫疲倦。但如果根据这种表象认为，只要刺激持续不断，马就永远不会感到疲倦，那就完全背离了一切理性和经验。一群猎犬的吠叫可以使一些奔跑过四十英里的马和出发时一样精力充沛，生气勃勃。那时要让马匹追猎，骑手们最初可能感觉不到马的体力和锐气有所减退，但辛苦的一天结束时，先前的疲乏就会完全显现，很快马儿们就会疲倦不堪了。某一天我持枪远行而一无所获回到家后，常常因为疲乏而感到不适。另一天我走的路程相差无几但猎获颇丰的话，回到家我还是精神饱满。在这两天的当日，归来时的疲劳感可能有显著的不同，但在两天之后的早晨，我就感觉不到这种差别了。我认为，无论是猎获颇丰，还是一无所获，次日的清晨，我的四肢都是同样僵硬，脚也同样酸痛。

In all these cases, stimulants upon the mind seem to act rather by taking off the attention from the bodily fatigue, than by really and truly counteracting it. If the energy of my mind had really counteracted the fatigue of my body, why should I feel tired the next morning?If the stimulus of the hounds had as completely overcome the fatigue of the journey in reality, as it did in appearance, why should the horse be tired sooner than if he had not gone the forty miles? I happen to have a very bad fit of the toothache at the time I am writing this. In the eagerness of composition, I every now and then, for a moment or two, forget it. Yet I cannot help thinking that the process, which causes the pain,

is still going forwards, and that the nerves which carry the information of it to the brain are even during these moments demanding attention and room for their appropriate vibrations. The multiplicity of vibrations of another kind may perhaps prevent their admission, or overcome them for a time when admitted, till a shoot of extraordinary energy puts all other vibration to the rout, destroys the vividness of my argumentative conceptions, and rides triumphant in the brain. In this case, as in the others, the mind seems to have little or no power in counteracting or curing the disorder, but merely possesses a power, if strongly excited, of fixing its attention on other subjects.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与其说精神刺激物对真正抵消了身体疲劳，莫不如说它们只是将人的注意力从身体疲劳转移了。如果精神的力量真正抵消了身体的疲劳，为何我在翌日清晨又感到疲惫呢？如果猎犬的刺激事实上同表象一样完全战胜了旅途的劳累，那为何跑了40英里的马要比没跑40英里的马更容易疲劳呢？我撰写此书之时，牙齿突发剧痛，但因写作的热忱，我常常暂时忘却疼痛。但我还会情不自禁地感到牙痛仍在持续，而将痛感传送到大脑的神经，此时也要求我对其适时的振动给予应有的关注。神经的各种其他振动可能会进行干扰，暂时转移我的注意力，直到一股特别的能量击退其他一切振动，毁坏我构思论辩的昂扬劲头，在我的大脑里占据优胜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情况亦然），精神好像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对抗、治疗病痛的能力，而仅仅是能在我受到强烈刺激时转移一下注意力罢了。

I do not, however, mean to say that a sound and vigorous mind has no tendency whatever to keep the body in a similar state. So close and intimate is the union of mind and body that it would be highly extraordinary if they did not mutually assist each other's functions. But, perhaps, upon a comparison, the body has more

effect upon the mind than the mind upon the body. The first object of the mind is to act as purveyor to the wants of the body. When these wants are completely satisfied, an active mind is indeed apt to wander further, to range over the fields of science, or sport in the regions of imagination, to fancy that it has 'shuffled off this mortal coil', and is seeking its kindred element. But all these efforts are like the vain exertions of the hare in the fable. The slowly moving tortoise, the body, never fails to overtake the mind, however widely and extensively it may have ranged, and the brightest and most energetic intellects, unwillingly as they may attend to the first or second summons, must ultimately yield the empire of the brain to the calls of hunger, or sink with the exhausted body in sleep.

然而，我并不否认健康又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能够有助于保持身体处于类似的状态。精神与肉体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如此密切，因而倘若两者之间的功能没有相互促进，倒是令人异常惊奇的。但相比而言，肉体对精神的作用或许要远大于精神对肉体的影响。精神的首要目标在于满足肉体的欲求。当这些欲望都完全满足后，活跃的精神往往会进一步漫游，徜徉于科学领域，或遨游于想象的世界中，幻想着它已经“摆脱尘世的喧嚣与烦扰”，并开始寻求相似的活动领域。然而这一切努力都如同寓言故事中兔子所付出的努力一样徒然。那个速度迟缓的乌龟，也就是肉体，从来都是超越着精神，无论精神活动的范围何其广大。最为聪慧、最富活力的头脑，或许会勉强屈从于初次或二次召唤，但最终使大脑服从于饥饿的呼唤，或者同精疲力竭的躯体一同沉睡。

It seems as if one might say with certainty that if a medicine could be found to immortalize the body, there would be no fear of its [not] being accompanied by the immortality of the mind. But the immortality of the mind by no means seems to infer the immortality

of the body. On the contrary, the greatest conceivable energy of mind would probably exhaust and destroy the strength of the body. A temperate vigour of mind appears to be favourable to health; but very great intellectual exertions tend rather, as has been often observed, to wear out the scabbard. Most of the instances which Mr. Godwin has brought to prove the power of the mind over the body, and the consequent probability of the immortality of man, are of this latter description, and could such stimulants be continually applied, instead of tending to immortalize, they would tend very rapidly to destroy the human frame.

看样子也许有人会很肯定地说，如果有一种药可以使肉身不死，则精神必然会随之永生。但是，精神的永生似乎无法推出肉身不死的结论。相反，我们可以想象的至高的精神力量很可能耗尽和摧毁肉体的力量。适度的精神活力似乎更有利于健康，巨大的脑力消耗往往如人们常见的那样，使人的身体疲惫不堪。葛德文先生所举的事例，大部分都是用来证明精神对肉体的支配力量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或然不死，都属于后一种。倘若不断使用这些刺激，不仅不会让人的肉体永生，反而会很快摧毁它。

The probable increase of the voluntary power of man over his animal frame comes next under Mr. Godwin's consideration, and he concludes by saying, that the voluntary power of some men, in this respect, is found to extend to various articles in which other men are impotent. But this is reasoning against an almost universal rule from a few exceptions; and these exceptions seem to be rather tricks, than powers, that may be exerted to any good purpose. I have never heard of any man who could regulate his pulse in a fever; and doubt much, if any of the persons here alluded to have made the smallest perceptible progress in the regular correction of

the disorders of their frames and the consequent prolongation of their lives.

接下来葛德文先生要探究的问题是，人的意志对自身躯体的支配力是否可能增加。他的结论是：在这方面，有些人的意志力可能会延展到其他人所无法企及的许多领域。然而这只是据以少数的例外来反驳一个近乎普遍的规律。与其说这些例外对某些目的有好处，不如说它们是戏法。我从未听说哪个人在患热病时能够调节自身的脉搏，也很怀疑此处提及的人当中，是否有人在对肉体之疾进行正规治疗之后在延长其寿命方面取得了些许明显的进展。

Mr. Godwin says, “Nothing can be more unphilosophical than to conclude, that, because a certain species of power is beyond the train of our present observation, that it is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 human mind.” I own my ideas of philosophy are in this respect widely different from Mr. Godwin's. The only distinction that I see, between a philosophical conjecture, and the assertions of the Prophet Mr. Brothers, is, that one is founded upon indications arising from the train of our present observations, and the other has no foundation at all. I expect that great discoveries are yet to take place in all the branches of human science, particularly in physics; but the moment we leave past experience as the foundation of our conjectures concerning the future, and still more, if our conjectures absolutely contradict past experience, we are thrown upon a wide field of uncertainty, and any one supposition is then just as good as another. If a person were to tell me that men would ultimately have eyes and hands behind them as well as before them, I should admit the usefulness of the addition, but should give as a reason for my disbelief of it, that I saw no indications whatever in the past, from which I could infer the smallest probability of such a change. If this

be not allowed a valid objection, all conjectures are alike, and all equally philosophical. I own it appears to me that in the train of our present observations, there are no more genuine indications that man will become immortal upon earth, than that he will have four eyes and four hands, or that trees will grow horizontally instead of perpendicularly.

葛德文先生称："因为某种力量超乎我们当前的观察力，便断定它超出了人类精神的界限，这种观点极缺乏哲学思维。"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我的哲学观念和葛德文先生的哲学观念大相径庭。在哲学的推测与预言家布拉泽斯先生的断言之间，我所见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建立在我们当前观察的迹象之上，而后者却毫无根据可言。我期待人类科学的各个领域还会产生伟大的发现，尤其是物理学。但若背离过去的经验来预测未来，尤其是当这些预测与过去的经验完全相悖时，我们便会陷入毫无确定性的荒野，结果任何一种假设都和其他假设一样了。如果有人告诉我，人类的背后最终会同前面一样长出眼睛和双手，我承认这多出来的眼睛和双手必然有用，但我在过去从未发现任何迹象可用以推断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于是我有理由对此怀疑。如果这算不上一种正当的反对理由，那么一切推测都几乎一样，而且同样具有哲学依据。我承认，在我看来，根据现在的观察判断推测人在尘世可以获得永生，同人会长出四只眼和四只手或者树木将横向生长而非竖向生长一样，都没有切实可信的迹象可寻。

It will be said, perhaps, that many discoveries have already taken place in the world that were totally unforeseen and unexpected. This I grant to be true; but if a person had predicted these discoveries without being guided by any analogies or indications from past facts, he would deserve the name of seer or prophet, but not of philosopher. The wonder that some of our modern discoveries would excite in the savage inhabitants of

Europe in the times of Theseus and Achilles, proves but little. Persons almost entirely unacquainted with the powers of a machine cannot be expected to guess at its effects. I am far from saying, that we are at present by any means fully acquainted with the powers of the human mind; but we certainly know more of this instrument than was known four thousand years ago; and therefore, though not to be called competent judges, we are certainly much better able than savages to say what is, or is not, within its grasp. A watch would strike a savage with as much surprise as a perpetual motion; yet one is to us a most familiar piece of mechanism, and the other has constantly eluded the efforts of the most acute intellects. In many instances, we are now able to perceive the causes, which prevent an unlimited improvement in those inventions, which seemed to promise fairly for it at first. The original improvers of telescopes would probably think, that as long as the size of the specula and the length of the tubes could be increased, the powers and advantages of the instrument would increase; but experience has since taught us, that the smallness of the field, the deficiency of light, and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atmosphere being magnified, prevent the beneficial results that were to be expected from telescopes of extraordinary size and power. In many parts of knowledge, man has been almost constantly making some progress; in other parts, his efforts have been invariably baffled. The savage would not probably be able to guess at the causes of this mighty difference. Our further experience has given us some little insight into these causes, and has therefore enabled us better to judge, if not of what we are to expect in future, at least of what we are not to expect, which, though negative, is a very useful piece of information.

有人可能会说，世上的很多发现都是人们完全不曾预见或始料不

及的。我承认这句话是正确的。但如果一个人不依照过去的事实做类比推理或者寻找迹象，就准确预测了这些发现，那么他就不配称作哲学家，而应当叫做先知或预言家。现代的很多发现足以令提修斯和阿基里斯时代的欧洲原始居民感到惊叹，但这几乎证明不了什么。人若对一台机器的动力几乎全然不知，便无法预测其效能。我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了解了人类的精神力量，但无可否认，我们对此工具的了解一定多于四千年前的人们。因此，即便不能叫做称职的评判者，但比起未开化的人，我们当然更有资格说哪些是精神力量所能达到的，而哪些是精神力量无法企及的。一块表会像一台永动机那样让未开化的人感到惊奇，然而表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件再熟悉不过的机械装置，而永动机却是连盖世奇才也无法制造出来的东西。起初看似完全可以无限完善的发明，实质上却并非如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现在是能够认识其中的原因的。最早改进望远镜的人也许会想，只要增大镜片、加长镜管，该仪器的放大能力会增强、优点就会增多。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视野狭小、光线不足以及空气环境被放大，都会使我们无法如愿获得和超大镜片、高放大率的望远镜一样的良好效果。在许多知识领域，人类可以持续不断地取得一定的进步，而在其他一些领域，人的努力始终在遭遇挫折。这种巨大差异的成因想必未开化之人是猜不出来的。拥有较多的经验使我们对这些成因有了零星的了解，从而至少使我们能够较好地判断未来什么是不能预期的，尽管我们不能较好地判断未来什么是能够预期的——这虽然有些消极，却是十分有用的信息。

As the necessity of sleep seems rather to depend upon the body than the mind, it does not appear how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ind can tend very greatly to supersede this 'conspicuous infirmity'. A man who by great excitements on his mind is able to pass two or three nights without sleep, proportionably exhausts the vigour of his body, and this diminution of health and strength will soon disturb the operations of his understanding, so that by these great efforts he appears to have made no real progress whatever in

superseding the necessity of this species of rest.

睡眠的必要性并不取决于精神，而是取决于肉体，所以改善精神大概也不会真正消除这种“明显的弱点”。一个精神受到巨大刺激的人可以两三夜无眠，他的精力也会有相应的消耗，这种健康和体力的衰退很快便会妨碍他的理解力的发挥，所以他虽然付出了巨大努力，却并没有在消除人类睡眠的必要性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There is certainly a sufficiently marked difference in the various characters of which we have some knowledge, relative to the energies of their minds, their benevolent pursuits, etc., to enable us to judge whether the operations of intellect have any decided effect in prolonging the duration of human life. It is certain that no decided effect of this kind has yet been observed. Though no attention of any kind has ever produced such an effect as could be construed into the smallest semblance of an approach towards immortality; yet of the two, a certain attention to the body seems to have more effect in this respect than an attention to the mind. The man who takes his temperate meals and his bodily exercise, with scrupulous regularity, will generally be found more healthy than the man who, very deeply engaged in intellectual pursuits, often forgets for a time these bodily cravings. The citizen who has retired, and whose ideas, perhaps, scarcely soar above or extend beyond his little garden, puddling all the morning about his borders of box, will, perhaps, live as long as the philosopher whose range of intellect is the most extensive, and whose views are the clearest of any of his contemporaries. It has been positively observed by those who have attended to the bills of mortality that women live longer upon an average than men; and, though I would not by any means say that their intellectual faculties are inferior, yet, I think, it must

be allowed that, from their different education, there are not so many women as men, who are excited to vigorous mental exertion.

在精神能力和仁爱追求等等方面，我们所知的形形色色的人无疑具有显著差别，这使我们能够判断智力活动对人类寿命的延长是否会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无疑，人们目前还尚未发现这种明显的影响。不管是注重肉体还是注重精神，其产生的效力都还不能用于推断使人类获得永生的最小相似性办法，但是在这方面，在这两者之间，重身体可能会比重精神的作用更大一些。一个生活规律、饮食有度并适量运动的人，一般来说要比埋头从事脑力工作、常常忘却身体的这类迫切需要的人活得更健康。一种思虑不超出田园范围、生活紧守田园的隐居平民，其寿命大概和智力活动范围最广、头脑比同时代人都清醒的哲学家相当。那些留意死亡表的人都会注意到，女性的平均寿命要高于男性。虽然我不能说女性的智力不如男性，但是我想，有一点应当予以承认，那就是由于所受教育不同，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女性确实不像男性那样多。

As in these and similar instances, or to take a larger range, as in the great diversity of characters that have existed during some thousand years, no decided difference has been observed in the duration of human life from the operation of intellect, the mortality of man on earth seems to be as completely established, and exactly upon the same grounds, as any one, the most constant, of the laws of nature. An immediate act of power in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might, indeed, change one or all of these laws, either suddenly or gradually; but without some indications of such a change, and such indications do not exist, it is just as unphilosophical to suppose that the life of man may be prolonged beyond any assignable limits, as to suppose that the attraction of the earth will gradually be changed into repulsion and that stones will ultimately rise instead of fall, or

that the earth will fly off at a certain period to some more genial and warmer sun.

从上述例子或与之相似的例子来看，或者取一个更大的范围，从几千年间世上生存过的各种各样的人来看，我们还不曾发现智力活动造成了人类寿命的显著差异。世人必有一死，似乎是既定的法则，它所依据的理由也同任何一个恒久不变的自然法则完全一致。宇宙创造者直接使用力量，可能真的会突然间或者逐渐改变其中的一个法则或者全部法则。但是，如果没有发生这种变化的迹象，或者根本不存在这种迹象，那么假设人类寿命可以无限延长，就如同假设地球的引力会逐渐变成排斥力，石头最终会上升而非下落，或者地球会在某一时刻脱离轨道飞向更暖更热的太阳一样，那肯定是毫无哲学根据的。

The conclusion of this chapter presents us, undoubtedly, with a very beautiful and desirable picture, but like some of the landscapes drawn from fancy and not imagined with truth, it fails of that interest in the heart which nature and probability can alone give.

毋庸置疑，本章的结论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令人心动的美丽画卷，然而它就像是凭幻想描画的景观，不是根据真实情况想象出来，因而也就无法引起只有自然及或然性才能赋予人的兴趣。

I cannot quit this subject without taking notice of these conjectures of Mr. Godwin and Mr. Condorcet concerning the indefinite prolongation of human life, as a very curious instance of the longing of the soul after immortality. Both these gentlemen have rejected the light of revelation which absolutely promises eternal life in another state. They have also rejected the light of

natural religion, which to the ablest intellects in all ages has indicated the future existence of the soul. Yet so congenial is the idea of immortality to the mind of man that they cannot consent entirely to throw it out of their systems. After all their fastidious scepticisms concerning the only probable mode of immortality, they introduce a species of immortality of their own, not only completely contradictory to every law of philosophical probability, but in itself in the highest degree, narrow, partial, and unjust. They suppose that all the great, virtuous, and exalted minds that have ever existed or that may exist for some thousands, perhaps millions of years, will be sunk in annihilation; and that only a few beings, not greater in number than can exist at once upon the earth, will be ultimately crowned with immortality. Had such a tenet been advanced as a tenet of revelation I am very sure that all the enemies of religion, and probably Mr. Godwin and Mr. Condorcet among the rest, would have exhausted the whole force of their ridicule upon it, as the most puerile, the most absurd, the poorest, the most pitiful, the most iniquitously unjust, and, consequently, the most unworthy of the Deity that the superstitious folly of man could invent.

葛德文及孔多塞先生有关人类寿命无限延长的猜想是灵魂渴求永生的一个新奇例子，因此我无法不对此加以评述。这两位先生都拒绝承认绝对允许人类在另一境界获得永生的天启神示。而自然宗教已向古往今来最有才智的人明示过灵魂在未来是存在的，对此他们也拒不接受。然而永生的思想又与人的精神如此契合，以至于他们也不能同意将其完全排斥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之外。他们对永生唯一可能的方式吹毛求疵、深表怀疑，因而提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另一种永生。这不仅与哲学或然性法则完全相悖，就其自身而言，也是极度狭隘、片面、有失公允的。他们假设：曾经存在或可能存在于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间的一切伟大、正直而崇高的人，都将沉入寂灭。只有少数人——其数目不会超过地球上同时存在的人数，会最终获得永生。如果

这种信条是作为天启的教义提出来的，我敢断定，宗教的一切敌人，或许包括葛德文与孔多塞先生在内，都将对之竭力嘲讽，认为这是迷信愚笨之人所杜撰的最幼稚、最荒唐、最拙劣、最可怜、最有失公正因而也是最不配上帝之名的一种教义。

What a strange and curious proof do these conjectures exhibit of the inconsistency of scepticism! For it should be observed, that there is a very striking difference between believing an assertion which absolutely contradicts the most uniform experience, and an assertion which contradicts nothing, but is merely beyond the power of our present observation and knowledge. So diversified are the natural objects around us, so many instances of mighty power daily offer themselves to our view, that we may fairly presume, that there are many forms and operations of nature which we have not yet observed, or which, perhaps, we are not capable of observing with our present confined inlets of knowledge. The resurrection of a spiritual body from a natural body does not appear in itself a more wonderful instance of power, than the germination of a blade of wheat from the grain, or of an oak from an acorn. Could we conceive an intelligent being, so placed as to be conversant only with inanimate or full grown objects, and never to have witnessed the process of vegetation and growth; and were another being to shew him two little pieces of matter, a grain of wheat, and an acorn, to desire him to examine them, to analyse them if he pleased, and endeavour to find out their properties and essences; and then to tell him, that however trifling these little bits of matter might appear to him, that they possessed such curious powers of selection, combination, arrangement, and almost of creation, that upon being put into the ground, they would choose, amongst all the dirt and moisture that surrounded them, those parts which best suited their purpose, that they would collect and arrange these parts

with wonderful taste, judgement, and execution, and would rise up into beautiful forms, scarcely in any respect analogous to the little bits of matter which were first placed in the earth. I feel very little doubt that the imaginary being which I have supposed would hesitate more, would require better authority, and stronger proofs, before he believed these strange assertions, than if he had been told, that a being of mighty power, who had been the cause of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and of that existence of which he himself was conscious, would, by a great act of power upon the death and corruption of human creatures, raise up the essence of thought in an incorporeal, or at least invisible form, to give it a happier existence in another state.

这些猜想为怀疑主义的矛盾出示了何等奇妙的证据！因为，我们应当看到，在相信一种完全与一贯经验相悖的断言与相信一种不与任何事物矛盾而仅仅是超出我们目前的观察与理解范围的说法之间，存在非常显著而根本的区别。我们的周围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自然物，每天呈现于眼前的巨大力量也非常多。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大自然中的许多形态及运转我们还尚未看到，或者说凭借我们目前有限的知识还无法看到。精神之躯脱离自然之躯而复活，就其本质而言似乎并非是显示力量，一点不比谷粒萌生出麦芽、橡实长成橡木来得更奇妙。我们能否想象一位智者处于这样的环境，让他只熟悉无生物或完全成熟的植物，而从未亲眼看见植物的生长及成熟过程；再设想另有一人向其展示两件东西，一颗麦粒和一粒橡实，请他观察它们，如若愿意还可对其进行分析，并努力弄清楚它们的特性及本质。然后告诉他，这两个颗粒物也许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却具有奇特的选择力、结合力、排列力和创造力，如果把它们放人土地，它们就会在其周围的泥土和湿气中选择对自己最适用的部分，以奇特的爱好、判断和行为，把这些部分收集和排列起来，成长为美丽的形状，几乎完全不像当初放入土地的那两个颗粒。我认为几乎毫无疑问，我所设想的这个虚构的人定会犹豫不决，并会要求我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和更有力

的证明，他才会相信这些不可思议的说法。这要比听到一个力量非凡的神创造了其周围所能看见、所能感知的一切，又拥有对人类的生杀大权，以无形或至少肉眼无法看见的形式让思想的本体起死回生，使之在另一境界更加幸福地生活还要匪夷所思。

The only difference, with regard to our own apprehensions, that is not in favour of the latter assertion is that the first miracle we have repeatedly seen, and the last miracle we have not seen. I admit the full weight of this prodigious difference; but surely no man can hesitate a moment in saying that, putting Revelation out of the question, the resurrection of a spiritual body from a natural body, which may be merely one among the many operations of nature which we cannot see, is an event indefinitely more probable than the immortality of man on earth, which is not only an event of which no symptoms or indications have yet appeared, but is a positive contradiction to one of the most constant of the laws of nature that has ever come within the observation of man.

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对后一种断言的唯一不利在于第一种奇迹是我们常见的，而后一种奇迹却从未见过。我承认这种巨大差异的重要性，但想必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若抛开天启神示，精神之躯脱离肉体之躯而复活，可能也仅仅是肉眼无法看见的大自然的一种活动，这要比地球上的人类永生不死更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地球上人类永生不死的说法不仅毫无征兆、毫无迹象，而且也同人类所察的恒久不变的一大自然法则完全悖逆。

When we extend our view beyond this life, it is evident that we can have no other guides than authority, or conjecture, and perhaps, indeed, an obscure and undefined feeling. What I say here,

therefore, does not appear to me in any respect to contradict what I said before, when I observed that it was unphilosophical to expect any specifick event that was not indicated by some kind of analogy in the past. In ranging beyond the bourne from which no traveller returns, we must necessarily quit this rule; but with regard to events that may be expected to happen on earth, we can seldom quit it consistently with true philosophy. Analogy has, however, as I conceive, great latitude. For instance, man has discovered many of the laws of nature: analogy seems to indicate that he will discover many more; but no analogy seems to indicate that he will discover a sixth sense, or a new species of power in the human mind, entirely beyond the train of our present observations.

若我们将眼界延伸到此生之外，显然除了权威、猜测或难以言表的模糊感觉，我们不会有其他任何指引。我说过，如果预见未来具体发生的事件，而这事件却是过去的某种类比未予明示的，则这种预见必然缺乏哲学依据。在我看来，无论从哪方面讲，我此处所言与我先前所言并不相矛盾。人生是有去无回的单程线，对于终点站之外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放弃这条规则，而对于今世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往往不会将其同真正的哲理一同摒弃。不管怎样，我想类比推理要有很高的自由度。例如，人已经发现了很多自然法则：类比推理似乎暗示着人们会发现更多自然法则，而没有类推似乎又表明了人们会发现第六感或拥有巨大能力的新型人种，这已完全超出我们目前的观察范围。

The powers of selection, combination, and transmutation, which every seed shews, are truly miraculous. Who can imagine that these wonderful faculties are contained in these little bits of matter? To me it appears much more philosophical to suppose that the mighty God of nature is present in full energy in all these

operations. To this all powerful being, it would be equally easy to raise an oak without an acorn as with one. The preparatory process of putting seeds into the ground is merely ordained for the use of man, as one among the various other excitements necessary to awaken matter into mind. It is an idea that will be found consistent, equally with the natural phenomena around us, with the various events of human life, and with the successive revelations of God to man, to suppose that the world is a mighty process for the creation and formation of mind. Many vessels will necessarily come out of this great furnace in wrong shapes. These will be broken and thrown aside as useless; while those vessels whose forms are full of truth, grace, and loveliness, will be wafted into happier situations, nearer the presence of the mighty maker.

每一粒种子所展示的选择力、结合力及衍变力都是真正的奇迹。谁能想到这些小小的物质颗粒里面竟会蕴含着如此奇妙的能力？在我看来，更有哲学依据的假设是，所有这些运作都体现着伟大造物主的伟力。对万能之神而言，不用橡实长成橡树和用一粒橡实长成橡树一样容易。把种子埋入土地这个准备过程，仅仅是为人类所设，就像各种刺激当中有一种刺激是唤醒物质并将其转变为精神所必需的一样。世界是一个精神创造和形成的伟大过程，将来会证明这一认识同我们周遭的自然现象是一致的，同人类生命的各种事件是一致的，同上帝向人发出的接连不断的启示也是一致的。从这个巨大的熔炉里定会生产出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容器。这些器物会被当作无用之物打碎后弃置一边，而那些外形富有真理、雅致精美的容器会被送到幸福的境地，和伟大的造物主离得更近。

I ought perhaps again to make an apology to my readers for dwelling so long upon a conjecture which many, I know, will think too absurd and improbable to require the least discussion. But if it

be as improbable and as contrary to the genuine spirit of philosophy as I own I think it is, why should it not be shewn to be so in a candid examination? A conjecture, however improbable on the first view of it, advanced by able and ingenious men, seems at least to deserve investigation. For my own part I feel no disinclination whatever to give that degree of credit to the opinion of the probable immortality of man on earth, which the appearances that can be brought in support of it deserve. Before we decide upon the utter improbability of such an event, it is but fair impartially to examine these appearances; and from such an examination I think we may conclude, that we have rather less reason for supposing that the life of man may be indefinitely prolonged, than that trees may be made to grow indefinitely high, or potatoes indefinitely large. Though Mr. Godwin advances the idea of the indefinite prolongation of human life merely as a conjecture, yet as he has produced some appearances, which in his conception favour the supposition, he must certainly intend that these appearances should be examined; and this is all that I have meant to do.

也许我应该再次向读者道歉：这么一个猜想我讲了这么长时间，我知道许多人认为它荒唐之至、不着边际，完全不必讨论。但是，假如它确无实现的可能，并且还与真正的哲学精神相抵触（我承认我是这样想的），那为什么不采取坦率的分析来证实这一点呢？一种猜想，不论乍一看多么不可能变成现实，如果是才俊智者提出的，至少应该探究一下。就我而言，我并非不愿对人类在世或然永生这一观点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只要有迹象证实这种观点，我会表示赞同。在判定这种事情绝对可能发生之前，我们还是要公正研究这些现象，经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假设树木可以长到无限高、马铃薯可以长到无限大是不合乎情理的，而假设人类生命可以无限延长则更无道理可言。葛德文先生提出人类生命无限延长的想法，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猜想，但他本人也提出了某些他自认为

对该设想有利的现象。毋庸置疑，他当然希望这些现象都能得到分析研究，而这一切也正是我打算做的。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Error of Mr. Godwin in considering man too much in the light of a being merely rational.—In the compound being, man, the passions will always act as disturbing forces in the decisions of the understanding.—Reasonings of Mr. Godwin on the subject of coercion.—Some truths of a nature not to be communicated from one man to another.

葛德文先生特别偏爱把人看作是仅有理性的动物，这是错误的——人是一种复合动物，情欲总是干扰着思维决断——葛德文先生对强制问题的思考——某种性质的真理无法在人与人之间传达。

In the chapter which I have been examining, Mr. Godwin professes to consider the objection to his system of equality from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It has appeared, I think clearly, that he is greatly erroneous in his statement of the distance of this difficulty, and that instead of myriads of centuries, it is really not thirty years, or even thirty days, distant from us. The supposition of the approach of man to immortality on earth is certainly not of a kind to soften the difficulty. The only argument, therefore, in the chapter which has any tendency to remove the objection is the conjecture concerning the extinction of the passion between the sexes; but as this is a mere conjecture, unsupported by the smallest shadow of proof, the force of the objection may be fairly said to remain unimpaired, and it is undoubtedly of sufficient weight of itself completely to overturn Mr. Godwin's whole system of equality.

I will, however, make one or two observations on a few of the prominent parts of Mr. Godwin's reasonings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place in a still clearer point of view the little hope that we can reasonably entertain of those vast improvements in the nature of man and of society which he holds up to our admiring gaze in his political justice.

在我刚刚一直在探讨的那一章中，葛德文先生声称，他是从人口论的角度来思考那些反对他的平等制度的意见的。他认为人口增长起阻碍作用还早着呢，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这种观点大错特错；用不着等无数年之后，实际上30年甚至是30天之后，这种阻碍作用就会显现出来。人生在世趋于永生的假设当然也丝毫不会缓和这种阻碍作用。因此，在那一章里，有可能消除这种阻碍作用的唯一论据就是关于两性情欲消失的猜想。但猜想也只是一种猜想，毫无证据支持，故此完全可以说这种阻碍依然未被削弱。它自身依然有足够的力量，因而绝对能彻底推翻葛德文先生描绘的平等制度。不过，我还是要就葛德文先生的某些著名推论谈一两点看法，借以更清楚地说明他在《政治正义论》中展示的人类和社会本质获取巨大进步的前景，虽然令人赞叹，却几乎全是痴人说梦。

Mr. Godwin considers man too much in the light of a being merely intellectual. This error, at least such I conceive it to be, pervades his whole work and mixes itself with all his reasonings. The voluntary actions of men may originate in their opinions, but these opinions will be very differently modified in creatures compounded of a rational faculty and corporal propensities from what they would be in beings wholly intellectual. Mr. Godwin, in proving that sound reasoning and truth are capable of being adequately communicated, examines the proposition first practically, and then adds, “Such is the appearance which this

proposition assumes, when examined in a loose and practical view. In strict consideration it will not admit of debate. Man is a rational being, etc.” (Bk. I, ch. 5; in the third edition Vol. I, p. 88). So far from calling this a strict consideration of the subject, I own I should call it the loosest, and most erroneous, way possible, of considering it. It is the calculating the velocity of a falling body in vacuo, and persisting in it, that it would be the same through whatever resisting mediums it might fall. This was not Newton's mode of philosophizing. Very few general propositions are just in application to a particular subject. The moon is not kept in her orbit round the earth, nor the earth in her orbit round the sun, by a force that varies merely in the inverse ratio of the squares of the distances. To make the general theory just in application to the revolutions of these bodies, it was necessary to calculate accurately the disturbing force of the sun upon the moon, and of the moon upon the earth; and till these disturbing forces were properly estimated, actual observations on the motions of these bodies would have proved that the theory was not accurately true.

葛德文先生特别爱把人视为一种只具理性的动物。这种谬误（至少我是这样认为）遍及他的整部著作，并且和他的全部推理混合在一起。人的自觉行动可能源于意念，但是这种意念常常受影响，这种影响在既有理性又有肉体的动物那里和在只具有理性的动物那里，差异很大。在证实正确的推理和真理能够得到充分的传播时，葛德文先生首先从实用角度分析了这一命题，而后补充道：“这是从一种不够严谨、注重实际的角度来考察时，该命题呈现的面貌。经过详细斟酌，该命题也不容争辩。人是一种理性动物。”（《政治正义论》第三版，第一卷，第五章，88页）我当然不把这称为严密的分析，我倒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最不严谨、错漏百出的考察方法。这就像计算出物体在真空中的下落速度，而后硬说物体的下落速度不管在什么阻力下都与此相同。这不是牛顿的推理方式。一般性命题很少会恰如其分地应

用于个别问题。无论是月球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都不是由某种力量来维持的，这种力的变化仅仅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要使有关天体运行的一般性理论能恰当地应用于这些天体的运行，就必须精确地计算出太阳对月球、月球对地球的干扰力量。尚未正确推算出这些干扰力量之前，对这些天体运动的实际观察会证明，这种一般性理论并不十分正确。

I am willing to allow that every voluntary act is preceded by a decision of the mind; but it is strangely opposite to what I should conceive to be the just theory upon the subject, and a palpable contradiction to all experience, to say that the corporal propensities of man do not act very powerfully, as disturbing forces, in these decisions. The question, therefore, does not merely depend upon whether a man may be made to understand a distinct proposition or be convinced by an unanswerable argument. A truth may be brought home to his conviction as a rational being, though he may determine to act contrary to it, as a compound being. The cravings of hunger, the love of liquor, the desire of possessing a beautiful woman, will urge men to actions, of the fatal consequences of which, to the general interests of society, they are perfectly well convinced, even at the very time they commit them. Remove their bodily cravings, and they would not hesitate a moment in determining against such actions. Ask them their opinion of the same conduct in another person, and they would immediately reprobate it. But in their own case, and under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situation with these bodily cravings, the decision of the compound be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viction of the rational being.

我愿承认，每一种自觉的行为都必然发生于理智的决定之后。倘

若认为人的肉体倾向不会作为一种干扰力量严重影响思维的决定，这便与我所设想的该问题的正确理论背道而驰，也明显与一切经验相悖逆了。因此，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到底是让人理解一种全然不同的命题，还是让人相信一个无可辩驳的论点。人作为理性动物会明白真理、相信真理，但作为复合动物，人又会决心逆真理而动。贪欲、嗜酒、占有美女的欲望会促使男人行动，尽管他们在采取行动时明明知道这样做会给整个社会的利益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如果消除了肉体欲求，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反对这类行为。如果问及如何看待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们会立即予以谴责。但是轮到他们自己，不论是何种情况下，只要怀有这类肉体的欲求，复合动物的抉择同理性动物的信念总有差距。

If this be the just view of the subject, and both theory and experience unite to prove that it is, almost all Mr. Godwin's reasonings on the subject of coercion in his seventh chapter, will appear to be founded on error. He spends some time in placing in a ridiculous point of view the attempt to convince a man's understanding and to clear up a doubtful proposition in his mind, by blows. Undoubtedly it is both ridiculous and barbarous, and so is cock-fighting, but one has little more to do with the real object of human punishments than the other. One frequent (indeed much too frequent) mode of punishment is death. Mr. Godwin will hardly think this intended for conviction, at least it does not appear how the individual or the society could reap much future benefit from an understanding enlightened in this manner.

如果关于这个问题，该观点是正确的，而且理论与经验都证明它是正确的，那么，葛德文先生在其著作的第七章有关强制问题的所有论断，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葛德文先生花了一些时间嘲笑有人想用打几拳的办法来让人相信理智或阐明他怀揣的可疑命题。毫无

疑问，殴打既可笑又野蛮，斗鸡也是这样，不过前者要比后者同人类惩罚的真正目的关系更大。一种常见的（实际上已司空见惯）惩罚方式是死刑。恐怕葛德文先生不会认为判处死刑是为了让人相信真理，至少利用这种方式开启人的智慧，似乎不会对个人或社会带来多少益处。

The principal objects which human punishments have in view are undoubtedly restraint and example: restraint, or removal, of an individual member whose vicious habits are likely to be prejudicial to the society; and example, which by expressing the sense of the community with regard to a particular crime, and by associating more nearly and visibly crime and punishment, holds out a moral motive to dissuade others from the commission of it.

无疑，人类惩罚的主要目的在于约束和警示。前者就是约束或消除个体身上可能损害社会利益的恶习；警示就是通过表达社会对某种罪行的看法，通过将罪行与惩罚更紧密、更直观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一种道德动机，劝诫他人不要犯罪。

Restraint, Mr. Godwin thinks, may be permitted as a temporary expedient, though he reprobates solitary imprisonment, which has certainly been the most successful, and, indeed, almost the only attempt towards the moral amelioration of offenders. He talks of the selfish passions that are fostered by solitude and of the virtues generated in society. But surely these virtues are not generated in the society of a prison. Were the offender confined to the society of able and virtuous men he would probably be more improved than in solitude. But is this practicable? Mr. Godwin's ingenuity is more frequently employed in finding out evils than in suggesting practical

remedies.

葛德文先生认为，监禁尚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但他反对单独监禁，尽管这实际上是提高犯人道德水平的最有效的也是唯一的办法。他大谈孤独会助长私欲，而生活在社会中则会培育美德。但可以肯定地说，在犹如监狱的社会中是不会培育出美德的。倘若让罪犯混迹于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所在的社会环境，他很可能会比离群索居改造得快。但是这种做法可行吗？葛德文先生似乎更爱用他的聪明才智挑毛病，而不是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方法。

Punishment, for example, is totally reprobated. By endeavouring to make examples too impressive and terrible, nations have, indeed, been led into the most barbarous cruelties, but the abuse of any practice is not a good argument against its use. The indefatigable pains taken in this country to find out a murder, and the certainty of its punishment, has powerfully contributed to generate that sentiment which is frequent in the mouths of the common people, that a murder will sooner or later come to light; and the habitual horror in which murder is in consequence held will make a man, in the agony of passion, throw down his knife for fear he should be tempted to use it in the gratification of his revenge. In Italy, where murderers, by flying to a sanctuary, are allowed more frequently to escape, the crime has never been held in the same detestation and has consequently been more frequent. No man, who is at all aware of the operation of moral motives, can doubt for a moment, that if every murder in Italy had been invariably punished, the use of the stiletto in transports of passion would have been comparatively but little known.

譬如，他对惩罚一律加以谴责。当然，为了以儆效尤，有些国家确实采用了极其残暴而严酷的刑罚，但一种方法被滥用并不是反对其使用的充分理由。在我国，一旦发生杀人案，警方一定会不屈不挠地去侦破，将行凶者绳之以法。这能让民众清楚地感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凶杀案迟早会水落石出。杀人必须承担的后果令人不寒而栗，迫使人在激愤的苦痛中放下屠刀，以免为了复仇而禁不住挥刀杀人。在意大利，杀人凶手若是飞往了避难所，常常可以免于刑罚，因而人们并不那么害怕犯杀人罪，也就经常发生命案。不管是谁，只要对道德动机的作用稍有了解就不会怀疑，如果在意大利杀人犯一律受到惩罚，则人们在愤怒冲动时就不会轻易使用短剑。

That human laws either do, or can, proportion the punishment accurately to the offence, no person will have the folly to assert. From the inscrutability of motives the thing is absolutely impossible; but this imperfection, though it may be called a species of injustice, is no valid argument against human laws. It is the lot of man, that he will frequently have to choose between two evils; and it is a sufficient reason for the adoption of any institution, that it is the best mode that suggests itself of preventing greater evils. A continual endeavour should undoubtedly prevail to make these institutions as perfect as the nature of them will admit. But nothing is so easy as to find fault with human institutions; nothing so difficult as to suggest adequate practical improvements. It is to be lamented, that more men of talents employ their time in the former occupation than in the latter.

谁都不会愚蠢到这样的地步，认为人类的法律确实可以而且有能力做到十分精确地量罪判刑。由于人类的动机莫测高深，因而要做到精确地量罪判刑是绝对不可能的，但这种缺陷，尽管可以称为一种不公正，却不是反对人类法律的正当理由。人类经常要在两种罪恶之间

作出抉择，这是人类所无法逃脱的命运。一种制度只要是防止深重罪恶的最佳办法，就可以成为采用这种制度的充足理由。毫无疑问，人的不断的努力定会使这种制度臻于完美。但世事之易莫过于对人类制度吹毛求疵，而世事之难也难不过为之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可悲的是，大多数的英才都将时间用于前者，而非后者。

The frequency of crime among men, who, as the common saying is, know better, sufficiently proves, that some truths may be brought home to the conviction of the mind without always producing the proper effect upon the conduct. There are other truths of a nature that perhaps never can be adequately communicated from one man to another. The superiority of the pleasures of intellect to those of sense, Mr. Godwin considers as a fundamental truth. Taking all circumstances into consideration, I should be disposed to agree with him; but how am I to communicate this truth to a person who has scarcely ever felt intellectual pleasure? I may as well attempt to explain the nature and beauty of colours to a blind man. If I am ever so laborious, patient, and clear, and have the most repeated opportunities of expostulation, any real progress toward the accomplishment of my purpose seems absolutely hopeless. There is no common measure between us. I cannot proceed step by step:it is a truth of a nature absolutely incapable of demonstration. All that I can say is, that the wisest and best men in all ages had agreed in giving the preference, very greatly, to the pleasures of intellect; and that my own experience completely confirmed the truth of their decisions; that I had found sensual pleasures vain, transient, and continually attended with tedium and disgust; but that intellectual pleasures appeared to me ever fresh and young, filled up all my hours satisfactorily, gave a new zest to life, and diffused a lasting serenity over my mind. If he believe me, it can only be from respect and

veneration for my authority:it is credulity, and not conviction. I have not said anything, nor can anything be said, of a nature to produce real conviction. The affair is not an affair of reasoning, but of experience. He would probably observe in reply, what you say may be very true with regard to yourself and many other good men, but for my own part I feel very differently upon the subject. I have very frequently taken up a book and almost as frequently gone to sleep over it; but when I pass an evening with a gay party, or a pretty woman, I feel alive, and in spirits, and truly enjoy my existence.

即便是俗语中称道的明事理之人也难免常常犯罪，这足以证明，有些真理可能让人信服，但却未必会对人的行为产生真正影响。还有其他一些真理，因其本质所限，或许永远都无法确切地在人与人之间传达。葛德文先生认为理智快乐优于感官愉悦即为一条基本真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话，我愿意认可他的观点，但我如何把这个真理传达给一个几乎从未体验过理智快乐的人呢？这就像跟瞎子解说颜色种类和颜色多美丽一样。即使我不辞劳苦、不厌其烦、毫不含糊、反反复复地对其进行劝导，想要达到我的目的似乎也全然无望。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公测度，我也无法做到循序渐进，因为这是一种本质上无以为证的真理。我所能说的是，古往今来的大仁大智者都无一例外地把理智的快乐放在非常崇高的位置，我个人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发觉声色口腹之乐空虚无益，转瞬即逝，常令人感到乏味和生厌；而理智的快乐却清新而富有朝气，让我无时不感到满足，给我的生命注入新的活力，使我的心灵长久洋溢着安宁。如果他信我之言，也只是出于尊敬以及对我所援引的权威人物的尊崇。这是轻信，并非信服。我的所言无法使他真正信服，而我也再无他言可出。这并非推理问题，而是个人经历使然。他可能会回答道，对于你本人及诸多贤良之人而言，也许你所言极是，但就我而言，我对该问题的感知却极为不同。我晚上拿起书来读，常常是读着读着就睡着了；如果是参加快乐的舞会，或者陪漂亮女人玩，我却精神焕发、兴

致勃勃，感到真正享受了人生。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reasoning and arguments are not instruments from which success can be expected. At some future time perhaps, real satiety of sensual pleasures, or some accidental impressions that awakened the energies of his mind, might effect that, in a month, which the most patient and able expostulations might be incapable of effecting in forty years.

在此情况下，推理及论证是无用之举，不可能获得成功。或许未来的某个时刻，他会对肉体的愉悦开始厌腻，或某些偶然的想法唤醒了心智的活力，那么长达40年之久的不厌其烦、循循善诱的劝导可能都无法奏效的事情，也许会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实现了。

CHAPTER 14

第十四章

Mr. Godwin's five propositions respecting political truth, on which his whole work hinges, not established.—Reasons we have for supposing, from the distress occasioned by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that the vices and moral weakness of man can never be wholly eradicated.—Perfectibility, in the sense in which Mr. Godwin uses the term, not applicable to man.—Nature of the real perfectibility of man illustrated.

葛德文先生这整部书的基础，是关于政治真理的五个命题，而这五个命题却是不成立的——根据人口法则造成的苦难，我们有理由认为人间的罪恶和人类的道德弱点永远不会消除——葛德文先生所说的尽善尽美不适用于人类——说明人类达到的真正尽善尽美的本质。

If the reasonings of the preceding chapter are just, the corollaries respecting political truth, which Mr. Godwin draws from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voluntary actions of men originate in their opinions, will not appear to be clearly established. These corollaries are, “Sound reasoning and truth, when adequately communicated, must always be victorious over error: Sound reasoning and truth are capable of being so communicated: Truth is omnipotent: The vices and moral weakness of man are not invincible: Man is perfectible, or in other words, susceptible of perpetual improvement.”

如果上一章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葛德文先生根据人的自觉行动

源于信念这一命题所得出的有关政治真理的推论，好像并不成立。他的五个推论是："正确的推理和真理，如果得到了充分表达，必将战胜谬误；正确的推理和真理能够充分表达；真理是万能的；人类的罪恶和道德弱点并非不可战胜；人是可以达到完美的，也就是说，是可以不断完善的。"

The first three propositions may be considered a complete syllogism. If by adequately communicated, be meant such a conviction as to produce an adequate effect upon the conduct, the major may be allowed and the minor denied. The consequent, or the omnipotence of truth, of course falls to the ground. If by 'adequately communicated' be meant merely the conviction of the rational faculty, the major must be denied, the minor will be only true in cases capable of demonstration, and the consequent equally falls. The fourth proposition Mr. Godwin calls the preceding proposition, with a slight variation in the statement. If so, it must accompany the preceding proposition in its fall. But it may be worthwhile to inquire, with reference to the principal argument of this essay, into the particular reasons which we have for supposing that the vices and moral weakness of man can never be wholly overcome in this world.

前三个命题可以看做是一个完整的三段论。如果充分表达的这样一种信念能够对行为产生适度影响，那就是承认了大前提而否定了小前提。由此得出的"真理万能的结论，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如果所谓"充分表达"指的是仅仅相信人的理性能力，那么大前提就必然被否定，而小前提只有在能够被证明的情况下才符合真理，由此得出的结论同样不能成立。葛德文先生认为第四个命题就是前述命题，只是叙述方式略有变化而已。若是这样，它也必然跟着上一命题一起，不能成立。不过，结合本书的主要论点，还是值得探究一下的是，我们到

底持有哪些特殊理由认为人类的罪恶和道德缺陷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被根除。

Man, according to Mr. Godwin, is a creature formed what he is by the successive impressions which he has received, from the first moment that the germ from which he sprung was animated. Could he be placed in a situation, where he was subject to no evil impressions whatever, though it might be doubted whether in such a situation virtue could exist, vice would certainly be banished. The great bent of Mr. Godwin's work on political justice, if I understand it rightly, is to shew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vices and weaknesses of men proceed from the injustice of their politic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at if these were removed and the understandings of men more enlightened, there would be little or no temptation in the world to evil. As it has been clearly proved, however, (at least as I think) that this is entirely a false conception, and that, independent of any political or social institutions whatever, the greater part of mankind, from the fixed and unalterable laws of nature, must ever be subject to the evil temptations arising from want, besides other passions, it follows from Mr. Godwin's definition of man that such impressions, and combinations of impressions, cannot be afloat in the world without generating a variety of bad men. According to Mr. Godwin's own concep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it is surely as improbable tha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ll men will be virtuous as that sixes will come up a hundred times following upon the dice. The great variety of combinations upon the dice in a repeated succession of throws appears to me not inaptly to represent the great variety of character that must necessarily exist in the world, supposing every individual to be formed what he is by that combination of impressions which he has received since his first existence. And this

comparison will, in some measure, shew the absurdity of supposing, that exceptions will ever become general rules; that extraordinary and unusual combinations will be frequent; or that the individual instances of great virtue which have appeared in all ages of the world will ever prevail universally.

按照葛德文先生的说法，人这种生物成为现在这种样子，是从出生的生殖细胞被激活的那一时刻起接受的连续不断的印象造成的。假如人能被放在一种没有任何丑恶现象的环境里，虽然美德是否能在这种环境里存在也许有些可疑，但罪恶肯定会被根除。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葛德文先生的《政治正义论》的主旨是要证明人类的罪恶和弱点大都源于不公正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如果能废除这些制度，进一步开启人的理智，那么世上罪恶的诱惑会少之又少，甚至不复存在。然而前面已经证明——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念，不管是什么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多数人在固定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左右下，必然会受到邪恶的诱惑，这种诱惑不光源于情欲，还源于匮乏。根据葛德文先生对人的定义，此种印象以及印象的组合，只要在世界上传播，就必然会造就各种各样的坏人。按照葛德文先生关于品格形成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让所有的人品德高尚，就像是掷一百次骰子得到一百回六点一样几无可能。连续掷骰子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组合，在我看来，组合的多样恰好可以表现这个世界上必然存在的各种品格。因为按照葛德文先生的假设，每一个个体的人成为现在他现在的样子，就是从其存在伊始接受的各种不同的印象造成的。这个比喻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诸如例外会变成普遍规律、非常罕见的组合会经常出现、从古至今德行崇高之人会大批涌现这样的假设，是荒谬可笑的。

I am aware that Mr. Godwin might say that the comparison is in one respect inaccurate; that in the case of the dice, the preceding causes, or rather the chances respecting the preceding causes, were

always the same; and that, therefore, I could have no good reason for supposing that a greater number of sixes would come up in the next hundred times of throwing than in the preceding same number of throws. But, that man had in some sort a power of influencing those causes that formed character, and that every good and virtuous man that was produced, by the influence which he must necessarily have, rather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that another such virtuous character would be generated, whereas the coming up of sixes upon the dice once, would certainly not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their coming up a second time. I admit this objection to the accuracy of the comparison, but it is only partially valid. Repeated experience has assured us,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most virtuous character will rarely prevail against very strong temptations to evil. It will undoubtedly affect some, but it will fail with a much greater number. Had Mr. Godwin succeeded in his attempt to prove that these temptations to evil could by the exertions of man be removed, I would give up the comparison; or at least allow, that a man might be so far enlightened with regard to the mode of shaking his elbow, that he would be able to throw sixes every time. But as long as a great number of those impressions which form character, like the nice motions of the arm, remain absolutely independent of the will of man, though it would be the height of folly and presumption to attempt to calculate the relative proportions of virtue and vice at the future periods of the world; it may be safely asserted that the vices and moral weakness of mankind, taken in the mass, are invincible.

我知道葛德文先生可能会反驳说，这样打比方有一点是不准确的。就掷骰子来说，前因，更准确地说是前因出现的几率总是相同的，因而笔者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接下来一百次掷出的六点会多于前一百次。然而，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种能影响品格形成因素的力

量。每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借助他必然具有的这种影响力，会增加另一品德高尚者再次出现的几率，而第一回掷骰子出现六点的情况却不会增加再次出现六点的可能性。我承认，就这一点来说，我的比喻是不够准确，但是却不无道理。经验一再告诉我们，至高无上的品格的影响力也很难抵御强烈的罪恶诱惑。这种影响力无疑会影响一些人，但大多数人却不会受其影响。倘若葛德文先生能证明这些罪恶的诱惑可以通过人的努力来消除，我便会放弃这种比喻，或者至少承认人们掷骰子的技术可能大有长进，每次都能掷出六点。但只要形成品格的多数印象，和掷骰子时手臂摇动的姿势一样，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想要算出未来世界善与恶的相对比例便是荒谬至极、自以为是的。但即便如此，我们却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总体而论，人的罪恶和道德缺陷是无法克服的。

The fifth proposition is the general deduction from the four former and will consequently fall, as the foundations which support it have given way. In the sense in which Mr. Godwin understands the term 'perfectible', 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 cannot be asserted, unless the preceding propositions could have been clearly established. There is, however, one sense, which the term will bear, in which it is, perhaps, just. It may be said with truth that man is always susceptible of improvement; or that there never has been, or will be, a period of his history, in which he can be said to have reached his possible acme of perfection. Yet it does not by any means follow from this, that our efforts to improve man will always succeed; or even that he will ever make, in the greatest number of ages, any extraordinary strides towards perfection. The only inference that can be drawn is that the precise limit of his improvement cannot possibly be known. And I cannot help again reminding the reader of a distinction which, it appears to me, ought particularly to be attended to in the present question: I mean,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there is between an unlimited improvement and

an improvement the limit of which cannot be ascertained. The former is an improvement not applicable to man under the present laws of his nature. The latter, undoubtedly, is applicable.

第五个命题是前四个命题的一般性推论，既然其根基已经坍塌，它也就不攻自破了。按照葛德文先生对“可完善的”一词的理解，我们无法断言人类可以达到尽善尽美，除非能明白无误地证明前四个命题是正确的。不过这个词还有另一种意义，按此意义理解，说人类是可以完善的也许没错。事实上，人类总是需要不断完善，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那种所谓的尽善尽美。但决不能据此说，我们为完善人类所付出的努力总会成功，更不能说，人类在绝大多数时代都将向完善的境界大踏步迈进。我们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只能是：人类自身完善的精确限度是无法预知的。在此，我不得不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区别，我认为这是讨论当前问题时应特别予以注意的一点。我指的是，无限完善与无法确定其限度的完善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就人类目前的本性而言，前者的完善并不适用于人类，毫无疑问，适用于人类的是后者。

The real perfectibility of man may be illustrated, as I have mentioned before, by the perfectibility of a plant. The object of the enterprising florist is, as I conceive, to unite size, symmetry, and beauty of colour. It would surely be presumptuous in the most successful improver to affirm, that he possessed a carnation in which these qualities existed in the greatest possible state of perfection. However beautiful his flower may be, other care, other soil, or other suns, might produce one still more beautiful.

如前所述，人类真正的可完善性可以由植物的可完善性加以说明。我想，爱钻研的花匠的目标是将花的大小、比例及色彩之美融为

一体。想必即便是最成功的改良者也不敢妄自宣称他栽种的石竹花在这些方面已经达到完美无比的程度。无论他栽种的花现在有多美，只要加倍照料、改良土壤、变换光照，都可能开出更美艳的花朵。

Yet, although he may be aware of the absurdity of supposing that he has reached perfection, and though he may know by what means he attained that degree of beauty in the flower which he at present possesses, yet he cannot be sure that by pursuing similar means, rather increased in strength, he will obtain a more beautiful blossom. By endeavouring to improve one quality, he may impair the beauty of another. The richer mould which he would employ to increase the size of his plant would probably burst the calyx, and destroy at once its symmetry. In a similar manner, the forcing manure used to bring about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o give a greater freedom and energy to the human mind, has burst the calyx of humanity, the restraining bond of all society; and, however large the separate petals have grown, however strongly, or even beautifully, a few of them have been marked, the whole is at present a loose, deformed, disjointed mass, without union, symmetry, or harmony of colouring.

不过，尽管他可能知道宣称已经达到完美是荒谬的，尽管他可能知道用什么办法培育出那般娇美的花朵，但他却无法断定，采用同样的办法，投入更多的精力，就一定能培育出更美艳的花来。他在想法改良某一品性的时候，可能伤了另一品性。如果他用的土壤比较肥沃，花株会长得比较大，但这也许会破坏花萼，随即会破坏花株的匀称。与之相似，“高效肥料”催生了法国大革命，为人类精神赋予了更多的自由和能量，结果胀破了人类的“萼”，也就是整个社会的约束力。无论单片的花瓣长得多大、多鲜艳、多美丽、多耀眼，整株花朵当前呈现的可能是松散畸形、杂乱无章的一团，既不整齐匀称，又无

色彩和谐可言。

Were it of consequence to improve pinks and carnations, though we could have no hope of raising them as large as cabbages, we might undoubtedly expect, by successive efforts, to obtain more beautiful specimens than we at present possess. No person can deny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the happiness of the human species. Every the least advance in this respect is highly valuable. But an experiment with the human race is not like an experiment upon inanimate objects. The bursting of a flower may be a trifle. Another will soon succeed it. But the bursting of the bonds of society is such a separation of parts as cannot take place without giving the most acute pain to thousands: and a long time may elapse, and much misery may be endured, before the wound grows up again.

如果改良石竹花和康乃馨意义非凡，那么即便我们不指望将它养得大如甘蓝，但我们却绝对可以期待经过不懈努力获得比现在更漂亮的品种。我想谁也不会否认，增进人类的幸福意义非同小可。在这方面，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极为可贵。但拿人类来试验和拿无生命之物来试验是不一样的。一朵花破碎可能是小事，因为另一朵马上会取而代之。而社会约束力一旦被破坏，会使整个社会分崩离析，使成千上万的人遭受巨大痛苦，唯有经过很长时间的深重苦难之后，那伤口才能愈合。

As the five propositions which I have been examining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cornerstones of Mr. Godwin's fanciful structure, and, indeed, as expressing the aim and bent of his whole work, however excellent much of his detached reasoning may be, he must be considered as having failed in the great object of his

undertaking. Besides the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compound nature of man, which he has by no means sufficiently smoothed, the principal argument against 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 and society remains whole and unimpaired from anything that he has advanced. And as far as I can trust my own judgement, this argument appears to be conclusive, not only against 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 in the enlarged sense in which Mr. Godwin understands the term, but against any very marked and striking change for the better, in the form and structure of general society; by which I mean any great and decided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ower classes of mankind, the most numerous, and, consequently, in a general view of the subject,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human race. Were I to live a thousand years, and the laws of nature to remain the same, I should little fear, or rather little hope, a contradiction from experience in asserting that no possible sacrifices or exertions of the rich, in a country which had been long inhabited, could for any time place the lower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in a situation equal, with regard to circumstances,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common people about thirty years ago in the northern States of America.

以上考察的五个命题可看成是葛德文先生臆造的大厦之基石，当然也可视为他整本著作的主旨，不管他的客观论证做得有多出色，我们不得不说他的大目标已经落空。人类的复杂本质为葛德文先生制造了种种难题，对此他根本没有能力解决。反对人类及社会的可完善性的主要论点仍然完好无损，并未受到葛德文论证的丝毫削弱。照我个人的判断，这一观点似乎是结论性的；就葛德文先生所理解的这个词的广泛意义来说，他认为人不可完善的；就整个社会的状况与结构来说，他认为社会不可能向着好的方面发生明显而惊人的转变。所谓整个社会不可能向好的方面转变，我的意思是下层阶级，也就是人类中人数最多因而从总整体看也最为重要的那部分人的生活境况，不会有

很显著的改善。我断言，在任何一个古老的国家，无论富人做出多大的努力或牺牲，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都无法与三十年前美国北方各州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相比。倘若我能活上一千年，而自然规律保持不变，我一点也不害怕或者说也希望会出现与我上述论断相矛盾的情况。

The lower classes of people in Europe may, at some future period, be much better instructed than they are at present; they may be taught to employ the little spare time they have in many better ways than at the ale-house; they may live under better and more equal laws than they have ever hitherto done, perhaps, in any country; and I even conceive it possible, though not probable, that they may have more leisure; but it is not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that they can be awarded such a quantity of money or subsistence as will allow them all to marry early, in the full confidence that they shall be able to provide with ease for a numerous family.

在未来的某一时期，欧洲下层阶级也许会受到比现在好得多的教育，会学习更好地利用自己能支配的那点闲暇，而不是泡在酒馆里；他们或许会生活在比以往任何国度都更加完善而平等的法律制度下，我甚至觉得他们可能会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即便可能性很小）。但是，他们的钱财和生活资料根本不可能多到让所有人都能早早结婚成家，不可能多到让他们都信心满满、轻轻松松地养活一大家子人。

CHAPTER 15

第十五章

Models too perfect may sometimes rather impede than promote improvement.—Mr. Godwin's essay on 'Avarice and Profusion'.—Impossibility of dividing the necessary labour of a society amicably among all.—Invectives against labour may produce present evil, with little or no chance of producing future good.—An accession to the mass of agricultural labour must always be an advantage to the labourer.

模式过于完美，有时反倒阻碍改进，而不是促进改进——葛德文先生有关贪欲与浪费的论述——社会的必要劳动不可能适当地分配给每一个人承担——嘲笑劳动在当前会产生恶，将来也不会带来善——农业劳动总量的增加，对劳动者来说永远都是好事。

Mr. Godwin in the preface to his Enquirer, drops a few expressions which seem to hint at some change in his opinions since he wrote the Political Justice; and as this is a work now of some years standing, I should certainly think that I had been arguing against opinions which the author had himself seen reason to alter, but that in some of the essays of the Enquirer, Mr. Godwin's peculiar mode of thinking appears in as striking a light as ever.

在《探求者》一书的序言里，葛德文先生讲了一些话，似乎是在暗示，自从写就了《政治正义论》以后，他的观点有所改变。《政治正义论》是他多年以前的作品，所以我当然会想到，我是一直对他的

观点持异议，大概葛德文先生自己也看出那些观点有修改的必要了吧；不过我认为，葛德文先生的独特思维方式在《探求者》一书的某些篇章里同以往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It has been frequently observed that though we cannot hope to reach perfection in anything, yet that it must always be advantageous to us to place before our eyes the most perfect models. This observation has a plausible appearance, but is very far from being generally true. I even doubt its truth in one of the most obvious exemplifications that would occur. I doubt whether a very young painter would receive so much benefit, from an attempt to copy a highly finished and perfect picture, as from copying one where the outlines were more strongly marked and the manner of laying on the colours was more easily discoverable. But in cases where the perfection of the model is a perfection of a different and superior nature from that towards which we should naturally advance, we shall not always fail in making any progress towards it, but we shall in all probability impede the progress which we might have expected to make, had we not fixed our eyes upon so perfect a model. A highly intellectual being, exempt from the infirm calls of hunger or sleep, is undoubtedly a much more perfect existence than man; but were man to attempt to copy such a model, he would not only fail in making any advances towards it; but by unwisely straining to imitate what was inimitable, he would probably destroy the little intellect which he was endeavouring to improve.

常有人说，任何事情不可能指望尽善尽美，但在眼前树立起完美无缺的模式，总是有益无害的。这种说法貌似有道理，实则荒谬之至。我甚至怀疑它是否适用于可能出现的最明显例证。一个年轻画家临摹一幅精美的成品画，是否像临摹一幅线条更加清晰、着色方法更

易辨识的画收获那么大，这颇为值得怀疑。但如果这一模式之完美在性质上不同于且优于其他模式，那么我们自然会朝着这种完美的模式发展，总会取得一些进展；但如果我们的目光没有专注于这种完美的模式，那我们本可以取得的进展十有八九会受到阻碍。一种极有智慧又不必挨饿、睡眠充足的生命，自然要比人类更完美。但人类如果盲目努力去模仿这种不可模仿的生物，很可能会毁掉他力图改善的那一点点智慧。

The form and structure of society which Mr. Godwin describes is as essentially distinct from any forms of society which have hitherto prevailed in the world as a being that can live without food or sleep is from a man. By improving society in its present form, we are making no more advances towards such a state of things as he pictures than we should make approaches towards a line, with regard to which we were walking parallel. The question, therefore, is whether, by looking to such a form of society as our polar star, we are likely to advance or retar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human species? Mr. Godwin appears to me to have decided this question against himself in his essay on 'Avarice and Profusion' in the Enquirer.

葛德文先生描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从本质上说不同于迄今存在于世间的任何社会形态，就如同不吃不睡的生物不同于人类一样。即使改进当前的社会形态，我们也丝毫不会趋近葛德文先生描述的社会状态，正如两个平行前行的人永远走不到一起一样。因此，问题是如果将这样的社会形态看作是指引我们方向的北斗，它究竟是会促进还是阻碍人类的完善呢？在我看来，葛德文先生在《探求者》中论述“贪欲与奢侈”的一文已就此问题得出了与其自身观点相矛盾的结论。

Dr. Adam Smith has very justly observed that nations as well as individuals grow rich by parsimony and poor by profusion, and that, therefore, every frugal man was a friend and every spendthrift an enemy to his country. The reason he gives is that what is saved from revenue is always added to stock, and is therefore taken from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that is generally unproductive and employed in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that realizes itself in valuable commodities. No observation can be more evidently just. The subject of Mr. Godwin's essay is a little similar in its first appearance, but in essence is as distinct as possible. He considers the mischief of profusion as an acknowledged truth, and therefore makes his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varicious man, and the man who spends his income. But the avaricious man of Mr. Godwin is totally a distinct character, at least with regard to his effect upon the prosperity of the state, from the frugal man of Dr. Adam Smith. The frugal man in order to make more money saves from his income and adds to his capital; and this capital he either employs himself in the maintenance of productive labour, or he lends it to some other person who will probably employ it in this way. He benefits the state because he adds to its general capital, and because wealth employed as capital not only sets in motion more labour than when spent as income, but the labour is besides of a more valuable kind. But the avaricious man of Mr. Godwin locks up his wealth in a chest and sets in motion no labour of any kind, either productive or unproductive. This is so essential a difference that Mr. Godwin's decision in his essay appears at once as evidently false as Dr. Adam Smith's position is evidently true. It could not, indeed, but occur to Mr. Godwin that some present inconvenience might arise to the poor from thus locking up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The only way, therefore, he had of weakening this objection was to compare the two characters chiefly with regard to their tendency to accelerate the approach of that

happy state of cultivated equality, on which he says we ought always to fix our eyes as our polar star.

亚当·斯密博士非常公正地指出，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富由节俭败由奢，因此每个节俭之人都堪称是其国家的朋友，而每个奢侈挥霍的人都是其国家的敌人。他提供的理由是，节省的收入总会用来增加资本，因而也就不再用于维持基本非生产性劳动，而是用于维持能生产有价值商品的劳动。很显然，这种说法再正确不过了。葛德文先生在文中所讨论的问题乍一看与这一点有些许相似，但实质上却截然不同。他认为，奢侈的危害是人们所公认的事实，因而只需对贪财者与挥霍者进行比较。但葛德文先生所指的贪财者，与亚当·斯密博士所说的节俭者，至少从对国家繁荣的影响来说是全然不同的。节俭者从收入里节省，增加资本，为的是赚取更多的钱财。这部分资金或由他自己使用，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或借给他人，可能也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他之所以有益于国家，是因为他增加了国家的总资本，而财富作为资本使用较之作为收入使用能调动更多劳动，而且这种劳动也更具有价值。可是葛德文先生所说的贪财者却把财富锁在柜子中，不调动任何劳动，无论是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区别，如果亚当·斯密博士的立场显然正确的话，那么自不待言，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便是错误的。葛德文先生肯定会想到，把本应维持劳动的资金锁起来，可能对穷人造成眼前的不便。因此，他弱化这种对立观点的唯一方法便是对照比较这两种人，看哪一种人更能促进人为平等的幸福状态的到来，在葛德文先生看来，我们的两眼应时刻盯着这种培育起来的平等的幸福状态，把它作为我们的北斗星。

I think it has been proved in the former parts of this essay that such a state of society is absolutely impracticable. What consequences then are we to expect from looking to such a point as our guide and polar star in the great sea of political discovery?

Reason would teach us to expect no other than winds perpetually adverse, constant but fruitless toil, frequent shipwreck, and certain misery. We shall not only fail in making the smallest real approach towards such a perfect form of society; but by wasting our strength of mind and body, in a direction in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proceed, and by the frequent distress which we must necessarily occasion by our repeated failures, we shall evidently impede that degree of improvement in society, which is really attainable.

我想，前面我们已经证实，这样一种社会状态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么在政治领域的茫茫沧海中，我们将这样一个点当作向导、当作北斗，那我们要等来的究竟是什么结果呢？理性会告诉我们，等来的结果只能是持续不断的逆风、无尽又徒劳的苦役、频频发生的海难和在所难免的不幸。我们非但无法取得任何微小的实际进展，来趋近这种完美的社会形态，反而会妨碍实际上可能实现的社会进步，因为我们浪费了脑力与体力，向着死胡同行进，而屡次的失败必然让我们频频陷入忧伤，这一点是很显见的。

It has appeared that a society constituted according to Mr. Godwin's system must, from the inevitable laws of our nature, degenerate into a class of proprietors and a class of labourers; and that the substitution of benevolence for self-love as the moving principle of society, instead of producing the happy effects that might be expected from so fair a name, would cause the same pressure of want to be felt by the whole of society, which is now felt only by a part. It is to the established administration of property and to the apparently narrow principle of self-love that we are indebted for all the noblest exertions of human genius, all the finer and more delicate emotions of the soul, for everything, indeed, that distinguishes the civilized from the savage state; and no sufficient

change has as yet taken place in the nature of civilized man to enable us to say that he either is, or ever will be, in a state when he may safely throw down the ladder by which he has risen to this eminence.

看起来，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理论构建的社会，在无法逃避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一定会退化为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仁爱取代自爱作为社会的推动力，非但无法产生人们对这个漂亮的字眼所期盼的满意结果，反而会使现在只有一部分人感受到的贫困的压力，蔓延到整个社会。人类天才所有的卓越努力，人类灵魂一切细致微妙的情感，实际上将人类文明区别于蛮荒状态的一切事物，无一不仰赖现行的财产管理制度，无一不受惠于表面狭隘的自爱本性。现行的财产制度及自爱心是人类得以攀升至现今这一高度的阶梯。文明人的本性发生的变化，还不足以使我们能够说他现在已经可以或将来能够抛弃这架梯子却安然无恙。

If in every society that has advanced beyond the savage state, a class of proprietors and a class of labourers must necessarily exist, it is evident that, as labour is the only property of the class of labourers, everything that tends to diminish the value of this property must tend to diminish the possession of this part of society. The only way that a poor man has of supporting himself in independence is by the exertion of his bodily strength. This is the only commodity he has to give in exchange for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It would hardly appear then that you benefit him by narrowing the market for this commodity, by decreasing the demand for labour, and lessening the value of the only property that he possesses.

如果在超越了野蛮状态的所有形态的社会里，一定要存在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那么很显然，由于劳动是劳动阶级唯一的财产，因而凡是趋于降低这种财产价值的事物，必然也就趋于减少劳动阶级拥有的财产。穷人自主谋生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体力。这是他唯一可用来换取生活必需品的商品。因而压缩这种商品的市场，减少对劳动的需求，降低穷人所持的唯一资产的价值，只会使穷人受害。

It should be observed that the principal argument of this Essay only goes to prove the necessity of a class of proprietors, and a class of labourers, but by no means infers that the present great inequality of property is either necessary or useful to society. On the contrary, it must certainly be considered as an evil, and every institution that promotes it is essentially bad and impolitic. But whether a government could with advantage to society actively interfere to repress inequality of fortunes may be a matter of doubt. Perhaps the generous system of perfect liberty adopted by Dr. Adam Smith and the French economists would be ill exchanged for any system of restraint.

应当指出，本文的主要论证旨在证明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存在的必然性，而绝非推论当前资产严重不均对社会的必要性或有效性。相反，这种不平等应被视作一种罪恶，凡是促进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从本质上讲都是有害的、不可取的。然而政府积极干预、压制财产分配不均的行为是否会对社会有利，这依然值得怀疑。用任何约束制度来换取亚当·斯密博士及法国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完全自由的宽容制度，或许是不明智之举。

Mr. Godwin would perhaps say that the whole system of barter and exchange is a vile and iniquitous traffic. If you would

essentially relieve the poor man, you should take a part of his labour upon yourself, or give him your money, without exacting so severe a return for it. In answer to the first method proposed, it may be observed, that even if the rich could be persuaded to assist the poor in this way, the value of the assistance would be comparatively trifling. The rich, though they think themselves of great importance, bear but a small proportion in point of numbers to the poor, and would, therefore, relieve them but of a small part of their burdens by taking a share. Were all those that are employed in the labours of luxuries added to the number of those employed in producing necessaries, and could these necessary labours be amicably divided among all, each man's share might indeed be comparatively light; but desirable as such an amicable division would undoubtedly be, I cannot conceive any practical principle according to which it could take place. It has been shewn, that the spirit of benevolence, guided by the strict impartial justice that Mr. Godwin describes, would, if vigorously acted upon, depress in want and misery the whole human race. Let us examine what would be the consequence, if the proprietor were to retain a decent share for himself, but to give the rest away to the poor, without exacting a task from them in return. Not to mention the idleness and the vice that such a proceeding, if general, would probably create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society, and the great risk there would be, of diminishing the produce of land, as well as the labours of luxury, another objection yet remains.

葛德文先生可能会说整个易物交换制度是肮脏卑劣的。如果想从根本上解救穷人，就应亲自分担他的劳动，将自己的钱财分给他，而不苛求任何回报。关于第一种办法，可以说即便能够说服富人用这种方式帮助穷人，其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富人虽然自命不凡，但人数较之穷人来说却很少，因此分担穷人的劳动，也只能解除他们一小部

分负担。假设所有生产奢侈品的劳动者都转而生产生活必需品，假设这种必要劳动可以合理地分配给所有人，那么每个人承担的劳动的确会比较轻。这种分配劳动的方法固然尽如人意，但我想不出这种做有什么切实可行的道理可循。前文已证明，在葛德文先生所描述的严格公正的正义指引下，仁爱精神如果发扬光大，将会使整个人类陷入贫困和苦难的深渊。让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所有者为自己保留一份适量的财产，把其余财产分给穷人而不要求他们做工回报，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姑且不论这种做法一经被广泛采用，可能在当今的社会形态下制造多少懒惰和罪恶，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土地产出，会诱使穷人过上怎么奢侈的生活，还另有一个理由可以反对它。

Mr. Godwin seems to have but little respect for practical principles; but I own it appears to me, that he is a much greater benefactor to mankind, who points out how an inferior good may be attained, than he who merely expatiates on the deformity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society, and the beauty of a different state, without pointing out a practical method, that might be immediately applied, of accelerating our advances from the one, to the other.

葛德文先生似乎对实际可行的原理不太重视。如果他指出如何达到次佳状态，而非仅仅阐述现存社会状态的丑恶和另一不同社会状态的美好，却不指出当下有助于我们快速步入另一美好社会状态的切实可行的方法，那么他绝对是全人类的大恩人。

It has appeared that from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more will always be in want than can be adequately supplied. The surplus of the rich man might be sufficient for three, but four will be desirous to obtain it. He cannot make this selection of three out of the four without conferring a great favour on those that are the objects of

his choice. These persons must consider themselves as under a great obligation to him and as dependent upon him for their support. The rich man would feel his power and the poor man his dependence, and the evil effects of these two impressions on the human heart are well known. Though I perfectly agree with Mr. Godwin therefore in the evil of hard labour, yet I still think it a less evil, and less calculated to debase the human mind, than dependence; and every history of man that we have ever read places in a strong point of view the danger to which that mind is exposed which is entrusted with constant power.

如此看起来，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处于贫困匮乏状态下的人数将永远比吃饱穿暖的人数多。富人手里的剩余生活资料或许足够用来养活三个人，但却会有四个人渴望得到它。因此他只能从四个人中挑选三人，令被他选中的人得到恩惠。入选者一定会认为自己蒙受了他的巨大恩惠，一定会认为自己必须依附于他。这样，富人便会油然感觉到自己有支配力，而穷人则会感觉自己不得不依附于他人。这两种印象对人类心灵的恶劣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虽然完全同意葛德文先生的观点，认为艰苦的劳动是一种罪恶，但仍然觉得比起依附于人，它还不算严重，还不至于将人的心灵败坏得太厉害；而且，我们读过的全部人类历史无不赫然表明，人如果被赋予永恒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ings, and particularly when labour is in request, the man who does a day's work for me confers full as great an obligation upon me as I do upon him. I possess what he wants, he possesses what I want. We make an amicable exchange. The poor man walks erect in conscious independence; and the mind of his employer is not vitiated by a sense of power.

在当前情况下，尤其是在需要劳动的时候，某人为我做一天工，我们对彼此给予的恩惠是相当的。我拥有他需要的东西，他拥有我需要的东西。我们之间进行了友好的交易。穷人自感自立，他便昂首阔步，雇主的心灵也不会被权力感所玷污。

Three or four hundred years ago, there was undoubtedly much less labour in Engl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population, than at present; but there was much more dependence, and we probably should not now enjoy our present degree of civil liberty if the poor, by the introduction of manufactures, had not been enabled to give something in exchange for the provisions of the great Lords, instead of being dependent upon their bounty. Even the greatest enemies of trade and manufactures, and I do not reckon myself a very determined friend to them, must allow that when they were introduced into England, liberty came in their train.

三四百年前，相对人口总量而言，英国的劳动者数量无疑要比现在少得多，但依附性却强得多。我们目前之所以能够享有高度的公民自由，也许正是因为制造业的推广使得穷人能够用某种东西与大领主交换食物，而非依赖于他们的施舍。即便是极力反对贸易及制造业的人（我本人并不是贸易和制造业的坚定支持者）也得承认，贸易和制造业引进英国的同时，自由也随之而来。

Nothing that has been said tends in the most remote degree to undervalue the principle of benevolence. It is one of the noblest and most godlike qualities of the human heart, generated, perhaps, slowly and gradually from self-love, and afterwards intended to act as a general law, whose kind office it should be, to soften the partial deformities, to correct the asperities, and to smooth the wrinkles of

its parent: and this seems to be the analog of all nature. Perhaps there is no one general law of nature that will not appear, to us at least, to produce partial evil; and we frequently observe at the same time, some bountiful provision which, acting as another general law, corrects the inequalities of the first.

以上所述毫无贬低仁爱原则之意。仁爱是人类心灵中最为崇高、最神圣的品质之一。它也许是由人的自爱之心渐渐生发出来的，随后成为一种普遍的法则。它的职责就是帮助克服其母体的某些缺陷，矫正他们的粗暴，抚平他们的皱纹，这似乎就是整个大自然的写照。大概任何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都会带来某种程度的罪恶，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而同时我们也常常看到，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一条普遍法则，它纠正了前一条法则造成的诸般不平等。

The proper office of benevolence is to soften the partial evils arising from self-love, but it can never be substituted in its place. If no man were to allow himself to act till he had completely determined that the action he was about to perform was more conducive than any other to the general good, the most enlightened minds would hesitate in perplexity and amazement; and the unenlightened would be continually committing the grossest mistakes.

仁爱本身的职责就是淡化自爱带来的偏私罪恶，但是仁爱是永远无法取代自爱的。倘若人们只有在完全确定自己要采取的行动比其他行动更有益于公众利益时才开始行动，那么即便是最开明的人也难免会陷入困惑与茫然，而愚昧无知者则会接连不断地犯下最严重的错误。

As Mr. Godwin, therefore, has not laid down any practical principle according to which the necessary labours of agriculture might be amicably shared among the whole class of labourers, by general invectives against employing the poor he appears to pursue an unattainable good through much present evil. For if every man who employs the poor ought to be considered as their enemy, and as adding to the weight of their oppressions, and if the miser is for this reason to be preferred to the man who spends his income, it follows that any number of men who now spend their incomes might, to the advantage of society, be converted into misers. Suppose then that a hundred thousand persons who now employ ten men each were to lock up their wealth from general use, it is evident, that a million of working men of different kinds would be completely thrown out of all employment. The extensive misery that such an event would produce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society, Mr. Godwin himself could hardly refuse to acknowledge; and I question whether he might not find some difficulty in proving that a conduct of this kind tended more than the conduct of those who spend their incomes to 'place human beings in the condition in which they ought to be placed.'

对于如何把必要的农业劳动合理地分配给整个劳动阶级，葛德文先生并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原则，故此，他空泛地抨击雇用穷苦劳动者，似乎有意通过现在的大恶来追寻一种无法实现的善。因为，如果凡是雇用穷人的人就该被当作穷人的对头，被看成是加重对穷人的压迫，如果因为这一点而宁愿要守财奴也不要消费者，那么可以断定的是，现在的许多对社会有利的消费者都应该转为守财奴。如果现在有10万名雇主，每位雇主雇用10人，假设他们现在把一般使用的钱财搁死，那么很显然各行各业将有百万工人彻底失业。在当今的社会状态下，这样的事会引发巨大的灾难，想必葛德文先生本人对此也不会予以否认。至于他是否能轻易地证明这种守财行为较之于消费行为

更利于“让人类处在应处的环境里”，我是抱有怀疑的。

But Mr. Godwin says that the miser really locks up nothing, that the point has not been rightly understood, and that the true development and definition of the nature of wealth have not been applied to illustrate it. Having defined therefore wealth, very justly, to be the commodities raised and fostered by human labour, he observes that the miser locks up neither corn, nor oxen, nor clothes, nor houses. Undoubtedly he does not really lock up these articles, but he locks up the power of producing them, which is virtually the same. These things are certainly used and consum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as truly, and to as great an extent, as if he were a beggar; but not to as great an extent as if he had employed his wealth in turning up more land, in breeding more oxen, in employing more tailors, and in building more houses. But supposing, for a moment, that the conduct of the miser did not tend to check any really useful produce, how are all those who are thrown out of employment to obtain patents which they may shew in order to be awarded a proper share of the food and raiment produced by the society? This is the unconquerable difficulty.

但葛德文先生称：守财奴实际上并没搁死什么东西，人们没有正确地理解这一点，而且财富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关于财富的定义也已不适用。他给财富下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定义，他认为财富是由人类劳动生产和累积的商品，既而指出守财奴既没有囤积谷物，也没有敛藏牛、衣服和房屋住宅。他的确没有敛藏这些东西，这没有疑问，但是他把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给藏起来了，这实质上等同于把这些东西都敛藏起来了。当然，他的同代人会照样大量使用、消费这些东西，而他则像个乞丐。但是，如果他能用积累的财富开垦更多的土地，饲养更多的牛，雇用更多的裁缝，建造更多的房屋，那他的同代人使用

和消费商品的能力远不及他自己。不过暂且假设守财奴的行为不会阻碍生产真正有用的产品的话，那么那些失业者凭借什么才能换取适量的由社会生产的食物和衣服呢？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I am perfectly willing to concede to Mr. Godwin that there is much more labour in the world than is really necessary; and that, if the lower classes of society could agree among themselves never to work more than six or seven hours in the day, the commodities essential to human happiness might still be produced in as great abundance as at present. Bu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conceive that such an agreement could be adhered to. From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some would necessarily be more in want than others. Those that had large families would naturally be desirous of exchanging two hours more of their labour for an ampler quantity of subsistence. How are they to be prevented from making this exchange? It would be a violation of the first and most sacred property that a man possesses to attempt, by positive institutions, to interfere with his command over his own labour.

我完全同意葛德文先生的看法，世人付出的劳动远远多于实际所需，即使下层阶级一致同意每天工作不再超过六七个小时，人类幸福所必需的商品也照样能生产出来，数量和现在一样丰足。但是几乎无法想象有谁会坚守这样的协议。由于人口原理的作用，一些人势必会比另一些人贫困。人口多的家庭自然会希望多付出两个小时的劳动来换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如何来阻止他们作这种交易呢？如果明确订立规章来干预人对自己劳动的支配权，那就是侵犯了人的最基本、最神圣的财产。

Till Mr. Godwin, therefore, can point out some practical plan

according to which the necessary labour in a society might be equitably divided, his invectives against labour, if they were attended to, would certainly produce much present evil without approximating us to that state of cultivated equality to which he looks forward as his polar star, and which, he seems to think, should at present be our guide in determining the nature and tendency of human actions. A mariner guided by such a polar star is in danger of shipwreck.

因此，除非葛德文先生能够提出某种切实可行的方案，使得社会所需的全部劳动得以合理分配，否则他对劳动的抨击，一旦引起人们注意，便会引发更多的恶，根本不会使我们趋近人为打造的平等状态。而葛德文先生却将这种人为打造的平等状态视为北极星，并似乎认为它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向导，用以探知人类行为的本质及倾向。一个海员如果拿这样的北极星当向导，保不齐会有沉船的危险。

Perhaps there is no possible way in which wealth could, in general, be employed so beneficially to a state, and particularly to the lower orders of it, as by improving and rendering productive that land which to a farmer would not answer the expense of cultivation. Had Mr. Godwin exerted his energetic eloquence in painting the superior worth and usefulness of the character who employed the poor in this way, to him who employed them in narrow luxuries, every enlightened man must have applauded his efforts.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labour must always tend to better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 and if the accession of work be of this kind, so far is it from being true that the poor would be obliged to work ten hours for the same price that they before worked eight, that the very reverse would be the fact; and a labourer might then support his wife and family as well by the

labour of six hours as he could before by the labour of eight.

总体而言，若要财富的利用最大程度地使国家受益，特别是国家的下层阶级人民，或许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改良土壤，提高原本耕种代价太大的土地的肥力，实现增产。倘若葛德文先生用其雄辩的口才，向那些雇用穷人生产奢侈品的人来描绘雇用他们改良土地的价值和效用，那么一切开明人士都会对他所做出的努力拍手称赞。农业的劳动需求日益增加，这必然会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如果增加的劳动用于改良土地，穷人就不用为先前工作8小时的报酬工作10小时，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劳动者以前供养妻儿要干8小时才完成的工作，现在可能只要干6小时就可以了。

The labour created by luxuries, though useful in distributing the produce of the country, without vitiating the proprietor by power, or debasing the labourer by dependence, has not, indeed, the same beneficial effects on the state of the poor. A great accession of work from manufacturers, though it may raise the price of labour even more than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labour, yet, as in this case the quantity of food in the country may not be proportionably increasing, the advantage to the poor will be but temporary, as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must necessarily rise in proportion to the price of labour. Relative to this subject, I cannot avoid venturing a few remarks on a part of Dr.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speaking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at diffidence which I ought certainly to feel in differing from a person so justly celebrated in the political world.

生产奢侈品所付出的劳动，虽然有助于分配全国的产品，不会以权势败坏所有者的道德，不会因依附贬损劳动者的人格，但却无助于

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制造业劳动的大量增加虽然比农业劳动需求的不断增加更有助于提高劳动价格，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食物量未必会相应增加，由于食物的价格必然会随着劳动价格的上涨而上涨，因此穷人得到的利益也只能是暂时的。就此问题，我不得不冒昧地评论一下亚当·斯密博士《国富论》中的某些内容，对于自己和这位大名鼎鼎的政界巨鳄存在分歧，我深感惶恐。

CHAPTER 16

第十六章

Probable error of Dr. Adam Smith in representing every increase of the revenue or stock of a society as an increase in the fund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Instances where an increase of wealth can have no tendency to better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or.—England has increased in riches without a proportional increase in the fund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The state of the poor in China would not be improved by an increase of wealth from manufactures.

亚当·斯密博士认为社会资本或收入的每一次增加都意味着供给劳动所需资金的增加，这种观点或许是错误的——在某些情况下，财富的增加并未显现出改善穷苦劳动者境况的趋向——英国的总财富增加了，但维持劳动力的资金却没有相应增加——在中国，制造业创造的财富有所增加，但并不会使穷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

The professed object of Dr. Adam Smith's inquiry is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re is another inquiry, however, perhaps still more interesting, which he occasionally mixes with it; I mean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which affect the happiness of nations or the happiness and comfort of the lower orders of society, which is the most numerous class in every nation. I am sufficiently aware of the near connection of these two subjects, and that the causes which tend to increase the wealth of a State tend also, generally speaking, to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the lower classes of the people. But perhaps Dr. Adam Smith has considered

these two inquiries as still more nearly connected than they really are; at least, he has not stopped to take notice of those instances where the wealth of a society may increase (according to his definition of 'wealth') without having any tendency to increase the comforts of the labouring part of it. I do not mean to enter into a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of what constitutes the proper happiness of man, but shall merely consider two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ingredients, health, and the command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es of life.

亚当·斯密博士公开宣称，他研究的对象是国民财富的本质和来源。不过同时，他偶然结合对此问题的探究，开展另外一项或许更为有趣的研究，我指的是研究那些影响着国民幸福或社会下层阶级的幸福与安乐的因素。无论在哪个国家，下层阶级都是人数最多的阶级。我十分清楚这两个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一般说来，使一国财富增加的因素也有助于增加下层阶级的幸福。但是，亚当·斯密博士也许把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看得过于紧密了。至少他没注意到还另有一些情况，即虽然社会财富可能增加了（根据他对“财富”的定义），却没有显现出增加劳动者幸福的趋向。我不想从哲学角度考察是什么构成了人类幸福，而只是想考察其中两个世界公认的成分，一个是健康，另一个是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设施的支配权。

Little or no doubt can exist that the comforts of the labouring poor depend upon the increase of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and will be very exactly in proportion to the rapidity of this increase. The demand for labour which such increase would occasion, by creating a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must necessarily raise the value of labour, and, till the additional number of hands required were reared, the increased funds would be distributed to the same number of persons as before the increase,

and therefore every labourer would live comparatively at his ease. But perhaps Dr. Adam Smith errs in representing every increase of the revenue or stock of a society as an increase of these funds. Such surplus stock or revenue will, indeed, always be considered by the individual possessing it as an additional fund from which he may maintain more labour: but it will not be a real and effectual fun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an additional number of labourers, unless the whole, or at least a great part of this increase of the stock or revenue of the society, be convertible into a proportional quantity of provisions; and it will not be so convertible where the increase has arisen merely from the produce of labour, and not from the produce of land. A distinction will in this case occur, between the number of hands which the stock of the society could employ, and the number which its territory can maintain.

穷苦劳动者的安乐取决于用于维持劳动的资金增加，而且完全同资金增加的速度成正比，这一点几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或者说是毫无疑问的。维持资金的增加必然引起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需求引起市场竞争，既而提升劳动力价值。在培养出所需的追加劳动力之前，劳动力供给金增加了，但分享资金的劳动力数量却保持不变，因而每个劳动者都生活得相对轻松自在。而亚当·斯密的错误也许在于他认为社会资本或收入的每一次增加都会使劳动力的维持供养资金增加。这种剩余资本或收入，实际上总是会被其所有者看作可用于维持更多劳动力的追加资金。但是，除非所增的社会资本或收入的全部，或者至少很大一部分都能转变为一定比例的食物，否则增加部分无法成为可用以供养维持追加劳动力的真正有效的资金。而如果增加的收入只是劳动而非土地产生的，那么增收部分也不会转化为食物。倘若如此，则社会资本可雇用的劳动力数量与土地所能供养的劳动力数量之间便会出现明显的差异。

To explain myself by an instance. Dr. Adam Smith defines the wealth of a nation to consist in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This definition evidently includes manufactured produce, as well as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Now supposing a nation for a course of years was to add what it saved from its yearly revenue to its manufacturing capital solely, and not to its capital employed upon land, it is evident that it might grow richer according to the above definition, without a power of supporting a greater number of labourers, and, therefore, without an increase in the real fund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There would, notwithstanding, be a demand for labour from the power which each manufacturer would possess, or at least think he possessed, of extending his old stock in trade or of setting up fresh works. This demand would of course raise the price of labour, but if the yearly stock of provisions in the country was not increasing, this rise would soon turn out to be merely nominal, as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must necessarily rise with it. The demand for manufacturing labourers might, indeed, entice many from agriculture and thus tend to diminish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but we will suppose any effect of this kind to be compensated by improvements in the instruments of agriculture, and the quantity of provisions therefore to remain the same. Improvements in manufacturing machinery would of course take place, and this circumstance, added to the greater number of hands employed in manufactures, would cause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bour of the country to be upon the whole greatly increased. The wealth therefore of the country would be increasing annually,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and might not, perhaps, be increasing very slowly.

且举一例来说明我的观点。根据亚当·斯密博士对国民财富的定义，即一国的财富是由该国土地的年产品及劳动的年产品构成。很显

然，该定义既包括土地出产物，也包括工业制造的产品。现假定某国在数年时间内将节省的年收入全部投入制造业生产资本，而不增加用于土地生产的资本，那么根据上述定义，该国显然会变得比较富裕，但它没有能力供养更多的劳动者，因而供给劳动力的实际资金也没有一点增加。尽管如此，每个制造商却都有能力或者至少他自认为有能力扩展其原有的生意资本或者开创新业务，因而会对劳动力产生需求。这种需求自然会提高劳动力的价格，但是，如果该国食物的年储存量未增加，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很快就会变成仅仅是名义上的上涨，因为食物的价格必然也会随之上涨。对生产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可能确实会吸引许多农业劳动力，导致务农人员减少，土地的年产量也会趋于下降。但是，我们假设农具的改进将完全抵消这种作用，那么食物产量将保持不变。制造业使用的机器当然也会有改进，这一情况加上制造业雇工的人数增加，会使该国的年劳动生产量整体上大幅增加。由此可见，根据亚当·斯密对财富的定义，该国的财富不仅会逐年增加，而且可能还会保持不慢的增速。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alth, increasing in this way, has any tendency to better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or. It is a self-evident proposition that any general rise in the price of labour, the stock of provisions remaining the same, can only be a nominal rise, as it must very shortly be followed by a proportional rise in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The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labour, therefore, which we have supposed, would have little or no effect in giving the labouring poor a greater command over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es of life. In this respect they would be nearly in the same state as before. In one other respect they would be in a worse state.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em would be employed in manufactures, and fewer, consequently, in agriculture. And this exchange of professions will be allowed, I think, by all, to be very unfavourable in respect of health, one essential ingredient of happiness, besides the greater uncertainty of manufacturing labour,

arising from the capricious taste of man, the accidents of war, and other causes.

问题是，由此而增加的财富是否会有利于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若劳动价格总体上涨，而食物的存量保持不变，那么劳动价格和提高只是有名无实，因为食物的价格很快也会随之提高。这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命题。因此，我们所假设的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几乎或根本不会让穷苦的劳动者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设施拥有更多的支配权。从这一点看，他们的生活状况会依然如故。而从另一方面看，他们的境遇会更糟。更多的穷苦劳动者会从事生产制造行业，因此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必然会减少。如此变换职业对人的健康非常不利，这一点我想大家都会承认，而健康是幸福的一个根本要素。此外，由于人们变化无常的喜好、突发战争等其他原因，制造业的劳动较之农业劳动更加不稳定。

It may be said, perhaps, that such an instance as I have supposed could not occur, because the rise in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would immediately turn some additional capital into the channel of agriculture. But this is an event which may take place very slowly, as it should be remarked that a rise in the price of labour had preceded the rise of provisions, and would, therefore, impede the good effects upon agriculture, which the increased value of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might otherwise have occasioned.

有人或许会说，我所假设的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食物价格上涨会立即使一部分增加的资本流入农业。不过，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很慢，须知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已先于食物价格的上涨，这也会妨害土地产出物价值的提高对农业产生的积极影响。

It might also be said, that the additional capital of the nation would enable it to import provisions sufficient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ose whom its stock could employ. A small country with a large navy, and great inland accommodations for carriage, such as Holland, may, indeed, import and distribute an effectual quantity of provisions; but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must be very high to make such an importation and distribution answer in large countries less advantageously circumstanced in this respect.

还有人可能会说，该国增加的资本会使它有能力进口足够的粮食，维持供养它能雇用的劳动力。拥有强大的海军和发达的内陆交通运输的小国，譬如荷兰，确实可以进口和销售大量的食物；但是，在这方面条件比较差的大国，必须把食物价格抬得很高，才能使食物的进口与销售变得有利可图。

An instance, accurately such as I have supposed, may not, perhaps, ever have occurred, but I have little doubt that instances nearly approximating to it may be found without any very laborious search. Indeed I am strongly inclined to think that England herself, since the Revolution, affords a very striking elucidation of the argument in question.

或许，同我假设的情况完全相符的事情可能从未发生过，但我敢肯定，相类的情况却并非难得一见。实际上，我更倾向于认为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英国就为本人的论点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

The commerce of this country, internal as well as external, has certainly been rapidly advancing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The

exchangeable value in the market of Europ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has, without doubt, increased very considerably. But, upon examination, it will be found that the increase has been chiefly in the produce of labour and not in the produce of land; and therefore, though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 has been advancing with a quick pace, the effectual fund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have been increasing very slowly, and the result is such as might be expected. The increasing wealth of the nation has had little or no tendency to better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or. They have not, I believe, a greater command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es of life, and a much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em than at the period of the Revolution is employed in manufactures and crowded together in close and unwholesome rooms.

上个世纪，英国的国内外商业取得了迅速发展。其土地及劳动年产出在欧洲市场上的交换价值，无疑也大大地增加。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增长的部分主要是劳动产出而非土地产出。因此，即便国民财富持续快速地增加，供养维持劳动者的有效资金却增长缓慢，结果可想而知。我国不断增加的财富几乎并未显现出任何改善穷苦劳动者生活境况的趋向。我认为，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及便利设施的支配权也不比以前多，但他们当中受雇于制造业的劳动者的人数却比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多得多，挤在封闭的、有害健康的工作间里。

Could we believe the statement of Dr. Price that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 has decreased since the Revolution, it would even appear that the effectual fund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had been declining during the progress of wealth in other respects. For I conceive that it may be laid down as a general rule that if the effectual fund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are increasing, that is,

if the territory can maintain, as well as the stock employ, a greater number of labourers, this additional number will quickly spring up, even in spite of such wars as Dr. Price enumerates. And, consequently, if the population of any country has been stationary, or declining, we may safely infer, that, however it may have advanced in manufacturing wealth, its effectual fund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cannot have increased.

普赖斯博士说，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来在不断减少，假如我们相信他的说法，那么显然供养维持劳动者的有效资金在其他方面的财富增加之时却在不断减少。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供养劳动者的有效资金在增加，就是说，不仅该资本可以雇用更多劳动者，土地也可以供养更多的劳动者，那么新增劳动力的数量便会迅速增长，就算发生了普赖斯博士所说的战争也不会有太大影响。我认为，这可以算作一条普遍规律了。所以，如果某一国家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或减少，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断：不论其制造业财富有多大增长，其供养劳动者的有效资金并没有增加。

It is difficult, however, to conceive that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 has been declining since the Revolution, though every testimony concurs to prove that its increase, if it has increased, has been very slow. In the controversy which the question has occasioned, Dr. Price undoubtedly appears to be much more completely master of his subject, and to possess more accurate information, than his opponents. Judging simply from this controversy, I think one should say that Dr. Price's point is nearer being proved than Mr. Howlett's. Truth, probably, lies between the two statements, but this supposition makes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since the Revolution to have been very slow in comparison with the increase of wealth.

然而，很难想象英国人口数量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在不断下降，虽然所有证据都证明英语人口增速非常缓慢（若有所增加的话）。在这一问题引起的论战中，普赖斯博士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无疑要比他的对手更全面、更精确。单纯从这场争论判断，我觉得普赖斯博士的观点要比霍莱特博士的观点更接近真实。或许真理就在这两种观点之间，但这一假设认定，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英国人口的增速较之财富的增速是很缓慢的。

That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has been decreasing, or even that it has been absolutely stationary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few will be disposed to believe. The enclosure of commons and waste lands certainly tends to increase the food of the country, but it has been asserted with confidence that the enclosure of common fields has frequently had a contrary effect; and that large tracts of land which formerly produced great quantities of corn, by being converted into pasture both employ fewer hands and feed fewer mouths than before their enclosure. It is, indeed, an acknowledged truth, that pasture land produces a smaller quantity of human subsistence than corn land of the same natural fertility, and could it be clearly ascertained that from the increased demand for butchers' meat of the best quality, and its increased price in consequence, a greater quantity of good land has annually been employed in grazing, the diminution of human subsistence, which this circumstance would occasion, might have counterbalanced the advantages derived from the enclosure of waste lands, and the general improvements in husbandry.

很少有人会相信上个世纪土地的产出量一直在减少，或者保持着绝对停滞状态。圈占公有地和荒地确实可以增加我国的食物，但有人

很有把握地断言，圈占公有田地常常起反作用，以前生产大量谷物的大片土地改成牧场后，雇用的人手比圈占前减少了，养活的人口也比以前减少了。在土地自然肥力相当的条件下，一块土地用于放牧所出产的人类生活资料比用于种植谷物要少，这是一条公认的真理。假如能明确断定，由于对上等鲜肉的不断需求及其价格的顺势上涨，每年有更多的良田用于放牧，既而导致人类生活资料减少，或许这已经抵消了圈占荒地以及农业总体改良所带来的收益。

It scarcely need be remarked that the high price of butchers' meat at present, and its low price formerly, were not caused by the scarcity in the one case or the plenty in the other, but by the different expense sustained at the different periods, in preparing cattle for the market. It is, however, possible, that there might have been more cattle a hundred years ago in the country than at present; but no doubt can be entertained, that there is much more meat of a superior quality brought to market at present than ever there was. When the price of butchers' meat was very low, cattle were reared chiefly upon waste lands; and except for some of the principal markets, were probably killed with but little other fatting. The veal that is sold so cheap in some distant counties at present bears little other resemblance than the name, to that which is bought in London. Formerly, the price of butchers' meat would not pay for rearing, and scarcely for feeding cattle on land that would answer in tillage; but the present price will not only pay for fatting cattle on the very best land, but will even allow of the rearing many, on land that would bear good crops of corn. The same number of cattle, or even the same weight of cattle at the different periods when killed, will have consumed (if I may be allowed the expression) very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human substance. A fatted beast may in some respects be considere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French economists, as an unproductive labourer: he has added

nothing to the value of the raw produce that he has consumed. The present system of grating, undoubtedly tends more than the former system to diminish the quantity of human subsistence in the country, in proportion to the general fertility of the land.

至于当前鲜肉价格较高，并非因为鲜肉稀缺，而之前价格低廉，也并非由于鲜肉充足，这无需赘言，只是不同时期家畜上市所需的费用不同而已。不过，一百年前我国家畜的数量也许比现在多，但毫无疑问，现在市场上的优质肉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鲜肉价格较低时，家畜一般都在荒地上饲养，除了供应一些大型市场的鲜肉外，家畜可能还没等上膘就被屠宰了。目前一些偏远郡县出售的小牛肉价格低廉，但和伦敦买到的小牛肉相比，除了名字一样，别无相同之处。以前，鲜肉价格不足以补偿在荒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更不用说补偿在可耕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了，而现在的价格则不仅能补偿在良田饲养让家畜上膘的费用，甚至能补偿在高产田里饲养家畜的费用。不同时期屠宰的同一数量、甚至同一重量的家畜，会消耗（恕笔者使用这个词）数量完全不同的人类生活资料。按照法国经济学家的话说，一头膘肥体壮的家畜在某些方面可视为一个非生产性劳动者，没有为其消耗的原料增添任何价值。相对于我国土地的一般肥沃程度而言，与过去的饲养方法相比，当前我国饲养家畜的方法会更严重地减少食物数量。

I would not by any means be understood to say that the former system either could or ought to have continued. The increasing price of butchers' meat is a natural and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the general progress of cultivation; but I cannot help thinking, that the present great demand for butchers' meat of the best quality, and the quantity of good land that is in consequence annually employed to produce it, together with the great number of horses at present kept for pleasure, are the chief causes that have prevented the

quantity of human food in the country from keeping pace with the generally increased fertility of the soil; and a change of custom in these respects would, I have little doubt, have a very sensible effect on the quantity of subsistence in the country, and consequently on its population.

千万别认为我的意思是可以或者应当沿用以前的饲养方法。鲜肉价格的提高是农业全面进步的自然且必然的结果。但是，考虑到目前对优质鲜肉的需求量之大，以及由此每年用于生产鲜肉的良田之多，加之现在单纯为娱乐饲养的马匹的数量之大，我不禁想，这就是导致我国粮食总量和土地肥力总体提高不能同步的主要原因。要是在这些方面改变一下传统习惯，我认为，会对国内粮食总量产生显著影响，继而对人口数量产生显著影响。

The employment of much of the most fertile land in grazing, the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al instruments, the increase of large farms, and particularly the diminution of the number of cottages throughout the kingdom, all concur to prove, that there are not probably so many persons employed in agricultural labour now as at the period of the Revolution. Whatever increase of population, therefore, has taken place, must be employed almost wholly in manufactures, and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failure of some of these manufactures, merely from the caprice of fashion, such as the adoption of muslins instead of silks, or of shoe-strings and covered buttons, instead of buckles and metal buttons, combined with the restraints in the market of labour arising from corporation and parish laws, have frequently driven thousands on charity for support. The great increase of the poor's rates is, indeed, of itself a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poor have not a greater command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es of life; and if to the consideration,

that their condition in this respect is rather worse than better, be added the circumstance, that a much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em is employed in large manufactories, unfavourable both to health and virtue,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at the increase of wealth of late years has had no tendency to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the labouring poor.

大片最肥沃的土地用于放牧，农具不断得到改进，大型农场增多，尤其是全国各地农户在减少，这些都表明，现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很可能不如革命时期那么多。因此，不论人口增加多少，肯定几乎全被吸纳进制造业。众所周知，就因为时尚变幻无常——棉布取代了丝绸，鞋带及暗扣取代了搭扣和金属扣，加之行会和教区法对劳动市场的限制，常有一部分制造企业关门倒闭，继而迫使成千上万的人依靠救济为生。实际上，济贫税的大幅度提高本身就有力地证明，穷人能自由支配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设施并未增加。在这方面，他们的境遇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加之大部分穷人受雇在大制造厂做工，既不利于健康，也不利于品德培养。综合以上两点，不得不承认，近年来的财富增长并没有增加穷苦劳动者的幸福。

That every increase of the stock or revenue of a nation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an increase of the real fund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and, therefore, cannot have the same good effect upon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 will appear in a strong light if the argument be applied to China.

一国资本或收入的每一次增长，不能看作是供养劳动者的实际资金的增长，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穷人的境况产生有别的影响。如果把这一论点应用于中国，这一点就会很清楚。

Dr. Adam Smith observes that China has probably long been as rich as the nature of her laws and institutions will admit, but that with other laws and institutions, and if foreign commerce were had in honour, she might still be much richer. The question is, would such an increase of wealth be an increase of the real fund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and consequently tend to place the lower classes of people in China in a state of greater plenty?

亚当·斯密博士指出，中国可能早已达到了其自身法律制度性质所允许的富裕程度。但是，如果改换其他法律制度，重视对外贸易，中国也许会比现在富裕得多。但问题是，这样增加的财富是否就是增加了供养维持劳动力的实际资金，从而让中国下层阶级生活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呢？

It is evident, that if trade and foreign commerce were held in great honour in China, from the plenty of labourers, and the cheapness of labour, she might work up manufactures for foreign sale to an immense amount. It is equally evident that from the great bulk of provisions and the amazing extent of her inland territory she could not in return import such a quantity as would be any sensible addition to the annual stock of subsistence in the country. Her immense amount of manufactures, therefore, she would exchange, chiefly, for luxuries collected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At present, it appears, that no labour whatever is spared in the production of food. The country is rather over-peopled in proportion to what its stock can employ, and labour is, therefore, so abundant, that no pains are taken to abridge it.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is, probably, the greatest production of food that the soil can possibly afford, for it will be generally observed, that processes for abridging labour, though they may enable a farmer to bring a

certain quantity of grain cheaper to market, tend rather to diminish than increase the whole produce; and in agriculture, therefore, may, in some respects, be considered rather as private than public advantages.

显然，如果非常重视商业和外贸，依靠大量的劳动力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中国可以扩大制造业规模，制造大量产品供出口。同样明显的是，由于中国需要的食物量巨大，其领土面积又大得惊人，无论进口多少食物，也不会使其每年的食物总量有明显的增加。因此，中国生产的巨量制造品主要用来同世界各国交换奢侈品。当前在粮食生产方面，中国似乎并未节省任何劳力。相对于资本可雇佣的劳动力来说，中国有些人口过剩，因而劳动力十分充裕，也就无需节省劳力了。由此产生的结果可能是，这一结果普遍可察，土地所能生产的最高粮食产量，缩减劳动的过程，虽然可以使农民以较低价格向市场供应一定量的粮食，但这非但不能增加粮食总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减少粮食总量。因而就农业而论，节省劳动从某些方面看可以算是一种利私不利公的过程。

An immense capital could not be employed in China in preparing manufactures for foreign trade without taking off so many labourers from agriculture as to alter this state of things, and in some degree to diminish the produce of the country. The demand for manufacturing labourers would naturally raise the price of labour; but as the quantity of subsistence would not be increased,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would keep pace with it, or even more than keep pace with it if the quantity of provisions were really decreasing. The country would be evidently advancing in wealth;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would be annually augmented; yet the real fund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would be stationary, or even declining, and,

consequently, the increasing wealth of the nation would rather tend to depress than to raise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 With regard to the command over the necessaries and comforts of life, they would be in the same or rather worse state than before; and a great part of them would have exchanged the healthy labours of agriculture for the unhealthy occupation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中国如果把大量资金投入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就必然会吸引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从而改变上述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国家的农业产量。制造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自然抬高劳动力价格，但由于粮食总量没有增加，食物价格也势必会以相同的幅度上涨；如果食物供量实际在减少，其价格增幅甚至会超出劳动价格的涨幅。中国的财富显然会不断增加，其土地及劳动年产出的交换价值也会逐年提升，然而供养维持劳动力的实际资金却保持不变，甚至会有所减少，因而中国增加的财富不仅不会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反而使之变得更糟。从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看，穷人的境况和以前没什么不同，甚至比以前更差；很多穷人不再从事有益于健康的农业劳动，转而投身于有损健康的制造行业。

The argument, perhaps, appears clearer when applied to China, because it is generally allowed that the wealth of China has been long stationary. With regard to any other country it might be always a matter of dispute at which of the two periods, compared, wealth was increasing the fastest, as it is upon the rapidity of the increase of wealth at any particular period that Dr. Adam Smith says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 depends. It is evident, however, that two nations might increase exactly with the same rapidity in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ir land and labour; yet if one had applied itself chiefly to agriculture, and the other chiefly to commerce, the fund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and

consequently the effect of the increase of wealth in each nation, would be extremely different. In that which had applied itself chiefly to agriculture, the poor would live in great plenty, and population would rapidly increase. In that which had applied itself chiefly to commerce, the poor would be comparatively but little benefited, and consequently population would increase slowly.

以上论点应用于中国时可能会更加明晰，因为中国的财富长期处于停滞不增的状态是个公认的事实。就任何其他国家来说，若拿两个时期作对比，哪个时期财富增长较快，总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说法，穷人的生活状况正是取决于财富的增长速度。不过很明显，两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是可以按相同的速度增长的，然而如果一国主要从事农业，另一国主要从事商业，那么供养维持劳动力的资金，以及由此而至的财富增长在这两个国家所起的作用，将会迥然不同。主要从事农业的国家，穷人将会过上相当优裕的生活，人口也会迅速增长；主要从事商业的国家，相对而言穷人受益少之又少，因此人口增长也比较缓慢。

CHAPTER 17

第十七章

Question of the proper definition of the wealth of a state.—Reason given by the French economists for considering all manufacturers as unproductive labourers, not the true reason.—The labour of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sufficiently productive to individuals, though not to the state.—A remarkable passage in Dr. Price's two volumes of Observations.—Error of Dr. Price in attributing the happiness and rapid population of America, chiefly, to its peculiar state of civilization.—No advantage can be expected from shutting our eyes to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way to th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如何恰当地界定一国的财富——法国经济学家认为所有制造商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他们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工匠和制造商的劳动虽然对国家而言是非生产性的，但对个体而言却完全是生产性的——普赖斯博士的《恤金支付意见书》两卷本里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话——普赖斯博士认为美国的幸福程度和人口快速增长主要是其特有的文明状态造成的，该观点错误——对社会改良道路上的困难视而不见，是毫无益处的。

A question seems naturally to arise here, whether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be the proper definition of the wealth of a country, or whether the gross produce of the land, according to the French economists, may not be a more accurate definition. Certain it is that every increase of wealth,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economists, will be an

increase of the fund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and consequently will always tend to ameliorate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or, though an increase of wealth, according to Dr. Adam Smith's definition, will by no means invariably have the same tendency. And yet it may not follow from this consideration that Dr. Adam Smith's definition is not just. It seems in many respects improper to exclude the clothing and lodging of a whole people from any part of their revenue. Much of it may, indeed, be of very trivial and unimportant valu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food of the country, yet still it may be fairly considered as a part of its revenue; and, therefore, the only point in which I should differ from Dr. Adam Smith is where he seems to consider every increase of the revenue or stock of a society as an increase of the fund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and consequently as tending always to ameliorate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

这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问题：土地年产量和劳动之间的交换价值，是否可以适当地界定一个国家的财富，或者按照法国经济学家的观点，土地的总产量是否能精确地界定一个国家的财富。可以肯定的是，按照法国经济学家的定义，财富的每次增加都会引起维持劳动力的资金的增加，因而总有助于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不过，按照亚当·斯密博士的定义看，财富的增加并不总会带来这种趋势。不过也不能由此而认为亚当·斯密博士的定义不正确。从许多方面看，要是把人们的穿衣和住房排除在收入之外，是不妥当的。其实，这些东西与该国的食物相比微不足道，也没有什么重大价值，但它们仍应当算作收入的一部分，故此，我与亚当·斯密的唯一分歧在于：他好像把一国收入和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视为供养劳动的资金有所增加，从而总会有助于改善穷人的状况。

The fine silks and cottons, the laces, and other ornamental

luxuries of a rich country, may contribute very considerably to augment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its annual produce; yet they contribute but in a very small degree to augment the mass of happiness in the society, and it appears to me that it is with some view to the real utility of the produce that we ought to estimate the productiveness or unproductiveness of different sorts of labour. The French economists consider all labour employed in manufactures as unproductive. Comparing it with the labour employed upon land, I should be perfectly disposed to agree with them, but not exactly for the reasons which they give. They say that labour employed upon land is productive because the produce, over and above completely paying the labourer and the farmer, affords a clear rent to the landlord, and that the labour employed upon a piece of lace is unproductive because it merely replaces the provisions that the workman had consumed, and the stock of his employer, without affording any clear rent whatever. But supposing the value of the wrought lace to be such as that, besides paying in the most complete manner the workman and his employer, it could afford a clear rent to a third person; it appears to me tha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labour employed upon land, it would be still as unproductive as ever. Though, according to the reasoning used by the French economists, the man employ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lace would, in this case, seem to be a productive labourer;yet according to their definition of the wealth of a state, he ought not to be considered in that light. He will have added nothing to the gross produce of the land: he has consumed a portion of this gross produce, and has left a bit of lace in return; and though he may sell this bit of lace for three times the quantity of provisions that he consumed whilst he was making it, and thus be a very productive labourer with regard to himself, yet he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having added by his labour to any essential part of the riches of the state. The clear rent, therefore, that a certain produce can afford,

after paying the expenses of procuring it, does not appear to be the sole criterion, by which to judge of the productiveness or unproductiveness to a state of any particular species of labour.

一个富国生产的丝绸精棉、花边和其他装饰性奢侈品，会十分有助于增加该国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但对于增加社会的幸福总量却贡献甚小，因而在我看来，我们应从产品的实际用途出发，来评估不同种类的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法国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用于制造业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的。将用于制造业的劳动同用于土地的劳动相比，我当然要完全赞同法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但我赞同的理由却和他们给出的理由不一样。他们认为，用于土地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因为除了向劳动者和农场主支付全部的报酬之外，还能向地主支付纯地租；而用于生产花边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因为它仅能补偿工人消耗的食物和雇主垫付的资本，却无法提供一丁点纯地租。但假设生产的花边具有很高价值，除了向工人和雇主支付全部报酬外，还能向第三方提供一笔纯地租；但在我看来，这种劳动和用于土地的劳动相比，仍然是非生产性的。按照法国经济学家的推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雇来制造花边的人应该是生产性劳动者。可是根据他们对一国财富所下的定义，又不应当把这类人看成是生产性劳动者。他没有为土地的总产量作出任何贡献：他消耗了总产量的一部分，却只留下一些花边作为回报；他出售花边换来的食物也许是他制造花边消耗的食物的三倍，故此就他自己而言，他是一名生产性很强的劳动者，但我们却不能认为他用自己的劳动为国家增加了财富。所以，某种产品在支付了生产费用后所能提供的这种纯地租，并不是评判某种劳动对于国家而言是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劳动的唯一标准。

Suppose that two hundred thousand men, who are now employed in producing manufactures that only tend to gratify the vanity of a few rich people, were to be employed upon some barren and uncultivated lands, and to produce only half the quantity of

food that they themselves consumed; they would be still more productive labourers with regard to the state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ough their labour, so far from affording a rent to a third person, would but half replace the provisions used in obtaining the produce. In their former employment, they consumed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food of the country and left in return some silks and laces. In their latter employment, they consumed the same quantity of food and left in return provision for a hundred thousand men.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which of the two legacies would be the most really beneficial to the country; and it will, I think, be allowed that the wealth which supported the two hundred thousand men while they were producing silks and laces, would have been more usefully employed in supporting them while they were producing the additional quantity of food.

设想现在有20万人被雇来制造那些仅用来满足少数富人虚荣心的产品，如果雇用这20万人去开荒种地，他们生产出的食物仅仅是他们自己所消耗的食物的一半，然而即使如此，对于国家来说，和之前相比，他们现在也是生产性劳动者，尽管他们的劳动非但不能向第三方提供地租，反而生产出来的食物只能补偿所消耗的食物的一半。从事前一种劳动时，他们消耗国家一定数量的食物而生产出一些丝绸和花边；从事后一种劳动时，他们消耗同样数量的食物却生产出可供养10万人的食物。究竟这两种产品哪一种真正对国家更有利，这是毋庸置疑的。我想，与其用财富供养20万制造丝绸和花边的人，还不如供养生产更多粮食的人。

A capital employed upon land may be unproductive to the individual that employs it, and yet be highly productive to the society. A capital employed in trade, on the contrary, may be highly productive to the individual, and yet be almost totally unproductive

to the society: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 should call manufacturing labour unproductive, in comparison of that which is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and not for the reason given by the French economists. It is, indeed, almost impossible to see the great fortunes that are made in trade, and the liberality with which so many merchants live, and yet agree in the statement of the economists, that manufacturers can only grow rich by depriving themselves of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ir support. In many branches of trade the profits are so great as would allow of a clear rent to a third person; but as there is no third person in the case, and as all the profits centre in the master manufacturer, or merchant, he seems to have a fair chance of growing rich, without much privation; and we consequently see large fortunes acquired in trade by persons who have not been remarked for their parsimony.

用于土地的资本对于使用它的个人来说也许是非生产性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具有高度的生产性。相反，用于工商业的资本对于个人来说也许是高度生产性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几乎完全是非生产性的。正因为如此，而不是因为法国经济学家们给出的理由，我才把制造业劳动（相对于农业劳动而言）称作非生产性劳动。的确，我们不可能一面看着工商业积聚起巨额财富，看着许多商人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一面还同意法国经济学家的说法，即制造业者只有依靠节衣缩食才能发财致富。在许多行业，利润大得足够向第三方提供纯地租，但由于根本不存在第三方，而且全部利润都集中在大制造商和商人手里，因而他们似乎不怎么需要节衣缩食就可以发财致富，所以，我们看见大笔的商业财富常被那些并非以节俭闻名的人敛获。

Daily experience proves that the labour employed in trade and manufactures is sufficiently productive to individuals, but it certainly is not productive in the same degree to the state. Every

accession to the food of a country tends to the immediate benefit of the whole society; but the fortunes made in trade tend but in a remote and uncertain manner to the same end, and in some respects have even a contrary tendency. The home trade of consumption is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trade of every nation. China is the rich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without any other. Putting then, for a moment, foreign trade out of the question, the man who, by an ingenious manufacture, obtains a double portion out of the old stock of provisions, will certainly not to be so useful to the state as the man who, by his labour, adds a single share to the former stock. The consumable commodities of silks, laces, trinkets, and expensive furniture, are undoubtedly a part of the revenue of the society; but they are the revenue only of the rich, and not of the society in general. An increase in this part of the revenue of a state, cannot, therefore, be considered of the same importance as an increase of food, which forms the principal revenue of the great mass of the people.

日常经验证明，用于商业和制造业的劳动对于个人来说是高度生产性的，但对于国家来说却肯定不具有同等程度的生产性。一国的粮食每有增加，都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直接的利益，但是，经商获得的财富却只能以某种间接的、不确定的方式增加社会的利益，而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增反减。目前国内贸易消费是各国最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却没有对外贸易。既如此，我们暂且把对外贸易放在一边。凭借精巧的制造业从原有食物总量中获取双份食物的人，肯定不如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原有食物总量增添一份食物的人对国家有用。丝绸、花边、装饰品以及昂贵的家具等消费品，毫无疑问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但它们仅仅是富人的收入，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收入。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这部分收入的增加和粮食增多具有相同的意义，因为食物才是普通大众的主要收入。

Foreign commerce adds to the wealth of a state, according to Dr. Adam Smith's definition, though not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economists. Its principal use, and the reason, probably, that it has in general been held in such high estimation is that it adds greatly to the external power of a nation or to its power of commanding the labour of other countries; but it will be found, upon a near examination, to contribute but little to the increase of the internal fund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and consequently but little to the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part of society. In the natural progress of a state towards riches, manufactures, and foreign commerce would follow, in their order, the high cultivation of the soil. In Europe, this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has been inverted, and the soil has been cultivated from the redundancy of manufacturing capital, instead of manufactures rising from the redundancy of capital employed upon land. The superior encouragement that has been given to the industry of the towns, and the consequent higher price that is paid for the labour of artificers than for the labour of those employed in husbandry, are probably the reasons why so much soil in Europe remains uncultivated. Had a different policy been pursued throughout Europe, it might undoubtedly have been much more populous than at present, and yet not be more incumbered by its population.

按照亚当·斯密的财富定义（而不是依据法国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对外贸易可以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对外贸易的主要用处，以及它常受到高度重视的原因，可能是它可以大大增强一个国家的外部影响力，大大增加该国对其他国家的劳动的支配权。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对外贸易几乎无助于增加国内供养劳动者的资金，因而也就几乎无助于增加社会大多数人的幸福。在一个国家走向富足的自然进程中，制造业，还有对外贸易，一般是在土地被高度开垦之后才依次兴起的。但在欧洲，这个自然顺序被颠倒了，耕种土地是因为

制造业有资本冗余，而不是制造业兴起于农业资本的过剩。城镇的工业受到较多的鼓励，工匠的劳动报酬比从事农耕的农民的劳动报酬高，这大概就是欧洲为什么有那么多土地未开垦耕种的原因吧。假如整个欧洲奉行另外一种政策，欧洲的人口肯定会比现在多得多，但又不会因人口问题陷入困境。

I cannot quit this curious subject of the difficulty arising from population, a subject that appears to me to deserve a minute investigation and able discussion much beyond my power to give it, without taking notice of an extraordinary passage in Dr. Price's two volumes of Observations. Having given some tables on the probabilities of life, in towns and in the country, he says [18_1] ,

人口增长会造成困境这个问题很有趣，我觉得这个问题需作详尽而深入的讨论，但这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在撇开这个问题不谈之前，我要提一提普赖斯博士在两卷著作《恤金支付意见书》中说的一段非同寻常的话。他先列出了一些表格来说明城乡人口的寿命概率，随后他说 [19_1] ：

“From this comparison, it appears with how much truth great cities have been called the graves of mankind. It must also convince all who consider it, that according to the observation, at the end of the fourth essay, in the former volume, it is by no means strictly proper to consider our diseases a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nature. They are, without doubt, in general our own creation. Were there a country where the inhabitants led lives entirely natural and virtuous, few of them would die without measuring out the whole period of present existence allotted to them; pain and distemper would be unknown among them, and death would come upon them

like a sleep, in consequence of no other cause than gradual and unavoidable decay.”

“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看出，有人把大城市称为人类的墓地，这是多么合乎实际。所有考虑到这一点的人也必然会相信在第一卷第四篇文章末尾所得出的结论，即根据调查得知，把人类的疾病看作是大自然的本意，这严格说来是不恰当的。毫无疑问，这些疾病一般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假如有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居民都过着完全合乎自然和道德的生活，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会尽享天年，不知道痛苦和疾病，死亡只是逐渐的、无法避免的衰老造成的，它会像睡眠一样降临在他们身上。”

I own that I felt myself obliged to draw a very opposite conclusion from the facts advanced in Dr. Price's two volumes. I had for some time been aware that population and food increased in different ratios, and a vague opinion had been floating in my mind that they could only be kept equal by some species of misery or vice, but the perusal of Dr. Price's two volumes of Observations, after that opinion had been conceived, raised it at once to conviction. With so many facts in his view to prove the extraordinary rapidity with which population increases when unchecked, and with such a body of evidence before him to elucidate even the manner by which the general laws of nature repress a redundant population, it is perfectly inconceivable to me how he could write the passage that I have quoted. He was a strenuous advocate for early marriages, as the best preservative against vicious manners. He had no fanciful conceptions about the extinction of the passion between the sexes, like Mr. Godwin, nor did he ever think of eluding the difficulty in the ways hinted at by Mr. Condorcet. He frequently talks of giving the prolifick powers of

nature room to exert themselves. Yet with these ideas, that his understanding could escape from the obvious and necessary inference that an unchecked population would increase, beyond comparison, faster than the earth, by the best directed exertions of man, could produce food for its support, appears to me as astonishing as if he had resisted the conclusion of one of the plainest propositions of Euclid.

我得承认，根据普赖斯博士在两卷本里列举的事实，我不能不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我有这种意识已有一段时间了，即人口和食物是按不同比例增长的，；我的脑海里还一直萦绕着只有借助某种苦难和邪恶才能使两者保持平衡的认识，但这种认识并不清晰，后来研读了普赖斯博士的两卷本《恤金支付意见书》，这种不清晰的认识就跃然变成了一种信念。他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人口如果不加控制就会迅速增加；他还举出许多证据证明大自然的普遍法则会如何抑制人口过剩，可之后，他竟然写下了我前边引述的那段话，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他极力倡导早婚，认为这是防止人们道德败坏的最好方法。他不像葛德文先生，幻想两性间的情欲会消失，也不考虑按孔多塞先生所暗示的办法来逃避困难。他常常说要让大自然有充分的空间来施展它的增殖力。他有上述想法，显然是可以得出以下显现而必然的推论：人口不受抑制就会超快增长，快到即使人作出最有效的努力，地球也生产不出足够养活人类的食物。可是，普赖斯博士竟没有受到这一推论的干扰，这真让我惊讶，就好像他否定了欧几里得的一个最浅白的命题一样。

Dr. Price, speaking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civilized state, says, “The first, or simple stages of civilization, are those which favour most the increase and the happiness of mankind.” He then instances the American colonies, as being at that time in the first and happiest of the states that he had described, and as affording a

very striking proof of the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civilization on population. But he does not seem to be aware that the happiness of the Americans depended much less upon their peculiar degree of civilization than upon the peculiarity of their situation, as new colonies, upon their having a great plenty of fertile uncultivated land. In parts of Norway, Denmark, or Sweden, or in this country, two or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he might have found perhaps nearly the same degree of civilization, but by no means the same happiness or the sam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He quotes himself a statute of Henry the Eighth, complaining of the decay of tillage, and the enhanced price of provisions, “whereby a marvellous number of people were rendered incapable of maintaining themselves and families.” The superior degree of civil liberty which prevailed in America contributed, without doubt, its share to promote the industry, happiness, and population of these states, but even civil liberty, all powerful as it is, will not create fresh land. The Americans may be said, perhaps, to enjoy a greater degree of civil liberty, now they are an independent people, than while they were in subjection to England, but we may be perfectly sure that population will not long continue to increase with the same rapidity as it did then.

普赖斯博士在谈到文明的不同阶段时说：“最初始或朴素的文明阶段，最有利于增加人口，最有助于增进人类幸福。”随后，他以美洲殖民地为例，认为这些殖民地当时就处于他所说的最初、最幸福的状态，认为它们可以作为一个非常显著的证据证明不同阶段的文明状态对人口产生的影响。但是，普赖斯似乎没有意识到，美国人的幸福感与其说取决于其特有的文明状态，不如说取决于它作为新殖民地的这一特殊情况，因为作为新殖民地，它拥有大量未开垦的肥沃土地。他可能发现，在挪威、丹麦、瑞典的某些地方，或者以我国而论，两三百年以前的文明程度和现在美国的文明程度相当，但幸福程度和人

口的增长速度却大不相同。他引述了亨利八世颁布的一项法令，抱怨耕地荒芜，食物价格上涨，“大批人因此而无力养家糊口”。毫无疑问，美国高度的公民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使幸福增加，使人口增长，但是不管公民自由的影响力有多强，它也无法创造出新的土地。美国人现在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也许可以说他们比当年受英国统治时享有更多的公民自由，但我们可以断定，美国的人口不会以那时的速度快速地增长下去。

A person who contemplated the happy state of the lower classes of people in America twenty years ago would naturally wish to retain them forever in that state, and might think, perhaps, that by preven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manufactures and luxury he might effect his purpose, but he might as reasonably expect to prevent a wife or mistress from growing old by never exposing her to the sun or air. The situation of new colonies, well governed, is a bloom of youth that no efforts can arrest. There are, indeed, many modes of treatment in the political, as well as animal, body, that contribute to accelerate or retard the approaches of age, but there can be no chance of success, in any mode that could be devised, for keeping either of them in perpetual youth. By encouraging the industry of the towns more than the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Europe may be said, perhaps, to have brought on a premature old age. A different policy in this respect would infuse fresh life and vigour into every state. While from the law of primogeniture, and other European customs, land bears a monopoly price, a capital can never be employed in it with much advantage to the individual; and, therefore, it is not probable that the soil should be properly cultivated. And, though in every civilized state, a class of proprietors and a class of labourers must exist, yet one permanent advantage would always result from a nearer equalization of property. 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proprietors, the smaller must

be the number of labourers: a greater part of society would be in the happy state of possessing property: and a smaller part in the unhappy state of possessing no other property than their labour. But the best directed exertions, though they may alleviate, can never remove the pressure of want; and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any person who contemplates the genuine situation of man on earth, and the general laws of nature, to suppose it possible that any, the most enlightened, efforts could place mankind in a state where 'few would die without measuring out the whole period of present existence allotted to them; where pain and distemper would be unknown among them; and death would come upon them like a sleep, in consequence of no other cause than gradual and unavoidable decay.'

了解20年前美国下层阶级人民幸福状态的人，自然希望他们永远处于那样的状态，而且也许会认为，只要不引入制造品和奢侈品就能做到这一点，但他的这种愿望就如同女人想不晒太阳不吹风就可以永葆青春那样荒唐。那些治理良好的新殖民地的状况，犹如绽放的青春一样风华正茂，但任何努力都无法留其长驻。诚然，无论是动物机体还是政治机体，都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来加速或延缓其衰老，但要想发明一种方法让它们青春永驻，那绝对是办不到的。也许可以说，欧洲因过多地鼓励工业发展而歧视农业而使自己未老先衰。在这方面改变政策也许会给每个国家注入新的生命力和活力。长子继承法和欧洲的其他习俗，使土地的价格被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向土地投资决不会给个人带来多大利益，因而土地也就不会得到适当的耕种。尽管每一个文明国度都必然存在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但近乎均等地分配财产总会产生永久性利益。所有者人数越多，劳动者人数必然越少；更多的社会成员会处于拥有财产的幸福状态，更少的人会处于仅有劳动、别无财产的不幸状态。但是，最有针对性的努力，虽说可以减轻匮乏的压力，却决不会消除它。如果我们了解了人类在地球上的真正处境，了解了大自然的一般规律，就很难设想努力（即便是最富智慧

的努力），能使人类到达普赖斯博士所说的那种境界——“绝大多数人都会尽享天年，不知道痛苦和疾病，死亡只是逐渐的、无法避免的衰老造成的，它会像睡眠一样降临在他们身上。”

It is, undoubtedly, a most disheartening reflection that the great obstacle in the way to any extraordinary improvement in society, is of a nature that we can never hope to overcome. The perpetual tendency in the race of man to increase beyond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is one of the general laws of animated nature which we can have no reason to expect will change. Yet, discouraging as the contemplation of this difficulty must be to those whose exertions are laudably direc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human species, it is evident that no possible good can arise from any endeavours to slur it over or keep it in the background. On the contrary, the most baleful mischiefs may be expected from the unmanly conduct of not daring to face truth because it is unpleasing. Independently of what relates to this great obstacle, sufficient yet remains to be done for mankind to animate us to the most unremitted exertion. But if we proceed without a thorough knowledge and accurate comprehension of the nature, extent, and magnitude of the difficulties we have to encounter, or if we unwisely direct our efforts towards an object in which we cannot hope for success, we shall not only exhaust our strength in fruitless exertions and remain at as great a distance as ever from the summit of our wishes, but we shall be perpetually crushed by the recoil of this rock of Sisyphus.

不论做何种特别的社会改良，必然会遭遇巨大的障碍，而且这种障碍是我们无法克服的，这无疑最让人心灰意冷。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加，这一总趋势是生机勃勃的自然界的一条普遍法则，是我们

无法期望改变的。不过，对这种困难的认识，会让那些为完善人类而做出令人钦佩的努力的人们感到沮丧，但是很显然，尽力忽略或掩饰这种困难，也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相反，因真相不尽如人意就不敢正视它的怯懦行为，很可能带来极严重的祸害。且不论上述障碍，仍有许多事情有待人类去做，这些事情会激励我们去坚持不懈地努力。但是，如果我们对必然遇到的困难的性质、范围和大小没有透彻的了解和明确的认识就着手努力的话，或者说，如果我们毫不明智地致力于一个无法企及的目标，那我们不仅会徒劳无益地浪费力气，始终和我们希望达到顶峰遥遥相望，而且还会被西西弗斯巨石的反冲力碾得粉碎。

[18_1].Vol. II, P.243:

[19_1].《恤金支付意见书》第二卷，第243页。

CHAPTER 18

第十八章

The constant pressure of distress on man, from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seems to direct our hopes to the future.—State of trial inconsistent with our ideas of the foreknowledge of God.—The world, probably, a mighty process for awakening matter into mind.—Theory of the formation of mind.—Excitements from the wants of the body.—Excitements from the operation of general laws.—Excitements from the difficulties of life arising from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人口原理让人类经常处在贫困的重压下，这种持续的压力让我们寄希望于来世——受苦受难的状态和我们对上帝先见之明的认识不一致——世界也许是召唤物质化为精神的一种伟大过程——有关精神形成的理论——源于肉体需要的刺激——源于普遍法规的刺激——人口定律造成的生活苦难带来的刺激。

The view of human life which results from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constant pressure of distress on man from the difficulty of subsistence, by shewing the little expectation that he can reasonably entertain of perfectibility on earth, seems strongly to point his hopes to the future. And the temptations to which he must necessarily be exposed, from the operation of those laws of nature which we have been examining, would seem to represent the world in the light in which it has been frequently considered, as a state of trial and school of virtue preparatory to a superior state of happiness. But I hope I shall be pardoned if I attempt to give a view

in some degree different of the situation of man on earth, which appears to me to be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various phenomena of nature which we observe around us and more consonant to our ideas of the power, goodness, and foreknowledge of the Deity.

由于生存困难，人类经常处于贫困的压力下，人类对这个世界所能达到的完美境界几乎不抱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人类生活的看法，似乎会强烈地寄希望于未来。而从我们已在考察的那些自然规律的运作来看，人类必然会遇到各种诱惑，这些诱惑会让世界按照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呈现出来，这些磨炼和品格培养是人类迈入高级的幸福状态之前所必经的状态。不过就世人的处境，我想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希望能求得原谅。我认为，我的看法更符合我们观察到的各种自然现象，更与我们对造物主全能、仁慈和先知先觉的认识相一致。

It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an unimproving exercise of the human mind to endeavour to 'Vindicate the ways of God to man' If we proceed with a proper distrust of our own understandings and a just sense of our insufficiency to comprehend the reason of all we see, if we hail every ray of light with gratitude, and, when no light appears, think that the darkness is from within and not from without, and bow with humble deference to the supreme wisdom of him, whose 'thoughts are above our thoughts' 'as the heavens are high above the earth.'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力有所怀疑，并正确地察觉我们不能充分理解所见事情的原因；如果我们感激并赞美每一束光线，而当没有光线时，就认为黑暗源于内部而非外部；如果我们谦卑地对造物主的最高智慧表示敬意，认为“由于天空高悬于大地之上”，他的“思想便高于

我们的思想”，那么我们为“证明上帝为人作出的安排是正当的”所付出的努力，就不能被看作是不利于改善人类精神的。

In all our feeble attempts, however, to 'find out the Almighty to perfection', it seems absolutely necessary that we should reason from nature up to nature's God and not presume to reason from God to nature. The moment we allow ourselves to ask why some things are not otherwise, instead of endeavouring to account for them as they are, we shall never know where to stop, we shall be led into the grossest and most childish absurdities, all progress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ways of Providence must necessarily be at an end, and the study will even cease to be an improving exercise of the human mind. Infinite power is so vast and incomprehensible an idea that the mind of man must necessarily be bewildered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it. With the crude and puerile conceptions which we sometimes form of this attribute of the Deity, we might imagine that God could call into being myriads and myriads of existences, all free from pain and imperfection, all eminent in goodness and wisdom, all capable of the highest enjoyments, and unnumbered as the points throughout infinite space. But when from these vain and extravagant dreams of fancy, we turn our eyes to the book of nature, where alone we can read God as he is, we see a constant succession of sentient beings, rising apparently from so many specks of matter, going through a long and sometimes painful process in this world; but many of them attaining, ere the termination of it, such high qualities and powers as seem to indicate their fitness for some superior state. Ought we not then to correct our crude and puerile ideas of Infinite Power from the contemplation of what we actually see existing? Can we judge of the Creator but from his creation? And, unless we wish to exalt the power of God at the expense of his goodness, ought we not to conclude that even to the

Great Creator, almighty as he is, a certain process may be necessary, a certain time (or at least what appears to us as time) may be requisite, in order to form beings with those exalted qualities of mind which will fit them for his high purposes?

不过，在我们试图凭借微薄之力“发现至善至美的上帝”时，我们应该由自然推论到上帝，而不应由上帝推论到自然，这一点似乎是绝对必要的。一旦我们不是尽力去解释说明事物现在呈现的状态，而是询问某些事物为何不呈现别的状态，我们会陷入极其严重、极其幼稚的荒谬之中。而我们在领会神意方面的全部进展必然会止步不前，为此而进行的研究再也不会是对人类精神的有益改善。造物主有无尽之力，这种认识太宽泛，也让人难以理解，所以人类若要对此进行深思，肯定会被弄得迷惑不已。怀着对神的这种特质的质朴而天真的认识，我们会想象上帝能够创造出不计其数的生命，他们多得就像是无限空间所能容纳的点，所有生命都不受折磨，完美无瑕，拥有美德与智慧，都能享有至高无上的快乐。但当我们把目光从这种徒劳而浮华的幻想转向我们唯一能读懂上帝的大自然之书时，我们看到的是有知觉的芸芸众生：他们显然起源于许多物质微粒，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过长期的、有时是痛苦的历程，但其中许多生物在结束这一历程前，培养了高尚的优良品质，获得了强大的力量，从而能处于某种较高级的状态。既然如此，难道我们不应根据实际所见来纠正我们对万能上帝的质朴而天真的看法吗？如果不从造物主的创造活动来判断，那我们又能凭什么来评断他呢？除非我们打算贬低上帝的仁慈而赞美他的力量，否则，我们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是全能无比的“伟大造物主”，也仍需要一个过程、一段时间（至少在我们看来是时间）才能创造出有着高尚品质且能实现其崇高目标的人。

A state of trial seems to imply a previously formed existence that does not agree with the appearance of man in infancy, and indicates something like suspicion and want of foreknowledge,

inconsistent with those ideas which we wish to cherish of the Supreme Being. I should be inclined, therefore, as I have hinted before in a note, to consider the world and this life as the mighty process of God, not for the trial, but for the creation and formation of mind, a process necessary to awaken inert, chaotic matter into spirit, to sublimate the dust of the earth into soul, to elicit an ethereal spark from the clod of clay. And in this view of the subject, the various impressions and excitements which man receives through life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forming hand of his Creator, acting by general laws, and awakening his sluggish existence, by the animating touches of the Divinity, into a capacity of superior enjoyment. The original sin of man is the torpor and corruption of the chaotic matter in which he may be said to be born.

磨炼状态似乎暗指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过一种生物，但是它与人类初期的样子不一样；同时还暗示对上帝是否有先见之明的怀疑以及这种先见之明的缺乏，而这又不符合我们希望珍视的对上帝的认识。因此，正如我上面所暗示的一样，我倾向于把这个世界和生命看作是上帝安排的伟大过程，它并非为了考验人类，而是为了创造和形成人类精神。要唤醒死气沉沉、混沌无序的物质并使其转化为精神，要使地上的尘埃升华为灵魂，要使泥土迸发出超越尘世的火花，这一过程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角度看，人在生命历程中得到的各种印象和刺激，可以被看作是造物主的创造之手，这只手通过普遍法则发挥作用，通过神灵的触摸得到启发，从怠惰的存在方式中觉醒过来，进而拥有了享受优越条件的能力。人类可以说是从混沌物质中诞生的，而人类的原罪就是混沌物质产生的麻木与堕落。

It could answer no good purpose to enter into the question whether mind be a distinct substance from matter, or only a finer form of it. The question is, perhaps, after all, a question merely of

words. Mind is as essentially mind, whether formed from matter or any other substance. We know from experience that soul and body are most intimately united, and every appearance seems to indicate that they grow from infancy together. It would be a supposition attended with very little probability to believe that a complete and full formed spirit existed in every infant, but that it was clogged and impeded in its operations during the first twenty years of life by the weakness, or hebetude, of the organs in which it was enclosed. As we shall all be disposed to agree that God is the Creator of mind as well as of body, and as they both seem to be forming and unfolding themselve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not appear inconsistent either with reason or revelation, if it appear to be consistent with phenomena of nature, to suppose that God is constantly occupied in forming mind out of matter and that the various impressions that man receives through life is the process for that purpose. The employment is surely worthy of the highest attributes of the Deity.

想要探讨精神究竟是有别于物质的东西，还是形式较为精致的物质，这是毫无意义的。这个问题终究可能只是字词之争。精神，不管是由物质还是任何其他东西形成的，从本质上说仍是精神。我们由经验得知，灵魂与肉体的联系是最为紧密的，所有迹象似乎都表明，两者是从人的婴儿期一起成长的。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每个婴儿都具有健全而完整的精神，只不过在人生的头20年，由于受制于身体上各个软弱无力、愚蠢迟钝的器官，精神的作用受到阻碍。由于我们都倾向于认为上帝是肉体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精神的创造者，由于肉体和精神似乎同时自我形成并自我发展，因此，假设上帝始终忙于用物质创造精神，假设人类在生命历程中获得的各种印象便是精神的创造过程，那么如果这种假设与自然现象吻合的话，它就不会有悖于理性或天启。这一目标绝对与造物主的最高属性相称。

This view of the state of man on earth will not seem to be unattended with probability, if, judging from the little experience we have of the nature of mind, it shall appear upon investigation that the phenomena around us, and the various events of human life, seem peculiarly calculated to promote this great end, and especially if, upon this supposition, we can account, even to our own narrow understandings, for many of those roughnesses and inequalities in life which querulous man too frequently makes the subject of his complaint against the God of nature.

这样来考察地球上人类的处境是颇有理由的，如果根据我们对精神实质的少许了解，通过调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周围的各种现象以及人类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似乎都是为促成这一伟大目标而特意安排的。尤其是，根据这一假设，我们甚至能够运用自身有限的理解力来解释生活中的许多不公平与不平等，爱发牢骚的人常常为此埋怨自然之神。

The first great awakeners of the mind seem to be the wants of the body. [19_1]

最初唤醒精神的伟大力量似乎就是肉体的需要 [20_1] 。

They are the first stimulants that rouse the brain of infant man into sentient activity; and such seems to be the sluggishness of original matter that unless by a peculiar course of excitements other wants, equally powerful, are generated, these stimulants seem, even afterwards, to be necessary to continue that activity which they first awakened. The savage would slumber for ever under his tree unless

he were roused from his torpor by the cravings of hunger or the pinchings of cold; and the exertions that he makes to avoid these evils, by procuring food, and building himself a covering, are the exercises which form and keep in motion his faculties, which otherwise would sink into listless inactivity. From all that experience has taught us concern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human mind, if those stimulants to exertion which arise from the wants of the body were removed from the mass of mankind, we have much more reason to think that they would be sunk to the level of brutes, from a deficiency of excitements, than that they would be raised to the rank of philosophers by the possession of leisure. In those countries where nature is the most redundant in spontaneous produce, the inhabitants will not be found the most remarkable for acuteness of intellect. Necessity has been with great truth called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Some of the noblest exertions of the human mind have been set in motion by the necessity of satisfying the wants of the body. Want has not unfrequently given wings to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oet, pointed the flowing periods of the historian, and added acuteness to the researches of the philosopher; and though there are undoubtedly many minds at present so far improved by the various excitements of knowledge, or of social sympathy, that they would not relapse into listlessness if their bodily stimulants were removed, yet it can scarcely be doubted that these stimulants could not be withdrawn from the mass of mankind without producing a general and fatal torpor, destructive of all the germs of future improvement.

肉体需要是最先唤醒婴儿大脑的刺激物，刺激它做有感受力的活动，这说明原始物质似乎具有很强的惰性。如果不通过特定的刺激方式产生同样强有力的其他需要，那么甚至是在刺激之后，这些刺激物仍是继续最初的刺激活动所必需的。如果不是饥饿的渴望和寒冷的痛

苦把野蛮人从麻木状态中唤醒，他们会永远躺在树下沉睡。他们不得不尽力获取食物、为自己建立栖身之所，以免受饥寒交迫之苦，这些努力就是一次次的锻炼，这种锻炼造就了他们身体的官能使其不断运动；不然，他们就会陷入无精打采的怠惰状态。根据我们对人脑结构的了解，如果消除广大群众的这种由肉体需要产生的刺激，那么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一定会因为缺乏刺激而沦为野蛮人，而不会利用闲暇时间跻身于哲学家的行列。在自然物产最为丰富的国家，其居民的智力不见得是最敏锐的。需要被称作发明之母，这颇具真理性。人类头脑所作的某些最高贵的努力，其实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肉体需要常常为诗人的想象力插上翅膀，引领历史学家进入创作的高峰期，使哲学家的研究更为犀利。尽管现在确实有许多人的头脑在知识和社会同情心的频频刺激下变得非常发达，即使没有肉体刺激，他们也不会再度陷入无精打采的状态，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一旦消除这些对广大群众的刺激，就会产生一种普遍的、致命性的麻木状态，就会毁灭未来进步的所有萌芽。

Locke, if I recollect, says that the endeavour to avoid pain rather than the pursuit of pleasure is the great stimulus to action in life: and that in looking to any particular pleasure, we shall not be roused into action in order to obtain it, till the contemplation of it has continued so long as to amount to a sensation of pain or uneasiness under the absence of it. To avoid evil and to pursue good seem to be the great duty and business of man, and this world appears to be peculiarly calculated to afford opportunity of the most unremitted exertion of this kind, and it is by this exertion, by these stimulants, that mind is formed. If Locke's idea be just, and there is great reason to think that it is, evil seems to be necessary to create exertion, and exertion seems evidently necessary to create mind.

我记得洛克说过，是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刺激了人们在生活中采取行动，他还说为获得某种特别的快乐，我们只会在对这种快乐思虑良久，直至感到失去这种快乐会痛苦不安时，才会采取行动去得到它。避恶趋善似乎是人类的伟大职责和事业，而这个世界似乎是特意安排机会让人不懈地做这种努力，正是由于这种努力和这些刺激，才形成了精神。如果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他是对的，那么为了促使人类作出努力，邪恶似乎是必要的，而努力对于创造精神显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The necessity of food for the support of life gives rise, probably, to a greater quantity of exertion than any other want, bodily or mental. The Supreme Being has ordained that the earth shall not produce food in great quantities till much preparatory labour and ingenuity has been exercised upon its surface. There is no conceivable connection to our comprehensions, between the seed and the plant or tree that rises from it. The Supreme Creator might, undoubtedly, raise up plants of all kinds, for the use of his creatures,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those little bits of matter, which we call seed, or even without the assisting labour and attention of man. The processes of ploughing and clearing the ground, of collecting and sowing seeds, are not surely for the assistance of God in his creation, but are made previously necessary to the enjoyment of the blessings of life, in order to rouse man into action, and form his mind to reason.

对维持生命的食物的需要，可能比其他肉体的或精神的需要更能让人类付出努力。上帝命令道，只有当人类在地球上付出大量劳动和才智之后，地球才可向人类提供充足的食物。在我们看来，种子和由种子长成的草木之间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联系。毫无疑问，造物主可以让各种植物生长，供其创造物使用，无需借助于我们称之为种子的

物质颗粒，甚至也无需人类的劳动和照看。耕地除草和收种播种的各个过程，当然不是为了帮助上帝造物，而是上帝为使人类享受幸福生活而作的必要的前提准备，旨在召唤人类积极行动，塑造理性的头脑。

To furnish the most unremitted excitements of this kind, and to urge man to further the gracious designs of Providence by the full cultivation of the earth, it has been ordained that population should increase much faster than food. This general law (as it has appeared in the former parts of this essay) undoubtedly produces much partial evil, but a little reflection may, perhaps, satisfy us, that it produces a great overbalance of good. Strong excitements seem necessary to create exertion, and to direct this exertion, and form the reasoning faculty, it seems absolutely necessary, that the Supreme Being should act always according to general laws. The constancy of the laws of nature, or the certainty with which we may expect the same effects from the same causes,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faculty of reason. If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ings, the finger of God were frequently visible, or to speak more correctly, if God were frequently to change his purpose (for the finger of God is, indeed, visible in every blade of grass that we see), a general and fatal torpor of the human faculties would probably ensue; even the bodily wants of mankind would cease to stimulate them to exertion, could they not reasonably expect that if their efforts were well directed, they would be crowned with success. The constancy of the laws of na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dustry and foresight of the husbandman, the indefatigable ingenuity of the artificer, the skilful researches of the physician and anatomist, and the watchful observation and patient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ural philosopher. To this constancy we owe all the greatest and noblest efforts of intellect. To this constancy we owe the immortal mind of a Newton.

为了不断提供这类刺激，为了促使人类精耕土地以实现上帝的神圣创意，上帝命令人口增长要远快于食物的增加。正如前文所示，这一普遍法则无疑造成了许多局部的邪恶，但稍作思考我们便会明白，其所产生的善远远多于恶。要使人不懈地努力，似乎得有很强的刺激才行，而要给人的努力指引方向并塑造人的推理思维能力，上帝必须始终按照普遍法则行事。自然法则的恒定性，或者说，那种同因同果的必然性，是人类推理能力的基础。如果在常规情况下上帝的神力时常可见，或更确切地说，如果上帝经常改变其意图（其实，上帝的神力从我们所见的每片草叶上都可以察觉到），那么人体的各种官能也许会随即陷入普遍而致命的麻痹状态中，甚至肉体需要也不再能刺激人类有所作为。如果他们的努力得到良好的引导，他们有理由期望会获得成功的王冠。自然法则的恒定性是农民勤勉劳作和深谋远虑的基础，是工匠不知疲倦地创造的基础，是医生和解剖学家得以娴熟地开展研究的基础，是自然哲学家谨慎观察和耐心考察的基础。人类智力所取得的一切最伟大最辉煌的成就，都归功于自然法则的恒定性。牛顿之所以名垂千古，也应感激自然法则的恒定性。

As the reasons, therefore, for the constancy of the laws of nature seem, even to our understandings, obvious and striking; if we return to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nd consider man as he really is, inert, sluggish, and averse from labour, unless compelled by necessity (and it is surely the height of folly to talk of man, according to our crude fancies of what he might be), we may pronounce with certainty that the world would not have been peopled, but for the superiority of the power of population to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Strong and constantly operative as this stimulus is on man to urge him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earth, if we still see that cultivation proceeds very slowly, we may fairly conclude that a less stimulus would have been insufficient. Even under the operation of this constant excitement, savages will

inhabit countries of the greatest natural fertility for a long period before they betake themselves to pasturage or agriculture. Had population and food increased in the same ratio, it is probable that man might never have emerged from the savage state. But supposing the earth once well peopled, an Alexander, a Julius Caesar, a Tamberlane, or a bloody revolution might irrecoverably thin the human race, and defeat the great designs of the Creator. The ravages of a contagious disorder would be felt for ages; and an earthquake might unpeople a region for ever. The principle, according to which population increases, prevents the vices of mankind, or the accidents of nature, the partial evils arising from general laws, from obstructing the high purpose of the creation. It keep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earth always fully up to the level of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and is constantly acting upon man as a powerful stumulus, urging him to the further cultivation of the earth, and to enable it, consequently, to support a more extended population. But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is law can operate, and produce the effects apparently intended by the Supreme Being, without occasioning partial evil. Unless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were to be altered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each separate country (which would not only be contrary to our universal experience, with regard to the laws of nature, but would contradict even our own reason, which sees the absolute necessity of general laws for the formation of intellect), it is evident that the same principle which, seconded by industry, will people a fertile region in a few years must produce distress in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long inhabited.

因此，在我们看来，自然法则恒定的原因是明显而突出的。如果我们再回头看看人口原理，思考一下人类的真实面目：懒惰、迟钝且厌恶劳动，迫于生活需要的情况除外（根据我们幼稚的幻想来谈论人

类的样子，肯定是极其愚蠢的），，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若不是人口增长力高于生活资料的增加力，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人居住了。这种刺激如此强烈而有效，才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如果我们仍发现耕作进展缓慢，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低于这种程度的刺激是不够的。即便不断受到这种刺激的影响，野蛮人也要在花很长时间致力于畜牧业或农业后，才可以在自然物产最丰饶的国家居住。假如人口和食物同比增长，人类可能永远也走不出野蛮状态。若假设地球上原本人口稠密，可是一个亚历山大大帝、一个尤里乌斯·恺撒大帝或一场血腥的革命就能把地球搞得人烟稀少，就可以毁坏造物主的伟大计划。一场瘟疫的蹂躏将持续数年之久，一场大地震可以使某个地区人烟绝迹。这种人类的恶行或自然灾害或普遍法则带来的局部的恶，会妨碍造物主实现其崇高的目标，人口增长法则可以阻止它们。在这个法则的作用下，地球上的人口数量总是和生活资料的数量不相上下；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它不断作用于人类，促使他们更努力地耕种土地，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但要在不引发局部邪恶的前提下运用这一法则并产生造物主预期的效果，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人口原理按照各国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变动（这不仅在自然法则方面有悖于我们的普遍经验，甚至还与我们的理性相抵触，因为理性认为普遍规律对智力的形成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否则很显然，同一人口原理，即依靠勤勉就能在几年内把富饶地区变得人口稠密的原理，也一定能使长期有人居住的国家陷入贫困。

It seems, however, every way probable that even the acknowledged difficulties occasioned by the law of population tend rather to promote than impede the general purpose of Providence. They excite universal exer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at infinite variety of situations, and consequently of impressions, which seems upon the whole favourable to the growth of mind. It is probable, that too great or too little excitement, extreme poverty, or too great riches may be alike unfavourable in this respect. The middle regions of society seem to be best suited to intellectual improvement, but it is

contrary to the analogy of all nature to expect that the whole of society can be a middle region. The temperate zones of the earth seem to be the most favourable to the mental and corporal energies of man, but all cannot be temperate zones. A world, warmed and enlightened but by one sun, must from the laws of matter have some parts chilled by perpetual frosts and others scorched by perpetual heats. Every piece of matter lying on a surface must have an upper and an under side, all the particles cannot be in the middle. The most valuable parts of an oak, to a timber merchant, are not either the roots or the branches, but these are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middle part, or stem, which is the object in request. The timber merchant could not possibly expect to make an oak grow without roots or branches, but if he could find out a mode of cultivation which would cause more of the substance to go to stem, and less to root and branch, he would be right to exert himself in bringing such a system into general use.

不过从各方面看，人口规律造成的那些公认的困难，很可能会有助于实现而不是妨碍上帝的总体意图。这些困难刺激全体人类作出努力，并促成了无限多样的状况，继而也就造成了各种印象，如此从整体上有利于精神的发展。过大或过小的刺激，如过度贫穷或过度富裕，可能同样不利于精神的发展。处在社会的中层阶级似乎最适于发展智力，但是期望社会全体成员都是中产阶级却是违反自然的。地球上的温带地区似乎最有利于人类的脑力和体力发展，但地球上不可能全是温带。根据物质规律，由于只有一个太阳温暖和照耀着这个世界，有些地方必然永远冰霜凛冽，而另一些地方则必然永远炽热炎炎。每一个放在平面上的的物质，必然有上下两面，不可能所有的微粒都在中间。对木材商来说，一颗橡树最有价值的部分既不是树根也不是树枝，但这两部分对于中间部分——树干的存在而言，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木材商不能指望一颗橡树无根无枝还会生长，但是，如果他能找到一种栽培方法，让树干长得粗大，让树根树枝长得小一些，

那么就算他把这套方法推广开来，也是无可非议的。

In the same manner, though we cannot possibly expect to exclude riches and poverty from society, yet if we could find out a mode of government by which the numbers in the extreme regions would be lessened and the numbers in the middle regions increased, it would be undoubtedly our duty to adopt it. It is not, however, improbable that as in the oak, the roots and branches could not be diminished very greatly without weakening the vigorous circulation of the sap in the stem, so in society the extreme parts could not be diminished beyond a certain degree without lessening that animated exertion throughout the middle parts, which is the very cause that they are the most favourable to the growth of intellect. If no man could hope to rise or fear to fall, in society, if industry did not bring with it its reward and idleness its punishment, the middle parts would not certainly be what they now are. In reasoning upon this subject, it is evident that we ought to consider chiefly the mass of mankind and not individual instances. There are undoubtedly many minds, and there ought to be many, according to the chances out of so great a mass, that, having been vivified early by a peculiar course of excitements, would not need the constant action of narrow motives to continue them in activity. But if we were to review the various useful discoveries, the valuable writings, and other laudable exertions of mankind, I believe we should find that more were to be attributed to the narrow motives that operate upon the many than to the apparently more enlarged motives that operate upon the few.

同样，尽管我们无法指望消除社会中的贫富现象，但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管理制度，能借以减少贫富两个极端的人口，增加中产阶级

的人数，那么毫无疑问我们有义务采取这种制度。不过，不妨以橡树为例，大幅度减少树根和树枝，势必会影响树干里树液的循环活力，所以，过度减少社会中贫富两极的人数，必然会减弱整个中产阶级的活力，而这种活力正是最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智力增长的原因。如果没有人想向社会上层攀登或者担心从社会上层的位置跌下来，如果没有奖勤罚惰，那么中产阶级肯定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显然应着眼于广大群众而非个别人。毫无疑问，现在有才华的人很多，而且以如此巨大的基数，有才华的人理应有很多；他们因为受到特别的刺激而焕发了活力，以后不再需要狭隘动机的驱使来保持活力。但如果我们要是回顾一下各种有用的发现、有价值的著作以及人类作出的其他值得称道的努力，我想我们会发现，人们作这种努力大多是出于影响多数人的狭隘动机，而不是出于影响少数人的高尚动机。

Leisure is, without doubt, highly valuable to man, but taking man as he is, the probability seems to be that in the greater number of instances it will produce evil rather than good. It has been not infrequently remarked that talents are more common among younger brothers than among elder brothers, but it can scarcely be imagined that younger brothers are, upon an average, born with a greater original susceptibility of parts. The difference, if there really is any observable difference, can only arise from their different situations. Exertion and activity are in general absolutely necessary in one case and are only optional in the other.

闲暇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但就人类现在的状况而言，闲暇更多情况下可能会给人带来恶而不是善。弟弟常比哥哥有才华，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不能说，总体上弟弟天生就有更强的原始敏感性。如果真的有任何可以察觉的差别，那就是上述这种差异也只是因他们所处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对一方来说付出努力和积

极行动一般是绝对不可少的，而对另一方来说，则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That the difficulties of life contribute to generate talents, every day's experience must convince us. The exertions that men find it necessary to make, in order to support themselves or families, frequently awaken faculties that might otherwise have lain for ever dormant, and it has been commonly remarked that new and extraordinary situations generally create minds adequate to grapple with the difficulties in which they are involved.

生活的磨难有助于造就人才，日常经验让我们信服这一点。男人为养活自己或家庭必须付出的努力频频唤醒他们的能力，否则这种能力可能会永远休眠；而且当局势有新的特殊变化时，通常会造就出伟大的人物，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所遭遇到的苦难，这样的情形总是屡见不鲜。

[19_1].It was my intention to have entered at some length into this subject as a kind of second part to the Essay. A long interruption, from particular business, has obliged me to lay aside this intention, at least for the present. I shall now, therefore, only give a sketch of a few of the leading circumstances that appear to me to favour the general supposition that I have advanced.

[20_1].我本打算在本文第二章对这一话题加以详尽论述的。但其他事情耽误了我很久，我不得不搁置初衷，至少目前看来如此。因此，在这里，我只概述几个主要情形，因为这些情形在我看来有利于证实我提出的那个普遍性假设。

CHAPTER 19

第十九章

The sorrows of life necessary to soften and humanize the heart.—The excitement of social sympathy often produce characters of a higher order than the mere possessors of talents.—Moral evil probably necessary to the production of moral excellence.—Excitements from intellectual wants continually kept up by the infinite variety of nature, and the obscurity that involves metaphysical subjects.—The difficulties in Revelation to be accounted for upon this principle.—The degree of evidence which the scriptures contain, probably, best suited to the improvements of the human faculties, and the moral amelioration of mankind.—The idea that mind is created by excitements seems to account for the existence of natural and moral evil.

人生的悲苦可柔化人心、使之富有人情——由社会同情心的激励培养出的人比仅有才能的人高一层次——要产生道德上的至善也许需要道德上的恶——大自然的无穷变化、形而上学问题的晦涩难解，总是让源于智力需求的刺激得以持续——应根据该原理解释启示中那些难懂的地方——圣经所包含证据范围，也许最适合改善人体机能、提高其道德水平——精神产生于刺激这一观点，似乎可以解释自然之恶与道德之恶存在的原因。

The sorrows and distresses of life form another class of excitements, which seem to be necessary, by a peculiar train of impressions, to soften and humanize the heart, to awaken social sympathy, to generate all the Christian virtues, and to afford scope

for the ample exertion of benevolence. The general tendency of an uniform course of prosperity is rather to degrade than exalt the character. The heart that has never known sorrow itself will seldom be feelingly alive to the pains and pleasures, the wants and wishes, of its fellow beings. It will seldom be overflowing with that warmth of brotherly love, those kind and amiable affections, which dignify the human character even more than the possession of the highest talents. Talents, indeed, though undoubtedly a very prominent and fine feature of mind, can by no means be considered as constituting the whole of it. There are many minds which have not been exposed to those excitements that usually form talents, that have yet been vivified to a high degree by the excitements of social sympathy. In every rank of life, in the lowest as frequently as in the highest, characters are to be found overflowing with the milk of human kindness, breathing love towards God and man, and, though without those peculiar powers of mind called talents, evidently holding a higher rank in the scale of beings than many who possess them. Evangelical charity, meekness, piety, and all that class of virtues distinguished particularly by the name of Christian virtues do not seem necessarily to include abilities; yet a soul possessed of these amiable qualities, a soul awakened and vivified by these delightful sympathies, seems to hold a nearer commerce with the skies than mere acuteness of intellect.

人生的悲苦构成另一类刺激，它可产生一系列特殊的印象，对于柔化人心、使之富有人情味，对于唤起社会同情心，对于生成基督教的一切美德，对于让慈善博爱之心得到充分施展，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事事顺遂、一切如意，非但不会让人品高尚，反而会使之堕落。未曾经历不幸的人，很少会感受到同类的痛苦和快乐，需要与希望。他们内心很少洋溢着手足之情的温暖和友善温柔的情感，具备这样的情感比拥有极高的才能更能让人品变得高尚。才能无疑是人类精神的

一个显著而优良的特征，但决不能将它视作精神的全部。有许多人虽然没有触及塑造才能的刺激，却在社会同情心的刺激下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在生活的每个阶层，无论是最高阶层还是最低阶层，都有一些满怀仁爱之心的人，他们向上帝和人类呈现出无限的爱；虽然他们没有那种叫作才能的特殊的精神能力，但是在人类的阶梯上，他们所站的位置显然要比许多有才能的人更高。传道士特有的博爱、谦卑、虔诚以及所有被特别冠以基督教美德之名的品质，并不一定包含才能，但一个具备这些优良品质的灵魂，一个被这些令人快慰的怜悯之举所唤醒而活力激扬的灵魂，应该比只是才智敏锐的人更接近苍穹。

The greatest talents have been frequently misapplied and have produced evil proportionate to the extent of their powers. Both reason and revelation seem to assure us that such minds will be condemned to eternal death; but while on earth, these vicious instruments performed their part in the great mass of impressions, by the disgust and abhorrence which they excited. It seems highly probable that moral evil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the production of moral excellence. A being with only good placed in view may be justly said to be impelled by a blind necessity. The pursuit of good in this case can be no indication of virtuous propensities. It might be said, perhaps, that infinite wisdom cannot want such an indication as outward action, but would foreknow with certainly whether the being would choose good or evil. This might be a plausible argument against a state of trial, but will not hold against the supposition that mind in this world is in a state of formation. Upon this idea, the being that has seen moral evil and has felt disapprobation and disgust at it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being that has seen only good. They are pieces of clay that have received distinct impressions: they must, therefore, necessarily be in different shapes; or, even if we allow them both to have the same

lovely form of virtue,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at one has undergone the further process, necessary to give firmness and durability to its substance, while the other is still exposed to injury, and liable to be broken by every accidental impulse. An ardent love and admiration of virtue seems to imply the existence of something opposite to it; and it seems highly probable that the same beauty of form and substance, the same perfection of character, could not be generated without the impressions of disapprobation which arise from the spectacle of moral evil.

卓越的才能常常被滥用，故而能力越强，造成的恶也越大。理性和神启似乎都让我们确信，滥用才能的人必将永不复生，不过在世间，这些恶者常激起厌恶和反感，给人们留下许多深刻的印象，所以也是自有其用处。要实现道德上的至善，道德上的恶似乎是绝对必要的。一个人的世界里若只有善，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个人一定会被盲目的必然性驱使。在这种情况下，对善的追求丝毫不能说明他的道德倾向。或许可以说，拥有无限智慧的上帝不可能要求一个人拿外在的行动来显示其道德倾向，他预先就确切地知道这个人是选择善还是选择恶。这一点也许能否定人生是一场考验，但是同这个世界上的精神还处于形成之中的推断却不矛盾。根据这一观点，看见道德上的恶并对之产生反感和憎恶的人，实质上并不同于只看见善的人。两种人都是用黏土做的，但接收的印象却迥然不同，因而他们的形态必然不同；或者，即使两种人具有同样令人愉悦的美德，我们也必须承认，前一种人阅历丰富，性格坚强而刚毅，后一种人则较脆弱，很容易受偶然冲动的摆布。要衷心地赞美和热爱美德，就必须存在同美德相对立的东西。没有见过道德上的恶，就不会体验到由此而产生的厌恶感；而没有这种厌恶感，很有可能不会生成形式与本质的那种美，也不可能实现性格上的那种至善。

When the mind has been awakened into activity by the

passions, and the wants of the body, intellectual wants arise; and the desire of knowledge, and the impatience under ignorance, form a new and important class of excitements. Every part of nature seems peculiarly calculated to furnish stimulants to mental exertion of this kind, and to offer inexhaustible food for the most unremitted inquiry. Our immortal Bard says of Cleopatra——“Custom cannot stale Her infinite variety.”

当情欲和肉体的需要唤醒了精神，把它转化为行动之后，就产生了智力需要。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在愚昧无知状态下的焦躁，构成一种新的、重要的刺激。大自然的每一部分似乎都有特别的安排，刺激头脑，让它做出这种心智上的努力，似乎专意为人的不懈探索提供了无尽的食物。已离我们而去的诗人莎士比亚在谈及古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时说：习俗不能减损她的千姿百态。

The expression, when applied to any one object, may be considered as a poetical amplification, but it is accurately true when applied to nature. Infinite variety seems, indeed, eminently her characteristic feature. The shades that are here and there blended in the picture give spirit, life, and prominence to her exuberant beauties, and those roughnesses and inequalities, those inferior parts that support the superior, though they sometimes offend the fastidious microscopic eye of short-sighted man, contribute to the symmetry, grace, and fair proportion of the whole.

这句话若是用来描述某一物体，可能被认为是诗意的夸张，但是用来描绘自然，却是精确而实在的。森罗万象、生机无限正是大自然最突出的特点。画面上的散落开来而又巧妙结合在一起的斑驳光影，给自然的壮美带来了灵气、生机和风姿；而那些粗陋坑凹之处，那些

衬托着优良精美的低劣之处，，虽然时常令吹毛求疵、挑剔苛刻的近视者感到不悦，但是整个画面却因此变得对称、优雅和协调。

The infinite variety of the forms and operations of nature, besides tending immediately to awaken and improve the mind by the variety of impressions that it creates, opens other fertile sources of improvement by offering so wide and extensive a field for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Uniform, undiversified perfection could not possess the same awakening powers. When we endeavour then to contemplate the system of the universe; when we think of the stars as the suns of other systems scattered throughout infinite space; when we reflect that we do not probably see a millionth part of those bright orbs that are beaming light and life to unnumbered worlds; when our minds, unable to grasp the immeasurable conception, sink, lost and confounded, in admiration at the mighty incomprehensible power of the Creator; let us not querulously complain that all climates are not equally genial; that perpetual spring does not reign throughout the year; that it God's creatures do not possess the same advantages; that clouds and tempests sometimes darken the natural world and vice and misery the moral world; and that all the works of the creation are not formed with equal perfection. Both reason and experience seem to indicate to us that the infinite variety of nature (and variety cannot exist without inferior parts, or apparent blemishes) is admirably adapted to further the high purpose of the creation and to produce the greatest possible quantity of good.

大自然造化万千，它不仅给人留下多彩多姿的印象，直接唤醒并改善人类的大脑，还为人类提供了广阔无比的探索和研究领域，从而为完善人的精神境界开辟了丰富多样的途径。始终如一、千篇一律的

尽善尽美不会有这种启迪人心的力量。因此，当我们思索整个宇宙的时候，当我们把点点繁星看作是散布在无限空间里的其他星系的太阳时，当我们想到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将光芒和生命赋予无数世界的天体，竟不到其总数的百万分之一的时候，当我们的头脑无法把握这样不可估量的概念，因而感到失落、消沉和困惑，同时又对造物主那不可思议的巨大力量赞叹不已的时候，让我们不要挑剔抱怨气候并不总是温暖宜人，不要抱怨一年里并不总是春光明媚，不要抱怨上帝创造的一切并不享有同样的有利条件，不要抱怨乌云和暴风雨常常把自然世界弄得一片昏暗，罪恶和苦难常常令道德世界昏黑一片，不要抱怨同是天设地造却并非一样完美。理性和经验告诉我们，大自然的千变万化（没有优劣之分、没有瑕瑜互见，也就无所谓变化之说），恰恰是为了实现上帝创造世界的崇高目的，让世间产生尽可能多的善。

The obscurity that involves all metaphysical subjects appears to me, in the same manner, peculiarly calculated to add to that class of excitements which arise from the thirst of knowledge. It is probable that man, while on earth, will never be able to attain complete satisfaction on these subjects; but this is by no means a reason that he should not engage in them. The darkness that surrounds these interesting topics of human curiosity may be intended to furnish endless motives to intellectual activity and exertion. The constant effort to dispel this darkness, even if it fail of success, invigorates and improves the thinking faculty. If the subjects of human inquiry were once exhausted, mind would probably stagnate; but the infinitely diversified forms and operations of nature, together with the endless food for speculation which metaphysical subjects offer, prevent the possibility that such a period should ever arrive.

对我而言，一切形而上学问题的晦暗不明也是被刻意安排的，从而来增加源于求知欲的刺激。人类只要在地球上，恐怕就永远无法完

全弄明白这类问题，但这绝不是说人不应该研究它们。这些牵涉人类好奇心的有趣问题被黑暗笼罩着，大概是为了不断激励人的智力活动和智力发挥。为驱除这种黑暗所作的不懈努力，即使达不到目的，也会激活和提高人的思维能力。人类探究的对象一旦穷尽，人的头脑很可能也会停滞不前。不过，因为大自然的形态形形色色，大自然的活动也是千变万化，加上形而上学问题又提供了无尽的资料供人类思考推断，所以，那样的时候永远不会到来。

It is by no means one of the wisest sayings of Solomon that 'there is no new thing under the sun.' On the contrary, it is probable that were the present system to continue for millions of years, continual additions would be making to the mass of human knowledge, and yet, perhaps, it may be a matter of doubt whether what may be called the capacity of mind be in any marked and decided manner increasing. A Socrates, a Plato, or an Aristotle, however confessedly inferior in knowledge to the philosophers of the present day, do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much below them in intellectual capacity. Intellect rises from a speck, continues in vigour only for a certain period, and will not perhaps admit while on earth of above a certain number of impressions. These impressions may, indeed, be infinitely modified, and from these various modifications, added probably to a difference in the susceptibility of the original germs, arise the endless diversity of character that we see in the world; but reason and experience seem both to assure us that the capacity of individual minds does not increase in proportion to the mass of existing knowledge. (It is probable that no two grains of wheat are exactly alike. Soil undoubtedly makes the principal difference in the blades that spring up, but probably not all. It seems natural to suppose some sort of difference in the original germs that are afterwards awakened into thought, and the extraordinary difference of

susceptibility in very young children seems to confirm the supposition.)

所罗门曾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他说过很过睿智的话，但这个说法并不睿智。相反，倘若现在这个宇宙还要存在千百万年，人类知识的总量很可能会继续增加，不过，所谓的智力是否能有显著提高，这值得怀疑。苏格拉底、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不论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与当今的哲学家相比有多么明显的差距，他们的智力好像不比当今的哲学家逊色多少。智力产生于一颗微粒，其活力仅能持续一段时间，在这个世界上只能接受一定量的印象。诚然，这些印象可以无限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使原胚的感受性差异有所增强，由此形成了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见的不计其数的特性。但是，理性和经验让我们确信，个人的智力并不会随着已有知识总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世界上恐怕不存在两颗相同的麦粒。无疑，造成麦子叶片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土壤，但未必所有的差异都是土壤造成的。我们会自然地设想日后被唤醒继而转变成有思维的人的原胚之内本来就存在某种差异，幼儿感受性的巨大差异似乎可以印证这个想法。）

The finest minds seem to be formed rather by efforts at original thinking, by endeavours to form new combinations, and to discover new truths, than by passively receiving the impressions of other men's ideas. Could we suppose the period arrived, when there was not further hope of future discoveries, and the only employment of mind was to acquire pre-existing knowledge, without any efforts to form new and original combinations, though the mass of human knowledge were a thousand times greater than it is at present, yet it is evident that one of the noblest stimulants to mental exertion would have ceased; the finest feature of intellect would be lost; everything allied to genius would be at an end; and it appears to be impossible, tha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ny individuals could

possess the same intellectual energies as were possessed by a Locke, a Newton, or a Shakespeare, or even by a Socrates, a Plato, an Aristotle, or a Homer.

给人的印象是：最聪明的头脑不是由被动地接受他人的思想印象造就的，而是通过不懈的努力，运用创造性思维，努力构建新组合体，发现新真理而形成的。我们可以设想，有一天人类再也不可能有新发现的，运用脑力只能获取已有的知识，再也不需要付出形成新东西、新思想的努力。也许那时候人类的知识总量比现在多一千倍，但是对智力活动的一种最宝贵的刺激却没有了，智力的最优异的特征也丧失了，一切与创造力有关的东西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的智力都不及洛克、牛顿、莎士比亚，甚至不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荷马。

If a revelation from heaven of which no person could feel the smallest doubt were to dispel the mists that now hang over metaphysical subjects, were to explain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mind, the affections and essences of all substances, the mode in which the Supreme Being operates in the works of the creation, and the whole plan and scheme of the Universe, such an accession of knowledge so obtained, instead of giving additional vigour and activity to the human mind,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tend to repress future exertion and to damp the soaring wings of intellect.

假若天降启示（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将现在笼罩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谜团一扫而光，向人们解说精神的本质和结构，讲明一切物质的特性与实质，让人们了解上帝创造万物的方式以及宇宙的整体格局，这当然会增加人类的知识，但人类由此而获得的知识非但不能更加激励人的精神活动，反而极可能抑制未来的活动，折断人类智力飞

翔的翅膀。

For this reason I have never considered the doubts and difficulties that involve some parts of the sacred writings as any ardent against their divine original. The Supreme Being might, undoubtedly, have accompanied his revelations to man by such a succession of miracles, and of such a nature, as would have produced universal overpowering conviction and have put an end at once to all hesitation and discussion. But weak as our reason is to comprehend the plans of the great Creator, it is yet sufficiently strong to see the most striking objections to such a revelation. From the little we know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we must be convinced that an overpowering conviction of this kind, instead of tending to the improvement and moral amelioration of man, would act like the touch of a torpedo on all intellectual exertion and would almost put an end to the existence of virtue. If the scriptural denunciations of eternal punishment were brought home with the same certainty to every man's mind as that the night will follow the day, this one vast and gloomy idea would take such full possession of the human faculties as to leave no room for any other conceptions; the external actions of men would be all nearly alike; virtuous conduct would be no indication of virtuous disposition; vice and virtue would be blended together in one common mass; and though the all-seeing eye of God might distinguish them, they must necessarily make the same impressions on man, who can judge only from external appearances. Under such a dispens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conceive how human beings could be formed to a detestation of moral evil, and a love and admiration of God, and of moral excellence.

因此，虽然圣经的某些篇章里有疑点和难点，但我从不就此认为圣经不是源自神圣的上帝。毫无疑问，上帝原本可以在降下启示的同时拿出一连串奇迹，让人类对上帝的意图深信不疑，一举消除一切迟疑与争论，可上帝并没有这么做。不过，我们虽然缺乏理性，理解不了上帝的意旨，但还是能够看出上帝不这么做是有十分明显的理由的。根据对人类理解力的有限了解，我们一定相信，对上帝意旨的深信不疑非但无助于人类自身的改善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反而会彻底破坏所有的心智努力，使人类的美德不复存在。如果让每一个人都确定无疑地明白圣经上所警告的永恒惩罚，就像知道白天之后是黑夜那样，那么这样沉重而阴郁的意念就会完全控制人类的官能，使人类不能有其他的思考，人类的行为将会变得几乎完全相同，善行将不再能说明其有善心，善与恶将会相互融合成为一体。虽然上帝有明察秋毫的眼睛可以辨明善与恶，但善与恶必定会给人类造成完全相同的印象，而人类只能根据表象来判断善与恶。上天如果做此安排，我们很难想象人类将如何被塑造得厌恶道德之恶、敬爱崇拜上帝、推崇道德至善。

Our ideas of virtue and vice are not, perhaps, very accurate and well-defined; but few, I think, would call an action really virtuous which was performed simply and solely from the dread of a very great punishment or the expectation of a very great reward.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very justly said to be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but the end of wisdom is the love of the Lord and the admiration of moral good. The denunciations of future punishment contained in the scriptures seem to be well calculated to arrest the progress of the vicious and awaken the attention of the careless, but we see from repeated experience that they are not accompanied with evidence of such a nature as to overpower the human will and to make men lead virtuous lives with vicious dispositions, merely from a dread of hereafter. A genuine faith, by which I mean a faith that shews itself in it the virtues of a truly Christian life, may generally

be considered as an indication of an amiable and virtuous disposition, operated upon more by love than by pure unmixed fear.

也许我们有关善与恶的观念并不是非常精确、清晰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惧怕被严厉惩罚或者因为希望得到巨大报偿而做出一种举动，我想恐怕不会有人把这种行为称为善行。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这样说非常妥当，但智慧的终点却是热爱上帝和崇敬道德上的善。圣经里所说的关于未来惩罚的警告，似乎是刻意要阻止恶人为所欲为，警醒漫不经心者要小心谨慎，但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圣经里的说法并没有有力的证据，不足以左右人的意志，不足以让性本恶的人仅仅因为害怕来世遭受惩罚而追求合乎道德的生活。一般而言，真正的信仰，我指的是从纯正的基督徒身上的所有美德中脱颖而出的信仰，代表了一种温厚敦良的性情，而温厚敦良的性情与其说源于纯粹的畏惧，还不如说是源于爱。

When we reflect on the temptations to which man must necessarily be exposed in this world, from the structure of his frame,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laws of nature, and the consequent moral certainty that many vessels will come out of this mighty creative furnace in wrong shapes, it is perfectly impossible to conceive that any of these creatures of God's hand can be condemned to eternal suffering. Could we once admit such an idea, all our natural conceptions of goodness and justice would be completely overthrown, and we could no longer look up to God as a merciful and righteous being. But the doctrine of life and Mortality which was brought to light by the gospel, the doctrine that the end of righteousness is everlasting life, but that the wages of sin are death, is in every respect just and merciful, and worthy of the Great Creator. Nothing can appear more consonant to our reason than that those beings which come out of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the

world in lovely and beautiful forms should be crowned with immortality, while those which come out misshapen, those whose minds are not suited to a purer and happier state of existence, should perish and be condemned to mix again with their original clay. Eternal condemnation of this kind may be considered as a species of eternal punishment, and it is not wonderful that it should be represented, sometimes, under images of suffering. But life and death, salvation and destruction, are more frequently opposed to each other in the New Testament than happiness and misery. The Supreme Being would appear to us in a very different view if we were to consider him as pursuing the creatures that had offended him with eternal hate and torture, instead of merely condemning to their original insensibility those beings that, by the operation of general laws, had not been formed with qualities suited to a purer state of happiness.

由于其肉体的构造、自然法则的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信念（许多从这个创造万物的大熔炉里造就的容器肯定被造得歪七扭八），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必然要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当仔细考察了这些诱惑之后，我们怎么也不可能认为，上帝之手创造的这些东西会被判处遭受永世的折磨。一旦我们接受这样的理念，我们有关善与正义的自然认识就会被完全颠覆，就不会再把上帝看作是大慈大悲、主持公道的主。但福音书昭示的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教义认为，正义的结果是永生，而罪恶的下场是死亡，这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正当仁慈的，绝对是造物主的意旨。由创世进程走出的那些可爱而俊美的人终将获得永生；而生来畸形丑陋且其精神状态不适于纯洁、幸福生活的人应该灭绝，并注定再度和造成他们的泥土混为一体，这样的情形似乎最符合我们的理性。这种永恒的判决可以被视为一种永恒的惩罚，这样的惩罚有时表现为受苦受难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圣经·新约》里经常展现的是生与死、拯救与毁灭的对立，而不是幸福与苦难的对立。由于普遍法则的作用，有些人生来就不具备适于纯洁幸福的生活

的素质，如果我们认为上帝不仅仅判处这些人返回原初的混沌状态，还会永远厌恶并折磨触犯过他的人，那么上帝在我们眼里就会是另一种形象。

Life is, generally speaking, a blessing independent of a future state. It is a gift which the vicious would not always be ready to throw away, even if they had no fear of death. The partial pain, therefore, that is inflicted by the Supreme Creator, while he is forming numberless beings to a capacity of the highest enjoyments, is but as the dust of the balance in comparison of the happiness that is communicated, and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think that there is no more evil in the world than wha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as one of the ingredients in the mighty process.

一般说来，生命是一种恩赐，和未来状态无关；它是神授之物，即使是不怕死的恶者也不愿舍弃。因此，造物主在创造出无数众生使其能够享受无限幸福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痛苦，但和他赐予的幸福相比，痛苦只不过是天平上的灰尘。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世间的罪恶只是壮阔的造物进程的一个要素，但并没有超过绝对必要的限度。

The striking necessity of general laws for the formation of intellect will not in any respect be contradicted by one or two exceptions, and these evidently not intended for partial purposes, but calculated to operate upon a great part of mankind, and through many ages. Upon the idea that I have given of the formation of mind,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general laws of nature, by a divine revelation, will appear in the light of the immediate hand of God mixing new ingredients in the mighty mass, suited to

the particular state of the process, and calculated to give rise to a new and powerful train of impressions, tending to purify, exalt, and improve the human mind. The miracles that accompanied these revelations when they had once excited the attention of mankind, and rendered it a matter of most interesting discussion, whether the doctrine was from God or man, had performed their part, had answered the purpose of the Creator, and these communications of the divine will were afterwards left to make their way by their own intrinsic excellence; and, by operating as moral motives, gradually to influence and improve, and not to overpower and stagnate the faculties of man.

理智的形成显然必须有一般规律，出现一两个例外并不会否定这一点。一般规律显然不是要达到局部的目的，而是要经过世世代代影响绝大多数人。根据我对精神形成过程的认识，神的启示对一般自然法则的违背，似乎是上帝亲手将新的要素加入精神形成这一伟大过程，以适应该过程中的特殊状态，有意造成一系列新的、强有力的印象，从而净化、提高和改善人类精神。一旦人类注意到伴随着这些启示出现的奇迹，并兴味盎然地讨论教义是出自上帝之手还是出自人类之手这一问题时，那些奇迹也就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实现了造物主的目的。之后，这些传达神意的形式凭借其内在的卓越品质开辟道路，同时又作为道德动机发挥作用，逐渐影响和改善——而不是制约和阻滞——人类官能的发展。

It would be, undoubtedly, presumptuous to say that the Supreme Being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effected his purpose in any other way than that which he has chosen, but as the revelation of the divine will which we possess is attended with some doubts and difficulties, and as our reason points out to us the strongest objections to a revelation which would force immediate, implicit,

universal belief, we have surely just cause to think that these doubts and difficulties are no argument against the divine origin of the scriptures, and that the species of evidence which they possess is best sui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human faculties and the moral amelioration of mankind.

若认为上帝只会以其选定的方式而不会以其他方式来实现其意图，这无疑是武断的，但是由于我们得到的神意启示总是伴有一些疑问和费解之处，并且理性总是要我们对那种迫使我们立即、绝对而全面地接受信仰的启示产生极强烈的抵触，因而我们确实有正当的理由认为：这些疑问和费解之处绝不是否定圣经神授的理由，圣经里的证据最有利于人类官能的完善，最有利于人类的道德水平的提高。

The idea that the impressions and excitements of this world are the instruments with which the Supreme Being forms matter into mind, and that the necessity of constant exertion to avoid evil and to pursue good is the principal spring of these impressions and excitements, seems to smooth many of the difficulties that occur in a contemplation of human life, and appears to me to give a satisfactory reason for the existence of natural and moral evil, and, consequently, for that part of both, and it certainly is not a very small part, which arises from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But, though, upon this supposition, it seems highly improbable that evil should ever be removed from the world; yet it is evident that this impression would not answer the apparent purpose of the Creator; it would not act so powerfully as an excitement to exertion, if the quantity of it did not diminish or increase with the activity or the indolence of man. The continual variations in the weight an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is pressure keep alive a constant expectation of throwing it off.

这个世界给人带来的种种印象和刺激，是上帝将物质塑造成精神的工具，而不断努力避恶趋善的必要性则是产生这些印象和刺激的主要源泉。这种认识似乎可以消除我们在思考人生时遇到的诸多难题；而在我看来，它似乎也是解释自然之恶和道德之恶存在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继而说明为什么源于人口原理的这两种恶确实并非小恶。虽说根据这个假设，恶绝不会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除，但是很显然，它不会实现造物主显而易见的目的。如果恶的量没有因为人类的勤奋和或懒惰而增减，那么恶也绝不会强有力地刺激人们做出努力。这种压力在重量和分布上的不断变化，使人类一直怀有最终摆脱压力的希望。

“Hope springs eternal in the Human breast, Man never is, but always to be blest.”

“希望永远在人的胸间涌流，幸福的降临永远是在未来，而不是现在。”

Evil exists in the world not to create despair but activity. We are not patiently to submit to it, but to exert ourselves to avoid it. It is not only the interest but the duty of every individual to use his utmost efforts to remove evil from himself and from as large a circle as he can influence; and the more he exercises himself in this duty, the more wisely he directs his efforts, and the more successful these efforts are; the more he will probably improve and exalt his own mind, and the more completely does he appear to fulfil the will of his Creator.

世上存在恶不是为了让人悲观绝望，而是为了激励人的能动性。

我们不会甘于向恶屈服，但要尽力避免它。尽最大努力消除自身的恶，并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尽力消除恶，这不仅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更是每个人的义务。每个人越能履行这种义务，就越能正确地把握努力的方向，而努力的成果就会越大；个人也越有可能完善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就越能完满地实现造物主的意志。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A New View of Society or Essays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Human Character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to Practice

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形成之原理及其应用

Robert Dale Owen
罗伯特·欧文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形成之原理及其应用

A New View of Society or Essays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Human Character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to Practice

罗伯特·欧文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First Essay: On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论文一：关于性格的形成
- Second Essay: The Principles of the Former Essay Continued and Applied in Part to Practice 论文二：继续阐述上篇论文的原理及该原理被局部付诸实践的情形
- Third Essay: The Principles of the Former Essays Applied to a Particular Situation 论文三：前面几篇论文所阐述的原理在特定情形下的应用
- Fourth Essay: The Principles of the Former Essays Applied to Government 论文四：前几篇论文的原理在政治上的运用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First Essay: On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论文一：关于性格的形成

According to the last returns under the Population Act, the poor and working classe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have been found to exceed fifteen millions of persons, or nearly three-fourths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British Islands.

根据《人口法案》的最新报告，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贫困人口以及工人阶级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一千五百万，几乎占了不列颠群岛总人口的四分之三。

The characters of these persons are now permitted to be very generally formed without proper guidance or direction, and, in many cases, under circumstances which directly impel them to a course of extreme vice and misery; thus rendering them the worst and most dangerous subjects in the empire; while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remainder of the community are educated upon the most mistaken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 such, indeed, as cannot fail to produce a general conduct throughout society, totally unworthy of the character of rational beings.

这些人在性格形成过程中，普遍没有得到过适当的引导。在很多情况下，环境甚至直接驱使他们走上极端邪恶或悲惨的道路，从而使其成为帝国最恶劣、最危险的臣民。与此同时，社会上其余的人，绝大部分接受的教育都是基于错误的人性原则，这种原则必定会使整个

社会形成一种完全与理性之人的性格完全相悖的普遍行为。

The first thus unhappily situated are the poor and the uneducated profligate among the working classes, who are now trained to commit crimes, for the commission of which they are afterwards punished.

第一类人是处于这种不幸境地的贫困人口以及工人阶级中没有受过教育的放荡者。这些人目前所受的教育促使他们去犯罪，继而又因为犯罪而受罚。

The second is the remaining mass of the population, who are now instructed to believe, or at least to acknowledge, that certain principles are unerringly true, and to act as though they were grossly false; thus filling the world with folly and inconsistency, and making society, throughout all its ramifications, a scene of insincerity and counteraction.

除此之外的人民大众是第二类。这类人目前受到的教导就是要他们相信，或至少是去承认某些原理是完全正确的，而他们被教导做的事又好像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一来，这个世界便充满了荒诞和矛盾，社会的各方面也因此充斥着虚伪和对抗。

In this state the world has continued to the present time; its evils have been and are continually increasing; they cry aloud for efficient corrective measures, which if we longer delay, general disorder must ensue.

直到现在，整个世界都处在这样一种境地，其危害一直持续并呈变本加厉之势。我们急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匡正，若再拖延下去，必将发生普遍性混乱。

'But,' say those who have not deeply investigated the subject, 'attempts to apply remedies have been often made, yet all of them have failed. The evil is now of a magnitude not to be controlled; the torrent is already too strong to be stemmed; and we can only wait with fear or calm resignation to see it carry destruction in its course, by confounding all distinctions of right and wrong.'

“可是，”那些并没有深究这个问题的人声称，“我们经常试图采取补救措施，但都是徒劳。现在危害已经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犹如大水泛滥，势不可阻。我们只能静静地等待，忐忑不安却无可奈何，看着它混淆是非，不断带来破坏。”

Such is the language now held, and such are the general feelings on this most important subject.

这就是当前的言论，这就是人们对于这一极其重要的议题的普遍感受。

These, however, if longer suffered to continue, must lead to the most lamentable consequences. Rather than pursue such a course, the character of legislators would be infinitely raised, if, forgetting the petty and humiliating contentions of sects and parties, they

would thoroughly investigate the subject, and endeavour to arrest and overcome these mighty evils.

然而，倘若任其发展，就必定会导致极其可悲的后果。反之，如果立法者忘却教派和党派之间琐碎而令人蒙羞的纷争，彻底地调查这一问题，并且努力去遏制、战胜这些巨大的危害，那么他们的声望将会无限地提高。

The chief object of these Essays is to assist and forward investigations of such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well-being of this country, and of society in general.

这些论文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并推进这些调查工作，这些调查工作对这个国家以及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The view of the subject which is about to be given has arisen from extensive experience for upwards of twenty years, during which period its truth and importance have been proved by multiplied experiments. That the writer may not be charged with precipitation or presumption, he has had the principle and its consequences examined, scrutinized, and fully canvassed, by some of the most learned, intelligent, and competent characters of the present day: who, on every principle of duty as well as of interest, if they had discovered error in either, would have exposed it—but who, on the contrary, have fairly acknowledged their incontrovertible truth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以下要阐述的相关观点源于作者二十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在此期间，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与重要性已经被无数次的实证研究所验证。人们不会指责作者鲁莽仓促或武断冒昧，因为当今某些最博学、最聪慧、最能干的人物已经对他的原理及其后果进行了考查、探究以及充分的查证。职责使然，加上利害关系所致，如果他们从中发现任何错误，本会将其曝光；可是恰恰相反，他们都公正地认可了这些原理无可争议的正确性以及在实践中的重要性。

Assured, therefore, that his principles are true, he proceeds with confidence, and courts the most ample and free discussion of the subject; courts it for the sake of humanity—for the sake of his fellow creatures millions of whom experience sufferings which, were they to be unfolded, would compel those who govern the world to exclaim—'Can these things exist and we have no knowledge of them?' but they do exist and even the heart-rending statements which are made known to the public during the discussions upon negro-slavery, do not exhibit more afflicting scenes than those which,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daily arise from the injustice of society towards itself; from the inattention of mankind to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incessantly surround them; and from the want of a correct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in those who govern and control the affairs of men.

因此，既然作者确信他的原理是正确的，他便充满信心地继续对这个主题进行最充分和最自由的讨论，这样做是为了人道，为了同胞。同胞中有千百万人在受苦受难，这些苦难如果被揭露的话，将会让当今世界的统治者们惊呼：“难道这些真的存在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吗？”可是，这些情况的确存在着。连那些在讨论黑奴问题时公之于世的、让人心碎的论断，也没有世界各地每天产生的景象那样让人心痛。这些景象的产生是由于社会自身的不公平，由于人类对与其息息

相关的生存环境的熟视无睹，由于管理人类事务的统治者们缺乏对人性的正确认识。

If these circumstances did not exist to an extent almost incredible, it would be unnecessary now to contend for a principle regarding Man, which scarcely requires more than to be fairly stated to make it self-evident.

如果这些情况还没有达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现在就没有必要为一个关于人类的原理辩论，因为这一原理只要清楚地说出来，那几乎就是不辩自明的。

This principle is, that 'Any general character, from the best to the worst, from the most ignorant to the most enlightened, may be given to any community, even to the world at large, by the application of proper means, which means are to a great extent at the command and under the control of those who have influence in the affairs of men.'

这一原理就是："任何一种普遍的性格，从最好的到最坏的，从最无知的到最开明的，任何社会乃至全世界都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获得；而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为那些对人类事务有影响力的人所掌控。"

The principle as now stated is a broad one, and, if it should be found to be true, cannot fail to give a new character to legislative proceedings, and such a character as will be most favourable to the

well-being of society.

现在陈述的这一原理是个概括性的原理，如果能证明它是正确的，就必然会使立法过程获得一种新的性质，而这种性质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将大有裨益。

That this principle is true to the utmost limit of the terms, is evident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ll past ages, and from every existing fact.

从过去历代的经验和现存的每一个事实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原理是极其正确的。

Shall misery, then, most complicated and extensive, be experienced, from the prince to the peasant, throughout all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and shall its cause and the means of its prevention be known, and yet these means withheld? The undertaking is replete with difficulties which can only be overcome by those who have influence in society; who, by foreseeing its important practical benefits, may be induced to contend against those difficulties; and who, when its advantages are clearly seen and strongly felt, will not suffer individual considerations to be put in competition with their attainment. It is true their ease and comfort may be for a time sacrificed to those prejudices; but, if they persevere,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this knowledge is founded must ultimately universally prevail.

那么，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从王子到农民，还要经历万般复杂、广泛的苦难吗？知道了其起因和预防方法后，还要把这些办法束之高阁吗？这是一项困难重重的任务，只有那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才能够克服这些困难；他们预见到这项任务的重大实际益处，就可能有了与困难作斗争的动力；他们清楚地看到并深刻地体会到这项任务的种种好处，就不会因为计较个人得失而妨碍这些好处成为现实。诚然，由于社会上的偏见，他们会暂时牺牲生活上的悠闲和舒适；然而，只要他们坚持下去，这一认识赖以建立的那些原理最终一定会在全球盛行开来。

In preparing the way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se principles, it cannot now be necessary to enter into the detail of acts to prove that children can be trained to acquire 'any language, sentiments, belief, or any bodily habits and manners, not contrary to human nature'.

现在还无需涉及行为细节来论证这一事实，即经过训练，儿童能习得“任何一种不违背人性的语言、情感、信仰或身体方面的习惯和举止”。

For that this has been done, the history of every nation of which we have records, abundantly confirms; and that this is, and may be again done, the facts which exist around us and throughout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prove to demonstration.

以前有过这样的实践，世界各国的史料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而这种实践现在还在进行，以后也有可能再次进行，我们周围以及世界各国的事实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Possessing, then, the knowledge of a power so important, which when understood is capable of being wielded with the certainty of a law of nature, and which would gradually remove the evils which now chiefly afflict mankind, shall we permit it to remain dormant and useless, and suffer the plagues of society perpetually to exist and increase?

既然人类对如此重要的一种力量有了认识，而这种力量被理解以后又能根据自然规律的确定性为人所用，并且会逐渐消除那些危害，也就是现在困扰人类的罪魁祸首，那么，我们还能听任它不起作用、无所作为吗？还能允许社会遭受的折磨有增无减、连绵不绝吗？

No: the time is now arrived when the public mind of this country, and the general state of the world, call imperatively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all-pervading principle, not only in theory, but into practice.

不能。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国的公众心理以及世界各国的整体情绪都迫切要求不仅从理论上引入这一普遍原理，并且在实践中运用它。

Nor can any human power now impede its rapid progress. Silence will not retard its course, and opposition will give increased celerity to its movements.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ork will, in fact, ensure its accomplishment; henceforth all the irritating angry passions, arising from ignorance of the true cause of bodily and mental character, will gradually subside, and be replaced by the

most frank and conciliating confidence and goodwill.

当今也没有任何人为的力量能够阻止其快速发展。沉默不会妨碍其进程，而反对则会不断加速其运动。实际上，这是一项一旦开始就一定能完成的工作。从此以后，人类因为不了解自己身心特点的真正成因，而产生的所有急躁易怒情绪都会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最坦诚、最宽和的信任和友善。

Nor will it be possible hereafter for comparatively a few individuals unintentionally to occasion the rest of mankind to be surrounded by circumstances which inevitably form such characters as they afterwards deem it a duty and a right to punish even to death; and that, too, while they themselves have been the instruments of forming those characters. Such proceedings not only create innumerable evils to the directing few, but essentially retard them and the great mass of society from attaining the enjoyment of a high degree of positive happiness. Instead of punishing crimes after they have permitted the human character to be formed so as to commit them, they will adopt the only means which can be adopted to prevent the existence of those crimes; means by which they may be most easily prevented.

此后，相对的少数个体也不可能在无意之中使其余的人受制于某种环境，而这种环境不可避免地造就特定性格——少数个体后来认为自己既有责任，又有权利对他人加以惩罚、甚至处以极刑的性格，殊不知正是这些少数个体自己造就了那些性格。这种做法不仅给当政的少数人带来了无数灾祸，而且也从根本上妨碍了他们以及广大社会民众享有高水准的实实在在的幸福。以后他们不会让犯罪性格形成之后再来惩治犯罪行为，而会采取唯一能用来遏制犯罪行为的手段；采用

这种手段后，防止犯罪行为易如反掌。

Happily for poor traduced and degraded human nature, the principle for which we now contend will speedily divest it of all the ridiculous and absurd mystery with which it has been hitherto enveloped by the ignorance of preceding times; and all the complicated and counteracting motives for good conduct, which have been multiplied almost to infinity, will be reduced to one single principle of action, which, by its evident operation and sufficiency, shall render this intricate system unnecessary, and ultimately supersede it in all parts of the earth. That principle is the happiness of self, clearly understood and uniformly practised, which can only be attained by conduct that must promote the happiness of the community.

幸亏对于遭受诋毁与屈辱的可怜人而言，我们目前所推崇的原理将会迅速地把它身上一切荒谬可笑的神秘东西剥除干净；由于历朝历代的愚昧无知，这些东西至今一直缠绕其身。与此同时，善良行为的各种错综复杂、互相抵制的动机成倍增长，几乎没有穷尽，这些动机都会被归结为一条单一的行动原则。由于其明显的作用和足够的力量，这一原则将使这种错综复杂的体制成为没有必要的东西，并最终在世界各地取代它。这条原则就是：被明确了解、一致体验的个人幸福，只有通过促进社会幸福的行为才能得到。

For that power which governs and pervades the universe has evidently so formed man, that he must progressively pass from a state of ignorance to intelligence, the limits of which it is not for man himself to define; and in that progress to discover, that his individual happiness can be increased and extended only in

proportion as he actively endeavours to increase and extend the happiness of all around him. The principle admits neither of exclusion nor of limitation; and such appears evidently the state of the public mind, that it will now seize and cherish this principle as the most precious boon which it has yet been allowed to attain. The errors of all opposing motives will appear in their true light, and the ignorance whence they arose will become so glaring, that even the most unenlightened will speedily reject them.

掌控宇宙并充斥其间的那种力量明显地塑造了人类，人类一定是从无知状态逐渐向充满智慧的状态过渡的，而智慧的极限却不是人类自身所能确定的；在向智慧迈进的过程中，人类还会发现，个人幸福增进、扩展的程度和这个人为增进、扩展周围所有人的幸福所做的积极努力成正比。这一原则不但不容排斥，而且也不可限制。公众的想法显而易见，他们马上就会掌握这一原则并把它当作至今能得到的最宝贵的恩赐去珍惜。所有与之相悖的动机的错误之处都会原形毕露，引发这些错误的愚昧无知也会变得非常刺眼，即便是最愚钝的人也会迅速抵制这些错误。

For this state of matters, and for all the gradual changes contemplated, the extraordinary events of the present times have essentially contributed to prepare the way.

对这种形势，以及人们所想到的一切渐变，当今时代的一些非常事件已经从根本上帮忙铺平了道路。

Even the late Ruler of France, although immediately influenced by the most mistaken principles of ambition, has contributed to this

happy result, by shaking to its foundation that mass of superstition and bigotry, which on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had been accumulating for ages, until it had so overpowered and depressed the human intellect, that to attempt improvement without its removal would have been most unavailing. And in the next place, by carrying the mistaken selfish principles in which mankind have been hitherto educated to the extreme in practice, he has rendered their error manifest, and left no doubt of the fallacy of the source whence they originated.

甚至连已故的法国统治者，尽管受到极端错误的个人野心信条的直接影响，也为这种令人高兴的结果做出了贡献。他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大陆上大量的迷信观念和偏执思想，这些迷信观念和偏执思想日积月累，由来已久，一直严重打击、压抑着人类的智慧，如果不加以消除便去尝试改良，那简直就是做无用之功。其次，他还把迄今为止一直用以教育人类的那些错误而自私的原则付诸实践并且达到极端的程度，使这些错误大白于天下，从而使人类毫不怀疑其根源的谬误本性。

These transactions, in which millions have been immolated, or consigned to poverty and bereft of friends, will be preserved in the records of time, and impress future ages with a just estimation of the principles now about to be introduced into practice; and will thus prove perpetually useful to all succeeding generations.

在这些事件中，千百万人或牺牲生命，或陷于贫困，或失去朋友。这些事件将载入史册，让后世对我们即将付诸实践的原理有一个公正的评判，从而被证明会永远惠及子孙后代。

For the direful effects of Napoleon's government have created the most deep-rooted disgust at notions which could produce a belief that such conduct was glorious, or calculated to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even the individual by whom it was pursued.

因为拿破仑政权所造成的可怕影响让人们对一些观念深恶痛绝，这些观念曾使人们相信这样的行为很光荣或有可能提升幸福感——哪怕是实施这种行为的个人。

And the late discoverie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Rev. Dr. Bell and Mr. Joseph Lancaster have also been preparing the way, in a manner the most opposite, but yet not less effectual, by directing the public attention to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n the young and unresisting mind, of even the limited education which their systems embrace.

牧师贝尔博士与约瑟夫•兰开斯特先生最近的发现和活动也一直在为此铺平道路；他们用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式，其效果却一点也不在其下。他们让公众注意到，虽然他们的体系所包含的教育非常有限，但是对于幼稚顺从的心灵也大有裨益。

They have already effected enough to prove that all which is now in contemplation respecting the training of youth may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fear of disappointment. And by so doing, a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improvements cannot be confined within the British Isles, they will for ever be ranked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benefactors of the human race, but henceforward to contend for any new exclusive system will be in vain: the public

mind is already too well informed, and has too far passed the possibility of retrogression, much longer to permit the continuance of any such evil.

他们的行动已经足以证明，正在酝酿的关于培养青年的一切计划都可以完成，不用担心会让人失望。这样一来，由于他们所做的那些改良的成果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不列颠群岛，因而他们就会永远被看成是人类最重要的造福者。可是从此以后，主张任何具有排他性的新制度都将是徒劳：公众已经掌握了很多信息，绝不可能倒退，因而也绝不会允许这样的危害继续存在。

For it is now obvious that such a system must be destructive of the happiness of the excluded, by their seeing others enjoy what they are not permitted to possess; and also that it tends, by creating opposition from the justly injured feelings of the excluded,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the exclusion, to diminish the happiness even of the privileged: the former therefore can have no rational motive for its continuance.

我们现在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上述情况的发生，是由于这种制度使被排斥者看到别人享受着自己不被允许拥有的东西，从而破坏了他们的幸福感；同样明显的是，这种制度会让被排斥者完全有理由感到自己受到伤害从而产生反抗情绪——这种情绪与受排斥的程度成正比，所以这种制度甚至可能让享有特权者的幸福大打折扣，因此前一种人没有任何合理的动机允许这种制度继续存在。

If, however, owing to the irrational principles by which the world has been hitherto governed, individuals, or sects, or parties,

shall yet by their plans of exclusion attempt to retard the amelioration of society, and prevent the introduction into PRACTICE of that truly just spirit which knows no exclusion, such facts shall yet be brought forward as cannot fail to render all their efforts vain.

然而，如果由于迄今为止世界仍然由不合理的原则统治着，任何个人、教派或党派就试图按照其排他性计划阻碍社会的改良，并妨碍人们将一视同仁、真正公正的精神付诸实践 ，那么，一定会有人用事实来让他们的一切努力归于徒劳。

It will therefore be the essence of wisdom in the privileged class to cooperate sincerely and cordially with those who desire not to touch one iota of the supposed advantages which they now possess; and whose first and last wish is to increase the particular happiness of those classes, as well as the general happiness of society. A very little reflection on the part of the privileged will ensure this line of conduct; whence, without domestic revolution—without war or bloodshed—nay, without prematurely disturbing any thing which exists, the world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principles which are alone calculated to build up a system of happiness, and to destroy those irritable feelings which have so long afflicted society solely because society has hitherto been ignorant of the true means by which the most useful and valuable character may be formed.

所以，特权阶层真正的明智之举在于与那些丝毫不觊觎他们现有的假定利益的人诚心诚意地合作，这些人一心一意想增进那些阶层特有的幸福感，同时也增进社会的普遍幸福感。特权阶层稍作反思就会

确保这样的行为路线得以实施；结果，不经过国内变革，不经过战争或流血，也不用过早地扰乱任何现有的事物，世界就会准备好去接受这些原理，只有依赖这些原理才能够建立起一套幸福的制度并消除急躁情绪。这些情绪长久以来困扰着社会，就是因为社会迄今一直不知道形成最有用、最有价值的性格的正确方法。

This ignorance being removed, experience will soon teach us how to form character, individually and generally, so as to give the greatest sum of happiness to the individual and to mankind.

一旦消除这种无知状况，我们就会立刻从经验中学习到培养个人性格以及普遍性格的方法，使得个人和全人类获取最大程度的幸福。

These principles require only to be known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the outline of our future proceedings then becomes clear and defined, nor will they permit us henceforth to wander from the right path. They direct that the governing powers of all countries should establish rational plans for the education and general formation of the characters of their subjects. These plans must be devised to train children from their earliest infancy in good habit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ch will of course prevent them from acquiring those of falsehood and deception). They must afterwards be rationally educated, and their labour be usefully directed. Such habits and education will impress them with an active and ardent desire to promote the happiness of every individual, and that without the shadow of exceptions for sect, or party, or country, or climate. They will also ensure, with the fewest possible exceptions, health, strength, and vigour of body; for the happiness of man can be erected only on the foundations of health of body and peace of

mind.

这些原理只要能够为人所知，就会自动创建起来，我们未来的行动框架也就变得清晰而明了，从此以后这些原理也不会允许我们偏离正道。这些原理指明，所有国家的执政力量都应该为其臣民的教育以及普遍性格的形成确立理性的规划，必须制定这些规划来培养孩子，使之从襁褓时期就养成各种好习惯，这些习惯自然就会防止他们形成撒谎与欺骗的性格。之后，他们必须接受理性的教育，其劳动必须得到有益的引导。这些习惯和教育会让他们拥有一种积极而热切的愿望，要去提升每个人的幸福感，不因教派、党派、国家或地域的不同而有任何例外。同时这些原理还鲜有例外地确保人们健康强壮、精力充沛，因为身体健康、心平气和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必要基础。

And that health of body and peace of mind may be preserved sound and entire, through youth and manhood, to old age, it becomes equally necessary that the irresistible propensities which form a part of his nature, and which now produce the endless and ever multiplying evils with which humanity is afflicted, should be so directed as to increase and not to counteract his happiness.

如果要让人类从小到大、一直到老都完全保持身体健康、心气平和，就同样有必要对人性中一些无法抑制的癖好进行指导，用以增加而不是抵消人类的幸福；这些癖好正繁衍滋生着无数灾祸，使人类饱受折磨。

The knowledge however thus introduced will make it evident to the understanding, that by fa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isery with which man is encircled may be easily dissipated and removed; and

that with mathematical precision he may be surrounded with those circumstances which must gradually increase his happiness.

可是，上面介绍的知识也会让人们清楚地懂得，到目前为止，包围着人类的绝大部分苦难都可以被轻而易举地驱散和消除，人类还可以无比精确地置身于某些环境中，这些环境一定会逐步提升人类的幸福感。

Hereafter, when the public at large shall be satisfied that these principles can and will withstand the ordeal through which they must inevitably pass; when they shall prove themselves true to the clear comprehension and certain conviction of the unenlightened as well as the learned; and when, by the irresistible power of truth, detached from falsehood, they shall establish themselves in the mind, no more to be removed but by the entire annihilation of human intellect; then the consequent practice which they direct shall be explained, and rendered easy of adoption.

以后，当一般公众相信这些原理能够并且将会经受住它们必然要通过的严峻考验的时候，当那些未受启迪的人以及有学问的人都清楚地理解并坚定地相信其真实性的时候，当它们远离谬误，带着不可抗拒的真理的力量在人类心中确立并且与人类智慧共存亡的时候，它们所指明的、随之而来的实践就会得到解释，并会很容易被采纳。

In the meantime, let no one anticipate evil, even in the slightest degree, from these principles; they are not innoxious only, but pregnant with consequences to be wished and desired beyond all others by every individual in society.

与此同时，不要让任何人认为这些原理会带来弊端，哪怕只是一丁点儿。这些原理不单只是无害，而且孕育着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最梦寐以求的结果。

Some of the best intentioned among the various classes in society may still say, 'All this is very delightful and very beautiful in theory, but visionaries alone expect to see it realized.' To this remark only one reply can or ought to be made; that these principles have been carried most successfully into practice.

社会各阶层中一些最好心的人也许还会说："从理论上说，这一切都十分让人高兴，而且也非常美好，然而只有幻想家才会指望它们变为现实。"对这种评说，能够或者应该作出的唯一答复是：这些原理已经非常成功地被付诸实践。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this practice have been experienced for many years among a population of between two and three thousand at New Lanark, in Scotland; at Munich, in Bavaria; and in the Pauper Colonies, at Fredericks-oord.)

(许多年来，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巴伐利亚的慕尼黑，还有弗雷德里克斯—奥德的贫民区，已有两三千人亲身体验到了实践这些原理的好处。)

The present Essays, therefore, are not brought forward as mere matter of speculation, to amuse the idle visionary who thinks in his

closet, and never acts in the world; but to create universal activity, pervade society with a knowledge of its true interests, and direct the public mind to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 to which it can be directed; to a national proceeding for rationally forming the character of that immense mass of population which is now allowed to be so formed as to fill the world with crimes.

因此，发表这几篇论文，并非只是把它们当作思考的素材，供那些静坐私室冥思、从不到外面去行动的闲散的空想家消遣，而是要引发普遍行动，让全社会认识到自身的真正利益，把公众的思想尽可能引向最重要的目标上去，也就是全民行动起来，对广大民众的性格进行合理的培养，现今这些人的性格让世界充斥着犯罪行为，却得不到约束。

Shall questions of merely local and temporary interest, whose ultimate results are calculated only to withdraw pecuniary profits from one set of individuals and give them to others, engage day after day the attention of politicians and ministers; call forth petitions and delegates from the widely spread agricultural and commercial interests of the empire—and shall the well-being of millions of the poor, half-naked, half-famished, untaught, and untrained, hourly increasing to a most alarming extent in these islands, not call forth one petition, one delegate, or one rational effective legislative measure?

仅仅牵扯到地方利益与暂时利益的问题最终不过是把金钱利益从一部分人身上转移到另一部分人身上，这些问题应该日复一日地引起政客和大臣们的注意，使帝国广大农界以及商界人士为了其利益而提出请愿、派出代表？帝国里千百万的贫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未能

接受培训和教育，其生存状况日益恶化，到了极为惊人的地步，难道针对他们的安康问题就不应提出一份请愿书、派出一名代表，或者是制定出一项合理有效的立法措施吗？

No! for such has been our education, that we hesitate not to devote years and expend millions in the detection and punishment of crimes, and in the attainment of objects whose ultimate results are, in comparison with this, insignificancy itself; and yet we have not moved one step in the true path to prevent crimes, and to diminish the innumerable evils with which mankind are now afflicted.

不！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我们不惜花费大量时间、花费巨资对犯罪行为进行侦查和惩处，并实现一些目标——其最后结果与上述问题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但在防止犯罪、减少当前让人类饱受折磨的无数灾祸的正确道路上，迄今为止我们毫无进展。

Are these false principles of conduct in those who govern the world to influence mankind permanently? And if not, how, and when is the change to commence?

执政者的这些错误的行为原则会永远影响人类吗？如若不会，则如何、何时开始变革呢？

Thes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shall form the subject of the next Essay.

这些都是下一篇论文将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Second Essay: The Principles of the Former Essay Continued and Applied in Part to Practice

论文二：继续阐述上篇论文的原理及该原理被局部付诸实践的情形

General principles only were developed in the First Essay. In this an attempt will be made to show the advantages which may be derived from the adoption of those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 and to explain the mode by which the practice may, without inconvenience, be generally introduced.

论文一只是阐述了一般原理。本文将试图说明将这些原理付诸实践带来的好处，并解释如何才能顺利地普遍推介这种实践。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enefits to be derived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those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 are, that they will create the most cogent reasons to induce each man 'to have charity for all men'. No feeling short of this can indeed find place in any mind which has been taught clearly to understand that children in all parts of the earth have been, are, and everlastingly will be, impressed with habits and sentiments similar to those of their parents and instructors; modified, however, by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y have been, are, or may be placed, and by the peculiar organizations of each individual. Yet not one of these causes of character is at the command, or in any manner under the control of infants, who (whatever absurdity we may have been taught to the contrary) cannot possibly be accountable for the sentiments and manners which may be given to them. And here lies the

fundamental error of society; and from hence have proceeded, and do proceed, most of the miseries of mankind.

将这些原理引入实践的最重要的好处之一就是，这些原理将会提供最具说服力的理由，促使每个人“对所有人怀有慈爱之心”。不具备这种胸怀的感情在人们心里是绝无容身之地的，因为经过清楚明了的教导，这些人已经懂得，世界各地的孩子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永远都具有与其父母师长相似的习惯和情感，只不过因为个人过去、现在或将来可能置身的环境及其特殊的身体条件会有所改变。然而造就性格的这些缘由没有一个是由孩子掌握，或者是以任何方式由孩子控制的；不管我们心目中被灌输了什么相反的谬论，孩子对于可能赋予他们的情感以及品性是不可能负责的。这正是社会的根本错误所在，也是人类过去、现在所遭受的大部分苦难产生的根源。

Children are, without exception, passive and wonderfully contrived compounds; which, by an accurate previous and subsequent attention, founded on a correct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may be formed collectively to have any human character. And although these compounds, like all the other works of nature, possess endless varieties, yet they partake of that plastic quality, which, by perseverance under judicious management, may be ultimately moulded into the very image of rational wishes and desires.

无一例外，孩子们都是被动地接受塑造、结构奇妙的复合体。在正确把握该问题的基础上，如果从头到尾给予其细致到位的关注，就可以使他们集体形成任何一种人类性格。尽管像其他一切自然产物一样，这些复合体种类繁多、不计其数，然而他们都具有可塑性；假如管教有方，坚持不懈，他们最终可以被塑造成代表人类理性愿望与诉

求的真正化身。

In the next place these principles cannot fail to create feelings which, without force or the production of any counteracting motive, will irresistibly lead those who possess them to make due allowance for the difference of sentiments and manners, not only among their friends and countrymen, but also among the inhabitants of every region of the earth, even including their enemies. With this insight into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there is no conceivable foundation for private displeasure or public enmity. Say, if it be within the sphere of possibility that children can be trained to attain that knowledge,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acquire feelings of enmity towards a single human creature? The child who from infancy has been rationally instructed in these principles, will readily discover and trace whence the opinions and habits of his associates have arisen, and why they possess them. At the same age he will have acquired reason sufficient to exhibit to him forcibly the irrationality of being angry with an individual for possessing qualities which, as a passive being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those qualities, he had not the means of preventing. Such are the impressions these principles will make on the mind of every child so taught; and, instead of generating anger or displeasure, they will produce commiseration and pity for those individuals who possess either habits or sentiments which appear to him to be destructive of their own comfort, pleasure, or happiness; and will produce on his part a desire to remove those causes of distress, and his own feelings of commiseration and pity may be also removed. The pleasure which he cannot avoid experiencing by this mode of conduct will likewise stimulate him to the most active endeavours to withdraw those circumstances which surround any part of mankind with causes of misery, and to replace them with others which have a tendency to

increase happiness. He will then also strongly entertain the desire 'to do good to all men', and even to those who think themselves his enemies.

其次，这些原理还必然能让人们产生一些情感，这些情感不带强迫性，也不会产生任何起反作用的动机，将会促使拥有这些情感的人不由自主地适当容忍和他人在感情以及生活方式上的差别，不但对朋友同乡是这样，而且对世界各地的人们，乃至于对他们的敌人都是如此。如果对性格的形成有了这样的见解，那就没有什么想象的根据，认为还会有私下的不快或者公开的仇恨。试想，孩子能够经过训练而获得这种认识，同时还会有可能对某一个体产生仇恨心理吗？从小在这些原理中被理性地教导的孩子，会很容易发现并追溯其伙伴的看法和习惯来自何处，以及他们又为什么会有那些看法和习惯。处于相同的年龄时，他具有足够的判断力，能够深刻认识到：人在品性形成时期处于被动地位，因而没法阻止某些品性形成，所以对一个人的这些品性发怒是不理性的。这就是这些原理在每一个接受这样的教育的孩子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在孩子看来，有些人身上的习惯或情感会破坏他们自己的舒适生活、愉悦心情或幸福感，对于这些人，孩子不会感到生气和不快，相反，这会引发他的同情和怜悯，还会使他萌生消除那些不幸的根源的愿望，进而使自己的同情怜悯之情得以释放。这种行为模式也必然让他感受到快意，这种快意同样激励他作出最积极的努力来消除产生苦难、困扰所有人类的环境，而代之以有望增进幸福感的其他环境。到那时，他还会强烈地希望“为所有人做好事”，甚至为那些视他为敌人的人做好事。

Thus shortly, directly, and certainly may mankind be taught the essence, and to attain the ultimate object, of all former moral and religious instruction.

这样一来，人类就可以迅速、直接、确定无疑地领会到以往一切道德与宗教教育的精髓，并达到其最终目标。

These Essays, however, are intended to explain that which is true, and not to attack that which is false. For to explain that which is true may permanently improve, without creating even temporary evil; whereas to attack that which is false, is often productive of very fatal consequences. The former convinces the judgement when the mind possesses full and deliberate powers of judging; the latter instantly arouses irritation, and renders the judgement unfit for its office, and useless. But why should we ever irritate? Do not these principles make it so obvious as to place it beyond any doubt, that even the present irrational ideas and practices prevalent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not to be charged as either a fault or a culpable error of the existing generation? The immediate cause of them was the partial ignorance of our forefathers, who, although they acquire some vague disjointed knowledge of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character is formed, could not discover the connected chain of those principles, and consequently knew not how to apply them to practice. They taught their children that which they had themselves been taught, that which they had acquired, and in so doing they acted like their forefathers; who retained the established customs of former generations until better and superior were discovered and made evident to them.

不过，这些论文旨在解释真理，并非抨击谬误；原因在于，对真理的解释可能会越做越好，甚至不会产生一时的弊病，而抨击谬误则常常会产生非常致命的后果。前一种行为在人具有充分的、审慎的判断力时可以让人信服它的决断；后者则迅速激起烦躁的情绪，从而使判断无法发挥功用而变得毫无价值。可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让人烦躁

呢？难道这些原理没有明白无误地表明，即使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非理性的观念和实践也不能算作是当前这一代人的过失或者应受谴责的错误吗？这些观念和实践的直接原因是我们祖先的一知半解，尽管他们对性格形成的原理有了一些模糊、零星的认识，但是却不能发现这些原理之间的联系，所以也就不知道如何把这些原理付诸实践。他们把别人教给他们的东西以及自己学到的东西再教给孩子们，这种行为与其祖先如出一辙。其祖先墨守着先辈们的成规旧习，直到有人发现更好更优的习俗，并且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习俗。

The present race of men have also instructed their children as they had been previously instructed, and are equally unblameable for any defects which their systems contain. And however erroneous or injurious that instruction and those systems may now be proved to be,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these Essays are founded will be misunderstood, and their spirit will be wholly misconceived, if either irritation or the slightest degree of ill will shall be generated against those who even tenaciously adhere to the worst parts of that instruction, and support the most pernicious of those systems. For such individuals, sects, or parties have been trained from infancy to consider it their duty and interest so to act, and in so acting they merely continue the customs of their predecessors. Let truth unaccompanied with error be placed before them; give them time to examine it and to see that it is in unison with all previously ascertained truths; and conviction and acknowledgement of it will follow of course. It is weakness itself to require assent before conviction; and afterwards it will not be withheld. To endeavour to force conclusions without making the subject clear to the understanding, is most unjustifiable and irrational, and must prove useless or injurious to the mental faculties.

当今的人类也像之前先辈教育他们那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因而同样也不能把他们制度的缺陷归咎于他们。无论这种教育和这些制度经过证实有多大的错误或者多大的害处，倘若人们对那些顽固不化地坚持这种教育最坏的部分并支持最有害制度的人感到恼怒，或者哪怕是产生了丝毫的恶意，那么这些论文所依据的原理就会被误解，其精神也会完全被误会。因为无论是那些独立的个人，还是教派、党派中的人，他们自幼所受的训练就让他们认为，那样做既是他们的责任，也是出于他们的利益，而且那样做也不过是传承了先辈们的习俗罢了。把毫无错误的真理摆放在他们面前，给他们时间去检验并发现它与以前一切经过肯定的真理毫无二致，那么对它的信任和认可自然就会随之而来。真理在没有得到认定以前就要求人们赞同它，这本身就是一种软弱，让人们信服之后，真理就会得到认可。如果不把问题讲清楚，不让人们去理解它，就力图强行得出结论，这是最无道理的，也是最不理性的，而且对人的心智来说，最后必定是毫无裨益或者是非常有害的。

In the spirit thus described we therefore proceed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ubject.

根据上述精神，我们便可以继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The facts which by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have gradually accumulated now show the errors of the systems of our forefathers so distinctly, that they must be, when pointed out, evident to all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and render it absolutely necessary that new legislative measures be immediately adopted to prevent the confusion which must arise from even the most ignorant being competent to detect the absurdity and glaring injustice of many of those laws by which they are now governed.

因为印刷术的发明而逐渐积累起来的事实现在已经把我们先辈制度中的错误暴露无遗，一旦有人指出这些错误，社会各阶层就一定会看得非常清楚，这就使得立即采取新的立法措施变得极为必要，以便防止混乱。即使是最无知的人也必定会产生这样的混乱，他们会发现如今统治他们的许多法律中有诸多荒谬与显而易见的不公之处。

Such are those laws which enact punishments for a very great variety of actions designated crimes; while those from whom such actions proceed are regularly trained to acquire no other knowledge than that which compels them to conclude that those actions are the best they could perform.

就是这些法律为被界定为犯罪的林林总总的行为规定了惩处办法，然而做出这些行为的人从所受的常规教育中获取的知识迫使他们得出这样的推论，即这些是他们力所能及的最佳行为。

How much longer shall we continue to allow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to be taught crime from their infancy, and, when so taught, hunt them like beasts of the forest, until they are entangled beyond escape in the toils and nets of the law? When, i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ose poor unpitied sufferers had been reversed with those who are even surrounded with the pomp and dignity of justice, these latter would have been at the bar of the culprit, and the former would have been in the judgement seat.

我们让一代又一代人从小就学着作奸犯科，教会他们之后，又像在森林里打猎一般去对他们围追堵截，直到他们陷入法律的桎梏无法

脱身为止，这种状况到底还要持续多长时间呢？设想一下，倘若这些无人同情的、可怜的受害者与那些尊贵显赫的法官们互换一下所处的环境，那么处于犯罪席的就会是后者，而坐在审判台上的则会是前者。

Had the present Judges of these realms been born and educated among the poor and profligate of St. Giles's or some similar situation, is it not certain, inasmuch as they possess native energies and abilities, that ere this they would have been at the head of their then profession, and, in consequence of that superiority and proficiency, would have already suffered imprisonment, transportation, or death? Can we for a moment hesitate to decide, that if some of those men whom the laws dispensed by the present Judges have doomed to suffer capital punishments, had been born, trained, and circumstanced, as these Judges were born, trained, and circumstanced, that some of those who had so suffered would have been the identical individuals who would have passed the same awful sentences on the present highly esteemed dignitaries of the law?

倘若现在这些地方的法官在穷人与浪荡子聚居的圣贾尔斯或者相似的环境里出生，并在那里接受教育，那么，由于生就的精力和能力，他们本会成为他们那一行的领军人物，而且正因为他们精于这些旁门左道，他们早就会被囚禁、流放或者处死了，这难道不是肯定的吗？反过来看，在被现任法官依法判处死刑的人里面，倘若某些人的出身、所受的教育以及所处的环境和这些法官相同，那么两方的情形就会完全颠倒，原本的罪犯可能会对现在法律界备受尊敬的显贵们施以相同极刑，难道我们对此还会有丝毫的怀疑吗？

If we open our eyes and attentively notice events, we shall observe these facts to multiply before us. Is the evil then of so small magnitude as to be totally disregarded and passed by as the ordinary occurrences of the day, and as not deserving of one reflection? And shall we be longer told, 'that the convenient time to attend to inquiries of this nature is not yet come; that other matters of far weightier import engage our attention, and it must remain over till a season of more leisure?'

假如我们睁大双眼，认真关注事实，就会发现此类事情屡见不鲜。那么其危害是否无关痛痒，以至于人们可以把它当成日常琐事全然不顾，并且认为它不值得反思呢？有人告诉我们说，“现在还不是探讨这类问题的时候，还有别的重要得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关注，这类问题必须等到我们有更多闲暇的时候再去处理”,这样的言辞我们还要继续听下去吗？

To those who may be inclined to think and speak thus, I would say, 'Let feelings of humanity or strict justice induce you to devote a few hours to visit some of the public prisons of the metropolis, and patiently inquire, with kind commiserating solicitude, of their various inhabitants, the events of their lives and the lives of their various connections. Then will tales unfold that must arrest attention, that will disclose sufferings, misery, and injustice, upon which, for obvious reasons, I will not now dwell, but which previously, I am persuaded, you could not suppose it possible to exist in any civilized state, far less that they should be permitted for centuries to increase around the very fountain of British jurisprudence.' The true cause, however, of this conduct, so contrary to the general humanity of the natives of these Islands, is, that a practical remedy for the evil, on clearly defined and sound

principles, had not yet been suggested. But the principles developed in this 'New View of Society' will point out a remedy which is almost simplicity itself, possessing no mor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than many of the common employments of life; and such as are readily overcome by men of very ordinary practical talents.

对于那些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与言辞的人，我要说："请让仁慈的情感或严格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引领你们花费几个小时到首都的一些公共监狱里去看一看吧，怀着善意怜悯的关怀，耐心询问狱中各类囚犯的身世以及他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吧。他们所披露的故事一定会扣人心弦，这些故事揭示了他们所遭受的诸多苦难、不幸和不公。这一切，由于种种明显的原因，此刻我不愿多说，可是我相信，你们此前怎么也不会料到这会在文明国家存在，更想不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会允许这一切在不列颠法理学的发源地蔓延。"这种行径有悖于不列颠诸岛本土人的普遍人性，可是导致这种行为的真正原因却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基于界定清楚、正确合理的原理针对危害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不过这本《新社会观》所阐述的原理将指出一种补救措施，这种措施本身十分简单，它所包含的实际困难并不比生活中的普通事务多，即便是实际才能很平庸的人也能轻而易举地克服这类困难。

That such a remedy is easily practicable, may be collected from the account of the following very partial experiment.

这种补救措施十分容易，切实可行；这一点从下面所谈的这个十分不完整的实验中就可以总结出来。

In the year 1784 the late Mr. Dale, of Glasgow, founded a manufactory for spinning of cotton, near the falls of the Clyde, in

the county of Lanark, in Scotland; and about that period cotton mills were first introduced into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kingdom.

1784年，格拉斯哥已故的戴尔先生创办了一家棉纺厂，就在苏格兰拉纳克郡的克莱德瀑布附近；大概就在那个时期，棉纺厂开始出现在王国北部。

It was the power which could be obtained from the falls of water that induced Mr. Dale to erect his mills in this situation; for in other respects it was not well chosen. The country around was uncultivated; the inhabitants were poor and few in number; and the roads in the neighbourhood were so bad, that the Falls, now so celebrated, were then unknown to strangers.

正是由于能够从瀑布中获取电力，戴尔先生才决定在这里建厂；因为从其他方面来看，这个厂址选择得并不理想。周围还没开发，居民不仅十分贫穷，而且人数稀少；附近的道路十分糟糕，所以尽管这瀑布现在十分有名，当时却鲜为外人所知。

It wa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collect a new population to supply the infant establishment with labourers. This, however, was no light task; for all the regularly trained Scotch peasantry disdained the idea of working early and late, day after day, within cotton mills. Two modes then only remained of obtaining these labourers; the one, to procure children from the various public charitie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other, to induce families to settle around the works.

因此就有必要招募新的人，为初创的工厂提供劳动力。然而这并非容易之事，原因在于大凡受过正规训练的苏格兰农民都不屑于起早贪黑、日复一日地在棉纺厂里劳作。如此一来，就只有两种获得劳工的方式：其一，从国内各公立慈善机构里招募童工；其二，吸引一些家庭到工厂附近安家落户。

To accommodate the first, a large house was erected, which ultimately contained about 500 children, who were procured chiefly from workhouses and charities in Edinburgh. These children were to be fed, clothed, and educated; and these duties Mr. Dale performed with the unwearied benevolence which it is well known he possessed.

第一种方案中，为了解决童工的住宿问题，厂方建了一所大房子，这所房子最终容纳了大约五百个孩子，他们主要是从爱丁堡的济贫院以及慈善机构里招来的。这些孩子需要吃饭穿衣，还要接受教育。戴尔先生坚持不懈地以仁爱之心履行这些职责；他的这种精神是众所周知的。

To obtain the second, a village was built; and the houses were let at a low rent to such families as could be induced to accept employment in the mills; but such was the general dislike to that occupation at the time, that, with a few exceptions, only persons destitute of friends, employment, and character, were found willing to try the experiment; and of these a sufficient number to supply a constant increase of the manufactory could not be obtained. It was therefore deemed a favour on the part even of such individuals to reside at the village, and when taught the business, they grew so valuable to the establishment, that they became agents not to be

governed contrary to their own inclinations.

第二种方案中，为了招来居民，厂方建了一个村庄，并且把房子廉价租给愿意到工厂工作的家庭。然而在当时，一般人都不喜欢这种工作，所以愿意来尝试的都是那些没有朋友、没有工作以及品德不好的人，只有少数例外。可是就连这样也凑不够数来满足工厂不断发展的要求。因此，在当时连这类人到村子里居住也成了一件幸事。后来他们学会了业务，对工厂而言成了非常有价值的人物，以至厂方在管理他们的时候居然不能违逆其意愿。

Mr. Dale's principal avocations were at a distance from the works, which he seldom visited more than once for a few hours in three or four months; he was therefore under the necessity of committ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establishment to various servants with more or less power.

戴尔先生的主要活动场所离工厂很远，所以平时他很少到工厂来，三到四个月才来一次，来了也只不过呆上几个小时，因此他不得不把厂子交给权力或大或小的雇员进行管理。

Those who have a practical knowledge of mankind will readily anticipate the character which a population so collected and constituted would acquire. It is therefore scarcely necessary to state, that the community by degrees was formed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nto a very wretched society; every man did that which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 and vice and immorality prevailed to a monstrous extent. The population lived in idleness, in poverty, in almost every kind of crime; consequently, in debt, out of health,

and in misery. Yet to make matters still worse—although the cause proceeded from the best possible motive, a conscientious adherence to principle—the whole was under a strong sectarian influence, which gave a marked and decided preference to one set of religious opinions over all others, and the professors of the favoured opinions were the privileged of the community.

那些对人类有实际了解的人很容易料想到，如此召集起来并由如此成分构成的一群人会形成什么样的性格。因此，不必多说，那个社区在那样的环境下逐渐变成了一个肮脏不堪的社会，人人各行其是，邪恶堕落的程度骇人听闻。人们游手好闲，穷困潦倒，几乎跟各种罪行都沾了边；结果，他们债台高筑，身体虚弱，境遇悲惨。然而更加糟糕的是，尽管是源于再好不过的动机，亦即诚心诚意地恪守教派原理，所有人却都深受教派的强烈影响，这就促使人们毅然决然、明显地青睐一派而拒绝其他一切教派的观点；公开宣称自己信奉热门观点的人，成了社区里拥有特权的人物。

The boarding-house containing the children presented a very different scene. The benevolent proprietor spared no expense to give comfort to the poor children. The rooms provided for them were spacious, always clean, and well ventilated; the food was abundant, and of the best quality; the clothes were neat and useful; a surgeon was kept in constant pay, to direct how to prevent or cure disease; and the best instructors which the country afforded were appointed to teach such branches of education as were deemed likely to be useful to children in their situation. Kind and well-disposed persons were appointed to superintend all their proceedings. Nothing, in short, at first sight seemed wanting to render it a most complete charity.

接纳孩子的那栋房舍呈现出的则是一番完全不一样的景象。仁慈的工厂主不惜代价让这些穷苦的孩子过得舒服。他们的房间很宽敞，总是很洁净，而且通风良好；他们的食物十分丰富，质量上乘；他们的衣着整洁而又实用；还有长期聘请的医生，指导他们预防和治疗疾病；同时工厂主还安排了当地最好的教师，按照孩子们的实际情况，教授给他们可能有用的科目。被指派来照管孩子们一切活动的都是一些心地仁慈、宽厚和善的人。总而言之，乍一看，似乎这里什么也不缺，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最为完善的慈善机构。

But to defray the expense of these well-devised arrangements, and to support the establishment generally,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that the children should be employed within the mills from six o'clock in the morning till seven in the evening, summer and winter; and after these hours their education commenced. The directors of the public charities, from mistaken economy, would not consent to send the children under their care to cotton mills, unless the children were received by the proprietors at the ages of six, seven and eight. And Mr. Dale was under the necessity of accepting them at those ages, or of stopping the manufactory which he had commenced.

然而为了支付这些周到的安排产生的费用，并且维持工厂大局，孩子们绝对必须不分寒暑冬夏地在工厂里劳作，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七点，然后才开始学习。公立慈善机构的那些负责人出于错误的节省开支的考虑，不同意把自己照管的那些孩子交给棉纺厂，除非那些工厂主接受六岁、七岁以及八岁的孩子。因此，戴尔先生不得不接受一些这样年龄的孩子，如若不然，已经开办的工厂就只得关闭。

It is not to be supposed that children so young could remain,

with the intervals of meals only, from six in the morning until seven in the evening, in constant employment, on their feet, within cotton mills, and afterwards acquire much proficiency in education. And so it proved; for many of them became dwarfs in body and mind, and some of them were deformed. Their labour through the day and their education at night became so irksome, that numbers of them continually ran away, and almost all looked forward with impatience and anxiety to the expiration of their apprenticeship of seven, eight, and nine years, which generally expired when they were from thirteen to fifteen years old. At this period of life, unaccustomed to provide for themselves, and unacquainted with the world, they usually went to Edinburgh or Glasgow, where boys and girls were soon assailed by the innumerable temptations which all large towns present, and to which many of them fell sacrifices.

如此年幼的孩子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七点一直在棉纺厂里站立着劳动，中间只给吃饭的时间，然后还要学习得很好，这不是他们能做到的。结果证明也是如此；许多孩子身材矮小、智力低下，有些还成了畸形。白天的劳作以及夜晚的教育都使他们烦不胜烦，以至不断有许多孩子逃离，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迫不及待地期待着他们七年、八年、九年的学徒期尽快结束，这一时期一般都是在他们十三至十五岁这样的年龄段才结束的。在人生的这一时期里，他们既不习惯于自给自足，又不谙人情世故，往往就跑到爱丁堡或者格拉斯哥。在那些地方，男孩女孩很快就受到凡是大城市都会有的无数诱惑的围攻，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成了这些诱惑的牺牲品。

Thus Mr. Dale's arrangements, and his kind solicitude for the comfort and happiness of these children, were rendered in their ultimate effect almost nugatory. They were hired by him and sent to be employed, and without their labour he could not support them;

but, while under his care, he did all that any individual, circumstanced as he was, could do for his fellow creatures. The error proceeded from the children being sent from the workhouses at an age much too young for employment. They ought to have been detained four years longer, and educated; and then some of the evils which followed w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因此说来，戴尔先生的安排以及他为了这些孩子的舒适与幸福而给予的善良的关怀，从最终的效果来看，几乎都化为乌有了。他们受雇于他而参加劳动，没有他们的劳动，他就不能维持他们的生计。然而，在他照管这些孩子时，他做了处于他这种环境下的任何人能为其同胞做的一切。错就错在济贫院送来的孩子年龄太小，没法胜任工作。他们应该再在济贫院呆四年，并且接受教育；这样的话，后来产生的一些弊病就可以得到预防。

If such be a true picture, not overcharged, of parish apprentices to our manufacturing system, under the best and most humane regulations, in what colours must it be exhibited under the worst?

倘若这就是我们工业体系里的教区学徒在最好、最具人性的规章制度下的真实景象，而且并未言过其实的话，那么他们在最糟糕的管理制度下又将是怎样的情形呢？

Mr. Dale was advancing in years; he had no son to succeed him; and, finding the consequences just described to be the result of all his strenuous exer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happiness of his fellow creature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he became disposed to retire from the cares of the establishment. He accordingly sold it to

some English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one of whom,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just narrated, undertook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ncern, and fixed his residence in the midst of the population. This individual had been previously in the management of large establishments, employing a number of workpeople,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Manchester, and, in every case, by the steady application of certain general principles, he succeeded in reforming the habits of those under his care, and who always, among their associates in similar employment, appeared conspicuous for their good conduct. With this previous success in remodelling English character, but ignorant of the local idea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ose now committed to his management, the stranger commenced his task.

戴尔先生年事渐高，又没有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当他发现自己为同胞的进步和幸福而竭尽全力，结果却是刚才所描绘的那种情况的时候，就想隐退，不再经管厂子，这是不足为奇的。因此他把工厂卖给一些英格兰商人和工厂主；其中有一位在刚才所说的情况下承担了工厂的管理工作，并且在当地定居下来。这个人以前在曼彻斯特附近经管过雇用大量工人的大工厂，在每一个工厂里，他通过坚持不懈地应用某些一般性原理，在改进其属下的习惯方面都获得了成功，使他们在同行的伙伴中一直以品行优良而独树一帜。虽然这位外乡人之前成功改造过英格兰人的性格，但是对于现在交给他管理的那些人有哪些地方观念、习惯以及风俗，他却一无所知；不过他还是走马上任了。

At that time the lower classes of Scotland, like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had strong prejudices against strangers having any authority over them, and particularly against the English, few of whom had then settled in Scotland, and not one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scenes under description. It is also well

known that even the Scotch peasantry and working classes possess the habit of making observations and reasoning thereon with great acuteness; and in the present case those employed naturally concluded that the new purchasers intended merely to make the utmost profit by the establishment, from the abuses of which many of themselves were then deriving support. The persons employed at these works were therefore strongly prejudiced against the new director of the establishment; prejudiced, because he was a stranger, and from England; because he succeeded Mr. Dale, under whose proprietorship they acted almost as they liked; because his religious creed was not theirs; and because they concluded that the works would be governed by new laws and regulations, calculated to squeeze, as they often termed it, the greatest sum of gain out of their labour.

那个时候，像其他地方一样，苏格兰的下层民众对管理他们的外乡人都有很强烈的偏见，对英格兰人尤其如此。当时在苏格兰定居的英格兰人很少，在上述地区的附近更是一个也没有。另外，众所周知，苏格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甚至也都养成了敏锐观察、深刻分析的习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那些受雇人员自然推断新买主只不过是想从工厂里获取最大利润，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当时就是靠损公肥私来维持生活的。因此，工厂的雇员对新来的厂长有很强烈的偏见：因为他是外乡人，又是来自英格兰的外乡人；因为他继承了戴尔先生的工厂，而当工厂属于戴尔先生的时候，他们几乎是为所欲为；因为他的宗教信条跟他们的不一样；还因为他们推断工厂将用新的法规来管理，而且厂长会盘算着从他们的劳动中榨取（这是他们常用的字眼）最大的利益。

In consequence, from the day he arrived amongst them every means which ingenuity could devise was set to work to counteract

the plan which he attempted to introduce; and for two years it was a regular attack and defence of prejudices and malpractices between the manager and the population of the place, without the former being able to make much progress, or to convince the latter of the sincerity of his good intentions for their welfare. He, however, did not lose his patience, his temper, or his confidence in the certain success of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he founded his conduct.

于是，从他到达他们那里的当天起，他们就想尽一切巧妙的办法来抵制他试图推行的计划。两年时间里，这位经理与当地人之间经常围绕偏见与渎职展开攻防拉锯战，前者未能取得多大的进展，也没能使后者相信他好意为他们谋求福利的诚心。但是，他并没失去耐心，仍然心平气和，相信自己的行动所依据的原理定能成功。

These principles ultimately prevailed: the population could not continue to resist a firm well-directed kindness, administering justice to all. They therefore slowly and cautiously began to give him some portion of their confidence; and as this increased, he was enabled more and more to develop his plans for their amelioration. It may with truth be said, that at this period they possessed almost all the vices and very few of the virtues of a social community. Theft and the receipt of stolen goods was their trade, idleness and drunkenness their habit, falsehood and deception their garb, dissensions, civil and religious, their daily practice; they united only in a zealous systematic opposition to their employers.

这些原理最终还是推广开来：人们无法继续抵制这样一种坚定而且方向正确、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善意。这样一来，人们便慢慢地、

十分谨慎地开始给他一些信任，随着这种信任度的增加，他就越发能够实施那些改善他们境况的计划。确确实实可以这样讲，在这个时期，他们身上几乎沾染了社会上的所有恶习，几乎没有任何美德。偷盗与分赃是他们的行当，游手好闲与酗酒是他们的习惯，撒谎与欺骗是他们的作派，世俗与宗教纷争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只有在热情地、有组织地与他们的雇主作对时他们才团结一致。

Here then was a fair field on which to try the efficacy in practice of principles supposed capable of altering any characters. The manager formed his plans accordingly. He spent some time in finding out the full extent of the evil against which he had to contend, and in tracing the true causes which had produced and were continuing those effects. He found that all was distrust, disorder, and disunion; and he wished to introduce confidence, regularity, and harmony. He therefore began to bring forward his various expedients to withdraw the un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by which they had hitherto been surrounded, and to replace them by others calculated to produce a more happy result. He soon discovered that theft was extended through almost all the ramifications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receipt of stolen goods through all the country around. To remedy this evil, not one legal punishment was inflicted, not one individual imprisoned, even for an hour; but checks and other regulations of prevention were introduced; a short plain explanation of the immediate benefits they would derive from a different conduct was inculcated by those instructed for the purpose, who had the best powers of reasoning among themselves. They were at the same time instructed how to direct their industry in legal and useful occupations, by which, without danger or disgrace, they could really earn more than they had previously obtained by dishonest practices. Thus the difficulty of committing the crime was increased, the detection afterwards

rendered more easy, the habit of honest industry formed, and the pleasure of good conduct experienced.

因此这就有了一块很好的田地，来试验认为能改变人们任何性格的那些原理在实践中的效用。这位经理因地制宜地拟定了一系列计划。他花了一些时间弄清了自己不得不与之斗争的那些恶习到了何种程度，并且找出了这些恶习产生并持续肆虐的真正原因。他发现原因就是到处都缺乏信任、混乱不堪、纷争不断；他希望建立起信任、秩序与和谐。所以，他便开始推行各种应急办法清除人们一直以来所处的不利环境，并代之以可能会产生较好效果的环境。他很快就发现，偷盗活动几乎遍及社会的每个角落，分赃行为在村子里无处不在。为了矫治这类恶习，他没用过一次法律惩处手段，没有监禁过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小时也没有过；他推行的是加以遏制的方法以及其他一些预防性的规定。他指导其中说理能力最强的人用简明的方式向其余的人反复解说，如果他们另行其道就会马上得到好处。同时他还教导他们如何把自己的勤劳用在合法而有用的行当上，这样他们就可以不担风险、不失体面地真正比以前用欺骗手段时赚到更多的钱。这样一来，犯罪的难度增加了，犯罪发生以后侦查起来也更加容易了，诚实、勤劳的习惯形成了，人们也因此体会到了良好行为带来的愉悦。

Drunkenness was attacked in the same manner: it was discountenanced on every occasion by those who had charge of any department; its destructive and pernicious effects were frequently stated by his own more prudent comrades, at the proper moment when the individual was soberly suffering from the effects of his previous excess; pot- and public-houses were gradually removed from the immediate vicinity of their dwellings; the health and comfort of temperance were made familiar to them; by degrees drunkenness disappeared, and many who were habitual bacchanalians are now conspicuous for undeviating sobriety.

整治酗酒恶习所用的方式如出一辙：所有部门的负责人在所有场合都反对酗酒；每当酗酒的人清醒过来，因为先前饮酒过量而痛苦的时候，他那些较为谨慎的同伴就常常在这一恰当的时机把酗酒的害处讲给他听。酒铺、酒馆逐渐从他们的居所旁边迁离；酗酒的人意识到了节制能带来身体的健康与舒适。于是酗酒现象渐渐销声匿迹了，很多常常狂饮的酒鬼现在也以长时间保持清醒而闻名。

Falsehood and deception met with a similar fate: they were held in disgrace; their practical evils were shortly explained; and every countenance was given to truth and open conduct. The pleasure and substantial advantages derived from the latter soon overcame the impolicy, error, and consequent misery, which the former mode of acting had created.

谎言与欺骗的行径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它们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其实际危害会得到即时的解释；真实与坦诚的行为则得到全力支持。源于后一类行为的快乐与实际利益很快就战胜了前一类行为所引发的失策、错误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惨境遇。

Dissensions and quarrels were undermined by analagous expedients. When they could not be readily adjusted between the parties themselves, they were stated to the manager; and as in such cases both disputants were usually more or less in the wrong, that wrong was in as few words as possible explained, forgiveness and friendship recommended, and one simple and easily remembered precept inculcated, as the most valuable rule for their whole conduct, and the advantages of which they would experience every moment of their lives; viz.—'That in future they should endeavour

to use the same active exertions to make each other happy and comfortable, as they had hitherto done to make each other miserable; and by carrying this short memorandum in their mind, and applying it on all occasions, they would soon render that place a paradise, which, from the most mistaken principle of action, they now made the abode of misery.'—The experiment was tried; the parties enjoyed the gratification of this new mode of conduct; references rapidly subsided; and now serious differences are scarcely known.

分歧与纷争也是用类似的办法破解的。倘若争执双方之间很难进行调解，便把问题呈交给经理。在这种情况下，争执双方往往或多或少都有过错，于是经理便尽可能言简意赅地说明他们的错处，奉劝他们宽以待人，以情义为重；他还谆谆教导他们明白一条简单易记的箴言，并让他们将其作为一切行为的最宝贵的准则，而其好处将使他们受益终身。这条箴言便是："将来，他们应该像以前积极地使彼此痛苦不堪一样，积极地尽量让彼此快乐舒适；牢记这句简短的箴言并且在所有场合加以应用，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使自己极端错误的行动原理所造成的不幸深渊成为一方乐土。"试验之后：纷争各方都享受到这种新的行为模式带来的喜悦；人们呈交的问题锐减；严重的分歧现在更是鲜有耳闻。

Considerable jealousies also existed on account of one religious sect possessing a decided preference over the others. This was corrected by discontinuing that preference, and by giving a uniform encouragement to those who conducted themselves well among all the various religious persuasions; by recommending the same consideration to be shown to the conscientious opinions of each sect, on the ground that all must believe the particular doctrines which they had been taught, and consequently that all were in that

respect upon an equal footing, nor was it possible yet to say which was right or wrong. It was likewise inculcated that all should attend to the essence of religion, and not act as the world was now taught and trained to do; that is, to overlook the substance and essence of religion, and devote their talents, time, and money, to that which is far worse than its shadow, sectarianism; another term for something very injurious to society, and very absurd, which one or other well-meaning enthusiast has added to true religion, which, without these defects, would soon form those characters which every wise and good man is anxious to see.

另外，由于有一个教派对其他教派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也引发了相当严重的嫉妒情绪。这个问题是这样纠正的：停止对某一教派的偏爱，对于各种教派中行为正派的人都一视同仁地加以鼓励；建议对每一个教派尽职尽责的主张给予同等的重视，因为所有人都必须信仰教导他们的特殊教条，所以在这方面大家都是平等的，更何况目前还很难分辨孰是孰非。同样，他还反复教导大家应该注重宗教的真谛，不应该像当今世上的人一样因为所受的教育和训练而忽视宗教的实质和要义，继而把自身的才能、时间以及金钱投入到比宗教的影子还要糟糕得多的宗派主义之中。宗派主义被这样或那样好意的热心人士添加到真正的宗教里，是非常有害于社会、非常荒谬的一种东西。真正的宗教没有这些缺点，很快就会培养出每一位善良的智者都急切想要看到的品行。

Such statements and conduct arrested sectarian animosity and ignorant intolerance; each retains full liberty of conscience, and in consequence each partakes of the sincere friendship of many sects instead of one. They act with cordiality together in the same departments and pursuits, and associate as though the whole community were not of different sectarian persuasions; and not one

evil ensues.

这样的一些说法和做法阻止了宗派的仇视与无知狭隘；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因而每个人与很多教派都拥有真挚的友情，而非只有一个派别。他们在相同部门与相同的工作中热诚协作，互相交好，仿佛整个社区里根本就不存在不同的教派一样，更是没有产生一点弊端。

The same principles were applied to correct the irregular intercourse of the sexes; such conduct was discountenanced and held in disgrace; fines were levied upon both parties for the use of the support fund of the community. (This fund arose from each individual contributing one sixtieth part of their wages, which, under their management, was applied to support the sick, and injured by accident, and the aged.) But because they had once unfortunately offended against the established laws and customs of society, they were not forced to become vicious, abandoned, and miserable; the door was left open for them to return to the comforts of kind friends and respected acquaintances; and, beyond any previous expectation, the evil became greatly diminished.

同样的原理也被用来匡正不正常的两性关系。不正常的两性行为会遭到反对，被看作是可耻行为；当事人双方都被处以罚款，用作社区的公积金。（这项基金由每个人捐出其薪水的六十分之一构成，由他们自行经管，用来资助生病的人、因事故受伤的人以及上了年纪的人。）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曾经令人遗憾地违反了社会既定的法律以及风俗而被迫变得十恶不赦，或是惨遭遗弃，陷入悲惨境地；大门依旧敞开，让他们回到善良体面的亲朋好友的舒适怀抱中来。因此，出乎以前任何人的意料，这种丑事竟然大大减少了。

The system of receiving apprentices from public charities was abolished; permanent settlers with large families were encouraged, and comfortable houses were built for their accommodation.

工厂从公立慈善机构接收学徒的制度被废除了；他们鼓励成员众多的家庭来永久定居，并为他们兴建了舒适的居所。

The practice of employing children in the mills, of six, seven and eight years of age, was discontinued, and their parents advised to allow them to acquire health and education until they were ten years old. (It may be remarked, that even this age is too early to keep them at constant employment in manufactories, from six in the morning to seven in the evening. Far better would it be for the children, their parents, and for society, that the first should not commence employment until they attain the age of twelve, when their education might be finished, and their bodies would be more competent to undergo the fatigue and exertions required of them. When parents can be trained to afford this additional time to their children without inconvenience, they will, of course, adopt the practice now recommended.)

工厂停止雇用六岁、七岁以及八岁的孩子，并建议这些孩子的父母让孩子在十岁以前接受教育，养好身体。（不妨指出，孩子即使到了这个年纪也还是太小，不能让他们在工厂里从早上六点一直劳作到晚上七点。让孩子们十二岁后再开始工作，这对孩子自身及其父母，以及对整个社会而言都要好得多，那个时候他们就可能已经受完了教育，其身体也更能忍受不得不努力工作所带来的劳累。当父母亲们经过教育，有能力让孩子们在家里多呆这一段时间而没有什么困难的时

候，他们当然就会接受这里所推荐的做法。）

The children were taught reading, writing, and arithmetic, during five years, that is, from five to ten, in the village school, without expense to their parents. All the modern improvements in education have been adopted, or are in process of adoption. (To avoid the inconveniences which must ever arise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a particular creed into a school, the children are taught to read in such books as inculcate those precept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which are common to all denominations.) They may therefore be taught and well-trained before they engage in any regular employment. Another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s, that all their instruction is rendered a pleasure and delight to them; they are much more anxious for the hour of school-time to arrive than to end; they therefore make a rapid progress; and it may be safely asserted, that if they shall not be trained to form such characters as may be most desired, the fault will not proceed from the children; the cause will be in the want of a true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in those who have the management of them and their parents.

孩子们从五岁到十岁这五年时间里，在村子里的学校学习阅读、写作以及算术，不用父母亲花钱。教育方面的所有现代改进措施都已采用或者正在采用。（在学校里专门推介一种宗教信条必然会引起麻烦，为了避免这种麻烦，书本教授给孩子们的是所有教派共同尊崇的基督教箴言。）这样，他们在从事任何正式工作以前就能接受教育，并受到很好的训练。另外一个要考虑的重要方面是，他们的所有课程对他们来说都会成为享受与快乐；他们更期盼上学，而不是急切地等待放学，所以进步迅速。因此可以肯定，倘若孩子经过教育后不能形成最尽如人意的性格，那么过错不在他们身上，而在于那些管教他们的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对人性缺乏真正的了解。

During the period that these changes were going forward, attention was given to the domestic arrangements of the community.

在这些变化发生期间，社区居民家中的状况也受到了关注。

Their houses were rendered more comfortable, their streets were improved, the best provisions were purchased, and sold to them at low rates, yet covering the original expense, and under such regulations as taught them how to proportion their expenditure to their income. Fuel and clothes were obtained for them in the same manner; and no advantage was attempted to be taken of them, or means used to deceive them.

他们的住房变得更加舒适，街道也得到了修整；能买到最好的生活必需品，依照教导他们如何量入为出的一些规定，商品仅以保本的低廉价格出售给他们；并用同样的方法让他们获得燃料和布匹，既没想从他们身上渔利，也没用什么方法欺骗他们。

In consequence, their animosity and opposition to the stranger subsided, their full confidence was obtained, and they became satisfied that no evil was intended them; they were convinced that a real desire existed to increase their happiness upon those grounds alone on which it could be permanently increased. All difficulties in the way of future improvement vanished. They were taught to be rational, and they acted rationally. Thus both parties experienced the incalculable advantages of the system which had been adopted.

Those employed became industrious, temperate, healthy, faithful to their employers, and kind to each other; while the proprietors were deriving services from their attachment, almost without inspection, far beyond those which could be obtained by any other means than those of mutual confidence and kindness. Such was the effect of these principles on the adults; on those whose previous habits had been as ill-formed as habits could be; and certainl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to practice was made under the most un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It may be supposed that this community was separated from other society; but the supposition would be erroneous, for it had daily and hourly communication with a population exceeding its own number. The royal borough of Lanark is only one mile distant from the works; many individuals came daily from the former to be employed at the latter; and a general intercourse is constantly maintained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towns.)

这样一来，他们对这位外乡人的憎恨与反对情绪便渐渐消退了，他们完全相信他，丝毫不再怀疑他对他们有什么恶意了；他们相信他是真心实意地希望在这样的基础上增进他们的幸福感——只需依赖这一基础，就能够一直增进幸福感。至此，未来实施改良措施的一切困难都消失了。他教育他们要理性，他们就理性行事。于是双方都体验到已采用的体制带来的无数好处。那些雇员变得勤勉、沉稳而健康，忠于雇主而且彼此友爱；企业主则依靠他们对自己的感情，几乎不用监督就能让他们为自己工作，这比彼此缺少信任和友爱的任何其他雇佣方式所得到的东西要多得多。这就是这些原理在成年人身上所产生的效果。这些人的习惯原本糟糕到了极点，这些原理也就是在极为不利的环境下应用到实践中的。（也许有人认为该社区与世隔绝，可是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该社区每日每时都在跟其他人交往，这些人的数量比本区人口还要多。拉纳克皇家特区距工厂只有一英里，每天都有很多人从那里来厂里做工，新旧区镇之间一直保持着普遍的交

往。）

I have thus given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is experiment, although a partial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is of far less importance than a clear and accurate account of the principles themselves, in order that they may be so well understood as to be easily rendered applicable to practice in any community an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Without this, particular facts may indeed amuse or astonish, but they would not contain that substantial value which the principles will be found to possess. But if the relation of the narrative shall forward this object, the experiment cannot fail to prove the certain means of renovating the moral and religious principles of the world, by showing whence arise the various opinions, manners, vices, and virtues of mankind, and how the best or the worst of them may, with mathematical precision, be taught to the rising generation.

虽然局部运用这些原理远远不如清楚、精确地叙述这些原理来得重要，但为了让人透彻理解这些原理，从而使其在任何社会以及任何环境下都容易实现，我还是详述了这一实验。如果没有这样的叙述，某些特例可能让人乐不可支或者惊讶无比，但是其中并不会包含这些原理所具有的那种实际价值。然而如果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推进目标的话，那么上面的实验最后就一定能成为革新全世界道德和宗教原理的必由之路，它表明了人类各种不同的观点、习性、恶行以及美德的出处，也显示了把其中最好的与最坏的东西无比准确地教给下一代的方法。

Let it not, therefore, be longer said that evil or injurious actions cannot be prevented, or that the most rational habits in the rising

generation cannot be universally formed. In those characters which now exhibit crime, the fault is obviously not in the individual, but the defects proceed from the system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was trained. Withdraw those circumstances which tend to create crime in the human character, and crime will not be created. Replace them with such as are calculated to form habits of order, regularity, temperance, industry; and these qualities will be formed. Adopt measures of fair equity and justice, and you will readily acquire the full and complete confidence of the lower orders. Proceed systematically on principles of undeviating persevering kindness, yet retaining and using, with the least possible severity, the means of restraining crime from immediately injuring society, and by degrees even the crimes now existing in the adults will also gradually disappear; for the worst formed disposition, short of incurable insanity, will not long resist a firm, determined, well-directed, persevering kindness. Such a proceeding, whenever practised, will be found the most powerful and effective corrector of crime, and of all injurious and improper habits.

因此，以后我们别再说坏的或有害的行为是不能防止的，或者说下一代不可能普遍养成最理性的习惯。就现在表现出犯罪特征的各种性格来看，错误显然不在于个人，而在于有缺陷的培养个人的体制。消除那种容易让人性变得罪恶的环境，罪恶就不会产生。用适于养成讲秩序、守规矩、节制以及勤勉等习惯的环境取而代之，这些品质就会形成。如果你采取公平公正的措施，你就容易获得下层民众充分、完全的信任。按照始终如一的仁爱原则按部就班地行动，而且尽量宽大地保留和运用那些防止罪行直接危害社会的方法，那么即便是成年人现有的罪行也会逐渐消失，因为除了无可救药的疯子以外，即便是性情最糟的人也不会长期抵制那种坚定、方向明确、坚持不懈的善意。只要这种做法付诸实践，就会被证明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举措，可以让人弃恶从善，还能矫治一切有害以及不正当的习惯。

The experiment narrated shows that this is not hypothesis and theory. The principles may be with confidence stated to be universal, and applicable to all times, persons, and circumstances. And the most obvious application of them would be to adopt rational means to remove the temptation to commit crimes, and increase the difficulties of committing them;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 proper direc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active powers of the individual, and a due share provided of uninjurious amusements and recreation. Care must also be taken to remove the causes of jealousy, dissensions, and irritation; to introduce sentiments calculated to create union and confidence among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whole should be directed by a persevering kindness, sufficiently evident to prove that a sincere desire exists to increase, and not to diminish, happiness.

上述实验表明这并非凭空假设或纸上谈兵。可以有信心地说，这些原理是普遍原理，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人以及任何环境。而对这些原理最明显的应用便是采取理性的方式消除犯罪的诱因，增加犯罪的难度；与此同时，应该对个人的活动能力给予适当的指导，使之获取应有的、无害的娱乐与消遣。此外还务必要注意消除那些引起嫉妒、分歧与恼怒的原因，倡导能让全体社区成员之间互相团结、彼此信任的情感。所有这一切都要以坚持不懈的善意为本，这种明显的善意足以证明有人真诚地希望增加而不是减少他们的幸福。

These principles, applied to the community at New Lanark, at first under many of the most discouraging circumstances, but persevered in for sixteen years, effected a complete change in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village, containing upwards of 2,000 inhabitants, and into which, also, there was a constant influx of

newcomers. But as the promulgation of new miracles is not for present times, it is not pretended tha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one and all are become wise and good; or, that they are free from error. But it may be truly stated, that they now constitute a very improved society; that their worst habits are gone, and that their minor ones will soon disappear under a continua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ame principles; that during the period mentioned, scarcely a legal punishment has been inflicted, or an application been made for parish funds by any individual among them. Drunkenness is not seen in their streets; and the children are taught and trained in the institution for forming their character without any punishment. The community exhibits the general appearance of industry, temperance, comfort, health, and happiness. These are and ever will be the sure and certain effects of the adoption of the principles explained; and these principles, applied with judgement, will effectually reform the most vicious community existing, and train the younger part of it to any character which may be desired; and that, too, much more easily on an extended than on a limited scale. To apply these principles, however, successfully to practice, both a comprehensive and a minute view must be taken of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e society on which they are intended to operate. The causes of the most prevalent evils must be accurately traced, and those means which appear the most easy and simple should be immediately applied to remove them.

这些原理刚开始在新拉纳克社区运用的时候，其环境十分令人沮丧，可是坚持了十六年以后，却彻底改变了村社居民的普遍性格；村里共有两千多居民，另外还不断有新的人口入住。但是因为当今时代还不是传播新奇迹的时代，所以这里还不敢妄言，在如此环境下所有人都变得聪明善良了，或者说全都摆脱了错误。不过确实可以说，他们目前构成的是一个进步非常大的社会；他们最坏的习惯已经消失，

一些小的不好的习惯在继续运用同样的原理后很快也会消失；在上面提到的那段时期里，几乎没动用法律惩处过一个人，也几乎没有一个人申请过教区救济金。他们的街道上不再看见醉汉；孩子们都在无任何惩罚手段、陶冶性格的机构里接受教育和训练。整个社区展现出一派勤勉、克制、舒适、健康以及快乐的景象。这些都是而且将永远是采用上述原理必然会得到的效果。倘若理性地运用这些原理，它们就会卓有成效地改造现存的最邪恶的社会，对其中的青年人进行培养，使其养成想要的任何一种性格；而且较之规模有限的改造与培养，规模扩大了的改造与培养要容易得多。然而如果要把这些原理成功地付诸实践，就必须对将要运用这些原理的社会的现状进行观察，不仅要面面俱到，而且要细致入微，必须准确找出最为盛行的祸害的原因，并且立即采取最为简易的方式予以消除。

In this progress the smallest alteration, adequate to produce any good effect, should be made at one time; indeed, if possible, the change should be so gradual as to be almost imperceptible, yet always making a permanent advance in the desired improvements. By this procedure the most rapid practical progress will be obtained, because the inclination to resistance will be removed, and time will be given for reason to weaken the force of long-established injurious prejudices. The removal of the first evil will prepare the way for the removal of the second; and this facility will increase, not in an arithmetical, but in a geometrical proportion; until the directors of the system will themselves be gratified beyond expression with the beneficial magnitude of their own proceedings.

在这一进程里，即便是最小的改动，只要它足够产生好的效果，就应该在某一时间付诸实践；的确，倘若可能的话，这种改变就应该平缓得让人几乎察觉不到，然而又总是朝着人们向往改进的方向前进。经过这一过程，就会得到最快的实际进展，因为缓慢的改变过程

可以消除抵制意向，还可以让人们有时间用理智去削弱根深蒂固的各种有害的偏见。消除第一种危害就为消除第二种危害铺平了道路，而且这种便利的程度将不是以等差速度，而是以等比速度增长的，到最后该体制的领导者对自己的作为给人们带来的丰厚利益会感到无以言表的满足。

Nor while these principles shall be acted upon can there be any retrogression in this good work; for the permanence of the amelioration will be equal to its extent.

如果依照这些原理行事，这样的好事业就不会有任何倒退，因为改良的持久性与其程度是成正比的。

What then remains to prevent such a system from being immediately adopted into national practice? Nothing, surely, but a general destitution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practice. For with the certain means of preventing crimes, can it be supposed that British legislators, as soon as these means shall be made evident, will longer withhold them from their fellow subjects? No: I am persuaded that neither prince, ministers, parliament, nor any party in church or state, will avow inclination to act on principles of such flagrant injustice. Have they not on many occasions evinced a sincere and ardent desire to ameliorate the condition of the subjects of the empire, when practicable means of amelioration were explained to them, which could be adopted without risking the safety of the state?

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在阻止这种体制立刻在全国范围内被付诸实践

呢？毫无疑问，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们对这种做法普遍缺乏了解。因为既然有了这些预防犯罪的可靠办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不列颠的立法者一旦弄清楚这些办法之后，还会继续对民众隐瞒这些办法？不会的。我相信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国会，或者教派党派都不会公开宣称要按照一些显然不公正的原理行事。当人们把运用起来不会危及国家安全、切实可行的改良办法向他们作了解释以后，难道他们没有在诸多场合表达一种真诚热切的愿望，希望改良帝国民众的状况吗？

For some time to come there can be but one practicable, and therefore one rational reform, which without danger can be attempted in these realms; a reform in which all men and all parties may join, that is, a reform in the training an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poor, the ignorant, the untaught and untrained, or ill-taught and ill-trained, among the whole mass of British population; and a plain, simple, practicable plan which would not contain the least danger to any individual, or to any part of society, may be devised for that purpose.

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只有一种可行的因而是理性的改革能够在帝国内试行而不致产生危险，这是一种所有人以及所有党派都可以参加的改革，也就是在不列颠全体民众中进行的一种改革，涉及对贫困无知、未受教育或者是没有被教育好的人进行教育和管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拟定一个对任何人以及任何社会群体几乎没有一点危险的，简单明了又切实可行的计划。

That plan is a national, well-digested, unexclusive system for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and general amelioration of the lower orders. On the experience of a life devoted to the subject, I hesitate

not to say, that the members of any community may by degrees be trained to live without idleness, without poverty, without crime, and without punishment; for each of these is the effect of error in the various systems prevalent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y are all necessary consequences of ignorance.

这个计划是一套全国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不带任何排斥性的体制，其目的在于陶冶下层民众性格并普遍改善其境遇。我一直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根据我的生活经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任何社会的成员都可逐渐通过培养，过上一种不再无所事事、没有贫穷、不犯罪也不受惩罚的生活，因为这每一种弊病都是世界上通行的各种体制中的错误所导致的结果。这些全都是愚昧无知带来的必然后果。

Train any population rationally, and they will be rational. Furnish honest and useful employments to those so trained, and such employments they will greatly prefer to dishonest or injurious occupations. It is beyond all calculation the interest of every government to provide that training and that employment; and to provide both is easily practicable.

如果理性地培养所有民众，那么他们就会成为理性的人。如果为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提供诚信有用的工作，他们会十分愿意从事这种工作，而不愿意从事没有诚信或者有害的营生。对各政府来说，提供这种教育和工作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好处，而且也是简单易行的。

The first, as before stated, is to be obtained by a national system for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the second, by governments preparing a reserve of employment for the surplus working classes,

when the general demand for labour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s not equal to the full occupation of the whole: that employment to be on useful national objects from which the public may derive advantage equal to the expense which those works may require.

如前所述，理性教育是通过全国性的性格陶冶制度获得的；获取有益的工作则是通过政府，在全国对劳动力的普遍需求不足以让全体工人阶级充分就业的时候，各国政府为剩余劳动力储备了就业岗位：这种就业应当属于全国性的有益的事业，公众从中获得的好处应该等同于筹办这些事业所需要的开销。

The national plan for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should include all the modern improvements of education, without regard to the system of any one individual; and should not exclude the child of any one subject in the empire. Anything short of this would be an act of intolerance and injustice to the excluded, and of injury to society, so glaring and manifest, that I shall be deceived in the character of my countrymen if any of those who have influence in church and state should now be found willing to attempt it. Is it not indeed strikingly evident even to common observers, that any further effort to enforce religious exclusion would involve the certain and speedy destruction of the present church establishment, and would even endanger our civil institutions?

这一全国性的性格陶冶计划应该包括现代的所有教育改进措施，不涉及任何个人体系，不应该把帝国里任何臣民的孩子拒之门外。任何不符合这种精神的行为不仅是对被排斥人的偏狭不公，而且对社会也是一种伤害；这一点再明白不过了，所以倘若政府或宗教界还有什么显要人物现在想要去尝试这样的做法，那我应当就是看错了同胞的

性格。倘若我们继续强制进行宗教排斥，就肯定会加速当今教会机构的毁灭，进而会危及我们的世俗体制，这难道不是连普通人都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的吗？

It may be said, however, that ministers and parliament have many other important subjects under discussion. This is evidently true; but will they not have high national concerns always to engage their attention? And can any question be brought forward of deeper interest to the community than that which affects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and the well-being of every individual within the empire? A question, too, which, when understood, will be found to offer the means of amelioration to the revenues of these kingdoms, far beyond any practical plan now likely to be devised. Yet, important as are considerations of revenue, they must appear secondary when put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lives, liberty, and comfort of our fellow subjects, which are now hourly sacrificed for want of an effective legislative measure to prevent crime. And is an act of such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well-being of all to be longer delayed? Shall yet another year pass in which crime shall be forced on the infant, who in ten, twenty, or thirty years hence shall suffer DEATH for being taught that crime? Surely it is impossible. Should it be so delayed, the individuals of the present parliament, the legislators of this day, ought in strict and impartial justice to be amenable to the laws for not adopting the means in their power to prevent the crime; rather than the poor, untrained, and unprotected culprit, whose previous years, if he had language to describe them, would exhibit a life of unceasing wretchedness, arising solely from the errors of society.

然而，也许有人会说，大臣们和国会还有诸多其他重要的问题有

待讨论。显然，这是事实；可是他们不就是永远要关注国家大事吗？与影响帝国内每一个人的福利和性格问题相比，难道还能提出和社会有更深层利害关系的任何其他问题吗？倘若人们领会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它还能提供办法，增加这些王国的年收入，其效果远远超出目前可能拟定的任何实际计划。然而，虽然关于年收入的考虑十分重要，但如果与我国同胞的生命、自由以及舒适生活相比较，它必然会显得次要。由于缺乏有效的立法措施来预防犯罪，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舒适生活现在时时刻刻都面临危险。难道这样一种对全民福利至关重要的行动还要耽搁下去吗？难道还要再拖延一年，眼看着罪恶被强加于婴幼儿吗，而再过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他们又因为学会了犯罪而被处以极刑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倘若如此拖延的话，从公正严明的角度来说，负法律责任的应该是那些没有尽职尽责采取办法预防犯罪的现任国会成员，也就是现如今的立法者们，而不是那些穷困潦倒、未受教育而又孤苦无依的罪犯。倘若罪犯能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往昔岁月的话，那么他们所展现的将会是灾祸不断的一生，而这些灾祸完全是由于社会的错误所引发的。

Much might be added on these momentous subjects, even to make them evident to the capacities of children; but for obvious reasons the outlines are merely sketched; and it is hoped these outlines will be sufficient to induce the well-disposed of all parties cordially to unite in this vital measur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everything dear to society.

对这些重大问题还可作出诸多增补，甚至能让懵懂孩童也了然于心；但是处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此只是略作概述。我希望这些概述足以让各方友善人士精诚团结，共谋大计，以保存社会之一切重要事物。

In the next Essay an account will be given of the plans which are in progress at New Lanark for the further comfor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inhabitants; and a general practical system be described, by which the same advantages may be gradually introduced among the poor and working classes throughout the United Kingdom.

下篇论文要说的是新拉纳克地区当前正在实施的，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增进其舒适程度的计划；同时，下文还要叙述一种普遍而又切实可行的体制，通过这种体制，同等的利益便可以逐渐惠及整个联合王国的贫民以及工人阶级。

Third Essay: The Principles of the Former Essays Applied to a Particular Situation

论文三：前面几篇论文所阐述的原理在特定情形下的应用

Truth must ultimately prevail over error.

“真理必将战胜谬误。”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Second Essay, a promise was made that an account should be given of the plans which were in progress at New Lanark for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its inhabitants; and that a practical system should be sketched, by which equal advantages might be generally introduced among the poor and working classes throughout the United Kingdom.

在论文二的结论部分，我曾经承诺要对新拉纳克地区里，那些为了进一步改善当地居民状况而正在实施的计划进行叙述，并且要对一个切实可行的体制进行概述，这个体制能给整个联合王国的贫民和工人阶级普遍带来同等利益。

This account became necessary, in order to exhibit even a limited view of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the plans of the author are founded, and to recommend them generally to practice.

为了阐明作者提出的计划所依据的原理——哪怕只是管中窥豹，也为了能将这些原理推荐给大家付诸实践，这种叙述是很有必要的。

That which has been hitherto done for the community at New Lanark, as described in the Second Essay, has chiefly consisted in withdrawing some of those circumstances which tended to generate, continue, or increase early bad habits, that is to say, undoing that which society had from ignorance permitted to be done.

正如论文二所述，迄今为止在新拉纳克地区所做的一切主要是使人们摆脱某些往往会滋生、延续或增加早期恶习的环境，也就是说，消除社会由于无知而认可的行为。

To effect this, however, was a far more difficult task than to train up a child from infancy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for that is the most easy process for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while to unlearn and to change long acquired habits is a proceeding directly opposed to the most tenacious feelings of human nature.

然而，做到这一点远比从小教育孩子应该走怎样的道路要困难得多，因为后者是最简单的性格塑造过程；可是忘掉并改变长期形成的习惯，这则是一种直接同人性中最顽强的情感相对抗的行为。

Nevertheless, the proper application steadily pursued did effect beneficial changes on these old habits, even beyond the most sanguine expectations of the party by whom the task was

undertaken.

但是，稳扎稳打、恰如其分地应用所述原理的的确确会促使这些旧习产生有益的改变，这些改变甚至会超出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所抱有的最乐观的期望。

The principles were driven from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itself and they could not fail of success.

这些原理都是研究人类本性之后得出来的，不可能不成功。

Still, however, very little, comparatively speaking, had been done for them. They had not been taught the most valuable domestic and social habits: such as the most economical method of preparing food; how to arrange their dwellings with neatness, and to keep them always clean and in order; but, what was of infinitely more importance, they had not been instructed how to train their children to form them into valuabl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or to know that principles existed, which, when properly applied to practice from infancy, would ensure from man to man, without chance of failure, a just, open, sincere, and benevolent conduct.

然而，相对而言，为这些人所做的依然太少了。不曾有人教过他们如何养成最有价值的家庭和社会习惯：比如怎样最经济合理地烹制食物，如何将居所打理得井井有条，并一直保持干净有序。但更重要的是，不曾有人教导他们怎样把子女培养成有用的社会成员，也不曾有人教导他们明白世上存在这样一些原理，如果他们从孩童时期就恰

当地将其付诸实践，那么人人都必定会具有公正、坦率、真诚和宽厚的品行。

It was in this stage of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that it became necessary to form arrangements for surrounding them with circumstances which should gradually prepare the individuals to receive and firmly retain those domestic and social acquirements and habits. For this purpose a building, which may be termed the 'new institution', was erected in the centre of the establishment, with an enclosed area before it. The area is intended for a playground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villagers, from the time they can walk alone until they enter the school.

正是在这个改良提高的阶段里，有必要做好安排，使他们得以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该环境能够使其逐步获得并牢牢保持那些家庭、社会中的知识和习惯。为此，一幢可以被称作“新馆”的建筑在工厂的中心地带拔地而起，在它前面还圈出了一片场地。这片场地旨在为村民的子女提供一个从他们会走路一直到上学这一期间的游戏场所。

It must be evident to those who have been in the practice of observing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that much of good or evil is taught to or acquired by a child at a very early period of its life; that much of temper or disposition is correctly or incorrectly formed before he attains his second year; and that many durable impressions are made at the termination of the first twelve or even six months of his existence. The children, therefore, of the uninstructed and ill-instructed, suffer material injury in the formation of their characters during these and the subsequent years

of childhood and of youth.

仔细观察过儿童的人一定很清楚，许多是非善恶都是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被教会或自己学会的，许多或好或坏的脾气、秉性也是在其两岁以前就养成的，而许多难忘的印象则是在一岁以前、甚至半岁以前就留下来的。所以，无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还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其子女在这几年和随后几年的孩童和青年时期里，在性格养成方面都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害。

It was to prevent, or as much as possible to counteract, these primary evils, to which the poor and working classes are exposed when infants, that the area became part of the New Institution.

这片场地之所以成为“新馆”的一部分，正是为了预防，或者说为了尽最大可能去抵制贫民和工人阶级在幼年时期所遭受的这些根本性危害。

Into this playground the children are to be received as soon as they can freely walk alone; to be superintended by persons instructed to take charge of them.

孩子们刚会自己走路，就可以送到这个游戏场，由派来照料他们的人负责监管。

As the happiness of man chiefly, if not altogether, depends on his own sentiments and habits, as well as those of the individuals

around him; and as any sentiments and habits may be given to all infants, it becomes of primary importance that those alone should be given to them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their happiness. Each child, therefore, on his entrance into the playground, is to be told in language which he can understand, that 'he is never to injure his playfellows; but that, on the contrary, he is to contribute all in his power to make them happy.' This simple precept, when comprehended in all its bearings, and the habits which will arise from its early adoption into practice, if no counteracting principle be forced upon the young mind, will effectually supersede all the errors which have hitherto kept the world in ignorance and misery. So simple a precept, too, will be easily taught, and as easily acquired; for the chief employment of the superintendents will be to prevent any deviation from it in practice. The older children, when they shall have experienced the endless advantages from acting on this principle, will, by their example, soon enforce the practice of it on the young strangers; and the happiness, which the little groups will enjoy from this rational conduct, will ensure its speedy and general and willing adoption. The habit also which they will acquire at this early period of life, by continually acting on the principle, will fix it firmly; it will become easy and familiar to them, or, as it is often termed, natural.

不仅因为人的幸福主要（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依赖于自己和周围人的情感与习惯，还因为所有的孩童都可以被赋予任何情感和习惯，所以，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能增强幸福感的情感和习惯。因此，每个孩子一进入这个游戏场，就会有人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话语告诉他们：绝对不要伤害自己的玩伴；相反，要竭尽全力让自己的玩伴快乐。如果人们全面地理解了这条简单的箴言，并且由于早年实行这一箴言而养成了习惯，只要不将截然对立的原则强加在那些稚嫩的心灵上，这条箴言就可以有效地消除迄今使整个世界处于愚昧可悲状态的

一切谬误。同时，这么简单的一条箴言既容易教，又容易学，因为“新馆”管理者的主要工作就是防止在实践中出现任何与之相悖的行为。稍大些的孩子一旦体会到了遵循这一原则行事所得到的无穷好处，就会以身作则，很快带动新来的年龄稍小的孩子去施行这一原则。这样一来，一群群孩子由于这种合理行为而获得幸福，而这种幸福则可以保证大家能迅速、普遍、自愿地采纳这条原则。他们在孩童时期通过不断地依据该原则行事而养成的习惯也会牢牢地巩固这条原则。对他们而言，这条原则将会变得简单易行、熟稔于心，或者，按照通常的说法，它会变得自然而然。

Thus, by merely attending to the evidence of our senses respecting human nature, and disregarding the wild, inconsistent, and absurd theories in which man has been hitherto trained in all parts of the earth, we shall accomplish with ease and certainty the supposed Herculean labour of forming a rational character in man, and that, too, chiefly before the child commences the ordinary course of education.

因此，如果只关注与人性相关的感官证据，而不去理会那些一直以来在世界各地教导着人们的不着边际、自相矛盾、荒诞不经的理论，我们就能轻而易举、有把握地完成塑造人类合理性格的艰巨任务，而且，这一任务大多在孩子们开始接受常规教育之前就可以完成。

The character thus early formed will be as durable as it will be advantageous to the individual and to the community; for by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nature, when once the mind fully understands that which is true, the impression of that truth cannot be erased except by mental disease or death; while error must be relinquished

at every period of life, whenever it can be made manifest to the mind in which it has been received. This part of the arrangement, therefore, will effect the following purposes:

这样，从小养成的性格将会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并且会非常持久，因为根据人类的本性，一旦人们充分理解了真理，对真理的印象就不会被抹灭，除非他们患有精神疾病或死亡；而对于那些已经接受错误认识的人，只要给他们指明错误，他们就一定能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中摈弃错误。因此，“新馆”这一部分的安排可以达到以下的目的：

The child will be removed, so far as is at present practicable, from the erroneous treatment of the yet untrained and untaught parents.

在如今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孩子们可以免遭至今仍未接受培训和教育的父母们的错误对待。

The parents will be relieved from the loss of time and from the care and anxiety which are now occasioned by attendance on their children from the period when they can go alone to that at which they enter the school.

从子女们能够自己走路到上学这一时期，父母不会因照顾他们而耗费时间，也不用操劳和焦虑。

The child will be placed in a situation of safety, where, with its

future schoolfellows and companions, it will acquire the best habits and principles, while at mealtimes and at night it will return to the caresses of its parents; and the affections of each are likely to be increased by the separation.

孩子们会被安置在安全的环境里。在那里，他们可以和未来的同学与伙伴一起，养成最好的习惯，学到最好的行为准则。同时，在用餐时间以及晚上，他们还可以回去享受父母的爱抚，父母和子女双方的感情可能还会由于这种分离而有所加深。

The area is also to be a place of meeting for the children from five to ten years of age, previous to and after school-hours, and to serve for a drill-ground, the object of which will be hereafter explained; and a shade will be formed, under which in stormy weather the children may retire for shelter.

这片场地还要当作五岁至十岁的孩子们课前课后的集合场地，并且用作军事操练场地（关于军事操练场地的目的将会在下文中予以说明）。另外还要搭个棚子，以便孩子们躲避风雨。

These are the important purposes to which a playground attached to a school may be applied.

这些就是学校附设游戏场的重要目的。

Those who have derived a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from

observation know that man in every situation requires relaxation from his constant and regular occupations, whatever they be; and that if he shall not be provided with or permitted to enjoy innocent and uninjurious amusements, he must and will partake of those which he can obtain, to give him temporary relief from his exertions, although the means of gaining that relief should be most pernicious. For man, irrationally instructed, is ever influenced far more by immediate feelings than by remote considerations.

通过观察而对人类本性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在任何情况下，不管一个人从事何种常规的工作，他都需要在持续工作后休息放松。如果没有为他提供或者不让他享受纯正无害的娱乐活动，他就必然会参与那些他能够参加的娱乐活动，暂时缓解自己工作的劳累，哪怕其缓解方式极其有害。这是因为人如果受到不合理的教育，那么一时感情的影响就远远超过长远考虑对他的影响。

Those, then, who desire to give mankind the character which it would be for the happiness of all that they should possess, will not fail to make careful provision for their amusement and recreation.

因此，那些想要人们为了所有人的幸福而养成特定品性的人，就必定会周详地为他们安排好娱乐消遣活动。

The Sabbath was originally so intended. It was instituted to be a day of universal enjoyment and happiness to the human race. It is frequently made, however, from the opposite extremes of error, either a day of superstitious gloom and tyranny over the mind, or of the most destructive intemperance and licentiousness. The one of

these has been the cause of the other; the latter, the certain and natural consequence of the former. Relieve the human mind from useless and superstitious restraints; train it on those principles which facts, ascertained from the first knowledge of time to this day, demonstrate to be the only principles which are true; and intemperance and licentiousness will not exist; for such conduct in itself is neither the immediate nor the future interest of man; and he is ever governed by one or other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according to the habits which have been given to him from infancy.

安息日最初的用意就是如此。这一天原本被定为普天同乐的一天。但是，由于错误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一天往往成了阴暗的迷信思想以及暴政压迫人们内心世界的日子，不然的话，就成了极具危害的纵情放荡的日子。这两种情况之间有着因果联系；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而自然的结果。如果使人类的心灵挣脱无用而迷信的束缚，按照从古至今业已确定的事实所证明的唯一正确的原理去培养他们，那么纵情与放荡的行为就不会存在，因为这样的行为本身既不符合人类的眼前利益，也不符合其长远利益。况且，依照从小养成的习惯，人类总是受制于对这些利益的某些考虑。

The Sabbath, in many parts of Scotland, is not a day of innocent and cheerful recreation to the labouring man; nor can those who are confined all the week to sedentary occupations, freely partake, without censure, of the air and exercise to which nature invites them, and which their health demands.

对于苏格兰许多地方的劳动者而言，安息日并不是什么纯真欢乐的娱乐的日子。 同时，对那些整个星期伏案工作的人来说，在安息日也不能自由自在且不受任何责难地去呼吸呼吸空气、做做运动，而这

些既是大自然吸引他们去做的，也是他们的健康所需要的。

The errors of the times of superstition and bigotry still hold some sway, and compel those who wish to preserve a regard to their respectability in society, to an overstrained demeanour; and this demeanour sometimes degenerates into hypocrisy, and is often the cause of great inconsistency. It is destructive of every open, honest, generous, and manly feeling. It disgusts many, and drives them to the opposite extreme. It is sometimes the cause of insanity. It is founded on ignorance, and defeats its own object.

在迷信和偏执的年代里所产生的错误仍然具有一些影响力。它们迫使那些希望自己的社会地位永远受到尊重的人产生过度紧张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有时会沦为伪善，并且常常导致严重的前后矛盾。这种紧张状态会破坏一切坦率、诚实、慷慨和充满男子气概的感情；它使很多人深感厌恶，并驱使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它有时还使人做出疯狂之举；它以愚昧无知为基础，从而招致其自身的失败。

While erroneous customs prevail in any country, it would evince an ignorance of human nature in any individual to offend against them, until he has convinced the community of their error.

在任何国家，当陋习盛行之时，一个人如果在还没有让社会认识到这些习俗的错误之前就去违反它们，那就表明他对人性是全然无知的。

To counteract, in some degree, the inconvenience which arose

from the misapplication of the Sabbath, it became necessary to introduce on the other days of the week some innocent amusement and recreation for those whose labours were unceasing, and in winter almost uniform. In summer, the inhabitants of the village of New Lanark have their gardens and potato grounds to cultivate; they have walks laid out to give them health and the habit of being gratified with the ever-changing scenes of nature—for those scenes afford not only the most economical, but also the most innocent pleasures which man can enjoy; and all men may be easily trained to enjoy them.

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安息日利用不当所导致的麻烦，有必要在安息日之外的日子里，为那些常年不断劳作，而且冬天还做着几乎同样的工作的人推介一些无害的娱乐和消遣活动。夏天，新拉纳克的村民有自家的庭院和马铃薯地可以耕种；有铺好的散步小径，可以使他们身体健康，并养成欣赏变化无穷的自然景色的习惯——因为这些景色给予人们的不仅是他们所能享受到的最经济的乐趣，也是最纯真的乐趣，况且，经过简单的训练，人人都能够欣赏。

In winter the community are deprived of these healthy occupations and amusements; they are employed ten hours and three-quarters every day in the week, except Sunday, and generally every individual continues during that time at the same work; and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the average health and spirits of the community are several degrees lower in winter than in summer; and this in part may be fairly attributed to that cause.

冬天，村民们就没有这些有益于健康的活动和娱乐了。一个礼拜中除了礼拜天，他们每天工作十小时又三刻钟，而且每个人通常在礼

拜天还是继续做着同样的工作。经验表明，村民们冬天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平均比夏天要差好几分；这种情况有一部分完全可以归咎于上述理由。

These considerations suggested the necessity of rooms for innocent amusements and rational recreation.

以上这些考虑表明，有必要准备一些房间供人们进行无害的娱乐以及理性的消遣。

Many well-intentioned individuals, unaccustomed to witness the conduct of those among the lower orders who have been rationally treated and trained, may fancy such an assemblage will necessarily become a scene of confusion and disorder; instead of which, however, it proceeds with uniform propriety; it is highly favourable to the health, spirits, and dispositions of the individuals so engaged; and if any irregularity should arise, the cause will be solely owing to the parties who attempt to direct the proceedings being deficient in a practical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很多好心人不常看到下层民众中那些受到合理对待和培养的人的行为举止，他们可能会猜想，集结在一起的那样一群人势必会造成混乱无序的局面。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这群人的行为非常统一，妥当得体。对如此行事的个人而言，他们的健康、精神和性情也大获裨益。倘若发生了任何混乱，那也只能是因为试图指导这些活动的党派对人性的实际认识不足。

It has been and ever will be found far more easy to lead mankind to virtue, or to rational conduct, by providing them with well-regulated innocent amusements and recreations, than by forcing them to submit to useless restraints, which tend only to create disgust, and often to connect such feelings even with that which is excellent in itself, merely because it has been judiciously associated.

通过提供有序、无害的娱乐消遣活动去引导人们养成美德或使其行为合理，这种方法远比强迫他们屈从于徒劳无益的束缚来得容易，这一点向来便是如此，而且今后也永远如此。那些无用的束缚只会使人徒增厌恶，哪怕是本身极好的事物，仅仅是因为在思想上和束缚联系到一起，人们往往也对其感到厌烦。

Hitherto, indeed, in all ages and in all countries, man seems to have blindly conspired against the happiness of man, and to have remained as ignorant of himself as he was of the solar system prior to the days of Copernicus and Galileo.

的确，到目前为止，在古往今来的任何国家里，人类似乎都盲目地破坏了自身的幸福，似乎都对自己一无所知，就如同在哥白尼和伽利略时代以前对太阳系一无所知一样。

Many of the learned and wise among our ancestors were conscious of this ignorance, and deeply lamented its effects; and some of them recommended the partial adoption of those principles which can alone relieve the world from the miserable effects of ignorance.

我们祖辈中的许多饱学聪慧之士都意识到了这种愚昧无知，也对其后果感到痛心疾首。其中一些人建议部分地采用一些原理，单凭这些原理就可以使世界摆脱愚昧无知造成的悲惨后果。

The time, however,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human mind had not then arrived: the world was not prepared to receive it.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shows it to be an undeviating law of nature, that man shall not prematurely break the shell of ignorance; that he must patiently wait until the principle of knowledge has pervaded the whole mass of the interior, to give it life and strength sufficient to bear the light of day.

可是，当时人类思想解放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世界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这种解放。人类历史表明，一条永远正确的自然法则就是，人不可过早地打碎愚昧的外壳，他必须耐心等待，直到知识原理渗透到愚昧的整个内部，使得它有足够的生气和力量去承受白昼的光明为止。

Those who have duly reflected on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mental movements of the world for the last half-century, must be conscious that great changes are in progress; that man is about to advance another important step towards that degree of intelligence which his natural powers seem capable of attaining. Observe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passing hours; see the whole mass of mind in full motion; behold it momentarily increasing in vigour, and preparing ere long to burst its confinement. But what is to be the nature of this change? A due attention to the facts around us, and to those transmitted by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from former ages, will

afford a satisfactory reply.

那些适当地反思了过去半个世纪中人类思想活动的本质和范围的人一定意识到正在发生一些巨变，也一定意识到，人类又将在其天赋似乎能够达到的智力水平上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看看流逝的光阴里所发生的一切吧！看看人们完全活动起来的整个内心世界吧！看着它的活力与时俱增，并准备不久就挣脱愚昧的束缚吧！然而，这种变化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如果对周围的事实以及那些凭借着印刷术的发明从过去流传下来的事实给予应有的关注，我们就可以给出满意的答复。

From the earliest ages it has been the practice of the world to act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each individual man forms his own character, and that therefore he is accountable for all his sentiments and habits, and consequently merits reward for some and punishment for others. Every system which has been established among men has been founded on these erroneous principles. When, however, they shall be brought to the test of fair examination, they will be found not only unsupported, but in direct opposition to all experience, and to the evidence of our senses.

自古以来，人们通常的做法就是按照这样的设想来行事：每个人的性格都是由他自己形成的，因此他就要对自己的一切情感和习惯负责；这样一来，他就理应因某些情感和习惯而得到回报，因另外一些情感和习惯而受到惩罚。以往人们建立起来的每一项制度都是以这些错误的原理为基础的。然而，只要公正地去考察这些原理，就会发现它们不仅毫无根据，还与所有的经验以及我们的感官认识截然相反。

This is not a slight mistake, which involves only trivial consequences; it is a fundamental error of the highest possible magnitude; it enters into all our proceedings regarding man from his infancy; and it will be found to be the true and sole origin of evil. It generates and perpetuates ignorance, hatred, and revenge, where, without such error, only intelligence, confidence, and kindness, would exist. It has hitherto been the Evil Genius of the world. It severs man from man throughout the various regions of the earth; and makes enemies of those who, but for this gross error, would have enjoyed each other's kind offices and sincere friendship. It is, in short, an error which carries misery in all its consequences.

这并不是一个只造成微不足道后果的小错误，而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根本性错误。从孩童时期起，我们所从事的与人类相关的一切活动都存在这种错误。大家会发现，它才是各种祸害真正的、唯一的根源。它引发并延续着人类的愚昧、仇恨和报复心理。倘若没有这样的错误，世上就会只有智慧、信任和友善。这种错误至今一直是横行于人世间的恶魔。它离间世界各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彼此敌对；若非这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原本可以享受到彼此的热心帮助和诚挚友情。简而言之，这个错误的一切后果都带来灾祸。

This error cannot much longer exist; for every day will make it more and more evident that the character of man is, without a single exception, always formed for him; that it may be, and is, chiefly created by his predecessors; that they give him, or may give him, his ideas and habits, which are the powers that govern and direct his conduct. Man, therefore, never did, nor is it possible he ever can, form his own character.

这个错误不可能继续存在太久，因为每一天人们都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的性格总是无一例外地由外界为他塑造而成，这种性格可能是，而且实际上也主要是，由前人所养成的；前人给予他或可能会给予他思想和习惯，而这些思想和习惯都是支配和指导其行为的力量。所以，人类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自己塑造自己的性格。

The knowledge of this important fact has not been derived from any of the wild and heated speculations of an ardent and ungoverned imagination; on the contrary, it proceeds from a long and patient study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uman nature, under many varied circumstances; it will be found to be a deduction drawn from such a multiplicity of facts, as to afford the most complete demonstration.

对这一重要事实的认知并非来自任何对狂热不羁的空想所做的异想天开的、热烈的揣测。相反，这种认识是在长期而耐心地从理论和实践上研究了许多不同环境下的人性之后才获得的；它是由繁多的事实推演而来的结论，从而能够最充分地说明问题。

Had not mankind been misinstructed from infancy on this subject, making it necessary that they should unlearn what they have been taught, the simple statement of this truth would render it instantly obvious to every rational mind. Men would know that their predecessors might have given them the habits of ferocious cannibalism, or of the highest known benevolence and intelligence; and by the acquirement of this knowledge they would soon learn that, as parents, preceptors, and legislators united, they possess the means of training the rising generations to either of those extremes; that they may with the greatest certainty make them the

conscientious worshippers of Juggernaut, or of the most pure spirit, possessing the essence of every excellence which the human imagination can conceive; that they may train the young to become effeminate, deceitful, ignorantly selfish, intemperate, revengeful, murderous—of course ignorant, irrational, and miserable; or to be manly, just, generous, temperate, active, kind, and benevolent—that is intelligent, rational, and happy. The knowledge of these principles having been derived from facts which perpetually exist, they defy ingenuity itself to confute them; nay, the most severe scrutiny will make it evident that they are utterly unassailable.

若非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自幼就受到了错误的教导（这使得忘掉以前教给他们的一切东西很有必要），那么，简单地叙述这条真理就可以使每一个理性的人立即对它了然于心。人们就会知道，前人可能已经使他们养成了凶残地自相残杀的习惯，或者是最仁慈、最睿智的性格。凭借这一认识，他们很快就会明白：父母师长和立法者联合起来，就有办法把下一代培养成这两种极端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可以十分肯定地使其成为讫里什那神的虔诚信徒，或者使其成为最纯洁的、拥有人们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美德的神灵的虔诚信徒；他们可以把年轻一代培养成脂粉气十足、奸猾狡诈、愚昧自私、轻狂放纵、睚眦必报、穷凶极恶的人，当然也是愚昧无知、缺乏理性、悲惨可怜的人；或者，他们也可以把年轻一代培养成具有男子气概、刚直公正、慷慨大度、性情稳重、积极活跃、热心快肠、宽厚仁慈的人，也就是聪明睿智、充满理智、幸福快乐的人。对于这些原理的认识来自于那些始终存在的事实。它们经受得住人们费尽心机的诘难，不仅如此，最严格的审查也只会清楚地证明它们是完全无懈可击的。

Is it then wisdom to think and to act in opposition to the facts which hourly exhibit themselves around us, and in direct contradiction to the evidence of our senses? Inquire of the most

learned and wise of the present day, ask them to speak with sincerity, and they will tell you that they have long known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society has been founded to be false. Hitherto, however, the tide of public opinion, in all countries has been directed by a combination of prejudice, bigotry, and fanaticism, derived from the wildest imaginations of ignorance; and the most enlightened men have not dared to expose those errors which to them were offensive, prominent, and glaring.

那么，与我们周围每时每刻都见到的事实相悖、与我们的感官认识直接相冲突的思想和行为难道会是明智的吗？大家去问问当今最博学、最睿智的人吧！请他们开诚布公地说说吧！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早就知道建立社会所依据的原理是错误的。但是，各国的舆论至今仍然趋从于最愚昧无知的空想所产生的那一整套有偏见、偏执、狂热的思想，而思想最为开明的人还不敢去披露那些在他们看来令人生厌而且十分明显、突出的错误。

Happily for man this reign of ignorance rapidly approaches to dissolution; its terrors are already on the wing, and soon they will be compelled to take their flight, never more to return. For now the knowledge of the existing errors is not only possessed by the learned and reflecting, but it is spreading far and wide throughout society; and ere long it will be fully comprehended even by the most ignorant.

幸运的是，对人类而言，这种受愚昧无知的思想支配的情形正趋于崩溃，它所造成的种种恐怖情形已经张开翅膀，不久就会被迫飞离，而且永不回还。原因是，现在不仅仅是博学善思的人知道了现存的错误，这些错误还在整个社会广泛传播；要不了多久，就连最无知

的人都会充分了解这些错误。

Attempts may indeed be made by individuals, who through ignorance mistake their real interests, to retard the progress of this knowledge; but as it will prove itself to be in unison with the evidence of our senses, and therefore true beyond the possibility of disproof, it cannot be impeded, and in its course will overwhelm all opposition.

因愚昧而错误地理解自己真正利益的人确实可能会试图阻止这种认识的发展；然而，由于这种认识将证明它是与我们的感官认识相吻合的，因而是千真万确、不容反驳的，所以它是无法被阻挠的，在其发展进程中会战胜一切反对力量。

These principles, however, are not more true in theory than beneficial in practice, whenever they are properly applied. Why, then, should all their substantial advantages be longer withheld from the mass of mankind? Can it, by possibility, be a crime to pursue the only practical means which a rational being can adopt to diminish the misery of man, and increase his happiness?

然而，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这些原理在理论方面的正确程度还比不上它们在实践中的有益程度。那么，为什么还要再阻止广大民众去享受它们所带来的丰厚利益呢？采纳有理性的人所能采用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以减轻人类的苦难并增进其幸福感，这样的做法难道有可能会是犯罪吗？

These questions, of the deepest interest to society, are now brought to the fair test of public experiment. It remains to be proved, whether the character of man shall continue to be form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ost inconsistent notions, the errors of which for centuries past have been manifest to every reflecting rational mind; or whether it shall be mould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uniformly consistent principles, derived from the unvarying facts of the creation; principles, the truth of which no sane man will now attempt to deny.

现在，这些关乎社会最深层利益的问题正经受着公开实验的公正检验。是应该继续在极为矛盾的种种观念（这些观念的错误之处在过去数百年间已经为每一个反思着的、充满理性的人所明了）的指导下塑造人的性格呢，还是应该由始终如一的、从世间万物永恒不变的事实中获得的、现在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试图去否认的那些原理去指导人类性格的塑造呢？这个问题还有待论证。

It is then by the full and complete disclosure of these principles, that the destruction of ignorance and misery is to be effected, and the reign of reason, intelligence, and happiness, is to be firmly established.

因此，只有充分地、完全地揭示这些原理，才能消灭愚昧和苦难，并牢牢地确立理性、才智和幸福的主导地位。

It was necessary to give this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s advocated, that the remaining parts of the New Institution, yet to be described, may be clearly understood. We now proceed to explain

the several purposes intended to be accomplished by the School, Lecture Room, and Church.

必须大力提倡这些原理的发展，人们才可以清楚地了解尚未描述的“新馆”的其余部分。现在我们来说明一下学校、报告厅以及教堂打算实现的一些功能。

It must be evident to those who have any powers of reason yet undestroyed, that man is now taught and trained in a theory and practice directly opposed to each other. Hence the perpetual inconsistencies, follies, and absurdities, which everyone can readily discover in his neighbour, without being conscious that he also possesses similar incongruities. The instruction to be given in the School, Lecture Room, and Church, is intended to counteract and remedy this evil; and to prove the incalculable advantages which society would derive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a theory and practice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The uppermost storey of the New Institution is arranged to serve for a School, Lecture Room, and Church. And these are intended to have a direct influence in form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villagers.

那些理性尚存的人一定会清楚地看到，现在教导和培养人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对立的。这样就有了永远存在的种种矛盾、愚蠢的行为和荒谬的做法，这些大家很容易在自己的邻里身上发现，却丝毫意识不到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不协调的东西。在学校、报告厅和教堂里进行的教育旨在抵制和根除这种危害，同时还要证明，采用协调的理论和实践之后，社会可以得到不可估量的种种好处。“新馆”的最高一层楼就被规划为学校、报告厅和教堂。我们打算通过这些来直接影响村民们性格的形成。

It is comparatively, of little avail to give to either young or old 'precept upon precept, and line upon line', except the means shall be also prepared to train them in good practical habits. Hence an education for the untaught and ill-taught becomes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to the welfare of society; and it is this which has influenced all the arrangements connected with the New Institution.

比较而言，给老老少少“律上加律，条上加条”的做法并没有什么用处，除非同时准备好办法去训练他们养成良好而实际的习惯。因此，教育那些没有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就成为对社会福利而言头等重要的事情了。而且，也正是这一点影响了“新馆”所有的规划格局。

The time the children will remain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the playground and school, will afford all the opportunity that can be desired to create, cultivate, and establish those habits and sentiments which tend to the welfare of the individual and of the community. And in conformity to this plan of proceeding, the precept which was given to the child of two years old, on coming into the playground, 'that he must endeavour to make his companions happy', is to be renewed and enforced on his entrance into the school; and the first duty of the schoolmaster will be to train his pupils to acquire the practice of always acting on this principle. It is a simple rule, the plain and obvious reasons for which, children at an early age may be readily taught to comprehend, and as they advance in years, become familiarized with its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the beneficial effects to themselves, they will better feel and understand all its important consequences to society.

孩子们在游戏场和学校接受锻炼的这一时期将给人们提供所需的一切机会去创造、培养并养成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习惯和情感。依照这一行动计划，“应该努力让同伴们感到快乐”这条在两岁儿童一进入游戏场时就提出的箴言，还要在他们进学校时予以重申和强调。老师的首要任务就是训练学生养成始终遵循这条原则行事的习惯。这是一条简单的规则，其道理浅显明白，很容易教年幼的儿童理解。随着年龄渐长，他们熟悉了这一规则的实际运用过程，也体验到了它带给自己的种种好处，他们就能更好地体会和理解这一规则对社会的一切重大影响。

Such then being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the practical habits of the children are to be formed, we proceed to explain the superstructure.

以上便是孩子要养成的实际习惯的基础所在，下面让我们阐释其上层建筑。

In addition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the above-mentioned precept, the boys and girls are to be taught in the school to read well, and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read; to write expeditiously a good legible hand; and to learn correctly, so that they may comprehend and use with facility the fundamental rules of arithmetic. The girls are also to be taught to sew, cut out, and make up useful family garments; and, after acquiring a sufficient knowledge of these, they are to attend in rotation in the public kitchen and eating rooms, to learn to prepare wholesome food in an economical manner, and to keep a house neat and well arranged.

在学校里，除了教给所有男孩女孩上述箴言的原理，并教他们将其付诸实践，还要教他们好好地读书，并理解他们所读的内容；教他们把字写得既快又工整好看；教他们正确地学习，以便能够理解并熟练地运用算术的基本规则。另外，还要教给女孩子怎样缝补、裁剪和缝制实用的家居服饰。掌握了足够的这些方面的知识后，她们还要轮流去公共厨房和食堂干活，学会经济实惠地烹制有益于健康的食物，并学会让房屋干净整洁、布局合理。

It was said that the children are to be taught to read well, and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read.

前面曾经说过，要教孩子们好好地读书并理解他们所读的内容。

In many schools, the children of the poor and labouring classes are never taught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read; the time therefore which is occupied in the mockery of the instruction is lost. In other schools, the children, through the ignorance of their instructors, are taught to believe without reasoning, and thus never to think or to reason correctly. These truly lamentable practices cannot fail to indispose the young mind for plain, simple, and rational instruction.

很多学校从来没有教过贫民和工人阶级的孩子去理解他们所读的内容，因此，用在这种“伪教育”上的时间就被浪费掉了。在其他一些学校里，教师由于愚昧无知，教导孩子们不假思索地相信自己所学的东西，所以，他们永远也不会正确地思考和推理。以上这些确实可悲的做法必然会使孩子们无法适应朴实、简单和理性的教育。

The books by which it is now the common custom to teach children to read, inform them of anything except that which, at their age, they ought to be taught; hence the inconsistencies and follies of adults. It is full time that this system should be changed. Can man, when possessing the full vigour of his faculties, form a rational judgement on any subject, until he has first collected all the facts respecting it which are known? Has not this been, and will not this ever remain, the only path by which human knowledge can be obtained? Then children ought to be instructed on the same principles. They should first be taught the knowledge of facts, commencing with those which are most familiar to the young mind, and gradually proceeding to the most useful and necessary to be known by the respective individuals in the rank of life in which they are likely to be placed; and in all cases the children should have as clear an explanation of each fact as their minds can comprehend, rendering those explanations more detailed as the child acquires strength and capacity of intellect.

目前通用的儿童读物让孩子们了解到的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在他们这种年龄教授，由此可以看出成年人的矛盾和愚蠢。已经到了该改变这种体制的时候了！人类在种种官能非常灵敏的情况下，如果事先不曾搜集一切相关的已知事实，能够对任何问题做出理性的判断吗？搜集一切相关的已知事实，难道不是人类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用以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吗？所以，我们应该用同样的原理去教导孩子。首先要教他们了解事实，从孩子们最熟悉的事实开始，逐渐过渡到各人以后归属到不同社会阶层所必须知道的最有用的东西。而且，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在孩子们能够理解的基础上对每一项事实清楚地加以解释。当他们的智力有所发展时，就做出更加具体的解释。

As soon as the young mind shall be duly prepared for such

instruction, the master should not allow any opportunity to escape, that would enable him to enforce the clear and inseparable connection which exists between the interest and happiness of each individual and the interest and happiness of every other individual. This should be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all instruction; and by degrees it will be so well understood by his pupils, that they will receive the same conviction of its truth, that those familiar with mathematics now entertain of the demonstrations of Euclid. And when thus comprehended, the all-prevailing principle of known life, the desire of happiness, will compel them without deviation to pursue it in practice.

一旦孩子们准备好了接受上述这种教育，老师就不应当放过任何机会，以使其深刻了解到个人的利益及幸福与其他人的利益及幸福之间存在着明显而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应该就是一切教育的来龙去脉。渐渐地，学生们也会理解得相当充分，以至对其真理性深信无疑，犹如通晓数学的人现在对欧几里得的证明深信无疑一样。当孩子们理解了上述道理之后，现实生活中全面盛行的原则以及对幸福的渴望就会驱使他们坚定不移地将其贯彻到实践中去。

It is much to be regretted that the strength and capacity of the minds of children are yet unknown; their faculties have been hitherto estimated by the folly of instruction which has been given to them; while, if they were never taught to acquire error, they would speedily exhibit such powers of mind, as would convince the most incredulous how much the human intellect has been injured by the ignorance of former and present treatment.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还不清楚孩子们心智的领悟力和承

受力到底有多大。他们的能力一直是由他们所受到的愚蠢的教育来评估的。然而，如果他们从未受过错误的教导，那么就会很快显示出其心智的威力，使得最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会确信：由于以前和现在的教育方法的愚昧，人类的智力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It is therefore indeed important that the mind from its birth should receive those ideas only 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which are in unison with all the known facts of the creation, and which are therefore true. Now, however, from the day they are born, the minds of children are impressed with false notions of themselves and of mankind; and in lieu of being conducted into the plain path leading to health and happiness, the utmost pains are taken to compel them to pursue an opposite direction, in which they can attain only inconsistency and error.

因此，真正重要的是，从出生时起，人们的头脑就应当只接受互相一致、与世间万物的一切已知事实相符、因而也是正确的那些观念。但是，现在的情况则是：自出生之日起，孩子们的头脑里就被灌输了关于自己和全人类的种种错误观念；他们不是被引向通往健康与幸福的坦途，而是被人费尽心机地驱使着走向相反方向，在那里，他们能够得到的只有矛盾和错误。

Let the plan which has now been recommended be steadily put in practice from infancy, without counteraction from the systems of education which now exist, and characters, even in youth, may be formed, that in true knowledge, and in every good and valuable quality, will not only greatly surpass the wise and learned of the present and preceding times, but will appear, as they really will be, a race of rational or superior beings. It is true, this change cannot

be instantaneously established; it cannot be created by magic, or by a miracle; it must be effected gradually and to accomplish it finally will prove a work of labour and of years.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misinstructed from infancy, who have now influence and are active in the world, and whose activity is directed by the false notions of their forefathers, will of course endeavour to obstruct the change. Those who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impressed with early errors, and conscientiously think them to be truths, will of necessity, while such errors remain, endeavour to perpetuate them in their children. Some simple but general method, therefore, becomes necessary to counteract as speedily as possible an evil of so formidable a magnitude.

如果从人们婴幼儿时期起就稳步地推行前文所建议的方案，不受任何现行教育制度的阻挠，那么，他们甚至在青年时代就能被培养成这样一群人：在真知卓见和一切优良可贵的品质方面，不仅大大超过古往今来的博学睿智之士，而且会表里一致地成为有理性的人，或者说是优秀的人。的确，这场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靠魔法或奇迹去创造；它必须逐步地实现，而且终将证明完成这种变革是一项劳力耗时的工作。因为那些从小就受到错误教导的人，那些如今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也很活跃的人，以及其行动受到先辈的错误观念引导的人，必然会设法阻挠这场变革。那些一直以来被系统地灌输了早期的错误思想，并衷心地将其视作真理的人，当这些错误思想仍然存在时，必定会设法使其在自己的孩子们身上流传下去。所以，有必要采取某种简单而普遍的方法，尽快消除如此可怕的巨大危害。

It was this view of the subject which suggested the utility of preparing the means to admit of evening lectures in the New Institution; and it is intended they should be given, during winter, three nights in the week, alternately with dancing.

正是上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让我们意识到，准备在“新馆”举办晚间讲座的方案会很有用。我们打算冬天的时候每周花三个晚上举办讲座，中间穿插举办舞会。

To the ill-trained and ill-taught these lectures may be made invaluable; and these are now numerous; for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has been permitted to pass the proper season for instruction without being trained to be rational; and they have acquired only the ideas and habits which proceed from ignorant association and erroneous instruction.

对于那些所受培训和教育程度差的人而言，这些讲座也许是极为有用的。这样的人现在数不胜数，因为世上绝大部分人得以虚度本应接受教育的时光，而没有被培养成理性的人，其观念和习惯只是从愚昧无知的同伴和错误的教育中得来的。

It is intended that the lectures should be familiar discourses, delivered in plain impressive language, to instruct the adult part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most useful practical parts of knowledge in which they are deficient, particularly in the proper method of training their children to become rational creatures; how to expend the earnings of their own labour to advantage; and how to appropriate the surplus gains which will be left to them, in order to create a fund which will relieve them from the anxious fear of future want, and thus give them, under the many errors of the present system, that rational confidence in their own exertions and good conduct, without which, consistency of character or domestic comfort cannot be obtained, and ought not to be expected. The

young people may be also questioned relative to their progress in useful knowledge, and allowed to ask for explanations. In short, these lectures may be made to convey, in an amusing and agreeable manner, highly valuable and substantial information to those who are now the most ignorant in the community; and by similar means, which at a trifling expense may be put into action over the whole kingdom, the most important benefits may be given to the labouring classes, and through them, to the whole mass of society.

我们的打算是，这些讲座应该成为亲切的谈心，用朴实感人的语言教给该群体中的成年人最有用的实践知识，这是他们所缺乏的，特别是把他们的子女培养成有理性的人的正确方法；还要教给他们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以及如何使用自己的剩余工资，以便积攒一笔资金，免得担心今后的用度。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在现行制度的种种错误下，对自己的努力和良好品行具有合理的信心。如果没有这种信心，他们就无法而且也不应该奢望形成始终一致的性格或者得到舒适的家庭生活。同时，可以根据年轻人学习实用知识的进度对其提问，也可以让他们自己提问来寻求答案。总之，这些讲座可以用饶有趣味、令人愉悦的方式，把极具价值的、实实在在的知识传授给群体中最愚昧的那些人。通过类似的办法——这种方法只需少许经费就可以在整个王国内推行开来——就可以让工人阶级获得最重要的利益，并通过他们使整个社会受益。

For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that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population belong to or have risen from the labouring classes; and by them the happiness and comfort of all ranks, not excluding the highest, are very essentially influenced: because even much more of the character of children in all families is formed by the servants, than is ever supposed by those unaccustomed to trace with attention the human mind from earliest infancy. It is indeed

impossible that children in any situation can be correctly trained, until those who surround them from infancy shall be previously well instructed; and the value of good servants may be duly appreciated by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ery good and very bad.

我们应当考虑到，绝大部分人属于或出身于工人阶级，社会各阶层（包括最高阶层）的幸福和安逸都从根本上受到他们的影响；这是因为每个家庭中儿童的性格有很大部分是通过仆人们养成的，这一点甚至远远超出了那些不惯于从人类幼时起就一心探究其思想状况的人的想象。事实上，孩子们自幼所接触的人应该事先接受良好的指导，否则，孩子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可能得到正确的培养。那些曾经体验过好仆人与差仆人之间的差别的人，都能充分领会好仆人的价值。

The last part of the intended arrangement of the New Institution remains yet to be described. This is the Church and its doctrines; and they involve considerations of the highest interest and importance; inasmuch as a knowledge of truth on the subject of religion would permanently establish the happiness of man; for it is the inconsistencies alone, proceeding from the want of this knowledge, which have created, and still create, a great proportion of the miseries which exist in the world.

接下来还要讲述一下“新馆”的最后一部分规划安排，也就是教堂及其教义。它们是最重要的且关系到最高利益的问题，因为对宗教问题的正确认识可以永久地确保人类的幸福。因为人们渴望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由此产生了种种矛盾，正是这些矛盾造成了、并且还在制造世上的大多数苦难。

The only certain criterion of truth is, that it is ever consistent with itself; it remains one and the same under every view and comparison of it which can be made; while error will not stand the test of this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ison, because it ever leads to absurd conclusions.

判断真理的唯一确定的标准就是：它永远不会自相矛盾；无论从哪种视角来看，无论怎样比较，它都始终如一。而谬误则经不起这种考察和比较，因为它永远只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Those whose minds are equal to the subject will, ere this,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principles in which mankind have been hitherto instructed, and by which they have been governed, will not bear the test of this criterion. Investigate and compare them; they betray absurdity, folly, and weakness; hence the infinity of jarring opinions, dissensions, and miseries, which have hitherto prevailed.

有能力认识这个问题的人在此之前就会发现，一直以来教导并支配人们的那些原理都经不起这一标准的检验。只要一经考察和比较，它们就会暴露其荒诞、愚蠢和不足；因而就有了无数一直以来充斥于世的争议、纠纷和苦难。

Had any one of the various opposing systems, which have governed the world and disunited man from man, been true, without any mixture of error—that system, very speedily after its public promulgation, would have pervaded society, and compelled all men to have acknowledged its truth.

假如在与上述制度相对立、一直支配着世界并使得人类不团结的各种制度中，有任何一种是正确的，绝无半点错误——那么，这一制度在公诸于世之后很快就会在全社会普及开来，并被所有人奉为真理。

The criterion, however, which has been stated, shows that they are all, without an exception, in part inconsistent with the works of nature; that is, with the facts which exist around us. Those systems therefore must have contained some fundamental errors; and it is utterly impossible for man to become rational, or enjoy the happiness he is capable of attaining, until those errors are exposed and annihilated.

然而，上述标准表明，这些制度无一例外地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大自然所造就的一切相矛盾，也就是与我们身边存在的事实相矛盾。所以，这些制度中一定包含着一些根本性的错误。在揭示并根除这些错误之前，人类绝不可能变得理性，也不可能享受到其能力所及的幸福。

Each of those systems contains some truth with more error; hence it is that no one of them has gained, or is likely to gain, universality.

这些制度中的每一种都包含了些许真理和更多的谬误。因此，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曾、也不可能得到普及。

The truth which the several systems possess, serves to cover

and perpetuate the errors which they contain; but those errors are most obvious to all who have not from infancy been taught to receive them.

这些制度所包含的真理起到了掩盖并延续所含谬误的作用；但是，在自幼就没有被教导要接受这些谬误的人看来，这些谬误却是极为明显的。

Is proof demanded? Ask, in succession, those who are esteemed the most intelligent and enlightened of every sect and party, what is their opinion of every other sect and party throughout the world. Is it not evident that, without one exception, the answer will be, that they all contain errors so clearly in opposition to reason and equity, that he can only feel pity and deep commiseration for the individuals whose minds have been thus perverted and rendered irrational? And this reply they will all make, unconscious that they themselves are of the number whom they commiserate.

需要佐证吗？请逐个地问问各教派和各党派中公认的那些最睿智、最开明的人士吧！问问他们对于世上其他所有教派和党派的看法吧！他们会毫无例外地如此作答：其他教派和党派都包含着显然有悖于理性和公正的谬误，使人变得思想败坏、缺乏理性，对此他们只能感到遗憾和深切的同情。以上这一切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他们全都会这么回答，丝毫不觉得自身也是他们自己所要同情的人之一。

The doctrines which have been taught to every known sect, combined with the external circumstances by which they have been surrounded, have been directly calculated, and could not fail, to

produce the characters which have existed. And the doctrines in whic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world are now instructed, combined with the external circumstances by which they are surrounded, form the characters which at present pervade society.

以往已经灌输给每个已知教派的教义，连同它们的外部环境，都直接可以形成，而且也必定会形成已有的种种性格。现在灌输给世人的教义，连同他们的外部环境，则形成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种种性格。

The doctrines which have been and now are taught throughout the world, must necessarily create and perpetuate, and they do create and perpetuate, a total want of mental charity among men. They also generate superstitions, bigotry, hypocrisy, hatred, revenge, wars, and all their evil consequences. For it has been and i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in every system hitherto taught, with exceptions more nominal than real, 'That man will possess merit, and receive eternal reward, by believing the doctrines of that peculiar system; that he will be eternally punished if he disbelieves them; that all those innumerable individuals also, who, through time, have been taught to believe other than the tenets of this system, must be doomed to eternal misery.' Yet nature itself, in all its works, is perpetually operating to convince man of such gross absurdities.

曾经和现在所灌输给整个世界的各种教义，必然会造成人类完全缺乏宽厚仁慈之心的状况， 而且使得该情况始终存在，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这些教义也使迷信、偏执、虚伪、仇恨、报复、战争及其一切恶果得以滋生。原因是，除了那些名义上的而非实际的例外情况，

从过去直到现在，在每一种制度下，人们都被灌输了这么一条基本原则：“相信这一特定制度的教义，人就会得到好处，并会得到永恒的回报；不相信它们，则必将受到永恒的惩罚；而无数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教导要去相信这一制度的宗旨的人们，则注定要遭受永恒的苦难。”不过，大自然本身，却通过其所创造的万物，不断使人认识到上述说法是极为荒谬的。

Yes, my deluded fellow men, believe me, for your future happiness, that the facts around us, when you shall observe them aright, will make it evident, even to demonstration, that all such doctrines must be erroneous, because THE WILL OF MAN HAS NO POWER WHATEVER OVER HIS OPINIONS; HE MUST, AND EVER DID, AND EVER WILL, BELIEVE WHAT HAS BEEN, IS, OR MAY BE IMPRESSED ON HIS MIND BY HIS PREDECESSORS AND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SURROUND HIM. It becomes therefore the essence of irrationality to suppose that any human being, from the creation to this day, could deserve praise or blame, reward or punishment, for the prepossessions of early education.

受骗的同胞们啊，为了你们自己未来的幸福，请相信我吧！倘若你们正确地观察我们身边的事实，就可以明显地看出甚至确证，所有这类教义必定都是错误的。原因是，人的意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支配自己的观念；人必定相信、也一直相信、并将永远相信其先辈和周围环境在过去、现在或将来可能向他灌输的一切。 这样一来，如果认为从古至今，任何人都理当因其早期教育中先入之见而受到褒扬或责备、奖励或惩罚，那么，这样的想法就切实变成了不合理的思想。

It is from these fundamental errors, in all systems which have been hitherto taught to the mass of mankind, that the misery of the

human race has to so great an extent proceeded; for, in consequence of them, man has been always instructed from infancy to believe impossibilities; he is still taught to pursue the same insane course, and the result still is misery. Let this source of wretchedness, this most lamentable of all errors, this scourge of the human race, be publicly exposed; and let those just principles be introduced, which prove themselves true by their uniform consistency and the evidence of our senses; hence insincerity, hatred, revenge, and even a wish to injure a fellow creature, will ere long be unknown; and mental charity, heartfelt benevolence, and acts of kindness to one another, will be the distinguished characters of human nature.

正是由于一直以来在一切制度中，人类所接受的教育中都存在这些根本性错误，人类才会蒙受这么多的苦难；因为有了这些错误，人们从小就一直被教导要去相信种种不可能的事情；而现在他们仍被教导着去追寻一条同样的疯狂的道路，其结果依然是苦难。让我们把这个不幸的根源、这个最为可悲的错误、这个人类的祸害，公开地揭露出来吧！让我们去采用那些公正的原理吧！这些原理已经通过其自身始终如一的一致性以及我们的感官认识证明了其正确性。这样一来，伪善、仇恨、报复，甚至伤害同胞的念头很快就会消失无踪，而心存仁慈、诚心向善和彼此友爱的行为都将成为人类本性的显著特征。

Shall then misery most complicated and extensive be experienced, from the prince to the peasant, in all n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shall its cause and prevention be known, and yet withheld? The knowledge of this cause, however, cannot be communicated to mankind without offending against the deep-rooted prejudices of all. The work is therefore replete with difficulties, which can alone be overcome by those who, foreseeing

all its important practical advantages, may be induced to contend against them.

到那时，世界各国的人们，从王公到农民，还会继续经受错综复杂并广泛存在的苦难吗？人们既然已经知道苦难的根源及其干预办法，还会继续压抑和忍受吗？但是，要把对这一根源的认识传达给人们，就势必会触犯所有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因此，这一工作困难重重，至于这些困难，只有那些预见到这项工作中一切重大实际利益，并有可能因此去同困难作斗争的人，才能克服。

Yet, difficult as it may be to establish this grand truth generally throughout society, on account of the dark and gross errors in which the world to this period has been instructed, it will be found, whenever the subject shall undergo a full investigation, that the principles now brought forward cannot, by possibility, injure any class of men, or even a single individual. On the contrary, there is not one member of the great family of the world, from the highest to the lowest, that will not derive the most important benefits from its public promulgation. And when such incalculable, substantial, and permanent advantages are clearly seen and strongly felt, shall individual considerations be for a moment put in competition with its attainment? No! Ease, comfort, the good opinion of a part of society, and even life itself may be sacrificed to those prejudices; and yet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this knowledge is founded must ultimately and universally prevail.

诚然，由于到目前为止人们所受的沉重且极为错误的教育，要在全社会普遍树立上述伟大真理是有难度的，但是只要充分地考察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会发现，现在我所提倡的原理绝不会伤害任何一个

阶层，甚至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个体。相反，这个世界大家庭中的所有成员，从最高阶层到最低阶层，没有一个不会由于这些原理的公开普及而获得最重要的利益。当人们清楚地看到并深刻地感受到这些难以计量的、实际的、永恒的利益时，他们还会任由个人的考虑去阻止他们获取这种利益吗？绝不会！轻松自在的生活、舒适安逸的状态、社会上一部分人对他们的好评，乃至他们的生命本身都可能因为那些偏见而被牺牲掉；然而这一认识所依据的原理最终必将赢得广泛的胜利。

This high event, of unequalled magnitud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is thus confidently predicted, because the knowledge whence that confidence proceeds is not derived from any of the uncertain legends of the days of dark and gross ignorance, but from the plain and obvious facts which now exist throughout the world. Due attention to these facts, to these truly revealed works of nature, will soon instruct, or rather compel mankind to discover the universal errors in which they have been trained.

这一重大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满怀信心地预言这一事件，是因为产生这种信心的认识并不是从黑暗、愚昧的年代里那些无法确知的传说中得来的，而是从世间现有的、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得来的。只要适当地关注这些事实，关注这些真实地显现出来的大自然的杰作，很快就会教导——或者说是迫使——人类去发现其所受教育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错误。

The principle, then, on which the doctrines taught in the New Institution are proposed to be founded, is, that they shall be in unison with universally revealed facts, which cannot but be true.

所以，我们建议“新馆”所教授的教义建立在如下原则的基础上，也就是：这些教义应该与普遍显现出来的、绝对正确的事实相一致。

The following are some of the facts, which, with a view to this part of the undertaking, may be deemed fundamental:

就这一部分工作来说，以下是一些可以被视为基本事实的东西：

That man is born with a desire to obtain happiness, which desire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all his actions, continues through life, and, in popular language, is called self-interest.

人生来就具有获取幸福的欲望，这是人类一切行为的首要动机，它贯穿人类一生，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利己主义”。

That he is also born with the germs of animal propensities, or the desire to sustain, enjoy, and propagate life; and which desires, as they grow and develop themselves, are termed his natural inclinations.

人生来还具有动物习性的幼芽，或者说是具有维持、享受和繁衍生命的欲望。随着其生长和发展，这些欲望就被定义为人的“自然性倾向”。

That he is born likewise with faculties which, in their growth,

receive, convey, compare, and become conscious of receiving and comparing ideas.

同时，人生来还具备种种能力——在其发展过程中接受、传达和比较各种观念，并意识到其正在接受和比较着各种观念的能力。

That the ideas so received, conveyed, compared, and understood, constitute human knowledge, or mind, which acquires strength and maturity with the growth of the individual.

像这样被人类接受、传达、比较和理解的种种观念便构成了人类的知识或思想，它们随着个人的成长而逐渐增强并不断变得成熟。

That the desire of happiness in man, the germs of his natural inclinations, and the faculties by which he acquires knowledge, are formed unknown to himself in the womb; and whether perfect or imperfect, they are alone the immediate work of the Creator, and over which the infant and future man have no control.

人类对幸福的渴望、其自然性倾向的幼芽及其用以获取知识的各种能力，都是尚在母体时就已形成，只是自己并不知情。不论是否完美，这一切都是造物主直接造就而成的，无论是幼儿还是将来的成人都无法掌控。

That these inclinations and faculties are not formed exactly alike in any two individuals; hence the diversity of talents, and the

varied impressions called liking and disliking which the same external objects make on different persons, and the lesser varieties which exist among men whose characters have been formed apparently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这些倾向和能力在任何两个个体身上都不会是完全相同的；这样就形成了才能上的差异，也使不同的人对同一外界事物会产生被称为“喜爱”与“憎恶”的不同想法；而那些显然在相似环境中形成其性格的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则会小一些。

That the knowledge which man receives is derived from the objects around him, and chiefly from the example and instruction of his immediate predecessors.

人类所接受的知识是从周围的事物中得来的，而且主要是直系先辈们的言传身教中得来的。

That this knowledge may be limited or extended, erroneous or true; limited, when the individual receives few, and extended when he receives many ideas; erroneous, when those ideas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facts which exist around him, and true when they are uniformly consistent with them.

这种知识可能要么有限，要么广泛，要么错误，要么正确。如果一个人几乎没有接受什么观念，这种知识就是有限的；而当其所接受的观念很多时，它就是广泛的；如果那些观念与周围的事实不一致，这种知识就是错误的；而如果始终如一地与事实相符，它就是正确

的。

That the misery which he experiences, and the happiness which he enjoys, depend on the kind and degree of knowledge which he receives, and on that which is possessed by those around him.

人所遭受的苦难及其所享受的幸福，取决于他所接受的知识的种类与程度，同时也取决于他周围的人所具备的知识。

That when the knowledge which he receives is true and unmixed with error, although it be limited, if the community in which he lives possesses the same kind and degree of knowledge, he will enjoy happiness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that knowledge. On the contrary, when the opinions which he receives are erroneous, and the opinions possessed by the community in which he resides are equally erroneous, his misery will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those erroneous opinions.

如果他所接受的知识是正确的且没有掺杂任何错误的，哪怕只是有限的知识，只要他所生活的社会具备同一种类、同一程度的知识，那么，他就会享受到与这种知识范围相称的幸福。反之，如果他所接受的观念是错误的，而且他所生活的社会所持有的观念都是同样错误的，那么，他便会遭受与这些错误的观念程度相当的苦难。

That when the knowledge which man receives shall be extended to its utmost limit, and true without any mixture of error, then he may and will enjoy all the happiness of which his nature

will be capable.

如果人所接受的知识延展到了最大限度，并且是正确无误，那么，他就可以、也将会享受到他的天性能够带给他的一切幸福。

That it consequently becomes of the first and highest importance that man should be taught to distinguish truth from error.

这样说来，首要的、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教会人类辨明对错。

That man has no other means of discovering what is false, except by his faculty of reason, or the power of acquiring and comparing the ideas which he receives.

人类只有通过自己的推理能力，或者说是获取和比较自己所接受的观念的能力，才能发现什么是谬误。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That when this faculty is properly cultivated or trained from infancy, and the child is rationally instructed to retain no impressions or ideas which by his powers of comparing them appear to be inconsistent, then the individual will acquire real knowledge, or those ideas only which will leave an impression of their consistency or truth on all minds which have not been rendered irrational by an opposite procedure.

如果从婴幼儿时期起就正确地培养或训练人的这种推理能力，并且理性地教导孩子，让他忘掉那些他比较后发现自相矛盾的印象或者观念，那么，该个体就将获得真正的知识，或者将只获得一些具有以下特征的观念：所有未因相反的教育方法而变得缺乏理性的人，全都认为这些观点是协调一致或是正确的。

That the reasoning faculty may be injured and destroyed during its growth, by reiterated impressions being made upon it of notions not derived from realities, and which it therefore cannot compare with the ideas previously received from the objects around it. And when the mind receives these notions which it cannot comprehend, along with those ideas which it is conscious are true and which yet are inconsistent with such notions, then the reasoning faculties become injured, the individual is taught or forced to believe, and not to think or reason, and partial insanity or defective powers of judging ensue.

有一些概念并非从现实中得来，从而使得人的推理能力无法将其同以前从周围事物中获得的观念进行比较。在推理能力发展过程中，这些概念反复地给它留下印象，这样，推理能力就可能会受到损害并被摧毁。如果一个人的头脑接受了这些无法理解的概念，以及那些意识到其正确性但与这些概念相矛盾的观念，那么，其推理能力就会受到损害，这个人就被教导或被迫去相信这些概念，而不加以任何思考或推理，结果就会造成人部分理性的缺失或者是判断力方面的缺陷。

That all men are thus erroneously trained at present, and hence the inconsistencies and misery of the world.

现今所有人都是这样错误地培养出来的，所以世上便有了种种矛盾和苦难。

That the fundamental errors now impressed from infancy on the minds of all men, and from whence all their other errors proceed, are, that they form their own individual characters, and possess merit or demerit for the peculiar notions impressed on the mind during its early growth, before they have acquired strength and experience to judge of or resist the impression of those notions or opinions, which, on investigation, appear contradictions to facts existing around them, and which are therefore false.

现在，根本性的错误从所有人幼时起就印刻在他们头脑中，同时也造成了后续的其他一切错误。这一根本性错误就是：每个人的性格都是自己养成的，并且因早年印刻在其头脑中的一些特定概念而具有某些优点或缺点；那时，他还不具备能力和经验去判断这些概念或看法，也不能抹去它们所留下的印象，一经考察追究，就会发现这些概念或看法是与周围事实相矛盾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That these false notions have ever produced evil and misery in the world; and that they still disseminate them in every direction.

一直以来都是这些错误的概念带来了世上的不幸与苦难，而且现在它们仍然在四处散播着这些祸害与苦难。

That the sole cause of their existence hitherto has been man's ignorance of human nature; while their consequences have been all

the evil and misery, except those of accidents, disease, and death, with which man has been and is afflicted; and that the evil and misery which arise from accidents, disease, and death, are also greatly increased and extended by man's ignorance of himself.

这些错误存在的唯一原因至今仍是人类对于人性的无知；其引发的后果就是，人们曾经遭受和正在遭受的那些除意外事故、疾病和死亡所造成的与苦难以外的一切祸害与苦难。而且由于人类对其自身的无知，意外事故、疾病和死亡所造成的祸害与苦难也极大地增加和扩大。

That in proportion as man's desire of self-happiness, or his self-love, is directed by true knowledge, those actions will abound which are virtuous and beneficial to man; that in proportion as it is influenced by false notions, or the absence of true knowledge, those actions will prevail which generate crimes, from whence arises an endless variety of misery; and, consequently, that every rational means should be now adopted to detect error, and to increase true knowledge among men.

人类对自身幸福的渴望，或者说是人类的利己之心，越是受到正确知识的指引，对人类而言高尚而有益的行为就会越多。这种欲望越是受到错误概念的影响，或者说越是缺乏真正的知识，滋生犯罪的行为就越是盛行，由此也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因此，现在应该采取一切理性措施去发现错误，并增长人们的正确知识。

That when these truths are made evident, every individual will

necessarily endeavour to promote the happiness of every other individual within his sphere of action; because he must clearly, and without any doubt, comprehend such conduct to be the essence of self-interest, or the true cause of self-happiness.

当人们明白了上述这些真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必定会努力提升其活动范围内其他所有人的幸福感，因为他一定会确定无疑地、清楚地理解，这样的行为才是个人利益的本质所在，或者说才是自身幸福的真正动因。

Here, then, is a firm foundation on which to erect vital religion, pure and undefiled, and the only one which, without any counteracting evil, can give peace and happiness to man.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来确立纯洁无邪的、不可或缺的信仰，这种信仰不带有任何反面危害，是唯一能带给人类和平与幸福的宗教信仰。

It is to bring into practical operation, in forming the character of men, thes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ruths, that the religious part of the Institution at New Lanark will be chiefly directed, and such ar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upon which the Instructor will proceed. They are thus publicly avowed before all men, that they may undergo discussion and the most severe scrutiny and investigation.

新拉纳克的“新馆”中有关宗教信仰的部分的主要导向就是，在实践中运用这些最重要的真理去塑造人们的性格；同时，这些真理也

是“新馆”的教导者将要遵循的基本原理。我们就这样在所有人面前公开地承认这些真理，以便大家对其进行讨论，并进行最严格的审查与研究。

Let those, therefore, who are esteemed the most learned and wise, throughout the various states and empires in the world, examine them to their foundation, compare them with every fact which exists, and if the shadow of inconsistency and falsehood be discovered, let it be publicly exposed, that error may not more abound.

因此，让世界各邦国和各帝国中公认的那些最博学和最睿智的人从根本上来考察这些真理吧！将它们同每一个现存的事实作比较吧！倘若发现一丝一毫的矛盾与谬误，就公开地揭露它们，那么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错误了。

But should they withstand this extended ordeal, and prove themselves uniformly consistent with every known fact, and therefore true, then let it be declared, that man may be permitted by man to become rational, and that the misery of the world may be speedily removed.

然而，倘若这些真理能够经受得住这种广泛的严峻考验，而且可以证明它们与一切已知事实始终相符，因而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要宣布：人可以让人变得理性，世上的苦难也会很快被根除。

Having alluded to the chief uses of the playground and exercise

rooms, with the School, Lecture Room, and Church, it remains, to complete the account of the New Institution, that the object of the drill exercises mentioned when stating the purposes of the playground, should be explained; and to this we now proceed.

前面已经谈过了在学校、报告厅和教堂附近设置游戏场和健身房的主要用途，此处还应该解释一下在说明游戏场的功能时所提到的军事操练的目的，才能结束关于“新馆”的讲述。接下来让我们开始说明这个问题。

Were all men trained to be rational, the art of war would be rendered useless. While, however, any part of mankind shall be taught that they form their own characters, and shall continue to be trained from infancy to think and act irrationally; that is, to acquire feelings of enmity, and to deem it a duty to engage in war against those who have been instructed to differ from them in sentiments and habits—even the most rational must, for their personal security, learn the means of defence; and every community of such characters, while surrounded by men who have been thus improperly taught, should acquire a knowledge of this destructive art, that they may be enabled to overrule the actions of irrational beings, and maintain peace.

倘若所有的人都被培养得有了理性，那么战争技术就会变得毫无用处。然而，如果有任何一部分人被教导说他们的性格是自己养成的，并且他们从幼时起就一直受到训练，以使其思维和行为没有理性；也就是使得他们怀有仇恨心理，并认为自己有责任向那些在情感和习惯方面被教导得不同于他们的人开战，那么，即使是最具理性的人，为了自身的安全，也必须学会自我防卫的办法；加入这样由最有

理性的人所组成的任何社会中周围全是用这样错误的方式教导出来的人，他们就应当学习这种破坏性技术，以使自己能够战胜没有理性的人的种种行为，并维护和平。

To accomplish these objects to the utmost practical limit, and with the least inconvenience, every male should be instructed how best to defend, when attacked, the community to which he belongs. And these advantages are only to be obtained by providing proper means for the instruction of all boys in the use of arms and the arts of war.

为了实际上最大限度地达到这些目标，同时尽量减少麻烦，就应该教导每一个男子如何在自己所属的社会遭受攻击时最好地进行防御。只有用恰当的方式去教所有的男孩子使用武器与战争技术，才能获取优势。

As an example how easily and effectually this might be accomplished over the British Isles, it is intended that the boys trained and educated at the Institution at New Lanark shall be thus instructed; that the person appointed to attend the children in the playground shall be qualified to drill and teach the boys the manual exercise, and that he shall be frequently so employed; that afterwards, firearms, of proportionate weight and size to the age and strength of the boys, shall be provided for them, when also they might be taught to practise and understand the more complicated military movements.

为了举例说明如何在不列颠诸岛简单高效地实现这一点，我们的

打算是：那些在新拉纳克“新馆”里接受训练和教育的男孩子应当学习使用武器与战争技术；被派去照管游戏场内的孩子的人应当能够胜任训练、教导男孩子进行体能操练的工作，并且应经常如此；然后，应当根据男孩子的年龄和力气，为他们提供重量和大小合适的武器，到时候也可以教导他们练习并了解更为复杂的军事动作。

This exercise, properly administered, will greatly contribute to the health and spirits of the boys, give them an erect and proper form, and habits of attention, celerity, and order. They will, however, be taught to consider this exercise, an art, rendered absolutely necessary by the partial insanity of some of their fellow creatures who by the errors of their predecessors, transmitted through preceding generations, have been taught to acquire feelings of enmity, increasing to madness, against those who could not avoid differing from them in sentiments and habits; that this art should never be brought into practice except to restrain the violence of such madmen; and, in these cases, that it should be administered with the least possible severity, and solely to prevent the evil consequences of those rash acts of the insane, and, if possible, to cure them of their disease.

这种军事训练如果施行得当，就会大大有益于男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既可以使他们具有挺拔匀称的体形，又可以使他们养成注意力集中、行动敏捷和遵守秩序的习惯。不过，我们要教他们认识到：由于他们的一些同伴的半疯狂状态，这种训练（也是一种技术）是完全必要的。由于世代相传的错误教育，这些同伴已经对那些难免在情感和习惯上不同于他们的人有了敌对心理，并逐步演化至疯狂。我们还要教他们认识到：除了用来制止这些狂人的暴行以外，永远不应当运用这种技术；而且，运用的时候应当尽量降低其严酷程度，运用它只是为了预防那些狂人的莽撞行动将造成的恶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治愈

他们的疯狂病症。

Thus, in a few years, by foresight and arrangement, may almost the whole expense and inconvenience attending the local military be superseded, and a permanent force created, which in numbers, discipline, and principles, would be superior, beyond all comparison, for the purposes of defence, always ready in case of need, yet without the loss which is now sustained by the community of efficient and valuable labour. The expenditure which would be saved by this simple expedient would be far more than competent to educate the whole of the poor and labouring classes of these kingdoms.

这样的话，凭借人们的先见之明和悉心安排，几年之内，地方军队的开支和麻烦就几乎可以完全省掉了，同时还可以建立起一支常备军队。这支军队的人数、纪律和信条，都将是无比优越、无与伦比的；出于防卫目的，它时刻处于备战状态，一旦需要，即可使用，而社会又不用像现在这样在有效、宝贵的劳动上蒙受损失。采用这一简单措施所能节省的开支将远远超过教育王国的全部贫民与劳动阶级所需的费用。

There is still another arrangement in contemplation for the community at New Lanark, and without which the establishment will remain incomplete.

对新拉纳克社区，我们还正在思考和规划另外一项安排。倘若没有这项安排，那么整个体制依然是不完善的。

It is an expedient to enable the individuals, by their own foresight, prudence, and industry, to secure to themselves in old age a comfortable provision and asylum.

这一安排使人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远见、谨慎和勤劳，确保自己安享晚年，衣食无忧，居有定所。

Those now employed at the establishment contribute to a fund which supports them when too ill to work, or superannuated. This fund, however, is not calculated to give them more than a bare existence; and it is surely desirable that, after they have spent nearly half a century in unremitting industry, they should, if possible, enjoy a comfortable independence.

现在受雇于这个工厂的人都出钱设立一项基金；在他们因病而无法工作或退休的时候，就靠这笔基金来维持生活。不过，这笔基金仅仅只够让他们维持生存；他们坚持不懈地辛勤劳作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如果有可能享有一种舒适而自立的生活，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To effect this object, it is intended that in the most pleasant situation near the present village, neat and convenient dwellings should be erected, with gardens attached; that they should be surrounded and sheltered by plantations, through which public walks should be formed; and the whole arranged to give the occupiers the most substantial comforts.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打算在现有的村子附近最舒适宜人的地方，建一些整洁便利的、带有庭园的住宅；周围都种上植物以作屏障，其间还要铺设公用的散步小径；整个布局都是为了给居民提供最实质性的享受。

That these dwellings, with the privileges of the public walks, etc., shall become the property of those individuals who, without compulsion, shall subscribe each equitable sums monthly, as, in a given number of years will be equal to the purchase, and to create a fund from which, when these individuals become occupiers of their new residences, they may receive weekly, monthly, or quarterly payments, sufficient for their support; the expenses of which may be reduced to a very low rate individually, by arrangements which may be easily formed to supply all their wants with little trouble to themselves; and by their previous instruction they will be enabled to afford the small additional subscription which will be required for these purposes.

这些住宅及公用散步小径这一特殊待遇等都将成为当地居民的财产。这些人每月自愿缴纳数额合理的一笔钱，到规定的若干年后，这些钱就足以购置这份财产，而且还能构成一笔基金，当他们搬进新住宅时，就可以按周、按月或按季度从中领取一笔钱，这笔钱足以维持生活。由于我们很容易做出安排，不用他们怎么费事就能提供其一切所需；而且由于先前所接受的教导，他们能够承担得起达到这些目的所需的、为数不多的额外认捐，所以，他们每个人在基金上的开支都将缩减到很低的程度。

This part of the arrangement would always present a prospect of rest, comfort, and happiness to those employed; in consequence,

their daily occupations would be performed with more spirit and cheerfulness, and their labour would appear comparatively light and easy. Those still engaged in active operations would, of course, frequently visit their former companions and friends, who, after having spent their years of toil, were in the actual enjoyment of this simple retreat; and from this intercourse each party would naturally derive pleasure. The reflections of each would be most gratifying. The old would rejoice that they had been trained in habits of industry, temperance, and foresight, to enable them to receive and enjoy in their declining years every reasonable comfort which the present state of society will admit;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that they were pursuing the same course, and that they had not been trained to waste their money, time, and health, in idleness and intemperance. These and many similar reflections could not fail often to arise in their minds; and those who could look forward with confident hopes to such certain comfort and independence would, in part, enjoy by anticipation these advantages. In short, when this part of the arrangement is well considered, it will be foun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to the community and to the proprietors; indeed, the extensively good effects of it will be experienced in such a variety of ways, that to describe them even below the truth would appear an extravagant exaggeration. They will not, however, prove the less true because mankind are yet ignorant of the practice, and of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it has been founded.

这一部分的安排总是呈现给那些雇工们一派休闲、舒适和幸福的景象；因此，他们每天就会更加起劲、更加高兴地工作，他们的劳作也会显得比较轻松容易。当然，仍然活跃在岗位上的雇工们会经常去看望那些老伙伴和老朋友，这些人辛劳多年之后正实实在在地享受着这种简单的退休生活。自然，他们双方都会从这种交往中得到快乐。

他们光是细想一下都会感到十分高兴。老年人会感到高兴，是因为他们在历经训练后，养成了勤劳、克己以及深谋远虑的习惯，这使他们能够在晚年得到并享受社会现状所允许的一切合理的舒适生活。青年人和中年人也会感到高兴，因为他们正走着同样的一条道路，他们所受的训练使他们不会把金钱、时间和体力浪费在懒散与放纵的生活上。这些考虑以及许多类似的考虑必定会时常在他们的脑海中浮现；能够满怀信心地期盼着这样一种必然的、舒适自立的生活的人，也会在希冀中或多或少得到享受到好处。总之，如果对这一部分的安排考虑周详，那么人们就会发现它对社区成员和工厂主都极为重要。的确，人们会在如此众多的方面体验其广泛的好处，以至即使把这些说得不如真实情况那么好，也会显得是一种极大的夸张。这些好处的真实性并不会因为人们现在还不了解这一做法及其所依据的原理而有所削弱。

These, then, are the plans which are in progress or intended for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inhabitants of New Lanark. They have uniformly proceeded from the principles which have been developed through these Essays, restrained, however, hitherto, in their operations, by the local sentiments and unfounded notions of the community and neighbourhood, and by the peculiar circumstances of the establishment.

以上这些就是目前正在实施或打算实施的进一步改善新拉纳克村民生存状况的计划。这些计划均是基于我在这几篇论文所阐述的原理。不过，由于新拉纳克村及其附近地区居民的情感与毫无根据的观念，以及该厂的特殊环境，它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受到了限制。

In every measure to be introduced at the place in question, for the comfort and happiness of man, the existing errors of the country

were always to be considered; and as the establishment belonged to parties whose views were various, it became also necessary to devise means to create pecuniary gains from each improvement, sufficient to satisfy the spirit of commerce.

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地区（新拉纳克地区）推介每一项措施时，为了人们生活的舒适与幸福，我们始终要考虑到当地存在的种种错误；同时，由于这个工厂分属于持有不同观念的派别，所以必须想方设法地使每一项改良活动都能产生金钱效益，并足以满足商业精神的需求。

All, therefore, which has been done for the happiness of this community, which consists of between two and three thousand individuals, is far short of what might have been easily effected in practice, had not mankind been previously trained in error. Hence, in devising these plans, the sole consideration was not what were the measures dictated by these principles, which would produce the greatest happiness to man; but what could be effected in practice under the present irrational systems by which these proceedings were surrounded.

因此，为了这个社区两、三千人口的幸福所做的一切，与假如人类事先没有受到错误的教育就会很容易做到的一切相比，还相差甚远。所以，我们制定这些计划时，唯一的考虑并不是根据这些原理，要够实现人类最大程度的幸福所要求的那些措施，而是在现有的种种不合理制度下，我们的这些做法实际上能够取得什么效果。

Imperfect, however, as these proceedings must yet be, in

consequence of the formidable obstructions enumerated, they will yet appear, upon a full minute investigation by minds equal to the comprehension of such a system, to combine a greater degree of substantial comfort to the individuals employed in the manufactory, and of pecuniary profit to the proprietors, than has hitherto been found attainable.

然而，由于前面所列举的种种巨大障碍，尽管这些做法仍然不够完善，但是根据能够理解这种制度的人所作的充分而仔细的考察，我们还是会发现，这些做法兼顾了工厂雇工的实际享受和工厂所有者的金钱利益，其程度前所未有。

But to whom can such arrangements be submitted? Not to the mere commercial character, in whose estimation to forsake the path of immediate individual gain would be to show symptoms of a disordered imagination; for the children of commerce have been trained to direct all their faculties to buy cheap and sell dear; and consequently, those who are the most expert and successful in this wise and noble art, are, in the commercial world, deemed to possess foresight and superior acquirements; while such as attempt to improve the moral habits and increase the comforts of those whom they employ, are termed wild enthusiasts.

可是该向谁提交这些计划安排呢？不能提交给纯粹的商人，在商人的心目中，放弃个人眼前利益这条路就是精神错乱的表现；因为商人在幼时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运用自己的一切才能去贱买贵卖；所以，那些最精通这种聪明、高贵的经商艺术，并且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人，在商界就被认为是具有远见卓识和卓越成就的人。而那些试图去改进他们雇工的道德习惯并让其生活更舒适的人，则被称作狂妄的好事

者。

Nor yet are they to be submitted to the mere men of the law; for these are necessarily trained to endeavour to make wrong appear right, or to involve both in a maze of intricacies, and to legalize injustice.

这些计划安排也不能提交给纯粹的法律工作者；因为他们一定受过训练，会极尽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之能事，把不公正的事情合法化。

Nor to mere political leaders or their partisans; for they are embarrassed by the trammels of party, which mislead their judgement, and often constrain them to sacrifice the real well-being of the community and of themselves, to an apparent but most mistaken self-interest.

也不能把它们提交给纯粹的政界领袖或其党徒；因为派别的束缚会使他们陷入为难境地，误导他们的判断，而且常常迫使他们牺牲社会和自己的真正福利，以换取看似真实但却极其错误的个人利益。

Nor to those termed heroes and conquerors, or to their followers; for their minds have been trained to consider the infliction of human misery, and the commission of military murders, a glorious duty, almost beyond reward.

也不能提交给那些所谓的英雄或征服者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因为他们所被灌输的思想会使他们认为，使人类遭受苦难和进行军事屠杀是一项几乎超出酬报的光荣任务。

Nor yet to the fashionable or splendid in their appearance; for these are from infancy trained to deceive and to be deceived, to accept shadows for substances, and to live a life of insincerity, and of consequent discontent and misery.

也不能提交给外表时尚光鲜的人；因为他们从小所学到的就是尔虞我诈、舍本逐末，过着虚伪的、从而也是不尽如人意、苦不堪言的生活。

Still less are they to be exclusively submitted to the official expounders and defenders of the various opposing religious systems throughout the world; for many of these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propagating imaginary notions, which cannot fail to vitiate the rational powers of man, and to perpetuate his misery.

这些措施安排更不能专门提交给世界上各种信仰体系的官方宣讲人和辩护者——那些体系与本论文所提倡的原理相对立；因为其中许多人在积极地参与宣传种种空想的概念，这些概念必定会损害人们的理性，并会使其苦难延续下去。

These principles, therefore, and the practical systems which they recommend, are not to be submitted to the judgement of those who have been trained under, and continue in, any of these

unhappy combinations of circumstances. But they are to be submitted to the dispassionate and patient investigation and decision of those individuals of every rank and class and denomination of society, who have become in some degree conscious of the errors in which they exist; who have felt the thick mental darkness by which they are surrounded; who are ardently desirous of discovering and following truth wherever it may lead; and who can perceive the inseparable connection which exist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general,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good!

所以，这些原理以及其推介的实际制度不能提交给在上述任何一种在不幸环境中接受教育、并继续处在这种不幸环境中的人去评判。这一切只能提交给另外一些人去冷静耐心地加以考察和决断。这些人来自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和各教派；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意识到现实中的错误；他们已经感受到自己被思想上的重重黑暗所包围；他们热情地渴望发现真理，并唯真理是瞻；他们能够觉察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It has been said, and it is now repeated, that these principles, thus combined, will prove themselves unerringly true against the most insidious or open attack; and, ere long, they will, by their irresistible truth, pervade society to the utmost bounds of the earth; for 'silence will not retard their progress, and opposition will give increased celerity to their movements'. When they shall have dissipated in some degree, as they speedily will dissipate, the thick darkness in which the human mind has been and is still enveloped, the endless beneficial consequences which must follow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m into practice may then be explained in greater detail, and urged upon minds to which they will then appear less questionable.

前文中已经提到过，现在还要重复一遍的是：这些原理像这样组合起来的话，将证明是正确无误的，经得起最阴险的或最公开的抨击；而且用不了多久，这些原理就会因其无法抗拒的真实性而最大限度地渗透到世界上的每个社会中。这是因为“沉默并不会阻止它们的发展，反对意见则会加速它们的活动”。当这些原理在某种程度上驱散了曾经包围着、并仍然包围着人类思想的重重黑暗之后，它们很快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更加详细地解释，在普遍推行这些原理之后人们必然会获得的无穷好处，并且把这些极力推荐给那时已经对此不那么持怀疑态度的人。

In the meantime we shall proceed to state, in a Fourth Essay, of what improvements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British population is susceptible in practice.

接下来我们要在第四篇论文中论述：针对不列颠民众现状，在实践中能够实施哪些改良措施。

Fourth Essay: The Principles of the Former Essays Applied to Government

论文四：前几篇论文的原理在政治上的运用

It is beyond all comparison better to prevent than to punish crime. A system of government therefore which shall prevent ignorance, and consequently crime, will be infinitely superior to one, which, by encouraging the first, creates a necessity for the last, and afterwards inflicts punishment on both.

预防犯罪远胜于惩罚罪行。因此，预防愚昧、从而预防犯罪的政治制度远胜于助长愚昧、因而必然制造罪行、然后又对二者都施加惩罚的政治制度。

The end of government is to make the governed and the governors happy.

政治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感到幸福。

That government, then, is the best, which in practice produces the greatest happiness to the greatest number; including those who govern, and those who obey.

那么，能够在实际意义上为最大多数的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

者，带来最大程度的幸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In a former Essay we said, and it admits of practical demonstration, that by adopting the proper means, man may by degrees be trained to live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without poverty, without crime, and without punishment; for all these are the effects of error in the various systems of training and governing error proceeding from very gross ignorance of human nature.

在前面一篇论文中我们讲过这一点，这一点也经得住实践的证明：通过采取适当的措施，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通过培养，逐渐过上没有贫困、没有犯罪、也没有惩戒的生活；因为这一切都是各种教育和统治制度中的谬误所带来的恶果，而这种谬误则来源于由于人们对人性极其无知。

It is of primary importance to make this ignorance manifest, and to show what are the means which are endowed with that transcendent efficacy.

最重要的是揭示这种无知，并且说明可以实现上文提到的卓越功效的方法。

We have also said that man may be trained to acquire any sentiments and habits, or any character; and no one now, possessing pretensions to the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will deny that the government of any independent community may form the individuals of that community into the best, or into the worst

characters.

我们也说过，人可以通过教育获得任何一种情感与习惯，或者任何一种性格。如今没有一个自视了解人类本性的人会否认，任何独立社会的政府都可以使这个社会里的人形成最好的或者是最差的性格。

If there be one duty therefore more imperative than another, on the government of every country, it is, that it should adopt, without delay, the proper means to form those sentiments and habits in the people, which shall give the most permanent and substantial advantages to the individuals and to the community.

因此，倘若说各国政府有一项最为紧迫的责任，那就是刻不容缓地采取适当措施，使人们养成这样一些情感和习惯；这些情感和习惯将会给个人和社会都带来最持久和最大限度的利益。

Survey the acquirements of the earliest ages; trace the progress of those acquirements, through all the subsequent periods, to the present hour; and say if there be anything of real value in them, except that which contributes in practice to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the world.

回顾一下人类远古时代的成就，追溯这些成就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审视一下其中除了那些在实践中增进世人幸福感的东西以外，还有没有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And yet, with all the parade of learning contained in the myriads of volumes which have been written, and which still daily pour from the press, the knowledge of the first step of the progress which leads to human happiness remains yet unknown or disregarded by the mass of mankind.

尽管已写成的、不可胜数的书籍以及目前每天仍然大量付印的书籍里包含了无数的知识，但是大众对于如何迈出走向幸福的第一步仍然一无所知或者不予理会。

The important knowledge to which we allude is, 'That the old collectively may train the young collectively, to be ignorant and miserable, or to be intelligent and happy.' And, on investigation, this will be found to be one of those simple yet grand laws of the universe, which experience discovers and confirms, and which, as soon as men become familiar with it, will no longer admit of denial or dispute. Fortunate will be that government which shall first acquire this knowledge in theory, and adopt it in practice.

我们所指的重要的知识是，“年老的一代可以把年轻一代全部培养成无知而不幸的人，也能把他们培养成聪明而幸福的人。”倘若加以考察，就会看出这一知识是经验所发现并证实的、简单而重大的宇宙定律之一。一旦人们熟悉这一知识，就不再有否认和争论的余地。假如政府能够首先从理论上掌握这一知识并将其付诸实践，那么这个政府就是幸运的。

To obtain its introduction into our own country first, a mode of procedure is now submitted to the immediate governing powers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it is so submitted, with an ardent desire that it may undergo the most full and ample discussion; that if it shall, as on investigation it will, be found to be the only consistent, and therefore rational, system of conducting human beings, it may be temperately and progressively introduced, instead of those defective national practices by which the state is now governed.

为了率先将这一知识引入到我国，我们便向大英帝国当前的执政者们提交了一套办法，我们热切希望这套办法提交后，能够得到最充分最全面的讨论。倘若经过考察之后，发现它是唯一没有矛盾因而也是合理的体制，能够指导人类行为，那么，就要逐步稳健地推介这一套办法，以取代目前国家目前所推行的有缺陷的执政措施。

We therefore proceed to explain how this principle may now be introduced into practice, without injury to any part of society. For it is the time and manner of introducing this principle and its consequent practice, which alone constitute any difficulty.

所以，我们继续阐述，现在怎样才能将这个原理付诸实践，而又对社会的任何部分都不造成伤害。唯一的困难就是引入并实施这一原理的时间和方式。

This will appear evident when it is considered that although, from a plain statement of the most simple facts, the truth of the principle cannot fail to prove so obvious that no one will ever attempt openly to attack it; and although its adoption into practice will speedily accumulate benefits of which the world can now form no adequate conception; yet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to be

introduced into a society trained and matured under principles that have impressed upon the individuals who compose it the most opposite habits and sentiments; which have been so entwined from infancy in their bodily and mental growth, that the simplicity and irresistible power of truth alone can disentangle them and expose their fallacy. It becomes then necessary, to prevent the evils of a too sudden change, that those who have been thus nursed in ignorance may be progressively removed from the abodes of mental darkness to the intellectual light which this principle cannot fail to produce. The light of true knowledge, therefore, must be first made to dawn on those dwellings of darkness, and afterwards gradually to increase, as it can be borne by the opening faculties of their inhabitants.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考虑到：尽管只需对最简单的事实加以清楚陈述，这个原理必定会清楚地证明其真实性，以至没有任何人会试图公开地攻击它；尽管这个原理付诸实践之后会迅速地获得日益增长的利益，而目前世人对此还没有充分理解；不过我们的理论和实践被引入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它是在那些在使其成员养成完全相反的习惯和情感的原理基础上培养与成熟起来的；这些习惯和情感从他们幼时起就与他们的身心发展盘根错节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真理具有的简朴而不可抗拒的力量才能解开它们，并暴露其荒谬性。所以为了防止过于突然的变革所带来的弊端，我们必须使那些在无知中被培养起来的人在思想上逐渐脱离黑暗之所,来到这个原理必将发出的智慧光环之下。因此，真正的知识的光芒首先必须用来照耀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然后根据那些人的承受能力逐渐增加亮度。

To proceed on this plan,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direct our attention to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British population, to disclose the cause of those great and leading evils of which all now complain.

要推行这项计划，我们必须注意到不列颠民众的实际境况，并揭露目前所有人都在抱怨的那些严重的主要弊端的成因。

It will then be seen that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these evils have been erected is ignorance, proceeding from the errors which have been impressed on the minds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by its predecessors; and chiefly by that greatest of all errors, the notion that individuals form their own characters. For while this most inconsistent, and therefore most absurd, of all human conceptions shall continue to be forced upon the young mind, there will remain no foundation whatever on which to build a sincere love and extended charity for man to his fellow creatures.

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些弊端产生的基础是无知，而无知是由先辈传给这一代人的种种谬误造成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最大谬误就是这种认为每个人的性格是自己形成的观念。因为当这一最自相矛盾，因而也最为荒谬的观念被继续强加于后辈时，人与人之间就再没有任何基础可以建立起真诚的关爱之情和博大的宽容精神了。

But destroy this hydra of human calamity, this immolator of every principle of rationality, this monster, which hitherto has effectually guarded every avenue that can lead to true benevolence and active kindness, and human happiness will be speedily established on a rock from whence it shall never more be removed.

但是只要摧毁这一人类灾害的大患，这个一切理性原则的献祭者，这个妖怪——一直以来它顽强固守着每一条能通往真正的仁慈与

积极的善行的道路，人类的幸福就会迅速地建立在磐石之上，永不可移。

This enemy of humanity may now be most easily destroyed. Let it be dragged forth from beneath the dark mysterious veil by which till now it has been hid from the eyes of the world; expose it but for an instant to the clear light of intellectual day; and, as though conscious of its own deformity, it will instantaneously vanish, never to reappear.

如今，这个人类的大敌可以很轻易地被消灭。到现在为止，它一直避开世人的目光藏身于黑暗的神秘面纱之后，让我们把它拖出来吧。只要将其置于明亮的智慧之光下片刻，它就会立刻消失，永不再现，仿佛自惭形秽一般。

As a groundwork, then, of a rational system, let this absurd doctrine, and all the chain of consequences which follow from it, be withdrawn; and let that only be taught as sacred, which can be demonstrated by its never-failing consistency to be true.

因此，为了建立起理性体制的根基，让我们消除这一荒谬的理论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恶果吧；让我们向人们传输始终如一，因而被证明是正确的唯一神圣的理论吧。

This essential object being accomplished (and accomplished it must be before another step can be taken to form man into a rational being), the next is to withdraw those national laws which

chiefly emanate from that erroneous doctrine, and which now exist in full vigour, training the population to almost every kind of crime. For these laws are, without chance of failure, adapted to produce a long train of crimes; which crimes are accordingly produced.

这一根本目标完成之后（为了将人类培养成理性的人，必须首先完成这一目标才能采取下一步骤），接下来就是废除那些主要由这一错误理论而产生的国家法律。现在它们甚嚣尘上，促使人们去犯几乎所有的罪行。因为这些法律，无一例外，适合制造一系列违法行为；所以这些罪行也就随之产生了。

Some of the most prominent to which allusion is made are such as encourage the consumption of ardent spirits, by fostering and extending those receptacles to seduce the ignorant and wretched, called gin-shops and pot-houses; those laws which sanction and legalize gambling among the poor, under the name of a state lottery; those which are insidiously destroying the real strength of the country, under the name of providing for the poor; and those of punishment, which, under the present irrational system of legislation, are supposed to be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hold society together.

以上所提及的法律中最突出的一些是：那些鼓励消费烈酒的法律，促使酒铺和酒店引诱那些无知与不幸的人，并助长这种气焰；以国家彩票的名义批准穷人赌博并使之合法化的法律；以救济贫民的名义暗中破坏国家真正实力的法律；还有那些惩处犯人的法律，在如今不合理的立法制度中，这些法律被认为是使国家团结的绝对必需的手段。

To prove the accuracy of this deduction, millions of facts exist around us, speaking in a language so clearly connected and audible, that it is scarcely credible any man can misunderstand it. These facts proclaim aloud to the universe, that ignorance generates, fosters, and multiplies sentiments and actions which must produce private and public misery; and that when evils are experienced, instead of withdrawing the cause which created them, it invents and applies punishments, which, to a superficial observer, may appear to lessen the evils which afflict society, while, in reality, they greatly increase them.

为了证明这一推断的正确性，我们周围有千百万的事实用层次分明而响亮的语言向我们证明，因此我们确信几乎不会有人对此产生误解。这些事实向全世界有力地证实：无知产生、助长并增加了那些必然会给个人和公众带来痛苦的情感和行为；当罪恶出现时，无知非但不能消除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反而发明并施行种种惩罚。在一个肤浅的观察者眼里，这些惩罚似乎减少了危害社会的罪恶，但是，实际上它却极大地增加了罪恶。

Intelligence, on the contrary, traces to its source the cause of every evil which exists; adopts the proper measures to remove the cause; and then, with the most unerring confidence, rests satisfied that its object will be accomplished.

相反，智慧则会追溯到现存每一种罪恶的成因之源；并且采取恰当措施消除该成因；然后智慧就会很有把握、心满意足地确信其目标能够实现。

Thus then intelligence, or in other words plain unsophisticated reason, will consider the various sentiments and actions which now create misery in society, will patiently trace the cause whence those sentiments and actions proceed, and immediately apply the proper remedies to remove them.

因此，智慧，也就是朴素单纯的理性，会考虑目前给社会带来苦难的种种情感和行为，会耐心地追溯这些情感和行为的成因，并立刻采取恰当的补救措施去消除它们。

And attention, thus directed, discovers that the cause of such sentiments and actions in the British population is the laws which have been enumerated, and others which shall be hereafter noticed.

注意到这一事实后，我们就会发现，不列颠民众之所以有这些情感和行为，就是由于我们前面已经列举过的那些法律，以及后面要加以关注的其他法律的存在。

To withdraw, therefore, the existing evils which afflict society, these unwise laws must be progressively repealed or modified.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in its present outline, is admirably adapted to effect these changes, without the evils which always accompany a coerced or ill-prepared change.

因此，为了消除这些现存的、危害社会的罪恶，我们必须逐步废除或者修正这些不明智的法律。就不列颠的宪法当前的要点来看，它非常适合施行这些变革，不会产生强制施行的变革或者准备不充分的

变革通常所伴随的弊端。

As a preliminary step, howeve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national improvements, it should be declared with a sincerity which shall not admit of any after deviation, that no individual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should be deprived of the emolument which he now receives, or of that which has been officially or legally promised.

然而，作为启动全国性变革的预备步骤，我们应该怀着将来也绝不动摇的真诚宣布：变革绝不会剥夺当代任何人所得到的、或是官方或法律已经准许给他的利益。

The next step in national reform is to withdraw from the national church those tenets which constitute its weakness and create its danger. Yet still, to prevent the evils of any premature change, let the church in other respects remain as it is; because under the old established forms it may effect the most valuable purposes.

全国性变革的第二步就是废除国教中的一些教义，那些教义构成了国教的弱点，并使其变得危险。但是，为了避免任何不成熟的变革带来的弊端，国教在其他方面可以保持原状；因为在其原有的既定形式下，国教或许能够实现那些最有价值的目标。

To render it truly a national church, all tests, as they are called, that is, declarations of belief in which all cannot conscientiously

join, should be withdrawn: this alteration would tend more perhaps than any other which can be devised, to give stability both to the national church and to the state; and a conduct thus rational would at once terminate all the theological differences which now confound the intellects of men and disseminate universal discord.

为了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教，一切所谓的考验，也就是所有人都无法本着良心参与的信仰宣誓，都应该被废除。这一变革也许比其他能够拟出的任何变革都更能给国教和国家带来稳定，这种理性的行为会立刻终止目前所有引得人们思想混乱，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纠纷的神学分歧。

The next measure of national improvement should be to repeal or modify those laws which leave the lower orders in ignorance, train them to become intemperate, and produce idleness, gambling, poverty, disease, and murder.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ardent spirits are now legally encouraged; licences to keepers of gin-shops and unnecessary pot-houses are by thousands annually distributed; the laws of the state now direct those licences to be distributed; and yet, perhaps, not one of the authors or guardians of these laws has once reflected how much each of those houses daily contributes to public crime, disease, and weakness, or how much they add to the stock of private misery.

这场全国性变革接下来的措施应该是废除或者修正那些使下层民众愚昧无知，驱使他们放纵，并在他们中间制造懒惰、赌博、贫穷、疾病等现象以及凶杀行为的法律。目前，生产和消费烈性酒在法律上是受到鼓励的；政府每年给酒铺和不必要的小酒馆的老板发放数以千计的执照；国家现在的法律指导这些执照的发放。可是，制定或维护

这些法律的人可能没有一个曾经反思，每家酒店每天给公众带来了多少罪行、疾病以及虚弱体质，也没有想过它们给个人增加了多少苦难。

Shall we then continue to surround our fellow creatures with a temptation which, as many of them are now trained, we know they are unable to resist? with a temptation, too, which predisposes its victims to proceed gradually from a state of temporary insanity, into which they had been led by the example and instruction of those around them, to one of madness and bodily disease, creating more than infantile weakness, which again produces mental torments and horrors, that silently, yet most effectually, undermine every faculty in man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private or public happiness?

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继续让同胞们被诱惑包围吗？就其中许多人所受的教育而言，我们也知道他们无法抵制这种诱惑。同时这种诱惑会使受害者们容易从一种暂时的精神失常状态——周围人的榜样和引导使他们进入这种状态——逐渐堕入疯狂状态并身染疾病，使得其体质比婴儿还要虚弱，这样又会使其产生精神上的痛苦和恐惧，悄然却有效地破坏着人们为个人和大众谋幸福的一切能力。

Ca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longer preserve such laws, or countenance a system which trains man to devise and enforce such laws?

不列颠政府还能继续保留这些法律，或者支持这种训练人们去制定和执行这些法律的制度吗？

(In the year 1736, an act of parliament—stat. 9, Geo. II., c. 23—was passed, of which the preamble is as follows: 'Whereas the drinking of spirituous liquors or strong waters is become very common, especially among the people of lower and inferior rank, the constant and excessive use of which tends greatly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health, rendering them unfit for useful labour and business, debauching their morals, and inciting them to perpetrate all manner of vices; and the ill consequences of the excessive use of such liquors are not confined to the present generation, but extend to future ages, and tend to the devastation and ruin of this kingdom.' It was therefore enacted, that no person should retail spirits without a licence, for which £50 was to be paid annually, with other provisions to restrain the sale of spirits.

（1736年通过了一条议会法案——《乔治二世九年第二十三号法案》，其序言中写道："饮用烈酒或烈性饮料的现象现已非常普遍，下层民众尤甚。但是长期过量饮酒很可能使其健康遭受极大的破坏，从而使其不适合有益的体力劳动和工作，也使其道德败坏，诱其无恶不作。过度饮用此类酒的恶果不仅祸及当代，而且贻害后人，甚至有可能破坏乃至毁灭这个国家。"因此法律规定，无执照者不得零售烈酒，每张执照每年需付五十英镑，同时还应遵守限制烈酒销售的其他条款。

By a report of His Majesty's Justices of the Peace for the county of Middlesex, made in January, 1736, it appeared that there were then within Westminster, Holborn, the Tower, and Finsbury division, exclusive of London and Southwark, 7,044 houses and shops wherein spirituous liquors were publicly sold by retail, of which they had got an account, and that they believed it was far

short of the true number.)

1736年1月，米德尔塞克斯郡英王陛下的治安法官们所作的一篇报告显示：根据已掌握的数据，当时在威斯敏斯特、霍尔本、伦敦塔及芬斯伯利区——南华克自治区和伦敦城区除外，共有7044家酒馆和酒铺公开零售烈酒，治安法官们认为实际数目远远不止这些。”）

Enough surely has been said to exhibit the evil consequences of these laws in their true colours. Let the duties therefore on the production of ardent spirits be gradually increased, until the price shall exceed the means of ordinary consumption. Let the licences be progressively withdrawn from the present occupiers of gin-shops and unnecessary pot-houses; and let the duties on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alt liquor be diminished, that the poor and working classes may be the more readily induced to abandon their destructive habits of dram-drinking, and by degrees to withdraw altogether from this incentive to crime and sure source of misery.

为揭示这些法律所导致的恶果的真实面目，我们已经说得足够充分了。因此，我们要逐步提高烈酒生产的税额，直到酒价超过大众的消费水平。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逐步吊销酒铺和不必要的小酒馆当前业主的执照；降低麦芽酒的生产和消费税额，以便贫民和工人阶级更快地戒除喝烈性酒的坏习惯，继而逐步将他们从这种犯罪诱因及苦难的必然根源中完全解脱出来。

The next improvement should be to discontinue the state lottery.

下一步的改革应该是停止发行国家彩票。

The law which creates this measure is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a law to legalize gambling, entrap the unwary, and rob the ignorant.

发行彩票的法律完全是使赌博合法化、诱陷轻率者和掠夺无知者的法律。

How great must be the error of that system which can induce a state to deceive and injure its subjects, and yet expect that those subjects shall not be necessarily trained to injure and to deceive.

这一制度所犯的错误何其严重！它致使国家欺骗、伤害自己的民众，但同时却又希望这些民众不养成欺骗和伤害别人的习惯。

These measures may be thought detrimental to the national revenues.

我们认为这些措施有损国家收入。

Those who have reflected on the nature of public revenue, and who possess minds capable of comprehending the subject, know that revenue has but one legitimate source that it is deriv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the labour of man, and that it may be more or

less from any given number of men (other circumstances being similar)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trength, industry and capacity.

那些考虑过国家收入性质的人和那些有能力理解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国家收入只有一个合法来源，那就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人的劳动；在其他条件都相似的情况下，国家收入来源于来特定人群，且几乎与与他们的体力、勤恳程度以及能力成比例。

The efficient strength of a state governed by laws founded on an accurate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in which the whole population are well trained, will greatly exceed one of equal extent of numbers, in which a large part of the population are improperly trained, and governed by laws founded in ignorance.

倘若统治国家的法律建立在对人性的准确理解之上，而且全体民众又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那么这个国家的实力要远远超过一个人口数量相等，但大部分民众受到不良教育并由基于无知的法律来管理的国家。

Thus were the small states of Greece, while governed by laws comparatively wise, superior in national strength to the extended empire of Persia.

因此，即便只是希腊的小城邦，在由相对比较明智的法律管理时，国家的实力也比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强大。

On this plain and obvious principle will the effective power and resourc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be largely increased, by withdrawing those laws which, under the plausible appearance of adding a few, and but a few, millions to the annual revenues of this kingdom, in reality feed on the very vitals of the state. For such laws destroy the energies and capacities of its population, which, so weakened and trained to crime, requires a far greater expenditure to protect and govern it.

根据这个直白浅显的原理，只要废除那些法律，不列颠帝国的实力和财力就会大大增加。这些法律表面上看似乎是合理的，每年都在给王国增加几百万镑，仅仅是几百万镑的收入，实际上却是在损耗着国家的命脉。原因是这些法律损毁了民众的精力和能力，使人民身体虚弱，接受犯罪的培训，为了保护和管理这些民众，国家需要花费的开支要远远多于这几百万的收入。

Confidently may it be said, that a short experience in practice is alone necessary to make the truth of these positions self-evident even to the most common understandings.

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即使是那些理解力最一般的人，只需要有那么一点实际经验，就能够发现这些论点不言自明。

The next measure for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of the British population should be to revise the laws relative to the poor. For pure and benevolent as, no doubt, were the motives which actuated those with whom the Poor Laws originated, the direct and certain effects of these laws are to injure the poor, and through them, the

state, as much almost as they can be injured.

要从总体上改善不列颠民众状况，下一步措施应该是修改与贫民有关的法律。毫无疑问，尽管制定济贫法的人的动机纯洁而仁慈，但是这些法律直接地、无可争议地伤害了贫民，由此，也极尽可能地伤害到了国家。

They exhibit the appearance of affording aid to the distressed, while, in reality, they prepare the poor to acquire the worst habits, and to practise every kind of crime. They thu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he poor and add to their distress. It becomes, therefore, necessary that decisive and effectual 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to remove those evils which the existing laws have created.

表面上看，这些法律是在给穷困的人提供帮助，但是实际上，它们则是在为贫民养成最坏的习惯、犯下各种罪行做准备。这样一来，这些法律就不仅增加了贫民的数量，而且加深了他们的苦难。因此，我们有必要采取坚决而有效的措施来消除这些现有法律所带来的危害。

Benevolence says that the destitute must not starve, and to this declaration political wisdom readily assents. Yet can that system be right, which compels the industrious, temperate, and comparatively virtuous, to support the ignorant, the idle, and comparatively vicious? Such, however, is the effect of the present British Poor Laws; for they publicly proclaim greater encouragement to idleness, ignorance, extravagance, and intemperance, than to industry and good conduct; and the evils which arise from a system so irrational

are hourly experienced, and hourly increasing.

慈善家们说，绝不能让穷人挨饿，对这种提法，政界的智者们也欣然赞同。可是，这种迫使勤劳克己、品性较好的人去养活那些无知懒散、品性较坏的人的制度难道是正确的吗？然而现在的大不列颠济贫法所发挥的正是这样的作用，因为这项法律大加鼓励的是懒散、无知、奢侈以及放纵的行为，而非勤劳和善良的行为。如此不合理的制度所引起的危害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增加。

It thus becomes necessary that some counteracting remedy be immediately devised and applied; for, injurious as these laws are, it is obviously impracticable,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British population, to annul at once a system to which so large a portion of the people has been taught to look for support.

因此有必要立即制定和实施某种能与之抗衡的补救措施；因为尽管这些法律十分有害，但是根据不列颠民众目前的状况，很明显，立刻废除这种制度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有很大一部分人一直被教育着向这种制度寻求支持。

These laws should be progressively undermined by a system of an opposite nature, and ultimately rendered altogether nugatory.

我们应当用另外一种性质相反的制度逐步取代这些法律，直至其完全失效。

The proper system to supersede these laws has been in part already explained, but we proceed to unfold it still more. It may be called 'A System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and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 and under an established and well-intentioned government, it will be found more efficacious in producing public benefit than any of the laws now in existence.

关于代替济贫法的合理制度，我们已经作了部分解释，不过，现在还要继续展开说明。我们可称该制度为“预防犯罪和人格培养体系”。在既定的、动机善良的政府的领导，该制度将会比现存的任何法律制度都更能为公众带来利益。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n which all these Essays proceed is, that 'children collectively may be taught any sentiments and habits;' or, in other words, 'trained to acquire any character'.

所有这些论文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孩子们可以通过集中接受教育而获得任何一种性格和习惯”，或者换句话说，“可以通过培训而形成任何一种性格”。

It is of importance that this principle should be for ever present in the mind, and that its truth should be established beyond even the shadow of doubt. To the superficial observer it may appear to be an abstract truth of little value; but to the reflecting and accurate reasoner, it will speedily discover itself to be a power which ultimately must destroy the ignorance and consequent prejudices that have accumulated through all preceding ages.

重要的是，人们应当将这一原理始终牢记在心，并对其正确性丝毫不加怀疑地予以证实。对肤浅的观察者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抽象真理；但是对于善于思考、严谨的推理者而言，会很快发现它是一种力量。该力量终将摧毁人类在以前所有年代累积起来的无知以及由其引发的偏见。

For as it is a deduction from all the leading facts in the past history of the world, so it will be found, on the most extensive investigation, to be consistent with every fact which now exists. It is calculated, therefore, to become the foundation of a new system, which, because true and of unparalleled importance, must prove irresistible, will speedily supersede all those which exist, and itself become permanent.

因为这个原理是依据世界史上所有的主要事实推理出来的，所以经过最广泛的考察之后，我们会发现它与现存的一切事实是一致的。因此，这个原理可能会成为新制度的基础。因为其正确性以及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它必然会被证明是无法抗拒的，会迅速地代替一切现存法律，并将永远存在下去。

It is necessary, however, prior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system in all its bearings and consequences, that the public mind should be impressed with the deepest conviction of its truth.

不过，在引入这个制度的方方面面及其带来的后果之前，我们还必须使公众对这一制度的正确性深信不疑。

For this purpose, let us in imagination survey the various states and empires of the world, and attentively observe man as in these arbitrary divisions of the earth he is known to exist.

为了这一目标，让我们想象着考察一下世界各个国家以及帝国，仔细观察生活在这些随机划分出来的不同区域里的人的状况。

Compare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each community with the laws and customs by which they are respectively governed, and, without an exception, the one will be found the archetype of the other.

倘若把各个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支配他们的各个法律和习俗作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同出一辙，无一例外。

Where, in former ages, the laws and customs established by Lycurgus formed man into a model for martial exploits, and a perfect instrument for war, he is now trained, by other laws and customs, to be the instrument of a despotism which renders him almost, or altogether, unfit for war. And where the law and custom of Athens trained the young mind to acquire as high a degree of partial rationality as the history of preceding times records; man is now reduced, by a total change of laws and customs, to the lowest state of mental degradation. Also, where, formerly, the superior native American tribes roamed fearlessly through their trackless forests, uniformly exhibiting the hardy, penetrating, elevated and sincere character, which was at a loss to comprehend how a rational being could desire to possess more than his nature could

enjoy; now, on the very same soil, in the same climate, characters are formed under laws and customs so opposite, that all their bodily and mental faculties are individually exerted to obtain, if possible, ten thousand times more than any man can enjoy.

过去，莱克格斯制定的法律和习俗使人类成为英勇好战的模范和完美的战争工具，可是如今在另一种法律和习俗的培养下，人类却成了专制的工具，几乎或者完全不适合打仗。雅典的法律和习俗培养年轻一代，使其具备史料所记载的、高水平的不完全理性；然而随着法律和习俗的完全改变，现在那里的人的理性已经下降到最低点了。还有，从前在美洲大陆上，优秀的土著部落成员无所畏惧地在人迹罕至的森林里漫游，他们无一例外地展示出那种坚强、敏锐、高贵以及真挚的性格，他们会难以理解一个理性的人怎么会希望占有超过自己本性所能享受到的东西；现在，在同一片土地上，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法律和习俗使人们了形成如此截然不同的性格，每个人都极尽身心所能，去获取那些超过本身所能享受的内容千倍万倍的东西。

But why proceed to enumerate such endless results as these, of the never-failing influence of training over human nature, when it may be easily rendered self-evident even to the most illiterate, by daily examples around their own dwellings?

为什么还要继续列举这些教育对于人性的永久影响所产生的无尽后果呢？即便是最无知的文盲，通过其居所周围的日常事例，也能轻易看出这种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No one, it may be supposed, can now be so defective in knowledge as to imagine it is a different human nature, which by its

own powers forms itself into a child of ignorance, of poverty, and of habits leading to crime and to punishment; or into a votary of fashion, claiming distinction from its folly and inconsistency; or, to fancy, that it is some undefined, blind, unconscious process of human nature itself, distinct from instruction, that forms the sentiments and habits of the man of commerce, of agriculture, the law, the church, the army, the navy, or of the private and illegal depredator on society; or that it is a different human nature which constitutes the societies of the Jews, of Friends, and of all the various religious denominations which have existed or which now exist. No! Human nature, save the minute differences which are ever found in all the compounds of the creation, is one and the same in all; it is without exception universally plastic, and by judicious training the infants of any one class in the world may be readily formed into men of any other class, even to believe and declare that conduct to be right and virtuous, and to die in its defence, which their parents had been taught to believe and say was wrong and vicious, and to oppose which, those parents would also have willingly sacrificed their lives.

或许可以认为，现在没有人会无知到认为是不同的人性通过其自身的力量使孩子陷于无知，变得贫穷，养成坏习惯导致犯罪、受刑；或是追求时尚，还声称自己远离了愚蠢、矛盾的行为；也没有人会认为，正是有别于教育的、不明确的、盲目的、无意识的人性发展过程本身使得商业、农业、法律、教会、陆军、海军等行业的人士，以及秘密地非法掠夺社会财富的人形成了不同的情感和习惯；同样，也没有人会认为是不同的人性构成了犹太教会、公谊会以及过去与现在存在的各种教派。不！除了在所有生物的化合物中一直可以找到的细微差别外，人的本性是唯一的，是一模一样的；它是可以普遍塑造的，无一例外。世界上任何一个阶层的儿童经过合理的培训都可以轻易地成为另一个阶层的人，甚至相信并宣称这种行为是正确而高尚的，是

誓死也要加以捍卫的；而其父母接受的教导却使他们相信并宣布这种行为是错误与邪恶的，为反对它，他们牺牲性命也心甘情愿。

Whence then the foundation of your claim, ye advocates for the superiority of the early prepossessions of your sect or party, in opposition to those taught to other men? Ignorance itself, at this day, might almost make it evident that one particle of merit is not due to you, for not possessing those notions and habits which you now the most contemn. Ought you not, and will you not, then, have charity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taught different sentiments and habits from yourselves? Let all men fairly investigate this subject for themselves; it well merits their most attentive examination. They will then discover that it is from the errors of education, misinstructing the young mind relative to the true cause of early prepossessions, that almost all the evils of life proceed.

你们这些人宣扬自己教派和党派早期形成的先入之见的优越性，却反对其他人经教育所接受的那些观念，你们又有何根据？目前，即使是最无知的人也几乎能明白：你们没有形成目前自己最蔑视的那些想法和习惯，这一点里面并没有你们一丝一毫的功劳。这样的话，你们难道不应该，也不愿意以宽厚之心对待那些因为所受的教育而形成与你们不同的情感和习惯的人吗？让所有人为了自己来公正地研究这个问题吧；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大家十分仔细地研究。研究后大家会发现，正是由于错误的教育，使得相关年轻人对于早期先入之见产生的真正原因有了错误认识，这才导致了他们人生中几乎所有不幸。

Whence then, ye advocates for the merit and demerit of early prepossessions of opinion, do you derive your principles?

你们这些为早期先入之见的优点和缺点辩护的人，你们依据的原理又来自何处？

Let this system of misery be seen in all its naked deformity! It ought to be exposed; for the instruction which it inculcates at the outset of forming human character is destructive of the genuine charity which can alone train man to be truly benevolent to all other men. The ideas of exclusive right and consequent superiority which men have hitherto been taught to attach to the early sentiments and habits in which they have been instructed, are the chief cause of disunion throughout society; such notions are, indeed, in direct opposition to pure and undefiled religion; nor can they ever exist together. The extent of the misery which they generate cannot, however, be much longer concealed. They are already hastening fast to meet the fate of all errors; for the gross ignorance on which this system of misery has been raised, is exposed to the world on its proper foundation, and, so exposed, its supporters will shrink from the task of defence, and no rational mind will be found to give it support.

让这个畸形的、苦难的体制原形毕露吧！这种体制应该得到揭露，因为在人的性格形成之初，正是它反复的教育，摧毁了真正的宽容精神，而只有这种宽容精神才能使人对其他所有人怀有真正的仁慈。人们迄今为止受到的教育使他们认为，自己早年被教导养成的那些情感和习惯是唯一正确的，因而也必然是优越的，这些观点是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这些观念，的确是与纯洁无暇的宗教直接对立的，两者永远互不相容。然而，这些观念引发了多少苦难，这一事实不可能再掩盖多久了。它们已经加快脚步去面对一切错误必然会有的下场。因为这一苦难体制赖以建立的基础，也就是严重的无知，已经被完全暴露在了世人面前；这样一来，它的支持者们就不敢为之辩护，

那些理性的人也不会予以支持。

Having exhibited the error on which ignorance has erected the systems by which man has been governed, or compelled to become irrational and miserable; and having laid an immovable foundation for a system devoid of that error, which, when fully comprehended and adopted into practice, must train mankind 'to think of and act to others as they would wish others to think of and act to them', we proceed further to explain this system without error, and which may be termed a system without mystery.

在无知基础上建立的体制统治着人类，或者迫使人类变得无理性和不幸，我们已经揭示了这一体制所依据的原理的谬误之处；我们也为另一种没有这种错误的体制提供了不可动摇的基础，这种体制在得到充分理解并且付诸实践之后，一定可以训练人类具备“希望别人如何看待、对待自己，就如何看待、对待别人”的能力——这样一来，我们将继续解释这种没有任何错误的体制，也可以称之为没有任何神秘之处的体制。

As then children collectively may be formed into any characters, by whom ought their characters to be formed?

既然孩子们可以被集中培养成任何一种性格，那么他们的性格应该由谁来培养呢？

The kind and degree of misery or happiness experienced by the members of any community, depend on the characters which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individuals which constitute the community.

任何社会的成员所经历的痛苦或幸福的种类和程度，取决于构成这个社会的个体的性格。

It becomes, then, the highest interest, and consequently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duty, of every state, to form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s of which the state is composed. And if any characters, from the most ignorant and miserable to the most rational and happy, can be formed, it surely merits the deepest attention of every state to adopt those means by which the formation of the latter may be secured, and that of the former prevented.

如此说来，每个国家最高的利益，因而也是其首要与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培养该国的构成因素——国民的性格。倘若任何一种性格——从最无知、最可悲的到最理性、最幸福的性格——都能够形成，那么采取措施，确保人们养成后一种性格并防止前一种性格的形成，这一点确实值得每个国家予以最深切的关注。

It follows that every state, to be well governed, ought to direct its chief atten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and thus the best governed state will be that which shall possess the best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随之得出的结论便是：任何国家要想得到很好的治理，就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培养性格上。因此，治理得最好的将会是那些拥有最好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国家。

Under the guidance of minds competent to its direction, a national system of training and education may be formed, to become the most safe, easy, effectual, and economical instrument of government that can be devised. And it may be made to possess a power equal to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most grand and beneficial purposes.

在有能力的领导者的指挥之下，可以制定出一种国民教育制度，使其成为我们能想到的最安全、最简单、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政府统治工具。同时这种教育制度还可以拥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最伟大和最有益的目标。

It is, however, by instruction only, that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can be made conscious of the irrational state in which they now exist; and, until that instruction is given, it is premature to introduce a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然而，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世人意识到周围的状态是不合理的；也只有完成了这种教育，推介该国民教育制度的时机才是成熟的。

But the time is now arrived whe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may with safety adopt a national system of training and education for the poor and uninstructed; and this measure alone, if the plan shall be well devised and executed, will effect the most importantly beneficial changes.

可是现在，不列颠政府稳妥地为贫穷而未受教育的人提供一种国民教育制度的时机已经来到了。单是这一项举措，倘若计划恰当、执行得法的话，就可以实现最重大的有益的变革。

As a preliminary step,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observe, that to create a well-trained, united, and happy people, this national system should be uniform over the United Kingdom; it should be also founded in the spirit of peace and of rationality; and, for the most obvious reasons, the thought of exclusion to one child in the empire should not for a moment be entertained.

然而，首先有必要指出，为了形成一个教育得当、团结一致且快乐幸福的民族，这种国家制度在联合王国境内应该是统一的。它还应该以和平与理性的精神为基础。此外，把帝国境内任何一个孩子排除在外的想法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其原因不言自明。

Several plans have been lately proposed for the national education of the poor, but these have not been calculated to effect all that a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of the poor ought to accomplish.

虽然最近有些人提出了几个全国性的贫民教育方案，但是估计这些方案尚不能够实现这种全国性的贫民教育制度应当实现的全部目标。

For the authors and supporters of these systems we feel those sentiments which the principles developed throughout these Essays

must create in any minds on which they have been early and effectually impressed; and we are desirous of rendering their labours for the community as extensively beneficial as they can be made. To fulfil, however, a great and important public duty, the plans which they have devised must be considered as though they had been produced and published in the days of antiquity.

对于这些方案的拟定者和支持者，我们的感想与所有了解了这几篇论文所阐述的原理的人产生的感想一样，这些人早就对这些原理印象深刻。我们希望使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尽可能广泛地为社会带来利益。然而，为了完成一项伟大而重要的公众义务，必须把他们制定出来的这些方案看作是好像上古时代就已经产生并公布了的。

The plans alluded to are those of the Rev. Dr. Bell, Mr. Joseph Lancaster, and Mr. Whitbread.

上述方案指的是牧师贝尔博士、约瑟夫•兰开斯特先生和惠特布雷德先生的方案。

The systems of Dr. Bell and Mr. Lancaster, for instructing the poor in reading, writing, and arithmetic, prove the extreme ignorance which previously existed in the manner of training the young; for it is in the manner alone of giving instruction that these new systems are an improvement on the modes of instruction which were formerly practised.

贝尔博士和约瑟夫•兰开斯特先生教贫民阅读、写作和算术的体系

证明，以前培养儿童的方式极端愚昧无知，因为这些新体系只是在教导方式上对以前实行的教育模式有所改进。

The arrangement of the room and many of the details in Mr. Lancaster's plan, are, in some respects, better calculated to give instruction in the elements enumerated, than those recommended by Dr. Bell, although some of the details introduced by the latter are very superior, and highly deserving of adoption.

兰开斯特先生的方案里关于房舍的安排和其他很多细节，从某些方面来说，比贝尔博士推荐的方案更适于教授上述基础课程，尽管后者提出的某些细节也是很好、很值得采纳的。

The essence, however, of national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s to impress on the young, ideas and habits which shall contribute to the future happiness of the individuals and of the state; and this can be accomplished only by instructing them to become rational beings.

然而，国民教育的真谛是培养年轻人，使其获得对个人和国家未来的幸福有益的观念和习惯。只有教导他们成为理性的人，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It must be evident to common observers that children may be taught, by either Dr. Bell's or Mr. Lancaster's system, to read, write, account, and sew, and yet acquire the worst habits, and have their minds rendered irrational for life.

普通的观察者一定明白：无论是贝尔博士还是兰开斯特先生的体系都可以教孩子阅读、写作、算术以及缝纫，但是他们将会养成最坏的习惯，而他们的思想终生都不理性。

Reading and writing are merely instruments by which knowledge either true or false, may be imparted; and, when given to children, are of little comparative value, unless they are also taught how to make a proper use of them.

阅读和写作仅仅只是传授知识的手段，无论这些知识是错误还是正确的。当我们教孩子读写的时候，除非我们同时教会孩子们如何合理地运用这些手段，否则它们便没有多大的相对价值。

When a child receives a full and fair explanation of the objects and characters around him, and when he is also taught to reason correctly, so that he may learn to discover general truths from falsehood, he will be much better instructed, although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one letter or figure, than those are who have been compelled to believe, and whose reasoning faculties have been confounded or destroyed by what is most erroneously termed learning.

当我们把孩子周围的人和事全面而公正地解释给他听，并教导他正确地推理之后，他就能学会辨别普遍真理与谬误。尽管不认一个字、不识一个数，他也比某些人受到的教育要好很多，那些人被迫相信那些被极其荒谬地称为学问的东西，其推理能力也已经被这些东西破坏或摧毁。

It is readi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manner of instructing children is of importance and deserves all the attention it has lately received; that those who discover or introduce improvements which facilitate the acquirement of knowledge are important benefactors of their fellow creatures. Yet the manner of giving instruction is one thing, the instruction itself another; and no two objects can be more distinct. The worst manner may be applied to give the best instruction, and the best manner to give the worst instruction. Were the real importance of both to be estimated by numbers, the manner of instruction may be compared to one, and the matter of instruction to millions: the first is the means only; the last, the end to be accomplished by those means.

我们可以欣然承认：教导孩子的方式很重要，值得它近来所受到的一切关注；那些发现或推介改良方法、促使孩子更好地获取知识的人是他们同胞的大恩人。不过，教导方式是一回事，教导本身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采用最坏的教导方式可以给予孩子最好的教导，而采用最好的方式也可以给予最坏的教导。假如用数字来评判两者的真正价值，那么教导方式就好比是“一”，而教学的内容则是“百万”：前者只是方法，后者才是所有的方法要实现的终极目标。

If, therefore, in a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for the poor, it be desirable to adopt the best manner, it is surely so much the more desirable to adopt also the best matter, of instruction.

因此，倘若人们希望全国性的贫民教育制度采取最好的教导方式，那么人们肯定更希望它也采用最好的内容。

Either give the poor a rational and useful training, or mock not their ignorance, their poverty, and their misery, by merely instructing them to become conscious of the extent of the degradation under which they exist. And, therefore, in pity to suffering humanity, either keep the poor, if you now can, in the state of the most abject ignorance, as near as possible to animal life, or at once determine to form them into rational beings, into useful and effective members of the state.

我们给予穷人理性而实用的教育，即使不这么做，也不要仅仅只是教导他们意识到自己堕落的程度，以嘲笑他们的无知、贫穷和痛苦。因此，出于对受苦受难之人的同情，要么继续让贫民（倘若你们现在还能这样做的话）像牲畜一样生活，处于最为卑贱的愚昧状态，要么痛下决心将其培养成理性的人，成为对国家有用并有益的人。

Were it possible, without national prejudice, to examine into the matter of instruction which is now given in some of our boasted new systems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poor, it would be found to be almost as wretched as any which can be devised. In proof of this statement, enter any one of the schools denominated national, and request the master to show the acquirements of the children. These are called out, and he asks them theological questions to which men of the most profound erudition cannot make a rational reply; the children, however, readily answer as they had been previously instructed; for memory, in this mockery of learning, is all that is required.

倘若我们可以抛弃民族偏见，细查我们自诩的新贫民教育体系目前所使用的教学内容，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内容几乎糟糕得无以复加。

要证明这个说法，我们只需走进任何一个所谓的国立学校，要求老师展示一下孩子们的学识即可。老师把孩子们叫了出来，向他们提一些连学识最渊博的人都无法给出理性答案的神学问题，然而孩子们立刻就把以前学到的那些答了出来；因为这种徒有形式的学习所要求的只不过就是死记硬背。

Thus the child whose natural faculty of comparing ideas, or whose rational powers, shall be the soonest destroyed, if, at the same time, he possess a memory to retain incongruities without connection, will become what is termed the first scholar in the class; and three-fourths of the time which ought to be devoted to the acquirement of useful instruction, will be really occupied in destroying the mental powers of the children.

这样的话，孩子对各种观念进行比较的天赋能力，或者说是其推理能力，将会第一个被摧毁；而与此同时，倘若孩子有记性能记住互相矛盾而且毫无联系的东西，那么他就能成为班上所谓的头名学子。因此，本应该用来学习有用知识的时间，实际上有四分之三都将用在摧毁孩子的智力上。

To those accustomed attentively to notice the human countenance from infancy to age, in the various classes and religious denominations of the British population, it is truly an instructive although melancholy employment, to observe in the countenances of the poor children in these schools the evident expression of mental injury derived from the well-intentioned, but most mistaken, plan of their instruction.

对那些习惯于密切关注不列颠不同阶层和教派中各色人等——从孩子到老人——的面容的人而言，观察这些学校里可怜孩子的面容是件虽然让人伤感但却真正有启发性的差事。这些孩子的面容清楚地表明，其智力受到了教育方案的摧残，这些方案本意很好，但却是极端错误的。

It is an important lesson, because it affords another recent and striking example to the millions which previously existed, of the ease with which children may be taught to receive any sectarian notions, and thence acquire any habits, however contrary to their real happiness.

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因为这是在已经存在的数百万个事例以外，新近又增添的一个显著事例。这样，孩子很容易通过教育接受任何宗教观念，从而养成任何习惯，无论这跟他们真正的幸福如何背离。

To those trained to become truly conscientious in any of the present sectarian errors which distract the world, this free exposure of the weakness of the peculiar tenets in which such individuals have been instructed, will, at first, excite feelings of high displeasure and horror, and these feelings will be acute and poignant in proportion to the obvious and irresistible evidence on which the disclosure of their errors is founded.

对那些经过培训，真正本着良心相信现在困扰世人的所有教派谬误的人而言，大胆揭露他们所学的特殊教义的缺点，这种做法一开始就会让他们感到非常不快和恐惧。而揭露谬误所依据的证据越是明

显、越是无法反驳，他们的这种感觉就越发深刻、越发强烈。

Let them, however, begin to think calmly on these subjects, to examine their own minds and the minds of all around them, and they will become conscious of the absurdities and inconsistencies in which their forefathers have trained them; they will then abhor the errors by which they have been so long abused; and, with an earnestness not to be resisted, they will exert their utmost faculties to remove the cause of so much misery to man.

然而，一旦让他们开始冷静地思考这些问题，审视自己和周围人的思想，他们就会意识到，前辈用以教育他们的思想是荒谬并相互矛盾的。这时，他们就会对长期以来欺骗自己的谬误感到憎恨；并且会用一种无法抑制的诚恳，极尽全力去消除给人类带来如此多苦难的原因。

Enough surely has now been said of the manner and matter of instruction in these new systems, to exhibit them in a just and true light.

现在，关于这些新制度的教育方式和内容，我们已经讲得够多了，足以把它们放在公正而真实的光线下。

The improvements in the manner of teaching children whatever may be deemed proper for them to learn—improvements which, we may easily predict, will soon receive great additions and amendments—have proceeded from the Rev. Dr. Bell and Mr.

Lancaster; while the errors which their respective systems assist to engrave on the ductile mind of infancy and childhood, are derived from times when ignorance gave countenance to every kind of absurdity.

在把人们认为适合孩子学习的一切内容教给孩子的过程中，教学方法已经根据牧师贝尔博士和兰开斯特先生的创意进行了改进——我们不难断言，这些改进很快会得到很大的补充与修正。可是，他们各自的体系却帮助人们把一些谬误铭刻在可塑性大的幼儿和儿童的头脑中，要知道，这些谬误来自于无知助长一切荒谬事物的时代。

Mr. Whitbread's scheme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poor was evidently the production of an ardent mind possessing considerable abilities; his mind, however, had been irregularly formed by the errors of his early education; and this was most conspicuous in the speech which introduced the plan he had devised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and in the plan itself.

惠特布雷德先生的贫民教育方案显然是一位热心而且相当有才能的人的构想；然而由于早年所受教育中的种种错误，他的思想是混乱无序的，这一点在他向下议院介绍他所设计的方案而发表的演讲中和方案本身中，都体现得极为明显。

The first was a clear exposition of all the reasons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poor which could be expected from a human being trained from infancy under the systems in which Mr. Whitbread had been instructed.

这篇演讲清楚地阐明了一个从小受到和惠特布雷德先生同样教育的人希望举办贫民教育的所有理由。

The plan itself evinced the fallacy of the principles which he had imbibed, and showed that he had not acquired a practical knowledge of the feelings and habits of the poor, or of the only effectual means by which they could be trained to be useful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 community.

方案本身表明了惠特布雷德先生所接受的原理的荒谬性，也表明了他对贫民的感情和习惯，或者说对训练贫民成为于自己和社会均有用的人的唯一有效手段，他都缺乏实际的了解。

Had Mr. Whitbread not been trained, as almost all the Members of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have been, in delusive theories, devoid of rational foundation, which prevent them from acquiring any extensive practical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he would not have committed a plan for the national education of the poor to the sole management and direction of the ministers, churchwardens, and overseers of parishes, whose present interests must have appeared to be opposed to the measure.

倘若惠特布雷德先生不和几乎所有的两院议员一样，一直受到欺骗性的理论的教育——这些理论缺乏理性根据，从而使他们无法获得关于人性的广博而实际的知识——他就不会把一个全国性的贫民教育方案单单交给牧师、教区委员和教区监督员来领导和管理，因为这一举措明显与这些人的眼前利益背道而驰。

He would surely, first, have devised a plan to make it the evident interest of the ministers, churchwardens, and overseers, to co-operate in giving efficacy to the system which he wished to introduce to their superintendence; and also to render them, by previous training, competent to that superintendence for which now they are in general unprepared. For, trained as these individuals have hitherto been, they must be deficient in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necessary to enable them successfully to direct the instruction of others; and had an attempt been made to carry Mr. Whitbread's plan into execution, it would have created a scene of confusion over the whole kingdom.

惠特布雷德先生肯定先设计好一个方案，使牧师、教区委员和教区监督员感到，双方合作来提高他希望介绍给他们监管的这个体系的功效，这对他们显然是有好处的；而且通过事先的培训，他还使他们能够胜任这份监管工作——总的来说，他们目前尚未准备好去做这份工作。因为就这些人一直以来所受的训练而言，他们肯定缺乏成功监管教学工作所必需的实用知识，所以倘若他们试图把惠特布雷德先生的方案付诸实践，那么肯定会在全国上下造成一片混乱的景象。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 will make it evident that it never was, and that it never can be, the interest of any sect claiming exclusive privileges on account of professing high and mysterious doctrines, about which the best and most conscientious men may differ in opinion, that the mass of the people should be otherwise instructed than in those doctrines which were and are in unison with its peculiar tenets; and that at this hour a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for the lower orders, on sound political principles, is really dreaded, even by some of the most learned and intelligent member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Such feelings in the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church are those only which ought to be expected; for most men so trained and circumstanced must of necessity acquire these feelings. Why, therefore, should any class of men endeavour to rouse the indignation of the public against them? Their conduct and their motives are equally correct, and therefore, equally good, with those who raise the cry against and oppose the errors of the church. And let it ever be remembered, that an establishment which possesses the power of propagating principles, may be rendered truly valuable when directed to inculcate a system of self-evident truth, unobstructed by inconsistencies and counteractions.

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将会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给广大民众教授其他内容，而不是过去和现在都符合该教派独特信条的教义，这样做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不会符合任何教派的利益——这些教派由于提出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教义而宣称独占特权（关于这一点，最优秀和最认真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还会清楚地看到，现在对于这个基于正确的政治原理拟定的全国性的下层民众教育制度，人们确实感到害怕，甚至包括那些英国国教中最有学识、最为聪明的人也是如此。国教成员里存在着这种心情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所受的教育和他们周围的环境必然会使得他们有这种心情。因此，无论是哪个阶层的人，有什么必要激起公众对国教徒的义愤呢？他们的行为和动机与那些奋起指责、反对国教中的谬误的人同样正确，因而也一样善良。让我们永远记住，有权宣传原则的的机构一旦倡导不言自明的真理体系，而不受不和谐因素及抵制行为的干扰，就它可以变成真正有价值的机构。

The dignitaries of the church, and their adherents, foresaw that a national system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poor, unless it were placed under the immediate influence and management of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the church, would effectually and rapidly

undermine the errors, not only of their own, but of every other ecclesiastical establishment. In this foresight they evinced the superiority of their penetration over the sectaries by whom the unexclusive system is supported. The heads of the church have wisely discovered that reason and inconsistency cannot long exist together; that the one must inevitably destroy the other, and reign paramount. They have witnessed the regular, and latterly the rapid progress which reason has made; they know that its accumulating strength cannot be much longer resisted; and, as they now see the contest is hopeless, the unsuccessful attempt to destroy the Lancastrian system of education is the last effort they will ever make to counteract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which is now widely extending itself in every direction.

国教的尊贵人物及其信徒们预见到，倘若本教会成员不直接影响和管理全国贫民教育制度，该制度就会迅速而有效地消除本教会以及其他所有教会的谬误。这种预见表明他们的洞察力胜过那些支持兼容并蓄制度的其他教派成员。国教的首脑们明智地发现：理性和矛盾不能长期并存；一方必定不可避免地摧毁另一方而占据最高统治地位。他们已经目睹了理性在稳步前进，而且最近进展迅速。他们明白，再也无法长时间抵制理性聚积起来的力量了。因为现在他们看到这种竞争已经是无望的了，所以破坏兰开斯特教育体系这一不成功的尝试就是他们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以阻止正向四面八方广泛扩展的知识的传播。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v. Dr. Bell's system of initiating the children of the poor in all the tenet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is an attempt to ward off a little longer the yet dreaded period of a change from ignorance to reason, from misery to happiness.

他们按照牧师贝尔博士的理论建立体系，向贫民的孩子传授英国国教的所有教义，是试图把从愚昧到理性、从痛苦到幸福这一令人畏惧的变革时期再稍作推迟。

Let us, however, not attempt impossibilities; the task is vain and hopeless; the church, while it adheres to the defective and injurious parts of its system, cannot be induced to act cordially in opposition to its apparent interests.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别去做这些不可能的事情了吧；那只会是无用之功，而且毫无希望；倘若国教奉行教会体系中有缺陷和有害的那部分，我们就没法引导它诚心诚意地采取违背其表面利益的行动。

The principles here advocated will not admit the application of any deception to any class of men; they countenance no proceedings in practice, but of unlimited sincerity and candour. They give rise to no one sentiment which is not in unison with the happiness of the human race; and they impart knowledge, which renders it evident that such happiness can never be acquired until every particle of falsehood and deception shall be eradicated from the instructions which the old force upon the young.

我们这里提倡的原理绝不允许我们对任何一类人使用任何欺骗的方式；这些原理只赞同我们在实践中采取无限真诚与坦率的行动。这些原理不会使人产生任何与人类幸福相悖的情感；它们所传授的知识使我们明白，只有把长者对年轻人强行施加的教育中的一切谬误和虚假铲除以后，人类才能获得幸福。

Let us then in this spirit openly declare to the church, that a national unexclusive plan of education for the poor will, without the shadow of doubt, destroy all the errors which are attached to the various systems; and that, when this plan shall be fully established, not one of the tenets which is in opposition to facts can long be upheld.

所以让我们本着这种精神公开向国教宣布：兼容并蓄的全国贫民教育方案将会毫无疑问地铲除各种体系中的一切谬误；在这项方案完全确定以后，任何与事实相悖的教义都不会长久存在。

This unexclusive system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poor has gone forth, and, having found a resting place in the minds of its supporters, it will never more return even to the control of its projectors; but it will be speedily so improved, that by rapidly increasing strides it will firmly establish the reign of reason and happiness.

这种兼容并蓄的贫民教育体系已经推行，并在很多支持者的心里扎下了根，即使是制度的拟定人也无法控制它了。可是它会迅速地得到推进，然后加快步伐，进而就会牢固地建立起理性和幸福的统治。

Seeing and knowing this, let us also make it equally evident to the church—warn it of its actual state—cordially and sincerely assist its members quietly to withdraw those inconsistencies from the system, which now create its weakness and its danger; that it may retain those rational principles alone which can be successfully defended against attack, or which rather will prevent any attack

from being attempted, or even meditated.

既然看到并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同样也要让国教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提醒它关注自己的实际状况——让它热诚真挚地帮助其教徒平心静气地消除体系中令其虚弱并身处危险的矛盾之处。这样，国教体系就只保留那些能成功抵御外来攻击的理性原理，更确切地说，只保留那些可以预防外界企图进行攻击，甚至打消人们这一念头的理性原理。

The wise and prudent, then, of all parties, instead of wishing to destroy national establishments, will use their utmost exertions to render them so consistent and reasonable in all their parts, that every well-disposed mind may be induced to give them their hearty and willing support.

这时，各方各派的明智谨慎人士就不会想要破坏这种国家体制，相反，会竭尽所能地使体制的各个部分变得非常一致与合理，这样一来任何善意的人都乐意给予衷心的支持。

For the first grand step towards effecting any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in these realms, without injury to any part of the community, is to make it the clear and decided interest of the church to co-operate cordially in all the projected ameliorations. Once found a national church on the true, unlimited, and genuine principles of mental charity, and all the members of the state will soon improve in every truly valuable quality. If the temperate and discerning of all parties will not now lend their aid to effect this change by peaceable means (which may with the greatest ease and

with unerring certainty be done), it is evident to every calm observer, that the struggle by those who now exist in unnecessary misery, to attain that degree of happiness which they may attain in practice, cannot long be deferred. It will therefore prove true political wisdom to anticipate and guide these feelings.

为了在这些王国境内实现任何实质性的改良而不伤害社会各方人士，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确保这一点，即国教以热诚态度合作推进一切拟定的改革，这毫无疑问对他们是很有利的。一旦国教建立在真实、无限制、真正关于仁爱之心的原理之上，全国民众一切真正可贵的品格很快就会得到提升。倘若各方各派沉稳、有洞察力的人士现在不愿意通过和平手段协助实现这一变革（通过和平方式可以轻而易举、准确无误地实现这种变革），那么每个冷静的观察者都会明白：为了获取他们实际上可以获取的那些幸福，那些正处在不必要的苦难中的人们进行斗争，迫在眉睫。因此，对这类情感有所预期并予以指导才是真正的政治智慧。

To those who can reflect and will attend to the passing scenes before them, the times are indeed awfully interesting; some change of high import, scarcely yet perhaps to be scanned by the present ill-taught race of men, is evidently in progress; in consequence, well-founded, prompt, and decisive measures are now required in the British councils, to direct this change, and to relieve the nation from the errors of its present systems.

对那些善于思考并关心时局的人而言，当今时代的确是极具吸引力的时代；也许那些目前受到不良教育的人几乎还没有察觉，但是现在显然在进行着某种有重大意义的变革。因此，不列颠议会必须采取有充分依据的、迅速而又果断的措施来指导这场变革，并使国家从目

前制度的错误中解放出来。

It must surely then be the desire of every rational man, of every true friend to humanity, that a cordial co-operation and unity of action should be effected between the British Executive, the Parliament, the Church, and the People, to lay a broad and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happiness of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这样的话，每个理智的人、人类真正的朋友都肯定会希望，不列颠的行政长官、议会、国教和人民能够热诚合作、一致行动，为他们自己以及世界未来的幸福奠定广泛而牢固的基础。

Say not, my countrymen, that such an event is impracticable; for, by adopting the evident means to form a rational character in man, there is a plain and direct road opened, which, if pursued, will render its accomplishment not only possible but certain. That road, too, will be found the most safe and pleasant that human beings have ever yet travelled. It leads direct to intelligence and true knowledge, and will show the boasted acquirements of Greece, of Rome, and of all antiquity, to be the mere weakness of mental infancy. Those who travel this road will find it so straight and well defined, that no one will be in danger of wandering from the right course. Nor is it yet a narrow or exclusive path; it admits of no exclusion: every colour of body and diversity of mind are freely and alike admitted. It is open to the human race, and it is broad and spacious enough to receive the whole, were they increased a thousandfold.

我的同胞们，不要说这件事情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只要采取明确的方法促使人类形成理性的性格，那么我们面前就会出现一条清晰而笔直的大道，只要循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不仅可能、而且肯定会把事情做成。我们还会发现，这条大道是人类迄今所走过的最安全、最惬意的一条道路。它径直通向智慧和真知，并将表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其他所有古国引以为傲的成就也相形见绌，他们只不过显示了人类早期智慧的不足。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会发现，这是十分笔直而清晰的道路，任何人都不会陷入偏离正道的危险。这也不是一条狭窄或排斥他人的路；它不容许任何排外的行为：各种不同肤色和不同思想的人都能够自由地在路上通行。这条路向全人类开放，而且非常宽广，即使人口增长千倍，它也足以容纳所有人。

We well know that a declaration like the one now made must sound chimerical in the ears of those who have hitherto wandered in the dark mazes of ignorance, error, and exclusion, and who have been taught folly and inconsistencies only from their cradle.

我们非常清楚，那些一直以来在无知、谬误和排外的黑暗迷宫里徘徊的人，还有那些从小就只是接受愚昧和矛盾的教育的人，听到这样的宣言，一定觉得这是异想天开。

But if every known fact connected with the subject proves that, from the day in which man first saw light to that in which the sun now shines, the old collectively have taught the young collectively the sentiments and habits which the young have acquired; and that the present generation and every following generation must in like manner instruct their successors; then do we say, with a confidence founded on certainty itself, that even much more shall come to pass than has yet been foretold or promised. When these principles,

derived from the unchangeable laws of nature, and equally revealed to all men, shall, as soon as they will, be publicly established in the world, no conceivable obstacle can remain to prevent a sincere and cordial union and co-operation for every wise and good purpose, not only among all the members of the same state, but also among the rulers of those kingdoms and empires whose enmity and rancour against each other have been carried to the utmost stretch of melancholy folly, and even occasionally to a high degree of madness.

可是倘若与该主题有关的所有已知事实都证明，从人类第一次看到光亮那天起，一直到阳光照耀的今天，年老的一代一直在教导年轻的一代，使后者获得那些情感和习惯；而且现今这一代以及以后的每一代都一定会用类似的方式教导下一代；那么我们可以深信不疑地说，将要发生的事情要比我们所设想和预期的事情还要多很多。这些原理来源于永不变化的自然法则，这一点众所周知；一旦这些原理在世界上公开确立，那么我们就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人们为了实现一切明智而善良的目标而热情真挚地团结合作——不仅同一国家的所有国民是这样，那些王国和帝国的统治者们也是如此。这些统治者之间的仇恨和积怨已经发展到非常愚蠢可悲的地步，有时甚至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

Such, my fellow men, are some, and yet but a few, of the mighty consequences which must result from the public acknowledgement of these plain, simple, and irresistible truths. They will not prove a delusive promise of mockery, but will in reality speedily and effectively establish peace, goodwill, and an ever-active benevolence throughout the whole human race.

同胞们，这些就是公开承认这些简单明了、不可抗拒的真理必定会引发的某些重大后果，然而这里所列举的只不过是其中几个而已。事实将会证明，以上所述的这些不是欺骗、嘲弄人的诺言，实际上，它能够在全人类当中迅速有效地建立起和平、友善以及永生不息的仁慈精神。

The public avowal of these principles, and their general introduction into practice, will constitute the invaluable secret, for which the human mind, from its birth, has been in perpetual search; its future beneficial consequences no man can yet foresee.

公开宣布这些原理并在实践中普遍推行，这是人类从诞生之日起不懈追求的无价秘诀，现在还没有人能够预见未来它将会产生的种种效益。

We will now show how these principles may be immediately and most advantageously introduced into general practice.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立即将这些原理以最有利的方式普遍推行开去。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state which shall possess the best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will be the best governed'; and if the principle on which the reasoning of these Essays is founded be true, then is that sentiment also true. Yet (will future ages credit the fact?) to this da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s without any national system of training and education even for its millions of poor and

uninstruc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mind and habits of its subjects is permitted to go on at random, often in the hands of those who are the most incompetent in the empire; and the result is, the gross ignorance and disunion which now everywhere abound!!

前面已经说过，“具有最好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国家就是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倘若这几篇论文推理时所依据的原理是确凿的，那么这种观点就是正确的。但是直到今天，不列颠政府居然没有为千百万的贫民和未受教育者建立任何国民教育制度！！（后代人会相信这是真的吗？）不列颠民众思想和习惯的形成是随意的，通常是由帝国中那些最无能的人负责；结果就是，如今到处都充斥着严重的无知与纠纷！！

(Even the recent attempts which have been made are conducted on the narrow principle of debasing man to a mere irrational military machine which is to be rapidly moved by animal force.)

（甚至最近进行的一些尝试也是基于狭隘的原理，该原理使人类沦为靠体力快速运转、毫无理性的军事机器。）

Instead of continuing such unwise proceedings, a national system for th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ought to be immediately arranged; and, if judiciously devised, it may be rendered the most valuable improvement ever yet introduced into practice.

让我们停止这些不明智的行径，立即建立起劳动阶级的国民教育体系。倘若审慎地制定这一体系，它便可以成为目前已付诸实践的措施中最有价值的改良。

For this purpose an act should be passed for the instruction of all the poor and labouring classes in the three kingdoms.

为实现这一目的，在联合王国范围内，应该通过一项联合王国全体贫民和劳动阶级的教育法案。

In this act, provision should be made:

这一法案应作如下规定：

First—For the appointment of proper persons to direct this new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which will be found ultimately to prove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its departments; consequently, those individuals who possess the highest integrity, abilities, and influence in the state, should be appointed to its direction.

首先，任命合适人选来领导这一政府新设部门。我们终究会发现，该部门是所有部门中最重要的部门；所以应该任命全国最正直、最有能力和最有影响力的人来承担领导工作。

Second—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eminaries in which those

individuals who shall be destined to form the minds and bodies of the future subjects of these realms should be well initiated in the art and matter of instruction.

第二，兴建学校。那些行将被安排对王国下一代民众进行身心发展教导的人，都应在此学好教学艺术和教学内容。

This is, and ought to be considered, an office of the greatest practical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the empire; for let this duty be well performed, and the government must proceed with ease to the people and with high gratification to those who govern.

这是——而且应该被视为——帝国内实际上最受信任和最让人放心的机构；因为只要这个机构执行好它的任务，政府就一定会轻而易举地亲近人民，而当权者对此也会非常满意。

At present there are not any individuals in the kingdom who have been trained to instruct the rising generation as it is for the interest and happiness of all that it should be instructed. The training of those who are to form the future man becomes a consideration of the utmost magnitude; for, on due reflection, it will appear, that instruction to the young must be, of necessity, the only foundation upon which the superstructure of society can be raised. Let this instruction continue to be left, as heretofore, to chance, and often to the most inefficient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nd society must still experience the endless miseries which still arise from such weak and puerile conduct. On the contrary, let the instruction to the young be well devised and well executed, and no

subsequent proceedings in the state can be materially injurious. For it may truly be said to be a wonder-working power; one that merits the deepest attention of the legislature; with ease it may be used to train man into a demon of mischief to himself and to all around him, or into an agent of unlimited benevolence.

如今，在王国境内还没有任何人是受到了培训，从而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幸福来教育年轻一代的，而这培训十分必要。对下一代进行教育是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只要经过充分思考，我们就可以看出，培育下一代必定是建立社会上层结构的唯一基础。倘若我们还跟以前一样，继续对下一代的教育放任自流，而且通常把这种教育交给社会上最无法胜任的人来掌管，那么社会一定会继续遭受这种幼稚无能的行为所带来的无尽苦难。相反，倘若对下一代的教育好好规划，并且认真执行，后续事宜就不会对国家造成大的危害了。这是因为这种教育确实可以说是一种创造奇迹的力量；是值得立法机构给予深切关注的。它可以很容易地把人培养成害人害己的魔鬼，也可以将其培养成无限仁慈的善人。

Third—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eminaries over the United Kingdoms; to be conveniently placed, and of sufficient extent to receive all those who require instruction.

第三，在联合王国境内建立学校。学校须位置便利，且其规模足以容纳一切有教育需求的人。

Fourth—For supplying the requisite expenditure for the building and support of those seminaries.

第四，为这些学校的修建和维持提供必需的费用。

Fifth—For the arrangement of the plan which, for the manner of instruction, upon a due comparison of the various modes now in practice, or which may be devised, shall appear to be the best.

第五，制定方案。在将目前实施的以及可能订立的各种教学模式进行充分比较之后，该方案的教学方法应当是呈现出来的最佳方案。

Sixth—For the appointment of proper masters to each of the schools. And,

第六，给各学校委派合适的教师。

Last—The matter of instruction, both for body and mind, in these seminaries, should be substantially beneficial to the individuals and to the state. For this is, or ought to be, the sole motiv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seminaries.

最后，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心灵方面，这些学校的教学内容都应对个人和国家有实际利益。因为这是，或者说应该是，建立国立学校的唯一动因。

These are the outlines of the provisions necessary to prepare the most powerful instrument of good that has ever yet been placed

in the hands of man.

为了准备迄今人类手中最强大的谋求幸福的工具，以上就是必不可少的各项规定的纲要。

The last national improvement which remains to be proposed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ublic mind, is, that another legislative act should be passed, for the purpose of obtaining regular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relative to the value of and demand for labour over the United Kingdoms. This information is necessary, preparatory to the adoption of measures which will be proposed, to provide labour for those who may be occasionally unable to procure other employment.

针对现在公众的思想状况，最后还要提出一项全国性改良措施，那就是通过另一项立法法案，以便定期获取王国境内关于劳工价值与需求的准确信息。作为我们下文将要提出的措施的准备工作，该信息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帮助那些偶尔找不到工作的人安排工作。

In this act, provision should be made to obtain accurate quarterly returns of the state of labour in each country or smaller district; the returns to be made either by the clergy, justices of the peace, or other more competent persons. These returns should contain,

这一法案应该规要求各郡或郡以下地区的劳工状况的准确季度报告，这些报告由教士、治安法官或者其他更有能力的人来撰写。报告

应该包括：

First—The average price of manual labour within the district for the period included in the return.

第一，在报告期间，该地区体力劳动的平均价格。

Second—The number of those in each district who depend on their daily labour or on the parish for their support; and who may be at the period of these returns unemployed, and yet able to labour.

第二，各地区依赖日常劳作或者教区救济为生的人的数量；以及在报告期间失业但仍具有劳动能力者的数量。

Third—The number of those who, at the period of each return, are but partially employed; and the extent of that partial employment.

第三，在报告期间，半失业者的人数，以及半失业的范围。

Provision should also be made to obtain a statement of the general occupations in which the individuals had been formerly employed, with the best conjectures as to the kind and quantity of work which each may be supposed still capable of performing.

此外，还应当规定，各分区应以陈述形式说明各人以前参加的工作的总体状况，并对各人仍然能够胜任的工作的种类和数量作出最准确的推测。

The want of due attention to this highly necessary branch of government, occasions thousands of our fellow subjects to be made wretched; while, from the same cause, the revenues of the empire are annually deteriorated to an enormous amount.

人们对于政府的这个非常必要的部门仍然缺乏应有的关注，这使得我们数以千计的同胞们陷入悲惨的境地；同时，也使帝国每年的收入遭受巨额损失。

We have stated, because it is easy of proof, that the revenues of all countries are deriv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the labour of man; and ye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hich, with all its errors, is among the best devised and most enlightened that has hitherto been established, makes extravagant and unnecessary waste of that labour. It makes this waste, too, in the midst of its greatest pecuniary difficulties, and when the utmost efforts of every individual in the state are requisite!

我们已经说过（因为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各国的收入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人的劳动。尽管不列颠政府有其失误，但它仍然是迄今为止规划得最好、最开明的政府之一，可是它还是不必要地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在财政极度困难、需要每个国民作出最大努力时，政府仍然在浪费人的劳动！

This waste of human labour, as it is highly unjust to all, is not only impolitic in a national view, but is most cruel to the individuals who, in consequence of this waste, are the immediate sufferers.

这样浪费人力，对各方都是很不公正的：不仅对国家来说是失策，而且对于这种浪费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来说更是极为残酷的。

It would be an Herculean task to trace through all their ramifications the various injurious effects which result from the fundamental errors by which man has been, and is governed; nor is the world yet fully prepared for such development. We shall, therefore, now merely sketch some of the most direct and palpable of these effects, relative to the oversight of governments in regard to the non-application or misapplication of the labour of the poor and unoccupied.

从古至今一直支配着人类的一些基本谬误造成了各种恶果，要查明其所有分支，是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而世界上的人现在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应对这一趋势。因此，我们现在只是概述一下其中一些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这些后果与各国政府忽视贫民和失业者的劳力闲置或误用这一问题有关。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governing powers of any country may easily and economically give the subjects just sentiments and the best habits; and so long as this shall remain unattempted, governments will continue to neglect their most important duties as

well as interests. Such neglect now exists in Britain, where, in lieu of the governing powers making any effort to attain these inestimable benefits for the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the empire, they must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the existence of laws which must create sentiments and habits highly injurious to the welfare of the individuals and of the state.

我们已经说明，任何国家的执政者都能轻而易举、经济合算地促使其民众养成公正的情感与最好的习惯。倘若政府仍然不进行这种尝试，那么它们就是在继续忽略其重大职责以及利益。这种忽视如今在不列颠就存在。不列颠的执政者不仅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为帝国内的民众谋取无法估计的利益，反而让一些法律继续存在，并为此感到心满意足，这些法律必定会产成对个人和国家的福利极其有害的情感和习惯。

Many of these laws, by their never-failing effects, speak in a language which no one can misunderstand, and say to the unprotected and untaught,

很多这样的法律必然产生的后果，已经以明确的方式向那些未受保护和未受教育的人证实了：

> Remain in ignorance, and let your labour be directed by that ignorance, for while you can procure what is sufficient to support life by such labour, although that life should be an existence in abject poverty, disease, and misery, we will not trouble ourselves with you, or any of your

> proceedings; when, however, you can no longer procure work, or obtain the means to support nature, then apply for relief to the parish, and you shall be maintained in idleness.

“愚昧下去吧，让你们的劳动受愚昧的支配，因为当你们通过这样的劳动就足以维持生活时，即便这种生活一贫如洗、疾病缠身、苦不堪言，我们也不会为了你们和你们的任何行为而劳神费心。可是，在你们无法找到工作或者维持生计的时候，就到教区领取救济吧，那样你们就能一直懒散下去。”

And in ignorance and idleness, even in this country, where manual labour is or always might be made valuabl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re daily supported. No one acquainted with human nature will suppose that men, women, and children, can be long maintained in ignorance and idleness, without becoming habituated to crime.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体力劳动现在是有价值的，或者可以说我们一直都能使之具有价值。可是即便在这里，每天仍然有成千上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在无知和懒散中得到供养。任何了解人性的人都会认为，长期在无知和懒散中得到供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会养成犯罪的习惯。

(It would, perhaps, prove an interesting calculation, and useful to government, to estimate how much its finances would be improved, by giving proper employment to a million of its subjects, rather than by supporting that million in ignorance, idleness, and

crime.

（我们来做一个有趣且对政府大有裨益的估算，假如国家为一百万民众提供合适的工作而不是供养这一百万人在无知、懒惰和罪恶中生活，那么国家的财政将会由此得到多大的改善。

Will it exceed the bounds of moderation to say, that a million of the population so employ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n intelligent government, might earn to the state ten pounds each annually, or ten millions sterling per annum? Ten millions per year would be obtained, by each individual earning less than four shillings per week; and any part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se kingdoms, including within the average the too young and the too old for labour, may be made to earn, under proper arrangements, more than four shillings per week to the state, besides creating an innumerable train of other more beneficial consequences.)

通过这种方式就业的一百万人，在英明政府的领导下，每人每年可能为国家挣十英镑，或者说总共每年挣一千万英镑，这样说是夸大其词吗？每人每个礼拜挣不到四先令，每年也会有一千英镑的收入；况且，王国里的任何一部分人，包括普通人、年龄太小或者太老而不能劳动的人，都能在适当的安排下，平均每人每个礼拜为国家挣得四先令以上，还不算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数不尽的更为有利的结果。）

Why then, are there any idle poor in these kingdoms? Solely because so large a part of the population have been permitted to grow up to manhood in gross ignorance; and because, when they are, or easily may be trained to be willing to labour, useful and

productive employment has not been provided for them.

那么，王国境内为什么还有闲散的贫民呢？这仅仅是因为社会允许这么大一部分人在完全无知的状态下长大成人；而且当他们正在被——或者很容易会被——培养得愿意劳动的时候，却没有人为他们提供有用和有成效的工作。

All men may, by judicious and proper laws and training, readily acquire knowledge and habits which will enable them, if they be permitted, to produce far more than they need for their support and enjoyment; and thus any population, in the fertile parts of the earth, may be taught to live in plenty and in happiness, without the checks of vice and misery.

有了明智而适当的法律后，再经过培养，所有人都可以轻易地获取知识，并养成某些习惯，若条件允许，他们就能够生产出远远超过自己的生活与享乐所需的产品。因此，生活在地球上肥沃地区的任何人都可以经过教育过上富足而幸福的生活，不受苦难和邪恶的牵制。

Mr. Malthus is, however, correct, when he says that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is ever adapting itself to the quantity of food raised for its support; but he has not told us how much more food an intelligent and industrious people will create from the same soil, than will be produced by one ignorant and ill-governed. It is, however, as one to infinity.

然而，马尔萨斯先生是对的，他曾经说过，世界人口的数量永远

要与为维持人们生活而生产出来的食物数量相适应；但是他没有告诉过我们，在同一块土地上，一个聪明而勤劳的人要比一个无知而管教不当的人生产出的粮食多多少。不管怎样，这种差异都好比无穷大比一。

For man knows not the limit to his power of creating food. How much has this power been latterly increased in these islands! And in them such knowledge is in its infancy. Yet compare even this power of raising food with the efforts of the Bosgemens or other savages, and it will be found, perhaps, as one to a thousand.

原因是人类并不知道其生产粮食的能力的限度。在我国诸岛，这种生产力最近增长了何其之多啊！可是这方面的知识还处于萌芽阶段。然而，倘若把我们这种生产粮食的能力与布须曼人以及其他野蛮人的能力作一下比较，我们会发现其结果也许是一千比一。

Food for man may also be considered as a compound of the original elements; of the qualities, combinations, and control of which, chemistry is daily adding to our knowledge; nor is it yet for man to say to what this knowledge may lead, or where it may end.

人类的食物也可以被视为一些初始元素组成的化合物。食物的质量、制成品及管控，就如同我们的化学知识，它，每天都在增加；但是人们还无法说清这些知识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或者这些知识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The sea, it may be remarked also, affords an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food. It may then be safely asserted that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may be allowed naturally to increase for many thousand years; and yet, under a system of government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s for the truth of which we contend, the whole may continue to live in abundance and happiness, without one check of vice or misery;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se principles, human labour, properly directed, may be made far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enable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to live in the highest state of human enjoyment.

还要指出的是，海洋也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食物。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全世界的人口还可以顺其自然地增长好几千年。然而，根据基于我们所主张的正确原理而建立起来的政府体制，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继续过着富足幸福的生活而不受任何苦难与邪恶的牵制；在这些原理的指导下，倘若人的劳动得到合理的安排，这些劳动就完全足以使世人享受最好的生活。

Shall we then continue to allow misery to predominate, and the labour of man to be most absurdly applied or wasted, when it might be easily directed to remove that misery?

这样的话，倘若人类的劳动可以轻易地用来消除苦难，难道我们还要继续让那些苦难处于主宰地位，让人类的劳动被无比荒谬地利用或浪费掉吗？

The labour of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possessing sufficient bodily strength, may be advantageously employed for the public; and there is not, perhaps, a stronger evidence of the extreme

ignorance and fallacy of the systems which have hitherto governed the world, than that the rich, the active, and the powerful, should, by tacit consent, support the ignorant in idleness and crime, without making the attempt to train them into industrious, intelligent, and valuabl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lthough the means by which the change could be easily effected have been always at their command!

每个有足够体力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劳动都可以用来为公众造福。迄今为止统治世界的种种制度都是极端无知和错误的，关于这一点，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恐怕就是：那些富裕、积极而有力量的人居然得到默许，去援助那些懒散而罪恶的无知者，而不是尝试着把他们培养成为勤劳、聪慧而有用的社会成员；尽管轻易实现这一变革的方法一直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It is not, however, intended to propose th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hould now give direct employment to all its working population. On the contrary, it is confidently expected that a national system for th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of the poor and lower orders will be so effectual, that ere long they will all find employment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mselves, except in cases of great sudden depression in the demand for, and consequent depreciation in the value of, labour.

不过，我们不打算建议不列颠政府现在就直接雇用所有的劳动人口。相反，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地预计，全国性的贫民和下层民众教育制度将会是十分有效的，不久他们所有人都能找到足以维持生活的工作，除非出现对劳工的需求骤减，从而导致劳动力贬值这种情况。

To prevent the crime and misery which ever follow these unfavourable fluctuations in the demand for and value of labour, it ought to be a primary duty of every government that sincerely interests itself in the well-being of its subjects, to provide perpetual employment of real national utility, in which all who apply may be immediately occupied.

为了防止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价值的这些不利的波动带来犯罪行为和苦难，任何真心关注民众福祉的政府都应该将这一点当作首要职责，即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真正对国家有用的职位，并且使所有申请的人都能立刻得到工作。

In order that those only who could not obtain employment from private individuals should be induced to avail themselves of these national works, the rate of the public labour might be in general fixed at some proportion less than the average rate of private labour in the district in which such public labour should be performed. These rates might be readily ascertained and fixed, by reference to the county or district quarterly returns of the average rate of labour.

为了确保只有无法通过私人雇佣工作的人才能为国家劳动，为公家劳动的工资一般比当地为私人劳动的平均工资要低一些。通过参考该郡或者该区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季度报告，这些工资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并且固定下来。

This measure, judiciously managed, would have a similar effect on the price of labour, that the sinking fund produces on the Stock

Exchange; and, as the price of public labour should never fall below the means of temperate existence, the plan proposed would perpetually tend to prevent an excess of nationally injurious pressure on the most unprotected part of society.

倘若执行得当，这一措施对劳动价格所起的作用与偿债基金对证券交易所所起的作用就会是相似的。同时，由于为公家劳动的价格绝不应该低于劳动者有节制的生活所需的费用，此处所提的方案将会始终有助于防止国家对社会上最缺乏保障的群体过分施加有害压力。

The most obvious, and, in the first place, the best source, perhaps, of employment, would be the making and repairing of roads. Such employment would be perpetual over the whole kingdom; and it will be found true national economy to keep the public roads at all times in a much higher state of repair than, perhaps, any of them are at present. If requisite, canals, harbours, docks, shipbuilding, and materials for the navy, may be afterwards resorted to; it is not, however, supposed that many of the latter resources would be necessary.

首先，最显而易见也是最合适的工作来源或许是筑路和修路。这样的工作在整个王国境内一直都会有。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国民经济需要使公路一直处于一种也许比任何现存的公路都更高的维修率。倘若有必要，以后还可以安排运河、港口、码头、造船以及海军器材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认为这方面的很多工作并非必要。

A persevering attention, without which, indeed, not anything beneficial in practice can ever be attained, will soon overcome all

the difficulties which may at first appear to obstruct this plan for introducing occasional national employment into the polity of the kingdom.

倘若没有坚持不懈的专注精神，实际上任何有益的事情都永远无法完成。这种精神可以很快克服一切困难，即使这些困难初看起来会阻碍该方案中提到的把临时的国家就业纳入王国的政策之中的策略。

In times of very limited demand for labour, it is truly lamentable to witness the distress which arises among the industrious for want of regular employment and their customary wages. In these periods, innumerable applications are made to the superintendents of extensive manual operations, to obtain any kind of employment, by which a subsistence may be procured. Such applications are often made by persons who, in search of work, have travelled from one extremity of the island to the other!

在对劳动力需求非常有限的时期，眼睁睁地看着勤劳的民众因为缺乏固定工作及惯常的薪酬而穷困不堪，这确实是非常可悲的。在这些时期，他们为了获得任何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向各种体力劳动的监管者提出了无数申请。这些申请者为了找工作，往往从岛的一端奔波到另一端！

During these attempts to be useful and honest, in the common acceptation of the terms, the families of such wandering individuals accompany them, or remain at home; in either case they generally experience sufferings and privations which the gay and splendid will hesitate to believe it possible that human nature could endure.

这些四处奔波的人试图成为一般意义上的诚实而有用的人，在此期间，其家人要么陪伴着他们四处奔走，要么留在家里。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们通常都要经历种种苦难和物质匮乏的折磨，那些过着幸福而奢侈的生活的人很难相信人性可以忍受这些。

Yet, after this extended and anxious endeavour to procure employment, the applicant often returns unsuccessful; he cannot, by his most strenuous exertions, procure an honest and independent existence; therefore, with intentions perhaps as good, and a mind as capable of great and benevolent actions as the remainder of his fellow men, he has no other resources left but to starve, apply to his parish for relief, and thus suffer the greatest degradation, or rely on his own native exertions, and, to supply himself and family with bread, resort to what are termed dishonest means.

然而，在如此四处奔波、忧虑不安地求职过后，申请者通常还是无功而返；他们全力以赴仍然无法独立、诚实地生活。因此，哪怕他们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怀着善良之心，也一样有能力从事伟大而仁慈的事业，但是除了忍饥挨饿、申请教区救济，从而忍受极大的屈辱，或者依靠自己本能的力量，采取所谓的不正当手段为自己和家人挣得面包以外，他们别无选择。

Some minds thus circumstanced are so delicately formed, that they will not accept the one or adopt the other of the two latter modes to sustain life, and in consequence they actually starve. These, however, it is to be hoped, are not very numerous. But the number is undoubtedly great, of those whose health is ruined by bad and insufficient food, clothing, and shelter; who contract

lingering diseases, and suffer premature death, the effect of partial starvation.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由于性格过于敏感，不愿采纳上述后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维持生活，所以就只能真的挨饿了。不过，如我们希望的那样，这种人数量并不太多。但是那些由于衣、食、住条件糟糕且匮乏而失去健康的人，毫无疑问，数量众多，他们由于处于半饥饿状态而疾病缠身，过早夭亡。

The most ignorant and least enterprising of them apply to the parish for support; soon lose the desire of exertion; become permanently dependent; conscious of their degradation in society; and henceforward, with their offspring, remain a burden and grievous evil to the state; while those among this class who yet possess strength and energy of body and mind, with some undestroyed powers of reasoning, perceive, in part, the glaring errors and injustice of society towards themselves and their fellow sufferers.

其中最无知和最没有事业心的人就去申请教区救济。很快，他们就丧失了努力的想法，继而成为永远依赖他人的人，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屈辱地位。此后，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继续成为国家的负担和严重的祸患。而这一阶层中，那些拥有体力和脑力并保留着一部分推理能力的人，或多或少就会看到，社会在对待他们以及同样遭受苦难的人时是极度错误与不公正的。

Can it then create surprise that feelings like those described should force human nature to endeavour to retaliate?

那么，上述情感会迫使人性力图报复，这还会让人觉得奇怪吗？

Multitudes of our fellow men are so goaded by these reflections and circumstances, as to be urged, even while incessantly and closely pursued by legal death almost without a chance of escape, to resist those laws under which they suffer; and thus the private depredator on society is formed, fostered, and matured.

这些思想和环境激励我们的无数同胞，即使不断且近距离地面临死刑且毫无机会逃脱，也急于要反对那些使其深受其害的法律。这样一来，一批暗自劫夺社会财富的人就产生、成长并成熟起来。

Shall we then longer withhold national instruction from our fellow men, who, it has been shown, might easily be trained to be industrious, intelligent, virtuous, and valuable members of the state?

这个时候，难道我们还应该忍受同胞们接受不到国民教育的现实吗？前面已经说明，他们可以很轻易地被培养成勤劳、聪慧、善良、有用的国民。

True, indeed, it is, that all the measures now proposed are only a compromise with the errors of the present systems; but as these errors now almost universally exist, and must be overcome solely by the force of reason; and as reason, to effect the most beneficial purposes, makes her advance by slow degrees, and progressively

substantiates one truth of high import after another, it will be evident, to minds of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thought, that by these and similar compromises alone can success be rationally expected in practice. For such compromises bring truth and error before the public; and whenever they are fairly exhibited together, truth must ultimately prevail.

的确，我们目前提议的所有这些办法仅仅是应对现存制度中的错误的一种权宜之计；可是由于这些错误现在几乎普遍存在，只能用理性的力量加以克服；同时，为了实现最有益的目标，理性虽然进展缓慢，但却在逐渐地证实一个又一个重要的真理，因此那些思维全面、精准的人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唯有采取这些以及类似的权宜之计，才有理由相信我们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这些权宜之计把真理和谬误摆到公众面前，只要它们同时被充分展示，真理最终必定会获胜。

As many of the inconsistencies of the present systems are evident to the most intelligent and well-disposed minds, the way for the public admission of the important truths which have now been in part unfolded seems to be rendered easy; and it is confidently expected that the period is at hand, when man, through ignorance, shall not much longer inflict unnecessary misery on man; because the mass of mankind will become enlightened, and will clearly discern that by so acting they will inevitably create misery to themselves.

因为那些聪慧贤良之士都能清楚地看到当今制度中的很多矛盾，所以让公众接受我们前面已经部分展示的重要真理，似乎就容易做到了。同时我们还可以自信地期盼，人们不再出于愚昧而使旁人遭受不必要的苦难的时期不久就会到来；因为人民大众将会受到启迪，进而

会弄清楚，那样做将会不可避免地给自己带来苦难。

(As soon as the public mind shall be sufficiently prepared to receive it, the practical detail of this system shall be fully developed.)

（一旦公众在思想上充分准备好接受这一制度，我们就会充分地阐述该制度实施过程中的细节问题。）

For the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facts which present themselves on the globe, makes it evident to those whose reasoning faculties have not been entirely paralysed, that all mankind firmly believe, that everybody except themselves has been grievously deceived in hi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feel the utmost astonishment that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could embrace such gross inconsistencies for divine or political truths. Most persons are now also prepar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se weaknesses are firmly and conscientiously fixed in the minds of millions, who, when born, possessed equal faculties with themselves. And although they plainly discern in others what they deem inconceivable aberrations of the mental powers, yet, in despite of such facts, they are taught to believe that they themselves could not have been so deceived; and this impression is made upon the infant mind with the greatest ease, whether it be to create followers of the most ignorant, or of the most enlightened systems.

因为对世界上不断涌现的事实的广泛了解使得那些推理能力还没有完全丧失的人能清楚地看到：全人类都坚定地相信，除自己以外，

所有人都在基本原理方面受到了严重的欺骗；同时，让大家都极其惊讶的是，世界各民族居然把如此矛盾的东西奉为宗教或政治真理。现在大多数的人也开始理解，这些谬误牢固而切实地扎根于千百万人的心目中，这些人出生的时候，拥有与他们同样的才能。虽然他们在其他人身上清楚地辨别出哪些是他们所认为的不可思议的智力失常现象，然而，尽管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所受的教育却使他们相信，自己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受到了欺骗。这种印象会很轻易地留在幼儿的心里，无论这种印象会培养出最愚昧体系还是最开明体系的追随者。

The inhabitants of the world are, therefore, abundantly conscious of the inconsistencies contained in those systems in which all have been trained out of the pale of their own peculiar, and, as they are taught to believe, highly favoured sect; and yet the number of the largest sect in the world is small, when compared with the remaining sects, which have been instructed to think the notions of that larger division an error of the grossest kind, proceeding alone from the ignorance or deception of their predecessors.

因此，世人都充分意识到，除了自己的那个独特而备受青睐的教派（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这么认为）以外，所有人培养体系都包含着种种矛盾；然而即便是世界上最大的教派，其人数与其余教派相比也是少的；而这些其他教派经过教育，都认为这个大教派的观念是极端错误的，完全是他们先辈的愚昧或者欺骗造成的。

All that is now requisite, previous to withdrawing the last mental bandage by which hitherto the human race has been kept in darkness and misery, is, by calm and patient reasoning to tranquillize the public mind, and thus prevent the evil effects which otherwise might arise from the too sudden prospect of freely

enjoying rational liberty of mind.

在清除一直以来使人类生活在黑暗和苦难中的最后一层思想束缚之前，我们目前需要做的只是，通过冷静而耐心的推理安抚公众，从而防止随意享受合理的思想自由这一前景出现得太突然，而可能产生种种恶果。

To withdraw that bandage without danger, reason must be judiciously applied to lead men of every sect (for all have been in part abused) to reflect that if untold myriads of beings, formed like themselves, have been so grossly deceived as they believe them to have been, what power in nature was there to prevent them from being equally deceived?

为了清除这层思想束缚而又不发生危险，我们必须明智地运用理性来引导一切教派的教徒（因为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受了欺骗）思考一下，倘若全世界难以计数的、像他们那样受到教育的人们，都像他们所相信的那样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欺骗，那么世上又有什么力量可以防止他们自己同样受到欺骗呢？

Such reflections, steadily pursued by those who are anxious to follow the plain and simple path of reason, will soon make it obvious that the inconsistencies which they behold in all other sects out of their own pale, are precisely similar to those which all other sects can readily discover within that pale.

那些孜孜以求、渴望循着这条平坦而又简单的理性之路前行的

人，经过这番思考之后会很快明白，他们看到的在自己教派领域以外所有其他教派中的矛盾，与其他教派在他们的领域内很容易发现的矛盾是极其相似的。

It is not, however, to be imagined, that this free and open exposure of the gross errors in which the existing generation has been instructed, should be forthwith palatable to the world; it would be contrary to reason to form any such expectations.

然而我们不要认为，自由公开地揭露当代人所受教育中的种种严重错误，会立刻适合世人的口味；有这样的指望是与理性背道而驰的。

Yet, as evil exists, and as man cannot be rational, nor of course happy, until the cause of it shall be removed; the writer, like a physician who feels the deepest interest in the welfare of his patient, has hitherto administered of this unpalatable restorative the smallest quantity which he deemed sufficient for the purpose. He now waits to see the effects which that may produce.

然而，只要危害的成因没有被消除，危害就会存在，人类就不可能合乎理性，当然也就不可能幸福。因此，作者就像一位深切关心病人利益的医生一样，用这种难以下咽的的药品时，始终坚持只用自己认为足以达到康复目的的最小剂量。目前他正等着看这些药产生的效用。

Should the application not prove of sufficient strength to

remove the mental disorder, he promises that it shall be increased, until sound health to the public mind be firmly and permanently established.

倘若事实证明药力尚不足以消除这种思想上的疾病，他保证会加大剂量，直至大众思想稳定而永久地获得健康。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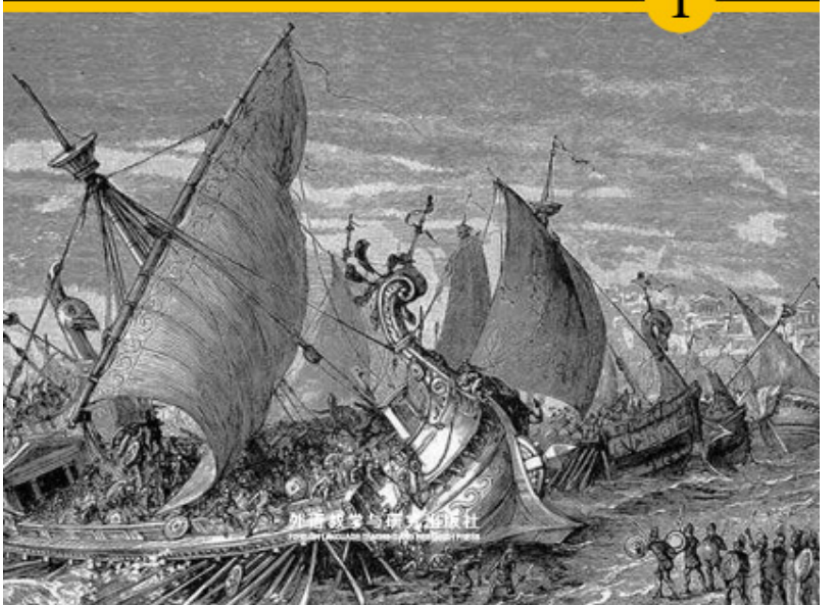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

修昔底德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BOOK I 第一卷
- BOOK II 第二卷
- BOOK III 第三卷
- BOOK IV 第四卷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BOOK I

第一卷

CHAPTER I The State of Greec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第一章　远古时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希腊的状况

Thucydides, an Athenian, wrote the history of the war between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beginning at the moment that it broke out, and believing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war and more worthy of relation than any that had preceded it. This belief was not without its grounds. The preparations of both the combatants were in every department in the last state of perfection; and he could see the rest of the Hellenic race taking sides in the quarrel; those who delayed doing so at once having it in contemplation. Indeed, this was the greatest movement yet known in history, not only of the, but of a large part of the barba Hellenes rian world—I had almost said of mankind. For though the events of remote antiquity, and even those that more immediately preceded the war, could not from lapse of time be clearly ascertained, yet the evidences which an inquiry carried as far back as was practicable leads me to trust, all point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was nothing on a great scale, either in war or in other matters.

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爆发伊始，我——雅典人修昔底德即开始为这场战争修史。我认为，这将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比以往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值得载入史册。这种想法并非毫无根据，当时，双方战斗人员在各个方面的准备已近完善。另外我还看到，其余希腊

人竞相在纷争中表明立场，即便暂时迟疑者，也在考虑到底站在哪一方。事实上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不仅对希腊人而言，对野蛮世界的大部而言也是如此——我几乎想说全人类。因为尽管远古之事，甚至那些距此战较近之事，因时间的逝去已无法厘清，但可以追及的情况仍使我相信，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无论是战争还是其他，论规模，无一曾如此宏大。

For instan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ountry now called Hellas had in ancient times no settled population; on the contrary, migrations were of frequent occurrence, the several tribes readily abandoning their homes under the pressure of superior numbers. Without commerce, without freedom of communication either by land or sea, cultivating no more of their territory than the exigencies of life required, destitute of capital, never planting their land (for they could not tell when an invader might not come and take it all away, and when he did come they had no walls to stop him), thinking that the necessities of daily sustenance could be supplied at one place as well as another, they cared little for shifting their habitation, and consequently neither built large cities nor attained to any other form of greatness. The richest soils were always most subject to this change of masters; such as the district now called Thessaly, Boeotia, most of the Peloponnese, Arcadia excepted, and the most fertile parts of the rest of Hellas. The goodness of the land favoured the aggrandizement of particular individuals, and thus created faction which proved a fertile source of ruin. It also invited invasion. Accordingly, Attica, from the poverty of its soil enjoying from a very remote period freedom from faction, never changed its inhabitants. And here is no inconsiderable exemplification of my assertion that the migrations were the cause of there being no correspondent growth in other parts. The most powerful victims of war or faction from the rest of

Hellas took refuge with the Athenians as a safe retreat; and at an early period, becoming naturalized, swelled the already large population of the city to such a height that Attica became at last too small to hold them, and they had to send out colonies to Ionia.

例如，在如今被称为希腊的这个国家，古时候显然没有定居的人口。相反，迁移之事却经常发生，迫于外族人多势众的压力，各部族总是轻易放弃自己的家园。他们没有通商手段，没有陆上或海上交通自由，开辟的地盘仅够生存之需，缺少资本，从来不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因为不知道何时会有敌来犯，将一切席卷而去，入侵者真的来了，他们又无城墙御敌）。他们认为，维持生存的必需品既然可以在一个地方获得，在其他地方同样可以获得，所以不大在乎更换居住地。因此，他们既不曾建立大的城市，也不曾成就任何其他形式的恢弘之举。那些最为富饶的土地总是最易更换主人，如现在被称为色萨利、维奥蒂亚的地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阿卡迪亚除外）以及希腊其他最富饶的地方。由于土地的肥沃有利于某些成员进行扩张，于是便产生了纷争，而纷争则成了孕育毁灭的沃土，同时也易招致外部入侵。恰因如此，阿提卡由于土壤贫瘠长期免受派别纷争之累，从来没有变换过居住者。这一点有力地证实了我的判断：其他地区之所以未相应地发展起来，原因就在于迁徙。希腊其他地方遭受战乱或派别纷争之祸的人中，最强悍的那部分向雅典人寻求避难。从他们归入雅典籍之初，这座本来人口就很多的城市便开始膨胀，阿提卡最终拥挤到无法容纳他们的地步，只好向爱奥尼亚派遣殖民团。

There is also another circumstance that contributes not a little to my conviction of the weakness of ancient times. Before the Trojan war there is no indication of any common action in Hellas, nor indeed of the universal prevalence of the name; on the contrary, before the time of Hellen, son of Deucalion, no such appellation existed, but the country went by the names of the different tribes, in

particular of the Pelasgian. It was not till Hellen and his sons grew strong in Phthiotis, and were invited as allies into the other cities, that one by one they gradually acquired from the connection the name of Hellenes; though a long time elapsed before that name could fasten itself upon all. The best proof of this is furnished by Homer. Born long after the Trojan War, he nowhere calls all of them by that name, nor indeed any of them except the followers of Achilles from Phthiotis, who were the original Hellenes; in his poems they are called Danaans, Argives, and Phthiotis. He does not even use the term barbarian, probably because the Hellenes had not yet been marked off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one distinctive appellation. It appears therefore that the several Hellenic communities, comprising not only those who first acquired the name, city by city, as they came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but also those who assumed it afterwards as the name of the whole people, were before the Trojan war prevented by their want of strength and the absence of mutual intercourse from displaying any collective action.

另外还有一点，对我判断远古时期希腊的弱小这一点也助益匪浅。特洛伊战争之前，无任何迹象表明整个希腊曾采取一致行动，甚至也无迹象表明“希腊”这一名称被普遍采用。相反，在丢卡利翁之子赫楞的时代到来之前，这个名称根本不存在，称呼这个国家时用的都是不同部族的名称，尤其是用派拉西亚人之名。直到赫楞和他的儿子们在弗西奥蒂斯势力逐渐壮大，并且作为盟友被邀请至其他城邦，他们才因这种联系一个接一个地逐渐获得“希腊人”这一称呼，尽管其后又经过很长时间，这一名称才成为所有希腊人的固定称呼。这一点在荷马的作品里得到了最好的验证。荷马虽然是特洛伊战争结束很久以后才出生的，但他的作品中无一处用这一名称来统称希腊人，事实上不用它来称呼其中任何人，除了来自弗西奥蒂斯的阿喀琉斯的追随者，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希腊人。在他的诗里，希腊人被称为“达纳安

人”、“阿尔戈斯人”和“亚该亚人”。他甚至未使用过“蛮族人”这一说法，原因或许是希腊人尚未以一种特有的称呼与世界上其他人区别开来。因此似乎就成了这样：希腊人的各个群体，不仅包括最初那些随着相互间了解的加深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先后获得这一称呼的群体，而且还包括那些后来采用这一名称作为全体人的称呼的群体，由于实力不足和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在特洛伊战争之前未能采取任何集体行动。

Indeed, they could not unite for this expedition till they had gained increased familiarity with the sea. And the first person known to us by tradition as having established a navy is Minos. He made himself master of what is now called the Hellenic sea, and ruled over the Cyclades, into most of which he sent the first colonies, expelling the Carians and appointing his own sons governors; and thus did his best to put down piracy in those waters, a necessary step to secure the revenues for his own use.

事实上，如果不是后来加深了对海洋的认识，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发动特洛伊远征。传统上我们都认为，米诺斯是建立海军的第一人。他成为如今被称为“希腊海”的海上霸主和基克拉泽斯群岛的统治者，并向大部分岛屿输送了第一批殖民者，赶走了卡里亚人，还任命自己的儿子们担任这些岛屿的总督。他就这样倾其全力镇压了那些水域的海盗活动，这是他为了确保收益为己所用必须采取的步骤。

For in early times, the Hellenes and the barbarians of the coast and islands, as communication by sea became more common, were tempted to turn pirates, under the conduct of their most powerful men; the motives being to serve their own cupidity and to support the needy. They would fall upon a town unprotected by walls, and

consisting of a mere collection of villages, and would plunder it; indeed, this came to be the main source of their livelihood, no disgrace being yet attached to such an achievement, but even some glory. An illustration of this is furnished by the honour with which some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ntinent still regard a successful marauder, and by the question, we find the old poets everywhere representing the people as asking of voyagers—“Are they pirates?“—as if those who are asked the question would have no idea of disclaiming the imputation, or their interrogators of reproaching them for it. The same rapine prevailed also by land.

其原因在于，在早期，随着海上交通日趋普遍，古希腊人和住在沿海区域及诸岛上的蛮族人便在利诱之下做起了海盗。他们的首领都是他们之中最强悍的人，抢劫的目的既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物欲，也是为了扶困济贫。这些海盗常常突袭那些没有城墙防护且仅散聚着零星几个村庄的城镇，尔后将其劫掠一空。他们甚至逐渐将抢劫当成了主要的谋生之道，不但不以这种行为为耻，反而有些引以为荣。这一点还可以找到如下例证：一是大陆上某些居民现在仍以抢劫成功为荣，二是古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时常描述人们这样问及从海上来的人，“他们是海盗吗？”，被问及者仿佛并无拒纳这一污名之意，询问者好像也无意为此而指责他们。这类劫掠在陆地上也常常发生。

And even at the present day, many of Hellas still follow the old fashion, the Ozolian Locrians for instance, the Aetolians, the Acarnanians, and that region of the continent; and the custom of carrying arms is still kept up among these continentals, from the old piratical habits. The whole of Hellas used once to carry arms, their habitations being unprotected and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each other unsafe; indeed, to wear arms was as much a part of everyday life with them as with the barbarians. And the fact that the people

in these parts of Hellas are still living in the old way points to a time when the same mode of life was once equally common to all. The Athenians were the first to lay aside their weapons, and to adopt an easier and more luxurious mode of life; indeed, it is only lately that their rich old men left off the luxury of wearing undergarments of linen, and fastening a knot of their hair with a tie of golden grasshoppers, a fashion which spread to their Ionian kindred and long prevailed among the old men there. On the contrary, a modest style of dressing, more in conformity with modern ideas, was first adopted by the Lacedaemonians, the rich doing their best to assimilate their way of life to that of the common people. They also set the example of contending naked, publicly stripping and anointing themselves with oil in their gymnastic exercises. Formerly, even in the Olympic contests, the athletes who contended wore belts across their middles; and it is but a few years since that the practice ceased. To this day among some of the barbarians, especially in Asia, when prizes for boxing and wrestling are offered, belts are worn by the combatants. And there are many other points in which a likeness might be shown between the life of the Hellenic world of old and the barbarian of to-day.

甚至时至今日，很多希腊人仍在奉行这一古风，如奥佐利亚的洛克里斯人、埃托利亚人、阿卡纳尼亚人以及大陆上居住在那一地区的人。由于古时海盗遗留下来的习惯，这些大陆人依旧保持着随身携带武器的习俗。全体希腊人过去都有携带武器的习惯，这是因为他们的居所不设防护，彼此往来也很不安全。事实上，携带武器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那些蛮族人毫无二致。现如今，希腊这些地区的居民依然保持着旧日的生活方式，这一事实表明，过去的某段时期，这种生活方式是所有希腊人共有的。最先卸下武器而采取比较安逸奢侈的生活方式者是雅典人。事实上，雅典富裕阶层的

老人不久前才不穿亚麻贴身内衣，也不再将头发用一个金蚱蜢扣盘成鬏。那种奢侈风尚亦曾传到过他们在爱奥尼亚的同族人那里，并在当地老人中流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然而，更符合现代理念的朴素穿着方式，最早则是在古斯巴达人中兴起的，那里的富人也尽可能按普通人的方式生活。古斯巴达人还率先开创了裸体竞技运动。进行体育锻炼时，他们公开脱去衣服往身上涂抹油膏。从前，即便是在奥林匹亚竞赛会上，参赛的运动员也要在腰部系一条带子。这种习惯几年前才刚刚消失。时至今日，一些蛮族人，尤其是亚细亚地区的蛮族人，在争夺拳击或摔跤运动的奖项时，选手们还是要束上腰带。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与现今蛮族人的生活方式，在其他方面可能还有许多相似之处。

With respect to their towns, later on, at an era of increased facilities of navigation and a greater supply of capital, we find the shores becoming the site of walled towns, and the isthmuses being occupied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erce and defence against a neighbour. But the old towns, on account of the great prevalence of piracy, were built away from the sea, whether on the islands or the continent, and still remain in their old sites. For the pirates used to plunder one another, and indeed all coast populations, whether seafaring or not.

至于希腊人的城镇，后来，到了航海设施增多和资本比较充裕的时期，我们可以发现，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筑有城墙的城镇；出于通商或防范邻邦侵犯的需要，地峡也已被占据。但是，由于海盗活动猖獗，那些古城镇都建在离海有一定距离的岛屿或大陆上，如今这些城镇依然屹立在原址。因为海盗们除了常常相互抢劫，实际上，整个沿海地区的居民都深涉其中，不论他们是否以航海为业。

The islanders, too, were great pirates. These islanders were Carians and Phoenicians, by whom most of the islands were colonized, as was proved by the following fact. During the purification of Delos by Athens, in this war all the graves in the island were taken up, and it was found that above half their inmates were Carians: they were identified by the fashion of the arms buried with them, and by the method of interment, which was the same as the Carians still follow. But as soon as Minos had formed his navy, communication by sea became easier, as he colonized most of the islands, and thus expelled the malefactors. The coast population now began to apply themselves more closely to the acquisition of wealth, and their life became more settled; some even began to build themselves walls on the strength of their newly acquired riches. For the love of gain would reconcile the weaker to the dominion of the stronger, and the possession of capital enabled the more powerful to reduce the smaller towns to subjection. And it was at a somewhat later stage of this development that they went on the expedition against Troy.

海上劫掠在岛上居民中也十分盛行。这些岛民就是将大多数岛屿开拓成殖民地的卡里亚人和腓尼基人，这一点有以下事实为证：这次战争期间，雅典人曾对提洛岛进行净秽，其间挖开了岛上所有的坟墓。结果发现，从殉葬武器的样式和埋葬的方式来看，墓中人大半是卡里亚人，卡里亚人现在仍采用这种武器样式和埋葬方式。不过，米诺斯建立海军伊始，就将大多数岛屿开拓成了殖民地，并逐走了那里的海盗，使得海上交通较之前更加便捷。沿海居民这时开始更为关注财富的获取，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安定了，其中一些人甚至开始凭借新获得的财富为居所修筑防护墙。利欲之心总是驱使弱者臣服于强者，因此，势力强大的城镇便倚仗对资本的占有，开始吞并较小的城镇。后来，当他们开始远征特洛伊时，希腊已经沿着这条路线发展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What enabled Agamemnon to raise the armament was more, in my opinion, his superiority in strength, than the oaths of Tyndareus, which bound the suitors to follow him. Indeed, the account given by those Peloponnesians who have been the recipients of the most credible tradition is this. First of all Pelops, arriving among a needy population from Asia with vast wealth, acquired such power that, stranger though he was, the country was called after him; and this power fortune saw fit materially to increase in the hands of his descendants. Eurystheus had been killed in Attica by the Heraclids. Atreus was his mother's brother; and to the hands of his relation, who had left his father on account of the death of Chrysippus, Eurystheus, when he set out on his expedition, had committed Mycenae and the government. As time went on and Eurystheus did not return, Atreus complied with the wishes of the Mycenaeans, who were influenced by fear of the Heraclids—besides, his power seemed considerable, and he had not neglected to court the favour of the populace—and assumed the sceptre of Mycenae and the rest of the dominions of Eurystheus. And so the power of the descendants of Pelops came to be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descendants of Perseus. To all this Agamemnon succeeded. He had also a navy far stronger than his contemporaries, so that, in my opinion, fear was quite as strong an element as lov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federate expedition. The strength of his navy i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his own was the largest contingent, and that of the Arcadians was furnished by him; this at least is what Homer says, if his testimony is deemed sufficient. Besides, in his account of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sceptre, he calls him

阿伽门农之所以能够召集起那支大军，我认为是由于他实力超群，而不是因为那些求婚者受廷达瑞奥斯誓约所缚才追随他。事实

上，伯罗奔尼撒人中流传下来的传说可靠性最强。他们的说法是这样的：首先，珀罗普斯带着巨额财富从亚细亚来到一片贫穷人口居住的地方，势力逐渐壮大，以致他来自异乡，却能使整个地区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这笔势力财富，在他的后人手里得到了发扬光大。欧律斯透斯在阿提卡被赫拉克勒斯的后裔所杀。欧律斯透斯在远征开始前将迈锡尼及其政府托付给了他的亲戚，即因克里西波斯之死而被他父亲放逐的阿特柔斯。此人是欧律斯透斯母亲的兄长。岁月流逝，欧律斯透斯却没有回来，阿特柔斯顺从了迈锡尼人的愿望（实际上迈锡尼人深陷对赫拉克勒斯后裔一族的恐惧，加之他的势力也不可小觑，而且他也没有忘记争取民众的支持），继承了王位。这样，他便统治了迈锡尼和欧律斯透斯所曾统治的其他地方。因此，珀罗普斯的后裔渐渐变得比珀修斯的后裔强大得多。阿伽门农继承了所有这一切。另外，他还拥有那个时代最强大的海军。因此，在我看来，在这支联合远征军的组建中，恐惧与爱戴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倘若我们相信荷马所言足以为凭，阿伽门农的海军实力由此可见一斑：他自己的舰队是其中最为庞大的一支，就连阿卡迪亚的舰队也由他装备，至少荷马是这样说的。此外，荷马在对阿伽门农继承权杖的描述中曾称他为：

Of many an isle, and of all Argos king.

“许多岛屿和整个阿尔戈斯的国王”。

Now Agamemnon's was a continental power; and he could not have been master of any except the adjacent islands (and these would not be many), but through the possession of a fleet.

阿伽门农的势力是在陆上，倘若他不曾拥有舰队，他便不会统治除海岸附近的岛屿（为数不多）之外的任何岛屿。

And from this expedition, we may infer the character of earlier enterprises. Now Mycenae may have been a small place, and many of the towns of that age may appear comparatively insignificant, but no exact observer would therefore feel justified in rejecting the estimate given by the poets and by tradition of the magnitude of the armament. For I suppose if Lacedaemon were to become desolate, and the temple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public buildings were left, that as time went on there would be a strong disposition with posterity to refuse to accept her fame as a true exponent of her power. And yet they occupy two-fifths of Peloponnese and lead the whole, not to speak of their numerous allies without. Still, as the city is neither built in a compact form nor adorned with magnificent temples and public edifices, but composed of villages after the old fashion of Hellas, there would be an impression of inadequacy. Whereas, if Athens were to suffer the same misfortune, I suppose that any inference from the appearance presented to the eye would make her power to have been twice as great as it is. We have therefore no right to be sceptical, nor to content ourselves with an inspection of a town to the exclusion of a consideration of its power; but we may safely conclude that the armament in question surpassed all before it, as it fell short of modern efforts; if we can here also accept the testimony of Homer's poems, in which, without allowing for the exaggeration which a poet would feel himself licensed to employ, we can see that it was far from equalling ours. He has represented it as consisting of twelve hundred vessels; the Boeotian complement of each ship being a hundred and twenty men, that of the ships of Philoctetes fifty. By this, I conceive, he meant to convey the maximum and the minimum complement: at any rate, he does not specify the amount of any others in his catalogue of the ships. That they were all rowers as well as warriors we see from his account of the ships of

Philoctetes, in which all the men at the oar are bowmen. Now it is improbable that many supernumeraries sailed, if we except the kings and high officers; especially as they had to cross the open sea with munitions of war, in ships, moreover, that had no decks, but were equipped in the old piratical fashion. So that if we strike the average of the largest and smallest ships,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sailed will appear inconsiderable, representing, as they did, the whole force of Hellas. And this was due not so much to scarcity of men as of money. Difficulty of subsistence made the invaders reduce the numbers of the army to a point at which it might live on the country during the prosecution of the war. Even after the victory they obtained on their arrival—and a victory there must have been, or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naval camp could never have been built—there is no indication of their whole force having been employed; on the contrary, they seem to have turned to cultivation of the Chersonese and to piracy from want of supplies. This was what really enabled the Trojans to keep the field for ten years against them; the dispersion of the enemy making them always a match for the detachment left behind. If they had brought plenty of supplies with them, and had persevered in the war without scattering for piracy and agriculture, they would have easily defeated the Trojans in the field, since they could hold their own against them with the division on service. In short, if they had stuck to the siege, the capture of Troy would have cost them less time and less trouble. But as want of money proved the weakness of earlier expeditions, so from the same cause even the one in question, more famous than its predecessors, may be pronounced on the evidence of what it effected to have been inferior to its renown and to the current opinion about it formed under the tuition of the poets.

从这次远征，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出此前几次远征的情况。如今的

迈锡尼过去可能只是个小地方，当时那个年代的诸多城镇，在今天看来似乎都不值一提。但是，谁也无法心安理得地否定诗人们和传说中对这支军队规模大小的估计。我想，假如斯巴达将来变得一片荒凉，只留下神庙和公共建筑的地基，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会很难相信它的势力确如它的声名那么显赫。但是，斯巴达人却占有伯罗奔尼撒五分之二的土地，而且在整个半岛居于统领地位，且不说在岛外还有许多盟邦。然而，由于这座城的布局不够紧凑，又没有雄伟的庙宇和公共建筑为之增色，而只是一些老式希腊村庄的聚合体，其外表难免给人一种不足之感。反之，如果雅典落到同样地步，我猜想，仅观其表，谁都会以为它的势力比实际上大一倍。因此，我们既无权持怀疑态度，也不能单凭一座城市的外表而不看它的实力就作出判断。不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这支军队的规模虽然无法与现代战争努力相提并论，却大于此前任何一次。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同样可以接受荷马史诗中的说法，即便不将诗人惯常使用的夸张手法考虑在内，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其描述远不能和我们这次战争所动用的兵力同日而语。按照荷马的描述，阿伽门农的大军有船舶1,200艘，维奥蒂亚人的船上每船配备120人，菲罗克忒忒斯的船上每船配备50人。我想，他这样写是想给出船上人员的最大和最小配备数：不管怎样，他都没有详细说明他所记载的其他船只所配备的兵员数。从他对菲罗克忒忒斯那些船的描述还可以看出，船上人员不仅是战士，同时还充当桨手，划桨的人全都是弓箭手。如此看来，除了国王和高级官吏外，船上不可能有多少额外人员，考虑到他们还得用船载着军需品穿过大海，情况更是这样。另外，他们的船上也没有装甲板，而是按照旧日海盗船的样式装备的。因此，我们如果取最大和最小的船的数量的平均值，船上人员的数目似乎不是很大，因为他们实际上代表的是全希腊的军事力量。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其说是人员短缺，毋宁说是资金不足。由于给养保障困难，他们不得不减少军队的人数，以便在战争进行期间能在对方国度里生存下去。即便在登陆获得胜利之后（这场胜利势在必得，否则便无法构筑海军营地的工事），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曾将全部军队投入作战。恰恰相反，由于给养不足，他们似乎转而开始在切尔松尼斯岛上耕作和劫掠。特洛伊人能够坚守十年与之对抗，真正原因正在于此。敌军的分散，使得他们和那些留在战场上的

军队一直处于势均力敌的状况。假如阿伽门农的军队带有充足的给养，一直坚持作战，没有分散兵力去进行劫掠与农耕，他们在战场上打败特洛伊人则会易如反掌，因为他们仅靠投入作战的那部分兵力便已能与其匹敌。简言之，假如全力投入围攻，他们攻陷特洛伊城就无需花那么多时间，也不用费那么大周折了。此前历次远征，其实都存在资金匮乏这一不足。从这次远征实际完成的业绩来看，虽然它比以往那些都声名卓著，但同样基于这一原因，或许我们可以断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也未必完全符合时下人们在诗人的影响下对它所形成的看法。

Even after the Trojan War, Hellas was still engaged in removing and settling, and thus could not attain to the quiet which must precede growth. The late return of the Hellenes from Iliumcaused many revolutions, and factions ensued almost everywhere; and it was the citizens thus driven into exile who founded the cities. Sixty years after the capture of Ilium, the modern Boeotians were driven out of Arne by the Thessalians, and settled in the present Boeotia, the former Cadmeis; though there was a division of them there before, some of whom joined the expedition to Ilium. Twenty years later, the Dorians and the Heraclids became masters of Peloponnese; so that much had to be done and many years had to elapse before Hellas could attain to a durable tranquillity undisturbed by removals, and could begin to send out colonies, as Athens did to Ionia and most of the islands, and the Peloponnesians to most of Italy and Sicily and some places in the rest of Hellas. All these places were founded subsequently to the war with Troy.

甚至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希腊人仍忙于动迁和移居，因而未能赢得发展前须有的一段平静。希腊军队迟迟不从伊利昂（特洛伊的曾用

名）归来，使得动荡频发，各地几乎都派系林立，那些因此而被放逐的人便建立了新的城市。伊利昂陷落六十年后，近代维奥蒂亚人被色萨利人逐出阿恩，定居在了现在的维奥蒂亚，也就是从前的卡兹米斯，尽管那里以前就有他们的一个分支，其中一些人还参加了对伊利昂的远征。二十年后，多里亚人和自称为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后裔的人成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主人。又过了很多年，经过大量努力，希腊才得以不受迁动之扰，过上持久安定的日子，并开始向外派遣殖民团。雅典人去的是爱奥尼亚和大多数岛屿，伯罗奔尼撒人去的是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大部以及希腊其他一些地方。所有这些殖民地都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

But as the power of Hellas grew, and the acquisition of wealth became more an object, the revenues of the states increasing, tyrannies were by their means established almost everywhere—the old form of government being hereditary monarchy with definite prerogatives—and Hellas began to fit out fleets and apply herself more closely to the sea. It is said that the Corinthians were the first to approach the modern style of naval architecture, and that Corinth was the first place in Hellas where galleys were built; and we have Ameinocles, a Corinthian shipwright, making four ships for the Samians. Dating from the end of this war, it is nearly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that Ameinocles went to Samos. Again, the earliest sea-fight in history was between the Corinthians and Corcyraeans; this was about two hundred and sixty years ago, dating from the same time. Planted on an isthmus, Corinth had from time out of mind been a commercial emporium; as formerly almost al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Hellenes within and without Peloponnese was carried on overland, and the Corinthian territory was the highway through which it travelled. She had consequently great money resources, as is shown by the epithet “wealthy” bestowed by the old poets on the place, and this enabled her, when

traffic by sea became more common, to procure her navy and put down piracy; and as she could offer a mart for both branches of the trade, she acquired for herself all the power which a large revenue affords. Subsequently the Ionians attained to great naval strength in the reign of Cyrus, the first king of the Persians, and of his son Cambyses, and while they were at war with the former commanded for a while the Ionian Sea. Polycrates also, the tyrant of Samos, had a powerful navy in the reign of Cambyses, with which he reduced many of the islands, and among them Rhenea, which he consecrated to the Delian Apollo. About this time, also the Phocaeans, while they were founding Marseilles, defeated the Carthaginians in a sea-fight. These were the most powerful navies. And even these, although so many generations had elapsed since the Trojan War, seem to have been principally composed of the old fifty-oars and long-boats, and to have counted few galleys among their ranks. Indeed, it was only shortly before the Persian war, and the death of Darius the successor of Cambyses, that the Sicilian tyrants and the Corcyraeans acquired any large number of galleys. For after these, there were no navies of any account in Hellas till the expedition of Xerxes; Aegina, Athens, and others may have possessed a few vessels, but they were principally fifty-oars. It was quite at the end of this period that the war with Aegina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barbarian invasion enabled Themistocles to persuade the Athenians to build the fleet with which they fought at Salamis; and even these vessels had not complete decks.

然而，随着势力的扩大，获取财富逐渐成为希腊追逐的目标。由于各个城邦的收入不断增加，几乎各地都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了僭主政治——旧有的政体是世袭式君主制，君主具有确定的特权——希腊开始装备舰队，更加注重海上势力扩张。据说，科林斯人是最早采用近代方式建造船只的，希腊最早的三列桨战舰也是在科林斯建造的。我

们知道，科林斯有一个叫阿米诺克莱斯的造船人，他曾为萨摩斯岛人造了四条船。从这次战争结束时算起，将近三百年前，阿米诺克莱斯去往萨摩斯岛。此外，历史上最早的海战即发生在科林斯人和克基拉人之间，如果从同一时间算起，大约发生在二百六十年前。科林斯位于地峡之上，自远古以来就是商业中心。由于之前希腊人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内外彼此间的往来几乎都是通过陆路，科林斯的领土可谓必经之地。因此，科林斯当时财源滚滚，这一点从古诗人提及这个地方时往往冠有“富裕的”一词即可得知。海上交通比较发达后，这一点也使得科林斯能够建立自己的海军去镇压海盗。由于可以同时为海上和陆上通商提供市场，不断积累的贸易财富帮助其势力进一步增强。随后，在波斯人的第一个国王居鲁士和他的儿子康比斯统治时期，爱奥尼亚人拥有了强大的海军力量。在与居鲁士交战期间，他们有一个时期曾经控制了爱奥尼亚海。在康比斯统治时期，萨摩斯岛的僭主波利克拉泰斯同样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据此征服了许多岛屿，其中包括雷尼亚岛，他把这个岛奉献给了提洛岛上的阿波罗神。这一时期前后，海上势力强大的还有福西亚人。在建立马赛的过程中，他们在一次海战中打败了迦太基人。这些是当时最强大的海军。但是，尽管特洛伊战争已过去不少代，但就连这些海军，其舰队似乎也没有多少三列桨战舰，主要还是由老式长船和五十桨大船组成。实际上，只有到了波斯战争和康比斯的继承者大流士死前不久，西西里的僭主们和克基拉人才拥有数量可观的三列桨战舰。其后到泽尔士远征之前，希腊一直没有值得一提的海军力量。埃伊纳岛、雅典和其他城市可能拥有少量船只，但主要是五十桨大船。这个时期的末期，与埃伊纳的作战和蛮族人入侵的预期使得塞米斯托克利斯说服雅典人建立舰队，用于在萨拉米斯作战，但就连这些船只也没有完整的甲板。

The navies, then, of the Hellenes during the period we have traversed were what I have described. All their insignificance did not prevent their being an element of the greatest power to those who cultivated them, alike in revenue and in dominion. They were the means by which the islands were reached and reduced, those of

the smallest area falling the easiest prey. Wars by land there were none, none at least by which power was acquired; we have the usual border contests, but of distant expeditions with conquest for object, we hear nothing among the Hellenes. There was no union of subject cities round a great state, no spontaneous combination of equals for confederate expeditions; what fighting there was consisted merely of local warfare between rival neighbours. The nearest approach to a coalition took place in the old war between Chalcis and Eretria; this was a quarrel in which the rest of the Hellenic name did to some extent take sides.

因此，在我们所谈及的时期，希腊人的海军即如上述。这些海军虽然微不足道，却为其创建者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势力做出了一份贡献，在获取收入和领土扩张方面都是如此。靠着这些力量，他们抵达和征服了一个个岛屿，面积最小的那些往往最易被他们吞并。陆地上倒是没有战事，至少没有为扩大势力而进行的陆上战争。惯常的边界争端虽有发生，但没听说希腊人中有谁以征服为目标进行远征。没有臣属城邦围绕某个大的城邦组成联盟，也没有平等的城邦自发组织联合征伐。即便打仗，也只是对立邻邦之间的局部战争。最接近联合行动的是哈尔基斯与埃雷特里亚之间那场古战。在那场战斗中，希腊名下的其他城邦在一定程度上都表了态。

Various, too, were the obstacles which the national growth encountered in various localities. The power of the Ionians was advancing with rapid strides, when it came into collision with Persia, under King Cyrus, who, after having dethroned Croesus and overrun everything between the Halys and the sea, stopped not till he had reduced the cities of the coast; the islands being only left to be subdued by Darius and the Phoenician navy.

由于地域不同，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也各不相同。爱奥尼亚人的势力迅猛发展时，却与居鲁士国王统治下的波斯发生了冲突。居鲁士废黜了克罗伊斯，将哈利斯河与大海之间的土地尽数收入囊中，直至攻克了沿岸诸城方才罢手。留待大流士和腓尼基海军去征服的，仅剩那些岛屿了。

Again, wherever there were tyrants, their habit of providing simply for themselves, of looking solely to their personal comfort and family aggrandizement, made safety the great aim of their policy, and prevented anything great proceeding from them; though they would each have their affairs with their immediate neighbours. All this is only true of the mother country, for in Sicily they attained to very great power. Thus for a long time everywhere in Hellas do we find causes which make the states alike incapable of combination for great and national ends, or of any vigorous action of their own.

此外，无论哪里实行僭主政治，僭主们都是只为自己打算，仅考虑他们个人的安逸和家族的光耀，所以总是把安全列为主要政策目标，因而成就不了大的业绩，尽管他们与各自的紧邻都发生过一些冲突。不过，这种情况仅发生在希腊本土，西西里的僭主们则势力大增。因此，我们发现，很长一个时期，希腊各地的城邦都未能联合一致开创民族伟业，各个城邦也曾采取过积极行动。

But at last, a time came when the tyrants of Athens and the far older tyrannies of the rest of Hellas wer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in Sicily, once and for all put down by Lacedaemon; for this city, though afte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orians, its present inhabitants, it suffered from factions for an unparalleled length of

time, still at a very early period obtained good laws, and enjoyed a freedom from tyrants which was unbroken; it has possessed the same form of government for more than four hundred years, reckoning to the end of the late war, and has thus been in a position to arrange the affairs of the other states. Not many years after the deposition of the tyrants, the battle of Marathon was fought between the Medes and the Athenians. Ten years afterwards, the barbarian returned with the armada for the subjugation of Hellas. In the face of this great danger, the command of the confederate Hellenes was assumed by the Lacedaemonians in virtue of their superior power; and the Athenians, having made up their minds to abandon their city, broke up their homes, threw themselves into their ships, and became a naval people. This coalition, after repulsing the barbarian, soon afterwards split into two sections, which included the Hellenes who had revolted from the King, as well as those who had aided him in the war. At the end of the one stood Athens, at the head of the other Lacedaemon, one the first naval, the other the first military power in Hellas. For a short time the league held together, till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thenians quarrelled and made war upon each other with their allies, a duel into which all the Hellenes sooner or later were drawn, though some might at first remain neutral. So that the whole period from the Median war to this, with some peaceful intervals, was spent by each power in war, either with its rival, or with its own revolted allies, and consequently afforded them constant practice in military matters, and that experience which is learnt in the school of danger.

希腊其他地方实行僭主政治比雅典长得多，但是，除了西西里的僭主之外，雅典和其他地方的僭主最终都被斯巴达彻底废黜了。斯巴达这座城市虽然在其目前的居民多里亚人定居下来之后，遭受了空前长的一段派别纷争期，但它很早就有良好的律法，而且从来不曾实行

过僭主政治。从上次战争结束时算起，它的政体四百多年来都不曾有过变化，所以它一直具备干预其他城邦事务的能力。僭主们被废黜后没多少年，波斯人与雅典人之间就开始了马拉松战役。十年后，蛮族人又带着舰队来征服希腊了。大难当头之际，斯巴达人凭借超群的实力担当起了希腊联军的指挥重任。雅典人则决心放弃他们的城市，他们毁掉家园，登上舰船，成了海上民族。将蛮族人击退后不久，这一联盟分裂成了两个集团，其中既有背离波斯国王的人，也有在战争中曾协助他的人。希腊这两大集团，一个以雅典为首，一个唯斯巴达是瞻；一个在海上称雄，一个在陆上为霸。战时同盟短暂地存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就起了争执，各自率领盟邦相互开战。起初，有些城邦可能还保持中立，但所有希腊人或迟或早都卷入了这场争斗。所以，从波斯战争结束到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其间虽有几段短暂的和平，但就整体情况而言，这两大势力一直在打仗，不是与对手打，就是与叛离自己的盟邦打。因此，他们在军事方面不断得到锻炼，同时也在实战的课堂上获得了经验。

The policy of Lacedaemon was not to exact tribute from her allies, but merely to secure their subservience to her interests by establishing oligarchies among them; Athens, on the contrary, had by degrees deprived hers of their ships, and imposed instead contributions in money on all except Chios and Lesbos. Both found their resources for this war separately to exceed the sum of their strength when the alliance flourished intact.

对于盟邦，斯巴达采取的办法不是要它们纳贡，而是在它们之中建立寡头政治，以确保它们服从它的利益。雅典则相反，它逐渐不再要求盟邦提供船只，而是要求除了希俄斯和莱斯沃斯以外全都缴纳贡金。双方后来都发现，他们各自用于这场战争的资源，竟然超过了同盟处于全盛时期军力的总和。

Having now given the result of my inquiries into early times, I grant that there will be a difficulty in believing every particular detail. The way that most men deal with traditions, even traditions of their own country, is to receive them all alike as they are delivered, without applying any critical test whatever. The general Athenian public fancy that Hipparchus was tyrant when he fell by the hands of Harmodius and Aristogiton, not knowing that Hippias, the eldest of the sons of Pisistratus, was really supreme, and that Hipparchus and Thessalus were his brothers; and that Harmodius and Aristogiton suspecting, on the very day, nay at the very moment fixed on for the deed, that information had been conveyed to Hippias by their accomplices, concluded that he had been warned, and did not attack him, yet, not liking to be apprehended and risk their lives for nothing, fell upon Hipparchus near the temple of the daughters of Leos, and slew him as he was arranging the Panathenaic procession.

尽管我已给出我对早期历史的探究结论，可我还是认为很难相信每一个具体细节。大多数人对历史传说都是照单全收，而不是用批判的眼光去检验，甚至对本国的历史传说也是如此。雅典的一般公众都以为，喜帕恰斯被哈尔莫季乌斯和阿里斯托伊通所刺时是僭主，孰不知真正大权在握的是皮西斯特拉图斯的儿子们当中最年长的希庇亚斯，喜帕恰斯和塞萨卢斯不过是他的弟弟。他们以为，哈尔莫季乌斯和阿里斯托伊通在举事的当天，就在预定动手的那一刻，曾怀疑自己的同伙已将消息透露给了希庇亚斯，断定他已经得到警告，所以就没动手，但又不甘心赌上了性命却毫无作为便被捕，当天恰逢喜帕恰斯在莱奥斯之女的神庙附近，所以就在他安排泛雅典娜节日游行时杀死了他。

There are many other unfounded ideas current among the rest

of the Hellenes, even on matters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which have not been obscured by time. For instance, there is the notion that the Lacedaemonian kings have two votes each, the fact being that they have only one; and that there is a company of Pitane, there being simply no such thing. So little pains do the vulgar take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ruth, accepting readily the first story that comes to hand. On the whole, however, the conclusions I have drawn from the proofs quoted may, I believe, safely be relied on. Assuredly they will not be disturbed either by the lays of a poet displaying the exaggeration of his craft, or by the compositions of the chroniclers that are attractive at truth's expense; the subjects they treat of being out of the reach of evidence, and time having robbed most of them of historical value by enthroning them in the region of legend. Turning from these, we can rest satisfied with having proceeded upon the clearest data, and having arrived at conclusions as exact as can be expected in matters of such antiquity. To come to this war: despite the known disposition of the actors in a struggle to overrate its importance, and when it is over to return to their admiration of earlier events, yet an examination of the facts will show that it was much greater than the wars which preceded it.

在其他希腊人中，当前同样存在着许多其他毫无根据的猜想，甚至在当代一些历史问题上也是如此，尽管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记忆尚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模糊。例如，有人认为，斯巴达的国王每人拥有两票表决权，事实上只有一票。还有人认为，曾有一支名叫“皮塔内”的军队，其实根本子虚乌有。可是，一般人很少想方设法去探究真相，总是听到什么就相信什么。不过，我认为，我根据以上引证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可信的。可以肯定，这些结论既不会因为诗人的叙述被推翻，也不会因为编年史家的著述而降低信度，因为前者往往使用夸张的手法，后者常常为了增加吸引力而牺牲真相。他们讲述的内容一般经不起证据的检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大部分会因为被奉

为传奇而失去历史价值。此外，依据最明确的资料进行过研究，并且在这么久远的问题上得出了尽可能准确的结论，我们大可对这一结果感到满意。关于这场战争，纵然我们知道战争的参加者往往夸大其词，但是当战争已然结束，人们回过头去品赏往日的战事时，只要看一看事实本身，自会看出它较此前那些战争伟大得多。

With reference to the speeches in this history, some were delivered before the war began, others while it was going on; some I heard myself, others I got from various quarters; it was in all cases difficult to carry them word for word in one's memory, so my habit has been to make the speakers say what was in my opinion demanded of them by the various occasions, of course adhering as closely as possible to the general sense of what they really said. A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narrative of events, far from permitting myself to derive it from the first source that came to hand, I did not even trust my own impressions, but it rests partly on what I saw myself, partly on what others saw for me, the accuracy of the report being always tried by the most severe and detailed tests possible. My conclusions have cost me some labour from the want of coincidence between accounts of the same occurrences by different eye-witnesses, arising sometimes from imperfect memory, sometimes from undue partiality for one side or the other. The absence of romance in my history will, I fear, detract somewhat from its interest; but if it be judged useful by those inquirers who desire an exact knowledge of the past as an aid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uture, which in the course of human things must resemble if it does not reflect it, I shall be content. In fine, I have written my work, not as an essay which is to win the applause of the moment, but as a possession for all time.

至于这部史书中所援用的一些演讲，有些是在战争开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发表的；有些我曾亲耳聆听，有些则是通过各种来源获知的。无论源于何处，要想把它们逐字逐句记载下来都很困难，所以我的处理方法是，让讲演者说出我认为的不同场合要求他们说的话，当然，大体上还得尽可能贴近他们实际所言。关于战事的叙述，我则绝不允许自己初闻一件事就写下来，我甚至不相信自己的印象，而应该部分基于个人亲眼所见，部分基于据其他亲历者对我的讲述，还要尽可能最为严格地仔细核实内容准确与否。有时因为记忆不全，有时因为不适当地偏袒一方或另一方，不同目击者对相同事件的叙述未必吻合，因此，这些结论的得出实非易事。由于缺乏浪漫色彩，这本史书读起来恐怕不够引人入胜。不过，在人间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未来即便不是历史的映像，也会与之相似。倘若希望透过准确了解过去而预知未来的研究者认为本书尚有助益，我心足矣。总之，我修本著，并非希冀它成为赢得时人喝彩的美文，而是望其成为永垂史册的财富。

The Median War,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of past times, yet found a speedy decision in two actions by sea and two by l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was prolonged to an immense length, and, long as it was, it was short without parallel for the misfortunes that it brought upon Hellas. Never had so many cities been taken and laid desolate, here by the barbarians, here by the parties contending (the old inhabitants being sometimes removed to make room for others); never was there so much banishing and blood-shedding, now on the field of battle, now in the strife of faction. Old stories of occurrences handed down by tradition, but scantily confirmed by experience, suddenly ceased to be incredible; there were earthquakes of unparalleled extent and violence; eclipses of the sun occurred with a frequency unrecorded in previous history; there were great droughts in sundry places and consequent famines, and that most calamitous and awfully fatal visitation, the plague. All

this came upon them with the late war, which was begun by the Athenians and Peloponnesians by the dissolution of the thirty years' truce made after the conquest of Euboea. To the question why they broke the treaty, I answer by placing first an account of their grounds of complaint and points of difference that no one may ever have to ask the immediate cause which plunged the Hellenes into a war of such magnitude. The real cause I consider to be the one which was formally most kept out of sight. The growth of the power of Athens, and the alarm which this inspired in Lacedaemon made war inevitable. Still it is well to give the grounds alleged by either side which led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treaty and the breaking out of the war.

波斯战争虽是以往最伟大的壮举，但经过两次海上战役和两次陆上战役，那场战争的胜负便迅速见了分晓。相比之下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的时间则很长，不过，长则长矣，它给希腊带来痛苦的速度却空前迅速。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令这么多城市被攻陷，被撂荒，有的是蛮族人所为，有的是战争双方所致（原有居民有时只好迁走，为他人让地方）；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被驱逐，被杀戮，有的是在战场上，有的则是在派系争斗中。过去流传下来的一些古老的传说，以前甚少为经验所证实，而今却突然不再那么难以置信了。地震的烈度和强度前所未有，日食出现的频度史无前例，各地均出现大旱，饥荒随之而至，而最具灾难性和致命性的灾祸则是瘟疫。所有这些全都随着最近这场战争的爆发一起降临到了希腊人头上。攻克埃维亚岛之后订立的三十年休战和约一经撕毁，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这场战争就开始了。要想回答他们为何撕毁和约这一问题，我想，首先得理清双方不满的缘由和分歧，这样，大家就不必询问使希腊陷入这么大一场战争的直接原因了。在我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起因，几乎被表面上的言辞掩而不见。雅典势力的壮大和因之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其实才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尽管如此，我们不妨还是探讨一下战争双方认为的导致和约破裂以及战争爆发的原因。

CHAPTER II Causes of the War—The Affair of Epidamnus—The Affair of Potidaea

第二章　战争的起因——埃庇丹努斯事件——波提狄亚事件

The city of Epidamnus stands on the right of the entrance of the Ionic Gulf. Its vicinity is inhabited by the Taulantians, an Illyrian people. The place is a colony from Corcyra, founded by Phalius, son of Eratocleides, of the family of the Heraclids, who had according to ancient usage been summoned for the purpose from Corinth, the mother country. The colonists were joined by some Corinthians, and others of the Dorian race. Now, as time went on, the city of Epidamnus became great and populous; but falling a prey to factions arising, it is said, from a war with her neighbours the barbarians, she became much enfeebled, and lost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her power. The last act before the war was the expulsion of the nobles by the people. The exiled party joined the barbarians, and proceeded to plunder those in the city by sea and land; and the Epidamnians, finding themselves hard pressed, sent ambassadors to Corcyra beseeching their mother country not to allow them to perish, but to make up matters between them and the exiles, and to rid them of the war with the barbarians. The ambassadors seated themselves in the temple of Hera as suppliants, and made the above requests to the Corcyraeans. But the Corcyraeans refused to accept their supplication, and they were dismissed without having effected anything.

埃庇丹努斯城位于爱奥尼亚湾入口的右侧，附近居住的是伊利里亚族的塔夫兰蒂亚人。这个地方是克基拉的殖民地，建立者是埃拉托克利泽斯之子法利乌斯，属于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后裔一族。依照固

有惯例，这位建立者是从母邦科林斯请来的。这一殖民地的居民中有些是科林斯人，还有一些是多里安族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埃庇丹努斯城的势力日益强大，人口也逐渐增多。但是，据说是由于与毗邻的蛮族人发生战争之故，埃庇丹努斯城派系林立，结果实力大衰，势力锐减。这场战争开始前上演的最后一幕是，平民派驱逐了贵族党。被逐出的一党投奔了蛮族人，进而从水陆两路对城里的居民大行抢劫之道。埃庇丹努斯人不堪所迫，只好派遣使者前往克基拉，恳请母邦不要坐视他们灭亡，一定要帮他们与流亡者达成和解协定，从而结束他们与蛮族人之间的战争。使者们作为祈祷者坐进赫拉神庙，向克基拉人提出了上述请求。但是，克基拉人拒不接受他们的请求，将他们打发走了。

When the Epidamnians found that no help could be expected from Corcyra, they were in a strait what to do next. So they sent to Delphi and inquired of the God whether they should deliver their city to the Corinthians and endeavour to obtain some assistance from their founders. The answer he gave them was to deliver the city and place themselves under Corinthian protection. So the Epidamnians went to Corinth and delivered over the colony in obedience to the commands of the oracle. They showed that their founder came from Corinth, and revealed the answer of the god; and they begged them not to allow them to perish, but to assist them. This, the Corinthians consented to do. Believing the colony to belong as much to themselves as to the Corcyraeans, they felt it to be a kind of duty to undertake their protection. Besides, they hated the Corcyraeans for their contempt of the mother country. Instead of meeting with the usual honours accorded to the parent city by every other colony at public assemblies, such as precedence at sacrifices, Corinth found herself treated with contempt by a power which in point of wealth could stand comparison with any even of the richest communities in Hellas, which possessed great military

strength, and which sometimes could not repress a pride in the high naval position of an island whose nautical renown dated from the days of its old inhabitants, the Phaeacians. This was one reason of the care that they lavished on their fleet, which became very efficient; indeed, they began the war with a force of a hundred and twenty galleys.

当埃庇丹努斯人发现无法指望从克基拉获得帮助时，他们感到前路迷茫，不知所措。于是，他们便派人到德尔斐去问神，想知道是否该把城交给科林斯人，争取从他们这座城的建立者那里获得一些帮助。神给予他们的回答是：把城交出去，接受科林斯人的保护。因此，埃庇丹努斯人便前往科林斯，遵照神谕将这个殖民地交给了科林斯人。他们表示，既然科林斯人是他们那座城的建立者，神的答复又如此这般，他们恳请对方伸出援手，不要听任他们遭受灭顶之灾。科林斯人答应了这一请求。他们认为，这个殖民地虽然属于克基拉人，但同样属于他们，因而觉得有责任向埃庇丹努斯人提供保护。此外，他们也很反感克基拉人，因为他们对母邦态度轻慢。在公共集会场合，其他殖民地对母邦都很尊重，如献祭时按身份持礼。但从克基拉那里，科林斯非但没有感受到惯有的礼仪，反而被待之以轻慢，克基拉当时在财富上堪与希腊任何一个最富有的城邦相提并论，在军事上也实力非凡，有时甚至掩饰不住海岛之邦对于作为岛屿海上优势明显那份自豪，声称自己的海上声望由来已久，可追溯至岛上古老的居民费阿刻斯人。这也是他们大力发展海军的一个原因，而且颇有成效。他们投入这场战争时，实际上已拥有一支配有120艘三列桨战舰的海军力量。

All these grievances made Corinth eager to send the promised aid to Epidamnus. Advertisement was made for volunteer settlers, and a force of Ambraciots, Leucadians, and Corinthians was dispatched. They marched by land to Apollonia, a Corinthian

colony, the route by sea being avoided from fear of Corcyraean interruption. When the Corcyraeans heard of the arrival of the settlers and troops in Epidamnus, and the surrender of the colony to Corinth, they took fire. Instantly putting to sea with five-and-twenty ships, which were quickly followed by others, they insolently commanded the Epidamnians to receive back the banished nobles—(it must be premised that the Epidamnian exiles had come to Corcyra and, pointing to the sepulchres of their ancestors, had appealed to their kindred to restore them)—and to dismiss the Corinthian garrison and settlers. But to all this, the Epidamnians turned a deaf ear. Upon this, the Corcyraeans commenced operations against them with a fleet of forty sail. They took with them the exiles, with a view to their restoration, and also secured the services of the Illyrians. Sitting down before the city, they issued a proclam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any of the natives that chose, and the foreigners, might depart unharmed, with the alternative of being treated as enemies. On their refusal, the Corcyraeans proceeded to besiege the city, which stands on an isthmus; and the Corinthians, receiving intelligence of the investment of Epidamnus, got together an armament and proclaimed a colony to Epidamnus, perfect political equality being guaranteed to all who chose to go. Any who were not prepared to sail at once might, by paying down the sum of fifty Corinthian drachmae, have a share in the colony without leaving Corinth. Great numbers took advantage of this proclamation, some being ready to start directly, others paying the requisite forfeit. In case of their passage being disputed by the Corcyraeans, several cities were asked to lend them a convoy. Megara prepared to accompany them with eight ships, Pale in Cephallonia with four; Epidaurus furnished five, Hermione one, Troezen two, Leucas ten, and Ambracia eight. The Thebans and Phliasians were asked for money, the Eleans for hulls as well; while Corinth herself furnished thirty ships and three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所有这些怨恨都促使科林斯急欲向埃庇丹努斯派遣它所承诺的援军。它不仅招募了志愿移民，而且派出了一支由安布拉基亚人、莱夫卡斯人和科林斯人组成的部队。他们避开水路，从陆路向科林斯的殖民地阿波罗尼亚进发，以免遭到克基拉人的阻扰。听到这些移民和部队抵达埃庇丹努斯和这个殖民地已交给科林斯的消息，克基拉人大为恼火。他们立即派遣25艘战舰启航出海，其他舰只旋即也紧随而至。他们蛮横地命令埃庇丹努斯人重新接纳被放逐的贵族（前提是埃庇丹努斯的流亡者早已前往克基拉，并指着他们祖先的坟墓，要求他们看在宗亲的份上帮他们恢复原有地位），打发走科林斯的驻军和移民。但是，埃庇丹努斯人却对他们所有的要求置之不理。于是，克基拉人用一支40艘舰只的舰队对其发起进攻。他们带上了那些流亡者，目的是帮助他们恢复原有地位。另外，他们还争取到了伊利里亚人出兵相助。一攻到城前，他们随即宣布，凡自愿离城者，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邦人，他们均不加伤害；另作他选者，将以敌人待之。他们提出的要求一遭到拒绝，克基拉人就对坐落在地峡之上的这座城市展开了围攻。科林斯人得到埃庇丹努斯被围的消息后，先召集了一支军队，然后宣布要到埃庇丹努斯建立一个殖民地，凡选择前往者将享有完全的政治平等。不准备马上登船前往者，缴纳50科林斯德拉克马，亦可不离开科林斯而在新殖民地享有一份权利。对于这一宣告，响应者甚众。有些人准备马上登程，有些人打算缴纳要求的款项。为了防止克基拉人中途阻难，他们要求几所城市出舰护航。迈加拉准备派8艘舰一路护送，凯法洛尼亚的帕莱准备派4艘，埃皮达鲁斯提供了5艘，海尔苗内1艘，特里曾2艘，莱夫卡斯10艘，安布拉基亚8艘。他们还要求底比斯人和弗利奥斯人提供资金，并要求埃利斯人提供舰身。科林斯人自己准备了30艘舰只和3,000名重步兵。

When the Corcyraeans heard of their preparations, they came to Corinth with envoys from Lacedaemon and Sicyon, whom they

persuaded to accompany them, and bade her recall the garrison and settlers, as sh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Epidamnus. If, however, she had any claims to make, they were willing to submit the matter to the arbitration of such of the cities in Peloponnese as should be chosen by mutual agreement, and that the colony should remain with the city to whom the arbitrators might assign it. They were also willing to refer the matter to the oracle at Delphi. If, in defiance of their protestations, war was appealed to, they should be themselves compelled by this violence to seek friends in quarters where they had no desire to seek them, and to make even old ties give way to the necessity of assistance. The answer they got from Corinth was that, if they would withdraw their fleet and the barbarians from Epidamnus, negotiation might be possible; but, while the town was still being besieged, going before arbitrators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The Corcyraeans retorted that if Corinth would withdraw her troops from Epidamnus they would withdraw theirs, or they were ready to let both parties remain in statu quo, an armistice being concluded till judgment could be given.

获悉他们这些准备活动后，克基拉人来到科林斯，并说服了斯巴达和西锡安也派特使与他们同来。他们要求科林斯召回它的驻军和移民，理由是科林斯与埃庇丹努斯毫无关系。不过，倘若科林斯提出要求，他们愿将此事交由伯罗奔尼撒诸城邦仲裁。参与仲裁的城邦可通过相互协商选定，仲裁者裁定这个殖民地归谁就归谁。他们同样愿意就此事到德尔斐去问神。如果科林斯无视他们的主张而诉诸战争，他们为这种暴力所迫，将会到他们本不想去的地方寻找盟友，甚至会为了获得援助之需而割舍旧盟。科林斯人对他们的答复是这样：如果他们将自己的舰队和蛮族人的军队撤出埃庇丹努斯，或许还有谈判的可能。但是，在埃庇丹努斯城依然被围的情况下，提交仲裁一事根本无从谈起。克基拉人反驳说，如果科林斯从埃庇丹努斯撤出军队，他们也撤走自己的军队；否则，他们准备签订一个休战协定，让双方保持

现状，直至作出裁决为止。

Turning a deaf ear to all these proposals, when their ships were manned and their allies had come in, the Corinthians sent a herald before them to declare war and, getting under way with seventy-five ships and two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sailed for Epidamnus to give battle to the Corcyraeans. The fleet was under the command of Aristeus, son of Pellichas, Callicrates, son of Callias, and Timanor, son of Timanthes; the troops under that of Archetimus, son of Eurytimus, and Isarchidas, son of Isarchus. When they had reached Actium in the territory of Anactorium, at the mouth of the mouth of the Gulf of Ambracia, where the temple of Apollo stands, the Corcyraeans sent on a herald in a light boat to warn them not to sail against them. Meanwhile, they proceeded to man their ships, all of which had been equipped for action, the old vessels being undergirded to make them seaworthy. On the return of the herald without any peaceful answer from the Corinthians, their ships being now manned, they put out to sea to meet the enemy with a fleet of eighty sail (forty were engaged in the siege of Epidamnus), formed line, and went into action, and gained a decisive victory, and destroyed fifteen of the Corinthian vessels. The same day had seen Epidamnus compelled by its besiegers to capitulate; the conditions being that the foreigners should be sold, and the Corinthians kept as prisoners of war, till their fate should be otherwise decided.

科林斯人对所有这些提议全都置若罔闻。当舰员配齐，各路盟友也赶到之后，他们先派一名传令官前去宣战，随后便带着75艘战舰和2,000名重步兵驶往埃庇丹努斯，准备向克基拉人开战。舰队由佩利哈斯的儿子阿里斯泰夫斯、卡利亚斯的儿子卡利克拉特和蒂曼塞斯的儿子蒂马诺尔指挥。步兵由埃夫里蒂穆斯的儿子阿尔海蒂穆斯和伊萨

尔胡斯的儿子伊萨尔希扎斯指挥。他们到达阿纳克托里乌姆境内的亚克兴（阿波罗神庙所在地，位于安布拉基亚湾的入口处）时，克基拉人派了一名传令官乘轻舟前去，劝他们不要发动进攻。同时，克基拉人继续配备舰员。他们的战舰已全部装备完毕，做好了战斗准备。为了使旧舰适于航海，他们还对底部进行了加固。传令官一回来，他们就知道科林斯人没有给予和平的答复。这时候，舰员已经配齐，他们便派出一支80艘舰的舰队（另有40艘在围攻埃庇丹努斯）出海迎敌。这些战舰排成横队，随即投入了战斗，结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摧毁了科林斯人15艘舰只。同日，埃庇丹努斯在围攻下被迫投降，条件是外邦人被卖为奴，科林斯人沦为战俘，等待命运另作安排。

After the engagement the Corcyraeans set up a trophy on Leukimme, a headland of Corcyra, and slew all their captives except the Corinthians, whom they kept as prisoners of war. Defeated at sea, the Corinthians and their allies repaired home, and left the Corcyraeans masters of all the sea about those parts. Sailing to Leucas, a Corinthian colony, they ravaged their territory, and burnt Cyllene, the harbour of the Eleans, because they had furnished ships and money to Corinth. For almost the whole of the period that followed the battle they remained masters of the sea, and the allies of Corinth were harassed by Corcyraean cruisers. At last, Corinth, roused by the sufferings of her allies, sent out ships and troops in the fall of the summer who formed an encampment at Actium and about Chimerium, in Thesprotis, for the protection of Leucas and the rest of the friendly cities. The Corcyraeans on their part formed a similar station on Leukimme. Neither party made any movement, but they remained confronting each other till the end of the summer, and winter was at hand before either of them returned home.

这次交战结束后，克基拉人在克基拉的莱基迈地角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他们杀掉了所有俘虏，仅将科林斯人留作战俘。海战失利后，科林斯人及其盟友返回本邦，克基拉人完全控制了那片海域。他们驶往科林斯的殖民地莱夫卡斯，践踏其领土，还烧毁了埃利斯人的海港基莱内，因为他们曾向科林斯提供战舰和金钱。战斗结束后那段时期，他们在那片海域几乎一直处于霸主地位，科林斯的盟邦不断受到克基拉舰只的袭扰。最后，科林斯终于为盟邦遭受的祸患所激怒，在夏季到来时派出了战舰和部队。这些部队在亚克兴和塞斯普罗替斯境内的希迈里乌姆附近扎下营盘，以保护莱夫卡斯和其他友好城邦。克基拉人也在莱基迈设立了类似驻地。直到夏末，双方都没有采取行动，但一直处于相互对峙状态。冬季即将来临时，双方军队才各自返回本邦。

Corinth, exasperated by the war with the Corcyraeans, spent the whole of the year after the engagement and that succeeding it in building ships, and in straining every nerve to form an efficient fleet; rowers being drawn from Peloponnese and the rest of Hellas by the inducement of large bounties. The Corcyraeans, alarmed at the news of their preparations, being without a single ally in Hellas (for they had not enrolled themselves either in the Athenian or in the Lacedaemonian confederacy), decided to repair to Athens in order to enter into alliance and to endeavour to procure support from her. Corinth also, hearing of their intentions, sent an embassy to Athens to prevent the Corcyraean navy being joined by the Athenian, and her prospect of ordering the war according to her wishes being thus impeded. An assembly was convoked, and the rival advocates appeared, the Corcyraeans spoke as follows:

与克基拉人的战争使科林斯愤怒不已。这次交战之后，它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建造战舰，竭力想打造一支高效率的舰队。桨手都是以

优厚的条件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其他地方招募来的。听到他们备战的消息，克基拉人大为惊恐。由于在希腊没有一个盟邦（因为他们既没有加入雅典同盟，也没有加入斯巴达同盟），他们决定奔赴雅典，投入雅典同盟，力争从雅典那里得到支援。科林斯得知他们的意图后，同样也派了一个使团来到雅典，旨在阻止克基拉的海军与雅典海军联手，以防它按自己所愿解决对克基拉之战的前景就此化为泡影。雅典人为此召开了公民大会，双方代表都到场作了辩护。克基拉人的发言如下：

“Athenians! When a people that have not rendered any important service or support to their neighbours in times past, for which they might claim to be repaid, appear before them as we now appear before you to solicit their assistance, they may fairly be required to satisfy certain preliminary conditions. They should show, first, that it is expedient or at least safe to grant their request; next, that they will retain a lasting sense of the kindness. But if they cannot clearly establish any of these points, they must not be annoyed if they meet with a rebuff. Now the Corcyraeans believe that with their petition for assistance they can also give you a satisfactory answer on these points, and they have therefore dispatched us hither. It has so happened that our policy as regards you with respect to this request, turns out to be inconsistent, and as regards our interests, to be at the present crisis inexpedient. We say inconsistent, because a power which has never in the whole of her past history been willing to ally herself with any of her neighbours, is now found asking them to ally themselves with her. And we say inexpedient, because in our present war with Corinth it has left us in a position of entire isolation, and what once seemed the wise precaution of refusing to involve ourselves in alliances with other powers, lest we should also involve ourselves in risks of their choosing, has now proved to be folly and weakness. It is true that in

the late naval engagement we drove back the Corinthians from our shores single-handed. But they have now got together a still larger armament from Peloponnese and the rest of Hellas; and we, seeing our utter inability to cope with them without foreign aid,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 danger which subjection to them implies, find it necessary to ask help from you and from every other power. And we hope to be excused if we forswear our old principle of complete political isolation, a principle which was not adopted with any sinister intention, but was rather the consequence of an error in judgment."

"雅典人！一个民族，在过去的时日里，如果对邻邦不曾有过重大贡献或尽过援助义务，那么也不曾有理由让它索取回报，若站在邻邦面前请求援助，如同我们现在站在你们面前一样，那么，邻邦要求他们满足某些先决条件是合理的。首先，他们应当表明，答应他们的请求是有利的，或者至少是无害的；其次，他们对这份恩惠将永存感激。但是，如果他们无法清楚地表明这两点，即便遭到拒绝，谅必也不会感到懊恼。现在，克基拉人坚信，提出援助请求时，在这两点上同样能给你们一个满意的回答，所以就派我们到这里来了。不巧的是，我们的政策，从我们向你们提出请求这一点上说，实际上是矛盾的；就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危机而言，对我们自己的利益也是不利的。之所以说是矛盾的，是因为一个过去一直不愿与任何邻邦结盟的城邦，如今却在请求他邦与自己为盟；之所以说是不利的，是因为在目前与科林斯的战争中，这一政策使我们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拒绝与他邦结盟，以免卷入因他邦选择不当造成的危险，过去看来似乎是一种明智而慎重之举，而今却证明是愚蠢与软弱的表现。不错，在最近发生的海战中，我们凭一己之力将科林斯人驱离了我们的海岸。但是，他们现在又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其他地方聚集了更多兵力。我们知道，没有外援，我们根本无力对付他们；而臣服于他们，又是多么危险，因此，我们感到必须向你们求援，向所有其他城邦求援。我们希望，如果我们放弃以往在政治上完全孤立的原则，我们能够得

到你们的谅解。过去我们采取这样一种原则，并非心存恶意，而是判断有误。”

“Now there are many reasons why in the event of your compliance you will congratulate yourselves on this request having been made to you. First, because your assistance will be rendered to a power which, herself inoffensive, is a victim to the injustice of others. Secondly, because all that we most value is at stake in the present contest, and your welcome of u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will be a proof of goodwill which will ever keep alive the gratitude you will lay up in our hearts. Thirdly, yourselves excepted, we are the greatest naval power in Hellas. Moreover, can you conceive a stroke of good fortune more rare in itself, or more disheartening to your enemies, than that the power whose adhesion you would have valued above much material and moral strength should present herself self-invited, should deliver herself into your hands without danger and without expense, and should lastly put you in the way of gaining a high character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the gratitude of those whom you shall assist, and a great accession of strength for yourselves? You may search all history without finding many instances of a people gaining all these advantages at once, or many instances of a power that comes in quest of assistance being in a position to give to the people whose alliance she solicits as much safety and honour as she will receive. But it will be urged that it is only in the case of a war that we shall be found useful. To this we answer that if any of you imagine that that war is far off, he is grievously mistaken, and is blind to the fact that Lacedaemon regards you with jealousy and desires war, and that Corinth is powerful there—the same, remember, that is your enemy, and is even now trying to subdue us as a preliminary to attacking you. And this she does to prevent our becoming united by a common

enmity, and her having us both on her hands, and also to ensure getting the start of you in one of two ways, either by crippling our power or by making its strength her own. Now it is our policy to be beforehand with her—that is, for Corcyra to make an offer of alliance and for you to accept it; in fact, we ought to form plans against her instead of waiting to defeat the plans she forms against us.”

“如果你们答应我们提出的这一请求，从许多方面来说，对你们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首先，你们施以援手的，不是一个危及他方的城邦，而是一个遭受他方不义之举的城邦。其次，在目前这场较量中，我们最珍视的一切全都危若累卵。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若欢迎我们入盟，将证明你们确有善意。对此，我们将不胜感激，永远铭记在心。再者，除了你们之外，我们是希腊最强大的海上之邦。此外，出于慷慨好义，你们原本就很重视我们这个城邦是否加盟，此番我们主动前来，毫无危险、无需破费地将自己交到你们手中，最后还让你们在世人眼中赢得高尚之名，在你们的受援者那里赢得感激之情，同时又能让你们的势力大增，诸位还能想出比这更难能可贵而又令敌人沮丧的幸事吗？一举同时获得所有这些好处，翻遍历史，可能也找不到多少这样的先例。同样少有的是，一个前来求援的城邦，可以承诺为被请求国盟友提供和其同等水平的安全和荣誉。然而，可能有人会说，只有在战争条件下，我们才对你们有益。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假如诸位当中有谁以为战争还很遥远，他就大错特错了。他没有看到，斯巴达对你们怀有戒备之心，一心想发动战争；他没有看到，科林斯在那里很有势力——同样应当记住的是，它是你们的敌人。甚至于此刻，它都在试图先制服我们，再进攻你们。它这样做，一是为了防止咱们双方联合起来，同仇敌忾，同时与它为敌；二是为了确保在你们动手之前抢得先机。其方法不外乎这么两种：一是削弱我们的势力；二是通过吞并我们来增强它自身的势力。我们目前对付它的政策是先发制人——从克基拉的角度说，即是要求加入你们的同盟；对你们而言，则是接受我们入盟。实际上，我们应当积极拟定对

抗它的方案，而不是消极等待它谋划好如何对付我们时再去挫败它。”

“If she asserts that for you to receive a colony of hers into alliance is not right, let her know that every colony that is well treated honours its parent state, but becomes estranged from it by injustice. For colonists are not sent forth 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are to be the slaves of those that remain behind, but that they are to be their equals. And that Corinth was injuring us is clear. Invited to refer the dispute about Epidamnus to arbitration, they chose to prosecute their complaints by war rather than by a fair trial. And let their conduct towards us who are their kindred be a warning to you not to be misled by their deceit, nor to yield to their direct requests; concessions to adversaries only end in self-reproach, and the more strictly they are avoided the greater will be the chance of security.”

“如果科林斯认为你们接受它的殖民地入盟有欠妥当，那么，请你们告诉它，如果以良善待之，每个殖民地都会尊重它的母邦；但若待之不公，它就会与母邦疏离。因为外派出去的移民，不是要当留在母邦者的奴隶，而是要做与他们平等的人。科林斯在伤害我们这一点是很明显的。我们请求他们将有关埃庇丹努斯的争端提交仲裁，他们却执意要通过战争而不是公平的仲裁来实现他们的要求。我们与他们同族，他们对我们尚且如此。务请你们以此为鉴，不要被他们的诡计所惑，也不要答应他们的直言相求。向对手让步，到头来只能以自责自怨而告终；越是不让他们得逞，安全的机率才越大。”

“If it be urged that your reception of us will be a breach of the treaty existing between you and Lacedaemon, the answer is that we

are a neutral state, and that one of the express provisions of that treaty is that it shall be competent for any Hellenic state that is neutral to join whichever side it pleases. And it is intolerable for Corinth to be allowed to obtain men for her navy not only from her allies, but also from the rest of Hellas, no small number being furnished by your own subjects; while we are to be excluded both from the alliance left open to us by treaty, and from any assistance that we might get from other quarters, and you are to be accused of political immorality if you comply with our request. On the other hand, we shall have much greater cause to complain of you, if you do not comply with it; if we, who are in peril and are no enemies of yours, meet with a repulse at your hands, while Corinth, who is the aggressor and your enemy, not only meets with no hindrance from you, but is even allowed to draw material for war from your dependencies. This ought not to be, but you should either forbid her enlisting men in your dominions, or you should lend us too what help you may think advisable."

"如果有人说，你们若接受我们入盟，就会破坏你们与斯巴达之间已有的和约。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是中立之邦，而且那份和约中有明文规定，希腊任何一个中立城邦都有权加入它认为合适的一方。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科林斯不仅可以从它的盟邦，而且可以从希腊其他地方为它的海军招募水兵，你们的臣民也不在少数；而我们却遭到排斥，既不能加入和约容许我们加入的同盟，也不能从其他地方获取援助。你们若同意我们的请求，还有可能被冠以有失政治道德之名。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的请求，如果我们在你们这里遭到拒绝，而科林斯却不仅在你们这里不受阻扰，甚至还可以从你们的属地获取战争资源，我们则更有理由抱怨你们，因为毕竟我们深陷险境，而且不是你们的敌人；科林斯则既是侵略者，又是你们的敌人。这是不应该的。你们应当要么禁止科林斯在你们的领土招募兵员，要么同样给予我们你们认为适当的帮助。"

“But your real policy is to afford us avowed countenance and support. The advantages of this course, as we premised in the beginning of our speech, are many. We mention one that is perhaps the chief. Could there be a clearer guarantee of our good faith than is offered by the fact that the power which is at enmity with you is also at enmity with us, and that that power is fully able to punish defection? And there is a wide difference between declining the alliance of an inland and of a maritime power. For your first endeavour should be to prevent, if possible, the existence of any naval power except your own; failing this, to secure the friendship of the strongest that does exist. And if any of you believe that what we urge is expedient, but fear to act upon this belief, lest it should lead to a breach of the treaty, you must remember that on the one hand, whatever your fears, your strength will be formidable to your antagonists; on the other, whatever the confidence you derive from refusing to receive us, your weakness will have no terrors for a strong enemy. You must also remember that your decision is for Athens no less than Corcyra, and that you are not making the best provision for her interests, if at a time when you are anxiously scanning the horizon that you may be in readiness for the breaking out of the war which is all but upon you, you hesitate to attach to your side a place whose adhesion or estrangement is alike pregnant with the most vital consequences. For it lies conveniently for the coast-naviga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Italy and Sicily, being able to bar the passage of naval reinforcements from thence to Peloponnese, and from Peloponnese thither; and it is in other respects a most desirable station. To sum up as shortly as possible, embracing both general and particular considerations, let this show you the folly of sacrificing us. Remember that there are but three considerable naval powers in Hellas—Athens, Corcyra, and Corinth—and that if you allow two of these three to become one, and

Corinth to secure us for herself, you will have to hold the sea against the united fleets of Corcyra and Peloponnese. But if you receive us, you will have our ships to reinforce you in the struggle.”

“不过，对你们来说，比较实际的政策是公开对我们表示赞同和支持。这种做法益处良多，这一点我们在演讲伊始时已经提及。这里仅提一点，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与你们为敌的那个城邦同样在与我们为敌，而且它完全有能力加害于叛离者。难道还有比这一点更能清楚地证明我们完全值得信赖吗？此外，拒绝一个内陆强邦入盟，与拒绝一个海上强邦入盟有云泥之差。其中原因在于，对你们来说，头等大事是，如果可能的话，阻止其他海上势力存在。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得和现有的最强海上之邦保持友好关系。如果诸位当中有谁认为，虽然我们所言并无不当，但又不敢照此办理，唯恐这样做会违背和约，那就必须牢记：一方面，无论你们有何担忧，你们的实力都会让对手望而生畏；另一方面，不管你们从拒绝接纳我们当中获得何等信心，你们的弱点都不会使强敌有所畏惧。还有一点必须牢记，你们的决定对雅典的影响，并不亚于对克基拉的影响。如果你们在焦急地瞭望着地平线，准备应付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之时，却仍在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把一个无论同意还是不同意它入盟都会左右战局的地区拉到自己一边，说明你们没有为捍卫自己利益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通往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沿岸航线中，克基拉地处有利位置，可以阻挡从那里前往伯罗奔尼撒或者从伯罗奔尼撒前往那里的海上增援部队。在其他方面，它同样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军事要地。最简洁地概括而言，无论从全局还是从局部考虑，放弃我们都不是明智之举。请不要忘记，希腊的海上强邦只有三个——雅典、克基拉和科林斯。如果你们听任其中两个成为一体，让科林斯为了自己把我们控制住，你们就得与克基拉和伯罗奔尼撒的联合舰队争夺制海权。但是，如果你们接纳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就会得到我们战舰的增援。”

Such were the words of the Corcyraeans.After they had

finished, the Corinthians spoke as follows:

这是克基拉人的发言。他们发言结束后，科林斯人发言如下：

“These Corcyraeans in the speech we have just heard do not confine themselves to the question of their reception into your alliance. They also talk of our being guilty of injustice, and their being the victims of an unjustifiable war. It becomes necessary for us to touch upon both these points before we proceed to the rest of what we have to say, that you may have a more correct idea of the grounds of our claim, and have good cause to reject their petition. According to them, their old policy of refusing all offers of alliance was a policy of moderation. It was in fact adopted for bad ends, not for good; indeed, their conduct is such as to make them by no means desirous of having allies present to witness it, or of having the shame of asking their concurrence. Besides, their geographical situation makes them independent of others, and consequently the decision in cases where they injure any lies not with judges appointed by mutual agreement, but with themselves, because, while they seldom make voyages to their neighbours, they are constantly being visited by foreign vessels which are compelled to put in to Corcyra. In short, the object that they propose to themselves, in their specious policy of complete isolation, is not to avoid sharing in the crimes of others, but to secure monopoly of crime to themselves—the licence of outrage wherever they can compel, of fraud wherever they can elude, and the enjoyment of their gains without shame. And yet if they were the honest men they pretend to be, the less hold that others had upon them, the stronger would be the light in which they might have put their honesty by giving and taking what was just.”

“适才我们听到，克基拉人在发言中并没有局限于你们是否接纳他们入盟这个问题。他们还谈到我们有不公之过，谈到他们是非正义战争的受害者。因此，在切入其他不得不谈的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就这两点略说几句，好让大家更确切地了解我们的要求有何依据，并且有合适的理由拒绝他们的请求。他们以往所奉行的那种拒绝所有结盟提议的政策，根据他们的说法，是一种稳健之策。事实上，他们采取这样的政策，则是居心不良，绝无善意。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使他们根本不想让在场的盟邦目睹之，也无颜要求别人相助。此外，他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使得他们能够独立于他人之外。他们很少航行到邻邦，异邦的船只却时常光顾他们，因为这些船不得不进入克基拉港。所以，即便是他们侵害了别人，最后还是由他们来裁决，而不是由经过相互协商指定的法官。总之，在那种似是而非的完全孤立政策中，他们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不是避免参与他人的恶行，而是确保自己能够独自作恶——能以力欺人就肆意胡为，能逃避惩处就随意欺诈，外加不知廉耻地享受不当所得。但是，如果他们真像自己装得那么真诚，别人对他们的控制越少，他们就越能通过适当的互让来表现出自己的真诚。”

“But such has not been their conduct either towards others or towards us. The attitude of our colony towards us has always been one of estrangement and is now one of hostility; for, say they, 'We were not sent out to be ill-treated.' We rejoin that we did not found the colony to be insulted by them, but to be their head and to be regarded with a proper respect. At any rate our other colonies honour us, and we are much beloved by our colonists; and clearly, if the majority are satisfied with us, these can have no good reason for a dissatisfaction in which they stand alone, and we are not acting improperly in making war against them, nor are we making war against them without having received signal provocation. Besides, if we were in the wrong, it would be honourable in them to

give way to our wishes, and disgraceful for us to trample on their moderation; but in the pride and licence of wealth they have sinned again and again against us, and never more deeply than when Epidamnus, our dependency, which they took no steps to claim in its distress upon our coming to relieve it, was by them seized, and is now held by force of arms."

"然而，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其他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不是这样。我们这个殖民地对我们一直采取疏离态度，现在则怀有敌意，因为他们说：'我们不是被派出来受虐待的。'我们却要说，我们建立这个殖民地，不是为了要受他们侮辱，而是为了领导他们，得到他们应有的尊重。不管怎样，我们的其他殖民地都很尊重我们，我们也深受殖民地居民的爱戴。显而易见，如果大多数人对我们表示满意，这些人就没有充分的理由说不满意，因为不满意的唯有他们；我们向他们开战也并无不当，况且要不是受到明显的挑衅，我们不会向他们开战。再说，即便我们错了，他们也应当顾及我们的意愿。如果我们不尊重他们谦和的态度，那我们也不光彩。但是，他们却恃财自傲，屡屡冒犯我们，最严重的莫过于在埃庇丹努斯问题上。当我们这个属地陷入危难时，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向我们提出归属要求就用武力夺取了它，而且至今还占据着这个地方。"

"As to their allegation that they wished the question to be first submitted to arbitration, it is obvious that a challenge coming from the party who is safe in a commanding position cannot gain the credit due only to him who, before appealing to arms, in deeds as well as words, places himself on a level with his adversary. In their case, it was not before they laid siege to the place, but after they at length understood that we should not tamely suffer it, that they thought of the specious word arbitration. And not satisfied with their own misconduct there, they appear here now requiring you to

join with them not in alliance but in crime, and to receive them in spite of their being at enmity with us. But it was when they stood firmest that they should have made overtures to you, and not at a time when we have been wronged and they are in peril; nor yet at a time when you will be admitting to a share in your protection those who never admitted you to a share in their power, and will be incurring an equal amount of blame from us with those in whose offences you had no hand. No, they should have shared their power with you before they asked you to share your fortunes with them."

"他们辩解说，他们希望首先将这件事提交仲裁解决。可是，稳居优势的一方提出的挑战，对手显然是不可能赏光的。只有在付诸武力之前，在口头和行动上都把自己放在与对手同等的地位，他才能赢得信任。他们的情况则是，不是在围攻埃庇丹努斯之前，而是在终于明白我们不会逆来顺受之后，才想起来'仲裁'这个动听的字眼。况且，他们是由于自己在那里的不当行径没有达到满意的效果，如今才出现在这里要求你们与他们联手，不是结为同盟作恶，而是联手作恶，并且要求你们在他们与我们为敌的情况下接纳他们。但是，他们向你们示好，应当是在自己立足最稳的时候，而不是在因为伤害了我们而处境危险的时候，更不应当是在你们若答应参与保护则会引起我们等量怨愤的时候，因为他们虽然从不与你们分享权势，我们却会把你们不曾插手的恶行算在你们头上。不，他们应当先与你们共享他们的权势，再要求你们与他们共命运。"

"So then the reality of the grievances we come to complain of and the violence and rapacity of our opponents have both been proved. But that you cannot equitably receive them, this you have still to learn. It may be true that one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treaty is that it shall be competent for any state, whose name was not down on the list, to join whichever side it pleases. But this

agreement is not meant for those whose object in joining is the injury of other powers, but for those whose need of support does not arise from the fact of defection, and whose adhesion will not bring to the power that is mad enough to receive them war instead of peace; which will be the case with you, if you refuse to listen to us. For you cannot become their auxiliary and remain our friend; if you join in their attack, you must share the punishment which the defenders inflict on them. And yet you have the best possible right to be neutral, or, failing this, you should on the contrary join us against them. Corinth is at least in treaty with you; with Corcyra you were never even in truce. But do not lay down the principle that defection is to be patronized. Did we on the defection of the Samians record our vote against you, when the rest of the Peloponnesian powers were equally divided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y should assist them? No, we told them to their face that every power has a right to punish its own allies. Why, if you make it your policy to receive and assist all offenders, you will find that just as many of your dependencies will come over to us, and the principle that you establish will press less heavily on us than on yourselves.”

“至此，我们已经阐明了我们怨愤对方的理由，阐明了他们的歪曲与贪婪。不过，你们还要知道，你们接纳他们将有欠公平。和约中确实有一条规定，凡是未在和约上署名的城邦，均有权加入它认为合适的一方。但是，和约在此所指的，不是那些以损害他方为目的而加入同盟的城邦，而是那些不是因为背叛而需要支持的城邦，那些不会给不理智地接纳他们的城邦带来战争而不是和平的城邦。如果不听我们的忠言，你们就会遭到这种下场。这是因为你们不可能既成为他们的援军，又仍作我们的盟友。如果你们加入他们进攻的行列，你们就得同样承受我们作为自卫者对他们的惩罚。不过，你们尽可以有权保持中立。如果无法做到，那就应当反过来与我们一道反击他们。科林

斯与你们之间，至少还有条约束缚；你们与克基拉之间，却连休战协定都不曾有过。那就不要开创叛离者可以受到保护这种先例。萨摩斯人叛离你们的时候，伯罗奔尼撒其他城邦在是否应当帮助他们这一问题上同样有分歧时，我们可曾投票反对过你们？没有！我们当面告诉他们，每个城邦都有权惩处自己的盟邦。当然，如果凡有冒犯母邦者你们就接纳和帮助，并将它奉为一项政策，你们将会发现有同样多的属地来投奔我们，而你们确立的原则对我们造成的压力，反而不及对你们自己那么大。”

“This then is what Hellenic law entitles us to demand as a right. But we have also advice to offer and claim on your gratitude, which, since there is no danger of our injuring you, as we are not enemies, and since our friendship does not amount to very frequent intercourse, we say ought to be liquidated at the present juncture. When you were in want of ships of war for the war against the Aeginetans, before the Persian invasion, Corinth supplied you with twenty vessels. That good turn, and the line we took on the Samian question, when we were the cause of the Peloponnesians refusing to assist them, enabled you to conquer Aegina and to punish Samos. And we acted thus at crises when, if ever, men are wont in their efforts against their enemies to forget everything for the sake of victory, regarding him who assists them then as a friend, even if thus far he has been a foe, and him who opposes them then as a foe, even if he has thus far been a friend; indeed, they allow their real interests to suffer from their absorbing preoccupation in the struggle.”

“这是我们根据希腊的法律有权向你们提出的要求。但是，我们还有一言相进，并就此向你们讨个回报。我们想说的是，既然我们不是敌人，我们就没有伤害你们的危险。不过，我们的友谊也没达到来

往密切的程度。因此，在眼下这个关头，我们大可算个明白。波斯人入侵之前，在与埃伊纳人作战时，你们缺少战舰，科林斯提供给了你们20艘。那次友善之举使你们征服了埃伊纳。我们在萨摩斯问题上采取的方针，阻止了伯罗奔尼撒人给予他们援助，又使你们惩罚了萨摩斯。我们如此行事，都是在危机关头，如果有的话，当时人们往往会全力对敌，不顾一切，只想获胜。即便此前是敌人，只要那时帮忙，就认作朋友；即便此前是朋友，只要那时反对他们，就视为敌人。在对敌斗争中专注于当务之急时，自己的真正利益确实会顾及不到。”

“Weigh well these considerations, and let your youth learn what they are from their elders, and let them determine to do unto us as we have done unto you. And let them not acknowledge the justice of what we say, but dispute its wisdom in the contingency of war. Not only is the straightest path generally speaking the wisest; but the coming of the war, which the Corcyraeans have used as a bugbear to persuade you to do wrong, is still uncertain, and it is not worth while to be carried away by it into gaining the instant and declared enmity of Corinth. It was, rather, wise to try and counteract the unfavourable impression which your conduct to Megara has created. For kindness opportunely shown has a greater power of removing old grievances than the facts of the case may warrant. And do not be seduced by the prospect of a great naval alliance. Abstinence from all injustice to other first-rate powers is a greater tower of strength than anything that can be gained by the sacrifice of permanent tranquillity for an apparent temporary advantage. It is now our turn to benefit by the principle that we laid down at Lacedaemon, that every power has a right to punish her own allies. We now claim to receive the same from you, and protest against your rewarding us for benefiting you by our vote by injuring us by yours. On the contrary, return us like for like, remembering that this is that very crisis in which he who lends aid is most a

friend, and he who opposes is most a foe. And for these Corcyraeans—neither receive them into alliance in our despite, nor be their abettors in crime. So do and you will act as we have a right to expect of you, and at the same time best consult your own interests.”

“好好考虑一下这些吧，让你们的青年从长辈那里了解自身是何等样人，让他们决定要不要像我们对待你们一样对待我们。另外，不要让他们觉得，虽然我们所言极是，但战事千变万化，这些话到底明智与否却值得怀疑。一般说来，最可靠之策就是最明智之策。克基拉人一直以战争即将来临为借口，想陷你们于不义。但是，战争到底来临与否，仍然是个未知数，不值得你们因此而失去冷静，立即公开与科林斯为敌。聪明的做法反而是，努力消除你们对迈加拉的所做所为而造成的不利印象。以及时相助来表达善意，比相助本身更能消除旧怨。此外，不要被建立强大的海上同盟这一前景所惑，牺牲永久的安宁换来暂时拥有的表面优势，不如公正地对待其他一流大邦更为安全可靠。在斯巴达的时候，我们确立了一条原则：每个城邦都有权惩处自己的盟邦。如今轮到我们从中受益了。过去你们曾经从我们的投票中受益，现在我们要求你们同样对待我们，不要以投票来伤害我们作为回报。恰恰相反，对我们应当善来善往。请不要忘记，我们正处于那种危急关头。这个时候，伸手相助的是真朋友，反对我们的是死对头。至于这些克基拉人，既不要接纳他们入盟对我们造成伤害，也不要协助他们为非作歹。这样，你们就做了我们有权期望你们做的，同时也最好地照顾到了你们自己的利益。”

Such were the words of the Corinthians.

这是科林斯人的发言。

When the Athenians had heard both out, two assemblies were held. In the first there was a manifest disposition to listen to the representations of Corinth; in the second, public feeling had changed and an alliance with Corcyra was decided on, with certain reservations. It was to be a defensive, not an offensive alliance. It did not involve a breach of the treaty with Peloponnese; Athens could not be required to join Corcyra in any attack upon Corinth. But each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had a right to the other's assistance against invasion, whether of his own territory or that of an ally. For it began now to be felt that the coming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was only a question of time, and no one was willing to see a naval power of such magnitude as Corcyra sacrificed to Corinth; though if they could let them weaken each other by mutual conflict, it would be no bad preparation for the struggle which Athens might one day have to wage with Corinth and the other naval pow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island seemed to lie conveniently on the coasting passage to Italy and Sicily. With these views, Athens received Corcyra into alliance and, on the departure of the Corinthians not long afterwards, sent ten ships to their assistance. They were commanded by Lacedaemonius, the son of Cimon, Diotimus, the son of Strombichus, and Proteas, the son of Epicles. Their instructions were to avoid collision with the Corinthian fleet except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If it sailed to Corcyra and threatened a landing on her coast, or in any of her possessions, they were to do their utmost to prevent it. These instructions were prompted by an anxiety to avoid a breach of the treaty.

雅典人听完双方的陈述后，召开了两次公民大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公众明显倾向于听信科林斯人的陈述。在第二次会议上，公众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们决定与克基拉结盟，但有一定条件。这一同盟

应当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同盟。它不能违背雅典与伯罗奔尼撒签署的和约，即不能要求雅典与克基拉一起进攻科林斯。但是，如果遭到入侵，无论是自己的领土还是盟邦的领土，缔约双方均有权要求对方提供支援。这时，雅典人已开始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来临只是个时间问题。雅典总有一天得与科林斯及其他海上强邦作战。现在如果能让这两方在彼此冲突中相互削弱，对未来的战争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尽管如此，哪个雅典人也不愿看到克基拉这么一个势力强大的海上城邦落入科林斯的手中。再者，在通往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沿海通道中，克基拉岛似乎处于很有利的位置。基于这些考虑，雅典接纳克基拉加入了同盟。科林斯人离去后不久，雅典派了10艘战舰去援助克基拉人。担任指挥的是西门的儿子拉塞泽莫尼乌斯、斯特罗姆维胡斯的儿子迪奥蒂穆斯、埃皮克莱斯的儿子普罗泰亚萨。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要避免与科林斯的舰队发生冲突，特殊情除外。如果科林斯的舰队开到克基拉，意欲在克基拉的海岸或其属地的任何一处登陆，则要全力予以阻止。这些命令的下达，目的在于避免破坏和约。

Meanwhile, the Corinthians completed their preparations, and sailed for Corcyra with a hundred and fifty ships. Of these Elis furnished ten, Megara twelve, Leucas ten, Ambracia twenty-seven, Anactorium one, and Corinth herself ninety. Each of these contingents had its own admiral, the Corinthian being under the command of Xenoclides, son of Euthycles, with four colleagues. Sailing from Leucas, they made land at the part of the continent opposite Corcyra. They anchored in the harbour of Chimerium, in the territory of Thesprotis, above which, at some distance from the sea, lies the city of Ephyre, in the Elean district. By this city the Acherusian lake pours its waters into the sea. It gets its name from the river Acheron, which flows through Thesprotis and falls into the lake. There also the river Thyamis flows, form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sprotis and Kestrine; and between these rivers rises the point of Chimerium. In this part of the continent the Corinthians

now came to anchor, and formed an encampment. When the Corcyraeans saw them coming, they manned a hundred and ten ships, commanded by Meikiades, Aisimides, and Eurybatus, and stationed themselves at one of the Sybota isles; the ten Athenian ships being present. On Point Leukimme they posted their land forces, and a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who had come from Zacynthus to their assistance. Nor were the Corinthians on the mainland without their allies. The barbarians flocked in large numbers to their assistance,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part of the continent being old allies of theirs.

其间，科林斯人也已做好准备，带着150艘战舰驶向了克基拉。在这些战舰中，埃利斯提供了10艘，迈加拉12艘，莱夫卡斯10艘，安布拉基亚27艘，阿纳克托里乌姆1艘，科林斯自己派出了90艘。这些分遣队各有自己的指挥官。科林斯的舰队由埃夫西克莱斯的儿子克赛诺克利泽斯担任指挥，另外还有四名副将。他们从莱夫卡斯启航，在克基拉对面那片大陆靠了岸。他们将战舰停泊在塞斯普罗替斯境内的希迈里乌姆港。港口的那边，在离海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坐落着埃利斯地区的埃菲雷城。阿谢鲁西安湖即从这座城旁注入大海。这个湖因阿谢隆河而得名，后者流经塞斯普罗替斯境内注入阿谢鲁西安湖。那里还有一条西阿米斯河，塞斯普罗替斯与凯斯特雷内即以此河为界。两河之间耸起的是希迈里乌姆角。科林斯人这时就是到大陆上这一带来停泊和扎营的。克基拉人看到他们来了，随即配备了110艘舰，在米基亚泽斯、埃西米泽斯和攸利巴都斯的率领下停泊到了西博塔群岛的一个小岛处，雅典那10艘舰也在那里。他们将自己的陆军部署到莱基迈角，另外还在那里部署了1,000名从扎金索斯来援助他们的重步兵。科林斯人在大陆上也不是孤立无援。大陆上这一带的居民向来与他们为盟，所以很多蛮族人都涌来助战。

When the Corinthian preparations were completed, they took

three days' provisions and put out from Chimerium by night, ready for action. Sailing with the dawn, they sighted the Corcyraean fleet out at sea and coming towards them. When they perceived each other, both sides formed in order of battle. On the Corcyraean right wing lay the Athenian ships, the rest of the line being occupied by their own vessels formed in three squadrons, each of which was commanded by one of the three admirals. Such was the Corcyraean formation. The Corinthian was as follows: on the right wing lay the Megarian and Ambraciot ships, in the centre the rest of the allies in order. But the left was composed of the best sailers in the Corinthian navy, to encounter the Athenians and the right wing of the Corcyraeans. As soon as the signals were raised on either side, they joined battle. Both sides had a large number of heavy infantry on their decks, and a large number of archers and darters, the old imperfect armament still prevailing. The sea-fight was an obstinate one, though not remarkable for its science; indeed, it was more like a battle by land. Whenever they charged each other, the multitude and crush of the vessels made it by no means easy to get loose; besides, their hopes of victory lay principally in the heavy infantry on the decks, who stood and fought in order, the ships remaining stationary. The manoeuvre of breaking the line was not tried; in short, strength and pluck had more share in the fight than science. Everywhere tumult reigned, the battle being one scene of confusion; meanwhile, the Athenian ships, by coming up to the Corcyraeans whenever they were pressed, served to alarm the enemy, though their commanders could not join in the battle from fear of their instructions. The right wing of the Corinthians suffered most. The Corcyraeans routed it, and chased them in disorder to the continent with twenty ships, sailed up to their camp, and burnt the tents which they found empty, and plundered the stuff. So in this quarter the Corinthians and their allies were defeated, and the Corcyraeans were victorious. But where the Corinthians themselves were, on the

left, they gained a decided success; the scanty forces of the Corcyraeans being further weakened by the want of the twenty ships absent on the pursuit. Seeing the Corcyraeans hard pressed, the Athenians began at length to assist them more unequivocally. At first, it is true, they refrained from charging any ships; but when the rout was becoming patent, and the Corinthians were pressing on, the time at last came when every one set to, and all distinction was laid aside, and it came to this point, that the Corinthians and Athenians raised their hands against each other.

科林斯人完成战前准备之后，带上三天的补给，乘着夜色驶出希迈里乌姆，准备采取行动。航行至黎明时，他们发现克基拉的舰队已到海上，正在朝他们驶来。彼此发现对方后，双方都排列成了战斗队形。克基拉一方的右翼是雅典的舰只，其余阵位由他们自己的战舰分三个中队填充。三名指挥官各指挥一个中队。这是克基拉人的阵列情况。科林斯方面是这样部署的：右翼是迈加拉和安布拉基亚的舰只，其他盟邦的舰只依次排在中央。左翼则由科林斯海军中最好的战舰组成，以对抗雅典人和克基拉人的右翼。各自一发出信号，战役便开始打响。双方的甲板上都配有大量重步兵，还有许多弓箭手和标枪手，那种老式而落后的军队模式依然盛行。这场海战在战技上虽然没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打得很顽强。实际上，与其说是海战，不如说是陆战。每逢相互发起冲锋，众多战舰就撞击在一起，要分开都很难。另外，他们获胜的希望主要寄托在甲板上的重步兵身上。这些步兵都是列队站着搏斗，战舰则停着不动。他们都没有运用战术突破敌军的防线。简言之，在这场战斗中，力量和胆量比战技更重要。战场上到处一片嘈杂，混乱不堪。其间，尽管雅典的指挥官由于害怕违抗命令，他们未能加入战团，但每当克基拉人处于下风，雅典的舰只就驶近，前来威胁敌方。科林斯人的右翼损失最为惨重。克基拉人用20艘舰只击溃科林斯的右翼，追得敌人溃不成军地逃向了陆地。接着，他们又驶向敌军营地，将里面的财物洗劫一空，然后放火烧了空空如也的帐篷。因此，在这一翼，科林斯人及其盟友惨遭失败，获胜的是克基拉

人。但是，在他们自己把守的左翼，科林斯人则赢得了决定性胜利。克基拉的部队本来就少，又缺了去追击敌军的那20艘战舰，力量就更弱了。看到克基拉人被逼入困境，雅典人终于比较直接地开始助战了。起初，雅典人的确克制着自己不去冲撞任何一艘舰只。但是，当克基拉人败势已明，科林斯人却还在继续猛攻时，雅典人终于开始抛却顾虑人人投入战斗了。这种情况下，科林斯人和雅典人只有交战了。

After the rout, the Corinthians, instead of employing themselves in lashing fast and hauling after them the hulls of the vessels which they had disabled,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men, whom they butchered as they sailed through, not caring so much to make prisoners. Some even of their own friends were slain by them, by mistake, in their ignorance of the defeat of the right wing For the number of the ships on both sides, and the distance to which they covered the sea, made it difficult, after they had once join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conquering and the conquered; this battle proving far greater than any before it, any at least between Hellenes, for the number of vessels engaged. After the Corinthians had chased the Corcyraeans to the land, they turned to the wrecks and their dead, most of whom they succeeded in getting hold of and conveying to Sybota, the rendezvous of the land forces furnished by their barbarian allies. Sybota, it must be known, is a desert harbour of Thesprotis. This task over, they mustered anew, and sailed against the Corcyraeans, who on their part advanced to meet them with all their ships that were fit for service and remaining to them, accompanied by the Athenian vessels, fearing that they might attempt a landing in their territory. It was by this time getting late, and the paean had been sung for the attack, when the Corinthians suddenly began to back water. They had observed twenty Athenian ships sailing up, which had been sent out afterwards to reinforce

the ten vessels by the Athenians, who feared, as it turned out justly, the defeat of the Corcyraeans and the inability of their handful of ships to protect them. These ships were thus seen by the Corinthians first. They suspected that they were from Athens, and that those which they saw were not all, but that there were more behind; they accordingly began to retire. The Corcyraeans, meanwhile, had not sighted them, as they were advancing from a point which they could not so well see, and were wondering why the Corinthians were backing water, when some caught sight of them, and cried out that there were ships in sight ahead. Upon this, they also retired; for it was now getting dark, and the retreat of the Corinthians had suspended hostilities. Thus they parted from each other, and the battle ceased with night. The Corcyraeans were in their camp at Leukimme, when these twenty ships from Athens, under the command of Glaucon, the son of Leagrus, and Andocides, son of Leogoras, bore on through the corpses and the wrecks, and sailed up to the camp, not long after they were sighted. It was now night and the Corcyraeans feared that they might be hostile vessels; but they soon knew them, and the ships came to anchor.

科林斯人打垮敌军后，并没有忙着系牢和拖走失去战斗力的舰只，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了舰上的人。他们一边行驶，一边不住地杀戮，对于是否该抓俘虏却不那么在意。由于不清楚自己的右翼已被打败，他们连一些友军也误杀了。双方参战的舰只本来就多，在海上航行的距离又远，交锋一旦开始，则很难分辨谁胜谁负。以参战舰只的数目而论，这次战役是历来最大的一次，至少在希腊人之间没有发生过规模如此之大的海战。科林斯人将克基拉人赶往陆地之后，开始注意被撞坏的舰只和阵亡人员。他们找到了大多数死者的尸体，并且送到了西博塔。那里是他们的蛮族盟友提供给陆军部队的会合地点。大家肯定知道，西博塔是塞斯普罗替斯一个荒废的港口。这项任务一完成，他们又重整旗鼓，驶去进攻克基拉人。克基拉人怕他们在自己的

领土上登陆，就召集所有尚能用于作战的剩余舰只，连同雅典那10艘战舰在内，一同前来迎击他们。这时天色渐晚，双方刚唱完战歌，科林斯人却突然开始倒划。原来他们注意到又有20艘雅典舰正在驶来。这些舰只是雅典人后来派来增援那10艘舰只的。他们担心克基拉人落败，而先来的那几艘又无力保护克基拉人。结果证明，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正是这些舰只被科林斯人先看到了。他们怀疑这些舰只是从雅典来的，而且他们看到的不是全部，后面还有很多，于是便开始后撤。克基拉人当时尚未看到，因为从他们那个角度看不大清这些舰只正在接近。正当他们诧异于科林斯人为何倒划时，突然有人看见了，这才大声呼喊：前方发现舰只。听到喊声，他们也开始后退。这时天色渐渐变黑，科林斯人再一撤，战斗其实已告中止。于是，双方各自离开，战斗随着夜幕的降临结束了。克基拉人刚回到他们在莱基迈的营地，在莱阿格鲁斯的儿子格拉夫孔和莱奥戈拉斯的儿子安多喀德斯的指挥下，从雅典来的那20艘舰在被发现后不久就穿过阵亡者的尸体和舰只的残骸向营地驶来。这时已是夜间，克基拉人起初担心可能是敌舰，但不久就看出是雅典舰，所以就放这些舰进来抛锚停泊了。

The next day, the thirty Athenian vessels put out to sea, accompanied by all the Corcyraean ships that were seaworthy, and sailed to the harbour at Sybota, where the Corinthians lay, to see if they would engage. The Corinthians put out from the land and formed a line in the open sea, but beyond this made no further movement, having no intention of assuming the offensive. For they saw reinforcements arrived fresh from Athens, and themselves confronted by numerous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necessity of guarding the prisoners whom they had on board and the want of all means of refitting their ships in a desert place. What they were thinking more about was how their voyage home was to be effected; they feared that the Athenians might consider that the treaty was dissolved by the collision which had occurred, and forbid their departure.

第二天，30艘雅典舰离岸出海，克基拉所有适航的舰只也随之前往，一同驶向科林斯人停泊的西博塔港，打算看一看他们是否准备交战。科林斯人虽然离开岸边，在海上摆开了阵势，却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毫无进攻之意。他们看到了新从雅典来增援的舰只，也看到了自己面临的诸多困难，譬如舰上的俘虏需要看守，他们的战舰在如此荒凉之地无法修理等。让他们思虑更多的是，他们如何才能驶回本邦。他们担心，鉴于已经发生的冲突，雅典人或许以为和约已经终止，因而不允许他们轻易离开。

Accordingly, they resolved to put some men on board a boat, and send them without a herald's wand to the Athenians, as an experiment. Having done so, they spoke as follows: “You do wrong, Athenians, to begin war and break the treaty. Engaged in chastising our enemies, we find you placing yourselves in our path in arms against us. Now if your intentions are to prevent us sailing to Corcyra, or anywhere else that we may wish, and if you are for breaking the treaty, first take us that are here and treat us as enemies.” Such was what they said, and all the Corcyraean armament that was within hearing immediately called out to take them and kill them. But the Athenians answered as follows: “Neither are we beginning war, Peloponnesians, nor are we breaking the treaty; but these Corcyraeans are our allies, and we are come to help them. So if you want to sail anywhere else, we place no obstacle in your way; but if you are going to sail against Corcyra, or any of her possessions, we shall do our best to stop you.”

于是，他们决定派几个人乘坐小船，不带传令官的权标，先到雅典人那里去探一下他们的口风。那些人去了之后这样说：“雅典人，

你们不守和约，向我们开战，这件事你们做得不对。我们在惩罚自己的敌人时发现，你们在用武力阻扰我们。现在，如果你们有意阻止我们开往克基拉或其他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如果你们要撕毁和约，那就先把我们这儿这几位抓起来，把我们当作敌人对待吧！”他们这么一说，克基拉军中所有听到这番话的人立刻高声呼喝，要求把他们抓起来杀掉。但是，雅典人却这样回答：“伯罗奔尼撒人，我们既不是在发动战争，也不是在撕毁和约。这些克拉基人是我们的盟友，我们是来帮助他们的。所以，如果你们想驶往其他任何地方，我们不会阻拦你们。但是，如果你们要去进攻克基拉或者它的任何一个属地，我们将会尽全力阻止。”

Receiving this answer from the Athenians, the Corinthians commenced preparations for their voyage home, and set up a trophy in Sybota, on the continent; while the Corcyraeans took up the wrecks and dead that had been carried out to them by the current, and by a wind which rose in the night and scattered them in all directions, and set up their trophy in Sybota, on the island, as victors. The reasons each side had for claiming the victory were these. The Corinthians had been victorious in the sea-fight until night; and having thus been enabled to carry off most wrecks and dead, they were in possession of no fewer than a thousand prisoners of war, and had sunk close upon seventy vessels. The Corcyraeans had destroyed about thirty ships, and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Athenians had taken up the wrecks and dead on their side; they had besides seen the Corinthians retire before them, backing water on sight of the Athenian vessels, and upon the arrival of the Athenians refuse to sail out against them from Sybota. Thus both sides claimed the victory.

从雅典人那里得到这一答复后，科林斯人开始准备启航返乡，并

且在大陆上的西博塔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夜里起了风，将战舰残骸和阵亡者的尸体刮得四散开来。克基拉人收拾起被风刮向或被水流冲向他们的战舰残骸和阵亡者的尸体，在岛上的西博塔也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以示他们是胜利者。双方都声称是胜利者的原因是这样：夜晚降临之前，科林斯在海战中一直占据优势，所以能带走大部分被撞坏的战舰和阵亡者的尸体。他们捉到的战俘不下千人，还击沉了近70艘敌舰。克基拉人撞沉了大约30艘战舰。雅典人赶到之后，他们打捞起了己方被撞沉的舰只和阵亡者的尸体。另外，他们还目睹了科林斯人在他们面前退却的情景。科林斯人一见雅典人的舰只开来就开始倒划。雅典人抵达后，科林斯人又拒不从西博塔驶出来与他们对阵。因此，双方都号称取得了胜利。

The Corinthians on the voyage home took Anactorium, which stands at the mouth of the Ambracian gulf. The place was taken by treachery, being common ground to the Corcyraeans and Corinthians. After establishing Corinthian settlers there, they retired home. Eight hundred of the Corcyraeans were slaves; these they sold; two hundred and fifty they retained in captivity, and treated with great attention, in the hope that they might bring over their country to Corinth on their return; most of them being, as it happened, men of very high position in Corcyra. In this way, Corcyra maintained her political existence in the war with Corinth, and the Athenian vessels left the island. This was the first cause of the war that Corinth had against the Athenians, viz., that they had fought against them with the Corcyraeans in time of treaty.

在返回本邦的航程中，科林斯人夺取了位于安布拉基亚湾口的阿纳克托里乌姆。这个地方原为克基拉和科林斯所共有，科林斯采用背信弃义的手段夺取了它。在那里安置好科林斯的移民后，他们撤回了本邦。在他们所俘虏的克基拉人中，有800名是奴隶。他们把这些人

都卖掉了，余下的250人，他们留作俘虏，而且照料有加，希望他们回去后能使克基拉回到科林斯一边来，因为这些人恰巧大多在克基拉身居高位。这样，克基拉在与科林斯的战争中仍旧维持了政治上的独立，雅典舰离开了克基拉岛。这就是科林斯与雅典人交战的第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在和约存续期间，雅典人曾与克基拉人一起向他们开战。

Almost immediately after this, fresh differences arose between the Athenians and Peloponnesians, and contributed their share to the war. Corinth was forming schemes for retaliation, and Athens suspected her hostility. The Potidaeans, who inhabit the isthmus of Pallene, being a Corinthian colony, but tributary allies of Athens, were ordered to raze the wall looking towards Pallene, to give hostages, to dismiss the Corinthian magistrates, and in future not to receive the persons sent from Corinth annually to succeed them. It was feared that they might be persuaded by Perdiccas and the Corinthians to revolt, and might draw the rest of the allies in the direction of Thrace to revolt with them. These precautions against the Potidaeans were taken by the Athenians immediately after the battle at Corcyra. Not only was Corinth at length openly hostile, but Perdiccas, son of Alexander, king of the Macedonians, had from an old friend and ally been made an enemy. He had been made an enemy by the Athenians entering into alliance with his brother Philip and Derdas, who were in league against him. In his alarm he had sent to Lacedaemon to try and involve the Athenians in a war with the Peloponnesians, and was endeavouring to win over Corinth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the revolt of Potidaea. He also made overtures to the Chalcidians in the direction of Thrace, and to the Bottiaeans, to persuade them to join in the revolt; for he thought that if these places on the border could be made his allies, it would be easier to carry on the war with their co-operation. Being alive to

all this, and wishing to anticipate the revolt of the cities, the Athenians acted as follows. They were just then sending off thirty ships and a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for his country under the command of Archestratus, son of Lycomedes, with four colleagues. They instructed the captains to take hostages of the Potidaeans, to raze the wall, and to be on their guard against the revolt of the neighbouring cities.

这次冲突刚刚结束，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紧接着又起了新的争端。这也是促使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科林斯图谋报复时，雅典察觉出了它的敌意。居住在帕莱内地峡的波提狄亚人虽是科林斯的移民，但又是雅典的纳贡盟友。因此，雅典人要求他们拆除面向帕莱内的城墙，向雅典交纳人质，并遣散科林斯派来的地方行政官，将来也不再接纳科林斯每年派来继任的人员。雅典人很担心波提狄亚人在佩尔狄卡斯和科林斯人的劝说下起来反叛，并且带动色雷斯一带的其他盟邦一同起来反叛。克基拉之战一结束，他们马上就对波提狄亚人采取了这些防范措施。最后，不仅是科林斯与雅典公开为敌，就连亚历山大的儿子，马其顿人的国王佩尔狄卡斯，也从老朋友和盟友变成了敌人。他之所以变友为敌，是因为雅典人与他的兄弟腓力和德尔扎斯结为同盟，联合起来反对他。惊恐之下，他派人前往斯巴达，试图挑起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战争，并且竭力想把科林斯争取过来，以促使波提狄亚起来反抗。他还主动结交色雷斯一带的哈尔基斯人和博蒂亚人，劝他们也加入到反叛的队伍之中。他认为，如果能说服边境地带与他为盟，与他们联手，将来打起仗来会比较容易。所有这些活动，雅典人都注意到了。他们打算在这些城邦反叛之前先发制人，所以采取了以下行动：他们立时派出30艘战舰和1,000名重步兵，在利科迈泽斯之子阿尔海斯特拉图斯和四名副将的率领下奔赴马其顿。这些指挥官还奉命扣留波提狄亚人作人质，拆毁城墙，同时注意防范毗邻的城邦起来反叛。

Meanwhile, the Potidaeans sent envoys to Athens on the chance of persuading them to take no new steps in their matters; they also went to Lacedaemon with the Corinthians to secure support in case of need. Failing after prolonged negotiation to obtain anything satisfactory from the Athenians; being unable, for all they could say, to prevent the vessels that were destined for Macedonia from also sailing against them; and receiving from the Lacedaemonian government a promise to invade Attica, if the Athenians should attack Potidaea, the Potidaeans, thus favoured by the moment, at last entered into league with the Chalcidians and Bottiaeans, and revolted. And Perdiccas induced the Chalcidians to abandon and demolish their towns on the seaboard and, settling inland at Olynthus, to make that one city a strong place; meanwhile to those who followed his advice he gave a part of his territory in Mygdonia round Lake Bolbe as a place of abode while the war against the Athenians should last. They accordingly demolished their towns, removed inland and prepared for war. The thirty ships of the Athenians, arriving before the Thracian places, found Potidaea and the rest in revolt. Their commanders, considering it to be quite impossible with their present force to carry on war with Perdiccas and with the confederate towns as well turned to Macedonia, their original destination, and, having established themselves there, carried on war in co-operation with Philip, and the brothers of Derdas, who had invaded the country from the interior.

与此同时，波提狄亚人也派特使奔赴雅典，希望说服他们不要再就他们的事务采取新的行动。他们还与科林斯人一同前往斯巴达，希望在需要时确实能得到支援。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他们没有从雅典人那里得到任何满意的结果。虽然费尽口舌，他们还是未能阻止预期前往马其顿的战舰攻击他们。不过，斯巴达政府倒是答应，倘若雅典人

进攻波提狄亚，他们就入侵阿提卡。于是，波提狄亚人终因时机的眷顾与哈尔基斯人和博蒂亚人订立同盟，叛离了雅典。佩尔狄卡斯还劝哈尔基斯人拆毁并放弃他们在海滨的城镇，移居到内地的奥林索斯，让那座城成为一个坚固的堡垒。同时，对于那些遵从其言的人，他把自己在米格佐尼亚境内博尔韦湖周围的土地拿出一部分，供他们在与雅典人的战争持续期间居住。于是，哈尔基斯人拆除自己的城镇，迁居到内地，开始进行战争准备。30艘雅典舰抵达色雷斯后，发现波提狄亚和其他城市已经叛变。他们的指挥官认为，以其现有的兵力很难与佩尔狄卡斯及其联盟城镇相对抗，所以就转而驶往他们最初的目标马其顿——腓力和德尔扎斯的兄弟们当时已从内地侵入这个国家——雅典人在那里驻扎下来之后，即开始与他们协同作战。

Meanwhile, the Corinthians, with Potidaea in revolt and the Athenian ships on the coast of Macedonia, alarmed for the safety of the place and thinking its danger theirs, sent volunteers from Corinth, and mercenaries from the rest of Peloponnese, to the number of sixteen hundred heavy infantry in all, and four hundred light troops. Aristeus, son of Adimantus, who was always a steady friend to the Potidaeans, took command of the expedition, and it was principally for love of him that most of the men from Corinth volunteered. They arrived in Thrace forty days after the revolt of Potidaea.

与此同时，由于波提狄亚已经叛离，马其顿沿岸又有雅典的舰只，科林斯人很担心那个地方的安危，他们认为，那里有危险就意味着他们有危险。于是，他们就派出了一支部队，其中有科林斯的志愿人员，也有伯罗奔尼撒其他地方的雇佣兵，加起来总共1,600名重步兵和400名轻步兵。阿季曼图斯的儿子阿里斯泰夫斯一向是波提狄亚人坚定的朋友，这支远征军即由他担任指挥之职，军中大部分科林斯人主要也是因为爱戴他才志愿前往的。波提狄亚发动反叛四十天后，

他们抵达了色雷斯。

The Athenians also immediately received the news of the revolt of the cities. On being informed that Aristeus and his reinforcements were on their way, they sent two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of their own citizens and forty ships against the places in revolt, under the command of Callias, son of Calliades, and four colleagues. They arrived in Macedonia first, and found the force of a thousand men that had been first sent out, just become masters of Therme and besieging Pydna. Accordingly, they also joined in the investment, and besieged Pydna for a while. Subsequently they came to terms and concluded a forced alliance with Perdiccas, hastened by the calls of Potidaea and by the arrival of Aristeus at that place. They withdrew from Macedonia, going to Beroea and thence to Strepsa, and, after a futile attempt on the latter place, they pursued by land their march to Potidaea with three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of their own citizens, besides a number of their allies, and six hundred Macedonian horsemen, the followers of Philip and Pausanias. With these sailed seventy ships along the coast. Advancing by short marches, on the third day they arrived at Gigonus, where they encamped.

那些城市反叛的消息，很快也传到了雅典人那里。他们获悉阿里斯泰夫斯已率援军上路之后，马上从自己的公民中派出2,000名重步兵和40艘战舰一起赶赴反叛之地，由卡利亚泽斯的儿子卡利亚斯和四名副将担任指挥。他们首先到达马其顿，发现原先派出的1,000人刚刚夺取塞尔迈，已经在围攻彼得那。于是，他们也加入围攻的队伍，将彼得那包围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波提狄亚情况紧急，阿里斯泰夫斯又率援军到了那里，他们只好与佩尔狄卡斯达成妥协，被迫与他结成了同盟。撤离马其顿后，他们先去了韦罗埃阿，从那里又去了斯特

雷普萨。后因攻打斯特雷普萨无果，他们又从陆路奔向波提狄亚。这支部队中除了很多盟军之外，有雅典自己的重步兵3,000人，还有马其顿骑兵600人，后者是腓力和保萨尼阿斯的追随者。沿着海岸与他们相随而行的，还有70艘战舰。他们走走停停，于第三天抵达伊戈努斯，在那里扎下了营盘。

Meanwhile, the Potidaeans and the Peloponnesians with Aristeus were encamped on the side looking towards Olynthus on the isthmus, in expectation of the Athenians, and had established their market outside the city. The allies had chosen Aristeus general of all the infantry; while the command of the cavalry was given to Perdiccas, who had at once left the alliance of the Athenians and gone back to that of the Potidaeans, having deputed Iolaus as his general: The plan of Aristeus was to keep his own force on the isthmus, and await the attack of the Athenians; leaving the Chalcidians and the allies outside the isthmus, and the two hundred cavalry from Perdiccas in Olynthus to act upon the Athenian rear, on the occasion of their advancing against him; and thus to place the enemy between two fires. While Callias the Athenian general and his colleagues dispatched the Macedonian horse and a few of the allies to Olynthus, to prevent any movement being made from that quarter, the Athenians themselves broke up their camp and marched against Potidaea. After they had arrived at the isthmus, and saw the enemy preparing for battle, they formed against him, and soon afterwards engaged. The wing of Aristeus, with the Corinthians and other picked troops round him, routed the wing opposed to it, and followed for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in pursuit. But the rest of the army of the Potidaeans and of the Peloponnesians was defeated by the Athenians, and took refuge within the fortifications. Returning from the pursuit, Aristeus perceived the defeat of the rest of the army. Being at a loss which of

the two risks to choose, whether to go to Olynthus or to Potidaea, he at last determined to draw his men into as small a space as possible, and force his way with a run into Potidaea. Not without difficulty, through a storm of missiles, he passed along by the breakwater through the sea, and brought off most of his men safe, though a few were lost. Meanwhile, the auxiliaries of the Potidaeans from Olynthus, which is about seven miles off and in sight of Potidaea, when the battle began and the signals were raised, advanced a little way to render assistance; and the Macedonian horse formed against them to prevent it. But on victory speedily declaring for the Athenians and the signals being taken down, they retired back within the wall; and the Macedonians returned to the Athenians. Thus there were no cavalry present on either side. After the battle the Athenians set up a trophy, and gave back their dead to the Potidaeans under truce. The Potidaeans and their allies had close upon three hundred killed; the Athenians a hundred and fifty of their own citizens, and Callias their general.

与此同时，由于预计雅典人会到来，波提狄亚人和阿里斯泰夫斯率领的伯罗奔尼撒人在地峡之上朝向奥林索斯一侧扎下了营盘，他们还在城外建了一个市场。盟友们推举阿里斯泰夫斯统领全体步兵，骑兵的指挥权交给了佩尔狄卡斯。佩尔狄卡斯授权伊俄拉俄斯代理将军之职后，马上脱离与雅典人的同盟，重新回到了与波提狄亚人结成的同盟。阿里斯泰夫斯的计划是这样：他自己的部队留在地峡，等着对付雅典人的进攻；把哈尔基斯人和盟邦的部队部署在地峡之外；将佩尔狄卡斯的200名骑兵部署在奥林索斯。雅典人若向他那个方向逼近，就由这些骑兵去抄他们的后路。这样，敌人就会受到两面夹击。雅典将军卡利亚斯和他的副将派遣马其顿的骑兵和少量盟军前往奥林索斯，以防那里有什么动静。雅典人自己则拔营而去，向波提狄亚方向挺进。到达地峡之后，他们发现敌军正在准备战斗，便列队向敌军攻去，双方很快开始了战斗。阿里斯泰夫斯率领的那一翼由科林斯人

和其他精兵组成。他们击溃了与之对阵的敌军之后，又向前追击了相当一段距离。但是，由波提狄亚人和伯罗奔尼撒人组成的其余部队却败给雅典人，逃进了防御工事。追击回来之后，阿里斯泰夫斯发现其余部队已经战败。可是，无论是去奥林索斯还是去波提狄亚都存在风险，他一时不知该作何抉择。最后，他决定让士兵集中在一起，尽量缩小排面，然后跑步强行冲进波提狄亚。他冒着暴风雨般密集的标枪和箭羽，艰难地沿着海中的防浪堤将大部分部队安全带了出来，当然也损失了几个人。当战役打响，信号旗升起，奥林索斯与波提狄亚相距大约7英里，放眼可及，来自奥林索斯的援军本想来增援，但只前进了一小段距离，就被马其顿的骑兵列阵挡住了。在雅典人很快取得战争胜利，信号旗又降了下来后，他们便退回城内。马其顿人也回到了雅典人那里。因此，双方都没有骑兵参战。战斗结束后，雅典人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在休战期间将波提狄亚人方面阵亡者的尸体交还给他们。波提狄亚人及其盟军有近300人阵亡。雅典人自己的公民阵亡了150人，包括他们的将领卡利亚斯在内。

The wall on the side of the isthmus had now works at once raised against it, and manned by the Athenians. That on the side of Pallene had no works raised against it. They did not think themselves strong enough at once to keep a garrison in the isthmus and to cross over to Pallene and raise works there; they were afraid that the Potidaeans and their allies might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division to attack them.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at home learning that there were no works at Pallene, some time afterwards sent off sixteen hundred heavy infantry of their own citizens under the command of Phormio, son of Asopius. Arrived at Pallene, he fixed his headquarters at Aphytis, and led his army against Potidaea by short marches, ravaging the country as he advanced. No one venturing to meet him in the field, he raised works against the wall on the side of Pallene. So at length Potidaea was strongly invested on either side, and from the sea by the ships co-operating in the

blockade. Aristeus, seeing its investment complete, and having no hope of its salvation, except in the event of some movement from the Peloponnese, or of some other improbable contingency, advised all except five hundred to watch for a wind and sail out of the place, in order that their provisions might last the longer. He was willing to be himself one of those who remained. Unable to persuade them, and desirous of acting on the next alternative, and of having things outside in the best posture possible, he eluded the guardships of the Athenians and sailed out. Remaining among the Chalcidians, he continued to carry on the war; in particular he laid an ambuscade near the city of the Sermylians, and cut off many of them; he also communicated with Peloponnese, and tried to contrive some method by which help might be brought. Meanwhile,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vestment of Potidaea, Phormio next employed his sixteen hundred men in ravaging Chalcidice and Bottica: some of the towns also were taken by him.

这时，雅典人立即针对地峡一侧的城墙筑起了防御工事，并派了人员把守。他们没有针对帕莱内那边的城墙修筑工事。他们认为自己还不够强大，无法在驻守地峡的同时跑到帕莱内那边去修筑工事；他们担心波提狄亚人及其盟军乘他们兵力分散之际去进攻他们。与此同时，雅典国内的人得知帕莱内没有工事防御之后，不久即派出一支由1,600名雅典公民组成的重步兵部队，由阿索皮乌斯的儿子福尔米奥率领前来。抵达帕莱内之后，他把司令部设在阿菲蒂斯，接着就率军走走停停地向波提狄亚进发，沿途大行劫掠之事。波提狄亚没有人敢冒险出来与他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他针对帕莱内那边的城墙修筑了工事。如此一来，波提狄亚最终从两面被严密封锁起来了，而雅典的战舰又从海上加入了对它的封锁。波提狄亚被完全封锁之后，除非伯罗奔尼撒人前来相助，或者有什么奇迹发生，否则毫无获救的希望。看到这种情况，阿里斯泰夫斯建议只留500人守城，其余人一有顺风就乘船离开，这样他们的粮食还可以支持得久一些。他表示自己愿意留

下。由于无法说服他人，同时又想采取下一步行动，尽可能扭转外面的局面，阿里斯泰夫斯便巧妙地绕开雅典人的警戒舰，乘船溜了出来。他留在哈尔基斯人中间，继续进行着战斗，尤其是在塞尔米利乌姆人的城市附近设置埋伏，消灭了他们不少人。他还与伯罗奔尼撒取得联系，想方设法争取获得援助。与此同时，在完成了对波提狄亚的封锁之后，福尔米奥借助他手下那1,600人大肆洗劫了哈尔基季基和博蒂卡，有些城镇也被他攻陷了。

CHAPTER III Congress of the Peloponnesian Confederacy at Lacedaemon

第三章　在斯巴达召开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

The Athenians and Peloponnesians had these antecedent grounds of complaint against each other, the complaint of Corinth was that her colony of Potidaea, and Corinthian and Peloponnesian citizens within it, were being besieged; that of Athens against the Peloponnesians that they had incited a town of hers, a member of her alliance and a contributor to her revenue, to revolt, and had come and were openly fighting against her on the side of the Potidaeans. For all this, war had not yet broken out, there was still truce for a while; for this was a private enterprise on the part of Corinth.

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都已经有了相互抱怨的理由。科林斯抱怨说，它的殖民地波提狄亚正在遭到围攻，里面有科林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公民；雅典对伯罗奔尼撒人的抱怨是，他们煽动它同盟内的一个纳贡城镇起来反叛，而且公开站在波提狄亚人一边与它作战。尽管如此，战争仍未爆发，休战和约暂时依然有效，因为至此尚属科林斯单方面的意图。

But the siege of Potidaea put an end to her inaction; she had men inside it; besides, she feared for the place. Immediately summoning the allies to Lacedaemon, she came and loudly accused Athens of breach of the treaty and aggression on the rights of Peloponnese. With her, the Aeginetans, formally unrepresented from fear of Athens, in secret proved not the least urgent of the advocates for war, asserting that they had not the independence guaranteed to them by the treaty. After extending the summons to any of their allies and others who might have complaints to make of Athenian aggression, the Lacedaemonians held their ordinary assembly, and invited them to speak. There were many who came forward and made their several accusations; among them the Megarians, in a long list of grievances, calle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fact of their exclusion from the ports of the Athenian empire and the market of Athens, in defiance of the treaty. Last of all the Corinthians came forward, and having let those who preceded them inflame the Lacedaemonians, now followed with a speech to this effect:

然而，波提狄亚被围之后，科林斯再也按捺不住了，因为里面有它的公民，另外它也为那个地方担忧。它立即召集盟友来到斯巴达，自己也派人猛烈抨击了雅典对和约的破坏和对伯罗奔尼撒权利的侵犯。埃伊纳人站在科林斯一边。由于惧怕雅典，他们没有正式派代表出席，但暗地里主张开战之急切却丝毫不亚于他人。他们声称，他们没有享受到和约许诺他们的独立。斯巴达人将自己的盟邦和其他对雅典的侵犯可能有怨言的城邦召集前去，之后组织召开了通常的公民大会，邀请他们到会发言。许多代表都站出来进行了内容各异的控诉，迈加拉的代表也在其中。除了历数其苦之外，他们还要求大家特别注意一点：他们被排除于雅典帝国的港口和雅典的市场之外，这是违背和约的行为。待前面发言的人燃起了斯巴达人的怒火之后，科林斯人

最后也站出来作了发言，大意如下：

“Lacedaemonians! The confidence which you feel in your constitution and social order inclines you to receive any reflections of ours on other powers with certain scepticism. Hence springs your moderation, but hence also the rather limited knowledge which you betray in dealing with foreign politics. Time after time was our voice raised to warn you of the blows about to be dealt us by Athens, and time after time, instead of taking the trouble to ascertain the worth of our communications, you contented yourselves with suspecting the speakers of being inspired by private interest. And so, instead of calling these allies together before the blow fell, you have delayed to do so till we are smarting under it; allies among whom we have not the worst title to speak, as having the greatest complaints to make, complaints of Athenian outrage and Lacedaemonian neglect. Now if these assaults on the rights of Hellas had been made in the dark, you might be unacquainted with the facts and it would be our duty to enlighten you. As it is, long speeches are not needed where you see servitude accomplished for some of us, meditated for others—in particular for our allies—and prolonged preparations in the aggressor against the hour of war. Or what, pray, is the meaning of their reception of Corcyra by fraud, and their holding it against us by force? What of the siege of Potidaea?—places one of which lies most conveniently for any action against the Thracian towns; while the other would have contributed a very large navy to the Peloponnesians?”

“斯巴达人！你们对自己的宪法和社会秩序所持有的信心，可能会使你们在听取我们对其他强邦的看法时有所怀疑。因此，你们会采取中庸之道，但也会因此而显露出，你们在对外策略方面略嫌寡闻。

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大声疾呼，提醒你们注意，雅典即将对我们实施打击。可是，你们却次次都没有费心去核实我们所言的真伪，反倒怀疑我们是否受自身利益所驱使而出此言论。因此，你们没有在打击降临之前将这些盟友召集到一起，而是一直拖延，直至我们在打击下痛苦地呻吟。在这些盟友当中，我们是最有资格发言的，因为我们最有理由控诉和抱怨——控诉雅典的暴行，抱怨斯巴达的疏忽。如果说对希腊权利的这些侵犯都是暗中所为，你们对事实可能不甚明了，那么，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揭晓。事实上，无需冗长的发言，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些城邦遭到了奴役，有些城邦受到了觊觎——尤其是我们那些盟邦，而侵略者却长期在为战争的爆发进行准备。否则的话，请问，以欺骗的手法夺取克基拉的统治权对付我们，他们意欲何在？他们对波提狄亚进行围攻又意欲何在？难道不是因为其中一处的位置最便于对色雷斯诸城镇采取行动，另一处可以为伯罗奔尼撒人提供一支庞大的海军？”

“For all this you are responsible. You it was who first allowed them to fortify their city after the Median war, and afterwards to erect the long walls—you who, then and now, are always depriving of freedom not only those whom they have enslaved, but also those who have as yet been your allies. For the true author of the subjugation of a people is not so much the immediate agent, as the power which permits it having the means to prevent it; particularly if that power aspires to the glory of being the liberator of Hellas. We are at last assembled. It has not been easy to assemble, nor even now are our objects defined. We ought not to be still inquiring into the fact of our wrongs, but into the means of our defence. For the aggressors with matured plans to oppose to our indecision have cast threats aside and betaken themselves to action. And we know what the paths by which Athenian aggression travels are, and how insidious is its progress. A degree of confidence she may feel from the idea that your bluntness of perception prevents your noticing

her; but it is nothing to the impulse which her advance will receive from the knowledge that you see, but do not care to interfere. You, Lacedaemonians, of all the Hellenes are alone inactive, and defend yourselves not by doing anything but by looking as if you would do something; you alone wait till the power of an enemy is becoming twice its original size, instead of crushing it in its infancy. And yet the world used to say that you were to be depended upon; but in your case, we fear, it said more than the truth. The Mede, we ourselves know, had time to come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to Peloponnese, without any force of yours worthy of the name advancing to meet him. But this was a distant enemy. Well, Athens at all events is a near neighbour, and yet Athens you utterly disregard; against Athens you prefer to act on the defensive instead of on the offensive, and to make it an affair of chances by deferring the struggle till she has grown far stronger than at first. And yet you know that on the whole the rock on which the barbarian was wrecked was himself, and that if our present enemy Athens has not again and again annihilated us, we owe it more to her blunders than to your protection; Indeed, expectations from you have before now been the ruin of some, whose faith induced them to omit preparation."

"对于这一切，你们是有责任的。是你们，在波斯战争之后，先是允许他们的城市设防，后来又允许他们筑起了长墙；是你们，无论昔日还是今朝，不仅总是剥夺被他们奴役者的自由，而且总是剥夺迄今仍与你们为盟者的自由。一个民族的真正奴役者，与其说是直接使然者，不如说是那个有能力阻止却任其使然的城邦，尤其是当那个城邦渴望享有"希腊的解放者"这一美誉时。不过，我们总算被召集来了。我们集合在一起并不容易。即便是现在，我们的目标也不够明确。我们不应当再探究我们遭到的不公了，而是应当仔细探讨我们该如何抵御。如何对付我们的优柔寡断，侵略者已经成竹在胸，他们已

经将威胁弃之一旁，集中精力在采取行动。我们知道雅典人的侵略轨迹，知道他们会如何伺机而行。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不大敏感，所以注意不到他们的行径，可能会使他们增加一点自信。但是，倘若他们知道你们看到了却不愿干预，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向前推进。斯巴达人啊，在所有希腊人中，唯独你们在静观其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保卫自己，只是摆出似乎要采取行动的架势；唯独你们在等待敌人的势力成倍增长，而不是将它摧毁在萌芽状态之中。可是，世人过去常说，你们是可以依靠的。但是，就你们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一说法恐怕言过其实。我们不是不知道，波斯人有时间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到伯罗奔尼撒，你们却没有派出一支像样的军队前去迎击。不过，毕竟那是远来之敌，可是，雅典却是紧邻，而你们竟全然不去注意它。对于雅典，你们宁愿处于守势，也不愿意采取攻势；宁肯拖延到它远比初时强大得多时才会重视。但是，你们知道，导致蛮族人失败的主要是他们自己；你们也知道，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敌人雅典尝试再三都没有把我们消灭掉，主要也是源于它的失误，而不是你们的保护。实际上，此前有些城邦遭到毁灭，就是因为指望你们保护。他们对你们的信赖，竟使他们忽略了战争准备。”

“We hope that none of you will consider these words of remonstrance to be rather words of hostility; men remonstrate with friends who are in error, accusations they reserve for enemies who have wronged them. Besides, we consider that we have as good a right as any one to point out a neighbour's faults, particularly when we contemplate the great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national characters; a contrast of which, as far as we can see, you have little perception, having never yet considered what sort of antagonists you will encounter in the Athenians, how widely, how absolutely different from yourselves. The Athenians are addicted to innovation, and their designs are characterized by swiftness alike in conception and execution; you have a genius for keeping what you have got, accompanied by a total want of invention, and when

forced to act you never go far enough. Again, they are adventurous beyond their power, and daring beyond their judgment, and in danger they are sanguine; your wont is to attempt less than is justified by your power, to mistrust even what is sanctioned by your judgment, and to fancy that from danger there is no release. Further, there is promptitude on their side against procrastination on yours; they are never at home, you are never from it: for they hope by their absence to extend their acquisitions, you fear by your advance to endanger what you have left behind. They are swift to follow up a success, and slow to recoil from a reverse. Their bodies they spend ungrudgingly in their country's cause; their intellect they jealously husband to be employed in her service. A scheme unexecuted is with them a positive loss, a successful enterprise a comparative failure. The deficiency created by the miscarriage of an undertaking is soon filled up by fresh hopes; for they alone are enabled to call a thing hoped for a thing got, by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y act upon their resolutions. Thus they toil on in trouble and danger all the days of their life, with little opportunity for enjoying, being ever engaged in getting; their only idea of a holiday is to do what the occasion demands, and to them laborious occupation is less of a misfortune than the peace of a quiet life. To describe their character in a word, one might truly say that they were born into the world to take no rest themselves and to give none to others.”

“我们希望，诸位当中没人把这些劝谏当恶语。朋友有错，你要劝谏；敌人对你作了恶，你才会厉言相斥。另外，我们认为，我们和任何人一样有权指出邻邦的过错，尤其是在考虑到两个民族间迥异的特征时。据我们看来，你们对这种差异几近无觉，从未细想过雅典人是什么样的对手，与你们差异有多大，又与你们多么截然不同。雅典人热衷于创新。他们有所图谋时的特点是，既敏于构想，又敏于行

动；你们却善于守成，全无求新之念，不得不行动时也从来不会太过。其次，他们喜欢不顾实力去冒险，抛开理智逞勇敢，即便陷入危险，也满怀希望；你们却不习惯去尝试实力不逮之举，哪怕理智上认可，却仍心存疑虑，总以为陷入危险便无法解脱。再者，他们果断，你们因循；他们从不待在家乡，你们从不离开家乡：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外出扩大其所得，你们却担心动之则危及身后之即得。胜利时，他们敏于扩大战果；失败时，他们迟于退缩。为了城邦的事业，他们可以慷慨捐躯；为城邦效劳时，他们不吝使用自己的智慧。对他们而言，订了计划而未实现，是十足的失败，一项事业成功与否则是相对失败。事业失败造成的缺失，很快会为新的希望所填补，一旦下定决心，他们马上行动因此，独有他们能把希望的东西当成到手的成果。所以，他们一生中所有的日子，都在艰难险阻中度过。他们总是在忙于获取，却没有多少机会享受：他们对度假的唯一概念，就是适机而做。对他们来说，攻城掠地的艰辛也强于安宁平静的生活。雅典人的性格，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生到这个世上，自己不想安宁，也不让别人安宁。”

“Such is Athens, your antagonist. And yet, Lacedaemonians, you still delay, and fail to see that peace stays longest with those, who are not more careful to use their power justly than to show their determination not to submit to injustice. On the contrary, your ideal of fair dealing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if you do not injure others, you need not risk your own fortunes in preventing others from injuring you. Now you could scarcely have succeeded in such a policy even with a neighbour like yourselves; but in the present instance, as we have just shown, your habits are old-fashioned as compared with theirs. It is the law as in art, so in politics, that improvements ever prevail; and though fixed usages may be best for undisturbed communities, constant necessities of action must be accompanied by the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methods. Thus it happens that the vast experience of Athens has

carried her further than you on the path of innovation.”

“这就是你们的对手雅典。可是，斯巴达人，你们却还在迟疑，没有看到唯有这样的人才能与和平相伴最长久：正义地使用武力这一原则永远没有不向非正义屈服的决心重要。相反，你们理想中的正义行为却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你不伤害别人，就不必赌上自己的命运去阻止别人伤害你。可是，纵然遇上一个和你们一样的邻邦，以这样的政策，你们也很难成功。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正如我们方才所言，与他们的习惯相比，你们的已经陈旧。在政治上，如同在技艺上一样，不断改进是一条规律。一成不变的做法对于社会稳定纵然最佳，但是，不断出现的采取行动的必要，也要伴之与方法的不断改进。因此，雅典人拥有的丰富经验恰巧使它在创新的道路上把你们抛在了后面。”

“Here, at least, let your procrastination end. For the present, assist your allies and Potidaea in particular, as you promised, by a speedy invasion of Attica, and do not sacrifice friends and kindred to their bitterest enemies, and drive the rest of us in despair to some other alliance. Such a step would not be condemned either by the Gods who received our oaths, or by the men who witnessed them. The breach of a treaty cannot be laid to the people whom desertion compels to seek new relations, but to the power that fails to assist its confederate. But if you will only act, we will stand by you; it would be unnatural for us to change, and never should we meet with such a congenial ally. For these reasons choose the right course, and endeavour not to let Peloponnese under your supremacy degenerate from the prestige that it enjoyed under that of your ancestors.”

“让你们的因循，至少在这里止步吧！目前，要赶快入侵阿提卡，按照你们的许诺，援助你们的盟友，尤其是波提狄亚。不要把朋友和族人丢给他们的死敌，迫使我们余下的盟邦在绝望中投奔其他同盟。如果这样做，无论是接受我们誓言的众神，还是在一旁见证誓言的人们，都不会谴责我们。破坏盟约的罪名，不会加诸于那些因为被丢弃而另寻新盟友的人，而是会加诸于未援助其同盟者的城邦。但是，只要你们行动起来，我们就会站在你们一边。我们若变心，天理不容，况且我们也再难找到这么志同道合的盟友。鉴于这些原因，请选择正确的道路，尽力不让伯罗奔尼撒在你们祖先领导下所享有的盛名在你们手中陨落。”

Such were the words of the Corinthians. There happened to be Athenian envoys present at Lacedaemon on other business. On hearing the speeches they thought themselves called upon to come before the Lacedaemonians. Their intention was not to offer a defence on any of the charges which the cities brought against them, but to show on a comprehensive view that it was not a matter to be hastily decided on, but one that demanded further consideration. There was also a wish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great power of Athens, and to refresh the memory of the old and enlighten the ignorance of the young, from a notion that their words might have the effect of inducing them to prefer tranquillity to war. So they came to the Lacedaemonians and said that they too, if there was no objection, wished to speak to their assembly. They replied by inviting them to come forward. The Athenians advanced, and spoke as follows:

这是科林斯人的发言。雅典的一些使节刚好也在斯巴达，他们是因其他公务去的。听罢这些发言，他们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在斯巴达人面前发表看法。他们无意就各个城邦对他们的指控进行辩护，只是想

概括说明这个问题不宜仓促议决，而是需要进一步考虑。他们还想提醒斯巴达人注意雅典的强大实力，以唤起年长者的记忆，消除年轻者的无知，从而使他们的发言起到劝其求稳不求战之功效。因此，他们走到斯巴达人面前说，如果没有异议，他们希望也能够在公民大会上发言。斯巴达人邀请他们上前发言作答。于是，雅典人走上前去，作了如下发言：

“The object of our mission here was not to argue with your allies, but to attend to the matters on which our state dispatched us. However, the vehemence of the outcry that we hear against us has prevailed on us to come forward. It is not to combat the accusations of the cities (indeed, you are not the judges before whom either we or they can plead), but to prevent your taking the wrong course on matters of great importance by yielding too readily to the persuasions of your allies. We also wish to show on a review of the whole indictment that we have a fair title to our possessions, and that our country has claims to consideration. We need not refer to remote antiquity; there we could appeal to the voice of tradition, but not to the experience of our audience. But to the Median War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we must refer, although we are rather tired of continually bringing this subject forward. In our action during that war we ran great risk to obtain certain advantages; you had your share in the solid results, do not try to rob us of all share in the good that the glory may do us. However, the story shall be told not so much to deprecate hostility as to testify against it, and to show, if you are so ill advised as to enter into a struggle with Athens, what sort of an antagonist she is likely to prove. We assert that at Marathon we were at the front, and faced the barbarian single-handed. That when he came the second time, unable to cope with him by land we went on board our ships with all our people, and joined in the action at Salamis. This prevented his taking the

Peloponnesian states in detail, and ravaging them with his fleet; when the multitude of his vessels would have made any combination for self-defence impossible. The best proof of this was furnished by the invader himself. Defeated at sea, he considered his power to be no longer what it had been, and retired as speedily as possible with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army.”

“我们使团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与你们的盟友争辩，而是为了处理我们城邦交办的其他事务。但是，听到对我们的声讨如此激烈，我们只能站出来说几句。我们站出来，不是要就各城邦的指控进行抗辩（当然，你们也不是听取我们或他们申诉的法官），而是想阻止你们轻易听信盟友的劝说，在重大问题上采取错误的做法。同时，我们还想回顾一下整个指控情况，借以表明我们有充分的资格拥有自己的属地，我们城邦提出的要求也理应得到考虑。远古旧事，我们就不必提了：那样虽然可以借助传说之力，却无法引起听众亲身经历的共鸣。但是，对于波斯战争和当代的史事，我们却必须要提，尽管我们对不断提起这个话题已经有点厌烦。为了获取一定优势，我们在那场战争冒极大风险采取的行动中：你们既然从实际成果中拿到了自己的一份，就不要再尽数剥夺这份荣耀带给我们的好处。不过，我们之所以要提这些，与其说是要祈求你们免去对我们的敌意，不如说是为了证明你们不能敌视我们。同时也是为了表明，倘若你们鲁莽行事，执意要向雅典开战，你们可能会遇到怎样一个对手。我们必须要说，在马拉松战役中，我们曾奔赴前线，独力与蛮族人作战。当他们再度来犯，我们在陆地上对付不了他们时，我们的人民全数登上战舰，参加了在萨拉米斯的战斗。这次战斗阻止了他们逐个攻克伯罗奔尼撒各个城邦，阻止了他们依仗自己的舰队对这些城邦大肆劫掠。当时他们的舰只数目庞大，即使联合自卫都无法制胜。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就是侵略者本身。他们在海上失利后，自感实力不复以往，带着大部分军队迅速撤离了。”

“Such, then, was the result of the matter, and it was clearly proved that it was on the fleet of Hellas that her cause depended. Well, to this result we contributed three very useful elements, viz., the largest number of ships, the ablest commander, and the most unhesitating patriotism. Our contingent of ships was little less than two-thirds of the whole four hundred; the commander was Themistocles, through whom chiefly it was that the battle took place in the straits, the acknowledged salvation of our cause. Indeed, this was the reason of your receiving him with honours such as had never been accorded to any foreign visitor. While for daring patriotism we had no competitors. Receiving no reinforcements from behind, seeing everything in front of us already subjugated, we had the spirit, after abandoning our city, after sacrificing our property (instead of deserting the remainder of the league or depriving them of our services by dispersing), to throw ourselves into our ships and meet the danger, without a thought of resenting your neglect to assist us. We assert, therefore, that we conferred on you quite as much as we received. For you had a stake to fight for; the cities which you had left were still filled with your homes, and you had the prospect of enjoying them again; and your coming was prompted quite as much by fear for yourselves as for us; at all events, you never appeared till we had nothing left to lose. But we left behind us a city that was a city no longer, and staked our lives for a city that had an existence only in desperate hope, and so bore our full share in your deliverance and in ours. But if we had copied others, and allowed fears for our territory to make us give in our adhesion to the Mede before you came, or if we had suffered our ruin to break our spirit and prevent us embarking in our ships, your naval inferiority would have made a sea-fight unnecessary, and his objects would have been peaceably attained.”

“这就是那次战争的结果。它清楚地表明，希腊的事业靠的是海军。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做出了三大有益的贡献：提供了最多的舰只，派出了最能干的指挥官，表现出了最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全部400艘战舰中，将近三分之二是我们舰队的。我们派出的指挥官是塞米斯托克利斯。在海峡打的那一仗，主要是在他的指挥下进行的，大家都公认他是我们事业的救星。实际上，你们也是因为这一点，在接待他时用了从来没有给过任何外邦来宾的礼遇。我们表现出的大无畏爱国主义精神，同样举世无双。在后无援军而眼前的一切又已被征服的情况下，我们靠着这种精神，放弃自己的城市，牺牲自己的财产（但并没有抛弃我们余下的盟友，也没有四散而去，不再为他们效劳），登上战舰便去迎接危险的来临，丝毫没有因为你们疏于援助我们而心生怨恨。因此，我们坚信，我们为你们付出的，并不亚于我们所得到的。你们还有为之而战的东西：你们离开的城市，依然有你们的家园，你们有可能重新享有它。你们来人增援，一方面是出于对我们的担忧，但同样也是出于对你们自身安危的担心。无论怎样，一直到我们再无可失之时，你们才终于出现。可是，我们留在身后的城市，已经不复是城市，为了这样一座几近无望重获的城市，我们赌上了性命。因此，为了解救你们，也为了解救我们，我们尽了全力。但是，假如我们效仿其他城邦，出于对自己领土的担心，在你们到来之前就依附波斯人，或者因为自己的城邦被毁而丧失勇气，没有登上战舰，你们那点海军力量又经不起在海上一战，那么，波斯人就会兵不血刃地实现他们的目标。”

“Surely, Lacedaemonians, neither by the patriotism that we displayed at that crisis, nor by the wisdom of our counsels, do we merit our extreme unpopularity with the Hellenes, not at least unpopularity for our empire. That empire we acquired by no violent means, but because you were unwilling to prosecute to its conclusion the war against the barbarian, and because the allies attached themselves to us and spontaneously asked us to assume the command. And the nature of the case first compelled us to advance

our empire to its present height; fear being our principal motive, though honour and interest afterwards came in. And at last, when almost all hated us, when some had already revolted and had been subdued, when you had ceased to be the friends that you once were, and had become objects of suspicion and dislike, it appeared no longer safe to give up our empire; especially as all who left us would fall to you. And no one can quarrel with a people for making, in matters of tremendous risk, the best provision that it can for its interest."

"斯巴达人啊，无论是凭着我们在那一关头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是凭着我们在决策中所显示出来的智慧，希腊人都不应以这种极端敌对的态度回报我们，至少对我们的帝国不应如此。这个帝国不是我们以暴力手段获得的，而是因为你们不愿意将抵抗蛮族人的战争进行到底，因为各盟邦自愿依附我们，并且自发地要求我们承担起统帅的责任。最初是由于情势所迫，我们的帝国被推上了目前的地位，后来荣誉和利益因素虽然也进入了考虑范围，但主要还是因为恐惧。最后，当几乎所有人都憎恨我们时，当有些盟邦已经叛变并被镇压时，当你们不再是昔日的朋友而成了怀疑和反感的对象时，尤其是当离开我们的所有盟友都会落入你们手中时，放弃我们的帝国似乎已不安全。在极具风险的问题上，谁也不能责备一个民族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好万全准备。"

"You, at all events, Lacedaemonians, have used your supremacy to settle the states in Peloponnese as is agreeable to you. And if at the period of which we were speaking you had persevered to the end of the matter, and had incurred hatred in your command, we are sure that you would have made yourselves just as galling to the allies, and would have been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a strong government and danger to yourselves. It follows that it was not a

very wonderful action, or contrary to the common practice of mankind, if we did accept an empire that was offered to us, and refused to give it up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ree of the strongest motives, fear, honour, and interest. And it was not we who set the example, for it has always been law that the weaker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stronger. Besides, we believed ourselves to be worthy of our position, and so you thought us till now, when calculations of interest have made you take up the cry of justice—a consideration which no one ever yet brought forward to hinder his ambition when he had a chance of gaining anything by might. And praise is due to all who, if not so superior to human nature as to refuse dominion, yet respect justice more than their position compels them to do.”

“你们斯巴达人，不管怎样，已经利用你们至高无上的地位将伯罗奔尼撒各城邦的事务安排得如你们所愿。在我们现在谈及的那段时间，假如你们坚持到底，在统帅大军的过程中招致了怨恨，我们敢肯定，对盟邦来说，你们同样令人厌恶，不得不在加强控制和陷入危险这两者之中做出选择。由此可得，即便我们确实接受了一个奉献给我们的帝国，在恐惧、荣誉和利益这三大动机的压力下都拒不放弃，我们的所做所为也不足为怪，与人类的惯常做法并没有相悖之处。况且，首开此例的也不是我们，弱者臣服于强者，向来是一条法则。此外，我们也相信，我们无愧于我们的地位。以前你们一直也这样认为，如今开始权衡利益了，你们就高喊起了正义——有机会凭实力获得利益时，从来没有人拿这种考虑来阻碍目标的实现。那些虽然不能超越人类的天性去拒绝接受统治权，却能不限于地位要求他们做的还去尊重正义的人，全都应该得到称赞。”

“We imagine that our moderation would be best demonstrated by the conduct of others who should be placed in our position; but even our equity has very unreasonably subjected us to

condemnation instead of approval. Our abatement of our rights in the contract trials with our allies, and our causing them to be decided by impartial laws at Athens, have gained us the character of being litigious. And none care to inquire why this reproach is not brought against other imperial powers, who treat their subjects with less moderation than we do; the secret being that where force can be used, law is not needed. But our subjects are so habituated to associate with us as equals that any defeat whatever that clashes with their notions of justice, whether it proceeds from a legal judgment or from the power which our empire gives us, makes them forget to be grateful for being allowed to retain most of their possessions, and more vexed at a part being taken, than if we had from the first cast law aside and openly gratified our covetousness. If we had done so, not even would they have disputed that the weaker must give way to the stronger. Men's indignation, it seems, is more excited by legal wrong than by violent wrong; the first looks like being cheated by an equal, the second like being compelled by a superior. At all events they contrived to put up with much worse treatment than this from the Mede, yet they think our rule severe, and this is to be expected, for the present always weighs heavy on the conquered. This at least is certain. If you were to succeed in overthrowing us and in taking our place, you would speedily lose the popularity with which fear of us has invested you, if your policy of to-day is at all to tally with the sample that you gave of it during the brief period of your command against the Mede. Not only is your life at home regulated by rules and institutions incompatible with those of others, but your citizens abroad act neither on these rules nor on those which are recognized by the rest of Hellas.”

“假如将别人放在我们的位置，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行为一定

会为我们的中庸之道提供最好的证明。但是，就连我们的公正，也毫无道理地使我们受到了责难，而不是赞许。在与盟邦发生的契约诉讼案中，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让那些案件在雅典由公正的法律裁决，不料却招来了好讼的恶名。可是，谁也没有费心去问，其他帝国对待自己的臣民还没有我们温和，他们却为什么不会受到这种责难。其中的奥秘在于：能够使用武力的地方，没有必要诉诸法律。但是，我们的臣民已经习惯于与我们平等相处了。但凡遇到与他们的公正观相冲突的任何挫败，不管是源于法律的判决，还是源于帝国赋予我们的权力，他们都会忘记对允许他们保有大多数财产而怀有感恩之心。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将法律抛在一边，泰然自若地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就不会为失去局部利益那么愤慨了。如果我们那样做，那么，连他们都不会不说，弱者必须向强者做出让步。法律上的侵害，较之暴力侵害，似乎更能激起人们的愤慨。前一种情况像是被同等人所骗，后一种情况则像是被强者所迫。波斯人对待他们要比这苛刻得多，但不管怎样他们都设法忍过来了。可是，他们却觉得我们的统治太严苛。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被征服者总是感觉时下的情况最难忍。有一点至少是肯定的。假如你们成功地推翻了我们，取代了我们的位置，如果你们把短暂指导希腊抗击波斯人那一时期实行的政策搬到今天，你们很快就会失去人们因为惧怕我们而对你们产生的好感。你们在本邦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与他人的生活方式不会相容。不仅如此，你们的公民在他乡既不会遵循你们那些规矩，也不会遵循希腊其他地方公认的规矩。”

“Take time then in forming your resolution, as the matter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do not be persuaded by the opinions and complaints of others to bring trouble on yourselves, but consider the vast influence of accident in war, before you are engaged in it. As it continues, it generally becomes an affair of chances, chances from which neither of us is exempt, and whose event we must risk in the dark. It is a common mistake in going to war to begin at the wrong end, to act first, and wait for disaster to discuss the matter.

But we are not yet by any means so misguided, nor, so far as we can see, are you; accordingly, while it is still open to us both to choose aright, we bid you not to dissolve the treaty, or to break your oaths, but to have our differences settled by arbitration according to our agreement. Or else we take the gods who heard the oaths to witness, and if you begin hostilities, whatever line of action you choose, we will try not to be behindhand in repelling you."

"那么，花点时间再制定决议吧，因为兹事体大。不要被他人的意见和抱怨所左右，到头来给自己惹麻烦。在投入战争之前，要考虑一下偶然因素在战争中的巨大影响。一般来说，仗越打越具有偶然性，而偶然之事是我们双方都免除不了的。结果如何，我们全无把握。投入战争时，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先后颠倒，往往是先行动，等到灾难临头时再作商议。不过，我们还远未误入歧途，据我们看来，你们也是如此。因此，趁我们双方都还有机会做出正确选择，我们奉劝你们不要破坏和约，也不要背弃你们的誓言，而是要按照协议的规定，用仲裁的方式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否则的话，我们要请那些听到你们誓言的众神作证，只要你们开始敌对行动，无论你们采取什么方式作战，我们都会毫不拖延地将你们击退。"

Such were the words of the Athenians. After the Lacedaemonians had heard the complaints of the allies against the Athenians, and the observations of the latter, they made all withdraw, and consulted by themselves on the question before them. The opinions of the majority all led to the same conclusion: the Athenians were open aggressors, and war must be declared at once. But Archidamus, the Lacedaemonian king, came forward, who had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at once a wise and a moderate man, and made the following speech:

这是雅典人的发言。听了各个盟邦对雅典人的指控和雅典人发表的意见之后，斯巴达人让外人全部退场，只留下他们自己讨论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一个结论：既然雅典人已公然发动侵略，那就必须立即宣战。然而，素以英明与稳健著称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却走上前来，发表了如下讲话：

“I have not lived so long, Lacedaemonians, without having had the experience of many wars, and I see those among you of the same age as myself, who will not fall into the common misfortune of longing for war from inexperience or from a belief in its advantage and its safety. This, the war on which you are now debating, would be one of the greatest magnitudes on a sober consideration of the matter. In a struggle with Peloponnesians and neighbours our strength is of the same character, and it is possible to move swiftly on the different points. But a struggle with a people who live in a distant land, who have also an extraordinary familiarity with the sea, and who are in the highest state of preparation in every other department; with wealth private and public, with ships, and horses, and heavy infantry, and a population such as no one other Hellenic place can equal, and lastly a number of tributary allies—what can justify us in rashly beginning such a struggle? Wherein is our trust that we should rush on it unprepared? Is it in our ships? There we are inferior; while if we are to practise and become a match for them, time must intervene. Is it in our money? There we have a far greater deficiency. We neither have it in our treasury, nor are we ready to contribute it from our private funds. Confidence might possibly be felt in our superiority in heavy infantry and population, which will enable us to invade and devastate their lands. But the Athenians have plenty of other land in their empire, and can import what they want by sea. Again, if we are to attempt an insurrection of their allies, these

will have to be supported with a fleet, most of them being islanders. What then is to be our war? For unless we can either beat them at sea or deprive them of the revenues which feed their navy, we shall meet with little but disaster. Meanwhile, our honour will be pledged to keeping on, particularly if it be the opinion that we began the quarrel. For let us never be elated by the fatal hope of the war being quickly ended by the devastation of their lands. I fear rather that we may leave it as a legacy to our children; so improbable is it that the Athenian spirit will be the slave of their land, or Athenian experience be cowed by war.”

“斯巴达人，我岁数不大，没经历过多少次战争。我知道，你们当中和我同龄的人，不会因为缺乏经验，也不会因为相信它既有益又安全从而陷入渴望战争这种为人熟知的不幸之中去。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会知道，你们现在所讨论的这场战争，将会是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与伯罗奔尼撒人和邻邦作战时，我们的军事力量属于同一种性质，我们可以迅速开赴不同的地点。但是，与这样一个民族作战则不同：他们地处遥远，对海洋又异常熟悉；在其他各个方面，他们也都做了最充分的准备；无论是就个人还是就城邦而言，他们都很富有，他们有战舰、战马和重步兵，还有希腊其他地方无一可望其项背的人口，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纳贡盟邦，因此我们能凭借什么贸然开始这样一场战争呢？我们靠什么仓促地去打一场无准备之仗呢？靠我们的战舰吗？在这方面，我们处于劣势。即便我们加紧训练，达到能与他们匹敌的程度，那也须花费一定时日。靠我们的金钱吗？在这方面，我们更是匮乏。我们的金库里没有，我们也没准备从私人资金中去募集。让我们感到有信心的，可能是我们在重步兵和人口数量方面的优势，我们可以借此入侵和践踏他们的土地。但是，雅典帝国另外还有大量土地，他们可以从海上运入他们需要的东西。再者，如果我们想策反他们的盟友，那就需要有舰队做后盾，因为他们大多是岛民。那么，我们将会去打一场怎样的战争呢？因为除非我们能在海上胜过他们，或者剥夺海军所依赖的款项，否则我们除了遭殃将难有所获。到

那时候，尤其是当舆论认为争端是由我们挑起的时候，若不硬着头皮打下去，我们的名誉亦将不保。我们千万不要被这种致命的希望冲昏了头脑，以为只要践踏了他们的土地，战争很快就能结束。我倒是担心，我们会把这场战争遗留给子孙。以雅典人的精神，他们不可能成为土地的奴隶，或者说以雅典人的经历，他们也不可能被战争所吓倒。”

“Not that I would bid you be so unfeeling as to suffer them to injure your allies, and to refrain from unmasking their intrigues; but I do bid you not to take up arms at once, but to send and remonstrate with them in a tone not too suggestive of war, nor again too suggestive of submission, and to employ the interval in perfecting our own preparations. The means will be, first, the acquisition of allies, Hellenic or barbarian it matters not, so long as they are an accession to our strength naval or pecuniary—I say Hellenic or barbarian, because the odium of such an accession to all who like us are the objects of the designs of the Athenians is taken away by the law of self-preservation—and secondly the development of our home resources. If they listen to our embassy, so much the better; but if not, after the lapse of two or three years our position will have become materially strengthened, and we can then attack them if we think proper. Perhaps by that time, the sight of our preparations, backed by language equally significant, will have disposed them to submission, while their land is still untouched, and while their counsels may be directed to the retention of advantages as yet undestroyed. For the only light in which you can view their land is that of a hostage in your hands, a hostage the more valuable the better it is cultivated. This you ought to spare as long as possible, and not make them desperate, and so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dealing with them. For if while still unprepared, hurried away by the complaints of our allies, we are

induced to lay it waste, have a care that we do not bring deep disgrace and deep perplexity upon Peloponnese. Complaints, whether of communities or individuals, it is possible to adjust; but war undertaken by a coalition for sectional interests, whose progress there is no means of foreseeing, does not easily admit of creditable settlement.”

“我并不是要求你们无动于衷地容忍他们伤害你们的盟友，而不去揭露他们的阴谋。我是想奉劝你们不要立刻拿起武器，而是先派人去向他们提出抗议，不要以带有战争威胁的口吻，也不要太露出妥协之意，同时利用这段时间间隔完善我们自己的战争准备。具体做法可以这样：首先，我们要争取增加盟友的数量。只要能增强我们的海军力量或财政能力，不管是希腊人还是蛮族人都无关紧要——我之所以说不管是希腊人还是蛮族人，是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都是雅典人耍弄阴谋的目标，所以我们要本着自我保护的原则，克服对这些人加入进来的嫌恶；其次，我们要开发我们城邦的资源。如果他们听从我们使者的劝告，那更好；如若不然，再过两、三年，我们的地位得到实质上的加强，如果我们认为合适，那时我们就可以进攻他们了。到那个时候，当他们看到我们的准备情况，再加上作用同样不可小觑的语言的力量，在土地尚未遭到破坏，还可以将目标转向保存尚未被摧毁的优势的时候，他们或许会产生让步的念头。至于他们的土地，你们唯一可以把它看作的就是你们手中的抵押物，一种耕种得越好越有价值的抵押物。你们应当尽可能长时间地不去动它，不要将他们逼至绝望的境地，否则就会增加对付他们的难度。倘若我们尚未做好准备，一听到盟邦抱怨就急忙去践踏他们的土地，那就要注意，不要让伯罗奔尼撒蒙受奇耻大辱，深陷混乱。但凡抱怨，不论是出自集体还是发自个人，都是可以调解的。但是，一个联盟为了局部利益所从事的战争，却不容易有妥善解决的机会，因为战争的进程根本无法预知。”

“And none need think it cowardice for a number of

confederates to pause before they attack a single city. The Athenians have allies as numerous as our own, and allies that pay tribute, and war is a matter not so much of arms as of money, which makes arms of use. And this is more than ever true in a struggle between a continental and a maritime power. First, then, let us provide money, and not allow ourselves to be carried away by the talk of our allies before we have done so; as we shall have the largest shar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sequences be they good or bad, we have also a right to a tranquil inquiry respecting them."

"如果多个城邦联合去攻打单独一个城市时有所迟疑，谁也不会认为这是懦弱。雅典人和我们一样拥有众多盟邦，而且还是纳贡盟邦。打仗要靠武器，但更要靠财力，有了财力，武器才能发挥效力。陆上强邦与海上强邦较量时更是如此。那么，首先，我们要准备好钱财。在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之前，不要因盟邦的说辞而头脑发热。无论结果好坏，承担最大责任的都是我们。因此，我们也有不受干扰地探讨战争后果的权利。"

"And the slowness and procrastination, the parts of our character that are most assailed by their criticism, need not make you blush. If we undertake the war without preparation, we should by hastening its commencement only delay its conclusion; further, a free and a famous city has through all time been ours. The quality which they condemn is really nothing but a wise moderation; thanks to its possession, we alone do not become insolent in success and give way less than others in misfortune; we are not carried away by the pleasure of hearing ourselves cheered on to risks which our judgment condemns; nor, if annoyed, are we any the more convinced by attempts to exasperate us by accusation. We are both warlike and wise, and it is our sense of order that makes us so. We

are warlike, because self-control contains honour as a chief constituent, and honour bravery. And we are wise, because we are educated with too little learning to despise the laws, and with too severe a self-control to disobey them, and are brought up not to be too knowing in useless matters—such as the knowledge which can give a specious criticism of an enemy's plans in theory, but fails to assail them with equal success in practice—but are taught to consider that the schemes of our enemies are not dissimilar to our own, and that the freaks of chance are not determinable by calculation. In practice we always base our preparations against an enemy on the assumption that his plans are good; indeed, it is right to rest our hopes not on a belief in his blunders, but on the soundness of our provisions. Not ought we to believe that there is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man and man, but to think that the superiority lies with him who is reared in the severest school. These practices, then, which our ancestors have delivered to us, and by whose maintenance we have always profited, must not be given up. And we must not be hurried into deciding in a day's brief space a question which concerns many lives and fortunes and many cities, and in which honour is deeply involved—but we must decide calmly. This, our strength peculiarly enables us to do. As for the Athenians, send to them on the matter of Potidaea; send on the matter of the alleged wrongs of the allies, particularly as they are prepared with legal satisfaction; and to proceed against one who offers arbitration as against a wrongdoer, law forbids. Meanwhile, do not omit preparation for war. This decision will be the best for yourselves, the most terrible to your opponents.”

“至于迟缓和因循，也就是他们指摘我们的性格时最常提及的两点，大家不必为此而羞愧。如果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承担起战争的责任，我们只能落得个开战匆匆却迟迟结束不了的下场；再说，我

们的城邦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自由的城邦，出色的城邦。他们指摘我们的那种品质，其实不过是一种适度的审慎。恰恰因为具有这种品质，我们才能胜利面前独不骄，逆境之中不似他人易折腰。我们不会因为听到别人朝我们欢呼就高兴得去冒不当之险。受到伤害时，我们也不会因为有人恶言相激就轻易相信。我们既勇于作战，又明智审慎，这是我们的秩序感使然。我们勇于作战，是因为自制主要源于荣誉，荣誉又主要源于勇敢。我们明智审慎，是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没有让我们学到什么蔑视法律的学问，而是让我们严格自制而不去违法；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也被教导不必通晓无用的事物——例如，在理论上能对敌人的图谋进行貌似有理的批判，在实践中却无法同样成功地攻击敌人的学说——而是教给我们这样考虑：敌人的计划与我们的没有什么不同，机运的转变不是算计所能决定的。现实情况中，我们的对敌准备总是基于这样的假想：敌人的计划没有问题。的确，不把希望寄托在敌人的失误上，而是寄托在我们准备的完善上这是正确的做法。我们不应当相信人与人之间差别悬殊，而是应当认为，只有在最严格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人才有过人之处。这些习惯既然是祖先传给我们的，我们也一直因为坚持这些习惯而从中获益，那么，我们就不能将它们放弃。倘若一个问题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与财富，关系到许多城市，而且与名誉息息相关，我们就切不可在短短的一天之内仓促决定，而是必须冷静地做出决定。凭着我们特有的力量，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至于雅典人，我们可以就波提狄亚问题，就各盟邦声称他们所受的冤屈，派人去跟他们谈。既然他们准备以法律手段获得满意的结果，我们尤当如此。将主动要求仲裁的一方作为过错方予以控诉，那是法律不允许的。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做好战争准备。如此决定，将对我们自己最有利，让我们的敌人最头痛。”

Such were the words of Archidamus. Last came forward Sthenelaidas, one of the ephors for that year, and spoke to the Lacedaemonians as follows:

以上是阿希达穆斯的发言。最后站出来的是斯塞内莱扎斯，那年的民选五长官之一，他对斯巴达人的讲话如下：

“The long speech of the Athenians I do not pretend to understand. They said a good deal in praise of themselves, but nowhere denied that they are injuring our allies and Peloponnese. And yet if they behaved well against the Mede then, but ill towards us now, they deserve double punishment for having ceased to be good and for having become bad. We, meanwhile, are the same then and now, and shall not, if we are wise, disregard the wrongs of our allies, or put off till to-morrow the duty of assisting those who must suffer to-day. Others have much money and ships and horses, but we have good allies whom we must not give up to the Athenians, nor by lawsuits and words decide the matter, as it is anything but in word that we are harmed, but render instant and powerful help. And let us not be told that it is fitting for us to deliberate under injustice; long deliberation is rather fitting for those who have injustice in contemplation. Vote therefore, Lacedaemonians, for war, as the honour of Sparta demands, and neither allow the further aggrandizement of Athens, nor betray our allies to ruin, but with the gods let us advance against the aggressors.”

“雅典人冗长的讲话，我不敢妄称听懂。他们说了不少自我赞扬的话，但无一句否认他们在伤害我们的盟邦和伯罗奔尼撒这一事实。但是，如果当年攻打波斯人时他们表现良好，如今却对我们恶意相向，那么，他们应当受到双重惩罚：一罚他们不再好，二罚他们已变坏。在此期间，我们却始终如一，无论过去与现在。如果明智，以后我们也不会对盟友的冤屈坐视不管，或者把援助他们的责任推迟到明天，因为他们今天就在受难。别人有大量的金钱、战舰和马匹，但是

我们有很好的盟友。我们决不能把他们丢给雅典人，也不能用诉讼和言语来解决这场事端，因为我们绝不是在言辞上受到了伤害。我们应当立即给予盟邦强有力的援助。不要对我们说，遭到不公时应当思虑再三。图谋不义的人才更须三思而后行。因此，斯巴达人，投票赞成开战吧！这是斯巴达的荣誉所要求的。不要再任由雅典进行扩张了，也不要听任我们的盟友走向毁灭。让我们在诸神的保佑下，向侵略者发起进攻吧！”

With these words he, as ephor, himself put the question to the assembly of the Lacedaemonians. He said that he could not determine which was the loudest acclamation (their mode of decision is by acclamation not by voting); the fact being that he wished to make them declare their opinion openly and thus to increase their ardour for war. Accordingly, he said, “All Lacedaemonians who are of opinion that the treaty has been broken, and that Athens is guilty, leave your seats and go there,” pointing out a certain place, “all who are of the opposite opinion, there.” They accordingly stood up and divided; and those who held that the treaty had been broken were in a decided majority. Summoning the allies, they told them that their opinion was that Athens had been guilty of injustice, but that they wished to convoke all the allies and put it to the vote;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make war, if they decided to do so, on a common resolution. Having thus gained their point, the delegates returned home at once; the Athenian envoys a little later, when they had dispatched the objects of their mission. This decision of the assembly, judging that the treaty had been broken, was made in the fourteenth year of the thirty years' truce, which was entered into after the affair of Euboea.

说完这番话，他以民选长官的身份，亲自将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斯巴达公民大会付诸表决。他说，他听不清哪方的喊声大（他们的表决方式不是投票，而是看呼喊声音的大小）。他这样说，其实是想让大家公开表明自己的意见，由此激发他们对战争的热情。因此，他说："凡是认为和约已经遭到破坏和雅典有罪的斯巴达人，离开座位，站到那边去。"他指着一个地方，"凡是持相反意见的人，去那边。"于是，大家站起来，分成了两部分。认为和约已遭到破坏的人显然占多数。他们请盟邦的代表们回到会场，告诉对方他们认为雅典的行为有失正义，但希望把所有盟邦都召集过来进行表决。如果大家决定开战，他们可以在共同议决的基础上这样做。这样，盟邦的代表们也算达到了目的，立即各回本邦去了。雅典的使节迅速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稍后也回去了。斯巴达公民大会这个决议，即认定和约已经失效这一决议，通过于休战和约缔结后第十四年。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休战和约缔结于埃维亚岛事件之后。

The Lacedaemonians voted that the treaty had been broken, and that the war must be declared, not so much because they were persuaded by the arguments of the allies, as because they feared the growth of the power of the Athenians, seeing most of Hellas already subject to them.

斯巴达人之所以投票认定和约已遭到破坏，而且非宣战不可，与其说是被盟邦的辩词所说服，不如说是担心雅典的势力继续增长。他们已经看到，希腊大部分地区已经臣服于雅典。

CHAPTER IV From the end of the Persian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Progress from Supremacy to Empire

第四章　从波斯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从霸主走向帝国

The way in which Athens came to be placed in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her power grew was this. After the Medes had returned from Europe, defeated by sea and land by the Hellenes, and after those of them who had fled with their ships to Mycale had been destroyed, Leotychides, king of the Lacedaemonians, the commander of the Hellenes at Mycale, departed home with the allies from Peloponnese. But the Athenians and the allies from Ionia and Hellespont, who had now revolted from the King, remained and laid siege to Sestos, which was still held by the Medes. After wintering before it, they became masters of the place on its evacuation by the barbarians; and after this, they sailed away from Hellespont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es. Meanwhile, the Athenian people, after the departure of the barbarian from their country, at once proceeded to carry over their children and wives, and such property as they had left, from the places where they had deposited them, and prepared to rebuild their city and their walls. For only isolated portions of the circumference had been left standing, and most of the houses were in ruins; though a few remained, in which the Persian grandees had taken up their quarters.

本章记叙的是雅典是在何情况下逐步走上势力扩张之路的。在海上和陆上都被希腊人打败之后，波斯人便撤出欧洲。他们之中乘船逃往米卡莱的那些人被消灭后，在米卡莱指挥希腊军队的斯巴达国王莱奥提基德斯也带着伯罗奔尼撒诸盟邦的军队启程回国了。但是，雅典人与当时已叛离波斯国王的爱奥尼亚和赫勒斯滂盟军却留了下来，对波斯人依然占据的塞斯托斯展开了围攻。围攻了一个冬天之后，蛮族人撤走了，他们成了那个地方的主人。其后，他们驶离赫勒斯滂，返回了各自的城邦。同时，雅典人在蛮族人离开他们的领土之后，立即着手从安置地点带回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所剩财产，准备重建他们的城市和城墙。城市四周已经只剩下断壁残墙，大多数房屋都成了废

墟，仅有少数几所曾被波斯要员占为寓所者留存了下来。

Perceiving what they were going to do, the Lacedaemonians sent an embassy to Athens. They would have themselves preferred to see neither her nor any other city in possession of a wall; though here they acted principally at the instigation of their allies, who were alarmed at the strength of her newly acquired navy and the valour which she had displayed in the war with the Medes. They begged her not only to abstain from building walls for herself, but also to join them in throwing down the walls that still held together of the ultra-Peloponnesian cities. The real meaning of their advice, the suspicion that it contained against the Athenians, was not proclaimed; it was urged that so the barbarian, in the event of a third invasion, would not have any strong place, such as he now had in Thebes, for his base of operations; and that Peloponnese would suffice for all as a base both for retreat and offence. After the Lacedaemonians had thus spoken, they were, on the advice of Themistocles, immediately dismissed by the Athenians, with the answer that ambassadors should be sent to Sparta to discuss the question. Themistocles told the Athenians to send him off with all speed to Lacedaemon, but not to dispatch his colleagues as soon as they had selected them, but to wait until they had raised their wall to the height from which defence was possible. Meanwhile, the whole population in the city was to labour at the wall, the Athenians, their wives, and their children, sparing no edifice, private or public, which might be of any use to the work, but throwing all down. After giving these instructions, and adding that he would be responsible for all other matters there, he departed. Arrived at Lacedaemon he did not seek an audience with the authorities, but tried to gain time and made excuses. When any of the government asked him why he did not appear in the assembly,

he would say that he was waiting for his colleagues, who had been detained in Athens by some engagement; however, that he expected their speedy arrival, and wondered that they were not yet there. At first, the Lacedaemonians trusted the words of Themistocles, through their friendship for him; but when others arrived, all distinctly declaring that the work was going on and already attaining some elevation, they did not know how to disbelieve it. Aware of this, he told them that rumours are deceptive, and should not be trusted; they should send some reputable persons from Sparta to inspect, whose report might be trusted. They dispatched them accordingly. Concerning these, Themistocles secretly sent word to the Athenians to detain them as far as possible without putting them under open constraint, and not to let them go until they had themselves returned. For his colleagues had now joined him, Abronichus, son of Lysicles, and Aristides, son of Lysimachus, with the news that the wall was sufficiently advanced; and he feared that when the Lacedaemonians heard the facts, they might refuse to let them go. So the Athenians detained the envoys according to his message, and Themistocles had an audience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t last openly told them that Athens was now fortified sufficiently to protect its inhabitants; that any embassy which the Lacedaemonians or their allies might wish to send to them should in future proce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eople to whom they were going was able to distinguish both its own and the general interests. That when the Athenians thought fit to abandon their city and to embark in their ships, they ventured on that perilous step without consulting them; and that on the other hand, wherever they had deliberated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they had proved themselves to be in judgment second to none. That they now thought it fit that their city should have a wall, and that this would be more for the advantage of both the citizens of Athens and the Hellenic confederacy; for without equal military strength it

was impossible to contribute equal or fair counsel to the common interest. It followed, he observed, either that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onfederacy should be without walls, or that the present step should be considered a right one.

斯巴达人觉察出雅典人意欲何为之后，马上派出一个使团前往雅典。雅典人新近发展起来的海军，以及他们在与波斯人作战中表现出来的勇猛，均令斯巴达的盟邦感到惊恐。斯巴达人这次前来，虽主要是受盟邦的怂恿，但他们自己也不愿看到雅典或其他任何城邦修筑城墙。他们劝雅典不仅不要为自己修筑城墙，而且还要和他们一起推倒伯罗奔尼撒以外诸城邦依然留存的城墙。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时，并没有说明他们的真正用意，即背后对雅典人的疑虑，而是极力强调，这样一来，万一蛮族人第三次来犯，他们就不会像如今在底比斯一样拥有坚固的堡垒作为作战基地了，而伯罗奔尼撒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可以满足所有城邦对基地的需求。听完斯巴达人这番话，雅典人依照塞米斯托克利斯的建议答复说，他们将派代表到斯巴达去商讨这个问题，随后立即把他们打发走了。塞米斯托克利斯要求雅典人尽快将他派往斯巴达，但选出其他代表后暂时不要派出，而是要等到他们把墙砌到足可用于防守的高度再说。其间，雅典须全城出动，雅典城的男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要来筑城墙。任何建筑物，无论是私产还是公产，凡是对筑墙有用者，要一律拆毁。给出这些指示后，塞米斯托克利斯又补充说，斯巴达那里的其余一切事务，他会负责料理，然后他就启程了。抵达斯巴达之后，他并没有马上要求当局接见，而是尽量找借口拖延时间。政府当中如果有人问他为何不在公民大会上露面，他就说他在等他的同僚，他们在雅典有事耽搁了，但是他预计他们很快就能到，他也纳闷他们怎么还没到。起初，出于对他的友好，斯巴达人还相信他的话。但是，当其他从雅典来的人都清清楚楚地说，筑墙工程仍在继续，而且已经达到一定高度，斯巴达人便不能不起疑心了。意识到这一点后，塞米斯托克利斯就对斯巴达人说，谣言靠不住，也不应该信；他们应当从斯巴达派几个可靠的人去查一查，他们的报告可能比较可信。于是，斯巴达人就派人去了。塞

米斯托克利斯随即暗中传话给雅典人，要他们尽量留住这些人，但不要公开予以拘留，待他和他的同僚们回去时再放这些人走。这时，他的同僚们到了。他们是利西克莱斯的儿子阿布罗尼胡斯和利西马科斯的儿子阿里斯蒂德斯。他们带来消息说，城墙已经修得够高了。他猜想，斯巴达人一旦知道实情，有可能拒绝放他们走。雅典人依照他传来的口信留住了那些使者，塞米斯托克里斯去拜见了斯巴达人。他终于坦率地告诉他们，雅典修筑的工事已足以保护它的居民；斯巴达人或他们的盟邦若要派使者去他们那里，以后前往时应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去见的人分得清自己的利益和共同的利益。当雅典人认为应当放弃自己的城市而登上战舰时，他们没与斯巴达人商议就大胆迈出了那危险的一步。再者，每逢与斯巴达人商量问题，他们都证明自己的判断力不亚于任何人。现在他们认为，他们的城市应该有道城墙，这样对雅典的公民和希腊联盟都更有利，因为不具备同等的军事实力，就不可能对共同的利益公平而公正地贡献意见。因此，他认为，要么就让联盟的所有成员都把城墙拆除，要么就应当承认雅典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

The Lacedaemonians did not betray any open signs of anger against the Athenians at what they heard. The embassy, it seems, was prompted not by a desire to obstruct, but to guide the counsels of their government; besides, Spartan feeling was at that time very friendly towards Athens on account of the patriotism which she had displayed in the struggle with the Mede. Still the defeat of their wishes could not but cause them secret annoyance. The envoys of each state departed home without complaint.

听了这番话，斯巴达人没有对雅典人公开表露愤怒之色。他们当初派使团去雅典，似乎也不是想阻止他们，而是为了给他们的政府提供指导性建议。另外，雅典在与波斯人作战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也让斯巴达对雅典颇有好感。不过，他们的希望没有达

成，暗地里也不可能不感到懊恼。双方使者都没有表示抗议，各自返回了自己的城邦。

In this way, the Athenians walled their city in a little while. To this day the building shows signs of the haste of its execution; the foundations are laid of stones of all kinds, and in some places not wrought or fitted, but placed just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were brought by the different hands; and many columns, too, from tombs, and sculptured stones were put in with the rest. For the bounds of the city were extended at every point of the circumference; and so they laid hands on everything without exception in their haste. Themistocles also persuaded them to finish the walls of Piraeus, which had been begun before, in his year of office as archon; being influenced alike by the fineness of a locality that has three natural harbours, and by the great start which the Athenians would gain in the acquisition of power by becoming a naval people. For he first ventured to tell them to stick to the sea and forthwith began to lay the foundations of the empire. It was by his advice, too, that they built the walls of that thickness which can still be discerned round Piraeus, the stones being brought up by two wagons meeting each other. Between the walls thus formed there was neither rubble nor mortar, but great stones hewn square and fitted together, cramped to each other on the outside with iron and lead. About half the height that he intended was finished. His idea was by their size and thickness to keep off the attacks of an enemy; he thought that they might be adequately defended by a small garrison of invalids, and the rest be freed for service in the fleet. For the fleet claimed most of his attention. He saw, as I think, that the approach by sea was easier for the king's army than that by land; he also thought Piraeus more valuable than the upper city; indeed, he was always advising the Athenians, if a day should come when they

were hard pressed by land, to go down into Piraeus, and defy the world with their fleet. Thus, therefore, the Athenians completed their wall, and commenced their other buildings immediately after the retreat of the Mede.

雅典人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为自己的城市修筑了城墙。时至今日，这道城墙依然看得出仓促建成的痕迹。城墙的地基是用五花八门的石头砌成的，有些地方也不严丝合缝，而是拿来哪块就用哪块。很多从墓穴里取来的石柱和雕刻过的石料也同其他石材混在一起用了。城市的四周都有所扩展。仓促之下，凡是能拿到手的材料，全都无一例外地派上了用场。塞米斯托克里斯还说服他们完成了比雷埃夫斯的城墙，那道城墙是他担任执政官那年开始动工的。兴建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那里有三个自然港，地理位置优越；其次，如果雅典成为海上民族，那里可以成为它扩张势力的良好开端。大胆告诉雅典人可以到海上发展扩大帝国势力者，塞米斯托克利斯是第一人。同样也是在他的建议下，雅典人修筑了那么厚的城墙，这种厚城墙如今在比雷埃夫斯周围依然可见，砌墙的石料是两辆四轮马车对着拉上来的。这样砌成的墙中间没有碎石和灰泥，都是把凿成方形的大石头码在一起，外面用铁板和铅板夹住。已完成部分的高度，大约是他计划中的一半。他的用意是依靠城墙的规模和厚度抵御敌人的进攻。照他看来，这种城墙只需由一小部分老少兵员防守即可，其他人则可以省下来为海军效力。他注意的焦点主要是海军。依我之见，他看到了波斯国王的军队从海上比从陆上入侵更容易这一点：他还认为，比雷埃夫斯比上城的地位更重要。实际上，他一直在劝雅典人，倘若有一天他们在陆上陷入困境，不妨下到比雷埃夫斯，用他们的舰队挑战世界。因此，波斯人刚撤走不久，雅典人就完成了城墙的修筑，其他建筑工事随即也开始动工。

Meanwhile, Pausanias, son of Cleombrotus, was sent out from Lacedaemon as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Hellenes, with twenty

ships from Peloponnese. With him sailed the Athenians with thirty ships, and a number of the other allies. They made an expedition against Cyprus and subdued most of the island, and afterwards against Byzantium, which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Medes, and compelled it to surrender. This event took place while the Spartans were still supreme. But the violence of Pausanias had already begun to be disagreeable to the Hellenes, particularly to the Ionians and the newly liberated populations. These resorted to the Athenians and requested them as their kinsmen to become their leaders, and to stop any attempt at violence on the part of Pausanias. The Athenians accepted their overtures, and determined to put down any attempt of the kind and to settle everything else as their interests might seem to demand. In the meantime, the Lacedaemonians recalled Pausanias for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ports which had reached them. Manifold and grave accusations had been brought against him by Hellenes arriving in Sparta; and, to all appearance, there had been in him more of the mimicry of a despot than of the attitude of a general. As it happened, his recall came just at the time when the hatred which he had inspired had induced the allies to desert him, the soldiers from Peloponnese excepted, and to range themselves by the side of the Athenians. On his arrival at Lacedaemon, he was censured for his private acts of oppression, but was acquitted on the heaviest counts and pronounced not guilty; it must be known that the charge of Medism formed one of the principal, and to all appearance one of the best founded, articles against him. The Lacedaemonians did not, however, restore him to his command, but sent out Dorkis and certain others with a small force; who found the allies no longer inclined to concede to them the supremacy. Perceiving this, they departed and the Lacedaemonians did not send out any to succeed them. They feared for those who went out deterioration similar to that observable in Pausanias; besides, they desired to be rid of the

Median War, and were satisfied of the competency of the Athenians for the position, and of their friendship at the time towards themselves.

与此同时，克莱奥姆布罗图斯的儿子保萨尼阿斯，作为希腊联军总司令，从斯巴达奉命率领20艘战舰驶出了伯罗奔尼撒。与他一同出航的还有雅典的30艘舰，以及其他盟邦的若干舰只。他们远征塞浦路斯，征服了岛上大部分土地，后来又去进攻尚在波斯人手中的拜占庭，迫使这个城市投降。这一战事发生时，斯巴达人仍居于盟主之位。但是，保萨尼阿斯的蛮横粗暴已经开始令希腊人不快，尤其是爱奥尼亚人和新解放过来的人。这些人便去向雅典人求助，要求他们以同族人的身份领导他们，以制止保萨尼阿斯的暴行。雅典人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制止他那种做法，将其他诸般事务也按照他们的利益作出安排。斯巴达人其时也接到了多份举报，于是就将保萨尼阿斯召回去进行调查。不少到斯巴达去的希腊人对他提出了多种严重控诉。他的做派显然不像一位将军，倒更像是在模仿一名专制暴君。保萨尼阿斯被召回时，恰巧是他已激起民愤之时。除了伯罗奔尼撒的士兵之外，盟友们都打算弃他而去，改投雅典人门下。他一抵达斯巴达，个人的专横行为便遭到了公开谴责，但他被控犯有的最大罪状却未被认定，因而被宣布无罪。大家一定知道，在对他的指控中，私通波斯是主要罪状之一，显然也是最有根据的一条。不过，斯巴达人也没有恢复他的指挥权，而是派多尔基斯和其他几个人率领一支小部队前去接任。他们去后发现，诸盟邦已不再愿意承认他们的盟主地位了。察觉到这一点之后，他们随即离去，斯巴达人也没有再派人前去继任。他们担心，若把人派出去，在保萨尼阿斯身上所看到的那种腐败现象同样会出现在那些人身上。另外，他们也想从波斯战争中脱身。他们相信雅典人能够胜任总司令一职，同时也相信雅典人当时对他们的友好。

The Athenians, having thus succeeded to the supremacy by the

voluntary act of the allies through their hatred of Pausanias, fixed which cities were to contribute money against the barbarian, which ships; their professed object being to retaliate for their sufferings by ravaging the King's country. Now was the time that the office of “Treasurers for Hellas” was first instituted by the Athenians. These officers received the tribute, as the money contributed was called. The tribute was first fixed at four hundred and sixty talents. The common treasury was at Delos, and the congresses were held in the temple. Their supremacy commenced with independent allies who acted on the resolutions of a common congress. It was marked by the following undertakings in war and in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Median and the present war, against the barbarian, against their own rebel allies, and against the Peloponnesian powers which would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m on various occasions. My excuse for relating these events, and for venturing on this digression, is that this passage of history has been omitted by all my predecessors, who have confined themselves either to Hellenic history before the Median War, or the Median War itself. Hellanicus, it is true, did touch on these events in his Athenian history; but he is somewhat concise and not accurate in his dates. Besides, the history of these events contains an explanation of the growth of the Athenian empire.

由于憎恶保萨尼阿斯，诸盟邦自愿服从了雅典人的领导，雅典人也就这样接过了盟主之位。他们遂分派了哪些城邦出钱，哪些城邦出舰，以抗击蛮族人。他们还公开宣称，他们的目标是践踏波斯国王的国土，以报复他使他们遭受的苦难。“希腊财务官”这一职位，就是这时候由雅典人率先设立的。这些官吏的职责是收取贡金，即各城邦缴纳的款项。贡金的数目最初定为460塔兰特。同盟的金库设在提洛岛上，同盟代表大会也是在那里的神庙里召开。雅典人初登盟主之位时，各盟邦是独立的，但须按照同盟代表大会的决议行事。在波斯战

争与目前这场战争之间这段时间，雅典在作战与管理方面主要做了以下一些事，其中有的是为了抗击蛮族，有的是为了惩治叛离他们的盟邦，有的是为了对付在不同场合与之发生冲突的伯罗奔尼撒城邦。我之所以冒昧偏离主题叙述这些史事，是因为之前的所有史家都对这段历史略而不提。他们不是局限于波斯战争以前的希腊史，就是仅述及波斯战争本身。诚然，赫兰尼科斯在他撰写的雅典史中确实触及过这些史事，但是稍嫌简略，而且年代有失准确。此外，从这些史事中，还可以看出雅典帝国的形成过程。

First, the Athenians besieged and captured Eion on the Strymon from the Medes, and made slaves of the inhabitants, being under the command of Cimon, son of Miltiades. Next they enslaved Scyros, the island in the Aegean, containing a Dolopian population, and colonized it themselves. This was followed by a war against Carystus, in which the rest of Euboea remained neutral, and which was ended by surrender on conditions. After this Naxos left the confederacy, and a war ensued, and she had to return after a siege; this was the first instance of the engagement being broken by the subjugation of an allied city, a precedent which was followed by that of the rest in the order which circumstances prescribed. Of all the causes of defection that connected with arrears of tribute and vessels, and with failure of service, was the chief; for the Athenians were very severe and exacting, and made themselves offensive by applying the screw of necessity to men who were not used to and in fact not disposed for any continuous labour. In some other respects the Athenians were not the old popular rulers they had been at first; and if they had more than their fair share of service, it was correspondingly easy for them to reduce any that tried to leave the confederacy. For this, the allies had themselves to blame; the wish to get off service making most of them arrange to pay their share of the expense in money instead of in ships, and so to avoid having to

leave their homes. Thus while Athens was increasing her navy with the funds which they contributed, a revolt always found them without resources or experience for war.

首先，雅典人在米尔蒂亚季斯之子西蒙的指挥下围攻了斯特鲁马河畔的伊翁，从波斯人手里夺取了它，并把那里的居民变成了奴隶。接着，他们征服了爱琴海中的斯基罗斯岛，将它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那里的居民是多洛皮亚人。随后，他们对卡里斯图斯发动了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埃维亚岛的其他城邦保持中立，战争以对方有条件投降而告终。这次战争之后，纳克索斯岛脱离了同盟，战争随之而起。在遭到围攻后，它不得不又重回同盟。这是雅典违背盟约镇压结盟城邦的首例。同盟的其他成员后来也先后遭到了如此镇压。在引发盟邦叛离的种种原因中，主要是到期不缴纳贡金和战舰以及拒绝服役。雅典人要求严苛，横征暴敛，对那些不习惯、实际上也不愿意不断服劳役的人严打重压，从而失去了民心。在其他方面，雅典人的统治也不再像起初那样民心所向了。如果说他们的服役负担超过了应有的份额，他们控制试图脱离同盟的城邦也相应地容易了。造成这种局面，那些盟邦自身也有责任。由于不想服役，他们大多不提供舰只，而是按份额付款相抵，从而避免远离家乡。这样一来，他们缴纳的贡金就使得雅典的海军不断壮大，而他们发动反叛时却既无战争资源，也无作战经验。

Next we come to the actions by land and by sea at the river Eurymedon, between the Athenians with their allies, and the Medes, when the Athenians won both battles on the same day under the conduct of Cimon, son of Miltiades, and captured and destroyed the whole Phoenician fleet, consisting of two hundred vessels. Some time afterwards occurred the defection of the Thasians, caused by disagreements about the marts on the opposite coast of Thrace, and about the mine in their possession. Sailing with a fleet to Thasos,

the Athenians defeated them at sea and effected a landing on the island. About the same time, they sent ten thousand settlers of their own citizens and the allies to settle the place then called Ennea Hodoi or Nine Ways, now Amphipolis. They succeeded in gaining possession of Ennea Hodoi from the Edonians, but on advancing into the interior of Thrace were cut off in Drabescus, a town of the Edonians, by the assembled Thracians, who regarded the settlement of the place Ennea Hodoi as an act of hostility. Meanwhile, the Thasians, being defeated in the field and suffering siege, appealed to Lacedaemon, and desired her to assist them by an invasion of Attica. Without informing Athens, she promised and intended to do so, but was prevented by the occurrence of the earthquake, accompanied by the secession of the Helots and the Thuriats and Aethaeans of the Perioeci to Ithome. Most of the Helots were the descendants of the old Messenians that were enslaved in the famous war; and so all of them came to be called Messenians. So the Lacedaemonians being engaged in a war with the rebels in Ithome, the Thasians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siege obtained terms from the Athenians by razing their walls, delivering up their ships, and arranging to pay the moneys demanded at once, and tribute in future; giving up their possessions on the continent together with the mine.

接下去，我们要述及的是发生在攸里梅宗河的海战与陆战。这些战事发生在雅典及其盟邦与波斯人之间。在米尔蒂亚季斯之子西蒙的指挥下，雅典人同一天赢得了海战和陆战的双重胜利，俘获并摧毁了拥有200艘战舰的整个腓尼基舰队。其后不久发生了萨索斯人叛变事件，起因是他们在色雷斯海岸对面的市场和其属地的矿山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雅典人率领一支舰队开赴萨索斯，在海上打败了他们，尔后在岛上登了陆。大约在同时，他们从自己的公民及盟邦中派出1万人，让他们移居到了当时叫做“恩内阿-霍季”或“九路”的地方，现在该

地称为安菲波利斯。他们成功地从埃佐尼亚人手中夺取了恩内阿-霍季。但是，在朝色雷斯腹地挺进途中，也就是在埃佐尼亚人的德拉韦斯库斯城，他们却被集合起来的色雷斯人拦住了去路。后者认为他们在恩内阿-霍季建立殖民地是敌对行为。与此同时，由于在战场上被打败后又遭到围攻，萨索斯人吁请斯巴达相助，希望它能入侵阿提卡。斯巴达没有告知雅典就答应了萨索斯人的请求，意欲出兵相助，但后来又为地震所阻。另外，希洛人和珀里俄基人中的苏里亚人和埃塞阿人逃往伊索迈，也使得他们无法出兵。希洛人大多是古代麦西尼亚人的后裔。在那次著名的战争中，他们沦为了奴隶，所以逐渐都被称为麦西尼亚人。这样，斯巴达人就忙着到伊索迈平叛去了。在被围困的第三年，萨索斯人被迫接受了雅典提出的条件：拆毁城墙，交出战舰，立即按要求给付赔款，以后还要缴纳贡金，并且要将大陆上的属地连同矿山一并放弃。

The Lacedaemonians, meanwhile, finding the war against the rebels in Ithome likely to last, invoked the aid of their allies, and especially of the Athenians, who came in some force under the command of Cimon. The reason for this pressing summons lay in their reputed skill in siege operations; a long siege had taught the Lacedaemonians their own deficiency in this art, else they would have taken the place by assault. The first open quarrel between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thenians arose out of this expedition. The Lacedaemonians, when assault failed to take the place, apprehensive of the enterprising and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of the Athenians, and further looking upon them as of alien extraction, began to fear that, if they remained, they might be tempted by the besieged in Ithome to attempt some political changes. They accordingly dismissed them alone of the allies, without declaring their suspicions, but merely saying that they had now no need of them. But the Athenians, aware that their dismissal did not proceed from the more honourable reason of the two, but from suspicions

which had been conceived, went away deeply offended, and conscious of having done nothing to merit such treatment from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 instant that they returned home they broke off the alliance which had been made against the Mede, and allied themselves with Sparta's enemy Argos; each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aking the same oaths and making the same alliance with the Thessalians.

在此期间，斯巴达人发现在伊索迈的平叛之战难以速决，所以就向盟邦请求支援，尤其是向雅典人。雅典人派出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部队，在西蒙的率领下来到斯巴达。斯巴达人之所以迫切要求他们来增援，原因是他们在攻城战技术方面声名卓著，而久攻不下又使斯巴达人看到了自己在这方面存在不足，否则他们肯定就以强攻方式拿下这个地方了。斯巴达人与雅典人首次公开发生冲突，也正是源于这次远征。对这个地方发起强攻失利之后，斯巴达人开始对雅典人的胆量和革命精神感到不安，进而又觉得他们属于异族血统，于是便开始担心，如果他们继续留在这里，或许会在伊索迈城内被围攻者的引诱下试图进行政治变革。因此，在赶来增援的盟军中，他们唯独遣回了雅典人。不过，他们并没有公开表露自己的疑虑，只是说他们现在不需要他们相助了。但是雅典人明白，他们之所以被遣回，不是出于两个原因当中比较体面的那一个，而是出于对他们的怀疑。他们相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可以让斯巴达人如此对待之事，离去时深感气愤。返回雅典之后，他们立刻中断了与其结成的反波斯同盟关系，并且与斯巴达的敌人阿戈斯结了盟。盟约双方继而又以相同的誓言与色萨利人同样结成了联盟。

Meanwhile, the rebels in Ithome, unable to prolong further a ten years' resistance, surrendered to Lacedaemon; the conditions being that they should depart from Peloponnese under safe conduct, and should never set foot in it again: any one who might hereafter

be found there was to be the slave of his captor. It must be known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had an old oracle from Delphi, to the effect that they should let go the suppliant of Zeus at Ithome. So they went forth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wives, and being received by Athens from the hatred that she now felt for the Lacedaemonians, were located at Naupactus, which she had lately taken from the Ozolian Locrians. The Athenians received another addition to their confederacy in the Megarians; who left the Lacedaemonian alliance, annoyed by a war about boundaries forced on them by Corinth. The Athenians occupied Megara and Pegae, and built the Megarians their long walls from the city to Nisaea, in which they placed an Athenian garrison. This was the principal cause of the Corinthians conceiving such a deadly hatred against Athens.

这时候，经过十年的抵抗，伊索迈的叛军再也无力支撑，便投降了斯巴达，条件是让他们在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撤离伯罗奔尼撒，但永不可再踏进那里一步。今后他们如果再来，任何人发现后都可以将其捉为奴隶。大家一定知道，斯巴达人从德尔斐得到过一个古老的神谕，大意是说，他们应当允许在伊索迈向宙斯祈求的人离去。那些人就这样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了。雅典这时已经开始仇视斯巴达人，因而接纳了他们，将他们安置在纳夫帕克图斯。这个地方是雅典新近从奥佐利亚的洛克里斯人手里夺来的。雅典人还接纳迈加拉人加入了他们的同盟。由于科林斯将一场边界之战强加到了他们头上，迈加拉人愤而退出了斯巴达同盟。这样，雅典人就占领了迈加拉和佩耶，帮迈加拉人修筑了从迈加拉城到尼塞阿的长墙，并向那里派驻了一支雅典军队。这就是科林斯人对雅典怀有深仇大恨的主要原因。

Meanwhile, Inaros, son of Psammetichus, a Libyan king of the Libyans on the Egyptian border, having his headquarters at Marea,

the town above Pharos, caused a revolt of almost the whole of Egypt from King Artaxerxes and, placing himself at its head, invited the Athenians to his assistance. Abandoning a Cyprian expedition upon which they happened to be engaged with two hundred ships of their own and their allies, they arrived in Egypt and sailed from the sea into the Nile, and making themselves masters of the river and two-thirds of Memphis, addressed themselves to the attack of the remaining third, which is called White Castle. Within it were Persians and Medes who had taken refuge there, and Egyptians who had not joined the rebellion.

与此同时，埃及边境上那些利比亚人的利比亚国王伊纳罗斯（普萨迈蒂胡斯之子）将指挥部设在法罗斯岛那边的马雷阿城，几乎发动整个埃及参加了暴动，力图摆脱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的统治。他自立为王，并请求雅典人给予援助。雅典人碰巧准备带着他们自己与盟邦的200艘舰出征塞浦路斯。他们放弃这次远征，转而来到埃及，从海上进入尼罗河。控制了这条河以及孟斐斯城的三分之二后，他们开始全力进攻其余那三分之一，一个叫做“白塞”的地方。避难的波斯人和米底人以及没有参加暴动的埃及人都在那里。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making a descent from their fleet upon Haliae, were engaged by a force of Corinthians and Epidaurians; and the Corinthians were victorious. Afterwards the Athenians engaged the Peloponnesian fleet off Cecruphalia; and the Athenians were victorious. Subsequently war broke out between Aegina and Athens, and there was a great battle at sea off Aegina between the Athenians and Aeginetans, each being aided by their allies; in which victory remained with the Athenians, who took seventy of the enemy's ships, and landed in the country and commenced a siege under the command of Leocrates, son of

Stroebus. Upon this, the Peloponnesians, desirous of aiding the Aeginetans, threw into Aegina a force of three hundred heavy infantry, who had before been serving with the Corinthians and Epidaurians. Meanwhile, the Corinthians and their allies occupied the heights of Geraneia, and marched down into the Megarid, in the belief that, with a large force absent in Aegina and Egypt, Athens would be unable to help the Megarians without raising the siege of Aegina. But the Athenians, instead of moving the army of Aegina, raised a force of the old and young men that had been left in the city, and marched into the Megarid under the command of Myronides. After a drawn battle with the Corinthians, the rival hosts parted, each with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had gained the victory. The Athenians, however, if anything, had rather the advantage, and on the departure of the Corinthians, set up a trophy. Urged by the taunts of the elders in their city, the Corinthians made their preparations, and about twelve days afterwards came and set up their trophy as victors. Sallying out from Megara, the Athenians cut off the party that was employed in erecting the trophy, and engaged and defeated the rest. In the retreat of the vanquished army, a considerable division, pressed by the pursuers and mistaking the road, dashed into a field on some private property, with a deep trench all round it, and no way out. Being acquainted with the place, the Athenians hemmed their front with heavy infantry and, placing the light troops round in a circle, stoned all who had gone in. Corinth here suffered a severe blow. The bulk of her army continued its retreat home.

与此同时，雅典人的舰队在哈利埃登陆时，科林斯人和埃皮达鲁斯人组成的一支部队上前与之交战，结果科林斯人获得了胜利。后来，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在凯克鲁法利亚附近交战，雅典人获得了胜利。随后，埃伊纳与雅典之间爆发了战争。雅典人与埃伊纳

人在埃伊纳附近的海面展开了大规模海战，双方都有盟邦相助。在这场海战中，胜利仍归于雅典人。他们缴获了70艘敌舰，在埃伊纳登了陆，并在斯特里武斯之子莱奥克拉泰斯的指挥下开始围攻这个地方。得知这一情况，很想援助埃伊纳人的伯罗奔尼撒人派遣一支300人的重步兵部队来到埃伊纳。这支部队以前曾与科林斯人和埃皮达鲁斯人并肩作战。与此同时，科林斯人及其盟友占领了耶拉尼亚的高地，并从那里下到了迈加里德。他们认为，既然雅典人已将一支大部队派往埃伊纳和埃及，要是不解除对埃伊纳的包围，他们一定无法帮助迈加拉人。但是，雅典人非但没有从埃伊纳撤军，反而召集留在雅典城的老人和年轻人组成了一支部队，在米罗尼泽斯的率领下开进了迈加里德。他们与科林斯人的战斗未分出胜负，双方收兵时都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不过，如果说谁占了点上风，那就是雅典人。科林斯人离去后，他们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科林斯人经不住本城长者的奚落，于是便做好准备，大约在十二天后，又回来竖立起他们的胜利纪念柱，以表明自己是胜利者。雅典人却突然从迈加拉冲出来，击溃了竖立纪念柱的分队，接着又与其余敌军交战，并将他们打败。战败了的科林斯人撤退时，一支人数可观的队伍被追得走错了路，冲进一处私人地产。那里四周深沟环绕，根本没有出路。雅典人却很熟悉那个地方。他们用重步兵堵住正面，让轻步兵对其余部分形成包围之势，将进去的敌人全部用石头砸死了。科林斯人在这里遭到了沉重打击。他们的大部分军队则继续撤往本邦。

About this time, the Athenians began to build the long walls to the sea, that towards Phalerum and that towards Piraeus. Meanwhile, the Phocians made an expedition against Doris, the old home of the Lacedaemonians, containing the towns of Boeum, Kitinium, and Erineum. They had taken one of these towns, when the Lacedaemonians under Nicomedes, son of Cleombrotus, commanding for King Pleistoanax, son of Pausanias, who was still a minor, came to the aid of the Dorians with fifteen hundred heavy infantry of their own, and ten thousand of their allies. After

compelling the Phocians to restore the town on conditions, they began their retreat. The route by sea, across the Crissaean Gulf, exposed them to the risk of being stopped by the Athenian fleet; that across Geraneia seemed scarcely safe, the Athenians holding Megara and Pegae. For the pass was a difficult one, and was always guarded by the Athenians; and, in the present instance, the Lacedaemonians had information that they meant to dispute their passage. So they resolved to remain in Boeotia, and to consider which would be the safest line of march. They had also another reason for this resolve. Secret encouragement had been given them by a party in Athens, who hoped to put an end to the reign of democracy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Long Walls.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marched against them with their whole levy and a thousand Argives and the respective contingents of the rest of their allies. Altogether they were fourteen thousand strong. The march was prompted by the notion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were at a loss how to effect their passage, and also by suspicions of an attempt to overthrow the democracy. Some cavalry also joined the Athenians from their Thessalian allies; but these went over to the Lacedaemonians during the battle.

大约在这个时候，雅典人开始修筑通向海边的两条长墙，一条至法莱鲁姆，一条至比雷埃夫斯。与此同时，福基斯人对多利斯地区发动了一次远征。那里是斯巴达人的老家，比夫姆、基蒂尼乌姆和埃里内夫姆这些城镇都在那里。他们攻克了其中一座城后，斯巴达人派出自己的1,500名重步兵和1万名盟军前去增援多里安人。当时保萨尼阿斯的儿子普利斯托阿纳克斯国王尚且年幼，这支部队由克莱奥姆布罗图斯的儿子尼科梅德斯代为指挥。他们迫使福基斯人依照条件归还了该城，之后便开始撤退。若走水路，他们就得横渡克里塞湾，这样就有被雅典舰队拦阻的危险。若从耶拉尼亚山走，似乎也难有安全可言，因为雅典人正占据着迈加拉和佩耶。这个关口本来就很难行，而

且总有雅典人在把守。在目前的情况下，斯巴达人又得到消息说，雅典人打算阻止他们通过。因此，他们决定先留在维奥蒂亚，考虑一下走哪条路线最安全。他们作此决定，还有一个原因。雅典有一个党派曾秘密给他们做工作，希望能结束民主统治并停止修筑长墙。同时，雅典人出动他们征召到的全部兵力，外加1,000名阿尔戈斯人和其余盟邦的各个分遣队，大举向他们袭来。这支部队的兵力加起来共有1.4万人。雅典人实施这次突袭，一则是认为斯巴达人在返途问题上不知所措，二则是怀疑他们有颠覆民主政治的企图。色萨利地区那些盟邦的一些骑兵本来也加入了雅典人的队伍，但是在战斗过程中，他们又转而投奔了斯巴达人。

The battle was fought at Tanagra in Boeotia. After heavy loss on both sides, victory declared for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After entering the Megarid and cutting down the fruit trees, the Lacedaemonians returned home across Geraneia and the isthmus. Sixty-two days after the battle the Athenians marched into Boeotia under the command of Myronides, defeated the Boeotians in battle at Oenophyta, and became masters of Boeotia and Phocis. They dismantled the walls of the Tanagraeans, took a hundred of the richest men of the Opuntian Locrians as hostages, and finished their own long walls. This was followed by the surrender of the Aeginetans to Athens on conditions; they pulled down their walls, gave up their ships, and agreed to pay tribute in future. The Athenians sailed round Peloponnese under Tolmides, son of Tolmaeus, burnt the arsenal of Lacedaemon, took Chalcis, a town of the Corinthians, and in a descent upon Sicyon defeated the Sicyonians in battle.

会战是在维奥蒂亚境内的塔纳格拉进行的。双方都遭到惨重伤亡之后，斯巴达人及其盟军宣布获得了胜利。他们进入迈加里德，砍倒

那里的果树，经由耶拉尼亚山和地峡返回了本邦。战役结束六十二天后，雅典人在米罗尼泽斯的率领下开进维奥蒂亚，在伊诺菲塔的战斗中打败维奥蒂亚人，成为了维奥蒂亚和福基斯的主人。他们拆除塔纳格拉人的城墙，将奥珀斯的洛克里斯人中最富有的100人扣作人质，同时筑完了他们自己的长墙。随后，埃伊纳人向雅典有条件投降。他们拆毁长墙，交出战舰，并答应以后缴纳贡金。在托尔迈夫斯的儿子托尔米泽斯的指挥下，雅典人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航行了一圈，烧毁了斯巴达的船坞，攻取了科林斯人的城镇哈尔基斯，在西锡安登陆时打败了西锡安人。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in Egypt and their allies were still there, and encountered all the vicissitudes of war. First, the Athenians were masters of Egypt, and the King sent Megabazus a Persian to Lacedaemon with money to bribe the Peloponnesians to invade Attica and so draw off the Athenians from Egypt. Finding that the matter made no progress, and that the money was only being wasted, he recalled Megabazus with the remainder of the money, and sent Megabuzus, son of Zopyrus, a Persian, with a large army to Egypt. Arriving by land he defeated the Egyptians and their allies in a battle, and drove the Hellenes out of Memphis, and at length shut them up in the island of Prosopitis, where he besieged them for a year and six months. At last, draining the canal of its waters, which he diverted into another channel, he left their ships high and dry and joined most of the island to the mainland, and then marched over on foot and captured it. Thus the enterprise of the Hellenes came to ruin after six years of war. Of all that large host a few travelling through Libya reached Cyrene in safety, but most of them perished. And thus Egypt returned to its subjection to the King, except Amyrtaeus, the king in the marshes, whom they were unable to capture from the extent of the marsh; the marshmen being also the most warlike of the Egyptians. Inaros, the Libyan

king, the sole author of the Egyptian revolt, was betrayed, taken, and crucified. Meanwhile, a relieving squadron of fifty vessels had sailed from Athens and the rest of the confederacy for Egypt. They put in to shore at the Mendesian mouth of the Nile, in total ignorance of what had occurred. Attacked on the land side by the troops, and from the sea by the Phoenician navy, most of the ships were destroyed; the few remaining being saved by retreat. Such was the end of the great expedition of the Athenians and their allies to Egypt.

这时候，在埃及的雅典人及其盟军仍未离去，在那里历经战争的沧桑变化。起初，雅典人控制了埃及。波斯国王派出一个名叫梅加巴祖斯的波斯人，让他带着钱到斯巴达去收买伯罗奔尼撒人，目的是想让他们入侵阿提卡，迫使雅典人撤离埃及。后来，他发现事情毫无进展，不过是在白白浪费钱财，所以就让梅加巴祖斯带着剩下的钱回去了。然后，他又派波斯人佐皮鲁斯之子梅加布祖斯率领一支大军奔赴埃及。梅加布祖斯从陆路抵达之后，在一次战斗中击败埃及人及其盟军，将希腊人赶出孟斐斯，最后把他们封锁在普罗索皮蒂斯岛，将他们围困了一年零六个月。最后，他采取让水流改道的办法排干运河里的水，终于使希腊人的战舰搁浅，使该岛大部与大陆连了起来。然后，他们徒步走过去夺取了这个岛。经过六年的战争，希腊人的这次远征就这样逐渐走向了失败。那支大军中除了少数人经利比亚安全抵达了昔兰尼，几乎全军覆没。这样，埃及又回到了波斯国王的统治之下，只有沼泽地带的阿米尔泰乌斯国王不在其中。那片沼泽面积很广，他们根本无法捉到他，而且沼泽地的居民又是埃及人当中最好战的。利比亚国王伊纳罗斯，埃及暴动的唯一发起人，则在为人所卖和捉获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与此同时，一个由50艘战舰组成的救援中队从雅典和同盟内其他城邦出发向埃及驶来。他们在尼罗河的门德西亚河口上了岸，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全然不晓。在腓尼基海军和波斯军队的水陆夹击下，他们的大部分舰只被毁，剩下的几艘赶紧撤走了，这才得以保全。这就是雅典人及其盟军对埃及这次大规模远征的结

局。

Meanwhile, Orestes, son of Echecratidas, the Thessalian king, being an exile from Thessaly, persuaded the Athenians to restore him. Taking with them the Boeotians and Phocians their allies, the Athenians marched to Pharsalus in Thessaly. They becam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though only in the immediate vicinity of the camp; beyond which they could not go for fear of the Thessalian cavalry. But they failed to take the city or to attain any of the other objects of their expedition, and returned home with Orestes without having effected anything. Not long after this a thousand of the Athenians embarked in the vessels that were at Pegae (Pegae, it must be remembered, was now theirs), and sailed along the coast to Sicyon under the command of Pericles, son of Xanthippus. Landing in Sicyon and defeating the Sicyonians who engaged them, they immediately took with them the Achaeans and, sailing across, marched against and laid siege to Oeniadae in Acarnania. Failing however to take it, they returned home.

与此同时，被逐出色萨利的色萨利国王，即埃海克拉蒂扎斯的儿子奥雷斯泰斯，劝雅典人帮助他恢复王位。雅典人带上盟友维奥蒂亚人和福基斯人，朝着色萨利的法萨卢斯开赴而去。他们控制了这里的乡村地带，不过却仅限于在营地附近活动。由于怕遭到色萨利骑兵的袭击，他们不敢超出这一范围。但是，他们并没有攻下这座城，也未能实现这次远征的其他目标，后来便一无所获地带着奥雷斯泰斯返回雅典去了。其后不久，1,000名雅典人在佩耶（大家一定记得，佩耶此时已归他们所有）登上战舰，在桑西普斯之子佩里克莱斯的指挥下，沿着海岸驶向西锡安。在西锡安登陆后，他们打败了前来迎战他们的西锡安人，随即带着亚该亚人驶过海湾，开赴阿卡纳尼亚的俄尼阿达，对该城实施了围攻。不过，他们未能攻克这座城，于是就返回

雅典去了。

Three years afterwards a truce was made between the Peloponnesians and Athenians for five years. Released from Hellenic war, the Athenians made an expedition to Cyprus with two hundred vessels of their own and their allies, under the command of Cimon. Sixty of these were detached to Egypt at the instance of Amyrtaeus, the king in the marshes; the rest laid siege to Kitium, from which, however, they were compelled to retire by the death of Cimon and by scarcity of provisions. Sailing off Salamis in Cyprus, they fought with the Phoenicians, Cyprians, and Cilicians by land and sea, and, being victorious on both elements departed home, and with them the returned squadron from Egypt. After this, the Lacedaemonians marched out on a sacred war, and, becoming masters of the temple at Delphi, it in the hands of the Delphians. Immediately after their retreat, the Athenians marched out, became masters of the temple, and placed it in the hands of the Phocians.

三年之后，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缔结了为期五年的休战和约。从希腊的战争中脱身之后，雅典人派出自己和盟邦的200艘战舰，在西蒙的率领下向塞浦路斯发起了远征。其中60艘战舰，在埃及沼泽地区国王阿米尔泰乌斯的请求下，被分派去了埃及，其余舰只包围了基蒂乌姆。然而，西蒙之死和给养的缺乏，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撤离那里。驶离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之后，他们曾与腓尼基人、塞浦路斯人和西利西亚人发生陆战与海战。双双获胜之后，他们与从埃及回来的那个海军中队一起启程返航了。在这之后，斯巴达人出兵参加了神圣战争。他们控制了德德尔斐的神庙后，把它交给了德尔斐人。他们一撤走，雅典人紧接着就占领了神庙，把它交给了福基斯人。

Some time after this, Orchomenus, Chaeronea, and some other places in Boeotia being in the hands of the Boeotian exiles, the Athenians marched against the above-mentioned hostile places with a thousand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and the allied contingents, under the command of Tolmides, son of Tolmaeus. They took Chaeronea, and made slaves of the inhabitants, and, leaving a garrison, commenced their return. On their road, they were attacked at Coronea by the Boeotian exiles from Orchomenus, with some Locrians and Euboean exiles, and others who were of the same way of thinking, were defeated in battle, and some killed, others taken captive. The Athenians evacuated all Boeotia by a treaty providing for the recovery of the men; and the exiled Boeotians returned, and with all the rest regained their independence.

不久之后，由于奥尔霍迈诺斯、喀罗尼亚以及维奥蒂亚的其他一些地方落到了维奥蒂亚流亡者手中，雅典人派出1,000名雅典重步兵和部分盟军，在托尔迈夫斯之子托尔米泽斯的率领下向上述敌对地区发起了进军。他们攻克喀罗尼亚，将那里的居民降为奴隶，留下一支驻军，尔后踏上了回程之路。返程途中，他们在科罗尼亚遭到袭击。袭击者是从奥尔霍迈诺斯来的维奥蒂亚流亡者，另外还有一些洛克里斯人和埃维亚流亡者，以及其他一些持相同看法的人。雅典人在战斗中失利，一些人被杀死，余者被俘。雅典人通过谈判订立条约要回了被俘的士兵，以撤出整个维奥蒂亚为代价。流亡的维奥蒂亚人复归本邦，与其他所有人一起重获独立。

This was soon afterwards followed by the revolt of Euboea from Athens. Pericles had already crossed over with an army of Athenians to the island, when news was brought to him that Megara had revolted, that the Peloponnesians were on the point of

invading Attica, and that the Athenian garrison had been cut off by the Megaria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few who had taken refuge in Nisaea. The Megarians had introduced the Corinthians, Sicyonians, and Epidaurians into the town before they revolted. Meanwhile, Pericles brought his army back in all haste from Euboea. After this, the Peloponnesians marched into Attica as far as Eleusis and Thrius, ravaging the country under the conduct of King Pleistoanax, the son of Pausanias, and without advancing further returned home. The Athenians then crossed over again to Euboea under the command of Pericles, and subdued the whole of the island: all but Histiaea was settled by convention; the Histiaeans they expelled from their homes, and occupied their territory themselves.

此后不久，埃维亚叛离了雅典。伯里克利率领雅典军队渡过海峡驶向该岛后方才获悉，迈加拉已经叛离，伯罗奔尼撒人即将入侵阿提卡，雅典守军已被迈加拉人消灭，仅有少数躲到了尼塞阿。迈加拉人叛离之前，已经将科林斯人、西锡安人和埃皮达鲁斯人引入城内。这时候，伯里克利只有率军火速撤出埃维亚。在这之后，伯罗奔尼撒人在保萨尼阿斯之子普利斯托阿纳克斯国王的指挥下长驱直入阿提卡，一路大肆劫掠，直抵埃莱夫西斯和斯里乌斯。不过，他们没再继续向前推进便撤回了本邦。后来，伯里克利又率雅典人渡过海峡来到埃维亚，征服了整个岛屿。他们让所有居民都按协定安顿下来，只有希斯蒂亚的居民被排除在外。他们将希斯蒂亚人逐出家园，占据了他们的土地。

Not long after their return from Euboea, they made a truce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for thirty years, giving up the posts which they occupied in Peloponnese—Nisaea, Pegae, Troezen, and Achaia. In the sixth year of the truce, war broke out between the Samians and Milesians about Priene. Worsted in the

war, the Milesians came to Athens with loud complaints against the Samians. In this, they were joined by certain private persons from Samos itself, who wished to revolutionize the government. Accordingly, the Athenians sailed to Samos with forty ships and set up a democracy; took hostages from the Samians, fifty boys and as many men, lodged them in Lemnos, and after leaving a garrison in the island returned home. But some of the Samians had not remained in the island, but had fled to the continent. Making an agreement with the most powerful of those in the city, and an alliance with Pissuthnes, son of Hystaspes, the then satrap of Sardis, they got together a force of seven hundred mercenaries, and under cover of night crossed over to Samos. Their first step was to rise on the commons, most of whom they secured; their next to steal their hostages from Lemnos; after which they revolted, gave up the Athenian garrison left with them and its commanders to Pissuthnes, and instantly prepared for an expedition against Miletus. The Byzantines also revolted with them.

他们从埃维亚回来之后不久，即放弃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所占之地——尼塞阿、佩耶、特里曾和亚该亚，与斯巴达人及其盟邦订立了三十年休战和约。休战和约订立后的第六年，萨摩斯人与米利都人都为争夺普里恩爆发了战争。在战争中被打败之后，米利都人来到雅典对萨摩斯人提出强烈控诉。他们的控诉得到了萨摩斯岛某些个人的声援，这些人希望能够对政府进行彻底改革。于是，雅典人带着40艘战舰驶往萨摩斯，在那里建立了民主政体。他们还从萨摩斯人中带走了50名少年和同样数量的成年男子作为人质，将他们安置在利姆诺斯岛。雅典人在岛上留下一支守备部队，然后返回了雅典。但是，有些萨摩斯人没留在岛上，而是逃往大陆去了。他们与城内最有势力的人达成协议，又与希斯塔斯普的儿子皮苏斯内斯（时任萨迪斯总督）结为同盟，然后召集起一支700人的雇佣军，在夜幕的掩护下渡海来到萨摩斯岛。他们首先造了民主党的反，把大多数民主党人关了起来；

接着，他们又偷偷从利利姆诺斯带回了人质。其后，暴动就开始了。他们把雅典人留在他们那里的守备部队及其指挥官统统交给皮苏斯内斯，随即准备对米利都发动远征。拜占庭人也和他们一起参加了暴动。

As soon as the Athenians heard the news, they sailed with sixty ships against Samos. Sixteen of these went to Caria to look out for the Phoenician fleet, and to Chios and Lesbos carrying round orders for reinforcements, and so never engaged; but forty-four ships under the command of Pericles with nine colleagues gave battle, off the island of Tragia, to seventy Samian vessels, of which twenty were transports, as they were sailing from Miletus. Victory remained with the Athenians.

雅典人闻听此讯，立即派出60艘战舰向萨摩斯开去。其中16艘分别去往卡里亚，以防范腓尼基人的舰队，还有希俄斯岛和莱斯沃斯岛，以传达增援命令，所以一直没有参加战斗。其余44艘战舰由伯里克利指挥，另配有9名副将。他们在特拉伊亚岛附近与从米利都驶回的70艘萨摩斯船舰（其中20艘为运输船）展开了战斗。结果，雅典人获得了胜利。

Reinforced afterwards by forty ships from Athens, and twenty-five Chian and Lesbian vessels, the Athenians landed, and having the superiority by land invested the city with three walls; it was also invested from the sea. Meanwhile, Pericles took sixty ships from the blockading squadron, and departed in haste for Caunus and Caria, intelligence having been brought in of the approach of the Phoenician fleet to the aid of the Samians; indeed, Stesagoras and others had left the island with five ships to bring them.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Samians made a sudden sally, and fell on the camp, which they found unfortified. Destroying the look-out vessels, and engaging and defeating such as were being launched to meet them; they remained masters of their own seas for fourteen days, and carried in and carried out what they pleased. But on the arrival of Pericles, they were once more shut up. Fresh reinforcements afterwards arrived—forty ships from Athens with Thucydides, Hagnon, and Phormio; twenty with Tlepolemus and Anticles, and thirty vessels from Chios and Lesbos. After a brief attempt at fighting, the Samians, unable to hold out, were reduced after a nine months' siege and surrendered on conditions; they razed their walls, gave hostages, delivered up their ships, and arranged to pay the expenses of the war by instalments. The Byzantines also agreed to be subject as before.

后来，雅典人听到这个消息，又派来40艘战舰，希俄斯和莱斯沃斯也派来25艘。在这些舰只的增援下，雅典人在萨摩斯岛登了陆。在陆地上占据优势之后，他们在三面筑墙，对该城形成了包围之势，同时还从海上对它实行了封锁。这时候，伯里克利得到消息说，前来援助萨摩斯人的腓尼基舰队正在逼近，于是他从执行封锁任务的海军中队中抽出60艘舰只，火速启航前往卡夫努斯和卡里亚。的确，斯泰萨戈拉斯和其他一些人带着5艘舰离开萨摩斯岛，到腓尼基搬救兵去了。但是，在此期间，萨摩斯人却突然冲出来扑向雅典人的营地，结果发现那里根本没有设防。他们捣毁负责警戒的舰只，打败迎上前来与他们交战的战舰，在自己的海面上当了十四天主人，随心所欲地运输往来物资。然而，伯里克利一到，他们又被封锁起来了。后来，雅典方面又来了新的增援部队——由修昔底德、哈格农和福尔米奥指挥的40艘战舰，由特莱波莱穆斯和安蒂克莱斯指挥的20艘，以及从希俄斯和莱斯沃斯来的30艘。短暂的交战之后，萨摩斯人就支撑不住了。经过九个月的围攻，他们被迫屈服，接受了投降条件。他们拆毁自己的城墙，交还了人质，交出了舰只，并承诺分期支付战争赔偿款。拜

占庭人也同意恢复以前的臣属关系。

CHAPTER V Second Congress at Lacedaemon—Preparations for War and Diplomatic Skirmishes—Cylon—Pausanias—Themistocles

第五章　在斯巴达举行的第二次同盟大会——战争准备与外交摩擦——基隆——保萨尼阿斯——塞米斯托克利斯

After this, though not many years later, we at length come to what has been already related, the affairs of Corcyra and Potidaea, and the events that served as a pretext for the present war. All these actions of the Hellenes against each other and the barbarian occurred in the fifty years' interval between the retreat of Xerx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war. During this interval, the Athenians succeeded in placing their empire on a firmer basis, and advanced their own home power to a very great height. The Lacedaemonians, though fully aware of it, opposed it only for a little while, but remained inactive during most of the period, being of old slow to go to war except under the pressure of necessity, and in the present instance being hampered by wars at home; until the growth of the Athenian power could be no longer ignored, and their own confederacy became the object of its encroachments. They then felt that they could endure it no longer, but that the time had come for them to throw themselves heart and soul upon the hostile power, and break it, if they could, by commencing the present war. And though the Lacedaemonians had made up their own minds on the fact of the breach of the treaty and the guilt of the Athenians, yet they sent to Delphi and inquired of the God whether it would be well with them if they went to war; and, as it is reported, received from him the answer that if they put their whole strength into the war, victory would be theirs, and the promise that he himself would

be with them, whether invoked or uninvoked. Still they wished to summon their allies again, and to take their vote on the propriety of making war. After the ambassadors from the confederates had arrived and a congress had been convened, they all spoke their minds, most of them denouncing the Athenians and demanding that the war should begin,in particular the Corinthians. They had before on their own account canvassed the cities in detail to induce them to vote for the war, in the fear that it might come too late to save Potidaea; they were present also on this occasion, and came forward the last, and made the following speech:

不几年之后，前文已述及的克基拉事件、波提狄亚事件和可为目前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提供借口的一些事情终于发生了。希腊人相互之间以及与蛮族人之间这些敌对行动，全都发生在薛西斯败退至目前这场战争开始这五十年间。在这段时间里，雅典人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帝国，极大地增强了自己在希腊的势力。斯巴达人虽然对这种情况了然于胸，却只是短暂地表示过反对，在大部分时间里均不积极采取行动。除非迫不得已，他们总是迟迟不诉诸于战争，目前则是被本邦的战乱拖住了手脚，以致雅典的势力增长到再也不能令人忽视的地步，他们自己的同盟也成了被蚕食的目标，这时他们才感到，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他们该全力以赴地迎战敌对势力了。如果可能，他们想通过发动目前这场战争将其摧毁。基于和约已被破坏而且错在雅典这一事实，斯巴达人虽然已经下定决心开战，但他们还是派人到德尔斐去问神，想知道投入战争对自己是否有利。据说，神的回答是这样的：如果他们全力投入战争，胜利将属于他们。另外神还允诺，无论他们祈求与否，将与他们同在。尽管如此，斯巴达人还是希望将诸盟邦再度召来，就宣战妥当与否进行表决。各盟邦的代表到达之后，同盟大会随即召开。代表们纷纷畅所欲言，大多数都对雅典人表示谴责并要求开战，尤其是科林斯人。他们担心拖得太晚会来不及援救波提狄亚，此前就曾派代表去游说各个城邦，劝他们投票支持开战。这次他们自己也到会了。他们的代表最后一个走上前来，作了

如下发言：

“Fellow allies, we can no longer accuse the Lacedaemonians of having failed in their duty; they have not only voted for war themselves, but have assembled us here for that purpose. We say their duty, for supremacy has its duties. Besides equitably administering private interests, leaders are required to show a special care for the common welfare in return for the special honours accorded to them by all in other ways. For ourselves, all who have already had dealings with the Athenians require no warning to be on their guard against them. The states more inland and out of the highway of communication should understand that, if they omit to support the coast powers, the result will be to injure the transit of their produce for exportation and the reception in exchange of their imports from the sea; and they must not be careless judges of what is now said, as if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m, but must expect that the sacrifice of the powers on the coast will one day be followed by the extension of the danger to the interior, and must recognize that their own interests are deeply involved in this discussion. For these reasons they should not hesitate to exchange peace for war. If wise men remain quiet, while they are not injured, brave men abandon peace for war when they are injured, returning to an understanding on a favourable opportunity; in fact, they are neither intoxicated by their success in war, nor disposed to take an injury for the sake of the delightful tranquillity of peace. Indeed, to falter for the sake of such delights is, if you remain inactive, the quickest way of losing the sweets of repose to which you cling; while to conceive extravagant pretensions from success in war is to forget how hollow is the confidence by which you are elated. For if many ill-conceived plans have succeeded through the still greater fatuity of an opponent,

many more, apparently well laid, have on the contrary ended in disgrace. The confidence with which we form our schemes is never completely justified in their execution; speculation is carried on in safety, but, when it comes to action, fear causes failure.”

“盟友们：我们再也不能指责斯巴达人不履行他们的职责了。他们不仅自己投票赞成开战，还为此将我们召集到了这里。我们之所以说到他们的职责，是因为盟主确有职责在身。除了公正地掌管自己的利益之外，作为领导者，还要特别关注我们共同的安康，以回报大家以其他方式对他们的特殊尊崇。至于我们自己，凡是与雅典人打过交道者，无需他人提醒就会提防雅典人。地处内陆和远离交通干线的城邦则要清楚，如果不支持滨海城邦，将会影响到自己产品的输出通路，还会难以从海上换回要输入的物资。因此，万万不可不仔细斟酌我们现在所说的话，好像此事与己无关似的，而是一定要想到，如果牺牲掉滨海城邦，总有一天危险会蔓延到内陆上来。这些城邦还要认识到，他们自身的利益与现在讨论的问题息息相关。鉴于以上原因，这些城邦应当毫不犹豫地以战争换取和平。如果说，人不犯我，我不妄动，可谓智者；那么，人若犯我，我弃和平而战之，待合适时机再寻求和解，乃是勇者。事实上，我们既不会陶醉于战争的胜利，也不会为了换取和平带来的那令人快乐的安宁而甘受侵害。实际上，如果不积极行动起来，为了享受这种快乐而迟疑不决，恰恰会最快失去你执意不肯放手的那种美好的宁静；若是因为战争的胜利而过分自负，则会忘记你为之得意的这种自信是多么空洞。不少构思拙劣的计划，常因对手更甚一步的愚昧而侥幸成功；更常见的是，明明十分完备的计划，反而以不光彩的结局告终。制定计划时持有的信心，执行计划时从来不会完整依旧；筹划时觉得万无一失，付诸行动时却会因恐惧而导致失败。

“To apply these rules to ourselves, if we are now kindling war it is under the pressure of injury, with adequate grounds of

complaint; and after we have chastised the Athenians we will in season desist. We have many reasons to expect success—first, superiority in numbers and in military experience, and secondly our general and unvarying obedience in the execution of orders. The naval strength which they possess shall be raised by us from our respective antecedent resources, and from the moneys at Olympia and Delphi. A loan from these enables us to seduce their foreign sailors by the offer of higher pay. For the power of Athens is more mercenary than national; while ours will not be exposed to the same risk, as its strength lies more in men than in money. A single defeat at sea is in all likelihood their ruin: should they hold out, in that case there will be the more time for us to exercise ourselves in naval matters; and as soon as we have arrived at equality in science, we need scarcely ask whether we shall be their superiors in courage. For the advantages that we have by nature they cannot acquire by education; while their superiority in science must be removed by our practice. The money required for these objects shall be provided by our contributions; nothing indeed could be more monstrous than the suggestion that, while their allies never tire of contributing for their own servitude, we should refuse to spend for vengeance and self-preservation the treasure which by such refusal we shall forfeit to Athenian rapacity and see employed for our own ruin.”

“联系这些规律来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现在点燃战火，那是由于被侵害所迫，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发出抗议的怒火。在惩罚了雅典人之后，我们将会适时罢手。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期待胜利——首先，我们在人数和军事经验方面占有优势；其次，我们大家一直都很服从命令听指挥。他们的海军实力的确很强。但是，我们利用各自现有的资源以及奥林匹亚和德尔斐的金钱，同样可以提升我们海军的实力。利用从这些地方借贷来的款项，我们可以用高薪吸引他们海军中的外

来水兵。雅典的势力主要靠的是雇佣兵，而不是本邦兵员。我们则不必冒此风险，因为我们的优势主要在于人，而不是在于钱。只要在海上打一个败仗，他们就很可能遭受灭顶之灾。他们若是硬撑下去，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操练海军战术。一旦我们在技巧方面达到同等水平，在勇气方面我们是否胜得过他们，几乎没有问的必要。我们天生具有的长处，他们通过教育无法获得。他们在技巧上的优势，我们却可以通过操练将其抵消。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金钱，要由我们大家来提供。他们的盟邦从来没停止过通过缴纳贡金来维持自己被奴役的地位，我们如果为了复仇和自卫都不肯花费钱财，那就等于任由财富被雅典人夺去，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用它来毁灭我们自己。老实说，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We have also other ways of carrying on the war, such as revolt of their allies, the surest method of depriving them of their revenu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their strength, and establishment of fortified positions in their country, and various operations which cannot be foreseen at present. For war of all things proceeds least upon definite rules, but draws principally upon itself for contrivances to meet an emergency; and in such cases the party who faces the struggle and keeps his temper best meets with most security, and he who loses his temper about it with correspondent disaster. Let us also reflect that if it was merely a number of disputes of territory between rival neighbours, it might be borne; but here we have an enemy in Athens that is a match for our whole coalition, and more than a match for any of its members; so that unless as a body and as individual nationalities and individual cities we make an unanimous stand against her, she will easily conquer us divided and in detail. That conquest, terrible as it may sound, would, it must be known, have no other end than slavery pure and simple; a word which Peloponnese cannot even hear whispered without disgrace, or without disgrace see so many states abused by

one. Meanwhile, the opinion would be either that we were justly so used, or that we put up with it from cowardice, and were proving degenerate sons in not even securing for ourselves the freedom which our fathers gave to Hellas; and in a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in Hellas of a tyrant state, though in individual states we think it our duty to put down sole rulers. And we do not know how this conduct can be held free from three of the gravest failings, want of sense, of courage, or of vigilance. For we do not suppose that you have taken refuge in that contempt of an enemy which has proved so fatal in so many instances—a feeling which from the numbers that it has ruined has come to be called not contemptuous but contemptible.”

“我们还可以用其他手段来进行战争，例如策反他们的盟邦（这是剥夺他们收入最可靠的方法，因为那是他们力量的源泉），在他们的领土内建立筑垒阵地，以及各种目前尚且无法预见的方式。世间万物之中，战争是最不按固定规则发展的，主要靠随机应变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谁在斗争面前头脑最冷静，谁就最安全；谁头脑不冷静，谁就会遭到相应的灾难。还有一点需要我们考虑：如果只是敌对邻邦之间的领土争端，或许还可以承受。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敌人是雅典，它的势力胜过我们任何一个盟邦，甚至足以与我们整个同盟旗鼓相当。因此，除非我们各个民族、各个城邦结为一体，一致对敌，否则它很容易将我们各个征服。虽然听起来可怕，但我们必须知道，那种征服的结果只能使我们完全沦为奴隶。对伯罗奔尼撒人来说，连听到有人悄声议论这个字眼都会感到耻辱，更不要说看到这么多城邦遭受欺压了。同时，别人还会说我们该当沦落至此，或者说我们因为懦弱才忍气吞声。尽管我们在各个城邦都把推翻独裁统治者看作我们的责任，别人照样会说我们是不肖子孙，连祖先留给希腊的自由都保不住，居然容许在希腊建立一个僭主式城邦。我们不晓得，这种行为如何能免除三大缺憾：缺乏理智，缺乏勇气，缺乏警惕。在我们看来，你们用蔑视敌人作掩饰也无济于事。众多实例已经证明，这

种蔑视只会带来致命后果——即便单从因其毁灭的人员数量来看，这种态度已无法再被称为‘蔑视’，而是应当被称为‘可鄙’了。”

“There is, however, no advantage in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further than may be of service to the present. For the future we must provide by maintaining what the present gives us and redoubling our efforts; it is hereditary to us to win virtue as the fruit of labour, and you must not change the habit, even though you should have a slight advantage in wealth and resources; for it is not right that what was won in want should be lost in plenty; no, we must boldly advance to the war for many reasons; the god has commanded it and promised to be with us, and the rest of Hellas will all join in the struggle, part from fear, part from interest. You will be the first to break a treaty which the god, in advising us to go to war, judges to be violated already, but rather to support a treaty that has been outraged; indeed, treaties are broken not by resistance but by aggression.”

“然而，如果无助于现在，对过去的事情回忆再多也属无用。为了将来，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现在所有的，而且要加倍努力。将美德作为辛勤努力才能获得的成果，这是我们的传统。即便在财富和资源方面略具优势，也不能改变这种习惯。困苦时获得的东西，富裕了就将它丢弃，这是错误的。我们不应当这样。出于多种原因，我们都必须勇往直前，投身于战争。神已经明令我们这样做，而且已经允诺与我们同在。希腊其他城邦，部分出于恐惧，部分为了谋求利益，也都会加入我们的战斗行列。神在指示我们投入战争时已经判定，和约已经遭到破坏。因此，你们不是要去做首先破坏和约的人，而是要去维护已经遭到破坏的和约。实际上，和约不会因为反抗而遭到破坏，而是因为侵略。”

“Your position, therefore, from whatever quarter you may view it, will amply justify you in going to war; and this step we recommend in the interests of all, bearing in mind that identity of interest is the surest of bonds, whether between states or individuals. Delay not, therefore, to assist Potidaea, a Dorian city besieged by Ionians, which is quite a reversal of the order of things; nor to assert the freedom of the rest.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wait any longer when waiting can only mean immediate disaster for some of us, and, if it comes to be known that we have conferred but do not venture to protect ourselves, like disaster in the near future for the rest. Delay not, fellow allies, but, convinced of the necessity of the crisis and the wisdom of this counsel, vote for the war, undeterred by its immediate terrors, but looking beyond to the lasting peace by which it will be succeeded. Out of war peace gains fresh stability, but to refuse to abandon repose for war is not so sure a method of avoiding danger. We must believe that the tyrant city that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Hellas has been established against all alike, with a programme of universal empire, part fulfilled, part in contemplation; let us then attack and reduce it, and win future security for ourselves and freedom for the Hellenes who are now enslaved.”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你们的境况都会使你们有充足的理由参战。我们建议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要记住，无论是城邦之间还是个人之间，利益一致都是最可靠的保障。因此，不要再拖延了，援助波提狄亚吧！一个多里安人的城邦居然在遭受爱奥尼亚人的围攻，这简直是天地颠倒了。其他城邦的自由，同样也要毫不拖延地去维护。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对我们当中有些城邦而言，等待只能意味着灾难临头。如果人们知道我们虽然曾在一起商议过，但是却没有勇气保护自己，同样的灾难在不远的将来也会降临到其他城邦头上。盟友们，不要再拖延了！要相信这次危机必会降临，要相信我

们这一忠告是有识之见。投票赞成开战吧！不要被眼前的恐怖所吓倒。要放眼未来，看到通过战争可获得的持久和平。战争过后，和平会更加稳固。不肯为战争而放弃安宁，并不是避免危险的可靠办法。我们必须知道，那个在希腊已经存在的僭主式城邦是为了统治所有城邦而建立起来的。它力图成为一个世界性帝国，如今部分已实现，部分尚在图谋之中。让我们去进攻它，攻克它，为我们自己的未来赢得安全，为目前正在遭受奴役的希腊人赢得自由吧！”

Such were the words of the Corinthians. The Lacedaemonians, having now heard all, give their opinion, took the vote of all the allied states present in order, great and small alike; and the majority voted for war. This decided, it was still impossible for them to commence at once, from their want of preparation; but it was resolved that the means requisite were to be procured by the different states, and that there was to be no delay. And indeed, in spite of the time occupied with the necessary arrangements, less than a year elapsed before Attica was invaded, and the war openly begun.

这是科林斯人的发言。斯巴达人至此已听完所有城邦的发言，他们让在场的大小城邦全都依次表明了态度。大多数城邦都赞成开战。决定虽已作出，但由于缺乏准备，马上开战仍不可能。不过他们决定，所需物资由各城邦设法筹备，不得延误。实际上，尽管进行必要的准备需要花费些时间，他们却在将近一年之后才侵入阿提卡，公开发动战争。

This interval was spent in sending embassies to Athens charged with complaints, in order to obtain as good a pretext for war as possible, in the event of her paying no attention to them. The first

Lacedaemonian embassy was to order the Athenians to drive out the curse of the goddess; the history of which is as follows. In former generations there was an Athenian of the name of Cylon, a victor at the Olympic games, of good birth and powerful position, who had married a daughter of Theagenes, a Megarian, at that time tyrant of Megara. Now this Cylon was inquiring at Delphi; when he was told by the god to seize the Acropolis of Athens on the grand festival of Zeus. Accordingly, procuring a force from Theagenes and persuading his friends to join him, when the Olympic festival in Peloponnese came, he seized the Acropolis, with the intention of making himself tyrant, thinking that this was the grand festival of Zeus, and also an occasion appropriate for a victor at the Olympic games. Whether the grand festival that was meant was in Attica or elsewhere was a question which he never thought of, and which the oracle did not offer to solve. For the Athenians also have a festival which is called the grand festival of Zeus Meilichios or Gracious, viz., the Diasia. It is celebrated outside the city, and the whole people sacrifice not real victims but a number of bloodless offerings peculiar to the country. However, fancying he had chosen the right time, he made the attempt. As soon as the Athenians perceived it, they flocked in, one and all, from the country, and sat down, and laid siege to the citadel. But as time went on, weary of the labour of blockade, most of them depart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keeping guard being left to the nine archons, with plenary powers to arrange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their good judgment. It must be known that at that time most political functions were discharged by the nine archons. Meanwhile, Cylon and his besieged companions were distressed for want of food and water. Accordingly, Cylon and his brother made their escape; but the rest being hard pressed, and some even dying of famine, seated themselves as suppliants at the altar in the Acropolis. The Athenians, who were charged with the duty of keeping guard, when they saw them at the point of death in

the temple, raised them up 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no harm should be done to them, led them out, and slew them. Some who as they passed by took refuge at the altars of the awful goddesses were dispatched on the spot. From this deed the men who killed them were called accursed and guilty against the goddess, they and their descendants. Accordingly, these cursed ones were driven out by the Athenians, driven out again by Cleomenes of Lacedaemon and an Athenian faction; the living were driven out, and the bones of the dead were taken up; thus they were cast out. For all that, they came back afterwards, and their descendants are still in the city.

在战争爆发之前这段时间里，他们不断派遣使团前往雅典提出种种抗议。如果雅典不予理睬，他们就会找到一个尽可能恰当的开战借口。斯巴达派去的第一个使团所奉之命是，要求雅典人驱逐被女神诅咒的人。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上溯几代人中，有一个名叫基隆的雅典人，这个人曾在奥林匹亚竞赛会上获胜。他出身显贵，地位显赫，娶了迈加拉人塞阿耶内斯的一个女儿为妻。当时塞阿耶内斯是迈加拉的僭主。这个名叫基隆的人到德尔斐去问神时，神吩咐他在宙斯的大节日夺取雅典的卫城。于是，他设法问塞阿耶内斯要了一支军队，还说服了他的一些朋友一同举事。在伯罗奔尼撒的奥林匹亚节到来时，他夺取了卫城，打算自己作僭主。他以为这就是宙斯的大节日，而且觉得时机跟他这个奥林匹亚竞赛会的优胜者也很相合。那个大节日到底是在阿提卡还是其他地方，他根本没有想过，神谕中也没有任何启示。雅典人其实还有一个节日，叫作仁慈的宙斯大节，也就是迪亚夏节。这个节日的庆祝地点在城外。所有人都不用动物作祭品，而是用当地特有的无血祭品来祭祀。但是，基隆自以为他选择的时间正确无误，所以就采取了行动。雅典人一察觉这件事，马上都从乡间涌来，包围并封锁了卫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对围城工作的辛劳感到厌倦，大部分人都散去了，留守之责就交给了九位执政官。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良好判断力全权安排一切。大家肯定知道，当时大部分政治职能都由九位执政官来履行。其间，由于缺少食物和水，基隆

及其被困的同党非常狼狈。于是，基隆和他兄弟就逃跑了，但余下的人处境非常艰难，有些甚至濒临饿死，他们便坐在卫城的神坛上向神祈祷。看到他们即将死于神庙，负责留守的雅典人就把他们拖起来，还答应不伤害他们，但把他们带出来后，却将他们杀掉了。在途中路过恐怖女神神坛，躲进去的一些人当场就被杀了。由于此事，那些杀死他们的人就被称为有罪于女神和被女神诅咒的人。不单是他们，还包括他们的后代。因此，这些被诅咒的人就被雅典人驱逐了。斯巴达的克莱奥梅尼和雅典的一个派别又驱逐过他们一次。活着的被驱逐，死了的尸骨被抛出来，就这样彻底将他们驱逐了。尽管如此，他们后来还是回来了，他们的后裔仍然居住在这个城市。

This then was the curse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ordered them to drive out. They were actuated primarily, as they pretended, by a care for the honour of the gods; but they also know that Pericles, son of Xanthippus, was connected with the curse on his mother's side, and they thought that his banishment would materially advance their designs on Athens. Not that they really hoped to succeed in procuring this; they rather thought to create a prejudice against him in the eyes of his countrymen from the feeling that the war would be partly caused by his misfortune. For being the most powerful man of his time, and the leading Athenian statesman, he opposed the Lacedaemonians in everything, and would have no concessions, but ever urged the Athenians on to war.

这些正是斯巴达人要求雅典人驱逐的“被诅咒的人”。他们声称，他们主要是出于对神的尊敬才提出来的。不过他们也知道，桑西普斯之子佩里克莱斯在母系方面也与这个诅咒有关。他们认为，若能将佩里克莱斯驱逐，他们对付雅典的计划就会有实质性进展。他们并非真的指望做到这一点，而是想在他的同胞中制造对他的偏见，让他的同胞们觉得他那不幸的身世也是开战的部分原因。佩里克莱斯是他那个

时代最有权势的人物，也是雅典首屈一指的政治家。他事事都与斯巴达人唱对台戏，而且决不让步，还总是敦促雅典人投入战争。

The Athenians retorted by ordering the Lacedaemonians to drive out the curse of Taenarus. The Lacedaemonians had once raised up some Helot suppliants from the temple of Poseidon at Taenarus, led them away and slain them; for which they believe the great earthquake at Sparta to have been retribution. The Athenians also ordered them to drive out the curse of the goddess of the Brazen House; the history of which is as follows. After Pausanias the Lacedaemonian had been recalled by the Spartans from his command in the Hellespont (this is his first recall), and had been tried by them and acquitted, not being again sent out in a public capacity, he took a galley of Hermione on his own responsibility,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rrived as a private person in the Hellespont. He came ostensibly for the Hellenic war, really to carry on his intrigues with the King, which he had begun before his recall, being ambitious of reigning over Hellas. The circumstance which first enabled him to lay the King under an obligation, and to make a beginning of the whole design, was this. Some connections and kinsmen of the King had been taken in Byzantium, on its capture from the Medes, when he was first there, after the return from Cyprus. These captives he sent off to the King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rest of the allies, the account being that they had escaped from him. He managed this with the help of Gongylus, an Eretrian, whom he had placed in charge of Byzantium and the prisoners. He also gave Gongylus a letter for the King, the contents of which were as follows, as was afterwards discovered, “Pausanias, the general of Sparta, anxious to do you a favour, sends you these his prisoners of war. I propose also, with your approval, to marry your daughter, and to make Sparta and the

rest of Hellas subject to you. I may say that I think I am able to do this, with your co-operation. Accordingly, if any of this pleases you, send a safe man to the sea, through whom we may in future conduct our correspondence.”

雅典人针锋相对，要求斯巴达人驱逐泰纳鲁斯的被诅咒者。斯巴达人曾将一些在泰纳鲁斯的波塞冬神庙里祈祷的希洛人拖起来，把他们引离神庙后将他们杀掉了。雅典人认为，斯巴达发生大地震就是这件事的报应。他们还要求斯巴达人驱逐受黄铜宫女神诅咒的人。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的：在赫勒斯滂担任指挥之职的斯巴达人保萨尼阿斯被斯巴达召回（这是他第一次被召回）后，经审讯被宣判无罪，但未再被派回去继续担任公职。可是，他却未经斯巴达人准许，擅自登上海尔苗内的一条三列桨战舰，以个人身份抵达了赫勒斯滂。他表面上是为了希腊战争而去，实际上却是要继续与波斯国王相勾结。此事在他被召回之前就开始了，目的是实现他统治全希腊的野心。整个计划始于波斯国王最初欠他的一个人情。事情是这样的：他从塞浦路斯回来之后，头一次去那一地区就从波斯人手里夺取了拜占庭，在那里俘获了波斯国王的一些亲戚和族人。他瞒着其他盟友，将这些俘虏送到了波斯国王那里，却佯称他们是从他那里逃走的。这件事是他在埃雷特里亚人贡伊卢斯的协助下办成的，事前他就安排了这个人负责拜占庭及俘虏事宜。他还交给贡伊卢斯一封致波斯国王的信。后来发现，信的内容如下：“斯巴达将军保萨尼阿斯竭诚渴望为您效劳，特将俘获的这些战俘送还于您。同时，我还有一个提议，如蒙不弃，请将您的女儿许配于我，而我将使斯巴达及希腊其他地方臣服于您。我认为，倘若有幸与您合作，即可曰吾将成就此事。因此，如您同有此意，请将一位可靠之人派至海边，日后可由他传递我们之间的往来信函。”

This was all that was revealed in the writing, and Xerxes was pleased with the letter. He sent off Artabazus, son of Pharnaces, to

the sea with orders to supersede Megabates, the previous governor in the satrapy of Daskylion, and to send over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o Pausanias at Byzantium a letter which he entrusted to him; to show him the royal signet, and to execute any commission which he might receive from Pausanias on the King's matters with all care and fidelity. Artabazus on his arrival carried the King's orders into effect, and sent over the letter, which contained the following answer. “Thus saith King Xerxes to Pausanias. For the men whom you have saved for me across sea from Byzantium, an obligation is laid up for you in our house, recorded for ever; and with your proposals I am well pleased. Let neither night nor day stop you from diligently performing any of your promises to me; neither for cost of gold nor of silver let them be hindered, nor yet for number of troops, wherever it may be that their presence is needed; but with Artabazus, an honourable man whom I send you, boldly advance my objects and yours, as may be most for the honour and interest of us both.”

信中所言尽在于此，薛西斯见信大悦。他将法尔纳塞斯的儿子阿尔塔巴祖斯派往海边，命他去接替达斯基利翁辖地的梅加巴泰斯担任总督。薛西斯还交给阿尔塔巴祖斯一封信，命他尽快送交在拜占庭的保萨尼阿斯，并且把国王的印鉴给他看。保萨尼阿斯若托付给他任何与国王相关之事，他亦须谨慎而忠实地执行。阿尔塔巴祖斯一到，即刻便去执行国王的命令，将信送了过去。复函内容如下：“薛西斯国王致保萨尼阿斯：您在海外从拜占庭为我救人之事，王室深为感激，没齿难忘。您的提议亦甚合吾意。谨望日夜勤行，实践您对吾之诺言。无论何处有需，切勿为金银花费所阻，亦无需为军队数目犯难。我派往你处的阿尔塔巴祖斯诚实可靠，可通过他大胆推进你我的目标，最大限度地为我们双方带来荣誉和利益。”

Before held in high honour by the Hellenes as the hero of Plataea, Pausanias, after the receipt of this letter, became prouder than ever, and could no longer live in the usual style, but went out of Byzantium in a Median dress, was attended on his march through Thrace by a bodyguard of Medes and Egyptians, kept a Persian table, and was quite unable to contain his intentions, but betrayed by his conduct in trifles what his ambition looked one day to enact on a grander scale. He also made himself difficult of access, and displayed so violent a temper to every one without exception that no one could come near him. Indeed, this was the principal reason why the confederacy went over to the Athenians.

保萨尼阿斯以前就声誉甚隆，被希腊人奉为普拉蒂亚战役的英雄。收到这封信后，他比以往更加自命不凡，再也不肯安于惯常的生活方式了。到拜占庭以外的地方去时，他穿波斯人的服装；通过色雷斯时，要由波斯人和埃及人组成的卫队护送；宴客时，上的是波斯人的美味佳肴。他又不太能掩饰自己的意图，单是在琐事上的行为举止就暴露出，他的野心总有一天会大爆发。他还变得很难接触，无论对谁都毫无例外地暴跳如雷，使得无人能够接近他。实际上，这也是同盟军为何倒向雅典人的主要原因。

The above-mentioned conduct, coming to the ears of the Lacedaemonians, occasioned his first recall. And after his second voyage out in the ship of Hermione, without their orders, he gave proofs of similar behaviour. Besieged and expelled from Byzantium by the Athenians, he did not return to Sparta; but news came that he had settled at Colonae in the Troad, and was intriguing with the barbarians, and that his stay there was for no good purpose; and the ephors, now no longer hesitating, sent him a herald and a scytale with orders to accompany the herald or be declared a public enemy.

Anxious above everything to avoid suspicion, and confident that he could quash the charge by means of money, he returned a second time to Sparta. At first thrown into prison by the ephors (whose powers enable them to do this to the King), soon compromised the matter and came out again, and offered himself for trial to any who wished to institute an inquiry concerning him.

对于保萨尼阿斯的以上行为，斯巴达人逐渐亦有所耳闻，所以才有了他第一次被召回之事。在未获命令即乘海尔苗内的战舰二次出行后，他的行为证明他毫无改观。被雅典人包围并从拜占庭驱走后，他没有回斯巴达。有消息说，他定居在了特罗阿兹的科洛奈，而且还在与蛮族人搞阴谋活动；还有消息说，他待在那里图谋不轨。这时，民选长官们不再犹豫了。他们派出一名传令官带着急令传标去找他，命令他随传令官一起回来，否则就宣布他为斯巴达人民的公敌。保萨尼阿斯最想避免的是引起怀疑，他自以为通过金钱可以撤销对他的指控，所以二次返回了斯巴达。起初，民选长官们将他投进了监狱（他们甚至有权对国王这样做）。但是不久，事情有所松动，他又从狱中出来了。他还表示，无论何人想就他的事立案调查，他都愿意接受质询。

Now the Spartans had no tangible proof against him—neither his enemies nor the nation—of that indubitable kind required for the punishment of a member of the royal family, and at that moment in high office; he being regent for his first cousin King Pleistarchus, Leonidas's son, who was still a minor. But by his contempt of the laws and imitation of the barbarians, he gave grounds for much suspicion of his being discontented with things established; all the occasions on which he had in any way departed from the regular customs were passed in review, and it was remembered that he had taken upon himself to have inscribed on

the tripod at Delphi, which was dedicated by the Hellenes as the first-fruits of the spoil of the Medes, the following couplet:

这时，斯巴达人——无论是他的私敌还是整个城邦，都没有于他不利的确凿证据，即惩处一个王室成员所需的那种明确证据，何况他还身居高位。莱昂尼达斯之子普利斯塔尔胡斯国王当时尚未成年，他时任他这位大堂弟的摄政王。但是，他对法律的蔑视和他对蛮族人的模仿，均使人有理由对他抱有怀疑，认为他对既定行为规则感到不满，进而回想他在种种场合有无背离常规的行为，于是记起了他曾擅自在德尔斐的青铜三脚祭坛上刻下一个对句。这个祭坛是希腊人作为抗击波斯人的第一批胜利果实献给神庙的。保萨尼阿斯所刻的对句如下：

The Mede defeated, great Pausanias raised This monument, that Phoebus might be praised.

波斯战败，伟大的保萨尼阿斯谨竖此坛，赞美太阳神福玻斯。

At the time, the Lacedaemonians had at once erased the couplet, and inscribed the names of the cities that had aided in the overthrow of the barbarian and dedicated the offering. Yet it was considered that Pausanias had here been guilty of a grave offence, which, interpreted by the light of the attitude which he had since assumed, gained a new significance, and seemed to be quite in keeping with his present schemes. Besides, they were informed that he was even intriguing with the Helots; and such indeed was the fact, for he promised them freedom and citizenship if they would join him in insurrection and would help him to carry out his plans

to the end. Even now, mistrusting the evidence even of the Helots themselves, the ephors would not consent to take any decided step against h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egular custom towards themselves, namely, to be slow in taking any irrevocable resolve in the matter of a Spartan citizen without indisputable proof. At last, it is said, the person who was going to carry to Artabazus the last letter for the King, a man of Argilus, once the favourite and most trusty servant of Pausanias, turned informer. Alarmed by the reflection that none of the previous messengers had ever returned, having counterfeited the seal, in order that, if he found himself mistaken in his surmises, or if Pausanias should ask to make some correction, he might not be discovered, he undid the letter, and found the postscript that he had suspected, viz. an order to put him to death.

当时，斯巴达人马上清除掉这个对句，刻上了参与推翻蛮族人的那些城邦之名，这才献出这件祭品。然而，人们还是认为保萨尼阿斯在这件事上犯有严重过错。如果从他此后所采取的态度来解释，这件事则具有新的含义，似乎与他当前所策划的阴谋相当吻合。此外，还有人报告说，他甚至在与希洛人密谋。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曾答应希洛人，如果他们参加他煽动的叛乱，帮助他彻底实现他的计划，他就给予他们自由和公民权。即便到这个时候，民选长官们还是连希洛人自己提供的证据也不予采信，因而不同意对他采取断然措施。这一做法倒也符合他们处理自己人时的惯例，即：没有无可辩驳的证据，在有关斯巴达公民的问题上，轻易不做出不可逆转的决定。据说，最终有一个阿尔伊卢斯人告发了他。这个人曾经是保萨尼阿斯最中意和最信任的仆人，他本来要将保萨尼阿斯写给波斯国王的最后一封信送到阿尔塔巴祖斯那里。可是，想到此前的信使全都有去无回，他便产生了警觉，所以就把那封信打开了。打开之前，他伪造了一枚印章。这样，即便他发现自己猜测有误，或者保萨尼阿斯要修改信的内容，他也不至于被发现。然而，他发现信的附言证实了他的怀疑，那是一条

要求处死他的命令。

On being shown the letter, the ephors now felt more certain. Still, they wished to hear Pausanias commit himself with their own ears. Accordingly, the man went by appointment to Taenarus as a suppliant, and there built himself a hut divided into two by a partition; within which he concealed some of the ephors and let them hear the whole matter plainly. For Pausanias came to him and asked him the reason of his suppliant position; and the man reproached him with the order that he had written concerning him, and one by one declared all the rest of the circumstances, how he who had never yet brought him into any danger, while employed as agent between him and the King, was yet just like the mass of his servants to be rewarded with death. Admitting all this, and telling him not to be angry about the matter, Pausanias gave him the pledge of raising him up from the temple, and begged him to set off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not to hinder the business in hand.

他把这封信拿给民选长官们看了以后，他们这才觉得比较有把握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想亲耳听听保萨尼阿斯自己怎么说。于是，阿尔伊卢斯如约装成一个求神者去了泰纳鲁斯，在那里给自己盖了一个用隔墙隔成两部分的小棚屋。他把几位民选长官藏在里面，好让他们清楚地听到整个情况。保萨尼阿斯前来看他，问他为什么来求神。那个人首先责备他在信中写了关于他的那条命令，尔后逐一谈到了其他所有情况，指出他在替他与波斯国王跑腿期间从未使他陷入过危险，如今得到的回报却是要像他的大多数仆人一样被处死。所有这些，保萨尼阿斯全承认了，并让他不要为此而生气。他向他保证，一定要把他从神庙里弄出去，并请他尽快出发，不要耽误谈判。

The ephors listened carefully, and then departed, taking no action for the moment, but, having at last attained to certainty, were preparing to arrest him in the city. It is reported that, as he was about to be arrested in the street, he saw from the face of one of the ephors what he was coming for; another, too, made him a secret signal, and betrayed it to him from kindness. Setting off with a run for the temple of the goddess of the Brazen House, the enclosure of which was near at hand, he succeeded in taking sanctuary before they took him, and entering into a small chamber, which formed part of the temple, to avoid being exposed to the weather, lay still there. The ephors, for the moment distanced in the pursuit, afterwards took off the roof of the chamber, and having made sure that he was inside, shut him in, barricaded the doors, and staying before the place, reduced him by starvation. When they found that he was on the point of expiring, just as he was, in the chamber, they brought him out of the temple, while the breath was still in him, and as soon as he was brought out he died. They were going to throw him into the Kaiadas, where they cast criminals, but finally decided to inter him somewhere near. But the god at Delphi afterwards ordered the Lacedaemonians to remove the tomb to the place of his death—where he now lies in the consecrated ground, as an inscription on a monument declares—and, as what had been done was a curse to them, to give back two bodies instead of one to the goddess of the Brazen House. So they had two brazen statues made, and dedicated them as a substitute for Pausanias. The Athenians retorted by telling the Lacedaemonians to drive out what the god himself had pronounced to be a curse.

民选长官们仔细听完之后就离开了。他们虽然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但终于有了确切的把握，因而准备在城里逮捕他。据说，民选长官们正要在街上逮捕他时，他从其中一位的面部表情中看出了他走过

来的目的。另外一位出于好心也作出暗示，向他透露了他们的来意。附近不远处就是黄铜宫女神庙的围墙，他拔腿就朝神庙跑去。抓他的人还没动手，他就躲进去了。为了免遭露天之苦，他躲进了属于神庙的一间小室，一动不动地平躺在了里面。民选长官们在追赶途中暂且被甩到了后面，后来他们揭起那间小室的屋顶，看到他确实在里面，就把他封在里头，连门也堵起来了，然后就守在门前，等着饥饿来降服他。当他们发现他在室内已奄奄一息时，就在他咽气的当儿，趁着他还有一口气，他们将他从神庙里抬了出来。刚一抬出来，他就死了。他们本来想把他的尸体扔进卡亚扎斯山谷，也就是他们扔罪犯的地方，但最终还是决定把他葬在附近。但是，德尔斐的神后来命令斯巴达人把他的墓迁到了他死的地方——他现在就安息在圣地那个地方，碑上的铭文可以为证。由于他们做的事给他们带来了神的诅咒，神又命令他们给黄铜宫的女神带回两具躯体，而不是一具。因此，斯巴达人铸了两尊铜像献给神殿，以代替保萨尼阿斯。据此，雅典人反驳斯巴达人说，既然神都宣布这是个诅咒，他们就得驱逐那些被诅咒的人。

To return to the Medism of Pausanias,matter was found in the course of the inquiry to implicate Themistocles; and the Lacedaemonians accordingly sent envoys to the Athenians and required them to punish him as they had punished Pausanias. The Athenians consented to do so. But he had, as it happened, been ostracized, and, with a residence at Argos, was in the habit of visiting other parts of Peloponnese. So they sent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who were ready to join in the pursuit, persons with instructions to take him wherever they found him. But Themistocles got scent of their intentions, and fled from Peloponnese to Corcyra, which was under obligations towards him. But the Corcyraeans alleged that they could not venture to shelter him at the cost of offending Athens and Lacedaemon, and they conveyed him over to the continent opposite. Pursued by the

officers who hung on the report of his movements, at a loss where to turn, he was compelled to stop at the house of, the Molossian king, though they were not on friendly terms. Admetus happened not to Admetus be indoors, but his wife, to whom he made himself a suppliant, instructed him to take their child in his arms and sit down by the hearth. Soon afterwards, Admetus came in, and Themistocles told him who he was, and begged him not to revenge on Themistocles in exile any opposition which his requests might have experienced from Themistocles at Athens. Indeed, he was now far too low for his revenge; retaliation was only honourable between equals. Besides, his opposition to the king had only affected the success of a request, not the safety of his person; if the king were to give him up to the pursuers that he mentioned, and the fate which they intended for him, he would just be consigning him to certain death.

我们再接着保萨尼阿斯私通波斯一事继续记叙。斯巴达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塞米斯托克里斯也与此事有染。于是，他们便派使者去见雅典人，要求对方像他们惩处保萨尼阿斯一样惩处塞米斯托克里斯。雅典人表示同意这样做。然而，不巧的是，塞米斯托克里斯当时已遭到放逐。他的寓所虽在阿尔戈斯，但常到伯罗奔尼撒其他地方走动。于是，雅典人就派人随同斯巴达人去追捕他，并且下令，无论在何处发现他，均可就地逮捕。斯巴达人也乐意参与追捕行动。但是，塞米斯托克里斯察觉了他们的意图，从伯罗奔尼撒逃到了克基拉，因为他对克基拉有恩。可是，克基拉人却提出，他们不能以得罪雅典和斯巴达为代价冒险收留他，所以把他送到了对面的大陆。他的行踪被人告发后，雅典的官员对他紧追不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被迫在阿德墨托斯家停留下来，尽管他和这位莫洛西亚的国王关系不是很融洽。阿德墨托斯碰巧不在家，他就向国王的妻子发出哀求。她让他抱上他们的孩子坐到壁炉旁。稍后，阿德墨托斯回来了。塞米斯托克里斯对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恳求他不要报复他这个逃亡之人，尽管

他在雅典求助时曾遭到过塞米斯托克里斯的反对。如今的塞米斯托克里斯与他地位相差的确太悬殊了，已经不值得他去报复。只有在同等人之间，报复才来得光彩。另外，他对国王的反对，只影响到请求被接受与否，并不涉及个人安危。国王要是把他交给他说的那些追击者，从他们想让他得到的下场来看，无疑是要将他置于死地。

The King listened to him and raised him up with his son, as he was sitting with him in his arms after the most effectual method of supplication, and on the arrival of the Lacedaemonians not long afterwards, refused to give him up for anything they could say, but sent him off by land to the other sea to Pydna in Alexander's dominions, as he wished to go to the Persian king. There he met with a merchantman on the point of starting for Ionia. Going on board, he was carried by a storm to the Athenian squadron which was blockading Naxos. In his alarm—he was luckily unknown to the people in the vessel—he told the master who he was and what he was flying for, and said that, if he refused to save him, he would declare that he was taking him for a bribe. Meanwhile, their safety consisted in letting no one leave the ship until a favourable time for sailing should arise. If he complied with his wishes, he promised him a proper recompense. The master acted as he desired, and, after lying to for a day and a night out of reach of the squadron, at length arrived at Ephesus.

国王听了他说的话，把他和自己的儿子一同扶起来。他坐着时一直把孩子抱在怀里，等于采取了一种最有效的哀求方式。没过多久，斯巴达人就到了。可是，无论他们说什么，国王都不肯把他交出去。由于塞米斯托克里斯想去投奔波斯国王，他派人从陆路把他送到了另一片海旁的彼得那，地点在亚历山大的领地内。在那里，他遇到一艘正要启航前往爱奥尼亚的商船。上船之后，风暴将他吹向正在围攻纳

克索斯岛的雅典舰队。惊恐之下——幸好船上没人知道他是谁——他对船长说出了他的身份以及他在逃的原因。他还说，如果船长不救他，他就说船长受贿挟持了他。同时，在适合升帆启航的时机到来以前，不让人离船也于他们的安全有利。如果船主能按他的要求去做，他答应给予他适当的报酬。船主按他的要求做了。他们在那支舰队所及的范围之外停泊了一天一夜，后来终于抵达了以弗所。

After having rewarded him with a present of money, as soon as he received some from his friends at Athens and from his secret hoards at Argos, Themistocles started inland with one of the coast Persians, and sent a letter to King Artaxerxes, Xerxes's son, who had just come to the throne. Its contents were as follows: “I, Themistocles, am come to you, who did your house more harm than any of the Hellenes, when I was compelled to defend myself against your father's invasion—harm, however, far surpassed by the good that I did him during his retreat, which brought no danger for me but much for him. For the past, you are a good turn in my debt”—here he mentioned the warning sent to Xerxes from Salamis to retreat, as well as his finding the bridges unbroken, which, as he falsely pretended, was due to him—“for the present, able to do you great service, I am here, pursued by the Hellenes for my friendship for you. However, I desire a year's grace, when I shall be able to declare in person the objects of my coming.”

塞米斯托克里斯一收到雅典的朋友送来的钱和他在阿尔戈斯的秘密存款，马上付给了船主一笔报酬。然后，他带着海边的一名波斯人启程赶往内陆，并且送了一封信给阿尔塔薛西斯国王，即刚即位的薛西斯之子。信的内容如下：“鄙人塞米斯托克里斯前来投奔于您。当我被迫自卫，以抗击您父王的入侵时，我对你们王室造成的危害比任何希腊人都多。然而，在他撤兵期间，当危险并不祸及我而他却危险

万分时，我对他施与的好处则远远超过那些危害。过去欠我的情，你们该当报答”——他在此处提到他曾从萨拉米斯派人提醒薛西斯撤退以及他发现桥梁未毁一事，妄称后者是他努力的结果——“现在我来到这里，能够为你们大力效劳了；我被希腊人追逐，正是因为我对你们友好。不过，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年的时间。届时，我将亲自说明我到来的目的。”

It is said that the King approved his intention, and told him to do as he said. He employed the interval in making what progress he could in the study of the Persian tongue, and of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rrived at court at the end of the year, he attained to very high consideration there, such as no Hellene has ever possessed before or since; partly from his splendid antecedents, partly from the hopes which he held out of effecting for him the subjugation of Hellas, but principally by the proof which experience daily gave of his capacity. For Themistocles was a man who exhibited the most indubitable signs of genius; indeed, in this particular he has a claim on our admiration quite extraordinary and unparalleled. By his own native capacity, alike unformed and unsupplemented by study, he was at once the best judge in those sudden crises which admit of little or of no deliberation, and the best prophet of the future, even to its most distant possibilities. An able theoretical expositor of all that came within the sphere of his practice, he was not without the power of passing an adequate judgment in matters in which he had no experience. He could also excellently divine the good and evil which lay hid in the unseen future. In fine, whether we consider the extent of his natural powers, or the slightness of his application, this extraordinary man must be allowed to have surpassed all others in the faculty of intuitively meeting an emergency. Disease was the real cause of his death; though there is a story of his having ended his life by poison, on finding himself unable to fulfil his promises to

the king. However this may be, there is a monument to him in the marketplace of Asiatic Magnesia. He was governor of the district, the King having given him Magnesia, which brought in fifty talents a year, for bread, Lampsacus, which was considered to be the richest wine country, for wine, and Myos for other provisions. His bones, it is said, were conveyed home by his relatives in accordance with his wishes, and interred in Attic ground. This was done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Athenians; as it is against the law to bury in Attica an outlaw for treason. So ends the history of Pausanias and Themistocles, the Lacedaemonian and the Athenian, the most famous men of their time in Hellas.

据说，波斯国王同意了他的打算，告诉他可以按照他自己所说的去做。他利用这段时间，努力学习波斯语并熟悉该国风俗习惯。一年期满时，他来到波斯宫廷，在那里赢得了极高的赞誉，在到过波斯的希腊人中堪称空前绝后，一方面是由于他辉煌的过去，一方面是由于他提出要为国王实现征服希腊的希望，更主要的则是由于他经常能证实他确有才干。塞米斯托克里斯是一个能够最明确地表现出自己具有天赋之人。其实，单凭这一点，他就有资格赢得我们超乎寻常且前所未有的钦佩。对于不容考虑或几乎不容考虑的突发性危机，他仅凭自己的天赋能力就可以立即作出最佳判断，而这种能力并不是通过后天学习形成和发展而来的。对于未来，他能够作出最可靠的预测，即便是未来最不可能发生之事。凡是他实际做过的事情，他都能够在理论上加以说明。即便是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他也不乏提供合理判断的能力。对于隐藏在不可预见的未来中的利与弊，他同样具有超凡的预测能力。总之，无论是考虑到其天赋能力之所及，还是其运用之流畅，这位超凡之人的直觉应变能力都堪称无与伦比。尽管有一种说法认为，当他知道自己无法实现他对波斯国王的承诺时，他服毒自尽了，但疾病才是他死亡的真正原因。不管怎样，亚细亚的马格尼西亚市场上有他的一个纪念碑。他曾是这一地区的统治者。波斯国王将马格尼西亚、兰萨库斯和米奥斯赐给了他。马格尼西亚一年带给他50塔兰特

的收入，供给他面包；兰萨库斯被认为是最富饶的产酒之地，供给他美酒；米奥斯供给他其他所需物品。他的遗骨，据说是按照他的遗愿由亲戚运回老家，安葬于阿提卡的土地上。这件事是私下进行的，没有告知雅典人，因为将一个犯有叛国罪的逃亡者葬在阿提卡是违法行为。保萨尼阿斯和塞米斯托克里斯，一个是斯巴达人，一个是雅典人，两位都是他们那个时代希腊最著名的人物。对他们的记述就到这里。

To return to the Lacedaemonians, The history of their first embassy, the injunctions which it conveyed, and the rejoinder which it provoked, concerning the expulsion of the accursed persons, have been related already. It was followed by a second, which ordered Athens to raise the siege of Potidaea, and to respect the independence of Aegina. Above all, it gave her most distinctly to understand that war might be prevented by the revocation of the Megara decree, excluding the Megarians from the use of Athenian harbours and of the market of Athens. But Athens was not inclined either to revoke the decree, or to entertain their other proposals; she accused the Megarians of pushing their cultivation into the consecrated ground and the unenclosed land on the border, and of harbouring her runaway slaves. At last, an embassy arrived with the Lacedaemonian ultimatum. The ambassadors were Ramphias, Melesippus, and Agesander. Not a word was said on any of the old subjects; there was simply this. “Lacedaemon wishes the peace to continue, and there is no reason why it should not, if you would leave the Hellenes independent.” Upon this, the Athenians held an assembly, and laid the matter before their consideration. It was resolved to deliberate once for all on all their demands, and to give them an answer. There were many speakers who came forward and gave their support to one side or the other, urging the necessity of war, or the revocation of the decree and the folly of allowing it to

stand in the way of peace. Among them came forward Pericles, son of Xanthippus, the first man of his time at Athens, ablest alike in counsel and in action, and gave the following advice:

我们再来说说斯巴达人。他们派出的第一个使团，这个使团传达的驱逐被诅咒者的要求，以及该使团因此而遭到的反驳，前文均已述及。他们接着又派出了第二个使团。这个使团要求雅典解除对波提狄亚的围攻，并尊重埃伊纳岛的独立。最重要的是，这个使团极为明确地提出，只要撤销迈加拉法令，不再阻止迈加拉人使用雅典人的港口和雅典的市场，即有可能阻止战争的发生。但是，雅典方面既不愿意撤销这个法令，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其他提议。他们还指责迈加拉人，说他们耕种时挤占了圣地和边境上的公共地带，而且还窝藏从雅典逃亡的奴隶。最后，有一个使团带着斯巴达的最后通牒到了。这个使团的成团有拉姆菲亚斯、迈莱西普斯和阿耶桑泽尔。他们一句旧话未提，只是简单地说道："只要你们愿意让希腊人保持独立，斯巴达人希望和平继续存在，也没有理由不让它存在。"听罢此言，雅典人召开了一次公民大会，将这个问题提交大会讨论。他们决定彻底商讨一下斯巴达人提出的所有要求，然后给他们一个答复。不少人走上台来，对一方或另一方表示支持，或力陈开战之必要，或敦促撤销迈加拉法令并指出任其阻碍和平做法之愚蠢。这些人中包括桑西普斯的儿子佩里克莱斯，他那个时代雅典的头号人物，议政能力和行动能力均首屈一指。他给出的意见是这样的：

"There is one principle, Athenians, which I hold to through everything, and that is the principle of no concession to the Peloponnesians. I know that the spirit which inspires men while they are being persuaded to make war is not always retained in action; that as circumstances change, resolutions change. Yet I see that now as before the same, almost literally the same, counsel is demanded of me; and I put it to those of you who are allowing

yourselves to be persuaded, to support the national resolves even in the case of reverses, or to forfeit all credit for their wisdom in the event of success. For sometimes the course of things is as arbitrary as the plans of man; indeed, this is why we usually blame chance for whatever does not happen as we expected. Now it was clear before that Lacedaemon entertained designs against us; it is still more clear now. The treaty provides that we shall mutually submit our differences to legal settlement, and that we shall meanwhile each keep what we have. Yet the Lacedaemonians never yet made us any such offer, never yet would accept from us any such offer; on the contrary, they wish complaints to be settled by war instead of by negotiation; and in the end we find them here dropping the tone of expostulation and adopting that of command. They order us to raise the siege of Potidaea, to let Aegina be independent, to revoke the Megara decree; and they conclude with an ultimatum warning us to leave the Hellenes independent. I hope that you will none of you think that we shall be going to war for a trifle if we refuse to revoke the Megara decree, which appears in front of their complaints, and the revocation of which is to save us from war, or let any feeling of self-reproach linger in your minds, as if you went to war for slight cause. Why, this trifle contains the whole seal and trial of your resolution. If you give way, you will instantly have to meet some greater demand, as having been frightened into obedience in the first instance; while a firm refusal will make them clearly understand that they must treat you more as equals. Make your decision therefore at once, either to submit before you are harmed, or if we are to go to war, as I for one think we ought, to do so without caring whether the ostensible cause is great or small, resolved against making concessions or consenting to a precarious tenure of our possessions. For all claims from an equal, urged upon a neighbour as commands before any attempt at legal settlement, be they great or be they small, have only one meaning, and that is

slavery.”

“雅典人：有一条原则，我在任何事情上都坚持奉行，那就是，决不向伯罗奔尼撒人作出任何让步。我知道，人们在受到战争鼓动时那种激昂的情绪，在行动中不是总能保持得住。随着情况的变化，人们的决心也会发生变化。然而，我发现，现在同以前一样，需要我贡献同样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意见，所以我想对你们当中愿意相信我的人说，支持国民的决心吧，即便是在逆境中；否则，在顺遂时就完全不能要求他们奉献智慧了。有时候，事物发展的过程如同人们制定的计划一样反复多变。正因为如此，每逢有意外发生，我们通常会归咎于时运不济。斯巴达人以前显然对我们怀有不良企图，现在这一点更加明显了。和约明文规定，我们之间若产生分歧，相互都要交由法律解决。其间，我们各自要维持现有状况。可是，斯巴达人却从来没有对我们提出过这种请求，也从来没有接受过我们这种请求。恰恰相反，他们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而不是通过谈判。最后我们发现，他们到这里来，不再采取规劝的口吻，而是采用命令的语气。他们命令我们解除对波提狄亚的围攻，命令我们让埃伊纳岛独立，命令我们撤销迈加拉法令，末了还下了一道最后通牒，警告我们要让希腊人保持独立。我希望，你们谁都不会以为，如果我们拒绝撤销迈加拉法令，我们就得为一点小事去打仗；谁也不会以为，他们既然把这项法令排在抱怨的前列，只要把它撤销，我们就可以免于战争。同时，谁也不要心存自责，好像我们为了一点小事就兴师动兵。可是，这点小事却是你们决心的全部象征，同时也是对你们决心的检验。如果你们作出让步，马上就又得去满足某种更大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你们当初是因为害怕才让步的。如果坚定地表示拒绝，他们反而会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更加平等地对待你们。因此，你们一定要当机立断。要么趁着还没受到损害就屈服；要么就不要在乎表面上的原因是大还是小，下定决心不让步，也不允许我们的财产有不保之虞，假如我们参战的话。我个人认为，我们应当开战。在寻求法律解决之前，处于同等地位的城邦向邻邦强烈提出的作为命令的所有要求，无论是大是小，其含义只有一个，那就是想奴役这个城邦。”

“As to the war and the resources of either party, a detailed comparison will not show you the inferiority of Athens. Personally engaged in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land, without funds either private or public, the Peloponnesians are also without experience in long wars across sea, from the strict limit which poverty imposes on their attacks upon each other. Powers of this description are quite incapable of often manning a fleet or often sending out an army; they cannot afford the absence from their homes, the expenditure from their own funds; and besides, they have not command of the sea. Capital, it must be remembered, maintains a war more than forced contributions. Farmers are a class of men that are always more ready to serve in person than in purse. Confident that the former will survive the dangers, they are by no means so sure that the latter will not be prematurely exhausted, especially if the war last longer than they expect, which it very likely will. In a single battle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ir allies may be able to defy all Hellas, but they are incapacitated from carrying on a war against a power different in character from their own, by the want of the single council-chamber requisite to prompt and vigorous action, and the substitution of a diet composed of various races, in which every state possesses an equal vote, and each presses its own ends, a condition of things which generally results in no action at all. The great wish of some is to avenge themselves on some particular enemy, the great wish of others to save their own pocket. Slow in assembling, they devote a very small fraction of the time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any public object, most of it to the prosecution of their own objects. Meanwhile, each fancy that no harm will come of his neglect, that it is the business of somebody else to look after this or that for him; and so, by the same notion being entertained by all separately, the common cause imperceptibly decays. "

“至于战争以及双方所能利用的资源，详细作个比较，你们将会看到，雅典并不是处于劣势的一方。伯罗奔尼撒人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没有资金。另外，他们也没有长期渡海作战的经验，连相互之间的袭击也因为贫困而严重受限。这种城邦不具备配备舰队的能力，也不能经常向外派遣军队，因为他们离不开家乡，他们的资金也应付不了这笔开支。此外，他们也没有制海权。必须知道，维持一场战争，靠的是资本积累，而不是强行勒派。农民是这样一个阶级：他们总是宁肯出人，也不愿出钱。他们认为，若是出人，他们还会从战争的危险中逃生；若是出钱，他们根本无法确定自己的钱会不会过早地被花光。倘若战争持续的时间比他们所预料得长，那种情况尤其可能发生。在单独一场战役中，伯罗奔尼撒人及其盟友或许足以抵御全希腊。但是，由于缺少一个可以迅速果敢采取行动的单一议事机构，他们却无力同一个特征与他们不同的城邦进行一场战争。他们的议会由不同的民族构成，每个城邦都有平等的投票权，各个城邦都只顾推进自己的目标，而他们却没有一个替代这种议会的机构，其结果往往是一事无成。有些城邦特别渴望去报复特定的敌人，其他一些城邦则非常希望看紧自己的口袋。他们召集会议慢，开会时考虑共同目标的时间少，大部分时间都在落实自己的目标。同时，每个成员还会觉得，自己的疏忽不会有害，他人应当为自己料理这事那事。由于各个城邦都怀有这样的想法，共同的事业便会不知不觉地日渐式微。”

“But the principal point is the hindrance that they will experience from want of money. The slowness with which it comes in will cause delay; but the opportunities of war wait for no man. Again, we need not be alarmed either at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raising fortifications in Attica, or at their navy.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any system of fortifications to establish a rival city, even in time of peace, much more, surely, in an enemy's country, with Athens just as much fortified against it as it against Athens; while a mere post might be able to do some harm to the country by incursions

and by the facilities which it would afford for desertion, but can never prevent our sailing into their country and raising fortifications there, and making reprisals with our powerful fleet. For our naval skill is of more use to us for service on land, than their military skill for service at sea. Familiarity with the sea they will not find an easy acquisition. If you who have been practising at it ever since the Median invasion have not yet brought it to perfection, is there any chance of anything considerable being effected by an agricultural, unseafaring population, who will besides be prevented from practising by the constant presence of strong squadrons of observation from Athens? With a small squadron they might hazard an engagement, encouraging their ignorance by numbers; but the restraint of a strong force will prevent their moving, and through want of practice they will grow clumsier, and consequently more timid. It must be kept in mind that seamanship, just like anything else, is a matter of art, and will not admit of being taken up occasionally as an occupation for times of leisure; on the contrary, it is so exacting as to leave leisure for nothing else."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资金匮乏对他们造成的阻碍。缓慢的筹资过程会造成迟延。可是，在战争中，机会是不等人的。另外，对于他们在阿提卡修筑工事这种可能，以及他们加强海军建设一事，我们也不必感到惊慌。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任何防御工事体系要想建立起一座可以匹敌的城市都是十分困难的，在敌方境内肯定就更不用说了，更何况雅典抵御它的工事足以与它抵御雅典的工事相抗衡。只建一个据点，确实有可能通过袭扰和收容逃犯对我们的乡村造成一定损害，却永远阻止不了我们驶入他们境内并在那里修建工事，也阻止不了我们利用强大的舰队进行报复。他们的陆战技能在海战中，远不如我们的海战技能在陆战中派得上用场。他们会发现，掌握航海技能绝非易事。自从波斯人入侵以来，你们一直在海上操练。如果连你们的航海

技能都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那些不以航海为业的农民又怎么可能取得可观的进展呢？再说，雅典强大的舰队一直在监视他们，他们也无法进行操练。面对一支很弱小的海军舰队，出于愚昧无知，他们还有可能依仗人多势众冒险接战。但是，受到一支强大舰队的抑制，他们将无法出动，而操练的缺乏又会使他们更加笨拙，因而也就更加胆怯。必须知道，航海技能和其他技能一样，它是一种艺术，绝不是一种可以在闲暇时偶尔为之的消遣。恰恰相反，它需要你付出极大的努力，让你没有闲暇去从事其他活动。”

“Even if they were to touch the moneys at Olympia or Delphi, and try to seduce our foreign sailors by the temptation of higher pay, that would only be a serious danger if we could not still be a match for them by embarking our own citizens and the alien's resident among us. But in fact by this means we are always a match for them; and, best of all, we have a larger and higher class of native coxswains and sailors among our own citizens than all the rest of Hellas. And to say nothing of the danger of such a step, none of our foreign sailors would consent to become an outlaw from his country, and to take service with them and their hopes, for the sake of a few days' high pay.”

“即便他们动用奥林匹亚或德尔斐的金钱，试图用高薪利诱我们的外邦水手，那也只能在以下这种情况才会面临严重危险：我们自己的公民和居住在我们城邦的异邦人已经全部上船，我们却仍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事实上，即便他们采用这种方法，我们也总能对付他们。最有利的一点是，即使希腊其他地方的舵手和水手全都加起来，在数量和技术方面，也不如我们自己公民中的舵手和水手。迈出这样一步的危险后果姑且不说，在我们的外邦水手当中，不会有人为了拿几天高薪就同意按照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到他们军中去服役，从而被自己的城邦剥夺公民权。”

“This, I think, is a tolerably fair account of the position of the Peloponnesians; that of Athens is free from the defects that I have criticized in them, and has other advantages of its own, which they can show nothing to equal. If they march against our country we will sail against theirs, and it will then be found that the desolation of the whole of Attica is not the same as that of even a fraction of Peloponnese; for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supply the deficiency except by a battle, while we have plenty of land both on the islands and the continent. The rule of the sea is indeed a great matter. Consider for a moment. Suppose that we were islanders; can you conceive a more impregnable position? Well, this in future should, as far as possible, be our conception of our position. Dismissing all thought of our land and houses, we must vigilantly guard the sea and the city. No irritation that we may feel for the former must provoke us to a battle with the numerical superiority of the Peloponnesians. A victory would only be succeeded by another battle against the same superiority; a reverse involves the loss of our allies, the source of our strength, who will not remain quiet a day after we become unable to march against them. We must cry not over the loss of houses and land but of men's lives; since houses and land do not gain men, but men them. And if I had thought that I could persuade you, I would have bid you go out and lay them waste with your own hands, and show the Peloponnesians that this at any rate will not make you submit.”

“关于伯罗奔尼撒人的境况，我想，我说得已经比较清楚了。至于雅典，我在刚才对伯罗奔尼撒人的分析中提到的缺点，它一个也没有，而雅典所拥有的其他优势，他们又望尘莫及。如果他们从陆路向我们进军，我们就从海上驶去进攻他们。届时他们将会发现，整个阿提卡的荒芜对我们带来的影响也远不及伯罗奔尼撒一小部分土地被破

坏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因为他们不去打仗就无法弥补这一不足，而我们在各个岛屿和大陆上都有充裕的土地。对海洋的控制绝非无足轻重。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我们是岛民，我们的地位岂不是最坚不可摧的？那么，我们将来应当努力想象自己处于这样一个地位。放下我们对土地和房屋的所有眷恋之后，我们必须警惕地守卫海洋和城市。不能因为失去了前者，我们就愤而去与数量上占优势的伯罗奔尼撒人交战。即便我们赢了，接下来又得与占同样优势的敌军再战；倘若结果相反，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盟邦，我们力量的源泉。当我们无力向盟邦提供支援时，它们一天也不会安生。我们不应当为失去房屋和土地而落泪，而应当为失去人的生命而哭泣。有了房屋和土地不见得有人，有了人却会有房屋和土地。假如我觉得能说服你们，我会让你们走出去，亲手毁掉你们的房屋和土地。让伯罗奔尼撒人看一看，你们决不会为此而屈服。”

“I have many other reasons to hope for a favourable issue, if you can consent not to combine schemes of fresh conquest with the conduct of the war, and will abstain from wilfully involving yourselves in other dangers; indeed, I am more afraid of our own blunders than of the enemy's devices. But these matters shall be explained in another speech, as events require; for the present dismiss these men with the answer that we will allow Megara the use of our market and harbours, when the Lacedaemonians suspend their alien acts in favour of us and our allies, there being nothing in the treaty to prevent either one or the other: that we will leave the cities independent, if independent we found them when we made the treaty, and when the Lacedaemonians grant to their cities an independence not involving subservience to Lacedaemonian interests, but such as each severally may desire: that we are willing to give the legal satisfaction which our agreements specify, and that we shall not commence hostilities, but shall resist those who do commence them. This is an answer agreeable at once to the rights

and the dignity of Athens. It must be thoroughly understood that war is a necessity; but that the more readily we accept it, the less will be the ardour of our opponents, and that out of the greatest dangers communities and individuals acquire the greatest glory. Did not our fathers resist the Medes not only with resources far different from ours, but even when those resources had been abandoned; and more by wisdom than by fortune, more by daring than by strength did not they beat off the barbarian and advance their affairs to their present height? We must not fall behind them, but must resist our enemies in any way and in every way, and attempt to hand down our power to our posterity unimpaired."

"只要你们不赞成利用战争去实施新的征服，主动避免牵扯到其他危险之中去，我还可以举出很多理由，说明我们可以期待好的结局。实际上，我所担心的不是敌人耍诡计，而是我们自己犯错误。不过，这些问题可以根据战事发展的需要另找机会再谈。现在，我们先得遣回斯巴达的使者，让他们带回这样的答复：只要斯巴达人不再对我们和我们的盟邦实行禁止异邦人入境的法令，我们就允许迈加拉使用我们的市场和港口，因为和约中并没有禁止以上这两点。只要缔结和约时我们认为他们是独立城邦，只要斯巴达人允许他们的城邦独立，并且允许它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斯巴达的利益作出选择，我们就放手让各城邦独立；我们愿意按照和约的规定提请仲裁；我们不会主动开战，但是如果有人开战，我们将予以反击。如此答复既可维护我们的权益，又不失雅典的尊严。大家必须彻底明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越是做好迎战的准备，对方的战争热情就越低。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只有从最大的危险中才能赢得最大的光荣。我们的先辈在抵御波斯人的时候，不仅没有我们这么多资源，甚至连原有的那些资源都放弃了，但他们靠着智慧而不是财富，靠着勇气而不是军事实力，不是照样打败蛮族人，将他们的事业推进到了目前这种程度吗？我们决不能落后于他们，无论以任何方式，我们都要抗击敌人，努力将我们的城邦完好无损地传给我们的后代。"

Such were the words of Pericles. The Athenians, persuaded of the wisdom of his advice, voted as he desired, and answered the Lacedaemonians as he recommended, both on the separate points and in the general; they would do nothing on dictation, but were ready to have the complaints settled in a fair and impartial manner by the legal method, which the terms of the truce prescribed. So the envoys departed home and did not return again.

这是佩里克莱斯的发言。雅典人被他那睿智的忠告所打动，按照他的意见投了票，并且根据他的建议回复了斯巴达人——无论是在总的原则上还是具体的各个方面。他们不愿在强迫命令之下做任何事，但愿意按照和约上规定的法律手段以公平、公正的方式解决争端。斯巴达的使者就这样回去了，以后也没再来过。

These were the charges and differences existing between the rival powers before the war, arising immediately from the affair at Epidamnus and Corcyra. Still intercourse continued in spite of them, and mutual communication. It was carried on without heralds, but not without suspicion, as events were occurring which were equivalent to a breach of the treaty and matter for war.

这就是战前两大敌对势力之间存在的责难和争执，这些责难和争执都是埃庇丹努斯事件和克基拉事件直接引发的。尽管如此，两大势力之间的交往仍在继续，彼此还有往来。这种往来虽然无需传令官，但是不无猜疑，因为构成和约破坏和引发战争的事端仍在发展之中。

BOOK II

第二卷

CHAPTER VI Beginning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First Invasion of Attica—Funeral Oration of Pericles

第六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开始——对阿提卡的第一次入侵——佩里克莱斯的葬礼演说

The war between the Athenians and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llies on either side now really begins. For now, all intercourse except through the medium of heralds ceased, and hostilities were commenced and prosecuted without intermission. The history follows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events by summers and winters.

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这场战争现在真要开始了，双方各有盟邦相助。除了通过传令官外，双方这时已断绝所有往来。敌对行动开始之后，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本史按夏冬两季纪年法依时间顺序记叙各战事。

The thirty years' truce which was entered into after the conquest of Euboea lasted fourteen years. In the fifteenth, in the forty-eighth year of the priestess-ship of Chrysis at Argos, in the ephorate of Aenesias at Sparta, in the last month but two of the archonship of Pythodorus at Athens, and six months after the battle of Potidaea, just at the beginning of spring, a Theban force a little over three hundred strong,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ir Boeotarchs, Pythangelus, son of Phyleides, and Diemporus, son of Onetorides,

about the first watch of the night, made an armed entry into Plataea, a town of Boeotia in alliance with Athens. The gates were opened to them by a Plataean called Naucleides, who, with his party, had invited them in, meaning to put to death the citizens of the opposite party, bring over the city to Thebes, and thus obtain power for themselves. This was arranged through Eurymachus, son of Leontiades, a person of great influence at Thebes. For Plataea had always been at variance with Thebes; and the latter, foreseeing that war was at hand, wished to surprise her old enemy in time of peace, before hostilities had actually broken out. Indeed, this was how they got in so easily without being observed, as no guard had been posted. After the soldiers had grounded arms in the market-place, those who had invited them in wished them to set to work at once and go to their enemies' houses. This, however, the Thebans refused to do, but determined to make a conciliatory proclamation, and if possible to come to a friendly understanding with the citizens. Their herald accordingly invited any who wished to resume their old place in the confederacy of their countrymen to ground arms with them, for they thought that in this way the city would readily join them.

三十年和约是征服埃维亚岛后缔结的，共持续了十四年。到了第十五年，即赫里西斯在阿尔戈斯当女祭司第四十八年，埃内夏斯在斯巴达担任民选长官那年，皮索佐鲁斯在雅典任执政官期满前三个月，波提狄亚战役之后六个月，正值初春时节，一支300余人的底比斯军队，在菲利泽斯之子皮桑耶卢斯和奥尼托里泽斯之子迪姆波鲁斯的率领下，大约在头更时分武装进入了普拉蒂亚，即维奥蒂亚地区一个与雅典为盟的城镇。城门是一个名叫纳夫克利泽斯的普拉蒂亚人帮他们打开的。他和他所在的党派将这支军队邀入城内，目的是想诛杀敌对党派的公民，使普拉蒂亚倒向底比斯，自己也趁势取得政权。这件事是通过莱翁蒂亚泽斯的儿子埃夫里马胡斯安排的，此人在底比斯是一

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普拉蒂亚与底比斯一向不睦。底比斯人预见到战争已迫在眉睫，便想趁着敌对行动尚未真正爆发，在和平时期就向它的宿敌发动突然袭击。由于城门没有设岗，他们就这么神不知鬼不晓地轻易进了城。这些士兵来到市场，把武器放在地上。邀他们入城的人希望他们马上开始行动，冲向他们政敌的宅邸。然而，底比斯人却拒绝这样做，而是决定发布一个抚慰性公告，如果可能，就与市民达成友好谅解。于是，他们的传令官宣布：凡是想在他们同胞的同盟中恢复原有地位者，请和他们一起放下武器。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这个城市就会欣然倒向他们。

On becoming awar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Thebans within their gates, and of the sudden occupation of the town, the Plataeans concluded in their alarm that more had entered than was really the case, the night preventing their seeing them. They accordingly came to terms and, accepting the proposal, made no movement; especially as the Thebans offered none of them any violence. But somehow or other,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they discovered the scanty numbers of the Thebans, and decided that they could easily attack and overpower them; the mass of the Plataeans being averse to revolting from Athens. At all events they resolved to attempt it. Digging through the party walls of the houses, they thus managed to join each other without being seen going through the streets, in which they placed wagons without the beasts in them, to serve as a barricade, and arranged everything else as seemed convenient for the occasion. When everything had been done that circumstances permitted, they watched their opportunity and went out of their houses against the enemy. It was still night, though daybreak was at hand; in daylight it was thought that their attack would be met by men full of courage and on equal terms with their assailants, while in darkness it would fall upon panic-stricken troops, who would also be at a disadvantage from their enemy's knowledge of the

locality. So they made their assault at once, and came to close quarters as quickly as they could.

乍闻底比斯人出现在他们城内，突然之间就占领了这座城，普拉蒂亚人惊恐万分，以为实际进来的人不止这些，只不过黑夜遮住了他们的眼睛。于是，他们表示就范，接受了对方的提议，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尤其是因为底比斯人没有向他们任何人施暴。但是，不知怎么，在谈判期间，他们发现底比斯人数量并不多，认为无需大动干戈就能对他们发动袭击并将其制服。再说，大多数普拉蒂亚人也不愿意叛离雅典。无论怎样，他们决计一试。他们把房屋之间的界墙凿通，这样大家既可以集合在一起，别人又看不见他们在街上走。他们还在街上安放了一些没套牲口的马车，以作障碍物之用。对举事似乎有利的其他一应事务，他们也都做了安排。当情况所允许的一切全都准备就绪后，他们瞅准机会冲出房屋，朝着敌人扑去。虽然破晓在即，但当时仍是夜间。他们认为，如果在白天行动，遭到袭击者肯定胆气十足，而且可以与攻击者在同等条件下作战；但如果在黑夜，敌军就会惊慌失措。另外，敌军对当地情况不熟，也是对他们不利的一点。因此，他们立刻发起攻击，战事很快进入胶着状态。

The Thebans, finding themselves outwitted, immediately closed up to repel all attacks made upon them. Twice or thrice they beat back their assailants. But the men shouted and charged them, the women and slaves screamed and yelled from the houses and pelted them with stones and tiles; besides, it had been raining hard all night; and so at last, their courage gave way, and they turned and fled through the town. Most of the fugitives were quite ignorant of the right ways out, and this, with the mud, and the darkness caused by the moon being in her last quarter, and the fact that their pursuers knew their way about and could easily stop their escape, proved fatal to many. The only gate open was the one by which

they had entered, and this was shut by one of the Plataeans driving the spike of a javelin into the bar instead of the bolt; so that even here there was no longer any means of exit. They were now chased all over the town. Some got on the wall and threw themselves over, in most cases with a fatal result. One party managed to find a deserted gate, and obtaining an axe from a woman, cut through the bar; but as they were soon observed only a few succeeded in getting out. Others were cut off in detail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ity. The most numerous and compact body rushed into a large building next to the city wall; the doors on the side of the street happened to be open, and the Thebans fancied that they were the gates of the town, and that there was a passage right through to the outside. The Plataeans, seeing their enemies in a trap, now consulted whether they should set fire to the building and burn them just as they were, or whether there was anything else that they could do with them; until at length these and the rest of the Theban survivors found wandering about the town agreed to an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arms to the Plataeans.

底比斯人发觉自己上当后，立刻收拢队伍，准备击退向他们发起的所有进攻。攻击者被打退了两、三次。但是，那些人还是高喊着向他们冲来。妇女和奴隶们也从屋内向屋外呼喊尖叫，还用石头和瓦片砸他们。此外，整个夜间一直大雨倾盆。所以，底比斯人终于丧了胆，转身朝城外逃窜。逃军大多不辨方向，加上道路泥泞和下弦月造成的黑暗，以及追击者依仗对道路的熟悉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堵住他们的逃路这一事实，使得大部分人丧了命。唯一开着的城门是他们原先进来的那个。可是，有个普拉蒂亚人将一杆标枪的枪头当门闩插进门栅，将这个门封死了。因此，就连这里也不再有路可退。这时，他们被追得满城乱窜。有些人翻上城墙往外跳，其中大多数都摔死了。有一队人设法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城门。他们从一名妇女那里弄到一把斧子，劈开了门栅，但由于很快就被发现了，仅有几个人成功脱逃，

余者均在城内各处被各个歼灭了。人数最多且最紧凑的一支队伍冲进了城墙近旁一栋较大的建筑物。临街的屋门正巧开着，底比斯人还以为那是城门，可以直通城外。看到敌人陷入了罗网，普拉蒂亚人开始商议，到底是往房子上放把火把他们烧死在里面，还是另想它法。最后，屋里这些人和仍在城里乱窜的其余底比斯幸存者无条件地向普拉蒂亚人缴械投降。

While such was the fate of the party in Plataea, the rest of the Thebans who were to have joined them with all their forces before daybreak, in case of anything miscarrying with the body that had entered, received the news of the affair on the road, and pressed forward to their succour. Now Plataea is nearly eight miles from Thebes, and their march delayed by the rain that had fallen in the night, for the river Asopus had risen and was not easy of passage; and so, having to march in the rain, and being hindered in crossing the river, they arrived too late, and found the whole party either slain or captive. When they learned what had happened, they at once formed a design against the Plataeans outside the city. As the attack had been made in time of peace, and was perfectly unexpected, there were of course men and stock in the fields; and the Thebans wished if possible to have some prisoners to exchange against their countrymen in the town, should any chance to have been taken alive. Such was their plan. But the Plataeans suspected their intention almost before it was formed, and becoming alarmed for their fellow citizens outside the town, sent a herald to the Thebans, reproaching them for their unscrupulous attempt to seize their city in time of peace, and warning them against any outrage on those outside. Should the warning be disregarded, they threatened to put to death the men they had in their hands, but added that, on the Thebans retiring from their territory, they would surrender the prisoners to their friends. This is the Theban account

of the matter, and they say that they had an oath given them. The Plataeans, on the other hand, do not admit any promise of an immediate surrender, but make it contingent upon subsequent negotiation: the oath they deny altogether. Be this as it may, upon the Thebans retiring from their territory without committing any injury, the Plataeans hastily got in whatever they had in the country and immediately put the men to death. The prisoners were a hundred and eighty in number; Eurymachus, the person with whom the traitors had negotiated, being one.

进入普拉蒂亚的这队人结局就是这样。其余底比斯人原定破晓前全部进城与他们会合，以防已进城的部队有何不测。但是，他们尚在途中就听到了出事的消息，于是便加快脚步赶去解围。可是，底比斯距离普拉蒂亚将近8英里，夜间的大雨又延缓了他们行军的速度。阿索普斯河的河水上涨后，渡河十分不易。因此，冒雨行军，再加上渡河有困难，他们赶到时为时已晚。整个先头部队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获悉所发生的情况之后，他们立刻打起了城外普拉蒂亚人的主意。由于这次袭击发生在和平时期，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田里当然有人和牲口。底比斯人希望，如果可能，就抓几个俘虏。万一在城里的同胞有被活捉的，他们还可以拿这些人来做交换。他们是这么计划的。但是，几乎未等他们的计划成形，普拉蒂亚人就猜到了他们的意图。出于对城外同胞的担心，他们派了一个传令官去见底比斯人，谴责他们在和平时期肆无忌惮地企图夺取他们的城市这一行径，并警告他们不要伤害城外的人。他们威胁说，底比斯人若对他们的警告置若罔闻，他们就杀掉手里的俘虏。不过，他们又补充说，只要底比斯人撤离他们的领土，他们就将俘虏交给其同胞。这是底比斯人对这件事的说法，他们说，普拉蒂亚人还对他们发过誓。普拉蒂亚人却不承认曾经答应过立即释放俘虏，而是认为只有经过其后的谈判才有这种可能。至于誓言一事，他们则矢口否认。不管怎样，底比斯人没有进行任何破坏就离开了普拉蒂亚人的领土。他们一走，普拉蒂亚人立即把他们在郊外的一切财产迁入城内，随即把俘虏全杀掉了。被杀的俘虏

总共180人，与普拉蒂亚的叛党谈判的那个埃夫里马胡斯也在其中。

This done, the Plataeans sent a messenger to Athens, gave back the dead to the Thebans under a truce, and arranged things in the city as seemed best to meet the present emergency. The Athenians, meanwhile, having had word of the affair sent them immediately after its occurrence, had instantly seized all the Boeotians in Attica, and sent a herald to the Plataeans to forbid their proceeding to extremities with their Theban prisoners without instructions from Athens. The news of the men's death had of course not arrived; the first messenger having left Plataea just when the Thebans entered it, the second just after their defeat and capture; so there was no later news. Thus the Athenians sent orders in ignorance of the facts; and the herald on his arrival found the men slain. After this, the Athenians marched to Plataea and brought in provisions, and left a garrison in the place, also taking away the women and children and such of the men as were least efficient.

这件事处理完毕之后，普拉蒂亚人派了一名信使去雅典，在休战期间向底比斯人交还了死者的尸体，同时对城里的事务做了似乎最适合当时情况的应急安排。其间，事情刚一发生，雅典人就从派去送信的人那里得到了消息。他们立即将阿提卡境内的所有维奥蒂亚人都抓起来，并派了一名传令官前往普拉蒂亚人那里，要求他们在得到雅典的指示之前不得对底比斯的俘虏采取极端行动。俘虏已死的消息那时当然还没到。底比斯人刚进城，第一个信使就从普拉蒂亚出发了。第二个信使是在底比斯人刚被打败和被俘时出发的。至于后来的消息，他们一无所知。因此，雅典人的命令是在不明实情的情况下发出的。传令官到了那里才发现，俘虏已经被杀。其后，雅典人开赴普拉蒂亚。他们运去了粮食，在那里留下了一支守军，还把女人和孩子以及不大适于作战的人一起带走了。

After the affair at Plataea, the treaty had been broken by an overt act, and Athens at once prepared for war, as did also Lacedaemon and her allies. They resolved to send embassies to the King and to such other of the barbarian powers as either party could look to for assistance, and tried to ally themselves with the independent states at home. Lacedaemon, in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marine, gave orders to the states that had declared for her in Italy and Sicily to build vessels up to a grand total of five hundred, the quota of each city being determined by its size, and also to provide a specified sum of money. Till these were ready they were to remain neutral and to admit single Athenian ships into their harbours. Athens on her part reviewed her existing confederacy, and sent embassies to the places more immediately round Peloponnese—Corcyra, Cephallenia, Acarnania, and Zacynthus—perceiving that if these could be relied on she could carry the war all round Peloponnese.

普拉蒂亚事件发生后，等于有了公然破坏和约的行为。雅典立即开始做战争准备，斯巴达及其盟邦同样如此。他们决定派专使去拜访波斯国王以及其他蛮族势力，因为战争双方都指望从那些地方获得援助。同时，他们还试图与本国的独立城邦结为同盟。除了原有的战舰之外，斯巴达命令意大利和西西里那些宣布拥护它的城邦再造共计500艘战舰，各个城邦的额定数量根据城邦的大小而定，另外还须各筹一定数目的资金。在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之前，这些城邦须继续保持中立，允许雅典的单个船只进入他们的港口。雅典方面则一一梳理了现有盟邦，另外又派使节奔赴伯罗奔尼撒周边地区——克基拉、凯法莱尼亚、阿卡纳尼亚和扎金索斯岛。雅典认为，只要能和这些地方建立可信赖的关系，它就可以放心地在伯罗奔尼撒周围发动战争了。

And if both sides nourished the boldest hopes and put forth their utmost strength for the war, this was only natural. Zeal is always at its height at the commencement of an undertaking; and on this particular occasion Peloponnese and Athens were both full of young men whose inexperience made them eager to take up arms, while the rest of Hellas stood straining with excitement at the conflict of its leading cities. Everywhere predictions were being recited and oracles being chanted by such persons as collect them and this not only in the contending cities. Further, some while before this, there was an earthquake at Delo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memory of the Hellenes. This was said and thought to be ominous of the events impending; indeed, nothing of the kind that happened was allowed to pass without remark. The good wishes of men made greatly for the Lacedaemonians, especially as they proclaimed themselves the liberators of Hellas. No private or public effort that could help them in speech or action was omitted; each thinking that the cause suffered wherever he could not himself see to it. So general was the indignation felt against Athens, whether by those who wished to escape from her empire, or were apprehensive of being absorbed by it. Such were the preparations and such the feelings with which the contest opened.

如果说双方对这场战争都寄予极大的期望，并全力以赴投入其中，这也是很自然的。一项事业刚刚开始时，人们总是热情高涨。这一次，伯罗奔尼撒和雅典都有很多年轻人参战，他们不曾有过战争经历，因而十分渴望拿起武器。希腊其他城邦则极力抑制着内心的兴奋，等着看这两大城邦发生冲突。那些爱搜罗预言和神谕的人则到处传播和吟诵，而且不止是在参战的城邦中。此外，战争爆发前不久，提洛岛发生了一次地震。在希腊人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人们都说，同时也这样认为，这是要出大事的征兆。其实，遇到这类事情发生，有人议论也在所难免。人们的良好祝愿大多是献给斯巴达人的，

尤其是因为他们宣布自己要成为希腊的解放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城邦，全都在不遗余力地用言语或行动帮助他们。大家都认为，但凡有一处自己没有亲力亲为，这项事业就要遭受损失。无论是希望逃离雅典帝国的人，还是担心被它网罗进去的人，普遍都对它义愤填膺。这就是战幕拉开时双方的准备情况和人们的心态。

The allies of the two belligerents were the following. These were the allies of Lacedaemon: all the Peloponnesians within the Isthmus except the Argives and Achaeans, who were neutral; Pellene being the only Achaean city that first joined in the war, though her example was afterwards followed by the rest. Outside Peloponnese were the Megarians, Locrians, Boeotians, Phocians, Ambraciots, Leucadians, and Anactorians. Of these, ships were furnished by the Corinthians, Megarians, Sicyonians, Pellenians, Eleans, Ambraciots, and Leucadians; and cavalry by the Boeotians, Phocians, and Locrians. The other states sent infantry. This was the Lacedaemonian confederacy. That of Athens comprised the Chians, Lesbians, Plataeans, the Messenians in Naupactus, most of the Acarnanians, the Corcyraeans, Zacynthians, and some tributary cities in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viz., Caria upon the sea with her Dorian neighbours, Ionia, the Hellespont, the Thracian towns, the islands lying between Peloponnese and Crete towards the east, and all the Cyclades except Melos and Thera. Of these, ships were furnished by Chios, Lesbos, and Corcyra, infantry and money by the rest. Such were the allies of either party and their resources for the war.

交战双方各有盟友，具体如下：斯巴达的盟友包括地峡之内的所有伯罗奔尼撒人，保持中立的阿尔戈斯人和亚该亚人除外；亚该亚诸城邦中，开始仅有佩莱内参战，后来其余城邦也先后加入斯巴达阵营

了。除伯罗奔尼撒以外，斯巴达的盟友还有迈加拉人、洛克里斯人、维奥蒂亚人、福基斯人、安布拉基亚人、莱夫卡斯人和阿纳克托里乌姆人。其中提供战舰的是科林斯人、迈加拉人、西锡安人、佩莱内人、埃利斯人、安布拉基亚人和莱夫卡斯人；提供骑兵的是维奥蒂亚人、福基斯人和洛克里斯人。其他城邦派遣的是步兵。这是斯巴达同盟的情况。雅典的盟友包括希俄斯人、莱斯沃斯人、普拉蒂亚人、纳夫帕克图斯的麦西尼亚人、大部分阿卡纳尼亚人、克基拉人、扎金索斯人，此外还有下列地区的一些纳贡城邦，即：临海的卡里亚以及与其相邻的多里安城邦、爱奥尼亚、赫勒斯滂、色雷斯诸城镇、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克里特岛之间靠东边的岛屿，以及除了梅卢斯岛和锡拉之外的基克拉泽斯群岛。其中提供战舰的城邦是希俄斯、莱斯沃斯和克基拉，其余城邦提供的是步兵和金钱。这是交战双方的盟友和战争资源情况。

Immediately after the affair at Plataea, Lacedaemon sent round orders to the cities in Peloponnese and the rest of her confederacy to prepare troops and the provisions requisite for a foreign campaign, in order to invade Attica. The several states were ready at the time appointed and assembled at the Isthmus; the contingent of each city being two-thirds of its whole force. After the whole army had mustered, the Lacedaemonian king, Archidamus, the leader of the expedition, called together the generals of all the states and the principal persons and officers, and exhorted them as follows:

普拉蒂亚事件发生后，斯巴达立即派人向伯罗奔尼撒各个城邦及其同盟的其他城邦传令，要求它们为入侵阿提卡准备部队和在异邦作战所需的给养。各城邦如期做好准备，全都集合到了地峡一带。每个城邦所派的兵力均为其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二。整个队伍集合完毕之后，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这次远征的总指挥——将各个城邦的

将军以及主要人员和军官召集到一起，对他们作了如下动员讲话：

“Peloponnesians and allies, our fathers made many campaigns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Peloponnese, and the elder men among us here are not without experience in war. Yet we have never set out with a larger force than the present; and if our numbers and efficiency are remarkable, so also is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gainst which we march. We ought not then to show ourselves inferior to our ancestors, or unequal to our own reputation. For the hopes and attention of all Hellas are bent upon the present effort, and its sympathy is with the enemy of the hated Athens. Therefore, numerous as the invading army may appear to be, and certain as some may think it that our adversary will not meet us in the field, this is no sort of justification for the least negligence upon the march; but the officers and men of each particular city should always be prepared for the advent of danger in their own quarters. The course of war cannot be foreseen, and its attacks are generally dictated by the impulse of the moment; and where overweening self-confidence has despised preparation, a wise apprehension often been able to make head against superior numbers. Not that confidence is out of place in an army of invasion, but in an enemy's country it should also be accompanied by the precautions of apprehension; troops will by this combination be best inspired for dealing a blow, and best secured against receiving one. In the present instance, the city against which we are going, far from being so impotent for defence, is on the contrary most excellently equipped at all points; so that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expect that they will take the field against us, and that if they have not set out already before we are there, they will certainly do so when they see us in their territory wasting and destroying their property. For men are always exasperated at suffering injuries to which they are not

accustomed, and on seeing them inflicted before their very eyes; and where least inclined for reflection, rush with the greatest heat to action. The Athenians are the very people of all others to do this, as they aspire to rule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are more in the habit of invading and ravaging their neighbours' territory, than of seeing their own treated in the like fashion. Considering, therefore,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gainst which we are marching, and the greatness of the reputation which, according to the event, we shall win or lose for our ancestors and ourselves, remember as you follow where you may be led to regard discipline and vigilance as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and to obey with alacrity the orders transmitted to you; as nothing contributes so much to the credit and safety of an army as the union of large bodies by a single discipline."

"伯罗奔尼撒人和诸位盟友：我们的先辈在伯罗奔尼撒内外参加过多次战役，在场各位当中岁数较大的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率领过如此庞大的队伍出征。我们的兵员数量和作战效率都十分可观，我们要进攻的城邦实力也不差。那么，我们决不能逊于我们的祖先，也不能辜负我们自己的名声。全希腊的希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目前的努力上。因为大家共同把可恨的雅典视为敌人因此，尽管我们进攻的队伍人数众多，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敌人肯定不会与我们在城外相见，但是我们在行军中决不能有丝毫懈怠。各个城邦的官兵应当时刻准备应付出现在自己那部分的危险。战争的进程不可预知，攻击通常源自一时的冲动。过分自信往往疏于准备，适度忧虑则常常能战胜敌人在人数上的优势。这不是说入侵的大军就不该有信心，而是说在敌人的地盘上应当预先有所警惕。两者兼备，部队才能在进攻时士气高昂，遭到打击时坚不可摧。在目前这次进军中，我们要攻击的城市，就防御而言，远非不堪一击。恰恰相反，它在各个方面都装备得异常完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一定会和我们兵戎相见。纵令他们在我们抵达之前还没有出发，当他们看到我们在他们境内践踏他们的土地、破坏他们的财产时，他们肯

定会出来和我们交战。遭到不常蒙受的侵害，看到这些侵害在自己眼前发生，人们总是怒火中烧。最不假思索而动的时候，冲出来投入战斗的劲头也最大。与其他人比起来，雅典人更有可能这样做，因为他们渴望统治世界的其他地方，更习惯侵略和践踏邻邦的领土，而不是看着自己的领土同样遭到破坏。因此，考虑到我们要去进攻的那个城邦的实力，以及依照命运的安排我们将要为祖先和自己赢得或失去的盛名，跟着队伍走的时候要记住，最重要的是遵守纪律和保持警惕，而且要欣然服从传达给你们的命令。多支大部队合在一起行动时，最能给它带来声誉和安全的就是统一的纪律。”

With this brief speech dismissing the assembly, Archidamus first sent off Melesippus, son of Diacritus, a Spartan, to Athens, in case she should be more inclined to submit on seeing the Peloponnesians actually on the march. But the Athenians did not admit into the city or to their assembly, Pericles having already carried a motion against admitting either herald or embassy from the Lacedaemonians after they had once marched out.

作完上述简短动员，阿希达穆斯即宣布散会。然后，他先派斯巴达人迪亚克里图斯之子迈莱西普斯前往雅典探询，看看雅典人实际见到伯罗奔尼撒的大军压境之后是否有屈服之意。但是，雅典人根本不许他进城，也不许他去公民大会会场。佩里克莱斯预先已使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斯巴达人的军队一旦出发，便不再允许他们的传令官或使团进城。

The herald was accordingly sent away without an audience, and ordered to be beyond the frontier that same day; in future, if those who sent him had a proposition to make, they must retire to their own territory before they dispatched embassies to Athens. An

escort was sent with Melesippus to prevent his holding communication with any one. When he reached the frontier and was just going to be dismissed, he departed with these words, “This day will be the beginning of great misfortunes to the Hellenes.” As soon as he arrived at the camp, and Archidamus learnt that the Athenians had still no thoughts of submitting, he at length began his march, and advanced with his army into their territory. Meanwhile, the Boeotians, sending their contingent and cavalry to join the Peloponnesian expedition, went to Plataea with the remainder and laid waste the country.

因此，他们没接见这位传令官就下了逐客令，并要求他当天就离开雅典境内，另外还对他说，派他来的人以后若有话要说，必须先撤回自己境内，然后再派遣使节到雅典来。为了防止他与任何人接触，雅典还派人护送他出境。抵达边境后，迈莱西普斯在即将被放行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天是希腊人大难降临的开始。”他一回到营地，阿希达穆斯即得知雅典人依然不作屈服之想。他终于催军前行，将军队开进了雅典境内。与此同时，维奥蒂亚人派出分遣队和骑兵加入伯罗奔尼撒人的远征之后，又带着其余部队开赴普拉蒂亚，践踏了那一地区。

While the Peloponnesians were still mustering at the Isthmus, or on the march before they invaded Attica, Pericles, son of Xanthippus, one of the ten generals of the Athenians, finding that the invasion was to take place, conceived the idea that Archidamus, who happened to be his friend, might possibly pass by his estate without ravaging it. This he might do, either from a personal wish to oblige him, or acting under instructions from Lacedaemon for the purpose of creating a prejudice against him, as had been before attempted in the demand for the expulsion of the accursed family.

He accordingly took the precaution of announcing to the Athenians in the assembly that, although Archidamus was his friend, yet this friendship should not extend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state, and that in case the enemy should make his houses and lands an exception to the rest and not pillage them, he at once gave them up to be public property, so that they should not bring him into suspicion. He also gave the citizens some advice on their present affairs in the same strain as before. They were to prepare for the war, and to carry in their property from the country. They were not to go out to battle, but to come into the city and guard it, and get ready their fleet, in which their real strength lay. They were also to keep a tight rein on their allies—the strength of Athens being derived from the money brought in by their payments, and success in war depending principally upon conduct and capital, had no reason to despond. Apart from other sources of income, an average revenue of six hundred talents of silver was drawn from the tribute of the allies; and there were still six thousand talents of coined silver in the Acropolis, out of nine thousand seven hundred that had once been there, from which the money had been taken for the porch of the Acropolis, the other public buildings, and for Potidaea. This did not include the uncoined gold and silver in public and private offerings, the sacred vessels for the processions and games, the Median spoils, and similar resources to the amount of five hundred talents. To this he added the treasures of the other temples. These were by no means inconsiderable, and might fairly be used. Nay, if they were ever absolutely driven to it, they might take even the gold ornaments of Athene herself; for the statue contained forty talents of pure gold and it was all removable. This might be used for self-preservation, and must every penny of it be restored. Such was their financial position—surely a satisfactory one. Then they had an army of thirteen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besides sixteen thousand more in the garrisons and on home duty at Athens. This was at first the

number of men on guard in the event of an invasion; it was composed of the oldest and youngest levies and the resident aliens who had heavy armour. The Phaleric wall ran for four miles, before it joined that round the city; and of this last nearly five had a guard, although part of it was left without one, viz., that between the Long Wall and the Phaleric. Then there were the Long Walls to Piraeus, a distance of some four miles and a half, the outer of which was manned. Lastly, the circumference of Piraeus with Munychia was nearly seven miles and a half; only half of this, however, was guarded. Pericles also showed them that they had twelve hundred horse including mounted archers, with sixteen hundred archers unmounted, and three hundred galleys fit for service. Such were the resources of Athens in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when the Peloponnesian invasion was impending and hostilities were being commenced. Pericles also urged his usual arguments for expecting a favourable issue to the war.

当伯罗奔尼撒人仍在地峡集结时，或者说，在他们赶赴阿提卡实施入侵之前，桑西普斯的儿子伯里克利（雅典十将军之一）发现入侵在即，马上想到了一件事：阿希达穆斯恰巧是他的朋友，他率军经过他的地产时，有可能不加破坏。这样做或许是出于个人对他的好意，或许是奉斯巴达之命行事，以便让人们对他产生反感，就像以前他们企图要求雅典驱逐被诅咒的家族一样。鉴于此，他预先就在公民大会上向雅典人宣布，阿希达穆斯虽然是他的朋友，但是这种友谊不能延伸到可容忍对雅典利益造成危害的地步。如果敌军唯独放过他的房屋和土地不予破坏，他就立刻将这些财产充公，以免大家对他产生怀疑。他还针对当时的局势，如以前一样向公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一是要做好开战的准备，把财产从乡下运进城里；二是不要出城接战，而是要进城固守，同时让舰队做好准备，因为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力量所在；另外还要牢牢控制住他们的盟邦——雅典的力量要靠他们缴纳的金钱作支撑。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主要是靠指挥得当和财力雄

厚。不过，在财力问题上，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除了其他收入来源之外，平均每年可以从盟邦的贡金中得到600银塔兰特，卫城还有6,000塔兰特银币。放在那里的资金原来是9,700塔兰特，修建卫城的城门和其他公共建筑以及围攻波提狄亚时花去了一部分。这还不包括公家和私人捐献出来但未铸成币的金银、游行和竞技时用的圣器以及从波斯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和类似资源，这些加起来也有500塔兰特。另外，他补充说，还有其他神庙的财宝，这些绝不是小数目，而且完全可以取用。不仅如此，到了被逼无奈的时候，连雅典娜神像上的金片也可以剥下来用。这尊神像含有40塔兰特纯金，而且全都是可以剥离的。为了自保，这笔黄金可以动用，但战后必须如数归还。这是雅典人的财力状况——当然相当令人满意。至于军队，他们有1.3万名重步兵。此外，在各个要塞驻防和在雅典守城的还有1.6万人。这是起初为了防备入侵而预备的守卫人员，全是军中年龄最大和最小的兵员以及有重甲的异邦居民。法莱鲁姆的城墙绵延4英里，之后与环绕雅典的城墙相会合。环绕雅典的城墙近5英里是有人把守的，但有一部分没有，即介于长墙与法莱鲁姆之间那一段。其次是通往比雷埃夫斯的长墙，长约4.5英里，城墙外有人把守。最后，比雷埃夫斯及穆尼希亚周围还有将近7.5英里，不过这里仅一半有人把守。伯里克利另向他们指出，他们还配有200匹战马，包括1,200名骑射手，另外还有1,600名徒步弓箭手，适于服役的三列桨战舰300艘。伯罗奔尼撒入侵在即和敌对行动即将开始时，雅典各方面的资源情况便是这样。伯里克利还借助他常用的论据强调指出，大家可以期待这场战争会有一个好的结局。

The Athenians listened to his advice, and began to carry in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from the country, and all their household furniture, even to the woodwork of their houses which they took down. Their sheep and cattle they sent over to Euboea and the adjacent islands. But they found it hard to move, as most of them had been always used to live in the country.

雅典人采纳了他的建议，着手将妻子儿女连同室内的所有家具，甚至屋内能拆的木造部分，全都从乡下运到了城里。牛和羊则被送到了埃维亚和邻近的岛上。不过，搬进城里对他们来说并不好受，因为大多数人一向习惯住在乡下。

From very early times, this had been more the case with the Athenians than with others. Under Cecrops and the first kings, down to the reign of Theseus, Attica had always consisted of a number of independent townships, each with its own town hall and magistrates. Except in times of danger the king at Athens was not consulted; in ordinary seasons they carried on their government and settled their affairs without his interference; sometimes even they waged war against him, as in the case of the Eleusinians with Eumolpus against Erechtheus. In Theseus, however, they had a king of equal intelligence and power; and one of the chief features in his organization of the country was to abolish the council-chambers and magistrates of the petty cities, and to merge them in the single council-chamber and town hall of the present capital. Individuals might still enjoy their private property just as before, but they were henceforth compelled to have only one political centre, viz., Athens; which thus counted all the inhabitants of Attica among her citizens, so that when Theseus died he left a great state behind him. Indeed, from him dates the Synoecia, or Feast of Union; which is paid for by the state, and which the Athenians still keep in honour of the goddess. Before this, the city consisted of the present citadel and the district beneath it looking rather towards the south. This i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the temples of the other deities, besides that of Athene, are in the citadel; and even those that are outside it are mostly situated in this quarter of the city, as that of the Olympian Zeus, of the Pythian Apollo, of Earth, and of Dionysus in the Marshes, the same in whose honour the older Dionysia are to this

day celebrated in the month of Anthesterion not only by the Athenians but also by their Ionian descendants. There are also other ancient temples in this quarter. The fountain too, which, since the alteration made by the tyrants, has been called Enneacrounos, or Nine Pipes, but which, when the spring was open, went by the name of Callirhoe, or Fairwater, was in those days, from being so near, used for the most important offices. Indeed, the old fashion of using the water before marriage and for other sacred purposes is still kept up. Again, from their old residence in that quarter, the citadel is still known among Athenians as the city.

从很久以前开始，雅典人就比其他人更习惯在乡下生活。从凯克洛普斯和最初几个国王那时起，一直到忒修斯统治时期，阿提卡一直由若干独立的城镇组成，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市政厅和行政官。只有在危难时期，他们才去雅典找国王商议，平时都是自行管理政务和解决纠纷，不受国王的干预。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向他开战。例如，埃莱夫西斯人就在尤摩尔浦斯的率领下公然反对过厄瑞克透斯。不过，忒修斯则兼具一个国王应有的智慧与权威。他所建立的乡村体制，主要特点之一即是取消小城镇的议事会和行政官，将其融入雅典的单一议事会和市政厅之中。个人仍可以像以前一样享有私人财产，但从此以后只能有一个政治中心，即雅典。这样，阿提卡的所有居民都可以算作雅典的公民。因此，忒修斯去世时留给了后代一个伟大的城邦。实际上，“西尼夏节”，或称“雅典统一节”，即是从他开始的。这个节日的开支由城邦统一支付。雅典人如今仍保留着这个节日，以纪念那位女神。在此之前，这座城市仅包括现在的卫城和它下面向南的那部分区域。这一点可以由以下事实证明：除了雅典娜的神庙以外，其他神的神庙都在卫城以内，连卫城之外的神庙也大多位于城市的这一区域，例如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皮提亚的阿波罗神庙、大地女神神庙和沼泽区的狄俄尼索斯神庙。时至今日，无论是雅典人，还是他们的爱奥尼亚后裔，都在安塞斯特里昂月庆祝比较古老的酒神节，以纪念狄俄尼索斯。这一区域还有其他一些古老的神庙。那里还有一处泉

水。自从僭主们开凿以来，这处泉水就被称为“恩内阿克鲁诺斯”，或曰“九泉”。但当泉水涌出时，则常被称为“卡利尔希”，或曰“芳溪”。那时候，因为就在近旁，所以举办最重要的宗教仪式时都用这个泉里的水。实际上，结婚之前和为了其他神圣目的而取用此泉之水这一古老习俗，如今仍在沿用。此外，现在雅典人称卫城为“城”，同样也是因为他们过去住在那里的缘故。

The Athenians thus long lived scattered over Attica in independent townships. Even after the centralization of Theseus, old habit still prevailed; and from the early times down to the present war most Athenians still lived in the country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and were consequently not at all inclined to move now, especially as they had only just restored their establishments after the Median invasion. Deep was their trouble and discontent at abandoning their houses and the hereditary temples of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at having to change their habits of life and to bid farewell to what each regarded as his native city.

因此，雅典人长期散居在阿提卡的各个独立城镇。即便是在忒修斯实行集权化之后，旧时的习惯仍在延续。从古时候到目前这场战争开始，大部分雅典人一直和家人及雇工生活在乡下。因此，现在要他们迁移，尤其是在波斯战争后刚刚安定下来之时，他们很不乐意。让他们感到万分难过和甚为不满的是，他们得抛弃自己的家园和古代遗留下来的神庙，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告别人人将其视为家乡的城镇。

When they arrived at Athens, though a few had houses of their own to go to, or could find an asylum with friends or relatives, by

far the greater number had to take up their dwelling in the parts of the city that were not built over and in the temples and chapels of the heroes, except the Acropolis and the temple of the Eleusinian Demeter and such other Places as were always kept closed. The occupation of the plot of ground lying below the citadel called the Pelasgian had been forbidden by a curse; and there was also an ominous fragment of a Pythian oracle which said:

他们到雅典后，只有少数人有自己的房屋可住或托庇在亲友家中，绝大多数不得不栖身在市内没有建房的地方以及庙宇和古代英雄们的神殿中，雅典卫城和埃莱夫西斯的得墨忒耳女神庙这类一向禁止入内的神庙除外。卫城下方有一块地叫“派拉西亚人的土地”，因为受到神的诅咒，所以也禁止居住。皮提亚的神谕中也有相关不祥之言：

Leave the Pelasgian parcel desolate, Woe worth the day that men inhabit it!

让派拉西亚人的土地荒着，有人住进去的日子会被诅咒！

Yet this too was now built over in the necessity of the moment. And in my opinion, if the oracle proved true, it was in the opposite sense to what was expected. For the misfortunes of the state did not arise from the unlawful occupation, but the necessity of the occupation from the war; and though the god did not mention this, he foresaw that it would be an evil day for Athens in which the plot came to be inhabited. Many also took up their quarters in the towers of the walls or wherever else they could. For when they were all come in, the city proved too small to hold them; though

afterwards they divided the Long Walls and a great part of Piraeus into lots and settled there. All this while great attention was being given to the war; the allies were being mustered, and an armament of a hundred ships equipped for Peloponnese. Such was the state of preparation at Athens.

然而，由于当时的情况所迫，人们在这块地上也盖起了房子。依我看来，如果说这一神谕真的应验了，其含义也和原本所预料的相反。这个城邦的不幸，不是由于有人非法住到这个地方，而是由于战争所迫不得不在此居住。神虽然没有提到这一点，但预料到了有人在这片土地定居的那天就是雅典倒霉的日子。还有很多人住进了城墙上的塔楼或其他所能找到的地方。因为大家都迁进来了，城里的地方就显得太小，无法容纳所有人。后来，长墙和比雷埃夫斯的很大一部分也分成了小块，以供他们居住。在这段时间里，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战争上。他们召集了盟邦的军队，装备了100艘战舰，准备开赴伯罗奔尼撒。这是雅典的战争准备情况。

Meanwhile, the army of the Peloponnesians was advancing. The first town they came to in Attica was Oenoe, where they to enter the country. Sitting down before it, they prepared to assault the wall with engines and otherwise. Oenoe, standing upon the Athenian and Boeotian border, was of course a walled town, and was used as a fortress by the Athenians in time of war. So the Peloponnesians prepared for their assault, and wasted some valuable time before the place. This delay brought the gravest censure upon Archidamus. Even during the levying of the war, he had credit for weakness and Athenian sympathies by the half measures he had advocated; and after the army had assembled he had further injured himself in public estimation by his loitering at the Isthmus and the slowness with which the rest of the march had

been conducted. But all this was as nothing to the delay at Oenoe. During this interval, the Athenians were carrying in their property; and it was the belief of the Peloponnesians that a quick advance would have found everything still out, had it not been for his procrastination. Such was the feeling of the army towards Archidamus during the siege. But he, it is said, expected that the Athenians would shrink from letting their land be wasted, and would make their submission while it was still uninjured; and this was why he waited.

与此同时，伯罗奔尼撒的军队一直在向前推进。进入阿提卡境内之后，他们抵达的第一个城镇是伊尼。他们想从这个地方深入阿提卡的腹地。在城前扎下营盘之后，他们准备用攻城器械和其他手段攻克城墙。伊尼位于雅典和维奥蒂亚的交界处，当然筑有城墙。打仗的时候，雅典人就把它作为边防要塞使用。伯罗奔尼撒人准备攻城，所以在城前浪费了一些宝贵的时间。因为这一耽搁，阿希达穆斯遭到了最严厉的责难。甚至在战争动员时期，由于他主张采取折衷的办法，大家就认为他比较软弱，而且对雅典人怀有同情之心。军队集结起来之后，他先是在地峡迟迟不动，后来又在进军过程中缓缓而行，所以他在公众中的声誉又有所下降。然而，与他在伊尼的耽搁相比，这一切都不足为道。雅典人利用这段时间将他们的财产运进了城里。伯罗奔尼撒人认为，要是阿希达穆斯不一味拖延，而是快速向前推进，雅典人什么都运不进去。这就是围城期间军队对阿希达穆斯的看法。然而，他之所以裹足不前，据说是因为他料想雅典人不愿让自己的土地被人践踏，因而会趁着土地尚未受损谋求和解。

But after he had assaulted Oenoe, and every possible attempt to take it had failed, as no herald came from Athens, he at last broke up his camp and invaded Attica. This was about eighty days after the Theban attempt upon Plataea, just in the middle of summer,

when the corn was ripe, and Archidamus, son of Zeuxis, king of Lacedaemon, was in command. Encamping in Eleusis and the Thriasian plain, they began their ravages, and putting to flight some Athenian horse at a place called Rheiti, or the Brooks, they then advanced, keeping Mount Aegaleus on their right, through Cropia, until they reached Acharnae, the largest of the Athenian demes or townships. Sitting down before it, they formed a camp there, and continued their ravages for a long while.

但是，在他攻取伊尼的所有尝试均告失败之后，雅典的传令官仍未出现。于是，他终于拔营而起，挥师入侵了阿提卡。这次入侵发生在底比斯人企图夺取普拉蒂亚约八十天之后，时值仲夏，正是麦子成熟的季节。指挥这次入侵的是斯巴达国王，即宙克西斯的儿子阿希达穆斯。他们在埃莱夫西斯和斯里亚平原扎下营盘，随即开始大肆洗劫。在一个叫“里蒂”或“群溪”的地方，他们击溃了雅典的一个骑兵队，随后沿着右边的埃加莱夫斯山继续前进，穿过克罗皮亚来到阿哈奈。这是雅典最大的德谟，或曰乡镇。他们在城前停下，在那里扎下营盘，又继续劫掠了好长时间。

The reason why Archidamus remained in order of battle at Acharnae during this incursion, instead of descending into the plain, is said to have been this. He hoped that the Athenians might possibly be tempted by the multitude of their youth and the unprecedented efficiency of their service to come out to battle and attempt to stop the devastation of their lands. Accordingly, as they had met him at Eleusis or the Thriasian plain, he tried if they could be provoked to a sally by the spectacle of a camp at Acharnae. He thought the place itself a good position for encamping; and it seemed likely that such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ate as the three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of the Acharnians would refuse to submit

to the ruin of their property, and would force a battle on the rest of the citizens. On the other hand, should the Athenians not take the field during this incursion, he could then fearlessly ravage the plain in future invasions, and extend his advance up to the very walls of Athens. After the Acharnians had lost their own property they would be less willing to risk themselves for that of their neighbours; and so there would be division in the Athenian counsels. These were the motives of Archidamus for remaining at Acharnae.

这次入侵期间，阿希达穆斯之所以在阿哈奈按兵不动，而不是长驱直入平原地带，据说是因为：他希望雅典人依仗年轻人多和战斗力空前强大这两点优势出城接战，试图阻止对其土地的践踏。因此，尽管他在埃莱夫西斯或斯里亚平原时他们都不出战，他还是想试探一下看看他们在看到他在阿哈奈扎营后会不会怒而出击。在他看来，这个地方本身很适于扎营，阿哈奈人又有3,000名重步兵，在城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似乎不会听任自己的财产遭到破坏，而是会迫使其他公民一同出战。另一方面，雅典人在这次入侵中若再不出战，那么，在以后的入侵中，他就可以无所顾忌地践踏平原地带，一直推进到雅典城下。阿哈奈人失去自己的财产后，他们就不会那么愿意为邻邦的财产去冒生命危险了。如此一来，雅典方面便会产生意见分歧。这就是阿希达穆斯在阿哈奈按兵不动的动机所在。

In the meanwhile, as long as the army was at Eleusis and the Thriasian plain, hopes were still entertained of its not advancing any nearer. It was remembered that Pleistoanax, son of Pausanias, king of Lacedaemon, had invaded Attica with a Peloponnesian army fourteen years before, but had retreated without advancing farther than Eleusis and Thria, which indeed proved the cause of his exile from Sparta, as it was thought he had been bribed to retreat. But when they saw the army at Acharnae, barely seven miles from

Athens, they lost all patience. The territory of Athens was being ravaged before the very eyes of the Athenians, a sight which the young men had never seen before and the old only in the Median wars; and it was naturally thought a grievous insult, and the determination was universal, especially among the young men, to sally forth and stop it. Knots were formed in the streets and engaged in hot discussion; for if the proposed sally was warmly recommended, it was also in some cases opposed. Oracles of the most various import were recited by the collectors, and found eager listeners in one or other of the disputants. Foremost in pressing for the sally were the Acharnians, as constituting no small part of the army of the state, and as it was their land that was being ravaged. In short, the whole city was in a most excited state; Pericles was the object of general indignation; his previous counsels were totally forgotten; he was abused for not leading out the army which he commanded, and was made responsible for the whole of the public suffering.

同时，只要敌军还在埃莱夫西斯和斯里亚平原，雅典人就仍心存希望，盼着它不再继续向前推进。他们还记得，十四年前，斯巴达国王普利斯托阿纳克斯（保萨尼阿斯之子）曾率领伯罗奔尼撒的一支军队入侵阿提卡，但到了埃莱夫西斯和斯里亚平原之后就撤走了，未再继续向前推进。实际上，这也是他被逐出斯巴达的原因。人们认为，他是因为受了贿赂而退兵的。但是，当他们看到敌军已到阿哈奈，离雅典仅有7英里之遥时，他们终于忍无可忍了。雅典的领土在他们眼皮底下遭到践踏，这种情景对雅典的青年人来说是前所未见的，上年纪的人也只是在波斯战争期间目睹过。他们自然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一致决心杀出城去，制止敌军的破坏行动，年轻人更是如此。人们在街头三五成群地热烈讨论着这个问题。只要有人极力主张出战，就有人出来表示反对。爱搜罗神谕的人所散布的神谕千奇百怪，但争论的一方或另一方总是有人喜闻乐见。要求出战呼声最高的是阿哈奈人，

因为他们在城邦的军队中为数甚众，而且遭到践踏的又是他们的土地。总之，整个雅典城群情激愤，伯里克利则成了众矢之的，他先前的忠告已统统被弃之脑后。人们指责他身为统帅却不率军出战，认为他应对公众遭受的所有苦难负全责。

He, meanwhile, seeing anger and infatuation just now in the ascendant, and of his wisdom in refusing a sally, would not call either assembly or meeting of the people, fearing the fatal results of a debate inspired by passion and not by prudence. Accordingly, he addressed himself to the defence of the city, and kept it as quiet as possible, though he constantly sent out cavalry to prevent raids on the lands near the city from flying parties of the enemy. There was a trifling affair at Phrygia between a squadron of the Athenian horse with the Thessalians and the Boeotian cavalry; in which the former had rather the best of it, until the heavy infantry advanced to the support of the Boeotians, when the Thessalians and Athenians were routed and lost a few men, whose bodies, however, were recovered the same day without a truce. The next day, the Peloponnesians set up a trophy. Ancient alliance brought the Thessalians to the aid of Athens; those who came being the Larisaeans, Pharsalians, Cranonians, Pyrasians, Gyrtonians, and Pheraeans. The Larisaean commanders were Polymedes and Aristonus, two party leaders in Larisa; the Pharsalian general was Menon; each of the other cities had also its own commander.

伯里克利则深信拒不出战的做法是明智的。看到人们此时已愤怒得不可理喻，他没有召集公民大会，也没有召集特别会议，因为他担心人们在争论中出于激愤而不是审慎从而得出不幸的结论。于是，他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城市的防御上，尽量维持城市的安宁，但也不断派遣骑兵出城，以防敌军的小股部队侵袭城郊地带。雅典的一个骑兵中

队和色萨利人与维奥蒂亚的骑兵在弗里吉亚发生过一次小规模冲突。起初前者占尽了上风，但重步兵前来增援维奥蒂亚人之后，色萨利人和雅典人开始落败，还损失了几个人。不过，尽管没有休战，他们当天就把尸体收了回去。翌日，伯罗奔尼撒人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色萨利与雅典结盟由来已久，所以色萨利人会来支援雅典一方。前来助战的人中有拉里萨人、法萨卢斯人、克拉农人、皮拉苏斯人、伊尔托尼亚人和费雷人。拉里萨人的指挥官是波利迈泽斯和阿里斯托努斯，这两位在拉里萨都是党派领导人。法萨卢斯的司令是梅农，其余城邦也各有各的指挥官。

In the meantime, the Peloponnesians, as the Athenians did not come out to engage them, broke up from Acharnae and ravaged some of the demes between Mount Parnes and Brilessus. While they were in Attica the Athenians sent off the hundred ships which they had been preparing round Peloponnese, with a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and four hundred archers on board, under the command of Carcinus, son of Xenotimus, Proteas, son of Epicles, and Socrates, son of Antigenes. This armament weighed anchor and started on its cruise, and the Peloponnesians, after remaining in Attica as long as their provisions lasted, retired through Boeotia by a different road to that by which they had entered. As they passed Oropus they ravaged the territory of Graea, which is held by the Oropians from Athens, and reaching Peloponnese broke up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es.

其间，由于雅典人还是没有出城接战，伯罗奔尼撒人拔营离开阿哈奈，对帕尔内斯山与布里莱苏斯之间的一些德谟进行劫掠。他们还在阿提卡时，雅典人就派他们准备的那100艘舰只向伯罗奔尼撒半岛周围驶去。舰上载有1,000名重步兵和400名弓箭手，指挥官是克赛诺蒂穆斯的儿子卡尔西努斯、埃皮克莱斯的儿子普罗泰亚萨和安蒂耶内

斯的儿子苏格拉底。这支大军起锚出航了，伯罗奔尼撒人却仍停留在阿提卡。直到军粮不济，他们才经维奥蒂亚往回撤，所走的路线与来时的不同。途径奥罗普斯时，他们践踏了格雷阿的领土，那个地方的占有者是来自雅典的奥罗普斯人。抵达伯罗奔尼撒半岛后，他们回到了各自的城邦。

After they had retired the Athenians set guards by land and sea at the points at which they intended to have regular stations during the war. They also resolved to set apart a special fund of a thousand talents from the moneys in the Acropolis. This was not to be spent, but the current expenses of the war were to be otherwise provided for. If any one should move or put to the vote a proposition for using the money for any purpose whatever except that of defending the city in the event of the enemy bringing a fleet to make an attack by sea, it should be a capital offence. With this sum of money they also set aside a special fleet of one hundred galleys, the best ships of each year, with their captains. None of these were to be used except with the money and against the same peril, should such peril arise.

伯罗奔尼撒人撤走后，雅典人在陆上和海上多处设了岗，战争期间，他们打算在这些地方设立常设据点。他们还决定从卫城那笔款项中拨出1,000塔兰特作为特别储备金。这笔款项不得动用，当下的战争费用由其他款项支付。若非敌人率舰队从海上攻来而必须保卫雅典，凡提议动用此款或将动用此款的提议付诸表决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均以死罪论处。在留出这笔款项的同时，他们还专门预留出一支拥有100艘三列桨战舰的舰队，这些都是每年最好的战舰，而且都配备了舰长。这些舰只除非与那笔款项同用，否则一律不得动用，而且只能用于应对同一危险，倘若这种危险真的降临的话。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in the hundred ships round Peloponnese, reinforced by a Corcyraean squadron of fifty vessels and some others of the allies in those parts, cruised about the coasts and ravaged the country. Among other places, they landed in Laconia and made an assault upon Methone; there being no garrison in the place, and the wall being weak. But it so happened that Brasidas, son of Tellis, a Spartan, was in command of a guard for the defence of the district. Hearing of the attack, he hurried with a hundred heavy infantry to the assistance of the besieged, and dashing through the army of the Athenians, which was scattered over the country and had its attention turned to the wall, threw himself into Methone. He lost a few men in making good his entrance, but saved the place and won the thanks of Sparta by his exploit, being thus the first officer who obtained this notice during the war. The Athenians at once weighed anchor and continued their cruise. Touching at Pheia in Elis, they ravaged the country for two days and defeated a picked force of three hundred men that had come from the vale of Elis and the immediate neighbourhood to the rescue. But a stiff squall came down upon them and, not liking to face it in a place where there was no harbour, most of them got on board their ships, and doubling Point Ichthys sailed into the port of Pheia. In the meantime, the Messenians and some others, who could not get on board, marched over by land and took Pheia. The fleet afterwards sailed round and picked them up and then put to sea, Pheia being evacuated, as the main army of the Eleans had now come up. The Athenians continued their cruise, and ravaged other places on the coast.

与此同时，伯罗奔尼撒半岛周围那100艘舰上的雅典人，在克基拉一支50艘舰只组成的舰队以及那些地区其他一些盟友的支援下，仍在环绕海岸游弋，对该地区横加劫掠。除了其他地方之外，他们还在

拉科尼亚上岸，对迈索内发动袭击，进攻要塞，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守军，城墙也不牢固。但是，他们碰巧上赶斯巴达人布拉西达斯（泰利斯的儿子）率领一支部队在防守该地区。获悉这一袭击的消息后，他火速率领100名重步兵前去增援被围困的城市。由于雅典人的军队都分散在乡间各处，而且注意力转向了城墙那边，他飞快地从敌军中冲过，直插迈索内。虽然在突围进城时损失了几个人，但他却挽救了这座城市，以其英勇行为赢得了斯巴达政府的感激，并因此而成为这场战争中第一个获得公开表彰的军官。雅典人则立即起锚，继续游弋。他们在埃利斯的菲阿登陆后，在那里劫掠了两天，打败了从埃利斯谷和邻近地区赶去救援的一支300人的精兵队伍。但是，当时一阵狂风猛然朝他们袭来。由于不想在没有港口的地方面对狂风，大部分人又上了舰。他们绕过伊赫西斯岬，驶进了菲阿港。与此同时，麦西尼亚人和其他一些未能上舰的人从陆路赶过去，攻取了菲阿。这支舰队后来又返回去将他们接上舰，然后驶向大海。埃利斯人的主力部队这时已经赶来，他们就撤离了菲阿。这些雅典人继续游弋，劫掠沿岸其他地方。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Athenians sent thirty ships to cruise round Locris and also to guard Euboea; Cleopompus, son of Clinias, being in command. Making descents from the fleet he ravaged certain places on the sea-coast, and captured Thronium and took hostages from it. He also defeated at Alope the Locrians that had assembled to resist him.

大约在同时，雅典人又派出30艘战舰环绕洛克里斯游弋，同时也是为了保卫埃维亚岛。指挥这些舰的是克利尼亚斯的儿子克莱奥蓬普斯。他们下舰劫掠了岸上一些地方，夺取了斯罗尼乌姆，并从那里带走了一些人质。他们还在阿洛佩打败了聚集起来抗击他们的洛克里斯人。

During the summer, the Athenians also expelled the Aeginetans with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from Aegina, on the ground of their having been the chief agents in bringing the war upon them. Besides, Aegina lies so near Peloponnese that it seemed safer to send colonists of their own to hold it, and shortly afterwards the settlers were sent out. The banished Aeginetans found an asylum in Thyrea, which was given to them by Lacedaemon, not only on account of her quarrel with Athens, but also because the Aeginetans had laid her under obligations at the time of the earthquake and the revolt of the Helots. The territory of Thyrea is on the frontier of Argolis and Laconia, reaching down to the sea. Those of the Aeginetans who did not settle here were scattered over the rest of Hellas.

夏季期间，雅典人还将埃伊纳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赶出了埃伊纳岛，理由是他们是给雅典人招来战争的主要祸因。此外，埃伊纳岛离伯罗奔尼撒很近，如果派自己的移民去占据该岛，似乎更安全一些，之后不久，他们就把移民派过去了。被逐出的埃伊纳人在西雷阿找到一个避难之处，那是斯巴达提供给他们的。斯巴达将此处提供给他们，不仅是因为它与雅典不和，同时也是因为它在地震和希洛人反叛期间曾受惠于埃伊纳人。西雷阿地区位于阿尔戈利斯与拉科尼亚的边境地带，一直延伸到海边。未定居于此的埃伊纳人则散居到了希腊其他地方。

The same summer,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lunar month, the only time by the way at which it appears possible, the sun was eclipsed after noon. After it had assumed the form of a crescent and some of the stars had come out, it returned to its natural shape.

同年夏季，在一个朔望月的月初，午后发生了日蚀。附带说一句，似乎只有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事才有可能发生。太阳呈新月状后，出现了一些星星，尔后太阳又恢复了原来的形状。

During the same summer, Nymphodorus, son of Pythes, an Abderite, whose sister Sitalces had married, was made their proxenus by the Athenians and sent for to Athens. They had hitherto considered him their enemy; but he had great influence with Sitalces, and they wished this prince to become their ally. Sitalces was the son of Teres and King of the Thracians. Teres, the father of Sitalces, was the first to establish the great kingdom of the Odrysians on a scale quite unknown to the rest of Thrace, a large portion of the Thracians being independent. This Teres is in no way related to Tereus who married Pandion's daughter Procne from Athens; nor indeed did they belong to the same part of Thrace. Tereus lived in Daulis, part of what is now called Phocis, but which at that time was inhabited by Thracians. It was in this land that the women perpetrated the outrage upon Itys; and many of the poets when they mention the nightingale call it the Daulian bird. Besides, Pandion in contracting an alliance for his daughter would consider the advantages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would naturally prefer a match at the above moderate distance to the journey of many days which separates Athens from the Odrysians. Again the names are different; and this Teres was king of the Odrysians, the first by the way who attained to any power. Sitalces, his son, was now sought as an ally by the Athenians, who desired his aid in the reduction of the Thracian towns and of Perdiccas. Coming to Athens, Nymphodorus concluded the alliance with Sitalces and made his son Sadocus an Athenian citizen, and promised to finish the war in Thrace by persuading Sitalces to send the Athenians a force of Thracian horse and targeteers. He also reconciled them with

Perdiccas, and induced them to restore Therme to him; upon which Perdiccas at once joined the Athenians and Phormio in an expedition against the Chalcidians. Thus Sitalces, son of Teres, King of the Thracians, and Perdiccas, son of Alexander, King of the Macedonians, became allies of Athens.

同年夏季，皮塞斯的儿子尼姆福佐鲁斯，阿夫季拉人，其姊妹嫁给了西塔尔塞斯的，被雅典人任命为他们的代理人，并被召往雅典。雅典人此前一直将他视为敌人，但他对西塔尔塞斯很有影响力，而他们希望这位君主成为他们的盟友。西塔尔塞斯是泰雷斯的儿子，色雷斯人的国王。西塔尔塞斯的父亲泰雷斯是奥兹里夏大王国的缔造者。由于大部分色雷斯人是独立的，这个王国的规模鲜为色雷斯其他地方所知。这位泰雷斯与从雅典迎娶了潘季翁之女普洛克涅为妻的忒瑞俄斯毫无关联，两人甚至不是同一个地方的色雷斯人。忒瑞俄斯住在达夫利斯，其中一部分如今被称为福基斯，但当时那一地区住的是色雷斯人。就是在这个地方，二女对伊蒂斯犯下了罪行。许多诗人每逢提及夜莺便称之为“达夫利斯鸟”。此外，潘季翁以嫁女的方式结盟，肯定会考虑到是否便于相互支援这一点，因而自然会在距离适中的地方寻找婚姻对象，而不是在离雅典有多日路程的奥兹里夏。再者，两个人的名字也不相同。这位泰雷斯是奥兹里夏人的国王，而且是头一位有势力的国王。雅典人这时寻求与他的儿子西塔尔塞斯成为盟友，就是想在他的协助下控制色雷斯的城镇和佩尔狄卡斯。尼姆福佐鲁斯一到雅典就商妥了与西塔尔塞斯结盟一事，使他的儿子萨佐库斯入籍雅典公民，并答应说服西塔尔塞斯，请他派遣一支色雷斯骑兵和轻盾兵部队协助雅典人结束在色雷斯的战事。他还说服他们与佩尔狄卡斯和解，劝他们将塞尔迈归还给他。此事一办妥，佩尔狄卡斯马上加入了雅典人在福尔米奥率领下对哈尔基斯人的远征。色雷斯人的国王西塔尔塞斯（泰雷斯之子）和马其顿人的国王佩尔狄卡斯（亚历山大之子），就这样双双成了雅典人的盟友。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in the hundred vessels were still cruising round Peloponnese. After taking Sollium, a town belonging to Corinth, and presenting the city and territory to the Acarnanians of Palaira, they stormed Astacus, expelled its tyrant Evarchus, and gained the place for their confederacy. Next they sailed to the island of Cephallenia and brought it over without using force. Cephallenia lies off Acarnania and Leucas, and consists of four states, the Paleans, Cranians, Samaeans, and Pronaeans. Not long afterwards the fleet returned to Athens. Towards the autumn of this year the Athenians invaded the Megarid with their whole levy, resident aliens included, under the command of Pericles, son of Xanthippus. The Athenians in the hundred ships round Peloponnese on their journey home had just reached Aegina, and hearing that the citizens at home were in full force at Megara, now sailed over and joined them. This was without doubt the largest army of Athenians ever assembled, the state being still in the flower of her strength and yet unvisited by the plague. Full ten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were in the field, all Athenian citizens, besides the three thousand before Potidaea. Then the resident aliens who joined in the incursion were at least three thousand strong; besides which there was a multitude of light troops. They ravage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territory, and then retired. Other incursions into the Megarid were afterwards made by the Athenians annually during the war, sometimes only with cavalry, sometimes with all their forces. This went on until the capture of Nisaea. Atalanta also, the desert island off the Opuntian coast, was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summer converted into a fortified post by the Athenians, in order to prevent privateers issuing from Opus and the rest of Locris and plundering Euboea. Such were the events of this summer after the return of the Peloponnesians from Attica.

在此期间，那100艘战舰上的雅典人仍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周围游弋。他们攻取了属于科林斯的索利乌姆城，把这座城连同所属土地赠予了帕莱拉的阿卡纳尼亚人，接着又对阿斯塔库斯发起猛攻，赶走了那里的僭主埃瓦尔胡斯，将这个地方纳入了他们的同盟。接着，他们又驶往凯法莱尼亚，未费一兵一卒便得到了这个岛屿。凯法莱尼亚位于阿卡纳尼亚和莱夫卡斯附近，岛上有四个城邦，即帕莱人、克拉尼人、萨迈人和普罗内人的城邦。没过多久，这支舰队返回了雅典。这年夏末将至时，雅典人在桑西普斯之子伯里克利的率领下，倾全军之力入侵了迈加里德。军中亦包括居住在雅典的异邦人。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游弋的那100艘战舰当时正在返航途中。刚驶到埃伊纳，舰上的雅典人就听说家乡应征入伍的公民已全数抵达迈加拉，他们便将舰只开过去与之会合。这无疑是雅典人至此召集的最庞大的一支军队，当时雅典的军力仍处于盛期，瘟疫尚未袭来。这次投入战场的重步兵有整整1万人，而且全是雅典公民，在波提狄亚城前的3,000人尚不计算在内。居住在雅典的异邦人至少也有3,000人参加了这次入侵。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轻步兵。劫掠了迈加里德的大部分地区之后，他们撤回去了。后来，雅典人在这次战争期间年年入侵迈加里德，有时仅用骑兵，有时则全军出动。直到攻陷尼塞阿，这种状况才告终止。这年夏季接近尾声时，雅典人还将奥珀斯海岸附近的荒岛阿塔兰塔变成了设防据点，以防私掠船从奥珀斯和洛克里斯的其他地方驶出侵扰埃维亚岛。这些是伯罗奔尼撒人从阿提卡撤回后夏季所发生的战事。

In the ensuing winter, the Acarnanian Evarchus, wishing to return to Astacus, persuaded the Corinthians to sail over with forty ships and fifteen hundred heavy infantry and restore him; himself also hiring some mercenaries. In command of the force were Euphamidas, son of Aristonymus, Timoxenus, son of Timocrates, and Eumachus, son of Chrysis, who sailed over and restored him and, after failing in an attempt on some places on the Acarnanian coast which they were desirous of gaining, began their voyage home. Coasting along shore they touched at Cephallenia and made

a descent on the Cranian territory, and losing some men by the treachery of the Cranians, who fell suddenly upon them after having agreed to treat, put to sea somewhat hurriedly and returned home.

在随后而至的冬季里，由于阿卡纳尼亚的埃瓦尔胡斯很想重返阿斯塔库斯，他便说服科林斯人派40艘战舰和1,500名重步兵以帮他恢复势力。另外，他自己也雇了一些雇佣兵。指挥这支军队的是阿里斯托尼穆斯的儿子埃夫法米扎斯、蒂莫克拉泰斯的儿子蒂莫克森努斯和赫里西斯的儿子埃夫马胡斯。他们驶往阿斯塔库斯助其恢复了势力之后，试图夺取阿卡纳尼亚沿海一带的一些地区，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便开始返航。在沿着海岸航行途中，他们曾在凯法莱尼亚靠岸，在克拉尼人的领土上登陆。克拉尼人起初假装同意和谈，后来突然向他们发起了进攻。由于上了克拉尼人的当，他们损失了一些人，匆忙启航返回本邦。

In the same winter, the Athenians gave a funeral at the public cost to those who had first fallen in this war. It was a custom of their ancestors, and the manner of it is as follows. Three days before the ceremony, the bones of the dead are laid out in a tent which has been erected; and their friends bring to their relatives such offerings as they please. In the funeral procession cypress coffins are borne in cars, one for each tribe; the bones of the deceased being placed in the coffin of their tribe. Among these is carried one empty bier decked for the missing, that is, for those whose bodies could not be recovered. Any citizen or stranger who pleases, joins in the procession: and the female relatives are there to wail at the burial. The dead are laid in the public sepulchre in the beautiful suburb of the city, in which those who fall in war are always buri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slain at Marathon, who for their singular and

extraordinary valour was interred on the spot where they fell. After the bodies have been laid in the earth, a man chosen by the state, of approved wisdom and eminent reputation, pronounces over them an appropriate panegyric; after which all retire. Such is the manner of the burying; and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the war, whenever the occasion arose, the established custom was observed. Meanwhile, these were the first that had fallen, and Pericles, son of Xanthippus, was chosen to pronounce their eulogium. When the proper time arrived, he advanced from the sepulchre to an elevated platform in order to be heard by as many of the crowd as possible, and spoke as follows:

同年冬季，雅典人为这场战争中首批阵亡的将士举行了公葬。这是他们祖先传下来的惯例，葬礼的方式是这样：葬礼前三天，将死者的尸骨安放在事先搭起的帐篷内，死者的朋友和死者的亲属带去自己认为合适的祭品。送葬时，柏木棺材用四轮马车载着，每个部族一具，死者的尸骨分别装在各部族的棺材内。这些棺材中有一具是空棺，这是为失踪者而设的，也就是那些尸体无法收回者。无论是本邦公民还是外邦人，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加入送葬的行列。死者的女性亲属在下葬时恸哭致哀。死者的遗骨安葬在公共墓地，地点在风景秀丽的市郊。在战争中阵亡的人员总是葬在那里。在马拉松战役中阵亡的将士例外，因为他们英勇过人，世所罕见，所以葬在了他们牺牲的地方。遗骨入土后，由城邦选出一位大家公认智识过人且享有盛名者发表颂扬死者的演说。演说之后，众人各自散去。葬礼的方式就是这样。整个战争期间，每逢举行公葬，雅典人都遵从这一既定习俗。这些将士是首批阵亡者，桑西普斯的儿子伯里克利被推举出来发表颂扬演说。时机一到，他从葬地走上一个高台，以便尽可能多的人能够听到。他的演说内容如下：

“Most of my predecessors in this place have commended him

who made this speech part of the law, telling us that it is well that it should be delivered at the burial of those who fall in battle. For myself, I should have thought that the worth which had displayed itself in deeds would be sufficiently rewarded by honours also shown by deeds; such as you now see in this funeral prepared at the people's cost. And I could have wished that the reputations of many brave men were not to be imperilled in the mouth of a single individual, to stand or fall according as he spoke well or ill. For it is hard to speak properly upon a subject where it is even difficult to convince your hearers that you are speaking the truth. On the one hand, the friend who is familiar with every fact of the story may think that some point has not been set forth with that fullness which he wishes and knows it to deserve; on the other, he who is a stranger to the matter may be led by envy to suspect exaggeration if he hears anything above his own nature. For men can endure to hear others praised only so long as they can severally persuade themselves of their own ability to equal the actions recounted; when this point is passed, envy comes in and with it incredulity. However, since our ancestors have stamped this custom with their approval, it becomes my duty to obey the law and to try to satisfy your several wishes and opinions as best I may.”

“以前在这里发表演说的人，大多都赞颂那位将这个演说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人，告诉我们理应在阵亡将士的葬礼上发表演说。我窃以为，以行动展示出来的价值，报之以用行动表示的敬意足矣，就像大家在这场用公费备办的葬礼中所看到的那样。我真的希望，众多勇士们的声誉不因一人之言而受到损害，也不因一人的褒贬而有所起落。恰如其分地评论一件事其实很难，让听众相信你所说的句句属实则更难。一方面，对情况了如指掌的朋友可能会认为，有的地方没有说足，没有达到他希望或认为应当达到的程度；另一方面，对情况全然不晓的人，如果听到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时，则可能由妒生疑，认

为你言过其实。人们对他人受到赞扬的容忍，仅限于相信自己也能做到的范围之内。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心生妒意，怀疑也会随之而至。但是，既然我们的祖先赞成将这一习俗定为一种制度，那么，我有义务遵从这一惯例，尽我所能来满足大家不同的期望和要求。”

“I shall begin with our ancestors; it is both just and proper that they should have the honour of the first mention on an occasion like the present. They dwelt in the country without break in the successi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d handed it down free to the present time by their valour. And if our more remote ancestors deserve praise, much more do our own fathers, who added to their inheritance the empire which we now possess, and spared no pains to be able to leave their acquisitions to us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Lastly, there are few parts of our dominions that have not been augmented by those of us here, who are still more or less in the vigour of life; while the mother country has been furnished by us with everything that can enable her to depend on her own resources whether for war or for peace. That part of our history which tells of the military achievements which gave us our several possessions, or of the ready valour with which either we or our fathers stemmed the tide of Hellenic or foreign aggression is a theme too familiar to my hearers for me to dilate on, and I shall therefore pass it by. But what was the road by which we reached our position, what the form of government under which our greatness grew, what the national habits out of which it sprang; these are questions which I may try to solve before I proceed to my panegyric upon these men; since I think this to be a subject upon which on the present occasion a speaker may properly dwell, and to which the whole assemblage, whether citizens or foreigners, may listen with advantage.”

“首先，我想说一说我们的祖先。在现在这种场合，他们理应而且适合享有首先被提及的荣幸。他们世世代代一直居住在这块土地上，并且凭着自己的勇敢，将这块土地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度传到了今天。如果说我们的祖先值得赞颂，那么，我们的父辈就更值得称道。他们不仅保住了所承继的土地，还创建了我们现在拥有的帝国，而且不遗余力地将他们获得的成就留给了我们现在这一代。最后，我要说的是在场的各位，我们的版图，在我们手中极少有哪一部分不曾扩大，而我们大多仍处于盛年。我们的祖国，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年代，都因为有我们而拥有它赖以生存的所有资源。我们的军事成就如何使我们取得了各个属地，我们或我们的父辈如何不假思索地英勇阻挡来自希腊内部或外部的侵略浪潮，对于在场的诸位来说，这部分历史早已耳熟能详，无需我再多言，所以我略去不谈。但是，我们是怎样达到我们目前这种地位的，我们是在什么政体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哪些民族气质造就了我们的伟大，在赞颂这些阵亡将士之前，我想先阐述一下这些问题。我认为，在现在这个场合，对此详加阐述不会失当。全体在场人员，无论是本邦公民还是外邦人士，听一听或许都会有所收益。”

“Our constitution does not copy the laws of neighbouring states; we are rather a pattern to others than imitators ourselves. Its administration favours the many instead of the few; this is why it is called a democracy. If we look to the laws, they afford equal justice to all in their private differences; if no social standing, advancement in public life falls to reputation for capacity, class considerations not being allowed to interfere with merit; nor again does poverty bar the way, if a man is able to serve the state, he is not hindered by the obscurity of his condition. The freedom which we enjoy in our government extends also to our ordinary life. There, far from exercising a jealous surveillance over each other, we do not feel called upon to be angry with our neighbour for doing what he likes, or even to indulge in those injurious looks which cannot fail to be

offensive, although they inflict no positive penalty. But all this ease in our private relations does not make us lawless as citizens. Against this fear is our chief safeguard, teaching us to obey the magistrates and the laws, particularly such as regard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jured, whether they are actually on the statute book, or belong to that code which, although unwritten, yet cannot be broken without acknowledged disgrace."

"我们的宪法没有照搬邻邦的法律。我们不是在模仿他人，而是他人在以我们为样板。我们的政体是为大众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所以才被称为民主政体。我们的法律，在解决私人争执时，对所有人同样公正；在公职升迁方面，即便一个人没有社会地位，我们考虑的也是他的能力，决不会让阶级出身淹没他的价值；一个人只要有能力为城邦服务，贫穷就阻挡不了他的前程，地位的卑微也对他构不成阻碍。我们不但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会心怀猜忌地相互监视，邻人即便为所欲为，我们也不至于怒火中烧，甚至不会恣意摆出难看的脸色。这种脸色虽然不会造成实际损失，却难免会引起他人的不快。但是，我们在私人相处中的这种宽松，并不影响我们成为守法的公民。对法律的敬畏，是我们预防违法行为发生的首要保证，它使我们服从执法官，遵守法律，尤其是保护被伤害者的法律，无论是已经实际汇编成册的法律，还是虽未成文但违反必被引以为耻的行为规范。

"Further, we provide plenty of means for the mind to refresh itself from business. We celebrate games and sacrifices all the year round, and the elegance of our private establishments forms a daily source of pleasure and helps to banish the spleen; while the magnitude of our city draws the produce of the world into our harbour, so that to the Athenian the fruits of other countries are as familiar a luxury as those of his own."

“此外，我们还提供多种方式，使人从纷繁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焕发精神。我们一年四季都有竞技会和祭祀活动。我们私人住宅的雅致，日日使我们赏心悦目，帮助我们消除心中的烦闷。我们的城市以其巨大的规模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物产进入我们的海港。对雅典人来说，享受他国的产品，如同享受我们本地的产品一样司空见惯。”

“If we turn to our military policy, there also we differ from our antagonists. We throw open our city to the world, and never by alien acts exclude foreigners from any opportunity of learning or observing, although the eyes of an enemy may occasionally profit by our liberality; trusting less in system and policy than to the native spirit of our citizens; while in education, where our rivals from their very cradles by a painful discipline seek after manliness, at Athens we live exactly as we please, and yet are just as ready to encounter every legitimate danger. In proof of this it may be noticed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do not invade our country alone, but bring with them all their confederates; while we Athenians advance unsupported into the territory of a neighbour and fighting upon a foreign soil usually vanquish with ease men who are defending their homes. Our united force was never yet encountered by any enemy, because we have at once to attend to our marine and to dispatch our citizens by land upon a hundred different services; so that, wherever they engage with some such fraction of our strength, a success against a detachment is magnified into a victory over the nation, and a defeat into a reverse suffered at the hands of our entire people. And yet if with habits not of labour but of ease, and courage not of art but of nature, we are still willing to encounter danger, we have the double advantage of escaping the experience of hardships in anticipation and of facing them in the hour of need as fearlessly as those who are never free from them.”

“在军事政策方面，我们也与对手迥然不同。我们的城市对世界是开放的。尽管敌人的耳目有时也会从我们的自由开放中获益，但我们从不用排外法案剥夺异邦人了解或观察我们的机会。我们依赖的不是制度和政策，而是我们公民固有的精神。在教育方面，我们的对手是自幼通过艰苦的训练培养男子气概。在雅典，我们虽然随心所欲地生活，却一样能随时应付各种真正的危险。这一点可由以下事实为证：斯巴达人侵犯我们的领土时，从不单独前来，而是纠集他们所有的盟邦一同而来；我们雅典人攻入邻邦的领土时，则往往孤军前往。虽然我们是在异邦的土地上作战，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乡，但我们却常常轻而易举地战胜他们。敌人从来不曾迎战过我们的全部兵力，因为我们既要兼顾海上，又要派遣我们的公民在陆上完成多项不同的任务。因此，无论在哪里与我们的部分兵力兵戎相见，他们胜了某个分遣队就号称打败了我们整个城邦，吃了败仗就声称败在了我们全体人民的手中。我们的脾性并不是通过艰苦的训练磨练出来的，而是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养成的；我们的勇气也不是人为的训练使然，而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倘若如此，我们仍乐于迎难而上，那么，我们就具有双倍的优势：既可以免受未来之苦，又可以在必要的时刻如同一直经受艰苦训练的人一样勇敢地去面对。”

“Nor are these the only points in which our city is worthy of admiration. We cultivate refinement without extravagance and knowledge without effeminacy; wealth we employ more for use than for show, and place the real disgrace of poverty not in owning to the fact but in declining the struggle against it. Our public men have, besides politics, their private affairs to attend to, and our ordinary citizens, though occupied with the pursuits of industry, are still fair judges of public matters; for, unlike any other nation, regarding him who takes no part in these duties not as unambitious but as useless, we Athenians are able to judge at all events if we cannot originate, and, instead of looking on discussion as a

stumbling-block in the way of action, we think it an indispensable preliminary to any wise action at all. Again, in our enterprises we present the singular spectacle of daring and deliberation, each carried to its highest point, and both united in the same persons; although usually decision is the fruit of ignorance, hesitation of reflection. But the palm of courage will surely be adjudged most justly to those, who best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ardship and pleasure and yet are never tempted to shrink from danger. In generosity, we are equally singular, acquiring our friends by conferring, not by receiving, favours. Yet, of course, the doer of the favour is the firmer friend of the two, in order by continued kindness to keep the recipient in his debt; while the debtor feels less keenly from the very consciousness that the return he makes will be a payment, not a free gift. And it is only the Athenians, who, fearless of consequences, confer their benefits not from calculations of expediency, but in the confidence of liberality."

"我们城邦值得赞赏的优点还不止这些。我们陶冶情操但行之有度，研习知识但不失勇武；财富对于我们来说是拿来用的，不是用来夸耀的；在我们看来，真正可耻的不是坦承自己贫困，而是拒不与贫困作斗争。我们的公职人员，在致力于政治事务的同时，同样也关注自己的私人事务。我们的普通公民，在勤勉劳作的同时仍能对公共事务做出公正的判断，这是因为我们雅典人和其他任何民族都不一样。我们认为，不参与公共事务，并不说明一个人没有野心，而是说明他是一个无用之人。即便不能发起讨论，我们雅典人也总能作出判断。我们认为，讨论不是行动的障碍，而是任何明智行动必不可少的前奏。另外，在冒险事业中，我们表现得异常大胆与慎重，而且这两样都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在同一些人身上两者兼具，尽管人们往往因无知而仓促决策，因思考而犹豫不决。但是，最勇敢的无疑当属这样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苦乐有别，可是在危险面前却从不退缩。在慷慨大方方面，我们同样超凡出众。我们结交朋友靠的是施惠于人，而不

是受人之惠。当然，在朋友双方当中，施惠的一方通常是更坚定的一方。他不断地表示善意，总是让受惠方对他有所亏欠；受惠的一方则没有那么热情，因为他作出回报时就像是在还债，而不是在自由自在地赠与。雅典人做事向来不计后果。因此，只有雅典人才会完全出于慷慨施惠于人，而不是为了谋取私利。”

“In short, I say that as a city we are the school of Hellas, while I doubt if the world can produce a man who, where he has only himself to depend upon, is equal to so many emergencies, and graced by so happy a versatility, as the Athenian. And that this is no mere boast thrown out for the occasion, but plain matter of fact,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cquired by these habits proves. For Athens alone of her contemporaries is found when tested to be greater than her reputation, and alone gives no occasion to her assailants to blush at the antagonist by whom they have been worsted, or to her subjects to question her title by merit to rule. Rather, the admiration of the present and succeeding ages will be ours, since we have not left our power without witness, but have shown it by mighty proofs; and far from needing a Homer for our panegyrist, or other of his craft whose verses might charm for the moment only for the impression which they gave to melt at the touch of fact, we have forced every sea and land to be the highway of our daring, and everywhere, whether for evil or for good, have left imperishable monuments behind us. Such is the Athens for which these men, in the assertion of their resolve not to lose her, nobly fought and died; and well may every one of their survivors be ready to suffer in her cause.”

“总之，作为一个城市，雅典可以说是希腊的大学校。我不晓得世界上是否还有人能像雅典人一样，在只有自身可以依赖的情况下，居然能够应付那么多突发情况，同时还能以如此令人感到荣幸的多方

面才能为自己增光添彩。这不是凭空吹嘘，而是明明白白的事实。靠着这些脾性，我们的城邦才获得了现有的势力，这一点就足以为证。在当今这些城邦中，唯有雅典遇到考验时实大于名，唯有雅典不让它的来犯之敌因败于对手而感到羞愧，唯有雅典无需它的臣民质疑它是否有资格居于统治地位。相反，今人与后世都将为我们发出赞叹，因为我们的实力并非没凭没据，而是有强有力的证据为证。我们完全不需要什么荷马或其他诗人讴歌赞颂。他们的诗句有可能风靡一时，但与事实一比，这些诗句留给人的印象就会黯然失色。我们曾攻入每一片大海、每一块陆地，以展示我们的勇气。我们在各处所留下的，无论是不幸还是恩德，都是留给后人永恒的纪念。这就是雅典，这些将士正是为了它而英勇战死的，并以此显示了他们绝不丧失它的决心。但愿我们每一个活下来的人，为了雅典的事业，也随时准备赴汤蹈火。”

“Indeed, if I have dwelt at some length upon the character of our country, it has been to show that our stake in the struggle is not the same as theirs who have no such blessings to lose, and also that the panegyric of the men over whom I am now speaking might be by definite proofs established. That panegyric is now in a great measure complete; for the Athens that I have celebrated is only what the heroism of these and their like have made her, men whose fame, unlike that of most Hellenes, will be found to be only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deserts. And if a test of worth be wanted, it is to be found in their closing scene, and this not only in cases in which it set the final seal upon their merit, but also in those in which it gave the first intimation of their having any. For there is justice in the claim that steadfastness in his country's battles should be as a cloak to cover a man's other imperfections; since the good action has blotted out the bad, and his merit as a citizen more than outweighed his demerits as an individual. But none of these allowed either wealth with its prospect of future enjoyment to unnerve his

spirit, or poverty with its hope of a day of freedom and riches to tempt him to shrink from danger. No, holding that vengeance upon their enemies was more to be desired than any personal blessings, and reckoning this to be the most glorious of hazards, they joyfully determined to accept the risk, to make sure of their vengeance, and to let their wishes wait; and while committing to hope the uncertainty of final success, in the business before them they thought fit to act boldly and trust in themselves. Thus choosing to die resisting, rather than to live submitting, they fled only from dishonour, but met danger face to face, and after one brief moment, while at the summit of their fortune, escaped, not from their fear, but from their glory."

"关于我们城邦的特点，我说了如此之多，其实都是为了说明，我们对这场斗争的投入与他们的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优点可失。同时，我也想说明，我现在对这些阵亡将士的赞颂，其实都有明确的证据为证。现在，我对这些将士的赞颂，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因为我所赞美的雅典，就是这些将士以及与他们同样的人的英雄气概造就而成的。我们将会发现，这些将士的声名与大多数希腊人的不同，他们完全是名实相副。要想检验一个人价值几何，就要看他人生的最后一幕，无论他的优秀品质是初次表现出来的也好，还是最后证明的也罢。这种说法其实不无道理：一个人如果坚定不移地为他的城邦而战，应当可以抵偿他在其他方面的不足。既然良行已将不良之行抵消，他作为公民之功应当远大于他作为个人之过。不过，在这些人中，无人因希冀将来能继续享有财富而丧失勇气，也无人因希冀能活着摆脱贫困过上自由和富裕的日子而在危险面前退缩。的确，他们更想要的是向敌人复仇，而不是个人的幸福。在他们看来，这是最光荣的冒险。因此，他们决心欣然承担危险，一定要复仇成功，而将自己的愿望暂且搁置一旁。尽管他们将难以预料的最后成败交给了希望之神，但面临战斗，他们认为还是应当勇往直前，相信自己。因此，他们宁肯在抵抗中死，也不愿在屈服中生。能让他们逃离

的，只有耻辱；遇到危险，他们则直面以对。但是，顷刻之间，在命运的顶点，他们却离去了，不是出于恐惧，而是为了光荣。”

“So died these men as became Athenians. You, their survivors, must determine to have as unfaltering a resolution in the field, though you may pray that it may have a happier issue. And not contented with ideas derived only from words of the advantages which are bound up with the defence of your country, though these would furnish a valuable text to a speaker even before an audience so alive to them as the present, you must yourselves realize the power of Athens, and feed your eyes upon her from day to day, till love of her fills your hearts; and then, when all her greatness shall break upon you, you must reflect that it was by courage, sense of duty, and a keen feeling of honour in action that men were enabled to win all this, and that no personal failure in an enterprise could make them consent to deprive their country of their valour, but they laid it at her feet as the most glorious contribution that they could offer. For this offering of their lives made in common by them all they each of them individually received that renown which never grows old, and for a sepulchre, not so much that in which their bones have been deposited, but that noblest of shrines wherein their glory is laid up to be eternally remembered upon every occasion on which deed or story shall call for its commemoration. For heroes have the whole earth for their tomb; and in lands far from their own, where the column with its epitaph declares it, there is enshrined in every breast a record unwritten with no tablet to preserve it, except that of the heart. These take as your model and, judging happiness to be the fruit of freedom and freedom of valour, never decline the dangers of war. For it is not the miserable that would most justly be unsparing of their lives; these have nothing to hope for: it is rather they, to whom continued life may bring

reverses as yet unknown, and to whom a fall, if it came, would be most tremendous in its consequences. And surely, to a man of spirit, the degradation of cowardice must be immeasurably more grievous than the unfelt death which strikes him in the midst of his strength and patriotism!”

“这些将士就这样牺牲了，他们无愧于雅典人这个称呼。你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尽管可以祈求获得比较幸运的结局，但在战场上必须要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你们不能满足于单从字面上理解保卫城邦所带来的好处，尽管这些可以为演说家在面对像现场这么活跃的听众时提供宝贵的材料。你们必须认识到雅典的力量，天天关注着它，直到对它的爱注满心间。然后，当你们认识到它的全部伟大时，你们肯定会想到，将士们之所以能赢得这一切，靠的是勇敢，靠的是责任感和在战斗中强烈的荣誉感。个人在冒险事业中的失败，不仅不会使他们丧失为城邦而战的勇气，反而会使他们将它作为自己所能进献的最美好的贡品奉献在国家的脚下。他们无一例外地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每个人也因此而赢得了不朽的英名。他们的坟墓不止是在安放他们忠骨的地方，更是在那些最为崇高的圣所，那里存有他们永远为人铭记的荣耀。每逢有机会，人们都会缅怀他们的英勇行为或事迹，因为整个大地处处都是他们英魂的归处，甚至在远离他们自己家乡的土地上。那里的纪念柱上用铭文昭示着他们的丰功，那里的人们人人都铭记着他们的伟绩，虽然没有刻写在牌匾上，而是留存在人们的心中。你们要以这些将士为榜样，决不在战争的危险面前退缩，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没有勇敢就没有自由。最痛苦的人不是甘愿献出生命的人，而是那些一无所望的人，继续活下去反倒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尚未可知的逆转。对他们而言，假如阵亡真的发生，将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当然，对于有勇气的人而言，沦为胆怯之徒，较之在展现自己的力量和爱国主义精神时不知不觉地迎来死亡，不知要痛苦多少倍！”

“Comfort, therefore, not condolence, is what I have to offer to the parents of the dead who may be here. Numberless are the chances to which, as they know, the life of man is subject; but fortunate indeed are they who draw for their lot a death so glorious as that which has caused your mourning, and to whom life has been so exactly measured as to terminate in the happiness in which it has been passed. Still I know that this is a hard saying, especially when those are in question of whom you will constantly be reminded by seeing in the homes of others blessings of which once you also boasted: for grief is felt not so much for the want of what we have never known, as for the loss of that to which we have been long accustomed. Yet you who are still of an age to beget children must bear up in the hope of having others in their stead; not only will they help you to forget those whom you have lost, but will be to the state at once a reinforcement and a security; for never can a fair or just policy be expected of the citizen who does not, like his fellows, bring to the decision the interests and apprehensions of a father. While those of you who have passed your prime must congratulate yourselves with the thought that the best part of your life was fortunate, and that the brief span that remains will be cheered by the fame of the departed. For it is only the love of honour that never grows old; and honour it is, not gain, as some would have it that rejoices the heart of age and helplessness.”

“因此，如果死者的父母在场，我不想吊慰他们，而是要安慰他们。正如他们所知道的，人的一生中有无数机遇。但是，能这么光荣地死去，让大家为之举哀，实属一种幸运。对他们而言，生命被如此精确地衡量使之恰巧在与幸福交汇之时到达了终点。尽管如此，我也知道这种说法很难为人接受，尤其是当你们在他人家中看到自己曾经同样拥有的幸福便会不断想起逝去的人时。我们缺少自己从未享有过的东西时所感到的悲伤，与我们失去久已习惯拥有的东西时那种悲

伤，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仍处于生育年龄的人必须撑下去，争取再生一些孩子来完成他们的未竟之志。这些孩子不仅可以帮助你们忘却失去的人，而且很快会为城邦增添新生力量，增加安全系数。一个不能像同胞们一样就为父的利与忧作出决定的公民，是不能指望他提出公平或公正的观点的。已过盛年的人则要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你们幸运地度过了你们这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在短暂的余生里，逝者的美名将会给你们带来宽慰。只有对荣誉的热爱永远不会衰老。就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能够使一颗年老而无助的心感到快乐的是荣誉，而不是谋利。”

“Turning to the sons or brothers of the dead, I see an arduous struggle before you. When a man is gone, all are wont to praise him, and should your merit be ever so transcendent, you will still find it difficult not merely to overtake, but even to approach their renown. The living has envy to contend with, while those who are no longer in our path are honoured with a goodwill into which rivalry does not enter. On the other hand, if I must say anything on the subject of female excellence to those of you who will now be in widowhood, it will be all comprised in this brief exhortation. Great will be your glory in not falling short of your natural character; and greatest will be hers who is least talked of among the men, whether for good or for bad.”

“现在我要对死者的儿子和兄弟们说几句。我认为，在你们面前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一个人去世之后，人人都颂扬他。纵然你们功绩卓著，你们还是会发现，且不要说超越，就连与他们齐名都难乎其难。活着的人总得与嫉妒作斗争，但逝去的人则往往会被善意相待，其中决不掺杂竞争之意。另一方面，如果我还得对现已孀居的妇女们谈谈妇女的美德，那么，我要说的只有这句简短的告诫：不失女人的本色，可谓荣耀大矣，但最荣耀的是极少成为男人议论的话题的

那部分女人，无论议论是褒还是贬。”

“My task is now finished. I have performed it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and in word, at leas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w are now satisfied. If deeds be in question, those who are here interred have received part of their honours already, and for the rest, their children will be brought up till manhood at the public expense; the state thus offers a valuable prize, as the garland of victory in this race of valour, for the reward both of those who have fallen and their survivors. And where the rewards for merit are greatest, there are found the best citizens.”

“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已经尽我所能履行了职责，至少在言辞上已经满足了惯例的要求。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那么，安葬在这里人已经领受了他们应得的一部分荣誉。余下的部分，则是用公费将他们的子女抚养成人。城邦以此方式将一份珍贵的奖赏，作为这场勇气之争的胜利花冠，敬献给那些倒下的人和他们的遗属。因功获奖最丰者，最佳公民也。”

“And now that you have brought to a close your lamentations for your relatives, you may depart.”

“现在，对亲友的追悼结束，大家可以散场了。”

CHAPTER VII Second Year of the War—The Plague of Athens—Position and Policy of Pericles—Fall of Potidaea

第七章　战争第二年——雅典的瘟疫——伯里克利的立场和政策——波提狄亚的陷落

Such was the funeral that took place during this winter, with which the first year of the war came to an end. In the first days of summer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with two-thirds of their forces as before, invaded Attica, under the command of Archidamus, son of Zeuxidamus, King of Lacedaemon, and sat down and laid waste the country. Not many days after their arrival in Attica the plague first began to show itself among the Athenians. It was said that it had broken out in many places previously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Lemnos and elsewhere; but a pestilence of such extent and mortality was nowhere remembered. Neither were the physicians at first of any service, ignorant as they were of the proper way to treat it, but they died themselves the most thickly, as they visited the sick most often; nor did any human art succeed any better. Supplications in the temples, divinations, and so forth were found equally futile, till the overwhelming nature of the disaster at last put a stop to them altogether.

这一年冬季举行的葬礼就这样结束了，战争的第一年亦随之告终。翌年夏初，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如先前一样，以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二侵入了阿提卡，担任指挥的是宙克西扎穆斯的儿子，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扎下营盘后，他们洗劫了那一地区。他们抵达阿提卡后没几天，瘟疫就开始在雅典人中露头了。据说，利姆诺斯附近和其他地区不少地方以前也发生过瘟疫。但是，在人们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哪个地方的瘟疫这么严重，而且死亡率这么高。起初，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不知如何处理是好。由于与病人接触最频繁，他们自身的死亡率反而最高。人类所掌握的任何本领对瘟疫也全都无济于事。到寺庙去求神和占卜等方法同样无效，最后，在这场灾难的巨大威力面前，人们再也无力抗争。

It first began, it is said, in the parts of Ethiopia above Egypt, and thence descended into Egypt and Libya and into most of the King's country. Suddenly falling upon Athens, it first attacked the population in Piraeus—which was the occasion of their saying that the Peloponnesians had poisoned the reservoirs, there being as yet no wells there—and afterwards appeared in the upper city, when the deaths became much more frequent. All speculation as to its origin and its causes, if causes can be found adequate to produce so great a disturbance, I leave to other writers, whether lay or professional; for myself, I shall simply set down its nature, and explain the symptoms by which perhaps it may be recognized by the student, if it should ever break out again. This I can the better do, as I had the disease myself, and watched its operation in the case of others.

据说，这种瘟疫最早出现于埃及上方的埃塞俄比亚，从那里向下传播到埃及和利比亚，然后又传到了波斯国王统治下的大部分领土。它在雅典出现得很突然。首先遭到袭击的是比雷埃夫斯的居民——即从那次他们说伯罗奔尼撒人往他们的蓄水池（当时那里还没有水井）里投毒开始。后来，这种病又出现在上城，从这时开始，死亡人数开始大增。有关这场瘟疫的起源和病因的猜测，是否能找到足以引起这样一场大混乱的原因，不管其他作家是内行还是外行，我都想留给他们去思索。我本人只想简单地记下它的性质，描述它的症状。如果它再度爆发，或许研究者可以借此对它有所认识。因为我自己染上过这种病，也看到过别人发病的情况，所以在这一点上可以做得更好。

That year then is admitted to have been otherwise unprecedentedly free from sickness; and such few cases as occurred all determined in this. As a rule, however, there was no ostensible

cause; but people in good health were all of a sudden attacked by violent heats in the head, and redness and inflammation in the eyes, the inward parts, such as the throat or tongue, becoming bloody and emitting an unnatural and fetid breath. These symptoms were followed by sneezing and hoarseness, after which the pain soon reached the chest, and produced a hard cough. When it fixed in the stomach, it upset it; and discharges of bile of every kind named by physicians ensued, accompanied by very great distress. In most cases also an ineffectual retching followed, producing violent spasms, which in some cases ceased soon after, in others much later. Externally the body was not very hot to the touch, nor pale in its appearance, but reddish, livid, and breaking out into small pustules and ulcers. But internally it burned so that the patient could not bear to have on him clothing or linen even of the very lightest description; or indeed to be otherwise than stark naked. What they would have liked best would have been to throw themselves into cold water; as indeed was done by some of the neglected sick, who plunged into the rain-tanks in their agonies of unquenchable thirst; though it made no difference whether they drank little or much. Besides this, the miserable feeling of not being able to rest or sleep never ceased to torment them. The body, meanwhile, did not waste away so long as the distemper was at its height, but held out to a marvel against its ravages; so that when they succumbed, as in most cases, on the seventh or eighth day to the internal inflammation, they had still some strength in them. But if they passed this stage, and the disease descended further into the bowels, inducing a violent ulceration there accompanied by severe diarrhoea, this brought on a weakness which was generally fatal. For the disorder first settled in the head, ran its course from thence through the whole of the body, and, even where it did not prove mortal, it still left its mark on the extremities; for it settled in the privy parts, the fingers and the toes, and many escaped with the

loss of these, some too with that of their eyes. Others again were seized with an entire loss of memory on their first recovery, and did not know either themselves or their friends.

那一年如果不流行瘟疫，本来是疾病空前少有的一年。少数所发病症，后来也查明均与这场瘟疫有关。可是，这种病一般无明显病因，本来很健康的人突然就头部烧得厉害，眼睛变红、发炎，喉咙或舌头之类的内部器官充血，呼吸不畅且伴有恶臭。这些症状出现之后，紧接着是打喷嚏和嗓子嘶哑，之后疼痛很快蔓延到胸部，引起剧烈的咳嗽。疼痛蔓延到腹部后，腹内便翻江倒海，凡是医生叫得出名的各种胆汁都能呕出来，痛苦万分。大多数患者接下去还会干呕，却什么都吐不出来，以致引起剧烈痉挛。有时呕后痉挛很快会停止，有时却持续很久。体表摸上去倒不是很热，肤色也不苍白，而是呈红色和青黑色，尔后突然出现小脓疮和溃疡。但是，患者体内却烧得厉害，根本受不了身上着衣，连最轻薄的亚麻衬衫都穿不住。或者说除了全裸别无他法。他们最喜欢的是跳进冷水里。实际上，看护人员稍不留神，有些患者就会这么做。他们难耐无法消除的口渴之苦，便纵身跳入雨水池中，尽管无论喝多少对他们都不起作用。除此之外，不得安宁和无法入眠之苦同样一刻不停地折磨着他们。其间，病情发展到顶点时，身体反而不见衰弱，而是奇迹般地坚持抵抗着疾病对它的侵袭。因此，当他们因体内发炎而死去时——大部分是在第七或第八天，他们却仍有一定气力。但是，假如能捱过这个阶段，疼痛就会向下蔓延至肠道，引发严重的肠道溃疡，并且伴有剧烈的腹泻，从而引起病体衰弱。这种衰弱通常会导致死亡。由于这种疾病首先在头部发作，然后再从头部蔓延至全身，即便它在某个部位没有置病人于死地，但四肢还是会留下痕迹。因为疾病曾蔓延到外生殖器、手指和脚趾，很多人虽然逃过了死劫，却丧失了这些器官的功能，有些人双目失明。还有一些人在康复初期则完全失去了记忆，甚至连自己或自己的朋友都不认识。

But while the nature of the distemper was such as to baffle all description, and its attacks almost too grievous for human nature to endure, it was still in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 that its difference from all ordinary disorders was most clearly shown. All the birds and beasts that prey upon human bodies, either abstained from touching them (though there were many lying unburied), or died after tasting them. In proof of this, it was noticed that birds of this kind actually disappeared; they were not about the bodies, or indeed to be seen at all. But of course the effects which I have mentioned could best be studied in a domestic animal like the dog.

然而，尽管这种疾病的性质难以描述，发作时痛苦得令人几乎无法忍受，但下面这种情况可以清晰说明它与普通疾病仍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即：食尸体的鸟兽们，要么是碰都不碰染病的尸体（尽管很多尸体躺着未埋），要么就是一吃即死。人们发现，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食肉鸟实际上已经绝迹。尸体周围不见其踪影，或者说实际上已经完全看不到它们。当然，若要深入研究我所提及的这种影响，最好还是观察一下狗之类的家养动物。

Such then, if we pass over the varieties of particular cases which were many and peculiar, were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the distemper. Meanwhile, the town enjoyed immunity from all the ordinary disorders; or if any case occurred, it ended in this. Some died in neglect, others in the midst of every attention. No remedy was found that could be used as a specific; for what did good in one case, did harm in another. Strong and weak constitutions proved equally incapable of resistance, all alike being swept away, although dieted with the utmost precaution. By far the most terrible feature in the malady was the dejection which ensued when any one felt himself sickening, for the despair into which they instantly

fell took away their power of resistance, and left them a much easier prey to the disorder; besides which, there was the awful spectacle of men dying like sheep, through having caught the infection in nursing each other. This caused the greatest mortality. On the one hand, if they were afraid to visit each other, they perished from neglect; indeed many houses were emptied of their inmates for want of a nurse; on the other, if they ventured to do so, death was the consequence. This was especially the case with such as made any pretensions to goodness; honour made them unsparing of themselves in their attendance in their friends' houses, where even the members of the family were at last worn out by the moans of the dying, and succumbed to the force of the disaster. Yet it was with those who had recovered from the disease that the sick and the dying found most compassion. These knew what it was from experience, and had now no fear for themselves; for the same man was never attacked twice—never at least fatally. And such persons not only received the congratulations of others, but themselves also, in the elation of the moment, half entertained the vain hope that they were for the future safe from any disease whatsoever.

如果不考虑各种特殊病例的多种特殊情况，这种疾病的总体特征即是如此。其间，普通疾病无一在雅典流行。即便有常见疾病发生，最终也发展成了瘟疫。有些人因疏于照料而死，有些人在无微不至的照料下同样死去。人们没有发现哪种药可以作为特效药使用。对一个患者有效的，对另外一个却有害。尽管进食时小心备至，体格强壮的人未必比体质虚弱的人抵抗力强。无论强弱都同样被席卷而去。这种疾病的最可怕之处在于，人们发觉自己染病后，情绪马上低落，立刻陷入绝望之中，抵抗力也随之消失，因而更容易被这种疾病所吞噬。另外，由于在相互看护中也会被传染，人简直像羊一样可怕地死去。因此而致死的人其实是最多的。一方面，他们若不敢去彼此探望，病人就会因无人照料而亡。实际上，因为无人照料，不少人家连主人带

奴隶全都死光了。另一方面，他们若敢于这样去做，结果便是染疫而亡。那些想行善的人尤其是这样。在道义的驱使下，他们会不顾自己的安危到朋友家里去。在那里，由于垂死者不停地呻吟，连朋友自家的人最终都会筋疲力尽，在这场灾难的威力面前倒下。对患者和生命垂危的人最富同情心的，还是那些病后恢复了健康的人。这些人有过亲身经历，知道这种病怎么回事，而且自己这时已无染病之虞，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二次患病——至少没有二次患病后死亡者。这种人不仅会得到其他人的祝贺，他们自己一时间也很得意，几乎妄想着自己今后会百病不侵。

An aggravation of the existing calamity was the influx from the country into the city, and this was especially felt by the new arrivals. As there were no houses to receive them, they had to be lodged at the hot season of the year in stifling cabins, where the mortality raged without restraint. The bodies of dying men lay one upon another and half-dead creatures reeled about the streets and gathered round all the fountains in their longing for water. The sacred places also in which they had quartered themselves were full of corpses of persons that had died there, just as they were; for as the disaster passed all bounds, men, not knowing what was to become of them, became utterly careless of everything, whether sacred or profane. All the burial rites before in use were entirely upset, and they buried the bodies as best they could. Many from want of the proper appliances, through so many of their friends having died already, had recourse to the most shameless sepultures; sometimes getting the start of those who had raised a pile, they threw their own dead body upon the stranger's pyre and ignited it; sometimes they tossed the corpse which they were carrying on the top of another that was burning, and so went off.

乡村居民大量流入城内，更使现在这场灾难雪上加霜。新迁进城内的人对这一点感受尤深。由于没有人家接纳，他们只好在炎热的季节住进空气不流通的棚屋，那里的死亡率高得出奇。垂死的人一个个摞在一起；半死的人跌跌撞撞地在大街上行走，因口渴聚集到各处泉水周围。他们栖身的圣所也尸体遍布，怎样死的就怎样呆在那里。这场灾难闹得一切都没了法度，人们不晓得自己今后会怎样，所以一切都不再顾及，无论是圣事还是俗务。以前采用的丧葬礼仪全都乱了套，埋葬死者时只能尽力而为。由于很多友人已经死去，不少人已无适当的器物可用，所以就开始采用最不体面的葬法：有时候，看到别人已经堆起火葬用的柴堆，他们就抢先一步，将自己手里的死尸扔到素不相识者的柴堆上，然后将柴堆点燃；有时候，发现有个柴堆正在燃烧，他们将抬着的尸体往上一抛就跑开了。

Nor was this the only form of lawless extravagance which owed its origin to the plague. Men now coolly ventured on what they had formerly done in a corner, and not just as they pleased, seeing the rapid transitions produced by persons in prosperity suddenly dying and those who before had nothing succeeding to their property. So they resolved to spend quickly and enjoy themselves, regarding their lives and riches as alike things of a day. Perseverance in what men called honour was popular with none, it was so uncertain whether they would be spared to attain the object; but it was settled that present enjoyment, and all that contributed to it, was both honourable and useful. Fear of gods or law of man there was none to restrain them. As for the first, they judged it to be just the same whether they worshipped them or not, as they saw all alike perishing; and for the last, no one expected to live to be brought to trial for his offences, but each felt that a far severer sentence had been already passed upon them all and hung ever over their heads, and before this fell it was only reasonable to enjoy life a little.

这还不是因瘟疫而起的唯一不法行为。看到人的命运转变如此之快，富有的人突然之间就要死去，昔日一文不名的人却要继承他们的财产，人们便为所欲为，做尽以前不敢明目张胆所为之事。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和财富都是过眼烟云，所以决定挥霍钱财，尽情享受。无人再坚持追求人们称之为荣誉的东西，因为很难说他们能否活到目标达成之时。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眼前的享受，以及促成这种享受的一切，既体面又有用。对神的敬畏和对人类法律的畏惧，已无一能约束他们。就前者而言，他们认为，敬神和不敬神都一样，因为他们看到所有人都一样在死亡；至于后者，没人指望自己能活到自己因犯罪被推上审判台之时。不过，每个人又都觉得他们已经受到了严厉得多的判决，而且这项判决一直悬在他们头上。在这项判决执行之前，唯有及时享受些许人生的快乐才合乎情理。

Such was the nature of the calamity, and heavily did it weigh on the Athenians; death raging within the city and devastation without. Among other things which they remembered in their distress was, very naturally, the following verse which the old men said had long ago been uttered:

这就是那场灾难的情况，它沉重地压在雅典人的头上，城内死神肆虐，城外惨遭践踏。在痛苦之中，他们所能记起的自然包括老人们说很久以前就流传的这样一句话：

A Dorian war shall come and with it death.

与多里安人的战争一旦发生，死亡将随之而至。

So a dispute arose as to whether dearth and not death had not been the word in the verse; but at the present juncture, it was of course decided in favour of the latter; for the people made their recollection fit in with their sufferings. I fancy, however, that if another Dorian war should ever afterwards come upon us, and a dearth should happen to accompany it, the verse will probably be read accordingly. The oracle also which had been given to the Lacedaemonians was now remembered by those who knew of it. When the god was asked whether they should go to war, he answered that if they put their might into it, victory would be theirs, and that he would himself be with them. With this oracle events were supposed to tally. For the plague broke out as soon as the Peloponnesians invaded Attica, and never entering Peloponnese (not at least to an extent worth noticing), committed its worst ravages at Athens, and next to Athens, at the most populous of the other towns. Such was the history of the plague.

至于诗中所用的字眼是否应为“dearth”（饥馑）而不是“death”（死亡），人们曾经有过争论，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自然是后一种意见占上风，因为人们的记忆与他们经受的苦难恰巧吻合。然而，我估计，如果与多里安人的战争以后再度降临到我们头上，而伴之而来的碰巧是饥馑，人们或许会相应地采纳另一种意见。这时，知情的人们同样想起了斯巴达人得到的那个神谕。当神被问及他们是否应当投入战争时，神的回答是：如果他们全力以赴，胜利将属于他们。另外，神还说自己将与他们同在。实际情况的发展与这一神谕可以说是吻合的。伯罗奔尼撒人刚一入侵阿提卡，瘟疫就爆发了，但这场瘟疫从来没进入过伯罗奔尼撒境内（至少没有达到值得注意的程度），而在雅典，以及雅典附近人口最稠密的其他城市，它却极尽践踏之能事。这就是那场瘟疫的情况。

After ravaging the plain, the Peloponnesians advanced into the Paralian region as far as Laurium, where the Athenian silver mines are, and first laid waste the side looking towards Peloponnese, next that which faces Euboea and Andros. But Pericles, who was still general, held the same opinion as in the former invasion, and would not let the Athenians march out against them.

伯罗奔尼撒人践踏了平原地区之后，接着进入帕拉利亚地区，一直推进至拉夫里乌姆，即雅典的银矿所在地。他们首先践踏了面朝伯罗奔尼撒的那边，继而又践踏了面朝埃维亚和安德罗斯的那一侧。但是，伯里克利当时仍居将军之位，他所持的观点与上次伯罗奔尼撒人来犯时相同，所以他不让雅典人出城抗敌。

However, while they were still in the plain, and had not yet entered the Paralian land, he had prepared an armament of a hundred ships for Peloponnese, and when all was ready put out to sea. On board the ships he took four thousand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and three hundred cavalry in horse transports, and then for the first time made out of old galleys; fifty Chian and Lesbian vessels also joining in the expedition. When this Athenian armament put out to sea, they left the Peloponnesians in Attica, in the Paralian region. Arriving at Epidaurus in Peloponnese, they ravaged most of the territory, and even had hopes of taking the town by an assault; in this however they were not successful. Putting out from Epidaurus, they laid waste the territory of Troezen, Halieis, and Hermione, all towns on the coast of Peloponnese, and thence sailing to Prasiai, a maritime town in Laconia, ravaged part of its territory, and took and sacked the place itself; after which they returned home, but found the Peloponnesians gone and no longer in Attica.

不过，伯罗奔尼撒人仍在平原地带，尚未进入帕拉利亚地区之时，伯里克利就组织了一支由10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打算出征伯罗奔尼撒。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启航了。他带着4,000名雅典重步兵上了舰，骑兵运输船上还有300名骑兵，这是旧式三列桨战舰首次改装后运载骑兵。参加这次远征的还有希俄斯和莱斯沃斯的50艘舰只。雅典人这支远征军启航时，伯罗奔尼撒人还在阿提卡的帕拉利亚地区。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的埃皮达鲁斯登陆后，践踏了那里的大部分土地，甚至想以突击的方式拿下这座城，不过没有成功。驶离埃皮达鲁斯后，他们又践踏了特里曾、哈利伊斯和海尔苗内的领土，这些都是伯罗奔尼撒沿岸的城镇。然后，他们又驶向拉科尼亚的沿海城镇普拉西埃，践踏了它的部分领土，攻陷并洗劫了该城本身。其后，他们返回雅典，却发现伯罗奔尼撒人已经离去，不在阿提卡了。

During the whole time that the Peloponnesians were in Attica and the Athenians on the expedition in their ships, men kept dying of the plague both in the armament and in Athens. Indeed it was actually asserted that the departure of the Peloponnesians was hastened by fear of the disorder; as they heard from deserters that it was in the city, and also could see the burials going on. Yet in this invasion they remained longer than in any other, and ravaged the whole country, for they were about forty days in Attica.

伯罗奔尼撒人在阿提卡和雅典人乘舰远征的整个期间，雅典军中和雅典城内不断有人死于瘟疫。实际上的确有人认为，伯罗奔尼撒人之所以急着离去，是因为他们害怕染上瘟疫。他们不但从逃兵口中听说了城里爆发瘟疫一事，而且也看到了雅典人在不停地举行葬礼。然而，在这次入侵中，他们停留的时间比任何一次都长。在阿提卡停留了大约四十天之久，整个地区全都遭到了他们的践踏。

The same summer, Hagnon, son of Nicias, and Cleopompus, son of Clinias, the colleagues of Pericles, took the armament of which he had lately made use, and went off upon an expedition against the Chalcidians in the direction of Thrace and Potidaea, which was still under siege. As soon as they arrived, they brought up their engines against Potidaea and tried every means of taking it, but did not succeed either in capturing the city or in doing anything else worthy of their preparations. For the plague attacked them here also, and committed such havoc as to cripple them completely, even the previously healthy soldiers of the former expedition catching the infection from Hagnon's troops; while Phormio and the sixteen hundred men whom he commanded only escaped by being no longer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Chalcidians. The end of it was that Hagnon returned with his ships to Athens, having lost one thousand and fifty out of four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in about forty days; though the soldiers stationed there before remained in the country and carried on the siege of Potidaea.

同年夏季，伯里克利的副将，尼西亚斯之子哈格农和克利尼亚斯之子克莱奥蓬普斯，率领他不久前调遣过的部队踏上征程，进攻了色雷斯和波提狄亚一带的哈尔基斯人，当时波提狄亚仍处于围困之中。他们一到，马上竖起攻城器械进攻波提狄亚，结果试尽各种办法却未获成功，既没有攻下这座城，也没取得任何无愧于其准备工作的其他功绩。其中原因在于，瘟疫在这里也袭击了他们，因此而造成的混乱使他们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就连上次远征中身体健康的士兵也从哈格农的部队那里染上了这种疾病。福尔米奥和他麾下的1,600名士兵因早已不在哈尔基斯人附近，这才逃过这一劫。这次远征的结果是，在大约四十天之内，哈格农带去的4,000名重步兵损失了1,050人，他只好率舰返回雅典。此前驻扎在那里的人员依然留在那里，继续对波提狄亚实施围攻。

After the second invasion of the Peloponnesians, a change came over the spirit of the Athenians. Their land had now been twice laid waste; and war and pestilence at once pressed heavy upon them. They began to find fault with Pericles, as the author of the war and the cause of all their misfortunes, and became eager to come to terms with Lacedaemon, and actually sent ambassadors thither, who did not however succeed in their mission. Their despair was now complete and all vented itself upon Pericles. When he saw them exasperated at the present turn of affairs and acting exactly as he had anticipated, he called an assembly, being (it must be remembered) still general, with the double object of restoring confidence and of leading them from these angry feelings to a calmer and more hopeful state of mind. He accordingly came forward and spoke as follows:

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入侵之后，雅典人的士气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土地此时已经两度惨遭践踏，战争和瘟疫又同时沉重地压在他们头上。他们开始责怪伯里克利，认为战争是他煽动起来的，他们遭受的所有不幸的根源也是他。他们热切希望与斯巴达人议和，事实上还派了使节去斯巴达。不过，这些使节并没有达成使命。他们这时已经绝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将这种情绪全都发泄到了伯里克利头上。看到人们对当时事态的发展恼怒不已，而且举动也恰如他事先所料，仍居将军之位（想必大家还记得）的伯里克利召集了一次公民大会。其目的有二：一是为了重建公众的信心，二是为了将他们的愤怒情绪引向较为平和而充满希望的状态。于是，他走上前去，发表了如下讲话：

“I was not unprepared for the indignation of which I have been the object, as I know its causes; and I have called an assembly for the purpose of reminding you upon certain points, and of protesting

against your being unreasonably irritated with me, or cowed by your sufferings. I am of opinion that national greatness is more for the advantage of private citizens, than any individual well-being coupled with public humiliation. A man may be personally ever so well off, and yet if his country be ruined he must be ruined with it; whereas a flourishing commonwealth always affords chances of salvation to unfortunate individuals. Since then a state can support the misfortunes of private citizens, while they cannot support hers, it is surely the duty of every one to be forward in her defence, and not like you to be so confounded with your domestic afflictions as to give up all thoughts of the common safety, and to blame me for having counselled war and yourselves for having voted it. And yet if you are angry with me, it is with one who, as I believe, is second to no man either in knowledge of the proper policy, or in the ability to expound it, and who is moreover not only a patriot but an honest one. A man possessing that knowledge without that faculty of exposition might as well have no idea at all on the matter; if he had both these gifts, but no love for his country, he would be but a cold advocate for her interests; while were his patriotism not proof against bribery, everything would go for a price. So that if you thought that I was even moderately distinguished for these qualities when you took my advice and went to war, there is certainly no reason now why I should be charged with having done wrong."

"大家将愤怒的矛头指向我，我不是没有思想准备，而且原因我也清楚。我召集这次公民大会，目的是有几点想提醒大家，同时我也想申明，大家迁怒于我，或者说被苦难所吓倒，完全于理不合。我认为，与其说个人的安康系于城邦的荣辱，不如说城邦的伟大对公民个人更有益。一个人可以非常富有，可是，如果他所在的城邦遭到毁灭，他个人势必也跟着毁灭。反之，整个城邦繁荣了，总能为陷入不幸的个人提供获救的机会。尽管公民个人未必能够为城邦排忧解难，

但当他们遇到不幸时，却可以得到城邦的支持。既然如此，每个人无疑都有责任站出来保卫城邦，而不是像诸位一样，因为自家有难，就把公共安全完全抛诸脑后，就怪我提议开战，同时也怪自己赞成开战。可是，你们如果怪我，我认为，就是在怪这样一个人：他知道采取什么政策合适，并且具备阐释这种政策的能力，在这两点上，无人能出其右。此外，他不仅是个爱国者，还是个正直的人。一个只懂政策却不善阐释的人，倒不如对它一窍不通；如果他两者兼具，却不热爱自己的城邦，他就不会满腔热情地为它的利益说话；纵然他有爱国心，但却不足以抵御贿赂的诱惑，那么，什么都可以被他拿去卖掉。因此，诸位当初采纳我的意见而投入战争时，哪怕觉得我在这些方面稍胜一筹，现在就肯定没有理由谴责我做错了。”

“For those of course who have a free choice in the matter and whose fortunes are not at stake, war is the greatest of follies. But if the only choice was between submission with loss of independence, and danger with the hope of preserving that independence, in such a case it is he who will not accept the risk that deserves blame, not he who will. I am the same man and do not alter, it is you who change, since in fact you took my advice while unhurt, and waited for misfortune to repent of it; and the apparent error of my policy lies in the infirmity of your resolution, since the suffering that it entails is being felt by every one among you, while its advantage is still remote and obscure to all, and a great and sudden reverse having befallen you, your mind is too much depressed to persevere in your resolves. For before what is sudden, unexpected, and least within calculation, the spirit quails; and putting all else aside, the plague has certainly been an emergency of this kind. Born, however, as you are, citizens of a great state, and brought up, as you have been, with habits equal to your birth, you should be ready to face the greatest disasters and still to keep unimpaired the lustre of your name. For the judgment of mankind is as relentless to the

weakness that falls short of a recognized renown, as it is jealous of the arrogance that aspires higher than its due. Cease then to grieve for your private afflictions, and address yourselves instead to the safety of the commonwealth.”

“对于那些在这件事上有选择的自由而自己的财产也没危险的人来说，选择战争当然是最愚蠢的。但是，如果只能在丧失独立而屈服与冒着危险保独立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应当受到责备的是那个不愿承担风险的人，而不是那个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我还是一如既往，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你们，因为事实上，是你们在未受损害时采纳了我的意见，盼着厄运会自己走开。如果说我的政策有明显失误，那也是你们的决心不够坚定，因为它需要大家承受的痛苦，你们每个人现在都感受得到；但它带来的好处，离所有的人却尚且遥远和模糊。所以，当巨大的厄运突然降临到头上，你们就沮丧得无法再坚持自己的决心了。当事情来得突然，出乎意料，而且完全不由人算时，人们便会丧失勇气。其他姑且不论，这场瘟疫肯定属于这类突发事件。但是，像你们这样生为一个伟大城邦公民的人，像你们这样受到无愧于自己出身的那些习惯教化长大的人，不但应当时刻准备面对最大的灾难，还要在灾难面前无损于你们的威名。人们容不得那种渴求不应有之名的自大之人，同样也鄙视那些不配享有已有之名的懦弱之人。既然如此，那就不要再为个人的痛苦而悲伤，而要为城邦的安全而奋斗。”

“If you shrink before the exertions which the war makes necessary, and fear that after all they may not have a happy result, you know the reasons by which I have often demonstrated to you the groundlessness of your apprehensions. If those are not enough, I will now reveal an advantage arising from the greatness of your dominion, which I think has never yet suggested itself to you, which I never mentioned in my previous speeches, and which has so bold

a sound that I should scarce adventure it now, were it not for the unnatural depression which I see around me. You perhaps think that your empire extends only over your allies; I will declare to you the truth. The visible field of action has two parts, land and sea. In the whole of one of these you are completely supreme, not merely as far as you use it at present, but also to what further extent you may think fit; in fine, your naval resources are such that your vessels may go where they please, without the King or any other nation on earth being able to stop them. So that although you may think it a great privation to lose the use of your land and houses, still you must see that this power is something widely different; and instead of fretting on their account, you should really regard them in the light of the gardens and other accessories that embellish a great fortune, and as, in comparison, of little moment. You should know too that liberty preserved by your efforts will easily recover for us what we have lost, while, the knee once bowed, even what you have will pass from you. Your fathers receiving these possessions not from others, but from themselves, did not let slip what their labour had acquired, but delivered them safe to you; and in this respect at least you must prove yourselves their equals, remembering that to lose what one has got is more disgraceful than to be balked in getting, and you must confront your enemies not merely with spirit but with disdain. Confidence indeed a blissful ignorance can impart, ay, even to a coward's breast, but disdain is the privilege of those who, like us, have been assured by reflection of their superiority to their adversary. And where the chances are the same, knowledge fortifies courage by the contempt which is its consequence, its trust being placed, not in hope, which is the prop of the desperate, but in a judgment grounded upon existing resources, whose anticipations are more to be depended upon.”

“如果在战争需要我们付出的努力面前畏缩不前，担心这些努力终将付之东流，你们应当清楚我常常对你们说起的理由，知道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这些理由仍嫌不足，我现在可以再揭示一项优势，一项源于你们的势力范围之大的优势。我想，这项优势还从来没有在你们的脑海中闪现过，在以往的讲话中我也从来没提到过。要不是看到周围的人情绪低落得反常，我现在大概也不会贸然说出这么大胆的话。也许你们认为你们帝国的势力只延伸到你们的盟邦，我要告诉你们真实情况。现有的战场分为两大部分：陆地和海洋。你们在其中整个一部分完全居于霸主地位，而且不只包括你们目前占有的区域，甚至包括你们认为适于进一步扩张的区域。总之，你们的海军资源可以供你们的战舰纵横海上。无论是波斯国王，还是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无法阻挡它们。因此，尽管你们觉得丧失自己的土地和房屋是巨大的损失，但你们依然要认识到，这种势力迥然不同。你们无需为失去那些东西而烦恼，而是应当将它们视为装点大宗财富的庭园和其他辅助设施，以及相比而言无足轻重的东西。你们还应当知道，只要努力维护自由，重新获得我们失去的东西并不是难事；可是一旦屈服，已经拥有的甚至也会离你们而去。你们父辈所拥有的东西，不是从别人手中接过来的，而是自己挣来的。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劳动成果白白溜走，而是将它们完好地传给了你们。在这方面，至少你们必须证明自己不输于他们。要记住，丧失已经得到的东西，要比争取得到时受挫更不光彩。面对敌人，不单要有勇气，还要有蔑视他们的气概。其实，即便是个懦夫，只要有无知之福，也会生出信心。但是，唯有我们这样的人，才会因为知道自己优于对手而心生蔑视。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知道自己优于对手，可以凭借随之而生的蔑视而勇气大增。这种知晓，靠的不是期盼——那是绝望者的支撑，而是基于已有资源作出的判断，所以他们的预见更可靠。”

“Again, your country has a right to your services in sustaining the glories of her position. These are a common source of pride to you all, and you cannot decline the burdens of empire and still expect to share its honours. You should remember also that what

you are fighting against is not merely slavery as an exchange for independence, but also loss of empire and danger from the animosities incurred in its exercise. Besides, to recede is no longer possible, if indeed any of you in the alarm of the moment has become enamoured of the honesty of such an unambitious part. For what you hold is, to speak somewhat plainly, a tyranny; to take it perhaps was wrong, but to let it go is unsafe. And men of these retiring views, making converts of others, would quickly ruin a state; indeed the result would be the same if they could live independent by themselves; for the retiring and unambitious are never secure without vigorous protectors at their side; in fine, such qualities are useless to an imperial city, though they may help a dependency to an unmolested servitude."

"再说，你们的城邦也有权要求你们为维护帝国的荣耀而效力。这是你们大家共同骄傲的源泉。你们不能拒绝为帝国分忧，却期待分享帝国的荣耀。你们还应当牢记，你们打仗的目的，不单是为了免受奴役而维护独立，同时也是为了帝国的存续，为了抵御它在管理过程中招致的仇恨所带来的危险。另外，倘若你们当中真有人因一时的恐慌执意要扮演那种与世无争的高尚角色，如今也不再有退却的可能，这是因为，坦率一点说，你们实行的是僭主政治。当初采取它或许有误，现在放弃它则有危险。持退却观点并且在劝别人也转变立场的人，很快就会使这个城邦走向毁灭。实际上，即便他们能够独立存活下去，结果也不会有何两样。一味退让、胸无大志的人，身旁若没有强有力的保护者，绝不会有安全可言。总之，具有这种品质，可能有利于在附庸城邦里安安生生地当奴隶；但对于一个处于霸主地位的城邦来说，这种品质却毫无用处可言。"

"But you must not be seduced by citizens like these or angry with me—who, if I voted for war, only did as you did yourselves—

in spite of the enemy having invaded your country and done what you could be certain that he would do, if you refused to comply with his demands; and although besides what we counted for, the plague has come upon us—the only point indeed at which our calculation has been at fault. It is this, I know, that has had a large share in making me more unpopular than I should otherwise have been—quite undeservedly, unless you are also prepared to give me the credit of any success with which chance may present you. Besides, the hand of heaven must be borne with resignation, that of the enemy with fortitude; this was the old way at Athens, and do not you prevent it being so still. Remember, too, that if your country has the greatest name in all the world, it is because she never bent before disaster; because she has expended more life and effort in war than any other city, and has won for herself a power greater than any hitherto known, the memory of which will descend to the latest posterity; even if now, in obedience to the general law of decay, we should ever be forced to yield, still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we held rule over more Hellenes than any other Hellenic state, that we sustained the greatest wars against their united or separate powers, and inhabited a city unrivalled by any other in resources or magnitude. These glories may incur the censure of the slow and unambitious; but in the breast of energy they will awake emulation, and in those who must remain without them an envious regret. Hatred and unpopularity at the moment have fallen to the lot of all who have aspired to rule others; but where odium must be incurred, true wisdom incurs it for the highest objects. Hatred also is short-lived; but that which makes the splendour of the present and the glory of the future remains for ever unforgotten. Make your decision, therefore, for glory then and honour now, and attain both objects by instant and zealous effort; do not send heralds to Lacedaemon, and do not betray any sign of being oppressed by your present sufferings, since they whose minds

are least sensitive to calamity, and whose hands are most quick to meet it, are the greatest men and the greatest communities.”

“尽管敌人已经侵入你们的领土——如果拒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你们肯定知道他们会做什么，而且已经这样做了；尽管我们千算万算还是碰上了瘟疫——这的确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唯一一点，但你们绝不能听信这类公民之言，也不要迁怒于我。我只是像你们一样对开战投了赞成票而已。我知道，我之所以不再那么得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点，否则本不该如此——这是很不公平的，除非你们准备将有幸获得的胜利同样归功于我。另外，顺从地忍受上天的惩罚，不屈不饶地抗击敌人的践踏，这本是雅典的传统，千万不要让它断送在你们手中。大家还要牢记，如果说你们的城邦在世界上最负盛名，那是因为它从来不在灾难面前低头，因为它在战争中比其他任何城邦牺牲了更多的生命，投入了更多的努力，从而使自己成了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城邦，而且将永为后世所铭记。哪怕我们现在就得屈服于盛极必衰这一普遍规律，人们依然会记得，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希腊城邦所统治的希腊人都多，我们经受住了他们联手或分别对我们进行的大规模战争，我们居住在一个其他任何城邦在资源或幅员上都无法与我们相媲美的城邦。这些荣耀也许会遭到没有血性和胸无大志者的责难，但是在积极进取者的心中却会唤起好胜之心，在始终无法获得荣耀者的心中留下艳羡的遗憾。胸怀统治大志者暂时都会被人憎恨，不得人心。但是，如果注定要招惹非难，具有真正大智慧者必为追求最高目标而为之。况且，憎恨不过是暂时的，能为现在添彩和为未来增光者，方能长留人们心间。因此，为了日后的光荣和今天的荣耀，一定要当机立断，立即通过积极的努力来实现这样两个目标：一个是不派传令官到斯巴达去，另一个是不要显现出被眼前的痛苦所压倒的迹象。那些灾难面前不慌乱，能积极采取行动应对者，才堪称最伟大的公民、最伟大的城邦。”

Such were the arguments by which Pericles tried to cure the

Athenians of their anger against him and to divert their thoughts from their immediate afflictions. As a community, he succeeded in convincing them; they not only gave up all idea of sending to Lacedaemon, but applied themselves with increased energy to the war; still as private individuals they could not help smarting under their sufferings, the common people having been deprived of the little that they were possessed, while the higher orders had lost fine properties with costly establishments and buildings in the country, and, worst of all, had war instead of peace. In fact, the public feeling against him did not subside until he had been fined. Not long afterwards,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the multitude, they again elected him general and committed all their affairs to his hands, having now become less sensitive to their private and domestic afflictions, and understanding that he was the best man of all for the public necessities. For as long as he was at the head of the state during the peace, he pursued a moderate and conservative policy; and in his time its greatness was at its height. When the war broke out, here also he seems to have rightly gauged the power of his country. He outlived its commencement two years and six months, and the correctness of his previsions respecting it became better known by his death. He told them to wait quiet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marine, to attempt no new conquests, and to expose the city to no hazards during the war, and doing this, promised them a favourable result. What they did was the very contrary, allowing private ambitions and private interests, in matters apparently quite foreign to the war, to lead them into projects unjust both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ir allies—projects whose success would only conduce to the honour and advantage of private persons, and whose failure entailed certain disaster on the country in the war. The causes of this are not far to seek. Pericles indeed, by his rank, ability, and known integrity, was enabled to exercise an independent control over the multitude—in short, to

lead them instead of being led by them; for as he never sought power by improper means, he was never compelled to flatter them, but, on the contrary, enjoyed so high an estimation that he could afford to anger them by contradiction. Whenever he saw them unseasonably and insolently elated, he would with a word reduce them to alarm;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y fell victims to a panic, he could at once restore them to confidence. In short, what was nominally a democracy became in his hands government by the first citizen. With his successors it was different. More on a level with one another, and each grasping at supremacy, they ended by committing even the conduct of state affairs to the whims of the multitude. This, as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in a great and sovereign state, produced a host of blunders, and amongst them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though this failed not so much through a miscalculation of the power of those against whom it was sent, as through a fault in the senders in not taking the best measures afterwards to assist those who had gone out, but choosing rather to occupy themselves with private cabals fo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ons, by which they not only paralysed operations in the field, but also first introduced civil discord at home. Yet after losing most of their fleet besides other forces in Sicily, and with faction already dominant in the city, they could still for three yearsmake head against their original adversaries, joined not only by the Sicilians, but also by their own allies nearly all in revolt, and at last by the King's son, Cyrus, who furnished the funds for the Peloponnesian navy. Nor did they finally succumb till they fell the victims of their own intestine disorders. So superfluously abundant were the resources from which the genius of Pericles foresaw an easy triumph in the war over the unaided forces of the Peloponnesians.

凭着这些论点，伯里克利试图平息雅典人对他的怒火，将他们的

思绪引离眼下的痛苦。作为城邦中的一员，他们被他说服了，不仅完全放弃了派遣使者去斯巴达和谈的想法，而且在战争方面投入了更大的精力。然而，作为个人，他们仍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普通民众连仅有的那点财产也丧失了，富有阶层则失去了乡间有着昂贵设施和建筑的舒适花园住宅。最糟糕的是，他们生活在战争而不是和平之中。事实上，直到他被处以罚款，公众对他的厌恶之感才逐渐平息。然而，不久之后，民众又推选他为将军，将所有的事务交由他处理。这也是民众的一贯行事方式。这时，他们对个人和家庭的痛苦感受已经不再那么强烈，同时也知道他是所有人当中最符合公众需求的人。当初在和平时期，只要他担任城邦的首脑，他就奉行温和而保守的政策。在他执政期间，雅典处于最强盛的时期。战争爆发时，他似乎也正确地估计了雅典的战争力量。他是战争爆发两年零六个月后去世的，他去世之后，人们更加确信他对战争具有先见之明。他曾告诫雅典人，在战争期间，要静待时机，要注意使用海军力量，不要再进行新的领土扩张，也不要使雅典城遭到危险。若能这样，他承诺他们会取得好结果。可是，雅典人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在一些明显与战争无关的事务中，个人野心和私利的驱使他们投身于一些对自己和盟邦都不利的事业——这些事业若能成功，只会给某些个人带来荣誉和好处；倘若失败，则会给战争中的雅典带来灾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难寻。无论是就其地位和能力，还是就其众所周知的正直而言，伯里克利确实是一位能够独立控制民众的人物——简言之，他能够领导他们，而不是让他们牵着他的鼻子走。他从来没有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过权力，也从来没有被迫逢迎过他们；相反，由于他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甚至可以用反对意见去激怒他们。每当他看到他们不合时宜地傲慢自得时，他都会劝他们警惕起来；反之，他们如果惊慌失措，他会立即让他们重拾信心。简言之，雅典名义上实行的是民主政治，在他的手中则变成了由第一公民执政。他的继任者们却与之不同，他们彼此处于更为平等的地位，每个人都想抓取最高权力，结果连城邦事务的管理都听凭民众的一时兴起。可以想象，在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城邦中，这种情况铸成了不少大错，西西里远征就是其中之一。这次远征的失败，主要不是因为误判了远征对象的实力，而是因为派遣远征军的人后来非但没有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去支援已派出的

军队，反倒为了争夺对平民的领导权而忙着去搞阴谋小集团。他们这样做，不仅使战场上的军事行动陷入了瘫痪，而且首次将内乱引入雅典。然而，即使在西西里丧失了大部分舰队和其他一些部队，城邦内部的派别纷争盛行，他们仍与原本的对手又对抗了三年，尽管这时西西里人已加入对方阵营，他们自己的盟邦也几近全部叛离，最后连波斯国王之子居鲁士都开始为伯罗奔尼撒的海军提供资金。他们最终被压垮，还是因为他们自己闹起了内乱。他们的资源很丰富，天才人物伯里克利凭此预言，雅典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孤立无援的伯罗奔尼撒军队。

During the same summer,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made an expedition with a hundred ships against Zacynthus, an island lying off the coast of Elis, peopled by a colony of Achaeans from Peloponnese, and in alliance with Athens. There were a thousand Lacedaemonian heavy infantry on board, and Cnemus, a Spartan, as admiral. They made a descent from their ships, and ravaged most of the country; but as the inhabitants would not submit, they sailed back home.

同年夏季，斯巴达人及其盟友率100艘战舰向扎金索斯发动了一次远征。扎金索斯是离埃利斯海岸不远的一座岛屿，岛上的居民是从伯罗奔尼撒半岛移入的亚该亚人，与雅典有同盟关系。这100艘战舰上载有1,000名斯巴达重步兵，舰队司令是斯巴达人克内穆斯。他们在岛上登陆，践踏了岛上大部分土地。但是，由于岛上居民不肯降服，他们又驶回本邦去了。

At the end of the same summer, the Corinthian Aristeus, Aneristus, Nicolaus, and Stratodemus, envoys from Lacedaemon, Timagoras, a Tegean, and a private individual named Pollis from

Argos, on their way to Asia to persuade the King to supply funds and join in the war, came to Sitalces, son of Teres in Thrace, with the idea of inducing him, if possible, to forsake the alliance of Athens and to march on Potidaea then besieged by an Athenian force, and also of getting conveyed by his means to their destination across the Hellespont to Pharnabazus, who was to send them up the country to the King. But there chanced to be with Sitalces some Athenian ambassadors—Learchus, son of Callimachus, and Ameiniades, son of Philemon—who persuaded Sitalces' son, Sadocus, the new Athenian citizen, to put the men into their hands and thus prevent their crossing over to the King and doing their part to injure the country of his choice. He accordingly had them seized, as they were travelling through Thrace to the vessel in which they were to cross the Hellespont, by a party whom he had sent on with Learchus and Ameiniades, and gave orders for their delivery to the Athenian ambassadors, by whom they were brought to Athens. On their arrival, the Athenians, afraid that Aristeus, who had been notably the prime mover in the previous affairs of Potidaea and their Thracian possessions, might live to do them still more mischief if he escaped, slew them all the same day, without giving them a trial or hearing the defence which they wished to offer, and cast their bodies into a pit; thinking themselves justified in using in retaliation the same mode of warfare which the Lacedaemonians had begun, when they slew and cast into pits all the Athenian and allied traders whom they caught on board the merchantmen round Peloponnese. Indeed, at the outset of the war, the Lacedaemonians butchered as enemies all whom they took on the sea, whether allies of Athens or neutrals.

同年夏末，他们派了一个使团奔赴亚细亚，目的是想说服波斯国王出资参战，使团包括科林斯人阿里斯泰夫斯，斯巴达的代表阿内里

斯图斯、尼科拉夫斯和斯特拉托泽穆斯，泰耶阿人蒂马戈拉斯，以及一个名叫波利斯的阿尔戈斯人，后者是以私人身份参加的。他们首先去色雷斯拜访了泰雷斯的儿子西塔尔塞斯。他们的想法是，如果可能，就劝他取消与雅典的盟约并派兵去解波提狄亚之围，因为波提狄亚当时仍处于雅典军队的包围之中。同时，他们还想通过他的帮助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到预定地点去找法尔纳巴佐斯，后者会送他们北上去觐见波斯国王。但是，雅典的两位使者碰巧也在西塔尔塞斯那里，即卡利马科斯的儿子莱阿尔胡斯和菲利门的儿子阿米尼阿泽斯。西塔尔塞斯的儿子萨佐库斯刚成为雅典公民，他们劝萨佐库斯将这些人交给他们，以防这些人渡过赫勒斯滂去见波斯国王，从而对他自愿归化的城邦造成危害。于是，当他们路经色雷斯去乘船，打算渡过赫勒斯滂海峡时，萨佐库斯拨给莱阿尔胡斯和阿米尼阿泽斯一队人，将他们抓了起来，并下令将他们移交给雅典使者，后者将他们带到了雅典。雅典先前在波提狄亚和色雷斯属地问题上遇到的麻烦，主要就是阿里斯泰夫斯造成的。雅典人怕阿里斯泰夫斯一旦逃脱再给自己造成更多的危害，所以没有审判他们，也没有听取他们希望为自己所作的辩护，在他们抵达当天就把他们全杀了，并将他们的尸体抛进了一个深坑。雅典人认为，既然斯巴达人曾将在伯罗奔尼撒周围航行的商船上抓到的所有雅典及其盟邦的商人全部杀掉，然后扔进深坑，他们以同样方式进行报复并无不当，因为这种战争方式是斯巴达人首先采用的。战争刚开始时，斯巴达人的确曾将他们在海上俘获的人统统当作敌人杀掉，不论是雅典的盟友，还是中立城邦的人。

About the same time,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summer, the Ambraciot forces, with a number of barbarians that they had raised, marched against the Amphilochian Argos and the rest of that country. The origin of their enmity against the Argives was this. This Argos and the rest of Amphilochia were colonized by Amphilochus, son of Amphiaraus. Dissatisfied with the state of affairs at home on his return thither after the Trojan War, he built this city in the Ambracian Gulf, and named it Argos after his own

country. This was the largest town in Amphilochia, and its inhabitants the most powerful. Under the pressure of misfortune many generations afterwards, they called in the Ambraciots, their neighbours on the Amphilochian border, to join their colony; and it was by this union with the Ambraciots that they learnt their present Hellenic speech, the rest of the Amphilochians being barbarians. After a time, the Ambraciots expelled the Argives and held the city themselves. Upon this, the Amphilochians gave themselves over to the Acarnanians; and the two together called the Athenians, who sent them Phormio as general and thirty ships; upon whose arrival they took Argos by storm, and made slaves of the Ambraciots; and the Amphilochians and Acarnanians inhabited the town in common. After this, began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Athenians and Acarnanians. The enmity of the Ambraciots against the Argives thus commenced with the enslavement of their citizens; and afterwards during the war they collected this armament among themselves and the Chaonians, and other of the neighbouring barbarians. Arrived before Argos, they becam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but not being successful in their attacks upon the town, returned home and dispersed among their different peoples.

大约与此同时，即夏季即将结束时，安布拉基亚人率领自己的军队和他们招募的大批蛮族人，向安菲洛希亚的阿尔戈斯以及那个地区的其他地方发起了进军。他们仇恨阿尔戈斯人的缘由是这样：阿尔戈斯以及安菲洛希亚的其他地方，原本是安菲亚拉夫斯的儿子安菲洛胡斯开拓的殖民地。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他返回了家乡，但对那里的情况很不满意，于是便在安布拉基亚湾建立了这座城市，并以自己故乡的名字将它命名为阿尔戈斯。这是安菲洛希亚最大的城镇，其居民在当地的势力也最强大。许多代之后，阿尔戈斯人迫于厄运的压力，邀请在安菲洛希亚边界上毗邻而居的安布拉基亚人加入自己的殖民地。正是通过与安布拉基亚人的这次联合，他们才学会了目前使用的希腊

语，其余安菲洛希亚人则是蛮族人。过了一段时间，安布拉基亚人赶走阿尔戈斯人，自己占据了这座城市。于是，安菲洛希亚人便去投奔阿卡纳尼亚人。他们两方联合向雅典人求援，后者派遣福尔米奥为将军率领30艘战舰前去支援。这些舰只一到，他们就攻占了阿尔戈斯，并且奴役了安布拉基亚人。这样，安菲洛希亚人和阿卡纳尼亚人就共同居住在了这座城市。雅典人与阿卡纳尼亚人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由于阿尔戈斯人将安布拉基亚的公民都变成了奴隶，安布拉基亚人便开始仇恨阿尔戈斯人。后来在战争期间，他们就召集自己人、哈奥尼亚人和邻近的其他蛮族人组成了这支军队。他们来到阿尔戈斯城前，控制了乡村地区，但未能攻克阿尔戈斯城，尔后便返回家乡，各自回到了本族人中间。

Such were the events of the summer. The ensuing winter, the Athenians sent twenty ships round Peloponnese, under the command of Phormio, who stationed himself at Naupactus and kept watch against any one sailing in or out of Corinth and the Crissaean Gulf. Six others went to Caria and Lycia under Melesander, to collect tribute in those parts, and also to prevent the Peloponnesian privateers from taking up their station in those waters and molesting the passage of the merchantmen from Phaselis and Phoenicia and the adjoining continent. However, Melesander, going up the country into Lycia with a force of Athenians from the ships and the allies, was defeated and killed in battle, with the loss of a number of his troops.

这是那年夏季所发生的事。在接下来的那个冬季，雅典人派20艘战舰驶至伯罗奔尼撒半岛周围。这些舰由福尔米奥指挥，他在纳夫帕克图斯驻扎下来，监视着进出科林斯和克里塞湾的所有船只。雅典人另派出6艘舰只，在迈莱桑泽尔的指挥下驶向卡里亚和吕西亚，目的是去那些地方收取贡金，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伯罗奔尼撒的私掠船将那

些水域作为根据地，以袭击从法塞利斯和腓尼基以及邻近大陆驶来的过往商船。然而，带领舰上的雅典人和盟军组成的部队进入吕西亚的内地后，迈莱桑泽尔却战败被杀，他手下的人员也损失了不少。

The same winter, the Potidaeans at length found themselves no longer able to hold out against their besiegers. The inroads of the Peloponnesians into Attica had not had the desired effect of making the Athenians raise the siege. Provisions there were none left; and so far had distress for food gone in Potidaea that, besides a number of other horrors, instances had even occurred of the people having eaten one another. In this extremity they at last made proposals for capitulating to the Athenian generals in command against them—Xenophon, son of Euripides, Hestiodorus, son of Aristocleides, and Phanomachus, son of Callimachus. The generals accepted their proposals, seeing the sufferings of the army in so exposed a position; besides which the state had already spent two thousand talents upon the siege. The terms of the capitulation were as follows: a free passage out for themselves, their children, wives and auxiliaries, with one garment apiece, the women with two, and a fixed sum of money for their journey. Under this treaty they went out to Chalcidice and other places, according as was their power. The Athenians, however, blamed the generals for granting terms without instructions from home, being of opinion that the place would have had to surrender at discretion. They afterwards sent settlers of their own to Potidaea, and colonized it. Such were the events of the winter, and so ended the second year of this war of which Thucydides was the historian.

同年冬季，波提狄亚人终于发现自己再也无力抵御雅典人的围攻。伯罗奔尼撒人对阿提卡的侵袭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雅典人仍未停

止围攻。波提狄亚城里的粮食已一点不剩，饥馑导致了诸多惨状，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在这种绝望的境地中，他们终于向雅典军队的将军们提出要有条件投降。指挥雅典军队围困他们的是欧里庇得斯之子克塞诺丰、阿里斯托克利泽斯之子赫斯蒂奥佐鲁斯和卡利马科斯之子法诺马胡斯。这几位将军看到自己的部队在处于如此暴露的阵地苦不堪言，同时也考虑到自己城邦在围城中已耗资2,000塔兰特，于是就接受了他们的提议。波提狄亚人的投降条件如下：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及其附属人员可自由离开波提狄亚。男子每人带外衣一件，妇女两件，并可携带一定数目的钱款在旅途中使用。波提狄亚人按照这项条约离开该城，各凭本事到哈尔基季基和其他地方去了。可是，雅典人却责备这几位将军没有得到城邦的指示就擅自同意投降条款。他们认为，这个地方本可以无条件投降的。后来，他们派遣自己的移民前往波提狄亚，将那里开拓为殖民地。这是那年冬季所发生的事。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二年到此结束。

CHAPTER VIII Third Year of the War—Investment of Plataea—Naval Victories of Phormio—Thracian Irruption into Macedonia under Sitalces

第八章　战争第三年——普拉蒂亚之围——福尔米奥的海战胜利——西塔尔塞斯率色雷斯人入侵马其顿

The next summer,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ir allies, instead of invading Attica, marched against Plataea, under the command of Archidamus, son of Zeuxidamus, king of the Lacedaemonians. He had encamped his army and was about to lay waste the country, when the Plataeans hastened to send envoys to him, and spoke as follows: “Archidamus and Lacedaemonians, in invading the Plataean territory, you do what is wrong in itself, and worthy neither of yourselves nor of the fathers who begot you. Pausanias, son of Cleombrotus, your countryman, after freeing Hellas from the

Medes with the help of those Hellenes who were willing to undertake the risk of the battle fought near our city, offered sacrifice to Zeus the Liberator in the marketplace of Plataea, and calling all the allies together restored to the Plataeans their city and territory, and declared it independent and inviolate against aggression or conquest. Should any such be attempted, the allies present were to help according to their power. Your fathers rewarded us thus for the courage and patriotism that we displayed at that perilous epoch; but you do just the contrary, coming with our bitterest enemies, the Thebans, to enslave us. We appeal, therefore, to the gods to whom the oaths were then made, to the gods of your ancestors, and lastly to those of our country, and call upon you to refrain from violating our territory or transgressing the oaths, and to let us live independent, as Pausanias decreed."

翌年夏季，伯罗奔尼撒人及其盟友没有入侵阿提卡，而是转而向普拉蒂亚进军。指挥这支军队的是斯巴达国王——宙克西扎穆斯的儿子阿希达穆斯。他让部队扎下营盘，刚要劫掠这一地区，普拉蒂亚人就急忙派使者来见他。他们这样说道："阿希达穆斯和斯巴达人：你们入侵普拉蒂亚的领土，这本身就是不对的，既有愧于你们自己，也有愧于生养你们的父辈。你们的同胞，克莱奥姆布罗图斯的儿子保萨尼阿斯，在那些甘愿冒险在我们城市附近作战的希腊人的帮助下，将希腊从波斯人手里解放出来之后，曾在普拉蒂亚的市场上向解放者宙斯献祭，还把所有的盟友都召集起来，将普拉蒂亚人的城市和领土还给了普拉蒂亚人，并且宣布普拉蒂亚为独立城邦，不容侵略或征服。倘若有人试图这样做，在场的盟友都要各尽所能给予帮助。对于我们在那一危险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你们的父辈曾如此报答我们，你们却反其道而行之，竟与我们的死敌底比斯人一道前来，想要奴役我们。为此，我们祈求当时见证誓言的众神，你们祖先的众神，最后还有我们城邦的众神，并吁请你们，不要侵犯我们的领土，也不要违背那些誓言，而是要让我们像保萨尼阿斯所宣布的那样

独立存在。”

The Plataeans had got thus far when they were cut short by Archidamus' saying, “There is justice, Plataeans, in what you say, if you act up to your words. According to the grant of Pausanias, continue to be independent yourselves, and join in freeing those of your fellow countrymen who, after sharing in the perils of that period, joined in the oaths to you, and are now subject to the Athenians; for it is to free them and the rest that all this provision and war has been made. I could wish that you would share our labours and abide by the oaths yourselves; if this is impossible, do what we have already required of you—remain neutral, enjoying your own; join neither side, but receive both as friends, neither as allies for the war. With this we shall be satisfied.” Such were the words of Archidamus. The Plataeans, after hearing what he had to say, went into the city and acquainted the people with what had passed, and presently returned for answer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do what he proposed without consulting the Athenians, with whom their children and wives now were; besides which they had their fears for the town. After his departure, what was to prevent the Athenians from coming and taking it out of their hands, or the Thebans, who would be included in the oaths, from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proposed neutrality to make a second attempt to seize the city? Upon these points he tried to reassure them by saying, “You have only to deliver over the city and houses to us Lacedaemonians, to point out the boundaries of your land, the number of your fruit-trees, and whatever else can be numerically stated, and yourselves to withdraw wherever you like as long as the war shall last. When it is over we will restore to you whatever we received, and in the interim hold it in trust and keep it in cultivation, paying you a sufficient allowance.”

普拉蒂亚人说到这里，阿希达穆斯打断他们的话说："普拉蒂亚人，只要你们按照你们所说的行事，你们的话也有道理。你们可以按照保萨尼阿斯所允诺的那样，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但也要加入到解放你们同胞的事业中来。他们那时与你们共患难之后，同样对你们立下了誓言，如今却接受着雅典人的统治。所有这些准备和这场战争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解放他们以及其他和他们一样的人。但愿你们能和我们一起努力，自己也遵守誓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按照我们已经要求你们的那样——保持中立，享受自己的独立，不参加任何一方，将双方都当作朋友，但不把任何一方作为战争盟友。如果能这样，我们就满意了。"阿希达穆斯如是说。普拉蒂亚人听完他的话之后，返回城里向民众汇报了交涉情况，但很快又回来答复说，他们不能不与雅典人商议就按照他的提议去做，因为他们的妻子儿女此时都在雅典人那里。另外，他们也担心自己的城市不保。他率军撤离之后，他们靠什么阻止雅典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这座城呢？又靠什么阻止参与了立誓的底比斯人利用拟议的中立条款再次企图夺城呢？为了消除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顾虑，阿希达穆斯说："你们只要把城市和房屋交给我们斯巴达人，说出你们的疆界在哪里，你们有多少果树，以及其他所有能以数量计的财产，然后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直至战争结束。俟战争结束，我们会把我们接收的一切如数归还给你们。在此之前，我们会代为管理，代为耕作，并付给你们足够的津贴。"

When they had heard what he had to say, they re-entered the city, and after consulting with the people said that they wished first to acquaint the Athenians with this proposal, and in the event of their approving to accede to it; in the meantime, they asked him to grant them a truce and not to lay waste their territory. He accordingly granted a truce for the number of days requisite for the journey, and meanwhile abstained from ravaging their territory. The Plataean envoys went to Athens, and consulted with the Athenians, and returned with the following message to those in the

city, “The Athenians say, Plataeans, that they never hitherto, since we became their allies, on any occasion abandoned us to an enemy, nor will they now neglect us, but will help us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and they adjure you by the oaths which your fathers swore, to keep the alliance unaltered.”

听完他说的话，普拉蒂亚人又返回城内。在征求了民众的意见之后，他们答复说，他们希望先把这个提议告诉雅典人。要是雅典人认可，他们就答应。在这之前，他们请求他暂且休战，不要践踏他们的土地。阿希达穆斯答应按他们的要求暂且休战，休战的天数足够他们往返雅典，其间他没有践踏他们的土地。普拉蒂亚的使者赴雅典与雅典人协商之后，给城内人带回来的口信是这样的：“普拉蒂亚人：雅典人说，自从我们成为他们的盟友以来，他们迄今从未在任何时候将我们抛弃给敌人，现在也不会对我们坐视不管，而是会尽力帮助我们。他们凭借你们父辈立下的誓言恳请你们，不要变更现有的同盟关系。”

On the delivery of this message by the envoys, the Plataeans resolved not to be unfaithful to the Athenians but to endure, if it must be, seeing their lands laid waste and any other trials that might come to them, and not to send out again, but to answer from the wall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do as the Lacedaemonians proposed. As soon as he had received this answer, King Archidamus proceeded first to make a solemn appeal to the gods and heroes of the country in words following: “Ye gods and heroes of the Plataean territory, be my witnesses that not as aggressors originally, nor until these had first departed from the common oath, did we invade this land, in which our fathers offered you their prayers before defeating the Medes, and which you made auspicious to the Hellenic arms; nor shall we be aggressors in the

measures to which we may now resort, since we have made many fair proposals but have not been successful. Graciously accord that those who were the first to offend may be punished for it, and that vengeance may be attained by those who would righteously inflict it.”

听完使者们传达的这个口信，普拉蒂亚人决定不失信于雅典人。如果不得不看着自己的土地惨遭践踏或眼睁睁看着其他磨难降临到他们头上，那也只好忍受。同时，他们决定不再派人出城，只是从城墙上答复说，他们不可能按照斯巴达人的提议去做。阿希达穆斯国王接到这一答复，首先郑重地向当地诸神和英雄们发出如下祈求：“普拉蒂亚境内的诸神和英雄们：请你们为我作证。我们本不想成为侵略者。若非这些普拉蒂亚人首先背离我们共同的誓言，我们也不会入侵这片土地。打败波斯人之前，我们的父辈曾在这里向你们祈祷，你们使这里成了希腊军队的福地。我们现在虽然可能会采取某些措施，但我们并不是侵略者，因为我们提出过不少公平的建议，但都被拒绝了。请你们仁慈地应允，让首先作恶的人受到惩罚，让正义复仇的人获得成功吧！”

After this appeal to the gods Archidamus put his army in motion. First, he enclosed the town with a palisade formed of the fruit-trees which they cut down, to prevent further egress from Plataea; next they threw up a mound against the city, hoping that the largeness of the force employed would ensure the speedy reduction of the place. They accordingly cut down timber from Cithaeron, and built it up on either side, laying it like lattice-work to serve as a wall to keep the mound from spreading abroad, and carried to it wood and stones and earth and whatever other material might help to complete it. They continued to work at the mound for seventy days and nights without intermission, being

divided into relief parties to allow of some being employed in carrying while others took sleep and refreshment; the Lacedaemonian officer attached to each contingent keeping the men to the work. But the Plataeans, observing the progress of the mound, constructed a wall of wood and fixed it upon that part of the city wall against which the mound was being erected, and built up bricks inside it which they took from the neighbouring houses. The timbers served to bind the building together, and to prevent its becoming weak as it advanced in height; it had also a covering of skins and hides, which protected the woodwork against the attacks of burning missiles and allowed the men to work in safety. Thus the wall was raised to a great height, and the mound opposite made no less rapid progress. The Plataeans also thought of another expedient; they pulled out part of the wall upon which the mound abutted, and carried the earth into the city.

向诸神祈祷之后，阿希达穆斯遂命他的军队开始行动。他们首先将果树砍倒做成栅栏，再用栅栏将普拉蒂亚城围住，以防再有人出城。然后，他们靠城墙堆起一个土丘，希望凭借投入的人手之多加速这座城市的陷落。于是，他们从基塞龙山上砍了一些树木，在土丘两旁搭成格栅权作墙用，以防土丘塌陷，然后往里填木头、石块、泥土和其他任何可以用作填充材料的东西，以塞满其中的空隙。他们采取分班作业的方式，连续干了七十个昼夜。一拨人搬运材料时，其他人睡觉和歇息。每个分队都有斯巴达的军官负责监工。但是，当普拉蒂亚人注意到土堆越来越高之后，修建起一道木墙，将它固定在挨着土丘的那部分城墙处，然后取邻近房屋的砖砌进里面。那些木料可将所砌之物拦在一起，以防往高处砌时垮塌。木墙上还覆有各种兽皮。在遭到火矢攻击时，这些兽皮对木结构可起到保护作用，同时保证里面的人安全作业。因此，这道木墙修得很高，而对面的土丘进展得也不慢。普拉蒂亚人另外还想出了一计：他们把紧靠着土堆的那部分城墙拆掉，将土运进城里。

Discovering this, the Peloponnesians twisted up clay in wattles of reed and threw it into the breach formed in the mound, in order to give it consistency and prevent its being carried away like the soil. Stopped in this way the Plataeans changed their mode of operation, and digging a mine from the town calculated their way under the mound, and began to carry off its material as before. This went on for a long while without the enemy outside finding it out, so that for all they threw on the top their mound made no progress in proportion, being carried away from beneath and constantly settling down in the vacuum. But the Plataeans, fearing that even thus they might not be able to hold out against the superior numbers of the enemy, had yet another invention. They stopped working at the large building in front of the mound, and starting at either end of it inside from the old low wall, built a new one in the form of a crescent running in towards the town; in order that in the event of the great wall being taken this might remain, and the enemy have to throw up a fresh mound against it, and as they advanced within might not only have their trouble over again, but also be exposed to missiles on their flanks. While raising the mound the Peloponnesians also brought up engines against the city, one of which was brought up upon the mound against the great building and shook down a good piece of it, to the no small alarm of the Plataeans. Others were advanced against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all but were lassoed and broken by the Plataeans; who also hung up great beams by long iron chains from either extremity of two poles laid on the wall and projecting over it, and drew them up at an angle whenever any point was threatened by the engine, and loosing their hold let the beam go with its chains slack, so that it fell with a run and snapped off the nose of the battering ram.

伯罗奔尼撒人发现这件事后，就把泥土裹进编起来的芦苇里再投进土丘形成的缺口，以增加其坚实度，同时也防止再像那些土一样被运走。普拉蒂亚人见此计不成，就改变了作业方式。他们算好距离，挖了一条从城里通往土丘下面的地道，又开始像以前一样运走建土丘的材料。他们连续运了很长时间，城外的敌人都没有发觉。他们虽然一直在往顶上填，土丘却没有相应地增高，因为下面的土被运走后，丘体总是往空处下沉。但是，普拉蒂亚人担心，即便如此，他们可能还是无法抵抗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所以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不再继续修筑土丘对面的大木栅，而是自它的两端开始，在原有的低墙内侧修了一道朝城内延伸呈新月形的新墙。这样，即便外侧木栅墙失陷了，他们还有这道墙，而敌人也得再造一座土丘与之对垒。敌人若再向内推进，不仅又会遭遇同样的困难，其两侧也会暴露在箭矢之下。在修筑土丘的同时，伯罗奔尼撒人还拿出攻城器械来攻城。他们把其中一个运上土丘，用它来撞击大木栅墙，而且撞下了很大一块，引起了普拉蒂亚人不小的恐慌。他们把其他攻城器械也拉去撞击城墙的不同部位，但都被普拉蒂亚人用套索套住后破坏了。普拉蒂亚人还将两根杆子固定在墙上探出去，杆子顶端用长长的铁索吊起一根巨大的梁木。每当攻城器械准备撞击的时候，他们就扯起大木头，与之形成直角，然后放手让木头随着铁索一起松开。这样，梁木就会突然下降，啪地打断撞墙装置的前端突出部位。

After this, the Peloponnesians, finding that their engines effected nothing, and that their mound was met by the counterwork, concluded that their present means of offence were unequal to the taking of the city, and prepared for its circumvallation. First, however, they determined to try the effects of fire and see whether they could not, with the help of a wind, burn the town, as it was not a large one; indeed, they thought of every possible expedient by which the place might be reduced without the expense of a blockade. They accordingly brought faggots of brushwood and threw them from the mound, first into

the space between it and the wall; and this soon becoming full from the number of hands at work, they next heaped the faggots up as far into the town as they could reach from the top, and then lighted the wood by setting fire to it with sulphur and pitch. The consequence was a fire greater than any one had ever yet seen produced by human agency, though it could not of course be compared to the spontaneous conflagrations sometimes known to occur through the wind rubbing the branches of a mountain forest together. And this fire was not only remarkable for its magnitude, but was also, at the end of so many perils, within an ace of proving fatal to the Plataeans; a great part of the town became entirely inaccessible, and had a wind blown upon 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opes of the enemy, nothing could have saved them. As it was, there is also a story of heavy rain and thunder having come on by which the fire was put out and the danger averted.

这之后，伯罗奔尼撒人发现他们的攻城器械效力全无，而且对方针对他们的土丘也修建了对抗工事，于是断定目前的攻击方法已不足以攻下该城，因而准备修筑一道围城工事。不过，他们还是决定先试一下火攻的效果，看看借助风力是否能把城烧掉，因为这座城不是很大。事实上，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总想不经封锁就攻取这个地方。因此，他们把一捆捆木柴搬上土丘，从那里先把木柴扔进土丘与城墙之间的空隙中。由于人手众多，空隙很快就填满了。接着，他们又把柴捆从土丘顶上尽量往城里堆，然后利用硫磺和树脂将木柴点燃。由此引发一场大火，人们还从来没有见过人为的火能有这么大。当然，与山林中有时因风刮树枝摩擦而生的自然火尚不能比。这场火不仅火势大得出奇，而且在普拉蒂亚人经历过那么多危险之后差点将他们毁灭。城里大部分被毁于一旦，无从进入。倘若真如敌人所愿刮起风来，那就什么都救不了他们了。实际上，据说当时天降大雨，并伴有雷鸣，大火被浇灭，他们这才转危为安。

Failing in this last attempt, the Peloponnesians left a portion of their forces on the spot, dismissing the rest, and built a wall of circumvallation round the town, dividing the ground among the various cities present; a ditch being made within and without the lines, from which they got their bricks. All being finished by about the rising of Arcturus, they left men enough to man half the wall, the rest being manned by the Boeotians, and drawing off their army dispersed to their several cities. The Plataeans had before sent off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and oldest men and the mass of the non-combatants to Athens; so that the number of the besieged left in the place comprised four hundred of their own citizens, eighty Athenians, and a hundred and ten women to bake their bread. This was the sum total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siege, and there was no one else within the walls, bond or free. Such were the arrangements made for the blockade of Plataea.

最后这次尝试失败后，伯罗奔尼撒人将其余人员遣散，只留下部分军队驻守。他们修了一道环城围墙，在场城邦各分管一段。墙内和墙外各挖有一条壕沟，他们从那里取土做砖。大约在大角星升起的时候，工程全部完成了。他们留下的人足够防守城墙的一半，剩下的一半由维奥蒂亚人防守，将其余军队遣回各自城邦去了。普拉蒂亚人此前已将他们的妻子儿女和老人以及大量非战斗人员送往雅典，留守在围城内的人员仅有400名本城公民、80名雅典人和110名为他们烤面包的妇女。这是围攻开始时城内人员的总数，除此之外城内别无他人，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民。普拉蒂亚之围开始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The same summer and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expedition against Plataea, the Athenians marched with two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and two hundred horse against the Chalcidians in the

direction of Thrace and the Bottiaeans, just as the corn was getting ripe, under the command of Xenophon, son of Euripides, with two colleagues. Arriving before Spartolus in Bottiaea, they destroyed the corn and had some hopes of the city coming over through the intrigues of a faction within. But those of a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 had sent to Olynthus; and a garrison of heavy infantry and other troops arrived accordingly. These issuing from Spartolus were engaged by the Athenians in front of the town; the Chalcidian heavy infantry, and some auxiliaries with them, were beaten and retreated into Spartolus; but the Chalcidian horse and light troops defeated the horse and light troops of the Athenians. The Chalcidians had already a few targeteers from Crusis, and presently after the battle were joined by some others from Olynthus; upon seeing whom the light troops from Spartolus, emboldened by this accession and by their previous success, with the help of the Chalcidian horse and the reinforcement just arrived again attacked the Athenians, who retired upon the two divisions which they had left with their baggage. Whenever the Athenians advanced, their adversary gave way, pressing them with missiles the instant they began to retire. The Chalcidian horse also, riding up and charging them just as they pleased, at last caused a panic amongst them and routed and pursued them to a great distance. The Athenians took refuge in Potidaea, and afterwards recovered their dead under truce, and returned to Athens with the remnant of their army; four hundred and thirty men and all the generals having fallen. The Chalcidians and Bottiaeans set up a trophy, took up their dead, and dispersed to their several cities.

同年夏季，在伯罗奔尼撒人及其盟友远征普拉蒂亚的同时，雅典人派出2,000名重步兵和200名骑兵去进攻色雷斯地区的哈尔基斯人和博蒂亚人。当时正是麦子要熟的时候。指挥这支军队的是欧里庇得斯

的儿子克塞诺丰，另外配有两名副将。一到博蒂亚的斯巴托卢斯城前，他们就对麦田进行破坏并寄希望于通过与城里的一个派别相互勾结夺取城市。但是，城里持不同想法的人早已派人通知了奥林索斯，奥林索斯随即派出重步兵和其他部队前来镇守。这些军队冲出斯巴托卢斯与兵临城下的雅典人交战。哈尔基斯的重步兵以及跟一些援军失利后退进了城里，但哈尔基斯的骑兵和轻步兵则打败了雅典人的骑兵和轻步兵。哈尔基斯人本来已有少数来自克鲁西斯的轻盾兵，这次交战之后，奥林索斯很快又派来一些。斯巴托卢斯城里的轻步兵刚打完胜仗，又见来了援军，胆子更壮了。在哈尔基斯骑兵和新来援军的帮助下，他们再度向雅典人发起进攻，打得雅典人退到了他们留下看守辎重的两个分队那里。只要雅典人进攻，敌人就往后退；雅典人后退，敌人就发射箭矢压制他们。哈尔基斯的骑兵也奔驰而来，肆意向他们发起冲锋，最后，雅典人终于乱了阵脚，溃退之后还被追了很远。雅典人逃到波提狄亚躲避，后来休战时才收回死者的尸体，尔后率残部回雅典去了。他们在此役中损失了430名士兵，将军全体阵亡。哈尔基斯人和博蒂亚人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然后收拾起死者的尸体，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城邦。

The same summer, not long after this, the Ambraciots and Chaonians, being desirous of reducing the whole of Acarnania and detaching it from Athens, persuaded the Lacedaemonians to equip a fleet from their confederacy and send a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to Acarnania, representing that, if a combined movement were made by land and sea, the coast Acarnanians would be unable to march, and the conquest of Zacynthus and Cephallenia easily following on the possession of Acarnania, the cruise round Peloponnese would be no longer so convenient for the Athenians. Besides which there was a hope of taking Naupactus. The Lacedaemonians accordingly at once sent off a few vessels with Cnemus, who was still high admiral, and the heavy infantry on board; and sent round orders for the fleet to equip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sail to Leucas. The

Corinthians were the most forward in the business; the Ambraciots being a colony of theirs. While the ships from Corinth, Sicyon, and the neighbourhood were getting ready, and those from Leucas, Anactorium, and Ambracia, which had arrived before, were waiting for them at Leucas, Cnemus and his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had run into the gulf, giving the slip to Phormio, the commander of the Athenian squadron stationed off Naupactus, and began at once to prepare for the land expedition. The Hellenic troops with him consisted of the Ambraciots, Leucadians, and Anactorians, and the thousand Peloponnesians with whom he came; the barbarian of a thousand Chaonians, who, belonging to a nation that has no king, were led by Photys and Nicanor, the two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to whom the chieftainship for that year had been confided. With the Chaonians came also some Thesprotians, like them without a king, some Molossians and Atintanians led by Sabylinthus, the guardian of King Tharyps who was still a minor, and some Paravaeans, under their king Oroedus, accompanied by a thousand Orestians, subjects of King Antichus and placed by him under the command of Oroedus. There were also a thousand Macedonians sent by Perdiccas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Athenians, but they arrived too late. With this force Cnemus set out, without waiting for the fleet from Corinth. Passing through the territory of Amphilochian Argos, and sacking the open village of Limnaea, they advanced to Stratus the Acarnanian capital; this once take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they felt convinced, would speedily follow.

此后不久，在同一个夏季，安布拉基亚人和哈奥尼亚人出面劝说斯巴达人，请他们用同盟的资源装备一个舰队，并派遣1,000名重步兵开赴阿卡纳尼亚，意欲征服整个阿卡纳尼亚地区，使它脱离雅典。他们称，只要能采取海陆联合行动，滨海的阿卡纳尼亚人就无法出

动。阿卡纳尼亚一到手，征服扎金索斯和凯法莱尼亚就易如反掌，雅典人再想绕着伯罗奔尼撒半岛游弋就没那么方便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可能攻陷纳夫帕克图斯。于是，斯巴达人立即派仍为海军大将的克内穆斯率重步兵先乘几艘舰只前往，并传令尽快装备好舰队，准备驶往莱夫卡斯岛。科林斯人对这件事态度最积极，因为安布拉基亚人是他们的移民。科林斯、西锡安以及附近地区的战舰正做准备时，莱夫卡斯、阿纳克托里乌姆和安布拉基亚的舰只已经先到了，正在莱夫卡斯岛等他们。福尔米奥当时正率领雅典那个海军中队守卫在纳夫帕克图斯附近。克内穆斯和他率领的1,000名重步兵已趁福尔米奥不备偷偷溜进海湾，立即开始准备从陆路进军。克内穆斯麾下的希腊军队包括安布拉基亚人、莱夫卡斯人和阿纳克托里乌姆人，另外还有他带来的1,000名伯罗奔尼撒人。蛮族人的军中有1,000名哈奥尼亚人，他们属于一个没有国王的部族，由福蒂斯和尼卡诺尔指挥。这两位都是统治家族的成员，那年由他们担任首领。跟哈奥尼亚人一起来的还有一部分塞斯普罗蒂亚人、莫洛西亚人、阿廷塔尼亚人以及帕拉沃拉人。塞斯普罗蒂亚人与哈奥尼亚人一样没有国王。莫洛西亚人和阿廷塔尼亚人由萨比林苏斯率领，他是尚未成年的国王萨里普斯的监护人。帕拉沃拉人由他们的国王奥里祖斯指挥。与帕拉沃拉人同来的还有1,000名奥雷斯蒂亚人，他们是安蒂胡斯国王的臣民，但他委托奥里祖斯国王代为指挥。佩尔狄卡斯瞒着雅典人也派来1,000名马其顿人，但他们到的太迟了。没等科林斯的舰队赶到，克内穆斯就率领这些军队出发了。经过安菲洛希亚的阿尔戈斯时，他们劫掠了没有设防的村庄利姆内阿，然后向阿卡纳尼亚的都城斯特拉图斯进发。他们相信，一旦拿下这座城市，阿卡纳尼亚的其他地方很快就会落入他们手中。

The Acarnanians, finding themselves invaded by a large army by land, and from the sea threatened by a hostile fleet, made no combined attempt at resistance, but remained to defend their homes, and sent for help to Phormio, who replied that, when a fleet was on the point of sailing from Corinth, it was impossible for him

to leave Naupactus unprotected. The Peloponnesians meanwhile and their allies advanced upon Stratus in three divisions, with the intention of encamping near it and attempting the wall by force if they failed to succeed by negotiation. The order of march was as follows: the centre was occupied by the Chaonians and the rest of the barbarians, with the Leucadians and Anactorians and their followers on the right, and Cnemus with the Peloponnesians and Ambraciots on the left; each division being a long way off from, and sometimes even out of sight of, the others. The Hellenes advanced in good order, keeping a look-out till they encamped in a good position; but the Chaonians, filled with self-confidence, and having the highest character for courage among the tribes of that part of the continent, without waiting to occupy their camp, rushed on with the rest of the barbarians, in the idea that they should take the town by assault and obtain the sole glory of the enterprise. While they were coming on, the Stratians, becoming aware how things stood, and thinking that the defeat of this division would considerably dishearten the Hellenes behind it, occupied the environs of the town with ambuscades, and as soon as they approached engaged them at close quarters from the city and the ambuscades. A panic seizing the Chaonians, great numbers of them were slain; and as soon as they were seen to give way the rest of the barbarians turned and fled. Owing to the distance by which their allies had preceded them, neither of the Hellenic divisions knew anything of the battle, but fancied they were hastening on to encamp. However, when the flying barbarians broke in upon them, they opened their ranks to receive them, brought their divisions together, and stopped quiet where they were for the day; the Stratians not offering to engage them, as the rest of the Acarnanians had not yet arrived, but contenting themselves with slinging at them from a distance, which distressed them greatly, as there was no stirring without their armour. The Acarnanians would seem to

excel in this mode of warfare.

当阿卡纳尼亚人发现自己在陆上遭到大军入侵，在海上也受到敌方舰队的威胁之后，他们并没有联合起来共同抗敌，而是继续坚守自己的家园，同时派人去向福尔米奥求助。福尔米奥答复说，有一支舰队正要驶出科林斯，他不能对纳夫帕克图斯不设防。这时候，伯罗奔尼撒人及其盟军兵分三路向斯特拉图斯进发。他们打算先在城旁扎下营盘，如果不能通过谈判方式取得该城，就用武力进行强攻。他们的行军队形是这样的：中路是哈奥尼亚人和其他蛮族人，右路是莱夫卡斯人和阿纳克托里乌姆人以及跟他们一起来的人，左路是克内穆斯率领的伯罗奔尼撒人和安布拉基亚人。各路之间相隔较远，有时甚至彼此看不见。希腊人井然有序地向前推进，在找到地势好的扎营地点之前一直小心戒备。但是，在附近部落中以胆量最大善战而著名的哈奥尼亚人却自信满满，他们没等扎营就与其余蛮族人一道向前杀去，意欲通过强攻一举将城拿下，在这次行动中独得这份光荣。他们尚在奔袭途中，斯特拉图斯人就知道情况如何了。他们认为，如果能打败这支敌军，随后而至的希腊人将会士气大跌。于是，他们在城郊设下伏兵，敌军一靠近，他们就从城内和设伏地点杀出来，与他们展开近战。哈奥尼亚人大为惊慌，不少人都被杀死了。一见他们垮了，其他蛮族人也纷纷转身逃命。由于相距较远，后面两路希腊军队根本不知道他们前面的盟军遇到了战事，还以为他们急着要赶到前边去扎营。然而，当溃逃的蛮族人闯入他们的队伍时，他们敞开队列接纳了他们，然后将各路军队收拢，白天就停留在原地未动。由于其他阿卡纳尼亚人尚未赶到，斯特拉图斯人也没有主动邀战，只是远远地朝他们掷弹石。这种打法着实让他们难受，因为不穿盔甲就无法行动。阿卡纳尼亚人却似乎很擅长这种作战方式。

As soon as night fell, Cnemus hastily drew off his army to the river Anapus, about nine miles from Stratus, recovering his dead next day under truce, and being there joined by the friendly

Oeniadae, fell back upon their city before the enemy's reinforcements came up. From hence each returned home; and the Stratians set up a trophy for the battle with the barbarians.

夜幕一降临，克内穆斯赶紧将部队撤到阿纳普斯河畔，那里距斯特拉图斯约9英里。次日，他在休战时收回了死者的尸体。由于与之交好的伊尼阿泽人在那里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便趁敌军的援兵未到之时退守至伊尼阿泽人的城市，进而从那里各自返回家乡。为了纪念这次与蛮族人之战的胜利，斯特拉图斯人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

Meanwhile, the fleet from Corinth and the rest of the confederates in the Crissaean Gulf, which was to have co-operated with Cnemus and prevented the coast Acarnanians from joining their countrymen in the interior, was disabled from doing so by being compelled about the same time as the battle at Stratus to fight with Phormio and the twenty Athenian vessels stationed at Naupactus. For they were watched, as they coasted along out of the gulf, by Phormio, who wished to attack in the open sea. But the Corinthians and allies had started for Acarnania without any idea of fighting at sea, and with vessels more like transports for carrying soldiers; besides which, they never dreamed of the twenty Athenian ships venturing to engage their forty-seven. However, while they were coasting along their own shore, there were the Athenians sailing along in line with them; and when they tried to cross over from Patrae in Achaea to the mainland on the other side, on their way to Acarnania, they saw them again coming out from Chalcis and the river Evenus to meet them. They slipped from their moorings in the night, but were observed, and were at length compelled to fight in mid passage. Each state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armament had its own general; the Corinthian commanders

were Machaon, Isocrates, and Agatharchidas. The Peloponnesians ranged their vessels in as large a circle as possible without leaving an opening, with the prows outside and the sterns in; and placed within all the small craft in company, and their five best sailers to issue out at a moment's notice and strengthen any point threatened by the enemy.

在这期间，科林斯和克里塞湾其他盟邦派出的舰队原计划要来与克内穆斯协同作战，以阻止滨海的阿卡纳尼亚人到内地来支援他们的同胞，但是却没有做到，因为大约在斯特拉图斯之战发生的同时，这支舰队正在被迫与福尔米奥麾下驻守在纳夫帕克图斯的那20艘雅典舰作战。他们沿着海岸驶出海湾时，福尔米奥只是监视他们，因为他想等他们到了海上再实施攻击。可是，科林斯人及其盟友启航驶往阿卡纳尼亚时，万万没有想到要在海上作战，他们所乘的更像是运兵船而不是战舰。此外，他们做梦也没想到，雅典人竟敢用20艘战舰与他们的47艘舰只对阵。然而，当他们沿着自己的海岸航行时，雅典人就在对岸列成一线与他们平行行驶。在驶往阿卡纳尼亚途中，当他们想从亚该亚的帕特雷驶向对面的大陆时，他们又看到雅典人从哈尔基斯和埃韦努斯河冲出来迎击他们。到了夜间，他们本想悄悄从停泊处驶出去，但还是被发觉了，最后只好在中途与之对阵。派战舰参加这次远征的城邦各有自己的将领，科林斯人的指挥官是马哈翁、伊索克拉底和阿加萨尔希扎斯。伯罗奔尼撒人尽量将战舰排面列成一个很大的圆阵，不留任何缺口，舰首朝外，舰尾朝内，将随行的小船全都置于阵内；阵内还有五艘最好的战舰，无论圆阵何处受到敌人威胁，只要一声令下，它们就冲过去增援。

The Athenians, formed in line, sailed round and round them, and forced them to contract their circle, by continually brushing past and making as though they would attack at once, having been previously cautioned by Phormio not to do so till he gave the

signal. His hope was that the Peloponnesians would not retain their order like a force on shore, but that the ships would fall foul of one another and the small craft cause confusion; and if the wind should blow from the gulf (in expectation of which he kept sailing round them, and which usually rose towards morning), they would not, he felt sure, remain steady an instant. He also thought that it rested with him to attack when he pleased, as his ships were better sailers, and that an attack timed by the coming of the wind would tell best. When the wind came down, the enemy's ships were now in a narrow space, and what with the wind and the small craft dashing against them, at once fell into confusion: ship fell foul of ship, while the crews were pushing them off with poles, and by their shouting, swearing, and struggling with one another, made captains' orders and boatswains' cries alike inaudible, and through being unable for want of practice to clear their oars in the rough water, prevented the vessels from obeying their helmsmen properly. At this moment, Phormio gave the signal, and the Athenians attacked. Sinking first one of the admirals, they then disabled all they came across, so that no one thought of resistance for the confusion, but fled for Patrae and Dyme in Achaea. The Athenians gave chase and captured twelve ships, and taking most of the men out of them sailed to Molycrium and after setting up a trophy on the promontory of Rhium and dedicating a ship to Poseidon, returned to Naupactus. As for the Peloponnesians, they at once sailed with their remaining ships along the coast from Dyme and Patrae to Cyllene, the Eleian arsenal; where Cnemus, and the ships from Leucas that were to have joined them, also arrived after the battle at Stratus.

雅典人将舰只排成纵队，绕着他们转了又转，不停地从他们旁边擦过，佯作马上就要发动进攻的样子，迫使他们将圆阵越收越小。实际上，福尔米奥事先已经有令，在他发出信号之前不能进攻。福尔米

奥希望，这些伯罗奔尼撒人不会像岸上的部队一样保持队形，舰与舰会互撞，小船会引起混乱。倘若再有风从海湾方向刮来（这种风通常起于黎明将至时分，他期待着有风刮来，所以一直不停地绕着他们转），他敢肯定，他们到时定会大乱。他还认为，由于他的战舰性能比较好，何时发动进攻取决于他，而进攻的最佳时机就是风起之时。风刮起来后，敌舰立刻挤成了一团，它们既要应付大风，又要躲避撞上来的小船，登时陷入了混乱：舰与舰撞在一起，船员要用竹竿推开冲过来的舰，呼喊声、叫骂声和相互撕扯声搅得舰长的命令和水手长的呼喊都听不见。桨手们由于缺乏在汹涌的海面上划桨的经验，更使得战舰不能很好地服从舵手的操纵。就在这时，福尔米奥发出信号，雅典人的进攻开始了。他们首先击沉了一艘旗舰，尔后将他们遇上的所有敌舰都打得失去了战斗力。在这种混乱状况中，无人再思抵抗，而是纷纷向亚该亚的帕特雷和迪迈逃去。雅典人紧追不舍，缴获了12艘战舰，俘虏了舰上大部分人员，这才向莫利克里乌姆驶去。他们在里乌姆岬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将一艘舰只献给海神波塞冬，尔后返回纳夫帕克图斯去了。伯罗奔尼撒人则立刻带着剩下的舰只沿着海岸从迪迈和帕特雷驶往埃利亚的海军船坞基莱内。斯特拉图斯一战之后，克内穆斯也带着本来要去与他们会合的舰队从莱夫卡斯来到了这里。

The Lacedaemonians now sent to the fleet to Cnemus three commissioners—Timocrates, Bradidas, and Lycophron—with orders to prepare to engage again with better fortune, and not to be driven from the sea by a few vessels; for they could not at all account for their discomfiture, the less so as it was their first attempt at sea; and they fancied that it was not that their marine was so inferior, but that there had been misconduct somewhere, not considering the long experience of the Athenians as compared with the little practice which they had had themselves. The commissioners were accordingly sent in anger. As soon as they arrived, they set to work with Cnemus to order ships from the different states, and to put

those which they already had in fighting order. Meanwhile, Phormio sent word to Athens of their preparations and his own victory, and desired as many ships as possible to be speedily sent to him, as he stood in daily expectation of a battle. Twenty were accordingly sent, but instructions were given to their commander to go first to Crete. For Nicias, a Cretan of Gortys, who was proxenus of the Athenians, had persuaded them to sail against Cydonia, promising to procure the reduction of that hostile town; his real wish being to oblige the Polichnitans, neighbours of the Cydonians. He accordingly went with the ships to Crete, and, accompanied by the Polichnitans, laid waste the lands of the Cydonians; and, what with adverse winds and stress of weather wasted no little time there.

这时，斯巴达人向克内穆斯及其舰队派去了三名特派员——蒂莫克拉泰斯、布拉季扎斯和利科夫龙，责令他们准备再打一次海战，而且战绩要好一点，不要被区区几艘舰只赶出大海。因为斯巴达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他们怎么那么狼狈，再加上是初尝海战，所以他们更搞不懂了。他们认为，并不是自己的水兵技不如人，而是什么地方出了错。他们没有考虑到，与他们自己那点操练时间相比，雅典人可谓具有长期的海上经验。一怒之下，他们派出了这几位特派员。特派员们一到，随即与克内穆斯共同要求各个城邦再派些舰只来，并将已有的舰只列成战斗队形。与此同时，福尔米奥也向雅典报告了敌军的准备情况和自己取得的胜利，并请求雅典赶快尽可能多给他派些战舰来，因为每天都有发生海战的可能。于是，雅典人派出了20艘战舰，但命令这些舰的指挥官先率舰队驶往克里特。这是因为格尔蒂斯的克里特人尼西亚斯（雅典在克里特的代理人）劝雅典人去进攻基佐尼亚，并说肯定能拿下这个敌对城市。他的真正意图其实是为了帮助与基佐尼亚人为邻的波利赫尼人。于是，这位指挥官就带着舰队去了克里特，与波利赫尼人一起践踏了基佐尼亚的土地。由于逆风和天气不好，他们在那里浪费了不少时间。

While the Athenians were thus detained in Crete, the Peloponnesians in Cyllene got ready for battle, and coasted along to Panormus in Achaea, where their land army had come to support them. Phormio also coasted along to Molycrian Rhium, and anchored outside it with twenty ships, the same as he had fought with before. This Rhium was friendly to the Athenians. The other, in Peloponnese, lies opposite to it; the sea between them is about three-quarters of a mile broad, and forms the mouth of the Crissaean gulf. At this, the Achaean Rhium, not far off Panormus, where their army lay, the Peloponnesians now cast anchor with seventy-seven ships, when they saw the Athenians do so. For six or seven days they remained opposite each other, practising and preparing for the battle; the one resolved not to sail out of the Rhia into the open sea, for fear of the disaster which had already happened to them, the other not to sail into the straits, thinking it advantageous to the enemy, to fight in the narrows. At last, Cnemus and Brasidas and the rest of the Peloponnesian commanders, being desirous of bringing on a battle as soon as possible, before reinforcements should arrive from Athens, and noticing that the men were most of them cowed by the previous defeat and out of heart for the business, first called them together and encouraged them as follows:

当雅典人因此而耽搁在克里特之时，基莱内的伯罗奔尼撒人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沿着海岸驶向了亚该亚的帕诺尔穆斯，承担支援任务的陆军部队已经到了那里。福尔米奥也沿着海岸驶向莫利克里乌姆的里乌姆，带着20艘舰只停泊在了它外面。这些舰还是他此前作战中用的那20艘。这个里乌姆与雅典人保持着友好关系，伯罗奔尼撒那个里乌姆位于它对面，两地之间大约四分之三英里宽的海面即是克里塞湾的湾口。看到雅典人在对面停泊下来，伯罗奔尼撒人立时也把77艘战

舰停泊到亚该亚的里乌姆，与陆军部队的扎营地帕诺尔穆斯相距不远。双方隔岸相持了六、七天的时间，其间各自都在不断操练为开战做准备。一方决意不从里亚驶入大海，唯恐重蹈上次战败的覆辙；另一方决意不驶进海峡，认为在狭小的水面作战于敌有利。最后，克内穆斯、布拉西达斯以及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其他指挥官都希望能在雅典的援军赶到之前尽早开战。另外他们也注意到，大多数士兵都受上次失利影响不愿再战。因此，他们首先将他们召集到一起，然后这样鼓励他们：

“Peloponnesians, the late engagement, which may have made some of you afraid of the one now in prospect, really gives no just ground for apprehension. Preparations for it, as you know, there was little enough; and the object of our voyage was not so much to fight at sea as an expedition by land. Besides this, the chances of war were largely against us; and perhaps also inexperience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our failure in our first naval action. It was not, therefore, cowardice that produced our defeat, nor ought the determination which force has not quelled, but which still has a word to say with its adversary, to lose its edge from the result of an accident; but admitt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chance miscarriage, we should know that brave hearts must be always brave, and while they remain so can never put forward inexperience as an excuse for misconduct. Nor are you so behind the enemy in experience as you are ahead of him in courage; and although the science of your opponents would, if valour accompanied it, have also the presence of mind to carry out at in emergency the lesson it has learnt, yet a faint heart will make all art powerless in the face of danger. For fear takes away presence of mind, and without valour art is useless. Against their superior experience set your superior daring, and against the fear induced by defeat the fact of your having been then unprepared; remember, too, that you have always the advantage of

superior numbers, and of engaging off your own coast, supported by your heavy infantry; and as a rule, numbers and equipment give victory. At no point, therefore, is defeat likely; and as for our previous mistakes, the very fact of their occurrence will teach us better for the future. Steersmen and sailors may, therefore, confidently attend to their several duties, none quitting the station assigned to them; as for ourselves, we promise to prepare for the engagement at least as well as your previous commanders, and to give no excuse for any one misconducting himself. Should any insist on doing so, he shall meet with the punishment he deserves, while the brave shall be honour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wards of valour."

"伯罗奔尼撒人：上次交战也许使你们有些人对目前即将到来的战斗有所畏惧，实际上，你们并没有理由心存恐惧。你们知道，上次我们准备得很不充分。我们出航的目的不是为了在海上作战，而是为了在陆上远征。此外，我们那次战运也不佳。我们在首次海上行动中失利，或许与我们缺乏海战经验也有一定关系。因此，我们的失利，不是因为我们怯弱；我们的决心，也不应当因为一次偶然的结果而减弱，因为它没有为武力所动摇，而是仍要和对手较量一番。但是，在承认偶尔会有失误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真正勇敢的人始终是勇敢的。只要不失勇敢，就决不会以经验不足作为失误的借口。你们在经验方面虽然落后于敌人，但是在勇气方面却胜过他们。即使你们的对手在有勇气的前提下，遇到紧急情况也能镇静自若地运用所学到的东西，但是，脆弱的内心也会使所有的技能在危险面前都不起作用。恐惧会使人失去镇定；但没有勇气，技能便一无所用。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你们有过人的胆量。因失利而恐惧，其实是由于你们当时没有准备。另外也不要忘记，你们在数量上一向占有优势，你们是在自己的海岸附近作战，而且还有重步兵支援。一般说来，胜利属于人数众多和装备精良的一方。因此，我们绝不可能失败。对未来而言，我们先前所犯的错误，反而可以让我们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因此，操舵

兵和水兵都要满怀信心地各尽其职，任何人都不得擅离指定的岗位。我们指挥官也要为交战做好准备，起码不能逊于你们先前的指挥官，不能让任何人找到失职的借口。如果有人坚持这样做，他将受到应得的惩罚，而勇敢者将获得应得的奖赏。”

The Peloponnesian commanders encouraged their men after this fashion. Phormio, meanwhile, being himself not without fears for the courage of his men, and noticing that they were forming in groups among themselves and were alarmed at the odds against them, desired to call them together and give them confidence and counsel in the present emergency. He had before continually told them, and had accustomed their minds to the idea, that there was no numerical superiority that they could not face; and the men themselves had long been persuaded that Athenians need never retire before any quantity of Peloponnesian vessels. At the moment, however, he saw that they were dispirited by the sight before them, and wishing to refresh their confidence, called them together and spoke as follows:

伯罗奔尼撒的指挥官以这种方式给部下打了气。福尔米奥当时对自己部下的士气也不无担心。他注意到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显然在为情况对他们不利而担心。因此，他也想把他们召集到一起，给他们树立信心，并根据当时的情况给他们一些忠告。以前他一直向他们灌输，所以他们早已树立起这样的概念：没有他们对付不了的数量优势。他的部下也早已认定，无论伯罗奔尼撒有多少战舰，雅典人都无需退却。然而，此刻他注意到，眼前的情景还是令他们有些沮丧。他很想让他们重拾信心，所以就将他们召集到一起，作了如下讲话：

“I see, my men, that you are frightened by the number of the

enemy, and I have accordingly called you together, not liking you to be afraid of what is not really terrible. In the first place, the Peloponnesians, already defeated, and not even themselves thinking that they are a match for us, have not ventured to meet us on equal terms, but have equipped this multitude of ships against us. Next, as to that upon which they most rely, the courage which they suppose constitutional to them, their confidence here only arises from the success which their experience in land service usually gives them, and which they fancy will do the same for them at sea. But this advantage will in all justice belong to us on this element, if to them on that; as they are not superior to us in courage, but we are each of us more confident, according to our experience in our particular department. Besides, as the Lacedaemonians use their supremacy over their allies to promote their own glory, they are most of them being brought into danger against their will, or they would never, after such a decided defeat, have ventured upon a fresh engagement. You need not, therefore, be afraid of their dash. You, on the contrary, inspire a much greater and better founded alarm, both because of your late victory and also of their belief that we should not face them unless about to do something worthy of a success so signal. An adversary numerically superior, like the one before us, comes into action trusting more to strength than to resolution; while he who voluntarily confronts tremendous odds must have very great internal resources to draw upon. For these reasons the Peloponnesians fear our irrational audacity more than they would ever have done a more commensurate preparation. Besides, many armaments have before now succumbed to an inferior through want of skill or sometimes of courage; neither of which defects certainly are ours. As to the battle, it shall not be, if I can help it, in the strait, nor will I sail in there at all; seeing that in a contest between a number of clumsily managed vessels and a small, fast, well-handled squadron, want of sea room is an

undoubted disadvantage. One cannot run down an enemy properly without having a sight of him a good way off, nor can one retire at need when pressed; one can neither break the line nor return upon his rear, the proper tactics for a fast sailer; but the naval action necessarily becomes a land one, in which numbers must decide the matter. For all this I will provide as far as can be. Do you stay at your posts by your ships, and be sharp at catching the word of command, the more so as we are observing one another from so short a distance; and in action think order and silence all-important—qualities useful in war generally, and in naval engagements in particular; and behave before the enemy in a manner worthy of your past exploits. The issues you will fight for are great—to destroy the naval hopes of the Peloponnesians or to bring nearer to the Athenians their fears for the sea. And I may once more remind you that you have defeated most of them already; and beaten men do not face a danger twice with the same determination."

"弟兄们：我知道，因为敌人数量众多，你们感到害怕。我把你们召集到一起，就是因为不希望你们畏惧不见得可怕的东西。首先，伯罗奔尼撒人已经在我们手里吃过败仗，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是我们的对手，所以才不敢与我们在同等条件下交战，而是配备了这么多艘战舰对付我们。其次，他们最依赖的东西，莫过于他们自认为与生俱来的勇气，但他们这种信心不过是从陆战的成功经验中得来的，他们还以为在海上也能奏效呢。但是，如果说他们在陆上具有这一优势，那么，在海上，这一优势自然属于我们。根据我们在海战方面的经验来看，他们并不比我们更勇敢，我们却个个比他们更有信心。另外，由于斯巴达人是在借助他们凌驾于盟友之上的霸权地位来增进自己的荣耀的，他们的盟友大多并不情愿被拖入危险之中。否则，在吃了这样一个败仗之后，他们绝不会再冒险来战了。因此，你们不必惧怕他们有多勇猛。相反，倒是他们更有理由畏惧你们，一是因为你们最近刚打败过他们，二是因为他们认为，若非稳操胜券，你们不会迎战他

们。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对手，如同我们面前这个一样，投入战斗时更多地依赖的是兵力，而不是决心；自愿面对数量上占巨大优势之敌者，依仗的必是巨大的内在力量。鉴于这些原因，与其说伯罗奔尼撒人怕我们进行相应的准备，不如说他们更怕我们肆意无畏。此外，以前也有不少军队败在劣势之敌手中，有时是因为欠缺技能，有时则是因为缺乏勇气，而这两样，我们一样都不缺。至于战斗，如果我能掌控，将不会发生在海峡中，我根本不会驶进那里。我知道，在与数量众多、操舰笨拙的敌军作战时，海面狭小对于舰数少、航速快、操舰熟练的舰队肯定不利。如果不能在一定距离之外观察到敌舰，就无法准确地将它撞沉，遭到围困时也不能在必要时退却；既不能冲破敌人的防线，也不能转到其尾部，而这些都是适于快舰采用的战术。否则，海战就会变成陆战，数量就成了决定的因素。我一定尽我所能，注意这些方面。你们在舰上一定要坚守岗位，注意听口令，由于敌我双方彼此都在很近的距离观察着对方的动静，所以更要注意。在行动中，要把保持秩序与肃静看作头等大事——这两点在任何战争中都很有用，在海战中尤其如此。在敌人面前，大家要表现得无愧于过去的英勇业绩。你们这次战斗的结局影响甚大——不是摧毁伯罗奔尼撒人在海上的希望，就是使雅典人的海上忧患更迫在眉睫。我想再次提醒大家，他们当中大多数都败给过你们，而战败的士兵是不会以同样的决心再次面对危险的。”

Such was the exhortation of Phormio. The Peloponnesians finding that the Athenians did not sail into the gulf and the narrows, in order to lead them in whether they wished it or not, put out at dawn, and forming four abreast, sailed inside the gulf in the direction of their own country, the right wing leading as they had lain at anchor. In this wing were placed twenty of their best sailers; so that in the event of Phormio thinking that their object was Naupactus, and coasting along thither to save the place, the Athenians might not be able to escape their onset by getting outside their wing, but might be cut off by the vessels in question. As they

expected, Phormio, in alarm for the place at that moment emptied of its garrison, as soon as he saw them put out, reluctantly and hurriedly embarked and sailed along shore; the Messenian land forces moving along also to support him. The Peloponnesians seeing him coasting along with his ships in single file, and by this inside the gulf and close inshore as they so much wished, at one signal tacked suddenly and bore down in line at their best speed on the Athenians, hoping to cut off the whole squadron. The eleven leading vessels, however, escaped the Peloponnesian wing and its sudden movement, and reached the more open water; but the rest were overtaken as they tried to run through, driven ashore and disabled; such of the crews being slain as had not swum out of them. Some of the ships the Peloponnesians lashed to their own, and towed off empty; one they took with the men in it; others were just being towed off, when they were saved by the Messenians dashing into the sea with their armour and fighting from the decks that they had boarded.

福尔米奥如此鼓励他的部下。伯罗奔尼撒人发现，雅典人并没有驶进海湾和狭窄的水域。可是，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伯罗奔尼撒人都要把他们引进去。因此，伯罗奔尼撒人黎明时分即起锚离岸，4艘舰只列成一排，朝着自己城邦的方向驶入海湾。行驶的次序和停泊时一样，仍是右翼在前，这一翼配置的是他们最好的20艘舰只。这样一来，如果福尔米奥真以为他们的目标是纳夫帕克图斯，并且沿着海岸驶到此处增援，雅典人就无法驶出右翼的防线，逃过他们的进攻，相反，他们会被这些舰只阻隔。正如他们所料，由于那个地方当时没有守军，福尔米奥果然很为那里担心。看到伯罗奔尼撒人启航，他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火速登舰，开始沿着海岸航行，麦西尼亚的陆军部队也随着他们向前移动，以作后援。看到他率舰成一列纵队沿着海岸航行，驶进海湾，而且距海岸非常近，正如他们所盼，信号一经发出，伯罗奔尼撒人突然来了个抢风调向，以最快的速度列队向雅典人

逼近，希望能将雅典舰队整个阻断。然而，前面的11艘战舰还是逃过了伯罗奔尼撒舰队此翼发起的突袭，驶进了比较开阔的水域。但是，其余舰只试图冲过去时，却被追上并逼到岸边，丧失了作战能力。舰上来不及逃走的人员都被杀掉了。伯罗奔尼撒人将一些舰只拴在自己的舰上，空着拖走了；有一条是连人带舰一起被拖走的；还有一些正要被拖走时，麦西尼亚人突然身穿盔甲跳进海中，登上甲板，与敌人展开搏斗，又将这些舰抢了回去。

Thus far victory was with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 fleet destroyed; the twenty ships in the right wing being meanwhile in chase of the eleven Athenian vessels that had escaped their sudden movement and reached the more open water. These, with the exception of one ship, all outsailed them and got safe into Naupactus, and forming close inshore opposite the temple of Apollo, with their prows facing the enemy, prepared to defend themselves in case the Peloponnesians should sail inshore against them. After a while the Peloponnesians came up, chanting the paean for their victory as they sailed on; the single Athenian ship remaining being chased by a Leucadian far ahead of the rest. But there happened to be a merchantman lying at anchor in the roadstead, which the Athenian ship found time to sail round, and struck the Leucadian in chase amidships and sank her. An exploit so sudden and unexpected produced a panic among the Peloponnesians; and having fallen out of order in the excitement of victory, some of them dropped their oars and stopped their way in order to let the main body come up—an unsafe thing to do considering how near they were to the enemy's prows; while others ran aground in the shallows, in their ignorance of the localities.

至此，胜利属于伯罗奔尼撒人，雅典的舰队被击溃了。这时候，

右翼那20艘战舰仍在追击逃过他们那个突转动作后，驶向较开阔水域的那11条雅典舰。雅典这些舰只，除一艘之外，速度都比他们的快，因而已安全驶入纳夫帕克图斯。它们在阿波罗神庙对面贴近海岸处排开，舰首朝向敌人，做好了自卫准备，以防伯罗奔尼撒人驶向岸边对他们发起攻击。没过多久，伯罗奔尼撒人出现了。他们一边向前行驶，一边高唱着胜利凯歌。莱夫卡斯的一条战舰远远超出其余战舰，正在追赶落在后面的那条雅典舰。但是，有条商船碰巧停泊在近岸锚地，那条雅典舰瞅准时机，绕着那条商船一转，朝着追它的那艘莱夫卡斯舰拦腰一撞，将它撞沉了。这一勇举发生得如此突然和意外，使得伯罗奔尼撒人大为恐慌。获胜后，他们兴奋得乱了套，有些人把桨都扔了，不再往前划，只等着大部队赶上来——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离敌舰的舰首很近；其他人则由于不辨方位，将舰只搁浅在了浅滩上。

Elated at this incident, the Athenians at one word gave a cheer, and dashed at the enemy, who, embarrassed by his mistakes and the disorder in which he found himself, only stood for an instant, and then fled for Panormus, whence he had put out. The Athenians following on his heels took the six vessels nearest them, and recovered those of their own which had been disabled close inshore and taken in tow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ction; they killed some of the crews and took some prisoners. On board the Leucadian which went down off the merchantman, was the Lacedaemonian Timocrates, who killed himself when the ship was sunk, and was cast up in the harbour of Naupactus. The Athenians on their return set up a trophy on the spot from which they had put out and turned the day, and picking up the wrecks and dead that were on their shore, gave back to the enemy their dead under truce. The Peloponnesians also set up a trophy as victors for the defeat inflicted upon the ships they had disabled in shore, and dedicated the vessel which they had taken at Achaean Rhium, side by side

with the trophy. After this, apprehensive of the reinforcement expected from Athens, all except the Leucadians sailed into the Crissaean Gulf for Corinth. Not long after their retreat, the twenty Athenian ships, which were to have joined Phormio before the battle, arrived at Naupactus?

雅典人见此大喜过望。随着一声令下，他们欢呼一声就向敌人猛冲过去。伯罗奔尼撒人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和陷入的混乱所迫，只抵挡了片刻，便朝自己的出航地帕诺尔穆斯逃去。雅典人紧追不舍，缴获了离他们最近的6艘战舰，收回了战斗开始时海岸近旁被破坏得失去了作战能力并被拖走的那些舰只。敌舰上的人有的被杀，有的当了俘虏。那艘莱夫卡斯舰在商船附近下沉时，斯巴达人蒂莫克拉泰斯就在那艘舰上。舰被撞沉时，他自杀了，尸体被冲进了纳夫帕克图斯港。雅典人一回来，随即在他们出航和反败为胜的地方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尔后收拾起自己岸旁的破舰残骸和尸体，按休战条件将敌军的尸体交还给了他们。伯罗奔尼撒人也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以纪念他们在岸旁破坏敌舰时所取得的胜利。他们还在胜利纪念柱旁将他们在亚该亚的里乌姆缴获的那艘战舰献给了神。完成这件事之后，因为担心预料之中的雅典援军将至，除了莱夫卡斯人之外，他们全部驶进了克里塞湾，尔后朝科林斯驶去。他们撤走后不久，本应在战斗之前就与福尔米奥会合的那20艘雅典舰抵达了纳夫帕克图斯。

Thus the summer ended. Winter was now at hand; but dispersing the fleet, which had retired to Corinth and the Crissaean Gulf, Cnemus, Brasidas, and the other Peloponnesian captains allowed themselves to be persuaded by the Megarians to make an attempt upon Piraeus, the port of Athens, which from her decided superiority at sea had been naturally left unguarded and open. Their plan was as follows: The men were each to take their oar, cushion, and rowlock thong, and, going overland from Corinth to

the sea on the Athenian side, to get to Megara as quickly as they could, and launching forty vessels, which happened to be in the docks at Nisaea, to sail at once to Piraeus. There was no fleet on the look-out in the harbour, and no one had the least idea of the enemy attempting a surprise; while an open attack would, it was thought, never be deliberately ventured on, or, if in contemplation, would be speedily known at Athens. Their plan formed, the next step was to put it in execution. Arriving by night and launching the vessels from Nisaea, they sailed, not to Piraeus as they had originally intended, being afraid of the risk, besides which there was some talk of a wind having stopped them, but to the point of Salamis that looks towards Megara; where there was a fort and a squadron of three ships to prevent anything sailing in or out of Megara. This fort they assaulted, and towed off the galleys empty, and surprising the inhabitants began to lay waste the rest of the island.

夏季就这样结束了，冬季即将到来。但是，在遣散已回到科林斯和克里塞湾的舰队时，克内穆斯、布拉西达斯和其他伯罗奔尼撒的舰长们采纳了迈加拉人的建议，打算去进攻雅典的港口比雷埃夫斯。由于雅典在海上明显具有优势，那个港口自然是开放的，没有设防。他们的计划是这样：每个人带着自己的桨、坐垫和桨架上的皮带，从科林斯经陆路赶往雅典一侧的海岸，抵达后尽快前往迈加拉，将正巧停泊在尼塞阿船坞内的40艘舰只推下水，然后立刻驶往比雷埃夫斯。港口内既没有舰队担任警戒，也没人想到敌人会发动突然袭击。人们认为，他们无意公开贸然进攻，否则，纵然他们的计划尚在谋划之中，照样会很快传到雅典那里。计划成形之后，下一步是付诸实施。夜间抵达尼塞阿并将舰只推下水后，一则怕有危险，二则因有风之说而受阻，他们没有按原计划驶往比雷埃夫斯，而是驶向了萨拉米斯面朝迈加拉的那个岬角——那里有一个堡垒和一支由3艘战舰组成的小舰队，以防有船进出迈加拉。他们袭击了这个堡垒，将那几艘舰只空着拖走了，随后对居民发动突袭，开始对该岛其余部分进行践踏。

Meanwhile, fire signals were raised to alarm Athens, and a panic ensued there as serious as any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war. The idea in the city was that the enemy had already sailed into Piraeus: in Piraeus it was thought that they had taken Salamis and might at any moment arrive in the port; as indeed might easily have been done if their hearts had been a little firmer: certainly no wind would have prevented them. As soon as day broke, the Athenians assembled in full force, launched their ships, and embarking in haste and uproar went with the fleet to Salamis, while their soldiery mounted guard in Piraeus. The Peloponnesians, on becoming aware of the coming relief, after they had overrun most of Salamis, hastily sailed off with their plunder and captives and the three ships from Fort Budorum to Nisaea; the state of their ships also causing them some anxiety, as it was a long while since they had been launched, and they were not water-tight. Arrived at Megara, they returned back on foot to Corinth. The Athenians finding them no longer at Salamis, sailed back themselves; and after this made arrangements for guarding Piraeus more diligently in future, by closing the harbours, and by other suitable precautions.

这时候，烽火信号燃起来，向雅典发出警报，雅典随即一片惊慌，严重程度不亚于这场战争中的任何一次。雅典城里的人以为敌人已经驶入比雷埃夫斯，比雷埃夫斯的人则以为敌人已经攻克萨拉米斯，并随时可能抵达港口。实际上，如果他们的信心再坚定一点，这倒并非难事，绝非风所能阻。天一破晓，雅典人将舰队全部召集起来，将舰只推下水，然后急忙登舰，率领舰队朝着萨拉米斯喧嚣而去。同时，他们的陆军也开始在比雷埃夫斯布岗。伯罗奔尼撒人侵扰了萨拉米斯的大部之后，听说对方的援军即将到来，赶紧带着他们的劫掠物和俘虏以及那3艘战舰从布佐鲁姆堡驶往尼塞阿。另外，他们战舰的状况也令他们有些担忧：这些战舰的下水时间已经不短了，而

且水密性差。抵达迈加拉后，雅典人徒步返回科林斯，他们发现敌人已不在萨拉米斯，自己也就回去了。这件事发生之后，他们对比雷埃夫斯今后的防卫工作做了更为周密的安排，关闭了港口，并采取了其他适当的预防措施。

About the same time,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inter, Sitalces, son of Teres, the Odrysian king of Thrace, made an expedition against Perdiccas, son of Alexander, king of Macedonia, and the Chalcidian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race; his object being to enforce one promise and fulfil another. On the one hand Perdiccas had made him a promise, when hard pressed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upon condition that Sitalces should reconcile the Athenians to him and not attempt to restore his brother and enemy, the pretender Philip, but had not offered to fulfil his engagement; on the other he, Sitalces, on entering into alliance with the Athenians, had agreed to put an end to the Chalcidian war in Thrace. These were the two objects of his invasion. With him he brought Amyntas, the son of Philip, whom he destined for the throne of Macedonia, and some Athenian envoys then at his court on this business, and Hagnon as general; for the Athenians were to join him against the Chalcidians with a fleet and as many soldiers as they could get together.

大约在同时，也就是这年冬季开始的时候，泰雷斯的儿子西塔尔塞斯，即色雷斯地区奥兹里夏人的国王，对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之子佩尔狄卡斯和色雷斯附近的哈尔基斯人发动了一次远征，目的是实现一个诺言，同时履行另外一个诺言。一方面，在战争之初，佩尔狄卡斯在处境艰难时曾对他许下一个诺言，条件是西塔尔塞斯促成雅典人与他和解，不再试图恢复其兄弟腓力的王位，因为这位王位觊觎者是他的敌手。但是，佩尔狄卡斯并没有表示要践约。另一方面，西塔尔

塞斯与雅典人结盟时，曾答应要终止哈尔基斯人在色雷斯的战争。这是他这次入侵的两个目的。他带在身边的有阿敏塔斯、雅典的一些使者和哈格农。阿敏塔斯是腓力的儿子，他打算将其扶上马其顿的王位，雅典的使者当时也是为这事到他宫里去的。因为雅典人要派一支舰队和尽可能多的士兵来协助他对抗哈尔基斯人，所以他也将哈格农作为将军带去了。

Beginning with the Odrysians, he first called out the Thracian tribes subject to him between Mounts Haemus and Rhodope and the Euxine and Hellespont; next the Getae beyond Haemus, and the other hordes settled south of the Danube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Euxine, who, like the Getae, border on the Scythians and are armed in the same manner, being all mounted archers. Besides these he summoned many of the hill Thracian independent swordsmen, called Dii and mostly inhabiting Mount Rhodope, some of whom came as mercenaries, others as volunteers; also the Agrianes and Laeaeans, and the rest of the Paeonian tribes in his empire, at the confines of which these lay, extending up to the Laeaean Paeonians and the river Strymon, which flows from Mount Scombrus through the country of the Agrianes and Laeaeans; there the empire of Sitalces ends and the territory of the independent Paeonians begins. Bordering on the Triballi, also independent, were the Treres and Tilataeans, who dwell to the north of Mount Scombrus and extend towards the setting sun as far as the river Oskius. This river rises in the same mountains as the Nestus and Hebrus, a wild and extensive range connected with Rhodope.

他从奥兹里夏人开始，首先召集了海穆斯山与罗多彼山之间和黑海与赫勒斯滂海峡之间臣服于他的色雷斯部族，接着召集了海穆斯山脉那边的耶泰人以及在黑海附近多瑙河以南定居的其他游牧部族。这

些部族和耶泰人一样，都与西徐亚人为邻，而且装备也相同，全是骑箭兵队。除了这些人以外，他还从色雷斯山区召集了不少自由武士。他们被称为迪伊人，大部分居住在罗多彼山，有些是作为雇佣军来的，其余是作为志愿者来的。另外还有阿格里亚人、莱阿人以及他那个帝国的其他培奥尼亚部族。这些部族都住在他那个帝国的边界地带，一直延伸到莱阿的培奥尼亚人居住地和斯特鲁马河。这条河源自斯科姆夫鲁斯山，流经阿格里亚人和莱阿人的土地，那里是西塔尔塞斯那个帝国的终点，也是独立的培奥尼亚人所拥有领土的起点。与同样独立的特里巴利人为邻的是特雷雷人和蒂拉泰阿人。他们居住在斯科姆夫鲁斯山的北面，向西延伸到奥斯基乌斯河。这条河与内斯图斯河和海夫鲁斯河发源于同一条山脉。这条山脉荒凉而绵长，与罗多彼山脉相接。

The empire of the Odrysians extended along the seaboard from Abdera to the mouth of the Danube in the Euxine. The navigation of this coast by the shortest route takes a merchantman four days and four nights with a wind astern the whole way; by land an active man, travelling by the shortest road, can get from Abdera to the Danube in eleven days. Such was the length of its coast line. Inland from Byzantium to the Laeaeans and the Strymon, the farthest limit of its extension into the interior, it is a journey of thirteen days for an active man. The tribute from all the barbarian districts and the Hellenic cities, taking what they brought in under Seuthes, the successor of Sitalces, who raised it to its greatest height, amounted to about four hundred talents in gold and silver. There were also presents in gold and silver to a no less amount, besides stuff, plain and embroidered, and other articles, made not only for the king, but also for the Odrysian lords and nobles. For there was here established a custom opposite to that prevailing in the Persian kingdom, namely, of taking rather than giving; more disgrace being attached to not giving when asked than to asking and being refused;

and although this prevailed elsewhere in Thrace, it was practised most extensively among the powerful Odrysians, it being impossible to get anything done without a present. It was thus a very powerful kingdom; in revenue and general prosperity surpassing all in Europe between the Ionian Gulf and the Euxine, and in numbers and military resources coming decidedly next to the Scythians, with whom indeed no people in Europe can bear comparison, there not being even in Asia any nation singly a match for them if unanimous, though of course they are not on a level with other races in general intelligence and the arts of civilized life.

奥兹里夏人的帝国沿着海岸从阿夫季拉延伸到黑海多瑙河口。商船如果沿着海岸航行，即便选择最短的航线，在全程都是顺风的情况下也需四天四夜的时间；如果走陆路，脚程快的人沿最短路线从阿夫季拉走到多瑙河，则需要十一天的时间。这是它的海岸线长度。如果往内陆走，从拜占庭到莱阿人的居住地和斯特鲁马河，即内陆离海最远的地方，脚程快的人得走十三天。所有这些蛮族地区和希腊城市缴纳的贡金，以西塔尔塞斯的继承人塞夫塞斯（他将贡金额度提到最高）统治时期所收取的为例，总共约为金银400塔兰特。除了普通织物和绣花织物及其他东西之外，作为礼物奉献的金银也不低于这个数，而且不仅要给国王送，还要给奥兹里夏的达官显贵送。这是因为这里确立的风俗与波斯王国所流行的全然不同。换句话说，他们崇尚的是索取，而不是给予。如果有人要求你给他什么你不给，比你要什么但被拒绝了更没面子。色雷斯其他地方虽然也流行这种风俗，但在势力强大的奥兹里夏人当中最为广泛。如果不送礼，任何事都办不成。因此，这个王国变得非常强大。在收入和普遍繁荣方面，它超过了爱奥尼亚与黑海之间的所有欧洲国家；在人数和军事资源方面，无疑仅居西徐亚人之后。事实上，欧洲没有哪个民族堪与西徐亚人相比。即便是在亚细亚，西徐亚人若联合起来，也没有哪个民族能单独与之匹敌。当然，在一般智力和文明生活的诸多技艺方面，他们与其他民族不在同一水准。

It was the master of this empire that now prepared to take the field. When everything was ready, he set out on his march for Macedonia, first through his own dominions, next over the desolate range of Cercine that divides the Sintians and Paeonians, crossing by a road which he had made by felling the timber on a former campaign against the latter people. Passing over these mountains, with the Paeonians on his right and the Sintians and Maedians on the left, he finally arrived at Doberus, in Paeonia, losing none of his army on the march, except perhaps by sickness, but receiving some augmentations, many of the independent Thracians volunteering to join him in the hope of plunder; so that the whole is said to have formed a grand total of a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Most of this was infantry, though there was about a third cavalry, furnished principally by the Odrysians themselves and next to them by the Getae. The most warlike of the infantry were the independent swordsmen who came down from Rhodope; the rest of the mixed multitude that followed him being chiefly formidable by their numbers.

这时准备作战的，正是这一帝国的主人。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开始向马其顿进军。他先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行进，继而开始翻越荒凉的凯尔西内山脉。这条山脉是辛蒂亚人与培奥尼亚人之间的边界，他翻山时走的是他以前与培奥尼亚人打仗时砍倒林木开出来的一条路。在左有辛蒂亚人和迈贾人，右有培奥尼亚人的情况下，他们翻过这些山，最终抵达了培奥尼亚的多韦鲁斯。在行军途中，除了因病而亡者无一减员，反而略有增加。不少独立的色雷斯人志愿加入他的队伍，希望能有劫掠的机会。这样，整个队伍的总数据说达到了15万人。尽管有三分之一的骑兵，这支军队大部分是步兵，主要来源是奥兹里夏人自己，其次是耶泰人。步兵中最骁勇善战的是从罗多彼山来的那些自由武士，其余跟随他的各色人等之所以令人生畏，主要是因为他们

人数众多。

Assembling in Doberus, they prepared for descending from the heights upon Lower Macedonia, where the dominions of Perdiccas lay; for the Lyncestae, Elimiots, and other tribes more inland, though Macedonians by blood, and allies and dependants of their kindred, still have their own separate governments. The country on the sea coast, now called Macedonia, was first acquired by Alexander, the father of Perdiccas, and his ancestors, originally Temenids from Argos. This was effected by the expulsion from Pieria of the Pierians, who afterwards inhabited Phagres and other places under Mount Pangaeus, beyond the Strymon (indeed, the country between Pangaeus and the sea is still called the Pierian Gulf); of the Bottiaeans, at present neighbours of the Chalcidians, from Bottia, and by the acquisition in Paeonia of a narrow strip along the river Axius extending to Pella and the sea; the district of Mygdonia, between the Axius and the Strymon, being also added by the expulsion of the Edonians. From Eordia also were driven the Eordians, most of whom perished, though a few of them still live round Physca, and the Almopians from Almopia. These Macedonians also conquered places belonging to the other tribes, which are still theirs—Anthemus, Crestonia, Bisaltia, and much of Macedonia proper. The whole is now called Macedonia, and at the time of the invasion of Sitalces, Perdiccas, Alexander's son, was the reigning king.

他们在多韦鲁斯集合，准备从山上下去侵袭佩尔狄卡斯统治范围内的下马其顿。利恩塞斯泰人、埃利米奥特人以及其他比较靠近内陆的部族，在血统上虽然属于马其顿人，同时也是他们的盟友和依附者，但仍各有自己的政府。海岸上当时称为马其顿的地区，最初是佩

尔狄卡斯的父亲亚历山大和他的先祖们获取的，他们原先是来自阿尔戈斯的泰迈尼德人。他们将皮埃里亚人逐出了皮埃里亚，后者后来定居到了法格雷斯和潘耶夫斯山下的其他地方，地点在斯特鲁马河的另一边（实际上，潘耶夫斯山到大海之间这一带如今仍被称为皮埃里亚湾）；他们还将博蒂亚人（目前与哈尔基斯人比邻而居）赶出了博蒂亚，在培奥尼亚沿阿克西乌斯河获取了一块狭长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培拉和海边；阿克西乌斯河与斯特鲁马河之间的米格佐尼亚地区，也是他们赶走埃佐尼亚人之后加在自己版图上的。他们还将埃奥尔贾人赶出了埃奥尔贾，其中虽有少数仍住在菲斯卡周围，但大部分均已丧生。另外，他们还从阿尔莫皮亚赶走了阿尔莫皮亚人。这些马其顿人还征服了属于其他部族的一些地方——安塞穆斯、克雷斯托尼亚、比萨尔蒂亚以及马其顿的大部。这些地方目前仍归他们所有。整个地区现在统称为马其顿。西塔尔塞斯入侵时，在位的国王是亚历山大之子佩尔狄卡斯。

These Macedonians, unable to take the field against so numerous invaders, shut themselves up in such strong places and fortresses as the country possessed. Of these there was no great number, most of those now found in the country having been erected subsequently by Archelaus, the son of Perdiccas, on his accession, who also cut straight roads, and otherwise put the kingdom on a better footing as regards horses, heavy infantry, and other war material than had been done by all the eight kings that preceded him. Advancing from Doberus, the Thracian host first invaded what had been once Philip's government, and took Idomene by assault, Gortynia, Atalanta, and some other places by negotiation, these last coming over for love of Philip's son, Amyntas, then with Sitalces. Laying siege to Europus, and failing to take it, he next advanced into the rest of Macedonia to the left of Pella and Cyrrhus, not proceeding beyond this into Bottiaea and Pieria, but staying to lay waste Mygdonia, Crestonia, and

Anthemus.

由于无法抵御人数如此庞大的侵略军，这些马其顿人退进了该地区拥有的各个据点和要塞。这种地方数量并不太多，如今仍然可见的大多是后来佩尔狄卡斯的儿子阿基劳斯登基时修筑的。阿基劳斯还修了直达路，而且在骑兵、重步兵和其他战争物资等方面，他以另一种方式为马其顿王国打下的基础之坚实，超过了他之前的所有八个国王。那位色雷斯的主人从多韦鲁斯出发后，首先入侵了曾经属于腓力的地区，袭取了伊佐迈内，通过谈判获取了格尔蒂尼亚、阿塔兰塔和其他一些地方。后面这几处是出于对腓力之子阿敏塔斯的爱戴而投奔他的，当时阿敏塔斯就在西塔尔塞斯身边。他围攻了欧罗普斯，但没有攻下来，尔后他挺进到马其顿以西地区，即培拉和基尔胡斯，不过没有继续前进至博蒂亚和皮埃里亚，而是留下来践踏了米格佐尼亚、克雷斯托尼亚和安塞穆斯。

The Macedonians never even thought of meeting him with infantry; but the Thracian host was, as opportunity offered, attacked by handfuls of their horse, which had been reinforced from their allies in the interior. Armed with cuirasses, and excellent horsemen, wherever these charged they overthrew all before them, but ran considerable risk in entangling themselves in the masses of the enemy, and so finally desisted from these efforts, deciding that they were not strong enough to venture against numbers so superior.

马其顿人连想都没想过要用步兵迎击这位色雷斯之主，而是一遇机会就用少数骑兵袭击他。这些骑兵是内地盟友派来增援马其顿人的。他们身穿胸甲，骑术精湛，每逢发起冲锋，都可将面前所有人冲翻在地。不过，一旦卷进大队敌军之中，他们就要冒相当大的危险，

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进攻。他们觉得，以自己的兵力不足以与人数上如此占优势之敌贸然相抗。

Meanwhile, Sitalces opened negotiations with Perdiccas on the objects of his expedition; and finding that the Athenians, not believing that he would come, did not appear with their fleet, though they sent presents and envoys, dispatched a large part of his army against the Chalcidians and Bottiaeans, and shutting them up inside their walls laid waste their country. While he remained in these parts, the people farther south, such as the Thessalians, Magnetes, and the other tribes subject to the Thessalians, and the Hellenes as far as Thermopylae, all feared that the army might advance against them, and prepared accordingly. These fears were shared by the Thracians beyond the Strymon to the north, who inhabited the plains, such as the Panaeans, the Odomanti, the Droi, and the Dersaeans, all of whom are independent. It was even matter of conversation among the Hellenes who were enemies of Athens whether he might not be invited by his ally to advance also against them. Meanwhile, he held Chalcidice and Bottica, and Macedonia, and was ravaging them all; but finding that he was not succeeding in any of the objects of his invasion, and that his army was without provisions and was suffering from the severity of the season, he listened to the advice of Seuthes, son of Spardacus, his nephew and highest officer, and decided to retreat without delay. This Seuthes had been secretly gained by Perdiccas by the promise of his sister in marriage with a rich dowry.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dvice, and after a stay of thirty days in all, eight of which were spent in Chalcidice, he retired home as quickly as he could; and Perdiccas afterwards gave his sister Stratonice to Seuthes as he had promised. Such was the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of Sitalces.

与此同时，西塔尔塞斯开始与佩尔狄卡斯就其远征的目的开始谈判。他发现，雅典人不相信他会出兵。他们虽然派使节送来了礼物，但没有带舰队前来。于是，他派出一大部分军队去进攻哈尔基斯人和博蒂亚人，迫使他们退入城内，践踏了他们的土地。西塔尔塞斯在这些地区逗留期间，居住在更南部的人，如色萨利人、马格尼西亚人、臣服于色萨利人的其他部族以及远至温泉关的希腊人，全都担心这支军队向他们进军，所以都做了准备。斯特鲁马河以北的色雷斯人同样有此担忧，他们居住在平原地带，全都是独立部族，如帕内人、奥佐曼蒂人、德里人和德尔塞人。就连与雅典为敌的希腊人也在议论，不知他是否会应他的盟友之邀，同样向他们发起进攻。在此期间，他一直在哈尔基季基、博蒂卡和马其顿，践踏着所有这些地区。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入侵的目的一个也没达到，而他的军队却饱受缺粮和严寒之苦时，他便采纳了他侄子塞夫塞斯（斯帕尔达库斯之子，他手下的高级军官）的建议，决定立即撤退。这位塞夫塞斯其实已被佩尔狄卡斯私下拉拢过去了，后者许诺让妹妹带着丰厚的嫁妆嫁给他。西塔尔塞斯按照塞夫塞斯这一建议迅速撤回本国去了。这次出兵前后共计三十天，其中八天在哈尔基季基。佩尔狄卡斯后来如约将自己的妹妹斯特拉托尼塞嫁给了塞夫塞斯。西塔尔塞斯这次远征的情况即如上所述。

In the course of this winter, after the dispersion of the Peloponnesian fleet, the Athenians in Naupactus, under Phormio, coasted along to Astacus and disembarked, and marched into the interior of Acarnania with four hundred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and four hundred Messenians. After expelling some suspected persons from Stratus, Coronta, and other places, and restoring Cynes, son of Theolytus, to Coronta, they returned to their ships, deciding that it was impossible in the winter season to march against Oeniadae, a place which, unlike the rest of Acarnania, had been always hostile to them; for the river Achelous flowing from Mount Pindus through Dolopia and the country of the Agraeans and

Amphilochians and the plain of Acarnania, past the town of Stratus in the upper part of its course, forms lakes where it falls into the sea round Oeniadae, and thus makes it impracticable for an army in winter by reason of the water. Opposite to Oeniadae lie most of the islands called Echinades, so close to the mouths of the Achelous that that powerful stream is constantly forming deposits against them, and has already joined some of the islands to the continent, and seems likely in no long while to do the same with the rest. For the current is strong, deep, and turbid, and the islands are so thick together that they serve to imprison the alluvial deposit and prevent its dispersing, lying, as they do, not in one line, but irregularly, so as to leave no direct passage for the water into the open sea. The islands in question are uninhabited and of no great size. There is also a story that Alcmaeon, son of Amphiraus, during his wanderings after the murder of his mother was bidden by Apollo to inhabit this spot, through an oracle which intimated that he would have no release from his terrors until he should find a country to dwell in which had not been seen by the sun, or existed as land at the time he slew his mother; all else being to him polluted ground. Perplexed at this, the story goes on to say, he at last observed this deposit of the Achelous, and considered that a place sufficient to support life upon, might have been thrown up during the long interval that had elapsed since the death of his mother and the beginning of his wanderings. Settling, therefore, in the district round Oeniadae, he founded a dominion, and left the country its name from his son Acarnan. Such is the story we have received concerning Alcmaeon.

在这年冬季期间，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解散后，纳夫帕克图斯的雅典人在福尔米奥的率领下，沿着海岸航行到阿斯塔库斯。他带着400名雅典重步兵和400名麦西尼亚人登陆上岸，开进了阿卡纳尼亚

的腹地。他们从斯特拉图斯、科龙塔和其他地方驱逐了一些可疑的人，帮助塞奥利图斯的儿子基内斯重新回到科龙塔，尔后返回舰上。他们认为，在冬季是不可能向伊尼阿泽进军的，那个地方与阿卡纳尼亚其他地方不同，一直对他们怀有敌意。阿谢洛奥斯河从品都斯山流出，流经多洛皮亚、阿格雷阿人与安菲洛希亚人居住的地区以及阿卡纳尼亚平原，其上游经过斯特拉图斯城，在伊尼阿泽附近注入大海，并在那里形成了许多湖泊。由于河水之故，军队在冬季根本无法行动。被称为埃希纳泽斯群岛的大部分岛屿都在伊尼阿泽对面，与阿谢洛奥斯河的河口相距很近。强有力的水流不断冲积带来泥沙，已经使其中一些岛屿与大陆相连，似乎不久之后还有可能使其他岛屿同样与大陆连接起来。由于水流又急又深，而且十分浑浊，这些岛屿又密集地聚在一起，冲积物淤塞河道排不出去，这些岛屿实际上并非成一条直线，而是排列得很不规则，所以没有一条笔直的水道供河水流入大海。这些岛屿无人居住，而且面积都不大。另据传说，安菲拉夫斯的儿子阿尔克迈翁弑母之后到处流浪，阿波罗通过一个神谕吩咐他住在这个地方。神谕上明确说，除非找到一处弑母时未被太阳见到或尚非陆地的地方居住，否则他就不能从恐怖中解脱出来。其他所有地方对他来说都是被玷污的土地。传说中还说，起初他不知所措，最后注意到了阿谢洛奥斯河这片冲积地。他认为，自从母亲死后到他流浪至此，其间已经过去很长时间，那里可能已经形成足以维持生活的土地了。于是，他在伊尼阿泽附近定居下来，建立了一块领地，以他儿子阿卡尔南的名字命名了这一地区。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有关阿尔克迈翁的传说。

The Athenians and Phormio putting back from Acarnania and arriving at Naupactus, sailed home to Athens in the spring, taking with them the ships that they had captured, and such of the prisoners made in the late actions as were freemen; who were exchanged, man for man. And so ended this winter, and the third year of this war, of which Thucydides was the historian.

福尔米奥率领的雅典人从阿卡纳尼亚返航后，首先来到纳夫帕克图斯。到了春天，他们才启航返回雅典，同时带走了他们缴获的舰只和新近几次行动中俘虏的自由民。这些人后来都一对一地交换了。这个冬季就这样结束了。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三年亦到此为止。

BOOK III

第三卷

CHAPTER IX Fourth and Fifth Years of the War—Revolt of Mitylene

第九章　战争第四年和第五年——米蒂利尼的反叛

The next summer, just as the corn was getting ripe,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ir allies invaded Attica under the command of Archidamus, son of Zeuxidamus, king of the Lacedaemonians, and sat down and ravaged the land; the Athenian horse as usual attacking them, wherever it was practicable, and preventing the mass of the light troops from advancing from their camp and wasting the parts near the city. After staying the time for which they had taken provisions, the invaders retired and dispersed to their several cities.

翌年夏季，正当麦熟时节，伯罗奔尼撒人及其盟友在斯巴达国王（宙克西扎穆斯之子）阿希达穆斯的率领下入侵了阿提卡。他们扎下营盘，践踏了那里的土地。雅典的骑兵如往常一样，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发动袭击，以阻止大批轻步兵离开营地去践踏雅典城附近的区域。入侵的军队逗留到他们所带的给养耗光才撤离，分别回到各自的城邦。

Immediately after the invasion of the Peloponnesians, all Lesbos, except Methymna, revolted from the Athenians. The Lesbians had wished to revolt even before the war, but the Lacedaemonians would not receive them; and yet now when they

did revolt, they were compelled to do so sooner than they had intended. While they were waiting until the moles for their harbours and the ships and walls that they had in building should be finished, and for the arrival of archers and corn and other things that they were engaged in fetching from the Pontus, the Tenedians, with whom they were at enmity, and the Methymnians, and some factious persons in Mitylene itself, who were proxeni of Athens, informed the Athenians that the Mitylenians were forcibly uniting the island under their sovereignty, and that the preparations about which they were so active, were all concerted with the Boeotians their kindred and the Lacedaemonians with a view to a revolt, and that, unless they were immediately prevented, Athens would lose Lesbos.

伯罗奔尼撒人这次入侵刚结束，整个莱斯沃斯岛，除了迈西姆纳之外，就全都叛离了雅典人。莱斯沃斯人早在战争之前就想叛离，但斯巴达人不肯接纳他们。现在既已反叛，他们也只好比原计划提前这样做了。他们本想等到港口的防波堤筑好，战舰造完，城墙竣工，弓箭手到位，要从本都运来的谷物及其他物资也全部运到时再行动。但是，与他们不和的泰内佐斯人、迈西姆纳人以及米蒂利尼城里某些为雅典充当代理人的分裂分子却对雅典人说，米蒂利尼人正在强行将全岛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如此积极进行的各项准备都是与其同族维奥蒂亚人和斯巴达人共同谋划的，目的是为了叛离雅典；若不及时加以制止，雅典将会失去莱斯沃斯。

However, the Athenians, distressed by the plague, and by the war that had recently broken out and was now raging, thought it a serious matter to add Lesbos with its fleet and untouched resources to the list of their enemies; and at first would not believe the charge, giving too much weight to their wish that it might not be

true. But when an embassy which they sent had failed to persuade the Mitylenians to give up the union and preparations complained of, they became alarmed, and resolved to strike the first blow. They accordingly suddenly sent off forty ships that had been got ready to sail round Peloponnese, under the command of Cleippides, son of Deinias, and two others; word having been brought them of a festival in honour of the Malean Apollo outside the town, which is kept by the whole people of Mitylene, and at which, if haste were made, they might hope to take them by surprise. If this plan succeeded, well and good; if not, they were to order the Mitylenians to deliver up their ships and to pull down their walls, and if they did not obey, to declare war. The ships accordingly set out; the ten galleys, forming the contingent of the Mitylenians present with the fleet according to the terms of the alliance, being detained by the Athenians, and their crews placed in custody. However, the Mitylenians were informed of the expedition by a man who crossed from Athens to Euboea, and going overland to Geraestus, sailed from thence by a merchantman which he found on the point of putting to sea, and so arrived at Mitylene the third day after leaving Athens. The Mitylenians accordingly refrained from going out to the temple at Malea, and moreover barricaded and kept guard round the half-finished parts of their walls and harbours.

然而，新近爆发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遭受着瘟疫和战争双重折磨的雅典人认为，莱斯沃斯如果再加入敌人的行列，可谓兹事体大，因为莱斯沃斯不仅拥有自己的舰队，它的资源也未曾遭到过破坏。由于过于希望此事非真，他们起初不肯相信那些人所言属实。但是，当他们派去的特使未能说服米蒂利尼人放弃统一全岛的想法和遭怨的种种准备时，他们惊慌起来，决定先发制人。于是，他们突然派出了40艘舰，这些舰原来是准备驶往伯罗奔尼撒周围的，指挥官是迪尼亚斯之子克利皮泽斯和另外两人。他们得到消息说，米蒂利尼城外要举行

一个纪念马莱阿的阿波罗的节日盛会，全城的人都要参加。如果抓紧时间赶过去，说不定能在那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一计划若能成功，那就更好。如否，他们准备命令米蒂利尼人交出舰只，拆除城墙。对方若是不从，那就宣战。于是，这些舰就出发了。按照同盟条约，米蒂利尼人在舰队中本该有一支由10艘战舰组成的分遣队。雅典人将这10艘舰扣留下来，舰上的人员也被拘留了。然而，有一个人将雅典舰队出征的消息告诉了米蒂利尼人。这个人从雅典渡海到埃维亚岛，经陆路到耶雷斯图斯，发现有条船正准备出海，就从那里上了船，在离开雅典之后的第三天抵达了米蒂利尼。因此，米蒂利尼人不但没有出城去马莱阿的神庙，而且还在未完工的城墙和港口周围设置了路障和岗哨。

When the Athenians sailed in not long after and saw how things stood, the generals delivered their orders, and upon the Mitylenians refusing to obey, commenced hostilities. The Mitylenians, thus compelled to go to war without notice and unprepared, at first sailed out with their fleet and made some show of fighting, a little in front of the harbour; but being driven back by the Athenian ships, immediately offered to treat with the commanders, wishing, if possible, to get the ships away for the present upon any tolerable terms. The Athenian commanders accepted their offers, being themselves fearful that they might not be able to cope with the whole of Lesbos; and an armistice having been concluded, the Mitylenians sent to Athens one of the informers, already repentant of his conduct, and others with him, to try to persuade the Athenians of the innocence of their intentions and to get the fleet recalled. In the meantime, having no great hope of a favourable answer from Athens, they also sent off a galley with envoys to Lacedaemon, unobserved by the Athenian fleet which was anchored at Malea to the north of the town.

不久之后，雅典人的舰队到了，几位将军一看是这种情况，径直发出了命令。米蒂利尼人刚一做出拒绝服从的表示，他们就对其开始了敌对行动。米蒂利尼人就这样突然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投入了战争。起初他们还率舰队驶出，在港口前面不远处摆出要作战的架势。但是，被雅典人的战舰逼退后，他们立即提出要与雅典的指挥官进行谈判。如果可能，他们希望能在可以容忍的条件下使雅典的战舰暂且撤离。雅典的指挥官们也担心自己无法对付整个莱斯沃斯岛，所以就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双方议定停战后，米蒂利尼人派出一名告密者（已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意）前往雅典，另外还派了其他一些人与他同行，试图说服雅典人相信他们并无不良企图，并劝他们把舰队召回去。在这期间，由于对雅典给予有利的答复不抱太大的希望，米蒂利尼人避开停泊在该城北面马莱阿处的雅典舰队，另派出一条三列桨战舰载着使者前往斯巴达。

While these envoys, reaching Lacedaemon after a difficult journey across the open sea, were negotiating for succours being sent them, the ambassadors from Athens returned without having effected anything; and hostilities were at once begun by the Mitylenians and the rest of Lesbo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Methymnians, who came to the aid of the Athenians with the Imbrians and Lemnians and some few of the other allies. The Mitylenians made a sortie with all their forces against the Athenian camp; and a battle ensued, in which they gained some slight advantage, but retired notwithstanding, not feeling sufficient 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to spend the night upon the field. After this, they kept quiet, wishing to wait for the chance of reinforcements arriving from Peloponnese before making a second venture, being encouraged by the arrival of Meleas, a Laconian, and Hermaeondas, a Theban, who had been sent off before the insurrection but had been unable to reach Lesbos before the Athenian expedition, and who now stole in in a galley after the

battle, and advised them to send another galley and envoys back with them, which the Mitylenians accordingly did.

经过艰难的海上之旅，这些使者来到了斯巴达。正当他们就派遣援军问题进行交涉时，派往雅典的使者一无所获地回来了。米蒂利尼人和莱斯沃斯岛上的其他人立即与雅典展开敌对行动，只有迈西姆纳人除外。他们与伊姆布罗斯人、利利姆诺斯人以及其他少数盟友一起去帮助雅典人了。米蒂利尼人倾全军之力向雅典人的营地发起突击，战斗随即发生。米蒂利尼人在战斗中稍占优势，但他们对自己能否冒险露营战场没有足够的信心，因而退回城里去了。此战之后，他们一直按兵不动，希望能有幸等到伯罗奔尼撒派来援军，尔后再二度出击。这种希望的燃起，与两个人的到来不无关系。一个是拉科尼亚人迈莱阿斯，另一个是底比斯人赫尔迈翁扎斯。这两人在起义爆发前就被派出来了，但他们尚未抵达莱斯沃斯，雅典的远征军就到了。这时，在交战之后，他们乘着一条三列桨战舰偷偷溜了进来，建议米蒂利亚人再派一艘战舰和一些使者与他们一同回去。米蒂利亚人照他们的话做了。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greatly encouraged by the inaction of the Mitylenians, summoned allies to their aid, who came in all the quicker from seeing so little vigour displayed by the Lesbians, and bringing round their ships to a new station to the south of the town, fortified two camps, one on each side of the city, and instituted a blockade of both the harbours. The sea was thus closed against the Mitylenians, who, however, commanded the whole country, with the rest of the Lesbians who had now joined them; the Athenians only holding a limited area round their camps, and using Malea more as the station for their ships and their market.

与此同时，由于米蒂利亚人没有积极采取行动，雅典人信心大增，赶紧召集盟友前来相助。看到莱斯沃斯人这么缺乏气势，那些盟友来得更快了。他们把舰只泊在城南，修筑了两座营地，城两旁一边一个，而且把两个港口都封锁了。这样，他们就封锁了米蒂利尼人通往海上的通道。然而，由于其他莱斯沃斯人这时已来相助，整个地区仍在米蒂利尼人的控制之中。雅典人仅控制着他们营地周围有限的区域，马莱阿主要被他们用作市场和泊船之地。

While the war went on in this way at Mitylene, the Athenians, about the same time, in this summer, also sent thirty ships to Peloponnese under Asopius, son of Phormio; the Acarnanians insisting that the commander sent should be some son or relative of Phormio. As the ships coasted along shore they ravaged the seaboard of Laconia; after which Asopius sent most of the fleet home, and himself went on with twelve vessels to Naupactus, and afterwards raising the whole Acarnanian population made an expedition against Oeniadae, the fleet sailing along the Achelous, while the army laid waste the country. The inhabitants, however, showing no signs of submitting, he dismissed the land forces and himself sailed to Leucas, and making a descent upon Nericus was cut off during his retreat, and most of his troops with him, by the people in those parts aided by some coastguards; after which the Athenians sailed away, recovering their dead from the Leucadians under truce.

当战争在米蒂利尼这样进行时，大约在这年夏季同一时候，雅典人还派了福尔米奥之子阿索皮乌斯率30艘战舰奔赴伯罗奔尼撒。因为阿卡纳尼亚人坚持要求，派去的指挥官必须是福尔米奥的儿子或亲戚。这些战舰一边沿着海岸航行，一边践踏拉科尼亚的沿海地区。其后，阿索皮乌斯打发大多数舰只返回雅典，他自己带着12艘战舰驶向

纳夫帕克图斯。后来，他发动所有阿卡纳尼亚人远征伊尼阿泽。舰队沿阿谢洛奥斯河行驶，陆军破坏沿途乡村。然而，这一带的居民并没有屈服的表示。阿索皮乌斯就遣散陆军部队，自己率舰驶往莱夫卡斯岛，在内里库斯上了岸。从内里库斯回撤时，那部分地区的人民在一些海岸巡逻队员的协助下，将他和他的大部分部下都杀死了。后来，雅典人在休战期间从莱夫卡斯人那里收回阵亡者的尸体，乘舰离开了那里。

Meanwhile, the envoys of the Mitylenians sent out in the first ship were told by the Lacedaemonians to come to Olympia, in order that the rest of the allies might hear them and decide upon their matter, and so they journeyed thither. It was the Olympiad in which the Rhodian Dorieus gained his second victory, and the envoys having been introduced to make their speech after the festival, spoke as follows:

在此期间，斯巴达人告诉米蒂利尼人派出的第一条舰只上的使者，他们可以前往奥林匹亚，让其他盟友也听一听他们的事情，然后再做出决定，所以他们就去了那里。这是罗得岛的多里埃夫斯第二次获胜的那个奥利匹克运动会。庆祝活动结束后，使者们被带进会场，作了如下发言：

“Lacedaemonians and allies, the rule established among the Hellenes is not unknown to us. Those who revolt in war and forsake their former confederacy are favourably regarded by those who receive them, in so far as they are of use to them, but otherwise are thought less well of, through being considered traitors to their former friends. Nor is this an unfair way of judging, where the rebels and the power from whom they secede are at one in policy

and sympathy, and a match for each other in resources and power, and where no reasonable ground exists for the rebellion. But with us and the Athenians this was not the case; and no one need think the worse of us for revolting from them in danger, after having been honoured by them in time of peace.”

“斯巴达人和盟友们：我们不是不知道希腊人的成规惯例。在战争期间起义和脱离自己先前所属同盟的人，只要对接纳他们入盟的人有益，就会得到接纳他们入盟的人的赞扬。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却不会受到如此好评，因为人们认为他们背弃了以前的朋友。如果起义者和他们所脱离的势力在政策上和情感上是一致的，在资源上和实力上也彼此对等；如果不存在发动起义的正当理由，那么，这种判断方式也不可谓不公。但是，我们与雅典人之间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的确是在和平时期受到过他们的尊重后，在危险时期叛离了他们，可是大家不必因此对我们印象更差。”

“Justice and honesty will be the first topics of our speech, especially as we are asking for alliance;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re can never be any solid friend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or union between communities that is worth the name, unless the parties be persuaded of each other's honesty, and be generally congenial the one to the other; since from difference in feeling springs also difference in conduct. Between ourselves and the Athenians alliance began, when you withdrew from the Median War and they remained to finish the business. But we did not become allies of the Athenians for the subjugation of the Hellenes, but allies of the Hellenes for their liberation from the Mede; and as long as the Athenians led us fairly we followed them loyally; but when we saw them relax their hostility to the Mede, to try to compass the subjection of the allies, then our apprehensions began. Unable,

however, to unite and defend themselves, on account of the number of confederates that had votes, all the allies were enslaved, except ourselves and the Chians, who continued to send our contingents as independent and nominally free. Trust in Athens as a leader, however, we could no longer feel, judging by the examples already given; it being unlikely that she would reduce our fellow confederates, and not do the same by us who were left, if ever she had the power.”

“首先，我们要谈谈正义和诚实的问题，尤其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请求和你们联盟。我们知道，如果相互不能取信于对方，彼此总体上不能达成一致，人与人之间绝不可能建立牢固的友谊，城邦与城邦之间也不可能结成名副其实的联盟。原因在于，思想上如果有分歧，行动上也不会一致。我们与雅典人之间的同盟，始于你们撤出波斯战争而他们留下来收尾之时。但是，我们不是要与雅典人为盟镇压希腊人，而是要与希腊人为盟使其从波斯人的奴役下获得解放。只要雅典人公正地领导我们，我们就会忠实地追随他们。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对波斯人的敌意逐渐减弱，对盟邦的征服却愈演愈烈时，我们不禁忧虑起来。然而，鉴于有表决权的同盟城邦数量，各盟邦不能团结起来保护自己，以致所有盟邦都遭到了奴役，只有我们自己和希俄斯人除外，仍可以作为独立的和名义上自由的城邦派遣分遣队。然而，从已有的事例来看，我们对雅典已无法再有那种对盟主的信任。它降服了同盟内的其他盟邦之后，一俟具备实力，难保它不会不以同样的方式对付我们。”

“Had we all been still independent, we could have had more faith in their not attempting any change; but the greater number being their subjects, while they were treating us as equals, they would naturally chafe under this solitary instance of independence as contrasted with the submission of the majority; particularly as

they daily grew more powerful, and we more destitute. Now the only sure basis of an alliance is for each party to be equally afraid of the other; he who would like to encroach is then deterred by the reflection that he will not have odds in his favour. Again, if we were left independent, it was only because they thought they saw their way to empire more clearly by specious language and by the paths of policy than by those of force. Not only were we useful as evidence that powers who had votes, like themselves, would not, surely, join them in their expeditions, against their will, without the party attacked being in the wrong; but the same system also enabled them to lead the stronger states against the weaker first, and so to leave the former to the last, stripped of their natural allies, and less capable of resistance. But if they had begun with us, while all the states still had their resources under their own control, and there was a centre to rally round, the work of subjugation would have been found less easy. Besides this, our navy gave them some apprehension: it was always possible that it might unite with you or with some other power, and become dangerous to Athens. The court which we paid to their commons and its leaders for the time being also helped us to maintain our independence. However, we did not expect to be able to do so much longer, if this war had not broken out, from the examples that we had had of their conduct to the rest."

"如果我们依然全是独立城邦，我们可能会更加相信他们不会谋变。但是，倘若大多数城邦已臣服于他们，而我们却与他们平等相处，他们自然不愿看到多邦臣服而一邦独立的局面，尤其是在他们日益强大而我们每况愈下的情况下。现在，结成联盟的唯一可靠基础是彼此同样畏惧对方，这样，想要侵犯他方者才会因为考虑到自己未必稳操胜券而罢手。另外，即便雅典人让我们保持独立，那也只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利用巧妙的言辞和政策途径，较之使用武力，更

易于走上通往帝国之路。他们可以用我们来证明：被讨伐的一方若是无错，与他们同样具有投票权的城邦肯定不会违背自己的意愿跟他们一起参加征伐。不仅如此，利用同样方法，他们还可以先率领比较强的城邦去对付比较弱的城邦，而将前者留至最后。待到强邦的天然盟友被吞并得一个不剩，他们的抵御能力自然也就减弱了。但是，如果雅典先对付我们，而其他所有城邦依然保有自己的资源，同时还有一支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核心力量，要想征服其他城邦就没那么容易了。除此之外，他们对我们的海军也有所顾忌：它随时有可能与你们或其他势力联合起来，对雅典构成威胁。我们尽力与他们的平民阶层及其领袖搞好关系，目前也有助于我们维持独立。然而，即便这场战争没有爆发，从他们对待其他盟邦的行为来看，我们也没指望这种局面能维持多久。”

“How then could we put our trust in such friendship or freedom as we had here? We accepted each other against our inclination; fear made them court us in war, and us them in peace; sympathy, the ordinary basis of confidence, had its place supplied by terror, fear having more share than friendship in detaining us in the alliance; and the first party that should be encouraged by the hope of impunity was certain to break faith with the other. So that to condemn us for being the first to break off, because they delay the blow that we dread, instead of ourselves delaying to know for certain whether it will be dealt or not, is to take a false view of the case. For if we were equally able with them to meet their plots and imitate their delay, we should be their equals and should be under no necessity of being their subjects; but the liberty of offence being always theirs, that of defence ought clearly to be ours.”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还能相信我们所拥有的这种友谊或者说自由呢？我们彼此违背自己的意愿接受了对方。在战争时期，他们

出于恐惧设法争取我们；在和平时期，我们同样出于恐惧设法争取他们。信任的基础本应是道合志同，却被恐惧所取代了。我们留在同盟中，与其说是出于友谊，不如说是因为恐惧。首先感觉有望脱身的一方，肯定会背弃另外一方。因此，就因为他们延缓实施我们所担心的打击，所以就谴责我们不等确实搞清打击是否实施就首先叛离，那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和他们实力相当，可以对抗他们的阴谋，可以像他们一样延缓实施打击，我们就应当与他们平起平坐，就不必臣服于他们了。但是，既然施予打击的自由总是属于他们，自卫的自由显然应当属于我们。”

“Such, Lacedaemonians and allies, are the grounds and the reasons of our revolt; clear enough to convince our hearers of the fairness of our conduct, and sufficient to alarm ourselves, and to make us turn to some means of safety. This we wished to do long ago, when we sent to you on the subject while the peace yet lasted, but were balked by your refusing to receive us; and now, upon the Boeotians inviting us, we at once responded to the call, and decided upon a twofold revolt, from the Hellenes and from the Athenians, not to aid the latter in harming the former, but to join in their liberation, and not to allow the Athenians in the end to destroy us, but to act in time against them. Our revolt, however, has taken place prematurely and without preparation—a fact which makes it all the more incumbent on you to receive us into alliance and to send us speedy relief, in order to show that you support your friends, and at the same time do harm to your enemies.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such as you never had before. Disease and expenditure have wasted the Athenians; their ships are either cruising round your coasts, or engaged in blockading us; and it is not probable that they will have any to spare, if you invade them a second time this summer by sea and land; but they will either offer no resistance to your vessels, or withdraw from both our shores.

Nor must it be thought that this is a case of putting yourselves into danger for a country which is not yours. Lesbos may appear far off, but when help is wanted she will be found near enough. It is not in Attica that the war will be decided, as some imagine, but in the countries by which Attica is supported; and the Athenian revenue is drawn from the allies, and will become still larger if they reduce us; as not only will no other state revolt, but our resources will be added to theirs, and we shall be treated worse than those that were enslaved before. But if you will frankly support us, you will add to your side a state that has a large navy, which is your great want; you will smooth the way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Athenians by depriving them of their allies, who will be greatly encouraged to come over; and you will free yourselves from the imputation made against you, of not supporting insurrection. In short, only show yourselves as liberators, and you may count upon having the advantage in the war."

"斯巴达人和盟友们：这就是我们起来反抗的根据和理由。这些已经很清楚，足以使我们的听众相信我们的行为并无不当，足以使我们自己警醒，转而寻求获得安全的方法。我们很早就想这样做了。和平尚存时，我们就派人与你们商讨过这个问题，但你们当时不肯接纳我们，我们只好作罢。现在，维奥蒂亚人一向我们发出邀请，我们马上作出了响应，决定与过去进行双重决裂，一方面同雅典人，另一方面同希腊人。我们不会再协助前者打击后者，而是要加入到后者的解放事业中去。我们不会再允许雅典人最终将我们毁灭，而是要及时采取行动对抗他们。然而，我们尚未做好准备就提早起事了——这也使得你们更有责任接纳我们入盟，并向我们迅速派遣援军，以表明你们支持朋友，同时打击敌人。这是你们前所未有的机会。疾病和战争开支已经使雅典人财尽民穷：他们的战舰不是在绕着你们的海岸游弋，就是在忙着封锁我们。你们今年夏季若能再度从水陆两路同时侵扰他们，他们不可能再有余力应付，只能要么不与你们的战舰抗衡，要么

从我们双方的海岸撤走。不要认为你们是在为他人的城邦将自己置入危险之中。莱斯沃斯岛看起来远在天边，但是当你需要帮助时，它会近在眼前。这场战争，不会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将在阿提卡决出胜负，而是要看支持阿提卡的那些城邦。雅典的收入来自各个盟邦。如果能迫使我们就范，他们的收入会更加丰厚。由于没有其他城邦起来反抗，加之我们的资源会加进他们的资源之中，他们对我们会比对此前遭受奴役的那些城邦更苛刻。但是，如果你们真诚地支持我们，你们一方将增加一个拥有庞大海军的城邦，而这正是你们非常需要的。如果能使雅典人的同盟瓦解，你们就会为征服他们铺平道路，他们的盟邦就会大受鼓舞，投奔你们。这样，你们也就不会因为不支持起义而受到责难了。总之，只要以解放者的面貌出现，你们就可以在战争中居于优势地位。”

“Respect, therefore, the hopes placed in you by the Hellenes, and that Olympian Zeus, in whose temple we stand as very suppliants; become the allies and defenders of the Mitylenians, and do not sacrifice us, who put our lives upon the hazard, in a cause in which general good will result to all from our success, and still more general harm if we fail through your refusing to help us; but be the men that the Hellenes think you, and our fears desire.”

“因此，请尊重希腊人寄予你们的希望，尊重奥林匹亚的宙斯，我们正是以祈祷者的身份站在他的神庙里。请成为米蒂利尼人的盟友和保卫者，不要牺牲掉我们，因为我们已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如果我们能在这场事业中获得成功，将对大家普遍有益；若是因为你们不肯施予援手而失败，殃及面会更广。所以，不要辜负希腊人对你们的期望，以及我们出于忧虑而对你们燃起的希望。”

Such were the words of the Mitylenians. After hearing them

out, the Lacedaemonians and confederates granted what they urged, and took the Lesbians into alliance, and deciding in favour of the invasion of Attica, told the allies present to march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o the Isthmus with two-thirds of their forces; and arriving there first themselves, got ready hauling machines to carry their ships across from Corinth to the sea on the side of Athens, in order to make their attack by sea and land at once. However, the zeal which they displayed was not imitated by the rest of the confederates, who came in but slowly, being engaged in harvesting their corn and sick of making expeditions.

这是米蒂利尼人的发言。听罢他们的发言，斯巴达人和同盟的成员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接受莱斯沃斯人加入了同盟。他们做出赞成入侵阿提卡的决定之后，随即吩咐到会的各个盟邦尽快率各自三分之二的兵力赶往地峡。斯巴达人到得最早，他们预备好绞盘机，准备将战舰从科林斯拖到雅典一侧的海中，以便从海上和陆上同时发动进攻。然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并没有得到其余盟邦的响应。那些盟邦虽然来了，但是来得很慢，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收割，另外也已倦于远征。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aware that the preparations of the enemy were due to his conviction of their weakness, and wishing to show him that he was mistaken, and that they were able, without moving the Lesbian fleet, to repel with ease that with which they were menaced from Peloponnese, manned a hundred ships by embarking the citizens of Athens, except the knights and Pentacosiomedimni, and the resident aliens; and putting out to the Isthmus, displayed their power, and made descents upon Peloponnese wherever they pleased. A disappointment so signal made the Lacedaemonians think that the Lesbians had not spoken

the truth; and embarrassed by the non-appearance of the confederates, coupled with the news that the thirty ships round Peloponnese were ravaging the lands near Sparta, they went back home. Afterwards, however, they got ready a fleet to send to Lesbos, and ordering a total of forty ships from the different cities in the league, appointed Alcidas to command the expedition in his capacity of high admiral.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in the hundred ships, upon seeing the Lacedaemonians go home, went home likewise.

雅典人这时候很清楚，敌人的准备是基于对他们的弱点作出的判断。他们希望向敌人表明其判断有误，而且无需动用莱斯沃斯的舰队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击退伯罗奔尼撒用来威胁他们的舰队。于是，他们用雅典公民（骑士级和五百麦斗级除外）和居住在雅典的外邦人配备了100艘战舰。这些战舰启航后直奔地峡，不仅在那里耀武扬威，还随心所欲地在伯罗奔尼撒沿岸登陆。这让斯巴达人大失所望，以至于认为莱斯沃斯人所言不实。由于盟军迟迟不到，又听说绕着伯罗奔尼撒游弋的那30艘舰只正在斯巴达附近践踏他们的土地，他们尴尬地回去了。不过，斯巴达人后来准备了一支派往莱斯沃斯的舰队，还命令同盟内各个城邦共出40艘战舰，并指定阿尔基扎斯以海军大将之职指挥这次远征。其间，那100艘舰上的雅典人看到斯巴达人撤回本邦，他们也回去了。

If, at the time that this fleet was at sea, Athens had almost the largest number of first-rate ships in commission that she ever possessed at any one moment, she had as many or even more when the war began. At that time one hundred guarded Attica, Euboea, and Salamis; a hundred more were cruising round Peloponnese, besides those employed at Potidaea and in other places; making a grand total of two hundred and fifty vessels employed on active

service in a single summer. It was this, with Potidaea, that most exhausted her revenues—Potidaea being blockaded by a force of heavy infantry (each drawing two drachmae a day, one for himself and another for his servant), which amounted to three thousand at first, and was kept at this number down to the end of the siege; besides sixteen hundred with Phormio who went away before it was over; and the ships being all paid at the same rate. In this way, her money was wasted at first; and this w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ships ever manned by her.

这支舰队同时出海，雅典服现役的一流战舰数量几乎达到前所未有的最大值。不过，战争开始时，雅典服现役的战舰也不少于此数，甚至更多。那时候，除了在波提狄亚和其他地方投入的舰只之外，还有100艘战舰在守卫阿提卡、埃维亚和萨拉米斯，另有100艘在伯罗奔尼撒周围游弋。总共加起来，一个夏季服现役的舰只即达250艘。正因为这一点，再加上对波提狄亚的围攻，使得雅典的财政收入几近耗尽。封锁波提狄亚的是一支重步兵部队（每人每天领取两个德拉克马，一个给本人，一个给他的仆人）。这支部队的人数开始时是3,000，到围困结束一直维持在这个数，此外还有福尔米奥率领的1,600人。福尔米奥的那些人虽然在围攻结束前就走了，但舰上人员的军饷与重步兵的相同。雅典的财力起初就是这样被消耗掉的，它配备的战舰数量之多前所未有。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were at the Isthmus, the Mitylenians marched by land with their mercenaries against Methymna, which they thought to gain by treachery. After assaulting the town, and not meeting with the success that they anticipated, they withdrew to Antissa, Pyrrha, and Eresus; and taking measures for the better security of these towns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walls, hastily returned home. After their

departure the Methymnians marched against Antissa, but were defeated in a sortie by the Antissians and their mercenaries, and retreated in haste after losing many of their number. Word of this reaching Athens, and the Athenians learning that the Mitylenians wer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and their own soldiers unable to hold them in check, they sent out about the beginning of autumn Paches, son of Epicurus, to take the command, and a thousand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who worked their own passage and, arriving at Mitylene, built a single wall all round it, forts being erected at some of the strongest points. Mitylene was thus blockaded strictly on both sides, by land and by sea; and winter now drew near.

大约是斯巴达人在地峡时，米蒂利尼人率领他们的雇佣军开始从陆路向迈西姆纳进军。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与城内叛军里应外合获取该城。他们袭击了那座城，却没有获得预期的胜利，之后便撤往安蒂萨、皮拉和埃雷苏斯。他们采取措施加强了这几座城的防务，并加固了城墙，然后就匆匆返回了。他们离去后，迈西姆纳人开始向安蒂萨进军，但在安蒂萨人及其雇佣军的一次突围中被打败，折损了不少兵力后匆忙撤退了。这件事也传到了雅典，得知米蒂利尼人已控制那个地区，他们自己的士兵又对付不了他们，大约在秋初时，雅典人便派伊壁鸠鲁的儿子帕海斯率1,000名雅典重步兵开赴那里，这些重步兵是自己划桨过去的。抵达米蒂利尼后，他们绕着城筑了一道单墙，在最坚固的几处设置了堡垒。米蒂利尼就这样从海陆两侧被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了。这时冬季已渐渐来临。

The Athenians needing money for the siege, although they had for the first time raised a contribution of two hundred talents from their own citizens, now sent out twelve ships to levy subsidies from their allies, with Lysicles and four others in command. After cruising to different places and laying them under contribution,

Lysicles went up the country from Myus, in Caria, across the plain of the Meander, as far as the hill of Sandius; and being attacked by the Carians and the people of Anaia, was slain with many of his soldiers.

雅典人虽然首次从自己的公民中征收了200塔兰特的特别税，但还是需要资金，以供围攻之用。于是，他们派遣利西克莱斯和其他四人率领12艘舰只到盟邦征收补充贡金。利西克莱斯率人驶往各地收缴了贡金后，从卡里亚的米乌斯进入内地，跨过米安德河平原，一直深入到了桑迪乌斯的丘陵地带。在那里，他们遭到了卡里亚人和阿纳亚人的袭击。利西克莱斯本人和他手下很多士兵都被杀死了。

The same winter, the Plataeans, who were still being besieged by the Peloponnesians and Boeotians, distressed by the failure of their provisions, and seeing no hope of relief from Athens, nor any other means of safety, formed a scheme with the Athenians besieged with them for escaping, if possible, by forcing their way over the enemy's walls; the attempt having been suggested by Theaenetus, son of Tolmides, a soothsayer, and Eupompides, son of Daimachus, one of their generals. At first, all were to join; afterwards, half hung back, thinking the risk great; about two hundred and twenty, however, voluntarily persevered in the attempt, which was carried out in the following way. Ladders were made to match the height of the enemy's wall, which they measured by the layers of bricks, the side turned towards them not being thoroughly whitewashed. These were counted by many persons at once; and though some might miss the right calculation, most would hit upon it, particularly as they counted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were no great way from the wall, but could see it easily enough for their purpose. The length required for the ladders was thus

obtained, being calculated from the breadth of the brick.

同年冬季，因为无法获得给养，依然遭受伯罗奔尼撒人和维奥蒂亚人围困的普拉蒂亚人深受其苦。眼见从雅典获援无望，又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自保，他们就与一同遭受围困的雅典人制定了一个计划。如果可能，他们打算强行越过敌军的封锁墙逃出城去。提出这个计划的人是托尔米泽斯的儿子塞埃内图斯和德马胡斯的儿子埃夫蓬皮泽斯。前者是一个预言家，后者是军中的一名将军。最初计划所有的人都要参加，后来有一半人退缩了，认为风险太大，不过，仍有大约220人自愿坚持一试。具体是这样进行的：他们先做了一些梯子，高度与敌军所修之墙的高度相当，因为朝向他们那一面墙体粉刷得不彻底，所以墙的高度是通过墙砖的层数计算出来的。墙砖的层数是许多人同时数的。有些人数得可能有误，但大多数人数得是对的，特别是因为他们反复数过，况且离墙也不远，数的时候很容易看清楚。根据单砖的厚度，他们算出了梯子所需的长度。

Now the wall of the Peloponnesians was constructed as follows. It consisted of two lines drawn round the place, one against the Plataeans, the other against any attack on the outside from Athens, about sixteen feet apart. The intermediate space of sixteen feet was occupied by huts portioned out among the soldiers on guard, and built in one block, so as to give the appearance of a single thick wall with battlements on either side. At intervals of every ten battlements were towers of considerable size, and the same breadth as the wall, reaching right across from its inner to its outer face, with no means of passing except through the middle. Accordingly, on stormy and wet nights the battlements were deserted, and guard kept from the towers, which were not far apart and roofed in above.

伯罗奔尼撒人的封锁墙是这样构筑的：它实际上包括两道绕城围墙，一道用于对付普拉蒂亚人，另一道用于抵御雅典从外面发动的进攻。两道墙之间相距大约16英尺。两墙之间这16英尺的空间内建有一些小屋，分别供值勤的士兵使用。这些小屋建于一个整体内，所以外表看上去就像是一道厚墙，两边都有雉堞。每十个雉堞之间建有一个相当大的哨塔，哨塔与墙一样厚，正好从墙的内面延伸到墙的外面。除了从塔中穿过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穿过墙。因此，在风雨交加之夜，雉堞一般无人把守，只有塔里设有岗哨。塔与塔之间相距不远，塔上都有顶。

Such be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wall by which the Plataeans were blockaded, when their preparations were completed, they waited for a stormy night of wind and rain and without any moon, and then set out, guided by the authors of the enterprise. Crossing first the ditch that ran round the town, they next gained the wall of the enemy unperceived by the sentinels, who did not see them in the darkness, or hear them, as the wind drowned with its roar the noise of their approach; besides which they kept a good way off from each other, that they might not be betrayed by the clash of their weapons. They were also lightly equipped, and had only the left foot shod to preserve them from slipping in the mire. They came up to the battlements at one of the intermediate spaces where they knew them to be unguarded; those who carried the ladders went first and planted them; next twelve light-armed soldiers with only a dagger and a breastplate mounted, led by Ammias, son of Coroebus, who was the first on the wall; his followers getting up after him and going six to each of the towers. After these came another party of light troops armed with spears, whose shields, that they might advance the easier, were carried by men behind, who were to hand them to them when they found themselves in presence of the enemy. After a good many had mounted they were

discovered by the sentinels in the towers, by the noise made by a tile which was knocked down by one of the Plataeans as he was laying hold of the battlements. The alarm was instantly given, and the troops rushed to the wall, not knowing the nature of the danger, owing to the dark night and stormy weather; the Plataeans in the town having also chosen that moment to make a sortie against the wall of the Peloponnesians upon the side opposite to that on which their men were getting over, in order to divert the attention of the besiegers. Accordingly, they remained distracted at their several posts, without any venturing to stir to give help from his own station, and at a loss to guess what was going on. Meanwhile, the three hundred set aside for service on emergencies went outside the wall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larm. Fire-signals of an attack were also raised towards Thebes; but the Plataeans in the town at once displayed a number of others, prepared beforehand for this very purpose, in order to render the enemy's signals unintelligible, and to prevent his friends getting a true idea of what was passing and coming to his aid before their comrades who had gone out should have made good their escape and be in safety.

封锁普拉蒂亚人的那道围墙的结构即是这样。完成准备工作之后，等到一个风雨交加、没有月光的夜晚，他们才在行动发起人的带领下出发。他们首先越过环城壕沟，然后跑到敌人修筑的墙下，没有被哨兵察觉。由于夜色黑暗，怒号的狂风又淹没了他们接近的声音，哨兵既没看到他们，也没听到他们的动静。另外，他们彼此之间还保持着相当合适的距离，以免因所带兵器相互碰撞而暴露自己。他们携带的装备也很轻便，而且只有左脚上穿着鞋，以防在泥泞中滑倒。他们来到两塔之间的雉堞下，因为他们知道那里无人把守。扛梯子的人首先到达那里，把梯子安放好；接着，科里武斯的儿子安米亚斯率12名轻装士兵爬上墙：他们仅带着匕首，穿着护胸甲。安米亚斯是第一个爬上去的，其他人跟着也上去了，然后六人一组分头奔向两边的哨

塔。这些人上去后，另外一支手拿长矛的轻步兵队伍也上去了。为了行动方便起见，他们的盾牌由后面的人拿着。若发现面前有敌人，后边的人就将盾牌递给他们。上去不少人之后，他们才被塔里的哨兵发现，有一个普拉蒂亚人抓雉堞时碰掉一块瓦，瓦片落下发出了声响。哨兵立即发出警报，守军随即冲上墙去，但由于夜黑，又是暴雨天气，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危险。城里的普拉蒂亚人也在此刻冲出来，向他们同胞正在翻越的围墙对面那道伯罗奔尼撒人修筑的墙发起突击，以牵制围城部队的注意力。因此，围城的敌军仍分散在各自的哨所，没敢离开自己的岗位出来帮忙，也搞不清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其间，专门留着应付紧急情况的300名士兵跑出墙外，朝着发出警报的方向奔去。围城部队还朝底比斯发出了遭到袭击的烽火信号。但是，城内的普拉蒂亚人事先对此早有准备，他们立即点燃多处烽火，使敌人的信号无法辨别。敌人的友军看不懂信号所传达的真实含义，也就不会及时赶来相助，他们出城的伙伴便可以成功地逃往安全地带了。

Meanwhile, the first of the scaling party that had got up, after carrying both the towers and putting the sentinels to the sword, posted themselves inside to prevent any one coming through against them; and rearing ladders from the wall, sent several men up on the towers, and from their summit and base kept in check all of the enemy that came up, with their missiles, while their main body planted a number of ladders against the wall, and knocking down the battlements, passed over between the towers; each as soon as he had got over taking up his station at the edge of the ditch, and plying from thence with arrows and darts any who came along the wall to stop the passage of his comrades. When all were over, the party on the towers came down, the last of them not without difficulty, and proceeded to the ditch, just as the three hundred came up carrying torches. The Plataeans,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the ditch in the dark, had a good view of their opponents, and discharged their arrows and darts upon the unarmed parts of

their bodies, while they themselves could not be so well seen in the obscurity for the torches; and thus even the last of them got over the ditch, though not without effort and difficulty; as ice had formed in it, not strong enough to walk upon, but of that watery kind which generally comes with a wind more east than north, and the snow which this wind had caused to fall during the night had made the water in the ditch rise, so that they could scarcely breast it as they crossed. However, it was mainly the violence of the storm that enabled them to effect their escape at all.

与此同时，首批爬上墙的普拉蒂亚人将两边的哨塔都占领了。他们杀死哨兵，在里面布了岗，以防有人从中过来袭击他们。他们还从墙上竖起梯子，派几个人爬上塔顶，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上下两路同时射击阻止所有上来的敌人。同时，他们的主力将多架梯子靠在了墙上，他们捣毁雉堞，从两塔中间越过。每个人一过去就立即在壕沟边各就各位，从那里奋力向沿着墙阻断同伴来路的敌人射箭和投掷标枪。所有的人都过来后，塔上的人也下来了，虽然最后一个费了些周折。他们刚跑到壕沟，那300名敌军就举着火把追上来了。站在壕沟边上的普拉蒂亚人身在暗处，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他们对准敌军身上没有护甲的部位，不住地放箭和投掷标枪，自己却不易被敌人的火把照见。借此，连最后一个人都过了壕沟，尽管其间不乏艰难。壕沟里的水已结冰，经不住人在上面走，但由于是那种通常伴有东风而不是北风的稀薄的冰，加上到了夜间，这种风又刮得雪花飞落，壕沟里的水更深了，因此他们过河时，几乎水深齐胸。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逃脱，主要也是得益于暴风之猛烈。

Starting from the ditch, the Plataeans went all together along the road leading to Thebes, keeping the chapel of the hero Androcrates upon their right; considering that the last road which the Peloponnesians would suspect them of having taken would be

that towards their enemies' country. Indeed, they could see them pursuing with torches upon the Athens road towards Cithaeron and Druoskephalai or Oakheads. After going for rather more than half a mile upon the road to Thebes, the Plataeans turned off and took that leading to the mountain, to Erythrae and Hysiae, and reaching the hills, made good their escape to Athens, two hundred and twelve men in all; some of their number having turned back into the town before getting over the wall, and one archer having been taken prisoner at the outer ditch. Meanwhile, the Peloponnesians gave up the pursuit and returned to their posts; and the Plataeans in the town, knowing nothing of what had passed, and informed by those who had turned back that not a man had escaped, sent out a herald as soon as it was day to make a truce for the recovery of the dead bodies, and then, learning the truth, desisted. In this way, the Plataean party got over and was saved.

这些普拉蒂亚人从壕沟出发，一起沿着通往底比斯的路向前走去，英雄安兹罗克拉泰斯的神庙在他们右边。他们认为，伯罗奔尼撒人决不会猜到他们会走通往敌方领土这条路。他们其实都能看到伯罗奔尼撒人举着火把，在通往雅典的路上朝基塞龙和德鲁奥斯凯法莱或奥阿凯阿兹的方向追去。在通往底比斯的路上走了半英里多之后，普拉蒂亚人转而踏上了通往山地那条路，朝埃利色雷和希夏埃进发。到达山地后，他们成功逃向了雅典，总共是212人。有些人没有翻过城墙就返回了城里，有一名弓箭手在外壕沟旁被俘。伯罗奔尼撒人此时已不再追，返回了自己的岗位。城内的普拉蒂亚人对于所发生的情况全然不晓，只是听那些折回来的人说一个都没跑掉。天一亮，他们就派出一个传令官请求休战，要求收回死者的尸体。后来得知了真相，他们便作罢了。这队普拉蒂亚人就这样翻过封锁墙得救了。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same winter, Salaethus, a

Lacedaemonian, was sent out in a galley from Lacedaemon to Mitylene. Going by sea to Pyrrha, and from thence overland, he passed along the bed of a torrent, where the line of circumvallation was passable, and thus entering unperceived into Mitylene told the magistrates that Attica would certainly be invaded, and the forty ships destined to relieve them arrive, and that he had been sent on to announce this and to superintend matters generally. The Mitylenians upon this took courage, and laid aside the idea of treating with the Athenians; and now this winter ended, and with it ended the fourth year of the war of which Thucydides was the historian.

这个冬季临近结束时，斯巴达人萨莱苏斯奉命乘一艘三列桨战舰从斯巴达前往米蒂利尼。他先从海路去往皮拉，从那里由陆路沿着一条激流的河床前行到一处可以越过围墙的地方，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米蒂利尼。他告诉那里的行政官员，阿提卡肯定会遭到入侵，派来援救他们的40艘战舰就要到了，他是被派来预先告知他们这件事的，同时负责督办一应事务。得知此讯，米蒂利尼人勇气大增，放弃了与雅典人谈判的想法。这时残冬已尽，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四年亦随之结束。

The next summer, the Peloponnesians sent off the forty-two ships for Mitylene, under Alcidas, their high admiral, and themselves and their allies invaded Attica, their object being to distract the Athenians by a double movement, and thus to make it less easy for them to act against the fleet sailing to Mitylene. The commander in this invasion was Cleomenes, in the place of King Pausanias, son of Pleistoanax, his nephew, who was still a minor. Not content with laying waste whatever had shot up in the parts which they had before devastated, the invaders now extended their

ravages to lands passed over in their previous incursions; so that this invasion was more severely felt by the Athenians than any except the second; the enemy staying on and on until they had overrun most of the country, in the expectation of hearing from Lesbos of something having been achieved by their fleet, which they thought must now have got over. However, as they did not obtain any of the results expected, and their provisions began to run short, they retreated and dispersed to their different cities.

翌年夏季，伯罗奔尼撒人派遣他们的海军大将阿尔基扎斯率42艘战舰前往米蒂利尼，他们自己及其盟军则入侵了阿提卡。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以两路人马同时行动来分散雅典人的注意力，这样一来，雅典人对驶往米蒂利尼的舰队采取行动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次入侵的指挥官是克莱奥梅尼，他是代替保萨尼阿斯国王（普利斯托阿纳克斯之子）率军出征的。保萨尼阿斯是他的侄子，尚未成年。入侵的军队将之前践踏过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一切都毁掉之后仍不满足，又将侵略的触角伸向先前入侵时忽略的地区。因此，雅典人感觉，除了第二次以外，这次入侵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一次。敌人久久逗留不去，直到大部分乡村地区都遭到了践踏，他们预计这时舰队肯定已到达莱斯沃斯了，总盼着听到些他们取得战果的消息。但是，还没有盼到所期望的结果，自身给养便开始不足，于是便撤离那里，各自返回了自己城邦。

In the meantime, the Mitylenians, finding their provisions failing, while the fleet from Peloponnese was loitering on the way instead of appearing at Mitylene, were compelled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Athenians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Salaethus having himself ceased to expect the fleet to arrive, now armed the commons with heavy armour, which they had not before possessed, with the intention of making a sortie against the Athenians. The

commons, however, no sooner found themselves possessed of arms than they refused any longer to obey their officers; and forming in knots together, told the authorities to bring out in public the provisions and divide them amongst them all, or they would themselves come to terms with the Athenians and deliver up the city.

这时候，米蒂利尼人也发现自己的粮食日见匮乏，而伯罗奔尼撒派来的舰队却还在途中不紧不慢地航行，迟迟不出现在米蒂利尼，他们只好与雅典人达成了妥协。具体情况是这样：萨莱苏斯本人也已不再指望舰队能到来，他把平民用重甲武装起来（他们以前不曾装备过重甲），打算率领他们向雅典人发起突击。可是，平民刚一拥有武器，就不肯再服从官员们的命令了，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要求当局把粮食拿出来公开分给大家，否则他们就要与雅典人达成妥协，将城市交出去。

The government, aware of their inability to prevent this, and of the danger they would be in, if left out of the capitulation, publicly agreed with Paches and the army to surrender Mitylene at discretion and to admit the troops into the town; up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Mitylenians should be allowed to send an embassy to Athens to plead their cause, and that Paches should not imprison, make slaves of, or put to death any of the citizens until its return. Such were the terms of the capitulation; in spite of which the chief authors of the negotiation with Lacedaemon were so completely overcome by terror when the army entered that they went and seated themselves by the altars, from which they were raised up by Paches under promise that he would do them no wrong, and lodged by him in Tenedos, until he should learn the pleasure of the Athenians concerning them. Paches also sent some

galleys and seized Antissa, and took such other military measures as he thought advisable.

政府知道自己无力阻止这种事发生，也知道如果被排除在议降之外有何危险，所以就公开与帕海斯和雅典军队议定：米蒂利尼无条件投降，雅典军队可以进城，但要允许米蒂利尼人派一个使团前往雅典陈述情况。在这个使团回来之前，帕海斯不得监禁、奴役或杀害任何一个公民。投降条款虽是这样，雅典军队进城时，曾主张与斯巴达谈判的主要人员还是吓得六神无主，跑去坐在圣坛旁。帕海斯将他们扶起来，允诺不会伤害他们。在得知雅典人意欲如何处置他们之前，他先将他们安置在了泰内佐斯。帕海斯还派遣了几艘三列桨战舰占领了安蒂萨，并采取了其他一些他认为适当的军事措施。

Meanwhile, the Peloponnesians in the forty ships, who ought to have made all haste to relieve Mitylene, lost time in coming round Peloponnese itself, and proceeding leisurely on the remainder of the voyage, made Delos without having been seen by the Athenians at Athens, and from thence arriving at Icarus and Myconus, there first heard of the fall of Mitylene. Wishing to know the truth, they put into Embatum, in the Erythraeid, about seven days after the capture of the town. Here they learned the truth, and began to consider what they were to do; and Teutiaplus, an Elean, addressed them as follows:

与此同时，本该前去援救米蒂利尼的那40艘战舰上的伯罗奔尼撒人，在绕伯罗奔尼撒半岛本身航行的过程中就浪费了不少时间，在余下的航程中又不紧不慢地向前行驶，虽然没被在雅典的雅典人发现就到达了提洛岛，又从那里继续航行到了伊卡鲁斯和米科努斯，在那里首次听说米蒂利尼已经陷落的消息。由于想知道实际情况，在米蒂利

尼被占领大约七天之后，他们驶入埃里斯雷伊兹的埃姆瓦图姆。在这里获悉实情后，他们开始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埃利斯人泰夫蒂亚普卢斯对他们提出如下意见：

“Alcidas and Peloponnesians who share with me the command of this armament, my advice is to sail just as we are to Mitylene, before we have been heard of. We may expect to find the Athenians as much off their guard as men generally are who have just taken a city; this will certainly be so by sea, where they have no idea of any enemy attacking them, and where our strength, as it happens, mainly lies; while even their land forces are probably scattered about the houses in the carelessness of victory. If therefore we were to fall upon them suddenly and in the night, I have hopes, with the help of the well-wishers that we may have left inside the town, that we shall become masters of the place. Let us not shrink from the risk, but let us remember that this is just the occasion for one of the baseless panics common in war; and that to be able to guard against these in one's own case, and to detect the moment when an attack will find an enemy at this disadvantage, is what makes a successful general.”

“阿尔基扎斯以及与我共同指挥这支军队的伯罗奔尼撒同僚们：我的建议是，趁着还没人听说我们抵达这里，按照原计划驶往米蒂利尼。刚刚夺取一座城市之后，人们通常会大大放松警惕，我们或许会发现，雅典人也是这样：在海上，他们肯定会这样，因为他们想不到会有敌人攻击他们，而我们的优势恰恰主要就在海上。在胜利后的疏忽中，就连他们的陆军部队，说不定也分散在各所房屋中。因此，如果我们在夜间突然对他们发动袭击，我想，或许城里还留有支持我们的人，在他们的协助下，我们有望变成这个地方的主人。我们不要在危险面前退缩，而是要记住，这正是战争中常见的一种莫名的恐慌时

刻。一个成功的将军，既要能防止自己的队伍出现这种恐慌，又要能在敌人处于这种不利状况时实施攻击。”

These words of Teutiaplus failing to move Alcidas, some of the Ionian exiles and the Lesbians with the expedition began to urge him, since this seemed too dangerous, to seize one of the Ionian cities or the Aeolic town of Cyme, to use as a base for effecting the revolt of Ionia. This was by no means a hopeless enterprise, as their coming was welcome everywhere; their object would be by this move to deprive Athens of her chief source of revenue,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saddle her with expense, if she chose to blockade them; and they would probably induce Pissuthnes to join them in the war. However, Alcidas gave this proposal as bad a reception as the other, being eager, since he had come too late for Mitylene, to find himself back in Peloponnese as soon as possible.

泰夫蒂亚普卢斯这些话并没有打动阿尔基扎斯。随军出征的一些爱奥尼亚流亡者和莱斯沃斯人便开始劝他，既然这样做似乎过于危险，那就去夺取伊奥尼亚的一座城市或者伊奥利亚的基迈城，再以它为根据地去策动爱奥尼亚反叛。这件事决非毫无成功的希望，因为他们在所到之处都很受欢迎。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剥夺雅典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且如果雅典对他们实施封锁，还可以使它增加开支。这些人还说，他们或许还可以说服皮苏斯内斯在战争中加入他们一方。然而，阿尔基扎斯对这个建议同样不赞成。既然来迟了，没有赶上援救米蒂利尼，他急欲想做的就是尽快回到伯罗奔尼撒。

Accordingly, he put out from Embatum and proceeded along shore; and touching at the Teian town, Myonnesus, there butchered most of the prisoners that he had taken on his passage. Upon his

coming to anchor at Ephesus, envoys came to him from the Samians at Anaia, and told him that he was not going the right way to free Hellas in massacring men who had never raised a hand against him, and who were not enemies of his, but allies of Athens against their will, and that if he did not stop he would turn many more friends into enemies than enemies into friends. Alcidas agreed to this, and let go all the Chians still in his hands and some of the others that he had taken; the inhabitants, instead of flying at the sight of his vessels, rather coming up to them, taking them for Athenian, having no sort of expectation that while the Athenians commanded the sea Peloponnesian ships would venture over to Ionia.

于是，他从埃姆瓦图姆启航，继续沿着海岸航行。在特俄斯的城镇米翁内苏斯靠岸后，他在那里屠杀了航行途中俘获的大部分俘虏。他率舰队刚停泊在以弗所，居住在阿纳亚的萨摩斯人便派代表来拜访他。他们对他说，那些人从来没有威胁过要攻击他，他们不是他的敌人，只是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了雅典的盟友。他这样屠杀他们，不是解放希腊的正当途径。如果不停止这样做，他非但不能化敌为友，反而会使更多的人变友为敌。阿尔基扎斯对此表示赞同。他释放了手中所有希俄斯人和俘获的其他一些人。当地居民误以为他们是雅典人，所以看到他的舰非但没跑，反而迎了上来。他们绝没料到，在雅典人控制海洋时，伯罗奔尼撒的战舰居然敢来爱奥尼亚。

From Ephesus Alcidas set sail in haste and fled. He had been seen by the Salaminian and Paralian galleys, which happened to be sailing from Athens, while still at anchor off Clarus; and fearing pursuit he now made across the open sea, fully determined to touch nowhere, if he could help it, until he got to Peloponnese. Meanwhile, news of him had come in to Paches from the Erythraeid, and indeed from all quarters. As Ionia was unfortified,

great fears were felt that the Peloponnesians coasting along shore, even if they did not intend to stay, might make descents in passing and plunder the towns; and now the Paralian and Salaminian, having seen him at Clarus, themselves brought intelligence of the fact. Paches accordingly gave hot chase, and continued the pursuit as far as the isle of Patmos, and then finding that Alcidas had got on too far to be overtaken, came back again. Meanwhile, he thought it fortunate that, as he had not fallen in with them out at sea, he had not overtaken them anywhere where they would have been forced to encamp, and so give him the trouble of blockading them.

阿尔基扎斯匆忙扬帆启航，逃离了以弗所。可是，他还停泊在克拉鲁斯附近时，就被恰巧驶离雅典的“萨拉米尼亚”号和“帕拉卢斯”号这两条三列桨战舰发现了。由于怕遭到追击，他横渡大海。如果可能的话，在抵达伯罗奔尼撒之前，他决不在任何地方靠岸。与此同时，关于他在那里的消息也从埃里斯雷伊兹（实际上是从四面八方）传到了帕海斯那里。由于爱奥尼亚没有设防，那里的人非常紧张，他们担心，即便伯罗奔尼撒人无意停留，但是在沿着海岸航行途中却有可能登陆，对城镇进行劫掠。现在“帕拉卢斯”号和“萨拉米尼亚”号在克拉鲁斯发现了他，并带来了确切的消息。于是，帕海斯开始猛追，一直追到帕特莫斯岛，发现阿尔基扎斯已经逃得远不可及，这才转回来。同时，帕海斯觉得也算万幸，因为他虽然没在海上碰上他们，却也没在任何他们被迫扎营的地方追上他们，这倒省了他的封锁之累。

On his return along shore he touched, among other places, at Notium, the port of Colophon, where the Colophonians had settled after the capture of the upper town by Itamenes and the barbarians, who had been called in by certain individuals in a party quarrel. The capture of the town took place about the time of the second Peloponnesian invasion of Attica. However, the refugees, after

settling at Notium, again split up into factions, one of which called in Arcadian and barbarian mercenaries from Pissuthnes and, entrenching these in a quarter apart, formed a new community with the Median party of the Colophonians who joined them from the upper town. Their opponents had retired into exile, and now called in Paches, who invited Hippias, the commander of the Arcadians in the fortified quarter, to a parley, upon condition that, if they could not agree, he was to be put back safe and sound in the fortification. However, upon his coming out to him, he put him into custody, though not in chains, and attacked suddenly and took by surprise the fortification, and putting the Arcadians and the barbarians found in it to the sword, afterwards took Hippias into it as he had promised, and, as soon as he was inside, seized him and shot him down. Paches then gave up Notium to the Colophonians not of the Median party; and settlers were afterwards sent out from Athens, and the place colonized according to Athenian laws, after collecting all the Colophonians found in any of the cities.

在沿着海岸返航途中，他停留的地方包括科洛丰的港口诺蒂乌姆，伊塔迈内斯带着蛮族人（这些人是在党派争吵中被某些人召来的）占领上城之后，科洛丰人就定居到了这里。这座城的陷落大约发生在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入侵阿提卡时。然而，那些难民定居在诺蒂乌姆后，又分裂成了不同的派别，其中一派从皮苏斯内斯召来阿卡迪亚和蛮族雇佣军，让他们盘踞在一个隔开的区域，与从上城赶来加入他们的科洛丰人中的波斯派组成了一个新城邦。他们的反对派虽已流亡，这时却请来了帕海斯。帕海斯邀请设防区内阿卡迪亚人的司令官希庇亚斯出来谈判，并且给出了一个条件：倘若他们达不成一致，他将被安全送回设防区。但是，希庇亚斯一到他那里，就被拘留了，尽管没上镣铐；接着，他突然发动进攻，出其不意地攻占了设防区，将里面的阿卡迪亚人和蛮族人尽数杀戮之后，他如约将希庇亚斯带进里面。希庇亚斯刚一进去，就被人抓住并射死了。然后，帕海斯将诺蒂

乌姆交给了非波斯派的科洛丰人。后来，雅典又派出移民，在将散居在各个城市的科洛丰人都集中起来之后，按照雅典的法律将那个地方开拓为殖民地。

Arrived at Mitylene, Paches reduced Pyrrha and Eresus; and finding the Lacedaemonian, Salaethus, in hiding in the town, sent him off to Athens, together with the Mitylenians that he had placed in Tenedos, and any other persons that he thought concerned in the revolt. He also sent back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forces, remaining with the rest to settle Mitylene and the rest of Lesbos as he thought best.

帕海斯回到米蒂利尼，征服了皮拉和埃雷苏斯。他找到躲藏在城里的斯巴达人萨莱苏斯之后，随即将他送往雅典，一同送去的还有他原来安置在泰内佐斯的米蒂利尼人和他认为涉嫌反叛的其他人，他还遣回了自己军中的大部分人，他本人则与其余人员留下来，按照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处理米蒂利尼和莱斯沃斯其他地方的诸般事务。

Upon the arrival of the prisoners with Salaethus, the Athenians at once put the latter to death, although he offered, among other things, to procure the withdrawal of the Peloponnesians from Plataea, which was still under siege; and after deliberating as to what they should do with the former, in the fury of the moment determined to put to death not only the prisoners at Athens, but the whole adult male population of Mitylene, and to make slaves of the women and children. It was remarked that Mitylene had revolted without being, like the rest, subjected to the empire; and what above all swelled the wrath of the Athenians was the fact of the Peloponnesian fleet having ventured over to Ionia to her support, a

fact which was held to argue a long meditated rebellion. They accordingly sent a galley to communicate the decree to Paches, commanding him to lose no time in dispatching the Mitylenians. The morrow brought repentance with it and reflection on the horrid cruelty of a decree, which condemned a whole city to the fate merited only by the guilty. This was no sooner perceived by the Mitylenian ambassadors at Athens and their Athenian supporters, than they moved the authorities to put the question again to the vote; which they the more easily consented to do, as they themselves plainly saw that most of the citizens wished some one to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for reconsidering the matter. An assembly was therefore at once called, and after much expression of opinion upon both sides, Cleon, son of Cleaenetus, the same who had carried the former motion of putting the Mitylenians to death, the most violent man at Athens, and at that time by far the most powerful with the commons, came forward again and spoke as follows:

萨莱苏斯与俘虏们一起到达雅典后，虽然他提出要为雅典人做事，其中包括使伯罗奔尼撒人从仍被围困的普拉蒂亚撤兵，他们还是立即将他处死了。然后，他们商议如何处理那些俘虏。出于一时激愤，他们决定不仅处死在雅典的那些俘虏，还要将米蒂利尼人当中的所有成年男子全部处死，并将妇女和儿童降为奴隶。他们说，米蒂利尼并没有像其他城邦一样被当作帝国的属邦看待，可他们竟然还反叛。尤其令雅典人气愤的是，伯罗奔尼撒的舰队竟敢开到爱奥尼亚去支援它，他们认为，这一事实证明，这次反叛是蓄谋已久的。因此，他们派了一艘三列桨战舰去向帕海斯传达这一决定，命令他刻不容缓地将米蒂利尼人处死。翌日，他们对此又有些后悔，反思到，这一政令残酷得可怕，它迫使整个一座城市落到了只有有罪者才应该得到的下场。身在雅典的米蒂利尼使者和支持他们的雅典人察觉到这种情况后，马上提请当局将这一问题再度付诸表决。当局自己也清楚地看

到，大部分公民都希望有人给他们一个重新考虑的机会，所以就比较痛快地同意了。于是，他们立即召开了一次公民大会，在双方充分表达意见之后，克莱埃内图斯的儿子克莱翁再次走上前来，处死米蒂利尼人的原有议案就是在他的鼓动下获得通过的。他是雅典看法最激烈的人，当时对平民的影响也最大。他的发言如下：

“I have often, before now, been convinced that a democracy is incapable of empire, and never more so than by your present change of mind in the matter of Mitylene. Fears or plots being unknown to you in your daily relations with each other, you feel just the same with regard to your allies, and never reflect that the mistakes into which you may be led by listening to their appeals, or by giving way to your own compassion, are full of danger to yourselves, and bring you no thanks for your weakness from your allies; entirely forgetting that your empire is a despotism and your subjects disaffected conspirators, whose obedience is ensured not by your suicidal concessions, but by the superiority given you by your own strength and not their loyalty. The most alarming feature in the case is the constant change of measures with which we appear to be threatened, and our seeming ignorance of the fact that bad laws which are never changed are better for a city than good ones that have no authority; that unlearned loyalty is more serviceable than quick-witted insubordination; and that ordinary men usually manage public affairs better than their more gifted fellows. The latter are always wanting to appear wiser than the laws, and to overrule every proposition brought forward, thinking that they cannot show their wit in more important matters, and by such behaviour too often ruin their country; while those who mistrust their own cleverness are content to be less learned than the laws, and less able to pick holes in the speech of a good speaker; and being fair judges rather than rival athletes, generally conduct affairs

successfully. These we ought to imitate, instead of being led on by cleverness and intellectual rivalry to advise your people against our real opinions.”

“以前我就常常认为，依靠民主管理不了帝国。现在看到你们在米蒂利尼问题上改变主意，我更加确信这一点了。在彼此之间的日常关系中，你们从不掺杂恐惧或阴谋，所以就以为你们的盟友也是这样。你们从来没有想过，你们因听从他们的恳求而犯下的错误，或者因听任怜悯之心的支配而犯下的错误，对你们自己来说危险重重，而你们的盟友却不会因为你们的软弱对你们有丝毫的感激。你们已经完全忘记，你们的帝国是一种专制政体，你们的臣民是心怀不满的谋反者。他们的服从，不是由于你们做出于己不利的让步，也不是由于对你们忠顺，而是由于你们自身的力量带给你们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最令人担忧的是，我们衡量问题的标准常常发生变化，同时我们似乎常常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一个城邦而言，一成不变的坏法律强于没有权威的好法律，无知而忠诚要比有智却不顺从更有用，普通人对公共事务的管理通常优于比较有才华的人。有才华的人总想显得比法律更高明，所以对人们提出的建议一概持否决态度，否则就觉得不能在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而这样做的结果却往往导致国家的毁灭。那些不相信自己聪明的人却甘于承认自己不如法律高明，甘于承认自己不太会从优秀演说家的演讲中寻找漏洞。他们是公正的裁判，而不是竞争的选手，所以他们处理事务通常比较成功。我们应当效法这些人，而不要为了斗才斗智去建议人民不要采纳我们真实的意见。

“For myself, I adhere to my former opinion, and wonder at those who have proposed to reopen the case of the Mitylenians, and who are thus causing a delay which is all in favour of the guilty, by making the sufferer proceed against the offender with the edge of his anger blunted; although where vengeance follows most closely

upon the wrong, it best equals it and most amply requites it. I wonder also who will be the man who will maintain the contrary, and will pretend to show that the crimes of the Mitylenians are of service to us, and our misfortunes injurious to the allies. Such a man must plainly either have such confidence in his rhetoric as to adventure to prove that what has been once for all decided is still undetermined, or be bribed to try to delude us by elaborate sophisms. In such contests the state gives the rewards to others, and takes the dangers for herself. The persons to blame are you who are so foolish as to institute these contests; who go to see an oration as you would to see a sight, take your facts on hearsay, judge of the practicability of a project by the wit of its advocates, and trust for the truth as to past events not to the fact which you saw more than to the clever strictures which you heard; the easy victims of new-fangled arguments, unwilling to follow received conclusions; slaves to every new paradox, despisers of the commonplace; the first wish of every man being that he could speak himself, the next to rival those who can speak by seeming to be quite up with their ideas by applauding every hit almost before it is made, and by being as quick in catching an argument as you are slow in foreseeing its consequences; asking, if I may so say, for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e live, and yet comprehending inadequately those very conditions; very slaves to the pleasure of the ear, and more like the audience of a rhetorician than the council of a city.”

“至于我自己，我依然坚持先前的意见。对于那些建议重新考虑米蒂利尼人问题的人，我感到诧异。他们这样做，将会造成延误，而延误只会对犯罪者有利，因为此时受害者对付加害者的怒火已经减弱。尽管恶行很快就有恶报，但最好报得同等，报得充分。如果有人坚持相反意见，企图证明米蒂利尼人的罪行对我们并非无用，而我们

的不幸对盟邦也造成了伤害，那么，我同样感到诧异。这种人显然要么是太相信自己的辩才，竟要证明已有定论的事依然悬而未决，要么就是受了贿赂，企图用精心准备的诡辩来欺骗我们。在这种辩论中，城邦将报偿给予别人，却会将危险留给自己。这都是你们之过，因为你们愚蠢地创立了这种辩论。你们去看一场演说，如同去看一种奇观，仅凭传闻，你们就信以为真；判断一项提议是否可行，看的是鼓吹者是否能言善辩；对往事的真实与否，信的是听到的巧言苛评，而不是眼见的事实。听到新奇的论点，你们就轻易相信，却不愿意采纳已被接受的结论。一有新的悖论，你们就追捧，却不将常识放在眼里。你们每个人的首要愿望都是自己能演说，其次是不亚于会演说的人，所以每逢演说者即将口吐妙语时就喝彩，仿佛自己完全跟得上演说者的思路，但是却敏于领会论点而迟于预见结论。你们总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寻求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境况不同的东西，却并不完全理解这些境况本身。你们是悦耳之辞的俘虏，与其说是一个城邦的议会，不如说更像是演说家脚下的听众。”

“In order to keep you from this, I proceed to show that no one state has ever injured you as much as Mitylene. I can make allowance for those who revolt because they cannot bear our empire, or who have been forced to do so by the enemy. But for those who possessed an island with fortifications; who could fear our enemies only by sea, and there had their own force of galleys to protect them; who were independent and held in the highest honour by you—to act as these have done, this is not revolt—revolt implies oppression; it is deliberate and wanton aggression; an attempt to ruin us by siding with our bitterest enemies; a worse offence than a war undertaken on their own account in the acquisition of power. The fate of those of their neighbours who had already rebelled and had been subdued was no lesson to them; their own prosperity could not dissuade them from affronting danger; but blindly confident in the future, and full of hopes beyond their

power though not beyond their ambition, they declared war and made their decision to prefer might to right, their attack being determined not by provocation but by the moment which seemed propitious. The truth is that great good fortune coming suddenly and unexpectedly tends to make a people insolent; in most cases it is safer for mankind to have success in reason than out of reason; and it is easier for them, one may say, to stave off adversity than to preserve prosperity. Our mistake has been to distinguish the Mitylenians as we have done; had they been long ago treated like the rest, they never would have so far forgotten themselves, human nature being as surely made arrogant by consideration as it is awed by firmness. Let them now therefore be punished as their crime requires, and do not, while you condemn the aristocracy, absolve the people. This is certain, that all attacked you without distinction, although they might have come over to us and been now again in possession of their city. But no, they thought it safer to throw in their lot with the aristocracy and so joined their rebellion! Consider therefore: if you subject to the same punishment the ally who is forced to rebel by the enemy, and him who does so by his own free choice, which of them, think you, is there that will not rebel upon the slightest pretext; when the reward of success is freedom, and the penalty of failure nothing so very terrible? We, meanwhile, shall have to risk our money and our lives against one state after another; and if successful, shall receive a ruined town from which we can no longer draw the revenue upon which our strength depends; while if unsuccessful, we shall have an enemy the more upon our hands, and shall spend the time that might be employed in combating our existing foes in warring with our own allies.”

“为了使你们摆脱这种状况，接下来我要说明，没有哪一个城邦比米蒂利尼带给你们的伤害更多。对于那些因为无法忍受我们的帝国

而叛离的人，或者那些为敌人所迫而反叛的人，我倒可以原谅。但是，倘若这样做的是那些拥有设防岛屿的人，那些仅需担心敌人从海上来犯而且在那里有自己的战舰力量来保护自己的人，那些独立而且受到你们最高礼遇的人，这就不是什么反叛——因为反叛意味着有压迫存在——这是蓄意而肆无忌惮的侵略，这是企图伙同我们的死敌毁灭我们的行为。这种罪行要比只为自己获得势力而发动战争更恶劣。他们的邻邦已经因反叛遭到镇压，他们却没有从邻邦的命运中汲取教训；他们自身拥有的繁荣，同样未能阻止他们铤而走险；他们盲目相信未来，内心满怀希望，这种希望虽未超出他们的野心，却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他们对我们宣了战，并且决定，宁要武力，不要公理。他们发动进攻，不是因为受到挑衅，而是因为时机似乎有利。事实上，突然之间意外降临的鸿运，往往会使一个民族目空一切。在多数情况下，对人类而言，合理获得的成功要比不合理获得的成功更牢靠。就他们而言，或许可以说，规避灾祸比保持繁荣更容易。我们以往错就错在将米蒂利尼人区别对待。假如我们早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对待他们，他们也不至于得意忘形。人的本性谅必就是这样：你敬他，他就傲慢；你强硬，他就生畏。那么，现在就让他们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吧！在给贵族定罪的同时，也不要赦免平民。他们肯定不分阶层，全都进攻过你们，尽管他们本来是可以投奔我们，重新拥有他们的城市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以为与贵族共命运更稳妥，所以参加了他们的反叛！因此，请好好想一想：如果你们赞成对那些被敌人所迫而反叛的盟友和自己选择反叛的人施予同样的处罚，那么，既然成功了就可以获得自由，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惩罚，你们想想，他们之中还有谁不会动不动就谋反？同时，我们既要耗费金钱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对付一个又一个城邦。即便胜了，我们得到的也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城镇，我们再也不能从中获取收入，而那恰恰是我们力量的基础；如果败了，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敌人，还得将本该用于与现有敌人作战的时间用来与我们自己的盟友打仗。”

“No hope, therefore, that rhetoric may instil or money purchase, of the mercy due to human infirmity must be held out to

the Mitylenians. Their offence was not involuntary, but of malice and deliberate; and mercy is only for unwilling offenders. I therefore, now as before, persist against your reversing your first decision, or giving way to the three failings most fatal to empire—pity, sentiment, and indulgence. Compassion is due to those who can reciprocate the feeling, not to those who will never pity us in return, but are our natural and necessary foes; the orators who charm us with sentiment may find other less important arenas for their talents, in the place of one where the city pays a heavy penalty for a momentary pleasure, themselves receiving fine acknowledgments for their fine phrases; while indulgence should be shown towards those who will be our friends in future, instead of towards men who will remain just what they were, and as much our enemies as before. To sum up shortly, I say that if you follow my advice you will do what is just towards the Mitylenians,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edient; while by a different decision you will not oblige them so much as pass sentence upon yourselves. For if they were right in rebelling, you must be wrong in ruling. However, if, right or wrong, you determine to rule, you must carry out your principle and punish the Mitylenians as your interest requires; or else you must give up your empire and cultivate honesty without danger. Make up your minds, therefore, to give them like for like; and do not let the victims who escaped the plot be more insensible than the conspirators who hatched it; but reflect what they would have done if victorious over you, especially they were the aggressors. It is they who wrong their neighbour without a cause, that pursue their victim to the death, on account of the danger which they foresee in letting their enemy survive; since the object of a wanton wrong is more dangerous, if he escape, than an enemy who has not this to complain of. Do not, therefore, be traitors to yourselves, but recall as nearly as possible the moment of suffering and the supreme importance which you then attached to their

reduction; and now pay them back in their turn, without yielding to present weakness or forgetting the peril that once hung over you. Punish them as they deserve, and teach your other allies by a striking example that the penalty of rebellion is death. Let them once understand this and you will not have so often to neglect your enemies while you are fighting with your own confederates.”

“因此，不要让米蒂利尼人怀有希望，以为凭着人类的弱点就可以通过巧言劝诱或金钱收买的方式得到宽恕。他们不是身不由己地犯下了罪行，而是恶意蓄意而为。宽恕只能施予非有意犯罪者。所以，我现在还是和以前一样，坚持认为你们不应当改变最初的决定，也不应当让步于对帝国最致命的三大弱点——易生怜悯，感情用事，宽大为怀。怜悯应当施予同样具有怜悯之心的人，而不应当施予那些从不以怜悯相报、反而是那些天然和势必与我们为敌的人；那些以情打动我们的演说家，可以到其他不太重要的场所去施展他们的才能，而不能在城邦会为一时的愉悦而付出惨重代价的地方，尽管他们自己会因漂亮的言词而赢得好评；宽容只应给予将来与我们为友的人，而不能给予那些依然故我、像以前一样以我们为敌的人。简要地概括起来，我想说的是，如果采纳我的建议，你们不仅对米蒂利尼人做得正当，同时也对你们自己有利。如果采取不同的决定，不仅不会得到他们的感激，甚至等于宣判自己有罪。既然他们反叛有理，那么，一定是你们统治有误。然而，对错姑且不论，既然你们决心维持统治，那就必须贯彻原则，按照自己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惩罚米蒂利尼人，否则就得放弃自己的帝国，安然地去博取正直的美名。因此，要下定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要令逃过了阴谋的受害者比策划阴谋的人更迟钝。好好想一想，如果他们胜过你们，他们会做什么，尤其是因为他们是侵略者。无故伤害邻人的人，会将受害者追杀至死，因为他们知道让敌人活着有何危险；无故受到伤害的人，如果能脱逃，会比无此怨恨的敌人更危险。因此，不要违背自己的心意，尽可能回想一下你们感到痛苦的那一刻，以及你们当时认为镇压他们的极端重要性，现在就以牙还牙吧！不要被目前的软弱所阻，也不要忘记曾经悬

在你们头上的危险。要给予他们应得的惩罚，用触目惊心的例子告诉其他盟邦：反叛者只有死路一条。一旦让他们明白这一点，你们就不必因为常常要与自己的盟邦作战而忽略你们的敌人了。”

Such were the words of Cleon. After him Diodotus, son of Eucrates, who had also in the previous assembly spoken most strongly against putting the Mitylenians to death, came forward and spoke as follows:

这是克莱翁的发言。在他之后，埃夫克拉泰斯的儿子狄奥多托斯走上前来。在上次会议上，他也发了言，而且是反对处死米蒂利尼人这一主张最坚决的一个。他的发言如下：

“I do not blame the persons who have reopened the case of the Mitylenians, nor do I approve the protests which we have heard against important questions being frequently debated. I think the two things most opposed to good counsel are haste and passion; haste usually goes hand in hand with folly, passion with coarseness and narrowness of mind. As for the argument that speech ought not to be the exponent of action, the man who uses it must be either senseless or interested; senseless if he believes it possible to treat of the uncertain future through any other medium; interested if, wishing to carry a disgraceful measure and doubting his ability to speak well in a bad cause, he thinks to frighten opponents and hearers by well-aimed calumny. What is still more intolerable is to accuse a speaker of making a display in order to be paid for it. If ignorance only were imputed, an unsuccessful speaker might retire with a reputation for honesty, if not for wisdom; while the charge of dishonesty makes him suspected, if successful, and thought, if

defeated, not only a fool but a rogue. The city is no gainer by such a system, since fear deprives it of its advisers; although in truth, if our speakers are to make such assertions, it would be better for the country if they could not speak at all, as we should then make fewer blunders. The good citizen ought to triumph not by frightening his opponents but by beating them fairly in argument; and a wise city, without over-distinguishing its best advisers, will nevertheless not deprive them of their due, and, far from punishing an unlucky counsellor, will not even regard him as disgraced. In this way, successful orators would be least tempted to sacrifice their convictions to popularity, in the hope of still higher honours, and unsuccessful speakers to resort to the same popular arts in order to win over the multitude."

"我不想责备那些提议重新讨论米蒂利尼人问题的人，我也不赞成刚才听到的反对将重要问题提出来频频讨论的主张。我认为，草率和感情用事是合理决策的两个大敌。草率通常与愚蠢相随，感情用事往往与粗鲁和心胸狭窄为伴。主张言辞不应代表行动的人，如果不是愚蠢，肯定就是有私心。如果他认为可以通过其他媒介来讨论不可知的未来，那是愚蠢；如果他想让一项不光彩的议案获得通过，但又拿不准自己是否具备能将无理说成有理的能力，所以就想用恶意的诽谤来恐吓反对者和听众，那就是有私心。更加不能容忍的是，谴责发言者故意炫耀竟是为了获取报酬。如果只是责难发言者无知，那么，无法说服听众时，他还可以退出辩论，即便不能赢得智慧之名，至少可以保有诚实的名声。但是，如果指责他不诚实，即便成功了，他也会受到怀疑；倘若失败了，那就不仅会被人看作愚蠢之人，而且会被人看作恶徒。这种做法对城邦毫无益处可言，因为恐惧会使人不敢谏言。假如我们的发言者也如此断言，那么，他们根本不发言其实对城邦更好，那样，我们就会少犯些错误。一个好的公民，不应当为吓倒对手而得意，而应当为在辩论中公平地战胜对手而欢欣。一个聪明的城邦，虽然不会对最出色的建言者给予过高的荣耀，但也不会剥夺他

们应得的荣誉；对运气不好的建言者非但不会惩处，甚至不会认为他有何不光彩。这样，成功的发言者至少不会为了迎合大众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以期获得更高的荣誉；不成功的发言者也不会为了笼络人心而采用同样的逢迎手法。”

“This is not our way; and, besides, the moment that a man is suspected of giving advice, however good, from corrupt motives, we feel such a grudge against him for the gain which after all we are not certain he will receive, that we deprive the city of its certain benefit. Plain good advice has thus come to be no less suspected than bad; and the advocate of the most monstrous measures is not more obliged to use deceit to gain the people, than the best counsellor is to lie in order to be believed. The city and the city only, owing to these refinements, can never be served openly and without disguise; he who does serve it openly being always suspected of serving himself in some secret way in return. Still, considering the magnitude of the interests involved, and the position of affairs, we orators must make it our business to look a little farther than you who judge offhand; especially as we, your advisers, are responsible, while you, our audience, are not so. For if those who gave the advice, and those who took it, suffered equally, you would judge more calmly; as it is, you visit the disasters into which the whim of the moment may have led you upon the single person of your adviser, not upon yourselves, his numerous companions in error.”

“我们却不是这样。此外，一旦人们怀疑一个人出于私利提出建议，无论建议本身有多好，我们都会因为他获得了私利而对他心怀怨恨，尽管私利事实上并未被证实，因而使城邦无法从建议中获得一定的益处。因此，明显有益的建议与有害的建议同样被人怀疑，提出最

荒谬建议的人为了争取民众必须采用欺骗手段，最出色的建言者为了使人相信同样也需要撒谎。这个城邦，唯有这个城邦，由于这些微妙的区别，从来不能让人公开而光明正大地为它服务。公开为它服务的人，总是被怀疑在为自己暗中谋取回报。尽管如此，考虑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牵涉到的利益之广，以及事情之重要，我们这些演说人必须得比席下判断的你们看得远些，尤其是考虑到我们是要负责任的，而你们则不必，因为我们是向你们提出建议的人，你们则是我们的听众。如果采纳建议的人和提出建议的人同样受罚，你们会更冷静地作出判断。事实上，你们出于一时冲动遭了殃时，迁怒的对象是当初提出建议的那个人，而不是你们自身——众多与他一同出错的人。”

“However, I have not come forward either to oppose or to accuse in the matter of Mitylene; indeed, the question before us as sensible men are not their guilt, but our interests. Though I prove them ever so guilty, I shall not, therefore, advise their death, unless it be expedient; nor though they should have claims to indulgence, shall I recommend it, unless it be dearly for the good of the country. I consider that we are deliberating for the future more than for the present; and where Cleon is so positive as to the useful deterrent effects that will follow from making rebellion capital, I, who consider the interests of the future quite as much as he, as positively maintain the contrary. And I require you not to reject my useful considerations for his specious ones; his speech may have the attraction of seeming the more just in your present temper against Mitylene; but we are not in a court of justice, but in a political assembly; and the question is not justice, but how to make the Mitylenians useful to Athens.”

“但是，我之所以站出来，不是要就米蒂利尼问题表示反对，也

不是要进行指责。实际上，如果我们是明智的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不是他们是否有罪，而是如何对我们有益。尽管我可以证明他们罪大恶极，但是我不会因此而建议处死他们，除非这样做对我们有利；尽管他们可以要求赦免，我也不会建议这样做，除非这样做对城邦十分有益。我认为，我们要谋划未来，而不是现在。克莱翁确信，如果将反叛定为死罪，一定会产生有效的威慑作用。我对未来利益的关注并不亚于他，但我的意见和他的完全相反。我请求诸位，不要因为他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而否决我提出的有用建议。若论哪个更顺应你们目前对米蒂利尼的情绪，他的发言似乎更具吸引力。但是，我们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政治会议上。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不是法律制裁，而是如何处置米蒂利尼人对雅典有益。”

“Now of course communities have enacted the penalty of death for many offences far lighter than this; still hope leads men to venture, and no one ever yet put himself in peril without the inward conviction that he would succeed in his design. Again, was there ever city rebelling that did not believe that it possessed either in itself or in its alliances resources adequate to the enterprise? All, states and individuals, are alike prone to err, and there is no law that will prevent them; or why should men have exhausted the list of punishments in search of enactments to protect them from evildoers? It is probable that in early times, the penalties for the greatest offences were less severe, and that, as these were disregarded, the penalty of death has been by degrees in most cases arrived at, which is itself disregarded in like manner. Either then some means of terror more terrible than this must be discovered, or it must be owned that this restraint is useless; and that as long as poverty gives men the courage of necessity, or plenty fills them with the ambition which belongs to insolence and pride, and the other conditions of life remain each under the thraldom of some fatal and master passion, so long will the impulse never be wanting

to drive men into danger. Hope also and cupidity, the one leading and the other following, the one conceiving the attempt, the other suggesting the facility of succeeding, cause the widest ruin, and, although invisible agents, are far stronger than the dangers that are seen. Fortune, too, powerfully helps the delusion and, by the unexpected aid that she sometimes lends, tempts men to venture with inferior means; and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with communities, because the stakes played for are the highest, freedom or empire, and, when all are acting together, each man irrationally magnifies his own capacity. In fine, it is impossible to prevent, and only great simplicity can hope to prevent, human nature doing what it has once set its mind upon, by force of law or by any other deterrent force whatsoever."

"当然，某些城邦对远轻于此的不少罪行都处以死刑，但还是有人怀抱希望以身试法。在投身于危险之中时，从来没有人内心觉得自己的计划不会成功。城邦也是这样。要不是相信自己或自己的盟邦所拥有的资源足以支撑这种冒险，哪个城邦会发动反叛？无论是城邦还是个人，全都容易犯错，没有哪条法律能够阻止。否则，人们为什么遍试各种惩罚，以求找到保护自己不受坏人侵犯的法令法规呢？或许早期对极为严重的罪行处罚没那么严苛，由于引不起人们的重视，后来大多逐渐以死刑论处，不过同样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我们要么必须找到比这更可怕的恐怖手段，要么就得承认这种约束办法不起作用。只要贫穷迫使人放胆妄为，只要富裕促使人蛮傲而充满野心，只要其他各种生活状况都会使人处于某种不可救药的强烈欲望支配之下，人们就绝不会缺乏铤而走险的冲动。希望同样使人如此。贪欲和希望前后相随，一个使人跃跃欲试，另一个使人觉得能轻易成功，结果却是彻底毁灭。虽然无影无形，二者却远比看得见的危险还要强劲。幸运同样会使人产生强烈的非分之想。有时，意外降临的幸运会诱使人们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就城邦而言，情况尤其是这样，因为所下的赌注最大，不是自由，就是帝国。当大家一起

行动时，每个人都会不合理地夸大自己的能力。总之，人若出于本性决心去做什么事，无论通过法律的力量，还是通过其他任何威慑力量，都无法予以阻止，只有头脑过于简单的人才会希望做到这一点。”

“We must not, therefore, commit ourselves to a false policy through a belief in the efficacy of the punishment of death, or exclude rebels from the hope of repentance and an early atonement of their error. Consider a moment. At present, if a city that has already revolted perceives that it cannot succeed, it will come to terms while it is still able to refund expenses, and pay tribute afterwards. In the other case, what city, think you, would not prepare better than is now done, and hold out to the last against its besiegers, if it is all one whether it surrender late or soon? And how can it be otherwise than hurtful to us to be put to the expense of a siege, because surrender is out of the question; and if we take the city, to receive a ruined town from which we can no longer draw the revenue which forms our real strength against the enemy? We must not, therefore, sit as strict judges of the offenders to our own prejudice, but rather see how by moderate chastisements we may be enabled to benefit in future by the revenue-producing powers of our dependencies; and we must make up our minds to look for our protection not to legal terrors but to careful administration. At present we do exactly the opposite. When a free community, held in subjection by force, rises, as is only natural, and asserts its independence, it is no sooner reduced than we fancy ourselves obliged to punish it severely; although the right course with freemen is not to chastise them rigorously when they do rise, but rigorously to watch them before they rise, and to prevent their ever entertaining the idea, and, the insurrection suppressed, to make as few responsible for it as possible.”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相信死刑的效力就采取错误的政策，也不能剥夺反叛者悔过的希望和早日赎罪的机会。请大家想一想。现在，假如一个城邦已经叛变，但后来发觉无法取得成功，倘若它仍有能力支付赔款，以后也能缴纳贡金，它一定会求和。相反，诸位想想，如果投降早晚都一样，哪个城邦不会比现在准备得更充分，并且在被围困时坚持到底呢？因为投降无从谈起，我们就要在修筑围城上花费费用，这对于我们除了有害还有其他吗？即便我们攻克了那座城市，接受的也是一个被毁灭的城市，我们再也不能从那里获取税收，而这种收入正是支撑我们抵御敌人的真正力量。因此，我们不能在罪犯面前扮演严厉的法官，这样反而对我们自己不利，而是要想办法通过适度的惩罚使我们从属邦日后源源不断的纳税能力中而受益。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不从合法的恐怖手段中寻求保护，而是要诉诸于审慎的管理。目前我们所做的却恰恰相反。当一个被我们以武力征服的自由城邦起来反抗（这是很自然的）并宣布独立时，我们刚一制服它，就认为必须严厉惩罚它。但是，自由民起来反抗时，对待他们的正确方式不是严厉惩处，而是在他们发动反抗前就严密监视他们，让他们连造反的念头都不会产生。即便要对起义进行镇压，也要尽可能限于少数罪魁祸首。”

“Only consider what a blunder you would commit in doing as Cleon recommends. As things are at present, in all the cities the people is your friend, and either does not revolt with the oligarchy, or, if forced to do so, becomes at once the enemy of the insurgents; so that in the war with the hostile city you have the masses on your side. But if you butcher the people of Mitylene, who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evolt, and who, as soon as they got arms, of their own motion surrendered the town, first you will commit the crime of killing your benefactors; and next you will play directly into the hands of the higher classes, who when they induce their cities to rise, will immediately have the people on their side, through your

having announced in advance the same punishment for those who are guilty and for those who are not. On the contrary, even if they were guilty, you ought to seem not to notice it, in order to avoid alienating the only class still friendly to us. In short, I consider it far more useful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our empire voluntarily to put up with injustice, than to put to death, however justly, those whom it is our interest to keep alive. As for Cleon's idea that in punishment the claims of justice and expediency can both be satisfied, facts do not confirm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combination.”

“只要考虑一下就会知道，如果采纳克莱翁的建议，你们将会铸下多么大的错啊！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各个城邦，人民都是你们的盟友，他们不会与寡头统治集团一起反叛。即便被迫这样做，他们也会很快与叛乱分子为敌。因此，在与敌对城邦的战争中，人民大众是站在你们一边的。米蒂利尼的人民与反叛毫无关联，一旦得到武器，他们就会主动将城献出来，但是，如果你们屠杀他们，首先，你们会犯罪，而且杀的是支持你们的人；其次，你们会直接给上层阶级以可乘之机。当他们鼓动自己的城邦起来反叛时，人民会立即站到他们一边，因为你们已经预先宣布，无论有罪还是无罪，处罚都是一样。相反，纵然他们有罪，为了避免唯一与我们保持友好的阶级与我们疏离，你们也应当佯装不知。总之，我认为，为了维持帝国的生存，无论处死他们多么正当，都不如容忍不公更有用，因为让他们活着更符合我们的利益。克莱翁认为，通过惩罚，正义和自身利益这两方面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但事实却证明，没有这种两全其美的可能。”

“Confess, therefore, that this is the wisest course, and without conceding too much either to pity or to indulgence, by neither of which motives do I any more than Cleon wish you to be influenced, upon the plain merits of the case before you, be persuaded by me to try calmly those of the Mitylenians whom Paches sent off as guilty,

and to leave the rest undisturbed. This is at once best for the future, and most terrible to your enemies at the present moment; inasmuch as good policy against an adversary is superior to the blind attacks of brute force.”

“因此，那就坦白地承认，这是最明智的做法。不必过多地怀有怜悯或宽容之心。其实，我和克莱翁一样，并不希望你们受其中任何一种情绪的影响。我只想劝你们，根据摆在面前的明显事实，冷静地审判帕海斯认为有罪而送来的那些米蒂利尼人，让其余的人安安生生地活着。这样做不仅对将来最有利，当下也让敌人最头痛，因为靠良策制敌胜于靠暴力盲攻。”

Such were the words of Diodotus. The two opinions thus expressed were the ones that most directly contradicted each other; and the Athenians, notwithstanding their change of feeling, now proceeded to a division, in which the show of hands was almost equal, although the motion of Diodotus carried the day. Another galley was at once sent off in haste, for fear that the first might reach Lesbos in the interval, and the city be found destroyed; the first ship having about a day and a night's start. Wine and barley-cakes were provided for the vessel by the Mitylenian ambassadors, and great promises made if they arrived in time; which caused the men to use such diligence upon the voyage that they took their meals of barley-cakes kneaded with oil and wine as they rowed, and only slept by turns while the others were at the oar. Luckily they met with no contrary wind, and the first ship making no haste upon so horrid an errand, while the second pressed on in the manner described, the first arrived so little before them, that Paches had only just had time to read the decree, and to prepare to execute the sentence, when the second put into port and prevented the

massacre. The danger of Mitylene had indeed been great.

这是狄奥多托斯的发言。以上陈述的两种意见彼此截然对立。雅典人虽然情绪有变，这时还是产生了分歧。举手表决时，双方的票数几乎相等，但狄奥多托斯的动议获得了通过。雅典人立刻又赶紧派出一艘三列桨战舰，生怕前一艘在这艘赶到之前就已抵达莱斯沃斯发现城被毁了。头一艘战舰大约已启航一天一夜了。米蒂利尼的使者给这艘战舰准备了酒和大麦饼，并向水手们许诺：若能及时赶到，必有重赏。此言一出，水手们在航行中十分卖力。吃饭时，他们一边嚼着掺有油和酒鞣制而成的大麦饼，一边手不停歇地划桨。睡觉也轮班进行，总有人在划着桨。幸运的是，他们没有遇上逆风，担负着如此可怕使命的前一艘舰也没有急于前行，第二艘又这样紧赶慢赶，结果前一艘战舰仅比他们稍微早到了一点儿。帕海斯刚看完命令准备执行判决，第二艘战舰就进了港，从而阻止了这场屠杀。米蒂利尼真是间不容发地逃脱了危险。

The other party whom Paches had sent off as the prime movers in the rebellion, were upon Cleon's motion put to death by the Athenians, the number being rather more than a thousand. The Athenians also demolished the walls of the Mitylenians, and took possession of their ships. Afterwards tribute was not imposed upon the Lesbians; but all their land, except that of the Methymnians, was divided into three thousand allotments, three hundred of which were reserved as sacred for the gods, and the rest assigned by lot to Athenian shareholders, who were sent out to the island. With these the Lesbians agreed to pay a rent of two minae a year for each allotment, and cultivated the land themselves. The Athenians also took possession of the towns on the continent belonging to the Mitylenians, which thus became for the future subject to Athens. Such were the events that took place at Lesbos.

在克莱翁的提议下，帕海斯作为主要叛乱分子送去的那批人都被雅典人处死了，数目达1,000人以上。雅典人还拆毁了米蒂利尼人的城墙，夺取了他们的战舰。后来，他们虽然没向莱斯沃斯人征收贡金，却把他们所有的土地（迈西姆纳人的除外）分成了3,000块份地，其中300块留作献给诸神的圣地，其余的都以抽签的方式分配给了雅典派往该岛的份地持有人。莱斯沃斯人同意由自己耕种这些份地，每块地一年上交两个迈纳的租金。雅典人还占领了大陆上原属于米蒂利尼人的各个城镇，这些城镇后来就这样变成了雅典的属地。这就是莱斯沃斯岛发生的事情。

CHAPTER X Fifth Year of the War—Trial and Execution of the Plataeans— Corcyraean Revolution

第十章　战争第五年——对普拉蒂亚人的审判与处决——克基拉的革命

During the same summer, after the reduction of Lesbos, the Athenians under Nicias, son of Niceratus, made an expedition against the island of Minoa, which lies off Megara and was used as a fortified post by the Megarians, who had built a tower upon it. Nicias wished to enable the Athenians to maintain their blockade from this nearer station instead of from Budorum and Salamis; to stop the Peloponnesian galleys and privateers sailing out unobserved from the island, as they had been in the habit of do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prevent anything from coming into Megara. Accordingly, after taking two towers projecting on the side of Nisaea, by engines from the sea, and clearing the entrance into the channel between the island and the shore, he next proceeded to cut off all communication by building a wall on the mainland at the point where a bridge across a morass enabled succours to be thrown

into the island, which was not far off from the continent. A few days sufficing to accomplish this, he afterwards raised some works in the island also, and leaving a garrison there, departed with his forces.

同年夏季，雅典人征服了莱斯沃斯岛之后，在尼塞拉图斯之子尼西亚斯的率领下，对米诺阿岛发起了远征。米诺阿岛位于迈加拉附近，迈加拉人将它作为设防据点使用，所以在岛上建了一个塔楼。这个位置离迈加拉比较近，尼西亚斯想让雅典军队从这里而不是布佐鲁姆和萨拉米斯实施封锁，并阻止伯罗奔尼撒的三列桨战舰和私掠船偷偷从岛内驶出（它们惯常如此），同时也阻止任何船只进入迈加拉。于是，他先从海上用攻城器械夺取了向尼塞阿一侧突出的两个塔楼，为进入该岛与海岸之间的海峡扫清了障碍。接着，他切断了所有交通通道，采取的办法是在大陆上筑起一道墙，墙体所在之处有一座横跨沼泽地的桥，可将援军送到岛上，因为这个岛离大陆不远。数日之后，工程就完工了。他后来又在岛上修建了一些工事，尔后留下一支守军，他就率部队离开了。

About the same time, in this summer, the Plataeans, being now without provisions and unable to support the siege, surrendered to the Peloponnesians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An assault had been made upon the wall, which the Plataeans were unable to repel. The Lacedaemonian commander, perceiving their weakness, wished to avoid taking the place by storm; his instructions from Lacedaemon having been so conceived, in order that if at any future time peace should be made with Athens, and they should agree each to restore the places that they had taken in the war, Plataea might be held to have come over voluntarily, an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list. He accordingly sent a herald to them to ask if they were willing voluntarily to surrender the town to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ccept them as their judges, up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guilty should be punished, but no one without form of law. The Plataeans were now in the last state of weakness, and the herald had no sooner delivered his message than they surrendered the town. The Peloponnesians fed them for some days until the judges from Lacedaemon, who were five in number, arrived. Upon their arrival no charge was preferred; they simply called up the Plataeans, and asked them whether they had done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llies any service in the war then raging. The Plataeans asked leave to speak at greater length, and deputed two of their number to represent them: Astymachus, son of Asopolaus, and Lacon, son of Aeimnestus, proxenus of the Lacedaemonians, who came forward and spoke as follows:

大约在这年夏季的同一时候，已经断粮的普拉蒂亚人无法再抵御围城的军队，向伯罗奔尼撒人投了降。事情的经过如下：伯罗奔尼撒人向城墙发起突击，普拉蒂亚人无力抵抗。斯巴达的指挥官察觉到他们的弱点之后，希望避免使用强攻的方式夺取这个地方，他从斯巴达接到的指令也是此意。这样一来，将来需要与雅典议和而双方又同意归还在战争中的攻取之地时，他们就可以将普拉蒂亚当作自动归顺者，不必将它纳入归还之列。于是，他派了一名传令官去询问他们，基于有罪者必须受罚，但一定是依法进行这一共识，他们是否愿意自动将城交给斯巴达人并接受他们的审判。普拉蒂亚人此时已弱不堪击，传令官刚传达完他带来的口信，他们就把城交出去了。伯罗奔尼撒人为他们提供了数日伙食之后，斯巴达派来的五名法官才到。他们抵达之后，并没有对普拉蒂亚人提出指控，只是将他们召集起来询问他们，在当时仍在进行的战争中，他们是否曾为斯巴达人及其盟友效过力。普拉蒂亚人请求准许他们比较详细地作个发言，并推举出两个人作为他们的代表，即阿索波拉夫斯的儿子阿斯蒂马胡斯和埃伊姆内斯图斯的儿子拉孔，后者是斯巴达人的代理人。这两个人站出来，作了如下发言：

“Lacedaemonians, when we surrendered our city we trusted in you, and looked forward to a trial more agreeable to the forms of law than the present, to which we had no idea of being subjected; the judges also in whose hands we consented to place ourselves were you, and you only (from whom we thought we were most likely to obtain justice), and not other persons, as is now the case. As matters stand, we are afraid that we have been doubly deceived. We have good reason to suspect, not only that the issue to be tried is the most terrible of all, but that you will not prove impartial; if we may argue from the fact that no accusation was first brought forward for us to answer, but we had ourselves to ask leave to speak, and from the question being put so shortly, that a true answer to it tells against us, while a false one can be contradicted. In this dilemma, our safest, and indeed our only course, seems to be to say something at all risks; placed as we are, we could scarcely be silent without being tormented by the damning thought that speaking might have saved us. Another difficulty that we have to encounter is the difficulty of convincing you. Were we unknown to each other we might profit by bringing forward new matter with which you were unacquainted; as it is, we can tell you nothing that you do not know already, and we fear, not that you have condemned us in your own minds of having failed in our duty towards you, and make this our crime, but that to please a third party we have to submit to a trial the result of which is already decided. Nevertheless, we will place before you what we can justly urge, not only on the question of the quarrel which the Thebans have against us, but also as addressing you and the rest of the Hellenes; and we will remind you of our good services, and endeavour to prevail with you.”

“斯巴达人：我们将城市交出去时，我们是信任你们的。我们希望受到的审判，要比现在更符合法律程序，没想到竟会遇到目前这种情况。另外，我们同意将自己交到其手中的法官是你们，而且只是你们（我们以为从你们手中最有可能获得公正），不是像现在这样交到他人手中。事实上，我们在这两点上恐怕都会失望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猜测，要审理的问题极为重大，而你们不会公正行事。我们的猜测或许可以基于这样的事实：你们没有事先提出指控要求我们申辩，而是我们自己要求准许我们发言的。你们如此简短干脆地提出的问题，我们若照实回答，肯定对我们不利；我们若假言以对，又会遭到反驳。在这种两难境地，最保险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唯一的办法，似乎是不顾一切地说出心中所想。尽管落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是无法保持沉默，否则，日后一想到当初如果说出来便有可能获救，我们肯定会懊恼不已。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是说服你们。倘若我们彼此不熟悉，或许我们可以提出对我们有利而你们不了解的新理由。可实际上，我们能说的你们已经了然，我们所担心的，不是你们谴责我们没履行对你们的义务，并以此为由向我们问罪，而是担心你们为了取悦第三方而让我们接受一场结局已定的审判。不过，我们还是要在你们面前据理力争，不仅是在底比斯人与我们不和的问题上，而且对你们和其他希腊人同样想说几句。我们要提醒你们一下我们有何功劳，尽力使你们理解我们的想法。”

“To your short question, whether we have done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any service in this war, we say, if you ask us as enemies, that to refrain from serving you was not to do you injury; if as friends, that you are more in fault for having marched against us. During the peace, and against the Mede, we acted well; we have not now been the first to break the peace, and we were the only Boeotians who then joined in defending against the Mede forthe liberty of Hellas. Although an inland people, we were present at the action at Artemisium; in the battle that took place in our territory we fought by the side of yourselves and

Pausanias; and in all the other Hellenic exploits of the time we took a part quite out of proportion to our strength. Besides, you, as Lacedaemonians, ought not to forget that at the time of the great panic at Sparta, after the earthquake, caused by the secession of the Helots to Ithome, we sent the third part of our citizens to assist you."

"对于你们那个简短的问题，即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是否为斯巴达人及其盟友效过力，我们想指明的是，如果你们是作为敌人问我们这个问题的，那么没有为你们效力就不能被称作是对你们的伤害；如果是作为朋友，那么，你们向我们进军，更有错的一方是你们。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抗击波斯人期间，我们都做得很好。现在我们也没有带头破坏和平，当初我们是唯一在抗击波斯过程中投身于希腊解放事业的维奥蒂亚人。我们虽然是内陆民族，却参加了在阿提密喜安举行的海上行动。在那场发生在我们自己领土的战役中，我们曾与你们和保萨尼阿斯并肩作战。在希腊人那时所完成的所有其他壮举中，我们都尽了一份超出自己能力的责任。此外，作为斯巴达人，你们不应当忘记，地震之后，希洛人要离开你们跑到伊索迈去，这一消息在斯巴引起巨大恐慌，我们派了三分之一的公民去援助你们。"

"On these great and historical occasions, such was the part that we chose, although afterwards we became your enemies. For this you were to blame. When we asked for your alliance against our Theban oppressors, you rejected our petition, and told us to go to the Athenians who were our neighbours, as you lived too far off. In the war we never have done to you, and never should have done to you, anything unreasonable. If we refused to desert the Athenians when you asked us, we did no wrong; they had helped us against the Thebans when you drew back, and we could no longer give them up with honour; especially as we had obtained their alliance

and had been admitted to their citizenship at our own request, and after receiving benefits at their hands; but it was plainly our duty loyally to obey their orders. Besides, the faults that either of you may commit in your supremacy must be laid, not upon the followers, but on the chiefs that lead them astray.”

“在这些重大的历史时刻，我们选择了走以上这样的道路，尽管我们后来成了你们的敌人。在这一点上，你们是有责任的。当我们要求与你们联合对付压迫我们的底比斯人时，你们拒绝了我们的请求，还要我们去找雅典人，理由是他们是我们的近邻，而你们住得离我们太远。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对你们从来没有，也不会有任何过分之举。即便我们在你们要求我们叛离雅典人时表示了拒绝，我们也没有做错。当你们拒绝伸出援手时，他们帮助我们抵御了底比斯人。我们若是放弃他们，那就不再有名誉可言，尤其是因为我们与他们结盟并且依照我们的请求获得了他们的公民权。从他们那里受益之后，我们自然有义务忠实地服从他们的命令。此外，你们两方在行使盟主之权时犯下的错，不应当归罪于追随者，而是应当记在将他们引入歧途的领导者头上。”

“With regard to the Thebans, they have wronged us repeatedly, and their last aggression, which has been the means of bringing us into our present position, is within your own knowledge. In seizing our city in time of peace and what is more at a holy time in the month, they justly encountered our venge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versal law which sanctions resistance to an invader; and it cannot now be right that we should suffer on their account. By taking your own immediate interest and their animosity as the test of justice, you will prove yourselves to be rather waiters on expediency than judges of right; although if they seem useful to you now, we and the rest of the Hellenes gave you much more valuable

help at a time of greater need. Now you are the assailants, and others fear you; but at the crisis to which we allude, when the barbarian threatened all with slavery, the Thebans were on his side. It is just, therefore, to put our patriotism then against our error now, if error there has been; and you will find the merit outweighing the fault, and displayed at a juncture when there were few Hellenes who would set their valour against the strength of Xerxes, and when greater praise was theirs who preferred the dangerous path of honour to the safe course of consulting their own interest with respect to the invasion. To these few we belonged, and highly were we honoured for it; and yet we now fear to perish by having again acted on the same principles, and chosen to act well with Athens sooner than wisely with Sparta. Yet in justice the same cases should be decided in the same way, and policy should not mean anything else than lasting gratitude for the service of good ally combined with a proper attention to one's own immediate interest.”

“至于底比斯人，他们曾屡次侵犯我们。他们最近一次侵略行为使我们落入了目前的境地，这一点你们自己也心知肚明。他们企图夺取我们的城市一事，发生在和平时期，而且是在那个月的神圣时刻。我们施以报复是理所应当的，也符合抗击侵略者这条公理。但是，现在我们却因为他们在承受痛苦，这不能说是合乎情理的。你们若是以自己当前的利益和他们的憎恶作为审判标准，只能证明你们不是正义的法官，而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尽管他们现在对你们似乎很有帮助，但是在你们更危难的时候，我们和其他希腊人曾给过你们更有价值的帮助。你们现在是进攻者，其他人都惧怕你们。但是，在我们提及的危机时刻，当大家都面临着被蛮族人奴役的危险时，底比斯人是站在蛮族人一边的。因此，即便我们确有过失，也应当将我们那时的爱国主义行为和现在的过错作个比较，你们将会发现，我们功大于过，而且是在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那时候，很少有希腊人愿意勇敢地站出

来抵抗薛西斯的大军；那时候，得到更多称赞的人，是那些面对侵略宁选择光荣而危险之路也不以稳妥的方式顾及自己利益的人。我们就属于那少数人之列，因而深受大家尊重。可是，我们现在却在担心自己是否会丧命，因为我们再次践行了同样的原则，选择了对得起雅典，而没有精明地站在斯巴达一边。但是，公平而论，同样的情况应当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政策须既适当地顾及自己现有的利益，又体现出对友邦之助永表感激。”

“Consider also that at present the Hellenes generally regard you as a pattern of worth and honour; and if you pass an unjust sentence upon us in this which is no obscure cause, but one in which you, the judges, are as illustrious as we, the prisoners, are blameless, take care that displeasure be not felt at an unworthy decision in the matter of honourable men made by men yet more honourable than they, and at the consecration in the national temples of spoils taken from the Plataeans, the benefactors of Hellas. Shocking indeed will it seem for Lacedaemonians to destroy Plataea, and for the city whose name your fathers inscribed upon the tripod at Delphi for its good service, to be by you blotted out from the map of Hellas, to please the Thebans. To such a depth of misfortune have we fallen that, while the Medes' success had been our ruin, Thebans now supplant us in your once fond regards; and we have been subjected to two dangers, the greatest of any—that of dying of starvation then, if we had not surrendered our town, and now of being tried for our lives. So that we Plataeans, after exertions beyond our power in the cause of the Hellenes, are rejected by all, forsaken and unassisted; helped by none of our allies, and reduced to doubt the stability of our only hope, yourselves.”

“另外也要考虑到，希腊人目前普遍将你们视为价值和荣誉的典范。你们这些审判官声名显赫，我们这些俘虏也没有过错，因此，这场审判绝无不为人知晓之理。倘若你们在这次审判中对我们作出不公正的判决，当心触怒舆论，谴责你们这些更值得尊敬的人对值得尊敬的人作出不应有的判决，谴责你们将从有恩于希腊的普拉蒂亚人那里掠取的战利品奉献到国家神庙中。你们斯巴达人的父辈曾将这座城市的名字刻在德尔斐神殿的青铜三角祭坛上，以表彰它立下的功劳。如果你们将普拉蒂亚毁灭，如果你们为了取悦底比斯人而将这座城市从希腊的版图上抹掉，那就实在太令人震惊了！我们已经落到了如此不幸的地步：波斯人获胜时，我们的城市遭毁；而今底比斯人又夺去了你们对我们曾有的尊重。我们遭到了两大危险，两个最大的危险——昔日是不交出城就得饿死，如今是正在接受生死审判。因此，我们普拉蒂亚人，在为希腊人的事业做出超乎自己能力的努力之后，如今却被所有的人抛弃了，孤立无援，没有一个盟友相助，沦落到了只能寄希望于你们的地步，却不知道能否真有希望。”

“Still, in the name of the gods who once presided over our confederacy, and of our own good service in the Hellenic cause, we adjure you to relent; to recall the decision which we fear that the Thebans may have obtained from you; to ask back the gift that you have given them, that they disgrace not you by slaying us; to gain a pure instead of a guilty gratitude, and not to gratify others to be yourselves rewarded with shame. Our lives may be quickly taken, but it will be a heavy task to wipe away the infamy of the deed; as we are no enemies whom you might justly punish, but friends forced into taking arms against you. To grant us our lives would be, therefore, a righteous judgment; if you consider also that we are prisoners who surrendered of their own accord, stretching out our hands for quarter, whose slaughter Hellenic law forbids, and who besides were always your benefactors. Look at the sepulchres of your fathers, slain by the Medes and buried in our country whom

year by year we honoured with garments and all other dues, and the first-fruits of all that our land produced in their season, as friends from a friendly country and allies to our old companions in arms. Should you not decide aright, your conduct would be the very opposite to ours. Consider only: Pausanias buried them thinking that he was laying them in friendly ground and among men as friendly; but you, if you kill us and make the Plataean territory Theban, will leave your fathers and kinsmen in a hostile soil and among their murderers, deprived of the honours which they now enjoy. What is more, you will enslave the land in which the freedom of the Hellenes was won, make desolate the temples of the gods to whom they prayed before they overcame the Medes, and take away your ancestral sacrifices from those who founded and instituted them.”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以曾经见证我们建立同盟的诸神的名义，凭着我们本身为希腊事业做出的贡献，请求你们慈悲为怀；请求你们撤销底比斯人可能已经从你们那里得到的决定；请求你们收回赠与他们的礼物，不要屠杀我们，让他们给你们带来耻辱；还要请求你们收获清清白白的感激，而不是让你们内疚的谢意，也不要为了满足他人而使自己背负恶名。你们顷刻之间就可以夺走我们的生命，但是，因此而招致的骂名则极难消除，因为我们不是你们理应惩罚的敌人，而是被迫与你们兵戎相见的朋友。因此，饶恕我们的性命才是正当的判决。如果你们还能考虑到，我们是自愿投降的俘虏，正在伸手向你们请求宽恕，希腊的法律是禁止屠杀我们这种人的，况且我们一直对你们有恩。请看看你们父辈的坟墓吧，他们被波斯人杀害后葬在了我们的土地上。我们年复一年地祭奠他们，向他们进献衣裳和其他一切应有的祭品，还有我们土地上各个季节出产的第一批果实。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友邦的朋友和盟友对老战友的情谊。你们如果做出不正确的决定，你们的行为将与我们的截然相反。你们只要想一想，保萨尼阿斯埋葬他们的时候，相信自己把他们安葬在了友邦的土地和友

好的人们中间。但是，你们如果杀死我们，将普拉蒂亚的土地变为底比斯人的领土，就会把自己的父辈和亲属留在敌人的领土上，留在杀害他们的刽子手之中，将他们现在享有的荣誉剥夺殆尽。另外，你们还将征服希腊人在此赢得自由的这片土地，将希腊人战胜波斯人之前曾向其祈祷的那些神庙变得荒芜，将祭祀你们祖先的祭品从发起和坚持祭祀的人手中夺走。”

“It were not to your glory, Lacedaemonians, either to offend in this way against the common law of the Hellenes and against your own ancestors, or to kill us your benefactors to gratify another's hatred without having been wronged yourselves: it were more so to spare us and to yield to the impressions of a reasonable compassion; reflecting not merely on the awful fate in store for us, but also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sufferers, and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predicting how soon misfortune may fall even upon those who deserve it not. We, as we have a right to do and as our need impels us, entreat you, calling aloud upon the gods at whose common altar all the Hellenes worship, to hear our request, to be not unmindful of the oaths which your fathers swore, and which we now plead—we supplicate you by the tombs of your fathers, and appeal to those that are gone to save us from falling into the hands of the Thebans and their dearest friends from being given up to their most detested foes. We also remind you of that day on which we did the most glorious deeds, by your fathers' sides, we who now on this are like to suffer the most dreadful fate. Finally, to do what is necessary and yet most difficult for men in our situation—that is, to make an end of speaking, since with that ending the peril of our lives draws near—in conclusion we say that we did not surrender our city to the Thebans (to that we would have preferred inglorious starvation), but trusted in and capitulated to you; and it would be just, if we fail to persuade you, to put us back in the same position and let us take

the chance that falls to u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adjure you not to give us up—your suppliants, Lacedaemonians, out of your hands and faith, Plataeans foremost of the Hellenic patriots, to Thebans, our most hated enemies—but to be our saviours, and not, while you free the rest of the Hellenes, to bring us to destruction.”

“斯巴达人，无论是违反希腊不成文的法律和亵渎你们的祖先，还是在自身未受伤害的情况下为了帮别人泄恨而杀害我们——你们的恩人，都不会给你们带来光荣。若为你们的荣誉计，你们反倒应当赦免我们，听从理智的召唤而对我们产生恻隐之心。不要只想到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同时也要想到受难者是何等人也，想到命运是多么难以预料，就连不该受它打击的人说不定很快也会遭到厄运。我们有权利，而且需要迫使我们不得不恳求你们，同时也大声祈求所有希腊人共同崇拜的诸神，请允准我们的请求吧！不要忘记你们的父辈立下的誓言，我们现在要诉诸的正是这些誓言——我们要以你们父辈的坟墓的名义向你们发出祈求，同时还要诉诸于那些已逝去的人，不要让我们落入底比斯人手中，不要让人把他们最珍视的朋友交给他们最憎恶的敌人。我们还想提醒你们，当日我们和你们的父辈并肩作战，立下了最值得称颂的功劳，今天我们却可能要遭到最可怕的命运。最后，我们要结束发言了——这是必需的，但是对处于我们这种境况的人来说，又是最难的。随着我们发言的结束，我们丧失生命的危险亦将临近。最后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没有将我们的城市交给底比斯人（我们宁肯悲惨地饿死，也不愿意那样做），而是选择相信你们，有条件地归顺于你们。如果我们说服不了你们，那就该让我们回到原来的境地，让我们试一试我们的运气，这样才算公道。同时，我们请求你们，不要抛弃我们。斯巴达人啊！我们在向你们乞求。不要辜负我们的信任，将希腊早先的爱国者普拉蒂亚人从你们手中转交给我们最痛恨的仇敌底比斯人，而是要拯救我们。在解放其他希腊人的同时，不要将我们推向毁灭。”

Such were the words of the Plataeans. The Thebans, afraid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might be moved by what they had heard, came forward and said that they too desired to address them, since the Plataeans had, against their wish, been allowed to speak at length instead of being confined to a simpl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Leave being granted, the Thebans spoke as follows:

以上是普拉蒂亚人的发言。底比斯人担心斯巴达人为他们听到的发言所动，所以就站起来说，他们也有话要说，因为普拉蒂亚人已经获准作了详细发言（这有违他们的愿望），而不是仅限于单纯地回答问题。在得到允许后，底比斯人发言如下：

“We should never have asked to make this speech if the Plataeans on their side had contented themselves with shortly answering the question, and had not turned round and made charges against us, coupled with a long defence of themselves upon matters outside the present inquiry and not even the subject of accusation, and with praise of what no one finds fault with. However, since they have done so, we must answer their charges and refute their self-praise, in order that neither our bad name nor their good may help them, but that you may hear the real truth on both points, and so decide.”

“如果普拉蒂亚人只是简要地回答了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没有转而指控我们，外加长篇大论地为自己辩护，而且所涉及的事情超出了目前质询的范围，甚至完全与本案无关，另外还就无人指摘之处进行了一番夸耀，我们是决不会请求发言的。然而，既然他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必须回应他们的指控，驳斥他们的自夸，使我们的恶名和他们的美名都对他们无所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听了真实情况之后再

做决定了。”

“The origin of our quarrel was this. We settled Plataea some time after the rest of Boeotia, together with other places out of which we had driven the mixed population. The Plataeans not choosing to recognize our supremacy, as had been first arranged, but separating themselves from the rest of the Boeotians, and proving traitors to their nationality, we used compulsion; upon which they went over to the Athenians, and with them did as much harm, for which we retaliated.”

“我们不和的起因是这样：我们在维奥蒂亚其他地区定居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在普拉蒂亚和其他一些地方建立了殖民地，这些地方都是我们驱逐了混杂人口之后占有的。普拉蒂亚人不愿按照最初的协议承认我们的统治地位，而是与其他维奥蒂亚人分道扬镳了。在他们背叛自己的部族之后，我们采用了强制手段，他们遂投靠了雅典人。在雅典人的支持下，他们作恶多端，所以我们才进行了报复。”

“Next, when the barbarian invaded Hellas, they say that they were the only Boeotians who did not Medize; and this is where they most glorify themselves and abuse us. We say that if they did not Medize, it was because the Athenians did not do so either; just as afterwards when the Athenians attacked the Hellenes they, the Plataeans, were again the only Boeotians who Atticized. And yet consider the forms of ou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when we so acted. Our city at that juncture had neither an oligarchical constitution in which all the nobles enjoyed equal rights, nor a democracy, but that which is most opposed to law and good government and nearest a tyranny—the rule of a close cabal. These,

hoping to strengthen their individual power by the success of the Mede, kept down by force the people, and brought him into the town. The city as a whole was not its own mistress when it so acted, and ought not to be reproached for the errors that it committed while deprived of its constitution. Examine only how we acted after the departure of the Mede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constitution; when the Athenians attacked the rest of Hellas and endeavoured to subjugate our country, of the greater part of which faction had already made them masters. Did not we fight and conquer at Coronea and liberate Boeotia, and do we not now ac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liberation of the rest, providing horses to the cause and a force unequalled by that of any other state in the confederacy? "

“后来，当蛮族人入侵希腊时，他们声称自己是唯一未与波斯合作的维奥蒂亚人。这是他们最引以为荣，也是他们诽谤我们最凶的一点。我们认为，如果说他们没有与波斯人合作，那是因为雅典人也没有这样做。后来的情况也是这样。雅典人侵犯其他希腊人时，普拉蒂亚人又是唯一与雅典合作的维奥蒂亚人。可是，请考虑一下我们这样做时各自的政体。那个时候，我们城邦实行的既不是所有贵族都享有同等权利的寡头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由一个小集团所统治，这种统治与法律和良政相去甚远，与僭主政治最接近。这些人希望借助波斯人的成功入侵来巩固他们个人的势力，所以就用武力镇压人民，将波斯人引进了城内。我们的城邦这样做时，它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自主行动，因而也不应当因宪制不健全时铸成的错误受到责难。你们要考虑的，只能是波斯人撤走和宪政恢复之后我们的所作所为，也就是雅典人进攻希腊其他地方并力图征服我们城邦的那个时候（由于我们内部的派别之争，他们当时已经占有我们的大部分土地）。难道我们没有在科罗尼亚与他们奋战并将他们打败，从而解放了维奥蒂亚？难道我们现在没有为希腊其他地方的解放积极贡献力量？我们不但为这一事业提供了马匹，所提供的军队也比同盟内其他城邦都

多。”

“Let this suffice to excuse us for our Medism. We will now endeavour to show that you have injured the Hellenes more than we, and are more deserving of condign punishment. It was in defence against us, say you that you became allies and citizens of Athens. If so, you ought only to have called in the Athenians against us, instead of joining them in attacking others; it was open to you to do this if you ever felt that they were leading you where you did not wish to follow, as Lacedaemon was already your ally against the Mede, as you so much insist; and this was surely sufficient to keep us off, and above all to allow you to deliberate in security. Nevertheless, of your own choice and without compulsion you chose to throw your lot in with Athens. And you say that it had been base for you to betray your benefactors; but it was surely far baser and more iniquitous to sacrifice the whole body of the Hellenes, your fellow confederates, who were liberating Hellas, than the Athenians only, who were enslaving it. The return that you made them was therefore neither equal nor honourable, since you called them in, as you say, because you were being oppressed yourselves, and then became their accomplices in oppressing others; although baseness rather consists in not returning like for like than in not returning what is justly due but must be unjustly paid.”

“这足以抵偿我们与波斯人合作的罪责了。现在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你们比我们对希腊人造成的伤害更多，所以更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你们说，你们成为雅典的盟友和公民是为了防御我们。如果是这样，你们应当只把雅典人请来对付我们，而不应当和他们一起去进攻别人，如果你们的确觉得他们正在带领你们走上你们不愿走的道路，你们是可以选择这样做的。正如你们屡屡指出的那样，你们已经与斯

巴达结成反波斯同盟，这一点足以阻止我们向你们发动进攻。最重要的是，你们可以安心地仔细考虑该作何选择。可是，在无人逼迫的情况下，你们却自愿选择了与雅典共命运。你们还说，如果背叛你们的恩人，那就是卑鄙。但是，牺牲全体希腊人——你们的同盟军，肯定要比只牺牲雅典人更卑鄙、更不义，因为他们正在解放希腊，而雅典人却在奴役希腊。因此，你们给予他们的回报，既不同等，也不光彩。按照你们的说法，你们把他们请来，是因为你们在遭受压迫，可你们后来却成了他们压迫别人的帮凶。有恩不报固然可鄙，但更可鄙的则是以不当之举去报当报之恩。”

“Meanwhile, after thus plainly showing that it was not for the sake of the Hellenes that you alone then did not Medize, but because the Athenians did not do so either, and you wished to side with them and to be against the rest; you now claim the benefit of good deeds done to please your neighbours. This cannot be admitted; you chose the Athenians, and with them you must stand or fall. Nor can you plead the league then made and claim that it should now protect you. You abandoned that league, and offended against it by helping instead of hindering the subjugation of the Aeginetans and others of its members, and that not under compulsion, but while in enjoyment of the same institutions that you enjoy to the present hour, and no one forcing you as in our case. Lastly, an invitation was addressed to you before you were blockaded to be neutral and join neither party; this you did not accept. Who then merit the detestation of the Hellenes more justly than you, you who sought their ruin under the mask of honour? The former virtues that you allege you now show not to be proper to your character; the real bent of your nature has been at length damningly proved: when the Athenians took the path of injustice you followed them.”

“同时，这也清楚地表明，当时唯有你们没有和波斯人合作，并不是因为希腊人的缘故，而是因为雅典人也没有这样做。你们不过是想和他们站在一起与其他希腊人作对，现在却说这是为了取悦邻邦而立下的功劳，而且还要索取报酬。这种说法不能成立：既然你们选择了雅典人，就理当与他们共存亡。你们也不能将那时所立的盟约搬出来，要求现在享受它的保护。你们已经脱离了那个同盟，违背了盟约的规定。你们不但不阻止雅典人征服埃伊纳人和同盟的其他成员，反而帮助他们这样做。你们不是在强迫之下这样做的，而是在享有宪政之时，直到此刻，你们依然享有同样的宪政。你们和我们的情况不同，没有人强迫你们。最后一点，在你们被封锁之前，我们曾建议你们严守中立，不加入任何一方，可你们没有接受。你们这些假借道义之名毁灭希腊的人，试问，还有谁比你们更应当受到希腊人的憎恶呢？先前那些你们号称自己拥有的价值观，从你们现在的表现来看，并不是你们的品格中所固有的。你们真正的本性如何，最终已昭然若揭：雅典人走上非正义之路时，你们紧随其后。”

“Of our unwilling, Medism and your wilful Atticizing this, then is our explanation. The last wrong of which you complain consists in our having, as you say, lawlessly invaded your town in time of peace and festival. Here again we cannot think that we were more in fault than yourselves. If of our own proper motion we made an armed attack upon your city and ravaged your territory, we are guilty; but if the first men among you in estate and family, wishing to put an end to the foreign connection and to restore you to the common Boeotian country, of their own free will invited us, wherein is our crime? Where wrong is done, those who lead, as you say, are more to blame than those who follow. Not that, in our judgment, wrong was done either by them or by us. Citizens like yourselves, and with more at stake than you, they opened their own walls and introduced us into their own city, not as foes but as friends, to prevent the bad among you from becoming worse; to

give honest men their due; to reform principles without attacking persons, since you were not to be banished from your city, but brought home to your kindred, nor to be made enemies to any, but friends alike to all.”

“关于我们并不情愿与波斯人合作而你们却执意要与雅典人合作的问题，我们就解释到这里。你们指控我们犯下的最后一项罪行，按照你们的说法是，我们在和平时期和宗教节日期间非法入侵了你们的城市。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同样认为，你们的罪过比我们的大。如果我们自行决定向你们的城市发动武装进攻，践踏你们的领土，我们自然有罪。但是，如果你们当中那些豪门巨富想终止与外部的关系，恢复你们在维奥蒂亚人所共有的这片土地上原有的地位，因而主动来邀请我们，我们何罪之有呢？即便是有错，按照你们的说法，更应当受到责备的也是领导者，而不是追随者。在我们看来，这并非是他们有错还是我们有错的问题。他们和你们一样，同是普拉蒂亚的公民，只不过比你们所冒的风险更大些。他们打开自己的城门，将我们作为朋友而不是敌人带进自己的城市，以阻止你们之中的坏人变得更坏，让正直的人得到他们应得的权利；在不攻击个人的情况下进行方针改革，因为他们并不是要把你们从自己的城市驱逐出去，而是要把你们带回自己的同族中来；他们也不是要把你们变成谁的敌人，而是要让你们跟大家一样都成为朋友。”

“That our intention was not hostile is proved by our behaviour. We did no harm to any one, but publicly invited those who wished to live under a national, Boeotian government to come over to us; which as first you gladly did, and made an agreement with us and remained tranquil, until you became aware of the smallness of our numbers. Now it is possible that there may have been something not quite fair in our entering without the consent of your commons. At any rate you did not repay us in kind. Instead of refraining, as

we had done, from violence, and inducing us to retire by negotiation, you fell upon us in violation of your agreement, and slew some of us in fight, of which we do not so much complain, for in that there was a certain justice; but others who held out their hands and received quarter, and whose lives you subsequently promised us, you lawlessly butchered. If this was not abominable, what is? And after these three crimes committed one after the other—the violation of your agreement, the murder of the men afterwards, and the lying breach of your promise not to kill them, if we refrained from injuring your property in the country—you still affirm that we are the criminals and yourselves pretend to escape justice. Not so, if these your judges decide aright, but you will be punished for all together.”

“我们的行为可以证明，我们没有敌对之意。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而是公开邀请那些希望生活在维奥蒂亚民族政府之下的人到我们这边来。起初你们也欣然这样做了，还和我们达成了协议。在你们知道我们人数不多之前，你们的态度一直很平和。现在，我们在没有征得你们的民众同意的情况下就进了城，可能是有些不公平。但不管怎样，你们都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回报我们。你们没有像我们一样避免使用暴力，也没有用协商的方式劝我们撤离，而是违反协议，向我们发起了袭击，并且在战斗中杀死了我们的一些同胞。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多加抱怨，因为其中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其他那些已经伸出手来乞求并接受了宽恕的人，你们后来也答应我们饶他们不死的，可你们却目无法纪地将他们屠杀了。如果这都不算可恶，什么才算可恶？你们接连犯下了三桩罪行：其一是违反了协定，其二是后来杀害了那些人，其三是以谎言破坏了自己的承诺：你们本来答应，只要我们不破坏你们在乡间的财产，你们就不杀他们。犯下这三桩罪行之后，你们还指控我们有罪，自己却妄想逃脱正义的惩罚。如果这些审判官所判无误，那这种情况就绝对不会发生，但是你们将会为所有这一切受到处罚。”

“Such, Lacedaemonians, are the facts. We have gone into them at some length both on your account and on our own, that you may feel that you will justly condemn the prisoners, and we, that we have given an additional sanction to our vengeance. We would also prevent you from being melted by hearing of their past virtues, if any such they had; these may be fairly appealed to by the victims of injustice, but only aggravate the guilt of criminals, since they offend against their better nature. Nor let them gain anything by crying and wailing, by calling upon your fathers' tombs and their own desolate condition. Against this we point to the far more dreadful fate of our youth, butchered at their hands; the fathers of whom either fell at Coronea, bringing Boeotia over to you, or seated, forlorn old men by desolate hearths, with far more reason implore your justice upon the prisoners. The pity which they appeal to is rather due to men who suffer unworthily; those who suffer justly as they do are on the contrary subjects for triumph. For their present desolate condition they have themselves to blame, since they wilfully rejected the better alliance. Their lawless act was not provoked by any action of ours: hate, not justice, inspired their decision; and even now the satisfaction which they afford us is not adequate; they will suffer by a legal sentence, not as they pretend as suppliants asking for quarter in battle, but as prisoners who have surrendered upon agreement to take their trial. Vindicate, therefore, Lacedaemonians, the Hellenic law which they have broken; and to us, the victims of its violation, grant the reward merited by our zeal. Nor let us be supplanted in your favour by their harangues, but offer an example to the Hellenes, that the contests to which you invite them are of deeds, not words: good deeds can be shortly stated, but where wrong is done a wealth of language is needed to veil its deformity. However, if leading powers were to do what you are now doing, and putting one short question to all alike were to

decide accordingly, men would be less tempted to seek fine phrases to cover bad actions.”

“斯巴达人，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比较详细地说明这些事实，既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们。你们可能会认为判处这些俘虏是伸张正义；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的复仇更属正当。同时，我们也要防止你们听到他们过去的善行就心软，如果说他们曾经有过善行的话。以往的善行，对于那些非正义行为的受害者来说，或许有些帮助；但对于那些罪犯来说，只能加重他们的罪行，因为他们背离了自己善良的本性。不要因为他们哭泣哀号，因为他们诉诸于你们父辈的坟墓和他们自己的惨状，你们就让他们得着便宜。对于这一点，我们想指出的是，我们那些惨遭他们屠杀的青年，命运要比他们悲惨得多。他们的父辈，不是为着争取维奥蒂亚倒向你们而在科罗尼亚战死沙场的先烈，就是凄凉地坐在壁炉旁的孤苦老人。他们更有理由要求你们主持正义，惩罚这些俘虏。他们要求获得的怜悯，更应当给予那些按理不该遭受痛苦的人；那些像他们一样罪有应得的人遭到惩罚，反倒是一件快事。他们落到目前这种惨状，这是他们咎由自取。他们本来可以加入更好的同盟，但是他们拒绝了。他们目无法纪的行为，不是由我们的任何行动所引起的。导致他们下定决心的是仇恨，而不是正义。即便是现在，我们仍觉得对他们的惩罚尚且不足。他们不能像他们装得那样，作为在战斗中乞求饶命的人接受法律的制裁，而是应当作为同意接受审判而投降的俘虏。因此，斯巴达人，你们一定要维护被他们破坏的希腊法律，对我们这些违法行为的受害者所表现出来的热忱给予应得的报偿。不要让他们的长篇阔论动摇你们对我们的好感，而是要借此向希腊人表明，你们邀其相争的是功劳的大小，不是言辞的拙巧：做了好事无需多言，做了错事才需要用大量的辞藻来掩饰丑行。但是，倘若盟主之邦都和你们现在做的一样，向所有的人提出同一个简短的问题，然后据此作出判决，那么，人们就不大会去寻找漂亮的词句来掩饰丑恶的行为了。”

Such were the words of the Thebans. The Lacedaemonian judges decided that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y had received any service from the Plataeans in the war, was a fair one for them to put; as they had always invited them to be neutral, agreeably to the original covenant of Pausanias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Mede, and had again definitely offered them the same conditions before the blockade. This offer having been refused, they were now, they conceived, by the loyalty of their intention released from their covenant; and having, as they considered, suffered evil at the hands of the Plataeans, they brought them in again one by one and asked each of them the same question, that is to say, whether they had done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llies any service in the war; and upon their saying that they had not, took them out and slew them, all without exception. The number of Plataeans thus massacred was not less than two hundred, with twenty-five Athenians who had shared in the siege. The women were taken as slaves. The city the Thebans gave for about a year to some political emigrants from Megara and to the surviving Plataeans of their own party to inhabit, and afterwards razed it to the ground from the very foundations, and built on to the precinct of Hera an inn two hundred feet square, with rooms all round above and below, making use for this purpose of the roofs and doors of the Plataeans; of the rest of the materials in the wall, the brass and the iron, they made couches which they dedicated to Hera, for whom they also built a stone chapel of a hundred feet square. The land they confiscated and let out on a ten years' lease to Theban occupiers. The adverse attitude of the Lacedaemonians in the whole Plataean affair was mainly adopted to please the Thebans, who were thought to be useful in the war at that moment raging. Such was the end of Plataea, in the ninety-third year after she became the ally of Athens.

这是底比斯人的发言。斯巴达的审判官们认为，他们是否在战争中接受过普拉蒂亚人的帮助这一问题，他们问得并无不当。依照波斯人被打败之后保萨尼阿斯最初与他们定下的盟约，他们一向要求普拉蒂亚人保持中立。这次封锁之前，他们再度明确向他们提出了同样条件。这一提议遭到拒绝之后，他们认为，从普拉蒂亚人对自己用意的坚持来看，如今他们已经无需再受条约的束缚了。由于他们认为遭受过普拉蒂亚人之害，所以他们再次将普拉蒂亚人一个个带进来，向他们每个人提出同一个问题，即他们是否曾在战争中为斯巴达人及其盟友效过力。一听到有人说“没有”，他们便立刻将其拖出去杀掉，无一例外。这样被杀掉的普拉蒂亚人不少于200名，同时被杀的还有和他们一起被围困的25个雅典人。妇女们则被掠为奴隶。底比斯人将这座城交给来自迈加拉的一些政治移民和普拉蒂亚人中存活下来的那些与他们一党的人，准许他们居住大约一年的时间。后来，他们将该城夷为平地，在赫拉神庙附近建了一个200英尺见方的客栈，楼上楼下都有房间。建客栈时，他们用了普拉蒂亚人的屋顶和门。墙上的其他材料——钢和铁，他们则用来做了一些长榻，然后献给了赫拉女神。另外，他们还为赫拉女神建了一所100英尺见方的石庙。他们将没收的土地租给了来自底比斯的占领者，以十年为期。斯巴达人在整个普拉蒂亚事件中之所以采取敌对态度，主要是为了取悦底比斯人，他们认为，在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中，底比斯人对他们十分有用。在与雅典结盟之后第九十三年，普拉蒂亚就这样灭亡了。

Meanwhile, the forty ships of the Peloponnesians that had gone to the relief of the Lesbians, and which we left flying across the open sea, pursued by the Athenians, were caught in a storm off Crete, and scattering from thence made their way to Peloponnese, where they found at Cyllene thirteen Leucadian and Ambraciot galleys, with Brasidas, son of Tellis, lately arrived as counsellor to Alcidas; the Lacedaemonians, upon the failure of the Lesbian expedition, having resolved to strengthen their fleet and sail to Corcyra, where a revolution had broken out, so as to arrive there

before the twelve Athenian ships at Naupactus could be reinforced from Athens. Brasidas and Alcidas began to prepare accordingly.

与此同时，赶去援救莱斯沃斯人的那40艘伯罗奔尼撒战舰（前文已经说到），正在雅典人的追击下飞快地驶过大海。在克里特岛附近，这些战舰遇上了暴风雨，于是便从那里分散返回伯罗奔尼撒。驶到基莱内时，他们碰上了莱夫卡斯和安布拉基亚的13艘三列桨战舰，另外还有不久前来给阿尔基扎斯当顾问的泰利斯之子布拉西达斯。对莱斯沃斯的远征失败之后，斯巴达人决心加强自己的舰队建设，然后开往克基拉，因为那里爆发了一场革命。斯巴达人想在雅典派出援军之前抵达纳夫帕克图斯，那里之前只有12艘雅典舰。于是，布拉西达斯和阿尔基扎斯便开始进行准备。

The Corcyraean revolution began with the return of the prisoners taken in the sea-fights off Epidamnus. These the Corinthians had released, nominally upon the security of eight hundred talents given by their proxeni, but in reality upon their engagement to bring over Corcyra to Corinth. These men proceeded to canvass each of the citizens, and to intrigue with the view of detaching the city from Athens. Upon the arrival of an Athenian and a Corinthian vessel, with envoys on board, a conference was held in which the Corcyraeans voted to remain allies of the Athenians according to their agreement, but to be friends of the Peloponnesians as they had been formerly. Meanwhile, the returned prisoners brought Peithias, a volunteer proxenus of the Athenians and leader of the commons, to trial, upon the charge of enslaving Corcyra to Athens. He, being acquitted, retorted by accusing five of the richest of their number of cutting stakes in the ground sacred to Zeus and Alcinous; the legal penalty being a stater for each stake. Upon their conviction, the amount of the penalty being very large,

they seated themselves as suppliants in the temples to be allowed to pay it by instalments; but Peithias, who was one of the senate, prevailed upon that body to enforce the law; upon which the accused, rendered desperate by the law, and also learning that Peithias had the intention, while still a member of the senate, to persuade the people to conclude a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alliance with Athens, banded together armed with daggers, and suddenly bursting into the senate killed Peithias and sixty others, senators and private persons; some few only of the party of Peithias taking refuge in the Athenian galley, which had not yet departed.

克基拉的革命始于在埃庇丹努斯附近海战中被俘的人员回来之时。科林斯人释放这些俘虏，名义上是因为他们的代理人交了800塔兰特保证金，实际上则是因为他们许诺要把克基拉拉到科林斯一边来。这些人向每个公民展开游说攻势，密谋使该城脱离雅典。当一艘雅典舰和一艘科林斯舰载着使者们到达之后，克基拉人召开了一次会议，经表决决定继续按协定与雅典人为盟，但也要像以前一样与伯罗奔尼撒人为友。与此同时，回来的那些俘虏将皮夏斯送上了审判席。皮夏斯是雅典人的志愿代理人，同时也是民主党的领袖。他被指控的罪名是使克基拉遭受雅典的奴役。他被宣告无罪后，反过来指控那伙人当中最富有的五位，称他们在宙斯和阿尔喀诺俄斯神庙的圣地上砍树桩。按照法律规定，每砍一根罚款1斯塔特。判决下达后，由于罚款数额巨大，他们作为祈祷者坐进神庙，要求分期交付罚款。但是，皮夏斯是元老商议会的成员，他力劝元老商议会依法实施。这样，被告们就被法律逼入了绝境。他们也知道，只要皮夏斯仍是元老商议会成员，他就会劝说人民与雅典订立攻守同盟。因此，他们身带匕首聚集到一起，突然冲进元老商议会，杀死了皮夏斯和另外60人，既有议员，也有平民。皮夏斯一党仅有少数几个人逃上了雅典那艘三列桨战舰，当时那艘舰尚未离港。

After this outrage, the conspirators summoned the Corcyraeans to an assembly, and said that this would turn out for the best, and would save them from being enslaved by Athens; for the future, they moved to receive neither party unless they came peacefully in a single ship, treating any larger number as enemies. This motion made, they compelled it to be adopted, and instantly sent off envoys to Athens to justify what had been done and to dissuade the refugees there from any hostile proceedings which might lead to a reaction.

这一暴行发生后，谋反者召集克基拉人开了一次公民大会。他们说，这件事将会变成好事，从此他们可以不再受雅典的奴役了。他们还提出一项动议：将来不接待他们任何一方，除非他们派一艘战舰和平友好前来，超过一艘者则以敌人待之。这项动议一经提出，他们马上迫使公民大会通过，尔后立即派使者前往雅典说明情况，并劝逃往那里的人不要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以免引起对抗。

Upon the arrival of the embassy, the Athenians arrested the envoys and all who listened to them, as revolutionists, and lodged them in Aegina. Meanwhile, a Corinthian galley arriving in the island with Lacedaemonian envoys, the dominant Corcyraean party attacked the commons and defeated them in battle. Night coming on, the commons took refuge in the Acropolis and the higher parts of the city, and concentrated themselves there, having also possession of the Hyllaic harbour; their adversaries occupying the market-place, where most of them lived, and the harbour adjoining, looking towards the mainland.

这个使团一到，雅典人马上将使者和所有听命于他们的人作为革

命党人扣押起来，将他们关在了埃伊纳岛。其间，科林斯的一艘三列桨战舰载着斯巴达的使者抵达该岛后，克基拉居于控制地位的党派立即对民主党人发起进攻，并在战斗中将其打败。夜晚将至时，民主党人退到卫城和城中地势较高的地方，在那里集中起来，同时控制了希拉伊克港。他们的对手则占领了市场一带（他们大多居住在那里）以及附近面朝大陆的港口。

The next day passed in skirmishes of little importance, each party sending into the country to offer freedom to the slaves and to invite them to join them. The mass of the slaves answered the appeal of the commons; their antagonists being reinforced by eight hundred mercenaries from the continent.

次日仅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规模战斗发生。双方都派人深入乡村，允诺给奴隶们以自由，力邀他们加入自己一方。大部分奴隶响应了民主党人的号召，他们的对手则得到了大陆上800名雇佣军的增援。

After a day's interval hostilities recommenced, victory remaining with the commons, who had the advantage in numbers and position, the women also valiantly assisting them, pelting with tiles from the houses, and supporting the melee with fortitude beyond their sex. Towards dusk, the oligarchs in full rout, fearing that the victorious commons might assault and carry the arsenal and put them to the sword, fired the houses round the marketplace and the lodging-houses, in order to bar their advance; sparing neither their own, nor those of their neighbours; by which much stuff of the merchants was consumed and the city risked total destruction, if a wind had come to help the flame by blowing on it.

Hostilities now ceasing, both sides kept quiet, passing the night on guard, while the Corinthian ship stole out to sea upon the victory of the commons, and most of the mercenaries passed over secretly to the continent.

隔日之后，战火重燃。民主党人在人数和地势上都占优势，所以一直居于胜势。妇女们也勇敢地协助他们，不断从屋内向外投掷瓦片，以一般女性所没有的刚毅支持着这场混战。夕阳西下时，寡头政治集团一方溃不成军。由于担心获胜的民主党人攻取兵器库并将他们全都杀掉，他们放火烧了市场周围的房屋和出租房，以阻止对方向前推进。他们自己和邻人的财产均未幸免，商人们的很多货物也被大火吞噬了。要是再有风助势，整座城都可能被毁于一旦。这时，战斗渐渐平息下来，双方都没有动静，夜间只留了岗哨。民主党人一获胜，科林斯的那艘战舰便悄悄驶离了海港，大部分雇佣军也不声不响地逃往大陆去了。

The next day, the Athenian general, Nicostratus, son of Diitrephes, came up from Naupactus with twelve ships and five hundred Messenian heavy infantry. He at once endeavoured to bring about a settlement, and persuaded the two parties to agree together to bring to trial ten of the ringleaders, who presently fled, while the rest were to live in peace, making terms with each other, and entering into a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alliance with the Athenians. This arranged, he was about to sail away, when the leaders of the commons induced him to leave them five of his ships to make their adversaries less disposed to move, while they manned and sent with him an equal number of their own. He had no sooner consented, than they began to enroll their enemies for the ships; and these, fearing that they might be sent off to Athens, seated themselves as suppliants in the temple of the Dioscuri. An attempt

on the part of Nicostratus to reassure them and to persuade them to rise proving unsuccessful, the commons armed upon this pretext, alleging the refusal of their adversaries to sail with them as a proof of the hollowness of their intentions, and took their arms out of their houses, and would have dispatched some whom they fell in with, if Nicostratus had not prevented it. The rest of the party, seeing what was going on, seated themselves as suppliants in the temple of Hera, being not less than four hundred in number; until the commons, fearing that they might adopt some desperate resolution, induced them to rise, and conveyed them over to the island in front of the temple, where provisions were sent across to them.

翌日，雅典将军，迪伊特雷费斯之子尼科斯特拉图斯，率领12艘战舰和500名麦西尼亚重步兵从纳夫帕克图斯赶来。他旋即力促和解，劝双方达成一致将十名首要分子（他们马上逃匿了）送上审判席，其余的人则要和平相处，对内相互妥协，对外与雅典结成攻守同盟。安排完毕之后，他正要扬帆返航，民主党的领导人突然提出请他留下5艘战舰，以防他们的对手轻举妄动，他们则配备同样数目的舰只随他返回雅典。他刚一答应，他们就列出与他们为敌者的名单，准备将这些人配备到舰上。这些人担心自己被派往雅典，就作为祈祷者坐进了狄俄斯库里神庙。尼科斯特拉图斯试图打消他们的疑虑，劝他们站起身来，但没有奏效，民主党人就以此为借口进入战备状态。他们认为，这些人拒绝与尼科斯特拉图斯他们一起航行证明他们别有用心。他们从这些人家里抄走他们的武器，若非尼科斯特拉图斯加以阻止，他们会把在这些人家里碰上的一些人一起杀掉。那个党派的其余成员见此情形，纷纷作为祈祷者坐进赫拉神庙，总数不少于400人。后来，民主党人怕他们被逼入绝境采取极端行动，先劝他们站起身来，尔后将他们送到了神庙前面的岛上，还送去了粮食。

At this stage in the revolution, on the fourth or fifth day after the removal of the men to the island, the Peloponnesian ships arrived from Cyllene where they had been stationed since their return from Ionia, fifty-three in number, still under the command of Alcidas, but with Brasidas also on board as his adviser; and dropping anchor at Sybota, a harbour on the mainland, at daybreak made sail for Corcyra.

在革命的这一阶段，将那些人移送到岛上四、五天后，伯罗奔尼撒的战舰从基莱内驶来。从爱奥尼亚归来之后，他们一直停泊在那里，总共53艘，指挥官仍是阿尔基扎斯，但布拉西达斯也作为他的顾问同在舰上。他们在大陆上的西博塔港下锚停泊之后，于黎明时分驶往克基拉。

The Corcyraeans in great confusion and alarm at the state of things in the city and at the approach of the invader, at once proceeded to equip sixty vessels, which they sent out, as fast as they were manned, against the enemy, in spite of the Athenians recommending them to let them sail out first, and to follow themselves afterwards with all their ships together. Upon their vessels coming up to the enemy in this straggling fashion, two immediately deserted; in others the crews were fighting among themselves, and there was no order in anything that was done; so that the Peloponnesians, seeing their confusion, placed twenty ships to oppose the Corcyraeans, and ranged the rest against the twelve Athenian ships, amongst which were the two vessels Salaminia and Paralus.

城里本来就情况不妙，如今入侵者又要来临，克基拉人大为惊

慌，乱作了一团。他们立即着手装备了60艘战舰，尽管雅典人建议他们让雅典舰先驶出去，随后他们再率所有舰只跟上来，他们还是刚配备上人员就把战舰派出去迎敌了。他们的战舰接近敌舰时，队形甚为散乱，有两艘立即逃走了。其他舰上的人员自相混战，全无秩序。伯罗奔尼撒人一见他们这种混乱状况，留下20艘战舰对付克基拉人，其余的全朝那12艘雅典舰攻去，“萨拉米尼亚”号和“帕拉卢斯”号这两艘舰也在其中。

While the Corcyraeans, attacking without judgment and in small detachments, were already crippled by their own misconduct, the Athenians, afraid of the numbers of the enemy and of being surrounded, did not venture to attack the main body or even the centre of the division opposed to them, but fell upon its wing and sank one vessel; after which the Peloponnesians formed in a circle, and the Athenians rowed round them and tried to throw them into disorder. Perceiving this, the division opposed to the Corcyraeans, fearing a repetition of the disaster of Naupactus, came to support their friends, and the whole fleet now bore down, united, upon the Athenians, who retired before it, backing water, retiring as leisurely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give the Corcyraeans time to escape, while the enemy was thus kept occupied. Such was the character of this sea-fight, which lasted until sunset.

克基拉人进攻时不加判断，而且以小分队形式进行，因此由于行动失当，战斗力早已削弱。雅典人担心敌人挟数量优势包围自己，所以未敢进攻敌军主力，甚至没敢攻击与之对阵那个分队的中央，而是突向敌军侧翼，击沉敌舰1艘。这之后，伯罗奔尼撒人列成圆阵，雅典人则围绕着他们航行，试图使他们陷入混乱。与克基拉人对阵的分队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担心重蹈纳夫帕克图斯那次海战的覆辙，便驶来增援自己的同胞，伯罗奔尼撒人的整个舰队联合起来一起向雅典

人冲去。迫于敌军的攻势，雅典人开始后撤。他们倒划着，尽量撤得从容些，以便拖住敌人，给克基拉人一些脱逃的时间。这次海战就是这样进行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日落时分。

The Corcyraeans now feared that the enemy would follow up their victory and sail against the town and rescue the men in the island, or strike some other blow equally decisive, and accordingly carried the men over again to the temple of Hera, and kept guard over the city. The Peloponnesians, however, although victorious in the sea-fight, did not venture to attack the town, but took the thirteen Corcyraean vessels which they had captured, and with them sailed back to the continent from whence they had put out. The next day equally they refrained from attacking the city, although the disorder and panic were at their height, and though Brasidas, it is said, urged Alcidas, his superior officer, to do so, but they landed upon the promontory of Leukimme and laid waste the country.

克基拉人这时担心敌人乘胜追击驶来攻城，将岛上的人救走，或者实施其他同样决定性的打击，所以又把那些人从岛上带回了赫拉神庙，同时对全城加强了警戒。然而，伯罗奔尼撒人虽然在海战中取得了胜利，却未敢贸然攻城，而是率领他们缴获的13艘克基拉战舰驶向大陆，回到了他们启航的地方。次日，尽管克基拉人的混乱与恐慌都达到了高潮，据说布拉西达斯也力劝他的上司阿尔基扎斯攻城，但他们还是没有这样做，而是在莱基迈海角登陆，践踏了乡村地带。

Meanwhile, the commons in Corcyra, being still in great fear of the fleet attacking them, came to a parley with the suppliants and their friends, in order to save the town; and prevailed upon some of

them to go on board the ships, of which they still manned thirty, against the expected attack. But the Peloponnesians after ravaging the country until midday sailed away, and towards nightfall were informed by beacon signals of the approach of sixty Athenian vessels from Leucas, under the command of Eurymedon, son of Thucles; which had been sent off by the Athenians upon the news of the revolution and of the fleet with Alcidas being about to sail for Corcyra.

与此同时，由于仍旧十分担心遭到伯罗奔尼撒舰队的袭击，克基拉的民主党人与神庙里那些祈祷者及其同党展开了谈判，以求挽救城市。他们还成功劝服其中一些人登舰效力，为了抵抗预料中的攻击，他们还为战舰配备了30名水手。但是，伯罗奔尼撒人践踏了乡村地带之后，中午时分就驶离了。将近黄昏时，他们通过烽火信号获悉，60艘雅典舰正从莱夫卡斯驶来，指挥官是苏克莱斯的儿子埃夫里迈宗。刚一听说克基拉爆发革命以及阿尔基扎斯所率舰队即将开往克基拉的消息，雅典人就派出了这支舰队。

The Peloponnesians accordingly at once set off in haste by night for home, coasting along shore; and hauling their ships across the Isthmus of Leucas, in order not to be seen doubling it, so departed. The Corcyraeans, made aware of the approach of the Athenian fleet and of the departure of the enemy, brought the Messenians from outside the walls into the town, and ordered the fleet which they had manned to sail round into the Hyllaic harbour; and while it was so doing, slew such of their enemies as they laid hands on, dispatching afterwards, as they landed them, those whom they had persuaded to go on board the ships. Next they went to the sanctuary of Hera and persuaded about fifty men to take their trial, and condemned them all to death. The mass of the suppliants who

had refused to do so, on seeing what was taking place, slew each other there in the consecrated ground; while some hanged themselves upon the trees, and others destroyed themselves as they were severally able. During seven days that Eurymedon stayed with his sixty ships, the Corcyraeans were engaged in butchering those of their fellow citizens whom they regarded as their enemies; and although the crime imputed was that of attempting to put down the democracy, some were slain also for private hatred, others by their debtors because of the moneys owed to them. Death thus raged in every shape; and, as usually happens at such times, there was no length to which violence did not go; sons were killed by their fathers, and suppliants dragged from the altar or slain upon it; while some were even walled up in the temple of Dionysus and died there.

于是，伯罗奔尼撒人急忙乘着夜色匆忙启航回逃，途中一直沿着海岸航行；为了绕着岬角航行时不被敌人发现，还拖着战舰过了莱夫卡斯地峡，就这样逃离了。获悉雅典舰队即将到来和敌人已经逃离的消息后，克基拉人将麦西尼亚人从城外带进城里，命令已配备好人员的舰队驶进希拉伊克港。在航行途中，凡是遇到的敌人都被他们杀掉了。那些经他们说服而登舰的人，一上岸也被他们杀死了。接着，克基拉人又奔向赫拉的圣所，说服了大约50人接受审判，结果全将他们处以死刑。那些拒绝接受审判的祈祷者看到这种情况，大部分都在圣地那里相互残杀，还有一些在树上自缢，其他人也都各自想办法结果了自己。在埃夫里迈宗带着他那60艘舰停留在那里的七天里，克基拉人一直在屠杀那些他们认为是敌人的同胞。被杀的人虽然均被冠以企图推翻民主的罪名，但也有些人是因为私仇被杀的，还有些人是因为债务关系被债务人杀害的。死亡就这样以各种形式肆虐着。正如这种时期通常所发生的那样，暴力无所不及。有儿子被父亲杀死的，有祈祷者被拖出祭坛或直接在祭坛上被杀死的，还有的甚至是被人用墙封堵在狄俄尼索斯神庙内而死在里面的。

So bloody was the march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impression which it made was the greater as it was one of the first to occur. Later on, one may say, the whole Hellenic world was convulsed; struggles being everywhere made by the popular chiefs to bring in the Athenians, and by the oligarchs to introduce the Lacedaemonians. In peace there would have been neither the pretext nor the wish to make such an invitation; but in war, with an alliance always at the command of either faction for the hurt of their adversaries and their own corresponding advantage, opportunities for bringing in the foreigner were never wanting to the revolutionary parties. The sufferings which revolution entailed upon the cities were many and terrible, such as have occurred and always will occur, as long as the nature of mankind remains the same; though in a severer or milder form, and varying in their symptoms, according to the variety of the particular cases. In peace and prosperity, states and individuals have better sentiments, because they do not find themselves suddenly confronted with imperious necessities; but war takes away the easy supply of daily wants, and so proves a rough master, that brings most men's characters to a level with their fortunes. Revolution thus ran its course from city to city, and the places which it arrived at last, from having heard what had been done before, carried to a still greater excess the refinement of their inventions, as manifested in the cunning of their enterprises and the atrocity of their reprisals. Words had to change their ordinary meaning and to take that which was now given them. Reckless audacity came to be considered the courage of a loyal ally; prudent hesitation, specious cowardice; moderation was held to be a cloak for unmanliness; ability to see all sides of a question, inaptness to act on any. Frantic violence became the attribute of manliness; cautious plotting, a justifiable means of self-defence. The advocate of extreme measures was always

trustworthy; his opponent a man to be suspected. To succeed in a plot was to have a shrewd head, to divine a plot a still shrewder; but to try to provide against having to do either was to break up your party and to be afraid of your adversaries. In fine, to forestall an intending criminal, or to suggest the idea of a crime where it was wanting, was equally commended until even blood became a weaker tie than party, from the superior readiness of those united by the latter to dare everything without reserve; for such associations had not in view the blessings derivable from established institutions but were formed by ambition for their overthrow; and the confidence of their members in each other rested less on any religious sanction than upon complicity in crime. The fair proposals of an adversary were met with jealous precautions by the stronger of the two, and not with a generous confidence. Revenge also was held of more account than self-preservation. Oaths of reconciliation, being only proffered on either side to meet an immediate difficulty, only held good so long as no other weapon was at hand; but when opportunity offered, he who first ventured to seize it and to take his enemy off his guard, thought this perfidious vengeance sweeter than an open one, since, considerations of safety apart, success by treachery won him the palm of superior intelligence. Indeed, it is generally the case that men are readier to call rogues clever than simpletons honest, and are as ashamed of being the second as they are proud of being the first. The cause of all these evils was the lust for power arising from greed and ambition; and from these passions proceeded the violence of parties once engaged in contention. The leaders in the cities, each provided with the fairest professions, on the one side with the cry of political equality of the people, on the other of a moderate aristocracy, sought prizes for themselves in those public interests which they pretended to cherish, and, recoiling from no means in their struggles for ascendancy engaged in the direst excesses; in

their acts of vengeance they went to even greater lengths, not stopping at what justice or the good of the state demanded, but making the party caprice of the moment their only standard, and invoking with equal readiness the condemnation of an unjust verdict or the authority of the strong arm to glut the animosities of the hour. Thus religion was in honour with neither party; but the use of fair phrases to arrive at guilty ends was in high reputation. Meanwhile, the moderate part of the citizens perished between the two, either for not joining in the quarrel, or because envy would not suffer them to escape.

这次革命如此残酷血腥，又是最早发生的革命之一，所以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后来，整个希腊世界可以说都受到了震撼，因为每个城邦都有党派斗争，只要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邀来雅典人，寡头统治集团的成员就求助于斯巴达人。在和平时期，既不存在提出这种邀请的借口，也没有提出这种邀请的愿望。但是在战争时期，为了打击对手和使自己相应地处于有利地位，各派总有一个同盟为其所用，革命党从来都不缺少将外邦人引入的机会。革命常常带给这些城邦很多恐怖的灾祸，诸如所发生的那样，并且只要人性不变，将来还会常常发生，尽管由于具体情况不同，残酷程度有重有轻，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在和平与繁荣时期，城邦与个人都崇尚高尚的情操，因为他们不会发现自己突然得面对迫切的需要。但是，战争使他们无法轻易得到日常所需，这位很难伺候的主人便将大多数人的品德降到了与其财富多寡相当的水平。这样，革命自然会在一座又一座城市发生。在最后发生革命的地方，由于听说过以前发生的情况，人们将他们的暴行推向了更为过分的程度，明显表现在他们实现计划时的诡诈和进行报复时的残暴上。某些词语也不得不改变通常的含义，以涵盖现在赋予它们的意义。鲁莽的大胆逐渐被看作忠实的盟友应具备的勇敢，出于谨慎的犹豫被看作虚伪懦弱，处事中庸被认为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表现，能够全面考虑问题则被视为拙于行动。疯狂施暴成了男子汉气概的标志，耍阴谋诡计变成了合法的自卫手段。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的人总是

被信任，反对他们的人则会受到猜疑。阴谋得逞表示头脑精明，识破阴谋则更加聪明，但反对两者任一，就会被认为是分裂党派，惧怕对手。总之，预先阻止意欲作恶之人或揭发根本不存在的罪恶，两者同样受到鼓励，以致血缘关系变得不如党派关系牢靠，因为靠党派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更愿意为了一切事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种组织建立的目的并不指望享有现行制度带来的好处，而是渴望推翻现行制度。组织内成员之间的彼此信任，与其说有赖于信仰上的约束，不如说因为彼此是犯罪的同谋。对手提出的合理建议，两者中较强的一方不会大方地接受，而是会出于嫉妒采取各种防备措施。同样，报复比自保更为人重视。和解的誓约只有在双方都需要应付眼前的困难时才会订立，也只有在无其他手段可用时才会被遵守。但是，一有机会，首先敢于抓住机会攻敌不备的一方，却认为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比公开报复更惬意，因为除却安全方面的考虑之外，以背信弃义的方式获得成功，还可以让他赢得智谋超群的美名。实际上，人们往往宁愿夸无赖者聪明，也不愿说头脑简单者诚实。他们以成为前一种人而自豪，却以成为后一种人为耻。所有这些恶行都源于对由贪欲和野心而生的权力的渴望。党派之间的斗争一旦开始，这些狂念又会引发暴力行动。这些城邦的领导人个个都有最动听的纲领：他们一方面高喊民众政治上的平等，另一方面又呼吁实行稳健的寡头政治。他们佯称自己珍视公众利益，实则却从中牟取私利。为了争权夺势，他们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进行报复的时候，他们则走得更远，不仅不会在正义或城邦利益的要求面前停步，而且会以自己党派一时的奇想作为唯一的标准，样随时准备利用不公平裁决的定罪或借助强制手段的权威来发泄一时的仇恨。因此，双方均无良心可言，但是利用漂亮的辞藻达到罪恶目的者，到头来却会获得盛誉。同时，那些持温和观点的公民则夹在两派之间惨遭不幸，不是因为没有参加争斗，就是因为遭人嫉妒而在劫难逃。

Thus every form of iniquity took root in the Hellenic countries by reason of the troubles. The ancient simplicity into which honour so largely entered was laughed down and disappeared; and society

became divided into camps in which no man trusted his fellow. To put an end to this, there was neither promise to be depended upon, nor oath that could command respect; but all parties dwelling rather in their calculation upon the hopelessness of a permanent state of things, were more intent upon self-defence than capable of confidence. In this contest the blunter wits were most successful. Apprehensive of their own deficiencies and of the cleverness of their antagonists, they feared to be worsted in debate and to be surprised by the combinations of their more versatile opponents, and so at once boldly had recourse to action; while their adversaries, arrogantly thinking that they should know in time, and that it was unnecessary to secure by action what policy afforded, often fell victims to their want of precaution.

因此，由于动乱所致，各种恶行在希腊各个城邦全都生了根。古时给人带来隆誉的纯朴，反被人取笑而逐渐消亡。社会分裂成不同的阵营，但各个阵营内又无一人信任他的同党。为了终止这种状况，既没有诺言可以信赖，也没有誓约值得尊重。所有党派都执著地认为，事物不可能长久停留在某种状态，因此，他们宁愿一门心思去自卫，也不能够相信他人。在这种争斗中，头脑迟钝的人反而最幸运。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和对手的聪明，担心在辩论中被击败，害怕那些才能多具的对手联合起来，给自己来个措手不及，所以就立即大胆诉诸行动；而他们的对手却傲慢地以为自己能够及时了解情况，认为没有必要以行动获取那些利用计谋即可获得的东西，结果往往会因疏于防范而葬送自己。

Meanwhile, Corcyra gave the first example of most of the crimes alluded to; of the reprisals exacted by the governed who had never experienced equitable treatment or indeed aught but insolence from their rulers—when their hour came; of the

iniquitous resolves of those who desired to get rid of their accustomed poverty, and ardently coveted their neighbours' goods; and lastly, of the savage and pitiless excesses into which men who had begun the struggle, not in a class but in a party spirit, were hurried by their ungovernable passions. In the confusion into which life was now thrown in the cities, human nature, always rebelling against the law and now its master, gladly showed itself ungoverned in passion, above respect for justice, and the enemy of all superiority; since revenge would not have been set above religion, and gain above justice,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fatal power of envy. Indeed, men too often take upon themselves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eir revenge to set the example of doing away with those general laws to which all alike can look for salvation in adversity, instead of allowing them to subsist against the day of danger when their aid may be required.

其间，克基拉开创了上述大多数罪行的先例，有报复，有不公正的决议，最后还有残酷无情的暴行。从来没有从统治者那里得到过公平待遇，或者更确切地说，除了傲慢无礼什么都没得到过的被统治者，一旦得志就实施了报复；渴望摆脱惯常的贫困和极度贪图邻人财产的人作出了不公平决议；那些并非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以一种党派精神发起了斗争的人们，在无法控制的情绪驱使下则参与了残酷无情的暴行。在各个城邦的生活此时陷入的混乱中，人的本性总是与法律相抵触。现在既已凌驾于法律之上，它便欣然原形毕露，放纵欲望，不顾正义，对胜过它的一切一概敌视。如果不是因为嫉妒的致命影响，人们本不会将复仇置于信仰之上，也不会重利而轻义。实际上，在复仇过程中，人们往往会自己率先废除一般法律，而这些法律本可以给所有落难之人以获救的希望。可是，他们却不允许这些法律继续存在，以备他们陷入危难时求得帮助。

While the revolutionary passions thus for the first time displayed themselves in the factions of Corcyra, Eurymedon and the Athenian fleet sailed away; after which some five hundred Corcyraean exiles who had succeeded in escaping, took some forts on the mainland, and becoming masters of the Corcyraean territory over the water, made this their base to plunder their countrymen in the island, and did so much damage as to cause a severe famine in the town. They also sent envoys to Lacedaemon and Corinth to negotiate their restoration; but meeting with no success, afterwards got together boats and mercenaries and crossed over to the island, being about six hundred in all; and burning their boats so as to have no hope except in becoming masters of the country, went up to Mount Istone, and fortifying themselves there, began to annoy those in the city and obtained command of the country.

克基拉各党派首次如此显露出革命情绪时，埃夫里迈宗就率领雅典舰队驶离了克基拉。后来，大约500名被放逐的克基拉人成功脱逃，占领了大陆上一些要塞。他们控制了海峡对岸克基拉的领土之后，遂开始以此为基地掠夺自己的岛上同胞，所造成的危害极大，竟至在城内引起了严重饥荒。他们还派使者前往斯巴达和科林斯，打算通过谈判恢复自己原有的地位，但是未获成功。后来，他们又搜罗了一些船只和雇佣军，总共率领大约600人渡过海峡来到岛上。他们先将带去的船烧毁，破釜沉舟，除了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别无他望。接着，他们跑上伊斯托内山，修筑好工事后，开始向城内进军，并且控制了乡村地带。

At the close of the same summer, the Athenians sent twenty ships under the command of Laches, son of Melanopus, and Charoeades, son of Euphiletus, to Sicily, where the Syracusans and Leontines were at war. The Syracusans had for allies all the Dorian

cities except Camarina—these had been included in the Lacedaemonian confederacy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hough they had not taken any active part in it—the Leontines had Camarina and the Chalcidian cities. In Italy the Locrians were for the Syracusans, the Rhegians for their Leontine kinsmen. The allies of the Leontines now sent to Athens and appealed to their ancient alliance and to their Ionian origin, to persuade the Athenians to send them a fleet, as the Syracusans were blockading them by land and sea. The Athenians sent it upon the plea of their common descent, but in reality to prevent the exportation of Sicilian corn to Peloponnese and to test the possibility of bringing Sicily into subjection. Accordingly, they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t Rhegium in Italy, and from thence carried on the war in concert with their allies.

当年夏末，雅典人派了20艘战舰驶往西西里，当时叙拉古人和莱昂蒂尼人正在那里打仗，指挥舰队的是迈拉诺普斯的儿子拉凯斯和埃夫菲莱图斯的儿子哈里阿泽斯。与叙拉古人为盟的是除卡马里纳之外所有多里安人的城市。战争爆发伊始，这些城市即已加入斯巴达同盟，只是尚未积极参与战争。莱昂蒂尼人则与卡马里纳和哈尔基斯人的城市结成了同盟。在意大利，洛克里斯人站在叙拉古人一边，雷伊乌姆人则支持与他们同族的莱昂蒂尼人。莱昂蒂尼人的盟邦这时派人前往雅典，以古老的盟约和同为爱奥尼亚人为由，劝雅典人派一支舰队支援他们，因为他们的海路和陆路都被叙拉古人封锁了。雅典人派出这支舰队，名义上是出于同宗之谊，实则是为了防止西西里的谷物输往伯罗奔尼撒，同时也是为了试探一下西西里有无臣服的可能。于是，他们在意大利的雷伊乌姆扎下营盘，从那里与他们的盟友联手进行战争。

CHAPTER XI Sixth Years of the War—Campaigns of Demosthenes in

Western Greece—Ruin of Ambracia

第十一章　战争第六年——狄摩西尼在希腊西部之战——安布拉基亚的灭亡

Summer was now over. The winter following, the plague a second time attacked the Athenians; for although it had never entirely left them, still there had been a notable abatement in its ravages. The second visit lasted no less than a year, the first having lasted two; and nothing distressed the Athenians and reduced their power more than this. No less than four thousand four hundred heavy infantry in the ranks died of it and three hundred cavalry, besides a number of the multitude that was never ascertained. At the same time took place the numerous earthquakes in Athens, Euboea, and Boeotia, particularly at Orchomenus in the last-named country.

夏季到此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冬季里，瘟疫再度袭击了雅典人。这场瘟疫虽然从未完全停止过，但它的严重性还是明显有所衰减。瘟疫的第二次袭击持续了一年之久，而第一次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再没有比瘟疫更让雅典人痛苦和更能削弱其力量的灾祸了。军中死于瘟疫的重步兵多达4,400人，骑兵300人，此外还有大量数目无法确定的民众。与此同时，雅典、埃维亚岛和维奥蒂亚还多次发生地震，尤其是维奥蒂亚地区的奥尔霍迈诺斯。

The same winter, the Athenians in Sicily and the Rhegians, with thirty ships, made an expedition against the islands of Aeolus; it being impossible to invade them in summer, owing to the want of water. These islands are occupied by the Liparaeans, a Cnidian colony, who live in one of them of no great size called Lipara; and

from this as their headquarters cultivate the rest, Didyme, Strongyle, and Hiera. In Hiera the people in those parts believe that Hephaestus has his forge, from the quantity of flame which they see it send out by night, and of smoke by day. These islands lie off the coast of the Sicels and Messinese, and were allies of the Syracusans. The Athenians laid waste their land, and as the inhabitants did not submit, sailed back to Rhegium. Thus the winter ended, and with it ended the fifth year of this war, of which Thucydides was the historian.

同年冬季，在西西里的雅典人和雷伊乌姆人率领30艘战舰向埃奥卢斯群岛发起远征。那里缺水，夏季不便入侵。占据这些岛屿的是尼多斯的移民利帕拉人。他们居住在这些群岛中一个不大的岛上，名叫利帕拉。他们以该岛为大本营，耕种着迪季迈、斯特龙伊莱和希埃拉等其他几个岛屿的土地。这些地方的人民相信，火神赫菲斯托斯的熔炉就在希埃拉，因为他们看到夜间火焰冲天，白天烟雾笼罩。这些岛屿位于西库尔人和墨西拿人居住的海滨附近，是叙拉古人的同盟。雅典人践踏了他们的土地，但由于岛上的居民不肯归顺，他们又驶回雷伊乌姆去了。冬季就这样结束了。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五年亦随之结束。

The next summer,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ir allies set out to invade Attica under the command of Agis, son of Archidamus, and went as far as the Isthmus, but numerous earthquakes occurring, turned back again without the invasion taking place.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these earthquakes were so common, the sea at Orobiae, in Euboea, retiring from the then line of coast, returned in a huge wave and invaded a great part of the town, and retreated leaving some of it still under water; so that what was once land is now sea; such of the inhabitants perishing as could not run up to

the higher ground in time. A similar inundation also occurred at Atalanta, the island off the Opuntian Locrian coast, carrying away part of the Athenian fort and wrecking one of two ships which were drawn up on the beach. At Peparethus also the sea retreated a little, without however any inundation following; and an earthquake threw down part of the wall, the town hall, and a few other buildings. The cause, in my opinion, of this phenomenon must be sought in the earthquake. At the point where its shock has been the most violent, the sea is driven back and, suddenly recoiling with redoubled force, causes the inundation. Without an earthquake I do not see how such an accident could happen.

次年夏季，在阿希达穆斯之子亚基斯的率领下，伯罗奔尼撒人及其盟友出发入侵阿提卡。他们虽然到了地峡，但那里多次发生地震，他们没有实施入侵就回去了。大约在同时，由于地震频发，在埃维亚岛的奥罗比埃，海水从当时的海岸线引退后，又卷着巨浪反冲回来，淹没了城市的大部分，海水退去后，还有一部分浸没在水中。过去曾是陆地的地方，如今一片汪洋。未能及时跑到高处的居民便葬身于洪水之中。同样的水灾也发生在离奥珀斯的洛克里斯海滨不远的阿塔兰塔岛：雅典人那个据点被冲走了一部分，被拖上海滩的两艘战舰中的一艘也被冲得七零八落。在佩帕里苏斯，海水也引退了一点，不过没有造成水灾，但部分城墙、市政厅和其他几所建筑物在一次地震中被震塌了。依我之见，这一现象肯定是由地震引起的。在震动最强烈的地方，海水被逼退，然后又以双倍的力量突然反冲回来，因而造成洪水泛滥。如果没有地震，我看不出这样的事情如何能发生。

During the same summer, different operations were carried on by the different belligerents in Sicily; by the Siceliots themselves against each other, and by the Athenians and their allies, I shall however confine myself to the actions in which the Athenians took

part, choosing the most important. The death of the Athenian general Charoeades, killed by the Syracusans in battle, left Laches in the sole command of the fleet, which he now directed in concert with the allies against Mylae, a place belonging to the Messinese. Two Messinese battalions in garrison at Mylae laid an ambush for the party landing from the ships, but were routed with great slaughter by the Athenians and their allies, who thereupon assaulted the fortification and compelled them to surrender the Acropolis and to march with them upon Messina. This town afterwards also submitted upon the approach of the Athenians and their allies, and gave hostages and all other securities required.

同年夏季，不同交战方在西西里进行着不同的战争。西凯利奥特人在进行内战，雅典人及其盟军也在打。我仅选取雅典人参加的一些最重要的行动加以记述。雅典将军哈里阿泽斯在战斗中被叙拉古人杀死之后，拉凯斯成了那支舰队唯一的指挥官。当时他正指挥舰队与盟军一起攻向迈利，一个归墨西拿人所有的地方。那里驻有墨西拿人的两个营。这两个营伏击了从舰上下来的这队人，但是却遭到雅典人及其盟军的重创，后者随即攻向守军的防御工事，迫使守军交出了卫城并与他们一起向墨西拿进军。后来，雅典人及其盟军一到，这座城也归降了，并且交出了人质和雅典人要求的其他所有保证物。

The same summer, the Athenians sent thirty ships round Peloponnese under Demosthenes, son of Alcisthenes, and Procles, son of Theodorus, and sixty others, with two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against Melos, under Nicias, son of Niceratus; wishing to reduce the Melians, who, although islanders, refused to be subjects of Athens or even to join her confederacy. The devastation of their land not procuring their submission, the fleet, weighing from Melos, sailed to Oropus in the territory of Graea, and landing at nightfall,

the heavy infantry started at once from the ships by land for Tanagra in Boeotia, where they were met by the whole levy from Athens, agreeably to a concerted signal, under the command of Hipponicus, son of Callias, and Eurymedon, son of Thucles. They encamped, and passing that day in ravaging the Tanagraean territory, remained there for the night; and next day, after defeating those of the Tanagraeans who sailed out against them and some Thebans who had come up to help the Tanagraeans, took some arms, set up a trophy, and retired, the troops to the city and the others to the ships. Nicias with his sixty ships coasted alongshore and ravaged the Locrian seaboard, and so returned home.

在同一个夏季，雅典人派出30艘舰到伯罗奔尼撒周围游弋，指挥官是阿尔基塞内斯的儿子狄摩西尼和塞奥佐鲁斯的儿子普罗克莱斯。另外，雅典人还派遣尼塞拉图斯的儿子尼西亚斯率领60艘舰和2,000名重步兵去进攻梅卢斯岛，希望能征服梅卢斯岛人。后者虽然是岛民，却拒不臣服于雅典，甚至也不加入以雅典为首的同盟。雅典人践踏了他们的土地，却未能使他们臣服，所以雅典舰队就启航离开梅卢斯岛，驶向了格雷阿境内的奥罗普斯。黄昏时分，舰一靠岸，重步兵立即从舰上下来，由陆路进攻维奥蒂亚的塔纳格拉。卡利亚斯的儿子希波尼库斯和苏克莱斯的儿子埃夫里迈宗率领征召来的全体将士，依照事先约定好的信号，从雅典赶来与他们会合。他们扎下营盘，当天白天践踏了塔纳格拉的土地，夜间在那里过了一夜。次日，他们打败了驶出来与之交战的塔纳格拉人和一些来给塔纳格拉人助战的底比斯人，缴获了一些武器，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然后就撤退了，陆军回城，其他人回到舰上。尼西亚斯率领60艘战舰沿着海岸航行，践踏了洛克里斯的海滨地区，尔后驶回了雅典。

About this time, the Lacedaemonians founded their colony of Heraclea in Trachis, their object being the following: the Malians

form in all three tribes, the Paralians, the Hiereans, and the Trachinians. The last of these, having suffered severely in a war with their neighbours the Oetaeans, at first intended to give themselves up to Athens; but afterwards fearing not to find in her the security that they sought, sent to Lacedaemon, having chosen Tisamenus for their ambassador. In this embassy joined also the Dorians from the mother country of the Lacedaemonians, with the same request, as they themselves also suffered from the same enemy. After hearing them, the Lacedaemonians determined to send out the colony, wishing to assist the Trachinians and Dorians, and also because they thought that the proposed town would lie conveniently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war against the Athenians. A fleet might be got ready there against Euboea, with the advantage of a short passage to the island; and the town would also be useful as a station on the road to Thrace. In short, everything made the Lacedaemonians eager to found the place. After first consulting the god at Delphi and receiving a favourable answer, they sent off the colonists, Spartans, and Perioeci, inviting also any of the rest of the Hellenes who might wish to accompany them, except Ionians, Achaeans, and certain other nationalities; three Lacedaemonians leading as founders of the colony, Leon, Alcidas, and Damagon. The settlement effected, they fortified anew the city, now called Heraclea, distant about four miles and a half from Thermopylae and two miles and a quarter from the sea, and commenced building docks, closing the side towards Thermopylae just by the pass itself,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be easily defended.

大约在这个时候，斯巴达人在特拉希斯建立了他们的殖民地赫拉克利亚。他们的目的是这样：马利亚人由三个部族的人组成，即帕拉利亚人、希埃拉人和特拉希斯人。最后一个部族的人在与他们的近邻伊塔人作战时损失惨重，起初他们打算投靠雅典，但后来又担心从雅

典那里得不到他们寻求的安全感，转而选派了蒂萨迈努斯作为特使前往斯巴达。这个使团中还有来自斯巴达人母邦的多里安人，他们同样遭受着伊塔人的侵害，所以也一同前去提出同样的请求。听完他们的话之后，斯巴达人决定派出殖民团，因为他们希望帮助特拉希斯人和多里安人，同时也是因为他们觉得建城的位置便于他们对雅典作战。那里的优势在于通往埃维亚岛的航道短。他们可以在那里部署一支舰队，时刻做好进攻埃维亚岛的准备。另外，这座城位于通向色雷斯的路上，他们还可以用它作中转站。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考虑，斯巴达人都很想建立这个殖民地。他们首先到德尔斐去问神，得到有利的答复后，开始派遣殖民团，其中有斯巴达人，也有珀里俄基人。另外，他们还招请了愿意一同前往的其他希腊人，爱奥尼亚人、亚该亚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人除外。这次殖民行动的领导者和这个殖民地的建立者是三位斯巴达人：莱翁、阿尔基扎斯和达马贡。殖民完成后，他们重新建立起一座设防城市，现在这座城叫赫拉克利亚，距温泉关大约4.5英里，离海滨约2.25英里。接着，他们开始修建船坞。为了易于防守起见，他们封锁了面朝温泉关那边，就在关口附近。

The foundation of this town, evidently meant to annoy Euboea (the passage across to Cenaeum in that island being a short one), at first caused some alarm at Athens, which the event however did nothing to justify, the town never giving them any trouble. The reason of this was as follows. The Thessalians, who were sovereign in those parts, and whose territory was menaced by its foundation, were afraid that it might prove a very powerful neighbour, and accordingly continually harassed and made war upon the new settlers, until they at last wore them out in spite of their originally considerable numbers, people flocking from all quarters to a place founded by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us thought secure of prosper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cedaemonians themselves, in the persons of their governors, did their full share towards ruining its prosperity and reducing its population, as they frightened away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inhabitants by governing harshly and in some cases not fairly and thus made it easier for their neighbours to prevail against them.

这座城的建立显然意在侵扰埃维亚岛（由此通往该岛凯内夫姆镇的航道很短），所以雅典最初有些恐慌，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这座城从未给雅典添过麻烦。其中缘由是这样：在那些地区，最有势力的是色萨利人，新城的建立对他们的领土来说是个威胁。他们担心这座城发展成一个势力强大的邻邦，所以不断侵扰这些外来移民，频频向他们开战。这些移民最初人数虽然甚多，但最终还是被拖垮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斯巴达人建立的殖民地，原以为这里肯定会繁荣起来。另一方面，对于这座城市的衰败和人口的减少，斯巴达人自己的总督负有主要责任，他们管理粗暴，有时还很不公平，将大部分居民都吓跑了，所以使得邻邦更容易战胜他们。

The same summer,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Athenians were detained at Melos, their fellow citizens in the thirty ships cruising round Peloponnese, after cutting off some guards in an ambush at Ellomenus in Leucadia, subsequently went against Leucas itself with a large armament, having been reinforced by the whole levy of the Acarnanians except Oeniadae, and by the Zacynthians and Cephallenians and fifteen ships from Corcyra. While the Leucadians witnessed the devastation of their land, without and within the isthmus upon which the town of Leucas and the temple of Apollo stand, without making any movement on account of the overwhelming numbers of the enemy, the Acarnanians urged Demosthenes, the Athenian general, to build a wall so as to cut off the town from the continent, a measure which they were convinced would secure its capture and rid them once and for all of a most troublesome enemy.

同年夏季，大约是雅典人耽搁在梅卢斯岛期间，他们在伯罗奔尼撒周围巡弋的30艘战舰上的同胞，在卢卡迪亚的埃洛迈努斯设伏并歼灭了一些守军，继而向莱夫卡斯城本身大举发起进攻。前去增援他们的有阿卡纳尼亚人的全部军队（伊尼阿泽人除外），另外还有扎金索斯人和凯法莱尼亚人以及从克基拉来的15艘战舰。莱夫卡斯城和阿波罗神庙都坐落在地峡上，莱夫卡斯人虽然目睹了自己在地峡内外的土地被毁，但由于敌军人多势众，他们未敢轻举妄动。阿卡纳尼亚人力劝雅典将军狄摩西尼建一道封锁墙，以切断该城与大陆的联系。他们认为，这样便有把握攻下这座城，一劳永逸地除掉一个令他们极为头痛的敌人。

Demosthenes, however, had in the meanwhile been persuaded by the Messenians that it was a fine opportunity for him, having so large an army assembled, to attack the Aetolians, who were not only the enemies of Naupactus, but whose reduction would further make it easy to gain the rest of that part of the continent for the Athenians. The Aetolian nation, although numerous and warlike, yet dwelt in unwalled villages scattered far apart, and had nothing but light armour, and might, according to the Messenians, be subdued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before succours could arrive. The plan which they recommended was to attack first the Apodotians, next the Ophionians, and after these the Eurytanians, who are the largest tribe in Aetolia, and speak, as is said, a language exceedingl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nd eat their flesh raw. These once subdued, the rest would easily come in.

可是，麦西尼亚人同时也在劝狄摩西尼：既然召集了这样一支大军，对他来说是一个进攻埃托利亚人的好机会。埃托利亚人不仅是纳夫帕克图斯的敌人，而且一旦将它征服，把大陆上那一地区的其他部

落争取到雅典人一边来就更加容易。埃托利亚虽然是一个人数众多而又好战的民族，却居住在一些分散很广且没有设防的村庄里，除了轻甲之外别无其他装备。据麦西尼亚人说，说不定在他们的援军赶到前，不用费多少事就可以将他们降服。他们建议采取的方案是，先打阿波佐蒂亚人，然后打奥菲奥尼亚人，最后再打埃夫里塔尼亚人。埃夫里塔尼亚人是埃托利亚最大的部族，据说这个部族讲的语言极为难懂，而且还吃生肉。这些部族一旦被征服，其余的便唾手可得。

To this plan, Demosthenes consented, not only to please the Messenians, but also in the belief that by adding the Aetolians to his other continental allies he would be able, without aid from home, to march against the Boeotians by way of Ozolian Locris to Kytinium in Doris, keeping Parnassus on his right until he descended to the Phocians, whom he could force to join him if their ancient friendship for Athens did not, as he anticipated, at once decide them to do so. Arrived in Phocis he was already upon the frontier of Boeotia. He accordingly weighed from Leucas, against the wish of the Acarnanians, and with his whole armament sailed along the coast to Sollium, where he communicated to them his intention; and upon their refusing to agree to it on account of the non-investment of Leucas, himself with the rest of the forces, the Cephallenians, the Messenians, and Zacynthians, and three hundred Athenian marines from his own ships (the fifteen Corcyraean vessels having departed), started on his expedition against the Aetolians. His base he established at Oeneon in Locris, as the Ozolian Locrians were allies of Athens and were to meet him with all their forces in the interior. Being neighbours of the Aetolians and armed in the same way, it was thought that they would be of great service upon the expedition, from their acquaintance with the localities and the warfare of the inhabitants.

狄摩西尼对这个方案表示赞成。他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取悦麦西尼亚人，同时他也相信，如果能将埃托利亚人纳入他在大陆上的盟友之列，无需从本邦获得支援，他就可以向维奥蒂亚人进军，即经奥佐利亚的洛克里斯开赴多利斯的基蒂尼乌姆，一直靠帕尔纳索斯山左侧前行直到下到福基斯人居住地。福基斯人与雅典的友谊源远流长，即便他们不能如他所望立时下决心加入他的大军，他也可以迫使他们这样做。到了福基斯，就已经算是到达维奥蒂亚的边界了。因此，他没有遵从阿卡纳尼亚人的愿望，而是率领整个部队从莱夫卡斯岛启航，沿着海岸驶向索利乌姆，在那里，他向阿卡纳尼亚人表明了他的意图。由于他不赞成封锁莱夫卡斯岛，他们拒绝同意这个方案。于是，他就带着其余部队，即凯法莱尼亚人、麦西尼亚人和扎金索斯人以及他自己那些战舰（克基拉的15艘战舰已经驶离）上的300名雅典水兵，发起对埃托利亚人的远征。他把根据地设在洛克里斯的伊内翁，因为奥佐利亚的洛克里斯人是雅典的盟友，而且将率领自己的全部军队在内地与他会合。雅典人认为，奥佐利亚的洛克里斯人既然与埃托利亚为邻，他们的武装方式又与埃托利亚人的一样，无论是从他们对当地情况还是对当地人战法的熟悉程度来看，他们对这次远征都会有很大帮助。

After bivouacking with the army in the precinct of Nemean Zeus, in which the poet Hesiod is said to have been killed by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an oracle which had foretold that he should die in Nemea, Demosthenes set out at daybreak to invade Aetolia. The first day he took Potidania, the next Krokyle, and the third Tichium, where he halted and sent back the booty to Eupalium in Locris, having determined to pursue his conquests as far as the Ophionians, and, in the event of their refusing to submit, to return to Naupactus and make them the objects of a second expedition. Meanwhile, the Aetolians had been aware of his design from the moment of its formation, and as soon as the army invaded their country came up in great force with all their tribes; even the

most remote Ophionians, the Bomiensians, and Calliensians, who extend towards the Malian Gulf, being among the number.

狄摩西尼带着军队在奈迈阿的宙斯神庙附近安营扎寨，据说，诗人赫西奥德就是在这里被当地居民杀死的，有一个神谕曾经预言，他将死于奈迈阿。黎明时分，狄摩西尼率军侵入埃托利亚。他第一天攻取了波蒂扎尼亚，第二天攻取了克罗基莱，第三天攻取了蒂希乌姆。在蒂希乌姆，他暂且停下脚步，派人将战利品送回洛克里斯的埃夫帕利乌姆。他的计划是继续自己征服的脚步，一直深入到奥菲奥尼亚人居住的地方。倘若他们拒不降服，他就先回纳夫帕克图斯，发动第二次远征。其间，他的计划刚一形成，埃托利亚人就知道了他的图谋。狄摩西尼的军队一侵入他们境内，他们就率领一支由所有部族组成的大军前来迎敌，就连离得最远的奥菲奥尼亚人、博米恩夏人和卡利恩夏人也在其中，他们的居住地一直延伸到马利亚湾。

The Messenians, however, adhered to their original advice. Assuring Demosthenes that the Aetolians were an easy conquest, they urged him to push on as rapidly as possible, and to try to take the villages as fast as he came up to them, without waiting until the whole nation should be in arms against him. Led on by his advisers and trusting in his fortune, as he had met with no opposition, without waiting for his Locrian reinforcements, who were to have supplied him with the light-armed darters in which he was most deficient, he advanced and stormed Aegitium, the inhabitants flying before him and posting themselves upon the hills above the town, which stood on high ground about nine miles from the sea. Meanwhile, the Aetolians had gathered to the rescue, and now attacked the Athenians and their allies, running down from the hills on every side and darting their javelins, falling back when the Athenian army advanced, and coming on as it retired; and for a

long while the battle was of this character, alternate advance and retreat, in both which operations the Athenians had the worst.

然而，麦西尼亚人还是坚持他们原来的建议。他们向狄摩西尼保证，征服埃托利亚人易如反掌，并敦促他尽快向前推进，到了哪些村庄就尽快攻取哪些村庄，不要等到整个埃托利亚民族都拿起武器反抗他再动手。狄摩西尼最缺的是轻装标枪手，洛克里斯人本来要给他派一些的，但由于受到他那些谋士们的影响，加之因尚未遭到过抵抗而相信自己运气当头，他没等洛克里斯的援军到达就进军袭击了埃伊蒂乌姆。这座城坐落在距海滨约9英里远的高地上。当地居民们在他到来之前就已逃之夭夭，守在俯瞰城区的山丘上。其间，埃托利亚人已集合军队前来救援，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山丘上跑下来，手掷标枪向雅典人及其盟军发起了进攻。雅典军队一前进，他们就后撤；雅典人一后撤，他们又跟上来。战斗就这样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前进与后撤交替进行。但是，无论是进还是退，吃亏的都是雅典人。

Still as long as their archers had arrows left and were able to use them, they held out, the light-armed Aetolians retiring before the arrows; but after the captain of the archers had been killed and his men scattered, the soldiers, wearied out with the constant repetition of the same exertions and hard pressed by the Aetolians with their javelins, at last turned and fled, and falling into pathless gullies and places that they were unacquainted with, thus perished, the Messenian Chromon, their guide, having also unfortunately been killed. A great many were overtaken in the pursuit by the swift-footed and light-armed Aetolians, and fell beneath their javelins; the greater number however missed their road and rushed into the wood, which had no ways out, and which was soon fired and burnt round them by the enemy. Indeed, the Athenian army fell victims to death in every form, and suffered all the vicissitudes of

flight; the survivors escaped with difficulty to the sea and Oeneon in Locris, whence they had set out. Many of the allies were killed, and about one hundred and twenty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not a man less, and all in the prime of life. These were by far the best men in the city of Athens that fell during this war. Among the slain was also Procles, the colleague of Demosthenes.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took up their dead under truce from the Aetolians, and retired to Naupactus, and from thence went in their ships to Athens; Demosthenes staying behind in Naupactus and in the neighbourhood, being afraid to face the Athenians after the disaster.

尽管如此，只要雅典人的弓箭手还有箭，而且还能用箭射击，他们就坚持着，因为身着轻甲的埃托利亚人在有箭射来时总是后退。但是，弓箭手的队长阵亡之后，他手下的人就散了。由于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士兵们已疲惫不堪。在手持标枪的埃托利亚人的紧逼之下，他们终于开始转身而逃，有掉落没有路径的溪谷丢命的，有陷入陌生之地丧生的。他们的向导，麦西尼亚人赫罗蒙，也不幸被杀死了。在追击过程中，许多人被脚程快且身着轻甲的埃托利亚人赶上后倒在他们的标枪下，更多的人因走错路冲进没有出路的林子里，敌人则放火烧山，将他们困在了火海里。事实上，这支雅典军队遍尝逃命之苦，怎么死的人都有。侥幸活下来的人好不容易才逃到海边，回到了他们的出发地——洛克里斯的伊内翁。盟军中很多人丧命，大约120名雅典重步兵，一个不剩地都被杀死了，而且全都正值青壮年时期。这些人是这次战争中倒下的最优秀的雅典城邦公民。狄摩西尼的同僚普罗克莱斯也在阵亡者之列。这期间，雅典人在休战时从埃托利亚人那里收回了阵亡者的尸体，撤回纳夫帕克图斯，从那里又乘船回雅典去了。狄摩西尼则留在纳夫帕克图斯及附近地区，这场大难之后，他已无颜见雅典父老。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Athenians on the coast of Sicily sailed

to Locris, and in a descent which they made from the ships defeated the Locrians who came against them, and took a fort upon the river Halex.

大约在同时，在西西里沿海的雅典人乘舰驶向洛克里斯，登陆时打败前来抵御他们的洛克里斯人，夺取了哈莱克斯河畔的一个要塞。

The same summer, the Aetolians, who before the Athenian expedition had sent an embassy to Corinth and Lacedaemon, composed of Tolophus, an Ophionian, Boriades, a Eurytanian, and Tisander, an Apodotian, obtained that an army should be sent them against Naupactus, which had invited the Athenian invasion. The Lacedaemonians accordingly sent off towards autumn three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of the allies, five hundred of whom were from Heraclea, the newly founded city in Trachis, under the command of Eurylochus, a Spartan, accompanied by Macarius and Menedaius, also Spartans.

同年夏季，在雅典人发动远征之前，埃托利亚人就派了一个使团前往科林斯和斯巴达，请求派给他们一支军队进攻纳夫帕克图斯，因为纳夫帕克图斯招请了雅典人前来侵略他们。这个使团包括奥菲奥尼亚人托洛富斯、埃夫里塔尼亚人博里亚泽斯和阿波佐蒂亚人蒂桑泽尔。于是，秋天即将来临时，斯巴达人从盟邦中派出3,000名重步兵，其中500人来自他们在特拉希斯新建的城市赫拉克利亚。担任指挥官的是斯巴达人埃夫里洛胡斯，与他同去的还有马卡里乌斯和迈内泽乌斯，他们也是斯巴达人。

The army having assembled at Delphi, Eurylochus sent a herald

to the Ozolian Locrians; the road to Naupactus lying through their territory, and he having besides conceived the idea of detaching them from Athens. His chief abettors in Locris were the Amphissians, who were alarmed at the hostility of the Phocians. These first gave hostages themselves, and induced the rest to do the same for fear of the invading army; first, their neighbours the Myonians, who held the most difficult of the passes, and after them the Ipnians, Messapians, Tritaeans, Chalaeans, Tolophonians, Hessians, and Oeanthians, all of whom joined in the expedition; the Olpaeans contenting themselves with giving hostages, without accompanying the invasion; and the Hyaeans refusing to do either, until the capture of Polis, one of their villages.

这支军队集结到德尔斐之后，埃夫里洛胡斯派出一个传令官去见奥佐利亚的洛克里斯人，因为通往纳夫帕克图斯之路通过他们的领土，另外他也想使他们脱离雅典。在洛克里斯帮他做工作的主要是安菲萨人，因为福基斯人的敌意使他们惊恐万分。他们带头交出了人质，接着又因担心军队来侵劝其他部族效法他们。他们首先说服的是他们的近邻米奥尼亚人（他们把守的关口最难通过），然后是伊普尼亚人、迈萨皮亚人、特里泰阿人、哈莱阿人、托洛福尼亚人、海希亚人和伊安夏人，他们都参加了这次远征。奥尔佩人只交出了人质，但没有随大军入侵。海希亚人起初也不愿意，直到他们一个叫波利斯的村庄被攻陷，他们才答应合作。

His preparations completed, Eurylochus lodged the hostages in Kytinium, in Doris, and advanced upon Naupactus through the country of the Locrians, taking upon his way Oeneon and Eupalium, two of their towns that refused to join him. Arrived in the Naupactian territory, and having been now joined by the Aetolians, the army laid waste the land and took the suburb of the town,

which was unfortified; and after this Molycrium also, a Corinthian colony subject to Athens. Meanwhile, the Athenian Demosthenes, who since the affair in Aetolia had remained near Naupactus, having had notice of the army and fearing for the town, went and persuaded the Acarnanians, although not without difficulty because of his departure from Leucas, to go to the relief of Naupactus. They accordingly sent with him on board his ships a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who threw themselves into the place and saved it; the extent of its wall and the small number of its defenders otherwise placing it in the greatest danger. Meanwhile, Eurylochus and his companions, finding that this force had entered and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storm the town, withdrew, not to Peloponnese, but to the country once called Aeolis, and now Calydon and Pleuron, and to the places in that neighbourhood, and Proschium in Aetolia; the Ambraciots having come and urged them to combine with them in attacking Amphilochian Argos and the rest of Amphilochia and Acarnania; affirming that the conquest of these countries would bring all the continent into alliance with Lacedaemon. To this Eurylochus consented, and dismissing the Aetolians, now remained quiet with his army in those parts, until the time should come for the Ambraciots to take the field, and for him to join them before Argos.

一切准备就绪后，埃夫里洛胡斯将人质安排在多利斯的基蒂尼乌姆，随后便率军经洛克里斯人的领土朝纳夫帕克图斯进发，途中攻陷了两个拒绝与他合作的洛克里斯城镇——伊内翁和埃夫帕利乌姆。抵达纳夫帕克图斯的领土时，埃托利亚人已加入他的队伍。这支军队践踏了这一地区的土地，攻取了这座未设防之城的郊区，尔后又攻陷了莫利克里乌姆——一个臣服于雅典的科林斯殖民地。自从在埃托利亚遭遇滑铁卢之后，雅典人狄摩西尼一直逗留在纳夫帕克图斯附近。这时他已经注意到这支军队，并且很为纳夫帕克图斯的安危担忧，于

是，他就去劝阿卡纳尼亚人，请他们出兵解救这座城，尽管这样做不无困难，因为他曾从莱夫卡斯率军而去。阿卡纳尼亚人按他的要求派出1,000名重步兵随他乘船扑向纳夫帕克图斯，保全了这个地方。否则，其守城范围之大和守军人数之少，一定会使它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其时，埃夫里洛胡斯和他的同僚发现这支军队进来之后，知道再袭取这座城已不可能，便将军队撤走了，但并没有撤回伯罗奔尼撒，而是撤到了过去被称为埃奥利斯的地区，现在这一地区被称为卡利敦和普莱夫龙；另外，他们还入侵了附近区域和埃托利亚的普罗斯希乌姆。这是因为安布拉基亚人曾来劝他们联合进攻安菲洛希亚的阿尔戈斯以及安菲洛希亚和阿卡那尼亚的其他地区。他们说，如果征服了这些地区，即可使整个大陆投入斯巴达同盟的怀抱。埃夫里洛胡斯对这一提议表示赞成，他遣散了埃托利亚人，带着自己的部队留在这些地区，静待安布拉基亚人开始行动，届时他将与他们在阿尔戈斯城前会合。

Summer was now over. The winter ensuing, the Athenians in Sicily with their Hellenic allies, and such of the Sicel subjects or allies of Syracuse as had revolted from her and joined their army, marched against the Sicel town Inessa, the acropolis of which was held by the Syracusans, and after attacking it without being able to take it, retired. In the retreat, the allies retreating after the Athenians were attacked by the Syracusans from the fort, and a large part of their army routed with great slaughter. After this, Laches and the Athenians from the ships made some descents in Locris, and defeating the Locrians, who came against them with Proxenus, son of Capaton, upon the river Caicinus, took some arms and departed.

夏季至此结束。在接下来的冬季里，在西西里的雅典人带着他们的希腊盟军开始向西库尔人的城镇伊内萨进军。参加这次进军的还有

叙拉古的西库尔臣民或盟友，他们早已叛离叙拉古，加入了雅典人的队伍。伊内萨的卫城由叙拉古人把守，雅典人向卫城发起进攻，但未攻克，于是就撤走了。在撤退过程中，叙拉古人从要塞中冲出来，攻向跟在雅典人后面撤退的盟军，将其大部击溃，还杀死了不少人。此事发生之后，拉凯斯率领雅典人几番在洛克里斯下舰登岸，在凯西努斯河畔打败了卡帕通之子普罗克塞努斯率领前来抵抗他们的洛克里斯人，缴获了一些武器，尔后便撤离了。

The same winter, the Athenians purified Delos, in compliance, it appears, with a certain oracle. It had been purified before by Pisistratus the tyrant; not indeed the whole island, but as much of it as could be seen from the temple. All of it was, however, now purified in the following way. All the sepulchres of those that had died in Delos were taken up, and for the future it was commanded that no one should be allowed either to die or to give birth to a child in the island; but that they should be carried over to Rhenea, which is so near to Delos that Polycrates, tyrant of Samos, having added Rhenea to his other island conquests during his period of naval ascendancy, dedicated it to the Delian Apollo by binding it to Delos with a chain.

在同一个冬季，雅典人似乎依照某种神谕对提洛岛进行了净秽。僭主皮西斯特拉图斯以前曾对这个岛进行过净秽，但不是整个岛，只是从神庙所能看到的范围。这次净秽是以下列方式对全岛进行的：他们将所有死于提洛岛者的坟墓都挖开，并宣布以后任何人不得在岛上死亡或生产，将要死亡或生产者须送往雷尼亚。雷尼亚岛与提洛岛相距很近，以至于萨摩斯岛的僭主波利克拉泰斯称霸海上时，曾将雷尼亚岛纳入他所征服的其他岛屿之列，并用一条铁链把这个岛与提洛岛连在一起，将它献给了提洛岛上的阿波罗神庙。

The Athenians, after the purification, celebra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quinquennial festival of the Delian games. Once upon a time, indeed, there was a great assemblage of the Ionians and the neighbouring islanders at Delos, who used to come to the festival, as the Ionians now do to that of Ephesus, and athletic and poetical contests took place there, and the cities brought choirs of dancers. Nothing can be clearer on this point than the following verses of Homer, taken from a hymn to Apollo:

净秽仪式结束后，雅典人首次举行了五年一度的提洛竞赛会庆祝活动。实际上，爱奥尼亚人和邻岛的居民从前就在提洛岛上举办过大型集会。他们常常去参加庆祝活动，就像现在爱奥尼亚人到以弗所去参加庆祝活动一样。以弗所还常常举行体育和诗歌比赛，各个城市都带歌舞队前来参加。关于这一点，荷马在阿波罗颂歌中描述得最清楚。他的诗句如下：

Phoebus, wherever thou strayest, far or near,

福玻斯啊，无论您远在哪里近在何处，

Delos was still of all thy haunts most dear.

提洛岛依然以最爱在您的心中永驻。

Thither the robed Ionians take their way

穿长袍的爱奥尼亚人都携妻带子

With wife and child to keep thy holiday,

动身前往那个岛去庆祝您的圣日。

Invoke thy favour on each manly game,

在各项勇敢者的竞赛中向您邀宠，

And dance and sing in honour of thy name.

一边载歌载舞一边赞颂着您的圣名。

That there was also a poetical contest in which the Ionians went to contend, again is shown by the following, taken from the same hymn. After celebrating the Delian dance of the women, he ends his song of praise with these verses, in which he also alludes to himself:

那里还有诗歌比赛，爱奥尼亚人同样也去参加，这一点从荷马同一首颂歌中的下列诗句里亦可得到印证。在赞美了提洛岛上妇女们的舞蹈之后，荷马用这些诗句结束了他的颂歌，其中还提到了他自己：

Well, may Apollo keep you all! and so,

愿阿波罗保佑你们大家！

Sweethearts, good-bye—yet tell me not I go

可爱的姑娘们，那就别了——但要告诉我

Out from your hearts; and if in after hours

我不会走出你们的心，倘若以后

Some other wanderer in this world of ours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游吟诗人

Touch at your shores, and ask your maidens here

踏上你们的海岸，询问你们这里的姑娘

Who sings the songs the sweetest to your ear,

谁唱的歌让你们觉得听起来最悦耳，

Think of me then, and answer with a smile,

那时一定要想起我，并微笑着回答，

'A blind old man of Scio's rocky isle.'

‘希俄斯多石岛上的一位盲老人。’

Homer thus attests that there was anciently a great assembly and festival at Delos. In later times, although the islanders and the Athenians continued to send the choirs of dancers with sacrifices, the contests and most of the ceremonies were abolished, probably through adversity, until the Athenians celebrated the games upon this occasion with the novelty of horse-races.

如此看来，古时候提洛岛上就有大型集会和庆祝活动这一点，荷马的诗歌可以为证。后来，岛上居民和雅典人虽然继续派歌舞队带着祭品前往，但或许是由于时世艰难，竞赛和大部分庆祝活动都没有了，直到这一次雅典人才又重办竞赛，并且新添了赛马项目。

The same winter, the Ambraciots, as they had promised Eurylochus when they retained his army, marched out against

Amphilochian Argos with three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and invading the Argive territory occupied Olpae, a stronghold on a hill near the sea, which had been formerly fortified by the Acarnanians and used as the place of assizes for their nation, and which is about two miles and three-quarters from the city of Argos upon the sea-coast. Meanwhile, the Acarnanians went with a part of their forces to the relief of Argos, and with the rest encamped in Amphilochia at the place called Crenae, or the Wells, to watch for Eurylochus and his Peloponnesians, and to prevent their passing through and effecting their junction with the Ambraciots; while they also sent for Demosthenes, the commander of the Aetolian expedition, to be their leader, and for the twenty Athenian ships that were cruising off Peloponnese under the command of Aristotle, son of Timocrates, and Hierophon, son of Antimnestus. On their part, the Ambraciots at Olpae sent a messenger to their own city, to beg them to come with their whole levy to their assistance, fearing that the army of Eurylochus might not be able to pass through the Acarnanians, and that they might themselves be obliged to fight single-handed, or be unable to retreat, if they wished it, without danger.

同年冬季，安布拉基亚人依照他们留下埃夫里洛胡斯的军队时对他的承诺，出动了3,000名重步兵向安菲洛希亚的阿尔戈斯进军。侵入阿尔戈斯的领土后，他们攻占了奥尔佩。这是大海附近小山上的一个要塞，以前是阿卡纳尼亚人修筑的，用作他们城邦巡回审判的处所，地点离海滨上的阿尔戈斯市大约2.75英里。与此同时，阿卡纳尼亚人带着部分部队前去援救阿尔戈斯，其余部队则在安菲洛希亚一个叫克雷内或“泉水”的地方扎下营盘，监视着埃夫里洛胡斯和他麾下伯罗奔尼撒人的动静，以防他们由此去与安布拉基亚人会合。同时，他们派人去找埃托利亚远征的指挥官狄摩西尼，请他来指挥他们。另外，他们还派人去请那20艘雅典舰。那些战舰当时正在伯罗奔尼撒附近游弋，指挥官是蒂莫克拉泰斯的儿子亚里士多德和安蒂姆内斯图斯

的儿子希埃罗丰。在奥尔佩的安布拉基亚人也派了一名信使去自己的城市，请求他们的同胞全军出动前来增援。他们非常担心埃夫里洛胡斯的军队过不了阿卡纳尼亚人那道关。倘若如此，他们可能就得孤军奋战。即便想撤，恐怕也无法安然撤离。

Meanwhile, Eurylochus and his Peloponnesians, learning that the Ambraciots at Olpae had arrived, set out from Proschium with all haste to join them, and crossing the Achelous advanced through Acarnania, which they found deserted by its population, who had gone to the relief of Argos; keeping on their right the city of the Stratians and its garrison, and on their left the rest of Acarnania. Traversing the territory of the Stratians, they advanced through Phytia, next, skirting Medeon, through Limnaea; after which they left Acarnania behind them and entered a friendly country, that of the Agraeans. From thence they reached and crossed Mount Thymaus, which belongs to the Agraeans, and descended into the Argive territory after nightfall, and passing between the city of Argos and the Acarnanian posts at Crenae, joined the Ambraciots at Olpae.

在此期间，埃夫里洛胡斯率领他麾下的伯罗奔尼撒人，在获悉奥尔佩的安布拉基亚人已经到达之后，连忙从普罗斯希乌姆出发前去与安布拉基亚人会合。他们渡过阿谢洛奥斯河后，遂经阿卡纳尼亚向前推进，却发现当地的居民已经走光，全都去援救阿尔戈斯了。他们的右边是斯特拉图斯人的城市及其要塞，左边是阿卡那尼亚的其余部分。通过斯特拉图斯人的领土之后，他们穿过菲蒂亚向前进发，然后绕过迈德翁，穿过利姆内阿。其后，他们将阿卡那尼亚甩在身后，进入了与他们友好的阿格雷阿人的领土。从那里，他们又来到属于阿格雷阿人的西马夫斯山。翻过山之后，他们在黄昏后下至阿尔戈斯境内，从阿尔戈斯城与阿卡那尼亚人在克雷内的营地之间穿过，与安布

拉基亚人会师于奥尔佩。

Uniting here at daybreak, they sat down at the place called Metropolis, and encamped. Not long afterwards the Athenians in the twenty ships came into the Ambracian Gulf to support the Argives, with Demosthenes and two hundred Messenian heavy infantry, and sixty Athenian archers. While the fleet off Olpae blockaded the hill from the sea, the Acarnanians and a few of the Amphilochians, most of whom were kept back by force by the Ambraciots, had already arrived at Argos, and were preparing to give battle to the enemy, having chosen Demosthenes to command the whole of the allied army in concert with their own generals. Demosthenes led them near to Olpae and encamped, a great ravine separating the two armies. During five days they remained inactive; on the sixth both sides formed in order of battle. The army of the Peloponnesians was the largest and outflanked their opponents; and Demosthenes fearing that his right might be surrounded, placed in ambush in a hollow way overgrown with bushes some four hundred heavy infantry and light troops, who were to rise up at the moment of the onset behind the projecting left wing of the enemy, and to take them in the rear. When both sides were ready they joined battle; Demosthenes being on the right wing with the Messenians and a few Athenians, while the rest of the line was made up of the different divisions of the Acarnanians, and of the Amphilochian darter. The Peloponnesians and Ambraciots were drawn up pell-mell together,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Mantineans, who were massed on the left, without however reaching to the extremity of the wing, where Eurylochus and his men confronted the Messenians and Demosthenes.

破晓时分在这里会师后，他们占据了一个叫迈特罗波利斯的地方，在那里扎下了营盘。不久之后，雅典人带着那20艘战舰进入安布拉基亚湾，以支援阿尔戈斯人。与他们同来的还有狄摩西尼率领的200名麦西尼亚重步兵和60名雅典弓箭手。这支舰队在奥尔佩附近从海上封锁住小山时，阿卡纳尼亚人和少数安菲洛希亚人（大部分安菲洛希亚人被安布拉基亚人用武力牵制住了）已经抵达阿尔戈斯，准备向敌人开战。他们推举狄摩西尼与他们自己的将军一同指挥整个盟军。狄摩西尼率领他们到奥尔佩附近安下营盘，这里有一个大深谷，将双方的军队分隔开来。两军五天都没动静。直到第六天，双方摆开了战斗队形。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队人数最多，对敌军形成了侧翼包围之势。狄摩西尼担心自己的右翼被围，命令大约400名重步兵和轻步兵埋伏在了一条灌木丛生的凹路上。在发起进攻那一刻，这支部队将从敌军前突的左翼背后跃起，以抄他们的后路。双方准备就绪后，交战就开始了。狄摩西尼率麦西尼亚人和少数雅典人在右翼，阵线的其余部分由阿卡纳尼亚人的各个分队和安菲洛希亚的标枪手分别组成。伯罗奔尼撒人与安布拉基亚人的队伍则混列在一起，只有曼提尼亚人除外。他们全聚在左翼，但也没及左翼之外，那里有埃夫里洛胡斯率其部队与狄摩西尼所率的麦西尼亚人对阵。

The Peloponnesians were now well engaged and with their outflanking wing were upon the point of turning their enemy's right; when the Acarnanians from the ambuscade set upon them from behind, and broke them at the first attack, without their staying to resist; while the panic into which they fell caused the flight of most of their army, terrified beyond measure at seeing the division of Eurylochus and their best troops cut to pieces. Most of the work was done by Demosthenes and his Messenians, who were posted in this part of the field. Meanwhile, the Ambraciots (who are the best soldiers in those countries) and the troops upon the right wing defeated the division opposed to them and pursued it to Argos. Returning from the pursuit, they found their main body

defeated; and hard pressed by the Acarnanians, with difficulty made good their passage to Olpae, suffering heavy loss on the way, as they dashed on without discipline or order, the Mantineans excepted, who kept their ranks best of any in the army during the retreat.

伯罗奔尼撒人立时激烈地搏杀起来，承担侧翼包抄任务的那一翼正要朝敌军的右翼围去，阿卡纳尼亚人突然冲出伏击点，从他们背后袭来，一举冲乱了他们的队伍，使得他们无法再列阵抵抗。他们一慌乱，军中大部分人便开始落荒而逃。埃夫里洛胡斯的部队是他们的精锐之师，看到他的部队都被打得溃不成军，他们惊恐至极。这一战果的取得，主要归功于狄摩西尼率领的麦西尼亚人，他们正好部署在这一阵地上。与此同时，安布拉基亚人（他们是这些地区最好的战士）和右翼的部队战胜了与之对阵的敌军，乘胜追击将敌人逼至阿尔戈斯。追击回来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主力已经战败。在阿卡纳尼亚人的紧逼之下，他们好不容易才回到奥尔佩。由于奔逃时军中既无纪律又无秩序，他们在途中损失惨重。不过，曼提尼亚人是个例外，在撤退过程中，他们的队形是整个军队中保持的最好的。

The battle did not end until the evening. The next day, Menedaius, who on the death of Eurylochus and Macarius had succeeded to the sole command, being at a loss after so signal a defeat how to stay and sustain a siege, cut off as he was by land and by the Athenian fleet by sea, and equally so how to retreat in safety, opened a parley with Demosthenes and the Acarnanian generals for a truce and permission to retreat, and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recovery of the dead. The dead they gave back to him, and setting up a trophy took up their own also to the number of about three hundred. The retreat demanded they refused publicly to the army; but permission to depart without delay was secretly granted to the

Mantineans and to Menedaius and the other commanders and principal men of the Peloponnesians by Demosthenes and his Acarnanian colleagues; who desired to strip the Ambraciots and the mercenary host of foreigners of their supporters; and, above all, to discredit the Lacedaemonians and Peloponnesians with the Hellenes in those parts, as traitors and self-seekers.

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才结束。翌日，由于埃夫里洛胡斯和马卡里乌斯皆已阵亡，迈内泽乌斯独自承担起了指挥之责。可是，在如此惨重的失败之后，他真不知该如何留在那里抵御围攻，因为陆路已被切断，海路也被雅典舰队切断了；他同样不知如何才能安全撤退。因此，他便与狄摩西尼和阿卡纳尼亚的将军们展开谈判，要求停战并允许其撤离，同时要求收回阵亡者的尸体。他们将阵亡者的尸体交还给他，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然后将己方阵亡者的尸体也收集起来，总共大约300具。至于这支部队提出的撤离要求，他们虽然公开表示拒绝，但狄摩西尼和他的阿卡纳尼亚同僚却私下商定，允许曼提尼亚人、迈内泽乌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其他指挥官及主要人员撤离，目的是想使安布拉基亚人及其外邦雇佣军失去支持者，尤其是想在那些地区的希腊人当中败坏斯巴达人和伯罗奔尼撒人的名声，让人们认为他们是背信弃义和追逐私利之徒。

While the enemy was taking up his dead and hastily burying them as he could, and those who obtained permission were secretly planning their retreat, word was brought to Demosthenes and the Acarnanians that the Ambraciots from the city, in compliance with the first message from Olpae, were on the march with their whole levy through Amphilochia to join their countrymen at Olpae, knowing nothing of what had occurred. Demosthenes prepared to march with his army against them, and meanwhile sent on at once a strong division to beset the roads and occupy the strong positions.

In the meantime, the Mantineans and others included in the agreement went out under the pretence of gathering herbs and firewood, and stole off by twos and threes, picking on the way the things which they professed to have come out for, until they had gone some distance from Olpae, when they quickened their pace. The Ambraciots and such of the rest as had accompanied them in larger parties, seeing them going on, pushed on in their turn, and began running in order to catch them up. The Acarnanians at first thought that all alike were departing without permission, and began to pursue the Peloponnesians; and believing that they were being betrayed, even threw a dart or two at some of their generals who tried to stop them and told them that leave had been given. Eventually, however, they let pass the Mantineans and Peloponnesians, and slew only the Ambraciots, there being much dispute and difficulty in distinguishing whether a man was an Ambraciot or a Peloponnesian. The number thus slain was about two hundred; the rest escaped into the bordering territory of Agraea, and found refuge with Salynthius, the friendly king of the Agraeans.

于是，敌军开始收回死者的尸体，尽快将尸体掩埋，那些获准离去的人则私下谋划着自己如何撤离。正在这时，狄摩西尼和阿卡纳尼亚人接到消息说，安布拉基亚城的人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根据奥尔佩传出的首条消息率全军人马经安菲洛希亚前来与他们在奥尔佩的同胞会合。狄摩西尼火速派出一支精兵先去堵塞道路，占据有利阵地，同时自己也准备率军迎敌。其间，曼提尼亚人和协议中所包括的其他人以掐菜和拾柴火为名离开队伍，三三两两地溜走了，沿途捡拾着自己号称出来要找的东西。离开奥尔佩有一段距离之后，他们才突然加快脚步。安布拉基亚人以及他们所在大部队的其余人等一见他们先走了，自己也赶紧前行，为了追上他们甚至开始跑起来。阿卡纳尼亚人起初以为他们全军擅自离队，开始追那些伯罗奔尼撒人。有几

个将军想阻止他们，便告诉他们这些人是获准离开的。他们觉得自己被背弃了，甚至向这几个将军扔了一、两支标枪。然而，他们最终还是放过了曼提尼亚人和伯罗奔尼撒人，只杀了安布拉基亚人。不过，要辨别一个人到底是安布拉基亚人还是伯罗奔尼撒人确实很难，还引起不少争议。这样被杀死的大约有200人。余者越过边界，逃进阿格雷阿境内，受到了友好的阿格雷阿国王萨林西乌斯的庇护。

Meanwhile, the Ambraciots from the city arrived at Idomene. Idomene consists of two lofty hills, the higher of which the troops sent on by Demosthenes succeeded in occupying after nightfall, unobserved by the Ambraciots, who had meanwhile ascended the smaller and bivouacked under it. After supper Demosthenes set out with the rest of the army, as soon as it was evening; himself with half his force making for the pass, and the remainder going by the Amphilochian hills. At dawn he fell upon the Ambraciots while they were still abed, ignorant of what had passed, and fully thinking that it was their own countrymen—Demosthenes having purposely put the Messenians in front with orders to address them in the Doric dialect, and thus to inspire confidence in the sentinels, who would not be able to see them as it was still night. In this way, he routed their army as soon as he attacked it, slaying most of them where they were, the rest breaking away in flight over the hills. The roads, however, were already occupied, and while the Amphilochians knew their own country, the Ambraciots were ignorant of it and could not tell which way to turn, and had also heavy armour as against a light-armed enemy, and so fell into ravines and into the ambushes which had been set for them, and perished there. In their manifold efforts to escape some even turned to the sea, which was not far off, and seeing the Athenian ships coasting alongshore just while the action was going on, swam off to them, thinking it better in the panic they were in, to perish, if perish they must, by the

hands of the Athenians, than by those of the barbarous and detested Amphilochians. Of the large Ambraciot force destroyed in this manner, a few only reached the city in safety; while the Acarnanians, after stripping the dead and setting up a trophy, returned to Argos.

这时候，来自安布拉基亚城的援军抵达了伊佐迈内。伊佐迈内由两座高山组成，较高的一座已在黄昏后被狄摩西尼派来的先遣部队所占领，但安布拉基亚人并未察觉。其间，他们曾爬上那座较低矮的山，尔后露宿在山脚下。晚饭后，天一黑，狄摩西尼就率领其余部队出发了。他本人带着一半部队向山口进发，其余部队则靠着安菲洛希亚的山边向前行进。黎明时，安布拉基亚人尚在熟睡，他就朝他们发起了进攻。安布拉基亚人根本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完全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同胞。狄摩西尼故意将麦西尼亚人放在队伍前面，还命令他们用多利斯地区的方言与敌军对话，从而打消了哨兵的疑虑。由于夜色未退，哨兵也辨不清他们是何人。他就用这种方法一举击溃了敌军，大部分人当场被杀，其余的人夺命而逃，跑到了山上。可是，那里的路早已被占领，安菲洛希亚人对自己的家乡了如指掌，安布拉基亚人对当地却一无所知，不知该转向哪条路才好，加之为了对付轻装的敌军，他们穿了重甲，以至于不是落入深谷，就是掉进了为他们设下的伏击圈而丧命。在他们多方设法逃跑的过程中，有些人甚至朝不远处的大海跑去。战斗正在进行时，他们看到雅典的战舰在沿着海岸航行，竟向雅典的舰只游去。惊惶之中，他们居然认为，即便死，也要死在雅典人手里，而不是死在野蛮而可恶的安菲洛希亚人手中。安布拉基亚的大军就这样被歼灭，安全逃回城里的只是少数。阿卡纳尼亚人剥去死者的衣甲，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尔后回阿尔戈斯去了。

The next day arrived a herald from the Ambraciots who had fled from Olpae to the Agraeans, to ask leave to take up the dead

that had fallen after the first engagement, when they left the camp with the Mantineans and their companions, without, like them, having had permission to do so. At the sight of the arms of the Ambraciots from the city, the herald was astonished at their number, knowing nothing of the disaster and fancying that they were those of their own party. Some one asked him what he was so astonished at, and how many of them had been killed, fancying in his turn that this was the herald from the troops at Idomene. He replied, “About two hundred”; upon which his interrogator took him up, saying, “Why, the arms you see here are of more than a thousand.” The herald replied, “Then they are not the arms of those who fought with us?” The other answered, “Yes, they are, if at least you fought at Idomene yesterday.” “But we fought with no one yesterday; but the day before in the retreat.” “However that may be, we fought yesterday with those who came to reinforce you from the city of the Ambraciots.” When the herald heard this and knew that the reinforcement from the city had been destroyed, he broke into wailing and, stunned at the magnitude of the present evils, went away at once without having performed his errand, or again asking for the dead bodies. Indeed, this was by far the greatest disaster that befell any one Hellenic city in an equal number of days during this war; and I have not set down the number of the dead, because the amount stated seems so out of proportion to the size of the city as to be incredible. In any case I know that if the Acarnanians and Amphilochians had wished to take Ambracia as the Athenians and Demosthenes advised, they would have done so without a blow; as it was, they feared that if the Athenians had it they would be worse neighbours to them than the present.

翌日，从奥尔佩逃往阿格雷阿的安布拉基亚人派来一名传令官，要求允许他们收回第一次交战中阵亡者的尸体。他们与曼提尼亚人及

其同伴离开营地时，没有像他们一样获准这样做。看到从来自安布拉基亚城的援兵身上取下的武器那么多，这名传令官十分惊讶。他对后来的惨败一无所知，还以为那些武器都是他们自己那队人的。有人以为这名传令官是伊佐迈内的军队派来的，就问他为何如此惊讶，还问他阵亡了多少人。他回答说："大约200人。"问话的人一听就打断他的话说："怎么会！你在这里看到的武器可不止1,000件呀。"传令官回答："这难道不是和我们并肩作战的那些人的武器？"另外那个人说："是他们的，如果你们昨天在伊佐迈内算是打过仗的话。""可是，我们昨天没打过仗呀，那是前天撤退时的事情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昨天跟那些安布拉基亚人城派来增援你们的人打过仗。"听到这里，传令官才知道城里来的援军已全军覆没，不禁失声恸哭起来。他被眼前的惨状惊得目瞪口呆，没有履行自己的使命，也没再要求收回阵亡者的尸体，而是马上走掉了。这确实是这场战争中单个希腊城市在同样天数内遭受的一次最大的灾难。我没有记载阵亡者的人数，因为传说中的阵亡人数与这个城市的规模似乎不成比例，因而不足以采信。不管怎样，我知道，如果阿卡纳尼亚人和安菲洛希亚人听从狄摩西尼和雅典人所建议的那样攻取安布拉基亚，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做到。实际上，他们所担心的是，如果雅典人占据了这个地方，则会比现在的近邻更难处。

After this, the Acarnanians allotted a third of the spoils to the Athenians, and divided the rest among their own different towns. The share of the Athenians was captured on the voyage home; the arms now deposited in the Attic temples are three hundred panoplies, which the Acarnanians set apart for Demosthenes, and which he brought to Athens in person, his return to his country after the Aetolian disaster being rendered less hazardous by this exploit. The Athenians in the twenty ships also went off to Naupactus. The Acarnanians and Amphilochians, after the departure of Demosthenes and the Athenians, granted the Ambraciots and Peloponnesians who had taken refuge with

Salynthius and the Agraeans a free retreat from Oeniadae, to which place they had removed from the country of Salynthius, and for the future concluded with the Ambraciots a treaty and alliance for one hundred years, upon the terms following. It was to be a defensive, not an offensive alliance; the Ambraciots could not be required to march with the Acarnanians against the Peloponnesians, nor the Acarnanians with the Ambraciots against the Athenians; for the rest the Ambraciots were to give up the places and hostages that they held of the Amphilochians, and not to give help to Anactorium, which was at enmity with the Acarnanians. With this arrangement they put an end to the war. After this, the Corinthians sent a garrison of their own citizens to Ambracia, composed of three hundred heavy infantry, under the command of Xenocleides, son of Euthycles, who reached their destination after a difficult journey across the continent. Such was the history of the affair of Ambracia.

这一仗之后，阿卡纳尼亚把三分之一的战利品分给了雅典人，其余的分给了他们自己的城镇。雅典人那一份在驶回雅典的途中被劫夺了。现在存放在阿提卡神庙中的300副甲胄是阿卡纳尼亚人专门留给狄摩西尼的，后来由他亲自带回了雅典。在埃托利亚那次惨败之后，因为有了这次的功绩，他返回雅典已经没有那么危险了。那20艘舰上的雅典人也回到纳夫帕克图斯去了。狄摩西尼和雅典人离去之后，阿卡那尼亚人和安菲洛希亚人允许在萨林西乌斯和阿格雷阿人那里避难的安布拉基亚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从伊尼阿泽（他们已离开萨林西乌斯的领土去了那个地方）不受干涉地撤离。关于未来，他们与安布拉基亚人缔结了一个百年同盟条约，条款如下：这是一个防御性同盟，而不是进攻性同盟。阿卡纳尼亚人不得要求安布拉基亚人与其一道攻打伯罗奔尼撒人；安布拉基亚人也不得要求阿卡纳尼亚人与其一道攻打雅典人。此外，安布拉基亚人放弃他们占领的安菲洛希亚市镇和他们扣押的安菲洛希亚人质，且不得帮助与阿卡纳尼亚人为敌的阿纳克托里乌姆。随着这一协议的达成，他们之间的战争亦告一段落。其后，

科林斯人将一支由自己公民组成的驻军派往安布拉基亚，军队由300名重步兵组成。在埃夫西克莱斯的儿子克赛诺克利泽斯的率领下，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才横穿大陆抵达目的地。这是安布拉基亚事件的始末。

The same winter, the Athenians in Sicily made a descent from their ships upon the territory of Himera, in concert with the Sicels, who had invaded its borders from the interior, and also sailed to the islands of Aeolus. Upon their return to Rhegium they found the Athenian general, Pythodorus, son of Isolochus, come to supersede Laches in the command of the fleet. The allies in Sicily had sailed to Athens and induced the Athenians to send out more vessels to their assistance, pointing out that the Syracusans who already commanded their land were making efforts to get together a navy, to avoid being any longer excluded from the sea by a few vessels. The Athenians proceeded to man forty ships to send to them, thinking that the war in Sicily would thus be the sooner ended, and also wishing to exercise their navy. One of the generals, Pythodorus, was accordingly sent out with a few ships; Sophocles, son of Sostratides, and Eurymedon, son of Thucles, being destined to follow with the main body. Meanwhile, Pythodorus had taken the command of Laches' ships, and towards the end of winter sailed against the Locrian fort, which Laches had formerly taken, and returned after being defeated in battle by the Locrians.

在同一个冬季，西西里的雅典人在希迈拉的领土登了陆。与他们联手行动的西库尔人曾从内地侵入希迈拉境内。雅典人还驶往埃奥卢斯群岛。他们返回雷伊乌姆后发现，雅典将军皮索佐鲁斯（伊索洛胡斯的儿子）已取代拉凯斯指挥这支舰队。西西里的盟友已驶往雅典，劝雅典人再派些战舰去支援他们。他们指出，叙拉古人已经控制他们

的土地，此时正在筹备一支舰队，以免再被区区几艘舰只挡在大海之外。于是，雅典人开始着手配备40艘战舰，准备派去支援他们。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早些结束在西西里的战事。同时，他们也希望借此使自己的海军得到锻炼。因此，他们先派其中一位将军皮索佐鲁斯率领少数舰只先期到达，又令索斯特拉蒂泽斯的儿子索福克莱斯和苏克莱斯的儿子埃夫里迈宗率主力随后赶到。与此同时，皮索佐鲁斯取得了拉凯斯麾下战舰的指挥权，冬季接近尾声时，他率舰前去攻打洛克里斯的要塞。拉凯斯以前曾攻克过这一要塞，被洛克里斯人打败之后又回来了。

In the first days of this spring, the stream of fire issued from Etna, as on former occasions, and destroyed some land of the Catanians, who live upon Mount Etna, which is the largest mountain in Sicily. Fifty years, it is said, had elapsed since the last eruption, there having been three in all since the Hellenes have inhabited Sicily. Such were the events of this winter; and with it ended the sixth year of this war, of which Thucydides was the historian.

春天刚开始那几天，埃特纳火山喷出的火山熔岩，如同前几次一样，摧毁了卡塔纳人的部分土地。埃特纳火山是西西里最大的山，卡塔纳人就居住在这座山上。据说，上一次火山爆发是在五十年前。自从希腊人居住到西西里之后，这座火山总共爆发过三次。这个冬季所发生的事到此结束，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六年亦随之结束。

BOOK IV

第四卷

CHAPTER XII Seventh Year of the War—Occupation of Pylos—Surrender of the Spartan Army in Sphacteria

第十二章　战争第七年——皮洛斯被占领——斯巴达军队在斯法克泰里亚投降

Next summer, about the time of the corn's coming into ear, ten Syracusan and as many Locrian vessels sailed to Messina, in Sicily, and occupied the town upon the invitation of the inhabitants; and Messina revolted from the Athenians. The Syracusans contrived this chiefly because they saw that the place afforded an approach to Sicily, and feared that the Athenians might hereafter use it as a base for attacking them with a larger force; the Locrians because they wished to carry on hostilitie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and to reduce their enemies, the people of Rhegium. Meanwhile, the Locrians had invaded the Rhegian territory with all their forces, to prevent their succouring Messina, and also at the instance of some exiles from Rhegium who were with them; the long factions by which that town had been torn rendering it for the moment incapable of resistance, and thus furnishing an additional temptation to the invaders. After devastating the country the Locrian land forces retired, their ships remaining to guard Messina, while others were being manned for the same destination to carry on the war from thence.

翌年夏季，大约在麦子正要吐穗的时候，10艘叙拉古战舰和10艘

洛克里斯战舰驶向西西里的墨西拿，应当地居民之邀占领了这座城，墨西拿就此叛离了雅典。叙拉古人策划这一行动，主要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地方是进入西西里的要道，担心雅典人将来以此为基地率领更大规模的军队进攻他们。洛克里斯人则是因为想从海峡两面发动进攻，以战胜他们的敌人雷伊乌姆人。同时，洛克里斯人还出动全部军队入侵了雷伊乌姆的领土，目的是为了阻止他们增援墨西拿，同时也是应随行的一些雷伊乌姆流亡者之邀。长期的党派斗争已令这座城四分五裂，暂无抵抗之力，也因此而使得它对入侵者更具诱惑力。破坏了这里的土地之后，洛克里斯的陆军撤走了，他们的战舰则留下来守卫墨西拿，同时他们为其他一些战舰配备人员，准备从墨西拿出击作战。

About the same time, in the spring, before the corn was ripe,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ir allies invaded Attica under Agis, the son of Archidamus, king of the Lacedaemonians, and sat down and laid waste the country.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sent off the forty ships which they had been preparing to Sicily, with the remaining generals Eurymedon and Sophocles; their colleague Pythodorus having already preceded them thither. These had also instructions as they sailed by to look to the Corcyraeans in the town, who were being plundered by the exiles in the mountain. To support these exiles sixty Peloponnesian vessels had lately sailed, it being thought that the famine raging in the city would make it easy for them to reduce it. Demosthenes also, who had remained without employment since his return from Acarnania, applied and obtained permission to use the fleet, if he wished it, upon the coast of Peloponnese.

大约在春天的同一时间，麦子尚未成熟时，伯罗奔尼撒人及其盟友在斯巴达国王亚基斯（阿希达穆斯之子）的指挥下入侵了阿提卡。

他们在那里扎下营盘，践踏了乡村地区。与此同时，雅典人将他们一直在准备的40艘战舰交给留下的两位将军，即埃夫里迈宗和索福克莱斯，由他们率领驶往西西里。他们的同僚皮索佐鲁斯已先于他们到了那里。他们还奉令在航行途中照应一下城里的克基拉人，因为后者正在遭受山中流亡党人的劫掠。为了支援这些流亡党人，伯罗奔尼撒人不久前已派60艘战舰驶往那里，在他们看来，城里饥荒肆虐，攻克它并非难事。从阿卡纳尼亚归来后一直未任职的狄摩西尼也申请并获准使用这支舰队，在舰队沿着伯罗奔尼撒的海岸航行期间，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动用这支舰队。

Off Laconia, they heard that the Peloponnesian ships were already at Corcyra, upon which Eurymedon and Sophocles wished to hasten to the island, but Demosthenes required them first to touch at Pylos and do what was wanted there, before continuing their voyage. While they were making objections, a squall chanced to come on and carried the fleet into Pylos. Demosthenes at once urged them to fortify the place, it being for this that he had come on the voyage, and made them observe there was plenty of stone and timber on the spot, and that the place was strong by nature, and together with much of the country round unoccupied; Pylos, or Coryphasium, as the Lacedaemonians call it, being about forty-five miles distant from Sparta, and situated in the old country of the Messenians. The commanders told him that there was no lack of desert headlands in Peloponnese if he wished to put the city to expense by occupying them. He, however, thought that this place was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s of the kind by having a harbour close by; while the Messenians, the old natives of the country, speaking the same dialect as the Lacedaemonians, could do them the greatest mischief by their incursions from it, and would at the same time be a trusty garrison.

驶至拉科尼亚附近时，他们听说伯罗奔尼撒的战舰已到克基拉。获悉这一消息后，埃夫里迈宗和索福克莱斯很想赶快驶往该岛，但狄摩西尼却要求他们先在皮洛斯作短暂停留，完成他在那里想做之事，尔后再继续他们的航程。他们正想表示异议，恰有一场暴风袭来，刮得舰队只好开进皮洛斯。狄摩西尼立即催促他们为这个地方修筑防御工事，他参加这次远航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提醒他们注意，现场就有很多石料和木材，而且那个地方本身就很坚不可摧，周围很多地方都没有居民。皮洛斯距斯巴达约45英里，位于麦西尼亚人的故土之上，斯巴达人称它为科里法西乌姆。两位指挥官对他说，如果他想花雅典的钱来占领荒芜的海角地带，伯罗奔尼撒不乏这种地方。然而，狄摩西尼却认为这个地方与其他同类地方不同：它附近有一个海港；另外，这地方原来的居民是麦西尼亚人，他们与斯巴达人讲同一种方言。他认为，若能从这里入侵，他们可以给斯巴达人造成极大的危害，同时还可以成为这里的可靠守军。

After speaking to the captains of companies on the subject, and failing to persuade either the generals or the soldiers, he remained inactive with the rest from stress of weather; until the soldiers themselves wanting occupation were seized with a sudden impulse to go round and fortify the place. Accordingly, they set to work in earnest, and having no iron tools, picked up stones, and put them together as they happened to fit, and where mortar was needed, carried it on their backs for want of hods, stooping down to make it stay on, and clasping their hands together behind to prevent it falling off; sparing no effort to be able to complete the most vulnerable points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Lacedaemonians, most of the place being sufficiently strong by nature without further fortifications.

他对各舰队船长说了这件事，但他既未能说服两位将军，也未能

说服那些士兵。由于天气不好，他便与其他人一起无所事事消磨时光。后来，闲极无聊的士兵们自己突发奇想，打算四处转转，给这个地方修筑防御工事。于是，他们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没有铁制工具，他们就去捡石头，把形状正好契合的对在一起；没有砂浆桶，哪里需要砂浆，他们就用自己的背来背，先弯下腰将砂浆堆到背上，再把两手背到身后扣在一起，以防砂浆掉下来。为了能在斯巴达人到来之前完成最易遭受攻击之处的加固工作，他们可谓不遗余力。其余大部分本身就够坚固了，不需要加筑工事。

Meanwhile, the Lacedaemonians were celebrating a festival, and also at first made light of the news, in the idea that whenever they chose to take the field the place would be immediately evacuated by the enemy or easily taken by force; the absence of their army before Athens having also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ir delay. The Athenians fortified the place on the land side, and where it most required it, in six days, and leaving Demosthenes with five ships to garrison it, with the main body of the fleet hastened on their voyage to Corcyra and Sicily.

那时候，斯巴达人正在欢庆节日。最初获知这一情况时，他们也没太在意，他们认为，不管什么时候想攻打那个地方，不是敌人望风而逃，就是那里一攻就破。另外，他们迟迟未打这个地方，与他们的军队尚在雅典城前也有一定关系。雅典人用六天的时间加固了面向陆地那边和最需要加固的地方，给狄摩西尼留下5艘战舰作防守之用，然后带着舰队主力赶往克基拉和西西里去了。

As soon as the Peloponnesians in Attica heard of the occupation of Pylos, they hurried back home;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king Agis thinking that the matter touched them nearly. Besides

having made their invasion early in the season, and while the corn was still green, most of their troops were short of provisions; the weather also was unusually bad for the time of year, and greatly distressed their army. Many reasons thus combined to hasten their departure and to make this invasion a very short one; indeed they only stayed fifteen days in Attica.

听说皮洛斯已被占领，在阿提卡的伯罗奔尼撒人急忙撤回本邦。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国王亚基斯都认为，这件事触及了他们的要害。此外，就季节而言，他们这次入侵也早了一些，麦田依然青苗一片，大部分军队缺少给养。另外，天气也比往年这个时候糟糕，让他们的军队大吃苦头。因此，由于多种原因所致，他们匆匆撤离了，使得这次入侵时间很短，事实上，他们在阿提卡仅停留了十五天。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Athenian general Simonides getting together a few Athenians from the garrisons, and a number of the allies in those parts, took Eion in Thrace, a Mendaean colony and hostile to Athens, by treachery, but had no sooner done so than the Chalcidians and Bottiaeans came up and beat him out of it, with the loss of many of his soldiers.

大约在同时，雅典将军西莫尼季斯召集起驻军中的一些雅典人和一些当地盟军，借助内应占领了色雷斯的伊翁，伊翁是门德人的一个殖民地，对雅典持敌视态度。但是，哈尔基斯人和博蒂亚人一到，便将他们又打了出去，致使他折损了不少士兵。

On the return of the Peloponnesians from Attica, the Spartans themselves and the nearest of the Perioeci at once set out for Pylos,

the other Lacedaemonians following more slowly, as they had just come in from another campaign. Word was also sent round Peloponnese to come up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o Pylos; while the sixty Peloponnesian ships were sent for from Corcyra, and being dragged by their crews across the isthmus of Leucas, passed unperceived by the Athenian squadron at Zacynthus, and reached Pylos, where the land forces had arrived before them. Before the Peloponnesian fleet sailed in, Demosthenes found time to send out unobserved two ships to inform Eurymedon and the Athenians on board the fleet at Zacynthus of the danger of Pylos and to summon them to his assistance. While the ships hastened on their voyage in obedience to the orders of Demosthenes, the Lacedaemonians prepared to assault the fort by land and sea, hoping to capture with ease a work constructed in haste, and held by a feeble garrison. Meanwhile, as they expected the Athenian ships to arrive from Zacynthus, they intended, if they failed to take the place before, to block up the entrances of the harbour to prevent their being able to anchor inside it. For the island of Sphacteria, stretching along in a line close in front of the harbour, at once makes it safe and narrows its entrances, leaving a passage for two ships on the side nearest Pylos and the Athenian fortifications, and for eight or nine on that next the rest of the mainland; for the rest, the island was entirely covered with wood, and without paths through not being inhabited, and about one mile and five furlongs in length. The inlets the Lacedaemonians meant to close with a line of ships placed close together, with their prows turned towards the sea, and, meanwhile, fearing that the enemy might make use of the island to operate against them, carried over some heavy infantry thither, stationing others along the coast. By this means the island and the continent would be alike hostile to the Athenians, as they would be unable to land on either; and the shore of Pylos itself outside the inlet towards the open sea having no harbour, and, therefore, presenting

no point which they could use as a base to relieve their countrymen, they, the Lacedaemonians, without sea-fight or risk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become masters of the place, occupied as it had been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and unfurnished with provisions. This being determined, they carried over to the island the heavy infantry, drafted by lot from all the companies. Some others had crossed over before in relief parties, but these last who were left there were four hundred and twenty in number, with their Helot attendants, commanded by Epitadas, son of Molobrus.

伯罗奔尼撒人从阿提卡回来之后，斯巴达人和离他们最近的珀里俄基人立即出发赶赴皮洛斯，其他斯巴达人则来得慢一些，因为他们刚从另一场战役归来。他们还传令整个伯罗奔尼撒，要求各部队尽快赶赴皮洛斯。在克基拉的那60艘伯罗奔尼撒战舰也接到了命令，这些舰只都是由舰上人员拖过莱夫卡斯地峡的，因而没被在扎金索斯那个雅典海军中队发觉。他们赶到皮洛斯时，陆军已经先到了。伯罗奔尼撒的舰队驶来之前，狄摩西尼预先悄悄派出了两艘战舰，将皮洛斯面临的危险通知给埃夫里迈宗和在扎金索斯雅典舰队，要求他们前去支援。这些舰只遵照狄摩西尼的命令急驶而来时，斯巴达人正准备从水陆两路同时向要塞发动进攻。他们希望能轻松夺取这个修建仓促且守军不足的要塞。同时，由于预料到雅典的战舰会从扎金索斯赶来，他们还作此打算：如果不能在雅典战舰赶到之前攻克这个地方，那就将港口的各个入口封锁起来，使他们的舰只无法进入停泊。港口前不远处横卧着斯法克泰里亚岛，增强了港口的安全性，缩小了港口的入口，使距皮洛斯和雅典人所筑工事最近的那一边只能容两艘船通过，在靠近大陆其他地方那边也只能容八、九艘船并行。岛上完全为林木所覆盖，没有人居住，所以也就没有道路。岛全长约1英里5弗隆。斯巴达人打算将战舰紧紧排成一排封锁住入口，舰首朝向大海。同时，由于担心敌人利用斯法克泰里亚岛向自己发动进攻，他们往那里运送了一批重步兵，其他重步兵则部署到了沿岸一带。这样，对雅典人来说，这个岛和大陆就都成了敌占区，因为他们无法在任何一处登陆。

再者，入口之外的皮洛斯岛面朝大海那边的海岸上没有港口，他们解救自己的同胞时没有可以用作基地的地方，而斯巴达人则无需海战或冒险便很有可能控制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是临时占领的，没有储备给养。方案确定之后，斯巴达人将重步兵运至岛上，这些重步兵是通过抽签方式由各个连队选派的。另外一些人此前已划分成增援小分队分拨轮流过去，最后一批渡海留在那里的总共420人，各自都带有希洛人作仆从，指挥官是莫洛布鲁斯的儿子埃皮塔扎斯。

Meanwhile, Demosthenes, seeing the Lacedaemonians about to attack him by sea and land at once, himself was not idle. He drew up under the fortification and enclosed in a stockade the galleys remaining to him of those which had been left him, arming the sailors taken out of them with poor shields made most of them of osier, it being impossible to procure arms in such a desert place, and even these having been obtained from a thirty-oared Messenian privateer and a boat belonging to some Messenians who happened to have come to them. Among these Messenians were forty heavy infantry, whom he made use of with the rest. Posting most of his men, unarmed and armed, upon the best fortified and strong points of the place towards the interior, with orders to repel any attack of the land forces, he picked sixty heavy infantry and a few archers from his whole force, and with these went outside the wall down to the sea, where he thought that the enemy would most likely attempt to land. Although the ground was difficult and rocky, looking towards the open sea, the fact that this was the weakest part of the wall would, he thought, encourage their ardour, as the Athenians, confident in their naval superiority, had her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ir defences, and the enemy if he could force a landing might feel secure of taking the place. At this point, accordingly, going down to the water's edge, he posted his heavy infantry to prevent, if possible, a landing, and encouraged them in

the following terms:

其间，狄摩西尼一看斯巴达人要从水陆两路同时对他发起进攻，他也没有坐以待毙。他将手中剩下的三列桨战舰拖到要塞下面，用栅栏围起来，然后让舰上的水兵下舰，给他们配上盾牌。盾牌的质量很差，大部分都是柳条编的。在这种荒凉的地方，不可能采办到武器。即便这些劣质盾牌还是从一条三十桨的麦西尼亚私掠船和一条大船上得到的，这两条船归碰巧到他们这里来的一些麦西尼亚人所有。这些麦西尼亚人中有40名重步兵，狄摩西尼对这些人和其他重步兵进行了统一调配。他将大部分士兵，不管是有武装的还是没武装的，均布置在面朝内陆那边加固最好和本身最坚固的地方，令他们击退敌陆军的任何进攻。然后，他从整个部队中精选出60名重步兵和少数弓箭手，率领他们走出围墙，下到海边他认为敌军最有可能登陆的地方。尽管地面多石难行，但因为面朝大海，这里仍是城墙中最薄弱的部分，他想，这一点肯定会促使敌军从这里进攻。雅典人向来对自己的海军优势很有信心，所以没太注意在这里修筑防御工事。敌军若要强行登陆，很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唾手可得。因此，他下到水边，在这里部署重步兵，如果可能的话，阻止敌军由此登陆。他还用下面的话鼓励他们：

“Soldiers and comrades in this adventure, I hope that none of you in our present strait will think to show his wit by exactly calculating all the perils that encompass us, but that you will rather hasten to close with the enemy, without staying to count the odds, seeing in this your best chance of safety. In emergencies like ours calculation is out of place; the sooner the danger is faced the better. To my mind also most of the chances are for us, if we will only stand fast and not throw away our advantages, overawed by the numbers of the enemy. One of the points in our favour is the awkwardness of the landing. This, however, only helps us if we

stand our ground. If we give way it will be practicable enough, in spite of its natural difficulty, without a defender; and the enemy will instantly become more formidable from the difficulty he will have in retreating, supposing that we succeed in repulsing him, which we shall find it easier to do, while he is on board his ships, than after he has landed and meets us on equal terms. As to his numbers, these need not too much alarm you. Large as they may be he can only engage in small detachments, from the impossibility of bringing to. Besides, the numerical superiority that we have to meet is not that of an army on land with everything else equal, but of troops on board ship, upon an element where many favourable accidents are required to act with effect. I, therefore, consider that his difficulties may be fairly set against our numerical deficienc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 charge you, as Athenians who know by experience what landing from ships on a hostile territory means, and how impossible it is to drive back an enemy determined enough to stand his ground and not to be frightened away by the surf and the terrors of the ships sailing in, to stand fast in the present emergency, beat back the enemy at the water's edge, and save yourselves and the place.”

“士兵们、共赴危难的朋友们，我希望，在我们目前这种情况下，不要有人去精确计算我们周围的危险有几多，以显示自己有多聪明。我所希望的是，大家宁愿赶快与敌人相搏，也不愿坐以待毙估摸到底有多少胜算。要知道，这才是大家转危为安的最佳选择。在我们所处的这种紧急情况下，精心算计是没有用的，越早面对危险才越有利。另外，在我看来，只要我们决不后退，不放弃自己的优势，不被敌人的数量所吓倒，我们的胜算还是很大的。对我们有利的一点是这里不易登陆。不过，只有我们坚持到底，这一点才帮得上我们。假如我们放弃，敌人照样能够克服自然条件的不利而登陆，因为无人防守。他们一旦上来，立时就会很难对付，因为撤离也很不容易。即便

我们能把他们击退，也是趁他们还在舰上时比较容易。他们上岸之后，就会和我们在同等条件下作战。至于他们的人数，我们倒不必过于担心。他们虽然人多，却只能以小分队为单位作战，因为他们不可能一起靠岸。另外，我们必须面临的敌方数量上的优势，不是其他所有条件都相当的陆地上的优势，而是海上的优势。在舰上行动，需要多种机缘巧合共同作用才能发挥效力。因此，我认为，我们在数量上的不足，完全可以为敌人面临的困难所抵消。同时，作为雅典人，你们凭经验就知道在敌对领土上实施登陆意味着什么，知道守军若决心坚守阵地，不畏惊涛拍岸，不怕敌舰来势汹汹，将他们逐退是如何不可能。所以，我要求大家，在目前这个危急关头，一定要坚守阵地，在海边把敌人打回去，拯救自己，也保全这个地方！”

Thus encouraged by Demosthenes, the Athenians felt more confident, and went down to meet the enemy, posting themselves along the edge of the sea. The Lacedaemonians now put themselves in movement and simultaneously assaulted the fortification with their land forces and with their ships, forty-three in number, under their admiral, Thrasymelidas, son of Cratesicles, a Spartan, who made his attack just where Demosthenes expected. The Athenians had thus to defend themselves on both sides, from the land and from the sea; the enemy rowing up in small detachments, the one relieving the other—it being impossible for many to bring to at once—and showing great ardour and cheering each other on, in the endeavour to force a passage and to take the fortification. He who most distinguished himself was Brasidas. Captain of a galley, and seeing that the captains and steersmen, impressed by the difficulty of the position, hung back even where a landing might have seemed possible, for fear of wrecking their vessels, he shouted out to them, that they must never allow the enemy to fortify himself in their country for the sake of saving timber, but must shiver their vessels and force a landing; and bade the allies, instead of hesitating in

such a moment to sacrifice their ships for Lacedaemon in return for her many benefits, to run them boldly aground, land in one way or another, and make themselves masters of the place and its garrison.

经过狄摩西尼这番鼓励，雅典人信心大增，下到海边准备迎击敌人。这时，斯巴达人开始行动了，派出陆军和战舰同时向这个要塞发起进攻。战舰总共43艘，担任舰队司令的是一个斯巴达人，科拉泰西克莱斯的儿子斯拉西迈利扎斯。他进攻的地点正是狄摩西尼所预料的地方。这样一来，雅典人就不得不从海陆两面实施防御。由于多艘战舰不可能同时靠岸，敌人只能轮番前来，以小分队为单位往上划。他们士气高昂，相互打气，力图强行前驶拿下这个要塞。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布拉西达斯。布拉西达斯是一艘三列桨战舰的舰长，他见舰长们和水手们顾及地势险峻，甚至在似乎可以登陆的地方畏缩不前，唯恐撞坏战舰，便朝他们大喊：决不能为了爱惜船身就让敌人在自己的领土上修筑工事；就是把舰撞碎，也要强行登陆。他还劝那些盟军：在这种时刻，要毫不犹豫地为斯巴达牺牲自己的战舰，以报答它的种种恩情；还要大胆地让舰搁浅，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登陆，征服这个地方，征服这个地方的守军。

Not content with this exhortation, he forced his own steersman to run his ship ashore, and stepping on to the gangway, was endeavouring to land, when he was cut down by the Athenians, and after receiving many wounds fainted away. Falling into the bows, his shield slipped off his arm into the sea, and being thrown ashore was picked up by the Athenians, and afterwards used for the trophy which they set up for this attack. The rest also did their best, but were not able to land, owing to the difficulty of the ground and the unflinching tenacity of the Athenians. It was a strange reversal of the order of things for Athenians to be fighting from the land, and from Laconian land too, against Lacedaemonians coming from the

sea; while Lacedaemonians were trying to land from shipboard in their own country, now become hostile, to attack Athenians, although the former were chiefly famous at the time as an inland people and superior by land, the latter as a maritime people with a navy that had no equal.

他并不满足于这样鞭策别人，还强令自己舰上的舵手将舰驶向岸边。正当他踏上跳板奋力登陆时，雅典人朝他砍来。他身上多处受伤，昏了过去。他栽倒在舰首，盾牌顺着他的手臂滑进海里，尔后又被海水抛到岸上。雅典人捡起这个盾牌，后来用到了他们为这次进攻竖立的胜利纪念柱上。其他人也竭尽了全力，但由于地势险峻，雅典人又顽强抵抗，他们还是未能登陆。令人奇怪的是，这一仗打得很反常：当时斯巴达人主要以内陆民族著称，在陆上可谓无人项背；雅典人则是海上民族，拥有无与伦比的海军。可是，雅典人却是从陆上与来自海上的斯巴达人作战，而且还是在拉科尼亚的土地上；斯巴达人却试图从自己的领土登陆（现已落入敌手），以进攻雅典人。

After continuing their attacks during that day and most of the next, the Peloponnesians desisted, and the day after sent some of their ships to Asine for timber to make engines, hoping to take by their aid, in spite of its height, the wall opposite the harbour, where the landing was easiest. At this moment, the Athenian fleet from Zacynthus arrived, now numbering fifty sail, having been reinforced by some of the ships on guard at Naupactus and by four Chian vessels. Seeing the coast and the island both crowded with heavy infantry, and the hostile ships in harbour showing no signs of sailing out, at a loss where to anchor, they sailed for the moment to the desert island of Prote, not far off, where they passed the night. The next day, they got under way in readiness to engage in the open sea if the enemy chose to put out to meet them, being

determined in the event of his not doing so to sail in and attack him. The Lacedaemonians did not put out to sea, and having omitted to close the inlets as they had intended, remained quiet on shore, engaged in manning their ships and getting ready, in the case of any one sailing in, to fight in the harbour, which is a fairly large one.

当天和次日的大部分时间，伯罗奔尼撒人一直在进攻，但后来他们放弃了。第三天，他们派了一些船去阿西内运木料，打算做一些攻城器械，希望能借助这些器械夺取港口对面的围墙。那里墙虽然高，却是最容易登陆的地方。这时，从扎金索斯开来的雅典舰队到了。这支舰队此时已有50艘战舰，在纳夫帕克图斯承担守卫任务的一些舰只和希俄斯的4艘舰只也已加入其中。看到海岸和岛上都布满重步兵，港内的敌舰丝毫没有驶出的迹象，他们不知停泊在何处，便暂时把舰驶往不远处的荒岛普罗泰，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做好了出航的准备。如果敌人出来迎击他们，他们就在公海与对方交战；敌人若不出来，他们就驶进港去进攻对方。斯巴达人没有出海迎战，也没有按照原来的打算封堵入口，而是静静地停泊在岸边，为他们的战舰配备人员。这个港相当大，万一有敌舰开进来，他们准备在港内迎击敌人。

Perceiving this, the Athenians advanced against them by each inlet, and falling on the enemy's fleet, most of which was by this time afloat and in line, at once put it to flight, and giving chase as far as the short distance allowed, disabled a good many vessels and took five, one with its crew on board; dashing in at the rest that had taken refuge on shore, and battering some that were still being manned, before they could put out, and lashing on to their own ships and towing off empty others whose crews had fled. At this sight the Lacedaemonians, maddened by a disaster which cut off

their men on the island, rushed to the rescue, and going into the sea with their heavy armour, laid hold of the ships and tried to drag them back, each man thinking that success depended on his individual exertions. Great was the melee, and quite in contradiction to the naval tactics usual to the two combatants; the Lacedaemonians in their excitement and dismay being actually engaged in a sea-fight on land, while the victorious Athenians, in their eagerness to push their success as far as possible, were carrying on a land-fight from their ships. After great exertions and numerous wounds on both sides they separated, the Lacedaemonians saving their empty ships, except those first taken; and both parties returning to their camp, the Athenians set up a trophy, gave back the dead, secured the wrecks, and at once began to cruise round and jealously watch the island, with its intercepted garrison, while the Peloponnesians on the mainland, whose contingents had now all come up, stayed where they were before Pylos.

雅典人发觉这一点后，从各个入口向他们发起了进攻。这时，大部分敌舰已在水面上排成一排。雅典人攻向敌人的舰队，立时把它打散了，并在短距离所允许的范围内展开了追击，打得许多战舰失去了战斗力，还缴获了5艘，其中一艘舰上人员齐全。接着，他们又冲向其余躲到岸边的舰只。有些舰仍在配备人员，尚未出航就遭到了重创。另外一些舰上的水手已经跑光，他们把这些空舰拴在自己的舰上拖走了。看到这种情景，斯巴达人被激怒了，一场惨败竟将他们的士兵堵在了岛上，他们赶紧过去施救，身穿重甲就跳进水里，用手抓着舰，拼命想把舰拽回来，人人都觉得胜负全靠他个人的努力。这场混战乱得出奇，而且与作战双方通常使用的海战战术截然不同。情绪激动而又惊慌失措的斯巴达人实际上是在陆地上进行海战，而获胜的雅典人急于扩大战果，则是在舰上进行陆战。激战之后，双方伤员都很多，他们便脱离了接触。除了最初被缴获的舰只之外，斯巴达人将余

下的空舰都救回去了。双方各自收兵回营。雅典人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归还了对方阵亡人员的尸体，打捞起严重破坏的舰只，马上开始绕岛巡航，严密监视着这个岛和岛上受困的守军。大陆上的各路伯罗奔尼撒人此时已经赶到，全都集结在皮洛斯岛前不敢轻举妄动。

When the news of what had happened at Pylos reached Sparta, the disaster was thought so serious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resolved that the authorities should go down to the camp, and decide on the spot what was best to be done. There, seeing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help their men, and not wishing to risk their being reduced by hunger or overpowered by numbers, they determined,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Athenian generals, to conclude an armistice at Pylos and send envoys to Athens to obtain a convention, and to endeavour to get back their me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有关皮洛斯所发生之事的消息传到斯巴达后，伯罗奔尼撒人觉得事态非常严重。他们认为，政府官员应当亲赴营地，现场决定采取何种最佳解决方案。到了那里，他们看出已不可能救出被困的人，但又不愿去冒饿死或者被数量优势之敌所制服的风险。在征得雅典军队将军们的同意后，他们决定先在皮洛斯缔结休战协定，然后再派使者去雅典获取换俘协议，力争尽快救回被困人员。

The generals accepting their offers, an armistice was concluded upon the terms following:

雅典军队的将军们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双方按下列条件缔结了休战协定：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should bring to Pylos and deliver up to the Athenians the ships that had fought in the late engagement, and all in Laconia that were vessels of war, and should make no attack on the fortification either by land or by sea.

斯巴达人应将本次参战的舰只开到皮洛斯，悉数交给雅典人。在拉科尼亚的所有战舰亦应全部交出，且不得从陆上或海上对要塞发动进攻。

That the Athenians should allow the Lacedaemonians on the mainland to send to the men in the island a certain fixed quantity of corn ready kneaded, that is to say, two quarts of barley meal, one pint of wine, and a piece of meat for each man, and half the same quantity for a servant.

雅典人应允许陆上的斯巴达人按定量给岛上的人运送备好的口粮，即每人大麦粗磨粉两夸脱，酒一夸脱，肉一块；侍从减半。

That this allowance should be sent in under the eyes of the Athenians, and that no boat should sail to the island except openly.

这些口粮应在雅典人的监督之下运送前往。任何船只不得私自驶往该岛。

That the Athenians should continue to the island same as

before, without however landing upon it, and should refrain from attacking the Peloponnesian troops either by land or by sea.

雅典人应和以前一样留在该岛附近，但不得登陆，亦不得从陆上或海上向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队发动进攻。

That if either party should infringe any of these terms in the slightest particular, the armistice should be at once void.

任何一方如有丝毫违反以上条款之处，休战协定即告失效。

That the armistice should hold good until the return of the Lacedaemonian envoys from Athens—the Athenians sending them thither in a galley and bringing them back again—and upon the arrival of the envoys should be at an end, and the ships be restored by the Athenians in the same state as they received them.

本次休战截止到斯巴达的使者从雅典归来之时为止。雅典人将派一艘三列桨战舰接送斯巴达使者往返雅典。斯巴达的使者一经返回，休战即告终止。雅典人应将接收的舰只原样奉还。

Such were the terms of the armistice, and the ships were delivered over to the number of sixty, and the envoys sent off accordingly. Arrived at Athens they spoke as follows:

这是休战协定的内容。斯巴达人交给雅典方面战舰60艘，斯巴达的使者随即便出发了。抵达雅典之后，他们作了如下发言：

“Athenians, the Lacedaemonians sent us to try to find some way of settling the affair of our men on the island that shall be at once satisfactory to our interests, and as consistent with our dignity in our misfortune as circumstances permit. We can venture to speak at some length without any departure from the habit of our country. Men of few words where many are not wanted, we can be less brief when there is a matter of importance to be illustrated and an end to be served by its illustration. Meanwhile, we beg you to take what we may say, not in a hostile spirit, nor as if we thought you ignorant and wished to lecture you, but rather as a suggestion on the best course to be taken, addressed to intelligent judges. You can now, if you choose, employ your present success to advantage, so as to keep what you have got and gain honour and reputation besides, and you can avoid the mistake of those who meet with an extraordinary piece of good fortune, and are led on by hope to grasp continually at something further, through having already succeeded without expecting it. While those who have known most vicissitudes of good and bad, have also justly least faith in their prosperity; and to teach your city and ours this lesson experience has not been wanting.”

“雅典人：斯巴达人派我们前来，目的是为了寻找我方将士被困岛上一事的解决办法。如果情况允许，争取既能符合我们的利益，又不使我们在不幸之中失去尊严。我们冒昧地多说几句，并不有违于我们城邦少言的习惯。无需多言时，我们不是多语之人，但遇到重大问题需要说明，而且必须通过说明来达到目的时，我们说话也可以不那么简短。同时，我们请求你们，不要以敌视的态度听取我们的发言，

也不要以为我们觉得你们无知，所以想教训你们。相反，请把我们的话当作向明智的法官提出的建议，以找出最佳解决方案。如果你们愿意，现在就可以利用目前的胜利获益，以保有已经到手的东西，赢得光荣和声誉，同时也可避免犯那些撞了大运之人所犯的错误，凭借意外获得的成功而得陇望蜀。饱尝世事无常的人最不相信好运常在。你们城邦和我们城邦都不乏这方面的经验，足以让我们汲取这种教训。”

“To be convinced of this you have only to look at our present misfortune. What power in Hellas stood higher than we did? And yet we are come to you, although we formerly thought ourselves more able to grant what we are now here to ask. Nevertheless, we have not been brought to this by any decay in our power, or through having our heads turned by aggrandizement; no, our resources are what they have always been, and our error has been an error of judgment, to which all are equally liable. Accordingly, the prosperity which your city now enjoys and the accession that it has lately received, must not make you fancy that fortune will be always with you. Indeed, sensible men are prudent enough to treat their gains as precarious, just as they would also keep a clear head in adversity, and think that war, so far from staying within the limit to which a combatant may wish to confine it, will run the course that its chances prescribe; and thus, not being puffed up by confidence in military success, they are less likely to come to grief, and most ready to make peace, if they can, while their fortune lasts. This, Athenians, you have a good opportunity to do now with us, and thus to escape the possible disasters which may follow upon your refusal, and the consequent imputation of having owed to accident even your present advantages, when you might have left behind you a reputation for power and wisdom which nothing could endanger.”

“要想证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我们目前的厄运足矣。在希腊，还有曾比我们地位更高的城邦吗？可是，现在我们却来找你们，尽管我们以前以为自己更有能力给予我们现在到此来要求的东西。不过，我们并不是因为势力衰败才到这里来的，也不是因为势力的扩大而冲昏了头脑。不，我们的资源还和以往一样，但我们的判断产生了错误，而这种错误是大家都容易犯的。因此，你们城邦如今所享有的繁荣，以及它最近获得的地位，谅必不会让你们以为幸运总是与你们同在。实际上，明智的人都十分谨慎，不会把到手的东西看得那么牢靠，正如他们身处逆境也会保持头脑冷静一样。他们认为，战争非但不会停留在参战者希望它所局限的范围之内，反而会根据意想不到的情况自然发展。因此，他们不会因为军事上的成功而自信心膨胀，所以也就不大可能受挫。如果能够做到，他们非常愿意在运气尚存时与对手讲和。雅典人，你们现在正有一个与我们讲和的良机，还能就此避免因拒不讲和而可能招致的灾难，以及随之而来的让人觉得就连你们目前的优势也纯系偶然的非难，而你们本来是可以在势力和智慧方面都留下无可非议的美名的。”

“The Lacedaemonians accordingly invite you to make a treaty and to end the war, and offer peace and alliance and the most friendly and intimate relations in every way and on every occasion between us; and in return ask for the men on the island, thinking it better for both parties not to stand out to the end, on the chance of some favourable accident enabling the men to force their way out, or of their being compelled to succumb under the pressure of blockade. Indeed, if great enmities are ever to be really settled, we think it will be, not by the system of revenge and military success, and by forcing an opponent to swear to a treaty to his disadvantage, but when the more fortunate combatant waives these his privileges, to be guided by gentler feelings conquers his rival in generosity, and accords peace on more moderate conditions than he expected.

From that moment, instead of the debt of revenge which violence must entail, his adversary owes a debt of generosity to be paid in kind, and is inclined by honour to stand to his agreement. And men oftener act in this manner towards their greatest enemies than where the quarrel is of less importance; they are also by nature as glad to give way to those who first yield to them, as they are apt to be provoked by arrogance to risks condemned by their own judgment."

"因此，斯巴达人请求你们与我们缔结条约，结束这场战争。我们提议，我们之间达成和解，建立同盟，在各个方面、各个场合结成最友好、最亲密的关系。作为报偿，我们要求你们将岛上的人交还给我们。我们认为，不坚持对抗到底，对双方都更有益，既不用指望那些人凭着意外幸运夺路而逃，也不用指望他们在封锁的压力下被迫投降。实际上，如果真想消除已经结下的深仇——我们认为终将如此，那就不能通过复仇之法和军事上的胜利，不能通过强迫对方宣誓履行对他不利的条约，而应通过比较幸运的一方不恃这些为特权，反而怀着宽大仁厚之心以温和的态度去征服他的对手，以对手料想不到的合适条件给予和平的方式获得。从那一刻起，就不再会有暴力引起的冤冤相报，他的对手只能以德报德，而他的荣誉感自会使他遵守协定。人们对于最大的敌人往往比对小有意见的人更多地采取这种方式。人的本性使人们对于先对自己作出让步的人更乐于作出让步。同理，如果有人态度倨傲，他们明知不可为，也会贸然行事。"

"To apply this to ourselves: if peace was ever desirable for both parties, it is surely so at the present moment, before anything irremediable befall us and force us to hate you eternally, personally as well as politically, and you to miss the advantages that we now offer you. While the issue is still in doubt, and you have reputation and our friendship in prospect, and we the compromise of our

misfortune before anything fatal occur, let us be reconciled, and for ourselves choose peace instead of war, and grant to the rest of the Hellenes a remission from their sufferings, for which be sure they will think they have chiefly you to thank. The war that they labour under they know not which began, but the peace that concludes it, as it depends on your decision, will by their gratitude be laid to your door. By such a decision you can become firm friends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at their own invitation, which you do not force from them, but oblige them by accepting. And from this, friendship consider the advantages that are likely to follow: when Attica and Sparta are at one, the rest of Hellas, be sure, and will remain in respectful inferiority before its heads."

"就我们自己的情况而言，如果双方都向往和平，现在肯定恰逢其时，因为我们还没有遭遇任何不可挽回的事情，迫使我们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私人角度出发都必须要永远仇视你们不可；你们也没有失去我们现在愿意让你们获得的优势。最后的结局悬而未决，你们就已荣誉在望，同时将获得我们的友谊；我们的不幸也尚未发展到致命的程度，以至于不能接受妥协。那就让我们和解吧！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这是选择和平而不要战争；对其他希腊人而言，则是免除他们的战乱之苦。他们一定会认为，这主要应当感激你们。这场战争使他们苦不堪言，至于是哪方挑起的战争，他们可能不甚明了。但是，结束战争而恢复和平这一功劳，他们肯定会记在你们名下，因为这全靠你们的决定。采取这样的决定，你们不用使用武力，斯巴达人自会诚邀你们成为他们可信赖的朋友，而你们只要好意接受即可。请你们想一想这种友谊可能带来的好处：当雅典和斯巴达取得一致时，其他希腊城邦肯定会对我们双方的领导地位都保持应有的尊重。"

Such were the words of the Lacedaemonians, their idea being that the Athenians, already desirous of a truce and only kept back

by their opposition, would joyfully accept a peace freely offered, and give back the men. The Athenians, however, having the men on the island, thought that the treaty would be ready for them whenever they chose to make it, and grasped at something further. Foremost to encourage them in this policy was Cleon, son of Cleaenetus, a popular leader of the time and very powerful with the multitude, who persuaded them to answer as follows: First, the men in the island must surrender themselves and their arms and be brought to Athens. Next, the Lacedaemonians must restore Nisaea, Pegae, Troezen, and Achaia, all places acquired not by arms, but by the previous convention, under which they had been ceded by Athens herself at a moment of disaster, when a truce was more necessary to her than at present. This done they might take back their men, and make a truce for as long as both parties might agree.

以上是斯巴达人所言。他们以为雅典人早就想停战，只是碍于斯巴达的反对才未提出。现在他们自愿将和平送上门来，雅典人一定会欣然接受，放还岛上的人。然而，雅典人却认为，既然岛上的人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何时签订条约全凭他们而定，因而想借机攫取更多的利益。鼓动雅典人采取这种对策的主要是克莱埃内图斯的儿子克莱翁。他是当时颇得人心的领导人，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他劝他们这样答复斯巴达人：首先，岛上的人必须缴械投降，而且要被带往雅典。其次，斯巴达人必须将尼塞阿、佩耶、特里曾和亚加亚归还雅典。所有这些地方都不是通过武力获取的，而是雅典处于危难之中时按照之前的协议割让的，当时的雅典比现在更需要休战。完成这些事之后，斯巴达人就可以领回自己的人，也可以要求休战，休战时间的长短由双方商定。

To this answer, the envoys made no reply, but asked that commissioners might be chosen with whom they might confer on

each point, and quietly talk the matter over and try to come to some agreement. Hereupon Cleon violently assailed them, saying that he knew from the first that they had no right intentions, and that it was clear enough now by their refusing to speak before the people, and wanting to confer in secret with a committee of two or three. No, if they meant anything honest let them say it out before all. The Lacedaemonians, however, seeing that whatever concessions they might be prepared to make in their misfortune,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speak before the multitude and lose credit with their allies for a negotiation which might after all miscarry,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the Athenians would never grant what they asked upon moderate terms, returned from Athens without having effected anything.

对于这个答复，斯巴达的使者没有表态，而是要求对方选出几位专员来与他们逐条磋商，平心静气地详尽商谈，争取达成某种共识。克莱翁随即对他们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来意不正，如今不愿意在民众面前说明，而是想与一个由两、三个人组成的委员会私下协商，心思更是昭然若揭。不，假如他们心怀诚意，他们尽可以在大家面前直言相告。可是，斯巴达人知道，以他们目前的窘况，无论他们准备做出何等让步，都不可能在群众面前把话说清，倘若谈判失败，则又会失去盟友的信任。另一方面，雅典人决不会以合理的条件同意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就从雅典回去了。

Their arrival at once put an end to the armistice at Pylos, and the Lacedaemonians asked back their ships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 The Athenians, however, alleged an attack on the fort in contravention of the truce, and other grievances seemingly not worth mentioning, and refused to give them back, insisting upon

the clause by which the slightest infringement made the armistice void. The Lacedaemonians, after denying the contravention and protesting against their bad faith in the matter of the ships, went away and earnestly addressed themselves to the war. Hostilities were now carried on at Pylos upon both sides with vigour. The Athenians cruised round the island all day with two ships going different ways; and by night, except on the seaward side in windy weather, anchored round it with their whole fleet, which, having been reinforced by twenty ships from Athens come to aid in the blockade, now numbered seventy sail; while the Peloponnesians remained encamped on the continent, making attacks on the fort, and on the look-out for any opportunity which might offer itself for the deliverance of their men.

他们的归来，意味着皮洛斯的休战状态即刻终止。于是，斯巴达人要求雅典人按照协定交还他们的舰只。雅典人则宣称，斯巴达人曾对要塞发动过一次进攻，因而已违反休战协定；他们还提出过其他一些似乎不值得一提的不满意见，因而拒绝交还战舰。他们坚持认为，按照休战协定的条款规定，但凡有丝毫违反之处，均可使休战协定失效。斯巴达人否认有违反协定的行为，并对雅典人在舰只问题上的不守信做法提出了抗议，之后就去认真备战了。双方随即又在皮洛斯展开了激战。白天，雅典人的两艘战舰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绕岛巡航；夜间，除了有风之日不在面向大海那边停泊之外，整个舰队都停泊在岛的周围。雅典又给这个舰队增派了20艘战舰，以协助它完成封锁任务，舰只总数此时已达70艘。伯罗奔尼撒人仍将营盘扎在大陆上，不断对要塞发动进攻，同时也在寻找任何可能出现的机会，以解救被困人员。

Meanwhile,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in Sicily had brought up to the squadron guarding Messina the reinforcement

which we left them preparing, and carried on the war from thence, incited chiefly by the Locrians from hatred of the Rhegians, whose territory they had invaded with all their forces. The Syracusans also wished to try their fortune at sea, seeing that the Athenians had only a few ships actually at Rhegium, and hearing that the main fleet destined to join them was engaged in blockading the island. A naval victory, they thought, would enable them to blockade Rhegium by sea and land, and easily to reduce it; a success which would at once place their affairs upon a solid basis, the promontory of Rhegium in Italy and Messina in Sicily being so near each other tha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the Athenians to cruise against them and command the strait. The strait in question consists of the sea between Rhegium and Messina, at the point where Sicily approaches nearest to the continent, and is the Charybdis through which the story makes Ulysses sail; and the narrowness of the passage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current that pours in from the vast Tyrrhenian and Sicilian mains, have rightly given it a bad reputation.

其时，叙拉古人和他们在西西里的盟友给守卫墨西拿的海军中队派去了前文曾提及他们一直在准备的援军，并从那里出发加入战斗。战事主要是洛克里斯人煽动起来的，他们仇恨雷伊乌姆人，出动全部军队入侵了他们的领土。另外，看到雅典人实际上只有很少几艘舰只在雷伊乌姆，又听说原定与之会合的主力舰队正忙着封锁斯法克泰里亚岛，叙拉古人也想在海上试一试自己的运气。他们认为，只要取得一次海战的胜利，他们就可以从海上和陆上两路封锁住雷伊乌姆，进而毫不费力地将它征服。一旦成功，他们的地位立时就会稳固起来。意大利的雷伊乌姆地角和西西里的墨西拿相距这么近，雅典人无法进行巡航，也不可能控制海峡。这里所说的海峡，指的是雷伊乌姆与墨西拿之间的海域，那里是西西里与大陆最接近的地方，也是传说中尤利西斯驶过的卡律布狄斯漩涡。此处水道狭窄，从广阔的第勒尼安海

和西西里海冲来的水流十分强劲，得此凶险之名也算恰当。

In this strait,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were compelled to fight, late in the day, about the passage of a boat, putting out with rather more than thirty ships against sixteen Athenian and eight Rhegian vessels. Defeated by the Athenians they hastily set off, each for himself, to their own stations at Messina and Rhegium, with the loss of one ship; night coming on before the battle was finished. After this, the Locrians retired from the Rhegian territory, and the ships of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united and came to anchor at Cape Pelorus, in the territory of Messina, where their land forces joined them. Here the Athenians and Rhegians sailed up, and seeing the ships unmanned, made an attack, in which they in their turn lost one vessel, which was caught by a grappling iron, the crew saving themselves by swimming. After this, the Syracusans got on board their ships, and while they were being towed alongshore to Messina, were again attacked by the Athenians, but suddenly got out to sea and became the assailants, and caused them to lose another vessel. After thus holding their own in the voyage alongshore and in the engagement as above described, the Syracusans sailed on into the harbour of Messina.

那天晚些时候，叙拉古人想让一条船驶过海峡，和其盟友被迫在这个海峡中作战，他们出动了30多艘战舰对付16艘雅典舰和雷伊乌姆的8艘战舰。结果，他们被雅典人打败了，损失了一艘舰。其后，他们仓皇撤退，分别回到各自在墨西拿和雷伊乌姆的停泊地。战斗尚未结束，夜幕便已降临。此战之后，洛克里斯人从雷伊乌姆的领土撤走了，叙拉古人及其盟友的舰只则汇聚至一处，停泊在墨西拿境内的佩洛鲁斯角。他们的陆军也在那里与他们会合了。雅典人和雷伊乌姆人驶到这里，发现敌舰尚未配备船员，就向对方发动了进攻。在这次进

攻中，他们损失了一艘战舰。那艘舰是被多爪钩抓住的，舰上的水手游泳逃脱了。此战之后，叙拉古人上了舰，正当他们所乘舰只沿着海岸被拖向墨西拿时，雅典人再次向他们发起进攻。但是，叙拉古人突然驶进海里，转而攻向雅典人，使得雅典人又损失了一艘舰。在沿着海岸航行和上述交战中，叙拉古人就这样抵抗住了敌人的进攻，之后，他们继续向前，驶进了墨西拿港。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having received warning that Camarina was about to be betrayed to the Syracusans by Archias and his party, sailed thither; and the Messinese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attack by sea and land with all their forces their Chalcidian neighbour, Naxos. The first day they forced the Naxians to keep their walls, and laid waste their country; the next they sailed round with their ships, and laid waste their land on the river Akesines, while their land forces menaced the city. Meanwhile, the Sicels came down from the high country in great numbers, to aid against the Messinese; and the Naxians, elated at the sight, and animated by a belief that the Leontines and their other Hellenic allies were coming to their support, suddenly sallied out from the town, and attacked and routed the Messinese, killing more than a thousand of them; while the remainder suffered severely in their retreat home, being attacked by the barbarians on the road, and most of them cut off. The ships put in to Messina, and afterwards dispersed for their different homes. The Leontines and their allies, with the Athenians, upon this at once turned their arms against the now weakened Messina, and attacked, the Athenians with their ships on the side of the harbour, and the land forces on that of the town. The Messinese, however, sallying out with Demoteles and some Locrians who had been left to garrison the city after the disaster, suddenly attacked and routed most of the Leontine army, killing a great number; upon seeing which the Athenians landed

from their ships, and falling on the Messinese in disorder chased them back into the town, and setting up a trophy retired to Rhegium. After this, the Hellenes in Sicily continued to make war on each other by land, without the Athenians.

这时候，雅典人接到消息说，卡马里纳即将被阿基亚斯及其党羽出卖给叙拉古人，他们便急忙驶向那里。墨西拿人抓住这个机会，率领全部军队从水陆两路向邻邦纳克索斯发起了进攻，那里是哈尔基斯人的殖民地。第一天，他们迫使纳克索斯人闭城不出，践踏了城外的土地。第二天，他们乘舰巡行了一圈，践踏了纳克索斯人位于阿凯西内斯河畔的土地，陆军则逼向市区。这时，大批西库尔人从高地上下来帮助纳克索斯人抵御墨西拿人。纳克索斯人一见他们来了，备受鼓舞，士气大振，他们相信莱昂蒂尼人和其他希腊盟友也在前来增援他们的途中，于是便突然冲出城去扑向墨西拿人，将他们全军击溃，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败军余部回逃时同样损失惨重，由于在途中遭到蛮族人的袭击，大部分人都被杀死了。盟邦的舰只开进墨西拿，后来各自返回本邦去了。这些舰只一走，莱昂蒂尼人及其盟友立即和雅典人一起转而进攻此时已势单力薄的墨西拿。雅典人率舰攻向海港那边，陆军则攻向城镇那边。可是，墨西拿人却在德莫泰莱斯的带领下，与战败后留守该城的一些洛克里斯人一起冲出来，突然发动攻击，击溃了大部分莱昂蒂尼人的军队，杀死了大量敌军。雅典人一见此状，马上从舰上下来扑向队伍散乱的墨西拿人，又将他们赶进了城里。雅典人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尔后退向雷伊乌姆。这一仗之后，西西里的希腊人继续在陆上彼此征战不休，而雅典人再未参与过他们的战争。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at Pylos were still besieging the Lacedaemonians in the island, the Peloponnesian forces on the continent remaining where they were. The blockade was very laborious for the Athenians from want of food and water; there was

no spring except one in the citadel of Pylos itself, and that not a large one, and most of them were obliged to grub up the shingle on the sea beach and drink such water as they could find. They also suffered from want of room, being encamped in a narrow space; and as there was no anchorage for the ships, some took their meals on shore in their turn, while the others were anchored out at sea. But their greatest discouragement arose from the unexpectedly long time which it took to reduce a body of men shut up in a desert island, with only brackish water to drink; a matter which they had imagined would take them only a few days. The fact was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had made advertisement for volunteers to carry into the island ground corn, wine, cheese, and any other food useful in a siege; high prices being offered, and freedom promised to any of the Helots who should succeed in doing so. The Helots accordingly were most forward to engage in this risky traffic, putting off from this or that part of Peloponnese, and running in by night on the seaward side of the island. They were best pleased, however, when they could catch a wind to carry them in. It was more easy to elude the look-out of the galleys, when it blew from the seaward, as it became impossible for them to anchor round the island; while the Helots had their boats rated at their value in money, and ran them ashore, without caring how they landed, being sure to find the soldiers waiting for them at the landing-places. But all who risked it in fair weather were taken. Divers also swam in under water from the harbour, dragging by a cord in skins poppyseed mixed with honey, and bruised linseed; these at first escaped notice, but afterwards a look-out was kept for them. In short, both sides tried every possible contrivance, the one to throw in provisions, and the other to prevent their introduction.

其时，在皮洛斯的雅典人依然围困着岛上的斯巴达人，大陆上的

伯罗奔尼撒军队也仍旧待在原地未动。由于水和食物匮乏，雅典人的封锁十分吃力。除了皮洛斯本身的卫城有一眼泉之外，再无其他，而且那眼泉也不大。大多数人不得不到海滩上去翻掘砂石，找到什么水就喝什么水。由于驻地狭小，空间局促也使他们倍受煎熬。此外，因为无处泊舰，吃饭也得轮流进行，一些人到岸上吃饭时，其他人只好待在停泊在大海的舰上。但是，最让他们泄气的是，他们原来以为，困在荒岛上的这批人只能喝到苦咸水，用不了几天就会屈服，不料却拖了这么久。事实上，斯巴达人招募了一些志愿者，将面粉、酒、奶酪和其他在围困中有用的食物运进了岛内。他们重金悬赏，并且许诺给予任何成功将食物运进去的希洛人以自由。因此，希洛人最愿意参加这场危险的运输活动。他们从伯罗奔尼撒各处把船开出来，趁着夜色匆匆将船驶向该岛朝向大海的那一面。不过，最让他们高兴的还是有风的时候，因为他们可以乘风而入。当风从朝海的那边吹来时，他们比较容易躲过三列桨战舰上瞭望哨的监视，因为那些舰在有风时不可能停泊在岛的四周，而希洛人则会预先将自己的船估个价，然后将船驶向岸边。至于如何登陆，他们却浑不在意，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士兵会在登陆地点等他们。但是，天气好的时候，冒险登陆的人往往都会被拿获。另外还有人用绳索拖着装有罂粟、蜂蜜和研碎的亚麻籽混合食物的皮囊从港口下潜水进去。起初，他们逃过了雅典人的视线，但后来雅典人专门设了一个监视哨防范他们。总之，双方都绞尽脑汁，想了各种办法，一方要往里运，另一方则要阻止他们往里运。

At Athens, meanwhile, the news that the army was in great distress, and that corn found its way in to the men in the island, caused no '; and the Athenians began to fear that winter might come on and find them still engaged in the blockade. They saw that the convoying of provisions round Peloponnese would be then impossible. The country offered no resources in itself, and even in summer they could not send round enough. The blockade of a place without harbours could no longer be kept up; and the men would either escape by the siege being abandoned, or would watch for bad

weather and sail out in the boats that brought in their corn. What caused still more alarm was the attitude of the Lacedaemonians, who must, it was thought by the Athenians, feel themselves on strong ground not to send them any more envoys; and they began to repent having rejected the treaty. Cleon, perceiving the disfavour with which he was regarded for having stood in the way of the convention, now said that their informants did not speak the truth; and upon the messengers recommending them, if they did not believe them, to send some commissioners to see, Cleon himself and Theagenes were chosen by the Athenians as commissioners. Aware that he would now be obliged either to say what had been already said by the men whom he was slandering, or be proved a liar if he said the contrary, he told the Athenians, whom he saw to be not altogether disinclined for a fresh expedition, that instead of sending and wasting their time and opportunities, if they believed what was told them, they ought to sail against the men. And pointing at Nicias, son of Niceratus, then general, whom he hated, he tauntingly said that it would be easy, if they had men for generals, to sail with a force and take those in the island, and that if he had himself been in command, he would have done it.

其间，军队处境困难和粮食被偷运进岛的消息也传到了雅典，在那里引起了不小的慌乱。雅典人开始担心，也许到冬天来临时，这场封锁依然无法结束。他们认为，届时将无法把军粮运至伯罗奔尼撒周围。当地本身没有粮食资源，即便是在夏季，他们送去的粮食也不足数。封锁一个没有港口的地方，实在让他们难以为继。到时被困人员不是因封锁解除而逃离，就是在天气不好时乘着运食物的小船溜走。更让他们惊恐的是斯巴达人的态度：在雅典人看来，斯巴达人肯定觉得自己地位有利，所以不会再派使团来了。他们开始后悔自己拒绝缔结和约。克莱翁发觉自己因阻挠和约而不得人心之后，竟然声称报信人所言不实。报信人则建议，如果大家不相信他们的话，可以派几个

专员前去调查。雅典人选派了克莱翁本人和塞阿耶内斯作为专员前往。克莱翁心里清楚，他现在要么承认他诽谤的那些人所言非虚，要么就得持相反说法，自居于扯谎者的地位。他看出雅典人并非都不愿意再发动一次远征，于是就对大家说，他们若是相信报信人所说的话，与其派专员前去调查，既浪费时间，又坐失良机，倒不如干脆扬帆出征，向敌人进攻。他很不喜欢时任将军的尼塞拉图斯的儿子尼西亚斯，指着他奚落说，如果将军们真有男子汉气概，率军前去俘获岛上的人应该不在话下。他要是指挥官，肯定就这样做了。

Nicias, seeing the Athenians murmuring against Cleon for not sailing now if it seemed to him so easy, and further seeing himself the object of attack, told him that for all that the generals cared, he might take what force he chose and make the attempt. At first, Cleon fancied that this resignation was merely a figure of speech, and was ready to go, but finding that it was seriously meant, he drew back, and said that Nicias, not he, was general, being now frightened, and having never supposed that Nicias would go so far as to retire in his favour. Nicias, however, repeated his offer, and resigned the command against Pylos, and called the Athenians to witness that he did so. And as the multitude is wont to do, the more Cleon shrank from the expedition and tried to back out of what he had said, the more they encouraged Nicias to hand over his command, and clamoured at Cleon to go. At last, not knowing how to get out of his words, he undertook the expedition, and came forward and said that he was not afraid of the Lacedaemonians, but would sail without taking any one from the city with him, except the Lemnians and Imbrians that were at Athens, with some targeteers that had come up from Aenus, and four hundred archers from other quarters. With these and the soldiers at Pylos, he would within twenty days either bring the Lacedaemonians alive, or kill them on the spot. The Athenians could not help laughing at his

fatuity, while sensible men comforted themselves with the reflection that they must gain in either circumstance; either they would be rid of Cleon, which they rather hoped, or if disappointed in this expectation, would reduce the Lacedaemonians.

雅典人对克莱翁颇有微词，认为要是他觉得事情这么容易，他就不该不即刻躬赴前方。尼西亚斯看到了这一点，同时又看出自己是克莱翁所攻击的对象，便对克莱翁说，从将军们这方面来看，他尽可以任选军队随他前往一试。起初，克莱翁以为尼西亚斯放权给他不过是巧言辞令而已，还表示乐于听命，后来却发现对方是认真的，他便开始往后缩。他说，指挥军队的将军是尼西亚斯，不是他。这时他真慌了神，根本没料到尼西亚斯为了占上风竟会让出将军之位。可是，尼西亚斯却一再重复他的提议，并交出了远征皮洛斯的指挥权，还号召雅典人为他作证，证明他确已辞职。民众的态度向来无异：克莱翁越是推辞远征一事，而且试图收回自己所说的话，他们就越是鼓动尼西亚斯交出指挥权，大声要求克莱翁率军前往。克莱翁知道覆水难收，最终只好承担起出征的重任。他站出来说，他不怕斯巴达人，但是除了在雅典的利利姆诺斯人和伊姆布罗斯人以及从埃努斯来的一些轻盾兵和其他地方来的400名弓箭手之外，他不从雅典城带一兵一卒前往；有了这些人和皮洛斯已有的兵力，他立誓不出二十天，要么把斯巴达人活捉回来，要么就把他们就地杀掉。听了他的蠢话，雅典人忍俊不禁，比较聪明的人则以此想法聊以自慰：两种结果总归都对他们有利，不是借此除掉克莱翁，就是降服斯巴达人。他们其实更希望的是前一种，但即使这种期望落了空，反正还有第二种。

After he had settled everything in the assembly, and the Athenians had voted him the command of the expedition, he chose as his colleague Demosthenes, one of the generals at Pylos, and pushed forward the preparations for his voyage. His choice fell upon Demosthenes because he heard that he was contemplating a

descent on the island; the soldiers distressed by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osition, and rather besieged than besiegers, being eager to fight it out, while the firing of the island had increas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general. He had been at first afraid, because the island having never been inhabited was almost entirely covered with wood and without paths, thinking this to be in the enemy's favour, as he might land with a large force, and yet might suffer loss by an attack from an unseen position. The mistakes and forces of the enemy the wood would in a great measure conceal from him, while every blunder of his own troops would be at once detected, and they would be thus able to fall upon him unexpectedly just where they pleased, the attack being always in their power. If, on the other hand, he should force them to engage in the thicket, the smaller number who knew the country would, he thought, have the advantage over the larger who were ignorant of it, while his own army might be cut off imperceptibly, in spite of its numbers, as the men would not be able to see where to succour each other.

在公民大会上把一应事务确定下来之后，雅典人投票推选克莱翁担任远征军指挥一职。他选了当时在皮洛斯的将军之一狄摩西尼为副手，接着便开始为航行做准备。他选择狄摩西尼的原因是，他听说狄摩西尼正计划在岛上登陆。士兵们为处境艰难所苦，觉得自身处境与其说是包围者，不如说是被困者，因而急于打出个结果来。同时，这位将军也因岛上发生的一次大火而信心大增。因为岛上从来无人居住，几乎完全被树木所覆盖，根本无路可行，狄摩西尼起初也心存畏惧，认为这一点对敌军有利：由于他可能要率大部队登陆，敌军若从隐蔽的阵位发动进攻，他即可能蒙受损失。敌军所犯的错误及其兵力多寡，多半会被树林掩而不见，而他自己的军队所犯下的每一个错误，却会立即被敌人察觉。因此，敌军可以从任何地方出其不意地扑向他们，进攻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敌军手中。从另一方面说，倘若他迫使敌军在丛林中交战，在他看来，熟悉地形的小部队比两眼一抹黑

的大部队更具优势。他自己的部队人数虽多，却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歼灭，因为士兵们根本看不出该去哪里支援同胞。

The Aetolian disaster, which had been mainly caused by the wood, had not a little to do with these reflections. Meanwhile, one of the soldiers who were compelled by want of room to land on the extremities of the island and take their dinners, with outposts fixed to prevent a surprise, set fire to a little of the wood without meaning to do so; and as it came on to blow soon afterwards, almost the whole was consumed before they were aware of it. Demosthenes was now able for the first time to see how numerous the Lacedaemonians really were, having up to this moment been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took in provisions for a smaller number; he also saw that the Athenians thought success important and were anxious about it, and that it was now easier to land on the island, and accordingly got ready for the attempt, sent for troops from the allies in the neighbourhood, and pushed forward his other preparations. At this moment, Cleon arrived at Pylos with the troops which he had asked for, having sent on word to say that he was coming. The first step taken by the two generals after their meeting was to send a herald to the camp on the mainland, to ask if they were disposed to avoid all risk and to order the men on the island to surrender themselves and their arms, to be kept in gentle custody until some general convention should be concluded.

他之所以产生这些想法，与埃托利亚那次惨败大有关系，因为那次惨败主要就是由于林木茂密所引起的。当时，由于空间狭小，士兵们被迫登陆岛的一隅吃饭，并且设了警戒哨，以防遭到突然袭击。其中一个士兵无意之中将一小片林子烧着了，不久起了风，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整个林子几乎被烧个精光。这时，狄摩西尼才头一次看清

岛上到底有多少斯巴达人，此前他还以为偷运进去的粮食所供应的人数没这么多。同时他也意识到，雅典人把得胜看得很重，因而急于求成。他还发现，如今看来，在岛上登陆并没有那么难。于是，他开始做登陆准备，并派人去附近的盟邦征调军队，同时抓紧做好其他准备工作。就在这时，克莱翁率领他所要求征用的部队来到皮洛斯，他曾事先派人告知他要来。两位将军相见之后，第一步便是派一名传令官前往大陆上的营地，询问对方是否有意避免事态扩大化，命令岛上的士兵缴械投降，在达成全面协定之前将他们软禁起来。

On the rejection of this proposition, the generals let one day pass, and the next, embarking all their heavy infantry on board a few ships, put out by night, and a little before dawn landed on both sides of the island from the open sea and from the harbour, being about eight hundred strong, and advanced with a run against the first post in the island.

这个提议遭到拒绝之后，两位将军等了一天。第二天，他们命所有重步兵登上几艘战舰，趁着夜色驶了出去。黎明将至时分，大约800人分别从大海和港口两侧上了岛，跑步冲向岛上的第一个哨所。

The enemy had distributed his force as follows: In this first post, there were about thirty heavy infantry; the centre and most level part, where the water was, was held by the main body, and by Epitadas their commander; while a small party guarded the very end of the island, towards Pylos, which was precipitous on the sea-side and very difficult to attack from the land, and where there was also a sort of old fort of stones rudely put together, which they thought might be useful to them, in case they should be forced to retreat. Such was their disposition.

敌军的部署是这样的：第一个哨所大约配备了30名重步兵；中部有水源的地方，同时也是地势最平缓的地带，由指挥官埃皮塔扎斯率主力把守；岛的尽头，即面朝皮洛斯那端，由一小队士兵把守，那里朝海的一面地势险峻，从陆上进攻非常困难，另外那里还有一个用石头简单堆成的旧堡垒，他们觉得，万一被迫撤退，这个堡垒说不定会对他们有用。斯巴达人的部署就是这样。

The advanced post thus attacked by the Athenians was at once put to the sword, the men being scarcely out of bed and still arming, the landing having taken them by surprise, as they fancied the ships were only sailing as usual to their stations for the night. As soon as day broke, the rest of the army landed, that is to say, all the crews of rather more than seventy ships, except the lowest rank of oars, with the arms they carried, eight hundred archers, and as many targeteers, the Messenian reinforcements, and all the other troops on duty round Pylos, except the garrison on the fort. The tactics of Demosthenes had divided them into companies of two hundred, more or less, and made them occupy the highest points in order to paralyse the enemy by surrounding him on every side and thus leaving him without any tangible adversary, exposed to the cross-fire of their host; plied by those in his rear if he attacked in front, and by those on one flank if he moved against those on the other. In short, wherever he went he would have the assailants behind him, and these light-armed assailants, the most awkward of all; arrows, darts, stones, and slings making them formidable at a distance, and there being no means of getting at them at close quarters, as they could conquer flying, and the moment their pursuer turned they were upon him. Such was the idea that inspired Demosthenes in his conception of the descent, and presided over its execution.

前沿哨所里的人刚从床上爬起来，尚未披挂停当，立刻就倒在攻进来的雅典人的剑下。这次登陆完全出其不意，他们还以为那些舰只不过是像往常一样开往驻地过夜的。天刚一亮，其余的雅典军队也登陆了，更确切地说，其中包括70多艘舰上的全体水兵（除了最低一层桨手之外，全都带有武器）、800名弓箭手、800名轻盾兵、麦西尼亚的增援部队以及所有派驻在皮洛斯周围的其他部队，只有要塞的守军没来。狄摩西尼采用的战术是，将每200人左右分为一队，命他们抢占各个制高点，目的是为了从四面包围敌人，使之陷入瘫痪无力反击，同时暴露于雅典军队的交叉打击之中。他们往前攻，腹背就会受敌；他们攻向一侧，另一侧就会受敌。总之，无论他攻向哪里，背后总会有人攻来，而且攻击者都是轻步兵，这是所有攻击者中最难对付的一类。他们用箭矢、标枪、石子和投石器作武器，在远距离进攻很有威力，你没有办法与他们短兵相接，因为他们逃得飞快，而且追击者刚一转身，他们又会攻上来。这就是狄摩西尼构思登陆计划时的意图，这一意图在登陆中得到了实施。

Meanwhile, the main body of the troops in the island (that under Epitadas), seeing their outpost cut off and an army advancing against them, serried their ranks and pressed forward to close with the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in front of them, the light troops being upon their flanks and rear. However, they were not able to engage or to profit by their superior skill, the light troops keeping them in check on either side with their missiles, and the heavy infantry remaining stationary instead of advancing to meet them; and although they routed the light troops wherever they ran up and approached too closely, yet they retreated fighting, being lightly equipped, and easily getting the start in their flight, from the difficult and rugged nature of the ground, in an island hitherto desert, over which the Lacedaemonians could not pursue them with their heavy armour.

埃皮塔扎斯指挥的部队是岛上部队的主力，他们看到前沿哨所已被打垮，一支军队正朝他们袭来，便赶紧收拢队伍，逼上前去欲与雅典重步兵展开肉搏，因为重步兵在他们正面，轻步兵排列在两翼和尾部。可是，他们却无法与敌人的重步兵交手，或者说，无法将他们精湛的战技派上用场。雅典的轻步兵通过投掷武器从两侧将他们牵制住，重步兵却按兵不动，并不上前接战。他们虽然将跑到前面的轻步兵打得败退而去，但雅典人却一面后退，一面还击，由于装备轻便，他们逃跑时很容易在速度上占优势。在一个截至当时一直无人居住且崎岖难行的荒岛上，身着重甲的斯巴达人根本追不上他们。

After this skirmishing had lasted some little while, the Lacedaemonians became unable to dash out with the same rapidity as before upon the points attacked, and the light troops finding that they now fought with less vigour, became more confident. They could see with their own eyes that they were many times more numerous than the enemy; they were now more familiar with his aspect and found him less terrible, the result not having justified the apprehensions which they had suffered, when they first landed in slavish dismay at the idea of attacking Lacedaemonians; and accordingly their fear changing to disdain, they now rushed all together with loud shouts upon them, and pelted them with stones, darts, and arrows, whichever came first to hand. The shouting accompanying their onset confounded the Lacedaemonians, unaccustomed to this mode of fighting; dust rose from the newly burnt wood, and it was impossible to see in front of one with the arrows and stones flying through clouds of dust from the hands of numerous assailants. The Lacedaemonians had now to sustain a rude conflict; their caps would not keep out the arrows, darts had broken off in the armour of the wounded, while they themselves were helpless for offence, being prevented from using their eyes to

see what was before them, and unable to hear the words of command for the hubbub raised by the enemy; danger encompassed them on every side, and there was no hope of any means of defence or safety.

其后，小规模战斗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各个被攻击点上的斯巴达人已无力如先前一般快速冲出来迎战了。雅典轻步兵发现对方这时已丧失战斗力，信心更足了。他们可以亲眼看到自身在人数上比敌人多好多倍。如今他们已熟悉敌人的情况，发现敌人也没那么可怕。初上岛时，一想到要进攻斯巴达人，他们就既沮丧又自卑，结果却证明他们没必要那么恐惧。因此，他们的恐惧开始转为蔑视，随即便高喊着一起冲向敌人，不断地朝敌人投石子，扔标枪和射箭，抓到什么就用什么。斯巴达人很不习惯这种作战方式，喊叫伴随着攻击使他们感到惊慌失措。新烧毁的树木间灰尘四起，无数攻击者手中投出的箭矢和石块飞快地在尘雾中穿行，使得他们根本看不清眼前的事物。斯巴达人此时不得不在恶战中苦苦支撑：他们的头盔挡不住箭矢，标枪头折断在伤员的甲胄里。由于用肉眼看不清面前的东西，他们无法抵御敌人的攻击。敌军掀起的喧闹，又使他们无法听清指挥官的命令。在危机四伏情况下，他们根本找不出任何防卫或保全自己的办法。

At last, after many had been already wounded in the confined space in which they were fighting, they formed in close order and retired on the fort at the end of the island, which was not far off, and to their friends who held it. The moment they gave way, the light troops became bolder and pressed upon them, shouting louder than ever, and killed as many as they came up with in their retreat, but most of the Lacedaemonians made good their escape to the fort, and with the garrison in it ranged themselves all along its whole extent to repulse the enemy wherever it was assailable. The Athenians pursuing, unable to surround and hem them in, owing to

the strength of the ground, attacked them in front and tried to storm the position. For a long time, indeed for most of the day, both sides held out against all the torments of the battle, thirst, and sun, the one endeavouring to drive the enemy from the high ground, the other to maintain himself upon it, it being now more easy for the Lacedaemonians to defend themselves than before, as they could not be surrounded on the flanks.

最后，由于作战空间狭小，很多人都受了伤，他们这才紧缩队伍，向岛尽头的堡垒退去，那里离他们不远，由他们的同胞把守着。他们一退却，雅典轻步兵的胆子更大了，伴着更大的喊叫声向他们袭来，尽数杀掉了他们能截住的退兵。不过，大部分斯巴达人还是逃到了堡垒处，与里面的守军一起沿着整个堡垒排开，不让敌人接近易受攻击的位置。雅典人追踪而至，但因为对方占据地势之利，无法将斯巴达人四面包围起来，所以采取了正面进攻的方式，力图将这块阵地强攻下来。尽管忍受着战斗、口渴和日晒的各种折磨，双方仍坚持了很久，实际上差不多有一天的时间，一方竭力想把敌人驱离高地，另一方坚守阵地。由于雅典人无法从侧翼将其包围，斯巴达人此时御敌较之前容易多了。

The struggle began to seem endless, when the commander of the Messenians came to Cleon and Demosthenes, and told them that they were losing their labour; but if they would give him some archers and light troops to go round on the enemy's rear by a way he would undertake to find, he thought he could force the approach. Upon receiving what he asked for, he started from a point out of sight in order not to be seen by the enemy, and creeping on wherever the precipices of the island permitted, and where the Lacedaemonians, trusting to the strength of the ground, kept no guard, succeeded after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in getting

round without their seeing him, and suddenly appeared on the high ground in their rear, to the dismay of the surprised enemy and the still greater joy of his expectant friends. The Lacedaemonians thus placed between two fires, and in the same dilemma, to compare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as at Thermopylae, where the defenders were cut off through the Persians getting round by the path, being now attacked in front and behind, began to give way, and overcome by the odds against them and exhausted from want of food, retreated.

这场战斗似乎要无限延续下去，此时麦西尼亚人的指挥官跑来对克莱翁和狄摩西尼说，他们这是在白费力气：如果拨给他一些弓箭手和轻步兵，他会找出一条路来，从那里绕到敌人背后，他相信他可以强行推进。得到他申请的人员后，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率队从一个敌人看不到的地点出发了。他们小心翼翼地在该岛的悬崖上寻路前行，穿过斯巴达人认为地形险峻而不必设岗的地方，费了很大劲才没被敌人发现绕过去，突然间出现在斯巴达人背后的高地上。此举令斯巴达人惊恐万分，却让期待他们有好消息的同胞欣喜万分。斯巴达人就这样遭到着两面夹攻，如果以小比大的话，他们的处境与在温泉关时毫无二致。在那次战役中，守军被从小道绕过去的波斯人消灭。如今斯巴达人也是腹背受敌，开始支持不住了，再加上对方人数超过他们，食物不足又使他们体力不支，斯巴达人便撤退了。

The Athenians were already masters of the approaches when Cleon and Demosthenes perceiving that, if the enemy gave way a single step further, they would be destroyed by their soldiery, put a stop to the battle and held their men back; wishing to take the Lacedaemonians alive to Athens, and hoping that their stubbornness might relax on hearing the offer of terms, and that they might surrender and yield to the present overwhelming danger.

Proclamation was accordingly made, to know if they would surrender themselves and their arms to the Athenians to be dealt at their discretion.

雅典人早已占领各个进口。克莱翁和狄摩西尼知道，敌人若再退一步，就会被他们的士兵歼灭。于是，他们下令停止战斗，撤回了己方士兵。他们想活捉斯巴达人，然后送往雅典，所以希望斯巴达人听到他们提出的条件之后不再那么顽固，而是迫于当前无法摆脱的危险而投降。因此，他们晓谕斯巴达人，想知道他们是否愿意缴械投降，然后听凭雅典人处理。

The Lacedaemonians hearing this offer, most of them lowered their shields and waved their hands to show that they accepted it. Hostilities now ceased, and a parley was held between Cleon and Demosthenes and Styphon, son of Pharax, on the other side; since Epitadas, the first of the previous commanders, had been killed, and Hippagretas, the next in command, left for dead among the slain, though still alive, and thus the command had devolved upon Styphon according to the law, in case of anything happening to his superiors. Styphon and his companions said they wished to send a herald to the Lacedaemonians on the mainland, to know what they were to do. The Athenians would not let any of them go, but themselves called for heralds from the mainland, and after questions had been carried backwards and forwards two or three times, the last man that passed over from the Lacedaemonians on the continent brought this message, “The Lacedaemonians bid you to decide for yourselves so long as you do nothing dishonourable”; upon which after consulting together they surrendered themselves and their arms. The Athenians, after guarding them that day and night, the next morning set up a trophy in the island, and got ready

to sail, giving their prisoners in batches to be guarded by the captains of the galleys; and the Lacedaemonians sent a herald and took up their dead. The number of the killed and prisoners taken in the island was as follows: four hundred and twenty heavy infantry had passed over; three hundred all but eight were taken alive to Athens; the rest were killed. About a hundred and twenty of the prisoners were Spartans. The Athenian loss was small, the battle not having been fought at close quarters.

听了这一提议，大部分斯巴达人放下盾牌，挥挥手表示接受。战斗立时停息下来，克莱翁和狄摩西尼与斯巴达方面的法拉克斯之子斯蒂丰展开了谈判。之前的指挥官当中，排在首位的埃皮塔扎斯已经阵亡；排在第二位的希帕格雷塔斯虽然还活着，别人却以为他死了，被丢在了战死者堆里，因此，在上司发生意外的情况下，斯蒂丰依法接过了指挥权。斯蒂丰和他的同僚们说，他们想派一名传令官向大陆上的斯巴达人请示一下他们该怎么办。雅典人不许他们派人去，而是邀了大陆上的传令官过来。来回传递了两、三次问询和答复之后，大陆上的斯巴达人派来的最后一位传话人带来的口信是这样："斯巴达人让你们自己做决定，但不得做有损名誉之事。"得到这一答复之后，他们聚在一起商议了一番，然后就缴械投降了。当天白天及夜间，雅典人将他们看守起来；次日上午，雅典人在岛上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把俘虏分批交给各舰舰长看管，随后便准备启航。斯巴达人派来一名传令官，接收了阵亡者的尸体。在岛上战死和被俘的人数分别如下：渡海来此的重步兵共420人，其中292人被俘送往雅典，其余的全被杀死了。俘虏中约有120名斯巴达人。由于这次没有进行肉搏战，雅典方面的损失很小。

The blockade in all, counting from the fight at sea to the battle in the island, had lasted seventy-two days. For twenty of these, during the absence of the envoys sent to treat for peace, the men

had provisions given them, for the rest they were fed by the smugglers. Corn and other victual was found in the island; the commander Epitadas having kept the men upon half rations. The Athenians and Peloponnesians now each withdrew their forces from Pylos, and went home, and crazy as Cleon's promise was, he fulfilled it, by bringing the men to Athens within the twenty days as he had pledged himself to do.

这次封锁，从海战开始到岛上的战斗结束，总共持续了七十二天。在使者被派去进行和谈的二十天里，被困人员有粮食补给。在其余时间内，他们的粮食全是偷运进去的。指挥官埃皮塔扎斯一直发给士兵半数的口粮，所以在岛上发现了谷物和其他食物。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这时都从皮洛斯撤走军队，各自返回自己的城邦。克莱翁虽然乱发狂言，但总算兑现了诺言，如他自己所保证的那样，在二十天内将岛上的人带回了雅典。

Nothing that happened in the war surprised the Hellenes so much as this. It was the opinion that no force or famine could make the Lacedaemonians give up their arms, but that they would fight on as they could, and die with them in their hands; indeed, people could scarcely believe that those who had surrendered were of the same stuff as the fallen; and an Athenian ally, who some time after insultingly asked one of the prisoners from the island if those that had fallen were men of honour, received for answer that the atraktos—that is, the arrow—would be worth a great deal if it could tell men of honour from the rest; in allusion to the fact that the killed were those whom the stones and the arrows happened to hit.

在这场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件中，最令希腊人惊讶的莫过于下面

这一件：人们原来以为，无论是武力还是饥饿，都不能让斯巴达人放下武器。只要还有一口气，他们就会继续战斗，至死武器都不会离手。大家确实很难相信，投降者和战死者同属一类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雅典的一位盟友曾无礼地询问一个从岛上被俘的人，那些阵亡的人是否才算真正高尚的人。他得到的回答是，如果箭能区分谁高尚谁不高尚，那它的用处可就大了。言外之意是，那些阵亡的人不过是被石子和箭矢偶然击中而已。

Upon the arrival of the men the Athenians determined to keep them in prison until the peace, and if the Peloponnesians invaded their country in the interval, to bring them out and put them to death. Meanwhile, the defence of Pylos was not forgotten; the Messenians from Naupactus sent to their old country, to which Pylos formerly belonged, some of the likeliest of their number, and began a series of incursions into Laconia, which their common dialect rendered most destructive. The Lacedaemonians, hitherto without experience of incursions or a warfare of the kind, finding the Helots deserting, and fearing the march of revolution in their country, began to be seriously uneasy, and in spite of their unwillingness to betray this to the Athenians began to send envoys to Athens, and tried to recover Pylos and the prisoners. The Athenians, however, kept grasping at more, and dismissed envoy after envoy without their having effected anything. Such was the history of the affair of Pylos.

俘虏们一到，雅典人就决定把他们关押起来，直到恢复和平时再行发落。如果伯罗奔尼撒人入侵他们的领土，他们就把这些人拉出去杀掉。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皮洛斯的防务。由于皮洛斯最初属于麦西尼亚人的故土，纳夫帕克图斯的麦西尼亚人将他们最可靠的部队派到那里，开始对拉科尼亚进行连续袭扰，由于他们与当地居民同讲一

种方言，所以造成的危害极大。到那时为止，斯巴达人对这种袭扰或类似的战法尚无经验，由于发现希洛人已经开始出逃，并且担心自己的城邦闹起革命，他们开始深感不安。他们虽然不愿让雅典人看出这种想法，但还是开始派遣使者前往雅典，试图收回皮洛斯和那些俘虏。然而，雅典人却一直想获取更多的利益，将一个又一个使者两手空空地打发走了。这就是皮洛斯事件的始末。

CHAPTER XIII Seventh and Eighth Years of the War—End of Corcyraean Revolution— Peace of Gela—Capture of Nisaea

第十三章　战争第七年和第八年——克基拉革命的终结——杰拉和约——攻克尼塞阿

The same summer, directly after these events, the Athenians made an expedition against the territory of Corinth with eighty ships and two thousand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and two hundred cavalry on board horse transports, accompanied by the Milesians, Andrians, and Carystians from the allies, under the command of Nicias, son of Niceratus, with two colleagues. Putting out to sea they made land at daybreak between Chersonese and Rheitus, at the beach of the country underneath the Solygian hill, upon which the Dorians in old times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nd carried on war against the Aeolian inhabitants of Corinth, and where a village now stands called Solygia. The beach where the fleet came to is about a mile and a half from the village, seven miles from Corinth, and two and a quarter from the Isthmus. The Corinthians had heard from Argos of the coming of the Athenian armament, and had all come up to the Isthmus long befor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who lived beyond it, and also of five hundred who were away in garrison in Ambracia and Leucadia; and they were there in full force watching for the Athenians to land. These last, however, gave

them the slip by coming in the dark; and being informed by signals of the fact the Corinthians left half their number at Cenchreae, in case the Athenians should go against Crommyon, and marched in all haste to the rescue.

同年夏季，以上事件刚一结束，雅典人就率领80艘战舰、2,000名雅典重步兵和200名骑兵（乘骑兵运输船），对科林斯的领土发起远征。参加这次远征的还有来自盟邦的米利都人、安德罗斯岛人和卡里斯图斯人。远征军的指挥官是尼塞拉图斯之子尼西亚斯，另外还有两名副将。出海后，他们于黎明时在切尔松尼斯半岛与里图斯之间登陆，即索利伊亚山下的海滩。古时候，多里安人曾定居于此，并与居住在伊奥利亚的科林斯人进行过战争。现在那里仍有一个叫索利伊亚的村庄。这支舰队登陆的海滩离这个村庄大约1.5英里，距科林斯约7英里，距地峡约2.25英里。科林斯人已经从阿尔戈斯获悉了雅典军队即将到来的消息，除了居住在地峡以外的人和驻守在安布拉基亚与柳卡迪亚的500人之外，他们早就全部集结到地峡，以全部兵力等着迎战登陆之敌。然而，雅典人却乘其不备，趁着黑夜溜了进来。从烽火信号中得知这一情况之后，科林斯人在肯赫雷埃留下一半兵力，以防雅典人对克罗米翁不利，然后火速赶去援救。

Battus, one of the two generals present at the action, went with a company to defend the village of Solygia, which was unfortified; Lycophron remaining to give battle with the rest. The Corinthians first attacked the right wing of the Athenians, which had just landed in front of Chersonese, and afterwards the rest of the army. The battle was an obstinate one, and fought throughout hand to hand. The right wing of the Athenians and Carystians, who had been placed at the end of the line, received and with some difficulty repulsed the Corinthians, who thereupon retreated to a wall upon the rising ground behind, and throwing down the stones upon them,

came on again singing the paean, and being received by the Athenians, were again engaged at close quarters. At this moment, a Corinthian company having come to the relief of the left wing, routed and pursued the Athenian right to the sea, whence they were in their turn driven back by the Athenians and Carystians from the ships. Meanwhile, the rest of the army on either side fought on tenaciously, especially the right wing of the Corinthians, where Lycophron sustained the attack of the Athenian left, which it was feared might attempt the village of Solygia.

在现场指挥作战的将军有两位，其中一位是巴图斯。他带了一队人马去守卫未设防的索利伊亚村；另一位将军利科夫龙则留下来率余部实施进攻。科林斯人首先向在切尔松尼斯前面登陆的雅典军队右翼发起进攻，后来又攻向其余部队。这一仗打得十分艰难，自始至终都是肉搏战。雅典人的右翼和排在尾端的卡里斯图斯人同科林斯人接战后，好不容易才将对方击退。科林斯人随即退到身后高地上的一堵墙边，用石块猛砸雅典人，继而又高唱着凯歌冲下来。雅典人一接战，双方又展开了肉搏战。正在这时，科林斯的一队人前来增援他们的左翼，将雅典人的右翼击溃，把他们追到了海边，但又被从舰上下来的雅典人和卡里斯图斯人赶了回来。与此同时，双方其余部队也在顽强奋战，尤其是科林斯人的右翼，利科夫龙在那里迎击着雅典人左翼的进攻，他们很担心雅典企图从这里寻找突破口夺取索利伊亚村。

After holding on for a long while without either giving way, the Athenians aided by their horse, of which the enemy had none, at length routed the Corinthians, who retired to the hill and, halting, remained quiet there, without coming down again. It was in this rout of the right wing that they had the most killed, Lycophron their general being among the number. The rest of the army, broken and put to flight in this way, without being seriously

pursued or hurried, retired to the high ground and there took up its position. The Athenians, finding that the enemy no longer offered to engage them, stripped his dead and took up their own and immediately set up a trophy. Meanwhile, the half of the Corinthians left at Cenchreae to guard against the Athenians sailing on Crommyon, although unable to see the battle for Mount Oneion, found out what was going on by the dust, and hurried up to the rescue; as did also the older Corinthians from the town, upon discovering what had occurred. The Athenians seeing them all coming against them, and thinking that they were reinforcements arriving from the neighbouring Peloponnesians, withdrew in haste to their ships with their spoils and their own dead, except two that they left behind, not being able to find them, and going on board crossed over to the islands opposite, and from thence sent a herald, and took up under truce the bodies which they had left behind. Two hundred and twelve Corinthians fell in the battle, and rather less than fifty Athenians.

双方相持了好长一段时间，彼此都没有退却之意。后来，雅典人仗着自己有骑兵助阵（科林斯人没有），终于击溃了科林斯人。后者退到小山上停下来，待在那里未动，没有再往下冲。在右翼的这次溃败中，他们战死的人数最多，利科夫龙将军也在其中。其余部队也是这样被打垮和溃逃的，但没有遭到猛烈的追击，也没有太匆促，他们退到高地上，在那里稳住了阵脚。雅典人发现敌人不再邀战，便剥下敌军死者的衣甲，收回己方阵亡者的尸体，马上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其间，留在肯赫雷埃防范雅典人驶向克罗米翁的那一半科林斯人，虽然由于奥尼翁山挡住了视线而无法看到战斗情况，但从腾起的尘雾便可知一二，便赶紧前去救援。城里年岁较大的科林斯人发觉出了什么事后，同样也赶来了。雅典人一见这些人都来对付他们，以为是附近的伯罗奔尼撒人赶来增援了，连忙带着战利品和阵亡者的尸体往舰上撤，只有两具尸体未找到，因而没有带走。上舰之后，他们驶

向对面的海岛，从那里派了一个传令官来，在休战期间收回了他们没带走的尸体。在这场战斗中，212名科林斯人阵亡，雅典人的阵亡人数则不足50人。

Weighing from the islands, the Athenians sailed the same day to Crommyon in the Corinthian territory, about thirteen miles from the city, and coming to anchor laid waste the country, and passed the night there. The next day, after first coasting along to the territory of Epidaurus and making a descent there, they came to Methana between Epidaurus and Troezen, and drew a wall across and fortified the isthmus of the peninsula, and left a post there from which incursions were henceforth made upon the country of Troezen, Haliae, and Epidaurus. After walling off this spot, the fleet sailed off home.

雅典人从海岛出发，当天驶往科林斯境内的克罗米翁。克罗米翁离科林斯城约有13英里，抛锚之后，他们践踏了那一地区，并在那里过了夜。次日，他们先沿着海岸驶至埃皮达鲁斯境内，在那里登陆后，他们来到位于埃皮达鲁斯与特里曾之间的迈萨纳，横向修了一道防护墙，为这个半岛的地峡修筑了防御工事，还在那里留下了一个哨所，此后便从可那里出发到特里曾、哈利埃和埃皮达鲁斯的土地上进行袭掠。这个地方的防护墙修好之后，舰队就驶回雅典去了。

While these events were going on, Eurymedon and Sophocles had put to sea with the Athenian fleet from Pylos on their way to Sicily and, arriving at Corcyra, joined the townsmen in an expedition against the party established on Mount Istone, who had crossed over, as I have mentioned, after the revolution and becom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to the great hurt of the inhabitants. Their

stronghold having been taken by an attack, the garrison took refuge in a body upon some high ground and there capitulated, agreeing to give up their mercenary auxiliaries, lay down their arms, and commit themselves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Athenian people. The generals carried them across under truce to the island of Ptychia, to be kept in custody until they could be sent to Athens, up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if any were caught running away, all would lose the benefit of the treaty. Meanwhile, the leaders of the Corcyraean commons, afraid that the Athenians might spare the lives of the prisoners, had recourse to the following stratagem. They gained over some few men on the island by secretly sending friends with instructions to provide them with a boat, and to tell them, as if for their own sakes, that they had best escap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s the Athenian generals were going to give them up to the Corcyraean people.

在这些事发生的同时，埃夫里迈宗和索福克莱斯率雅典舰队从皮洛斯入海，开始了驶往西西里的航程。抵达克基拉之后，他们偕同城里的市民征讨了以伊斯托内山为根据地的反对党。如前所述，这些人是在革命后渡海过去的，他们占据了这一带之后，对当地居民造成很大危害。他们的堡垒被攻克后，守军全都躲到高地上，在那里投了降。他们同意交出雇佣兵，放下武器，将自己交由雅典人民处理。根据休战协议，将军们把他们带到普蒂希亚岛，在送他们去雅典之前暂且将他们关在那里，但有一个条件：如果发现他们当中有人逃走，所有人将失去协议的保护。当时，克基拉民主党的领袖们担心雅典人饶这些俘虏不死，所以就耍了这样一个诡计：他们秘密派了一些与俘虏交好的人到岛上去，先争取过来几个人，然后让这些人给那几个人提供一条小船，并作出为他们着想的样子说，他们最好尽快逃跑，因为雅典军队的将军们准备把他们移交给克基拉人民。

These representations succeeding, it was so arranged that the men were caught sailing out in the boat that was provided, and the treaty became void accordingly, and the whole body were given up to the Corcyraeans. For this result the Athenian generals were in a great measure responsible; their evident disinclination to sail for Sicily, and thus to leave to others the honour of conducting the men to Athens, encouraged the intriguers in their design and seemed to affirm the truth of their representations. The prisoners thus handed over were shut up by the Corcyraeans in a large building, and afterwards taken out by twenties and led past two lines of heavy infantry, one on each side, being bound together, and beaten and stabbed by the men in the lines whenever any saw pass a personal enemy; while men carrying whips went by their side and hastened on the road those that walked too slowly.

这些说服工作取得成效之后，克基拉人就作出安排，在这些人正要乘着提供给他们的小船驶离时，将他们抓了个正着，协议进而失效，雅典人将他们全都移交给了克基拉人。对于这一结果，雅典的将军们负有很大责任。他们得驶往西西里，但显然又不愿将押送这些人去雅典的这份光荣让给他人，这便助长了阴谋者大胆策划，似乎也更使得俘虏们对阴谋者的话信以为真。俘虏们就这样被移交出去了，克基拉人将他们关进一间大屋里，随后20人为一组，将他们绑在一起分批带他们从两排重步兵中间穿过。重步兵队伍中若有人发现走过的人是他的私敌，就连打带刺。手持鞭子的人还跟在旁边，对走得过慢的人一路催逼。

As many as sixty men were taken out and killed in this way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ir friends in the building, who fancied they were merely being moved from one prison to another. At last, however, someone opened their eyes to the truth, upon which they

called upon the Athenians to kill them themselves, if such was their pleasure, and refused any longer to go out of the building, and said they would do all they could to prevent any one coming in. The Corcyraeans, not liking themselves to force a passage by the doors, got up on the top of the building,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roof, threw down the tiles and let fly arrows at them, from which the prisoners sheltered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ey could. Most of their number, meanwhile, were engaged in dispatching themselves by thrusting into their throats the arrows shot by the enemy, and hanging themselves with the cords taken from some beds that happened to be there, and with strips made from their clothing; adopting, in short, every possible means of self-destruction, and also falling victims to the missiles of their enemies on the roof. Night came on while these horrors were enacting, and most of it had passed before they were concluded. When it was day the Corcyraeans threw them in layers upon wagons and carried them out of the city. All the women taken in the stronghold were sold as slaves. In this way, the Corcyraeans of the mountain were destroyed by the commons; and so after terrible excesses the party strife came to an end, at least as far as the period of this war is concerned, for of one party there was practically nothing left.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sailed off to Sicily, their primary destination, and carried on the war with their allies there.

这样带出去被杀掉的多达60人了，他们那些大屋里的同胞还不明就里，以为他们只是从一个监狱转移到了另外一个监狱而已。但是，后来终于有人告诉了他们真相，于是他们就请求雅典人，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自己动手将他们杀掉。他们拒绝再离开那所屋子，并且说要全力阻止任何人进去。克基拉人无意破门而入，因此爬到顶上，把屋顶打破，朝他们扔瓦片，射箭，俘虏们则尽量躲避。其间，大多数人把敌人射来的箭插进自己的喉咙，借以自决。大屋里碰巧有几张床，

有些人从床上寻了些绳索或者把自己的衣服撕成布条，用以自缢。总之，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了结了自己的生命，也有人被屋顶上的敌人射死或砸死了。夜晚降临，这些惨剧却依然在上演，直到夜晚过去大半之后才告终。天亮时，克基拉人将他们的尸体一层层扔在马车上运出了城。在堡垒里被捉到的妇女都被卖为奴隶。山里的克基拉人就这样被民主党人除掉了。在可怕的暴行发生之后，党派纷争终于结束了，至少就这场战争的一个阶段而论是这样的，因为其中一个党派几乎一人不剩。与此同时，雅典人启航前往他们的主要目的地西西里，与他们在那里的盟友一同继续进行这场战争。

At the close of the summer, the Athenians at Naupactus and the Acarnanians made an expedition against Anactorium, the Corinthian town lying at the mouth of the Ambracian Gulf, and took it by treachery; and the Acarnanians themselves, sending settlers from all parts of Acarnania, occupied the place.

夏末将至时，在纳夫帕克图斯的雅典人和阿卡纳尼亚人一起出征阿纳克托里乌姆。这是科林斯的一座城市，地处安布拉基亚湾湾口。他们利用内应夺取了这座城后，阿卡纳尼亚人从阿卡纳尼亚各地派遣移民占领了这个地方。

Summer was now over. During the winter ensuing, Aristides, son of Archippus, one of the commanders of the Athenian ships sent to collect money from the allies, arrested at Eion, on the Strymon, Artaphernes, a Persian, on his way from the King to Lacedaemon. He was conducted to Athens, where the Athenians got his dispatches translated from the Assyrian character and read them. With numerous references to other subjects, they in substance told the Lacedaemonians that the King did not know what they wanted,

as of the many ambassadors they had sent him no two ever told the same story; if however they were prepared to speak plainly they might send him some envoys with this Persian. The Athenians afterwards sent back Artaphernes in a galley to Ephesus, and ambassadors with him, who heard there of the death of King Artaxerxes, son of Xerxes, which took place about that time, and so returned home.

夏季就此结束了。在随之而来的冬季里，阿尔希普斯的儿子阿里斯提得斯，即雅典派往各盟邦征收贡金那批战舰的指挥官之一，在斯特鲁马河畔的伊翁抓获了一个名叫阿尔塔费尔内斯的波斯人。此人受波斯国王的派遣，正在前往斯巴达的途中。他被带到雅典后，雅典人将他携带的亚述语文书翻译过来，阅读了其中的内容。文书中虽多处提到其他问题，但主要是告诉斯巴达人，波斯国王不清楚他们究竟有什么要求，因为他们派去的众多使者说法不一。倘若他们准备把自己的想法讲清楚，可以派几位使者随同这个波斯人前去见他。后来，雅典人用一艘三列桨战舰将阿尔塔费尔内斯送回以弗所，并派了几名使者一同前往。薛西斯之子阿尔塔薛西斯国王大约就是那个时候死的，在以弗所听到他的死讯后，这些使者又折回去了。

The same winter, the Chians pulled down their new wall at the command of the Athenians, who suspected them of meditating an insurrection, after first however obtaining pledges from the Athenians, and security as far as this was possible for their continuing to treat them as before. Thus the winter ended, and with it ended the seventh year of this war of which Thucydides is the historian.

同年冬季，希俄斯人奉雅典人之命拆毁了他们新修的城墙，因为

雅典人怀疑他们图谋造反。不过，在拆毁之前，他们首先让雅典人许下诺言，保证在可能的范围内继续一如既往地对待他们。冬季就这样结束了，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七年亦就此告终。

In first days of the next summer, there was an eclipse of the sun at the time of new moon, and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same month an earthquake. Meanwhile, the Mitylenian and other Lesbian exiles set out, for the most part from the continent, with mercenaries hired in Peloponnese, and others levied on the spot, and took Rhoeteum, but restored it without injury on the receipt of two thousand Phocaean staters. After this, they marched against Antandrus and took the town by treachery, their plan being to free Antandrus and the rest of the Actaean towns, formerly owned by Mitylene but now held by the Athenians. Once fortified there, they would have every facility for ship-building from the vicinity of Ida and the consequent abundance of timber, and plenty of other supplies, and might from this base easily ravage Lesbos, which was not far off, and make themselves masters of the Aeolian towns on the continent.

次年夏季刚开始那几天，在新月出现时发生了一次日蚀，当月上旬又发生了一次地震。与此同时，米蒂利尼和其他莱斯沃斯的流亡者，偕同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所雇的雇佣军和在当地招募的其他人，从大陆出发，攻取了里泰夫姆，但在收到福西亚人2,000斯塔特之后又完好无损地将其归还了。在这之后，他们又向安坦德鲁斯进发，利用内应夺取了该城。他们的计划是解放安坦德鲁斯及其他阿克泰城镇。这些城镇以前归米蒂利尼所有，现在掌握在雅典人手中。一旦在那里设防，他们造船将十分便利，因为伊达山就在近旁，木材取之不尽，另外还有许多其他资源。有了这个根据地，他们袭掠相距不远的莱斯沃斯岛就很容易，控制大陆上的伊奥利亚诸城镇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While these were the schemes of the exiles, the Athenians in the same summer made an expedition with sixty ships, two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a few cavalry, and some allied troops from Miletus and other parts, against Cythera, under the command of Nicias, son of Niceratus, Nicostratus, son of Diotrephes, and Autocles, son of Tolmaeus. Cythera is an island lying off Laconia, opposite Malea; the inhabitants are Lacedaemonians of the class of the Perioeci; and an officer called the judge of Cythera went over to the place annually from Sparta. A garrison of heavy infantry was also regularly sent there, and great attention paid to the island, as it was the landing-place for the merchantmen from Egypt and Libya, and at the same time secured Laconia from the attacks of privateers from the sea, at the only point where it is assailable, as the whole coast rises abruptly towards the Sicilian and Cretan seas.

在这些流亡者如此计划的同时，雅典人在同年夏季率60艘战舰、2,000名重步兵、少量骑兵和一些从米利都以及其他地方来的盟军，对基西拉发动了进攻。指挥官是尼塞拉图斯的儿子尼西亚斯、迪奥特雷费斯的儿子尼科斯特拉图斯、托尔迈夫斯的儿子阿夫托克莱斯。基西拉是拉科尼亚附近的一个岛屿，位于马莱阿对面，当地居民是珀里俄基阶层的斯巴达人。斯巴达每年派一名被称为基西拉事务官的人去那里一次，另外还定期派遣重步兵去那里驻守。斯巴达人对这个岛非常重视，因为那里是来自埃及和利比亚的商船的靠岸之处，同时还可以保护拉科尼亚免遭私掠船只的海上袭击。由于整个海岸朝向西西里海和克里特海之处突然耸起，那里是唯一容易遭受攻击之处。

Coming to land here with their armament, the Athenians with ten ships and two thousand Milesian heavy infantry took the town of Scandea, on the sea; and with the rest of their forces landing on

the side of the island looking towards Malea, went against the lower town of Cythera, where they found all the inhabitants encamped. A battle ensuing, the Cytherians held their ground for some little while, and then turned and fled into the upper town, where they soon afterwards capitulated to Nicias and his colleagues, agreeing to leave their fate to the decision of the Athenians, their lives only being safe. A correspondence had previously been going on between Nicias and certain of the inhabitants, which caused the surrender to be effected more speedily, and upon terms more advantageous, present and future, for the Cytherians; who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expelled by the Athenians on account of their being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island being so near to Laconia. After the capitulation, the Athenians occupied the town of Scandea near the harbour, and appointing a garrison for Cythera, sailed to Asine, Helus, and most of the places on the sea, and making descents and passing the night on shore at such spots as were convenient, continued ravaging the country for about seven days.

雅典人率领大军在这里登陆之后，带着10艘战舰和2,000名米利都重步兵攻取了临海的斯坎泽阿城。其余部队在这个岛面朝马莱阿一侧登陆，攻向基西拉的下城，到了那里发现所有的居民早已扎营列阵，准备迎战。接下来双方交战，基西拉人在阵地上坚守了一段时间后，转身逃进上城。不久之后，他们在那里向尼西亚斯和他的同僚投了降，同意将自己的命运交由雅典人决定，但雅典人必须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此前尼西亚斯和基西拉的一些居民已经有所接触，所以投降生效得比较快。无论从当时还是以后来说，投降条款对基西拉人都比较有利。否则，雅典人会以他们属于斯巴达人以及他们的岛屿距拉科尼亚过近为由将他们驱逐出去。基西拉人投降之后，雅典人占领了港口附近的斯坎泽阿城，还指派了一支部队驻守基西拉，尔后驶往阿西内、希洛以及临海的大部分地区，遇便利之处就登岸过夜，又继续对这一地区袭掠了大约七天之久。

The Lacedaemonians seeing the Athenians masters of Cythera, and expecting descents of the kind upon their coasts, nowhere opposed them in force, but sent garrisons here and there through the country, consisting of as many heavy infantry as the points menaced seemed to require, and generally stood very much upon the defensive. After the severe and unexpected blow that had befallen them in the island, the occupation of Pylos and Cythera, and the apparition on every side of a war whose rapidity defied precaution, they lived in constant fear of internal revolution, and now took the unusual step of raising four hundred horse and a force of archers, and became more timid than ever in military matters, finding themselves involved in a maritime struggle, which their organization had never contemplated, and that against Athenians, with whom an enterprise unattempted was always looked upon as a success sacrificed. Besides this, their late numerous reverses of fortune, coming close one upon another without any reason, had thoroughly unnerved them, and they were always afraid of a second disaster like that on the island, and thus scarcely dared to take the field, but fancied that they could not stir without a blunder, for being new to the experience of adversity they had lost all 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看到雅典人控制了基西拉，斯巴达人预计雅典人也会在他们的海岸进行类似登陆，但他们并没有大举与雅典人对抗，只是派军队在本城邦各处加强守卫，所派重步兵人数则根据受到威胁之处的需要而定，大体上都是采取守势。斯巴达人在斯法克泰里亚岛上意外遭到严重打击后，皮洛斯和基西拉相继被占领，斯巴达人四面楚歌，而且战争发展的速度之快令人防不胜防。这些事发生后，斯巴达人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总怕内部发生革命。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种非常措施——招募了400名骑兵和一队弓箭手。发现自己卷入海上之争以后，他们

在军事事务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小慎微，因为他们的组织从来都不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构建的，更何况对手是雅典人。后者向来认为，有事业不干，就等于失去一次成功的机会。除此之外，斯巴达人近来命运多舛，厄运毫无来由地接踵而至，使他们彻底丧失了勇气。他们总怕岛上那种灾难二次降临，所以几乎不敢轻易上阵，总觉得一动就会出错。由于初涉逆境，他们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

Accordingly, they now allowed the Athenians to ravage their seaboard, without making any movement, the garrisons in whose neighbourhood the descents were made always thinking their numbers insufficient, and sharing the general feeling. A single garrison which ventured to resist, near Cotyrta and Aphrodisia, struck terror by its charge into the scattered mob of light troops, but retreated, upon being received by the heavy infantry, with the loss of a few men and some arms, for which the Athenians set up a trophy, and then sailed off to Cythera. From thence they sailed round to Epidaurus Limera, ravaged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so came to Thyrea in the Cynurian territory, upon the Argive and Laconian border. This district had been given by its Lacedaemonian owners to the expelled Aeginetans to inhabit, in return for their good offices at the time of the earthquake and the rising of the Helots; and also because, although subjects of Athens, they had always sided with Lacedaemon.

因此，他们这时对雅典人袭掠他们沿海地区的行为听之任之，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无论雅典人在哪支守军的防区登陆，他们的态度都一样，总认为自己的兵力不足。有一支守军在科蒂尔塔和阿弗罗狄忒附近大胆进行了抵抗。他们刚一冲锋，就把一群散乱的雅典轻步兵吓得心惊胆战。但是，重步兵一接战，他们便开始退却，还损失了几个人和一些武器。雅典人为此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然后离开了那

里，驶向了基西拉。他们从基西拉又绕到埃皮达鲁斯-利迈拉，践踏了那一地区的部分土地，接着又来到基努里亚境内的西雷阿，即阿尔戈斯与拉科尼亚之间的边界地带。这一地区本来归斯巴达人所有，但斯巴达人将它让给了被驱逐的埃伊纳人居住，以报答他们在地震和希洛人起义期间所提供的帮助。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虽然是雅典的臣民，却总是站在斯巴达一边。

While the Athenians were still at sea, the Aeginetans evacuated a fort which they were building upon the coast, and retreated into the upper town where they lived, rather more than a mile from the sea. One of the Lacedaemonian district garrisons which was helping them in the work, refused to enter here with them at their entreaty, thinking it dangerous to shut themselves up within the wall, and retiring to the high ground remained quiet, not considering themselves a match for the enemy.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landed, and instantly advanced with all their forces and took Thyrea. The town they burnt, pillaging what was in it; the Aeginetans who were not slain in action they took with them to Athens, with Tantalus, son of Patrocles, their Lacedaemonian commander, who had been wounded and taken prisoner. They also took with them a few men from Cythera whom they thought it safest to remove. These the Athenians determined to lodge in the islands; the rest of the Cytherians were to retain their lands and pay four talents tribute; the Aeginetans captured to be all put to death, on account of the old inveterate feud; and Tantalus to share the imprisonment of the Lacedaemonians taken on the island.

雅典人仍在海上航行时，埃伊纳人便撤离他们正在海岸上修筑的要塞，退入了他们居住的上城，那里距大海约1英里。该地区的一支斯巴达守军一直在帮助他们修筑要塞，埃伊纳人恳求这支守军与他们

一同退入城内，后者却认为把自己关进城里很危险，因而拒绝了。他们退到高地上之后，自认不是敌人的对手，在那里据守不出。这时候，雅典人登陆了，并立即率全部兵力向前推进，占领了西雷阿。他们烧毁城市，将里面的财物抢劫一空。凡是在战斗中未被杀死的埃伊纳人，他们都带回了雅典，负伤后被俘的斯巴达指挥官坦塔罗斯（帕特罗克莱斯之子）亦在其中。他们还带走了一些基西拉人，因为觉得将这几个人转移走最安全。雅典人决定将这些人暂时安置在岛屿上，其余的基西拉人可以继续保有自己的土地，但要缴纳4塔兰特贡金。被俘的埃伊纳人则要统统被处死，因为他们与雅典人积怨甚深。坦塔罗斯与在岛上被俘的斯巴达人关在一起。

The same summer, the inhabitants of Camarina and Gela in Sicily first made an armistice with each other, after which embassies from all the other Sicilian cities assembled at Gela to try to bring about pacification. After many expressions of opinion on one side and the other, according to the griefs and pretensions of the different parties complaining, Hermocrates, son of Hermon, a Syracusan, the most influential man among them, addressed the following words to the assembly:

同年夏季，西西里的卡马里纳和杰拉两城的居民率先签订休战协议，其他西西里城邦的代表随后也齐聚杰拉，谋求和解。各方皆道出自己的苦楚和主张并据此发表了不同看法之后，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赫尔蒙的儿子赫莫克拉特斯，一个叙拉古人，向大会发表了如下讲话：

“If I now address you, Sicilians, it is not because my city is the least in Sicily or the greatest sufferer by the war, but in order to state publicly what appears to me to be the best policy for the

whole island. That war is an evil is a proposition so familiar to every one that it would be tedious to develop it. No one is forced to engage in it by ignorance, or kept out of it by fear, if he fancies there is anything to be gained by it. To the former the gain appears greater than the danger, while the latter would rather stand the risk than put up with any immediate sacrifice. But if both should happen to have chosen the wrong moment for acting in this way, advice to make peace would not be unserviceable; and this, if we did but see it, is just what we stand most in need of at the present juncture."

"西西里人，我作此发言，不是因为我们城邦在西西里岛最无足轻重，也不是因为我们城邦蒙受战争的苦难最深，而是要公开说明我认为采取什么政策对整个西西里岛最有利。战争是灾祸这一命题，各位都很熟悉，无需仔细分说。如果觉得打仗有利可图，没有人会糊里糊涂地被迫卷入战争，也没有人会因为恐惧而置身于战争之外。对前者来说，似乎利大于险；后者则宁肯冒险也不愿承受眼前的损失。但是，假如双方恰巧都选择了错误的时机这样做，讲和的提议就不无助益。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在目前这一关头，这正是我们最需要做的。"

"I suppose that no one will dispute that we went to war at first in order to serve our own several interests, that we are now, in view of the same interests, debating how we can make peace; and that if we separate without having as we think our rights, we shall go to war again. And yet, as men of sense, we ought to see that our separate interests are not alone at stake in the present congress: there is also the question whether we have still time to save Sicily, the whole of which in my opinion is menaced by Athenian ambition; and we ought to find in the name of that people more

imperious arguments for peace than any which I can advance, when we see the first power in Hellas watching our mistakes with the few ships that she has at present in our waters, and under the fair name of alliance speciously seeking to turn to account the natural hostility that exists between us. If we go to war, and call in to help us a people that are ready enough to carry their arms even where they are not invited; and if we injure ourselves at our own expense, and at the same time serve as the pioneers of their dominion, we may expect, when they see us worn out, that they will one day come with a larger armament, and seek to bring all of us into subjection."

"我想，大家对这一点都没有异议：当初我们开战，都是为了我们各自不同的利益；现在我们讨论如何讲和，同样也是出于对这些利益的考虑。如果我们没有获得我们认为应有的权利就各奔东西，我们势必会重开战火。可是，作为理智的人，在目前这个大会上，我们应当看到，利害攸关的不止是我们各自的利益，我们是否仍有时间拯救西西里，同样也很成问题。在我看来，雅典的野心已经对整个西西里岛构成了威胁。雅典人这个让我们讲和的理由，应当比我所能提出的任何理由都更有说服力。我们可以看到，雅典这个希腊第一大城邦，正在利用目前停泊在我们水域里的少量舰密切监视我们，只等着我们犯错，正在虚伪地打着同盟的漂亮旗号，设法利用我们之间存在的天然敌意。假如我们开战，招引一个即便无人邀请也随时准备出兵的民族帮助我们；假如我们耗费自己的资源伤害自己，同时又为他们的统治充当先锋，那么可以预料，当他们看到我们被慢慢拖垮之时，总有一天会率领更多的军队试图将我们全都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

"And yet as sensible men, if we call in allies and court danger, it should be in order to enrich our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new acquisitions, and not to ruin what they possess already; and w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e intestine discords which are so fatal to communities generally, will be equally so to Sicily, if we, its inhabitants, absorbed in our local quarrels, neglect the common enemy. These considerations should reconcile individual with individual, and city with city, and unite us in a common effort to save the whole of Sicily. Nor should any one imagine that the Dorians only are enemies of Athens, while the Chalcidian race is secured by its Ionian blood; the attack in question is not inspired by hatred of one of two nationalities, but by a desire for the good things in Sicily, the common property of us all. This is proved by the Athenian reception of the Chalcidian invitation: an ally who has never given them any assistance whatever, at once receives from them almost more than the treaty entitles him to. That the Athenians should cherish this ambition and practise this policy is very excusable; and I do not blame those who wish to rule, but those who are over-ready to serve. It is just as much in men's nature to rule those who submit to them, as it is to resist those who molest them; one is not less invariable than the other. Meanwhile, all who see these dangers and refuse to provide for them properly, or who have come here without having made up their minds that our first duty is to unite to get rid of the common peril, are mistaken. The quickest way to be rid of it is to make peace with each other; since the Athenians menace us not from their own country, but from that of those who invited them here. In this way, instead of war issuing in war, peace quietly ends our quarrels; and the guests who come hither under fair pretences for bad ends, will have good reason for going away without having attained them.”

“可是，作为明智的人，如果我们在召来盟军的同时也招致危险，目的应当是为了有新的收获，从而使我们各自的城邦更加富有，而不是要毁灭已经拥有的东西。我们应当懂得，通常来说内部不和对

各个城邦来说是致命的。如果我们西西里岛的居民都专注于彼此争斗，却忽视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整个西西里同样难逃毁灭的厄运。考虑到这些，我们人与人、城邦与城邦之间就应当和解。我们就应当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拯救整个西西里。任何人都不应当以为，唯有多里安人是雅典的敌人，哈尔基斯人则可凭爱奥尼亚血统而永保安全无虞。雅典人进攻我们，不是因为他们仇视这两个民族中的一个，而是因为他们垂涎西西里的好东西，垂涎我们大家的共同财产。这一点，从他们接受哈尔基斯人的请求这一点即可得到证明：一个从来没有给过他们任何援助的盟邦，却立刻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帮助，而且几乎比条约规定的还要多。雅典人怀有这种野心，并采取这种政策，完全可以理解。我不想责备那些想统治他人的人，而是想责备那些过分乐于为之效力，轻易屈服的人。统治那些甘愿受其统治的人，与抵抗那些侵扰他们的人一样，都是人的本性。在这一点上，两者并无多大差别。可是，如果有人明知有这些危险，却不肯适当防范，或者说，虽然来到了这里，却没有认定我们的头等大事是团结起来摆脱我们共同的危险，那他就错了。雅典人不是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威胁我们，而是来自邀请他们来这里的那些人的领土上，因此，要想摆脱这种危险，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我们彼此握手言和。这样，我们之间的争端就可以和平解决，而不会诉诸一场又一场战争。那些表面公允却实揣不良目的来到这里的外来客，也可以有正当的理由无功而返了。”

“So far as regards the Athenians, such are the great advantages proved inherent in a wise policy. Independently of this, in the face of the universal consent, that peace is the first of blessings, how can we refuse to make it amongst ourselves; or do you not think that the good which you have, and the ills that you complain of, would be better preserved and cured by quiet than by war; that peace has its honours and splendours of a less perilous kind, not to mention the numerous other blessings that one might dilate on, with the not less numerous miseries of war? These considerations should teach you not to disregard my words, but rather to look in them every

one for his own safety. If there be any here who feels certain either by right or might to effect his object, let not this surprise be to him too severe a disappointment. Let him remember that many before now have tried to chastise a wrongdoer, and failing to punish their enemy have not even saved themselves; while many who have trusted in force to gain an advantage, instead of gaining anything more, have been doomed to lose what they had. Vengeance is not necessarily successful because wrong has been done, or strength sure because it is confident; but the incalculable element in the future exercises the widest influence, and is the most treacherous, and yet in fact the most useful of all things, as it frightens us all equally, and thus makes us consider before attacking each other."

"就雅典人来说，这是采取明智政策所固有的巨大益处。除此之外，既然大家都认为和平是最大的福祉，我们自己之间怎能不达成和解呢？或者说，难道你们不认为通过和平而不是战争可以更好地保全你们现有的利益或消除你们抱怨的祸患吗？难道你们不认为和平带来的荣耀和光彩没那么危险吗？更不用说和平还有数不尽的其他好处，而战争却有数不尽的祸患了。以上这些考虑，应当不会使你们忽视我说的话，而是会让大家为了各自的安全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这里有人认为他可以靠公理或强权达成自己的目标，请不要因为结果出乎意料而大失所望。请他不要忘记，以前曾有很多人试图惩办作恶者，可他们不但未能惩罚敌人，连自己也未能保全；许多曾相信可以凭武力获利的人，不但没有获取更多的东西，反而注定要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报复未必会因确有恶行而成功，实力也未必会因为你对它有信心就可靠。最具影响力、最变幻莫测的，还是未来不可预料的因素。但事实上，它又是一切事物中最有用的因素，因为我们大家对它同样怀有恐惧，促使我们在相互进攻之前才会三思而后行。"

"Let us therefore now allow the undefined fear of this unknown

future, and the immediate terror of the Athenians' presence, to produce their natural impression, and let us consider any failure to carry out the programmes that we may each have sketched out for ourselves as sufficiently accounted for by these obstacles, and send away the intruder from the country; and if everlasting peace be impossible between us, let us at all events make a treaty for as long a term as possible, and put off our private differences to another day. In fine, let us recognize that the adoption of my advice will leave us each citizens of a free state, and as such arbiters of our own destiny, able to return good or bad offices with equal effect; while its rejection will make us dependent on others, and thus not only impotent to repel an insult, but on the most favourable supposition, friends to our direst enemies, and at feud with our natural friends.”

“因此，不管是对不可知的未来的莫名担忧，还是眼下对雅典人所感到的恐惧，让它们尽管来吧！既然我们认为这些障碍足以使我们无法完成我们各自为自己所做的规划，那就让我们把侵略者逐出我们的领土吧！即便我们之间无法维持持久的和平，无论怎样，让我们缔结一个尽可能长的和约，将我们私下的不和推迟到以后去解决吧！总之，我们要认识到，采纳我的建议，我们每个人仍会是自由城邦的公民，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能够以德报德或以怨抱怨；否决我的建议，将会使我们依赖于他人，结果不仅是无力抵御屈辱，即便作最乐观的假定，也会把朋友当作最可怕的敌人，而对天然盟友心怀怨恨。”

“For myself, though, as I said at first, the representative of a great city, and able to think less of defending myself than of attacking others, I am prepared to concede something in prevision of these dangers. I am not inclined to ruin myself for the sake of

hurting my enemies, or so blinded by animosity as to think myself equally master of my own plans and of fortune which I cannot command; but I am ready to give up anything in reason. I call upon the rest of you to imitate my conduct of your own free will, without being forced to do so by the enemy. There is no disgrace in connections giving way to one another, a Dorian to a Dorian, or a Chalcidian to his brethren; above and beyond this we are neighbours, live in the same country, are girt by the same sea, and go by the same name of Sicilians. We shall go to war again, I suppose, when the time comes, and again make peace among ourselves by means of future congresses; but the foreign invader, if we are wise, will always find us united against him, since the hurt of one is the danger of all; and we shall never, in future, invite into the island either allies or mediators. By so acting we shall at the present moment do for Sicily a double service, ridding her at once of the Athenians, and of civil war, and in future shall live in freedom at home, and be less menaced from abroad."

"至于我自己，尽管我开始时说过，我代表的是一个伟大的城邦，所以对进攻别人想得多，对自卫想得少，但是，考虑到这些危险，我准备做出一些让步。我并不想为了伤害敌人而毁灭自己，也不想仇令智昏，以为自己既可以掌控自己的计划，也同样能掌控命运，而命运其实是我无法控制的。只要合情合理，我愿意做出让步。我提议，你们其余各位也应仿效我的做法，不要为敌人所迫才这样做。相互做出让步并不可耻，多里安人让多里安人，或者哈尔基斯人让自己的同胞。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是邻邦，住在同一片土地上，被同一片海洋所环绕，都被称为西西里人。我想，时机一到，我们还会兵戎相见，将来我们也还会通过协商再度讲和。但是，如果我们不失明智，外来侵略者将始终会看到我们一致对外的姿态，因为伤及一邦则全岛遭殃。我们未来也决不会邀外人到岛上来，不管是盟友还是调停者。如果能这样做，眼下我们将为西西里立下双重功劳：其一是可以

使它立即摆脱雅典人，其二是可以使它立即摆脱内战；将来我们则可以生活在自由的家园，同时少受外敌的威胁。”

Such were the words of Hermocrates. The Sicilians took his advice, and came to an understanding among themselves to end the war, each keeping what they had—the Camarinaeans taking Morgantina at a price fixed to be paid to the Syracusans—and the allies of the Athenians called the officers in command, and told them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make peace and that they would be included in the treaty. The generals assenting, the peace was concluded, and the Athenian fleet afterwards sailed away from Sicily. Upon their arrival at Athens, the Athenians banished Pythodorus and Sophocles, and fined Eurymedon for having taken bribes to depart when they might have subdued Sicily. So thoroughly had the present prosperity persuaded the citizens that nothing could withstand them and that they could achieve what was possible and impracticable alike, with means ample or inadequate it mattered not. The secret of this was their general extraordinary success, which made them confuse their strength with their hopes.

这是赫莫克拉特斯的讲话。西西里人采纳了他的建议，内部达成结束战争的共识，各自保有原有的领土，只有卡马里纳人占领了莫尔甘蒂纳，以商定的价格付给叙拉古人一定的款项。雅典人的盟友将雅典军队的几位指挥官召集来，并告诉他们，西西里人打算讲和，他们也将包括在和约范围之内。这几位将军表示同意，于是就缔结了和约。后来，雅典的舰队驶离了西西里。他们一回到雅典，雅典人流放了皮索佐鲁斯和索福克莱斯，对埃夫里迈宗则处以罚款，理由是，他们本来是有可能征服西西里的，却收受贿赂离开了。雅典当时的繁盛足以令他们的公民以为，他们无往而不胜；不管是办得到的，还是办

不到的，他们都能办到，财富足与不足则无关紧要。他们这种心态的产生，是由于他们在各个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功所致，这种成功使他们误以为凡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就有力量做到。

The same summer, the Megarians in the city, pressed by the hostilities of the Athenians, who invaded their country twice every year with all their forces, and harassed by the incursions of their own exiles at Pegae, who had been expelled in a revolution by the popular party, began to ask each other whether it would not be better to receive back their exiles, and free the town from one of its two scourges. The friends of the emigrants, perceiving the agitation, now more openly than before demanded the adoption of this proposition; and the leaders of the commons, seeing that the sufferings of the times had tired out the constancy of their supporters, entered in their alarm into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Athenian generals, Hippocrates, son of Ariphron, and Demosthenes, son of Alcisthenes, and resolved to betray the town, thinking this less dangerous to themselves than the return of the party which they had banished. It was accordingly arranged that the Athenians should first take the long walls extending for nearly a mile from the city to the port of Nisaea, to prevent the Peloponnesians coming to the rescue from that place, where they formed the sole garrison to secure the fidelity of Megara; and that after this, the attempt should be made to put into their hands the upper town, which it was thought would then come over with less difficulty.

同年夏季，迈加拉城里的人既为雅典人的战争行动所迫，雅典人每年出动全军人马入侵迈加拉两次，又为他们自己在革命中被民主党驱逐到佩耶的逃亡者所扰，开始相互谈论这样一个问题：将流亡者召回来是否更好？这样，迈加拉城就可以除去一种祸患，免得同时遭受

两种。同情被驱逐者的人察觉到这种情绪的涌动之后，立刻比以往更为公开地要求采取这一主张。民主党的领袖们也明白，当时遭受的苦难已经大大降低了其支持者的忠诚度。惊恐之下，他们开始与雅典的两位将军接触，即阿里夫龙之子希波克拉底和阿尔基塞内斯之子狄摩西尼，并决定出卖这座城。他们认为，对他们来说，这样反倒比召回被他们驱逐的党派更安全。因此，他们商定这样做：首先由雅典人占领从迈加拉城到尼塞阿港将近1英里长的城墙，以防伯罗奔尼撒人从那里赶来援救（为了防止迈加拉叛变，那里的守军都是清一色的伯罗奔尼撒人）；然后，他们将设法把上城交到雅典人手中。他们认为，只要第一步成功了，就不难将上城争取过来。

The Athenians, after plans had been arranged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ir correspondents both as to words and actions, sailed by night to Minoa, the island off Megara, with six hundred heavy infantry under the command of Hippocrates, and took post in a quarry not far off, out of which bricks used to be taken for the walls; while Demosthenes, the other commander, with a detachment of Plataean light troops and another of Peripoli, placed himself in ambush in the precinct of Enyalius, which was still nearer. No one knew of it, except those whose business it was to know that night. A little before daybreak, the traitors in Megara began to act. Every night for a long time back, under pretence of marauding, in order to have a means of opening the gates, they had been used,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officer in command, to carry by night a sculling boat upon a cart along the ditch to the sea, and so to sail out, bringing it back again before day upon the cart, and taking it within the wall through the gates, in order, as they pretended, to baffle the Athenian blockade at Minoa, there being no boat to be seen in the harbour. On the present occasion the cart was already at the gates, which had been opened in the usual way for the boat, when the Athenians, with whom this had been concerted,

saw it, and ran at the top of their speed from the ambush in order to reach the gates before they were shut again, and while the cart was still there to prevent their being closed; their Megarian accomplices at the same moment killing the guard at the gates. The first to run in was Demosthenes with his Plataeans and Peripoli, just where the trophy now stands; and he was no sooner within the gates than the Plataeans engaged and defeated the nearest party of Peloponnesians who had taken the alarm and come to the rescue, and secured the gates for the approaching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雅典人与他们的联系人拟定好口令和行动计划后，即在夜幕的掩护下驶向迈加拉附近的岛屿米诺阿。希波克拉底率领600名重步兵占据了离岛不远的一个采石场，以前修筑城墙时常常从这里采集石料。另一位指挥官狄摩西尼则率领普拉蒂亚人的一支轻步兵部队和边防军的一支部队埋伏在恩亚利乌斯神庙周围，那里离城更近一些。除了必须知情者外，那天晚上的计划无人知晓。黎明将至时，迈加拉城里的叛徒们开始行动了。相当长时间以来，为了有办法打开城门，他们每天夜里都打着袭掠的幌子，在征得守军指挥官的同意后，在夜间将一条摇橹船用马车沿着壕沟拖到海边，然后驶出海去。天亮前，他们再用马车将船载回来，从城门运入城内。他们假称这样做是为了打破雅典人在米诺阿的封锁，因为在港内看不到一条船。这一次，马车早已到达城门处。当城门照例为运船的马车开启时，雅典人看到了（这本来就是事先与他们约好的）。他们从设伏地点全速冲出，以便在城门关闭之前跑到城门边，那辆马车则仍堵在那里，以防城门关闭。与此同时，与他们一伙的迈加拉人开始击杀守城的卫兵。最先冲进城里的是由狄摩西尼率领的普拉蒂亚人和那支边防军部队，地点恰好就是胜利纪念柱现在所在之处。这时，离城门最近的一支伯罗奔尼撒队伍发觉后赶来救援，狄摩西尼率部队刚冲进城门，普拉蒂亚人就与这队人马展开激战，并将他们打败了；同时普拉蒂亚人把守着城门，迎接即将到来的雅典重步兵。

After this, each of the Athenians as fast as they entered went against the wall. A few of the Peloponnesian garrison stood their ground at first, and tried to repel the assault, and some of them were killed; but the main body took fright and fled; the night attack and the sight of the Megarian traitors in arms against them making them think that all Megara had gone over to the enemy. It so happened also that the Athenian herald of his own idea called out and invited any of the Megarians that wished, to join the Athenian ranks; and this was no sooner heard by the garrison than they gave way, and, convinced that they were the victims of a concerted attack, took refuge in Nisaea. By daybreak, the walls being now taken and the Megarians in the city in great agitation, the persons who had negotiated with the Athenians, supported by the rest of the popular party which was privy to the plot, said that they ought to open the gates and march out to battle. It had been concerted between them that the Athenians should rush in, the moment that the gates were opened, while the conspirators were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rest by being anointed with oil, and so to avoid being hurt. They could open the gates with more security, as four thousand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from Eleusis, and six hundred horses, had marched all night, according to agreement, and were now close at hand. The conspirators were all ready anointed and at their posts by the gates, when one of their accomplices denounced the plot to the opposite party, who gathered together and came in a body, and roundly said that they must not march out—a thing they had never yet ventured on even when in greater force than at present—or wantonly compromise the safety of the town, and that if what they said was not attended to, the battle would have to be fought in Megara. For the rest, they gave no signs of their knowledge of the intrigue, but stoutly maintained that their advice was the best, and meanwhile kept close by and watched the gates, making it impossible for the

conspirators to effect their purpose.

每个雅典人一进城都朝城墙冲杀过去。起初，少数几个伯罗奔尼撒守军还坚守阵地，力图击退雅典人的进攻，一些守军被杀，主力部队惊恐而逃。由于袭击发生在夜间，同时又看到迈加拉的叛党也在全副武装地向他们进攻，他们还以为整个迈加拉已倒向敌人一边。雅典的传令官凑巧也自作主张地高声向迈加拉人宣布：无论是谁，只要愿意，可以加入雅典人的队伍。伯罗奔尼撒守军听闻此言，随即不再抵抗。他们以为自己遭到了雅典人和迈加拉人的联合进攻，因而逃往尼塞阿去了。天亮时，长墙已被攻克，城里的迈加拉人极为慌乱，那些曾与雅典人谈判的人说，他们应该打开城门，列队出去接战。其他民主党人也表示赞成，因为他们暗中参与了阴谋的筹划。按照他们商定的计划，城门一开，雅典人就冲进来。为了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以免误伤，密谋者身上都要涂上油膏。由于4,000名雅典重步兵和600名骑兵已如约从埃莱夫西斯连夜开来，而且马上就要到了，他们打开城门的安全系数更高了。当密谋者全部涂好油膏在城门口各就各位时，他们的一个同伙将这个阴谋透露给了反对党。后者集合到一起，一同赶来厉声说，他们不能列队出去——就是比现在兵力更强时也不曾冒险做过这种事——也不能不负责任地危及城邦的安全。他们还说，如果不听他们的意见，迈加拉城里就得打起来。他们并没有流露出对阴谋知情之状，只是坚持称他们的意见最为恰当，同时凑近前去守着城门，使密谋者无法实现他们的目的。

The Athenian generals seeing that some obstacle had arisen, and that the capture of the town by force was no longer practicable, at once proceeded to invest Nisaea, thinking that, if they could take it before relief arrived, the surrender of Megara would soon follow. Iron, stone-masons, and everything else required quickly coming up from Athens, the Athenians started from the wall which they occupied, and from this point built a cross wall looking towards

Megara down to the sea on either side of Nisaea; the ditch and the walls being divided among the army, stones and bricks taken from the suburb, and the fruit-trees and timber cut down to make a palisade wherever this seemed necessary; the houses also in the suburb with the addition of battlements sometimes entering into the fortification. The whole of this day the work continued, and by the afternoon of the next the wall was all but completed, when the garrison in Nisaea, alarmed by the absolute want of provisions, which they used to take in for the day from the upper town, not anticipating any speedy relief from the Peloponnesians, and supposing Megara to be hostile, capitulated to the Athenians on condition that they should give up their arms, and should each be ransomed for a stipulated sum; their Lacedaemonian commander, and any others of his countrymen in the place, being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Athenians. On these conditions they surrendered and came out, and the Athenians broke down the long walls at their point of junction with Megara, took possession of Nisaea, and went on with their other preparations.

雅典军队的将军们看到出现了问题，再强行夺城已行不通，马上开始封锁尼塞阿。他们认为，只要在救兵抵达之前拿下尼塞阿，迈加拉不久也会投降。他们很快从雅典运来铁器、石匠以及其他所需的一切，以他们占领的城墙为起点，修筑起一道面朝迈加拉的横墙，一直延伸到尼塞阿两侧的海边。壕沟和城墙由各部队分段负责完成。他们从郊外找来石块和砖头，砍倒果树和林木，在必要之处修上了栅栏；郊外的房屋也加上了雉堞，有几处还与工事连成了一体。这项工程进行了整整一天。次日下午，就在城墙快要完工时，尼塞阿的守军突然因断粮恐慌起来，因为往常他们都是到上城去取当天的口粮。他们估计伯罗奔尼撒人短时间内不会前来救援，同时又觉得迈加拉对他们持敌对态度，所以便向雅典人投了降。投降的条件是，他们放下武器，每个人在缴纳一定数额的赎金后可以获释；他们的斯巴达指挥官以及

那里的其他斯巴达人则交由雅典人处置。基于这些条件，他们便投降出来了。雅典人毁掉与迈加拉城连接处的长墙，占领了尼塞阿，继续为其他军事行动做准备。

Just at this time, the Lacedaemonian Brasidas, son of Tellis, happened to be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Sicyon and Corinth, getting ready an army for Thrace. As soon as he heard of the capture of the walls, fearing for the Peloponnesians in Nisaea and the safety of Megara, he sent to the Boeotians to meet him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t Tripodiscus, a village so called of the Megarid, under Mount Geraneia, and went himself, with two thousand seven hundred Corinthian heavy infantry, four hundred Phliasians, six hundred Sicyonians, and such troops of his own as he had already levied, expecting to find Nisaea not yet taken. Hearing of its fall (he had marched out by night to Tripodiscus), he took three hundred picked men from the army, without waiting till his coming should be known, and came up to Megara unobserved by the Athenians, who were down by the sea, ostensibly, and really if possible, to attempt Nisaea, but above all to get into Megara and secure the town. He accordingly invited the townspeople to admit his party, saying that he had hopes of recovering Nisaea.

斯巴达人布拉西达斯，即泰利斯的儿子，这时正巧在西锡安和科林斯附近，正在为远征色雷斯准备军队。听到守城围墙被攻破的消息后，他既为尼塞阿的伯罗奔尼撒人担心，又为迈加拉城的安危担忧，随即派人去见维奥蒂亚人，要求他们尽快派军队前来，到迈加里德的耶拉尼亚山下一个叫特里波季斯库斯的村庄与他会合。同时，他亲自率领2,700名科林斯重步兵、400名弗利奥斯人、600名西锡安人和他自己已招募到的全部人员一起出发，希望在尼塞阿被占领前赶到。获悉尼塞阿已经陷落（他是夜间向特里波季斯库斯进发的）之后，不等

敌人得知他到来的消息，他就从军中选出300名精兵，率领他们直奔迈加拉。雅典人当时都在海边，所以没发现他。表面看来，他意在夺取尼塞阿。如果可能，他也真会这么做。但是，他的首要目标是进入迈加拉，以保全这座城市。因此，他请求城里的市民让他的队伍进去，并且对他们说，他有希望收复尼塞阿。

However, one of the Megarian factions feared that he might expel them and restore the exiles; the other that the commons, apprehensive of this very danger, might set upon them, and the city be thus destroyed by a battle within its gates under the eyes of the ambushed Athenians. He was accordingly refused admittance, both parties electing to remain quiet and await the event; each expecting a battle between the Athenians and the relieving army, and thinking it safer to see their friends victorious before declaring in their favour.

然而，迈加拉城里的两派都有顾虑：民主党人怕布拉西达斯将他们驱逐出去，恢复流亡者的地位；另一派则怕民主党人担心有被驱逐的危险而对他们发动袭击。城内如果在雅典伏兵的眼皮底下发生战事，那这座城势必毁掉。因此，他进城的要求被拒绝了。两派都宁愿静待事态发展，都盼着雅典人与前来救援的军队开战，认为等自己的友军胜利了再宣布欢迎他们比较稳妥。

Unable to carry his point, Brasidas went back to the rest of the army. At daybreak the Boeotians joined him. Having determined to relieve Megara, whose danger they considered their own, even before hearing from Brasidas, they were already in full force at Plataea, when his messenger arrived to add spurs to their resolution; and they at once sent on to him two thousand two

hundred heavy infantry, and six hundred horse, returning home with the main body. The whole army thus assembled numbered six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The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were drawn up by Nisaea and the sea; but the light troops being scattered over the plain were attacked by the Boeotian horse and driven to the sea, being taken entirely by surprise, as on previous occasions no relief had ever come to the Megarians from any quarter. Here the Boeotians were in their turn charged and engaged by the Athenian horse, and a cavalry action ensued which lasted a long time, and in which both parties claimed the victory. The Athenians killed and stripped the leader of the Boeotian horse and some few of his comrades who had charged right up to Nisaea, and remaining masters of the bodies gave them back under truce, and set up a trophy; but regarding the action as a whole the forces separated without either side having gained a decisive advantage, the Boeotians returning to their army and the Athenians to Nisaea.

由于无法达到目的地，布拉西达斯便回到其他部队那里去了。黎明时分，维奥蒂亚人与他会合。维奥蒂亚人认为，迈加拉的危险就是他们的危险，所以决定援救迈加拉，甚至还没听到布拉西达斯的召唤，他们就已经将全部兵马集结在普拉蒂亚了，信使的到来，只是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决心而已。维奥蒂亚人即刻拨给他2,200名重步兵和600名骑兵，尔后率主力返回本邦。这样，全部军队集合在一起，共有6,000名重步兵。雅典的重步兵军队在尼塞阿附近和海边列成阵势，轻步兵则分散在平原地带，但后者遭到了维奥蒂亚骑兵的袭击，继而被逼退至海边。这次袭击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任何地方派兵增援过迈加拉人。在这里，维奥蒂亚人反过来遭到了雅典骑兵的猛攻，双方随即陷入激战，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双方都宣称在这次交战中获得了胜利。雅典人杀死了维奥蒂亚的骑兵指挥官和他手下几个径直冲向尼塞阿的人，剥掉了他们的衣甲。这些人的尸体一直在雅典人手中，直至后来根据休战协议雅典人才将其归

还；雅典人还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但是，纵观整个战役，双方势均力敌并无一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维奥蒂亚人返回自己军中，雅典人返回了尼塞阿。

After this Brasidas and the army came nearer to the sea and to Megara, and taking up a convenient position, remained quiet in order of battle, expecting to be attacked by the Athenians and knowing that the Megarians were waiting to see which would be the victor. This attitude seemed to present two advantages. Without taking the offensive or willingly provoking the hazards of a battle, they openly showed their readiness to fight, and thus without bearing the burden of the day would fairly reap its honour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y effectually served their interests at Megara. For if they had failed to show themselves they would not have had a chance, but would have certainly been considered vanquished, and have lost the town. As it was, the Athenians might possibly not be inclined to accept their challenge, and their object would be attained without fighting. And so it turned out. The Athenians formed outside the long walls and, the enemy not attacking, there remained motionless; their generals having decided that the risk was too unequal. In fact most of their objects had been already attained; and they would have to begin a battle against superior numbers, and if victorious could only gain Megara, while a defeat would destroy the flower of their heavy soldiery. For the enemy it was different; as even the states actually represented in his army risked each only a part of its entire force, he might well be more audacious. Accordingly, after waiting for some time without either side attacking, the Athenians withdrew to Nisaea and the Peloponnesians after them to the point from which they had set out. The friends of the Megarian exiles now threw aside their hesitation, and opened the gates to Brasidas and the commanders from the

different states—looking upon him as the victor and upon the Athenians as having declined the battle—and receiving them into the town proceeded to discuss matters with them; the party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Athenians being paralysed by the turn things had taken.

这一仗之后，布拉西达斯率领军队转移到更加靠近海边和迈加拉的地方。占据了有利地势之后，他们排成战斗队形按兵不动，等着雅典人来进攻。他们知道，迈加拉人正在观望哪一方将获胜。采取这种态度，似乎有两大优势：其一，他们虽未采取攻势行动，也不愿贸然挑起战斗，但已公开表明自己已做好战斗准备，这样不用大费周折就完全可以享有胜利的荣耀；其二，这样做实质上也符合他们在迈加拉的利益。因为如果不做出姿态，他们就不会有机会，别人肯定就会以为他们被打败了，从而失去这座城。事实上，雅典人可能并不想接受挑战，因为他们目标的实现完全可以不诉诸战争。结果证明果真如此。雅典人虽然在长墙外摆开了阵势，但敌人既无进攻之意，他们也就在那里一动未动。雅典的将军们认为，双方承担的风险太不对等。事实上，他们的大部分目标已经达成。若是开战，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即便打胜了，也不过是取得迈加拉；倘若败了，将会毁掉他们重步兵部队的精锐之师。敌军的情况则不同：即便实际派兵参加的各个城邦都要承担风险，每个城邦所承担的也只是全军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很可能会表现得更加胆大无畏。因此，两方均未进攻对峙了一段时间之后，雅典人撤回尼塞阿去了，伯罗奔尼撒人随后也回到了他们出发的地方。同情迈加拉流亡者的人彼时也不再犹豫，他们认为布拉西达斯是胜利者，雅典人不愿再战了，于是便为布拉西达斯和各城邦指挥官打开城门，将他们迎进城里，继而与他们展开了磋商。由于事态发生了转变，原先与雅典人相互勾结的那个党派反而不知所措了。

Afterwards Brasidas let the allies go home, and himself went

back to Corinth, to prepare for his expedition to Thrace, his original destination. The Athenians also returning home, the Megarians in the city most implicated in the Athenian negotiation, knowing that they had been detected, presently disappeared; while the rest conferred with the friends of the exiles, and restored the party at Pegae, after binding them under solemn oaths to take no vengeance for the past, and only to consult the real interests of the town. However, as soon as they were in office, they held a review of the heavy infantry, and separating the battalions, picked out about a hundred of their enemies, and of those who were thought to be most involved in the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Athenians, brought them before the people, and compelling the vote to be given openly, had them condemned and executed, and established a close oligarchy in the town—a revolution which lasted a very long while, although effected by a very few partisans.

后来，布拉西达斯打发那些盟军各回本邦了，自己也返回科林斯，为他此次远征的最初目的地色雷斯做准备。雅典人也返回了本邦，而城里那些与雅典人私通的迈加拉人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暴露，不久便逃之夭夭了。其余的人与同情流亡者那些人进行协商，召回了逃亡到佩耶的流亡党人，但在召回之前要求他们庄严地宣誓：绝不因往事进行报复，只为城邦真正谋利益。然而，他们一当政，马上检阅了重步兵，将部队分别派往各地，又从他们的敌人和他们认为与雅典人勾结最深的人中挑出了大约100人，将他们带到人民面前，强迫大家进行公开表决，将这些人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他们在城里建立了由少数人控制的寡头政治——尽管是由极少数党徒策动，但这却是一场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治变革。

CHAPTER XIV Eighth and Ninth Years of the War—Invasion of Boeotia—Fall of Amphipolis—Brilliant Successes of Brasidas

第十四章　战争第八年和第九年——对维奥蒂亚的入侵——安菲波利斯的陷落——布拉西达斯的辉煌胜利

The same summer, the Mitylenians were about to fortify Antandrus, as they had intended, when Demodocus and Aristides, the commanders of the Athenian squadron engaged in levying subsidies, heard on the Hellespont of what was being done to the place (Lamachus their colleague having sailed with ten ships into the Pontus) and conceived fears of its becoming a second Anaia-the place in which the Samian exiles had established themselves to annoy Samos, helping the Peloponnesians by sending pilots to their navy, and keeping the city in agitation and receiving all its outlaws. They accordingly got together a force from the allies and set sail, defeated in battle the troops that met them from Antandrus, and retook the place. Not long after, Lamachus, who had sailed into the Pontus, lost his ships at anchor in the river Calex, in the territory of Heraclea, rain having fallen in the interior and the flood coming suddenly down upon them; and himself and his troops passed by land through the Bithynian Thracians on the Asiatic side, and arrived at Chalcedon, the Megarian colony at the mouth of the Pontus.

在同一个夏季，米蒂利尼人正要按他们的计划在安坦德鲁斯修筑工事时，当时正在征收补充贡金的雅典海军中队指挥官德莫佐库斯和阿里斯提得斯（他们的同僚拉马胡斯已带着10条舰驶入本都）在赫勒斯滂听说了此事，他们很担心此地会成为第二个阿纳亚——萨摩斯的逃亡者为了骚扰萨摩斯所定居的地方他们帮助伯罗奔尼撒人，派人给他们的海军当舵手，搅得萨摩斯城不得安宁，对于被萨摩斯放逐的人则一概予以收留。因此，这两位指挥官就从盟邦召集了一支军队，随即扬帆启航，打败了从安坦德鲁斯出来迎击他们的部队，重新夺回了那个地方。不久之后，由于内地天降大雨，洪水突然奔泻而下，将已

驶入本都的拉马胡斯泊在赫拉克利亚境内卡莱克斯河上的舰只都冲跑了。他率领军队经陆路从亚细亚一侧穿过比提尼亚的色雷斯人所居住的地方，抵达本都入海口处的迈加拉殖民地卡尔西登。

The same summer, the Athenian general, Demosthenes, arrived at Naupactus with forty ships immediately after the return from the Megarid. Hippocrates and himself had had overtures made to them by certain men in the cities in Boeotia, who wished to change the constitution and introduce a democracy as at Athens; Ptoeodorus, a Theban exile, being the chief mover in this intrigue. The seaport town of Siphae, in the bay of Crisae, in the Thespian territory, was to be betrayed to them by one party; Chaeronea (a dependency of what was formerly called the Minyan, now the Boeotian, Orchomenus) to be put into their hands by another from that town, whose exiles were very active in the business, hiring men in Peloponnese. Some Phocians also were in the plot, Chaeronea being the frontier town of Boeotia and close to Phanotis in phocia..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were to seize Delium, the sanctuary of Apollo, in the territory of Tanagra looking towards Euboea; and all these events were to take place simultaneously upon a day appointed, in order that the Boeotians might be unable to unite to oppose them at Delium, being everywhere detained by disturbances at home. Should the enterprise succeed, and Delium be fortified, its authors confidently expected that even if no revolution should immediately follow in Boeotia, yet with these places in their hands, and the country being harassed by incursions, and a refuge in each instance near for the partisans engaged in them, things would not remain as they were, but that the rebels being supported by the Athenians and the forces of the oligarchs divided, it would be possible after a while to settle matters according to their wishes.

同年夏季，雅典将军狄摩西尼从迈加里德回来之后，立即率领40艘战舰来到纳夫帕克图斯。维奥蒂亚的一些城市中，有些人曾与狄摩西尼和希波克拉底相互勾结，密谋改变政体，像雅典一样实行民主政治。这一阴谋的主要推动者是底比斯的流亡者普蒂奥佐鲁斯。按照约定，有一个党派将塞斯比阿境内克里塞湾的港口城市西费出卖给雅典，另外一个党派将自己所在的喀罗尼亚城（即之前被称为“米尼安—奥尔霍迈诺斯”，现在被称为“维奥蒂亚—奥尔霍迈诺斯”的属地）交到他们手中，这座城市的逃亡者非常热衷于此事，还在伯罗奔尼撒雇了人手。一些福基斯人也参与了这个阴谋，因为喀罗尼亚是维奥蒂亚的边境城镇，离福基斯的法诺蒂斯很近。同时，雅典人还计划夺取德利乌姆，即塔纳格拉境内面朝埃维亚岛的阿波罗神庙所在地。所有这一切都要在约定的日期同时进行，目的在于使维奥蒂亚人内乱缠身，无法联合起来到德利乌姆去对付他们。此事若能成功，再加上对德利乌姆设防，谋反者们确信，即便维奥蒂亚不会马上发生革命，只要有这些地方在手，再不断对这一地区进行袭扰，而且每次起事附近都有一个庇护所供参加袭扰者使用，原有的局面就难以为继；实际上由于雅典人会支持反叛者，寡头们的势力会分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事物发展终将如反叛者所愿。

Such was the plot in contemplation. Hippocrates with a force raised at home awaited the proper moment to take the field against the Boeotians; while he sent on Demosthenes with the forty ships above mentioned to Naupactus, to raise in those parts an army of Acarnanians and of the other allies, and sail and receive Siphae from the conspirators; a day having been agreed on for the simultaneous execution of both these operations. Demosthenes on his arrival found Oeniadae already compelled by the united Acarnanians to join the Athenian confederacy, and himself raising all the allies in those countries marched against and subdued Salynthius and the Agraeans; after which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preparations necessary to enable him to be at Siphae by the time

appointed.

他们拟议中的阴谋就是这样。商定好同时实施这两项行动的日期之后，希波克拉底即率领在雅典征募到的军队等待合适的时机向维奥蒂亚人开战。同时，他派狄摩西尼率领前文曾提及的那40艘战舰先行驶往纳夫帕克图斯，在那里从阿卡纳尼亚人和其他盟友中召集一支军队，尔后启航前去从同谋者手中接收西费。狄摩西尼一到，遂发现联合起来的阿卡纳尼亚人已迫使伊尼阿泽人加入了雅典同盟。他召集那些城邦的所有盟军，向萨林西乌斯和阿格雷阿人发起进军。将他们征服之后，他开始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能在约定的时间赶到西费。

About the same time, in the summer, Brasidas set out on his march for the Thracian places with seventeen hundred heavy infantry, and arriving at Heraclea in Trachis, from thence sent on a messenger to his friends at Pharsalus, to ask them to conduct himself and his army through the country. Accordingly, there came to Melitia in Achaia Panaerus, Dorus, Hippolochidas, Torylaus, and Strophacus, the Chalcidian proxenus, under whose escort he resumed his march, being accompanied also by other Thessalians, among whom was Niconidas from Larissa, a friend of Perdiccas. It was never very easy to traverse Thessaly without an escort; and throughout all Hellas for an armed force to pass without leave through a neighbour's country was a delicate step to take. Besides this, the Thessalian people had always sympathized with the Athenians. Indeed, if instead of the customary close oligarchy there had been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ssaly, he would never have been able to proceed; since even as it was, he was met on his march at the river Enipeus by certain of the opposite party who forbade his further progress, and complained of his making the attempt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nation. To this his escort

answered that they had no intention of taking him through against their will; they were only friends in attendance on an unexpected visitor. Brasidas himself added that he came as a friend to Thessaly and its inhabitants, his arms not being directed against them but against the Athenians, with whom he was at war, and that although he knew of no quarrel between the Thessalians and Lacedaemonians to prevent the two nations having access to each other's territory, he neither would nor could proceed against their wishes; he could only beg them not to stop him. With this answer they went away, and he took the advice of his escort, and pushed on without halting, before a greater force might gather to prevent him. Thus in the day that he set out from Melitia he performed the whole distance to Pharsalus, and encamped on the river Apidanus; and so to Phacium and from thence to Perrhaebia. Here his Thessalian escort went back, and the Perrhaebians, who are subjects of Thessaly, set him down at Dium in the dominions of Perdiccas, a Macedonian town under Mount Olympus, looking towards Thessaly.

大约在这个夏季的同一时候，布拉西达斯率领1,700名重步兵踏上了进军色雷斯地区的征程，抵达特拉希斯的赫拉克利亚之后，他随即派出一名信使去见他在法萨卢斯的朋友，请他们护送他和他的军队穿过这一地区。于是，帕内鲁斯、多鲁斯、希波洛希扎斯、托里拉夫斯和哈尔基斯的代理人斯特罗法库斯来到亚加亚的迈利蒂亚与他会合。在他们的护送下，狄摩西尼继续率军前行，参与护送的还有一些色萨利人，其中包括佩尔狄卡斯的一位朋友，拉里萨的尼科尼扎斯。倘若无人护送，要想穿过色萨利绝非易事。在整个希腊，一支军队未经许可穿过邻邦的领土都属冒险行为。除此之外，色萨利人一向与雅典人交好。实际上，如果色萨利不是像通常那样由少数寡头控制，而是实行宪政，他根本无法通过。即便当时确由少数寡头控制，他前进到埃尼佩夫斯河时，还是被某些反对党人拦住了去路，指责他没有征得全体人民的同意就从那里经过。对于这一指责，护送他的人回答

说，他们并不想违背人民的意愿把他带过去，他们只是在尽朋友之责，护送不速之客。布拉西达斯自己也说，他是作为色萨利及其居民的朋友而来的，他这次进军行动不是针对他们，而是针对雅典人的，因为他在跟雅典人打仗。他还说，尽管他知道色萨利人与斯巴达人之间并无不和，他们两城邦彼此可以通过对方的领土，但他不会那样做，也不能违背他们的意愿继续前进，只能恳求他们不要阻拦他。听了这番回答，色萨利人散开了。他听从护送人员的建议，不等色萨利人集合起更多的军队前来阻拦，连忙向前疾奔，丝毫未敢停歇。因此，他从迈利蒂亚出发的当天就走完全程，赶到了法萨卢斯，在阿皮扎努斯河畔安营扎寨。之后，他又奔赴法基乌姆，再从那里去往佩尔埃维亚。到了这里，护送他的色萨利人就回去了。佩尔埃维亚人是色萨利的属民，他们把他带到佩尔狄卡斯统治下的迪乌姆，即奥林波斯山下一个面朝色萨利的马其顿城镇。

In this way, Brasidas hurried through Thessaly before any one could be got ready to stop him, and reached Perdiccas and Chalcidice. The departure of the army from Peloponnese had been procured by the Thracian towns in revolt against Athens and by Perdiccas, alarmed at the successes of the Athenians. The Chalcidians thought that they would be the first objects of an Athenian expedition, not that the neighbouring towns which had not yet revolted did not also secretly join in the invitation; and Perdiccas also had his apprehensions on account of his old quarrels with the Athenians, although not openly at war with them, and above all wished to reduce Arrhabaeus, king of the Lyncestians. It had been less difficult for them to get an army to leave Peloponnese, because of the ill fortune of the Lacedaemonians at the present moment. The attacks of the Athenians upon Peloponnese, and in particular upon Laconia, might, it was hoped, be diverted most effectually by annoying them in return, and by sending an army to their allies, especially as they were willing to

maintain it and asked for it to aid them in revolting. The Lacedaemonians were also glad to have an excuse for sending some of the Helots out of the country, for fear that the present aspect of affairs and the occupation of Pylos might encourage them to move. Indeed, fear of their numbers and obstinacy even persuaded the Lacedaemonians to the action which I shall now relate, their policy at all times having been governed by the necessity of taking precautions against them. The Helots were invited by a proclamation to pick out those of their number who claimed to have most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against the enemy,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receive their freedom; the object being to test them, as it was thought that the first to claim their freedom would be the most high-spirited and the most apt to rebel. As many as two thousand were selected accordingly, who crowned themselves and went round the temples, rejoicing in their new freedom. The Spartans, however, soon afterwards did away with them, and no one ever knew how each of them perished. The Spartans now therefore gladly sent seven hundred as heavy infantry with Brasidas, who recruited the rest of his force by means of money in Peloponnese.

这样，不等有人做好拦阻他的准备，布拉西达斯就匆匆穿过色萨利，来到了佩尔狄卡斯和哈尔基季基。看到雅典人连连得胜，叛离雅典的色雷斯诸城镇和佩尔狄卡斯都很恐慌，所以从伯罗奔尼撒请来了这支军队。哈尔基斯人认为他们将是雅典人远征的首要目标，而非那些尚未反叛的相邻城镇也秘密加入了要求伯罗奔尼撒人派兵前来的行列，但佩尔狄卡斯也有他的担忧：他虽然没有公开向雅典人开战，但与他们有旧怨，尤其是因为他想征服利恩库斯人的国王阿拉韦夫斯。斯巴达人这时正处于战运不佳之际，所以他们从伯罗奔尼撒请到这支军队并不太难。斯巴达人希望，雅典人对伯罗奔尼撒的进攻，尤其是对拉科尼亚的进攻，可以通过反侵扰和派兵到其盟邦的方式受到最有

效的牵制，特别是因为这些盟邦愿意给这支军队提供给养，并主动要求它帮助他们叛离。另外，斯巴达人也乐得有借口将一些希洛人派到城邦之外去，以免他们趁当时形势不利和皮洛斯被占领之机蠢蠢欲动。实际上，斯巴达人秉承的政策一向是必须对希洛人加以防范，对希洛人人数众多和性格顽强的担忧，甚至促使斯巴达人采取过这样的行动：他们发布公告，要求希洛人从他们自己中间推选出那些自称在对敌作战中表现最突出的人，貌似是为了让他们获得自由，实则是为了试探他们，因为他们认为，首先要求获得自由的人是斗志最强的人，也是最容易起来反叛的人。结果选出了多达2,000人。这些人带上花冠，绕着神庙行走，为自己新获得的自由欣喜不已。可是，不久之后，斯巴达人就把他们除掉了，谁都不知道他们每个人是怎么死的。因此，斯巴达人这时很高兴派出700名希洛人作为重步兵跟随布拉西达斯出征，军中其他人是他在伯罗奔尼撒花钱招募的雇佣兵。

Brasidas himself was sent out by the Lacedaemonians mainly at his own desire, although the Chalcidians also were eager to have a man so thorough as he had shown himself whenever there was anything to be done at Sparta, and whose after-service abroad proved of the utmost use to his country. At the present moment his just and moderate conduct towards the towns generally succeeded in procuring their revolt, besides the places which he managed to take by treachery; and thus when the Lacedaemonians desired to treat, as they ultimately did, they had places to offer in exchange, and the burden of war, meanwhile, shifted from Peloponnese. Later on in the war, after the events in Sicily, the present valour and conduct of Brasidas, known by experience to some, by hearsay to others, was what mainly created in the allies of Athens a feeling for the Lacedaemonians. He was the first who went out and showed himself so good a man at all points as to leave behind him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rest were like him.

布拉西达斯被斯巴达人派出去，主要是由于他本人主动请缨，尽管哈尔基斯人也很盼望派他这样一个能力全面的人去。但凡斯巴达本土有事，布拉西达斯都表现得很出色。他后来在城邦之外的功绩也同样证明，他是对城邦极为有用之人。时下他对各个城镇所采取的恰当而温和的处理方式，普遍促成了各个城镇叛离雅典，还有一些地方是他还里应外合取得的。这样，当斯巴达人希望议和时（他们最终的确也这样做了），他们就可以拿出一些地方作为交换，同时也可以减轻伯罗奔尼撒的战争负担。在这场战争后期，即西西里的战事结束之后，雅典那些盟邦对斯巴达人的好感主要即源于布拉西达斯这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有些人曾亲身经历，其他人则由传闻而知。他是第一个被派出去之后在各方面都赢得良好声誉的人，以致后人们深信其他斯巴达人都和他一样。

Meanwhile, his arrival in the Thracian country no sooner became known to the Athenians than they declared war against Perdiccas, whom they regarded as the author of the expedition, and kept a closer watch on their allies in that quarter.

同时，雅典人认为这次远征是佩尔狄卡斯招来的，他们一听说布拉西达斯抵达色雷斯，马上就对佩尔狄卡斯宣战，并对自己在那一地区的盟邦加强了监视。

Upon the arrival of Brasidas and his army, Perdiccas immediately started with them and with his own forces against Arrhabaeus, son of Bromerus, king of the Lyncestian Macedonians, his neighbour, with whom he had a quarrel and whom he wished to subdue. However, when he arrived with his army and Brasidas at the pass leading into Lyncus, Brasidas told him that before commencing hostilities he wished to go and try to persuade

Arrhabaeus to become the ally of Lacedaemon, this latter having already made overtures intimating his willingness to make Brasidas arbitrator between them, and the Chalcidian envoys accompanying him having warned him not to remove the apprehensions of Perdiccas, in order to ensure his greater zeal in their cause. Besides, the envoys of Perdiccas had talked at Lacedaemon about his bringing many of the places round him into alliance with them; and thus Brasidas thought he might take a larger view of the question of Arrhabaeus. Perdiccas however retorted that he had not brought him with him to arbitrate in their quarrel, but to put down the enemies whom he might point out to him; and that while he, Perdiccas, maintained half his army it was a breach of faith for Brasidas to parley with Arrhabaeus. Nevertheless Brasidas disregarded the wishes of Perdiccas and held the parley in spite of him, and suffered himself to be persuaded to lead off the army without invading the country of Arrhabaeus; after which Perdiccas, holding that faith had not been kept with him, contributed only a third instead of half of the support of the army.

布拉西达斯和他的军队一到，佩尔狄卡斯立即率领自己的军队与他们一起开始进攻利恩库斯的马其顿国王——布罗迈鲁斯的儿子阿拉韦夫斯。他们是近邻，但他与阿拉韦夫斯不睦，很想征服他。可是，当他率领自己的军队与布拉西达斯抵达通往利恩库斯的关口时，布拉西达斯却对他说，在敌对行动开始之前，他想试着去劝一下阿拉韦夫斯，争取让他成为斯巴达的盟友。阿拉韦夫斯其实早已主动暗示，愿意让布拉西达斯充当他们之间的调停者。陪同布拉西达斯前往的哈尔基斯使者劝他先不要消除佩尔狄卡斯的担忧，以确保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他们的事业。此外，佩尔狄卡斯派往斯巴达的使节们也曾谈到，佩尔狄卡斯会使他周围很多地方加入斯巴达同盟。因此，布拉西达斯认为，他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去考虑阿拉韦夫斯这个问题。但是，佩尔狄卡斯却反驳说，他把布拉西达斯带来，不是为了让他充当仲裁

者，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而是为了让他击败向自己指出的敌人；他给布拉西达斯的半数军队提供给养，而他竟要与阿拉韦夫斯谈判，这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然而，布拉西达斯还是不顾佩尔狄卡斯的意愿，与阿拉韦夫斯进行了谈判。在阿拉韦夫斯的劝说下，布拉西达斯没有入侵对方的领土就率军队离开了那里。此事之后，佩尔狄卡斯认为他没有守信，便不肯再负担他半数军队的给养，只肯负担三分之一了。

The same summer, without loss of time, Brasidas marched with the Chalcidians against Acanthus, a colony of the Andrians, a little before vintage. The inhabita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parties on the question of receiving him; those who had joined the Chalcidians in inviting him, and the popular party. However, fear for their fruit, which was still out, enabled Brasidas to persuade the multitude to admit him alone, and to hear what he had to say before making a decision; and he was admitted accordingly and appeared before the people, and not being a bad speaker for a Lacedaemonian, addressed them as follows:

同年夏季，葡萄收获季节即将来临时，布拉西达斯不失时机地率领哈尔基斯人开始向安德罗斯人的殖民地阿坎苏斯进军。在是否接纳他的问题上，当地居民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与哈尔基斯人一起邀请他来的人，另一派是普通民众。但是，由于担心城外未收的果实，民众被布拉西达斯说服了，允许他单独一个人进来，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前先听听他有何话要说。因此，他获准进城，来到了民众面前。作为一个斯巴达人，他绝对不属于拙于言辞之辈，他是这样对他们讲的：

“Acanthians, the Lacedaemonians have sent out me and my army to make good the reason that we gave for the war when we

began it, viz., that we were going to war with the Athenians in order to free Hellas. Our delay in coming has been caused by mistaken expectations as to the war at home, which led us to hope, by our own unassisted efforts and without your risking anything, to effect the speedy downfall of the Athenians; and you must not blame us for this, as we are now come the moment that we were able, prepared with your aid to do our best to subdue them. Meanwhile, I am astonished at finding your gates shut against me, and at not meeting with a better welcome. We Lacedaemonians thought of you as allies eager to have us, to whom we should come in spirit even before we were with you in body; and in this expectation undertook all the risks of a march of many days through a strange country, so far did our zeal carry us. It will be a terrible thing if after this you have other intentions, and mean to stand in the way of your own and Hellenic freedom. It is not merely that you oppose me yourselves; but wherever I may go people will be less inclined to join me, on the score that you, to whom I first came—an important town like Acanthus, and prudent men like the Acanthians—refused to admit me. I shall have nothing to prove that the reason which I advance is the true one; it will be said either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unfair in the freedom which I offer, or that I am in insufficient force and unable to protect you against an attack from Athens. Yet when I went with the army which I now have to the relief of Nisaea, the Athenians did not venture to engage me although in greater force than I; and it is not likely they will ever send across sea against you an army as numerous as they had at Nisaea. And for myself, I have come here not to hurt but to free the Hellenes, witness the solemn oaths by which I have bound my government that the allies that I may bring over shall be independent; and besides my object in coming is not by force or fraud to obtain your alliance, but to offer you mine to help you against your Athenian masters. I protest, therefore, against any

suspicions of my intentions after the guarantees which I offer, and equally so against doubts of my ability to protect you, and I invite you to join me without hesitation.”

“阿坎苏斯人：斯巴达人派我和我的军队来，是为了落实我们在开战时的宣言，也就是说，我们向雅典人开战，目的是为了使希腊获得解放。我们之所以姗姗来迟，是因为我们对于在自己城邦进行的战争预计有误。我们曾经希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仅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无需你们冒任何风险，很快就能让雅典人垮掉。请你们不要因此而责备我们，因为我们一有机会就马上来了，而且准备在你们的帮助下尽全力使雅典人屈服。可是，看到你们对我紧闭城门，看到自己没有受到更为热情的欢迎，我感到十分诧异。我们斯巴达人以为，作为盟友，你们渴望我们到来。即便我们人未到，我们的心也该和你们在一起。正是怀着这种想法，我们才穿过陌生的地区，经过多日跋涉，历尽途中艰险，怀着满腔热情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在这之后，你们如果还另有想法，打算阻碍自己以及希腊获得自由，那就太糟糕了。这不单是你们反对我的问题，而是我所到之处人们会不再那么愿意和我联合的问题，因为他们会想，我首先来找的是你们，而像阿坎苏斯这么重要的城镇，像阿坎苏斯人这么精明的人民都不肯允许我入城。那么，我来这里的真实原因将无以为证。人们要么会说我提出来的自由有不当之处，要么就会说我的军队不足以保护你们免遭雅典的进攻。但是，当我率领我现在的这支军队去援救尼塞阿时，雅典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却不敢与我交战；而他们不可能会派遣他们在尼塞阿那么多军队渡过大海来进攻你们。至于我本人，我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要伤害希腊人，而是要解放希腊人，要证明我令我们政府立下的神圣誓言，即保障转向我们一边的盟邦保有独立。另外，我来的目的，不是要用武力或欺骗手段使你们加入我们的同盟，而是要与你们结为同盟，以便帮助你们反抗雅典的统治。因此，在我作出了保证之后，我想，你们不该再怀疑我的目的，也不该再怀疑我保护你们的能力，我请求你们毫不犹豫地和我站在一起。”

“Some of you may hang back because they have private enemies, and fear that I may put the city into the hands of a party; none need be more tranquil than they. I am not come here to help this party or that; and I do not consider that I should be bringing you freedom in any real sense, if I should disregard your constitution, and enslave the many to the few or the few to the many. This would be heavier than a foreign yoke; and we Lacedaemonians, instead of being thanked for our pains, should get neither honour nor glory, but, contrariwise, reproaches. The charges which strengthen our hands in the war against the Athenians would on our own showing be merited by ourselves, and more hateful in us than in those who make no pretensions to honesty; as it is more disgraceful for persons of character to take what they covet by fair-seeming fraud than by open force; the one aggression having for its justification the might which fortune gives, the other being simply a piece of clever roguery. A matter which concerns us thus nearly we naturally look to most jealously; and over and above the oaths that I have mentioned, what stronger assurance can you have, when you see that our words, compared with the actual facts, produce the necessary conviction that it is our interest to act as we say?”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因为有私敌而踌躇不前，担心我会把这座城交到某个党派手中，其实他们尤其没有担心的必要。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帮助某个党派。我认为，如果我置你们的宪法于不顾，让少数人奴役多数人，或者让多数人奴役少数人，那么我不认为我带给了你们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如果是这样，将会比受外族人统治更加难以忍受，我们斯巴达人也就不仅不应当为我们付出的辛劳得到感激，而且不应当获得荣誉和光荣，反而应当受到贬责。我们对雅典人那些指责，本来会增强我们在战争中的地位，却会因为我们也如此表现而落到我们自己头上，而且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会比在没有自命

正直的人身上表现出来更可恨。有德之人利用貌似公平的欺骗手段夺取他们觊觎的东西，要比通过公开诉诸武力更可耻。有幸获得势力者实行侵略，总算还有点理由，另一种侵略则只不过是巧妙的流氓行径而已。与我们这么密切相关的事情，我们自然会严加注意。除了我提到的誓言之外，你们还可以看到，将我们的言辞与实际情况比较一下，势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难道还有比这更可靠的保证吗？”

“If to these considerations of mine you put in the plea of inability, and claim that your friendly feeling should save you from being hurt by your refusal; if you say that freedom, in your opinion, is not without its dangers, and that it is right to offer it to those who can accept it, but not to force it on any against their will, then I shall take the gods and heroes of your country to witness that I came for your good and was rejected, and shall do my best to compel you by laying waste your land. I shall do so without scruple, being justified by the necessity which constrains me, first, to prevent the Lacedaemonians from being damaged by you, their friends, in the event of your nonadhesion, through the moneys that you pay to the Athenians; and secondly, to prevent the Hellenes from being hindered by you in shaking off their servitude. Otherwise, indeed, we should have no right to act as we propose; except in the name of some public interest, what call should we Lacedaemonians have to free those who do not wish it? Empire we do not aspire to: it is what we are labouring to put down; and we should wrong the greater number if we allowed you to stand in the way of the independence that we offer to all. Endeavour, therefore, to decide wisely, and strive to begin the work of liberation for the Hellenes, and lay up for yourselves endless renown, while you escape private loss, and cover your commonwealth with glory.”

“了解了我说的这些理由之后，如果你们还以无力做到为托辞，声称你们心存友好，即便拒绝了我，你们也不应该受到伤害；如果你们还说，照你们看来，自由不是没有危险，所以应当将它给予能够接受的人，而不应当违背任何人的意愿强加给他们，那么，我将请你们国家的神明和英雄们作证，我为你们着想而来，却遭到了你们的拒绝；我将践踏你们的土地，尽力使你们屈服。我这样做，丝毫不会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因为有两个原因使我不得不这样做：一个是防止你们在不依附我们时向雅典人支付款项，从而给你们的朋友斯巴达人造成伤害；另一个是防止你们阻碍希腊人摆脱被奴役的状态。否则，我们实际上就没有权利按照我们提议的去做。如果不是为了公众利益，我们斯巴达人有何必要去解放不希望获得解放的人呢？我们并不企求建立帝国，那恰恰是我们要努力推翻的。如果允许你们阻碍我们实现让所有人获得独立的进程，我们就会伤害大多数人。因此，要明智决断，开启希腊人的解放事业，努力为自己赢得永久的芳名。这样不仅可以使你们个人免受损失，而且还可以为你们的城邦带来光荣。”

Such were the words of Brasidas. The Acanthians, after much had been said on both sides of the question, gave their votes in secret, and the majority, influenced by the seductive arguments of Brasidas and by fear for their fruit, decided to revolt from Athens; not however admitting the army until they had taken his personal security for the oaths sworn by his government before they sent him out, assuring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allies whom he might bring over. Not long after, Stagirus, a colony of the Andrians, followed their example and revolted.

这是布拉西达斯所讲的话。在充分听取了两方面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后，阿坎苏斯人举行了秘密表决。一方面受布拉西达斯具有说服力的论点影响，一方面出于对未收获的果实的担心，大多数人决定叛离

雅典。不过，他们首先要求布拉西达斯为其政府在派遣他出来之前立下的誓言作出保证，即保证他争取过来的盟邦保持独立，然后才允许他的军队进城。不久之后，安德罗斯人的殖民地斯塔伊鲁斯也效法他们，同样叛离了雅典。

Such were the events of this summer. It was in the first days of the winter following that the places in Boeotia were to be put into the hands of the Athenian generals, Hippocrates and Demosthenes, the latter of whom was to go with his ships to Siphae, the former to Delium. A mistake, however, was made in the days on which they were each to start; and Demosthenes, sailing first to Siphae, with the Acarnanians and many of the allies from those parts on board, failed to effect anything, through the plot having been betrayed by Nicomachus, a Phocian from Phanotis, who told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y the Boeotians. Succours accordingly flocked in from all parts of Boeotia, Hippocrates not being yet there to make his diversion, and Siphae and Chaeronea were promptly secured, and the conspirators, informed of the mistake, did not venture on any movement in the towns.

这些是那年夏季发生的事。在随后而至的冬季开始时，维奥蒂亚的一些地区原准备要交到雅典将军希波克拉底和狄摩西尼手中，前者要率舰队前往德利乌姆，后者要去西费。但是，他们各自要动身那几天却出了差错。狄摩西尼起初载着阿卡纳尼亚人和那些地区的不少盟军前往西费，结果却无功而返。法诺蒂斯一个名叫尼科马胡斯的福基斯人将他们的计划泄露给了斯巴达人，斯巴达人又转告给了维奥蒂亚人，结果，希波克拉底尚未赶到那里发挥牵制作用，救兵便从维奥蒂亚各地蜂拥而至，西费和喀罗尼亚迅即固若金汤。参与阴谋的人得知出了差错，也就未敢在这些城镇采取任何行动。

Meanwhile, Hippocrates made a levy in mass of the citizens, resident aliens, and foreigners in Athens, and arrived at his destination after the Boeotians had already come back from Siphae, and encamping his army began to fortify Delium, the sanctuary of Apollo,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A trench was dug all round the temple and the consecrated ground, and the earth thrown up from the excavation was made to do duty as a wall, in which stakes were also planted, the vines round the sanctuary being cut down and thrown in, together with stones and bricks pulled down from the houses near; every means, in short, being used to run up the rampart. Wooden towers were also erected where they were wanted, and where there was no part of the temple buildings left standing, as on the side where the gallery once existing had fallen in. The work was begun on the third day after leaving home, and continued during the fourth, and till dinnertime on the fifth, when most of it being now finished the army removed from Delium about a mile and a quarter on its way home. From this point most of the light troops went straight on, while the heavy infantry halted and remained where they were; Hippocrates having stayed behind at Delium to arrange the posts, and to give directions for the completion of such part of the outworks as had been left unfinished.

那时，希波克拉底在雅典公民、外籍居民和在雅典的异邦人中大量征召兵员，维奥蒂亚人已经从西费撤回来了，他才抵达目的地。扎下营盘后，他遂率领部队开始在德利乌姆修筑防御工事，即阿波罗神庙所在地。修筑方式如下：他们在神庙和圣地周围挖了一条壕沟，用挖出来的土筑起一道墙；墙内打上木桩，还把神庙周围的藤蔓砍下来，与从附近房屋上拆取的石料和砖头一起扔进去。总之，为了筑成这道防御土墙，能用的都用上了。另外，在必要之处和神庙的建筑物不复存在的地方还修建了木塔，譬如以前有柱廊但后来坍塌了的那一侧。他们是在离开雅典后第三天开始这项工程的，第四天继续施工，

一直到第五天晚餐时间，大部分工程才完工，军队随即启程离开德利乌姆返回雅典，德利乌姆距雅典大约1.25英里。大部分轻步兵从这里继续往前推进，重步兵则停在原地未动。希波克拉底仍留在德利乌姆安排布哨事宜，指挥防御工事的未完成部分。

During the days thus employed the Boeotians were mustering at Tanagra, and by the time that they had come in from all the towns, found the Athenians already on their way home. The rest of the eleven Boeotarchs were against giving battle, as the enemy was no longer in Boeotia, the Athenians being just over the Oropian border, when they halted; but Pagondas, son of Aeolidas, one of the Boeotarchs of Thebes (Arianthides, son of Lysimachidas, being the other), and then commander-in-chief, thought it best to hazard a battle. He accordingly called the men to him, company after company, to prevent their all leaving their arms at once, and urged them to attack the Athenians, and stand the issue of a battle, speaking as follows:

这段时间里，维奥蒂亚人调集来的军队一直集结在塔纳格拉。当各城邦的军队到齐时，他们发现雅典人已经踏上了归程。维奥蒂亚同盟的十一位同盟官中有十个反对开战，因为敌军已经不在维奥蒂亚境内。雅典人停下来时，刚好已越过奥罗普斯的边境。但是，底比斯的两位同盟官之一，时任总司令的埃奥利扎斯之子帕贡扎斯（另一位是利西马希扎斯的儿子阿里安西泽斯），却认为最好冒险一战。为了防止士兵们同时拒战，他把部队一队队叫到面前，竭力劝他们进攻雅典人，并从主战场的立场作了如下讲话：

“Boeotians, the idea that we ought not to give battle to the Athenians, unless we came up with them in Boeotia, is one which

should never have entered into the head of any of us, your generals. It was to annoy Boeotia that they crossed the frontier and built a fort in our country; and they are therefore, I imagine, our enemies wherever we may come up with them, and from wheresoever they may have come to act as enemies do. And if any one has taken up with the idea in question for reasons of safety, it is high time for him to change his mind. The party attacked, whose own country is in danger, can scarcely discuss what is prudent with the calmness of men who are in full enjoyment of what they have got, and are thinking of attacking a neighbour in order to get more. It is your national habit, in your country or out of it, to oppose the same resistance to a foreign invader; and when that invader is Athenian, and lives upon your frontier besides, it is doubly imperative to do so. As between neighbours generally, freedom means simply a determination to hold one's own; and with neighbours like these, who are trying to enslave near and far alike, there is nothing for it but to fight it out to the last. Look at the condition of the Euboeans and of most of the rest of Hellas, and be convinced that others have to fight with their neighbours for this frontier or that, but that for us conquest means one frontier for the whole country, about which no dispute can be made, for they will simply come and take by force what we have. So much more have we to fear from this neighbour than from another. Besides, people who, like the Athenians in the present instance, are tempted by pride of strength to attack their neighbours, usually march most confidently against those who keep still, and only defend themselves in their own country, but think twice before they grapple with those who meet them outside their frontier and strike the first blow if opportunity offers. The Athenians have shown us this themselves; the defeat which we inflicted upon them at Coronea, at the time when our quarrels had allowed them to occupy the country, has given great security to Boeotia until the present day. Remembering this, the old

must equal their ancient exploits, and the young, the sons of the heroes of that time, must endeavour not to disgrace their native valour; and trusting in the help of the god whose temple has been sacrilegiously fortified, and in the victims which in our sacrifices have proved propitious, we must march against the enemy, and teach him that he must go and get what he wants by attacking someone who will not resist him, but that men whose glory it is to be always ready to give battle for the liberty of their own country, and never unjustly to enslave that of others, will not let him go without a struggle."

"维奥蒂亚人：我们中间任何人，包括你们的将军绝不该产生这种想法，即除非在维奥蒂亚境内遇上雅典人，否则就不该进攻他们。雅典人越过边界，在我们境内构筑防御工事，目的就是为了侵扰维奥蒂亚。因此，我认为，无论我们在何处遇上他们，无论他们从何处而来行不义之举，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倘若有人为了安全起见已经接受这种想法，那么，他早该改变看法了。当自己的领土处于危险之中时，遭受攻击的一方很难镇定自若地去探讨如何慎重行事。只有那些饱享既得利益之人才能这样做，为了获取更多利益，他们甚至还要处心积虑进攻邻邦。反抗外来侵略，是你们民族的传统，无论是在境内还是境外。当入侵者是与你们毗邻的雅典人时，那就更得这样做了。邻邦之间一般都是这样：只有坚守自由，才能获得自由。对于那些无论远近都想征服的邻邦，那就只有跟它打到底。看一看埃维亚和希腊大多数城邦的状况，大家就会知道，其他城邦都是为边界问题而不得不与邻邦打仗。但对我们来说，如果被征服，则意味着整个城邦就只剩一条边界了，而且无法再作边界之争。他们只要跑过来，就可以用武力夺取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因此，与雅典为邻，比与其他城邦为邻更让人担忧。此外，当人们为自己的强大感到骄傲而去进攻邻邦时，就像现在雅典人这样，他们通常会满怀信心地向那些按兵不动的人发起进军，因为后者只在自己境内进行自卫。但是，如果有人到境外接战，而且一有机会就先发制人，他们在搏杀前则会三思而后行。雅典

人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当他们乘我们内乱之机要占领这片领土时，我们在科罗尼亚打败了他们，这次胜利使得维奥蒂亚直到今天都安享太平。记住这一点，年纪大些的要不减当年勇；年纪轻的，当年那些英雄的子辈，要努力不损自己民族的英名。虽然他们亵渎神圣，在神庙里修筑了工事，但我们应当相信里面的神明会佑助我们，相信我们所供奉的牺牲所显示的吉兆。我们一定要向敌人进军，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要想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只能去进攻那些不抵抗的人。那些将时刻准备为自己城邦的自由而战视为光荣，而且从不非正义地去奴役他邦的人，决不会一仗不打就让他们溜掉。”

By these arguments, Pagondas persuaded the Boeotians to attack the Athenians, and quickly breaking up his camp led his army forward, it being now late in the day. On nearing the enemy, he halted in a position where a hill intervening prevented the two armies from seeing each other, and then formed and prepared for action. Meanwhile, Hippocrates at Delium, informed of the approach of the Boeotians, sent orders to his troops to throw themselves into line, and himself joined them not long afterwards, leaving about three hundred horse behind him at Delium, at once to guard the place in case of attack, and to watch their opportunity and fall upon the Boeotians during the battle. The Boeotians placed a detachment to deal with these, and when everything was arranged to their satisfaction appeared over the hill, and halted in the order which they had determined on, to the number of seven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more than ten thousand light troops, one thousand horse, and five hundred targeteers. On their right were the Thebans and those of their province, in the centre the Haliartians, Coronaeans, Copaeans, and the other people around the lake, and on the left the Thespians, Tanagraeans, and Orchomenians, the cavalry and the light troops being at the extremity of each wing. The Thebans formed twenty-five shields

deep, the rest as they pleased. Such was the strength and disposition of the Boeotian army.

帕贡扎斯借此番言论说服了维奥蒂亚人进攻雅典人。当时虽然天色已晚，他还是迅速拔营而起，率领军队向前进发。抵达敌军附近后，他在一处停下来，那里有一座小山相隔，两军彼此看不见。接着，他让军队列成战阵，准备战斗。与此同时，在德利乌姆的希波克拉底得知维奥蒂亚人正在逼近的消息后，传令部队排成了战斗阵列。不久之后，他本人也加入了其中。他在德利乌姆留下了大约300名骑兵驻守，既可以在敌人进攻时发起反击，又可以在战斗期间伺机向维奥蒂亚人发动进攻。维奥蒂亚人专门划拨出来一个分遣队对付这支雅典军队。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他们出现在山头上，按照事先安排的顺序列好阵，共计7,000名重步兵，1万多名轻步兵，1,000名骑兵和500名轻盾兵。他们的右翼是底比斯人及其殖民地的人，中路是哈利亚尔蒂亚人、科罗尼亚人、科佩人以及湖滨地区的一些人，左翼是塞斯比阿人、塔纳格拉人和奥尔霍迈诺斯人，骑兵和轻步兵列在两翼的外侧。底比斯人列成纵深二十五盾的队形，其余人马则随意而列。这是维奥蒂亚军队的兵力和布阵情况。

On the side of the Athenians, the heavy infantry throughout the whole army formed eight deep, being in numbers equal to the enemy, with the cavalry upon the two wings. Light troops regularly armed there were none in the army, nor had there ever been any at Athens. Those who had joined in the invasion, though many times more numerous than those of the enemy, had mostly followed unarmed, as part of the levy in mass of the citizens and foreigners at Athens, and having started first on their way home were not present in any number. The armies being now in line and upon the point of engaging, Hippocrates, the general, passed along the Athenian ranks, and encouraged them as follows:

雅典人方面的情况是这样：整个军队的重步兵列成纵深八排的队形，人数与敌军相当，骑兵列在两翼。军中没有正规武装的轻步兵部队，雅典不曾有过这类军队。参加这次入侵的轻步兵人数虽然比敌军多出好多倍，但大部分装备不齐，仅作为整个雅典公民和异邦人军队中的一部分随军出征。因为他们最先启程返回雅典，所以尚在军中的人数甚少。两军这时均已列阵完毕，交战在即，希波克拉底将军一边沿着雅典人的队伍走，一边用下面的话鼓励他们：

“Athenians, I shall only say a few words to you, but brave men require no more, and they are addressed more to your understanding than to your courage. None of you must fancy that we are going out of our way to run this risk in the country of another. Fought in their territory the battle will be for ours: if we conquer, the Peloponnesians will never invade your country without the Boeotian horse, and in one battle you will win Boeotia and in a manner free Attica. Advance to meet them then like citizens of a country in which you all glory as the first in Hellas, and like sons of the fathers who beat them at Oenophyta with Myronides and thus gained possession of Boeotia.”

“雅典人：我只想对你们说几句话。不过，对勇敢的人也无需多言，而且我想说的不是你们的勇气问题，而是认识问题。你们谁都不要以为，我们是特意跑到另一个城邦的土地上来冒这种险的。我们虽然是在他们的领土上作战，却是在为我们自己的领土而战：如果我们胜了，没有维奥蒂亚骑兵的帮助，伯罗奔尼撒人绝不会再入侵你们的领土。打胜这一仗，你们将不仅赢得维奥蒂亚，在某种意义上，还会使阿提卡获得自由。你们是希腊第一大城邦的公民，享有无上荣光；你们的父辈曾经在米罗尼泽斯的率领下在伊诺菲塔打败过他们，从而夺取了维奥蒂亚。那就以这样一个城邦的公民精神，不辱你们的父辈

的使命，冲上前去迎击他们吧！”

Hippocrates had got half through the army with his exhortation, when the Boeotians, after a few more hasty words from Pagondas, struck up the paean, and came against them from the hill; the Athenians advancing to meet them, and closing at a run. The extreme wing of neither army came into action, one like the other being stopped by the water-courses in the way; the rest engaged with the utmost obstinacy, shield against shield. The Boeotian left, as far as the centre, was worsted by the Athenians. The Thespians in that part of the field suffered most severely. The troops alongside them having given way, they were surrounded in a narrow space and cut down fighting hand to hand; some of the Athenians also fell into confusion in surrounding the enemy and mistook and so killed each other. In this part of the field the Boeotians were beaten, and retreated upon the troops still fighting; but the right, where the Thebans were, got the better of the Athenians and shoved them further and further back, though gradually at first. It so happened also that Pagondas, seeing the distress of his left, had sent two squadrons of horse, where they could not be seen, round the hill, and their sudden appearance struck a panic into the victorious wing of the Athenians, who thought that it was another army coming against them. At length in both parts of the field, disturbed by this panic, and with their line broken by the advancing Thebans, the whole Athenian army took to flight. Some made for Delium and the sea, some for Oropus, others for Mount Parnes, or wherever they had hopes of safety, pursued and cut down by the Boeotians, and in particular by the cavalry, composed partly of Boeotians and partly of Locrians, who had come up just as the rout began. Night however coming on to interrupt the pursuit, the mass of the fugitives escaped more easily than they

would otherwise have done. The next day, the troops at Oropus and Delium returned home by sea, after leaving a garrison in the latter place, which they continued to hold notwithstanding the defeat.

帕贡扎斯也对维奥蒂亚人讲了几句话，不过讲得更匆促。希波克拉底讲着话刚走过队伍的一半，维奥蒂亚人便已高唱着战歌从山上朝他们攻下来了。雅典人冲上前去接战，跑步逼向对方。由于同被河道所阻，双方两翼的外侧兵力都没有投入战斗。其余部队盾牌碰盾牌，打得难解难分。维奥蒂亚人的左翼直到中央，全被雅典人击溃。在那部分战场上，塞斯比阿人的伤亡最为惨重。旁边的部队败下阵后，他们被围困在一处狭小空间，在肉搏战中败下阵来。在包围敌军的过程中，有些雅典人也陷入了混乱，彼此把自己人当作敌人给误杀了。在这部分战场上，维奥蒂亚人被逼退到了仍在战斗的部队那里。不过，底比斯人所在的右翼部队战胜了雅典人，尽管起初进展比较缓慢，后来却逼得他们一退再退。碰巧帕贡扎斯也看到自己的左翼处境不妙，便派两个骑兵中队从敌人看不到的地方绕到了山后。他们的突然出现，在本已获胜的雅典人右翼引起了一阵恐慌，以为又有一支军队攻来了。最后，两部分战场都受到了这种恐慌的影响，防线被不断向前推进的底比斯人突破后，整个雅典军队开始溃逃。有些逃往德利乌姆和海边，有些逃往奥罗普斯，还有些逃向了帕尔内斯山或他们认为有望获得安全的地方。维奥蒂亚人则在后面不停地追杀，尤其是骑兵。骑兵当中一部分是维奥蒂亚人，一部分是洛克里斯人，他们是在雅典人刚开始溃逃时赶到的。然而，夜幕的降临阻止了他们追击的脚步，否则，大多数败兵不会那么容易逃掉。次日，逃到奥罗普斯和德利乌姆的部队从海路返回雅典，在德利乌姆留下了一支守军。雅典人虽然败了，但德利乌姆仍在他们手中。

The Boeotians set up a trophy, took up their own dead, and stripped those of the enemy, and leaving a guard over them retired to Tanagra, there to take measures for attacking Delium.

Meanwhile, a herald came from the Athenians to ask for the dead, but was met and turned back by a Boeotian herald, who told him that he would effect nothing until the return of himself the Boeotian herald, and who then went on to the Athenians, and told them on the part of the Boeotians that they had done wrong in transgressing the law of the Hellenes. Of what use was the universal custom protecting the temples in an invaded country, if the Athenians were to fortify Delium and live there, acting exactly as if they were on unconsecrated ground, and drawing and using for their purposes the water which they, the Boeotians, never touched except for sacred uses? Accordingly, for the god as well as for themselves, in the name of the deities concerned, and of Apollo, the Boeotians invited them first to evacuate the temple, if they wished to take up the dead that belonged to them.

维奥蒂亚人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拾起己方阵亡者的尸体，剥掉敌方死者的衣甲，留下一队人看守，然后退回到塔纳格拉，在那里准备进攻德利乌姆。与此同时，雅典人派出一名传令官，要求收回死者的尸体。但是，这名传令官在途中遇到一名维奥蒂亚传令官，后者对他说，在自己——维奥蒂亚传令官——回来之前，他什么事都办不成。于是，雅典的传令官就折回去了，维奥蒂亚的传令官则继续赶往雅典。他代表维奥蒂亚人对雅典人说，他们做错了，触犯了希腊人的法律。倘若雅典人在德利乌姆修筑工事并驻扎在那里，而且行事如同在非圣地上一样，将维奥蒂亚人除了用于神圣仪式外从来都不碰的水取来用，那么，保护被入侵领土内的神庙这一通行惯例还有何用？因此，为了神邸，同时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维奥蒂亚人以相关诸神和阿波罗的名义要求雅典人，如果他们希望收回他们那些阵亡者的尸体，那就先离开神庙。

After these words from the herald, the Athenians sent their own

herald to the Boeotians to say that they had not done any wrong to the temple, and for the future would do it no more harm than they could help; not having occupied it originally in any such design, but to defend themselves from it against those who were really wronging them. The law of the Hellenes was that conquest of a country, whether more or less extensive, carried with it possession of the temples in that country, with the obligation to keep up the usual ceremonies, at least as far as possible. The Boeotians and most other people who had turned out the owners of a country, and put themselves in their places by force, now held as of right the temples which they originally entered as usurpers. If the Athenians could have conquered more of Boeotia, this would have been the case with them: as things stood, the piece of it which they had got they should treat as their own, and not quit unless obliged. The water they had disturbed under the impulsion of a necessity which they had not wantonly incurred, having been forced to use it in defending themselves against the Boeotians who first invaded Attica. Besides, anything done under the pressure of war and danger might reasonably claim indulgence even in the eye of the god; or why, pray, were the altars the asylum for involuntary offences? Transgression also was a term applied to presumptuous offenders, not to the victims of adverse circumstances. In short, which were most impious—the Boeotians who wished to barter dead bodies for holy places, or the Athenians who refused to give up holy places to obtain what was theirs by right? The condition of evacuating Boeotia must therefore be withdrawn. They were no longer in Boeotia. They stood where they stood by the right of the sword. All that the Boeotians had to do was to tell them to take up their dead under a truce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ustom.

听完维奥蒂亚的传令官这番话，雅典人派他们自己的传令官去对

维奥蒂亚人说，他们不曾对神庙做过任何错事，将来也会避免对它造成损害。他们当初占领神庙时并无此意，只是想利用它来自卫，以抵御那些实际上在侵犯他们的人。根据希腊人的法律，对一个地区的征服，无论其地域大小，均意味着同时拥有那个地区的神庙，并且有义务继续举行惯常的宗教仪式，起码要尽最大可能这样做。维奥蒂亚人以及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人，亦曾驱逐过某个地区的原有居民，用武力取而代之，强行入驻，现在也理所当然地占据着他们起初作为侵占者踏入的神庙。如果雅典人能够征服维奥蒂亚更多的土地，他们同样会照此办理：依照当时的情况，他们应当将自己获取的部分视为己有，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放弃。至于有扰圣水问题，他们并不是恣意妄为，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维奥蒂亚人入侵阿提卡在先，他们只是在抵御维奥蒂亚人的过程中不得不取用而已。此外，为战争和危险所迫而为之事，即便在神的眼里，也有理由得到宽容。否则的话，那么请问，神的祭坛为什么是过失犯罪者的庇护所呢？再者，“触犯法律”这个词仅适用于恣意妄为者，而不适用于为情势所迫之人。总之，维奥蒂亚人希望以死者的尸体换回圣地，雅典人则不肯为收回他们理应收回的东西而放弃圣地，那么，到底是谁对神更不敬呢？因此，要求雅典人撤离维奥蒂亚这一条件必须撤销。他们已不在维奥蒂亚境内，他们所站之处是他们凭武力获取的地方。维奥蒂亚人只需告诉他们，根据民族惯例，他们可以在休战情况下收回死者的尸体。

The Boeotians replied that if they were in Boeotia, they must evacuate that country before taking up their dead; if they were in their own territory, they could do as they pleased: for they knew that, although the Oropid where the bodies as it chanced were lying (the battle having been fought on the borders) was subject to Athens, yet the Athenians could not get them without their leave. Besides, why should they grant a truce for Athenian ground? And what could be fairer than to tell them to evacuate Boeotia if they wished to get what they asked? The Athenian herald accordingly returned with this answer, without having accomplished his object.

维奥蒂亚人回答说，如果他们（雅典人）是在维奥蒂亚，那就必须先撤出去，然后才能收回死者的尸体；如果他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他们尽可以为所欲为；可他们知道，尽管尸体所在的奥罗皮兹（战斗是在边界上进行的）恰巧是雅典人的属地，但非经他们同意，雅典人无法收回尸体。此外，他们有何理由为了雅典的土地而承诺休战呢？欲得所求，须先撤出维奥蒂亚。难道还有比向他们申明这一点更公平合理的答复吗？于是，雅典的传令官没有达成他的目标，带着这一答复回去了。

Meanwhile, the Boeotians at once sent for darters and slingers from the Malian Gulf, and with two thousand Corinthian heavy infantry who had joined them after the battle, the Peloponnesian garrison which had evacuated Nisaea, and some Megarians with them, marched against Delium, and attacked the fort, and after divers efforts finally succeeded in taking it by an engine of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 They sawed in two and scooped out a great beam from end to end, and fitting it nicely together again like a pipe, hung by chains a cauldron at one extremity, with which communicated an iron tube projecting from the beam, which was itself in great part plated with iron. This they brought up from a distance upon carts to the part of the wall principally composed of vines and timber, and when it was near, inserted huge bellows into their end of the beam and blew with them. The blast passing closely confined into the cauldron, which was filled with lighted coals, sulphur and pitch, made a great blaze, and set fire to the wall, which soon became untenable for its defenders, who left it and fled; and in this way the fort was taken. Of the garrison some were killed and two hundred made prisoners; most of the rest got on board their ships and returned home.

与此同时，维奥蒂亚人立即遣人前往马利亚湾，要求那里派标枪手和投石手来。接着，在此役结束之后到来的那2,000名科林斯重步兵、撤离尼塞阿的伯罗奔尼撒守军以及跟他们在一起的迈加拉人的支援下，维奥蒂亚人向德利乌姆进军，对这个要塞发动了进攻。在尝试了各种办法之后，他们最终是用这样一种攻城器械攻下这个要塞的：他们先把一根大木头锯成两半，将中间凿空，再将这两半严丝合缝地重新对在一起，就像一根管子一样，然后用铁链在木头的前端吊上一口大锅，再从大木头内将一根铁管伸进锅里。木头外面大部分包有铁皮。他们从一段距离之外用马车将这个器械运往主要由藤蔓和木料搭建的围墙下。靠近围墙之后，他们将巨大的风箱插入大木头的后端，然后用风箱鼓风。鼓起的风直吹入锅内引燃了锅内的煤块、硫磺和树脂。大火熊熊燃起，引燃城墙。不一会儿，守卫人员就支持不住了，只好弃城而逃，要塞就这样失守了。一些守军被杀死，被俘的有200人，余者大部分跑上他们的战舰，返回了雅典。

Soon after the fall of Delium, which took place seventeen days after the battle, the Athenian herald, without knowing what had happened, came again for the dead, which were now restored by the Boeotians, who no longer answered as at first. Not quite five hundred Boeotians fell in the battle, and nearly one thousand Athenians, including Hippocrates the general, besides a great number of light troops and camp followers.

德利乌姆是在战役结束后第十七天失陷的。失陷后不久，雅典的传令官又来索要阵亡者的尸体，但他并不知道德利乌姆所发生的事。这一次，维奥蒂亚人没有再像当初那样答复，而是把尸体交还给了他。维奥蒂亚人在此役中阵亡数量不足500人，雅典人则将近1,000人，除了大量轻步兵和随营人员之外，还包括他们的将军希波克拉底。

Soon after this battle Demosthenes, after the failure of his voyage to Siphae and of the plot on the town, availed himself of the Acarnanian and Agraean troops and of the four hundred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which he had on board, to make a descent on the Sicyonian coast. Before however all his ships had come to shore, the Sicyonians came up and routed and chased to their ships those that had landed, killing some and taking others prisoners; after which they set up a trophy, and gave back the dead under truce.

此役之后不久，在出航西费和夺城计划均告失败之后，狄摩西尼率领他麾下那些舰上的阿卡那尼亚和阿格雷阿军队以及400名雅典重步兵，对西锡安的海滨地区发动了袭击。但是，他的战舰尚未全部靠岸，西锡安人就来了，将已经登陆的人员打得败退到了舰上。雅典人有些被杀，其他人当了俘虏。之后，西锡安人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在休战期间将阵亡者的尸体还给了雅典人。

Abou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affair of Delium took place the death of Sitalces, king of the Odrysians, who was defeated in battle, in a campaign against the Triballi; Seuthes, son of Sparadocus, his nephew, succeeding to the kingdom of the Odrysians, and of the rest of Thrace ruled by Sitalces.

大约在德利乌姆一事发生的同时，奥兹里夏人的国王西塔尔塞斯去世了。他曾率军进攻特里巴利，结果以战败告终。他的侄子——斯帕拉佐库斯之子塞夫塞斯继承了奥兹里夏人的王国以及西塔尔塞斯所统治的色雷斯其他地区。

The same winter, Brasidas, with his allies in the Thracian

places, marched against Amphipolis, the Athenian colony on the river Strymon. A settlement upon the spot on which the city now stands was before attempted by Aristagoras, the Milesian (when he fled from King Darius), who was however dislodged by the Edonians; and thirty-two years later by the Athenians, who sent thither ten thousand settlers of their own citizens, and whoever else chose to go. These were cut off at Drabescus by the Thracians. Twenty-nine years after, the Athenians returned (Hagnon, son of Nicias, being sent out as leader of the colony) and drove out the Edonians, and founded a town on the spot, formerly called Ennea Hodoi or Nine Ways. The base from which they started was Eion, their commercial seaport at the mouth of the river, not more than three miles from the present town, which Hagnon named Amphipolis, because the Strymon flows round it on two sides, and he built it so as to be conspicuous from the sea and land alike, running a long wall across from river to river, to complete the circumference.

同年冬季，布拉西达斯率领他在色雷斯地区的盟军向安菲波利斯发起进军。安菲波利斯是雅典人在斯特鲁马河畔的一个殖民地。在这座城市现今坐落的地方，以前曾有人试图在此建立殖民地：最初是米利都人阿里斯塔戈拉斯（从大流士国王那里逃出来时），但被埃佐尼亚人赶走了；三十二年后，雅典人从自己的公民和其他愿意前往者中向那里派遣了1万名移民，这些人在德拉韦斯库斯被色雷斯人杀死了；二十九年后，雅典人卷土重来（尼西亚斯之子哈格农奉命前往担任这个殖民地的首领）。他们驱走埃佐尼亚人，在过去被称为恩内阿-霍季或“九路”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城镇。他们最初的活动基地是伊翁，即他们位于河口处的商业港口，离现在这座城不超过3英里。哈格农之所以将现在这座城命名为“安菲波利斯”，原因是斯特鲁马河从两旁绕城流过。他建这座城，就是要让人们从海上和陆上都看得到；他在两旁的河流之间横筑起一道长墙，这样，城的四周就都有了围护。

Brasidas now marched against this town, starting from Arne in Chalcidice. Arriving about dusk at Aulon and Bromiscus, where the lake of Bolbe runs into the sea, he supped there, and went on during the night. The weather was stormy and it was snowing a little, which encouraged him to hurry on, in order, if possible, to take every one at Amphipolis by surprise, except the party who were to betray it. The plot was carried on by some natives of Argilus, an Andrian colony, residing in Amphipolis, where they had also other accomplices gained over by Perdiccas or the Chalcidians. But the most active in the matter were the inhabitants of Argilus itself, which is close by, who had always been suspected by the Athenians, and had had designs on the place. These men now saw their opportunity arrive with Brasidas, and having for some time been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ir countrymen in Amphipolis for the betrayal of the town, at once received him into Argilus, and revolted from the Athenians, and that same night took him on to the bridge over the river; where he found only a small guard to oppose him, the town being at some distance from the passage, and the walls not reaching down to it as at present. This guard he easily drove in, partly through there being treason in their ranks, partly from the stormy state of the weather and the suddenness of his attack, and so got across the bridge, and immediately became master of all the property outside; the Amphipolitans having houses all over the quarter.

布拉西达斯此番从哈尔基季基的阿恩出发，目的就是要进攻这座城。大约在黄昏时分，他抵达阿夫隆与布罗米斯库斯，博尔韦湖就是从那里奔向大海的。在那里吃过晚饭后，他又率军连夜继续前进。当时是风暴天气，还飘着点雪花，这更促使他加快了脚步。如果可能，除了准备出卖这座城接应他的那个党派之外，他想出其不意地进入安

菲波利斯城令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图谋卖城的是安德罗斯的殖民地阿尔伊卢斯的一些本地人，他们住在安菲波利斯，在那里还有其他一些同谋，都是佩尔狄卡斯或哈尔基斯人争取过来的。但是，在这件事上表现最积极的是附近阿尔伊卢斯城的居民，他们一向为雅典人所猜疑，对这座城早有图谋。布拉西达斯一到，这些人立时看出机会来了。他们与住在安菲波利斯城的同胞已经相互勾结很长一段时间了，目的就是出卖这座城。他们马上将布拉西达斯迎进阿尔伊卢斯，就此叛离了雅典人。当天夜里，他们就把布拉西达斯带到河上那座桥边。他在那里发现，安菲波利斯城离过河的地方虽有一段距离，但城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直抵桥边，抵抗他的也仅有一支很小的守卫部队。他轻而易举地就把这支守卫部队赶回了城，部分原因是守军中有叛徒，部分原因是没人料到他会在风雪之夜突然来袭。他就这样过了桥，很快控制了安菲波利斯人在城外的所有财产。安菲波利斯人在整个地区都有房屋。

The passage of Brasidas was a complete surprise to the people in the town; and the capture of many of those outside, and the flight of the rest within the wall, combined to produce great confusion among the citizens; especially as they did not trust one another. It is even said that if Brasidas, instead of stopping to pillage, had advanced straight against the town, he would probably have taken it. In fact, however, he established himself where he was and overran the country outside, and for the present remained inactive, vainly awaiting a demonstration on the part of his friends within. Meanwhile, the party opposed to the traitors proved numerous enough to prevent the gates being immediately thrown open, and in concert with Eucles, the general, who had come from Athens to defend the place, sent to the other commander in Thrace, Thucydides, son of Olorus, the author of this history, who was at the isle of Thasos, a Parian colony, half a day's sail from Amphipolis, to tell him to come to their relief. On receipt of this

message he at once set sail with seven ships which he had with him, in order, if possible, to reach Amphipolis in time to prevent its capitulation, or in any case to save Eion.

布拉西达斯过桥而来，完全出乎城里人的意料。城外许多人被俘，城里人则落荒而逃。这一切在公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尤其是因为他们彼此并不信任。有人甚至说，假如布拉西达斯不停下来转而劫掠他处，而是继续前进径直攻城，他很有可能攻下这座城。然而，实际上，在等不到城内内应接应的情况下，他让军队在他所停的地方安顿下来，践踏了城外的地区，暂且未再行动。当时，反对卖城的党派人数众多，足以阻止立即打开城门。他们与雅典派来守卫这个地方的将军埃夫克莱斯共同派人去见色雷斯的另一位指挥官修昔底德（奥洛鲁斯的儿子，本书作者），要求他前去救援。修昔底德当时在帕罗斯的殖民地萨索斯岛，离安菲波利斯有半日的航程。接到这一消息后，他立刻率领他麾下的7艘战舰启航，为的是尽可能及时抵达安菲波利斯，阻止它投降。如果做不到，无论如何也要挽救伊翁。

Meanwhile, Brasidas, afraid of succours arriving by sea from Thasos, and learning that Thucydides possessed the right of working the gold mines in that part of Thrace, and had thus great influence wit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ntinent, hastened to gain the town, if possible, before the people of Amphipolis should be encouraged by his arrival to hope that he could save them by getting together a force of allies from the sea and from Thrace, and so refuse to surrender. He accordingly offered moderate terms, proclaiming that any of the Amphipolitans and Athenians who chose, might continue to enjoy their property with full rights of citizenship; while those who did not wish to stay had five days to depart, taking their property with them.

这时候，布拉西达斯很担心塔索斯出动救兵从海上驶来，加之又听说修昔底德在色雷斯那个地区拥有金矿开采权，对大陆上的居民很有影响力，他便加快了夺城的步伐。如果可能，他想赶在修昔底德抵达之前完成，以免他的到来使安菲波利斯的人大受鼓舞，进而燃起希望，以为他能从海上和色雷斯召集盟军前来拯救他们，从而拒不投降。因此，他提出的投降条件比较温和：他宣布，凡愿留下者，无论是安菲波利斯人还是雅典人，均可继续享有自己的财产，并享有完全公民权；不愿留下者，可于五日之内带着自己的财产离开。

The bulk of the inhabitants, upon hearing this, began to change their minds, especially as only a small number of the citizens were Athenians, the majority having come from different quarters, and many of the prisoners outside had relations within the walls. They found the proclamation a fair one in comparison of what their fear had suggested; the Athenians being glad to go out, as they thought they ran more risk than the rest, and further, did not expect any speedy relief, and the multitude generally being content at being left in possession of their civic rights, and at such an unexpected reprieve from danger. The partisans of Brasidas now openly advocated this course, seeing that the feeling of the people had changed, and that they no longer gave ear to the Athenian general present; and thus the surrender was made and Brasidas was admitted by them on the terms of his proclamation. In this way, they gave up the city, and late in the same day, Thucydides and his ships entered the harbour of Eion, Brasidas having just got hold of Amphipolis, and having been within a night of taking Eion, had the ships been less prompt in relieving it, in the morning it would have been his.

听了这一公告，大多数居民开始改变主意，尤其是因为城内仅有

一小部分公民是雅典人，大部分来自各个不同地方。再者，那些在城外被俘的人不少都有亲属在城里。他们发现，与他们担心出现的情况相比，公告的内容尚算公平。听说能够离城，雅典人也很高兴，他们原以为自己比其他人处境更危险，而且也没指望能这么快得到解救。民众普遍感到比较满意，因为他们既可以继续拥有公民权，又可以如此意外地解除危险。民众的看法改变之后，便不再听从在场雅典将军的意见。布拉西达斯在城内的支持者看到这种状况，立即公开表示支持这一方案，进而按照公告上的条款归顺布拉达西斯，并放他进了城。他们就这样将这座城交出去了。当天晚些时候，修昔底德率舰开进伊翁港。当时，布拉西达斯刚刚占领安菲波利斯，隔夜就要攻打伊翁。若非这些战舰及时赶来救援，到了早上，伊翁定会落入他的手中。

After this, Thucydides put all in order at Eion to secure it against any present or future attack of Brasidas, and received such as had elected to come there from the interior according to the terms agreed on. Meanwhile, Brasidas suddenly sailed with a number of boats down the river to Eion to see if he could not seize the point running out from the wall, and so command the entrance; at the same time he attempted it by land, but was beaten off on both sides and had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arranging matters at Amphipolis and in the neighbourhood. Myrcinus, an Edonian town, also came over to him; the Edonian king Pittacus having been killed by the sons of Goaxis and his own wife Brauro; and Galepsus and Oesime, which are Thasian colonies, not long after followed its example. Perdiccas too came up immediately after the capture and joined in these arrangements.

此事之后，修昔底德在伊翁将诸事安排妥当，以防布拉西达斯当时或日后发动进攻。另外，他还接纳了那些按照商定条件选择从城内

去往那里的人。其时，布拉西达斯突然率许多船顺河而下，来到伊翁，想看看是否能攻取从城墙那里突出来的岬角，以便控制这一入口。同时，他还从陆路进行了尝试。但是，两面的进攻均被击退，他只好仅对安菲波利斯和附近一带做出安排。另外，埃佐尼亚的国王皮塔科斯被戈阿克西斯的儿子们和他自己的妻子布拉夫罗杀害之后，埃佐尼亚的城镇米尔西努斯也倒向了他那边。不久，萨索斯的两个殖民地加莱普苏斯和伊西迈也效法米尔西努斯，同样倒向了他那边。安菲波利斯易手之后，佩尔狄卡斯很快也过来参与了这些事物的安排。

The news that Amphipolis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enemy caused great alarm at Athens. Not only was the town valuable for the timber it afforded for shipbuilding, and the money that it brought in; but also, although the escort of the Thessalians gave the Lacedaemonians a means of reaching the allies of Athens as far as the Strymon, yet as long as they were not masters of the bridge but were watched on the side of Eion by the Athenian galleys, and on the land side impeded by a large and extensive lake formed by the waters of the river,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go any further. Now, on the contrary, the path seemed open. There was also the fear of the allies revolting, owing to the moderation displayed by Brasidas in all his conduct, and to the declarations which he was everywhere making that he sent out to free Hellas. The towns subject to the Athenians, hearing of the capture of Amphipolis and of the terms accorded to it, and of the gentleness of Brasidas, felt most strongly encouraged to change their condition, and sent secret messages to him, begging him to come on to them; each wishing to be the first to revolt. Indeed, there seemed to be no danger in so doing; their mistake in their estimate of the Athenian power was as great as that power afterwards turned out to be, and their judgment was based more upon blind wishing than upon any sound prevision; for it is a habit of mankind to entrust to careless hope what they

long for, and to use sovereign reason to thrust aside what they do not fancy. Besides the late severe blow which the Athenians had met with in Boeotia, joined to the seductive, though untrue, statements of Brasidas, about the Athenians not having ventured to engage his single army at Nisaea, made the allies confident, and caused them to believe that no Athenian force would be sent against them. Above all the wish to do what was agreeable at the moment, and the likelihood that they should find the Lacedaemonians full of zeal at starting, made them eager to venture. Observing this, the Athenians sent garrisons to the different towns, as far as was possible at such short notice and in winter; while Brasidas sent dispatches to Lacedaemon asking for reinforcements, and himself made preparations for building galleys in the Strymon. The Lacedaemonians however did not send him any, partly through envy on the part of their chief men, partly because they were more bent on recovering the prisoners of the island and ending the war.

安菲波利斯落入敌手的消息，在雅典引起了很大的恐慌。这座城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出产的木材可供造船，以及它可以带来金钱收入，同样也是因为：斯巴达人虽然可以在色萨利人的护送下抵达远至斯特鲁马河的雅典盟邦，但只要控制不了河上的桥，他们就无法再前进一步，因为伊翁那边有雅典的三列桨战舰警戒，陆地那边有河水冲积而成的辽阔湖面相阻。现在则相反，这条路似乎畅通无阻了。另外，雅典人还担心各盟邦叛离，因为布拉西达斯处理问题的方式显得温和有度，他还到处宣称自己是奉命派来解放希腊的。听到安菲波利斯失陷的消息，又得知布拉西达斯对安菲波利斯提出的条件以及他平和的态度之后，臣服于雅典人的城镇也大受鼓舞。那些城镇的人也很想改变自己的状况，于是便秘密送信给他，恳求他到他们境内，而且各个城镇都争先叛离。实际上，这样做看似没有任何危险，但后来却证明，他们对雅典势力的估计偏差之大，不亚于雅典本身实际的实

力。他们的判断，更多的基于盲目的希望，而不是合理的预测。这是因为人们习惯于把自己渴求的东西寄托在无谓的希望之上，对于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则会用极好的理由抛至一旁。此外，布拉西达斯曾声称，雅典人在尼塞阿不敢与他率领的那支孤军交战。此话虽然不实，但雅典人不久前在维奥蒂亚遭到的重创，却使他的话颇具煽动力，使那些盟邦信心倍增，认为雅典不会派军队来对付它们。不过，最使那些盟邦急于冒险而为的，一是它们很想顺应时下的潮流而动，二是它们可能感到斯巴达人开始充满热情了。雅典人注意到这种情况之后，虽然时间仓促，而且又是在冬季，但还是尽可能向各个城镇派出了守军。布拉西达斯则一边派人向斯巴达送急报请求增援，一边准备在斯特鲁马河上建造三列桨战舰。可是，斯巴达人却没有给他派来一兵一卒，一来是因为斯巴达的主要人物有嫉妒之心，二来是因为他们对要回岛上的被俘人员和结束战争问题更为关注。

The same winter, the Megarians took and razed to the foundations the long walls which had been occupied by the Athenians; and Brasidas after the capture of Amphipolis marched with his allies against Acte, a promontory running out from the King's dike with an inward curve, and ending in Athos, a lofty mountain looking towards the Aegean Sea. In it are various towns, Sane, an Andrian colony, close to the canal, and facing the sea in the direction of Euboea; the others being Thyssus, Cleone, Acrothoi, Olophyxus, and Dium, inhabited by mixed barbarian races speaking the two languages. There is also a small Chalcidian element; but the greater number are Tyrrheno-Pelasgians once settled in Lemnos and Athens, and Bisaltians, Crestonians, and Edonians; the towns being all small ones. Most of these came over to Brasidas; but Sane and Dium held out and saw their land ravaged by him and his army.

同年冬季，迈加拉人收复了被雅典人占领的长墙，尔后将其夷为

平地。布拉西达斯在夺得安菲波利斯之后，又率盟军向阿克泰进发。那是从波斯国王的运河处伸出来的一个向内弯曲的地角，地角尽头是面朝爱琴海的高山阿索斯。地角上的城镇不止一个，靠近运河的是安德罗斯的殖民地萨内，面朝埃维亚岛那面的大海。其余城镇包括：西苏斯、克莱奥内、阿克罗西、奥洛菲克苏斯和迪乌姆。这些城镇的居民都是混杂的蛮族，讲两种语言。哈尔基斯人在其中也有一个小的分支，但大多数是曾经居住在利姆诺斯和雅典的蒂雷诺-培拉斯吉人以及比萨尔蒂亚人、克雷斯托尼亚人和埃佐尼亚人。这些城镇都很小，大部分都倒向了布拉西达斯，但萨内和迪乌姆却坚持不妥协，眼看着布拉西达斯率军队践踏了他们的土地。

Upon their not submitting, he at once marched against Torone in Chalcidice, which was held by an Athenian garrison, having been invited by a few persons who were prepared to hand over the town. Arriving in the dark a little before daybreak, he sat down with his army near the temple of the Dioscuri, rather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 mile from the city. The rest of the town of Torone and the Athenians in garrison did not perceive his approach; but his partisans knowing that he was coming (a few of them had secretly gone out to meet him) were on the watch for his arrival, and were no sooner aware of it than they took it to them seven light-armed men with daggers, who alone of twenty men ordered on this service dared to enter, commanded by Lysistratus an Olynthian. These passed through the sea wall, and without being seen went up and put to the sword the garrison of the highest post in the town, which stands on a hill, and broke open the postern on the side of Canastraeum.

布拉西达斯看到他们不肯屈服，马上转而向哈尔基季基的托罗内进军。托罗内城由雅典的一支军队驻守，城里一些准备倒戈的人招请

布拉西达斯前来。在黎明将至前抵达之后，他带着军队在狄俄斯库里兄弟神庙的附近扎下营盘，那里离城有四分之一英里远。托罗内城的其他人和雅典守军都没有觉察到他在逼近，但知道他要来的那些支持者（其中有几个人还秘密出城去迎接他）却一直守望着他的到来。刚一得知他抵达的消息，他们就将7名带匕首的轻装人员带进了城里。原定执行这项任务的是20人，但只有奥林索斯人利西斯特拉图斯率领的7个人敢进城。这些人越过海堤，未被发现就爬了上去，杀死了城内最高哨所（在一座小山上）的守军，砸开了卡纳斯特雷夫姆一侧的后门。

Brasidas, meanwhile, came a little nearer and then halted with his main body, sending on one hundred targeteers to be ready to rush in first, the moment that a gate should be thrown open and the beacon lighted as agreed. After some time passed in waiting and wondering at the delay, the targeteers by degrees got up close to the town. The Toronaeans inside at work with the party that had entered had by this time broken down the postern and opened the gates leading to the market-place by cutting through the bar, and first brought some men round and let them in by the postern, in order to strike a panic into the surprised townsmen by suddenly attacking them from behind and on both sides at once; after which they raised the fire-signal as had been agreed, and took in by the market gates the rest of the targeteers.

与此同时，布拉西达斯带着主力部队又向前靠近了一些，然后停了下来。他先派出100名轻盾兵，准备让他们在城门打开和烽火信号如约点燃时先冲进去。这些轻盾兵等了一段时间，却迟迟不见动静，于是就慢慢向城下靠近。城里的托罗内人和已经进去的那队人已开始行动，此时已砸开后门，砍断门闩，打开了通往市场的大门。他们先引导一部分人马让他们从后门进来，目的是从后面和两侧同时向城里

的居民发起突袭，在居民中制造恐慌。随后，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发出烽火信号，并将其余的轻盾兵从通往市场的那个门放了进去。

Brasidas seeing the signal told the troops to rise, and dashed forward amid the loud hurrahs of his men, which carried dismay among the astonished townspeople. Some burst in straight by the gate, others over some square pieces of timber placed against the wall (which has fallen down and was being rebuilt) to draw up stones; Brasidas and the greater number making straight uphill for the higher part of the town, in order to take it from top to bottom, and once for all, while the rest of the multitude spread in all directions.

布拉西达斯一见信号，马上集结部队，高喊着向前冲去，士兵们的叫喊声使吃惊的市民大为恐慌。有些士兵从城门径直冲入城内，其他人则踏着放在墙边（这部分墙已倒塌，正在重修）用来拖石头的方木冲了进去。布拉西达斯率领大部队直冲上山，抢占该城的较高部分，目的是为了一劳永逸地从上到下完全夺取该城；留下的则分散在全城各处。

The capture of the town was effected before the great body of the Toronaeans had recovered from their surprise and confusion; but the conspirators and the citizens of their party at once joined the invaders. About fifty of the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happened to be sleeping in the market-place when the alarm reached them. A few of these were killed fighting; the rest escaped, some by land, others to the two ships on the station, and took refuge in Lecythus, a fort garrisoned by their own men in the corner of the town running out into the sea and cut off by a narrow isthmus; where

they were joined by the Toronaeans of their party.

大部分托罗内人尚未从惊愕和混乱中恢复过来，这座城就失陷了。然而密谋者及其所在党派的市民立即开始与入侵者合作。约有50名雅典重步兵得到警报时，碰巧睡在市场。这些人当中有少数在战斗中被杀，余者逃之夭夭。有些是从陆路逃的，其他人登上停泊地的两艘船逃往莱基苏斯。莱基苏斯是他们自己人驻守的一个要塞，位于城的一角。这个要塞突入海中，被一条狭窄的地峡与城隔开。亲雅典派的托罗内人也逃进了那里。

Day now arrived, and the town being secured, Brasidas made a proclamation to the Toronaeans who had taken refuge with the Athenians, to come out, as many as chose, to their homes without fearing for their rights or persons, and sent a herald to invite the Athenians to accept a truce, and to evacuate Lecythus with their property, as being Chalcidian ground. The Athenians refused this offer, but asked for a truce for a day to take up their dead. Brasidas granted it for two days, which he employed in fortifying the houses near, and the Athenians in doing the same to their positions. Meanwhile, he called a meeting of the Toronaeans, and said very much what he had said at Acanthus, namely, that they must not look upon those who had negotiated with him for the capture of the town as bad men or as traitors, as they had not acted as they had done from corrupt motives or in order to enslave the city, but for the good and freedom of Torone; nor again must those who had not shared in the enterprise fancy that they would not equally reap its fruits, as he had not come to destroy either city or individual. This was the reason of his proclamation to those that had fled for refuge to the Athenians: he thought none the worse of them for their friendship for the Athenians; he believed that they had only to

make trial of the Lacedaemonians to like them as well, or even much better, as acting much more justly; it was for want of such a trial that they were now afraid of them. Meanwhile, he warned all of them to prepare to be staunch allies, and for being held responsible for all faults in future; for the past, they had not wronged the Lacedaemonians but had been wronged by others who were too strong for them, and any opposition that they might have offered him could be excused.

这时天已亮。布拉西达斯牢牢控制住这座城后，随即向在雅典人那里避难的托罗内人发布公告称：凡愿出来者均可返回家园，无须为自身权利和人身安全担忧。他还派一名传令官前去同雅典人讲和接受休战，带着他们的财产撤离莱基苏斯，因为那是哈尔基斯人的土地。雅典人拒绝了这一提议，但要求休战一天，以便收葬他们的阵亡人员。布拉西达斯给了他们两天的时间。他利用这两天在附近的房屋上构筑了工事，雅典人也加固了他们的阵地。同时，他还召集托罗内人开了个会。他的讲话内容与他在阿坎苏斯所言大致相同，即：大家不要将那些与他共商夺城之计的人看成坏人或叛徒，因为他们这样做既非出于腐败动机，也不是为了奴役这座城市，而是为了托罗内的利益和自由。没有参与此事的人也不要以为他们不会平等地享受其成果，因为他来的目的既不是要毁城，也不是要灭谁。他向逃到雅典人那里去避难的人发布公告的原因是这样：他认为，并不是谁与雅典人交好谁更加可憎。他相信，只要他们试着接触一下斯巴达人，同样也会喜欢斯巴达人，或许更加喜欢，因为斯巴达人办事公道得多。正是由于缺乏这种体验，他们现在才惧怕斯巴达人。他同时告诫大家说：要有做忠实盟友的思想准备。今后若再做错事，他们就要负起责任；至于过去，他们并没有对不起斯巴达人，而是那些对他们来说过于强大的人让他们受了委屈。因此，他们过去反对他有情可原。

Having encouraged them with this address, as soon as the truce

expired he made his attack upon Lecythus; the Athenians defending themselves from a poor wall and from some houses with parapets. One day they beat him off; the next the enemy were preparing to bring up an engine against them from which they meant to throw fire upon the wooden defences, and the troops were already coming up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fancied they could best bring up the engine, and where place was most assailable;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put a wooden tower upon a house opposite, and carried up a quantity of jars and casks of water and big stones, and a large number of men also climbed up. The house thus laden too heavily suddenly broke down with a loud crash; at which the men who were near and saw it were more vexed than frightened; but those not so near, and still more those furthest off, thought that the place was already taken at that point, and fled in haste to the sea and the ships.

用这番话鼓励了他们之后，休战期刚一满，他就对莱基苏斯发动了进攻。雅典人依仗一道简陋的城墙和一些带有矮护墙的房屋进行了抵御。第一天，他们击退了敌人的进攻。第二天，敌人准备征调一部攻城器械对付他们，打算借助器械向他们的木质防御工事上投火。同时，部队也已经在向他们认为最便于把器械运上去的地点和要塞最易受攻击处靠近。其间，雅典人在对面屋顶上搭了一个大木塔，将大量水罐、水桶和大石头运了上去，另外还有好多人爬上塔。由于不堪如此重负，突然之间，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房子塌了。在附近看见这一幕的雅典人与其说是惊恐，不如说是恼怒。但是，那些离现场没那么近的人，以及离得更远一些的人，却以为要塞已从那里被攻克，连忙逃往海边，向船上逃去。

Brasidas, perceiving that they were deserting the parapet, and seeing what was going on, dashed forward with his troops, and

immediately took the fort, and put to the sword all whom he found in it. In this way, the place was evacuated by the Athenians, who went across in their boats and ships to Pallene. Now there is a temple of Athene in Lecythus, and Brasidas had proclaimed in the moment of making the assault that he would give thirty silver minae to the man first on the wall. Being now of opinion that the capture was scarcely due to human means, he gave the thirty minae to the goddess for her temple, and razed and cleared Lecythus, and made the whole of it consecrated ground. The rest of the winter, he spent in settling the places in his hands, and in making designs upon the rest; and with the expiration of the winter the eighth year of this war ended.

布拉西达斯发觉他们在放弃矮墙，随即明白了战事的发展情况，他立刻率领部队猛冲上去，很快夺取了要塞，将里面发现的人都杀死了。雅典人就这样撤离了这个地方，乘着大小船只去了帕莱内。莱基苏斯当时有一个雅典娜女神庙。进攻开始时，布拉西达斯曾经宣布，他要赏给第一个爬上城墙的人30个银迈纳。此时他认为，这一要塞的取得，很难说归功于人力，所以就把这30个迈纳献给了这位女神，以作庙资之用。接着，他把莱基苏斯的工事拆除并清理干净，将整片土地归为了圣地。在这个冬季余下的时间里，他将已经攻下的几处安排妥当，并筹划了日后对其余地方的征服事宜。冬季结束时，这场战争的第八年亦随之告终。

In the spring of the summer following,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thenians made an armistice for a year; the Athenians thinking that they would thus have full leisure to take their precautions before Brasidas could procure the revolt of any more of their towns, and might also, if it suited them, conclude a general peace; the Lacedaemonians divining the actual fears of the Athenians, and

thinking that after once tasting a respite from trouble and misery they would be more disposed to consent to a reconciliation, and to give back the prisoners, and make a treaty for the longer period. The great idea of the Lacedaemonians was to get back their men while Brasidas's good fortune lasted; further successes might make the struggle a less unequal one in Chalcidice, but would leave them still deprived of their men, and even in Chalcidice not more than a match for the Athenians and by no means certain of victory. An armistice was accordingly concluded by Lacedaemon and her allies upon the terms following:

在下个夏季开始前的春天里，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商定休战一年。雅典人认为，这样就可以抢在布拉西达斯唆使其他城镇叛离之前从容地采取预防措施；如果对他们合适，或许还可以缔结全面和平协定。斯巴达人觉察到了雅典人的真实用意，他们认为，稍事尝到没有战乱和苦难的甜头之后，雅典人会更倾向于和解，也更愿意归还俘虏，签订长期和约。斯巴达人打的好算盘是在布拉西达斯的好运持续期间要回被俘人员。如果布拉西达斯再取得一些胜利，在哈尔基季基的这场斗争或许会多一些对等性，但他们还是要不回他们的人。即便是在哈尔基季基，他们也无法与雅典人相匹敌，无法稳操胜券。因此，斯巴达及其盟邦以下列条件缔结了休战协定：

1 . As to the temple and oracle of the Pythian Apollo, we are agreed that whosoever will shall have access to it, without fraud or fear, according to the usages of his forefathers.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 allies present agree to this, and promise to send heralds to the Boeotians and Phocians, and to do their best to persuade them to agree likewise.

1．关于皮提亚的阿波罗神庙和神谕宣示所，我们一致同意，凡愿前往问神者均可按照其祖先的惯例前往，无需弄虚作假，亦无需心怀恐惧。斯巴达人和在场的各同盟方均对此表示赞成，并承诺派传令官去见维奥蒂亚人和福基斯人，尽力说服他们同样赞成。

2．As to the treasure of the god, we agree to exert ourselves to detect all malversators, truly and honestly following the customs of our forefathers, we and you and all others willing to do so, all following the customs of our forefathers. As to these points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 other allies are agreed as has been said.

2．关于神的财物问题，我们赞成竭力查出所有贪污分子，忠实而真诚地遵循祖先的惯例。我们和你们以及其他所有愿意采取此做法者，均须遵循祖先的惯例行事。关于上述诸点，斯巴达人和其他同盟方均表示同意。

3．As to what follows,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 other allies agree, if the Athenians conclude a treaty, to remain, each of us in our own territory, retaining our respective acquisitions: the garrison in Coryphasium keeping within Buphras and Tomeus; that in Cythera attempting no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loponnesian confederacy, neither we with them, nor they with us; that in Nisaea and Minoa not crossing the road leading from the gates of the temple of Nisus to that of Poseidon and from thence straight to the bridge at Minoa: the Megarians and the allies being equally bound not to cross this road, and the Athenians retaining the island they have taken, without any communication on either side; as to Troezen, each side retaining what it has, and as was arranged with the Athenians.

3．倘若雅典人准备缔约，斯巴达人和其他同盟方均同意下列各点：我们全都留在自己的领土内，但可保留各自所获；科里法西乌姆的守军继续留在布夫拉斯和托梅夫斯；基西拉的守军不得与伯罗奔尼撒同盟来往，即我们不得与他们来往，他们亦不得与我们来往；尼塞阿和米诺阿的守军不得越过从尼索斯神庙大门经波塞冬神庙再直达米诺阿之桥那条路；迈加拉人及其盟邦同样不得越过此路；雅典人仍可保留已占领的岛屿，但不得与两侧有任何往来；至于特里曾，各方均可依照与雅典人的协定保留其现有部分。

4．As to the use of the sea, so far as refers to their own coast and to that of their confederacy,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may voyage upon it in any vessel rowed by oars and of not more than five hundred talents tonnage, not a vessel of war.

4．关于海域的使用问题，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可自由航行至自己和同盟成员的近海水域，可乘坐用桨划的船只通行，战舰及吨数超过500塔兰特的船只不得通行。

5．That all heralds and embassies, with as many attendants as they please, for concluding the war and adjusting claims, shall have free passage, going and coming, to Peloponnese or Athens by land and by sea.

5．负责交涉结束战争和调处双方要求的所有传令官与特使及其随行人员（人数自定），可通过陆路和海路自由往来于伯罗奔尼撒或雅典之间。

6．That during the truce, deserters whether bond or free shall be received neither by you, nor by us.

6．休战期间，你方和我方均不得收留逃亡者，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

7．Further, that satisfaction shall be given by you to us and by us to you according to the public law of our several countries, all disputes being settled by law without recourse to hostilities.

7．此外，双方各自对对方提出的赔偿，均须依照我们多个城邦的公法给予。所有争端均须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而非诉诸战争行动。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llies agree to these articles; but if you have anything fairer or juster to suggest, come to Lacedaemon and let us know: whatever shall be just will meet with no objection either from the Lacedaemonians or from the allies. Only let those who come come with full powers, as you desire us. The truce shall be for one year.

斯巴达人和各同盟方均同意上述条款，但如果你们有更公平或更合理的建议，请到斯巴达来告知我们。凡属合理者，决不会遭到斯巴达人和各同盟方的反对。但来者须有全权，如同你们所要求我们的一样。本次休战为期一年。

Approved by the people.

本条约已为人民批准。

The tribe of Acamantis had the prytany, Phoenippus was secretary, Niciades chairman. Laches moved, in the name of the good luck of the Athenians, that they should conclude the armistice upon the terms agreed upon by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 allies. It was agreed accordingly in the popular assembly that the armistice should be for one year, beginning that very day, the fourteenth of the month of Elaphebolion; during which time ambassadors and heralds should go and com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discuss the bases of a pacification. That the generals and prytanes should call an assembly of the people, in which the Athenians should first consult on the peace, and on the mode in which the embassy for putting an end to the war should be admitted. That the embassy now present should at once take the engagement before the people to keep well and truly this truce for one year.

阿卡曼蒂斯部族召开了主席团会议，菲尼普斯担任秘书，尼夏泽斯担任主席。拉凯斯以为雅典人好的名义提议，他们应根据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商定一致的条件缔结休战协定。因此，公民大会同意休战一年，当日生效，即埃拉费博利翁月第14日。休战期间，双方应派使节与传令官往来于两城邦之间，就和约的基础进行磋商。将军们和议事会主席团应召集公民大会，雅典人在会上应首先商议和平问题，以及以何方式准许为结束战争而来之使团的入场问题。目前在场的使团应立即在人民面前承诺，保证在一年内切实遵守本休战协定。

On these terms, the Lacedaemonians concluded with the

Athenians and their allies on the twelfth day of the Spartan month Gerastius; the allies also taking the oaths. Those who concluded and poured the libation were Taurus, son of Echetimides, Athenaeus, son of Pericleidas, and Philocharidas, son of Eryxidaidas, Lacedaemonians; Aeneas, son of Ocytus, and Euphamidas, son of Aristonymus, Corinthians; Damotimus, son of Naucrates, and Onasimus, son of Megacles, Sicyonians; Nicasus, son of Cecalus, and Menecrates, son of Amphidorus, Megarians; and Amphias, son of Eupaidas, an Epidaurian; and the Athenian generals Nicostratus, son of Diitrephes, Nicias, son of Niceratus, and Autocles, son of Tolmaeus. Such was the armistice, and during the whole of it conferences went on on the subject of a pacification.

基于这些条件，斯巴达人与雅典人以及各自的盟邦在斯巴达的历耶拉斯蒂乌斯月第12日缔结了休战协定。各盟邦也参加了宣誓。参加缔约和奠酒者如下：斯巴达人的代表埃海蒂米泽斯之子塔夫鲁斯、佩里克利扎斯之子阿忒那奥斯和埃里克西泽扎斯之子菲洛哈里扎斯，科林斯人的代表奥基图斯之子埃涅阿斯和阿里斯托尼穆斯之子埃夫法米扎斯，西锡安人的代表纳夫克拉泰斯之子达莫蒂穆斯和麦加克勒斯之子奥纳西穆斯，迈加拉人的代表凯卡卢斯之子尼卡苏斯和安菲多鲁斯之子迈内克拉泰斯，埃皮达鲁斯人的代表埃夫佩扎斯之子安菲亚斯，雅典将军——迪伊特雷费斯之子尼科斯特拉图斯、尼塞拉图斯之子尼西亚斯和托尔迈夫斯之子阿夫托克莱斯。以上是休战协定的情况。在整个休战期间，双方一直在就和约问题开会协商。

In the days, in which they were going backwards and forwards to these conferences, Scione, a town in Pallene, revolted from Athens, and went over to Brasidas. The Scionaeans say that they are Pallenians from Peloponnese, and that their first founders on their voyage from Troy were carried in to this spot by the storm which

the Achaeans were caught in, and there settled. The Scionaeans had no sooner revolted than Brasidas crossed over by night to Scione, with a friendly galley ahead and himself in a small boat some way behind; his idea being that if he fell in with a vessel larger than the boat he would have the galley to defend him, while a ship that was a match for the galley would probably neglect the small vessel to attack the large one, and thus leave him time to escape. His passage effected, he called a meeting of the Scionaeans and spoke to the same effect as at Acanthus and Torone, adding that they merited the utmost commendation, in that, in spite of Pallene within the isthmus being cut off by the Athenian occupation of Potidaea and of their own practically insular position, they had of their own free will gone forward to meet their liberty instead of timorously waiting until they had been by force compelled to their own manifest good. This was a sign that they would valiantly undergo any trial, however great; and if he should order affairs as he intended, he should count them among the truest and sincerest friends of the Lacedaemonians, and would in every other way honour them.

在他们来回奔走于这些会议那些天，帕莱内的西奥内城叛离雅典，投向了布拉西达斯一边。西奥内人说，他们是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帕莱内人，他们这座城最早的建立者在从特洛伊返航途中被亚该亚人遇上的那场风暴刮到这个地方，然后便再次定居下来。西奥内人刚一叛离，布拉西达斯就趁黑夜渡海赶往西奥内。他让友邦一艘三列桨战舰在前面开路，他本人则乘一条小船隔着一段距离跟在后面。他的用意是，假如遇到一艘比他所乘之船更大的船，那艘三列桨战舰可以保护他；如果遇上与那艘三列桨战舰大小相当的船，它有可能不理会小船，忙着去攻击较大的三列桨战舰，这样他就有时间逃脱。渡过海后，他召集西奥内人开会并发言。讲话内容与他在阿坎苏斯和托罗内所说的大体相同，只是补充说，他们非常值得称赞，因为地峡内的帕

莱内人虽然在雅典人占领波提狄亚后被隔绝，实际上处于孤岛地位，但他们却主动行动起来争取自由，而不是胆怯地等到为武力所迫才走上明显对他们有益的道路。这表示他们会勇敢地经受任何考验，无论这种考验有多大。如果他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旨行事，他一定会把他们当作斯巴达人最忠实可靠的朋友，在各方面都尊重他们。

The Scionaeans were elated by his language, and even those who had at first disapproved of what was being done catching the general confidence, they determined on a vigorous conduct of the war, and welcomed Brasidas with all possible honours, publicly crowning him with a crown of gold as the liberator of Hellas; while private persons crowded round him and decked him with garlands as though he had been an athlete. Meanwhile, Brasidas left them a small garrison for the present and crossed back again, and not long afterwards sent over a larger force, intending with the help of the Scionaeans to attempt Mende and Potidaea before the Athenians should arrive; Scione, he felt, being too like an island for them not to relieve it. He had besides intelligence in the above towns about their betrayal.

听了他的话，西奥内人非常振奋，就连那些起初不赞成这样做的人也和大家一样有了信心，他们决定积极投入战争，并尽可能用最高礼节欢迎他。他们公开将他作为希腊的解放者加以金冠，平民们还簇拥在他周围，给他戴上花环，好像他是竞技场上的优胜者一样。这时候，布拉西达斯暂且留下一小队守军，自己先渡海回去了。不久之后，他又派过来一支较大的部队，打算趁雅典人尚未赶到之际，在西奥内人的帮助下袭取门德和波提狄亚。他认为，对雅典人来说，西奥内太像一个孤岛了，他们一定会出兵去解救的。此外，前文提及的城镇也有内应跟布拉西达斯联系，表示有叛离之意。

In the midst of his designs, upon the towns in question, a galley arrived with the commissioners carrying round the news of the armistice, Aristonymus for the Athenians and Athenaeus for the Lacedaemonians. The troops now crossed back to Torone, and the commissioners gave Brasidas notice of the convention. All the Lacedaemonian allies in Thrace accepted what had been done; and Aristonymus made no difficulty about the rest, but finding, on counting the days, that the Scionaeans had revolted after the date of the convention, refused to include them in it. To this Brasidas earnestly objected, asserting that the revolt took place before, and would not give up the town. Upon Aristonymus reporting the case to Athens, the people at once prepared to send an expedition to Scione. Upon this, envoys arrived from Lacedaemon, alleging that this would be a breach of the truce, and laying claim to the town upon the faith of the assertion of Brasidas, and meanwhile offering to submit the question to arbitration. Arbitration, however, was what the Athenians did not choose to risk; being determined to send troops at once to the place, and furious at the idea of even the islanders now daring to revolt, in a vain reliance upon the power of the Lacedaemonians by land. Besides the facts of the revolt were rather as the Athenians contended, the Scionaeans having revolted two days after the convention. Cleon accordingly succeeded in carrying a decree to reduce and put to death the Scionaeans; and the Athenians employed the leisure which they now enjoyed in preparing for the expedition.

正当他图谋夺取这些城镇时，一艘三列桨战舰载着宣布休战消息的特派员抵达了。雅典人方面的代表是阿里斯托尼穆斯，斯巴达人方面的代表是阿忒那奥斯。于是，部队又渡海返回托罗内，特派员们将休战协议一事传达给了布拉西达斯。对于已做出的安排，斯巴达在色雷斯的所有盟邦都表示接受。阿里斯托尼穆斯对其余部分也未提出异

议，只是不肯将西奥内人包括在内。他算过日期之后发现，西奥内人的叛离发生在休战协议签订之后。布拉西达斯坚决反对这一看法，坚称叛离是在此前发生的，因而不肯放弃这座城。阿里斯托尼穆斯将这个情况汇报给雅典之后，雅典人立刻准备派出一支远征军赶赴西奥内。斯巴达闻讯后，立即派特使来到雅典，宣称这是违反休战协定的行为。他们相信布拉西达斯的话绝非戏言，坚持称这座城属于他们，同时要求将这个问题提交仲裁。可是，雅典人不愿冒仲裁之险，他们决定立即派部队赶赴那里。如今连岛民都敢叛离雅典，竟然去依靠斯巴达那种于岛民无益的陆上势力，这一点令雅典人大为恼火。此外，雅典人所言更符合事实，西奥内人的叛离确实发生在休战协定签订两日之后。因此，在克莱翁的提议下，雅典人通过了一道政令：收复西奥内，处死西奥内人。雅典人当时别无战事，便开始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准备远征。

Meanwhile, Mende revolted, a town in Pallene and a colony of the Eretrians, and was received without scruple by Brasidas, in spite of its having evidently come over during the armistice, on account of certain infringements of the truce alleged by him against the Athenians. This audacity of Mende was partly caused by seeing Brasidas forward in the matter and by th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his refusal to betray Scione; and besides, the conspirators in Mende were few, and, as I have already intimated, had carried on their practices too long not to fear detection for themselves, and not to wish to force the inclination of the multitude. This news made the Athenians more furious than ever, and they at once prepared against both towns. Brasidas, expecting their arrival, conveyed away to Olynthus in Chalcidice the women and children of the Scionaeans and Mendaeans, and sent over to them five hundred Peloponnesian heavy infantry and three hundred Chalcidian targeteers, all under the command of Polydamidas.

在此期间，帕莱内的门德城（埃雷特里亚人的一个殖民地）同样叛离了雅典。尽管它明显是在休战期间投奔过来的，布拉西达斯仍毫无顾忌地接受了它，理由是他认为雅典人也有违背休战协定之处。门德人之所以有此大胆之举，一则是因为看到布拉西达斯对此事很支持，二则是看到他不肯背弃西奥内这一点。此外，门德城内支持布拉西达斯的人数量甚少，同时如前文所及，密谋时间也足够久，因此不担心自己的阴谋被暴露，想迫使民众依从他们的意愿。这一消息使得雅典人更加恼火。他们立即准备进攻这两座城。布拉西达斯预料到雅典人会来进攻，他先把西奥内人和门德人中的妇女和儿童转移到哈尔基季基的奥林索斯，然后给他们派去了500名伯罗奔尼撒重步兵和300名哈尔基斯轻盾兵，这些部队全部由波利扎米扎斯指挥。

Leaving these two towns to prepare together against the speedy arrival of the Athenians, Brasidas and Perdiccas started on a second joint expedition into Lyncus against Arrhabaeus; the latter with the forces of his Macedonian subjects, and a corps of heavy infantry composed of Hellenes domiciled in the country; the former with the Peloponnesians whom he still had with him and the Chalcidians, Acanthians, and the rest in such force as they were able. In all there were about three thousand Hellenic heavy infantry, accompanied by all the Macedonian cavalry with the Chalcidians, near one thousand strong, besides an immense crowd of barbarians. On entering the country of Arrhabaeus, they found the Lyncestians encamped awaiting them, and themselves took up a position opposite. The infantry on either side were upon a hill, with a plain between them, into which the horse of both armies first galloped down and engaged a cavalry action. After this, the Lyncestian heavy infantry advanced from their hill to join their cavalry and offered battle; upon which Brasidas and Perdiccas also came down to meet them, and engaged and routed them with heavy loss; the survivors taking refuge upon the heights and there remaining inactive. The

victors now set up a trophy and waited two or three days for the Illyrian mercenaries who were to join Perdiccas. Perdiccas then wished to go on and attack the villages of Arrhabaeus, and to sit still no longer; but Brasidas, afraid that the Athenians might sail up during his absence, and of something happening to Mende, and seeing besides that the Illyrians did not appear, far from seconding this wish was anxious to return.

在这两座城一起准备迎战很快就要到来的雅典人时，布拉西达斯和佩尔狄卡斯二次联合踏上征程，同赴利恩库斯进攻阿拉韦夫斯。佩尔狄卡斯所率领的是他的马其顿臣民，另外还有一支由定居在马其顿的希腊人组成的重步兵部队；布拉西达斯率领的是仍旧跟随他的伯罗奔尼撒人和哈尔基斯人、阿坎苏斯人以及其他可供使用的力量。两支军队总共约有3,000名希腊重步兵，另有马其顿人和哈尔基斯人的全部骑兵近1,000人，此外还有一大群蛮族人。进入阿拉韦夫斯的领土之后，他们随即发现，利恩库斯人早已安营扎寨，严阵以待。于是，他们连忙占据了对面的阵地。双方的步兵都在小山上，中间是一片平原。两军的骑兵首先疾驰而下，在平原内展开了一场骑兵战。接着，利恩库斯的重步兵从山上冲下来，加入骑兵一起激战。一见此状，布拉西达斯和佩尔狄卡斯也下来迎战。交战之后，利恩库斯人大败，损失惨重，幸存者逃至高处，待在那里未再出战。胜利者立刻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在那里又逗留了两、三天，等待伊利里亚的雇佣兵前来加入佩尔狄卡斯的队伍。当时，佩尔狄卡斯很想继续攻打阿拉韦夫斯的村庄，不想再空等下去；布拉西达斯却急于撤兵，他怕雅典人趁他不在之际驶来，担心门德那里会出事，加之又看到伊利里亚人迟迟不出现，所以很不赞成佩尔狄卡斯这一想法。

While they were thus disputing, the news arrived that the Illyrians had actually betrayed Perdiccas and had joined Arrhabaeus; and the fear inspired by their warlike character made

both parties now think it best to retreat. However, owing to the dispute, nothing had been settled as to when they should start; and night coming on, the Macedonians and the barbarian crowd took fright in a moment in one of those mysterious panics to which great armies are liable; and persuaded that an army many times more numerous than that which had really arrived was advancing and all but upon them, suddenly broke and fled in the direction of home, and thus compelled Perdiccas, who at first did not perceive what had occurred, to depart without seeing Brasidas, the two armies being encamped at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from each other. At daybreak Brasidas, perceiving that the Macedonians had gone on, and that the Illyrians and Arrhabaeus were on the point of attacking him, formed his heavy infantry into a square, with the light troops in the centre, and himself also prepared to retreat. Posting his youngest soldiers to dash out wherever the enemy should attack them, he himself with three hundred picked men in the rear intended to face about during the retreat and beat off the most forward of their assailants, Meanwhile, before the enemy approached, he sought to sustain the courage of his soldiers with the following hasty exhortation:

正当他们这样争执不下时，有消息传来说，伊利里亚人其实已经背叛佩尔狄卡斯，加入了阿拉韦夫斯的队伍。伊利里亚人生性好战，这一点使他们都心生畏惧，双方这时都认为最好是赶快撤兵。然而，由于这场争执所致，他们没有具体安排何时开始撤退。临近天黑时，马其顿人和那群蛮族人立时陷入了大部队很容易出现的那种莫名的恐慌，顿时惊慌失措起来。他们相信，一支大军正在逼近，人数远比实际到来者多出很多倍，而且完全是冲着他们来的。突然之间，他们一哄而散，逃之夭夭，朝着家乡的方向奔去。佩尔狄卡斯起初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如此一来，他也只好顾不上见布拉西达斯一面就撤离了，因为两军的营地隔有一段距离。黎明时，布拉西达斯发觉马其顿

人已经先行逃跑，伊利里亚人和阿拉韦夫斯又即将向他们发起进攻，他让重步兵列成方阵，将轻步兵围在中央，自己也准备撤退。他布置手下最年轻的士兵，敌军从何处攻来就冲向何处。他本人则率300名精兵殿后，准备在撤退时转身击退冲在最前面的追击之敌。同时，趁敌人尚未迫近，为了维持部队的士气，他抓紧时间作了如下动员：

“Peloponnesians, if I did not suspect you of being dismayed at being left alone to sustain the attack of a numerous and barbarian enemy, I should just have said a few words to you as usual without further explanation. As it is, in the face of the desertion of our friends and the numbers of the enemy, I have some advice and information to offer, which, brief as they must be, will, I hope, suffice for the more important points. The bravery that you habitually display in war does not depend on your having allies at your side in this or that encounter, but on your native courage; nor have numbers any terrors for citizens of states like yours, in which the many do not rule the few, but rather the few the many, owing their position to nothing else than to superiority in the field. Inexperience now makes you afraid of barbarians; and yet the trial of strength which you had with the Macedonians among them, and my own judgment, confirmed by what I hear from others, should be enough to satisfy you that they will not prove formidable. Where an enemy seems strong but is really weak, a true knowledge of the facts makes his adversary the bolder, just as a serious antagonist is encountered most confidently by those who do not know him. Thus the present enemy might terrify an inexperienced imagination; they are formidable in outward bulk, their loud yelling is unbearable, and the brandishing of their weapons in the air has a threatening appearance. But when it comes to real fighting with an opponent who stands his ground, they are not what they seemed; they have no regular order that they should be ashamed of deserting their

positions when hard pressed; flight and attack are with them equally honourable, and afford no test of courage; their independent mode of fighting never leaving any one who wants to run away without a fair excuse for so doing. In short, they think frightening you at a secure distance a surer game than meeting you hand to hand; otherwise they would have done the one and not the other. You can thus plainly see that the terrors with which they were at first invested are in fact trifling enough, though to the eye and ear very prominent. Stand your ground therefore when they advance, and again wait your opportunity to retire in good order, and you will reach a place of safety all the sooner, and will know for ever afterwards that rabble such as these, to those who sustain their first attack, do but show off their courage by threats of the terrible thing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do, at a distance, but with those who give way to them are quick enough to display their heroism in pursuit when they can do so without danger."

"伯罗奔尼撒人，如果不是考虑到你们会因为被抛在这里单独对付众多蛮敌而感到害怕，我就会像往常那样只说几句，不作更多的解释。可是，面对友军的抛弃和敌军在数量上的优势，我要给大家几句忠告，并且说明一些情况。话虽不能长，但我希望，足以讲明白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你们在战争中素常表现出来的勇敢，不是靠你们在这次或那次交战中有盟军在身旁，而是靠你们天生的勇气。对于你们这种城邦的公民来说，数量上的优势也不是害怕的理由，因为在你们的城邦不是多数统治少数，而是少数统治多数，这些少数人的统治地位，不是源于其他，正是源于战场上的优势。由于缺乏经验，你们现在怕蛮族人。但是，你们与他们之中的马其顿人已有的较量，加之我本人的判断（这种判断也从他人口中得到过证实），应当足以使你们确信，他们并不可怕。碰上外强中干的敌人，搞清他的真实情况，可以使对手增强信心；同理，碰上真正强大的敌人，对他一无所知，反而会使进攻者充满信心。因此，我们目前面对的敌人，在没有经验的

人看来，可能会十分恐怖：他们身躯庞大，高声叫喊令人难忍，在空中挥舞武器的样子也很吓人。但是，真正跟绝不退让的对手打起来，他们的表现与外表看上去并不相同：他们不讲正规秩序，陷入困境时放弃阵地也不觉得可耻。对于他们来说，逃跑与进攻同样光荣。他们的勇敢经不起任何考验。他们那种各自为战的作战方式，使得任何一个想逃跑的人都找得到合适的借口。总之，他们认为，在安全距离之外吓唬你们，比跟你们在近距离对抗更有胜算。否则，他们肯定会采取后一种而不是前一种作战方式。你们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起初那种令人恐怖的架势，尽管令人耳晕目眩，实际上却不足挂齿。因此，他们向前推进时，你们要坚守阵地，待到时机来临，再有条不紊地撤退。这样，你们就会更快地到达安全地带。以后你们会知道，这种乌合之众，对于能顶住他们首次进攻的人来说，不过是在炫耀自己的勇气，从一定距离之外摆出要做什么可怕之事的架势。不过，如果在他们面前退却，他们也会很快追上来，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表现一下他们的英雄气概。”

With this brief address, Brasidas began to lead off his army. Seeing this, the barbarians came on with much shouting and hubbub, thinking that he was flying and that they would overtake him and cut him off. But wherever they charged they found the young men ready to dash out against them, while Brasidas with his picked company sustained their onset. Thus the Peloponnesians withstood the first attack, to the surprise of the enemy, and afterwards received and repulsed them as fast as they came on, retiring as soon as their opponents became quiet. The main body of the barbarians ceased therefore to molest the Hellenes with Brasidas in the open country, and leaving behind a certain number to harass their march, the rest went on after the flying Macedonians, slaying those with whom they came up, and so arrived in time to occupy the narrow pass between two hills that leads into the country of Arrhabaeus. They knew that this was the only way by which

Brasidas could retreat, and now proceeded to surround him just as he entered the most impracticable part of the road, in order to cut him off.

作完这一简短动员，布拉西达斯开始率军出发。蛮族人一见这种情况，马上大喊大叫着跟上来。他们以为他是在逃跑，所以要追上他，把他杀掉。但是，他们发现，无论他们攻向何处，总有年轻的士兵冲出来迎击，布拉西达斯则率领他那队精兵阻挡着他们的进攻。伯罗奔尼撒人就这样顶住了他们的首次进攻，这使敌军大为诧异。后来，敌军一攻上来，马上就有人出来接战，将他们打回去；敌军一停止进攻，他们就继续后退。于是，蛮族人的主力不再在开阔地带向布拉西达斯率领的希腊人发起进攻。他们留下一部分人继续阻扰他们行进，其余的则去追击正在奔逃的马其顿人，将被追上的人全部杀掉，所以他们及时赶到并占领了两山之间那个狭窄的隘口，从这里可以进入阿拉韦夫斯统治下的领土。他们知道，这是布拉西达斯唯一的退路。正当他进入最难行的一段路程时，他们迅即上前包围，意欲阻断他的去路。

Brasidas, perceiving their intention, told his three hundred to run on without order, each as quickly as he could, to the hill which seemed easiest to take, and to try to dislodge the barbarians already there, before they should be joined by the main body closing round him. These attacked and overpowered the party upon the hill, and the main army of the Hellenes now advanced with less difficulty towards it—the barbarians being terrified at seeing their men on that side driven from the height and no longer following the main body, who, they considered, had gained the frontier and made good their escape. The heights once gained, Brasidas now proceeded more securely, and the same day arrived at Arnisa, the first town in the dominions of Perdiccas. The soldiers, enraged at the desertion

of the Macedonians, vented their rage on all their yokes of oxen which they found on the road, and on any baggage which had tumbled off (as might easily happen in the panic of a night retreat), by unyoking and cutting down the cattle and taking the baggage for themselves. From this moment Perdiccas began to regard Brasidas as an enemy and to feel against the Peloponnesians a hatred which could not be congenial to the adversary of the Athenians. However, he departed from his natural interests and made it his endeavour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latter and to get rid of the former.

布拉西达斯察觉出了他们的意图，遂令手下的300名精兵冲向前去，不必保持队形，各自尽快冲上看起来比较容易攻取的那座山即可，趁着向他们围拢过来的敌军主力尚未与山上的敌军会合，尽量将已在那里的蛮族人赶跑。这300人发起进攻，打败了山上那队人，这时，希腊人的主力部队向小山推进起来便没那么困难了。看到那边的人已被赶下高地，蛮族人顿时惊慌起来，他们以为希腊人的主力已越过边境成功脱逃，便不再继续追击。高地一得手，布拉西达斯再向前行进，立刻就比较安全了。他当天就抵达了阿尔尼萨，即佩尔狄卡斯所攻取的第一个城镇。他手下的士兵对马其顿人弃他们而去的行为极为愤慨，把怒气都发泄到了在路上看到的一对同轭公牛和滚落在地的行李（夜间仓皇撤退时常有之事）上。他们卸下牛轭，把牛砍倒，将行李全部据为己有。从这时起，佩尔狄卡斯便将布拉西达斯视为敌人，开始对伯罗奔尼撒人怀恨在心。这种仇恨与他雅典人对手的身份很不相符。然而，他开始背离利益相关的天然盟友，试图与雅典人达成和解，力图与伯罗奔尼撒人脱离关系。

On his return from Macedonia to Torone, Brasidas found the Athenians already masters of Mende, and remained quiet where he was, thinking it now out of his power to cross over into Pallene and assist the Mendaeans, but he kept good watch over Torone. For

about the same time, as the campaign in Lyncus, the Athenians sailed upon the expedition which we left them preparing against Mende and Scione, with fifty ships, ten of which were Chians, one thousand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and six hundred archers, one hundred Thracian mercenaries and some targeteers drawn from their allies in the neighbourhood, under the command of Nicias, son of Niceratus, and Nicostratus, son of Diitrephes. Weighing from Potidaea, the fleet came to land opposite the temple of Poseidon, and proceeded against Mende; the men of which town, reinforced by three hundred Scionaeans, with their Peloponnesian auxiliaries, seven hundred heavy infantry in all, under Polydamidas, they found encamped upon a strong hill outside the city. These Nicias, with one hundred and twenty light-armed Methonaeans, sixty picked men from the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and all the archers, tried to reach by a path running up the hill, but received a wound and found himself unable to force the position; while Nicostratus, with all the rest of the army, advancing upon the hill, which was naturally difficult, by a different approach further off, was thrown into utter disorder; and the whole Athenian army narrowly escaped being defeated. For that day, as the Mendaeans and their allies showed no signs of yielding, the Athenians retreated and encamped, and the Mendaeans at nightfall returned into the town.

从马其顿一回到托罗内，布拉西达斯就发现雅典人已控制了门德。他认为自己当时无力渡海去帕莱内援助门德人，所以便留在原地未动，而是严密监视着托罗内的动静。大约在利恩库斯战役发生的同时，雅典人完成了前文提及的准备工作，启航去攻打门德和西奥内。所带的舰只和人员包括：战舰50艘（其中10艘是希俄斯人的），雅典重步兵1,000名，弓箭手600名，色雷斯雇佣军和从附近盟邦召来的一些轻盾兵100名。指挥这支军队的是尼塞拉图斯之子尼西亚斯和迪伊特雷费斯之子尼科斯特拉图斯。这支舰队从波提狄亚起锚，在波塞冬

神庙对面抵岸，进而向门德进军。门德城里的人和300名前来增援的西奥内人以及伯罗奔尼撒援军，总共700名重步兵，在波利扎米扎斯的指挥下，已经在城外一座坚固的小山上扎下营盘。尼西亚斯率领120名轻武装的迈索内人、60名精选出来的雅典重步兵和全部弓箭手，试图从一条小路跑上山去与这些人交战，但自己却受了伤，无法再对这个阵地发动强攻。尼科斯特拉图斯则带着其余所有部队，从另外一条比较远的路向山上推进，这自然很困难，他的部队秩序大乱。因此，这支雅典军队险些全军覆没。那天，由于门德人及其盟军丝毫没有屈服的迹象，雅典人就撤回去安营了。夜幕降临时，门德人也退进了城里。

The next day, the Athenians sailed round to the Scione side, and took the suburb, and all day plundered the country, without any one coming out against them, partly because of intestine disturbances in the town; and the following night the three hundred Scionaeans returned home. On the morrow Nicias advanced with half the army to the frontier of Scione and laid waste the country; while Nicostratus with the remainder sat down before the town near the upper gate on the road to Potidaea. The arms of the Mendaeans and of their Peloponnesian auxiliaries within the wall happened to be piled in that quarter, where Polydamidas accordingly began to draw them up for battle, encouraging the Mendaeans to make a sortie. At this moment, one of the popular party answered him factiously that they would not go out and did not want a war, and for thus answering was dragged by the arm and knocked about by Polydamidas. Hereupon the infuriated commons at once seized their arms and rushed at the Peloponnesians and at their allies of the opposite faction. The troops thus assaulted were at once routed, partly from the suddenness of the conflict and partly through fear of the gates being opened to the Athenians, with whom they imagined that the attack

had been concerted. As many as were not killed on the spot took refuge in the citadel, which they had held from the first; and the wholeAthenian army, Nicias having by this time returned and being close to the city, now burst into Mende, which had opened its gates without any convention, and sacked it just as if they had taken it by storm, the generals even finding some difficulty in restraining them from also massacring the inhabitants. After this, the Athenians told the Mendaeans that they might retain their civil rights, and themselves judge the supposed authors of the revolt; and cut off the party in the citadel by a wall built down to the sea on either side, appointing troops to maintain the blockade. Having thus secured Mende, they proceeded against Scione.

次日，雅典人乘舰绕到西奥内那边，占领了城郊地区，全天对乡村进行大肆劫掠。但是，没有一个人出城抗击他们，有一部分原因是城中闹内乱。当天夜里，300名西奥内人返回了本邦。第二天，尼西亚斯率领半数军队推进到西奥内的边境地带，践踏了那里的乡村；尼科斯特拉图斯则率余部在城前北门附近扎下营盘，地点位于通向波提狄亚的路上。门德人和伯罗奔尼撒援军的兵器恰巧堆放在墙内那个地方。于是，波利扎米扎斯开始集合部队，准备战斗，并鼓励门德人出击。这时候，民主党中有人出于派别之见回答他，他们既不愿出城，也不想打仗。听到这种回答，波利扎米扎斯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将他拖出去一顿暴打。民主党人被此激怒了。他们立即拿起武器，冲向伯罗奔尼撒人以及反对党中伯罗奔尼撒人的支持者。遭此袭击的部队顿时被击垮，一方面是因为冲突发生得太突然，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为这次袭击是对方与雅典人合谋而为，担心城门已经向雅典人敞开。当场未被杀死者都逃进了卫城，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占据了那里。尼西亚斯这时已经回到城的附近，于是，雅典全军冲进了门德，而城门的打开并未事先议定。他们将城洗劫一空，好像这座城是经过猛攻才夺得似的，将军们甚至连禁止部队屠杀居民都有一定难度。后来，雅典人对门德人说，他们可以保留公民权，但这次反叛的发起人则要由

他们审判。他们还在卫城的两侧各筑了一道墙，直达海边，以切断卫城内那个党派与外界的联系。为了维持封锁，他们还指派了部队把守。如此获取门德之后，他们转而去攻打西奥内。

The Scionaeans and Peloponnesians marched out against them, occupying a strong hill in front of the town, which had to be captured by the enemy before they could invest the place. The Athenians stormed the hill, defeated and dislodged its occupants, and, having encamped and set up a trophy, prepared for the work of circumvallation. Not long after they had begun their operations, the auxiliaries besieged in the citadel of Mende forced the guard by the sea-side and arrived by night at Scione, into which most of them succeeded in entering, passing through the besieging army.

西奥内人与伯罗奔尼撒人列阵出城迎战，占领了城前一座难以攻取的小山。敌人只有先拿下这座小山，才能对这个地方形成包围之势。雅典人向这座小山发起猛攻，击退了山上的敌军。他们扎下营盘，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然后开始为修筑环城封锁墙做准备。他们开始城墙修筑后不久，被困在门德卫城内的援军突破大海那侧守军的防线，在夜幕的掩护下抵达西奥内，其中大部分人都躲过围城军队的视线，顺利地进了城。

While the investment of Scione was in progress, Perdiccas sent a herald to the Athenian generals and made peace with the Athenians, through spite against Brasidas for the retreat from Lyncus, from which moment indeed he had begun to negotiate. The Lacedaemonian Ischagoras was just then upon the point of starting with an army overland to join Brasidas; and Perdiccas, being now required by Nicias to give some proof of the sincerity of his

reconciliation to the Athenians, and being himself no longer disposed to let the Peloponnesians into his country, put in motion his friends in Thessaly, with whose chief men he always took care to have relations, and so effectually stopped the army and its preparation that they did not even try the Thessalians. Ischagoras himself, however, with Ameinias and Aristeus, succeeded in reaching Brasidas; they had been commissioned by the Lacedaemonians to inspect the state of affairs, and brought out from Sparta (in violation of all precedent) some of their young men to put in command of the towns, to guard against their being entrusted to the persons upon the spot. Brasidas accordingly placed Clearidas, son of Cleonymus, in Amphipolis, and Pasitelidas, son of Hegesander, in Torone.

西奥内被封锁期间，佩尔狄卡斯派遣一名传令官去见雅典军队的将军，与雅典人达成了和解。他对布拉西达斯从利恩库斯先行撤退之事一直耿耿于怀，实际上，从那一刻起，他就开始寻求与雅典人谈判了。斯巴达人伊斯哈戈拉斯当时正要率军出发，经陆路去与布拉西达斯会合。一则因为尼西亚斯此时要求佩尔狄卡斯拿出点证明来表示他真心与雅典人和解，二则因为他本人也不愿意再让伯罗奔尼撒人进入他的境内，佩尔狄卡斯便给他在色萨利的朋友们做工作。由于他一直比较注意与那里的领导人物搞好关系，因而有效地阻止了斯巴达军队及其作战准备，以致他们甚至都未及色萨利人的领土。不过，伊斯哈戈拉斯却与阿米尼亚斯和阿里斯泰夫斯设法赶到了布拉西达斯那里。他们是受斯巴达人委派前去视察当地情况的。但是，他们一反以往惯例，从斯巴达带了一些年轻人来管辖这些城镇，以防它们落到当地人手里。于是，布拉西达斯将克莱奥尼穆斯的儿子克莱阿里扎斯安排在安菲波利斯，将赫耶桑泽尔的儿子帕西泰利扎斯安排在托罗内。

The same summer, the Thebans dismantled the wall of the

Thespians on the charge of Atticism, having always wished to do so, and now finding it an easy matter, as the flower of the Thespian youth had perished in the battle with the Athenians. The same summer, also the temple of Hera at Argos was burnt down, through Chrysis, the priestess, placing a lighted torch near the garlands and then falling asleep, so that they all caught fire and were in a blaze before she observed it. Chrysis that very night fled to Phlius for fear of the Argives, who, agreeably to the law in such a case, appointed another priestess named Phaeinis. Chrysis at the time of her flight had been priestess for eight years of the present war and half the ninth. At the close of the summer, the investment of Scione was completed, and the Athenians, leaving a detachment to maintain the blockade, returned with the rest of their army.

同年夏季，底比斯人以其亲雅典为由拆除了塞斯比阿人的城墙。实际上，他们一直想这样做。由于底比斯最优秀的青年都已在与雅典人作战中阵亡，他们发觉现在做起这件事来毫不费力。同样是在这个夏季，女祭司赫里西斯不慎将阿尔戈斯的赫拉神庙烧毁。她把一个点燃的火把放在花环近旁，然后就睡着了，结果引燃了花环。待她发觉时，大火已经在熊熊燃烧。赫里西斯生怕阿尔戈斯人怪罪她，连夜逃往弗利奥斯去了。阿尔戈斯人依照这种情况下的惯例，另外指定了一名女祭司，名叫费伊尼斯。赫里西斯出逃时，已经在目前这场战争中担任了八年半女祭司。夏季结束时，雅典人完成了对西奥内的封锁。他们留下一个分遣队维持封锁，带着余部撤回雅典去了。

During the winter following, the Athenians and Lacedaemonians were kept quiet by the armistice; but the Mantineans and Tegeans, and their respective allies, fought a battle at Laodicium, in the Oresthid. The victory remained doubtful, as each side routed one of the wings opposed to them, and both set up

trophies and sent spoils to Delphi. After heavy loss on both sides the battle was undecided, and night interrupted the action; yet the Tegeans passed the night on the field and set up a trophy at once, while the Mantineans withdrew to Bucolion and set up theirs afterwards.

在随后而至的冬季里，因为休战协定的关系，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之间未起战事。但是，曼提尼亚人与泰耶阿人却各率盟邦在奥雷斯西兹境内的拉奥季西乌姆交战。这场仗的胜负尚无定论，因为双方各打败了对方的一翼，竖立起胜利纪念柱，并且都向德尔斐送了战利品。双方均遭受惨重损失后，胜负依然未决，且随着夜幕降临只好罢战。不过，泰耶阿人是在战场上过的夜，所以当下立即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曼提尼亚人则是撤到布科利翁后才竖立起他们的胜利纪念柱。

At the close of the same winter, in fact almost in spring, Brasidas made an attempt upon Potidaea. He arrived by night, and succeeded in planting a ladder against the wall without being discovered, the ladder being planted just in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passing round of the bell and the return of the man who brought it back. Upon the garrison, however, taking the alarm immediately afterwards, before his men came up, he quickly led off his troops, without waiting until it was day. So ended the winter and the ninth year of this war of which Thucydides is the historian.

这年冬季结束时，实际上几乎已是春天，布拉西达斯试图对波提狄亚发动进攻。他于夜间抵达波提狄亚，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架梯子靠在城墙上。安放梯子时，恰好是卫兵去取传来的警钟但尚未回到岗位上的间隙。然而，他手下的士兵刚接近要塞，还没有爬上梯子，警报声就立刻响了起来，因此不等天亮他就带着部队迅速撤离了。这个

冬季就这样结束了，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九年亦随之结束。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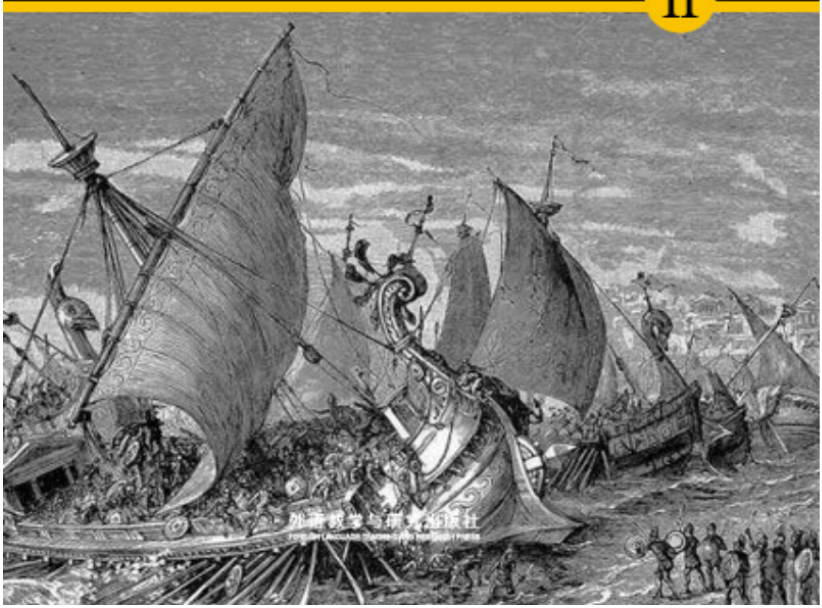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I

修昔底德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BOOK V 第五卷
- BOOK VI 第六卷
- BOOK VII 第七卷
- BOOK VIII 第八卷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BOOK V

第五卷

CHAPTER XV Tenth Year of the War—Death of Cleon and Brasidas—Peace of Nicias

第十五章　战争第十年——克莱翁和布拉西达斯之死——尼西亚斯和约

The next summer, the truce for a year ended, after lasting until the Pythian games. During the armistice the Athenians expelled the Delians from Delos, concluding that they must have been polluted by some old offence at the time of their consecration, and that this had been the omission in the previous purification of the island, which, as I have related, had been thought to have been duly accomplished by the removal of the graves of the dead. The Delians had Atramyttium in Asia given them by Pharnaces, and settled there as they removed from Delos.

翌年夏季，一年的休战协定持续到皮提亚竞赛会时才告终止。休战期间，雅典人将提洛人从提洛岛赶了出去。他们说，提洛人在过去祭祀时犯有过错，因而是污秽的，但在该岛上次举行的净秽活动中被遗漏了。那次净秽，如我先前所述，让人觉得只是将死者的坟墓正式移除了而已。法尔纳塞斯将位于亚细亚的阿特拉米蒂乌姆赠予提洛人，他们从岛上被赶出后就定居在了此地。

Meanwhile, Cleon prevailed on the Athenians to let him set sail at the expiration of the armistice for the towns in the direction of

Thrace with twelve hundred heavy infantry and three hundred horse from Athens, a large force of the allies, and thirty ships. First, touching at the still besieged Scione, and taking some heavy infantry from the army there, he next sailed into Cophos, a harbour in the territory of Torone, which is not far from the town. From thence, having learnt from deserters that Brasidas was not in Torone, and that its garrison was not strong enough to give him battle, he advanced with his army against the town, sending ten ships to sail round into the harbour. He first came to the fortification lately thrown up in front of the town by Brasidas in order to take in the suburb, to do which he had pulled down part of the original wall and made it all one city. To this point Pasitelidas, the Lacedaemonian commander, with such garrison as there was in the place, hurried to repel the Athenian assault; but finding himself hard pressed, and seeing the ships that had been sent round sailing into the harbour, Pasitelidas began to be afraid that they might get up to the city before its defenders were there and, the fortification being also carried, he might be taken prisoner, and so abandoned the outwork and ran into the town. But the Athenians from the ships had already taken Torone, and their land forces following at his heels burst in with him with a rush over the part of the old wall that had been pulled down, killing some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oronaeans in the melee, and making prisoners of the rest, and Pasitelidas their commander amongst them. Brasidas, meanwhile, had advanced to relieve Torone, and had only about four miles more to go when he heard of its fall on the road, and turned back again. Cleon and the Athenians set up two trophies, one by the harbour, the other by the fortification and, making slaves of the wives and children of the Toronaeans, sent the men with the Peloponnesians and any Chalcidians that were there, to the number of seven hundred, to Athens; whence, however, they all came home afterwards, the Peloponnesians on the conclusion of peace, and the

rest by being exchanged against other prisoners with the Olynthians. About the same time, Panactum, a fortress on the Athenian border, was taken by treachery by the Boeotians. Meanwhile, Cleon, after placing a garrison in Torone, weighed anchor and sailed around Athos on his way to Amphipolis.

与此同时，克莱翁成功地说服了雅典人，他们同意他在休战期满后进攻色雷斯地区诸城镇。他所率领的军队除了雅典的1,200名重步兵和300名骑兵之外，还有一支庞大的盟军和30艘战舰。他首先停靠在仍处于围困中的西奥内，从那里的军队抽调了一些重步兵，尔后驶进了位于托罗内境内的港口科福斯，那里离托罗内城不远。克莱翁从逃亡者口中获悉，布拉西达斯不在托罗内，当地的驻军也不足以与他对抗，于是就让10艘舰驶入港口，他自己则率军从那里向城区进发。他首先来到布拉西达斯不久前刚在城前匆匆筑起的要塞。布拉西达斯修筑此要塞的目的是想将郊区纳入市区的范围，为此他拆除了部分旧城墙，使郊区和市区连成一片。斯巴达司令官帕西泰利扎斯急忙率领当地仅有的守军开往那里，以击退雅典军队的进攻。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处境艰难，又见敌人派过去的战舰正在驶入港内，他开始害怕起来，担心雅典人会先于守军抵达托罗内；要塞若再失守，他自己即有可能沦为战俘，于是便放弃外围工事，率军跑进了城里。但是，舰上的雅典人已经攻下托罗内，他们的陆军又紧随而至，从被推倒的旧城墙那里冲了进来。在这场混战中，雅典军队杀死了一些伯罗奔尼撒人和托罗内人。其余的人，连同他们的司令官帕西泰利扎斯在内，全都被俘。其间，布拉西达斯曾前来援救托罗内，但行至距离托罗内大约还有4英里时，听说托罗内已经失陷，又折了回去。克莱翁和雅典人竖立了两个胜利纪念柱，一个在港口附近，另一个在要塞附近。托罗内人的妻子和孩子都沦为了奴隶，男子以及留在那里的伯罗奔尼撒人和哈尔基斯人都被送往雅典，人数共计700名。不过，他们后来都返回了家园。伯罗奔尼撒人是在缔结和约时回去的，其他人是在与奥林索斯人交换俘虏时回去的。大约在这个时候，维奥蒂亚人在内奸的配合下，占领了位于雅典边界上的帕纳克图姆要塞。与此同时，克莱翁

安排了一支守军驻守托罗内之后起了锚，绕道阿索斯驶往安菲波利斯。

About the same time, Phaeax, son of Erasistratus, set sail with two colleagues as ambassador from Athens to Italy and Sicily. The Leontines, upon the departure of the Athenians from Sicily after the pacification, had placed a number of new citizens upon the roll, and the commons had a design for redividing the land; but the upper classes, aware of their intention, called in the Syracusans and expelled the commons. These last were scattered in various directions; but the upper classes came to an agreement with the Syracusans, abandoned and laid waste their city, and went and lived at Syracuse, where they were made citizens. Afterwards some of them were dissatisfied, and leaving Syracuse occupied Phocaeae, a quarter of the town of Leontini, and Bricinniae, a strong place in the Leontine country, and being there joined by most of the exiled commons carried on war from the fortifications. The Athenians hearing this, sent Phaeax to see if they could not by some means so convince their allies there and the rest of the Sicilians of the ambitious designs of Syracuse as to induce them to form a general coalition against her, and thus save the commons of Leontini. Arrived in Sicily, Phaeax succeeded at Camarina and Agrigentum, but meeting with a repulse at Gela did not go on to the rest, as he saw that he should not succeed with them, but returned through the country of the Sicels to Catana, and after visiting Bricinniae as he passed, and encouraging its inhabitants, sailed back to Athens.

大约在同一时间，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儿子费阿刻斯作为使节，偕同两个同僚从雅典乘船前往意大利和西西里。议和之后，雅典人刚从西西里撤退，莱昂蒂尼人就接纳了一批新公民，于是，民主党人打

算重新分配土地。上层阶级知道他们的意图后，请来叙拉古人，将这些民主党人驱逐了。这些人最终被分散到了各地，上层阶级却和叙拉古人达成协议，他们撂荒自己的城市，弃之而迁往叙拉古居住，成为了那里的公民。后来，他们中间有些人感到不满，便离开叙拉古，占领了莱昂蒂尼城的福西亚区和城郊的布里辛尼埃要塞。大多数被驱逐的民主党人都奔向那里与他们会合，以此为据点展开了战斗。雅典人闻听此事之后，随即派费阿刻斯前往，看看是否能通过某种方式说服那里的盟友和其他西西里人，使他们相信叙拉古野心勃勃的扩张计划，目的是劝他们形成一个统一的反叙拉古同盟，以解救莱昂蒂尼的民主党人。费阿刻斯到达西西里之后，在卡马里纳和阿格里延图姆获得了成功，但在杰拉却受了阻。考虑到在其余地方也不易成功，他就没再继续前行，而是穿过西库尔人的地区返回了卡塔纳。途径布里辛尼埃时，他对那里的居民进行了一番鼓励，然后驶回雅典去了。

During his voyage along the coast to and from Sicily, he treated with some cities in Italy on the subject of friendship with Athens, and also fell in with some Locrian settlers exiled from Messina, who had been sent thither when the Locrians were called in by one of the factions that divided Messina after the pacification of Sicily, and Messina came for a time into the hands of the Locrians. These being met by Phaeax on their return home received no injury at his hands, as the Locrians had agreed with him for a treaty with Athens. They were the only people of the allies who, when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Sicilians took place, had not made peace with her; nor indeed would they have done so now, if they had not been pressed by a war with the Hipponians and Medmaeans who lived on their border, and were colonists of theirs. Phaeax, meanwhile, proceeded on his voyage, and at length arrived at Athens.

在沿着海岸往返西西里期间，费阿刻斯和意大利一些城邦就与雅典建立友好关系一事进行磋商，他还遇见了一些从墨西拿被放逐出来后居住在洛克里斯的，这些人是在西西里平定后被送往那里的。当时墨西拿正闹分裂，其中一个党派召集起洛克里斯人到墨西拿，墨西拿因此曾一度被洛克里斯人所控制。费阿刻斯遇到这些正在返回故乡的人时，没有加以伤害，因为洛克里斯人已经答应他要与雅典缔约。西西里人相互达成和解时，他们是盟友中唯一没与雅典人讲和的人。如果不是受他们与希波尼亚人和迈德马人之间的战事所迫，他们现在也不会与雅典人讲和。希波尼亚人和迈德马人都是他们的移民，居住在边境上。其间，费阿刻斯继续他的航程，最终回到了雅典。

Cleon, whom we left on his voyage from Torone to Amphipolis, made Eion his base, and after an unsuccessful assault upon the Andrian colony of Stagirus, took Galepsus, a colony of Thasos, by storm. He now sent envoys to Perdiccas to command his attendance with an army, as provided by the alliance; and others to Thrace, to Polles, king of the Odomantians, who was to bring as many Thracian mercenaries as possible; and himself remained inactive in Eion, awaiting their arrival. Informed of this, Brasidas on his part took up a position of observation upon Cerdylium, a place situated in the Argilian country on high ground across the river, not far from Amphipolis, and commanding a view on all sides, and thus made it impossible for Cleon's army to move without his seeing it; for he fully expected that Cleon, despising the scanty numbers of his opponent, would march against Amphipolis with the force that he had got with him. At the same time Brasidas made his preparations, calling to his standard fifteen hundred Thracian mercenaries and all the Edonians, horse and targeteers; he also had a thousand Myrcinian and Chalcidian targeteers, besides those in Amphipolis, and a force of heavy infantry numbering altogether about two thousand, and three hundred Hellenic horse. Fifteen hundred of

these he had with him upon Cerdylium; the rest were stationed with Clearidas in Amphipolis.

我们在前文曾提到，克莱翁正从托罗内驶向安菲波利斯。他以伊翁为根据地，进攻安德罗斯的殖民地斯塔伊鲁斯未获成功，尔后通过强攻夺取了萨索斯的殖民地加莱普苏斯。他派使者去见佩尔狄卡斯，要求他依照同盟的规定率军前来；他还派使者到色雷斯去见奥佐曼蒂人的国王波莱斯，请他尽量多带些色雷斯雇佣军来。他自己则在伊翁按兵不动，静候他们的到来。布拉西达斯听说此事后，在凯尔季利乌姆设立了一个观察据点。凯尔季利乌姆位于阿尔伊卢斯境内，在河对面的高地上，距离安菲波利斯不远。从这里可以居高临下，将四周的情况尽收眼底，因此，克莱翁军队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布拉西达斯完全预料得到，克莱翁一定会欺对手兵少，率领自己召集到的军队进攻安菲波利斯。与此同时，布拉西达斯也在做准备，他召集了1,500名标准的色雷斯雇佣兵以及埃佐尼亚的全部骑兵和轻盾兵。除了驻扎在安菲波利斯的兵力以外，他还有1,000名米尔西努斯和哈尔基斯轻盾兵，以及数量共约2,000人的重步兵和300名希腊骑兵。布拉西达斯率领其中1,500人据守凯尔季利乌姆，其余军队在克莱阿里扎斯的指挥下驻扎在安菲波利斯。

After remaining quiet for some time, Cleon was at length obliged to do as Brasidas expected. His soldiers, tired of their inactivity, began also seriously to reflect on the weakness and incompetence of their commander, and the skill and valour that would be opposed to him, and on their own original unwillingness to accompany him. These murmurs coming to the ears of Cleon, he resolved not to disgust the army by keeping it in the same place, and broke up his camp and advanced. The temper of the general was what it had been at Pylos, his success on that occasion having given him confidence in his capacity. He never dreamed of any one

coming out to fight him, but said that he was rather going up to view the place; and if he waited for his reinforcements, it was not in order to make victory secure in case he should be compelled to engage, but to be enabled to surround and storm the city. He accordingly came and posted his army upon a strong hill in front of Amphipolis, and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lake formed by the Strymon, and how the town lay on the side of Thrace. He thought to retire at pleasure without fighting, as there was no one to be seen upon the wall or coming out of the gates, all of which were shut. Indeed, it seemed a mistake not to have brought down engines with him; he could then have taken the town, there being no one to defend it.

克莱翁静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果然不出布拉西达斯所料，终于被迫采取行动了。他的士兵对他按兵不动已然厌烦，进而当真开始怀疑他们这位指挥官懦弱无能，将其与布拉西达斯的机智勇敢作对比，还想起了当初他们就不愿随他出征。这些抱怨传到克莱翁的耳中之后，为了不使士兵们因长期待在同一地点而生厌，他拔营而起，开始向前推进。他此时的心态仍和在皮洛斯时一样，那次的胜利使他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他从未想过有人会出来与他作战，反而说他要前去观察一下这个地方。如果说他在等待援军的到来，那也不是为了在不得不作战时多一些胜算，而是为了能够对安菲波利斯实施包围和强攻。于是他率军前来，先在安菲波利斯前面一座很坚固的小山上扎下营盘，接着仔细观察了因斯特鲁马河而形成的湖区以及该城在靠色雷斯一侧是如何布局的。他认为自己可以随时不战而退，因为城墙上没有发现敌军，也没有军队从城门里出来，各个城门都紧闭着。他没有携带攻城器械似乎倒是一个错误，否则他当时就拿下这座城了，因为里面根本没人防守。

As soon as Brasidas saw the Athenians in motion he descended

himself from Cerdylium and entered Amphipolis. He did not venture to go out in regular order against the Athenians: he mistrusted his strength, and thought it inadequate to the attempt; not in numbers—these were not so unequal—but in quality, the flower of the Athenian army being in the field, with the best of the Lemnians and Imbrians. He therefore prepared to assail them by stratagem. By showing the enemy the number of his troops, and the shifts which he had been put toarm them, he thought that he should have less chance of beating him than by not letting him have a sight of them, and thus learn how good a right he had to despise them. He accordingly picked out a hundred and fifty heavy infantry and, putting the rest under Clearidas, determined to attack suddenly before the Athenians retired; thinking that he should not have again such a chance of catching them alone, if their reinforcements were once allowed to come up; and so calling all his soldiers together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m and explain his intention, spoke as follows:

一见雅典军队开始移动，布拉西达斯立刻从凯尔季利乌姆下到安菲波利斯城。他没有贸然以常规队形出城与雅典人交战，因为他不相信自己有此实力，认为自己的军队不足以冒这个风险，不是在数量上与雅典军队差异悬殊（在这方面倒不相上下），而是在质量上逊色。雅典军队上阵的都是上等的精兵强将，跟他们一道来的利姆诺斯人和伊姆布罗斯人也都是精锐之师。因此，布拉西达斯准备靠计谋攻之。他认为，如果将自己兵员不足和装备简陋的事实暴露在敌人面前，他获胜的机会就会变小，倒不如不让敌人看到，让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藐视对手。因此，他挑选出150名重步兵，将其余的军队交给克莱阿里扎斯指挥，决定在雅典军队尚未撤退时实施突然袭击。他认为，一旦雅典援军开到，他就再也没有这种与雅典人独战的机会了。于是，一方面为了鼓舞军心，一方面为了说明作战意图，他将全体将士召集在一起，发表了如下讲话：

“Peloponnesians, the character of the country from which we have come, one which has always owed its freedom to valour, and the fact that you are Dorians and the enemy you are about to fight Ionians, whom you are accustomed to beat, are things that do not need further comment. But the plan of attack that I propose to pursue, this it is as well to explain, in order that the fact of our adventuring with a part instead of with the whole of our forces may not damp your courage by the apparent disadvantage at which it places you. I imagine it is the poor opinion that he has of us, and the fact that he has no idea of any one coming out to engage him, that has made the enemy march up to the place and carelessly look about him as he is doing, without noticing us. But the most successful soldier will always be the man who most happily detects a blunder like this, and who carefully consulting his own means makes his attack not so much by open and regular approaches, as by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moment; and these stratagems, which do the greatest service to our friends by most completely deceiving our enemies, have the most brilliant name in war. Therefore, while their careless confidence continues, and they are still thinking, as in my judgment they are now doing, more of retreat than of maintaining their position, while their spirit is slack and not high-strung with expectation, I with the men under my command will, if possible, take them by surprise and fall with a run upon their centre; and do you, Clearidas, afterwards, when you see me already upon them, and, as is likely, dealing terror among them, take with you the Amphipolitans, and the rest of the allies, and suddenly open the gates and dash at them, and hasten to engage as quickly as you can. That is our best chance of establishing a panic among them, as a fresh assailant has always more terrors for an enemy than the one he is immediately engaged with. Show yourself a brave man, as a Spartan should; and do you, allies, follow him like men, and remember that zeal, honour, and obedience mark the

good soldier, and that this day will make you either free men and allies of Lacedaemon, or slaves of Athens; even if you escape without personal loss of liberty or life, your bondage will be on harsher terms than before, and you will also hinder the liberation of the rest of the Hellenes. No cowardice then on your part, seeing the greatness of the issues at stake, and I will show that what I preach to others I can practise myself.”

“伯罗奔尼撒人：我们来自这样一个城邦，一个靠着勇敢而获取自由的城邦；你们是多里安人，你们现在要打的敌人是爱奥尼亚人，他们常常被你们打败，这些我就不必多说了。但是，我现在打算实施的作战计划，还是要向大家作个说明，以免我们只投入部分而不是全部兵力冒险一战而令你们明显被置于劣势地位这一事实使你们丧失斗志。我想，正是因为敌人对我们的偏见，因为他们想不到有人会出来接战，所以他们才把队伍开到这地方来了，并且对周围情况毫无戒备。但是，最成功的军事家总是能最有幸地发现这种失误，然后仔细思考自己的战法，不是采用人们熟知的常规方式进攻，而是善于抓住当前的重要时机。这种策略最能蒙蔽敌人，因而对我们的同盟军最有利，也最能在战争中赢得无上荣誉。因此，趁着敌人仍在盲目自信——根据我对他们目前所为的判断，他们此时应该仍在考虑后撤，而不是守住阵地；趁着他们精神涣散和斗志未起，我要带着我指挥的这部分人，如果可能，跑步直插敌军心脏，给敌人来个突然袭击。然后，克莱阿里扎斯，当你看到我已扑向敌军，很可能在敌军中引起了混乱时，你要带上安菲波利斯人和其他盟军，迅速打开城门，冲向他们，尽快投入战斗。这是我们在敌人内部引起恐慌的最好机会，因为新攻上来的军队总是比正与之交战的军队更使敌人恐惧。克莱阿里扎斯，你要表现出斯巴达人应有的勇敢；盟友们，你们要像堂堂男子汉一样奋勇相随。要记住，优秀的军人应该热血满腔，崇尚荣誉，服从命令。还要记住，你们今天要么获得自由，无愧于斯巴达盟友这一称号，要么沦为雅典人的奴隶；即使你们能逃脱，既没有失去自由，也没有丧失生命，你们所受的奴役也将比过去更严酷，而且你们还将阻

碍其他希腊人获得解放。既然大家已经明了事关重大，那就放下胆怯，我本人也会让大家看到，我要求别人做到的，我都会身体力行。”

After this brief speech Brasidas himself prepared for the sally, and placed the rest with Clearidas at the Thracian gates to support him as had been agreed. Meanwhile, he had been seen coming down from Cerdylium and then in the city, which is overlooked from the outside, sacrificing near the temple of Athene; in short, all his movements had been observed, and word was brought to Cleon, who had at the moment gone on to look about him, that the whole of the enemy's force could be seen in the town, and that the feet of horses and men in great numbers were visible under the gates, as if a sally were intended. Upon hearing this he went up to look, and having done so, being unwilling to venture upon the decisive step of a battle before his reinforcements came up, and fancying that he would have time to retire, bid the retreat be sounded and sent orders to the men to effect it by moving on the left wing in the direction of Eion, which was indeed the only way practicable. This however not being quick enough for him, he joined the retreat in person and made the right wing wheel round, thus turning its unarmed side to the enemy. It was then that Brasidas, seeing the Athenian force in motion and his opportunity come, said to the men with him and the rest,“Those fellows will never stand before us, one can see that by the way their spears and heads are going. Troops which do as they do seldom stand a charge. Quick, someone, and open the gates I spoke of, and let us be out and at them with no fears for the result.” Accordingly, issuing out by the palisade gate and by the first in the long wall then existing, he ran at the top of his speed along the straight road, where the trophy now stands as you go by the steepest part of the hill, and fell upon and routed the

centre of the Athenians, panic-stricken by their own disorder and astounded at his audacity. At the same moment Clearidas in execution of his orders issued out from the Thracian gates to support him, and also attacked the enemy.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Athenians, suddenly and unexpectedly attacked on both sides, fell into confusion; and their left towards Eion, which had already got on some distance, at once broke and fled. Just as it was in full retreat and Brasidas was passing on to attack the right, he received a wound; but his fall was not perceived by the Athenians, as he was taken up by those near him and carried off the field. The Athenian right made a better stand, and though Cleon, who from the first had no thought of fighting, at once fled and was overtaken and slain by a Myrcinian targeteer, his infantry forming in close order upon the hill twice or thrice repulsed the attacks of Clearidas, and did not finally give way until they were surrounded and routed by the missiles of the Myrcinian and Chalcidian horse and the targeteers. Thus the Athenian army was all now in flight; and such as escaped being killed in the battle, or by the Chalcidian horse and the targeteers, dispersed among the hills, and with difficulty made their way to Eion. The men who had taken up and rescued Brasidas, brought him into the town with the breath still in him;he lived to hear of the victory of his troops, and not long after expired. The rest of the army returning with Clearidas from the pursuit stripped the dead and set up a trophy.

简短演说之后，布拉西达斯本人即准备率兵出征，并将交由克莱阿里扎斯指挥的其余军队布署在色雷斯城门附近，以便按照商定的方案出城支援他。其间，雅典军队看见他从凯尔季利乌姆下来之后进了城，还看见他在雅典娜女神庙附近举行了献祭仪式，因为从城外就望得见。总之，他的一举一动都没逃过雅典人的视线。当时克莱翁已进一步四下察看过地形，他得到的情报称，城内全部敌军的情况都可看

得见，从城门下露出的马蹄和人脚即可看出敌军兵马众多，看来似乎准备突击。得此情报后，克莱翁随即上前查看，查看完毕后，由于他不愿意在援军到达之前冒险决战，又觉得有时间主动撤退，所以就下令撤退，并传令部队向伊翁方向移动，左翼开路，其实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撤退方案。但他认为这还不够快，于是亲自带领右翼部队转身撤退。这样一来，没有武装那侧就朝向了敌人。就在这时，布拉西达斯看到雅典军队开始移动，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对自己率领的那部分士兵和其余的人说："那些人挡不住我们，从他们持矛的样子和矛头所向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那副模样的部队很少经得住冲锋。快，来人，打开我说的城门，咱们冲出去，无所畏惧地杀向敌人！"于是，他率军从木栅门和当时尚存的那道长墙的第一个门冲出，沿着那条直路（胜利纪念柱现在所在地，也是山上最陡的地方）全速奔跑，直扑雅典军队的中央。雅典军队既为他们的勇猛而失色，又为自己的无序而惊慌，就这样被击溃了。与此同时，克莱阿里扎斯依照布拉西达斯的命令，从色雷斯的城门冲出来增援他，也向敌军发起了进攻。结果，雅典军队突然之间意外遭到两面夹攻，陷入了一片混乱。向伊翁方向退却的左翼已经走了一段距离，这时也立即溃散而逃。正当左翼全线撤退，布拉西达斯正要上前进击右翼之时，他却负了伤，但由于他身边的士兵及时将他抬起来送离了战场，因此雅典人没发觉他倒下去。雅典军队的右翼停下来进行了比较顽强的反击。克莱翁从一开始就没有战斗的决心，战斗一开始立刻就逃了，后被一名米尔西努斯轻盾兵赶上并杀死。尽管如此，他手下的步兵却在山上列成紧密的队形，击退了克莱阿里扎斯的两、三次进攻。直到米尔西努斯和哈尔基斯的骑兵和轻盾兵把他们包围起来，用投掷武器将他们击溃，他们才最后放弃。如此一来，整个雅典军队这时都在溃逃，那些没有战死的或没有被哈尔基斯的骑兵和轻盾兵杀死的都溃散逃到山间，好不容易才逃往伊翁。士兵们把布拉西达斯抬起来救走后，在他气息尚存时将他送进了城内，在听到自己部队胜利的消息不久便一命呜呼了。其余人员随同克莱阿里扎斯追击敌军回来后，剥去敌军阵亡者的衣甲，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

After this, all the allies attended in arms and buried Brasidas at the public expense in the city, in front of what is now the marketplace, and the Amphipolitans, having enclosed his tomb, ever afterwards sacrifice to him as a hero and have given to him the honour of games and annual offerings. They constituted him the founder of their colony, and pulled down the Hagnonic erections, and obliterated everything that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memorial of his having founded the place; for they considered that Brasidas had been their preserver, and courting as they did the alliance of Lacedaemon for fear of Athens, in their present hostile relations with the latter they could no longer with the same advantage or satisfaction pay Hagnon his honours. They also gave the Athenians back their dead. About six hundred of the latter had fallen and only seven of the enemy, owing to there having been no regular engagement, but the affair of accident and panic that I have described. After taking up their dead the Athenians sailed off home, while Clearidas and his troops remained to arrange matters at Amphipolis.

这一役之后，盟军所有将士全副武装出席了布拉西达斯在市区的公葬，地点就在现在的市场前面。安菲波利斯人在他的坟墓周围筑起一道护墙，此后一直把他当作英雄祭拜，每年还举行各种赛会和祭祀活动纪念他。他们将布拉西达斯奉为殖民地的创立者，将哈格农的建筑物全部拆毁，并毁掉了所有能让人们想起该殖民地是哈格农所创的物品，因为他们认为布拉西达斯才是他们的保护者。同时，因为惧怕雅典，他们急切希望与斯巴达建立同盟关系。由于当时与雅典的敌对关系，他们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从对哈格农的敬意中获得好处或得到满足了。他们还把阵亡者的尸体还给了雅典人。因为不是正规交战，如我所述，只是一次意外恐慌事件，雅典方面阵亡了大约600人，对方仅有7人死亡。取回死者的尸体之后，雅典人启航返回本邦去了。克莱阿里扎斯和他的军队仍留在那里，处理安菲波利斯的善后事宜。

About the same time, three Lacedaemonians—Ramphias, Autocharidas, and Epicydidas—led a reinforcement of nine hundred heavy infantry to the towns in the direction of Thrace, and arriving at Heraclea in Trachis reformed matters there as seemed good to them. While they delayed there, this battle took place and so the summer ended.

差不多与此同时，三名斯巴达人，即拉姆菲亚斯、阿夫托哈里扎斯和埃皮基季扎斯，率领一支由900名重步兵组成的援军，向色雷斯地区诸城镇开去。抵达特拉希斯境内的赫拉克利亚后，他们按照看起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对那里的诸般事务进行了调整。安菲波利斯这场战役就是他们耽搁在此处时发生的，这个夏季就这样结束了。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winter following, Ramphias and his companions penetrated as far as Pierium in Thessaly; but as the Thessalians opposed their further advance, and Brasidas whom they came to reinforce was dead, they turned back home, thinking that the moment had gone by, the Athenians being defeated and gone, and themselves not equal to the execution of Brasidas's designs. The main cause however of their return was because they knew that when they set out Lacedaemonian opinion was really in favour of peace.

下个冬季一开始，拉姆菲亚斯及其同僚就率军开到了色萨利的皮埃里乌姆。但是，由于色萨利人反对他们继续前进，他们前来增援的对象布拉西达斯又已经阵亡，他们认为，既然雅典人已战败而去，战机不再，他们也没信心能实现布拉西达斯的宏伟计划，于是便掉头返回了本邦。不过，他们回返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出发时就知道，

斯巴达人其实更渴望和平。

Indeed, it so happened that directly after the battle of Amphipolis and the retreat of Ramphias from Thessaly, both sides ceased to prosecute the war and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peace. Athens had suffered severely at Delium, and again shortly afterwards at Amphipolis, and had no longer that confidence in her strength which had made her before refuse to treat, in the belief of ultimate victory which her success at the moment had inspired; besides, she was afraid of her allies being tempted by her reverses to rebel more generally, and repented having let go the splendid opportunity for peace which the affair of Pylos had offered. Lacedaemon, on the other hand, found the event of the war to falsify her notion that a few years would suffice for the overthrow of the power of the Athenians by the devastation of their land. She had suffered on the island a disaster hitherto unknown at Sparta; she saw her country plundered from Pylos and Cythera; the Helots were deserting, and she was in constant apprehension that those who remained in Peloponnese would rely upon those outside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to renew their old attempts at revolution. Besides this, as chance would have it, her thirty years' truce with the Argives was upon the point of expiring; and they refused to renew it unless Cynuria were restored to them; so that it seemed impossible to fight Argos and Athens at once. She also suspected some of the cities in Peloponnese of intending to go over to the enemy and that was indeed the case.

实际上，安菲波利斯之战和拉姆菲亚斯从色萨利撤军以后，双方就没再继续交战，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了谋求和平。雅典人在德利乌姆受到重挫，紧接着又在安菲波利斯打了败仗，他们对曾经促使自己拒

绝讲和时的实力已经不再有信心，也不再相信一时的成功会带来最终的胜利。此外，他们还怕战事的失败会引起盟邦更加普遍的反抗，同时他们十分后悔没有抓住皮洛斯一事所提供的那个重建和平的千载良机。斯巴达人则发现，战事并没有依照他们的想法发展。他们原以为，只要践踏了雅典人的土地，不消几年就可以摧毁雅典人的势力。可是，他们却在岛上经历了一场迄今未曾经历过的灾难，眼看着自己的每一寸土地从皮洛斯到基西拉都遭人劫掠，希洛人也在不断逃亡；而且他们还一直在担心，留在伯罗奔尼撒的希洛人会依仗外面那些人，并利用当前的形势，像过去那样又闹起革命来。除此之外，偏偏在这时候，斯巴达与阿尔戈斯人之间的三十年休战协定行将期满。除非把基努里亚归还给他们，否则，阿尔戈斯人就不愿再续此约了，斯巴达似乎是不可能与雅典和阿尔戈斯同时作战的。他们还怀疑，伯罗奔尼撒的某些城邦有意倒向敌方，事实也的确如此。

These considerations made both sides disposed for an accommodation; the Lacedaemonians being probably the most eager, as they ardently desired to recover the men taken upon the island, the Spartans among whom belonged to the first families and were accordingly related to the governing body in Lacedaemon. Negotiations had been begun directly after their capture, but the Athenians in their hour of triumph would not consent to any reasonable terms; though after their defeat at Delium, Lacedaemon, knowing that they would be now more inclined to listen, at once concluded the armistice for a year, during which they were to confer together and see if a longer period could not be agreed upon.

基于这些考虑，双方都想和解，斯巴达人求和的心情可能更为迫切，因为他们强烈希望要回在岛上被俘的人。被俘者中的斯巴达人属于显赫家族，与斯巴达的统治集团有亲缘关系。他们一被俘，斯巴达人随即开始与雅典人谈判，但那时雅典人正处于因胜利而得意之时，

不愿接受任何合理的条件。雅典人在德利乌姆战败后，斯巴达人知道他们此时比较能听得进建议了，马上和他们订立了一年的休战协定。在这期间，双方须共同商讨是否要延长休战期。

Now, however, after the Athenian defeat at Amphipolis, and the death of Cleon and Brasidas, who had been the two principal opponents of peace on either side—the latter from the success and honour which war gave him, the former because he thought that, if tranquillity were restored, his crimes would be more open to detection and his slanders less credited—the foremost candidates for power in either city, Pleistoanax, son of Pausanias, king of Lacedaemon, and Nicias, son of Niceratus, the most fortunate general of his time, each desired peace more ardently than ever. Nicias, while still happy and honoured, wished to secure his good fortune, to obtain a present release from trouble for himself and his countrymen, and hand down to posterity a name as an ever-successful statesman, and thought the way to do this was to keep out of danger and commit himself as little as possible to fortune, and that peace alone made this keeping out of danger possible. Pleistoanax, again, was assailed by his enemies for his restoration, and regularly held up by them to the prejudice of his countrymen, upon every reverse that befell them, as though his unjust restoration were the cause; the accusation being that he and his brother Aristocles had bribed the prophetess of Delphi to tell the Lacedaemonian deputations which successively arrived at the temple to bring home the seed of the demigod son of Zeus from abroad, else they would have to plough with a silver share. In this way, it was insisted, in time he had induced the Lacedaemonians in the nineteenth year of his exile to Lycaeum (whither he had gone when banished on suspicion of having been bribed to retreat from Attica, and had built half his house within the consecrated precinct

of Zeus for fear of the Lacedaemonians), to restore him with the same dances and sacrifices with which they had instituted their kings upon the first settlement of Lacedaemon. The smart of this accusation, and the reflection that in peace no disaster could occur, and that when Lacedaemon had recovered her men there would be nothing for his enemies to take hold of (whereas, while war lasted, the highest station must always bear the scandal of everything that went wrong), made him ardently desire a settlement. Accordingly, this winter was employed in conferences; and as spring rapidly approached, the Lacedaemonians sent round orders to the cities to prepare for a fortified occupation of Attica, and held this as a sword over the heads of the Athenians to induce them to listen to their overtures; and at last, after many claims had been urged on either side at the conferences a peace was agreed on upon the following basis. Each party was to restore its conquests, but Athens was to keep Nisaea; her demand for Plataea being met by the Thebans asserting that they had acquired the place not by force or treachery, but by the voluntary adhesion upon agreement of its citizens; and the same, according to the Athenian account, being the history of her acquisition of Nisaea. This arranged, the Lacedaemonians summoned their allies, and all voting for peace except the Boeotians, Corinthians, Eleans, and Megarians, who did not approve of these proceedings, they concluded the treaty and made peace, each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swearing to the following articles:

可是，如今雅典人在安菲波利斯打了败仗，克莱翁和布拉西达斯又已双双战死，这两位曾是双方主要的反和派人物——后者是因为从战争中获取了成功和荣誉；前者则是因为担心复归安宁后他的罪行更容易暴露，他的谗言也更无人听信。在这些事情发生后，两个城邦最有势力的人比以往更为急切地想要议和：一个是斯巴达国王，保萨尼阿斯之子普利斯托阿纳克斯；另一个是当时最幸运的将军，尼塞拉图

斯之子尼西亚斯。仍在享受幸福和荣誉的尼西亚斯希望能够维持这份好运，使自己及其同胞从当下的忧患中解脱出来，给后世留下一个“常胜政治家”之名。他认为，只有避免冒险，尽量不靠运气，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而只有实现和平，才有避免冒险的可能。普利斯托阿纳克斯则因其复辟为政敌所攻击，他们一有不顺，往往就会让他成为国民的公敌，好像他的非法复辟是不顺的根源。他们指责他和他的兄弟阿里斯托克莱斯贿赂德尔斐的女祭司，怂恿她让相继来到神庙的斯巴达代表从国外带回宙斯半神半人之子的后裔，否则他们就得用银犁头耕田。他们坚持说，他就是用这种办法，在被放逐到利凯夫姆（当他被疑因收受贿赂而从阿提卡撤军时，他被放逐到了那里。因为害怕斯巴达人对其不利，他将自己的一半房屋建在了宙斯神庙的圣地之内）的第十九个年头，诱使斯巴达人采用舞蹈和献祭之仪将他迎了回来，就像最初建立斯巴达时国王的即位仪式一样。普利斯托阿纳克斯深为这一指责所苦。他认为在和平时期就不会有这种不幸发生，他相信，只要要回被俘的斯巴达人，他的政敌就不会再有什么根据来攻击他（但只要战争持续下去，任何事情出了错，居于最高位者总得承受指责），所以他强烈希望和解。因此，双方在这个冬季不断进行磋商。当春天的脚步迅即临近时，斯巴达传令要求各城邦准备在阿提卡修筑要塞，使其成为悬在雅典人头上的一把剑，逼迫雅典人听从他们的提议。双方在会上多次申明自己的要求之后，最终在以下基础上缔结了和平协议，即：各方均须归还自己所征服的土地，但雅典可以继续保留尼塞阿。雅典对普拉蒂亚的要求则遭到了底比斯人的反对，他们坚持认为，普拉蒂亚是经该城居民同意后自愿归顺他们的，而不是靠武力或内应的协助得到的。但按雅典人的说法，他们也是这样获取尼塞阿的。这一基本原则商定后，斯巴达人召集盟邦举行了会议。除了维奥蒂亚人、科林斯人、埃利斯人和迈加拉人不同意这些做法之外，大家都投票赞成讲和，于是他们缔结条约，实现了和平。缔约各方宣誓遵守下列条款：

The Athenians and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made a treaty, and swore to it, city by city, as follows;

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以及各自的盟邦缔结本条约，各城邦依次宣誓遵守下列条款：

1．Touching the national temples, there shall be a free passage by land and by sea to all who wish it, to sacrifice, travel, consult, and attend the oracle or games, according to the customs of their countries.

1．关于国家神庙，凡依照本邦习俗入庙祭祀、游览、问神、聆听神谕或参加赛会者，均可依愿在海上与陆上自由通行。

2．The temple and shrine of Apollo at Delphi and the Delphians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ir own laws, taxed by their own state, and judged by their own judges,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custom of their country.

2．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和神殿以及德尔斐人，可依照自己的法律进行管理，由自己的城邦征税，由自己的法官进行审判；有关土地和人民的问题，可按照自己城邦的风俗习惯处理。

3．The treaty shall be binding for fifty years upon the Athenians and the allies of the Athenians, and upon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 allies of the Lacedaemonians, without fraud or hurt by land or by sea.

3．本条约对雅典人及其盟邦和斯巴达人及其盟邦的约束期限为五十年，无论在陆上还是海上，均不得有欺骗或伤害对方的行为。

4．It shall not be lawful to take up arms, with intent to do hurt, either for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against the Athenians and their allies, or for the Athenians and their allies against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in any way or means whatsoever. But should any difference arise between them they are to have recourse to law and oaths, according as may be agreed between the parties.

4．无论是斯巴达人及其盟邦，还是雅典人及其盟邦，无论以何种方式或手段，凡拿起武器意欲对对方施行伤害者，均属非法。双方若发生争执，应依照双方协商一致的办法诉诸于法律和誓约加以解决。

5．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shall give back Amphipolis to the Athenians. Nevertheless, in the case of cities given up by the Lacedaemonians to the Athenians, the inhabitants shall be allowed to go where they please and to take their property with them;and the cities shall be independent, paying only the tribute of Aristides. And it shall not be lawful for the Athenians or their allies to carry on war against them after the treaty has been concluded, so long as the tribute is paid. The cities referred to are Argilus, Stagirus, Acanthus, Scolus, Olynthus, and Spartolus. These cities shall be neutral, allies neither of the Lacedaemonians nor of the Athenians; but if the cities consent, it shall be lawful for the Athenians to make them their allies,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cities wish it.

5．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应将安菲波利斯交还给雅典人。然而，对于斯巴达人交给雅典人的城邦，其居民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居留地并携带财产前往。这些城邦应为独立城邦，仅需按照阿里斯提得斯所规定的数目缴纳贡金。本条约一经缔结，只要这些城邦缴纳贡金，雅典人或其盟邦若对其发动战争即为非法。本条款适用的城邦包括阿尔伊卢斯、斯塔伊鲁斯、阿坎苏斯、斯科鲁斯、奥林索斯和斯巴托卢斯。这些城邦应保持中立，既不成为斯巴达人的盟邦，也不成为雅典人的盟邦，但若这些城邦同意，雅典人接纳他们为盟邦亦属合法，条件必须始终是这些城邦自愿如此。

The Mecybernaeans, Sanaeans, and Singaeans shall inhabit their own cities, as also the Olynthians and Acanthians;but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shall give back Panactum to the Athenians.

迈基贝尔纳人、萨内人和辛古斯人应当在自己的城邦内居住，奥林索斯人和阿坎苏斯人亦同，但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应将帕纳克图姆交还给雅典人。

6．The Athenians shall give back Coryphasium, Cythera, Methana, Lacedaemonians that are in the prison at Athens or elsewhere in the Athenian dominions, and shall let go the Peloponnesians besieged in Scione, and all others in Scione that are allies of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ll whom Brasidas sent in there, and any others of the allies of the Lacedaemonians that may be in the prison at Athens or elsewhere in the Athenian dominions.

6．雅典人须交还在科里法西乌姆、基西拉、迈萨纳以及在雅典或雅典所辖其他地区关押的斯巴达人，释放被围困在西奥内的伯罗奔尼撒人、在西奥内的所有斯巴达盟邦人员、布拉西达斯派往西奥内的所有人员以及所有被关押在雅典或雅典所辖其他地区的斯巴达盟邦人员。

7．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shall in like manner give back any of the Athenians or their allies that they may have in their hands.

7．斯巴达人及其盟邦须同样交还他们手中的雅典人或其盟邦的人员。

8．In the case of Scione, Torone, and Sermylium, and any other cities that the Athenians may have, the Athenians may adopt such measures as they please.

8．关于西奥内、托罗内、塞尔米利乌姆和其他雅典控制下的城邦，雅典人可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

9．The Athenians shall take an oath to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city by city. Every man shall swear by the most binding oath of his country, seventeen from each city. The oath shall be as follows:“I will abide by this agreement and treaty honestly and without deceit.” In the same way an oath shall be taken by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to the Athenians;and the oath shall be renewed annually by both parties. Pillars shall be

erected at Olympia, Pythia, the Isthmus, at Athens in the Acropolis, and at Lacedaemon in the temple at Amyclae.

9．雅典人须向斯巴达人及其盟邦逐城宣誓。所有人均须依照各城邦最具约束力的方式宣誓。双方各出代表十七人。誓词如下："我将诚实而忠实地遵守本协议和条约。"斯巴达人及其盟邦亦须以同样方式向雅典人宣誓。宣誓仪式须每年由双方重新举行一次。在奥林匹亚、皮提亚、地峡，雅典的卫城以及斯巴达的阿米克莱神庙，应竖立誓约柱。

10．If anything be forgotten, whatever it be, and on whatever point, it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ir oath for both parties, the Athenians and Lacedaemonians, to alter it, according to their discretion.

10．如果在任何问题上有疏漏之处，在不违背双方誓言的情况下，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可依其意愿予以修改。

The treaty begins from the ephoralty of Pleistolas in Lacedaemon, on the 27th day of the month of Artemisium, and from the archonship, of Alcaeus at Athens, on the 25th day of the month of Elaphebolion. Those who took the oath and poured the libations for the Lacedaemonians were Pleistoanax, Agis, Pleistolas, Damagetis, Chionis, Metagenes, Acanthus, Daithus, Ischagoras, Philocharidas, Zeuxidas, Antippus, Tellis, Alcinadas, Empedias, Menas, and Laphilus: for the Athenians, Lampon, Isthmonicus, Nicias, Laches, Euthydemus, Procles, Pythodorus, Hagnon, Myrtilus, Thrasycles, Theagenes, Aristocrates, Iolcius, Timocrates, Leon,

Lamachus, and Demosthenes.

本条约于民选长官普利斯托拉斯任期内的阿提密喜安月27日在斯巴达生效；于执政官阿尔凯奥斯任期内的埃拉费博利翁月15日在雅典生效。斯巴达方面参加宣誓与奠酒者包括：普利斯托阿纳克斯、亚基斯、普利斯托拉斯、达马耶蒂斯、希奥尼斯、迈塔耶内斯、阿坎苏斯、德苏斯、伊斯哈戈拉斯、菲洛哈里扎斯、宙克西扎斯、安蒂普斯、泰利斯、阿尔基纳扎斯、恩佩贾斯、梅纳斯和拉菲卢斯。雅典方面参加宣誓与奠酒者包括：兰蓬、伊斯莫尼库斯、尼西亚斯、拉凯斯、埃西泽穆斯、普罗克莱斯、皮索佐鲁斯、哈格农、米尔蒂卢斯、斯拉西克莱斯、塞阿耶内斯、阿里斯托克拉泰斯、伊奥尔基乌斯、蒂莫克拉泰斯、莱翁、拉马胡斯和狄摩西尼。

This treaty was made in the spring, just at the end of winter, directly after the city festival of Dionysus, just ten years, with the difference of a few days, from the first invasion of Attica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war. This must be calculated by the seasons rather than by trusting to the enumeration of the names of the several magistrates or offices of honour that are used to mark past events. Accuracy is impossible where an event may have occurred in the beginning, or middle, or at any period in their tenure of office. But by computing by summers and winters, the method adopted in this history, it will be found that, each of these amounting to half a year, there were ten summers and as many winters contained in this first war.

这一条约缔结于冬尽春初之时，恰逢城里的酒神节刚刚结束，距离第一次入侵阿提卡和这次战争爆发正好十年，前后相差不过数日。这个时间必须按季节来计算，而不是采用各自的行政官或其他官员的

任职日期记载过去重大事件发生的年代。因为某个事件可能发生在官员任职的初期、中期或任何时期，所以那样计算不可能精确。但是，采用本史所使用的夏冬两季纪年法，我们将会发现，每季等于半年，即第一次战争历时十个夏季和十个冬季。

Meanwhile, the Lacedaemonians, to whose lot it fell to begin the work of restitution, immediately set free all the prisoners of war in their possession, and sent Ischagoras, Menas, and Philocharidas as envoys to the towns in the direction of Thrace, to order Clearidas to hand over Amphipolis to the Athenians, and the rest of their allies each to accept the treaty as it affected them. They, however, did not like its terms, and refused to accept it; Clearidas also, willing to oblige the Chalcidians, would not hand over the town, averring his inability to do so against their will. Meanwhile, he hastened in person to Lacedaemon with envoys from the place, to defend his disobedience against the possible accusations of Ischagoras and his companions, and also to see whether it was too late for the agreement to be altered; and on finding the Lacedaemonians were bound, quickly set out back again with instructions from them to hand over the place, if possible, or at all events to bring out the Peloponnesians that were in it.

其间，根据抽签结果，斯巴达人首先归还所占土地，立即释放他们手中的战俘，并派遣伊斯哈戈拉斯、梅纳斯和菲洛哈里扎斯作为使者前往色雷斯地区诸城镇，命令克莱阿里扎斯将安菲波利斯移交给雅典人，还命令其他各盟邦接受条约中涉及他们的条款。然而，他们却不欢迎条约中的条款，因而拒绝接受。克莱阿里扎斯很想帮哈尔基斯人，所以也不愿交出安菲波利斯，声称自己无力违背哈尔基斯人的意愿这样做。与此同时，他还亲自率领当地代表火速赶往斯巴达，为伊斯哈戈拉斯及其同僚有可能对他违抗命令提出的指控进行辩护，同时

也想探听一下是否还来得及修改条约。当他发现斯巴达人已经受到了条约的约束之后，便立即启程回去了。他从他们那里领受的指令是，如果可能，就移交该地；否则，无论如何也要把留在安菲波利斯的伯罗奔尼撒人带出境外。

The allies happened to be present in person at Lacedaemon, and those who had not accepted the treaty were now asked by the Lacedaemonians to adopt it. This, however, they refused to do, for the same reasons as before, unless a fairer one than the present were agreed upon; and remaining firm in their determination were dismissed by the Lacedaemonians, who now decided on forming an alliance with the Athenians, thinking that Argos, who had refused the application of Ampelidas and Lichas for a renewal of the treaty, would without Athens be no longer formidable, and that the rest of the Peloponnese would be most likely to keep quiet, if the coveted alliance of Athens were shut against them. Accordingly, after conference with the Athenian ambassadors, an alliance was agreed upon and oaths were exchanged, upon the terms following:

盟邦的代表们当时刚好还在斯巴达，因此，斯巴达人便开始要求那些尚未采纳和约的盟邦接受条约。但是，这些盟邦却不肯这样做，理由仍与先前相同，那就是要商定一份比目前这个更公平合理的和约。由于这些盟邦的代表都坚持己见，斯巴达人就打发他们回去了。决定与雅典人结为同盟。他们认为，阿尔戈斯已经拒绝了安佩利扎斯和利哈斯提出的续约请求，在无雅典相助的情况下，它不再那么难以对付。如果与雅典的秘密同盟将伯罗奔尼撒的其他城邦排斥在外，它们很可能也会安静下来。因此，经过与雅典的特使进行协商，双方同意结盟，并交换了誓言，盟约条款如下：

1．The Lacedaemonians shall be allies of the Athenians for fifty years.

1．斯巴达人与雅典人结为同盟，有效期为五十年。

2．Should any enemy invade the territory of Lacedaemon and injure the Lacedaemonians, the Athenians shall help in such way as they most effectively can, according to their power. But if the invader be gone after plundering the country, that city shall be the enemy of Lacedaemon and Athens, and shall be chastised by both, and one shall not make peace without the other. This to be honestly, loyally, and without fraud.

2．敌人如果侵犯斯巴达的领土或伤害斯巴达人，雅典人须依其力以最有效的方式向斯巴达人提供援助。如果入侵者在劫掠乡村后扬长而去，其城邦将成为斯巴达和雅典的共同敌人，受到双方的惩处，且任何一方不得抛开另一方与其议和。本条款应诚实、忠实、毫无欺瞒地付诸实施。

3．Should any enemy invade the territory of Athens and injure the Athenians, the Lacedaemonians shall help them in such way as they most effectively can, according to their power. But if the invader be gone after plundering the country, that city shall be the enemy of Lacedaemon and Athens, and shall be chastised by both, and one shall not make peace without the other. This to be honestly, loyally, and without fraud.

3．敌人如果侵犯雅典的领土或伤害雅典人，斯巴达人须依其力以最有效的方式向雅典人提供援助。如果入侵者在劫掠乡村后扬长而去，其城邦将成为雅典和斯巴达的共同敌人，双方均将对其实施惩罚，且任何一方不得抛开另一方与其议和。本条款应诚实、忠实、毫无欺瞒地付诸实施。

4．Should the slave population rise, the Athenians shall help the Lacedaemonians with all their might, according to their power.

4．如果奴隶们起来暴动，雅典人应依其力全力向斯巴达提供援助。

5．This treaty shall be sworn to by the same persons on either side that swore to the other. It shall be renewed annually by the Lacedaemonians going to Athens for the Dionysia, and the Athenians to Lacedaemon for the Hyacinthia, and a pillar shall be set up by either party: at Lacedaemon near the statue of Apollo at Amyclae, and at Athens on the Acropolis near the statue of Athene. Should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thenians see to add to or take away from the alliance in any particular, it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ir oaths for both parties to do so, according to their discretion.

5．双方对前一个条约的宣誓者须同样对本条约宣誓。宣誓仪式应每年重新举行一次。斯巴达方面的代表于酒神节去雅典，雅典方面的代表于希阿辛夏节去斯巴达。双方须各立一个纪念柱：斯巴达的纪念柱设在阿米克莱的阿波罗神像旁；雅典的纪念柱设在卫城的雅典娜女神像旁。如果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对本盟约的细节有何补充或删节，须由双方在不违背誓言的前提下按其意愿进行。

Those who took the oath for the Lacedaemonians were Pleistoanax, Agis, Pleistolas, Damagetus, Chionis, Metagenes, Acanthus, Daithus, Ischagoras, Philocharidas, Zeuxidas, Antippus, Alcinadas, Tellis, Empedias, Menas, and Laphilus; for the Athenians, Lampon, Isthmionicus, Laches, Nicias, Euthydemus, Procles, Pythodorus, Hagnon, Myrtilus, Thrasycles, Theagenes, Aristocrates, Iolcius, Timocrates, Leon, Lamachus, and Demosthenes.

代表斯巴达人宣誓的是：普利斯托阿纳克斯、亚基斯、普利斯托拉斯、达马耶图斯、希奥尼斯、迈塔耶内斯、阿坎苏斯、德苏斯、伊斯哈戈拉斯、菲洛哈里扎斯、宙克西扎斯、安蒂普斯、阿尔基纳扎斯、泰利斯、恩佩贾斯、梅纳斯和拉菲卢斯；代表雅典人宣誓的是：兰蓬、伊斯莫尼库斯、拉凯斯、尼西亚斯、埃西泽穆斯、普罗克莱斯、皮索佐鲁斯、哈格农、米尔蒂卢斯、斯拉西克莱斯、塞阿耶内斯、阿里斯托克拉泰斯、伊奥尔基乌斯、蒂莫克拉泰斯、莱翁、拉马胡斯和狄摩西尼。

This alliance was made not long after the treaty; and the Athenians gave back the men from the island to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 summer of the eleventh year began. This completes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ar, which occupied the whole of the ten years previously [1_1] .

这一同盟条约是在和约订立后不久缔结的。雅典人将在岛上俘获的人交还给斯巴达人。战争第十一年的夏季开始了，至此，第一次战争整整持续了十年，关于这次战争的记载到此结束。

CHAPTER XVI Feeling against Sparta in Peloponnese—League of the Mantineans, Eleans, Argives, and Athenians—Battle of Mantinea and breaking up of the League

第十六章　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招致反感——曼提尼亚人、埃利斯人、阿尔戈斯人与雅典人结盟——曼提尼亚之战和同盟的分裂

After the treaty and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thenians, concluded after the ten years' war, in the ephorate of Pleistolas at Lacedaemon, and the archonship of Alcaeus at Athens, the states which had accepted them were at peace; but the Corinthians and some of the cities in Peloponnese trying to disturb the settlement, a fresh agitation was instantly commenced by the allies against Lacedaemon. Further, the Lacedaemonians, as time went on, became suspected by the Athenians through their not performing some of the provisions in the treaty; and though for six years and ten months they abstained from invasion of each other's territory, yet abroad an unstable armistice did not prevent either party doing the other the most effectual injury, until they were finally obliged to break the treaty made after the ten years' war and to have recourse to open hostilities.

十年战争结束后，普利斯托拉斯在斯巴达任民选长官和阿尔凯奥斯在雅典任执政官期间，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缔结了和平条约并结成了同盟。此后，那些接受条约的城邦都恢复了和平。但是，科林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其他一些城邦却试图打乱这种和解局面，斯巴达人与其盟邦之间很快开始了新的动荡。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斯巴达人未能履行和约中的某些条款，雅典人对他们开始生疑。尽管双方已有六年零十个月未侵犯过对方的领土，但在这两个城邦之外，战争从未停止，本不牢靠的休战协定始终没能阻挡住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最有力的侵害，最后双方不得不撕毁十年之战后所缔结的和约，彼此又公开

对立起来。

The history of this period has been also written by the same Thucydides, an Athenian, in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events by summers and winters, to the time when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put an end to the Athenian empire, and took the Long Walls and Piraeus. The war had then lasted for twenty-seven years in all. Only a mistaken judgment can object to including the interval of treaty in the war. Looked at by the light of facts it cannot, it will be found, be rationally considered a state of peace, where neither party either gave or got back all that they had agreed, apart from the violations of it which occurred on both sides in the Mantinean and Epidaurian wars and other instances, and the fact that the allies in the direction of Thrace were in as open hostility as ever, while the Boeotians had only a truce renewed every ten days. So that the first ten years' war, the treacherous armistice that followed it, and the subsequent war will, calculating by the seasons, be found to make up the number of years which I have mentioned, with the difference of a few days, and to afford an instance of faith in oracles being for once justified by the event. I certainly all along rememb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war its being commonly declared that it would last thrice nine years. I lived through the whole of it, being of an age to comprehend events, and giving my attention to them in order to know the exact truth about them. It was also my fate to be an exile from my country for twenty years after my command at Amphipolis; and being present with both parties, and more especially with the Peloponnesians by reason of my exile, I had leisure to observe affairs somewhat particularly. I will accordingly now relate the differences that arose after the ten years' war, the breach of the treaty, and the hostilities that followed.

这一时期的历史同样是由我——雅典人修昔底德——所记述的。我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以夏冬两季纪年法，一直记述到斯巴达人及其盟邦摧毁雅典帝国，占领长墙与比雷埃夫斯之时。那时战事已经持续了二十七年。如果不把缔结和约后那段时期包括在这场战争之内，只能说看法有误。只要从事实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将那段时期看作和平阶段是不恰当的，因为双方都没有交还或收回他们商定的全部土地；除此之外，在曼提尼亚和埃皮达鲁斯的战争及其他战事中，双方均曾违反和约；色雷斯地区的盟邦依旧互相敌视；维奥蒂亚人虽然处于休战状态，但这种休战需要每十天重续一次。因此，如果将最初十年的战争和随后并不太平的休战期以及后来的战事连起来以两季纪年法计算，人们将会发现，我所得出的年数和实际情况只有几天的出入，同时这也提供了一个例证，证实信奉神谕破例对了一次。我当然一直记得，从这场战争开始到结束，人们常常断言它将延续三个九年。我经历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我的年龄也足以使我理解所发生的事件。为了探求这些事件的真相，我一直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另外，完成了在安菲波利斯的指挥任务之后，我因被放逐而离开了本邦二十年，因此目睹了双方的行动，尤其是因流亡之故，我更多地目睹了伯罗奔尼撒方面的行动，同时也有闲暇比较仔细地观察战事的发展。因此，下面我将叙述十年战争之后所发生的争端、和约的破坏以及继之而来的战争行动。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fifty years' truce and of the subsequent alliance, the embassies from Peloponnese which had been summoned for this business returned from Lacedaemon. The rest went straight home, but the Corinthians first turned aside to Argos and opened negotiations with some of the men in office there, pointing out that Lacedaemon could have no good end in view, but only the subjugation of Peloponnese, or she would never have entered into treaty and alliance with the once detested Athenians, and that the duty of consulting for the safety of

Peloponnese had now fallen upon Argos, who should immediately pass a decree inviting any Hellenic state that chose, such state being independent and accustomed to meet fellow powers upon the fair and equal ground of law and justice, to make a defensive alliance with the Argives; appointing a few individuals with plenipotentiary powers, instead of making the people the medium of negotiation, in order that, in the case of an applicant being rejected, the fact of his overtures might not be made public. They said that many would come over from hatred of the Lacedaemonians. After this explanation of their views, the Corinthians returned home.

五十年休战协定缔结继而与雅典结为同盟之后，为此被召集来的伯罗奔尼撒诸城邦各使团都从斯巴达回去了。其他使团都直接回本邦去了，科林斯人却转道先去了阿尔戈斯，与那里的一些政府官员进行了磋商。他们指出，斯巴达心怀不轨，只是想征服伯罗奔尼撒诸邦，否则它决不会与曾经仇视的雅典人缔约并结盟。他们还指出，如何保障伯罗奔尼撒诸邦的安全这一重任，如今落到了阿尔戈斯的肩上。阿尔戈斯应该通过一个法令，邀请每一个独立自主而且惯于在法律与正义这一公平而平等的基础上对待其他盟邦的希腊城邦与阿尔戈斯人订立防守同盟，只要它愿意，并委派少数几位全权代表而不是由公民大会商议此事。这样，如果某个城邦的入盟申请遭到拒绝，该城邦曾提出过申请一事也不会人尽皆知。他们说，出于对斯巴达人的仇恨，很多城邦都会投奔而来。如此陈述完他们的观点后，科林斯人就返回本邦去了。

The persons with whom they had communicated reported the proposal to their government and people, and the Argives passed the decree and chose twelve men to negotiate an alliance for any Hellenic state that wished it, except Athens and Lacedaemon, neither of which should be able to join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Argive people. Argos came into the plan the more readily because she saw that war with Lacedaemon was inevitable, the truce being on the point of expiring; and also because she hoped to gain the supremacy of Peloponnese. For at this time, Lacedaemon had sunk very low in public estimation because of her disasters, while the Argives were in a most flourishing condition, having taken no part in the Attic war, but having on the contrary profited largely by their neutrality. The Argives accordingly prepared to receive into alliance any of the Hellenes that desired it.

与他们接触的那些人向政府和人民反映了他们的建议后，阿尔戈斯人通过了上述法令，并推选出十二名代表，由他们负责与除雅典和斯巴达以外愿意入盟的任何希腊城邦商谈结盟事宜，而雅典和斯巴达非经阿尔戈斯人民同意则不得加入。阿尔戈斯人之所以比较乐意实施这个计划，是因为他们看到休战协定期满在即，与斯巴达之间势必会有战事发生；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希望称霸伯罗奔尼撒。这时，斯巴达已遭重创，在公众中威信大跌，而阿尔戈斯人则处于全盛状态。他们非但没有参加阿提卡的战事，反而从中立地位中获益匪浅。因此，阿尔戈斯人准备将所有自由入盟的希腊城邦都纳入同盟。

The Mantineans and their allies were the first to come over through fear of the Lacedaemonians. Having taken advantage of the war against Athens to reduce a large part of Arcadia into subjection, they thought that Lacedaemon would not leave them undisturbed in their conquests, now that she had leisure to interfere, and consequently gladly turned to a powerful city like Argos, the historical enemy of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 sister democracy. Upon the defection of Mantinea, the rest of Peloponnese at once began to agitate the propriety of following her example, conceiving that the Mantineans not have changed sides without good reason;

besides which they were angry with Lacedaemon among other reasons for having inserted in the treaty with Athens that it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ir oaths for both parties, Lacedaemonians and Athenians, to add to or take away from it according to their discretion. It was this clause that was the real origin of the panic in Peloponnese, by exciting suspicions of a Lacedaemonian and Athenian combination against their liberties: any alteration should properly have been made conditional upon the consent of the whole body of the allies. With these apprehensions there was a very general desire in each state to place itself in alliance with Argos.

首先投奔而来的是曼提尼亚人及其盟邦，因为他们害怕斯巴达人。借与雅典作战之机征服了阿卡迪亚的大片土地之后，曼提尼亚人认为，既然斯巴达已有暇干预，它是不会让他们安稳地占有这些土地的，所以他们很高兴投靠一个像阿尔戈斯这样强大的城邦，阿尔戈斯是斯巴达人的宿敌，并与他们一样实行民主政治。曼提尼亚反叛后，伯罗奔尼撒其他城邦立即开始就是否该效仿它的做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觉得，曼提尼亚人投向对方营垒不无道理。此外，他们对斯巴达也很气愤，其中一个原因是斯巴达与雅典的盟约中加有这样一条：斯巴达人和雅典人若对本盟约的细节有何补充或删节，须由双方在不违背誓言的前提下依其意予以修改。让伯罗奔尼撒诸邦真正感到恐慌的就是这项条款，他们怀疑，斯巴达与雅典之所以联合，就是为了剥夺他们的自由，因为条约的任何变更本应经所有盟邦同意。出于这些考虑，各城邦普遍希望与阿尔戈斯结为同盟。

In the meantime, the Lacedaemonians perceiving the agitation going on in Peloponnese, and that Corinth was the author of it and was herself about to enter into alliance with the Argives, sent ambassadors thither in the hope of preventing what was in contemplation. They accused her of having brought it all about, and

told her that she could not desert Lacedaemon and become the ally of Argos, without adding violation of her oaths to the crime which she had already committed in not accepting the treaty with Athens, when it had been expressly agreed that the decision of the majority of the allies should be binding, unless the gods or heroes stood in the way. Corinth in her answer, delivered before those of her allies who had like her refused to accept the treaty, and whom she had previously invited to attend, refrained from openly stating the injuries she complained of, such as the non-recovery of Sollium or Anactorium from the Athenians, or any other point in which she thought she had been prejudiced, but took shelter under the pretext that she could not give up her Thracian allies, to whom her separate individual security had been given, when they first rebelled with Potidaea, as well as upon subsequent occasions. She denied, therefore, that she committed any violation of her oaths to the allies in not entering into the treaty with Athens; having sworn upon the faith of the gods to her Thracian friends, she could not honestly give them up. Besides, the expression was, “unless the gods or heroes stand in the way.” Now here, as it appeared to her, the gods stood in the way. This was what she said on the subject of her former oaths. As to the Argive alliance, she would confer with her friends and do whatever was right. The Lacedaemonian envoys returning home, some Argive ambassadors who happened to be in Corinth pressed her to conclude the alliance without further delay, but were told to attend at the next congress to be held at Corinth.

与此同时，斯巴达人也觉察到了骚动正在伯罗奔尼撒蔓延，始作俑者是科林斯，科林斯当时正准备加入阿尔戈斯同盟。于是，斯巴达人便派遣使者前往科林斯，希望能阻止酝酿中的阴谋。这些使者指责科林斯造成了这一切，叮嘱它不能背弃斯巴达与阿尔戈斯结盟。他们指出，它不肯接受与雅典订立的和约已是罪过，不能再违背自己的誓

言了，因为和约中已清楚地规定，除非神或英雄予以阻止，否则多数盟邦作出的决定即具约束力。科林斯事先已将那些同它一样拒绝接受和约的盟邦召集前来，这时便当着那些盟邦的面答复了斯巴达人。科林斯没有公开陈诉所受到的伤害，诸如没有从雅典人手中收回索利乌姆或阿纳克托里乌姆，也闭口不提自己在其他方面受到的侵害，而是以不能抛弃在色雷斯的盟友这一借口而避之，因为当初与波提狄亚一同反叛，以及后来，它均曾对这些盟邦单独另作过保证。因此，科林斯否认自己不与雅典缔结和约即是背弃对盟邦的誓约。它曾以神的名义向自己的色雷斯盟友发过誓，所以它实在不能背弃这些盟友。此外，和约上说："除非神或英雄予以阻止。"在科林斯看来，这恰恰就是神阻止的结果。这是科林斯关于以往誓约的说法。至于与阿尔戈斯结盟问题，它要先和自己的盟友商议，然后行正确之事。斯巴达的使者们回去后，恰好也在科林斯的一些阿尔戈斯使者竭力劝说科林斯别再拖延，赶快与他们订立同盟，科林斯却邀请他们出席下次在科林斯举行的协商会议。

Immediately afterwards an Elean embassy arrived, and first making an alliance with Corinth went on from thence to Argos, according to their instructions, and became allies of the Argives, their country being just then at enmity with Lacedaemon and Lepreum. Some time back there had been a war between the Lepreans and some of the Arcadians; and the Eleans being called in by the former with the offer of half their lands, had put an end to the war, and leaving the land in the hands of its Leprean occupiers had imposed upon them the tribute of a talent to the Olympian Zeus. Till the Attic war this tribute was paid by the Lepreans, who then took the war as an excuse for no longer doing so, and upon the Eleans using force appealed to Lacedaemon. The case was thus submitted to her arbitrament; but the Eleans, suspecting the fairness of the tribunal, renounced the reference and laid waste the Leprean territory. The Lacedaemonians nevertheless decided that the

Lepreans were independent and the Eleans aggressors, and as the latter did not abide by the arbitration, sent a garrison of heavy infantry into Lepreum. Upon this, the Eleans, holding that Lacedaemon had received one of their rebel subjects, put forward the convention providing that each confederate should come out of the Attic war in possession of what he had when he went into it, and considering that justice had not been done them went over to the Argives, and now made the alliance through their ambassadors, who had been instructed for that purpose. Immediately after them the Corinthians and the Thracian Chalcidians became allies of Argos. Meanwhile, the Boeotians and Megarians, who acted together, remained quiet, being left to do as they pleased by Lacedaemon, and thinking that the Argive democracy would not suit so well with their aristocratic government as the Lacedaemonian constitution.

紧接着，埃利斯的使团也到了。他们首先与科林斯结盟，随后又奉令从那里前往阿尔戈斯，与阿尔戈斯人也结成了盟友。当时，埃利斯正与斯巴达和莱普雷夫姆处于敌对状态。此前一段时间，莱普雷夫姆人与一些阿卡迪亚人之间曾发生战争。莱普雷夫姆人以割让一半土地为条件召来埃利斯人，这才将战火扑灭。埃利斯人虽将这些土地留在了莱普雷夫姆的使用者手中，但要求他们缴纳1塔兰特贡金给奥林匹亚的宙斯。阿提卡的战争爆发前，莱普雷夫姆人一直在如数缴纳这项贡金，后来以战争为借口不再缴纳了。埃利斯人对他们一动用武力，他们立即向斯巴达求救。这样，这个案子就提交给了斯巴达进行仲裁，但埃利斯人怀疑裁决的公正性，宣布放弃接受斯巴达的仲裁，并践踏了莱普雷夫姆的土地。然而，斯巴达人则裁定，莱普雷夫姆人是独立的，埃利斯人是侵略者。由于埃利斯人不肯接受这一仲裁结果，斯巴达人便派了一支重步兵部队进驻了莱普雷夫姆。鉴于斯巴达接纳了一个背叛埃利斯人的属邦，埃利斯人搬出了一份协定，协定上规定：各盟邦撤出阿提卡战争时，应拥有它参战时所享有的一切。他

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因而投向了阿尔戈斯人一边，由肩负缔约之命的使者与阿尔戈斯人缔结了盟约。科林斯人和色雷斯的哈尔基斯人也紧随其后加入了阿尔戈斯同盟。其时，斯巴达虽允许维奥蒂亚人和迈加拉人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他们却行动一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认为，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还不如斯巴达的政体与他们的贵族政府更相适应。

About the same time, in this summer, Athens succeeded in reducing Scione, put the adult males to death, and, making slaves of the women and children, gave the land for the Plataeans to live in. She also brought back the Delians to Delos, moved by her misfortunes in the field and by the commands of the god at Delphi. Meanwhile, the Phocians and Locrians commenced hostilities. The Corinthians and Argives, being now in alliance, went to Tegea to bring about its defection from Lacedaemon, seeing that, if so considerable a state could be persuaded to join, all Peloponnese would be with them. But when the Tegeans said that they would do nothing against Lacedaemon, the hitherto zealous Corinthians relaxed their activity, and began to fear that none of the rest would now come over. Still they went to the Boeotians and tried to persuade them to alliance and a common action generally with Argos and themselves, and also begged them to go with them to Athens and obtain for them a ten days' truce similar to that made between the Athenians and Boeotians not long after the fifty years' treaty, and, in the event of the Athenians refusing, to throw up the armistice, and not make any truce in future without Corinth. These were the requests of the Corinthians. The Boeotians stopped them on the subject of the Argive alliance, but went with them to Athens, where however they failed to obtain the ten days' truce; the Athenian answer being that the Corinthians had truce already, as being allies of Lacedaemon. Nevertheless the Boeotians did not

throw up their ten days' truce, in spite of the prayers and reproaches of the Corinthians for their breach of faith; and these last had to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a de facto armistice with Athens.

大约在这个夏季的同一时候，雅典人成功征服了西奥内，将成年男子尽行处死，把妇女和儿童降为奴隶，将那里的土地交给了普拉蒂亚人居住。他们还将提洛人迁回了提洛岛，一则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遭受的厄运，二则是因为他们在德尔斐接到的神谕。与此同时，福基斯人与洛克里斯人之间也开始了敌对行动。此时已结为同盟的科林斯人与阿尔戈斯人去往泰耶阿，想要促使它叛离斯巴达。他们认为，如果能说服泰耶阿这么重要的城邦加入同盟，整个伯罗奔尼撒就会站到他们一边。但是，泰耶阿人却说，他们不会做任何反对斯巴达的事情，至此，一直奔走甚欢的科林斯人这才放慢脚步，开始担心其余城邦一个也不会转到他们一边来。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去了维奥蒂亚人那里，试图劝说他们入盟，与他们和阿尔戈斯人统一行动。他们还请求维奥蒂亚人与他们一同前往雅典，为他们争取一份十日休战协议，即类似于雅典人与维奥蒂亚人在五十年和约缔结后不久订立的那种。倘若雅典人拒绝，他们就劝维奥蒂亚人撕毁休战条约，并且在没有科林斯参与的情况下，将来也不再与雅典订立任何休战协议。这是科林斯人的请求。维奥蒂亚人虽然没有让他们就加入阿尔戈斯同盟问题再行相劝，但还是偕同他们去了雅典。但是，他们在那里并没有争取到为期十天的休战协议。雅典人答复说，作为斯巴达的盟友，科林斯人与他们早已有休战协议。然而，尽管科林斯人一再恳求，又指责他们违背承诺，维奥蒂亚人仍没有放弃他们的十日休战协议，科林斯人也只好接受了他们与雅典之间的休战事实。

The same summer, the Lacedaemonians marched into Arcadia with their whole levy under Pleistoanax, son of Pausanias, king of Lacedaemon, against the Parrhasians, who were subjects of

Mantinea, and a faction of whom had invited their aid. They also meant to demolish, if possible, the fort of Cypsela which the Mantineans had built and garrisoned in the Parrhasian territory, to annoy the district of Sciritis in Laconia. The Lacedaemonians accordingly laid waste the Parrhasian country, and the Mantineans, placing their town in the hands of an Argive garrison, addressed themselves to the defence of their confederacy, but being unable to save Cypsela or the Parrhasian towns went back to Mantinea. Meanwhile, the Lacedaemonians made the Parrhasians independent, razed the fortress, and returned home.

在同一个夏季，斯巴达国王普利斯托阿纳克斯（保萨尼阿斯的儿子）率领所召集到的全部人马开进阿卡迪亚进攻帕尔哈夏人。帕尔哈夏人是曼提尼亚的臣民，他们中的一个党派曾向斯巴达人求援。如果可能，他们还打算摧毁基普塞拉要塞（这一要塞是曼提尼亚人在帕尔哈夏境内修建的，并派有军队驻守），以骚扰拉科尼亚境内的斯基里蒂斯地区。因此，斯巴达人践踏了帕尔哈夏的乡村；曼提尼亚人把自己的城镇交由阿尔戈斯的军队驻守，自己则把注意力放在了守卫盟邦领土上。但是，他们既未能保全基普塞拉，也未能拯救帕尔哈夏的城镇，只好返回曼提尼亚去了。斯巴达人则帮助帕尔哈夏人获得了独立，把要塞夷为平地，然后收兵回去了。

The same summer, the soldiers from Thrace who had gone out with Brasidas came back, having been brought from thence after the treaty by Clearidas; and the Lacedaemonians decreed that the Helots who had fought with Brasidas should be free and allowed to live where they liked, and not long afterwards settled them with the Neodamodes at Lepreum, which is situated on the Laconian and Elean border; Lacedaemon being at this time at enmity with Elis. Those however of the Spartans who had been taken prisoners on the

island and had surrendered their arms might, it was feared, suppose that they were to be subjected to some degradation in consequence of their misfortune, and so make some attempt at revolution, if left in possession of their franchise. These were therefore at once disfranchised, although some of them were in office at the time, and thus placed under a disability to take office, or buy and sell anything. After some time, however, the franchise was restored to them.

同年夏季，跟随布拉西达斯出征的士兵从色雷斯回来了，是在和约签订后由克莱阿里扎斯从那里带回来的。斯巴达人下令规定，凡曾跟随布拉西达斯征战的希洛人均可获得自由，并可居住在他们愿意居住的地方。不久之后，他们就与新公民一起被安置在了位于拉科尼亚与埃利斯交界地区的莱普雷夫姆。此时的斯巴达与埃利斯正处于敌对状态。然而，人们对在岛上被俘且缴械投降的斯巴达人却不无担心，唯恐他们觉得自己的不幸遭遇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若是保留他们的公民权，说不定他们会试图造反。因此，这些人的公民权很快就被剥夺了，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当时还担任着公职。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再担任公职了，连买卖的权利也没有了。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公民权。

The same summer, the Dians took Thyssus, a town on Acte by Athos in alliance with Athens. During the whole of this summer,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Athenians and Peloponnesians continued, although each party began to suspect the other directly after the treaty, because of the places specified in it not being restored. Lacedaemon, to whose lot it had fallen to begin by restoring Amphipolis and the other towns, had not done so. She had equally failed to get the treaty accepted by her Thracian allies, or by the Boeotians or the Corinthians; although she was continually

promising to unite with Athens in compelling their compliance, if it were longer refused. She also kept fixing a time at which those who still refused to come in were to be declared enemies to both parties, but took care not to bind herself by any written agreement.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seeing none of these professions performed in fact, began to suspect the honesty of her intentions, and consequently not only refused to comply with her demands for Pylos, but also repented having given up the prisoners from the island, and kept tight hold of the other places, until Lacedaemon's part of the treaty should be fulfilled. Lacedaemon, on the other hand, said she had done what she could, having given up the Athenian prisoners of war in her possession, evacuated Thrace, and performed everything else in her power. Amphipolis it was out of her ability to restore; but she would endeavour to bring the Boeotians and Corinthians into the treaty, to recover Panactum, and send home all the Athenian prisoners of war in Boeotia. Meanwhile, she required that Pylos should be restored, or at all events that the Messenians and Helots should be withdrawn, as her troops had been from Thrace, and the place garrisoned, if necessary, by the Athenians themselves. After a number of different conferences held during the summer, she succeeded in persuading Athens to withdraw from Pylos the Messenians and the rest of the Helots and deserters from Laconia, who were accordingly settled by her at Cranii in Cephallenia. Thus during this summer, there was peace and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同年夏季，迪安人占领了西苏斯，即阿克泰岛上阿索斯附近一个与雅典为盟的城镇。整个夏季，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往来一直在继续。不过，和约刚缔结，他们就开始互相猜疑了，因为双方都没有交还和约中规定的地区。按照抽签结果，斯巴达本该首先交还安菲波利斯和其他城镇，但是却没有这样做。斯巴达也没能使它的色雷

斯盟友、维奥蒂亚人和科林斯人接受和约，尽管它不断向雅典人承诺：如果这些盟邦长久不接受，它就与雅典联手迫使他们接受。斯巴达还不断规定时间，声称届时仍拒不就范者，将会被宣布为双方的敌人，但又有意不以书面形式约束自己。看到斯巴达连一个承诺也没有兑现，雅典人开始怀疑它的诚意，因此不仅拒不依从它对皮洛斯的要求，还后悔交出了岛上俘获的俘虏，对其他地方也紧紧抓着不放，打算等斯巴达履行了协定上规定它应做的部分再行处理。斯巴达人却认为他们已经尽力了，他们释放了手中的雅典战俘，从色雷斯撤回了军队，做了所有力所能及的事。至于收回安菲波利斯，它无能为力。但是，它会尽力使维奥蒂亚人和科林斯人接受和约，收复帕纳克图姆，并将所有留在维奥蒂亚的雅典战俘送回雅典。同时，斯巴达人要求雅典归还皮洛斯，无论如何也得撤走麦西尼亚人和希洛人，因为它的军队已经撤出色雷斯。如果必要，该地可由雅典人自己派兵驻守。整个夏季多次会议之后，斯巴达终于成功说服雅典从皮洛斯撤走了麦西尼亚人、剩余的希洛人以及拉科尼亚逃亡者。这些人后来由雅典安置在了凯法莱尼亚境内的克拉尼。因此，在这个夏季，双方一直处于和平状态，并且互有往来。

Next winter, however, the ephors under whom the treaty had been made were no longer in office, and some of their successors were directly opposed to it. Embassies now arrived from the Lacedaemonian confederacy, and the Athenians, Boeotians, and Corinthians also presented themselves at Lacedaemon, and after much discussion and no agreement between them, separated for their several homes; when Cleobulus and Xenares, the two ephors who were the most anxious to break off the treaty, took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privately with the Boeotians and Corinthians, and, advising them to act as much as possible together, instructed the former first to enter into alliance with Argos, and then try and bring themselves and the Argives into alliance with Lacedaemon. The Boeotians would so be least likely to

be compelled to come into the Attic treaty; and the Lacedaemonians would prefer gaining the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of Argos even at the price of the hostility of Athens and the rupture of the treaty. The Boeotians knew that an honourable friendship with Argos had been long the desire of Lacedaemon; for the Lacedaemonians believed that this would considerably facilitate the conduct of the war outside Peloponnese. Meanwhile, they begged the Boeotians to place Panactum in her hands in order that she might, if possible, obtain Pylos in exchange for it, and so be more in a position to resume hostilities with Athens.

然而，到了冬季，斯巴达方面主持缔结条约的民选五长官已不在任，接替他们的人中有些对和约持断然反对的态度。这时，斯巴达同盟的各个使团到了，雅典人、维奥蒂亚人和科林斯人也来到了斯巴达。不断磋商彼此并没有达成协议，于是又各自回去了。这时，五长官之中最急于中止和约的两位——克莱奥布洛斯和克赛纳雷斯，利用这次机会私下与维奥蒂亚人和科林斯人联系，建议他们尽可能联合采取行动，并劝维奥蒂亚人先与阿尔戈斯结盟，然后再设法使自己和阿尔戈斯人与斯巴达结成同盟，这样，维奥蒂亚人被迫接受与雅典所签和约的几率才最低；而斯巴达人，即便以遭到雅典敌视以及和约被毁为代价，也要赢得阿尔戈斯的友谊和同盟。维奥蒂亚人知道，长久以来，斯巴达人一直渴望与阿尔戈斯建立体面的友谊，因为他们相信，这样会大大方便他们在伯罗奔尼撒以外进行战争。同时，他们还恳请维奥蒂亚人将帕纳克图姆交给斯巴达，以便在可能时用它换回皮洛斯。这样，在与雅典重开战火时，斯巴达就可以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After receiving these instructions for their governments from Xenares and Cleobulus and their friends at Lacedaemon, the Boeotians and Corinthians departed. On their way home they were

joined by two persons high in office at Argos, who had waited for them on the road, and who now sounded them upon the possibility of the Boeotians joining the Corinthians, Eleans, and Mantineans in becoming the allies of Argos, in the idea that if this could be effected they would be able, thus united, to make peace or war as they pleased either against Lacedaemon or any other power. The Boeotian envoys were pleased at thus hearing themselves accidentally asked to do what their friends at Lacedaemon had told them; and the two Argives perceiving that their proposal was agreeable, departed with a promise to send ambassadors to the Boeotians. On their arrival the Boeotians reported to the Boeotarchs what had been said to them at Lacedaemon and also by the Argives who had met them, and the Boeotarchs, pleased with the idea, embraced it with the more eagerness from the lucky coincidence of Argos soliciting the very thing wanted by their friends at Lacedaemon. Shortly afterwards ambassadors appeared from Argos with the proposals indicated; and the Boeotarchs approved of the terms and dismissed the ambassadors with a promise to send envoys to Argos to negotiate the alliance.

听取了克赛纳雷斯和克莱奥布洛斯以及他们在斯巴达的朋友对他们政府的建议之后，维奥蒂亚人和科林斯人就离去了。在返回途中，他们遇到两个在阿尔戈斯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这两人是特地在路上等他们的。二人试探性地询问他们有无这种可能性：维奥蒂亚人和科林斯人、埃利斯人以及曼提尼亚人一起与阿尔戈斯结为同盟。他们认为，如果能实现这一点，他们就能以联合之势随心所欲地对斯巴达或其他任何势力宣战或求和了。意外听到有人要求他们做斯巴达的朋友要他们做的事，维奥蒂亚的使者非常高兴。两个阿尔戈斯人觉得他们的建议很受对方欢迎，离开时承诺要派遣使者前往维奥蒂亚。这些维奥蒂亚人一回去，就将斯巴达人和中途遇到的阿尔戈斯人对他们所言禀报给了同盟官。同盟官们听到这个想法后很高兴，由于阿尔戈斯的

请求与斯巴达的朋友们所要求的不谋而合，他们更乐于采纳了。不久之后，阿尔戈斯的使者就前来向他们提出了上述建议，同盟官们不但赞成他们提出的条件，打发他们走时还承诺派使者前往阿尔戈斯商议结盟一事。

In the meantime, it was decided by the Boeotarchs, the Corinthians, the Megarians, and the envoys from Thrace first to interchange oaths together to give help to each other whenever it was required and not to make war or peace except in common; after which the Boeotians and Megarians, who acted together, should make the alliance with Argos. But before the oaths were taken the Boeotarchs communicated these proposals to the four councils of the Boeotians, in whom the supreme power resides, and advised them to interchange oaths with all such cities as should be willing to enter into a defensive league with the Boeotians. But the members of the Boeotian councils refused their assent to the proposal, being afraid of offending Lacedaemon by entering into a league with the deserter Corinth; the Boeotarchs not having acquainted them with what had passed at Lacedaemon and with the advice given by Cleobulus and Xenares and the Boeotian partisans there, namely, that they should become allies of Corinth and Argos as a preliminary to a junction with Lacedaemon; fancying that, even if they should say nothing about this, the councils would not vote against what had been decided and advised by the Boeotarchs. This difficulty arising, the Corinthians and the envoys from Thrace departed without anything having been concluded; and the Boeotarchs, who had previously intended after carrying this to try and effect the alliance with Argos, now omitted to bring the Argive question before the councils, or to send to Argos the envoys whom they had promised; and a general coldness and delay ensued in the matter.

在此期间，维奥蒂亚的同盟官、科林斯人、迈加拉人和色雷斯的使者们决定，首先要共同宣誓，以便在需要时互相帮助，并且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同进退。交换完誓言后，行动一致的维奥蒂亚人和迈加拉人应与阿尔戈斯结为同盟。但是，在宣誓之前，同盟官们将这些提议通报给了维奥蒂亚四个拥有最高权利的议事会，建议他们与所有愿与维奥蒂亚结成防守同盟的城邦交换誓言。然而，维奥蒂亚议事会的成员们却拒绝通过这一建议，担心与背弃斯巴达同盟的科林斯结盟会得罪斯巴达。同盟官们事先并没有向他们交代清楚在斯巴达发生的事，也没有讲明克莱奥布洛斯、克赛纳雷斯和那里的维奥蒂亚支持者所提的建议，即：要与斯巴达联合，首先应与科林斯和阿尔戈斯结盟。他们原以为，即使他们对这一点只字不提，议事会也不会投票否决同盟官们的决定和建议。计划受挫，科林斯人和色雷斯的使者两手空空地离去了。此前本打算提议通过后就与阿尔戈斯结盟的同盟官们，也未再向议事会提及阿尔戈斯问题，更没有按照承诺向阿尔戈斯派遣使者，整个事情就这样被搁置。

In this same winter, Mecyberna was assaulted and taken by the Olynthians, having an Athenian garrison inside it.

同年冬季，奥林索斯人攻占了雅典人驻守的迈基贝尔纳。

All this while negotiations had been going on between the Athenians and Lacedaemonians about the conquests still retained by each, and Lacedaemon, hoping that if Athens were to get back Panactum from the Boeotians she might herself recover Pylos, now sent an embassy to the Boeotians, and begged them to place Panactum and their Athenian prisoners in her hands, in order that she might exchange them for Pylos. This the Boeotians refused to

do, unless Lacedaemon made a separate alliance with them as she had done with Athens. Lacedaemon knew that this would be a breach of faith to Athens, as it had been agreed that neither of them should make peace or war without the other; yet wishing to obtain Panactum which she hoped to exchange for Pylos, and the party who pressed fo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treaty strongly affecting the Boeotian connection, she at length concluded the alliance just as winter gave way to spring; and Panactum was instantly razed. And so the eleventh year of the war ended.

这期间，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一直在就交还彼此侵占的领土问题进行谈判。斯巴达希望，如果雅典从维奥蒂亚人那里收回帕纳克图姆，他们自己或许能收复皮洛斯，于是便派遣使者去见维奥蒂亚人，恳求他们将帕纳克图姆和俘获的雅典战俘交由自己管理，这样它就有可能换回皮洛斯了。维奥蒂亚却拒绝这样做，除非斯巴达像与雅典那样也与他们单独结为同盟。斯巴达明白，这样做将会失信于雅典，因为当初双方曾达成一致，没有另外一方的参与，双方均不得单独议和或发动战争。然而，由于很想获得帕纳克图姆用它来交换皮洛斯，竭力主张终止和约的那一派又强烈倾向于加强与维奥蒂亚的联系，在冬春交替之时，斯巴达终于与维奥蒂亚结成了同盟。帕纳克图姆即刻被夷为平地。战争第十一年就这样结束了。

In the first days of the summer following, the Argives, seeing that the promised ambassadors from Boeotia did not arrive, and that Panactum was being demolished, and that a separate alliance had been concluded between the Boeotians and Lacedaemonians, began to be afraid that Argos might be left alone, and all the confederacy go over to Lacedaemon. They fancied that the Boeotians had been persuaded by the Lacedaemonians to raze Panactum and to enter into the treaty with the Athenians, and that

Athens was privy to this arrangement, and even her alliance, therefore, no longer open to them—a resource which they had always counted upon, by reason of the dissensions existing, in the event of the noncontinuance of their treaty with Lacedaemon. In this strait the Argives, afraid that, as the result of refusing to renew the treaty with Lacedaemon and of aspiring to the supremacy in Peloponnese, they would have the Lacedaemonians, Tegeans, Boeotians, and Athenians on their hands all at once, now hastily sent off Eustrophus and Aeson, who seemed the persons most likely to be acceptable, as envoys to Lacedaemon, with the view of making as good a treaty as they could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upon such terms as could be got, and being left in peace.

次年夏季之初，阿尔戈斯人看到维奥蒂亚答应派遣的使者没有来，帕纳克图姆又被夷平，维奥蒂亚人还与斯巴达人单独结成了同盟，他们便害怕起来，害怕阿尔戈斯被孤立，担心所有盟邦都倒向斯巴达一边。他们猜想，斯巴达人已经说服维奥蒂亚人将帕纳克图姆夷为平地并接受与雅典人的和约，而雅典对这一安排私下里也是知情的，因此，就连与雅典结盟也不再有希望了。由于斯巴达与雅典之间龃龉不断，阿尔戈斯人本来一直指望，万一他们与斯巴达的条约难以为继，还有与雅典结盟这条出路。身陷窘境的阿尔戈斯人担心，如果拒绝与斯巴达续约，并对伯罗奔尼撒的霸主地位心怀渴望，到头来可能会与斯巴达人、泰耶阿人、维奥蒂亚人以及雅典人同时为敌。因此，他们立即派遣似乎最有可能为对方所接纳的埃夫斯特罗富斯和埃松作为使者前往斯巴达，指望他们能够借助一切可利用的条件，与对方缔结一份尽可能满意的条约，保自身无虞。

Having reached Lacedaemon, their ambassadors proceeded to negotiate the terms of the proposed treaty. What the Argives first demanded was that they might be allowed to refer to the arbitration

of some state or private person the question of the Cynurian land, a piece of frontier territory about which they have always been disputing, and which contains the towns of Thyrea and Anthene, and is occupied by the Lacedaemonians. The Lacedaemonians at first said that they could not allow this point to be discussed, but were ready to conclude upon the old terms. Eventually, however, the Argive ambassadors succeeded in obtaining from them this concession: for the present there was to be a truce for fifty years, but it should be competent for either party, there being neither plague nor war in Lacedaemon or Argos, to give a formal challenge and decide the question of this territory by battle, as on a former occasion, when both sides claimed the victory; pursuit not being allowed beyond the frontier of Argos or Lacedaemon. The Lacedaemonians at first thought this mere folly; but at last, anxious at any cost to have the friendship of Argos they agreed to the terms demanded, and reduced them to writing. However, before any of this should become binding, the ambassadors were to return to Argos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ir people and, in the event of their approval, to come at the feast of the Hyacinthia and take the oaths.

他们的使者抵达斯巴达后，遂开始与斯巴达商谈拟议中的条约条款。阿尔戈斯人首先提出的要求是，允许他们以仲裁的方式解决基努里亚那块土地的问题，仲裁方可以是某个城邦，也可以是某个人，这里所指的是边界上一直存在争议的一块土地，包括西雷阿和安塞内两座城镇在内，目前由斯巴达人占据。斯巴达人起初说，他们不能接受这一议题，但愿意就原有条款缔结条约。然而，阿尔戈斯的使者最终还是成功使对方认可了这一办法：双方暂时缔结一个为期五十年的休战协定。但是，既然先前交战时双方都觉得自己是胜方，如果斯巴达或阿尔戈斯未发生疫情或战事，双方均有权向另一方正式发起挑战，通过战争方式解决这块领土的归属问题，但在追击时不许跨过阿尔戈斯或斯巴达的边界。斯巴达人起初觉得这一规定纯属荒唐，但考虑到

无论如何也要争取获得阿尔戈斯的友谊，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对方提出的条件，并以书面形式写入条约。然而，在其中任何条款发生效力之前，阿尔戈斯的使者须返回阿尔戈斯向人民汇报，获得批准后，他们方可在希阿辛夏节期间前来宣誓。

The envoys returned accordingly. In the meantime, while the Argives were engaged in these negotiations, the Lacedaemonian ambassadors—Andromedes, Phaedimus, and Antimenidas—who were to receive the prisoners from the Boeotians and restore them and Panactum to the Athenians, found that the Boeotians had themselves razed Panactum, upon the plea that oaths had been anciently exchanged between their people and the Athenians, after a dispute on the subject to the effect that neither should inhabit the place, but that they should graze it in common. As for the Athenian prisoners of war in the hands of the Boeotians, these were delivered over to Andromedes and his colleagues, and by them conveyed to Athens and given back. The envoys at the same time announced the razing of Panactum, which to them seemed as good as its restitution, as it would no longer lodge an enemy of Athens. This announcement was received with great indignation by the Athenians, who thought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had played them false, both in the matter of the demolition of Panactum, which ought to have been restored to them standing, and in having, as they now heard, made a separate alliance with the Boeotians, in spite of their previous promise to join Athens in compelling the adhesion of those who refused to accede to the treaty. The Athenians also considered the other points in which Lacedaemon had failed in her compact, and thinking that they had been overreached, gave an angry answer to the ambassadors and sent them away.

于是，使者们就回去了。其间，在阿尔戈斯人忙于这些谈判的同时，斯巴达的使者安兹罗迈泽斯、费季穆斯和安蒂迈尼扎斯本来准备把俘虏从维奥蒂亚人手中接收过来，连同帕纳克图姆一并交还给雅典人，结果却发现维奥蒂亚人竟已将帕纳克图姆夷为平地。他们的借口是，很久以前，他们和雅典人在这个问题上曾存在争议，但后来他们交换了誓言，大意是双方都不能在此居住，但都可以在此放牧。至于他们手中的雅典战俘，维奥蒂亚人则交给安兹罗迈泽斯及其同僚，由他们押解到雅典交还给了雅典人。这些使者同时还把帕纳克图姆被夷平一事告诉了雅典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似乎与归还无异，因为这里不会再有雅典的敌人了。雅典人听罢之后却很愤慨，他们觉得斯巴达人背信弃义地耍了他们，不管是在夷平帕纳克图姆的问题上，还是在单独与维奥蒂亚人结盟一事上。他们认为，该要塞本该完好无损地交与他们；至于他们现在才听说的结盟一事，先前斯巴达人曾承诺与雅典一起迫使那些拒绝加入的城邦接受和约。雅典人还想到了斯巴达人没能履约的其他方面，他们认为自己受了骗，所以很不客气地答复了这些使者，然后把他们打发走了。

The breach between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thenians having gone thus far, the party at Athens, also, who wished to cancel the treaty, immediately put themselves in motion. Foremost amongst these was Alcibiades, son of Clinias, a man yet young in years for any other Hellenic city, but distinguished by the splendour of his ancestry. Alcibiades thought the Argive alliance really preferable, not that personal pique had not also a great deal to do with his opposition; he being offended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for having negotiated the treaty through Nicias and Laches, and having overlooked him on account of his youth, and also for not having shown him the respect due to the ancient connection of his family with them as their proxeni, which, renounced by his grandfather, he had lately himself thought to renew by his attentions to their prisoners taken in the island. Being thus, as he thought, slighted on

all hands, he had in the first instance spoken against the treaty, saying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were not to be trusted, but that they only treated, in order to be enabled by this means to crush Argos, and afterwards to attack Athens alone; and now, immediately upon the above occurring, he sent privately to the Argives, telling them to com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o Athens, accompanied by the Mantineans and Eleans, with proposals of alliance; as the moment was propitious and he himself would do all he could to help them.

斯巴达人与雅典人之间的裂痕就这样一点点扩大，希望终止和约的那派雅典人立时活跃起来。其中为首的人物是克利尼亚斯的儿子——年纪尚轻的亚西比德。在希腊其他各城邦中，他都算是年轻的，但因家世显赫而崭露头角。亚西比德认为与阿尔戈斯结盟的确更可取。不过，他反对与斯巴达订立的和约，与他认为个人的自尊受到伤害也大有关系；他对斯巴达人感到不快，一是因为斯巴达人通过尼西亚斯和拉凯斯与雅典人谈了缔约事宜，却欺他年轻而忽视了他；二是因为他们没有给他以应有的尊重，而这种尊重是他的家族一直为他们作为代理人所应得的。他的祖父虽然放弃了这一职务，但他最近想借着对岛上被俘人员的关注而重拾家族旧业。由于认为自己在各方面受到了轻视，他首先声言反对这个和约。他说，斯巴达人是靠不住的，他们来谈判的目的只是为了通过这种办法征服阿尔戈斯，然后再进攻孤立无援的雅典。现在发生了以上之事，他立即私下派人去见阿尔戈斯人，让他们尽快在曼提尼亚人和埃利斯人的陪同下赶到雅典提出结盟建议。他还说，因为时机很有利，他本人也要尽倾力相助。

Upon receiving this message and discovering that the Athenians, far from being privy to the Boeotian alliance, were involved in a serious quarrel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the Argives paid no further attention to the embassy which they had just sent to

Lacedaemon on the subject of the treaty, and began to incline rather towards the Athenians, reflecting that, in the event of war, they would thus have on their side a city that was not only an ancient ally of Argos, but a sister democracy and very powerful at sea. They accordingly at once sent ambassadors to Athens to treat for an alliance, accompanied by others from Elis and Mantinea.

接到这一讯息后，阿尔戈斯人这才发现，雅典人非但对与维奥蒂亚结盟一事毫不知情，反而与斯巴达陷入了严重的分歧之中。于是，阿尔戈斯人不再关注就和约问题刚刚派往斯巴达的使团，而是开始转向雅典人一边。他们认为，万一发生战争，到时身边就会有这样一个城邦：它不仅是阿尔戈斯的故盟友，而且与他们一样实行民主政治，海军力量也非常强大。因此，他们立刻派遣使者前往雅典商谈结盟事宜，同行的还有一些埃利斯人和曼提尼亚人。

At the same time arrived in haste from Lacedaemon an embassy consisting of persons reputed well disposed towards the Athenians—Philocharidas, Leon, and Endius—for fear that the Athenians in their irritation might conclude alliance with the Argives, and also to ask back Pylos in exchange for Panactum, and in defence of the alliance with the Boeotians to plead that it had not been made to hurt the Athenians. Upon the envoys speaking in the senate upon these points, and stating that they had come with full powers to settle all others at issue between them, Alcibiades became afraid that, if they were to repeat these statements to the popular assembly, they might gain the multitude, and the Argive alliance might be rejected, and accordingly had recourse to the following stratagem. He persuaded the Lacedaemonians by a solemn assurance that if they would say nothing of their full powers in the assembly, he would give back Pylos to them (himself, the present

opponent of its restitution, engaging to obtain this from the Athenians), and would settle the other points at issue. His plan was to detach them from Nicias and to disgrace them before the people, as being without sincerity in their intentions, or even common consistency in their language, and so to get the Argives, Eleans, and Mantineans taken into alliance. This plan proved successful. When the envoys appeared before the people, and upon the question being put to them, did not say as they had said in the senate, that they had come with full powers, the Athenians lost all patience, and carried away by Alcibiades, who thundered more loudly than ever against the Lacedaemonians, were ready instantly to introduce the Argives and their companions and to take them into alliance. An earthquake, however, occurring, before anything definite had been done, this assembly was adjourned.

与此同时，由大家公认与雅典人关系好的人组成的使团也从斯巴达匆匆赶到了雅典，其中包括菲洛哈里扎斯、莱翁和恩季乌斯。他们一方面担心雅典人一气之下与阿尔戈斯人结盟，另一方面也想用帕克纳图姆换回皮洛斯，另外还想为他们与维奥蒂亚人结盟一事进行辩护，申明他们结盟不是为了伤害雅典人。斯巴达的使者在议事会上就上面几点作了发言，并说明他们此行享有全权处理双方之间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亚西比德听后开始担心起来，倘若他们将如上说明在公民大会上重述一遍，他们就有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与阿尔戈斯结盟一事便可能遭到否决，于是他采取了以下手段：通过庄严的保证使斯巴达人相信，如果他们在公民大会上只字不提他们负有全权一事，他就把皮洛斯还给他们（他目前是归还皮洛斯的反对者，但会去劝雅典人赞同这一点），而且还会设法解决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他的意图是离间斯巴达人与尼西亚斯之间的关系，在公民们面前使他们颜面扫地，让大家觉得他们没有诚意，甚至前后说法不一。这样，他就可以将阿尔戈斯、埃利斯还有曼提尼亚纳入同盟。果然，这一计划获得了成功。当斯巴达的使者出现在公民面前回答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时，他

们所言与当初在议事会上所言果然不同，而且未说自己此行负有全权。雅典人耐心尽失，亚西比德则比以前语气更加强烈地对斯巴达人大发雷霆，结果雅典人被他说动了，准备立即将阿尔戈斯人及其同伴请入会场，接纳他们加入同盟。然而，事情尚未办妥，一场地震袭击了雅典，此次公民大会就此休会。

In the assembly held the next day, Nicias, in spite of the Lacedaemonians having been deceived themselves, and having allowed him to be deceived also in not admitting that they had come with full powers, still maintained that it was best to be friends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and, letting the Argive proposals stand over, to send once more to Lacedaemon and learn her intentions. The adjournment of the war could only increase their own prestige and injure that of their rivals; the excellent state of their affairs making it their interest to preserve this prosperity as long as possible, while those of Lacedaemon were so desperate that the sooner she could try her fortune again the better. He succeeded accordingly in persuading them to send ambassadors, himself being among the number, to invite the Lacedaemonians, if they were really sincere, to restore Panactum intact with Amphipolis, and to abandon their alliance with the Boeotians (unless they consented to accede to the treaty), agreeably to the stipulation which forbade either to treat without the other. The ambassadors were also directed to say that the Athenians, had they wished to play false, might already have made alliance with the Argives, who were indeed come to Athens for that very purpose, and went off furnished with instructions as to any other complaints that the Athenians had to make. Having reached Lacedaemon, they communicated their instructions, and concluded by telling the Lacedaemonians that unless they gave up their alliance with the Boeotians, in the event of their not acceding to the treaty, the

Athenians for their part would ally themselves with the Argives and their friends. The Lacedaemonians, however, refused to give up the Boeotian alliance—the party of Xenares the ephor, and such as shared their view, carrying the day upon this point—but renewed the oaths at the request of Nicias, who feared to return without having accomplished anything and to be disgraced; as was indeed his fate, he being held the author of the treaty with Lacedaemon. When he returned, and the Athenians heard that nothing had been done at Lacedaemon, they flew into a passion, and deciding that faith had not been kept with them, took advantag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Argives and their allies, who had been introduced by Alcibiades, and made a treaty and alliance with them upon the terms following:

在第二天召开的公民大会上，尽管斯巴达人受了骗，而且由于他们不承认自己此行负有全权，害的尼西亚斯也跟着上了当，但尼西亚斯依然坚持，最好还是与斯巴达保持友好关系，先搁置阿尔戈斯的提议，另外要再次打发人去斯巴达探明其意向。他认为，推迟战争只会提高雅典人的威望，损害对手的声誉；雅典人当前诸事顺遂，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这种昌盛状态对他们有利，而斯巴达的情况则非常危急，越早碰运气对它越好。因此，尼西亚斯成功说服雅典人派遣使者前往斯巴达，包括他自己在内。如果斯巴达人真有诚意，那就请他们完整无缺地将帕纳克图姆与安菲波利斯一同交还，并放弃与维奥蒂亚人的同盟（除非维奥蒂亚人同意加入斯巴达与雅典缔结的和约），欣然履行任何一方不得抛开另一方订立条约的约定。使者们还应告诉斯巴达人，要是雅典人想使诈，他们早就与阿尔戈斯人结盟了，因为阿尔戈斯人就是带着这个目的来雅典的。关于不得不吐的其他怨言，雅典人在使者们临行时也对他们作了交代。抵达斯巴达后，他们依命令说明了来意，最后告诉斯巴达人，除非他们放弃与维奥蒂亚人的同盟关系，否则，万一维奥蒂亚人不加入和约，雅典人就会与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友结盟。然而，斯巴达人却拒绝放弃与维奥蒂亚人的同盟——

民选长官克赛纳雷斯所属党派以及与他们想法一致的人在这一点上获得了大家的支持。不过，在尼西亚斯的要求下，斯巴达人重新宣了誓，尼西亚斯担心两手空空地回去遭人耻笑。事实上，由于大家都认为他是与斯巴达缔结和约的推动者，他也确实落得了这一结果。尼西亚斯回来之后，雅典人听说他在斯巴达一无所获而怒气冲天，认为斯巴达人没有信守对他们的承诺，便趁着亚西比德介绍的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友还在，与他们签订了条约并结为同盟。盟约条款如下：

The Athenians, Argives, Mantineans, and Eleans, acting for themselves and the allies in their respective empires, made a treaty for a hundred years, to be without fraud or hurt by land and by sea.

雅典人、阿尔戈斯人、曼提尼亚人和埃利斯人，代表自身和各自帝国内的盟邦，愿缔结一个百年有效的条约，以使各方不得在陆上或海上彼此欺诈或伤害。

1．It shall not be lawful to carry on war, either for the Argives, Eleans, Mantineans, and their allies, against the Athenians, or the allies in the Athenian empire: or for the Athenians and their allies against the Argives, Eleans, Mantineans, or their allies, in any way or means whatsoever.

1．阿尔戈斯人、埃利斯人、曼提尼亚人及其盟邦，无论以何种方式或手段向雅典人或雅典帝国内的盟邦开战均属非法；雅典人及其盟邦无论以何种方式或手段向阿尔戈斯人、埃利斯人、曼提尼亚人或其盟邦开战亦属非法。

The Athenians, Argives, Eleans, and Mantineans shall be allies for a hundred years upon the terms following:

雅典人、阿尔戈斯人、埃利斯人和曼提尼亚人将依据以下条款结为百年同盟：

2．If an enemy invade the country of the Athenians, the Argives, Eleans, and Mantineans shall go to the relief of Athens, according as the Athenians may require by message, in such way as they most effectually can, to the best of their power. But if the invader be gone after plundering the territory, the offending state shall be the enemy of the Argives, Mantineans, Eleans, and Athenians, and war shall be made against it by all these cities;and no one of the cities shall be able to make peace with that state, except all the above cities agree to do so.

2．如有敌入侵雅典的领土，阿尔戈斯人、埃利斯人和曼提尼亚人将根据雅典人所传信息中的要求，以最有效的方式倾全力对雅典施以援救。但如入侵者在践踏了其领土之后扬长而去，入侵的城邦将成为阿尔戈斯人、曼提尼亚人、埃利斯人和雅典人共同的敌人，所有这些城邦均要与之为战。非经以上所有城邦同意，其中任何一个城邦不得单独与之讲和。

3．Likewise the Athenians shall go to the relief of Argos, Mantinea, and Elis, if an enemy invade the country of Elis, Mantinea, or Argos, according as the above cities may require by message, in such way as they most effectually can, to the best of their power. But if the invader be gone after plundering the

territory, the state offending shall be the enemy of the Athenians, Argives, Mantineans, and Eleans, and war shall be made against it by all these cities, and peace may not be made with that state except all the above cities agree to it.

3．同样，如有敌入侵阿尔戈斯、曼提尼亚或埃利斯的领土，雅典人将根据以上城邦所传信息中的要求，以其最有效的方式倾全力对阿尔戈斯、曼提尼亚和埃利斯施以援救。但如入侵者在践踏了其领土之后扬长而去，入侵的城邦将成为雅典人、阿尔戈斯人、曼提尼亚人和埃利斯人共同的敌人，所有这些城邦均要与之为战。非经以上所有城邦同意，其中任何一个城邦不得单独与之讲和。

4．No armed force shall be allowed to pass for hostile purposes through the country of the powers contracting, or of the allies in their respective empires, or to go by sea, except all the cities—that is to say, Athens, Argos, Mantinea, and Elis—vote for such passage.

4．非经所有城邦（即雅典、阿尔戈斯、曼提尼亚和埃利斯）投票赞成，任何武装部队不得出于敌对目的通过缔约城邦或各自帝国内盟邦的领土，亦不得通过其控制下的海域。

5．The relieving troops shall be maintained by the city sending them for thirty days from their arrival in the city that has required them, and upon their return in the same way;if their services be desired for a longer period, the city that sent for them shall maintain them, at the rate of three Aeginetan obols per day for a heavy-armed soldier, archer, or light soldier, and an Aeginetan drachma for a trooper.

5．救援部队在抵达求救城邦之后三十天内由派遣城邦提供给养，返回途中亦应如此。如效力时间超过三十天，则求援城邦须负责其给养，标准为：重步兵、弓箭手或轻步兵，每人每天3个埃伊纳奥卜尔；骑兵每人每天1个埃伊纳德拉克马。

6．The city sending for the troops shall have the command when the war is in its own country;but in case of the cities resolving upon a joint expedition the command shall be equally divided among all the cities.

6．当战争在自己境内进行时，求援的城邦对援军拥有指挥权；但如果各城邦决定联合远征，指挥权则应由各城邦平均分担。

7．The treaty shall be sworn to by the Athenians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allies, by the Argives, Mantineans, Eleans, and their allies, by each state individually. Each shall swear the oath most binding in his country over full-grown victims; the oath being as follows:

7．雅典人须代表自己及其盟邦对此条约宣誓；阿尔戈斯人、曼提尼亚人、埃利斯人及其盟邦的宣誓须逐一进行。各城邦均须以本城邦最具约束力的方式宣誓，宣誓时须用成年牲畜作祭品。誓言如下：

“I stand by the alliance and its articles, justly, innocently, and sincerely, and I will not transgress the same in any way or means whatsoever.”

“我谨以公正、无欺和真诚的态度遵守本盟约及其条款，绝不以任何方式或手段违之。”

The oath shall be taken at Athens by the Senate and the magistrates, the Prytanes administering it;at Argos by the Senate, the Eighty, and the Artynae, the Eighty administering it;at Mantinea by the Demiurgi, the Senate, and the other magistrates, the Theori and Polemarchs administering it;at Elis by the Demiurgi, the magistrates, and the Six Hundred, the Demiurgi and the Thesmophylaces administering it. The oaths shall be renewed by the Athenians going to Elis, Mantinea, and Argos thirty days before the Olympic games;by the Argives, Mantineans, and Eleans going to Athens ten days before the great feast of the Panathenaea. The articles of the treaty, the oaths, and the alliance shall be inscribed on a stone pillar by the Athenians in the citadel, by the Argives in the market-place, in the temple of Apollo;by the Mantineans in the temple of Zeus, in the market-place;and a brazen pillar shall be erected jointly by them at the Olympic games now at hand. Should the above cities see good to make any addition in these articles, whatever all the above cities shall agree upon, after consulting together, shall be binding.

在雅典的宣誓应由元老商议会和地方行政官执行，主席团负责实施；在阿尔戈斯的宣誓应由元老商议会、八十人议事会和阿提奈执行，八十人议事会负责实施；在曼提尼亚的宣誓应由十执行官、元老商议会和其他地方行政官执行，宗教官和司令官负责实施；在埃利斯的宣誓应由执行官、地方行政官和六百人议事会执行，执行官和司法官负责实施。在距离奥林匹克竞赛会三十日之前，雅典人应到埃利斯、曼提尼亚和阿尔戈斯重新宣誓；在距离泛雅典娜节十日之前，阿

尔戈斯人、曼提尼亚人和埃利斯人应去往雅典重新进行宣誓。本条约的各项条款、誓言以及盟约应刻在石柱上。雅典人应将石柱立于卫城，阿尔戈斯人应将石柱立于阿波罗神庙的市场上，曼提尼亚人应将石柱立于市场上的宙斯神庙中；在即将到来的这次奥林匹克竞赛会上，缔约各方要共同竖立一根铜柱。以上诸城邦如认为有必要对上述条款予以补充，凡经上述各城邦协商一致同意者均具约束力。

Although the treaty and alliances were thus concluded, still the treaty between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thenians was not renounced by either party. Meanwhile, Corinth, although the ally of the Argives, did not accede to the new treaty, any more than she had done to the alliance,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formed before this between the Eleans, Argives, and Mantineans, when she declared herself content with the first alliance, which was defensive only, and which bound them to help each other, but not to join in attacking any. The Corinthians thus stood aloof from their allies, and again turned their thoughts towards Lacedaemon.

尽管条约和同盟如此缔结了，但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均未宣布放弃他们之间的条约。同时，科林斯虽然与阿尔戈斯人为盟，但并未加入这一新条约，也没有加入此前埃利斯人、阿尔戈斯人和曼提尼亚人结成的攻守同盟。它只是宣布，有第一个同盟足矣，而该同盟只是防御性的，仅要求彼此相助，而不要求参与对他方的进攻。这样一来，科林斯人就游离于其盟邦之外了，转而又考虑投向斯巴达一方。

At the Olympic games which were held this summer, and in which the Arcadian Androsthenes was vict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wrestling and boxing, the Lacedaemonian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temple by the Eleans, and thus prevented from sacrificing or

contending, for having refused to pay the fine specified in the Olympic law imposed upon them by the Eleans, who alleged that they had attacked Fort Phyrcus, and sent heavy infantry of theirs into Lepreum during the Olympic truce. The amount of the fine was two thousand minae, two for each heavy-armed soldier, as the law prescribes. The Lacedaemonians sent envoys, and pleaded that the imposition was unjust; saying that the truce had not yet been proclaimed at Lacedaemon when the heavy infantry were sent off. But the Eleans affirmed that the armistice with them had already begun (they proclaim it first among themselves), and that the aggression of the Lacedaemonians had taken them by surprise while they were living quietly as in time of peace, and not expecting anything. Upon this, the Lacedaemonians submitted, that if the Eleans really believed that they had committed an aggression, it was useless after that to proclaim the truce at Lacedaemon; but they had proclaimed it notwithstanding, as believing nothing of the kind, and from that moment the Lacedaemonians had made no attack upon their country. Nevertheless the Eleans adhered to what they had said, that nothing would persuade them that an aggression had not been committed; if, however, the Lacedaemonians would restore Lepreum, they would give up their own share of the money and pay that of the god for them.

在这年夏季举行的奥林匹克竞赛会上，阿卡迪亚人安兹罗斯赛内斯首次在摔跤和拳击赛中获胜，斯巴达人则由于拒绝交纳埃利斯人按照奥林匹克法律规定对他们处以的罚款而被埃利斯人拒之于神庙之外，因而未能参加祭祀和竞赛活动。埃利斯人声称，在奥林匹克竞赛会休战期间，斯巴达人曾对菲尔库斯要塞发动进攻，还派重步兵开进了莱普雷夫姆。按照法律规定，每个重步兵罚款2迈纳，共计2,000迈纳。斯巴达人派来使节，申辩称这一处罚有失公正。他们说，重步兵被派出时，休战一事尚未在斯巴达宣布。但是，埃利斯人却坚持认

为，当时他们已经开始休战（他们首先是在自己人中宣布的），如同在和平时期一样过着宁静的生活，没有预料到会出什么事，斯巴达的入侵让他们措手不及。关于这一点，斯巴达人认为，如果那时埃利斯人确实认为斯巴达有侵略之过，其后就没必要在斯巴达宣布休战了，但他们还是宣布了，可见他们并不认为存在侵略之事，况且从宣布停战那时起，斯巴达人就没有进攻过他们的领土。然而，埃利斯人却坚持自己的说法，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斯巴达人没有实施侵略这一说法。不过，如果斯巴达人同意归还莱普雷夫姆，他们将放弃罚款中自己应得的那份，还将替斯巴达人支付贡献给神的那份。

As this proposal was not accepted, the Eleans tried a second. Instead of restoring Lepreum, if this was objected to, the Lacedaemonians should ascend the altar of the Olympian Zeus, as they were so anxious to have access to the temple, and swear before the Hellenes that they would surely pay the fine at a later day. This being also refused, the Lacedaemonian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temple, the sacrifice, and the games, and sacrificed at home; the Lepreans being the only other Hellenes who did not attend. Still the Eleans were afraid of the Lacedaemonians sacrificing by force, and kept guard with a heavy-armed company of their young men; being also joined by a thousand Argives, the same number of Mantineans, and by some Athenian cavalry who stayed at Harpina during the feast. Great fears were felt in the assembly of the Lacedaemonians coming in arms, especially after Lichas, son of Arcesilaus, a Lacedaemonian, had been scourged on the course by the umpires; because, upon his horses being the winners, and the Boeotian people being proclaimed the victor on account of his having no right to enter, he came forward on the course and crowned the charioteer, in order to show that the chariot was his. After this incident all were more afraid than ever, and firmly looked for a disturbance;the Lacedaemonians, however, kept quiet, and let the

feast pass by, as we have seen. After the Olympic games, the Argives and the allies repaired to Corinth to invite her to come over to them. There they found some Lacedaemonian envoys; and a long discussion ensued, which after all ended in nothing, as an earthquake occurred, and they dispersed to their different homes.

由于斯巴达人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埃利斯人又提出一个办法。如果斯巴达人不愿交还莱普雷夫姆，既然他们十分渴望能够进入神庙，那就应该走上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祭坛，在希腊人面前发誓，他们以后一定交付罚款。这一提议同样遭到了斯巴达人的拒绝，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挡在了神庙之外，也无法参加祭祀和竞赛活动，只好在本邦举行祭祀。其他希腊人中，唯有莱普雷夫姆人没有出席祭祀和竞赛会。然而，埃利斯人仍担心斯巴达人以武力强行参加祭祀，他们便安排了一队身着重甲的年轻人担任警戒。协助他们的有1,000名阿尔戈斯人，还有1,000名曼提尼亚人以及庆祝活动期间逗留在哈尔皮纳的一些雅典骑兵。竞赛会期间，大家都很担心斯巴达人会全副武装前来，尤其是在斯巴达人利哈斯（阿凯西劳斯的儿子）在赛场上被裁判严惩之后。他被惩罚的原因是这样：利哈斯的双轮马车获胜后，裁判员却宣布胜利者是维奥蒂亚人，理由是利哈斯无权参赛。于是利哈斯便走进赛场，把胜利之冠戴在御者头上，以示他是那辆获胜马车的主人。这一事件发生后，大家比以前担心更甚，总觉得肯定会出事。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斯巴达人一直没有什么动静，庆祝活动就这么过去了。奥林匹克竞赛会结束之后，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友前往科林斯，邀请科林斯加入他们一边。他们发现一些斯巴达使者也在那里。经过长时间协商，但没什么结果，后因发生地震，他们就各自回本邦去了。

Summer was now over. The winter following a battle took place between the Heracleots in Trachinia and the Aenianians, Dolopians, Malians, and certain of the Thessalians, all tribes

bordering on and hostile to the town, which directly menaced their country. Accordingly, after having opposed and harassed it from its very foundation by every means in their power, they now in this battle defeated the Heracleots, Xenares, son of Cnidis, their Lacedaemonian commander, being among the slain. Thus the winter ended and the twelfth year of this war ended also. After the battle, Heraclea was so terribly reduced that in the first days of the summer following the Boeotians occupied the place and sent away the Lacedaemonian Agesippidas for misgovernment, fearing that the town might be taken by the Athenians while the Lacedaemonians were distracted with the affairs of Peloponnese. The Lacedaemonians, nevertheless, were offended with them for what they had done.

夏季这时也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冬季里，特拉希尼亚的赫拉克利亚人与埃尼安尼亚人、多洛皮亚人、马利亚人以及一些色萨利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这些部族与赫拉克利亚城都是近邻，但全都对它持敌视态度，因为它直接威胁着他们的领土安全。因此，自从这座城建立之后，他们就尽己所能以各种方式反对和侵扰它。这一仗中，他们打败了赫拉克利亚人，杀死了他们的斯巴达司令官克赛纳雷斯（克尼季斯的儿子）。这个冬季就这样结束了，战争的第十二年亦随之结束。这一仗之后，赫拉克利亚实力锐减，致使维奥蒂亚人在随后那个夏初占领了该地。由于担心雅典人趁斯巴达人为伯罗奔尼撒之事分心之际夺取该城，他们以管理无方为由将斯巴达人阿耶西皮扎斯打发走了。然而，他们的做法还是冒犯了斯巴达人。

The same summer, Alcibiades, son of Clinias, now one of the generals at Athens, in concert with the Argives and the allies, went into Peloponnese with a few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and archers and some of the allies in those parts whom he took up as he passed,

and with this army marched here and there through Peloponnese, and settled various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alliance, and among other things induced the Patrians to carry their walls down to the sea, intending himself also to build a fort near the Achaean Rhium. However, the Corinthians and Sicyonians, and all others who would have suffered by its being built, came up and hindered him.

同一个夏季，克利尼亚斯的儿子、当时已是雅典将军之一的亚西比德在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友的协同配合下，率领少数雅典重步兵和弓箭手以及他在途中吸纳的当地一些盟军开进了伯罗奔尼撒。凭借这支军队，他进军伯罗奔尼撒各地，处理了与同盟相关的各种事务，其中包括说服帕特雷人将城墙修至海边，他自己也打算在亚该亚的里乌姆附近建一个要塞。然而，科林斯人和西锡安人以及所有其他担心要塞的修建会使自己蒙受损害的人，全都赶来阻止了他的计划。

The same summer war broke out between the Epidaurians and Argives. The pretext was that the Epidaurians did not send an offering for their pasture-land to Apollo Pythaeus, as they were bound to do, the Argives having the chief management of the temple; but, apart from this pretext, Alcibiades and the Argives were determined, if possible, to gain possession of Epidaurus, and thus to ensure the neutrality of Corinth and give the Athenians a shorter passage for their reinforcements from Aegina than if they had to sail round Scyllaeum. The Argives accordingly prepared to invade Epidaurus by themselves, to exact the offering.

在同一个夏季，埃皮达鲁斯人与阿尔戈斯人之间爆发了战争。阿尔戈斯人发动战争的借口是，埃皮达鲁斯人没有按规定为他们的牧场向皮塞夫斯的阿波罗献祭，阿尔戈斯人是这个神庙的主要管理方。除

了这个借口之外，亚西比德和阿尔戈斯人还商定，如果可能就夺取埃皮达鲁斯，这样既能使科林斯保持中立，又能为雅典人从埃伊纳岛获取援兵提供一条比绕道斯基莱夫姆更近的海上通道。于是，阿尔戈斯人准备单独入侵埃皮达鲁斯，以迫使它缴纳祭品。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Lacedaemonians marched out with all their people to Leuctra upon their frontier, opposite to Mount Lycaeum, under the command of Agis, son of Archidamus, without any one knowing their destination, not even the cities that sent the contingents. The sacrifices, however, for crossing the frontier not proving propitious, the Lacedaemonians returned home themselves, and sent word to the allies to be ready to march after the month ensuing, which happened to be the month of Carneus, a holy time for the Dorians. Upon the retreat of the Lacedaemonians the Argives marched out on the last day but three of the month before Carneus, and keeping this as the day during the whole time that they were out, invaded and plundered Epidaurus. The Epidaurians summoned their allies to their aid, some of whom pleaded the month as an excuse; others came as far as the frontier of Epidaurus and there remained inactive.

大约在同时，斯巴达人全军出动，在阿希达穆斯之子亚基斯的率领下，开向边境处正对着利凯夫姆山的留克特拉。没人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是何方，连派军参战的盟邦也不知晓。然而，由于过境祭祀没有预示吉兆，斯巴达人又折回去了，并传令各盟邦过了下个月再准备进军，因为下个月正好是卡尔内夫斯月。对于多里安人来说，卡尔内夫斯月是圣月。斯巴达人刚退回去，阿尔戈斯人就出兵了，时间是卡尔内夫斯月之前那个月的倒数第四天，并且在整个远征期间，把每一天都说成是那一天。他们入侵并劫掠了埃皮达鲁斯。埃皮达鲁斯人召请他们的盟邦前去相助，但有的以当月是圣月为借口不肯赴援，有的开

到埃皮达鲁斯的边境处就按兵不动了。

While the Argives were in Epidaurus embassies from the cities assembled at Mantinea, upon the invitation of the Athenians. The conference having begun, the Corinthian Euphamidas said that their actions did not agree with their words; while they were sitting deliberating about peace, the Epidaurians and their allies and the Argives were arrayed against each other in arms; deputies from each party should first go and separate the armies, and then the talk about peace might be resumed. In compliance with this suggestion, they went and brought back the Argives from Epidaurus, and afterwards reassembled, but without succeeding any better in coming to a conclusion; and the Argives a second time invaded Epidaurus and plundered the country. The Lacedaemonians also marched out to Caryae; but the frontier sacrifices again proving unfavourable, they went back again, and the Argives, after ravaging about a third of the Epidaurian territory, returned home. Meanwhile, a thousand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had come to their aid under the command of Alcibiades, but finding that the Lacedaemonian expedition was at an end, and that they were no longer wanted, went back again.

阿尔戈斯人入侵埃皮达鲁斯期间，各城邦的使团应雅典人之邀聚集到了曼提尼亚。会议开始后，科林斯的埃夫法米扎斯发言说，他们言行不一；埃皮达鲁斯人及其盟友正在列阵与阿尔戈斯人兵戎相见，他们却端坐在这里商讨和平问题；各方代表应当首先去劝解双方军队，然后再讨论和平问题。他们接受了这个建议，先去将阿尔戈斯人从埃皮达鲁斯劝了回来，尔后才重新聚在一起商谈，但还是没能得出任何结论。阿尔戈斯人再次入侵埃皮达鲁斯，劫掠了它的土地。斯巴达人的军队也出发前往卡里埃，但过境祭祀再度显示出不祥之兆，他

们又折回去了。阿尔戈斯人则在践踏了埃皮达鲁斯三分之一的土地后才返回本邦。与此同时，亚西比德带领1,000名雅典重步兵前来支援阿尔戈斯人，结果发现斯巴达人的远征已告结束，阿尔戈斯人已不再需要援助，他们就又回去了。

So passed the summer. The next winter, the Lacedaemonians managed to elude the vigilance of the Athenians, and sent in a garrison of three hundred men to Epidaurus, under the command of Agesippidas. Upon this, the Argives went to the Athenians and complained of their having allowed an enemy to pass by sea, in spite of the clause in the treaty by which the allies were not to allow an enemy to pass through their country. Unless, therefore, they now put the Messenians and Helots in Pylos to annoy the Lacedaemonians, they, the Argives, should consider that faith had not been kept with them. The Athenians were persuaded by Alcibiades to inscribe at the bottom of the Laconian pillar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had not kept their oaths, and to convey the Helots at Cranii to Pylos to plunder the country; but for the rest they remained quiet as before. During this winter, hostilities went on between the Argives and Epidaurians, without any pitched battle taking place, but only forays and ambuscades, in which the losses were small and fell now on one side and now on the other. At the close of the winter, towards the beginning of spring, the Argives went with scaling ladders to Epidaurus, expecting to find it left unguarded on account of the war and to be able to take it by assault, but returned unsuccessful. And the winter ended, and with it the thirteenth year of the war ended also.

这个夏季就这样过去了。在接下来的冬季，在阿耶西皮扎斯的指挥下，斯巴达人设法躲过雅典人的警戒，将一支300人的军队派驻到

了埃皮达鲁斯。阿尔戈斯人知晓后就去找雅典人，埋怨他们不顾条约上盟邦不得允许敌人经过其领土的明文规定，竟允许敌人由海路通过。因此，除非雅典人立即将麦西尼亚人和希洛人派往皮洛斯侵扰斯巴达人，否则，他们就认为雅典人对他们不守信用。亚西比德说服雅典人在拉科尼亚的石柱下面加刻了“斯巴达人未遵守誓言”字样，并把克拉尼的希洛人派往皮洛斯劫掠了这座城市。对于其他地区，他们则仍像以前一样没有采取行动。在这个冬季，阿尔戈斯人与埃皮达鲁斯人之间的战事仍在继续，不过没有发生对阵战，只有袭击战和伏击战。双方虽然都有伤亡，但数量不大。冬去春来之时，阿尔戈斯人带着云梯开赴埃皮达鲁斯，希望那里因战乱而无人防守，这样就能以强攻夺取该城，结果却无功而返。随着冬季的结束，战争的第十三年亦结束了。

In the middle of the next summer, the Lacedaemonians, seeing the Epidaurians, their allies, in distress, and the rest of Peloponnese either in revolt or disaffected, concluded that it was high time for them to interfere if they wished to stop the progress of the evil, and accordingly with their full force, the Helots included, took the field against Argos, under the command of Agis, son of Archidamus, king of the Lacedaemonians. The Tegeans and the other Arcadian allies of Lacedaemon joined in the expedition. The allies from the rest of Peloponnese and from outside mustered at Phlius; the Boeotians with five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and as many light troops, and five hundred horse and the same number of dismounted troopers; the Corinthians with two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the rest more or less as might happen; and the Phliasians with all their forces, the army being in their country.

次年仲夏时节，斯巴达人看到自己的盟友埃皮达鲁斯人遭遇困境，伯罗奔尼撒其他城邦不是叛离就是疏远它，他们认为，如果要遏

制这种不利局面的蔓延，现在该是干预的时候了。于是，斯巴达国王亚基斯（阿希达穆斯之子）率领包括希洛人在内的全部兵力，对阿尔戈斯发起进攻。泰耶阿人和斯巴达的其他阿卡迪亚盟友也参加了这次远征。从伯罗奔尼撒其他地区和伯罗奔尼撒以外来的盟邦军队都集合在弗利奥斯。维奥蒂亚人带来重步兵和轻步兵各5,000名，骑兵和徒步兵各500名；科林斯人带了2,000名重步兵；其余盟邦也都或多或少带了些兵力；弗利奥斯人则带来了全部兵力，至此，整个大军集结于弗利奥斯。

The preparations of the Lacedaemonians from the first had been known to the Argives, who did not, however, take the field until the enemy was on his road to join the rest at Phlius. Reinforced by the Mantineans with their allies, and by three thousand Elean heavy infantry, they advanced and fell in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at Methydrium in Arcadia. Each party took up its position upon a hill, and the Argives prepared to engage the Lacedaemonians while they were alone; but Agis eluded them by breaking up his camp in the night, and proceeded to join the rest of the allies at Phlius. The Argives discovering this at daybreak, marched first to Argos and then to the Nemean road, by which they expected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would come down. However, Agis, instead of taking this road as they expected, gave the Lacedaemonians, Arcadians, and Epidaurians their orders, and went along another difficult road, and descended into the plain of Argos. The Corinthians, Pellenians, and Phliasians marched by another steep road; while the Boeotians, Megarians, and Sicyonians had instructions to come down by the Nemean road where the Argives were posted, in order that, if the enemy advanced into the plain against the troops of Agis, they might fall upon his rear with their cavalry. These dispositions concluded, Agis invaded the plain and began to ravage Saminthus and other places.

阿尔戈斯人从一开始就知道斯巴达人在进行准备，但一直到敌人踏上前往弗利奥斯与其他盟军会合之路，他们才开赴战场。在曼提尼亚人及其盟邦军队和3,000名埃利斯重步兵的支援下，他们在阿卡迪亚的迈西兹里乌姆与斯巴达人狭路相逢。双方在山上就位后，阿尔戈斯人准备趁斯巴达孤立无援时与之交战，但亚基斯却趁着黑夜拔营而起，避开他们，继续前往弗利奥斯与其他盟军会合。阿尔戈斯人在黎明时分发现这一情况后，先是向阿尔戈斯挺进，尔后奔向奈迈阿大道，他们预料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军队会从那里下来。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亚基斯没有走这条路，而是命令斯巴达人、阿卡迪亚人以及埃皮达鲁斯人沿着另外一条比较难行的路下到阿尔戈斯平原。科林斯人、佩莱内人和弗利奥斯人沿着另一条比较崎岖的路向前进发，维奥蒂亚人、迈加拉人和西锡安人则奉命从阿尔戈斯人设岗的奈迈阿大道下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敌人进入平原与亚基斯的部队交战，他们便可利用骑兵袭击敌军后部。部署完这些之后，亚基斯向平原挺进，开始劫掠萨明苏斯和其他地方。

Discovering this, the Argives came up from Nemea, day having now dawned. On their way they fell in with the troops of the Phliasians and Corinthians, and killed a few of the Phliasians and had perhaps a few more of their own men killed by the Corinthians. Meanwhile, the Boeotians, Megarians, and Sicyonians, advancing upon Nemea according to their instructions, found the Argives no longer there, as they had gone down on seeing their property ravaged, and were now forming for battle, the Lacedaemonians imitating their example. The Argives were now completely surrounded; from the plain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shut them off from their city; above them were the Corinthians, Phliasians, and Pellenians; and on the side of Nemea the Boeotians, Sicyonians, and Megarians. Meanwhile, their army was without cavalry, the Athenians alone among the allies not having yet

arrived. Now the bulk of the Argives and their allies did not see the danger of their position, but thought that they could not have a fairer field, having intercepted the Lacedaemonians in their own country and close to the city. Two men, however, in the Argive army, Thrasylus, one of the five generals, and Alciphron, the Lacedaemonian proxenus, just as the armies were upon the point of engaging, went and held a parley with Agis and urged him not to bring on a battle, as the Argives were ready to refer to fair and equal arbitration whatever complaints the Lacedaemonians might have against them, and to make a treaty and live in peace in future.

阿尔戈斯人发现这一情况后，连忙从奈迈阿赶了过来，这时天已破晓。在途中，他们与弗利奥斯人和科林斯人的部队狭路相逢，杀死了少数弗利奥斯人，但被科林斯人杀死的己方士兵可能更多一些。与此同时，奉命向奈迈阿进发的维奥蒂亚人、迈加拉人和西锡安人却发现阿尔戈斯人已不在那里。阿尔戈斯人一见自己的财产遭到毁坏就下来了，此时正在列阵准备战斗，斯巴达人也跟着开始列阵。阿尔戈斯人这时已完全被包围。斯巴达人及其盟军从平原切断了阿尔戈斯人与其城市之间的联系。他们上方是科林斯人、弗利奥斯人和佩莱内人；奈迈阿一侧是维奥蒂亚人、西锡安人和迈加拉人。当时，他们军中没有骑兵，盟邦军队中只有雅典人尚未赶到。大多数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军这时并未觉察出自己处于危险之地，反而以为战地位置对他们来说再有利不过，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土地及附近切断了斯巴达人同外界的联系。但是，在两军即将交战之际，阿尔戈斯军中的两个人前去同亚基斯洽谈，其中一个是五位将军之一斯拉西卢斯，另一个是斯巴达在阿尔戈斯的代理人阿尔西弗龙。这两人都劝他不要开战，因为阿尔戈斯人已经准备将斯巴达人对他们可能有的抱怨全都提请公正而公平的裁决，并准备缔结一项条约，今后和平度日。

The Argives who made these statements did so upon their own

authority, not by order of the people, and Agis on his accepted their proposals, and without himself either consulting the majority, simply communicated the matter to a single individual, one of the high officers accompanying the expedition, and granted the Argives a truce for four months, in which to fulfil their promises; after which he immediately led off the army without giving any explanation to any of the other allies.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llies followed their general out of respect for the law, but amongst themselves loudly blamed Agis for going away from so fair a field (the enemy being hemmed in on every side by infantry and cavalry) without having done anything worthy of their strength. Indeed, this was by far the finest Hellenic army ever yet brought together; and it should have been seen while it was still united at Nemea,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in full force, the Arcadians, Boeotians, Corinthians, Sicyonians, Pellenians, Phliasians and Megarians, and all these the flower of their respective populations, thinking themselves a match not merely for the Argive confederacy, but for another such added to it. The army thus retired blaming Agis, and returned every man to his home. The Argives however blamed still more loudly the persons who had concluded the truce without consulting the people, themselves thinking that they had let escape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an opportunity such as they should never see again; as the struggle would have been under the walls of their city, and by the side of many and brave allies. On their return accordingly they began to stone Thrasylus in the bed of the Charadrus, where they try all military causes before entering the city. Thrasylus fled to the altar, and so saved his life; his property however they confiscated.

这些话是这两个阿尔戈斯人自作主张去说的，并没有受命于众人。亚基斯也没有同大多数人商议，仅与随其出征的高级军官中的一

位沟通了此事，就自作主张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答应阿尔戈斯人休战四个月，以便阿尔戈斯人在此期间履行他们的诺言。其后，他也没向其他盟军作任何解释，就立即率军撤离了。出于对法律的尊重，斯巴达人及其盟军都跟着这位将军撤走了，但彼此却高声指责亚基斯抛开如此有利的战地优势（敌人已被步兵和骑兵四面合围）就撤离，自己的力量丝毫没有得到施展。实际上，这次召集的军队是希腊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军队。在奈迈阿集合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了。斯巴达人动用了全部人马，阿卡迪亚人、维奥蒂亚人、科林斯人、西锡安人、佩莱内人、弗利奥斯人和迈加拉人等派出的也都是各自的精锐之师。他们认为自己不仅能与阿尔戈斯同盟相匹敌，就是再加上这样一个同盟，他们也对付得了。这支军队就这样怀揣着对亚基斯的不满撤走了，各自返回了本邦。然而，阿尔戈斯人对于不征求众人的意见就订立休战协议者指责更甚，他们觉得自己放过了一个绝难再逢的对付斯巴达人的机会，因为战事本来会发生在他们自己城下，而且会有很多勇敢的盟友与他们并肩作战。因此，在回国途中，他们在哈拉兹鲁斯河床开始朝斯拉西卢斯扔石头，那里是他们入城前审理军事案件的地方。斯拉西卢斯飞快地逃向祭坛，这才保住性命，但他的财产被没收了。

After this arrived a thousand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and three hundred horse, under the command of Laches and Nicostratus; whom the Argives, being nevertheless loath to break the truce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begged to depart, and refused to bring before the people, to whom they had a communication to make, until compelled to do so by the entreaties of the Mantineans and Eleans, who were still at Argos. The Athenians, by the mouth of Alcibiades their ambassador there present, told the Argives and the allies that they had no right to make a truce at all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ir fellow confederates, and now that the Athenians had arrived so opportunely the war ought to be resumed. These arguments proving successful with the allies, they immediately marched upon

Orchomenos, all except the Argives, who, although they had consented like the rest, stayed behind at first, but eventually joined the others. They now all sat down and besieged Orchomenos, and made assaults upon it; one of their reasons for desiring to gain this place being that hostages from Arcadia had been lodged there by the Lacedaemonians. The Orchomenians, alarmed at the weakness of their wall and the numbers of the enemy, and at the risk they ran of perishing before relief arrived, capitulated upon condition of joining the league, of giving hostages of their own to the Mantineans, and giving up those lodged with them by the Lacedaemonians. Orchomenos thus secured, the allies now consulted as to which of the remaining places they should attack next. The Eleans were urgent for Lepreum; the Mantineans for Tegea; and the Argives and Athenians giving their support to the Mantineans, the Eleans went home in a rage at their not having voted for Lepreum; while the rest of the allies made ready at Mantinea for going against Tegea, which a party inside had arranged to put into their hands.

这之后，拉凯斯和尼科斯特拉图斯率领1,000名雅典重步兵和300名骑兵赶到了。但是，阿尔戈斯人不愿破坏他们与斯巴达人订立的休战协议，所以要求雅典人回去。雅典人要求在公民大会上发言，阿尔戈斯人也拒绝了。曼提尼亚人和埃利斯人当时仍在阿尔戈斯，在他们的请求下，阿尔戈斯人才被迫同意。出使那里的亚西比德代表雅典人讲了话，他对阿尔戈斯人和盟友们说，在未征得其他盟邦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权订立休战协议；既然雅典人已适时赶到，战争就该继续进行。这些理由成功说服了各个盟邦。除了阿尔戈斯人之外，其他盟邦的军队立即开始向奥尔霍迈诺斯进发。阿尔戈斯人虽然跟其他盟友一样表示同意，但一开始却趑趄不前，不过最终还是加入了大军。他们这时全都来到奥尔霍迈诺斯城下，将城包围，并发动了进攻。他们想夺取这个地方的原因之一是，阿卡迪亚的人质被斯巴达人

关押在那里。奥尔霍迈诺斯人既为自己的城防薄弱和敌军人数众多而惊恐，又为援军尚未到达即有城池不保之虞而担忧，所以就投降了。投降的条件是加入同盟，向曼提尼亚人交还人质，并将斯巴达人关押在他们那里的人质交出来。奥尔霍迈诺斯就这样被攻克了，同盟军开始商讨下一步该进攻哪个地方。埃利斯人坚持要进攻莱普雷夫姆，曼提尼亚人则主张进攻泰耶阿。阿尔戈斯人和雅典人支持曼提尼亚人。埃利斯人对他们不赞成攻打莱普雷夫姆深为恼火，径自回去了。其余盟军在曼提尼亚准备进攻泰耶阿，城内有一个派别已叛离准备将城交到他们手中。

Meanwhile, the Lacedaemonians, upon their return from Argos after concluding the four months' truce, vehemently blamed Agis for not having subdued Argos, after an opportunity such as they thought they had never had before; for it was no easy matter to bring so many and so good allies together. But when the news arrived of the capture of Orchomenos, they became more angry than ever, and, departing from all precedent, in the heat of the moment had almost decided to raze his house, and to fine him ten thousand drachmae. Agis however entreated them to do none of these things, promising to atone for his fault by good service in the field, failing which they might then do to him whatever they pleased; and they accordingly abstained from razing his house or fining him as they had threatened to do, and now made a law, hitherto unknown at Lacedaemon, attaching to him ten Spartans as counsellors, without whose consent he should have no power to lead an army out of the city.

与此同时，签订了为期四个月的休战协议后，斯巴达人就从阿尔戈斯撤走了。他们回去后，强烈谴责亚基斯没有征服阿尔戈斯，失去了他们认为前所未有的良机，因为把人数这么多、战斗力这么强的盟

军召集到一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当奥尔霍迈诺斯被攻陷的消息传到斯巴达之后，他们更加气愤，竟一反常态，盛怒之下差点决定把亚基斯的房子拆掉，还要对他处以1万德拉克马的罚款。亚基斯请求他们一样都不要做，承诺要在战场上将功补过。倘若他做不到，到那时他会听凭他们处置。因此，斯巴达人没有像他们威胁的那样拆毁他的房子，也没有对他处以罚款，而是制定了一条斯巴达过去不曾有过的法令——派十名斯巴达人给他当顾问，没有这些人的同意，他无权率领军队出城。

At this juncture arrived word from their friends in Tegea that, unless they speedily appeared, Tegea would go over from them to the Argives and their allies, if it had not gone over already. Upon this news a force marched out from Lacedaemon, of the Spartans and Helots and all their people, and that instantly and upon a scale never before witnessed. Advancing to Orestheum in Maenalia, they directed the Arcadians in their league to follow close after them to Tegea, and, going on themselves as far as Orestheum, from thence sent back the sixth part of the Spartans, consisting of the oldest and youngest men, to guard their homes, and with the rest of their army arrived at Tegea; where their Arcadian allies soon after joined them. Meanwhile, they sent to Corinth, to the Boeotians, the Phocians, and Locrians, with orders to come up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o Mantinea. These had but short notice; and it was not easy except all together, and after waiting for each other, to pass through the enemy's country, which lay right across and blocked up the line of communication. Nevertheless they made what haste they could. Meanwhile, the Lacedaemonians with the Arcadian allies that had joined them, entered the territory of Mantinea, and encamping near the temple of Heracles began to plunder the country.

在这个当口，他们在泰耶阿的盟友传来消息：如果他们不迅速开到，泰耶阿将弃他们而去倒向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友，即便他们尚未这样做。接到这个消息后，一支由斯巴达人和希洛人以及他们的所有随从组成的队伍迅速开出斯巴达。其行动之迅速与规模之浩大前所未有。他们一边向迈纳利亚的奥雷斯塞夫姆推进，一边命令同盟内的阿卡迪亚人紧随其后向泰耶阿进发。斯巴达人的军队到达奥雷斯塞夫姆之后，将六分之一的兵力（均为年纪最大和最小的士兵）派回守卫本邦，其余的则开往到了泰耶阿。不久之后，阿卡迪亚的盟军也赶到那里与之会合了。与此同时，他们还打发人去科林斯，并派人通知了维奥蒂亚人、福基斯人和洛克里斯人，命他们尽快将军队开到曼提尼亚。这些通知来得太仓促了，况且要想穿过横挡在交通线上的敌方领土并非易事，除非彼此等候，大家一起过去。不过，这些军队还是尽量往前赶。与此同时，斯巴达人和已与他们会合的阿卡迪亚盟军进入了曼提尼亚境内。在赫拉克勒斯神庙附近扎下营盘后，他们开始劫掠曼提尼亚。

Here they were seen by the Argives and their allies, who immediately took up a strong and difficult position, and formed in order of battle. The Lacedaemonians at once advanced against them, and came on within a stone's throw or javelin's cast, when one of the older men, seeing the enemy's position to be a strong one, hallooed to Agis that he was minded to cure one evil with another; meaning that he wished to make amends for his retreat, which had been so much blamed, from Argos, by his present untimely precipitation. Meanwhile, Agis, whether in consequence of this halloo or of some sudden new idea of his own, quickly led back his army without engaging, and entering the Tegean territory, began to turn off into that of Mantinea the water about which the Mantineans and Tegeans are always fighting, on account of the extensive damage it does to whichever of the two countries it falls into. His object in this was to make the Argives and their allies

come down from the hill, to resist the diversion of the water, as they would be sure to do when they knew of it, and thus to fight the battle in the plain. He accordingly stayed that day where he was, engaged in turning off the water. The Argives and their allies were at first amazed at the sudden retreat of the enemy after advancing so near, and did not know what to make of it; but when he had gone away and disappeared, without their having stirred to pursue him, they began anew to find fault with their generals, who had not only let the Lacedaemonians get off before, when they were so happily intercepted before Argos, but who now again allowed them to run away, without any one pursuing them, and to escape at their leisure while the Argive army was leisurely betrayed. The generals, half-stunned for the moment, afterwards led them down from the hill, and went forward and encamped in the plain, with the intention of attacking the enemy.

这时，他们被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军发现了，后者立即占领了一个坚固而难攻的阵地，并列成战斗队形。斯巴达人立即向他们开过去，两军相隔只有投石或标枪所及之距离。一个年纪较大的士兵发现敌军阵地坚固，突然朝亚基斯大喊，说他成心想将过补过。他的意思是说，亚基斯曾因从阿尔戈斯撤退而大受责难，现在竟想以不合时宜的冒险进攻加以弥补。这时候，或许是受了这个老兵高声呼喝的影响，抑或是他自己突然萌生了新的想法，亚基斯没有上前交战，而是迅速率军掉头开进了泰耶阿境内，开始为河水改道，使之流入曼提尼亚境内。泰耶阿人和曼提尼亚人总是为那条河发生冲突，因为它无论流向两方中哪一方境内都会造成巨大破坏。亚基斯这样做，目的是迫使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军从山上下来阻止河水改道，这样他就可以和敌军在平原上作战了，敌军知道后肯定会那样做。因此，他那天一直待在那里忙于河水改道的事。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军起初对敌人在如此逼近时突然撤离大为惊诧，不知如何解释。但是，当敌人走得不见踪影，而他们却没挪动半步去追击时，他们又开始责备他们的将领。此前斯巴

达人在阿尔戈斯城前意外被截住时，这些将领就让敌人逃跑了，如今他们又让敌人逃之夭夭了，而且没有一个人去追，敌人逃得从容不迫，而阿尔戈斯人却被出卖了。阿尔戈斯的将领们一时间有点怔住了，后来他们率领军队从山上下来，推进到平原地带扎下营盘，打算向敌军发起进攻。

The next day, the Argives and their allies formed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meant to fight, if they chanced to encounter the enemy; and the Lacedaemonians returning from the water to their old encampment by the temple of Heracles, suddenly saw their adversaries close in front of them, all in complete order, and advanced from the hill. A shock like that of the present moment the Lacedaemonians do not ever remember to have experienced;there was scant time for preparation, as they instantly and hastily fell into their ranks, Agis, their king, directing everything, agreeably to the law. For when a king is in the field all commands proceed from him;he gives the word to the Polemarchs; they to the Lochages; these to the Pentecostyes; these again to the Enomotarchs, and these last to the Enomoties. In short all orders required pass in the same way and quickly reach the troops; as almost the whole Lacedaemonian army, save for a small part, consists of officers under officers, and the care of what is to be done falls upon many.

第二天，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军列成战斗队形，准备一和敌人接触就开战。斯巴达人从河道回到他们在赫拉克勒斯神庙附近的老营地后，突然发现敌军就在前面不远处。他们已从山上下来，而且已全部列成战斗队列。在斯巴达人的记忆中，他们从来不曾经历过眼下这种震惊。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准备，立刻匆匆在队伍中各就各位，国王亚基斯则依照法律规定指挥着一切。国王亲临战场时，所有命令均出自国王。他向司令官下达命令，司令官传达给大队长，大队长传达给中

队长，中队长传达给小队长，小队长最后再传达给各小队。总之，需要下达的所有命令均以此方式迅速下达到部队。除了一小部分之外，整个斯巴达军队几乎都是分级隶属的，行动命令的下达由多级军官完成。

In this battle, the left wing was composed of the Sciritae, who in a Lacedaemonian army have always that post to themselves alone; next to these were the soldiers of Brasidas from Thrace, and the Neodamodes with them; then came the Lacedaemonians themselves, company after company, with the Arcadians of Heraea at their side. After these were the Maenalians, and on the right wing the Tegeans with a few of the Lacedaemonians at the extremity; their cavalry being posted upon the two wings. Such was the Lacedaemonian formation. That of their opponents was as follows: On the right were the Mantineans, the action taking place in their country; next to them the allies from Arcadia; after whom came the thousand picked men of the Argives, to whom the state had given a long course of military training at the public expense; next to them the rest of the Argives, and after them their allies, the Cleonaeans and Orneans, and lastly the Athenians on the extreme left, and lastly the Athenians on the extreme left, and their own cavalry with them.

在这次战役中，左翼是西里泰人，他们在斯巴达军中总是单独占据那个位置；西里泰人旁边是布拉西达斯从色雷斯带回来的士兵，以及跟他们在一起的新公民；然后是一队接一队的斯巴达人，他们旁边是海里亚的阿卡迪亚人，这些军队后面是迈纳利亚人；右翼是泰耶阿人，末端有少数斯巴达人；骑兵则分布在两翼。这是斯巴达方面的列队情况。他们的敌方是这样排列的：右翼是曼提尼亚人，因为战争发生在他们境内；挨着他们的是阿卡迪亚的盟军；他们后面是1,000名

阿尔戈斯精兵，城邦以公费对他们进行过长期训练；他们旁边是其余的阿尔戈斯人，这些人后面是阿尔戈斯人的盟友克莱奥奈人和奥尔内埃人；最后是外左翼的雅典人和他们的骑兵。

Such were the order and the forces of the two combatants. The Lacedaemonian army looked the largest; though as to putting down the numbers of either host, or of the contingents composing it, I could not do so with any accuracy. Owing to the secrecy of their government the number of the Lacedaemonians was not known, and men are so apt to brag about the forces of their country that the estimate of their opponents was not trusted. The following calculation, however, makes it possible to estimate the numbers of the Lacedaemonians present upon this occasion. There were seven companies in the field without counting the Sciritae, who numbered six hundred men;in each company there were four Pentecostyes, and in the Pentecosty four Enomoties. The first rank of the Enomoty was composed of four soldiers;as to the depth, although they had not been all drawn up alike, but as each captain chose, they were generally ranged eight deep; the first rank along the whole line, exclusive of the Sciritae, consisted of four hundred and forty-eight men.

这是作战双方的列队和兵力情况。斯巴达军队的规模看起来最大。至于双方军队的数目和下辖各分遣队的具体数字，我无法准确说清。由于斯巴达政府对此保密，其军队的数目无从得知。因为人们总是喜欢吹嘘自己城邦的军队，因而对敌军的估计也不可信。不过，根据下面的计算方法，可以大概估算出斯巴达这次参战的人数。除去600名西里泰人之外，在这次战役中，他们共投入了7队人马，每队有4个中队，每个中队有4个小队。每个小队的前排是4名士兵。至于纵队的人数，各队排列不一，具体由队长决定，一般每列纵队为8人。

整个队列的第一排，除去西里泰人，共有448人。

The armies being now on the eve of engaging, each cont-ingent received some words of encouragement from its own commander. The Mantineans were, reminded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fight for their country and to avoid return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servitude after having tasted that of empire; the Argives, that they would contend for their ancient supremacy, to regain their once equal share of Peloponnese of which they had been so long deprived, and to punish an enemy and a neighbour for a thousand wrongs; the Athenians, of the glory of gaining the honours of the day with so many and brave allies in arms, and that a victory over the Lacedaemonians in Peloponnese would cement and extend their empire, and would besides preserve Attica from all invasions in future. These were the incitements addressed to the Argives and their allies. The Lacedaemonians, meanwhile, man to man, and with their war-songs in the ranks, exhorted each brave comrade to remember what he had learnt before; well aware that the long training of action was of more saving virtue than any brief verbal exhortation, though never so well delivered.

这时，两军交战在即，各分遣队指挥官都对自己的部队讲了一些鼓舞士气的话。曼提尼亚的指挥官提醒曼提尼亚人，他们将要为自己的城邦而战；既然尝到过被帝国奴役的滋味，就要避免再次回到被奴役的状态。阿尔戈斯的指挥官对阿尔戈斯人说，他们要夺回过去享有的霸权，重获他们对伯罗奔尼撒曾经拥有但被剥夺已久的平等地位，同时还要惩处敌人和邻邦所犯下的无数罪行。雅典的指挥官对雅典人说，与如此众多勇敢的盟军并肩作战将是何等的光荣；如果能在伯罗奔尼撒打败斯巴达人，他们的帝国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另外还可以使阿提卡将来不再遭受任何侵犯。这是他们对阿尔戈斯人及其

盟军发出的激励之语。斯巴达人则彼此鼓励，在队列中高唱着战歌，激励每一位勇敢的战友牢记之前的经验教训。他们明白，简短的口头鼓励，不管多么动听，都不如长期的作战训练来得可靠。

After this, they joined battle, the Argives and their allies advancing with haste and fury, the Lacedaemonians slowly and to the music of many flute-players—a standing institution in their army,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religion, but is meant to make them advance evenly, stepping in time, without break their order, as large armies are apt to do in the moment of engaging.

激励之后，两军开始交战。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军推进得急速而迅猛，斯巴达人则踏着众多长笛手演奏的音乐缓缓前行——这是他们军队长期保持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与宗教无关，只是为了使他们行进时动作一致、步伐整齐、队伍不乱，因为大部队交战时很容易混乱。

Just before the battle joined, King Agis resolved upon the following manoeuvre. All armies are alike in this: on going into action they get forced out rather on their right wing, and one and the other overlap with this adversary's left; because fear makes each man do his best to shelter his unarmed side with the shield of the man next him on the right, thinking that the closer the shields are locked together the better will he be protected. The man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this is the first upon the right wing, who is always striving to withdraw from the enemy his unarmed side; and the same apprehension makes the rest follow him. On the present occasion the Mantineans reached with their wing far beyond the Sciritae, and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egeans still farther beyond the Athenians, as their army was the largest. Agis, afraid of his left

being surrounded, and thinking that the Mantineans outflanked it too far, ordered the Sciritae and Brasideans to move out from their place in the ranks and make the line even with the Mantineans, and told the Polemarchs Hipponoidas and Aristocles to fill up the gap thus formed, by throwing themselves into it with two companies taken from the right wing; thinking that his right would still be strong enough and to spare, and that the line fronting the Mantineans would gain in solidity.

在两军即将接战之际，亚基斯国王决定这样调整一下队伍：所有军队在这一点上都一样：投入战斗时，大家总是往右靠，双方的右翼都超出敌人的左翼。出于恐惧心理，每个人都尽力把自己没有武装的一面隐蔽在右侧士兵所持的盾牌下，认为彼此的盾牌靠得越近，就越能得到保护。右翼的第一个人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因为他总是使自己没有盾牌掩护的一侧尽力避开敌人。其他人同样有此担忧，所以纷纷效仿。这一次，曼提尼亚人那一翼的阵线就远远超出了西里泰人；斯巴达人和泰耶阿人则超出雅典人更远，因为他们军队的人数最多。亚基斯很担心自己的左翼被包围，他觉得曼提尼亚人的侧翼延伸得太长了，于是就命令西里泰人和布拉西达斯的军队离开原来的阵位，令己方的战线与曼提尼亚人的长短相当，并要求司令官希波尼扎斯和阿里斯托克莱斯调遣右翼的两队士兵填上队伍移动后留下的缺口。他认为，这样调整后右翼依然会强大有余，与曼提尼亚人对峙的那一翼也会得到加强。

However, as he gave these orders in the moment of the onset, and at short notice, it so happened that Aristocles and Hipponoidas would not move over, for which offence they were afterwards banished from Sparta, as having been guilty of cowardice; and the enemy, meanwhile, closed before the Sciritae (whom Agis on seeing that the two companies did not move over ordered to return to their

place) had time to fill up the breach in question. Now it was, however,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utterly worsted in respect of skill, showed themselves as superior in point of courage. As soon as they came to close quarters with the enemy, the Mantinean right broke their Sciritae and Brasideans, and, bursting in with their allies and the thousand picked Argives into the unclosed breach in their line, cut up and surrounded the Lacedaemonians, and drove them in full rout to the wagons, slaying some of the older men on guard there. But the Lacedaemonians, worsted in this part of the field, with the rest of their army, and especially the centre, where the three hundred knights, as they are called, fought round King Agis, fell on the older men of the Argives and the five companies so named, and on the Cleonaeans, the Orneans, and the Athenians next them, and instantly routed them; the greater number not even waiting to strike a blow, but giving way the moment that they came on, some even being trodden under foot, in their fear of being overtaken by their assailants.

但是，由于命令下得仓促，而且正值进攻开始之时，阿里斯托克莱斯和希波尼扎斯就是不肯把军队移过去（后来他们因这次抗命以临阵畏怯罪被逐出斯巴达）。亚基斯发现这两队人马没有移过去，又命令西里泰人返回原位。期间，西里泰人还没来得及填补那个缺口，敌人就围过来了。就作战技能而言，斯巴达人可谓惨败。然而，在勇敢这一点上，他们却无可比拟。他们一贴近敌人，右翼的曼提尼亚人就攻破了西里泰人和布拉西达斯那支军队组成的防线，与其盟军以及那1,000名阿尔戈斯精兵一起冲向了阵线上尚未填补的缺口，分割并包围了斯巴达人，把溃不成军的斯巴达人赶到了辎重车停放之处，还杀死了在那里防守的一些年纪较大的士兵。但是，斯巴达人在这部分战场上虽然战败了，却利用其余的军队，尤其是阵线中央在国王亚基斯周围作战的那300名人称“武士”者，向年纪较大的阿尔戈斯人（他们如此称呼那五队士兵）以及克莱奥奈人、奥尔内埃人和他们旁边的雅

典人发起了攻击，很快就把这些队伍打垮了。大部分人甚至没等攻击降临，对方一进攻就开始退却。有些人害怕被敌人追上，在逃命时竟自相践踏而死。

The army of the Argives and their allies, having given way in this quarter, was now completely cut in two, and the Lacedaemonian and Tegean right simultaneously closing round the Athenians with the troops that outflanked them, these last found themselves placed between two fires, being surrounded on one side and already defeated on the other. Indeed, they would have suffered more severely than any other part of the army, but for the services of the cavalry which they had with them. Agis also on perceiving the distress of his left opposed to the Mantineans and the thousand Argives, ordered all the army to advance to the support of the defeated wing; and while this took place, as the enemy moved past and slanted away from them, the Athenians escaped at their leisure, and with them the beaten Argive division. Meanwhile, the Mantineans and their allies and the picked body of the Argives ceased to press the enemy, and seeing their friends defeated and the Lacedaemonians in full advance upon them, took to flight. Many of the Mantineans perished; but the bulk of the picked body of the Argives made good their escape. The flight and retreat, however, were neither hurried nor long; the Lacedaemonians fighting long and stubbornly until the rout of their enemy, but that once effected, pursuing for a short time and not far.

这时，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军在此处退却后，完全被分割成了两部分。在右翼的斯巴达人和泰耶阿人利用翼侧延伸出去的部队同时对雅典人形成包围之势；雅典人发现自己遭到了两面夹击：一侧被围，另一侧已经战败。实际上，若不是有骑兵在旁相助，他们的损失会比其

他部队更加惨重。亚基斯在发现己方与曼提尼亚人和那1,000名阿尔戈斯人对阵的左翼处境危险时，曾下令全军前去支援遭到重创的这一翼。可是，正当他调兵遣将时，雅典军队和已被击败的阿尔戈斯人却移师而过，不慌不忙地逃走了。与此同时，曼提尼亚人和他们的盟军以及阿尔戈斯的精锐部队停止了对敌人的进攻。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盟军受挫，斯巴达人又在全力向他们进攻，也开始逃跑。曼提尼亚人被杀者甚多，但阿尔戈斯那支精锐部队大都安然逃脱了。不过，撤与逃都进行得很快，也很从容。斯巴达人虽然打得持久而顽强，直到敌军溃退方才作罢，但达到目的之后，他们只是稍事追击，并未追出多远。

Such was the battle, as nearly as possible as I have described it; the greatest that had occurred for a very long while among the Hellenes, and joined by the most considerable states. The Lacedaemonians took up a position in front of the enemy's dead, and immediately set up a trophy and stripped the slain; they took up their own dead and carried them back to Tegea, where they buried them, and restored those of the enemy under truce. The Argives, Orneans, and Cleonaeans had seven hundred killed; the Mantineans two hundred, and the Athenians and Aeginetans also two hundred, with both their generals. On the side of the Lacedaemonians, the allies did not suffer any loss worth speaking of;as to the Lacedaemonians themselves it was difficult to learn the truth; it is said, however, that there were slain about three hundred of them.

这次战役的情况基本如上所述。这是很久以来希腊人之间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参战方都是最有影响力的城邦。斯巴达人在敌军的尸体前面选了一个位置，马上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并剥掉了死者的衣甲，尔后把己方阵亡者的尸体运回泰耶阿，将他们安葬在那

里。休战后，他们交还了敌方阵亡者的尸体。阿尔戈斯人、奥尔内埃人和克莱奥奈人共阵亡了700人，曼提尼亚人阵亡了200人，雅典和埃伊纳的阵亡者也有200人，包括双方的将军在内。斯巴达人方面的盟军损失很小，均不值一提；斯巴达人自身的损失情况则难以确知。不过，据说他们阵亡了大约300人。

While the battle was impending, Pleistoanax, the other king, set out with a reinforcement composed of the oldest and youngest men, and got as far as Tegea, where he heard of the victory and went back again. The Lacedaemonians also sent and turned back the allies from Corinth and from beyond the Isthmus, and returning themselves dismissed their allies, and kept the Carnean holidays, which happened to be at that time. The imputations cast upon them by the Hellenes at the time, whether of cowardice on account of the disaster in the island, or of mismanagement and slowness generally, were all wiped out by this single action;fortune, it was thought, might have humbled them, but the men themselves were the same as ever.

战事即将发生时，另一位国王普利斯托阿纳克斯曾带着由年事最高和最年轻的士兵组成的援军前去增援。行至泰耶阿后，他听说已经获胜，便又带着人折回去了。斯巴达人还派人去通知从科林斯和地峡以外地区来的盟军回去。他们自己也返乡了，同时遣散了盟军。由于当时恰逢卡尼亚节，他们就都去过节了。当初希腊人加在他们头上的恶名，无论是斯法克泰里亚岛之难带给他们的胆怯懦弱，还是一般印象中的管理不善和行动缓慢，统统都被这一战役洗刷掉了。人们认为，命运可能羞辱过他们，但斯巴达人还是以前的斯巴达人。

The day before this battle, the Epidaurians with all their forces

invaded the deserted Argive territory, and cut off many of the guards left there in the absence of the Argive army. After the battle three thousand Elean heavy infantry arriving to aid the Mantineans, and a reinforcement of one thousand Athenians, all these allies marched at once against Epidaurus, while the Lacedaemonians were keeping the Carnea, and dividing the work among them began to build a wall round the city. The rest left off; but the Athenians finished at once the part assigned to them round Cape Heraeum; and having all joined in leaving a garrison in the fortification in question, they returned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es.

这次战役前一天，埃皮达鲁斯人趁阿尔戈斯的军队外出作战之际，出动全部军队入侵了乏人守卫的阿尔戈斯领土，杀掉了很多留守的士兵。战役结束之后，埃利斯派来支援曼提尼亚人的3,000名重步兵到了，雅典人派来增援的1,000人也到了，这些盟军立即向埃皮达鲁斯发起了进军。斯巴达人边庆祝卡尼亚节，边在埃皮达鲁斯分工修起了围墙。其他盟军都中途放弃了，只有雅典人很快完成了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修筑好环绕海雷夫姆角的那部分围墙。不过，这些盟军都在该工事处留了一支守军，尔后才返回自己城邦。

Summer now came to an end. In the first days of the next winter, when the Carnean holidays were over, the Lacedaemonians took the field, and arriving at Tegea sent on to Argos proposals of accommodation. They had before had a party in the town desirous of overthrowing the democracy; and after the battle that had been fought, these were now far more in a position to persuade the people to listen to terms. Their plan was first to make a treaty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to be followed by an alliance, and after this to fall upon the commons. Lichas, son of Arcesilaus, the Argive proxenus, accordingly arrived at Argos with two proposals from

Lacedaemon, to regulate the conditions of war or peace, according as they preferred the one or the other. After much discussion, Alcibiades happening to be in the town, the Lacedaemonian party, who now ventured to act openly, persuaded the Argives to accept the proposal for accommodation; which ran as follows:

这时，夏季结束了。在下一个冬季刚开始时，卡尼亚节一结束，斯巴达人就出征了。到达泰耶阿后，他们派人去阿尔戈斯，向他们提出和解建议。阿尔戈斯城内早就有一个党派想推翻民主政治，这场战役打完之后，这些人更能说服民众听从斯巴达人的建议了。他们打算首先与斯巴达人缔结和约，进而成立同盟，然后再向民主党人发动进攻。于是，斯巴达派来了阿凯西劳斯的儿子利哈斯，即阿尔戈斯在斯巴达的代理人。他带来了两个建议：一个是协调战争情况的，另一个是协调和平情况的，具体要看阿尔戈斯人选择哪一个。亚西比德恰巧也在阿尔戈斯。经过大量谈判之后，亲斯巴达的党派开始冒然公开采取行动，说服阿尔戈斯人接受了和平建议，内容如下：

The assembly of the Lacedaemonians agrees to treat with the Argives upon the terms following:

斯巴达公民大会同意按照下列条件与阿尔戈斯人展开磋商：

1．The Argives shall restore to the Orchomenians their children, and to the Maenalians their men, and shall restore the men they have in Mantinea to the Lacedaemonians.

1．阿尔戈斯人应将奥尔霍迈诺斯人的子女交还给奥尔霍迈诺斯

人，将迈纳利亚的成年男子交还给迈纳利亚人，并将他们拘留在曼提尼亚的斯巴达人交还给斯巴达人。

2．They shall evacuate Epidaurus, and raze the fortification there. If the Athenians refuse to withdraw from Epidaurus, they shall be declared enemies of the Argives and of the Lacedaemonians, and of the allies of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 allies of the Argives.

2．阿尔戈斯人应撤离埃皮达鲁斯，并拆毁那里的工事。雅典人若不愿撤离埃皮达鲁斯，将被视为阿尔戈斯人和斯巴达人的敌人，以及斯巴达人和阿尔戈斯人盟友的敌人。

3．If the Lacedaemonians have any children in their custody, they shall restore them every one to his city.

3．如斯巴达人拘有其他城邦的儿童，应悉数交还给各自的城邦。

4．As to the offering to the god, the Argives, if they wish, shall impose an oath upon the Epidaurians, but, if not, they shall swear it themselves.

4．关于向神献祭问题，如果阿尔戈斯人愿意，可责成埃皮达鲁斯人立誓；如否，他们自己须立誓。

5．All the cities in Peloponnese, both small and great, shall be independent according to the customs of their country.

5．伯罗奔尼撒以内的所有城邦，无论大小，均可按照本邦习俗保持独立。

6．If any of the powers outside Peloponnese invade Peloponnesian territory, the parties contracting shall unite to repel them, on such terms as they may agree upon, as being most fair for the Peloponnesians.

6．伯罗奔尼撒以外的城邦如果入侵伯罗奔尼撒的领土，各缔约方应依据一致同意的条款，本着对伯罗奔尼撒人最公正的原则，联合起来共御外敌。

7．All allies of the Lacedaemonians outside Peloponnese shall be on the same footing as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 allies of the Argives shall be on the same footing as the Argives, being left in enjoyment of their own possessions.

7．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以外的所有盟邦，均应与斯巴达人同等对待；阿尔戈斯人的盟邦应与阿尔戈斯人同等对待；各城邦均可保留自己的属地。

8．This treaty shall be shown to the allies, and shall be concluded, if they approve; if the allies think fit, they may send the

treaty to be considered at home.

8．本条约应送达各盟邦代表，如其同意，则应缔约；如其认为必要，可将本条约送回城邦考虑。

The Argives began by accepting this proposal, and the Lacedaemonian army returned home from Tegea. After this intercourse was renewed between them, and not long afterwards the same party contrived that the Argives should give up the league with the Mantineans, Eleans, and Athenians, and should make a treaty and alliance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which was consequently done upon the terms following:

阿尔戈斯人首先接受了这个建议，斯巴达军队便从泰耶阿撤回本邦去了。其后双方恢复了往来。不久以后，同一个党派又劝阿尔戈斯人放弃与曼提尼亚人、埃利斯人以及雅典人的同盟，转而与斯巴达订立条约并结为同盟，按照以下条款达成了协议：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rgives agree to a treaty and alliance for fifty years upon the terms following:

斯巴达人和阿尔戈斯人同意订立为期五十年的条约并建立同盟，条件如下：

1．All disputes shall be decided by fair and impartial arbitration, agreeably to the customs of the two countries.

1．所有争端均应通过公平而公正的仲裁方式，按照两城邦的习俗加以解决。

2．The rest of the cities in Peloponnese may be included in this treaty and alliance, as independent and sovereign, in full enjoyment of what they possess, all disputes being decided by fair and impartial arbitration, agreeably to the customs of the said cities.

2．伯罗奔尼撒以内的其他城邦均可作为具有独立主权的城邦加入本条约与同盟，并对其拥有的领土享有完整的主权；所有争端应通过公平而公正的仲裁方式，按照上述城邦的习俗加以解决。

3．All allies of the Lacedaemonians outside Peloponnese shall be upon the same footing as the Lacedaemonians themselves, and the allies of the Argives shall be upon the same footing as the Argives themselves, continuing to enjoy what they possess.

3．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以外的所有盟邦，均应与斯巴达人同等对待；阿尔戈斯人的盟邦应与阿尔戈斯人同等对待，并可继续享有其拥有的领土。

4．If it shall be anywhere necessary to make an expedition in common,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rgives shall consult upon it and decide, as may be most fair for the allies.

4．如有必要对任何一个地方联合进行远征，斯巴达人和阿尔戈斯人须共同商议，并采用对各盟邦最公允的方式作出决定。

5．If any of the cities, whether inside or outside Peloponnese, have a question whether of frontiers or otherwise, it must be settled, but if one allied city should have a quarrel with another allied city, it must be referred to some third city thought impartial by both parties. Private citizens shall have their disputes decid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ir several countries.

5．伯罗奔尼撒以内还是以外的任何城邦发生边界纠纷或其他问题，均须予以解决；但如一盟邦与另一盟邦发生争执，则需提交给双方公认的公正的第三方城邦进行仲裁。公民个人之间的纠纷应按照各自所在城邦的法律予以解决。

The treaty and above alliance concluded, each party at once released everything whether acquired by war or otherwise, and thenceforth acting in common voted to receive neither herald nor embassy from the Athenians unless they evacuated their forts and withdrew from Peloponnese, and also to make neither peace nor war with any, except jointly. Zeal was not wanting: both parties sent envoys to the Thracian places and to Perdiccas, and persuaded the latter to join their league. Still he did not at once break off from Athens, although minded to do so upon seeing the way shown him by Argos, the original home of his family. They also renewed their old oaths with the Chalcidians and took new ones: the Argives, besides, sent ambassadors to the Athenians, bidding them evacuate the fort at Epidaurus. The Athenians, seeing their own men outnumbered by the rest of the garrison, sent Demosthenes to bring

them out. This general, under colour of a gymnastic contest which he arranged on his arrival, got the rest of the garrison out of the place, and shut the gates behind them. Afterwards the Athenians renewed their treaty with the Epidaurians, and by themselves gave up the fortress.

缔结了以上条约并结为同盟后，双方立即交还了通过战争或其他方式获取的一切。因自此须采取一致行动，双方投票决定不接待雅典人派来的传令官或使团，除非雅典人撤离要塞并撤出伯罗奔尼撒；除联合行动外，亦不得与任何城邦单独议和或作战。双方对此都不乏热情，均派出使者前往色雷斯各地并与佩尔狄卡斯接洽，劝他加入他们的同盟。阿尔戈斯是佩尔狄卡斯家族的故乡。看到阿尔戈斯为他指明的道路，他也很想与雅典人断绝关系，但还是没有立即这样做。他们还与哈尔基斯人重新交换了誓言，订立了新誓言。除此之外，阿尔戈斯人还派使者去见雅典人，请他们撤离埃皮达鲁斯的要塞。雅典人看到其他城邦的驻军比自己多，便派狄摩西尼去将自己的驻军撤出来。这位将军到达目的地后，打着组织体育比赛的旗号，将其他驻军调出城，随即关闭了城门。后来，雅典人与埃皮达鲁斯人重订了条约，自己放弃了要塞。

After the defection of Argos from the league, the Mantineans, though they held out at first, in the end finding themselves powerless without the Argives, themselves too came to terms with Lacedaemon, and gave up their sovereignty over the towns. The Lacedaemonians and Argives, each a thousand strong, now took the field together, and the former first went by themselves to Sicyon and made the government there more oligarchical than before, and then both, uniting, put down the democracy at Argos and set up an oligarchy favourable to Lacedaemon. These events occurred at the close of the winter, just before spring; and the fourteenth year of

the war ended. The next summer, the people of Dium, in Athos, revolted from the Athenians to the Chalcidians, and the Lacedaemonians settled affairs in Achaea in a way more agreeable to the interests of their country. Meanwhile, the popular party at Argos little by little gathered new consistency and courage, and waited for the moment of the Gymnopaedic festival at Lacedaemon, and then fell upon the oligarchs. After a fight in the city, victory declared for the commons, who slew some of their opponents and banished others. The Lacedaemonians for a long while let the messages of their friends at Argos remain without effect. At last, they put off the Gymnopaediae and marched to their succour, but learning at Tegea the defeat of the oligarchs, refused to go any further in spite of the entreaties of those who had escaped, and returned home and kept the festival. Later on, envoys arrived with messages from the Argives in the town and from the exiles, when the allies were also at Sparta; and after much had been said on both sides, the Lacedaemonians decided that the party in the town had done wrong, and resolved to march against Argos, but kept delaying and putting off the matter. Meanwhile, the commons at Argos, in fear of the Lacedaemonians, began again to court the Athenian alliance, which they were convinced would be of the greatest service to them; and accordingly proceeded to build long walls to the sea, in order that in case of a blockade by l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Athenians they might have the advantage of importing what they wanted by sea. Some of the cities in Peloponnese were also privy to the building of these walls; and the Argives with all their people, women and slaves not excepted, addressed themselves to the work, while carpenters and masons came to them from Athens.

阿尔戈斯退出与雅典的同盟以后，起初曼提尼亚人还在坚持，但后来发现没有阿尔戈斯人难以为继，自己也与斯巴达达成协议，放弃

了对一些城镇的主权。这时，斯巴达人和阿尔戈斯人各带1,000人同赴战场。斯巴达军队首先单独开赴西锡安，将西锡安政府按照寡头政治的形式进行改组，然后两军联合起来，取缔了阿尔戈斯的民主政体，建立起对斯巴达有利的寡头统治政府。这些事发生在冬去春来之时。战争的第十四年至此结束。翌年夏季，阿索斯的迪乌姆人背弃雅典人，转而投向了哈尔基斯人，斯巴达人则以更符合其城邦利益的方式安排了亚该亚的事务。与此同时，阿尔戈斯的民主党逐渐重新聚集起了力量和勇气。等斯巴达的伊姆诺佩贾节这一时机一到，他们遂对寡头政治集团发起了攻击。城里这一战役过后，民主党宣布获得胜利，他们杀掉了一些政敌，放逐了其他人。斯巴达人得到他们在阿尔戈斯的盟友送来的讯息后，很长时间没有作出回应。最后，他们将伊姆诺佩贾节的庆祝活动推迟，终于出发兵前去相救，但行进到泰耶阿时，听说寡头政治集团已经失败，他们便不肯再继续前进，尽管逃出来的人一再恳求，他们还是回去庆祝伊姆诺佩贾节了。后来，城里的阿尔戈斯人和流亡在外的阿尔戈斯人都派使团带着口信去往斯巴达，当时各盟邦的代表也在斯巴达。双方作了充分陈述之后，斯巴达人认为错在城里那个党派，于是决定向阿尔戈斯进军，但是却一再拖延，推迟行动日期。其间，由于惧怕斯巴达人，阿尔戈斯的民主党再度开始向雅典同盟示好，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对他们最有利。于是，他们继续朝着海边修筑长墙。万一陆路被封锁，借助雅典人的帮助，他们或许可以通过海路获取所需的物资。伯罗奔尼撒的一些城邦私下也参与了长墙的修筑。阿尔戈斯的全体居民，妇女和奴隶也不例外，全都参加了这一工事，雅典也派了木匠和石匠帮助他们。

Summer was now over. The winter following the Lacedaemonians, hearing of the walls that were building, marched against Argos with their allies, the Corinthians excepted, being also not without intelligence in the city itself; Agis, son of Archidamus, their king, was in command. The intelligence which they counted upon within the town came to nothing; they however took and razed the walls which were being built, and after capturing the

Argive town Hysiae and killing all the freemen that fell into their hands, went back and dispersed every man to his city. After this. the Argives marched into Phlius and plundered it for harbouring their exiles, most of whom had settled there, and so returned home. The same winter, the Athenians blockaded Macedonia, on the score of the league entered into by Perdiccas with the Argives and Lacedaemonians, and also of his breach of his engagement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expedition prepared by Athens against the Chalcidians in the direction of Thrace and against Amphipolis, under the command of Nicias, son of Niceratus, which had to be broken up mainly because of his desertion. He was therefore proclaimed an enemy. And thus the winter ended, and the fifteenth year of the war ended with it.

夏季就此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冬季里，斯巴达人听说阿尔戈斯人正在修筑长墙一事，随即率领除科林斯之外的盟邦军队进军阿尔戈斯，城内也有人给他们传递情报。担任指挥官的是阿希达穆斯之子亚基斯国王。他们本指望获得城里的帮助，结果却未能如愿。不过，他们还是占领并捣毁了正在修筑的长墙。攻陷了阿尔戈斯的希夏埃镇并杀掉落到他们手里的所有自由民后，他们收兵返回各自城邦去了。这之后，阿尔戈斯人开进了弗利奥斯，并大肆劫掠了那里，因为那里是大多数阿尔戈斯流亡者的定居之处；之后，他们才返回本邦。在同一个冬季，由于佩尔狄卡斯的缘故，雅典人封锁了马其顿。原因之一是佩尔狄卡斯与阿尔戈斯人和斯巴达人结成了同盟；原因之二是，雅典准备让尼塞拉图斯之子尼西亚斯率军远征色雷斯地区的哈尔基斯人和安菲波利斯时，佩尔狄卡斯未履行诺言。这支远征军后来不得不解散，主要就是因为他未履行同盟之责造成的。因此，雅典人公开与佩尔狄卡斯为敌。这个冬季就这样结束了，战争的第十五年亦就此结束。

CHAPTER XVII Sixteenth Year of the War——The Melian Conference——Fate of Melos

第十七章　战争第十六年——梅卢斯会议——梅卢斯的命运

The next summer, Alcibiades sailed with twenty ships to Argos and seized the suspected persons still left of the Lacedaemonian faction to the number of three hundred, whom the Athenians forthwith lodged in the neighbouring islands of their empire. The Athenians also made an expedition against the isle of Melos with thirty ships of their own, six Chian, and two Lesbian vessels, sixteen hundred heavy infantry, three hundred archers, and twenty mounted archers from Athens, and about fifteen hundred heavy infantry from the allies and the islanders. The Melians are a colony of Lacedaemon that would not submit to the Athenians like the other islanders, and at first remained neutral and took no part in the struggle, but afterwards upon the Athenians using violence and plundering their territory, assumed an attitude of open hostility. Cleomedes, son of Lycomedes, and Tisias, son of Tisimachus, the generals, encamping in their territory with the above armament, before doing any harm to their land, sent envoys to negotiate. These the Melians did not bring before the people, but bade them state the object of their mission to the magistrates and the few; upon which the Athenian envoys spoke as follows:

翌年夏季，亚西比德率领20艘战舰开赴阿尔戈斯，抓获了300名疑为亲斯巴达一党的残余分子。雅典人立即将这些人幽禁在了帝国附近的岛屿上。雅典人还对梅卢斯发动了远征，军队中有雅典战舰30艘，希俄斯战舰6艘，莱斯沃斯战舰2艘；来自雅典的重步兵1,600名，弓箭手300名，乘马弓箭手20名；还有来自盟邦和岛民中的大约1,500名重步兵。梅卢斯人是斯巴达的移民。他们同其他岛民一样，

不肯臣服于雅典人。起初他们还保持中立，不介入这场冲突，但后来由于雅典人使用暴力劫掠了他们的领土，他们便公开与雅典人为敌。远征军的将军是利科迈泽斯之子克莱奥迈季斯和蒂西马胡斯之子蒂夏斯，他们率领上述军队在梅卢斯境内扎下营盘后，没有立即对其土地进行破坏，而是先派使者前去谈判。梅卢斯人没有把这些使者带到公众面前，只是请他们向行政长官和少数人陈述了这次出使的目的。雅典使者的陈述如下：

Athenians: Since the negotiations are not to go on before the people, in order that we may not be able to speak straight on without interruption, and deceive the ears of the multitude by seductive arguments which would pass without refutation (for we know that this is the meaning of our being brought before the few), what if you who sit there were to pursue a method more cautious still? Make no set speech yourselves, but take us up at whatever you do not like, and settle that before going any farther. And first tell us if this proposition of ours suits you.

雅典人：既然你们不准备在公众面前进行协商，目的无非是不让我们不受干扰地直抒己见，不让我们不受辩驳地用具有说服力的辩词有扰公众视听（我们知道，这就是你们把我们带到少数人面前的用意）。请问在座的诸位，如果你们想要寻求一个更加稳妥的办法，又该怎么办呢？那么，你们自己就不要发表准备好的演说，而是听到你们不喜欢的东西就向我们提出来，解决了那个问题再继续向下进行。请首先告诉我们，我们这一建议是否可取。

The Melian commissioners answered:

梅卢斯议事会的委员答复如下：

Melians: To the fairness of quietly instructing each other as you propose there is nothing to object; but your military preparations are too far advanced to agree with what you say, as we see you are come to be judges in your own cause, and that all we can reasonably expect from this negotiation is war, if we prove to have right on our side and refuse to submit, and in the contrary case, slavery.

梅卢斯人：关于你方提出的相互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一点，我们毫无异议。但是，你们的军事准备却与你们所言大不相符。在我们看来，你们是要来为自己充当仲裁者。倘若我们证明正义在我们一边，因而拒不投降，可以想见，我们能够从这次谈判中得到的只有战争；反之，我们就会沦为奴隶。

Athenians: If you have met to reason about presentiments of the future, or for anything else than to consult for the safety of your state upon the facts that you see before you, we will give over; otherwise we will go on.

雅典人：如果你们是来推测未来的种种可能的，或是为了其他事情，而不是基于你们面临的现实就你们城邦的安全进行协商的，我们将放弃这次谈判；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继续谈下去。

Melians: It is natural and excusable for men in our position to turn more ways than one both in thought and utterance. However,

the question in this conference is, as you say, the safety of our country; and the discussion, if you please, can proceed in the way which you propose.

梅卢斯人：处于我们这种境况的人，在想法上和表达方式上不囿于一种方式，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正如你们所说，这次会议的议题是讨论我们城邦的安危问题。如果你们愿意，这种讨论可以按照你们所提出的方式进行。

Athenians: For ourselves, we shall not trouble you with specious pretences—either of how we have a right to our empire because we overthrew the Mede, or are now attacking you because of wrong that you have done us—and make a long speech which would not be believed; and in return we hope that you, instead of thinking to influence us by saying that you did not join the Lacedaemonians, although their colonists, or that you have done us no wrong, will aim at what is feasible, holding in view the real sentiments of us both; since you know as well as we do that right, as the world goes, is only in question between equals in power, while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雅典人：就我们而言，我们是不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借口来烦扰你们的——譬如说，我们推翻了波斯人的统治，所以我们有权掌控我们的帝国；或者说，我们现在进攻你们，是因为你们曾经冒犯过我们。我们也不会发表冗长的演说，那是不会令人信服的。反过来，我们不希望你们通过宣扬虽然是斯巴达的移民，但却没有与斯巴达人联手这一事实而试图对我们施加影响，也不要说你们没有冒犯过我们。我们希望，你们的目标要切实可行，并且照顾到我们双方真实的想

法，因为你们和我们一样明白，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公正只存在于力量对等的双方。强者可以做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承受他们必须承受的一切。

Melians: As we think, at any rate, it is expedient—we speak as we are obliged, since you enjoin us to let right alone and talk only of interest—that you should not destroy what is our common protection, the privilege of being allowed in danger to invoke what is fair and right, and even to profit by arguments not strictly valid if they can be got to pass current. And you are as much interested in this as any, as your fall would be a signal for the heaviest vengeance and an example for the world to meditate upon.

梅卢斯人：既然你们吩咐我们撇开正义，只谈利益，那我们就不得不说，在我们看来，无论如何，你们都不应该破坏我们共享的这份保护，即在危险时刻可以求助于公平与公正的权利，甚至于通过争辩而获益的权利，尽管这些争辩即使被接受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有效争辩。这种权利不仅与他人相关，同样也与你们相关，因为你们一旦衰败，即会引起最强烈的报复，并且会被全世界引以为鉴。

Athenians: The end of our empire, if end it should, does not frighten us: a rival empire like Lacedaemon, even if Lacedaemon was our real antagonist, is not so terrible to the vanquished as subjects who by themselves attack and overpower their rulers. This, however, is a risk that we are content to take. We will now proceed to show you that we are come here in the interest of our empire, and that we shall say what we are now going to sa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your country; as we would fain exercise that empire over you without trouble, and see you preserved for the good of us

both.

雅典人：我们帝国的末日，倘若真的来临，我们也不会为之惊恐。一个像斯巴达这样的敌对帝国，即便斯巴达是我们真正的对手，对于被征服的城邦来说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自发进攻和推翻其统治者的臣民。然而，我们甘冒此险。我们现在要向你们申明，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我们帝国的利益，为了保全你们的城邦，我们必须要说出我们要说的话。这是因为我们更愿意不费吹灰之力地对你们行使最高统治权，设法保全你们，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Melians: And how, pray, could it turn out as good for us to serve as for you to rule?

梅卢斯人：那么，请问，我们当奴隶，你们做主人，结果怎么能对我们有好处呢？

Athenians: Because you would have the advantage of submitting before suffering the worst, and we should gain by not destroying you.

雅典人：因为你们可以享有选择投降而免遭灭顶之灾之利，我们则可以不毁灭你们就达到目的。

Melians: So that you would not consent to our being neutral, friends instead of enemies, but allies of neither side.

梅卢斯人：如此说来，你们不赞成我们保持中立，做朋友而不做敌人但不与任何一边结盟的做法？

Athenians: No; for your hostility cannot so much hurt us as your friendship will be an argument to our subjects of our weakness, and your enmity of our power.

雅典人：不，因为你们的友好比你们的敌视对我们伤害更大。你们的友好，在我们臣民看来，昭示着我们软弱无能；而你们的敌视，则标志着我们势力强大。

Melians: Is that your subjects' idea of equity, to put those wh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you in the same category with peoples that are most of them your own colonists, and some conquered rebels?

梅卢斯人：将那些与你们毫不相干的人与大多是你们的移民、少数是反叛后归顺的人们归为一类，这难道就是你们的臣民对平等的理解吗？

Athenians: As far as right goes they think one has as much of it as the other, and that if any maintain their independence it is because they are strong, and that if we do not molest them it is because we are afraid; so that besides extending our empire we should gain in security by your subjection; the fact that you are islanders and weaker than others rendering it all the more important that you should not succeed in baffling the masters of the sea.

雅典人：就权利而言，他们认为这两种人所享有的是同等的。如果谁能保持独立，那是因为他们强大；如果我们不去干扰他们，那是因为我们有所畏惧。所以，除了扩充我们帝国的领土之外，我们还要通过你们的臣服增强我们的安全。你们是岛民，而且比别的岛民更弱一些，因此，不让你们阻碍我们的海上霸业就最为重要。

Melians: But do you consider that there is no security in the policy which we indicate? For here again if you debar us from talking about justice and invite us to obey your interest, we also must explain ours, and try to persuade you, if the two happen to coincide. How can you avoid making enemies of all existing neutrals who shall look at case from it that one day or another you will attack them? And what is this but to make greater the enemies that you have already, and to force others to become so who would otherwise have never thought of it?

梅卢斯人：可是，你们认为我们提出的政策让你们没有安全感吗？在这一点上，如果你们还是不让我们谈论正义，只要求我们服从你们的利益，那我们也必须阐明我们的观点。如果我们双方的利益恰巧吻合，我们还要尽力说服你们。如果现有的中立城邦都这样看问题，即认为你们总有一天会进攻它们，你们如何能够避免成为所有这些城邦的敌人呢？那样岂不是会使你们已有的敌人更难对付，迫使那些本来没想过与你们为敌的城邦成为你们的敌人？

Athenians: Why, the fact is that continentals generally give us but little alarm; the liberty which they enjoy will long prevent their taking precautions against us; it is rather islanders like yourselves, outside our empire, and subjects smarting under the yoke, who

would be the most likely to take a rash step and lead themselves and us into obvious danger.

雅典人：呃，其实，大陆人一般不怎么让我们担心。他们所享有的自由，将使他们长时间内不会对我们加以防备。反倒是那些和你们一样未被纳入帝国的岛民，或者是那些在帝国的统治下感到痛苦的臣民，最有可能轻举妄动，将他们自己和我们都置于危险之中。

Melians: Well then, if you risk so much to retain your empire, and your subjects to get rid of it, it were surely great baseness and cowardice in us who are still free not to try everything that can be tried, before submitting to your yoke.

梅卢斯人：唔，如果你们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维持你们的帝国，你们的臣民也要冒着这么大危险挣脱帝国的统治，那么，我们这些仍享有自由的人如果不奋力一搏就屈服于你们的统治，那就真成了卑贱怯懦之辈了。

Athenians: Not if you are well advised, the contest not being an equal one, with honour as the prize and shame as the penalty, but a question of self-preservation and of not resisting those who are far stronger than you are.

雅典人：如果你们从善如流，那就不是这样。这不是一场公平的竞争，不会奖以荣誉，罚以羞辱，而是一个自我保全的问题，一个不去抵抗远比自己强大者的问题。

Melians: But we know that the fortune of war is sometimes more impartial than the disproportion of numbers might lead one to suppose; to submit is to give ourselves over to despair, while action still preserves for us a hope that we may stand erect.

梅卢斯人：但是，我们知道，战争运气有时比兵力悬殊引发的联想更公允。若是屈服，我们就会陷入绝望；若是采取行动，我们就还有不倒下去的希望。

Athenians: Hope, danger's comforter, may be indulged in by those who have abundant resources, if not without loss at all events without ruin; but its nature is to be extravagant, and those who go so far as to put their all upon the venture see it in its true colours only when they are ruined; but so long as the discovery would enable them to guard against it, it is never found wanting. Let not this be the case with you, who are weak and hang on a single turn of the scale; nor be like the vulgar, who, abandoning such security as human means may still afford, when visible hopes fail them in extremity, turn to invisible, to prophecies and oracles, and other such inventions that delude men with hopes to their destruction.

雅典人：希望不过是危险中的一种安慰而已。倘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没有损失，但也不会导致毁灭，资源丰厚的人固然可以沉湎于希望。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希望是奢侈的。那些孤注一掷去冒险的人，只有在毁灭时才会发现它的本来面目，但只要这一发现能够使他们有所警惕，就永远不会没有希望。你们是弱者，命运悬于一线，但愿你们不是这样；也不要像那些庸人一样，在绝境中看不到有形的希望时，竟然放弃人力依然可以提供的安全保障，转而投向那些无形的东西，乞灵于预言和神谕，以及其他这类用希望骗人走向毁灭的新鲜

玩意。

Melians: You may be sure that we are as well aware as you of the difficulty of contending against your power and fortune, unless the terms be equal. But we trust that the gods may grant us fortune as good as yours, since we are just men fighting against unjust, and that what we want in power will be made up by the alliance of the Lacedaemonians, who are bound, if only for very shame, to come to the aid of their kindred. Our confidence, therefore, after all is not so utterly irrational.

梅卢斯人：你们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和你们一样清楚，除非条件同等，否则我们很难与你们的实力以及时运相抗衡。但是，我们相信，诸神会眷顾你们，同样也会眷顾我们，因为我们是在以正义对抗非正义。我们在军事力量方面的不足，可以通过与斯巴达人结盟加以弥补。只要事关荣辱，他们就一定会来帮助与他们同族之人。因此，我们的自信并不是完全毫无根据。

Athenians: When you speak of the favour of the gods, we may as fairly hope for that as yourselves; neither our pretensions nor our conduct being in any way contrary to what men believe of the gods, or practise among themselves. Of the gods we believe, and of men we know, that by a necessary law of their nature they rule wherever they can. And it is not as if we were the first to make this law, or to act upon it when made: we found it existing before us, and shall leave it to exist for ever after us; all we do is to make use of it, knowing that you and everybody else, having the same power as we have, would do the same as we do. Thus, as far as the gods are concerned, we have no fear and no reason to fear that we shall be

at a disadvantage. But when we come to your notion about the Lacedaemonians, which leads you to believe that shame will make them help you, here we bless your simplicity but do not envy your folly. The Lacedaemonians, when their own interests or their country's laws are in question, are the worthiest men alive; of their conduct towards others much might be said, but no clearer idea of it could be given than by shortly saying that of all the men we know they are most conspicuous in considering what is agreeable honourable, and what is expedient just. Such a way of thinking does not promise much for the safety which you now unreasonably count upon.

雅典人：说到诸神的眷顾，我们与你们一样，同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的目的和行为，与人们眼中的神意，或者他们奉行的准则，并没有任何冲突。我们对诸神的信奉，以及我们对人的认识，均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必然法则就是可以将统治扩展到任何可能的地方。这个法则好像不是我们首创的；这一法则创造出来之后，也不是我们首先付诸实施的。我们发现它在我们之前就存在，我们也将使它在我们之后永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它，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或者其他任何人，倘若拥有与我们一样的实力，同样也会这样做。因此，就神而言，我们并不害怕，也没有理由担心我们会处于不利地位。但是，谈到你们对斯巴达人的看法，也就是你们认为荣辱观念会使他们来帮助你们的看法，我们要恭贺你们在这一点上的单纯，但并不羡慕你们的愚笨。当事关他们自己的利益或者他们城邦的法律时，斯巴达人是世上最可敬的人；至于他们对别人的行为，那可是说来话长。不过，我们也可以简单明了地将其归纳为：在我们所认识的所有人中，他们最明显的特征是，他们认为合意的就是光荣的，有利的就是正义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不大可能为你们提供你们现在过于依赖的安全。

Melians: But it is for this very reason that we now trust to their respect for expediency to prevent them from betraying the Melians, their colonists, and thereby losing the confidence of their friends in Hellas and helping their enemies.

梅卢斯人：但是，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才相信，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不会使他们出卖他们自己的移民梅卢斯人，从而使他们在希腊的朋友对他们丧失信心，却对他们的敌人起到帮助作用。

Athenians: Then you do not adopt the view that expediency goes with security, while justice and honour cannot be followed without danger; and danger the Lacedaemonians generally court as little as possible.

雅典人：这么说来，你们并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利益与安全相伴，正义和荣誉则不能不与危险相随。斯巴达人一般总是尽量避免寻求危险。

Melians: But we believe that the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face even danger for our sake, and with more confidence than for others, as our nearness to Peloponnese makes it easier for them to act, and our common blood ensures our fidelity.

梅卢斯人：但是，我们相信，为了我们，斯巴达人连危险都更有勇气去面对，而且会比为了别人更大胆地去这样做。因为我们靠近伯罗奔尼撒，所以他们行动起来更容易；因为我们血脉相通，所以我们更忠诚。

Athenians: Yes, but what an intending ally trusts to is not the goodwill of those who ask his aid, but a decided superiority of power for action; and the Lacedaemonians look to this even more than others. At least, such is their distrust of their home resources that it is only with numerous allies that they attack a neighbour; now is it likely that while we are masters of the sea they will cross over to an island?

雅典人：是呀，但是，未来盟邦需要的，不是求援者的亲善，而是在作战能力方面的明显优势。斯巴达人比别人更指望这一点。至少，他们不相信本邦的资源，所以他们只有联合众多盟邦才会去攻打邻邦。在我们控制海洋之时，难道他们有可能横渡海洋来到一个岛上吗？

Melians: But they would have others to send. The Cretan Sea is a wide one, and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those who command it to intercept others, than for those who wish to elude them to do so safely. And should the Lacedaemonians miscarry in this, they would fall upon your land, and upon those left of your allies whom Brasidas did not reach; and instead of places which are not yours, you will have to fight for your own country and your own confederacy.

梅卢斯人：但是，他们可以派遣别人来援助我们。克里特海非常广阔，控制这片海域的人要想拦截别人，比想要躲过他们的人安全渡海还要难。就算斯巴达人渡海受挫，他们也会侵袭你们的土地，侵袭你们那些布拉西达斯没有触及的盟邦，届时你们将不得不为自己的领土和自己的同盟而战，而不是为了那些不属于你们自己的地方。

Athenians: Some diversion of the kind you speak of you may one day experience, only to learn, as others have done, that the Athenians never once yet withdrew from a siege for fear of any. But we are struck by the fact that, after saying you would consult for the safety of your country, in all this discussion you have mentioned nothing which men might trust in and think to be saved by. Your strongest arguments depend upon hope and the future, and your actual resources are too scanty, as compared with those arrayed against you, for you to come out victorious. You will therefore show great blindness of judgment, unless, after allowing us to retire, you can find some counsel more prudent than this. You will surely not be caught by that idea of disgrace, which in dangers that are disgraceful, and at the same time too plain to be mistaken, proves so fatal to mankind; since in too many cases the very men that have their eyes perfectly open to what they are rushing into, let the thing called disgrace, by the mere influence of a seductive name, lead them on to a point at which they become so enslaved by the phrase as in fact to fall wilfully into hopeless disaster, and incur disgrace more disgraceful as the companion of error, than when it comes as the result of misfortune. This, if you are well advised, you will guard against; and you will not think it dishonourable to submit to the greatest city in Hellas, when it makes you the moderate offer of becoming its tributary ally, without ceasing to enjoy the country that belongs to you; nor when you have the choice given you between war and security, will you be so blinded as to choose the worse. And it is certain that those who do not yield to their equals, who keep terms with their superiors, and are moderate towards their inferiors, on the whole succeed best. Think over the matter, therefore, after our withdrawal, and reflect once and again that it is for your country that you are consulting, that you have not more than one, and that upon this one deliberation

depends its prosperity or ruin.

雅典人：你们所说的受到某种牵制的情况，或许有一天你们也会遇到，结果你们也只会像其他人一样意识到，雅典人从来不曾因为惧怕什么而撤回围城的军队。但是，令我们惊讶的是，你们说是要商议自己城邦的安危问题，可是，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你们都没有提出任何令人相信并觉得你们可以赖以获救的证据。你们最有力的论据，全都建立在希望和未来之上。你们实际拥有的资源，与列阵准备进攻你们的对手相比，却又少得可怜，无法使你们拥有获胜的希望。因此，在允许我们告退之后，除非你们能够找到比此更为审慎之策，否则就会显得非常缺乏判断力。你们绝不要纠缠于什么羞耻感的想法。处于让人觉得羞耻同时又明白无误的危险之中时，它会给人类造成致命的后果。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明明知道他们要陷入什么境况，却在所谓“羞耻感”的驱使下，在区区一个富有诱惑力的词语影响下，竟完全受制于这个词，甚至执拗地非要落入无可挽救的灾难境地。这种与谬见相伴而生的羞耻感，要比与不幸相随而至者更加不光彩。如果你们从善如流，你们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们不会觉得向希腊——这一最伟大的城邦低头有何不光彩，因为它的提议十分公道，你们在成为他的纳贡盟邦的同时仍可享有属于你们的领土；当你们可以在战争与安全之间做出选择时，也一定不会愚昧地作出错误的选择。毫无疑问，那些对地位平等者不低声下气的人，与地位优越者保持友好关系的人，以及对地位低下者态度温和的人，总的说来是最成功的人。因此，在我们告退之后，请你们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经过再三考虑后要认识到，你们是在讨论自己城邦的命运，你们只有一个城邦，它的兴衰完全取决于你们这次考虑后所做的决定。

The Athenians now withdrew from the conference; and the Melians, left to themselves, came to a decision corresponding with what they had maintained in the discussion, and answered,“Our resolution, Athenians, is the same as it was at first. We will not in a

moment deprive of freedom a city that has been inhabited these seven hundred years; but we put our trust in the fortune by which the gods have preserved it until now, and in the help of men, that is, of the Lacedaemonians; and so we will try and save ourselves. Meanwhile, we invite you to allow us to be friends to you and foes to neither party, and to retire from our country after making such a treaty as shall seem fit to us both.”

雅典人说完就退出了会场。会场只剩下梅卢斯人，他们依照自己在讨论中一直坚持的看法做出了决定。其答复是：“雅典人，我们的决定和最初一样。我们不愿意在顷刻之间使一个人们居住了七百年的城市丧失自由。我们寄希望于诸神迄今赐予我们的幸运和人们的帮助，也就是斯巴达人的帮助，所以我们要努力保全自己。同时，我们恳请你们允许我们做你们的朋友，而不是与任何一方为敌，并请你们在缔结了于我们双方均有利的条约后从我们城邦撤走。”

Such was the answer of the Melians. The Athenians now departing from the conference said,“Well, you alone, as it seems to us, judging from these resolutions, regard what is future as more certain than what is before your eyes, and what is out of sight, in your eagerness, as already coming to pass; and as you have staked most on, and trusted most in, the Lacedaemonians, your fortune, and your hopes, so will you be most completely deceived.”

以上是梅卢斯人的答复。雅典人离开会场时对梅卢斯人说：“好吧，从你们的决定来看，似乎唯有你们对未来之事比对眼前之事更有把握；唯有你们在情急之下会认为遥远的希望已经在实现的路上。你们几乎把一切都交托给了斯巴达人，交托给了你们的运气和希望，完全信任它们，你们终究会几近彻底失望的。”

The Athenian envoys now returned to the army; and the Melians showing no signs of yielding, the generals at once betook themselves to hostilities, and drew a line of circumvallation round the Melians, dividing the work among the different states. Subsequently the Athenians returned with most of their army, leaving behind them a certain number of their own citizens and of the allies to keep guard by land and sea. The force thus left stayed on and besieged the place.

于是，雅典使者返回自己军中去了。获悉梅卢斯人没有屈服的迹象之后，雅典的将军们马上开始了敌对行动。他们绕着梅卢斯人的城画了一道线，向各个城邦分派了筑墙任务。后来，雅典人率领自己的大部分军队撤回去了，只留了一定数量的雅典公民和盟邦公民从海上和陆上封锁梅卢斯。留下的这支部队继续围攻梅卢斯。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Argives invaded the territory of Phlius and lost eighty men cut off in an ambush by the Phliasians and Argive exiles.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at Pylos took so much plunder from the Lacedaemonians that the latter, although they still refrained from breaking off the treaty and going to war with Athens, yet proclaimed that any of their people that chose might plunder the Athenians. The Corinthians also commenced hostilities with the Athenians for private quarrels of their own; but the rest of the Peloponnesians stayed quiet. Meanwhile, the Melians attacked by night and took the part of the Athenian lines over against the market, and killed some of the men, and brought in corn and all else that they could find useful to them, and so returned and kept quiet, while the Athenians took measures to keep better guard in future.

大约在同一时间，阿尔戈斯人入侵了弗利奥斯的领土。他们中了弗利奥斯人和阿尔戈斯流亡者所设的埋伏，损失了80人。与此同时，在皮洛斯的雅典人从斯巴达人那里劫掠了大量财富。尽管斯巴达人仍然保持克制，既没有中止条约，也没向雅典宣战，但还是宣布，凡本邦公民，只要愿意，皆可劫掠雅典人。科林斯人也因为与雅典人私下发生争执对雅典人展开了敌对行动，但其他伯罗奔尼撒人仍按兵不动。与此同时，梅卢斯人采用夜袭的方式，攻下了市场对面所设的雅典防线，杀死了一些敌人，将谷物和其他所有能找到的有用物品席卷而去，尔后撤回城里，未再采取进一步行动。后来，雅典人采取措施加强了戒备。

Summer was now over. The next winter, the Lacedaemonians intended to invade the Argive territory, but arriving at the frontier found the sacrifices for crossing unfavourable, and went back again. This intention of theirs gave the Argives suspicions of certain of their fellow citizens, some of whom they arrested; others, however, escaped them.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Melians again took another part of the Athenian lines which were but feebly garrisoned. Reinforcements afterwards arriving from Athens in consequence, under the command of Philocrates, son of Demeas, the siege was now pressed vigorously; and some treachery taking place inside, the Melians surrendered at discretion to the Athenians, who put to death all the grown men whom they took, and sold the women and children for slaves, and subsequently sent out five hundred colonists and inhabited the place themselves. [1_2]

夏季就此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冬季里，斯巴达人本打算入侵阿尔戈斯的领土，但到边境后却发现过境祭祀未显示吉兆，便又折回去了。这一侵略意图却使阿尔戈斯人对他们的某些同胞产生了怀疑，他

们逮捕了其中一部分人，其他的则逃跑了。大约在同一时期，梅卢斯人又攻下了雅典人防守薄弱的另外一道防线。因此，雅典后来派遣德迈阿斯的儿子菲洛克拉泰斯率领援军前去增援。围攻战立时打得激烈起来，再加上城内有叛徒，梅卢斯人便无条件向雅典人投了降。雅典人将他们俘获的所有成年男子都处死，把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随后派遣他们自己的500名殖民者定居在了那里。

[1_1].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break in the composition at this point between an account of the Ten Years' War that may have originally been published independently and an account of the later war, parts of which, at least, were composed after the Athenian surrender in 404 BC.

[1_2].Xenophon indicates that some Melians did survive, and were restored at the end of thewar, at 2.2.9

BOOK VI

第六卷

CHAPTER XVIII Seventeenth Year of the War—The Sicilian Campaign—Affair of the Hermae—Departure of the Expedition

第十八章　战争第十七年——西西里战役——赫尔迈石像事件——远征军出征

The same winter, the Athenians resolved to sail again to Sicily, with a greater armament than that under Laches and Eurymedon, and, if possible, to conquer the island; most of them being ignorant of its size and of the number of its inhabitants, Hellenic and barbarian, and of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undertaking a war not much inferior to that against the Peloponnesians. For the voyage round Sicily in a merchantman is not far short of eight days; and yet, large as the island is, there are only two miles of sea to prevent its being mainland.

同年冬季，雅典人决定再度率军出征西西里，而且要比拉凯斯和埃夫里迈宗所率领的那支军队规模更庞大。如果可能，他们就征服西西里岛。然而，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岛有多大，也不知道岛上的希腊和蛮族居民共有多少人，更不知道他们将要进行的战争在规模上跟他们与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战争相差无几。若乘商船绕西西里航行一周，差不多要八天的时间。这个岛虽然如此之大，但它与大陆仅相隔两英里。

It was settled originally as follows, and the peoples that

occupied it are these. The earliest inhabitants spoken of in any part of the country are the Cyclopes and Laestrygones; but I cannot tell of what race they were, or whence they came or whither they went, and must leave my readers to what the poets have said of them and to what may be generally known concerning them. The Sicanians appear to have been the next settlers, although they pretend to have been the first of all and aborigines; but the facts show that they were Iberians, driven by the Ligurians from the river Sicanus in Iberia. It was from them that the island, before called Trinacria, took its name of Sicania, and to the present day they inhabit the west of Sicily. On the fall of Ilium, some of the Trojans escaped from the Achaeans, came in ships to Sicily, and settled next to the Sicanians under the general name of Elymi; their towns being called Eryx and Egesta. With them settled some of the Phocians carried on their way from Troy by a storm, first to Libya, and afterwards from thence to Sicily. The Sicels crossed over to Sicily from their first home Italy, flying from the Opicans, as tradition says and as seems not unlikely, upon rafts, having watched till the wind set down the strait to effect the passage; although perhaps they may have sailed over in some other way. Even at the present day there are still Sicels in Italy; and the country got its name of Italy from Italus, a king of the Sicels, so called. These went with a great host to Sicily, defeated the Sicanians in battle and forced them to remove to the south and west of the island, which thus came to be called Sicily instead of Sicania, and after they crossed over continued to enjoy the richest parts of the country for near three hundred years before any Hellenes came to Sicily; indeed, they still hold the centre and north of the island. There were also Phoenicians living all round Sicily, who had occupied promontories upon the sea coasts and the islets adjacent for the purpose of trading with the Sicels. But when the Hellenes began to arrive in considerable numbers by sea, the Phoenicians abandoned most of their stations, and drawing together

took up their abode in Motye, Soloeis, and Panormus, near the Elymi, partly because they confided in their alliance, and also because these are the nearest points for the voyage between Carthage and Sicily.

最初定居在此和后来占据这个岛的部族情况如下：这一地区各个地方最早的居民据说是库克罗普斯人和莱斯特里戈内人，但我说不出他们属于哪个种族，也不知他们从何而来，后来又去往何方。因此，关于他们，我只能听凭读者相信诗人所言和人所共知的说法。继他们之后来此定居的似乎是西卡尼亚人。虽然他们自称来此最早，是这里的土著居民，但事实表明，他们是被利古里亚人从伊比利亚的西卡努斯河驱逐而来的伊比利亚人。这个岛以前叫作“特里纳克里亚”。由于他们的到来，这里开始被称为“西卡尼亚”。直到现在，西卡尼亚人还住在西西里的西部。特洛伊失陷之后，一些特洛伊人从亚该亚人手中逃脱，乘船抵达西西里，成了继西卡尼亚人之后定居在西西里的人。他们被统称为埃利米人，他们的城镇被称为埃里克斯和埃耶斯塔。同他们一起来这里定居的还有一些福基斯人。他们是在从特洛伊返回途中被风暴刮来的，开始去了利比亚，后来又从那里来到了西西里。西库尔人是从他们的第一故乡意大利渡海来到西西里的。在逃出奥皮坎人之手后，据传说，但似乎也并非不可能，他们等到顺风时才乘着木筏渡海而来，尽管他们也有可能是通过别的方式渡海的。甚至现在，意大利仍有西库尔人。西库尔人曾有一个国王名叫意大卢斯，意大利的国名即由这位国王的名字而来。他们带领大批军队来到西西里，战败了西卡尼亚人，迫使他们移居到了岛的南部和西部，这个岛也因此而逐渐被称为西西里，而不是西卡尼亚。他们渡海过来之后，曾连续将近三百年享有这一地区最肥沃的土地，然后才有希腊人到西西里来。事实上，他们现在仍占有这个岛的中部和北部。另外，西西里周边地区还住有腓尼基人。为了与西库尔人通商，他们占据了沿海地区的岬角和附近的小岛。但是，当希腊人开始从海上大量涌入时，腓尼基人放弃他们的大部分居住区，集中住到了莫蒂埃、索洛伊斯和帕诺尔穆斯，与埃利米人为邻。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信赖与埃

利米人的盟约；另一方面是因为经由这些地方从迦太基到西西里航程最短。

These were the barbarians in Sicily, settled as I have said. Of the Hellenes, the first to arrive were Chalcidians from Euboea with Thucles, their founder. They founded Naxos and built the altar to Apollo Archegetes, which now stands outside the town, and upon which the deputies for the games sacrifice before sailing from Sicily. Syracuse was founded the year afterwards by Archias, one of the Heraclids from Corinth, who began by driving out the Sicels from the island upon which the inner city now stands, though it is no longer surrounded by water;in process of time the outer town also was taken within the walls and became populous. Meanwhile, Thucles and the Chalcidians set out from Naxos in the fifth year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Syracuse, and drove out the Sicels by arms and founded Leontini and afterwards Catana; the Catanians themselves choosing Evarchus as their founder.

以上所述即蛮族人在西西里岛定居的情况。希腊人中最早来到西西里的是哈尔基斯人，他们是在建立者苏克莱斯的带领下从埃维亚来的。他们建立了纳克索斯，并为保护神阿波罗修建了一个神坛。这个神坛现在还立于城外，前往希腊参加竞赛会的代表从西西里启程前都要到这个神坛前献祭。那年过后，来自科林斯的赫拉克勒斯后裔一族中的阿基亚斯将西库尔人从如今内城所在的岛上赶走，尔后建立了叙拉古。该地现在已经不再四面环水。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城也并入了城中，人口就变得稠密起来。同时，在叙拉古建立后的第五年，苏克莱斯带领哈尔基斯人从纳克索斯出发，以武力驱走了西库尔人，建立了莱昂蒂尼，后来又建立了卡塔纳，但卡塔纳人选择埃瓦尔胡斯当了他们城市的建立者。

About the same time, Lamis arrived in Sicily with a colony from Megara, and after founding a place called Trotilus beyond the river Pantacyas, and afterwards leaving it and for a short while joining the Chalcidians at Leontini, was driven out by them and founded Thapsus. After his death his companions were driven out of Thapsus, and founded a place called the Hyblaean Megara; Hyblon, a Sicel king, having given up the place and inviting them thither. Here they lived two hundred and forty-five years; after which they were expelled from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 by the Syracusan tyrant Gelo. Before their expulsion, however, a hundred years after they had settled there, they sent out Pamillus and founded Selinus; he having come from their mother country Megara to join them in its foundation. Gela was founded by Antiphemus from Rhodes and Entimus from Crete, who joined in leading a colony thither, in the forty-fifth year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Syracuse. The town took its name from the river Gelas, the place where the citadel now stands, and which was first fortified, being called Lindii. The institutions which they adopted were Dorian. Near one hundred and eight years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Gela, the Geloans founded Acragas (Agrigentum), so called from the river of that name, and made Aristonous and Pystilus their founders; giving their own institutions to the colony. Zancle was originally founded by pirates from Cuma, the Chalcidian town in the country of the Opicans;afterwards, however, large numbers came from Chalcis and the rest of Euboea, and helped to people the place; the founders being Perieres and Crataemenes from Cuma and Chalcis respectively. It first had the name of Zancle given it by the Sicels, because the place is shaped like a sickle, which the Sicels call zanclon; but upon the original settlers being afterwards expelled by some Samians and other Ionians who landed in Sicily flying from the Medes, and the Samians in their turn not long afterwards by Anaxilas, tyrant of Rhegium, the town was by him colonized with a mixed population,

and its name changed to Messina, after his old country.

大约在同一时期，拉米斯带着一个殖民团从迈加拉来到了西西里，在潘塔基阿斯河畔建立了一个叫特罗蒂卢斯的地方。后来他离开那里，与莱昂蒂尼的哈尔基斯人共处了很短一段时间，后又被哈尔基斯人驱逐，他就建立了塔普苏斯。他去世之后，追随他的人被赶出塔普苏斯，建立了希夫隆的迈加拉。希夫隆是西库尔国王，他让出该地，邀他们到那里去居住。他们在这里住了两百四十五年，后来被叙拉古的僭主耶洛驱逐出了那座城及那一带地区。但是，在他们被逐出之前，也就是他们在那里定居了一百年之后，他们派帕米卢斯建立了塞利努斯。帕米卢斯是从他们的母邦迈加拉来与他们一起建立这座城的。杰拉是由罗得岛人安蒂费穆斯和克里特岛人恩蒂穆斯建立的。叙拉古建立后第四十五年，他们共同带领一个殖民团到了那里。这座城因杰拉斯河而得名。如今卫城的所在地是最早设防之处，那里被称为林季伊。杰拉人采用多里安式政制。杰拉建立将近一百零八年后，杰拉人建立了阿克拉加斯（阿格里延图姆），该城因与之同名的河流而得名。他们将阿里斯托努斯和皮斯蒂卢斯奉为建立者，连自己在杰拉的政制也移植到了这一殖民地。赞克莱最初是由来自库迈的海盗建立的，这是哈尔基斯人在奥皮坎人的土地上建立的城镇。但是，后来从哈尔基斯和埃维亚岛上其他地方来了很多人，与他们一起定居在此地。这座城镇的建立者是佩里雷斯和科拉泰迈内斯，他们分别来自库迈和哈尔基斯。西库尔人起初为此地取名为赞克莱，因为这个地方的形状象一把镰刀，而他们称镰刀为“赞克隆”。但是，从米底人那里逃到西西里的一些萨摩斯人和其他爱奥尼亚人后来把原先的居民驱逐了。不久之后，萨摩斯人又被雷伊乌姆的僭主阿纳克西拉斯驱逐了。阿纳克西拉斯让不同种族的人混居在这里，并以他自己家乡的名字将这座城更名为墨西拿。

Himera was founded from Zancle by Euclides, Simus, and Sacon, most of those who went to the colony being Chalcidians;

though they were joined by some exiles from Syracuse, defeated in a civil war, called the Myletidae. The language was a mixture of Chalcidian and Doric, but the institutions which prevailed were the Chalcidian. Acrae and Casmenae were founded by the Syracusans; Acrae seventy years after Syracuse, Casmenae nearly twenty after Acrae. Camarina was first founded by the Syracusans, close upon a hundred and thirty-five years after the building of Syracuse; its founders being Daxon and Menecolus. But the Camarinaeans being expelled by arms by the Syracusans for having revolted, Hippocrates, tyrant of Gela, some time later receiving their land in ransom for some Syracusan prisoners, resettled Camarina, himself acting as its founder. Lastly, it was again depopulated by Gelo, and settled once more for the third time by the Geloans.

希迈拉是由来自赞克莱的埃夫克利泽斯、西穆斯和萨孔兴建的。虽然也有一些流亡者从叙拉古来到这一殖民地，但移居到那里的人大多是哈尔基斯人。叙拉古那些流亡者是因为在内战中落败而去的，被称为米莱蒂泽人。希迈拉人所使用的语言是哈尔基斯语和多里斯语的混合体，但采用的政制是哈尔基斯式的。阿克雷和卡斯迈奈是叙拉古人建立的。阿克雷是叙拉古建立七十年后兴建的，卡斯迈奈是在阿克雷建立近二十年后兴建的。卡马里纳最初是由叙拉古人建立的，大约是在叙拉古建立后近一百三十五年，建立者是达克松和迈内科卢斯。但是，叙拉古人以叛变为由用武力将卡马里纳人驱逐了。不久之后，叙拉古人用此地从杰拉的僭主希波克拉底手中赎回了一些俘虏。希波克拉底获得这块土地后，又让卡马里纳人重新定居于此，自己则担任了这个城的建立者。最后，耶洛再度使这里的人口锐减，杰拉人又第三次移居到了这个地方。

Such is the list of the peoples, Hellenic and barbarian, inhabiting Sicily, and such the magnitude of the island which the

Athenians were now bent upon invading; being ambitious in real truth of conquering the whole, although they had also the specious design of succouring their kindred and other allies in the island. But they were especially incited by envoys from Egesta, who had come to Athens and invoked their aid more urgently than ever. The Egestaeans had gone to war with their neighbours the Selinuntines upon questions of marriage and disputed territory, and the Selinuntines had procured the alliance of the Syracusans, and pressed Egesta hard by land and sea. The Egestaeans now reminded the Athenians of the alliance made in the time of Laches, during the former Leontine war, and begged them to send a fleet to their aid, and among a number of other considerations urged as a capital argument that if the Syracusans were allowed to go unpunished for their depopulation of Leontini, to ruin the allies still left to Athens in Sicily, and to get the whole power of the island into their hands, there would be a danger of their one day coming with a large force, as Dorians, to the aid of their Dorian brethren, and as colonists, to the aid of the Peloponnesians who had sent them out, and joining these in pulling down the Athenian empire. The Athenians would, therefore, do well to unite with the allies still left to them, and to make a stand against the Syracusans; especially as they, the Egestaeans, were prepared to furnish money sufficient for the war. The Athenians, hearing these arguments constantly repeated in their assemblies by the Egestaeans and their supporters, voted first to send envoys to Egesta, to see if there was really the money that they talked of in the treasury and templ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ascertain in what posture was the war with the Selinuntines.

以上所列即居住于西西里的希腊人和蛮族人，雅典人如今一心想入侵的就是这样一个大岛。他们表面上虽然佯装要援助岛上的同族人和其他盟友，事实上却野心勃勃地想要征服整个岛屿。不过，埃耶斯

塔派到雅典来的使者对雅典人也尤具煽动力，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请求获得雅典人的援助。埃耶斯塔人与相邻的塞利努斯人因为婚姻问题和领土争执在打仗。塞利努斯人已与叙拉古人结盟，而且从海上和陆上同时向埃耶斯塔步步紧逼。埃耶斯塔人这时提醒雅典人，上次莱昂蒂尼战争期间，他们在拉凯斯时期曾结为同盟，并请雅典人派一支舰队去援助他们。除了其他许多需要考虑的方面之外，他们提出的主要论点是，如果听任叙拉古人劫掠莱昂蒂尼而不加惩罚，让他们继续毁灭雅典在西西里剩下的盟邦，进而控制整个西西里岛，那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危险：迟早有一天，作为多里安人，他们会派大军来援助他们的多里安兄弟；作为移民，他们会派大军来援助派遣他们出来的伯罗奔尼撒人，并和这些人联合起来推翻雅典帝国。因此，雅典人最好还是与剩下的盟友团结起来抵抗叙拉古人，尤其是因为他们埃耶斯塔人愿意提供足够的资金作为战争经费。雅典人在公民大会上一再听到埃耶斯塔人和他们的支持者陈述这些理由，于是他们投票决定，首先派遣使者到埃耶斯塔去，看看他们的金库和神庙里的资金是否真如其说，同时查明他们与塞利努斯人之间的战争处于何状态。

The envoys of the Athenians were accordingly dispatched to Sicily. The same winter,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the Corinthians excepted, marched into the Argive territory, and ravaged a small part of the land, and took some yokes of oxen and carried off some corn. They also settled the Argive exiles at Orneae, and left them a few soldiers taken from the rest of the army; and after making a truce for a certain while, according to which neither Orneatae nor Argives were to injure each other's territory, returned home with the army. Not long afterwards the Athenians came with thirty ships and six hundred heavy infantry, and the Argives joining them with all their forces, marched out and besieged the men in Orneae for one day; but the garrison escaped by night, the besiegers having bivouacked some way off. The next day, the Argives, discovering it, razed Orneae to the ground, and went back again;

after which the Athenians went home in their ships.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took by sea to Methone on the Macedonian border some cavalry of their own and the Macedonian exiles that were at Athens, and plundered the country of Perdiccas. Upon this, the Lacedaemonians sent to the Thracian Chalcidians, who had a truce with Athens from one ten days to another, urging them to join Perdiccas in the war, which they refused to do. And the winter ended, and with it ended the sixteenth year of this war of which Thucydides is the historian.

因此，雅典人就派使者前往西西里去了。在同一个冬季，斯巴达人联合盟友（科林斯人除外）开进阿尔戈斯境内，践踏了一小部分土地，夺了一些牛车，运走了一些谷物。他们还把阿尔戈斯的流亡者安置在奥尔内埃，并从其余军队中抽了少量士兵留给他们。商定了休战一段时间后，他们就率军回去了。根据休战协定，奥尔内埃人与阿尔戈斯人双方均不得触犯对方的领土。不久之后，雅典人率领30艘战舰和600名重步兵来了，阿尔戈斯人率领全部军队与之会合后，他们快步进发，对奥尔内埃城里的人展开了一天的围攻，但由于围城人员的露营地距离奥尔内埃有一段距离，奥尔内埃的守军在夜间逃跑了。第二天，阿尔戈斯人发现守军已经逃跑，便将奥尔内埃夷为平地，然后又回去了。雅典人后来也乘战舰回去了。与此同时，雅典人带着他们自己的一些骑兵和在雅典的马其顿流亡者，经海路开赴马其顿边境上的迈索内，劫掠了佩尔狄卡斯的领土。此事发生后，斯巴达人派人到色雷斯地区的哈尔基斯人那里去，力劝他们与佩尔狄卡斯联手作战，但遭到了拒绝，因为他们与雅典签有每十天续订一次的休战协定。这个冬季就这样过去了，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十六年亦随之结束。

Early in the spring of the following summer the Athenian envoys arrived from Sicily, and the Egestaeans with them, bringing

sixty talents of uncoined silver, as a month's pay for sixty ships, which they were to ask to have sent them. The Athenians held an assembly and, after hearing from the Egestaeans and their own envoys a report, as attractive as it was untrue, upon the state of affairs generally, and in particular as to the money, of which, it was said, there was abundance in the temples and the treasury, voted to send sixty ships to Sicily, under the command of Alcibiades, son of Clinias, Nicias, son of Niceratus, and Lamachus, son of Xenophanes, who were appointed with full powers; they were to help the Egestaeans against the Selinuntines, to restore Leontini upon gaining any advantage in the war, and to order all other matters in Sicily as they should deem best for the interests of Athens. Five days after this a second assembly was held, to consider the speediest means of equipping the ships, and to vote whatever else might be required by the generals for the expedition; and Nicias, who had been chosen to the command against his will, and who thought that the state was not well advised, but upon a slight and specious pretext was aspiring to the conquest of the whole of Sicily, a great matter to achieve, came forward in the hope of diverting the Athenians from the enterprise, and gave them the following counsel:

次年夏季之初，雅典的使者从西西里回来了，与他们同来的还有埃耶斯塔人。他们带来了60塔兰特未铸成货币的银块，作为使用60艘战舰一个月的报酬，因为他们准备要求雅典人派遣这么多艘舰去援助他们。雅典人举行了一次公民大会，听取了埃耶斯塔人和他们自己所派使者就总体情况所做的报告。报告十分诱人，却并不真实，特别是有关资金方面的内容。他们说神庙和金库里的资金储备丰富。因此，雅典人表决赞成派遣60艘战舰前往西西里，并指定由克利尼亚斯的儿子亚西比德、尼塞拉图斯的儿子尼西亚斯和色诺芬尼的儿子拉马胡斯负责全权指挥。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埃耶斯塔人抗击塞利努斯人，一旦

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即重建莱昂蒂尼，并依照他们认为对雅典最有利的方式处理西西里的其他一应事务。五天之后，雅典人又举行了一次公民大会，目的是讨论以最快的方式装备舰只，并就远征军将领可能提出的其他需求进行表决。尼西亚斯虽被选为将军，却非出自他本人所愿。他认为，雅典城邦并没有经过周密考虑，而是仅凭一个似是而非且站不住脚的援助借口，就想去成就征服整个西西里这一伟业。他希望能够扭转雅典人对这项事业的想法，于是便走上前来，向他们提出了如下忠告：

“Although this assembly was convened to consider the preparations to be made for sailing to Sicily, I think, notwithstanding, that we have still this question to examine, whether it be better to send out the ships at all, and that we ought not to give so little consideration to a matter of such moment, or let ourselves be persuaded by foreigners into undertaking a war with which we have nothing to do. And yet, individually, I gain in honour by such a course, and fear as little as other men for my person—not that I think a man need be any the worse citizen for taking some thought for his person and estate; on the contrary, such a man would for his own sake desire the prosperity of his country more than others—nevertheless, as I have never spoken against my convictions to gain honour, I shall not begin to do so now, but shall say what I think best. Against your character any words of mine would be weak enough, if I were to advise your keeping what you have got and not risking what is actually yours for advantages which are dubious in themselves, and which you may or may not attain. I will, therefore, content myself with showing that your ardour is out of season, and your ambition not easy of accomplishment.”

“尽管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远征西西里需要做的准备，但是我认为，我们仍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派战舰去到底好不好这一问题。对于这么重大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如此缺乏考虑，也不应该被外邦人一劝就发动一场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战争。不过，就个人而言，我倒是可以从中获得荣誉；对于我的身体，我也可以如其他人一样毫不担忧——这并不是说我认为，适当考虑自己身体和自己财产的人必定不是好公民。恰恰相反，这样的人，出于自身考虑，反而会比其他人更加希望自己的城邦繁荣昌盛。但是，我从来没有为了获取荣誉作过违背自己信念的发言，所以现在也不会这样做，而是要说出我认为怎样做最好。如果我劝你们守护好自己已有的东西，不要拿目前拥有的去冒险获取本身就不可靠而且是否能得到尚不确定的好处，那么，无论我说什么，在你们的勇气面前都不堪一击。因此，我只想向你们表明一点：你们的冒险，现在还不是时候；你们的雄心，眼下也难以实现。”

“I affirm, then, that you leave many enemies behind you here to go yonder and bring more back with you. You imagine, perhaps, that the treaty which you have made can be trusted; a treaty that will continue to exist nominally, as long as you keep quiet—for nominal it has become, owing to the practices of certain men here and at Sparta—but which in the event of a serious reverse in any quarter would not delay our enemies a moment in attacking us; first, because the convention was forced upon them by disaster and was less honourable to them than to us; and secondly, because in this very convention there are many points that are still disputed. Again, some of the most powerful states have never yet accepted the arrangement at all. Some of these are at open war with us; others (as the Lacedaemonians do not yet move) are restrained by truces renewed every ten days, and it is only too probable that if they found our power divided, as we are hurrying to divide it, they would attack us vigorously with the Siceliots, whose alliance they

would have in the past valued as they would that of few others. A man ought, therefore, to consider these points, and not to think of running risks with a country placed so critically, or of grasping at another empire before we have secured the one we have already; for in fact the Thracian Chalcidians have been all these years in revolt from us without being yet subdued, and others on the continents yield us but a doubtful obedience. Meanwhile, the Egestaeans, our allies, have been wronged, and we run to help them, while the rebels who have so long wronged us still wait for punishment."

"假使那样的话，我敢肯定，为了奔赴远方，你们弃众多敌人于此而不顾，回来时则会招来更多的敌人。或许你们认为，你们缔结的和约是可以信赖的；只要你们不采取行动，它在名义上就会继续存在——由于我们这里和斯巴达那里某些人的一些做法，这份合约其实已名存实亡。但是，如果我们在任何地方遭到严重失败，这份和约片刻也延迟不了敌人对我们的进攻。原因有三：首先，这份和约是他们在遭到重挫的情况下被迫缔结的，因而对他们来说不如对我们那样体面；其次，和约本身仍存在许多有争议之处。再者，某些最有影响力的城邦从来就没有认可过这一解决方案。其中有些在公开与我们为战；有些（因为斯巴达尚无行动）尚被每十天续订一次的休战协定所束缚。如果他们发现我们的力量分散了——我们现在就在急于分散自己的力量，他们很可能会和西凯利奥特人联合起来，向我们发动强有力的进攻。他们过去原本就很重视与西凯利奥特人的同盟关系，这种情况在他们与其他城邦的关系中甚为少有。因此，每个人都应当考虑到这些方面，而不要想着拿一个处境如此危急的城邦去冒险，也不要在已有的帝国尚未稳固之前就去抓另一个。事实上，这些年来，色雷斯地区的哈尔基斯人从未被制服，他们一直在反抗我们。大陆上的其他城邦虽然屈从于我们，但他们是否忠顺也让人怀疑。同时，如果我们的盟友埃耶斯塔人一受到侵犯，我们就赶紧跑去帮助他们，那么，冒犯了我们这么久的叛逆者就得推迟受到惩罚。"

“And yet the latter, if brought under, might be kept under; while the Sicilians, even if conquered, are too far off and too numerous to be ruled without difficulty. Now it is folly to go against men who could not be kept under even if conquered, while failure would leave us in a very different position from that which we occupied before the enterprise. The Siceliots, again, to take them as they are at present, in the event of a Syracusan conquest (the favourite bugbear of the Egestaeans), would to my thinking be even less dangerous to us than before. At present they might possibly come here as separate states for love of Lacedaemon; in the other case one empire would scarcely attack another; for after joining the Peloponnesians to overthrow ours, they could only expect to see the same hands overthrow their own in the same way. The Hellenes in Sicily would fear us most if we never went there at all, and next to this, if after displaying our power we went away again as soon as possible. We all know that that which is farthest off, and the reputation of which can least be tested, is the object of admiration; at the least reverse they would at once begin to look down upon us, and would join our enemies here against us. You have yourselves experienced this with regard to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whom your unexpected success, as compared with what you feared at first, has made you suddenly despise, tempting you further to aspire to the conquest of Sicily. Instead, however, of being puffed up by the misfortunes of your adversaries, you ought to think of breaking their spirit before giving yourselves up to confidence, an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one thought awakened in the Lacedaemonians by their disgrace is how they may even now, if possible, overthrow us and repair their dishonour; inasmuch as military reputation is their oldest and chiefest study. Our struggle, therefore, if we are wise, will not be for the barbarian Egestaeans in Sicily, but how to defend ourselves most effectually

against the oligarchical machinations of Lacedaemon.”

“然而，这些叛逆者若被镇压下去，则有可能被控制住；而那些西凯利奥特人，即便被我们征服了，由于距离我们太远，人口又太多，我们也很难统治他们。现在与那些即便被征服也无法控制的人发生冲突，实在是愚蠢之举。倘若遭到失败，我们所居的地位将会与发动此举前完全不同。再说，照西凯利奥特人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便叙拉古人征服了他们（埃耶斯塔人特喜欢以此来吓唬我们），我认为，他们对我们造成的危险也比以前还小。他们现在可能会看在斯巴达的份上作为独立城邦来对抗我们。倘若他们真被叙拉古人征服了，一个帝国则很少会进攻另外一个帝国，因为他们与伯罗奔尼撒人联手推翻我们的帝国之后，只能看到他们自己的帝国被同样的人以同样的方式所推翻。让西西里的希腊人最怕我们的办法是，我们根本不到那里去；其次是扬威之后再尽快撤离。我们都知道，离得越远，声名就越少受到检验，就越能成为令人叹服的对象。否则，哪怕稍有失利，他们马上就会开始轻视我们，与我们这里的敌人一起对付我们。在与斯巴达人及其盟友的交锋中，你们自己就有过这种经验。你们即曾因为自己取得了意外胜利，将态度由起初的惧怕突然转为轻蔑，进而开始渴望征服西西里。但是，你们不应当因对手的不幸而趾高气扬，而是应当先挫败他们的锐气，然后再沉浸于自信之中。你们应该知道，斯巴达人所遭受的耻辱，在他们心中唤起的唯一念头就是如何将我们推翻，一洗他们的耻辱。如果可能，他们现在就想这样做，因为获取军事上的声誉是他们追寻最久而又最重要的奋斗目标。因此，如果明智的话，我们就不会为西西里的蛮族埃耶斯塔人而奋战，而是要设法最有效地保卫我们自己，以反击斯巴达寡头们的阴谋诡计。”

“We should also remember that we are but now enjoying some respite from a great pestilence and from war, to the no small benefit of our estates and persons, and that it is right to employ these at home on our own behalf, instead of using them on behalf of these

exiles whose interest it is to lie as fairly as they can, who do nothing but talk themselves and leave the danger to others, and who if they succeed will show no proper gratitude, and if they fail will drag down their friends with them. And if there be any man here, overjoyed at being chosen to command, who urges you to make the expedition, merely for ends of his own—specially if he be still too young to command—who seeks to be admired for his stud of horses, but on account of its heavy expenses hopes for some profit from his appointment, do not allow such a one to maintain his private splendour at his country's risk, but remember that such persons injure the public fortune while they squander their own, and that this is a matter of importance, and not for a young man to decide or hastily to take in hand.”

“我们还应当牢记，我们刚从大瘟疫和战争中稍得喘息，这对我们的人员和财产不无好处。我们应当将这些好处用于本邦，用于造福我们自己，而不是用到那些极尽谎骗之能事的流亡者身上。他们别的不做，只管为自己游说，却把危险留给别人。即便成功了，他们也不会适当地表示感激；若是失败了，他们会连盟友一起拖败。在座的诸位当中，如果有人因为被选为指挥官而沾沾自喜，极力鼓动你们进行远征，那不过是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如果他还年轻，胜任不了指挥官职务，那就更是如此。他会想方设法使人们因为他的良驹而钦佩他，但这是很花钱的，所以他便指望从指挥官职位中捞些好处。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人为了维护个人的风光而让城邦担风险，而是要记住，这种人在挥霍自己财产的同时，同样也在使公共财产蒙受损失。这件事事关重大，不是一个年轻人能够决定或匆忙接手的。”

“When I see such persons now sitting here at the side of that same individual and summoned by him, alarm seizes me; and I, in my turn, summon any of the older men that may have such a

person sitting next him not to let himself be shamed down, for fear of being thought a coward if he do not vote for war, but, remembering how rarely success is got by wishing and how often by forecast, to leave to them the mad dream of conquest, and as a true lover of his country, now threatened by the greatest danger in its history, to hold up his hand on the other side; to vote that the Siceliots be left in the limits now existing between us, limits of which no one can complain (the Ionian sea for the coasting voyage, and the Sicilian across the open main), to enjoy their own possessions and to settle their own quarrels; that the Egestaeans, for their part, be told to end by themselves with the Selinuntines the war which they began without consulting the Athenians; and that for the future we do not enter into alliance, as we have been used to do, with people whom we must help in their need, and who can never help us in ours."

"此时此刻，当我看到这样的人坐在这里，就在召唤他们来的同一个人身边，我顿感担忧。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想请求年纪大一些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坐在你身旁，不要让自己被他们的羞辱所吓倒，不要因为不投票支持战争而害怕被说成是懦夫，而是要记住，单凭主观愿望而成功者微乎其微，成功往往要靠先见之明。让他们去做那狂妄的征服之梦吧！现在我们的城邦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危险，作为一个真正热爱城邦的人，举起你的手来反对战争，投票赞成西凯利奥特人在我们之间现有的界限内享有他们自己的属地和解决他们的争端吧！关于现有的界限，无人能提出异议（即可以在爱奥尼亚海沿岸自由航行和在西西里主海域直接航行）。对埃耶斯塔人，则要告诉他们，开战时他们并未与雅典人商议，结束战争时也应当由他们自己与塞利努斯人去处理；将来我们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与那些他们有难时我们得帮而我们有难时他们却不能给予我们任何帮助的人结为同盟。"

“And you, Prytanis, if you think it your duty to care for the commonwealth, and if you wish to show yourself a good citizen, put the question to the vote, and take a second time the opinions of the Athenians. If you are afraid to move the question again, consider that a violation of the law cannot carry any prejudice with so many abettors, that you will be the physician of your misguided city, and that the virtue of men in office is briefly this, to do their country as much good as they can, or in any case no harm that they can avoid.”

“而您，这次会议的主席，如果您认为维护城邦的利益是您的职责，如果您希望表明自己是一位优秀的公民，请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再次征求一下雅典人的意见。如果您不敢再度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那就请想一想，违法行为是无法获得这么多人赞同的；同时也要想一想，您将挽救这个被误导的城邦；还要想一想，公职人员的美德，简言之就是尽力为城邦谋福利，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让城邦遭受可以避免的侵害。”

Such were the words of Nicias. Most of the Athenians that came forward spoke in favour of the expedition, and of not annulling what had been voted, although some spoke on the other side. By far the warmest advocate of the expedition was, however, Alcibiades, son of Clinias, who wished to thwart Nicias both as his political opponent and also because of the attack he had made upon him in his speech, and who was, besides, exceedingly ambitious of a command by which he hoped to reduce Sicily and Carthage, and personally to gain in wealth and reputation by means of his successes. For the position he held among the citizens led him to indulge his tastes beyond what his real means would bear, both in keeping horses and in the rest of his expenditure; and this later on

had not a little to do with the ruin of the Athenian state. Alarmed at the greatness of his licence in his own life and habits, and of the ambition which he showed in all things soever that he undertook, the mass of the people set him down as a pretender to the tyranny, and became his enemies; and although publicly his conduct of the war was as good as could be desired, individually, his habits gave offence to every one, and caused them to commit affairs to other hands, and thus before long to ruin the city. Meanwhile, he now came forward and gave the following advice to the Athenians:

以上是尼西亚斯的发言。尽管有一些发言者持反对意见，但上来发言的大多数雅典人都支持远征，不赞成废除已经投票作出的决定。不过，最支持远征的是克利尼亚斯的儿子亚西比德。他之所以想挫败尼西亚斯，不仅是因为他们二人在政治上是对手，而且是因为尼西亚斯在演说中对他进行了攻击。此外，亚西比德极其渴望指挥一支部队，希望凭借它攻占西西里和迦太基，通过军事上的成功为他个人赢得财富和声誉。为了维持自己在公民们心目中的地位，他沉溺于养马和其他消费方面的爱好，他的财产实际上已不能满足他的需求，这一点与后来雅典城邦的灭亡也大有关系。许多人对他在个人生活与习惯上极为放纵以及他无论负责何事均显得野心勃勃感到担忧，认为他觊觎僭主之位，因而对他持敌视态度。尽管他在指挥作战方面不孚众望，但作为个人，他的习惯却冒犯了众人。因此，他们就把城邦的事务交给了其他人，致使城邦在不久之后遭到了毁灭。这时侯，他走上前来，向雅典人提出了如下建议：

“Athenians, I have a better right to command than others—I must begin with this as Nicias has attacked me—and at the same time I believe myself to be worthy of it. The things for which I am abused, bring fame to my ancestors and to myself, and to the country profit besides. The Hellenes, after expecting to see our city

ruined by the war, concluded it to be even greater than it really is, by reason of the magnificence with which I represented it at the Olympic games, when I sent into the lists seven chariots, a number never before entered by any private person, and won the first prize, and was second and fourth, and took care to have everything else in a style worthy of my victory. Custom regards such displays as honourable, and they cannot be made without leaving behind them an impression of power. Again, any splendour that I may have exhibited at home in providing choruses or otherwise, is naturally envied by my fellow citizens, but in the eyes of foreigners has an air of strength as in the other instance. And this is no useless folly, when a man at his own private cost benefits not himself only, but his city;nor is it unfair that he who prides himself on his position should refuse to be upon an equality with the rest. He who is badly off has his misfortunes all to himself, and as we do not see men courted in adversity, on the like principle a man ought to accept the insolence of prosperity; or else, let him first mete out equal measure to all, and then demand to have it meted out to him. What I know is that persons of this kind and all others that have attained to any distinction, although they may be unpopular in their lifetime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ir fellow-men and especially with their equals, leave to posterity the desire of claiming connection with them even without any ground, and are vaunted by the country to which they belonged, not as strangers or ill-doers, but as fellow-countrymen and heroes. Such are my aspirations, and however I am abused for them in private,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any one manages public affairs better than I do. Having united the most powerful states of Peloponnese, without great danger or expense to you, I compelled the Lacedaemonians to stake their all upon the issue of a single day at Mantinea; and although victorious in the battle, they have never since fully recovered confidence."

“雅典人：我比别人更有权出任指挥官——因为尼西亚斯对我进行了攻击，所以我必须一开始就谈这个问题，同时我也相信自己能够胜任。我被诋毁之事，正是给我的祖先和我本人带来声望，同时也给城邦带来好处之举。当初希腊人曾以为我们的城邦已被战争摧毁，但由于我在奥林匹克竞赛会上代表城邦所铸就的辉煌，他们后来认为它甚至比实际上更强大。我派了七辆马车参赛——以前从来没有过任何个人用这么多辆车参赛，而且还分别获得了第一名，第二名和第四名，在赛场上其他方面，我也着力安排得与我所取得的胜利相称。人们习惯上将这种表现视为荣耀之举，而这些表现不可能不给人留下实力超群的印象。再说，无论我在提供合唱队或其他方面在本邦展示出多少光彩，自然都会引起同邦公民的嫉妒，但在外邦人眼中，却与其他事情一样，同样是实力的象征。当一个人耗费自己的财产使自己和城邦都能获益时，那就不是一种无用的蠢举；他得意于自己的地位而拒绝与他人平等，也就不可谓不公平。境况不佳的人只能独自承担所有的不幸。既然我们没有看到过有人讨好身处逆境之人，那么，其他人同样应该接受成功者的傲慢。否则，他只有首先以平等的方式对待所有的人，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他。我知道，这种人以及所有其他获得了显著声誉的人，虽然在有生之年在同胞中不得人心，特别是在同等人中间，但是到了后世，人们甚至会毫无根据地巴望能声称与他们扯得上关系，他们所属的城邦还要将他们作为同胞和英雄加以炫耀，而不是把他们视为异邦人和作恶者。我梦寐以求的正是如此。无论我的个人生活因此而受到怎样的指责，问题在于是否有人能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超过我。我联合伯罗奔尼撒一些势力最大的城邦，没有让你们冒多大危险，也没让你们耗费多少钱财，就迫使斯巴达人在曼提尼亚仅有一天的战事上孤注一掷。尽管他们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此后却从未完全恢复信心。”

“Thus did my youth and so-called monstrous folly find fitting arguments to deal with the powe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by its ardour win their confidence and prevail. And do not be afraid of my youth now, but while I am still in its flower, and Nicias appears

fortunate, avail yourselves to the utmost of the services of us both. Neither rescind your resolution to sail to Sicily, on the ground that you would be going to attack a great power. The cities in Sicily are peopled by motley rabbles, and easily change their institutions and adopt new ones in their stead; and consequently the inhabitants, being without any feeling of patriotism, are not provided with arms for their persons, and have not regularly established themselves on the land; every man thinks that either by fair words or by party strife he can obtain something at the public expense, and then in the event of a catastrophe settle in some other country, and makes his preparations accordingly. From a mob like this you need not look for either unanimity in counsel or concert in action; but they will probably one by one come in as they get a fair offer, especially if they are torn by civil strife as we are told. Moreover, the Siceliots have not so many heavy infantry as they boast; just as the Hellenes generally did not prove so numerous as each state reckoned itself, but Hellas greatly over-estimated their numbers, and has hardly had an adequate force of heavy infantry throughout this war. The states in Sicily, therefore, from all that I can hear, will be found as I say, and I have not pointed out all our advantages, for we shall have the help of many barbarians, who from their hatred of the Syracusans will join us in attacking them; nor will the powers at home prove any hindrance, if you judge rightly. Our fathers with these very adversaries, which it is said we shall now leave behind us when we sail, and the Mede as their enemy as well, were able to win the empire, depending solely on their superiority at sea. The Peloponnesians had never so little hope against us as at present; and let them be ever so sanguine, although strong enough to invade our country even if we stay at home, they can never hurt us with their navy, as we leave one of our own behind us that is a match for them."

“因此，正是我的年轻和所谓的极度愚蠢，使我有合适的理由去与伯罗奔尼撒人的势力较量；也正是我的年轻气盛，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依从。现在，不要再害怕我的年轻。趁着我依然朝气蓬勃，趁着尼西亚斯鸿运当头，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俩为你们效劳吧。不要因为你们要去进攻一个强大的城邦而放弃开赴西西里的决定。西西里诸城邦由各色人等混杂而居，极易改变自己的政制而用新的取而代之。因此，那里的居民没有爱国主义情感，没有给自己配备武器，在陆地上也没有固定耕作的土地；每个人都想通过精彩的演说或党派斗争从公共开支中捞到些好处，大难临头时就移居到其他城邦，并为此作着相应的准备。对于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你们不必想着他们会作出一致决定或采取一致行动。不过，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一些不错的建议时，尤其是当他们像我们所听说的那样因内争而四分五裂时，他们倒有可能会一个个前来与我们订立协议。此外，西凯利奥特人的重步兵并没有他们所吹嘘的那么多。正像希腊人通常无法证明各个城邦的军队如他们自己估算的那么多一样，希腊人确实大大高估了他们的数目。在整个这场战争中，他们几乎一直不曾有过足够的重步兵。因此，从我所能听到的情况来看，西西里诸城邦的情况与我说的一样，而我们的优势还不止我所说的这些。我们还将获得很多蛮族人的帮助，他们痛恨叙拉古人，愿意和我们联手发动进攻。如果你们作出正确的判断，对我们城邦内部的势力也形不成任何阻碍。有人说，我们扬帆远征时，将会弃敌人于后方。然而，我们的父辈在与波斯人作战时，同样将敌人留在了后方，但他们仅凭海上优势就赢得了这个帝国。在与我们的对抗中，伯罗奔尼撒人从来没有像目前这样希望如此渺茫。然而，就算我们留在本邦，他们也有能力侵犯我们的领土，但他们用海军绝对伤害不了我们，因为我们留一支舰队在后方就足以对付他们，那就随他们去乐观好了。”

“In this state of things what reason can we give to ourselves for holding back, or what excuse can we offer to our allies in Sicily for not helping them? They are our confederates, and we are bound to assist them, without objecting that they have not assisted us. We

did not take them into alliance to have them to help us in Hellas, but that they might so annoy our enemies in Sicily as to prevent them from coming over here and attacking us. It is thus that empire has been won, both by us and by all others that have held it, by a constant readiness to support all, whether barbarians or Hellenes, that invite assistance; since if all were to keep quiet or to pick and choose whom they ought to assist, we should make but few new conquests, and should imperil those we have already won. Men do not rest content with parrying the attacks of a superior, but often strike the first blow to prevent the attack being made. And we cannot fix the exact point at which our empire shall stop; we have reached a position in which we must not be content with retaining but must scheme to extend it, for, if we cease to rule others, we are in danger of being ruled ourselves. Nor can you look at inaction from the same point of view as others, unless you are prepared to change your habits and make them like theirs."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有什么理由畏缩不前，又能向西西里的盟邦提出什么不去帮助他们的理由呢？他们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而不能因为他们没有帮过我们就表示反对。我们与他们结盟，并不是想让他们到希腊来帮助我们，而是想要他们在西西里骚扰我们的敌人，以阻止那些敌人到这里来进攻我们。不仅是我们，其他所有拥有帝国的人，都是这样赢得自己的帝国的，即对所有请求援助的人始终有求必应，无论是蛮族人还是希腊人。如果大家都无动于衷，或者对帮助的对象有挑有拣，我们就征服不了多少新的领土，连已经获得的领土也有丧失的危险。人不能只满足于抵御优势之敌的进攻，往往还要先发制人，以阻止进攻的发生。我们无法确定我们的帝国止于何处。但我们既已到了不能满足于守成而必须设法扩张的地步，如果我们不再去统治别人，我们自己就有被别人统治的危险。你们也不能站在与其他人一样的角度上来看待不作为这个问题，除非你们准备将自己的习惯变得同他人的一样。"

“Be convinced, then, that we shall augment our power at home by this adventure abroad, and let us make the expedition, and so humble the pride of the Peloponnesians by sailing off to Sicily, and letting them see how little we care for the peace that we are now enjoy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shall either become masters, as we very easily may, of the whole of Hellas through the accession of the Sicilian Hellenes, or in any case ruin the Syracusans, to the no small advantage of ourselves and our allies. The faculty of staying if successful, or of returning, will be secured to us by our navy, as we shall be superior at sea to all the Siceliots put together. And do not let the do-nothing policy which Nicias advocates, or his setting of the young against the old, turn you from your purpose, but in the good old fashion by which our fathers, old and young together, by their united counsels brought our affairs to their present height, do you endeavour still to advance them; understanding that neither youth nor old age can do anything the one without the other, but that levity, sobriety, and deliberate judgment are strongest when united, and that, by sinking into inaction, the city, like everything else, will wear itself out, and its skill in everything decay; while each fresh struggle will give it fresh experience, and make it more used to defend itself not in word but in deed. In short, my conviction is that a city not inactive by nature could not choose a quicker way to ruin itself than by suddenly adopting such a policy, and that the safest rule of life is to take one's character and institutions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and to live up to them as closely as one can.”

“那么，请相信，这次出征海外，将增强我们在本邦的实力。因此，让我们去远征吧！当我们驶向西西里，当我们让他们看到我们是多么不在意眼下享有的和平，我们将会灭掉伯罗奔尼撒人的傲慢气

焰。同时，一旦我们征服了西西里的希腊人，我们将不难成为整个希腊的主人；不管怎样，我们都会打垮叙拉古人，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盟邦谋得不小的利益。如果获胜，我们的海军可以为我们或留或走提供保证，因为我们在海上比所有西凯利奥特人加起来都强大。不要让尼西亚斯所倡导的安于现状政策，以及他挑拨年轻人与年长者对立的做法，使你们的目标有所改变，而是要发扬我们父辈的优良传统。他们老少团结，齐心协力，这才把我们的事业推进到了现有的高度，而你们要力争再上新台阶。要知道，不论你是年轻还是年长，离了彼此均将一事无成；然而，当年少轻率、老成稳重与深思熟虑的判断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最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要知道，如果一个城邦陷入无所作为的状态，它就会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被慢慢耗尽，各方面的能力也会逐渐衰退；而每一次新的战斗都会使它获得新的经验，使它更惯于以行动而不是用言辞来保卫自己。总之，我认为，一个本质上不安于现状的城邦要想毁灭自己，再没有比突然采取这样一种政策更快的办法了。最安全的人生原则是，不论自己的本性和政制好坏都予以接受，并尽可能按其行事。”

Such were the words of Alcibiades. After hearing him and the Egestaeans and some Leontine exiles, who came forward reminding them of their oaths and imploring their assistance, the Athenians became more eager for the expedition than before. Nicias, perceiving that it would be now useless to try to deter them by the old line of argument, but thinking that he might perhaps alter their resolution by the extravagance of his estimates, came forward a second time and spoke as follows:

以上是亚西比德的发言。埃耶斯塔人和莱昂蒂尼的一些流亡者随后也走上来提醒雅典人履行誓言，并恳求他们提供援助。听了亚西比德和这些人的发言之后，雅典人比以前更急于发动这次远征了。尼西亚斯觉察到他原有的论点这时已无法阻止他们采取行动，但他认为，

如果他极力夸大所需的军力，或许可以改变他们的决定。于是，他再次上前，作了如下发言：

“I see, Athenians, that you are thoroughly bent upon the expedition, and therefore hope that all will turn out as we wish, and proceed to give you my opinion at the present juncture. From all that I hear we are going against cities that are great and not subject to one another, or in need of change, so as to be glad to pass from enforced servitude to an easier condition, or in the least likely to accept our rule in exchange for freedom; and, to take only the Hellenic towns, they are very numerous for one island. Besides Naxos and Catana, which I expect to join us from their connection with Leontini, there are seven others armed at all points just like our own power, particularly Selinus and Syracuse, the chief objects of our expedition. These are full of heavy infantry, archers, and darters, have galleys in abundance and crowds to man them; they have also money, partly in the hands of private persons, partly in the temples at Selinus, and at Syracuse first-fruits from some of the barbarians as well. But their chief advantage over us lies in the number of their horses, and in the fact that they grow their corn at home instead of importing it.”

“雅典人：我知道你们一心想进行这次远征。因此，我希望一切都能如我们所愿。值此关键时刻，我想再贡献一点意见。据我所听到的情况来看，我们要去进攻的城邦都是大邦；它们彼此不相隶属，也不需要作出改变，所以也不会乐意从被迫受奴役的状况转向比较舒适的状态；它们也丝毫不可能放弃自由而接受我们的统治。仅就希腊城镇而言，以单个岛屿而论，其数量甚多。我预计，纳克索斯和卡塔纳会加入我们这边，因为它们与莱昂蒂尼有关系。但是，除了这两个城邦之外，还有七个城邦。它们的军事力量在各方面有着和我们一样的

装备，特别是塞利努斯和叙拉古，这两个地方也是我们这次远征的主要目标。这些城邦的重步兵、弓箭手和标枪手人数众多，三列桨战舰数量充足，可配备到舰上的人手多不胜数。另外，他们财力丰厚，一部分在私人手中，一部分在塞利努斯的神庙里，而且叙拉古还有一些蛮族人奉献的初熟果实。不过，他们对我们的主要优势还在于他们骑兵甚多，而且他们的谷物都由本地生产，不从外地进口。”

“Against a power of this kind it will not do to have merely a weak naval armament, but we shall want also a large land army to sail with us, if we are to do anything worthy of our ambition, and are not to be shut out from the country by a numerous cavalry; especially if the cities should take alarm and combine, and we should be left without friends (except the Egestaeans) to furnish us with horse to defend ourselves with. It would be disgraceful to have to retire under compulsion, or to send back for reinforcements, owing to want of reflection at first: we must therefore start from home with a competent force, seeing that we are going to sail far from our country, and upon an expedition not like any which you may have undertaken in the quality of allies, among your subject states here in Hellas, where any additional supplies needed were easily drawn from the friendly territory; but we are cutting ourselves off, and going to a land entirely strange, from which during four months in winter it is not even easy for a messenger get to Athens.”

“对付这样一种强邦，仅靠一支势单力薄的海军部队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想采取与我们的目标相应的行动，而不是被数量众多的骑兵阻在境外，我们还需要一支庞大的陆军部队一道远航；倘若这些城市在惊恐之下联合起来，而我们却无盟友（除了埃耶斯塔人之外）向我们提供骑兵以供自卫之用，则尤当如此。如果因为起初考虑不周而被

迫撤退，或是派人回来请求增援，那是很不光彩的。因此，我们从本邦出发时就必须带足部队，因为我们将离开本邦，航行到很远的地方去征战，而这次远征与你们过去在希腊这里对属邦所进行的征战完全不同。在这里，需要额外补给时，很容易就可以从友邦的领土上获取；而我们却将隔断与家乡的联系，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冬季的四个月里，就连从那里派个信使来雅典都不容易。”

“I think, therefore, that we ought to take great numbers of heavy infantry, both from Athens and from our allies, and not merely from our subjects, but also any we may be able to get for love or for money in Peloponnese, and great numbers also of archers and slingers, to make head against the Sicilian horse. Meanwhile, we must have an overwhelming superiority at sea, to enable us the more easily to carry in what we want; and we must take our own corn in merchant vessels, that is to say, wheat and parched barley, and bakers from the mills compelled to serve for pay in the proper proportion; in order that in case of our being weather-bound the armament may not want provisions, as it is not every city that will be able to entertain numbers like ours. We must also provide ourselves with everything else as far as we can, so as not to be dependent upon others; and above all we must take with us from home as much money as possible, as the sums talked of as ready at Egesta are readier, you may be sure, in talk than in any other way.”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从雅典和我们的盟邦抽调大量重步兵，而且不但要从我们的臣民中，还要不惜代价尽可能从伯罗奔尼撒招募重步兵以及大量的弓箭手和投石手，以迎击西西里人的骑兵。同时，我们必须在海上具有绝对优势，以易于我们运入所需物资。我们必须用商船从这里带上我们自己吃的粮食，即小麦和烘干的大麦，还

要按照合适的比例从磨坊强制征募面包师为军队提供有薪服务。这样，万一我们被恶劣气候所困，军队才不至于缺粮，因为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能力接待我们这么庞大的军队。我们还要尽我们所能将其他一切准备齐全，以免依赖他人，尤其是必须尽量从本邦多带些金钱。虽说埃耶斯塔已经准备了说过的那笔钱，但可以肯定，这笔钱更多的是在口头上而不是以其他方式存在。”

“Indeed, even if we leave Athens with a force not only equal to that of the enemy except in the number of heavy infantry in the field, but even at all points superior to him, we shall st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conquer Sicily or save ourselves. We must not disguise from ourselves that we go to found a city among strangers and enemies, and that he who undertakes such an enterprise should be prepared to become master of the country the first day he lands, or failing in this to find everything hostile to him. Fearing this, and knowing that we shall have need of much good counsel and more good fortune—a hard matter for mortal man to aspire to—I wish as far as may be to make myself independent of fortune before sailing, and when I do sail, to be as safe as a strong force can make me. This I believe to be surest for the country at large, and safest for us who are to go on the expedition. If any one thinks differently I resign to him my command.”

“实际上，除了能上阵的重步兵之外，即使我们从雅典带去的军队在数量上与敌军旗鼓相当，甚至于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他们，我们还是很难征服西西里或保全自己。我们必须清楚，我们要到陌生人和敌人中间去建立一座城市。我们还要清楚，从事这样一项事业的人在登陆第一天就要准备成为那片土地的主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发现一切都会以他为敌。对于这一点我很担忧，同时我也知道，我们需要诸多忠告和更多的运气——那是凡人难求之物。我希望，启航前我

可以尽量少靠些运气；真要启航时，我的军队能够强大到为我提供安全保障。我相信，对于我们整个城邦来说，这样最可靠；对于我们这些远征的将士来说，这样也最安全。如果有人持有异议，我愿把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他。”

With this Nicias concluded, thinking that he should either disgust the Athenians by the magnitude of the undertaking, or, if obliged to sail on the expedition, would thus do so in the safest way possible. The Athenians, however, far from having their taste for the voyage taken away by the burdensomeness of the preparations, became more eager for it than ever; and just the contrary took place of what Nicias had thought, as it was held that he had given good advice, and that the expedition would be the safest in the world. All alike fell in love with the enterprise. The older men thought that they would either subdue the places against which they were to sail, or at all events, with so large a force, meet with no disaster; those in the prime of life felt a longing for foreign sights and spectacles, and had no doubt that they should come safe home again; while the idea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 soldiery was to earn wages at the moment, and make conquests that would supply a never-ending fund of pay for the future. With this enthusiasm of the majority, the few that liked it not, feared to appear unpatriotic by holding up their hands against it, and so kept quiet.

说完这句话，尼西亚斯结束了发言。他以为经此一说，雅典人就会因为这次远征规模之大而失去兴趣；即使他被迫出海远征，他也可以尽可能以最安全的方式进行。然而，雅典人并没有因为准备之累而对远征西西里失去兴趣，反而比以前更加渴望远征。他们认为，尼西亚斯提出的建议很好，这次远征将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一次远征。因此，结果与尼西亚斯原来的设想恰恰相反。所有人都对这次远征充满

了热情。年纪大一些的人认为，结果不是将所到之地尽行征服，就是不管怎样也不会遭到什么灾难，因为他们有如此庞大的军队；正值盛年的人渴望去看看异乡的风光和奇观，他们毫不怀疑自己能够安全返乡；普通民众和士兵则想眼下先挣点军饷，日后掠了地就会有取之不尽的薪饷来源。由于多数人对远征如此狂热，少数不赞成的人担心自己若举手反对会显得不爱城邦，所以就没作声。

At last, one of the Athenians came forward and called upon Nicias and told him that he ought not to make excuses or put them off, but say at once before them all what forces the Athenians should vote him. Upon this he said, not without reluctance, that he would advise upon that matter more at leisure with his colleagues; as far however as he could see at present, they must sail with at least one hundred galleys—the Athenians providing as many transports as they might determine, and sending for others from the allies—not less than five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in all, Athenian and allied, and if possible more; and the rest of the armament in proportion; archers from home and from Crete, and slingers, and whatever else might seem desirable, being got ready by the generals and taken with them.

最后，有一位雅典人走上前来，向尼西亚斯发出呼吁。他对尼西亚斯说，他不应该再找理由推辞或拖延了，而是应该即刻向民众说明，雅典人应该通过表决决定拨给他什么样的军队。闻听此言，尼西亚斯不无勉强地说，他将与他的同僚们慢慢再就这个问题提出意见，但以他目前所见，他们至少要带100艘三列桨战舰——雅典人还要决定尽量多提供些运输船，不足之数可派人从盟邦去要；重步兵总共不应少于5,000名，雅典和盟邦的均包括在内，如果可能的话，多些更好；远征军的其他方面也应当与之成比例。从雅典和克里特招募的弓箭手和投石手以及其他所需的一切，同样要由将军们准备好并一起带

去。

Upon hearing this, the Athenians at once voted that the generals should have full powers in the matter of the numbers of the army and of the expedition generally, to do as they judged best for the interests of Athens. After this, the preparations began; messages being sent to the allies and the rolls drawn up at home. And as the city had just recovered from the plague and the long war, and a number of young men had grown up and capital had accumulated by reason of the truce, everything was the more easily provided.

听罢尼西亚斯的意见，雅典人立即投票表决，决定由将军们全权决定军队的人数以及远征方面的一应事务，并按照他们认为对雅典最有利的去做。随后，准备工作就开始了。他们一边派人送信给盟邦，一边在雅典拟定远征人员名单。由于雅典城恰好已从瘟疫和长期战争中恢复过来，不少年轻人已经成年，资金也因休战而积累起来了，一切准备起来都比较容易。

In the midst of these preparations, all the stone Hermae in the city of Athens, that is to say the customary square figures, so common in the doorways of private houses and temples, had in one night most of them their faces mutilated. No one knew who had done it, but large public rewards were offered to find the authors; and it was further voted that any one who knew of any other act of impiety having been committed should come and give information without fear of consequences, whether he were citizen, alien, or slave. The matter was taken up the more seriously, as it was thought to be ominous for the expedition, and part of a conspiracy

to bring about a revolution and to upset the democracy.

正当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雅典城内的赫尔迈石像，也就是习惯上多竖在私人住宅和庙宇门口的方形雕像，一夜之间几乎全都被毁了。没人知道这是什么人干的，但政府拿出了巨额赏金来追查毁坏石像的人，进而又投票决定：不管是雅典公民、异邦人还是奴隶，凡是知道有人犯有其他渎神行为者，均应前来告发，不必有何后顾之忧。大家对这件事更加重视起来，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事对远征来说是不祥之兆，而且是引发革命和妄图推翻民主政治阴谋活动的一部分。

Information was given accordingly by some resident aliens and body servants, not about the Hermae but about some previous mutilations of other images perpetrated by young men in a drunken frolic, and of mock celebrations of the mysteries, averred to take place in private houses. Alcibiades being implicated in this charge, it was taken hold of by those who could least endure him, because he stood in the way of their obtaining the undisturbed direction of the people, and who thought that if he were once removed the first place would be theirs. These accordingly magnified the matter and loudly proclaimed that the affair of the mysteries and the mutilation of the Hermae were part and parcel of a scheme to overthrow the democracy, and that nothing of all this had been done without Alcibiades; the proofs alleged being the general and undemocratic licence of his life and habits.

于是，一些居住在雅典的异邦人和贴身男仆便提供了一些情况，但不是关于赫尔迈石像事件的，而是某些年轻人此前在酒后嬉闹中对其他雕像的一些破坏行为，以及据称在私人住宅里戏仿秘密宗教仪式之类。这种指控把亚西比德也牵连进去了。于是，那些最不能容忍他

的人就抓住这个把柄不放，因为他妨碍了他们不受干扰地操纵民众。他们认为，一旦扳倒亚西比德，最高权力将属于他们。因此，这些人便夸大这件事，叫嚣说秘密宗教仪式和破坏赫尔迈石像事件都是推翻民主政治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还说，如果没有亚西比德，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们所援引的证据是，亚西比德在生活和作风方面通常不太民主。

Alcibiades repelled on the spot the charges in question, and also before going on the expedition, the preparations for which were now complete, offered to stand his trial, that it might be seen whether he was guilty of the acts imputed to him; desiring to be punished if found guilty, but, if acquitted, to take the command. Meanwhile, he protested against their receiving slanders against him in his absence, and begged them rather to put him to death at once if he were guilty, and pointed out the imprudence of sending him out at the head of so large an army, with so serious a charge still undecided. But his enemies feared that he would have the army for him if he were tried immediately, and that the people might relent in favour of the man whom they already caressed as the cause of the Argives and some of the Mantineans joining in the expedition, and did their utmost to get this proposition rejected, putting forward other orators who said that he ought at present to sail and not delay the departure of the army, and be tried on his return within a fixed number of days; their plan being to have him sent for and brought home for trial upon some graver charge, which they would the more easily get up in his absence. Accordingly, it was decreed that he should sail.

亚西比德当场否认了对他的指控，并且在远征前（当时各项准备已经就绪）主动要求接受审判，以查明加诸于他的罪名是否成立。如

果被判有罪，他甘愿接受惩罚；若被宣判无罪，他再担任远征军的指挥官。同时，他反对他们在他缺席时受理对他的诽谤，并且恳请他们，他若有罪，不如立刻将他处死。他还指出，倘若如此严重的指控尚无定论就派他率领如此庞大的军队出征，那可就太轻率了。但是，他的政敌们却担心，如果立即审判他，他就会获得军队的支持，民众也有可能会出于爱戴他而宽恕他，因为他们认为阿尔戈斯人和某些曼提尼亚人是因为他才参加远征的。因此，他们极力促使这一提案得到否决，还鼓动其他人上前发言。发言的那些人说，亚西比德应当马上启程，不应当再推迟出发时间了，他可以在回来后一定时日内再接受审判。他们计划先派他出征，然后再以更严重的指控为由把他召回来。他不在城邦时，他们更容易罗织罪名。于是，他们颁布政令，命亚西比德启航出发。

After this, the departure for Sicily took place, it being now about midsummer. Most of the allies, with the corn transports and the smaller craft and the rest of the expedition, had already received orders to muster at Corcyra, to cross the Ionian Sea from thence in a body to the Iapygian promontory. But the Athenians themselves, and such of their allies as happened to be with them, went down to Piraeus upon a day appointed at daybreak, and began to man the ships for putting out to sea. With them also went down the whole population, one may say, of the city, both citizens and foreigner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each escorting those that belonged to them, their friends, their relatives, or their sons, with hope and lamentation upon their way, as they thought of the conquests which they hoped to make, or of the friends whom they might never see again, considering the long voyage which they were going to make from their country. Indeed, at this moment, when they were now upon the point of parting from one another, the danger came more home to them than when they voted for the expedition; although the strength of the armament, and the profuse

provision which they remarked in every department, was a sight that could not but comfort them. As for the foreigners and the rest of the crowd, they simply went to see a sight worth looking at and passing all belief.

这之后，远征西西里的大军就出发了，此时大约已是仲夏时节。大多数盟军都已接到了在克基拉集合的命令。他们带着运载谷物的运输船和一些小型船只以及远征军的其余所需，从那里一起渡过爱奥尼亚海，直抵亚皮伊亚海角。但是，雅典人自己则与当时和他们在一起的盟军，在指定之日的黎明时分来到比雷埃夫斯，开始为战舰配备人员，准备出海。与他们一同前往比雷埃夫斯的还有雅典城的全体居民，本邦公民和外邦人均有。每个人都是带着希望与悲伤前来为他们的朋友、亲人或儿子送行的。他们虽然希望征服西西里，但考虑到这些人毕竟要远离家乡去远航，他们同时也想到可能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友了。此时此刻，在相互离别之际，他们的确比投票赞成远征之时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远征的危险，尽管他们在看到远征军队伍庞大和各方面装备精良时不禁感到一丝安慰。至于外邦人和其他民众，他们不过是为了去看一种值得观看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壮观场面。

Indeed, this armament that first sailed out was by far the most costly and splendid Hellenic force that had ever been sent out by a single city up to that time. In mere number of ships and heavy infantry that against Epidaurus under Pericles, and the same when going against Potidaea under Hagnon, was not inferior; containing as it did four thousand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three hundred horse, and one hundred galleys accompanied by fifty Lesbian and Chian vessels and many allies besides. But these were sent upon a short voyage and with a scanty equipment. The present expedition was formed in contemplation of a long term of service by land and sea alike, and was furnished with ships and troops so as to be ready

for either as required. The fleet had been elaborately equipped at great cost to the captains and the state; the treasury giving a drachma a day to each seaman, and providing empty ships, sixty men-of-war and forty transports, and manning these with the best crews obtainable; while the captains gave a bounty in addition to the pay from the treasury to the thranitae and crews generally, besides spending lavishly upon figure-heads and equipments, and one and all making the utmost exertions to enable their own ships to excel in beauty and fast sailing. Meanwhile, the land forces had been picked from the best muster-rolls, and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paying great attention to their arms and personal accoutrements. From this resulted not only a rivalry among themselves in their different departments, but an idea among the rest of the Hellenes that it was more a display of power and resources than an armament against an enemy. For if any one had counted up the public expenditure of the state, and the private outlay of individuals —that is to say, the sums which the state had already spent upon the expedition and was sending out in the hands of the generals, and those which individuals had expended upon their personal outfit, or as captains of galleys had laid out and were still to lay out upon their vessels; and if he had added to this, the journey money which each was likely to have provided himself with, independently of the pay from the treasury, for a voyage of such length, and what the soldiers or traders took with them for the purpose of exchange —it would have been found that many talents in all were being taken out of the city. Indeed, the expedition became not less famous for its wonderful boldness and for the splendour of its appearance, than for its overwhelming strength as compared with the peoples against whom it was directed, and for the fact that this was the longest passage from home hitherto attempted, and the most ambitious in its objects considering the resources of those who undertook it.

实际上，这支首次出征的军队是到那时为止由单个城邦派出的耗资最多、阵容最壮观的希腊军队。单就战舰和重步兵的数量而论，在伯里克利的指挥下进攻埃皮达鲁斯的军队也不逊于它。那支军队实际上包括4,000名雅典重步兵、300名骑兵和100艘三列桨战舰，此外还有莱斯沃斯和希俄斯的50艘战舰以及很多盟军。在哈格农指挥下进攻波提狄亚的军队也不少于此。但是，过去派出去的那些军队航程很短，而且装备匮乏。现在这支远征军在组建时就考虑到了要在陆上和海上长期服役，既配备了战舰，也配备了陆军，以便随时准备按需出动。各位舰长和城邦都斥巨资对舰队进行了精心装备。城邦每天从金库支付1德拉克玛给每个水手，另外还提供了空船，包括60艘军舰和40艘运输船，并将能招募到的最好的水手配备到了各条船上；舰长们则花大价钱制作了艏饰像并购置了设备，个个都竭力使自己的战舰在外观和航速方面胜过其它舰只。另外，上排桨手和船上人员除了得到城邦给付的军饷外，舰长还额外发给他们奖金。同时，陆军士兵也都是从最优秀的应征人员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也争先恐后地对武器和个人装备的配备大加重视。这不仅导致了雅典军队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而且也使其他希腊人觉得，这次远征与其说是要去进攻敌人，不如说是在炫耀雅典的实力和资源。如果有人统计过城邦的公共支出和私人花费——即城邦已经用在远征上和将要送到将军们手中的资金，远征军将士在个人装备上的花销，舰长们在战舰上已经投入和将来还要投入的金钱，再加上每个人在公款支付的军饷外因航程遥远而随身携带的途中花费，以及士兵或商人们为了进行买卖而携带的财物——他一定会发现巨额塔兰特将要被带出城。实际上，这支远征军之所以闻名，不仅在于它较之所要进攻的对手具有压倒性优势，也不仅在于它是迄今为止从雅典出发进行的远征中航程最远的一次，而且就远征者所拥有的资源而言，也是目标最雄心勃勃的一次，同样也在于它显示出的那令人惊叹的勇气和奢华的外表。

The ships being now manned, and everything put on board with which they meant to sail, the trumpet commanded silence, and

the prayers customary before putting out to sea were offered, not in each ship by itself, but by all together to the voice of a herald; and bowls of wine were mixed through all the armament, and libations made by the soldiers and their officers in gold and silver goblets. In their prayers joined also the crowds on shore, the citizens and all others that wished them well. The hymn sung and the libations finished, they put out to sea, and first out in column then raced each other as far as Aegina, and so hastened to reach Corcyra, where the rest of the allied forces were also assembling.

这时，人员已经配备完毕，他们想带的一切也都装上了舰。接着，号声响起，全体肃静下来，举行了出航前惯有的祈祷。祈祷不是由各舰进行的，而是全体一起由传令官领着进行的。然后，全军将士把酒倾入碗中，将士们用金银酒杯进行了奠酒。随他们一同祈祷的还有岸上送行的群众，不论是雅典公民还是其他人，大家全都为他们祝福。唱完凯歌，行毕奠酒仪式，他们就起锚出航了。开始时排成纵队出了港，继而你追我赶地驶至埃伊纳，然后迅速抵达了克基拉，其他盟军也正在那里集结。

CHAPTER XIX Seventeenth Yearof the War—Parties at Syracuse—Story of Harmodius and Aristogiton—Disgrace of Alcibiades

第十九章　战争第十七年——叙拉古诸党派——哈尔莫季乌斯和阿里斯托伊通的故事——亚西比德受辱

Meanwhile, at Syracuse news came in from many quarters of the expedition, but for a long while met with no credence whatever. Indeed, an assembly was held in which speeches, as will be seen, were delivered by different orators, believing or contradicting the report of the Athenian expedition; among whom Hermocrates, son

of Hermon, came forward, being persuaded that he knew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and gave the following counsel:

这时候，雅典人进行远征的消息也从各地传到了叙拉古，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无人相信。实际上，叙拉古曾召开过一次公民大会。从大会发言中可以看出，对于雅典人发动远征这一消息，发言者意见不一，有的相信，有的否认。赫尔蒙之子赫莫克拉特斯也在发言者之列。他认为自己了解事实的真相，于是走上前来，发表了如下看法：

“Although I shall perhaps be no better believed than others have been when I speak upon the reality of the expedition, and although I know that those who either make or repeat statements thought not worthy of belief not only gain no converts but are thought fools for their pains, I shall certainly not be frightened into holding my tongue when the state is in danger, and when I am persuaded that I can speak with more authority on the matter than other persons. Much as you wonder at it, the Athenians nevertheless have set out against us with a large force, naval and military, professedly to help the Egestaeans and to restore Leontini, but really to conquer Sicily, and above all our city, which once gained, the rest, they think, will easily follow. Make up your minds, therefore, to see them speedily here, and see how you can best repel them with the means under your hand, and do be taken off your guard through despising the news, or neglect the common weal through disbelieving it. Meanwhile, those who believe me need not be dismayed at the force or daring of the enemy.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do us more hurt than we shall do them; nor is the greatness of their armament altogether without advantage to us. Indeed, the greater it is the better, with regard to the rest of the Siceliots, whom dismay will make more ready to join us; and if we defeat or drive

them away, disappointed of the objects of their ambition (for I do not fear for a moment that they will get what they want), it will be a most glorious exploit for us, and in my judgment by no means an unlikely one. Few indeed have been the large armaments, either Hellenic or barbarian, that have gone far from home and been successful. They cannot be more numerous than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and their neighbours, all of whom fear leagues together; and if they miscarry for want of supplies in a foreign land, to those against whom their plans were laid none the less they leave renown, although they may themselves have been the main cause of their own discomfort. Thus these very Athenians rose by the defeat of the Mede, in a great measure due to accidental causes, from the mere fact that Athens had been the object of his attack; and this may very well be the case with us also."

"如果我说这次远征确有其事，我也许会和别人一样不为人信。我知道，提出或者重复人们认为不值得一信的说法，不仅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还会被看作是自讨苦吃的傻瓜。尽管如此，当城邦处于危险之中时，当我相信我比他人对此事更有发言权时，我肯定不会因为害怕而保持沉默。虽然你们对远征的消息感到惊讶，但雅典人已经出动海陆大军进攻我们了。他们虽然号称是来援助埃耶斯塔人和收复莱昂蒂尼的，但实际上是来征服西西里的，尤其是我们城邦。他们认为，一旦征服了我们城邦，其余城邦便唾手可得。因此，承认他们很快就会开到这里吧，再想想如何才能利用手中现有的资源最有效地抵御他们。千万不要置若罔闻，丧失警惕，也不要因为不相信真有此事而忽略了公众的利益。同时，那些相信我的话的人，也没必要因为敌军人多势众或胆大妄为而感到惊慌。他们能对我们造成的损害，不会比我们对他们造成的更多。他们聚集起如此庞大的军队，对我们也不是毫无益处。实际上，他们的军队规模越大越好，因为其他西凯利奥特人会感到惊恐从而会更愿意加入我们一方。如果我们打败或赶走了雅典人，使他们的勃勃野心不能得逞（我一刻也不怕他们如愿以

偿），那将是我们极其辉煌的战绩。依我之见，这也绝非不可能。其实，无论是希腊人还是蛮族人，派遣如此庞大的军队离开本土远赴他乡，成功者凤毛麟角。他们人数再多，也不可能超过被侵略城邦及其邻邦，后者出于恐惧往往会联合起来。如果因为在异乡补给不足而受挫，他们只好把战争的荣誉留给那些他们想要对付的敌手，尽管令他们沮丧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自己。这些雅典人当初之所以能因打败波斯人而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偶然原因，不过是因为他们是波斯人进攻的目标罢了。如今这种事也很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Let us, therefore, confidently begin preparations here; let us send and confirm some of the Sicels, and obtain the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of others, and dispatch envoys to the rest of Sicily to show that the danger is common to all, and to Italy to get them to become our allies, or at all events to refuse to receive the Athenians. I also think that it would be best to send to Carthage as well; they are by no means there without apprehension, but it is their constant fear that the Athenians may one day attack their city, and they may perhaps think that they might themselves suffer by letting Sicily be sacrificed, and be willing to help us secretly if not openly, in one way if not in another. They are the best able to do so, if they will, of any of the present day, as they possess most gold and silver, by which war, like everything else, flourishes. Let us also send to Lacedaemon and Corinth, and ask them to come here and help u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o keep alive the war in Hellas. But the true thing of all others, in my opinion, to do at the present moment, is what you, with your constitutional love of quiet, will be slow to see, and what I must nevertheless mention. If we Siceliots, all together, or at least as many as possible besides ourselves, would only launch the whole of our actual navy with two months' provisions, and meet the Athenians at Tarentum and the Iapygian promontory, and show them that before fighting for Sicily they

must first fight for their passage across the Ionian Sea, we should strike dismay into their army, and set them on thinking that we have a base for our defensive—for Tarentum is ready to receive us—while they have a wide sea to cross with all their armament, which could with difficulty keep its order through so long a voyage, and would be easy for us to attack as it came on slowly and in small detachments.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y were to lighten their vessels, and draw together their fast sailers and with these attack us, we could either fall upon them when they were wearied with rowing, or if we did not choose to do so, we could retire to Tarentum; while they, having crossed with few provisions just to give battle, would be hard put to it in desolate places, and would either have to remain and be blockaded, or to try to sail along the coast, abandoning the rest of their armament, and being further discouraged by not knowing for certain whether the cities would receive them. In my opinion this consideration alone would be sufficient to deter them from putting out from Corcyra; and what with deliberating and reconnoitring our numbers and whereabouts, they would let the season go on until winter was upon them, or, confounded by so unexpected a circumstance, would break up the expedition, especially as their most experienced general has, as I hear, taken the command against his will, and would grasp at the first excuse offered by any serious demonstration of ours. We should also be reported, I am certain, as more numerous than we really are, and men's minds are affected by what they hear, and besides the first to attack, or to show that they mean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an attack, inspire greater fear because men see that they are ready for the emergency. This would just be the case with the Athenians at present. They are now attacking us in the belief that we shall not resist, having a right to judge us severely because we did not help the Lacedaemonians in crushing them; but if they were to see us showing a courage for which they are not prepared, they

would be more dismayed by the surprise than they could ever be by our actual power. I could wish to persuade you to show this courage; but if this cannot be, at all events lose not a moment in preparing generally for the war; and remember all of you that contempt for an assailant is best shown by bravery in action, but that for the present the best course is to accept the preparations which fear inspires as giving the surest promise of safety, and to act as if the danger was real. That the Athenians are coming to attack us, and are already upon the voyage, and all but here—this is what I am sure of."

"因此，我们要满怀信心地着手准备；我们要派遣使节前往西库尔人那里，进一步确认可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并争取与其他人建立友好同盟关系；我们要派遣使节前往西西里其他城邦，向他们说明我们大家面临着共同的危险；我们还要派人到意大利去，争取让他们成为我们的盟友，无论如何也不要接受雅典人。另外，我认为最好也要派使节到迦太基去。那里的人不会没有一点疑惧，他们一直担心雅典人会在某一天来进攻他们的城市。他们或许会想，一旦西西里成为牺牲品，他们自己也可能遭遇不幸。因此，他们即便不会公开相助，私下里也会以各种方式帮助我们。如果他们愿意，他们是当下所有人中最能帮得上我们的人，因为他们拥有的金银最多。战争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有了金钱才能顺利进行。我们还要派人去斯巴达和科林斯，请他们尽快到这里来帮助我们，同时在希腊继续进行战争。但是，依我之见，在当前所有要做的事情当中，真正应当去做的是你们这些生性喜好安宁的人们慢慢才能领悟到的，我无论如何得说出来。如果我们所有的西凯利奥特人都联合起来，至少把尽可能多的西凯利奥特人团结起来，那么，我们只需出动现有全部海上力量，带上两个月的给养，就可以在他林敦和亚皮伊亚海角迎击雅典人，并且让他们知道，在打西西里之前，他们必须先打通爱奥尼亚海这条通道。我们要挫伤他们军队的锐气，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个防卫基地——他林敦随时准备接待我们，而雅典人则要率领整个远征军渡过辽阔的大海。由于

航程很长，他们很难保持秩序，而我们在他们以小型编队慢慢前来时实施进攻则比较容易。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想轻载前进，将速度最快的舰只集中起来进攻我们，我们则可以在他们划得精疲力竭时攻击他们，如果不愿意这样做，我们还可以退回他林敦；而他们只是为渡海作战而来，所带的给养甚少，在荒无人烟之地将会陷入困境，不是待在那里等待被包围，就是抛下其余军队沿着海岸航行，再加上无法确知哪些城市会接待他们，他们会更加气馁。在我看来，仅此一条就足以阻止他们从克基拉启航了。加之还得考虑和侦察我们的人数和去向，他们会错过这个季节，任凭冬季来临，抑或会因为情况如此出乎意料而惊慌失措，因而终止这次远征，特别是因为，据我所闻，他们最有经验的将军并不情愿出任这次远征的指挥官。我们方面一有重大行动，他肯定会抓住不放，作为放弃这次远征的借口。我敢肯定，我军的人数在传说中同样会比实际上多，而人的想法是会受传闻影响的。此外，首先发起进攻或表现出决心要抵御进攻而自卫的人，将会使敌人更加畏惧，因为敌人知道他们已经做好了应变准备。这就是雅典人当前所面临的情况。他们则认为我们不会抵抗，所以现在要进攻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帮助斯巴达人毁灭他们，所以他们现在有权对我们有此苛见。但是，如果他们看到我们表现出令他们毫无防备的勇气，他们因这一意外而生出的沮丧，将甚于以往任何看到我们的真实实力之时。但愿我能够说服诸位表现出这种勇气，即便做不到这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全面做好战争准备，片刻也不能耽搁。大家要记住，战斗中的勇敢确实最能表明对敌人的蔑视，但眼下最明智的办法是，将因恐惧而做的准备当作最可靠的安全保证，要像真的处于危急之中那样行动起来。雅典人就要来进攻我们了，他们已在航行途中，很快就要到达这里了——我对此深信不疑。”

Thus far spoke Hermocrates. Meanwhile, the people of Syracuse were at great strife among themselves; some contending that the Athenians had no idea of coming and that there was no truth in what he said; some asking if they did come what harm they could do that would not be repaid them tenfold in return; while

others made light of the whole affair and turned it into ridicule. In short, there were few that believed Hermocrates and feared for the future. Meanwhile, Athenagoras, the leader of the people and very powerful at that time with the masses, came forward and spoke as follows:

赫莫克拉特斯的发言到此为止。紧接着，叙拉古的公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认为雅典人根本无意前来，赫莫克拉特斯所言纯属空穴来风；有些人问，即使雅典人真的来了，他们也会以十倍还之，雅典人又能对他们有何伤害？还有一部分人对整件事浑不在意，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笑话。总之，相信赫莫克拉特斯的话并为未来担心者寥寥无几。这时，人民领袖，当时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阿忒那哥拉，站出来作了如下发言：

“For the Athenians, he who does not wish that they may be as misguided as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and that they may come here to become our subjects, is either a coward or a traitor to his country; while as for those who carry such tidings and fill you with so much alarm, I wonder less at their audacity than at their folly if they flatter themselves that we do not see through them. The fact is that they have their private reasons to be afraid, and wish to throw the city into consternation to have their own terrors cast into the shade by the public alarm. In short, this is what these reports are worth; they do not arise of themselves, but are concocted by men who are always causing agitation here in Sicily. However, if you are well advised, you will not be guided in your calculation of probabilities by what these persons tell you, but by what shrewd men and of large experience, as I esteem the Athenians to be, would be likely to do. Now it is not likely that they would leave the Peloponnesians behind them, and before they have well ended the

war in Hellas wantonly come in quest of a new war quite as arduous in Sicily; indeed, in my judgment, they are only too glad that we do not go and attack them, being so many and so great cities as we are.”

“说到雅典人，那种不希望他们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误入歧途，也不希望他们来到这里变成我们的属民的人，要么是胆小鬼，要么就是自己城邦的叛徒。至于那些散布这种消息并使你们如此惊恐不安的人，如果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没有看穿他们，那么，较之他们的胆量，我更惊讶于他们的愚蠢。事实上，他们确实有其害怕的理由，想把城邦置于惊恐之中，以公众的惶恐来掩饰他们自己的恐惧。总之，这就是这些传闻的意义所在。这些恐慌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那些总在西西里制造骚乱的人编造出来的。但是，如果你们明智的话，就不会根据这些人告诉你们的消息去猜测各种可能性，而是会去考虑那些精明而又经验丰富的人（我相信雅典人就是这样的人）可能会做什么。他们现在不可能抛下伯罗奔尼撒人不打，在希腊的战争尚未结束时就鲁莽地跑到西西里来寻求发动一场同样艰难的新战争。实际上，据我判断，我们不去进攻他们，他们就谢天谢地了，因为我们人数众多，各城邦的力量也非常强大。”

“However, if they should come as is reported, I consider Sicily better able to go through with the war than Peloponnese, as being at all points better prepared, and our city by itself far more than a match for this pretended army of invasion, even were it twice as large again. I know that they will not have horses with them, or get any here, except a few perhaps from the Egestaeans; or be able to bring a force of heavy infantry equal in number to our own, in ships which will already have enough to do to come all this distance, however lightly laden, not to speak of the transport of the other stores required against a city of this magnitude, which will be no

slight quantity. In fact, so strong is my opinion upon the subject, that I do not well see how they could avoid annihilation if they brought with them another city as large as Syracuse, and settled down and carried on war from our frontier; much less can they hope to succeed with all Sicily hostile to them, as all Sicily will be, and with only a camp pitched from the ships, and composed of tents and bare necessaries, from which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stir far for fear of our cavalry.In fact I do not think they will win any ground at all, such is how superior I believe our force will be.”

“然而，如果雅典人真如传说的那样来了，我认为，西西里比伯罗奔尼撒更具备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实力，因为我们各方面准备得更充分，兵力也是对方的两倍。我知道他们不会带骑兵来，除了或许能从埃耶斯塔人那里招到几个之外，他们在这里也征募不到。他们同样无法运来一支与我军人数相当的重步兵，因为他们乘坐的船只航行如此遥远的路程本身就够受的了，更不用说还得运输其他补给了。要对付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城邦，所需的补给数量一定不小。事实上，我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深以为是。我认为，即便雅典人带着一座与叙拉古一样大的城邦前来并在此驻扎，自边境向我们发起进攻，他们也难逃被消灭的命运。如果整个西西里全都与他们为敌（实际上定会如此），他们获胜的希望就会更加渺茫，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用船上所带之物搭建的营地，营地中只有帐篷和少量必需品。由于害怕我们的骑兵，他们挪动不了多远。事实上，我认为他们没有任何胜算，因为我们的实力实在是难以逾越。”

“But the Athenians see this as I tell you, and as I have reason to know are looking after their possessions at home, while persons here invent stories that neither are true nor ever will be. Nor is this the first time that I see these persons, when they cannot resort to deeds, trying by such stories and by others even more abominable

to frighten your people and get into their hands the government: it is what I see always. And I cannot help fearing that trying so often they may one day succeed, and that we, as long as we do not feel the smart, may prove too weak for the task of prevention, or, when the offenders are known, of pursuit. The result is that our city is rarely at rest, but is subject to constant troubles and to contests as frequent against herself as against the enemy, not to speak of occasional tyrannies and infamous cabals. However, I will try, if you will support me, to let nothing of this happen in our time, by gaining you, the many, and by chastising the authors of such machinations, not merely when they are caught in the act—a difficult feat to accomplish—but also for what they have the wish though not the power to do; as it is necessary to punish an enemy not only for what he does, but also beforehand for what he intends to do, if the first to relax precaution would not be also the first to suffer. I shall also reprove, watch, and on occasion warn the few—the most effectual way, in my opinion, of turning them from their evil courses. And after all, as I have often asked, what would you have, young men? Would you hold office at once? The law forbids it, a law enacted rather because you are not competent than to disgrace you when competent. Meanwhile, you would not be on a legal equality with the many! But how can it be right that citizens of the same state should be held unworthy of the same privileges?”

“但是，正如我对你们所说，雅典人也明白这一点。我有理由相信，雅典本土人正在照料自己的属地，而这里的人却在炮制现在不实而且将来也不会成真的谣言。这倒也不是我第一次发现这类人的存在。当他们无法诉诸于行动时，就试图用这类或者其他更可恶的传闻恐吓人民，以便夺取政权。这种事我屡见不鲜。我不禁担心，他们屡次这样做，说不定有一天会得逞。如果感觉不到这种悲哀，我们就可能无力进行阻止；即使发现了谁在作怪，可能也无力追究。其结果

是，我们的城邦罕有安宁，动乱不断；内忧同外患一样频繁，更不用说间或发生的暴政和无耻的阴谋事件了。但是，如果你们支持我，我将努力不让这类事件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是通过赢得你们众人的支持，二是通过惩罚这些阴谋活动的始作俑者，不单是被逮个正着时（虽然很难做到），而且要在他们图谋不轨但尚无能力付诸行动之际。我们不仅有必要对敌人已犯罪行进行惩罚，而且有必要预先对其图谋加以惩处。谁先放松警惕，谁就会首先遭殃。我还要揭露、监视，间或还要警告那一小撮人——我认为，这是使他们不再继续为恶的最有效方法。不过，我还是要问一个我常问的问题：年轻人，你们究竟想要什么？立刻担任公职吗？法律不允许。法律作此规定，不是因为你们有能力却非要排斥你们，而是因为你们现在还无法胜任。同时，你们不能与广大民众处于同等地位！但是，同一个城邦的公民不享受同样的特权，这有什么错吗？”

“It will be said, perhaps, that democracy is neither wise nor equitable, but that the holders of property are also the best fitted to rule. I say, on the contrary, first, that the word demos, or people, includes the whole state, oligarchy only a part; next, that if the best guardians of property are the rich, and the best counsellors the wise, none can hear and decide so well as the many; and that all these talents, severally and collectively, have their just place in a democracy. But an oligarchy gives the many their share of the danger, and not content with the largest part takes and keeps the whole of the profit; and this is what the powerful and young among you aspire to, but in a great city cannot possibly obtain.”

“可能会有人说，民主政治既不明智也不公平，财富的持有者才最适于当统治者。我认为恰恰相反。首先，‘民众’或曰‘人民’这个词，包括整个城邦在内，‘寡头’仅指其中一部分；其次，如果说财富的最佳守护者是富人，最佳顾问是智者，那么，最善于听取意见和做出决

定的莫过于大众。所有这些有才之士，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整体，在民主政治中都应当享有适当的地位。但是，寡头政治集团只会让大众分担危险，他们并不满足于享有最大部分的利益，而是想攫取和独占全部利益。这便是你们当中那些有势力的年轻人一心向往的。但是，在一个伟大的城邦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But even now, foolish men, most senseless of all the Hellenes that I know, if you have no sense of the wickedness of your designs, or most criminal if you have that sense and still dare to pursue them—even now, if it is not a case for repentance, you may still learn wisdom, and thus advance the interest of the country, the common interest of us all. Reflect that in the country's prosperity the men of merit in your ranks will have a share and a larger share than the great mass of your fellow countrymen, but that if you have other designs you run a risk of being deprived of all; and desist from reports like these, as the people know your object and will not put up with it. If the Athenians arrive, this city will repulse them in a manner worthy of itself; we have moreover, generals who will see to this matter. And if nothing of this be true, as I incline to believe, the city will not be thrown into a panic by your intelligence, or impose upon itself a self-chosen servitude by choosing you for its rulers; the city itself will look into the matter, and will judge your words as if they were acts, and, instead of allowing itself to be deprived of its liberty by listening to you, will strive to preserve that liberty, by taking care to have always at hand the means of making itself respected.”

“可是，愚蠢的人们啊，到了现在，如果你们还不觉得自己的图谋是邪恶的，你们就是我所知道的希腊人中最麻木的人了。如果你们明知是邪恶的竟还敢去追寻，你们就是罪孽最深重的人。即便是现

在，如果尚未酿成令人追悔莫及的后果，你们仍可以明智一些，以促进城邦的利益，也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利益。请想一想，城邦繁荣了，你们阶层中的优秀分子也将拥有一份，而且比你们同胞们中大部分人所得的都要丰厚。但是，如果你们还有其他图谋，你们就会有被剥夺一切的危险。不要再散布这种传闻了，因为人们知道你们的意图，他们是不会容忍你们这样做的。纵然雅典人来了，这座城市也会以无愧于自己的方式将他们逐出城外。此外，我们还有诸位将军，他们会料理此事的。如果这件事完全是无稽之谈——我倾向于这样认为，那么，这个城邦就不会因为你们获得的消息而陷于恐慌，也不会因为选择你们作统治者而自陷于被奴役的境地。城邦自会调查此事，并且把你们的言论当作行动来评判。它不会仅凭你们的一面之词就听任自己的自由被剥夺，而是会小心行事，维护自身尊严以保全自己的自由。”

Such were the words of Athenagoras. One of the generals now stood up and stopped any other speakers coming forward, adding these words of his own with reference to the matter in hand,“It is not well for speakers to utter calumnies against one another, or for their hearers to entertain them; we ought rather to look to the intelligence that we have received, and see how each man by himself and the city as a whole may best prepare to repel the invaders. Even if there be no need, there is no harm in the state being furnished with horses and arms and all other insignia of war; and we will undertake to see to and order this, and to send round to the cities to reconnoitre and do all else that may appear desirable. Part of this we have seen to already, and whatever we discover shall be laid before you.” After these words from the general, the Syracusans departed from the assembly.

这是阿忒那哥拉的发言。这时，有一位将军站起来阻止其他人再

上前发言。对于正在讨论的问题，他补充了自己的意见：“发言者相互诽谤或听众哗众取宠都不可取。我们应该仔细考虑一下我们获得的情报，看看每个人自身以及城邦作为整体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做好抵抗侵略者的准备。纵然没有必要，但以马匹、武器还有其他所有与战争相关的装备将城邦武装起来也没有坏处。我们将着手安排这件事，传令各城邦进行侦察，并做好其他一切有利的准备。其中一部分我们已经做了安排，无论发现什么情况，我们都将向你们汇报。”这位将军说完这番话之后，叙拉古人退出了会场。

In the meantime, the Athenians with all their allies had now arrived at Corcyra. Here the generals began by again reviewing the armament, and made arrangements as to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were to anchor and encamp, and dividing the whole fleet into three divisions, allotted one to each of their number, to avoid sailing all together and being thus embarrassed for water, harbourage, or provisions at the stations which they might touch at,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be generally better ordered and easier to handle, by each squadron having its own commander. Next they sent on three ships to Italy and Sicily to find out which of the cities would receive them, with instructions to meet them on the way and let them know before they put in to land.

这时，雅典人已率领所有盟军抵达克基拉。将军们在这里再度检阅了军队，并对停泊和扎营的次序做了安排。他们把整个舰队分成三个部分，每个将军负责一部分，以避免所有战舰一同启航，从而在可能停靠的站位造成供水、锚地和补给方面的困难。同时，每个中队都有自己的指挥官。这样，总体上秩序比较好维持，管理起来也比较容易。接着，他们派遣3艘舰只驶往意大利和西西里，目的是要搞清哪个城邦愿意接纳他们，然后再依令转回来在中途来接应他们，并在登陆前告知他们前方的情况。

After this, the Athenians weighed from Corcyra, and proceeded to cross to Sicily with an armament now consisting of one hundred and thirty-four galleys in all (besides two Rhodian fifty-oars), of which one hundred were Athenian vessels—sixty men-of-war, and forty troopships—and the remainder from Chios and the other allies; five thousand and one hundred heavy infantry in all, that is to say, fifteen hundred Athenian citizens from the rolls at Athens and seven hundred Thetes shipped as marines, and the rest allied troops, some of them Athenian subjects, and besides these five hundred Argives, and two hundred and fifty Mantineans serving for hire; four hundred and eighty archers in all, eighty of whom were Cretans, seven hundred slingers from Rhode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light-armed exiles from Megara, and one horse-transport carrying thirty horses.

其后，雅典人率领大军从克基拉起锚，横渡大海前往西西里岛。这支军队此时共有134艘三列桨战舰（此外还有罗得人的2艘五十桨大船），其中100艘是雅典人的——60艘用于作战，40艘用于运送兵员，其余战舰来自希俄斯和其他盟邦；重步兵共5,100人，即1,500名登记在册的雅典公民，700名作为水兵运来的贫民级公民，余者均来自盟邦的部队，其中有些是雅典的臣民，此外还有500名阿尔戈斯人和250名曼提尼亚雇佣兵；弓箭手一共是480名，其中克里特人80名；另外还有700名来自罗得的投石手，由迈加拉流亡者组成的一支120人的轻步兵队伍，以及一艘载有30匹马的马匹运输船。

Such was the strength of the first armament that sailed over for the war. The supplies for this force were carried by thirty ships of burden laden with corn, which conveyed the bakers, stone-masons, and carpenters, and the tools for raising fortifications, accompanied

by one hundred boats, like the former pressed into the service, besides many other boats and ships of burden which followed the armament voluntarily for purposes of trade; all of which now left Corcyra and struck across the Ionian Sea together. The whole force making land at the Iapygian promontory and Tarentum, with more or less good fortune, coasted along the shores of Italy, the cities shutting their markets and gates against them, and according them nothing but water and liberty to anchor, and Tarentum and Locri not even that, until they arrived at Rhegium, the extreme point of Italy. Here at length they reunited, and not gaining admission within the walls pitched a camp outside the city in the precinct of Artemis, where a market was also provided for them, and drew their ships on shore and kept quiet. Meanwhile, they opened negotiations with the Rhegians, and called upon them as Chalcidians to assist their Leontine kinsmen; to which the Rhegians replied that they would not side with either party, but should await the decision of the rest of the Italiots, and do as they did. Upon this, the Athenians now began to consider what would be the best action to take in the affairs of Sicily, and meanwhile, waited for the ships sent on to come back from Egesta, in order to know whether there was really there the money mentioned by the messengers at Athens.

这是跨海作战的第一支远征军的兵力情况。这支部队的补给由30艘货船运载，船上装满谷物，还有面包师、石匠和木工以及修建防御工事所用的工具。另外，除了为了做生意自愿与远征军同行的不少其他小船和货船之外，还有100艘小船随行。这些小船与运载补给的货船一样，都是被征用来的。所有这些船只此时都已驶离克基拉，一同横渡爱奥尼亚海。整个部队多少靠着些运气在亚皮伊亚海角和他林敦地区靠了岸，然后开始沿着意大利的海岸航行，但沿岸城市都不向他们开放市场，也不给他们开城门，只允许他们取水和自由停泊，而他林敦和洛克里却连这点便利都不给。他们就这样一直到了意大利最边

上的雷伊乌姆，终于在这里又会合在了一起。由于未获准进城，他们在城外阿耳忒弥斯神庙周围扎了营，那里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市场。他们将舰只靠了岸，没再继续前行。与此同时，他们与雷伊乌姆人展开了谈判，吁请他们援助与其同样源于哈尔基斯人的莱昂蒂尼人。雷伊乌姆人答复说，他们不会站在任何一边，而是要先等其他意大利奥特人做出决定，然后与他们行动一致。得到这一答复之后，雅典人立即开始考虑他们在西西里一事上采取何种行动最佳，同时也等着先期派往埃耶斯塔的战舰回来，以确定那里是否真有信使在雅典提到的那笔资金。

In the meantime, came in from all quarters to the Syracusans, as well as from their own officers sent to reconnoitre, the positive tidings that the fleet was at Rhegium; upon which they laid aside their incredulity and threw themselves heart and soul into the work of preparation. Guards or envoys, as the case might be, were sent round to the Sicels, garrisons put into the posts of the Peripoli in the country, horses and arms reviewed in the city to see that nothing was wanting, and all other steps taken to prepare for a war which might be upon them at any moment.

与此同时，四面八方的消息都传到了叙拉古人那里，他们自己派出去侦察的军官也传回了确切的消息：雅典舰队已经到达雷伊乌姆。于是，叙拉古人不再持怀疑态度，开始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作战准备之中。根据不同情况，他们或派卫兵或派使节前往西库尔人居住的地方，还派遣守军进驻边防军在境内的各个要塞，并检查了城内的马匹和武器，以确保无一短缺。为了应付随时可能降临到头上的战争，他们做了万全的准备。

Meanwhile, the three ships that had been sent on came from

Egesta to the Athenians at Rhegium, with the news that so far from there being the sums promised, all that could be produced was thirty talents. The generals were not a little disheartened at being thus disappointed at the outset, and by the refusal to join in the expedition of the Rhegians, the people they had first tried to gain and had had had most reason to count upon, from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Leontines and constant friendship for Athens. If Nicias was prepared for the news from Egesta, his two colleagues were taken completely by surprise. The Egestaeans had had recourse to the following stratagem, when the first envoys from Athens came to inspect their resources. They took the envoys in question to the temple of Aphrodite at Eryx and showed them the treasures deposited there: bowls, wine-ladles, censers, and a large number of other pieces of plate, which from being in silver gave an impression of wealth quite out of proportion to their really small value. They also privately entertained the ships' crews, and collected all the cups of gold and silver that they could find in Egesta itself or could borrow in the neighbouring Phoenician and Hellenic towns, and each brought them to the banquets as their own; and as all used pretty nearly the same, and everywhere a great quantity of plate was shown, the effect was most dazzling upon the Athenian sailors, and made them talk loudly of the riches they had seen when they got back to Athens. The dupes in question—who had in their turn persuaded the rest—when the news got abroad that there was not the money supposed at Egesta, were much blamed by the soldiers.

这时候，原先派出去的那3艘舰只从埃耶斯塔回到了在雷伊乌姆的雅典人那里。他们带回的消息是，埃耶斯塔的资金远不及当初承诺的那么多，总共能拿出来的也就30塔兰特。一开始就这么令人失望，而且雷伊乌姆人还拒绝加入远征军，将军们感到十分气馁。雷伊乌姆人是他们最先争取的人，也是他们最有理由指望的人，因为雷伊乌姆

人不仅与莱昂蒂尼人有同族关系，对雅典人一直也很友好。如果说尼西亚斯对于从埃耶斯塔获得的消息尚有思想准备，他那两位同僚却完全没有料到。雅典的第一批使者来查验埃耶斯塔人的财产物资情况时，他们采取了以下计策：他们把这些使者带到埃里克斯的阿佛洛狄忒神庙，向他们展示了在那里存放的宝物：碗、酒勺、香炉和大量其他餐具。这些东西都是银质的，给人一种很富有的印象，实则并没有多大价值。埃耶斯塔人还私下里招待船上的船员，他们把在埃耶斯塔能找到的或在邻近的腓尼基和希腊城镇能借到的金杯银杯都收集起来，每个人都把它们作为私人之物拿到宴会上。由于所有人用的差不多都一样，而且随处可见大量的餐具，结果搞得雅典的水手们眼花缭乱。回到雅典后，他们便大肆宣扬埃耶斯塔富有的景象。这些人受骗后，转而又通过他们的宣传让其他人上了当。埃耶斯塔没有预计的那笔钱这一消息传开后，远征在外的士兵们对这些人大加谴责。

Meanwhile, the generals consulted upon what was to be done. The opinion of Nicias was to sail with all the armament to Selinus, the main object of the expedition, and if the Egestaeans could provide money for the whole force, to advise accordingly; but if they could not, to require them to supply provisions for the sixty ships that they had asked for, to stay and settle matters between them and the Selinuntines either by force or by agreement, and then to coast past the other cities, and after displaying the power of Athens and proving their zeal for their friends and allies, to sail home again (unless they should have some sudden and unexpected opportunity of serving the Leontines, or of bringing over some of the other cities), and not to endanger the state by wasting its home resources.

与此同时，将军们也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尼西亚斯的意见是，率领全部军队驶往这次远征的主要目的地塞利努斯。如果埃耶斯

塔人能够为整个部队提供资金，他们将相应地作出考虑；如若不能，那就要求埃耶斯塔人为他们所要的60艘战舰提供给养，并且留下来用武力或协商的方式解决他们与塞利努斯人之间的问题，随后沿着海岸驶经其他城市。在向他们展示了雅典的实力，并证明了自己对友邦和盟邦的热情援助之意后，驶回家乡（除非他们突然而意外获得可以帮助莱昂蒂尼人或使其他城市投向他们的机会），而不是浪费本土的资源，使城邦陷入危险之中。

Alcibiades said that a great expedition like the present must not disgrace itself by going away without having done anything; heralds must be sent to all the cities except Selinus and Syracuse, and efforts be made to make some of the Sicels revolt from the Syracusans, and to obtain the friendship of others, in order to have corn and troops; and first of all to gain the Messinese, who lay right in the passage and entrance to Sicily, and would afford an excellent harbour and base for the army. Thus, after bringing over the towns and knowing who would be their allies in the war, they might at length attack Syracuse and Selinus; unless the latter came to terms with Egesta and the former ceased to oppose the restoration of Leontini.

亚西比德说，规模如此之大的一支远征军，不能一无所获地回去遭人耻笑，必须派传令官前往除塞利努斯和叙拉古之外的其他所有城市，设法让一部分西库尔人背叛叙拉古人，并与其他西库尔人建立友好关系，以便从他们那里得到谷物和军队。他们首先要争取的是墨西拿人，因为墨西拿是他们的必经之地，而且是西西里的门户，可以为远征军提供优良的港口和基地。这样，在争取了一些城镇并摸清了谁将成为他们在战争中的盟友之后，他们最终才可能攻打叙拉古和塞利努斯，除非塞利努斯与埃耶斯塔达成妥协，叙拉古也不再反对他们收复莱昂蒂尼。

Lamachus, on the other hand, said that they ought to sail straight to Syracuse, and fight their battle at once under the walls of the town while the people were still unprepared, and the panic at its height. Every armament was most terrible at first; if it allowed time to run on without showing itself, men's courage revived, and they saw it appear at last almost with indifference. By attacking suddenly, while Syracuse still trembled at their coming, they would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gaining a victory for themselves and of striking a complete panic into the enemy by the aspect of their numbers—which would never appear so considerable as at present—by the anticipation of coming disaster, and above all by the immediate danger of the engagement. They might also count upon surprising many in the fields outside, incredulous of their coming; and at the moment that the enemy was carrying in his property the army would not want for booty if it sat down in force before the city. The rest of the Siceliots would thus be immediately less disposed to enter into alliance with the Syracusans, and would join the Athenians, without waiting to see which were the strongest. They must make Megara their naval station as a place to retreat to and a base from which to attack: it was an uninhabited place at no great distance from Syracuse either by land or by sea.

拉马胡斯则说，他们应当直接驶往叙拉古，趁城市不设防以及叙拉古人仍无防备和极度恐慌之时，在城下迅速开战。每支军队最初都十分令人畏惧。若是任由时间流逝而不显示自己的威力，人们的勇气就会复原，最终看到它出现时就不大会在乎它了。当叙拉古人仍在为他们的到来而战栗时，如果进行突袭，他们最有可能为自己赢得胜利，也最有可能使敌人完全陷入混乱，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其他时候都不会比现在显得多，同时也是因为敌人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交战的危险在即。他们还有可能打得城外田野中的许多人措手不及，因

为他们不相信雅典人会到来，此刻正在将财产运入城内。如果以大军压城，他们是不会缺少战利品的。这样，其余西凯利奥特人很快就不那么愿意与叙拉古人结盟了。不等看到孰强孰弱，他们就会加入雅典人一方。他们必须把迈加拉作为海军基地，这样进则有根据地，退则有避难所，那里荒无人烟，陆上和海上都离叙拉古不远。

After speaking to this effect, Lamachus nevertheless gave his support to the opinion of Alcibiades. After this Alcibiades sailed in his own vessel across to Messina with proposals of alliance, but met with no success, the inhabitants answering that they could not receive him within their walls, though they would provide him with a market outside. Upon this he sailed back to Rhegium. Immediately upon his return the generals manned and victualled sixty ships out of the whole fleet and coasted along to Naxos, leaving the rest of the armament behind them at Rhegium with one of their number. Received by the Naxians, they then coasted on to Catana, and being refused admittance by the inhabitants, there being a Syracusan party in the town, went on to the river Terias. Here they bivouacked, and the next day sailed in single file to Syracuse with all their ships except ten which they sent on in front to sail into the great harbour and see if there was any fleet launched, and to proclaim by herald from shipboard that the Athenians were come to restore the Leontines to their country, as being their allies and kinsmen, and that such of them, therefore, as were in Syracuse should leave it without fear and join their friends and benefactors the Athenians. After making this proclamation and reconnoitring the city and the harbour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country which they would have to make their base of operations in the war, they sailed back to Catana.

拉马胡斯虽然表达了上述想法，但还是表示支持亚西比德的意见。随后，亚西比德乘自己的战舰渡海去了墨西拿，建议与其结盟，不过没有获得成功。那里的居民答复说，他们虽然可以在城外为他提供一个市场，却不能接纳他入城。得此答复后，亚西比德返回了雷伊乌姆。他刚一回来，将军们就从整个舰队中选出60艘战舰，配备好人员并备足食物后，沿着海岸驶往纳克索斯岛。其余军队则留在雷伊乌姆，由另一位将军指挥。受到纳克索斯人的接待之后，他们又沿着海岸驶往卡塔纳。由于城内有一个亲叙拉古的党派，居民们拒不允许他们入城。于是，他们又继续向泰里亚斯河驶去。他们在这里露宿了一晚，次日，除了奉命先行驶入大港去查看是否有战舰出动的10艘舰只外，所有战舰均排成单列驶往叙拉古，传令官还在舰上宣布：雅典人是莱昂蒂尼人的盟友和同族同胞，此次前来是为了帮助莱昂蒂尼人重建家园。因此，叙拉古城中的莱昂蒂尼人应该无所畏惧地离开叙拉古，加入到他们的朋友和恩人雅典人当中来。宣布完毕之后，他们察看了这座城市和港口，侦察了他们在战争中要设为作战基地的地区的地形，然后驶回了卡塔纳。

An assembly being held here, the inhabitants refused to receive the armament, but invited the generals to come in and say what they desired; and while Alcibiades was speaking and the citizens were intent on the assembly, the soldiers broke down an ill-walled-up postern gate without being observed, and getting inside the town, flocked into the marketplace. The Syracusan party in the town no sooner saw the army inside than they became frightened and withdrew, not being at all numerous; while the rest voted for an alliance with the Athenians and invited them to fetch the rest of their forces from Rhegium. After this, the Athenians sailed to Rhegium, and put off, this time with all the armament, for Catana, and fell to work at their camp immediately upon their arrival.

卡塔纳的居民召开了一次公民大会。他们虽然拒绝接纳雅典军队入城，但邀请了雅典的将军们进城陈述来意。趁着亚西比德进行陈述和公民们专心开会之际，雅典的士兵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捣毁了不甚牢固的城墙后门。进城之后，他们涌进了市场。一看雅典军队进了城，城里的亲叙拉古党人马上害怕起来，连忙逃走了。他们的人数本来也不多。其余卡塔纳人则投票赞成与雅典人结盟，并请他们把其余军队都从雷伊乌姆带到卡塔纳来。雅典人随后驶往雷伊乌姆，这次是带着所有部队离岸开往卡塔纳的。刚一抵达，便开始着手搭建临时营房。

Meanwhile, word was brought them from Camarina that if they went there the town would go over to them, and also that the Syracusans were manning a fleet. The Athenians accordingly sailed alongshore with all their armament, first to Syracuse, where they found no fleet manning, and so always along the coast to Camarina, where they brought to at the beach, and sent a herald to the people, who, however, refused to receive them, saying that their oaths bound them to receive the Athenians only with a single vessel, unless they themselves sent for more. Disappointed here, the Athenians now sailed back again, and after landing and plundering on Syracusan territory and losing some stragglers from their light infantry through the coming up of the Syracusan horse, so got back to Catana.

这时候，从卡马里纳传来消息说，如果雅典军队前往那里，这座城就倒向他们。另外还有消息说，叙拉古人正在为一支舰队配备船员。于是，雅典人率领全部军队沿着海岸驶去。他们先驶到叙拉古，却没有发现那里有配备舰队的迹象，所以就一直沿着海岸驶到卡马里纳。他们在海滩旁停下，派了一名传令官去见卡马里纳人，但后者拒不接纳他们。卡马里纳人说，他们受誓言的束缚，只能接待乘单个舰

只而来的雅典人，除非他们自己请求派遣更多的舰只前来。在这里受挫之后，雅典人随即再次折回。他们在叙拉古的领土登陆并进行了劫掠。由于叙拉古的骑兵赶了上来，一些掉队的轻步兵落入了敌手，所以他们又返回卡塔纳去了。

There they found the Salaminia come from Athens for Alcibiades, with orders for him to sail home to answer the charges which the state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for certain others of the soldiers who with him were accused of sacrilege in the matter of the mysteries and of the Hermae. For the Athenians, after the departure of the expedition, had continued as active as ever in investigating the facts of the mysteries and of the Hermae, and, instead of testing the informers, in their suspicious temper welcomed all indifferently, arresting and imprisoning the best citizens upon the evidence of rascals, and preferring to sift the matter to the bottom sooner than to let an accused person of good character pass unquestioned, owing to the rascality of the informer. The commons had heard how oppressive the tyranny of Pisistratus and his sons had become before it ended, and further that that had been put down at last, not by themselves and Harmodius, but by the Lacedaemonians, and so were always in fear and took everything suspiciously.

在卡塔纳，他们发现“萨拉米尼亚”号战舰从雅典驶来了。这艘舰是奉命前来召回亚西比德就城邦对他提出的指控进行抗辩的，同时也要求其他一些与他一起被控在秘密宗教仪式和赫尔迈石像之事上有亵渎行为的士兵返回雅典。远征军出发后，雅典人仍像先前一样积极调查秘密宗教仪式和赫尔迈石像事件的情况。他们不去考查告发者的人品，而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不加区别地一概接受，仅凭无赖之徒所提供的证据就将最优秀的公民逮捕和关押起来。他们宁可将此事尽快一查到底，也不愿让一个品行良好的被告因告发者品行恶劣而逃避审

问。在皮西斯特拉图斯及其儿子们的僭主政治统治结束之前，雅典民众就听说过这种统治多么残暴专横。他们还听说，最终推翻僭主政治的不是他们自己和哈尔莫季乌斯，而是斯巴达人，所以他们一直担惊受怕，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

Indeed, the daring action of Aristogiton and Harmodius was undertaken in consequence of a love affair, which I shall relate at some length, to show that the Athenians are not more accurate th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heir accounts of their own tyrants and of the facts of their own history. Pisistratus dying at an advanced age in possession of the tyranny, was succeeded by his eldest son, Hippias, and not Hipparchus, as is vulgarly believed. Harmodius was then in the flower of youthful beauty, and Aristogiton, a citizen in the middle rank of life, was his lover and possessed him. Solicited without success by Hipparchus, son of Pisistratus, Harmodius told Aristogiton, and the enraged lover, afraid that the powerful Hipparchus might take Harmodius by force, immediately formed a design, such as his condition in life permitted, for overthrowing the tyranny. In the meantime, Hipparchus, after a second solicitation of Harmodius, attended with no better success, unwilling to use violence, arranged to insult him in some covert way. Indeed, generally their government was not grievous to the multitude, or in any way odious in practice; and these tyrants cultivated wisdom and virtue as much as any, and without exacting from the Athenians more than a twentieth of their income, splendidly adorned their city, and carried on their wars, and provided sacrifices for the temples. For the rest, the city was left in full enjoyment of its existing laws, except that care was always taken to have the offices in the hands of some one of the family. Among those of them that held the yearly archonship at Athens was Pisistratus, son of the tyrant Hippias, and named after his

grandfather, who dedicated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the altar to the twelve gods in the market-place, and that of Apollo in the Pythian precinct. The Athenian people afterwards built on to and lengthened the altar in the market-place, and obliterated the inscription; but that in the Pythian precinct can still be seen, though in faded letters, and is to the following effect:

实际上，阿里斯托伊通和哈尔莫季乌斯的鲁莽行动是由一起风流韵事引发的。对此我将比较详细地加以说明，以证明雅典人在描述他们自己的僭主和自己的历史事实方面并不比世界上其他人更准确。皮西斯特拉图斯去世时年事已高，但仍旧拥有僭主之位。继承其位的是他的长子希皮亚斯，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喜帕恰斯。哈尔莫季乌斯当时正值年轻俊美时期，中等阶层公民阿里斯托伊通是其情人并占有着他。皮西斯特拉图斯的儿子喜帕恰斯试图勾引哈尔莫季乌斯，但没有成功。哈尔莫季乌斯将此事告诉了阿里斯托伊通。这位情人气愤至极，同时又怕势力强大的喜帕恰斯强行夺走哈尔莫季乌斯，便立即尽自己的力量之所及，制定了一个计划，以期推翻僭主政治统治。其间，喜帕恰斯曾二度勾引哈尔莫季乌斯，但依旧未成，她不愿动用暴力手段，于是就准备采取某种隐蔽的方式侮辱他。其实，民众总体上并没有觉得他们的政府难以忍受，在实际中也没有觉得它十分可憎。这些僭主像其他人一样培养智慧，修炼美德，对雅典人所征的税也不超过其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极大地改善了雅典的面貌，对外不断发动战争，而且也向诸神庙奉献祭品。在其他方面，雅典城邦的治理也完全依照现行法律行事，只是公职向来由某家族世袭。在一年一任的雅典执政官当中，即包括僭主希皮亚斯的儿子皮西斯特拉图斯。他因自己的祖父而得名，任职期间在市场所在地为十二位神修建了祭坛，并在皮提亚的地界范围内为阿波罗神修建了祭坛。后来，雅典人民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再造，将市场上的祭坛加长，并清除了祭坛上的铭文，但皮提亚地界范围内祭坛上的铭文虽已褪色，字迹却依稀可辨，大意如下：

Pisistratus, the son of Hippias, Sent up this record of his archonship In precinct of Apollo Pythias.

希皮亚斯之子皮西斯特拉图斯，在皮提亚的阿波罗之圣地竖立此坛，谨以此纪念其出任执政官一职。

That Hippias was the eldest son and succeeded to the government, is what I positively assert as a fact upon which I have had more exact accounts than others, and may be also ascertained by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 He is the only one of the legitimate brothers that appears to have had children; as the altar shows, and the pillar placed in the Athenian Acropolis, commemorating the crime of the tyrants, which mentions no child of Thessalus or of Hipparchus, but five of Hippias, which he had by Myrrhine, daughter of Callias, son of Hyperechides; and naturally the eldest would have married first. Again, his name comes first on the pillar after that of his father; and this too is quite natural, as he was the eldest after him, and the reigning tyrant. Nor can I ever believe that Hippias would have obtained the tyranny so easily, if Hipparchus had been in power when he was killed, and he, Hippias, had had to establish himself upon the same day; but he had no doubt been long accustomed to overawe the citizens, and to be obeyed by his mercenaries, and thus not only conquered, but conquered with ease, without experiencing any of the embarrassment of a younger brother unused to the exercise of authority. It was the sad fate which made Hipparchus famous that got him also the credit with posterity of having been tyrant.

希皮亚斯是长子，并且继承了执政权。我可以肯定这是事实，因

为我从口传中获知的情况比他人更准确，这一点也可以由以下情况得到印证：希皮亚斯似乎是他所有合法兄弟中唯一一个有子嗣的。祭坛和雅典卫城内记载僭主们罪行的石柱上，都没有提及塞萨卢斯或喜帕恰斯有子女，却提到希皮亚斯有五个子女，均系他与希佩雷希泽斯之子卡利亚斯的女儿米尔希内所生，而长子自然会最早成婚。再者，希皮亚斯的名字在石柱上紧排在其父的名字之后，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除了他父亲之外，他是最年长者，而且还是在位僭主。要是喜帕恰斯被杀那天握有政权，希皮亚斯当天不得不站稳脚跟，我相信他不会那么容易得到僭主之位。但他无疑已长期惯于威慑民众，并让雇佣兵服从他。因此，他不仅得了手，而且如此轻而易举。，因是弟弟不惯于行使权力而免遭尴尬。喜帕恰斯正是因其命运悲惨而名声大噪的，亦因此而使后世相信他曾为僭主。

To return to Harmodius; Hipparchus having been repulsed in his solicitations insulted him as he had resolved, by first inviting a sister of his, a young girl, to come and bear a basket in a certain procession, and then rejecting her, on the plea that she had never been invited at all owing to her unworthiness. If Harmodius was indignant at this, Aristogiton for his sake now became more exasperated than ever; and having arranged everything with those who were to join them in the enterprise, they only waited for the great feast of the Panathenaea, the sole day upon which the citizens forming part of the procession could meet together in arms without suspicion. Aristogiton and Harmodius were to begin, but were to be supported immediately by their accomplices against the bodyguard. The conspirators were not many, for better security, besides which they hoped that those not in the plot would be carried away by the example of a few daring spirits, and use the arms in their hands to recover their liberty.

回头再来说哈尔莫季乌斯。喜帕恰斯试图勾引他遭拒之后，就下定决心要羞辱他。他先是邀请哈尔莫季乌斯的一个妹妹——一位少女——在某个仪式行列中担任持篮者，但后来又拒绝了她，借口是她不配参加，因而根本没邀请她。如果说哈尔莫季乌斯对此事愤愤不平，此时的阿里斯托伊通则因他之故比以往更加恼火。他与打算参与举事者把一切安排妥当，只等泛雅典娜节这个大节日的到来。唯有这一天，参加游行的公民可以携带武器聚在一起而不受怀疑。阿里斯托伊通与哈尔莫季乌斯准备首先动手，但他们的同谋者亦须立即响应，向卫队发起攻击。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参与密谋的人不是很多。此外，他们希望那些没有参与密谋的人能在少数勇敢人物的带动下行动起来，利用手中的武器，争取恢复自己的自由。

At last, the festival arrived; and Hippias with his bodyguard was outside the city in the Ceramicus, arranging how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procession were to proceed. Harmodius and Aristogiton had already their daggers and were getting ready to act, when seeing one of their accomplices talking familiarly with Hippias, who was easy of access to every one, they took fright, and concluded that they were discovered and on the point of being taken; and eager if possible to be revenged first upon the man who had wronged them and for whom they had undertaken all this risk, they rushed, as they were, within the gates, and meeting with Hipparchus by the Leocorium recklessly fell upon him at once, infuriated, Aristogiton by love, and Harmodius by insult, and smote him and slew him. Aristogiton escaped the guards at the moment, through the crowd running up, but was afterwards taken and dispatched in no merciful way: Harmodius was killed on the spot.

泛雅典娜节终于来临了，希皮亚斯带着他的卫队在城外陶瓷区安排各部分队伍的行进顺序。哈尔莫季乌斯和阿里斯托伊通早已匕首在

手，但正欲行动之际，突然看到他们的一个同谋正在与希皮亚斯亲近地交谈（其实任何人都很容易接近他）。他们大为惊恐，以为自己已经暴露，而且很快就会被拿获。他们急切希望，如果可能，就先报复这个伤害了他们并让他们冒了这么大危险的人。于是，他们冲进城门，在莱奥科里乌姆神殿旁遇到了喜帕恰斯。盛怒之下，他们立刻不顾一切地向他扑去，阿里斯托伊通是因为爱情，哈尔莫季乌斯则是因为受辱。他们击倒并杀死了喜帕恰斯。由于人群不断聚拢过来，阿里斯托伊通暂时躲过了卫兵的抓捕，但后来还是被人抓获，残忍地被处死了。哈尔莫季乌斯当场即被杀死。

When the news was brought to Hippias in the Ceramicus, he at once proceeded not to the scene of action, but to the armed men in the procession, before they, being some distance away, knew anything of the matter, and composing his features for the occasion, so as not to betray himself, pointed to a certain spot, and bade them repair thither without their arms. They withdrew accordingly, fancying he had something to say; upon which he told the mercenaries to remove the arms, and there and then picked out the men he thought guilty and all found with daggers, the shield and spear being the usual weapons for a procession.

消息传到身在陶瓷区的希皮亚斯那里时，他没有立即赶往出事现场，而是走向行进队伍中携带武器的人们。因为隔有一段距离，他们对所发生之事尚无所知。希皮亚斯装作面色平静，以免暴露自己的情绪，然后指着某个地方，命令他们到那里去，不要携带武器。他们以为他有事要说，便按照他说的离开了队伍。他们一离开，他随即命令雇佣兵们将武器拿走，当场立时将他认为有罪的人和所有被查出携带匕首的人都抓了出来，游行时通常携带的武器是矛和盾。

In this way offended love first led Harmodius and Aristogiton to conspire, and the alarm of the moment to commit the rash action recounted. After this, the tyranny pressed harder on the Athenians, and Hippias, now grown more fearful, put to death many of the citizens, and at the same time began to turn his eyes abroad for a refuge in case of revolution. Thus, although an Athenian, he gave his daughter, Archedice, to a Lampsacene, Aeantides, son of the tyrant of Lampsacus, seeing that they had great influence with Darius. And there is her tomb in Lampsacus with this inscription:

就这样，受到冒犯的爱情最初导致哈尔莫季乌斯和阿里斯托伊通走上了密谋之路，临场的惊恐又使得他们鲁莽地采取了上述行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僭主政治对雅典人的压迫更甚。希皮亚斯这时感到更加恐惧，他处死了很多公民，同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外，以求找到一处革命时的避难之所。因此，尽管他是雅典人，却将女儿阿尔海季赛嫁给了兰萨库斯人埃安蒂泽斯，也就是兰萨库斯僭主的儿子，因为他觉得他们在大流士那里很有影响力。阿尔海季赛的墓在兰萨库斯，墓碑上刻着如下碑文：

Archedice lies buried in this earth, Hippias her sire, and Athens gave her birth; Unto her bosom pride was never known, Though daughter, wife, and sister to the throne.

阿尔海季赛长眠于此，她出生于雅典，其父为希皮亚斯；虽贵为僭主之女、之妻、之姊，她却从不知傲慢为何物。

Hippias, after reigning three years longer over the Athenians, was deposed in the fourth by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 banished

Alcmaeonidae, and went with a safe conduct to Sigeum, and to Aeantides at Lampsacus, and from thence to King Darius; from whose court he set out twenty years after, in his old age, and came with the Medes to Marathon.

希皮亚斯又继续统治了雅典人三年，在第四年被斯巴达人和被驱逐的阿尔克迈翁族人废黜。他被安全送往西耶夫姆，然后到了兰萨库斯的埃安蒂泽斯那里，后来又从那里去了大流士王那里。二十年后，已是高龄的希皮亚斯从那里出发，随波斯人出征来到马拉松。

With these events in their minds, and recalling everything they knew by hearsay on the subject, the Athenian people grow difficult of humour and suspicious of the persons charged in the affair of the mysteries, and persuaded that all that had taken place was part of an oligarchical and monarchical conspiracy. In the state of irritation thus produced, many persons of consideration had been already thrown into prison, and far from showing any signs of abating, public feeling grew daily more savage, and more arrests were made; until at last one of those in custody, thought to be the most guilty of all, was induced by a fellow prisoner to make a revelation, whether true or not is a matter on which there are two opinions, no one having been able, either then or since, to say for certain who did the deed. However this may be, the other found arguments to persuade him, that even if he had not done it, he ought to save himself by gaining a promise of impunity, and free the state of its present suspicions; as he would be surer of safety if he confessed after promise of impunity than if he denied and were brought to trial. He accordingly made a revelation, affecting himself and others in the affair of the Hermae; and the Athenian people, glad at last, as they supposed, to get at the truth, and furious until then at not

being able to discover those who had conspired against the commons, at once let go the informer and all the rest whom he had not denounced, and bringing the accused to trial executed as many as were apprehended, and condemned to death such as had fled and set a price upon their heads. In this it was, after all, not clear whether the sufferers had been punished unjustly, while in any case the rest of the city received immediate and manifest relief.

雅典人并没有忘记这些事。回想起风闻的有关于此事的一切，他们就变得难以宽容，并对因秘密宗教仪式事件而被指控的人持怀疑态度，确信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建立寡头政治和君主政体阴谋的组成部分。在由此而起的群情激愤中，许多受人尊重的人已被投入监狱。可是，公众的情绪非但远无缓解的迹象，反而日渐凶猛，致使更多的人遭到逮捕。直到最后有一个被扣押的人被认为是首恶之人，在一名狱友的劝诱下出面自首，此事方才完结。至于他所交代的情况是真是假，则有两种看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均无人能确切说出此事系何人所为。不论真实情况如何，那个狱友找到了说服他的理由。即使他没做这事，他也应该以获取免罚承诺自保，同时也使城邦摆脱目前胡乱猜疑的状态，因为他若在获得免罚承诺后予以供认，肯定要比他矢口否认而被带去审判安全得多。于是，他供认有罪，假称赫尔迈石像一事是他和其他一些人所为。正如他们所料，雅典人民此前一直因无法查出谁在阴谋反对民主政治而怒不可遏，如今以为查明了真相，终于高兴起来了。他们立即释放了认罪者本人和所有其他未被他告发的人。被告发者交付审判后，凡被捉到者都被处死了。凡在逃者均被处以死刑并悬赏缉拿其首级。在这个事件中，毕竟很难说清受惩罚者是否罪有应得，但不管怎样，城内其余的人显然立即得以解脱。

To return to Alcibiades: public feeling was very hostile to him, being worked on by the same enemies who had attacked him before he went out; and now that the Athenians fancied that they had got

a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of the Hermae, they believed more firmly than ever that the affair of the mysteries also, in which he was implicated, had been contrived by him in the same intention and was connected with the plot against the democracy. Meanwhile, it so happened that, just at the time of this agitation, a small force of Lacedaemonians had advanced as far as the Isthmus, in pursuance of some scheme with the Boeotians. It was now thought that this had come by appointment, at his instigation, and not on account of the Boeotians, and that, if the citizens had not acted on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and forestalled them by arresting the prisoners, the city would have been betrayed. The citizens went so far as to sleep one night armed in the temple of Theseus within the walls. The friends also of Alcibiades at Argos were just at this time suspected of a design to attack the commons; and the Argive hostages deposited in the islands were given up by the Athenians to the Argive people to be put to death upon that account: in short, everywhere something was found to create suspicion against Alcibiades. It was therefore decided to bring him to trial and execute him, and the Salaminia was sent to Sicily for him and the others named in the information, with instructions to order him to come and answer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but not to arrest him, because they wished to avoid causing any agitation in the army or among the enemy in Sicily, and above all to retain the services of the Mantineans and Argives, who, it was thought, had been induced to join by his influence. Alcibiades, with his own ship and his fellow accused, accordingly sailed off with the Salaminia from Sicily, as though to return to Athens, and went with her as far as Thurii, and there they left the ship and disappeared, being afraid to go home for trial with such a prejudice existing against them. The crew of the Salaminia stayed some time looking for Alcibiades and his companions, and at length, as they were nowhere to be found, set sail and departed. Alcibiades, now an outlaw, crossed in a boat not

long after from Thurii to Peloponnese; and the Athenians passed sentence of death by default upon him and those in his company.

我们再来说亚西比德：在他率军出征前攻击过他的那些敌人的煽动下，公众对其的情绪非常敌视。雅典人既已认为他们弄清了赫尔迈神像事件的真相，他们就比以前更加坚信，亚西比德牵涉其中的秘密宗教仪式一事，一定也是他出于同样目的一手策划的，而且与反对民主政治的阴谋有关。同时，正当民众对他如此激愤时，碰巧斯巴达人有一支小部队开到了地峡，目的是为了履行他们与维奥蒂亚人商订的某项计划。雅典人此时却认为，斯巴达人此番前来，不是因为维奥蒂亚人，而是在亚西比德的煽动下如约而至。要不是雅典公民没有根据所收到的情报采取行动，抢在他们之前逮捕涉嫌者，雅典城就会被出卖。公民们甚至在城内的忒修斯神庙中全副武装地睡了一夜。恰在此时，亚西比德在阿尔戈斯的朋友们也被怀疑图谋进攻民主党人；雅典人把拘押在岛上的阿尔戈斯人质交给阿尔戈斯民众处死了。总之，各地都发现了加重亚西比德嫌疑的事情。因此，雅典人决定将亚西比德交付审判并处以死刑。他们派遣“萨拉米尼亚”号到西西里去召回亚西比德和其他密告中提及之人。该舰所奉之令是命他回来答复指控而不是逮捕他，因为他们希望避免在军中或在西西里的敌人中引起骚动，尤其希望曼提尼亚人和阿尔戈斯人继续在远征军中服役。他们认为，这些人都是受了亚西比德的影响才参加远征军的。于是，亚西比德便与同被指控的人乘着自己的舰跟随“萨拉米尼亚”号从西西里出发了。他们做出要返回雅典的样子，但随“萨拉米尼”号驶至图里时却弃舰而逃，不见了踪影。由于雅典人对他们存有很大偏见，他们担心回去后受到不公正审判。“萨拉米尼亚”号舰上的人员停留了一段时间寻找亚西比德及其追随者，但最终查无踪影，便启航离去了。此时已成逃犯的亚西比德不久后乘着一条小船从图里渡海去了伯罗奔尼撒。雅典人采取缺席审判的方式，判处了亚西比德及其追随者死刑。

CHAPTER XX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Years of the War—

Inaction of the Athenian Army—Alcibiades at Sparta—Investment of Syracuse

第二十章　战争第十七年和第十八年——雅典军队暂行休整——亚西比德在斯巴达——对叙拉古的围攻

The Athenian generals left in Sicily now divided the armament into two parts, and, each taking one by lot, sailed with the whole for Selinus and Egesta, wishing to know whether the Egestaeans would give the money, and to look into the question of Selinus and ascertain the state of the quarrel between her and Egesta. Coasting along Sicily, with the shore on their left, on the side towards the Tyrrhene Gulf they touched at Himera, the only Hellenic city in that part of the island, and being refused admission resumed their voyage. On their way they took Hyccara, a petty Sicanian seaport, nevertheless at war with Egesta, and making slaves of the inhabitants gave up the town to the Egestaeans, some of whose horse had joined them; after which the army proceeded through the territory of the Sicels until it reached Catana, while the fleet sailed along the coast with the slaves on board. Meanwhile, Nicias sailed straight from Hyccara along the coast and went to Egesta and, after transacting his other business and receiving thirty talents, rejoined the forces. They now sold their slaves for the sum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alents, and sailed round to their Sicel allies to urge them to send troops; and meanwhile went with half their own force to the hostile town of Hybla in the territory of Gela, but did not succeed in taking it.

留在西西里的雅典将军这时将军队分为两部分，以抽签的方式各取了一部分，然后率领全军一同驶往塞利努斯和埃耶斯塔，希望搞清埃耶斯塔人是否可以拿出那笔资金，同时也想了解一下塞利努斯，查

明它与埃耶斯塔之间的争执情况。他们在面朝第勒尼安湾那边沿着西西里的海岸靠右航行，后来在希迈拉靠了岸。希迈拉是岛上那个地区唯一一个希腊城市。由于城里人拒绝他们入内，他们又继续向前航行。在航行途中，他们攻取了希布拉，一个很小的西卡尼亚海港城镇，当时正在与埃耶斯塔打仗。他们把那里的居民变为奴隶，将这个城镇交给了埃耶斯塔人，因为埃耶斯塔人的一些骑兵此前已加入他们的队伍。接着，他们的陆军穿过西库尔人的领土直抵卡塔纳，舰队则载着奴隶沿着海岸继续航行。与此同时，尼西亚斯也沿着海岸从希布拉径直驶向埃耶斯塔。在处理完其他事务并收取了30塔兰特之后，他又与大部队会合了。他们此时卖掉奴隶，总共得了120塔兰特，然后驶回他们的西库尔盟友那里，敦促他们派遣军队。同时，他们还率领半数军队去进攻杰拉境内的敌对城镇希布拉，但未得手。

Summer was now over. The winter following, the Athenians at once began to prepare for moving on Syracuse, and the Syracusans on their side for marching against them. From the moment when the Athenians failed to attack them instantly as they at first feared and expected, every day that passed did something to revive their courage; and when they saw them sailing far away from them on the other side of Sicily, and going to Hybla only to fail in their attempts to storm it, they thought less of them than ever, and called upon their generals, as the multitude is apt to do in its moments of confidence, to lead them to Catana, since the enemy would not come to them. Parties also of the Syracusan horse employed in reconnoitring constantly rode up to the Athenian armament, and among other insults asked them whether they had not really come to settle with the Syracusans in a foreign country rather than to resettle the Leontines in their own.

夏季就这样结束了。接着，冬季来临了。雅典人立即开始准备开

赴叙拉古，叙拉古人也准备向他们进军。雅典人并未如他们起初所担心和预料的那样立即向他们发起进攻。从那一刻起，他们的勇气与日俱增。当他们看见雅典人在西西里的另一侧远远地离开他们驶向了希布拉，结果却攻而未得，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藐视雅典人。正像民众信心十足时往往会做的那样，他们向将军们提出，既然敌人不来找他们，那就干脆带领他们去进攻卡塔纳。用于侦察敌情的一队队叙拉古骑兵也不断前往雅典军队那里。除了对雅典军队进行其他羞辱之外，他们还问雅典人，是否是来与叙拉古人一起在异乡定居的，而不是要将莱昂蒂尼人重新安置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

Aware of this, the Athenian generals determined to draw them out in mass as far as possible from the city, and themselves in the meantime to sail by night alongshore, and take up at their leisure a convenient position. This they knew they could not so well do, if they had to disembark from their ships in front of a force prepared for them, or to go by land openly. The numerous cavalry of the Syracusans (a force which they were themselves without) would then be able to do the greatest mischief to their light troops and the crowd that followed them; but this plan would enable them to take up a position in which the horse could do them no hurt worth speaking of, some Syracusan exiles with the army having told them of the spot near the Olympieum, which they afterwards occupied. In pursuance of their idea, the generals imagined the following stratagem. They sent to Syracuse a man devoted to them, and by the Syracusan generals thought to be no less in their interest; he was a native of Catana, and said he came from persons in that place, whose names the Syracusan generals were acquainted with, and whom they knew to be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ir party still left in the city. He told them that the Athenians passed the night in the town, at some distance from their arms, and that if the Syracusans would name a day and come with all their people at

daybreak to attack the armament, they, their friends, would close the gates upon the troops in the city, and set fire to the vessels, while the Syracusans would easily take the camp by an attack upon the stockade. In this, they would be aided by many of the Catanians, who were already prepared to act, and from whom he himself came.

雅典的将军们知道这种情况后，决定将敌军大批引出城外，越远越好。与此同时，雅典军队要趁黑夜沿着海岸航行，从容占据有利阵地。他们知道，如果不得不在准备迎击他们的军队面前登陆，或者公开从陆地上进军，他们就无法顺利做到这一点。叙拉古人的骑兵为数众多（他们自己没有骑兵部队），届时将会对他们的轻步兵部队和跟随在他们后边的人员造成极大危害，但若实行这一计划，他们就能占据一个骑兵无法对他们造成多大危害的阵地。随军而来的一些叙拉古流亡者曾告诉他们，奥林匹埃夫姆附近就有这么个地方，后来他们占据了那里。为了实现他们的想法，将军们想出了以下计策：他们派了一个忠于他们而叙拉古的将军们也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人到叙拉古去。这个人是卡塔纳本地人，他说他是卡塔纳的一些人派去的。叙拉古的将军们对那些人的名字很熟悉，他们知道那些人是亲叙拉古党派残留在卡塔纳城的余党。那个人告诉他们，雅典人在城里过夜，地点离他们放武器的地方有一段距离。叙拉古人若定个日子，率领所有兵力在黎明时来袭击雅典的军队，他们这些叙拉古人的朋友会把敌军关在城内，然后放火烧掉他们的战舰。叙拉古人若同时攻向木栅，毫不费力就可以夺取他们的军营。在这件事上，他们定将得到很多卡塔纳人的帮助。那些人早就准备行动了，他本人就是奉他们差遣而来的。

The generals of the Syracusans, who did not want confidence, and who had intended even without this to march on Catana, believed the man without any sufficient inquiry, fixed at once a day upon which they would be there, and dismissed him, and the

Selinuntines and others of their allies having now arrived, gave orders for all the Syracusans to march out in mass. Their preparations completed, and the time fixed for their arrival being at hand, they set out for Catana, and passed the night upon the river Symaethus, in the Leontine territory.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no sooner knew of their approach than they took all their forces and such of the Sicels or others as had joined them, put them on board their ships and boats, and sailed by night to Syracuse. Thus, when morning broke the Athenians were landing opposite the Olympieum ready to seize their camping ground, and the Syracusan horse having ridden up first to Catana and found that all the armament had put to sea, turned back and told the infantry, and then all turned back together, and went to the relief of the city.

叙拉古的将军们并不缺乏信心。即使没有得到这个消息，他们也打算进军卡塔纳。因此，他们没有经过充分盘问就相信了这个人，并且定下了他们去往那里的日期，之后便打发他回去了。这时，塞利努斯人和其他盟军已经到达，将军们即令全体叙拉古人大举进发。由于一切已准备完毕，指定到达的日期也已临近，他们便出发前往卡塔纳。当晚，他们在莱昂蒂尼境内的西迈苏斯河畔宿了营。与此同时，雅典人获悉他们上路后，随即率领他们所有部队以及参加他们这次行动的西库尔人和其他人登上战舰和小船，连夜驶往叙拉古。这样，天破晓时，雅典人已经在奥林匹埃夫姆对面登陆，准备占据一个适宜扎营的地方。叙拉古的骑兵先是驰往卡塔纳，后来发现雅典远征军已全部出海，于是便折回来，将情况告诉了步兵，尔后全部人马一起折返，前去援救自己的城市。

In the meantime, as the march before the Syracusans was a long one, the Athenians quietly sat down their army in a convenient position, where they could begin an engagement when they

pleased, and where the Syracusan cavalry would have least opportunity of annoying them, either before or during the action, being fenced off on one side by walls, houses, trees, and by a marsh, and on the other by cliffs. They also felled the neighbouring trees and carried them down to the sea, and formed a palisade alongside of their ships, and with stones which they picked up and wood hastily raised a fort at Daskon, the most vulnerable point of their position, and broke down the bridge over the Anapus. These preparations were allowed to go on without any interruption from the city, the first hostile force to appear being the Syracusan cavalry, followed afterwards by all the foot together. At first, they came close up to the Athenian army, and then, finding that they did not offer to engage, crossed the Helorine road and encamped for the night.

其间，由于叙拉古人的行军距离较长，雅典人已经在一个很有利的位置悄悄扎下了营。在那里，他们可以随时开始战斗行动，而叙拉古的骑兵在行动前和行动中都鲜有机会对他们进行骚扰，因为一侧有墙壁、房屋、树木和沼泽相隔，另一侧则有悬崖峭壁相阻。他们还将附近的树木伐倒运到海边，沿着战舰构筑起一道栅栏。在达斯孔，即阵地最易遭受攻击的地方，他们用捡来的石块和木头匆匆构筑起一个堡垒，另外还拆毁了阿纳普斯河上的桥。进行这些准备时，城里没人出来进行阻挠。最先出现的敌军是叙拉古的骑兵，随后而来的是全体步兵。起初他们逐渐逼近雅典的军队，后来发现雅典人没有邀战之意，他们就跨过海洛拉斯大道去扎营过夜了。

The next day, the Athenians and their allies prepared for battle, their dispositions being as follows: Their right wing was occupied by the Argives and Mantineans, the centre by the Athenians, and the rest of the field by the other allies. Half their army was drawn

up eight deep in advance, half close to their tents in a hollow square, formed also eight deep, which had orders to look out and be ready to go to the support of the troops hardest pressed. The camp followers were placed inside this reserve. The Syracusans, meanwhile, formed their heavy infantry sixteen deep, consisting of the mass levy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such allies as had joined them, the strongest contingent being that of the Selinuntines; next to them the cavalry of the Geloans, numbering two hundred in all, with about twenty horse and fifty archers from Camarina. The cavalry was posted on their right, full twelve hundred strong, and next to it the darters. As the Athenians were about to begin the attack, Nicias went along the lines, and addressed these words of encouragement to the army and the nations composing it,

第二天，雅典人及其盟军准备投入战斗。他们的兵力部署情况是这样：右翼是阿尔戈斯人和曼提尼亚人，雅典人在中路，其余部分由其他盟军负责。军队的一半兵力列成8排，作为前突部分；另一半兵力也列成8排，靠近营帐围成一个空心四方形。所奉之命是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去支援压力最大的部队。随营人员都安置在四方形内。与此同时，叙拉古人也将自己的重步兵列成16排，包括叙拉古从自己人中所征募的大量兵员和加入他们军队的盟军。盟军中最具战斗力的是塞利努斯人那支分遣队；其次是杰拉人的骑兵，总共有200人；另外还有来自卡马里纳的大约20名骑兵和50名弓箭手。骑兵位于右翼，足有1,200人，他们旁边是标枪手。雅典人即将开始进攻时，尼西亚斯一边沿着队伍巡视，一边用下面这些话鼓励部队以及部队中的各族士兵：

“Soldiers, a long exhortation is little needed by men like ourselves, who are here to fight in the same battle, the force itself being, to my thinking, more fit to inspire confidence than a fine

speech with a weak army. Where we have Argives, Mantineans, Athenians, and the first of the islanders in the ranks together, it were strange indeed, with so many and so brave companions in arms, if we did not feel confident of victory; especially when we have mass levies opposed to our picked troops, and what is more, Siceliots, who may disdain us but will not stand against us, their skill not being at all commensurate to their rashness. You may also remember that we are far from home and have no friendly land near, except what your own swords shall win you; and here I put before you a motive just the reverse of that which the enemy are appealing to; their cry being that they shall fight for their country, mine that we shall fight for a country that is not ours, where we must conquer or hardly get away, as we shall have their horse upon us in great numbers. Remember, therefore, your renown, and go boldly against the enemy, thinking the present strait and necessity more terrible than they."

"士兵们：我们这样的人不需要用长篇大论来督促。我们是为了打同一场仗到这里来的。在我看来，我们这支部队的实力本身更能激发我们的信心。夸夸其谈的演讲只适合羸弱之师。我们的队伍中有阿尔戈斯人、曼提尼亚人、雅典人和一流的岛民。跟这么多这么勇敢的战友一起作战，我们要是对胜利没有信心，岂不是咄咄怪事？特别是考虑到与我们的精锐之师对阵的是大量临时征募的兵员。此外，那些西凯利奥特人虽然可能蔑视我们，却抵抗不了我们，因为他们的战技与他们的蛮勇实在不相称。你们也许还要记住一点：我们远离家乡，附近没有友邦，除非用自己的剑去赢取。我在这里摆在你们面前的战争动机，与敌人诉诸的理由恰恰相反。他们的口号是要为自己的城邦而战，我却要说，我们要为一个不属于我们的城邦而战，而我们必须获胜，否则将难逃一劫，因为他们会派大量的骑兵来追击我们。因此，要牢记你们的荣誉，勇敢地杀向敌人。要知道，我们目前的困境和窘迫要比敌人更可怕。"

After this address Nicias at once led on the army. The Syracusans were not at that moment expecting an immediate engagement, and some had even gone away to the town, which was close by; these now ran up as hard as they could and, though behind time, took their places here or there in the main body as fast as they joined it. Want of zeal or daring was certainly not the fault of the Syracusans, either in this or the other battles, but although not inferior in courage, so far as their military science might carry them, when this failed them they were compelled to give up their resolution also. On the present occasion, although they had not supposed that the Athenians would begin the attack, and although constrained to stand upon their defence at short notice, they at once took up their arms and advanced to meet them. First, the stone-throwers, slingers, and archers of either army began skirmishing, and routed or were routed by one another, as might be expected between light troops; next, soothsayers brought forward the usual victims, and trumpeters urged on the heavy infantry to the charge; and thus they advanced, the Syracusans to fight for their country, and each individual for his safety that day and liberty hereafter; in the enemy's army, the Athenians to make another's country theirs and to save their own from suffering by their defeat; the Argives and independent allies to help them in getting what they came for, and to earn by victory another sight of the country they had left behind; while the subject allies owed most of their ardour to the desire of self-preservation, which they could only hope for if victorious; next to which, as a secondary motive, came the chance of serving on easier terms, after helping the Athenians to a fresh conquest.

讲完这番话，尼西亚斯立即率军前进。当时，叙拉古人并没有预

料到会立刻交战，因为离城很近，有些人甚至去了城里。这些人现在拼命跑来，尽管晚了，但一归队还是迅速在大部队各就各位。不论是在这次还是在其他战斗中，缺乏战斗热情或勇敢精神肯定不是叙拉古人的错。但是，如果说他们在勇气上不输于人，那也只是就其战技所能及的范围而言。要是这方面也落败了，他们就不得不连决心也放弃了。这一次，尽管他们没有料到雅典人会发起攻击，而且不得不仓促应战，他们还是立即拿起武器上前迎敌了。首先，两军的投石手、弹石手和弓箭手展开了小规模战斗，双方各有胜负，这也是轻步兵作战时常见的现象；接着，预言者拿出通常的祭品，号手们朝着重步兵吹响了冲锋的号角。他们就这样开始进击了。叙拉古人是在为城邦而战，而每个人又是在为当日的安危和未来的自由而战。在敌军方面，雅典人为的是将他邦变为己有，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的城邦不因他们的失败而蒙受损失；阿尔戈斯人和那些独立盟友则是为了帮助雅典人获取他们意欲获取的东西，如若获胜，还能再次见到他们阔别已久的城邦；那些属邦盟友的热情则大多源于自保的愿望，只有胜利才能给予他们这种希望，其次他们考虑的是：在帮助雅典人实现新的征服之后，他们作为臣民的处境能有所改善。

The armies now came to close quarters, and for a long while fought without either giving ground. Meanwhile, there occurred some claps of thunder with lightning and heavy rain, which did not fail to add to the fears of the party figh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nd very little acquainted with war; while to their more experienced adversaries these phenomena appeared to be produced by the time of year, and much more alarm was felt at the continued resistance of the enemy. At last, the Argives drove in the Syracusan left, and after them the Athenians routed the troops opposed to them, and the Syracusan army was thus cut in two and betook itself to flight. The Athenians did not pursue far, being held in check by the numerous and undefeated Syracusan horse, who attacked and drove back any of their heavy infantry whom they saw pursuing in

advance of the rest; in spite of which the victors followed so far as was safe in a body, and then went back and set up a trophy. Meanwhile, the Syracusans rallied at the Helorine road, where they re-formed as well as they coul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nd even sent a garrison of their own citizens to the Olympieum, fearing that the Athenians might lay hands on some of the treasures there. The rest returned to the town.

双方军队很快逼近对方，相持了好久都互不退让。其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让第一次参战且对战争很不熟悉的一方感到更加恐惧；而对他们那些实战经验比较丰富的对手而言，则不过是这个时节产生的自然现象而已，更让他们感到恐慌的反倒是敌人的持续抵抗。阿尔戈斯人最终击退了叙拉古军队的左翼，雅典人紧接着也击溃了与他们对阵的军队。这样一来，叙拉古的军队就被截为两段，开始溃逃。雅典人没有追出多远，因为他们被人数众多且未被击败的叙拉古骑兵挡住了去路。这些骑兵看到雅典重步兵中有人冲在队伍前面追杀他们的部队，就攻向他们并把他们堵回去。尽管如此，在整个队伍比较安全的情况下，获胜的雅典人还是尽量追击。后来，他们返回自己的阵地，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与此同时，叙拉古人在海洛拉斯大道上集结，在当时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重整好队形，甚至派出了一支由他们自己的公民组成的守军去往奥林匹埃夫姆，因为他们怕雅典人攫取那里的金银财宝。其余人则撤回城里去了。

The Athenians, however, did not go to the temple, but collected their dead and laid them upon a pyre, and passed the night upon the field. The next day, they gave the enemy back their dead under truce, to the number of about two hundred and sixty, Syracusans and allies, and gathered together the bones of their own, some fifty, Athenians and allies, and taking the spoils of the enemy, sailed back to Catana. It was now winter; and it did not seem possible for the

moment to carry on the war before Syracuse, until horse should have been sent for from Athens and levied among the allies in Sicily—to do away with their utter inferiority in cavalry—and money should have been collected in the country and received from Athens, and until some of the cities, which they hoped would be now more disposed to listen to them after the battle, should have been brought over, and corn and all other necessaries provided, for a campaign in the spring against Syracuse.

然而，雅典人并没有去那座神庙，而是将己方阵亡者的尸体收拾起来放到了火葬的柴堆上，当晚在战地宿了营。第二天，他们按照休战协定，将敌军阵亡者的尸体还给了他们，叙拉古人及其盟友的加起来共约260具。他们又将自己人的遗骨拣到一起，雅典人的和盟友的都算上，大约有50具。然后，他们带着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驶回了卡塔纳。这时已是冬季，这个时候在叙拉古城前继续进行战争似乎已不可能，只有等到派人从雅典要来骑兵和从西西里的盟邦中招到骑兵——以弥补他们在骑兵方面的劣势，等到从当地筹集的和从雅典送来的资金都到位，等到他们希望经此一战更听命于他们的一些城邦被争取过来，等到春天对叙拉古之战所需的谷物等其他必需品准备齐全之时方能实现。

With this intention they sailed off to Naxos and Catana for the winter. Meanwhile, the Syracusans burned their dead and then held an assembly, in which Hermocrates, son of Hermon, a man who with a general ability of the first order had given proofs of military capacity and brilliant courage in the war, came forward and encouraged them, and told them not to let what had occurred make them give way, since their spirit had not been conquered, but their want of discipline had done the mischief. Still they had not been beaten by so much as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especially as they

were, one might say, novices in the art of war, an army of artisans opposed to the most practised soldiers in Hellas. What had also done great mischief was the number of the generals (there were fifteen of them) and the quantity of orders given, combined with the disorder and insubordination of the troops. But if they were to have a few skilful generals, and used this winter in preparing their heavy infantry, finding arms for such as had not got any, so as to make them as numerous as possible, and forcing them to attend to their training generally, they would have every chance of beating their adversaries, courage being already theirs and discipline in the field having thus been added to it. Indeed, both these qualities would improve, since danger would exercise them in discipline, while their courage would be led to surpass itself by the confidence which skill inspires. The generals should be few and elected with full powers, and an oath should be taken to leave them entire discretion in their command: if they adopted this plan, their secrets would be better kept, all preparations would be properly made, and there would be no room for excuses.

怀着这种想法，雅典人驶到纳克索斯和卡塔纳过冬去了。与此同时，叙拉古人先将己方阵亡者的尸体火化，尔后召开了一次公民大会。在会上，赫尔蒙的儿子赫莫克拉特斯起来给大家鼓了劲。此人各方面能力超群，军事才能和卓越的胆识在这次战争中都得到了印证。他对大家说，不要因为已经发生的事而屈服，他们的意志并未被征服，只是因为缺乏纪律才出了问题。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被打得一败涂地，尤其是考虑到他们在打仗方面其实可以说是新手。他们的军队是由工匠所组成的，他们的对手则是希腊最富有实战经验的士兵。遭到重创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将军人数太多（共有15位）和下达的命令数量过多，外加部队秩序混乱，不服从命令。但是，如果他们只重用几个会打仗的将军，再利用这个冬季好好为重步兵置备装备，给那些没有武器的士兵配上武器，尽可能壮大队伍，并

迫使他们普遍接受训练，他们便很可能击败对手，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缺乏勇气，而经过训练后在战场上也会严守纪律。实际上，这两方面的素质都会有所提高，因为危险会使他们的纪律性有所增强，战技的提高将激发他们的信心，而信心可以使人勇气倍增。将军的人数要少，但把他们选出来就应当授予他们全权，还应当立誓，准许将军们完全依照自己的意见实施指挥权。如果他们采纳这个方案，保密工作会做得更好，准备工作也会开展得更顺利，而且不会再有找借口的必要。

The Syracusans heard him, and voted everything as he advised, and elected three generals, Hermocrates himself, Heraclides, son of Lysimachus, and Sicanus, son of Execestes. They also sent envoys to Corinth and Lacedaemon to procure a force of allies to join them, and to induce the Lacedaemonians for their sakes openly to address themselves in real earnest to the war against the Athenians, that they might either have to leave Sicily or be less able to send reinforcements to their army there.

叙拉古人听完他的发言后，投票通过了他提出的各项建议，并且选出了三位将军：赫莫克拉特斯本人、利西马科斯的儿子赫拉克利德斯和埃克塞斯泰斯的儿子西卡努斯。他们还派遣使者前往科林斯和斯巴达，目的是为了邀一支盟军相助，并劝说斯巴达人为了他们的利益公开而积极地投入到与雅典人的战争中去。这样，雅典人可能就不得不撤离西西里，或者难以再派兵增援那里的军队了。

The Athenian forces at Catana now at once sailed against Messina, in the expectation of its being betrayed to them. The intrigue, however, after all came to nothing: Alcibiades, who was in the secret, when he left his command upon the summons from

home, foreseeing that he would be outlawed, gave information of the plot to the friends of the Syracusans in Messina, who had at once put to death its authors, and now rose in arms against the opposite faction with those of their way of thinking, and succeeded in preventing the admission of the Athenians. The latter waited for thirteen days, and then, as they were exposed to the weather and without provisions, and met with no success, went back to Naxos, where they made places for their ships to lie in, erected a palisade round their camp, and retired into winter quarters; meanwhile, they sent a galley to Athens for money and cavalry to join them in the spring. During the winter, the Syracusans built a wall on to the city, so as to take in the statue of Apollo Temenites, all along the side looking towards Epipolae, to make the task of circumvallation longer and more difficult, in case of their being defeated, and also erected a fort at Megara and another in the Olympieum, and stuck palisades along the sea wherever there was a landing Place. Meanwhile, as they knew that the Athenians were wintering at Naxos, they marched with all their people to Catana, and ravaged the land and set fire to the tents and encampment of the Athenians, and so returned home. Learning also that the Athenians were sending an embassy to Camarina, on the strength of the alliance concluded in the time of Laches, to gain, if possible, that city, they sent another from Syracuse to oppose them. They had a shrewd suspicion that the Camarinaeans had not sent what they did send for the first battle very willingly; and they now feared that they would refuse to assist them at all in future, after seeing the success of the Athenians in the action, and would join the latter on the strength of their old friendship. Hermocrates, with some others, accordingly arrived at Camarina from Syracuse, and Euphemus and others from the Athenians; and an assembly of the Camarinaeans having been convened, Hermocrates spoke as follows, in the hope of prejudicing them against the Athenians:

在卡塔纳的雅典军队当下立刻驶去进攻墨西拿，期望城内有人叛变。然而，这一图谋却无果而终。亚西比德也与闻此事，当他应城邦之召离开指挥岗位时，已预见到自己会被流放，所以就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叙拉古人在墨西拿的支持者。他们立即将这一阴谋的策划者处死了，并与那些和他们看法一致的人一同拿起武器对付反对党人，从而成功地阻止了雅典人进城。雅典人在那里等了十三天，后来因为风吹雨淋，粮食短缺，战事又毫无进展，只好返回纳克索斯去了。他们在那里找地方把船停下，在营地四周围起木栅，然后退进营房过冬去了。同时，他们派了一艘三列桨战舰到雅典去索要资金和骑兵，以供来年春天使用。整个冬季，叙拉古人沿着面向埃皮波莱那一侧在城外筑起一道墙，目的是为了把泰迈尼泰斯的阿波罗塑像划在范围内。万一他们被打败，敌人修筑围城工事时费时会更久，难度也会更大。同时，他们还在迈加拉和奥林匹埃夫姆各修建起一个要塞，并且在沿岸有码头的地方都钉了木栅。与此同时，由于知道雅典人在纳克索斯过冬，他们率领全军开赴卡塔纳，践踏了那里的土地，烧了雅典人的帐篷和营地，然后返回本邦去了。他们还得知雅典人要派使节去卡马里纳，如果可能，打算凭着在拉凯斯时代订立的盟约将那座城市争取过去。于是，他们也派了一个使团前去干预。他们本来就深疑卡马里纳人在第一次战役时不很情愿派出他们所要的军队，现在则开始担心，卡马里纳人看到雅典人打了胜仗，今后可能会拒绝帮助他们，甚至可能会出于旧日的友好关系而加入雅典人一方。于是，赫莫克拉特斯就带了其他一些人从叙拉古赶到了卡马里纳，雅典人也派去了埃夫费穆斯等人。在卡马里纳人召开的公众大会上，赫莫克拉特斯想让卡马里纳人对雅典人产生偏见，所以作了如下发言：

“Camarinaeans, we did not come on this embassy because we were afraid of your being frightened by the actual forces of the Athenians, but rather of your being gained by what they would say to you before you heard anything from us. They are come to Sicily with the pretext that you know, and the intention which we all

suspect, in my opinion less to restore the Leontines to their homes than to oust us from ours; as it is out of all reason that they should restore in Sicily the cities that they lay waste in Hellas, or should cherish the Leontine Chalcidians because of their Ionian blood and keep in servitude the Euboean Chalcidians, of whom the Leontines are a colony. No; but the same policy which has proved so successful in Hellas is now being tried in Sicily. After being chosen as the leaders of the Ionians and of the other allies of Athenian origin, to punish the Mede, the Athenians accused some of failure in military service, some of fighting against each other, and others, as the case might be, upon any colourable pretext that could be found, until they thus subdued them all. In fine,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Medes, the Athenians did not fight for the liberty of the Hellenes, or the Hellenes for their own liberty, but the former to make their countrymen serve them instead of him, the latter to change one master for another, wiser indeed than the first, but wiser for evil."

"卡马里纳人：我们使团前来，不是怕你们被雅典人眼下的兵力所吓倒，而是怕你们还没听到我们的想法就相信他们的说辞。他们来西西里的借口，你们是知道的。他们的真正用意，我们却都怀疑。依我之见，与其说他们是来帮助莱昂蒂尼人重返家园，不如说是要将我们逐出家园。他们在希腊把这些城市毁掉，却要在西西里重建，这毫无道理可言。因为自己有爱奥尼亚血统就爱护莱昂蒂尼的哈尔基斯人，却将埃维亚的哈尔基斯人置于被奴役的地位也是不应该的，因为莱昂蒂尼人是埃维亚的哈尔基斯人的移民。不，他们现在是在重施曾在希腊大获成功的伎俩。雅典人被推举为爱奥尼亚人以及与雅典人同源的其他盟邦的领袖，目的是为了惩罚波斯人。可是，他们后来却指责这些盟邦没有履行军事义务，指责那些盟邦相互之间征战不休，还视情况找出种种似是而非的借口责难其他盟邦，直到将他们悉数降服。总之，在抗击波斯人的斗争中，雅典人不是在为希腊人的自由而战，希腊人也不是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前者是为了使自己的同胞为

他们而不是为波斯国王效劳，后者不过是从一个主人换成了另一个主人。新主人的确比旧主人更高明，可是却将聪明用到了作恶上。”

“But we are not now come to declare to an audience familiar with them the misdeeds of a state so open to accusation as is the Athenian, but much rather to blame ourselves, who, with the warnings we possess in the Hellenes in those parts that have been enslaved through not supporting each other, and seeing the same sophisms being now tried upon ourselves—such as restorations of Leontine kinsfolk and support of Egestaean allies—do not stand together and resolutely show them that here are no Ionians, or Hellespontines, or islanders, who change continually, but always serve a master, sometimes the Mede and sometimes some other, but free Dorians from independent Peloponnese, dwelling in Sicily. Or, are we waiting until we be taken in detail, one city after another; knowing as we do that in no other way can we be conquered, and seeing that they turn to this plan, so as to divide some of us by words, to draw some by the bait of an alliance into open war with each other, and to ruin others by such flattery as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may render acceptable? And do we fancy when destruction first overtakes a distant fellow countryman that the danger will not come to each of us also, or that he who suffers before us will suffer in himself alone? "

“雅典这样一个城邦的恶性虽然诚可指摘，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来向熟悉他们的听众宣布他的恶行的，更重要的是来自责的。我们明明有前车之鉴，知道那些地区的希腊人因为不互相支持而遭到了奴役，看到了有人在用同样的诡辩来对付我们——诸如让莱昂蒂尼的同族人重返家园和支援埃耶斯塔的盟友之类，而我们却没有团结一致，毅然决然地向他们表示，这里没有爱奥尼亚人，没有赫勒斯滂人，也没有

什么岛民。这里的居民虽然时常更换，但总是为一位主人效劳，有时是波斯人，有时是其他人。我们是来自独立的伯罗奔尼撒的自由多里安人。我们明明知道他们别无他法征服我们，也看到了他们转用这一诡计，企图用巧言离间我们，以结盟为诱饵唆使某些城邦相互开战，或者因时因地而异地使用不同的阿谀奉承的方式使其他一些城邦走向毁灭，难道我们就这样等着我们的城邦相继被逐个征服吗？当距离我们较远的同胞首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难道我们以为这种危险不会同样降临到我们每个人头上，以为先遭难者会独遭此难吗？”

“As for the Camarinaean who says that it is the Syracusan, not he, that is the enemy of the Athenian, and who thinks it hard to have to encounter risk in behalf of my country, I would have him bear in mind that he will fight in my country, not more for mine than for his own, and by so much the more safely in that he will enter on the struggle not alone, after the way has been cleared by my ruin, but with me as his ally, and that the object of the Athenian is not so much to punish the enmity of the Syracusan as to use me as a blind to secure the friendship of the Camarinaean. As for him who envies or even fears us (and envied and feared great powers must always be), and who on this account wishes Syracuse to be humbled to teach us a lesson, but would still have her survive, in the interest of his own security the wish that he indulges is not humanly possible. A man can control his own desires, but he cannot likewise control circumstances; and in the event of his calculations proving mistaken, he may live to bewail his own misfortune, and wish to be again envying my prosperity. An idle wish, if he now sacrifice us and refuse to take his share of perils which are the same, in reality though not in name, for him as for us; what is nominally the preservation of our power being really his own salvation. It was to be expected that you, of all people in the world, Camarinaeans, being our immediate neighbours and the next in

danger, would have foreseen this, and instead of supporting us in the lukewarm way that you are now doing, would rather come to us of your own accord, and be now offering at Syracuse the aid which you would have asked for at Camarina, if to Camarina the Athenians had first come, to encourage us to resist the invader. Neither you, however, nor the rest have as yet bestirred yourselves in this direction. "

“至于卡马里纳人所说的，雅典人的敌人是叙拉古人，不是他们，因而觉得很难为了我们城邦去冒险，那么，我想请他们记住，他们在我们城邦境内作战，的确是在为我们而战，但同样也是在为他们自己的城邦而战。有我们作盟友，他们在作战时才不会孤军奋战，才会更加安全。如果我们被消灭了，屏障就被清除了。同时他们也应当记住，雅典人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惩罚叙拉古人对他们的敌视，不如说是拿叙拉古人当幌子，以获得卡马里纳人的友谊。如果有人妒忌我们，甚至惧怕我们（强邦总是为人所忌妒和惧怕），并因此而希望叙拉古威风扫地，以此教训我们一下，但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却依然希望叙拉古留存下来，那么，他沉湎于其中的这个愿望，则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人可以控制自己的愿望，却无法同样控制命运。如果他的打算后来被证明是错的，他可能会活着哀叹自己的不幸，希望能再次忌妒我们的繁荣。如果他现在牺牲我们，拒不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一份危险，这种希望就毫无意义。这种危险名义上虽然对他没有构成威胁，实际上却威胁着他，如同威胁着我们一样；承担这份危险，名义上是保全我们的力量，实际上是在拯救他自己。我们本来期望，在世上所有人中，唯有你们卡马里纳人会看到这一点，因为你们是我们的近邻，也是继我们之后将要遭遇危险之人；我们本来期望，你们不是像现在这样不冷不热，而是会主动来支援我们，现在正在叙拉古表示要提供援助，以鼓励我们抵抗侵略者。如果雅典人首先进攻卡马里纳，你们在卡马里纳同样会请求获得这种援助的。可是，无论是你们还是其他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Fear perhaps will make you study to do right both by us and by the invaders, and plead that you have an alliance with the Athenians. But you made that alliance, not against your friends, but against the enemies that might attack you, and to help the Athenians when they were wronged by others, not when as now they are wronging their neighbours. Even the Rhegians, Chalcidians though they be, refuse to help to restore the Chalcidian Leontines; and it would be strange if, while they suspect the gist of this fine pretence and are wise without reason, you, with every reason on your side, should yet choose to assist your natural enemies, and should join with their direst foes in undoing those whom nature has made your own kinsfolk. This is not to do right; but you should help us without fear of their armament, which has no terrors if we hold together, but only if we let them succeed in their endeavours to separate us; since even after attacking us by ourselves and being victorious in battle, they had to go off without effecting their purpose. "

“恐惧，或许会使你们仔细考虑如何对待我们和入侵者才算正确，也会使你们推说你们与雅典人之间有盟约。但是，你们建立那个同盟，不是用来对付朋友，而是用来对付可能进攻你们的敌人的；你们的目的是为了在雅典人遭到他人侵犯时去帮助他们，而不是在他们侵犯邻邦时去助纣为虐。雷伊乌姆人虽然也算哈尔基斯人，但连他们都不肯帮助莱昂蒂尼的哈尔基斯人收复家园。如果连他们都怀疑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的真正含义，从而不问原由地做出明智选择，有充分理由的你们竟然选择去帮助自己的天然敌人，与自己族人那最可怕的敌人联手去毁灭自己天生的同族，这岂非咄咄怪事？你们不应当这样做，而是应当帮助我们，对他们的军队毫不畏惧。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这支军队就没什么可怕的，除非让他们离间我们的企图得逞。其中原因在于，即使他们只进攻我们并且取得了胜利，他们也达不到目的，照样还得离开。”

“United, therefore, we have no cause to despair, but rather new encouragement to league together; especially as succour will come to us from the Peloponnesians, in military matters the undoubted superiors of the Athenians. And you need not think that your prudent policy of taking sides with neither, because allies of both, is either safe for you or fair to us. Practically it is not as fair as it pretends to be. If the vanquished be defeated, and the victor conquer, through your refusing to join, what is the effect of your abstention but to leave the former to perish unaided, and to allow the latter to offend unhindered? And yet it were more honourable to join those who are not only the injured party, but your own kindred, and by so doing to defend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Sicily and save your friends the Athenians from doing wrong.”

“因此，我们要团结起来。我们没有理由感到绝望，而是要满怀新的勇气结成同盟，特别是因为伯罗奔尼撒人会前来支援，在军事事务上，他们无疑胜过雅典人。你们不必觉得，因为你们与双方都有同盟关系，所以采取不支持任何一方的审慎政策对于你们比较安全，或者说，对我们比较公平。实际上，这样做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公平。如果因为你们拒不参战，被侵略者失败了，而侵略者获胜了，那么，除了使前者孤立无援地遭到毁灭，使后者不受阻挡地为所欲为，你们避不参战还能产生什么结果呢？可是，如果你们加入到被侵犯者一方，同时也是你们自己的同族这一方，则既能维护西西里的共同利益，又能阻止你们的雅典朋友作恶，你们也会感到无上光荣。”

“In conclusion, we Syracusans say that it is useless for us to demonstrate either to you or to the rest what you know already as well as we do; but we entreat, and if our entreaty fail, we protest that we are menaced by our eternal enemies the Ionians, and are

betrayed by you our fellow Dorians. If the Athenians reduce us, they will owe their victory to your decision, but in their own name will reap the honour, and will receive as the prize of their triumph the very men who enabled them to gain it. On the other hand, if we are the conquerors, you will have to pay for having been the cause of our danger. Consider, therefore; and now make your choice between the security which present servitude offers and the prospect of conquering with us and so escaping disgraceful submission to an Athenian master and avoiding the lasting enmity of Syracuse."

"总之，我们叙拉古人认为，对于你我双方都已了解的事情，用不着我们向你们或其他人赘述，但是我们要发出恳求。如果恳求无效，我们就提出抗议，抗议我们的永世仇敌伊奥尼亚人对我们的威胁，抗议我们的多里安同胞对我们的背叛。如果雅典人征服了我们，他们的胜利应当归功于你们的决定，但他们将会把这份荣耀归于自己名下，并且把帮助他们赢得胜利的人作为战利品。反之，如果我们赢得了胜利，你们就必须为你们给我们造成的威胁付出代价。因此，请你们慎重考虑，然后立刻做出抉择：是照目前这样安安生生地当奴隶，还是和我们一道去赢得胜利，免于遭受被雅典统治的耻辱，同时也避免叙拉古人对你们永世怀有仇恨。"

Such were the words of Hermocrates; after whom Euphemus, the Athenian ambassador, spoke as follows:

以上是赫莫克拉特斯的发言。接着，雅典的使者埃夫费穆斯作了如下发言：

“Although we came here only to renew the former alliance, the attack of the Syracusans compels us to speak of our empire and of the good right we have to it. The best proof of this the speaker himself furnished, when he called the Ionians eternal enemies of the Dorians. It is the fact; and the Peloponnesian Dorians being our superiors in numbers and next neighbours, we Ionians looked out for the best means of escaping their domination. After the Median War we had a fleet, and so got rid of the empire and supremacy of the Lacedaemonians, who had no right to give orders to us more than we to them, except that of being the strongest at that moment; and being appointed leaders of the King's former subjects, we continue to be so, thinking that we are least likely to fall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Peloponnesians, if we have a force to defend ourselves with, and in strict truth having done nothing unfair in reducing to subjection the Ionians and islanders, the kinsfolk whom the Syracusans say we have enslaved. They, our kinsfolk, came against their mother country, that is to say against us, together with the Mede, and, instead of having the courage to revolt and sacrifice their property as we did when we abandoned our city, chose to be slaves themselves, and to try to make us so.”

“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虽然只是为了重续旧盟，但叙拉古人的抨击却迫使我们不得不谈谈我们的帝国以及我们拥有这个帝国的正当理由。关于这一点，叙拉古的发言者自己就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因为他把爱奥尼亚人称为多里安人的永世仇敌。事实的确如此。伯罗奔尼撒的多里安人在人数上超过我们，又是我们的近邻，所以我们爱奥尼亚人要寻找不受他们控制的最好方法。波斯战争之后，我们拥有了一支舰队，也因此而摆脱了斯巴达帝国和他们的统治。他们没有权利对我们发号施令，就像我们没有权利对他们发号施令一样，除非他们当时力量最为强大。既然我们被指定为波斯国王昔日臣民的领导者，我们就将继续担当此任。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有能力自卫，就极有可能

摆脱伯罗奔尼撒人的统治。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虽然征服了爱奥尼亚人和岛民，也就是叙拉古人声称受到我们奴役的同族人，但我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任何不公平之处。他们这些同族人曾联合波斯人进攻他们的母邦，也就是我们，但他们不像我们当初放弃自己的城市时那样有勇气反抗和牺牲自己的财产，所以选择了当奴隶，而且试图把我们也变为奴隶。”

“We, therefore, deserve to rule because we placed the largest fleet and an unflinching patriotism at the service of the Hellenes, and because these, our subjects, did us mischief by their ready subservience to the Medes; and, desert apart, we seek to strengthen ourselves against the Peloponnesians. We make no fine profession of having a right to rule because we overthrew the barbarian single-handed, or because we risked what we did risk for the freedom of the subjects in question any more than for that of all, and for our own: no one can be quarrelled with for providing for his proper safety. If we are now here in Sicily, it is equally in the interest of our security, with which we perceive that your interest also coincides. We prove this from the conduct which the Syracusans cast against us and which you somewhat too timorously suspect; knowing that those whom fear has made suspicious may be carried away by the charm of eloquence for the moment, but when they come to act follow their interests.”

“因此，我们应当享有统治权，因为我们为希腊人提供了最庞大的舰队，并且表现出了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因为我们的这些臣民准备通过奉承波斯人加害于我们；还因为我们致力于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以对抗伯罗奔尼撒人。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独立推翻了异族人的统治就炫耀自己有权居于统治地位，也没有因为我们为这些臣民的自由比为了所有希腊人的自由所冒的危险更多些而这样做。我们冒险，同

样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自由，而为自身提供安全保障无可厚非。我们现在来到西西里，同样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我们觉得，在这一点上，你们的利益和我们是一致的。这一点，从叙拉古人对我们的抨击中，从你们怯懦的疑虑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我们知道，那些因恐惧而生疑的人暂时也许会被雄辩的讲演所吸引，但是到了行动的时候，他们就会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

“Now, as we have said, fear makes us hold our empire in Hellas, and fear makes us now come, with the help of our friends, to order safely matters in Sicily, and not to enslave any but rather to prevent any from being enslaved. Meanwhile, let no one imagine that we are interesting ourselves in you without your having anything to do with us, seeing that, if you are preserved and able to make head against the Syracusans, they will be less likely to harm us by sending troops to the Peloponnesians. In this way, you have everything to do with us, and on this account it is perfectly reasonable for us to restore the Leontines, and to make them, not subjects like their kinsmen in Euboea, but as powerful as possible, to help us by annoying the Syracusans from their frontier. In Hellas we are alone a match for our enemies; and as for the assertion that it is out of all reason that we should free the Sicilian, while we enslave the Chalcidian, the fact is that the latter is useful to us by being without arms and contributing money only; while the former, the Leontines and our other friends, cannot be too independent.”

“现在，正如我们所说，正是恐惧才使我们在希腊能保有我们的帝国；正是恐惧，我们现在才来到这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稳妥地处理西西里的事务。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奴役任何人，而是要防止任何人受到奴役。同时，大家不要以为，你们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却非要来关注你们。要看到，保全了你们，你们就能够抵抗叙拉古人，他们

就不大可能派兵支援伯罗奔尼撒人危害我们了。由此看来，你们与我们休戚相关。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帮助莱昂蒂尼人恢复家园。我们不是要让他们像他们在埃维亚的同族一样成为我们的臣民，而是要尽可能使他们强大起来，使他们可以通过在边境骚扰叙拉古人来帮助我们。在希腊，我们独自就可以对付我们的敌人。至于叙拉古人所说的，我们在奴役哈尔基斯人的同时，却要来解放西西里人，这毫无道理可言。事实上，后者解除武装，仅缴纳贡金，对我们才有助益；而前者，莱昂蒂尼人和我们的其他朋友，则是越独立越好。”

“Besides, for tyrants and imperial cities nothing is unreasonable if expedient, no one a kinsman unless sure; but friendship or enmity is everywhere an affair of time and circumstance. Here, in Sicily, our interest is not to weaken our friends, but by means of their strength to cripple our enemies. Why doubt this? In Hellas we treat our allies as we find them useful. The Chians and Methymnians govern themselves and furnish ships; most of the rest have harder terms and pay tribute in money; while others, although islanders and easy for us to take, are free altogether, because they occupy convenient positions round Peloponnese. In our settlement of the states here in Sicily, we should therefore; naturally be guided by our interest, and by fear, as we say, of the Syracusans. Their ambition is to rule you, their object to use the suspicions that we excite to unite you, and then, when we have gone away without effecting anything, by force or through your isolation, to become the masters of Sicily. And masters they must become, if you unite with them; as a force of that magnitude would be no longer easy for us to deal with united, and they would be more than a match for you as soon as we were away.”

“此外，对于僭主和宗主城邦而言，有利可图的就是合理的，靠

得住的才是同族；无论在何处，是敌是友要视时势和情势而定。在这里，在西西里，合乎我们利益的做法，不是削弱我们的朋友，而是凭借他们的力量去削弱我们的敌人。为什么要怀疑这一点呢？在希腊，盟邦对我们有利，我们便好生相待。希俄斯人和迈西姆纳人拥有自治权，为我们提供战舰；其余大多数盟邦条件更严苛一些，需缴纳贡金；而有些盟邦尽管是岛民，很容易被我们征服，但是却完全享有自由，因为他们在伯罗奔尼撒周围占据着有利位置。因此，在西西里诸城邦问题的处理上，我们自然也要以我们的利益为准则，还要考虑到我们所说的，即叙拉古人带给我们的恐惧。叙拉古人的目的是要统治你们，他们的目标是利用你们对我们的猜疑与你们联手，然后，在我们一无所获地撤离之后，利用武力或者你们的孤立无援成为西西里的主人。如果你们与他们联手，他们肯定会成为你们的主人，因为那样一支庞大的联军，对于我们来说，很难对付，而我们一旦撤离，他们的力量将远胜于你们。”

“Any other view of the case is condemned by the facts. When you first asked us over, the fear which you held out was that of danger to Athens if we let you come under the dominion of Syracuse; and it is not right now to mistrust the very same argument by which you claimed to convince us, or to give way to suspicion because we are come with a larger force against the power of that city. Those whom you should really distrust are the Syracusans. We are not able to stay here without you, and if we proved perfidious enough to bring you into subjection, we should be unable to keep you in bondage, owing to the length of the voyage and the difficulty of guarding large, and in a military sense continental, towns;they, the Syracusans, live close to you, not in a camp, but in a city greater than the force we have with us, plot always against you, never let slip an opportunity once offered, as they have shown in the case of the Leontines and others, and now have the face, just as if you were fools, to invite you to aid them

against the power that hinders this, and that has thus far maintained Sicily independent. We, as against them, invite you to a much more real safety, when we beg you not to betray that common safety which we each have in the other, and to reflect that they, even without allies, will, by their numbers, have always the way open to you, while you will not often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defending yourselves with such numerous auxiliaries; if, through your suspicions, you once let these go away unsuccessful or defeated, you will wish to see if only a handful of them back again, when the day is past in which their presence could do anything for you.”

“如果有人对这个问题持有异议，事实将证明他的看法有误。最初要求我们前来时，你们说你们担心的是，如果我们听任你们被叙拉古控制，就会给雅典带来危险，现在你们却不相信你们用来说服我们的同一个论点了，或者说，因为我们带来的军队多于那座城市的兵力，你们就对我们产生怀疑了。你们真正应当怀疑的是叙拉古人。没有你们，我们无法在这里逗留。纵然我们背信弃义，将你们征服了，我们也难以维继对你们的统治，因为航程遥远，守卫大型城镇也很困难，而且还是军事意义上的陆上城镇。他们叙拉古人则居住在你们近旁，不是在营帐里，而是在一个人口比我们带来的军队还多的城市里。他们总是密谋如何对付你们，一有机会便绝不放过，就像他们在莱昂蒂尼人一事和其他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现在他们竟敢来要求你们援助他们，以对付妨碍其阴谋得逞和迄今为止一直在使西西里保持独立的城邦，就好像你们是笨伯一样。我们则与他们不同。我们邀你们所获取的是一种实际得多的安全，我们恳请你们不要背弃我们相互依存的共同安全，同时提醒你们审慎考虑，即使没有盟邦，凭着人数上的优势，他们照样可以进攻你们，而你们则不常有机会获得如此多的援军帮助你们自卫。如果因为你们的疑虑而让这些军队一无所获地离去或失败而归，你们将来会希望看到哪怕其中一小部分回来也好。但是，时机一旦消逝，纵然他们能够出现，对你们也无所助益

了。”

“But we hope, Camarinaeans, that the calumnies of the Syracusans will not be allowed to succeed either with you or with the rest;we have told you the whole truth upon the things we are suspected of, and will now briefly recapitulate, in the hope of convincing you. We assert that we are rulers in Hellas in order not to be subjects; liberators in Sicily that we may not be harmed by the Sicilians; that we are compelled to interfere in many things, because we have many things to guard against; and that now, as before, we are come as allies to those of you who suffer wrong in this island, not without invitation but upon invitation. Accordingly, instead of making yourselves judges or censors of our conduct, and trying to turn us, which it were now difficult to do, so far as there is anything in our interfering policy or in our character that chimes in with your interest, this take and make use of; and be sure that, far from being injurious to all alike, to most of the Hellenes that policy is even beneficial. Thanks to it, all men in all places, even where we are not, who either apprehend or meditate aggression, from the near prospect before them, in the one case, of obtaining our intervention in their favour, in the other, of our arrival making the venture dangerous, find themselves constrained, respectively, to be moderate against their will, and to be preserved without trouble of their own. Do not reject this security that is open to all who desire it, and is now offered to you; but do like others, and instead of being always on the defensive against the Syracusans, unite with us, and in your turn at last threaten them.”

“但是，卡马里纳人，我们希望，你们和其他西西里人不会听信叙拉古人的诽谤。我们已经就我们被怀疑的方面全部以实相告了，下

面我扼要地重述一下我们的观点，希望能够说服你们。我们坚信，我们在希腊成为统治者，目的是不沦为他人的臣民；我们在西西里成为解放者，为的是不遭到西西里人的伤害；我们被迫干预诸多事务，是因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需要加以防范；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同以往一样，是作为盟友应邀前来援助在这个岛上受到伤害的人，而不是不请自来的。因此，不要把自己当作仲裁人或监察官来评判我们的所作所为，也不要试图改变我们的做法，何况如今要这样做也很难。我们的干涉政策或我们的性格中若有与你们的利益相吻合的东西，你们就要抓住并利用这一点。一定要相信，那种政策远非对所有人同样有害，对大多数希腊人来说，甚至是有益的。幸亏有那种政策，各个地方的人，甚至于我们未涉足之地的人，无论是担心被侵略者，还是计划进行侵略者，在考虑即将面临的前景时都会受到约束：担心被侵略者出于自身利益而寻求干涉，计划进行侵略者则怕我们的到来会危及其侵略行动。这样，后者会节制自己的意愿，前者则不用自己费事便得以保全。凡是希望得到这种保障的人都可以得到，而这种保障如今就摆在你们面前，请务必不要拒绝，不要总是防御叙拉古人，要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样，跟我们联合起来，这样你们最终才可以反过去威胁他们。”

Such were the words of Euphemus. What the Camarinaeans felt was this. Sympathizing with the Athenians, except in so far as they might be afraid of their subjugating Sicily, they had always been at enmity with their neighbour Syracuse. From the very fact, however, that they were their neighbours, they feared the Syracusans most of the two, and being apprehensive of their conquering even without them, both sent them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e few horsemen mentioned, and for the future determined to support them most in fact, although as sparingly as possible; but for the moment in order not to seem to slight the Athenians, especially as they had been successful in the engagement, to answer both alike. Agreeably to this resolution they answered that as both the contending parties

happened to be allies of theirs, they thought it most consistent with their oaths at present to side with neither; with which answer the ambassadors of either party departed.

以上是埃夫费穆斯的发言。卡马里纳人的感受是这样的：他们对雅典人持同情态度，只是担心他们会征服西西里。对于邻邦叙拉古，他们则一直持敌视态度。然而，他们与叙拉古人是近邻。从这一事实出发，他们在两者之中更畏惧叙拉古人。他们担心，即使没有他们的援助，叙拉古人也能取胜，所以他们先派了为数不多的骑兵去增援，这一点在前文已经提及。至于将来，他们决定实际上还是以支持叙拉古人为主，尽管数量尽可能要少些。但是，眼下为了不显得轻视雅典人，特别是因为雅典人在交战中已经取得胜利，他们决定对雅典人和叙拉古人作出同样回答。根据这一决定，他们答复说：由于冲突双方都是他们的盟友，他们认为，目前最符合誓言的办法就是不加入任何一方。听毕，双方的使者就离开了。

In the meantime, while Syracuse pursued her preparations for war, the Athenians were encamped at Naxos, and tried by negotiation to gain as many of the Sicels as possible. Those more in the low lands, and subjects of Syracuse, mostly held aloof; but the peoples of the interior who had never been otherwise than independent, with few exceptions, at once joined the Athenians, and brought down corn to the army, and in some cases even money. The Athenians marched against those who refused to join, and forced some of them to do so; in the case of others they were stopped by the Syracusans sending garrisons and reinforcements.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moved their winter quarters from Naxos to Catana, and reconstructed the camp burnt by the Syracusans, and stayed there the rest of the winter. They also sent a galley to Carthage, with proffers of friendship, on the chance of obtaining

assistance, and another to Tyrrhenia; some of the cities there having spontaneously offered to join them in the war. They also sent round to the Sicels and to Egesta, desiring them to send them as many horses as possible, and meanwhile, prepared bricks, iron, and all other things necessary for the work of circumvallation, intending by the spring to begin hostilities.

在此期间，叙拉古人继续进行着战争准备，雅典人在纳克索斯扎下营盘后，试图通过谈判将尽可能多的西库尔人争取到自己一边。那些居住在低地的叙拉古臣民大多态度比较冷淡，但居住在内地的部族向来都是独立的，仅有少数例外，所以立即加入了雅典人一边。他们为雅典军队送来谷物，有些甚至送来了金钱。雅典人出兵进攻了那些拒绝与他们合作的人，强迫其中一些加入了他们一方，但在对余者采取行动时却被叙拉古人派去的守军和援军阻止了。其间，雅典人把他们的冬季营房从纳克索斯迁到了卡塔纳，重建了被叙拉古人烧毁的兵营，在那里度过了余下的冬天。他们还派出一艘三列桨战舰去迦太基示好，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帮助，另外还派出一艘前往第勒尼亚，那里有些城市曾主动表示要在战争中加入他们一方。他们又派人前往西库尔人那里和埃耶斯塔，请他们尽量多送一些马匹来。同时，他们还准备了砖、铁和修筑围城工事所需的其他各种材料，准备在来年春天发动战争。

In the meantime, the Syracusan envoys dispatched to Corinth and Lacedaemon tried as they passed along the coast to persuade the Italiots to interfere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thenians, which threatened Italy quite as much as Syracuse, and having arrived at Corinth made a speech calling on the Corinthians to assist them on the ground of their common origin. The Corinthians voted at once to aid them heart and soul themselves, and then sent on envoys with them to Lacedaemon, to help them to persuade her also

to prosecute the war with the Athenians more openly at home and to send succours to Sicily. The envoys from Corinth having reached Lacedaemon found there Alcibiades with his fellow refugees, who had at once crossed over in a trading vessel from Thurii, first to Cyllene in Elis, and afterwards from thence to Lacedaemon; upon the Lacedaemonians' own invitation, after first obtaining a safe conduct, as he feared them for the part he had taken in the affair of Mantinea.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Corinthians, Syracusans, and Alcibiades, pressing all the same request in the assembly of the Lacedaemonians, succeeded in persuading them; but as the ephors and the authorities, although resolved to send envoys to Syracuse to prevent their surrendering to the Athenians, showed no disposition to send them any assistance, Alcibiades now came forward and inflamed and stirred the Lacedaemonians by speaking as follows:

与此同时，叙拉古人派往科林斯和斯巴达的使者在沿着海岸航行期间，同样在试图说服意大利奥特人干预雅典人的行动，因为这些行动不仅威胁到叙拉古，同样也威胁到意大利。抵达科林斯后，他们发表了演讲，呼吁科林斯人看在同族的份上帮助叙拉古人。科林斯人立即投票同意将竭诚支援他们，随后又派使者与他们同赴斯巴达，以帮助他们劝说斯巴达人更加公开地在希腊同雅典人开战，而且要向西西里派遣援军。使者们从科林斯抵达斯巴达后发现，亚西比德以及追随他的逃亡者也在那里。他们是一起乘一艘商船从图里渡海过来的，起初去了埃利斯的基莱内，后来又从那里来到了斯巴达。由于顾忌曼提尼亚事件中自己的所做所谓，他对斯巴达人有些忌惮，所以先获得了斯巴达人的安全保证之后才应斯巴达人之邀前来。在斯巴达人举行的公民大会上，科林斯人、叙拉古人和亚西比德提出的请求全都一样，结果成功地说服了斯巴达人。但是，斯巴达的民选长官和当局虽然准备派使者前往叙拉古以阻止叙拉古人屈服于雅典人，却不愿出兵相助。于是，亚西比德走上前去鼓动和激励斯巴达人，发表了如下演说：

“I am forced first to speak to you of the prejudice with which I am regarded, in order that suspicion may not make you disinclined to listen to me upon public matters. The connection, with you as your proxeni, which the ancestors of our family by reason of some discontent renounced, I personally tried to renew by my good offices towards you, in particular upon the occasion of the disaster at Pylos. But although I maintained this friendly attitude, you yet chose to negotiate the peace with the Athenians through my enemies, and thus to strengthen them and to discredit me. You had therefore no right to complain if I turned to the Mantineans and Argives, and seized other occasions of thwarting and injuring you; and the time has now come when those among you, who in the bitterness of the moment may have been then unfairly angry with me, should look at the matter in its true light, and take a different view. Those again who judged me unfavourably, because I leaned rather to the side of the commons, must not think that their dislike is any better founded. We have always been hostile to tyrants, and all who oppose arbitrary power are called commons; hence we continued to act as leaders of the multitude; besides which, as democracy was the government of the city, it was necessary in most things to conform to established conditions. However, we endeavoured to be more moderate than the licentious temper of the times; and while there were others, formerly as now, who tried to lead the multitude astray—the same who banished me—our party was that of the whole people, our creed being to do our part in preserving the form of government under which the city enjoyed the utmost greatness and freedom, and which we had found existing. As for democracy, the men of sense among us knew what it was, and I perhaps as well as any, as I have the more cause to complain of it; but there is nothing new to be said of a patent absurdity; meanwhile, we did not think it safe to alter it under the

pressure of your hostility.”

“首先，我不得不说一说你们对我的偏见，这样才有可能使你们不至于因为对我有疑虑而不愿听取我对公共事务的意见。我们家族的祖先曾担任斯巴达在雅典的代理人，后来因某些不满而放弃了。我个人曾试图通过为你们效劳重续前缘，尤其是在皮洛斯那场灾难发生时。但是，尽管我坚持这种友好态度，但你们仍选择通过我的政敌与雅典人议和，这就壮大了他们的力量，损坏了我的名誉。因此，即使我转向曼提尼亚人和阿尔戈斯人，利用其他机会阻挠和损害你们，你们也无权抱怨。你们当中那些在遭受痛苦时有失公允地迁怒于我的人，现在该看到事情的真相而改变看法了。那些因为我偏向民主党而对我抱有不公开发的人也无须认为，他们对我的厌恶有多站得住脚。我们一向反对僭主统治，而所有反对专制政权的人都被称为民主党，所以我们一直是民众的领袖。此外，由于雅典城邦实行的是民主政治，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必须依照既定体制行事。然而，尽管当时漠视常规是一种常态，我们还是尽力保持克制。过去和现在一样，有些人总是试图将民众引上歧途——正是这些人驱逐了我，但我们的党是全体民众的党，我们的信条是尽力保全业已存在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下，我们的城邦最强盛也最自由。至于民主政治，我们当中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它的含义，而我或许不输于任何人，因为我更有理由抨击它。但是，对于一种显然很荒谬的东西，我并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同时，我们认为，迫于你们反对的压力而去变更它，同样也不稳妥。”

“So much then for the prejudices with which I am regarded: I now can call your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s you must consider, and upon which superior knowledge perhaps permits me to speak. We sailed to Sicily first to conquer, if possible, the Siceliots, and after them the Italiots also, and finally to assail the empire and city of Carthage. In the event of all or most of these schemes succeeding, we were then to attack Peloponnese, bringing with us the entire

force of the Hellenes lately acquired in those parts, and taking a number of barbarians into our pay, such as the Iberians and others in those countries, confessedly the most warlike known, and building numerous galleys in addition to those which we had already, timber being plentiful in Italy; and with this fleet blockading Peloponnese from the sea and assailing it with our armies by land, taking some of the cities by storm, drawing works of circumvallation round others, we hoped without difficulty to effect its reduction, and after this to rule the whole of the Hellenic name. Money and corn meanwhile for the better execution of these plans were to be supplied in sufficient quantities by the newly acquired places in those countries, independently of our revenues here at home."

"关于你们对我的偏见，我就说这么多。现在我可以提醒你们注意你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了。由于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胜过他人，或许我可以谈谈我的看法。我们驶往西西里，如果可能，首先是为了征服西凯利奥特人，然后再征服意大利奥特人，最后再进攻迦太基帝国和迦太基城。如果这些计划全部或大部获得成功，我们接下去将率领在这些地区新近得到的所有希腊军队，并雇佣大量土著居民（如这些地区内公认最骁勇善战的伊比利亚人和其他土著）一同进攻伯罗奔尼撒。除了已有的战舰外，我们还要建造大量战舰，毕竟意大利木材丰富。我们要利用这支舰队从海上封锁伯罗奔尼撒，同时借助陆军从陆上发起进攻，以猛攻的方式夺取其中一些城市，再采用修筑环城工事的办法围攻其他城市。我们希望毫不费力地征服这一地区，进而统治整个希腊世界。同时，顺利实施这些计划所需的金钱和谷物，可由我们在那些地区新征服的区域提供，无需动用我们在希腊这里的税收收入。"

"You have thus heard 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expedition

from the man who most exactly knows what our objects were; and the remaining generals will, if they can, carry these out just the same. But that the states in Sicily must succumb if you do not help them, I will now show. Although the Siceliots, with all their inexperience, might even now be saved if their forces were united, the Syracusans alone, beaten already in one battle with all their people and blockaded from the sea, will be unable to withstand the Athenian armament that is now there. But if Syracuse falls, all Sicily falls also, and Italy immediately afterwards; and the danger which I just now spoke of from that quarter will before long be upon you. None need therefore fancy that Sicily only is in question; Peloponnese will be so also, unless you speedily do as I tell you, and send on board ship to Syracuse troops that shall able to row their ships themselves, and serve as heavy infantry the moment that they land; and what I consider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troops, a Spartan as commanding officer to discipline the forces already on foot and to compel recusants to serve. The friends that you have already will thus become more confident, and the waverers will be encouraged to join you. Meanwhile, you must carry on the war here more openly, that the Syracusans, seeing that you do not forget them, may put heart into their resistance, and that the Athenians may be less able to reinforce their armament. You must fortify Decelea in Attica, the blow of which the Athenians are always most afraid and the only one that they think they have not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war; the surest method of harming an enemy being to find out what he most fears, and to choose this means of attacking him, since every one naturally knows best his own weak points and fears accordingly. The fortification in question, while it benefits you, will create difficulties for your adversaries, of which I shall pass over many, and shall only mention the chief. Whatever property there is in the country will most of it become yours, either by capture or surrender; and the Athenians will at once be deprived

of their revenues from the silver mines at Laurium, of their present gains from their land and from the law courts, and above all of the revenue from their allies, which will be paid less regularly, as they lose their awe of Athens and see you addressing yourselves with vigour to the war. The zeal and speed with which all this shall be done depends, Lacedaemonians, upon yourselves; as to its possibility, I am quite confident, and I have little fear of being mistaken."

"现在你们已经从最了解我们目标的人口中获悉了目前这次远征的情况。留下的将军们，如果可能，照样会实施这些计划。但是，现在我要向你们说明，如果你们不援助西西里人，西西里诸邦肯定会屈服。西凯利奥特人虽然完全没有作战经验，但如果他们的军队团结一致，即便是现在也能得以存在。叙拉古人在一次战役中就已全军覆没，海上也被封锁。因此，单凭叙拉古人是抵抗不了如今盘踞在那里的雅典军队的。但是，如果叙拉古陷落了，整个西西里也会陷落，紧接着就是意大利，我刚才说到的来自那一地区的危险不久就会降临到你们头上。因此，谁都不要以为只有西西里受到威胁，伯罗奔尼撒同样面临着挑战，除非你们立刻照我说的去做，派遣军队乘船前往叙拉古。这支军队的士兵应当能够自己划船，登陆又能充当重步兵。我认为，比派遣军队更重要的是由一名斯巴达人担任指挥官，以控制已有的军队，强制不愿服役的人服兵役。这样，你们原有的朋友将会更加信心十足，那些动摇者也会因此而加入你们一方。同时，你们必须在这里更加公开地进行战争，叙拉古人看到你们没有忘记他们，就会奋力抵抗，雅典人也就更难派兵去增援他们的远征军了。你们必须在阿提卡的德西利亚修筑要塞，这种打击一直是雅典人最害怕的，也是他们认为在当前这场战争中唯一没经历过的。打击敌人的最可靠方法，就是找出敌人的弱点，然后选用这种方法去攻击他。每个人的弱点在哪里，他自己当然最了解，因而就会心生恐惧。在德西利亚修筑要塞，不仅对你们有益，对你们的敌人也会造成困难。凡此种种，我不想多言，只谈谈主要方面。无论这个地区有何财产，你们夺来的也

好，他们交出来的也罢，大部分都将落入你们手中。雅典人会立即被剥夺从拉夫里乌姆银矿获得的收益，以及目前从土地和法庭所获得的收入，尤其是来自盟邦的收入，因为盟邦看到你们积极投入战争，他们就不再会畏惧雅典人，也就不会再按时缴纳贡金了。斯巴达人，完成这一切所需要的热情和速度，就要全靠你们自己了。至于完成的可能，我有十足的信心，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有错。”

“Meanwhile, I hope that none of you will think any the worse of me if, after having hitherto passed as a lover of my country, I now actively join its worst enemies in attacking it, or will suspect what I say as the fruit of an outlaw's enthusiasm. I am an outlaw from the iniquity of those who drove me forth, not, if you will be guided by me, from your service; my worst enemies are not you who only harmed your foes, but they who forced their friends to become enemies; and love of country is what I do not feel when I am wronged, but what I felt when secure in my rights as a citizen. Indeed, I do not consider that I am now attacking a country that is still mine; I am rather trying to recover one that is mine no longer; and the true lover of his country is not he who consents to lose it unjustly rather than attack it, but he who longs for it so much that he will go all lengths to recover it. For myself, therefore, Lacedaemonians, I beg you to use me without scruple for danger and trouble of every kind, and to remember the argument in every one's mouth, that if I did you great harm as an enemy, I could likewise do you good service as a friend, inasmuch as I know the plans of the Athenians, while I only guessed yours. For yourselves I entreat you to believe that your most capital interests are now under deliberation; and I urge you to send without hesitation the expeditions to Sicily and Attica; by the presence of a small part of your forces you will save important cities in that island, and you will destroy the power of Athens both present and prospective; after

this you will dwell in security and enjoy the supremacy over all Hellas, resting not on force but upon consent and affection.”

“同时我也希望，不要因为此前一直把我看作爱国者，如今我却在积极帮助它的死敌进攻它，你们当中就有人把我看得更坏，或者将我所说当作一个流亡者的情感宣泄。我成为流亡者，是因为迫使我出逃的那些人极不公正，而不是因为我为你们效劳，如果你们肯接受我的意见的话。我最凶险的敌人不是你们（因为你们只伤害你们的敌人），而是那些迫使朋友变成敌人的人。他们对我不公时，我感受不到爱国之情，那种情感是我安享公民权利时所感受到的。实际上，我认为，我并不是在抨击一个仍然属于我的城邦，而是在努力寻回不再属于我的城邦。真正的爱国者，不是任其不公正地将自己逐出也不对它进行抨击的人，而是对它眷恋至深，不遗余力地要寻回它的人。因此，就我来说，斯巴达人，我请求你们，不要因顾虑到种种风险和麻烦就不用我这个人。请记住这个人尽皆知的说法：如果我作为敌人给你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那么，作为朋友，我同样能很好地为你们效劳，因为我对雅典人的各项计划一清二楚，对你们的只是猜测而已。“就你们而言，我恳请你们相信，现在讨论的是你们最重要的利益；我奉劝你们毫不犹豫地派遣远征军前往西西里和阿提卡，只要你们的一小部分军队出现在那里，你们就能挽救那个岛上的重要城市，就会摧毁那里现有的和未来的势力。尔后你们将安享太平，称霸整个希腊，不是靠武力威慑，而是出于人们的赞同和拥戴。”

Such were the words of Alcibiades. The Lacedaemonians, who had themselves before intended to march against Athens, but were still waiting and looking about them, at once became much more in earnest when they received this particular information from Alcibiades, and considered that they had heard it from the man who best knew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Accordingly, they now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fortifying of Decelea and sending immediate

aid to the Sicilians; and naming Gylippus, son of Cleandridas, to the command of the Syracusans, bade him consult with that people and with the Corinthians and arrange for succours reaching the island, in the best and speediest way possi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Gylippus desired the Corinthians to send him at once two ships to Asine, and to prepare the rest that they intended to send, and to have them ready to sail at the proper time. Having settled this, the envoys departed from Lacedaemon.

这是亚西比德的发言。斯巴达人此前就曾打算向雅典进军，但仍在等待和观望。从亚西比德口中获悉这一详细情况，并自认已从最了解情况的人那里得知了实情后，他们对这件事的态度立刻变得认真起来。于是，他们随即将注意力转向在德西利亚修筑要塞和派兵援助西西里人。他们任命克莱安兹里扎斯之子吉利普斯为叙拉古人的指挥官，责成他与叙拉古人和科林斯人共同商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以最佳和最快的方式安排援军抵达西西里岛。吉利普斯希望科林斯人立即给他派两艘战舰到阿西内来，并将他们打算派遣的其他舰只也准备好，以便随时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启航出发。商妥这件事后，使者们离开了斯巴达。

In the meantime, arrived the Athenian galley from Sicily sent by the generals for money and cavalry; and the Athenians, after hearing what they wanted, voted to send the supplies for the armament and the cavalry. And the winter ended, and with it ended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the present war of which Thucydides is the historian.

在此期间，雅典远征军的将军们从西西里派来索要资金和骑兵的三列桨战舰抵达了雅典。雅典人听了他们的请求后，投票决定为远征

军送去补给和骑兵。冬季就此结束，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十七年亦随之结束。

The next summer,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eason, the Athenians in Sicily put out from Catana, and sailed along shore to Megara in Sicily, from which, as I have mentioned above, the Syracusans expelled the inhabitants in the time of their tyrant Gelo, themselves occupying the territory. Here the Athenians landed and laid waste the country, and after an unsuccessful attack upon a fort of the Syracusans, went on with the fleet and army to the river Terias, and advancing inland laid waste the plain and set fire to the corn; and after killing some of a small Syracusan party which they encountered, and setting up a trophy, went back again to their ships. They now sailed to Catana and took in provisions there, and going with their whole force against Centoripa, a town of the Sicels, acquired it by capitulation, and departed, after also burning the corn of the Inessaeans and Hybleans. Upon their return to Catana they found the horsemen arrived from Athens, to the number of two hundred and fifty (with their equipments, but without their horses which were to be procured upon the spot), and thirty mounted archers and three hundred talents of silver.

翌年夏季刚开始的时候，在西西里的雅典人乘船从卡塔纳出发，沿着海岸驶往西西里的迈加拉。如前所述，僭主耶洛在位时期，叙拉古人就是从这里赶走了原著民，自己占领了这片领土。雅典人在这里登陆，践踏了这一地区。在向叙拉古人的一个要塞发起进攻但未攻克之后，雅典人率舰队和陆军驶往泰里亚斯河，继而由此深入内地，践踏了平原地带，焚烧了当地的谷物。与叙拉古人的一支小部队相遇后，他们杀死其中一些士兵，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然后又回到了舰上。接着，他们驶向卡塔纳，在那里补充了给养，又率全部兵力去

进攻西库尔人的城镇肯托里帕，通过协商占领了该城而后离开了，但离开之前烧了伊内萨人和希布拉人的谷物。回到卡塔纳后，他们发现从雅典派来的骑兵已经到了，总数达250人（带有装备，但没带马，因为打算在当地获取），另外还有30名马上弓箭手和300塔兰特白银。

The same spring, the Lacedaemonians marched against Argos, and went as far as Cleonae, when an earthquake occurred and caused them to return. After this, the Argives invaded the Thyreatid, which is on their border, and took much booty from the Lacedaemonians, which was sold for no less than twenty-five talents. The same summer, not long after, the Thespian commons made an attack upon the party in office, which was not successful, but succours arrived from Thebes, and some were caught, while others took refuge at Athens.

同年春天，斯巴达人开始向阿尔戈斯进军。前进至克莱奥奈时，突然发生了地震，他们又返回去了。其后，阿尔戈斯人入侵位于边境上的西雷阿蒂兹，从斯巴达人那里掠夺了大量物品，出售后获得了至少25塔兰特。不久之后，即当年夏季，塞斯比阿的民主党人向执政党发起进攻，但未获成功，底比斯的援兵赶到后，一些人被捕，其余则逃到雅典避难去了。

The same summer the Syracusans learned that the Athenians had been joined by their cavalry, and were on the point of marching against them; and seeing that without becoming masters of Epipolae, a precipitous spot situated exactly over the town, the Athenians could not, even if victorious in battle, easily invest them, they determined to guard its approaches, in order that the enemy

might not ascend unobserved by this, the sole way by which ascent was possible, as the remainder is lofty ground, and falls right down to the city, and can all be seen from inside; and as it lies above the rest the place is called by the Syracusans Epipolae or Overtown. They accordingly went out in mass at daybreak into the meadow along the river Anapus, their new generals, Hermocrates and his colleagues, having just come into office, and held a review of their heavy infantry, from whom they first selected a picked body of six hundred, under the command of Diomilus, an exile from Andros, to guard Epipolae, and to be ready to muster at a moment's notice to help wherever help should be required.

同年夏季，叙拉古人获悉雅典人已经得到骑兵的增援，准备向他们发动进攻。叙拉古人认为，雅典人如果不占领埃皮波莱——叙拉古城上方一处险峻之地，那么，即使他们在战斗中获胜，也无法轻而易举地包围叙拉古。于是，叙拉古人决定守住它的各条进路，防止敌人偷偷从这里摸上去。因为其余地方都很高，靠城的一侧径直向下形成斜坡，所有动静都能从城里看到，所以这里是唯一的登城道路。由于它的地势高于其他地方，叙拉古人称它为埃皮波莱或上城。因此，叙拉古人在黎明时分大批出动，来到阿纳普斯河沿岸的草地上。新任将军赫莫克拉特斯及其同僚刚刚就职，他们检阅了重步兵之后，从中选出600人组成了一支精锐部队，由安德罗斯岛的流亡者迪奥米卢斯率领前去守卫埃皮波莱，并时刻做好准备，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助战。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the very same morning, were holding a review, having already made land unobserved with all the armament from Catana, opposite a place called Leon, not much more than half a mile from Epipolae, where they disembarked their army, bringing the fleet to anchor at Thapsus, a peninsula running out into the sea, with a narrow isthmus, and not far from the city of

Syracuse either by land or water. While the naval force of the Athenians threw a stockade across the isthmus and remained quiet at Thapsus, the land army immediately went on at a run to Epipolae, and succeeded in getting up by Euryelus before the Syracusans perceived them, or could come up from the meadow and the review. Diomilus with his six hundred and the rest advanced as quickly as they could, but they had nearly three miles to go from the meadow before reaching them. Attacking in this way in considerable disorder, the Syracusans were defeated in battle at Epipolae and retired to the town, with a loss of about three hundred killed, and Diomilus among the number. After this, the Athenians set up a trophy and restored to the Syracusans their dead under truce, and next day descended to Syracuse itself; and no one coming out to meet them, reascended and built a fort at Labdalum, upon the edge of the cliffs of Epipolae, looking towards Megara, to serve as a magazine for their baggage and money, whenever they advanced to battle or to work at the lines.

同时，雅典人也在同一天早晨检阅了部队。此前他们早已率领远征军的全部人马自卡塔纳悄悄登陆，该地位于一个叫莱翁的地方的对面，距埃皮波莱不过半英里多一点。他们让军队在这里下舰，将战舰停泊在塔普苏斯。这是一个突入海中的半岛，有一条狭窄的地峡，陆上和海上离叙拉古城都不远。雅典人的海军部队在地峡横着围起一排栅栏，之后便静待在塔普苏斯，陆军则立刻跑向埃皮波莱。没等叙拉古人察觉，他们的守军也未从阅兵的草地上赶来，雅典人就从埃夫里埃卢斯上来了。迪奥米卢斯率领他的600人和其余士兵尽量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但是从草地到他们那里要走3英里。因此，叙拉古人的进攻相当无序。在埃皮波莱一战中战败之后，他们退回了城内。战死者大约有300人，包括指挥官迪奥米卢斯在内。此战之后，雅典人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在休战期间将阵亡者的尸体交还给了叙拉古人。第二天，雅典人下来进攻叙拉古城，但无一人出来迎战，他们便

再次登城，在拉夫扎卢姆筑起一个要塞。该要塞位于埃皮波莱的悬崖边上，面向迈加拉，他们出去作战或修筑围墙时，此处可充作存放物资和金钱之地。

Not long afterwards three hundred cavalry came to them from Egesta, and about a hundred from the Sicels, Naxians, and others; and thus, with the two hundred and fifty from Athens, for whom they had got horses from the Egestaeans and Catanians, besides others that they bought, they now mustered six hundred and fifty cavalry in all. After posting a garrison in Labdalum, they advanced to Syca, where they sat down and quickly built the Circle or centre of their wall of circumvallation. The Syracusans, appalled at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the work advanced, determined to go out against them and give battle and interrupt it; and the two armies were already in battle array, when the Syracusan generals observed that their troops found such difficulty in getting into line, and were in such disorder, that they led them back into the town, except part of the cavalry. These remained and hindered the Athenians from carrying stones or dispersing to any great distance, until a tribe of the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with all the cavalry, charged and routed the Syracusan horse with some loss; after which they set up a trophy for the cavalry action.

不久之后，埃耶斯塔给他们派来了300名骑兵，西库尔人、纳克索斯岛人及其他人派来了大约100名。这样，加上从雅典带来的250名（所需马匹除他们自购的以外，均是从埃耶斯塔人和卡塔纳人那里获得的），雅典人此时共有650名骑兵。在拉夫扎卢姆留下一支守军后，他们随后向西卡挺进，在那里扎下营盘，迅速修筑了一个环形要塞，或曰围城长墙的中心要塞。雅典人修筑要塞的速度使叙拉古人惊恐万分，他们决定出来迎战，以中止对方的工程。两军本来已经列成

了战斗队形，但叙拉古的将军们却突然注意到自己的军队秩序混乱，很难排成行列，于是便率领军队撤回城内，只留下了一些骑兵，留下的这些骑兵使得雅典人无法搬运石头或跑得太远。后来，有一队雅典重步兵与全体骑兵一起冲出来，击溃了叙拉古的骑兵，使他们蒙受了一些损失。战斗结束后，雅典人为这次骑兵行动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

The next day, the Athenians began building the wall to the north of the Circle, at the same time collecting stone and timber, which they kept laying down towards Trogilus along the shortest line for their works from the great harbour to the sea; while the Syracusans, guided by their generals, and above all by Hermocrates, instead of risking any more general engagements, determined to build a counterwork in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Athenians were going to carry their wall. If this could be completed in time, the enemy's lines would be cut; and meanwhile, if he were to attempt to interrupt them by an attack, they would send a part of their forces against him, and would secure the approaches beforehand with their stockade, while the Athenians would have to leave off working with their whole force in order to attend to them. They accordingly sallied forth and began to build, starting from their city, running a cross wall below the Athenian Circle, cutting down the olives and erecting wooden towers. As the Athenian fleet had not yet sailed round into the great harbour, the Syracusans still commanded the seacoast, and the Athenians brought their provisions by land from Thapsus.

次日，雅典人开始向环形要塞北侧修筑围墙，同时开始收集石头和木材，不断沿大港至海上防御工事的最短路线朝特罗伊卢斯堆放。叙拉古人根据其将军们的意见，尤其是赫莫克拉特斯的意见，没有再

冒险与敌人进行大会战，而是决定朝雅典人计划筑墙的方向修筑对抗工事。如果这一工事能够及时建成，敌军的封锁线就会被切断。同时，如果雅典人试图通过发动进攻来阻止他们，他们可派一部分军队予以反击，并可事先用栅栏挡住各个入口，而雅典人却不得不让全体军队停止作业来对付他们。因此，叙拉古人便全体出动修建起工事。这道工事始于他们的城市，在雅典人的环形要塞下方横穿而过。他们还砍倒橄榄树，用来构筑木塔。由于雅典舰队尚未驶进大港，叙拉古人仍控制着沿岸地区，雅典人的给养要经陆路从塔普苏斯运过来。

The Syracusans now thought the stockades and stonework of their counterwall sufficiently far advanced; and as the Athenians, afraid of being divided and so fighting at a disadvantage, and intent upon their own wall, did not come out to interrupt them, they left one tribe to guard the new work and went back into the city.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destroyed their pipes of drinking-water carried underground into the city; and watching until the rest of the Syracusans were in their tents at midday, and some even gone away into the city, and those in the stockade keeping but indifferent guard, appointed three hundred picked men of their own, and some men picked from the light troops and armed for the purpose, to run suddenly as fast as they could to the counterwork, while the rest of the army advanced in two divisions, the one with one of the generals to the city in case of a sortie, the other with the other general to the stockade by the postern gate. The three hundred attacked and took the stockade, abandoned by its garrison, who took refuge in the outworks round the statue of Apollo Temenites. Here the pursuers burst in with them, and after getting in were beaten out by the Syracusans, and some few of the Argives and Athenians slain; after which the whole army retired, and having demolished the counterwork and pulled up the stockade, carried away the stakes to their own lines, and set up a trophy.

叙拉古人此时认为，他们的栅栏和对抗工事的石造部分已遥遥领先，而雅典人因恐兵力分散而在战斗中处于劣势，只好专心修筑围墙，没有出来阻止他们。于是，他们留下一队士兵防守新建的工事，其余的就返回城里去了。与此同时，雅典人捣毁了从地下通往叙拉古城的饮水管道，同时严密监视着叙拉古人，直到其余叙拉古人中午进了营帐，有些人甚至进了城，栅栏旁虽有人防守但警戒比较松懈时，他们从自己部队中精选了300人，又从轻步兵中挑了一些人，专为这次行动为他们配上重甲，尔后以最快的速度突然冲向叙拉古人的对抗工事。其余军队则兵分两路：一路由将军中的一位带着奔向叙拉古城，以防叙拉古人从城内出击；另外一路由另一位将军带着奔向后门旁的栅栏处。那300名士兵攻克了栅栏，叙拉古守军放弃栅栏，逃进了保护神阿波罗神像周围的简易外围工事中。雅典追兵紧随其后冲到这里，但进到里面之后却被叙拉古人打了出来，少数阿尔戈斯人和雅典人还被杀死了。随后，雅典军队全数撤退，他们拆毁了叙拉古人的对抗工事，拔掉栅栏，将木桩都运到自己防线这边，然后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

The next day, the Athenians from the Circle proceeded to fortify the cliff above the marsh which on this side of Epipolae looks towards the great harbour; this being also the shortest line for their work to go down across the plain and the marsh to the harbour. Meanwhile, the Syracusans marched out and began a second stockade, starting from the city,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marsh, digging a trench alongside to make it impossible for the Athenians to carry their wall down to the sea. As soon as the Athenians had finished their work at the cliff they again attacked the stockade and ditch of the Syracusans. Ordering the fleet to sail round from Thapsus into the great harbour of Syracuse, they descended at about dawn from Epipolae into the plain, and laying doors and planks over the marsh, where it was muddy and firmest,

crossed over on these, and by daybreak took the ditch and the stockade, except a small portion which they captured afterwards. A battle now ensued, in which the Athenians were victorious, the right wing of the Syracusans flying to the town and the left to the river. The three hundred picked Athenians, wishing to cut off their passage, pressed on at a run to the bridge, when the alarmed Syracusans, who had with them most of their cavalry, closed and routed them, hurling them back upon the Athenian right wing, the first tribe of which was thrown into a panic by the shock. Seeing this, Lamachus came to their aid from the Athenian left with a few archers and with the Argives, and crossing a ditch, was left alone with a few that had crossed with him, and was killed with five or six of his men. These the Syracusans managed immediately to snatch up in haste and get across the river into a place of security, themselves retreating as the rest of the Athenian army now came up.

次日，雅典人以环形要塞为起点，开始在悬崖上面修筑要塞。这个悬崖位于埃皮波莱面向大港一侧的沼泽地上方，这也是他们所筑工事向下穿过平原和沼泽直抵大港的最短路线。其间，叙拉古人开始修筑第二道栅栏，这道栅栏以叙拉古城为起点，从沼泽地中央穿过。他们还沿着栅栏挖了一条壕沟，使雅典人无法将他们的围墙向下延伸到海边。雅典人完成悬崖上的作业之后，再度向叙拉古人的栅栏和壕沟发起了进攻。他们命令舰队从塔普苏斯出发返航行驶进叙拉古的大港。大约黎明时分，雅典军队从埃皮波莱下到平原，在沼泽地中最泥泞和最坚实的地方铺上门板和厚板子，然后踏着这些板子穿过沼泽地。破晓时，他们夺取了壕沟和栅栏，仅有一小部分是后来攻取的。战斗随即开始，雅典人在此战中获得了胜利。叙拉古人的右翼逃向城里，左翼向河边逃去，那300名雅典精兵想切断他们的退路，奋力跑步压向桥边。叙拉古人虽然惊恐不已，但因有大多数骑兵在侧，围上去将他们击溃，把他们压回到了雅典人的右翼。右翼中的第一队经此

一冲陷入了恐慌。看到这种情况，拉马胡斯从雅典军队左翼率领一些弓箭手和阿尔戈斯人前去增援，跨过一条壕沟之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和他手下那五、六个人都被杀死了。叙拉古人赶紧抓起这些人的尸体，跨越河流进入了安全地带，其余雅典军队此时已压上来，叙拉古人自己便也撤走了。

Meanwhile, those who had at first fled for refuge to the city, seeing the turn affairs were taking, now rallied from the town and formed against the Athenians in front of them, sending also a part of their number to the Circle on Epipolae, which they hoped to take while denuded of its defenders. These took and destroyed the Athenian outwork of a thousand feet, the Circle itself being saved by Nicias, who happened to have been left in it through illness, and who now ordered the servants to set fire to the engines and timber thrown down before the wall; want of men, as he was aware, rendering all other means of escape impossible. This step was justified by the result, the Syracusans not coming any further on account of the fire, but retreating. Meanwhile, succours were coming up from the Athenians below, who had put to flight the troops opposed to them; and the fleet also, according to orders, was sailing from Thapsus into the great harbour. Seeing this, the troops on the heights retired in haste, and the whole army of the Syracusans re-entered the city, thinking that with their present force they would no longer be able to hinder the wall reaching the sea.

这时候，原先逃进城里的叙拉古人看到战局出现了变化，重新从城里出来集结，列成战斗队形准备进攻已攻到城下的雅典人。他们还派出部分军队前往埃皮波莱的环形要塞，希望趁着无人防守将它拿下。这些叙拉古人攻取并摧毁了雅典人1,000英尺长的外围工事，但

环形要塞本身被尼西亚斯保住了，由于生病，他碰巧留在那里。他立刻命令仆从放火烧了扔在围墙前面的器械和木材。他知道，在缺乏人手的情况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逃脱之路。结果证明采取这个办法是正确的。叙拉古人一见火起便未再继续向前推进，而是开始后撤。与此同时，下面的雅典人已经击退与之对抗的敌军，他们派来的援军开始往上赶，他们的舰队也在奉命从塔普苏斯驶入大港。看到这种情况，高地上的叙拉古部队连忙后撤，叙拉古人的全部军队重新撤进了城里。他们认为，以其目前的兵力，已无法再阻止雅典人将围墙修到海边了。

After this, the Athenians set up a trophy and restored to the Syracusans their dead under truce, receiving in return Lamachus and those who had fallen with him. The whole of their forces, naval and military, being now with them, they began from Epipolae and the cliffs and enclosed the Syracusans with a double wall down to the sea. Provisions were now brought in for the armament from all parts of Italy; and many of the Sicels, who had hitherto been looking to see how things went, came as allies to the Athenians;there also arrived three ships of fifty oars from Tyrrhenia. Meanwhile, everything else progressed favourably for their hopes. The Syracusans began to despair of finding safety in arms, no relief having reached them from Peloponnese, and were now proposing terms of capitulation among themselves and to Nicias, who after the death of Lamachus was left sole commander. No decision was come to, but, as was natural with men in difficulties and besieged more straitly than before, there was much discussion with Nicias and still more in the town. Their present misfortunes had also made them suspicious of one another; and the blame of their disasters was thrown upon the ill-fortune or treachery of the generals under whose command they had happened; and these were deposed and others, Heraclides, Eucles, and Tellias, elected in their stead.

这一仗之后，雅典人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根据休战协定，他们把阵亡者的尸体交还给叙拉古人，同时也收回了拉马胡斯以及与他一同战死者的尸体。这时，他们的整个部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在内，全都集结到了一起。他们从埃皮波莱和悬崖处开始，修筑起一道双墙，向下直达海边，将叙拉古人完全包围了起来。这时，意大利各地纷纷给远征军送来给养，很多截至当时一直在观望形势如何发展的西库尔人都作为盟友加入了雅典人的队伍，第勒尼亚还派来了3艘五十桨大船。与此同时，其他各个方面也在朝着雅典人所希望的方向顺利发展。由于伯罗奔尼撒的救兵未到，叙拉古人开始对通过武力保全城邦这一打算失去希望。他们自己内部此时已开始商议投降条件，并提请尼西亚斯考虑，拉马胡斯战死后，他成了唯一的指挥官。尽管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但由于围攻比以往更紧，如同身处困境的人一样，叙拉古人与尼西亚斯进行了多次讨论，市民中对此则议论得更多。他们当前面临的不幸也引起了他们彼此间的猜疑。他们把自己的灾难归咎于指挥他们作战的将军，认为是他们的运气不好或叛逆行为所致。于是，他们罢免了这些将军，另选其他人代替他们，即赫拉克利德斯、埃夫克莱斯和泰利亚斯。

Meanwhile, the Lacedaemonian, Gylippus, and the ships from Corinth were now off Leucas, intent upon going with all haste to the relief of Sicily. The reports that reached them being of an alarming kind, and all agreeing in the falsehood that Syracuse was already completely invested, Gylippus abandoned all hope of Sicily, and wishing to save Italy, rapidly crossed the Ionian Sea to Tarentum with the Corinthian, Pythen, two Laconian, and two Corinthian vessels, leaving the Corinthians to follow him after manning, in addition to their own ten, two Leucadian and two Ambraciot ships. From Tarentum Gylippus first went on an embassy to Thurii, and claimed anew the rights of citizenship which his father had enjoyed; failing to bring over the townspeople, he weighed anchor and

coasted along Italy. Opposite the Terinaean Gulf he was caught by the wind which blows violently and steadily from the north in that quarter, and was carried out to sea; and after experiencing very rough weather, remade Tarentum, where he hauled ashore and refitted such of his ships as had suffered most from the tempest. Nicias heard of his approach, but, like the Thurians, despised the scanty number of his ships, and set down piracy as the only probable object of the voyage, and so took no precautions for the present.

与此同时，斯巴达人吉利普斯和来自科林斯的战舰此时已离开莱夫卡斯岛，准备火速赶去援救西西里。尽管得到的消息令人震惊，但他们还是完全听信了叙拉古城已被完全包围这一不实之说。吉利普斯放弃了对西西里的所有希望，但仍想保全意大利，所以就与科林斯人皮森率两艘拉科尼亚舰和两艘科林斯舰渡过爱奥尼亚海，迅速驶向他林敦，而让科林斯人随后再赶来。除了他们自己的10艘战舰之外，科林斯人还要为莱夫卡斯的两艘舰和安布拉基亚的两艘舰配备人员。吉利普斯首先从他林敦派使节前往图里，请求接续他父亲曾在那里享有的公民权，但他没有争取到图里人的支持，所以又从那里起锚，沿意大利的海岸航行。在泰里内湾对面的海域，他遭到了狂风的袭击，从北面吹来的风在那一区域刮得很猛烈，将他吹到了海上。在经历了恶劣气候的考验之后，他又回到他林敦，在那里把遭受风暴损坏最严重的战舰拖上岸进行修理。尼西亚斯获悉了他到来的消息，但他像图里人一样没把他那区区几条舰放在眼里。他认为，吉利普斯此次航行唯一可能的目的就是在海上劫掠，所以暂时没有采取防范措施。

About the same time, in this summer, the Lacedaemonians invaded Argos with their allies, and laid waste most of the country. The Athenians went with thirty ships to the relief of the Argives, thus breaking their treaty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in the most

overt manner. Up to this time, incursions from Pylos, descents on the coast of the rest of Peloponnese, instead of on the Laconian, had been the extent of their co-operation with the Argives and Mantineans; and although the Argives had often begged them to land, if only for a moment, with their heavy infantry in Laconia, lay waste ever so little of it with them, and depart, they had always refused to do so. Now, however, under the command of Phytodorus, Laespodius, and Demaratus, they landed at Epidaurus Limera, Prasiae, and other places, and plundered the country; and thus furnished the Lacedaemonians with a better pretext for hostilities against Athens. After the Athenians had retired from Argos with their fleet, and the Lacedaemonians also, the Argives made an incursion into the Phlisaid, and returned home after ravaging their land and killing some of the inhabitants.

大约在这个夏季的同一时候，斯巴达人及其盟邦的军队侵入阿尔戈斯，践踏了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土地。雅典人率领30艘战舰去援救阿尔戈斯人，这就以最明显的方式撕毁了他们与斯巴达人之间的和约。他们此前与阿尔戈斯人和曼提尼亚人之间的合作，仅限于从皮洛斯入侵和在伯罗奔尼撒其他地区的海岸登陆，但不曾在拉科尼亚登陆。尽管阿尔戈斯人常常请求他们与自己的重步兵一起在拉科尼亚登陆，哪怕一会儿也好，只要对拉科尼亚稍加破坏后即可离开，但雅典人一直拒绝这样做。然而，如今他们却在菲托佐鲁斯、莱斯波季乌斯和德马拉托斯的指挥下，在埃皮达鲁斯的利迈拉、普拉西埃和其他地方登了陆，并且劫掠了这一地区，这就为斯巴达人对雅典采取敌对行动提供了更合适的借口。雅典人率舰队从阿尔戈斯撤离后，斯巴达人也撤了。阿尔戈斯人则侵入弗利塞兹，劫掠土地，杀害居民，尔后才返回本邦。

BOOK VII

第七卷

CHAPTER XXI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Years of the War—Arrival of Gylippus at Syracuse—Fortification of Decelea—Successes of the Syracusans

第二十一章　战争第十八年和第十九年——吉利普斯抵达叙拉古——在德西利亚构筑要塞——叙拉古人的胜利

After refitting their ships, Gylippus and Pythen coasted along from Tarentum to Epizephyrian Locris. They now received the more correct information that Syracuse was not yet completely invested, but that it was still possible for an army arriving at Epipolae to effect an entrance; and they consulted, accordingly, whether they should keep Sicily on their right and risk sailing in by sea, or, leaving it on their left, should first sail to Himera and, taking with them the Himeraeans and any others that might agree to join them, go to Syracuse by land. Finally they determined to sail for Himera, especially as the four Athenian ships which Nicias had at length sent off, on hearing that they were at Locris, had not yet arrived at Rhegium. Accordingly, before these reached their post, the Peloponnesians crossed the strait and, after touching at Rhegium and Messina, came to Himera. Arrived there, they persuaded the Himeraeans to join in the war, and not only to go with them themselves but to provide arms for the seamen from their vessels which they had drawn ashore at Himera; and they sent and appointed a place for the Selinuntines to meet them with all their forces. A few troops were also promised by the Geloans and some of the Sicels, who were now ready to join them with much greater

alacrity, owing to the recent death of Archonidas, a powerful Sicel king in that neighbourhood and friendly to Athens, and owing also to the vigour shown by Gylippus in coming from Lacedaemon. Gylippus now took with him about seven hundred of his sailors and marines, that number only having arms, a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and light troops from Himera with a body of a hundred horse, some light troops and cavalry from Selinus, a few Geloans, and Sicels numbering a thousand in all, and set out on his march for Syracuse.

吉利普斯和皮森整修完战舰后，沿着海岸从他林敦驶往伊壁犀斐里亚的洛克里。这时，他们收到了比较可靠的消息：叙拉古尚未完全被包围，军队抵达埃皮波莱后仍有进城的可能。于是他们就商议，到底是该沿西西里左侧冒险从水路进去，还是沿西西里右侧先驶往希迈拉，在那里带上希迈拉人和其他愿意加入他们的人，再经陆路前往叙拉古。最后，他们决定驶往希迈拉，尤其是因为4艘雅典舰尚未到达雷伊乌姆。听说他们到达洛克里后，尼西亚斯终于派出4艘战舰。因此，这些舰尚未到位，伯罗奔尼撒人就渡过海峡，在雷伊乌姆和墨西拿稍事停靠之后来到了希迈拉。抵达那里之后，他们就劝希迈拉人参战，不仅要与他们一同赴战，而且要为他们在希迈拉拖上岸的那些舰上的水兵提供武器。他们还派人与塞利努斯人约定了一个地点，要求塞利努斯人率全部军队去那里与他们会合。杰拉人和一些西库尔人也答应提供少量军队。他们如今爽快多了，非常乐意加入伯罗奔尼撒人的队伍，原因有二：一是他们那个地区很有势力且与雅典关系甚好的西库尔国王阿尔霍尼扎斯最近去世了，二是吉利普斯从斯巴达开来时所展现出的气势令其折服。吉利普斯现在率领着自己的水手和海军陆战士兵约700人（这部分人只配备了兵器）、希迈拉的1,000名重步兵和轻步兵以及100名骑兵、塞利努斯的一些轻步兵和骑兵、一些杰拉人以及总共1,000名西库尔人，踏上了赶赴叙拉古的征程。

Meanwhile, the Corinthian fleet from Leucas made all haste to

arrive; and one of their commanders, Gongylus, starting last with a single ship, was the first to reach Syracuse, a little before Gylippus. Gongylus found the Syracusans on the point of holding an assembly to consider whether they should put an end to the war. This he prevented, and reassured them by telling them that more vessels were still to arrive, and that Gylippus, son of Cleandridas, had been dispatched by the Lacedaemonians to take the command. Upon this, the Syracusans took courage, and immediately marched out with all their forces to meet Gylippus, who they found was now close at hand. Meanwhile, Gylippus, after taking Ietae, a fort of the Sicels, on his way, formed his army in order of battle, and so arrived at Epipolae, and ascending by Euryelus, as the Athenians had done at first, now advanced with the Syracusans against the Athenian lines. His arrival chanced at a critical moment. The Athenians had already finished a double wall of six or seven furlongs to the great harbour,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small portion next the sea, which they were still engaged upon; and in the remainder of the circle towards Trogilus on the other sea, stones had been laid ready for building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distance, and some points had been left half finished, while others were entirely completed. The danger of Syracuse had indeed been great.

与此同时，从莱夫卡斯岛开来的科林斯舰队也在火速赶来。他们的一个指挥官贡伊卢斯虽然是率领一艘战舰最后出发的，却是第一个抵达叙拉古的，比吉利普斯还要早一点。贡伊卢斯抵达时，恰逢叙拉古人正要召开公民大会，讨论是否应该结束战争的问题。他阻止了这次会议的召开，告诉他们还有更多的战舰要赶过来，并说斯巴达人已经指派克莱安兹里扎斯的儿子吉利普斯担任指挥官，以此让他们安心。听到这个消息，叙拉古人鼓起了勇气，立刻出动全部军队在吉利普斯快要到达时去迎接他。其间，吉利普斯在途中攻取了西库尔人的要塞伊埃泰之后，即让军队排成了战斗队形，并以此队形抵达了埃皮

波莱。他们像雅典人先前那样从埃夫里埃卢斯上来之后，随即带着叙拉古人向雅典人的防线挺进。他的到来恰逢关键时刻。雅典人已经筑成了那道延伸至大港的双重围墙，约有六、七弗隆长，只有靠海的一小段仍在修筑中。位于另一片海域朝向特罗伊卢斯尚未竣工的那段环形要塞，大部分也已备好石料，有些地方已完成了一半，其他地方则已完全竣工。叙拉古的确已陷入危殆。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recovering from the confusion into which they had been first thrown by the sudden approach of Gylippus and the Syracusans, formed in order of battle. Gylippus halted at a short distance off and sent on a herald to tell them that, if they would evacuate Sicily with bag and baggage within five days' time, he was willing to make a truce accordingly. The Athenians treated this proposition with contempt, and dismissed the herald without an answer. After this both sides began to prepare for action. Gylippus, observing that the Syracusans were in disorder and did not easily fall into line, drew off his troops more into the open ground, while Nicias did not lead on the Athenians but lay still by his own wall. When Gylippus saw that they did not come on, he led off his army to the citadel of the quarter of Apollo Temenites, and passed the night there. On the following day he led out the main body of his army, and, drawing them up in order of battle before the walls of the Athenians to prevent their going to the relief of any other quarter, dispatched a strong force against Fort Labdalum, and took it, and put all whom he found in it to the sword, the place not being within sight of the Athenians. On the same day an Athenian galley that lay moored off the harbour was captured by the Syracusans.

与此同时，雅典人已经从吉利普斯和叙拉古人突然到来最初引起

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列成了战斗队形。吉利普斯在不远的地方停下，先派来一名传令官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在五天之内带着行李和辎重撤离西西里，他便愿意签订休战协定。雅典人对这个提议不屑一顾，未作任何答复就把传令官打发走了。这之后，双方开始准备作战。吉利普斯注意到叙拉古人秩序混乱，很难排成队形，就把部队带到了比较开阔的地方。尼西亚斯没有率雅典人继续前行，而是在己方的墙边按兵不动。吉利普斯看到他们没跟上来，便率领自己的部队前往保护神阿波罗神庙所在区域的要塞，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他率领主力部队出来，命令他们在雅典人的墙前列成战斗队形，以防雅典人前去支援其他区域，然后派出一队强兵去攻打拉夫扎卢姆要塞，得手后将里面能找到的人都杀了。拉夫扎鲁姆要塞在雅典人的视线之外。同日，停泊在海港附近的一艘雅典战舰被叙拉古人缴获。

After this,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began to carry a single wall, starting from the city, in a slanting direction up Epipolae, in order that the Athenians, unless they could hinder the work, might be no longer able to invest them.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having now finished their wall down to the sea, had come up to the heights; and part of their wall being weak, Gylippus drew out his army by night and attacked it. However, the Athenians who happened to be bivouacking outside took the alarm and came out to meet him, upon seeing which he quickly led his men back again. The Athenians now built their wall higher, and in future kept guard at this point themselves, disposing their confederates along the remainder of the works, at the stations assigned to them. Nicias also determined to fortify Plemmyrium, a promontory over against the city, which juts out and narrows the mouth of the Great Harbour. He thought that the fortification of this place would make it easier to bring in supplies, as they would be able to carry on their blockade from a less distance, near to the port occupied by the Syracusans; instead of being obliged, upon every movement of the

enemy's navy, to put out against them from the bottom of the great harbour. Besides this, he now bega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war by sea, seeing that the coming of Gylippus had diminished their hopes by land. Accordingly, he conveyed over his ships and some troops, and built three forts in which he placed most of his baggage, and moored there for the future the larger craft and men-of-war. This was the first and chief occasion of the losses which the crews experienced. The water which they used was scarce and had to be fetched from far, and the sailors could not go out for firewood without being cut off by the Syracusan horse, who wer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a third of the enemy's cavalry being stationed at the little town of Olympieum, to prevent plundering incursions on the part of the Athenians at Plemmyrium. Meanwhile, Nicias learned that the rest of the Corinthian fleet was approaching, and sent twenty ships to watch for them, with orders to be on the look-out for them about Locris and Rhegium and the approach to Sicily.

其后，叙拉古人及其盟军以叙拉古城为起点，开始斜着沿埃皮波莱向上加筑一道单墙。这样，除非雅典人能够阻碍他们作业，否则就不可能再对他们形成包围了。与此同时，雅典人完成通往海边的封锁墙之后，已经上到高地上来了。他们的墙有一段不够牢固，吉利普斯便趁夜间率领部队对该处发动了袭击。然而，碰巧在外露营的雅典人被惊扰后随即出来迎战。吉利普斯一见此状，又迅速带着自己的部队撤回去了。雅典人这时把墙加高，以后他们要自己守卫这个地方，沿墙其他地段则准备交给派到各个哨位的盟军负责。尼西亚斯还决定在普莱米里乌姆修筑防御工事。这是城上方突出去的一个海角，大港的入口因它而变得很狭窄。他认为，若在这个地方修了防御工事，他们运入给养会更容易，因为他们可以从较近的距离实施封锁，即在叙拉古人所占据的港口附近。敌人的海军若有任何动静，他们也不必从大港的远端出航去对付他们。除此之外，看到吉利普斯的到来减少了他们在陆上获胜的希望，他这时开始更加关注海战。于是，他带着自己

的战舰和一些军队过去筑了三个要塞，把大部分物资都存放在那里，以后还要在那里停泊较大的船只和军舰。然而，此举也成了舰上人员遭受损失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所用的水极度匮乏，不得不到远处去取。水兵们外出拾柴时，无不遭到叙拉古骑兵的截击，因为他们控制着这一地区。敌军三分之一的骑兵都驻在奥林匹埃夫姆这个小镇上，以防普莱米里乌姆的雅典人出来进行劫掠性袭击。这时候，尼西亚斯获悉科林斯舰队的其余舰只即将到来，他便派出20艘舰前去监视，命其密切注意这些舰对洛克里和雷伊乌姆有何行动以及它们是否会前往西西里。

Gylippus, meanwhile, went on with the wall across Epipolae, using the stones which the Athenians had laid down for their own wall,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stantly led out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and formed them in order of battle in front of the lines, the Athenians forming against him. At last, he thought that the moment was come, and began the attack; and a hand-to-hand fight ensued between the lines, where the Syracusan cavalry could be of no use; and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were defeated and took up their dead under truce, while the Athenians erected a trophy. After this Gylippus called the soldiers together, and said that the fault was not theirs but his; he had kept their lines too much within the works, and had thus deprived them of the services of their cavalry and darters. He would now, therefore, lead them on a second time. He begged them to remember that in material force they would be fully a match for their opponents, while, with respect to moral advantages, it were intolerable if Peloponnesians and Dorians should not feel confident of overcoming Ionians and islanders with the motley rabble that accompanied them, and of driving them out of the country.

与此同时，吉利普斯利用雅典人当初为修建围墙而存放的石头，继续修筑横穿埃皮波莱的城墙，同时还不断率领叙拉古人及其盟军在防线前排成战斗阵列，雅典人同样也列阵以待。最后，他认为时机已到，便发动进攻。双方在两军阵线之间展开了白刃战，叙拉古的骑兵在那里未能派上用场。叙拉古人及其盟军战败后，在休战期间抬走了阵亡者的尸体，雅典人则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这之后，吉利普斯将士兵们召集到一起，他说，这次失利是他的责任，与他们无关。他把阵线设得太靠工事范围之内了，所以骑兵和标枪手都没派上用场，因此，他现在要率领他们二次出战。他恳请他们记住，论有形力量，他们完全可以与敌人相匹敌；就士气方面的优势而言，如果伯罗奔尼撒人和多里安人没有信心战胜爱奥尼亚人和那些岛民以及跟随他们的乌合之众，并将他们赶出这一地区，那是不能容忍的。

After this he embraced, the first opportunity that offered of again leading them against the enemy. Now Nicias and the Athenians held the opinion that even if the Syracusans should not wish to offer battle,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m to prevent the building of the cross wall, as it already almost overlapped the extreme point of their own, and if it went any further it would from that moment make no difference whether they fought ever so many successful actions, or never fought at all. They accordingly came out to meet the Syracusans. Gylippus led out his heavy infantry further from the fortifications than on the former occasion, and so joined battle; posting his horse and darters upon the flank of the Athenians in the open space, where the works of the two walls terminated. During the engagement the cavalry attacked and routed the left wing of the Athenians, which was opposed to them; and the rest of the Athenian army was in consequence defeated by the Syracusans and driven headlong within their lines. The night following the Syracusans carried their wall up to the Athenian works and passed them, thus putting it out of their power any longer to stop them,

and depriving them, even if victorious in the field, of all chance of investing the city for the future.

其后，他利用最早出现的机会，再次率领他们向敌军发起了攻击。尼西亚斯和雅典人此时认为，即使叙拉古人不想邀战，他们也有必要阻止对方修筑那道横墙，因为这道墙几乎已修到他们自己那道墙的末端了。如果再往前修，他们是否打过那么多次胜仗，届时将毫无意义，与一仗未打毫无二致。因此，他们便出来迎战叙古拉人。吉利普斯将重步兵带到离防御工事比上次远些的地方，然后才开始交战。骑兵和标枪手则部署在开阔地界雅典人的侧面，两道围墙的终点都在这里。交战期间，骑兵发起进攻，击溃了与之对抗的雅典人左翼，其余的雅典军队随之被叙拉古人打败，仓皇逃回了防线内。第二天夜间，叙拉古人将他们的城墙修到雅典人的工事旁，并越过它，这就使得雅典人再也无法阻止他们了。即便雅典人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他们将来也没有机会围攻叙拉古城了。

After this, the remaining twelve vessels of the Corinthians, Ambraciots, and Leucadians sailed into the harbour under the command of Erasinides, a Corinthian, having eluded the Athenian ships on guard, and helped the Syracusans in completing the remainder of the cross wall. Meanwhile, Gylippus went into the rest of Sicily to raise land and naval forces, and also to bring over any of the cities that either were lukewarm in the cause or had hitherto kept out of the war altogether. Syracusan and Corinthian envoys were also dispatched to Lacedaemon and Corinth to get a fresh force sent over, in any way that might offer, either in merchant vessels or transports, or in any other manner likely to prove successful, as the Athenians too were sending for reinforcements; while the Syracusans proceeded to man a fleet and to exercise, meaning to try their fortune in this way also, and generally became

exceedingly confident.

此战之后，在科林斯人埃拉西尼泽斯的指挥下，其余那12艘科林斯人、安布拉基亚人和莱夫卡斯人的战舰驶进了港口。他们躲过雅典舰的监视，帮助叙拉古人修完了横墙余下的部分。与此同时，吉利普斯深入到西西里其他地方，一是为招募陆军和海军，二是想把那些对事业不热心或至此全然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城邦争取过来。他还派叙拉古和科林斯的使者前往斯巴达和科林斯，请求再派援军前来，不论何种方式，商船也行，运输船也好，其他行得通的方式也可以，因为雅典人也在派人求援。叙拉古人则继续为舰队配备水手，进行操练，他们也打算以此方式试一下运气，总体说来，他们变得极其自信。

Nicias perceiving this, and seeing the strength of the enemy and his own difficulties daily increasing, himself also sent to Athens. He had before sent frequent reports of events as they occurred, and felt it especially incumbent upon him to do so now, as he thought that they were in a critical position, and that, unless speedily recalled or strongly reinforced from home, they had no hope of safety. He feared, however, that the messengers, either through inability to speak, or through failure of memory, or from a wish to please the multitude, might not report the truth, and so thought it best to write a letter, to ensure that the Athenians should know his own opinion without its being lost in transmission, and be able to decide upon the real facts of the case.

尼西亚斯注意到了这种变化。看到敌人的力量日益壮大，自己的困难却与日俱增，他也派人赴雅典请求增援。此前每逢有战事发生，他都频频派人去报告情况。现在他尤其感到自己有责任这样做，因为他感觉他们此刻处境危急，除非迅速将他们召回或得到本邦的大力增

援，他们完全没有安全的希望。然而，他又担心信使们因表达能力差或记忆有误，甚或为了讨好民众，而不将情况以实相告，所以认为最好还是写封信，以确保雅典人了解他的意见，不至于在传达过程中有所疏漏，同时也便于他们根据真实情况作出决定。

His emissaries, accordingly, departed with the letter and the requisite verbal instructions; and he attended to the affairs of the army, making it his aim now to keep on the defensive and to avoid any unnecessary danger.

于是，使节们就带着这封信和必要的口头指令出发了。他则专心处理军务，以维持守势和避免陷入不必要的危险作为现阶段的目标。

At the close of the same summer the Athenian general Euetion marched in concert with Perdiccas with a large body of Thracians against Amphipolis, and failing to take it brought some galleys round into the Strymon, and blockaded the town from the river, having his base at Himeraeum.

这个夏季结束时，雅典将军埃夫埃蒂翁在佩尔狄卡斯的陪同下，率领大批色雷斯人向安菲波利斯发起进军，但未能攻下这座城，于是就率领几艘三列桨战舰驶进了斯特鲁马河。他将基地设在希迈雷夫姆，从河上对该城实施了封锁。

Summer was now over. The winter ensuing, the persons sent by Nicias, reaching Athens, gave the verbal messages which had been entrusted to them, and answered any questions that were asked

them, and delivered the letter. The clerk of the city now came forward and read out to the Athenians the letter, which was as follows:

这时夏季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冬季里，尼西亚斯所派的人抵达雅典，传达了委托他们传达的口头讯息，回答了被问及的问题，并递交了尼西亚斯那封信。雅典的书记员立时走上前去，向雅典人宣读了这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Our past operations, Athenians, have been made known to you by many other letters; it is now time for you to become equally familiar with our present condition, and to take your measures accordingly. We had defeated in most of our engagements with them the Syracusans, against whom we were sent, and we had built the works which we now occupy, when Gylippus arrived from Lacedaemon with an army obtained from Peloponnese and from some of the cities in Sicily. In our first battle with him we were victorious; in the battle on the following day we were overpowered by a multitude of cavalry and darters, and compelled to retire within our lines. We have now, therefore, been forced by the numbers of those opposed to us to discontinue the work of circumvallation, and to remain inactive; being unable to make use even of all the force we have, since a large portion of our heavy infantry is absorbed in the defence of our lines. Meanwhile, the enemy have carried a single wall past our lines, thus making it impossible for us to invest them in future, until this cross wall be attacked by a strong force and captured. So that the besieger in name has become, at least from the land side, the besieged in reality; as we are prevented by their cavalry from even going for any distance into the country.”

“雅典人：我们以往的行动，你们已经从不少其他信件中获悉。现在你们该同样了解我们当前的状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是被派去对付叙拉古人的。在与他们的交战中，我们胜多于负。当吉利普斯带着从伯罗奔尼撒和西西里一些城市获得的军队抵达这里时，我们已经修筑了我们现在占据的工事。在与吉利普斯的首次交战中，我们取得了胜利；在次日的交锋中，我们则被众多骑兵和弓箭手所打败，被迫退进了我们的防线之内。因此，由于敌方人数众多，我们现在只好中止封锁墙的修筑，暂时按兵不动。我们甚至不能动用我们的全部兵力，因为我们的大部分重步兵都在守卫我们的防线。与此同时，敌人却增修了一道单墙，而且越过了我们的防线。这样一来，如果不用一支强大的军队攻取这道横墙，我们将来就不可能对他们实施封锁。所以，我们名义上虽然是在围城，实际上却是被包围者，至少在陆地上是这样。由于为他们的骑兵所阻，我们向乡间的进军几乎寸步难进。”

“Besides this, an embassy has been dispatched to Peloponnese to procure reinforcements, and Gylippus has gone to the cities in Sicily, partly in the hope of inducing those that are at present neutral to join him in the war, partly of bringing from his allies additional contingents for the land forces and material for the navy. For I understand that they contemplate a combined attack, upon our lines with their land forces and with their fleet by sea. You must none of you be surprised that I say by sea also. They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length of the time we have now been in commission has rotted our ships and wasted our crews, and that with the entireness of our crews and the soundness of our ships the pristine efficiency of our navy has departed. For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haul our ships ashore and careen them, because, the enemy's vessels being as many or more than our own, we are constantly anticipating an attack. Indeed, they may be seen exercising, and it

lies with them to take the initiative; and not having to maintain a blockade, they have greater facilities for drying their ships.”

“除此之外，他们还派了一个使团到伯罗奔尼撒去请求增援。吉利普斯也已前往西西里各城，一是希望说服目前仍保持中立的城邦为其助战，二是希望从其盟邦再调些部队充实陆军，同时为海军再获取些物资。在我看来，他们打算发动一次联合进攻，不单用他们的陆军，而且还要利用他们的舰队从海上进攻我们的防线。我说他们还要从海上进攻，你们谁也不要感到惊讶。他们已经发现，我们在海上服役已久，舰体已腐，人员已乏。尽管我们人员尚齐，舰尚无损，但我们海军原有的行动效率已不复存。我们不可能把舰拖到岸上使其倾侧，因为敌人的战舰和我们的一样多，甚至比我们的还要多，我们时时有遭到进攻的可能。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在操练，主动出击权也在他们手中。由于不必维持封锁，他们晒干船体更为便利。”

“This we should scarcely be able to do, even if we had plenty of ships to spare, and were freed from our present necessity of exhausting all our strength upon the blockade. For it is already difficult to carry in supplies past Syracuse; and were we to relax our vigilance in the slightest degree it would become impossible. The losses which our crews have suffered and still continue to suffer arise from the following causes. Expeditions for fuel and for forage, and the distance from which water has to be fetched, cause our sailors to be cut off by the Syracusan cavalry; the loss of our previous superiority emboldens our slaves to desert; our foreign seamen are impressed by the unexpected appearance of a navy against us,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enemy's resistance; such of them as were pressed into the service take the first opportunity of departing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es; such as were originally seduced by the temptation of high pay, and expected little fighting and large

gains, leave us either by desertion to the enemy or by availing themselves of one or other of the various facilities of escape which the magnitude of Sicily affords them. Some even engage in trade themselves and prevail upon the captains to take Hyccaric slaves on board in their place; thus they have ruined the efficiency of our navy.”

“即使我们有大量的备用舰只，当前也不必倾尽全力实施封锁，我们也很难做到这一点。经过叙拉古运入补给本已很难，如果我们再放松警戒，哪怕稍有松懈，都会全无可能。我们的舰上人员已经遭受和仍将遭受的损失缘于以下原因：出去搜寻柴火和粮秣以及不得不到远处去取水，往往使我们的水兵遭到叙拉古骑兵的阻截；我们先前的优势不再，使得我们的奴隶开始放胆逃亡；一支与我们对抗的海军力量的意外出现，以及敌人的对抗能力，又使得我们的外邦水手印象深刻；他们当中那些被迫来服役的人，一有机会便跑回各自城邦去了；那些当初受高薪所诱，原指望不用怎么作战就可以获得大笔饷银的人，现在则离我们而去，不是跑到敌人那里，就是利用幅员辽阔的西西里提供的各种便利逃之夭夭了。有些人甚至做起了生意，说服舰长们用希卡拉的奴隶顶替他们上舰，从而使我们海军的效率受到了破坏。”

“Now I need not remind you that the time during which a crew is in its prime is short, and that the number of sailors who can start a ship on her way and keep the rowing in time is small. But by far my greatest trouble is, that holding the post which I do, I am prevented by the natural indocility of the Athenian seaman from putting a stop to these evils; and that meanwhile, we have no source from which to recruit our crews, which the enemy can do from many quarters, but are compelled to depend both for supplying the crews in service and for making good our losses upon

the men whom we brought with us. For our present confederates, Naxos and Catana, are incapable of supplying us.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more wanting to our opponents, I mean the defection of our Italian markets. If they were to see you neglect to relieve us from our present condition, and were to go over to the enemy, famine would compel us to evacuate, and Syracuse would finish the war without a blow."

"此刻我无需提醒你们，一组舰员的最佳状态保持不了多久，能使战舰开启航程并合着节拍保持划速的水手为数很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最大的麻烦是，尽管身居将军之位，我却被雅典水手难以驯服的天性所阻，无法制止这些不幸。同时，我们也无从招募水手，而敌人却能从多处招募。无论是提供服役的水手，还是弥补我们的损失，我们都不得不依靠自己带来的人。我们现有的盟邦纳克索斯和卡塔纳，在这方面也无能为力。我们的对手欠缺的只有一样：供给我们给养的意大利市场背叛我们。如果意大利人看到你们不把我们从目前的状况里解救出来，他们就会投奔敌方，而饥饿将迫使我们撤离，叙拉古人则无需一战即可结束这场战争。"

"I might, it is true, have written to you something different and more agreeable than this, but nothing certainly more useful, if it is desirable for you to know the real state of things here before taking your measures. Besides I know that it is your nature to love to be told the best side of things, and then to blame the teller if the expectations which he has raised in your minds are not answered by the result; and I therefore thought it safest to declare to you the truth."

"其实，我本来可以写给你们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些比这令人高

兴的东西，但如果你们想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再采取措施，那么，我所告诉你们的最为有用。此外，我知道，你们素来喜听到事情好的一面，但结果若与在你们心中所激起的期望不相吻合，你们就会责备告诉你们的人。因此，我认为还是告诉你们实情最保险。”

“Now you are not to think that either your generals or your soldiers have ceased to be a match for the forces originally opposed to them. But you are to reflect that a general Sicilian coalition is being formed against us; that a fresh army is expected from Peloponnese, while the force we have here is unable to cope even with our present antagonists; and you must promptly decide either to recall us or to send out to us another fleet and army as numerous again, with a large sum of money, and someone to succeed me, as a disease in the kidneys unfits me for retaining my post. I have, I think, some claim on your indulgence, as while I was in my prime I did you much good service in my commands. But whatever you mean to do, do it at the commencement of spring and without delay, as the enemy will obtain his Sicilian reinforcements shortly, those from Peloponnese after a longer interval; and unless you attend to the matter the former will be here before you, while the latter will elude you as they have done before.”

“就起初要对付的敌军而论，你们现在不要以为你们的将军和士兵已不再有能力与之相匹敌。但是，你们要明白，整个西西里正在联合起来对付我们，伯罗奔尼撒将增派援军来，而我们在这里的军队连现有的敌人都对付不了。因此，你们必须当机立断，要么把我们召回去，要么给我们派一支舰队和同样多数量的陆军来，并需带来大量资金，同时还要派人来接替我。因为我有肾疾，已不适合继续担任此职。我想，我有一定权利要求你们照顾，因为我年富力强时曾在指挥职位上为你们多方效力。但是，无论你们作何打算，请一定在春天开

始时行动，不得拖延，因为敌人很快就会从西西里获得援军，伯罗奔尼撒派来的援军稍晚一点也会到达。你们若不注意这个问题，前者就会先于你们到达这里，后者则会像以前一样从你们面前溜过。”

Such were the contents of Nicias's letter. When the Athenians had heard it they refused to accept his resignation, but chose him two colleagues, naming Menander and Euthydemus, two of the officers at the seat of war, to fill their places until their arrival, that Nicias might not be left alone in his sickness to bear the whole weight of affairs. They also voted to send out another army and navy, drawn partly from the Athenians on the muster-roll, partly from the allies. The colleagues chosen for Nicias were Demosthenes, son of Alcisthenes, and Eurymedon, son of Thucles. Eurymedon was sent off at once, about the time of the winter solstice, with ten ships, a hundred and twenty talents of silver, and instructions to tell the army that reinforcements would arrive, and that care would be taken of them; but Demosthenes stayed behind to organize the expedition, meaning to start as soon as it was spring, and sent for troops to the allies, and meanwhile, got together money, ships, and heavy infantry at home.

这就是尼西亚斯一信的内容。雅典人听完这封信后，虽然不肯接受他辞职，但为他选了两名副将，并决定由身在战地的两名军官米南德和埃西泽穆斯在两人到达之前暂替其职。这样，尼西亚斯就不必抱病独自承担全部军务了。他们还投票决定再派去一支由陆军和海军组成的军队，部分人员从名册上的雅典人中征召，部分从盟邦中召集。他们为尼西亚斯挑选的副将是阿尔基塞内斯的儿子狄摩西尼和苏克莱斯的儿子埃夫里迈宗。埃夫里迈宗立即被派了出去，时间大约是在冬至，带领10艘战舰和120塔兰特白银。他还奉命告诉在西西里的军队，援军会来的，他们不会没有人管。狄摩西尼则留在后面组织远征

军，计划一开春就出发。他一面派人到各盟邦去请求援军，一面在本城邦筹集资金、战舰和重步兵。

The Athenians also sent twenty vessels round Peloponnese to prevent any one crossing over to Sicily from Corinth or Peloponnese. For the Corinthians, filled with confidence by the favourable alteration in Sicilian affairs which had been reported by the envoys upon their arrival, and convinced that the fleet which they had before sent out had not been without its use, were now preparing to dispatch a force of heavy infantry in merchant vessels to Sicily, while the Lacedaemonians did the like for the rest of Peloponnese. The Corinthians also manned a fleet of twenty-five vessels, intending to try the result of a battle with the squadron on guard at Naupactus, and meanwhile, to make it less easy for the Athenians there to hinder the departure of their merchantmen, by obliging them to keep an eye upon the galleys thus arrayed against them.

雅典人还派出20艘战舰到伯罗奔尼撒周围巡弋，以防有人从科林斯或伯罗奔尼撒渡海去西西里。至于科林斯人，由于使者们一到就向他们报告了西西里战局发生的可喜变化，他们充满了信心。他们认为此前派出的舰队并非无用，现在他们准备用商船将一支重步兵部队运往西西里。斯巴达人同样准备把从伯罗奔尼撒其他地方召集来的军队运过去。科林斯人还为一支25艘战舰的舰队配备了人员，打算在纳夫帕克图斯承担警戒任务那个雅典海军中队那里一试身手，同时也是为了使那里的雅典人不太容易阻止他们的商船离港。有三列桨战舰阵列于前，雅典人将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舰上。

In the meantime, the Lacedaemonians prepared for their

invasion of Attica,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previous resolve, and at the instigation of the Syracusans and Corinthians, who wished for an invasion to arrest the reinforcements which they heard that Athens was about to send to Sicily. Alcibiades also urgently advised the fortification of Decelea, and a vigorous prosecution of the war. But the Lacedaemonians derived most encouragement from the belief that Athens, with two wars on her hands, against themselves and against the Siceliots, would be more easy to subdue, and from the conviction that she had been the first to infringe the truce. In the former war, they considered, the offence had been more on their own side, both on account of the entrance of the Thebans into Plataea in time of peace, and also of their own refusal to listen to the Athenian offer of arbitration, in spite of the clause in the former treaty that where arbitration should be offered there should be no appeal to arms. For this reason they thought that they deserved their misfortunes, and took to heart seriously the disaster at Pylos and whatever else had befallen them. But when, besides the ravages from Pylos, which went on without any intermission, the thirty Athenian ships came out from Argos and wasted part of Epidaurus, Prasiae, and other places; when upon every dispute that arose a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y doubtful point in the treaty, their own offers of arbitration were always rejected by the Athenians, the Lacedaemonians at length decided that Athens had now committed the very same offence as they had before done, and had become the guilty party; and they began to be full of ardour for the war. They spent this winter in sending round to their allies for iron, and in getting ready the other implements for building their fort; and meanwhile began raising at home, and also by forced requisitions in the rest of Peloponnese, a force to be sent out in the merchantmen to their allies in Sicily. Winter thus ended, and with it the eighteenth year of this war of which Thucydides is the historian.

与此同时，斯巴达人按照他们之前所作的决定，开始准备入侵阿提卡。这次入侵也是叙拉古人和科林斯人力促的结果。他们听说雅典人要派援军奔赴西西里之后，非常希望斯巴达进行一次入侵，以阻止援军成行。亚西比德也力劝他们在德西利亚构筑防御工事和积极投入战争。但是，最打动斯巴达人的是，他们相信，同时打两场战争（与他们之战和与西凯利奥特人之战）的雅典更容易被打垮。他们还认为，首先违反休战和约的是雅典。在雅典人与他们之战中，斯巴达人认为，过错更多地在自己一方，一则是因为底比斯人是在和平时期进入普拉蒂亚的，二则是因为先前的和约中有条款规定，只要提出了仲裁之议，便不得再诉诸武力，而他们自己却拒不听从雅典人的仲裁提议。因为这一原因，他们认为自己理应遭受不幸，所以才认真反思在皮洛斯的灾难以及他们遭受的其他失败。但是，除了从皮洛斯不间断地出来进行劫掠外，雅典人还派30艘舰从阿尔戈斯出来劫掠埃皮达鲁斯、普拉西埃和其他地方的部分地区；每当双方对和约中存在的疑点发生争议时，他们提出的仲裁建议总是遭到雅典人的拒绝。因此，斯巴达人最终认定，雅典同样犯下了他们以前所犯的过失，现在已是有过的一方，于是他们开始满腔热情地投入战争。这个冬季，他们派人到各盟邦去要求他们提供铁，并为构筑要塞准备其他材料，同时开始在本城邦招募军队，另外也从伯罗奔尼撒其他地区强行征调，并准备用商船将这支部队运去援助在西西里的盟友。冬季就这样结束了，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十八年亦告结束。

In the first days of the spring following, at an earlier period than usual,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invaded Attica, under the command of Agis, son of Archidamus, king of the Lacedaemonians. They began by devastating the parts bordering upon the plain, and next proceeded to fortify Decelea, dividing the work among the different cities. Decelea is about thirteen or fourteen miles from the city of Athens, and the same distance or not much further from Boeotia; and the fort was meant to annoy the

plain and the richest parts of the country, being in sight of Athens. While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ir allies in Attica were engaged in the work of fortification, their countrymen at home sent off, at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heavy infantry in the merchant vessels to Sicily; the Lacedaemonians furnishing a picked force of Helots and Neodamodes (or freedmen), six hundred heavy infantry in all, under the command of Eccritus, a Spartan; and the Boeotians three hundred heavy infantry, commanded by two Thebans, Xenon and Nicon, and by Hegesander, a Thespian. These were among the first to put out into the open sea, starting from Taenarus in Laconia. Not long after their departure the Corinthians sent off a force of five hundred heavy infantry, consisting partly of men from Corinth itself, and partly of Arcadian mercenaries, placed under the command of Alexarchus, a Corinthian. The Sicyonians also sent off two hundred heavy infantry at same time as the Corinthians, under the command of Sargeus, a Sicyonian. Meantime the five-and-twenty vessels manned by Corinth during the winter lay confronting the twenty Athenian ships at Naupactus until the heavy infantry in the merchantmen were fairly on their way from Peloponnese; thus fulfilling the object for which they had been manned originally, which was to divert the attention of the Athenians from the merchantmen to the galleys.

次年春初，在阿希达穆斯之子亚基斯国王的率领下，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入侵了阿提卡。此次入侵比以往都早些。他们首先践踏了与平原接壤的地区，接着开始在德西利亚构筑要塞，办法是把工程分派给各城邦完成。德西利亚距雅典城约十三、四英里，距离维奥蒂亚也是一样，抑或稍远一些。由于这一要塞临近雅典，修筑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侵扰这一地区的平原地带和最富饶的区域。在阿提卡的伯罗奔尼撒人及其盟友忙于构筑要塞的时候，他们在城邦内的同胞几乎同时在用商船将重步兵送往西西里。斯巴达人提供了一支从希洛人和新公民

（或自由民）中挑选的精兵，共600名重步兵，指挥官是斯巴达人埃克里图斯。维奥蒂亚人提供了300名重步兵，由两名底比斯人克赛农和尼孔以及塞斯比阿人赫耶桑泽尔指挥。这些人属于首批出发者，他们是从拉科尼亚的泰纳鲁斯驶入公海的。他们出发后不久，科林斯人派出了一支由500名重步兵组成的部队，其中部分来自科林斯本身，部分是阿卡迪亚雇佣兵。这支军队由科林斯人亚力克萨尔胡斯负责指挥。在科林斯人遣出军队的同时，西锡安人也派出了200名重步兵，由西锡安人萨尔耶夫斯指挥。与此同时，科林斯在冬季配备好人员的25艘舰一直在与纳夫帕克图斯那20艘雅典舰对峙，直至商船上的重步兵完全离开伯罗奔尼撒，从而达到了当初为这些战舰配备人员的目的，即将雅典人的注意力由商船转向了这些三列桨战舰。

During this time, the Athenians were not idle.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fortification of Decelea,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spring, they sent thirty ships round Peloponnese, under Charicles, son of Apollodorus, with instructions to call at Argos and demand a force of their heavy infantry for the fleet, agreeably to the alli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y dispatched Demosthenes to Sicily, as they had intended, with sixty Athenian and five Chian vessels, twelve hundred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from the muster-roll, and as many of the islanders as could be raised in the different quarters, drawing upon the other subject allies for whatever they could supply that would be of use for the war. Demosthenes was instructed first to sail round with Charicles and to operate with him upon the coasts of Laconia, and accordingly sailed to Aegina and there waited for the remainder of his armament, and for Charicles to fetch the Argive troops.

在这期间，雅典人也没有闲着。春初，斯巴达人修筑德西利亚要塞的同时，他们即派阿波罗多罗斯之子哈里克莱斯率30艘战舰到伯罗

奔尼撒周围游弋，并命他在阿尔戈斯稍作停留，要求对方按盟约规定为这支舰队提供一支重步兵部队。与此同时，他们还按计划派遣狄摩西尼前往西西里，所率舰只和人员包括：60艘雅典舰和5艘希俄斯舰，从雅典兵员名册中征调的1,200名重步兵，以及从各地招募来的岛民，另外还带了其他附属盟邦所提供的各种战争所需物资。狄摩西尼奉命先与哈里克莱斯一同绕行，并与他一起在拉科尼亚沿岸活动。于是，狄摩西尼驶向埃伊纳，在那里等候其余部队，同时也等着哈里克莱斯将阿尔戈斯的部队带过来。

In Sicily, about the same time, in this spring, Gylippus came to Syracuse with as many troops as he could bring from the cities which he had persuaded to join. Calling the Syracusans together, he told them that they must man as many ships as possible, and try their hand at a sea-fight, by which he hoped to achieve an advantage in the war not unworthy of the risk. With him Hermocrates actively joined in trying to encourage his countrymen to attack the Athenians at sea, saying that the latter had not inherited their naval prowess nor would they retain it for ever; they had been landsmen even to a greater degree than the Syracusans, and had only become a maritime power when obliged by the Mede. Besides, to daring spirits like the Athenians, a daring adversary would seem the most formidable; and the Athenian plan of paralysing by the boldness of their attack a neighbour often not their inferior in strength could now be used against them with as good effect by the Syracusans. He was convinced also that the unlooked-for spectacle of Syracusans daring to face the Athenian navy would cause a terror to the enemy, the advantages of which would far outweigh any loss that Athenian science might inflict upon their inexperience. He accordingly urged them to throw aside their fears and to try their fortune at sea; and the Syracusa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ylippus and Hermocrates, and perhaps some

others, made up their minds for the sea-fight and began to man their vessels.

在西西里，大约在这年春天同一时候，吉利普斯来到了叙拉古，并从被他说服参战的城邦带来了尽可能多的军队。他把叙拉古人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你们必须为尽可能多的舰只配备人手，试着打一场海战。他希望能以此获得战争优势，无愧于这次冒险。赫莫克拉特斯也与他一道积极鼓励自己的同胞与雅典人进行海战。他说，雅典人的海上威力不是先天就具备的，也不会永久保有。与叙拉古人相比，他们更像是陆地居民，只是被波斯人所迫才变成海上强邦的。此外，对雅典人这种胆大的人来说，遇到同样大胆的对手似乎才是最可怕的。遇到实力并不次于他们的邻邦，雅典人往往采取大胆进攻的方式使其丧失战斗力。叙拉古人现在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可以达到良好效果。他还深信，叙拉古人若出乎意料地以勇敢迎战雅典海军的面貌出现，将会使敌人感到恐惧，由此带来的优势将大大抵偿雅典人利用战技为经验不足的叙拉古人造成的损失。因此，他敦促他们抛开恐惧，在海上碰一碰运气。在吉利普斯和赫莫克拉特斯（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影响下，叙拉古人下定了进行海战的决心，开始为他们的战舰配备人员。

When the fleet was ready, Gylippus led out the whole army by night; his plan being to assault in person the forts on Plemmyrium by land, while thirty-five Syracusan galleys sailed according to appointment against the enemy from the great harbour, and the forty-five remaining came round from the lesser harbour, where they had their arsenal, in order to effect a junction with those inside and simultaneously to attack Plemmyrium, and thus to distract the Athenians by assaulting them on two sides at once. The Athenians quickly manned sixty ships, and with twenty-five of these engaged the thirty-five of the Syracusans in the great harbour, sending the

rest to meet those sailing round from the arsenal; and an action now ensued directly in front of the mouth of the great harbour, maintained with equal tenacity on both sides; the one wishing to force the passage, the other to prevent them.

舰队准备就绪后，吉利普斯率领全部军队在夜色的掩护下出发了。他计划亲自率军从陆路进攻普莱米里乌姆的要塞。与此同时，叙拉古的35艘三列桨战舰按照约定从大港向敌人发起进攻，其余45艘战舰从其船坞所在较小港口绕过来与港内舰只会合，然后同时向普莱米里乌姆发起进攻。这样，雅典人就会因腹背受敌而发生混乱。雅典人迅速为60艘舰只配备了人员，其中25艘用于对付大港内叙拉古人的35艘舰，余者奉命派去迎击从船坞驶过来的那些舰只。一场大战随即在大港港口的正前方展开，双方都打得很顽强：一方要强行进港，另一方竭力阻止。

In the meantime, while the Athenians in Plemmyrium were down at the sea, attending to the engagement, Gylippus made a sudden attack on the forts in the early morning and took the largest first, and afterwards the two smaller, whose garrisons did not wait for him, seeing the largest so easily taken. At the fall of the first fort, the men from it who succeeded in taking refuge in their boats and merchantmen, found great difficulty in reaching the camp, as the Syracusans were having the best of it in the engagement in the great harbour, and sent a fast-sailing galley to pursue them. But when the two others fell, the Syracusans were now being defeated; and the fugitives from these sailed alongshore with more ease. The Syracusan ships fighting off the mouth of the harbour forced their way through the Athenian vessels and sailing in without any order fell foul of one another, and transferred the victory to the Athenians; who not only routed the squadron in question, but also

that by which they were at first being defeated in the harbour, sinking eleven of the Syracusan vessels and killing most of the men, except the crews of three ships whom they made prisoners. Their own loss was confined to three vessels; and after hauling ashore the Syracusan wrecks and setting up a trophy upon the islet in front of Plemmyrium, they retired to their own camp.

与此同时，趁着普莱米里乌姆的雅典人下海交战之际，吉利普斯于清晨对各个要塞发动了突然袭击。他首先攻陷了最大的一个要塞，后来又攻陷了两个比较小的，那里的守军看到最大的要塞失守，不等他来就逃之夭夭了。第一个要塞陷落时，里面的人虽然成功逃上了小船和商船，却费了很大劲才抵达营地。叙拉古人当时在大港内的海战中占上风，所以派了一艘快舰去追他们。但是，当其他两个要塞陷落时，叙拉古人战败在即，从这两个要塞逃离的人员没费多大劲就沿着海岸驶离了。在港口附近作战的叙拉古战舰虽然强行穿过雅典人的战舰驶入了港内，但是却毫无秩序，互相碰撞，结果战机又转到了雅典人手中，他们不仅打垮了这个中队，还击溃了最初在港内打败他们的那个中队，击沉叙拉古战舰11艘，杀死了大多数舰员，只有3艘舰的舰员被他们抓了俘虏，而他们自己仅损失了3艘舰。他们把叙拉古人那些残破舰只拖上岸，在普莱米里乌姆前面的小岛上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然后返回自己的兵营去了。

Unsuccessful at sea, the Syracusans had nevertheless the forts in Plemmyrium, for which they set up three trophies. One of the two last taken they razed, but put in order and garrisoned the two others. In the capture of the forts a great many men were killed and made prisoners, and a great quantity of property was taken in all. As the Athenians had used them as a magazine, there was a large stock of goods and corn of the merchants inside, and also a large stock belonging to the captains; the masts and other furniture of

forty galleys being taken, besides three galleys which had been drawn up on shore. Indeed, the first and chiefest cause of the ruin of the Athenian army was the capture of Plemmyrium; even the entrance of the harbour being now no longer safe for carrying in provisions, as the Syracusan vessels were stationed there to prevent it, and nothing could be brought in without fighting; besides the general impression of dismay and discouragement produced upon the army.

叙拉古人在海战中虽未取胜，却占据了普莱米里乌姆的各个要塞，为此他们竖立了三个胜利纪念柱。他们把最后占领的两要塞之一夷为平地，将其余两个收拾好并派驻了守军。在攻取这些要塞的过程中，很多人都被杀或被俘了，大量物资也完全落入了敌手。雅典人原是把这些要塞作为仓库用的，所以里面贮有商人们的大量货物和谷物，还有大量属于舰长们的东西。除了已拖到岸上的那3艘三列桨战舰外，40艘三列桨战舰的桅杆和其他帆具也易手了。实际上，雅典军队垮掉的首要原因就是普莱米里乌姆的失陷；现在则连运给养的船都无法再安全进港了，因为叙拉古的战舰就停泊在那里阻止其驶入，不打就什么都运不进来；此外，这一战事还使军队普遍感到沮丧和失望。

After this, the Syracusans sent out twelve ships under the command of Agatharchus, a Syracusan. One of these went to Peloponnese with ambassadors to describe the hopeful state of their affairs, and to incite the Peloponnesians to prosecute the war there even more actively than they were now doing, while the eleven others sailed to Italy, hearing that vessels laden with stores were on their way to the Athenians. After falling in with and destroying most of the vessels in question, and burning in the Caulonian territory a quantity of timber for shipbuilding, which had been got

ready for the Athenians, the Syracusan squadron went to Locri, and one of the merchantmen from Peloponnese coming in, while they were at anchor there, carrying Thespian heavy infantry, took these on board and sailed alongshore towards home. The Athenians were on the look-out for them with twenty ships at Megara, but were only able to take one vessel with its crew; the rest getting clear off to Syracuse. There was also some skirmishing in the harbour about the piles which the Syracusans had driven in the sea in front of the old docks, to allow their ships to lie at anchor inside, without being hurt by the Athenians sailing up and running them down. The Athenians brought up to them a ship of ten thousand talents burden furnished with wooden turrets and screens, and fastened ropes round the piles from their boats, wrenched them up and broke them, or dived down and sawed them in two. Meanwhile, the Syracusans plied them with missiles from the docks, to which they replied from their large vessel; until at last most of the piles were removed by the Athenians. But the most awkward part of the stockade was the part out of sight;some of the piles which had been driven in did not appear above water, so that it was dangerous to sail up, for fear of running the ships upon them, just as upon a reef, through not seeing them. However divers went down and sawed off even these for reward; although the Syracusans drove in others. Indeed, there was no end to the contrivances to which they resorted against each other, as might be expected between two hostile armies confronting each other at such a short distance;and skirmishes and all kinds of other attempts were of constant occurrence. Meanwhile, the Syracusans sent embassies to the cities, composed of Corinthians, Ambraciots, and Lacedaemonians, to tell them of the capture of Plemmyrium, and that their defeat in the sea-fight was due less to the strength of the enemy than to their own disorder; and generally, to let them know that they were full of hope, and to desire them to come to their help with ships and

troops, as the Athenians were expected with a fresh army, and if the one already there could be destroyed before the other arrived, the war would be at an end.

此战过后，叙拉古人派出12艘战舰，指挥官由叙拉古人阿加萨尔胡斯担任。其中一艘载着使者们去往伯罗奔尼撒，向伯罗奔尼撒人讲述叙拉古的情况多么有希望，以敦促他们比现在更加积极地在那里发动战争；另外11艘驶向了意大利，因为他们得到消息说，给雅典人运送补给品的船只已在途中。遇上那些运输船后，他们将大部分船只摧毁，在卡夫洛尼亚境内将大量准备供雅典人造船用的木材付之一炬。其后，这个叙拉古海军中队开往洛克里。他们停泊在那里时，一艘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商船开到了，船上载着塞斯比阿的重步兵。叙拉古人载上这些重步兵，沿着海岸朝本邦驶去。雅典人率20艘战舰在迈加拉密切监视着他们，但连人带舰仅缴获了一艘，其余舰只逃往叙拉古去了。双方在港内还围绕着木桩问题发生过几次小规模冲突。这些木桩是叙拉古人钉在旧船坞前面的海里的，这样，他们的战舰若停靠在里面，雅典战舰就无法驶过去将其撞沉了。雅典人调来一艘载重1万塔兰特的大船，船上装有木塔和舷壁。他们乘着小船将绳子套在木桩上，猛地将木桩拉起并折断，或者潜入水中把木桩锯为两截。其间，叙拉古人不住地从船坞那里用弹石对他们实施攻击，雅典人也从大船上予以回击，最后他们移除了大部分木桩。但是，最棘手的还是眼睛看不见的那部分围桩。有些木桩钉得没有露出水面，船开过去十分危险。由于看不见，所以唯恐有船撞上去，就像怕撞上暗礁一样。不过，重奖之下，潜水员竟潜下去连这些也锯掉了，尽管叙拉古人后来又钉了一些。事实上，两军一直没有停止过相互算计。敌对双方距离如此之近，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所以，小规模战斗不断发生，各种智斗层出不穷。同时，叙拉古人还派遣由科林斯人、安布拉基亚人和斯巴达人组成的使团前往各个城市，告知这些城市他们夺取了普莱米里乌姆，并说明他们在海战中失利不是由于敌人强大，更多的是由于他们自己秩序混乱。总之，他们想让各城邦知道他们很有希望，并想让各城为他们提供战舰和部队，因为他们预计雅典人会获得新的援

军。如果能在雅典的援军赶到之前把那里原有的军队消灭掉，这场战争就可以结束了。

While the contending parties in Sicily were thus engaged, Demosthenes, having now got together the armament with which he was to go to the island, put out from Aegina, and making sail for Peloponnese, joined Charicles and the thirty ships of the Athenians. Taking on board the heavy infantry from Argos they sailed to Laconia, and, after first plundering part of Epidaurus Limera, landed on the coast of Laconia, opposite Cythera, where the temple of Apollo stands, and, laying waste part of the country, fortified a sort of isthmus, to which the Helots of the Lacedaemonians might desert, and from whence plundering incursions might be made as from Pylos. Demosthenes helped to occupy this place, and then immediately sailed on to Corcyra to take up some of the allies in that island, and so to proceed without delay to Sicily; while Charicles waited until he had completed the fortification of the place and, leaving a garrison there, returned home subsequently with his thirty ships and the Argives also.

敌对双方在西西里的战事就这样持续着。狄摩西尼这时已把他要带往西西里岛的军队集中到了一起。他们从埃伊纳出发驶往伯罗奔尼撒，与哈里克莱斯和他率领的那30艘雅典舰会合。他们载上阿尔戈斯的重步兵驶向拉科尼亚，首先劫掠了埃皮达鲁斯-利迈拉的部分地区，然后在基西拉岛对面的拉科尼亚海岸登陆，那里是阿波罗神庙的所在地。他们践踏了部分乡村地区，在一个形似地峡的地方修筑了防御工事，这样既可为伯罗奔尼撒人手中的希洛人提供一个避难之所，他们自己也可以从那里出发去进行劫掠，如同从皮洛斯出动一样。狄摩西尼帮助占领了这个地方之后，随即继续驶向克基拉，接上那个岛上的一些盟军，尔后毫不耽搁地朝西西里驶去。哈里克莱斯则等到那里的

要塞筑成才走，他留下一支守军，然后率领他麾下30艘舰返回本邦去了。阿尔戈斯人也回去了。

This same summer arrived at Athens thirteen hundred targeteers, Thracian swordsmen of the tribe of the Dii, who were to have sailed to Sicily with Demosthenes. Since they had come too late, the Athenians determined to send them back to Thrace, whence they had come; to keep them for the Decelean war appearing too expensive, as the pay of each man was a drachma a day. Indeed, since Decelea had been first fortified by the whole Peloponnesian army during this summer, and then occupied for the annoyance of the country by the garrisons from the cities relieving each other at stated intervals, it had been doing great mischief to the Athenians; in fact this occupation, by the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and loss of men which resulted from it, was one of the principal causes of their ruin. Previously the invasions were short, and did not prevent their enjoying their land during the rest of the time;the enemy was now permanently fixed in Attica; at one time it was an attack in force, at another it was the regular garrison overrunning the country and making forays for its subsistence, and the Lacedaemonian king, Agis, was in the field and diligently prosecuting the war; great mischief was therefore done to the Athenians. They were deprived of their whole country;more than twenty thousand slaves had deserted, a great part of them artisans, and all their sheep and beasts of burden were lost; and as the cavalry rode out daily upon excursions to Decelea and to guard the country, their horses were either lamed by being constantly worked upon rocky ground, or wounded by the enemy.

同年夏季，1,300名轻盾兵抵达了雅典。他们都是色雷斯地区迪

伊人部落的武士，原本是准备随狄摩西尼一同驶往西西里的，但由于他们来得太迟，雅典人决定把他们送回色雷斯——他们的出发地。如果让他们留下参加德西利亚战争，费用似乎太过高昂，因为他们每人每天的军饷高达1德拉克马。伯罗奔尼撒的军队在夏季动用全部人员在德西利亚构筑了工事，继而为了侵扰这一地区又占领了此地，还让各城的守军定期来此换防。自此之后，德西利亚对雅典人造成的危害实际上一直很大。事实上，这种占领，因其对财产造成的破坏和对人员造成的伤亡，构成了雅典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前的入侵时间都很短，也没有妨碍雅典人在其余时间继续保用自己的土地。现在敌人竟在阿提卡长期盘踞下来，有时大举发动进攻，有时又定期出动守军侵扰这一地区，以突袭的方式掠夺其赖以生存的资源。斯巴达国王亚基斯还亲临战地，不遗余力地从事战争，因而对雅典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他们失去了整个乡村：逃走的奴隶达两万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工匠；所有的羊和驼畜都没了；由于骑兵每天都要到德西利亚去保卫乡村，他们的马匹不是因为长期在多石地面上奔走而变跛，就是被敌军所打伤。

Besides, the transport of provisions from Euboea, which had before been carried on so much more quickly overland by Decelea from Oropus, was now effected at great cost by sea round Sunium; everything the city required had to be imported from abroad, and instead of a city it became a fortress. Summer and winter the Athenians were worn out by having to keep guard on the fortifications, during the day by turns, by night all together, the cavalry excepted, at the different military posts or upon the wall. But what most oppressed them was that they had two wars at once, and had thus reached a pitch of frenzy which no one would have believed possible if he had heard of it before it had come to pass. For could any one have imagined that even when besieged by the Peloponnesians entrenched in Attica, they would still, instead of withdrawing from Sicily, stay on there besieging in like manner

Syracuse, a town (taken as a town) in no way inferior to Athens, or would so thoroughly upset the Hellenic estimate of their strength and audacity, as to give the spectacle of a people which,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some thought might hold out one year, some two, none more than three, if the Peloponnesians invaded their country, now seventeen years after the first invasion, after having already suffered from all the evils of war, going to Sicily and undertaking a new war nothing inferior to that which they already had with the Peloponnesians? These causes, the great losses from Decelea, and the other heavy charges that fell upon them, produced their financial embarrassment; and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they imposed upon their subjects, instead of the tribute, the tax of a twentieth upon all imports and exports by sea, which they thought would bring them in more money; their expenditure being now not the same as at first, but having grown with the war while their revenues decayed.

此外，还有从埃维亚来的给养如何运输这一问题。以前都是取道德西利亚，经陆路从奥罗普斯运过来的，那样速度要快得多；现在却得经海路绕道苏尼乌姆，运费十分高昂。由于雅典城所需的一切都不得不从海外进口，它已不再是一座城市，而是变成一个要塞了。雅典人一年到头都得在防御工事站岗。白天，他们轮流守卫；夜间，除了骑兵，所有的人都得站岗，不是在各个哨所，就是在城墙上，因而已疲惫不堪。但是，最令他们不堪重负的是，他们同时进行着两场战争，从而使他们达到了疯狂的顶点。若非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单凭耳闻，谁都不会相信有此可能。当盘踞在阿提卡的伯罗奔尼撒人对雅典城进行包围之时，他们竟仍未从西西里撤军，反而留在那里以同样方式围攻着叙拉古，一座规模绝不亚于雅典的城市（作为一座城市而言），抑或说，他们要彻底颠覆希腊世界对其实力和胆魄的估计，展现出一个民族的惊人之处。在战争之初，有些人曾认为，如果伯罗奔尼撒人侵入其境内，这个民族或许可以坚持一年，也有些人认为可以

坚持两年，但从来没有人认为会超过三年。可如今，距伯罗奔尼撒人第一次入侵阿提卡已十七年之久，雅典人虽然已饱受各种战争祸患，却还是到西西里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在规模上毫不逊于他们已经在与伯罗奔尼撒人所进行的那场战争。这些谁又料想得到呢？以上这些原因，在德西利亚所蒙受的重大损失，以及由他们负担的其他巨大开支，使得他们在财政上陷入了困境。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对属邦征收贡金，而是对所有经海上进出口的货物均抽取二十分之一的关税。他们认为，这样将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他们的支出现在已不复当初。随着战争的持续，支出逐渐增加，收入则减少了。

Accordingly, not wishing to incur expense in their present want of money, they sent back at once the Thracians who came too late for Demosthenes, under the conduct of Diitrephes, who was instructed, as they were to pass through the Euripus, to make use of them if possible in the voyage alongshore to injure the enemy. Diitrephes first landed them at Tanagra and hastily snatched some booty; he then sailed across the Euripus in the evening from Chalcis in Euboea and disembarking in Boeotia led them against Mycalessus. The night he passed unobserved near the temple of Hermes, not quite two miles from Mycalessus, and at daybreak assaulted and took the town, which is not a large one; the inhabitants being off their guard and not expecting that any one would ever come up so far from the sea to molest them, the wall too being weak, and in some places having tumbled down, while in others it had not been built to any height, and the gates also being left open through their feeling of security. The Thracians bursting into Mycalessus sacked the houses and temples, and butchered the inhabitants, sparing neither youth nor age, but killing all they fell in with, one after the other, children and women, and even beasts of burden, and whatever other living creatures they saw; the Thracian race, like the bloodiest of the barbarians, being even more so when

it has nothing to fear. Everywhere confusion reigned and death in all its shapes; and in particular they attacked a boys' school, the largest that there was in the place, into which the children had just gone, and massacred them all. In short, the disaster falling upon the whole town was unsurpassed in magnitude, and unapproached by any in suddenness and in horror.

因此，在当前资金紧缺的情况下，由于不想增加开支，他们立刻把那些来得过晚而未能随狄摩西尼一起出征的色雷斯人送回去了。负责送他们的人是迪伊特雷费斯。由于他们要途经埃夫里普，迪伊特雷费斯奉命在沿着海岸航行途中尽可能利用他们对敌人造成危害。迪伊特雷费斯首先让他们在塔纳格拉登陆，迅速掠夺了一些物品，继而在傍晚时从埃维亚的哈尔基斯渡过埃夫里普海峡。在维奥蒂亚登陆后，他又率领他们进攻了米卡莱苏斯。他们在赫尔墨斯神庙附近过了夜，没有被人发现。这座神庙距米卡莱苏斯不足两英里。黎明时分，他们发动进攻，拿下了这个不大的城镇。城里的居民未加提防，没有料到会有人到离海这么远的地方来侵扰他们。他们的城墙也不太牢固，有些地方已经倒塌，其他地方又修得不够高，而且他们总以为很安全，所以连城门也没关。色雷斯人冲进米卡莱苏斯城，将房屋和神庙洗劫一空，对居民大肆屠戮，无论老少都不放过。他们接连不断地逢人便杀，连妇女和儿童乃至驼畜和他们看到的其他活物也统统杀掉了。色雷斯族人如同最嗜杀的蛮族人一样，在无所畏惧时会更加残忍。城里到处混乱不堪，死亡的方式各式各样，特别是在他们袭击一所男校时。那是当地最大的一所学校。学生们刚刚走进学校，就被他们全部屠杀了。总之，整座城所遭受的这场灾难，论程度奇惨无比；论意外和恐怖，亦属史无前例。

Meanwhile, the Thebans heard of it and marched to the rescue, and overtaking the Thracians before they had gone far, recovered the plunder and drove them in panic to the Euripus and the sea,

where the vessels which brought them were lying. The greatest slaughter took place while they were embarking, as they did not know how to swim, and those in the vessels on seeing what was going on on shore moored them out of bowshot;in the rest of the retreat the Thracians made a very respectable defence against the Theban horse, by which they were first attacked, dashing out and closing their ranks according to the tactics of their country, and lost only a few men in that part of the affair. A good number who were after plunder were actually caught in the town and put to death. Altogether the Thracians had two hundred and fifty killed out of thirteen hundred, the Thebans and the rest who came to the rescue about twenty, troopers and heavy infantry, with Scirphondas, one of the Boeotarchs. The Mycalessians lost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ir population.

这时候，底比斯人听到消息后赶来了。没等色雷斯人跑出多远，底比斯人就追上他们，夺回他们劫走的财物，赶得他们慌忙逃向埃夫里普和海边，那里停泊着载他们来的船。因为不会游泳，他们登船时伤亡最惨重。船上的人一见岸上发生的情况，赶紧把船停泊到了弓箭射程之外。在其余撤退过程中，色雷斯人对底比斯骑兵的防御可圈可点。底比斯人首先向他们发起进攻，他们则按照自己地区的战术，猛地向外一冲，随即聚拢队伍，因而在那部分战斗中只损失了一小部分人。不少去劫掠的人其实是在城里被擒后杀死的。在1,300名色雷斯人当中，共有250人被杀。赶来救援的底比斯人及其余人中，约有20名骑兵和重步兵丧生，其中包括维奥蒂亚的一位同盟官希尔丰扎斯。米卡莱苏斯损失的人口比例很大。

While Mycalessus thus experienced a calamity for its extent as lamentable as any that happened in the war, Demosthenes, whom we left sailing to Corcyra, after the building of the fort in Laconia,

found a merchantman lying at Phea in Elis, in which the Corinthian heavy infantry were to cross to Sicily. The ship he destroyed, but the men escaped, and subsequently got another in which they pursued their voyage. After this, arriving at Zacynthus and Cephallenia, he took a body of heavy infantry on board, and sending for some of the Messenians from Naupactus, crossed over to the opposite coast of Acarnania, to Alyzia, and to Anactorium which was held by the Athenians. While he was in these parts he was met by Eurymedon returning from Sicily, where he had been sent, as has been mentioned, during the winter, with the money for the army, who told him the news, and also that he had heard, while at sea, that the Syracusans had taken Plemmyrium. Here, also, Conon came to them, the commander at Naupactus, with news that the twenty-five Corinthian ships stationed opposite to him, far from giving over the war, were meditating an engagement; and he therefore begged them to send him some ships, as his own eighteen were not a match for the enemy's twenty-five. Demosthenes and Eurymedon, accordingly, sent ten of their best sailers with Conon to reinforce the squadron at Naupactus, and meanwhile, prepared for the muster of their forces; Eurymedon, who was now the colleague of Demosthenes, and had turned back in consequence of his appointment, sailing to Corcyra to tell them to man fifteen ships and to enlist heavy infantry; while Demosthenes raised slingers and darters from the parts about Acarnania.

前文提到，狄摩西尼在拉科尼亚筑完要塞就驶往克基拉去了。当米卡莱苏斯遭到悲惨程度不亚于这场战争中任何一场灾难的劫难时，狄摩西尼发现有一艘商船停泊在埃利斯的菲阿。科林斯重步兵打算乘这条船渡海前往西西里。狄摩西尼撞毁了这艘商船，但船上的人跑掉了，后来又乘了另一艘船继续他们的航程。这件事之后，狄摩西尼抵达扎金索斯和凯法莱尼亚，接了一批重步兵上船，并派人去纳夫帕克

图斯要求派些麦西尼亚人来，然后渡海前往对面的阿卡那尼亚海岸，后来又去了阿利贾和雅典人占领的阿纳克托里乌姆。在这些地区时，他遇到了从西西里回来的埃夫里迈宗。前文已提及，埃夫里迈宗是冬季被派往那里给军队送钱的。他把叙拉古人已经攻下普莱米里乌姆的消息告诉了狄摩西尼，并说他在海上就听说了。驻守在纳夫帕克图斯的指挥官科农也来这里与他们会了面。他带来消息说，停泊在他们对面的25艘科林斯战舰远未停止战争，而是在企图交战。因此，他请求他们给他一些舰，因为他自己的18艘舰不足以对抗敌人的25艘。于是，狄摩西尼和埃夫里迈宗让科农带走了他们最好的大型帆船中的10艘，以加强纳夫帕克图斯那个海军中队的力量，同时准备把军队集中在一起。埃夫里迈宗已回来赴命，现在是狄摩西尼的副将。他要驶往克基拉，要求克基拉人配齐15艘舰上的人员并征募重步兵；狄摩西尼则在阿卡那尼亚周围地区征召投石手和标枪手。

Meanwhile, the envoys, already mentioned, who had gone from Syracuse to the cities after the capture of Plemmyrium, had succeeded in their mission, and were about to bring the army that they had collected, when Nicias got scent of it, and sent to the Centoripae and Alicyaeans and other of the friendly Sicels, who held the passes, not to let the enemy through, but to combine to prevent their passing, there being no other way by which they could even attempt it, as the Agrigentines would not give them a passage through their country. Agreeably to this request the Sicels laid a triple ambuscade for the Siceliots upon their march, and attacking them suddenly, while off their guard, killed about eight hundred of them and all the envoys, the Corinthian only excepted, by whom fifteen hundred who escaped were conducted to Syracuse.

与此同时，前文已提到的使者们，即攻取普莱米里乌姆后从叙拉古派往各城者，已成功地完成使命，正要将他们所募集的军队带回

来。可是，尼西亚斯却听到了风声。他派人到把守着各个关口的肯托里帕人、阿利西埃人和其他友好的西库尔人那里去，请他们不要让敌人通过，而是要联合起来阻止其通行。由于阿格里延图姆人不会让他们从自己境内通过，他们舍此别无他路可寻。西库尔人接受了这一要求，在西凯利奥特人的行军途中设下了三重埋伏，在他们毫无防备时突然发起进攻，杀掉了大约800人。所有的使者都被杀死了，仅有科林斯的幸免，逃掉的1,500人在其率领下去了叙拉古。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Camarinaeans also came to the assistance of Syracuse with five hundred heavy infantry, three hundred darters, and as many archers, while the Geloans sent crews for five ships, four hundred darters, and two hundred horse. Indeed, almost the whole of Sicily, except the Agrigentines, who were neutral, now ceased merely to watch events as it had hitherto done, and actively joined Syracuse against the Athenians.

大约在同时，卡马里纳人也率500名重步兵、300名标枪手和300名弓箭手来支援叙拉古，杰拉人派来了可配备5艘战舰的人员、400名标枪手和200名骑兵。实际上，除了保持中立的阿格里延图姆人之外，几乎整个西西里这时都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观望事态的发展，而是在积极地与叙拉古一起抵抗雅典人。

While the Syracusans after the Sicel disaster put off any immediate attack upon the Athenians, Demosthenes and Eurymedon, whose forces from Corcyra and the continent were now ready, crossed the Ionian Gulf with all their armament to the Iapygian promontory, and starting from thence touched at the Choerades Isles lying off Iapygia, where they took on board a hundred and fifty Iapygian darters of the Messapian tribe, and after

renewing an old friendship with Artas the chief, who had furnished them with the darters, arrived at Metapontium in Italy. Here they persuaded their allies the Metapontines to send with them three hundred darters and two galleys, and with this reinforcement coasted on to Thurii, where they found the party hostile to Athens recently expelled by a revolution, and accordingly remained there to muster and review the whole army, to see if any had been left behind, and to prevail upon the Thurians resolutely to join them in their expedition, and in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y found themselves to conclude a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alliance with the Athenians.

在西库尔遭到惨败之后，叙拉古人放弃了立即进攻雅典人的意图。狄摩西尼和埃夫里迈宗从克基拉和大陆招来的部队则已整装待发。于是，他们就带着所有部队渡过爱奥尼亚湾，来到亚皮伊亚海角，从那里出发后在亚皮伊亚附近的希拉泽群岛作了短暂停靠，在那里把迈萨皮亚部落的150名亚皮伊亚标枪手接上舰。在与曾向其提供过标枪手的部落酋长阿尔塔斯重续旧好之后，他们抵达了意大利的迈塔蓬图姆。在这里，他们说服其盟友迈塔蓬图姆人派了300名标枪手和2艘三列桨战舰给他们。他们带着这批援军继续沿着海岸驶至图里，发现那里反雅典的政党已在最近一次暴动中被驱逐。于是，他们就留在那里，将整个军队集合起来进行了检阅，看看是否有人掉队，同时也想说服图里人坚定地参加他们的远征，并在目前他们所处的情况下与雅典人订立攻守同盟。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Peloponnesians in the twenty-five ships stationed opposite to the squadron at Naupactus to protect the passage of the transports to Sicily had got ready for engaging, and manning some additional vessels, so as to be numerically little inferior to the Athenians, anchored off Erineus in Achaia in the

Rhypic country. The place off which they lay being in the form of a crescent, the land forces furnished by the Corinthians and their allies on the spot came up and ranged themselves upon the projecting headlands on either side, while the fleet, under the command of Polyanthes, a Corinthian, held the intervening space and blocked up the entrance. The Athenians under Diphilus now sailed out against them with thirty-three ships from Naupactus, and the Corinthians, at first not moving, at length thought they saw their opportunity, raised the signal, and advanced and engaged the Athenians. After an obstinate struggle, the Corinthians lost three ships, and without sinking any altogether, disabled seven of the enemy, which were struck prow to prow and had their foreships stove in by the Corinthian vessels, whose cheeks had been strengthened for this very purpose. After an action of this even character, in which either party could claim the victory (although the Athenians became masters of the wrecks through the wind driving them out to sea, the Corinthians not putting out again to meet them), the two combatants parted. No pursuit took place, and no prisoners were made on either side; the Corinthians and Peloponnesians who were fighting near the shore escaping with ease, and none of the Athenian vessels having been sunk. The Athenians now sailed back to Naupactus, and the Corinthians immediately set up a trophy as victors, because they had disabled a greater number of the enemy's ships. Moreover they held that they had not been worsted, for the very same reason that their opponent held that he had not been victorious; the Corinthians considering that they were conquerors, if not decidedly conquered, and the Athenians thinking themselves vanquished, because not decidedly victorious. However, when the Peloponnesians sailed off and their land forces had dispersed, the Athenians also set up a trophy as victors in Achaia, about two miles and a quarter from Erineus, the Corinthian station.

大约在同时，为了保护通往西西里的运输通道，停泊在驻纳夫帕克图斯海军中队对面那25艘舰上的伯罗奔尼撒人已经为交战做好了准备。他们另配备了一些舰，以使他们的战舰在数量上与雅典人的相差无几。然后，他们把舰停泊在里皮克地区亚加亚的埃里内夫斯附近。他们停泊的那个地方状如新月，科林斯人提供的陆军部队和当地盟友都赶过来，在河道两侧突出的海角上列成阵列，舰队则在科林斯人波利安塞斯的指挥下控制了介于中间的海域并封锁了入口。在迪菲卢斯的指挥下，雅典人立即带着33艘舰从纳夫帕克图斯驶出，向他们发起了进攻。科林斯人起初没动，后来终于觉得看到了战机，于是便发出信号，驶上前去与雅典人交战。经过顽强拼战，科林斯人损失了3艘舰。他们虽未完全撞沉任何一艘雅典舰，却使7艘失去了战斗力。科林斯战舰向这些舰迎头撞去，将这些舰的舰首撞坏了，因为科林斯舰的锚桔特地为撞击进行过加固。这是一次势均力敌的海战，双方都可以说获得了胜利（尽管那些被风吹向海里的破船落到了雅典人手中，而科林斯人没有再出来与他们交战），打完之后两方就脱离了战斗。双方都没有展开追击，也没有人员被俘。在海岸附近作战的科林斯人和伯罗奔尼撒人没费力就逃走了，雅典方面也没有战舰被撞沉。雅典人驶回了纳夫帕克图斯，科林斯人立即以胜利者的身份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因为他们使更多的敌舰丧失了战斗力。此外，他们认为他们也没有一败涂地。基于同样原因，他们的对手认为自己也没有取得胜利。在科林斯人看来，只要没被彻底击败，就可以算是胜利；雅典人却认为，只要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自己就算败了。然而，当伯罗奔尼撒人驶离而去，他们的陆军也散去之后，雅典人也以胜利者的身份在亚加亚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地点距科林斯人的驻地埃里内夫斯约2.25英里。

This was the termination of the action at Naupactus. To return to Demosthenes and Eurymedon: the Thurians having now got ready to join in the expedition with seven hundred heavy infantry and three hundred darters, the two generals ordered the ships to

sail along the coast to the Crotonian territory, and meanwhile, held a review of all the land forces upon the river Sybaris, and then led them through the Thurian country. Arrived at the river Hylias, they here received a message from the Crotonians, saying that they would not allow the army to pass through their country; upon which the Athenians descended towards the shore, and bivouacked near the sea and the mouth of the Hylias, where the fleet also met them, and the next day embarked and sailed along the coast touching at all the cities except Locri, until they came to Petra in the Rhegian territory.

纳夫帕克图斯的海战就此结束了。我们再来看狄摩西尼和埃夫里迈宗。图里人此时已准备派遣700名重步兵和300名标枪手参加这次远征。这两位将军命令战舰沿着海岸航行至克罗托尼亚境内，同时在锡巴里斯河畔检阅了全部陆军部队，然后率领这些部队从图里境内穿过。抵达希利亚斯河后，克罗托尼亚人送信来说，他们不允许这支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土。于是，他们走向海岸，在希利亚斯河口近海处宿了营。他们的舰队也到那里与他们会合一处。次日，他们又上舰继续沿着海岸航行。除了洛克里之外，他们每到一座城市均作短暂停留，直至抵达雷伊乌姆境内的佩特拉。

Meanwhile, the Syracusans hearing of their approach resolved to make a second attempt with their fleet and their other forces on shore, which they had been collecting for this very purpose in order to do something before their arrival. In addition to other improvements suggested by the former sea-fight which they now adopted in the equipment of their navy, they cut down their prows to a smaller compass to make them more solid and made their cheeks stouter, and from these let stays into the vessels' sides for a length of six cubits within and without, in the same way as the

Corinthians had altered their prows before engaging the squadron at Naupactus. The Syracusans thought that they would thus have an advantage over the Athenian vessels, which were not constructed with equal strength, but were slight in the bows, from their being more used to sail round and charge the enemy's side than to meet him prow to prow, and that the battle being in the great harbour, with a great many ships in not much room, was also a fact in their favour. Charging prow to prow, they would stave in the enemy's bows, by striking with solid and stout beaks against hollow and weak ones; and secondly, the Athenians for want of room would be unable to use their favourite manoeuvre of breaking the line or of sailing round, as the Syracusans would do their best not to let them do the one, and want of room would prevent their doing the other. This charging prow to prow, which had hitherto been thought want of skill in a helmsman, would be the Syracusans' chief manoeuvre, as being that which they should find most useful, since the Athenians, if repulsed, would not be able to back water in any direction except towards the shore, and that only for a little way, and in the little space in front of their own camp. The rest of the harbour would be commanded by the Syracusans; and the Athenians, if hard pressed, by crowding together in a small space and all to the same point, would run foul of one another and fall into disorder, which was, in fact, the thing that did the Athenians most harm in all the sea-fights, they not having, like the Syracusans, the whole harbour to retreat over. As to their sailing round into the open sea, this would be impossible, with the Syracusans in possession of the way out and in, especially as Plemmyrium would be hostile to them, and the mouth of the harbour was not large.

与此同时，叙拉古人听说他们即将到来之后，决定率领他们的舰队和岸上的其他部队再次向雅典人发起进攻。他们一直在为此集结部

队，目的就是想在雅典的援军到达前有所行动。除了根据上次海战的经验对海军装备已进行的其他改进之外，他们还将舰首改短了一些，使之更为坚固。另外，他们还加固了锚桔，并从那里将支撑梁木伸至船侧，内外各长六肘尺。在与纳夫帕克图斯的那个海军中队交战前，科林斯人即这样改装过舰首。叙拉古人认为，这样可使他们的战舰比雅典人的更具优势。雅典人比较习惯采用绕过去冲向敌舰侧面的战术，而不是用舰首对撞，所以他们的舰建造得前后强度不均衡，舰首要轻一些。再者，这次战斗将在大港进行，里面舰多空间小，这也是对他们有利的一点。采用以舰首撞舰首的办法，他们可以用坚固而结实的冲撞角去撞击敌舰空而不坚的冲撞角，从而撞穿敌人的舰首；其次，由于空间狭小，雅典人将无法采用他们特别爱用的破敌防线或迂回行驶战术。使用前者，叙拉古人必尽全力阻止；使用后者，则将因水面狭小而受阻。这种以舰首撞击舰首的战术，过去一直被认为是舵手技术欠缺的表现，而今将成为叙拉古人的主要战术，因为这种办法对他们最有利。其原因是，如果雅典人被击退，他们将别无他路，只能朝海岸方向倒划，而且能够倒划的距离很短，还只能在他们自己营地前狭小的水域内进行。港内其余部分将被叙拉古人所控制。雅典人若遭到紧逼，势必将在狭小的区域内挤在一起，而且大家都朝一个点挤，互相撞击，陷入混乱。事实上，这正是使雅典人在所有海战中最深受其害的一点。他们与叙拉古人不同，不能向港内的所有水面退却。至于绕道驶入公海，那也不大可能，因为叙拉古人控制着进出港口的通道，尤其是因为普莱米里乌姆也对他们持敌视态度，而且港口本身就不大。

With these contrivances to suit their skill and ability, and now more confident after the previous sea-fight, the Syracusans attacked by land and sea at once. The town force Gylippus led out a little the first and brought them up to the wall of the Athenians, where it looked towards the city, while the force from the Olympieum, that is to say, the heavy infantry that were there with the horse and the light troops of the Syracusans, advanced against the wall from the

opposite side; the ships of the Syracusans and allies sailing out immediately afterwards. The Athenians at first fancied that they were to be attacked by land only, and it was not without alarm that they saw the fleet suddenly approaching as well; and while some were forming upon the walls and in front of them against the advancing enemy, and some marching out in haste against the numbers of horse and darters coming from the Olympieum and from outside, others manned the ships or rushed down to the beach to oppose the enemy, and when the ships were manned put out with seventy-five sail against about eighty of the Syracusans.

有了这些适合自己技术和能力的战术，加之经历了上次海战后此时已更有信心，叙拉古人从海上和陆上同时向雅典人发动了进攻。吉利普斯先将城里的部队带出去一小段距离，然后带至雅典人所筑围墙之前，这部分围墙正对着叙拉古城。来自奥林匹埃夫姆的军队，即与叙拉古人的骑兵和轻步兵同在那里的重步兵，则从对面攻向雅典人的围墙。叙拉古人及其盟军的战舰随后也立即出动了。雅典人起初还以为敌人只准备从陆地上进攻他们，及至突然见到敌人的舰队也在逼近，他们才不无惊慌起来。有些人在围墙上和围墙前列成阵迎击迫近的敌人，有些人急忙跑出来抵挡来自奥林匹埃夫姆和城外的众多骑兵和标枪手，其他人则登上战舰或冲向海滩去迎击敌人。舰上人员到齐后，75艘舰随即启航去对抗叙拉古人的大约80艘舰。

After spending a great part of the day in advancing and retreating and skirmishing with each other, without either being able to gain any advantage worth speaking of, except that the Syracusans sank one or two of the Athenian vessels, they parted, the land force at the same time retiring from the lines. The next day, the Syracusans remained quiet, and gave no signs of what they were going to do; but Nicias, seeing that the battle had been a drawn

one, and expecting that they would attack again, compelled the captains to refit any of the ships that had suffered, and moored merchant vessels before the stockade which they had driven into the sea in front of their ships, to serve instead of an enclosed harbour, at about two hundred feet from each other, in order that any ship that was hard pressed might be able to retreat in safety and sail out again at leisure. These preparations occupied the Athenians all day until nightfall.

当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双方互有进退，只发生了一些小规模战斗。除了叙拉古人撞沉了一、两艘雅典舰以外，双方均未能获得值得一提的战果，后来各自脱离了接触，陆军部队同时也撤离了前线。次日，叙拉古人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做出将要有何行动的表示。但是，由于此战未分出胜负，尼西亚斯预料敌人会再次发动进攻，所以便强令各舰长对已经破损的所有舰只加以整修，并把商船停泊在木栅前。这排木栅钉在他们战舰前面的海中，用以围作一个港口。商船之间彼此相距约为200英尺。这样，任何一艘受到紧逼的战舰都可以安全退入，又可以重新从容驶出。雅典人用了一整天进行这些准备，直到日暮。

The next day, the Syracusans began operations at an earlier hour, but with the same plan of attack by land and sea. A great part of the day the rivals spent as before, confronting and skirmishing with each other; until at last Ariston, son of Pyrrhicus, a Corinthian, the ablest helmsman in the Syracusan service, persuaded their naval commanders to send to the officials in the city, and tell them to move the sale market as quickly as they could down to the sea, and oblige every one to bring whatever eatables he had and sell them there, thus enabling the commanders to land the crews and dine at once close to the ships, and shortly afterwards, the selfsame day, to

attack the Athenians again when they were not expecting it.

次日，叙拉古人开始行动了，时间比上次早，但还是采用上次海陆同时进攻的策略。当天大部分时间，双方还是和以前一样相互对峙，只有一些小规模战斗。后来，皮尔希库斯之子阿里斯通，一名科林斯人，同时也是在叙拉古军中效力的最能干的舵手，说服他们的海军指挥官派人去城里的官员那里，要求他们尽快把市场移到海边来，并强制各商贩把手头的所有食物都拿到海边来出售。这样，指挥官让舰员们上陆后，他们立刻就可以在离舰不远处就餐。稍后不久，他们不出当天就可以再次向雅典人发动攻击，打雅典人一个出其不意。

In compliance with this advice a messenger was sent and the market got ready, upon which the Syracusans suddenly backed water and withdrew to the town, and at once landed and took their dinner upon the spot; while the Athenians, supposing that they had returned to the town because they felt they were beaten, disembarked at their leisure and set about getting their dinners and about their other occupations, under the idea that they done with fighting for that day. Suddenly the Syracusans had manned their ships and again sailed against them; and the Athenians, in great confusion and most of them fasting, got on board, and with great difficulty put out to meet them. For some time both parties remained on the defensive without engaging, until the Athenians at last resolved not to let themselves be worn out by waiting where they were, but to attack without delay, and giving a cheer, went into action. The Syracusans received them, and charging prow to prow as they had intended, stove in a great part of the Athenian foreships by the strength of their beaks; the darters on the decks also did great damage to the Athenians, but still greater damage was done by the Syracusans who went about in small boats, ran in

upon the oars of the Athenian galleys, and sailed against their sides, and discharged from thence their darts upon the sailors.

指挥官采纳了这一建议，派了一名信使进城，将市场准备好了。叙拉古人随即突然开始倒划，朝城市那边退去，上岸后立即就地用餐。雅典人还以为叙拉古人自感战败，所以撤回城里去了。于是，他们从容下舰，开始准备膳食并进行其他活动，因为他们认为当天的战事已告结束。然而，叙拉古人却突然上舰，再次驶来向他们发起了进攻。雅典人秩序大乱，多数人空着肚子就上了舰，费了很大劲才把舰开出来迎战。开始一段时间，双方都保持守势，没有交战。后来，雅典人为了不使自己因久在那里等待而疲惫，决定发起进攻，不再拖延。他们呼喊一声，投入了战斗。叙拉古人当即迎敌，按计划采用舰首对撞的方式冲上前去，用对撞角的力量撞穿了大部分雅典舰的前端，甲板上的标枪手也给雅典人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给雅典人造成更大损失的是乘小船四处划行的叙拉古人。他们插入到雅典战舰的桨座之下，紧倚舰侧而行，从那里用标枪刺杀雅典的水手。

At last, fighting hard in this fashion, the Syracusans gained the victory, and the Athenians turned and fled between the merchantmen to their own station. The Syracusan ships pursued them as far as the merchantmen, where they were stopped by the beams armed with dolphins suspended from those vessels over the passage. Two of the Syracusan vessels went too near in the excitement of victory and were destroyed, one of them being taken with its crew. After sinking seven of the Athenian vessels and disabling many, and taking most of the men prisoners and killing others, the Syracusans retired and set up trophies for both the engagements, being now confident of having a decided superiority by sea, and by no means despairing of equal success by land.

叙拉古人以这种方式奋力作战，终于赢得了胜利。雅典人调头从商船之间败逃向自己的停泊地。叙拉古的战舰穷追不舍，一直追到商船前。那些船上置有悬着大铁块的横杆，横杆伸出于两船之间的航道上，这才挡住他们的去路。有两艘叙拉古舰在胜利的喜悦中过于迫近横木，致使战舰被毁，其中一艘连人带舰一起被获。叙拉古人击沉了7艘雅典舰，并使多艘丧失了战斗能力。舰上人员大多被俘，余者被杀。其后，叙拉古人撤兵罢战，为这两次海战竖立了胜利纪念柱。这时，他们深信自己在海上已具有决定性优势，对于在陆战中同样取胜也成竹在胸。

CHAPTER XXII Nineteenth Year of the War—Arrival of Demosthenes—Defeat of the Athenians at Epipolae—Folly and Obstinancy of Nicias

第二十二章　战争第十九年——狄摩西尼的到来——雅典人在埃皮波莱的失败——尼西亚斯的荒唐与固执

In the meantime, while the Syracusans were preparing for a second attack upon both elements, Demosthenes and Eurymedon arrived with the succours from Athens, consisting of about seventy-three ships, including the foreigners; nearly five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Athenian and allied; a large number of darters, Hellenic and barbarian, and slingers and archers and everything else upon a corresponding scale.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were for the moment not a little dismayed at the idea that there was to be no term or ending to their dangers, seeing, in spite of the fortification of Decelea, a new army arrive nearly equal to the former, and the power of Athens proving so great in every quart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rst Athenian armament regained a certain confidence in the midst of its misfortunes. Demosthenes, seeing how matters stood, felt that he could not drag on and fare as Nicias had done,

who by wintering in Catana instead of at once attacking Syracuse had allowed the terror of his first arrival to evaporate in contempt, and had given time to Gylippus to arrive with a force from Peloponnese, which the Syracusans would never have sent for if he had attacked immediately; for they fancied that they were a match for him by themselves, and would not have discovered their inferiority until they were already invested, and even if they then sent for succours, they would no longer have been equally able to profit by their arrival. Recollecting this, and well aware that it was now on the first day after his arrival that he like Nicias was most formidable to the enemy, Demosthenes determined to lose no time in drawing the utmost profit from the consternation at the moment inspired by his army; and seeing that the counterwall of the Syracusans, which hindered the Athenians from investing them, was a single one, and that he who should become master of the way up to Epipolae, and afterwards of the camp there, would find no difficulty in taking it, as no one would even wait for his attack, made all haste to attempt the enterprise. This he took to be the shortest way of ending the war, as he would either succeed and take Syracuse, or would lead back the armament instead of frittering away the lives of the Athenians engaged in the expedition and the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at large.

正当叙拉古人准备依仗这两方面的优势再次发动进攻时，狄摩西尼和埃夫里埃卢斯带着从雅典来的援军到了。援军中有包括外邦舰只在内的战舰大约73艘，来自雅典及其盟邦的近5,000名重步兵，大量希腊和蛮族标枪手、投石手、弓箭手以及其他各种相应数量的装备。叙拉古人及其盟友这时大为惊恐。他们看到，德西利亚虽然构筑了防御工事，但雅典却又派来一支规模几乎同上次一样大的军队，可见雅典各方面实力都很雄厚，因而觉得自己的危险将永无终期。另一方面，遭到挫败的第一支雅典军队却重拾了一些信心。看到这种情况，

狄摩西尼感到他不能再拖了，否则就会重蹈尼西亚斯的覆辙。当初尼西亚斯就是因为在卡塔纳过冬而没有立即进攻叙拉古，致使敌人心生蔑意，他初到时的可怕荡然无存，也给吉利普斯从伯罗奔尼撒带来援军留出了时间。如果他立时发动攻击，叙拉古人决不会派人去请援军，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就能与他相匹敌，直到已被封锁才会发现自己处于劣势。纵然他们那时派人去求援，援军的到来也无法再对他们同样有所帮助了。想到这一点，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现在就是头天乍到之时，他与尼西亚斯当初一样，正是最让敌人畏惧之际。因此，他决定不失时机地尽量利用敌人眼下对其军队的恐惧，以谋取最大利益。看到叙拉古人用以阻碍雅典人包围他们的那道对立的墙是单墙，同时又看到，谁能控制住登上埃皮波莱之路，进而控制住那里的军营，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取这道墙，他亟图一试，因为那里连等着阻碍他进攻的人都没有。他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的最快办法，因为他胜则可以占领叙拉古，败则可以率军而归，而不是让参加远征的这些雅典人的生命和整个城邦的资源徒遭耗费。

First, therefore the Athenians went out and laid waste the lands of the Syracusans about the Anapus and carried all before them as at first by land and by sea, the Syracusans not offering to oppose them upon either element, unless it were with their cavalry and darters from the Olympieum. Next Demosthenes resolved to attempt the counterwall first by means of engines. As however the engines that he brought up were burnt by the enemy fighting from the wall, and the rest of the forces repulsed after attacking at many different points, he determined to delay no longer, and having obtained the consent of Nicias and his fellow commanders, proceeded to put in execution his plan of attacking Epipolae. As by day it seemed impossible to approach and get up without being observed, he ordered provisions for five days, took all the masons and carpenters, and other things, such as arrows, and everything else that they could want for the work of fortification if successful, and, after the

first watch, set out with Eurymedon and Menander and the whole army for Epipolae, Nicias being left behind in the lines. Having come up by the hill of Euryelus (where the former army had ascended at first) unobserved by the enemy's guards, they went up to the fort which the Syracusans had there, and took it, and put to the sword part of the garrison. The greater number, however, escaped at once and gave the alarm to the camps, of which there were three upon Epipolae, defended by outworks, one of the Syracusans, one of the other Siceliots, and one of the allies; and also to the six hundred Syracusans forming the original garrison for this part of Epipolae. These at once advanced against the assailants and, falling in with Demosthenes and the Athenians, were routed by them after a sharp resistance, the victors immediately pushing on, eager to achieve the objects of the attack without giving time for their ardour to cool; meanwhile, other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ere taking the counterwall of the Syracusans, which was abandoned by its garrison, and pulling down the battlements. The Syracusans and the allies, and Gylippus with the troops under his command, advanced to the rescue from the outworks, but engaged in some consternation (a night attack being a piece of audacity which they had never expected), and were at first compelled to retreat. But while the Athenians, flushed with their victory, now advanced with less order, wishing to make their way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rough the whole force of the enemy not yet engaged, without relaxing their attack or giving them time to rally, the Boeotians made the first stand against them, attacked them, routed them, and put them to flight.

因此，雅典人首先出去践踏了叙拉古人在阿纳普斯河周围的土地，并像起初那样在海上和陆上无往而不利，因为除了奥林匹埃夫姆的骑兵和标枪手外，叙拉古人在海上和陆上都没有出来应战。接着，

狄摩西尼决定先用攻城器械进攻那道对立的城墙。可是，他拖上去的攻城器械却被把守城墙的敌军烧毁了，其他军队在多个不同地点的进攻也一一被打退了。他决定不再耽搁，在征得了尼西亚斯和其他同僚的同意之后，他开始实施进攻埃皮波莱的计划。在白天，要想接近和登上埃皮波莱而不被发现，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下令准备好五天的口粮，带上所有的泥瓦匠、木匠、测量标杆之类的物品以及其他获胜后构筑防御工事所需的东西，在头更后与埃夫里迈宗和米南德率领全部军队向埃皮波莱进发，尼西亚斯则留下坚守防线。他们未被敌哨兵发觉即从埃夫里埃卢斯小山（第一支军队原先上去的旧路）摸上去，冲向了叙拉古人在那里的要塞，随即将要塞攻陷，杀死了部分守军。然而，大部分守军立即逃走，并向兵营报了警。埃皮波莱共有三座兵营，全都有简易外围工事防护，一座是叙拉古人的，一座是其他西凯利奥特人的，另外一座是盟军的。他们还将这一情况通知了原本守卫埃皮波莱这一部分的600名叙拉古人。这些人立即前去迎战袭击者。与狄摩西尼和雅典人的军队遭遇后，他们虽抵御甚力，但还是被对方击溃了。胜利者随即向前推进，急切希望能够趁热打铁，一举达成进攻目标。与此同时，其他人一开始就去夺叙拉古人所筑的对立墙。守军将墙放弃后，他们将城垛毁掉了。叙拉古人和其盟军以及吉利普斯和他麾下的军队都从外围工事赶来救援，但夜战毕竟是他们意料之外的一种大胆之举，交战时不免有些惊恐，因而起初曾被迫后退。但是，满怀胜利喜悦的雅典人此时虽在前进，队伍已有些凌乱。他们只想尽快突破所有尚未接战的敌军，自己又不减进攻之势，也不给敌军留有重整旗鼓的时间。维奥蒂亚人率先奋起抵御，向他们发起进攻并击溃了他们，打得他们夺命而去。

The Athenians now fell into great disorder and perplexity, so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get from one side or the other any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affair. By day certainly the combatants have a clearer notion, though even then by no means of all that takes place, no one knowing much of anything that does not go on in his own immediate neighbourhood; but in a night engagement (and this was

the only one that occurred between great armies during the war) how could any one know anything for certain? Although there was a bright moon they saw each other only as men do by moonlight, that is to say, they could distinguish the form of the body, but could not tell for certain whether it was a friend or an enemy. Both had great numbers of heavy infantry moving about in a small space. Some of the Athenians were already defeated, while others were coming up yet unconquered for their first attack. A large part also of the rest of their forces either had only just got up, or were still ascending, so that they did not know which way to march. Owing to the rout that had taken place all in front was now in confusion, and the noise made it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anything. The victorious Syracusans and allies were cheering each other on with loud cries, by night the only possibl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meanwhile, receiving all who came against them; while the Athenians were seeking for one another, taking all in front of them for enemies, even although they might be some of their now flying friends; and by constantly asking for the watchword, which was their only means of recognition, not only caused great confusion among themselves by asking all at once, but also made it known to the enemy, whose own they did not so readily discover, as the Syracusans were victorious and not scattered, and thus less easily mistaken. The result was that if the Athenians fell in with a party of the enemy that was weaker than they, it escaped them through knowing their watchword; while if they themselves failed to answer they were put to the sword. But what hurt them as much, or indeed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as the singing of the paean, from the perplexity which it caused by being nearly the same on either side; the Argives and Corcyraeans and any other Dorian peoples in the army, struck terror into the Athenians whenever they raised their paean, no less than did the enemy. Thus, after being once thrown into disorder, they ended by coming into collision with each other

in many parts of the field, friends with friends, and citizens with citizens, and not only terrified one another, but even came to blows and could only be parted with difficulty. In the pursuit many perished by throwing themselves down the cliffs, the way down from Epipolae being narrow; and of those who got down safely into the plain, although many, especially those who belonged to the first armament, escaped through their better acquaintance with the locality, some of the newcomers lost their way and wandered over the country, and were cut off in the morning by the Syracusan cavalry and killed.

雅典人此时已陷入极大的混乱和茫然之中，因而很难从交战的一方或另一方获知战事的详情。天亮时，参战人员肯定对事情比较清楚。但即便是那时，除了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之外，大家对整个战局也知之甚少。可是，在夜战中（这是这场战争中两支大军之间唯一的一次夜战），谁又能确切知晓一切呢？尽管明月当空，他们也只能达到在月光下彼此看见的程度，也就是说，他们只能辨别出人的轮廓，却无法确切分清是敌是友。双方都有大量重步兵在一块狭小的空间内移动。有些雅典人已经战败，其他的尚未被击退第一次进攻，所以还在不断地往上冲。其余部队还有一大部分不是刚刚上来，就是仍在往上冲，所以不知该朝哪里前进。由于溃败已经发生，前线的一切这时全都乱了套，嘈杂的声音更使得一切难辨。获胜的叙拉古人及其盟军在高声呐喊，互相鼓励，这是夜间唯一可能的交流方式。同时，他们对所有迎上前来的人照打不误。雅典人则在互相寻找，将所有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人都当成敌人，尽管有些可能是他们正在败退的战友。他们不停地询问对方口令，这也是他们辨别彼此的唯一方式，但这种大家同时询问的方式不仅在他们自己人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而且也将口令泄露给了敌人，而敌人的口令却不那么容易被他们发现。叙拉古人打了胜仗，队伍没有被冲散，因而比较容易辨认。其结果是，如果雅典人遇到一队比他们弱的敌军，这队敌军会因为知道他们的口令而得以逃脱；而他们自己若不能应声作答，却会死于剑下。但

是，同样使他们深受其害，甚或受害最深的是唱凯歌。因为双方的歌几乎相同，所以令人十分困惑。每当阿尔戈斯人、克基拉人以及军中其他多里安人唱起凯歌，雅典人都会心惊胆战，就像听到敌军在唱一样。这样，一旦陷入混乱，结果就是战场上多处发生相互冲突，友军相抗，同胞对峙，而且不仅彼此受惊，甚至相搏起来，要把他们分开都不容易。在追击过程中，由于从埃皮波莱下来的道路很窄，很多人坠崖而亡。安全下到平原上的人虽然也不少，特别是属于头一支军队的人，他们因比较熟悉地形而得以逃脱，但新来的一些人则迷了路，在乡间东奔西突，天亮时都被叙拉古的骑兵截住并杀死了。

The next day, the Syracusans set up two trophies, one upon Epipolae where the ascent had been made, and the other on the spot where the first check was given by the Boeotians; and the Athenians took back their dead under truce. A great many of the Athenians and allies were killed, although still more arms were taken than could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number of the dead, as some of those who were obliged to leap down from the cliffs without their shields escaped with their lives and did not perish like the rest.

第二天，叙拉古人竖立了两个胜利纪念柱，一个在他们登上埃皮波莱之处，另一个在维奥蒂亚人率先挫败了雅典人之处。雅典人在休战期间收回了他们死者的尸体。雅典人及其盟军的阵亡者为数众多，被夺去的武器更是超出了死者的比例之外。一些被迫跳崖的人虽然扔掉了盾牌，却逃了活命，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丧生。

After this, the Syracusans, recovering their old confidence at such an unexpected stroke of good fortune, dispatched Sicanus with fifteen ships to Agrigentum where there was a revolution, to induce

if possible the city to join them; while Gylippus again went by land into the rest of Sicily to bring up reinforcements, being now in hope of taking the Athenian lines by storm, after the result of the affair on Epipolae.

此战之后，叙拉古人由于获得如此意外好运而重拾了信心。他们派遣西卡努斯率领15艘舰前往发生革命的阿格里延图姆，如果可能，他们想把这座城争取到他们一方。吉利普斯则又经陆路进入西西里其他地区去调集援军。有了埃皮波莱之战这一结果，他此时希望能通过强攻突破雅典人的防线。

In the meantime, the Athenian generals consulted upon the disaster which had happened, and upon the general weakness of the army. They saw themselves unsuccessful in their enterprises, and the soldiers disgusted with their stay; disease being rife among them owing to its being the sickly season of the year, and to the marshy and unhealthy nature of the spot in which they were encamped; and the state of their affairs generally being thought desperate. Accordingly, Demosthenes was of opinion that they ought not to stay any longer; but agreeably to his original idea in risking the attempt upon Epipolae, now that this had failed, he gave his vote for going away without further loss of time, while the sea might yet be crossed, and their late reinforcement might give them the superiority at all events on that element. He also said that it would be more profitable for the state to carry on the war against those who were building fortifications in Attica, than against the Syracusans whom it was no longer easy to subdue; besides which it was not right to squander large sums of money to no purpose by going on with the siege.

与此同时，雅典的将领就已经遭到的惨败和全军普遍存在的弱点进行了商议。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冒险未获成功，也知道士兵们不愿再待下去了，而且军中疾病流行，因为此时恰逢一年中最易患病的季节，他们扎营的地方又是对健康有害的沼泽地。总之，他们的情况整个看来已经无望。因此，狄摩西尼认为他们不该再留。既然他们已经按照他最初的构想在埃皮波莱冒险试过，而且已经失败，趁着还可以渡海而去，以及最近到的援军在那方面总算还可以使他们居于优势，他主张不再耽搁，立刻撤离。他还说，与其继续与已经不易被征服的叙拉古人作战，不如去进攻在阿提卡修筑工事的敌人，这样对城邦更有利。此外，徒然耗费大量资金继续围攻亦非得当。

This was the opinion of Demosthenes. Nicias, without denying the bad state of their affairs, was unwilling to avow their weakness, or to have it reported to the enemy that the Athenians in full council were openly voting for retreat; for in that case they would be much less likely to effect it when they wanted without discovery. Moreover, his own particular information still gave him reason to hope that the affairs of the enemy would soon be in a worse state than their own, if the Athenians persevered in the siege; as they would wear out the Syracusans by want of money, especially with the more extensive command of the sea now given them by their present navy. Besides this, there was a party in Syracuse who wished to betray the city to the Athenians, and kept sending him messages and telling him not to raise the siege. Accordingly, knowing this and really waiting because he hesitated between the two courses and wished to see his way more clearly, in his public speech on this occasion he refused to lead off the army, saying he was sure the Athenians would never approve of their returning without a vote of theirs. Those who would vote upon their conduct, instead of judging the facts as eye-witnesses like themselves and not from what they might hear from hostile critics, would simply be

guided by the calumnies of the first clever speaker; while many, indeed most, of the soldiers on the spot, who now so loudly proclaimed the danger of their position, when they reached Athens would proclaim just as loudly the opposite, and would say that their generals had been bribed to betray them and return. For himself, therefore, who knew the Athenian temper, sooner than perish under a dishonourable charge and by an unjust sentence at the hands of the Athenians, he would rather take his chance and die, if die he must, a soldier's death at the hand of the enemy. Besides, after all, the Syracusans were in a worse case than themselves. What with paying mercenaries, spending upon fortified posts, and now for a full year maintaining a large navy, they were already at a loss and would soon be at a standstill;they had already spent two thousand talents and incurred heavy debts besides, and could not lose even ever so small a fraction of their present force through not paying it, without ruin to their cause; depending as they did more upon mercenaries than upon soldiers obliged to serve, like their own. He therefore said that they ought to stay and carry on the siege, and not depart defeated in point of money, in which they were much superior.

这是狄摩西尼的看法。尼西亚斯虽未否认他们境况不妙，却不愿意坦承他们的弱点，也不愿让敌人知道他们全都公开赞成撤退。如果那样，他们真想撤退时，就绝难不被发觉而撤离了。此外，根据他自己特有的情报，他有理由希望，如果雅典人坚持围攻，敌人的状况很快会比他们自己的更糟。他们将会使叙拉古人因资金短缺被拖垮，特别是因为他们现有的海军力量可以使他们控制更为广阔的海域。除此之外，叙拉古还有一个党派想把城出卖给雅典人，因而不断给他送信，劝他不要解除围攻。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其实想等一等，因为他仍在两种方案之间犹豫不决，同时也希望前路更明朗些，但在这次会上的公开发言中，他却拒绝率军撤离。他说他确信，雅典人决不会不

经公民表决就同意他们撤退。那些就他们何去何从进行投票的人，不会像他们一样作为目击者对事实作出判断，也不会从敌对的批评中作出判断，只会一听狡黠的演说家口吐不实之词就随声附和。很多士兵，实际上这里的大多数士兵都是这样，现在虽然大喊处境危险，但到了雅典之后，他们叫喊的内容就会相反。他们会说，他们的将领受了贿赂，背叛了他们，所以才撤回来的。他既然清楚雅典人的脾性，如果必须一死，与其在雅典人手中身背污名被不公正地处死，不如冒险一试，像一个战士一样死在敌人手里。此外，叙拉古人的处境其实比他们的更糟糕。叙拉古人要付给雇佣军军饷，要花钱修筑要塞，现在又将一支庞大的舰队维持了一整年，因而已感拮据，行将陷于瘫痪。他们已经耗去了2,000塔兰特，此外还债台高筑，若因付不出军饷而失去现有军队中哪怕很小一部分，他们的事业就会毁灭，因为他们主要靠的是雇佣军，而不是像雅典人那样，靠的是强制性服役的士兵。因此，他说他们应该留下来继续围攻，而不能因为资金问题而败退。就资金而论，他们远比敌人更具优势。

Nicias spoke positively because he had exact in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distress at Syracuse, and also because of the strength of the Athenian party there which kept sending him messages not to raise the siege; besides which he had more confidence than before in his fleet, and felt sure at least of its success. Demosthenes, however, would not hear for a moment of continuing the siege, but said that if they could not lead off the army without a decree from Athens, and if they were obliged to stay on, they ought to remove to Thapsus or Catana; where their land forces would have a wide extent of country to overrun, and could live by plundering the enemy, and would thus do them damage; while the fleet would have the open sea to fight in, that is to say, instead of a narrow space which was all in the enemy's favour, a wide sea-room where their science would be of use, and where they could retreat or advance without being confined or circumscribed either when they

put out or put in. In any case he was altogether opposed to their staying on where they were, and insisted on removing at once, as quickly and with as little delay as possible; and in this judgment Eurymedon agreed. Nicias however still objecting, a certain diffidence and hesitation came over them, with a suspicion that Nicias might have some further information to make him so positive.

尼西亚斯之所以讲得非常肯定，一是因为他握有叙拉古财政困难方面的确切情报，二是因为叙拉古亲雅典党派的促动。这个党派不断给他带信，劝他不要停止围攻。除此之外，他对自己的舰队也比以前更有信心，确信至少可以在海上取得胜利。然而，狄摩西尼片刻也不愿听继续围攻之言。他说，如果他们没有雅典的命令就不能率军而归，即使必须要留下来，他们也应当转移到塔普苏斯或者卡塔纳去。在那里，他们的陆军可以践踏大片乡村地区。靠着掠夺敌人的财物，他们不但自己可以生存下去，而且可以对敌人造成损害。同时，他们的舰队还可以在公海中作战，也就是说，不必在完全对敌人有利的狭窄水域作战，而是到可以充分施展他们战技的广阔海域中去。在那里，无论是出航还是返航，他们都可以不受限制或约束地进退自如。无论如何，他完全反对留在原地不动，力主立即转移，尽快行动，尽少耽搁。埃夫里迈宗也赞同这一意见。但是，尼西亚斯依然持反对意见，他们便有些踌躇和犹豫，猜想尼西亚斯或许另有一些情报，所以才如此自信。

CHAPTER XXIII Nineteenth Year of the War—Battles in the Great Harbour—Retreat and Annihilation of the Athenian Army

第二十三章　战争第十九年——大港战役——雅典军队的撤离与覆灭

While the Athenians lingered on in this way without moving

from where they were, Gylippus and Sicanus now arrived at Syracuse. Sicanus had failed to gain Agrigentum, the party friendly to the Syracusans having been driven out while he was still at Gela; but Gylippus was accompanied not only by a large number of troops raised in Sicily, but by the heavy infantry sent off in the spring from Peloponnese in the merchantmen, who had arrived at Selinus from Libya. They had been carried to Libya by a storm, and having obtained two galleys and pilots from the Cyrenians, on their voyage alongshore had taken sides with the Euesperitae and had defeated the Libyans who were besieging them, and from thence coasting on to Neapolis, a Carthaginian mart, and the nearest point to Sicily, from which it is only two days' and a night's voyage, there crossed over and came to Selinus. Immediately upon their arrival the Syracusans prepared to attack the Athenians again by land and sea at once. The Athenian generals seeing a fresh army come to the aid of the enemy, and that their own circumstances, far from improving, were becoming daily worse, and above all distressed by the sickness of the soldiers, now began to repent of not having removed before; and Nicias no longer offering the same opposition, except by urging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open voting, they gave orders as secretly as possible for all to be prepared to sail out from the camp at a given signal. All was at last ready, and they were on the point of sailing away, when an eclipse of the moon, which was then at the full, took place. Most of the Athenians, deeply impressed by this occurrence, now urged the generals to wait; and Nicias, who was somewhat over-addicted to divination and practices of that kind, refused from that moment even to take the question of departure into consideration, until they had waited the thrice nine days prescribed by the soothsayers.

雅典人就这样在原地逗留时，吉利普斯和西卡努斯抵达了叙拉

古。西卡努斯未能获取阿格里延图姆。他还在杰拉时，亲叙拉古党人就被赶出去了。但是，吉利普斯不仅带来了在西西里招到的大量士兵，还带来了春天乘商船从伯罗奔尼撒来的重步兵。这些重步兵是从利比亚抵达塞利努斯的。他们被风暴吹到利比亚后，从昔兰尼人那里搞到了两艘三列桨战舰及舵手。在沿着海岸航行途中，他们帮助被利比亚人围攻的埃夫斯佩里泰人打败了利比亚人，从那里又继续沿着海岸航行到迦太基的商业中心奈阿波利。那里离西西里最近，只有两天一夜的航程。他们从那里渡海到了塞利努斯。他们一到，叙拉古人立即准备再次从海上和陆上同时进攻雅典人。雅典军队的将领看到敌人又来了新的援军，而他们自己的境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日益恶化，尤其是士兵们深为疾病所苦，他们这时开始后悔当初没有转移。尼西亚斯也不再持反对意见，只是坚持此事不应公开付诸表决。于是，他们尽量秘密传令全体人员做好准备，一俟信号发出就离营出航。当一切终于准备就绪，他们正要驶离时，适值满月之夜，发生了一次月蚀。大多数雅典人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力劝将军们等待。尼西亚斯本来就有点过于迷信占卜术之类的事情，从那时开始，他甚至不肯将撤离问题纳入考虑之列，执意要等到占卜师所说的三个九天之后。

The besiegers were thus condemned to stay in the country; and the Syracusans, getting wind of what had happened, became more eager than ever to press the Athenians, who had now themselves acknowledged that they were no longer their superiors either by sea or by land, as otherwise they would never have planned to sail away. Besides which the Syracusans did not wish them to settle in any other part of Sicily, where they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to deal with, but desired to force them to fight at sea as quickly as possible, in a position favourable to themselves. Accordingly they manned their ships and practised for as many days as they thought sufficient. When the moment arrived they assaulted on the first day the Athenian lines, and upon a small force of heavy infantry and horse sallying out against them by certain gates, cut off some of the

former and routed and pursued them to the lines, where, as the entrance was narrow, the Athenians lost seventy horses and some few of the heavy infantry.

围攻部队就这样被迫滞留在了那一地区。叙拉古人获悉这一情况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于进攻雅典人。雅典人自己这时也承认，无论在海上还是在陆上，他们都已不再占有优势，否则他们也不会作驶离之计。再者，叙拉古人也不希望他们在西西里的其他任何地方立足，那样他们会更难对付。他们想迫使雅典人尽快进行海战，但地点要对他们自己有利。于是，他们为战舰配备好人手，操练到他们认为时日足够为止。时机一到，他们头一天就袭击了雅典人的防线。一小队重步兵和骑兵刚从围墙的门里冲出来应战，他们就截住一些重步兵，将他们击溃，追得他们退回了防线。因入口狭窄，雅典人损失了70匹马和若干重步兵。

Drawing off their troops for this day, on the next the Syracusans went out with a fleet of seventy-six sail, and at the same time advanced with their land forces against the lines. The Athenians put out to meet them with eighty-six ships, came to close quarters, and engaged.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first defeated the Athenian centre, and then caught Eurymedon, the commander of the right wing, who was sailing out from the line more towards the land in order to surround the enemy, in the hollow and recess of the harbour, and killed him and destroyed the ships accompanying him; after which they now chased the whole Athenian fleet before them and drove them ashore.

叙拉古人当天将军队撤走，第二天出动了一支76艘战舰的舰队，同时又率陆军部队扑向雅典人的防线。雅典人带领86艘战舰出来迎

战。双方一靠近，随即开始交战。叙拉古人及其盟军首先击败了雅典的中军，接着又在港口的凹进处俘获了雅典军队右翼的指挥官埃夫里迈宗。其时，他为了包围敌军，正在驶离阵线，向陆地方向靠拢。叙拉古人将他杀死，击毁了他率领的舰只，尔后一路追击他们前面的整个雅典舰队，将后者赶到了岸边。

Gylippus seeing the enemy's fleet defeated and carried ashore beyond their stockades and camp, ran down to the breakwater with some of his troops, in order to cut off the men as they landed and make it easier for the Syracusans to tow off the vessels by the shore being friendly ground. The Tyrrhenians who guarded this point for the Athenians, seeing them come on in disorder, advanced out against them and attacked and routed their van, hurling it into the marsh of Lysimeleia. Afterwards the Syracusan and allied troops arrived in greater numbers, and the Athenians fearing for their ships came up also to the rescue and engaged them, and defeated and pursued them to some distance and killed a few of their heavy infantry. They succeeded in rescuing most of their ships and brought them down by their camp; eighteen however were taken by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and all the men killed. The rest the enemy tried to burn by means of an old merchantman which they filled with faggots and pine-wood, set on fire, and let drift down the wind which blew full on the Athenians. The Athenians, however, alarmed for their ships, contrived means for stopping it and putting it out, and checking the flames and the nearer approach of the merchantman, thus escaped the danger.

吉利普斯看到敌人的舰队已败，并已被驱至其栅栏和营地以外的岸边，于是就率领部分军队冲到下面的防波堤，目的是想在敌人登陆时予以歼灭，将岸边置于己方控制之下，以便叙拉古人更易把敌舰拖

走。为雅典人防守该处的是第勒尼安人。他们看到敌人凌乱无序地攻来，遂上前迎战，击溃了他们的先头部队，把他们赶进了利西迈利阿沼泽。随后，更多的叙拉古人及其盟军赶到了。雅典人担心他们的战舰有失，所以也赶来援救并与敌交战。他们打败这批敌军，又追了一段距离，还杀死了其中几个重步兵。他们成功地救回了大部分舰只，将它们拖到了营地附近，但仍有18艘舰被叙拉古人及其盟军所获，舰上人员全数被杀。敌军还试图烧毁余下的舰只。他们在一条旧商船里塞满柴捆和松木，点燃后使之顺风而去，其时大风正强劲地吹向雅典人。然而，雅典人也怕他们的舰只被烧，同样想出了各种阻拦和灭火的对策。他们控制住火势和那条船的靠近，躲过了这场危险。

After this, the Syracusans set up a trophy for the sea-fight and for the heavy infantry whom they had cut off up at the lines, where they took the horses; and the Athenians for the rout of the foot driven by the Tyrrhenians into the marsh, and for their own victory with the rest of the army.

此战之后，叙拉古人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以纪念这次海战的胜利以及在敌军防线前歼敌重步兵和夺获其马匹。雅典人也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以纪念第勒尼安人将敌步兵击溃并赶进沼泽以及他们自己对其余军队所取得的胜利。

The Syracusans had now gained a decisive victory at sea, where until now they had feared the reinforcement brought by Demosthenes, and deep, in consequence, was the despondency of the Athenians, and great their disappointment, and greater still their regret for having come on the expedition. These were the only cities that they had yet encountered, similar to their own in character, under democracies like themselves, which had ships and

horses, and were of considerable magnitude. They had been unable to divide and bring them over by holding out the prospect of changes in their governments, or to crush them by their great superiority in force, but had failed in most of their attempts, and being already in perplexity, had now been defeated at sea, where defeat could never have been expected, and were thus plunged deeper in embarrassment than ever.

叙拉古人这时已经在海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前他们还一直惧怕狄摩西尼带来的援军，结果沮丧万分的却是雅典人。他们感到非常失望，对于来参加这次远征的懊悔就更大了。在他们所遇到的对手中，只有这些城市与他们的性质类似，与他们一样实行民主政治，有舰有马，而且幅员辽阔。他们既未能通过更换政府的提议分裂和拉拢过来这些城市，也未能依靠他们在兵力上的巨大优势将其征服，反而在大部分努力中遭到了失败。他们本已困惑无措，现在又在海上吃了败仗，而他们又绝难料及会在海战中落败，这就使他们陷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尴尬的境地。

Meanwhile, the Syracusans immediately began to sail freely along the harbour, and determined to close up its mouth, so that the Athenians might not be able to steal out in future, even if they wished. Indeed, the Syracusans no longer thought only of saving themselves, but also how to hinder the escape of the enemy; thinking, and thinking rightly, that they were now much the stronger, and that to conquer the Athenians and their allies by land and sea would win them great glory in Hellas. The rest of the Hellenes would thus immediately be either freed or released from apprehension, as the remaining forces of Athens would be henceforth unable to sustain the war that would be waged against her; while they, the Syracusans, would be regarded as the authors

of this deliverance, and would be held in high admiration, not only with all men now living but also with posterity. Nor were these the only considerations that gave dignity to the struggle. They would thus conquer not only the Athenians but also their numerous allies, and conquer not alone, but with their companions in arms, commanding side by side with the Corinthians and Lacedaemonians, having offered their city to stand in the van of danger, and having been in a great measure the pioneers of naval success.

这时候，叙拉古人却立刻开始沿着海港自由地航来驶去，并且决定封锁港口。这样一来，纵然雅典人想偷偷溜出海，他们也无法做到了。其实，叙拉古人已不再仅仅考虑如何保全自己，同时也在考虑如何阻止敌人脱逃。他们在想，而且这种想法很正确，他们现在已强大得多；如果能够在海上和陆上都打败雅典人及其盟友，将会为他们在全希腊赢得巨大的荣耀。这样，其他希腊人也会立刻获得解放或摆脱恐惧，因为雅典残存的兵力从此将无法支撑对它进行的战争，而他们叙拉古人将会被视为这一解放行动的推动者，无论在现今还是后世，均将为人所敬仰。这次斗争所带来的荣耀还不止这些。他们以此征服的将不仅仅是雅典人，还有其众多的盟友；他们也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既有战友一同作战，又有科林斯人和斯巴达人并肩指挥，况且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城市置于首当其冲的危险境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赢得海战胜利的急先锋。

Indeed, there were never so many peoples assembled before a single city, if we except the grand total gathered together in this war under Athens and Lacedaemon. The following were the states on either side who came to Syracuse to fight for or against Sicily, to help to conquer or defend the island. Right or community of blood was not the bond of union between them, so much as interest or

compulsion as the case might be. The Athenians themselves being Ionians went against the Dorians of Syracuse of their own free will; and the peoples still speaking Attic and using the Athenian laws, the Lemnians, Imbrians, and Aeginetans, that is to say the then occupants of Aegina, being their colonists, went with them. To these must be also added the Hestiaeans dwelling at Hestiaea in Euboea. Of the rest some joined in the expedition as subjects of the Athenians, others as independent allies, others as mercenaries. To the number of the subjects paying tribute belonged the Eretrians, Chalcidians, Styrians, and Carystians from Euboea; the Ceans, Andrians, and Tenians from the islands; and the Milesians, Samians, and Chians from Ionia. The Chians, however, joined as independent allies, paying no tribute, but furnishing ships. Most of these were Ionians and descended from the Athenians, except the Carystians, who are Dryopes, and although subjects and obliged to serve, were still Ionians fighting against Dorians. Besides these there were men of Aeolic race, the Methymnians, subjects who provided ships, not tribute, and the Tenedians and Aenians who paid tribute. These Aeolians fought against their Aeolian founders, the Boeotians in the Syracusan army, because they were obliged, while the Plataeans, the only native Boeotians opposed to Boeotians, did so upon a just quarrel. Of the Rhodians and Cytherians, both Dorians, the latter, Lacedaemonian colonists, fought in the Athenian ranks against their Lacedaemonian countrymen with Gylippus; while the Rhodians, Argives by race, were compelled to bear arms against the Dorian Syracusans and their own colonists, the Geloans, serving with the Syracusans. Of the islanders round Peloponnese, the Cephallenians and Zacynthians accompanied the Athenians as independent allies, although their insular position really left them little choice in the matter, owing to the maritime supremacy of Athens, while the Corcyraeans, who were not only Dorians but Corinthians, were openly serving against Corinthians and Syracusans, although

colonists of the former and of the same race as the latter, under colour of compulsion, but really out of free will through hatred of Corinth. The Messenians, as they are now called in Naupactus and from Pylos, then held by the Athenians, were taken with them to the war. There were also a few Megarian exiles, whose fate it was to be now fighting against the Megarian Selinuntines.

的确，除去这场战争中聚集在雅典和斯巴达旗下的全部军队，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部族聚集在单独一座城下。下面是双方来叙拉古参战的城邦。有的是为保卫西西里而来，有的是为进攻西西里而来；有的是为了帮助征服此岛，有的则是为了帮助保卫这个岛屿。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与其说是正义或血缘关系，不如说是利益，也有可能是被迫而为。雅典人本身是爱奥尼亚人，他们是自愿来进攻叙拉古的多里安人的。随他们而来的有利利姆诺斯人、伊姆布罗斯人和埃伊纳人（即当时埃伊纳的占领者）。他们都是雅典人的移民，仍操阿提卡方言，并且在沿用雅典的法律。这些人当中还须加上海斯蒂亚人，他们居住在埃维亚岛的海斯蒂亚。余者有的是作为雅典人的属民参加这次远征的，有的是作为独立盟友身份参加的，还有的是作为雇佣兵参加的。属于缴纳贡金类的属民有来自埃维亚岛的埃雷特里亚人、哈尔基斯人、斯蒂里亚人和卡里斯图斯人，有从各岛来的凯安人、安德罗斯岛人和泰诺斯人，还有来自爱奥尼亚的米利都人、萨摩斯人和希俄斯人。不过，希俄斯人是作为独立盟友身份参加远征的，他们不缴纳贡金，而是提供战舰。除了属于德里奥佩人的卡里斯图斯人之外，以上大多是爱奥尼亚人和雅典人的后裔。尽管他们是属民，而且是被迫来服役的，但仍算是爱奥尼亚人在与多里安人作战。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伊奥利亚族人，即只提供战舰而不缴纳贡金的属民迈西姆纳人，以及缴纳贡金的泰内佐斯人和埃努斯人。叙拉古军中的维奥蒂亚人是伊奥利亚城的创建者，这些伊奥利亚人与他们作战实非得已。普拉蒂亚人虽则是唯一对抗维奥蒂亚人的维奥蒂亚本族人，但他们既然不和，这样做也属正当。罗得人和基西拉人同属多里安人。基西拉人虽然是斯巴达的移民，但却与雅典人为伍，反而攻打吉利普斯所率领的

斯巴达同胞；罗得人在种族上虽属阿尔戈斯人，却被迫拿起武器攻打多里安种族的叙拉古人和他们自己的移民杰拉人，因为杰拉人在叙拉古人军中服役。在居住于伯罗奔尼撒周边的岛民中，凯法莱尼亚人和扎金索斯人是以独立盟友身份与雅典人一起参战的，但他们处于岛民地位，雅典又握有制海权，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并没有多少选择。克基拉人既是多里安人，又是科林斯人；既是科林斯人的移民，又与叙拉古人同属一个种族。尽管他们以迫不得已为借口公开对抗科林斯人和叙拉古人，实际上却是出于自愿，因为他们憎恨科林斯人。住在纳夫帕克图斯和来自皮洛斯的麦西尼亚人（现在他们被如此称之）也被裹挟到了战争之中。当时皮洛斯在雅典人的控制之下。还有一些迈加拉的流亡者，此时也要在命运的驱使下与迈加拉的塞利努斯人作战。

The engagement of the rest was more of a voluntary nature. It was less the league than hatred of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 immediate private advantage of each individual that persuaded the Dorian Argives to join the Ionian Athenians in a war against Dorians; while the Mantineans and other Arcadian mercenaries, accustomed to go against the enemy pointed out to them at the moment, were led by interest to regard the Arcadians serving with the Corinthians as just as much their enemies as any others. The Cretans and Aetolians also served for hire, and the Cretans who had joined the Rhodians in founding Gela, thus came to consent to fight for pay against, instead of for, their colonists. There were also some Acarnanians paid to serve, although they came chiefly for love of Demosthenes and out of goodwill to the Athenians whose allies they were. These all lived on the Hellenic side of the Ionian Gulf. Of the Italiots, there were the Thurians and Metapontines, dragged into the quarrel by the stern necessities of a time of revolution; of the Siceliots, the Naxians and the Catanians; and of the barbarians, the Egestaeans, who called in the Athenians, most of the Sicels, and

outside Sicily some Tyrrhenian enemies of Syracuse and Iapygian mercenaries.

其余的人参与交战则带有比较自愿的性质。多里安族的阿尔戈斯人与爱奥尼亚族的雅典人联手向多里安人开战，主要是因为仇恨斯巴达人以及个人想迅速捞取私利，而不是由于同盟的关系。曼提尼亚人和其他阿卡迪亚雇佣兵则习惯于进攻临时指给他们的敌人。他们为利所诱，将为科林斯人服役的阿卡迪亚人与其他人同样视为敌人。克里特人和埃托利亚人也是受雇而来的。因此，克里特人虽曾与罗得人一起创建杰拉，却为了赚取军饷而同意对付自己的移民，而不是为他们而战。阿卡那尼亚人虽然也有为军饷而来的，但主要是出于对狄摩西尼的爱戴和对其盟友雅典人的亲善。这些人都居住在爱奥尼亚湾希腊那一侧。在意大利奥特人中，图里人和迈塔蓬图姆人是被革命时期的严峻形势所迫才被拖入这场争斗中的。西凯利奥特人当中参战的有纳克索斯人和卡塔纳人。蛮族人当中有把雅典人召来的埃耶斯塔人和大部分西库尔人。西西里之外还有一些以叙拉古为敌的第勒尼安人和亚皮伊亚雇佣兵。

Such were the peoples serving with the Athenians. Against these the Syracusans had the Camarinaeans their neighbours, the Geloans who live next to them; then passing over the neutral Agrigentines, the Selinuntines settled on the farther side of the island. These inhabit the part of Sicily looking towards Libya; the Himeraeans came from the side towards the Tyrrhenian Sea, being the only Hellenic inhabitants in that quarter, and the only people that came from thence to the aid of the Syracusans. Of the Hellenes in Sicily the above peoples joined in the war, all Dorians and independent, and of the barbarians the Sicels only, that is to say, such as did not go over to the Athenians. Of the Hellenes outside Sicily there were the Lacedaemonians, who provided a Spartan to

take the command, and a force of Neodamodes or Freedmen, and of Helots; the Corinthians, who alone joined with naval and land forces, with their Leucadian and Ambraciot kinsmen; some mercenaries sent by Corinth from Arcadia; some Sicyonians forced to serve, and from outside Peloponnese the Boeotians. In comparison, however, with these foreign auxiliaries, the great Siceliot cities furnished more in every department—numbers of heavy infantry, ships, and horses, and an immense multitude besides having been brought together; while in comparison, again, one may say, with all the rest put together, more was provided by the Syracusans themselves, both from the greatness of the city and from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in the greatest danger.

这是雅典人方面参战诸族。在与之对立的叙拉古人方面，有他们的近邻卡马里纳人，有紧挨着卡马里纳人的杰拉人，还有定居在岛那边的塞利努斯人，后两者中间隔着保持中立的阿格里延图姆人。这些人都居住在西西里面朝利比亚那部分地区。希迈拉人来自面对第勒尼安海的那边，他们是那个地区仅有的希腊居民，也是唯一从那里赶来支援叙拉古人的部族。以上是西西里的希腊人中参战诸族，他们都是独立的多里安人。参战的蛮族人只有西库尔人，即那些没有投向雅典人一方者。在西西里之外的希腊人中，则有斯巴达人、科林斯人、科林斯派来的阿卡迪亚雇佣军、被迫而来的一些西锡安人以及来自伯罗奔尼撒之外的维奥蒂亚人。斯巴达人派遣了一位斯巴达人担任指挥官，还派来一支由新公民（或曰自由民）和希洛人组成的军队。科林斯人是唯一同时率领海军和陆军前来参战者，另外还带来了与他们同族的莱夫卡斯人和安布拉基亚人。但是，与这些外来援军相比，西西里岛的希腊移民西凯利奥特人所居各大城市所提供的各方面人力物力则更多——他们召集到了大量重步兵、战舰、马匹以及数目众多的各色人等。同时，也可以说，一则因为其城之大，二则因为其处境最危险，叙拉古人自己所提供的人力物力比其余各城邦之总和还要多。

Such were the auxiliaries brought together on either side, all of which had by this time joined, neither party experiencing any subsequent accession. It was no wonder, therefore, if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thought that it would win them great glory if they could follow up their recent victory in the sea-fight by the capture of the whole Athenian armada, without letting it escape either by sea or by land. They began at once to close up the Great Harbour by means of boats, merchant vessels, and galleys moored broadside across its mouth, which is nearly a mile wide, and made all their other arrangements for the event of the Athenians again venturing to fight at sea. There was, in fact, nothing little either in their plans or their ideas.

以上是双方召集到的援军。这时，所有援军均已到位，其后双方都没有再添援军。因此，难怪叙拉古人及其盟友会认为，如果他们能继最近海战的胜利之后再俘获整个雅典舰队，将敌军的海上和陆上逃路尽行阻断，他们将为自己赢得极大的荣耀。他们立刻开始封锁大港，将小船、商船和三列桨战舰横着泊在宽近一英里的入口处。他们还做了其他各方面准备，以防雅典人再次在海上冒险一战。事实上，不论是他们的计划还是想法，全都志不在小。

The Athenians, seeing them closing up the harbour and informed of their further designs, called a council of war. The generals and colonels assembled and discussed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situation; the point which pressed most being that they no longer had provisions for immediate use (having sent on to Catana to tell them not to send any, in the belief that they were going away), and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any in future unless they could command the sea. They therefore determined to evacuate their upper lines, to enclose with a cross wall and garrison a small space close to the

ships, only just sufficient to hold their stores and sick, and manning all the ships, seaworthy or not, with every man that could be spared from the rest of their land forces, to fight it out at sea, and, if victorious, to go to Catana, if not, to burn their vessels, form in close order, and retreat by land for the nearest friendly place they could reach, Hellenic or barbarian. This was no sooner settled than carried into effect; they descended gradually from the upper lines and manned all their vessels, compelling all to go on board who were of age to be in any way of use. They thus succeeded in manning about one hundred and ten ships in all, on board of which they embarked a number of archers and darters taken from the Acarnanians and from the other foreigners, making all other provisions allowed by the nature of their plan and by the necessities which imposed it. All was now nearly ready, and Nicias, seeing the soldiery disheartened by their unprecedented and decided defeat at sea, and by reason of the scarcity of provisions eager to fight it out as soon as possible, called them all together, and first addressed them, speaking as follows:

看到叙拉古人封锁了海港，又获悉了敌人的下一步计划，雅典人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将官和校官们齐聚一处，讨论了他们所处的困境，其中最紧迫的是他们的给养已不能再满足眼前之需（他们原以为即将撤离，已派人去卡塔纳通知对方停送给养）。如果他们不能控制海上，将来也不会筹到给养。因此，他们决定撤离上面一段防线，在靠近战舰之处用一道横墙围起一小块地方，大小足以存放补给和安置病号即可，并留人防守；其余陆军人员凡能抽出者都配备到各条舰上，适航与不适航的都在其列，然后在海上与敌军决一雌雄。胜则去卡塔纳，败则烧毁战舰，列成密集队形，经陆路撤往最近可达的友好地区，希腊的或蛮族的均可。决定一经作出，随即开始付诸实施。他们逐步从防线的上段退下来，为所有战舰配备上水手，强令年龄在可用范围者都上了船。他们这样配备起来的战舰共约110艘，舰上还载

有许多从阿卡那尼亚人和其他外族人那里征来的弓箭手和标枪手。另外，他们还依据计划的性质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了其他所有可能的准备。当一切即将准备就绪时，尼西亚斯看到士兵们因为在海上遭到的前所未有的重创而丧气，又因为给养匮乏而急于尽早与敌人一决雌雄，他就把他们全部召集到一起，先对他们作了动员。讲话内容如下：

“Soldiers of the Athenians and of the allies, we have all an equal interest in the coming struggle, in which life and country are at stake for us quite as much as they can be for the enemy; since if our fleet wins the day, each can see his native city again, wherever that city may be. You must not lose heart, or be like men without any experience, who fail in a first essay and ever afterwards fearfully forebode a future as disastrous. But let the Athenians among you who have already had experience of many wars, and the allies who have joined us in so many expeditions, remember the surprises of war, and with the hope that fortune will not be always against us, prepare to fight again in a manner worthy of the number which you see yourselves to be.”

“雅典和盟邦的士兵们：即将到来的这场战斗，与我们每个人都同样息息相关。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将为生存而战，为城邦而战，敌人也是这样。我们的舰队如果能赢得今天的胜利，我们每个人就能重见乡邦，不论它在何方。大家不要失去信心，也不能像毫无经验的人那样，初战一败，从此就丧了胆，总觉得将来也会同样不幸。但是，你们当中有曾经身经百战的雅典人，还有跟随我们一起进行过那么多次远征的盟友。请你们不要忘记，战事往往难料；同时要抱有这样的期望：命运不会总是与我们作对。你们也看到了自己的队伍多么壮大，那就要准备再战，无愧于这支大军。”

“Now, whatever we thought would be of service against the crush of vessels in such a narrow harbour, and against the force upon the decks of the enemy, from which we suffered before, has all been considered with the helmsmen, and, as far as our means allowed, provided. A number of archers and darters will go on board, and a multitude that we should not have employed in an action in the open sea, where our science would be crippled by the weight of the vessels; but in the present land-fight that we are forced to make from shipboard all this will be useful. We have also discovered the changes in construction that we must make to meet theirs; and against the thickness of their cheeks, which did us the greatest mischief, we have provided grappling-irons, which will prevent an assailant backing water after charging, if the soldiers on deck here do their duty; since we are absolutely compelled to fight a land battle from the fleet, and it seems to be our interest neither to back water ourselves, nor to let the enemy do so, especially as the shore, except so much of it as may be held by our troops, is hostile ground.”

“现在，凡是我们认为有利于在如此狭窄的港口中对付密集的战舰的，凡是有利于对付敌军在甲板上配置的兵力的——上次我们就吃了这两点的亏，我们都已经跟舵手们讨论过了，并且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做了准备。大量弓箭手和标枪手将上舰作战。在公海上作战，我们不曾使用过这么多人，因为载重量过大会妨碍战技的发挥。但是，在目前这次不得不在舰上进行的陆战中，这一切都会有用。我们还发现，为了迎击敌舰，就必须在舰的结构上做些改变。为了对付他们曾让我们遭受最大损失的坚厚锚桔，我们准备了抓勾。只要甲板上的士兵尽职尽责，这些抓勾就可以阻止敌人在冲锋后倒划。既然我们必须得在舰上进行陆战，我们自己不倒划，也不让敌人倒划，似乎对我们比较有利，特别是因为岸上除了我军占领的部分之外都是敌方的土地。”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nd fight on as long as you can, and must not let yourselves be driven ashore, but once alongside must make up your minds not to part company until you have swept the heavy infantry from the enemy's deck. I say this more for the heavy infantry than for the seamen, as it is more the business of the men on deck; and our land forces are even now on the whole the strongest. The sailors I advise, and at the same time implore, not to be too much daunted by their misfortunes, now that we have our decks better armed and greater number of vessels. Bear in mind how well worth preserving is the pleasure felt by those of you who through your knowledge of our language and imitation of our manners were always considered Athenians, even though not so in reality, and as such were honoured throughout Hellas, and had your full share of the advantages of our empire, and more than your share in the respect of our subjects and in protection from ill treatment. You, therefore, with whom alone we freely share our empire, we now justly require not to betray that empire in its extremity, and in scorn of Corinthians, whom you have often conquered, and of Siceliots, none of whom so much as presumed to stand against us when our navy was in its prime, we ask you to repel them, and to show that even in sickness and disaster your skill is more than a match for the fortune and vigour of any other.”

“你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只要还能打，就继续打下去，千万不要让自己被赶上岸。一旦与敌舰并排靠拢，就必须下定决心，不扫清敌舰甲板上的重步兵决不罢休。我的这番话，主要是对重步兵而不是对水手们讲的，因为这次战斗主要是靠甲板上的士兵。即便是现在，我们的陆军在整体上也还是最强的。至于水手，我要劝你们，同时也恳请你们，不要为过去的败绩而过于沮丧。我们的甲板上已经配备了更强的兵力，我们的战舰数量也增加了。你们当中那些通晓我们的语

言、仿效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人，虽然实际上不是雅典人，但总是被当作雅典人，并且作为雅典人在全希腊受到尊重。要记住，这种感觉多么令人愉快，又是多么值得保有啊！我们帝国具有的好处，你们一点也不少享有。在享受我们臣民的尊重和免受虐待方面，你们得到的甚至比应有的更多。因此，既然我们独与你们慷慨地分享我们的帝国，现在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你们在帝国危难时不要背弃它。对于科林斯人，你们应当藐视，因为你们曾经屡次征服过他们；对于西凯利奥特人，你们同样应当藐视，因为我们的海军处于全盛时期时，他们竟无一人胆敢与我们对抗。因此，我们要求你们把他们击退，要让他们看到，即使在疾病和灾难中，你们的战技也非其他任何幸运与健壮之人可比。”

“For the Athenians among you, I add once more this reflection: You left behind you no more such ships in your docks as these, no more heavy infantry in their flower; if you do aught but conquer, our enemies here will immediately sail thither, and those that are left of us at Athens will become unable to repel their home assailants, reinforced by these new allies. Here you will fall at once into the hands of the Syracusans—I need not remind you of the intentions with which you attacked them—and your countrymen at home will fall into those of the Lacedaemonians. Since the fate of both thus hangs upon this single battle, now, if ever, stand firm, and remember, each and all, that you who are now going on board are the army and navy of the Athenians, and all that is left of the state and the great name of Athens, in whose defence if any man has any advantage in skill or courage, now is the time for him to show it, and thus serve himself and save all.”

“至于你们当中的雅典人，我要再补充一句：你们没有在故乡的船坞中留下与这些一样的战舰，也没有留下年轻力壮的重步兵。如果

此战不胜，这里的敌人会立时驶往那里，我们留在雅典的人将无法驱走当地原有的侵略者，因为后者会新增援军。留在这里的你们将会立即落入叙拉古人手中（当时你们进攻他们时意欲何为，我就不必提醒你们了），你们在家乡的同胞也将落入斯巴达人手中。既然这一战事关两处的安危，那么，一定要坚定不屈。所有的人都要牢记，你们这些现在行将上舰的人，既是雅典人的陆军，也是雅典人的海军。你们是城邦的一切，也是雅典盛誉之所系。为了保卫雅典，谁有过人的本领或过人之勇，现在都该拿出来了，这样才能拯救自己，拯救大家！”

After this address Nicias at once gave orders to man the ships. Meanwhile, Gylippus and the Syracusans could perceive by the preparations which they saw going on that the Athenians meant to fight at sea. They had also notice of the grappling-irons, against which they specially provided by stretching hides over the prows and much of the upper part of their vessels, in order that the irons when thrown might slip off without taking hold. All being now ready, the generals and Gylippus addressed them in the following terms:

讲完话后，尼西亚斯立刻发出了登舰的命令。与此同时，看到雅典人所做的准备，吉利普斯和叙拉古人也觉察得出雅典人想在海上一战。他们还获悉了敌人要用抓勾的消息。为了对付这种武器，他们特地在舰首和舰身上部大部分地方都蒙上了兽皮。这样，抓勾投过来时就会滑落，而不会勾住。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吉利普斯等诸位将军向士兵们作了如下动员讲话：

“Syracusans and allies, the glorious character of our past achievements and the no less glorious results at issue in the coming

battle are, we think, understood by most of you, or you would never have thrown yourselves with such ardour into the struggle; and if there be any one not as fully aware of the facts as he ought to be, we will declare them to him. The Athenians came to this country first to effect the conquest of Sicily, and after that, if successful, of Peloponnese and the rest of Hellas, possessing already the greatest empire yet known, of present or former times, among the Hellenes.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found in you men who faced their navy which made them masters everywhere; you have already defeated them in the previous sea-fights, and will in all likelihood defeat them again now. When men are once checked in what they consider their special excellence, their whole opinion of themselves suffers more than if they had not at first believed in their superiority, the unexpected shock to their pride causing them to give way more than their real strength warrants; and this is probably now the case with the Athenians."

"叙拉古人和盟友们：我们过去的战绩多么光荣，在即将到来的这场战斗中我们行将取得的战果同样多么光荣，我们想，你们大多数人是了解的。否则，你们不会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场战斗中来。如果有人对理应知道的这些事还不完全了解，我们愿意向他说明。雅典人来到这个地方，首先是想征服西西里。如果能获得成功，其次是想征服伯罗奔尼撒和希腊其他地方，而他们已经拥有希腊人过去和现在已知的最大帝国。他们到处称王称霸，靠的是他们的海军。在你们这里，他们头一次见识到了勇于面对他们海军的人。在之前的海战中，你们已经打败过他们。这一次，你们完全有可能再次打败他们。人们一旦在自视杰出的方面遭到挫折，他们对自己的整个看法都会变差，甚至不及他们当初没有自视具有优势之时；他们的得意之处遭到意外打击时，他们即便还有优势也会屈服。雅典人现在的情况或许就是这样。"

“With us it is different. The original estimate of ourselves which gave us courage in the days of our unskilfulness has been strengthened, while the conviction superadded to it that we must be the best seamen of the time, if we have conquered the best, has given a double measure of hope to every man among us; and, for the most part, where there is the greatest hope, there is also the greatest ardour for action. The means to combat us which they have tried to find in copying our armament are familiar to our warfare, and will be met by proper provisions; while they will never be able to have a number of heavy infantry on their decks, contrary to their custom, and a number of darters (born landsmen, one may say, Acarnanians and others, embarked afloat, who will not know how to discharge their weapons when they have to keep still), without hampering their vessels and falling all into confusion among themselves through fighting not according to their own tactics. For they will gain nothing by the number of their ships—I say this to those of you who may be alarmed by having to fight against odds—as a quantity of ships in a confined space will only be slower in executing the movements required, and most exposed to injury from our means of offence. Indeed, if you would know the plain truth, as we are credibly informed, the excess of their sufferings and the necessities of their present distress have made them desperate; they have no confidence in their force, but wish to try their fortune in the only way they can, and either to force their passage and sail out, or after this to retreat by land, it being impossible for them to be worse off than they are.”

“我们的情况则不然。我们当初对自己的看法，在我们战技不熟时即曾给予我们勇气，而今已更为坚定。我们更加深信，如果我们战胜了最强的水手，我们就是当代最棒的。这种信心给了我们每个人双倍的希望。一般来说，希望最大者，必投入最大的热忱。至于他们试

图通过模仿我们的装备来对付我们，由于我们在作战中对这些方法比较熟悉，我们自会预先采取合适的措施；而他们一旦违背常规，在甲板上配置很多重步兵，再加上很多标枪手（阿卡那尼亚人和其他人，可以说，生来就是陆地上的人。在舰上不得不保持不动时，他们是不会知道如何投掷武器的），则不可能在不按自己战术作战的情况下发挥出战舰的效力，同时又不自乱阵脚。如果你们有人怕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作战，我要对你们说，他们从战舰的数量上得不到任何好处。在狭小的空间内，舰数多只能减缓执行要求动作的速度，反而很容易受到我们采用的进攻方式的打击。实际上，如果你们要了解真实情况，我们即有可靠的情报。在过多灾难的压力下，又为当前的困境所迫，他们已感到非常绝望。他们对自己的部队已经毫无信心，不过是想以他们唯一能用的方式碰一碰运气，成则夺路驶离；败则再从陆路撤退，因为他们的情况再糟也糟不过现在了。”

“The fortune of our greatest enemies having thus betrayed itself, and their disorder being what I have described, let us engage in anger, convinced that, as between adversaries, nothing is more legitimate than to claim to sate the whole wrath of one's soul in punishing the aggressor, and nothing more sweet, as the proverb has it, than the vengeance upon an enemy, which it will now be ours to take. That enemies they are and mortal enemies you all know, since they came here to enslave our country, and if successful had in reserve for our men all that is most dreadful, and for our children and wives all that is most dishonourable, and for the whole city the name which conveys the greatest reproach. None should therefore relent or think it gain if they go away without further danger to us. This they will do just the same, even if they get the victory; while if we succeed, as we may expect, in chastising them, and in handing down to all Sicily her ancient freedom strengthened and confirmed, we shall have achieved no mean triumph. And the rarest dangers are those in which failure brings little loss and

success the greatest advantage.”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这样阔别了他们的运气。他们的混乱，我已经说过。让我们怒火满腔地投入战斗吧！我们要相信，对手之间，惩治侵略者，饱雪心中之恨，再恰当不过了。常言道：天下快事，莫过于向敌人复仇。这正是我们现在该做的。你们都知道，他们是敌人，而且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奴役我们的城邦。假如他们得逞，等待我们男人的是最可怕的痛苦，等待我们妻子儿女的是最大的侮辱，等待我们整个城邦的是最耻辱的污名。因此，任何人都不要心存怜悯，不要觉得只要他们离去而不再危害我们就是一得。即便获得了胜利，他们照样会离开。但如果我们成功地惩治了他们，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将西西里自古享有的自由在整个西西里传承下去，并且使它得到巩固和加强，我们取得的胜利将非同寻常。在所有冒险中，成则获益最大、败也损失甚微者，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After the above address to the soldiers on their side, the Syracusan generals and Gylippus now perceived that the Athenians were manning their ships, and immediately proceeded to man their own also. Meanwhile, Nicias, appalled by the position of affairs, realizing the greatness and the nearness of the danger now that they were on the point of putting out from shore, and thinking, as men are apt to think in great crises, that when all has been done they have still something left to do, and when all has been said that they have not yet said enough, again called on the captains one by one, addressing each by his father's name and by his own, and by that of his tribe, and adjured them not to belie their own personal renown, or to obscure the hereditary virtues for which their ancestors were illustrious;he reminded them of their country, the freest of the free, and of the unfettered discretion allowed in it to all to live as they pleased; and added other arguments such as men would use at such

a crisis, and which, with little alteration, are made to serve on all occasions alike—appeals to wives, children, and national gods—without caring whether they are thought commonplace, but loudly invoking them in the belief that they will be of use in the consternation of the moment. Having thus admonished them, not, he felt, as he would, but as he could, Nicias withdrew and led the troops to the sea, and ranged them in as long a line as he was able, in order to aid as far as possible in sustaining the courage of the men afloat; while Demosthenes, Menander, and Euthydemus, who took the command on board, put out from their own camp and sailed straight to the barrier across the mouth of the harbour and to the passage left open, to try to force their way out.

在对他们一方的士兵作了上述动员讲话后，吉利普斯和叙拉古的将军们觉察到雅典人正在登舰，他们也立即开始调集自己的人员上舰。其间，尼西亚斯一直对所面临的局势胆战心惊。他深知危险极大，而且迫在眉睫，因为敌人眼看就要离岸入海了。他和一般身临重大危机的人一样，总觉得该做的都做了还有事没做，该说的都说了仍嫌不足。于是，他又把舰长们一一召来，以其父名、自身的名字和其部落之名称呼每个人，嘱咐他们不要辜负自己的声名，也不要为他们祖先以其著称的传统美德抹黑。他提醒他们，他们的城邦是世上最自由的城邦，居于其中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他还援引了人们在这种危急时刻常说的其他一些话。尽管这些话几乎可以一字不变地用于各种场合，他也不避俗套，照样诉诸于妻子、儿女还有本邦神之名。他相信这些名字在惊恐之际总有些用，所以便大声祈求他们保佑。这样告诫了一番之后，尼西亚斯觉得虽仍不尽如人意，但他已尽其所能了。他回去把军队带到海边，尽可能让他们把队伍拉得长些，以尽量加大为海上将士助威的范围。登舰担任指挥之职的狄摩西尼、米南德和埃西泽穆斯则从自己的营地出发，径直驶向横在港口的障碍物和障碍物之间的空隙，试图强行突围出港去。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had already put out with about the same number of ships as before, a part of which kept guard at the outlet, and the remainder all round the rest of the harbour, in order to attack the Athenians on all sides at once; while the land forces held themselves in readiness at the points at which the vessels might put into the shore. The Syracusan fleet was commanded by Sicanus and Agatharchus, who had each a wing of the whole force, with Pythen and the Corinthians in the centre. When the rest of the Athenians came up to the barrier, with the first shock of their charge they overpowered the ships stationed there, and tried to undo the fastenings; after this, as the Syracusans and allies bore down upon them from all quarters, the action spread from the barrier over the whole harbour, and was more obstinately disputed than any of the preceding ones. On either side the rowers showed great zeal in bringing up their vessels at the boatswains' orders, and the helmsmen great skill in manoeuvring, and great emulation one with another; while the ships once alongside, the soldiers on board did their best not to let the service on deck be outdone by the others; in short, every man strove to prove himself the first in his particular department. And as many ships were engaged in a small compass (for these were the largest fleets fighting in the narrowest space ever known, being together little short of two hundred), the regular attacks with the beak were few, there being no opportunity of backing water or of breaking the line; while the collisions caused by one ship chancing to run foul of another, either in flying from or attacking a third, were more frequent. So long as a vessel was coming up to the charge the men on the decks rained darts and arrows and stones upon her; but once alongside, the heavy infantry tried to board each other's vessel, fighting hand to hand. In many quarters it happened, by reason of the narrow room, that a vessel was charging an enemy on one side and being charged herself on another, and that two or sometimes

more ships had perforce got entangled round one, obliging the helmsmen to attend to defence here, offence there, not to one thing at once, but to many on all sides; while the huge din caused by the number of ships crashing together not only spread terror, but made the orders of the boatswains inaudible. The boatswains on either side in the discharge of their duty and in the heat of the conflict shouted incessantly orders and appeals to their men; the Athenians they urged to force the passage out, and now if ever to show their mettle and lay hold of a safe return to their country; to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they cried that it would be glorious to prevent the escape of the enemy, and, conquering, to exalt the countries that were theirs. The generals, moreover, on either side, if they saw any in any part of the battle backing ashore without being forced to do so, called out to the captain by name and asked him—the Athenians, whether they were retreating because they thought the thrice hostile shore more their own than that sea which had cost them so much labour to win; the Syracusans, whether they were flying from the flying Athenians, whom they well knew to be eager to escape in whatever way they could.

叙拉古人及其盟军已出动与上次数目大体相当的战舰，其中一部分守在出口，其余的全都布置在海港四周，以便同时从四面八方向雅典人发起进攻。同时，陆军也已在战舰可能靠岸的各个地点准备就绪。叙拉古的舰队由西卡努斯和阿加萨尔胡斯指挥，他们各率舰队的一翼，皮森则率科林斯人位居中央。其余希腊人靠近障碍物后，首次冲击就击败了停泊在那里的船只，进而试图解开连接各船的锁链。后来，叙拉古人及其盟军从四面八方攻来，战斗从障碍物处扩及全港，双方打得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顽强。各自的水手长一下命令，双方的桨手都奋勇前划，舵手们在操舰中也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艺，竞相争胜。战舰一旦相互横靠，舰上的士兵就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在甲板上的表现逊于他人。总之，每个人都奋力证明他在自己那一行表现最佳。

由于很多战舰挤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进行战斗（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大的舰队挤在这么狭小的区域内作战，双方的舰只总共有近200艘），因而极少采用惯常的以冲撞角进攻的方式，因为没有机会倒划，也没机会冲破敌舰的防线。但是，为避开或攻击他舰而与另一艘舰碰巧相撞的情况却时有发生。只要有战舰冲过来，甲板上的战士便会用标枪、箭矢加石块不停地射向该舰。一旦两舰靠拢，重步兵们就会设法跳上对方的战舰，继而展开肉搏。由于空间狭小，在很多地方都会碰巧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艘舰从一侧冲向敌舰时，自身的另一侧却遭到撞击。有时又有两艘或更多的舰围着一艘纠缠得难解难分的情况，舵手们不得不一面防这边，一面攻那边，不能一时只应付一事，而是得四面照应，同时兼顾多头。好多舰撞在一起时发出的巨响，不仅让人觉得胆战心惊，还淹没了水手长们的口令声。双方的水手长们则尽职尽责，在激战中不停地呼喊着下达命令，提醒自己手下的水手们注意。雅典方面的水手长竭力鼓励水手们冲出一条通道来，只有现在拿出勇气，才能安全返乡；叙拉古方面的水手长则对叙拉古人及其盟军呼喊：阻止敌人逃跑光荣，一定要打败敌人，为城邦增光。此外，双方的将领若看到战场上任何一处任何一条舰在并非不得已的情况下倒划回岸，就会大声喊着舰长的名字责问他。雅典的将领会问，他们是不是觉得敌对无比的海岸比自己花这么大气力赢得的海域更像自己的地盘，所以才撤退的。叙拉古人的将领则会问，他们明知道雅典人想方设法要跑，是不是还要从逃敌面前退却？

Meanwhile, the two armies on shore, while victory hung in the balance, were a prey to the most agonizing and conflicting emotions; the natives thirsting for more glory than they had already won, while the invaders feared to find themselves in even worse plight than before. The all of the Athenians being set upon their fleet, their fear for the event was like nothing they had ever felt; while their view of the struggle was necessarily as chequered as the battle itself. Close to the scene of action and not all looking at the same point at once, some saw their friends victorious and took

courage and fell to calling upon heaven not to deprive them of salvation, while others who had their eyes turned upon the losers, wailed and cried aloud, and, although spectators, were more overcome than the actual combatants. Others, again, were gazing at some spot where the battle was evenly disputed; as the strife was protracted without decision, their swaying bodies reflected the agitation of their minds, and they suffered the worst agony of all, ever just within reach of safety or just on the point of destruction. In short, in that one Athenian army as long as the sea-fight remained doubtful there was every sound to be heard at once, shrieks, cheers, “We win”, “We lose”, and all the other manifold exclamations that a great host would necessarily utter in great peril; and with the men in the fleet it was nearly the same; until at last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after the battle had lasted a long while, put the Athenians to flight, and with much shouting and cheering chased them in open rout to the shore. The naval force, one one way, one another, as many as were not taken afloat now ran ashore and rushed from on board their ships to their camp; while the army, no more divided, but carried away by one impulse, all with shrieks and groans deplored the event, and ran down, some to help the ships, others to guard what was left of their wall, while the remaining and most numerous part already began to consider how they should save themselves. Indeed, the panic of the present moment had never been surpassed. They now suffered very nearly what they had inflicted at Pylos; as then the Lacedaemonians with the loss of their fleet lost also the men who had crossed over to the island, so now the Athenians had no hope of escaping by land, without the help of some extraordinary accident.

其间，在胜败未见分晓时，双方在岸上的陆军内心备受煎熬，矛盾万分。当地的叙拉古人渴望赢得比上次更大的光荣，入侵的雅典人

则担心落入比以前更糟的境地。雅典人将一切都倾注到了舰队上。对于这次战事，他们感到的恐惧非比以往。他们对这一仗的看法，也必然随着战斗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变换。战斗场面虽近在眼前，但由于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时朝同一个点看，有些人看到自己的同胞占了上风后勇气大增，开始祈求上天保佑他们安然获救；有些人则将目光落到了落败的自己人身上，于是便悲恸不已，大放悲声。尽管只是旁观者，可他们比那些实际参战的士兵更加难以克制情感。还有些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相持不下的地方。当双方久战不决时，他们来回摇晃着身体，显露着内心的焦虑。他们所经受的煎熬最甚，忽而觉得安全伸手可及，忽而又觉得到了毁灭的边缘。总之，只要海战还未分出胜负，在同一支雅典军队中就会同时听到各种声音——尖叫声，欢呼声，“我们胜了”，“我们败了”，以及一支大军在处境非常危险时必会发出的其他各种不同的惊呼。舰队里的士兵也几近如此。战斗持续了很久之后，叙拉古人及其盟军终于打得雅典人开始溃逃。他们频频高喊着，欢呼着，把溃不成军的雅典人一直赶到了岸边。海军中没有在海上被俘者这时也从不同的方向逃向岸边，一下舰就急忙奔向他们的营地。陆军已不再心绪不同，而是心同一念，或高声尖叫或低声呻吟着为这一战事的结局齐感痛惜，随后向下跑去，有的去战舰那里帮忙，有的去守卫尚存的围墙，余下的大部分人已开始考虑如何自保。眼前的恐慌的确前所无逾。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与他们在皮洛斯施予斯巴达人的非常接近。当初斯巴达人丧失了自己的舰队，同时也丧失了渡海去往岛上的士兵；而今若无异事相助，雅典人同样没有从陆路逃脱的希望。

The sea-fight having been a severe one, and many ships and lives having been lost on both sides, the victorious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now picked up their wrecks and dead, and sailed off to the city and set up a trophy. The Athenians, overwhelmed by their misfortune, never even thought of asking leave to take up their dead or wrecks, but wished to retreat that very night. Demosthenes, however, went to Nicias and gave it as his opinion that they should

man the ships they had left and make another effort to force their passage out next morning; saying that they had still left more ships fit for service than the enemy, the Athenians having about sixty remaining as against less than fifty of their opponents. Nicias was quite of his mind; but when they wished to man the vessels, the sailors refused to go on board, being so utterly overcome by their defeat as no longer to believe in the possibility of success.

这次海战打得甚为惨烈，双方都损失了很多战舰和士兵。获胜的叙拉古人及其盟军收拾起他们破损的战舰和阵亡者的尸体，然后驶回城里，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雅典人却完全被这场灾难压垮了，甚至不曾想到去请求允许他们带走己方的死者和破损的战舰，而是恨不得当夜就撤离。不过，狄摩西尼还是去见了尼西亚斯，谈了他的意见，认为他们应当为剩余的舰只备齐人员，第二天一早再作一次突围的尝试。他说，他们剩下的可用舰只仍比敌人的多。雅典人尚余大约60艘，敌人的却不足50艘。尼西亚斯很赞成他的意见，但是当他们往舰上配备人员时，水手们却拒绝上舰。他们已完全被失败所压倒，不再相信有获胜的可能。

Accordingly, they all now made up their minds to retreat by land. Meanwhile, the Syracusan Hermocrates—suspecting their intention, and impressed by the danger of allowing a force of that magnitude to retire by land, establish itself in some other part of Sicily, and from thence renew the war—went and stated his views to the authorities, and pointed out to them that they ought not to let the enemy get away by night, but that all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should at once march out and block up the roads and seize and guard the passes. The authorities were entirely of his opinion, and thought that it ought to be done, but on the other hand felt sure that the people, who had given themselves over to

rejoicing, and were taking their ease after a great battle at sea, would not be easily brought to obey; besides, they were celebrating a festival, having on that day a sacrifice to Heracles, and most of them in their rapture at the victory had fallen to drinking at the festival, and would probably consent to anything sooner than to take up their arms and march out at that moment. For these reasons the thing appeared impracticable to the magistrates; and Hermocrates, finding himself unable to do anything further with them, had now recourse to the following stratagem of his own. What he feared was that the Athenians might quietly get the start of them by passing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s during the night; and he therefore sent, as soon as it was dusk, some friends of his own to the camp with some horsemen who rode up within earshot and called out to some of the men, as though they were well-wishers of the Athenians, and told them to tell Nicias (who had in fact some correspondents who informed him of what went on inside the town) not to lead off the army by night as the Syracusans were guarding the roads, but to make his preparations at his leisure and to retreat by day. After saying this, they departed; and their hearers informed the Athenian generals, who put off going for that night on the strength of this message, not doubting its sincerity.

因此，他们此时全都接受了从陆路撤退的想法。叙拉古人赫莫克拉特斯其时料想他们必有此意。他认为，如果允许这么大规模的一支军队从陆路撤离，然后在西西里的其他什么地方安顿下来，再从那里重燃战火，将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他就去向当局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并向他们指出，饮酒。在这个时候，他们最不同意做的可能就是拿起武器向敌人进军。鉴于这些原因，这件事在地方行政官们看来似乎不切实际。赫莫克拉特斯发现已无法再跟他们谈下去，就转而采取了他自己想出的这样一个计策：他担心雅典人先行一步，在夜间悄悄穿过最难通行的地段。因此，一到黄昏，不应当让敌人趁夜间逃跑，

而是应让所有叙拉古人及其盟军立即出动，封锁道路，占领并把守住各个隘口。当局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认为这样做理所应当，但另一方面又深感人们不会轻易遵从，因为他们已经开始纵情狂欢，并且正在享受海上大战之后的悠闲时光。此外，他们正在庆祝一个节日，那天还要向赫拉克勒斯献祭。大多数人在胜利的狂喜中已开始在节日的欢宴上他即派自己的几个朋友带着一些骑兵前往雅典人的营地。他们骑到雅典人能够听见的范围之内，然后呼喊某些人的名字，好像自己是雅典人的好友一样。他们让那些人告诉尼西亚斯（事实上，的确有些人向他报告城内发生的情况），叙拉古人已经在路上设防，所以夜间不要率军撤离，而是要从容做好准备，到了白天再撤。他们说完就离开了。听到他们说的人将这些话报告给了雅典的将领们，后者不疑其中有诈，因而推迟了当晚的行动。

Since after all they had not set out at once, they now determined to stay also the following day to give time to the soldiers to pack up as well as they could the most useful articles, and, leaving everything else behind, to start only with what was strictly necessary for their personal subsistence. Meanwhile, the Syracusans and Gylippus marched out and blocked up the roads through the country by which the Athenians were likely to pass, and kept guard at the fords of the streams and rivers, posting themselves so as to receive them and stop the army where they thought best; while their fleet sailed up to the beach and towed off the ships of the Athenians. Some few were burned by the Athenians themselves as they had intended; the rest the Syracusans lashed on to their own at their leisure as they had been thrown up on shore, without any one trying to stop them, and conveyed to the town.

既然还是没能立刻出发，他们就决定次日白天也留在那里，让士兵们有时间把最有用的东西尽量收拾好，其他的全都扔掉，出发时只

带个人生存所必需的物品。与此同时，吉利普斯率领叙拉古人出城，封锁了雅典人有可能经过的乡间道路，在大小河流的浅滩设了岗，并在他们认为最有利的地方列兵以待，准备阻断敌军。他们的舰队则驶向岸边，拖走了雅典人的战舰。雅典人按计划烧掉了少数战舰，其余的被抛在了岸上。叙拉古人从容无阻地将它们拖到自己那里，然后送往城里去了。

After this, Nicias and Demosthenes now thinking that enough had been done in the way of preparation, the removal of the army took place upon the second day after the sea-fight. It was a lamentable scene, not merely from the single circumstance that they were retreating after having lost all their ships, their great hopes gone, and themselves and the state in peril; but also in leaving the camp there were things most grievous for every eye and heart to contemplate. The dead lay unburied, and each man as he recognized a friend among them shuddered with grief and horror; while the living whom they were leaving behind, wounded or sick, were to the living far more shocking than the dead, and more to be pitied than those who had perished. These fell to entreating and bewailing until their friends knew not what to do, begging them to take them and loudly calling to each individual comrade or relative whom they could see, hanging upon the necks of their tent-fellows in the act of departure, and following as far as they could, and, when their bodily strength failed them, calling again and again upon heaven and shrieking aloud as they were left behind. So that the whole army being filled with tears and distracted after this fashion found it not easy to go, even from an enemy's land, where they had already suffered evils too great for tears and in the unknown future before them feared to suffer more. Dejection and self-condemnation were also rife among them. Indeed, they could only be compared to a starved-out town, and that no small one,

escaping; the whole multitude upon the march being not less than forty thousand men. All carried anything they could which might be of use, and the heavy infantry and troopers, contrary to their wont, while under arms carried their own victuals, in some cases for want of servants, in others through not trusting them; as they had long been deserting and now did so in greater numbers than ever. Yet even thus they did not carry enough, as there was no longer food in the camp. Moreover their disgrace generally,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their sufferings, however to a certain extent alleviated by being borne in company, were still felt at the moment a heavy burden, especially when they contrasted the splendour and glory of their setting out with the humiliation in which it had ended. For this was by far the greatest reverse that ever befell an Hellenic army. They had come to enslave others, and were departing in fear of being enslaved themselves;they had sailed out with prayer and paeans, and now started to go back with omens directly contrary; travelling by land instead of by sea, and trusting not in their fleet but in their heavy infantry. Nevertheless the greatness of the danger still impending made all this appear tolerable.

这之后，尼西亚斯和狄摩西尼认为准备工作已经足矣，在海战之后的第二天开始率军撤离。那是一幅可悲的场面。他们失去了所有战舰后在退却，巨大的希望已不复存在，自己和城邦都处于危境，但可悲的不独于此。他们离开营地时，人人目中所及、心中所想，都是一幅幅极其令人悲伤的景象。死者的尸体没有安葬，每个人从中认出自己的朋友时都痛苦和恐惧得一阵战栗；那些因伤病被他们抛下的活人，则远比已死者更让人惊恐，也远比已逝者更让人可怜。这些人一直乞求哀号，致使他们的朋友不知如何以对才好。他们请求朋友将他们带走，大声呼喊着每一个他们能够看到的战友和亲戚的名字，离别时抱住同营帐战友的脖子不放，跟着队伍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最终体力耗尽落在后面时，他们就一遍又一遍地呼唤苍天，尖声哀叫。因

此，整个雅典军队哭成了一片，经此之后再难一心撤退。他们发现，即便是敌人的土地，亦觉难舍难离，尽管他们在这里遭受的不幸已经大得非涕泪能诉。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他们又担心还会遭到更多的不幸。另外，他们也普遍感到沮丧和自责。实际上，他们很像从一座被迫就范的城中逃走的人，而且不是一个小城，因为同行者不下4万之众。所有人都带上了一切可能有用的东西。重步兵和骑兵也一反往日习惯，虽身负重甲，却带着自己的口粮，有的是因为没有仆从，有的是因为不信任仆从。长期以来，仆从中一直有人开小差，现在这样做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带够，因为军营里已经不再有粮。此外，他们普遍感到的耻辱和共同遭受的痛苦，虽因有同伴分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此刻依然使人感到重负在心，特别是当他们将出发时的威风和自豪与结束时的耻辱进行对比时。这是迄今为止希腊军队所遭受的最大挫折。他们来时是为着奴役他人，走时却担心自己被奴役；出征时伴着祈祷和凯歌，而今踏上回程时则伴着截然相反的征兆。他们走的是陆路而不是海路，因为他们对重步兵而不是舰队更有信心。不过，想到即将到来的危险之大，这一切似乎尚可容忍。

Nicias seeing the army dejected and greatly altered, passed along the ranks and encouraged and comforted them as far as was possi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raising his voice still higher and higher as he went from one company to another in his earnestness, and in his anxiety that the benefit of his words might reach as many as possible:

看到部队萎靡不振，面貌大变，尼西亚斯一边沿着队伍行走，一边就当时的情况尽可能鼓励和安慰他们。他坚定地从一队人走向另一队人，越说声音越大，热切地希望尽多的人能从他下面这些话中受益：

“Athenians and allies, even in our present position we must still hope on, since men have ere now been saved from worse straits than this; and you must not condemn yourselves too severely either because of your disasters or because of your present unmerited sufferings. I myself who am not superior to any of you in strength—indeed you see how I am in my sickness—and who in the gifts of fortune am, I think, whether in private life or otherwise, the equal of any, am now exposed to the same danger as the meanest among you; and yet my life has been one of much devotion toward the gods, and of much justice and without offence toward men. I have, therefore, still a strong hope for the future, and our misfortunes do not terrify me as much as they might. Indeed, we may hope that they will be lightened: our enemies have had good fortune enough; and if any of the gods was offended at our expedition, we have been already amply punished. Others before us have attacked their neighbours and have done what men will do without suffering more than they could bear; and we may now justly expect to find the gods more kind, for we have become fitter objects for their pity than their jealousy. And then look at yourselves, mark the numbers and efficiency of the heavy infantry marching in your ranks, and do not give way too much to despondency, but reflect that you are yourselves at once a city wherever you sit down, and that there is no other in Sicily that could easily resist your attack, or expel you when once established. The safety and order of the march is for yourselves to look to; the one thought of each man being that the spot on which he may be forced to fight must be conquered and held as his country and stronghold. Meanwhile, we shall hasten on our way night and day alike, as our provisions are scanty; and if we can reach some friendly place of the Sicels, whom fear of the Syracusans still keeps true to us, you may forthwith consider yourselves safe. A message has been sent on to them with directions to meet us with supplies of food. To sum up, be convinced, soldiers,

that you must be brave, as there is no place near for your cowardice to take refuge in, and that if you now escape from the enemy, you may all see again what your hearts desire, while those of you who are Athenians will raise up again the great power of the state, fallen though it be. Men make the city and not walls or ships without men in them.”

“雅典人和盟友们：即便处于我们现在这种境况，我们还是要怀有希望，因为以前有人比这处境更糟，但还是得救了。不要因为过去的灾难或者现在不该遭受的痛苦深自责怨。我个人在身体方面虽不如你们任何一个人（其实你们也看到了我在遭受疾病怎样的折磨），可是在私人生活或其他方面，我想，拜命运所赐，并不比任何人差。如今我也跟你们当中最卑微的人一样，处于同样的危险之中。但是，我这一生对神虔诚有加，待人公正无愧。因此，我对未来依然抱有极大的希望。我们所遭受的不幸，也并没有把我吓倒。实际上，我们或许可以期望这些不幸会缓解，因为我们的敌人已经享够了好运。如果我们这次远征对哪位神明有所冒犯，我们也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过去也有人进攻过邻邦，做过常人会做的事，却没有遭受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所以我们现在有理由期盼诸神更为仁慈，因为我们现在更该受到他们的怜悯，而不是嫉妒。你们再看看自己，算算队伍中走着多少重步兵，再估量一下他们的实力，那就不要过分丧气。你们要想到，无论你们在何处安身，立马就可以形成一个城邦；一旦你们安定下来，西西里其他城市无一能轻易抵抗你们的进攻，也没一个能将你们驱逐出去。在这次行军中，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和秩序。每个人心中应该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在何处被迫作战，都必须把它拿下，并且当作自己的城邦和堡垒去坚守。同时，我们还要日夜兼程，因为我们的给养不足。如果我们能够到达西库尔人控制的友好地方，那里的人因为惧怕叙拉古人又依然忠于我们，你们立时就会觉得安全了。我们已经派人去给他们送信，要求他们带着粮食来迎接我们。总之，士兵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必须勇敢起来，因为附近根本没有懦夫的藏身之地；如果现在逃出敌手，你们就会再次看到自己渴望的东西，你们

中的雅典人就会重振城邦的雄风，尽管它现在已经衰落。须知有人才有城邦，空有城墙或战舰则不成其为城邦。”

As he made this address, Nicias went along the ranks, and brought back to their place any of the troops that he saw straggling out of the line; while Demosthenes did as much for his part of the army, addressing them in words very similar. The army marched in a hollow square, the division under Nicias leading, and that of Demosthenes following, the heavy infantry being outside and the baggage-carriers and the bulk of the army in the middle. When they arrived at the ford of the river Anapus there they found drawn up a body of the Syracusans and allies, and routing these, made good their passage and pushed on, harassed by the charges of the Syracusan horse and by the missiles of their light troops. On that day they advanced about four miles and a half, halting for the night upon a certain hill. On the next they started early and got on about two miles further, and descended into a place in the plain and there encamped, in order to procure some eatables from the houses, as the place was inhabited, and to carry on with them water from thence, as for many furlongs in front, in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y were going, it was not plentiful. The Syracusans, meanwhile, went on and fortified the pass in front, where there was a steep hill with a rocky ravine on each side of it, called the Acraean cliff. The next day, the Athenians advancing found themselves impeded by the missiles and charges of the horse and darters, both very numerous, of the Syracusans and allies; and after fighting for a long while, at length retired to the same camp, where they had no longer provisions as before, it being impossible to leave their position by reason of the cavalry.

尼西亚斯边讲边沿着队伍走。看到哪里队伍不整，他就让他们回到原位。狄摩西尼对他那部分部队的做法也基本类似，所讲的话也大体相同。整个部队以空心方阵的队形向前行进。尼西亚斯的队伍在前，狄摩西尼的队伍殿后；重步兵在外侧，辎重运输车和大部分军队在中间。到达阿纳普斯河的浅滩时，他们发现叙拉古人及其盟军的一支部队已列阵以待。他们将其击溃，过了河后继续向前推进，但叙拉古的骑兵不断冲过来袭扰，轻步兵也向他们投掷弹石。那天，他们前进了大约4.5英里，夜间在一座小山上停下来过了夜。次日，他们出发得很早，又向前走了大约两英里，然后下到平原上一处地方，在那里扎了营，目的是想从那里的住户中搞些食物（因为那里有人居住），另外再从那里带上些水，因为沿着他们要走的方向前行，很多弗隆之内都缺水。同时，叙拉古人也在前进，并且在前方的隘口设了防。那里有一座很陡的小山，名叫阿克雷崖，崖两侧各有一个多石的皱谷。第二天，前进中的雅典军队发现自己遭到了众多叙拉古人及其盟军的阻击，骑兵向他们冲锋，标枪手朝他们投掷标枪。打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雅典人最终撤到了原来的营地，但他们已经不能再和以前一样从那里搞到粮食了。因为敌人有骑兵，他们无法离开营地。

Early next morning they started afresh and forced their way to the hill, which had been fortified, where they found before them the enemy's infantry drawn up many shields deep to defend the fortification, the pass being narrow. The Athenians assaulted the work, but were greeted by a storm of missiles from the hill, which told with the greater effect through its being a steep one, and unable to force the passage, retreated again and rested. Meanwhile, occurred some claps of thunder and rain, as often happens towards autumn, which still further disheartened the Athenians, who thought all these things to be omens of their approaching ruin. While they were resting, Gylippus and the Syracusans sent a part of their army to throw up works in their rear on the way by which they had advanced; however, the Athenians immediately sent some

of their men and prevented them; after which they retreated more towards the plain and halted for the night. When they advanced the next day, the Syracusans surrounded and attacked them on every side, and disabled many of them, falling back if the Athenians advanced and coming on if they retired, and in particular assaulting their rear, in the hope of routing them in detail, and thus striking a panic into the whole army. For a long while the Athenians persevered in this fashion, but after advancing for four or five furlongs halted to rest in the plain, the Syracusans also withdrawing to their own camp.

第二天一早，他们重新上路，强行向小山推进，但那里已经设防。他们还发现，敌步兵已经在他们前面列成纵深很多盾的阵势。由于通道狭窄，敌军准备守住工事，雅典人朝防御工事发起了进攻，但迎接他们的却是从山上射来的一阵弹雨，而山势的陡峭更增强了打击效果。他们无法夺路而过，只好又退回去休息。这时传来几声霹雳，还下起了暴雨。这是入秋时经常发生的现象，但却使雅典人更加沮丧。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即将毁灭的预兆。他们休息的时候，吉利普斯和叙拉古人派部分军队在他们来时走过的路上修起了工事，以断其后路。雅典人立刻派出一些人加以阻止，尔后他们又朝平原退了一些，停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他们又向前行进。叙拉古人将雅典人包围，从四面八方向他们进攻，杀伤了很多人。雅典人一前进，他们就退却；雅典人一退，他们又攻上来。他们尤其注意攻击雅典人的后卫，希望将其各个击破，从而使整个雅典军队陷入恐慌之中。雅典人就这样坚持了好长时间，但是在前进了四、五弗隆之后，他们便在平原上停下来休息了。叙拉古人也撤到了他们自己的营地。

During the night Nicias and Demosthenes, seeing the wretched condition of their troops, now in want of every kind of necessary, and numbers of them disabled in the numerous attacks of the

enemy, determined to light as many fires as possible, and to lead off the army, no longer by the same route as they had intended, but towards the sea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o that guarded by the Syracusans. The whole of this route was leading the army not to Catana but to the other side of Sicily, towards Camarina, Gela, and the other Hellenic and barbarian towns in that quarter. They accordingly lit a number of fires and set out by night. Now all armies, and the greatest most of all, are liable to fears and alarms,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marching by night through an enemy's country and with the enemy near; and the Athenians falling into one of these panics, the leading division, that of Nicias, kept together and got on a good way in front, while that of Demosthenes, comprising rather more than half the army, got separated and marched on in some disorder. By morning, however, they reached the sea, and getting into the Helorine road, pushed on in order to reach the river Cacyparis, and to follow the stream up through the interior, where they hoped to be met by the Sicels whom they had sent for. Arrived at the river, they found there also a Syracusan party engaged in barring the passage of the ford with a wall and a palisade, and forcing this guard, crossed the river and went on to another called the Erineus, according to the advice of their guides.

入夜之后，尼西亚斯与狄摩西尼因见部队境况悲惨，且缺乏各种必需品，很多人还在敌人屡次进攻中负了伤，遂决定尽量多点些火把，然后率军离开，不过不再走原来计划的路线，而是奔向海边，与叙拉古人防守的方向正相反。这条路线不是通向卡塔纳的，而是通向西西里的另一边，即卡马里纳、杰拉和该地区的其他希腊和蛮族城镇。于是，他们点起很多火把，在夜间出发了。所有的军队都容易害怕和惊恐，特别是夜间穿过敌方领土而敌军又在近旁时，庞大的军队尤甚，雅典人此时就陷入了这样的惊恐之中。尼西亚斯率领的先头部

队队形紧凑，远远地走在前面；狄摩西尼率领的那部分人数占整个部队的一半还多，队伍却断断续续，行军秩序颇为混乱。不过，天亮时他们总算到达了海边。踏上海洛拉斯大道后，他们继续向前推进，打算先到卡西帕里斯河，然后沿河而上进入内地，希望在那里与他们已派人去通知的西库尔人会合。抵达河边之后，他们发现那里也有一队叙拉古人，后者正在用围墙和栅栏封锁可涉水而过的地方。他们强行突破敌军的防守，按照向导的建议，渡过河后继续前往另一条名为埃里内夫斯的河。

Meanwhile, when day came and the Syracusans and allies found that the Athenians were gone, most of them accused Gylippus of having let them escape on purpose, and hastily pursuing by the road which they had no difficulty in finding that they had taken, overtook them about dinner-time. They first came up with the troops under Demosthenes, who were behind and marching somewhat slowly and in disorder, owing to the night panic above referred to, and at once attacked and engaged them, the Syracusan horse surrounding them with more ease now that they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rest and hemming them in on one spot. The division of Nicias was five or six miles on in front, as he led them more rapidly, thinking tha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ir safety lay not in staying and fighting, unless obliged, but in retreating as fast as possible, and only fighting when forced to do so. On the other hand, Demosthenes was, generally speaking, harassed more incessantly, as his post in the rear left him the first exposed to the attacks of the enemy; and now, finding that the Syracusans were in pursuit, he omitted to push on, in order to form his men for battle, and so lingered until he was surrounded by his pursuers and himself and the Athenians with him placed in the most distressing position, being huddled into an enclosure with a wall all round it, a road on this side and on that, and olive-trees in great number, where

missiles were showered in upon them from every quarter. This mode of attack the Syracusans had with good reason adopted in preference to fighting at close quarters, as to risk a struggle with desperate men was now more for the advantage of the Athenians than for their own; besides, their success had now become so certain that they began to spare themselves a little in order not to be cut off in the moment of victory, thinking too that, as it was, they would be able in this way to subdue and capture the enemy.

其间，叙拉古人及其盟军在天亮时发现雅典人已经走了。大部分人都责怪吉利普斯，说他有意把敌人放走了。不过，雅典人的去路并不难发现，他们循路急追，大约在午饭时赶上了雅典人。他们首先追上的是狄摩西尼率领的部队。由于上文提及的夜间恐慌，这支部队落在了后面，而且行进缓慢，秩序混乱。他们立即向这支部队发起进攻，开始了交战。这支部队其时已与其他队伍断开，所以叙拉古的骑兵更容易将其驱至一处，予以包围。尼西亚斯所率领的那支部队在前面五、六英里的地方。他认为，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安全，除非万不得已，不能在此滞留和恋战，而是要尽快撤退，不得不打时才打，所以他率军前进的速度比较快。然而，总的说来，狄摩西尼则不断遭到袭扰。他处在后部的位置，总是首先遭到敌军的袭击。此时发现叙拉古人正在追来，他停下来未再前进，目的是想让部队列成战斗队形，但也因此而拖延了时间，被追来的敌军包围了，他本人和他率领的雅典人都陷入了最悲惨的境地。他们挤进了一处四面有墙的地方，两边各有一条路，还有许多橄榄树。敌军的石从四面八方如雨点般朝他们掷来。叙拉古人采取这种进攻方式，而不是与敌军短兵相接，完全有其道理。这时候雅典人已处于绝境，与他们冒险厮拼对雅典人比对他们更有利。此外，他们这时已胜券在握，有点开始保存实力了，以免在胜利之际浪掷生命。另外，他们觉得这样其实也能制服和俘获敌人。

In fact, after plying the Athenians and allies all day long from every side with missiles, they at length saw that they were worn out with their wounds and other sufferings; and Gylippus and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made a proclamation, offering their liberty to any of the islanders who chose to come over to them; and some few cities went over. Afterwards a capitulation was agreed upon for all the rest with Demosthenes, to lay down their arms on condition that no one was to be put to death either by violence or imprisonment or want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Upon this, they surrendered to the number of six thousand in all, laying down all the money in their possession, which filled the hollows of four shields, and were immediately conveyed by the Syracusans to the town.

事实上，用弹石从四面八方向雅典人及其盟军持续攻击了一整天后，他们终于看到对方因战伤和其他痛苦而精疲力竭了。于是，吉利普斯和叙拉古人及其盟军向岛民们宣布：凡愿倒戈者均可获得自由。有少数城邦的人投降了。后来，他们又与狄摩西尼麾下的其余人员全都达成了投降协议。其条件是：只要这些人放下武器，他们就不以暴力、囚禁或断绝生存之需的方式将任何人处死。总共多达6,000人以此为条件投降了。他们交出自己所携全部金钱，装了满满四盾。叙拉古人立即将他们送往了城里。

Meanwhile, Nicias with his division arrived that day at the river Erineus, crossed over, and posted his army upon some high ground upon the other side. The next day, the Syracusans overtook him and told him that the troops under Demosthenes had surrendered, and invited him to follow their example. Incredulous of the fact, Nicias asked for a truce to send a horseman to see, and upon the return of the messenger with the tidings that they had

surrendered, sent a herald to Gylippus and the Syracusans, saying that he was ready to agree with them on behalf of the Athenians to repay whatever money the Syracusans had spent upon the war if they would let his army go; and offered until the money was paid to give Athenians as hostages, one for every talent. The Syracusans and Gylippus rejected this proposition, and attacked this division as they had the other, standing all round and plying them with missiles until the evening. Food and necessaries were as miserably wanting to the troops of Nicias as they had been to their comrades; nevertheless they watched for the quiet of the night to resume their march. But as they were taking up their arms the Syracusans perceived it and raised their paean, upon which the Athenians, finding that they were discovered, laid them down again, except about three hundred men who forced their way through the guards and went on during the night as they were able.

与此同时，尼西亚斯带着他那部分部队同天抵达了埃里内夫斯河。渡过河后，他将军队部署在河那边的高地上。次日，叙拉古人追上他，对他说狄摩西尼手下的部队已经投降，并邀他也效法他们。尼西亚斯表示怀疑，他要求休战，打算派一名骑兵先去看一看。这名信使一回来，他即得知他们确已投降，于是便派一名传令官去见吉利普斯和叙拉古人，并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放他的军队走，他愿意代表雅典人同意赔偿叙拉古人为这次战争所耗的一切费用。他还主动提出，在赔款付清之前，可将雅典人作为人质，每个塔兰特可留一人。吉利普斯和叙拉古人驳回了这个建议，以攻打另外那支部队的方式攻打了这支部队。他们站在雅典人周围，用弹石掷向他们，直至日暮。尼西亚斯的部队如同他们的同胞一样，可悲地缺乏食物和必需品，但还是等待着静夜的来临，以便继续前进。但是，他们刚刚拿起武器，叙拉古人即已察觉，并且唱起了军歌。雅典人一听就知道他们的行动已经暴露，于是又将武器放下了，只有大约300人冲破守军的防卫，踏着夜色尽力向前行进。

As soon as it was day Nicias put his army in motion, pressed, as before, by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pelted from every side by their missiles, and struck down by their javelins. The Athenians pushed on for the Assinarus, impelled by the attacks made upon them from every side by a numerous cavalry and the swarm of other arms, fancying that they should breathe more freely if once across the river, and driven on also by their exhaustion and craving for water. Once there they rushed in, and all order was at an end, each man wanting to cross first, and the attacks of the enemy making it difficult to cross at all; forced to huddle together, they fell against and trod down one another, some dying immediately upon the javelins, others getting entangled together and stumbling over the articles of baggage, without being able to rise again. Meanwhile, the opposite bank, which was steep, was lined by the Syracusans, who showered missiles down upon the Athenians, most of them drinking greedily and heaped together in disorder in the hollow bed of the river. The Peloponnesians also came down and butchered them,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water, which was thus immediately spoiled, but which they went on drinking just the same, mud and all, bloody as it was, most even fighting to have it.

天一亮，尼西亚斯又率军开始行动。叙拉古人及其盟军则仍像以前一样紧逼过来，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投掷石，并用标枪击杀他们。雅典人为大量骑兵和大群其他部队的四面围攻所迫，继续向阿西纳鲁斯河推进，以为一旦过了河就能稍松口气，另外也是因为他们已经精疲力尽，很想喝水。一到河边，他们就冲入河里，秩序全无，人人都想争先过河，而敌人的进攻又使他们很难过去。于是，他们不得不挤成一团，相互叠压，互相踩踏。有些人倒在标枪上立时毙了命，其他人则纠缠在一起或被行李绊倒，无法再站起身。其间，叙拉古人一直沿着陡峭的对岸而立，将石雨点般地掷向雅典人。大多数雅典人则渴极

狂饮，混乱无序地挤在低洼的河床中。伯罗奔尼撒人也下来屠杀他们，尤其是那些在河里的人。河水立时因之变得污浊起来。但是，纵然混杂着泥浆等物，实际上还混有血水，雅典人却依然狂喝不止，多数人甚至为喝水相互打了起来。

At last, when many dead now lay piled one upon another in the stream, and part of the army had been destroyed at the river, and the few that escaped from thence cut off by the cavalry, Nicias surrendered himself to Gylippus, whom he trusted more than he did the Syracusans, and told him and the Lacedaemonians to do what they liked with him, but to stop the slaughter of the soldiers. Gylippus, after this, immediately gave orders to make prisoners; upon which the rest were brought together alive, except a large number secreted by the soldiery, and a party was sent in pursuit of the three hundred who had got through the guard during the night, and who were now taken with the rest. The number of the enemy collected as public property was not considerable; but that secreted was very large, and all Sicily was filled with them, no convention having been made in their case as for those taken with Demosthenes. Besides this, a large portion were killed outright, the carnage being very great, and not exceeded by any in this Sicilian war. In the numerous other encounters upon the march, not a few also had fallen. Nevertheless many escaped, some at the moment, others served as slaves, and then ran away subsequently. These found refuge at Catana.

最后，当河内死尸多得堆积如垛，部分军队已在河里被歼灭，少数逃过河的人也被骑兵歼灭之后，尼西亚斯向吉利普斯投了降，因为他觉得吉利普斯比叙拉古人更可信。他对吉利普斯和斯巴达人说，他们可以随意处置他，但要停止屠杀他的士兵。吉利普斯听后立刻下令

抓活的。这样，除了大量被士兵私自截留者外，其他人都被活着带到了一起。在夜间冲破守军的防卫而走的那300人，这时也已被派出去的一队人追回，与其他人带到了一起。作为公共财产被接收的俘虏数量并不很多，被私自截留的数目却很大，全西西里到处都有这种人。他们和狄摩西尼所带的那些人不同，受降时没有订立协议。此外，当场被杀者也有很大一部分。这次屠杀规模之大，非西西里战争中其他任何一战所能及。在行军途中频频发生的其他遭遇战中，阵亡者亦为数不少。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逃走了：有些是当时逃掉的，有些是在沦为奴隶之后逃掉的。这些人在卡塔纳找到了避难处。

The Syracusans and their allies now mustered and took up the spoils and as many prisoners as they could, and went back to the city. The rest of their Athenian and allied captives were deposited in the quarries, this seeming the safest way of keeping them; but Nicias and Demosthenes were butchered, against the will of Gylippus, who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the crown of his triumph if he could take the enemy's generals to Lacedaemon. One of them, as it happened, Demosthenes, was one of her greatest enemies, on account of the affair of the island and of Pylos; while the other, Nicias, was for the same reasons one of her greatest friends, owing to his exertions to procure the release of the prisoners by persuading the Athenians to make peace. For these reasons the Lacedaemonians felt kindly towards him; and it was in this that Nicias himself mainly confided when he surrendered to Gylippus. But some of the Syracusans who had been in correspondence with him were afraid, it was said, of his being put to the torture and troubling their success by his revelations; others, especially the Corinthians, of his escaping, as he was wealthy, by means of bribes, and living to do them further mischief; and these persuaded the allies and put him to death. This or the like was the cause of the death of a man who, of all the Hellenes in my time, least deserved

such a fate, seeing that the whole course of his life had been regulated with strict attention to virtue.

叙拉古人及其盟军这时集合起来，带上战利品和尽可能多的俘虏回城去了。其余雅典人及其盟军的俘虏都被送到了采石场，这似乎是监禁他们最可靠的方法。但是，尼西亚斯和狄摩西尼却被残杀了，虽然这样做有违吉利普斯的意愿。他本来想，要是能把敌军这两名将军带回斯巴达，一定会给他的胜利锦上添花。这两人中的一位，即狄摩西尼，因为斯法克泰里亚岛及皮洛斯之事，恰为斯巴达最大的敌人之一；另一位将军尼西亚斯，因同一原因则恰为斯巴达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曾劝雅典人议和，力促释放从岛上俘获的俘虏。由于这些原因，斯巴达人对尼西亚斯怀有好感。当初尼西亚斯向吉利普斯投降，主要也是因为相信这一点。但是，与他一直有联系的一些叙拉古人据说却很担心，恐怕他被拷问时把他们都招出来，使得他们的成功受挫。其他人，特别是科林斯人，则因其富有而担心他会通过行贿跑掉。他若活下来，将会进一步给他们造成危害，所以这些人就说服盟友们将他处死了。这个人就因为这样一个或类似理由被处死了。在我所处的时代，他是所有希腊人中最不应该遭此厄运的，因为他一生都以严格的道德标准约束自己。

The prisoners in the quarries were at first hardly treated by the Syracusans. Crowded in a narrow hole, without any roof to cover them, the heat of the sun and the stifling closeness of the air tormented them during the day, and then the nights, which came on autumnal and chilly, made them ill by the violence of the change; besides, as they had to do everything in the same place for want of room, and the bodies of those who died of their wounds or from the variation in the temperature, or from similar causes, were left heaped together one upon another, intolerable stenches arose; while hunger and thirst never ceased to afflict them, each man

during eight months having only half a pint of water and a pint of corn given him daily. In short, no single suffering to be apprehended by men thrust into such a place was spared them. For some seventy days they thus lived all together, after which all, except the Athenians and any Siceliots or Italiots who had joined in the expedition, were sold. The total number of prisoners taken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tate exactly, but it could not have been less than seven thousand.

采石场的俘虏们起初饱受叙拉古人的虐待。他们挤在一个狭窄的坑里，上无屋顶遮蔽，白天经受着炎炎烈日和令人窒息的闷人热气的折磨；到了夜晚，因为已是秋凉季节，气温的骤变又使他们患上了疾病。此外，由于空间狭小，所有的活动不得不在同一处进行，因受伤、温差或类似原因而死者的尸体交相叠积，散发着难当的恶臭。同时，饥渴还不间断地侵扰着他们。在八个月的时间里，每人每天只能得到半品脱水和一品脱食物。总之，被丢在这么一个地方的人所能感受到的痛苦，他们无一不曾领受。在大约七十天的时间里，他们就这样生活在一起。后来，除了雅典人以及参加远征的西凯利奥特人或意大利奥特人之外，其余的全都被卖为奴隶了。被俘的人共有多少，虽然很难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不会少于7,000人。

This was the greatest Hellenic achievement of any in this war, or, in my opinion, in Hellenic history; at once most glorious to the victors, and most calamitous to the conquered. They were beaten at all points and altogether; all that they suffered was great; they were destroyed, as the saying is, with a total destruction, their fleet, their army, everything was destroyed, and few out of many returned home. Such were the events in Sicily.

这是这场战争中希腊人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依我之见，同样也是希腊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同时也是对胜者最荣耀而对败者最具灾难性的一次。他们在各个地方都被打败了；在所有方面都饱受痛苦；诚如常言所说，他们全军覆灭了。他们的舰队，他们的陆军，一切都毁灭了，那么多人当中只有极少数返回了家乡。这就是在西西里发生的各项战事。

BOOK VIII

第八卷

CHAPTER XXIV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Years of the War—Revolt of Ionia— Intervention of Persia—The War in Ionia

第二十四章　战争第十九年和第二十年——爱奥尼亚的叛离——波斯的干涉——爱奥尼亚战争

When the news was brought to Athens, for a long while they disbelieved even the most respectable of the soldiers who had themselves escaped from the scene of action and clearly reported the matter, a destruction so complete not being thought credible. When the conviction was forced upon them, they were angry with the orators who had joined in promoting the expedition, just as if they had not themselves voted it, and were enraged also with the reciters of oracles and soothsayers, and all other omen-mongers of the time who had encouraged them to hope that they should conquer Sicily. Already distressed at all points and in all quarters, after what had now happened, they were seized by a fear and consternation quite without example. It was grievous enough for the state and for every man in his proper person to lose so many heavy infantry, cavalry, and able-bodied troops, and to see none left to replace them; but when they saw, also, that they had not sufficient ships in their docks, or money in the treasury, or crews for the ships, they began to despair of salvation. They thought that their enemies in Sicily would immediately sail with their fleet against Piraeus, inflamed by so signal a victory; while their adversaries at home, redoubling all their preparations, would vigorously attack them by sea and land at once, aided by their own

revolted confederates. Nevertheless, with such means as they had, it was determined to resist to the last, and to provide timber and money, and to equip a fleet as they best could, to take steps to secure their confederates and above all Euboea, to reform things in the city upon a more economical footing, and to elect a board of elders to advise upon the state of affairs as occasion should arise. In short, as is the way of a democracy, in the panic of the moment they were ready to be as prudent as possible.

当战败的消息传入雅典时，尽管消息是从战场上逃回来的那些最可尊重的战士们清清楚楚地报告的，人们还是久久无法相信。他们认为，如此彻底的全军覆灭不可能是真的。当他们不得不相信这是事实时，他们对那些齐力促成远征的演说家们感到很愤慨，好像他们自己没有投票赞成过这件事似的。他们还对那些传播神谕者和预言家以及当时所有其他征兆散布者极为气愤，因为这些人使他们燃起了征服西西里的希望。他们在各个地方和各个方面已经很困难了，如今又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和惊愕。失去这么多重步兵、骑兵和身强力壮的战士，看到已无任何可以替代他们的兵员，无论是对城邦还是对每个人来说，均堪称悲惨。但是，当他们发觉船坞里的战舰、金库里的金钱和配备战舰的水手同样不足时，他们开始对获救失去希望。他们认为，在如此重大胜利的鼓舞下，西西里的敌人一定会立即率舰队开赴比雷埃夫斯；希腊本土的敌人也会加紧进行各种准备，在反叛盟邦的支持下从海上和陆上同时对他们发起猛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凭借现有的资源抵抗到底。他们要设法准备木材和资金，尽最大努力装备一支舰队；要采取措施保住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埃维亚；要在更为经济的基础上对城邦的事务进行改革；还要选出一个由年长者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在必要时由其对城邦事务提供建议。总之，在这令人恐慌的时刻，他们准备如任何民主政体一样，尽可能审慎从事。

These resolves were at once carried into effect. Summer was now over. The winter ensuing saw all Hellas stirring under the impression of the great Athenian disaster in Sicily. Neutrals now felt that even if uninvited they ought no longer to stand aloof from the war, but should volunteer to march against the Athenians, who, as they severally reflected, would probably have come against them if the Sicilian campaign had succeeded. Besides, they considered that the war would now be short, and that it would be creditable for them to take part in it. Meanwhile, the allies of the Lacedaemonians felt all more anxious than ever to see a speedy end to their heavy labours. But above all, the subjects of the Athenians showed a readiness to revolt even beyond their ability, judging the circumstances with passion, and refusing even to hear of the Athenians being able to last out the coming summer. Beyond all this, Lacedaemon was encouraged by the near prospect of being joined in great force in the spring by her allies in Sicily, lately forced by events to acquire their navy. With these reasons for confidence in every quarter, the Lacedaemonians now resolved to throw themselves without reserve into the war, considering that, once it was happily terminated, they would be finally delivered from such dangers as that which would have threatened them from Athens, if she had become mistress of Sicily, and that the overthrow of the Athenians would leave them in quiet enjoyment of the supremacy over all Hellas.

这些决定马上付诸了实施。夏季到此结束了。雅典人在西西里遭到惨败之后，整个希腊在接下来这个冬季里都活跃起来了。保持中立的城邦此时认为，即便未受邀请，它们也不应当再置身于战争之外了，而是应该主动向雅典人进军，因为这些城邦各自都意识到，雅典人如果在西西里战役中获胜，很可能已经来进攻它们了。另外，这些城邦还认为，这场战争如今不会持续太久了，现在参战将会给它们带

来荣誉。同时，斯巴达人的盟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于看到他们沉重的劳役尽快结束。但是，最活跃的当属雅典的臣民。他们不能冷静地判断形势，对于雅典人能撑过来年夏季的说法连听都不听，竟不自量力地准备反叛。除此之外，近来为战事所迫不得不建立海军的斯巴达同样感到鼓舞，因为西西里的盟友很可能在春天率大军来援。由于这些原因，斯巴达人在各个方面都增添了信心。他们现在决心毫无保留地投入这场战争。他们认为，一旦战争令人满意地结束，他们将最终摆脱雅典若征服西西里即会对他们形成的那种威胁。此外，若能推翻雅典人的势力，他们便可以不受干扰地在整个希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Their king, Agis, accordingly set out at once during this winter with some troops from Decelea, and levied from the allies contributions for the fleet, and turning towards the Malian Gulf exacted a sum of money from the Oetaeans by carrying off most of their cattle in reprisal for their old hostility, and, in spite of the protests and opposition of the Thessalians, forced the Achaeans of Phthiotis and the other subjects of the Thessalians in those parts to give him money and hostages, and deposited the hostages at Corinth, and tried to bring their countrymen into the confederacy. The Lacedaemonians now issued a requisition to the cities for building a hundred ships, fixing their own quota and that of the Boeotians at twenty-five each; that of the Phocians and Locrians together at fifteen; that of the Corinthians at fifteen; that of the Arcadians, Pellenians, and Sicyonians together at ten; and that of the Megarians, Troezenians, Epidaurians, and Hermionians together at ten also; and meanwhile, made every other preparation for commencing hostilities by the spring.

因此，在这个冬季，他们的国王亚基斯立即率领一些部队从德西

利亚出发，为建舰队从盟邦征收了特别税，然后转向马利亚湾，以报旧仇为名拉走了伊塔人的大部分牲口，借此向伊塔人索取了一笔钱。他还不顾色萨利人的抗议和反对，强迫弗西奥蒂斯的亚该亚人和色萨利人在那些地区的其他臣民向他交纳了金钱和人质。他把人质安置在科林斯，企图迫使他们的同胞加入斯巴达同盟。斯巴达人接着又向各城邦正式发布了一项建造100艘舰的要求，规定自己和维奥蒂亚人各造25艘，福基斯人与洛克里斯人合造15艘，科林斯人15艘，阿卡迪亚人、佩莱内人与西锡安人合造10艘，迈加拉人、特里曾人、埃皮达鲁斯人与海尔苗内人也合造10艘。同时，他们还为春天开战进行了其他各种准备。

In the meantime, the Athenians were not idle. During this same winter, as they had determined, they contributed timber and pushed on their ship-building, and fortified Sunium to enable their corn-ships to round it in safety, and evacuated the fort in Laconia which they had built on their way to Sicily; while they also, for economy, cut down any other expenses that seemed unnecessary, and above all kept a careful look-out against the revolt of their confederates.

在此期间，雅典人也没有坐以待毙。在同一个冬季，按照已有的决定，他们筹集木材，建造了战舰；在苏尼乌姆修筑了防御工事，以使他们运输谷物的船只能够安全绕其航行；他们还撤离了去西西里途中在拉科尼亚修筑的要塞。同时，为了节约起见，他们削减了其他各种不必要的开支；对于盟邦，他们尤其严加监视，以防它们叛离。

While both parties were thus engaged, and were as intent upon preparing for the war as they had been at the outset, the Euboeans first of all sent envoys during this winter to Agis to treat of their

revolting from Athens. Agis accepted their proposals, and sent for Alcamenes, son of Sthenelaidas, and Melanthus from Lacedaemon, to take the command in Euboea. These accordingly arrived with some three hundred Neodamodes, and Agis began to arrange for their crossing over. But in the meanwhile, arrived some Lesbians, who also wished to revolt; and these being supported by the Boeotians, Agis was persuaded to defer acting in the matter of Euboea, and made arrangements for the revolt of the Lesbians, giving them Alcamenes, who was to have sailed to Euboea, as governor, and himself promising them ten ships, and the Boeotians the same number. All this was done without instructions from home, as Agis while at Decelea with the army that he commanded had power to send troops to whatever quarter he pleased, and to levy men and money. During this period, one might say, the allies obeyed him much more than they did the Lacedaemonians in the city, as the force he had with him made him feared at once wherever he went. While Agis was engaged with the Lesbians, the Chians and Erythraeans, who were also ready to revolt, applied, not to him but at Lacedaemon; where they arrived accompanied by an ambassador from Tissaphernes, the commander of King Darius, son of Artaxerxes, in the maritime districts, who invited the Peloponnesians to come over, and promised to maintain their army. The King had lately called upon him for the tribute from his government, for which he was in arrears, being unable to raise it from the Hellenic towns by reason of the Athenians; and he therefore calculated that by weakening the Athenians he should get the tribute better paid, and should also draw the Lacedaemonians into alliance with the King; and by this means, as the King had commanded him, take alive or dead Amorges, the bastard son of Pissuthnes, who was in rebellion on the coast of Caria.

正当双方如此忙碌，像开战之初一样专心致志地准备战争时，埃维亚人率先在这个冬季遣使去见了亚基斯，与他商谈叛离雅典一事。亚基斯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并派人从斯巴达召来斯塞内莱扎斯之子阿尔卡梅内斯和迈兰苏斯，让他们到埃维亚去接管军队的指挥权。这两人遂带着大约300名新公民赶到了，亚基斯便开始安排他们渡海。但是，这时候又来了一些莱斯沃斯人，他们也想叛离雅典。由于这些人得到了维奥蒂亚人的支持，亚基斯被说服了。他暂缓在埃维亚岛的行动，开始安排莱斯沃斯人的叛离事宜。他把本来要去埃维亚岛的阿尔卡梅内斯派到他们那里当总督，还答应给他们10艘舰。维奥蒂亚人也答应给他们10艘。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接到本邦指令的情况下安排的。亚基斯率军在德西利亚期间，他有权按照自己的想法将军队派往任何地方，也有权征召兵员和征收款项。在这段时间，可以说，各盟邦听从他的指挥多于听从斯巴达城内的斯巴达人。由于他带有军队，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立时令人望而生畏。正当亚基斯忙着处理莱斯沃斯人的问题时，同样准备叛离雅典的希俄斯人和埃利色雷人也提出了援助请求，不过不是向他本人，而是在斯巴达。他们是在蒂萨费尔内斯所派的一位特使陪同下抵达斯巴达的。蒂萨费尔内斯是波斯国王大流士（阿尔塔薛西斯之子）所任命的沿海地区司令官。他邀请伯罗奔尼撒人前去，并承诺负担他们的军费。国王最近曾要求他缴纳他辖区内的贡金，但因雅典人之故，他未能从希腊诸城镇征到贡金，所以逾期未缴。因此，他认为，如果能削弱雅典人的势力，他就能比较顺利地征收到贡金，同时也可以使斯巴达人与国王结为同盟；这样，他还可以按照国王的命令，将正在卡里亚海岸造反的阿莫尔耶斯（皮苏斯内斯的私生子）活捉或打死。

While the Chians and Tissaphernes thus joined to effect the same object, about the same time, Calligeitus, son of Laophon, a Megarian, and Timagoras, son of Athenagoras, a Cyzicene, both of them exiles from their country and living at the court of Pharnabazus, son of Pharnaces, arrived at Lacedaemon upon a mission from Pharnabazus, to procure a fleet for the Hellespont; by

means of which, if possible, he might himself effect the object of Tissaphernes' ambition and cause the cities in his government to revolt from the Athenians, and so get the tribute, and by his own agency obtain for the King the alliance of the Lacedaemonians.

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希俄斯人与蒂萨费尔内斯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大约在同时，迈加拉人卡利伊图斯（拉奥丰之子）和基齐库斯人蒂马戈拉斯（阿忒那哥拉之子）也来到了斯巴达。这两人被自己的城邦放逐后同住在法尔纳巴佐斯（法尔纳塞斯之子）的官邸，这次是受法尔纳巴佐斯之托而来，目的是请求斯巴达派一支舰队前往赫勒斯滂。如果可能，他想通过这个办法由自己实现蒂萨费尔内斯追求的目标，即促使自己辖区内的诸城市叛离雅典人。这样，他不仅能得到贡金，还能靠自己的力量为国王争取与斯巴达人结盟。

The emissaries of Pharnabazus and Tissaphernes treating apart, a keen competition now ensued at Lacedaemon as to whether a fleet and army should be sent first to Ionia and Chios, or to the Hellespont. The Lacedaemonians, however, decidedly favoured the Chians and Tissaphernes, who were seconded by Alcibiades, the family friend of Endius, one of the ephors for that year. Indeed, this is how their house got its Laconic name, Alcibiades being the family name of Endius. Nevertheless the Lacedaemonians first sent to Chios Phrynis, one of the Perioeci, to see whether they had as many ships as they said, and whether their city generally was as great as was reported; and upon his bringing word that they had been told the truth, immediately entered into alliance with the Chians and Erythraeans, and voted to send them forty ships, there being already, 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 of the Chians, not less than sixty in the island. At first, the Lacedaemonians meant to send ten of these forty themselves, with Melanchridas their admiral; but

afterwards, an earthquake having occurred, they sent Chalcideus instead of Melanchridas, and instead of the ten ships equipped only five in Laconia. And the winter ended, and with it ended also the nineteenth year of this war of which Thucydides is the historian.

法尔纳巴佐斯和蒂萨费尔内斯的使者各自与斯巴达人展开了磋商，继而围绕着到底该先派舰队和陆军去往爱奥尼亚和希俄斯还是赫勒斯滂在斯巴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不过，斯巴达人明显倾向于希俄斯人和蒂萨费尔内斯一方，亚西比德也支持他们。那年的执政官之一是恩季乌斯，亚西比德是其家族挚友。实际上，这也是亚西比德家族采用这个拉科尼亚名字的由来，而恩季乌斯也采用了“亚西比德”这个姓。尽管如此，斯巴达人还是先派了一个名叫弗里尼斯的珀里俄基人前往希俄斯，以了解他们是否确有他们宣称的那么多艘舰只，以及他们城邦总体上是否确如所说的那么大。弗里尼斯带回其言属实的消息后，他们立刻与希俄斯人和埃利色雷人结成同盟，并投票决定支援他们40艘舰只。据希俄斯人说，他们岛上已有不少于60艘。起初，在这40艘舰中，斯巴达人打算自己出10艘，由他们的海军大将迈兰赫里扎斯率舰前往，但后来发生了地震，他们派去的是哈尔基泽夫斯，而不是迈兰赫里扎斯，而且派去的舰也不是10艘，只是在拉科尼亚装备了5艘。这个冬季就此结束了，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十九年亦随之结束。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summer, the Chians were urging that the fleet should be sent off, being afraid that the Athenians, from whom all these embassies were kept a secret, might find out what was going on, and the Lacedaemonians at once sent three Spartans to Corinth to haul the ship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cross the Isthmus from the other sea to that on the side of Athens, and to order them all to sail to Chios, those which Agis was equipping for Lesbos not excepted. The number of ships from the allied states was

thirty-nine in all.

次年夏初，希俄斯人竭力催促斯巴达人派舰队出发。他们担心，虽然所有这些使者全都在瞒着雅典人与斯巴达接触，但雅典人或许会发现这些事。斯巴达人随即派了三名斯巴达人去科林斯，要他们尽快将战舰从那边的海中经地峡拖到雅典一侧，并命这些舰全部驶往希俄斯，亚基斯为莱斯沃斯装备的那些也不例外。盟邦派出的战舰共计39艘。

Meanwhile, Calligeitus and Timagoras did not join on behalf of Pharnabazus in the expedition to Chios or give the money—twenty-five talents—which they had brought with them to help in dispatching a force, but determined to sail afterwards with another force by themselves. Agis, on the other hand, seeing the Lacedaemonians bent upon going to Chios first, himself came in to their views; and the allies assembled at Corinth and held a council, in which they decided to sail first to Chios under the command of Chalcideus, who was equipping the five vessels in Laconia, then to Lesbos, under the command of Alcamenes, the same whom Agis had fixed upon, and lastly to go to the Hellespont, where the command was given to Clearchus, son of Ramphias. Meanwhile, they would take only half the ships across the Isthmus first, and let those sail off at once, in order that the Athenians might attend less to the departing squadron than to those to be taken across afterwards, as no care had been taken to keep this voyage secret through contempt of the impotence of the Athenians, who had as yet no fleet of any account upon the sea. Agreeably to this determination, twenty-one vessels were at once conveyed across the Isthmus.

卡利伊图斯和蒂马戈拉斯这时并没有代表法尔纳巴佐斯参加赴希俄斯的远征，也没有把他们带来资助派遣部队的费用（25塔兰特）拿出来，而是决定以后单独跟另一支部队一起去。另一方面，亚基斯看到斯巴达人倾向于先去希俄斯，他也就依从了他们的想法。各盟邦的代表在科林斯集合开了个会。他们在会上决定，首先在哈尔基泽夫斯的指挥下驶往希俄斯，其时他正在拉科尼亚配备那5艘舰；然后在阿尔卡梅内斯的指挥下驶往莱斯沃斯岛，亚基斯选定的也是这个人；最后再去赫勒斯滂，在那里由拉姆菲亚斯的儿子克莱阿尔胡斯指挥。其间，他们可以仅将半数战舰先拖过地峡，并让那些舰立即启航。这样，雅典人就不大会注意正在驶离的那个海军中队，而是会去注意其后从地峡那边拖过来的战舰。雅典人迄今在海上没有一支像样的舰队，所以斯巴达人很蔑视他们，因而也就没有特别注意为这次航行保密。根据这一决定，21艘战舰立即被拖过了地峡。

They were now impatient to set sail, but the Corinthians were not willing to accompany them until they had celebrated the Isthmian festival, which fell at that time. Upon this Agis proposed to them to save their scruples about breaking the Isthmian truce by taking the expedition upon himself. The Corinthians not consenting to this, a delay ensued, during which the Athenians conceived suspicions of what was preparing at Chios, and sent Aristocrates, one of their generals, and charged them with the fact, and, upon the denial of the Chians, ordered them to send with them a contingent of ships, as faithful confederates. Seven were sent accordingly. The reason of the dispatch of the ships lay in the fact that the mass of the Chians were not privy to the negotiations, while the few who were in the secret did not wish to break with the multitude until they had something positive to lean upon, and no longer expected the Peloponnesians to arrive by reason of their delay.

他们现在切望启航，但科林斯人却不愿一道同行。当时正值地峡运动会的节期，他们想庆祝完再出发。鉴于此，亚基斯向他们提出由他负责这次远征，以免他们对打破地峡运动会节期的休战心存顾虑。科林斯人则不同意这一提议，远征的事就这样延期了。在这期间，雅典人对希俄斯进行的准备产生了怀疑，派了一位阿里斯托克拉泰斯将军前去以事实相责。希俄斯人否认后，阿里斯托克拉泰斯遂命他们派一支分遣队加入雅典的舰队，以表示他们作为同盟者的诚意。于是，希俄斯人派出了7艘舰。他们派出这些舰的原因是，大多数希俄斯人并不与闻谈判一事，少数参与这一秘密的人想等有了切实的结果可依时再公之于众。由于伯罗奔尼撒人的行动已延期，他们已不再指望伯罗奔尼撒人来了。

In the meantime, the Isthmian games took place, and the Athenians, who had been also invited, went to attend them, and now seeing more clearly into the designs of the Chians, as soon as they returned to Athens took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fleet putting out from Cenchreae without their knowledge. After the festival the Peloponnesians set sail with twenty-one ships for Chios, under the command of Alcamenes. The Athenians first sailed against them with an equal number, drawing off towards the open sea. The enemy, however, turning back before he had followed them far, the Athenians returned also, not trusting the seven Chian ships which formed part of their number, and afterwards manned thirty-seven vessels in all and chased him on his passage alongshore into Spiraeum, a desert Corinthian port on the edge of the Epidaurian frontier. After losing one ship out at sea, the Peloponnesians got the rest together and brought them to anchor. The Athenians now attacked not only from the sea with their fleet, but also disembarked upon the coast; and a melee ensued of the most confused and violent kind, in which the Athenians disabled most of the enemy's vessels and killed Alcamenes their commander, losing

also a few of their own men.

在此期间，地峡运动会召开了，雅典人同样接到了邀请，所以也去参加了。这时他们已比较清楚地了解了希俄斯人的图谋。一回到雅典，他们马上采取措施，以防舰队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驶离肯赫雷埃。节期过后，在阿尔卡梅内斯的指挥下，伯罗奔尼撒人带着21艘战舰驶往希俄斯。雅典人首先派出同样数目的战舰出航迎击，朝着公海开去。然而，敌人并没有跟随多远就折回去了，于是雅典人也回去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舰队中那7艘希俄斯舰不可靠。后来，他们共配备了37艘舰，在敌舰沿着海岸航行时将其赶进了斯皮雷夫姆。这是科林斯境内靠近埃皮达鲁斯边界的一个弃港。在海上损失了一艘舰之后，伯罗奔尼撒人将其余战舰集中起来，抛锚停泊在那里。雅典人这时不仅用舰队从海上进攻，而且还上了岸。接着，一场最为混乱和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在这场战斗中，雅典人打得大多数敌舰失去了战斗力，杀死了敌军指挥官阿尔卡梅内斯，自己也有少量人员伤亡。

After this, they separated, and the Athenians, detaching a sufficient number of ships to blockade those of the enemy, anchored with the rest at the islet adjacent, upon which they proceeded to encamp, and sent to Athens for reinforcements; the Peloponnesians having been joined on the day after the battle by the Corinthians, who came to help the ships, and by the other inhabitants in the vicinity not long afterwards. These saw the difficulty of keeping guard in a desert place, and in their perplexity at first thought of burning the ships, but finally resolved to haul them up on shore and sit down and guard them with their land forces until a convenient opportunity for escaping should present itself. Agis also, on being informed of the disaster, sent them a Spartan of the name of Thermon. The Lacedaemonians first received the news of the fleet having put out from the Isthmus, Alcamenes having been ordered

by the ephors to send off a horseman when this took place, and immediately resolved to dispatch their own five vessels under Chalcideus, and Alcibiades with him. But while they were full of this resolution came the second news of the fleet having taken refuge in Spiraeum; and disheartened at their first step in the Ionian war proving a failure, they laid aside the idea of sending the ships from their own country, and even wished to recall some that had already sailed.

战斗结束后，双方脱离了接触。雅典人派遣足够数量的舰只去封锁敌人的舰队，其余的都停泊在附近的小岛旁。接着，他们上岛扎营，并派人去雅典请求增援。伯罗奔尼撒人在战斗发生后第二天便得到了科林斯人的支援，他们是来为战舰提供帮助的。不久之后，附近的其他居民也来帮忙了。这些人意识到在荒凉之地很难警戒，起初在困惑中曾想烧毁战舰，但最终还是决心将战舰拉上岸，让陆军驻扎下来守卫这些舰，等到出现适当的机会再行逃离。亚基斯也听说了这场灾难，给他们派去了一位名叫塞尔蒙的斯巴达人。斯巴达的民选长官曾命阿尔卡梅内斯，战舰一出发即派一名骑兵去报信。因此，斯巴达人最初收到的消息是舰队已从地峡出发。得此消息后，他们立刻决定派哈尔基泽夫斯率领他们自己的5艘舰出发，亚西比德也与他一同前往。但是，正当他们满心想这样做时，又传来了第二个消息：舰队已躲进斯皮雷夫姆。他们在爱奥尼亚战争中的第一步就这样失败了。他们大为丧气，因而放弃了从自己城邦派遣战舰的想法，甚至连已经出发的一些舰也想召回来。

Perceiving this, Alcibiades again persuaded Endius and the other ephors to persevere in the expedition, saying that the voyage would be made before the Chians heard of the fleet's misfortune, and that as soon as he set foot in Ionia, he should, by assuring them of the weakness of the Athenians and the zeal of Lacedaemon, have

no difficulty in persuading the cities to revolt, as they would readily believe his testimony. He also represented to Endius himself in private that it would be glorious for him to be the means of making Ionia revolt and the King become the ally of Lacedaemon, instead of that honour being left to Agis (Agis, it must be remembered, was the enemy of Alcibiades); and Endius and his colleagues thus persuaded, he put to sea with the five ships and the Lacedaemonian Chalcideus, and made all haste upon the voyage.

亚西比德觉察到了这一点，再次劝说恩季乌斯和其他民选长官坚持远征。他说，这次航行一定要赶在希俄斯人获悉这支舰队遭到惨败之前。他还说，一踏上爱奥尼亚的土地，他就会让那些城邦了解雅典人的软弱和斯巴达的热情，说服它们背离雅典并非难事，因为那些城邦很乐意相信他的说辞。他还私下向恩季乌斯说明，如果由他促成爱奥尼亚叛离，并使波斯国王成为斯巴达的盟友，对他来说将十分光荣，而且还不会将那份荣耀留给亚基斯（大家肯定记得，亚基斯是亚西比德的仇敌）。恩季乌斯和他的同僚们被如此说服后，他就随着斯巴达人哈尔基泽夫斯率领的那5艘舰出了海，途中未敢懈怠。

About this time, the sixteen Peloponnesian ships from Sicily, which had served through the war with Gylippus, were caught on their return off Leucadia and roughly handled by the twenty-seven Athenian vessels under Hippocles, son of Menippus, on the lookout for the ships from Sicily. After losing one of their number, the rest escaped from the Athenians and sailed into Corinth.

大约在这个时候，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由吉利普斯率领的那16艘伯罗奔尼撒舰正从西西里归来。在柳卡迪亚附近，这些舰被监视驶离西西里之舰的迈尼普斯之子希波克莱斯所率领的27艘雅典舰截住，并遭

到了猛烈攻击。在丧失了一艘舰之后，其余舰只逃过雅典人的截击，开进了科林斯。

Meanwhile, Chalcideus and Alcibiades seized all they met with on their voyage, to prevent news of their coming, and let them go at Corycus, the first point which they touched at in the continent. Here they were visited by some of their Chian correspondents and, being urged by them to sail up to the town without announcing their coming, arrived suddenly before Chios. The many were amazed and confounded, while the few had so arranged that the council should be sitting at the time; and after speeches from Chalcideus and Alcibiades stating that many more ships were sailing up, but saying nothing of the fleet being blockaded in Spiraeum, the Chians revolted from the Athenians, and the Erythraeans immediately afterwards. After this three vessels sailed over to Clazomenae, and made that city revolt also; and the Clazomenians immediately crossed over to the mainland and began to fortify Polichna, in order to retreat there, in case of necessity, from the island where they dwelt.

与此同时，哈尔基泽夫斯和亚西比德把航行途中遇到的人都抓了起来，以防有人把他们到来的消息泄露出去。到了他们在大陆上停靠的第一个地点科里库斯，他们才放这些人下舰。希俄斯一些与他们有关系的人来这里见了他们。这些人竭力劝他们不要宣布自己的到来，直接开进城里，结果他们就突然出现在了希俄斯。民众还在惊愕与困惑时，少数人就已经在安排开会了。哈尔基泽夫斯和亚西比德都作了发言，并声称还有很多战舰正在驶来，但对舰队在斯皮雷夫姆被封锁一事却只字未提。听罢他们的讲话，希俄斯人叛离了雅典人，埃利色雷人紧随其后也叛离了。在这之后，3艘战舰开往克拉佐曼纳，使那座城也叛离了雅典。克拉佐曼纳人立刻渡海来到大陆，开始在波利赫

纳设防，以便在必要时从他们居住的岛上撤往这里。

While the revolted places were all engaged in fortifying and preparing for the war, news of Chios speedily reached Athens. The Athenians thought the danger by which they were now menaced great and unmistakable, and that the rest of their allies would not consent to keep quiet after the secession of the greatest of their number. In the consternation of the moment they at once took off the penalty attaching to whoever proposed or put to the vote a proposal for using the thousand talents which they had jealously avoided touching throughout the whole war, and voted to employ them to man a large number of ships, and to send off at once under Strombichides, son of Diotimus, the eight vessels, forming part of the blockading fleet at Spiraeum, which had left the blockade and had returned after pursuing and failing to overtake the vessels with Chalcideus. These were to be followed shortly afterwards by twelve more under Thrasycles, also taken from the blockade. They also recalled the seven Chian vessels, forming part of their squadron blockading the fleet in Spiraeum, and giving the slaves on board their liberty, put the freemen in confinement, and speedily manned and sent out ten fresh ships to blockade the Peloponnesians in the place of all those that had departed, and decided to man thirty more. Zeal was not wanting, and no effort was spared to send relief to Chios.

当叛离雅典的这些地方都忙着修筑工事和准备打仗时，希俄斯叛离的消息迅速传到了雅典。雅典人认为，他们现在明确无误地遭受着巨大的危险。同盟中最大的盟邦脱离他们之后，余者也不会同意保持沉默的。这时他们甚为惊恐，立即取消了对提议动用或将动用那1,000塔兰特的提议付诸表决者均予处罚的规定，投票决定将他们在

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小心避免动用的这笔款项用来为大量舰只配备人员，并派迪奥蒂穆斯的儿子斯特罗姆维希泽斯立即率8艘舰出发。这些舰本属在斯皮雷夫姆执行封锁任务的那支舰队，曾离开封锁线去追哈尔基泽夫斯所率战舰，但没追上，所以又回来了。不久之后，斯拉西克莱斯将再率12艘舰前去增援，这些舰也是从封锁线上调出来的。他们还将那7艘希俄斯舰从他们封锁斯皮雷夫姆那支舰队的海军中队召回，给了舰上的奴隶以自由，将舰上的自由民监禁起来，很快又重新配备了10艘舰去封锁伯罗奔尼撒人，以代替所有那些被撤回的舰。他们还决定另外再配备30艘。雅典人精神饱满，不遗余力地向希俄斯输送着救援部队。

In the meantime, Strombichides with his eight ships arrived at Samos, and, taking one Samian vessel, sailed to Teos and required them to remain quiet. Chalcideus also set sail with twenty-three ships for Teos from Chios, the land forces of the Clazomenians and Erythraeans moving alongshore to support him. Informed of this in time, Strombichides put out from Teos before their arrival, and while out at sea, seeing the number of the ships from Chios, fled towards Samos, chased by the enemy. The Teians at first would not receive the land forces, but upon the flight of the Athenians took them into the town. There they waited for some time for Chalcideus to return from the pursuit, and as time went on without his appearing, began themselves to demolish the wall which the Athenians had built on the land side of the city of the Teians, being assisted by a few of the barbarians who had come up under the command of Stages, the lieutenant of Tissaphernes.

其间，斯特罗姆维希泽斯率领他的8艘舰抵达了萨摩斯。他缴获了一艘萨摩斯舰，之后驶向特俄斯，要求那里的居民保持平静。哈尔基泽夫斯也带着他的23艘舰从希俄斯开赴特俄斯，克拉佐曼纳人与埃

利色雷人的陆军沿着海岸随行，以作支援。斯特罗姆维希泽斯及时得知了这一情况，不等他们赶到就驶出了特俄斯。到了海上，他一看从希俄斯所来舰只的数目，便向萨摩斯逃去，敌舰在后面紧紧追赶。特俄斯人起初不愿接纳陆军部队入城，但雅典人一逃跑，他们便允许这些部队进了城。他们在那里等了一段时间，以待哈尔基泽夫斯从追击中返回。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哈尔基泽夫斯仍踪影皆无，他们就开始拆毁雅典人在特俄斯城靠陆地一侧修建的围墙。蒂萨费尔内斯的副将斯塔耶斯也带了少数蛮族人来帮忙。

Meanwhile, Chalcideus and Alcibiades, after chasing Strombichides into Samos, armed the crews of the ships from Peloponnese and left them at Chios, and filling their places with substitutes from Chios and manning twenty others, sailed off to effect the revolt of Miletus. The wish of Alcibiades, who had friends among the leading men of the Milesians, was to bring over the town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ships from Peloponnese, and thus, by causing the revolt of as many cities as possible with the help of the Chian power and of Chalcideus, to secure the honour for the Chians and himself and Chalcideus, and, as he had promised, for Endius who had sent them out. Not discovered until their voyage was nearly completed, they arrived a little before Strombichides and Thrasycles (who had just come with twelve ships from Athens, and had joined Strombichides in pursuing them), and occasioned the revolt of Miletus. The Athenians sailing up close on their heels with nineteen ships found Miletus closed against them, and took up their station at the adjacent island of Lade. The first alliance between the King and the Lacedaemonians was now concluded immediately upon the revolt of the Milesians, by Tissaphernes and Chalcideus, and was as follows:

与此同时，把斯特罗姆维希泽斯赶进萨摩斯之后，哈尔基泽夫斯和亚西比德将伯罗奔尼撒舰上的水手武装起来，把他们留在了希俄斯，然后又从希俄斯找了一些人代替他们，同时又配备了20艘舰，然后便驶去策动米利都叛离。亚西比德在米利都的领导层中有朋友，所以希望在伯罗奔尼撒的战舰到达之前将这座城争取过来。这样，他就可以在希俄斯的势力和哈尔基泽夫斯的帮助下，尽量多争取一些城市叛离雅典，为希俄斯人、他自己以及哈尔基泽夫斯争光，并如他所承诺的那样，为派他们出来的恩季乌斯争光。航程将近结束时，他们被发现了，但他们还是比斯特罗姆维希泽斯和斯拉西克莱斯（他刚从雅典带了12艘舰来，已加入斯特罗姆维希泽斯追击他们的行列）到得稍早些，促成了米利都的叛离。紧随其后驶来的19艘雅典舰发现米利都对他们城门紧闭，便在附近的拉泽岛驻扎下来。米利都人一叛变，蒂萨费尔内斯与哈尔基泽夫斯立即缔结了波斯国王与斯巴达人之间的第一次盟约，内容如下：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made a treaty with the King and Tissaphernes upon the terms following:

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与波斯国王和蒂萨费尔内斯基于以下条款订立了盟约：

1．Whatever country or cities the King has, or the King's ancestors had, shall be the king's;and whatever came in to the Athenians from these cities, either money or any other thing, the King and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shall jointly hinder the Athenians from receiving either money or any other thing.

1．凡国王所拥有或国王之祖先曾拥有的乡村或城市均应属国王

所有；凡雅典人从这些城市所获之金钱或其他，国王与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均应共同加以阻止，无论是金钱还是其他。

2．The war with the Athenians shall be carried on jointly by the King and by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and it shall not be lawful to make peace with the Athenians except both agree, the King on his side and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on theirs.

2．国王与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应联合与雅典人作战。若非双方同意，国王一方或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一方与雅典人休战均属非法。

3．If any revolt from the King, they shall be the enemies of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And if any revolt from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they shall be the enemies of the King in like manner.

3．凡反叛国王者，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将视其为敌。凡反叛斯巴达人及其盟友者，国王将同样视其为敌。

This was the alliance. After this, the Chians immediately manned ten more vessels and sailed for Anaia, in order to gain intelligence of those in Miletus, and also to make the cities revolt. A message, however, reaching them from Chalcideus to tell them to go back again, and that Amorges was at hand with an army by land, they sailed to the temple of Zeus, and there sighting ten more ships sailing up with which Diomedon had started from Athens after Thrasycles, fled, one ship to Ephesus, the rest to Teos. The

Athenians took four of their ships empty, the men finding time to escape ashore; the rest took refuge in the city of the Teians; after which the Athenians sailed off to Samos, while the Chians put to sea with their remaining vessels, accompanied by the land forces, and caused Lebedos to revolt, and after it Erae. After this, they both returned home, the fleet and the army.

这是他们之间的盟约。同盟缔结之后，希俄斯人马上又为10艘舰只配备人员，并驶向了阿纳亚，目的是为了获悉在米利都那些人的情况，同时也想促成那些城市叛离。然而，哈尔基泽夫斯却送信来要求他们回去，并称阿莫尔耶斯率一支部队即将从陆上前来。于是，他们便驶向宙斯神庙，在那里看见另有10艘舰只驶来。这10艘舰只是在迪奥迈宗的率领下继斯拉西克莱斯之后自雅典而来。希俄斯人一见此番景象，立即逃跑，一艘逃向以弗所，其余的逃向特俄斯。雅典人缴获了他们4艘空舰，舰上的人及时逃到岸上去了，其余的人躲进了特俄斯人的城市。后来，雅典人驶向萨摩斯，希俄斯人则在陆军的陪同下率剩下的舰只离港出海，先是促成了莱贝佐斯的叛离，接着又策反了埃雷。这之后，他们的舰队和陆军都回本邦去了。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twenty ships of the Peloponnesians in Spiraeum, which we left chased to land and blockaded by an equal number of Athenians, suddenly sallied out and defeated the blockading squadron, took four of their ships, and, sailing back to Cenchreae, prepared again for the voyage to Chios and Ionia. Here they were joined by Astyochus as high admiral from Lacedaemon, henceforth invested with the supreme command at sea. The land forces now withdrawing from Teos, Tissaphernes repaired thither in person with an army and completed the demolition of anything that was left of the wall, and so departed. Not long after his departure Diomedon arrived with ten Athenian ships, and, having made a

convention by which the Teians admitted him as they had the enemy, coasted along to Erae, and, failing in an attempt upon the town, sailed back again.

大约在同时，伯罗奔尼撒人在斯皮雷夫姆那20艘战舰（前文曾提及，他们被同样数目的雅典舰赶得靠了岸并被封锁起来了）突然驶出来，打败了封锁他们的那个海军中队，缴获了4艘舰只，尔后驶回肯赫雷埃，准备再度开赴希俄斯和伊奥尼亚。阿斯提奥胡斯作为海军大将从斯巴达来到这里与他们会合，自此被授予海上最高指挥权。陆军此时正从特俄斯撤退，蒂萨费尔内斯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去那里拆毁了围墙的残余部分，然后才离开。他离开后不久，迪奥迈宗率领10艘雅典舰赶到了。他与特俄斯人订下一个约定，特俄斯人据此允许他们进了城，如同他们允许敌人进城那样。后来，他沿着海岸驶向埃雷，试图攻下该城，但未获成功，遂又驶回去了。

About this time, took place the rising of the commons at Samos against the upper classes, in concert with some Athenians, who were there in three vessels. The Samian commons put to death some two hundred in all of the upper classes, and banished four hundred more, and themselves took their land and houses; after which the Athenians decreed their independence, being now sure of their fidelity, and the commons henceforth governed the city, excluding the landholders from all share in affairs, and forbidding any of the commons to give his daughter in marriage to them or to take a wife from them in future.

大约在这个时候，萨摩斯的平民奋起而反抗上层阶级，雅典人在那里有3艘舰只，舰上一些雅典人也给予了支持。萨摩斯的平民共处死了大约200名上层人士，放逐了400人，并占领了这些人的土地和

房屋。这件事发生后，雅典人对他们的忠诚度有了把握，随即颁布法令，宣布他们独立。从此以后，平民统治了萨摩斯这座城市。他们将土地所有者完全排斥于政务之外，并禁止平民以后将女儿嫁与他们，也不许他们娶平民为妻。

After this, during the same summer, the Chians, whose zeal continued as active as ever, and who even without the Peloponnesians found themselves in sufficient force to effect the revolt of the cities and also wished to have as many companions in peril as possible, made an expedition with thirteen ships of their own to Lesbos; the instructions from Lacedaemon being to go to that island next, and from thence to the Hellespont. Meanwhile, the land forces of the Peloponnesians who were with the Chians and of the allies on the spot, moved alongshore for Clazomenae and Cuma, under the command of Eualas, a Spartan; while the fleet under Diniadas, one of the Perioeci, first sailed up to Methymna and caused it to revolt, and, leaving four ships there, with the rest procured the revolt of Mitylene.

其后，同年夏季，希俄斯人的热情不减。他们发现，即便没有伯罗奔尼撒人，他们自己也有足够的力量促成各城的叛离。同时，他们也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城邦与其共赴危难，于是便率自己的13艘舰开赴莱斯沃斯岛，而斯巴达下达的指令则是下一步再驶往该岛，然后从那里开往赫勒斯滂。与此同时，与希俄斯人一同进军的伯罗奔尼撒人和当地盟友的陆军部队，在斯巴达人埃夫阿拉斯的指挥下，则沿着海岸向克拉佐曼纳和库迈进发。由珀里俄基人迪尼亚扎斯所指挥的舰队首先开到迈西姆纳，促成了它的叛离，在那里留下4艘舰只，尔后又率领其余舰只促成了米蒂利尼的叛离。

In the meantime, Astyochus, the Lacedaemonian admiral, set sail from Cenchreae with four ships, as he had intended, and arrived at Chios. On the third day after his arrival, the Athenian ships, twenty-five in number, sailed to Lesbos under Diomedon and Leon, who had lately arrived with a reinforcement of ten ships from Athens. Late in the same day Astyochus put to sea, and taking one Chian vessel with him sailed to Lesbos to render what assistance he could. Arrived at Pyrrha, and from thence the next day at Eresus, he there learned that Mitylene had been taken, almost without a blow, by the Athenians, who had sailed up and unexpectedly put into the harbour, had beaten the Chian ships, and landing and defeating the troops opposed to them had become masters of the city. Informed of this by the Eresians and the Chian ships, which had been left with Eubulus at Methymna, and had fled upon the capture of Mitylene, and three of which he now fell in with, one having been taken by the Athenians, Astyochus did not go on to Mitylene, but raised and armed Eresus, and, sending the heavy infantry from his own ships by land under Eteonicus to Antissa and Methymna, himself proceeded alongshore thither with the ships which he had with him and with the three Chians, in the hope that the Methymnians upon seeing them would be encouraged to persevere in their revolt. As, however, everything went against him in Lesbos, he took up his own force and sailed back to Chios; the land forces on board, which were to have gone to the Hellespont, being also conveyed back to their different cities. After this six of the allied Peloponnesian ships at Cenchreae joined the forces at Chios. The Athenians, after restoring matters to their old state in Lesbos, set sail from thence and took Polichna, the place that the Clazomenians were fortifying on the continent, and carried the inhabitants back to their town upon the island, except the authors of the revolt, who withdrew to Daphnus; and thus Clazomenae became once more Athenian.

这时候，斯巴达海军大将阿斯蒂奥胡斯率4艘战舰从肯赫雷埃驶出，按计划抵达了希俄斯。他抵达后的第三天，总共25艘雅典舰在迪奥迈宗和莱翁的率领下驶往莱斯沃斯岛。莱翁不久前率领10艘舰只刚刚从雅典赶来增援。当天晚些时候，阿斯提奥胡斯离港出海，率一艘希俄斯舰驶向莱斯沃斯岛，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先到了皮拉，第二天又从那里到达埃雷苏斯，他在那里了解到，雅典人几乎未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米蒂利尼。他们驶来后，突如其来地进港打败了希俄斯人的舰队，接着又登陆打败了与之对抗的陆军，从而夺取了这座城。阿斯提奥胡斯是从埃雷苏斯人和希俄斯战舰那里获悉这一消息的。这些舰本来留在迈西姆纳由欧布洛斯指挥，米蒂利尼一失陷，它们立即出逃，其中一艘被雅典人所获，他这时遇到的是其余3艘。阿斯提奥胡斯没有继续前往米蒂利尼，而是在那里发动和武装埃雷苏斯人。他派埃泰奥尼库斯率领自己舰上的重步兵从陆路奔赴安蒂萨和迈西姆纳，他本人则率领自己麾下的舰只和那3艘希俄斯舰沿着海岸驶往那里，希望迈西姆纳人见到他们会受到鼓舞，坚持反抗雅典。然而，由于在莱斯沃斯岛上诸事不顺，他率自己的部队又驶回了希俄斯。舰上的陆军本该去赫勒斯滂的，但也被送回了各自的城市。其后，伯罗奔尼撒同盟在肯赫雷埃的6艘战舰与在希俄斯的部队会合。雅典人恢复了莱斯沃斯的原貌后，从那里启航攻克了波利赫纳，即克拉佐曼纳人在大陆上修建工事的地方。他们将当地居民带回了岛上的城镇，只有发动反叛者撤到达夫努斯去了。克拉佐曼纳就这样再次回到了雅典人手中。

The same summer, the Athenians in the twenty ships at Lade, blockading Miletus, made a descent at Panormus in the Milesian territory, and killed Chalcideus the Lacedaemonian commander, who had come with a few men against them, and the third day after sailed over and set up a trophy, which, as they were not masters of the country, was however pulled down by the Milesians. Meanwhile, Leon and Diomedon with the Athenian fleet from Lesbos issuing from the Oenussae, the isles off Chios, and from their

forts of Sidussa and Pteleum in the Erythraeid, and from Lesbos, carried on the war against the Chians from the ships, having on board heavy infantry from the rolls pressed to serve as marines. Landing in Cardamyle and in Bolissus they defeated with heavy loss the Chians that took the field against them and, laying desolate the places in that neighbourhood, defeated the Chians again in another battle at Phanae, and in a third at Leuconium. After this, the Chians ceased to meet them in the field, while the Athenians devastated the country, which was beautifully stocked and had remained uninjured ever since the Median wars. Indeed, after the Lacedaemonians, the Chians are the only people that I have known who knew how to be wise in prosperity, and who ordered their city the more securely the greater it grew. Nor was this revolt, in which they might seem to have erred on the side of rashness, ventured upon until they had numerous and gallant allies to share the danger with them, and until they perceived the Athenians after the Sicilian disaster themselves no longer denying the thoroughly desperate state of their affairs. And if they were thrown out by one of the surprises which upset human calculations, they found out their mistake in company with many others who believed, like them, in the speedy collapse of the Athenian power. While they were thus blockaded from the sea and plundered by land, some of the citizens undertook to bring the city over to the Athenians. Apprised of this, the authorities took no action themselves, but brought Astyochus, the admiral, from Erythrae, with four ships that he had with him, and considered how they could most quietly, either by taking hostage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put an end to the conspiracy.

同在这个夏季，在拉泽那20艘舰上的雅典人封锁了米利都。他们在米利都境内的帕诺尔穆斯登陆，杀死了率领少数士兵前来迎击他们的斯巴达指挥官哈尔基泽夫斯。登陆后第三日，他们渡海过去竖立了

一个胜利纪念柱。然而，由于他们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米利都人又把它推倒了。与此同时，莱翁和迪奥迈宗率领从莱斯沃斯来的雅典舰队，载着从兵员名册上征来作海军步兵用的重步兵，分别从希俄斯附近的岛屿伊努塞、他们在埃利色雷的西祖萨和普泰莱夫姆要塞以及莱斯沃斯出发，从战舰上与希俄斯人进行着战争。他们在卡尔扎米莱和博利苏斯登陆，重创了前来抵抗他们的希俄斯人，践踏了附近一些地方，在法内的另一次战斗以及在莱科尼乌姆的第三次战斗中又击败了希俄斯人。此后，希俄斯人不再出来接战，雅典人便践踏了这片草木丰美的土地。自波斯战争以来，这里一直未曾遭到过破坏。实际上，在我所知道的民族中，除了斯巴达人之外，唯有希俄斯人知道如何在昌盛时明智行事，而且它越是强盛，处理城邦事务就越审慎。这次背叛雅典也是这样。他们虽则似乎犯了鲁莽之错，但直到有众多勇敢的盟友与他们一同赴险，直到他们发现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后自己都不再否认已彻底陷入绝望状态，他们才冒险一试。若是被世人难料的意外所捉弄，他们发现自己犯了错，那也是因为有许多人与他们一样相信，雅典的势力很快就会崩溃。因此，他们遭到海上封锁和陆上劫掠时，一些市民又想把城邦拉回到雅典人一边。当局获悉这一情况后并未采取行动，而是将海军指挥官阿斯提奥胡斯以及他麾下的4艘战舰从埃利色雷召来，盘算着如何才能通过扣押人质或其他方法尽可能平静地遏止这一阴谋。

While the Chians were thus engaged, a thousand Athenian heavy infantry and fifteen hundred Argives (five hundred of whom were light troops furnished with armour by the Athenians), and one thousand of the allies,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same summer sailed from Athens in forty-eight ships, some of which were transports, under the command of Phrynichus, Onomacles, and Scironides, and putting into Samos crossed over and encamped at Miletus. Upon this, the Milesians came out to the number of eight hundred heavy infantry, with the Peloponnesians who had come with Chalcideus, and some foreign mercenaries of Tissaphernes, Tissaphernes himself

and his cavalry, and engaged the Athenians and their allies. While the Argives rushed forward on their own wing with the careless disdain of men advancing against Ionians who would never stand their charge, and were defeated by the Milesians with a loss little short of three hundred men, the Athenians first defeated the Peloponnesians, and driving before them the barbarians and the ruck of the army, without engaging the Milesians, who after the rout of the Argives retreated into the town upon seeing their comrades worsted, crowned their victory by grounding their arms under the very walls of Miletus. Thus, in this battle, the Ionians on both sides overcame the Dorians, the Athenians defeating the Peloponnesians opposed to them, and the Milesians the Argives. After setting up a trophy, the Athenians prepared to draw a wall round the place, which stood upon an isthmus; thinking that, if they could gain Miletus, the other towns also would easily come over to them.

正当希俄斯人作此考虑时，1,000名雅典重步兵、1,500名阿尔戈斯人（雅典人为其中500名轻步兵配备了盔甲）和1,000名盟军士兵在弗里尼胡斯、奥诺马克莱斯和希龙尼泽斯的指挥下，于同年夏季即将结束时，乘着48艘舰船从雅典驶来，其中有些是运输船。他们首先驶进萨摩斯，然后渡海来到米利都，在那里扎下了营盘。闻知此讯，米利都人带着总共800名重步兵，联合哈尔基泽夫斯带来的伯罗奔尼撒人、蒂萨费尔内斯雇来的一些外邦雇佣军以及他本人和他所率的骑兵，一同出来迎战雅典人及其盟军。阿尔戈斯人对从来都抵挡不住他们冲锋的人自然不放在眼里。他们那一翼冲上前去就进攻爱奥尼亚人，结果却被米利都人打败，损失了将近300人。雅典人则首先击败了伯罗奔尼撒人，尔后将他们面前的蛮族人和跟在后边的敌军打得落荒而逃，但他们没有与米利都人交战。米利都人打败阿尔戈斯人后，看到己方其他部队已经失利，马上退入城内。雅典人终于获胜，在米利都城下放下了武器。在这次战斗中，双方的爱奥尼亚人全都战胜了

多利亚人：雅典人打败了与之对抗的伯罗奔尼撒人，米利都人战胜了阿尔戈斯人。雅典人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后，准备绕着地峡之上这个地方修筑一道封锁墙。他们认为，只要能夺取米利都，其他城镇就很可能同样转向他们一边。

Meanwhile, about dusk tidings reached them that the fifty-five ships from Peloponnese and Sicily might be instantly expected. Of these the Siceliots, urged principally by the Syracusan Hermocrates to join in giving the finishing blow to the power of Athens, furnished twenty-two—twenty from Syracuse, and two from Silenus; and the ships that we left preparing in Peloponnese being now ready, both squadrons had been entrusted to Therimenes, a Lacedaemonian, to take to Astyochus, the admiral. They now put in first at Leros the island off Miletus, and from thence, discovering that the Athenians were before the town, sailed into the Iasic Gulf, in order to learn how matters stood at Miletus. Meanwhile, Alcibiades came on horseback to Teichiussa in the Milesian territory, the point of the gulf at which they had put in for the night, and told them of the battle in which he had fought in person by the side of the Milesians and Tissaphernes, and advised them, if they did not wish to sacrifice Ionia and their cause, to fly to the relief of Miletus and hinder its investment.

与此同时，大约在黄昏时分，他们得到的消息称，从伯罗奔尼撒和西西里来的55艘舰只预计很快到达。这些舰只有22艘是西凯利奥特人提供的，其中20艘来自叙拉古，2艘来自西莱努斯，他们主要是在叙拉古人赫莫克拉特斯的敦促下才参与到给雅典势力最后一击的行动中来的。前文提到的那些在伯罗奔尼撒进行准备的战舰，这时也已准备就绪。这两个海军中队都交给了斯巴达人塞里迈内斯，由他带到海军大将阿斯提奥胡斯那里。他们首先驶到米利都附近的莱罗斯岛。发

现雅典人在米利都城前之后，他们又从那里驶进了亚苏斯湾，以便了解米利都的情况。与此同时，亚西比德骑马赶到了米利都境内的蒂希乌萨，即他们曾驶入过夜的那个海湾的一处，向他们讲述了那场战斗的情况，因为他与米利都人和蒂萨费尔内斯曾并肩亲历了那场战斗。他建议他们，如果不想牺牲爱奥尼亚和他们的事业，那就火速前往援救米利都，阻止雅典人对它实施包围。

Accordingly, they resolved to relieve it the next morning. Meanwhile, Phrynichus, the Athenian commander, had received precise intelligence of the fleet from Leros, and when his colleagues expressed a wish to keep the sea and fight it out, flatly refused either to stay himself or to let them or any one else do so if he could help it. Where they could hereafter contend, after full and undisturbed preparation, with an exact knowledge of the number of the enemy's fleet and of the force which they could oppose to him, he would never allow the reproach of disgrace to drive him into a risk that was unreasonable. It was no disgrace for an Athenian fleet to retreat when it suited them;put it as they would, it would be more disgraceful to be beaten, and to expose the city not only to disgrace, but to the most serious danger. After its late misfortunes it could hardly be justified in voluntarily taking the offensive even with the strongest force, except in a case of absolute necessity: much less then without compulsion could it rush upon peril of its own seeking. He told them to take up their wounded as quickly as they could and the troops and stores which they had brought with them, and leaving behind what they had taken from the enemy's country, in order to lighten the ships, to sail off to Samos, and there concentrating all their ships to attack as opportunity served. As he spoke so he acted; and thus not now more than afterwards, nor in this alone but in all that he had to do with, did Phrynichus show himself a man of sense. In this way that very evening the Athenians

broke up from before Miletus, leaving their victory unfinished, and the Argives, mortified at their disaster, promptly sailed off home from Samos.

因此，他们决定次日一早便去援救米利都。这时候，雅典指挥官弗里尼胡斯已经从莱罗斯获悉了这支舰队的确切消息。尽管他的同僚们都希望留在海上与敌人一决高下，他却断然拒绝了，不但不同意自己留下，如果他能阻止，也不让他们或其他任何人这样做。今后无论在何处作战，在做好充分及万全的准备之后，如果知道敌舰的确切数量和与之对抗的敌军的人数，他决不会因为怕人说撤退可耻就违反理智去冒险。对于雅典舰队来说，在适合撤退的时候撤退，算不上什么耻辱，尽管有人会那样说；但如果战败了，不仅会使雅典城蒙羞，还会使它面临最严重的危险，那样才可耻。在遭遇了近期的惨败之后，即使拥有最强大的军队，也难有理由主动采取攻势行动，除非迫不得已必须这样做。如果不是形势所迫，而是自愿扑向危险之中，那就更无道理可言了。他要求他们尽快带上伤员、部队和他们携带的补给，丢掉在敌人境内获取的东西，以减轻舰船的负载，然后驶向萨摩斯，待他们的战舰全都集结到那里后，再伺机发动进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仅现在是这样，将来更是这样，而且不仅在这件事上，在他所参与的所有事中，弗里尼胡斯都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理智的人。当天傍晚，在未获全胜的情况下，雅典人就这样从米利都撤离了。阿尔戈斯人因惨遭失败而感到屈辱，迅速从萨摩斯启航返回本邦去了。

As soon as it was morning, the Peloponnesians weighed from Teichiussa and put into Miletus after the departure of the Athenians; they stayed one day, and on the next took with them the Chian vessels originally chased into port with Chalcideus, and resolved to sail back for the tackle which they had put on shore at Teichiussa. Upon their arrival Tissaphernes came to them with his

land forces and induced them to sail to Iasus, which was held by his enemy Amorges. Accordingly, they suddenly attacked and took Iasus, whose inhabitants never imagined that the ships could be other than Athenian. The Syracusans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most in the action. Amorges, a bastard of Pissuthnes and a rebel from the King, was taken alive and handed over to Tissaphernes, to carry to the King, if he chose, according to his orders: Iasus was sacked by the army, who found a very great booty there, the place being wealthy from ancient date. The mercenaries serving with Amorges the Peloponnesians received and enrolled in their army without doing them any harm, since most of them came from Peloponnese, and handed over the town to Tissaphernes with all the captives, bond or free, at the stipulated price of one Doric stater a head; after which they returned to Miletus. Pedaritus, son of Leon, who had been sent by the Lacedaemonians to take the command at Chios, they dispatched by land as far as Erythrae with the mercenaries taken from Amorges; appointing Philip to remain as governor of Miletus.

天一亮，伯罗奔尼撒人即从蒂希乌萨起锚，在雅典人撤离后驶入了米利都。他们在那里停留了一天，次日率哈尔基泽夫斯麾下原先那些被追进港口的希俄斯战舰，决定驶回去取他们放在蒂希乌萨岸上的装备。抵达蒂希乌萨后，蒂萨费尔内斯带着他的陆军赶来，劝他们驶往他的敌人阿莫尔耶斯占据的亚苏斯。于是，伯罗奔尼撒人突袭并攻下了亚苏斯，那里的居民绝没想到这些战舰不是雅典的。这次行动中，叙拉古人表现得最突出。背叛国王的阿莫尔耶斯是皮苏斯内斯的私生子，活捉后被交给蒂萨费尔内斯。如果蒂萨费尔内斯愿意，他可以依照命令把他交给国王。军队洗劫了亚苏斯，在那里掠取了大量战利品，因为那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富饶之地。伯罗奔尼撒人没有伤害在阿莫尔耶斯手下服役的雇佣军，而是把他们收编进了自己的军队，因为他们大多来自伯罗奔尼撒。至于这座城市以及所有的俘虏，不管

是奴隶还是自由民，他们统统交给了蒂萨费尔内斯。按照约定的价格，每个俘虏1个大流克金币。其后，他们返回了米利都。莱翁的儿子佩扎里图斯本是奉斯巴达人之命派到希俄斯担任指挥官的，伯罗奔尼撒人却派他带领从阿莫尔耶斯那里俘虏来的雇佣军由陆路远赴埃利色雷，腓力被指定为米利都的总督。

Summer was now over. The winter following, Tissaphernes put Iasus in a state of defence, and passing on to Miletus distributed a month's pay to all the ships as he had promised at Lacedaemon, at the rate of an Attic drachma a day for each man. In future, however, he was resolved not to give more than three obols, until he had consulted the King; when if the King should so order he would give, he said, the full drachma. However, upon the protest of the Syracusan general Hermocrates (for as Therimenes was not admiral, but only accompanied them in order to hand over the ships to Astyochus, he made little difficulty about the pay), it was agreed that the amount of five ships' pay should be given over and above the three obols a day for each man; Tissaphernes paying thirty talents a month for fifty-five ships, and to the rest, for as many ships as they had beyond that number, at the same rate.

夏季这时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冬季里，蒂萨费尔内斯令亚苏斯进入防御态势。接着，他前往米利都，按照他在斯巴达许下的诺言，给舰上所有人员发放了一个月的军饷，即每人每天1阿提卡德拉克马。但是，他决定以后每人每天不超过3奥卜尔，直到他请求过国王，而且国王也同意，他说他才会给足1德拉克马。然而，由于叙拉古将军赫莫克拉特斯反对（塞里迈内斯不是海军指挥官，只是跟随他们而来，以便把战舰交给阿斯提奥胡斯，所以他没有在军饷的问题上表示什么异议），后来达成一致意见：除了每人每天3奥卜尔之外，再支付一笔5条舰的款项。蒂萨费尔内斯每月付给55艘舰30塔兰特。超出

这一数目之外的其他舰只亦按相同比例发放。

The same winter, the Athenians in Samos, having been joined by thirty-five more vessels from home under Charminus, Strombichides, and Euctemon, called in their squadron at Chios and all the rest, intending to blockade Miletus with their navy, and to send a fleet and an army against Chios; drawing lots for the respective services. This intention they carried into effect; Strombichides, Onamacles, and Euctemon sailing against Chios, which fell to their lot, with thirty ships and a part of the thousand heavy infantry, who had been to Miletus, in transports; while the rest remained masters of the sea with seventy-four ships at Samos, and advanced upon Miletus.

同年冬季，哈尔米努斯、斯特罗姆维希泽斯和埃夫克泰蒙又率35艘战舰从雅典赶来增援萨摩斯的雅典人。他们召来在希俄斯的海军中队及其他所有舰只，打算借助海军封锁米利都，并派一支舰队和一支陆军部队去进攻希俄斯，指挥官们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各司何责。他们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践了。按照抽签结果，斯特罗姆维希泽斯、奥纳马克莱斯和埃夫克泰蒙率30艘战舰前去进攻希俄斯，再从曾到过米利都的那1,000名重步兵中抽调一部分乘运输船同往；其余将领留在海上，负责率领在萨摩斯的那74艘战舰进攻米利都。

Meanwhile, Astyochus, whom we left at Chios collecting the hostages required in consequence of the conspiracy, stopped upon learning that the fleet with Therimenes had arrived, and that the affairs of the league were in a more flourishing condition, and putting out to sea with ten Peloponnesian and as many Chian vessels, after a futile attack upon Pteleum, coasted on to

Clazomenae, and ordered the Athenian party to remove inland to Daphnus, and to join the Peloponnesians, an order in which also joined Tamos the king's lieutenant in Ionia. This order being disregarded, Astyochus made an attack upon the town, which was unwalled, and having failed to take it was himself carried off by a strong gale to Phocaea and Cuma, while the rest of the ships put in at the islands adjacent to Clazomenae—Marathussa, Pele, and Drymussa. Here they were detained eight days by the winds, and, plundering and consuming all the property of the Clazomenians there deposited, put the rest on shipboard and sailed off to Phocaea and Cuma to join Astyochus.

与此同时，前文曾提及，为了遏止阴谋事件，阿斯提奥胡斯正在希俄斯搜罗所需的人质。获悉塞里迈内斯率领的舰队已经到来，同盟的情况亦有所好转，他便罢了手，转而率领10艘伯罗奔尼撒舰和10艘希俄斯舰出了海。他攻打普泰莱夫姆未果，其后便沿着海岸航行到克拉佐曼纳，命令那里的亲雅典党人迁至内地的达夫努斯并加入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队。波斯国王在爱奥尼亚的官员塔莫斯也发布了同样的命令。由于这一命令没有得到响应，阿斯提奥胡斯进攻了这座没有城墙的城市，但他非但未将其攻克，自己反而被猛烈的大风吹向了福西亚和库迈，其余舰只则驶到了克拉佐曼纳附近的岛屿——马拉苏萨、佩莱和德里穆萨。“由于大风之故，他们在这里滞留了八天。他们劫掠和消耗了克拉佐曼纳人贮藏在那里的所有财物，将余下的装到舰上，然后驶向福西亚和库迈，以便与阿斯提奥胡斯会合。

While he was there, envoys arrived from the Lesbians who wished to revolt again. With Astyochus they were successful; but the Corinthians and the other allies being averse to it by reason of their former failure, he weighed anchor and set sail for Chios, where they eventually arrived from different quarters, the fleet

having been scattered by a storm. After this Pedaritus, whom we left marching along the coast from Miletus, arrived at Erythrae, and thence crossed over with his army to Chios, where he found also about five hundred soldiers who had been left there by Chalcideus from the five ships with their arms. Meanwhile, some Lesbians making offers to revolt, Astyochus urged upon Pedaritus and the Chians that they ought to go with their ships and effect the revolt of Lesbos, and s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heir allies, or, if not successful, at all events harm the Athenians. The Chians, however, turned a deaf ear to this, and Pedaritus flatly refused to give up to him the Chian vessels.

他在那里的时候，莱斯沃斯人派来的使者到了，莱斯沃斯人希望能再筹划一次反叛。他们成功说服了阿斯提奥胡斯，但科林斯人和其他盟友却因之前的失利不大情愿。于是，他便启航前往希俄斯。虽然舰队被风暴吹得七零八落，但所有舰只最终还是从各处赶到了那里。这之后，佩扎里图斯到达埃利色雷——前文曾提及，他是从米利都沿着海岸进发——率领他的军队从那里渡海开赴希俄斯。在希俄斯，他还碰上了约500名佩带武器的战士，即哈尔基泽夫斯率领的5艘战舰留在那里的人员。与此同时，一些莱斯沃斯人主动提出要反叛。阿斯提奥胡斯竭力劝说佩扎里图斯和希俄斯人，认为他们应当率战舰前去促成莱斯沃斯这次反叛，以便增加盟友的数量。即使不成功，至少也可以给雅典人造成一定冲击。然而，希俄斯人对此置若罔闻，佩扎里图斯更是断然拒绝把希俄斯人的战舰交给他。

Upon this, Astyochus took five Corinthian and one Megarian vessel, with another from Hermione, and the ships which had come with him from Laconia, and set sail for Miletus to assume his command as admiral; after telling the Chians with many threats that he would certainly not come and help them if they should be in

need. At Corycus in the Erythraeid he brought to for the night; the Athenian armament sailing from Samos against Chios being only separated from him by a hill, upon the other side of which it brought to; so that neither perceived the other. But a letter arriving in the night from Pedaritus to say that some liberated Erythraean prisoners had come from Samos to betray Erythrae, Astyochus at once put back to Erythrae, and so just escaped falling in with the Athenians. Here Pedaritus sailed over to join him; and after inquiry into the pretended treachery, finding that the whole story had been made up to procure the escape of the men from Samos, they acquitted them of the charge, and sailed away, Pedaritus to Chios and Astyochus to Miletus as he had intended.

于是，阿斯提奥胡斯就率5艘科林斯舰、1艘迈加拉舰、1艘海尔苗内舰以及从拉科尼亚带来的战舰驶向米利都，以就任舰队司令一职。启航之前，他以多重威胁的口吻告诉希俄斯人，他们若遇到危急情况，他肯定不来相助。在埃利色雷的科里库斯，他让舰队停下来过了一夜。从萨摩斯驶来进攻希俄斯的雅典军队就停泊在小山的另一边，因与他有一山之隔，彼此并未发现对方。但是，当天夜里他收到佩扎里图斯的一封信。信中说，一些获释的埃利色雷战俘已从萨摩斯出发，意欲出卖埃利色雷。阿斯提奥胡斯立即启航返回埃利色雷，这才没与雅典人相遇。佩扎里图斯也渡海来此与他会合。在调查了这次所谓的叛城事件之后，他们发现整个事情纯属捏造，目的是为了使那些从萨摩斯逃出来的人成功脱逃，于是他们撤销了对这些人的指控，然后各自驶离，佩扎里图斯驶向希俄斯，阿斯提奥胡斯按他原来的打算驶向米利都。

Meanwhile, the Athenian armament sailing round Corycus fell in with three Chian men-of-war off Arginus, and gave immediate chase. A great storm coming on, the Chians with difficulty took

refuge in the harbour; the three Athenian vessels most forward in the pursuit being wrecked and thrown up near the city of Chios, and the crews slain or taken prisoners. The rest of the Athenian fleet took refuge in the harbour called Phoenicus, under Mount Mimas, and from thence afterwards put into Lesbos and prepared for the work of fortification.

与此同时，在科里库斯周围航行的雅典军队在阿尔伊努斯附近遇上了3艘希俄斯战舰，他们立即展开了追击。后来，一场大风暴袭来，希俄斯人艰难地躲进了港口。冲在最前面进行追击的3艘雅典舰失事后流落到希俄斯城附近，舰上人员或被杀或被了。雅典舰队的其他舰只躲进了米马斯山下一个名叫菲尼库斯的港口，后来又从那里驶进莱斯沃斯，为修筑防御工事做准备。

The same winter, the Lacedaemonian Hippocrates sailed out from Peloponnese with ten Thurian ships under the command of Dorieus, son of Diagoras, and two colleagues, one Laconian and one Syracusan vessel, and arrived at Cnidus, which had already revolted at the instigation of Tissaphernes. When their arrival was known at Miletus, orders came to them to leave half their squadron to guard Cnidus, and with the rest to cruise round Triopium and seize all the merchantmen arriving from Egypt. Triopium is a promontory of Cnidus and sacred to Apollo. This coming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Athenians, they sailed from Samos and captured the six ships on the watch at Triopium, the crews escaping out of them. After this, the Athenians sailed into Cnidus and made an assault upon the town, which was unfortified, and all but took it; and the next day assaulted it again, but with less effect, as the inhabitants had improved their defences during the night, and had been reinforced by the crews escaped from the ships at Triopium. The Athenians

now withdrew, and after plundering the Cnidian territory sailed back to Samos.

同年冬季，斯巴达人希波克拉底带着由迪亚戈拉斯之子多里埃夫斯及其两位同僚所指挥的10艘图里战舰、1艘拉科尼亚战舰和1艘叙拉古战舰，从伯罗奔尼撒驶出后抵达尼多斯。在蒂萨费尔内斯的煽动下，尼多斯已经反叛。他们抵达的消息传到米利都后，下达给他们这个海军中队的命令是，留下一半战舰守卫尼多斯，其余战舰在特里奥皮乌姆周围巡航，截获从埃及驶入这个海域的所有商船。特里奥皮乌姆是尼多斯的一个海角，那里供奉着阿波罗神。雅典人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从萨摩斯驶来，缴获了在特里奥皮乌姆周围巡航的6艘舰只，但舰上的人员逃掉了。随后，雅典人驶入尼多斯，袭击了这座没有设防的城镇，几近将其攻克。翌日，他们再次向这座城发起进攻，但收效却不如前，因为居民们当夜加强了防御，并且得到了从特里奥皮乌姆战舰上逃出来的那些人的增援。雅典人当下开始撤离，在尼多斯境内进行了一番劫掠之后，驶回萨摩斯去了。

About the same time, Astyochus came to the fleet at Miletus. The Peloponnesian camp was still plentifully supplied, being in receipt of sufficient pay, and the soldiers having still in hand the large booty taken at Iasus. The Milesians also showed great ardour for the war. Nevertheless the Peloponnesians thought the first convention with Tissaphernes, made with Chalcideus, defective, and more advantageous to him than to them, and consequently while Therimenes was still there concluded another, which was as follows:

大约在同时，阿斯提奥胡斯来到了位于米利都的舰队。伯罗奔尼撒的军营依然供给充足，士兵们可以得到足够的军饷，他们手中仍有

从亚苏斯抢得的大量财物。米利都人也对战争充满了热情。然而，伯罗奔尼撒人却认为哈尔基泽夫斯与蒂萨费尔内斯之间所订立的第一个协定有漏洞，蒂萨费尔内斯比他们获益更多。因此，趁着塞里迈内斯仍在那里，他们又签订了一个协定，内容如下：

The convention of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 allies with King Darius and the sons of the King, and with Tissaphernes for a treaty and friendship, as follows:

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与大流士国王及其儿子以及蒂萨费尔内斯订立如下友好条约：

1．Neither the Lacedaemonians nor the allies of the Lacedaemonians shall make war against or otherwise injure any country or cities that belong to King Darius or did belong to his father or to his ancestors; neither shall the Lacedaemonians nor the allies of the Lacedaemonians exact tribute from such cities. Neither shall King Darius nor any of the subjects of the King make war against or otherwise injure the Lacedaemonians or their allies.

1．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不得向属于大流士国王或属于其父或其先祖的乡村或城市开战，或以其他方式对这些地方造成损害；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也不得向这些城市征收贡金；大流士国王或国王的任何臣民亦不得向斯巴达人或其盟友开战，或以其他方式对其造成损害。

2．If the Lacedaemonians or their allies should require any assistance from the King, or the King from the Lacedaemonians or

their allies, whatever they both agree upon they shall be right in doing.

2．斯巴达人或其盟友如需大流士国王提供任何援助，或大流士国王需要斯巴达人或其盟友提供任何援助，采取双方认可的任何步骤均属正当。

3．Both shall carry on jointly the war against the Athenians and their allies;and if they make peace, both shall do so jointly.

3．双方须联合起来与雅典人及其盟友作战。若要议和，双方亦须联合进行。

4．The expense of all troops in the King's country, sent for by the King, shall be borne by the King.

4．凡应国王之邀来国王境内的所有军队，其开支由国王承担。

5．If any of the states comprised in this convention with the King attack the King's country, the rest shall stop them and aid the King to the best of their power. And if any in the King's country or in the countries under the King's rule attack the country of the Lacedaemonians or their allies, the King shall stop it and help them to the best of his power.

5．与国王订立此协定的城邦中若有进犯国王之领土者，其余诸城邦应予以阻止，并倾其全力施以援手。国王境内或国王治下的任何属邦境内若有进犯斯巴达人或其盟友领土者，国王应予以制止，并倾其全力帮助斯巴达人及其盟友。

After this convention, Therimenes handed over the fleet to Astyochus, sailed off in a small boat, and was lost. The Athenian armament had now crossed over from Lesbos to Chios, and being master by sea and land began to fortify Delphinium, a place naturally strong on the land side, provided with more than one harbour, and also not far from the city of Chios. Meanwhile, the Chians remained inactive. Already defeated in so many battles, they were now also at discord among themselves; the execution of the party of Tydeus, son of Ion, by Pedaritus upon the charge of Atticism, followed by the forcible imposition of an oligarchy upon the rest of the city, having made them suspicious of one another; and they therefore thought neither themselves not the mercenaries under Pedaritus a match for the enemy. They sent, however, to Miletus to beg Astyochus to assist them, which he refused to do, and was accordingly denounced at Lacedaemon by Pedaritus as a traitor. Such was the state of the Athenian affairs at Chios; while their fleet at Samos kept sailing out against the enemy in Miletus, until they found that he would not accept their challenge, and then retired again to Samos and remained quiet.

这一协定签订后，塞里迈内斯将舰队交给阿斯提奥胡斯，自己则乘着一叶小舟离去，尔后不知去向。雅典军队此时已从莱斯沃斯渡海来到希俄斯。由于海上和陆地均已被控制，他们开始在德尔菲尼乌姆修筑要塞。这个地方的陆地一侧本身即很坚固，而且不止有一个港口，距希俄斯城也不远。这期间，希俄斯人一直没有什么动静。多次

作战失利之后，希俄斯人内部此时也产生了不和。伊翁之子蒂泽夫斯一党被佩扎里图斯以亲雅典罪判处死刑，城中余众继而被迫接受寡头统治，使得他们相互猜疑起来。鉴于此，他们认为，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佩扎里图斯手下的雇佣兵，均不是敌人的对手。不过，他们还是派人到米利都去请求阿斯提奥胡斯援助他们，但遭到了他的拒绝，佩扎里图斯因此写信给斯巴达，痛斥他为叛徒。这就是雅典人在希俄斯的情况。他们在萨摩斯的舰队陆续驶出进攻在米利都的敌人，后来发现敌人并不愿意应战，就退回到萨摩斯去了，没有再采取行动。

In the same winter, the twenty-seven ships equipped by the Lacedaemonians for Pharnabazus through the agency of the Megarian Calligeitus, and the Cyzicene Timagoras, put out from Peloponnese and sailed for Ionia about the time of the solstice, under the command of Antisthenes, a Spartan. With them the Lacedaemonians also sent eleven Spartans as advisers to Astyochus; Lichas, son of Arcesilaus, being among the number. Arrived at Miletus, their orders were to aid in generally superintending the good conduct of the war; to send off the above ships or a greater or less number to the Hellespont to Pharnabazus, if they thought proper, appointing Clearchus, son of Ramphias, who sailed with them, to the command; and further, if they thought proper, to make Antisthenes admiral, dismissing Astyochus, whom the letters of Pedaritus had caused to be regarded with suspicion. Sailing accordingly from Malea across the open sea, the squadron touched at Melos and there fell in with ten Athenian ships, three of which they took empty and burned. After this, being afraid that the Athenian vessels escaped from Melos might, as they in fact did, give information of their approach to the Athenians at Samos, they sailed to Crete, and having lengthened their voyage by way of precaution made land at Caunus in Asia, from whence considering themselves in safety they sent a message to the fleet at Miletus for a

convoy along the coast.

同年冬季，通过迈加拉人卡利伊图斯和基齐库斯人蒂马戈拉斯的斡旋，斯巴达人为法尔纳巴佐斯配备了27艘战舰。大约冬至时分，在斯巴达人安提西尼的指挥下，这些舰只从伯罗奔尼撒出发驶往爱奥尼亚。斯巴达人还派了十一名斯巴达人作为阿斯提奥胡斯的顾问与他们一同前往，斯巴达人阿凯西劳斯的儿子利哈斯也在其中。抵达米利都后，他们奉命共同督战，以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如需要，他们可派上述舰只或者数量更多或更少的战舰开赴赫勒斯滂支援法尔纳巴佐斯，并任命与他们同行的拉姆菲亚斯之子克莱阿尔胡斯为指挥官；此外，如果他们认为合适，还可解除阿斯提奥胡斯的舰队司令之职，由安提西尼取而代之，因为佩扎里图斯的信件使他们对阿斯提奥胡斯产生了怀疑。于是，这个海军中队从马莱阿启程，渡过公海，在梅卢斯靠了岸。他们在那里与10艘雅典舰相遇，缴获了3艘空舰，并将其焚毁。这之后，由于担心从梅卢斯逃走的雅典舰把他们到来的消息告诉在萨摩斯的雅典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们驶向了克里特岛。出于谨慎，他们延长了航程，在亚细亚的卡夫努斯登陆。他们认为在那里很安全，便从那里派人送信给驻扎在米利都的舰队，要求沿海岸为其护航。

Meanwhile, the Chians and Pedaritus, undeterred by the backwardness of Astyochus, went on sending messengers pressing him to come with all the fleet to assist them against their besiegers, and not to leave the greatest of the allied states in Ionia to be shut up by sea and overrun and pillaged by land. There were more slaves at Chios than in any one other city except Lacedaemon, and being also by reason of their numbers punished more rigorously when they offended, most of them, when they saw the Athenian armament firmly established in the island with a fortified position, immediately deserted to the enemy, and through their knowledge of

the country did the greatest mischief. The Chians therefore urged upon Astyochus that it was his duty to assist them, while there was still a hope and a possibility of stopping the enemy's progress, while Delphinium was still in process of fortification and unfinished, and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a higher rampart which was being added to protect the camp and fleet of their besiegers. Astyochus now saw that the allies also wished it and prepared to go, in spite of his intention to the contrary owing to the threat already referred to.

这期间，尽管阿斯提奥胡斯不愿提供支援，但希俄斯人和佩扎里图斯毫不气馁，不断派信使向他施压，催他率领整个舰队协助他们反击围攻之敌，不要听凭爱奥尼亚境内最大的盟邦遭遇敌人的海上封锁和陆上劫掠。除了斯巴达之外，希俄斯比其他任何一个城邦拥有的奴隶都多。正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所以他们违规时遭到的惩罚也更严厉。看到雅典军队在修了筑垒阵地的岛上稳扎下来，大部分人立即逃向了雅典人一边。由于对这一地区了如指掌，他们给希俄斯人造成的危害最大。鉴于此，希俄斯人竭力劝说阿斯提奥胡斯，趁着仍有阻止敌人继续向前推进的希望与可能，德尔菲尼乌姆仍在修建之中的要塞尚未完工，围攻者用以保护其营地和舰队而加筑的更高的壁垒还未建成，他应当履行援助他们的责任。由于出现过上文提及的威胁，阿斯提奥胡斯本无意相助，现在看到连盟邦也希望他伸出援手，他便准备前往。

In the meantime, news came from Caunus of the arrival of the twenty-seven ships with the Lacedaemonian commissioners; and Astyochus, postponing everything to the duty of convoying a fleet of that importance, in order to be more able to command the sea, and to the safe conduct of the Lacedaemonians sent as spies over his behaviour, at once gave up going to Chios and set sail for Caunus. As he coasted along he landed at the Meropid Cos and sacked the

city, which was unfortified and had been lately laid in ruins by an earthquake, by far the greatest in living memory, and, as the inhabitants had fled to the mountains, overran the country and made booty of all it contained, letting go, however, the free men. From Cos arriving in the night at Cnidus he was constrained by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nidians not to disembark the sailors, but to sail as he was straight against the twenty Athenian vessels, which with Charminus, one of the commanders at Samos, were on the watch for the very twenty-seven ships from Peloponnese which Astyochus was himself sailing to join; the Athenians in Samos having heard from Melos of their approach, and Charminus being on the look-out off Syme, Chalce, Rhodes, and Lycia, as he now heard that they were at Caunus.

与此同时，卡夫努斯传来消息说，斯巴达来的特派员和27艘战舰已经抵达。为了增强海上控制力，阿斯提奥胡斯须暂时搁置所有事情，先去履行为如此重要的一支舰队护航之责，将奉命前来监视其行为的那些斯巴达人的安全放在首位，所以他立即放弃了前往希俄斯的想法，扬帆驶向卡夫努斯。沿着海岸航行期间，他在迈罗皮德-科斯登陆，洗劫了那座城市。这座城没有设防，不久前刚刚毁于人们记忆中最严重的一次地震。由于城内居民已逃往山中，他的军队践踏了乡村地带，将那里的一切抢劫一空，只放走了自由民。当天夜里，他又从科斯来到尼多斯。由于受尼多斯人的抗议所限，他没有让水手们上岸，而是直接攻向了哈尔米努斯率领的那20艘雅典舰。哈尔米努斯是驻扎在萨摩斯的雅典指挥官之一，他所监视的目标正是阿斯提奥胡斯要与之会合的那27艘伯罗奔尼撒战舰。在萨摩斯的雅典人已经从梅卢斯处获悉了那27艘战舰即将到来的消息，哈尔米努斯这时已得知它们在卡夫努斯，所以便守候在西迈、卡尔西、罗得和利西亚附近。

Astyochus accordingly sailed as he was to Syme, before he was

heard of, in the hope of catching the enemy somewhere out at sea. Rain, however, and foggy weather encountered him, and caused his ships to straggle and get into disorder in the dark. In the morning his fleet had parted company and was most of it still straggling round the island, and the left wing only in sight of Charminus and the Athenians, who took it for the squadron which they were watching for from Caunus, and hastily put out against it with part only of their twenty vessels, and attacking immediately sank three ships and disabled others, and had the advantage in the action until the main body of the fleet unexpectedly hove in sight, when they were surrounded on every side. Upon this, they took to flight, and after losing six ships with the rest escaped to Teutlussa or Beet Island, and from thence to Halicarnassus. After this, the Peloponnesians put into Cnidus and, being joined by the twenty-seven ships from Caunus, sailed all together and set up a trophy in Syme, and then returned to anchor at Cnidus.

因此，阿斯提奥胡斯在人们获悉他的行踪之前就驶向了西迈，希望能在海上某处截住敌舰。但是，由于遇上了大雾天气，他那些战舰迷失了方向，在黑暗中陷入了一片混乱。到了早晨，舰队已经队形散乱，多数仍在岛的周围漂荡，只有左翼进入了哈尔米努斯和雅典人的视界之内。他们误以为这就是他们等候的那个从卡夫努斯驶来的海军中队，赶紧从自己那20艘战舰中抽调出一部分向其攻去，甫一进攻即击沉3艘敌舰，并使其他敌舰丧失了战斗力。在战斗中，他们一直占上风，及至敌舰队的主力出乎意料地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才发现自己已被包围。一见此状，他们紧急撤逃。在损失了6艘舰只之后，他们带着其余战舰逃到泰夫特卢萨，或曰比特岛，从那里又向哈利卡尔纳苏斯逃去。此战之后，伯罗奔尼撒人进入尼多斯，在那里与从卡夫努斯驶来的27艘舰会合后，所有战舰一起驶出，在西迈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然后又返回停泊在尼多斯了。

As soon as the Athenians knew of the sea-fight, they sailed with all the ships at Samos to Syme, and, without attacking or being attacked by the fleet at Cnidus, took the ships' tackle left at Syme, and touching at Lorymi on the mainland sailed back to Samos. Meanwhile, the Peloponnesian ships, being now all at Cnidus, underwent such repairs as were needed; while the eleven Lacedaemonian commissioners conferred with Tissaphernes, who had come to meet them, upon the points which did not satisfy them in the past transactions, and upon the best and mutually most advantageous manner of conducting the war in future. The severest critic of the present proceedings was Lichas, who said that neither of the treaties could stand, neither that of Chalcideus, nor that of Therimenes; it being monstrous that the King should at this date pretend to the possession of all the country formerly ruled by himself or by his ancestors—a pretension which implicitly put back under the yoke all the islands—Thessaly, Locris, and everything as far as Boeotia—and made the Lacedaemonians give to the Hellenes instead of liberty a Median master. He therefore invited Tissaphernes to conclude another and a better treaty, as they certainly would not recognize those existing and did not want any of his pay upon such conditions. This offended Tissaphernes so much that he went away in a rage without settling anything.

雅典人得知这次海战的消息后，随即率领在萨摩斯的所有战舰驶向西迈。不过，他们没有向尼多斯的敌舰队发起进攻，也没有遭到对方的攻击，而是带上留在西迈的船具，在大陆上的洛里米作了短暂停靠，然后又驶回萨摩斯去了。在此期间，伯罗奔尼撒人的战舰全都集中在尼多斯进行了必要的修理。同时，那十一位斯巴达特派员与前来与他们相见的蒂萨费尔内斯就过去协议中令他们不满意的条款进行了协商，另讨论了将来如何进行战争最有效，对双方最有利。对现行做法批评最严苛的是利哈斯。他说，无论是哈尔基泽夫斯所签订的条

约，还是塞里迈内斯所签订的条约，全都站不住脚。他认为，如果波斯国王时至今日还声称拥有他自己或其祖先过去所统治的所有领土，无疑意味着使所有岛屿——色萨利、洛克里斯以及维奥蒂亚的所有领土——复归被奴役的状态。那样一来，斯巴达人带给希腊人的将不是解放，而是波斯人的统治，这岂不太荒谬了。因此，他恳请蒂萨费尔内斯另外签订一份更合适的条约，因为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现有的条约，也不愿基于这些条件接受波斯国王的任何财政援助。这一主张激怒了蒂萨费尔内斯，他没有谈妥任何问题就愤然离去了。

CHAPTER XXV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Years of the War—Intrigues of Alcibiades—Withdrawal of the Persian Subsidies—Oligarchical Coup d'Etat at Athens—Patriotism of the Army at Samos

第二十五章　战争第二十年和第二十一年——亚西比德的阴谋——波斯财政援助的撤销——雅典寡头党的政变——驻萨摩斯岛军队的爱国主义行为

The Peloponnesians now determined to sail to Rhodes, upon the invitation of some of the principal men there, hoping to gain an island powerful by the number of its seamen and by its land forces, and also thinking that they would be able to maintain their fleet from their own confederacy, without having to ask for money from Tissaphernes. They accordingly at once set sail that same winter from Cnidus, and first put in with ninety-four ships at Camirus in the Rhodian country, to the great alarm of the mass of the inhabitants, who were not privy to the intrigue, and who consequently fled, especially as the town was unfortified. They were afterwards, however, assembled by the Lacedaemonians together wit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wo other towns of Lindus and Ialysus; and the Rhodians were persuaded to revolt from the Athenians and

the island went over to the Peloponnesians.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had received the alarm and set sail with the fleet from Samos to forestall them, and came within sight of the island, but being a little too late sailed off for the moment to Chalce, and from thence to Samos, and subsequently waged war against Rhodes, issuing from Chalce, Cos, and Samos.

伯罗奔尼撒人这时决定应罗得岛一些领导人之邀驶往那里，希望藉此获得一个拥有众多水手和庞大陆军的强大岛屿。他们认为，这样还可以不必再向蒂萨费尔内斯讨要资金，从自己的盟邦即可获得维持舰队的费用。因此，他们在这个冬季马上从尼多斯启航，首先率领94艘舰只开进了罗得境内的卡米鲁斯。城里的居民事先对这一图谋并不知情，因而大为惊恐，尤其是因为这座城没有设守，于是纷纷出逃。不过，斯巴达人后来将他们与林都斯和亚利苏斯两城的居民召集到一起，说服罗得人叛离了雅典人，罗得岛就此转向伯罗奔尼撒人一边。其间，雅典人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便率舰队从萨摩斯启航前去阻止，罗得岛已在视线范围内了，可还是稍晚了一步，所以就暂时驶往卡尔西，又从那里回到了萨摩斯，后来便从卡尔西、科斯和萨摩斯出兵对罗得开战。

The Peloponnesians now levied a contribution of thirty-two talents from the Rhodians, after which they hauled their ships ashore and for eighty days remained inactive. During this time, and even earlier, before they removed to Rhodes, the following intrigues took place. After the death of Chalcideus and the battle at Miletus, Alcibiades began to be suspected by the Peloponnesians; and Astyochus received from Lacedaemon an order from them to put him to death, he being the personal enemy of Agis, and in other respects thought unworthy of confidence. Alcibiades in his alarm first withdrew to Tissaphernes, and immediately began to do all he

could with him to injure the Peloponnesian cause. Henceforth becoming his adviser in everything, he cut down the pay from an Attic drachma to three obols a day, and even this not paid too regularly; and told Tissaphernes to say to the Peloponnesians that the Athenians, whose maritime experience was of an older date than their own, only gave their men three obols, not so much from poverty as to prevent their seamen being corrupted by being too well off, and injuring their condition by spending money upon enervating indulgences, and also paid their crews irregularly in order to have a security against their deserting in the arrears which they would leave behind them. He also told Tissaphernes to bribe the captains and generals of the cities, and so to obtain their connivance—an expedient which succeeded with all except the Syracusans, Hermocrates alone opposing him on behalf of the whole confederacy. Meanwhile, the cities asking for money Alcibiades sent off, by roundly tell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issaphernes that it was great impudence in the Chians, the richest people in Hellas, not content with being defended by a foreign force, to expect others to risk not only their lives but their money as well in behalf of their freedom; while the other cities, he said, had had to pay largely to Athens before their rebellion, and could not justly refuse to contribute as much or even more now for their own selves.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issaphernes was at present carrying on the war at his own charges, and had good cause for economy, but that as soon as he received remittances from the king he would give them their pay in full and do what was reasonable for the cities.

伯罗奔尼撒人这时从罗得人那里筹得了32塔兰特。筹到款后，他们把战舰拖到岸上，八十天没有出动。在此期间，甚至更早一些，在他们开赴罗得之前，以下阴谋活动就已秘密进行。哈尔基泽夫斯战死和米利都之战以后，伯罗奔尼撒人即开始对亚西比德产生怀疑。阿斯

提奥胡斯甚至收到了他们从斯巴达发来的命令，要求他将其处死，因为亚西比德是亚基斯的私敌；另外，人们认为他在其他方面也不值得信任。惊恐之下，亚西比德首先逃到蒂萨费尔内斯那里，随即开始不遗余力地破坏伯罗奔尼撒人的事业。从此以后，他凡事都为蒂萨费尔内斯出谋划策。他把士兵的军饷从每天1阿提卡德拉克马减少到每天3奥卜尔，即便这样也很难按期支付；他让蒂萨费尔内斯对伯罗奔尼撒人说，雅典人的海上经验比他们丰富得多，他们给士兵的军饷也不过一天3奥卜尔，这不是因为他们穷得给不起，而是为了防止水兵们因为手头宽裕而堕落，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他们花钱纵欲而损害健康。另外，雅典人也不按期付给士兵们军饷，目的是以欠款作抵押，以防他们开小差。他还让蒂萨费尔内斯去贿赂各城邦的舰长和将军，以便获得他们的默许——除了叙拉古人之外，这一计策在所有人那里都获得了成功。唯有赫莫克拉特斯一人代表整个同盟对亚西比德表示反对。同时，他还把那些要求获得资金援助的各城邦使者遣回，并以蒂萨费尔内斯的名义严厉地对他们说，作为希腊最富有的人，希俄斯人竟然不满足于外邦军队提供的防御力量，不但期望别人为了他们的自由去冒生命危险，还要求别人提供金钱，未免太厚颜无耻了。对于其他城邦，他则说，在反叛之前，他们还得向雅典人缴纳大量贡金，现在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应该同意贡献同样数量或更多的资金才对。他还指出，蒂萨费尔内斯现在是自己出钱在打仗，所以完全有理由节约开支。但是，他承诺一收到波斯国王送来的资金，就会全额发给他们，以满足各城邦的合理要求。

Alcibiades further advised Tissaphernes not to be in too great a hurry to end the war, or to let himself be persuaded to bring up the Phoenician fleet which he was equipping, or to provide pay for more Hellenes, and thus put the power by land and sea into the same hands; but to leave each of the contending parties in possession of one element, thus enabling the king when he found one troublesome to call in the other. For if the command of the sea and land were united in one hand, he would not know where to

turn for help to overthrow the dominant power; unless he at last chose to stand up himself, and go through with the struggle at great expense and hazard. The cheapest plan was to let the Hellenes wear each other out, at a small share of the expense and without risk to himself. Besides, he would find the Athenians the most convenient partners in empire as they did not aim at conquests on shore, and carried on the war upon principles and with a practice most advantageous to the King; being prepared to combine to conquer the sea for Athens, and for the King all the Hellenes inhabiting his country, whom the Peloponnesians, on the contrary, had come to liberate. Now it was not likely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would free the Hellenes from the Hellenic Athenians, without freeing them also from the barbarian Mede, unless overthrown by him in the meanwhile. Alcibiades therefore urged him to wear them both out at first, and, after docking the Athenian power as much as he could, forthwith to rid the country of the Peloponnesians. In the main Tissaphernes approved of this policy, so far at least as could be conjectured from his behaviour; since he now gave his confidence to Alcibiades in recognition of his good advice, and kept the Peloponnesians short of money, and would not let them fight at sea, but ruined their cause by pretending that the Phoenician fleet would arrive, and that they would thus be enabled to contend with the odds in their favour, and so made their navy lose its efficiency, which had been very remarkable, and generally betrayed a coolness in the war that was too plain to be mistaken.

亚西比德还建议蒂萨费尔内斯不要太急于结束战争，不要听信他言把他正在装备的腓尼基舰队调上战场，也不要再向更多的希腊人支付军饷，因为那样会使陆上优势和海上优势集于一方之手，正确做法是应当让作战双方各拥有一项优势。这样，国王若发现一方比较难缠，他可以把另外一方召来。如果海上和陆上控制权集于一方之手，

他就会不知到何方寻求帮助以瓦解统治势力，除非他最终选择自己站出来，以巨额费用和巨大风险为代价战斗到底。最划算的办法就是让希腊人彼此拖垮对方。这样花费不多，自己也不冒风险。此外，他会发现雅典人在扩展帝国的疆土方面是最合宜的伙伴，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在岸上进行征服，进行战争时所奉行的原则和采取的做法对国王最为有利。因此，要准备与之联合起来，以达到为雅典征服海洋和为国王征服所有居住在其领土上的希腊人之目的。伯罗奔尼撒人则相反，他们是来解放这些希腊人的。既如此，斯巴达人不可能只将希腊人从同属希腊的雅典人手里解放出来，而不使他们摆脱属于外族的波斯人，除非他能同时将他们除掉。因此，亚西比德劝他首先消耗双方的力量，在尽可能地消耗了雅典人的力量之后，毫不拖延地将伯罗奔尼撒人赶出境内。蒂萨费尔内斯基本上赞成这一计策，至少从他的行为上看是这样。由于亚西比德贡献了良策，他现在很信任他，所以一直不向伯罗奔尼撒人足数提供金钱，不让他们在海上作战，而是一味谎称腓尼基的舰队即将到达，届时再战将会胜券在握。他就这样对他们的事业造成了破坏，并使他们的海军丧失了曾经很强的作战效能。总之，他明显无误地对这场战争表现出了冷漠的态度。

Alcibiades gave this advice to Tissaphernes and the King, with whom he then was, not merely because he thought it really the best, but because he was studying means to effect his restoration to his country, well knowing that if he did not destroy it he might one day hope to persuade the Athenians to recall him, and thinking that his best chance of persuading them lay in letting them see that he possessed the favour of Tissaphernes. The event proved him to be right. When the Athenians at Samos found that he had influence with Tissaphernes, principally of their own motion (though partly also through Alcibiades himself sending word to their chief men to tell the best men in the army that, if there were only an oligarchy in the place of the rascally democracy that had banished him, he would be glad to return to his country and to make Tissaphernes

their friend), the captains and chief men in the armament at once embraced the idea of subverting the democracy.

亚西比德当时与蒂萨费尔内斯和国王在一起。他向他们提出这一建议，不单是因为他认为这的确是上上策，同时也是因为他正在谋划复归本邦的办法。他非常清楚，如果他不将其毁灭，有朝一日他或许有望说服雅典人将他召回。他认为，他最有可能说服他们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蒂萨费尔内斯对他青眼有加。事情的发展证明他所料不错。在萨摩斯的雅典人发现他对蒂萨费尔内斯具有影响之后，军中各位舰长和主要人物，主要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尽管部分原因是由于亚西比德传话给那些主要人物，让他们告诉军中的优秀士兵，只要有一个寡头政权取代将他放逐的卑鄙民主制度，他就乐意回到自己的城邦，并使蒂萨费尔内斯成为他们的朋友），立刻接受了颠覆民主制度的想法。

The design was first mooted in the camp, and afterwards from thence reached the city. Some persons crossed over from Samos and had an interview with Alcibiades, who immediately offered to make first Tissaphernes, and afterwards the King, their friend, if they would give up the democracy and make it possible for the King to trust them. The higher class, who also suffered most severely from the war, now conceived great hopes of getting the government into their own hands, and of triumphing over the enemy. Upon their return to Samos the emissaries formed their partisans into a club, and openly told the mass of the armament that the King would be their friend, and would provide them with money, if Alcibiades were restored and the democracy abolished. The multitude, if at first irritated by these intrigues, were nevertheless kept quiet by the advantageous prospect of the pay from the King; and the oligarchical conspirators, after making this communication to the

people, now re-examined the proposals of Alcibiades among themselves, with most of their associates. Unlike the rest, who thought them advantageous and trustworthy, Phrynichus, who was still general, by no means approved of the proposals. Alcibiades, he rightly thought, cared no more for an oligarchy than for a democracy, and only sought to change the institutions of his country in order to get himself recalled by his associates; while for themselves their one object should be to avoid civil discord. It was not the King's interest, when the Peloponnesians were now their equals at sea, and in possession of some of the chief cities in his empire, to go out of his way to side with the Athenians whom he did not trust, when he might make friends of the Peloponnesians who had never injured him. And as for the allied states to whom oligarchy was now offered, because the democracy was to be put down at Athens, he well knew that this would not make the rebels come in any the sooner, or confirm the loyal in their allegiance; as the allies would never prefer servitude with an oligarchy or democracy to freedom with the constitution which they actually enjoyed, to whichever type it belonged. Besides, the cities thought that the so-called better classes would prove just as oppressive as the commons, as being those who originated, proposed, and for the most part benefited from the acts of the commons injurious to the confederates. Indeed, if it depended on the better classes, the confederates would be put to death without trial and with violence; while the commons were their refuge and the chastiser of these men. This he positively knew that the cities had learned by experience, and that such was their opinion. The propositions of Alcibiades, and the intrigues now in progress, could therefore never meet with his approval.

这一阴谋发端于军营，后来又从那里传到了雅典。有些人从萨摩

斯渡海前去与亚西比德会谈。亚西比德立即提出，如果他们放弃民主政治，让国王能够信任他们，他会首先使蒂萨费尔内斯成为他们的朋友，继而让波斯国王也成为他们的朋友。上层阶级，同时也是在战争中受损失最严重的阶级，这时非常希望政权能落入己手，进而战胜敌人。这些人一回到萨摩斯，马上就召集自己的党羽组成了一个政治集团，并公开向广大士兵们宣布，若能召回亚西比德，废除民主政治，波斯国王就会成为他们的朋友，还会向他们提供金钱。“广大士兵对这些阴谋起初虽有些气恼，但因为有望从国王那里得到军饷这一好处，他们就安静下来了。主张寡头政治的密谋者将这一情况告知民众后，随即开始与大多数共谋者再度讨论亚西比德的提议。“其他人都觉得这些提议是有利的，也非常可信；当时仍担任将军的弗里尼胡斯却力排众议，决不赞成。“他不无道理地认为，亚西比德既不在乎寡头政治，也不在乎民主政治，他所求的唯有改变城邦的政体，以使他的同党能把他召回来。对他们自己而言，唯一的目标则应当是避免发生内乱。伯罗奔尼撒人如今在海上已与他们势均力敌，并且控制着波斯帝国境内的一些主要城市，波斯国王又不是不可以与从未伤害过他的伯罗奔尼撒人建立友好关系，这时候他反倒站在他不信任的雅典人一边，这不符合他的利益。至于那些盟邦，由于雅典要推翻民主政治，因而也建议它们实行寡头政治，但弗里尼胡斯很清楚，这样既不会使已经叛离的城邦更快地重返同盟，也不会增强它们的忠诚度，因为它们宁愿在现有的政体下享有自由——无论这种政体属于哪一类，也不愿在寡头政治或民主政治统治下遭受奴役。此外，各个城邦还会认为，所谓更好的阶级，将会同平民阶级一样实行压迫，因为平民阶级那些有损于盟友的行为正是他们发起和提出的，他们从中获益也最大。实际上，如果依靠所谓更好的阶级，盟友们不经审讯就会被残暴地处死；而平民阶级则是他们的庇护者和这些人的惩罚者。他确信这是各个城邦从经验中汲取的教训，也是其所思所想。鉴于此，他决不赞成亚西比德的提议和目前正在进行的阴谋活动。

However, the members of the club assembled, agreeably to their original determination, accepted what was proposed, and

prepared to send Pisander and others on an embassy to Athens to trea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Alcibiades 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democracy in the city, and thus to make Tissaphernes the friend of the Athenians.

然而，到会的政治集团成员却愿意坚持最初的决定，接受了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准备派皮桑泽尔和其他人作为使者去雅典，前去磋商召回亚西比德和废除城邦的民主政治事宜，以使蒂萨费尔内斯成为雅典人的朋友。

Phrynichus now saw that there would be a proposal to restore Alcibiades, and that the Athenians would consent to it; and fearing after what he had said against it that Alcibiades, if restored, would revenge himself upon him for his opposition, had recourse to the following expedient. He sent a secret letter to the Lacedaemonian admiral Astyochus, who was still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Miletus, to tell him that Alcibiades was ruining their cause by making Tissaphernes the friend of the Athenians, and containing an express revelation of the rest of the intrigue, desiring to be excused if he sought to harm his enemy even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terests of his country. However, Astyochus, instead of thinking of punishing Alcibiades, who, besides, no longer ventured within his reach as formerly, went up to him and Tissaphernes at Magnesia, communicated to them the letter from Samos, and turned informer, and, if report may be trusted, became the paid creature of Tissaphernes, undertaking to inform him as to this and all other matters; which was also the reason why he did not remonstrate more strongly against the pay not being given in full. Upon this Alcibiades instantly sent to the authorities at Samos a letter against Phrynichus, stating what he had done, and requiring that he should

be put to death. Phrynichus distracted, and placed in the utmost peril by the denunciation, sent again to Astyochus, reproaching him with having so ill kept the secret of his previous letter, and saying that he was now prepared to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of destroying the whole Athenian armament at Samos; giving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means which he should employ, Samos being unfortified, and pleading that, being in danger of his life on their account, he could not now be blamed for doing this or anything else to escape being destroyed by his mortal enemies. This also Astyochus revealed to Alcibiades.

弗里尼胡斯此时已意识到，一定会有人提议将亚西比德召回，而且雅典人也会同意这样做。令他担心的是，在他提出反对意见之后，亚西比德若真能回来，必会因为他曾表示反对而对他进行报复。于是，他采取了如下做法：他给仍在米利都附近的斯巴达海军大将阿斯提奥胡斯送去一封密信，在信中对他说，亚西比德正在设法使蒂萨费尔内斯成为雅典人的朋友，企图以此毁灭他们的事业。他还在信中明确透漏了有关这一阴谋的其他细节，同时希望对方谅解自己为了损及私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城邦利益的做法。然而，阿斯提奥胡斯非但无意惩罚亚西比德（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他所及的范围内贸然行事了），反而到马格尼西亚去见了亚西比德和蒂萨费尔内斯，将萨摩斯来信一事转告了他们。如果传闻足以为信，他自己竟变成告密者，成了蒂萨费尔内斯的有偿工具，答应将这件事以及其他所有的事都报告给他，这也是他没有对不发全饷一事比较激烈地表示反对的原因。闻知此事后，亚西比德即刻派人给萨摩斯当局送去一封对弗里尼胡斯不利的信，陈述了他的所作所为，请求将他处死。这一指控使得弗里尼胡斯甚为不安，并且使他陷入了极为危险的境地。他又给阿斯提奥胡斯送去一封信，责备他没有为他的前一封信保密，还说他现在准备再给他们一次消灭驻扎在萨摩斯的全部雅典军队的机会。由于萨摩斯没有设防，他详细讲述了阿斯提奥胡斯应当采取何方案。他还辩解说，由于他的生命因他们之故危在旦夕，如今他做这事或其他什么事，谁

都不能责备他，以免他被自己的死敌所灭。阿斯提奥胡斯又把这封信的内容透漏给了亚西比德。

Meanwhile, Phrynichus having had timely notice that he was playing him false, and that a letter on the subject was on the point of arriving from Alcibiades, himself anticipated the news, and told the army that the enemy, seeing that Samos was unfortified and the fleet not all stationed within the harbour, meant to attack the camp, that he could be certain of this intelligence, and that they must fortify Samo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generally look to their defences.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he was general, and had himself authority to carry out these measures. Accordingly, they addressed themselves to the work of fortification, and Samos was thus fortified sooner than it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Not long afterwards came the letter from Alcibiades, saying that the army was betrayed by Phrynichus, and the enemy about to attack it. Alcibiades, however, gained no credit, it being thought that he was in the secret of the enemy's designs, and had tried to fasten them upon Phrynichus, and to make out that he was their accomplice, out of hatred; and consequently far from hurting him he rather bore witness to what he had said by this intelligence.

与此同时，弗里尼胡斯及时得知了阿斯提奥胡斯在骗他，知道亚西比德马上就有信来谈及此事。于是，他抢在消息到达之前晓谕全军，敌人看到萨摩斯没有设防，舰队也没有全部停到港内，所以打算来袭击军营。他还说，他对这一消息确有把握，他们必须尽快在萨摩斯修筑工事，普遍注意防守。不要忘记，他当时是将军，他本人就有权实施这些措施。于是，他们开始修筑防御工事。这样，萨摩斯设防就比原本早了一些。不久之后，亚西比德的信到了。信上说，雅典军队已经被弗里尼胡斯出卖，敌人即将来攻。然而，亚西比德的话却无

人相信。大家认为，他参与了敌人的阴谋，却要把阴谋之罪强加到弗里尼胡斯头上，企图使人相信他是他们的同谋。结果，亚西比德送来的这一情报远未伤到弗里尼胡斯，反而印证了他所说的话。

After this Alcibiades set to work to persuade Tissaphernes to become the friend of the Athenians. Tissaphernes, although afraid of the Peloponnesians because they had more ships in Asia than the Athenians, was yet disposed to be persuaded if he could, especially after his quarrel with the Peloponnesians at Cnidus about the treaty of Therimenes. The quarrel had already taken place, as the Peloponnesians were by this time actually at Rhodes; and in it the original argument of Alcibiades touching the liberation of all the towns by the Lacedaemonians had been verified by the declaration of Lichas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submit to a convention which made the King master of all the states at any former time ruled by himself or by his fathers.

此事过后，亚西比德开始劝蒂萨费尔内斯与雅典人为友。由于伯罗奔尼撒人在亚细亚的战舰比雅典人的多，蒂萨费尔内斯的确伯罗奔尼撒人。尽管如此，如果他有办法做到，他还是愿意接受劝说的，特别是他与伯罗奔尼撒人因塞里迈内斯条约在尼多斯发生争执之后。“那场争执早已发生了，因为伯罗奔尼撒人这时实际上已在罗得。关于这个问题，亚西比德原先提出的观点，即斯巴达人将解放所有城镇这一点，也已经为利哈斯所证实。他宣称，任何允许国王统治他本人或其祖先过去统治的所有城邦的协定都是不能容忍的。

While Alcibiades was besieging the favour of Tissaphernes with an earnestness proportioned to the greatness of the issue, the Athenian envoys who had been dispatched from Samos with

Pisander arrived at Athens, and made a speech before the people, giving a brief summary of their views, and particularly insisting that, if Alcibiades were recalled and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 changed, they could have the King as their ally, and would be able to overcome the Peloponnesians. A number of speakers opposed them on the question of the democracy, the enemies of Alcibiades cried out against the scandal of a restoration to be effected by a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Eumolpidae and Ceryces protested in behalf of the mysteries, the cause of his banishment, and called upon the gods to avert his recall; when Pisander, in the midst of much opposition and abuse, came forward, and taking each of his opponents aside asked him the following question: In the face of the fact that the Peloponnesians had as many ships as their own confronting them at sea, more cities in alliance with them, and the King and Tissaphernes to supply them with money, of which the Athenians had none left, had he any hope of saving the state, unless someone could induce the King to come over to their side? Upon their replying that they had not, he then plainly said to them,“This we cannot have unless we have a more moderate form of government, and put the offices into fewer hands, and so gain the King's confidence, and forthwith restore Alcibiades, who is the only man living that can bring this about. The safety of the state, not the form of its government, is for the moment the most pressing question, as we can always change afterwards whatever we do not like.”

由于事关重大，亚西比德相应地也就积极争取获得蒂萨费尔内斯的支持。从萨摩斯派来的雅典使者在皮桑泽尔的带领下到达雅典后，在公众面前发表了演讲，简要陈述了他们的观点。他们尤其坚持这样一点：如果召回亚西比德并改变民主政体，他们就能使波斯国王成为他们的盟友，进而征服伯罗奔尼撒人。许多发言者在民主政体问题上

对他们表示反对。亚西比德的政敌大声反对违反宪法将他召回这等事；埃夫莫尔皮泽族人和凯里凯斯族人以秘密宗教仪式一事为由提出抗议——当初亚西比德就是因此而被流放的，祈求诸神不要让他回来。在一片反对和辱骂声中，皮桑泽尔走上前来，将反对者一一拉到一旁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伯罗奔尼撒人正以同样多的战舰在海上与雅典人对峙，与他们结盟的城邦又多，波斯国王和蒂萨费尔内斯还为他们提供资金援助，而雅典人的资金却一点都不剩了。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没人能说服波斯国王倒向他们一边，你对拯救这个城邦还怀有希望吗？他们一作出否定回答，皮桑泽尔紧接着就坦率地对他们说："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比较稳健的政体，将权力部门交给较少的人掌管，由此赢得波斯国王的信任，我们就没有希望，所以要立即召回亚西比德，因为他是活在世间的人当中唯一能办到这件事的人。目前最紧迫的问题，不是政体的形式，而是城邦的安全。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以后总可以把它变掉嘛。"

The people were at first highly irritated at the mention of an oligarchy, but upon understanding clearly from Pisander that this was the only resource left, they took counsel of their fears, and promised themselves some day to change the government again, and gave way. They accordingly voted that Pisander should sail with ten others and make the best arrangement that they could with Tissaphernes and Alcibiad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eople, upon a false accusation of Pisander, dismissed Phrynichus from his post together with his colleague Scironides, sending Diomedon and Leon to replace them in the command of the fleet. The accusation was that Phrynichus had betrayed Iasus and Amorges; and Pisander brought it because he thought him a man unfit for the business now in hand with Alcibiades. Pisander also went the round of all the clubs already existing in the city for help in lawsuits and elections, and urged them to draw together and to unite their efforts for the overthrow of the democracy; and after taking all other measures

required by the circumstances, so that no time might be lost, set off with his ten companions on his voyage to Tissaphernes.

最初一提寡头统治，人们极为愤慨。但是，经皮桑泽尔一说，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已是唯一出路，遂就所担心的问题进行了商讨。他们想着日后还可以把政体再变回来，于是就做出了让步。因此，他们投票决定由皮桑泽尔带领另外十人前去，争取与蒂萨费尔内斯和亚西比德作出最适当的安排。同时，民众还根据皮桑泽尔的不实指控，将弗里尼胡斯及其同僚希龙尼泽斯一起撤了职，并委派迪奥迈宗和莱翁接替他们指挥舰队。皮桑泽尔对弗里尼胡斯的指控是，他出卖了亚苏斯和阿莫尔耶斯。他提出这一指控的原因是，他认为弗里尼胡斯不是负责眼下与亚西比德交涉一事的合适人选。“皮桑泽尔还逐一拜访了城内现有的所有团体，以争取在诉讼和选举方面得到帮助。他敦促这些团体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推翻民主政治。在采取了形势所需的其他所有措施之后，他又毫不耽搁地与十位同僚一起踏上了去见蒂萨费尔内斯的航程。

In the same winter, Leon and Diomedon, who had by this time joined the fleet, made an attack upon Rhodes. The ships of the Peloponnesians they found hauled up on shore, and, after making a descent upon the coast and defeating the Rhodians who appeared in the field against them, withdrew to Chalce and made that place their base of operations instead of Cos, as they could better observe from thence if the Peloponnesian fleet put out to sea. Meanwhile, Xenophantes, a Laconian, came to Rhodes from Pedaritus at Chios, with the news that the fortification of the Athenians was now finished, and that, unless the whole Peloponnesian fleet came to the rescue, the cause in Chios must be lost. Upon this, they resolved to go to his relief. In the meantime, Pedaritus, with the mercenaries that he had with him and the whole force of the Chians, made an

assault upon the work round the Athenian ships and took a portion of it, and got possession of some vessels that were hauled up on shore, when the Athenians sallied out to the rescue, and first routing the Chians, next defeated the remainder of the force round Pedaritus, who was himself killed, with many of the Chians, a great number of arms being also taken.

在同一个冬季，此时已经到舰队就职的莱翁和迪奥迈宗对罗得发动了进攻。他们发现伯罗奔尼撒人的战舰已经被拖到了岸上。上岸打败了前来抵抗他们的罗得人后，他们撤往卡尔西，并不再以科斯岛而是以该地作为他们的作战基地。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若出海行动，他们从那里可以看得更清楚。与此同时，一个名叫克赛诺凡泰斯的拉科尼亚人从希俄斯的佩扎里图斯那里来到罗得。他带来消息说，雅典人的防御工事现在已经完成，伯罗奔尼撒的舰队若不全数来援，他们在希俄斯的事业必败无疑。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决定前去援救。这时候，佩扎里图斯带着他手下的雇佣军和希俄斯人的所有军队，向雅典舰只周围的防御工事发动攻击，占领了部分工事，缴获了几艘已拖到岸上的舰。后来，雅典人出来援救，先是击溃了希俄斯人，接着又打败了佩扎里图斯身边的其余军队，杀死了许多希俄斯人，包括佩扎里图斯本人在内，还缴获了大量武器。

After this, the Chians were besieged even more straitly than before by land and sea, and the famine in the place was great. Meanwhile, the Athenian envoys with Pisander arrived at the court of Tissaphernes, and conferred with him about the proposed agreement. However, Alcibiades, not being altogether sure of Tissaphernes (who feared the Peloponnesians more than the Athenians, and besides wished to wear out both parties, as Alcibiades himself had recommended), had recourse to the following stratagem to make the treaty between the Athenians and

Tissaphernes miscarry by reason of the magnitude of his demands. In my opinion Tissaphernes desired this result, fear being his motive; while Alcibiades, who now saw that Tissaphernes was determined not to treat on any terms, wished the Athenians to think, not that he was unable to persuade Tissaphernes, but that after the latter had been persuaded and was willing to join them, they had not conceded enough to him. For the demands of Alcibiades, speaking for Tissaphernes, who was present, were so extravagant that the Athenians, although for a long while they agreed to whatever he asked, yet had to bear the blame of failure;he required the cession of the whole of Ionia, next of the islands adjacent, besides other concessions, and these passed without opposition; at last, in the third interview, Alcibiades, who now feared a complete discovery of his inability, required them to allow the King to build ships and sail along his own coast wherever and with as many as he pleased. Upon this, the Athenians would yield no further, and concluding tha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done, but that they had been deceived by Alcibiades, went away in a passion and proceeded to Samos.

这一仗之后，希俄斯人在陆上和海上遭到了更严密的包围，城内饥荒十分严重。与此同时，皮桑泽尔带着雅典使者们抵达蒂萨费尔内斯的官邸，就拟议中的协议与他展开了磋商。然而，亚西比德对蒂萨费尔内斯的态度并无十足的把握（蒂萨费尔内斯虽怕雅典人，但更怕伯罗奔尼撒人。此外，他希望能像亚西比德本人所建议的那样，让双方彼此拖垮对方）。因此，他采取了如次策略：以过分的要求使雅典人与蒂萨费尔内斯之间的协议流产。依我之见，出于担忧，蒂萨费尔内斯也希望看到这种结果。亚西比德这时已经看出蒂萨费尔内斯决意不就任何条款进行协商，因而希望雅典人认为，不是他不能说服蒂萨费尔内斯，而是在蒂萨费尔内斯已被说服并愿意与他们联手之后，他们没有向他做出足够的让步。亚西比德代表当时在场的蒂萨费尔内斯

提出的要求极其过分。雅典人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对他提出的要求全盘接受，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承担谈判失败的责任。除了要求作出其他让步外，他还要求割让整个爱奥尼亚，接下去又要求割让邻近的岛屿，雅典人对这些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最后，在第三次会谈中，亚西比德害怕自己的无能暴露无遗，要求他们容许国王建造战舰和沿着他自己的海岸航行，地点和所带船只数目均随其意而定。听到这里，雅典人不再让步了。他们认为，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们被亚西比德骗了，于是愤而离场，返回萨摩斯去了。

Tissaphernes immediately after this, in the same winter, proceeded along shore to Caunus, desiring to bring the Peloponnesian fleet back to Miletus, and to supply them with pay, making a fresh convention upon such terms as he could get, in order not to bring matters to an absolute breach between them. He was afraid that if many of their ships were left without pay they would be compelled to engage and be defeated, or that their vessels being left without hands the Athenians would attain their objects without his assistance. Still more he feared that the Peloponnesians might ravage the continent in search of supplies. Having calculated and considered all this, agreeably to his plan of keeping the two sides equal, he now sent for the Peloponnesians and gave them pay, and concluded with them a third treaty in words following:

此后不久，在同一个冬季，蒂萨费尔内斯沿着海岸驶往卡夫努斯，希望能将伯罗奔尼撒舰队带回米利都，另向他们支付军饷，并就他所能争取到的条件与他们新签一个协定，以避免双方的关系彻底破裂。他担心，如果伯罗奔尼撒的众多舰只都领不到军饷，他们不是会被迫应战而被打败，就是无人手可配备战舰，而雅典人无需他的援助即可达成目标。他更担心的是，伯罗奔尼撒人为了搜寻给养会劫掠大陆。在权衡和考虑了所有这些之后，他依照使双方势力保持平衡的既

定方案，派人请来伯罗奔尼撒人，将军饷付给他们，并与他们签订了第三个协定，内容如下：

In the thirte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Darius, while Alexippidas was ephor at Lacedaemon, a convention was concluded in the plain of the Maeander by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with Tissaphernes, Hieramenes, and the sons of Pharnaces, concerning the affairs of the King and of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大流士国王在位第十三年，亚力克西皮扎斯在斯巴达担任民选长官任期内，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与蒂萨费尔内斯、希埃拉尔迈内斯以及法尔纳塞斯的儿子们，在迈安德平原就国王与斯巴达及其盟友之间诸事宜缔结协定。

1．The country of the King in Asia shall be the King's, and the King shall treat his own country as he pleases.

1．国王在亚细亚的领土归国王所有，国王可随其意处理自己国家的事务。

2．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shall not invade or injure the King's country: neither shall the King invade or injure that of the Lacedaemonians or of their allies. If any of the Lacedaemonians or of their allies invade or injure the King's country,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shall prevent it;and if any from the King's country invade or injure the country of the Lacedaemonians or of their allies, the King shall prevent it.

2．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不得入侵或损害国王的领土；国王亦不得入侵或损害斯巴达人或其盟友的领土。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中若有入侵或损害国王的领土者，斯巴达人及其盟友须加以阻止；国王境内若有入侵或损害斯巴达人或其盟友的领土者，国王亦须加以阻止。

3．Tissaphernes shall provide pay for the ships now present,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until the arrival of the King's vessels;but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King's vessels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may pay their own ships if they wish it. If, however, they choose to receive the pay from Tissaphernes, Tissaphernes shall furnish it;and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shall repay him at the end of the war such moneys as they shall have received.

3．根据协议，蒂萨费尔内斯应向目前在服役的舰只支付军饷，直至国王的战舰抵达为止；但国王的战舰抵达之后，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如若愿意，即可负担自己战舰的军饷。然而，他们如果想要从蒂萨费尔内斯处接受军饷，蒂萨费尔内斯须为其提供。战争结束时，斯巴达人及其盟友须如数归还他们从蒂萨费尔内斯处所得金额。

4．After the vessels have arrived, the ships of the Lacedaemonians and of their allies and those of the King shall carry on the war jointly, according as Tissaphernes and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ir allies shall think best. If they wish to make peace with the Athenians, they shall make peace also jointly.

4．国王的战舰抵达之后，斯巴达人及其盟友的舰只与国王的舰只，须按蒂萨费尔内斯与斯巴达人及其盟友所认为的最佳方式联合作

战。倘若他们希望与雅典人议和，双方亦应联合进行。

This was the treaty. After this Tissaphernes prepared to bring up the Phoenician fleet according to agreement, and to make good his other promises, or at all events wished to make it appear that he was so preparing.

这是协定的内容。协定签订后，蒂萨费尔内斯准备按协定将腓尼基的舰队调上来，并准备履行他的其他诺言。无论如何，他都希望使自己看上去准备这样做。

Winter was now drawing towards its close, when the Boeotians took Oropus by treachery, though held by an Athenian garrison. Their accomplices in this were some of the Eretrians and of the Oropians themselves, who were plotting the revolt of Euboea, as the place was exactly opposite Eretria, and while in Athenian hands was necessarily a source of great annoyance to Eretria and the rest of Euboea. Oropus being in their hands, the Eretrians now came to Rhodes to invite the Peloponnesians into Euboea. The latter, however, were rather bent on the relief of the distressed Chians, and accordingly put out to sea and sailed with all their ships from Rhodes. Off Triopium they sighted the Athenian fleet out at sea sailing from Chalce, and, neither attacking the other, arrived, the latter at Samos, the Peloponnesians at Miletus, seeing that it was no longer possible to relieve Chios without a battle. And this winter ended, and with it ended the twentieth year of this war of which Thucydides is the historian.

这时冬季即将结束。尽管奥罗普斯有雅典军队防守，维奥蒂亚人还是利用内应攻占了这个地方。在这次行动中，与他们合作的是一些埃雷特里亚人和奥罗普斯人自己当中的一些人。奥罗普斯位于埃雷特里亚正对面，只要这个地方在雅典人手里，对埃雷特里亚和其他埃维亚地区就必然是个巨大的威胁源，所以这些人也在策划埃维亚的叛离。控制了奥罗普斯之后，埃雷特里亚人立即来到罗得岛，邀请伯罗奔尼撒人进入埃维亚。然而，伯罗奔尼撒人更倾向于去解救处境维艰的希俄斯人。因此，他们率领全部战舰出海，从罗得驶往希俄斯去了。在特里奥皮乌姆附近，他们看到了从卡尔西驶出海的雅典舰队，但彼此都未进攻对方。雅典舰队驶抵萨摩斯，伯罗奔尼撒人驶到了米利都。不过，伯罗奔尼撒人意识到，不经一战，已不再有解救希俄斯之可能。这个冬季结束了，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二十年亦就此结束。

Early in the spring of the summer following, Dercyllidas, a Spartan, was sent with a small force by land to the Hellespont to effect the revolt of Abydos, which is a Milesian colony; and the Chians, while Astyochus was at a loss how to help them, were compelled to fight at sea by the pressure of the siege. While Astyochus was still at Rhodes they had received from Miletus, as their commander after the death of Pedaritus, a Spartan named Leon, who had come out with Antisthenes, and twelve vessels which had been on guard at Miletus, five of which were Thurian, four Syracusans, one from Anaia, one Milesian, and one Leon's own. Accordingly, the Chians marched out in mass and took up a strong position, while thirty-six of their ships put out and engaged thirty-two of the Athenians; and after a tough fight, in which the Chians and their allies had rather the best of it, as it was now late, retired to their city.

在接下来这个夏季之初，斯巴达人德尔奇利扎斯奉派率领一支小部队从陆路前往赫勒斯滂，以促成米利都殖民地阿拜多斯的叛离。正当阿斯提奥胡斯不知如何帮助希俄斯人时，他们为围攻所迫，不得不打起了海战。阿斯提奥胡斯仍在罗得时，他们从米利都得到一个名叫莱翁的斯巴达人。佩扎里图斯死后，莱翁担任了他们的指挥官。他是与安提西尼一起带着一直防守米利都的12艘舰出来的：其中5艘是图里人的，4艘是叙拉古人的，1艘来自阿纳亚，1艘是米利都人的，还有1艘是莱翁自己的。于是，希俄斯人大举出动，占领了一处有利阵地。同时，他们出动36艘战舰，向雅典人的32艘战舰发起了进攻。一场激战之后，尽管希俄斯人及其盟军颇占上风，但因天色已晚，他们还是退回了城里。

Immediately after this Dercyllidas arrived by land from Miletus; and Abydos in the Hellespont revolted to him and Pharnabazus, and Lampsacus two days later. Upon receipt of this news Strombichides hastily sailed from Chios with twenty-four Athenian ships, some transports carrying heavy infantry being of the number, and defeating the Lampsacenes who came out against him, took Lampsacus, which was unfortified, at the first assault, and making prize of the slaves and goods restored the freemen to their homes, and went on to Abydos. The inhabitants, however, refusing to capitulate, and his assaults failing to take the place, he sailed over to the coast opposite, and appointed Sestos, the town in the Chersonese held by the Medes at a former period in this history, as the centre for the defence of the whole Hellespont.

这一仗之后，德尔奇利扎斯立即经陆路从米利都赶来。赫勒斯滂的阿拜多斯倒戈，倒向了他和法尔纳巴佐斯。两天之后，兰萨库斯也倒向他们。获悉这一消息，斯特罗姆维希泽斯立刻率24艘雅典舰从希俄斯启航，其中一些舰上载有重步兵。他打败了出来迎击他的兰萨库

斯人，一举攻克了未设防的兰萨库斯城，将奴隶和财物掳为战利品，让自由民复归了家园，然后赶往阿拜多斯。然而，阿拜多斯的居民拒不投降。他攻城未克，于是便驶往对面海岸，将塞斯托斯作为保卫整个赫勒斯滂的中心基地。塞斯托斯位于切尔松尼斯半岛，在这段历史的早些时候，曾被波斯人占领。

In the meantime, the Chians commanded the sea more than before; and the Peloponnesians at Miletus and Astyochus, hearing of the sea-fight and of the departure of the squadron with Strombichides, took fresh courage. Coasting along with two vessels to Chios, Astyochus took the ships from that place, and now moved with the whole fleet upon Samos, from whence, however, he sailed back to Miletus, as the Athenians did not put out against him, owing to their suspicions of one another. For it was about this time, or even before, that the democracy was put down at Athens. When Pisander and the envoys returned from Tissaphernes to Samos they at once strengthened still further their interest in the army itself, and instigated the upper class in Samos to join them in establishing an oligarchy, the very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a party of them had lately risen to avoid. At the same time, the Athenians at Samos, after a consultation among themselves, determined to let Alcibiades alone, since he refused to join them, and besides was not the man for an oligarchy; and now that they were once embarked, to see for themselves how they could best prevent the ruin of their cause, and meanwhile, to sustain the war, and to contribute without stint money and all else that might be required from their own private estates, as they would henceforth labour for themselves alone.

这时候，希俄斯人的制海力更强了。获悉这次海战的情况和斯特罗姆维希泽斯率舰队离去的消息后，在米利都的伯罗奔尼撒人和阿斯

提奥胡斯又重拾了勇气。阿斯提奥胡斯率领两艘舰沿着海岸驶到希俄斯，带上那里的舰只，随即率领整个舰队开赴萨摩斯。然而，由于雅典人相互猜疑，没有出海迎战，他又从那里驶回了米利都。雅典人相互猜疑的原因是，大约在这个时候，甚或更早一些，雅典的民主政体被推翻了。皮桑泽尔与使者们从蒂萨费尔内斯那里返回萨摩斯后，立刻加强了对军队本身的关注，并且鼓动萨摩斯的上层阶级与他们一起建立寡头统治，尽管萨摩斯人中的一个党派不久前揭竿而起的目的正是要避免这种政府形式。同时，经过内部磋商，在萨摩斯的雅典人决定不再理会亚西比德，因为他拒不肯与他们联手，而且也不是搞寡头政治的人。既然他们已经开始，那就要自己设法最有效地防止他们的事业惨遭毁灭，同时要将战争支撑下去，从自己的私人产业中毫不吝惜地贡献出金钱和战争所需的其他物资，因为他们自此以后要为自己而奋斗了，而不是为他人。

After encouraging each other in these resolutions, they now at once sent off half the envoys and Pisander to do what was necessary at Athens (with instructions to establish oligarchies on their way in all the subject cities which they might touch at), and dispatched the other half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o the other dependencies. Diitrephes also, who wa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Chios, and had been elected to the command of the Thracian towns, was sent off to his government, and arriving at Thasos abolished the democracy there. Two months, however, had not elapsed after his departure before the Thasians began to fortify their town, being already tired of an aristocracy with Athens, and in daily expectation of freedom from Lacedaemon. Indeed, there was a party of them (whom the Athenians had banished), with the Peloponnesians, who with their friends in the town were already making every exertion to bring a squadron, and to effect the revolt of Thasos; and this party thus saw exactly what they most wanted done, that is to say, the re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 without risk, 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democracy

which would have opposed them. Things at Thasos thus turned out just the contrary to what the oligarchical conspirators at Athens expected; and the same in my opinion was the case in many of the other dependencies; as the cities no sooner got a moderate government and liberty of action, than they went on to absolute freedom without being at all seduced by the show of reform offered by the Athenians.

他们相互鼓励，坚定了决心，然后立即派遣半数使者与皮桑泽尔同回雅典开展必要的工作（他们奉令在沿途停靠的所有属邦建立寡头统治的政府），又派另一半使者分赴不同方向的其他属邦。当时迪伊特雷费斯就在希俄斯附近，已被选为色雷斯诸城镇指挥官。他也奉派前去就职。一到萨索斯，他就废除了那里的民主政体。然而，他离开尚不足两个月，萨索斯人就开始在他们的城镇设防。他们已经对依附于雅典的贵族统治集团感到厌倦，日日盼望斯巴达带给他们自由。实际上，他们当中有一个党派（已被雅典人驱逐）已投奔伯罗奔尼撒人。他们已经在与城内的朋友尽力争取让伯罗奔尼撒人派一个海军中队过来，以促成萨索斯的叛离，而这个党派就这样看到他们最想完成的事发生了，即：他们没有冒任何风险就完成了对政府的改革，并且废除了与他们对立的民主政体。因此，萨索斯的情况发展，恰恰与雅典主张寡头政治那些密谋者的期望相反。在我看来，不少其他属邦的情况亦同。这些城邦一旦有了温和的政府和行动自由，继而就会要求绝对自由，根本不会再为雅典人作出的改革表示所吸引。

Pisander and his colleagues on their voyage alongshore abolished, as had been determined, the democracies in the cities, and also took some heavy infantry from certain places as their allies, and so came to Athens. Here they found most of the work already done by their associates. Some of the younger men had banded together, and secretly assassinated one Androcles, the chief

leader of the commons, and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banishment of Alcibiades; Androcles being singled out both because he was a popular leader and because they sought by his death to recommend themselves to Alcibiades, who was, as they supposed, to be recalled, and to make Tissaphernes their friend. There were also some other obnoxious persons whom they secretly did away with in the same manner. Meanwhile, their cry in public was that no pay should be given except to persons serving in the war, and that not more than five thousand should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and those such as were most able to serve the state in person and in purse.

皮桑泽尔及其同僚，按照已有决定，在沿着海岸航行途中废除了各城邦的民主政治，还从某些地方征召了一些重步兵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就这样返回了雅典。在雅典，他们发现，他们的同党已经完成大部分准备工作。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已经组织起来，秘密刺杀了一个名叫安兹罗克莱斯的人。此人是民主派的主要领导人，亚西比德被驱逐主要也是因他而致。他们之所以选择他作为暗杀目标，一是因为他是一位颇得人心的领导人物，二是想通过他的死来向亚西比德毛遂自荐。他们推测他会被召回，而且会使蒂萨费尔内斯成为他们的朋友。他们还以同样方式秘密除掉了其他一些他们所憎恨的人。同时，他们还公开宣布，除了在军中服役的人之外，不应向其他人支付薪金；参与政权的人数不应超过5,000人，而且应当是在个人能力和财产方面都最能为城邦效力的人。

But this was a mere catchword for the multitude, as the authors of the revolution were really to govern. However, the Assembly and the Council of the Bean still met notwithstanding, although they discussed nothing that was not approved of by the conspirators, who both supplied the speakers and reviewed in advance what they were to say. Fear, and the sight of the numbers of the conspirators,

closed the mouths of the rest; or if any ventured to rise in opposition, he was presently put to death in some convenient way, and there was neither search for the murderers nor justice to be had against them if suspected; but the people remained motionless, being so thoroughly cowed that men thought themselves lucky to escape violence, even when they held their tongues. An exaggerated belief in the numbers of the conspirators also demoralized the people, rendered helpless by the magnitude of the city, and by their want of intelligence with each other, and being without means of finding out what those numbers really were. For the same reason it was impossible for any one to open his grief to a neighbour and to concert measures to defend himself, as he would have had to speak either to one whom he did not know, or whom he knew but did not trust. Indeed, all the popular party approached each other with suspicion, each thinking his neighbour concerned in what was going on, the conspirators having in their ranks persons whom no one could ever have believed capable of joining an oligarchy; and these it was who made the many so suspicious, and so helped to procure impunity for the few, by confirming the commons in their mistrust of one another.

不过，这只是面向大众的宣传口号而已，实际上即将执掌政权的还是这次变革的发起者。尽管公民大会和“豆粒议事会”仍在开会议事，但未经密谋者批准的事，他们一项也不能议。那些人不仅指派发言人，事先还审查他们的发言内容。恐惧，加上看到密谋者人数众多，使得其余的人归于沉默。若有人敢于起来反对，马上就会被人以某种便捷的方式处死。即便引起怀疑，凶犯既不会遭到追捕，也不会受到公正的处罚。民众却只有保持沉默，他们完全被吓住了。纵然缄口不言，他们也会为自己免遭祸害而庆幸。对参与密谋者人数的过高想象，同样也是使民众信心受挫的一个原因。由于城市规模庞大，彼此之间信息不通，又无办法了解那些人到底人数几何，他们变得十分

无助。基于同样原因，任何人都无法向邻人倾诉自己的不幸，共商自卫的办法，因为他要向之诉说的人，不是素不相识者，就是虽则相识但不可信之人。实际上，所有民主党人相互接触时都心存疑虑，每个人都认为他的邻人与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关，密谋者中即有无人信其能加入寡头政治集团者。正是这些人使很多人相互猜疑，使少数人安然无恙，因为他们加重了民众的相互不信任。

At this juncture arrived Pisander and his colleagues, who lost no time in doing the rest. First, they assembled the people, and moved to elect ten commissioners with full powers to frame a constitution, and that when this was done they should on an appointed day lay before the people their opinion as to the best mode of governing the city. Afterwards, when the day arrived, the conspirators enclosed the assembly in Colonus, a temple of Poseidon, a little more than a mile outside the city; when the commissioners simply brought forward this single motion, that any Athenian might propose with impunity whatever measure he pleased, heavy penalties being imposed upon any who should indict for illegality, or otherwise molest him for so doing. The way thus cleared, it was now plainly declared that all tenure of office and receipt of pay under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s were at an end, and that five men must be elected as presidents, who should in their turn elect one hundred, and each of the hundred three apiece; and that this body thus made up to four hundred should enter the council chamber with full powers and govern as they judged best, and should convene the five thousand whenever they pleased.

在这个当口，皮桑泽尔及其同僚抵达雅典，不失时机地落实了其他事宜。他们首先将民众召集起来，提议选出十位拥有全权的委员起草一个章程。起草完毕之后，委员们应当在一个指定日期就治理城邦

的最佳模式向民众提出他们的意见。后来，当指定日期到来时，密谋者封锁了公民大会会场。会场设在波塞冬神庙区的科洛努斯，距雅典城1英里多一点。委员们只提出了一项动议：任何一个雅典人均可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出任何动议而不受惩罚；指控提出动议者违法或以其他方式对其进行干扰者，则要被施以重罚。道路就这样被扫清了，紧接着就有人明确提出，现行体制下的所有任职和薪金收受应一律终止，须选出五人作为主席，再由这五人选出一百人，这一百人每人再各选出三人，由这些人组成一个四百人的机构进入议事厅。他们拥有全权，可依照他们认为最佳的方式管理城邦，并可在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时间召集“五千人”会议。

The man who moved this resolution was Pisander, who was throughout the chief ostensible agent in putting down the democracy. But he who concerted the whole affair, and prepared the way for the catastrophe, and who had given the greatest thought to the matter, was Antiphon, one of the best men of his day in Athens; who, with a head to contrive measures and a tongue to recommend them, did not willingly come forward in the assembly or upon any public scene, being ill looked upon by the multitude owing to his reputation for talent; and who yet was the one man best able to aid in the courts, or before the assembly, the suitors who required his opinion. Indeed, when he was afterwards himself tried for his life on the charge of having been concerned in setting up this very government, when the Four Hundred were overthrown and hardly dealt with by the commons, he made what would seem to be the best defence of any known up to my time. Phrynichus also went beyond all others in his zeal for the oligarchy. Afraid of Alcibiades, and assured that he was no stranger to his intrigues with Astyochus at Samos, he held that no oligarchy was ever likely to restore him, and once embarked in the enterprise, proved, where danger was to be faced, by far the staunchest of them all.

Theramenes, son of Hagnon, was also one of the foremost of the subverters of the democracy—a man as able in council as in debate. Conducted by so many and by such sagacious heads, the enterprise, great as it was, not unnaturally went forward; although it was no light matter to deprive the Athenian people of its freedom, almost a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deposition of the tyrants, when it had been not only not subject to any during the whole of that period, but accustomed during more than half of it to rule over subjects of its own.

提出这一决议案的是皮桑泽尔。表面看来，他自始至终都是推翻民主政治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协调整个事情，为这次灾祸铺平了道路和考虑得最多的却是安梯丰，即当时雅典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他足智多谋，巧舌如簧，但却不愿在公民大会上发言，也不愿在任何公开场合抛头露面。由于他的辩才人尽皆知，民众对他印象不佳。然而，要上法庭或者要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的人若需向他求教，他却是一个最能帮得上忙的人。后来，当他被控参与建立这个寡头政府而受到生死审判，在四百人议事会被推翻后遭到民主党人的严惩时，他所作的辩护似乎的确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一次。另外，弗里尼胡斯对寡头政治的热心，同样超乎所有其他人之上。他害怕亚西比德，确信亚西比德知道他与阿斯提奥胡斯在萨摩斯所搞的阴谋。他认为，任何寡头统治的政府都不可能召回亚西比德。一旦投身于这一事业，他即证明自己在面对危险时是他们所有人当中最坚定者。哈格农之子塞拉门尼斯在议事和辩论中都是一把好手，他也是冲在颠覆民主政体最前列的人物之一。在废黜僭主制后的将近一百年间，雅典人不仅一直没有屈从于任何人的统治，而且在一半以上的时间里都习惯于统治自己的臣民，要剥夺雅典人民的自由绝非易事。尽管如此，在如此众多聪明人物的推动下，此事虽然艰巨，但其成功却也不足为奇。

The assembly ratified the proposed constitution, without a

single opposing voice, and was then dissolved; after which the Four Hundred were brought into the council chamber in the following way. On account of the enemy at Decelea, all the Athenians were constantly on the wall or in the ranks at the various military posts. On that day the persons not in the secret were allowed to go home as usual, while orders were given to the accomplices of the conspirators to hang about, without making any demonstration, at some little distance from the posts, and in case of any opposition to what was being done, to seize the arms and put it down. There were also some Andrians and Tenians, three hundred Carystians, and some of the settlers in Aegina come with their own arms for this very purpose, who had received similar instructions. These dispositions completed, the Four Hundred went, each with a dagger concealed about his person, accompanied by one hundred and twenty Hellenic youths, whom they employed wherever violence was needed, and appeared before the Councillors of the Bean in the council chamber, and told them to take their pay and be gone; themselves bringing it for the whole of the residue of their term of office, and giving it to them as they went out.

公民大会批准了所提出的章程，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于是就散会了。其后，四百人议事会以下述方式进入了议事厅：由于敌人就在德西利亚，所有雅典人通常不是在守卫城墙，就是分守在各个军事哨所的岗位上。那天，没有参与密谋的人可以像往常一样回家，与密谋者一伙的人则奉命不露声色地守在离哨所不远的地方。万一有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反对的表示，他们可以立即拿起武器前去镇压。另外还有一些安德罗斯岛人和泰诺斯人，300名卡里斯图斯人和一些埃伊纳岛的移民也带着自己的武器前来。他们也接到了类似的命令。布置完这些之后，“四百人”就去了，每个人身上都暗藏着匕首，另有120名希腊青年陪同，以备需要使用暴力时调用。他们走到议事厅中“豆粒议事会”的议员面前，命令他们领完薪金就离开。他们已带来

议员们所余任期的全部薪金，议员们离开时就发给他们。

Upon the Council withdrawing in this way without venturing any objection, and the rest of the citizens making no movement, the Four Hundred entered the council chamber, and for the present contented themselves with drawing lots for their Prytanes, and making their prayers and sacrifices to the gods upon entering office, but afterwards departed widely from the democratic system of government, and except that on account of Alcibiades they did not recall the exiles, ruled the city by force; putting to death some men, though not many, whom they thought it convenient to remove, and imprisoning and banishing others. They also sent to Agis, the Lacedaemonian king, at Decelea, to say that they desired to make peace, and that he might reasonably be more disposed to treat now that he had them to deal with instead of the inconstant commons.

议事会的议员们未敢表示反对就这样退出了，其余公民也未采取任何行动，于是“四百人”就这样进入议事厅，暂且以抽签方式决定了各自的部团期，就职时虔诚祈祷并向诸神献祭，但其后却与民主政体的做法相去甚远。除了因亚西比德之故未召回被放逐的人员之外，他们竟以武力统治城邦，处死了一些他们认为适合除掉的人——尽管人数不多，并囚禁和放逐了其他一些人。他们还派人去拜见了当时在德西利亚的斯巴达国王亚基斯，对他说他们希望讲和，还说亚基斯或许更有理由倾向讲和，因为与他交涉的已不再是反复无常的民主党人。

Agis, however, did not believe in the tranquillity of the city, or that the commons would thus in a moment give up their ancient liberty, but thought that the sight of a large Lacedaemonian force would be sufficient to excite them if they were not already in

commotion, of which he was by no means certain. He accordingly gave to the envoys of the Four Hundred an answer which held out no hopes of an accommodation, and sending for large reinforcements from Peloponnese, not long afterwards, with these and his garrison from Decelea, descended to the very walls of Athens; hoping either that civil disturbances might help to subdue them to his terms, or that, in the confusion to be expected within and without the city, they might even surrender without a blow being struck; at all events he thought he would succeed in seizing the Long Walls, bared of their defenders. However, the Athenians saw him come close up, without making the least disturbance within the city; and sending out their cavalry, and a number of their heavy infantry, light troops, and archers, shot down some of his soldiers who approached too near, and got possession of some arms and dead. Upon this Agis, at last convinced, led his army back again and, remaining with his own troops in the old position at Decelea, sent the reinforcement back home, after a few days' stay in Attica. After this, the Four Hundred persevering sent another embassy to Agis, and now meeting with a better reception, at his suggestion dispatched envoys to Lacedaemon to negotiate a treaty, being desirous of making peace.

然而，亚基斯国王并不认为雅典的局势已经安定，也不相信雅典的民主党人顷刻之间就会放弃他们自古以来一直享有的自由。他认为，即使他们还没有搞动乱——对此他可不敢肯定，但如果看到一支庞大的斯巴达军队，一定会激起他们的斗志。因此，他给了四百人议事会派来的使者一个不具和解希望的答复，然后派人从伯罗奔尼撒调来大批援军。不久之后，他率领这些援军和在德西利亚的守军一起直逼雅典城下，希望城内的骚乱会促使四百人议事会接受他提出的条件，或者在城内外预计会发生的混乱中不战而降。他认为，不管怎样，他都会成功地夺取守卫不力的长墙。然而，雅典人看到他率军逼

近时，城内丝毫没有引起骚乱，反而派骑兵以及大量重步兵、轻步兵和弓箭手射杀了他手下一些过于靠近的士兵，并夺走了一些武器和阵亡者的尸体。看到这种情况，亚基斯终于知道自己想错了。他率军返回，带着自己的军队仍留在德西利亚的原有阵地，援军在阿提卡滞留了几天后也被遣回本邦去了。这之后，四百人议事会又派了一个使团去见亚基斯。这次他们受到了较好的接待。根据亚基斯的建议，他们派出代表前往斯巴达商谈缔约事宜，因为他们求和心切。

They also sent ten men to Samos to reassure the army, and to explain that the oligarchy was not established for the hurt of the city or the citizens, but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country at large; and that there were five thousand, not four hundred only, concerned; although, what with their expeditions and employments abroad, the Athenians had never yet assembled to discuss a question important enough to bring five thousand of them together. The emissaries were also told what to say upon all other points, and were so sent off immediatel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government, which feared, as it turned out justly, that the mass of seamen would not be willing to remain under the oligarchical constitution, and, the evil beginning there, might be the means of their overthrow.

他们还派出十个人到萨摩斯去安抚军队，并向他们解释说，建立寡头统治的政府不是为了危害城邦或公民，而是为了挽救整个城邦；况且参政议政的不只是400人，而是5,000人；尽管因为他们在海外征战和活动，雅典人还从没聚集起来讨论过一个需要将5,000人召集到一起的重大问题。他们还向使者们交待了在其他所有问题上怎么说。新政府成立后，这些使者立即就奉派出发了，因为政府担心大部分水兵不愿在寡头政体下继续服役。如果那里率先闹事，可能会导致他们被推翻，后来证明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Indeed, at Samos the question of the oligarchy had already entered upon a new phase, the following events having taken place just at the time that the Four Hundred were conspiring. That part of the Samian population which has been mentioned as rising against the upper class, and as being the democratic party, had now turned round, and yielding to the solicitations of Pisander during his visit, and of the Athenians in the conspiracy at Samos, had bound themselves by oaths to the number of three hundred, and were about to fall upon the rest of their fellow citizens, whom they now in their turn regarded as the democratic party. Meanwhile, they put to death one Hyperbolus, an Athenian, a pestilent fellow that had been ostracized, not from fear of his influence or position, but because he was a rascal and a disgrace to the city; being aided in this by Charminus, one of the generals, and by some of the Athenians with them, to whom they had sworn friendship, and with whom they perpetrated other acts of the kind, and now determined to attack the people. The latter got wind of what was coming, and told two of the generals, Leon and Diomedon, who, on account of the credit which they enjoyed with the commons, were unwilling supporters of the oligarchy; and also Thrasybulus and Thrasyllus, the former a captain of a galley, the latter serving with the heavy infantry, besides certain others who had ever been thought most opposed to the conspirators, entreating them not to look on and see them destroyed, and Samos, the sole remaining stay of their empire, lost to the Athenians. Upon hearing this, the persons whom they addressed now went round the soldiers one by one, and urged them to resist, especially the crew of the Paralus, which was made up entirely of Athenians and freemen, and had from time out of mind been enemies of oligarchy, even when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existing; and Leon and Diomedon left behind some ships for their protection in case of their sailing away anywhere themselves. Accordingly, when the Three Hundred attacked the people, all these

came to the rescue, and foremost of all the crew of the Paralus; and the Samian commons gained the victory, and putting to death some thirty of the Three Hundred, and banishing three others of the ringleaders, accorded an amnesty to the rest, and lived together under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for the future.

实际上，反对寡头统治这一问题在萨摩斯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以下这些事件早在“四百人”密谋之际就发生了。前文曾经提及，部分萨摩斯人曾作为民主党人群起而反抗上层阶级。皮桑泽尔造访期间，由于不敌皮桑泽尔和在萨摩斯参与密谋的雅典人的引诱，他们已倒戈。多达300人已被誓言所缚转而将其他人看作民主党，准备对其发起进攻。在此期间，他们处死了一个名叫希佩尔博卢斯的雅典人，一个依贝壳流放法放逐的社会的蛀虫。他们将他处死，并不是因为畏惧他的影响或地位，而是因为他是个无赖，对城邦来说是个耻辱。这一行动得到了将军之一哈尔米努斯的支持，也得到了与他们在一起的一些雅典人的协助。他们已发誓与这些雅典人维持友谊，并与这些人做过其他类似之事。现在他们决定向民众发起进攻。对于即将发生的情况，民众也听到了风声，他们把情况告诉了莱翁和迪奥迈宗两位将军。这二人深得民主党人信任，他们虽然支持寡头统治，却并非心甘情愿。他们还告诉了色拉西布洛斯和斯拉西卢斯，前者是一艘三列桨战舰的舰长，后者在重步兵部队服役。此外，他们还告诉了其他一些据认为最反对密谋者的人。他们恳求这些人不要坐视不管，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消灭，看着雅典人失去萨摩斯这个帝国仅存的支持地。听罢这番话，那些人马上开始与士兵们逐一接触，敦促他们起来反抗，尤其是“帕拉卢斯”号舰上的人员。他们全是雅典公民，自古以来，甚至在寡头政治根本不存在时，他们就与其为敌了。莱翁和迪奥迈宗留下了一些舰只，以备自己驶往别处去时对他们施加保护。因此，当“三百人”进攻民众时，所有这些人，尤其是“帕拉卢斯”号舰上的人员，全都赶来援救。萨摩斯的民主党人获得了胜利，处死了“三百人”中大约三十人，放逐了另外三名主谋，但对其他人给予了赦免，后来便一起在民主政体下生活。

The ship Paralus, with Chaereas, son of Archestratus, on board, an Athenian who had taken an active part in the revolution, was now without loss of time sent off by the Samians and the army to Athens to report what had occurred; the fact that the Four Hundred were in power not being yet known. When they sailed into harbour the Four Hundred immediately arrested two or three of the Parali and, taking the vessel from the rest, shifted them into a troopship and set them to keep guard round Euboea. Chaereas, however, managed to secrete himself as soon as he saw how things stood, and returning to Samos, drew a picture to the soldiers of the horrors enacting at Athens, in which everything was exaggerated; saying that all were punished with stripes, that no one could say a word against the holders of power, that the soldiers' wives and children were outraged, and that it was intended to seize and shut up the relatives of all in the army at Samos who were not of the government's way of thinking, to be put to death in case of their disobedience; besides a host of other injurious inventions.

这时，奉萨摩斯人和在萨摩斯的雅典军队之命，“帕拉卢斯”号立即载着积极参与到这次革命的雅典人海雷阿斯（阿尔海斯特拉图斯之子）回雅典禀报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四百人议事会已经掌权。他们驶入港口时，“四百人”立即逮捕了“帕拉卢斯”号上的两、三个人，并夺走战舰，然后把这些人转移到一艘部队运输船上，并安排他们到埃维亚岛周围负责守卫任务。不过，一见这种情况，海雷阿斯就设法藏起来了。返回萨摩斯后，他绘声绘色地向士兵们描述了雅典的恐怖状况，而且有夸大之嫌。他说，所有人都遭到了鞭打，没有人能说一句反对当权者的话，士兵们的妻室儿女也都受到了凌辱，政府打算把驻萨摩斯的军队中所有与其意见相左者的亲属都逮捕、关押起来，违者处死。此外，他还编造了许多其他不实之词。

On hearing this, the first thought of the army was to fall upon the chief authors of the oligarchy and upon all the rest concerned. Eventually, however, they desisted from this idea upon the men of moderate views opposing it and warning them against ruining their cause, with the enemy close at hand and ready for battle. After this, Thrasybulus, son of Lycus, and Thrasyllus, the chief leaders in the revolution, now wishing in the most public manner to change the government at Samos to a democracy, bound all the soldiers by the most tremendous oaths, and those of the oligarchical party more than any, to accept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to be united, to prosecute actively the war with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o be enemies of the Four Hundred, and to hold no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The same oath was also taken by all the Samians of full age; and the soldiers associated the Samians in all their affairs and in the fruits of their dangers, having the conviction that there was no way of escape for themselves or for them, but that the success of the Four Hundred or of the enemy at Miletus must be their ruin.

听了这番描述，士兵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除掉寡头统治集团的首要分子和所有其他相关人员。然而，最终他们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持温和观点的人提出了反对意见，提醒他们不要毁掉他们的大业，况且敌人近在咫尺，随时准备对他们发动进攻。其后，这次变革的主要领导人，利库斯之子色拉西布洛斯和斯拉西卢斯，这时希望以最公开的方式将萨摩斯政府变为民主政府，以最可怕的誓言约束住所有士兵，尤其是那些寡头党的士兵，要求他们接受民主政府，团结一心，积极参与到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并要求他们与“四百人”为敌，不同他们有任何往来。所有成年的萨摩斯人也以同样的誓言宣了誓。士兵们深信，他们与萨摩斯人既然都已无法逃脱，“四百人”或米利都之敌的胜利就是他们的毁灭，因此，他们凡事都与萨摩斯人共进退，有难共当。

The struggle now was between the army trying to force a democracy upon the city, and the Four Hundred an oligarchy upon the camp. Meanwhile, the soldiers forthwith held an assembly, in which they deposed the former generals and any of the captains whom they suspected, and chose new captains and generals to replace them, besides Thrasybulus and Thrasyllus, whom they had already. They also stood up and encouraged one another, and among other things urged that they ought not to lose heart because the city had revolted from them, as the party seceding was smaller and in every way poorer in resources than themselves. They had the whole fleet with which to compel the other cities in their empire to give them money just as if they had their base in the capital, having a city in Samos which, so far from wanting strength, had when at war been within an ace of depriving the Athenians of the command of the sea, while as far as the enemy was concerned they had the same base of operations as before. Indeed, with the fleet in their hands, they were better able to provide themselves with supplies than the government at home. It was their advanced position at Samos which had throughout enabled the home authorities to command the entrance into Piraeus; and if they refused to give them back the constitution, they would now find that the army was more in a position to exclude them from the sea than they were to exclude the army. Besides, the city was of little or no use towards enabling them to overcome the enemy; and they had lost nothing in losing those who had no longer either money to send them (the soldiers having to find this for themselves), or good counsel, which entitles cities to direct armies. On the contrary, even in this, the home government had done wrong in abolishing the institutions of their ancestors, while the army maintained the said institutions, and would try to force the home government to do so likewise. So that even in point of good counsel the camp had as good counsellors as the city. Moreover, they had but to grant him security for his person

and his recall, and Alcibiades would be only too glad to procure them the alliance of the King. And above all if they failed altogether, with the navy which they possessed, they had numbers of places to retire to in which they would find cities and lands.

现在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军队想迫使城邦实行民主政治，“四百人”则想迫使军队接受寡头统治。其时，士兵们立即召开会议，罢免了以前那些他们不信任的将军和舰长，选拔出新的舰长和将军取而代之，此外色拉西布洛斯和斯拉西卢斯此前就已在他们所选之列。他们还站起来相互鼓励。除了其他事情，他们竭力强调不要因为城邦背叛了他们而失去勇气，因为脱离他们的党派人数很少，各方面的资源也比他们的匮乏。他们拥有整个舰队，可以迫使帝国境内其他城邦向他们提供金钱，就像他们的基地在首都一样，因为他们在萨摩斯岛拥有一座城。这座城非但不乏实力，而且在过去交战时差一点剥夺雅典人的制海权，而敌人的作战基地还与从前一样。由于手中有舰队，他们其实比雅典的政府更能获取补给。雅典当局过去一直凭借他们在萨摩斯岛的前沿阵地控制着进入比雷埃夫斯港的通道。如果他们拒不恢复民主政体，他们将会看到，军队把他们赶出海域，要比他们把军队排斥在外更容易。此外，在克敌制胜方面，雅典城对他们用处也很小，或者说，根本没有什么用处。失去那些既不能给他们送来金钱又不能向他们提供良策的人，对他们丝毫无损，因为钱得靠士兵们自己去筹，而其出谋划策只会使城邦有权指挥军队。即便在这一点上，雅典的政府恰恰也做错了。他们废除了祖先建立的政制，而军队却在维护这种政制，而且要设法迫使政府也这样做。因此，甚至在提供良策这一点上，军营里的人也不逊于雅典城里的谋士。此外，他们只要保证亚西比德的人身安全并把他召回来，他会非常乐于帮助他们与波斯国王结盟。尤其是，即便全盘皆输了，凭着手上这支海军，他们也不乏退避之处，在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城市和土地。

Debating together and comforting themselves after this manner, they

pushed on their war measures as actively as ever; and the ten envoys sent to Samos by the Four Hundred, learning how matters stood while they were still at Delos, stayed quiet there. About this time, a cry aroseamong the soldiers in the Peloponnesian fleet at Miletus that Astyochus and Tissaphernes were ruining their cause. Astyochus had not been willing to fight at sea—either before, while they were still in full vigour and the fleet of the Athenians small, or now, when the enemy was, as they were informed, in a state of sedition and his ships not yet united—but kept them waiting for the Phoenician fleet from Tissaphernes, which had only a nominal existence, at the risk of wasting away in inactivity. While Tissaphernes not only did not bring up the fleet in question, but was ruining their navy by payments made irregularly, and even then not made in full. They must therefore, they insisted, delay no longer, but fight a decisive naval engagement. The Syracusans were the most urgent of any.

他们一边如此讨论和安慰着自己，一边一如既往地积极推行战争措施。四百人议事会派往萨摩斯的十名使者仍在提洛岛上时即获悉了这一情况，所以就留在那里没再继续前进。大约在这个时候，在米利都的伯罗奔尼撒舰队中出现了这样一种传言：阿斯提奥胡斯和蒂萨费尔内斯正在毁灭他们的事业。阿斯提奥胡斯一直不愿意在海上作战——以前他们处于鼎盛时期而雅典舰队处于下风时，他不愿意；如今，据他们所闻，敌人处于反叛状态而其舰只尚未形成合力时，他还是不愿意。他只是按兵不动，冒着士气被耗掉的危险，让他们等着蒂萨费尔内斯派腓尼基舰队来，而这支舰队只是名义上存在。蒂萨费尔内斯不仅没有调来那支舰队，而且不按期支付军饷，甚至不再足额支付，正在一步步摧毁自己的海军力量。因此，他们坚持认为，绝对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一定要打一场决定性的海战。最急于这样做的是叙拉古人。

The confederates and Astyochus, aware of these murmurs, had already decided in council to fight a decisive battle; and when the news reached them of the disturbance at Samos, they put to sea with all their ships, one hundred and ten in number, and, ordering the Milesians to move by land upon Mycale, set sail thither. The Athenians with the eighty-two ships from Samos were at the moment lying at Glauce in Mycale, a point where Samos approaches near to the continent; and, seeing the Peloponnesian fleet sailing against them, retired into Samos, not thinking themselves numerically strong enough to stake their all upon a battle. Besides, they had notice from Miletus of the wish of the enemy to engage, and were expecting to be joined from the Hellespont by Strombichides, to whom a messenger had been already dispatched, with the ships that had gone from Chios to Abydos. The Athenians accordingly withdrew to Samos, and the Peloponnesians put in at Mycale, and encamped with the land forces of the Milesians and the people of the neighbourhood. The next day, they were about to sail against Samos, when tidings reached them of the arrival of Strombichides with the squadron from the Hellespont, upon which they immediately sailed back to Miletus. The Athenians, thus reinforced, now in their turn sailed against Miletus with a hundred and eight ships, wishing to fight a decisive battle, but, as no one put out to meet them, sailed back to Samos.

盟友们和阿斯提奥胡斯也知道这些怨言，他们已开会决定要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萨摩斯的军队发生骚乱的消息传到他们那里后，他们率领所有战舰出了海，总共110艘，同时命令米利都人由陆路开赴米卡莱，然后从那里启航。率领82艘战舰从萨摩斯出来的雅典人当时正停靠在米卡莱的格拉夫基，萨摩斯岛上一个靠近大陆的地方。发现伯罗奔尼撒人的战舰正朝他们驶来，雅典人又退进了萨摩斯。他们认为自己的战舰在数量上尚不足以在一仗中孤注一掷。此外，他们已从

米利都了解到，敌人求战心切，而他们正期待着斯特罗姆维希泽斯率领由希俄斯去往阿拜多斯的战舰从赫勒斯滂驶来与他们会合，他们早先已经派了信使去斯特罗姆维希泽斯那里。因此，雅典人撤往萨摩斯，伯罗奔尼撒人则驶入米卡莱，与米利都人的陆军和附近的民众一起扎下营盘。次日，他们正要驶出去进攻萨摩斯时，传来了斯特罗姆维希泽斯率舰队从赫勒斯滂抵达的消息。闻听此讯，他们又立即退向米利都。得到增援的雅典人此时反而希望决战了。他们率领108艘战舰去进攻米利都，但由于无人出来迎战，他们又驶回萨摩斯去了。

CHAPTER XXVI Twenty-first Year of the War—Recall of Alcibiades to Samos—Revolt of Euboea and Downfall of the Four Hundred—Battle of Cynossema

第二十六章　战争第二十一年——亚西比德被召至萨摩斯——埃维亚岛的叛离与“四百人”的垮台——基诺塞马之战

In the same summer, immediately after this, the Peloponnesians having refused to fight with their fleet united, through not thinking themselves a match for the enemy, and being at a loss where to look for money for such a number of ships, especially as Tissaphernes proved so bad a paymaster, sent off Clearchus, son of Ramphias, with forty ships to Pharnabazus, agreeably to the original instructions from Peloponnese; Pharnabazus inviting them and being prepared to furnish pay, and Byzantium besides sending offers to revolt to them. These Peloponnesian ships accordingly put out into the open sea, in order to escape the observation of the Athenians, and being overtaken by a storm, the majority with Clearchus got into Delos, and afterwards returned to Miletus, whence Clearchus proceeded by land to the Hellespont to take the command: ten, however, of their number, under the Megarian Helixus, made good their passage to the

Hellespont, and effected the revolt of Byzantium. After this, the commanders at Samos were informed of it, and sent a squadron against them to guard the Hellespont; and an encounter took place before Byzantium between eight vessels on either side.

紧接着，同年夏季，伯罗奔尼撒人自认不是敌人的对手，也不知该去哪里为如此庞大的舰队筹集资金，特别是因为蒂萨费尔内斯给钱很不痛快，所以未肯率舰队联合出战。他们依照起初从伯罗奔尼撒所奉之令，派拉姆菲亚斯之子克莱阿尔胡斯率领40艘战舰前往法尔纳巴佐斯那里。法尔纳巴佐斯曾对他们发出过邀请，并已做好给付军饷的准备。此外，拜占庭也表示要向他们一边。因此，这些伯罗奔尼撒战舰就启航了。为了躲避雅典人的监视，这些舰驶进了公海。后因突遭暴风雨袭击，克莱阿尔胡斯率领大多数战舰开到了提洛岛，之后又返回到了米利都。克莱阿尔胡斯从那里由陆路前往赫勒斯滂就任指挥一职，不过，这些舰只中有10艘在迈加拉人赫利克苏斯的带领下顺利到达赫勒斯滂，促成了拜占庭的叛离。此事发生之后，萨摩斯的雅典指挥官也得到了消息。他们派出一个海军中队前去进攻他们，以保卫赫勒斯滂。于是，在拜占庭前面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双方各有8艘战舰参战。

Meanwhile, the chiefs at Samos, and especially Thrasybulus, who from the moment that he had changed the government had remained firmly resolved to recall Alcibiades, at last in an assembly brought over the mass of the soldiery, and upon their voting for his recall and amnesty, sailed over to Tissaphernes and brought Alcibiades to Samos, being convinced that their only chance of salvation lay in his bringing over Tissaphernes from the Peloponnesians to themselves. An assembly was then held in which Alcibiades complained of and deplored his private misfortune in having been banished, and speaking at great length upon public

affairs, highly incited their hopes for the future, and extravagantly magnified his own influence with Tissaphernes. His object in this was to make the oligarchical government at Athens afraid of him, to haste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lubs, to increase his credit with the army at Samos and heighten their own confidence, and lastly to prejudice the enemy as strongly as possible against Tissaphernes, and blast the hopes which they entertained. Alcibiades accordingly held out to the army such extravagant promises as the following;that Tissaphernes had solemnly assured him that if he could only trust the Athenians they should never want for supplies while he had anything left, no, not even if he should have to coin his own silver couch, and that he would bring the Phoenician fleet now at Aspendus to the Athenians instead of to the Peloponnesians; but that he could only trust the Athenians if Alcibiades were recalled to be his security for them.

与此同时，在萨摩斯的领导人，特别是色拉西布洛斯（自变更政体之时起，他就打定主意要召回亚西比德），终于在一次公民大会上说服了广大士兵。赞成将他召回并予以赦免的表决一结束，他们就驶到蒂萨费尔内斯那里，将亚西比德接到了萨摩斯。他们坚信，他们获救的唯一机会，就是由亚西比德把蒂萨费尔内斯从伯罗奔尼撒人那边拉到他们这边来。他们随即召开了一次公民大会。在会上，亚西比德抱怨和哀叹了他个人被放逐的不幸，大谈他对公共事务的看法，极大地激起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并且肆无忌惮地吹嘘了一番他对蒂萨费尔内斯的影响。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雅典的寡头政府惧怕他，以加快政治集团的瓦解，增强驻萨摩斯军队对他的信任并提振他们的信心，最终使敌人对蒂萨费尔内斯产生尽可能强烈的反感，摧毁他们抱有的希望。因此，亚西比德大言不惭地向军队作出了这样的承诺：蒂萨费尔内斯曾郑重地向他保证，只要他能信任雅典人，但凡自己还有一点东西，就不会让他们短缺给养。即便他需不得不把自己的银床拿去铸币，也不会让他们短缺；他还可以将现在停泊在阿斯彭祖斯的腓尼基

舰队带给雅典人，而不是给伯罗奔尼撒人；但是，只有将亚西比德召回来给他们作担保，他才能相信雅典人。

Upon hearing this and much more besides, the Athenians at once elected him general together with the former ones, and put all their affairs into his hands. There was now not a man in the army who would have exchanged his present hopes of safety and vengeance upon the Four Hundred for any consideration whatever; and after what they had been told they were now inclined to disdain the enemy before them, and to sail at once for Piraeus. To the plan of sailing for Piraeus, leaving their more immediate enemies behind them, Alcibiades opposed the most positive refusal, in spite of the numbers that insisted upon it, saying that now that he had been elected general he would first sail to Tissaphernes and concert with him measures for carrying on the war. Accordingly, upon leaving this assembly, he immediately took his departure in order to have it thought that there was an entire confidence between them, and also wishing to increase his consideration with Tissaphernes, and to show that he had now been elected general and was in a position to do him good or evil as he chose; thus managing to frighten the Athenians with Tissaphernes and Tissaphernes with the Athenians.

雅典人听罢这番话和其他许多说辞，立刻选他与先前几位一起担任将军，并把所有事务都交由他处理。现在军中无一人会出于任何考虑而放弃目前获得安全和报复“四百人”的希望了。听了他的话之后，他们此时已对面前的敌人心怀蔑视，真想立刻驶去进攻比雷埃夫斯。对于置眼前的敌人于不顾而驶往比雷埃夫斯这一方案，亚西比德拒绝得最坚决，尽管很多人力主这样做。他说，既然他已被选为将军，他首先要驶去会见蒂萨费尔内斯，与他共商发动战争之策。于是，这次

公民大会一结束，他立刻启程，目的是想让大家觉得他们相互之间绝对信任，同时也想在蒂萨费尔内斯心目中抬高自己的身价，让他知道自己现在已当选为将军，造福还是为祸任由他选。这样，他既可以利用蒂萨费尔内斯吓唬雅典人，也可以利用雅典人吓唬蒂萨费尔内斯。

Meanwhile, the Peloponnesians at Miletus heard of the recall of Alcibiades and, already distrustful of Tissaphernes, now became far more disgusted with him than ever. Indeed, after their refusal to go out and give battle to the Athenians when they appeared before Miletus, Tissaphernes had grown slacker than ever in his payments; and even before this, on account of Alcibiades, his unpopularity had been on the increase. Gathering together, just as before, the soldiers and some persons of consideration besides the soldiery began to reckon up how they had never yet received their pay in full; that what they did receive was small in quantity, and even that paid irregularly, and that unless they fought a decisive battle or removed to some station where they could get supplies, the ships' crews would desert; and that it was all the fault of Astyochus, who humoured Tissaphernes for his own private advantage.

在此期间，在米利都的伯罗奔尼撒人也听说了亚西比德被召回的消息。他们本来就对蒂萨费尔内斯抱有怀疑，现在比以往更憎恶他了。实际上，自雅典人出现在米利都城前而他们拒不出战之后，蒂萨费尔内斯支付军饷就比以前更拖拉了。甚至在此之前，由于亚西比德之故，伯罗奔尼撒人对他的不满就已开始上升。士兵们和他们之外一些有影响的人如同过去一样凑在一起开始议论：他们从来没有领到过全饷；即便领到了，数量也很少，可就连这点都不能按期发放；如果不打一场决定性的战斗，或者转移到能够得到给养的地方去，舰上人员就会逃走；这全是阿斯提奥胡斯的错，他为了一己私利而对蒂萨费尔内斯唯命是从。

The army was engaged in these reflections, when the following disturbance took place about the person of Astyochus. Most of the Syracusan and Thurian sailors were freemen, and these the freest crews in the armament were likewise the boldest in setting upon Astyochus and demanding their pay. The latter answered somewhat stiffly and threatened them, and when Dorieus spoke up for his own sailors even went so far as to lift his baton against him; upon seeing which the mass of men, in sailor fashion, rushed in a fury to strike Astyochus. He, however, saw them in time and fled for refuge to an altar; and they were thus parted without his being struck. Meanwhile, the fort built by Tissaphernes in Miletus was surprised and taken by the Milesians, and the garrison in it turned out—an act which met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rest of the allies, and in particular of the Syracusans, but which found no favour with Lichas, who said moreover that the Milesians and the rest in the King's country ought to show a reasonable submission to Tissaphernes and to pay him court, until the war should be happily settled. The Milesians were angry with him for this and for other things of the kind, and upon his afterwards dying of sickness, would not allow him to be buried where the Lacedaemonians with the army desired.

军中不断地议论着这些事，结果发生了一次威胁到阿斯提奥胡斯人身安全的骚动。大多数叙拉古和图里的水兵都是自由民。在围上前去朝阿斯提奥胡斯索要军饷过程中，军中这些最自由的舰员同样最勇敢。阿斯提奥胡斯答复他们时有几分傲慢，并对他们进行威胁；当多里埃夫斯为他的水手们说话时，阿斯提奥胡斯竟然举起节杖朝他挥去。看到这一幕，士兵们以水手的方式愤怒地冲上去要揍他。可是，他及时看出了他们的意图，逃到一个祭坛躲了起来。士兵们没有打着他，也就这样散去了。这时候，蒂萨费尔内斯在米利都修的要塞遭到

米利都人的突袭，并且被占领了，里面的守军都被赶了出来。这次行动得到了其他盟友的赞成，尤其是叙拉古人，但利哈斯未表赞许，利哈斯表示，米利都人和在波斯国王疆域内的其他人理应服从并讨好蒂萨费尔内斯，直到战争圆满结束。因为此事和其他此类事情，米利都人对他十分不满。后来他病死时，米利都人竟不许把他葬在军中的斯巴达人想葬的地方。

The discontent of the army with Astyochus and Tissaphernes had reached this pitch, when Mindarus arrived from Lacedaemon to succeed Astyochus as admiral, and assumed the command. Astyochus now set sail for home; and Tissaphernes sent with him one of his confidants, Gaulites, a Carian, who spoke the two languages, to complain of the Milesians for the affair of the fort,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defend himself against the Milesians, who were, as he was aware, on their way to Sparta chiefly to denounce his conduct, and had with them Hermocrates, who was to accuse Tissaphernes of joining with Alcibiades to ruin the Peloponnesian cause and of playing a double game. Indeed, Hermocrates had always been at enmity with him about the pay not being restored in full; and eventually when he was banished from Syracuse, and new commanders—Potamis, Myscon, and Demarchus—had come out to Miletus to the ships of the Syracusans, Tissaphernes, pressed harder than ever upon him in his exile, and among other charges against him accused him of having once asked him for money, and then given himself out as his enemy because he failed to obtain it.

正当军队对阿斯提奥胡斯和蒂萨费尔内斯的不满达到这种程度时，明扎鲁斯从斯巴达来了，接替阿斯提奥胡斯出任海军大将，担任指挥之职。阿斯提奥胡斯随即启航返回本邦。蒂萨费尔内斯派了他的一名亲信与他同行，即卡里亚人加夫利泰斯。此人能讲两种语言，既

可就要塞一事指控米利都人，又可为蒂萨费尔内斯本人辩护，以反击米利都人。据他所知，米利都人已在前往斯巴达途中，目的主要是为了谴责他的所作所为。随他们同往的还有赫莫克拉特斯，一是指控蒂萨费尔内斯伙同亚西比德破坏伯罗奔尼撒的事业，二是控诉他耍两面派。实际上，在是否全额支付军饷一事上，赫莫克拉特斯一直与他不和。最后，当赫莫克拉特斯被叙拉古放逐，新的指挥官——波塔米斯、米斯孔和德马尔胡斯）到米利都接手叙拉古舰队的指挥权时，蒂萨费尔内斯更是对流亡中的赫莫克拉特斯施以猛攻。除了其他指控外，蒂萨费尔内斯还谴责他曾向自己要钱，称他后来与自己为敌就是没有得到这笔钱的缘故。

While Astyochus and the Milesians and Hermocrates made sail for Lacedaemon, Alcibiades had now crossed back from Tissaphernes to Samos. After his return the envoys of the Four Hundred sent, as has been mentioned above, to pacify and explain matters to the forces at Samos, arrived from Delos; and an assembly was held in which they attempted to speak. The soldiers at first would not hear them, and cried out to put to death the subverters of the democracy, but at last, after some difficulty, calmed down and gave them a hearing. Upon this, the envoys proceeded to inform them that the recent change had been made to save the city, and not to ruin it or to deliver it over to the enemy, for they had already had an opportunity of doing this when he invaded the country during their government; that all the Five Thousand would have their proper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and that their hearers' relatives had neither outrage, as Chaereas had slanderously reported, nor other ill treatment to complain of, but were all in undisturbed enjoyment of their property just as they had left them. Besides these they made a number of other statements which had no better success with their angry auditors; and amid a host of different opinions the one which found most favour was that of

sailing to Piraeus. Now it was that Alcibiades for the first time did the state a service, and one of the most signal kind. For when the Athenians at Samos were bent upon sailing against their countrymen, in which case Ionia and the Hellespont would most certainly at once have passed into possession of the enemy, Alcibiades it was who prevented them. At that moment, when no other man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hold back the multitude, he put a stop to the intended expedition, and rebuked and turned aside the resentment felt, on personal grounds, against the envoys; he dismissed them with an answer from himself, to the effect that he did not object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Five Thousand, but insisted that the Four Hundred should be deposed and the Council of Five Hundred reinstated in power;meanwhile, any retrenchments for economy, by which pay might be better found for the armament, met with his entire approval. Generally, he bade them hold out and show a bold face to the enemy, since if the city were saved there was good hope that the two parties might some day be reconciled, whereas if either were once destroyed, that at Samos, or that at Athens, there would no longer be any one to be reconciled to. Meanwhile, arrived envoys from the Argives, with offers of support to the Athenian commons at Samos;these were thanked by Alcibiades, and dismissed with a request to come when called upon. The Argive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crew of the Paralus, whom we left placed in a troopship by the Four Hundred with orders to cruise round Euboea, and who being employed to carry to Lacedaemon some Athenian envoys sent by the Four Hundred—Laespodias, Aristophon, and Melesias—as they sailed by Argos laid hands upon the envoys, and delivering them over to the Argives as the chief subverters of the democracy, themselves, instead of returning to Athens, took the Argive envoys on board, and came to Samos in the galley which had been confided to them.

阿斯提奥胡斯、米利都人和赫莫克拉特斯驶往斯巴达时，亚西比德已从蒂萨费尔内斯那里渡海回到萨摩斯。他回来后，“四百人”遣来的使者已从提洛岛抵达萨摩斯。如前所述，他们是来安抚驻扎在萨摩斯的军队并向他们说明情况的。他们召开了一次大会，试图在会上发言。士兵们起初不肯听他们说话，高喊着要处死民主政治的颠覆者，但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终于还是平静下来愿意洗耳恭听。于是，使者们向士兵们解释说，最近进行的变革，目的是为了挽救城邦，而不是为了毁灭它，也不是为了把它拱手交给敌人，因为如果要这样做，在他们执政期间敌人入侵时早就有机会这样做了；“五千人”在政府中将适当地拥有一份权利；听众们的亲属并没有像海雷阿斯所诽谤的那样受到凌辱，也没有受到任何他虐待，而是如同他们离开时一样，全都安享着自己的财产。除了这些之外，他们还做了许多其他陈述，但是在愤怒的听众那里一样没有奏效。在他们提出的诸多不同意见中，赞成人数最多的是驶去进攻比雷埃夫斯。亚西比德就是在这时首次为城邦作出了贡献，而且是最重要的贡献。当驻扎在萨摩斯的雅典人一心要去进攻他们的同胞时（如果那样，爱奥尼亚和赫勒斯滂肯定会立即落入敌手），正是亚西比德阻止了他们。那时候，在没有其他人能够控制住众人的行动时，他打消了他们进攻的打算，遏制和扭转了他们因个人原因对使者们产生的忿恨。他自己给了他们一个答复，然后把他们打发回去了。他说，他不反对“五千人”体制，但他坚持认为，“四百人”应当被罢免，“五百人”议事会应当恢复原有的权力；同时，他完全赞成为了节约而削减费用的做法。这样，远征军的军饷发放情况才有可能得到改善。总之，他劝他们不要妥协，要勇敢面对敌人。如果城邦得以保全，两个党派有朝一日还有和解的希望；如果一方被消灭了，无论是萨摩斯一方，还是雅典一方，就不会再有可与之和解的人了。这时候，阿尔戈斯的使者到了，他们主动表示要支援在萨摩斯的雅典民主党人。亚西比德对他们表示了感谢，并恳请他们一接到召唤就能前来，然后把他们打发走了。阿尔戈斯人是由“帕拉卢斯”号的舰员陪同而来的，前文曾提及，这些舰员被“四百人”派到了一艘部队运输船上，奉命在埃维亚周围游弋。在运送“四百人”派往斯巴达的一些雅典使者（莱斯波贾斯、阿里斯托丰和迈莱夏斯）过程中，途径阿尔戈斯时，他们把这些使者抓起来，将其作为颠覆民主政体的主要分子

交给了阿尔戈斯人。他们自己也没再回雅典，而是带上阿尔戈斯的使者，乘着他们信任的这条舰来到了萨摩斯。

The same summer at the time that the return of Alcibiades coupled with the general conduct of Tissaphernes had carried to its height the discontent of the Peloponnesians, who no longer entertained any doubt of his having joined the Athenians, Tissaphernes wishing, it would seem, to clear himself to them of these charges, prepared to go after the Phoenician fleet to Aspendus, and invited Lichas to go with him; saying that he would appoint Tamos as his lieutenant to provide pay for the armament during his own absence. Accounts differ, and it is not easy to ascertain with what intention he went to Aspendus, and did not bring the fleet after all. That one hundred and forty-seven Phoenician ships came as far as Aspendus is certain; but why they did not come on has been variously accounted for. Some think that he went away in pursuance of his plan of wasting the Peloponnesian resources, since at any rate Tamos, his lieutenant, far from being any better, proved a worse paymaster than himself;others that he brought the Phoenicians to Aspendus to exact money from them for their discharge, having never intended to employ them: others again that it was in view of the outcry against him at Lacedaemon, in order that it might be said that he was not in fault, but that the ships were really manned and that he had certainly gone to fetch them. To myself it seems only too evident that he did not bring up the fleet because he wished to wear out and paralyse the Hellenic forces, that is, to waste their strength by the time lost during his journey to Aspendus, and to keep them evenly balanced by not throwing his weight into either scale. Had he wished to finish the war, he could have done so, assuming of course that he made his appearance in a way which left no room for

doubt; as by bringing up the fleet he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have given the victory to the Lacedaemonians, whose navy, even as it was, faced the Athenian more as an equal than as an inferior. But what convicts him most clearly, is the excuse which he put forward for not bringing the ships. He said that the number assembled was less than the King had ordered; but surely it would only have enhanced his credit if he spent little of the King's money and effected the same end at less cost. In any case, whatever was his intention, Tissaphernes went to Aspendus and saw the Phoenicians; and the Peloponnesians at his desire sent a Lacedaemonian called Philip with two galleys to fetch the fleet.

同年夏季，亚西比德的复归，再加上蒂萨费尔内斯处理各方面问题的方式，使得伯罗奔尼撒人对蒂萨费尔内斯的不满积聚至顶峰。他们对他与雅典人联手一事不再持有怀疑，而蒂萨费尔内斯似乎则希望洗脱对他的这些指责，所以准备到阿斯彭祖斯去把腓尼基的舰队带来，并邀利哈斯与他同往。他说，他将指定塔莫斯作为代理指挥，他本人不在位期间由塔莫斯向军队支付军饷。对于他为何到阿斯彭祖斯去，人们众说纷纭，因此很难确定，毕竟他没有带来腓尼基的舰队。曾有147艘腓尼基战舰驶至阿斯彭祖斯，这一点是肯定的；但这些舰只为何不继续前行，人们却有着种种不同的解释。一些人认为，他离开那里是为了实施消耗伯罗奔尼撒一方资源的计划，因为他的代理指挥官塔莫斯，不管怎么说，在拖欠军饷方面，跟他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一些人认为，他让腓尼基人到阿斯彭祖斯来，目的是为了从他们那里勒索钱财，然后再把他们遣散，却从来就没打算要用他们；还有一些人认为，鉴于斯巴达反对他的呼声甚高，他想让人们说错不在他，而那些战舰的确配备了人员，他也确实前去接那些战舰了。依我之见，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他之所以不把腓尼基的舰队带来，原因是他想把希腊的军队拖垮，使他们丧失战斗力，也就是说，他驶往阿斯彭祖斯期间，逝去的时间会耗去希腊军队的力量，而他不帮任何一方即可使双方的力量维持均衡。倘若他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只要他态

度明朗地出面干涉，他当然能够做到，因为只要把腓尼基的舰队带来，他就很有可能使斯巴达人获得胜利。即便在当时，他们的海军也与雅典的海军势均力敌，而不是处于劣势。不过，最能清楚地表明他有错的，还是他提出的不把战舰带来的借口。他说，所调集到的战舰没有达到国王要求的数量。但是，如果他用较少的花费，以较小的代价同样达到了目的，肯定只会提高他的声望。不管他意欲何为，他总归去了阿斯彭祖斯，也见到了腓尼基人；伯罗奔尼撒人也应他的要求派了一位名叫腓力的斯巴达人带着两艘三列桨战舰去接这支舰队。

Alcibiades finding that Tissaphernes had gone to Aspendus, himself sailed thither with thirteen ships, promising to do a great and certain service to the Athenians at Samos, as he would either bring the Phoenician fleet to the Athenians, or at all events prevent its joining the Peloponnesians. In all probability he had long known that Tissaphernes never meant to bring the fleet at all, and wished to compromise him as much as possible in the eyes of the Peloponnesians through his apparent friendship for himself and the Athenians, and thus in a manner to oblige him to join their side.

亚西比德发现蒂萨费尔内斯去了阿斯彭祖斯之后，他也率领13艘战舰赶往那里。他向在萨摩斯的雅典人许诺，他一定要为他们立一大功：要么把腓尼基舰队带来交给雅典人，要么不管怎样都要阻止该舰队加入伯罗奔尼撒人一方。亚西比德很可能早就知道蒂萨费尔内斯决无将这支舰队带来之意，所以想利用他与自己和雅典人表面上的友好关系，尽可能损害他在伯罗奔尼撒人心目中的形象，以此迫使蒂萨费尔内斯加入他们一边。

While Alcibiades weighed anchor and sailed eastward straight for Phaselis and Caunus, the envoys sent by the Four Hundred to

Samos arrived at Athens. Upon their delivering the message from Alcibiades, telling them to hold out and to show a firm front to the enemy, and saying that he had great hopes of reconciling them with the army and of overcoming the Peloponnesians, the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oligarchy, who were already discontented and only too much inclined to be quit of the business in any safe way that they could, were at once greatly strengthened in their resolve. These now banded together and strongly criticized the administration, their leaders being some of the principal generals and men in office under the oligarchy, such as Theramenes, son of Hagnon, Aristocrates, son of Scellias, and others; who, although among the most prominent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being afraid, as they said, of the army at Samos, and most especially of Alcibiades, and also lest the envoys whom they had sent to Lacedaemon might do the state some harm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people), without insisting on objections to the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 a few hands, yet urged that the Five Thousand must be shown to exist not merely in name but in reality, and the constitution placed upon a fairer basis. But this was merely their political cry; most of them being driven by private ambition into the line of conduct so surely fatal to oligarchies that arise out of democracies. For all at once pretend to be not only equals but each the chief and master of his fellows; while under a democracy a disappointed candidate accepts his defeat more easily, because he has not the humiliation of being beaten by his equals. But what most clearly encouraged the malcontents was the power of Alcibiades at Samos, and their own disbelief in the stability of the oligarchy; and it was now a race between them as to which should first become the leader of the commons.

于是，亚西比德启锚东去，径直驶往法塞利斯和卡夫努斯。这时

候，“四百人”派往萨摩斯的使者回到了雅典。他们转达了亚西比德的口信，告诉他们不要妥协，要对敌人作出信心十足的姿态，还说他对他们与军队达成和解以及战胜伯罗奔尼撒人抱有很大希望。寡头政府中的多数成员早已不满，如果可以，他们巴不得全身而退。因此，亚西比德所言顿时大大坚定了他们的决心。这些人立刻组织起来，激烈地抨击政府。为首的是一些位居主要将军之列和在寡头政治统治下任职的要员，例如哈格农之子塞拉门尼斯、谢利亚斯之子阿里斯托克拉泰斯和其他一些人。尽管他们都是政府中最显赫的成员（照他们所言，由于害怕在萨摩斯的军队，尤其是最怕亚西比德，另外也担心他们派往斯巴达的使者未经民众允许就做些有损城邦的事），他们并未坚持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是竭力主张必须让人看到五千人议事会不单是在名义上存在，实际上也存在，并且主张必须将政府建立在更加公平的基础上。但是，这不过是他们的政治口号，大多数人都是受个人野心驱使才采取这种行为方式的，而这种行为方式对于取代了民主政治的寡头政治来说是毁灭性的。这是因为大家全都不再满足于与他人平起平坐，个个都自命为自己同胞的领袖和主人；而在民主政治下，失望的候选人则比较容易接受失败，因为他被同等者击败时并不感到屈辱。不过，激发这些不满情绪的显然莫过于亚西比德在萨摩斯的势力，以及对于寡头政治能够长久这一观点的不认同。他们之间现在所争的是谁该首先成为民众的领袖。

Meanwhile, the leaders and members of the Four Hundred most opposed to a democratic form of government—Phrynichus who had had the quarrel with Alcibiades during his command at Samos, Aristarchus the bitter and inveterate enemy of the commons, and Pisander and Antiphon and others of the chiefs who already as soon as they entered upon power, and again when the army at Samos seceded from them and declared for a democracy, had sent envoys from their own body to Lacedaemon and made every effort for peace, and had built the wall in Eetionia—now redoubled their exertions when their envoys returned from Samos, and they saw not

only the people but their own most trusted associates turning against them. Alarmed at the state of things at Athens as at Samos, they now sent off in haste Antiphon and Phrynichus and ten others with injunctions to make peace with Lacedaemon upon any terms, no matter what, that should be at all tolerable. Meanwhile, they pushed on more actively than ever with the wall in Eetionia. Now the meaning of this wall, according to Theramenes and his supporters, was not so much to keep out the army of Samos, in case of its trying to force its way into Piraeus, as to be able to let in, at pleasure, the fleet and army of the enemy. For Eetionia is a mole of Piraeus, close alongside of the entrance of the harbour, and was now fortifi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all already existing on the land side, so that a few men placed in it might be able to command the entrance; the old wall on the land side and the new one now being built within on the side of the sea, both ending in one of the two towers standing at the narrow mouth of the harbour. They also walled off the largest porch in Piraeus which was in immediate connection with this wall, and kept it in their own hands, compelling all to unload there the corn that came into the harbour, and what they had in stock, and to take it out from thence when they sold it.

其间，在四百人议事会的领导人和成员中，最反对民主政体的人是弗里尼胡斯、阿里斯塔胡斯以及皮桑泽尔、安梯丰和其他一些主要人物。弗里尼胡斯在萨摩斯担任指挥官期间即与亚西比德有过争执，阿里斯塔胡斯是民主党人不共戴天的死敌。这些人刚一掌权，马上就从自己的机构中选派使者前往斯巴达，尽一切努力与之议和。萨摩斯的军队脱离他们并宣布拥护民主政治时，他们又再度这样做，并且在埃蒂奥尼亚修筑了城墙。现在他们的使者从萨摩斯回来后，他们更是加倍努力了。他们已看到，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他们自己最信任的同党，也在转而反对他们。由于对雅典的局势如同对萨摩斯的一样感

到忧虑，他们这时急忙派出了安梯丰、弗里尼胡斯和另外十人，并嘱咐他们只要尚可容忍，要不惜一切代价与斯巴达讲和。同时，他们比以往更为积极地加紧修筑埃蒂奥尼亚的城墙。按照塞拉门尼斯及其支持者的看法，如今修筑这道城墙的意义已不在于阻止驻萨摩斯的军队强行进入比雷埃夫斯，而是在于能够随己之意放敌人的舰队和军队进来。埃蒂奥尼亚是紧靠比雷埃夫斯港入口处的一个防波堤，现在修筑城墙是为了与陆地一侧已有的城墙相连，这样只需部署少数士兵即可控制入口。陆地一侧的老城墙和现在靠海那侧正在修筑的新内墙都以狭窄的港口处伫立的两灯塔之一为终点。他们还把比雷埃夫斯最大的仓库围在里面了，因为这个仓库紧连着这道墙，这样就把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迫使所有人把进港的谷物卸在那里，库存也存放在那里，出售时就从那里取出。

These measures had long provoked the murmurs of Theramenes, and when the envoys returned from Lacedaemon without having effected any general pacification, he affirmed that this wall was like to prove the ruin of the state. At this moment, forty-two ships from Peloponnese, including some Siceliot and Italiot vessels from Locri and Tarentum, had been invited over by the Euboeans and were already riding off Las in Laconia preparing for the voyage to Euboea, under the command of Agesandridas, son of Agesander, a Spartan. Theramenes now affirmed that this squadron was destined not so much to aid Euboea as the party fortifying Eetionia, and that unless precautions were speedily taken the city would be surprised and lost. This was no mere calumny, there being really some such plan entertained by the accused. Their first wish was to have the oligarchy without giving up the empire; failing this to keep their ships and walls and be independent; while, if this also were denied them, sooner than be the first victims of the restored democracy, they were resolved to call in the enemy and make peace, give up their walls and ships, and at all costs retain

possession of the government, if their lives were only assured to them.

塞拉门尼斯对这些措施早有微词。当使者们未达成全面和解的目标从斯巴达返回时，他断言这道墙有可能导致城邦毁灭。正在这个时候，从伯罗奔尼撒开来42艘战舰，其中包括一些来自洛克里和他林敦的西凯利奥特和意大利奥特战舰。这些舰只是应埃维亚人之邀而来的，已经驶入拉科尼亚境内的拉斯附近，正准备驶往埃维亚。担任指挥官的是一名斯巴达人——阿耶桑泽尔之子阿耶桑泽里扎斯。塞拉门尼斯这时断定，这个海军中队未必会去援助埃维亚，而是要去援助在埃蒂奥尼亚修筑工事那队人。若不迅速采取防范措施，雅典城就会遭到突袭而沦陷。这不仅仅是指责之辞，那些被指责的人的确有此计划。他们所希望的，首先是实行寡头统治，同时保有帝国；若达不到，退而求其次是希望保住战舰和城墙，并保持独立；如果连这一希望也落空，那就要赶在成为恢复民主政治后的首批牺牲品之前下定决心，将敌人召来议和，放弃城墙和战舰。只要性命无虞，就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政府。

For this reason they pushed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work with posterns and entrances and means of introducing the enemy, being eager to have it finished in time. Meanwhile, the murmurs against them were at first confined to a few persons and went on in secret, until Phrynichus, after his return from the embassy to Lacedaemon, was laid wait for and stabbed in full market by one of the Peripoli, falling down dead before he had gone far from the council chamber. The assassin escaped; but his accomplice, an Argive, was taken and put to the torture by the Four Hundred, without their being able to extract from him the name of his employer, or anything further than that he knew of many men who used to assemble at the house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Peripoli and at other houses. Here the matter was allowed to drop. This so emboldened Theramenes and Aristocrates and the rest of their partisans in the Four Hundred and out of doors, that they now resolved to act. For by this time, the ships had sailed round from Las, and anchoring at Epidaurus had overrun Aegina; and Theramenes asserted that, being bound for Euboea, they would never have sailed in to Aegina and come back to anchor at Epidaurus, unless they had been invited to come to aid in the designs of which he had always accused the government. Further inaction had therefore now become impossible. In the end, after a great many seditious harangues and suspicions, they set to work in real earnest. The heavy infantry in Piraeus building the wall in Eetionia, among whom was Aristocrates, a colonel, with his own tribe, laid hands upon Alexicles, a general under the oligarchy and the devoted adherent of the cabal, and took him into a house and confined him there. In this, they were assisted by one Hermon, commander of the Peripoli in Munychia, and others, and above all had with them the great bulk of the heavy infantry. As soon as the news reached the Four Hundred, who happened to be sitting in the council chamber, all except the disaffected wished at once to go to the posts where the arms were, and menaced Theramenes and his party. Theramenes defended himself, and said that he was ready immediately to go and help to rescue Alexicles; and taking with him one of the generals belonging to his party, went down to Piraeus, followed by Aristarchus and some young men of the cavalry. All was now panic and confusion. Those in the city imagined that Piraeus was already taken and the prisoner put to death, while those in Piraeus expected every moment to be attacked by the party in the city. The older men, however, stopped the persons running up and down the town and making for the stands of arms; and Thucydides the Pharsalian, proxenus of the city, came forward and threw himself in the way of the rival factions, and appealed to them

not to ruin the state, while the enemy was still at hand waiting for his opportunity, and so at length succeeded in quieting them and in keeping their hands off each other. Meanwhile, Theramenes came down to Piraeus, being himself one of the generals, and raged and stormed against the heavy infantry, while Aristarchus and the adversaries of the people were angry in right earnest. Most of the heavy infantry, however, went on with the business without faltering, and asked Theramenes if he thought the wall had been constructed for any good purpose, and whether it would not be better that it should be pulled down. To this he answered that if they thought it best to pull it down, he for his part agreed with them. Upon this, the heavy infantry and a number of the people in Piraeus immediately got up on the fortification and began to demolish it. Now their cry to the multitude was that all should join in the work who wished the Five Thousand to govern instead of the Four Hundred. For instead of saying in so many words “all who wished the commons to govern”, they still disguised themselves under the name of the Five Thousand; being afraid that these might really exist, and that they might be speaking to one of their number and get into trouble through ignorance. Indeed, this was why the Four Hundred neither wished the Five Thousand to exist, nor to have it known that they did not exist; being of opinion that to give themselves so many partners in empire would be downright democracy, while the mystery in question would make the people afraid of one another.

基于这一原因，他们加紧修筑城墙，在城墙上留了后门和入口以及能将敌人引入的通道，并急切盼望能及时完工。与此同时，对他们的指责起初仅限于少数人中间秘密进行，但弗里尼胡斯出使斯巴达回来后就发生了变化。他刚从议事厅走出来没多远，就在挤满人的市场上遭到一名边防军的伏击，被刺后倒地毙命。刺客逃走了，但他的同

伙——一个阿尔戈斯人被抓获了。“四百人”对他进行了拷问，不过也未能逼问出主使者的姓名或更多的情况，他只知道有许多人常在边防军指挥官的屋里或其他屋子里集会。这件事至此便无人再去追究。这使得塞拉门尼斯、阿里斯托克拉泰斯以及他们在“四百人”内外的其他同党胆气大壮，他们此时决定采取行动。这时候，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已从拉斯驶来，停泊在埃皮达鲁斯之后践踏了埃伊纳。塞拉门尼斯坚称，如果要驶往埃维亚，他们绝不会先开到埃伊纳，然后再回来停泊在埃皮达鲁斯，除非他们是应邀前来协助实施他一直指责政府所搞的阴谋的。因此，现在再也不能继续无所作为了。最后，在发表了大量慷慨激昂的煽动性演说和消除了诸多疑虑后，他们当真开始行动了。在埃蒂奥尼亚修筑城墙的驻比雷埃夫斯重步兵当中，有一位阿里斯托克拉泰斯上校。他率领自己部族的人抓了亚力克西克莱斯，寡头政府的一名将军，同时也是阴谋小集团的忠实追随者。他们把他带进一所房子，将他关在了那里。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得到了穆尼希亚的边防军指挥官赫尔蒙和其他人的协助，尤其是得到了大部分重步兵的支持。消息传到“四百人”那里时，他们碰巧正在议事厅里开会。除了对寡头政治心怀不满者外，所有人都希望立即奔向放有武器的哨所，并对塞拉门尼斯及其同党发出了威胁。塞拉门尼斯为自己辩护说，他准备立即去协助营救亚力克西克莱斯。他带着与他同属一党的一位将军前往比雷埃夫斯，阿里斯塔胡斯和骑兵中的一些青年人也跟着去了。所有人这时都陷入了惊慌与混乱之中。雅典城内的人以为比雷埃夫斯已被占领，被囚者已被处死；比雷埃夫斯的人则每时每刻都在担心遭到城里那派人的进攻。但是，年纪较大的人制止了那些在城里来回乱跑和奔去拿武器的人。法萨卢斯人修昔底德，雅典在法萨卢斯的代理人，挺身而出挡住对立派的人群，呼吁他们不要毁掉城邦，因为敌人仍在眼前伺机进攻。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他终于使他们平静下来，彼此放了手。与此同时，身为将军之一的塞拉门尼斯来到比雷埃夫斯，对重步兵大发雷霆，咆哮如雷；阿里斯塔胡斯和民众的对立派则确实愤怒了。然而，大多数重步兵却不为所动，继续坚持着。他们质问塞拉门尼斯，他认为修筑这道城墙有何好处，将它推倒是否更好。对于这个问题，塞拉门尼斯回答，如果他们认为推倒最好，他个人赞成他们的意见。听到这一回答，重步兵和比雷埃夫斯的许多民众

立即爬上这道防御墙拆了起来。他们此时向群众发出的呼吁是，凡是希望由“五千人”而不是“四百人”统治的人，都应当参与到拆墙行动中来。他们没有用“凡是希望由民主党统治的人”这些字眼，而是依然用“五千人”的名义作掩饰，原因是他们怕“五千人”真的存在，说不定其中某个成员就在听他们说话，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陷入麻烦。实际上，这正是“四百人”既不希望“五千人”存在，也不希望人们知道“五千人”并不存在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帝国内发展同僚就是彻头彻尾的民主；不揭开这个谜，则可以使民众相互畏惧。

The next day, the Four Hundred, although alarmed, nevertheless assembled in the council chamber, while the heavy infantry in Piraeus, after having released their prisoner Alexicles and pulled down the fortification, went with their arms to the theatre of Dionysus, close to Munychia, and there held an assembly in which they decided to march into the city, and setting forth accordingly halted in the Anaceum. Here they were joined by some delegates from the Four Hundred, who reasoned with them one by one, and persuaded those whom they saw to be the most moderate to remain quiet themselves, and to keep in the rest; saying that they would make known the Five Thousand, and have the Four Hundred chosen from them in rotation, as should be decided by the Five Thousand, and meanwhile, entreated them not to ruin the state or drive it into the arms of the enemy. After a great many had spoken and had been spoken to, the whole body of heavy infantry became calmer than before, absorbed by their fears for the country at large, and now agreed to hold upon an appointed day an assembly in the theatre of Dionysu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concord.

次日，“四百人”虽感惊恐，但还是在议事厅举行了会议。比雷埃夫斯的重步兵在释放了关押的亚力克西克莱斯并拆毁了防御墙之后，

带着武器奔向穆尼希亚旁边的狄俄尼索斯剧院，在那里举行了一次集会，会上决定向雅典城进军。他们随即出发了，但在阿纳塞夫姆又停了下来。他们在这里遇上了“四百人”派来的一些代表。代表们逐一对他们进行劝导，说服那些他们认为最温和的人不但自己不能轻举妄为，还要使其他人保持克制。他们说，他们将把“五千人”的名单公诸于公，并按“五千人”的决定，从“五千人”当中轮流选出“四百人”。同时，他们还恳求重步兵不要毁掉城邦，也不要将城邦推入敌人的怀抱。经过多人对众多士兵进行劝说，全体重步兵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对对整个城邦的安危担忧。这时他们同意在指定日期召开公民大会，以恢复和睦局面，地点就定在狄俄尼索斯剧院。

When the day came for the assembly in the theatre, and they were upon the point of assembling, news arrived that the forty-two ships under Agesandridas were sailing from Megara along the coast of Salamis. The people to a man now thought that it was just what Theramenes and his party had so often said, that the ships were sailing to the fortification, and concluded that they had done well to demolish it. But though it may possibly have been by appointment that Agesandridas hovered about Epidaurus and the neighbourhood, he would also naturally be kept there by the hope of an opportunity arising out of the troubles in the town. In any case the Athenians, on receipt of the news immediately ran down in mass to Piraeus, seeing themselves threatened by the enemy with a worse war than their war among themselves, not at a distance, but close to the harbour of Athens. Some went on board the ships already afloat, while others launched fresh vessels, or ran to defend the walls and the mouth of the harbour.

在剧院举行会议的日期到了。正当他们要开会时，有消息传来说，阿耶桑泽里扎斯正率领42艘战舰沿着萨拉米斯海岸从迈加拉驶

来。所有人这时无一例外地认为，这就是塞拉门尼斯及其同党常说的情景，敌舰正朝防御墙驶来。他们断定，将墙拆毁确属正确之举。然而，尽管阿耶桑泽里扎斯的舰队可能是如约在埃皮达鲁斯及其附近巡弋，但他自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寄希望于雅典城内发生的骚乱能给他提供机会才逗留不去。不管怎样，雅典人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大举奔向比雷埃夫斯。他们意识到，敌人带来的战争威胁要比他们内部之战造成的威胁更严重，而且这种威胁并不遥远，就在雅典的港口附近。一些人登上已经下水的战舰，其他人把另外一些舰只也拖下水，或者跑去守卫城墙和港口。

Meanwhile, the Peloponnesian vessels sailed by, and rounding Sunium anchored between Thoricus and Prasiae, and afterwards arrived at Oropus. The Athenians, with revolution in the city, and unwilling to lose a moment in going to the relief of their most important possession (for Euboea was everything to them now that they were shut out from Attica), were compelled to put to sea in haste and with untrained crews, and sent Thymochares with some vessels to Eretria. These upon their arrival, with the ships already in Euboea, made up a total of thirty-six vessels, and were immediately forced to engage. For Agesandridas, after his crews had dined, put out from Oropus, which is about seven miles from Eretria by sea; and the Athenians, seeing him sailing up, immediately began to man their vessels. The sailors, however, instead of being by their ships, as they supposed, were gone away to purchase provisions for their dinner in the houses in the outskirts of the town; the Eretrians having so arranged that there should be nothing on sale in the marketplace, in order that the Athenians might be a long time in manning their ships, and, the enemy's attack taking them by surprise, might be compelled to put to sea just as they were. A signal also was raised in Eretria to give them notice in Oropus when to put to sea. The Athenians, forced to put out so poorly prepared,

engaged off the harbour of Eretria, and after holding their own for some little while notwithstanding, were at length put to flight and chased to the shore. Such of their number as took refuge in Eretria, which they presumed to be friendly to them, found their fate in that city, being butchered by the inhabitants; while those who fled to the Athenian fort in the Eretrian territory, and the vessels which got to Chalcis, were saved. The Peloponnesians, after taking twenty-two Athenian ships, and killing or making prisoners of the crews, set up a trophy, and not long afterwards effected the revolt of the whole of Euboea (except Oreus, which was held by the Athenians themselves), and made a general settlement of the affairs of the island.

其间，伯罗奔尼撒的战舰扬帆而过，绕过苏尼乌姆，停泊在索里库斯和普拉西埃之间，后来又到达奥罗普斯。城里虽然爆发了革命，但在援救他们最重要的属地（他们与阿提卡的联系已被切断，埃维亚对他们至关重要）这件事上，雅典人片刻也不愿耽搁，所以不得不赶紧率领未经训练的舰员出了海，并派西莫哈雷斯率领一些舰只开赴埃雷特里亚。这些舰只一抵达，马上与已在埃维亚的战舰会合，凑成了一支36艘战舰的舰队，随后立即投入了战斗。阿耶桑泽里扎斯待其舰员用过餐后从奥罗普斯驶出，那里距埃雷特里亚约有7英里海路。雅典人发现他正在向他们驶来，立即让人员上舰。然而，水手们并未如他们预想的那样在舰旁待命，而是到城郊的商店购买正餐吃的食物去了。这是埃雷特里亚人有意安排的。市场上不出售任何食物，这样一来雅典人可能就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为舰队配备好人员。敌方若对其实施突袭，他们可能没准备好就得投入战斗。另外，还有人从埃雷特里亚发出信号，通知在奥罗普斯的伯罗奔尼撒人何时驶出。被迫在准备不足情况下出海的雅典人在埃雷特里亚港附近接了战。他们虽然抵挡了一小段时间，但最终还是溃败而逃被赶上了岸。他们当中那些逃到埃雷特里亚的人原以为那里对他们十分友好，结果却在那座城里丧了命，被当地居民屠杀了。逃到埃雷特里亚境内雅典要塞里的人和设

法驶抵哈尔基斯的战舰都得救了。伯罗奔尼撒人缴获了22艘雅典舰，将舰上的人员或杀或俘，之后竖立起一个胜利纪念柱，不久之后又促成了整个埃维亚岛的叛离（雅典人自己把守的奥雷夫斯除外），并对岛上的事务作了总体安排。

When the news of what had happened in Euboea reached Athens, a panic ensued such as they had never before known. Neither the disaster in Sicily, great as it seemed at the time, nor any other had ever so much alarmed them. The camp at Samos was in revolt; they had no more ships or men to man them; they were at discord among themselves and might at any moment come to blows; and a disaster of this magnitude coming on the top of all, by which they lost their fleet, and worst of all Euboea, which was of more value to them than Attica, could not occur without throwing them into the deepest despondency. Meanwhile, their greatest and most immediate trouble wa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enemy, emboldened by his victory, might make straight for them and sail against Piraeus, which they had no longer ships to defend; and every moment they expected him to arrive. This, with a little more courage, he might easily have done, in which case he would either have increased the dissensions of the city by his presence, or, if he had stayed to besiege it, have compelled the fleet from Ionia, although the enemy of the oligarchy, to come to the rescue of their country and of their relatives, and in the meantime, would have become master of the Hellespont, Ionia, the islands, and of everything as far as Euboea, or, to speak roundly, of the whole Athenian empire. But here, as on so many other occasions, the Lacedaemonians proved the most convenient people in the world for the Athenians to be at war with. The wid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haracters, the slowness and want of energy of the Lacedaemonians as contrasted with the dash and enterprise of their

opponents, proved of the greatest service, especially to a maritime empire like Athens. Indeed, this was shown by the Syracusans, who were most like the Athenians in character, and also most successful in combating them.

有关埃维亚所发生之事的消息传到雅典后，引起了雅典前所未有的恐慌。在西西里的惨败当时似乎也很严重，但无论是那场惨败还是其他灾难，都不曾使他们如此惊恐。萨摩斯的军队已经叛变；他们没有更多的战舰，也没有更多的人员用以武装战舰；他们自己内部意见不和，随时都有可能动手打起来；而眼下这么大一场灾难则无异于雪上加霜，他们因此而丧失了舰队，最糟糕的是失去了整个埃维亚岛。对他们而言，埃维亚比阿提卡更重要。因此，这场灾难的发生不能不让他们沮丧至极。同时，对于他们来说，最棘手而又最急迫的麻烦是，敌人可能会因这次胜利而更加胆大妄为，径直奔向他们，驶来进攻比雷埃夫斯，而他们已经没有战舰保卫它了。可是，他们预计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到来。只要胆量稍微再大一点，敌人轻易就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是那样，敌人的存在不是会加剧城内的党派不和，就是会迫使爱奥尼亚那支舰队前来，如果敌人留下来围攻雅典城的话。这支舰队虽然仇视寡头政治，但还是会来援救城邦和亲属的。同时，他们还会成为赫勒斯滂、爱奥尼亚、各个岛屿以及远至埃维亚所有地方的主人，坦率地说，甚至是整个雅典帝国的主人。但是这一次，如同其他不少次一样，斯巴达人证明是世界上最适合与雅典人交战的民族。这两个民族性格迥异：斯巴达人动作迟缓，雅典人行动迅速；斯巴达人怠惰有余，雅典人进取有加。这种差异对雅典最为有益，尤其是对于雅典这样一个海上帝国来说。实际上，这一点通过叙拉古人即可得到证实。叙古拉人在性格上与雅典人最相似，因而在与雅典人作战方面也最成功。

Nevertheless, upon receipt of the news, the Athenians manned twenty ships and called immediately a first assembly in the Pnyx,

where they had been used to meet formerly, and deposed the Four Hundred and voted to hand over the government to the Five Thousand, of which body all who furnished a suit of armour were to be members, decreeing also that no one should receive pay for the discharge of any office, or if he did should be held accursed. Many other assemblies were held afterwards, in which law-makers were elected and all other measures taken to form a constitution. It was during the first period of this constitution that the Athenians appear to have enjoyed the best government that they ever did, at least in my time. For the fusion of the high and the low was effected with judgment, and this was what first enabled the state to raise up her head after her manifold disasters. They also voted for the recall of Alcibiades and of other exiles, and sent to him and to the camp at Samos, and urged them to devote themselves vigorously to the war.

尽管如此，雅典人一接到消息还是配备了20艘战舰，并立即在过去常开会的普尼克斯召开了第一次公民大会。他们废除了“四百人”议事会，投票决定把政府交给“五千人”，并规定所有能自备一套盔甲的人都可以成为“五千人”的成员。他们还规定，担任公职者均不得获得薪水，违者将受到诅咒。后来他们还多次举行过其他会议，在会上选举了立法者，并为制定宪法采取了一切可能措施。在这部宪法形成初期，雅典人似乎拥有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的政府，至少在我所处的时代是这样的。上层阶级和下层民众合理地融合到了一起，这种融合首次使城邦在历经灾难之后得以重新昂起头。他们还投票决定召回亚西比德和其他被放逐的人，并派人去亚西比德和萨摩斯的军营那里，敦促他们积极投入到战争中去。

Upon this revolution taking place, the party of Pisander and Alexicles and the chiefs of the oligarchs immediately withdrew to Decelea, with the single exception of Aristarchus, one of the

generals, who hastily took some of the most barbarian of the archers and marched to Oenoe. This was a fort of the Athenians upon the Boeotian border, at that moment besieged by the Corinthians, irritated by the loss of a party returning from Decelea, who had been cut off by the garrison. The Corinthians had volunteered for this service, and had called upon the Boeotians to assist them. After communicating with them, Aristarchus deceived the garrison in Oenoe by telling them that their countrymen in the city had compounded with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at one of the terms of the capitulation was that they must surrender the place to the Boeotians. The garrison believed him as he was general, and besides knew nothing of what had occurred owing to the siege, and so evacuated the fort under truce. In this way, the Boeotians gained possession of Oenoe, and the oligarchy and the troubles at Athens ended.

这次革命一发生，皮桑泽尔和亚力克西克莱斯一派以及寡头统治集团的主要人物立即撤到德西利亚去了，唯有阿里斯塔胡斯例外。阿里斯塔胡斯也是一名将军，仓促之间，他带着一批最野蛮的弓箭手向伊尼奔去。伊尼是雅典人在维奥蒂亚边境上的一个要塞，当时正在遭受科林斯人的围攻。它被围攻的原因是，从德西利亚返回的一队人被那里的守军歼灭了，这一损失激怒了科林斯人。科林斯人是主动前来实施围攻的，他们还召集了维奥蒂亚人来助战。经过与他们沟通，阿里斯塔胡斯欺骗伊尼的守军说，他们在雅典城的同胞已经与斯巴达人达成妥协。他还说，妥协的条件之一是，他们必须把这个地方交给维奥蒂亚人。由于他是将军，守军相信了他的话；另外，由于在遭受围攻，他们对所发生的事也一无所知，所以就按休战协定撤离了要塞。维奥蒂亚人就这样占领了伊尼，雅典的寡头统治和动乱就此结束了。

To return to the Peloponnesians in Miletus. No pay was

forthcoming from any of the agents deputed by Tissaphernes for that purpose upon his departure for Aspendus; neither the Phoenician fleet nor Tissaphernes showed any signs of appearing, and Philip, who had been sent with him, and another Spartan, Hippocrates, who was at Phaselis, wrote word to Mindarus, the admiral, that the ships were not coming at all, and that they were being grossly abused by Tissaphernes. Meanwhile, Pharnabazus was inviting them to come, and making every effort to get the fleet and, like Tissaphernes, to cause the revolt of the cities in his government still subject to Athens, founding great hopes on his success; until at length, at about the period of the summer which we have now reached, Mindarus yielded to his importunities, and, with great order and at a moment's notice, in order to elude the enemy at Samos, weighed anchor with seventy-three ships from Miletus and set sail for the Hellespont. Thither sixteen vessels had already preceded him in the same summer, and had overrun part of the Chersonese. Being caught in a storm, Mindarus was compelled to run in to Icarus and, after being detained five or six days there by stress of weather, arrived at Chios.

我们回头再来看米利都的伯罗奔尼撒人。在启程前往阿斯彭祖斯时，蒂萨费尔内斯曾将发放军饷一事委托于人，但伯罗奔尼撒人并未从任何一个代理人那里得到过军饷，腓尼基的舰队和蒂萨费尔内斯也没有任何露面的迹象。于是，奉派与蒂萨费尔内斯同往的腓力以及另外一个在法塞利斯的斯巴达人希波克拉底一同写信给海军大将明扎鲁斯，告诉他腓尼基的战舰根本不会来了，他们完全被蒂萨费尔内斯欺骗了。这时候，法尔纳巴佐斯却在邀他们前去。他竭力想得到他们舰队的支持，同时也与蒂萨费尔内斯一样，想促成他辖区内仍臣服于雅典那些城邦的叛离，并把很大的希望建立在他能成功之上。大约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夏季，明扎鲁斯终于没拗过他的纠缠。为了避开萨摩斯那些敌军的注意，他即刻井然有序地率领73艘战舰从米利都起

锚，扬帆向赫勒斯滂驶去。在同一个夏季，已有16艘战舰先于他抵达那里，践踏了切尔松尼斯半岛的部分地区。由于遇上了暴风雨，明扎鲁斯被迫驶入伊卡鲁斯。恶劣的天气条件使他在那里滞留了五、六天，然后才抵达希俄斯。

Meanwhile, Thrasyllus had heard of his having put out from Miletus, and immediately set sail with fifty-five ships from Samos, in haste to arrive before him in the Hellespont. But learning that he was at Chios, and expecting that he would stay there, he posted scouts in Lesbos and on the continent opposite to prevent the fleet moving without his knowing it, and himself coasted along to Methymna, and gave orders to prepare meal and other necessaries, in order to attack them from Lesbos in the event of their remaining for any length of time at Chios. Meanwhile, he resolved to sail against Eresus, a town in Lesbos which had revolted, and, if he could, to take it. For some of the principal Methymnian exiles had carried over about fifty heavy infantry, their sworn associates, from Cuma, and hiring others from the continent, so as to make up three hundred in all, chose Anaxander, a Theban, to command them, on account of the community of blood existing between the Thebans and the Lesbians, and first attacked Methymna. Balked in this attempt by the advance of the Athenian guards from Mitylene, and repulsed a second time in a battle outside the city, they then crossed the mountain and effected the revolt of Eresus. Thrasyllus accordingly determined to go there with all his ships and to attack the place. Meanwhile, Thrasybulus had preceded him thither with five ships from Samos, as soon as he heard that the exiles had crossed over, and coming too late to save Eresus, went on and anchored before the town. Here they were joined also by two vessels on their way home from the Hellespont, and by the ships of the Methymnians, making a grand total of sixty-seven vessels; and

the forces on board now made ready with engines and every other means available to do their utmost to storm Eresus.

与此同时，斯拉西卢斯获悉明扎鲁斯已从米利都启航，随即也率领55艘战舰从萨摩斯出发，想赶在他之前抵达赫勒斯滂。但是，听说明扎鲁斯已到达希俄斯之后，他预计明扎鲁斯会在那里停留，便在莱斯沃斯和对面大陆上设置了侦察哨，以防这支舰队趁他不备转移他处。他自己则沿着海岸驶向迈西姆纳，并下令准备饭食和其他必需品。如果敌人继续留在希俄斯，他们就从莱斯沃斯向其发起进攻。同时，他决定驶去进攻莱斯沃斯岛上已经叛离的埃雷苏斯城，若有可能就将它拿下。迈西姆纳的一些主要流亡者从库迈带来了大约50名重步兵——都是他们的死党，另外还从大陆上雇了些人，总共凑成了300人。由于底比斯人和莱斯沃斯人之间存在血缘关系，底比斯人阿纳克桑泽尔被选为指挥官。他们首先进攻的是迈西姆纳。守卫在米蒂利尼的雅典军队赶来挫败了他们这一企图。接着，他们又在城外的一次战斗中被二次击退。后来他们翻过山去，促成了埃雷苏斯的反叛。于是，斯拉西卢斯决定率领他的全部舰只赶赴那里，向那个地方发动进攻。与此同时，色拉西布洛斯听说流亡者已经翻山过去，立刻带领5艘战舰从萨摩斯出发，先于他赶到了埃雷苏斯。他抵达时已为时过晚，没能保住埃雷苏斯，于是继续向前，在埃雷苏斯城前落了脚。有两艘从赫勒斯滂返回本邦的战舰和迈西姆纳人的战舰也在这里加入了他们的舰队，加在一起总共67艘。舰上的部队这时也已准备就绪，打算利用舰上的攻城器械和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对埃雷苏斯全力展开猛攻。

In the meantime, Mindarus and the Peloponnesian fleet at Chios, after taking provisions for two days and receiving three Chian pieces of money for each man from the Chians, on the third day put out in haste from the island; in order to avoid falling in with the ships at Eresus, they did not make for the open sea, but

keeping Lesbos on their left, sailed for the continent. After touching at the port of Carteria, in the Phocaeid, and dining, they went on along the Cumaean coast and supped at Arginusae, on the continent over against Mitylene. From thence they continued their voyage along the coast, although it was late in the night, and arriving at Harmatus on the continent opposite Methymna, dined there; and swiftly passing Lectum, Larisa, Hamaxitus, and the neighbouring towns, arrived a little before midnight at Rhoeteum. Here they were now in the Hellespont. Some of the ships also put in at Sigeum and at other places in the neighbourhood.

与此同时，在希俄斯的明扎鲁斯以及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用两天的时间补充了食品和必需品，每人还从开俄斯人那里获得了3块开俄斯币。第三天，他们急忙驶离了这个岛，以避免遇上在埃雷苏斯的舰队。他们没有开往公海，而是沿莱斯沃斯右侧向大陆驶去。在福西伊兹的卡尔泰里亚港进行短暂停留并用过餐后，他们继续沿着库迈的海岸航行，在与米蒂利尼隔海相望那片大陆上的阿尔伊努塞吃了晚餐。尽管天色已晚，他们从那里又继续沿着海岸航行，抵达迈西姆纳对面大陆上的哈尔马图斯之后，在那里用了餐，尔后快速驶过莱克图姆、拉里萨、哈马克西图斯以及附近的城镇，在接近午夜时分到达里泰夫姆。这时他们已经到达赫勒斯滂境内。有些战舰还驶进了西耶夫姆和附近其他地方。

Meanwhile, the warnings of the fire signals and the sudde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fires on the enemy's shore informed the eighteen Athenian ships at Sestos of the approach of the Peloponnesian fleet. That very night they set sail in haste just as they were, and, hugging the shore of the Chersonese, coasted along to Elaeus, in order to sail out into the open sea away from the fleet of the enemy.

与此同时，烽火信号发出警告，敌军一侧海岸上火光突然增多，停泊在塞斯托斯那18艘雅典舰上的人得知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正在接近。当天夜里，他们匆匆启航，紧贴着切尔松尼斯海岸驶向埃莱夫斯，以避开敌方舰队而驶入公海。

After passing unobserved the sixteen ships at Abydos, which had nevertheless been warned by their approaching friends to be on the alert to prevent their sailing out, at dawn they sighted the fleet of Mindarus, which immediately gave chase. All had not time to get away; the greater number however escaped to Imbros and Lemnos, while four of the hindmost were overtaken off Elaeus. One of these was stranded opposite to the temple of Protesilaus and taken with its crew, two others without their crews; the fourth was abandoned on the shore of Imbros and burned by the enemy.

他们未被阿拜多斯那16艘舰发觉就驶过了，尽管即将赶来的友军向其发出过警告，要他们保持警惕，阻止雅典人的战舰驶出。黎明时分，他们进入明扎鲁斯所率舰队的视界之内，后者即刻展开了追击。并非所有战舰都来得及逃走。尽管大多数都逃向了伊姆布罗斯和利利姆诺斯，落在最后的4艘舰在埃莱夫斯附近被敌人追上了。其中一艘搁浅在普洛忒西拉俄斯神庙对面，连舰带人被敌擒获，另外两艘舰上的人员得以逃脱；第四艘被弃置在伊姆布罗斯的岸边，被敌人烧毁了。

After this, the Peloponnesians were joined by the squadron from Abydos, which made up their fleet to a grand total of eighty-six vessels; they spent the day in unsuccessfully besieging Elaeus, and then sailed back to Abydos. Meanwhile, the Athenians,

deceived by their scouts, and never dreaming of the enemy's fleet getting by undetected, were tranquilly besieging Eresus. As soon as they heard the news they instantly abandoned Eresus, and made with all speed for the Hellespont, and after taking two of the Peloponnesian ships which had been carried out too far into the open sea in the ardour of the pursuit and now fell in their way, the next day dropped anchor at Elaeus, and, bringing back the ships that had taken refuge at Imbros, during five days prepared for the coming engagement.

这之后，从阿拜多斯来的那个海军中队与伯罗奔尼撒人会合，这样，他们的舰队总共就有了86艘战舰。当天他们围攻埃莱夫斯，但无果而终，尔后便驶回阿拜多斯去了。其间，由于侦察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加之做梦也没想到敌方舰队会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通过，雅典人仍在静静地围困着埃雷苏斯。听到上述情况发生的消息，他们立即放弃埃雷苏斯，全速驶往赫勒斯滂。此前两艘追击至公海的伯罗奔尼撒战舰至这时恰与他们相遇，被他们所截获，次日，停泊在埃莱夫斯。在为即将到来的战斗作准备的五天里，他们带回了在伊姆布罗斯避难的舰只。

After this, they engaged in the following way. The Athenians formed in column and sailed close alongshore to Sestos; upon perceiving which the Peloponnesians put out from Abydos to meet them. Realizing that a battle was now imminent, both combatants extended their flank; the Athenians along the Chersonese from Idacus to Arrhiani with seventy-six ships; the Peloponnesians from Abydos to Dardanus with eighty-six. The Peloponnesian right wing was occupied by the Syracusans, their left by Mindarus in person with the best sailers in the navy; the Athenian left by Thrasyllus, their right by Thrasybulus, the other commanders being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fleet. The Peloponnesians hastened to engage first, and outflanking with their left the Athenian right sought to cut them off, if possible, from sailing out of the straits, and to drive their centre upon the shore, which was not far off. The Athenians perceiving their intention extended their own wing and outsailed them, while their left had by this time passed the point of Cynossema. This, however, obliged them to thin and weaken their centre, especially as they had fewer ships than the enemy, and as the coast round Point Cynossema formed a sharp angle which prevented their seeing what was going on on the other side of it.

此后，双方的交战情况是这样：雅典人以纵队紧靠着海岸驶向塞斯托斯。伯罗奔尼撒人一发觉，马上从阿拜多斯驶出来迎战。双方都意识到战斗即将发生，各自展开了自己的侧翼。雅典人的76艘战舰沿着切尔松尼斯从伊达库斯延伸到阿里亚尼，伯罗奔尼撒人的86艘战舰则从阿拜多斯延伸到了达尔扎努斯。伯罗奔尼撒一方的右翼由叙拉古人控制，明扎鲁斯亲自率领舰队中性能最好的战舰控制左翼；雅典方由斯拉西卢斯居左翼，色拉西布洛斯居右翼，其他司令官分别居于舰队各个不同部位。伯罗奔尼撒人急于首先发动进攻。他们想利用自己的左翼从侧面包围雅典人的右翼，如果可能，切断他们驶离海峡的通道，把他们的中路赶到距离不远的岸边。雅典人觉察到了他们的意图，随即将右翼展开，航行得比敌舰还快，他们的左翼此时已绕过基诺塞马角。但是，这也使得他们减弱了中路的力量，尤其是因为他们比敌军舰只数量少，绕过基诺塞马角的海岸又呈锐角，使得他们无法看到另一侧的情况。

The Peloponnesians now attacked their centre and drove ashore the ships of the Athenians, and disembarked to follow up their victory. No help could be given to the centre either by the squadron of Thrasybulus on the right, on account of the number of

ships attacking him, or by that of Thrasyllus on the left, from whom the point of Cynossema hid what was going on, and who was also hindered by his Syracusan and other opponents, whose numbers were fully equal to his own. At length, however, the Peloponnesians in the confidence of victory began to scatter in pursuit of the ships of the enemy, and allowed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ir fleet to get into disorder. On seeing this the squadron of Thrasybulus discontinued their lateral movement and, facing about, attacked and routed the ships opposed to them, and next fell roughly upon the scattered vessels of the victorious Peloponnesian division, and put most of them to flight without a blow. The Syracusans also had by this time given way before the squadron of Thrasyllus, and now openly took to flight upon seeing the flight of their comrades.

伯罗奔尼撒人立即进攻他们的中路，将雅典人的战舰赶到岸上，接着便下舰乘胜追击。雅典的中路从左右两翼都得不到支援：右翼色拉西布洛斯所率的那个中队正在遭受众多敌舰的进攻，左翼斯拉西卢斯所率的那个中队因被基诺塞马角所挡而无法看到所发生的情况，另外也被叙拉古人及其他敌军的舰只所阻，敌舰的数量与他的不相上下。然而，伯罗奔尼撒人最后以为胜券在握，开始分散兵力追逐敌舰，使得自己舰队中相当一部分战舰陷入了混乱。看到这种情况，色拉西布洛斯那个海军中队不再横向移动，而是转过来进攻并击溃了迎面冲来之敌，接着又猛攻已经获胜但四散开来的那部分伯罗奔尼撒战舰，打得其中大部分不战而逃。这之前，面对斯拉西卢斯那个中队的进攻，叙拉古人早已开始退却，如今看到友军在逃，他们也公然叛逃。

The rout was now complete. Most of the Peloponnesians fled for refuge first to the river Midius, and afterwards to Abydos. Only a few ships were taken by the Athenians; as owing to the

narrowness of the Hellespont the enemy had not far to go to be in safety. Nevertheless nothing could have been more opportune for them than this victory. Up to this time, they had feared the Peloponnesian fleet, owing to a number of petty losses and to the disaster in Sicily; but they now ceased to mistrust themselves or any longer to think their enemies good for anything at sea. Meanwhile, they took from the enemy eight Chian vessels, five Corinthian, two Ambraciot, two Boeotian, one Leucadian, Lacedaemonian, Syracusan, and Pellenian, losing fifteen of their own. After setting up a trophy upon Point Cynossema, securing the wrecks, and restoring to the enemy his dead under truce, they sent off a galley to Athens with the news of their victory. The arrival of this vessel with its unhoped-for good news, after the recent disasters of Euboea, and in the revolution at Athens, gave fresh courage to the Athenians, and caused them to believe that if they put their shoulders to the wheel their cause might yet prevail.

伯罗奔尼撒人这时已被彻底打垮。大部分伯罗奔尼撒人先是逃向米季乌斯河躲避，后来又逃向阿拜多斯，只有少数舰只被雅典人所缴获。由于赫勒斯滂海峡水域狭窄，敌军不用逃出多远即可抵达安全水域。然而，对雅典人而言，这次海战胜利来得简直太及时了。由于多次在小规模战斗中失利以及在西西里遭到惨败，他们此前一直对伯罗奔尼撒的舰队心存畏惧，但他们现在已不再怀疑自己了，也不再认为敌人在海上无往而不胜了。同时，他们还从敌人那里缴获了8艘希俄斯舰，5艘科林斯舰，2艘安布拉基亚舰，2艘维奥蒂亚舰以及柳卡迪亚、斯巴达、叙拉古和佩莱内舰各1艘。他们自己损失了15艘战舰。他们在基诺塞马角竖立了一个胜利纪念柱，收回了破损的舰只，并依据休战协定归还了敌军阵亡者的尸体，然后派一艘三列桨战舰驶回雅典去报告胜利的消息。这艘舰的到来，给雅典人带来了意外的喜讯，使得最近经受了埃维亚惨败和雅典革命的雅典人重新鼓起了勇气，同时也使他们相信，只要全力以赴，大业依然可成。

On the fourth day after the sea-fight the Athenians in Sestos having hastily refitted their ships sailed against Cyzicus, which had revolted. Off Harpagium and Priapus they sighted at anchor the eight vessels from Byzantium, and, sailing up and routing the troops on shore, took the ships, and then went on and recovered the town of Cyzicus, which was unfortified, and levied money from the citizens. In the meantime, the Peloponnesians sailed from Abydos to Elaeus, and recovered such of their captured galleys as were still uninjured, the rest having been burned by the Elaeusians, and sent Hippocrates and Epicles to Euboea to fetch the squadron from that island.

在塞斯托斯的雅典人急速整修完战舰，在这次海战后的第四天即驶去进攻已经叛离的基齐库斯。在哈尔帕伊乌姆和普里亚普斯附近，他们看到8艘来自拜占庭的战舰停泊在那里。他们驶过去击溃了岸上的军队，夺取了这些战舰，然后继续向前行驶，收复了未设防的基齐库斯城，还向城内居民征收了钱款。同时，伯罗奔尼撒人也从阿拜多斯驶至埃莱夫斯，收回了他们缴获的那些依然完好的战舰，其余的已被埃莱夫斯人烧毁。然后，他们派希波克拉底和埃皮克莱斯前往埃维亚，将岛上的海军中队带来。

About the same time, Alcibiades returned with his thirteen ships from Caunus and Phaselis to Samos, bringing word that he had prevented the Phoenician fleet from joining the Peloponnesians, and had made Tissaphernes more friendly to the Athenians than before. Alcibiades now manned nine more ships, and levied large sums of money from the Halicarnassians, and fortified Cos. After doing this and placing a governor in Cos, he sailed back to Samos, autumn being now at hand. Meanwhile,

Tissaphernes, upon hearing that the Peloponnesian fleet had sailed from Miletus to the Hellespont, set off again back from Aspendus, and made all sail for Ionia. While the Peloponnesians were in the Hellespont, the Antandrians, a people of Aeolic extraction, conveyed by land across Mount Ida some heavy infantry from Abydos, and introduced them into the town; having been ill-treated by Arsaces, the Persian lieutenant of Tissaphernes. This same Arsaces had, upon pretence of a secret quarrel, invited the chief men of the Delians to undertake military service (these were Delians who had settled at Atramyttium after having been driven from their homes by the Athenians for the sake of purifying Delos); and after drawing them out from their town as his friends and allies, had laid wait for them at dinner, and surrounded them and caused them to be shot down by his soldiers. This deed made the Antandrians fear that he might some day do them some mischief; and as he also laid upon them burdens too heavy for them to bear, they expelled his garrison from their citadel.

大约在同时，亚西比德率领他的13艘舰只从卡夫努斯和法塞利斯回到了萨摩斯，并带回消息说，他已阻止腓尼基舰队加入伯罗奔尼撒人一边，并已使蒂萨费尔内斯对雅典人比从前更为友好。亚西比德这时又为9艘舰只配备了船员，还从哈利卡尔纳苏斯人那里征收了大笔款项，并且在科斯岛修筑了防御工事。工事完成之后，他在科斯岛安排了一名总督。这时已近秋天，他驶回了萨摩斯。其时，蒂萨费尔内斯获悉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已从米利都驶往赫勒斯滂之后，他随即又从阿斯彭祖斯返回，全速驶往爱奥尼亚。伯罗奔尼撒人在赫勒斯滂期间，由于遭到蒂萨费尔内斯的波斯副将阿萨息斯的虐待，伊奥利亚血统的安坦德罗斯人把一些重步兵从阿拜多斯经陆路穿过伊达山引入城里。同一个阿萨息斯还曾以私人恩怨为借口邀请提洛人中的主要人物到军中服役（这些人原住提洛岛，后被雅典人以为提洛岛净秽为由赶出家园后定居在阿特拉米蒂乌姆）。他将他们作为朋友和盟友从城中

引出来后，让他的士兵设下埋伏，在他们用餐时将他们包围并射杀。这起事件让安坦德罗斯人担心他可能有一天也会对他们下手，加之他加诸于他们的负担不堪忍受，他们将他的驻军逐出了卫城。

Tissaphernes, upon hearing of this act of the Peloponnesians in addition to what had occurred at Miletus and Cnidus, where his garrisons had been also expelled, now saw that the breach between them was serious; and fearing further injury from them, and being also vexed to think that Pharnabazus should receive them, and in less time and at less cost perhaps succeed better against Athens than he had done, determined to rejoin them in the Hellespont, in order to complain of the events at Antandros and excuse himself as best he could in the matter of the Phoenician fleet and of the other charges against him. Accordingly, he went first to Ephesus and offered sacrifice to Artemis……

蒂萨费尔内斯原已获悉在米利都和尼多斯所发生之事，知道他在那里的驻军已被驱逐，如今听说伯罗奔尼撒人又采取了这一行动，便感到他与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裂痕已很难愈合。由于担心他们还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危害，同时又苦恼地想到，法尔纳巴佐斯若接受他们，或许以较少的时间和较小的代价就能比他更成功地对付雅典人，他决定前往赫勒斯滂重会伯罗奔尼撒人，以便对在安坦德罗斯所发生之事提出抗议，并尽可能就腓尼基舰队一事以及对他的其他指责为自己辩解。于是，他首先前往以弗所，向阿耳忒弥斯女神献祭……

[When the winter after this summer is over, the twenty-first year of this war will be completed.]

（在这个夏季之后的那个冬季结束时，这场战争的第二十一年亦将结束。）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Jacob Burckhardt

雅各布·布克哈特

I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上）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art 1 The State as a Work of Art 第一编　艺术品般的国度
- Part 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第二编　个体的发展
- Part 3 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第三编　古典文化的复兴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art 1 The State as a Work of Art

第一编　艺术品般的国度

Introduction

引言

This work bears the title of an essay in the strictest sense of the word. No one is more conscious than the writer with what limited means and strength he has addressed himself to a task so arduous. And even if he could look with greater confidence upon his own researches, he would hardly thereby feel more assured of the approval of competent judges. To each eye, perhaps, the outlines of a given civilization present a different picture; and in treating of a civilization which is the mother of our own, and whose influence is still at work among us, it is unavoidable that individual judgement and feeling should tell every moment both on the writer and on the reader. In the wide ocean upon which we venture, the possible ways and directions are many; and the same studies which have served for this work might easily, in other hands, not only receive a wholly different treatment and application, but lead also to essentially different conclusions. Such indeed i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ubject, that it still calls for fresh investigation, and may be studied with advantage from the most varied points of view. Meanwhile we are content if a patient hearing be granted us, and if this book be taken and judged as a whole. It is the most serious difficulty of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that a great intellectual process must be broken up into single, and often into what seem arbitrary categories, in order to be in any way intelligible. It was formerly our intention to fill up the gaps in this book by a special

work o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an intention, however, which we have been able to fulfill only in part. [1_1]

本书的标题，可谓最严格意义上的论文题目。只有作者本人最清楚，自己是在研究方法和体力何等有限的情况下投身于一项如此艰巨的任务中的。况且，即便作者对自己的研究信心满满，但对能否得到行家的认可却没什么把握。在不同人的眼里，某一文明的轮廓也许会呈现出不同的图景；探讨一种成为我们自身文明之母、对我们仍有影响的文明时，个人的判断与感觉对作者和读者时时刻刻都会产生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冒险航行的广袤海洋中，可供选择的航道与方向不可胜数；进行同样的研究时，本书与在其他研究者手中的处理和运用方式可能完全不同，得出的结论也迥然各异。这一主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而仍需展开新的调查，也需要从各种不同角度开展有效的研究。同时，如果读者能耐心地给我们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能从整体上看待和评判本书，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文明史研究的最大困难在于，思想发展的伟大历程必须拆分成一个一个单独的范畴，且往往是任意划分的范畴，理解起来才容易一些。我们最初的意图是再写一本专著，论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把本书中各个范畴之间的缺口补上，但这个意图我们也只完成了一部分。 [2_1]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popes and the Hohenstaufen left Italy in a political condition which differed essentially from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of the West. While in France, Spain and England the feudal system was so organized that, at the close of its existence, it was naturally transformed into a unified monarchy, and while in Germany it helped to maintain, at least outwardly, the unity of the empire, Italy had shaken it off almost entirely. The emperor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even in the most favorable case, were no longer received and respected as feudal lords, but as possible leaders and supporters of powers already in existence; while the papacy, with

its creatures and allies, was strong enough to hinder national unity in the future, not strong enough itself to bring about that unity. Between the two lay a multitude of political units—republics and despots—in part of long standing, in part of recent origin, whose existence was founded simply on their power to maintain it. [1_2] In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we detect the modern political spirit of Europe, surrendered freely to its own instincts, often displaying the worst features of an unbridled egotism, outraging every right, and killing every germ of a healthier culture. But, wherever this vicious tendency is overcome or in any way compensated, a new fact appears in history—the state as the outcome of reflection and calculation, the state as a work of art. This new life displays itself in a hundred forms, both in the republican and in the despotic states, and determines their inward constitution, no less than their foreign policy. We shall limit ourselves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pleter and more clearly defined type, which is offered by the despotic states.

罗马教廷与霍亨斯陶芬王朝之间的斗争，使得意大利的政治环境与其他西方国家截然不同。法兰西、西班牙和英格兰的封建制度是井然有序的，这样到封建制度结束时就自然而然地转变成了统一君主制，德意志的封建制度至少在表面上帮助维系了帝国的统一，而意大利却几乎彻底甩掉了封建制度。14世纪的皇帝，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都不再被奉为封建领主，而是被尊为政权的潜在领导者与支持者；而以教皇职权及其所控制的人员和盟友力量，日后阻碍国家统一是不成问题的，但教皇职权要促成国家统一却独力难支。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政治单位——共和政体和专制政体——有的历史悠久，有的刚刚组建。这些单位得以存在，靠的完全是自身的勉力支撑。 [2_2] 在它们身上，我们第一次洞察到欧洲现代政治的灵魂，它听凭本性的摆布，常常展示出糟糕透顶、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特征，践踏一切权利，将比之更为健康的文化扼杀于摇篮之中。但是，只要是在这种邪

恶势头得到控制或以某种方式抵消掉的地方，历史上都有新事物出现，即通过反思和精心设计建立起来的国家、艺术品一般的国度。这一新的政治生命有上百种展示形式，既有共和的也有专制的，既决定国家的内部建制也支配其外交政策。我们仅考量其中较为完善、界定更清晰的类型，也就是专制国家的类型。

The internal condition of the despotically governed states had a memorable counterpart in the Norman empire of Lower Italy and Sicily, after its transformation by the emperor Frederick II. Bred amid treason and peril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Saracens, Frederick, the first ruler of the modern type who sat upon a throne, had early accustomed himself to a thoroughly objective treatment of affairs.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internal condi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Saracenic states was close and intimate; and the mortal struggle in which he was engaged with the papacy compelled him, no less than his adversaries, to bring into the field all the resources at his command. Frederick's measures (especially after the year 1231) are aimed at the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the feudal state, 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eople into a multitude destitute of will and of the means of resistance, but profitable in the utmost degree to the exchequer. He centralized, in a manner hitherto unknown in the West, the whole judicial and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No office was henceforth to be filled by popular election, under penalty of the devastation of the offending district and of the enslavement of its inhabitants. The taxe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and distributed in accordance with Muhammadan usages, were collected by those cruel and vexatious methods without which, it is true, it is impossible to obtain any money from Orientals. Here, in short, we find, not a people, but simply a disciplined multitude of subjects, who were forbidden, for example, to marry out of the country without special permission,

and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ere allowed to study abroad. The University of Naples was the first we know of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study, while the East, in these respects at all events, left its youth unfettered. It was after the example of Muhammadan rulers that Frederick traded on his own account in all parts of the Mediterranean, reserving to himself the monopoly of many commodities, and restricting in various ways the commerce of his subjects. The Fatimite Caliphs, with all their esoteric unbelief, were, at least in their earlier history, tolerant of all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eligious faith of their people; Frederick, on the other hand, crowned his system of government by a religious inquisition, which will seem the more reprehensible when we remember that in the persons of the heretics he was persecuti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 free municipal life. Lastly, the internal police, and the kernel of the army for foreign service, was composed of Saracens who had been brought over from Sicily to Nocera and Lucera—men who were deaf to the cry of misery and careless of the ban of the Church. At a later period the subjects, by whom the use of weapons had long been forgotten, were passive witnesses of the fall of Manfred and of the seizure of the government by Charles of Anjou; the latter continued to use the system which he found already at work.

专制统治下的国家，其国内情形与腓特烈二世变革后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地区的诺曼帝国类似。作为第一位现代型统治者，腓特烈二世从小目睹周边撒拉森人的叛乱，且历经各种危险，早就养成了完全客观的处事习惯。他对国内的情况和撒拉森各国的政府了如指掌。与教皇的殊死斗争，迫使他与对手一样下令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投入战争。腓特烈的举措（特别是在1231年以后）目的是要彻底摧毁封建国家，把人民变成完全丧失意志、毫无反抗手段的乌合之众，利用他们最大限度地增加国库收入。他以西方前所未闻的方式，对整个司法和政治管理体系实行了集权。抗命不从者的处罚是地尽毁、人尽

奴，因而从此以后再无一官半职由普选产生。当时的税收制度要通过综合评估并按照伊斯兰教统治者的惯例进行分配，虽然征税手段残酷无理，但的确，若非如此，想从东方人手中获得半分钱都是不可能的。总之，在这里我们发现的不是一国之人民，而只是一群唯唯诺诺的臣民，不经特批不得与外国人通婚，也绝不允许出国留学。那不勒斯大学是我们所知的第一所限制学习自由的大学，而东方国家在这些方面对青年人是毫不限制的。腓特烈当时是仿照伊斯兰国家的规则，在整个地中海地区自己做生意，垄断了大量商品，还想方设法打压臣民的买卖。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们尽管私底下不信神，但至少在王朝早期历史上包容了其民众的宗教信仰差异；而腓特烈则是通过宗教裁判的方式来为其统治制度加冕，还将多名自由市政代表当作异教徒加以迫害，每想到这件事，就更让人觉得他这么做应该受到谴责。最后，国内的警力以及驻外军队的核心力量均由从西西里派到诺切拉和卢切拉的撒拉森人组成，这些人全然无视民间疾苦，对教会禁令也漫不经心。后来，老百姓因久不用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曼弗雷德垮台，政权被安茹王朝的查理夺取，后者发现这个现成的制度已经在发挥作用，便继续沿用了下去。

At the side of the centralizing emperor appeared a usurper of the most peculiar kind: his vicar and son-in-law, Ezzelino da Romano. He stand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no system of government or administration, for all his activity was wasted in struggles for supremacy in the eastern part of Upper Italy; but as a political type he was a figure of no less importance for the future than his imperial protector Frederick. The conquests and usurpations which had hitherto taken place in the Middle Ages rested on real or pretended inheritance and other such claims, or else were effected against unbelievers and excommunicated persons.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ttempt was openly made to found a throne by wholesale murder and endless barbarities, by the adoption, in short, of any means with a view to nothing but the end

pursued. None of his successors, not even Cesare Borgia, rivaled the colossal guilt of Ezzelino; but the example once set was not forgotten, and his fall led to no return of justice among the nations, and served as no warning to future transgressors.

此时这位集大权于一身的君主身边出现了一位身份极其特殊的篡权者：他的教士监理兼女婿艾泽利诺·达·罗曼诺。艾泽利诺不代表任何政府和管理体制，因为他全部的精力都浪费在了夺取北意大利东部统治权的斗争中。但是作为一种政治人物类型，他这样的人对未来的影响毫不逊色于其皇室靠山腓特烈。中世纪所发生的一切征服与篡权事件，都是以或真或假的继承权和类似理由为借口，或者是以无信仰者和被逐出教会的人员为打击对象。此时，第一次出现了通过大规模屠杀和无休止的暴行实现的对建立王权的公然尝试，简而言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艾泽利诺罪恶滔天，继任者无一能与之匹敌，就算切萨雷·波吉亚都难出其右。但先例一开便引人效仿，艾泽利诺的垮台并没有使正义重回诸国，也没能让未来的僭越者引以为戒。

It was in vain at such a time that St Thomas Aquinas, a born subject of Frederick, set up the theory of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which the prince was to be supported by an upper house named by himself, and a representative body elected by the people. Such theories found no echo outside the lecture-room, and Frederick and Ezzelino were and remain for Italy the great political phenomena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ir personality, already half legendary, forms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 of *The Hundred Old Tales* , whose original composition falls certainly within this century. In them Ezzelino is spoken of with the awe which all mighty impressions leave behind them. His person became the centre of a whole literature from the chronicle of eyewitnesses to the half-mythical tragedy of later poets.

出生于腓特烈统治时期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创建了一套君主立宪制理论，规定王储须得到由自己任命的上议院和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的支持，但在那种时代提出这样的思想是徒劳无功的。这种理论无法在讲堂之外获得反响，对意大利来说，腓特烈和艾泽利诺当初是13世纪伟大的政治奇才，今天依然如此。他们那近乎传奇的鲜明个性，成了《古代故事百篇》中最重要的题材，而该书的初稿无疑是在本世纪完成的。故事里提到艾泽利诺时，流露出了他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所带来的世人的崇敬。从时人撰写的编年史到后世诗人创作的半虚构的悲剧，艾泽利诺本人已成了各种文学体裁的中心人物。

Despot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14世纪的专制君主

The tyrannies, great and small,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fford constant proof that examples such as these were not thrown away. Their misdeeds cried forth loudly and have been circumstantially told by historians. As states depending for existence on themselves alone, and scientifically organized with a view to this object, they present to us a higher interest than that of mere narrative.

14世纪大大小小的暴政反复证明，诸如此类的暴虐行为并未被摒弃。它们罪恶昭彰，历史学家们已有详细记述。作为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而存在并为此目的而系统地组织起来的国家，它们给我们呈现的是比单纯叙事更有趣的东西。

The deliberate adaptation of means to ends, of which no prince out of Italy had at that time a conception, joined to almost absolute

power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state, produced among the despots both men and modes of life of a peculiar character. The chief secret of government in the hands of the prudent ruler lay in leaving the incidence of taxation so far as possible where he found it, or as he had first arranged it. The chief sources of income were: a land tax, based on a valuation; definite taxes on articles of consumption and duties on exported and imported goods; together with the private fortune of the ruling house. The only possible increase was derived from the growth of business and of general prosperity. Loans, such as we find in the free cities, were here unknown; a well-planned confiscation was held a preferable means of raising money, provided only that it left public credit unshaken—an end attained, for example, by the truly oriental practice of deposing and plundering the director of the finances.

对这种为达目的而蓄意调整手段的做法，意大利之外的君主们当时还毫无概念，再加上举国上下近乎绝对的权力，于是暴君中产生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人和各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精明君主的治理秘诀在于尽可能把征税的范围固定在原有的或者初始规定的项目上。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以评估为基础的土地税、各种明确的消费品税收和进出口关税、统治家族的私有财产。唯一可能的收入增长来自商业发展和普遍繁荣。诸如自由城市的借贷，在这里是闻所未闻的；精心策划的财产充公，被认为是一种更可取的筹款方式，只要不影响政府的信用就行，例如采用地道的东方式的做法，罢免财务主管的职务，没收其财产来达到目的。

Out of this income the expenses of the little court, of the bodyguard, of the mercenary troops, and of the public buildings were met, as well as of the buffoons and men of talent who belonged to the personal attendants of the prince. The illegitimacy

of his rule isolated the tyrant and surrounded him with constant danger; the most honorable alliance which he could form was with intellectual merit, without regard to its origin. The liberality of the northern prince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was confined to the knights, to the nobility which served and sang. It was otherwise with the Italian despot. With his thirst for fame and his passion for monumental works, it was talent, not birth, which he needed. In the company of the poet and the scholar he felt himself in a new position, almost, indeed in possession of a new legitimacy.

这笔收入主要用于小皇室、护卫、雇佣军、公共建筑等方面的开支，以及在君主身边服务的弄臣和人才的开销。暴君因其统治的非法性而遭到孤立，时时都处在危机四伏的境地；他此时能够组建的最体面的联盟便是与贤能之士结交，无论这些人出身如何。13世纪北方各国君主们只对骑士和侍奉左右、歌功颂德的贵族慷慨大度。而意大利的专制君主却与之相反，他们渴望名扬四海，一心只想成就不朽伟业，因而要的是才华横溢而非出身高贵的下属。有诗人和学者侍奉左右，君主会觉得自己的地位焕然一新，仿佛自己的统治变得更加正统了。

No prince was more famous in this respect than the ruler of Verona, Can Grande della Scala, who numbered among the illustrious exiles whom he entertained at his cour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hole of Italy. The men of letters were not ungrateful. Petrarch, whose visits at the courts of such men have been so severely censured, sketched an ideal picture of a princ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He demands great things from his patron, the lord of Padua, but in a manner which shows that he holds him capable of them.

在这方面，没有哪位君主比维罗纳的统治者卡恩·格兰德·德拉·斯卡拉更有名了，他在宫廷里接待过的好些杰出的流亡者都是来自全意大利各地的精英代表。当时的文人对此心怀感激。曾因数次造访这些君主的宫殿而受到严厉谴责的彼特拉克描绘了一幅14世纪理想君主的形象。他对资助自己的帕多瓦的君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表达的方式则体现出他认定君主有能力达到这些要求。

> Thou must not be the master but the father of thy subjects, and must love them as thy children; yea, as members of thy body. Weapons, guards, and soldiers thou mayest employ against the enemy—with thy subjects goodwill is sufficient. By citizens, of course, I mean those who love the existing order; for those who daily desire change are rebels and traitors, and against such a stern justice may take its course.

> 君不可为民之主，而须为民父，爱民如子；然也，视为同侪。兵刃、侍卫、军士皆御敌之用，于民，善意足矣。余之谓公民，当指拥护现制者也；日日思变，非逆即奸，此类人等可依律严惩。

Here follows, worked out in detail, the purely modern fiction of the omnipotence of the state. The prince is to take everything into his charge, to maintain and restore churches and public buildings, to keep up the municipal police, [1_3] to drain the marshes, to look after the supply of wine and corn; so to distribute the taxes that the people can recognize their necessity; he is to support the sick and the helpless, and to give his protection and society to distinguished

scholars, on whom his fame in after ages will depend.

接下来都是关于现代全能型国家的详细构想。君主须将一切置于自己掌控之下，养护、修缮教堂和公共建筑，维持地方警力 [2_3] ，疏浚沼泽，确保红酒和谷物供应；以此合理分配税收以使人民认识到征税的必要性；还须帮助生病和无助之人，并为著名学者提供保护，与他们交往，因为他的后世声誉全要仰仗这些人。

But whatever might be the brighter sides of the system, and the merits of individual rulers, yet the men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ere not without a more or less distinct consciousness of the brief and uncertain tenure of most of these despotisms. Inasmuch a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like these are naturally secure in proportion to the size of the territory in which they exist, the larger principalities were constantly tempted to swallow up the smaller. Whole hecatombs of petty rulers were sacrificed at this time to the Visconti alone. As a result of this outward danger an inward ferment was in ceaseless activity; and the effect of the situation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ruler was generally of the most sinister kind. Absolute power, with its temptations to luxury and unbridled selfishness, and the perils to which he was exposed from enemies and conspirators, turned him almost inevitably into a tyrant in the worst sense of the word. Well for him if he could trust his nearest relations! But where all was illegitimate, there could be no regular law of inheritance, either with regard to the succession or to the division of the ruler's property; and consequently the heir, if incompetent or a minor, was liable in the interest of the family itself to be supplanted by an uncle or cousin of more resolute character. The acknowledgement or exclusion of the bastards was a fruitful source of contest; and most of these families in consequence were plagued with a crowd of

discontented and vindictive kinsmen. This circumstance gave rise to continual outbreaks of treason and to frightful scenes of domestic bloodshed. Sometimes the pretenders lived abroad in exile, and like the Visconti, who practiced the fisherman's craft on the Lake of Garda, viewed the situation with patient indifference. When asked by a messenger of his rival when and how he thought of returning to Milan, he gave the reply, 'By the same means as those by which I was expelled, but not till his crimes have outweighed my own.' Sometimes, too, the despot was sacrificed by his relations, with the view of saving the family, to the public conscience which he had too grossly outraged. In a few cases the government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whole family, or at least the ruler was bound to take their advice; and here, too, the distribution of property and influence often led to bitter disputes.

但无论这一制度有多好、统治者个人有多优秀，14世纪的人们对于当时大部分专制政权统治时间短、国运变数多的现象，多多少少还是有所体认的。由于此类政治机构的稳固性自然与其疆域的面积成正比，因而许多大的城邦国家受此诱惑，不断吞并小的城邦国家。当时被屠杀的小国君主中，单单死于维斯孔蒂家族之手的就数不胜数。国家外部危机重重，国内骚乱也无休无止；这种局面对于统治者性格的影响一般来说都是极其恶劣的。绝对权力及在其引诱下产生的奢靡生活与毫无节制的自利，以及敌人和谋反者的威胁，几乎是不可避免地把统治者变成了最名副其实的暴君。哪怕他可以信赖自己的至亲也是好的！但在那个一切都无合法性可言的时代，无论是君权承继还是统治者财产的分割，都不可能有规范的继承法可循；因此，如果王位继承人孱弱无能或年龄过小，就有可能因为家族的利益而被性格更为果敢坚毅的叔伯或堂兄弟取而代之。私生子的认留问题成为皇室纷争的主因，因而多数这样的皇室家族里男性成员之间心怀不满、仇恨相向。这种情况导致叛乱事件层出不穷，家庭流血事件骇人听闻。有时觊觎王位者会流亡异国，就像跑到加尔达湖上练习打鱼的维斯孔蒂家

族的流亡者一样，对国内局势冷眼旁观。其中一位在对手派使者问他打算何时、以何种方式回到米兰时，他答复说：“当初是怎么赶我走的，就怎么迎我回去，但要等到他的罪孽超过我自己的罪孽。”有时君主触犯了众怒，为保全王室，其亲属也会牺牲君主以平息民愤。有时政权掌握在全体王室成员手中，或至少统治者不得不采纳王室成员的意见，这种情况下，财产和势力的分配问题也常导致激烈的争端。

The whole of this system excited the deep and persistent hatred of the Florentine writers of that epoch. Even the pomp and display, with which the despot was perhaps less anxious to gratify his own vanity than to impress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awakened their keenest sarcasm. Woe to an adventurer if he fell into their hands, like the upstart Doge Agnello of Pisa (1364), who used to ride out with a golden scepter, and show himself at the window of his house, 'as relics are shown', reclining on embroidered drapery and cushions, served like a pope or emperor, by kneeling attendants. More often, however, the old Florentines speak on this subject in a tone of lofty seriousness. Dante saw and characterized well the vulgarity and commonplace which marked the ambition of the new princes. 'What mean their trumpets and their bells, their horns and their flutes; but come, hangman—come, vultures?' The castle of the tyrant, as pictured by the popular mind, is a lofty and solitary building, full of dungeons and listening-tubes, the home of cruelty and misery. [1_4] Misfortune is foretold to all who enter the service of the despot, who even becomes at last himself an object of pity: he must needs be the enemy of all good and honest men; he can trust no one, and can read in the faces of his subjects the expectation of his fall. 'As despotisms rise, grow, and are consolidated, so grows in their midst the hidden element which must produce their dissolution and ruin.' But the deepest ground of dislike has not been stated; Florence was then the scene of the

richest development of human individuality, while for the despots no other individuality could be suffered to live and thrive but their own and that of their nearest dependents. The control of the individual was rigorously carried out, even dow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of passports. [1_5]

这一整套制度一直令当时佛罗伦萨的作家们深恶痛绝。哪怕专制君主举行的盛大浮夸的排场主要是为了给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非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也会招来作家们最尖酸刻薄的讽刺。这些胆大的人要是落到他们手里就倒霉了，就像比萨新贵总督阿涅洛（1364年）那样，出行时总要手持一根金色权杖，还常在官邸窗前“像文物展览一样”展示自己，斜倚在刺绣帷帐和靠垫上，周围是双膝跪地的侍从，像对待教皇或帝王一般服侍着他。然而，上了年纪的佛罗伦萨人谈起这个话题来，却常常是一副不屑一顾的严肃口吻。但丁对这些野心勃勃的新国君之粗俗与平庸看得很清楚，对其特征刻画得也很到位：“他们的喇叭和钟声，他们的号角和长笛，除了召唤——来吧绞刑官，来吧秃鹫——之外，还能有什么意思？”民众心中所设想的专制君主的城堡，是一座巍峨高耸而又孤零零的建筑，里面到处都是地牢，布满了窃听管道，是残暴与痛苦的渊薮 [2_4] 。所有为专制君主服务的人都被提前告知有遭遇不幸的可能，甚至君主本人最后也会变成可怜虫：他必须成为所有善良诚实者之敌，他无人可以信赖，从臣民的面部表情都能看出对他垮台的期望。“随着专制政权的兴起、发展和巩固，导致其必然解体和灭亡的潜在因素也在其中发展壮大起来。”但是民众不满情绪的最深刻的原因我们还没有谈到：佛罗伦萨当时是人文个性发展最为繁荣的地方，而在专制君主看来，除了他们自己和最亲近的家人，其他人都是不允许有个性且张扬个性的。他们对个人实行了严密的控制，甚至建立了一套通行证制度 [2_5] 。

The astrological superstitions and the religious unbelief of many of the tyrants gave, in the minds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a

peculiar colour to this awful and God-forsaken existence. When the last Carrara could no longer defend the walls and gates of the plague-stricken Padua, hemmed in on all sides by the Venetians (1405), the soldiers of the guard heard him cry to the devil 'to come and kill me'.

许多专制君主迷信占星术而不信宗教，在当时的人们眼中，这给他们这种被上帝抛弃了的可怕人物披上了一层特殊的色彩。当卡拉拉家族最后一位君主再也守不住瘟疫流行、被威尼斯人围得水泄不通的帕多瓦城（1405年）时，卫兵们听到他对魔鬼大喊“快来把我杀了吧”。

The most complete and instructive type of the tyranny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s to be found unquestionably among the Visconti of Milan, from the death of the Archbishop Giovanni onwards (1354). The family likeness which shows itself between Bernabo and the worst of the Roman emperors is unmistakable;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object was the prince's boar-hunting; whoever interfered with it was put to death with torture; the terrified people were forced to maintain 5,000 boar-hounds, with strict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health and safety. The taxes were extorted by every conceivable sort of compulsion; seven daughters of the prince received a dowry of 100,000 gold florins apiece; and an enormous treasure was collected. On the death of his wife (1384) an order was issued 'to the subjects' to share his grief, as once they had shared his joy, and to wear mourning for a year. The *coup de main* (1385) by which his nephew Giangaleazzo got him into his power—one of those brilliant plots which make the heart of even late historians beat more quickly—was strikingly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n.

14世纪最完整、最有启发意义的专制类型，无疑要数从乔瓦尼大教主去世（1354年）开始的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贝尔纳博与罗马帝国最差劲的皇帝如出一辙，显示了两个家族的相似性，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就是君主狩猎野猪；谁要是妨碍他猎猪，就要被严刑拷打致死；战战兢兢的人们被迫豢养了5000只猎猪犬，对其健康和安全承担严格的责任。税收方面极尽横征暴敛之能事；他的七个女儿出嫁时，都以10万金弗罗林作为陪嫁；此外他还搜罗了一大堆财宝。妻子去世（1384年）的时候，他发布了一道“告臣民书”，命令臣民们要像以前分享他的欢乐一样分担他的悲伤，且要服丧一年。他的侄子詹加莱亚佐俘获他并夺取政权的那次奇袭（1385年），是连后世的历史学家们都为之心跳加速的一条妙计，体现了詹加莱亚佐这个人最鲜明的特点。

In Giangaleazzo that passion for the colossal which was common to most of the despots shows itself on the largest scale. He undertook, at the cost of 300,000 golden florins, the construction of gigantic dykes, to divert in case of need the Mincio from Mantua and the Brenta from Padua, and thus to render these cities defenceless. It is not impossible, indeed, that he thought of draining away the lagoons of Venice. He founded that most wonderful of all convents, the Certosa of Pavia, and the cathedral of Milan, 'which exceeds in size and splendor all the churches of Christendom'. The Palace in Pavia, which his father Galeazzo began and which he himself finished, was probably by far the most magnificent of the princely dwellings of Europe. There he transferred his famous library, and the great collection of relics of the saints, in which he placed a peculiar faith. It would have been strange indeed if a prince of this character had not also cherished the highest ambitions in political matters. King Wenceslaus made him Duke (1395); he was hoping for nothing less than the kingdom of Italy or

the imperial crown, when (1402) he fell ill and died. His whole territories are said to have paid him in a single year, besides the regular contribution of 1,200,000 gold florins, no less than 800,000 more in extraordinary subsidies. After his death the dominions which he had brought together by every sort of violence fell to pieces; and for a time even the original nucleus could with difficulty be maintained by his successors. What might have become of his sons Giovanni Maria (died 1412) and Filippo Maria (died 1447), had they lived in a different country and among other traditions, cannot be said. But, as heirs of their house, they inherited that monstrous capital of cruelty and cowardice which had been accumula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大部分专制君主都酷爱宏伟建筑，詹加莱亚佐尤甚。他斥资30万金弗罗林修筑了多道大坝，以便在必要时将明乔河和布伦塔河的水分别从曼图亚和帕多瓦引走，从而使这两个城市无险可守。实际上，可能他也不是没有想过把威尼斯附近的潟湖水排干。他修建了最宏伟的女修道院——帕维亚切尔托萨修道院，以及“规模大小和宏伟壮观程度超越了基督教世界所有教堂”的米兰大教堂。位于帕维亚的宫殿由其父加莱亚佐始建，由他本人完工，这座宫殿可能是迄今为止欧洲最宏伟的君王宅邸。他把自己那个著名的图书馆以及一大批寄托了自己特殊信念的圣徒遗物都转移到了那里。要说一位有着如此性格的君主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远大抱负，那确实是怪事一桩。文策斯劳斯国王册封他为公爵（1395年）；在他一病不起、撒手人寰（1402年）之际，他仍然渴望着要建立意大利王国或者是戴上那顶皇冠。据说他的整个统治区域每年要缴纳给他的钱财，除了常规纳贡的120万金弗罗林，还需进献不少于80万金弗罗林的额外补贴。詹加莱亚佐死后，他通过各种暴力手段统一的领土分崩离析；他的继任者们甚至一度连王国的发源地都难以保全。他的两个儿子乔瓦尼·马里亚（死于1412年）和菲利波·马里亚（死于1447年）要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继承不同的传统，后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物，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作为

家族子嗣，他们继承了这个家族世代积累下来的那种可怕的、既残忍又懦弱的品质。

Giovanni Maria, too, is famed for his dogs, which were no longer, however, used for hunting but for tearing human bodies. Tradition has preserved their names, like those of the bears of the Emperor Valentinian I. In May 1409, when war was going on, and the starving populace cried to him in the streets, *Pace! Pace!,* he let loose his mercenaries upon them, and 200 lives were sacrificed; under penalty of the gallows it was forbidden to utter the words *pace* and *guerra,* and the priests were ordered, instead of *dona nobis pacem,* to say *tranquillitatem!* At last a band of conspirators took advantage of the moment when Facino Cane, the chief *condottiere* of the insane ruler, lay ill at Pavia, and cut down Giovanni Maria in the church of San Gottardo at Milan; the dying Facino on the same day made his officers swear to stand by the heir Filippo Maria, whom he himself urged his wife to take for a second husband. His wife, Beatrice di Tenda, followed his advice. We shall have occasion to speak of Filippo Maria later on.

乔瓦尼·马里亚同样以狗出名，但他的狗不是用来打猎的，而是用来撕咬人的身体的。按照惯例，狗的名字都保留了下来，就像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的那些熊的名字一样。1409年5月，战争还在进行，饥饿的平民在大街上冲他喊：和平，和平！他派雇佣兵进行镇压，致200人死亡。他不允许民众说“和平”和“战争”这两个词，违者处以绞刑。神职人员也接到命令，不得吟诵“赐予我们和平”，而须改为“赐予我们安宁”。最后，一群密谋者利用乔瓦尼·马里亚的雇佣兵首领法西诺·卡恩病倒在帕维亚的时机，在米兰的圣哥塔德教堂里砍死了这位疯狂的统治者。就在当天，奄奄一息的法西诺还让部下军官们发誓拥护继位的菲利波·马里亚，并亲自劝自己的妻子嫁给他。他妻子贝

亚特里切·迪·腾达听从了他的建议。我们后面有机会再说菲利波·马里亚。

And in times like these Cola di Rienzi was dreaming of founding on the rickety enthusiasm of the corrupt population of Rome a new state which was to comprise all Italy. By the side of rulers such as those whom we have described, he seems no better than a poor deluded fool.

就在这样的时代里，科拉·迪·黎恩济还在梦想着依靠腐化堕落的罗马人民那并不牢靠的热情建立一个囊括整个意大利的新国家。同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些统治者比起来，他似乎只是一个被蒙蔽的傻瓜罢了。

Despot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15世纪的专制君主

The despotism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show an altered character. Many of the less important tyrants, and some of the greater, like the Scala and the Carrara, had disappeared, while the more powerful ones, aggrandized by conquest, had given to their systems each its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Naples, for example, received a fresh and stronger impulse from the new Aragonese dynasty. A striking feature of this epoch is the attempt of the *condottieri* to found independent dynasties of their own. Facts and the actual relations of things, apart from traditional estimates, are alone regarded; talent and audacity win the great prizes. The petty despots, to secure a trustworthy support, begin to enter the service

of the larger states, and become themselves *condottieri* , receiving in return for their services money and impunity for their misdeeds, if not an increase of territory. All, whether small or great, must exert themselves more, must act with greater caution and calculation, and must learn to refrain from too wholesale barbarities; only so much wrong is permitted by public opinion as is necessary for the end in view, and this the impartial bystander certainly finds no fault with. No trace is here visible of that half-religious loyalty by which the legitimate princes of the West were supported; personal popularity is the nearest approach we can find to it. Talent and calculation are the only means of advancement. A character like that of Charles the Bold, which wore itself out in the passionate pursuit of impracticable ends, was a riddle to the Italians. 'The Swiss were only peasants, and if they were all killed, that would be no satisfaction for the Burgundian nobles who might fall in the war. If the duke got possession of all Switzerland without a struggle, his income would not be 5,000 ducats the greater.' The medieval features in the character of Charles, his chivalrous aspirations and ideals, had long become unintelligible to the Italians. The diplomatists of the South, when they saw him strike his officers and yet keep them in his service, when he maltreated his troops to punish them for a defeat, and then threw the blame on his counselor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same troops, gave him up for lost. Louis XI, on the other hand, whose policy surpasses that of the Italian princes in their own style, and who was an avowed admirer of Francesco Sforza, must be placed in all that regards culture and refinement far below these rulers.

15世纪的专制统治的特点发生了一些变化。许多势力较小的独裁者，还有一些像斯卡拉和卡拉拉那样势力较大的，都已销声匿迹，而更强大的则通过征服进行了扩张，使得各自的制度获得了具有自身特

色的新发展。例如，那不勒斯就从阿拉贡王朝那里获得了更为强劲的新动力。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雇佣军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除了传统的评判，事实和事物之间的实际关系也格外受人关注；才干和胆略大获赏识。弱小的独裁者们为了获得可靠的支持，开始为大国服务，摇身一变成了雇佣军，所换得的，不是国土面积的扩大，就是金钱和免罪。所有的独裁者，无论大小，都必须更加努力，行事须更加小心、更深思熟虑，要学会控制，使暴行规模不致过大；舆论只能容忍那些为实现目标而不得不犯的错，对此公正的旁观者肯定也无话可说。这里完全看不到支持西方合法君主们的那种半宗教式忠诚；个人声望是我们所知的获得忠诚的最佳途径。才干与谋略是提升的唯一资本。像勃艮第公国最后一位公爵大胆的查理那样，狂热地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意大利人是无法理解的。“瑞士人不过是些农民，把他们都杀了，未必会让可能被卷入战争的勃艮第贵族们满意。要是公爵毫不费力就占领了整个瑞士，那他的收入也不会多出5,000达克特。”查理性格里的中世纪特征、他的骑士抱负和理想，长久以来一直都令意大利人颇为费解。南部地区的外交官们看到查理殴打部下军官之后还逼着他们继续为自己效力，见他虐待士兵以惩罚他们打了败仗，然后又当着同一批士兵的面把责任一股脑全推到了参事们的头上，就知道这人没希望了。另一方面，路易十一推行的政策虽然比意大利君主们的那套法子要好，他也公开承认自己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仰慕者，但他在教养和品位等各方面都远不如这些统治者。

Good and evil lie strangely mixed together in the Italian state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personality of the ruler is so highly developed, often of such deep significance, and so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nditions and needs of the time, that to form an adequate moral judgement on it is no easy task. [1_6]

15世纪的意大利各国，善与恶奇怪地交织在一起。统治者个性发

展程度很高，影响往往很深，这对于当时的环境与需要来说是很典型的，因此要对此种个性作恰当的道德评判殊非易事 [2_6] 。

The foundation of the system was and remained illegitimate, and nothing could remove the curse which rested upon it. The imperial approval or investiture made no change in the matter, since the people attached little weight to the fact that the despot had bought a piece of parchment somewhere in foreign countries, or from some stranger passing through his territory. If the emperor had been good for anything—so ran the logic of uncritical common sense—he would never have let the tyrant rise at all. Since the Roman expedition of Charles IV, the emperors had done nothing more in Italy than sanction a tyranny which had arisen without their help; they could give it no other practical authority than what might flow from an imperial charter. The whole conduct of Charles in Italy was a scandalous political comedy. Matteo Villani relates how the Visconti escorted him round their territory, and at last out of it; how he went about like a hawker selling his wares (privileges, etc.) for money; what a mean appearance he made in Rome, and how at the end, without even drawing the sword, he returned with replenished coffers across the Alps. Sigismund came, on the first occasion at least (1414), with the good intention of persuading John XXIII to take part in his council; it was on that journey, when pope and emperor were gazing from the lofty tower of Cremona on the panorama of Lombardy, that their host, the tyrant Gabrino Fondolo, was seized with the desire to throw them both over. On his second visit Sigismund came as a mere adventurer; for more than half a year he remained shut up in Siena, like a debtor in gaol, and only with difficulty, and at a later period, succeeded in being crowned in Rome. And what can be thought of Frederick III? His journeys to Italy have the air of holiday-trips or pleasure-tours

made at the expense of those who wanted him to confirm their prerogatives, or whose vanity is flattered to entertain an emperor. The latter was the case with Alfonso of Naples, who paid 150,000 florins for the honor of an imperial visit. At Ferrara, on his second return from Rome (1469), Frederick spent a whole day without leaving his chamber, distributing no less than eighty titles; he created knights, counts, doctors, notaries—counts, indeed, of different degrees, as, for instance, counts palatine, counts with the right to create doctors up to the number of five, counts with the rights to legitimatize bastards, to appoint notaries, and so forth. The chancellor, however, expected in return for the patents in question a gratuity which was thought excessive at Ferrara. The opinion of Borso, himself created Duke of Modena and Reggio in return for an annual payment of 4,000 gold florins, when his imperial patron was distributing titles and diplomas to all the little court, is not mentioned. The humanists, then the chief spokesmen of the age, were divided in opinion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while the emperor was greeted by some of them with the conventional acclamations of the poets of imperial Rome. Poggio confessed that he no longer knew what the coronation meant; in the old times only the victorious Imperator was crowned; and then he was crowned with laurel.

这一制度的根基原本就不合法，也一直没能得到改观，什么也无法解开附在它身上的诅咒。不管皇室御批还是加官进爵，在这件事上都无任何改变，因为民众根本不重视独裁君主的羊皮诏书是从外国某个地方买来的还是从过境的陌生人手中买来的。假如皇帝稍有担当——按照常识来推理——他是绝对不会听任独裁者崛起的。自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远征罗马以来，意大利的皇帝们除了承认那些未经他们扶持而兴起的暴政外，什么都没做；他们无法为之提供任何实际权威，只能颁发一纸诏书予以认可。查理在意大利的所作所为，

就是一场丑闻不断的政治闹剧。马泰奥·维拉尼叙述了维斯孔蒂家族护送他周游他们的领地以及最后离境的情形；他讲述自己如何像个小贩一样为了钱财到处兜售货物（特权等）；还描绘了他在罗马期间给人怎样一副不友善的形象，以及最后如何剑未出鞘就带着装得满满的大小箱子翻越阿尔卑斯山满载而归。西吉斯蒙德至少是一有机会就善意地劝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参加他的宗教大会（1414年）的；正是在那次宗教大会之旅中，教皇和皇帝从克雷莫纳的高塔上眺望伦巴第全貌时，宗教大会东道主、暴君加布里诺·丰多洛，产生了把他们两个从塔上扔下去的念头。西吉斯蒙德第二次来意大利时，身份只是一个冒险者；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把自己像个负债累累的囚徒一般关在锡耶纳，历尽艰辛，后来终于在罗马加冕。说起腓特烈三世又能让人想起什么呢？他的意大利之行颇有度假和开心之旅的味道，费用自有人替他支付，这些人有的是想要他确认他们的特权，有的则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款待皇帝的那点虚荣心。那不勒斯的阿方索就属后者，他曾斥资15万弗罗林，只为邀请皇帝光临一回。腓特烈第二次从罗马返回（1469年）途中，在费拉拉曾一整天足不出户，封了不下80个爵位出去；分封的头衔有骑士、伯爵、博士、书记官等——其中伯爵实际上又分为不同的等级，例如：在其领地内享有王权的伯爵，有权分封多达五位博士的伯爵，以及有权将私生子合法化、有权任命书记官的伯爵，等等。但是这位爵位批准官一口气批了这么多特权爵位出去，是想要得到在费拉拉这里被认为是数目极大的一笔酬金。博尔索册封了摩德纳和雷焦公爵，每年收取4,000金弗罗林作为回报，在他的皇室靠山给小宫廷全体人员分封爵位、颁发文状时，他是什么意见，史界无人提及。人文主义者是那个时代的主要代言人，他们根据个人的兴趣各持己见，而其中一些人向皇帝致以罗马帝国诗人传统的欢呼声。波焦坦言他已不知加冕礼意义何在，因为古时只有打了胜仗的罗马皇帝才可以加冕，而当时他已戴上了桂冠。

With Maximilian I begins not only the general intervention of foreign nations, but a new imperial policy with regard to Italy. The first step—the investiture of Lodovico il Moro with the duchy of

Milan and the exclusion of his unhappy nephew—was not of a kind to bear good fruits.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theory of intervention, when two parties are tearing a country to pieces, a third may step in and take its share, and on this principle the empire acted. But right and justice were appealed to no longer. When Louis XII was expected in Genoa (1502), and the imperial eagle was removed from the hall of the ducal palace and replaced by painted lilies, the historian Senarega asked what, after all, was the meaning of the eagle which so many revolutions had spared, and what claims the empire had upon Genoa. No one knew more about the matter than the old phrase that Genoa was a *camera imperii* . In fact, nobody in Italy could give a clear answer to any such questions. At length, when Charles V held Spain and the empire together, he was able by means of Spanish forces to make good imperial claims; but it is notorious that what he thereby gained turned to the profit, not of the empire, but of the Spanish monarchy.

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即位后，不但开始全面干涉外国事务，而且开始针对意大利实施一项新的帝国政策。政策的第一步——加封洛多维科·摩洛为米兰公爵并将他那心怀不满的侄子驱逐出境，并不是那种能取得好结果的政策。根据现代干预理论，两方在瓜分一个国家时，第三方可插足分一杯羹，当时帝国也的确是按此原则行事的。但公理和正义却被抛到脑后去了。当路易十二即将攻克热那亚（1502年）、公爵宫殿大厅里的帝国鹰徽将要被彩绘百合花取代时，历史学家塞纳雷加追问道：那历经无数次革命却保留完好的鹰徽到底意义何在？帝国对热那亚到底有何索求？对此，除了那句“热那亚是帝国账房”的老话，没人知道更多情况了。事实上，在意大利没有人能对这样的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到最后查理五世将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合并在一起时，他有能力凭借西班牙的军队索取一大笔赔偿；但臭名昭著的是，他藉此所获并非为帝国牟利，而是为西班牙王室牟利。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political illegitimacy of the dynastie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as the public indifference to legitimate birth, which to foreigners—for example, to Comines—appeared so remarkable. The two things went naturally together. In northern countries, as in Burgundy, the illegitimate offspring were provided for by a distinct class of appanages, such as bishoprics and the like; in Portugal an illegitimate line maintained itself on the throne only by constant effort; in Italy, on the contrary, there no longer existed a princely house where, even in the direct line of descent, bastards were not patiently tolerated. The Aragonese monarchs of Naples belonged to the illegitimate line, Aragon itself falling to the lot of the brother of Alfonso I. The great Federigo of Urbino was, perhaps, no Montefeltro at all. When Pius II was on his way to the Congress of Mantua (1459), eight bastards of the house of Este rode to meet him at Ferrara, among them the reigning duke Borso himself and two illegitimate sons of his illegitimate brother and predecessor Lionello. The latter had also had a lawful wife, herself an illegitimate daughter of Alfonso I of Naples by an African woman. The bastards were often admitted to the succession where the lawful children were minors and the dangers of the situation were pressing; and a rule of seniority became recognized, which took no account of pure or impure birth. The fitness of the individual, his worth and his capacity, were of more weight than all the laws and usages which prevailed elsewhere in the West. It was the age, indeed, in which the sons of the popes were founding dynastie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ideas and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 which then began, the whole question was judged more strictly: Varchi discovers that the succession of the legitimate children 'is ordered by reason, and is the will of heaven from eternity'. Cardinal Ippolito de' Medici founded his claim to the lordship of Florence on the fact that he

was perhaps the fruit of a lawful marriage, and at all events son of a gentlewoman, and not, like Duke Alessandro, of a servant girl. At this time began those morganatic marriages of affection which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on grounds either of policy or morality, would have had no meaning at all.

与15世纪各朝各代政治上的不合法密切相联的，是公众对统治者婚生身份的漠视，而这种漠视对于外国人——譬如科米纳——来说，显得太不寻常了。这两件事情是自然而然地牵扯在一起的。在北方各国，与勃艮第公国一样，庶出子嗣只能获得诸如主教之类等级的封地；在葡萄牙，非嫡出后裔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唯有不懈努力；而意大利的情况与之相反，不容许有私生子的王室已不复存在，即便是嫡系后裔的私生子。那不勒斯阿拉贡王国的君主们就属于庶出皇族，因为阿拉贡王国本身就落入了阿方索一世的兄弟之手。乌尔比诺的腓特烈大帝可能根本就不是蒙泰费尔特罗的后代。庇护二世在赶赴曼图亚会议（1459年）的路上，有八个埃斯特家族的私生子在费拉拉骑马相迎，其中就有在位公爵博尔索本人以及他的庶出兄弟、前任费拉拉公爵廖内洛的两个庶子。廖内洛也有过一个明媒正娶的妻子，而他妻子本人则是那不勒斯的阿方索一世与一个非洲女人的私生女。私生子女常在合法子女尚未成年而政权局势岌岌可危时得以继承王位；论资排辈是普遍接受的规则，并不考虑出身纯正与否。个人的健康、价值与能力，比盛行于西方其他国家的一切法规和惯例分量都要更重。这实际上就是教皇的儿子们建立各大王朝的时代。在16世纪，经过外国思想和当时开始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整个问题受到更严格的评判：瓦尔奇认识到，嫡传子女继承王位“是由理性决定的，是上天永恒的意志”。红衣主教伊波利托·德·美第奇自称佛罗伦萨之王，所依据的事实就是他或许是合法婚姻所生，不管怎么说，他的母亲是一位贵妇人，不像阿里桑德罗公爵，是一个女仆生的。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以感情为基础的贵贱通婚，要是在15世纪，不管依据政策还是依据道德，这样的通婚都毫无意义。

But the highest and the most admired form of illegitimac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was presented by the *condottiere,* who, whatever may have been his origin, raised himself to the position of an independent ruler. At bottom, the occupation of Lower Italy by the Normans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was of this character. Such attempts now began to keep the peninsula in a constant ferment.

但在15世纪将非法性发扬到极致且令人极为敬佩之境界的则非雇佣军首领莫属，因为他不管出身如何，都平步青云，成为了独立的统治者。事实上，11世纪诺曼人占领意大利南部时这一特征已现端倪。此种企图使得意大利半岛开始陷入持续动荡之中。

It was possible for a *condottiere* to obtain the lordship of a district even without usurpation, in the case when his employer, through want of money or troops, provided for him in this way;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e *condottiere,* even when he dismissed for the time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forces, needed a safe place where he could establish his winter quarters, and lay up his stores and provisions. The first example of a captain thus portioned is John Hawkwood, who was invested by Gregory XI with the lordship of Bagnacavallo and Cotignola. When with Alberico da Barbiano Italian armies and leaders appeared upon the scene, the chances of founding a principality, or of increasing one already acquired, became more frequent. The first great bacchanalian outbreak of military ambition took place in the duchy of Milan after the death of Giangaleazzo (1402). The policy of his two sons was chiefly aimed a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new despotisms founded by the *condottieri;* and from the greatest of them, Facino Cane, the house of Visconti inherited, together with his widow, a long list of cities, and 400,000 golden florins, not to speak of the soldiers of her first

husband whom Beatrice di Tenda brought with her. From henceforth that thoroughly immoral rel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and their *condottieri* ,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mon. An old story—one of those which are true and not true, everywhere and nowhere—describes it as follows: The citizens of a certain town (Siena seems to be meant) had once an officer in their service who had freed them from foreign aggression; daily they took counsel how to recompense him, and concluded that no reward in their power was great enough, not even if they made him lord of the city. At last one of them rose and said, 'Let us kill him and then worship him as our patron saint.' And so they did, following the example set by the Roman senate with Romulus. In fact, the *condottieri* had reason to fear none so much as their employers; if they were successful, they became dangerous, and were put out of the way like Roberto Malatesta just after the victory he had won for Sixtus IV (1482); if they failed, the vengeance of the Venetians on Carmagnola showed to what risks they were exposed (1432). [1_7]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moral aspect of the situation that the *condottieri* had often to give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as hostages, and notwithstanding this, neither felt nor inspired confidence. They must have been heroes of abnegation, natures like Belisarius himself, not to be cankered by hatred and bitterness; only the most perfect goodness could save them from the most monstrous iniquity. No wonder then if we find them full of contempt for all sacred things, cruel and treacherous to their fellows—men who cared nothing whether or no they died under the ban of the Church. At the same time, and through the force of the same conditions, the genius and capacity of many among them attained the highest conceivable development, and won for them the admiring devotion of their followers; their armies are the first in modern history in which the personal credit of the leader is the one moving power. A brilliant example is shown in the

life of Francesco Sforza; no prejudice of birth could prevent him from winning and turning to account when he needed it a boundless devotion from each individual with whom he had to deal; it happened more than once that his enemies laid down their arms at the sight of him, greeting him reverently with uncovered heads, each honoring in him 'the common father of the men-at-arms'. The race of the Sforza has this special interest, tha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its history we seem able to trace its endeavors after the crown. The foundation of its fortune lay in the remarkable fruitfulness of the family; Francesco's father, Jacopo, himself a celebrated man, had twenty brothers and sisters, all brought up roughly at Cotignola, near Faenza, amid the perils of one of the endless Romagnole vendettas between their own house and that of the Pasolini. The family dwelling was a mere arsenal and fortress; the mother and daughters were as warlike as their kinsmen. In his thirteenth year Jacopo ran away and fled to Panicale to the papal *condottiere* Boldrino—the man who even in death continued to lead his troops, the word of order being given from the bannered tent in which the embalmed body lay, till at last a fit leader was found to succeed him. Jacopo, when he had at length made himself a name in the service of different *condottieri,* sent for his relations, and obtained through them the same advantages that a prince derives from a numerous dynasty. It was these relations who kept the army together when he lay a captive in the Castel dell' Uovo at Naples; his sister took the royal envoys prisoner with her own hands, and saved him by this reprisal from death. It was an indication of the breadth and the range of his plans that in monetary affairs Jacopo was thoroughly trustworthy; even in his defeats he consequently found credit with the bankers. He habitually protected the peasants against the license of his troops, and reluctantly destroyed or injured a conquered city. He gave his well-known mistress, Lucia, the mother of Francesco, in marriage to another, in order to be free

for a princely alliance. Even the marriages of his relations were arranged on a definite plan. He kept clear of the impious and profligate life of his contemporaries, and brought up his son Francesco to the three rules: 'Let other men's wives alone; strike none of your followers, or, if you do, send the injured man far away; don't ride a hard-mouthed horse, or one that drops his shoe.' But his chief source of influence lay in the qualities, if not of a great general, at least of a great soldier. His frame was powerful, and developed by every kind of exercise; his peasant's face and frank manners won general popularity; his memory was marvelous, and after the lapse of years could recall the names of his followers, the number of their horses, and the amount of their pay. His education was purely Italian: he devoted his leisure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had Greek and Latin authors translated for his use. Francesco, his still more famous son, set his mind from the first on founding a powerful state, and through brilliant generalship and a faithlessness which hesitated at nothing, got possession of the great city of Milan (1447-50).

对于一个雇佣军首领来说，即便不通过篡权的方式，也同样可以获得某地区的统治权，前提是他能替雇主解决金钱或部队需求。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雇佣军首领都需要建立冬季营地，即便雇佣军首领暂时解散了主体部队，他也需要这样一个地方来储藏军需给养物品。第一个这样得到封地的首领是约翰·霍克伍德，他被格雷戈里十一世授予亚卡瓦洛和科迪尼奥拉领主的身份。当意大利军队及其领导者与阿伯里格·德·巴尔比亚诺一道登上历史舞台时，成立一个公国、扩大原有国土面积已经不再那么困难。詹加莱亚佐死后（1402年），米兰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无节制的军事暴乱。他的两个儿子制定政策打算消灭雇佣兵建立的专制政权，维斯孔蒂家族从最有实力的雇佣军首领法西诺·凯恩那里接管了很多城镇，还得到了40万金弗罗林，当然还有寡妇贝亚特里切·迪·腾达带来的她前夫的部队。从那以后，15世纪典型的

政府和雇佣军之间的肮脏关系变得越来越常见。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真假难辨，众说纷纭，故事内容是这样的：曾经有一个被外国入侵的城镇（可能指的是锡耶纳城），那里的人们在一位将军的帮助下得到了解救，人们每天都讨论如何报答这个将军，但是他们认为能力有限，怎么报答他都是不够的，就算把他推选为领主都不足以为报。最后，他们中的一个起身说道："让我们把他杀了，然后把他尊为我们的守护神。"然后他们仿照罗马上议院处理罗慕路斯的方法杀了那位将军。事实上，雇佣军的恐惧远不及雇佣军的头领们，这是有原因的。头领们一旦成功，会立即处于危险的境地[2_7]，随后就会像罗伯托·马拉泰斯塔刚刚为西克塔斯四世赢得胜利后一样被人除掉（1482年）。如果失败了，他们同样面临危险，正如威尼斯人对卡尔马尼诺拉的报复（1432年）。这种处境下，能反映头领们精神风貌的最典型的举动是，他们经常不得不把妻子孩子拿出来当人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既感受不到也得不到信任。成为英雄的同时，他们不得不保持高度的自制力，保持像贝利撒留一样的天性，不被愤怒和怨恨腐蚀；要想把他们从可怕的罪孽中拯救出来，需要至上之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蔑视神圣，对他们的同类——那些不在意自己是否会死于教会禁令之下的人，他们凶狠狡诈。同时，出于上述形势所迫，很多雇佣军首领们的能力和天分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开发，这也为他们赢得了许多部下的崇拜和忠心。他们的军队也是最早只以领袖个人威信为动力的军队。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的一生就是最好的例证；无论之前人们对他的身世有何偏见，只要他有需要，每一个他与之交往的人会立刻为他赴汤蹈火、为他所用；曾经不止一次，敌人见了他，都会放下武器，摘下头盔向他致敬，尊他为"军人之父"。斯福尔扎世族有这种特殊的传统和渊源，从家族历史一开始我们似乎就可以发现他们为追求王位所付出的努力。这个家族的繁盛离不开众多背景显赫的家庭成员，弗朗西斯科的父亲雅各布本就是个有名望的人，有20个兄弟姐妹，大多在法恩扎附近的科迪尼奥拉长大成人，伴随着他们的是和帕索里尼家族之间无穷无尽的世仇危险。全家的住处简直是一所兵工厂，像军事要塞一样；母亲和女儿们像家中男人一样好战。雅各布13岁的时候，从家出逃至帕尼卡莱，投奔教皇的雇佣军首领博尔德力诺——这个队长甚至连死了都继续指挥着军队，他被防腐处理过的尸体

摆放在插满旗帜的营帐中，营帐中仍旧传出他的指令，直到最终找到了合适的新首领继承他的事业。雅各布辗转多支雇佣军队，功成名就之后告知家人，这才通过他们得到历代王朝君主所应有的好处。他被俘在那不勒斯的乌奥沃城堡里做阶下囚时，正是他的亲戚家人们将军队团结了起来。他的姐姐亲手把皇家公使抓了起来，关进监狱，通过这种方式报复了公使，救了雅各布的性命。雅各布在金钱计划方面展现出的全面细致证明他是一个完全值得信任的人。甚至在战败时，他仍能从银行家那里获得贷款。他习惯性地保护农民免遭他军队的肆意侵扰，并且不情愿毁灭或损坏一座已经攻占的城市。为了恢复自由身好进行王室联姻，他把自己有名的情人露西娅，即弗朗西斯科的母亲，让给了别人。甚至他亲戚的婚姻也是有意安排过的。他远离同龄人放荡堕落的生活方式，在教育儿子弗朗西斯科时约法三章："不得与他人之妻有染；不得打部下，真要打了就别再留在身边；不得骑难以驾驭或蹄铁脱落的马。"但是雅各布主要的影响力来源于他的个人素质，就算他不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也肯定算是一名伟大的士兵。他骨骼健壮天生神力，后天又进行过各种锻炼；农民般朴实的脸和直率的做事方式使他很受欢迎；他记忆力超群，多年后还能记起昔日部属的名字、马匹的数量和他们的禄供。他接受的教育是纯粹的意大利式教育：空余时间全用于研究历史，身边有希腊语和拉丁语作者们为他翻译。雅各布久负盛名的儿子弗朗西斯科从一开始就立志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并最终凭借卓越的军事领导能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占领了伟大的米兰城（1447-1450年）。

His example was contagious. Aeneas Sylvius wrote about this time: 'In our change-loving Italy, where nothing stands firm, and where no ancient dynasty exists, a servant can easily become a king.' One man in particular, who styled himself 'the man of fortune', fille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Giacomo Piccinino, the son of Niccolo. It was a burning question of the day if he, too, would succeed in founding a princely house. The greater states had an obvious interest in hindering it, and even Francesco

Sforza thought it would be all the better if the list of self-made sovereigns were not enlarged. But the troops and captains sent against him, at the time, for instance, when he was aiming at the lordship of Siena, recognized their interest in supporting him: 'If it were all over with him, we should have to go back and plough our fields.' Even while besieging him at Orbetello, they supplied him with provisions; and he got out of his straits with honor. But at last fate overtook him. All Italy was betting on the result, when (1465), after a visit to Sforza at Milan, he went to King Ferrante at Naples. In spite of the pledges given, and of his high connections, he was murdered in the Castel Nuovo. Even the *condottieri* , who had obtained their dominions by inheritance, never felt themselves safe. When Roberto Malatesta and Frederick of Urbino died on the same day (1482), the one at Rome, the other at Bologna, it was found that each had recommended his state to the care of the other. Against a class of men who themselves stuck at nothing, everything was held to be permissible. Francesco Sforza, when quite young, had married a rich Calabrian heiress, Polissena Russa, Countess of Montalto, who bore him a daughter; an aunt poisoned both mother and child, and seized the inheritance.

雅各布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埃尼亚斯·西尔维于斯在描述那个时代时是这样说的："我们身处在一个多变的意大利，没有什么是不可动摇的，没有哪个古代王朝还能存在到今天，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佣人也能成为国王。"其中有一个人，尤其能满足整个国家的想象，他就是尼科洛的儿子，自称"天命之子"的贾科莫·皮奇尼诺。当时人们话题的焦点也马上转移到了他能否也能成功地建立一代王室的问题上来。大国自然想对这一问题加以阻挠，连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也希望自建政权的名单不要再增加了。但是派出去的士兵也支持皮奇尼诺，例如有一次皮奇尼诺想统领锡耶纳时，派出镇压他的士兵们也都认为："如果他彻底失败的话，我们也不得不回家种地。"甚至已经把他

包围在奥尔贝泰洛时，士兵们还在为他提供给养，最后皮奇尼诺大大方方地走出了奥尔贝泰洛，脱离了困境。不过最终断送皮奇尼诺的是命运，皮奇尼诺去米兰拜访斯福尔扎后前往那不勒斯找国王费兰特时（1465年），全意大利都在猜想他的下场。尽管他一再得到承诺，尽管他关系人脉广阔，最后他还是在乌奥沃城堡被暗杀了。在那个时代，就算拥有继承领地的佣兵队长都从未有过安全感。后来，人们发现同一天（1482年）死于罗马的罗伯托·马拉泰斯塔和死于博洛尼亚的乌尔比诺的腓特烈死前曾相互托付自己的国家。当时，只要能阻止那些心狠手辣的人，没有什么办法不可以使用。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还很年轻的时候娶过一位卡拉布里的富家千金，她叫保丽赛纳·拉萨，是蒙达多的女伯爵，后来还为斯福尔扎生过一个女儿。不过最终这对母女被一个姑母毒死，并被夺去了继承权。

From the death of Piccinino onwards, the foundations of new states by the *condottieri* became a scandal not to be tolerated. The four great powers, Naples, Milan, the papacy and Venice, formed among themselves a political equilibrium which refused to allow of any disturbance. In the States of the Church, which swarmed with petty tyrants, who in part were, or had been, *condottieri,* the nephews of the popes, since the time of Sixtus IV, monopolized the right to all such undertakings. But at the first sign of a political crisis, the soldiers of fortune appeared again upon the scene. Under the wretched administration of Innocent VIII it was near happening that a certain Boccalino, who had formerly served in the Burgundian army, gave himself and the town of Osimo, of which he was master, up to the Turkish forces; fortunately,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he proved willing to be paid off, and took himself away. In the year 1495, when the wars of Charles VIII had turned Italy upside down, the *condottiere* Vidovero, of Brescia, made trial of his strength: he had already seized the town of Cesena and murdered many of the nobles and the burghers;

but the citadel held out, and he was forced to withdraw. He then, at the head of a band lent him by another scoundrel, Pandolfo Malatesta of Rimini, son of the Roberto already spoken of, and Venetian *condottiere,* wrested the town of Castelnuovo from the Archbishop of Ravenna. The Venetians, fearing that worse would follow, and urged also by the pope, ordered Pandolfo, 'with the kindest intentions', to take an opportunity of arresting his good friend: the arrest was made, though 'with great regret', whereupon the order came to bring the prisoner to the gallows. Pandolfo was considerate enough to strangle him in prison, and then show his corpse to the people. The last notable example of such usurpers is the famous castellan of Musso, who, during the confusion in the Milanese territory which followed the battle of Pavia (1525), improvised a sovereignty on the Lake of Como.

从皮奇尼诺死后开始，雇佣军建立新国家这样的事情已成为令人无法容忍的丑闻。四大强权那不勒斯、米兰、教皇和威尼斯之间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平衡，其他势力全然不能对其产生任何影响。在教皇统治的那些全由雇佣军首领或当年做过雇佣军首领的僭主们当政的国家，教皇的侄甥们从西斯科特四世时期开始就垄断了这桩买卖。但是随着政治危机初露苗头，有钱的士兵们开始重回历史舞台。在因诺森特八世的苛政下，在勃艮第军队效力过的奥西莫城的首领巴克利诺，差点连人带城归降土耳其军队。幸好洛伦佐大帝及时发现并干预，最终劝服巴克利诺，给他一笔钱让他离开了。1495年意大利被查理八世发起的战争搞得天翻地覆，布雷西亚的雇佣军维多韦罗趁这个时候，试了试自己的实力：他当时已经攻下了切塞纳城，杀掉了很多贵族和市民，但是一些军事要塞迟迟攻不下，无奈他只好撤退，之后，他从另外一个恶人，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的罗伯托的儿子和威尼斯的佣军队长——里米尼的潘多福·马拉泰斯诺那儿借来了一支军队，并亲任队长，从拉文那的大教主那里把卡斯泰尔诺沃镇抢占了过来。威尼斯人一方面担心更糟的事情会接踵而至，另一方面又受教皇的不断催

促，于是命令潘多弗出于“最善意的目的”逮捕他的好朋友：不管事后有多悔多恨，潘多弗当时还是逮捕了自己的朋友。接着传来的就是把他的朋友送上绞刑架的命令。潘多弗煞费苦心，他选择先在监狱将犯人勒死，然后再陈尸于众。在诸多篡权者中，最后一个与此类似，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穆索城的城主了，帕维亚战争后米兰境内的骚乱中，他仓促地在科莫湖畔成立了一个政权。

The Smaller Despotisms

小规模专制

It may be said in general of the despotism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at the greatest crimes are most frequent in the smallest states. In these, where the family was numerous and all the members wished to live in a manner befitting their rank, disputes respecting the inheritance were unavoidable. Bernardo Varano of Camerino put two of his brothers to death (1434), wishing to divide their property among his sons. Where the ruler of a single town was distinguished by a wise, moderate and humane government, and by zeal for intellectual culture, he was generally a member of some great family, or politically dependent on it. This was the case, for example, with Alessandro Sforza, Prince of Pesaro (d. 1473), brother of the great Francesco, and step-father of Frederick of Urbino. Prudent in administration, just and affable in his rule, he enjoyed, after years of warfare, a tranquil reign, collected a noble library, and passed his leisure in learned or religious conversation. A man of the same class was Giovanni II Bentivoglio of Bologna (1462-1506), whose policy was determined by that of the Este and the Sforza. What ferocity and bloodthirstiness is found, on the other hand, among the Varani of Camerino, the Malatesta of Rimini, the Manfreddi of Faenza, and above all among the Baglioni of Perugia.

We find a striking picture of the events in the last-named family,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the admirable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Graziani and Matarazzo.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概括15世纪的专制独裁：在最小的国家里往往能产生最大的罪恶。这些国家，家族往往成员众多，而且每个人都想过上和自己地位相匹配的体面生活，因继承所有权问题引发的纠纷自然是少不了的。卡梅里诺的伯那多·瓦拉诺就曾将他的两个兄弟处死（1434年），希望把他们的财产分给自己的几个儿子。而那些开明、中庸、人道，热心学术文化事业的一城之主，通常是传统大家族的一员，或是在政治上依附于大家族。比如，亚历山大·斯福尔扎（卒于1473年）就是如此，他是佩扎罗的君王，伟大弗朗西斯科的兄弟，还是乌尔比诺的腓特烈大帝的继父。他执政谦虚谨慎，治理国家公正和善。所以多年战乱之后，他得以享受太平之治。他汇集了一批好书，在一次次充满博学和宗教气息的对话中度过了自己悠闲快乐的时光。与亚历山大·斯福尔扎类似的还有博洛尼亚的乔瓦尼二世·本蒂沃利奥（1462-1506），他制定的政策是由埃斯特家族和斯福尔扎家族的政策决定的。但是加米里诺的瓦拉尼、里米尼的马拉泰斯达、法恩扎的曼弗雷蒂等家族则与此相反，他们处处实行暴虐血腥的统治，佩鲁贾的巴廖尼家族尤甚。我们可以在格拉齐亚诺和马达拉佐那令人敬仰的历史记载中，鲜明地看到15世纪巴廖尼家族的面貌。

The Baglioni were one of those families whose rule never took the shape of an avowed despotism. It was rather a leadership exercised by means of their vast wealth and of their practical influence in the choice of public officers. Within the family one man was recognized as head; but deep and secret jealousy prevailed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pposed to the Baglioni stood another aristocratic party, led by the family of the Oddi. In 1487 the city was turned into a camp, and the houses of

the leading citizens swarmed with bravos; scenes of violence were of daily occurrence. At the burial of a German student, who had been assassinated, two colleges took arms against one another; sometimes the bravos of the different houses even joined battle in the public square. The complaints of the merchants and artisans were vain; the papal governors and *nipoti* held their tongues, or took themselves off on the first opportunity. At last the Oddi were forced to abandon Perugia, and the city became a beleaguered fortress under the absolute despotism of the Baglioni, who used even the cathedral as barracks. Plots and surprises were met with cruel vengeance; in the year 1491, after 130 conspirators who had forced their way into the city were killed and hung up at the Palazzo Comunale, thirty-five altars were erected in the square, and for three days mass was performed and processions held, to take away the curse which rested on the spot. A nephew of Innocent VIII was in open day run through in the street. A nephew of Alexander VI, who was sent to smooth matters over, was dismissed with public contempt. All the while the two leaders of the ruling house, Guido and Ridolfo, were holding frequent interviews with Suor Colomba of Rieti, a Dominican nun of saintly reputation and miraculous powers, who under penalty of some great disaster ordered them to make peace—naturally in vain. Nevertheless the chronicle takes the opportunity to point out the devotion and piety of the better men in Perugia during this reign of terror. When in 1494 Charles VIII approached, the Baglioni from Perugia and the exiles encamped in and near Assisi conducted the war with such ferocity that every house in the valley was leveled to the ground. The fields lay untilled, the peasants were turned into plundering and murdering savages, the fresh-grown bushes were filled with stags and wolves, and the beasts grew fat on the bodies of the slain, on so-called 'Christian flesh'. When Alexander VI withdrew (1495) into Umbria before Charles VIII, then returning from Naples, it occurred to him,

when at Perugia, that he might now rid himself of the Baglioni once for all; he proposed to Guido a festival or tournament, or something else of the same kind, which would bring the whole family together. Guido, however, wa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most impressive spectacle of all would be to see the whole military force of Perugia collected in a body', whereupon the pope abandoned his project. Soon after, the exiles made another attack in which, nothing but the personal heroism of the Baglioni won them the victory. It was then that Simonetto Baglione, a lad of scarcely eighteen, fought in the square with a handful of followers against hundreds of the enemy: he fell at last with more than twenty wounds, but recovered himself when Astorre Baglione came to his help, and mounting on horseback in gilded armour with a falcon on his helmet, 'like Mars in bearing and in deeds, plunged into the struggle'.

巴廖尼家族是没有公然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家族之一。他们更多的是凭借着巨大的财富和官员选举时强大的影响力来形成自己的领导权。家族内部会有一个人被视作领袖，但是内部不同派系的成员之间却暗藏深深的嫉妒。巴廖尼统治家族的敌人是另一个以奥迪家族为首的贵族政党。1487年，他们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兵营，暴徒闯进贵族家里，暴力场面每天都会上演，在一个被刺死的德意志学生的葬礼上，两个学校的人兵戎相见。有时，两个阵营的暴徒甚至还会走上广场厮打起来。商人和工人们的抱怨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教皇派来的官员和亲族缄口不言，或是一有机会就自己先跑了。最终，奥迪不得不放弃佩鲁贾，这座城市转而变成了被四面包围的军事要塞，笼罩在巴廖尼家族的统治之下，教堂也变成了军营。搞阴谋和偷袭的反抗者遭到严厉的打压和报复。1491年，130个冲进城市的谋反者被处决，尸体悬挂在市政厅门前，广场上立起了35座祭坛，弥撒和游行持续了三天，以驱散弥漫其间的咒怨。因诺森特八世的外甥大白天在街上遇刺身亡之后，亚历山大六世的外甥接到命令前去平息事端，结果受到公众唾弃，悻悻而退。在这期间，统治家族的两个领袖圭多和利都弗经

常会见一个多明我会的修女科隆巴，这个名誉圣洁的修女拥有神奇的力量，她以天降大灾的惩戒预言责令二人握手言和，但这自然是徒劳的。尽管如此，史书上还是适时地记述了这一恐怖统治期间佩鲁贾上层人士的虔诚和信仰。1494年查理八世率兵迫近时，佩鲁贾的巴廖尼和驻扎在阿西西附近的逃亡者展开了惨绝人寰的战争，山谷中几乎所有的房屋被夷为平地，土地几乎寸草不生，农民们变成了互相抢夺残杀的强盗，刚刚长出点叶的灌木丛中净藏着逃亡的牡鹿和野狼，野兽因食人尸体而变得健硕凶残，那些被杀的人的尸体当时被称为“基督徒之肉”。在亚历山大六世先于查理八世撤入温布里亚（1495年），再从那不勒斯回去的路上，途经佩鲁贾时他想到，当时可能是他一劳永逸地摆脱巴廖尼的最好机会；他因此向圭多提议举行一次节日、比赛或诸如此类的其他活动，这样可以把家人们聚在一起。而圭多则认为“最壮观的景象莫过于看到佩鲁贾的全部军队集合到一起来”，教皇则否决了他的计划。不久，流亡的士兵们发动了另一场战争，全凭巴廖尼个人的英勇才为他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就在当时，一个不到十八岁的小伙子西蒙内托·巴廖内带着寥寥不多的几个部下在广场和数百名敌人厮杀：他身负20余处伤，终于倒下，但当阿斯托利·巴廖内前来支援时，他又重振旗鼓，身披金甲，头戴鹰盔，跨上战马，“如战神一般英姿飒爽地投入了战斗”。

At that time Raphael, a boy of twelve years of age, was at school under Pietro Perugino. The impressions of these days are perhaps immortalized in the small, early pictures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 something of them, it may be, lives eternally in the great painting of St Michael; and if Astorre Baglione has anywhere found his apotheosis, it is in the figure of the heavenly horseman in the Heliodorus. [1_8]

那时12岁的拉斐尔还在彼得罗·佩鲁吉诺的门下学习。那段时光也许被永久地刻在了其早期有关圣米迦勒和圣乔治的小型绘画作品中；

还有一些可能永久地留在了伟大的画作《圣米迦勒》中；如果阿斯托利·巴廖内可以在哪里被尊奉为神的话，那就是在描绘赫利奥多罗斯的画作里天国骑手的形象中。[2_8]

The opponents of the Baglioni were partly destroyed, partly scattered in terror, and were henceforth incapable of another enterprise of the kind. After a time a partial reconciliation took place, and some of the exiles were allowed to return. But Perugia became none the safer or more tranquil: the inward discord of the ruling family broke out in frightful excesses. An opposition was formed against Guido and Ridolfo and their sons Gianpaolo, Simonetto, Astorre, Gismondo, Gentile, Marcantonio and others, by two great-nephews, Grifone and Carlo Barciglia; the latter of the two was also nephew of Varano, Prince of Camerino, and brother-in-law of one of the former exiles, Ieronimo della Penna. In vain did Simonetto, warned by sinister presentiment, entreat his uncle on his knees to allow him to put Penna to death: Guido refused. The plot ripened suddenl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marriage of Astorre with Lavinia Colonna, at midsummer 1500. The festival began and lasted several days amid gloomy forebodings, whose deepening effect is admirably described by Matarazzo. Varano fed and encouraged them with devilish ingenuity: he worked upon Grifone by the prospect of undivided authority, and by stories of an imaginary intrigue of his wife Zenobia with Gianpaolo. Finally each conspirator was provided with a victim. (The Baglioni lived all of them in separate houses, mostly on the site of the present castle.) Each received fifteen of the bravos at hand; the remainder were set on the watch. In the night of 15 July the doors were forced, and Guido, Astorre, Simonetto and Gismondo were murdered; the others succeeded in escaping.

巴廖尼的敌人们当时在恐慌之中死的死逃的逃，已经没有了铤而走险的能力。不久以后，部分和解达成，有一些流亡者得以回到家乡。但是佩鲁贾丝毫没有因此变得太平一些：统治家族内部的纷争屡屡爆发，让人恐慌。圭多和利都弗的两个侄子——格力冯和卡洛·巴奇格力亚组成了反对派，共同对抗圭多和利都弗及他们的儿子詹保罗、西蒙内托、阿斯托利、吉斯蒙多、真蒂莱、马堪托尼奥等人。卡洛·巴奇格力也是加米里诺君主瓦拉诺的侄子，同时又是亡命徒耶罗尼莫·德拉·潘那的兄弟。西蒙有过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曾跪请他的叔父准许他杀死潘那，但是徒劳无功，圭多拒绝了他的请求。1500年仲夏，在阿斯托利和拉维尼亚·科隆那的婚礼上，突然出现转折点，阴谋酝酿成熟。这场婚礼在阴谋的笼罩之下开始进行，并持续了几天。后来这场婚礼的深远影响被马塔拉佐极好地记录了下来。瓦拉诺用邪恶狡诈的阴谋鼓励着叛乱者们，他捏造出未来独掌大权的前景，编造格力冯妻子季诺碧亚和詹保罗之间通奸的故事。最后，每一个叛乱者都有一个指定要加害的对象（巴廖尼家族成员们都住在独立分开的房间里，大部分位于城堡旧址）。每个叛乱者的手底下都有15个勇士，还有一些人站岗放哨。7月15号晚上，他们破门而入，杀害了圭多、阿斯托利、西蒙内托和吉斯蒙德，其余的人侥幸逃脱。

As the corpse of Astorre lay by that of Simonetto in the street, the spectators, 'and especially the foreign students', compared him to an ancient Roman, so great and imposing did he seem. In the features of Simonetto could still be traced the audacity and defiance which death itself had not tamed. The victors went round among the friends of the family, and did their best to recommend themselves; they found all in tears and preparing to leave for the country. Meantime the escaped Baglioni collected forces without the city, and on the following day forced their way in, Gianpaolo at their head, and speedily found adherents among others whom Barciglia had been threatening with death. When Grifone fell into their hands near Sant' Ercolano, Gianpaolo handed him over for

execution to his followers. Barciglia and Penna fled to Varano, the chief author of the tragedy, at Camerino; and in a moment, almost without loss, Gianpaolo became master of the city.

阿斯托利和西蒙内托的尸体并排摆在大街上，旁观者，尤其是那些“外国留学生”，看西蒙内托如此伟岸，竟将他比作古罗马人。西蒙内托的脸上仍然可以看出无畏和反抗的精神，丝毫没有因死亡而褪色。那些得手的胜利者走街串巷，四处讨好统治家族的亲戚朋友、极尽全力向他们举荐自己；却发现人们眼含泪水、准备去往乡村。与此同时，那些成功脱逃的巴廖尼族人在城外招兵买马，第二天，由詹保罗带领军队攻入了城内，很快就在巴奇格力亚以死亡相胁迫的人中找到了一些追随者。最终格力冯在圣埃克洛诺教堂附近被擒，被詹保罗交给他的部下处以死刑。巴奇格力亚和潘那逃到加米里诺，投奔了这场悲剧的首要制造者瓦拉诺。而詹保罗几乎未损一兵一卒就拿下了这座城市。

Atalanta, the still young and beautiful mother of Grifone, who the day before had withdrawn to a country house with the latter's wife Zenobia and two children of Gianpaolo, and more than once had repulsed her son with a mother's curse, now returned with her daughter-in-law in search of the dying man. All stood aside as the two women approached, each man shrinking from being recognized as the slayer of Grifone, and dreading the malediction of the mother. But they were deceived: she herself besought her son to pardon him who had dealt the fatal blow, and he died with her blessing. The eyes of the crowd followed the two women reverently as they crossed the square with blood-stained garments. It was Atalanta for whom Raphael afterwards painted the world-famed *Deposition,* with which she laid her own maternal sorrows at the feet of a yet higher and holier suffering. [1_9]

格力冯依然年轻漂亮的妈妈阿塔兰特在事发前一天就携格力冯的妻子季诺碧亚和詹保罗的两个孩子撤回乡下家里去了，她也曾不止一次以母亲骂儿子的方式斥责过格力冯，如今却和儿媳妇一起回到城里来找那个将死之人。两个女人所到之处，大家都躲闪着向后退，谁都不想被认出来是杀害格力冯的凶手，害怕被这个母亲诅咒。但是这些人都想错了。阿塔兰特自己其实在恳求儿子原谅那个最后结束他生命的人，格力冯最终在他母亲的祝福中慢慢死去。最终这两个女人穿着沾满血迹的衣服穿过广场时，人群中纷纷投来了尊敬的目光。拉斐尔后来画的世界名作《基督被解下十字架》即是为阿塔兰特所作，在此画中她把母亲的哀思献在一个更崇高更圣洁的受难者的脚下 [2_9] 。

The cathedral, in the immediate neighborhood of which the greater part of this tragedy had been enacted, was washed with wine and consecrated afresh. The triumphal arch, erected for the wedding, still remained standing, painted with the deeds of Astorre and with the laudatory verses of the narrator of these events, the worthy Matarazzo.

临近悲剧发生主要地点的天主大教堂后来用酒洗礼过并得到了净化。为婚礼所建的凯旋门依旧巍然屹立，阿斯托利的英勇事迹、可敬诗人马塔拉佐的赞美诗赫然可见，诉说着一个个伟大的故事。

A legendary history, which is simply the reflection of these atrocities, arose out of the early days of the Baglioni. All the members of this family from the beginning were reported to have died an evil death—twenty-seven on one occasion together; their houses were said to have been once before levelled to the ground, and the streets of Perugia paved with the bricks—and more of the

same kind. Under Paul III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palaces really took place.

从巴廖尼家族早期岁月中，诞生了一部传奇历史，这部历史所记载的仅有这一系列的暴行。据说家族所有成员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是寿终正寝的——有一次一下就死了27个。据说他们的房子一度被夷为平地，房子的砖块被用来铺佩鲁贾的大街，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保罗三世在位时，他们的宅邸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For a time they seemed to have formed good resolutions, to have brought their own party into order, and to have protected the public officials against the arbitrary acts of the nobility. But the old curse broke out again like a smouldering fire. In 1520 Gianpaolo was enticed to Rome under Leo X, and there beheaded; one of his sons, Orazio, who ruled in Perugia for a short time only, and by the most violent means, as the partisan of the Duke of Urbino (himself threatened by the pope), once more repeated in his own family the horrors of the past. His uncle and three cousins were murdered, whereupon the duke sent him word that enough had been done. His brother, Malatesta Baglione, the Florentine general, has made himself immortal by the treason of 1530; and Malatesta's son Ridolfo, the last of the house, attained, by the murder of the legate and the public officers in the year 1534, a brief but sanguinary authority.

有段时间他们似乎形成了妥善的解决方案，重整了自己的派系，也保护了政府官员，使之免受贵族阶层飞扬跋扈之苦。但古老的诅咒像暗火一样死灰复燃。1520年，被利奥十世骗到罗马的詹保罗惨遭砍头。他的一个儿子奥拉齐奥，仅统治了佩鲁贾很短一段时间，他作为

乌尔比诺公爵（公爵本人受到教皇威胁）的拥护者，被处以最残暴的处决，又一次重复了家族的惨剧。随后他叔叔以及三个堂兄弟又接连遭到杀害，而当时公爵给他捎话说是事情到此为止的。他的兄弟马拉泰斯塔是佛罗伦萨的将军，因1530年的叛国事件而遗臭万年。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个继承人，马拉泰斯塔的儿子利都弗，在1534年谋杀了教皇的使节和官员，开始了自己短暂而血腥的统治。

Here and there we meet with the names of the rulers of Rimini. Unscrupulousness, impiety, military skill and high culture have been seldom so combined in one individual as in Sigismondo Malatesta (d. 1467). But the accumulated crimes of such a family must at last outweigh all talent, however great, and drag the tyrant into the abyss. Pandolfo, Sigismondo's nephew, who has been mentioned already, succeeded in holding his ground, for the sole reason that the Venetians refused to abandon their *condottiere,* whatever guilt he might be chargeable with; when his subjects, after ample provocation, bombarded him in his castle at Rimini (1497), and afterwards allowed him to escape, a Venetian commissioner brought him back, stained as he was with fratricide and every other abomination. Thirty years later the Malatesta were penniless exiles. In the year 1527, as in the time of Cesare Borgia, a sort of epidemic fell on the petty tyrants; few of them outlived this date, and none to their own good. At Mirandola, which was governed by insignificant princes of the house of Pico, lived in the year 1533 a poor scholar, Lilio Gregorio Giraldi, who had fled from the sack of Rome to the hospitable hearth of the aged Giovanni Francesco Pico, nephew of the famous Giovanni; the discussions as to the sepulchral monument which the prince was constructing for himself gave rise to a treatise, the dedication of which bears the date of April in this year. The postscript is a sad one—'In October of the same year the unhappy prince was attacked in the night and

robbed of life and throne by his brother's son; and I myself escaped narrowly, and am now in the deepest misery.'

我们时不时就会看到名字中有“里米尼”的统治者。很少有人可以像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卒于1467年）一样，既有很高的军事才能和文化素养，但又目中无人，毫无信仰。像这种家族的人，不管多么才华横溢，最后都会被累积的罪行所掩盖，使暴君坠入无底的深渊。前面提到的西吉斯蒙多的侄子潘多弗之所以能成功保持住他的地位仅仅是因为威尼斯人不管他被判了什么罪，都不愿意因此而放弃他们的雇佣军。当他的臣民们受到不断的挑衅忍无可忍的时候，便开始炮轰在里米尼的城堡里的潘多弗（1497年）。后来潘多弗得到机会出逃，身背弑兄等一系列罪行的他被一个威尼斯行政官将带了回来。30年后，马拉泰斯塔家族变成了身无分文的流亡者。1527年切萨雷·波吉亚时代，很多小政权的暴君都染上了一种流行病，没有几个人幸存，活下来的人也没有什么好结果。1533年，在由比科家族弱小君主统治的米兰多拉，有一个名叫利略·格雷戈里·吉拉尔第的穷学者从罗马浩劫中逃了出来，他逃到了年长的乔瓦尼·弗朗西斯科·比科的家中，热情好客的乔瓦尼·弗朗西斯科·比科是另一个著名的乔瓦尼的侄子。这个穷学者到了以后，恰好赶上当时乔瓦尼君王为自己建造墓碑，于是他加入了讨论并帮他写了一篇碑文。这篇碑文的书写日期是这一年的四月。碑文的附言却令人感伤不已——“在这一年的十月，不幸的君主在夜间惨遭侄儿弑逆，君位被夺；而我虽有幸逃脱，现在仍悲伤不已。”

A pseudo-despotism without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such as Pandolfo Petrucci exercised from the year 1490 in Siena, then torn by faction, is hardly worth a closer consideration. Insignificant and malicious, he governed with the help of a professor of jurisprudence and of an astrologer, and frightened his people by an occasional murder. His pastime in the summer months was to roll blocks of

stone from the top of Monte Amiata, without caring what or whom they hit. After succeeding, where the most prudent failed, in escaping from the devices of Cesare Borgia, he died at last forsaken and despised. His sons maintained a qualified supremacy for many years afterwards.

潘多弗·彼得鲁奇1490年成立于锡耶纳的专制政权因派系斗争而四分五裂，其实这是非常不典型的伪专制统治，是不值得具体考量的。潘多弗·彼得鲁奇治理国家不仅手段平平而且心术不正，靠着一个法学教授和一个占星家实行统治，还时不时以杀戮威胁恐吓百姓。他夏天无趣之时，把成块的石头滚下米亚塔山，以供消遣，而完全不顾砸到人的危险。切萨雷·波吉亚曾制定阴谋设计潘多弗·彼得鲁奇，切萨雷的阴谋虽然曾让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君主折戟，但却仍未能让潘多弗·彼得鲁奇中计，不过他最后还是在世人的唾弃和鄙夷中死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儿子们勉强维持住仅有的政权，再无发展。

The Greater Dynasties

大王朝

In treating of the chief dynasties of Italy, it is convenient to discuss the Aragonese, on account of its special character, apart from the rest. The feudal system, which from the days of the Normans had survived in the form of a territorial supremacy of the barons, gave a distinctive color to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of Naples; while elsewhere in Italy, excepting only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dominion, and in a few other districts, a direct tenure of land prevailed, and no hereditary powers were permitted by the law. The great Alfonso, who reigned in Naples from 1435 onwards (d. 1458), was a man of another kind than his real or

alleged descendants. Brilliant in his whole existence, fearless in mixing with his people, dignified and affable in intercourse, admired rather than blamed even for his old man's passion for Lucrezia d'Alagna, he had the one bad quality of extravagance, from which, however, the natural consequence followed. Unscrupulous financiers were long omnipotent at court, till the bankrupt king robbed them of their spoils; a crusade was preached as a pretext for taxing the clergy; when a great earthquake happened in the Abruzzi, the survivors were compelled to make good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dead. By such means Alfonso was able to entertain distinguished guests with unrivaled splendor; he found pleasure in ceaseless expense, even for the benefit of his enemies, and in rewarding literary work knew absolutely no measure. Poggio received 500 pieces of gold for translating Xenophon's *Cyropaedia.*

谈起意大利的一些主要王朝时，我们发现由于阿拉贡王朝自身极具特殊性，因此很容易就这个王朝的情况单独进行一下讨论。自诺曼统治起，封建体制就以贵族领地霸权的形式延续了下来，这给那不勒斯的政治制度增添了一笔鲜明的亮色。但是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除了教会统治的南部和其他小部分区域，土地直接使用权非常盛行，且任何世袭权力都不被法律所承认。从1435年就开始统治那不勒斯的大阿方索（卒于1458年），其实和他真正的或所谓的后代完全不是一类人。他一生光辉卓越，和百姓相处真诚和善，尊重他人，和蔼可亲，尽管晚年流露过对卢克雷齐娅·德·阿莱尼亚的爱意，也没有受到人们的非议，相反得到了人们的赞赏。但是大阿方索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奢侈浪费。也正是这个缺点，决定了他最终的下场。肆无忌惮的财政官们在宫廷里长期一手遮天，直到国王破产，将他们的赃物赃款全部没收。阿方索为向牧师征税，掀起了了所谓的改革运动；阿布鲁齐大地震以后，他要求活着的人替死者完税。阿方索排场奢华地招待达官显贵，正是得益于这些手段方法。他尽情挥霍，沉溺其中，钱有时甚至流进了敌人的腰包。在奖赏文学作品上他也毫无节制，波焦因翻译

了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就获得了500金弗罗林。

Ferrante, who succeeded him, passed as his illegitimate son by a Spanish lady, but was not improbably the son of a half-caste Moor of Valencia. Whether it was his blood or the plots formed against his life by the barons which embittered and darkened his nature, it is certain that he was equaled in ferocity by none among the princes of his time. Restlessly active,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political minds of the day, and free from the vices of the profligate, he concentrated all his powers, among which must be reckoned profound dissimulation and an irreconcilable spirit of vengeance, on the destruction of his opponents. He had been wounded in every point in which a ruler is open to offence; for the leaders of the barons, though related to him by marriage, were yet the allies of his foreign enemies. Extreme measures became part of his daily policy. The means for this struggle with his barons, and for his external wars, were exacted in the same Muhammadan fashion which Frederick II had introduced: the government alone dealt in oil and corn; the whole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was put by Ferrante into the hands of a wealthy merchant, Francesco Coppola, who had entire control of the anchorage on the coast, and shared the profits with the king. Deficits were made up by forced loans, by executions and confiscations, by open simony, and by contributions levied on the ecclesiastical corporations. Besides hunting, which he practiced regardless of all rights of property, his pleasures were of two kinds: he liked to have his opponents near him, either alive in well-guarded prisons, or dead and embalmed, dressed in the costume which they wore in their lifetime. He would chuckle in talking of the captives with his friends, and made no secret whatever of the museum of mummies. His victims were mostly men whom he had got into his power by treachery; some were even

seized while guests at the royal table. His conduct to his first minister, Antonello Petrucci, who had grown sick and gray in his service, and from whose increasing fear of death he extorted 'present after present', was literally devilish. At length the suspicion of complicity with the last conspiracy of the barons gave the pretext for his arrest and execution. With him died Coppola. The way in which all this is narrated in Caracciolo and Porzio makes one's hair stand on end.The elder of the king's sons, Alfonso, Duke of Calabria, enjoyed in later years a kind of co-regency with his father. He was a savage, brutal profligate, who in point of frankness alone had the advantage of Ferrante, and who openly avowed his contempt for religion and its usages. The better and nobler features of the Italian despotisms are not to be found among the princes of this line; all that they possessed of the art and culture of their time served the purposes of luxury or display. Even the genuine Spaniards seem to have almost always degenerated in Italy; but the end of this cross-bred house (1494 and 1503) gives clear proof of a want of blood. Ferrante died of mental care and trouble; Alfonso accused his brother Federigo, the only honest member of the family, of treason, and insulted him in the vilest manner. At length, though he had hitherto passed for one of the ablest generals in Italy, he lost his head and fled to Sicily, leaving his son, the younger Ferrante, a prey to the French and to domestic treason. A dynasty which had ruled as this had done must at least have sold its life dear, if its children were ever to hope for a restoration. But, as Comines one-sidedly and yet on the whole rightly observes on this occasion, '*Jamais homme cruel ne fut plus hardi* ':there was never a more cruel man.

继位的费兰特可能是阿方索和一个西班牙女人的私生子，也有可能是和混血摩尔人瓦伦西亚的私生子。不知是因为天生如此，还是因为贵族们用阴谋害得他性格阴暗乖戾，总之费兰特残暴之程度在那个

时代无可匹敌。他积极活跃，是那个时代最具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他丝毫没有铺张浪费的恶习。他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敌人，在他诸多的能力中，包含一种深度伪装和极端报复的特质。一个君主所能受到的所有攻击他都经历过。一些贵族领袖虽然和他有姻亲的关系，但同时又是外国敌人的同盟，于是极端手段成为了他日常政策的一部分。在和贵族斗争、处理外部战争时，费兰特采取了和腓特烈二世引进的伊斯兰教方式一样的手段：政府亲自掌管油类和谷物，国家商业被费兰特转手给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科波拉的富商，富商掌管整个沿海地区的停泊税，国王从中分享收益。用强征贷款、强制让渡、没收资产、公开买卖圣职来冲顶财政赤字。费兰特不顾一切财产所有权也要狩猎，除了狩猎，他还有两样乐趣：他喜欢自己的敌人呆在他身边，要么是活着关在密不透风的监狱里的，要么是已经死了的，费兰特会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然后让他们穿上生前的衣服。他和朋友们谈到俘虏时常常得意忘形地笑出声来，对他建的木乃伊博物馆丝毫不忌讳。大多数死在费兰特手中的人都是中了他伪装精良的计谋，有的人被抓的一刻还在皇宫餐厅做客吃饭。费兰特对其首任大臣安多尼罗·彼得鲁奇的行径简直惨无人道。彼得鲁奇一生为费兰特服务，兢兢业业，随着年龄衰老，能力越来越弱，对死亡的恐惧也越来越强，费兰特便利用这种恐惧感，一次次地勒索彼得鲁奇，逼他上贡。最后，彼得鲁奇因为被怀疑和贵族串通一气而遭到了费兰特的抓捕并处决。和他一起共遭不测的还有科波拉。卡拉乔洛和波吉奥对这件事情的叙述读起来让人毛骨悚然。国王的长子，卡拉布里亚的公爵阿方索，在随后的几年中和他的父亲一起掌权。他是一个野蛮残忍的浪荡子，只有在坦诚这一点上能和费兰特媲美，他公开表明了对宗教习俗的鄙视。在这个家族的国王之中，人们很难发现意大利专制独裁较为优秀高贵的那些特点。那个时代拥有的艺术和文化全部是为了满足奢侈和炫耀。甚至真正的西班牙后代在意大利也逐渐堕落。不过这种混血家族的结束（1494年以及1503年）清晰地证明了优秀血统已经不在。费兰特死于思虑忧患过度；阿方索的哥哥费德里戈是家族中唯一诚实的人，但却被阿方索处以叛国罪，遭到了最恶劣的对待。虽然阿方索曾被很多人看成最有能力的一位将军，但他最终却失去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并逃至西西里岛，把他的年轻儿子费兰特留下，任其受到法兰西人和国内

叛乱势力的宰割。对一个曾经如此的王朝而言，如果他的子孙们仍希望统一复辟，就需要不惜自己的生命做一番斗争。但是正如科米尼斯略带片面但是总的来说不失公允的总结一样："残暴的人是从来不会勇敢的。"而没有人比之更残暴了。

The despotism of the dukes of Milan, whose government from the time of Giangaleazzo onwards was an absolute monarchy of the most thoroughgoing sort, shows the genuine Italian character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last of the Visconti, Filippo Maria (1412-47), is a character of peculiar interest, and of which fortunately an admirable description has been left us. What a man of uncommon gifts and high position can be made by the passion of fear is here shown with what may be called a mathematical completeness. All the resources of the state were devoted to the one end of securing his personal safety, though happily his cruel egotism did not degenerate into a purposeless thirst for blood. He lived in the Citadel of Milan, surrounded by magnificent gardens, arbours and lawns. For years he never set foot in the city, making his excursions only in the country, where lay several of his splendid castles; the flotilla which, drawn by the swiftest horses, conducted him to them along canals constructed for the purpose, was so arranged as to allow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st rigorous etiquette. Whoever entered the Citadel was watched by a hundred eyes; it was forbidden even to stand at the window, lest signs should be given to those without. All who were admitted among the personal followers of the prince were subjected to a series of the strictest examinations; then, once accepted, were charged with the highest diplomatic commissions, as well as with the humblest personal services—both in this court being alike honorable. And this was the man who conducted long and difficult wars, who dealt habitually with political affairs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and every day sent his

plenipotentiaries to all parts of Italy. His safety lay in the fact that none of his servants trusted the others, that his *condottieri* were watched and misled by spies, and that the ambassadors and higher officials were baffled and kept apart by artificially nourished jealousies, and in particular by the device of coupling an honest man with a knave. His inward faith, too, rested upon opposed and contradictory systems; he believed in blind necessity, and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stars, and offering prayers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to helpers of every sort; he was a student of the ancient authors, as well as of French tales of chivalry. And yet the same man, who would never suffer death to be mentioned in his presence, and caused his dying favorites to be removed from the castle, that no shadow might fall on the abode of happiness, deliberately hastened his own death by closing up a wound, and, refusing to be bled, died at last with dignity and grace.

米兰大公的专制统治从詹加莱亚佐时代开始就属于最彻底的君主专制，处处真实地体现着15世纪意大利的典型特征。菲利波·马里亚（1412-1447）是维斯孔蒂家族的最后一代人，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我们有幸保留了一些有关他的各种神奇的故事。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充分地看到恐惧能使一个能力非凡、高高在上的人变成什么样子。当时几乎全部的国家力量都被集中起来保护菲利波·马里亚，不过幸好残酷无情的利己主义还没有让他堕落到嗜血成瘾的地步。他住在米兰城堡里，周围环绕着绚烂的花园、郁郁葱葱的林荫路和草地。菲利波·马里亚常年远离城市，只游历乡间小道，那里是他的王宫城堡。他处处实行最严格到位的礼仪规矩，精心布置，用快马牵引舰队，使运河上的游览舰船井然有序。任何进入城堡的人都要受到严密的监视，有的甚至在窗前站立都不可以，以防城内的人向城外发送暗号。被录用的君主随从要经过一番严格检查，一经录用就委任以最高级别的外交职衔，同时配备最精心到位的贴身服务——这两个待遇当时在宫廷里都十分令人羡慕尊敬。就是这样一个君主，发动了一场场旷日

持久、痛苦难熬的战争，他终日忙于国家要务，经常派遣国家使节前往意大利各地。菲利波·马里亚之所以地位安全稳定是因为他的部下彼此互不信任，雇佣军首领受间谍监视误导，大使和高官因蓄意酿成的猜忌而互相疏远，缺乏理解，忠义之人被设计和奸诈之人在一起。菲利波·马里亚内心信仰建立在互相对立矛盾的思想基础之上。他盲目相信命运，迷信星宿，先后求助的救星不一而足。他经常学习古代文人的作品，还喜欢法国骑士小说。但同时还是这样一个君主，一个从来不准别人在他面前提死字，甚至为了远离死亡阴影而把濒死宠臣驱逐出外的君主，临死之前竟为了保留尊严和荣耀，盖住伤口，拒绝排放淤血，加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His son-in-law and successor, the fortunate *condottiere* Francesco Sforza (1401-66), was perhaps of all the Italian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man most after the heart of his age. Never was the triumph of genius and individual power more brilliantly displayed than in him; and those who would not recognize his merit were at least forced to wonder at him as the spoilt child of fortune. The Milanese claimed it openly as an honor to be governed by so distinguished a master; when he entered the city the thronging populace bore him on horseback into the cathedral, without giving him the chance to dismount. Let us listen to the balance-sheet of his life, in the estimate of Pope Pius II, a judge in such matters:

菲利波·马里亚的女婿，同时也是继承者——幸运的佣兵队长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1401-1466），可能是15世纪意大利最受人爱戴的君王。在他身上表现出了少有的天赋和个人才干，在当时无出其右。就算有人否认他天赋异禀，但他们不得不承认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是命运的宠儿。米兰人公开承认有如此卓越的君王是他们的荣幸。斯福尔扎进城的时候，熙熙攘攘的群众将他背上马背，一路前往大教堂，他连下马的机会都没有。让我们听听教皇庇护二世（此类事情的公正

评价者）对他一生的评价：

In the year 1459, when the duke came to the congress at Mantua, he was sixty (really fifty-eight) years old; on horseback he looked like a young man; of a lofty and imposing figure, with serious features, calm and affable in conversation, princely in his whole bearing, with a combination of bodily and intellectual gifts unrivaled in our time, unconquered on the field of battle—such was the man who raised himself from a humble position to the control of an empire. His wife was beautiful and virtuous, his children were like the angels of heaven; he was seldom ill, and all his chief wishes were fulfilled. And yet he was not without misfortune. His wife, out of jealousy, killed his mistress; his old comrades and friends, Troilo and Brunoro, abandoned him and went over to King Alfonso; another, Ciarpollone, he was forced to hang for treason; he had to suffer it that his brother Alessandro set the French upon him; one of his sons formed intrigues against him, and was imprisoned; the March of Ancona, which he had won in war, he lost again in the same way. No man enjoys so unclouded a fortune, that he has not somewhere to struggle with adversity. He is happy who has but few troubles.

1459年斯福尔扎公爵前来出席曼图亚会议时已经60岁（实为58岁）；他骑在马背上，看起来就像

一个年轻人。他的身形伟岸，面相庄重，谈吐亲切，为人和蔼，充满皇家气质。他身体和心智上均天赋异禀，无可匹敌，他在战场上战无不胜。就是这样一个人，出身卑微却最终上升到了一国之君的位置。他的妻子漂亮端庄，子女美好如天使；他很少生病，一生的主要愿望都得以实现。但是即便如此，他的生活也并非一点不幸都没有。他的妻子出于嫉妒杀死了他的情妇；他昔日的同伴与朋友特洛伊罗和布鲁诺罗舍弃他而投奔了阿方索国王；另一个旧友奇阿波伦内选择了叛国，他忍痛处其于绞刑；兄弟阿里桑德罗引诱法兰西人前来攻击，他痛苦地默默承受；一个儿子暗中图谋造反，他咬牙将其监禁；在战争中赢得的安科纳边境地区但却又以同样的方式失去。他的幸运是独有的，是纯粹的，面对困境他不必做出大的牺牲。他这样忧患少的人是很幸福的。

With this negative definition of happiness the learned pope dismisses the reader. Had he been able to see into the future, or been willing to stop and discuss the consequences of an uncontrolled despotism, one pervading fact would not have escaped his notice—the absence of all guarantee for the future. Those children, beautiful as angels, carefully and thoroughly educated as they were, fell victims, when they grew up, to the corruption of a measureless egotism. Galeazzo Maria (1466-76), solicitous only of outward effect, took pride in the beauty of his hands, in the high salaries he paid, in the financial credit he enjoyed, in his treasure of two million pieces of gold, in the distinguished people who surrounded him, and in the army and birds of chase which he maintained. He was fond of the sound of his own voice, and spoke well, most fluently, perhaps, when he had the chance of insulting a Venetian ambassador. He was subject to caprices, such as having a

room painted with figures in a single night; and, what was worse, to fits of senseless debauchery and of revolting cruelty to his nearest friends. To a handful of enthusiasts, he seemed a tyrant too bad to live; they murdered him, and thereby delivered the state into the power of his brothers, one of whom, Lodovico il Moro, threw his nephew into prison, and took the government into his own hands. From this usurpation followed the French intervention, and the disasters which befell the whole of Italy.

这位博学的教皇对幸福下了反面定义之后，就和读者们告别了。如果他可以预见未来，或是愿意停下来，讨论一下肆无忌惮的专制统治的下场，他就一定会注意到这个明显的事实——未来还是飘忽不定的。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的子女们尽管美如天使，受过良好教育，但在长大成人以后却堕落成为了极端利己主义的受害者。加莱亚佐·马里亚只崇尚虚荣，能让他骄傲自豪的只有他那双漂亮的手、高额的俸禄、财政上的信誉、200万金币的财富、身边的贵族及供养的军队和猎鹰。他十分喜欢自己的声音而且巧舌如簧，也许在侮辱威尼斯大使时，最能体现他这一点。他时常任性而为，例如有一次曾一夜之间把屋子涂满了画；更过分的是，他经常放荡而为，对待亲友残暴无情。一些狂热的改革者们认为这个暴君太残虐不可留，于是一起谋害了他，并将国家交由其兄弟管理。其中他的一个叫洛多维科·摩罗的兄弟把加莱亚佐·马里亚的侄子关进了监狱，掌握了政权。这次篡权引来了法国的干涉，进而整个意大利陷入了灾难之中。

Lodovico Sforza, called 'il Moro', the Moor, is the most perfect type of the despot of that age, and, as a kind of natural product, almost disarms our moral judgement. Notwithstanding the profound immorality of the means he employed, he used them with perfect ingeniousness; no one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more astonished than himself to learn that for the choice of means as well as of ends

a human being is morally responsible; he would rather have reckoned it as a singular virtue that, so far as possible, he had abstained from too free a use of the punishment of death. He accepted as no more than his due the almost fabulous respect of the Italians for his political genius. In 1496 he boasted that the Pope Alexander was his chaplain, the Emperor Maximilian his *condottiere,* Venice his chamberlain, and the King of France his courier, who must come and go at his bidding. With marvelous presence of mind he weighed, even in his last extremity (1499), all possible means of escape, and at length decided, to his honor, to trust to 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he rejected the proposal of his brother, the Cardinal Ascanio, who wished to remain in the Citadel of Milan, on the ground of a former quarrel: 'Monsignore, take it not ill, but I trust you not, brother though you be'; and appointed to the command of the castle, 'that pledge of his return', a man to whom he had always done good, but who nevertheless betrayed him. At home the Moor was a good and useful ruler, and to the last he reckoned on his popularity both in Milan and in Como. In later years (after 1496) he had overstrained the resources of his state, and at Cremona had ordered, out of pure expediency, a respectable citizen, who had spoken against the new taxes, to be quietly strangled. Since that time, in holding audiences, he kept his visitors away from his person by means of a bar, so that in conversing with him they were compelled to speak at the top of their voices. At his court, the most brilliant in Europe, since that of Burgundy had ceased to exist, immorality of the worst kind was prevalent; the daughter was sold by the father, the wife by the husband, the sister by the brother. The prince himself was incessantly active, and, as son of his own deeds, claimed relationship with all who, like himself, stood on their personal merits—with scholars, poets, artists and musicians. The academy which he founded served rather for his own purposes than for the instruction of scholars; nor was it the

fame of the distinguished men who surrounded him which he heeded, so much as their society and their services. It is certain that Bramante was scantily paid at first; Leonardo, on the other hand, was up to 1496 suitably remunerated—and besides, what kept him at the court, if not his own free will? The world lay open to him, as perhaps to no other mortal man of that day; and if proof were wanting of the loftier element in the nature of Lodovico il Moro, it is found in the long stay of the enigmatic master at his court. That afterwards Leonardo entered the service of Cesare Borgia and Francis I was probably due to the interest he felt in the unusual and striking character of the two men.

洛多维科·斯福尔扎，又叫做“这个摩罗”（摩尔），是那个时代独裁者最具代表性的类型。作为时代的天然产物，他几乎瓦解了我们的道德评判。尽管他当时有很多行为很不道德，但是却展现出了足智多谋的一面。“一个人不仅要对目标和手段的选择负责，还要对道德负责。”这样的内容，他听了大概会比谁都吃惊。他更愿相信，自己尽量不再随意地使用死刑已经是一个非凡的美德。意大利人对他政治天赋表达出的难以置信的尊敬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1496年，他吹嘘教皇亚历山大一世是他的牧师，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是他的雇佣军，威尼斯的国王是他的管家，法兰西国王是他的情报员，听他的指挥。就在穷途末路的时候（1499年），他还是泰然自若地考虑一切可能的逃走方法，最后他光荣地决定把一切交付给人类善良的天性。他因以前和他兄弟阿斯卡尼奥有过一次争吵，拒绝了他的兄弟阿斯卡尼奥红衣主教的请求，没有留他在米兰城堡：“主教，不要不高兴，但是我不信任你，虽然你是我的弟弟。”他将城堡的控制权交给了一个经常受他恩惠的人，“作为他回来的保证”，但是那个人还是出卖了他。摩尔对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统治者，到最后他还想依仗自己在米兰和科摩的名气。后来（在1496年之后），他过度消耗了国家资源，还出于私人原因，在克雷莫纳秘密地绞死了一位反对税收、受人尊敬的公民。自那时以后，在接见宾客时，他总是用一个隔间将自己和拜访者分

开，这样拜访者们就不得不提高嗓门来和他交谈。他的宫廷是勃艮第时代灭亡以来全欧洲最辉煌的，但里面充斥着最卑劣不道德的行为。女儿被父亲出卖，妻子被丈夫出卖，妹妹被哥哥出卖。摩尔自身则一直很活跃，而且从中深受影响，他与所有同他一样以一己之长立身的人——包括学者、诗人、艺术家和音乐家，都交情不薄。他创办的大学，与其说是为了培养学者，不如说是为实现自己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他身边重用的那些名人的名气，毋宁说是看中了他们的社交圈子和服务。可以确定的是他一开始给布拉曼特的待遇是十分微薄的；而李奥纳多也是直到1496年才得到适当补偿的——此外，若非本人自愿，还有什么能让他留在朝廷里呢？世界的大门已为他敞开，似乎当世再无其他凡夫俗子可获此殊荣；要是证明洛多维科·摩罗天性高尚的证据不足，那么他允许李奥纳多这位高深莫测的大师在宫中长期任职就是最好的证据。李奥纳多后来效力于切萨雷·波吉亚和弗朗西斯一世，原因可能也是他喜欢这两位君主非同寻常、引人注目的性格。

After the fall of the Moor his sons were badly brought up among strangers. The elder, Massimiliano, had no resemblance to him; the younger, Francesco, was at all events not without spirit. Milan, which in those years changed its rulers so often, and suffered so unspeakably in the change, endeavored to secure itself against a reaction. In the year 1512 the French, retreating before the arms of Maximilian and the Spaniards, were induced to make a declaration that the Milanese had taken no part in their expulsion, and, without being guilty of rebellion, might yield themselves to a new conqueror. It is a fact of some political importance that in such moments of transition the unhappy city, like Naples at the flight of the Aragonese, was apt to fall a prey to gangs of (often highly aristocratic) scoundrels.

摩尔垮台之后，其子由陌生人胡乱抚养成人。大儿子马西米利亚

诺一点都不像摩尔，小儿子弗朗西斯科不管怎么说还有那么一点气质。当时，米兰频频易主，这座城市也在改变中经历了很多难以言喻的磨难，灾难过后它渴求安定，远离暴动。1512年，在马克西米利安和西班牙军队压迫下撤退的法兰西人，被诱导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中米兰人没有参与对他们的驱逐，没有叛变之罪，因此他们可以向新的统治者臣服。这里有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现实：在这样的历史转折时期，一个怨声载道的城市很容易像阿拉贡人逃跑以后的那不勒斯一样，沦为一群流氓（常常是高级贵族）的掠夺对象。

The house of Gonzaga at Mantua and that of Montefeltro of Urbino were among the best ordered and richest in men of ability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Gonzaga were a tolerably harmonious family; for a long period no murder had been known among them, and their dead could be shown to the world without fear. The Marquis Francesco Gonzaga [1_10] and his wife, Isabella of Este, in spite of some few irregularities, were a united and respectable couple, and brought up their sons to be successful and remarkable men at a time when their small but most important state was exposed to incessant danger. That Francesco, either as statesman or as soldier, should adopt a policy of exceptional honesty, was what neither the emperor, nor Venice, nor the King of France could have expected or desired; but certainly since the battle of the Taro (1495), so far as military honor was concerned, he felt and acted as an Italian patriot, and imparted the same spirit to his wife. Every deed of loyalty and heroism, such as the defence of Faenza against Cesare Borgia, she felt as a vindication of the honor of Italy. Our judgement of her does not need to rest on the praises of the artists and writers who made the fair princess a rich return for her patronage; her own letters show her to us as a woman of unshaken firmness, full of kindliness and humorous observation. Bembo, Bandello, Ariosto and Bernardo Tasso sent their works to

this court, small and powerless as it was, and empty as they found its treasury. A more polished and charming circle was not to be seen in Italy, since the dissolution (1508) of the old court of Urbino; and in one respect, in freedom of movement, the society of Ferrara was inferior to that of Mantua. In artistic matters Isabella had an accurate knowledge, and the catalogue of her small but choice collection can be read by no lover of art without emotion.

在15世纪后半叶的名门望族中，曼图亚的贡扎加家族和乌尔比诺的蒙泰费尔特罗家族最为组织有序，也最为人才辈出。贡扎加家族相对和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家族内部没有发生过一起谋杀案，且可以毫无畏惧地将族人去世的消息公之于众。尽管马奎斯·弗朗西斯科·贡扎加侯爵 [2_10] 和他的妻子，埃斯特家族的伊莎贝拉，在行为上有失检点，但夫妻二人团结和睦、受人尊敬。曼图亚城邦领土狭小，却占据了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其城邦国危机四伏之际，弗朗西斯科夫妇二人还是把儿子培养成了一个卓越非凡之才。弗朗西斯科不论身为政治家还是军人，其所采取政策之诚实确出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威尼斯或法兰西国王之预期及所愿；但就一个军人的荣誉来看，自塔罗战役（1495年）以来，其所思、所为无不彰显了一个意大利爱国人士之情怀。在丈夫弗朗西斯科的感染下，伊莎贝拉也起来为意大利的荣誉而战，比如，保卫法恩扎以抵抗切萨雷·波吉亚入侵就体现了其忠诚、英勇的一面。艺术家、文学家曾为其吟诗作颂，以报答伊莎贝拉对自己的庇护。其实，要评价伊莎贝拉根本无需借这些咏颂的诗章，我们从其信件中就可以看出，她善良、幽默、意志坚定。当时的曼图亚宫廷国库空虚，又小又没有势力，尽管如此，本博、班戴洛、阿里奥斯托和博纳多·塔索还是将自己的作品送往宫廷。自乌尔比诺旧宫廷解体（1508）以来，曼图亚宫廷便是全意大利最为优雅迷人的宫廷；并且从行动自由这一方面来看，费拉拉宫廷远不及曼图亚。伊莎贝拉在艺术上造诣颇深，任何一个艺术爱好者看了她那为数不多，但精心挑选的艺术品后，都不能不为之叹羡。

In the great Federigo (1444-82), whether he were a genuine Montefeltro or not, Urbino possessed a brilli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incely order. As a *condottiere* he shared the political morality of soldiers of fortune, a morality of which the fault does not rest with them alone; as ruler of his little territory he adopted the plan of spending at home the money he had earned abroad, and taxing his people as lightly as possible. Of him and his two successors, Guidobaldo and Francesco Maria, we read: 'They erected buildings, furthere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land, lived at home, and gave employment to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their subjects loved them.' But not only the state, but the court too, was a work of art and organization, and this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Federigo had 500 persons in his service; the arrangements of the court were as complete as in the capitals of the greatest monarchs, but nothing was wasted; all had its object, and all was carefully watched and controlled. The court was no scene of vice and dissipation: it served as a school of military education for the sons of other great houses, the thoroughness of whose culture and instruction was made a point of honor by the duke. The palace which he built, if not one of the most splendid, was classical in the perfection of its plan; there was placed the greatest of his treasures, the celebrated library. Feeling secure in a land where all gained profit or employment from his rule, and where none were beggars, he habitually went about unarmed and almost unaccompanied; alone among the princes of his time he ventured to walk in an open park, and to take his frugal meals in an open chamber, while Livy, or in time of fasting some devotional work, was read to him. In the course of the same afternoon he would listen to a lecture on some classical subject, and thence would go to the monastery of the Clarisses and talk of sacred things through the grating with the abbess. In the evening he would overlook the martial exercises of the young people of his court on the meadow of San Francesco, known for its

magnificent view, and saw to it well that all the feats were done in the most perfect manner. He strove always to be affable and accessible to the utmost degree, visiting the artisans who worked for him in their shops, holding frequent audiences, and, if possible, attending to the requests of each individual on the same day that they were presented. No wonder that the people, as he walked along the street, knelt down and cried: '*Dio ti mantenga, signore!* 'He was called by thinking people 'the light of Italy'. His gifted son Guidobaldo, visited by sickness and misfortune of every kind, was able at the last (1508) to give his state into the safe hands of his nephew Francesco Maria (nephew also of Pope Julius II), who at least succeeded in preserving the territory from any permanent foreign occupation. It is remarkable with what confidence Guidobaldo yielded and fled before Cesare Borgia and Francesco before the troops of Leo X; each knew that his restoration would be all the easier and the more popular the less the country suffered through a fruitless defence. When Lodovico made the same calculation at Milan, he forgot the many grounds of hatred which existed against him. The court of Guidobaldo has been made immortal as the high school of polished manners by Baldassare Castiglione, who represented his eclogue 'Thyrsis' before, and in honor of, that society (1506), and who afterwards (1518) laid the scene of the dialogue of his *Cortigiano* in the circle of the accomplished Duchess Elisabetta Gonzaga.

伟大的费德里戈（1444-1482），不论他是否出身于蒙泰费尔特罗家族，他都是乌尔比诺所有君主中的光辉代表。作为雇佣军队长，他身上有着同其他风云人物同样的政治品德，也有着同他们一样的缺点。作为一个狭小领土的统治者，他的做法是在国外赚钱在国内花费，并且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的捐税。关于他和他的两个继承者——圭多巴尔多和弗朗西斯科·马里亚，我们曾读到过这样的记载：“他们兴

建房屋，改进耕作，安居国内，并给臣民提供就业机会：他们的臣民爱戴他们。”除城邦国以外，乌尔比诺宫廷本身也是一件组织完美的艺术品，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如此。费德里戈拥有500人的服务团队，宫廷的安排布置同最伟大的君主的都城一样设计完美，没有浪费；所有布设自有其目的，一切都被周密地管理着，没有不道德和放荡的行为：乌尔比诺宫廷在当时是名门子弟接受军事教育的学校。乌尔比诺大公认为让这些名门子弟接受全面教育是关乎名誉之大事。他所建造的宫室即便不是最壮丽的，也是设计完美、古色古香的；其无上至宝和著名藏书都存放于此。在其统治之下，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没有乞丐，没有饥民，他也放心地常常出入不带武器，不带随从；当时的君主里只有他一人敢于在广场散步，在没有警卫的房子里简单用食。他命人为其朗读李维的作品（斋戒时就读一些宗教修养方面的著作）。当天下午，费德里戈会听一场关于某经典问题的演讲，然后走访克拉利兹女修道院，隔着格子门和女修道院长详细探究宗教问题。晚上，他往往会在景色壮丽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草地上观察宫中青年子弟们的军事训练，看看他们的水平是否已经达到完美。在接见各类工匠、来客时，他总是那么地平易近人，并尽可能在当天就满足每个人所提出来的请求。无怪乎当他走在街道上的时候，人们跪倒高呼：“殿下啊，上帝保佑你！”有识之士称他为“意大利之光”。他有个才华出众的儿子圭多巴尔多，一生饱受疾病和厄运折磨，不过总算在弥留之际（1508年）把国家安全地交到了他的侄子弗朗西斯科·马里亚（也是教皇朱利叶斯二世的侄子）手中。弗朗西斯科·马里亚至少成功地保住了领土，避免了任何外来势力的长期占领。值得一提的是，在圭多巴尔多屈服于切萨雷·波吉亚，而后逃走，以及弗朗西斯科屈服于利奥十世的军队，而后逃走时，他们其实相当自信；他们深知，国家在无谓的抵抗中损失得越少，就越容易重建家园，越容易受到民众的欢迎。当洛多维科对米兰做同样的估计时，他却忘了各地公民憎恨他的专制独裁。圭多巴尔多的宫廷被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誉为注重文化教养的最高学府而永垂不朽；为表达对该宫廷的敬意，他曾当场朗诵他的牧歌《泰西斯》（1506年），而后来（1518年）他在作品《廷臣论》中，就将对话地点假设在学识渊博的伊丽莎贝塔·贡扎加女公爵的宫廷里。

The government of the family of Este at Ferrara, Modena and Reggio displays curious contrasts of violence and popularity. Within the palace frightful deeds were perpetrated; a princess was beheaded (1425) for alleged adultery with a step-son;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children fled from the court, and even abroad their lives were threatened by assassins sent in pursuit of them (1471). Plots from without were incessant; the bastard of a bastard tried to wrest the crown from the lawful heir, Ercole I; this latter is said afterwards (1493) to have poisoned his wife on discovering that she, at the instigation of her brother Ferrante of Naples, was going to poison him. This list of tragedies is closed by the plot of two bastards against their brothers, the ruling Duke Alfonso I and Cardinal Ippolito (1506), which was discovered in time, and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life.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this state was of the most perfect kind, and necessarily so, since none of the large or second-rate powers of Italy were exposed to such danger and stood in such constant need of armaments and fortifications. It was the hope of the rulers that the increasing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 would keep pace with the increasing weight of taxation, and the Marquis Niccolo (d. 1441) used to express the wish that his subjects might be richer than the people of other countries. If the rapid increase of the population be a measure of the prosperity actually attained, it is certainly a fact of importance that in the year 1497, notwithstanding the wonderful extension of the capital, no houses were to be let. Ferrara is the first really modern city in Europe; large and well-built quarters sprang up at the bidding of the ruler: here, by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official classes and the active promotion of trade, was formed for the first time a true capital; wealthy fugitives from all parts of Italy, Florentines especially, settled and built their palaces at Ferrara. But the indirect taxation, at all events, must have reached a point at

which it could only just be borne. The government, it is true, took measures of alleviation which were also adopted by other Italian despots, such as Galeazzo Maria Sforza: in time of famine corn was brought from a distance and seems to have been distributed gratuitously; but in ordinary times it compensated itself by the monopoly, if not of corn, of many other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fish, salt, meat, fruit and vegetables, which last were carefully planted on and near the walls of the city. The most considerable source of income, however, was the annual sale of public offices, a usage which was common throughout Italy, and about the working of which at Ferrara we have more precise information. We read, for example, that at the new year 1502 the majority of the officials bought their places at '*prezzi salad* ';public servants of the most various kinds, custom-house officers, bailiffs (*massari*), notaries, '*podesta* ', judges and even captains, i.e. lieutenant-governors of provincial towns, are quoted by name. As one of the 'devourers of the people' who paid dearly for their places, and who were 'hated worse than the devil', Tito Strozza—let us hope not the famous Latin poet—is mentioned. About the same time every year the dukes were accustomed to make a round of visits in Ferrara, the so-called '*andar per ventura* ',in which they took presents from, at any rate, the more wealthy citizens. The gifts, however, did not consist of money, but of natural products.

埃斯特家族在费拉拉、摩德纳和雷焦的统治，展示了暴力执政与深得民心这两者之间的奇怪对照。宫城内可怕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一个公爵夫人因被认为和继子通奸而被斩首（1425年）；嫡庶子女相继逃出宫廷，即便逃至国外，他们仍因躲避派去追杀他们的刺客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1471年）。外部的阴谋同样接连不断地发生；一个私生子的私生子企图从合法继承人埃尔克莱一世手中抢夺君位；据说后来（1493年），埃尔克莱一世毒死了他的妻子，因为他发

现他妻子在她那不勒斯哥哥费兰特的煽动下企图毒害自己。一连串悲剧以两个私生子反对他们的兄弟——当时掌权的公爵阿方索一世和红衣主教伊波利托的阴谋（1506年）而告终。这次阴谋被及时发现后，两位私生子被处以终身监禁。这个国家的财政系统非常完善，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在意大利所有一流或二流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像它那样处境危险，且需要不断加强军备和防御工事的。统治者们希望随着其子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也可以随之增加赋税。马奎斯·尼科洛（卒于1441年）曾经常表示希望他的子民能比其他国家更富裕。如果说人口的快速增长可以衡量实际繁荣程度，那么为什么在1497年都城不断扩张的情况下，却找不出一套可以出租的房子？这确是一件不容小觑的事。费拉拉是欧洲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统治者命人兴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精品住宅区。通过不断集中官吏阶层和大力发展商业，费拉拉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都城；从意大利各地来的富裕流亡者，特别是佛罗伦萨人，都在费拉拉定居下来，并建起了他们的宅邸。但不管怎样，间接税已经达到了百姓能够承受的极限。诚然，政府曾经采取了其他意大利的独裁统治者所采取过的减轻百姓疾苦的措施。如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在荒年时派人从大老远运来谷物，并且似乎是无偿地分于子民。但在平常的年景里，却施行垄断政策狂征暴敛以捞回损失，不是垄断谷物，就是垄断许多其他生活必需品——鱼、盐、肉、水果和蔬菜，其中所垄断的蔬菜都是百姓精心栽种于城墙及城墙附近的。但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是靠每年出卖官爵，这在整个意大利已相习成风。而关于费拉拉卖官的运作方式，我们掌握了更为精确的资料。例如，据记载，在1502年的新年，多数官吏都以“高价”买到了官职；资料例举了各种各样的公职，如关税吏、执达吏、公证员、市镇长官、法官，乃至各省城的副长官等。在资料中所提到的用高价买官职，“比魔鬼还更可恶”的“吃人鬼”当中，提托·斯特罗扎也赫然在内——但愿所指的不是那个著名拉丁诗人。每年大概这个时候，那些公爵们都会去费拉拉“环游”一圈，反正就是从更富有的公民那里收取礼物。但这些礼物是农产品，而不是现金。

It was the pride of the duke for all Italy to know that at Ferrara the soldiers received their pay and the professors of the university their salary not a day later than it was due; that the soldiers never dared lay arbitrary hands on a citizen or peasant; that the town was impregnable to assault; and that vast sums of coined money were stored up in the citadel. To keep two sets of accounts seemed unnecessary;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was at the same time manager of the ducal household. The buildings erected by Borso (1430-71), by Ercole I (till 1505), and by Alfonso I (till 1534), were very numerous, but of small size; they are characteristic of a princely house which, with all its love of splendor—Borso never appeared but in embroidery and jewels—indulged in no ill-considered expense. Alfonso may perhaps have foreseen the fate which was in store for his charming little villas, the Belvedere with its shady gardens, and Montana with its fountains and beautiful frescoes.

全意大利人都知道，在费拉拉，军人和大学教授都能一天也不差地准时领到他们的薪金；军人们从来不敢随意欺压市民或农民；城市的防御工事坚不可摧；城堡里藏有大量铸币。所有这些都让费拉拉大公引以为傲。设立两套账目似无必要；财政大臣同时又是宫内大臣。博尔索（1430-1471）、埃尔克莱一世（卒于1505年）和阿方索一世（卒于1534年）所建造的建筑物有很多，但都规模不大；这说明君主家族尽管喜爱豪华——博尔索每次出现都是锦绣被体、珠光宝气——但不会肆意挥霍。阿方索可能已经预料到，在他那些规模不大却精致无比的别墅当中，贝尔维德尔别墅有浓阴满地的花园，蒙塔纳别墅有喷泉和美丽的壁画。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dangers to which these princes were constantly exposed developed in them capacities of a remarkable kind. In so artificial a world only a man of consummate address

could hope to succeed; each candidate for distinction was forced to make good his claims by personal merit and show himself worthy of the crown he sought. Their characters are not without dark sides; but in all of them lives something of those qualities which Italy then pursued as its ideal. What European monarch of the time labored for his own culture as, for instance, Alfonso I? His travels in France, Eng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were undertaken for the purpose of study: by means of them he gained an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industry and commerce of these countries. [1_11] It is ridiculous to reproach him with the turner's work which he practiced in his leisure hours, connected as it was with his skill in the casting of cannon, and with the unprejudiced freedom with which he surrounded himself by masters of every art. The Italian princes were not, like their contemporaries in the North, dependent on the society of an aristocracy which held itself to be the only class worth consideration, and which infected the monarch with the same conceit. In Italy the prince was permitted and compelled to know and to use men of every grade in society; and the nobility, though by birth a caste, were forced in social intercourse to stand upon their personal qualifications alone. But this is a point which we shall discuss more fully in the sequel.

不可否认的是，君主们在险象迭生的情况下，慢慢表现出了一些过人的才能。在那个诈伪百出的世界里，只有处事非常圆滑老练的人才有成功的机会；每个候选者都希望脱颖而出，竭尽所能地争夺那顶王冠，并证明自己配得上那把交椅。他们的性格并不是完美无缺；但他们身上却有当时意大利当作理想来追求的某些特质。在当时的欧洲，有哪个君主像阿方索一世那样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他赴法兰西、英格兰、荷兰游历考察，由此学习到那些国家的工商业发展模式。 [2_11] 要是责备他在闲暇时做一些他所擅长的铸炮方面的旋工工作，要是责备他毫无偏见地网罗各种能工巧匠，那就再荒谬不过了。

同时代的北方君主们往往依赖贵族社会，认为只有贵族阶层才值得尊重，他们也因而变得自高自大起来。意大利君主则不然。在意大利，君王可以且必须去结识和任用社会各阶层人士；贵族虽然血统高贵，但也只能靠自身能力去进行社会交往。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中做更详尽的讨论。

The feeling of the Ferrarese towards the ruling house was a strange compound of silent dread, of the truly Italian sense of well-calculated interest, and of the loyalty of the modern subject: personal admiration was transferred into a new sentiment of duty. The city of Ferrara raised in 1451 a bronze equestrian statue to their Prince Niccolo, who had died ten years earlier; Borso (1454) did not scruple to place his own statue, also of bronze, but in a sitting posture, hard by in the market; in addition to which the city,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reign, decreed to him a 'marble triumphal pillar'. A citizen who, when abroad in Venice, had spoken ill of Borso in public was informed against on his return home, and condemned to banishment and the confiscation of his goods; a loyal subject was with difficulty restrained from cutting him down before the tribunal itself, and with a rope round his neck the offender went to the duke and begged for a full pardon. The government was well provided with spies, and the duke inspected personally the daily list of travelers which the inn-keepers were strictly ordered to present. Under Borso, who was anxious to leave no distinguished stranger unhonored, this regulation served a hospitable purpose; Ercole I used it simply as a measure of precaution. In Bologna, too, it was then the rule, under Giovanni II Bentivoglio, that every passing traveler who entered at one gate must obtain a ticket in order to go out at another. An unfailing means of popularity was the sudden dismissal of oppressive officials. When Borso arrested in person his chief and confidential counsellors, when Ercole I removed and

disgraced a tax-gatherer who for years had been sucking the blood of the people, bonfires were lighted and the bells were pealed in their honor. With one of his servants, however, Ercole let things go too far.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e, or by whatever name we should choose to call him (*capitano di giustizia*), was Gregorio Zampante of Lucca—a native being unsuited for an office of this kind. Even the sons and brothers of the duke trembled before this man; the fines he inflicted amounted to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ducats, and torture was applied even before the hearing of a case: bribes were accepted from wealthy criminals, and their pardon obtained from the duke by false representations. Gladly would the people have paid any sum to this ruler for sending away the 'enemy of God and man'. But Ercole had knighted him and made him godfather to his children; and year by year Zampante laid by 2,000 ducats. He dared only eat pigeons bred in his own house, and could not cross the street without a band of archers and bravos. It was time to get rid of him; in 1496 two students and a converted Jew whom he had mortally offended killed him in his house while he was taking his siesta, and then rode through the town on horses held in waiting, raising the cry, 'Come out! Come out! We have slain Zampante!' The pursuers came too late, and found them already safe across the frontier. Of course it now rained satires—some of them in the form of sonnets, others of odes.

对于埃斯特家族，费拉拉人感到一种无言的恐惧，他们既像真正的意大利人那样善于权衡利害，又像现代人那样效忠于君主：在费拉拉，个人崇拜已经转化成一种新的责任感。1451年，费拉拉城给他们在十年前逝世的君主尼科洛树了座骑马铜像；随后在1454年，博尔索也跟着在市场旁给自己树了座坐式铜像；此外，在博尔索刚开始统治费拉拉城时，费拉拉城就下令为其建造一座“大理石凯旋柱”。当时，一个费拉拉人在威尼斯公开说了博尔索的坏话，回国后就被人告发，

并被判处流放和没收个人财产；一个忠诚的市民好容易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当着法庭将那个人砍倒；那个罪犯以绳索系颈，到大公那求赦免其全部罪行。政府动用了多名侦探，并严令旅店店主每天呈送旅客名单，并交由大公亲自审查。博尔索在统治期间希望每位贵客都能受其礼遇而去。设此规定就是为了殷勤招待来客；埃尔克莱一世却仅仅把它当作一种预防措施。在博洛尼亚，乔瓦尼二世·本蒂沃利奥执政时，也有一条规定，即每个旅客进入城门时，必须领取一纸证明，才能从另一个城门出城。如果官员鱼肉百姓，政府会立即将其撤职，这项规定深得人心。当博尔索亲自逮捕了他的最高枢密顾问官，当埃尔克莱一世撤换并贬黜了一个多年来搜刮民脂民膏的收税官时，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向他们表达敬意。不过，埃尔克莱一世对他的一个部下就太过纵容了。卢卡的格里高利奥·扎邦特是一名警察官，或者说是法庭长（随便怎么称呼都行）；这个费拉拉人完全不适合做这份工作。即使是公爵的儿子和兄弟们，在他面前也都是战战兢兢的；他判起案件来，罚金就高达数百、数千达克特，甚至在还未审理案件的情况下，就对罪犯严刑拷打。他从富有的罪犯那里收受贿赂，并且通过虚假陈述从公爵那里获得赦免。百姓们觉得，要是可以把这个“上帝和人类的公敌”送走，即便是付出任何代价，他们也都在所不惜。然而，埃尔克莱一世却授予其骑士爵位，让他当自己孩子们的教父。就这样，扎邦特每年就可以轻松赚取2000达克特。他只敢吃自家饲养的鸽子，并且只有在一群弓箭手和勇士的保护下，才敢上街走动。是时候除掉他了！1496年，两个学生和一个受过他极大冒犯的改宗犹太人趁其在家午睡时将其杀害。事后，骑上早已备好的马匹，高喊着：“出来啊！出来啊！我们已将扎邦特就地正法！”那些追兵赶到时，已经太晚了。他们已经安全地越过了边境。果不其然，此次事件后，大量讽刺作品以十四行诗和歌谣的形式涌现出来。

It was wholly in the spirit of this system that the sovereign imposed his own respect for useful servants on the court and on the people. When in 1469 Borso's privy councillor Lodovico Casella died, no court of law or place of business in the city, and no lecture-

room at the university, was allowed to be open: all had to follow the body to San Domenico, since the duke intended to be present. And, in fact, 'the first of the house of Este who attended the corpse of a subject' walked, clad in black, after the coffin, weeping, while behind him came the relatives of Casella, each conducted by one of the gentlemen of the court: the body of the plain citizen was carried by nobles from the church into the cloister, where it was buried. Indeed this official sympathy with princely emotion first came up in the Italian states. At the root of the practice may be a beautiful, humane sentiment; the utterance of it, especially in the poets, is, as a rule, of equivocal sincerity. One of the youthful poems of Ariosto, on the death of Leonora of Aragon, wife of Ercole I, contains besides the inevitable graveyard flowers, which are scattered in the elegies of all ages, some thoroughly modern features:

本着制度所示的精神，君主对那些造福于民、效忠于朝廷的公仆们表示尊敬。1469年，当博尔索的枢密官，洛多维科·卡塞拉逝世的时候，城内所有法庭、营业场所和大学讲堂都一律关闭，因为公爵会亲自参加葬礼，所有人都必须送殡至圣多米尼克教堂。事实上，博尔索是埃斯特家族中第一个参加臣民葬礼的公爵。那天，他身穿黑色丧服，跟在灵柩后面哭泣。在他后面的是卡塞拉的亲戚，由廷臣一一搀扶着：这个普通市民的遗体由贵族们从教堂抬往修道院安葬。诚然，在意大利国家中，这是第一次以君主身份对臣民表示正式哀悼。从根源上看，这种做法体现了人类美好高尚的情感；但这种情感，尤其是在通过诗歌表达出来的情况下，那它的真实性就有待商榷了。阿里奥斯托早年为悼念埃尔克莱一世的妻子，阿拉贡的利奥诺拉，写了一首挽诗。这首挽诗除了堆砌各个时代都有的墓志铭辞藻外，还富有现代挽诗特色：

This death had given Ferrara a blow which it

> would not get over for years: its benefactress was now its advocate in heaven, since earth was not worthy of her; truly the angel of Death did not come to her, as to us common mortals, with blood-stained scythe, but fair to behold (*onesta*) and with so kind a face that every fear was allayed.

> 多年来，费拉拉一直无法从利奥诺拉去世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它的女施主现在成了它在天上的保护人。俗世已不值得她留恋；诚然，死神并没有像对待我们凡夫俗子那样拿着血迹斑斑的镰刀走向她，相反，他一脸和善，仿佛一切恐惧都能随之烟消云散。

But we meet, also, with a sympathy of a different kind. Novelists, depending wholly on the favor of their patrons, tell us the love-stories of the prince, even before his death, in a way which, to later times, would seem the height of indiscretion, but which then passed simply as an innocent compliment. Lyrical poets even went so far as to sing the illicit flames of their lawfully married lords, e.g. Angelo Poliziano, those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 Gioviano Pontano, with a singular gusto, those of Alfonso of Calabria. The poem in question betrays unconsciously the odious disposition of the Aragonese ruler; in these things too, he must needs be the most fortunate, else woe be to those who are more successful! That the greatest artists, for example Leonardo, should paint the mistresses of their patrons was no more than a matter of course.

然而，这种情感的呈现，还有另一种形式。小说家们，仗着保护人对他们的支持，甚至在君主尚未离世的情况下，就把君主的爱情故

事公之于众。在后人看来，这是相当轻率之举。但在当时，这种做法却仅仅被视为一种率真的赞颂。抒情诗人们甚至歌颂他们已婚君主的非法情爱。例如，安吉洛·波利齐亚诺歌颂伟大的洛伦佐的情人，乔维诺·庞达诺用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格歌颂卡拉布里亚·阿方索的情人。我们刚才所探讨的诗歌无意间暴露了阿拉贡统治者丑恶的一面；在这些事情上，他们定是再幸运不过了。不然就让那些更成功的人遭受厄运吧！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例如列奥纳多·达·芬奇，为其保护人的情妇作画也就不足为怪了。

But the house of Este was not satisfied with the praises of others; it undertook to celebrate them itself. In the Palazzo Schifanoia Borso caused himself to be painted in a series of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 and Ercole (from 1472 on) kept the anniversary of hi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by a procession which was compared to the feast of Corpus Christi; shops were closed as on Sunday; in the center of the line walked all the members of the princely house (bastards included) clad in embroidered robes. That the crown was the fountain of honor and authority, that all personal distinction flowed from it alone, had been long expressed at this court by the Order of the Golden Spur—an order which had nothing in common with medieval chivalry. Ercole I added to the spur a sword, a gold-laced mantle and a grant of money, in return for which there is no doubt that regular service was required.

但是埃斯特家族对他人的赞赏却不甚满意，他们还要自我赞颂一番。在斯基法诺亚宫殿里，博尔索命人为其作画，以颂扬其一系列光辉事迹。埃尔克莱（从1472年开始）每年都要举行游行仪式来庆祝自己登基。其游行仪式之规模足以与耶稣圣体节相比拟；所有店铺都要像礼拜天那样关门歇业；君主家族所有成员（包括私生子在内），都身着锦绣华服，走在游行队伍中间。在这个宫廷里，君主是荣誉和权

威的源泉，个人显达全来自于君主。“金马刺勋章”一直以来就是荣誉的象征，不过这一勋章跟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毫无关联。除授予金马刺勋章外，埃尔克莱一世又加了一把宝剑、一件镶金斗篷和一笔赏金作为奖励。这些无疑是埃尔克莱一世对受勋者例行服务的酬谢。

The patronage of art and letters for which this court has obtained a worldwide reputation was exercised through the university, which was one of the most perfect in Italy, and by the gift of places in the personal or official service of the prince; it involved consequently no additional expense. Boiardo, as a wealthy country gentleman and high official, belonged to this class. At the time when Ariosto began to distinguish himself, there existed no court, 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word, either at Milan or Florence, and soon there was none either at Urbino or at Naples. He had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a place among the musicians and jugglers of Cardinal Ippolito till Alfonso took him into his service. It was otherwise at a later time with Torquato Tasso, whose presence at court was jealously sought after.

这个宫廷以赞助文学艺术事业而享誉海外。主要表现为：大力赞助大学教育，使大学教育臻于完备；赏赐官职于效命于君主或宫廷的臣民。这项赞助事业并不需要额外开支。博亚尔多之为富绅和显宦即属于此类。当阿里奥斯托初露头角时，米兰或佛罗伦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宫廷了。随后不久，乌尔比诺或那不勒斯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宫廷了。在效命于阿方索之前，他只得满足于在红衣主教伊波利托的音乐家和杂耍者中获得一席之地。后来，托尔夸托·塔索的地位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各君主都想拉他为自己效命。

The Opponents of the Despots

暴君专制的反对者

In face of this centralized authority, all legal opposition within the borders of the state was futile. The elements needed for the restoration of a republic had been for ever destroyed, and the field prepared for violence and despotism. The nobles, destitute of political rights, even where they held feudal possessions, might call themselves Guelphs or Ghibellines at will, might dress up their bravos in padded hose and feathered caps or how else they pleased; thoughtful men like Machiavelli knew well enough that Milan and Naples were too 'corrupt' for a republic. Strange judgements fall on these two so-called parties, which now served only to give an official sanction to personal and family disputes. An Italian prince, whom Agrippa of Nettesheim advised to put them down, replied that their quarrels brought him in more than 12,000 ducats a year in fines. And when in the year 1500, during the brief return of Lodovico il Moro to his states, the Guelphs of Tortona summoned a part of the neighbouring French army into the city, in order to make an end once for all of their opponents, the French certainly began by plundering and ruining the Ghibellines, but finished by doing the same to the Guelphs, till Tortona was utterly laid waste. In Romagna, the hotbed of every ferocious passion, these two names had long lost all political meaning. It was a sign of the political delusion of the people that they not seldom believed the Guelphs to be the natural allies of the French and the Ghibellines of the Spaniards. It is hard to see that those who tried to profit by this error got much by doing so. France, after all her interventions, had to abandon the peninsula at last, and what became of Spain, after she had destroyed Italy, is known to every reader.

在中央集权面前，所有在国内的合法反抗都是徒劳无功的。恢复

共和国需要的一些要素受到永久性破坏，这片土地为暴力和专制而存。那些贵族虽然有封建财产，但却没有政治权利。他们可能会随意地称自己为归尔甫派或吉伯林派，可能会用装有垫料的长筒袜和羽毛高冠或他们喜欢的任意方式装扮他们的勇士；像马基雅弗利这样有思想的人却很清楚，米兰和那不勒斯已经腐败到了不能称之为共和国的地步。人们对这两个所谓的政党有奇怪的判断，因为这两个政党现在只对个人或家庭的争端做出官方的制裁。内提斯海姆的阿格利巴曾劝一个意大利君王把这两个政党打压下去，那个君王却说，政党之间的攻讦每年可以让他收入超过12,000达克特的罚款。在1500年，在洛多维科·摩罗短暂回国期间，为了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的竞争对手，托尔托纳的归尔甫派党人将邻国法兰西的部分军队引入城内。法兰西人的确在一开始掠夺和破坏吉伯林派，但是最后直到托尔托纳完全荒废，他们也对归尔甫派党人做出了同样的行径。在滋长各种残暴行为的罗马涅，这两个政党的名字已经长久地失去了政治意义。人们始终相信归尔甫派是法兰西的天然盟友，而吉伯林派是西班牙人的盟友，这是人们政治错觉的表现。很难看出那些试图从这个错误中获利的人到底能得多大的好处。法兰西在进行了它所有的干预后，不得不放弃这个半岛。至于西班牙，它在摧毁意大利后变成了什么样子，想必每个读者也都了然于心。

But to return to the despots of the Renaissance. A pure and simple mind, we might think, would perhaps have argued that, since all power is derived from God, these princes, if they were loyally and honestly supported by all their subjects, must in time themselves improve and lose all traces of their violent origin. But from characters and imaginations inflamed by passion and ambition, reasoning of this kind could not be expected. Like bad physicians, they thought to cure the disease by removing the symptoms, and fancied that if the tyrant were put to death, freedom would follow of itself. Or else, without reflecting even to this extent, they sought only to give a vent to the universal hatred, or to

take vengeance for some family misfortune or personal affront. Since the governments were absolute, and free from all legal restraints, the opposition chose its weapons with equal freedom. Boccaccio declares openly:

但是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暴君，我们可能会认为一个思想单纯的人也许会争辩，既然所有的权力都是上帝给予的，如果这些君王得到他们臣民忠诚的拥护，必须及时地自我提高，并且不能展露一丁点暴力的痕迹。但是这种人的性格和想象力受到激情和野心的刺激，很难有这样的理性想法。他们就像庸医一样，认为通过消除症状就可以治愈疾病。他们幻想着如果暴君被处以死刑的话，自由就会随之而来。或者，他们就连这些也没有想到，只是为群众泄愤，或为一个不幸的家庭或为一个被伤害的个人复仇。因为政府是专权的，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反对派可以有同样的自由来选择自己的武器。薄伽丘曾经公开宣称：

> Shall I call the tyrant king or prince, and obey him loyally as my lord? No, for he is the enemy of the commonwealth. Against him I may use arms, conspiracies, spies, ambushes and fraud; to do so is a sacred and necessary work. There is no more acceptable sacrifice than the blood of a tyrant.

> 我将称呼那个暴君为君主或国王，并且忠诚地服从于他吗？不，因为他是共和国的敌人，我会用武器、阴谋、间谍、伏击和计谋来反对他；这是一项神圣和必要的工作。除了暴君本身，我们不允许更多的流血牺牲。

We need not occupy ourselves with individual cases; Machiavelli, in a famous chapter of his *Discorsi,* treats of the conspiracies of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from the days of the Greek tyrants downwards, and classifies them with cold-blooded indifference according to their various plans and results. We need make but two observations, first on the murders committed in church, and next on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antiquity. So well was the tyrant guarded that it was almost impossible to lay hands upon him elsewhere than at solemn religious services; and on no other occasion was the whole family to be found assembled together. It was thus that the Fabrianese murdered the members of their ruling house, the Chiavelli, during high mass (1435), the signal being given by the words of the Creed, '*Et incarnatus est.* ' At Milan the Duke Giovan Maria Visconti (1412) was assassinated at the entrance of the church of San Gottardo, Galeazzo Maria Sforza (1476) in the church of Santo Stefano, and Lodovico il Moro only escaped (1484) the daggers of the adherents of the widowed Duchess Bona through entering the church of Sant' Ambrogio by another door than that by which he was expected. There was no intentional impiety in the act; the assassins of Galeazzo did not fail to pray before the murder to the patron saint of the church, and to listen devoutly to the first mass. It was, however, one cause of the partial failure of the conspiracy of the Pazzi against Lorenzo and Giuliano Medici (1478), that the brigand Montesecco, who had bargained to commit the murder at a banquet, declined to undertake it in the Cathedral of Florence. Certain of the clergy 'who were familiar with the sacred place, and consequently had no fear' were induced to act in his stead.

我们不必在个别例子上多费时间。马基雅弗利在他的《史论》一书著名的章节中探讨了从古希腊暴君以来的现代或古代时期的阴谋，

并且根据它们不同的计划和结果冷静地加以分类。我们只需要做出两种评论：第一种是发生在教堂里的谋杀，第二种是古代谋杀的影响。暴君受到层层的保护，除了在庄严的宗教仪式上，在其他地方几乎是不可能对他下手的，而且在另外的场合也看不到整个家族聚在一起。因此，法布亚诺人在大弥撒（1435年）中听到作为暗号的信经中“圣神降孕”的那句话时，谋杀了他们的统治家族基亚韦利全家。在米兰，乔瓦尼·马里亚·维斯孔蒂（1412年）在圣哥塔德教堂的入口处被暗杀，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在圣斯蒂芬教堂门口被杀，洛多维科·摩罗在通过另一个门进入圣安布洛吉奥教堂，而非人们之前预想的那一个，他因此才躲过了（1484年）守寡的公爵夫人博纳的随从的匕首。在刺杀行动中没有蓄意的不敬。刺杀加莱亚佐的刺客们在刺杀前向教堂里的保护神祈祷，并非常虔诚地聆听第一次弥撒。但是帕奇家族针对洛伦佐和朱利亚诺·美第奇（1478年）的谋划却遭到了部分的失败。那是因为那个说好在宴会上实施谋杀的匪徒蒙特西科，拒绝在佛罗伦萨大教堂动手。一定是“熟悉这个圣地，并对结果毫无畏惧的”某个神职人员被诱导代替他实施谋杀。

As to the imitation of antiquity, the influence of which on moral and more especially on political questions we shall often refer to, the example was set by the rulers themselves, who, both in their conception of the state and in their personal conduct, took the old Roman empire avowedly as their model. In like manner their opponents, when they set to work with a deliberate theory, took pattern by the ancient tyrannicides. It may be hard to prove that in the main point—in forming the resolve itself—they consciously followed a classical example; but the appeal to antiquity was no mere phrase. The most striking disclosures have been left us with respect to the murderers of Galeazzo Sforza—Lampugnani, Olgiati and Visconti. Though all three had personal ends to serve, yet their enterprise may be partly ascribed to a more general reason. About this time Cola de' Montani, a humanist and professor of eloquence,

had awakened among many of the young Milanese nobility a vague passion for glory and patriotic achievements, and had mentioned to Lampugnani and Olgiati his hope of delivering Milan. Suspicion was soon aroused against him: he was banished from the city, and his pupils were abandoned to the fanaticism he had excited. Some ten days before the deed they met together and took a solemn oath in the monastery of Sant' Ambrogio. 'Then,' says Olgiati, 'in a remote corner I raised my eyes before the picture of the patron saint, and implored his help for ourselves and for all *his* people.' The heavenly protector of the city was called on to bless the undertaking, as was afterwards St Stephen, in whose church it was fulfilled. Many of their comrades were now informed of the plot, nightly meetings were held in the house of Lampugnani, and the conspirators practiced for the murder with the sheaths of their daggers. The attempt was successful, but Lampugnani was killed on the spot by the attendants of the duke; the others were captured. Visconti was penitent, but Olgiati through all his tortures maintained that the deed was an acceptable offering to God, and exclaimed while the executioner was breaking his ribs, 'Courage, Girolamo! Thou wilt long be remembered; death is bitter, but glory is eternal.'

至于“效仿古代”，我们经常提及它对于道德，尤其是对于政治问题的影响，统治者自己在这方面就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他们在对国家的设想以及自己的行为上，都明确地以古罗马帝国作为他们的模范。同样的，当反对者开始制定详细的理论时，他们也按照古代弑戮暴君的模式行事。也许很难证明他们在关键点上——即决定本身的形成上——有意识地效仿古代先例；但向古代求助却绝不仅仅是一句空话。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加莱亚佐·斯福尔扎的谋杀者：兰普尼亚尼、奥尔加提和维斯孔蒂。虽然他们三个都各有各的目的，但是他们的野心可能部分源于一个更加普遍的理由。那时，人文主义者修辞学教授科拉·德·蒙塔尼在很多年轻的米兰贵族中唤起了一种对光荣和爱国成就的模糊

激情，并且向兰普尼亚尼和奥尔加提提出了拯救米兰的愿望。很快人们就对他起了疑心：他被逐出米兰城，他的弟子遂被卷入他所煽动起来的狂热中。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大约十天前，他们聚在一起，在圣安布洛吉奥修道院庄严宣誓。奥尔加提说道："那时，我在远处一个角落，仰视着守护圣人的画像，为我们自己也为神的全体人民祈求帮助。"他们恳求这个城市的神圣保护者保佑他们的任务顺利完成，随后又向圣史蒂芬求助，并在他的教堂里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很多同僚都得知了这个计划，每晚都在兰普尼亚尼的宅邸中集会讨论，用匕首的鞘来练习杀人。预谋成功了，但是兰普尼亚尼被公爵的随从当场杀害；其他人被逮捕。维斯孔蒂忏悔了，但奥尔加提在各种严刑拷打下，仍一直认为这一行动是献给上帝、令其满意的供品，并在刽子手将要折断他的肋骨时高声喊道："拿出勇气来，吉罗拉莫。人们会永远纪念你，死亡是痛苦的，但光荣将永存。"

But however idealistic the object and purpose of such conspiracies may appear, the manner in which they were conducted betrays the influence of that worst of all conspirators, Catiline—a man in whose thoughts freedom had no place whatever. The annals of Siena tell us expressly that the conspirators were students of Sallust, and the fact is indirectly confirmed by the confession of Olgiati. Elsewhere, too, we meet with the name of Catiline, and a more attractive pattern of the conspirator, apart from the end he followed, could hardly be discovered.

但是不管这些密谋的目的和意图看起来是多么地理想主义，它们所采取的方式却暴露出它们受到了所有密谋者中最糟糕的那个人的影响，即喀提林，此人的思想中无论如何都没有自由的一席之地。锡耶纳的年鉴清楚地告诉我们阴谋者们是塞勒斯特的弟子，这个事实已经间接地从奥尔加提的供词中得到印证。在其他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喀提林这个名字，撇开他所追求的目的，我们很难发现一个比他更有吸

引力的阴谋家典型。

Among the Florentines, whenever they got rid of, or tried to get rid of, the Medici, tyrannicide was a practice universally accepted and approved. After the flight of the Medici in 1494, the bronze group of Donatello—Judith with the dead Holofernes—was taken from their collection, and placed before the Palazzo della Signoria, on the spot where the *David* of Michelangelo now stands, with the inscription, '*Exemplum salutis publicae cives posuere* 1495'. [1_12] No example was more popular than that of the younger Brutus, who, in Dante, lies with Cassius and Judas Iscariot in the lowest pit of hell, because of his treason to the empire. Pietro Paolo Boscoli, whose plot against Giuliano, Giovanni and Giulio Medici failed (1513), was an enthusiastic admirer of Brutus, and in order to follow his steps, only waited to find a Cassius. Such a partner he met with in Agostino Capponi. His last utterances in prison—a striking evidence of the religious feeling of the time—show with what an effort he rid his mind of these classical imaginations, in order to die like a Christian. A friend and the confessor both had to assure him that St Thomas Aquinas condemned conspirators absolutely; but the confessor afterwards admitted to the same friend that St Thomas drew a distinction and permitted conspiracies against a tyrant who had forced himself on a people against their will. After Lorenzino Medici had murdered the Duke Alessandro (1537), and then escaped, an apology for the deed appeared, which is probably his own work, and certainly composed in his interest, and in which he praises tyrannicide as an act of the highest merit;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Alessandro was a legitimate Medici, and, therefore, related to him, if only distantly, he boldly compares himself with Timoleon, who slew his brother for his country's sake. Others, on the same occasion, made use of the comparison with Brutus, and that

Michelangelo himself, even late in life, was not unfriendly to ideas of this kind, may be inferred from his bust of Brutus in the Bargello. He left it unfinished, like nearly all his works, but certainly not because the murder of Cesare was repugnant to his feeling, as the couplet beneath declares.

在佛罗伦萨人中，每当他们脱离或者试图脱离美第奇家族的统治时，他们都普遍接受和认可诛戮暴君这种方式。在1494年美第奇家族逃亡后，多纳泰罗的青铜雕像——比如朱迪斯和已死的荷罗孚尼铜像——从他们所收藏的艺术作品中被挑了出来，并放在领主广场上，就是现在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大卫》矗立的地方，并刻上“挽救国家的榜样，全体公民建于1495年”的字样。[2_12] 没有哪一个榜样比小布鲁特斯更受欢迎了。在但丁的诗中，因为背叛罗马帝国，他和卡西乌斯和加略人犹大一起关在地狱的最下层。在针对朱利亚诺、乔瓦尼和朱利奥·美第奇的阴谋中失败（1513年）的彼得罗·保罗·博斯克利，是布鲁特斯的狂热拥护者，为了追随效仿他，他等待着只为发现一个卡西乌斯。在阿戈斯蒂诺·卡波尼身上他发现了同伴的影子。他在狱中所说的最后几句话，是当时宗教感情的鲜明证据，表明他为了要像一个基督徒那样死去而要摆脱那些对于古代的幻想是何等的困难。一个朋友和神父向他保证圣托马斯·阿奎那一定谴责了密谋者；但是这个神父随后向同一个朋友承认圣托马斯对于密谋者是区别对待的，即允许那些针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人们的暴君们的密谋。在洛伦齐诺·美第奇谋杀了阿里桑德罗公爵（1537）然后潜逃之后，出现了一篇为这次事件辩护的文章。这可能出自他自己的手笔，文章也自然是从对他有利角度来组织的，在辩护中他赞扬弑戮暴君为一种高尚的行为；假设阿里桑德罗是美第奇家族的合法后人，因而自己和他有亲属关系，即使是远亲也好，他大胆地把自己比作为国家利益而杀死自己兄弟的提莫利昂。在同样的情形下，其他人也会把他们和布鲁特斯进行比较，米开朗基罗他自己甚至在自己的晚年也欣然接受这种想法，这可以从巴杰罗美术馆关于布鲁特斯的半身雕像中得知一二。和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一样，他并没有将其完成，但就像雕像下面的诗句所言，一定不是因

为他对谋杀切萨雷一事心怀厌恶。

A popular radicalism in the form in which it is opposed to the monarchies of later times is not to be found in the despotic states of the Renaissance. Each individual protested inwardly against despotism but was rather disposed to make tolerable or profitable terms with it, than to combine with others for its destruction. Things must have been as bad as at Camerino, Fabriano or Rimini before the citizens united to destroy or expel the ruling house. They knew in most cases only too well that this would but mean a change of masters. The star of the republics was certainly on the decline.

一种在随后时代流行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激进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暴君国家里并没有出现。每一个公民都在内心反抗着，但是比起和他人一起努力将其推翻，他们还是倾向于对其做出容忍或有利可图的让步。事态必须像在卡梅里诺，法布里亚诺和里米尼那样严峻，人们才有可能团结起来推翻或者驱逐统治家族。在大多数情形下，他们非常清楚这无非是换了一个主人而已。共和国已然走向衰落。

The Republics: Venice and Florence

共和国：威尼斯与佛罗伦萨

The Italian municipalities had, in earlier days, given signal proof of that force which transforms the city into the state. It remained only that these cities should combine in a great confederation; and this idea was constantly recurring to Italian statesmen, whatever differences of form it might from time to time display. In fact, during the struggles of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great and formidable leagues actually were formed by the cities; and Sismondi [1_13]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time of the final armaments of the Lombard confederation against Barbarossa (from 1168 on) was the moment when a universal Italian league was possible. But the more powerful states had already developed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which made any such scheme impracticable. In their commercial dealings they shrank from no measures, however extreme, which might damage their competitors; they held their weaker neighbors in a condition of helpless dependence—in short, they each fancied they could get on by themselves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the rest, and thus paved the way for future usurpation. The usurper was forthcoming when long conflicts between the nobility and the people, and between the different factions of the nobility, had awakened the desire for a strong government, and when bands of mercenaries ready and willing to sell their aid to the highest bidder had superseded the general levy of the citizens, which party leaders now found unsuited to their purposes. The tyrants destroyed the freedom of most of the cities; here and there they were expelled, but not thoroughly, or only for a short time; and they were always restored, since the inward conditions were favorable to them, and the opposing forces were exhausted.

在早期，意大利的城市就显现出它们有把城市转变成国家的力量。问题只在于应该怎样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大联盟；意大利政治家们常常思索这一问题，尽管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时有不同。实际上，在12、13世纪的斗争之中，强大的联盟已经在城市之间形成；西斯蒙第[2_13] 认为，伦巴族联盟最后武装起来反抗巴尔巴罗萨（从1168年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遍的意大利联盟可能成型之时。但是更加强大的国家已经发展成型，从而使这样的计划难以施行。在商业交易中，它们不惧怕任何严厉的、可能摧毁它们竞争对手的措施；它们使弱小

的邻国处于一种无助依附的状态。简而言之，它们中每一个都认为就算没有其他国家的援助，它们也照样能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发展，从而为将来的夺权埋下了伏笔。当旷日持久的发生在贵族和百姓之间、发生在不同贵族派系之间的冲突激起一个建立强大政府的渴望时，当党派领袖们弃用并不符合要求的征募兵，而选用正准备也愿意为最高出价者提供有偿援助的雇佣兵队伍时，篡夺者就出现了。暴君因破坏了大多数城市的自由而被流放至各地，但这种流放并不长久，往往只持续一小段时间。他们总是能够卷土重来，因为内部的情况对他们有利，而反对他们的势力已经筋疲力尽。

Among the cities which maintained their independence are two of deep significanc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 Florence, the city of incessant movement, which has left us a record of the thoughts and aspirations of each and all who, for three centuries, took part in this movement, and Venice, the city of apparent stagnation and of political secrecy. No contrast can be imagined stronger than that which is offered us by these two, and neither can be compared to anything else which the world has hitherto produced.

在那些保持自身独立的城市当中，有两个城市给人类历史带来了深远影响。一个是佛罗伦萨，这个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城市让我们了解到那些参与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联盟战争中的人的所思所愿。另一个是威尼斯，这个城市看上去停滞不前，但其政治却极富神秘色彩。这两个城市所构成的对比再鲜明不过了，此前世界上的其他城市也不能与这两个城市中的任何一个相媲美。

Venice recognized itself from the first as a strange and mysterious creation—the fruits of a higher power than human

ingenuity. The solemn foundation of the city was the subject of a legend. On 25 March 413, at midday, the emigrants from Padua laid the first stone at the Rialto, that they might have a sacred, inviolable asylum amid the devastations of the barbarians. Later writers attributed to the founders the presentiment of the future greatness of the city; M. Antonio Sabellico, who has celebrated the event in the dignified flow of his hexameters, makes the priest who completes the act of consecration cry to heaven, 'When we hereafter attempt great things, grant us prosperity! Now we kneel before a poor altar; but if our vows are not made in vain, a hundred temples, O God, of gold and marble shall arise to Thee.' The island city at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as the jewel-casket of the world. It is so described by the same Sabellico, with its ancient cupolas, its leaning towers, its inlaid marble facades, its compressed splendor, where the richest decoration did not hinder the practical employment of every corner of space. He takes us to the crowded piazza before San Giacometto at the Rialto, where the business of the world is transacted, not amid shouting and confusion, but with the subdued hum of many voices; where in the porticoes round the square and in those of the adjoining streets sit hundreds of money-changers and goldsmiths, with endless rows of shops and warehouses above their heads. He describes the great Fondaco of the Germans beyond the bridge, where their goods and their dwellings lay, and before which their ships are drawn up side by side in the canal; higher up is a whole fleet laden with wine and oil, and parallel with it, on the shore swarming with porters, are the vaults of the merchants; then from the Rialto to the square of St Mark come the inns and the perfumers' cabinets. So he conducts the reader from one quarter of the city to another till he comes at last to the two hospitals which were among those institutions of public utility nowhere so numerous as at Venice. Care for the people, in peace as well as in war, was characteristic of this government, and

its attention to the wounded, even to those of the enemy, excited the admiration of other states.

威尼斯从一开始就承认自己是个古怪而又神秘的城市——一个比人类创造力还更强大的力量的产物。关于威尼斯的神圣建城史有这么一个传说。413年3月25日中午，帕多瓦人为躲避蛮族人的迫害，转而避往里亚尔托的一个小岛，希望能在那儿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所。后世的作家们认为，先人们在当时已经预感到自己所建的这座城市在将来会是何等地卓尔不凡；安东尼奥·萨贝利科在他庄严的六音步诗歌中，歌颂了这个事件，并让主持献祭礼的牧师对天高喊："我们现在跪在破败的祭坛前，愿主在我们今后要完成伟业时赐予我们繁荣；主啊，如若我们所誓不虚，我们将为您建起上百座黄金大理石神殿。"15世纪末，这座岛城俨然世界上的一个珍宝箱。在萨贝利科的笔下，这里有着年代久远的圆顶塔、斜塔，有着镶嵌大理石的幕墙，有着浓缩的辉煌。富丽堂皇的装饰并没有妨碍每一块隙地的实际利用。他把我们带到里亚尔托的圣吉亚科米多教堂前那个挤满人群的广场上，在那儿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们轻声洽谈着他们的生意，没有喧哗，没有混乱；广场周围和附近街道的门廊前坐着上百个兑换商和金匠，他们前面则是一排排望不到头的店铺和仓库。在他笔下，桥那边是德意志人的货栈，货栈里边有他们的货物和住所。货栈前有条运河，河边并排停泊着他们的船只；再往上是载满美酒香油的一支船队，跟他们的船只平行停泊着。岸边全是搬运工。岸上是商人们的圆顶房屋；从里亚尔托到圣马可广场一路都是旅馆和香料店。作者就这样带着读者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逛，最后他把读者带到两个公立医院前。威尼斯公共设施之多，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不管是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威尼斯政府总是心系百姓。它对伤员甚至是敌军伤员那种无微不至的照料，更是让其他国家肃然起敬。

Public institutions of every kind found in Venice their pattern; the pensioning of retired servants was carried out systematically,

and included a provision for widows and orphans. Wealth, political security and acquaintance with other countries had matured the understanding of such questions. These slender fair-haired men with quiet cautious steps and deliberate speech differed but slightly in costume and bearing from one another; ornaments, especially pearls, were reserved for the women and girls. At that time the general prosperity, notwithstanding the losses sustained from the Turks, was still dazzling; the stores of energy which the city possessed and the prejudice in its favor diffused throughout Europe enabled it at a much later time to survive the heavy blows which were inflicted by the discovery of the sea route to the Indies, by the fall of the Mamelukes in Egypt, and by the war of the League of Cambrai.

任何一种公共机构都可以在威尼斯找到典范；威尼斯有一套系统的针对退休公职人员的养老金制度，其中包括对孤寡的补助政策。威尼斯之所以有一套日臻成熟的养老金制度，跟其发达的经济、稳定的政局和对别国国情的熟谙是分不开的。威尼斯人身材苗条，有着一头金发。他们走路时安静谨慎，说话从容不迫，但在穿着打扮和气质风度上相差不大；妇人和妙龄少女们个个佩戴饰品，她们尤其钟爱珍珠。尽管威尼斯在土耳其人那里蒙受了一些损失，但是大体上它还是非常繁华的；得益于自身贮藏的潜力和整个欧洲对它的偏爱，威尼斯在随后印度洋航道的开辟、埃及的马穆鲁克家族的衰落及康布雷同盟战争的沉重打击下还得以存续。

Sabellico, born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ivoli, and accustomed to the frank loquacity of the scholars of his day, remarks elsewhere with some astonishment that the young nobles who came of a morning to hear his lectures could not be prevailed on to enter into political discussions. 'When I ask them what people think, say and

expect about this or that movement in Italy, they all answer with one voice that they know nothing about the matter.' Still, in spite of the strict imposition of the state, much was to be learned from the more corrupt members of the aristocracy by those who were willing to pay enough for it.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re were traitors among the highest officials; the popes, the Italian princes, and even second-rate *condottieri* in the service of the government had informers in their pay, sometimes with regular salaries; things went so far that the Council of Ten found it prudent to conceal important political news from the Council of the Pregadi, and it was even supposed that Lodovico il Moro had control of a definite number of votes among the latter. Whether the hanging of single offenders and the high rewards—such as a life-pension of sixty ducats paid to those who informed against them—were of much avail, it is hard to decide; one of the chief causes of this evil, the poverty of many of the nobility, could not be removed in a day. In the year 1492 a proposal was urged by two of that order, that the state should annually spend 70,000 ducats for the relief of those poorer nobles who held no public office; the matter was near coming before the Great Council, in which it might have had a majority, when the Council of Ten interfered in time and banished the two proposers for life to Nicosia in Cyprus. About this time a Soranzo was hanged, though not in Venice itself, for sacrilege, and a Contarini put in chains for burglary; another of the same family came in 1499 before the Signoria, and complained that for many years he had been without an office, that he had only sixteen ducats a year and nine children, that his debts amounted to sixty ducats, that he knew no trade and had lately been turned on to the streets. We can understand why some of the wealthier nobles built houses, sometimes whole rows of them, to provide free lodging for their needy comrades. Such works figure in wills among deeds of charity.

生于蒂沃利附近的萨贝利科，和其他同时代的学者一样，喜欢毫不顾忌地高谈阔论。有一次他在某地惊讶地表示，自己竟然说服不了早上来听他演讲的青年贵族们去讨论政治问题。“当我问他们，人们对意大利的某某运动是怎么看的，说了些什么，又有哪些期待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自己对那些事情一无所知。”尽管这个国家有着严格的监管制度，但是只要高价收买，人们还是可以从那些腐败的贵族成员那里打探到不少情报。在15世纪的最后20几年里，最高级的官员中也有一些叛徒；那些教皇们、意大利的君主们，甚至为政府服役的二等雇佣军队长们都有他们雇用的情报员，有时还给他们固定的薪金；后来事态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境地，以至于出于审慎的考虑，十人议会向大议会封锁了一些重要的政治信息，人们甚至认为洛多维科·摩罗在大议会里控制了一定数目的选票。对罪犯处以绞刑和给告发者高额赏金——例如给告发者60达克特的终身养老金，到底收效如何，我们无从决断。这一弊害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些贵族的贫困问题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的。1492年，两个贫穷的贵族提议，国家应该每年拿出7万达克特来救济那些没有公职的贫穷贵族们；这件事情几乎要被提到大议会处，在那里这项提议可能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十人议会及时出面干预，并将这两个提议者永久地驱逐到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个索兰佐家族的人因亵渎圣物而被处以绞刑（虽然不是在威尼斯），而康达利尼家族也有一个人因盗窃罪而被收监；同家族的另一人于1499年到领主宫诉苦，说他多年来都没有官职，有九个孩子要养，但每年却只有16达克特的收入，他的债务已经达到60达克特，他不懂任何谋生之道，近来已经流落街头。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为什么那些较为富有的贵族会建造整列的房子给他们贫苦的同侪们提供免费住宿。这一类工作有时作为一种慈善事业而在遗嘱中提出。

But if the enemies of Venice ever founded serious hopes upon abuses of this kind, they were greatly in error. It might be thought that the commercial activity of the city, which put within reach of the humblest a rich reward for their labor, and the colonies on the

eastern shores of the Mediterranean would have diverted from political affairs the dangerous elements of society. But had not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Genoa, notwithstanding similar advantages, been of the stormiest? The cause of the stability of Venice lies rather in a combination of circumstances which were found in union nowhere else. Unassailable from its position, it had been able from the beginning to treat of foreign affairs with the fullest and calmest reflection and ignore nearly altogether the parties which divided the rest of Italy, to escape the entanglement of permanent alliances, and to set the highest price on those which it thought fit to make. The keynote of the Venetian character was, consequently, a spirit of proud and contemptuous isolation, which, joined to the hatred felt for the city by the other states of Italy, gave rise to a strong sense of solidarity within. The inhabitants meanwhile were united, by the most powerful ties of interest in dealing both with the colonies and with the possessions on the mainland, forcing the population of the latter, that is, of all the towns up to Bergamo, to buy and sell in Venice alone. A power which rested on means so artificial could only be maintained by internal harmony and unity; and this conviction was so widely diffused among the citizens that the conspirator found few elements to work upon. And the discontented, if there were such, were held so far apart by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noble and the burgher that a mutual understanding was not easy. On the other hand, within the ranks of the nobility itself, travel, commercial enterprise and the incessant wars with the Turks saved the wealthy and dangerous from that fruitful source of conspiracies—idleness. In these wars they were spared, often to a criminal extent, by the general in command, and the fall of the city was predicted by a Venetian Cato, if this fear of the nobles 'to give one another pain' should continue at the expense of justice. Nevertheless this free movement in the open air gave the Venetian aristocracy, as a whole, a healthy bias.

但是，威尼斯的敌人们如果把希望全然寄托在这一类的弊端上，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人们可能这样想，这个城市的工商业可以让最粗鄙的人通过劳动获得丰厚的回报，那些位于地中海东海岸的殖民地可能已经把社会上危险分子的注意力从政治事件中转移过来。但是热那亚，尽管也有同样的有利条件，它的政局还不是一样动荡不安？威尼斯之所以政局稳定，是因为多种因素合力推动。而这种合力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威尼斯处于一个不易受到攻击的地理位置，从一开始它就可以对各种外交问题做周密而冷静的考虑，并且几乎全然不必理睬意大利党派纷争、地方分裂的烂摊子。因此，它可以避免卷入永久联盟，并且对于那些它认为适合结成联盟的国家提出最高的要求。因此，威尼斯人的性格中带有一种傲然孤立和蔑视一切的倔强，这种性格和他们所感知到的意大利其他国家的嫉恨糅合在一起，就引起了一种内部团结的强烈意识。威尼斯人无论是在和殖民地还是和意大利大陆有生意往来时，都被最强大的利益纽带维系在一起，这便迫使北至贝加莫的所有意大利城镇居民都不得不只能在威尼斯进行买卖。威尼斯这种依赖人为手段的强国，只能靠内部和谐团结来维持，威尼斯人深谙这一点，因而那些阴谋者根本找不到几个他们可以煽动的不安定分子。即使有持不满意见的人，他们也会被贵族和市民区别对待而被远远地隔离开，从而使这些人很难互相理解。另一方面，旅行、商贸和对土耳其的持续作战也铲除了在贵族内部的富人群体及危险分子当中滋生阴谋诡计的温床——无所事事。战争中，他们就算犯了罪也能得到统帅将军的宽恕。威尼斯人卡托曾预言，如果那些贵族仍然因害怕“互相折磨”而不惜践踏正义，那么这座城市终将走向灭亡。尽管如此，在这种公开的自由运动的影响下，威尼斯贵族阶层大体呈现出健康的发展态势。

And when envy and ambition called for satisfaction an official victim was forthcoming, and legal means and authorities were ready. The moral torture, which for years the Doge Francesco Foscari (d. 1457) suffered before the eyes of all Venice, is a frightful

example of a vengeance possible only in an aristocracy. [1_14] The Council of Ten, which had a hand in everything, which disposed without appeal of life and death, of financial affairs and military appointments, which included the Inquisitors among its number, and which overthrew Foscari, as it had overthrown so many powerful men before—this council was yearly chosen afresh from the whole governing body, the Gran Consiglio, and was consequently the most direct expression of its will. It is not probable that serious intrigues occurred at these elections, as the short duration of the office and the accountability which followed rendered it an object of no great desire. But violent and mysterious as the proceedings of this and other authorities might be, the genuine Venetian courted rather than fled their sentence, not only because the republic had long arms, and if it could not catch him might punish his family, but because in most cases it acted from rational motives and not from a thirst for blood. No state, indeed, has ever exercised a greater moral influence over its subjects, whether abroad or at home. If traitors were to be found among the Pregadi, there was ample compensation for this in the fact that every Venetian away from home was a born spy for his government. It was a matter of course that the Venetian cardinals at Rome sent home news of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secret papal consistories. The Cardinal Domenico Grimani had the dispatches intercept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Rome (1500) which Ascanio Sforza was sending to his brother Lodovico il Moro, and forwarded them to Venice; his father, then exposed to a serious accusation, claimed public credit for this service of his son before the Gran Consiglio; in other words, before all the world.

在嫉妒和野心的驱使下，公职人员中出现了牺牲者，法律手段和有关当局已准备就绪。多年来，总督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卒于

1457年）就在所有意大利人的眼前饱受道德拷问。这一可怕的报复案例也只有在贵族政治下才有可能出现。十人议会可以插手所有事情，拥有判决生死、处理财政事务和军事任命的最终权限。[2_14] 十人议会设有多名检察官。十人议会像它以前推翻很多权贵一样推翻了福斯卡里总督。十人议会每年由大议会（威尼斯管理机构）选举产生，是大议会意愿的最直接表现。因为它任期短，在换届选举中不大可能出现严重的密谋事件，而成员卸任后的随带责任也使得人们对其不愿觊觎。虽然十人议会和其他政府机关行动激进叵测，但威尼斯人宁可求得它们的审判而不是加以逃避。究其原因，不仅由于威尼斯共和国势力范围之广，就算没抓到罪犯也可以惩罚其家人，也由于在很多情况下判罪本身出于合理的动机而非肆意的杀人流血。的确，在对民众施行道德权威这一方面，不论国内还是国外民众，没有一个国家能跟威尼斯较量。即使在参议院中发现叛徒也可以有一种相当的补救方式，因为每一个在国外的威尼斯人就是为其政府而生的间谍。在罗马的威尼斯红衣主教把红衣主教秘密会议的活动消息传回国内，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红衣主教多米尼克·格里玛尼曾在罗马附近将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寄给他哥哥洛多维科·摩罗的急件截了下来，转送至威尼斯；而他父亲，因在大议会面前，换句话说，在全世界面前为他儿子替威尼斯做出的贡献公开邀功，而受到严厉的谴责。

The conduct of the Venetian government to the *condottieri* in its pay has been spoken of already. The only further guarantee of their fidelity which could be obtained lay in their great number, by which treachery was made as difficult as its discovery was easy. In looking at the Venetian army list, one is only surprised that among forces of such miscellaneous composition any common action was possible. In the catalogue for the campaign of 1495 we find 15,526 horsemen, broken up into a number of small divisions. Gonzaga of Mantua alone had as many as 1,200, and Gioffredo Borgia 740; then follow six officers with a contingent of 600 to 700, ten with 400, twelve with 400 to 200, fourteen or thereabouts with 200 to

100, nine with 80, six with 50 to 60, and so forth. These forces were partly composed of old Venetian troops, partly of veterans led by Venetian city or country nobles; the majority of the leaders were, however, princes and rulers of cities or their relatives. To these forces must be added 24,000 infantry—we are not told how they were raised or commanded—with 3,300 additional troops, who probably belonged to the special services. In time of peace the cities of the mainland were wholly unprotected or occupied by insignificant garrisons. Venice relied, if not exactly on the loyalty, at least on the good sense of its subjects; in the war of the League of Cambrai (1509) it absolved them, as is well known, from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and let them compare the amenities of a foreign occupation with the mild government to which they had been accustomed. As there had been no treason in their desertion of St Mark, and consequently no punishment was to be feared, they returned to their old masters with the utmost eagerness. This war, we may remark parenthetically, was the result of a century's outcry against the Venetian desire for aggrandizement. The Venetians, in fact, were not free from the mistake of those over-clever people who will credit their opponents with no irrational and inconsiderate conduct. Misled by this optimism, which is, perhaps, a peculiar weakness of aristocracies, they had utterly ignored not only the preparations of Muhammad II for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but even the armaments of Charles VIII, till the unexpected blow fell at last. The League of Cambrai was an event of the same character, in so far as it was clearly opposed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two chief members, Louis XII and Julius II. The hatred of all Italy against the victorious city seemed to be concentrated in the mind of the pope, and to have blinded him to the evils of 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as to the policy of Cardinal d'Amboise and his king, Venice ought long before to have recognized it as a piece of malicious imbecility, and to have been thoroughly on its guar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League took part in it from that envy which may be a salutary corrective to great wealth and power, but which in itself is a beggarly sentiment. Venice came out of the conflict with honor, but not without lasting damage.

我们在上文提到过威尼斯政府对其所雇用的雇佣军的管理。威尼斯政府要想雇佣军更加忠诚地效命于它，就必须依赖其庞大的军队人数。由于数量庞大，雇佣军的叛变有多容易被人发现，叛变就有多难以实现。要是去翻翻威尼斯军队名册，人们会惊讶于在一个如此庞杂的军队编制下如何有效开展共同军事行动。在1495年之役的编制表中，我们可以看到15,526名骑兵被分成若干小队。曼图亚的贡扎加手下的骑兵就多达1,200名，乔福里多·波吉亚带领740名骑兵；此外，6个分遣队长各带领600到700名骑兵，10个分遣队长各带领400名骑兵，12个分遣队长各带领200到400名骑兵，14个左右的分遣队长各带领100到200名骑兵，9个分遣队长各有80名骑兵，6个分遣队长各有50到60名骑兵。这些军队一部分是由先前的威尼斯军队组成，一部分是由威尼斯城乡贵族所领导的老战士所组成；但是，指挥官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各城市君主、城市统治者抑或是他们的亲属。此外，还有24,000名步兵（关于步兵的征募和统一调度我们无从得知）和由3,300名士兵组成的特种部队。在和平时期，本土各城市没有军队驻守，或只派少量军队驻守。如果威尼斯并不全然依靠于市民的忠诚，那么它至少是建立在市民的良知之上的；在康布雷同盟战争（1509）中，众所周知，威尼斯免除了其市民宣誓效忠的义务，还让其市民对威尼斯被外国占领后的统治和他们早已习惯的温和统治做一番对比。由于背弃圣马可并不算作叛国，他们就不必担心任何惩罚，于是他们都迫切地回到了自己的旧主身边。顺带说一句，康布雷同盟战争是为了遏制威尼斯长达一个世纪的扩张野心。事实上，威尼斯人也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觉得自己的对手不会有不合理或者轻率之举。在乐观主义这一贵族统治弱点的误导下，威尼斯不但完全忽略了穆罕默德二世为占领君士坦丁堡所做的准备，也忽略了查尔斯八世的军备活动，直到最后，敌军的攻击令其猝不及防。从康布雷同盟的利益完全与其

主要的两个成员，路易十二和教皇朱利叶斯二世背道而驰来看，该联盟性质同上。教皇的脑子里似乎集中着全意大利对威尼斯这座胜利之城的嫉恨，根本看不到外国人干涉威尼斯所带来的弊害；至于法国阿姆布阿斯红衣主教及其国王的政策，威尼斯老早就该觉察到它的愚蠢敌意而作好充分戒备。其他成员参与这个联盟是出于妒忌，这种妒忌心理可能是对财富和权力的一种有益匡正，但究其本身却只是一种卑鄙的情感。威尼斯虽然光荣地从这场战争中走了出来，但也遭受了持续性伤害。

A power, whose foundations were so complicated, whose activity and interests filled so wide a stage, cannot be imagined without a systematic oversight of the whole, without a regular estimate of means and burdens, of profits and losses. Venice can fairly make good its claim to be the birthplace of statistical science, together, perhaps, with Florence, and followed by the more enlightened despotisms. The feudal state of the Middle Ages knew of nothing more than catalogues of signorial rights and possessions (*urbaria*);it looked on production as a fixed quantity, which it approximately is, so long as we have to do with landed property only. The towns,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out the West must from very early times have treated production, which with them depended on industry and commerce, as exceedingly variable; but, even in the most flourishing times of the Hanseatic League, they never got beyond a simple commercial balance-sheet. Fleets, armies, political power and influence fall under the debit and credit of a trader's ledger. In the Italian states a clear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he pattern of Muhammad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ong and active exercise of trade and commerce combined to produce for the first time a true science of statistics. [1_15] The absolute monarchy of Frederick II in Lower Italy was organized with the sole object of securing a concentrated power for the death-

struggle in which he was engaged. In Venice, on the contrary, the supreme objects were the enjoyment of life and power, the increase of inherited advantages, the creation of the most lucrative forms of industry, and the opening of new channels for commerce.

一个构成要素复杂，领土及利益范围广阔的强国，如果没有一套系统全面的监督方案，如果没有对资产和负债、利润和损失作定期估算，那它将会是一团糟。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同是统计科学的诞生地，且为其他比较开明的专政国家所效仿。中世纪的封建国家除了领主的权利和财产的编目外，对其他知之甚少；它把生产看作定量，但实际上只有生产涉及土地时，情况才大体是那样的。另一方面，西方城镇很早以前就把生产看作变量，因为其生产完全依赖于工商业；但是，即使是在汉萨同盟最繁荣的时期，他们的商业行为也无非是一张简单的资产负债表。舰队、军队、政治力量和影响都收录于商业总账的借贷双方。在意大利国家中，一种清晰的政治意识、穆罕默德式的行政管理方式以及长期积极的商贸活动一起第一次促进了真正的统计科学的诞生。 [2_15] 意大利南部腓特烈二世的专制独裁的唯一目的就是在自己所卷入的殊死斗争中实现权力集中。相反，威尼斯统治者的最高目标是享受生活，拥有至上权力，扩大既有优势，创造最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及开拓新的商业途径。

The writers of the time speak of these things with the greatest freedom. We learn that the population of the city amounted in the year 1422 to 190,000 souls; the Italians were, perhaps, the first to reckon, not according to hearths, or men able to bear arms, or people able to walk, and so forth, but according to *animæ,* and thus to get the most neutral basis for further calculation. About this time, when the Florentines wished to form an alliance with Venice against Filippo Maria Visconti, they were for the moment refused, in the belief, resting on accurate commercial returns, that a war

between Venice and Milan, that is, between seller and buyer, was foolish. Even if the duke simply increased his army, the Milanese, through the heavier taxation they must pay, would become worse customers. 'Better let the Florentines be defeated, and then, used as they are to the life of a free city, they will settle with us and bring their silk and woollen industry with them, as the Lucchese did in their distress.' The speech of the dying Doge Mocenigo (1423) to a few of the senators whom he had sent for to his bedside is still more remarkable. It contains the chief elements of a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whole resources of Venice. I cannot say whether or where a thorough elucidation of this perplexing document exists; by way of illustration, the following facts may be quoted. After repaying a war-loan of four million ducats, the public debt (*il monte*)still amounted to six million ducats; the current trade reached (so it seems) ten million, which yielded, the text informs us, a profit of four million. The 3,000 *navigli,* the 300 *navi,* and the 45 galleys were manned respectively by 17,000, 8,000 and 11,000 seamen (more than 200 for each galley). To these must be added 16,000 shipwrights. The houses in Venice were valued at seven million, and brought in a rent of half a million. [1_16] There were 1,000 nobles whose income ranged from 70 to 4,000 ducats. In another passage the ordinary income of the state in that same year is put at 1,100,000 ducats; through the disturbance of trade caused by the wars it sank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century to 800,000 ducats.

当时的作家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这些话题。我们了解到在1422年威尼斯人口达到了十九万；不同于别国按炉灶、能拿起武器的臣民或能走路的人的数量来统计人口，意大利也许是第一个按照“生命体”个数来统计人口的国家，因而为进一步的统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约在那时，当佛罗伦萨人提出想和威尼斯人结成同盟以对抗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时，却被威尼斯人给当场回绝了；威尼斯从商业

回报这一角度分析，认为一场发生在威尼斯和米兰，及卖家和买家之间的战争是相当愚蠢的。即使米兰公爵仅仅是扩充他的军队，米兰人也会因他们必须缴纳较重的捐税而变成不受欢迎的消费者。“最好让佛罗伦萨人吃个败仗，这样，由于他们习惯了自由城市的生活，就会像卢瑟卡人在他们贫困时一样，带着他们的丝绸品和毛织品来跟我们协商。”莫塞尼戈总督临终前（1423年）把大臣们传唤至自己的病榻前交代了些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威尼斯几个主要财政来源的账目。我不能保证是否有或在某个地方能找到关于这个复杂公文的详尽说明文件；接下来我们通过举例来看看这些账目。在偿还了400万达克特战债后，国家公债（总额）仍高达600万达克特；贸易额（大概是这样）为1,000万达克特。也就是说可以获益400万达克特（从文中获知）。小船3,000只，大船300艘，战舰45艘，分别配有海员17,000名、8,000名和11,000名（≥200人／战舰）。此外，还有造船工16,000人。威尼斯的房子大约估价在700万达克特，可以赚到50万的租金。 [2_16] 贵族1,000人，收入在70到4,000达克特不等。另一段记载着威尼斯那一年的普通收入为110万达克特；但是在战争引起的贸易不稳定的情况下，威尼斯在15世纪中叶的普通收入降至80万达克特。

If Venice, by this spirit of calculation, and by the practical turn which she gave it, was the first fully to represent one important side of modern political life, in that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which Italy then prized most highly she did not stand in the front rank. The literary impulse, in general, was here wanting, and especially that enthusiasm for classical antiquity which prevailed elsewhere. [1_17] The aptitude of the Venetians, says Sabellico, for philosophy and eloquence was in itself not less remarkable than for commerce and politics. George of Trebizond, who, in 1459, laid the Latin translation of Plato's *Laws* at the feet of the doge, was appointed professor of philology with a yearly salary of 150 ducats, and finally dedicated his *Rhetoric* to the Signoria. If, however, we look through

the history of Venetian literature which Francesco Sansovino has appended to his well-known book, we shall find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lmost nothing but history, and special works on theology, jurisprudence and medicine; 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ill we come to Ermolao Barbaro and Aldo Manucci, humanistic culture is, for a city of such importance, most scantily represented. The library which Cardinal Bessarion bequeathed to the state (1468) narrowly escaped dispersion and destruction. Learning was certainly cultiva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Padua, where, however, the physicians and the jurists—the latter as the authors of legal opinions—received by far the highest pay. The share of Venice in the poetical creations of the country was long insignificant, til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her deficiencies were made good. Eve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was imported into the city from without, and it was not before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at she learned to move in this field with independent freedom and strength. But we find more striking instances still of intellectual backwardness. This government, which had the clergy so thoroughly in its control, which reserved to itself the appointment to all important ecclesiastical offices, and which, one time after another, dared to defy the court of Rome, displayed an official piety of a most singular kind. The bodies of saints and other relics imported from Greece after the Turkish conquest were bought at the greatest sacrifices and received by the doge in solemn procession. For the coat without a seam it was decided (1455) to offer 10,000 ducats, but it was not to be had. These measures were not the fruit of any popular excitement, but of the tranquil resolutions of the heads of the government, and might have been omitted without attracting any comment, and at Florence,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would certainly have been omitted. We shall say nothing of the piety of the masses, and of their firm belief in the indulgences of an Alexander VI. But the state itself, after absorbing

the Church to a degree unknown elsewhere, had in truth a certain ecclesiastical element in its composition, and the doge, the symbol of the state, appeared in twelve great processions (*andate*)in a half-clerical character. They were almost all festivals in memory of political events, and competed in splendor with the great feasts of the Church; the most brilliant of all, the famous marriage with the sea, fell on Ascension Day.

威尼斯在近代政治的统计科学及其实际应用这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然而在其最看重的文化方面，意大利却仍然落后于别国。总的来说，意大利在文化尤其是普遍流行于其他地方的古典文化这一块是相当欠缺的。 [2_17] 萨贝利科说，威尼斯人在哲学和修辞学方面的天资并不比他们在商业和政治上的要逊色多少。来自特拉比松的乔治曾在1459年把柏拉图《法律篇》的拉丁文译本亲自献给总督，并被任命为哲学教授，其年薪为150达克特。在其弥留之际又将自己的《修辞学》献给了元老院。但是，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弗朗西斯科·圣索维诺名作后面的附录——威尼斯文学史，就会发现在14世纪，除了历史、神学、法律和医学方面的著作外，很难找到其他方面的书籍；在15世纪，当埃尔莫劳·巴尔巴罗和奥尔多·曼努奇等人文主义者还未出现时，在威尼斯这个有着如此重要地位的城市几乎还是找不到几本人文主义著作。红衣主教贝萨里翁（1468年）遗赠予威尼斯的那些藏书差点儿被毁。帕多瓦大学相当重视人文学科的发展，但在那儿，还属医学院及法学院老师（法律著作家）的工资最高。威尼斯在诗歌创作上一直毫无作为，直到16世纪初这种现象才有所缓和。即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也都得从外部引进。直到15世纪末，威尼斯才以一种独创的自由精神和力量开始活跃于艺术创作领域。但我们还能找到更惊人的例子说明威尼斯在思想意识方面落后于其他城市。政府虽然完全控制着神职人员，独揽所有重要教职的任命权，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罗马教廷的权威，但对教廷却表现出一种极为独特的虔诚态度。在希腊被土耳其攻占后，威尼斯不惜一切代价从希腊买来圣徒遗体和其他遗物，并由总督以盛大的仪式列队恭迎。威尼斯（1455年）曾出价

10,000达克特意欲购买一件无缝僧袍，却没有得手。以上种种并不是由民意所驱使，而是政府冷静思考后才做出的决议，政府就是不这样做也不会引来批评；在类似情形下，佛罗伦萨就肯定不会采取这些措施。我们将不会谈及百姓的虔敬行为及其对亚历山大六世赎罪券的坚定信仰。威尼斯在与教会融合到其他地方未之前闻的程度后，其国家结构就带有一种宗教色彩；作为国家代表的总督十二次出现在重大的半宗教性质的游行仪式上。它们几乎全是纪念政治事件的庆典，并在恢弘程度上可以和教堂的盛典相媲美；其中最盛大的一个——著名的“海的婚礼”，会在耶稣升天节那天举行。

The most elevated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most varied forms of human development are found united in the history of Florence, which in this sense deserves the name of the first modern state in the world. Here the whole people are busied with what in the despotic cities is the affair of a single family. That wondrous Florentine spirit, at once keenly critical and artistically creative, was incessantly transforming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 of the state, and as incessantly describing and judging the change. Florence thus became the home of political doctrines and theories, of experiments and sudden changes, but also, like Venice, the home of statistical science, and alone and above all other states in the world, the home of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modern sense of the phrase. The spectacle of ancient Rome and a familiarity with its leading writers were not without influence; Giovanni Villani confesses that he received the first impulse to his great work at the jubilee of the year 1300, and began it immediately on his return home. Yet how many among the 200,000 pilgrims of that year may have been like him in gifts and tendencies and still did not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ir native cities! For not all of them could encourage themselves with the thought, 'Rome is sinking; my native city is rising, and ready to achieve great things, and therefore I wish to

relate its past history, and hope to continue the story to the present time, and as long as my life shall last.' And besides the witness to its past, Florence obtained through its historians something further—a greater fame than fell to the lot of any other city of Italy.

佛罗伦萨历史上出现过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最变化多端的发展模式，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佛罗伦萨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现代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全国人忙于在那些专制城市由单个家族经手的事件。曾经具有批判性和艺术创造性的美妙的佛罗伦萨精神，不断地改变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面貌，并不断地对这种改变作出评述和批判。佛罗伦萨因此成了政治学说和理论的发源地，成了实验和变革的发源地，但也像威尼斯一样成了统计科学的发源地，并且举世无双地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代表的发源地。佛罗伦萨对古罗马的憧憬和对其主要作家的了解绝非对其以上美名的获得没有影响；乔瓦尼·维拉尼承认他从1300年罗马城纪念活动中获得灵感，回国后便立刻开始写作。那一年在二十万朝圣者中有多少人和他有同样的才能和向往啊，但又有多少人写出了他们家乡的历史？并不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种想法来鼓舞自己："罗马正在走向衰落，而我的家乡正在崛起，我的家乡将要完成伟业。只要我一息尚存，我要把家乡的过去和现在都叙述出来。"除了通过历史学家见证历史外，佛罗伦萨还收获了意大利其他任何城市所未曾有的盛誉。

Our present task is not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this remarkable state, but merely to give a few indic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for which the Florentines were indebted to this history.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不是要书写这座伟大城市的历史，而是指出佛罗伦萨的思想自由和独立，而这也是佛罗伦萨人感激这段历史的原

因。

In no other city of Italy were the struggles of political parties so bitter, of such early origin, and so permanent. The descriptions of them, which belong, it is true, to a somewhat later period, give clear evidence of the superiority of Florentine criticism.

在意大利，没有一个城市的党派之争像佛罗伦萨那样激烈，发端之早，持续时间之久。关于这些党派之争的叙述固为时较晚，但很清楚地证明了佛罗伦萨批判主义的优越性。

And what a politician is the great victim of these crises, Dante Alighieri, matured alike by home and by exile! He uttered his scorn of the incessant changes and experiment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his native city in verses of adamant, which will remain proverbial so long as political events of the same kind recur; he addressed his home in words of defiance and yearning which must have stirred the hearts of his countrymen. But his thoughts ranged over Italy and the whole world; and if his passion for the Empire, as he conceived it, was no more than an illusion, it must yet be admitted that the youthful dreams of a newborn political speculation are in his case not without a poetical grandeur. He is proud to be the first who had trod this path, certainly in the footsteps of Aristotle, but in his own way independently. His ideal emperor is a just and humane judge, dependent on God only, the heir of the universal sway of Rome to which belonged the sanction of nature, of right and of the will of God. The conquest of the world was, according to this view, rightful, resting on a divine judgement between Rome and the other nations of the earth, and God gave his approval to this Empire,

since under it he became Man, submitting at his birth to the census of the Emperor Augustus, and at his death to the judgement of Pontius Pilate. We may find it hard to appreciate these and other arguments of the same kind, but Dante's passion never fails to carry us with him. In his letters he appears as one of the earliest publicists, and is perhaps the first layman to publish political tracts in this form. He began early. Soon after the death of Beatrice he addressed a pamphlet on the state of Florence 'to the Great ones of the Earth', and the public utterances of his later years, dating from the time of his banishment, are all directed to emperors, princes and cardinals. In these letters and in his book *De Vulgari Eloquio* the feeling, bought with such bitter pains, is constantly recurring that the exile may find elsewhere than in his native place an intellectual home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which cannot be taken from him. On this point we shall have more to say in the sequel.

这些斗争中的一个最大牺牲者，在家乡和流放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但丁·阿利吉耶里无疑配得上政治家这个称号。他通过诗歌坚定地表达了他对于故乡政治上的不断变革和实验的嘲讽，只要同类政治事件重现，这些诗歌就将永远为人们所传诵；他以一种蔑视和可以激起他同胞的渴望的口吻论述自己的家乡。但是他的思想却远及于意大利和全世界；如果说他对于帝国所怀抱的一腔热情不过是一种幻影，我们还是必须得承认像他那种新生的政治理想的青春幻梦一定具有诗意般的伟大。他是第一个按照这种构思实践的人，当然仿效学习亚里士多德，但却独立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着，但丁对此而感到骄傲。他构思中的理想君主是一个正义仁慈的法官，仅仅依附于上帝，是自然、正义和上帝意志所批准的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按照这种看法，征服世界是合理的，是建立在神对罗马帝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裁判上的，而上帝认可这个帝国，因为在其统治下，他降生为人，并将自己交由奥古斯都大帝进行人口审查，在他垂死之际把自己交由庞提乌斯·彼拉多审判。我们认为很难去赏识这些以及另外一些同类的争论，但

是但丁以其热情说服了我们。在他的书信中，他是最早一批以政论家身份出现的人，并且可能也是第一个以这种形式出版政治小册子的门外汉。他很早开始着手。在贝亚特里切死后不久，他写了一本关于佛罗伦萨国家的小册子《致世界上那些伟大的国家》，并且从他流放开始随后一些年里的，他的公共言论都是和帝王、国王和红衣主教有关。在这些书信和他的著作《俗语论》中，经常萦回着一种巨大痛苦所换来的感情，使这个流放者意识到他可以在他家乡以外的地方找到一个语言和文化的精神家园，且无法被夺走。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详述。

To the two Villani, Giovanni as well as Matteo, we owe not so much deep political reflection as fresh and practical observations, together with the elements of Florentine statistics and important notices of other states. Here too trade and commerce had given the impulse to economical as well as political science.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was such accurate information to be had on financial affairs. The wealth of the papal court at Avignon, which at the death of John XXII amounted to 25 million gold florins, would be incredible on any less trustworthy authority. Here only, at Florence, do we meet with colossal loans like that which the King of England contracted from the Florentine houses of Bardi and Peruzzi, who lost to His Majesty the sum of 1,365,000 gold florins (1338)—their own money and that of their partners—and nevertheless recovered from the shock. [1_18] Most important facts are here recorded as to the condition of Florence at this time: [1_19] the public income (over 300,000 gold florins) and expenditure; the population of the city, here only roughly estimated, according to the consumption of bread, in *bocche,* i.e. mouths, put at 90,000, and the population of the whole territory; the excess of 300 to 500 male children among the 5,800 to 6,000 annually baptized; the schoolchildren, of whom 8,000 to 10,000 learned reading, 1,000 to 1,200 in six schools

arithmetic; and besides these, 600 scholars who were taught Latin grammar and logic in four schools. Then follow the statistics of the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of the hospitals, which held more than a thousand beds; of the wool-trade, with its most valuable details; of the mint, the provisioning of the city, the public officials, and so on. Incidentally we learn many curious facts; how, for instance, when the public funds (*monte*)were first established, in the year 1353, the Franciscans spoke from the pulpit in favor of the measure, the Dominicans and Augustinians against it. The economical results of the black death were and could be observed and described nowhere else in all Europe as in this city. Only a Florentine could have left it on record how it was expected that the scanty population would have made everything cheap, and how instead of that labor and commodities doubled in price; how the common people at first would do no work at all, but simply gave themselves up to enjoyment; how in the city itself servants and maids were not to be had except at extravagant wages; how the peasants would only till the best lands, and left the rest uncultivated; and how the enormous legacies bequeathed to the poor at the time of the plague seemed afterwards useless, since the poor had either died or had ceased to be poor. Lastly, on the occasion of a great bequest, by which a childless philanthropist left six *danari* to every beggar in the city, the attempt is made to give a comprehensive statistical account of Florentine mendicancy.

对于维拉尼、乔瓦尼以及马泰奥，他们在新鲜事物以及实践方面的观察，以及关于佛罗伦萨的统计资料和对其他国家的重要评论比那些政治反思更值得我们感激。在这里，工商业推动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发展。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这样准确的财政报告。阿维尼翁教皇教廷的财富在约翰二十二世死时达到2,500万金弗罗林，这在任何相对不受信任的政权那儿都是难以置信的。只有在佛罗伦

萨，我们才能看到像英格兰国王从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家族和佩鲁齐家族那里借到的那样巨额的款项；这两个家族在英格兰国王身上损失了1,365,000金弗罗林（1338年）——这些钱是他们自己及其合伙人的——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从损失中[2_18]恢复了过来。笔者对佛罗伦萨这一时期的重要情况作了详细记录[2_19]：国家收入（30万金弗罗林以上）和支出，按照面包消费量计算出来的整个国家的人口数（按照口粮算大约有9万人）；在每年受洗的5,800到6,000人中，男孩比女孩多300到500人；8,000到10,000名学童学习诵读，有1,000到1,200人在6所学校里学算数；除此之外，有600名学生在4所学校里学习拉丁文法和逻辑。随后是有关教堂和修道院的统计数据；以及医院的统计数据，医院里有1,000多张床位；毛织工业的统计数据，其详细资料最具价值；还有关于铸币、城市粮食供应、公务人员等统计数据。我们也偶然得知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比如说，在1353年，当第一次确定发行公债时，方济会在教坛上赞成发行公债，而多明我会士和奥斯定会士则反对发行公债。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地方像佛罗伦萨这样对黑死病所引发的经济后果做过观察和叙述。只有佛罗伦萨人才能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人们期待可以通过人口减少降低物价；这种想法不但没能实现，劳务和商品价格反而涨了一倍；普通百姓一开始不愿意工作而耽溺于享乐；在佛罗伦萨只有出很高的工资才能找到男女仆人；农民们只会耕种良田而任由其余土地荒废；瘟疫肆虐时赠予穷人的一笔巨大财产随后看来毫无用处，因为穷人们要么死亡，要么已经不再是穷人。最后，人们利用一个无子嗣的慈善家给佛罗伦萨每个乞丐六个“达那利”的巨大遗赠的机会，曾试图对佛罗伦萨的乞丐情况做一个全面的数据统计。

This statistical view of things was at a later time still more highly cultivated at Florence. The noteworthy point about it is that, as a rule, we can perceive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higher aspects of history, with art, and with culture in general. An inventory of the year 1422 mentions,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same document, the seventy-two exchange offices which surrounded the Mercato Nuovo;

the amount of coined money in circulation (2 million golden florins); the then new industry of gold spinning; the silk wares; Filippo Brunellesco, then busy in digging classical architecture from its grave; and Leonardo Aretino, secretary of the republic, at work at the revival of ancient literature and eloquence; lastly, it speaks of the general prosperity of the city, then free from political conflicts, and of the good fortune of Italy, which had rid itself of foreign mercenaries. The Venetian statistics quoted above, which date from about the same year, certainly give evidence of larger property and profits and of a more extensive scene of action; Venice had long been mistress of the seas before Florence sent out its first galleys (1422) to Alexandria. But no reader can fail to recognize the higher spirit of the Florentine documents. These and similar lists recur at intervals of ten years, systematically arranged and tabulated, while elsewhere we find at best occasional notices. We can form an approximate estimate of the property and the business of the first Medici; they paid for charities, public buildings and taxes from 1434 to 1471 no less than 663,755 gold florins, of which more than 400,000 fell on Cosimo alone, and Lorenzo il Magnifico was delighted that the money had been so well spent. [1_20] In 1478 we have again a most important and in its way complete view of the commerce and trades of this city, some of which may be wholly or partly reckoned among the fine arts—such as those which had to do with damasks and gold or silver embroidery, with woodcarving and intarsia, with the sculpture of arabesques in marble and sandstone, with portraits in wax, and with jewellery and work in gold. The inborn talent of the Florentines for the systematization of outward life is shown by their books on agriculture, business and domestic economy, which are markedly superior to those of other European peopl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t has been rightly decided to publish selections of these works, although no little study will be needed to extract clear and definite results from them. At all events,

we have no difficulty in recognizing the city, where dying parents begged the government in their wills to fine their sons 1,000 florins if they declined to practice a regular profession.

以一种统计的眼光去对待事物的做法随后在佛罗伦萨得到进一步发展。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可以发现它与更高层面上的历史、艺术和一般文化之间的联系。同一部著作中，我们发现一个1422年的存货清单提到“新市场”周围有72处交换所；在市面上流通的铸币数量为200万金弗罗林；那时金织工业为新兴工业；菲利波·布鲁内来斯科当时忙于从坟墓中挖掘古代建筑；而共和国大臣列奥纳多·阿雷蒂诺则致力于复兴古代文学和修辞学的工作；最后，它谈及了佛罗伦萨当时不受政治斗争影响的普遍繁荣以及意大利将自己从外国雇佣兵关系中脱离开来的不错运气。上述威尼斯大约于同年开始统计的数据资料证明了它有更多的财产和利润以及更为广阔的领土范围。当佛罗伦萨将自己的第一支舰队（1422年）派向亚历山大港时，威尼斯已经在海上称霸多年。但所有读者都不得不承认：佛罗伦萨所做的统计数据更有水平。佛罗伦萨每隔十年会对这些及其类似统计数据做系统的整理和列表，相比之下，其他地方顶多只是偶尔介绍一下而已。我们对位列第一的美第奇家族的财产和营业额做了一个估算：从1434年到1471年，他们在慈善、公共建筑和税收方面的花费不少于663,755金弗罗林，其中有超过40万由科西莫一人承担，并且伟大的洛伦佐乐于正当地用掉这些财产。 [2_20] 在1478年，我们再一次比较全面地窥探到了这座城市的支柱产业——商业和贸易产业方面的资料——比如那些和锦缎以及金银刺绣、木雕以及嵌花、用大理石以及砂石雕刻而成的蔓藤花纹、蜡像、珠宝以及金子制成的艺术作品。佛罗伦萨人把外部生活系统化的天赋才能表现在他们的农业、商业和家政方面的著作上，在这些方面他们显然是优于15世纪期间欧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尽管不需要任何研究就可以从这些书籍中得到一些清晰和明确的结果，但是人们还是明智地决定出版这些著作的选集。无论如何，我们是不难了解这座城市的。因为在佛罗伦萨，父母在弥留之际往往在遗嘱中请求政府，如果他们的儿子不务正业，就罚款1,000金弗罗林。

For the first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probably no state in the world possesses a document like the magnificent description of Florence by Varchi. In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s in so many things besides, yet another model is left to us, before the freedom and greatness of the city sank into the grave.[1]

在16世纪上半叶，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有像瓦尔奇描写佛罗伦萨那样的恢弘之作。在这座城市的自由和伟大归于沉寂之前，它在描述统计学上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给我们留下了另一种典范。[1]

1: In respect of prices and of wealth in Italy, I am only able, in default of further means of investigation, to bring together some scattered facts, which I have picked up here and there. Obvious exaggerations must be put aside. The gold coins which are worth referring to are the ducat, the sequin, the forino d'oro and the scudo d'oro. The value of all is nearly the same, 11 to 12 francs of our money [i.e. Swiss francs of the 1860s]. In Venice, for example, the Doge Andrea Vendramin (1476) with 170,000 ducats passed for an exceedingly rich man. About 1460 the Patriarch of Aquileia, Lodovico Patavino, with 200,000 ducats, was called 'perhaps the richest of all Italians'. Antonio Grimani paid 30,000 ducats for his son's election as cardinal. His ready money alone was put at 100,000 ducats ... In 1522 it is no longer

Venice, but Genoa, next to Rome, which ranks as the richest city in Italy... Bandello (Novelle 34 and 42) names as the richest Genoese merchant of his time Ansaldo Grimaldi. Between 1400 and 1580 Francesco Sansovino assumes a depreciation of 50 per cent in the value of money ... At Ferrara there were people at the time of Duke Borso with 50 to 60,000 ducats. In Florence the data are exceptional and do not justify a conclusion as to averages. Of this kind are the loans to foreign princes, in which the names of only one or two houses appear, but which were in fact the work of great companies. So too the enormous fines levied on defeated parties; we read that from 1430 to 1453 seventy-seven families paid 4,875,000 gold florins. The fortune of Giovanni Medici amounted at his death (1428) to 179,221 gold florins, but of his two sons, Cosimo and Lorenzo, Lorenzo alone left at his death (1440) as much as 235,137. It is proof of the general activity of trade that the forty-four goldsmiths on the Ponte Vecchio paid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 rent of 800 florins to the government. The diary of Buonaccorso Pitti [English translation in G. Brucker, ed., Two Memoirs of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York, 1967] is full of figures, which, however, only prove in general the high price of commodities and the low value of money. For Rome, the income of the Curia, which was derived from all Europe, gives us no criterion; nor are statements about papal treasures and the fortunes

of cardinals very trustworthy. The well-known banker Agostino Chigi left (1520) a fortune of 800,000 ducats in all. [This long note has been abbreviated slightly and references omitted.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currencies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estimate modern equivalents, but Professor Roderick Floud of Birkbeck College, London, has drawn my attention to R. W. Stevens, On the Stowage of Ships..., fourth edition, London, 1867, which gives equivalents of Swiss francs and several Italian coinages in terms of British money of the time: it seems that 11 or 12 Swiss francs would have been near enough 10 shillings in 1867, say approximately £15 or $26-$27 in 1987 terms. It is by no means clear that Burckhardt's assumption that the ducat, the sequin, the fiorino d'oro and the scudo d'oro were all approximately equal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covered by his book is correct. On this basis, the Patriarch of Aquileia, with 200,000 ducats, would be worth about £3 million, which would not make him the richest man in modern Italy.]

1: 对于意大利的物价和财富情况，因无法开展深入调查，我只能将从各处收集到的一些零散事实拼凑起来。明显夸大其词的内容必须撇开。值得一提的金币有达克特、塞千、弗罗林和斯库多。所有金币的价值差不多是一样的，每枚相当于我们的11-12法郎[1860年代瑞士法郎]。例如在威尼斯，总督安德里

亚·温德拉敏1476年拥有17万达克特，被误以为是个大富翁。大约1460年，阿奎莱亚的教长洛多维科·帕塔维诺有20万达克特，被称为“可能是意大利最有钱的人”。安东尼奥·格里曼尼为自己的儿子竞选红衣主教支付了3万达克特，其财产光是现款就有10万达克特……1522年，意大利最富有的城市不再是威尼斯，而是毗邻罗马的热那亚。班戴洛（*Novelle* 34 and 42）称他那个时代最富有的热那亚商人是安萨尔多·格里马尔蒂。弗朗西斯科·圣索维诺认为，1400年至1580年间货币贬值了50%……在费拉拉，博尔索公爵时代就有人拥有5-6万达克特。佛罗伦萨的数据是个例外，无法证明为均值。借给外国君主的贷款就属此列，其中只出现一两家的名字，而实际上却是大公司的行为。向失败方征收的巨额罚款也属于这一类；文献资料显示，1430年至1453年，有77个家族支付了4,875,000金弗罗林。乔瓦尼·美第奇去世时（1428年），财产多达179,221金弗罗林，而在他的两个儿子科西莫和洛伦佐中，光是洛伦佐去世时（1440年）留下的财产就多达235,137弗罗林。14世纪，佛罗伦萨维其奥桥上的44位金匠向政府支付了800弗罗林的租金，这是反映当时经贸活动概况的证据。布纳柯尔索·比蒂的日记[英译文载G. Brucker, ed., *Two Memoirs of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York, 1967]里写满了数字，却只能大体证明商品价格之高与货币价值之低。对罗马而言，教廷的收入来自全欧洲，无法提供参照标准；关于教皇财富和红衣主教财产的声明也不是很可信。著名的银行家奥古斯丁·齐吉在1520年留下了一笔总数为80万达克特的遗产。[这一长注释略有缩简，参考文献亦略。按照目前的货币情况，要估算出这些钱今天能值多少几乎不太可

能，但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罗德里克·弗勒德教授帮助下，我注意到了史蒂文斯《关于船舶积载……》一书（R. W. Stevens, *On the Stowage of Ships...,* fourth edition, London, 1867），该书依据当时的英国货币，为瑞士法郎和意大利的若干货币确定了等价物：大致为11-12瑞士法郎近似于1867年的10先令，亦即1987年的15英镑或26-27美元。布克哈特关于达克特、塞千、弗罗林和斯库多等金币在本书涉及的历史阶段里大致等值的假定是否正确，这一点完全不清楚。以此为基础，阿奎莱亚那位教长拥有的20万达克特相当于300万英镑，这要放在现代意大利就不能算是最富有的人了。]

This statistical estimate of outward life is, however, uniformly accompanied by the narrative of political events to which we have already referred.

但是，在对物质生活做统计估算的同时，作者同样展开对政治事件的叙述。

Florence not only existed under political forms more varied than those of the free states of Italy and of Europe generally, but it reflected upon them far more deeply. It is a faithful mirror of the relations of individuals and classes to a variable whole. The pictures of the great civic democracies in France and in Flanders, as they are delineated in Froissart, and the narratives of the German chronicler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re in truth of high importance; but in comprehensiveness of thought and in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none will bear comparison with the Florentines. The rule of the nobility, the tyrannies, the struggles of the middle class with the proletariat, limited and unlimited democracy, pseudo-democracy, the primacy of a single house, the theocracy of Savonarola, and the mixed forms of government which prepared the way for the Medicean despotism—all are so described that the inmost motives of the actors are laid bare to the light. At length Machiavelli in his Florentine history (down to 1492) represents his native city as a living organism and its development as a natural and individual process; he is the first of the moderns who has risen to such a conception. It lies without our province to determine whether and in what points Machiavelli may have done violence to history, as is notoriously the case in his life of Castruccio Castracani —a fancy picture of the typical despot. We might find something to say against every line of the *Istorie Fiorentine,* and yet the great and unique value of the whole would remain unaffected. And his contemporaries and successors, Jacopo Pitti, Guicciardini, Segni, Varchi, Vettori, what a circle of illustrious names! And what a story it is which these masters tell us! The great and memorable drama of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Florentine republic is here unfolded. The voluminous record of the collapse of the highest and most original life which the world could then show may appear to one but as a collection of curiosities, may awaken in another a devilish delight at the shipwreck of so much nobility and grandeur, to a third may seem like a great historical assize; for all it will be an object of thought and study to the end of time. The evil, which was for ever troubling the peace of the city, was its rule over once powerful and now conquered rivals like Pisa—a rule of which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 was a chronic state of violence. The only remedy, certainly an extreme one and which none but Savonarola could have persuaded Florence to accept, and that only with the help of favorable chances, would have been the well-timed dissolution of

Tuscany into a federal union of free cities. At a later period this scheme, then no more than the dream of a past age, brought (1548) a patriotic citizen of Lucca to the scaffold. From this evil and from the ill-starred Guelph sympathies of Florence for a foreign prince, which familiarized it with foreign intervention, came all the disasters which followed. But who does not admire the people, which was wrought up by its venerated preacher to a mood of such sustained loftiness,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in Italy it set the example of sparing a conquered foe, while the whole history of its past taught nothing but vengeance and extermination? The glow which melted patriotism into one with moral regeneration may seem, when looked at from a distance, to have soon passed away; but its best results shine forth again in the memorable siege of 1529-30. They were 'fools', as Guicciardini then wrote, who drew down this storm upon Florence, but he confesses himself that they achieved things which seemed incredible; and when he declares that sensible people would have got out of the way of the danger, he means no more than that Florence ought to have yielded itself silently and ingloriously into the hands of its enemies. It would no doubt have preserved its splendid suburbs and gardens, and the lives and prosperity of countless citizens; but it would have been the poorer by one of its greatest and most ennobling memories.

佛罗伦萨不但依赖于其较意大利和欧洲的自由国家更为复杂多变的政体，且对其政体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它就像一面忠实的镜子，折射出个人以及阶级对于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的关系。像弗鲁瓦萨特所描绘的法国以及佛兰德斯伟大的市民民主的图景，以及14世纪德意志编年史作者的叙述诚然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思想的全面性以及在故事情节的合理推动上，没有一部书能和佛罗伦萨人的著作相比。书中叙述了贵族统治、暴君专制、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受限和不受限的民主、伪民主，单个家族的专权、萨沃纳罗拉的

神权政体，以及为美第奇家族的独裁专制铺平道路的混合形式的政府，历史扮演者最隐秘的动机都在光天化日下暴露无遗。最后，马基雅弗利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到1492年为止）把他的家乡描写为一个活体，把这座城市的发展记叙成一种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第一个上升到这种思想高度的现代人。但是要确定马基雅弗利是否以及在哪些事件上歪曲了历史——就像他所写的为大家所熟知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一个虚构的典型暴君的形象——那样，并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我们也许可以从他的著作《佛罗伦萨史》的字里行间找到某些訾议之处，但全书巨大无比的价值并不因此受到影响。他的同时代的人以及后继者，比如雅各布·皮蒂、圭恰迪尼、塞尼、瓦尔奇、韦托里，是一群多么优秀的人物啊！这些大师所告知予我们的故事又是多么地伟大！他们在书中记录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最后几十年中伟大而值得纪念的光辉岁月，记录了当时世界上所能表现的最高级和最具特色的生活的瓦解。这些卷帙浩繁的记载在有的人看来也许是一堆瑰宝藏珍，对有的人也许能引起他对于豪华生活覆灭魔鬼般的快乐，在有的人看来也许像一个伟大的历史审判；而对于所有人来说它将永远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对象。长久扰乱这座城市的和平的一个祸害就是它可以统治像比萨那样曾经强大而现在被它所征服的对手，持续不断地使用暴力是这种统治的必然结果。唯一的补救方式，一种极端的只有萨沃纳罗拉可以说服佛罗伦萨接受的，以及只有在机缘巧合下才能成功的方法，可能就是合乎时宜地将托斯卡纳分解为自由城市的联邦。随后的一个时期里，在过去年代只能是一个美梦的计划，将卢卡的一个爱国公民送上了绞刑架（1548年）。由于这一祸端，以及倒霉的佛罗伦萨归尔甫派因同情外国君主而招致外国不断插足国内事务，所有灾难随之而来。虽然这一民族在过去所教导的无非是复仇和消灭，但其受人敬仰的传教士却在人民中培养起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高贵的感情，因而在意大利第一次树立起宽待降敌的榜样。对于这样的民族谁能不敬服呢？从远处看，那种把爱国主义和新生的道德合二为一的光辉似乎是一瞬即逝；但其最佳效果却在令人怀念的1529—1530年之围中重新发出了光辉。如圭恰迪尼当时所写的那样，那些给佛罗伦萨带来这场变革的人都是“傻子”，但他自己也承认他们实现了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并且当他宣称那些聪明人必将

逃脱这个危险时，他想说的无非就是佛罗伦萨应该安静地、不光彩地屈服于它的敌人。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固然可以保存佛罗伦萨美丽的郊区和花园以及无数市民的生命和幸福，但是比起那些最伟大最崇高的历史记忆，这就显得很不体面。

In many of their chief merits the Florentines are the pattern and the earliest type of Italians and modern Europeans generally; they are so also in many of their defects. When Dante compares the city which was always mending its constitution with the sick man who is continually changing his posture to escape from pain, he touches with the comparison a permanent feature of the political life of Florence. The great modern fallacy that a constitution can be made, can be manufactured by a combination of existing forces and tendencies, [1_21] was constantly cropping up in stormy times; even Machiavelli is not wholly free from it. Constitutional artists were never wanting who by an ingenious distribution and division of political power, by indirect elections of the most complicated kin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nominal offices, sought to found a lasting order of things, and to satisfy or to deceive the rich and the poor alike. They naively fetch their examples from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borrow the party names *ottimati, aristocrazia,* as a matter of course. The world since then has become used to these expressions and given them a conventional European sense, whereas all former party names were purely national, and either characterized the cause at issue or sprang from the caprice of accident. But how a name colors or discolors a political cause!

从佛罗伦萨人的主要优点来看，他们在一般意义上是意大利人以及现代欧洲人的榜样和最早的典型；在许多缺点方面也是如此。当但丁把这个永远在修改其政体的城市比作一个欲借辗转反侧以逃避痛苦

的病人时，他恰如其分地比喻出佛罗伦萨政治生活上多年以来的特点。那些认为通过把现存势力和派别联合起来就可以人为制造出一种政体的重大近代谬见经常出现于动乱年代；甚至马基雅弗利也或多或少受了其影响。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这样一群政治艺术家：他们想通过巧妙分割和分配政权，通过最复杂的间接选举，通过设立名义上的职务，来建立事物间永久不变的秩序以及满足或欺骗富人和穷人。他们天真地在古典遗迹中寻找着各种样例，并理所当然地借用“清流党”“贵族党”等政党名称。从那时起人们开始习惯于这类表达，并且赋予它们一种传统的欧洲的意义，但是所有先前政党的名称都带有纯粹民族性的色彩，要么以事件的起因为特点，要么就发端于难以预料的偶发事件。但是一个名称对于加重或冲淡政治色彩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

But of all who thought it possible to construct a state, the greatest beyond all comparison was Machiavelli. He treats existing forces as living and active, takes a large and an accurate view of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and seeks to mislead neither himself nor others. No man could be freer from vanity or ostentation; indeed, he does not write for the public, but either for princes and administrators or for personal friends. The danger for him does not lie in an affectation of genius or in a false order of ideas, but rather in a powerful imagination which he evidently controls with difficulty. The objectivity of his political judgement is sometimes appalling in its sincerity; but it is the sign of a time of no ordinary need and peril, when it was a hard matter to believe in right, or to credit others with just dealing. Virtuous indignation at his expense is thrown away upon us who have seen in what sense political morality is understood by the statesmen of our own century. Machiavelli was at all events able to forget himself in his cause. In truth, although his writings, with the exception of very few words, are altogether destitute of enthusiasm, and although the Florentines themselves treated him at last as a criminal, he was a patriot in the

fullest meaning of the word. But free as he was, like most of his contemporaries, in speech and morals, the welfare of the state was yet his first and last thought.

但是在那些认为可能建立起一个国家的人当中，最伟大、最无与伦比的当数马基雅弗利了。他认为现存势力是有生命和能动的，并从宏观角度准确审视可能采取的方法，既不想自欺也不想欺人。他不矜虚荣，不尚浮夸，在这一点上无人能及；事实上，马基雅弗利不是为公众而是为君王和执政者或是为自己的朋友而写作的。对他来说，危险并不在于他冒充天才或在于其错误的思维体系，很明显，其危险在于他难以控制自己强大的想象力。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时，人们很难相信正义，也很难用正义的行为来说服他人。我们没有必要对其充满道德上的愤怒，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政治家们是从何种意义上来理解政治道德的。马基雅弗利毕竟能够为了他的主张而忘掉自己。实在说来，虽然他的著作除了几句辞藻外读起来使人兴味索然，虽然佛罗伦萨人最后把他看成是一个罪人，但他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人士。虽然他在言行和道德上像他同时代的人一样放荡不羁，但他自始至终都在为这个国家的福祉着想。

His most complete programm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olitical system at Florence is set forth in the memorial to Leo X, composed after the death of the younger Lorenzo Medici, Duke of Urbino (d. 1519), to whom he had dedicated his *Prince*. The state was by that time in extremities and utterly corrupt, and the remedies proposed are not always morally justifiable; but it is most interesting to see how he hopes to set up the republic in the form of a moderate democracy, as heiress to the Medici. A more ingenious scheme of concessions to the pope, to the pope's various adherents, and to the different Florentine interests cannot be imagined; we

might fancy ourselves looking into the works of a clock. Principles, observations, comparisons, political forecasts and the like are to be found in numbers in the *Discorsi,* among them flashes of wonderful insight. He recog¬nizes, for example, the law of a continuous though not uniform development in republican institutions, and requires the constitution to be flexible and capable of change, as the only means of dispensing with bloodshed and banishments. For a like reason, in order to guard against private violenc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the death of all freedom'—he wishes to see introduced a judicial procedure *(accusa)* against hated citizens, in place of which Florence had hitherto had nothing but the court of scandal. With a masterly hand the tardy and involuntary decisions are characterized, which at critical moments play so important a part in republican states. Once, it is true, he is misled by his imagination and the pressure of events into unqualified praise of the people, which chooses its officers, he says, better than any prince, and which can be cured of its errors by 'good advice'. With regard to the government of Tuscany, he has no doubt that it belongs to his native city, and maintains, in a special *Discorso,* that the reconquest of Pisa is a question of life or death; he deplores that Arezzo, after the rebellion of 1502, was not razed to the ground; he admits in general that Italian republics must be allowed to expand freely and add to their territory in order to enjoy peace at home, and not to be themselves attacked by others, but declares that Florence had always begun at the wrong end, and from the first made deadly enemies of Pisa, Lucca and Siena, while Pistoia, 'treated like a brother', had voluntarily submitted to her.

马基雅弗利对佛罗伦萨新政治体系构想的完整计划是在对利奥十世的纪念文中提出的。这篇文章写于小洛伦佐·美第奇即乌尔比诺公爵死后，马基雅弗利曾将自己的《君主论》呈现给这位大公。那时，国

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极其腐败的地步，提议中的挽救措施未必总合于道德；但最有趣的就是从中看到马基雅弗利是如何希望建立起一个温和民主形式的共和国，以此来作为美第奇家族的延续。我们能够想象窥探一件精密的钟表装置，但却不能想象出一种更精妙的办法对教皇及其形形色色的追随者以及佛罗伦萨人的不同利益作出让步。在他的著作《史论》中，原则、观察、对照、政治预见等比比皆是，其中闪现着惊人的洞见。例如，他认识到了共和国制度虽不一致但却不断发展的规律，并且要求宪法能够做到灵活变通，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免于流血和放逐的手段。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抵御他所称的“一切自由的死亡”——个人暴力以及外来干涉，马基雅弗利希望采取一种司法程序（“起诉”）来对待被憎恨的市民，而过去佛罗伦萨除了审理诽谤罪的法庭之外别无其他。他巧妙地描述了延迟判决和无意判决，这两种判决在共和国的关键时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确，他曾经被自己的想象和局势的压力误导，给予了人民不合理的颂扬，说人民能够比任何君主更好地选择官吏并可以用“善意的劝告”来纠正君主的错误。当谈及托斯卡纳区的统治权时，马基雅弗利认为这毫无疑问应该属于他的故乡，并且在一次特殊演讲中宣称重新征服比萨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哀叹阿雷佐在1502年的叛乱后没有被夷为平地；他大体上认为，应该允许意大利的共和国自由拓展、开拓疆土，以此来保证国内和平并免受外来攻击。但是他又宣称佛罗伦萨总是刚开头就出错，在一开始就与比萨、卢卡和锡耶纳交恶，而皮斯托亚因受到佛罗伦萨兄弟般的对待而主动地臣服于它。

It would be unreasonable to draw a parallel between the few other republics which still existe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d this unique city—the most important workshop of the Italian, and indeed of the modern European spirit. Siena suffered from the gravest organic maladies, and its relative prosperity in art and industry must not mislead us on this point. Aeneas Sylvius looks with longing from his native town over to the 'merry' German imperial cities, where life is embittered by no confiscations of land

and goods, by no arbitrary officials, and by no political factions.[1_22] Genoa scarcely comes within range of our task, as before the time of Andrea Doria it took almost no part in the Renaissance. Indeed, the inhabitant of the Riviera was proverbial among Italians for his contempt of all higher culture. Party conflicts here assumed so fierce a character, and disturbed so violently the whole course of life, that we can hardly understand how, after so many revolutions and invasions, the Genoese ever contrived to return to an endurable condition. Perhaps it was owing to the fact that nearly all who took part in public affairs were at the same time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active men of business. The example of Genoa shows in a striking manner with what insecurity wealth and vast commerce, and with what internal disorder the possession of distant colonies, are compatible.

锡耶纳这个城市独一无二，它不仅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制造中心同时也是近代欧洲最重要的精神发源地，因此将15世纪仍然存在的少数其他共和国与其相提并论是不合理的。然而锡耶纳自身有着严重的弊端，因此我们不能被它在艺术和工业上相对的繁荣误导。埃尼亚斯·西尔维于斯在他出生的城镇向往地望着“快乐的”德意志帝国城市，因为在那里生活不会因为土地和财产的没收、专横的官吏和政治派系[2_21]而变得苦闷。热那亚几乎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因为在安德烈亚·多里亚的时代之前它几乎没有参与到文艺复兴之中。的确，里维埃拉的居民在意大利人中是以对高级文化的蔑视著称的。党派冲突在这里非常激烈，并且严重扰乱了整个生活进程，所以我们很难理解在经历过如此多的内部革命和外部侵略后热那亚人是如何地恢复到可以忍受的境地的。这可能是因为所有参与政治事件的人同时也全部是积极的经商者。热那亚的例子显著表明了坐拥巨大的商业的同时存在财富的不安全性，国内政局混乱也可以拥有远方殖民地，这些并不矛盾。

Lucca is of small significanc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卢卡在15世纪的意义不是很大。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

As the majority of the Italian states were in their internal constitution works of art, that is, the fruit of reflection and careful adaptation, so was their relation to one another and to foreign countries also a work of art. That nearly all of them were the result of recent usurpations was a fact which exercised as fatal an influence in their foreign as in their internal policy. Not one of them recognized another without reserve; the same play of chance which had helped to found and consolidate one dynasty might upset another. Nor was it always a matter of choice with the despot whether to keep quiet or not. The necessity of movement and aggrandizement is common to all illegitimate powers. Thus Italy became the scene of a 'foreign policy' which gradually, as in other countries also, acquired the position of a recognized system of public law. The purely objective trea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 free from prejudice as from moral scruples, attained a perfection which sometimes is not without a certain beauty and grandeur of its own. But as a whole it gives us the impression of a bottomless abyss.

大多数的意大利城邦都在内部构成上是一种策略的产物，是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结果，而它们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对外关系也是种策略

的产物。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新近篡夺的结果，这个事实对其内政外交政策都有着重大影响。它们中没有一个国家毫无保留地承认另一个国家；同样的机遇既可以帮助成立或者巩固一个朝代，也可能会颠覆另一个朝代。君主是否保持缄默也不总是选择的问题。对于所有的不合法国家，运动和扩张的需求都是正常的。因此，意大利变成了“外交政策”的舞台，这种政策也像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逐渐取得了一个公认的国际公法地位。因为不受到偏见和道德的影响，外交政策对国际事务的客观处理达到了一种完美程度。这种完美有时也有自身的美丽和雄伟。但是总体上它给我们一种无底深渊的感觉。

Intrigues, armaments, leagues, corruption and treason make up the outward history of Italy at this period. Venice in particular was long accused on all hands of seeking to conquer the whole peninsula, or gradually so to reduce its strength that one state after another must fall into her hands. But on a closer view it is evident that this complaint did not come from the people, but rather from the courts and official classes, which were commonly abhorred by their subjects, while the mild government of Venice had secured for it general confidence. [1_23] Even Florence, with its restive subject cities, found itself in a false position with regard to Venice, apart from all commercial jealousy and from the progress of Venice in Romagna. At last the League of Cambrai actually did strike a serious blow at the state which all Italy ought to have supported with united strength.

阴谋，军备，联盟，贪污和叛国构成了这个时期意大利的对外历史。特别是威尼斯，因为被认为想要征服整个半岛或逐渐削弱其力量以便将半岛城邦一一吞并，长久以来它成为了众怨之的。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显然这种抱怨不是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宫廷和统治阶级，它们通常为人民所厌弃，但威尼斯的温和统治却为自己赢得了

普遍的信任。 [2_22] 甚至有着难以驾驭的从属城市的佛罗伦萨，也发现自己和威尼斯一样处在一个错误的位置，更不用说它对威尼斯在商业上的嫉妒和威尼斯在罗马涅的进步了。最后，康布雷同盟确实对整个意大利应该团结起来支持的这个国家进行了一次严重的打击。

The other states, also, were animated by feelings no less unfriendly, and were at all times ready to use against one another any weapon which their evil conscience might suggest. Lodovico il Moro, the Aragonese kings of Naples and Sixtus IV—to say nothing of the smaller powers—kept Italy in a state of constant and perilous agitation. It would have been well if the atrocious game had been confined to Italy; but it lay in the nature of the case that intervention and help should at last be sought from abroad—in particular from the French and the Turks.

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被不友好的态度驱使，并且时刻准备着使用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手段来互相对待。那不勒斯阿拉贡的国王，洛多维科·摩罗以及教皇西斯科特四世——遑论一些更小的政权——使意大利处在持续的动乱中。如果这个残暴的游戏局限在意大利境内还好一些，但是由于这种相互竞争的性质，最后一定会向国外——特别是向法兰西和土耳其，寻求援助和干涉。

The sympathies of the people at large were throughout on the side of France. Florence had never ceased to confess with shocking *naïveté* its old Guelph preference for the French. And when Charles VIII actually appeared on the south of the Alps, all Italy accepted him with an enthusiasm which to himself and his followers seemed unaccountable. I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Italians, to take Savonarola for an example, the ideal picture of a wise, just and

powerful saviour and ruler was still living, with the difference that he was no longer the emperor invoked by Dante, but the Capetian King of France. With his departure the illusion was broken; but it was long before all understood how completely Charles VIII, Louis XII and Francis I had mistaken their true relation to Italy, and by what inferior motives they were led. The princes, for their part, tried to make use of France in a wholly different way. When the Franco-English wars came to an end, when Louis XI began to cast about his diplomatic nets on all sides, and Charles of Burgundy to embark on his foolish adventures, the Italian Cabinets came to meet them at every point.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 intervention of France was only a question of time, even though the claims on Naples and Milan had never existed, and that the old interference with Genoa and Piedmont was only a type of what was to follow. The Venetians, in fact, expected it as early as 1462. The mortal terror of the Duke Galeazzo Maria of Milan during the Burgundian war, in which he was apparently the ally of Charles as well as of Louis, and consequently had reason to dread an attack from both, is strikingly shown in his correspondence. The plan of an equilibrium of the four chief Italian powers, as understood by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was but the assumption of a cheerful optimistic spirit, which had outgrown both the recklessness of an experimental policy and the superstitions of Florentine Guelphism, and persisted in hoping for the best. When Louis XI offered him aid in the war against Ferrante of Naples and Sixtus IV, he replied, 'I cannot set my own advantage above the safety of all Italy; would to God it never came into the mind of the French kings to try their strength in this country! Should they ever do so, Italy is lost.' For the other princes, the King of France was alternately a bugbear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ir enemies, and they threatened to call him in whenever they saw no more convenient way out of their difficulties. The popes, in their turn, fancied that they could make use of France without any

danger to themselves, and even Innocent VIII imagined that he could withdraw to sulk in the North, and return as a conqueror to Italy at the head of a French army.

大部分人民的同情完全是在法兰西这边的。佛罗伦萨一直以惊人的天真承认自己对法兰西人有着归尔甫派的偏好。并且当查理八世亲临阿尔卑斯山以南时，所有意大利人以查理本人及其从者难以理解的热情欢迎他。在意大利人的想象中，以萨沃纳罗拉为例，一个明智、公正和具有力量的救世主和统治者的理想形象仍然存在，但不同的是他不再是但丁所祈求的那种君主，而是法兰西卡佩王朝的国王。随着他的离去这种幻想破灭了；但很久之后，人们才开始明白查理八世，路易十二世和弗朗索瓦一世怎样彻底误导了法兰西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卑劣的动机。而那些意大利的君主们，则试图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来利用法兰西。当英法战争结束时，当路易十一世开始全面铺设其外交网络时，以及当勃艮第的查理开始着手于他愚蠢的冒险时，意大利各国政府准备全方位应付他们。很明显，即使法兰西对那不勒斯和米兰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它的干涉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过去对热那亚和皮德蒙特的干涉就是一个先例。事实上，威尼斯人早在1462年就开始等待它的到来。米兰的加莱亚佐·马里亚大公在勃艮第战争中显然与查理和路易是同盟，因此有理由担心自己可能会受到来自这两方的攻击，这种恐惧在他的书信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正如伟大的洛伦佐理解的那样，四个主要意大利国家之间保持均势的计划无非是乐观的设想，这种乐观主义已经超过了实验政策的鲁莽以及对佛罗伦萨归尔甫派的迷信，并执著于得到最好的结果。在对抗那不勒斯的弗兰特和西斯科特四世时，路易十一世向他提供援助，那时他说道，“我不能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整个意大利的安全之上；但愿法兰西国王永远不要将他的军队派到这片土地之上。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会失去意大利。”对于其他君王来说，法兰西国王成为被他们轮换作为恐吓自身和对方的怪物，当他们难以摆脱困境时，他们就会威胁着要召唤出法兰西国王。教皇们则幻想着他们可以利用法兰西而不对自己产生任何威胁，甚至因诺森特八世也曾想象自己可以退

回北部（虽然这个结果不太愉快），然后率领着一支法兰西军队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回到意大利。

Thoughtful men, indeed, foresaw the foreign conquest long before the expedition of Charles VIII. And when Charles was back agai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Alps, it was plain to every eye that an era of intervention had begun. Misfortune now followed on misfortune; it was understood too late that France and Spain, the two chief invaders, had become great European powers, that they would be no longer satisfied with verbal homage, but would fight to the death for influence and territory in Italy. They had begun to resemble the centralized Italian states, and indeed to copy them, only on a gigantic scale. Schemes of annexation or exchange of territory were for a time indefinitely multiplied. The end, as is well known, was the complete victory of Spain, which, as sword and shield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 long held the papacy among its other subjects. The melancholy reflections of the philosophers could only show them how those who had called in the barbarians all came to a bad end.

实际上，明智之人在查理八世远征很久之前就预见到了外国的征服。当查理重回阿尔卑斯山另一边时，每个人都清楚干涉的时代开始了。不幸接踵而来；两个主要的侵略者——法兰西和西班牙，已经成为欧洲强国，它们不满足于口头上的服从，而要拼死在意大利争夺势力和土地，当意大利人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法、西两国已经开始变得与中央集权的意大利国家类似，实际上也就是在模仿它们，只不过是大规模的模仿。兼并或领土交易的计划一时接连不断。结果如我们所熟知的一样，西班牙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成为了反宗教改革的利器和有力后盾，使教廷如同其他属国一样长期沦为了它的附庸。哲学家们悲伤的沉思只能告诉他们，引狼入室的人都没有好的下

场。

Alliances were at the same time formed with the Turks too, with as little scruple or disguise; they were reckoned no worse than any other political expedients. The belief in the unity of Western Christendom had at various times in the course of the Crusades been seriously shaken, and Frederick II had probably outgrown it. But the fresh advance of the oriental nations, the need and the ruin of the Greek empire, had revived the old feeling, though not in its former strength, throughout Western Europe. Italy, however, was a striking exception to this rule. Great as was the terror felt for the Turks, and the actual danger from them, there was yet scarcely a government of any consequence which did not conspire against other Italian states with Muhammad II and his successors. And when they did not do so, they still had the credit of it; nor was it worse than the sending of emissaries to poison the cisterns of Venice, which was the charge brought against the heirs of Alfonso, King of Naples. From a scoundrel like Sigismondo Malatesta nothing better could be expected than that he should call the Turks into Italy. But the Aragonese monarchs of Naples, from whom Muhammad—at the instigation, we read, of other Italian governments, especially of Venice—had once wrested Otranto (1480), afterwards hounded on the Sultan Bajazet II against the Venetians. The same charge was brought against Lodovico il Moro. 'The blood of the slain, and the misery of the prisoners in the hands of the Turks, cry to God for vengeance against him,' says the state historian. In Venice, where the government was informed of everything, it was known that Giovanni Sforza, ruler of Pesaro, the cousin of the Moor, had entertained the Turkish ambassadors on their way to Milan. The two most respectable among the pope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Nicholas V and Pius II, died in the deepest

grief at the progress of the Turks, the latter indeed amid the preparations for a crusade which he was hoping to lead in person; their successors embezzled the contributions sent for this purpose from all parts of Christendom, and degraded the indulgences granted in return for them into a private commercial speculation. Innocent VIII consented to be gaoler to the fugitive Prince Djem, for a salary paid by the prisoner's brother Bajazet II, and Alexander VI supported the steps taken by Lodovico il Moro in Constantinople to further a Turkish assault upon Venice (1498), whereupon the latter threatened him with a Council. It. is clear that the notorious alliance between Francis I and Soliman II was nothing new or unheard of.

没有任何的顾虑和伪装，意大利人还同时和土耳其人结成了同盟；他们的做法在当时被认为和其他政治的权宜之计一样好不到哪儿去。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的不同时期，西方基督教国家团结的信仰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动摇，而腓特烈二世可能已经摆脱了这种信仰。但是，由于东方国家兴起和希腊帝国的危急与覆亡，西欧又恢复了这种旧日的情感，虽然它在势头上已不如从前。但意大利却显然是个例外。尽管意大利国家对土耳其人及其威胁有着极大的恐惧，但是几乎没有一个政权不联合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继承者密谋反对其他意大利国家的。即使有时没有这么做，人们也相信它们这么做了。这比派间谍在威尼斯的储水池里下毒好不了多少，那不勒斯的国王，阿方索的继承人就受到过这样的指控。像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这样的恶棍，除了将土耳其人引入意大利之外，我们很难希望他还能做些什么。但我们知道，穆罕默德在其他意大利政府，尤其是威尼斯的煽动下，曾经从那不勒斯阿拉贡人的君主那占领了奥特朗托（1480年），这些君主们后来也促使苏丹巴雅泽二世来反对威尼斯人。洛多维科·摩罗也受到过同样的责难。国史学家们说道：“被屠杀人的鲜血和土耳其人手中囚犯的悲惨遭遇，都在向上帝哭诉为其复仇。”在威尼斯，政府对一切消息都很灵通，人们得知佩扎罗的统治者乔瓦尼·斯福尔扎，也就

是摩尔的表兄，在土耳其大使们去米兰的路上招待了他们。15世纪最受尊敬的两位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和庇护二世，都死于对土耳其人扩展的深切忧虑，后者确实在为亲自领导十字军东征做准备时死去。他们的继承者侵吞了各地基督教界为亲征而送来的捐输，并将为回报这些国家而颁发的赎罪券分散到私人的商业投机中。为了得到逃亡君主杰姆的兄弟巴雅泽二世支付的报酬，因诺森特八世同意囚禁君主杰姆，而亚历山大六世支持了洛多维科·摩罗在君士坦丁堡促成的由土耳其人对威尼斯发动袭击的措施（1498年），威尼斯因此以召开大会议来威胁他。显然，弗朗索瓦一世和索利曼二世之间臭名昭著的同盟不再是新鲜或是前所未闻的事。

Indeed, we find instances of whole populations to whom it seemed no particular crime to go over bodily to the Turks. Even if it were only held out as a threat to oppressive governments, this is at least a proof that the idea had become familiar. As early as 1480 Battista Mantovano gives us clearly to understand that most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Adriatic coast foresaw something of this kind, and that Ancona in particular desired it. When Romagna was suffering from the oppressive government of Leo X, a deputy from Ravenna said openly to the legate, Cardinal Giulio Medici: 'Monsignore, the honorable Republic of Venice will not have us, for fear of a dispute with the Holy See; but if the Turk comes to Ragusa we will put ourselves into his hands.'

的确，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例子，即全体人民认为归顺于土耳其人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罪恶。即使它被作为对压迫统治的一种威胁而提出，但也至少证明这种想法已经具有了普遍性。早在1480年，巴蒂斯塔·曼托瓦诺就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大多数居民已经预见了这种事情，而安科纳尤其盼望。当罗马涅正遭受利奥十世的压迫统治时，一个来自拉文那的代表向罗马教皇的使节，红衣主教朱利

奥·美第奇说："主教大人，受人尊敬的威尼斯共和国不会接受我们，因为怕和罗马教廷产生不和，但是如果土耳其人来到拉古萨，我们会臣服于他们。"

It was a poor but not wholly groundless consolation for the enslavement of Italy then begun by the Spaniards that the country was at least secured from the relapse into barbarism which would have awaited it under the Turkish rule. By itself, divided as it was, it could hardly have escaped this fate.

这时的意大利已经受到西班牙人奴役，这是一番可怜的但却并非毫无根据的安慰，因为至少意大利已经逃离了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堕入野蛮的命运。像意大利这样四分五裂，凭借自己的力量很难逃脱这种命运。

If, with all these drawbacks, the Italian statesmanship of this period deserves our praise, it is only on the ground of its practical and unprejudiced treatment of those questions which were not affected by fear, passion or malice. Here was no feudal system after the northern fashion, with its artificial scheme of rights; but the power which each possessed he held in practice as in theory. Here was no attendant nobility to foster in the mind of the prince the medieval sense of honor, with all its strange consequences; but princes and counsellors were agreed in acting according to the exigencies of the particular case and to the end they had in view. Towards the men whose services were used and towards allies, come from what quarter they might, no pride of caste was felt which could possibly estrange a supporter; and the class of the *condottieri,* in which birth was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shows

clearly enough in what sort of hands the real power lay; and lastly, the government, in the hands of an enlightened despot, had an incomparably more accurate acquaintance with its own country and that of its neighbors than was possessed by northern contemporaries, and estimated the economical and moral capacities of friend and foe down to the smallest particular. The rulers were, notwithstanding grave errors, born masters of statistical science. With such men negotiation was possible; it might be presumed that they would be convinced and their opinion modified when practical reasons were laid before them. When the great Alfonso of Naples was (1434) a prisoner of Filippo Maria Visconti, he was able to satisfy his gaoler that the rule of the House of Anjou instead of his own at Naples would make the French masters of Italy; Filippo Maria set him free without ransom and made an alliance with him. A northern prince would scarcely have acted in the same way, certainly not one whose morality in other respects was like that of Visconti. What confidence was felt in the power of self-interest is shown by the celebrated visit which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to the universal astonishment of the Florentines, paid the faithless Ferrante at Naples—a man who would be certainly tempted to keep him a prisoner, and was by no means too scrupulous to do so. For to arrest a powerful monarch, and then to let him go alive, after extorting his signature and otherwise insulting him, as Charles the Bold did to Louis XI at Péronne (1468), seemed madness to the Italians; so that Lorenzo was expected to come back covered with glory, or else not to come back at all. The art of political persuasion was at this time raised to a point—especially by the Venetian ambassadors—of which northern nations first obtained a conception from the Italians, and of which the official addresses give a most imperfect idea. These are mere pieces of humanistic rhetoric. Nor, in spite of an otherwise ceremonious etiquette, was there in case of need any lack of rough and frank speaking in diplomatic

intercourse. A man like Machiavelli appears in his *Legazioni* in an almost pathetic light. Furnished with scanty instructions, shabbily equipped, and treated as an agent of inferior rank, he never loses his gift of free and wide observation or his pleasure in picturesque description.

这段时期意大利的政治策略具有上述诸多缺点，如果还有什么值得我们称赞的话，那仅仅是因为意大利以一种务实和没有偏见的方式对待这些问题且不受恐惧、激动和怨恨影响。这里没有仿照北方形式的具有虚伪权利的封建制度；只有每个人在实际和理论中都拥有的权力。这里没有侍从贵族给君主灌输中世纪的荣誉感，也没有随之而来的离奇后果；有的只是君主和大臣们按照特定情况的需要和他们已经考虑好的结果而采取的一致行动。对待那些可以为己所用的人以及可能来自任何地方的同盟，意大利各国都显得彬彬有礼，因为傲慢的态度会令支持者形同陌路。在雇佣军中一个人的出身无足轻重，这就表明何人掌握着真正的权力。最后，开明的意大利专制君主对本国和邻邦的透彻了解远非同时代的北方诸国可比拟，而他们对友邦和敌国的经济实力和道义精神也有着最为详细的估计。虽然这些统治者会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他们生来就是统计科学的大师。有了这些人，谈判就有可能；只要把实际理由摆出来，他们是可以被说服并改变主张的。当那不勒斯的大阿方索成为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的阶下囚时（1434年），他让这个看守他的人相信，是安茹王朝而非他自己在那不勒斯的统治将使法国入侵进而成为意大利的主人；菲利波·马里亚没有收取任何赎金就释放了他并和他结成了同盟。一个北方的君主很少会像这样行事，因为他们中定没有人具备维斯孔蒂那样的品行。在利己主义权力中感受到的自信通过伟大的洛伦佐在那不勒斯对不忠实的费兰特的著名拜访中体现出来。这让佛罗伦萨人普遍感到惊讶，因为费兰特当时一定会忍不住将洛伦佐囚禁起来，并且这样做完全不算过分。对于逮捕一个有权威的君王，在勒令他签字或用其他方式羞辱他之后将他释放，就像大胆的查理在佩罗讷对路易十一世做的一样（1468年），在意大利人看来是疯狂的行为；因此人们认为洛伦佐不

是载誉归来就是一去不返。此时，纵横的艺术，尤其是在那些威尼斯大使们的帮助下，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北方国家第一次从意大利那里得到这种概念，而正式的演说则给人极不完全的观念。这些演说不过是人文主义者的辞令而已。在外交上尽管有客气的礼节，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也不乏粗鲁和坦率的言辞。像马基雅弗利这样的人在他的《使节》中是以非常寒酸的方式出现的。虽然得到有限的指示，有着不体面的装备，被人看作是一个卑下的代表，但马基雅弗利永远没有失去他自由广泛的观察力以及对生动描述的喜好。

A special division of this work will treat of the study of man individually and nationally, which among the Italians went hand in hand with the study of the outward conditions of human life.

本书将有一个专编来研究意大利的个人和整个民族，在研究意大利人的同时对人生活的外部条件的研究也会同时进行。

War as a Work of Art

战争艺术

It must here be briefly indicated by what steps the art of war assumed the character of a product of reflec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ies of the West the edu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soldier in the Middle Ages was perfect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then prevalent system of defence and attack: nor was there any want of ingenious inventors in the arts of besieging and of fortification. But the development both of strategy and of tactics was hindered by the character and dura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and by the ambition of the nobles, who disputed questions of precedence in the face of the

enemy, and through simple want of discipline caused the loss of great battles like Crecy and Maupertuis. Italy, on the contrary,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adopt the system of mercenary troops, which demanded a wholly different organization; and the early introduction of firearms did its part in making war a democratic pursuit, not only because the strongest castles were unable to withstand a bombardment, but because the skill of the engineer, of the gun-founder and of the artillerist—men belonging to another class than the nobility—was now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in a campaign. It was felt, with regret, that the value of the individual, which had been the soul of the small and admirably organized bands of mercenaries, would suffer from these novel means of destruction, which did their work at a distance; and there were *condottieri* who opposed to the utmost the introduction at least of the musket, which had been lately invented in Germany. We read that Paolo Vitelli, while recognizing and himself adopting the cannon, put out the eyes and cut off the hands of the captured *schioppettieri* of the enemy, because he held it unworthy that a gallant, and it might be noble, knight should be wounded and laid low by a common, despised foot soldier. On the whole, however, the new discoveries were accepted and turned to useful account, till the Italians became the teachers of all Europe, both in the building of fortifications and in the means of attacking them. Princes like Federigo of Urbino and Alfonso of Ferrara acquired a mastery of the subject compared to which the knowledge even of Maximilian I appears superficial. In Italy, earlier than elsewhere, there existed a comprehensive science and art of military affairs;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impartial delight is taken in able generalship for its own sake which might, indeed, be expected from the frequent change of party and from the wholly unsentimental mode of action of the*condottieri.* During the Milano-Venetian war of 1451 and 1452, between Francesco Sforza and Jacopo Piccinino,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latter were attended by the scholar Gian Antonio Porcello dei Pandoni, commissioned by Alfonso of Naples to write a report of the campaign. It is written, not in the purest, but in a fluent Latin, a little too much in the style of the humanistic bombast of the day, is modeled on Caesar's *Commentaries,* and interspersed with speeches, prodigies and the like. Since fo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it had been seriously disputed whether Scipio Africanus or Hannibal was the greater, Piccinino through the whole book must needs be called Scipio and Sforza Hannibal. But something positive had to be reported, too, respecting the Milanese army; the sophist presented himself to Sforza, was led along the ranks, praised highly all that he saw, and promised to hand it down to posterity. Apart from him the Italian literature of the day is rich in descriptions of wars and strategic devices, written for the use of educated men in general as well as of specialists, while the contemporary narratives of northerners, such as the *Burgundian War* by Diebold Schilling, still retain the shapelessness and matter-of-fact dryness of a mere chronicle. The greatest dilettante who has ever treated in that character of military affairs, Machiavelli, was then busy writing his *Arte della Guerra.* B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soldier found its most complete expression in those public and solemn conflicts between one or more pairs of combatants which were practiced long before the famous 'Challenge of Barletta' (1503). The victor was assured of the praises of poets and scholars, which were denied to the northern warrior. The result of these combats was no longer regarded as a divine judgement, but as a triumph of personal merit, and to the minds of the spectators seemed to be both the decision of an exciting competition and a satisfaction for the honor of the army or the nation.

战争的艺术是深思熟虑的成果，在这里必须简要指出，它是以何

种方式呈现出这种特点的。中世纪时，在当时盛行的攻守方法体系范围内，所有西方国家对个人军官的教育是很完善的。在围攻和建筑堡垒的技术上，这里也并不缺少具有创造性的发明家。但是战略和战术的发展却受到了军事服役特点和服役期限的阻碍，也受到了贵族野心的阻碍，他们面对敌军时却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并且由于军纪的缺失而导致了一些诸如克雷西和莫佩尔蒂战役的失败。但是，意大利反而是第一个采用雇佣军制度的国家，这要求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早期对火器的引进使战争成为平民的职业，这不仅仅是因为最坚固的城堡也抵御不了轰炸，还因为工程师、枪支建造者和炮兵——这些属于其他阶级而非贵族的人当时在战役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人们感到十分惋惜，个人曾是小而组织良好的兵队的灵魂，可他的价值将在从远处飞来的利炮面前殆尽；并且有些雇佣军队长极尽可能地反对引进，至少在引进德国最新发明的火枪方面是如此。我们知道，当保罗·维特利认可并使用大炮时，会挖掉敌俘火枪手的眼睛，砍掉他们的双手。因为他认为一个英勇的并且可能还是贵族的骑士被一个平凡卑贱的步兵所伤是与身份不相称的。但是总体而言，直到意大利人在防御工事和进攻方面成为全欧洲的教师时，这些新的发明才开始被人们接受和采用。像乌尔比诺的费德里戈和费拉拉的阿方索那样的君主都精通这门技术，这样一比的话就连渊博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也显得浅薄了。比起其他地方，意大利早就有广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在这里，人们第一次由衷地对能干的将才产生了不偏不倚的喜爱，这确实可能是出于党派的时常变换和雇佣军全然不带感情的运作模式引起的。1451年和1452年，在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和雅各布·皮奇尼诺之间爆发了米兰-威尼斯战争时，学者吉安·安东尼奥·波尔切洛·德·潘多尼加入了后者的总部，并奉那不勒斯的阿方索之命撰写关于战争的报告。这篇报道不是用最纯正的拉丁文写成的，但却流畅通顺，颇有当时人文主义夸夸其谈的风格，它以恺撒的《高卢战记》为蓝本，中间穿插着演说词和奇闻轶事之类。在一百年以来，就关于大西庇阿和汉尼拔究竟谁更加伟大这个问题人们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皮奇尼诺在整本书中都必须被叫做西庇阿，而斯福尔扎被叫做汉尼拔。但是关于米兰军队的一些正面消息有时也需报告；这位诡辩家拜访了斯福尔扎，并被带去领检阅了军队，他高度赞扬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并且答应将它记载下来流传后世。除了他的作品，当时意大利的文献中，也有关于战争和战略的丰富记载，它们是写给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以及专家们的，但同时代北方人的记叙，如迪博尔德·席林的《勃艮第战争》，则仍然保留着编年史的平铺直叙、就事论事和枯燥无味的特点。以爱好者身份探讨军事问题的马基雅弗利当时正忙于书写自己的《战争艺术》。但是发生在一对或者更多对战斗者间公开严肃的决斗中，士兵个人的发展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种决斗在著名的《巴列塔挑战》（1503）出现很久前就开始流行了。这些胜利者定会收获来自诗人和学者的歌颂，这种殊荣是北方的勇士们所没有的。这些冲突的胜利不再被看作上天神圣的判断，而被认为是个人能力的胜利，而在旁观者看来，它既是一场激烈的赛事也是一种军队或国家的荣誉。

It is obvious that this purely rational treatment of warlike affairs allowed,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of the worst atrocitie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 strong political hatred, as, for instance, when the plunder of a city had been promised to the troops. After the forty days' devastation of Piacenza, which Sforza was compelled to permit to his soldiers (1447), the town long stood empty, and at last had to be peopled by force. Yet outrages like these were nothing compared with the misery which was afterwards brought upon Italy by foreign troops, and most of all by the Spaniards, in whom perhaps a touch of oriental blood, perhaps familiarity with the spectacles of the Inquisition, had unloosed the devilish element of human nature. After seeing them at work at Prato, Rome and elsewhere, it is not easy to take any interest of the higher sort in Ferdinand the Catholic and Charles V, who knew what these hordes were, and yet unchained them. The mass of documents which are gradually brought to light from the Cabinets of these rulers will always remain an important source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but from such men no fruitful political conception can be looked for.

很明显，即使没有强烈的政治仇恨，这种对战争的纯理性的处理方式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导致最丑陋的暴行，比如允许军队对城市进行掠夺。斯福尔扎曾被迫准许他的士兵对皮亚琴察进行了为期四十天的掠夺（1447年），结果这座城市长期成为空城，最后不得不强迫人民迁入居住。但是这样的暴行比起外国军队，特别是西班牙军队给意大利带来的痛苦是微乎其微的。这些西班牙人或许是看惯了宗教法庭的非人审讯，竟使人类天性中穷凶极恶的成分大为放肆。看过他们在普拉托、罗马及其他地方的行径之后，我们很难对“天主教徒”斐迪南和查理五世的行动产生更多期待，他们知道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劫掠者，然而竟不加以约束。大量文献被慢慢从这些统治者的密室中发现，它们将永远成为重要的史料；但是从这些人身上我们发现不了任何有成果的政治理念。

The Papacy

教皇制度

The papacy and the dominions of the Church are creations of so peculiar a kind that we have hitherto, in determining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Italian states, referred to them only occasionally. The deliberate choice and adaptation of political expedients, which gives so great an interest to the other states, is what we find least of all at Rome, since here the spiritual power could constantly conceal or supply the defects of the temporal. And what fiery trials did this state undergo in the fourteen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hen the papacy was led captive to Avignon! All, at first, was thrown into confusion; but the pope had money, troops and a great statesman and general, the Spaniard Albornoz, who again brought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into complete subjection. The danger of a final dissolution was still greater at the time of the schism, when neither the Roman nor the French pope was rich enough to

reconquer the newly lost state; but this was done under Martin V, after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was restored, and done again under Eugenius IV, when the same danger was renewed. But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was and remained a thorough anomaly among the powers of Italy; in and near Rome itself, the papacy was defied by the great families of the Colonna, Orsini, Savelli and Anguilara; in Umbria, in the Marches and in Romagna, those civic republics had almost ceased to exist, for whose devotion the papacy had showed so little gratitude; their place had been taken by a crowd of princely dynasties, great or small, whose loyalty and obedience signified little. As self-dependent powers, standing on their own merits, they have an interest of their own; and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m have already been discussed.

教皇制度和教会领地是一种特殊的产物，所以到目前为止，在确定意大利国家的一般性质时我们只是偶尔有所涉及。其他国家对政治手段的慎重抉择和采用都怀有极大的兴趣，但是在罗马我们却很少看到，因为在这里宗教权力可以经常掩盖或弥补世俗权力的缺陷。当教皇被诱至阿维尼翁囚禁起来时，这个国家在14世纪和15世纪初经历了怎样激烈的考验啊！一开始，一切都陷入混乱之中；但是教皇有金钱，有军队，还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兼将领，即西班牙人阿尔沃诺斯。他又重新控制了这个教皇国家。在教会分裂时期，罗马教皇和法兰西教皇都没有充分的财力重新恢复失去的国家，教会瓦解的危险更甚于前。但在马丁五世时期教会恢复统一后，这种局面终于结束。同样的困境曾再次出现，但被尤金四世终结。这个教皇国家在意大利各国中历来都显示出它的与众不同；在罗马城及其附近地区，教皇政府遭到了科隆纳、奥尔西尼、萨韦利和安吉拉拉大家族的抵触；而在翁布里亚、马尔凯斯和罗马涅，那些公民共和国所表现出的忠诚并没有得到教皇政府的太多感激，这些共和国几乎不再存在，它们被一些或大或小的君主专制王朝所代替，几乎没有忠诚和服从可言。作为独立存在的政权，它们坚守着自己的优势，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前面我们

已经就其中一些重要的王朝作过相关的讨论。

Nevertheless, a few general remarks on the papacy can hardly be dispensed with. New and strange perils and trials came upon it in the cours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as the political spirit of the nation began to lay hold upon it on various sides, and to draw it within the sphere of its action. The least of these dangers came from the populace or from abroad; the most serious had their ground in the characters of the popes themselves.

尽管如此，仍然需要对教皇政府做一些一般的评论。在15世纪的进程中，它面临着新奇的危险和考验，因为这个民族的政治精神开始从各方面支配它，并且将它吸引进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危险很少来自人民或是国外；最大的危险恰恰来自教皇本身的性格。

Let us, for this moment, leave out of consideration the countries beyond the Alps. At the time when the papacy was exposed to mortal danger in Italy, it neither received nor could receive the slightest assistance either from France, then under Louis XI, or from England, distracted by the Wars of the Roses, or from the then disorganized Spanish monarchy, or from Germany, but lately betrayed at the Council of Basel. In Italy itself there were a certain number of instructed and even uninstructed people whose national vanity was nattered by the Italian character of the papacy;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very many depended on its having and retaining this character; and vast masses of the people still believed in the virtue of the papal blessing and consecration; [1_24] among them notorious transgressors like that Vitellozzo Vitelli, who still prayed to be absolved by Alexander VI, when the pope's son had

him strangled. But all these grounds of sympathy put together would not have sufficed to save the papacy from its enemies, had the latter been really in earnest, and had they known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envy and hatred with which the institution was regarded.

暂且不论阿尔卑斯山彼麓的那些国家，当教皇政府在意大利面临致命的危险时，它没有也可不能获得来自某些国家的帮助，比如路易十一世统治下的法兰西，或正处于玫瑰战争中的英格兰，或是当时秩序混乱的西班牙，或不久前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被出卖的德意志。在意大利，有一些人无论他们接受过教育与否，他们的民族虚荣心因教皇统治的意大利地方性特色而得到满足；并且很多百姓仍然相信教皇祝福和祝圣 [2_23] 的美德；在他们中像维特洛佐·维特利这样臭名昭著的犯人在教皇的儿子将对他处以绞刑时，仍然向亚历山大六世祈求宽恕。但是如果那些与教皇为敌的人真的认真起来并且知道怎样利用人们对于这个制度的嫉妒和仇恨的话，那么这些同情的理由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把教皇从这些敌人手中解救出来。

And at the very time when the prospect of help from without was so small, the most dangerous symptoms appeared within the papacy itself. Living, as it now did, and acting in the spirit of the secular Italian principalities, it was compelled to go through the same dark experiences as they; but its own exceptional nature gave a peculiar color to the shadows.

当从国外获得援助的希望如此渺茫时，教皇制度内部出现了最危险的征象。像它这样按照世俗意大利君主国的精神生存和行事，就会不得不遭受和它们一样黑暗的经历；但是教皇制度本身超乎寻常的性质给这些黑暗的经历带来了一种别样的色彩。

As far as the city of Rome itself is concerned, small account was taken of its internal agitations, so many were the popes who had returned after being expelled by popular tumult, and so greatly did the presence of the Curia minister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Roman people. But Rome not only displayed at times a specific anti-papal radicalism, but in the most serious plots which were then contrived, gave proof of the working of unseen hands from without. It was so in the case of the conspiracy of Stefano Porcari against Nicholas V (1453), the very pope who had done most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city.Porcari aimed at the complete overthrow of the papal authority, and had distinguished accomplices, who, though their names are not handed down to us, are certainly to be looked for among the Italian governments of the time. Under the pontificate of the same man, Lorenzo Valla concluded his famous declamation against the gift of Constantine with the wish for the speedy secularization of the states of the Church. [1_25]

就罗马这个城市本身而言，它内部的骚乱不用太过于重视，有很多教皇在人民动乱驱逐之后又重新回到了罗马，教皇驻扎在罗马非常符合罗马人民的利益。但是罗马有时却展现出特别的反教皇激进主义，而且在当时策划的最严重的阴谋中发现有来自国外隐秘势力的干预。斯特凡诺·波尔卡里谋划推翻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就是这种情况（1453年），而正是这位教皇对罗马城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波尔卡里旨在彻底推翻教皇的统治，他的同谋者中有颇多的名人，虽然他们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一定能在当时意大利各国政府中找到。在这位教皇的任期内，洛伦佐·瓦拉完成了他反对“君士坦丁捐献诏书”著名的演说词，表达了教会 [2_24] 国家可以快速世俗化的愿望。

The Catilinarian gang, with which Pius II had to contend

(1460), avowed with equal frankness their resolution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iests, and its leader, Tiburzio, threw the blame on the soothsayers, who had fixed the accomplishment of his wishes for this very year. Several of the chief men of Rome, the Prince of Taranto and the *condottiere* Jacopo Piccinino were accomplices and supporters of Tiburzio. Indeed, when we think of the booty which was accumulated in the palaces of wealthy prelates—the conspirators had the Cardinal of Aquileia especially in view—we are surprised that, in an almost unguarded city, such attempts were not more frequent and more successful. It was not without reason that Pius II preferred to reside anywhere rather than in Rome, and even Paul II was exposed to no small anxiety through a plot formed by some discharged abbreviators, who, under the command of Platina, besieged the Vatican for twenty days. The papacy must sooner or later have fallen a victim to such enterprises, if it had not stamped out the aristocratic factions under whose protection these bands of robbers grew to a head.

庇护二世不得不与之斗争（1460年）的阴谋团伙也同样直率地表明推翻神职人员统治的决心，他们的领袖蒂布尔齐奥将责任推在预言者身上，因为预言者认为那一年就可以实现他的愿望。罗马的几个主要人物，塔兰托国王以及雇佣军队长雅各布·皮奇尼诺是蒂布尔齐奥的同谋者和拥护者。想想那些在富有的高级教士宫殿中积累的财富，它们竟然被存放在一个无人防守的城市，然而密谋者们尤其将阿奎莱亚红衣大主教作为自己的目标，因此这样窥伺夺取的事几乎没有发生，这的确令人惊讶。庇护二世不喜欢住在罗马是有原因的，甚至保罗二世也因一些撤职的神职人员策划的密谋而感到不安，那些人在普拉蒂纳的命令下，将梵蒂冈包围了二十多天。如果不摧毁那些助长强盗集团兴风作浪贵族派系的话，这些教皇迟早会成为那些人阴谋活动的牺牲品。

This task was undertaken by the terrible Sixtus IV. He was the first pope who had Rome and the neighborhood thoroughly under his control, especially after his successful attack on the House of Colonna, and consequently, both in his Italian policy and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Church, he could venture to act with a defiant audacity, and to set at nought the complaints and threats to summon a Council which arose from all parts of Europe. He supplied himself with the necessary funds by simony, which suddenly grew to unheard-of proportions, and which extended from the appointment of cardinals down to the granting of the smallest favors. Sixtus himself had not obtained the papal dignity without recourse to the same means.

西斯科特四世承担了这一任务。他是第一个将罗马和附近地区完全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教皇，特别是在他击败科隆纳家族之后。随后，无论是在意大利的政策还是在教会的内部事务上，他都敢于以旁若无人的轻蔑态度行事，欧洲各地发出抱怨并威胁召开宗教会议，他却充耳不闻。他通过买卖圣职为自己敛财，钱财数量之大前所未闻，从红衣主教的任命到最小恩惠的授予无所不包。如果不通过这种手段的话，西斯科特他自己也不可能获得教皇的高位。

A corruption so universal might sooner or later bring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on the Holy See, but they lay in the uncertain future. It was otherwise with nepotism, which threatened at one time to destroy the papacy altogether. Of all the *nipoti,* Cardinal Pietro Riario enjoyed at first the chief and almost exclusive favor of Sixtus. He soon drew upon him the eyes of all Italy, partly by the fabulous luxury of his life, partly through the reports which were current of his irreligion and his political plans. He bargained with Duke Galeazzo Maria of Milan (1473) that the latter should become King

of Lombardy, and then aid him with money and troops to return to Rome and ascend the papal throne; Sixtus, it appears, would have voluntarily yielded it to him. This plan, which, by making the papacy hereditary, would have ended in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papal state, failed through the sudden death of Pietro. The second *nipote,* Girolamo Riario, remained a layman, and did not seek the pontificate. From this time the *nipoti,* by their endeavors to found principalities for themselves, became a new source of confusion to Italy. It had already happened that the popes tried to make good their feudal claims on Naples in favor of their relatives! But since the failure of Calixtus III, such a scheme was no longer practicable, and Girolamo Riario, after the attempt to conquer Florence (and who knows how many other places) had failed, was forced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founding a state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papal dominions themselves. This was justifiable in so far as Romagna, with its princes and civic despots, threatened to shake off the papal supremacy altogether, and ran the risk of shortly falling a prey to Sforza or the Venetians, when Rome interfered to prevent it. But who, at times and in circumstances like these, could guarantee the continued obedience of *nipoti* and their descendants, now turned into sovereign rulers, to popes with whom they had no further concern? Even in his lifetime the pope was not always sure of his own son or nephew, and the temptation was strong to expel the *nipote* of a predecessor and replace him with one of his own. The reaction of the whole system on the papacy itself was of the most serious character; all means of compulsion, whether temporal or spiritual, were used without scruple for the most questionable ends, and to these all the other objects of the Apostolic See were made subordinate. And when they were attained, at whatever cost of revolutions and proscriptions, a dynasty was founded which had no stronger interest tha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apacy.

如此普遍的腐败风气早晚会给教廷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这还是将来未知的事情。然而裙带关系就不一样了，它曾一度有毁灭教皇制度的危险。在所有的亲族中，红衣主教彼得罗·里亚里奥首先最受西斯科特的宠爱，几乎是专宠。很快，他就吸引了所有意大利人的眼球，部分是因为他难以置信的奢华生活，部分是因为当时流传着他不信宗教和他的政治阴谋的消息。彼得罗·里亚里奥与米兰的加莱亚佐·马里亚公爵约定（1473年）：后者应该成为伦巴第的国王，然后用金钱和军队帮助彼得罗回到罗马登上教皇的宝座，并让西斯科特看起来好像自愿让位给他。这个计划要使教皇职位变成世袭，其结果必将使教皇国世俗化，然而它却因彼得罗的突然离世而失败。第二位“亲族”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一直是普通信徒，未曾觊觎教皇之位。从那时开始，那些族亲们试图建立自己的公国，这就成为了意大利混乱的根源。以前教皇们为了支持自己的亲族就曾试图向那不勒斯提出建立封建国家以作为报偿。但是自从加里斯都三世失败后，这种计划就不再具有实践意义了，而吉罗拉莫·里亚里奥试图占领佛罗伦萨（谁知道还有多少其他地方）失败后，不得不在教皇领地内建立一个国家聊以自慰。对于罗马涅来说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它的君主和城市暴君们威胁要摆脱教皇的统治，并且当罗马进行干预阻碍时，他们有可能变成斯福尔扎或者威尼斯人的受害者。但是在像这样的时候和情况下，因为对教皇没有进一步的顾虑，一旦“亲族”及其后人成为与教皇没有太大关系的君主，谁又能够保证他们对教皇的服从呢？教皇甚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也并不总是信任自己的子侄，驱逐前任教皇的亲族而让自己的子侄取而代之的想法是强烈的。整个体系对教皇体制的影响极为严重；人们为了私利而不加顾虑地使用一切世俗或精神的强制手段，而教皇的其他目标与这些人的私利相比成了次要的。他们以革命、放逐或其他任何代价达到目的时，就会建立起一个以摧毁教皇统治为最高利益的王朝。

At the death of Sixtus, Girolamo was only able to maintain himself in his usurped principality of Forli and Imola by the utmost exertions of his own, and by the aid of the House of Sforza, to

which his wife belonged.In the conclave (1484) which followed the death of Sixtus—that in which Innocent VIII was elected—an incident occurred which seemed to furnish the papacy with a new external guarantee. Two cardinals, who, at the same time, were princes of ruling houses, Giovanni d'Aragona, son of King Ferrante, and Ascanio Sforza, brother of the Moor, sold their votes with the most shameless effrontery; so that, at any rate, the ruling houses of Naples and Milan became interested, by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booty, in the continuance of the papal system. Once again, in the following conclave, when all the cardinals but five sold themselves, Ascanio received enormous sums in bribes, but without cherishing the hope that at the next election he would himself be the favored candidate.

西斯科特死时，吉罗拉莫只能凭自己的力量和来自妻子所属的斯福尔扎家族的帮助来维持自己从福尔利和伊莫拉手上篡夺过来的公国。在西斯科特死后的选举会议（1484年）——因诺森特八世当选的那次会议——发生了似乎能够给教皇制度崭新的外部保障的事件。两个红衣主教同时都是统治家族的王子，阿拉贡的乔瓦尼是费兰特国王的儿子，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是摩尔的兄弟，他们极端厚颜无耻，售卖了自己的选票；因此，由于维持教皇制度能够使他们继续参与分赃，那不勒斯和米兰的统治家族都对继续维持教皇制度产生了兴趣。在下届的教皇选举会议中，只有五名红衣主教没有出卖他们自己的选票，阿斯卡尼奥又一次收到了大量的贿赂，并希望自己在下一次选举中成为最有优势的候选人。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for his part, was anxious that the House of Medici should not be sent away with empty hands. He married his daughter Maddalena to the son of the new pope—the first who publicly acknowledged his children—Franceschetto Cybo,

and expected not only favors of all kinds for his own son, Cardinal Giovanni, afterwards Leo X, but also the rapid promotion of his son-in-law. But with respect to the latter, he demanded impossibilities. Under Innocent VIII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for the audacious nepotism by which states had been founded, since Franceschetto himself was a poor creature who, like his father the pope, sought power only for the lowest purpose of all—the acquisi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money. The manner, however, in which father and son practiced this occupation must have led sooner or later to a final catastrophe—the dissolution of the state. If Sixtus had filled his treasury by the sale of spiritual dignities and favors, Innocent and his son, for their part, established an office for the sale of secular favors, in which pardons for murder and manslaughter were sold for large sums of money. Out of every fine 150 ducats were paid into the papal exchequer, and what was over to Franceschetto. Rome,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is pontificate, swarmed with licensed and unlicensed assassins; the factions, which Sixtus had begun to put down, were again as active as ever; the pope, well guarded in the Vatican, was satisfied with now and then laying a trap, in which a wealthy misdoer was occasionally caught. For Franceschetto the chief point was to know by what means, when the pope died, he could escape with well-filled coffers. He betrayed himself at last, on the occasion of a false report (1490) of his father's death; he endeavored to carry off all the money in the papal treasury, and when this proved impossible, insisted that, at all events, the Turkish prince, Djem, should go with him, and serve as a living capital, to be advantageously disposed of, perhaps to Ferrante of Naples. It is hard to estimate the political possibilities of remote periods, but we cannot help asking ourselves the question, if Rome could have survived two or three pontificates of this kind. Even with reference to the believing countries of Europe, it was imprudent to let matters go so far that not only travelers and

pilgrims, but a whole embassy of Maximilian, King of the Romans, were stripped to their shirt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Rome, and that envoys had constantly to turn back without setting foot within the city.

伟大的洛伦佐唯恐美第奇家族会空手而归。他把自己的女儿玛达莱娜嫁给了新教皇的儿子弗兰切斯齐托·奇博，这位教皇是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有儿女的教皇，他不仅希望为自己的儿子（红衣主教乔瓦尼，也就是后来的利奥十世）获得种种好处，也希望自己的女婿可以得到快速升迁。但是对于后者，他的希望不可能实现。在因诺森特八世的统治下，那些胆大妄为想要建立国家的亲族已无机可乘，因为弗兰切斯齐托，像他的教皇父亲一样，是一个可怜的人，他们寻求权力仅仅是为了达到获得和积累财富这一卑贱的目的。然而这对父子从事这种勾当的行径早晚必会招致教皇国家的解体。如果说西斯科特是通过售卖宗教高职或者恩惠来充实自己的财库的话，因诺森特和他的儿子可以说是成立了一个出售世俗恩惠的办事处，在那里以高价出卖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的特赦。每一笔罚金中有150达克特归入教皇的国库，其余那些归弗兰切斯齐托所有。在这位教皇任期的后半阶段，罗马城内云集了大量刺客；西斯科特曾经镇压的派系又开始死灰复燃；而教皇在梵蒂冈受到森严警卫的保护，并时不时设下陷阱，以抓住一个富有的行为不轨者为乐。对弗兰切斯齐托而言，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掌握教皇逝世时能够携着满满的金库逃跑的方法。终于，他在听到关于父亲死亡的误报时（1490年）暴露了本性，企图抢走教皇国库里的所有金钱，而当这件事显然不可能实现时，他坚持无论如何土耳其王子杰姆都应该和他一起逃跑，这样他可以将这位王子作为活的资本，以备有利出卖，也许是卖给那不勒斯的费兰特。我们很难推测古时的政治可能性，但是不禁要自问，经过这两三任教皇的统治之后，罗马是否能够残存下去。甚至是对于欧洲那些有宗教信仰的国家而言，让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也是非常轻率的，当时不仅游客和朝圣者，就连罗马国王和马克西米利安的整个使团都在罗马附近被剥得只剩了衬衫，那些大使们经常还没踏足城内就被迫返回了。

Such a condition of things w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conception of power and its pleasures which inspired the gifted Alexander VI (1492-1503), and the first event that happened was the restoration, at least provisionally, of public order, and the punctual payment of every salary.

这种情况正好与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对权力的概念和喜爱相悖，所以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公共秩序——即便是短暂的恢复，以及准时发放所有薪金。

Strictly speaking, as we are now discussing phases of Italian civiliza¬tion, this pontificate might be passed over, since the Borgias are no more Italian than the House of Naples. Alexander spoke Spanish in public with Cesare; Lucrezia, at her entrance to Ferrara, where she wore a Spanish costume, was sung to by Spanish buffoons; their confidential servants consisted of Spaniards, as did also the most ill-famed company of the troops of Cesare in the war of 1500; and even his hangman, Don Micheletto, and his poisoner, Sebastian Pinzon Cremonese, seem to have been of the same nation. Among his other achievements, Cesare, in true Spanish fashion, kill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craft, six wild bulls in an enclosed court. But the Roman corruption, which seemed to culminate in this family, was already far advanced when they came to the city.

严格地来说，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意大利的文化状况，因为波吉亚家族和那不勒斯家族一样不是意大利人，所以这一任教皇可以略去不谈。亚历山大当众和切萨雷·波吉亚用西班牙语交谈；卢克雷齐娅在进

入费拉拉时身着西班牙服饰，并受到西班牙优伶的歌唱欢迎；他们的心腹侍从也是由西班牙人构成的，参加1500年战争的切萨雷军队中最声名狼藉的士兵也是西班牙人；甚至他的绞刑官，唐·米凯莱托和他的毒杀者塞巴斯蒂安·平松·克雷莫内塞也似乎来自西班牙。切萨雷的成就之一，就是他曾以地道的西班牙的方式，在一个围起来的圈子里，按照斗牛的方式杀死了六头野牛。但是，在这个家族里看起来已登峰造极的罗马式的腐败在他们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

What they were and what they did has been often and fully described. Their immediate purpose, which, in fact, they attained, was the complete subjugation of the pontifical state. All the petty despots, who were mostly more or less refractory vassals of the Church, were expelled or destroyed; and in Rome itself the two great factions were annihilated, the so-called Guelph Orsini as well as the so-called Ghibelline Colonna. But the means employed were of so frightful a character that they must certainly have ended in the ruin of the papacy, had not the contemporaneous death of both father and son by poison suddenly intervened to alter the whole aspect of the situation. The moral indignation of Christendom was certainly no great source of danger to Alexander; at home he was strong enough to extort terror and obedience; foreign rulers were won over to his side, and Louis XII even aided him to the utmost of his power. The mass of the people throughout Europe had hardly a conception of what was passing in Central Italy. The only moment which was really fraught with danger—when Charles VIII was in Italy—went by with unexpected fortune, and even then it was not the papacy as such that was in peril, but Alexander, who risked being supplanted by a more respectable pope. [1_26] The great, permanent and increasing danger for the papacy lay in Alexander himself, and, above all, in his son Cesare Borgia.

他们常常详尽地描述着自己的身份和功绩。他们直接的目的就是对教皇国的完全征服，事实上他们已经做到了。所有小的暴君，或多或少都是教廷的不安分的臣属，他们或被驱除或被毁灭；罗马的两个大的派系——所谓的归尔甫·奥尔西尼和吉伯林·科隆纳已经被消灭。但是采用的手段非常地可怕，如果没有父子同时被毒杀事件的突然干预改变整个局势的话，这些手段必定导致教皇政权的毁灭。对于亚历山大而言，基督教国家的义愤并不是危险的主要来源；在国内他有足够的力量使人们恐惧和臣服，国外很多统治者都站在他的立场上，路易十二世甚至还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他施以援助。欧洲的百姓们对于在中部意大利发生着什么一无所知。唯一真正充满危险的时刻是当查理八世在意大利时，他却以意想不到的幸运躲过一劫，而在那时并不是教皇这类人处在危险之中，而是亚历山大有被一个更加受人尊敬的教皇 [2_25] 替代的危险。教皇政权最大的且日益增长的长期危险来自亚历山大本人和他的儿子切萨雷·波吉亚。

In the nature of the father, ambition, avarice and sensuality were combined with strong and brilliant qualities. All the pleasures of power and luxury he granted himself from the first day of his pontificate in the fullest measure. In the choice of means to this end he was wholly without scruple; it was known at once that he would more than compensate himself for the sacrifices which his election had involved, [1_27] and that the simony of the seller would far exceed the simony of the buyer.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the vice-chancellorship and other offices which Alexander had formerly held had taught him to know better and turn to more practical account the various sources of revenue than any other member of the Curia. As early as 1494, a Carmelite, Adam of Genoa, who had preached at Rome against simony, was found murdered in his bed with twenty wounds. Hardly a single cardinal was appointed without the payment of enormous sums of money.

亚历山大的本性是野心、贪婪、肉欲和强大杰出的品质相融合的产物。从他任职的那一天起就沉湎于权力和奢侈的享乐。而为了这些，他没有丝毫顾虑手段方法；人们立刻就知道他会更多地补偿自己在选举时付出的牺牲， [2_26] 他卖出的圣职远远超过了买进的圣职。有一点要记得，亚历山大曾担任过副财政大臣和其他的一些职务，因此对于各种收入来源他比教廷其他成员更清楚，而且还能有效地加以利用。早在1494年，一个加尔默罗会修道士——热那亚的亚当，在罗马鼓吹反对出售圣职，后来被人谋杀在床上，受伤二十多处。几乎没有一个红衣主教不是在支付大笔钱款后被任命的。

But when the pope in course of time fel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s son Cesare Borgia, his violent measures assumed that character of devilish wickedness which necessarily reacts upon the ends pursued. What was done in the struggle with the Roman nobles and with the tyrants of Romagna exceeded in faithlessness and barbarity even that measure to which the Aragonese rulers of Naples had already accustomed the world; and the genius for deception was also greater. The manner in which Cesare isolated his father, murdering brother, brother-in-law and other relations or courtiers, whenever their favor with the pope or their position in any other respect became inconvenient to him, is literally appalling. Alexander was forced to acquiesce in the murder of his best-loved son, the Duke of Gandia, since he himself lived in hourly dread of Cesare.

但是当教皇逐渐受到其子切萨雷·波吉亚的影响，他的暴力措施就呈现出一种穷凶极恶的性质，而这种性质必然反映在他所追求的目标上。在同罗马贵族和罗马涅暴君的斗争中，其不信不义和野蛮程度甚至超过了那不勒斯阿拉贡的统治者；他采用的欺骗手段也是非常高明的。一旦教皇对人们的宠信或在其他方面对他不利时，切萨雷就会采

取令人震惊的方式来处理，比如鼓励自己的父亲，谋杀自己的兄弟、姐夫和其他的亲戚或廷臣。亚历山大被迫默然接受他最喜欢的儿子甘迪亚大公被刺杀的事实，因为他自己也时刻生活在对切萨雷的恐惧之中。

What were the final aims of the latter? Even in the last months of his tyranny, when he had murdered the *condottieri* at Sinigaglia, and was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master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1503), those who stood near him gave the modest reply that the duke merely wished to put down the factions and the despots, and all for the good of the Church only; that for himself he desired nothing more than the lordship of the Romagna, and that he had earned the gratitude of all the following popes by riding them of the Orsini and Colonna. But no one will accept this as his ultimate design. The Pope Alexander himself, in his discussions with the Venetian ambassador, went further than this, when committing his son to the protection of Venice: 'I will see to it,' he said, 'that one day the papacy shall belong either to him or to you.' Cesare certainly added that no one could become pop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Venice, and for this end the Venetian cardinals had only to keep well together. Whether he referred to himself or not we are unable to say; at all events, the declaration of his father is sufficient to prove his designs on the pontifical throne. We further obtain from Lucrezia Borgia a certain amount of indirect evidence, in so far as certain passages in the poems of Ercole Strozza may be the echo of expressions which she as Duchess of Ferrara may easily have permitted herself to use. Here, too, Cesare's hopes of the papacy are chiefly spoken of; but now and then a supremacy over all Italy is hinted at, and finally we are given to understand that as temporal ruler Cesare's projects were of the greatest, and that for their sake he had formerly surrendered his cardinalate. In fact, there can be no

doubt whatever that Cesare, whether chosen pope or not after the death of Alexander, meant to keep possession of the pontifical state at any cost, and that this, after all the enormities he had committed, he could not as pope have succeeded in doing permanently. He, if anybody, could have secularized the States of the Church, and he would have been forced to do so in order to keep them. Unless we are much deceived, this is the real reason of the secret sympathy with which Machiavelli treats the great criminal; from Cesare, or from nobody, could it be hoped that he 'would draw the steel from the wound', in other words, annihilate the papacy—the source of all 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of all the divisions of Italy. The intriguers who thought to divine Cesare's aims, when holding out to him hopes of the kingdom of Tuscany, seem to have been dismissed with contempt.

切萨雷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即使在他暴君统治的最后几个月，那时他已经在西尼加利亚谋杀了雇佣军队长，成为教皇国实际的主人（1503年），他的近臣给人以谦虚的回答：大公只是希望可以平服那些反对党和暴君们，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教会的利益；对于大公本人而言，除了对罗马涅的统治权之外别无所求，而且通过除掉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两大家族他已经获得了后继教皇们的感激。但是没有人相信这会是切萨雷的最终目标。教皇亚历山大本人在和威尼斯大使的谈话中，想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威尼斯保护，当时他就预料到这一点。他说："我会留心的，有一天教皇的宝座要么是你的，要么就是他的。"切萨雷当然会补充道，没有威尼斯的同意没有人可以成为教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威尼斯的红衣主教们只能团结在一起。我们很难说切萨雷说的是否是自己；无论如何他父亲的话足以证明他对教皇宝座的垂涎。我们从卢克雷齐娅·波吉亚那儿可以得到一些间接的证据，那就是在埃尔科莱·斯特罗扎诗歌的一些段落中可以反映出作为费拉拉的女公爵她可以自由使用某些表达；其中也主要谈及了切萨雷对教皇宝座的期望；但是时不时也表明切萨雷对于整个意大利至高无上

权力的觊觎，到最后我们明白在世俗的统治者中切萨雷的计划是最伟大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放弃了先前自己枢机主教一职。事实上，在亚历山大死后，无论切萨雷是否被选为教皇，他也无疑将不惜任何代价来占有这个教皇国，而在他犯下种种重大罪行后，也无疑不可能以教皇的身份继续占有下去。如果有人可以将这些教皇国家世俗化的话，那么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保住它们，他必将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这样行事。除非我们被深深地欺骗，否则这就是马基雅弗利对待这个重大罪犯抱有隐秘同情的真实原因；除了切萨雷外，我们不能希望任何人可以“从伤者身上抽出刀来”，换言之，消除教皇制度——外国干预和全意大利分裂的根源。当那些揣测切萨雷目的的阴谋家们向他表达托斯卡纳王国的希望时，似乎被轻蔑地斥退了。

But all logical conclusions from his premises are idle, not because of the unaccountable genius which in fact characterized him as little as it did Wallenstein, [1_28] but because the means which he employed were not compatible with any large and consistent course of action. Perhaps, indeed, in the very excess of his wickedness some prospect of salvation for the papacy may have existed even without the accident which put an end to his rule.

但是从对切萨雷的假设中推理出的任何结论都是无效的，这不是因为他拥有非凡的天赋，事实上他的天赋之少就和华伦斯坦 [2_27] 一样，而是因为他采用的手段与其大型且持续的行动方针不相符。确实，即使没有发生结束他统治的意外事件，在他的极端的邪恶中也存在着教皇政权得救的希望。

Even if we assume tha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etty despots in the pontifical state had gained for him nothing but sympathy, even if we take as proof of his great projects the army, composed of the

best soldiers and officers in Italy, with Leonardo da Vinci as chief engineer, which followed his fortunes in 1502, other facts nevertheless wear such a character of unreason that our judgement, like that of contemporary observers, is wholly at a loss to explain them. One fact of this kind is the devastation and maltreatment of the newly won state, which Cesare still intended to keep and to rule over. Another is the condition of Rome and of the Curi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pontificate. Whether it were that father and son had drawn up a formal list of proscribed persons, or that the murders were resolved upon one by one, in either case the Borgias were bent on the secret destruction of all who stood in their way or whose inheritance they coveted. Of this money and movable goods formed the smallest part; it was a much greater source of profit for the pope that the incomes of the clerical dignitaries in question were suspended by their death, and that he received the revenues of their offices while vacant, and the price of these offices when they were filled by the successors of the murdered men. The Venetian ambassador Paolo Capello announces in the year 1500: 'Every night four or five murdered men are discovered—bishops, prelates and others—so that all Rome is trembling for fear of being destroyed by the duke (Cesare).' He himself used to wander about Rome in the night-time with his guards, and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he did so not only because, like Tiberius, he shrank from showing his now repulsive features by daylight, but also to gratify his insane thirst for blood, perhaps even on the persons of those unknown to him.

即使我们认为在教皇国中消灭小暴君会帮他获得同情，即使我们认为那支由意大利的精锐官兵组成、有列奥纳多·达·芬奇作为总机械设计师、在1502年和他同命运的军队是他远大计划的证明，但其他事实仍然具有不合理的性质，因此和当时的观察者们一样，我们很难对

其进行解释。这类事实的其中之一就是，对刚刚攻占的城市切萨雷仍然想予以保持和统治，但却又加以破坏和虐待。另外一个就是教皇任期最后几年罗马和教廷的情况。无论他们父子是否曾列出了一张要处死人的正式名单，或是那些谋杀的决定是一个一个分别做出的，任何一种情形都说明了波吉亚父子一心想秘密地消灭那些妨碍他们，以及遗产被他们垂涎的人。现金和动产只是这笔遗产的最小一部分；教皇利益的更大来源是：对被处死的教会高级教士会停发俸禄，而在职位空缺期间该项俸禄归教皇所有，另外当有人接替这些被害者的职位时教皇还可以得到一笔入职贿赂金。威尼斯大使保罗·卡佩洛在1500年宣称："每夜都会发现四五个被谋杀的人，其中有主教、高级教士等人，因此整个罗马都战战兢兢，惧遭公爵（切萨雷）的毒手。"他自己经常在夜间带着卫兵在罗马城内游荡，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他像提比略一样不想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看到自己的可憎容貌，也是因为要满足他对杀戮的疯狂渴望，他甚至会杀害自己不认识的人。

As early as the year 1499 the despair was so great and so general that many of the papal guards were waylaid and put to death. But those whom the Borgias could not assail with open violence fell victims to their poison. For the cases in which a certain amount of discretion seemed requisite, a white powder of an agreeable taste was made use of, which did not work on the spot, but slowly and gradually, and which could be mixed without notice in any dish or goblet. Prince Djem had taken some of it in a sweet draught, before Alexander surrendered him to Charles VIII (1495), and at the end of their career father and son poisoned themselves with the same powder by accidentally tasting a sweetmeat intended for a wealthy cardinal. The official epitomizer of the history of the popes, Onofrio Panvinio, mentions three cardinals, Orsini, Ferrerio and Michiel, whom Alexander caused to be poisoned, and hints at a fourth, Giovanni Borgia, whom Cesare took into his own charge—

though probably wealthy prelates seldom died in Rome at that time without giving rise to suspicions of this sort. Even tranquil scholars who had withdrawn to some provincial town were not out of reach of the merciless poison. A secret horror seemed to hang about the pope; storms and thunderbolts, crushing in walls and chambers, had in earlier times often visited and alarmed him; in the year 1500, when these.phenomena were repeated, they were held to be *cosa diabolica.* The report of these events seems at last, through the well-attended jubilee of 1500, to have been carried far and wide throughout the countries of Europe, and the infamous traffic in indulgences did what else was needed to draw all eyes upon Rome. Besides the returning pilgrims, strange white-robed penitents came from Italy to the North, among them disguised fugitives from the papal state, who are not likely to have been silent. Yet none can calculate how far the scandal and indignation of Christendom might have gone before they became a source of pressing danger to Alexander. 'He would,' says Panvinio elsewhere, 'have put all the other rich cardinals and prelates out of the way, to get their property, had he not, in the midst of his great plans for his son, been struck down by death.' And what might not Cesare have achieved if, at the moment when his father died, he had not himself been laid upon a sickbed! What a conclave would that have been, in which, armed with all his weapons, he had extorted his election from a college whose numbers he had judiciously reduced by poison—and this at a time when there was no French army at hand! In pursuing such a hypothesis the imagination loses itself in an abyss.

早在1499年，绝望就如此之大如此之普遍，甚至教皇的很多卫兵遭到伏击和杀戮。而波吉亚父子不能公开袭击的人则往往遭到他们的毒杀。这种事情需要谨慎进行，他们使用了一种白色的具有怡人味道的粉末，这种粉末可以掺到菜肴或酒类中而不被发现且不会当场产生

作用，但会缓慢、逐渐地置人于死地。在亚历山大将王子杰姆交给查理八世（1495年）之前，这位王子已经在甜酒中尝了一口。在波吉亚父子统治末期，他们意外地品尝了为一个富有的红衣主教准备的有毒甜食而将他们自己毒死。教皇的摘录史官奥诺弗里奥·潘维尼奥提及了三位被亚历山大毒死的红衣主教，奥尔西尼、费雷里奥和米契尔，并且暗示还有第四位，即切萨雷准备自己动手的乔瓦尼·波吉亚——当时富有的高级教士死在罗马而不引起这方面怀疑的情况很少。甚至那些退居到其他乡下城镇的一些安静学者也难逃无情的毒杀。一种隐秘的恐惧似乎笼罩在教皇周围；早些时候，经常风雨大作，宫墙和卧房中的动静会使他受到惊吓；1500年，当这些现象再次发生时，人们就认为那是“魔鬼的故事”。最后关于这些事情的传说通过1500年的大赦年纪念盛典而在全欧洲得到广泛和深远的传播，声名狼藉的赎罪券交易足以引起全欧洲对罗马的注意了。除了归来的朝圣者，一些陌生的白袍忏悔者从意大利来到北方，其中一些是来自教皇国的逃亡者，他们是不太可能保持沉默的。在基督教界的这种愤慨和恼怒变成亚历山大迫在眉睫的危险根源前，没人能够估量它们到底将发展到何种程度。潘维尼奥在其他的地方说过：“如果没有在为自己儿子策划巨大阴谋的中途死去的话，他一定会除掉那些富有的红衣主教和高级教士，并获得他们的财产。”如果切萨雷不是在他父亲死时卧病在床，有什么事是他办不到的！当时没有法国军队在旁，而他拥有一切手段以勒令由于他的毒杀而人数减少的教皇选举团，那将是一个怎样的教会选举呢！在做这种假设时，结论简直不敢设想。

Instead of this followed the conclave in which Pius III was elected, and, after his speedy death, that which chose Julius II—both elections the fruits of a general reaction.

取而代之的是庇护三世当选的那次教皇选举会议，在他很快去世后，就是选举朱利叶斯二世的会议——两次选举都是普遍反动的结果。

Whatever may have been the private morals of Julius II, in all essential respects he was the saviour of the papacy. His familiarity with the course of events since the pontificate of his uncle Sixtus had given him a profound insight into the grounds and conditions of the papal authority. On these he founded his own policy, and devoted to it the whole force and passion of his unshaken soul. He ascended the steps of St Peter's chair without simony and amid general applause, and with him ceased, at all events, the undisguised traffic in the highest offices of the Church. Julius had favorite, and among them were some the reverse of worthy, but a special fortune put him above the temptation to nepotism. His brother, Giovanni della Rovere, was the husband of the heiress of Urbino, sister of the last Montefeltro Guidobaldo, and from this marriage was born, in 1491, a son, Francesco Maria della Rovere, who was at the same time papal *nipote* and lawful heir to the duchy of Urbino. What Julius elsewhere acquired, either on the field of battle or by diplomatic means, he proudly bestowed on the Church, not on his family; the ecclesiastical territory, which he found in a state of dissolution, he bequeathed to his successor completely subdued, and increased by Parma and Piacenza. It was not his fault that Ferrara too was not added to the dominions of the Church. The 700,000 ducats which were stored up in the Castel Sant' Angelo were to be delivered by the governor to none but the future pope. He made himself heir of the cardinals, and, indeed, of all the clergy who died in Rome, and this by the most despotic means; but he murdered or poisoned none of them. [1_29] That he should himself lead his forces to battle was for him an unavoidable necessity, and certainly did him nothing but good at a time when a man in Italy was forced to be either hammer or anvil, and when personality was a greater power than the most indisputable right. If, despite all his high-sounding 'Away with the barbarians!' he nevertheless

contributed more than any man to the firm settlement of the Spaniards in Italy, he may have thought it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to the papacy, or even, as things stood, a relative advantage. And to whom, sooner than to Spain, could the Church look for a sincere and lasting respect, in an age when the princes of Italy cherished none but the sacrilegious projects against her? Be this as it may, the powerful, original nature, which could swallow no anger and conceal no genuine good-will, made on the whole the impression most desirable in his situation—that of the *pontefice terribile.* [1_30] He could even, with a comparatively clear conscience, venture to summon a Council to Rome, and so bid defiance to that outcry for a Council which was raised by the opposition all over Europe. A ruler of this stamp needed some great outward symbol of his conceptions; Julius found it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t Peter's. The plan of it, as Bramante wished to have it, is perhaps the grandest expression of power in unity which can be imagined. In other arts besides architecture the face and the memory of the pope live on in their most ideal form, and it is not without significance that even the Latin poetry of those days gives proof of a wholly different enthusiasm for Julius than that shown for his predecessors. The entry into Bologna, at the end of the *Iter Julii Secundi,* by the Cardinal Adriano da Corneto, has a splendor of its own, and Giovan Antonio Flaminio, in one of the finest elegies, appealed to the patriot in the pope to grant his protection to Italy.

不管朱利叶斯二世个人道德如何，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他都是教皇制度的救星。他对叔父西斯科特任职教皇以来事件的熟悉使他对教皇制度的基础和情况有着深刻的认识。基于这些，他形成了自己的政策，并以自己全部的力量和坚定不移的气魄投入其中。朱利叶斯二世没有买卖圣职就在掌声中坐上了教皇的宝座，并且在他的任期内结束了教会高级职务的公开买卖。朱利叶斯有一些特别偏倚的人，在他们

中有一些是不值一提的，但是一种特殊的运气使他没有受到裙带关系的诱惑。他的兄弟乔瓦尼·德拉·诺维是乌尔比诺女继承人的丈夫，女继承人是蒙泰费尔特罗家族的最后一代，圭多巴尔多的妹妹。结婚后他们在1491年生下儿子弗朗西斯科·马里亚·德拉·诺维，他既是教皇的侄子同时也是乌尔比诺公爵之位的合法继承人。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通过外交手段获得的成果，朱利叶斯都会骄傲地赠与教会而非自己的家族；他完全平服了濒于解体的教会领土，将它遗留给自己的后任，并新增加了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两块领地。没有将费拉拉划入教会的领地不是他的错误。而储藏在圣安吉洛城堡中的70万达克特将由地方长官移交给未来的教皇。他使自己成为所有红衣主教的，实际上也是所有死在罗马的教士的财产继承人，但是他没有谋杀或毒杀任何一人。[2_28] 当一个人在意大利处在不为刀俎则为鱼肉的时代，当个性比不容置疑的权利更具有力量的时代，他必须带领着军队驰骋沙场，于他而言这是不容避免的义务，而这种做法给他带来的自然只有好处。如果说，他曾经大声疾呼“把野蛮人赶出去！”却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帮助了西班牙人在意大利的稳定驻扎，那么大概他认为对教皇而言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或者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是件有利的事情。在意大利君主们一心策划亵渎神明反对教会的时代里，教会可以从谁那里寻求比西班牙更真诚和持久的尊敬呢？尽管这样，这位喜怒形于色的教皇由于其强有力的性格给人独特的印象——“好厉害的教皇” [2_29] ，而这种印象对他的地位十分有利。他甚至敢于问心无愧地在罗马召开一个宗教大会，以此来蔑视由全欧洲的反对派提出的抗议召开宗教大会的喧嚷。这种类型的统治者需要一些伟大的外部符号来作为他的象征；而朱利叶斯在圣彼得教堂的重建上找到了这个征象。正如布拉曼特所希望的，它的设计也许是人们所能设想到的统一权力的最伟大的表现。除了建筑，在其他艺术方面，这位教皇的面貌和记忆也以最理想的形式被保存了下来，甚至当时的拉丁诗歌对朱利叶斯也表现出了一种与对其前任教皇完全不同的热情，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红衣主教阿德里亚诺·达·科尔内托在他的《朱利叶斯二世的旅程》一诗的结尾描述了朱利叶斯进入博洛尼亚城的雄伟之景，焦万·安东尼奥·弗拉米尼奥在他最出色的一首挽歌中曾向这位教皇呼吁发扬他的爱国者精神给予意大利以保护。

In a constitution of his Lateran Council, Julius had solemnly denounced the simony of the papal elections. After his death in 1513, the money-loving cardinals tried to evade the prohibition by proposing that the endowments and offices hitherto held by the chosen candidate should be equally divided among themselves, in which case they would have elected the best-endowed cardinal, the incompetent Raphael Riario. But a reaction, chiefly arising from the younger members of the Sacred College, who, above all things, desired a liberal pope, rendered the miserable combination futile; Giovanni Medici was elected—the famous Leo X.

在拉特兰会议的一篇谕令中，朱利叶斯庄严地宣布通过买卖圣职获得教皇选举是无效的。在他1513年死后，见钱眼开的红衣主教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议案：选定候选人拥有的钱财和官职也应该公平地在他们当中分配，他们想通过此方法来逃避这项禁令，在这个主张下他们选出了拥有最多产权的红衣主教——没有才能的拉斐尔·里亚里奥。但是由于罗马教廷红衣主教团中的年轻成员的反对才使这个卑鄙的计划失败，因为他们要求选出一位宽宏豁达的教皇；结果乔瓦尼·美第奇——就是那个著名的利奥十世当选了。

We shall often meet with him in treating of the noonday of the Renaissance; here we wish only to point out that under him the papacy was again exposed to great inward and outward dangers. Among these we do not reckon the conspiracy of the Cardinals Petrucci, De Saulis, Riario and Corneto (1517), which at most could have occasioned a change of persons, and to which Leo found the true antidote in the unheard-of creation of thirty-one new cardinals, a measure which had the additional advantage of rewarding, in some cases at least, real merit.

我们在讨论文艺复兴全盛期时会经常谈及这位教皇；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他的统治下教皇政权再度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危险。在这些危险中我们还没有将红衣主教彼得鲁奇、德·绍利斯、里亚里奥和科尔内托的阴谋考虑进去，因为这些最多也只能引起人事的变化，利奥前所未闻地任命三十一个新红衣主教，因为他发现这才是真正有效的应对方法，而这个措施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奖优的附带好处。

But some of the paths which Leo allowed himself to tread during the first two years of his office were perilous to the last degree. He seriously endeavored to secure, by negotiation, the kingdom of Naples for his brother Giuliano, and for his nephew Lorenzo a powerful North Italian state, to comprise Milan, Tuscany, Urbino and Ferrara. It is clear that the pontifical state, thus hemmed in on all sides, would have become a mere Medicean appanage, and that, in fact,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further need to secularize it.

但是在里奥任职的前两年，他采取的一些措施是非常危险的。他非常努力地想通过谈判的方式为自己的兄弟朱利亚诺得到那不勒斯王国，并且为他的侄子洛伦佐建立一个有实力的意大利北部国家，包括米兰、托斯卡纳、乌尔比诺和费拉拉。很显然，这个教皇国会被包围起来，因此必将成为一个美第奇家族的属国，而没有进一步世俗化的必要了。

The plan found an insuperable obstacle in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the time. Giuliano died early. To provide for Lorenzo, Leo undertook to expel the Duke Francesco Maria della Rovere from Urbino, but reaped from the war nothing but hatred and poverty,

and was forced, when in 1519 Lorenzo followed his uncle to the grave, to hand over the hard-won conquests to the Church. He did on compulsion and without credit what, if it had been done voluntarily, would have been to his lasting honor. What he attempted against Alfonso of Ferrara, and actually achieved against a few petty despots and *condottieri,* was assuredly not of a kind to raise his reputation. And this was at a time when the monarchs of the West were yearly growing more and more accustomed to political gambling on a colossal scale, of which the stakes were this or that province of Italy. Who could guarantee that, since the last decades had seen so great an increase of their power at home, their ambition would stop short of the States of the Church? Leo himself witnessed the prelude of what was fulfilled in the year 1527; a few bands of Spanish infantry appeared—of their own accord, it seems—at the end of 1520, on the borders of the pontifical territory, with a view of laying the pope under contribution, but were driven back by the papal forces. The public feeling, too, against the corruptions of the hierarchy had of late years been drawing rapidly to a head, and men with an eye for the future, like the younger Pico della Mirandola, called urgently for reform. Meantime Luther had already appeared upon the scene.

这个计划在当时遭到了很难克服的政治阻碍。朱利亚诺很早就去世了。为了给洛伦佐进行准备，利奥着手把弗朗西斯科·马里亚·德拉·诺维大公从乌尔比诺驱逐出去，但是他从战争中得到的仅仅是仇恨和贫穷。1519年洛伦佐追随他的叔父撒手西去，他被迫将辛辛苦苦得到的征服之物转交给教会。他是被迫这么做的，所以谈不上功绩，如果他是自愿的，那么必将得到不朽的名声。他企图攻击费拉拉的阿方索，然而事实上只在攻打一些小暴君和雇佣军上获得了成就，并没有提高他的名誉。在那段时间中，西方的一些君主年复一年地更加习惯于大规模的政治博弈，这种赌博就导致意大利的这或那个省处在危险

之中。他们国内的实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得到巨大的增长，谁能够保证他们不会有袭击教皇属国的野心？利奥在1527年亲眼见证了这种事情的序曲；在1520年底，几个西班牙步兵队似乎是自作主张地出现在教皇领地的边境，其目的就是强制教皇进行捐献，但是被教皇的武装力量赶了回去。而最近几年公众反对教士阶层腐败的情绪也达到了极点，像小比科·德拉·米兰多拉这样具有远见的公民迫切地要求改革。与此同时，路德已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Under Adrian VI (1522-3), the few and timid improvements, carried out in the face of the great German Reformation, came too late. He could do little more than proclaim his horror of the course which things had taken hitherto, of simony, nepotism, prodigality, brigandage and profligacy. The danger from the side of the Lutherans was by no means the greatest; an acute observer from Venice, Girolamo Negro, uttered his fears that a speedy and terrible disaster would befall the city of Rome itself.

伟大德意志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在阿德里安六世的统治下（1522-1523）进行的为数不多的胆怯改进已经太迟了。他只会表达对先前发生事态的厌恶，比如买卖圣职，裙带关系，放荡，抢劫和肆意挥霍，其他无所作为。来自路德教派的危险绝不是最大的；一个来自威尼斯的敏锐的观察者吉罗拉莫·内格罗表达了他对一场可怕的灾难即将降临罗马城的恐惧。

Under Clement VII the whole horizon of Rome was filled with vapors, like that leaden veil which the scirocco drew over the Campagna, and which made the last months of summer so deadly. The pope was no less detested at home than abroad. Thoughtful people were filled with anxiety, hermits appeared upon the streets

and squares of Rome, foretelling the fate of Italy and of the world, and calling the pope by the name of Antichrist; the faction of the Colonna raised its head defiantly; the indomitable Cardinal Pompeo Colonna, whose mere existence was a permanent menace to the papacy, ventured to surprise the city in 1526, hoping, with the help of Charles V, to become pope then and there, as soon as Clement was killed or captured. It was no piece of good fortune for Rome that the latter was able to escape to the Castel Sant' Angelo, and the fate for which he himself was reserved may well be called worse than death.

在克莱门特七世的统治时期，整个罗马城笼罩着雾气，就像热风吹过坎帕尼亚区一样，使得夏末的几个月毫无生机。教皇在国内外遭到人们的厌弃。有识之士满怀隐忧，隐士们出现在罗马的大街和广场上，预言着意大利和世界的命运，并称教皇为基督之敌；科隆纳集团以挑战的姿态重新抬头；坚强不屈的红衣主教蓬佩奥·科隆纳，仅仅是他的存在对教皇统治来说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威胁，他在1526年突袭罗马，并希望在查理五世的帮助下，在克莱门特被杀或被俘后成为罗马的教皇。后者逃到了圣安吉洛那边的古堡，这对罗马来说并非幸事，而他为自己所保留的命运可以说比死亡还糟糕。

By a series of those falsehoods, which only the powerful can venture on, but which bring ruin upon the weak, Clement brought about the advance of the Germano-Spanish army under Bourbon and Frundsberg (1527). It is certain that the Cabinet of Charles V intended to inflict on him a severe castigation, and that it could not calculate beforehand how far the zeal of its unpaid hordes would carry them. It would have been vain to attempt to enlist men in Germany without paying any bounty, if it had not been well known that Rome was the object of the expedition. It may be that the

written orders to Bourbon will be found some day or other, and it is not improbable that they will prove to be worded mildly. But historical criticism will not allow itself to be led astray. The Catholic king and emperor owed it to his luck and nothing else that pope and cardinals were not murdered by his troops. Had this happened, no sophistry in the world could clear him of his share in the guilt. The massacre of countless people of less consequence, the plunder of the rest, and all the horrors of torture and traffic in human life show clearly enough what was possible in the *Sacco di Roma.*

克莱门特由于一系列谎言——这些谎言只有强者才敢于冒险，但是弱者会因此毁灭——招致了波旁皇王室和弗伦茨贝格（1527年）领导下的德意志-西班牙军队的进犯。很明显，查理五世的内阁想要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并且也很难提前估计出那些没有报酬的狂热士兵到底会把这项惩罚实施到何种程度。如果一开始没有告知士兵们远征目标是罗马的话，想在德国不付饷金就招募到士兵简直是天方夜谭。写给波旁皇族的书面命令有一天可能会被发现，并且也有可能发现其措辞是温和的。但是历史的评判不能就此被它引入歧途。这个天主教国王和皇帝很走运——教皇和红衣主教没有被他的士兵杀害。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么世界上的任何诡辩也不能洗清他的罪恶。无数普通人民被屠杀，其余的人们被掠夺，一切严刑拷打以及对人性命的交易都清楚地表明了在“罗马的劫掠”中可能发生的都是哪些事情。

Charles seems to have wished to bring the pope, who had fled a second time to the Castel Sant' Angelo, to Naples, after extorting from him vast sums of money, and Clement's flight to Orvieto must have happened without any connivance on the part of Spain. Whether the emperor ever thought seriously of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States of the Church, for which everybody was quite prepared,

and whether he was really dissuaded from it by the representations of Henry VIII of England, will probably never be made clear.

查理似乎想要从这位第二次逃到圣安吉洛城堡的教皇那里勒索一大笔钱财，然后再把他送到那不勒斯，克莱门特逃至奥维多的行为一定是在没有得到西班牙默许的情况下发生的。无论他是否认真考虑过将教皇属国世俗化（因为每个人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他是否真的由于英格兰亨利八世代表的劝阻而没有这样做，这些可能永远难以真相大白。

But if such projects really existed, they cannot have lasted long: from the devastated city arose a new spirit of reform both in Church and state. It made itself felt in a moment. Cardinal Sadoleto, one witness of many, thus writes:

但是即使这种计划真的存在，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因为在这个被劫掠的城市中兴起了改革教会和国家的新精神。人们立即感觉到了。红衣主教萨多莱托是许多见证人中的一个，他写道：

> If through our suffering a satisfaction is made to the wrath and justice ofGod, if these fearful punishments again open the way to better laws and morals, then is our misfortune perhaps not of the greatest… What belongs to God He will take care of; before us lies a life of reformation, which no violence can take from us. Let us so rule our deeds and thoughts as to seek in God only the true glory of the priesthood and our own true greatness and

power.

> 如果我们的受苦得以对上帝的愤怒和正义做出弥补，如果这些可怕的惩罚再一次为更好的法律和道德开辟了道路，那么我们的厄运也许不是最大的……上帝会照顾好属于他的一切；在我们面前有一种改革的生活，任何暴力都不能将其夺走。我们要以此来掌控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就像我们只向上帝寻求真正光荣以及我们自身的真正伟大和力量。

In point of fact, this critical year, 1527, so far bore fruit that the voices of serious men could again make themselves heard. Rome had suffered too much to return, even under a Paul III, to the gay corruption of Leo X.

事实上，1527年是关键的一年，因为在那时严肃认真的人的心声可以再次被人听到。罗马所遭受的苦难非常深重，即使在保罗三世的统治下，也很难回到利奥十世的快乐腐朽中。

The papacy, too, when its sufferings became so great, began to excite a sympathy half religious and half political. The kings could not tolerate that one of their number should arrogate to himself the rights of papal gaoler, and concluded (18 August 1527) the Treaty of Amiens, one of the objects of which was the deliverance of Clement. They thus, at all events, turned to their own account the unpopularity which the deeds of the imperial troops had exci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emperor became seriously embarrassed, even in Spain, where the prelates and grandees never saw him without

making the most urgent remonstrances. When a general deputation of the clergy and laity, all clothed in mourning, was projected, Charles, fearing that troubles might arise out of it, like those of the insurrection quelled a few years before, forbade the scheme. Not only did he not dare to prolong the maltreatment of the pope, but he was absolutely compelled, even apart from all considerations of foreign politics, to be reconciled with the papacy which he had so grievously wounded. For the temper of the German people, which certainly pointed to a different course, seemed to him, like German affairs generally, to afford no foundation for a policy. It is possible, too, as a Venetian maintains, that the memory of the sack of Rome lay heavy on his conscience, and tended to hasten that expiation which was sealed by the permanent subjection of the Florentines to the Medicean family of which the pope was a member. The *nipote* and new duke, Alessandro Medici, was married to the natural daughter of the emperor.

教皇政权也在遭遇如此大困苦的时候开始引起一种半宗教半政治的同情。国王们不能容忍他们当中有谁把教皇看管者的权利霸占在自己手里，因而缔结了（1527年8月18日）《亚眠条约》，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释放克莱门特。因此，不管怎么样他们也要利用帝国军队行为引起的不得人心的局面。与此同时，国王的境地也变得非常尴尬，甚至在西班牙，高级教士和贵族们只要一看到他就会非常急切地做出规劝。当计划建立一个所有神职人员和俗人都身着丧服的大众代表团时，查理担心会因此产生很多麻烦，就像多年前镇压的叛乱一样，因而禁止了这一计划。他不但不敢再继续虐待教皇，而且，且不说对一切外交政策的考虑，他也不得不和被他曾严重伤害的教皇政府进行和解。这表明了一种与他性格相悖的德意志人民的性情，对他而言就像普遍意义上德意志的事件一样，这种性情是不能作为一项政策的基础的。像某个威尼斯人所说的，对罗马抢劫的记忆使他的良心受到谴责，他急于赎罪，就决定使佛罗伦萨人永久地臣服于教皇所在的美第

奇家族。他的侄子，新即位的大公阿里桑德罗·美第奇娶了国王亲生的女儿。

In the following years the plan of a Council enabled Charles to keep the papacy in all essential points under his control, and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to protect and to oppress it. The greatest danger of all—secularization—the danger which came from within, from the popes themselves and their *nipoti,* was adjourned for centuries by the German Reformation. Just as this alone had made the expedition against Rome (1527) possible and successful, so did it compel the papacy to become once more the expression of a worldwide spiritual power, to raise itself from the soulless debasement in which it lay, and to place itself at the head of all the enemies of this Reformation. The institution thus developed during the latter years of Clement VII, and under Paul III, Paul IV, and their successors, in the face of the defection of half Europe, was a new, regenerated hierarchy, which avoided all the great and dangerous scandals of former times, particularly nepotism, with its attempts at territorial aggrandizement, and which, in alliance with the Catholic princes, and impelled by a new-born spiritual force, found its chief work in the recovery of what had been lost. It only existed and is only intelligible in opposition to the seceders. In this sense it can be said with perfect truth that the moral salvation of the papacy is due to its mortal enemies. And now its political position, too, though certainly under the permanent tutelage of Spain, became impregnable; almost without effort it inherited, on the extinction of its vassals, the legitimate line of Este and the house of della Rovere, the duchies of Ferrara and Urbino. But without the Reformation—if, indeed, it is possible to think it away—the whole ecclesiastical state would long ago have passed into secular hands.

在随后的年代里，一个宗教会议的计划使查理可以在很多关键点上将教皇处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既保护它又压迫它。最危险的就是世俗化，它来自于教皇政府内部，来自于教皇们本身以及他们的亲族，然而却因为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而延迟了好几个世纪。就像这个运动本身就使得对罗马的远征（1527年）成为可能并获得成功一样，它也迫使教皇重新成为全世界宗教力量的代表，从它自己所处的萎靡状态中崛起，从而领导这个改革运动的一切反对者。这个教会因此在克莱门特七世在位的最后几年中得到发展，并且在保罗三世、保罗四世和他们的继承者中，以及在面对半个欧洲的背叛时，产生了一种新的，再生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避免了先前所有严重而危险的丑行，特别是裙带关系和随之而来的扩疆的野心；与此同时，它和天主教国君主们联合起来，并且受到新生精神力量的推动，随后主要致力于恢复那些已经缺失的事物。只有在反对那些分裂者上这种制度是存在且可以被理解的。就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十分正确地说：教皇制度之所以能在精神上得到救赎是因为它的死敌。而这时它的政治地位已经变得十分稳固，尽管它必须处在西班牙的永久保护之下；当它的属国处于灭亡的边缘时，它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继承了埃斯特和德诺维家族的合法世系，即费拉拉和乌尔比诺的公国。但是如果没有了这场宗教改革的话，我们的确可以设想整个教皇国家早就处在世俗统治之中了。

Patriotism

爱国主义

In conclusion, let us briefly consider the effect of these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on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 at large.

最后，我们可以简单考虑一下这些政治情况对这个民族的精神的一般影响。

It is evident that the general political uncertainty in Italy during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was of a kind to excite in the better spirits of the time a patriotic disgust and opposition. Dante and Petrarch, in their day, proclaimed loudly a common Italy, the object of the highest efforts of all her children. It may be objected that this was only the enthusiasm of a few highly instructed men, in which the mass of the people had no share; but it can hardly have been otherwise even in Germany, although in name at least that country was united, and recognized in the emperor one supreme head. The first patriotic utterances of German literature, if we except some verses of the *Minnesanger,* belong to the humanists of the time of Maximilian I and after, and read like an echo of Italian declamations. And yet, as a matter of fact, Germany had been long a nation in a truer sense than Italy ever was since the Roman days. France owes the consciousness of its national unity mainly to its conflicts with the English, and Spain has never permanently succeeded in absorbing Portugal, closely related as the two countries are. For Italy, the existence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and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lone it could continue, were a permanent obstacle to national unity, an obstacle whose removal seemed hopeless. When, therefore, in the political intercours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common fatherland is sometimes emphatically named, it is done in most cases to annoy some other Italian state. But those deeply serious and sorrowful appeals to national sentiment were not heard again till later, when the time for unity had gone by, when the country was inundated with Frenchmen and Spaniards. The sense of local patriotism may be said in some measure to have taken the place of this feeling, though it was but a poor equivalent for it.

显然，14和15世纪的意大利在政治上的不稳定引起了当时优秀人物一种出于爱国的厌恶和反对情绪。但丁和彼特拉克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曾宣称一个统一的意大利是她所有儿女最崇高的奋斗目标。也许有人会表示异议，说这只是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会有的激情，在这方面人民大众很难产生共鸣；但是在德意志情况也是一样的，尽管这个国家在名义上是统一的，并将国王视作最高元首。如果我们将“行吟诗人”的某些诗歌撇开，则德意志文学最早表达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出自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以及随后一些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的作品，这些作品读起来有意大利政治演说的意味。但是，事实上自罗马时代以来，比起意大利，德意志才更称得上是一个国家。法兰西主要是在和英格兰的斗争中才有了国家统一意识，而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关系密切，但西班牙在合并葡萄牙的问题上，始终没能获得持久的成功。就意大利来说，教皇国家存在及其赖以生存的条件是国家统一道路上的长期的障碍，要移除这种障碍似乎没有希望可言。因此，在15世纪的政治交往中，当共同的祖国这一名词有时被着重提出时，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惹怒很多其他意大利国家。但是直到统一的希望已经走远，意大利充满了法兰西和西班牙人，人们才又听到对民族情感十分严肃和悲哀的呼吁。这种情感可以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地方爱国主义的意识所代替，虽然这种情感是无法比拟的。

The great offices in church were treated as matters of much importance by the pomp-loving Paul II (Platina, cit. 321) and by Sixtus IV, who, in spite of the gout, conducted Mass at Easter in a sitting posture (Jac. Volaterran. Diarium, Murat., xxiii, col. 131). It is curious to notice how the people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magical efficacy of the blessing and the unworthiness of the man who gave it; when he was unable to give the benediction on Ascension Day, 148,1, the populace murmured and cursed him (ibid., col. 133). [Eccardus, i.e. J. von Eckhart, Corpus historicum medii aevii…, Leipzig, 1723; the Infessura references can also be found in Muratori, iii, 2. It is indeed 'curious' that Burckhardt seems

not to have realized that the Roman Church has always asserted that the efficacy of sacraments is not affected by the worthiness of the minister.]

保罗二世喜欢排场（Platina, cit. 321），西斯笃四世则是不顾痛风之苦、坚持坐着也要做完复活节弥撒的（*Jac. Volaterran. Diarium,* Murat., xxiii, col. 131），因此建设气派的教会大楼是这两位教皇极为重视的事情。民众是如何把祈福的神奇效力与祈福者本人的德不配位区分开来的，这一点颇令人好奇；1481年耶稣升天节那天教皇未能行祈福礼，百姓便议论纷纷并诅咒他（*ibid.,* col. 133）。[Eccardus, i.e. J. von Eckhart, *Corpus historicum medii aevii* …, Leipzig, 1723；英菲苏拉的引文内容另见Muratori, iii, 2。确实让人“好奇”的是，布克哈特似乎没有认识到罗马教会一直都宣称圣礼的效力与牧师本人是否德高望重无关。]

[1_1].Franz Kugler, ed., *Geschichte der Baukunst;* vol. IV, part 1, on the architecture and decoration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s by Burckhardt. [Thi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867. An English translation, ed. P. Murray, was published in 1985 (Penguin, 1987).Sections o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which never got beyond brief notes, were published in the *Gesamtausgabe* of Burckhardt(1932); *The Altarpiece,* ed. P. Humfrey, was published in 1988.]

[1_2].The rulers and their dependants were together called *lo stato,* and this name afterwards acquired the meaning of the collective existence of a territory.

[1_3].With the parenthetical request, in reference to a previous conversation, that the prince would again forbid the keeping of pigs in the streets of Padua, as the sight of them was unpleasing, especially for strangers, and apt to frighten the horses.

[1_4].This we find first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but their representations are certainly based on the beliefs of earlier times: L. B. Alberti, *De re aedif,* v, 3, Franc, di Giorgio, 'Trattato', in Delia Valle, *Lettere sanesi,* iii, 121. [There is a modern Latin/ Italian edition of Alberti's *De re aedifcatoria libri X,* by G. Orlandi and P. Portoghesi, 2 vols., Milan, 1966, and of Francesco di Giorgio's *Trattato d'architettura* by C. Maltese and L. Maltese-Degrassi, 2 vols., Milan, 1967.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lberti

(London, 1726 and 1955) has been superseded by one ed. J. Rykwert, Cambridge, Mass., 1988. For Della Valle, see note 23.]

[1_5].The Paduan passport office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s referred to by Franco Sacchetti, Nov. 117, in the words 'quelli delle bullette' [the people of the licences]. In the last ten years of the reign of Frederick II, when the strictest control was exercised on the personal conduct of his subjects, this system must have been very highly developed. [The Trecento-novelle—Three Hundred Tales—were written before 1400 and have been reprinted many times, e.g. ed. E. Faccioli, 1970.]

[1_6].This compound of force and intellect is called by Machiavelli virtu, and is quite compatible with scelleratezza [wickedness]. E.g. Discorsi, i, 10, in speaking of Septimius Severus.

[1_7].It is uncertain whether the Venetians did not poison Alviano in 1516, cf. Prato, Arch, stor., iii, p. 348. The republic made itself Colleoni's heir, and after his death in 1475 formally confiscated his property. Cf. Malipiero, Annali veneti, in Arch, stor., vii, i, 244. It was approved of when the condottieri invested their money in Venice, ibid., p. 3 51.

[1_8].[The early Raphaels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 are the pictures now in the Louvre, Paris, of around 1500-1504; what Burckhardt refers to as 'the great painting of St Michael' is presumably the very late picture, also in the Louvre, dated 1518, but perhaps finished by his studio. The reference to the heavenly horseman is to Raphael's fresco of the Expulsion of Heliodorus from the Temple, in the Vatican, completed by 1514.]

[1_9].[Now in the Borghese Galleria, Rome, dated 1507.]

[1_10].Born 1466, betrothed to Isabella, herself six years of age in 1480, succeeded 1484, married 1490, died 1519. Isabella died in 1539. Her sons were Federigo (1519-40), made duke in 1530, and the famous Ferrante Gonzaga. What follows is taken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f Isabella, with Appendices, *Archiv. stor.,* append., tom, ii, communicated by d'Arco. [J. Cartwright, *Isabella d'Este,* London, 1903 and later.]

[1_11].The journey of Leo X when cardinal may also be mentioned here. Cf. Paul. Jov., Vita Leonis X, lib. I. His purpose was less serious, and directed rather to amusement and knowledge of the world; but the spirit is wholly modern. No

northerner then traveled with such objects. [Paolo Giovio (Paulus Jovius), Vita Leonis X, Florence, 1548.]

[1_12].[On account of weathering, Michelangelo's David was moved into the Accademia in 1873, but a replica made in 1905 still stands outside the Palazzo della Signoria.]

[1_13].[The reference to Sismondi is to J. Sismondi, Histoire des republiques italiennes au moyen age, 16 vols., Zurich, 1807-18; an abridged English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London in 1907 and often reprinted.]

[1_14].[The military adventures of Doge Foscari were much criticized, and just before his death he was formally deposed, an act for which there was no Venetian precedent.]

[1_15].The statistical view of Milan, in the 'Manipulus Florum' (in Muratori, xi, 711 ff), for the year 1288, is important, though not extensive. It includes house-doors, population, men of military age, loggie of the nobles, wells, bakeries, wine-shops, butchers' shops, fishmongers, the consumption of corn, dogs, game birds, the price of salt, wood, hay and wines; and also the judges, notaries, doctors, schoolmasters, copying clerks, armourers, smiths, hospitals, monasteries, endowments and religious corporations.

[1_16].Here all the houses, not merely those owned by the state, are meant. The latter, however, sometimes yielded enormous rents. See Vasari, Vita di Jacopo Sansovino.

[1_17].This dislike seems to have amounted to positive hatred in Paul II, who called the humanists, one and all, heretics. Platina, Vita Pauli, p. 323.

[1_18].See for this and similar facts Giov. Villani, xi, 87, xii, 54. [G. Villani (d. 1348), Chroniche, Venice, 1537, and Florence, ed. Dragomanni, 4 vols., 1844-5. A partial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 Selfe and P. Wicksteed, London, 1896, does not include these passages. The loan to Edward III of England to pay for his wars was made in 1338; Edward reneged on it and both the Bardi and Peruzzi went bankrupt in the 1340s.]

[1_19].Giov. Villani, xi, 92, 93. In Machiavelli, Stor. Fiorent., lib. ii, cap. 42, we read that 96,000 persons died of the plague in 1348. [G. Villani, Chroniche; see note 18.]

[1_20].Ricordi of Lorenzo, in Fabroni, Laur. Med. Magnifici Vita, Adnot. 2 and 25. Paul. Jovius, Elogia, pp. 131 ff. Cosmus. [Paolo Giovio (Paulus Jovius), Elogia veris clarorum virorum, Venice, 1546 and Basle, 3 vols., 1576-8. See also A. Fraser Jenkins, 'Cosimo de' Medici's Patronage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Theory, of Magnificence' i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xxiii, 1970.]

[1_21].On the third Sunday in Advent, 1494, Savonarola preached as follows on the method of bringing about a new constitution: the sixteen companies of the city were each to work out a plan, the Gonfalonieri to choose the four best of these, and the Signoria to name the best of all on the reduced list. Things, however, took a different turn, under the influence, indeed, of the preacher himself.

[1_22].How strangely modern half-culture affected political life is shown by the party struggles of 1535. Delia Valle, Lettere sanesi, iii, p. 317. A number of small shopkeepers, excited by the study of Livy and of Machiavelli's Discorsi, call in all seriousness for tribunes of the people and other Roman magistrates against the misgovernment of the nobles and the official classes. [G. Delia Valle, Lettere sanesi, 3 vols., Rome, 1782-6.]

[1_23].Galeazzo Maria Sforza, indeed, declared the contrary (1467) to the Venetian agent, namely, that Venetian subjects had offered to join him in making war on Venice; but this is only vapouring. Compare Malipiero, Annali veneti, in Archiv. Stor., vii, i, p. 216 ff. On every occasion cities and villages surrendered voluntarily to Venice, chiefly, it is true, those that escaped from the hands of some despot, while Florence had to keep down the neighboring republics, which were used to independence, by force of arms, as Guicciardini (Ricordi, no. 29) observes. [F. Guicciardini, Ricordi, exists in several versions, the modern critical edition being that by R. Spongano, Florence, 1951, which is the basis of C. Grayson, Guicciardini: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1965.]

[1_24].For the impression made by the blessing of Eugenius IV in Florence, see Vespasiano Fior., p. 18. For the impressive offices of Nicolas V, see Infessura (Eccard, ii, col. 1883 ff) and G. Manetti, Vita Nicolai V (Muratori, iii, ii, col. 923). For the homage given to Pius II, see Diario ferrarese (Murat., xxiv, col. 205), and Pii II, Commentarii, passim, esp. iv, 201, 204, and xi, 562. Even professional murderers respect the person of the pope.

[1_25].'Ut Papa tantum vicarius Christi sit et non etiam Caesaris... Tunc Papa et dicetur et erit pater sanctus, pater omnium, pater ecclesiae...' ['That the pope will be Christ's vicar, not Caesar's... Then the pope will be called, and will be, Holy Father,

Father of all, Father of the Church...' Lorenzo Valla (1407-57) finally disproved (1440) the long-doubted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a forgery of the eighth century purporting to prove papal claims to the temporal power, allegedly given to them by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1_26].According to Corio (fol. 479) Charles had thoughts of a Council, of deposing the pope, and even of carrying him away to France, this upon his return from Naples. According to Benedictus, Carolus VIII (in Eccard, Scriptores, ii, col. 1584 [see note 25]), Charles, while in Naples, when pope and cardinals refused to recognize his new crown, had certainly entertained the thought 'de Italiae imperio deque pontificis statu mutando' [to change the dominion in Italy, reducing the pope], but soon after made up his mind to be satisfied with the personal humiliation of Alexander. The pope, nevertheless, escaped him. Details in Pilorgerie, Campagne et bulletins de la Grande Armee d'Italie, 1494, 1495 (Paris, 1866), where the degree of Alexander's danger at different moments is discussed (pp. in, 117, etc.). Even on his return journey Charles had no wish to harm him.

[1_27].Corio, fol. 450. Malipiero, Ann. veneti in Arch, stor., vii, i, p. 318. The rapacity of the whole family can be seen in Malipiero, among other authorities, cit., p. 565. A nipote was splendidly entertained in Venice as papal legate, and made an enormous sum of money by selling dispensations; his servants, when they went away, stole whatever they could lay their hands on, including a piece of cloth of gold from the high altar of a church at Murano.

[1_28].[The reference is to the Austrian general, Wallenstein, Duke of Friedland, whose bloody career was ended by his murder by his own officers, on suspicion of changing sides.]

[1_29].Hence, the splendor of the tombs of the prelates erected during their lifetime. A part of the plunder was in this way saved from the hands of the popes. [Examples of such splendid tombs are those by Andrea Sansovino in Sta Maria del Popolo, Rome.]

[1_30].[Terribile is a word associated with Michelangelo and implies awesome force of will, perhaps inspiring terror in lesser men.]

[2_1].Franz Kugler, ed., *Geschichte der Baukunst* ；其卷四第一部分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与装饰的内容为布克哈特所著。[该书初版于1867年，英译本由P. Murray编，出版于1985年（企鹅出版社，1987）。其中有关油画和雕塑的部分均为札记，收入布克哈特《全集》（*Gesamtausgabe* ）出版（1932）；《祭坛画》（*The*

Altarpiece ）由P. Humfrey编，出版于1988年。]

[2_2].当时的统治者及其侍从统称为“国家”（lo stato），这一名称后来有了“集体存在的领土”之意。

[2_3].提及前一次的谈话，彼特拉克附带请求君主再次禁止在帕多瓦大街上养猪，因为有碍观瞻，对外地人尤甚，也容易惊吓到马匹。

[2_4].这些情况最早见于15世纪，但其描述的依据无疑更早：L. B. Alberti, *De re aedif,* v, 3, Franc, di Giorgio, 'Trattato', in Delia Valle, Lettere sanesi, iii, 121. Franc, di Giorgio, 'Trattato', in Delia Valle, *Lettere sanesi* , iii, 121. [L. B. Alberti的 *De re aedifcatoria libri X* 有现代拉丁语／意大利语版，G. Orlandi和P. Portoghesi译，2 vols., Milan, 1966；Francesco di Giorgio的*Trattato d'architettura* 也有，C. Maltese和L. Maltese-Degrassi译，2 vols., Milan, 1967. Alberti作品的英译本（London, 1726 and 1955）已有新译本ed. J. Rykwert, Cambridge, Mass., 1988.关于Della Valle，参见“共和国：威尼斯与佛罗伦萨”一节末尾注释。]

[2_5].关于帕多瓦14世纪中叶的通行证签发办公室，Franco Sacchetti 曾用“发许可证的人”（*'quelli delle bullette'* ）这样的字眼称之。腓特烈二世统治的最后十年，对臣民个人行为的控制极为严格，因此这一制度当时必定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十四世纪的小说——故事三百则》一书成书于1400年之前，已多次重印，例如ed. E. Faccioli, 1970.版。]

[2_6].这种武力与才智的复合被马基雅弗利（N. Machiavelli, 1469-1527）称为“德”（*virtù* ），与“恶”（*scelleratezza* ）并行不悖。例如他在*Discorsi,* i, 10中言及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 145-211）所述。

[2_7].威尼斯人是否在1516年投毒害死了阿尔维亚诺（Alviano），并无确证，参见Prato, *Arch, stor.,* iii, p. 348。共和国成为科莱奥尼（Colleoni）的继承人，在他于1475年去世之后将其财产正式充公，参见Malipiero, *Annali veneti,* in *Arch, stor.,* vii, i, 244。这一点在雇佣军首领们投资于威尼斯时是征得过他们同意的，同上，p. 351。

[2_8].[拉斐尔的早期画作《圣米迦勒》和《圣乔治》现藏于巴黎卢浮宫，大致创作于1500-1504年间；布克哈特所谓的“伟大的画作《圣米迦勒》”大概是指后期那幅同样收藏于卢浮宫、创作日期为1518年的画，但这有可能是他早年完成于画室的作品。这里所说的天国骑手，是指拉斐尔在梵蒂冈的壁画作品《赫利奥多罗斯被逐出神殿》，完成于1514年。]

[2_9].[目前收藏于罗马鲍格才画廊（Borghese Galleria），创作日期为1507年。]

[2_10].生于1466年，1480年与六岁的伊莎贝拉订婚，1484年继位，1490年完婚，1519年驾崩。伊莎贝拉于1539年去世，育有二子，一个是费德里戈（Federigo, 1519-1540），1530年加封公爵，另一位就是著名的费兰特·贡扎加（Ferrante Gonzaga, 1507-1557）。下文内容取自伊莎贝拉的往来书信，见Appendices, *Archiv. stor.,* append., tom, ii，由d'Arco提供。[J. Cartwright, *Isabella d'Este,* London, 1903 and later.]。

[2_11].教皇利奥十世做红衣主教时的旅行此处也可以提一提。参见Paul. Jov., *Vita Leonis X,* lib. I。他旅行的目的并不是很严肃，更主要是为了消遣和了解世界；但这种精神却完全是现代的。当时意大利北方还没有一个人是为此类目的而旅行的。[Paolo Giovio (Paulus Jovius), *Vita Leonis X,* Florence, 1548.]

[2_12].[由于受到风化侵蚀影响，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塑于1873年被移入艺术学院，但1905年制作的一个复制品仍矗立在领主宫外。]

[2_13].[参见J. Sismondi, *Histoire des ré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 age,* 16 vols., Zurich, 1807-18；英文删节版出版于1907年，多次重印。]

[2_14].福斯卡里总督的军事冒险深受诟病，于去世前不久被正式罢免，这一做法在威尼斯没有过先例。]

[2_15].据《花束》（‘Manipulus Florum'，见Muratori, xi, 第711页及其后数页）所载，米兰1288年的统计范围虽然不广，却很重要，包括户数、人口、兵役适龄人数、贵族的“游廊”、水井、面包店、酒肆、屠宰店、鱼铺、谷物消耗量、犬只、猎禽、盐价、木材、草料、葡萄酒等；以及法官、公证员、医生、教师、誊写员、军械制造者、金属工匠、医院、修道院、各类基金、宗教团体等。

[2_16].这里指所有房屋，而不仅仅是国有房产。但后者有时反而能获得巨额房租。参见Vasari, *Vita di Jacopo Sansovino.*

[2_17].这种厌恶到保罗二世时期似乎变成了明确的憎恨，保罗二世把人文主义者一律称为异教徒。参见Platina, *Vita Pauli,* p. 323.

[2_18].关于此事及类似事实，见Giov. Villani, xi, 87, xii, 54. [G. Villani *(d.* 1348), *Chroniche,* Venice, 1537, and Florence, ed. Dragomanni, 4 vols., 1844-5. 英文节译本（R. Selfe and P. Wicksteed, London, 1896）没有这些内容。给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提供战争贷款是在1338年；爱德华赖账，致使巴迪财团与佩鲁齐财团于1340年代破产。]

[2_19].见Giov. Villani, xi, 92, 93. 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 *Stor. Fiorent.,* lib. ii,

cap. 42）认为有96,000人死于1348年的那场瘟疫。[G. Villani, *Chroniche* ；见上注。]

[2_20].洛伦佐《回忆录》（*Ricordi* ），载Fabroni, *Laur. Med. Magnifici Vita* , Adnot. 2 and 25. Paul. Jovius, *Elogia* , pp. 131 ff. Cosmus. [Paolo Giovio (Paulus Jovius), *Elogia veris clarorum virorum,* Venice, 1546 and Basle, 3 vols., 1576-8. 另见A. Fraser Jenkins, 'Cosimo de' Medici's Patronage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Theory, of Magnificence' i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xxiii, 1970.]

[2_22].近代的半开化状态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有多么不可思议，由1535年的政党之争可见一斑。见Delia Valle, *Lettere sanesi,* iii, p. 317. 许多小店主在研习了李维的作品和马基雅弗利的《罗马史论》之后受到激励，纷纷义正辞严地要求护民官和其他治安法官起来反对贵族和官僚阶层的恶政。[G. Delia Valle, *Lettere sanesi,* 3 vols., Rome, 1782-6.]

[2_23].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确曾于1467年宣布与威尼斯一方的代表反目，也就是说，威尼斯有臣属此前就提出要与他联合起来向威尼斯开战；但这不过是夸大其词而已。可对照Malipiero, *Annali veneti,* in *Archiv. Stor.,* vii, i, p. 216 ff. 正如圭恰迪尼（*Ricordi,* no. 29）所言，只要有机会，城市和乡村都会自愿投靠威尼斯，尤其是那些从专制君主手中逃出来的人，而佛罗伦萨则不得不靠武力来控制周边那些习惯于独立的共和国。[F. Guicciardini, *Ricordi* ，该书有多个版本，其中现代批评本R. Spongano, Florence, 1951，成为C. Grayson, *Guicciardini: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1965.的基础。]

[2_24].关于尤金四世在佛罗伦萨祈福的印象，见Vespasiano Fior., p. 18. 有关尼古拉五世那些显赫的办公大楼，见Infessura (Eccard, ii, col. 1883 ff) and G. Manetti, *Vita Nicolai V* (Muratori, iii, ii, col. 923)。关于向庇护二世宣誓效忠者的情况，见 *Diario ferrarese* (Murat., xxiv, col. 205), and *Pii II, Commentarii,* passim, esp. iv, 201, 204, and xi, 562. 甚至连职业杀手都对教皇本人敬重有加。

[2_25].[‘罗马教皇将是基督而非恺撒的代表……然后罗马教皇将被称为——并将成为——神圣之父、众生之父、教会之父……’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 1407-1457）最终于1440年证明长期受到质疑的“君士坦丁捐献诏书”系伪造，那是一份八世纪时炮制的圣谕，意在证实教皇可以主张世俗的权力，声称此种权力为君士坦丁大帝所赐。]

[2_26].按照Corio（fol. 479）的说法，查理是有过召开大会废黜教皇、甚至将其带到法国去的想法的，这是他从那不勒斯回国时的事情。据Benedictus《查理八世》（载Eccard, *Scriptores,* ii, col. 1584 [详见本节上文注1]）所述，查理在那不勒斯时，在教皇和红衣主教拒绝承认他加冕成为那不勒斯新国王的情况下，肯定是想过要“改变意大利治权、削弱教皇地位”的，但随后不久就打定主意只想羞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本人了。不过教皇还是逃过了这一劫。详见Pilorgerie, *Campagne et bulletins de la Grande*

Armee d'Italie, 1494, 1495（Paris, 1866），其中谈及亚历山大在不同时期的危险程度（第111、117等页）。即便是在撤回法国的途中，查理也并无伤害教皇之意。

[2_27].见Corio, fol. 450. Malipiero, *Ann. veneti* in *Arch, stor.,* vii, i, p. 318. 关于整个家族的贪得无厌，不少权威文献均有记载，其中包括Malipiero, *cit.,* p. 565，讲述的是教皇的一个“侄子”在威尼斯被当作教廷使节受到盛情款待，并通过兜售教会豁免权捞取了大笔钱财；他的仆从们离开时，手边能偷走的都偷走了，包括穆拉诺教堂内主祭坛上的一块金丝布。

[2_28].[指奥地利将军、弗里德兰公爵华伦斯坦（Albrecht Wallenstein, 1583-1634），他因被怀疑通敌叛国，被手下军官杀死，结束了他残忍血腥的军旅生涯。]

[2_29].因此，这些高级教士的墓碑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辉煌壮观地立好了。他们所侵吞的财富有一部分也因此而免于落入教皇之手。[罗马波波洛圣母堂里有安德烈·圣索维诺雕刻的墓碑，堪称此类奢华墓碑之范。]

[2_30].[Terribile一词与米开朗基罗有关，指令人敬畏的意志力，可能还会令小人物心生恐惧。]

Part 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第二编　个体的发展

Personality

个性

In the character of these states, whether republics or despotisms, lies not the only but the chief reason for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Italian. To this it is due that he was the first-born among the sons of modern Europe.

无论是实行共和制还是专制统治的国家，它们的特点虽不是意大利人早期发展的唯一原因，但却是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意大利成为近代欧洲的长子。

In the Middle Ages both sides of human consciousness—that which was turned within as that which was turned without—lay dreaming or half awake beneath a common veil. The veil was woven of faith, illusion and childish prepossession, through which the world and history were seen clad in strange hues. Man was conscious of himself only as a member of a race, people, party, family or corporation—only through some general category. In Italy this veil first melted into air; an *objective* treatment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state and of all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became possible. The *subjective* side at the same time asserted itself with corresponding emphasis; man became a spiritual *individual* , [2_1] and recognized himself as such. In the same way the Greek had

once distinguished himself from the barbarian, and the Arab had felt himself an individual at a time when other Asiatics knew themselves only as members of a race. It will not be difficult to show that this result was due above all to the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of Italy.

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隐藏于心的一面和显露在外的一面——在同一层薄纱遮掩下，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这层薄纱由信仰、幻觉和幼稚的偏见编织而成，通过它看到的世界和历史都笼罩着陌生的色彩。人类只意识到个体是种族、民族、党派、家族和社团的一名成员——仅仅通过某些一般范畴来认识自我。这层薄纱在意大利最先被揭开。客观对待和考虑国家以及所有事情成为可能。同时，人们的主观感觉也相应地强化了；人类变成了具有精神的个体[3_1]，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以同样的方式，希腊人把他们自己和野蛮人区别开来，当其他亚洲人只把自己当作种族一员的时候，阿拉伯人已经把自己作为个体来看待了。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这个结果主要归因于意大利的政治氛围。

In far earlier times we can here and there detect a development of free personality which in northern Europe either did not occur at all, or could not display itself in the same manner. The band of audacious wrongdoers in the tenth century described to us by Liudprand, some of the contemporaries of Gregory VII (for example, Benzo of Alba) and a few of the opponents of the first Hohenstaufen show us characters of this kind. But at the clos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Italy began to swarm with individuality, the ban laid upon human personality was dissolved; and a thousand figures meet us each in its own special shape and dress. Dante's great poem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in any other country of Europe, if only for the reason that they all still lay under the spell of race. For Italy the

august poet, through the wealth of individuality which he set forth, was the most national herald of his time. But this unfolding of the treasures of human nature-in literature and art—this many-sided representation and criticism—will be discussed in separate chapters; here we have to deal only with the psychological fact itself. This fact appears in the most decisive and unmistakable form. The Italian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knew little of false modesty or of hypocrisy in any shape; not one of them was afraid of singularity, of being and seeming unlike his neighbors.

还在很早以前的时候就到处都可以见到自由人性的发展了，这样的发展在北欧要么从未发生过，要么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出现。柳德普兰德给我们描述的10世纪那帮胆大妄为的作恶者、与格雷戈里七世同时代的一些人（例如阿尔巴的本佐）以及第一代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几个反对者就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性格。但是到13世纪末，意大利个性鲜明的人物比比皆是，对人类性格的约束解除了；上千个人物各自以其独特的外形和服饰为我们所知。如果依然处于种族的诅咒之下，单凭这个理由，但丁的伟大诗篇就不可能在欧洲的任何其他国家产生。这位令人敬畏的诗人，通过作品表现出丰富的个性，是当代最具民族性的先驱。但是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人类性格具体丰富的表现——多方面的描述和批评——将在独立的章节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们只讨论心理现象本身。这种现象以最明确和最清楚的形式出现。14世纪的意大利人不知虚伪的谦虚和伪善为何物；没有人害怕特立独行，没有人害怕和旁人不一样或看起来不一样。

Despotism,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fostered in the highest degree the individuality not only of the tyrant or *condottiere* himself, [2_2] but also of the men whom he protected or used as his tools—the secretary, minister, poet and companion. These people were forced to know all the inward resources of their own nature,

passing or permanent; and their enjoyment of life was enhanced and concentrated by the desire to obtain the greatest satisfaction from a possibly very brief period of power and influence.

我们已经看到，暴君统治不仅最大程度地培养了暴君和雇佣军首领本人的个性 [3_2] ，也培养了那些暴君要保护或利用的人的性格——大臣、部长、诗人和朋友。这些人不得不洞悉自己身上转瞬即逝或恒久的才能；他们渴望从可能一闪即逝的权势中获得最大的满足，这使他们享受生活的程度被提升和浓缩了。

But even the subjects whom they ruled over were not free from the same impulse. Leaving out of account those who wasted their lives in secret opposition and conspiracies, we speak of the majority who were content with a strictly private station, like most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nd the Muhammadan states. No doubt it was often hard for the subjects of a Visconti to maintain the dignity of their persons and families, and multitudes must have lost in moral character through the servitude they lived under. But this was not the case with regard to individuality; for political impotence does not hinder the different tendenc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private life from thriving in the fullest vigour and variety. Wealth and culture, so far as display and rivalry were not forbidden to them, a municipal freedom which did not cease to be considerable, and a Church which, unlike that of the Byzantine or of the Muhammadan world, was not identical with the state—all these conditions undoubtedly favored the growth of individual thought, for which the necessary leisure was furnished by the cessation of party conflicts. The private man, indifferent to politics, and busied partly with serious pursuits, partly with the interests of a dilettante, seems to have been first fully formed in these

despotism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Documentary evidence cannot, of course, be required on such a point. The novelists, from whom we might expect information, describe to us oddities in plenty, but only from one point of view and in so far as the needs of the story demand. Their scene, too, lies chiefly in the republican cities.

但是他们统治的人们也没有摆脱同样的冲动。不考虑那些在秘密抵抗和反叛中丧生的人，我们讨论的是满足于完全私人生活的大多数人，就像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教国家大部分城市居民一样。毫无疑问，维斯孔蒂暴君统治下的人们想要保持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尊严通常是困难的，大众由于生活在奴役状态下肯定失去道德品质。但是，个性方面并非如此；因为政治无能并不能阻碍个人生活蓬勃发展、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和表现。财富和文化的炫耀和竞争没被禁止，市民的自由度是可观的，教会不像拜占庭或伊斯兰国家一样政教合一——所有这些条件无疑都有利于个人思想的发展，党派冲突的中止也为此提供了必要的闲暇时间。对政治漠不关心，部分忙正事、部分忙业余爱好的独行者，似乎是在14世纪的这些专制国家里首次完整形成的。当然，我们还找不到相关的书面证据。可能给我们提供信息的小说家描述了很多怪事，但是只采用了一个视角，并且仅限于故事需要的范围内。这些故事的场景主要也是共和国的城市里。

In the latter, circumstances were also, but in another way, favorable to the growth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The more frequently the governing party was changed, the more the individual was led to make the utmost of the exercise and enjoyment of power. The statesmen and popular leaders, especially in Florentine history, acquired so marked a personal character that we can scarcely find, even exceptionally, a parallel to them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hardly even in Jacob von Artevelde.

共和国的情况也有利于个体性格的发展，只是方式不同。执政党更替得越频繁，个体越能充分行使和享受权力。尤其是在佛罗伦萨历史上的政治家和大众爱戴的领袖们，他们表现出非常鲜明的个性特征，我们几乎不能从同时代的历史中找到一个和他们相媲美的人物，雅各布·冯·阿特威尔德 [3_3] 也还算不上。

The members of the defeated parties, on the other hand, often came into a position like that of the subjects of the despotic states, with the difference that the freedom or power already enjoyed, and in some cases the hope of recovering them, gave a higher energy to their individuality. Among these men of involuntary leisure we find, for instance, an Agnolo Pandolfini (d. 1446), whose work on domestic economy [2_3] is the first complete programme of a developed private life. His estimate of the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as against the dangers and thanklessness of public life is in its way a true monument of the age.

另一方面，未当选的党派成员所处的地位通常和专制国家国民一样，不同的是，他们已经享受过自由或权力，并期待在某些情况下重新获取自由和权力，这给他们的个性注入更高的活力。我们发现，这些被迫清闲下来的人，例如阿尼奥洛·潘多尔菲尼（卒于1446年），他关于家政的著作 [3_4] 是得到发展的私人生活的首部完整方案。他对比了个体的责任和社会生活的危险以及忘恩负义，他的评价称得上当代的典范。

Banishment, too, has this effect above all, that it either wears the exile out or develops whatever is greatest in him. 'In all our more populous cities,' says Gioviano Pontano, 'we see a crowd of

people who have left their homes of their own free will; but a man takes his virtues with him wherever he goes.' And, in fact, they were by no means only men who had been actually exiled, but thousands left their native place voluntarily, because they found its political or economical condition intolerable. The Florentine emigrants at Ferrara and the Lucchese in Venice formed whole colonies by themselves.

流放也有上述作用，它要么让人们在流放中精疲力竭，要么发展人们内心最强大的部分。“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城市，”乔维诺·庞达诺说，“我们看见一群人自愿离开家园；但是无论他去哪里，他把身上的美德也带走了。”事实上，这群人绝不仅限于真正被放逐的人，还有成千上万自愿离开故土的人，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家乡的政治或经济状况。佛罗伦萨的移民抵达费拉拉和威尼斯的卢瑟卡，形成他们自己的集聚地。

The cosmopolitanism which grew up in the most gifted circles is in itself a high stage of individualism. Dante, as we have already said, finds a new home i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Italy, but goes beyond even this in the words, 'My country is the whole world.' And when his recall to Florence was offered him on unworthy conditions, he wrote back: 'Can I not everywhere behold the light of the sun and the stars; everywhere meditate on the noblest truths, without appearing ingloriously and shamefully before the city and the people? Even my bread will not fail me.' The artists exult no less defiantly in their freedom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fixed residence. 'Only he who has learned everything,' says Ghiberti, [2_4] 'is nowhere a stranger; robbed of his fortune and without friends, he is yet the citizen of every country, and can fearlessly despise the changes of fortune.' In the same strain an

exiled humanist writes: 'Wherever a learned man fixes his seat, there is home.' [2_5]

在最具才华的人们当中形成的世界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高层次的个人主义。前文提到过，但丁在意大利的语言和文化中找到了新的归属，但是这也远不是一句“我的国家就是全世界”所能表述的。当他希望重返佛罗伦萨，却必须忍受不堪的屈辱时， [3_5] 他回信写道：“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吗？难道我不向佛罗伦萨市民卑躬屈膝，我就不能思考宝贵的真理吗？我绝不愁没有面包吃！”艺术家们仍然桀骜不驯，为他们不受居所限制的自由欢呼雀跃。吉贝尔蒂 [3_6] 说：“博学的人到哪儿都不会是异乡客；就算被剥夺了财产和朋友，他依然是每个国家的国民，依然可以无所畏惧，宠辱不惊。”一位被流放的人文主义者用同样的口吻写道：“做学问的人在哪儿安坐下来，哪儿就是家了。” [3_7]

An acute and practiced eye might be able to trace, step by step,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omplete men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Whether they had before them as a conscious object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ir spiritual and material existence is hard to say; but several of them attained it, so far a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mperfection of all that is earthly. It may be better to renounce the attempt at an estimate of the share which fortune, character and talent had in the life of Lorenzo il Magnifico. But look at a personality like that of Ariosto, especially as shown in his satires. In what harmony are there expressed the pride of the man and the poet, the irony with which he treats his own enjoyment, the most delicate satire, and the deepest goodwill!

目光敏锐和经验丰富的人可能会发现，15世纪具有完整性格的人

的数量在逐步增加。他们此前是否有意识地把保持精神与物质存在的和谐发展作为目的，这很难下定论；但是，鉴于尘世间的人和物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做到了。我们最好不要企图去评价在伟大的洛伦佐的一生中，财富、性格和才能各起多少作用。但是让我们看看像阿里奥斯托一样的个性吧，尤其是他讽刺作品里的人物个性。他是如此和谐地表达出他作为人和诗人的骄傲，对自己享乐的嘲笑，在最精妙的讽刺里蕴藏着最深的善意！

When this impulse to the highest individual development was combined with a powerful and varied nature, which had mastered all the elements of the culture of the age, then arose the 'all-sided man'—*l'uomo universale* —who belonged to Italy alone. Men there were of encyclopedic knowledge in many countries during the Middle Ages, for this knowledge was confined within narrow limits; and even in the twelfth century there were universal artists, but the problems of architecture were comparatively simple and uniform, and in sculpture and painting the matter was of more importance than the form. But in Italy at the time of the Renaissance we find artists who in every branch created new and perfect works, and who also made the greatest impression as men. Others, outside the arts they practiced, were masters of a vast circle of spiritual interests.

当最高层次的个性发展的助推力和强大丰富的天性结合到一起，而这种天性精通当代文化的所有要素，这时候意大利独有的“全才”产生了。在中世纪，许多国家都有知识渊博的人，因为那时候的知识局限于狭窄的范围；到了12世纪出现了全面型的艺术家，但是当时的建筑问题相对简单单一，在雕塑和绘画方面，内容被置于形式之上。然而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我们发现各个领域的艺术家都创造出富有新意和完美的作品，并且作为人，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一

些人，除了艺术领域外，也是研究精神利益领域的大师。

Dante, who, even in his lifetime, was called by some a poet, by others a philosopher, by others a theologian, pours forth in all his writings a stream of personal force by which the reader, apart from the interest of the subject, feels himself carried away. What power of will must the steady, unbroken elaboration of the *Divine Comedy* have required! And if we look at the matter of the poem, we find that in the whole spiritual or physical world there is hardly an important subject which the poet has not fathomed, and on which his utterances—often only a few words—are not the most weighty of his time. For the plastic arts he is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and this for better reasons than the few references to contemporary artists—he soon became himself the source of inspiration.

但丁甚至在生前就被一些人称为诗人，被另一些人称为哲学家、神学家，他的作品中弥漫着个人力量，使得读者除了被主题吸引外，发觉自己完全着迷了。完成一部完整无损的《神曲》需要多么强大的意志力！如果我们看一下诗篇里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精神世界还是物质世界的重要主题，但丁无一不精通，而他基于这些主题所说的话——通常只是只言片语——没有一句不是在他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在造型艺术上，他的地位举足轻重，相比同时代的少数艺术家，我们更有理由这样评价他——他自己很快成为灵感的来源。

The fifteenth century is, above all, that of the many-sided men. There is no biography which does not, besides the chief work of its hero, speak of other pursuits all passing beyond the limits of dilettantism. The Florentine merchant and statesman was often learned in both the classical languages; the most famous humanists

read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Aristotle to him and his sons; even the daughters of the house were highly educated. It is in these circles that private education was first treated seriously. The humanist, on his side, was compelled to the most varied attainments, since his philological learning was not limited, as it is now, to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classical antiquity, but had to serve the practical needs of daily life. While studying Pliny, he made collections of natural history; the geography of the ancients was his guide in treating of modern geography; their history was his pattern in writing contemporary chronicles, even when composed in Italian; he not only translated the comedies of Plautus, but acted as manager when they were put on the stage; every effective form of ancient literature down to the dialogues of Lucian he did his best to imitate; and besides all this, he acted as magistrate, secretary and diplomatist—not always to his own advantage.

15世纪尤其是一个全才的世纪。除了讲述主人公的主要成就，所有传记都会讲到他的其他爱好，而这爱好远不只浅薄涉猎的程度。佛罗伦萨的商人兼政治家往往精通两种古典语言；最有名的人文主义者自诵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并读给自己的儿子听；甚至家里的女儿们也受过不错的教育。就是在这些圈子里，私人教育最早被严肃对待。从人文主义者的角度来说，他不得不掌握形形色色的才能，因为他的语言学习不仅限于古代经典的理论知识，就像今时今日一样，而且还必须满足为日常生活服务的实际需求。当他在研究普林尼时，他就收集博物学的资料；祖先时代的地理就是他研究现代地理的向导；甚至是用意大利语写成的历史，也是他写当代编年史的典范；他不仅翻译了普劳图斯的喜剧，而且在喜剧搬上舞台时担当经理人；无论古代文学的表现方式，还是卢西安的对话，他都竭尽全力地模仿；此外，他还充当着并不总是利于自己的角色——地方法官、大臣和外交官。

But among these many-sided men, some who may truly be called all-sided tower above the rest. Before analyzing the general phases of life and culture of this period, we may here,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consider for a moment the figure of one of these giants—Leon Battista Alberti (b. 1404?, d. 1472). His biography, [2_6] which is only a fragment, speaks of him but little as an artist, and makes no mention at all of hi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We shall now see what he was, apart from these special claims to distinction.

但是在众多全才中，有一些人能真正被称为出类拔萃的全才。在我们分析这个时期生活和文化的一般阶段之前，我们先看看15世纪初期的巨人之一——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1404?-1472）。他的传记 [3_8] 表述不完整，提及他艺术家身份的地方微乎其微，对他在建筑史的重大影响力也只字未提。除了这些让他取得名声的方面外，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的真实面貌。

In all by which praise is won, Leon Battista was from his childhood the first. Of his various gymnastic feats and exercises we read with astonishment how, with his feet together, he could spring over a man's head; how, in the cathedral, he threw a coin in the air till it was heard to ring against the distant roof; how the wildest horses trembled under him. In three things he desired to appear faultless to others, in walking, in riding, and in speaking. He learned music without a master, and yet his compositions were admired by professional judges. Under the pressure of poverty, he studied both civil and canonical law for many years, till exhaustion brought on a severe illness. In his twenty-fourth year, finding his memory for words weakened, but his sense of facts unimpaired, he set to work at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all the while he

acquired every sort of accomplishment and dexterity, cross-examining artists, scholars and artisans of all descriptions, down to the cobblers, about the secrets and peculiarities of their craft. Painting and modeling he practiced by the way, and especially excelled in admirable likenesses from memory. Great admiration was excited by his mysterious camera obscura, in which he showed at one time the stars and the moon rising over rocky hills, at another wide landscapes with mountains and gulfs receding into dim perspective, and with fleets advancing on the waters in shade or sunshine. And that which others created he welcomed joyfully, and held every human achievement which followed the laws of beauty for something almost divine. To all this must be added his literary works, first of all those on art, which are landmarks and authorities of the first order for the Renaissance of form, especially in architecture; then his Latin prose writings—novels and other works—of which some have been taken for productions of antiquity; his elegies, eclogues and humorous dinner-speeches. He also wrote an Italian treatise on domestic life [2_7] in four books; and even a funeral oration on his dog. His serious and witty sayings were thought worth collecting, and specimens of them, many columns long, are quoted in his biography. And all that he had and knew he imparted, as rich natures always do, without the least reserve, giving away his chief discoveries for nothing. But the deepest spring of his nature has yet to be spoken of—the sympathetic intensity with which he entered into the whole life around him. At the sight of noble trees and waving cornfields he shed tears; handsome and dignified old men he honored as 'a delight of nature', and could never look at them enough. Perfectly formed animals won his goodwill as being specially favored by nature; and more than once, when he was ill, the sight of a beautiful landscape cured him. No wonder that those who saw him in this close and mysterious communion with theworld ascribed to

him the gift of prophecy. He was said to have foretold a bloody catastrophe in the family of Este, the fate of Florence, and the death of the popes years before they happened, and to be able to read into the countenances and the hearts of men. It need not be added that an iron will pervaded and sustained his whole personality; like all the great men of the Renaissance, he said, 'Men can do all things if they will.'

莱昂·巴蒂斯塔在童年时期就脱颖而出，获得诸多殊荣。在他的各种体操技能和训练活动中，令我们叹为观止的有：双足跳过一个人的头顶、在大教堂里可将一枚硬币掷得碰到高高的屋顶发出响声、能让野马颤栗于他身下。他渴望在走路、骑马、说话这三件事情上表现得完美无缺。他学音乐纯属无师自通，可就连专家评审也对他的作曲大加赞赏。虽然穷困潦倒，他依然多年坚持学习民法和教会法规，直到精疲力竭造成严重的疾病。在他24岁那年，他发现他记忆单词的能力减弱了，但是理解事实的能力未受损害，于是他开始致力于物理学和数学。同时，他反复追问上至艺术家、学者和各式各样的工匠，下至修鞋匠，请教他们技艺的奥秘和独特之处，获得各种技能和熟练的技巧。他还顺便学习了绘画和雕塑，尤其擅长凭借记忆塑造逼真的模型。让人钦佩的还有他神秘的“暗箱”，他时而展示出星星和月亮爬上多石的山峰，时而表现出广阔的景色，山脉和海湾逐渐消退在灰暗的远景中，船队在水面上前进，时而曝于阳光下，时而藏进阴凉处。他对其他人的创作也热烈欢迎，认为一切遵循美的定律的人类成就都是神圣的。他的文学艺术作品也算得上是这样的成就了。首先，在艺术方面，他的艺术作品是形式文艺复兴的里程碑和一流的权威，尤其是建筑方面；其次是他的拉丁散文——小说和其他著作——其中一些就被当成了古代的作品；他还写挽歌、牧歌和幽默的晚宴致辞。他写了一部共四册的关于家庭生活的意大利文著作；甚至还有悼念爱犬的悼文。人们觉得他严肃而又诙谐的话语值得收集，有些典型的句子，长达数行，被引用到他的个人传记中。就像天性丰富的人常做的那样，他毫无保留地传授他所拥有和他所知道的一切，他无偿地公开他的主

要发现。但是我们还没有触及他本性最深处的源泉——他一生都带有的强烈的同情心。看到高大伟岸的树木和随风起伏的麦田，他泪流满面；那些端庄又有尊严的老人，他尊为“大自然之佳作”，百看不厌。他对体形完美的动物很有好感，认为这是大自然的宠爱；不止一次因为看到美丽的景色，他从病中痊愈。难怪那些看见他和世界亲密而又神秘地交流的人们认为他具有预言的天赋。据说他在事发多年前就准确预言了埃斯特家族的一场血腥灾难、佛罗伦萨的命运、教皇的灭亡，而且，据说他能读懂人们的表情和内心。无需赘述，钢铁般的意志渗透进其个性并滋养着他的个性；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伟人一样，他曾说：“只要人们下定决心去做，他将无所不能。”

And Leonardo da Vinci was to Alberti as the finisher to the beginner, as the master to the dilettante. Would only that Vasari's work were here supplemented by a description like that of Alberti! The colossal outlines of Leonardo's nature can never be more than dimly and distantly conceived.

把列奥纳多·达·芬奇和阿尔伯蒂做比较，前者就像是大功告成者，后者是初学者，前者是专家，后者是业余爱好者。如果瓦萨里的作品里能够补充一段像这里描写阿尔伯蒂一样的描写，那该多好啊！列奥纳多的伟大个性就不会模糊不清，让我们难以想象。

Glory

荣耀

To this inward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corresponds a new sort of outward distinction—the modern form of glory. [2_8]

对应个体内部的发展，个体外部的一个新特性也出现了——近代形式的荣耀。[3_9]

In the other countries of Europe the different classes of society lived apart, each with its own medieval caste sense of honor. The poetical fame of the troubadours and Minnesingers was peculiar to the knightly order. But in Italy social equality had appeared before the time of the tyrannies or the democracies. We there find early traces of a general society, having, as will be shown more fully later on, a common ground in Latin and Italian literature; and such a ground was needed for this new element in life to grow in. To this must be added that the Roman authors, who were now zealously studied, are filled and saturated with the conception of fame, and that their subject itself—the universal empire of Rome—stood as a permanent ideal before the minds of Italians. From henceforth all the aspiration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people were governed by a moral postulate, which was still unknown elsewhere in Europe.

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不同的社会阶层分开居住，各自保持着中世纪社会等级的荣耀感。抒情诗人和行吟诗人的诗人荣誉是骑士阶层特有的。但是在意大利，早在暴君专制或民主政治的时代到来之前就出现了社会平等。我们发现了一般社会早期的蛛丝马迹，对此会在后文中更完整地叙述，它根植于拉丁和意大利文学；这个根基是生活的新元素生长所需要的。我们还要补充说明现在人们热衷研究的罗马作家，他们的思维里都充斥并渗透着名誉的概念，而他们的主题——罗马统一帝国——在意大利人心目中是个永恒的理想。此后，人们的所有愿望和成就都以道德为先决条件，而这在欧洲其他地方仍是不为所知的。

Here, again, as in all essential points, the first witness to be called is Dante. He strove for the poet's garland with all the power of his soul. As publicist and man of letters, he laid stress on the fact that what he did was new, and that he wished not only to be, but to be esteemed, the first in his own walks. But even in his prose writings he touches on the inconveniences of fame; he knows how often personal acquaintance with famous men is disappointing, and explains how this is due partly to the childish fancy of men, partly to envy, and partly to the imperfections of the hero himself. And in his great poem he firmly maintains the emptiness of fame, although in a manner which betrays that his heart was not set free from the longing for it. In paradise the sphere of Mercury is the seat of such blessed ones as on earth strove after glory and thereby dimmed 'the beams of true love'. It is characteristic that the lost souls in hell beg of Dante to keep alive for them their memory and fame on earth, while those in purgatory only entreat his prayers and those of others for their deliverance. And in a famous passage, the passion for fame—*'lo gran disio dell'eccellenza'* —is reproved for the reason that intellectual glory is not absolute, but relative to the times, and may be surpassed and eclipsed by greater successors.

此处，与所有主要问题上一样，堪称首位见证者的还是但丁。他竭尽全力争取诗人的花冠。作为政论家和文学家，他强调他所做的都是新的，他希望他不仅仅在他所在的行业出类拔萃，而且也希望人们是这样评价他的。但即使在他的散文里，他也提到了名声的困扰；他知道和名人的私人交往是多么频繁地令人失望，并且解释部分原因是人们对名人的幼稚幻想，部分是出于妒忌，还有部分则是名人自身的缺点。在他伟大的诗篇中，但丁坚决认为名誉是空虚之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能看出他的内心还是渴望名誉的。在“天堂” [3_10] 里，“水星天”居住着善良的人，他们在世的时候奋力争取荣耀，使得身上“真爱的光芒”都黯淡了。很典型的一点是流离失所的灵魂在“地

狱”恳求但丁让世人保留对他们的记忆和美誉，而在“炼狱”的那些灵魂只恳求他和别人为他们祈祷从而解救他们的灵魂。诗篇中有名的一段话，对名誉的激情——想坐第一把交椅的野心——饱受指责，因为才智的荣耀不是绝对的，而是和时代有关，可能会被更伟大的后来人超越，与后来者相比相形见绌。

The new race of poet-scholars which arose soon after Dante quickly made themselves masters of this fresh tendency. They did so in a double sense, being themselves the most acknowledged celebrities of Italy, and at the same time, as poets and historians, consciously disposing of the reputation of others. An outward symbol of this sort of fame was the coronation of the poets, of which we shall speak later on.

新的诗人学者在但丁之后迅速出现，称为这种新趋势的主人。这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他们自身成为意大利公认的社会名流，二是同时，作为诗人和历史学家，他们可以有意识地评定别人的名声。诗人的加冕礼就是这种声誉的外在象征，我们稍后会讲到。

A contemporary of Dante, Albertinus Musattus or Mussatus, crowned poet at Padua by the bishop and rector, enjoyed a fame which fell little short of deification. Every Christmas Day the doctors and students of both colleges at the university came in solemn procession before his house with trumpets and, as it seems, with burning tapers, to salute him and bring him presents. His reputation lasted till, in 1318, he fell into disgrace with the ruling tyrant of the House of Carrara.

阿尔伯蒂纳斯·莫莎图是但丁同时代的诗人，由主教和教区长为他在帕多瓦加冕，他享受的名誉简直不比神明差。每个圣诞节，大学两个学院的学者和学生们都会排着庄严的队伍来到他的家门前，吹着喇叭，好像还点着蜡烛，向他致敬并赠送礼物。他的名声一直持续到1318年，直到他和卡拉拉家族的暴君闹不和。

This new incense, which once was offered only to saints and heroes, was given in clouds to Petrarch, who persuaded himself in his later years that it was but a foolish and troublesome thing. His letter 'To Posterity' is the confession of an old and famous man, who is forced to gratify the public curiosity. He admits that he wishes for fame in the times to come, but would rather be without it in his own day. In his dialogue on fortune and misfortune, the interlocutor, who maintains the futility of glory, has the best of the contest. But, at the same time, Petrarch is pleased that the autocrat of Byzantium knows him as well by his writings as Charles IV knows him. And in fact, even in his lifetime, his fame extended far beyond Italy. And the emotion which he felt was natural when his friends, on the occasion of a visit to his native Arezzo (1350), took him to the house where he was born, and told him how the city had provided that no change should be made in it. In former times the dwellings of certain great saints were preserved and revered in this way, like the cell of St Thomas Aquinas in the Dominican convent at Naples, and the Portiuncula of St Francis near Assisi; and one or two great jurists also enjoyed the half-mythical reputation which led to this honor.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 people at Bagnolo, near Florence, called an old building the 'Studio' of Accursius (b.*c.* 1150), but, nevertheless, suffered it to be destroyed.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great incomes and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which some jurists obtained as consulting lawyers made a lasting impression on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过去人们只献给圣人和英雄的赞美，此时大量地给予了彼特拉克，他晚年确信这不过是一件愚蠢而又麻烦的事情。《致后人书》是这位声名远扬的老人为了满足公众好奇心无奈之下而写的自白。他承认，他渴望在将来获得名声，但是宁愿在他尚在人世的时候默默无闻。在他那关于幸运和不幸的对话中，对话者坚持名誉无用，在辩驳中占上风。但是，与此同时，就像查尔斯四世知晓他一样，拜占庭帝国的君主从他的著作中知道他，彼特拉克对此是高兴的。实际上，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名声早已远及意大利以外。当他的朋友和他一同拜访他的出生地阿雷佐（1350年），带他回到他出生的房子，告诉他那个城市如何禁止对房屋内原来的样子作任何变动，他为之激动的心情亦是自然流露。以前，一些圣人的住处都是原封不动地保存，以表敬意，例如圣托马斯·阿奎那 [3_11] 在那不勒斯的多明我会修道院的一所小房子，还有拉西西附近圣方济各 [3_12] 的宝尊堂；还有一两个法学家也享受着半神话式的名誉而得到这种光荣。14世纪末，人们把佛罗伦萨附近的巴尼奥洛的一座古老的建筑称作阿库修斯（约生于1150年）的“书斋”，但是后来却眼睁睁看着它遭到破坏。很有可能，某些法学家作为咨询律师获得的巨大收入和政治影响力，给大众想象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To the cultus of the birthplaces of famous men must be added that of their graves, and, in the case of Petrarch, of the spot where he died. In memory of him Arqua became a favorite resort of the Paduans, and was dotted with graceful little villas. At this time there were no 'classic spots' in northern Europe, and pilgrimages were only made to pictures and relics. It was a point of honor for the different cities to possess the bones of their own and foreign celebrities; and it is most remarkable how seriously the Florentines, even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long before the building of Santa Croce—labored to make their cathedral a pantheon. Accorso, Dante, Petrarch, Boccaccio and the jurist Zanobi della Strada were to have

had magnificent tombs there erected to them. Lat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renzo il Magnifico applied in person to the Spoletans, asking them to give up the corpse of the painter Fra Filippo Lippi for the cathedral, and received the answer that they had none too many ornaments to the city, especially in the shape of distinguished people, for which reason they begged him to spare them; and, in fact, he had to be contented with erecting a cenotaph. And even Dante, in spite of all the applications to which Boccaccio urged the Florentines with bitter emphasis, remained sleeping tranquilly by the side of San Francesco at Ravenna, 'among ancient tombs of emperors and vaults of saints, in more honorable company than thou, O Home, couldst offer him'. It even happened that a man once took away unpunished the lights from the altar on which the crucifix stood, and set them by the grave, with the words, 'Take them; thou art more worthy of them than He, the Crucified One!'

除了对名人出生地的崇拜外，还有对坟墓的崇拜，就彼特拉克而言，还有对他去世地点的崇拜。为了纪念他，阿夸变成了帕多瓦人最喜爱的旅游胜地之一，那里散布着美丽的小别墅。那时，北欧没有“圣地”，人们的旅行意在名人遗像和遗物。城市是否拥有本国或外国名人的骨骸，这是事关名誉的大事；最引人注目的是佛罗伦萨人，甚至在14世纪——早在圣十字教堂建筑之前——就努力把他们的教堂打造成万神庙。他们为阿克索、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法学家扎诺比·德拉·斯特拉达在佛罗伦萨建造了气势宏伟的坟墓。15世纪下半叶，伟大的洛伦佐亲自到斯波莱托，请求他们为教堂放弃画家弗拉·菲利波·利比的遗体，他收到回复声称他们的城市没有多余的纪念物，尤其是名人遗留下来的，因此恳求他割爱；实际上，他不得不为伟人建立纪念碑而感到满足。尽管薄伽丘严厉地敦促佛罗伦萨人归还但丁的骨骸，如今但丁依然在拉文那，安静地沉睡在圣方济各教堂附近。“安睡在君主的古墓和圣人的墓穴之间，啊，家乡！您为他提供了比你更光荣的伴侣。”甚至曾有一个人从立着十字架的祭坛上拿走

烛灯，放到但丁的墓前说：“收下吧，你比十字架上的人更值得拥有它们！”这个人没有受到惩罚。

And now the Italian cities began again to remember their ancient citizens and inhabitants. Naples, perhaps, had never forgotten its tomb of Virgil, since a kind of mythical halo had become attached to the name.

这时，意大利的城市又开始记起古代的市民和居民了。或许那不勒斯从未忘记维吉尔的坟墓，因为有一种神秘的光环和这个名字紧密相连。

The Paduans, eve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firmly believed that they possessed not only the genuine bones of their founder, Antenor, but also those of the historian Livy. [2_9] 'Sulmona,' says Boccaccio, 'bewails that Ovid lies buried far away in exile; and Parma rejoices that Cassius sleeps within its walls.' The Mantuans coined a medal in 1257 with the bust of Virgil, and raised a statue to represent him. In a fit of aristocratic insolence, the guardian of the young Gonzaga, Carlo Malatesta, caused it to be pulled down in 1392, and was afterwards forced, when he found the fame of the old poet too strong for him, to set it up again. Even then, perhaps, the grotto, a couple of miles from the town, where Virgil was said to have meditated, was shown to strangers, like the 'Scuola di Virgilio' at Naples. Como claimed both the Plinys for its own, and at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erected statues in their honor, sitting under graceful baldachins on the facade of the cathedral.

甚至在16世纪，帕多瓦人就坚信他们不仅有缔造者安特诺尔的真正遗骨，还有历史学家李维的。[3_13] 薄伽丘说：“奥维德在流亡中去世埋葬远乡，苏尔莫纳悲恸不已；卡西乌斯长眠于帕尔玛，帕尔玛鼓舞欢欣。”1257年，曼图亚人新铸上面刻有维吉尔半身像的纪念币，并建造维吉尔的塑像。1392年，卡洛·马拉泰斯塔，年轻的贡扎加的保护人，逞一时贵族蛮横无理之气，将塑像推倒，之后，他发现这位老诗人的声誉太深入人心了，于是不得不再次树立起维吉尔的塑像。直到这时，距离曼图亚几英里的一个洞穴对外开放参观，据说这里是维吉尔冥想的地方，就像那不勒斯的“维吉尔学校”一样。科摩城声称两个普林尼 [3_14] 都属于它，并于15世纪末建立雕像以示敬意，雕塑坐落在教堂正面的祭坛华盖下。

History and the new topography were now careful to leave no local celebrity unnoticed. At the same period the northern chronicles only here and there, among the list of popes, emperors, earthquakes and comets, put in the remark that at such a time this or that famous man 'flourished'. We shall elsewhere have to show how, main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idea of fame, an admirabl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was developed. We must here limit ourselves to the local patriotism of the topographers who recorded the claims of their native cities to distinction.

此时，历史学和新的地志学都小心翼翼，不忽略每一个当地的名人。在同一时期，北方地区的编年史里记录着教皇、君主、地震和彗星等事件，零星地插入此时这个或那个名人“活跃”过的话语。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说明，在声誉观念的影响下，值得称道的传记文学如何应运而生。这里我们只谈那些将自己的家乡描述得出神入化的地质学家们的地方主义。

In the Middle Ages, the cities were proud of their saints and of the bones and relics in their churches. With these the panegyrist of Padua in 1450, Michele Savonarola, begins his list; from them he passes to 'the famous men who were no saints, but who, by their great intellect and force (virtus) deserve to be added(*adnecti*) to the saints'—just a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the distinguished man came close upon the hero. The further enumeration is most characteristic of the time. First comes Antenor, the brother of Priam, who founded Padua with a band of Trojan fugitives; King Dardanus, who defeated Attila in the Euganean hills, followed him in pursuit and struck him dead at Rimini with a chess-board; the Emperor Henry IV, who built the cathedral; a King Marcus, whose head was preserved in Monselice; then a couple of cardinals and prelates as founders of colleges, churches and so forth; the famous Augustinian theologian, Fra Alberto; a string of philosophers beginning with Paolo Veneto and the celebrated Pietro of Albano; the jurist Paolo Padovano; then Livy and the poets Petrarch, Mussato, Lovato. If there is any want of military celebrities in the list, the poet consoles himself for it by the abundance of learned men whom he has to show, and by the more durable character of intellectual glory, while the fame of the soldier is buried with his body, or, if it lasts, owes its permanence only to the scholar. It is nevertheless honorable to the city that foreign warriors lie buried here by their own wish, like Pietro de' Rossi of Parma, Filippo Arcelli of Piacenza, and especially Gattamelata of Narni (d. 1443), whose brazen equestrian statue, 'like a Caesar in triumph', already stood by the church of the Santo. The author then names a crowd of jurists and physicians, nobles 'who had not only, like so many others, received, but deserved, the honor of knighthood'. Then follows a list of famous mechanicians, painters and musicians, which is closed by the name of a fencing-master Michele Rosso, who, a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man in his profession, was to be seen painted in many places.

在中世纪，城市因它们的圣人及教堂里的遗骸和遗物而自豪。1450年，帕多瓦的致颂词者米凯莱·萨沃纳罗拉开始列出一长串人物；他从这些圣人延伸到“不是圣人的名人，但是他们有勇有谋（德行），应该列入圣人行列。”就像在古典时代，名人很接近英雄了。进一步的阐述更能表现这个时代的特征。首先，普里亚姆的兄弟安特诺尔，他和特洛伊的逃亡者建立了帕多瓦；达尔达诺斯国王在尤根尼亚山打败了阿蒂拉，并紧随其后，在里米尼用棋盘将阿蒂拉打死；亨利四世建造了大教堂；国王马库斯的头颅还保存在蒙塞利切；还有几个枢机主教和高级教士创建了大学、教堂等等；名扬四海的奥斯定会神学家阿尔伯托教士；一批以保罗·威尼托和以阿尔巴诺的彼得罗为首的哲学家；法学家保罗·帕多万诺；其次还有李维和诗人彼特拉克、莫莎图、洛瓦托。如果要问为什么名单中不包括军队里的名人，诗人米凯莱·萨沃纳罗拉安慰自己说他已经列举了很多博学者，才智的荣耀是经久不衰的，而士兵的名誉和他们的尸体一起埋葬在土地里，或者，即使名垂青史，也只是学者记录的功劳。尽管如此，国外的战士愿意埋葬于斯是城市的荣幸，比如帕尔玛的彼得罗·德·罗西，皮亚琴察的菲利普·阿尔切利，尤其是纳尔尼的格太梅拉达（卒于1443年），他骑马的黄铜雕塑，“就像凯旋的恺撒”，早已矗立在桑托教堂旁。作者还列举了很多法官和医生，这些尊贵的人“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不仅荣获骑士头衔，并让这些头衔实至名归”。然后他列举了著名的机械师、画家和音乐家，以剑术领域里最杰出的剑术大师米凯莱·罗索收尾，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的画像。

By the side of these local temples of fame, which myth, legend, popular admiration and literary tradition combined to create, the poet-scholars built up a great pantheon of worldwide celebrity. They made collections of famous men and famous women, often in direct imitation of Cornelius Nepos, the pseudo-Suetonius, Valerius Maximus, Plutarch *(Mulierum virtutes),* Hieronymus *(De viris illustribus)* and others; or they wrote of imaginary triumphal

processions and Olympian assemblies, as was done by Petrarch in his *Trionfo della fama,* and Boccaccio in the *Amorosa isione,* with hundreds of names, of which three-fourths at least belong to antiquity and the rest to the Middle Ages.[1] By and by this new and comparatively modern element was treated with greater emphasis; the historians began to insert descriptions of character, and collections arose of the biographies of distinguished contemporaries, like those of Filippo Villani, Vespasiano Fiorentino, Bartolommeo Facio and lastly of Paolo Giovio.

在神话、传说、民众赞颂和文学传统共同造就的本地荣誉殿堂旁，诗人学者为誉满天下的名人建造了伟大的万神庙。无论男女，他们往往直接模仿科尔奈利乌斯·奈波斯，伪托苏埃托尼乌斯，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普鲁塔克（《妇女的美德》），希罗尼穆斯（《名人传》）等人的作品，荟萃了很多男女名流；他们或者编写想象中的胜利游行和奥林匹斯山盛大的群神集会，就像彼特拉克在《荣誉的凯旋》和薄伽丘在《爱情的幻影》里写的一样，上百个名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属于古代，其余的属于中世纪。[1] 这种新式的近代元素逐渐受到重视；历史学家开始插入人物性格的描述，大量当代名人传记也兴起了，比如菲利波·维拉尼、维斯帕夏诺·菲奥兰提诺、巴尔托洛梅奥·法奇奥，和保罗·乔维奥所写的传记。

1: In the Casus virorum illustrium of Boccaccio only the close of the eighth book and the last book—the ninth—deal with non-classical times. And so at a much later time in the Commentarii urbani of Raph. Volaterranus, in the twenty-first book; popes and emperors are treated separately in Books 22 and 23. [Raphael Maffeius (Volaterranus),

Commentariorum urbanorum, Rome, 1506, and Paris, 1526.] In the work De claris mulieribus by the Augustinian Jacobus Bergomensis (printed 1497, but probably published earlier) antiquity and legend hold the chief plac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valuable biographies of Italian women [cf. note 33: Jacobus Phillipus Foresti (Bergomensis), Ferrara, 1497]. In Scardeonius (De Urb. Patav. Antiqu. in Graev., Thesaur., vi, iii, col. 405 ff [i.e. J. Graevius and P. Burmannus, Thesaurus antiquitatum et historiarum Italiae, 30 vols., Leiden, 1704-23] only famous Paduan women are mentioned. First comes a legend or tradition from the time of the fall of the empire, then tragical stories of the party struggles of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then notices of several heroic women; then the foundress of nunneries, the political woman, the female doctor, the mother of many and distinguished sons, the learned woman, the peasant girl who dies defending her chastity; then the cultivated beauty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on whom everybody writes sonnets; and lastly, the female novelist and poet at Padua. A century later the woman professor would have been added to these. For the famous women of the House of Este, see Ariosto, Orlando furioso, xiii.

1：在薄伽丘的《名人的不幸》中，只有第8卷的末尾和最后一卷（第9卷）才涉及到非古典时代。很久之

后的伏尔泰拉的《城市记事》亦是如此。奥古斯丁会教士雅克布·伯格曼的作品《名妇传》中（1497年出版，但可能发表得更早），古人和圣徒列传占主要地位，但是也有一些有价值的意大利妇女传记。斯卡第奥尼乌斯的《帕多瓦古都记》中（载《宝典》第6卷第3章，第405栏及以下各栏），只提及著名的帕多瓦妇女。这本书首先是写帝国衰落时期的传说或传统，接着讲述13世纪和14世纪党派争斗的悲剧故事；其次它记录了一些巾帼英雄；再次是女修道院的女创办人、女政治家、女医生、生有多个名人的母亲、女学者。捍卫节操丧生的农村女性；还有16世纪人人写十四行诗赞美的有教养的美人，最后是帕多瓦的女小说家和女诗人。一个世纪之后，女教授将会加入这个行列。关于埃斯特家族的著名妇女，参见阿里奥斯托《奥兰多·富里索》第13章。

The north of Europe, until Italian influence began to tell upon its writers—for instance, on Trithemius, the first German who wrote the lives of famous men—possessed only either legends of the saints, or descriptions of princes and churchmen partaking largely of the character of legends and showing no traces of the idea of fame, that is, of distinction won by a man's personal efforts. Poetical glory was still confined to certain classes of society, and the names of northern artists are only known to us at this period in so far as they were members of certain guilds or corporations.

直至意大利的影响力波及欧洲北部的作家以前——例如，特里特米乌斯就曾受到影响，他是德国第一位写名人传记的作家——北方只有圣徒的传说，或者君王和圣职人员的描述，但是这种描述主要具有

传说性质，和名誉没有任何联系，也就是说，和个人努力获得的荣誉无关。诗人的荣耀依然局限于某些社会阶层，而这个时期的北方艺术家能为我们所知，也是因为他们当时的身份是某些协会或社团成员。

The poet-scholar in Italy had, as we have already said, the fullest consciousness that he was the giver of fame and immortality, or, if he chose, of oblivion. Boccaccio complains of a fair one to whom he had done homage, and who remained hard-hearted in order that he might go on praising her and making her famous, and he gives her a hint that he will try the effect of a little blame. Sannazaro, in two magnificent sonnets, threatens Alfonso of Naples with eternal obscurity on account of his cowardly flight before Charles VIII. Angelo Poliziano seriously exhorts (1491) King John of Portugal to think betimes of his immortality in reference to the new discoveries in Africa, and to send him materials to Florence, there to be put into shape *(operosius excolenda),* otherwise it would befall him as it had befallen all the others whose deeds, unsupported by the help of the learned, 'lie hidden in the vast heap of human frailty'. The king, or his humanistic chancellor, agreed to this, and promised that at least the Portuguese chronicles of African affairs 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Italian and sent to Florence to be done into Latin. Whether the promise was kept is not known. These pretensions are by no means so groundless as they may appear at first sight; for the form in which events, even the greatest, are told to the living and to posterity is anything but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The Italian humanists, with their mode of exposition and their Latin style, had long the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reading world of Europe, and till last century the Italian poets were more widely known and studied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nation. The baptismal name of the Florentine Amerigo Vespucci was given, on account of his book of travels, to a new quarter of the globe, and if

Paolo Giovio, with all his superficiality and graceful caprice, promised himself immortality, his expectation has not altogether been disappointed.

正如我们提到的，意大利的诗人学者充分意识到自己能让他人获得名誉且永垂不朽，或者如果他乐意，也能使之遭到漠视。薄伽丘曾抱怨一位美丽的女士，他向她表示敬意，而这位女士却无动于衷，为的是希望薄伽丘继续赞美她，让她一举成名，他暗示这位女士他会试试稍加指责的效果。桑纳扎罗有两首有名的十四行诗，使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面对被永世遗忘的威胁，因为他曾在查尔斯八世面前怯懦地逃离。安吉洛·波利齐亚诺（1491年）郑重其事地劝说葡萄牙的国王约翰，鉴于他在非洲的新发现，他应该趁早考虑让伟业能够流芳百世，并且把资料送到佛罗伦萨，让他来成文（细加润色）。否则，就像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一样，没有学者的帮助，他们的业绩也将永远“埋藏在人类的无常里”。这位国王，或者是人文主义的大臣，同意了安吉洛·波利齐亚诺的提议，并承诺至少关于非洲大事的葡萄牙文编年史应该翻译成意大利语，并且送到佛罗伦萨再翻译成拉丁语。这个承诺是否兑现，我们不得而知。这些主张并不像我们第一眼看到的那么毫无根据；因为让事件，甚至是最伟大的事件，传播于当代和流传后世的方式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以他们的阐述风格和拉丁文特性，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长期完全控制欧洲的阅读群体，直到上世纪，意大利的诗人更广为人知，研究他们的人比研究其他国家诗人的人更多。世界上有一个新发现的地方以佛罗伦萨的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教名命名，是因为他写过一本游记，而保罗·乔维奥充满肤浅之见和美丽的空想，如果他指望自己能够永垂不朽，那么他的期望并没有完全落空。

Amid all these preparations outwardly to win and secure fame, the curtain is now and then drawn aside, and we see with frightful evidence a boundless ambition and thirst after greatness, independent of all means and consequences. Thus, in the Preface to

Machiavelli's Florentine history, in which he blames his predecessors Leonardo, Aretino and Poggio for their too considerate reticence with regard to the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city: 'They erred greatly and showed that they understood little the ambition of men and the desire to perpetuate a name. How many who could distinguish themselves by nothing praiseworthy strove to do so by infamous deeds! Those writers did not consider that actions which are great in themselves, as is the case with the actions of rulers and of states, always seem to bring more glory than blame, of whatever kind they are and whatever the result of them may be.' In more than one remarkable and dreadful undertaking the motive assigned by serious writers is the burning desire to achieve something great and memorable. This motive is not a mere extreme case of ordinary vanity, but something demonic, involving a surrender of the will, the use of any means, however atrocious, and even an indifference to success itself. In this sense, for example, Machiavelli conceives the character of Stefano Porcari; of the murderers of Galeazzo Maria Sforza the documents tell us about the same; and the assassination of Duke Alessandro of Florence (1537) is ascribed by Varchi himself to the thirst for fame which tormented the murderer Lorenzino Medici. Still more stress is laid on this motive by Paolo Giovio. Lorenzino, according to him, pilloried by a pamphlet of Molza, broods over a deed whose novelty shall make his disgrace forgotten, and ends by murdering his kinsmen and prince. These ar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is age of overstrained and despairing passions and forces, and remind us of the burning of the temple of Diana at Ephesus in the time of Philip of Macedon.

在这些表面上看似赢取名誉和保护名誉的努力中，帷幕有时被拉开到了一旁，我们看到追求“伟大”的无限野心和渴望，不计任何方法和后果，让人触目惊心。所以，马基雅弗利在《佛罗伦萨史》的前言

中指责他的前辈列奥纳多、阿雷蒂诺和波焦在城市政治党派的问题上过于谨慎沉默："他们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根本不明白人们流芳百世的野心和渴望。有多少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事迹，却希望通过一些不耻的行为来达到这个目的！那些作家没有考虑到，那些伟大的行为，就像统治者和国家的行为，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似乎总是能带来光荣，而不是责难。"严肃的作家不止一次把不同寻常而又可怕的事件的动机归于一种想要名留青史的强烈愿望。这种动机不仅仅是对普通虚名的极端追求，而是像恶魔似的，包括使意志屈服、再残忍的手段都会用，乃至对成功本身毫不在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基雅弗利构想出人物斯特凡诺·波尔卡里和谋杀犯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的性格，和历史记载所述一样；瓦尔奇本人把佛罗伦萨的阿里桑德罗公爵遇刺（1537年）归结于谋杀犯洛伦佐·美第奇受到了渴望名誉的折磨。保罗·乔维奥更是强调了这一动机。根据保罗·乔维奥所述，洛伦佐曾被莫尔扎的一本小册子嘲笑，他思考着做一件新奇的事情让人忘掉他不光彩的过去，最终他以弑亲和弑君的结局收尾。这个时代是感情和力量都过度紧张和绝望的时代，以上是典型特征，并让我们想起在马其顿的菲利普时代焚烧以弗所的狄安娜神庙。

Ridicule and Wit

嘲笑和机智

The corrective, not only of this modern desire for fame, but of all highly developed individuality, is found in ridicule, especially when expressed in the victorious form of wit. We read in the Middle Ages how hostile armies, princes and nobles provoked one another with symbolical insult, and how the defeated party was loaded with symbolical outrage. Here and there, too,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wit began to be used as a weapon in theological disputes, and the poetry of Provence produced a whole class of

satirical compositions. Even the Minnesingers, as their political poems show, could adopt this tone when necessary. But wit could not be an independent element in life till its appropriate victim, the developed individual with personal pretensions, had appeared. Its weapons were then by no means limited to the tongue and the pen, but included tricks and practical jokes—the so-called *burle* and *beffe*—which form a chief subject of many collections of novels.

近代对名誉的渴望和高度发展的个性在嘲笑中得到矫正，尤其是当嘲笑以出奇制胜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读到在中世纪怀有敌意的部队、君主和贵族怎样用象征性的侮辱激怒对方，被打败的党派如何忍受象征性的凌辱。在古典文学的影响下，机智也开始到处被神学辩论当作武器，而普罗旺斯的诗歌产生了一整类的讽刺文文体。甚至行吟诗人，就如他们的政治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在需要的时候也采取这种语气。但是，直到适合的嘲笑对象，即直到自命不凡且充分发展的个人出现，机智才成为生活中独立的元素。武器绝不再仅仅是口舌笔墨，还包括恶作剧和玩笑话——所谓的“burle”和“beffe”——构成很多小说集的主题。

The Hundred Old Tales, which must have been composed abou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have as yet neither wit, the fruit of contrast, nor the *burla,* for their subject; their aim is merely to give simple and elegant expression to wise sayings and pretty stories or fables. But if anything proves the great antiquity of the collection, it is precisely this absence of satire. For with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omes Dante, who, in the utterance of scorn, leaves all other poets in the world far behind, and who, if only on account of his great picture of the deceivers, must be called the chief master of colossal comedy. With Petrarch begin the collections of Witty sayings after the pattern of Plutarch (Apophthegmata,

etc.).

《古代故事百篇》应该是在13世纪末完成的，既没有用对比的手法产生“机智”，也没有把“嘲笑”作为主题；这本书的目的仅仅是简洁优美地讲述睿智格言、好听的故事或寓言。但是如果要找出什么来证明这本集子有多古老，那恰恰是它毫无讽刺特征。因为伴随着14世纪但丁的出现，他嘲笑的说话方式将世界上的所有其他诗人远远抛在身后，如果就他描写出的骗子形象而言，他必定能被称为大喜剧的大师。从彼特拉克起，才开始按照普鲁塔克的范例收集睿智格言（《格言集》等）。

What stores of wit were concentrated in Florence during this century is most characteristically shown in the novels of Franco Sacchetti. These are, for the most part, not stories but answers, given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shocking pieces of *naïveté,* with which silly folks, court jesters, rogues and profligate women make their retort. The comedy of the tale lies in the startling contrast of this real or assumed *naïveté* with conventional morality and the ordinary relations of the world—things are made to stand on their heads. All means of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 are made use of,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certain North Italian dialects. Often the place of wit is taken by mere insolence, clumsy trickery, blasphemy and obscenity; one or two jokes told *of condottieri* are among the most brutal and malicious which are recorded. Many of the *burle* are thoroughly comic, but many are only real or supposed evidence of personal superiority, of triumph over another. How much people were willing to put up with, how often the victim was satisfied with getting the laugh on his side by a retaliatory trick, cannot be said; there was much heartless and pointless malice mixed up with it all, and life in Florence was no doubt often made

unpleasant enough from this cause. [2_10] The inventors and retailers of jokes soon became inevitable figures, and among them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who were classical—far superior to all the mere court-jesters, to whom competition, a changing public and the quick apprehension of the audience, all advantages of life in Florence, were wanting. Some Florentine wits went starring among the despotic courts of Lombardy and Romagna, and found themselves much better rewarded than at home, where their talent was cheap and plentiful. The better type of these people is the amusing man *(l'uomo piacevole),* the worse is the buffoon and the vulgar parasite who presents himself at weddings and banquets with the argument, 'If I am not invited, the fault is not mine.' Now and then the latter combine to pluck a young spendthrift, but in general they are treated and despised as parasites, while wits of higher position bear themselves like princes, and consider their talent as something sovereign. Dolcibene, whom Charles IV had pronounced to be the 'king of Italian jesters', said to him at Ferrara: 'You will conquer the world, since you are my friend and the pope's; you fight with the sword, the pope with his bulls, and I with my tongue.' This is no mere jest, but the foreshadowing of Pietro Aretino.

在这个世纪，弗朗哥·萨克蒂的小说最能体现佛罗伦萨收集的睿智格言有多么丰富。其实，小说大部分不是故事而是在特定情况下的回答——愚蠢的普通人、宫廷弄臣、市井无赖和放荡女子用以反驳的极为质朴的语言。故事的喜剧在于这种真实或假装的质朴，与传统的道德和通常人际关系之间的惊人对比——一切都上下颠倒了。作者利用了所有生动的表现方法，包括某种意大利北部方言的应用。往往机智被傲慢的态度、拙劣的花招、侮慢的言辞和污秽文字取代；其中雇佣军的几个笑话是所记载的最粗鲁恶毒的几则。许多“恶作剧”是彻头彻尾的喜剧，但是也有许多只是为了证明个人凌驾他人的真正或假想的

优越感和胜利。人们愿意忍受的程度是多少，被伤害者是否常常能从一个报复性的把戏令人发笑这一点而感觉满足，我们不得而知。这中间掺杂了很多无情无义和毫无意义的恶意，毫无疑问，佛罗伦萨人的生活往往因此很不愉快。 [3_15] 那些笑话的发明者和传播者很快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当中肯定有一些人是第一流的——远远高于宫廷弄臣，对于弄臣来说，他们没有竞争，缺乏变化的公众，观众的快速理解力不足，一切佛罗伦萨生活的有利条件都是欠缺的。一些机智的佛罗伦萨人到伦巴第和罗马涅的暴君宫廷上当主要演员，他们发现，在国内这种才能比比皆是而且廉价，相比之下，他们在那能得到更好的回报。这些人当中最好的一类是逗笑的人，最差的是穿着演出服在婚礼、宴会上表演的小丑和粗俗的食客。“如果我没有被邀请，那不是我的错。”后两种人不时联合起来从浪荡子那里骗钱，但是一般他们被人视为食客，遭人鄙视，而地位较高的戏谑家以王者自居，认为他们的才能是至高无上的。查尔斯四世称多尔奇本是“意大利宫廷滑稽家之王”，多尔奇本在费拉拉对查尔斯四世说：“你将征服这个世界，因为你是我和教皇的朋友；你用宝剑战斗，教皇用训谕战斗，而我用舌头战斗。”这不仅仅是句玩笑话，也预示着彼得罗·阿雷蒂诺的到来。

The two most famous jesters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ere a priest near Florence, Arlotto (1483), for more refined wit *(facezie),* and the court-fool of Ferrara, Gonnella, for buffoonery. We can hardly compare their stories with those of the Parson of Kalenberg and Till Eulenspiegel, since the latter arose in a different and half-mythical manner, as fruits of the imagination of a whole people, and touch rather on what is general and intelligible to all, while Arlotto and Gonnella were historical beings, colored and shaped by local influences. But if the comparison be allowed, and extended to the jests of the non-Italian nations, we shall find in general that the joke in the French *fabliaux,* as among the Germans, is chiefly directed to the attainment of some advantage or

enjoyment, while the wit of Arlotto and the practical jokes of Gonnella are an end in themselves, and exist simply for the sake of the triumph of production. (Till Eulenspiegel again forms a class by himself, as the personified quiz, mostly pointless enough, of particular classes and professions.) The court-fool of the Este saved himself more than once by his keen satire and refined modes of vengeance.

15世纪中期有两位最有名的滑稽家，一位是居住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僧侣阿罗托（1483年），以较高雅的机智著称，另一位是费拉拉的滑稽弄臣贡内拉，以插科打诨著称。我们很难将他们的故事和卡伦堡的教士、蒂尔·厄伦史皮格尔的故事相比较，因为后者是整个民族想象力的结果，以不同的、半神话的方式叙述，涉及的内容是一般的并且是人们一望而知的，而阿罗托和贡内拉是历史的人物，带有地方色彩和受地方影响。但是，如果允许我们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到非意大利国家的笑话，我们就会发现法国《寓言故事》中的笑话，就像德国人的一样，主要达到利用或享乐的目的，而阿罗托的机智和贡内拉的恶作剧本身就是目的，是为了玩笑而玩笑，它们的存在只为作品的胜利。（蒂尔·厄伦史皮格尔，作为特定阶层和职业的爱开玩笑的人的化身，他所开的玩笑再次形成一个新类别，但大多数是没有意义的。）埃斯特家族的滑稽弄臣不止一次用他机智的讽刺和高雅的报复方式挽救了他自己。

The type of the *uomo piacevole* and the *buffone* long survived the freedom of Florence. Under Duke Cosimo flourished Barlacchia,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sco Ruspoli and Curzio Marignolli. In Pope Leo X the genuine Florentine love of jesters showed itself strikingly. This prince, whose taste for the most refined intellectual pleasures was insatiable, endured and desired at his table a number of witty buffoons and jack-puddings, among

them two monks and a cripple; at public feasts he treated them with deliberate scorn as parasites, setting before them monkeys and crows in the place of savoury meats. Leo, indeed, showed a peculiar fondness for the *burla;* it belonged to his nature sometimes to treat his own favorite pursuits—music and poetry—ironically, parodying them with his factotum, Cardinal Bibbiena. Neither of them found it beneath him to fool an honest old secretary till he thought himself a master of the art of music. The *improvvisatore,* Baraballo of Gaeta, was brought so far by Leo's flattery that he applied in all seriousness for the poet's coronation on the Capitol. On the anniversary of St Cosmas and St Damian, the patrons of the House of Medici, he was first compelled, adorned with laurel and purple, to amuse the papal guests with his recitations, and at last, when all were ready to split with laughter, to mount a gold-harnessed elephant in the court of the Vatican, sent as a present to Rome by Emmanuel the Great of Portugal, while the pope looked down from above through his eyeglass. The brute, however, was so terrified by the noise of the trumpets and kettledrums, and the cheers of the crowd, that there was no getting him over the bridge of Sant' Angelo.

“逗笑的人”和“滑稽戏演员”在佛罗伦萨失去自由很久以后还存在着，巴尔拉奇亚活跃在科西莫公爵时期，弗朗西斯科·鲁斯波利和库尔齐奥·马黎诺里活跃在17世纪初期。佛罗伦萨人对滑稽家的喜爱明显地体现在教皇利奥十世身上。这位君王对高雅的精神愉悦总是不满足，他在饭桌上就容许并希望有一些诙谐的弄臣和丑角陪伴左右，其中有两个僧侣和一个瘸子。在公开的宴会上，他故意轻蔑地把他们当食客看待，他们面前原本放置美味肉食的位置被摆上猴子和乌鸦。利奥对“嘲笑”的确有种特别的爱好；他的本性使他有时候以嘲讽的态度对待他的两大爱好——音乐和诗歌，和他的秘书枢机主教比别纳一起写这方面的滑稽模仿的作品。他们曾愚弄一位诚实的老秘书，直至这位老秘书觉得自己是音乐艺术的大师，但是他们俩都不觉得这有失君主

的身份。即兴诗人，加埃塔的巴拉巴洛，利奥对他奉承备至，甚至严肃地请求为这位诗人在卡比托利欧山上加冕典。在圣科斯马斯和圣达米安，即美第奇家族守护人的纪念日上，他最初不得不头顶桂冠身着紫袍朗诵诗歌去娱悦教皇的宾客，最后，当大家马上要捧腹大笑的时候，他又不得不在梵蒂冈的宫廷爬上套着金鞍的大象（葡萄牙国王埃马努尔送给罗马的礼物），而此时，教皇正透过他的眼镜俯视他。然而这头大象被喇叭声、铜鼓声和众人的欢呼声惊吓，根本走不过圣安吉洛桥。

The parody of what is solemn or sublime, which here meets us in the case of a procession, had already taken an important place in poetry. [2_11] It was naturally compelled to choose victims of another kind than those of Aristophanes, who introduced the great tragedians into his plays. But the same maturity of culture which at a certain period produced parody among the Greeks did the same in Italy. By the clos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 love-lorn wailings of Petrarch's sonnets and others of the same kind were taken off by caricaturists; and the solemn air of this form of verse was parodied in lines of mystic twaddle. A constant invitation to parody was offered by the *Divine Comedy,* and Lorenzo il Magnifico wrote the most admirable travesty in the style of the *Inferno (Simposio* or *IBeoni)*. Luigi Pulci obviously imitates the *improvvisatori* in his *Morgante,* and both his poetry and Boiardo's are in part, at least, a half-conscious parody of the chivalrous poetry of the Middle Ages. Such a caricature was deliberately undertaken by the great parodist Teofilo Folengo (about 1520). Under the name of Limerno Pitocco, he composed the *Orlandino,* in which chivalry appears only as a ludicrous setting for a crowd of modern figures and ideas. Under the name of Merlinus Coccaius he described the journeys and exploits of his fantastic vagabonds (also in the same spirit of parody) in half-Latin hexameters, with all the affected pomp of the

learned Epos of the day *(opus macaronicorum)*. Since then caricature has been constantly, and often brilliantly, represented on the Italian Parnassus.

滑稽地模仿严肃和崇高的事情，正如我们在仪式中看到的，已经在诗歌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3_16] 阿里斯托芬将伟大的悲剧家写进他的剧作，而自然而然地，这时的诗人不得不选择不同于阿里斯托芬嘲讽对象的人物。希腊在某段文化成熟时期产生了讽刺诗文，意大利也是如此。到14世纪末，讽刺作家戏拟彼特拉克哀诉失恋的十四行诗和类似作品；十四行诗的庄重感被不可思议的瞎扯话滑稽模仿。《神曲》也经常被滑稽模仿，伟大的洛伦佐模仿《地狱》的风格写了最令人赞美的滑稽作品《盛宴》或《酒会》。显然路易吉·普尔西模仿即兴诗人才写成《巨人莫尔甘特》，他和博亚尔多的诗歌至少有一部分有意无意地滑稽模仿了中世纪的骑士诗。伟大的滑稽文作家泰奥菲洛·弗伦哥（大约1520年）有意采用这种讽刺体裁。以利墨尔诺·皮托科为笔名，他创作了《小奥兰多》，诗中的骑士精神仅仅作为现代人物和观念的可笑陪衬。借梅尔利奴斯·科凯乌斯之名，他用半拉丁文写了六部格诗，描绘了幻想中流浪汉的旅行和探险（同样采用滑稽模仿的方法），尽管有当时熟悉的叙事诗的故作夸张之文（《混淆体诗集》）。从那时起，滑稽模仿开始常常地出现在意大利诗坛，并且被加以巧妙地应用。

About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Renaissance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wit was undertaken,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good society was regulated more precisely. The theorist was Gioviano Pontano. In his work on speaking, especially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books, he tries by means of the comparison of numerous jokes, or *facetiæ,* to arrive at a general principle. How wit should be used among people of position is taught by Baldassare Castiglione in his *Cortigiano.* [2_12] Its chief function is naturally to enliven those

present by the repetition of comic or graceful stories and sayings; personal jokes, on the contrary, are discouraged on the ground that they wound unhappy people, show too much honor to wrong-doers, and make enemies of the powerful and the spoiled children of fortune; and even in repetition, a wide reserve in the use of dramatic gestures is recommended to the gentleman. Then follows, not only for purposes of quotation, but as patterns for future jesters, a large collection of puns and witty sayings, methodically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ir species, among them some that are admirable. The doctrine of Giovanni della Casa, some twenty years later, in his guide to good manners, [2_13] is much stricter and more cautious; with a view to the consequences, he wishes to see the desire of triumph banished altogether from jokes and *burle*. He is the herald of a reaction, which was certain sooner or later to appear.

大约在文艺复兴中期，人们已经开始对“机智”进行一次理论分析，对其在良好社会的实际应用也做了更加准确的规定。这个理论家就是乔维诺·庞达诺。在他有关讲话的著作中，尤其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书中，他试图对比多则笑话（或者说滑稽故事）得出一个普遍规律。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在《廷臣论》一书中教导人们如何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运用机智。 [3_17] 它的主要功能是自然地复述喜剧故事、高雅故事和谚语使在场的人活跃起来；相反地，人们相互间的笑话不受鼓励，因为这些玩笑会使不幸的人更不快乐，使犯错者洋洋自得，并且与有权者和幸运宠儿树敌；甚至在复述的时候，也建议绅士们尽量少用表演式的动作。接着，他收集了大量双关语和睿智的谚语，并根据它们所属的类型进行系统地排列，目的不仅是为了提供引用，也是为未来的滑稽家提供典范，其中一些十分绝妙。大约二十年后，乔瓦尼·德拉·卡萨在他交际指南中的主张更为审慎； [3_18] 至于后果，他希望从笑话和恶作剧中消除制胜他人的愿望。他是反倾向先驱（这种趋势迟早要发生）。

Italy had, in fact, become a school for scandal, the like of which the world cannot show, not even in France at the time of Voltaire. In him and his comrades there was assuredly no lack of the spirit of negation; but whe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as to be found the crowd of suitable victims, that countless assembly of highly and characteristically developed human beings, celebrities of every kind, statesmen, churchmen, inventors and discoverers, men of letters, poets and artists, all of whom then gave the fullest and freest play to their individuality? This host existed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and by its side the general culture of the time had educated a poisonous brood of impotent wits, of born critics and railers, whose envy called for hecatombs of victims; and to all this was added the envy of the famous men among themselves. In this the philologists notoriously led the way—Filelfo, Poggio, Lorenzo Valla and others—while the artist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lived in peaceful and friendly competition with one another. The history of art may take note of the fact.

事实上，意大利已经成了制造丑闻的学校，世界上再没这样的地方，就连法国的伏尔泰时期也算不上。毫无疑问，伏尔泰和他的同伴们不缺否定精神；但是，在18世纪，我们到哪去找嘲讽的对象呢？无数高度发展和个性鲜明的人们——各行各业的名人、政治家、牧师、发明家和发现者、文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他们当时都让自身的个性得到最充分和最自由的发展。这些人存在于15世纪和16世纪，这个时期的普遍文化培养出了一大群恶毒无能的机智嘲讽者，他们天生就是批评家、斥责者，嫉妒心驱使他们要求有无数的人供嘲讽；此外，名人间还相互嫉妒。这次文人臭名昭著地打了先锋——菲莱尔福、波焦、洛伦佐·瓦拉等，而15世纪的艺术家却和平友好地相互竞争。艺术史会注意到这一事实。

Florence, the great market of fame, was in this point, as we have said, in advance of other cities. 'Sharp eyes and bad tongues' is the description given of the inhabitants. An easygoing contempt of everything and everybody was probably the prevailing tone of society. Machiavelli, in the remarkable Prologue to his *Mandragola,* refers rightly or wrongly the visible decline of moral force to the general habit of evil-speaking, and threatens his detractors with the news that he can say sharp things as well as they. Next to Florence comes the papal court, which had long been a rendezvous of the bitterest and wittiest tongues. Poggio's *Facetiæ* are dated from the Chamber of Lies *(bugiale)* of the apostolic notaries; and when we remember the number of disappointed place-hunters, of hopeless competitors and enemies of the favorites, of idle, profligate prelates there assembled, it is intelligible how Rome became the home of the savage pasquinade as well as of more philosophical satire. If we add to this the widespread hatred borne to the priests, and the well-known instinct of the mob to lay any horror to the charge of the great, there results an untold mass of infamy. Those who were able protected themselves best by contempt both of the false and true accusations, and by brilliant and joyous display. More sensitive natures sank into utter despair when they found themselves deeply involved in guilt, and still more deeply in slander. In course of time calumny became universal, and the strictest virtue was most certain of all to challenge the attacks of malice. Of the great pulpit orator, Fra Egidio of Viterbo, whom Leo made a cardinal on account of his merits, and who showed himself a man of the people and a brave monk in the calamity of 1527, Giovio gives us to understand that he preserved his ascetic pallor by the smoke of wet straw and other means of the same kind. Giovio is a genuine Curial in these matters. He generally begins by telling his story, then adds that he does not believe it, and then hints at the end that perhaps after all there may be something in it. But the true scapegoat of Roman scorn was the

pious and moral Adrian VI. A general agreement seemed to be made to take him only on the comic side. He fell out from the first with the formidable Francesco Berni, threatening to have thrown into the Tiber not, as people said, the statue of Pasquino, but the writers of the satires themselves. The vengeance for this was the famous *Capitolo* against Pope Adriano, inspired not exactly by hatred, but by contempt for the comical Dutch barbarian; the more savage menaces were reserved for the cardinals who had elected him. The plague, which then was prevalent in Rome, was ascribed to him; Berni and others sketch the environment of the pope with the same sparkling untruthfulness with which the modern *feuilletoniste* turns black into white, and everything into anything. The biography which Paolo Giovio was commissioned to write by the Cardinal of Tortosa, and which was to have been a eulogy, is for anyone who can read between the lines an unexampled piece of satire. It sounds ridiculous—at least for the Italians of that time—to hear how Adrian applied to the Chapter of Saragossa for the jaw-bone of St Lambert; how the devout Spaniards decked him out till he looked 'like a right well-dressed pope'; how he came in a confused and tasteless procession from Ostia to Rome, took counsel about burning or drowning Pasquino, would suddenly break off the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when dinner was announced; and lastly, at the end of an unhappy reign, how he died of drinking too much beer—whereupon the house of his physician was hung with garlands by midnight revellers, and adorned with the inscription, *'Liberatori Patriæ S.P.Q.R.'* It is true that Giovio had lost his money in the general confiscation of public funds, and had only received a benefice by way of compensation because he was 'no poet', that is to say, no pagan. But it was decreed that Adrian should be the last great victim. After the disaster which befell Rome in 1527, slander visibly declined along with the unrestrained wickedness of private life.

佛罗伦萨，名利的大市场，正如我们所说的，在这一点上已经超过了其他城市。“目光敏锐，舌头毒辣”是对这个城市居民的描写。对诸人诸事都怡然自得地表示蔑视可能就是当时社会盛行的风气。马基雅弗利在《曼德拉草》一书的序言中正确或错误地提到，道德力量显然堕落成恶语中伤的坏习惯，并且威胁他的诽谤者，他会说出和他们一样尖刻的话。教皇的宫廷仅次于佛罗伦萨城，长期以来它就聚集了最刻薄和最睿智的嘲讽者。波焦的《诙谐集》从教廷显贵的“谎言之所”开始；当我们想到这么多失望的猎取官职者、无望的竞争者、嫉妒受宠者的敌人以及聚集在那儿的懒散放荡教士，我们可以理解罗马如何既成为野蛮的讽刺文的家园，又成为具有哲学意味的讽刺的故乡。如果我们加上人们对教士的普遍仇恨，和我们所熟悉的民众归咎伟人的本能，结果产生的将是无数声名狼藉的丑闻。那些善于保护自己的人对或真或假的指控不屑一顾，通过出色而又欢乐的夸示来保护自己。更多天性敏感的人发现他们深陷罪恶和诽谤，彻底地绝望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诽谤中伤变得普遍，最严格的道德也一定要经受恶意的攻击。维泰博的伟大布道演说家埃吉迪奥教士，教皇利奥曾因他的良好品质任命他为主教，他也在1527年的灾难中证明自己是亲民勇敢的僧侣，但是乔维奥告诉我们埃吉迪奥用湿稻草的烟和相似方法来保持他苦行僧的苍白脸色。乔维奥在这些问题上成了真正的教廷官员。一般他先讲述故事，然后补充说他不相信，接着在最后又暗示说或许这个故事还是有真实成分的。但是，罗马式嘲讽的真正替罪羊是虔诚、品行端庄的阿德里安六世。大家似乎一致同意只看他可笑的一面。一开始他就和难对付的弗朗西斯科·贝尔尼闹翻，威胁着要把讽刺作家们而不是如人们所说的，把帕斯奎诺雕像扔到台伯河。对于这件事情的报复就是反对教皇阿德里亚诺的有名的《加比托洛》，这并不完全是来自仇恨的驱使，而是出于对这个可笑的荷兰蛮人的鄙视；对于选举他当选的主教们则进行了更残忍的威胁。人们将当时在罗马流行的瘟疫也归咎于他；贝尔尼和其他人以同样不真实的口吻描写教皇所处的环境，以至近现代文艺小品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枢机主教托尔托萨委任保罗·乔维奥来完成一部歌功颂德的传记，但是凡是能体会字里行间言外之意的人都能看出这是一部绝无仅有的讽刺文。这听起

来很滑稽——至少对那个时期的意大利人来讲——听说阿德里安如何到萨拉戈萨的教士会请求圣兰伯特的下颌骨；虔诚的西班牙人如何把他乔装打扮，让他看起来“像个真正的衣冠楚楚的教皇”；阿德里安如何跟随一个混乱粗俗的仪仗从奥斯提亚来到罗马，商量着烧毁帕斯奎诺雕像或者扔进水里；他听到仆人通报用饭会突然中断最重要的事务；最后，在他不幸的统治时期结束的时候，他死于饮酒过度——而他的医生的房子被午夜纵酒者挂上花环并献词：“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献给祖国的拯救者。”乔维奥确实因为普遍没收公款而赔钱，只得到一份圣俸作为补偿，这还是因为他“非诗人”的身份，也就是说，不是异教徒。但天意使然，阿德里安成了最后一个被嘲弄的大人物。在1527年发生在罗马的灾难之后，诽谤显然随着私生活的放纵败坏而衰落了。

But while it was still flourishing was developed, chiefly in Rome, the greatest railer of modern times, Pietro Aretino. A glance at his life and character will save us the trouble of noticing many less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his class.

但是在诽谤还蓬勃发展的时期，彼得罗·阿雷蒂诺主要在罗马发展成近代最伟大的讽刺家。我们看一看他的生活和性格，就不必麻烦再去看那些和他属于同一类但是不那么有名的人物了。

We know him chiefly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of his life (1527-56), which he passed in Venice, the only asylum possible for him. From hence he kept all that was famous in Italy in a kind of state of siege, and here were delivered the presents of the foreign princes who needed or dreaded his pen. Charles V and Francis I both pensioned him at the same time, each hoping that Aretino would do some mischief to the other. Aretino flattered both, but

naturally attached himself more closely to Charles, because he remained master in Italy. After the emperor's victory at Tunis in 1535, this tone of adulation passed into the most ludicrous worship, in observing which it must not be forgotten that Aretino constantly cherished the hope that Charles would help him to a cardinal's hat. It is probable that he enjoyed special protection as Spanish agent, as his speech or silence could have no small effect on the smaller Italian courts and on public opinion in Italy. He affected utterly to despise the papal court because he knew it so well; the true reason was that Rome neither could nor would pay him any longer. Venice, which sheltered him, he was wise enough to leave unassailed. The rest of his relations with the great is mere beggary and vulgar extortion.

我们了解的主要是他在威尼斯度过的最后30年（1527-1556年），那里也是他唯一可能居住的避难所了。从那时起，他使所有在意大利的有名人物都处于受围攻的状态，而那些需要或者害怕他那笔锋的外国君主们都向他送来礼物。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同时给他提供生活补贴，彼此都希望阿雷蒂诺能够嘲弄对方。阿雷蒂诺对双方都表现出奉承的样子，但是却自然地更靠拢查理，因为查理依然是意大利的主宰者。1535年，当这位君主在突尼斯取得胜利之后，这种谄媚的语气逐渐变成最荒唐可笑的崇拜，我们看到这一点绝不能忘记：阿雷蒂诺一直希望查理能帮他获得一顶枢机主教的帽子。作为西班牙代理人，他有可能享受特殊的保护，因为他的言辞或沉默对较小的意大利宫廷和民众的舆论有着不小的影响。他假装因为他对宫廷太过了解而鄙视教皇宫廷；而真正的原因是罗马不能也不愿再给他钱了。他是明智的，没有攻击庇护他的威尼斯。他和大人物的其他关系不过是乞求和庸俗的敲诈。

Aretino affords the first great instance of the abuse of publicity

to such ends. The polemical writings which a hundred years earlier Poggio and his opponents interchanged are just as infamous in their tone and purpose, but they were not composed for the press, but for a sort of private circulation. Aretino made all his profit out of a complete publicity, and in a certain sense may be considered the father of modern journalism. His letters and miscellaneous articles were printed periodically, after they had already been circulated among a tolerably extensive public.

阿雷蒂诺首先提供了为这类目的滥行发表文章的重大先例。一百多年前，波焦和他的反对者之间交换的辩论文章在语气和目的上同样臭名昭著，但是他们不是为出版而创作，而是为了私人之间的传阅。阿雷蒂诺获得的一切利益都来自完全公开的发表物，在某种意义上，他可能被看作现代新闻业之父。他的信件以及各式各样的文章在公众中还算广泛流传之后，就会定期印刷出来。

Compared with the sharp pen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retino had the advantage that he was not burdened with principles, neither with liberalism nor philanthropy nor any other virtue, nor even with science; his whole baggage consisted of the well-known motto, *'Veritas odium parit'*. He never, consequently, found himself in the false position of Voltaire, who was forced to disown his *Pucelle* and conceal all his life the authorship of other works. Aretino put his name to all he wrote, and openly gloried in his notorious *Ragionamenti*. His literary talent, his clear and sparkling style, his varied observation of men and things, would have made him a considerable writer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destitute as he was of the power of conceiving a genuine work of art, such as a true dramatic comedy; and to the coarsest as well as the most refined malice he added a grotesque wit so brilliant that in

some cases it does not fall short of that of Rabelais.

和18世纪的其他尖刻作家相比，阿雷蒂诺的优势在于他不受任何规则的束缚，无论是自由主义、博爱主义还是其他任何道德约束、科学制约；他整个思想由一句格言组成："忠言逆耳。"因此，他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深陷伏尔泰式的尴尬处境，因为伏尔泰不得不否认《处女》是他的作品，并终其一生隐藏他其他作品的作者身份。阿雷蒂诺给他所有作品署名，公开表示他对臭名远扬的《争论》一书的骄傲之情。他的文学才华，明快机智的风格，对人和事物多方位的观察力，这一切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为了不起的作家，尽管他并没有创作出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比如一部真正激动人心的喜剧）。他把滑稽的机智融入到最粗俗和最文雅的恶意中，他的作品如此才华横溢，有时绝不亚于拉伯雷。

In such circumstances, and with such objects and means, he set to work to attack or circumvent his prey. The tone in which he appealed to Clement VII not to complain or to think of vengeance, but to forgive, at the moment when the wailings of the devastated city were ascending to the Castel Sant' Angelo, where the pope himself was a prisoner, is the mockery of a devil or a monkey. Sometimes, when he is forced to give up all hope of presents, his fury breaks out into a savage howl, as in the *Capitolo* to the Prince of Salerno, who after paying him for some time refused to do so any longer. On the other hand, it seems that the terrible Pierluigi Farnese, Duke of Parma, never took any notice of him at all. As this gentleman had probably renounced altogether the pleasures of a good reputation, it was not easy to cause him any annoyance; Aretino tried to do so by comparing his personal appearance to that of a constable, a miller and a baker. Aretino is most comical of all in the expression of whining mendicancy, as in the *Capitolo* to

Francis I; but the letters and poems made up of menaces and flattery cannot, notwithstanding all that is ludicrous in them, be read without the deepest disgust. A letter like that one of his written to Michelangelo [2_14] in November 1545 is alone of its kind; along with all the admiration he expresses for the *Last Judgement* he charges him with irreligion, indecency and theft from the heirs of Julius II, and adds in a conciliating postscript, 'I only want to show you that if you are *divino,* I am not *d'acqua.'* Aretino laid great stress upon it—whether from the insanity of conceit or by way of caricaturing famous men—that he himself should be called divine, as one of his flatterers had already begun to do; and he certainly attained so much personal celebrity that his house at Arezzo passed for one of the sights of the place. There were indeed whole months during which he never ventured to cross his threshold at Venice, lest he should fall in with some incensed Florentine like the younger Strozzi. Nor did he escape the cudgels and the daggers of his enemies, although they failed to have the effect which Berni prophesied him in a famous sonnet. Aretino died in his house, of apoplexy.

在这种情况下，带着这样的目的和手段，他开始攻击和陷害他的“猎物”。当被毁坏的城市的哀嚎传到圣安吉洛城堡，而克莱门特七世也被囚禁在内，阿雷蒂诺请求他不要抱怨或报复，而是宽恕，所用的语气是对魔鬼或猴子的嘲弄。有时候，当他不得不放弃他所有馈赠的希望，他的愤怒爆发成野蛮的咆哮，正如他在《加比托洛》对待萨勒诺王子一样，因为萨勒诺王子在给他生活补贴一段时间之后拒绝继续供给。另一方面，帕尔玛的公爵，骇人的皮埃路易吉·法尔内塞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可能这位先生已经放弃美誉带来的愉悦感，所以也就不容易惹恼他了；阿雷蒂诺曾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把他的容貌和警察、磨坊主和面包师相比较。阿雷蒂诺哀诉乞讨的样子在他写给弗朗索瓦一世的《加比托洛》中表现得最为可笑；尽管内容荒唐可

笑，但是由恐吓和奉承构成的信件和诗歌读起来不能不让人深感厌恶。1545年11月他写给米开朗基罗的信[3_19]就是这一类型的；除了表达他对《最后的审判》的赞美之情外，他谴责他无宗教信仰，猥亵以及从朱利叶斯二世那里偷盗，并在附言里以和解的口吻写道："我只是想跟你说明，如果你是'神圣的'，那我也不是'不值钱的'。"阿雷蒂诺着重强调——以自负狂妄或者讽刺名人的方式——他自己应该被称为"神圣的"，他的一位奉承者已经开始这么称呼他了；无疑他享誉盛名，他在阿雷佐的房子被当作当地的名胜之一。的确，他曾整整几个月呆在威尼斯的住所里足不出户，生怕碰到一些像小斯特罗齐一样被激怒的佛罗伦萨人。但是他也没能逃脱宿敌的棍棒和匕首，尽管没有像贝尔尼在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中对他预言的那样死于非命。阿雷蒂诺在家中死于中风。

The differences he made in his modes of flattery are remarkable: in dealing with non-Italians he was grossly fulsome; people like Duke Cosimo of Florence he treated very differently. He praised the beauty of the then youthful prince, who in fact did share this quality with Augustus in no ordinary degree; he praised his moral conduct, with an oblique reference to the financial pursuits of Cosimo's mother Maria Salviati, and concluded with a mendicant whine about the bad times and so forth. When Cosimo pensioned him, which he did liberally, considering his habitual parsimony—to the extent, at last, of 160 ducats a year—he had doubtless an eye to Aretino's dangerous character as Spanish agent. Aretino could ridicule and revile Cosimo, and in the same breath threaten the Florentine agent that he would obtain from the duke his immediate recall; and if the Medicean prince felt himself at last to be seen through by Charles V he would not care for Aretino's jokes and rhymes against him to circulate at the imperial court. A curiously qualified piece of flattery was that addressed to the notorious Marquis of Marignano, who as castellan of Musso had

attempted to found an independent state. Thanking him for the gift of a hundred crowns, Aretino writes: 'All the qualities which a prince should have are present in you, and all men would think so, were it not that the acts of violence inevitable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undertakings cause you to appear a trifle rough (*aspro*).'

他奉承方式的不同是值得注意的：对待非意大利人，他是非常讨厌的；对待像佛罗伦萨的科西莫公爵的态度又完全不同。他赞美当时年轻君主的美貌，事实上，科西莫公爵确实相貌不凡，和奥古斯都很相像；他赞美他的德行，并拐弯抹角地提及科西莫公爵的母亲玛丽亚·萨尔维亚蒂的财政活动，最后以困难时期的乞讨哀嚎收尾。当科西莫给他生活津贴的时候——最后每年有160达克特，考虑到他平时的吝啬，这已经很大方了——他无疑看到了阿雷蒂诺作为西班牙代理人的危险性格。阿雷蒂诺能够嘲弄和辱骂科西莫，同时，他还可以威胁佛罗伦萨的代理人，声称他能让公爵立刻撤掉他的职务；而如果这位美第奇的君主最后觉得自己被查理五世看穿了，他也无需在意阿雷蒂诺那些反对他的笑话和诗歌是否在皇室的宫廷流传。有一篇奇怪的奉承作品寄至臭名昭著的马里尼亚诺侯爵，他是穆索的城主，曾试图建立一个独立国家。除了感谢侯爵赠与他一百个银币以外，阿雷蒂诺写道："一个君主身上该有的品质你都具备了，所有人也会这么认为，如果不是你的事业开始时那些不可避免的暴行让你显得有点粗鲁（严厉）的话。"

It has often been noticed as something singular that Aretino only reviled the world, and not God also. The religious belief of a man who lived as he did is a matter of perfect indifference, as are also the edifying writings which he composed for reasons of his own. [2_15] It is in fact hard to say why he should have been a blasphemer. He was no professor, or theoretical thinker or writer; and he could extort no money from God by threats or flattery, and

was consequently never goaded into blasphemy by a refusal. A man like him does not take trouble for nothing.

人们经常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阿雷蒂诺只辱骂世界而不辱骂上帝。像他这样生活的人，宗教信仰他是完全不感兴趣的，他为自己写的启迪后人的作品亦是如此。 [3_20] 实际上，我们很难说他为什么应该是亵渎神明的人。他不是教授，也不是理论思想家或作家；他不能靠威胁或奉承上帝来敲诈金钱，因而他也从来不会由于遭到拒绝而被激怒成为亵渎神明的人。像他这样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招惹麻烦。

It is a good sign of the present spirit of Italy that such a character and such a career have become a thousand times impossible. But historical criticism will always find in Aretino an important study.

在意大利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物和这样的经历了，这是意大利现代精神的良好的征兆。但是历史的批判将一直把阿雷蒂诺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2_1].Observe the expressions 'uomo singolare' and 'uomo unico' for the higher and highest stages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2_2].And also of their wives, as is seen in the Sforza family and among other North Italian rulers. Compare, in the work of Jacobus Phil. Bergomensis, De plurimis claris selectisque mulieribus, Ferrara, 1497, the lives of Battista Malatesta, Paola Gonzaga, Bona Lombarda, Riccarda d'Este and the chief women of the house of Sforza, Beatrice and others. Among them are more than one genuine virago, and in several cases natural gifts are supplemented by great humanistic culture. (See below, Part V).

[2_3].Trattato del governo della famiglia forms part of a work, La cura della

famiglia (Opere volgari di L. B. Alberti, Florence, 1844, vol. ii). [By 1871 this was recognized as a work by Alberti, not Pandolfini, to whom the text attributes it. See now C. Grayson, ed., L. B. Alberti, Opere volgari, I, Bari, i960 (Ilibri della famiglia).]

[2_4].Ghiberti, Secondo Commentario, cap. xv (Vasari, ed. Lemonnier, i, p. xxix). [Ghiberti's Commentaries, written c. 1450, were first published in full by J. von Schlosser (Berlin, 2 vols., 1912). The passage quoted here is not Ghiberti's own, but is taken from Vitruvius, De architectura, Book vi, Preface, para. 2, and is used as an introduction to his autobiography. There i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utobiography (excluding this passage) in R. Krautheimer and T. Krautheimer-Hess, Lorenzo Ghiberti, 2 vols., Princeton, N J, 1970.]

[2_5].Codri Urcei vita,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works, first published at Bologna, 1502 [A. Urceus, called Codrus, Opera, Bologna, 1502]. This cer¬tainly comes near the old saying: 'ubi bene, ibi patria' [where one is well-off is one's country]. The abundance of neutral intellectual pleasure,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local circumstances, and of which the educated Italians became more and more capable, rendered exile more tolerable to them. Cosmo-politanism is further a sign of an epoch in which new worlds are discovered, and men no longer feel at home in the old. We see it among the Greeks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 Plato, as Niebuhr says, was not a good citizen, and Xenophon was a bad one; Diogenes went so far as to proclaim homelessness a pleasure, and calls himself, Laertius tells us, apolis [having no city].

[2_6].In Murat., xxv, col. 295 ff, with the Italian translation in the Opere volgari di L. B. Alberti, i, pp. lxxxix-cix, where the conjecture is made and shown to be probable that this Vita is by Alberti himself. See further Vasari, iv, 52 ff. Mariano Socini, if we can believe what we read of him in Aeneas Sylvius (Opera, p. 622, Epist. 112) was a universal dilettante, and at the same time a master in several subjects.

[2_7].This is the book of which one part, often printed alone, long passed for a work of Pandolfini.

[2_8].One writer among many: Blondus, Roma triumphans, lib. v, pp. 117 ff, where the definitions of glory are collected from the ancients, and the desire of it is expressly allowed to the Christian. Cicero's work, De gloria, which Petrarch claimed to own, was stolen from him by his teacher Convenevole, and has never been seen since. [Flavio Biondo, Roma Triumphans, writtvn 1457-9 and published in Brescia, 1482, and later.]

[2_9].The former in the well-known sarcophagus near San Lorenzo, the latter over a door in the Palazzo della Ragione. For details of their discovery in 1413, see Misson, Voyage en Italie, vol. i. [The so-called Tomb of Livy is still in the Palazzo della Ragione, but is now thought to refer to a different Livy; that of Antenor is in a niche near the Ponte S. Lorenzo, with bones discovered in 1274, which may be those of a tenth-century Hungarian soldier.]

[2_10].The well-known jest of Brunellesco and the fat wood-carver, Manetto Ammanatini, who is said to have fled into Hungary before the ridicule he encountered, is clever but cruel. [The unfortunate Manetto was led to believe that he had become a man called Matteo. The story is told in a manuscript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manuscript of the anonymous Life of Brunelleschi, and is referred to in the Life. It is not contained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Life by C. Enggass, ed. H. Saalman,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1970, but there is a modern Italian edition in C. Varese, ed., Prosatori volgari del Quattrocento (vol. 14 of La letteratura italiana, storia e testi), Milan-Naples, 1955.]

[2_11].We find it also in the visual arts, e.g. in the famous engraving parodying the group of the Laocoon as three monkeys. But here parody seldom went beyond sketches and the like, though much, it is true, may have been destroyed. Caricature, again, is something different. Leonardo, in the grotesque faces in the Biblioteca Ambrosiana, Milan, represents what is hideous when and because it is comical, and exaggerates the ludicrous element at pleasure. [The Laocoon is a woodcut by Boldrini after Titian. It seems more likely that Leonardo's grotesque heads were made as serious studies of physiognomy, rather than for comic effect.]

[2_12].Il cortigiano, lib. ii, cap. 4 ff, ed. Baude di Vesme, Florence, 1854, pp. 124 ff. For the explanation of wit as the effect of contrast, though not clearly put, see ibid., cap. lxxiii, p. 136. [B. Castiglione, Il libro del cortegiano, Venice, 1528; modern edition by V. Cian, Florence, 1947, English translation by G. Bull, Penguin Classics, 1967.]

[2_13].[G. della Casa, Ilgalateo, Venice, 1558; modern edition by G. Tinivella, Milan, 1954,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 Pine-Coffin, Penguin Classics, 1958.]

[2_14].Gaye, Carteggio, ii, 332. [G. Gaye, Carteggio inedito d'artisti dei secoli XIV, XV, XVI..., 3 vols., Florence, 1839-40; facsimile reprint, Turin, 1961. This nauseating letter, which is constantly quoted in the Michelangelo literature, is reprinted in 77 carteggio di Michelangelo, ed. P. Barocchi and R. Ristori, Florence, IV, 1980, p. 215; an English translation is in L. Murray, Michelangelo, His Life, Work

and Times, London, 1984. It is not included in the selection of Aretino's letters, translated by G. Bull, in the Penguin Classics, 1976, which does contain a similar letter of 1547 (no. 95).]

[2_15].He may have done so in the hope of obtaining the red hat or from fear of the new activity of the Inquisition, which he had ventured to attack bitterly in 153 5 (Lettere, Venice, 1539, f. 37), but which, af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institution in 1542, suddenly took a fresh start, and soon silenced every opposing voice.

[3_1].注意“独特的人”和“个人发展的较高阶段”的表达，它们分别是个体发展的更高和最高阶段。

[3_2].还包括他们的妻子，正如我们在斯福尔扎家族和其他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统治者所见。参见雅各布斯·菲尔·伯格曼的作品《名妇选辑》（费拉拉，1497年），巴蒂斯塔·马拉泰斯塔、保罗·贡扎加、博纳·伦巴达、埃斯特家族的里卡多和斯福尔扎家族的重要女性贝亚特里切等人的传记。她们当中不止一人是真正的女中豪杰，而且有些女性还具有伟大的人文主义教养。（见本书第五编）

[3_3].雅各布·冯·阿特威尔德（Jacobs von Arteveldt，约1295-1345年），14世纪佛兰德人的领袖，领导根特人民保持中立，驱逐原统治者路易一世，后在暴乱中遇害。——译者注

[3_4].《齐家论》是《持家》这部著作的一部分（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俗语文集》，佛罗伦萨，1844年，第2卷）。（从前这部作品一直被认为是潘多尔菲尼所著，直至1871年，本文作者也是这么认为的。）

[3_5].1315年，佛罗伦萨被军人掌权，宣布如果但丁肯付罚金，并在头上撒灰，颈下挂刀，游街一周就可免罪返国。——译者注

[3_6].见吉贝尔蒂《续回忆录》，第1卷第15章（瓦萨里编，勒摩尼埃版）。

[3_7].参见《科德路斯·乌尔塞斯传》，博洛尼亚1502年初版。这句话和谚语“哪里衣食无忧，哪里就是故乡”差不多。不拘于地方环境，并充满中立的精神愉悦感，意大利人因此变得更能忍受流放。以世界为家的思想更是成为新世界被发现的时代标志，人们不再安于旧世界的生活。我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希腊人中也看到这一点；如尼布尔所述，柏拉图不是一个好公民，而色诺芬则是一个坏公民；第欧根尼甚至声称无家可归是一种快乐，他自称为“无国者”。

[3_8].据穆拉特《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5卷，第295栏及其以后各栏，附有阿尔伯蒂《俗语文集》第1卷，89-109页的意大利译文，本文此处猜测这部传记系阿尔伯蒂

之作。另见瓦萨里，第4章，第52页及以后各页。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在埃尼亚斯·西尔维于斯的著作中（《全集》，第622页，书信第112号）关于马里亚诺·索奇尼的叙述，那么，他就是一位全面型的艺术爱好者，同时又是精通好几门学科的大师。

[3_9].作家的作品中，有布朗德斯的《凯旋的罗马》，其中（第5卷，第117页及其后各页），荣誉的定义是从古人的作品中收集而来的。而且明确容许基督徒追求荣誉。彼特拉克声称拥有西塞罗的《论荣誉》，但是被他的老师孔文内沃尔偷走，从此这本书就再也没人见过了。

[3_10].参见但丁《神曲》。全诗分《地狱》《炼狱》《天堂》三部。——译者注

[3_11].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年）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他所撰写的最知名著作是《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天主教会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将其评为三十五位教会圣师之一，也被称作天使博士（天使圣师）或全能博士。——译者注

[3_12].圣方济各（St. Francis，1182-1226年），方济会的创办者。——译者注

[3_13].前者在圣洛伦佐教堂附近的有名的石棺里，后者在“司法宫”的一扇门上。关于1413年骨骸发现的详细情况参见米梭《意大利旅行记》第1卷。

[3_14].老普林尼是维罗纳人。——译者注

[3_15].对布鲁内莱斯科和胖木雕工曼那托·阿马那提尼进行人尽皆知的嘲笑，据说胖木雕工在遭受嘲笑之前就逃到匈牙利去了。嘲笑虽然巧妙但是也很残忍。

[3_16].在视觉艺术上，我们也看到这种现象，例如，有一座有名的木雕上把拉奥孔群雕戏仿成三只猴子。但是戏仿作品很少超过草图等类似的范围，而这些作品确实可能被毁坏很多。讽刺画不一样，因为它滑稽好笑，并且随意地夸张可笑的元素。（这个木雕是宝尔德里尼的作品，之前提香曾受《拉奥孔》影响创作绘画。）

[3_17].参见《廷臣论》，第4卷。

[3_18].参见卡萨《加拉提奥》，威尼斯，1558年。

[3_19].见盖伊《通信集》，第2卷，第332页。

[3_20].他这么做可能是希望获得一顶枢机主教的红帽子，或者是因为害怕异端裁判所的新措施，因为他在1535年猛烈地攻击过异端裁判所（见《书信集》，威尼斯，

第37页，1539年），但是裁判所在1542年改组之后，迅速以全新面貌出现并很快使各方面的反对意见都沉默下来。

Part 3 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第三编　古典文化的复兴

Introductory

导言

Now that this point in our historical view of Italian civilization has been reached, it is time to speak of the influence of antiquity, the 'new birth' of which has been one-sidedly chosen as the name to sum up the whole period. The conditions which have been hitherto described would have sufficed, apart from antiquity, to upturn and to mature the national mind; and most of the intellectual tendencies which yet remain to be noticed would be conceivable without it. But both what has gone before and what we have still to discuss are colored in a thousand ways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ancient world; and though the essence of the phenomena might still have been the same without the classical revival, it is only with and through this revival that they are actually manifested to us. The Renaissance would not have been the process of worldwide significance which it is, if its elements could be so easily separated from one another. We must insist upon it, as one of the chief propositions of this book, that it was not 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alone, but its union with the genius of the Italian people, which achieved the conquest of the Western world. The amount of independence which the national spirit maintained in this union varied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In the modern Latin literature of the period, it is very small, while in plastic art, as well as in other spheres, it is remarkably great; and hence the alliance between two distant epochs in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same people, because concluded on equal terms, proved

justifiable and fruitful. The rest of Europe was free either to repel or else partly or wholly to accept the mighty impulse which came forth from Italy. Where the latter was the case we may as well be spared the complaints over the early decay of medieval faith and civilization. Had these been strong enough to hold their ground, they would be alive to this day. If those elegiac natures which long to see them return could pass but one hour in the midst of them, they would gasp to be back in modern air. That in a great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is kind flowers of exquisite beauty may perish without being made immortal in poetry or tradition is undoubtedly true; nevertheless, we cannot wish the process undone. The general result of it consists in this—that by the side of the Church which had hitherto held the countries of the West together (though it was unable to do so much longer) there arose a new spiritual influence which, spreading itself abroad from Italy, became the breath of life for all the more instructed minds in Europe. The worst that can be said of the movement is that it was anti-popular, that through it Europe became for the first time sharply divided into the cultivated and uncultivated classes. The reproach will appear groundless when we reflect that even now the fact, though clearly recognized, cannot be altered. The separation, too, is by no means so cruel and absolute in Italy as elsewhere. The most artistic of her poets, Tasso, is in the hands of even the poorest.

说到意大利的文明史观，那就不得不提一下古典文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一直以来，人们片面地以古典文化的“重生”来囊括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特点。撇开古典文化不谈，前文所述条件也足以使意大利民族精神得到振兴并使其臻于成熟；此外，在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文明趋势中，绝大部分不需要借古典文化之名也能为人们所理解。但不管是那些讨论过的文明趋势，还是没讨论过的文明趋势，它们都深受古代世界的影响。要是不借古典文化复兴之名，我们可能

还真看不出这些文明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这些文明趋势都是依附于并通过古典文化复兴的形式得以彰显。如果文艺复兴就其各层面而言都不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那么它就不会是一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解放运动了。我们必须坚信，古典文化之所以能征服西方世界，靠的不单单是文化复兴，更是其与意大利民族精神的有机结合，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而意大利民族精神在这种文化交融之下究竟保留了多少独立性，是依情况而变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近代拉丁文学中，文化复古色彩较为浓厚，而在造型艺术和其他领域，意大利民族精神又得以全部保留；因为结合条件相同，我们就有理由将两种年代相距甚远的同一民族的文化结合在一起，且经过证明，这种结合是卓有成效的。而欧洲其他民族有权自决到底是拒绝、部分吸收抑或是全盘吸收来自意大利的这个巨大的文化冲力。如果它们选择了全盘吸收，那我们就不必为中世纪信仰和文明的过早衰落而感慨唏嘘了。要是这些信仰和文明足够强大，能在文化复古的大潮中坚守自己的立场，它们也不会过早地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中了。一些怀古之士还心心念念地想重拾那些衰落的信仰和文明，但倘若让他们在中世纪只是待上一个小时，恐怕他们也想立即逃回近代生活中吧。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那些如花朵般脆弱的民族也许还没能借诗歌和传说流传千古就早早地衰亡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希望这一进程未曾发生过。在古典文化的复兴过程中，一方面教会仍妄图将西方国家继续禁锢在自己的思想牢笼里（尽管教会对此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一种新思想在意大利得以萌芽，继而传遍欧洲，成为欧洲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古典文化复兴运动最大的弊端在于其反人民性，在其影响下，欧洲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将阶级划分为文明阶级和蛮夷阶级两大类。这一阶级划分早已是公认的事实，难获改变，从这一点来看，这种非议似乎是毫无根据的。意大利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把阶级划分得那样残酷和绝对。就拿意大利艺术造诣极高的诗人塔索来说吧，他的作品，即使最穷苦的人家里都有。

The civilization of Greece and Rome, which, ever since the fourteenth century, obtained so powerful a hold on Italian life, as

the source and basis of culture, as the object and ideal of existence, partly also as an avowed reaction against preceding tendencies—this civilization had long been exerting a partial influence on medieval Europe, even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Italy. The culture of which Charlemagne was a representative was, in face of the barbarism of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essentially a Renaissance, and could appear under no other form. Just as in the Romanesque architecture of the North, beside the general outlines inherited from antiquity, remarkable direct imitations of the antique also occur, so too monastic scholarship had not only gradually absorbed an immense mass of materials from Roman writers, but the style of it, from the days of Einhard onwards, shows traces of conscious imitations.

自14世纪以来，古希腊罗马文化在意大利人心目中就拥有极高的地位。他们视古希腊罗马文化为他们的文化源泉，为他们的生存目标和理想，部分人也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武器，公开反对前人的各种思想倾向——这一文明对中世纪的欧洲一直都产生着一定的影响，甚至超出意大利的范围影响到了其他国家。以查理曼大帝为代表的文化，在七、八世纪的蛮族面前本来就是一种文艺复兴，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出现。正如北方的罗马式建筑，除了沿袭古典建筑的轮廓风格，也出现了大量的直接模仿；同样，经院学者不仅逐渐从罗马作家那里获取了大量资料，还开始仿效古罗马写作风格。自艾因哈德的时期起，我们便可以从那些作品中发现很多刻意模仿古风的痕迹。

But the resuscitation of antiquity took a different form in Italy from that which it assumed in the North. The wave of barbarism had scarcely gone by before the people, in whom the former life was but half effaced, showed a consciousness of its past and a wish to reproduce it. Elsewhere in Europe men deliberately and with

reflection borrowed this or the other element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in Italy the sympathies both of the learned and of the people were naturally engaged on the side of antiquity as a whole, which stood to them as a symbol of past greatness. The Latin language, too, was easy to an Italian, and the numerous monuments and documents in which the country abounded facilitated a return to the past. With this tendency other elements—the popular character which time had now greatly modified,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mported by the Lombards from Germany, chivalry and other northern form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Church—combined to produce the modern Italian spirit, which was destined to serve as the model and ideal for the whole Western world.

意大利的古典文化复兴与北方有所区别。在蛮族文化的影响之下，意大利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而意大利民族也迅速意识到昔日文化的重要性，并希望重建昔日文化。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人们只是借鉴古典文化的某种成分；而在意大利，不论是学者还是平民，都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整个古典文化，因为对他们而言，古典文化就是伟大历史的象征。学拉丁语对意大利人来说不算难事儿。而意大利丰富的古迹和文献资源又为其实现古典文化的复兴增添了另一筹码。再加上意大利人的性格（尽管早已为时间所改变）、伦巴族人从德意志借鉴过来的政治制度、骑士制度等北方文化形态，以及宗教和教会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共同缔造了现代意大利精神，而这种意大利精神注定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典范。

How antiquity began to work in plastic art, as soon as the flood of barbarism had subsided, is clearly shown in the Tuscan buildings of the twelfth and in the sculpture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 In poetry, too, there will appear no want of similar analogies to those

who hold that the greatest Latin poet of the twelfth century, the writer who struck the keynote of a whole class of Latin poems, was an Italian. We mean the author of the best pieces in the so-called *Carmina Burana.*[1] A frank enjoyment of life and its pleasures, as whose patrons the gods of heathendom are invoked, while Catos and Scipios hold the place of the saints and heroes of Christianity, flows in full current through the rhymed verses. Reading them through at a stretch, we can scarcely help coming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n Italian, probably a Lombard, is speaking; in fact, there are positive grounds for thinking so. To a certain degree these Latin poems of the *clerici vagante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with all their remarkable frivolity, are, doubtless, a product in which the whole of Europe had a share; but the writer of the song '*De Phyllide et Flora*' and the '*Æstuans Interius*' can have been a northerner as little as the polished Epicurean observer to whom we owe '*Dum Dianæ vitrea sero lampas oritur*'. Here, in truth, is a reproduction of the whole ancient view of life, which is all the more striking from the medieval form of the verse in which it is set forth. There are many works of this and the following centuries, in which a careful imitation of the antique appears both in the hexameter and pentameter of the metre and in the classical, often myth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subject, and which yet have not anything like the same spirit of antiquity about them. In the hexameter chronicles and other works of Guglielmus Appulus and his successors (from about 1100), we find frequent traces of a diligent study of Virgil, Ovid, Lucan, Statius and Claudian; but this classical form is, after all, a mere matter of archaeology, as is the classical subject in collectors like Vincent of Beauvais, or in the mythological and allegorical writer, Alanus ab Insulis. The Renaissance is not a mere fragmentary imitation or compilation, but a new birth; and the signs of this are visible in the poems of the unknown *clericu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蛮族之势退去后，意大利的造型艺术很快便加入了古典文化因素，12世纪的托斯卡纳建筑和13世纪的雕塑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意大利诗歌也同样加入了古典文化因素，就拿《布兰诗歌》[1] 来说吧，其中最经典的诗作就出自一个意大利人之手。大量资料表明，很多人认为这位意大利诗人奠定了整个拉丁诗歌流派的基调，是12世纪最伟大的拉丁诗人。在加图和西庇阿位列基督教圣徒和英雄的时期，这些押韵诗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乐享生活的理念，庇护这种生活的异教之神被召唤。在一口气把这些押韵诗都读完后，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韵诗出自一个意大利人之手，没准儿还是一个伦巴第人；事实上，这一结论是有根有据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2世纪“流浪教士”笔下的这些内容轻快的拉丁诗歌，无疑是整个欧洲智慧的结晶；但是，要说《菲立德和弗萝拉》与《燃烧着的热情》这两首诗出自一个北方人之手，那跟说《当傍晚月亮出现的时候》的作者是精致的享乐主义者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这种对整个古代人生观的再现在中世纪诗歌的形式下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从12世纪和接下来几个世纪的作品中，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风格的细心模仿表现在具有古典和神话色彩的五音步诗和六音步诗中，而这些韵诗却和古代精神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在古列尔慕斯·阿波利安西斯和他的继承者的六音步史诗和其他作品里（1100年左右起），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很多向维吉尔、奥维德、卢坎、斯塔提乌斯、克劳狄安勤勉学习的痕迹；但是，跟博韦的文森那样的收藏家笔下的古典主题，抑或是跟神话寓言作家阿拉尼斯·阿布·尼索利斯笔下的古典主题一样，这种古典形式只能算是考古学问题。文艺复兴并不仅仅是对古典文化的碎片式模仿或汇编，它更像是一种“新生”；而这种新生在12世纪无名教士的诗歌里一览无遗。

1: Carmina burana, in the Bibliothek des literarischen Vereins in Stuttgart, vol. xvi, Stuttgart, 1847. The stay in Pavia, the Italian local references in general, the scene with the 'pastorella' under the

olive tree, the mention of the 'pinus' as a shady field-tree, the frequent use of the word 'bravium',and particularly the form Madii for Maji, all speak in favor of our assumption. That he bore the name of Walther throws no light upon his origin. He was formerly identified with Gualterus de Mapes, a canon of Salisbury and chaplain to the English kings at the end of the twelfth century; since, by Giesebrecht (Die Vaganten oder Goliarden und ihre Lieder, in Allgemeine Monatsschrift, 1855) with Walther of Lille or Chatillon, who passed from France into England and Germany, and thence possibly with Archbishop Reinhold of Cologne (1164 and 1175) to Italy (Pavia, etc.). [Carmina burana is the name given to the songs—carmina discovered in 1803 in the Bavarian monastery of Benediktbeuren. They date from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and are in Latin, Middle High German and Old French, and most of them are drinking songs or fairly earthy love songs. Some of them are reprinted in F. Raby, The Oxford Book of Medieval Latin Verse, Oxford, 1959; Helen Waddell's Wandering Scholars, London, 1927 and later, and her Mediaeval Latin Lyrics, London, 1929 and many later editions, give details of their authors.]

: 《布兰诗歌》，载斯图加特文艺协会丛书，第十六卷（斯图加特：1847年版）。在帕维亚的逗留时

光、普遍的意大利地方色彩、油橄榄树下的牧羊女、提到松树是一种可以遮阴的大树、频繁使用“bravium”这个词，特别是以“Madii”来代替“Maji”，所有这些都证实了我们的臆测。他这个“瓦尔特”的名字也无助于查证他的身世。从前人们曾认为他和12世纪末索尔兹伯里的教士以及做过英国国王的王宫教士的瓜尔泰鲁斯·德·梅普斯是同一个人；吉泽布雷希特（《流浪教士或行吟诗人和他们的诗歌》，载《普通月刊》，1855年）又确定他同里尔的瓦尔特或者同由法兰西去英格兰和德意志的沙蒂永的瓦尔特，并且可能和前往意大利帕维亚等地的科隆大主教赖因霍尔德（1164和1175年）为同一人。《布兰诗歌》得名于1803年在巴伐利亚州贝内迪先特博伊伦修道院中发现的一本十二三世纪的诗集。这些诗歌由拉丁语、高地德语和古法语写成，大部分都是些饮酒诗或质朴的情歌。夫·雷比出版社再版了部分诗歌，载《牛津中古拉丁诗歌》，牛津：1959年版；像海伦·沃德尔的《流浪学者》，伦敦：1927年再版；还有她的《中古拉丁诗歌》，伦敦：1929年再版；之后还有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再版。

But the great and general enthusiasm of the Italians for classical antiquity did not display itself before the fourteenth century. For this a development of civic life was required, which took place only in Italy, and there not till then. It was needful that noble and burgher should first learn to dwell together on equal terms, and that a social world should arise which felt the want of culture, and had the leisure and the means to obtain it. But culture, as soon as it freed itself from the fantastic bonds of the Middle Ages, could not at once and without help find its wa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hysical and intellectual world. It needed a guide, and found one in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with its wealth of truth and knowledge in every spiritual interest. Both the form and the substance of this civilization were adopted with admiring gratitude; it became the chief part of the culture of the age. The general condition of the country was favorable to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medieval empire, since the fall of the Hohenstaufen, had either renounced, or was unable to make good, its claims on Italy. The popes had migrated to Avignon. Most of the political powers actually in existence owed their origin to violent and illegitimate means. The spirit of the people, now awakened to self-consciousness, sought for some new and stable ideal on which to rest. And thus the vision of the worldwide empire of Italy and Rome so possessed the popular mind that Cola di Rienzi could actually attempt to put it in practice. The conception he formed of his task, particularly when tribune for the first time, could only end in some extravagant comedy; nevertheless, the memory of ancient Rome was no slight support to the national sentiment. Armed afresh with its culture, the Italian soon felt himself in truth citizen of the most advanced nation in the world.

但是，意大利人在14世纪以前并没有表现出对古典文化有多大热情。要复兴古典文化，意大利就必须首开先河，加强自身文化建设。必须形成一种有文化需求的社会氛围，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贵族和市民必须首先学会平等共处，并且有时间和资金去获取和学习文化。但是，意大利人一旦将其文化从中世纪空想思想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他们就没法通过自身文化来理解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因此，他们需要一种文化向导来指引其前行，而古典文化集知识和真理于一体，他们便从古典文化中找到了这种向导。人们仰视着古典文化，并怀着感激之情接受了古典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古典文化于是成了那一时代意大利文化的主要部分。意大利的总体情况是有助于实现古典文化的复兴

的。自霍亨斯陶芬王朝覆灭后，中世纪罗马帝国不是放弃就是无力实现它对于意大利的所有权。教皇们迁到了阿维尼翁。实际存在的政治权利大多数都是靠暴力和非法手段获取的。意大利民族精神上升为一种自我意识，并开始寻找一个可以依托的稳定的新理想。因为意大利和罗马将形成世界帝国的这一构想早已深入人心，科拉·迪·黎恩济才可以将其付诸实践。但是，他对于事业的那种雄心，特别是在他第一次任护民官时的那种雄心，最终只能以某种狂想的喜剧而收场。尽管如此，对古罗马的追怀不失为意大利民族情感的一个有力的支撑。意大利人在古典文化的熏陶下，很快就觉得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同时认为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It is now our task to sketch this spiritual movement, not indeed in all its fullness, but in its most salient features, and especially in its first beginnings. [3_1]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对古典文化复兴运动做一个简要概述，当然不是巨细靡遗，而是要指出它最突出的特征，尤其是它发端时的面貌。 [4_1]

The Ruins of Rome

古罗马遗迹

Rome itself, the city of ruins, now became the object of a wholly different sort of piety from that of the time when the *Mirabilia Romæ* and the collection of William of Malmesbury were composed. The imaginations of the devout pilgrim, or of the seeker after marvels and treasures, are supplanted in contemporary records by the interests of the patriot and the historian. In this sense we

must understand Dante's words, that the stones of the walls of Rome deserve reverence, and that the ground on which the city is built is more worthy than men say. The jubilees, incessant as they were, have scarcely left a single devout record in literature properly so called. The best thing that Giovanni Villani brought back from the jubilee of the year 1300 was the resolution to write his history which had been awakened in him by the sight of the ruins of Rome. Petrarch gives evidence of a taste divided between classical and Christian antiquity. He tells us how often with Giovanni Colonna he ascended the mighty vaults of the Baths of Diocletian, and there in the transparent air, amid the wide silence, with the broad panorama stretching far around them, they spoke, not of business or political affairs, but of the history which the ruins beneath their feet suggested, Petrarch appearing in their dialogues as the partisan of classical, Giovanni of Christian antiquity; then they would discourse of philosophy and of the inventors of the arts. How often since that time, down to the days of Gibbon and Niebuhr, have the same ruins stirred men's minds to the same reflections!

如今人们对罗马这一废墟之城的崇拜，已完全不同于《罗马珍奇录》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著作所记录的那个时代了。虔诚的朝圣者或是寻觅奇迹与珍宝者对罗马古城的各种想象，在当代记载中已为爱国人士和历史学家们对罗马古城的兴趣所取代。“罗马城墙的石头值得我们尊敬，而托起这座古城的土地，比人们所说的更有价值。”从这个层面来看，但丁的这句话也就不难理解了。纪念庆典虽然不间断地举行，然而在真正的文学作品中却几乎没有留下一篇关于纪念庆典的忠实记录。乔瓦尼·维拉尼从罗马的1300周年纪念庆典中受到的最宝贵的影响就是写史书的决心，而这正是由他看到罗马古城遗迹而激发起来的。彼特拉克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古代文明都很感兴趣。他跟乔瓦尼·科隆纳经常爬上戴克里先浴场那高高的穹窿，于澄澈的碧空下，无边的静寂中，俯瞰罗马周围全景；此刻他们所谈的不是

公事政事，而是脚下这座古城遗迹使他们联想起来的历史。从他们的对话里可以看出，彼特拉克欣赏古希腊罗马文化，而乔瓦尼·科隆纳则欣赏基督教的古代文明；他们进而谈哲学，谈艺术的创造者。从那时起，一直到吉本、尼布尔的时代，这同样的遗迹曾多少次在人们心中唤起同样的沉思啊！

This double current of feeling is also recognizable in the *Dittamondo* of Fazio degli Uberti, composed about the year 1360—a description of visionary travels, in which the author is accompanied by the old geographer Solinus, as Dante was by Virgil. They visit Bari in memory of St Nicholas, and Monte Gargano of the archangel Michael, and in Rome the legends of Aracoeli and of Santa Maria in Trastevere are mentioned. Still, the pagan splendor of ancient Rome unmistakably exercises a greater charm upon them. A venerable matron in torn garments—Rome herself is meant—tells them of the glorious past, and gives them a minute description of the old triumphs; she then leads the strangers through the city and points out to them the seven hills and many of the chief ruins—'*che comprender potrai, quanto fui bella*'.

法齐奥·德利·乌贝蒂在其作品《狄达蒙多》（约写于1360年）中同样流露出这种双重情感。在这本描写神游奇境的著作中，作者假想自己跟一位年迈的地理学家索利努斯一同出游，就跟《神曲》中但丁假想跟维吉尔一同前行一样。为了缅怀圣尼古拉，他们参观巴里城，爬上天使长米迦勒的加尔加诺山。书中还提到了在罗马的阿拉泽利传奇以及特拉斯提弗列的圣玛利亚传奇。但是，古罗马的异教光辉显然更吸引他们。罗马古城就像一位衣衫褴褛、德高望重的老妇人，跟他们娓娓道出自己昔日的荣耀，并详尽地描述了当年一幕幕凯旋的场景；接着，她带着客人们逛遍了整座古城，向他们指出罗马七山和其他主要遗迹——“你可以想象我曾经是如何地风姿绰约。”

Unfortunately this Rome of the schismatic and Avignonese popes was no longer, in respect of classical remains, what it had been some generations earlier. The destruction of 140 fortified houses of the Roman nobles by the senator Brancaleone in 1257 must have wholly altered the character of the most important buildings then standing: for the nobles had no doubt ensconced themselves in the loftiest and best-preserved of the ruins. [3_2] Nevertheless, far more was left than we now find, and probably many of the remains had still their marble incrustation, their pillared entrances and their other ornaments, where we now see nothing but the skeleton of brickwork. In this state of things, the first beginnings of a topographical study of the old city were made.

不幸的是，当时罗马宗派分立，教皇们纷纷迁至阿维尼翁，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对古代遗址的保存工作就做得不如几世纪前了。1257年，140座罗马贵族府邸遭到元老院议员布兰卡莱奥的无情破坏，因为这些贵族府邸建在最巍峨也是保存最为完好的遗址之上，因此当时主要建筑的特色也就被完全改变了 [4_2] 。即便如此，当年留下的遗迹还是比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要多得多。很有可能当年的不少遗迹还保留着大理石外墙，门口的墩柱仍然矗立不倒，人们还能发现很多装饰物。而现在，除了砖砌的骨架以外，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了。对于这座古城最早的地志学研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In Poggio's walks through Rome [3_3] the study of the remains themselves is for the first time more intimately combined with that of the ancient authors and inscriptions—the latter he sought out from among all the vegetation in which they were embedded—the writer's imagination is severely restrained, and the memories of Christian Rome carefully excluded. The only pity is that Poggio's

work was not fuller and was not illustrated with sketches. Far more was left in his time than was found by Raphael eighty years later. He saw the tomb of Caecilia Metella and the columns in front of one of the temples on the slope of the Capitol, first in full preservation, and then afterwards half destroyed, owing to that unfortunate quality which marble possesses of being easily burnt into lime. A vast colonnade near the Minerva fell piecemeal a victim to the same fate. A witness in the year 1443 tells us that this manufacture of lime still went on, 'which is a shame, for the new buildings are pitiful, and the beauty of Rome is in its ruins'. The inhabitants of that day, in their peasant's cloaks and boots, looked to foreigners like cowherds; and in fact the cattle were pastured in the city up to the Banchi. The only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gatherings were the services at church, on which occasion it was possible to get a sight of the beautiful women.

在《罗马漫游》[4_3]中，波焦第一次将遗迹、古代作家及碑铭放在一起研究，这些碑铭是他从茂林丰草中找到的。书中作者严格限制了对想象力的使用，对于罗马基督教的回忆也是小心地加以排除。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此书内容较为简略，且书中没附插图。波焦所处的时代所留下来的古迹远比80年后拉斐尔所看到的要多得多。他看到了凯奇利亚·梅泰拉的坟墓，还看到了建在卡比托利欧山上的其中一座神庙前面的几根柱子。这几根柱子原先还保存完好，但到后来却多半遭到焚毁。因为大理石质地脆弱，容易被烧成石灰。弥涅耳瓦神像附近的一个巨大的柱廊也同样遭到焚毁。1443年的一个目击者说，这个“石灰制造业”还在继续，“真是丢人，新建筑少得可怜，罗马古城的美丽已然尽毁”。那时的罗马居民穿着农民的衣服和靴子，这在外国人看来就像是一群放牛的人；事实上，就连牛群也已经放牧到城里的班奇一带了。唯一的社交活动就是去教堂做礼拜，那时你才有机会瞅两眼美女。

In the last years of Eugenius IV (d. 1447) Blondus of Forli [3_4] wrote his *Roma Instaurata,* making use of Frontinus and of the old *Libri Regionali,* as well as, it seems, of Anastasius. His object is not only the description of what existed, but still more the recovery of what was lo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dication to the pope, he consoles himself for the general ruin by the thought of the precious relics of the saints in which Rome was so rich.

在教皇尤金四世（卒于1447年）的最后几年，弗利的布朗德斯 [4_4] 以弗龙蒂努斯的著作和旧日的《地方志》以及阿纳斯塔修斯的著作为参照，写了一本《重建罗马》。其目的不仅是描述现存遗迹，更是想借文字来恢复那些逝去的东西。从他献给教皇的题献里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罗马如今的荒凉令人感慨神伤，但一想到当年罗马城内藏有大量珍贵的圣徒遗物，也就姑且聊以自慰了。

With Nicholas V (1447-55) that new monumental spirit which was distinctive of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appeared on the papal throne. The new passion for embellishing the city brought with it on the one hand a fresh danger for the ruins, on the other a respect for them, as forming one of Rome's claims to distinction. Pius II was wholly possessed by antiquarian enthusiasm, and if he speaks little of the antiquities of Rome, he closely studied those of all other parts of Italy, and was the first to know and describe accurately the remains which abounded in the districts for miles around the capital. It is true that, both as priest and cosmographer, he was interested alike in classical and Christian monuments and in the marvels of nature. Or was he doing violence to himself when he wrote that Nola was more highly honored by the memory of St Paulinus than by all its classical reminiscences and by the heroic struggle of Marcellus? Not, indeed, that his faith in relics was

assumed; but his mind was evidently rather disposed to an inquiring interest in nature and antiquity, to a zeal for monumental works, to a keen and delicate observation of human life.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papacy, afflicted with the gout and yet in the most cheerful mood, he was borne in his litter over hill and dale to Tusculum, Alba, Tibur, Ostia, Falerii and Otriculum, and whatever he saw he noted down. He followed the line of the Roman roads and aqueducts, and tried to fix the boundaries of the old tribes who dwelt round the city. On an excursion to Tivoli with the great Federigo of Urbino the time was happily spent in talk on the military system of the ancients, and particularly on the Trojan war. Even on his journey to the Congress of Mantua (1459) he searched, though unsuccessfully, for the labyrinth of Clusium mentioned by Pliny, and visited the so-called villa of Virgil on the Mincio. That such a pope should demand a classical Latin style from his abbreviators, is no more than might be expected. It was he who, in the war with Naples, granted an amnesty to the men of Arpinum, as countrymen of Cicero and Marius, after whom many of them were named. It was to him alone, as both judge and patron, that Blondus could dedicate his *Roma Triumphans,* the first great attempt at a complete exposition of Roman antiquity.

随着教皇尼古拉五世（1447-1455）即位，王权之中也显示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独特的伟大精神。美化城市的新激情一方面给罗马古迹带来了新的危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罗马古迹的尊敬——正是因为这一壮举，罗马得以扬名海外。教皇庇护二世好古成癖，他对罗马古迹研究不多，却仔细研究了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古迹，并且是第一个了解并准确描述罗马方圆几十里以内的古迹的人。他是一位教士、一位宇宙志学者，他对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以及自然奇观都很感兴趣。他曾写道，比起诺拉镇的件件往事，比起马塞勒斯英勇斗争的画面，使诺拉镇更为声名远扬的是人们对圣·保利努斯的怀念之情。这句话并

没有与他的初衷相悖。他对于古迹的信仰并不是伪装出来的；天性使然，他热衷于探索自然，搜奇访古，热衷于不朽的作品，热衷于对人类生活做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在他任教皇的最后几年，尽管饱受痛风折磨，但他仍然轻松愉悦地坐着轿舆翻山越岭至图斯卡伦、阿尔巴、提布尔、奥斯提亚、法莱里和奥基库卢姆，他把途中所见都一股脑儿地记了下来。他沿着罗马公路和沟渠线一路前行，试图通过在罗马周边定居的那些古老部族来确定罗马疆域。在和乌尔比诺的费德里戈公爵一起前往蒂沃利的旅途中，他们谈古代军事制度，特别是特洛伊战争，一路上欢声笑语。在他去参加曼图亚会议（1459年）的路上，他还去克鲁修姆古城找了普林尼所提到的迷宫，（尽管没有找到），他还参观了维吉尔在明乔河畔的别墅。那么，庇护二世要求教廷布令官用古典拉丁风格来写作，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同那不勒斯的作战中，他大赦阿尔庇努姆人，因为他们和西塞罗、马里乌斯是同乡。在阿尔庇努姆，有很多人都选用西塞罗和马里乌斯作为他们的名字。布朗德斯在其《胜利的罗马》一书中，第一次完整恢弘地展现了罗马古典文化。而庇护二世又是此书唯一的鉴赏者和保护人。

Nor was the enthusiasm for the classical past of Italy confined at this period to the capital. Boccaccio had already called the vast ruins of Baiae 'old walls, yet new for modern spirits'; and since this time they were held to be the most interesting sight near Naples. Collections of antiquities of all sorts now became common. Ciriaco of Ancona (d. 1457)traveled, not only through Italy, but through other countries of the old world, and brought back with him countless inscriptions and sketches. When asked why he took all this trouble, he replied, 'To wake the dead.' The histories of the various cities of Italy had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laid claim to some true or imagined connection with Rome, had alleged some settlement or colonization which started from the capital; and the obliging manufacturers of pedigrees seem constantly to have derived various families from the oldest and most famous blood of

Rome. So highly was the distinction valued that men clung to it even in the light of the dawning criticism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hen Pius II was at Viterbo he said frankly to the Roman deputies who begged him to return, 'Rome is as much my home as Siena, for my House, the Piccolomini, came in early times from the capital to Siena, as is proved by the constant use of the names Aeneas and Sylvius in my family.' He would probably have had no objection to be held a descendant of the Julii. Paul II, a Barbo of Venice, found his vanity flattered by deducing his House, notwithstanding an adverse pedigree, according to which it came from Germany, from the Roman Ahenobarbus, who led a colony to Parma, and whose successors were driven by party conflicts to migrate to Venice. That the Massimi claimed descent from Q. Fabius Maximus, and the Cornaro from the Cornelii, cannot surprise u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 strikingly exceptional fact for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at the novelist Bandello tried to connect his blood with a noble family of Ostrogoths (i. nov. 23).

文艺复兴时期，对意大利古典文化的热情并非仅限于罗马城内。薄伽丘曾把巴亚的大片遗迹称为“富有现代气息的古城墙”；自那时起，这些遗迹便构成了那不勒斯附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文艺复兴时期曾掀起一阵古物收藏热。安科纳的奇里亚科（卒于1457年）不仅走遍了整个意大利，还走遍了其他各国，并带回来无数的碑文和略图。人们问他为什么这么大费周章地收集古物，他回答说：“为了让逝者复活。”从意大利各城市的历史来看，意大利人很久以前就自以为和罗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信誓旦旦地说意大利人先以罗马作为他们的首站移民地或者殖民地，然后才扩散至其他城市；在意大利，很多家族似乎是从罗马最古老和最负盛名的血统传下来的。当时人们很看重这一显贵身份，即便在15世纪批判思潮的影响下，人们还是想把自己尽可能地向罗马血统靠拢。数名罗马代表曾恳请庇护二世回罗马去，而在维泰博的庇护二世却说：“罗马和锡耶纳都是我的故乡。我

的家族，皮科洛米尼，早前就从罗马搬到了锡耶纳，我的家族常常使用埃尼亚斯和西尔维于斯这两个名字就可以证明。”要说他是尤利乌斯的后代，想必他也是不会反对的。保罗二世巴尔博，威尼斯人，虽然他有德意志血统，但他却以从罗马的阿恩奥巴布斯那儿找到他的家谱为荣。阿恩奥巴布斯曾率一支移民队到帕尔马，而他的后人又因为党派纷争被迫迁居威尼斯。因此，马西米家族说自己是法比尤斯·马克西莫斯的后代，科尔纳罗说自己是科内尔利的后代，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也有反例，16世纪小说家班戴洛却想把自己的血统跟东哥特族的一个贵族家庭联系在一起（见班戴洛著《故事集》第二十三篇故事）。

To return to Rome. The inhabitants, 'who then called themselves Romans', accepted greedily the homage which was offered them by the rest of Italy. Under Paul II, Sixtus IV and Alexander VI magnificent processions formed part of the carnival, representing the scene most attractive to the imagination of the time—the triumph of the Roman Imperator. The sentiment of the people expressed itself naturally in this shape and others like it. In this mood of public feeling, a report arose that on 18 April 1485 the corpse of a young Roman lady of the classical period—wonderfully beautiful and in perfect preservation—had been discovered. [3_5] Some Lombard masons digging out an ancient tomb on an estate of the convent of Santa Maria Nuova, on the Appian Way, beyond the tomb of Caecilia Metella, were said to have found a marble sarcophagus with the inscription, 'Julia, daughter of Claudius'. On this basis the following story was built. The Lombards disappeared with the jewels and treasure which were found with the corpse in the sarcophagus. The body had been coated with an antiseptic essence, and was as fresh and flexible as that of a girl of fifteen the hour after death. It was said that she still kept the colors of life, with eyes and mouth half open. She was taken to the palace of the

conservatori on the Capitol; and then a pilgrimage to see her began. Among the crowd were many who came to paint her; 'for she was more beautiful than can be said or written, and, were it said or written, it would not be believed by those who had not seen her'. By the order of InnocentVIII she was secretly buried one night outside the Pincian Gate; the empty sarcophagus remained in the court of the *conservatori.* Probably a colored mask of wax or some other material was modeled in the classical style on the face of the corpse, with which the gilded hair of which we read would harmonize admirably. The touching point in the story is not the fact itself, but the firm belief that an ancient body, which was now thought to be at last really before men's eyes, must of necessity be far more beautiful than anything of modern date.

还是继续谈罗马吧。当时“以罗马人自诩”的居民们贪婪地接受着意大利各地对他们所表达的敬意。在保罗二世、西斯科特四世和亚历山大六世统治的时代，狂欢节时盛大的游行活动总是格外吸引人，因为这能让人联想到古罗马皇帝凯旋的场景。人们通过这种形式和其他类似形式来表达他们对罗马的崇敬之情。在这种氛围下，民间曾流出一个传闻，说在1485年4月18日发现了一具古典时代罗马少女的尸体——惊艳动人且保存得十分完好。[4_5] 据说：几个伦巴第石匠在亚壁古道上凯奇利亚·梅泰拉墓另一边的圣·玛利亚·诺沃修道院内掘开一个古墓，发现里面藏有一个石棺，上面刻着“尤利娅，克劳狄的女儿”字样。下边的故事就是根据这一传说编造而成的。那几个伦巴第石匠取走了石棺里的金银珠宝，还有尸体上的首饰配件，就留下那具女尸。尸体表面涂有一层防腐剂，皮肤仍然嫩滑富有弹性，俨然一个刚死不久的十五岁少女。据说她仍保持着活人的面色，半睁着眼，微张着嘴。自她被移至卡比托利欧山上的保守宫后，朝圣者从此络绎不绝。在朝圣者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来画像的；“语言文字尚不足以形容其美貌，即便能形容出来，那些从没见过她的人也是不会相信的。”由于教皇因诺森特八世的一道指令，她便在一个夜晚被秘密地葬于平奇

恩门外；而那口空棺仍留在保守宫内。人们以尤利娅的脸为模型，按照古典风格，用蜡质或其他材料做成了一个彩色面具。姣好的面容，加上一头金发，看上去舒服自然、美艳动人。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并不在于故事本身，而在于人们坚信现在任何尤物都不能跟当时人们得以亲眼所见的那具古代遗体相媲美。

Meanwhile the material knowledge of old Rome was increased by excavations. Under Alexander VI the so-called 'grotesques', that is, the mural decorations of the ancients, were discovered, and the Apollo of the Belvedere was found at Porto d'Anzio. Under Julius II followed the memorable discoveries of the Laocoon, of the Venus of the Vatican, of the Torso of the Cleopatra. The palaces of the nobles and the cardinals began to be filled with ancient statues and fragments. Raphael undertook for Leo X that ideal restoration of the whole ancient city which his (or Castiglione's) celebrated letter (1518 or 1519) speaks of. [3_6] After a bitter complaint over the devastations which had not even then ceased, and which had been particularly frequent under Julius II, he beseeches the pope to protect the few relics which were left, to testify to the power and greatness of that divine soul of antiquity whose memory was inspiration to all who were capable of higher things. He then goes on with penetrating judgement to lay the foundations of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art, and concludes by giving the definition of an architectural survey which has been accepted since his time; he requires the ground plan, section and elevation separately of every building that remained. How archeology devoted itself after his day to the study of the venerated city and grew into a special science, and how the Vitruvian Academy at all events proposed to itself great aims, cannot here be related. Let us rather pause at the days of Leo X, under whom the enjoyment of antiquity combined with all other pleasures to give to Roman life a unique stamp and

consecration. The Vatican resounded with song and music, and their echoes were heard through the city as a call to joy and gladness, though Leo did not succeed thereby in banishing care and pain from his own life, and his deliberate calculation to prolong his days by cheerfulness was frustrated by an early death. The Rome of Leo, as described by Paolo Giovio, forms a picture too splendid to turn away from, unmistakable as are also its darker aspects—the slavery of those who were struggling to rise; the secret misery of the prelates, who, notwithstanding heavy debts, were forced to live in a style befitting their rank; the system of literary patronage, which drove men to be parasites or adventurers; and, lastly, the scandalous maladministration of the finances of the state. Yet the same Ariosto who knew and ridiculed all this so well gives in the sixth satire a longing picture of his expected intercourse with the accomplished poets who would conduct him through the city of ruins, of the learned counsel which he would there find for his own literary efforts, and of the treasures of the Vatican library. These, he says, and not the long-abandoned hope of Medicean protection, were the real baits which attracted him, when he was asked to go as Ferrarese ambassador to Rome.

随着文物的大量出土，人们对古罗马的认识也在进一步加深。在亚历山大六世统治时期，人们发现了“岩窟式壁画”，也就是古人的墙饰，并在安齐奥港找到了望楼上的阿波罗像。朱利叶斯二世统治时期，人们又相继发现了大量文物，譬如拉奥孔群像雕塑、梵蒂冈的维纳斯像和克利奥帕特拉像。贵族们和枢机主教们的宫室里也陆陆续续地摆满了古代雕像和美术品的碎片。拉斐尔曾在他的那封赫赫有名的信[4_6]（1518年或1519年）中提到，自己受利奥十世之命，要将整座古城恢复至最佳面貌。信中，他提到很多教皇只知肆意破坏文物，朱利叶斯二世统治时期更甚。除了对此举表达强烈的控诉以外，他还恳求教皇利奥十世保护好那几处仅存的古迹，因为这些古迹印证了伟

大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同时鼓舞着那些有志之士去完成更崇高的事业。后来，他以一种敏锐的鉴赏力为比较美术史奠定了基础，并总结了建筑测绘学的定义，而这一定义一直为后人所接受和沿用；每一座留存下来的古罗马建筑，他都参与了其平面图、剖面图和正面图的主持测绘工作。继拉斐尔之后，罗马古城考古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维特鲁威学院也就罗马古城的考古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宏伟目标，具体内容我们就不展开叙述了。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利奥十世时代的情况。在利奥十世统治时代，古典文化气息浓厚，人们享受着古典文化所带来的那种精神上的愉悦，这也赋予了罗马一种神秘的色彩。在梵蒂冈，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城市上空，给人们带去了欢乐。而利奥十世却没能摆脱他所必须面对的难题和苦痛，他想继续舒舒服服地做他的教皇，却不幸英年早逝了。在保罗·乔维奥的笔下，利奥时代的罗马，就像一幅宏伟壮丽的画卷，让人爱不释手。但当时的罗马，也同样危机四伏：奴隶们挣扎着想要起来反抗；教士们强忍着内心的苦楚，在教廷债台高筑的情况下，仍然强撑门面，以教士自居；文学庇护制之下，人们要么成了文学的寄生虫，要么成了文学冒险主义者；教皇国财政管理不善，早已臭名远扬。阿里奥斯托一边针砭时弊，一边在其第六首讽刺诗中表达自己的诉求：切盼能与那些伟大的诗人有所往来，在他们的陪同下，游遍整座古城；切盼能在那儿得到博学之人对自己作品的批评指正；并切盼能读到梵蒂冈图书馆的珍贵藏书。他说，他早就不指望能求得美第奇家族的保护，以上诉求才是他应邀以费拉拉大使的身份出访罗马的真正动因。

But the ruins within and outside Rome awakened not only archeological zeal and patriotic enthusiasm, but an elegiac or sentimental melancholy. In Petrarch and Boccaccio we find touches of this feeling. Poggio Bracciolini often visited the temple of Venus at Rome, in the belief that it was that of Castor and Pollux, where the senate used so often to meet, and would lose himself in memories of the great orators Crassus, Hortensius, Cicero. The language of Pius II, especially in describing Tivoli, has a thoroughly

sentimental ring, and soon afterwards (1467) appeared the first pictures of ruins, with a commentary by Polifilo. [3_7] Ruins of mighty arches and colonnades, half hid in plane-trees, laurels, cypresses and brushwood, figure in his pages. In the sacred legends it became the custom, we can hardly say how, to lay the scene of the birth of Christ in the ruins of a magnificent palace. [3_8] That artificial ruins became afterwards a necessity of landscape gardening is only a practical consequence of this feeling.

但古城内外的遗迹不仅激起了人们的考古热情和爱国情怀，同样也勾起了人们的缕缕忧思。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在其作品中就流露出这种感伤的情怀。波焦·布拉乔利尼时常去罗马参观维纳斯神庙，他相信那就是卡斯托和波克鲁斯神庙，当时元老院常在此开会，并且他沉湎于对克拉苏、霍腾西乌斯、西塞罗等演说家的无限追怀中。庇护二世的文字中往往带有一种感伤的基调，这在描述蒂沃利的文字中最为明显。不久以后（1467年），玻利菲洛 [4_7] 的第一套罗马遗迹注释版图册面世。翻开图册，只见那些巨大的拱门和柱廊掩映在梧桐、月桂、柏树和丛林中。在宗教传说中，人们都习惯于把基督的出生地说成是一个宏伟壮丽的宫殿遗址 [4_8] 。在这种情感的影响下，后人在布置庭院时，往往会加入一些仿古元素。

The Classics

经典著作

But the literary bequests of antiquity, Greek as well as Latin, were of far more importance than the architectural, and indeed than all the artistic remains which it had left. They were held in the most absolute sense to be the springs of all knowledge. The literary conditions of that age of great discoveries have been often set forth;

no more can be here attempted than to point out a few less-known features of the picture.

在古典文化中，建筑遗迹的重要性并不能与希腊拉丁文学作品相媲美，事实上，后者的重要性远超其他一切艺术遗迹。它们在最绝对的意义上被认为是一切知识的源泉。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于那个伟大发现时代的文学环境；此处主要谈谈古代文学作品几个鲜为人知的特点。

Great as was the influence of the old writers on the Italian mind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before, yet that influence was due rather to the wide diffusion of what had long been known than to the discovery of much that was new. The most popular Latin poets, historians, orators and letter-writers, together with a number of Latin translations of single works of Aristotle, Plutarch and a few other Greek authors, constituted the treasure from which a few favored individuals in the time of Petrarch and Boccaccio drew their inspiration. The former, as is well known, owned and kept with religious care a Greek Homer, which he was unable to read. A complete Latin translation of the *Iliad* and *Odyssey,* though a very bad one, was made at Petrarch's suggestion, and with Boccaccio's help, by a Calabrian Greek, Leonzio Pilato. But with the fifteenth century began the long list of new discoveries, the systematic creation of libraries by means of copies, and the rapid multiplication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Greek.

14世纪及以前，意大利人的思想深受古代作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因为那些早已为人所知的东西的广泛传播，而不是因为发现了很多新东西。最受欢迎的拉丁诗人、历史学家、演说家、书信作家

的作品，连同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和其他几个希腊作家的个别作品的拉丁文译本一起，构成了一个宝库。而彼特拉克、薄伽丘时代的一些幸运儿正是从中获得灵感、受到启发的。众所周知，彼特拉克曾有过一部希腊文的荷马史诗，如宗教般虔诚地小心珍藏着，只是读不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一个拉丁文全译本就是在彼特拉克的建议和薄伽丘的帮助下，由一个希腊裔卡拉布里亚人莱昂齐奥·皮拉托完成的，只不过译得很糟糕。15世纪以来，新发现层出不穷，通过抄写的方法系统地制作出很多丛书，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作品也在成倍地迅速增加。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enthusiasm of a few collectors of that age, who shrank from no effort or privation in their researches, we should certainly possess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at of the Greeks, which is now in our hands. Pope Nicholas V, when only a simple monk, ran deeply into debt through buying manuscripts or having them copied. Even then he made no secret of his passion for the two great interests of the Renaissance, books and buildings. As pope he kept his word. Copyists wrote and spies searched for him through half the world. Perotto received 500 ducats for the Latin translation of Polybius; Guarino, 1,000 gold florins for that of Strabo, and he would have been paid 500 more but for the death of the pope. Filelfo was to have received 10,000 gold florins for a metrical translation of Homer, and was only prevented by the pope's death from coming from Milan to Rome. Nicholas left a collection of 5,000 or, according to another way of calculating, 9,000 volumes, for the use of the members of the Curia, which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the library of the Vatican. It was to be preserved in the palace itself, as its noblest ornament, like the library of Ptolemy Philadelphus at Alexandria. When the plague (1450) drove him and his court to Fabriano, whence then, as now, the best paper was procured, he took his translators and compilers

with him, that he might run no risk of losing them.

要不是那个时代几位收藏家怀着满腔热情，不遗余力、不怕困难地从事搜索工作，恐怕我们现在能读到的文学作品将少之又少，更别说是希腊文学作品了。教皇尼古拉五世还是一个小教士的时候，他曾由于购买手稿或请人抄写手稿而负债累累。即使在那时，他也毫不掩饰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最感兴趣的两样东西——书籍和建筑的热情。即位后，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他命人抄写书稿，派人四处寻求资料，范围之广，遍及半个地球。佩罗托把波里比阿的作品译成拉丁文后，拿到了500达克特；格里诺把斯特拉博的作品译成拉丁文后，拿到了1,000金弗罗林，要是教皇没死，他还可以再拿到500金弗罗林。菲莱尔福本可以在完成荷马韵文译本后拿到10,000金弗罗林，但他还没来得及从米兰赶到罗马，教皇就去世了。教皇尼古拉五世去世的时候，留下了5,000卷（按另一种计算方法为9,000卷）藏书供罗马教廷成员使用，这些书成为梵蒂冈图书馆最早的藏书，被作为最高贵的装饰保存在宫殿内，就像亚历山大港的托勒密·费拉德尔甫斯的藏书一样。1450年瘟疫爆发，尼古拉五世和罗马教廷被迫迁至法布里亚诺，当时与现在一样，从那里可以获取到最佳文献，因此当时他还带着翻译和编辑人员，他可不想冒失去他们的风险。

The Florentine Niccolo Niccoli,a member of that accomplished circle of friends which surrounded the elder Cosimo de' Medici, spent his whole fortune in buying books. At last, when his money was all gone, the Medici put their purse at his disposal for any sum which his purpose might require. We owe to him the completion of Ammianus Marcellinus, of the *De Oratore* of Cicero, and other works; he persuaded Cosimo to buy the best manuscript of Pliny from a monastery at Lubeck. With noble confidence he lent his books to those who asked for them, allowed all comers to study them in his own house, and was ready to converse with the students

on what they had read. His collection of 800 volumes, valued at 6,000 gold florins, passed after his death, through Cosimo's intervention, to the monastery of San Marco, on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ould be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在老科西莫·美第奇那群学者朋友中，佛罗伦萨的尼科洛·尼科利算得上书痴一个，他曾把他的全部财产都花在了购买古籍上。在他因此而倾尽家产的时候，美第奇家族包揽了他此举花费的所有开支。于是，无数珍贵的古希腊著作经他之手得以流传至今，像阿米亚诺斯·马塞勒斯全集、西塞罗的《论演说家》等等。他说服科西莫从吕贝克的修道院里买来普林尼最好的手稿。他还非常慷慨。凡是有人来问他借书，他都有求必应，他还让所有来客在他家里阅读，并跟他们一起探讨书中的内容。他共有800册藏书，价值6,000金弗罗林。在他死后，这些藏书经科西莫之手一并捐给圣马可修道院，条件是，这些藏书必须对公众开放。

Of the two great book-finders, Guarino and Poggio, the latter,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and acting partly as the agent of Niccoli, searched industriously among the abbeys of South Germany. He there discovered six orations of Cicero, and the first complete Quintilian, that of St Gall, now at Zurich; in thirty-two days he is said to have copied the whole of it in a beautiful handwriting. He was able to make important additions to Silius Italicus, Manilius, Lucretius, Valerius Flaccus, Asconius Pedianus, Columella, Celsus, Aulus Gellius, Statius and others; and with the help of Leonardo Aretino he unearthed the last twelve comedies of Plautus, as well as the Verrine orations.

格里诺和波焦是两个伟大的书籍收集家。波焦曾借出席康斯坦茨

会议的机会，以尼科利代理人的身份，在南德意志修道院中遍寻佚失的古籍。他在圣加尔修道院里发现了西塞罗的六篇演说词以及现藏于苏黎世的第一本昆体良全集；并据说花了32天的时间用娟秀的字迹把这些著作全部抄了下来。他还对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马尼利、卢克莱修、瓦莱里乌斯·弗拉库斯、阿斯科尼乌斯·佩迪亚尼乌斯、科鲁迈拉、凯尔苏斯、奥卢斯·格利乌斯和斯塔提乌斯等人的作品做了些重要增补；并在列奥纳多·阿雷蒂诺的帮助下，发现了普劳图斯的最后12部喜剧以及西塞罗反对韦里内家族的演说。

The famous Greek, Cardinal Bessarion, in whom patriotism was mingled with a zeal for letters, collected, at a great sacrifice, 600 manuscripts of pagan and Christian authors. He then looked round for some receptacle where they could safely lie until his unhappy country, if she ever regained her freedom, could reclaim her lost literature. The Venetian government declared itself ready to erect a suitable building, and to this day the Biblioteca Marciana retains a part of these treasures. [3_9]

著名希腊籍枢机主教贝萨里翁，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热诚的文学爱好者；他费尽千辛万苦，共收集了600部异教和基督教作家的手稿，之后，又想替这些手稿寻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以便有朝一日，在祖国恢复自由后，这些著作可以重回祖国怀抱。为了收藏这些手稿，威尼斯政府特地修建了圣马可图书馆；直到今天，馆内还保存着一部分手稿 [4_9] 。

The formation of the celebrated Medicean library has a history of its own, into which we cannot here enter. The chief collector for Lorenzo il Magnifico was Johannes Lascaris.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collection, after the plundering in the year 1494, had to be

recovered piecemeal by the Cardinal Giovanni Medici, afterwards Leo X.

关于美第奇家族的藏书史，我们在此就不展开叙述了。伟大的洛伦佐在位时期，约翰内斯·拉斯卡里斯是古籍收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1494年藏书遭劫后，枢机主教乔瓦尼·美第奇，也就是后来的教皇利奥十世承担了藏书的修复工作。

The library of Urbino, now in the Vatican, was wholly the work of the great Federigo of Montefeltro. As a boy he had begun to collect; in after years he kept thirty or forty *scrittori* employed in various places, and spent in the course of time no less than 30,000 ducats on the collection. It was systematically extended and completed, chiefly by the help of Vespasiano, and his account of it forms an ideal picture of a library of the Renaissance. At Urbino there were catalogues of the libraries of the Vatican, of St Mark at Florence, of the Visconti at Pavia, and even of the library at Oxford. It was noted with pride that in richness and completeness none could rival Urbino. Theology and the Middle Ages were perhaps most fully represented. There was a complete Thomas Aquinas, a complete Albertus Magnus, a complete Bonaventura. The collection, however, was a many-sided one, and included every work on medicine which was then to be had. Among the 'moderns' the great writer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Dante and Boccaccio, with their complete works—occupied the first place. Then followed twenty-five select humanists, invariably with both their Latin and Italian writings and with all their translations. Among the Greek manuscripts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far outnumbered the rest; yet in the list of the classics we find all the works of Sophocles, all of Pindar, and all of Menander. The last must have quickly

disappeared from Urbino, else the philologists would have soon edited it.

乌尔比诺的藏书现存于梵蒂冈。我们今天能有这么庞大的图书库，完全得益于伟大的费德里戈·达·蒙泰费尔特罗当年的努力。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收集图书，多年来，他四处奔波，并雇三四十人替他抄书，所花经费不下30，000达克特。在维斯帕夏诺的帮助下，藏书库得以扩充和完善，文艺复兴时期一个理想的图书馆得以应运而生。乌尔比诺藏书目录之广，甚至囊括了梵蒂冈图书馆、佛罗伦萨的圣马可图书馆、帕维亚的维斯孔蒂家族藏书以及牛津图书馆。在图书的丰富程度和完善程度上，乌尔比诺走在世界前列。在乌尔比诺，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神学和中世纪著作，例如托马斯·阿奎那全集、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全集以及博纳文图拉全集。中世纪藏书种类繁多，还包括当时所有的医学著作。在近代文学藏书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4世纪文坛巨匠——但丁和薄伽丘的全集，其次是出自25位人文主义作家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作品以及他们的译作。在希腊文手稿中，教父手稿居多；但是，在古代著作目录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像索福克勒斯、品达、米南德这些作家的作品。不过遗憾的是，米南德的作品之后遗失了，不然那些文献学者早就把它编辑好了。

We have, further, a good deal of information as to the way in which manuscripts and libraries were multiplied. The purchase of an ancient manuscript, which contained a rare, or the only complete, or the only existing text of an old writer, was naturally a lucky accident of which we need take no further account. Among the professional copyists those who understood Greek took the highest place, and it was they especially who bore the honorable name of *scrittori.* Their number was always limited, and the pay they received very large. The rest, simply called *copisti,* were partly mere clerks who made their living by such work, partly

schoolmasters and needy men of learning who desired an addition to their income. The copyists at Rome in the time of Nicholas V were mostly Germans or Frenchmen—'barbarians' as the Italian humanists called them, probably men who were in search of favors at the papal court, and who kept themselves alive meanwhile by this means. When Cosimo de' Medici was in a hurry to form a library for his favorite foundation, the Badia below Fiesole, he sent for Vespasiano, and received from him the advice to give up all thoughts of purchasing books, since those which were worth getting could not behad easily, but rather to make use of the copyists; whereupon Cosimo bargained to pay him so much a day, and Vespasiano, with forty-five writers under him, delivered 200 volumes in twenty-two months. The catalogue of the works to be copied was sent to Cosimo by Nicholas V, who wrote it with his own hand. Ecclesiastical literature and the books needed for the choral services naturally held the chief place in the list.

我们接下来来谈谈手稿和藏书的抄写制度。要是能买到一部古代手稿，碰巧还是出自某位古代作家的唯一一部完整的或是唯一遗世的手稿，就是再幸运不过的事儿了。在以抄书为职业的人们当中，那些懂希腊文的人地位最高，他们还有一个光荣称号——“写本人员”。写本人员人数不多，而且他们获得的报酬相当丰厚。剩下的人仅仅只是“抄书手”，他们当中，一部分是以此为谋生手段的办事员，一部分是想挣些外快的学校教师和贫苦的学者。尼古拉五世时期，罗马抄书手大多数都是德意志人或法兰西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口中的“野蛮人”，大概就是指这些寻求教堂庇护并以此维持生计的人。菲耶索莱山麓地带的巴迪亚修道院是科西莫·美第奇的最爱，他曾急着想给修道院建个藏书室，还派人去请维斯帕夏诺前来商议。然而，维斯帕夏诺却劝他断了买书这一念头，既然很难买到那些有价值的书，倒不如雇人来抄书；俩人商量好每天付给维斯帕夏诺的工钱后，维斯帕夏诺便雇了45人替他抄书，在22个月之内就交付了两百册图书。由于尼古

拉五世会亲自列好抄书单，交至科西莫手中，教会传道书籍和教堂合唱用书自然也就占了书单的一大部分比例。

The handwriting was that beautiful modern Italian which was already in use in the preceding century, and which makes the sight of one of the books of that time a pleasure. Pope Nicholas V, Poggio, Giannozzo Manetti, Niccolo Niccoli and other distinguished scholars themselves wrote a beautiful hand, and desired and tolerated none other. The decorative adjuncts, even when miniatures formed no part of them, were full of taste, as may be seen especially in the Laurentian manuscripts, with the light and graceful scrolls which begin and end the lines. The material used to write on, when the work was ordered by great or wealthy people, was always parchment; the binding, both in the Vatican and at Urbino, was a uniform crimson velvet with silver clasps. Where there was so much care to show honor to the contents of a book by the beauty of its outward form, it is intelligible that the sudden appearance of printed books was greeted at first with anything but favor. Federigo of Urbino 'would have been ashamed to own a printed book'.

尼古拉五世时期，前一世纪娟秀的新式意大利字体得以沿用，因为用这种字体写出来的书让人看着很舒服。教皇尼古拉五世、波焦、詹诺佐·马内蒂、尼科洛·尼科利等知名学者就写得一手好字。他们欣赏好字，也绝不容忍字迹潦草的文书。那些附带的装饰，即使其中没有精细插画，也是饶有风味的，这尤其可以从老楞佐图书馆的手抄本中看出来；轻便而雅致的卷轴在字行的开始和结尾处。大人物或有钱人请人抄书时，总是会选用羊皮纸作为书写材料；而无论是在梵蒂冈或是在乌尔比诺，都一律以深红色天鹅绒作为封面装订，并带有白银搭扣。因为在当时，人们相当注重通过书籍外观之美来表示对于其内

容的重视，所以，印本书刚出现时并不受欢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乌尔比诺的费德里戈公爵想必也“会以拥有一本印本书而感到耻辱”。

But the weary copyists—not those who lived by the trade, but the many who were forced to copy a book in order to have it—rejoiced at the German invention.It was soon applied in Italy to the multiplication first of the Latin and then of the Greek authors, and for a long period nowhere but in Italy, yet it spread with by no means the rapidity which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from the general enthusiasm for these works. After a while the modern relation between author and publisher began to develop itself, and under Alexander VI, when it was no longer easy to destroy a book, as Cosimo could make Filelfo promise to do, the prohibitive censorship made its appearance.

但是德国人的这一发明，对于那些精疲力尽的抄书者——并不是以此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抄书手，而是那些不得不靠抄书来获取书本内容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喜从天降。印刷术很快在意大利推广开来，先是用于增印拉丁文作家的著作，然后是希腊文作家的著作。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刷术却只在意大利得到了推广应用，且发展速度并没有与人们对著作的普遍热情成正比。随后，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近代关系开始发展起来。在亚历山大六世时代，已不能再像科西莫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地就让菲莱尔福答应毁掉一本书了，于是书籍查禁制度出现了。

The growth of textual criticism which accompanied the advancing study of languages and antiquity belongs as little to the subject of this book as the history of scholarship in general. We are here occupied, not with the learning of the Italians in itself, but

with the reproduction of antiquity in literature and life. One word more on the studies themselves may still be permissible.

随着语言文字和古典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考证学逐渐兴起。不过总的来说，考证学和学术史一样，与本书内容之间没有多大的关联。我们在这里所要论述的是古典文化在文学和生活层面上的再生，而非意大利人的学术问题。不过，也可以就学术研究本身略说一二。

Greek scholarship was chiefly confined to Florence and to the fifteen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ies.

15世纪以及16世纪初，佛罗伦萨成了希腊文学的主要研究阵地。

The impulse which proceeded from Petrarch and Boccaccio, superficial as was their own acquaintance with Greek, was powerful, but did not tell immediately on their contemporar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udy of Greek literature died out about the year 1520 with the last of the colony of learned Greek exiles, and it was a singular piece of fortune that northerners like Erasmus, the Stephani and Budaeus had meanwhile made themselves masters of the language. That colony had begun with Manuel Chrysoloras and his relation John, and with George of Trebizond. Then followed, about and after the time of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John Argyropulos, Theodore Gaza, Demetrios Chalcondylas, who brought up his sons Theophilos and Basilios to be excellent Hellenists, Andronikos Kallistos, Marcos Musuros and the family of the Lascaris, not to mention others. But after the subjection of Greece by the Turks was completed, the succession of scholars was

maintained only by the sons of the fugitives and perhaps here and there by some Candian or Cypriot refugee. That the decay of Hellenistic studies began about the time of the death of Leo X was due partly to a general change of intellectual attitude, and to a certain satiety of classical influences which now made itself felt; but its coincidence with the death of the Greek fugitives was not wholly a matter of accident. The study of Greek among the Italians appears, if we take the year 1500 as our standard, to have been pursued with extraordinary zeal. The youths of that day learned to speak the language, and half a century later, like the Popes Paul III and Paul IV, they could still do so in their old age. But this sort of mastery of the study presupposes intercourse with native Greeks.

彼特拉克、薄伽丘对希腊文学钻研不深，但他们却极大地推动了希腊文学在意大利的发展进程，尽管这一进程发展得较为缓慢；希腊学者一度流亡国外，1520年，当他们的最后一个侨居地消失后，对希腊文学的研究工作也随之停止了；在希腊文学研究止步不前时，好在北方地区还出了几个像伊拉斯谟、斯特凡尼家族、布多伊斯这样的希腊语言大师。第一批侨居者包括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和他的亲属约翰以及特拉比松的乔治。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约翰·阿伊罗普洛斯、西奥多·加扎、德美特里·卡尔孔狄利斯（他曾把他的两个儿子狄奥斐卢斯和巴西利奥斯培养成杰出的希腊语言学家）、安德罗尼科斯·卡利斯托斯、马科斯·穆舒罗斯和拉斯卡里斯家族纷纷侨居海外，还有很多人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希腊完全被土耳其占领后，希腊文学的研究重任就落到了流亡者的子弟以及坎迪安或塞浦路斯的流亡者的身上。利奥十世死后，希腊文化研究热逐渐衰退，部分原因是学界对希腊文化的态度有所改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古典文化已经深入意大利的生活；此外，这与当时希腊流亡者的相继去世也密不可分。1500年，意大利人学希腊语的热情相当高涨。那时候，年轻人在学希腊语，五十年后，很多人到晚年还在学希腊语，就比方说教皇保罗三世和保罗四世。他们能说一口道地的希腊语，就好像曾跟希腊本地人打过交道一

样。

Besides Florence, Rome and Padua nearly always maintained paid teachers of Greek, and Verona, Ferrara, Venice, Perugia, Pavia and other cities occasional teachers. Hellenistic studies owed a priceless debt to the press of Aldo Manuzio at Venice, wher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voluminous writers were for the first time printed in the original. Aldo ventured his all in the enterprise; he was an editor and publisher whose like the world has rarely seen.

除了佛罗伦萨以外，罗马、帕多瓦也长年聘有专职希腊语教师，而维罗纳、费拉拉、威尼斯、佩鲁贾、帕维亚等地也聘有临时教师。威尼斯的阿尔多·马努齐奥的出版社曾为希腊文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那儿，很多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得以将其作品第一次刊行。阿尔多把毕生精力都放在了书籍刊印这些事业上，像他这样的编辑兼出版家是世间少有的。

Along with this classical revival, oriental studies now assumed considerable proportions. The controversial writings of the great Florentine statesman and scholar, Giannozzo Manetti (d. 1459), against the Jews afford an early instance of a complete mastery of their language and science. His son Agnolo was from his childhood instructed in Latin, Greek and Hebrew. The father, at the bidding of Nicholas V, translated the whole Bible, as learned opinion of the time insisted on giving up the *Vulgata.*

在古典文化复兴时期，东方文化也是其中一块重要的研究领域。佛罗伦萨杰出政治家兼学者，詹诺佐·马内蒂（卒于1459年）曾发表

数篇反对犹太人的文章，一度引起争议。这些文章便是当时已有人精通犹太语的最早的例证。他的儿子阿尼奥洛从童年时代起就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马内蒂曾受尼古拉五世之命翻译了整本《圣经》，而在当时，学界并不看好《圣经》的拉丁文翻译。

Many other humanists devoted themselves before Reuchlin to the study of Hebrew, among them Pico della Mirandola, who was not satisfied with a knowledge of the Hebrew grammar and Scriptures, but penetrated into the Jewish Cabbalah and even made himself as familiar with the literature of the Talmud as any rabbi.

在约翰内斯·罗伊希林之前，已有很多人文主义者致力于希伯来语的研究工作。比科·德拉·米兰多拉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并不单单满足于掌握希伯来语语法和圣经内容，他还深入研究犹太教卡巴拉，甚至还要求自己跟拉比（犹太教教士）一样精通《塔木德经》。

Among the oriental languages, Arabic was studied as well as Hebrew. The science of medicine, no longer satisfied with the older Latin translations of the great Arab physicians, had constant recourse to the originals, to which an easy access was offered by the Venetian consulates in the East, where Italian doctors were regularly kept. Hieronimo Ramusio, a Venetian physician, translated a great part of Avicenna from the Arabic and died at Damascus in 1486. Andrea Mongaio of Belluno, a disciple of the same Avicenna, lived long at Damascus, learnt Arabic, and improved on his master. The Venetian government afterwards appointed him professor of this subject at Padua.

就东方语言的学习来看，人们除了学希伯来语，还同样学阿拉伯语。阿拉伯医学家著作的较旧的拉丁文译本已不能满足当时医学研究的需要，人们经常需要求助于原本；而威尼斯驻阿拉伯的很多领事馆恰恰给人们提供了这一便利，那儿还有很多意大利医生。一个威尼斯医生希罗尼莫·拉穆西奥，就将阿维森纳的很多著作从阿拉伯语翻成了意大利语，他于1486年死于大马士革。贝卢诺医生安德烈亚·蒙加约，是阿维森纳的弟子，他在大马士革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不仅学会了阿拉伯语，还改进了他老师的学说。后来，他被威尼斯政府聘为帕多瓦大学医学教授。

We must here linger for a moment over Pico della Mirandola before passing on to the general effects of humanism. He was the only man who loudly and vigorously defended the truth and science of all ages against the one-sided worship of classical antiquity. He knew how to value not only Averroes and the Jewish investigators, but also the scholastic writers of the Middle Ages, according to the matter of their writings. He seems to hear them say,

在叙述人文主义对意大利的影响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简要介绍一下比科·德拉·米兰多拉。他是唯一一个大声疾呼并坚决捍卫真理和科学、反对片面崇拜古典文化的人。他尊重阿维洛斯和那些犹太籍研究家的著作，也尊重中世纪经院学者的著作。他似乎听到了他们的呼喊：

> We shall live for ever, not in the schools of word-catchers, but in the circle of the wise, where they talk not of the mother of Andromache or of the sons of Niobe, but of the deeper causes of things human and divine; he who looks closely will

> see that even the barbarians had intelligence (*mercurium*),not on the tongue but in the breast.

> 我们不是在迂腐的咬文嚼字者而是在智者群体中永垂不朽！这个群体讨论的并不是安德洛玛刻的母亲或尼俄伯的儿子们，而是天上人间事物的起源。在这个群体里，细心的人会发现，即便是野蛮人也有他们的智慧，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智慧。

Himself writing a vigorous and not inelegant Latin, and a master of clear exposition, he despised the purism of pedants and the current over-estimate of borrowed forms, especially when joined, as they often are, with one-sidedness, and involving indifference to the wider truth of the things themselves. Looking at Pico, we can guess at the lofty flight which Italian philosophy would have taken had not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nihilated the higher spiritual life of the people.

他能写拉丁文，他的文字笔力遒劲但字体不失优美，他叙事条理清晰，是阐述方面的大师；他蔑视那些只知舞文弄墨的迂腐之士，蔑视当时一味追求模仿形式的社会风气，当这两种风气和片面地看问题、忽视事物客观真理的冷漠态度相结合时，他尤其蔑视，而这三者却常常相结合。看着比科，我们可以猜想到：如果不是反宗教改革遏制了人们的先进思想，意大利哲学必能实现飞跃式发展。

The Humanists

人文主义者

Who now were those who acted as mediators between their own age and a venerated antiquity, and made the latter a chief element in the culture of the former?

那么，谁在充当自己所在的时代与受人推崇的古老时期之间的中介，并使古典文化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一个主要部分呢？

They were a crowd of the most miscellaneous sort, wearing one face today and another tomorrow; but they clearly felt themselves, and it was fully recognized by their time, that they formed a wholly new element in society. The *clerici vagante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may perhaps be taken as their forerunners—the same unstable existence, the same free and more than free views of life, and the germs at all events of the same pagan tendencies in their poetry. But now, as competitor with the whole culture of the Middle Ages, which was essentially clerical and was fostered by the Church, there appeared a new civilization, founding itself on that which lay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iddle Ages. Its active representatives became influential because they knew what the ancients knew, because they tried to write as the ancients wrote, because they began to think, and soon to feel, as the ancients thought and felt. The tradition to which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passed at a thousand points into genuine reproduction.

有这样一群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今天以一种形象出现，明天又以另一种形象出现；但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中的新兴力量，而这股力量也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可。人们可能会认为12世纪的“流浪教士”就是他们的先驱——因为他们有着同样不安定的生活际遇，他们同样追求自由、超越自由，而且无论如何他们的诗歌都存在

着同样的异教倾向的萌芽。而现在，在以神职人员为主、由教会培养出来的中世纪整体文化中，出现了作为竞争者的新文明，其立足点是中世纪的对立面。其活跃的代表已颇具影响力，因为他们知古人所知，因为他们努力像古人那样写作，因为他们开始像古人那样思考，也很快会像那样去感受。他们所致力复兴的传统逐步在各方面实现了真正的再生。

Some modern writers deplore the fact that the germs of a far more independent and essentially national culture, such as appeared in Florence about the year 1300, were afterwards so completely swamped by the humanists. There was then, we are told, nobody in Florence who could not read; even the donkey-men sang the verses of Dante; the best Italian manuscripts which we possess belonged originally to Florentine artisans; the publication of a popular encyclopedia, like the *Tesoro* of Brunetto Latini, was then possible; and all this was founded on a strength and soundness of character due to the universal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to commerce and travel, and to the systematic reprobation of idleness. The Florentines, it is urged, were at that time respected and influential throughout the whole world, and were called in that year, not without reason, by Pope Boniface VIII, 'the fifth element'. The rapid progress of humanism after the year 1400 paralyzed native impulses. Henceforth men looked only to antiquity for the solution of every problem, and consequently allowed literature to sink into mere quotation. Nay, the very fall of civil freedom is partly to be ascribed to all this, since the new learning rested on obedience to authority, sacrificed municipal rights to Roman law, and thereby both sought and found the favor of the despots.

一种极具独立性、本质上富有民族性的文化开始萌芽，譬如1300

年前后佛罗伦萨所出现的文化，后来却被人文主义者的大潮彻底淹没，一些近代作家对此深感惋惜。据说，那时的佛罗伦萨人，个个能读会写，就连辅机操作工都能吟诵几句但丁的诗；我们今天拥有的最好的意大利文手抄本，原出自佛罗伦萨工匠之手；在当时就能出版像布鲁内托·拉蒂尼《宝库》那样的通用百科全书；能做到这一切，基础在于佛罗伦萨人的坚强而健全的性格，而这样的性格又源于当时人们普遍参与公共事务，从事商业活动，四处旅行，全社会都谴责懒惰。据说，当时佛罗伦萨人到处受人尊敬，世界影响力很高，为此，还被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授予“第五元素”的光荣称号。然而，1400年后，人文主义迅速发展，在其巨大冲击之下，人们的天赋本能也就逐渐消失了。自那时起，人们仅仅依靠古典文化来解决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文学著作也因而沦为古代作品的引文。不仅如此，人文主义的冲击还导致市民自由的丧失，因为新学术的发展有赖于对权威的绝对服从，为了施行罗马法，只好以牺牲市民权利为代价，因而也就讨得了暴君们的欢心。

These charges will occupy us now and then at a later stage of our inquiry, when we shall attempt to reduce them to their true value, and to weigh the losses against the gains of this movement. For the present we must confine ourselves to showing how the civilization even of the vigorous fourteenth century necessarily prepared the way for the complete victory of humanism, and how precisely the greates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ational Italian spirit were themselves the men who opened wide the gate for the measureless devotion to antiquit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会经常引述以上这些人文主义弊端，归纳人文主义运动的真正价值，并衡量这一运动的得与失。当前我们能阐明的只是：即便是14世纪这样生机勃勃的文明，也如何必然地成了人文主义完胜之路的铺路石，以及意大利民族精神里最伟大的几位代表

人物，他们自身又是怎样成为开启15世纪全面复古大门的人的。

To begin with Dante. If a succession of men of equal genius had presided over Italian culture, whatever elements their natures might have absorbed from the antique, they still could not fail to retain a characteristic and strongly marked national stamp. But neither Italy nor Western Europe produced another Dante, and he was and remained the man who first thrust antiquity into the foreground of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Divine Comedy* he treats the ancient and the Christian worlds, not indeed as of equal authority, but as parallel to one another. Just as at an earlier period of the Middle Ages types and antitypes were sought in the history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so does Dante constantly bring together a Christian and a pagan illustration of the same fact.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the Christian cycle of history and legend was familiar, while the ancient was relatively unknown, was full of promise and of interest, and must necessarily have gained the upper hand in the competition for public sympathy when there was no longer a Dante to hold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先说但丁。那些曾经引领意大利文化发展的天才们，不论他们的天性从古典文化中吸收了哪些元素，他们身上都仍然保留了特色鲜明的民族烙印。不论意大利还是西欧各国，都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但丁，但丁是将古典文化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第一人。在《神曲》中，他认为古代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在权威性方面不是对等的，而是平行的。中世纪初，人们会分别从新旧约的历史中找寻预表和本体，同样，但丁也常常会分别从基督教和异教的角度对同一件事进行阐述。毕竟，人们对基督教所记载的历史和传说的始末比较熟悉，而对古代的记载知之甚少，因此，人们对基督教文化更感兴趣；如果没有一个像但丁这样的人来维持基督教世界和古代世界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那么，基督

教文化肯定更受公众欢迎。

Petrarch, who lives in the memory of most people nowadays chiefly as a great Italian poet, owed his fame among his contemporaries far rather to the fact that he was a kind of living representative of antiquity, that he imitated all styles of Latin poetry, endeavored by his voluminous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not to supplant but to make known the works of the ancients, and wrote letters that, as treatises on matters of antiquarian interest, obtained a reputation which to us is unintelligible, but which was natural enough in an age without handbooks.

彼特拉克在我们现代人心目中，主要是一个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的形象；而在同时代的人看来，彼特拉克能名扬遐迩，是因为他是古典文化在当世的代表人物，他模仿各种体裁的拉丁诗歌，力图通过其卷帙浩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让人们接触并了解古代著作，而非以等身的著作去取代它们。他写了不少关于古文物研究的文学作品，并因此获得了在我们今人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声誉。但试想在一个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时代里要研究古代文物，并将研究成果写成文学作品，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

It was the same with Boccaccio. For two centuries, when but little was known of the *Decameron* north of the Alps, he was famous all over Europe simply on account of his Latin compilations on mythology, geography and biography. One of these, *De genealogia deorum,* contains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books a remarkable appendix, in which he discusses the position of the then youthful humanism with regard to the age. We must not be misled by his

exclusive references to *poesia,* as closer observation shows that he means thereby the whole mental activity of the poet-scholars. This it is whose enemies he so vigorously combats—the frivolous ignoramuses who have no soul for anything but debauchery; the sophistical theologian, to whom Helicon, the Castalian fountain and the grove of Apollo were foolishness; the greedy lawyers, to whom poetry was a superfluity, since no money was to be made by it; finally the mendicant friars, described periphrastically, but clearly enough, who made free with their charges of paganism and immorality. Then follows the defence of poetry, the praise of it, and especially of the deeper and allegorical meanings which we must always attribute to it, and of that calculated obscurity which is intended to repel the dull minds of the ignorant.

薄伽丘跟彼特拉克的情况很相似。整整两百年，他的《十日谈》在阿尔卑斯山以北都还是少有人知，而他只是编纂了几部拉丁文的神话、地理和传记书就红遍了欧洲。《异教诸神谱系》就是其中的一部书。在该书第14和第15卷有一篇附录值得注意，他在里面讨论了那个时代的新人文主义的地位。书中他就“诗”展开了专门论述，但我们不能被这种“诗”所误导。通过细心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他所说的“诗”是指诗人学者的整个精神活动。书中他将矛头直指诗的敌人——那些只知纵情酒色，对任何事情都打不起精神来的蠢人；那些认为赫利孔山、卡斯塔利亚泉和阿波罗树林都可笑之至的诡辩神学家；那些因为诗歌不能创造财富就认为诗歌是个多余的东西的贪婪的法律家；最后，他还拐弯抹角地批评了那些随随便便就给诗歌扣上异教和不道德的罪名的化缘的托钵僧人。随后是为诗歌进行的辩护，对诗歌的赞扬，尤其是赞扬诗歌寓意深刻的特性，以及赞扬蓄意诗歌隐晦的写法——用以将那些思想迟钝的愚者排除在外。

And finally, with a clear reference to his own scholarly work,

the writer justifies the new relation in which his age stood to paganism. The case was wholly different, he pleads, when the early Church had to fight its way among the heathen. Now—praised be Jesus Christ!—true religion was strengthened, paganism destroyed, and the victorious Church in possession of the hostile camp. It was now possible to touch and study paganism almost *(fere)* without danger. This is the argument invariably used in later times to defend the Renaissance.

最后，作者在提及自己的学术著作时为当时教会与异教之间的新关系作了辩解。他辩称，那时的情况跟现在完全不同，早期的教会处境艰难，不得不与异教徒作斗争。而现在——让我们赞美耶稣基督吧！——真正的宗教已经站稳了脚跟，异教已经被摧毁，教会占领了敌人的堡垒，取得了胜利。现在要想接触并研究异端思想已经不存在什么危险了。在往后的时代里为文艺复兴运动作辩护时总是会用到这种论断。

There was thus a new cause in the world and a new class of men to maintain it. It is idle to ask if this cause ought not to have stopped short in its career of victory, to have restrained itself deliberately, and conceded the first place to purely national elements of culture. No conviction was more firmly rooted in the popular mind than that antiquity was the highest title to glory which Italy possessed.

因此，新兴阶级将发展人文主义视为一项新的事业。那么，这项事业该不该适可而止？人们该不该限制这项事业的发展？该不该让位于民族文化发展事业？这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们坚信，在意大利所拥有的荣誉中，古典文化是最高级的头衔。

There was a symbolical ceremony familiar to this generation of poet-scholars which lasted on into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though losing the higher sentiment which inspired it—the coronation of the poets with the laurel wreath. The origin of this custom in the Middle Ages is obscure, and the ritual of the ceremony never became fixed. It was a public demonstration, an outward and visible expression of literary enthusiasm, and naturally its form was variable. Dante, for instance, seems to have understood it in the sense of a half-religious consecration; he desired to assume the wreath in the baptistery of San Giovanni, where, like thousands of other Florentine children, he had received baptism. He could, says his biographer, have anywhere received the crown in virtue of his fame, but desired it nowhere but in his native city, and therefore died uncrowned. From the same source we learn that the usage was till then uncommon, and was held to be inherited by the ancient Romans from the Greeks. The most recent source to which the practices could be referred is to be found in the Capitoline contests of musicians, poets and other artists, founded by Domitian in imitation of the Greeks and celebrated every five years, which may possibly have survived for a time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but as few other men would venture to crown themselves, as Dante desired to do, the question arises, to whom did this office belong? Albertino Mussato was crowned at Padua in 1310 by the bishop and the 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the rector of which was then a Florentine (1341), and the municipal authorities of Rome, competed for the honor of crowning Petrarch. His self-elected examiner, King Robert of Anjou, would gladly have performed the ceremony at Naples, but Petrarch preferred to be crowned on the Capitol by the senator of Rome. This honor was long the highest object of ambition, and so it seemed to Jacobus Pizinga, an illustrious Sicilian magistrate. Then came the Italian

journey of Charles IV, whom it amused to flatter the vanity of ambitious men and impress the ignorant multitude by means of gorgeous ceremonies. Starting from the fiction that the coronation of poets was a prerogative of the old Roman emperors, and consequently was no less his own, he crowned (15 May 1355) the Florentine scholar Zanobi della Strada at Pisa, to the great disgust of Boccaccio, who declined to recognize this *'laurea Pisana'* as legitimate. Indeed, it might be fairly asked with what right this stranger, half Slavonic by birth, came to sit in judgement on the merits of Italian poets. But from henceforth the emperors crowned poets wherever they went on their travels; 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popes and other princes assumed the same right, till at last no regard whatever was paid to place or circumstances. In Rome, under Sixtus IV, the academy of Pomponius Laetus gave the wreath on its own authority. The Florentines had the good taste not to crown their famous humanists till after death. Carlo Aretino and Leonardo Aretino were thus crowned; the eulogy of the first was pronounced by Matteo Palmieri, of the latter by Giannozzo Manetti, before th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and the whole people, the orator standing at the head of the bier, on which the corpse lay clad in a silken robe. Carlo Aretino was further honored by a tomb in Santa Croce, which is among the most beautiful in the whole course of the Renaissance. [3_10]

桂冠加冕礼对诗人学者来说想必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一象征性典礼虽然已经不如当初那样高度鼓舞人心，却历经15、16世纪而未衰。关于这一中世纪制度，人们并不清楚它的起源，而它也从没有个固定不变的仪式。那是一种公开的证明，一种文学热情的外露，一种形式不定的节礼。例如，但丁似乎就是从半宗教的献祭仪式的角度去理解桂冠加冕礼；他跟其他千千万万名佛罗伦萨儿童一样，曾在圣乔瓦尼教堂的洗礼堂受洗过，他就希望能在那个洗礼堂接受桂冠。他的

传记作者说，本来，就凭他的名声，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得到桂冠，但他只渴望在家乡受冕，因而直到临终他都没有被加冕。我们从传记中还可以了解到，桂冠加冕在那时还不是很常见，当时人们认为，桂冠加冕礼是由古罗马人从古希腊人那儿继承过来的。桂冠加冕最晚可以追溯到图密善仿效希腊人所发起的卡比托利欧竞技会。这场五年一届的竞技大会汇聚了音乐家、诗人等艺术家纷纷上台竞技，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卡比托利欧竞技会仍然坚持举办了一段时间；不过在当时，还是有部分人想要争取这一桂冠，但丁就是其中的一位。那么问题就来了，桂冠加冕权究竟在谁手中？1310年，主教和巴黎大学校长于帕多瓦给阿尔伯蒂诺·莫莎图加冕。当时，出任巴黎大学校长的是一个佛罗伦萨人（1341年）。巴黎大学和罗马市政局争抢着给彼特拉克加冕的荣耀。安茹王朝国王罗伯特曾以彼特拉克的加冕人自居，他满心想在那不勒斯举行加冕礼，而彼特拉克却想在卡比托利欧山由罗马元老院议员为自己加冕。长期以来这项荣耀一直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著名的西西里地方长官雅各布斯·皮金加就是其中的一位。后来，查理四世出访意大利，他乐于迎合那些沽名钓誉者的虚荣心，并用豪华的加冕仪式打动了那些无知的群众。他认为，既然罗马皇帝拥有给诗人加冕的特权，那么自己也同样拥有这一特权，于是，他在比萨给佛罗伦萨学者扎诺比·德拉·斯特拉达加冕（1355年5月15日）；这件事让薄伽丘大为厌恶，他因此也拒绝承认“比萨桂冠”的合法性。人们确实可以义正词严地质问，这个半斯拉夫裔的外邦人凭什么能来评判意大利诗人的成就。然而，自那以后，事态却发展成皇帝们走到哪儿就给哪儿的诗人加冕；到了15世纪，教皇们和君主们也僭取了这一权利，最后，竟然发展成不顾地点不顾条件随意乱授。在罗马西斯科特四世的统治下，蓬波尼乌斯·拉埃图斯学院拥有桂冠加冕自主权。在佛罗伦萨，著名人文主义者一般在死后才获加冕。卡洛·阿雷蒂诺和列奥纳多·阿雷蒂诺就是死后才获加冕的；在他们的加冕仪式上，棺柩上安放着身着丝质礼服的遗体，马泰奥·帕尔米耶里（卡洛·阿雷蒂诺的致辞者）和詹诺佐·马内蒂（列奥纳多·阿雷蒂诺的致辞者）站在棺柩前，在市议会议员和全体到场人士面前致颂词。圣十字教堂曾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最美丽的教堂之一，卡洛·阿雷蒂诺的遗体就安葬在圣十字教堂内[4_10]。

Universities and Schools

大学和学校

The influence of antiquity on culture, of which we have now to speak, presupposes that the new learning had gained possession of the universities. This was so, but by no means to the extent and with the results which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我们现在不得不谈谈古典文明对意大利文化的影响，而这个影响是以新学已经掌控大学为前提的。当时大学发展的情形确实如此，不过发展程度和结果都没有达到当时人们可能有的期望。

Few of the Italian universities show themselves in their full vigor till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when the increase of wealth rendered a more systematic care for education possible. At first there were generally three sorts of professorships—one for civil law, another for canonical law, the third for medicine; in course of time professorships of rhetoric, of philosophy and of astronomy were added, the last commonly, though not always, identical with astrology. The salaries varied greatly in different cases. Sometimes a capital sum was paid down. With the spread of culture competition became so active that the different universities tried to entice away distinguished teachers from one another, under which circumstances Bologna is said to have sometimes devoted the half of its public income (20,000 ducats) to the university. The appointments were as a rule made only for a certain time, sometimes for only half a year, so that the teachers were forced to lead a wandering life, like actors. Appointments for life were,

however, not unknown. Sometimes the promise was exacted not to teach elsewhere what had already been taught at one place. There were also voluntary, unpaid professors.

直到13、14世纪，意大利的大学才完全展示出活力来。财富的增加使得对教育的系统化发展成为可能。起初，学校一般只开三门课——民法、教会法和医学；之后才逐渐开设了修辞学、哲学和天文学，在当时，天文学一般来说就是占星学，但也有例外。在不同情况下，教师薪金差别巨大。有时候要付给教师一大笔薪金。随着文化的发展，教育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各高校名师争夺战打得如火如荼。在这种情形下，据说博洛尼亚有时甚至拿出一半的财政收入（20,000达克特）用于办大学。教师的任期一般都很短，有时甚至只有半年，因此，教师们就跟演员一样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不过那时也有教师终身制。有时还要求教师承诺不在其他地方教授已经在某个地方讲过的知识。也有一些教师不拿薪金，义务教学。

Of the chairs which have been mentioned, that of rhetoric was especially sought by the humanist; yet it depended only on his familiarity with the matter of ancient learning whether or no he could aspire to those of law, medicine, philosophy or astronomy. The inward conditions of the science of the day were as variable as the outward conditions of the teacher. Certain jurists and physicians received by far the largest salaries of all, the former chiefly as consulting lawyers for the suits and claims of the state which employed them. In Padua a lawyer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received a salary of 1,000 ducats, and it was proposed to appoint a celebrated physician with a yearly payment of 2,000 ducats, and the right of private practice, the same man having previously received 700 gold florins at Pisa. When the jurist Bartolommeo Socini, professor at Pisa, accepted a Venetian appointment at

Padua, and was on the point of starting on his journey, he was arrested by the Florentine government and only released on payment of bail to the amount of 18,000 gold florins. The high estimation in which these branches of science were held makes it intelligible why distinguished philologists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law and medicine,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specialists were more and more compelled to acquire something of a wide literary culture. We shall presently have occasion to speak of the work of the humanists in other departments of practical life.

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几门课中，修辞学是人文主义者最想教授的；然而，他们能否教授法律、医学、哲学或是天文学课程，仅仅取决于他们是否熟悉关于那些科目领域的古代学说。在当时，课程教育质量跟教师薪酬待遇都不是很固定。律师和医生的收入远远超过其他人。律师主要供职于政府部门，提供诉讼和索赔案的法律咨询服务。15世纪时，在帕多瓦，一个律师的收入就高达1,000达克特。当时曾有人提议，以年薪2,000达克特高薪聘请一位知名的外科医生，并且他还能开私人诊所。那名外科医生之前在比萨的收入就只有700金弗罗林。比萨教授兼律师巴尔托洛梅奥·索奇尼在帕多瓦接受了一项威尼斯的职务，在他准备出发去威尼斯的时候，却被佛罗伦萨政府逮捕了，缴了18,000金弗罗林的保释金才获释。就当时社会对这些学科的重视程度来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知名语文学家们纷纷开始学法律、学医，而另一方面专家们又越来越被迫学习宽泛的文学文化知识了。我们再来谈谈人文主义者在其他领域都做些什么工作。

Nevertheless, the position of the philologists, as such, even where the salary was large and did not exclude other sources of income, was on the whole uncertain and temporary, so that one and the same teacher could be connected with a great variety of institutions. It is evident that change was desired for its own sake,

and something fresh expected from each newcomer, as was natural at a time when science was in the making, and consequently depended to no small degree on the personal influence of the teacher. Nor was it always the case that a lecturer on classical authors really belonged to the university of the town where he taught. Communication was so easy, and the supply of suitable accommodation, in monasteries and elsewhere, was so abundant, that a private undertaking was often practicable.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hen the University of Florence was at its greatest brilliance, when the courtiers of Eugenius IV and perhaps even of Martin V throngedthe lecture-rooms, when Carlo Aretino and Filelfo were competing for the largest audience, there existed, not only an almost complete university among the Augustinians of Santo Spirito, not only an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among the Camaldolesi of the Angeli, but individuals of mark, either singly or in common, arranged to provide philosophical and philological teaching for themselves and others. Linguistic and antiquarian studies in Rome had next to no connec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Sapienza), and depended almost exclusively either on the favor of individual popes and prelates, or on the appointments made in the papal chancery. It was not till Leo X (1513) that the great reorganization of the Sapienza took place, with its eighty-eight lecturers, among whom there were able men, though none of the first rank, at the head of the archeological department. But this new brilliancy was of short duration. We have already spoken briefly of the Greekprofessorships in Italy.

虽然语文学者薪金很高，而且还不排除其他收入来源，但总的来说，因为他们没有固定职业，所从事的只是临时性工作，所以他们往往可能跟多所学校之间有人事关系。对大学来说，它们就欢迎这种人事变动，也期待从新来的教师那里汲取一些新的知识；在那样一个时

代，科学正处于发展阶段，而科学成就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能力的高下，这样的人事变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比方说，一个讲授古典作家作品的讲师就未必属于他所讲学的那座城市的大学。由于修道院等地交通便利，还提供食宿，因而私人讲学之风逐渐兴起。15世纪的头几十年正是佛罗伦萨大学的全盛时期。那时，尤金四世甚至可能还有马丁五世的廷臣们全都挤在教室里面听讲，而卡洛·阿雷蒂诺和菲莱尔福也争着让自己的课成为最火爆的课。奥斯定会修士就在圣神教堂里办了一所近乎完整的大学；天使教堂的卡马尔多利会修士中也产生了一个学者协会；此外，还有很多知名人士，他们以个人名义或集体名义为自己或其他人开了哲学和文学讲座。而在罗马，语言学和古典文学的研究，却很少以大学为载体，它们几乎完全依赖教皇和主教的个人赞助，或依赖教廷的任命设立。直到利奥十世（1513年）时，大学才进行了大规模改组。改组后的大学由88名教师组成，其中考古系领导班子虽然并不是一流人才，却个个都很能干。但是，这种光辉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们之前就简要提到过希腊语教授在意大利的情况。

To form an accurate picture of the method of scientific instruction then pursued, we must turn away our eyes as far as possible from our present academic system. Personal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teachers and the taught, public disputations, the constant use of Latin and often of Greek, the frequent changes of lecturers and the scarcity of books, gave the studies of that time a color which we cannot represent to ourselves without effort.

为了对当时所推崇的科学教学法做一个准确的描述，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抛开我们现有的教学体制。师生关系、公开辩论、拉丁语和希腊语的频繁使用、教师的频繁更换、书籍资料的稀缺，所有这些给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There were Latin schools in every town of the least importance, not by any means merely as preparatory to higher education, but because, next to reading, writing and arithmetic, the knowledge of Latin was a necessity, and after Latin came logic. It is to be noted particularly that these schools did not depend on the Church, but on the municipality; some of them, too, were merely private enterprises.

那时，即便是小镇里也设有拉丁语学校，设立这些学校并不只是为高等教育做准备。这还因为，在当时人们看来，除了读、写、算这些基本技能以外，拉丁语也是必须掌握的，排在拉丁语之后的是逻辑学。有一点我们需要特别提一下，这些学校并不依存于教会，而是由市政当局开办的；不过，也有一些私立学校。

This school system, directed by a few distinguished humanists, not only attained a remarkable perfection of organization, but became an instru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modern sense of the phrase. With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ldren of two princely houses in North Italy institutions were connected which may be called unique of their kind.

在少数杰出的人文主义者的管理下，这种学校制度不仅在组织上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而且成了近代意义上的一种实行高等教育的手段。在这种学校制度中还有一种较为独特的学校，那种学校专门教授北意大利两族皇室子女。

At the court of Giovan Francesco Gonzaga at Mantua (reg. 1407-44) appeared the illustrious Vittorino da Feltre, one of those

men who devote their whole life to an object for which their natural gifts constitute a special vocation.

曼图亚的焦万·弗朗西斯科·贡扎加（1407-1444年摄政）的宫廷里曾出了一个叫维托里奥·达·费尔特的名人，在那些倾毕生精力于自己所擅长的事业的人当中，他算得上一个。

He directed the education of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princely house, and one of the latter became under his care a woman of learning. When his reputation extended far and wide over Italy, and members of great and wealthy families came from long distances, even from Germany, in search of his instructions, Gonzaga was not only willing that they should be received, but seems to have held it an honor for Mantua to be the chosen school of the aristocratic worl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gymnastics and all noble bodily exercises were treated along with scientific instruction as indispensable to a liberal education. Besides these pupils came others, whose instruction Vittorino probably held to be his highest earthly aim, the gifted poor, whom he supported in his house and educated, *per l'amore di Dio,* along with the high-born youths who here learned to live under the same roof with untitled genius. Gonzaga paid him a yearly salary of 300 gold florin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expenses caused by the poorer pupils. He knew that Vittorino never saved a penny for himself, and doubtless realized that the education of the poor was the unexpressed condition of his presence. The establishment was conducted on strictly religious lines, stricter indeed than many monasteries.

他给皇室子女讲学，其中一位姑娘就在他的培养下成了学者。当

时他扬名意大利各地，许多富豪贵绅的子弟远道而来，甚至还有从德意志过来的，愿列其门下受教。贡扎加不仅乐意接待他们，似乎还以曼图亚能选为贵族学校之都为荣。在这里，体育和所有高尚的体训，第一次和科学教育一起列为普通高等教育的必修科目。除了这些富家子弟外，还有一些天资聪慧的穷学生。维托里奥大概认为教这些学生便是他最高的现世目的；他让这些学生住在他家里，并从“爱上帝”的角度出发，让他们和贵族青年们一同接受教育。在这里，这些贵族青年也学会了和平民天才们同居共处。贡扎加每年付给他300金弗罗林的薪金，另外，还给贫困生发放补助金。他知道维托里奥不会给自己留下一分钱，并且毫无疑问，他已意识到，虽然维托里奥并未明说，但是让穷学生受教育是他来讲学的条件。贡扎加还为维托里奥和学生建了一所校舍，校舍严格按照宗教院校的模式修建，建筑要求甚至比很多修道院还要严格。

More stress was laid on pure scholarship by Guarino of Verona (1370-1460), who in the year 1429 was called to Ferrara by Niccolo d'Este to educate his son Lionello, and who, when his pupil was nearly grown up in 1436, began to teach at the university of eloquence and of the ancient languages. While still acting as tutor to Lionello, he had many other pupils from various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in his own house a select class of poor scholars, whom he partly or wholly supported. His evening hours till far into the night were devoted to hearing lessons or to instructive conversation. His house, too, was the home of a strict religion and morality.It signified little to him or to Vittorino that most of the humanists of their day deserved small praise in the matter of morals or religion. It is inconceivable how Guarino, with all the daily work which fell upon him, still found time to write translations from the Greek and voluminous original works.

维罗纳的格里诺（1370-1460）则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纯学术研究上。他在1429年受费拉拉侯爵尼科洛·德·埃斯特之聘，去教他的儿子廖内洛。1436年，在廖内洛快要成年的时候，他开始在大学里教授修辞学和古代语言。当年，除了给廖内洛讲课，他还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他在家里设了一间小班教室，供给那些穷学生部分或全部生活所需。他会一直工作到深夜，给学生温习功课或跟学生交流学习。在他的家里，学生们也同样得到了宗教和道德的熏陶。那时候，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在道德或宗教方面都少有建树，他和维托里奥却是例外。很难想象，格里诺在工作之余还能抽出时间来翻译希腊文和写作卷帙浩繁的作品。

Not only in these two courts, but generally throughout Italy, the education of the princely families was in part and for certain years in the hands of the humanists, who thereby mounted a step higher in the aristocratic world. The writing of treatises on the education of princes, formerly the business of theologians, fell now within their province.

多年来，皇室子女的教育事宜部分掌握在人文主义者的手中，不仅在这两个宫廷里，整个意大利亦无不如此。因此人文主义者在贵族社会中的地位又提高了一个台阶。关于皇室子女教育工作的论文写作以前都是神学家的事情，现在也落到他们的职权范围内了。

From the time of Pier Paolo Vergerio the Italian princes were well taken care of in this respect, and the custom was transplanted into Germany by Aeneas Sylvius, who addressed detailed exhortations to two young German princes of the House of Habsburg on the subject of their further education, in which they are both urged, as might be expected, to cultivate and nurture

humanism. Perhaps Aeneas was aware that in addressing these youths he was talking in the air, and therefore took measures to put his treatise into public circulation. But the relations of the humanists to the rulers will be discussed separately.

从皮耶尔·保罗·韦尔杰里奥那时候起，意大利君主们都得到了很好的教育，而这种教育风尚也由埃尼亚斯·西尔维于斯带到了德意志。他极力规劝哈布斯堡王室的两个年轻的德意志王子接受高等教育，尽可能地鼓励他们培育和发展人文主义。埃尼亚斯可能意识到这两个年轻人并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儿，于是，他便想办法公开发表了他的文章。关于人文主义者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另行讨论。

Propagators of Antiquity

古典文化的传播者

We have here first to speak of those citizens, mostly Florentines, who made antiquarian interests one of the chief objects of their lives, and who were themselves either distinguished scholars or else distinguished dilettanti who maintained the scholars. They were of peculiar significa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since it was in them that humanism first showed itself practically as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daily life. It was not till after this time that the popes and princes began seriously to occupy themselves with it.

在此，我们必须要先谈谈意大利的那些市民，其中主要是佛罗伦萨的市民。这些市民将古典文化研究当作自己毕生的主要目标之一，他们之中有人本身就是知名的学者，不然就是支持这些学者的知名文

艺爱好者。他们在15世纪初的过渡时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正是在他们身上人文主义首次体现出它实际上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在这之后，那些教皇们和君主们才开始认真地对待它。

Niccolo Niccoli and Giannozzo Manetti have been already spoken of more than once. Niccoli is described to us by Vespasiano as a man who would tolerate nothing around him out of harmony with his own classical spirit. His handsome long-robed figure, his kindly speech, his house adorned with the noblest remains of antiquity, made a singular impression. He was scrupulously cleanly in everything, most of all at table, where ancient vases and crystal goblets stood before him on the whitest linen. [3_11] The way in which he won over a pleasure-loving young Florentine to intellectual interests is too charming not to be here described. Piero de' Pazzi, son of a distinguished merchant, and himself destined to the same calling, fair to behold, and much given to the pleasures of the world, thought about anything rather than literature. One day, as he was passing the Palazzo del Podesta, Niccolo called the young man to him, and although they had never before exchanged a word, the youth obeyed the call of one so respected. Niccolo asked him who his father was. He answered, 'Messer Andrea de' Pazzi.' When he was further asked what his pursuit was, Piero replied, as young people are wont to do, 'I enjoy myself (*attendo a darmi buon tempo*). ' Niccolo said to him, 'As son of such a father, and so fair to look upon, it is a shame that thou knowest nothing of the Latin language, which would be so great an ornament to thee. If thou learnest it not, thou wilt be good for nothing, and as soon as the flower of youth is over, wilt be a man of no consequence (*virtu*).' When Piero heard this, he straightway perceived that it was true, and said that he would gladly take pains to learn, if only he had a teacher. Whereupon Niccolo answered that he would see to that.

And he found him a learned man for Latin and Greek, named Pontano, whom Piero treated as one of his own house, and to whom he paid 100 gold florins a year. Quitting all the pleasures in which he had hitherto lived, he studied day and night, and became a friend of all learned men and a noble-minded statesman. He learned by heart the whole *Aeneid* and many speeches of Livy, chiefly on the way between Florence and his country house at Trebbio. Antiquity was represented in another and higher sense by Giannozzo Manetti (1393-1459). Precocious from his first years, he was hardly more than a child when he had finished his apprenticeship in commerce, and became book-keeper in a bank. But soon the life he led seemed to him empty and perishable, and he began to yearn after science, through which alone man can secure immortality. He then busied himself with books as few laymen had done before him, and became, as has been said, one of the most profound scholars of his time. When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its representative magistrate and tax-collector at Pescia and Pistoia, he fulfilled his du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fty ideal with which his religious feeling and humanistic studies combined to inspire him. He succeeded in collecting the most unpopular taxes which the Florentine state imposed, and declined payment for his services. As provincial governor he refused all presents, abhorred all bribes, checked gambling, kept the country well supplied with corn,was indefatigable in settling lawsuits amicably, and did wonders in calming inflamed passions by his goodness. The Pistoiese were never able to discover to which of the two political parties he leaned. As if to symbolize the common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ll, he spent his leisure hours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which was preserved, bound in a purple cover, as a sacred relic in the town hall. When he took his leave the city presented him with a banner bearing the municipal arms and a splendid silver helmet.

前文中我们已不止一次提到了尼科洛·尼科利和詹诺佐·马内蒂。在维斯帕夏诺的描述中，尼科利是一个不能容忍周围事物与自己古典精神不协调的人。他长袍加身，修长俊美，谈吐不凡，温文尔雅，此外他还用最高贵的古典文物装饰自己的居所，这些都给人一种特别的印象。他对任何事物都要求保持清洁，在用餐的时候更甚——桌上铺着纯白的亚麻桌布，上面精心摆放着古代的花瓶和水晶高脚杯。[4_11]他引导一个追求享乐的佛罗伦萨青年对学问产生兴趣的方法十分有趣，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里加以叙述。皮耶罗·德·帕齐是一个著名商人的儿子，他也注定将继承父业。他生得漂亮，沉迷于世俗享乐，但对于文学却提不起一丁点兴趣来。有一天，皮耶罗·德·帕齐路过市政大厦时正好遇见了尼科洛，尼科洛把他叫到了面前。虽然两人之前从未交谈过，但是青年服从了这位十分可敬的长者的召唤。尼科洛问他父亲是谁，他回答说："安德烈亚·德·帕齐先生。"他又问青年的追求是什么，皮耶罗像普通年轻人常回答的那样说："及时行乐。"尼科洛对他说："你有这么出色的父亲，长得又这么帅气，拉丁语却一窍不通，真是丢人，拉丁语可以给你增添很多光彩的。要是不学，你将一事无成，待到花一般的青春年华耗尽，就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了。"皮耶罗一听此言觉得非常有道理，说要是能有一位老师的话，他很愿意努力学习。尼科洛回答说他会办好这件事。于是他给皮耶罗找了一个叫庞达诺的学者教他拉丁文和希腊文，皮耶罗视庞达诺如家人，还每年付给他100金弗罗林。皮耶罗放弃了之前的一切享乐，日夜攻读，广交有学问的人，成了一位思想高尚的政治家。他能够背诵《埃涅阿斯纪》全文和李维的许多演讲词，大部分都是在他往返佛罗伦萨和他在特莱比奥的乡间住宅的途中背下来的。古典文化的另一种更高层面意义上的代表是詹诺佐·马内蒂（1393-1459）。马内蒂天赋早现，商业学徒期满时还只是个孩子，在一家银行做簿记员。但很快这样的生活似乎就让他觉得空虚、过不下去了，于是他开始渴望做学问，因为只要有了学问人就能不朽。此后他埋首书山勤奋攻读，在他之前很少有俗世之人这么做过，如前所说，他成为了他那个时代最渊博的学者之一。被政府任命为驻佩夏和皮斯托亚的代理长官和税收官后，他根据宗教感情和人文主义研究的共同启示所赋予他的崇高理想

完成了使命。他成功地完成了佛罗伦萨王国所课的最不得人心的税收征收任务，并谢绝为自己的工作获取报酬。作为地方长官，他拒绝一切礼品馈赠，憎恶一切贿赂行为，查禁赌博，保证国家粮食供应充分，不知疲倦地以友好方式处理诉讼，并能奇迹般地以善良平息激愤。皮斯托亚人从来没能发现他在两个政党中偏向哪一个。似乎是为了象征大家共同的权利和利益，他利用闲暇时间来写这个城市的历史，写好的书用紫色封面装订起来，被作为神圣的文物保存于市政厅。他离任时，这个城市送给他一面绣有市徽的锦旗和一顶精美的银盔。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s to the learned citizens of Florence at this period the reader must all the more be referred to Vespasiano, [3_12] who knew them all personally, because the tone and atmosphere in which he writes, and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n which he mixed in their society, are of even more importance than the facts which he records. Even in a translation, and still more in the brief indications to which we are here compelled to limit ourselves, this chief merit of his book is lost. Without being a great writer, he was thoroughly familiar with the subject he wrote on, and had a deep sense of its intellectual significance.

读者如想进一步了解有关这个时期佛罗伦萨学者的情况，须多多参考对他们每个人都很了解的维斯帕夏诺 [4_12] 的著作，因为他的写作语气和风格，以及他跟他们相处时的关系和情形，甚至比他所记述的事实更加重要。即使是原文照翻，他著作的这个主要优点也会在字里行间失散，遑论我们在这里囿于篇幅所做的简短说明了。维斯帕夏诺并非伟大的作家，却对自己所写的题材烂熟于心，而且能深刻意识到这个题材的学术意义。

If we seek to analyze the charm which the Medici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especially Cosimo the Elder (d. 1464) 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d. 1492) exercised over Florence and over all their contemporaries, we shall find that it lay less in their political capacity than in their leadership in the culture of the age. A man in Cosimo's position—a great merchant and party leader, who also had on his side all the thinkers, writers and investigators, a man who was the first of the Florentines by birth and the first of the Italians by culture—such a man was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already a prince. To Cosimo belongs the special glory of recognizing in the Platonic philosophy the fairest flower of the ancient world of thought, of inspiring his friends with the same belief, and thus of fostering within humanistic circles themselves another and a higher resuscitation of antiquity. The story is known to us minutely. It all hangs on the calling of the learned Johannes Argyropulos, and on the personal enthusiasm of Cosimo himself in his last years, which was such that the great Marsilio Ficino could style himself, as far as Platonism was concerned, the spiritual son of Cosimo. Under Pietro Medici, Ficino was already at the head of a school; to him Pietro's son and Cosimo's grandson, the illustrious Lorenzo, came over from the Peripatetics. Among his most distinguished fellow-scholars were Bartolommeo Valori, Donato Acciaiuoli and Pierfilippo Pandolfini. The enthusiastic teacher declares in several passages of his writings that Lorenzo had sounded all the depths of the Platonic philosophy, and had uttered his conviction that without Plato it would be hard to be a good Christian or a good citizen. The famous band of scholars which surrounded Lorenzo was united together, and distinguished from all other circles of the kind, by this passion for a higher and idealistic philosophy. Only in such a world could a man like Pico della Mirandola feel happy. But perhaps the best thing of all that can be said about it is that, with all this worship of antiquity, Italian poetry found here a sacred refuge, and that of all

the rays of light which streamed from the circle of which Lorenzo was the center, none was more powerful than this. As a statesman, let each man judge him as he pleases; a foreigner will hesitate to pronounce what was due to human guilt and what to circumstances in the fate of Florence, but no more unjust charge was ever made than that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Lorenzo was the protector of mediocrity, that through his fault Leonardo da Vinci and the mathematician Fra Luca Paciolo lived abroad, and that Toscanella, Vespucci and others at least remained unsupported. He was not, indeed, a man of universal mind; but of all the great men who have striven to favor and promote spiritual interests, few certainly have been so many-sided, and in none probably was the inward need to do so equally deep.

如果我们要分析一下15世纪的美第奇家族，特别是老科西莫（卒于1464年）和伟大的洛伦佐（卒于1492年）这两人对于佛罗伦萨和他们同时代所有人所施加的吸引力，我们会发现这种吸引力并非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政治才能上，而主要在于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文化领袖。一个人要是处在科西莫的位置上——大商人兼党首，身边全是思想家、作家和研究者，论出身全佛罗伦萨第一，论教养整个意大利无双——这样一个人实际上已是君主了。认识到柏拉图哲学是古代思想界最美丽的花朵，[4_13] 并用同样的信念启发友人，从而在人文主义界内部推动另一种更高层面的古典文化复兴，这是属于科西莫的殊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都很清楚，[4_14] 这完全是靠着博学的约翰·阿尔吉罗波洛斯的号召和科西莫本人晚年时的个人热情才做到的，这种热情的感染力之甚，连伟大的马尔西利奥·费奇诺都自称是科西莫在柏拉图学说方面的精神传人。在彼得罗·美第奇执政期间，费奇诺已经是一个学派的领袖了；连彼得罗的儿子、科西莫的孙子，德高望重的洛伦佐，都从逍遥学派转投他门下。他最著名的同行学者有巴尔托洛梅奥·瓦洛里、多纳托·阿奇亚奥里和比埃尔菲利波·潘多尔菲尼等人。这位满腔热情的教师在其著述中用几段话宣称：洛伦佐不仅已经洞悉柏拉

图哲学的所有深奥之处，还说出了他的信念，即不了解柏拉图的思想就很难做一名好基督徒或是一个好公民。洛伦佐周围的那群著名学者由于此种对更高层次唯心主义哲学的热情而团结在了一起，与其他所有同类圈子迥然不同。只有在这样的领域里，像比科·德拉·米兰多拉这样的人才会感到幸福。但关于这一点，最值得一提的也许是，尽管这个圈子崇尚古典，意大利的诗歌却在这里找到了神圣的庇护所，而在这个以洛伦佐为中心的圈子里发出的所有光芒中，没有哪一道比这道光芒更强烈了。要是把洛伦佐视为政治家，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对他做出评判；外国人会难以断言，佛罗伦萨的命运有哪些是人的罪过造成的，哪些是客观形势导致的，但没有比以下针对他的指责更不公平的了，即认为在文化领域洛伦佐是庸才的保护者，因他的过错才导致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数学家卢卡·帕西奥利修士侨居国外，以及托斯卡内拉[4_15]、韦斯普奇[4_16]等人至少一直没能得到应有的支持。的确，他不是一个有普世头脑的人；但在所有那些致力于支持和推动精神领域研究兴趣的伟大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多面开花，大概也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一样是出自内心需要而把每个方面都钻研得如此之深。

The age in which we live is loud enough in proclaiming the worth of culture, and especially of the culture of antiquity. But the enthusiastic devotion to it,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need of it is the first and greatest of all needs, i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such a degree as among the Florentines of the fifteenth and the early part of the sixteenth centuries. On this point we have indirect proof which precludes all doubt. It would not have been so common to give the daughters of the house a share in the same studies, had they not been held to be the noblest of earthly pursuits; exile would not have been turned into a happy retreat, as was done by Palla Strozzi; nor would men who indulged in every conceivable excess have retained the strength and the spirit to write critical treatises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Pliny like Filippo Strozzi. Our business

here is not to deal out either praise or blame, but to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the age in all its vigorous individuality.

我们的这个时代已经高声宣告了文化的价值，并特别肯定了古代文化的价值。但是对古代文化如此热诚崇奉，把对它的肯定看作所有需求中的重中之重，这种情况也只有在15世纪和16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才能找到。在这一点上我们拥有足以打消一切怀疑的间接证据。美第奇家族如果不是认为古典文化学习是世间最高贵的事业，就不会经常让他们的女儿参加同样的学习；人们也就不会像帕拉·斯特罗齐[4_17]那样，把放逐看作是一种可喜的隐退；沉湎于各种可以想象的放纵中的人们也不会像菲利波·斯特罗齐[4_18]那样，留了力气和精神来写关于普林尼《自然史》的评论文章。我们在此并非要褒贬谁，而是要在这些精力充沛的人物身上来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

Besides Florence, there were many cities of Italy where individuals and social circles devoted all their energies to the support of humanism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scholars who lived among them.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at period is full of references to personal relations of this kind. The feeling of the instructed classes set strongly and almost exclusively in this direction.

除了佛罗伦萨外，还有很多意大利城市，在那里，不论个人还是社会团体都曾全力以赴地支持人文主义并保护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学者。当时的通信中充满了关于这类私人关系的叙述。受教育阶层的感情尤为强烈，几乎专门投身于这种行动。

But it is now time to speak of humanism at the Italian courts. The natural alliance between the despot and the scholar, each

relying solely on his personal talent, has already been touched upon; that the latter should avowedly prefer the princely courts to the free cities was only to be expected from the higher pay which they there received. At a time when the great Alfonso of Aragon seemed likely to become master of all Italy, Aeneas Sylvius wrote to another citizen of Siena: 'I had rather that Italy attained peace under his rule than under that of the free cities, for kingly generosity rewards excellence of every kind.' Too much stress has latterly been laid on the unworthy side of this relation, and the mercenary flattery to which it gave rise, just as formerly the eulogies of the humanists led to a too favorable judgement on their patrons. Taking all things together, it is greatly to the honor of the latter that they felt bound to place themselves at the head of the culture of their age and country, one-sided though this culture was. In some of the popes, the fearlessness of the consequences to which the new learning might lead strikes us as something truly, but unconsciously, imposing. Nicholas V was confident of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since thousands of learned men supported her. Pius II was far from making such splendid sacrifices for humanism as were made by Nicholas, and the poets who frequented his court were few in number; but he himself was much more the personal head of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than his predecessor, and enjoyed his position without the least misgiving. Paul II was the first to dread and mistrust the culture of his secretaries, and his three successors, Sixtus, Innocent and Alexander, accepted dedications and allowed themselves to be sung to the hearts' content of the poets—there even existed a *Borgiad,* probably in hexameters—but were too busy elsewhere, and too occupied in seeking other foundations for their power, to trouble themselves much about the poet-scholars. Julius II found poets to eulogize him, because he himself was no mean subject for poetry, but he does not seem to have troubled himself much about them. He was followed by Leo X, 'as Romulus by Numa'

—in other words, after the warlike turmoil of the first pontificate, a new one was hoped for wholly given to the muses. The enjoyment of elegant Latin prose and melodious verse was part of the programme of Leo's life, and his patronage certainly had the result that his Latin poets have left us a living picture of that joyous and brilliant spirit of the Leonine days, with which the biography of Jovius is filled, in countless epigrams, elegies, odes and orations. Probably in all European history there is no prince who, in proportion to the few striking events of his life, has received such manifold homage. The poets had access to him chiefly about noon, when the musicians had ceased playing; but one of the best among them tells us how they also pursued him when he walked in his garden or withdrew to the privacy of his chamber, and if they failed to catch him there, would try to win him with a mendicant ode or elegy, filled, as usual, with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Olympus. For Leo, prodigal of his money, and disliking to be surrounded by any but cheerful faces, displayed a generosity in his gifts which was fabulously exaggerated in the hard times that followed. His reorganization of the Sapienza has already been spoken of. In order not to underrate Leo's influence on humanism we must guard against being misled by the toy-work that was mixed up with it, and must not allow ourselves to be deceived by the apparent irony with which he himself sometimes treated these matters. Our judgement must rather dwell on the countless spiritual possibilities which are included in the word 'stimulus', and which, although they cannot be measured as a whole, can still, on closer study, be actually followed out in particular cases. Whatever influence in Europe the Italian humanists have had since 1520 depends in some way or other on the impulse which was given by Leo. He was the pope who, in granting permission to print the newly found Tacitus, could say that the great writers were a rule of life and a consolation in misfortune; that helping learned men and obtaining excellent books had ever

been one of his highest aims; and that he now thanked heaven that he could benefit the human race by further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但现在该谈一谈意大利宫廷里的人文主义思想了。君主与学者之间惟才是举的自然结盟，前文已作探讨；而后者公开宣称青睐君王宫廷更甚于自由城邦，原因只可能是他们在宫廷里得到的报酬更高一些。在阿拉贡王朝的大阿方索有望一统整个意大利的时候，埃尼亚斯·西尔维于斯有一次写信给另一个锡耶纳的市民说："我宁愿意大利是在他的统治之下而不是在自由城邦的统治下获得和平，因为国君的慷慨就是对各种卓越成就的回报。"最近一直都在过分强调此种关系的不光彩的一面，以及由其引发的以金钱为目的的阿谀奉承，就像以前人文主义者写的颂辞最后沦为替赞助人歌功颂德一样。总而言之，令人文主义者倍感荣幸的是，他们觉得必须把自己置于时代和国家文化引领者的地位，哪怕这种文化是片面的。某些教皇对于新学术研究可能产生的后果抱着大无畏的态度，着实令我们不由得为之感动，且自然而然认可其伟大。尼古拉五世对于教会的前途抱有信心，因为有成千上万的学者支持教会。庇护二世对人文主义可就远不如尼古拉那样贡献卓著了，因而经常访问他宫廷的诗人也寥寥无几；不过他本人比他的前任更加身体力行地成了文坛的领袖，而且内心毫无不安地享受着这样的地位。保罗二世是第一位对手下书记官们的教养感到不安和怀疑的教皇，他的三位继任者西斯科特、因诺森特和亚历山大则接受下属的献词，允许诗人们尽情歌颂他们——甚至还有过一首《波吉亚特》，可能是用六步韵体写的——但这几位教皇都在忙其他事情，成天都在为自己的权力寻找其他支持，没有工夫自找麻烦来管诗人学者们的事情。朱利叶斯二世找了几个诗人来为他写颂歌，因为他本人确实是个很好的诗歌题材，不过他似乎并不怎么在意他们。朱利叶斯二世的继任者是利奥十世，"就像罗慕路斯的继任者是努马"[4_19]——换言之，经过第一任教皇统治期间的战乱之后，人们希望换一位致力于文艺的新教皇。欣赏优美的拉丁散文和悦耳的诗篇成为利奥教皇生活的一部分内容，而他的赞助所带来的结果无疑是，他的那些拉丁诗

人们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利奥时代的兴高采烈、精神焕发的生动图景，尤维乌斯的传记里有无数短诗、挽歌、颂歌和演讲词都洋溢着这样的精神。在整个欧洲历史上可能没有一位君主一生没做几件了不起的大事却收获了这么多的敬意。诗人们多数都是在中午时分乐师们停止演奏之后才能接近他；但其中最优秀的一位诗人告诉我们，他们趁利奥十世在花园散步或回房独处时也找到过他，要是两处都找不到，他们就会写一首乞求的颂歌或哀歌来赢得他的召见，作品内容照例全是奥林匹斯山诸神。因为利奥挥金如土，而且不喜欢被愁眉苦脸的人围着，所以在馈赠上表现得慷慨大方，而这样的慷慨在接下来的艰难时世里被难以置信地夸大了。他对罗马大学的改组前面已经讲过。为了不低估利奥对人文主义的影响，我们必须谨防被混杂于其中的滑稽作品误导，也决不能被他有时候针对这些事情所说的明显的反话所欺骗。我们的判断必须聚焦于包含在“刺激”一词中的精神上的无数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尽管无法整体衡量，但仔细研究的话，仍然可以在具体案例中贯彻实施。自1520年以来，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不管在欧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某些方面都依靠了利奥的推动。他是在批准印行新发现的塔西佗著作时能够说出以下这番话的教皇：伟大的作家是生活规则与苦难慰藉这二者的结合；帮助有学问的人和获得好书一直都是他的最高目标之一；他现在要感谢上天使他得以通过促成这部书的出版造福人类。

The sack of Rome in the year 1527 scattered the scholars no less than the artists in every direction, and spread the fame of the great departed Maecenas to the farthest boundaries of Italy.

1527年罗马遭到洗劫，学者和艺术家们流离四方，也把伟大的先贤梅塞纳斯 [4_20] 的声誉传播到了意大利最远的边境。

Among the secular prince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none

displayed such enthusiasm for antiquity as Alfonso the Great of Aragon, King of Naples. It appears that his zeal was thoroughly unaffected, and that the monuments and writings of the ancient world made upon him, from the time of his arrival in Italy, an impression deep and powerful enough to reshape his life. With strange readiness he surrendered the stubborn Aragon to his brother, and devoted himself wholly to his new possessions. He had in his service, either successively or together, George of Trebizond, the younger Chrysoloras, Lorenzo Valla, Bartolommeo Facio and Antonio Panormita, of whom the two latter were his historians; Panormita daily instructed the king and his court in Livy, even during military expeditions. These men cost him yearly 20,000 gold florins. He gave Panormita 1,000 for his work. Facio received for the *Historia Alfonsi,* besides a yearly income of 500 ducats, a present of 1,500 more when it was finished, with the words, 'It is not given to pay you, for your work would not be paid for if I gave you the fairest of my cities; but in time I hope to satisfy you.' When he took Giannozzo Manetti as his secretary on the most brilliant conditions, he said to him, 'My last crust I will share with you.' When Giannozzo first came to bring the congratulations of the Florentine government on the marriage of Prince Ferrante, the impression he made was so great that the king sat motionless on the throne, 'like a brazen statue, and did not even brush away a fly, which had settled on his nos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ration'. His favorite haunt seems to have been the library of the castle at Naples, where he would sit at a window overlooking the bay, and listen to learned debates on the Trinity. For he was profoundly religious, and had the Bible, as well as Livy and Seneca, read to him, till after fourteen perusals he knew it almost by heart.Who can fully understand the feeling with which he regarded the supposititious remains of Livy at Padua? When, by dint of great entreaties, he obtained an arm-bone of the skeleton from the Venetians, and received it with solemn

pomp at Naples, how strangely Christian and pagan sentiment must have been blended in his heart! During a campaign in the Abruzzi, when the distant Sulmona, the birthplace of Ovid, was pointed out to him, he saluted the spot and returned thanks to its tutelary genius. It gladdened him to make good the prophecy of the great poet as to his future fame. Once indeed, at his famous entry into the conquered city of Naples (1443), he himself chose to appear before the world in ancient style. Not far from the market a breach forty ells wide was made in the wall, and through this he drove in a gilded chariot like a Roman *triumphator*. [3_13] The memory of the scene is preserved by a noble triumphal arch of marble in the Castel Nuovo. His Neapolitan successors inherited as little of this passion for antiquity as of his other good qualities.

在15世纪的世俗君主中，没有一个像那不勒斯国王、阿拉贡王朝的阿方索大帝那样对古典文化如此热情洋溢。看起来，他的热情毫不矫揉造作，从他到达意大利的那一刻起，古代世界的遗迹和著作就给他留下了深刻有力的印象，足以重塑他的生活。他以不可思议的乐意态度，把棘手的阿拉贡王朝拱手让给了他的兄弟，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他的新家当里去了。他先后或同时任用过特拉比松的乔治、小赫里索洛拉斯、洛伦佐·瓦拉、巴尔托洛梅奥·法奇奥和安东尼奥·帕诺尔密达等人，其中后两者是他的史官；帕诺尔密达每天要给国王和他的廷臣讲授李维的著作，甚至远征打仗期间也不间断。这些人每年要耗去他20,000金弗罗林的费用。他为帕诺尔密塔的著作付给他1,000金弗罗林。法奇奥写《阿方索传》时每年有500达克特的收入，完成后还得到了一笔1,500达克特的奖金，以及赠言："这不是给你的报酬，因为即使我把我最美丽的城市送给你，也不足以作为你作品的报酬；但我希望最终能让你满意。"他以最优厚的条件任命詹诺佐·马内蒂做他的书记官时，对詹诺佐说："我的最后一块面包皮都会与你分享。"詹诺佐第一次带来佛罗伦萨政府对费兰特国君大婚的祝贺时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国王坐在宝座上一动不动，"像一尊黄铜雕塑一般，甚至

连演讲开始时就停在他鼻子上的一只苍蝇都顾不上赶”。阿方索大帝似乎喜欢常去那不勒斯宫城里的图书馆，他常坐在那儿的一扇窗前眺望远处的海湾，并聆听关于三位一体的学术辩论。因为大阿方索笃信宗教，所以他命人像为他读李维和塞涅卡的作品时那样读圣经，一直到读了14遍他几乎能背诵下来时才停止。有谁能够完全理解他对帕多瓦城内李维假遗体的那种敬重之情呢？当他苦苦恳求才从威尼斯人那里得到骨架的一块臂骨，并在那不勒斯举行了隆重的接受仪式时，基督教和异教的感情在他心中该是多么奇怪地糅合在一起的啊！在阿布鲁齐的一场战役期间，当有人把远处的苏尔莫纳，即奥维德的出生地，指给他看时，他当即面向那个地方敬礼并向其守护神致谢。这位伟大的诗人曾预言大阿方索将获得荣誉，他为能实现这个预言而感到高兴。在他举世闻名的那不勒斯入城仪式上（1443年），大阿方索确实曾选择以复古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人们在离市场不远的城墙上开了一个四十埃尔 [4_21] 宽的豁口，他像一个罗马的胜利者一样坐在镀金的战车上，通过这个豁口驶入城内。 [4_22] 为了纪念这个场面，人们在新堡建立了一个壮丽的大理石凯旋门。正如没有继承他的其他优秀品质一样，大阿方索那不勒斯的继承者们对于这种向往古代文化的热情并没有继承多少。

Alfonso was far surpassed in learning by Federigo of Urbino, who had but few courtiers around him, squandered nothing, and in his appropriation of antiquity, as in all other things, went to work considerately. It was for him and for Nicholas V that most of the translations from the Greek, and a number of the best commentaries and other such works, were written. He spent much on the scholars whose services he used, but spent it to good purpose. There were no traces of the official poet at Urbino, where the duke himself was the most learned in the whole court. Classical antiquity, indeed, only formed a part of his culture. An accomplished ruler, captain and gentleman, he had mastere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cience of the day, and this with a view to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s a

theologian, he was able to compare Scotus with Aquinas, and was familiar with the writings of the old fathers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hurches, the former in Latin translations. In philosophy, he seems to have left Plato altogether to his contemporary Cosimo, but he knew thoroughly not only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Aristotle but the *Physics* and some other works. The rest of his reading lay chiefly among the ancient historians, all of whom he possessed; these, and not the poets, 'he was always reading and having read to him'.

乌尔比诺的费德里戈在学术上的建树远超阿方索。费德里戈周围只有少数廷臣，他从不铺张浪费，而他对古典文化的拨款也同对待其他事情一样进行过深思熟虑。大多数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作品和一些最好的注释本连同其他这一类的著作都是为他和尼古拉五世而作的。费德里戈在侍从他左右的学者身上花了不少钱，但这些钱花得很有意义。在乌尔比诺找不出公认的诗人来，但在整个宫廷中，大公本人就是最有学问的人。实在来说，古典文化只是他文化教养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有才学的君主、统帅和绅士，费德里戈已经掌握了当时的大部分学问并且是以实际应用为目的的。作为一个神学家，费德里戈能够把斯科特斯 [4_23] 和阿奎那作比较，并熟悉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的教父著作，而东方教会教父著作他是通过拉丁文的译本熟悉的。在哲学上，他似乎是把柏拉图完全留给了和他同时代的科西莫，但是费德里戈不仅完全懂得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而且也懂得他的《物理学》和其他一些著作。其余他所读的书主要是他收藏的所有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这是“他经常自己读并让别人念给他听”的那些书，而非那些诗人的作品。

The Sforza, too, were all of them men of more or less learning and patrons of literature; they have been already referred to in passing. Duke Francesco probably looked on humanistic culture as a

matter of course in the education of his children, if only for political reasons. It was felt universally to be an advantage if the prince could mix with the most instructed men of his time on an equal footing. Lodovico il Moro, himself an excellent Latin scholar, showed an interest in intellectual matters which extended far beyond classical antiquity.

斯福尔扎家族 [4_24] 或多或少也算是学问人和文学赞助人，我们之前已顺带提到过他们。即使仅仅是为了政治上的理由，弗朗西斯科大公大概也会把人文主义的文化看作子女教育中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如果这位君主能够在平等的地位上与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交游，那么这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有利条件。而“摩罗”洛多维科·斯福尔扎本人就是一个卓越的拉丁学者，他在学术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兴趣已经远远超过了古典文化的范围。

Even the petty despots strove after similar distinctions, and we do them injustice by thinking that they only supported the scholars at their courts as a means of diffusing their own fame. A ruler like Borso of Ferrara, with all his vanity, seems by no means to have looked for immortality from the poets, eager as they were to propitiate him with a *Borseid* and the like. He had far too proud a sense of his own position as a ruler for that. But intercourse with learned men, interest in antiquarian matters, and the passion for elegant Latin correspondence were necessities for the princes of that age. What bitter complaints are those of Duke Alfonso, competent as he was in practical matters, that his weakliness in youth had forced him to seek recreation in manual pursuits only! Or was this merely an excuse to keep the humanists at a distance? A nature like his was not intelligible even to contemporaries.

甚至就连那些小君主们也在追求同样的荣誉，如果我们认为他们在宫廷中维持一批学者只是为了传播自己的声誉，那么我们的这种评价是不公正的。虽然费拉拉的君主博尔索喜好虚荣，但他似乎从没想过要通过诗人使自己的名声不朽，尽管如此，诗人们还是急切地想用《博尔索诗》 [4_25] 等这类著作来取悦这位君主。博尔索很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君主的高贵地位，所以他并不屑接受这些。但是和博学者交流，对古代研究倾注兴趣并热爱优美的拉丁文书信对于当时的君主是十分必要的。在一切实际问题上非常能干的阿方索大公，曾经因为他年轻时身体虚弱而不得不只从体力活动中寻求消遣，他为此该留下多么大的遗憾啊！或者说这纯粹是他与人文主义者保持一定距离的借口？即使是与他同时代的人也很难理解他那样的性格。

Even the most insignificant despots of Romagna found it hard to do without one or two men of letters about them. The tutor and secretary were often one and the same person, who sometimes, indeed, acted as a kind of court factotum. We are apt to treat the small scale of these courts as a reason for dismissing them with a too ready contempt, forgetting that the highest spiritual things are not precisely matters of measurement.

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罗马涅地区的君主们也认为若没有一两个文学之士在身边就不好办事。教师和秘书往往是同一个人，实际上这个人有时也兼任宫廷执事。我们总把这些宫廷的规模太小当作借口而以一种断然轻蔑的态度草草提及一下，却忘记了最高尚的精神事业与规模的大小无关。

Life and manners at the court of Rimini must have been a singular spectacle under the bold pagan *condottiere* Sigismondo Malatesta. He had a number of scholars around him, some of whom

he provided for liberally, even giving them landed estates, while others earned at least a livelihood as officers in his army. In his citadel—*arx Sismundea* —they used to hold discussions, often of a very venomous kin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rex',* as they termed him. In their Latin poems they sing his praises and celebrate his amour with the fair Isotta, in whose honor and as whose monument the famous rebuilding of San Francesco at Rimini took place—*'Divae Isottae Sacrum.'* When the humanists themselves came to die, they were laid in or under the sarcophagi with which the niches of the outside walls of the church were adorned, with an inscription testifying that they were laid here at the time when Sigismundus, the son of Pandulfus, ruled. [3_14] It is hard for us nowadays to believe that a monster like this prince felt learning and the friendship of cultivated people to be a necessity of life; and yet the man who excommunicated him, made war upon him and burnt him in effigy, Pope Pius II, says: 'Sigismund knew history and had a great store of philosophy; he seemed born to all that he undertook.'

在豪放不羁的异教雇佣军队长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的统治之下，里米尼宫廷的生活和作风必然另有一番景象。他周围有很多学者，其中有几个受到了他优厚的待遇，有人甚至还收到了他赠予的庄园，而另外一些人则起码与他军队中的将校们有同样的生活水准。在西吉斯蒙多的城堡——“西斯蒙底亚城寨”里，学者们经常在这位他们称之为“国王”的人面前进行辩论，辩论的内容往往很恶毒。学者们通过写拉丁文诗篇歌颂他，并赞扬他和美人伊索塔的情事，而为了尊重和纪念伊索塔，西吉斯蒙多命人在里米尼进行了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重建，这个工程十分有名，而此教堂又被人们称作“圣妇伊索塔教堂”。当这些学者去世时，他们会被安放在用来装饰教堂外墙的壁龛的石棺里面或下面，石棺表面刻上字迹表明他们是在潘德尔夫斯的儿子西吉斯蒙多统治时期被安葬在这里的。 [4_26] 今天我们很难相信，像这样一位残忍的君主竟然能够觉察到学术以及同有教养的人交往是

生活中的必需品；而把他逐出教会、向他开战并焚烧他雕像的教皇庇护二世也评价他说："西吉斯蒙多知晓历史并懂得不少哲学知识，他好像是生而能有所作为似的。"

Reproduction of Antiquity: Letter-Writing and Latin Speeches

古典文化的复制：书信与拉丁文演讲

There were two purposes, however, for which the humanist was as indispensable to the republics as to princes or popes, namely, the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state, and the making of speeches on public and solemn occasions.

不管怎样，不论对于共和国或是君主或是教皇，人文主义者之所以能够成为必不可少之人是因为他们有两项用途，即为国家草拟公函和在公开而庄严的场合担任演讲人。

Not only was the secretary required to be a competent Latinist, but conversely, only a humanist was credited with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y necessary for the post of secretary. And thus the greatest men in the sphere of science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mostly devoted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ir lives to serve the state in this capacity. No importance was attached to a man's home or origin. Of the four great Florentine secretaries who filled the office between 1427 and 1465, three belonged to the subject city of Arezzo, namely, Leonardo (Bruni), Carlo (Marzuppini) and Benedetto Accolti; Poggio was from Terra Nuova, also in Florentine territory. For a long period, indeed, many of the highest officers of state were on principle given to foreigners. Leonardo, Poggio and Giannozzo

Manetti were at one time or another private secretaries to the popes, and Carlo Aretino was to have been so. Blondus of Forli, and, in spite of everything, at last even Lorenzo Valla, [3_15] filled the same office. From the time of Nicholas V and Pius II onwards, the papal chancery continued more and more to attract the ablest men, and this was still the case even under the last pope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little as they cared for letters. In Platina's *History of the Popes,* the life of Paul II is a charming piece of vengeance taken by a humanist on the one pope who did not know how to behave to his chancery—to that circle 'of poets and orators who bestowed on the papal court as much glory as they received from it'. It is delightful to see the indignation of these haughty gentlemen,when some squabble about precedence happened, when, for instance, the *advocati consistoriales* claimed equal or superior rank to theirs. The Apostle John, to whom the *secreta cœlestia* were revealed; the secretary of Porsenna, whom Mucius Scaevola mistook for the king; Maecenas, who was private secretary to Augustus; the archbishops, who in Germany were called chancellors—are all appealed to in turn.

不仅做书记官的人必须是称职的拉丁文学者，而且反过来说，人们相信只有人文主义者才具有书记官职位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因此，15世纪时知识界最伟大的人物们大都以这样的能力将一生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时间用于服务国家。人们并不看重一个人的家庭或出身。1427到1465年间，四位在佛罗伦萨任职的知名秘书官中有三位是属于阿雷佐这个附庸城市的，他们是列奥纳多（布鲁尼）、卡洛（马尔苏比尼）和贝内代托·阿科尔蒂；而波焦是特拉诺瓦人，也在佛罗伦萨的领土内。的确，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国家的许多高级官员原则上是由外国人担任的。列奥纳多、波焦和詹诺佐·马内蒂曾先后担任过教皇的私人秘书，卡洛·阿雷蒂诺也担任过这个职务。而弗利的布朗德斯，乃至洛伦佐·瓦拉（虽经种种曲折） [4_27] 最后也担任了同样的职务。

自从尼古拉五世和庇护二世时代以来，教皇的秘书厅愈加不断吸引着一批最能干的人物，尽管15世纪的最后几个教皇并不大重视文学，但在他们的任期内情况也依然如此。在普拉蒂纳的《教皇史》中，保罗二世的传记是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作者是一位人文主义者，意在对教皇进行报复，因为这位教皇不懂得如何对待他的办事处——那个“由诗人和演说家组成，给予教廷的光荣并不亚于得自教廷的光荣的集团”。当发生某些席次之争时，例如，当“御前会议的辩护人”要求和书记官们具有平等或更高的地位时，看看这些目中无人的先生们的愤怒是件有趣的事情。得到过“天廷秘密”启示的使徒约翰、被穆奇乌斯·司凯沃拉误当成国王的波尔森纳的书记官、给奥古斯都做过私人秘书的梅塞纳斯以及在德意志被称为大臣的大主教们都依次受到过这样的吁请。

> The apostolic secretaries have the most weighty business of the world in their hands. For who but they decide on matters of the Catholic faith, who else combat heresy, re-establish peace, and mediate between great monarchs; who but they write the statistical accounts of Christendom? It is they who astonish kings, princes and nations by what comes forth from the pope. They write commands and instructions for the legates, and receive their orders only from the pope, on whom they wait day and night.

> 教廷的秘书们掌握着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除了他们，有谁能决定天主教的信仰问题呢？又有谁能够和异端邪说作战，恢复和平并在强大的君主国家之间进行调停呢？除了他们，还有谁能够对基督教界的事情做统计学的记载呢？是他们以教皇的名义令那

些国王、王公和国家感到震惊。他们为教皇使节草拟
训令和指示，朝夕侍从教皇左右，只听令于他一人。

But the highest summit of glory was only attained by the two famous secretaries and stylists of Leo X: Pietro Bembo and Jacopo Sadoleto.

不过，达到这种光荣最高峰的只有彼得罗·本博和雅各布·萨多莱托两人，他们都是利奥十世的两个著名秘书兼文章大家。

All the chanceries did not turn out equally elegant documents. A leathern official style, in the impurest of Latin, was very common. In the Milanese documents preserved by Corio there is a remarkable contrast between this sort of composition and the few letters written by members of the princely house, which must have been written, too, in moment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They are models of pure Latinity. To maintain a faultless style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was a rule of good breeding, and a result of habit.

但并不是所有的秘书厅都能写出同样优美的文章来。用最不纯正的拉丁文写出来的拙劣官样文章是常有的事。在科里奥所保存的米兰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这种文章和少数君主家族成员所写信件之间有显著的不同。出自这些少数君主家族成员之手的信件一定也是在最紧要的时刻所写，但它们却是纯洁拉丁文法的典范。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够保持完美的文体是良好教育的一个准则，同时也是习惯修养的结果。

The letters of Cicero, Pliny and others were at this time

diligently studied as models. As early as the fifteenth century a mass of forms and instructions for Latin correspondence had appeared, as accessory to the great grammatical and lexicographic works, the mass of which is astounding to us even now when we look at them in the libraries. But just as the existence of these helps tempted many to undertake a task to which they had no vocation, so were the really capable men stimulated to a more faultless excellence, till at length the letters of Politian,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ose of Pietro Bembo, appeared, and took their place as unrivaled masterpieces, not only of Latin style in general, but also of the more special art of letter-writing.

在这一时期，西塞罗、普林尼等人的书信被人当作典范加以勤勉地学习。早在15世纪，关于拉丁文书信形式和说明的著作就已经作为大部头的文法书和辞书的附录而大量出现；即使今天我们在图书馆里看到这批著作，也会为其数量之巨而感到惊讶。但是，正是这些参考书吸引了很多人去从事他们并不适合的工作，它们也鼓励了真正有能力的人写出更加完美的优秀作品来，直至最后出现了波利提安以及16世纪初彼得罗·本博的书信。他们二人的书信不仅在一般的拉丁文体上，而且也在更特殊的书信写作艺术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杰作地位。

Together with these there appeare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classical style of Italian correspondence, at the head of which stands Bembo again. Its form is wholly modern, and deliberately kept free from Latin influence, and yet its spirit is thoroughly penetrated and possessed by the ideas of antiquity.

和这些书信一起，在16世纪出现了意大利文书信的古典文体，它的集大成者仍然是本博。这种书信的形式全完是近代的，并且写作者

有意识地避开了拉丁文的影响，但其精神则完全渗透和弥漫着古代的理想。

But, at a time and among a people where 'listening' was among the chief pleasures of life, and where every imagination was filled with the memory of the Roman senate and its great speakers, the orator occupied a far more brilliant place than the letter-writer. Eloquence had shaken off the influence of the Church, in which it had found a refug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and now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and ornament of all elevated lives. Many of the social hours which are now filled with music were then given to Latin or Italian oratory, with results which every reader can imagine.

但是，在一个人们以“倾听”为生活中主要享受之一，且每一种想象都充满了对古罗马元老院和它伟大演说家的回忆的时代，演讲家比书信作家占有更光辉的地位。雄辩术在中世纪时期从教会中寻求到了庇护，但是到了16世纪它已经摆脱了其影响，而成为这个时期一切高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和装饰。现在用来听音乐的许多社交时间，在那时都用于听拉丁语或意大利语的演讲，相信每位读者都能想象得出。

The social position of the speaker was a matter of perfect indifference; what was desired was simply the most cultivated humanistic talent. At the court of Borso of Ferrara, the duke's physician, Jeronimo da Castello, was chosen to deliver the congratulatory address on the visits of Frederick III and of Pius II. Married laymen ascended the pulpits of the churches at any scene of festivity or mourning, and even on the feast-days of the saints. It

struck the non-Italian members of the Council of Basel as something strange that the Archbishop of Milan should summon Aeneas Sylvius, who was then unordained, to deliver a public discourse at the feast of St Ambrogius; but they suffered it in spite of the murmurs of the theologians, and listened to the speaker with the greatest curiosity.

演讲者的社会地位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其造诣精湛的人文主义才能才是最重要的。在费拉拉的博尔索宫廷，大公的医生，热罗尼莫·达·卡斯泰洛被选中在腓特烈三世和教皇庇护二世访问的时候致祝词。已婚俗人在任何庆祝或追悼仪式上，甚至在圣徒的节日上都可以登上教坛。米兰大主教竟召来当时还没有被授圣职的埃尼亚斯·西尔维于斯在圣阿姆布洛吉乌斯的节日上做公开说教，这件事使得巴塞尔宗教议会的非意大利成员感到十分惊讶，但他们还是不顾那些神学家们的啧有烦言而容忍了它，并带着极大的好奇听完了他的讲话。

Let us glance for a moment at the most frequent and important occasions of public speaking.

我们暂且看一下那些最常见和最重要的公开讲演的场合。

It was not for nothing,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the ambassadors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 received the title of orators. Whatever else might be done in the way of secret negotiation, the envoy never failed to make a public appearance and deliver a public speech, under circumstances of the greatest possible pomp and ceremony. As a rule, however numerous the embassy might be, one individual spoke for all; but it happened to Pius II, a critic before

whom all were glad to be heard, to be forced to sit and listen to a whole deputation, one after another. Learned princes who had the gift of speech were themselves fond of discoursing in Latin or Italian. The children of the House of Sforza were trained to this exercise. The boy Galeazzo Maria delivered in 1455 a fluent speech before the Great Council at Venice, and his sister Ippolita saluted Pope Pius II with a graceful address at the Congress of Mantua (1459). Pius himself through all his life did much by his oratory to prepare the way for his final elevation to the papal chair. Great as he was both as scholar and diplomatist, he would probably never have become pope without the fame and the charm of his eloquence. 'For nothing was more lofty than the dignity of his oratory.' Without doubt this was a reason why multitudes held him to be the fittest man for the office, even before his election.

首先，那些在国家间游走的使节们并不是平白地就得到了演讲家的称号的。无论他们通过秘密交涉完成何种任务，那些使节从来不会错过在极其隆重的仪式和典礼上公开露面并发表演说。虽然使节数量众多，遵循惯例却总是由一个人代表全体讲话；但对于庇护二世来说，因为他是一个鉴赏家，人人都想在他面前发言，所以他就不得不坐在那里一个接着一个听完整个代表团的演说。有演讲天赋的博学君主们喜欢用拉丁语或意大利语讲演。斯福尔扎家族的子女们都受过这种训练。加莱亚佐·马里亚还是个孩子时曾在1455年威尼斯大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流利的讲演，而他的妹妹伊波丽塔在1459年曼图亚宗教会议上用一篇优美的演说向教皇庇护二世致敬。而庇护二世本人在他一生中利用演讲为他最后登上教皇宝座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尽管他是位伟大的学者兼外交家，但如果没有他那样辩才的荣誉和魅力，他或许永远也坐不上教皇的宝座。“因为再没有比他的讲演更显得高雅威仪的了。”无疑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甚至在他当选之前就认为他最适合担任教皇的职位了。

Princes were also commonly received on public occasions with speeches, which sometimes lasted for hours. This happened of course only when the prince was known as a lover of eloquence, [3_16] or wished to pass for such, and when a competent speaker was present, whether university professor, official, ecclesiastic, physician or court-scholar.

人们通常也在公开的庆典上用讲演来欢迎君主们，这些讲演有时长达数小时。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必须有两个必要条件——这位君主是位讲演爱好者 [4_28] 或他希望树立自己爱好讲演的形象，并且演说家必须具备雄辩之才，至于演说家到底是位大学教授、官员、教士、医生还是宫廷学者都无所谓。

Every other political opportunity was seized with the same eagerness, and according to the reputation of the speaker, the concourse of the lovers of culture was great or small. At the yearly change of public officers, and even at the consecration of new bishops, a humanist was sure to come forward, and sometimes addressed his audience in hexameters or Sapphic verses. Often a newly appointed official was himself forced to deliver a speech more or less relevant to his department, as, for instance, on justice; and lucky for him if he were well up in his part! At Florence even the *condottieri,* whatever their origin or education might be, were compelled to accommodate themselves to the popular sentiment, and on receiving the insignia of their office, were harangued before the assembled people by the most learned secretary of state. It seems that beneath or close to the Loggia dei Lanzi—the porch where the government was wont to appear solemnly before the people—a tribune or platform *(rostra, ringhiera)* was erected for such purposes.

人们以同样的热情抓住每一个政治机会来做讲演，而群集来听讲的文化人的数量则依据讲演者的名望大小而定。在每年国家官吏更动时，甚至在新主教的圣职受任典礼上，也必有一个人文主义者出场，有时他还会为听众吟诵六音步诗或萨福体诗歌。而新任命的政府官员本人也往往必须做一篇多少与其部门相关的演讲，例如关于司法的演讲；如果他是一个擅长此道的人，那算是他的幸运。在佛罗伦萨，甚至雇佣军队长们，无论他们出身、教育如何，也必须来做一篇演讲以适应群众的要求，并且在接受其职务任命时，由最有学识的秘书官在群集的民众面前向他做一番大声疾呼的讲演。政府官员时常在雇佣军凉廊庄严地出现在民众面前，为此人们专门在凉廊边上修建了一个讲坛。

Anniversaries,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death of princes, were commonly celebrated by memorial speeches. Even the funeral oration strictly so-called was generally entrusted to a humanist, who delivered it in church, clothed in a secular dress; nor was it only princes, but officials, or persons otherwise distinguished, to whom this honor was paid. [3_17] This was also the case with the speeches delivered at weddings or betrothals, with the difference that they seem to have been made in the palace, instead of in church, like that of Filelfo at the betrothal of Anna Sforza to Alfonso of Este in the castle of Milan. It is still possible that the ceremony may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chapel of the castle. Private families of distinction no doubt also employed such wedding orators as one of the luxuries of high life. At Ferrara, Guarino was requested on these occasions to send some one or other of his pupils. The church simply took charge of the religious ceremonies at weddings and funerals.

周年纪念日，特别是君主们的逝世纪念日，通常都是以纪念演说的形式举行的。即使是最严格意义上的追悼演说，一般也是委托一位穿着世俗服装的人文主义者在教堂里发表的；得到这种荣誉的不仅有君主，而且也有官员或其他杰出人士。 [4_29] 在婚礼或订婚典礼上发表演说也是这种情形，不过有一点不同，即它们是在宫廷里而非教堂里发表，如菲莱尔福在米兰宫城中为埃斯特的阿方索和安娜·斯福尔扎婚礼所做的讲演。这种礼节也有在宫城的小礼堂里举行的可能。名门望族无疑也雇佣这种婚礼演说家作为一种上层生活的奢侈享受。在费拉拉，人们会请求格里诺派出他的学生来参加这种典礼。教会在婚礼和葬礼上仅仅负责宗教仪式。

The academical speeches, both those made at the installation of a new teacher and at the opening of a new course of lectures, were delivered by the professor himself, and treated as occasions of great rhetorical display. The ordinary university lectures also usually had an oratorical character.

在学院里，无论是一位新教师的就职演说还是一门新课程的开课演说，都由教授本人来发表，并且被看作表现伟大辩才的机会。另外，大学的一般讲课通常也具有讲演的性质。

With regard to forensic eloquence, the quality of the audience determined the form of speech. In case of need it was enriched with all sorts of philosophical and antiquarian learning.

关于法庭辩论，听众的水平决定着演说的形式。必要时，就用各种哲学和古代知识来丰富其内容。

As a special class of speeches we may mention the address made in Italian on the battlefield,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combat. Frederick of Urbino was esteemed a classic in this style; he used to pass round among his squadrons as they stood drawn up in order of battle, inspiring them in turn with pride and enthusiasm. Many of the speeches in the military historian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as for instance in Porcellius (p. 80), may be, in fact at least, imaginary, but may be also in part faithful representations of words actually spoken. The addresses again which were delivered to the Florentine militia, organized in 1506 chiefly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Machiavelli, and which were spoken first at reviews, and afterwards at special annual festivals, were of another kind. They were simply general appeals to the patriotism of the hearers, and were addressed to the assembled troops in the church of each quarter of the city by a citizen in armour, sword in hand.

还有一种特别的演说值得一提，那就是在战斗之前或之后用意大利语所做的战地演说。乌尔比诺的腓特烈被认为是这类演说的能手。当他的队伍排成战斗序列时，他惯于在队伍中间巡行并依次地以自豪感和热情来激励他们。15世纪的军事史学家们的著作里的许多演说（例如波尔切利乌斯的著作第80页的内容）实际上可能是虚构的，但其中一部分也有可能是真实讲话的忠实记录。还有另一种讲演，是针对佛罗伦萨民兵的，这种民兵主要是由于马基雅弗利的影响在1506年组成；这类讲演最初是在检阅时做的，后来则在每年的特别节日上发表。这仅仅是普遍激发听众爱国热情的讲演，地点设在城内各区的教堂里，由一个身穿甲胄手持宝剑的市民对集合起来的军队发表。

Finally, the oratory of the pulpit bega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o lose its distinctive peculiarities. Many of the clergy had entered into the circle of classical culture and were ambitious of success in

it. The street-preacher Bernardino da Siena, who even in his lifetime passed for a saint and who was worshipped by the populace, was not above taking lessons in rhetoric from the famous Guarino, although he had only to preach in Italian. Never indeed was more expected from preachers than at that time—especially from the Lenten preachers; and there were not a few audiences which could not only tolerate, but which demanded a strong dose of philosophy from the pulpit. But we have here especially to speak of the distinguished occasional preachers in Latin. Many of their opportunities had been taken away from them, as has been observed, by learned laymen. Speeches on particular saints' days, at weddings and funerals, or at the installation of a bishop, and even the introductory speech at the first mass of a clerical friend, or the address at the festival of some religious order, were all left to laymen. But at all events at the papal court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whatever the occasion might be, the preachers were generally monks. Under Sixtus IV, Giacomo da Volterra regularly enumerates these preachers, and criticizes them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art. Fedra Inghirami, famous as an orator under Julius II, had at least received holy orders and was canon at St John Lateran; and besides him, elegant Latinists were now common enough among the prelates. In this matter, as in others, the exaggerated privileges of the profane humanists appear lessene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on which point we shall presently speak more fully.

教坛演说最终在15世纪时开始失去了其特色。许多神职人员加入了研究古典文化的团体，并热切希望在这一领域获得成功。街道说教师，锡耶纳的贝尔纳迪诺，甚至在生前就被认为是圣徒并为人民所崇拜，但他仍虚心地向有名望的格里诺学习修辞学，不过他不得不用意大利语讲道。对于说教师，特别是对于四旬斋期说教师的要求，的确以这个时代最多；有很多听众不仅能够容忍而且还要求从教坛讲道中

得到丰富的哲学知识。然而，在此我们须特别谈谈那些在特殊场合用拉丁文讲道的著名说教师。如前文所谈，他们的许多机会已经被有学问的俗人夺去了。那些在特定的圣徒的节日、婚葬典礼，或是主教就职典礼，甚至是一个神职朋友的开台弥撒或某些修会节日上的讲演都是委托俗人来做。但是，在15世纪的教廷里举行的所有庆典，不管情况如何，说教师一般都是僧侣。在西斯科特四世时期，吉亚科莫·伏尔泰拉一一列出了这些说教师的名字，并按照讲演这门艺术的规则对他们作出了相应的评论。费德拉·因吉拉米在朱利叶斯二世时代以演说家著称，他起码是接受过圣职，并且是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的执掌祈祷礼式者。除他之外，在当时高级教士中优秀的拉丁语学家比比皆是。在这个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俗人的人文主义者过分享有的特权在16世纪里显得减少了，我们即将就这个问题展开更详尽的叙述。

What now was the subject and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se speeches? The national gift of eloquence was not wanting to the Italians of the Middle Ages, and a so-called 'rhetoric' belonged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ven liberal arts; but so far as the revival of the ancient methods is concerned, this merit must be ascribed, according to Filippo Villani, to the Florentine Bruno Casini, who died of the plague in 1348. With the practical purpose of fitting his countrymen to speak with ease and effect in public, he treated, after the pattern of the ancients, invention, declamation, bearing and gesticulation, each in its proper connection. Elsewhere too we read of an oratorical training directed solely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 No accomplishment was more highly esteemed than the power of elegant improvisation in Latin. The growing study of Cicero's speeches and theoretical writings, of Quintilian and of the imperial panegyrists, the appearance of new and original treatises, the general progress of antiquarian learning, and the stores of ancient matter and thought which now could and must be drawn upon—all combined to shape the character of the new eloquence.

那么什么是这些讲演的主旨和一般特征呢？中世纪的意大利人是并不缺少民族辩才的，而所谓的“修辞学”从一开始就属于七门学艺之内；但就古代讲演方法的复兴而言，根据菲利波·维拉尼的意见，应该归功于死于1348年瘟疫的佛罗伦萨人布鲁诺·卡西尼。布鲁诺·卡西尼的实际目的是使他的同胞在公众面前能够有效地畅所欲言，因此他以古人为典范，对于立意、发言、姿态和手势各按照其固有关系做了论述。在其他地方我们也读到了专门为实际应用而写的训练讲演的作品。能以拉丁文做优美的即席演说被视为最高级别的讲演才能。对西塞罗的讲演词和其理论著作越来越多的研究、对昆体良和讴歌皇帝的颂词作家越来越多的学习、新论著的出现、博古学术的普遍发展，以及这时可以而且必须从中吸取营养的丰富古代事物和思想等等一起形成了新雄辩术的特征。

This character nevertheless differed widely 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 Many speeches breathe a spirit of true eloquence, especially those which keep to the matter treated of; of this kind is the mass of what is left to us of Pius II. The miraculous effects produced by Giannozzo Manetti point to an orator the like of whom has not been often seen. His great audiences as envoy before Nicholas V and before the doge and Council of Venice were events not to be soon forgotten. Many orators, on the contrary, w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not only to flatter the vanity of distinguished hearers, but to load their speeches with an enormous mass of antiquarian rubbish. How it was possible to endure this infliction for two and even three hours can only be understood when we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nse interest then felt in everything connected with antiquity, and the rarity and defectiveness of treatises on the subject at a time when printing was but little diffused. Such orations had at least the value which we have claimed for many of Petrarch's letters. But some speakers went too far. Most of Filelfo's

speeches are an atrocious patchwork of classical and biblical quotations, tacked on to a string of commonplaces, among which the great people he wishes to flatter are arranged under the head of the cardinal virtues, or some such category, and it is only with the greatest trouble, in his case and in that of many others, that we can extricate the few historical notices of value which they really contain. The speech, for instance, of a scholar and professor of Piacenza at the reception of the Duke Galeazzo Maria, in 1467, begins with Julius Caesar, then proceeds to mix up a mass of classical quotations with a number from an allegorical work by the speaker himself, and concludes with some exceedingly indiscreet advice to the ruler. Fortunately it was late at night, and the orator had to be satisfied with handing his written panegyric to the prince. Filelfo begins a speech at a betrothal with the words: 'Aristotle, the peripatetic'. Others start with P. Cornelius Scipio, and the like, as though neither they nor their hearers could wait a moment for a quotation. At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ublic taste suddenly improved, chiefly through Florentine influence, and the practice of quotation was restricted within due limits. Many works of reference were now in existence, in which the first comer could find as much as he wanted of what had hitherto been the admiration of princes and people.

尽管如此，这种新特征仍然因人而大异。许多演说词，特别是紧扣所讨论问题的演说词，灌注着一种真正的雄辩精神；庇护二世留给我们的大量演说词就是这一类。詹诺佐·马内蒂的演讲所产生的神奇效果说明像他一样的演讲家是不多见的。作为一名使臣，他在尼古拉五世和威尼斯总督与大议会面前都进行过伟大的晋见演说，这些是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大事件。然而，许多演说家却不仅会抓住这种机会来迎合权贵的虚荣心，而且在其演说词中连篇累牍地塞满古董糟粕。对于这种讲演，人们为何能够不厌其烦地听上两个甚至三个小时？原因

只在于当时人们对于每一种与古代文化有关的事情怀有浓厚的兴趣，而印刷术尚未普及，关于这门学问的著述极为稀少且现有资料缺点较多，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也不难理解。这类讲演起码还有我们认为的在彼特拉克书信中所具有的那些价值。但有些演说家做得太过火了。菲莱尔福的大多数讲演词是由古典的和圣经的引文杂凑而成，并添以陈词滥调；在讲演词里，他以基本美德或类似的东西来恭维那些大人物；似此情形，我们就必须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分辨出其中少数的真正具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他人的情况也不外乎此。例如，一个皮亚琴察的学者兼教授于1467年在加莱亚佐·马里亚大公的欢迎会上做演说，他从尤利乌斯·恺撒说起，进而把一大堆的经典引文和自己杜撰的一些譬喻掺和在一起，最后以向这位君主提供一些极其轻率的劝告作结。所幸天色已晚，这位讲演家不得不把他写好了的颂词交给这位君主了事。菲莱尔福在一个订婚典礼上的演说以这样的话开头："亚里士多德，这位逍遥学派哲人。"有的人从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这一类的人开始，好像这些讲演家和听众们对于引经据典都是迫不及待的样子。在15世纪末，公众的品位突然提升了，这主要是由于佛罗伦萨人的影响，而引经据典的做法被限制在了适当的范围之内。当时有很多参考书，其中包括一切古代人们对于君主和一般人的赞颂之词，需要之人一检即得。

As most of the speeches were written out beforehand in the study, the manuscripts served as a means of further publicity afterwards. The great extemporaneous speakers, on the other hand, were attended by shorthand writers. We must further remember that not all the orations which have come down to us were intended to be actually delivered. The panegyric, for example, of the elder Beroaldus on Lodovico il Moro was presented to him in manuscript. In fact, just as letters were written addressed to all conceivable persons and parts of the world as exercises, as formularies, or even to serve a controversial end, so there were speeches for imaginary occasions to be used as models for the reception of princes, bishops

and other dignitaries.

因为大多数的讲演词是事先在书斋里写好的，那些手稿就作为以后进一步的宣传之用。另一方面，那些大即席演说家则有速记员跟随。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流传下来的演讲词并不都是打算真正当场发表的。例如老贝罗阿尔都斯对洛多维科·摩罗的颂词就是以手稿的形式交给他的。事实上，正像书信作为练习、范文，乃至争论的工具能够写给世界上假想的人、寄到假想的地方，同样，也有为假想的场合所作的模范讲演词以供在招待君主、主教等显贵们时使用。

For oratory, as for the other arts, the death of Leo X (1521) and the sack of Rome (1527) mark the epoch of decadence. Giovio, just escaped from the desolation of the eternal city, describes, not exhaustively, but on the whole truly, the causes of this decline.

讲演就如同其他艺术一样，教皇利奥十世的逝世（1521年）和罗马遭劫（1527年）标志其衰落时代的开始。刚刚从那个永恒之都的废墟中逃出来的乔维奥记述了这次衰落的原因，虽然他的描写不是详尽无遗的，但在大体上却是真实可靠的。

> The plays of Plautus and Terence, once a school of Latin style for the educated Romans, are banished to make room for Italian comedies. Graceful speakers no longer find the recognition and reward which they once did. The consistorial advocates no longer prepare anything but the introductions to their speeches, and deliver the rest—a confused muddle—on the inspiration of the

moment. Sermons and occasional speeches have sunk to the same level. If a funeral oration is wanted for a cardinal or other great personage, the executors do not apply to the best orators in the city, to whom they would have to pay a hundred pieces of gold, but they hire for a trifle the first impudent pendant whom they come across, and who only wants to be talked of whether for good or ill. The dead, they say, is none the wiser if an ape stands in a black dress in the pulpit, and beginning with a hoarse, whimpering mumble, passes little by little into a loud howling. Even the sermons preached at great papal ceremonies are no longer profitable, as they used to be. Monks of all orders have again got them into their hands, and preach as if they were speaking to the mob. Only a few years ago a sermon at mass before the pope might easily lead the way to a bishopric.

过去有教养的罗马人都学习拉丁风格的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戏剧，到了此时都被摒弃而代之以意大利喜剧了。优雅的演说家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人们所赏识并得到报酬了。宗教法庭的辩护人除了他们演说的引言部分外不再做任何准备工作，而其余部分杂乱无章的讲话则靠随机应变来对付。教堂讲道和庆祝会上的演说也降低到同样的水平。如果需要对枢机主教或其他大人物做追悼演说，行政人员不必再花100金币去聘请本城最好的演说家，而只需花一点点钱去雇佣他们所碰到的任何一个厚颜无耻、只是希望被人们谈论到、好坏在所不计的腐儒。他们说，如果一个猴子身着丧服站在教坛上，用沙哑的声音开始抽抽噎

噎、叽叽咕咕地讲话，然后逐渐变为大声的嚎叫，那个死了的人对于现场发生了什么也仍然一无所知。即使在重大的教廷典礼上的讲道也不再像过去常见的那样让人有利可图了。各级僧侣又重新把这项工作抓到了他们自己的手里，说起教来像是在对一群暴徒讲话一样。而仅仅数年前，一场在教皇面前举行的弥撒中的说教还很可能极易成为晋升主教的阶梯呢。

The Treatise, and History in Latin

专题论文与拉丁文历史

From the oratory and the epistolary writings of the humanists we shall here pass on to their other creations, which were all, to a greater or less extent, reproductions of antiquity.

本节我们将从人文主义者的讲演和书信作品转到其他创作，这些创作或多或少都是对古代文化的模仿。

Among these must be placed the treatise, which often took the shape of a dialogue. In this case it was borrowed directly from Cicero. In order to do anything like justice to this class of literature—in order not to throw it aside at first sight as a bore—two things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entury which escaped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 Middle Ages felt the need of something to mediate between itself and antiquity in many questions of morals and philosophy; and this need was met by the writer of treatises and dialogues. Much which appears to us as mere commonplace in their writings was for them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 a new and

hardly won view of things upon which mankind had been silent since the days of antiquity. The language too, in this form of writing, whether Italian or Latin, moved more freely and flexibly than in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letters or in oratory, and thus became in itself the source of a special pleasure. Several Italian compositions of this kind still hold their place as patterns of style. Many of these works have been or will be mentioned on account of their contents; we here refer to them as a class. From the time of Petrarch's letters and treatises down to near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heaping up of learned quotations, as in the case of the orators, is the main business of most of these writers. The whole style, especially in Italian, was then suddenly clarified, till, in the *Asolani* of Bembo, and the *Vita Sobria* of Luigi Cornaro, a classical perfection was reached. Here too the decisive fact was that antiquarian matter of every kind had meantime begun to be deposited in encyclopedic works (now printed), and no longer stood in the way of the essayist.

谈到这些创作，我们就绕不开其中的一种——专题论文，这类论文往往以对话的形式写成。在这方面，它直接模仿了西塞罗的作品。为了力求公平地对待这类著作——为了不出现看到它就把它当作令人厌烦的东西丢弃在一旁的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件事。摆脱了中世纪影响的那个世纪，在许多道德和哲学问题上都亟需某些东西来调和自身与古典文化之间的龃龉；而专题论文和对话体著作的作者就满足了这一需求。这些人著作里有许多在我们看来不过是稀松寻常的内容，但对他们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们来说，却是关于人类自古以来从未对其发表过任何意见的那些事情的、得之不易的新观点。在这种形式的著作中，所用的语言不管是意大利语还是拉丁语，也都比历史叙事、书信或讲演词的语言更流畅、灵活，因而语言本身就成了一个特别的愉悦之源。有几篇这种类型的意大利语作品仍然保持着它们文体典范的地位。由于其内容方面的原因，这些作品有很多前面已经提

到，或者会在下文提及；我们此处将其作为一类作品来探讨。从彼特拉克创作书信与论文之时到15世纪末叶，像演说家那样广征博引，是大多数此类作家的主要任务。后来，整个文风，尤其是意大利语作品的文风，突然清晰了，直至在本博《阿苏拉尼》和路易吉·科尔纳罗《有节制的生活》中达到经典的完美。此处决定性的事实还是，各种古文物已同时开始收录于百科全书（现已刊印）之中，不再成为评论家们的障碍了。

It was inevitable too that the humanistic spirit should control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 superficial comparison of the histories of this period with the earlier chronicles, especially with works so full of life, color and brilliancy as those of the Villani, will lead us loudly to deplore the change. How insipid and conventional appear by their side the best of the humanists, and particularly their immediate and most famous successors among the historians of Florence, Leonardo, Aretino and Poggio! The enjoyment of the reader is incessantly marred by the sense that, in the classical phrases of Facius, Sabellicus, Folieta, Senarega, Platina in the chronicles of Mantua, Bembo in the annals of Venice, and even of Giovio in his histories, the best local and individual coloring and the full sincerity of interest in the truth of events have been lost. Our mistrust is increased when we hear that Livy, the pattern of this school of writers, was copied just where he is least worthy of imitation—on the ground, namely, 'that he turned a dry and naked tradition into grace and richness'. In the same place we meet with the suspicious declaration that it is the function of the historian—just as if he were one with the poet—to excite, charm or overwhelm the reader. We ask ourselves, finally, whether the contempt for modern things, which these same humanists sometimes avowed openly, must not necessarily have had an unfortunate influence on their treatment of them. Unconsciously the reader finds himself

looking with more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on the unpretending Latin and Italian annalists, like those of Bologna and Ferrara, who remained true to the old style, and still more grateful does he feel to the best of the genuine chroniclers who wrote in Italian—to Marin Sanudo, Corio and Infessura—who were follow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by that new and illustrious band of great national historians who wrote in their mother tongue.

人文主义的精神支配着对历史的书写也是势所必然的。把这一时代的史书和较早的年代记，特别是像维拉尼那些生气洋溢、色彩丰富、光辉灿烂的著作，做一个粗浅的比较后，我们就会不禁对这种变化喟然兴叹。和他们比较起来，最优秀的人文主义者，特别是他们在佛罗伦萨历史家中最有名的直接继承者，列奥纳多·阿雷蒂诺和波焦，显得那么枯燥无味和墨守成规！法奇奥、萨贝利科、福列塔、塞纳雷加、普拉蒂纳在曼图亚的编年史里，本博在威尼斯的年代记里，乃至乔维奥在他的历史著作里都有些古典的词句，当读者意识到在这些古典的词句中间最好的地方色彩和个人特色以及对事件真实性的完全忠实已经丧失时，他们的欣赏就不断地遭到了破坏。李维本是这派作家学习的典范，但当我们听到他被人抄袭，并且是在他最不值得模仿的地方遭到了抄袭，而抄袭者这么做的理由是“他把一个枯燥无味的传统写作变成了美妙而内容丰富的故事”，我们就会更加不信任这样的作品。同样地我们也听到了一种令人怀疑的说法，即历史学家的任务正和诗人一样，是刺激、陶醉和感动读者。最后我们就要自问，这些人文主义者有时公开承认对近代事物的不屑，这种态度是否未必会对他们处理这些事物产生一种不幸的影响。读者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对像来自博洛尼亚和费拉拉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编年史作者寄予更大的兴趣和信赖，因为他们忠实于旧文风、不尚矫饰；并且读者对于那些顶级的用意大利文写作的真正年代记作家——即马林·萨努多、科里奥和茵菲苏拉等人怀有更多的感激之情。在16世纪初，这些人受到了一批以本国语言写作的新兴优秀民族历史学家的效仿。

Contemporary history, no doubt, was written far better in the language of the day than when forced into Latin. Whether Italian was also more suitable for the narrative of events long past, or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is a question which admits, for that period, of more answers than one. Latin was, at that time; the lingua franca of instructed people, not only in an international sense, as a means of intercourse between Englishmen, Frenchmen and Italians, but also in an inter-provincial sense. The Lombard, the Venetian and the Neapolitan modes of writing, though long modeled on the Tuscan, and bearing but slight traces of the dialect, were still not recognized by the Florentines. This was of less consequence in local contemporary histories, which were sure of readers at the place where they were written, than in the narratives of the past, for which a larger public was desired. In these the loc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had to be sacrificed to the general interests of the learned. How far would the influence of a man like Blondus of Forli have reached if he had written his great monuments of learning in the dialect of the Romagna? They would have assuredly sunk into neglect, if only through the contempt of the Florentines, while written in Latin they exercised the profoundest influence on the whole European world of learning. And even the Florentine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wrote Latin, not only because their minds were imbued with humanism, but in order to be more widely read.

无疑，当时的历史用当时的语言来写远比勉强用拉丁文来写为好。意大利语言是否更适合于记载过去很久的事件或更适合于做历史研究，对此当时有着不同的看法。在那时，拉丁语是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共同语”，这不仅体现在国际意义上，即作为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的一种交往工具，而且体现在国内各地之间的交往上。伦巴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写作风格，虽然很久以来就以托斯卡纳语为典范，而且只带有极轻微的方言痕迹，但却仍然不为佛罗伦萨人所

承认。如果书写的是当时当地的历史，这就不太重要，因为在所写历史的那个地方一定会有读者，但如果书写的是过去的历史，这就很重要了，因为会期望更多的读者。在这些著作中，人们的地方兴趣不得不被学者的普遍兴趣所打消。比如像弗利的布朗德斯，如果他用罗马涅方言去写他那不朽的学术巨著，那么他的影响所及会有多远呢？无疑，这些著作只是由于佛罗伦萨人的轻视就将堕入无声无臭之中，而用拉丁文来写，它们就会对整个欧洲学术界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另外佛罗伦萨人自己在15世纪也写拉丁文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当时他们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而且是为了获得更广泛的读者。

Finally, there exist certain Latin essay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which stand on a level with the best Italian works of the kind. When the continuous narrative after the manner of Livy—that Procrustean bed of so many writers—is abandoned, the change is marvelous. The same Platina and Giovio, whose great histories we only read because and so far as we must, suddenly come forward as masters in the biographical style. We have already spoken of Tristan Caracciolo, of the biographical works of Facius and of the Venetian topography of Sabellico, and others will be mentioned in the sequel.

最后，在同时代的历史中还存有一些拉丁文论文，它们和这类最好的意大利文作品具有同样高的水平。模仿李维的风格对于众多作家来说无异于是一张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但当这种长篇大论的叙述被抛弃时，文章有了惊人的变化。同样，普拉蒂纳和乔维奥（他们所写的大部头的历史著作，我们只有不得已时才会去读）在当时一变而成为了传记体裁的能手。我们已经提到过特里斯坦·卡拉乔洛的著作，提到过法奇奥的传记著作和萨贝利科的威尼斯地志学，其他著作下文还要提到。

The Latin treatises on past history were naturally concerned, for the most part, with classical antiquity. What we are most surprised to find among these humanists are some considerable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The first of this kind was the chronicle of Matteo Palmieri (449-1449), beginning where Prosper Aquitanus ceases. On opening the *Decades* of Blondus of Forli, we are surprised to find a universal history, *'ab inclinatione Romanorum imperii',* as in Gibbon, full of original studies on the authors of each century, and occupied, through the first 300 folio pages, with early medieval history down to the death of Frederick II. And this when in northern countries nothing more was wanted than chronicles of the popes and emperors, and the *fasciculus temporum.* We cannot here stay to show what writings Blondus made use of, and where he found his materials, though this justice will some day be done to him by the historians of literature. This book alone would entitle us to say that it was the study of antiquity which made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Ages possible, by first training the mind to habits of impartial historical criticism. To this must be added that the Middle Ages were now over for Italy, and that the Italian mind could the better appreciate them, because it stood outside them. It cannot, nevertheless, be said that it at once judged them fairly, and still less that it judged them with piety. In art a fixed prejudice showed itself against all that those centuries had created, and the humanists date the new era from the time of their own appearance. 'I begin,' says Boccaccio, 'to hope and believe that God has had mercy on the Italian name, since I see that His infinite goodness puts souls into the breasts of the Italians like those of the ancients—souls which seek fame by other means than robbery and violence, but rather on the path of poetry, which makes men immortal.' But this narrow and unjust temper did not preclude investigation in the minds of the more gifted men, at a time, too, when elsewhere in Europe any such investigation would have been

out of the question. A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the Middle Ages was practicable just because the rational treatment of all subjects by the humanists had trained the historical spirit.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is spirit had so far penetrated the history even of the individual cities of Italy that the stupid fairy tales about the origin of Florence, Venice and Milan vanishe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nd long after, the chronicles of the North were stuffed with this fantastic rubbish, destitute for the most part of all poetical value, and invented as late as the fourteenth century.

过去历史方面的拉丁文著作自然大部分是关于古代文化的。但使我们更加惊异的是我们在人文主义者中间看到了相当数量的关于中世纪的历史著作。这类著作的第一部作品是马泰奥·帕尔米耶里的编年史（449-1449），它是从普罗斯珀·阿奎塔努斯搁笔的地方写起的。打开弗利的布朗德斯的《十卷史》，我们意外地发现：它是“从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一部世界史，像在吉本的著作里那样，充满了对每一个世纪的作家的独到研究，而前300张对开页中所讲的全都是到腓特烈二世逝世时的早期中世纪史。而此时在北方的国家里，对这类著作的要求无非是关于教皇和皇帝的编年史以及被称为“时代之束”的编年史而已。我们并不能在此说明布朗德斯利用了哪些作品、从哪里得到了写作素材，虽然有一天文学史家会对他做出这种公平的判断。仅这部书就能够使我们有理由说：正是基于对于古代的研究，才使对中世纪的研究成为可能，因为那些研究古代的作品首先在思想上养成了我们对历史做出公平判断的习惯。此外我们还须说明：此时中世纪对于意大利来说已经成为了过去，意大利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它们正是因为他们已经置身于中世纪之外了。虽然如此，但并不能说他们立刻就判断得很正确，更不能说判断得很忠实。在艺术上，则表现出了一种反对中世纪所创造出来的一切事物的成见，并且人文主义者是以自己勃兴之日为新纪元的。薄伽丘说：“我开始希望并且相信上帝怜悯了意大利的名誉，因为我看到他的无穷仁爱使得意大利人的内心具有和古人同样的精神——用掠夺和暴力以外的方法取得荣誉的精神，更确切

地说，是人们在诗歌的道路上获得不朽。”但是，当任何这种研究在欧洲其他地方还不足道的时候，这种狭隘而偏激的气质并没有妨碍意大利天才们的研究精神。对于中世纪的历史评判之所以可行，正是因为人文主义者对于一切问题的合理对待已经养成了一种历史精神。在15世纪，这种精神甚至已经如此深深贯穿在意大利的个别城市的历史中，因而讲述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起源的那些愚蠢神话故事已经不复再现，而与此同时并在这很久之后，北方的编年史中却装满了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其中大部分没有任何文学价值，但却仍然一直捏造到了14世纪。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local history and the sentiment of glory has already been touched on in reference to Florence. Venice would not be behindhand. Just as a great rhetorical triumph of the Florentines would cause a Venetian embassy to write home post-haste for an orator to be sent after them, so too the Venetians felt the need of a history which would bear comparison with those of Leonardo, Aretino and Poggio. And it was to satisfy this feeling that,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Decades* of Sabellico appeared, and in the sixteenth the *Historia rerum Venetarum* of Pietro Bembo, both written at the express charge of the republic, the latter a continuation of the former.

地方史和荣誉感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已经在叙述佛罗伦萨时谈到过。威尼斯也是不甘落后的。正像佛罗伦萨人在一次演讲上的巨大胜利促使一位威尼斯使节赶紧写信回去请求派来一位演说家一样，威尼斯人也感到有必要写一部能与列奥纳多·阿雷蒂诺和波焦作品相媲美的历史著作。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在15世纪，出现了萨贝利科的《十卷史》，而在16世纪出现了彼得罗·本博的《威尼斯事迹史》，这两部书都是在这个共和国的正式委托之下写成的，后者是前者的续集。

The great Florentine historia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ere men of a wholly different kind from the Latinists Bembo and Giovio. They wrote Italian, not only because they could not vie with the Ciceronian elegance of the philologists, but because, like Machiavelli, they could only record in a living tongue the living results of their own immediate observations—and we may add in the case of Machiavelli, of his observation of the past—and because, as in the case of Guicciardini, Varchi and many others, what they most desired was that their view of the course of events should have as wide and deep a practical effect as possible. Even when they only write for a few friends, like Francesco Vettori, they feel an inward need to utter their testimony on men and events, and to explain and justify their share in the latter.

16世纪初期佛罗伦萨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与拉丁语学家本博和乔维奥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用意大利文写作，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和语言学家们优美的西塞罗风格争长短，而且也因为他们像马基雅弗利那样，只能用活的语言来记载自己直接观察所得的现实结果——具体到马基雅弗利，我们还可以加上他对过去的观察结果——并且像圭恰迪尼、瓦尔奇和许多其他人的情况一样，这些16世纪初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最希望的是他们对于事件进程的看法能够产生一种尽可能广泛而深远的实际影响。即使他们只是为少数友人而写作，像弗朗西斯科·韦托里那样，他们也从内心感到有必要说出他们对人物和事件的见证，解释和辩护他们参与那些事件的理由。

And yet, with all that is characteristic in their language and style, they were powerfully affected by antiquity, and, without its influence, would be inconceivable. They were not humanists, but they had passed through the school of humanism, and they have in them more of the spirit of the ancient historians than most of the

imitators of Livy. Like the ancients, they were citizens who wrote for citizens.

可是，尽管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风格，他们还是受到了古典文化强有力的影响，而没有这种影响，他们将难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他们不是人文主义者，但他们接受的是人文主义学校的教育，与大多数的李维模仿者相比他们身上有着更多的古代历史学家的精神。像古人一样，他们是为市民而写作的市民。

Antiquity as the Common Source

作为共同源泉的古典文化

We cannot attempt to trace the influence of humanism in the special sciences. Each has its own history, in which the Italian investigators of this period, chiefly through their rediscovery of the results attained by antiquity, mark a new epoch, with which the modern period of the science in question begins with more or less distinctness. With regard to philosophy, too, we must refer the reader to the special historical works on the subject. The influence of the old philosophers on Italian culture will appear at times immense, at times inconsiderable; the former, when we consider how the doctrines of Aristotle, chiefly drawn from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both widely diffused at an early period—became the common property of educated Italians, and how the whole method of abstract thought was governed by him; the latter, when we remember how slight was the dogmatic influence of the old philosophies, and even of the enthusiastic Florentine Platonists, on the spirit of the people at large. What looks like such an influence is generally no more than a consequence of the new culture in

general, and of the speci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talian mind. When we come to speak of religion, we shall have more to say on this head. But in by far the greater number of cases, we have to do, not with the general culture of the people, but with the utterances of individuals or of learned circles; and here, too, a distinction must be drawn between the true assimilation of ancient doctrines and fashionable make-believe. For with many antiquity was only a fashion, even among very learned people.

我们无法尝试探究人文主义在专门学科领域的影响。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研究者们重新发现了古代在此种学科史上所取得的成就，并主要藉此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这里所讲的学科的现代时期就是伴随着这个新纪元的到来才多多少少开始各不一样的。关于哲学，我们也必须请读者去参考专述这方面历史的著作。古代哲学家们对意大利文化的影响，有时候看起来会很大，有时候则又无足轻重；说它很大，是考虑到以《伦理学》和《政治学》——二者早期都曾广泛传播——为主要出处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如何成了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的共同财富，以及抽象思维的一整套方法是如何受制于亚里士多德；说它无足轻重，是我们记得古代哲学乃至佛罗伦萨那些满腔热情的柏拉图学派的人对民众精神的教条影响总体上是多么微不足道。看起来像是这种影响的东西，通常不过是一般新文化和意大利思想特殊成长和发展的一种结果罢了。等我们谈宗教时会详细探讨这个问题。但在更多情况下，我们必须解决的并不是民众的一般文化，而是个人或学术界的言论；此处也必须区分对古代学说的真正吸收和赶时髦的装扮。因为对于许多人，甚至是学识渊博的人来说，古典文化仅仅只是一种时尚。

Nevertheless, all that looks like affectation to our age need not then have actually been so. The giving of Greek and Latin names to children, for example, is better and more respectable than the

present practice of taking them, especially the female names, from novels. When the enthusiasm for the ancient world was greater than for the saints, it was simple and natural enough that noble families called their sons Agamemnon, Tydeus and Achilles, and that a painter named his son Apelles and his daughter Minerva. [3_18] Nor will it appear unreasonable that, instead of a family name, which people were often glad to get rid of, a well-sounding ancient name was chosen. A local name, shared by all residents in the place, and not yet transformed into a family name, was willingly given up, especially when its religious associations made it inconvenient; Filippo da San Gimignano called himself Callimachus. The man, misunderstood and insulted by his family, who made his fortune as a scholar in foreign cities, could afford, even if he were a Sanseverino, to change his name to Julius Pomponius Laetus. Even the simple translation of a name into Latin or Greek, as was almost uniformly the custom in Germany, may be excused to a generation which spoke and wrote Latin, and which needed names that could be not only declined, but used with facility in verse and prose. What was blameworthy and ridiculous was the change of half a name, baptismal or family, to give it a classical sound and a new sense. Thus Giovanni was turned into Jovianus or Janus, Pietro to Petreius or Pierius, Antonio to Aonius, Sannazaro to Syncerus, Luca Grasso to Lucius Crassus. Ariosto, who speaks with such derision of all this, lived to see children called after his own heroes and heroines.

然而，所有在我们这个时代看起来像是矫揉造作的事情在当时并不一定真正如此。例如，当时给子女们取希腊、拉丁名字就比现在从小说故事里取名，特别是取女人名字的习惯更好、更文雅一些。当人们对古代世界的热情大于对圣徒的热情时，贵族家庭给他们的儿子起名叫做阿伽门农、堤丢斯、阿基里斯，和一个画家给他的儿子起名阿佩莱斯，把他的女儿叫做密涅瓦 [4_30] 就是一件很简单、很自然的事

情。人们常常愿意摆脱家族的名字，而选择一个好听的古代名字来代替看来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一个当地名字为本地居民所共有并且还未转变成为一个家族的名字，那么人们是愿意放弃它的，特别是在其宗教联系使人们感到不便的情况下。菲利波·达·圣吉米尼亚诺就把自己叫做卡利马科斯。那个被他的家族误解和侮辱，而在异乡城市以学者身份成名的人，即便他原来来自圣塞韦里诺，也能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尤利乌斯·蓬波尼乌斯·拉埃图斯。即便是简单地把一个名字译成拉丁文或希腊文，像在德意志几乎成了普遍的习惯那样，对于这个时代来说也能被原谅。因为这个时代用拉丁文演讲和写作，需要既有尾语变化又便于在韵文和散文中使用的名字。可恼又可笑的是人们改变洗礼名或族名的一半，想要以此获得古典的声音和新的意义。于是，乔瓦尼变成了乔维亚努斯或亚努斯，彼得罗变成了彼特利乌斯或比埃利乌斯，安东尼奥变成了奥尼乌斯，圣纳扎罗成了桑塞路斯，卢卡·格拉索成了卢西乌斯·克拉苏斯。而对这一切嘲笑不已的阿里奥斯托在他有生之年就看到了孩子们被以他自己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

Nor must we judge too severely the Latinization of many usages of social life, such as the titles of officials, of ceremonies and the like, in the writers of the period. As long as people were satisfied with a simple, fluent Latin style, as was the case with most writers from Petrarch to Aeneas Sylvius, this practice was not so frequent and striking; it became inevitable when a faultless, Ciceronian Latin was demanded. Modern names and things no longer harmonized with the style, unless they were first artificially changed. Pedants found a pleasure in addressing municipal counsellors as *'patres conscripti,* nuns as *'virgines vestales',* and entitling every saint *'divus'* or *'deus';* but men of better taste, such as Paolo Giovio, only did so when and because they could not help it. But as Giovio does it naturally, and lays no special stress upon it, we are not offended if, in his melodious language, the cardinals

appear as *senatores,* their dean as *princeps senatus,* excommunication as *dirae,* and the carnival as *lupercalia.* This example of this author alone is enough to warn us against drawing a hasty inference from these peculiarities of style as to the writer's whole mode of thinking.

我们也不必过于严厉地批评这一时代的作家们在其作品中将许多社会生活习惯，如官吏、礼节的名称和类似的东西拉丁化。只要人们满足于简单流畅的拉丁文风格，如从彼特拉克到埃尼亚斯·西尔维于斯的大多数作家们的作品那样，这种习惯就不是那么常见和显眼了。而当人们要求一种完美的西塞罗体拉丁文时，拉丁化才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近代的名称和事物与这种文体已经不复谐调，除非是早先对它们加以了人为的改变。腐儒们喜欢把市政议员称为“元老院元老”，把修女叫做“维斯塔贞女”，把每位圣徒叫做“圣”或“神”，但像保罗·乔维奥那样更风雅的人则只是在不得已时才这样做。而正因为乔维奥做得很自然，且并不特意强调，所以在他富于旋律的语言里，即使枢机主教被称作“元老”，主教长变成了“首席元老”，逐出教会被称为“诅咒”，狂欢节变成了“牧神节”，我们听到也不会感到刺耳。仅仅这一位作家的例子就足以警示我们，不要妄图仅仅通过这些特殊的风格就草率地对作家的整个思维模式做出结论。

The history of Latin composition cannot here be traced in detail. For fully two centuries the humanists acted as if Latin were, and must remain, the only language worthy to be written. Poggio deplores that Dante wrote his great poem in Italian; and Dante, as is well known, actually made the attempt in Latin, and wrote the beginning of the *Inferno* first in hexameters. The whole future of Italian poetry hung on his not continuing in the same style, but even Petrarch relied more on his Latin poetry than on the Sonnets and *Canzoni,* and Ariosto himself was desired by some to write his poem in Latin. A stronger coercion never existed in literature; but

poetry shook it off for the most part, and it may be said, without the risk of too great optimism, that it was well for Italian poetry to have had both means of expressing itself. In both something great and characteristic was achieved, and in each we can see the reason why Latin or Italian was chosen. Perhaps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prose. The position and influence of Italian culture throughout the world depended on the fact that certain subjects were treated in Latin—*urbi et orbi* —while Italian prose was written best of all by those to whom it cost an inward struggle not to write in Latin.

“拉丁文写作”的历史是不能在此详细追溯的。因为在整整两个世纪里，人文主义者们所表现出的对拉丁文的态度就好像拉丁文是，而且必须一直是唯一有写作价值的语言。波焦对但丁用意大利文来写他的伟大诗篇而感到惋惜；而众所周知，但丁也确实曾试图用拉丁文来写作，《地狱》的开头部分最初就是以六音步诗写成的。整个意大利诗歌就由于他没有继续采用这种同样的体裁而得到发展；但是就连彼特拉克对自己拉丁文诗歌的重视程度也比对其十四行诗和组合歌的程度大；而有些人也曾希望阿里奥斯托用拉丁文写诗。在文学方面，从未存在过比这更为强大的压力；但诗歌却在极大程度上摆脱了它，并且可以不冒过分乐观的危险而这样说：好在意大利诗歌有两种表现自己的方法。两种文字的诗歌创作都完成了一些伟大而经典的作品，而从两种文字各自的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出作者选择拉丁文或是意大利文的理由。或许我们可以说散文也是同样的情况。意大利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用一句拉丁文来形容就是“遍及全世界”，而这是依靠某些用拉丁文写成的著作而获得的；然而与此同时，那些为了不用拉丁文写作而经过一番内心斗争的人却写出了最好的意大利文散文。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icero was recognized universally as the purest model of prose. This was by no means due solely to a dispassionate opinion in favor of his choice of language, of the

structure of his sentences and of his style of composition, but rather to the fact that the Italian spirit responded fully and instinctively to the amiability of the letter-writer, to the brilliancy of the orator, and to the lucid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thinker. Even Petrarch recognized clearly the weakness of Cicero as a man and a statesman, though he respected him too much to rejoice over them. After Petrarch's time, the epistolary style was formed entirely on the pattern of Cicero; and the rest,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narrative style, followed the same influence. Yet the true Ciceronianism, which rejected every phrase which could not be justified out of the great authority, did not appear till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hen the grammatical writings of Lorenzo Valla had begun to tell on all Italy, and when the opinions of the Roman historians of literature had been sifted and compared. Then every shade of difference in the style of the ancients was studied with closer and closer attention till the consoling conclusion was at last reached that in Cicero alone was the perfect model to be found, or, if all forms of literature were to be embraced, in 'that immortal and almost heavenly age of Cicero'. Men like Pietro Bembo and Pierio Valeriano now turned all their energies to this one object. Even those who had long resisted the tendency, and had formed for themselves an archaic style from the earlier authors, yielded at last, and joined in the worship of Cicero. Longolius, at Bembo's advice, determined to read nothing but Cicero for five years long, and finally took an oath to use no word which did not occur in this author. It was this temper which broke out at last in the great war among the scholars, in which Erasmus and the elder Scaliger led the battle.

从14世纪起，西塞罗的著作就被公认为最纯洁的散文典范。这绝不只是来自人们对他的遣词造句和文章风格的公正评价，更确切地

说，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西塞罗作为一名书信家态度亲切，作为一名讲演家才华横溢，作为一名哲学思想家又思维敏捷且能够透彻剖析；而意大利精神充分而自然地符合于他的这些品质。即使是彼特拉克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西塞罗作为一个普通人和一个政治家的弱点，不过他非常尊敬西塞罗，因此对于这些弱点他并不感到欣喜。彼特拉克的时代过后，书信体完全模仿西塞罗，除了记叙文体裁之外，其他文体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但是，那种对每一个不能从大师的权威著作中找到根据的词句都加以排斥的真正西塞罗主义，直到15世纪末才出现，那时洛伦佐·瓦拉的文法著作已经开始对整个意大利产生影响，而罗马的文学史家的主张也被加以分析和比较。自那以后，人们对古代作家风格中的每一个细微的差别都进行了越来越细致的研究，最后得出了令人安慰的结论，即最完美的典范只有求之于西塞罗的著作中，或者说，如果将所有文学作品的形式囊括在内，那么最完美的典范只有求之于那“不朽且依然神圣的西塞罗时代”。像彼得罗·本博和彼埃利奥·瓦莱里亚诺这样的人在这时都把他们的全部精力用在这一个目标上。就连那些长期反对这种倾向，并从早期作家那里形成了自己的一种古代体裁的人最后也屈服了，而且加入了对西塞罗的崇拜队伍。隆哥利乌斯在本博的劝告之下决定用五年的时间来专读西塞罗的作品，并最后发誓不用这个作家未用过的字写作。这种偏激最后爆发成为文人学者中间以伊拉斯谟和斯卡利杰尔二人为首的一场大论战。

For all the admirers of Cicero were by no means so one-sided as to consider him the only source of languag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Politian and Ermolao Barbaro made a conscious and deliberate effort to form a style of their own, naturally on the basis of their 'overflowing' learning,and our informant of this fact, Paolo Giovio, pursued the same end. He first attempted, not always successfully, but often with remarkable power and elegance, and at no small cost of effort, to reproduce in Latin a number of modern, particularly aesthetic, ideas. His, Lat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eat painters and sculptors of his time contain a mixture of the most

intelligent and the most blundering interpretation. [3_19] Even Leo X, who placed his glory in the fact, *'ut lingua latina nostro pontificatu dicatur facta auctior',* was inclined to a liberal and not too exclusive Latinity, which, indeed, was in harmony with his pleasure-loving nature. He was satisfied when the Latin which he had to read and hear was lively, elegant and idiomatic. Then, too, Cicero offered no model for Latin conversation, so that here other gods had to be worshipped beside him. The want was supplied b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omedies of Plautus and Terence, frequent both in and out of Rome, which for the actors were an incomparable exercise in Latin as the language of daily life. A few years later, in the pontificate of Paul II, the learned Cardinal of Teano (probably Niccolo Forteguerra of Pistoia) became famous for his critical labours in this branch of scholarship. He set to work upon the most defective plays of Plautus, which were destitute even of the list of the characters, and went carefully through the whole remains of this author, chiefly with an eye to the language. Possibly it was he who gave the first impulse for the publ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se plays. Afterwards Pomponius Laetus took up the same subject, and acted as manager when Plautus was put on the stage in the houses of great churchmen. That these representations became less common after 1520 is mentioned by Giovio, as we have seen, among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eloquence.

西塞罗的所有崇拜者决不会片面到认为他就是语言的唯一源泉。在15世纪，波利提安和埃尔莫劳·巴尔巴罗就曾经自觉而有意地形成他们自己的写作风格，这自然以他们“渊博的”学识为基础，而为我们记述这件事实的保罗·乔维奥也曾追求过同样的目标。他虽然做得未必成功，却用力甚勤，并力求典雅，他首先试图用拉丁文来重新表现近代的特别是美学的思想。乔维奥用拉丁文描写当时的伟大画家和雕刻家的特质，其中交织他最明智的解释和最笨拙的说明。 [4_31] 利奥十世

虽曾引以为荣，“使得我们的拉丁语文于我在任期间确实称得上有所提高。”但他也倾向于自由的而非过于狭隘的拉丁语法，而这的确符合他那好游乐的性格。读到和听到生动优美又符合习惯语法的拉丁语时，他是欣然满意的。此外，西塞罗并没有为拉丁语会话提供典范，所以在这方面不得不于他之外另觅泰斗。而这种需要从在罗马内外经常上演的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喜剧中得到了满足，他们二人的喜剧对于演员来说是将拉丁语当作日常生活用语的一种最好练习。几年以后，在保罗二世任教皇期内，泰亚诺博学多闻的枢机主教（大概是来自皮斯托亚的尼科洛·福尔泰圭拉）以擅长这一门学问的鉴定工作著称。他从普劳图斯最不完整的甚至连登场人物表都没有的剧本开始着手，仔细研究这个作家的全部遗留作品，并主要着眼于普劳图斯所用的语言。或许就是他首先促成了这些剧本的公演。之后，蓬波尼乌斯·拉埃图斯也从事同一问题的研究，当普劳图斯的剧本在高级圣职人员家里上演时，他会担任戏剧的导演。乔维奥提到的这些戏剧在1520年以后上演的次数已不如从前，我们在前文提到的雄辩术的衰落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We may mention, in conclusion, the analogy between Ciceronianism in literature and the revival of Vitruvius[2] by the architects in the sphere of art. And here, too, the law holds good which prevails elsewhere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that each artistic movement is preceded by a corresponding movement in the general culture of the age. In this case, the interval is not more than about twenty years, if we reckon from Cardinal Adrian of Corneto (1505?) to the first avowed Vitruvians.

总之，我们可以说在文学上西塞罗主义和建筑家们在艺术领域内对维特鲁威[2]　建筑艺术的复兴二者具有相似之处。每种艺术运动都有一种当时一般文化上相应的运动为其先导，这条在文艺复兴史其他方面适用的规律在这里也同样有效。至于建筑艺术，如果我们从科尔内

托的枢机主教阿德里安（1505？年）算到第一批以维特鲁威派自居的建筑家们为止，这个时间段不到20年。

2: [Vitruvius Pollio, working at the time of the Emperor Augustus, was the author of the only known ancient text on architecture, De architectura.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both in language and in style, but was known throughout the Middle Ages. A manuscript is supposed to have been rediscovered by Poggio Bracciolini in a Swiss monastery and to have excited the interest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Renaissance architects. Alberti's own treatise, De re aedificatoria, is obviously modeled upon it, and he frequently mentions Vitruvius disparagingly: the editip princeps of Alberti is Rome, 1485, and that of Vitruvius, also Rome, is probably i486. The first attempt at a critical edition of Vitruvius is by Fra Giocondo, Venice, 1511, and the first Italian translation is by Cesariano, Como, 1521. A sixteenth-century attempt at a full-scale critical edition, fully illustrated, was proposed by a special Vitruvian Academy in Rome, but got no further than an edition by Philander (1544).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edi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as that by Daniele Barbaro, with woodcuts by Palladio, Venice, 1556 and later.]

2: 维特鲁威·波利奥的创作时期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他是目前已知的西方古代唯一一部建筑著作《建筑十书》的作者。无论从语言还是风格来说，这都是一部难以理解的著作，但是在整个中世纪却众人皆知。本作的手稿应该是波焦·布拉乔利尼在瑞士的一座修道院里发现的，这部书稿唤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代建筑家们的兴趣与热情。显然，阿尔伯蒂的《论建筑》是对《建筑十书》的模仿，而他却时常以轻蔑的口吻提到维特鲁威：阿尔伯蒂的《论建筑》是在罗马于1485年出版的，而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也是在罗马，但是约于1486年出版。《建筑十书》的第一部评述版是由弗拉·乔康多所著，在威尼斯于1511年出版，而《建筑十书》的意大利文版则由科摩的塞萨里亚诺翻译，于1521年第一次出版。在16世纪时，罗马一个专门的维特鲁威派学院计划对《建筑十书》做一个全面的且包括所有插图的评注本，但是1544年菲兰德版比其做得更好。目前16世纪中最重要的版本是达尼埃莱·巴尔巴罗版，这版还配以帕拉第奥的木版画，于1556年及之后在威尼斯出版。

Neo-Latin Poetry

近代拉丁诗歌

The chief pride of the humanists is, however, their modern Latin poetry. It lies within the limits of our task to treat of it, at least in so far as it serves to characterize the humanist movement.

然而，人文主义者的主要成就是近代拉丁诗歌。这些诗歌至少就

目前来说，能够一定程度上呈现人文主义运动的特征，因此，本书会对这些诗歌做必要的论述。

How favorable public opinion was to that form of poetry, and how nearly it supplanted all others, has been already shown. We may be very sure that the most gifted and highly developed nation then existing in the world did not renounce the use of a language such as the Italian out of mere folly and without knowing what they were doing. It must have been a weighty reason which led them to do so.

当时这种近代新体的拉丁诗歌受到了公众舆论的迎合，几乎取代了其他所有类型的诗歌，其规模与程度前文已经有所体现。我们坚信像意大利这样一个在当时世界上最富才气、发展成熟的民族不会平白无故地放弃某种语言，之所以废置意大利语，绝非一时糊涂，而一定是事出有因，而且一定是某种重大的原因。

This cause was the devotion to antiquity. Like all ardent and genuine devotion it necessarily prompted men to imitation. At other times and among other nations we find many isolated attempts of the same kind. But only in Italy were the two chief conditions present which were needful for the continu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eo-Latin poetry: a general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among the instructed classes, and a partial re-awakening of the old Italian genius among the poets themselves—the wondrous echo of a far-off strain. The best of what is produced under these conditions is not imitation, but free production. If we decline to tolerate any borrowed forms in art, if we either set no value on antiquity at all, or attribute to it some magical and unapproachable virtue, or if we

will pardon no slips in poets who were forced, for instance, to guess or to discover a multitude of syllabic quantities, then we had better let this class of literature alone. Its best works were not created in order to defy criticism, but to give pleasure to the poet and to thousands of his contemporaries.

而这个原因就是当时的人们对古典文化的崇奉，一如既往的热切且真诚，由此掀起了对古典文化的模仿热潮。在其他时候和其他国家我们发现了许多孤立的同类尝试。当时近代拉丁诗歌要延续和发展必须有两个条件，首先是有教养的阶层要普遍对这种形式的诗歌感兴趣。第二，现有诗人中那部分老一代意大利学者们要一定程度上觉醒复苏——正如来自远方的美妙诗韵开始回响。而这两个条件当时只有意大利才具备，此时模仿行为已难以为继，只有通过自由创作才能创造出最好的作品。如果我们不能容忍任何艺术上的形式借鉴，如果我们认为古典文化要么只是故弄玄虚、难以接近，要么一无是处，如果诗人们被迫苦苦推敲和寻找音节数而我们却不能原谅他们的任何小错误，那么我们最好不要碰这类文学作品。最好的作品不是为了回击批评之声，而是拿来给诗人和成千上万同代人玩味和欣赏的。

The least success of all was attained.by the epic narratives drawn from the history or legends of antiquity. The essential conditions of a living epic poetry were denied, not only to the Romans who now served as models, but even to the Greeks after Homer. They could not be looked for among the Latins of the Renaissance. And yet the *Africa* of Petrarch probably found as many and as enthusiastic readers and hearers as any epos of modern times. The purpose and origin of the poem are not without interest. The fourteenth century recognized with sound historical tact the time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as the noonday of Roman greatness; and Petrarch could not resist writing of this time. Had Silius Italicus

been then discovered, Petrarch would probably have chosen another subject; but, as it was, the glorification of Scipio Africanus the Elder was so mu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at another poet, Zanobi di Strada, also proposed to himself the same task, and only from respect for Petrarch withdrew the poem with which he had already made great progress. If any justification were needed for the *Africa,* it lies in the fact that in Petrarch's time and afterwards Scipio was as much an object of public interest as if he were then alive, and that he was held by many to be a greater man than Alexander, Pompey and Caesar. How many modern epics treat of a subject at once so popular, so historical in its basis, and so striking to the imagination? For us, it is true, the poem is unreadable. For other themes of the same kind the reader may be referred to the histories of literature.

相比之下，那些取材于古代历史或古代传说的叙事诗所取得的成就少之又少。因为要写出一篇生动叙事诗所需的条件，不仅被奉为典范的古罗马人不具备，就连荷马以后的希腊人都不具备，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诗人也缺少这样的条件。不过彼特拉克和他的《阿非利加》仍拥有许多忠诚热情的读者与听众，丝毫不逊于任何一部近代叙事诗。说起这部诗的起源和主题，还是让人饶有兴致的。如果我们用正确的历史眼光来看待14世纪的罗马，会发现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的罗马正如日中天，因此彼特拉克当时一定会记叙这段历史，好在当时的执政官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对此没有察觉，否则彼特拉克可能就要另换主题了，但无论如何，彼特拉克诗中对非洲的征服者大西庇阿的颂扬与14世纪精神主题非常吻合，诗人扎诺比·达·斯特拉达当时也有意这么做，后来出于对彼特拉克的尊重放弃了已经快要成型的作品。如果写作《阿非利加》需要理由，那么理由就是在彼特拉克的时代甚至在那之后西庇阿都深得民心，仿佛他当时还活着一样，在很多人心中他的地位甚至比亚历山大、庞培和恺撒大帝还要高。作为一部叙事诗

的主题，能如此有历史底蕴，如此引人入胜又受人拥护，实在少见。但对我们来说，这部诗的确晦涩难懂。同样类型的叙事诗还有其他主题，读者们可以参考文学史。

A richer and more fruitful vein was discovered in expanding and completing the Greco-Roman mythology. In this too Italian poetry began early to take a part, beginning with the *Teseide* of Boccaccio, which passes for his best poetical work. Under Martin V, Maffeo Vegio wrote in Latin a thirteenth book to the *Aeneid;* besides which we meet with many less considerable attempts, especially in the style of Claudian—a *Meleagris,* a *Hesperis,* and so forth. Still more curious were the newly invented myths, which peopled the fairest regions of Italy with a primeval race of gods, nymphs, genii and even shepherds, the epic and bucolic styles here passing into one another. In the narrative or conversational eclogue after the time of Petrarch, pastoral life was treated in a purely conventional manner, as a vehicle of all possible feelings and fancies; and this point will be touched on again in the sequel. For the moment, we have only to do with the new myths. In them, more clearly than anywhere else, we see the double significance of the old gods to the men of the Renaissance. On the one hand they replace abstract terms in poetry, and render allegorical figures superfluous; and, on the other, they serve as free and independent elements in art, as forms of beauty which can be turned to some account in any and every poem. The example was boldly set by Boccaccio, with his fanciful world of gods and shepherds who people the country round Florence in his *Ninfale d'Ameto* and *Ninfale Fiesolano.* Both these poems were written in Italian. But the masterpiece in this style was the *Sarca* of Pietro Bembo, which tells how the river-god of that name wooed the nymph Garda; of the brilliant marriage feast in a cave of Monte Baldo; of the prophecies of Manto, daughter of

Tiresias; of the birth of the child Mincius; of the founding of Mantua, and of the future glory of Virgil, son of Mincius and of Maia, nymph of Andes. This humanistic rococo is set forth by Bembo in verses of great beauty, concluding with an address to Virgil, which any poet might envy him. Such works are often slighted as mere declamation. This is a matter of taste on which we are all free to form our own opinion.

我们在详述、研究希腊-罗马神话时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就好像发现了一条丰富多产的矿脉，在这个矿脉里我们找到了蕴藏已久的意大利诗歌，首先发现了薄伽丘的《苔塞伊达》，相传这是他最好的诗作，还有马费奥·维吉奥在马丁五世统治时期用拉丁语写的第13册《埃涅阿斯纪》，这些著作旁边还有部分小作品，克劳狄安风格的尤其多，像是《墨勒阿革洛斯》《赫斯珀瑞斯》等等。新创作的神话则更加引人入胜，将叙事诗体和田园诗体相互融合，记叙了美丽神奇的意大利大地上有关原始神、仙女、妖怪和牧羊人的神话故事。在后彼特拉克时代记叙体和对话体的牧歌中，人们也开始因袭地描写田园生活，以此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幻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后文还会提及。现在我们只能谈谈这些新的神话故事，透过故事内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叙述古代诸神的故事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具有双重意义。这些神话故事一方面代替了诗歌中抽象的词语，淘汰了那些多余难懂的隐喻，另一方面又将其精妙的构思渗透到了各种其他诗体中，形成了一种自由且独立的艺术形式。薄伽丘的《亚美托的女神们》和《菲埃索拉的女神》是这类作品的大胆先行者，叙写的是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有关女神和牧羊人的奇幻故事。但是这类作品当时的代表作是彼得罗·本博的《萨尔卡河》，本博用美妙的诗篇将人文主义的精巧与华丽显现得淋漓尽致：河神萨尔卡对女神加尔达的求婚、巴尔多山洞里盛大的婚宴、提瑞西阿斯之女曼托的预言、小明希乌斯的出生、曼图亚的建立、明希乌斯与安第斯女神迈亚之子维吉尔荣耀的未来等等。诗篇结尾还为维吉尔做了一篇精彩绝伦的致辞，足以羡煞当时任何诗人。但后来，很多人认为这类作品只不过是一种口

若悬河的演说词而已，当然每个人的鉴赏水平不同，众说纷纭。

Further, we find long epic poems in hexameters on biblical or ecclesiastical subjects. The authors were by no means always in search of preferment or of papal favor. With the best of them, and even with less gifted writers, like Battista Mantovano, the author of the *Parthenice,* there was probably an honest desire to serve religion by their Latin verses—a desire with which their half-pagan conception of Catholicism harmonized well enough. Gyraldus goes through a list of these poets, among whom Vida, with his *Christiad,* and Sannazaro, with his three books, *De partu virginis,* hold the first place. Sannazaro (b. 1458, d. 1530) is impressive by the steady and powerful flow of his verse, in which Christian and pagan elements are mingled without scruple, by the plastic vigour of his description, and by the perfection of his workmanship. He could venture to introduce Virgil's fourth eclogue into his song of the shepherds at the manger without fearing a comparison. In treating of the unseen world, he sometimes gives proofs of a boldness worthy of Dante, as when King David in the Limbo of the Patriarchs rises up to sing and prophesy, or when the Eternal, sitting on the throne clad in a mantle shining with pictures of all the elements, addresses the heavenly host. At other times he does not hesitate to weave the whole classical mythology into his subject, yet without spoiling the harmony of the whole, since the pagan deities are only accessory figures, and play no important part in the story. To appreciate the artistic genius of that age in all its bearings, we must not refuse to notice such works as these. The merit of Sannazaro will appear the greater, when we consider that the mixture of Christian and pagan elements is apt to disturb us much more in poetry than in the plastic arts. The latter can still satisfy the eye by beauty of form and color, and in general are much more

independent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ubject than poetry. With them, the imagination is interested chiefly in the form, with poetry, in the matter. Honest Battista Mantovano in his calendar of the festivals tried another expedient. Instead of making the gods and demigods serve the purposes of sacred history, he put them, as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did, in active opposition to it. When the angel Gabriel salutes the Virgin at Nazareth, Mercury flies after him from Carmel, and listens at the door. He then announces the result of his eavesdropping to the assembled gods, and stimulates them thereby to desperate resolutions. Elsewhere, it is true, in his writings, Thetis, Ceres, Aeolus and other pagan deities pay willing homage to the glory of the Madonna.

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圣经和教会题材的长篇叙事诗，多为六音步诗形式。这些诗的作者们绝非是一味地为了升迁而讨好教皇。无论是像《处女神》的作者巴蒂斯塔·曼托瓦诺这样天资平庸的诗人，还是那些天赋异禀的诗人，他们用拉丁诗服务于宗教的愿望有些也许是真实的，这种愿望与他们半异教的天主教思想足够一致。在历史学家吉拉尔德斯列出的诗人与作品中，当属维达的《基督记》和桑纳扎罗的三卷《处女的分娩》居首。在桑纳扎罗（1458-1530）高超绝伦的技巧和鲜活明快的风格下，基督教和异教元素在诗中毫无顾忌地融合，其诗文行云流水，掷地有声，十分引人注目。桑纳扎罗还大胆地将维吉尔的第四牧歌引入自己的选段《马槽边的牧羊人》当中，无惧被拿来比较。在描写虚拟灵魂世界时，他更是有但丁一样的胆识，正如他诗中描写的，大卫王在古圣祖地狱边境起身吟咏预言、上帝高坐王位身披闪亮元素斗篷鼓舞天使大军。在桑纳扎罗的其他作品里，我们能看到他将整个古典神话融入主题，果断但不突兀，因为异教之中的神在故事中只是配角而不是主角，所以原文整体的和谐性没有遭到破坏。要想从多种角度品味那个年代的意大利艺术气质，这些作品我们不得不看。从以下角度来看，桑纳扎罗作品的优点尤其明显：与造型艺术相比，诗歌中的基督教元素和异教元素的结合更令我们费神，

前者仅凭颜色和形式就能满足人们的视觉美感，在主题的意义方面通常独立得多。如果说造型艺术是给形式上的想象力插上了一对翅膀，那么诗歌艺术则是给内容上的想象力插上了一对翅膀。连率真的巴蒂斯塔·曼托瓦诺都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法，在其节日历中他没有让神和半神服务于圣史的发展主线，而是仿效教父的做法，让他们成为圣史发展的反对力量。举个例子，有一次信使墨丘利从卡尔迈勒山开始一路跟踪加百列天使到拿撒勒，然后在加百列向圣母玛利亚行礼时，在门口偷听他们的讲话，随后他回去向诸神通风报信并怂恿他们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决定。确实，在他作品里的其他地方，忒提斯、刻瑞斯、埃俄罗斯以及其他异教神祇都心甘情愿地向圣母玛利亚的荣光致敬。

The fame of Sannazaro, the number of his imitators, the enthusiastic homage which was paid to him by the greatest men, all show how dear and necessary he was to his age.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Reformation he solved for the Church the problem of whether it were possible for a poet to be a Christian as well as a classic; and both Leo and Clement were loud in their thanks for his achievements.

桑纳扎罗誉满天下，他被很多人当作效法的对象，也收到了许多一流人物的热情致敬，由此可见，桑纳扎罗的地位在那个时代被视若珍宝、不可取代。宗教改革初期，他更是解决了诗人不能既是基督教徒又是艺术家的问题，其取得的辉煌成就令利奥和克莱门特高声称赞、感激不已。

And, finally, contemporary history was now treated in hexameters or distichs, sometimes in a narrative and sometimes in a panegyrical style, but most commonly to the honor of some prince or princely family. We thus meet with a*Sforziad,* a *Borseid,* a

Laurentiad, a *Borgiad,* a *Trivulziad* and the like. The object sought after was certainly not attained; for those who became famous and are now immortal owe it to anything rather than to this sort of poem, for which the world has always had an ineradicable dislike, even when they happen to be written by good poets. A wholly different effect is produced by smaller, simpler and more unpretentious scenes from the lives of distinguished men, such as the beautiful poem on Leo X's 'Hunt at Palo', or the 'Journey of Julius II' by Adrian of Corneto. Brilliant descriptions of hunting-parties are found in Ercole Strozzi, in the above-mentioned Adrian, and in others; and it is a pity that the modern reader should allow himself to be irritated or repelled by the adulation with which they are doubtless filled. The masterly treatment and the considerable historical value of many of these most graceful poems, guarantee to them a longer existence than many popular works of our own day are likely to attain.

当代史最终也用六音步诗和押韵对诗的形式呈现了出来，有时是叙事体的，有时是颂词体的，但这些诗最多的是写给君主和王室贵族的，也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如《斯福尔扎记》《博尔索记》《洛伦佐记》《波吉亚记》和《特里武尔齐奥记》一类的作品。这当然远远不能满足当时人们追求的目标，那些不朽的诗人肯定也不是因为这类作品而名垂青史的，尽管也不排除个别出自优秀诗人，但当时人们对这类作品似乎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相反，那些短小朴素的诗作没有那么多华丽浮夸的辞藻，却很受欢迎，叙述的都是当时的名人贤士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像科尔内托的阿德里安写的幽美诗篇《朱利叶斯二世之旅》和有关利奥十世的诗《帕洛狩猎》。从阿德里安和埃尔科莱·斯特罗齐还有其他人的诗中还可以读到有关猎队的壮丽描写，当然这些文字肯定都是奉承恭维，不过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如果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反感厌恶，甚至读都不想读了，实在可惜。这些优雅朴素的诗篇不仅构思高超精妙，而且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也正是这个原

因，它们比许多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流行作品更有生命力。

In general, these poems are good in proportion to the sparing use of the sentimental and the general. Some of the smaller epic poems, even of recognized masters, unintentionally produce, by the ill-timed introduction of mythological elements, an impression that is indescribably ludicrous. Such, for instance, is the lament of Ercole Strozzi on Cesare Borgia. We there listen to the complaint of Rome, who had set all her hopes on the Spanish popes, Calixtus III and Alexander VI, and who saw her promised deliverer in Cesare. His history is related down to the catastrophe of 1503. The poet then asks the muse what were the counsels of the gods at that moment, and Erato tells how, upon Olympus, Pallas took the part of the Spaniards, Venus of the Italians, how both then embrace the knees of Jupiter, how thereupon he kisses them, soothes them, and explains to them that he can do nothing against the fate woven by the Parcae, but that the divine promises will be fulfilled by the child of the House of Este-Borgia. After relating the fabulous origin of both families, he declares that he can confer immortality on Cesare as little as he could once, in spite of all entreaties, on Memnon or Achilles; and concludes with the consoling assurance that Cesare, before his own death, will destroy many people in war. Mars then hastens to Naples to stir up war and confusion, while Pallas goes to Nepi, and there appears to the dying Cesare under the form of Alexander VI. After giving him the good advice to submit to his fate and be satisfied with the glory of his name, the papal goddess vanishes 'like a bird'.

一般来说，这些诗篇之所以富有美感是因为作者们惜字如金，将诗中情感成分和一般成分的比例控制得恰到好处。也有一些短小的叙

事诗，虽然出自名家之手，但是引用的神话故事很不合时宜，无意中给人一种难以名状的荒谬感。例如在埃尔科莱·斯特罗齐写给切萨雷·波吉亚的挽歌中，我们仿佛听到了罗马在悲叹，她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西班牙教皇加里斯都三世和亚历山大六世身上，并在切萨雷·波吉亚身上看到了救主的影子。斯特罗扎叙写到1503年的那场灾祸时，他问缪斯女神当时诸神是怎么决策的，缪斯女神埃拉托告诉他当时在奥林匹斯山上，帕拉斯和维纳斯拥簇在朱庇特膝前，一个为西班牙人说话，一个为意大利人求情，朱庇特听后俯下身去亲吻并安慰她们："帕耳开编织的命运谁也无法改变，不过神圣的诺言和愿望将降临到埃斯特和波吉亚家族的下一代身上。"朱庇特还告诉她们尽管这两个家族功名显赫，尽管有无数的恳求祈福，但是他对切萨雷·波吉亚所能做的最多也只能像他当时对曼农和阿基里斯所做的那样。不过朱庇特最后安慰她们："切萨雷这一生肯定是战功赫赫、离世前定能杀敌无数。"于是战神玛尔斯就赶赴那不勒斯挑起了混乱与战争。而帕拉斯则赶到了内皮，变成了亚历山大六世的样子，在切萨雷临死前俯下身去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此生能获此荣耀已是命运的眷顾，应该知足安息。然后帕拉斯女神便翩翩而起，像鸟儿一样，消失在了天空中。

Yet we should needlessly deprive ourselves of an enjoyment, which is sometimes very great, if we threw aside everything in which classical mythology plays a more or less appropriate part. Here, as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art has often ennobled what is in itself purely conventional. The beginnings of parody are also to be found by lovers of that class of literature, e.g. in the *Macaroneid* — to which the comic *Feast of the Gods,* by Giovanni Bellini, forms an early parallel.

不过如果我们不去管那些古典神话的引用是否合适，只用欣赏的眼光和心态去品读这些作品，有时真的是一种享受。文学诗歌艺术和

绘画雕刻艺术一样，都能使原本平淡无奇的事物升华。谐模诗文的爱好者们可以从类似“混淆体狂诗集”的作品中寻找其文学起源，例如早期乔瓦尼·贝利尼的喜剧作品《诸神之宴》就和这类作品很像。

Many, too, of the narrative poems in hexameters are merely exercises, or adaptations of histories in prose, which latter the reader will prefer, where he can find them. At last, everything—every quarrel and every ceremony—came to be put into verse, and this even by the German humanists of the Reformation. And yet it would be unfair to attribute this to mere want of occupation, or to an excessive facility in stringing verses together. In Italy, at all events, it was rather due to an abundant sense of style, as is further proved by the mass of contemporary reports, histories, and even pamphlets, in the *terza rima.* Just as Niccolo da Uzzano published his scheme for a new constitution, Machiavelli his view of the history of his own time, a third, the life of Savonarola, and a fourth, the siege of Piombino by Alfonso the Great, in this difficult metre, in order to produce a stronger effect, so did many others feel the need of hexameters in order to win their special public. What was then tolerated and demanded, in this shape, is best shown by the didactic poetry of the time. Its popularit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s something astounding. The most distinguished humanists were ready to celebrate in Latin hexameters the most commonplace, ridiculous or disgusting themes, such as the making of gold, the game of chess, the management of silkworms, astrology, and venereal diseases *(morbus gallicus),* to say nothing of many long Italian poems of the same kind. Nowadays this class of poem is condemned unread, and how far, as a matter of fact, they are really worth the reading, we are unable to say. One thing is certain, that the epochs far above our own in the sense of beauty—the Renaissance and the Greco-Roman world—could not dispense with

this form of poetry. It may be urged in reply that it is not the lack of a sense of beauty, but the greater seriousness and the altered method of scientific treatment which renders the poetical form inappropriate, on which point it is unnecessary to enter.

六音步的叙事诗中也有许多只是练习之作，有的只是对散文体历史的改编，这类作品很受欢迎，基本上看过的读者都会喜欢。发展到后来，几乎每一件事情，每一段争论，每一个礼节都会用诗的形式呈现出来，甚至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们也这样做。不过，要说写诗仅仅是为了消遣或者认为这就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句子堆砌，未免有些有失公允。在意大利能看到大量用“三音步诗”写的当代故事、历史和文选，足以证明其诗歌盛行是因为意大利对诗歌体裁风格有充分的认识。正如尼科洛·达·乌扎诺发表的新政体计划、马基雅弗利表达的自己对当代历史的见解，接着又相继有人写了萨沃纳罗拉传记、大阿方索包围皮翁比诺。这些诗之所以用六音步等极难的韵律形式写出来是为了增强诗文的表达效果，后来越来越多的人也认为有必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精英群体的关注。这种形式的诗歌到底有哪些是可以写的，哪些是必须写的，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教育诗中得知，不过其在15世纪的流行程度可以说是惊人的。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们动不动就写拉丁文六音步诗来歌颂再常见不过、滑稽可笑或让人作呕的对象，像炼金术、棋赛、养蚕术、占星术、花柳病等等，同类的意大利语长诗就更不用说了。而这类诗如今饱受质疑，很多人认为没有人会去读这些诗，而事实上它们究竟有多少阅读价值还真不好说。不过毫无疑问，在审美观念远远高于现在的文艺复兴和希腊-罗马时代，这类诗歌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有的人认为这些诗歌现在看起来之所以有点不合时宜是因为文体严肃性和科学处理的个别方式产生了变化。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必要深加讨论了。

One of these didactic works has of late years been occasionally republished—the *Zodiac of Life,* by Marcellus Palingenius (Pier

Angelo Manzolli), a secret adherent of Protestantism at Ferrara, written about 1528. With the loftiest speculations on God, virtue and immortality, the writer connects the discussion of many questions of practical life, and is, on this account, an authority of some weight in the history of morals. On the whole, however, his work must be considered as lying outside the boundaries of the Renaissance, as is further indicated by the fact that, in harmony with the serious didactic purpose of the poem, allegory tends to supplant mythology.

马塞勒斯·帕林吉尼斯（皮耶尔·安吉洛·曼佐利）的《生活的黄道带》近年来不时地重复发行，作者是一名新教的秘密信徒，于1528年在费拉拉完成这部作品。这是一部道德说教类型的作品，作者把很多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同上帝、美德、永生这些最崇高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因此奠定了其在伦理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他的这部作品又不能算作文艺复兴范围内的作品，因为为了达到教育诗更加严肃的说教目的，这部作品更倾向于引用寓言和比喻而非神话故事。

But it was in lyric, and more particularly in elegiac, poetry that the poet-scholar came nearest to antiquity; and next to this, in epigram.

事实上，最接近古典诗歌的是这些诗人学者的抒情诗歌，尤其是挽歌，其次是讽刺诗。

In the lighter style, Catullus exercised a perfect fascination over the Italians. Not a few elegant Latin madrigals, not a few little

satires and malicious epistles are mere adaptations from him; and the death of parrots and lapdogs is bewailed, even where there is no verbal , in precisely the tone and style of the verses on Lesbia's sparrow. There are short poems of this sort, the date of which even a critic would be unable to fix, in the absence of positive evidence that they are works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在意大利，风格轻松的诗歌也曾风靡一时，这多亏了卡图卢斯，不少优美的牧歌、讽刺小短诗和毒舌的书信体诗都是对卡图卢斯作品的改编。诗人为小狗和鹦鹉之死写的悼词虽然在字词上不同，但其所用的风格和语气绝对和《莱斯比亚的麻雀》别无两样。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些短诗一定是15、16世纪的作品，就算是鉴定家，目前也无法确定它们的写作年代。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find scarcely an ode in the Sapphic or Alcaic metre which does not clearly betray its modern origin. This is shown mostly by a rhetorical verbosity, rare in antiquity before the time of Statius, and by a singular want of the lyrical concentration which is indispensable to this style of poetry. Single passages in an ode, sometimes two or three strophes together, may look like an ancient fragment; but a longer extract will seldom keep this character throughout. And where it does so, as, for instance, in the fine 'Ode to Venus', by Andrea Navagero, it is easy to detect a simple paraphrase of ancient masterpieces. Some of the ode-writers take the saints for their subject, and invoke them in verses tastefully modeled after the pattern of analogous odes of Horace and Catullus. This is the manner of Navagero, in the 'Ode to the Archangel Gabriel', and particularly of Sannazaro who goes still further in his appropriation of pagan sentiment. He celebrates above all his patron saint, whose chapel was attached to his lovely villa on the

shores of Posillipo, 'there where the waves of the sea drink up the stream from the rocks, and surge against the walls of the little sanctuary'. His delight is in the annual feast of St Nazzaro, and the branches and garlands with which the chapel is hung on this day seem to him like sacrificial gifts. Full of sorrow, and far off in exile, at St Nazaire, on the banks of the Loire, with the banished Federigo of Aragon, he brings wreaths of box and oak leaves to his patron saint on the same anniversary, thinking of former years, when all the youth of Posillipo used to come forth to greet him on flower-hung boats, and praying that he may return home.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用沙弗诗体和阿尔凯奥斯诗体韵律写的颂诗都流露出了近代诗歌的起源特点。尤其体现在这类诗歌冗长的修辞上，这种手法在斯塔提乌斯时代之前的古典文学中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些诗歌无一例外地表达出了一种集中抒情的单纯愿望，这些都是与当时那个时代不符的。单拿出颂歌中的某一段或者把两三个诗节拼凑在一起，也许还有点像古代诗歌的一部分，但是段落一长文学风格就保持不住了。有时即便能够保持住这种风格，像安德烈亚·纳瓦格罗的《维纳斯颂》，也让人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只不过是对古代名作的简单意译罢了。有一些以圣徒为写作主题的诗人会以贺拉斯和卡图卢斯的类似作品为模板来写高雅文艺的诗歌，以向圣徒祈求。纳瓦格罗在写有关大天使加百列的颂歌时就是如此，桑纳扎罗更是如此，他将异教情感进一步吸收进了诗歌里，在诗歌中特别赞颂了他的守护圣徒，那个圣徒的教堂就在他波西利波海岸的小村庄里，他在诗中写道："海浪冲刷着教堂的岩壁，吞纳着那些从岩壁中跻身而出的溪流。"最让桑纳扎罗开心的就是圣纳扎罗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教堂里悬挂的花枝和花环在他眼里就像是祭祀的礼物。满怀悲伤，流浪远方，在卢瓦尔河的海岸圣纳泽尔，身旁坐着遭阿拉贡王朝流放的费德里戈，借着这个一年一度的节日，桑纳扎罗为他的守护神献上了盒装的花圈和几片橡树叶，这似曾相识的画面勾起了他对过往的回忆，那时波西利波的年轻人听说他回来了会乘着满载鲜花的小船去迎接他，

并祈祷祝福他下次还能平安回到故乡。

Perhaps the most deceptive likeness to the classical style is borne by a class of poems in elegiacs or hexameters, whose subject ranges from elegy, strictly so-called, to epigram. As the humanists dealt most freely of all with the text of the Roman elegiac poets, so they felt themselves most at home in imitating them. The elegy of Navagero addressed to the night, like other poems of the same age and kind, is full of points which remind us of his models; but it has the finest antique ring about it. Indeed Navagero always begins by choosing a truly poetical subject, which he then treats, not with servile imitation, but with masterly freedom, in the style of the Anthology, of Ovid, of Catullus, or of the Virgilian eclogues. He makes a sparing use of mythology, only, for instance, to introduce a sketch of country life, in a prayer to Ceres and other rural divinities. An address to his country, on his return from an embassy to Spain, though left unfinished, might have been worthy of a place beside the *'Bella Italia, amate sponde'* of Vincenzo Monti, if the rest had been equal to this beginning:

哀挽类和六音步型的诗歌风格看起来与古典诗歌（古希腊罗马诗歌）的风格很像，内容包含严格意义上的挽歌一直到讽刺类型的短诗，可能是最能以假乱真的。这其中的原因是当时罗马哀婉派诗人的原作几乎随处可见，人文主义者们觉得仿写起这些作品来简直是得心应手、方便快捷。纳瓦格罗的挽夜歌和当时的同类作品一样，全篇到处是模仿的痕迹，不过纳瓦格罗的作品也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古典诗歌的美感。的确，纳瓦格罗选择的诗歌主题都是饱含诗意的，不过他没有机械地仿写，而是融入了许多高超的、富有创造性的加工，借用了希腊诗歌选集、奥维德、卡图卢斯和维吉尔牧歌的风格。纳瓦格罗对于神话的引用十分谨慎，例如有一次，在写到一份给刻瑞斯谷神和其

他的村落诸神的祷词时，为了描绘出一幅田园生活的画面，他才引用了神话。其中有一部作品，是纳瓦格罗出使西班牙归来所写的致祖国的诗，虽然是一部未竟之作，但是如果余下的部分和开篇一样好，它就足以和文森佐·蒙蒂的《美丽的意大利，我爱你》相媲美，诗的开篇是这样的：

Salve cura Deûm, mundi felicior ora,

诸神的所爱世间尤其幸福之地，祝你无恙，

Formosae Veneris dulces salvete recessus;

美丽的维纳斯的甜蜜之乡，愿你纳详；

Ut vos post tantos animi mentisque labores

唯望我与心神俱极疲劳之余，

Aspicio lustroque libens, ut munere vestro

心情愉快地瞻望你，游览你，

Sollicitas toto depello e pectore curas!

唯望我邀你之惠，自我胸怀，扫尽忧虑。

The elegiac or hexametral form was that in which all higher sentiment found expression, both the noblest patriotic enthusiasm and the most elaborate eulogies on the ruling houses, as well as the tender melancholy of a Tibullus. Francesco Mario Molza, who rivals Statius and Martial in his flattery of Clement VII and the Farnesi, gives us in his elegy to his 'comrades', written from a sick-bed, thoughts on death as, beautiful and genuinely antique as can be found in any of the poets of antiquity, and this without borrowing anything worth speaking of from them. The spirit and range of the Roman elegy were best understood and reproduced by Sannazaro, and no other writer of his time offers us so varied a choice of good poems in this style as he. We shall have occasion now and then to speak of some of these elegies in reference to the matter they treat of.

哀婉类和六步音诗类的形式体裁几乎能表达所有崇高的情感，从最崇高的对爱国主义的热诚到对统治阶层最苦心孤诣的颂扬，再到提布鲁斯作品中表达出的淡淡哀愁。佛朗西斯科·马力欧·莫尔扎对克莱门特七世和法尔内塞家族的恭维奉承和斯塔提乌斯以及马夏尔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病床上曾写了一首挽歌给他“战友”，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把死亡看作一种美，确实这种思想风格在当时几乎任何古典诗作中都能找到，没有借鉴什么特别的值得一提的东西。最能理解和再现罗马挽歌的精神与变化的要属桑纳扎罗了，当时没有哪个诗人能像他一样为我们提供这么多这种体裁的好诗。我们在讨论这类诗相关问题的时候会时不时地提一提这些诗的内容。

The Latin epigram finally became in those days an affair of serious importance, since a few clever lines, engraved on a monument or quoted with laughter in society, could lay the foundation of a scholar's celebrity. This tendency showed itself early in Italy. When it was known that Guido da Polenta wished to erect a monument at Dante's grave, epitaphs poured in from all directions, 'written by such as wished to *show themselves,* or to honor the dead poet, or to win the favor of Polenta'. On the tomb of the Archbishop Giovanni Visconti (d. 1354) in the cathedral at Milan, we read at the foot of thirty-six hexameters: 'Master Gabrius de Zamoreis of Parma, Doctor of Laws, wrote these verses.' In course of time, chief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rtial, and partly of Catullus,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of this sort was formed. It was held the greatest of all triumphs when an epigram was mistaken for a genuine copy from some old marble, or when it was so good that all Italy learned it by heart, as happened in the case of some of Bembo's. When the Venetian government paid Sannazaro 600 ducats for a eulogy in three distichs, no one thought it an act of generous prodigality. The epigram was prized for what it was, in truth, to all the educated classes of that age—the concentrated essence of fame. Nor, on the other hand, was any man then so powerful as to be above the reach of a satirical epigram, and even the most powerful needed, for every inscription which they set before the public eye, the aid of careful and learned scholars, lest some blunder or other should qualify it for a place in the collections of ludicrous epitaphs. The epigraph and the epigram were branches of the same pursuit;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former was based on a diligent study of ancient monuments.

后来拉丁讽刺诗终于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如果一个人能写几句足以被刻在纪念碑上的妙语警句，或者能让大众对他写的警句信手拈

来，他就能敲开成为知名学者的大门。这种趋势很早在意大利就已经有所体现。当时圭多·达·波伦塔想在但丁的墓旁立一座纪念碑，消息散播出去以后，各种各样的墓志碑文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写碑文的人有的是为了展现自己的能力，有的是为了纪念但丁，有的只是为了讨取波伦塔的欢心”。在米兰大教堂里，乔瓦尼·维斯孔蒂大主教（卒于1354年）的墓碑上刻着的36首六音步诗的下方，刻着“法学博士，帕尔马的加布里乌斯·迪·扎莫利斯大师所作”的字样。马夏尔对这类作品的演化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卡图卢斯也功不可没，在他们影响之下，久而久之这类作品发展成为了一种广泛的文学形式。如果一首拉丁讽刺短诗能好到让人误以为是抄自古老墓碑上的真迹，甚至好到像本博的作品一样，能让全意大利的人都心慕笔追，那么这首诗就算是百里挑一的成功之作了。当时威尼斯政府为了三个对句的颂诗就给了桑纳扎罗600达克特，但这在当时绝对算不上慷慨之举和挥霍浪费。这些讽刺诗的可贵之处在于诗中的警句对于当时所有有教养的阶层来说，都是名誉的集中体现，是声望的精华。另外，当时所有人无论权力大小，都会受到讽刺诗影响，就算是最有势力的人，在要镌刻自己公布于世的碑铭题词时，都需要渊博学者的细心帮助，查缺补漏，生怕自己的题词出现什么滑稽荒诞的错误，沦为笑柄。碑铭题词和讽刺诗中的警句诗隶属于同一文学的两个分支，对前者的仿制是在不断研习古代纪念碑文的基础之上得来的。

The city of epigrams and inscriptions was, above all others, Rome. In this state without hereditary honors, each man had to look after his own immorta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found the epigram an effective weapon against his competitors. Pius II counts with satisfaction the distichs which his chief poet Campanus wrote on any event of his government which could be turned to poetical account. Under the following popes satirical epigrams came into fashion, and reached, in the opposition to Alexander VI and his family, the highest pitch of defiant invective. Sannazaro, it is true, wrote his verses in a place of comparative safety, but others in the

immediate neighborhood of the court ventured on the most reckless attacks. On one occasion when eight threatening distichs were found fastened to the door of the library, Alexander strengthened his guard by 800 men; we can imagine what he would have done to the poet if he had caught him. Under Leo X, Latin epigrams were like daily bread. For complimenting or for reviling the pope, for punishing enemies and victims, named or unnamed, for real or imaginary subjects of wit, malice, grief or contemplation, no form was held more suitable. On the famous group of the *Virgin with St Anne and the Child,* which Andrea Sansovino carved for Sant' Agostino, no fewer than 120 persons wrote Latin verses, not so much, it is true, from devotion, as from regard for the patron who ordered the work. This man, Johann Goritz of Luxemburg, papal referendary of petitions, not only held a religious service on the feast of St Anne, but gave a great literary dinner in his garden on the slopes of the Capitol. It was then worthwhile to pass in review, in a long poem *De poetis urbanis,* the whole crowd of singers who sought their fortune at the court of Leo. This was done by Franciscus Arsillus—a man who needed the patronage neither of pope nor prince, and who dared to speak his mind, even against his colleagues. The epigram survived the pontificate of Paul III only in a few rare echoes, while the epigraph continued to flourish till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hen it perished finally of bombast.

说起罗马，绝对算得上是警句讽刺诗之城，碑铭题词之都，在这个没有世袭荣耀光环的国度里，每个人都在想着依靠自己的实力流芳百世，这时警句诗、讽刺诗就成了与竞争者对抗的有效武器。庇护二世最器重的诗人康庞努斯将当时政府办的所有大事，只要是能用诗的形式表述的，都用对句诗歌的形式表述了出来，庇护二世对每首诗都会一一过目，觉得十分满意。接下来几个教皇的时代里，这种讽刺性的诗歌引领潮流，挑衅谩骂之风大行其道，并在反对亚历山大六世和

其家族的过程中达到了巅峰。桑纳扎罗在写这些诗的时候确实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但是不少人铤而走险，在紧挨着教廷的地方也敢这么做。有一次，宫廷图书馆的门上发现了八幅挑衅式的对诗，亚历山大随即把他的护卫队扩充到了八百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抓到了这个写诗的人，会如何处置他。到了利奥十世时期，讽刺、警句拉丁诗简直成了家常便饭。无论是对教皇进行赞美或谩骂，还是对敌人和目标进行指名道姓或旁敲侧击式的口诛笔伐，或是为了表达那些亦真亦幻的有关智慧、邪恶、悲伤、沉思的话题，讽刺诗都是不二之选。在安德烈亚·圣索维诺为圣阿戈斯蒂诺教堂所刻的著名的《圣母子与圣安妮》上，有不下于120人题了诗，诚然，更多的人不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是为了在这个项目赞助人面前的“前程”才这么做的。这个赞助人叫约翰·哥利兹，卢森堡人，是教皇的传旨官，曾在圣安妮节主持过宗教仪式，还曾经在加比托利欧的山坡上，也就是他的花园里，举办过文学主题的宴会。当时弗朗西斯库斯·阿尔希路斯写过一篇叫《都市的诗人》的长诗，这是一个既不需要教皇、君主袒护又能对同事直言不讳的诗人，诗中他对利奥时期宫廷上那些为了追逐名利而歌功颂德的诗人大加评论，这在当时是很值得一写的。到了保罗三世之后的几个时代，讽刺、警句诗日渐式微，而一直盛行到17世纪的碑铭题词最终也由于夸大吹捧的风格而走向了灭亡。

In Venice, also, this form of poetry had a history of its own, which we are able to trace with the help of the *Venezia* of Francesco Sansovino. A standing task for the epigram-writers was offered by the mottoes *(brievi)* on the pictures of the doges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ducal palace—two or four hexameters, setting forth the most noteworthy facts in the government of each. In addition to this, the tombs of the doge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bore short inscriptions in prose, recording merely facts, and beside them turgid hexameters or leonine verse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more care was taken with the styl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t is seen at its best; and then soon after came pointless antithesis, prosopopoeia, false pathos,

praise of abstract qualities—in a word, affectation and bombast. A good many traces of satire can be detected, and veiled criticism of the living is implied in open praise of the dead. At a much later period we find a few instances of deliberate recurrence to the old, simple style.

这种形式的诗歌在威尼斯也有一段历史，我们可以拿弗朗西斯科·圣索维诺的《威尼斯史》来对其做一番追溯。当时警句诗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悬挂在公爵总督宫廷里的总督画像题句，用两首或四首六音步诗将每个总督最值得称道的功绩写出来。此外，14世纪各总督的墓碑上有些碑文是用短篇散文写的，仅仅用来叙述事迹，散文下面附有文风浮夸的六音步和利奥体诗。到了15世纪，诗体风格受到了更多的关注；16世纪时，这种风气达到了顶峰，随之而来的是千篇一律的排比、亦步亦趋的语调模仿、虚情假意的情感抒发以及对那些抽象品质的大肆赞扬，总结下来，就是矫揉造作、夸夸其谈。表面上对死者的赞颂实际上暗含对某个生者的批评指责，诗中讽刺的痕迹随处可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从个别例子中发现有一些作品在有意识地回归陈旧简单的文风。

Architectural works and decorative works in general were constructed with a view to receiving inscriptions, often in frequent repetition; while the northern Gothic seldom, and with difficulty, offered a suitable place for them, and in sepulchral monuments, for example, left free only the most exposed parts—namely the edges.

标准和装饰性的建筑一般都会留一块空间专门用于铭刻题词，题词的内容大多是重复的。但是这种情况在北方哥特式的建筑中比较少见，因为在这种建筑中要给铭刻题词找一块合适的地方也的确比较困难，例如墓碑就只能暴露在建筑物外面，一般就是建筑边缘处。

By what has been said hitherto we have, perhaps, failed to convince the reader of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this Latin poetry of the Italians. Our task was rather to indicate its position and necessity in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its own day, a caricature of it appeared—the so-called macaronic poetry. The masterpiece of this style, the *opus macaronicorum,* was written by Merlinus Coccaius (Teofilo Folengo of Mantua). We shall now and then have occasion to refer to the matter of this poem. As to the form—hexameter and other verses, made up of Latin words and Italian words with Latin endings—its comic effect lies chiefly in the fact that these combinations sound like so many slips of the tongue, or the effusions of an over-hasty Latin *improvvisatore.* The German imitations do not give the smallest notion of this effect.

也许我们之前提的这些还不足以向读者展示意大利诗人拉丁诗歌的典型价值。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指出拉丁诗歌在文明发展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当时这种诗流行时出现了一类对其进行讽刺戏谑的诗歌——也就是所谓的混淆体的狂诗。其中的杰作，《混淆体狂诗集》是由梅尔利奴斯·科凯乌斯（曼图亚的泰奥菲洛·弗伦哥）写的。我们后面会时不时地提到这部作品的内容。这类诗多以六音步诗或其他诗体为主要形式，结尾用拉丁文字所写，全篇由拉丁文字和意大利文字构成——其滑稽诙谐之处在于其不同词音的组合，读起来就像舌头一直不断地打滑，也有点像一个做即席创作的拉丁诗人由于过于仓促紧张而念出来的诗。德语的仿作可是一点也达不到这种效果。

Fall of the Humanist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6世纪人文主义者的没落

After a brilliant succession of poet-scholars ha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filled Italy and the world with the worship of antiquity, had determined the forms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had often taken the lead in political affairs and had, to no small extent, reproduced ancient literature—at length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fore their doctrines and scholarship had lost hold of the public mind, the whole class fell into deep and general disgrace. Though they still served as models to the poets, historians and orators, personally no one would consent to be reckoned of their number. To the two chief accusations against them—that of malicious self-conceit, and that of abominable profligacy—a third charge of irreligion was now loudly added by the rising powers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

自14世纪初以来，优秀的诗人学者层出不穷，他们燃起了意大利对古典文化的崇奉之情，对教育和文化的形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国家的政治事务并且很大程度上再造了古典文学；直到16世纪，诗人学者阶层普遍深深地失去了从前的地位，他们的学术理论大势已去、不得民心。诗人、史学家和演说家虽然还会视他们为模范，但是就个人来说，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他们的成员之一。诗人学者们遭到指责打压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们敌视一切的自高自大；二是惹人憎恶的放荡不羁。此外，还有第三点，就是新兴的反宗教改革派给他们加上了无宗教的罪名。

Why, it may be asked, were not these reproaches, whether true or false, heard sooner? As a matter of fact, they were heard at a very early period, but the effect they produced was insignificant, for the plain reason that men were far too dependent on the scholars for their knowledge of antiquity—that the scholars were personally the possessors and diffusers of ancient culture. But the spread of

printed editions of the classics, and of large and well-arranged handbooks and dictionaries, went far to free the people from the necessity of personal intercourse with the humanists, and, as soon as they could be but partly dispensed with, the change in popular feeling became manifest. It was a change under which the good and bad suffered indiscriminately.

或许有人会问，先不管这些责难正确与否，为什么早没有人察觉到呢？事实上，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察觉了，只不过没有造成很明显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当时人们对人文主义学者们过于依赖，依靠他们来获取有关古典文化的知识——人文主义学者们本人就是古典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但是经典著作印刷本及大本排版良好的手册和词典的传播大大降低了人们和人文主义者交流的必要性，并且只要哪怕稍稍远离人文主义者，人们这种情感的变化就会十分明显，觉得有没有人文主义者都可以。这种变化让人饱受煎熬，无分优劣。

The first to make these charges were certainly the humanists themselves. Of all men who ever formed a class, they had the least sense of their common interests, and least respected what there was of this sense. All means were held lawful, if one of them, saw a chance of supplanting another. From literary discussion they passed with astonishing suddenness to the fiercest and the most groundless vituperation. Not satisfied with refuting, they sought to annihilate an opponent. Something of this must be put to the account of their position and circumstances; we have seen how fiercely the age, whose loudest spokesmen they were, was borne to and fro by the passion for glory and the passion for satire. Their position, too, in practical life was one that they had continually to fight for. In such a temper they wrote and spoke and described one another. Poggio's works alone contain dirt enough to create a prejudice against the

whole class—and these*Opere Poggii* were just those most often printed, on the north as well as on the south side of the Alps. We must take care not to rejoice too soon, when we meet among these men a figure which seems immaculate; on further inquiry there is always a danger of meeting with some foul charge, which, even when it is incredible, still discolors the picture. The mass of indecent Latin poems in circulation, and such things as ribaldry on the subject of his own family in Pontano's dialogue, *Antonius,* did the rest to discredit the class. The sixteenth century was not only familiar with all these ugly symptoms, but had also grown tired of the type of the humanist. These men had to pay both for the misdeeds they had done, and for the excess of honor which had hitherto fallen to their lot. Their evil fate willed it that the greatest poet of the nation wrote of them in a tone of calm and sovereign contempt. [3_20]

首先互相指责的当然是人文主义者们自己。纵观当时所有阶层，人文主义者们是最缺少集体利益感的，也是最不尊重集体利益感的。只要看到有机会能取代对方，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只要能达到目标，任何方式在他们眼里都是合理合法的。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讨论可能瞬间就会演变成一场空前激烈的无理骂战，让人瞠目结舌。有时候不满足于相互驳斥，他们甚至还想消灭对方。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和当时这些人文主义者们的立场和环境不无关系。我们从前文了解到，当时那样一个时代是多么地极端和狂热，追名逐利、挖苦讽刺之风大行其道，他们简直是那个时代的最响亮的代言人。同时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还必须不断地为自己的地位、立场而斗争，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们开始恶语相向，用嘴和笔来互相影射对方。单是波焦一个人的作品里，就包含足以让人对整个人文主义者群体产生偏见的污言秽语，而在阿尔卑斯山南北两面地区，“波焦式”的作品又偏偏恰好是发行最多的作品。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些人中遇到了看起来纯洁善良的人，不得不小心，不能高兴得太早，往往进一步交流就有可能遭到恶

意的讽刺挖苦，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极端、不可信，但还是抹黑了人文主义者们的形象。当时流传着大量的语言内容不得体的拉丁诗歌，像庞达诺的对话体作品《安托尼斯》中关于其家族的污秽粗鄙的文字等，让人文主义者们丢尽了脸。到了16世纪，人们对这些丑陋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开始厌倦这类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们为他们先前做出的种种丑陋行径以及所攫取的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荣誉付出了代价。鉴于人文主义者们遭受了这样的厄运，这个国家最伟大的诗人一定会站出来，居高临下地用冷静的笔调对他们进行具有轻蔑意味的评述。[4_32]

Of the reproaches which combined to excite so much hatred, many were only too well founded. Yet a clear and unmistakable tendency to strictness in matters of religion and morality was alive in many of the philologists, and it is a proof of small knowledge of the period, if the whole class is condemned. Yet many, and among them the loudest speakers, were guilty.

所有的这些引起人们怨恨的指责中，有许多其实是有十二分理由的。尽管如此，许多博学的语文学家们仍认为宗教和道德的底线是不能触碰的，这种高要求的风气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当时的整个阶层都受到了谴责，那一定是人们对那个时代了解不多。不过不可否认，有很多人，还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的确是有罪过的。

Three facts explain and perhaps diminish their guilt: the overflowing excess of favor and fortune, when the luck was on their side; the uncertainty of the future, in which luxury or misery depended on the caprice of a patron or the malice of an enemy; and finally, the misleading influence of antiquity. This undermined their morality, without giving them its own instead; and in religious

matters, since they could never think of accepting the positive belief in the old gods, it affected them only on the negative and skeptical side. Just because they conceived of antiquity dogmatically—that is, took it as the model for all thought and action—its influence was here pernicious. But that an age existed which idolized the ancient world and its products with an exclusive devotion was not the fault of individuals. It was the work of an historical providence, and all the culture of the ages which have followed, and of the ages to come, rests upon the fact that it was so, and that all the ends of life but this one were then deliberately put aside.

有三个事实可以解释人文主义者们罪恶的原因，同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们的罪恶：第一，鸿运当头时得到过多恩惠和机遇的眷顾；第二，自己的苦乐因顾主或敌人喜怒哀乐而反复无常，因而感到前途难料；第三，因古典文化的误导而误入歧途。这最后一点不仅没有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道德观，反倒损害了他们自己原有的道德观。在宗教层面，则仅让他们变得更易否定和怀疑，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想过接受古代诸神的正面信仰。正是因为他们教条地去理解古典文化——把古典文化看成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准则，古典文化的影响才如此恶劣。不过在那样一个极度崇奉古代世界和古代作品的时代，这不能说是某些人的个人错误。这种思想观念是历史留下的天然产物，每一个已经到来或将要到来的时代的文化都将基于这些过去的事实，即在那个时代，除了这个目标以外的一切人生目标都被有意撇开。

The career of the humanists was, as a rule, of such a kind that only the strongest characters could pass through it unscathed. The first danger came, in some cases, from the parents, who sought to turn a precocious child into a miracle of learning, with an eye to his future position in that class which then was supreme. Youthful prodigies, however, seldom rise above a certain level; or, if they do,

are forced to achieve their further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at the cost of the bitterest trials. For an ambitious youth, the fame and the brilliant position of the humanists were a perilous temptation; it seemed to him that he too 'through inborn pride could no longer regard the low and common things of life'. He was thus led to plunge into a life of excitement and vicissitude, in which exhausting studies, tutorships, secretaryships, professorships, offices in princely households, mortal enmities and perils, luxury and beggary, boundless admiration and boundless contempt followed confusedly one upon the other, and in which the most solid worth and learning were often pushed aside by superficial impudence. But the worst of all was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humanist was almost incompatible with a fixed home, since it either made frequent changes of dwelling necessary for a livelihood, or so affected the mind of the individual that he could never be happy for long in one place. He grew tired of the people, and had no peace among the enmities which he excited, while the people themselves in their turn demanded something new. Much as this life reminds us of the Greek sophists of the Empire, as described to us by Philostratus, yet the position of the sophists was more favorable. They often had money, or could more easily do without it than the humanists, and as professional teachers of rhetoric, rather than men of learning, their life was freer and simpler. But the scholar of the Renaissance was forced to combine great learning with the power of resisting the influence of ever-changing pursuits and situations. Add to this the deadening effect of licentious excess and—since do what he might, the worst was believed of him—a total indifference to the moral laws recognized by others. Such men can hardly be conceived to exist without an inordinate pride. They needed it, if only to keep their heads above water, and were confirmed in it by the admiration which alternated with hatred in the treatment they received from the world. They are the most striking examples and

victims of an unbridled subjectivity.

人文主义者们的一生照例来说是弱肉强食、危机四伏的一生，只有能力最强的才能全身而退。对有些人来讲，第一个危机来自父母，他们一心想把思想早熟的孩子培养成学习神童，以保证孩子以后能在最高层次的人群中有一席之地，但是神童往往很少大有作为，即便有所作为，要想不断取得更好的成绩，也要以残酷的训练为代价。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人文主义者所能带来的荣誉和地位是一种危险的诱惑。一旦他把自己当作人文主义者，他就会想象“自己也有那种与生俱来的骄傲，所以不必去关注生活中卑微而平凡的东西”。转而投身到一种盛衰浮沉，看似充满激情的生活中：勤苦攻读、教徒授业、出仕为官、主持讲席、高官厚禄、四面树敌、危机四伏，经历荣华富贵和一贫如洗，万人追捧和万人唾弃交织出现的情形。在这样的一生中，最宝贵的真才实学早已被粗鄙浮夸所取代。最惨的是成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几乎注定要居无定所，要么是迫于生计颠沛流离，要么则是心有不甘不愿停留。人文主义者厌倦与人们交流，身处自己招来的敌人中间不得安宁，而人民又不断对他提出新要求。这种生活让我们不禁想起了腓勒司多斯所描写的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希腊诡辩家，不过就算是当时的诡辩家，所处的境遇也要比人文主义者好一些。因为他们更富裕，就算没有钱，日子也要比人文主义者好过，比起做学者，他们作为修辞学老师的生活简单多了，也自由多了。但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既要有渊博的学识，又要能保持定力、不因职业追求和所处环境的日新月异而有所动摇。除此之外，他还要有对于那些放荡厥词的消化能力，因为不管他做什么，人们总是朝最坏的一面想他；同时也要有一套完全不同于常人的道德准则。很难想象这样的学者如果没有一点非同常人的骄傲感要如何活下去。即使只是为了维持他们继续走下去，他们也需要骄傲感，在这个世界给予他们的夹杂着憎恶的称赞声中，他们确认了这种骄傲感。他们既是极端主观主义最鲜明的例子，又是最大的牺牲者。

The attacks and the satirical pictures began, as we have said, at an early period. For all strongly marked individuality, for every kind of distinction, a corrective was at hand in the national taste for ridicule. And in this case the men themselves offered abundant and terrible materials which satire had but to make use of.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Battista Mantovano, in discoursing of the seven monsters, includes the humanists, with many others, under the head *'Superbia'*. He describes how, fancying themselves children of Apollo, they walk along with affected solemnity and with sullen, malicious looks, now gazing at their own shadow, now brooding over the popular praise they hunted after, like cranes in search of food. Bu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indictment was presented in full. Besides Ariosto, their own historian Gyraldus gives evidence of this, whose treatise, written under Leo X, was probably revised about the year 1540. Warning examples from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of the moral disorder and the wretched existence of the scholars meet us in astonishing abundance, and along with these, accusations of the most serious nature are brought formally against them. Among these are anger, vanity, obstinacy, self-adoration, a dissolute private life, immorality of all descriptions, heresy, atheism; further, the habit of speaking without conviction, a sinister influence on government, pedantry of speech, thanklessness towards teachers, and abject flattery of the great, who first give the scholar a taste of their favors and then leave him to starve. The description is closed by a reference to the golden age, when no such thing as science existed on the earth. Of these charges, that of heresy soon became the most dangerous, and Gyraldus himself, when he afterwards republished a perfectly harmless youthful work, was compelled to take refuge beneath the mantle of Duke Hercules II of Ferrara, since men now had the upper hand who held that people had better spend their time on Christian themes than on mythological researches. He justifies himself on the ground that the

latter, on the contrary, were at such a time almost the only harmless branches of study, as they deal with subjects of a perfectly neutral character.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很早的时候人文主义者就开始互相讽刺、进行人身攻击。在当时，对于所有极具个性的个体、任何与众不同的特质，随时都会出现一种符合国民喜好的嘲笑来对此进行纠正。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时普通大众自己就已经贡献出了足够的、数量惊人的素材，讽刺家们和那些讽刺作品只不过是从中借鉴而已。15世纪的巴蒂斯塔·曼托瓦诺在演说中提到七种怪物时，把人文主义者和许多其他人一起划分为“傲慢鬼”的行列。根据他演说中的描述，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们自以为是，把自己看成阿波罗的子孙，走起路来绷着脸，面色阴沉，一副不怀好意、道貌岸然的样子，有时候孤芳自赏、顾影自怜，有的时候又为了哗众取宠而挖空心思，简直就像觅食的野鹤。但是到了16世纪，这种不满与讨骂之声达到了顶峰。不仅仅是阿里奥斯托，人文主义者们当中的历史学家吉拉尔德斯也给出了这段历史的证据，他在利奥十世时期所写的著作可能在1540年做了重新的修订。其中有关古代和近代人文学者道德沦丧、品行卑劣的例子简直让人触目惊心，数量多到让人惊愕不已，同样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他们最严重、最严肃的指责与控诉，控诉他们的种种丑陋行径：愤怒、虚荣、固执、自恋、私生活放荡、行为举止伤风败俗、支持宗教异端、信奉无神论；不止这些，他们信口开河成习惯，对国家产生险恶的影响，演说讲学变成了卖弄学识，忘恩负义代替了尊师重道，对大人物低声下气阿谀奉承。往往这种奉承换来的只是一时之欢、人走茶凉。这篇文章结尾还提了提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学问尚未产生的时代。在所有的这些控诉与谴责当中，宗教异端这一项不久就变成了众矢之的，成为了最大的罪名，连吉拉尔德斯自己当时也被迫投向了费拉拉大公爵赫拉克勒斯二世的庇护，仅仅因为他当时写了一部稍含锐气的作品，尽管这部作品与宗教毫不相悖，但是当时全面占据上风的阶层认为应该更多地把时间精力放在有关基督教主题的创作上，而不应该在神话研究上浪费时间。吉拉尔德斯当时辩解的理由是：神话研究的主题都是完

全中立的，因此恰恰相反，它在当时几乎是唯一一个对基督教无威胁的研究项目。

But if it is the duty of the historian to seek for evidence in which moral judgement is tempered by human sympathy, he will find no authority comparable in value to the work so often quoted of Pierio Valeriano, *On the Infelicity of the Scholar*. It was written under the gloomy impressions left by the sack of Rome, which seems to the writer, not only the direct cause of untold misery to the men of learning, but, as it were, the fulfilment of an evil destiny which had long pursued them. Pierio is here led by a simple and, on the whole, just feeling. He does not introduce a special power, which plagued the men of genius on account of their genius, but he states facts, in which an unlucky chance often wears the aspect of fatality. Not wishing to write a tragedy or to refer events to the conflict of higher powers, he is content to lay before us the scenes of everyday life. We are introduced to men who, in times of trouble, lose first their incomes and then their places; to others who, in trying to get two appointments, miss both; to unsociable misers who carry about their money sewn into their clothes, and die mad when they are robbed of it; to others, who accept well-paid offices, and then sicken with a melancholy longing for their lost freedom. We read how some died young of a plague or fever, and how the writings which had cost them so much toil were burnt with their bed and clothes; how others lived in terror of the murderous threats of their colleagues; how one was slain by a covetous servant, and another caught by highwaymen on a journey, and left to pine in a dungeon, because unable to pay his ransom. Many died of unspoken grief for the insults they received and the prizes of which they were defrauded. We are told of the death of a Venetian, because his son, a youthful prodigy, had died; and the mother and brothers

followed, as if the lost child drew them all after him. Many, especially Florentines, ended their lives by suicide; others through the secret justice of a tyrant. Who, after all, is happy? And by what means? By blunting all feeling for such misery? One of the speakers in the dialogue in which Pierio clothed his argument can give an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the illustrious Gasparo Contarini, at the mention of whose name we turn with the expectation to hear at least something of the truest and deepest which was then thought on such matters. As a type of the happy scholar, he mentions Fra Urbano Valeriano of Belluno, who was for years teacher of Greek at Venice, who visited Greece and the East, and towards the close of his life traveled, now through this country, now through that, without ever mounting a horse; who never had a penny of his own, rejected all honors and distinctions, and after a gay old age, died in his eighty-fourth year, without, if we except a fall from a ladder, having ever known an hour of sickness. And what w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h a man and the humanists? The latter had more free will, more subjectivity, than they could turn to purposes of happiness. The mendicant friar, who had lived from his boyhood in the monastery, and never eaten or slept except by rule, ceased to feel the compulsion under which he lived. Through the power of this habit he led, amid all outward hardships, a life of inward peace, by which he impressed his hearers far more than by his teaching. Looking at him, they could believe that it depends on ourselves whether we bear up against misfortune or surrender to it. 'Amid want and toil he was happy, because he willed to be so, because he had contracted no evil habits, was not capricious, inconstant, immoderate; but was always contented with little or nothing.' If we heard Contarini himself, religious motives would no doubt play a part in the argument—but the practical philosopher in sandals speaks plainly enough. An allied character, but placed in other circumstances, is that of Fabio Calvi of Ravenna, the

commentator of Hippocrates. He lived to a great age in Rome, eating only pulse 'like the Pythagoreans', and dwelt in a hovel little better than the tub of Diogenes. Of the pension which Pope Leo gave him, he spent enough to keep body and soul together, and gave the rest away. He was not a healthy man, like Fra Urbano, nor is it likely that, like him, he died with a smile on his lips. At the age of ninety, in the sack of Rome, he was dragged away by the Spaniards, who hoped for a ransom, and died of hunger in a hospital. But his name has passed into the kingdom of the immortals, for Raphael loved the old man like a father, and honored him as a teacher, and came to him for advice in all things. Perhaps they discoursed chiefly of the projected restoration of ancient Rome, [3_21] perhaps of still higher matters. Who can tell what a share Fabio may have had in the conception of the *School of Athens,* and in other great works of the master?

但是如果说历史学家有责任去寻找证据，证明人类之间的同情能缓和道德的裁判，那么那本常被引用的彼埃利奥·瓦莱里亚诺的著作《论学者的不幸》一定是历史学家们视为珍宝的，其参考价值超过任何一部权威著作。这本著作是作者在经历了罗马大劫后，在极其压抑的心情下写的，在作者看来，这次劫难不仅直接给学者们带来了难以言传的痛苦，更给他们带来了长期以来难以摆脱的厄运。彼埃利奥用以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简单的、大体公正的情感。他没有把那些因为才华横溢而遭到厄运的学者归结为是某种特殊力量的缘故，他只是在阐述事实，那些厄运都只是穿着宿命的外衣罢了。彼埃利奥并不想写一部悲剧，也不想把那些大事件归因于某些深层力量的较量，他只是想为我们呈现日常生活的平凡画面。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深陷困境的人，丢了工作、流离失所；那些一心想身兼数职、一举多得的人，到头来一无所有；那些不谙世故、爱财如命得甚至把钱缝在衣服里的人，因遭劫财而愤懑而终；那些贪恋高官厚禄的人，身在其位后又因失去自由而郁郁寡欢。我们还看到了那些死于瘟疫或热病的年轻学

者，他们殚精竭虑写成的作品和衣裳衾枕一起被烧成灰烬；那些遭到同僚威胁，随时可能被谋杀的人们，生活在焦虑与恐慌中；还有那些被贪婪的仆人杀害的人；那些路上遭劫匪绑架，因无力缴纳赎金而在地牢中憔悴而终的人。这些人大多死于难言之痛，他们受尽屈辱、自己苦心经营换来的成就遭到巧取豪夺。我们从书中了解到当时有一个威尼斯人，他的儿子是一个神童，只可惜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就死了，不久以后他也死了，紧接着祸不单行，这个威尼斯人的母亲兄弟们都相继去世了，就好像这个死去的儿子把他们一家全都带走了。当时很多人，特别是很多佛罗伦萨人都是死于自杀，还有一部分人死于暴君的秘密审判。那么当时到底还有谁是快乐的呢？这种情况下要怎么才能快乐？面对这些痛苦选择麻木不仁吗？彼埃利奥发表的那篇对话体文章中有一个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加斯帕罗·孔塔里尼，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答案，甚至一提到他的名字，我们就觉得哪怕得不到答案，至少我们可以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更加深刻和真实的观点。加斯帕罗·孔塔里尼提到了贝卢诺的乌尔巴诺·瓦莱里亚诺修士，他是一个典型的可以称得上快乐的学者，在威尼斯做过多年的希腊语教师，后来周游希腊和东部，晚年的时候游历过多个国家，竹杖芒鞋轻胜马，他一生贫苦，淡泊名利，晚年生活怡然自得，活到了八十四岁才寿终，据说他除了有一次从梯子上摔下来以外，病都没得过一次。那么他这样一个学者和人文主义者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人文主义者已经被自由意志和主观性所占据，追求快乐的心已经不复存在。乌尔巴诺·瓦莱里亚诺从小就生活在修道院里，是一个托钵修士，寝食活动按部就班，这样的生活让他不再感受到冲动和欲望。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习惯赐予了他力量，让他能够拥有一颗平常心，面对外界的艰难困苦波澜不惊，这些远比他的讲学说教能说服人心。听众只要看着他的人，内心就坚信：是克服不幸还是屈服于不幸全要看我们自己。“之所以能在贫乏劳苦中苦中作乐，是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内心真正想要的，因为他远离一切恶习，从不朝三暮四，从不反复无常，从不漫无节制。而是永远保持知足常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果我们听孔塔里尼自己的叙述，他的论点中少不了宗教动机——但是那个穿着拖鞋有几分哲学家模样的修道士展示得已经够清楚了。拥有类似性格但处境不同的还有法比奥·卡尔维，他来自拉文那，是希波克拉底的批

注者，“像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一样”，他只吃豆子，也十分长寿，住的小屋不比第欧根尼住的那个桶强多少。他把教皇利奥给他的年金大部分都捐了出去，自己只留了一小部分，刚刚够维持生计。法比奥·卡尔维不像乌尔巴诺修士那样身体健康，也不太可能像他一样，死的时候嘴角上还挂着微笑。法比奥·卡尔维90岁的时候经历了罗马大劫，西班牙人把他掳走希望能拿他换一笔赎金，后来因饥饿过度，他死在了一家医院里。但是法比奥·卡尔维的名字已经万古流芳，因为当时拉斐尔敬爱他如自己的父亲，尊崇他如自己的老师，有什么大事小情都会请教他，也许是谈有关重建古罗马的计划 [4_33] ，也许还有更加深不可测的话题。谁能说得准“雅典学派”的创作有多少是法比奥的功劳，又有谁能说得准法比奥在拉斐尔的其他作品中有多大贡献？

We would gladly close this part of our essay with the picture of some pleasing and winning character. Pomponius Laetus, of whom we shall briefly speak, is known to us principally through the letter of his pupil Sabellicus, in which an antique coloring is purposely given to his character. Yet many of its features are clearly recognizable. He was a bastard of the House of the Neapolitan Sanseverini, princes of Salerno, whom he nevertheless refused to recognize, writing, in reply to an invitation to live with them, the famous letter: *'Pomponius Laetus cognatis et propinquis suis, salutem. Quod petites fieri non potest. Valete.'* An insignificant little figure, with small, quick eyes, and quaint dress, he lived,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as professor in the University of Rome, either in his cottage in a garden on the Esquiline hill, or in his vineyard on the Quirinal. In the one he bred his ducks and fowls; the other he cultivated according to the strictest precepts of Cato, Varro and Columella. He spent his holidays in fishing or bird-catching in the Campagna, or in feasting by some shady spring or on the banks of the Tiber. Wealth and luxury he despised. Free himself from envy and uncharitable speech, he would not suffer

them in others. It was only against the hierarchy that he gave his tongue free play, and passed, till his latter years, for a scorner of religion altogether. He was involved in the persecution of the humanists begun by Pope Paul II, and surrendered to this pontiff by the Venetians; but no means could be found to wring unworthy confessions from him. He was afterwards befriended and supported by popes and prelates, and when his house was plundered in the disturbances under Sixtus IV, more was collected for him than he had lost. No teacher was more conscientious. Before daybreak he was to be seen descending the Esquiline with his lantern, and on reaching his lecture-room found it always filled to overflowing. A stutter compelled him to speak with care, but his delivery was even and effective. His few works give evidence of careful writing. No scholar treated the text of ancient authors more soberly and accurately. The remains of antiquity which surrounded him in Rome touched him so deeply that he would stand before them as if entranced, or would suddenly burst into tears at the sight of them. As he was ready to lay aside his own studies in order to help others, he was much loved and had many friends; and at his death, even Alexander VI sent his courtiers to follow the corpse, which was carried by the most distinguished of his pupils. The funeral service in the Aracoeli was attended by forty bishops and by all the foreign ambassadors.

我们很高兴，在本书本章节结束之际，能介绍一个卓有成就又招人喜欢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蓬波尼乌斯·拉埃图斯，我们将对其做简短的介绍，主要通过他给学生萨贝利库斯的书信来对他进行了解。这封信有意给蓬波尼乌斯·拉埃图斯披上一层古老的色彩。蓬波尼乌斯·拉埃图斯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个人特征。他是萨勒诺君主的私生子，有桑瑟夫内洛家族血统，是那不勒斯人。但是蓬波尼乌斯·拉埃图斯从不承认这一点，在接到一封邀请他回家团聚的信函后，他写了那篇著名的

回信“我蓬波尼乌斯·拉埃图斯祝诸位亲人朋友一切安好，但我不能答应你们的条件，再见。”身材矮小、穿着古朴，蓬波尼乌斯·拉埃图斯这个其貌不扬的人物看似普通，却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在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他在罗马大学担任教授，在他埃斯奎利诺山上花园的农舍里，在他奎利纳雷山上的葡萄园里，都能看到他工作生活的身影。在农舍里喂喂鸭子、养养野禽，换个地方又耕耕地、松松土，每次干活时蓬波尼乌斯·拉埃图斯都严格参照加图、瓦罗和科鲁迈拉的理念，一丝不苟。到了假期，他则去康帕尼亚网鱼捕鸟，有时则去台伯河岸边或绿树成荫的泉水之畔野宴怡情。蓬波尼乌斯·拉埃图斯一生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嫉贤妒能、恶语相向这种行为从来不会做，他也无法容忍别人这么做。只有在反对宗教等级制度时，我们才能看到蓬波尼乌斯·拉埃图斯肆言无忌的一面，他作为一个宗教嘲讽者的身份也是到了晚年时才得到追加的。蓬波尼乌斯·拉埃图斯也曾身受教皇保罗二世发动的对人文主义者们的迫害，被威尼斯人押送到了教皇处，但是他问心无愧、从未因逼供而就范。后来，教皇和主教们转而支持扶持了他，西斯科特四世动乱时期进行扫荡洗劫时，他未失反得。在为人师者中，蓬波尼乌斯·拉埃图斯是最认真尽职的了。天未拂晓，他就提着灯笼从埃斯奎利诺山上出发了，到了教室，屋里总是挤满了前来听课的学生。蓬波尼乌斯·拉埃图斯有点口吃，讲起话来不得不小心翼翼，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讲课的稳重和生动。他的作品为数不多，但是每一部都体现着他的严谨和认真，他对待古代作者原著的态度更是严肃小心，没有哪个学者能比得上他。身处罗马，环视古迹，他深感震撼，常不由地怅然若失、泪流满面。蓬波尼乌斯·拉埃图斯非常乐于帮助他人，有时不惜把自己的研究和工作放在一边，也因此深受爱戴、好友众多。在他逝世时，甚至都有亚历山大六世派遣的廷臣为他送葬，抬着他遗体的则是他最优秀、最有成就的学生。他在天坛圣母堂的葬礼，四十个主教和全部外交使节悉数到场。

It was Laetus who introduced and conducted the representations of ancient, chiefly Plautine, plays in Rome. Every year, he celebrated the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ity by

a festival, at which his friends and pupils recited speeches and poems. Such meetings were the origin of what acquired, and long retained, the name of the Roman Academy. It was simply a free union of individuals, and was connected with no fixed institution. Besides the occasions mentioned, it met at the invitation of a patron, or to celebrate the memory of a deceased member, as of Platina. At such times, a prelate belonging to the academy would first say mass; Pomponio would then ascend the pulpit and deliver a speech; someone else would then follow him and recite an elegy. The customary banquet, with declamations and recitations, concluded the festival, whether joyous or serious, and the academicians, notably Platina himself, early acquired the reputation of epicures. At other times, the guests performed farces in the old Atellan style. As a free association of very varied elements, the academy lasted in its original form down to the sack of Rome, and included among its guests Angelus Coloccius, Joh. Corycius and others. Its precise value as an element i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people is as hard to estimate as that of any other social union of the same kind; yet a man like Sadoleto reckoned it among the most precious memories of his youth. A large number of other academies appeared and passed away in many Italian cities,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humanists living in them, and to the patronage bestowed by the great and wealthy. Of these we may mention the Academy of Naples, of which Jovianus Pontanus was the centre, and which sent out a colony to Lecce, and that of Pordenone, which formed the court of the *condottiere* Alviano. The circle of Lodovico il Moro, and its peculiar importance for that prince, has been already spoken of.

正是拉埃图斯引进并推广了一部部极具代表性的古代戏剧巨作，以普劳图斯风格为主，这些经典戏剧在罗马广为流传。每年，拉埃图

斯都会举行周年庆典，邀请他的朋友和学生们共同参与，发表演说，朗诵诗歌，庆祝并纪念罗马城的创立。这种形式就是“罗马学会”的早期起源，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了继承和延续。罗马学会仅仅是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群体，与任何既有的组织都无关系。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周年庆典，罗马学会有时也会受某赞助人的邀请而召开，另外，在祭奠像普拉蒂纳这样逝去的成员时，也会举行。通常在会上，先由一个学会的主教举行弥撒，然后由蓬波尼乌斯登上教坛发表演说，演说过后会有人朗诵挽歌。无论会上的主题是欢快的还是严肃的，典礼都照例伴随着一场盛大的宴会而结束，在慷慨激昂的演说和催人泪下的朗诵声下缓缓落幕。而当时的一些学会会员，很早就获得了美食家的称号，最明显的就是普拉蒂纳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会员们则常常演出老式的亚提拉闹剧。罗马学会组织形式自由，人员成分多样，直到罗马大劫时，仍保持着原有的组织结构，知名的会员有安吉路斯·科洛奇乌斯、约翰·科里奇乌斯等等。作为当时人们精神、智慧生活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罗马学会真正的价值和同类的任何社会组织一样，难以估计；不过像萨多莱托这样的人，会把它当作青年时代最宝贵的记忆。当时在意大利的大地上，不同学会组织中的人文主义者们数量和影响力天差地别，受富豪和名人资助的程度也大不相同，因此新旧更替十分频繁。这些学会中特别值得我们一提的是那不勒斯的学会，其中心人物是乔维诺·庞达诺，并于后来在莱切成立了一个分会。还有波尔代诺内的学会，后来发展成为了雇佣军队长阿尔维亚诺的宫廷组织。洛多维科·摩罗的集团就更不用说了，其对当权者的特别影响我们前文已经有所提及。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se associations seem to have undergone a complete change. The humanists, driven in other spheres from their commanding position, and viewed askance by the men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 lost the control of the academies; and here, as elsewhere, Latin poetry was replaced by Italian. Before long every town of the least importance had its academy, with some strange, fantastic name, and its own

endowment and subscriptions. Besides the recitation of verses, the new institutions inherited from their predecessors the regular banquet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plays, sometimes acted by the members themselves, sometimes under their direction by young amateurs, and sometimes by paid players. The fate of the Italian stage, and afterwards of the opera, was long in the hands of these associations.

大概到了16世纪中叶，这些学会组织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文主义者们失去了可以发号施令的地位，被赶入了其他不同的阶层、领域，随后遭到了蔑视，反宗教改革的人们纷纷对其投以鄙夷的目光，人文主义者们对学会的控制力也随之丧失，而此时此刻，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拉丁诗歌作品已被意大利文作品所代替。不久，最不起眼的城市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学会，名字各个古灵精怪，学会的自有财产和捐款一应俱全。除了诗歌朗诵，新的学会组织沿袭了过去按时举行宴会、上演戏剧的习俗，有时学会的会员会亲自上阵，有时则会由会员指导年轻的新手参加，有时则由花钱聘请的专业演员来表演。意大利戏剧的命运、歌剧的命运，长期地掌握在这些学会组织的手里。

[3_1].For details we must refer the reader to Roscoe, Lorenzo Mag. and Leo X, as well as to Voigt, Enea Silvio, Berlin, 1856-63; and to F. Papencordt, Geschichte der Stadt Rom im Mittelalter, Paderborn, 1857. To form a conception of the extent which stud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had reached, we cannot do better than turn to the Commentarii urbani of Raphael Volaterranus (ed. Basle, 1554, fol. 16, etc.) [cf. note 41]. Here we see how antiquity formed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hief matter of study in every branch of knowledge, from geography and local history, the lives of great and famous men, popular philosophy, morals and the special sciences, dow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whole of Aristotle, with which the work closes. To understand its significance as an authority for the history of culture, we must compare it with all the earlier encyclopedias. A complete and circumstantial account of the matter is given in G. Voigt's admirable work, Die Wiederbelebung des classischen Alterthums, Berlin, 1859 [third edition, Berlin, 1893; this has unfortunately never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3_2].Parenthetically we may quote foreign evidence that Rome in the Middle Ages was looked upon as a quarry. The famous Abbot Sugerius, who about 1140 was in search of lofty pillars for the rebuilding of Saint-Denis, at first thought of nothing less than getting hold of the granite monoliths of the Baths of Diocletian, but later changed his mind. See 'Sugerii Libellus Alter', in Duchesne, Hist. Franc. Scriptores, iv, p. 352 [see E. Panofsky, Abbot Suger and the Abbey Church of Saint-Denis..., 2nd ed., Princeton, 1976]. Charlemagne was doubtless more modest in his requirements.

[3_3].Poggii Opera, fol. 50 ff, 'Ruinarum Urbis Romae Descriptio', written about 1430, shortly before the death of Martin V. The Baths of Caracalla and Diocletian then had their pillars and marble revetments. [Poggio Bracciolini, Opera, Argentorati (i.e. Strasburg), 1513, and Basle, 1538 (reprinted Turin, 1964-6). The passage on the ruins of Rome is reprinted in full in R. Valentini and G. Zucchetti, Codice topografico della citta di Roma, IV, Rome, 1953, 230 ff. There is an abbreviated English translation in The Portable Renaissance Reader, ed. J. Ross and M. McLaughlin, New York, 1958, quoted from Latin Writings of the Italian Humanists, ed. F. Gragg, New York, 1927.]

[3_4].[Blondus of Forli (Flavio Biondo,, Biondo Flavio, Flavius Blondus), Roma instaurata, Rome i47o(?) and later, is now available in R. Valentini and G. Zucchetti (cf. note 51), 247 ff.]

[3_5].See on this point, Nantiporto, in Murat., iii, ii, col. 1094; Infessura, in Eccard, Scriptores, ii, col. 1951; Matarazzo, in the Arch. Stor., xvi, ii, p. 180. [There is a contemporary drawing of this beautiful girl reproduced in F. Saxl, 'The Classical Inscription in Renaissance Art and Polities',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IV, 1940-41, plate 5b.]

[3_6].Quatremere [de Quincy], Storia della vita etc. di Raffaello, ed. Longhena, p. 531. [See now the Italian text in V. Golzio, Raffaello nei documenti..., Vatican City, 1936, 78 ff, and the abbreviated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discussion in R.Jones and N. Penny, Raphael,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3.]

[3_7].Polifilo (i.e. Franciscus Columna), Hypnerotomachia, Venice, Aldus Manutius, 1499, pages unnumbered; extracts in Temanza, p. 12. [The reference to Temanza is to Vite de' piu celebri architteti veneziani..., 2 vols., Venice, 1778, but the Hypnerotomachia Polifili, generally attributed to Fra Francesco Colonna, is now available in modern facsimile reprints, e.g. London, 1963. It is more of an architectural fantasy-novel than a commentary, with many fine woodcuts. Burckhardt's date, 1467, occurs in the text, but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is 1499.]

[3_8].While all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and all the pilgrims speak only of a cave. The poets, too, do without the palace. Compare Sannazaro, De partu virginis, book ii. [Jacopo Sannazaro's poem was published in Rome and Naples in 1526 and in Venice in 1527. The setting of the Nativity in the ruins of a palace—King David's—is especially common in Flemish painting of the fifteenth and early sixteenth centuries, e.g. the Portinari Altarpiece by Hugo van der Goes, c. 1475, which has been in Florence since it was painted.]

[3_9].How the matter was provisionally treated is related in Malipiero, Ann. Veneti, Arch. Stor., vii, ii, pp. 653, 655. [Cardinal Bessarion died in 1472; the Marciana Library opposite St Mark's was begun by Jacopo Sansovino in 1537.]

[3_10].[The tomb of Carlo Marsuppini, called Aretino, who died in 1453, is by Desiderio da Settignano.]

[3_11].The following words of Vespasiano are untranslatable: 'A vederlo in tavola costi antico come era, era una gentilezza.' [The general meaning is that it was a charming spectacle to see him at table, with his antique appearance; antico meaning 'ancient, classical', as opposed to vecchio, 'old'.]

[3_12].[Vespasiano da Bisticci.]

[3_13].Giorn. Napolet. in Muratori, xxi, col. 1127. [See now J. Pope-Hennessy, Italian Renaissance Sculpture (vol. 2 of An Introduction to Italian Sculpture), third edition, Oxford, 1985, and G. Hersey, The Aragonese Arch at Naples, 1443-75, New Haven, 1973.]

[3_14].[For the rebuilding of San Francesco see R. Wittkower, 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in the Age of Humanism, third edition, London, 1962, where the use of the Triumphal Arch on the facade is interpreted as a 'glory' motive.]

[3_15].[For Valla's exposure of the fraudulent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see note 26.]

[3_16].Charles V, when unable on one occasion to follow the flourishes of a Latin orator at Genoa, whispered in the ear of Giovio: 'Ah, my tutor Adrian was right when he told me I should be chastened for my childish idleness in learning Latin.' Paulus Jovius, Vita Hadriani VI. [Adrian of Utrecht, Charles's tutor, became Pope Hadrian VI, 1522-3.]

[3_17].Which, nevertheless, gave some offence to Jac. Volaterranus (in Murat., xxiii, col. 171) at the service in memory of Platina.

[3_18].Vasari, xi, pp. 189, 257; Vite di Sodoma e di Garofalo [Milanesi edition, vi, 379, 457].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profligate women at Rome took the most harmonious ancient names—Julia, Lucretia, Cassandra, Portia, Virginia, Penthesilea, under which they appear in Aretino. It was, perhaps, then that the Jews took the names of the great Semitic enemies of the Romans—Hannibal, Hamilcar, Hasdrubal, which even now they commonly bear in Rome.

[3_19].Paul. Jov., Dialogus de viris litteris illustribus, in Tiraboschi, ed. Venez., 1766, vol. vii, pt. iv. It is well known that Giovio was long anxious to undertake the great work which Vasari accomplished. In the dialogue men-tioned above it is foreseen and deplored that Latin would soon altogether lose its supremacy. [G. Tiraboschi, Storia delta letteratura italiana, 14 vols., Venice, 1772-81. Vasari's autobiography in the final volume of his Lives gives a somewhat colored account of how he was pressed by Giovio, Cardinal Farnese and others to write the lives of the Italian artists (see G. Bull's 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volume of Vasari in the Penguin Classics, 1987, pp. xi-xii). In fact, Giovio's attempt at the lives of Michelangelo, Leonardo and Raphael demonstrates how fortunate it was that Vasari undertook the task.]

[3_20].Ariosto, Satira, vii. The date is 1531.

[3_21].[Fabio Calvi made a translation of Vitruvius for Raphael, who seems to have intended to publish it with his own annotations.]

[4_1].详情请参阅罗斯科《洛伦佐·德·美第奇传》和《利奥十世》以及福格特《埃内亚·西尔维奥》（柏林：1856-1863年版），又菲利克斯·帕本科特的《中世纪罗马城史》（帕德博恩：1857年版）。如要了解16世纪初各种学术所涉及的范围，请参阅拉斐尔·沃拉特拉努斯的《都市杂记》（巴塞尔：1554年版，160页等处）。古典文化贯穿于引言以及正文研究部分的各个分支，包括地理、地方志、伟人和名人传记、通俗哲学、伦理学、专门科学以及亚里士多德所有著作的分析。在介绍完这些分支体系后，这部著作也就收尾了。为了解它作为文学史的权威著作的意义，我们可以参看所有早些时候的百科全书。格奥尔格·福格特在其引以为豪的《古典文化的复兴或人文主义的最初世纪》（柏林：1859年版。第三版，柏林：1893年，本书没有英译本）中曾就此书内容作过全面而详尽的说明。

[4_2].从国外文献资料来看，在中世纪，人们把罗马看作一个采石场。约在1140年，著名的苏格里乌斯院长为了重建圣德尼教堂四处搜求极高的石柱，起初是想把戴

克里先浴场的花岗岩石柱弄到手，但后来却改变了这个主意。见《苏格里的第二疏》，载迪歇纳；《法兰克福史》，第四卷，第352页。见帕诺夫斯基的《苏格里院长和圣德尼教堂修道院》，第二版，普林斯顿：1976年。而查理大帝的要求却不是很高。

[4_3].见《波焦全集》，第50页以下，《罗马城遗迹记述》，约写于1430年，马丁五世去世前不久。当时卡拉卡拉和戴克里先浴场尚有石柱和大理石护壁。波焦·布拉乔利尼的《歌剧》，斯特拉斯堡：1513年版；巴塞尔：1538年版（都灵：1964—1966再版）。古罗马遗迹这篇文章由R·瓦伦蒂尼和G·祖凯蒂出版商再版，载《古罗马地形解码》第4卷，罗马：1953年版，230页以下。英译本精简版见《文艺复兴读者便携本》，J·罗斯和M·麦克劳克林版，纽约，1958；文章引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拉丁语作品》，F·格拉格出版社，纽约，1927。

[4_4].弗拉维奥·比翁多的《罗马建城史》，罗马，1470年，后由R·瓦伦蒂尼和G·祖凯蒂出版社出版，见247页以下。

[4_5].关于这一点，见南蒂波托，载《意大利史料集成》，第3卷，第2章，第1094栏；因法苏拉，载埃卡尔《史家集》，第二卷，第1951栏；马塔拉佐，载《历史文献》，第16卷，第2章，第180页。夫·萨克斯尔的《文艺复兴艺术和政治中的古代碑文》（瓦尔堡杂志和考陶尔德学院，第4卷，1940—1941年）中就有一幅该女子的现代肖像画。

[4_6].卡特勒梅尔，《拉斐尔生平》，隆盖纳，第531页。现可参阅夫·格尔齐奥出版的意大利语版《拉斐尔纪略》，梵蒂冈，1936，第78页以下；以及英语精简版《拉斐尔》，R·琼斯和N·戴佩妮出版社，纽黑文，伦敦，1983。

[4_7].玻利菲洛（弗朗西斯科·科隆纳）在《寻爱绮梦》（威尼斯，奥尔德斯·马努休斯出版，1499年，未编号）一书中告诉人们，世间一切人事无非幻梦。泰南扎的介绍，参阅《威尼斯著名建筑》第2卷，威尼斯，1778。不过，弗拉·弗朗西斯科·科隆纳的《寻爱绮梦》已有现代影印本，伦敦，1963。书上附有精致的木版画，与其说它是一本评论本，不如说它是一本建筑学奇幻小说。文中写到伯克哈特生于1467年，但此书出版于1499年。

[4_8].可是教父们和所有的朝圣者只谈到一个地窖，诗人们也无需宫殿。参看桑纳扎罗的《论童贞女的生子》第2卷。雅各布·桑纳扎罗的诗歌于1526年在罗马和那不勒斯出版，次年在威尼斯出版。15世纪和16世纪初弗兰德人的画作里就常常把国王大卫的出生地画成一座宫殿遗址。例如，雨果·凡·德·胡斯于1475年所画的波尔蒂纳里祭祀画。这幅祭祀画自面世以来就一直保存于佛罗伦萨。

[4_9].关于这些手稿的最终去向，见马利皮耶罗的《威尼斯年代记》，载《历史文

献》第7卷，第2章，第653、 655页中曾有记述。主教贝萨里翁死于1472年；雅各布·圣索维诺设计的圣马可图书馆建于1537年。

[4_10].卡洛·阿雷蒂诺（卒于1453年）坟墓的雕刻人是狄赛德里奥·达·塞廷纳诺。

[4_11].维斯帕夏诺的以下这句话是难以翻译的："*A vederlo in tavola costi antico come era, era una gentilezza.* "（大意是他坐在餐桌前，桌上摆放着他的古董，整个场景看起来十分富有魅力。*antico* 意为"年代久远的、典雅的"，与*vecchio* "旧的"相对。）

[4_12].即Vespasiano da Bisticci，维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

[4_13].以前人们关于柏拉图思想的认知，可能只是片片断断的东西。1438年在费拉拉，锡耶纳的乌哥和前来参加这次宗教会议的希腊人之间发生了一次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立的奇怪争论。参考埃尼亚斯·西尔维于斯《论欧洲》第52章。——译者注

[4_14].见尼科洛·瓦洛利的《伟大的洛伦佐传》。——译者注

[4_15].托斯卡内拉（Toscanella，1397-1482年）是意大利的地质学家，据说哥伦布在1492年航行到南美洲时曾用他所制的世界地图。——译者注

[4_16].韦斯普奇（Vespucci， 1451-1512年）是意大利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佛罗伦萨人，后入西班牙籍，从事航海事业，曾横过大西洋到达南美洲沿岸。——译者注

[4_17].帕拉·斯特罗齐（Palla Strozzi，1372-1462年）是希腊语言学家，在两大贵族斯特罗齐家族与美第奇家族的斗争中被放逐。——译者注

[4_18].菲利波·斯特罗齐（Filippo Strozzi，1483-1533年）也是斯特罗齐家族一员。——译者注

[4_19].传说罗慕路斯是罗马王政时代的首位国王，在他死后努马成为继任者。罗慕路斯通过发动战争扩大罗马，而努马不愿发动战争，改革罗马历法，对内充实内政。——译者注

[4_20].梅塞纳斯（Gaius Cilnius Maecenas，前70-前8年）是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的谋臣，著名外交家，同时还是诗人艺术家的保护人。他的名字在西方被公认为文学艺术赞助者的代名词。这里借喻利奥十世本人。——译者注

[4_21].埃尔，西方旧制长度单位，约等于45英寸。——译者注

[4_22].《那不勒斯日记》载穆拉托里，第21卷，第1127栏。

[4_23].斯科特斯（Scotus, 810-880年）是爱尔兰最早的烦琐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4_24].斯福尔扎家族（The Sforza）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以米兰为中心的统治家族。——译者注

[4_25].《博尔索记》（*Borseid*）是仿照荷马《伊利亚特》和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等诗所起的名字，以此来阿谀博尔索，所以为《博尔索记》。——译者注

[4_26].关于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重建，参见鲁道夫·威特科尔（Rudolf Wittkower）的《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则》（*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in the Age of Humanism*）第三版，伦敦，1962年。另外书中还提到凯旋门是荣耀的象征。

[4_27].因为洛伦佐·瓦拉揭发了君士坦丁献上的伪造文件。

[4_28].有一次查理五世在热那亚听不懂拉丁文演说家的美丽辞藻，于是他对乔维奥耳语道："啊，我们的老师阿德里安说得对，他告诉我小时候不努力学习拉丁文，长大一定会吃亏。"见保罗·乔维奥《阿德里安六世传》（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查理五世的导师，即哈德良六世，1522-1523年在位。）

[4_29].不过，这件事在为纪念普拉蒂纳所举行的仪式中曾使吉亚科莫·伏尔泰拉感到一些不快（载穆拉托里，第23卷，第171栏）。

[4_30].见瓦萨里，第11卷，第189、257页，《索多马和卡罗法洛传》（米拉内西版，见379,457页）。罗马的浪荡女人们都取最美妙动听的古人名字，如尤利娅、卢克雷蒂娅、卡珊德拉、波西亚、弗吉尼亚、彭忒西勒亚，她们就是以这些名字出现在阿雷蒂诺的作品中，这种事并不足为奇。可能就在那个时期，犹太人取罗马人的敌人大闪族的名字，如汉尼拔、哈米尔卡、哈斯德鲁巴，甚至现在的罗马犹太人还普遍地叫这样的名字。

[4_31].保罗·乔维奥，《著名学者对话集》，载蒂拉博斯基1776年，威尼斯版，第7卷，第4页。众所周知，乔维奥早就渴望从事瓦萨里完成的那项伟大工作。在上述对话中，他预见到拉丁文就要完全失去其无上优势而不禁兴叹。[吉罗拉莫·蒂拉博斯基《意大利文学史》，14卷，威尼斯，1772-1781页。乔尔乔·瓦萨里在其作品《艺苑名人传》的最后一卷，即自传中对乔维奥、法尔内塞枢机以及其他人对自己施压写一部关于意大利艺术家的著作做了生动鲜明的叙述（见G.布尔对瓦萨里第二卷的序言，企鹅经典，1987年，11-12页）。事实上，正是由于乔维奥在米开朗基罗、列奥纳多和拉斐尔等人身上的努力表明了瓦萨里接受这份工作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4_32].阿里奥斯托，1531。

[4_33].法比奥·卡尔沃给拉斐尔翻译《维特鲁威》的时候，似乎加入了自己的释文。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Jacob Burckhardt

雅各布·布克哈特

II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下）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art 4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and of Man 第四编　世界与人的发现
- Part 5 Society and Festivals 第五编　社会与节日
- Part 6 Morality and Religion[^1] 第六编　道德与宗教[^1]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art 4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and of Man

第四编　世界与人的发现

Journeys of the Italians

意大利人的旅行

Freed from the countless bonds which elsewhere in Europe checked progress, having reached a high degree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been schooled by the teachings of antiquity, the Italian mind now turned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outward universe, and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it in speech and in form.

欧洲其他地方的文明进度受累累桎梏的阻碍，而意大利人的思想已经从中解放出来，实现了高度的个体发展，并受到古老学说的熏陶，现在转向外部世界的发现，以及其在口头和形式上的表达。

On the journeys of the Italians to distant parts of the world we can here make but a few general observations. The Crusades had opened unknown distances to the European mind, and awakened in all the passion for travel and adventure. It may be hard to indicate precisely the point where this passion allied itself with, or became the servant of, the thirst for knowledge; but it was in Italy that this was first and most completely the case. Even in the Crusades the interest of the Italians was wider than that of other nations, since they already were a naval power and had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the East. From time immemorial the Mediterranean sea had given to the nations that dwelt on its shores mental impulses different

from those which governed the peoples of the North; and never, from the very structure of their character, could the Italians be adventurers in the sense which the word bore among the Teutons. After they were once at home in all the eastern harbors of the Mediterranean, it was natural that the most enterprising among them should be led to join that vast international movement of the Muhammadans which there found its outlet. A new half of the world lay, as it were, freshly discovered before them. Or, like Polo of Venice, they were caught in the current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and carried on to the steps of the throne of the Great Khan. At an early period, we find Italians sharing in the discoveries made in the Atlantic ocean; it was the Genoese who,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found the Canary Islands. In the same year, 1291, when Ptolemais, the last remnant of the Christian East, was lost, it was again the Genoese who made the first known attempt to find a sea-passage to the East Indies. Columbus himself is but the greatest of a long list of Italians who, in the service of the Western nations, sailed into distant seas. The true discoverer, however, is not the man who first chances to stumble upon anything, but the man who finds what he has sought. Such a one alone stands in a link with the thoughts and interests of his predecessors, and this relationship will also determine the account he gives of his search. For which reason the Italians, although their claim to be the first comers on this or that shore may be disputed, will yet retain their title to be pre-eminently the nation of discoverers for the whole latter part of the Middle Ages. The fuller proof of this assertion belongs to the speci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Yet ever and again we turn with admiration to the august figure of the great Genoese, by whom a new continent beyond the ocean was demanded, sought and found; and who was the first to be able to say: *'il mondo e poco'* —the world is not so large as men have thought. At the time when Spain gave Alexander VI to the Italians, Italy gave Columbus to the Spaniards. Only a few

weeks before the death of that pope (7 July 1503), Columbus wrote from Jamaica his noble letter to the thankless Catholic kings, which the ages to come can never read without profound emotion. In a codicil to his will, dated Valladolid, 4 May 1506, he bequeathed to 'his beloved home, the Republic of Genoa, the prayer-book which Pope Alexander had given him, and which in prison, in conflict and in every kind of adversity had been to him the greatest of comforts'. It seems as if these words cast upon the abhorred name of Borgia one last gleam of grace and mercy.

关于意大利人驶向远方的征程，我们在这里只能做些许一般性的评述。十字军东征向欧洲人打开了未知的世界，唤醒所有人对旅行和冒险的热情。要准确指出在哪个点上这种热情结合了对知识的渴求，或者服务于对知识的渴求，可能很困难，而这在意大利首先并最彻底地发生了。即使在十字军东征中，意大利人也有着比其他民族更广泛的兴趣，因为他们已经是海军强国，而且和东方有了商业关系。自远古以来，地中海给予居住在其沿岸各民族的那种精神冲击力不同于控制着北部各民族的精神冲击力；而且从意大利人性格构成来看，他们永不可能成为条顿人中诞生的那种冒险者。熟悉地中海所有东方港口后，很自然地，他们中最有胆识的人会受指引参加伊斯兰教徒广泛的国际活动，而伊斯兰教在这里找到了出路。可以说，世界另一半好像新发现的一样展现在他们面前。或者像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一样，他们被卷入蒙古民族的思潮，走向大可汗的朝堂。在早期，我们发现意大利人参与了在大西洋的发现，即热那亚人在13世纪发现了加那利群岛。同一年，即1291年，东方基督教最后一个遗存的城市托勒密不复存在时，又是热那亚人做出了大家已知的第一次尝试，找到一条通往东印度群岛的海路。哥伦布本人只是为西方国家服务、航行到远洋的诸多意大利人中最伟大的一个。然而，真正的发现者并非那个最先靠误打误撞才得以发现的人，而是那个找到他一直寻找之物的人。只有这样的一个人才和他的前辈们的思想和兴趣保持了一致的联系，并且这种关系也将决定他对自己的探索所做的报告。出于这个原因，尽管

意大利人宣称他们最先来到这个或者那个海滨时可能遭到质疑，但对于“中世纪后半期的发现家之国”这个称号，意大利的确当之无愧。对这一称号更充分的验证属于专门的发现史的范畴。不过迄今，我们还不时怀着敬仰的心情谈到那位伟大的热那亚人的威严形象，是他要求、探索并发现了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而且他也是第一个能够说“ilmondo e poco”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世界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当西班牙把亚历山大六世送给意大利人的时候，意大利也把哥伦布给了西班牙人。仅仅在那位教皇去世（1503年7月7日）的前几个星期，哥伦布从牙买加给那些忘恩负义的天主教君主写了庄重的信件，即使历经千秋万代，人们读之也会被深深感动。在他写于巴利亚多利德，1506年5月4日的遗嘱附录里，他将“教皇亚历山大赐给他的那本祈祷书遗赠给他热爱的家乡，热那亚共和国；不管他是在监狱里，在战斗中还是在各种逆境中，这本书都曾给他带去最大的安慰”。看样子这些话似乎给波吉亚家族这令人憎恶的名字投下了最后一道慈悲而宽容的光芒。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and allied sciences among the Italians must, like the history of their voyages, be touched upon but very briefly. A superficial comparison of their achievements with those of other nations shows an early and striking superiority on their part. W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could be found, anywhere but in Italy, such a union of geographical,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knowledge as was found in Aeneas Sylvius? Not only in his great geographical work, but in his letters and commentaries, he describes with equal mastery landscapes, cities, manners, industries and products,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constitutions, wherever he can use his own observation or the evidence of eye-witnesses. What he takes from books is naturally of less moment. Even the short sketch of that valley in the Tyrolese Alps, where Frederick III had given him a benefice, and still more his description of Scotland, leaves untouched none of the relations

of human life, and displays a power and method of unbiased observation and comparison impossible in any but a countryman of Columbus, trained in the school of the ancients. Thousands saw and, in part, knew what he did, but they felt no impulse to draw a picture of it, and were unconscious that the world desired such pictures.

意大利人中有关地理学和相关科学的发展，正如他们的航海史一样，这里只简单涉及。对他们取得的成就和其他国家做一个粗浅的比较，显示出他们的那一方面在早期就有了显著的优越性。在15世纪中叶，除了意大利，还能找到哪个地方可以发现在埃尼亚斯·西尔维于斯书中那种地理学、统计学和历史学知识的综合呢？不仅在他伟大的地理学著作里，而且在他的信件和评论文章中，只要他能用上自己的观察或目击者的证据之处，他对风景、城市、风俗、产业和产品、政治环境和法律规章的描写都同样熟练。他从书中得来的资料自然就不那么重要。甚至对腓特烈三世给他圣俸之地——蒂罗尔地区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谷的简介，以及他更多的对苏格兰的描述，都没有漏掉涉及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的描写，并且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观察和比较的能力和方法，而这除了受过古人传统教育的哥伦布的同乡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做到。成千上万人看到他所做的事，某种程度上也明白他做的是什么，但他们内心却没有对此进行描画的念头，也没有意识到世人需要这样的描画。

In geography [1_1] as in other matters, it is vain to attempt to distinguish how much is to be attributed to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s, and how much to the special genius of the Italians. They saw and treated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from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even before they were familiar with ancient literature, partly because they were themselves a half-ancient people, and partly because their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predisposed them to it; but

they would not so rapidly have attained to such perfection had not the old geographers showed them the way. The influence of the existing Italian geographies on the spirit and tendencies of the travelers and discoverers was also inestimable. Even the simple dilettante of a science—if in the present case we should assign to Aeneas Sylvius so low a rank—can diffuse just that sort of general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which prepares for new pioneers the indispensable groundwork of a favorable predisposition in the public mind. True discoverers in any science know well what they owe to such mediation.

在地理学 [2_1] 上和在其他学科上一样，要分清多少归功于古人的研究，多少归功于意大利人的特殊天赋是白费力气。甚至在他们认识古代著作之前，他们就已经用一种客观的观点认识和对待世间事，这部分由于他们本身就是半古代人，部分因为他们的政治环境让他们倾向于这样做。但如果没有以前的地理学家给他们指明道路，他们也不可能如此快速地达到这般完美的程度。而且现存的意大利地理学书籍对旅行家和发现者的精神和偏好的影响也是无法估量的。即使一门科学的一个简单的外行——如果是在目前的情况，我们应该把埃尼阿斯·西尔维于斯安排在这么低的一个级别上——也能在这门学科中恰好传播那种普遍的兴趣，这种兴趣为新的开拓者们准备了利于对这门学科发生偏好的不可或缺的群众基础。任何科学的真正发现者都非常清楚他们的发现要归功于这种中介。

The Natural Sciences in Italy

意大利的自然科学

For the position of the Italians in the sphere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we must refer the reader to the special treatises on the

subject, of which the only one with which we are familiar is the superficial and depreciatory work of Libri. The dispute as to the priority of particular discoveries concerns us all the less, since we hold that, at any time, and among any civilized people, a man may appear who, starting with very scanty preparation, is driven by an irresistible impulse into the path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through his native gifts achieves the most astonishing success. Such men were Gerbert of Rheims and Roger Bacon. That they were masters of the whole knowledge of the age in their several departments was a natural consequence of the spirit in which they worked. When once the veil of illusion was torn asunder, when once the dread of nature and the slavery to books and tradition were overcome, countless problems lay before them for solution. It is another matter when a whole people takes a natural delight in the study and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at a time when other nations are indifferent, that is to say, when the discoverer is not threatened or wholly ignored, but can count on the friendly support of congenial spirits. That this was the case in Italy is unquestionable. The Italian students of nature trace with pride in the *Divine Comedy* the hints and proofs of Dante's scientific interest in nature. On his claim to priority in this or that discovery or reference we must leave the men of science to decide; but every layman must be struck by the wealth of his observations on the external world, shown merely in his pictures and comparisons. He, more than any other modern poet, takes them from reality, whether in nature or human life, and uses them, never as mere ornament, but in order to give the reader the fullest and most adequate sense of his meaning. It is in astronomy that he appears chiefly as a scientific specialist, though it must not be forgotten that many astronomical allusions in his great poem, which now appear to us learned, must then have been intelligible to the general reader. Dante, learning apart, appeals to a popular knowledge of the heavens, which the Italians

of his day, from the mere fact that they were a nautical people, had in common with the ancients. This knowledge of the rising and setting of the constellations has been rendered superfluous to the modern world by calendars and clocks, and with it has gone whatever interest in astronomy the people may once have had. Nowadays, with our schools and handbooks, every child knows—what Dante did not know—that the earth moves round the sun; but the interest once taken in the subject itself has given place, except in the case of astronomical specialists, to the most absolute indifference.

对于意大利人在自然科学领域所处的地位，读者必须参考关于这一主题的专论，其中我们唯一熟悉的是利布里那部肤浅的不受人重视的作品。至于某些特定发现谁有优先权的争论，我们倒关心较少，因为我们认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文明化民族中，都可能出现这样的人，他开始可能准备不充分，但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所驱使，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并通过他的天赋取得了最惊人的成功。兰斯的格伯特和罗杰·培根就是这种人。他们能精通当时几种知识范围中的所有知识，这是他们工作精神的自然结果。一旦撕碎幻象的面纱，一旦克服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书本和传统的禁锢，就有无数问题摆在他们面前等待解决。当别的民族对自然漠不关心时，有一整个民族却天生喜爱仔细观察和研究自然，换句话说，发现者既不是受到威胁也不是完全遭到忽视，而是能够指望从意气相投的人那里得到友好支持，不过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毫无疑问，在意大利就是这种情况。意大利研究自然的学者发现，在《神曲》中，但丁流露出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这一发现令他们深感自豪。关于他是否如他声称是第一个做出林林总总的发现或者引证的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留给科学家来判断；但他对外部世界做出了丰富描绘和比较，仅这一点也能震惊门外汉。他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现实中获取观察资料，而且在使用这些资料时，从不仅仅是将其用作点缀，而是为了让读者能最充分、最恰当地理解他的意图。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任何一位近代诗人。尤其在天文学上，

他以一个学术专家的面貌出现，不过，一定不能忘记，他的伟大诗篇中很多天文学上的引喻，我们现在看来是学术性的，而在那时，对一般读者来说，必定是可以理解的。但丁除了学术知识外，还诉诸天文学的通俗知识，从意大利人是一个航海的民族这一事实来看，这些知识是他们和古人共有的。历法和钟表使星座升落的知识在现代世界已不再需要，而人们可能曾一度对天文学所怀有的任何兴趣也随之消逝。今天，有了我们的学校和参考书，每个孩子都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是但丁不知道的；但是，曾一度对这门学问本身所怀有的兴趣，除天文学专家以外，已经彻底淡漠下来。

The pseudo-science, which also dealt with the stars, proves nothing against the inductive spirit of the Italians of that day. That spirit was but crossed, and at times overcome, by the passionate desire to penetrate the future. We shall recur to the subject of astrology when we come to speak of the moral and religious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伪科学，它也涉及星象，并不能证明那个时代的意大利人缺少归纳的精神，只不过是这种精神被那种要洞悉未来的强烈渴望所切断，有时甚至被压倒而已。当我们谈到这个民族的道德和宗教特征时，将重新提及占星术这一话题。

The Church treated this and other pseudo-sciences nearly always with toleration; and showed itself actually hostile even to genuine science only when a charge of heresy together with necromancy was also in question—which certainly was often the case. A point which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decide is this: whether and in what cases the Dominican (and also the Franciscan) Inquisitors in Italy were conscious of the falsehood of the charges,

and yet condemned the accused, either to oblige some enemy of the prisoner or from hatred to natural science, and particularly to experiments. The latter doubtless occurred, but it is not easy to prove the fact. What helped to cause such persecutions in the North, namely, the opposition made to the innovators by the upholders of the received official, scholastic system of nature, was of little or no weight in Italy. Pietro of Alban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s well known to have fallen a victim to the envy of another physician, who accused him before the Inquisition of heresy and magic; and something of the same kind may have happened in the case of his Paduan contemporary, Giovannino Sanguinacci, who was known as an innovator in medical practice. He escaped, however, with banishment. Nor must it be forgotten that the inquisitorial power of the Dominicans was exercised less uniformly in Italy than in the North. Tyrants and free citie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reated the clergy at times with such sovereign contempt that very different matters from natural science went unpunished. But when, with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tiquity became the leading power in Italy, the breach it made in the old system was turned to account by every branch of secular science. Humanism, nevertheless, attracted to itself the best strength of the nation, and thereby, no doubt, did injury to the inductive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Here and there the Inquisition suddenly started into life, and punished or burned physicians as blasphemers or magicians. In such cases it is hard to discover what was the true motive underlying the condemnation. And after all, Italy, at the clos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ith Paolo Toscanelli, Luca Pacioli and Leonardo da Vinci, held incomparably the highest place among European nations in mathematics and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learned men of every country, even Regiomontanus and Copernicus, confessed themselves its pupils. This glory surviv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even today the Italians would occupy the first

place in this respect if circumstances had not made it impossible for the greatest mind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ranquil research.

教会几乎总是以容忍的态度对待这一门以及其他伪科学，哪怕当对异端和巫术的指控还在受质疑时，教会本身都会显示出敌对态度来，甚至是针对真正的科学——这无疑是屡见不鲜了。让人有兴趣做出决断的一点是：意大利的多明我会（还有圣方济会）的异端审判者们是否意识到，并且在什么情况下意识到这些控诉是诬告，但是，要么是为狱犯的某个敌人效劳，要么出自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对试验的憎恶，他们仍然判处被告有罪。后一种情形无疑存在，但却不容易加以证实。在北方助长造成这些迫害的，即为大众所接受的官方的、学术的自然体系的拥护者们对革新者的反对，在意大利却无足重轻，或毫无意义。众所周知，在14世纪初，阿尔巴诺的彼得罗成为另一个医生嫉妒的受害者，后者到异端审判者那里控告他是异端，会施魔法。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和他同时代的一个帕多瓦人身上，他叫乔万尼诺·桑圭纳奇，号称医疗实践的革新者。但他以遭流放而逃脱一死。我们还一定不能忘记，多明我会会士在意大利行使宗教审判的权力不像在北方那样一成不变。14世纪的专制统治者和自由城邦有时对教会人士如此强烈地蔑视，以至于极端违反自然科学的情况却没有受到惩罚。但到了15世纪，当古代研究成为在意大利的主要力量时，它对旧体制的破坏为世俗科学的每一个分支所利用。然而，人文主义自身吸引了该民族最优秀的力量，因此，毫无疑问，它对自然科学的归纳研究有害。而宗教裁判所突然在各处盛行起来，把医生们作为渎神者或巫师来惩罚或烧死。在这些情况下，很难发现潜藏在这种定罪下的真实动机。不管怎样，在15世纪末，意大利因为有保罗·托斯卡内利、卢卡·帕乔利和列奥纳多·达·芬奇诸人，而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在欧洲各国中占据了不可比拟的最高地位。而且每个国家的学者，甚至雷格蒙塔努斯和哥白尼，都承认自己是意大利的学生。这一荣耀在反宗教改革中得以幸存，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环境不允许那些最伟大的人们致力于安宁的研究工作，意大利人在这一方面还是会占据第一的位置。

A significant proof of the widespread interest in natural history is found in the zeal which showed itself at an early period for the collec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plants and animals. Italy claims to be the first creator of botanical gardens, though possibly they may have served a chiefly practical end, and the claim to priority may be itself disputed. It is of far greater importance that princes and wealthy men, in laying out their pleasure-gardens, instinctively made a point of collecting the greatest possible number of different plants in all their species and varieties. Thu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noble grounds of the Medicean Villa Careggi appear from the descriptions we have of them to have been almost a botanical garden, with countless specimens of different trees and shrubs. Of the same kind was a villa of the Cardinal Trivulzi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the Roman Campagna towards Tivoli, with hedges made up of various species of roses, with trees of every description—the fruit-trees especially showing an astonishing variety—with twenty different sorts of vines and a large kitchen-garden. This is evidently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score or two of familiar medicinal plants, which were to be found in the garden of any castle or monastery in Western Europe. Along with a careful cultivation of fruit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table, we find an interest in the plant for its own sake, on account of the pleasure it gives to the eye. We learn from the history of art at how late a period this passion for botanical collections was laid aside, and gave place to what was considered the picturesque style of landscape-gardening.

意大利人对博物学的广泛兴趣的重要证明，可以在其早期对收集动植物和对其加以比较研究所表现的热情中找到，意大利声称自己是植物园最早的创建者，尽管这些植物园可能主要是为了实用的目的，

而“最早”的断言本身也有争议。更加重要的是，君主们和富人们在设计他们游玩的花园时，本能地重视最大数量地收集各种各样不同种类的植物。因此，在15世纪，美第奇家族的卡雷吉别墅的宏伟庭院，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它的描写来看，它几乎堪称一个植物园，有着数不胜数的不同种类的花草树木的标本。16世纪初，在罗马的坎帕尼亚通往蒂沃利的方向有一个特里武尔齐奥红衣主教的别墅也是这种类型，它的篱笆用不同种类的玫瑰圈成，有各种各样的树木——果树种类之多尤为惊人——还有20个品种的葡萄树和一个大菜园。这显然与在西欧的任何城堡或修道院的花园中所能找到的20种或40种人们熟悉的药用植物是很不相同的。除了仔细培植供食用的水果以外，我们也发现由于植物的赏心悦目而发生的对植物的兴趣。我们从艺术史中得知，当收集植物的热情被置于一边，让位给所谓具有生动如画风格的造园法的时候，已经是很晚的一个时期了。

The collections, too, of foreign animals not only gratified curiosity, but served also the higher purposes of observation. The facility of transport from the southern and eastern harbors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ildness of the Italian climate, made it practicable to buy the largest animals of the south, or to accept them as presents from the sultans. The cities and princes were especially anxious to keep live lions, even when the lion was not, as in Florence, the emblem of the state. The lions' den was generally in or near the government palace, as in Perugia and Florence; in Rome, it lay on the slope of the Capitol. The beasts sometimes served as executioners of political judgements, and no doubt, apart from this, they kept alive a certain terror in the popular mind. Their condition was also held to be ominous of good or evil. Their fertility, especially, was considered a sign of public prosperity, and no less a man than Giovanni Villani thought it worth recording that he was present at the delivery of a lioness. The cubs were often given to allied states and princes, or to *condottieri* as a reward of

valour. In addition to the lions, the Florentines began very early to keep leopards, for which a special keeper was appointed. Borso of Ferrara used to set his lions to fight with bulls, bears and wild boars.

同样，外国动物的收集不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也是为了更高的观察目的。从地中海南部和东部港口运输很容易，意大利气候很温和，这些让意大利从南方买到最大的动物，或者从苏丹们那里接受它们作为礼物都是切实可行的。城邦和君主们特别渴望养活狮子，哪怕那时狮子并不像在佛罗伦萨那样是国家的标志。狮子洞一般像在佩鲁贾和佛罗伦萨那样设在政府宫殿里或在附近。在罗马，它被置于卡比托利欧山的斜坡上。这些野兽有时被用来作为政治判决的刽子手，而且毫无疑问，除此之外，它们还让大众心里保持着某种恐惧。它们的健康状况也被用来预示吉凶。特别是它们的繁殖力被认为是国家繁荣的象征，就是乔瓦尼·维拉尼也认为他在一头母狮分娩现场是值得记载的。幼崽们常常被送给盟邦和君主们，或者送给雇佣军队长作为对他们勇敢的一种奖赏。除了狮子以外，佛罗伦萨人很早就开始委派专门的饲养员来养豹子。费拉拉的博尔索常常安排他的狮子们和牛、熊还有野猪争斗。

By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however, true menageries *(serragli),* now reckoned part of the suitable appointments of a court, were kept by many of the princes. 'It belongs to the position of the great,' says Matarazzo, 'to keep horses, dogs, mules, falcons and other birds, court-jesters, singers and foreign animals.' The menagerie at Naples, in the time of Ferrante and others, contained a giraffe and a zebra, presented, it seems, by the ruler of Baghdad. Filippo Maria Visconti possessed not only horses which each cost him 500 or 1,000 pieces of gold, and valuable English dogs, but a number of leopards brought from all parts of the East; the expense

of his hunting-birds, which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countries of northern Europe, amounted to 3,000 pieces of gold a month.King Emanuel the Great of Portugal knew well what he was about when he presented Leo X with an elephant and a rhinoceros. It wa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at the foundations of a scientific zoology and botany were laid.

但是，到15世纪末，君主中有很多都保有真正的动物园，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宫廷的适宜设施的一部分。马塔拉佐说："养马、养狗、养骡子、养猎鹰以及其他鸟类，蓄养宫廷弄臣、歌手和外国动物是符合大人物的身份的。"在费兰特等人执政的时代，那不勒斯的动物园里有一只长颈鹿和一匹斑马，好像是巴格达的君主赠送的。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不仅拥有每匹价值500或1,000金币的马和贵重的英国狗，而且还有从东方各地买来的大量豹子；他从北欧各国收集来的猎鸟每个月的花销达到3,000金币。葡萄牙的伊曼纽尔大王送给利奥十世一头大象和一头犀牛时，很清楚他要干什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科学的动植物学的基础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A practical fruit of these zoological studies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studs, of which the Mantuan, under Francesco Gonzaga, was esteemed the first in Europe. All interest in and knowledge of the different breeds of horses is as old, no doubt, as riding itself, and the crossing of the European with the Asiatic must have been common from the time of the Crusades. In Italy, a special inducement to perfect the breed was offered by the prizes at the horse-races held in every considerable town in the peninsula. In the Mantuan stables were found the infallible winners in these contests, as well as the best military chargers, and the horses best suited by their stately appearance for presents to great people. Gonzaga kept stallions and mares from Spain, Ireland, Africa, Thrace and Cilicia,

and for the sake of the last he cultivated the friendship of the sultans. All possible experiments were here tried in order to produce the most perfect animals.

这些动物学研究的一个实际成果就是种马场的建立，其中，弗朗西斯科·贡扎加时代的曼图亚的种马场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一个。对于不同品种的马的兴趣和了解无疑和骑马本身一样古老，而欧洲品种和亚洲品种的杂交必定是从十字军东征时代起就很普遍了。在意大利这个半岛上各大城镇所举行的有奖赛马是改良马种的一个特别诱因。在曼图亚的马厩里，能够找到这些比赛中永远获胜的马和最好的战马，以及那些有着雄壮外形的马，它们最适合于作为礼物送给大人物。贡扎加保有从西班牙、爱尔兰、阿非利加、色雷斯和奇里乞亚等地来的种马和母马，为了从奇里乞亚获得马匹，他曾和苏丹们建立了友谊。为了培育出最优良的动物，这里尝试过各种可能的实验。

Even human menageries were not wanting. The famous Cardinal Ippolito Medici, bastard of Giuliano, Duke of Nemours, kept at his strange court a troop of barbarians who talked no less than twenty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who were all of them perfect specimens of their races. Among them were incomparable *voltigeurs* of the best blood of the North African Moors, Tartar bowmen, Negro wrestlers, Indian divers, and Turks, who generally accompanied the cardinal on his hunting expeditions. When he was overtaken by an early death (1535), this motley band carried the corpse on their shoulders from Itri to Rome, and mingled with the general mourning for the open-handed cardinal their medley of tongues and violent gesticulations.[1]

甚至不乏人类动物园。有名的红衣主教伊波利托·美第奇，是内穆

尔大公朱利亚诺的私生子，他在他奇怪的宫廷里养着一群异邦人，他们说着不下于20种不同的语言，而且他们都是他们种族中最优秀的典型。他们当中有具有北非摩尔人最优良血统的举世无双的走钢丝的人，有鞑靼族弓箭手、有黑人摔跤手、有印第安潜水员和土耳其人，他们一般都陪伴这位主教外出打猎。当他在1535年突然早逝时，这支杂色队伍肩托他的尸体从伊特里走到罗马，以他们混杂的方言和有力的手势，和大家一起向这位慷慨的红衣主教表示哀悼。[1]

1: At this point a few notices on slavery in Italy at the time of the Renaissance will not be out of place. In North Italy there were no slaves; elsewhere even Christians, as well as Circassians and Bulgarians, were bought from the Turks, and made to serve until they had earned their ransom. The negroes, on the contrary, remained slaves; but it was not permitted, at least in the kingdom of Naples, to emasculate them. The word *moro* signifies any dark-skinned man; the negro was called *moro nero*. Document on the sale of a female Circassian slave (1427)—List of the female slaves of Cosimo de' Medici—Innocent VIII received 100 Moors as a present from Ferdinand the Catholic, and gave them to cardinals and other great men (1488)—Sale of slaves; negro slaves who also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owner?) work as *facchini* [porters], and gain the love of the women; Moors from Tunis caught by Catalans and sold at Pisa—Manumission and reward of a negro slave in a Florentine will (1490)—Negroes as jailers and executioners of the

House of Aragon in Naples—Negroes as followers of the prince on his excursions—A negro slave as a musician—A (free?) negro as swimming teacher and diver at Genoa—A negro (Aethiops) as superior officer at Venice, according to which we are justified in thinking of Othello as a negro—When a slave at Genoa deserved punishment he was sold away to Ibiza, one of the Balearic isles, to carry salt. [This note has been slightly shortened, and the references omitted.]

1: 就这点适合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奴隶制度做些介绍。北意大利没有奴隶，在其他地方，人们从土耳其人手里甚至买来基督徒、切尔克斯人和保加利亚人，让他们一直服役到挣够赎金为止。与之相反的是，黑人们一直是奴隶，但至少在那不勒斯王国，禁止对他们阉割。“摩洛”一词指任何肤色黝黑的人，黑人被称为“黑摩洛人”。——发布罗尼：《科西莫》附注110，载有关于贩卖切尔克斯女性奴隶的文件（1427）；附注141载有柯西莫家族的女奴名单。南提波托（载木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3卷，第2章，第1106栏）记载：英诺森八世收到天主教徒斐迪南赠送的100名摩尔人，并把他们送给红衣主教和其他大人物（1488年）。——马苏奇奥：《故事集》第14篇：奴隶的贩卖；同书第24-25篇：黑奴也做“看门人”的工作（为他们主人的利益？）并赢得妇女们的爱情；同书第48篇：卡塔兰人从突尼斯抓到摩尔人并把他们卖到比萨；盖伊：《通信集》，第1章，第360页：一个佛洛伦萨人的遗嘱中

（1490），记着给一个黑奴的解放和奖赏；科米斯：《查理八世》，第18章：黑人作为那不勒斯阿拉戈纳家族的狱卒和刽子手。保罗·乔维奥：《语录》，加利佐条：黑人作为王侯游幸时的跟班。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全集》，第456页：一个黑奴当乐师。保罗·乔维奥：《论鱼类》第3章：在热那亚，一个（自由的？）黑人当潜水员和游泳师。亚历山大·本尼迪特：《论查理八世》（见埃卡尔《史家集》，第2卷，第1608栏）：一个黑人（埃塞俄比亚人）在威尼斯任高级将士。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奥赛罗是一个黑人。班戴洛，第三编，故事第21篇：当一个奴隶在热那亚要受惩处时，他就被卖到巴利阿里群岛中的伊比萨小岛去，从事运盐的苦役。（该注释有删减）

These scattered notices of the relations of the Italians to natural science, and their interest in the wealth and variety of the products of nature, are only fragments of a great subject. No one is more conscious than the author of the defects in his knowledge on this point. Of the multitude of special works in which the subject is adequately treated even the names are but imperfectly known to him.

意大利人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自然界的财富和各种物产的兴趣的零散声明，只是一个伟大主题的片段而已。作者比任何人都深知自己在这一方面知识的欠缺。有大量充分研究这一主题的著作，但作者甚至连书名都知之甚少。

Discovery of the Beauty of Landscape

发现风光之美

But, outside the sphere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draw near to nature. The Italians are the first among modern peoples by whom the outward world was seen and felt as something beautiful.

但是，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还另有一种靠近自然的方法。在现代各民族中，意大利人最早看到外部世界并感受到它的美。

The power to do so is always the result of a long and complicated development, and its origin is not easily detected, since a dim feeling of this kind may exist long before it shows itself in poetry and painting, and thereby becomes conscious of itself. Among the ancients, for example, art and poetry had gone through the whole circle of human interests, before they turned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ture, and even then the latter filled always a limited and subordinate place. And yet, from the time of Homer downwards, the powerful impression made by nature upon man is shown by countless verses and chance expressions. The Germanic races, which founded their states on the ruins of the Roman Empire, were thoroughly and specially fitted to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natural scenery; and though Christianity compelled them for a while to see in the springs and mountains, in the lakes and woods, which they had till then revered, the working of evil demons, yet this transitional conception was soon outgrown. By the year 1200, at the height of the Middle Ages, a genuine, hearty enjoyment of the external world was again in existence, and found lively

expression in the minstrelsy of different nations, which gives evidence of the sympathy felt with all the simple phenomena of nature—spring with its flowers, the green fields and the woods. But these pictures are all foreground without perspective. Even the crusaders, who traveled so far and saw so much, are not recognizable as such in these poems. The epic poetry, which describes armour and costumes so fully, does not attempt more than a sketch of outward nature; and even the great Wolfram von Eschenbach scarcely anywhere gives us an adequate picture of the scene on which his heroes move. From these poems it would never be guessed that their noble authors in all countries inhabited or visited lofty castles, commanding distant prospects. Even in the Latin poems of the wandering clerks, we find no traces of a distant view—of landscape properly so called—but what lies near is sometimes described with a glow and splendor which none of the knightly minstrels can surpass. What picture of the Grove of Love can equal that of the Italian poet—for such we take him to be—of the twelfth century?

他们这种看到并感受外部世界之美的能力通常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发展结果，而其起源却不容易察觉，因为这种模糊的感觉可能在它表现在诗歌和绘画中，并由此得到注意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比如说，在古人中，艺术和诗歌遍及整个人类的兴趣圈子后，才转向表现自然，后来，甚至后者总是处于一个有限的、附属的地位。可是，从荷马时代以来，自然给予人类的强烈印象被表现在无数的诗文和偶得的词句中。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国家的日耳曼各民族，完全并特别能领会自然风景的精神；虽然基督教有一个时期强迫他们把一向尊崇的山、泉、湖泊、树林看成是恶魔所造，但这种过渡性概念不久就被放弃了。到公元1200年，在中世纪全盛时期，对外部世界又有了一种真正的、衷心的领略，并在各民族的游吟诗人的歌唱中得到生动的表达，这显现了对自然界所有简单现象——春天与鲜花、绿地与树林

——的共鸣。但这些描述都是前景，缺乏远景。哪怕是行过很远的路、看过很多地方的十字军战士，在这些诗中也不那么容易被认出。那种把盔甲和服装描写非常充分的叙事诗，对外部的自然界不过略作描画；甚至伟大的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对于他主角们活动的场景也很少在任何地方给我们足够的描绘。从这些诗篇中，人们永不会猜到，各国高贵的诗作者们居住或者参观过巍峨的城堡，俯瞰过远方的景色。即使在流浪牧师的拉丁诗中，我们也找不到远处风景——所谓纯自然风景——的描绘，但有时对于眼前景物的热烈而夺目的描述却是任何骑士诗人所无法超越的。有什么样的描绘可以和那篇《爱的丛林》——我们认为它是12世纪的意大利诗人写的——相媲美呢？

Immortalis fieret

住在那儿的人，

Ibi manens homo;

长生不老；

Arbor ibi quaelibet

那儿的树木，

Suo gaudet pomo;

无不以自己的果实自豪；

Viae myrrha, cinnamo

条条道路上，

Fragrant,et amomo —

没药、肉桂和豆蔻的芳香缭绕——

Conjectari poterat

主人不出门

Dominus ex domo, etc.

可以猜想到，……

To the Italian mind, at all events, nature had by this time lost its taint of sin, and had shaken off all trace of demoniacal powers. St Francis of Assisi, in his Hymn to the Sun, frankly praises the Lord for creating the heavenly bodies and the four elements.

无论如何，在意大利人心目中，大自然到这时已经丢掉了罪恶的污点，摆脱了恶魔势力的痕迹。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在他的《太阳颂》里，率直地赞美上帝创造了天体和四行 [2_2] 。

But the unmistakable proofs of a deepening effect of nature on the human spirit begin with Dante. Not only does he awaken in us by a few vigorous lines the sense of the morning air and the trembling light on the distant ocean, or of the grandeur of the storm-beaten forest, but he makes the ascent of lofty peaks, with the only possible object of enjoying the view—the first man, perhaps, since the days of antiquity who did so. In Boccaccio we can do little more than infer how country scenery affected him; yet his pastoral romances show his imagination to have been filled with it. But the significance of nature for a receptive spirit is fully and clearly displayed by Petrarch—one of the first truly modern men. That clear soul—who first collected from the literature of all countries evidence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sense of natural beauty, and himself, in his *Aspects of Nature,* achieved the noblest masterpiece of description—Alexander von Humboldt, has not done full justice to Petrarch; and, following in the steps of the great reaper, we may still hope to glean a few ears of interest and value.

不过，准确无误地证明自然对人类精神的深刻影响始于但丁。他不仅用一些充满活力的诗句唤醒我们去领会清晨的空气、海洋远处颤动的光亮，抑或暴风雨袭击下的森林的壮观，也纯粹为了欣赏风景而登上高峰——自古以来，他也许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至于薄伽丘，我们可能只能猜测乡村风光对他发生过怎样的影响，不过，他的田园爱情小说表明他的想象中充满了乡村风光。但是，充分而明确地表明自然对一个善于感受的人的意义的是彼特拉克——最早的真正的现代人之一。那颗纯净的灵魂——亚历山大·冯·洪堡——他首先从各国文

学中收集关于自然美的感受的起源和发展的证据，并在其《自然的面貌》中，完成了描写风景的最好杰作。他没有对彼特拉克做出完全公平的评价。追随这位伟大的收获者的脚步，我们也许仍有望拾捡到一些有趣而且有价值的落穗。

Petrarch was not only a distinguished geographer—the first map of Italy is said to have been drawn by his direction—and not only a reproducer of the sayings of the ancients, but felt himself 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beauty. The enjoyment of nature is, for him, the favorite accompaniment of intellectual pursuits; it was to combine the two that he lived in learned retirement at Vaucluse and elsewhere, that he from time to time fled from the world and from his age. We should do him wrong by inferring from his weak and undeveloped power of describing natural scenery that he did not feel it deeply. His picture, for instance, of the lovely Gulf of Spezia and Porto Venere, which he inserts at the end of the sixth book of the *Africa,* for the reason that none of the ancients or moderns had sung of it, is no more than a simple enumeration, butPetrarch is also conscious of the beauty of rock scenery, and is perfectly able to distinguish the picturesqueness from the utility of nature. During his stay among the woods of Reggio, the sudden sight of an impressive landscape so affected him that he resumed a poem which he had long laid aside. But the deepest impression of all was made upon him by the ascent of Mont Ventoux, near Avignon. An indefinable longing for a distant panorama grew stronger and stronger in him, till at length the accidental sight of a passage in Livy, where King Philip, the enemy of Rome, ascends the Haemus, decided him. He thought that what was not blamed in a grey-headed monarch might well be *excused* in a young man of private station. The ascent of a mountain for its own sake was unheard of, and there could be no thought of the companionship of friends or

acquaintances. Petrarch took with him only his younger brother and two country people from the last place where he halted.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an old herdsman besought him to turn back, saying that he himself had attempted to climb it fifty years before, and had brought home nothing but repentance, broken bones and torn clothes, and that neither before nor after had anyone ventured to do the same. Nevertheless, they struggled forward and upward, till the clouds lay beneath their feet, and at last they reached the top. A description of the view from the summit would be looked for in vain, not because the poet was insensible to it, but, on the contrary, because the impression was too overwhelming. His whole past life, with all its follies, rose before his mind; he remembered that ten years ago that day he had quitted Bologna a young man, and turned a longing gaze towards his native country; he opened a book which then was his constant companion, the *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 and his eye fell on the passage in the tenth chapter, 'and men go forth, and admire lofty mountains and broad seas, and roaring torrents, and the ocean, and the course of the stars, and forget their own selves while doing so'. His brother, to whom he read these words, could not understand why he closed the book and said no more.

彼特拉克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地理学家——据说意大利的第一幅地图就是在他的指点下画出来的——也不仅是一个古代谚语的再现者，而且他觉得自己感受到自然美的吸引力。对他而言，享受自然是他进行脑力工作的同时最爱做的事。为了二者兼得，他就在沃克卢斯等地过着一种学者的隐居生活，或有时逃避世界、逃避时代。但如果从他描述自然风光时薄弱而没有得到发展的能力上就得出他没有深刻地感受自然的结论，那我们就错看他了。比如，他把关于可爱的斯培西亚海湾和韦内雷港的描述插入《阿非利加》第六卷的末尾，原因在于没有任何古人或现代人曾经歌颂过它，他的描述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列

举，而彼特拉克也察觉到岩石风景的优美，并完全能够把这份美丽和自然界的实用价值区分开来。在他居住于雷焦的森林期间，突然看到一处给人印象深刻的风景，对他影响至深，让他重拾搁置一旁许久的一首诗的创作。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攀登阿维尼翁附近的文图克斯山峰。在他心中，一种难以言表的登高远眺的渴望越来越强烈，直到最后，他偶然看到李维作品中一段关于罗马的敌人，菲利普国王攀登哈伊莫斯山的描写，这让他下了决心。他想，一个白头的君主登上高峰而不受指责，这也可以成为一个年轻人以私人身份登高的借口。为登山而登山是没听说过的，而且不要想着有朋友或者熟人的陪伴。彼特拉克只带着他的弟弟和他最后停留地的两名乡下人同行。在山脚下，一个老牧人恳请他往回走，说他自己在五十年前就试图攀登，但带回家的是悔悟、摔断的骨头和撕碎的衣服，而在那以前或以后，就没有人敢冒险做同样的事。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努力向前，拼力向上，直到云彩飘在他们脚下，最后他们终于到达峰顶。要寻找一种从山顶来对风景进行的描述是徒劳的，并不是因为诗人对它没有感觉，与之相反，恰恰是因为印象太过强烈、压倒一切。他整个以前的生命连同生命中所有荒唐的想法都浮上他的脑海；他记起了十年前他离开博洛尼亚那天还是个年轻人，并向他的故土投去热切凝望的目光。他打开了一本当时他一直带在身边的书，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他的目光落在第10章的一个段落上，“人们去旅行，欣赏巍峨高山、广阔大海、咆哮的急流和海洋，以及星辰的运行。他们这样做时，就忘记了自己”。他给他的弟弟读了这段话，而他的弟弟却不明白为什么他关上了书，不再说任何话。

Some decades later, about 1360, Fazio degli Uberti describes, in his rhyming geography, the wide panorama from the mountains of Auvergne, with the interest, it is true, of the geographer and antiquarian only, but still showing clearly that he himself had seen it. He must, however, have ascended far higher peaks, since he is familiar with facts which only occur at a height of 10,000 feet or more above the sea—mountain-sickness and its accompaniments—

of which his imaginary comrade Solinus tries to cure him with a sponge dipped in an essence. The ascents of Parnassus and Olympus, of which he speaks, are perhaps only fictions.

几十年以后，大约1360年，法齐奥·得利·乌贝蒂在他用韵文写的地理书中描述了从奥弗涅山脉远眺的广阔全景。诚然，他的兴趣只在地理和考古上，但他仍清楚地表明他亲身看到了这广阔全景。不管怎样，他一定登上过更高的山峰，因为他熟悉那些只有在海拔10,000英尺或更高的地方才能发生的那些事实，比如高山病及并发症等，而他虚构的伙伴苏利努斯试图用浸有香精的海绵给他治疗。他所说的攀登帕纳塞斯山和奥林匹斯山或许都是虚构的。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great masters of the Flemish school, Hubert and Jan van Eyck, suddenly lifted the veil from nature. Their landscapes are not merely the fruit of an endeavor to reflect the real world in art, but have, even if expressed conventionally, a certain poetical meaning—in short, a soul. Their influence on the whole art of the West is undeniable, and extended to the landscape-painting of the Italians, but without prev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 interest of the Italian eye for nature from finding its own expression.

在15世纪，佛兰德斯画派的大师们，胡伯特和扬·凡·艾克，突然揭开了大自然的面纱。他们的风景画不仅仅是力图在艺术中反映真实世界的结果，而且虽然使用的是传统的表现手法，但却具有某种诗意——简单地说，拥有一种灵魂。他们对于西方整个艺术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而且扩至意大利人的风景绘画，不过这没有阻碍意大利人用观察自然的特有的兴趣，去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

On this point, as in the scientific description of nature, Aeneas Sylvius is again one of the most weighty voices of his time. Even if we grant the justice of all that has been said against his character, we must nevertheless admit that in few other men was the picture of the age and its culture so fully reflected, and that few came nearer to the normal type of the men of the early Renaissance. It may be added parenthetically that even in respect to his moral character he will not be fairly judged if we listen solely to the complaints of the German Church, which his fickleness helped to balk of the Council it so ardently desired.

就这点而言，正如对自然的科学描述，埃尼亚斯·西尔维于斯仍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即使我们认为所有对他性格的非难都不失公允，但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很少有其他人的作品能如此充分反映那个时代的图景以及它的文化，而且很少有人能更接近于文艺复兴早期标准型的人。可能还要附带提到，甚至关于他的道德品质，如果我们只听德意志教会的抱怨，说他的反复无常使教会热切盼望的政务会无法召开，那我们就不能对他做出公平的判断。

He here claims our attention as the first who not only enjoyed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Italian landscape, but described it with enthusiasm down to its minutest details.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and the south of Tuscany—his native home—he knew thoroughly, and after he became pope he spent his leisure during the favorable season chiefly in excursions to the country. Then at last the gouty man was rich enough to have himself carried in a litter through the mountains and valleys; and when we compare his enjoyments with those of the popes who succeeded him, Pius, whose chief delight was in nature, antiquity and simple but noble architecture, appears almost a saint. In the elegant and flowing Latin of his *Commentaries*

he freely tells us of his happiness. [1_2]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是第一个不仅领略了意大利壮丽的乡村风光，还满怀热情将其描写得细致入微的人。对这个教会国家及托斯卡纳南部——他的家乡——他了解很全面。成为教皇后，在适宜的季节里，他的闲暇时间主要用于去乡村远足。最后，他患痛风病，但又相当富裕，足够他坐在轿子上请人抬着他穿山过谷。当我们把他的享受和他以后的教皇们相比时，这位庇护教皇主要以领略自然美、寻访古迹和欣赏朴素而宏伟的建筑为乐，他看来几乎是一个圣人。他在以优美而流畅的拉丁文所写的《个人生平传记》中，直率地谈及他的乐趣。 [2_3]

His eye seems as keen and practiced as that of any modern observer. He enjoys with rapture the panoramic splendor of the view from the summit of the Alban Hills—from the Monte Cavo—whence he could see the shores of St Peter from Terracina and the promontory of Circe as far as Monte Argentaro, and the wide expanse of country round about, with the ruined cities of the past, and with the mountain-chains of central Italy beyond; and then his eye would turn to the green woods in the hollows beneath and the mountain-lakes among them. He feels the beauty of the position of Todi, crowning the vineyards and olive-clad slopes, looking down upon distant woods and upon the valley of the Tiber, where towns and castles rise above the winding river. The lovely hills about Siena, with villas and monasteries on every height, are his own home, and his descriptions of them are touched with a peculiar feeling. Single picturesque glimpses charm him too, like the little promontory of Capo di Monte that stretches out into the Lake of Bolsena. 'Rocky steps,' we read, 'shaded by vines, descend to the water's edge, where the evergreen oaks stand between the cliffs,

alive with the song of thrushes.' On the path round the Lake of Nemi, beneath the chestnuts and fruit-trees, he feels that here, if anywhere, a poet's soul must awake—here in the hiding-place of Diana! He often held consistories or received ambassadors under huge old chestnut-trees, or beneath the olives on the greensward by some gurgling spring. A view like that of a narrowing gorge, with a bridge arched boldly over it, awakens at once his artistic sense. Even the smallest details give him delight through something beautiful, or perfect, or characteristic in them—the blue fields of waving flax, the yellow gorse which covers the hills, even tangled thickets, or single trees, or springs, which seem to him like wonders of nature.

他似乎有可以和任何现代观察家一样敏锐而熟练的眼光。他怀着极度狂喜的心情，从阿尔本群山的最高峰——从卡弗山上——眺望周围壮丽的全景，从那里，他能够看到从特拉西那和喀耳刻海岬绵延的圣彼得湾海岸，远及阿尔真塔里奥山以及周围的广阔田野，还有古代城市的废墟和对面中部意大利的山脉。然后，他的目光转向下面低洼处的绿色森林和它们中的大片湖水。他觉得托迪山形很美，它盘踞在布满葡萄园和橄榄树的山坡上，俯瞰远处的森林和台伯河的溪谷，那里很多市镇和城堡耸立在蜿蜒的河流上方。锡耶纳周围迷人的山冈，高高低低到处点缀着别墅和寺院，那就是他的家乡，而他以一种特殊的感情对它们进行了描述。瞥见那种单独的如画风景同样让他陶醉，比如伸展到博尔塞纳湖里的蒙特岬小山嘴。“岩石石级，”我们读到，“被葡萄藤浓荫覆盖，向下通到水边，那里长青的橡树挺立在悬崖峭壁之间，画眉鸟的歌唱让它们充满生机。”在绕着内米湖的小路上，在栗子树和果树的下边，他感到，就是在这儿，在狄安娜女神的隐居处，一个诗人的灵魂一定是觉醒的！他常常在巨大古老的栗树下，或是在淙淙泉水边的绿草地上的橄榄树下召开红衣教会议或接见使节。一条渐窄的峡谷，一弯拱桥醒目地架于其上，诸如此类的风景马上就会唤醒他的艺术细胞。即使最细枝末节处也能通过其中某些美

丽的、完好的或独特的地方让他欣喜——如亚麻翻涌的蓝色田野、漫山遍野的黄色金雀花，甚至缠结的灌木丛，抑或孤树流泉，在他看来都是大自然的奇观。

The height of his enthusiasm for natural beauty was reached during his stay on Monte Amiata, in the summer of 1462, when plague and heat made the lowlands uninhabitable. Half-way up the mountain, in the old Lombard monastery of San Salvatore, he and his court took up their quarters. There, between the chestnuts which clothe the steep declivity, the eye may wander over all southern Tuscany, with the towers of Siena in the distance. The ascent of the highest peak he left to his companions, who were joined by the Venetian envoy; they found at the top two vast blocks of stone one upon the other—perhaps the sacrificial altar of a pre-historical people—and fancied that in the far distance they saw Corsica and Sardinia rising above the sea. In the cool air of the hills, among the old oaks and chestnuts, on the green meadows where there were no thorns to wound the feet, and no snakes or insects to hurt or to annoy, the pope passed days of unclouded happiness. For the *segnatura,* which took place on certain days of the week, he selected on each occasion some new shady retreat, *'novos in convallibus fontes et novas inveniens umbras, quæ dubiam facerent electionem'.* At such times the dogs would perhaps start a great stag from his lair, who, after defending himself a while with hoofs and antlers, would fly at last up the mountain. In the evening the pope was accustomed to sit before the monastery on the spot from which the whole valley of the Paglia was visible, holding lively conversations with the cardinals. The courtiers who ventured down from the heights on their hunting expeditions found the heat below intolerable, and the scorched plains like a very hell, while the monastery, with its cool, shady woods, seemed like an abode of the

blessed.

1462年夏，瘟疫和高温让低地不适合居住，他就暂住在阿米亚塔山上，那段时间，他对自然美的热爱达到顶峰。就在半山腰处，圣塞尔瓦托那古老的伦巴第修道院里，他和他的廷臣们住了下来。在那儿，在长满陡坡的栗子树中间，可以放眼看到整个南部托斯卡纳区和远处锡耶纳的群塔。他让他的同伴们和威尼斯使节一起登上最高峰；他们在峰顶发现两块巨石相互重叠——也许是一个史前民族的祭坛——并幻想在远方，他们看到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从海上升起。在山上凉爽的空气里，在古老的橡树和栗子树之间，在绿油油的草地上，既没有刺伤足踝的荆棘，也没有伤人、扰人的蛇虫，这位教皇就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至于一周中某些天里要签署公文，他每次都挑一个新的阴凉的隐蔽处，“当时他正发现深山穷谷间使人选择为难的新的泉水和新的树荫处”。在这些时候，猎狗也许会把一只雄鹿从它的穴洞中惊起，而雄鹿用蹄子和叉角反抗一阵后，最后必定往山上飞奔而去。在夜晚，教皇习惯于坐在修道院前一个能看到整个帕格里亚山谷的地方，和红衣主教们进行愉快的交谈。那些冒险从高处下山打猎的廷臣们，发现下边的酷热让人难以忍受，烤焦的平地正如一个十足的地狱，而修道院树荫笼罩、凉气袭人，恰似一个福地洞天。

All this is genuine modern enjoyment, not a reflection of antiquity. As surely as the ancients themselves felt in the same manner, so surely, nevertheless, were the scanty expressions of the writers whom Pius knew insufficient to awaken in him such enthusiasm.

这一切都是真正的现代享受，而并非古人的想法。尽管古人自己有同样的感受，但这位庇护教皇所知的那些作家们的贫乏的描写一定不足以在他心中唤醒这种热情。

The second great age of Italian poetry, which now followed at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ies, as well as the Latin poetry of the same period, is rich in proofs of the powerful effect of nature on the human mind. The first glance at the lyric poets of that time will suffice to convince us. Elaborate descriptions, it is true, of natural scenery, are very rare, for the reason that, in this energetic age, the novels and the lyric or epic poetry had something else to deal with. Boiardo and Ariosto paint nature vigorously, but as briefly as possible, and with no effort to appeal by their descriptions to the feelings of the reader, which they endeavor to reach solely by their narrative and characters. Letter-writers and the authors of philosophical dialogues are, in fact, better evidence of the growing love of nature than the poets. The novelist Bandello, for example, observes rigorously the rules of his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he gives us in his novels themselves not a word more than is necessary on the natural scenery amid which the action of his tales takes place, but in the dedications which always precede them we meet with charming descriptions of nature as the setting for his dialogues and social pictures. Among letter-writers, Aretino unfortunately must be named as the first who has fully painted in words the splendid effect of light and shadow in an Italian sunset.

随着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而来的意大利诗歌的第二个伟大时代，以及同时期的拉丁诗歌，都充分证明自然对人类心理的巨大影响。首先看看那个时代的抒情诗人就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一点。诚然，对自然风景过于繁复的描述很少见，因为在那个精神饱满的时代，小说和抒情诗或叙事诗另有要处理的事情。博亚尔多和阿里奥托斯积极地描绘自然，但尽可能简短；他们没有试着通过自己的描述去激起读者的感情，而只求用他们的故事和人物来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书信作家

和哲学对话作家比诗人们更能表明人对自然界日益增长的热爱。例如，小说家班戴洛严格遵守他那个文学范围的准则，在其小说中描述的故事发生所处的自然风景，除非必要，不会多写一个字。但常在给故事作序的题词里，我们见到关于自然作为他的对话和社会画面的背景的迷人描绘。在书信作家中，遗憾的是，阿雷蒂诺必须被提名为第一个曾经用语言来充分描绘意大利黄昏时光影交错的壮丽景象的人。

We sometimes find the feeling of the poets, also, attaching itself with tenderness to graceful scenes of country life. Tito Strozzi, about the year 1480, describes in a Latin elegy the dwelling of his mistress. We are shown an old ivy-clad house, half hidden in trees, and adorned with weather-stained frescoes of the saints, and near it a chapel, much damaged by the violence of the river Po, which flowed hard by; not far off, the priest ploughs his few barren roods with borrowed cattle. This is no reminiscence of the Roman elegists, but true modern sentiment; and the parallel to it—a sincere, unartificial description of country life in general—will be found at the end of this part of our work.

我们有时发现诗人们的情感也系附在乡村生活的优美风景中。大约在1480年，提托·斯特罗齐在一篇拉丁文挽歌里描绘了他的情妇的住所。展示给我们的是一所爬满常春藤的房子，半隐在树丛中，装点着因日晒雨淋而褪色的圣徒们的壁画，它附近有一个小教堂，大部分已被紧挨它流过的波河那汹涌河水冲毁。不远处，一个教士在用借来的牛耕种他没几个路德 [2_4] 的贫瘠的土地。这不是对罗马挽歌作者的缅怀，而是真正的当代情感；与此类似的描绘——对乡村生活一种大体上真实而没有加工的描绘——出现在本书这部分的结尾处。

It may be objected that the German painte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succeed in representing with perfect mastery these scenes of country life, as, for instance, Albrecht Durer, in his engraving of the Prodigal Son. But it is one thing if a painter, brought up in a school of realism, introduces such scenes, and quite another thing if a poet, accustomed to an ideal or mythological framework, is driven by inward impulse into realism. Besides which, priority in point of time is here, as in the descriptions of country life, on the side of the Italian poets.

也许有人反驳说，德国画家在16世纪初成功地以完美的技能表现了乡村生活的种种场景，比如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就在他《回头的浪子》这幅版画里这样做了。但是，如果一个受现实主义学派影响成长的画家，介绍这些场景，那是一回事，而如果一个习惯于一种理想或神话框架的诗人，受到内心的冲动进入现实主义，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除此以外，这里关于时间上的优先次序，就如对乡村生活的描绘中一样，还是以意大利诗人为先的。

Discovery of Man

人的发现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outward world the Renaissance added a still greater achievement, by first discerning and bringing to light the full, whole nature of man.

文艺复兴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人类的所有天性，当属人类对外部世界探索征程中的伟大进步。

This period, as we have seen, first gave the highest development to individuality, and then led the individual to the most zealous and thorough study of himself in all forms and under all conditions. Indeed,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is essentially involved in the recognition of it in oneself and in others. Between these two great processes our narrative has placed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literature because the mode of conceiving and representing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human nature in general was defined and colored by that influence. But the power of conception and representation lay in the age and in the people.

正如我们所见，这段时期首先给个性以最高度的发展，其次引导个人以一切形式、在一切条件下对自己做最热忱、最彻底的研究。确实，人格的发展从本质上说牵涉到对自身和他人的人格识别。本书讲过古代文学对这两大过程的影响，因为总的来说对个人和人性的设想和表现方式都是受这种影响的限定和渲染的。但设想和表现的能力仍然为那个时代和人民所有。

The facts which we shall quote in evidence of our thesis will be few in number. Here, if anywhere in the course of this discussion, the author is conscious that he is treading on the perilous ground of conjecture, and that what seems to him a clear, if delicate and gradual, transition in the intellectual movement of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may not be equally plain to others. The gradual awakening of the soul of a people is a phenomenon which may produce a different impression on each spectator. Time will judge which impression is the most faithful.

本文要用以引证的事实很少。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如果说作者

可以意识到他在任何地方是立足于危险的猜想这一基础之上，而且在他看来是14世纪和15世纪智力运动中的一个明确的（即使是微妙和渐进的）过渡，对别人来说也许不是同样清楚。一个民族精神的逐渐觉醒是一种现象，它可能对每个旁观者都产生不同印象。时间将判断哪一种印象是最可靠的。

Happily the study of the intellectual side of human nature began, not with the search after a theoretical psychology—for that, Aristotle still sufficed—but with the endeavor to observe and to describe. The indispensable ballast of theory was limited to the popular doctrine of the four temperaments, in its then habitual union with the belief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planets. Such conceptions may remain ineradicable in the minds of individuals without hindering the general progress of the age. It certainly makes on us a singular impression, when we meet them at a time when human nature in its deepest essence and in all its characteristic expressions was not only known by exact observation, but represented by an immortal poetry and art. It sounds almost ludicrous when an otherwise competent observer considers Clement VII to be of a melancholy temperament, but defers his judgement to that of the physicians, who declare the pope of a sanguine-choleric nature; or when we read that the same Gaston de Foix, the victor of Ravenna, whom Giorgione painted and Bambaia carved, and whom all the historians describe, had the saturnine temperament. No doubt those who use these expressions mean something by them; but the terms in which they tell us their meaning are strangely out of date in the Italy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幸而关于人性智力方面的研究不是从寻求一种理论心理学开始的——为此目的，只亚里士多德就足够了——而是从努力观察和描述入

手的。这种学说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局限于流行的四种气质学说，它当时惯常与对星宿力量的信仰结合在一起。这些概念可能在个人的心理上是很难根除的，但不会阻碍时代总的进步。当人性最深奥的本质及其所有独特的表达不仅通过准确的观察为我们所知，并为不朽的诗歌和艺术所表现时，如果我们能遇上这些概念，那当然会产生非凡的印象。听起来近乎可笑，一个本来有能力的观察者认为克莱门特七世有一种忧郁的气质，但由于医生声称教皇有一种多血质-胆汁质的天性，就屈从于他们的判断了。或者当我们读到，同一个加斯顿·德·富瓦，这位拉文那的胜利者，乔尔乔内为他画过像，巴姆拜亚为他雕过像，而且所有历史学家都描述过他，而这个人却有着阴沉的性格，这也是可笑的。使用那些表达的人这样做无疑有他们的用意，但他们用以表明其意思的术语在16世纪的意大利就过时已久了。

As examples of the free delineation of the human spirit, we shall first speak of the great poet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作为无拘无束描述人类精神的范例，我们将首先谈谈14世纪的伟大诗人。

If we were to collect the pearls from the courtly and knightly poetry of all the countries of the West during the two preceding centuries, we should have a mass of wonderful divinations and single pictures of the inward life, which at first sight would seem to rival the poetry of the Italians. Leaving lyrical poetry out of account, Godfrey of Strassburg gives us, in *Tristan und Isolde,* a representation of human passion, some features of which are immortal. But those pearls lie scattered in the ocean of artificial convention, and they are altogether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from a complete objective picture of the inward man and his spiritual

wealth.

如果我们从前两个世纪期间的西方所有国家的宫廷诗和骑士诗里收集精华，我们就能得到大批对内心生活的精彩预测和单独描绘，这些作品乍看之下似乎可以和意大利人的诗歌相媲美。不谈抒情诗，斯特拉斯堡的哥德弗雷在其《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中为我们描绘了人类的激情，其中有些特质是永恒的。但这些沧海遗珠散落在浩渺的矫揉造作的常规作品中，而它们全部都不同于那种对人类内心及其精神财富的完全客观的描述。

Italy, too,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had, through the *trovatori,* its share in the poetry of the courts and of chivalry. To them is mainly due the *canzone,* whose construction is as difficult and artificial as that of the songs of any northern minstrel. Their subject and mode of thought represents simply the conventional tone of the courts, be the poet a burgher or a scholar.

在13世纪，意大利也通过“抒情诗人”在宫廷诗和骑士诗中占有它的一份。这主要是由于产生了“合组歌”，它的结构和任何北部吟游诗人的歌曲结构一样费解和不自然。无论这个诗人是市民还是学者，歌曲主题和思维模式仅仅表现了宫廷习惯的基调。

But two new paths at length showed themselves, along which Italian poetry could advance to another and a characteristic future. They are not the less important for being concerned only with the formal and external side of the art.

但最后出现两条新的道路，沿着这两条路，意大利诗歌能够向前推进到另一个而且是独特的未来。它们不会因为只是涉及艺术的形式和外部方面就不大重要。

To the same Brunetto Latini—the teacher of Dante—who, in his *Canzoni,* adopts the customary manner of the *trovatori,* we owe the first-known *versi sciolti,* or blank hendecasyllabic verses, and in his apparent absence of form, a true and genuine passion suddenly showed itself. The same voluntary renunciation of outward effect, through confidence in the power of the inward conception, can be observed some years later in fresco-painting, and later still in painting of all kinds, which began to cease to rely on colour for its effect, using simply a lighter or darker shade. For an age which laid so much stress on artificial form in poetry, these verses of Brunetto mark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poch.

同样，布鲁内托·拉蒂尼——但丁的老师——在他的“合组歌”里，采用了“抒情诗人”的习惯写法，我们认为第一首已知的“无韵诗”，或者说十一音节诗是他写的。而且他显然不注重形式，但意外地表现了一种真实纯粹的激情。在几年后的壁画中，以及更晚一些年代里的各种绘画中，可以观察到，他同样通过对内心构思力量的信心而有意放弃外部效果。这些绘画开始不再依靠颜色来产生效果，而仅仅采用一种或淡或浓的阴影。对于一个如此重视诗歌中的人为形式的时代来说，布鲁内托的这些诗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About the same time, or eve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one of the many strictly balanced forms of metre, in which Europe was then so fruitful, became a normal and recognized form in Italy—the sonnet. The order of rhymes and even the number of

lines varied for a whole century, till Petrarch fixed them permanently. In this form all higher lyrical or meditative subjects, and at a later time subjects of every possible description, were treated, and the madrigals, the *sestine* and even the *canzoni* were reduced to a subordinate place. Later Italian writers complain, half jestingly, half resentfully, of this inevitable mould, this Procrustean bed, to which they were compelled to make their thoughts and feelings fit. Others were, and still are, quite satisfied with this particular form of verse, which they freely use to express any personal reminiscence or idle sing-song without necessity or serious purpose. For which reason there are many more bad or insignificant sonnets than good ones.

大约同时，甚至在13世纪的前半期，当时在欧洲大量出现的许多严格对称的韵律形式之一的十四行诗，在意大利成了一种标准的、公认的形式。韵脚的押法，甚至诗行的数目在整个世纪中都是变化的，直到彼特拉克把它们永久地固定下来。所有较高级的抒情或冥想的主题，以及较晚时期主题的每一个可能描述，都以这种形式来处理。而那些无伴奏合唱曲、六重唱甚至“合组歌”都降到了从属的地位。后来的意大利作家半是谐谑半是愤懑地抱怨这种必然的模型，这种强求一致的政策，他们被迫要让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去适应这种形式。其他人在过去和现在都对这种特殊的诗歌形式相当满意，他们自由地用它来表达任何个人对旧事的追忆，或写些没有必要或严肃目的的毫无意义的单调诗行。因此，拙劣而毫无意义的十四行诗比好的十四行诗多得多。

Nevertheless, the sonnet must be held to have been an unspeakable blessing for Italian poetry. The clearness and beauty of its structure, the invitation it gave to elevate the thought in the second and more rapidly moving half, and the ease with which it

could be learned by heart, made it valued even by the greatest masters. In fact, they would not have kept it in use down to our own century, had they not been penetrated with a sense of its singular worth. These masters could have given us the same thoughts in other and wholly different forms. But when once they had made the sonnet the normal type of lyrical poetry, many other writers of great, if not the highest, gifts, who otherwise would have lost themselves in a sea of diffusiveness, were forced to concentrate their feelings. The sonnet became for Italian literature a condenser of thoughts and emotions such as was possessed by the poetry of no other modern people.

不过，我们必须认为，十四行诗对意大利诗歌来说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福祉。它的结构清晰完美，它的后半首更加迅速让人感动，引人提高思想，以及它可以让人轻松牢记，这使得它甚至受到最伟大的大师们的重视。事实上，如果他们没有深深感到十四行诗的独特价值，他们也就不会一直使用到我们这个世纪。这些大师们本可以用其他而且完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同样的思想的。但他们一旦使十四行诗成为抒情诗的标准形式，许多其他即使不是具有最高才能也是具有伟大才能的作家们被迫将他们的感情集中于此，否则可能就已经迷失在无限的散漫中。对意大利文学来说，十四行诗成了一种思想和情感的冷凝器，这是其他任何当代民族诗歌中所不具有的。

Thus the world of Italian sentiment comes before us in a series of pictures, clear, concise, and most effective in their brevity. Had other nations possessed a form of expression of the same kind, we should perhaps have known more of their inward life; we might have had a number of pictures of inward and outward situations—reflections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emper—and should not be dependent for such knowledge on the so-called lyrical poets of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who can hardly ever be read with any serious enjoyment. In Italy we can trace an undoubted progress from the time when the sonnet ca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trovatori della transizione,* as they have been recently named, mark the passage from the troubadours to the poets—that is, to those who wrot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tiquity. The simplicity and strength of their feeling, the vigorous delineation of fact, the precise expression and rounding off of their sonnets and other poems, herald the coming of a Dante. Some political sonnets of the Guelphs and Ghibellines (1260-70) have about them the ring of his passion, and others remind us of his sweetest lyrical notes.

因此，意大利情感世界以一系列清晰、精炼和最有效的简洁的描绘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其他民族也具有这种同样的表达形式，那我们也许会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内心生活，我们或许也有了很多对内心情景和外部情况的描述——对民族性格和民族特征的反映——而不应该依赖14世纪和15世纪的所谓抒情诗人来获得这些知识，读这些诗人的作品很难让人产生任何真正的愉悦之情。在意大利，我们能够追溯从十四行诗开始存在的时候起就确实发生的进步。在13世纪的后半叶，正如他们最近被称作的“过渡时期的抒情诗人”，标志着从行吟诗人到诗人的过渡，换句话说，过渡到受古风影响写作的诗人。他们情感的简单和充沛，对事实强劲的描述，以及他们十四行诗和其他诗篇的精确表达和圆滑过渡，都预示着一个但丁的到来。归尔甫教皇党派和吉伯林皇帝党派的某些政治类十四行诗（1260-1270）带有他的热情的特点，而其他人的作品则让我们想起他最悦耳的抒情曲调。

Of his own theoretical view of the sonnet, we are unfortunately ignorant, since the last books of his work, *De vulgari eloquentia,* in which he proposed to treat of ballads and sonnets, either remained

unwritten or have been lost.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he has left us in his sonnets and *canzoni* a treasure of inward experience. And in what a framework he has set them! The prose of the *Vita nuova,* in which he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 of each poem, is as wonderful as the verses themselves, and forms with them a uniform whole, inspired with the deepest glow of passion. With unflinching frankness and sincerity he lays bare every shade of his joy and his sorrow, and moulds it resolutely into the strictest forms of art. Reading attentively these sonnets and *canzoni,* and the marvelous fragments of the diary of his youth which lie between them, we fancy that throughout the Middle Ages the poets have been purposely fleeing from themselves, and that he was the first to seek his own soul. Before his time we meet with many an artistic verse; but he is the first artist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d—the first who consciously cast immortal matter into an immortal form. Subjective feeling has here a full objective truth and greatness, and most of it is so set forth that all ages and peoples can make it their own. Where he writes in a thoroughly objective spirit, and lets the force of his sentiment be guessed at only by some outward fact, as in the magnificent sonnets *'Tanto gentile',* etc., and '*Vede perfettamente',* etc., he seems to feel the need to excuse himself. The most beautiful of these poems really belongs to this class—the *'Deh peregrini che pensosi andate'.*

至于但丁自己对十四行诗的理论观点，很不幸我们对此是无知的，因为他打算论述叙事诗歌和十四行诗的著作《俗语论》的最后几卷，不是没有写，就是已经散失。但事实上，他在他的十四行诗和“合组歌”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内心经验的宝藏。而且，他的结构安排多好啊！他在《新生》中记述每首诗的起源的散文，和那些诗本身一样美妙，并且受到最深的激情之光的激励，和那些诗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怀着无所畏惧的坦率和诚意，他将自己的喜悦和悲伤的

种种层次公之于众，并毅然将之熔铸于最严格的艺术形式里。仔细阅读这些十四行诗和“合组歌”，以及含在诗行之间的他年轻时的日记里那些精彩的片段，我们料想，在整个中世纪，诗人们都在有意逃离自我，而他是探索自己灵魂的第一人。在他那个时代之前，我们遇到很多艺术诗篇，但他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第一个有意识地将不朽的事件铸成不朽的形式的人。主观情感在这里有充分客观的事实和成就。而且它大部分都是这样展示，故而一切时代和民族都可以把它化为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以一种完全客观的精神写作，并让自己的情感力量只通过某种外在事实被人猜测，正如在宏伟的十四行诗《多么可爱》等篇和《仔细地看吧》等篇里，在这些地方，他似乎觉得有必要为自己辩解。这些诗歌中最美的篇章《且行且沉思的巡礼者们》实际上就属于这一类。

Even apart from the *Divine Comedy,* Dante would have marked by these youthful poems the boundary between medievalism and modern times. The human spirit had taken a mighty step towards the consciousness of its own secret life.

甚至撇开《神曲》不说，但丁也会用这些青春洋溢的诗歌标出中世纪精神和现代的界限。人类精神已经朝着意识到自己内在生活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The revelations in this matter which are contained in the *Divine Comedy* itself are simply immeasurable; and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go through the whole poem, one canto after another, in order to do justice to its valu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Happily we have no need to do this, as it has long been a daily food of all the countries of the West. Its plan, and the ideas on which it is based, belong to the Middle Ages, and appeal to our interest only historically; but it

is nevertheless the beginning of all modern poetry, through the power and richness shown in the description of human nature in every shape and attitude.

包含在《神曲》本身中在这方面的启示简直无可估量。而且为了从这种观点上尽量利用其价值，就有必要一篇接一篇地通读全诗。幸而我们不必这样做，因为它很久以来就是西方所有国家的日常食粮了。它的谋篇和立意属于中世纪，而且只是从历史角度引起我们的兴趣；但是，它凭借在描写人性的每种状态和态度中所展示的力量和丰富性，还是成为所有现代诗歌的开端。

From this time forward poetry may have experienced unequal fortunes, and may show, for half a century together, a so-called relapse. But its nobler and more vital principle was saved for ever; and whenever in the fourteenth, fifteen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ies an original mind devotes himself to it, he represents a more advanced stage than any poet out of Italy, given—what is certainly not always easy to settle satisfactorily—an equality of natural gifts to start with.

从这一时代以来，诗歌或许经历了不同的命运，而且可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呈现了一种所谓的倒退状态。但是，它更崇高更重要的原则却被永远地保存了下来。无论在14世纪、15世纪和16世纪初的哪个时候，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只要忠于这条原则，和意大利外任何诗人相比，他就代表一种更高级的阶段，前提是他们首先有同等的天赋——这当然未必容易得到满意解决。

Here, as in other things in Italy, culture—to which poetry

belongs—precedes the plastic arts and, in fact, gives them their chief impulse. More than a century elapsed before the spiritual element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attained a power of expression in any way analogous to that of the *Divine Comedy*. How far the same rule holds good for the artistic development of other nations, and of what importance the whole question may be, does not concern us here. For Italian civilization it is of decisive weight.

这里，正如意大利其他事物一样，文化——诗歌属于其中的一种——走在造型艺术前面，而且事实上，文化给了它们主要的推动力。过了一百多年，绘画和雕刻的精神要素才获得一种完全可以和《神曲》相比拟的表达力量。这条准则对其他国家的艺术发展有多大效果、这整个问题有多重要，此处并不涉及。而对于意大利文明来说，它却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The position to be assigned to Petrarch in this respect must be settled by the many readers of the poet. Those who come to him in the spirit of a cross-examiner, and busy themselves in detecting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poet and the man, his infidelities in love, and the other weak sides of his character, may perhaps, after sufficient effort, end by losing all taste for his poetry. In place, then, of artistic enjoyment, we may acquire a knowledge of the man in his 'totality'. What a pity that Petrarch's letters from Avignon contain so little gossip to take hold of, and that the letters of his acquaintances and of the friends of these acquaintances have either been lost or never existed! Instead of Heaven being thanked when we are not forced to inquire how and through what struggles a poet has rescued something immortal from his own poor life and lot, a biography has been stitched together for Petrarch out of these so-called 'remains', which reads like an indictment. But the poet may

take comfort. If the printing and editing of the correspondence of celebrated people goes on for another half-century as it has begun in England and Germany, he will have illustrious company enough sitting with him on the stool of repentance.

在这一方面能给彼特拉克什么地位，必须由这位诗人的许多读者来决定。那些本着盘问者的精神想起他并忙着探寻在这位诗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探寻他对于爱情的不忠以及他性格上其他弱点的人，经过一番努力后，或许最终会完全失去对他诗歌的兴趣。那时，我们或许会以获得对这个人“整体”的了解来代替艺术享受。遗憾的是，彼特拉克在阿维尼翁写的书信里几乎没有留下话柄的闲言碎语，而他的熟人和这些熟人的朋友们的书信不是遗失就是从来没有过。当我们不必被迫查究一个诗人怎样和通过什么样的斗争，使他自己不幸生活和不幸命运中的不朽的东西免遭损害，这时我们不是去感谢上帝，而是从这些所谓的“遗稿”中为彼特拉克缝缀出一篇读起来像诉状一样的传记。但诗人可以得到安慰。如果要像在英国和德国已经开始的那样，把名人书信的印刷和编纂再进行半个世纪，他就会有足够的杰出的同伴和他一起坐在悔罪席上。

Without shutting our eyes to much that is forced and artificial in his poetry, where the writer is merely imitating himself and singing on in the old strain, we cannot fail to admire the marvelous abundance of pictures of the inmost soul—descriptions of moments of joy and sorrow which must have been thoroughly his own, since no one before him gives us anything of the kind, and on which his significance rests for his country and for the world. His verse is not in all places equally transparent; by the side of his most beautiful thoughts stands at times some allegorical conceit, or some sophistical trick of logic, altogether foreign to our present taste. But the balance is on the side of excellence.

他诗中有很多不自然的和矫揉造作的地方，这仅仅是作者在效仿自己，按老旋律继续歌唱，对此我们不会视若无睹，但我们不能不赞赏那些灵魂最深处的大量精彩的描绘——对喜悦和悲痛的描述，这些必定都完全是他自己的，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作过这类描述，而他对于他的国家和世界的重要性就在于此。他的诗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同样清晰易懂，在他最美的想法中，有时会出现某种讽喻的思想或某种逻辑上的诡辩把戏，所有这些都不符合我们现在的口味。但是，权衡之下，还是优点居多。

Boccaccio, too, in his imperfectly known sonnets, succeeds sometimes in giving a most powerful and effective picture of his feeling. The return to a spot consecrated by love (Son. 22), the melancholy of spring (Son. 33), the sadness of the poet who feels himself growing old (Son. 65), are admirably treated by him. And in the *Ameto* he has described the ennobling and transfiguring power of love in a manner which would hardly be expected from the author of the *Decameron.* In the *Fiammetta* we have another great and minutely painted picture of the human soul, full of the keenest observation, though executed with anything but uniform power, and in parts marred by the passion for high-sounding language and by an unlucky mixture of mythological allusions and learned quotations. The *Fiammetta,* if we are not mistaken, is a sort of feminine counterpart to the *Vita nuova* of Dante, or at any rate owes its origin to it.

薄伽丘在他不大为人所知的十四行诗里，有时也成功地对自己的情感做出最有力、最有效的描绘。《回到被爱祝圣的地方》（诗22），《春的忧郁》（诗33），《一个感觉自己老去的诗人的悲哀》（诗65），他都极好地加工过。在《爱弥多》里，他描述了爱情使人

高贵和使人容光焕发的力量，那种风格很难让人想象它是出自《十日谈》的作者之手。在《菲亚梅塔》中，我们看到另一幅充满最敏锐观察的关于人类灵魂的伟大而详细的描画，尽管它没有用始终如一的力量去处理，有些地方因热衷夸夸其谈的语言以及不凑巧地把神话典故和学术引文混在一起而遭到破坏。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菲亚梅塔》就是但丁《新生》的一个姐妹篇，或者说它至少源于《新生》。

That the ancient poets, particularly the elegists, and Virgil, in the fourth book of the *Aeneid,* were not without influence on the Italians of this and the following generation is beyond a doubt; but the spring of sentiment within the latter was nevertheless powerful and original. If we compare them in this respect with their contemporaries in other countries, we shall find in them the earliest complete expression of modern European feeling. The question, be it remembered, is not to know whether eminent men of other nations did not feel as deeply and as nobly, but who first gave documentary proof of the widest knowledge of the movements of the human heart.

毫无疑问，古代诗人，特别是挽歌作者，以及维吉尔的《埃涅伊德》第四卷，对这一代和下一代的意大利人不是没有影响的，但意大利人内心的情感之泉却是强大而独特的。如果我们就这方面把他们和其他国家同时代的人相比较，我们将发现他们身上最早地完整表达了现代欧洲情感。应该记住的是，问题不是要知道其他国家的杰出人物是否和他们有同样深刻和高尚的感受，而是谁首先书面证明自己拥有关于人类内心活动的最广泛的知识？

Why did the Italians of the Renaissance do nothing above the second rank in tragedy? That was the field on which to display

human character, intellect and passion in the thousand forms of their growth, their struggles and their decline. In other words: why did Italy produce no Shakespeare? For with the stage of other northern countries besides England the Italian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had no reason to fear a comparison; and with the Spaniards they could not enter into competition, since Italy had long lost all traces of religious fanaticism, treated the chivalrous code of honor only as a form, and was both too proud and too intelligent to bow down before its tyrannical and illegitimate masters. We have therefore only to consider the English stage in the period of its brief splendor.

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在悲剧上不过二流的地位？悲剧是表现人类性格、智力和激情的许许多多种形式的成长、斗争和衰退的场地。换句话说，为什么意大利没有产生莎士比亚？16世纪和17世纪的意大利人没有理由害怕和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北方国家的戏剧进行比较，而他们却无法和西班牙人相抗衡，因为意大利早就失去了宗教狂热的一切痕迹，把骑士风度的荣誉守则仅仅作为一种形式，而且他们太过骄傲，又太过聪明，不愿在它专制而不合法的主人们面前示弱。因此，我们只好考虑处于其短暂辉煌期的英语戏剧。

It is an obvious reply that all Europe produced but one Shakespeare, and that such a mind is the rarest of Heaven's gifts. It is further possible that the Italian stage was on the way to something great when the Counter-Reformation broke in upon it, and, aided by the Spanish rule over Naples and Milan, and indirectly over almost the whole peninsula, withered the best flowers of the Italian spirit. It would be hard to conceive of Shakespeare himself under a Spanish viceroy, or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Holy Inquisition at Rome, or even in his own

country a few decades later, at the time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The stage, which in its perfection is a late product of every civilization, must wait for its own time and fortune.

一个明显的回答是，全欧洲只产生了一个莎士比亚，而这样的人是最罕见的天赋奇才。进一步的可能是，当意大利戏剧正朝着伟大迈进时，突然反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了，而且受助于西班牙对那不勒斯和米兰的统治及对整个半岛的间接统治，意大利精神最美的花朵枯萎了。很难想象，在西班牙总督的统治下，或者在罗马宗教裁判所附近，甚至是在几十年后他自己的国家，在英国革命时期，会产生一个莎士比亚。处于完美状态的戏剧是每一个文明的晚期产物，必须等待它自己的时代和时运的到来。

We must not, however, quit this subject without mentioning certain circumstances which were of a character to hinder or retard a high development of the drama in Italy till the time for it had gone by.

然而，离开这个话题前，我们必须提到一些情况，它们充当阻碍或推迟意大利戏剧高度发展的角色，直到戏剧的时代成为过去。

As the most weighty of these causes we must mention without doubt that the scenic tastes of the people were occupied elsewhere, and chiefly in the mysteries and religious processions. Throughout all Europe dramatic representations of sacred history and legend form the origin of the secular drama; but Italy, as it will be shown more fully in the sequel, had spent on the mysteries such a wealth of decorative splendor as could not but be unfavorable to the

dramatic element. Out of all the countless and costly representations, there sprang not even a branch of poetry like the *autos sacramentales* of Calderon and other Spanish poets, much less any advantage or foundation for the legitimate drama.

作为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当然必须提到，这一民族的舞台兴趣转向了别处，主要是在奇迹剧和宗教游行中。在整个欧洲，有关宗教历史和传说的戏剧演出形成世俗戏剧的滥觞；但是意大利，后文还要更充分地展示，在奇迹剧上大量投入装饰华丽的场面，这只能对戏剧要素不利。从所有这些数不胜数的代价高昂的描绘中，甚至无法产生如卡尔德隆的《圣餐神秘剧》和其他西班牙诗人那一派的诗歌，更不用说为专门适用于舞台的正规戏剧提供任何有利条件或基础了。

And when the latter did at length appear, it at once gave itself up to magnificence of scenic effects, to which the mysteries had already accustomed the public taste to far too great an extent. We learnt with astonishment how rich and splendid the scenes in Italy were, at a time when in the North the simplest indication of the place was thought sufficient. This alone might have had no such unfavorable effect on the drama if the attention of the audience had not been drawn away from the poetical conception of the play partly by the splendor of the costumes, partly and chiefly by fantastic interludes *(intermezzi)*.

当正规戏剧最终出现时，它就立刻沉溺在宏大的舞台效果中，对此奇迹剧已经在极大程度上适应了公众品位。我们惊奇地了解到意大利的戏剧场面有多富丽堂皇，而那时在北方，最简单的道具来表明演出场所就被认为是足够了。要不是观众的注意力一部分受到华丽的戏

服、一部分——而且是主要——受到极美妙的幕间插曲的吸引而没有注意到戏剧诗意的构想的话，单就这一点或许不会对戏剧产生如此不利的影响。

That in many places, particularly in Rome and Ferrara, Plautus and Terence, as well as pieces by the old tragedians, were given in Latin or in Italian, that the academies of which we have already spoken made this one of their chief objects, and that the poets of the Renaissance followed these models too servilely, were all untoward conditions for the Italian stage at the period in question. Yet I hold them to be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Had not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rule of foreigners intervened, these very disadvantages might have been turned into useful means of transition. At all events, by the year 1520 the victory of the mother-tongue in tragedy and comedy was, to the great disgust of the humanists, as good as won. On this side, then, no obstacle stood in the way of the most developed people in Europe to hinder them from raising the drama, in its noblest forms, to be a true reflection of human life and destiny. It was the Inquisitors and Spaniards who cowed the Italian spirit, and rendered impossibl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greatest and most sublime themes, most of all when they were associated with patriotic memo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distracting *intermezzi* did serious harm to the drama. We must now consider them a little more closely.

在很多地方，特别是罗马和费拉拉，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以及古代悲剧作家的作品，都是以拉丁语或意大利语上演的，那些我们已经说过的学会以此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们过分屈从于这些模式，所有这些对我们谈论的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戏剧都是不利条件。然而，我认为这些都是次要的。如果没有反宗教

改革和外国人的统治干预，这些十足的不利条件可能已经转变成有用的过渡方式。无论如何，到了1520年，让人文主义者极其扫兴的是，在悲剧和喜剧中使用母语的这场仗可以算是胜利了。当时，在大西洋一边的欧洲这个最发达的民族，没有任何障碍阻挡他们以戏剧最崇高的形式来将其提升到真实反映人类生活和命运的位置。正是异端裁判所的审判者和西班牙人威胁到意大利精神，并且使人不能对最伟大最崇高的主题进行描绘，特别是当它们与爱国往事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同时，分散注意力的幕间插曲无疑严重损害了戏剧。我们现在必须对它们进行更严密地考虑。

When the marriage of Alfonso of Ferrara with Lucrezia Borgia was celebrated, Duke Hercules in person showed his illustrious guests the 110 costumes which were to serve at the representation of five comedies of Plautus, in order that all might see that not one of them was used twice. But all this display of silk and camlet was nothing to the ballets and pantomimes which served as interludes between the acts of the Plautine dramas. That, in comparison, Plautus himself seemed mortally dull to a lively young lady like Isabella Gonzaga, and that while the play was going on everybody was longing for the interludes, is quite intelligible when we think of the picturesque brilliancy with which they were put on the stage. There were to be seen combats of Roman warriors, who brandished their weapons to the sound of music, torch-dances executed by Moors, a dance of savages with horns of plenty, out of which streamed waves of fire—all as the ballet of a pantomime in which a maiden was delivered from a dragon. Then came a dance of fools, got up as Punches, beating one another with pigs' bladders, with more of the same kind. At the court of Ferrara they never gave a comedy without 'its' ballet *(moresca)*. In what style the *Amphitruo* of Plautus was there represented (1491, at the first marriage of Alfonso with Anna Sforza) is doubtful. Possibly it was given rather

as a pantomime with music than as a drama. In any case, the accessories were more considerable than the play itself. There was a choral dance of ivy-clad youths, moving in intricate figures, done to the music of a ringing orchestra; then came Apollo, striking the lyre with the plectrum, and singing an ode to the praise of the House of Este; then followed, as an interlude within an interlude, a kind of rustic farce, after which the stage was again occupied by classical mythology—Venus, Bacchus and their followers—and by a pantomime representing the judgement of Paris. Not till then was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able of Amphitruo performed, with unmistakable references to the future birth of a Hercules of the House of Este. At a former representation of the same piece in the courtyard of the palace (1487), 'a paradise with stars and other wheels' was constantly burning, by which is probably meant an illumination with fireworks, that, no doubt, absorbed most of the attention of the spectators. It was certainly better when such performances were given separately, as was the case at other courts. We shall have to speak of the entertainments given by the Cardinal Pietro Riario, by the Bentivogli at Bologna, and by others, when we come to treat of the festivals in general.

在庆祝费拉拉的阿方索和卢克雷齐娅·波吉亚的婚礼时，赫拉克勒斯公爵亲自向他显赫的宾客们展示了上演普劳图斯的五部喜剧时穿着的一百一十套戏服，为的是所有人都能看到它们中没有一件穿过两次。但是，所有这些丝绸羽纱的展现相对于充当普劳图斯戏剧幕与幕之间的幕间节目的芭蕾舞和哑剧来说却无足轻重。和一个如伊莎贝拉·贡扎加般活泼的年轻女子相比，普劳图斯自己似乎沉闷十足；与此相似，当我们想到那些幕间节目在舞台表演时的生动出色，那在表演进行当中，每个人都盼望看幕间节目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人们可以看到罗马武士们的格斗，他们随着音乐声挥舞着武器；还有摩尔人表演的火把舞，这是一种野蛮人的舞蹈，他们拿着很多号角，号角里涌动

着一波波的火光——整个是一出哑剧芭蕾，演的是从恶龙那儿解救出一个少女的故事。然后是扮成潘趣的小丑们的舞蹈，他们用猪膀胱和更多的此类东西来互相厮打。在费拉拉的宫廷里，从来没有一个喜剧的表演不伴以“它的”芭蕾舞剧（化装舞）的。我们拿不准普劳图斯的《安菲特鲁奥》在那儿是以什么形式上演的（是1491年，在阿方索的第一次婚礼，即与安娜·斯福尔萨的结婚典礼上表演的）。或许它不是以戏剧而是以有音乐伴奏的哑剧形式表演的。不管怎样，那些附属的东西比戏剧本身更引人注意。有一个身披常春藤的青年合唱舞表演，舞蹈随着交响乐队的音乐按复杂的图形移动。然后阿波罗出来了，用琴拨敲击竖琴，唱着颂歌来赞扬埃斯特家族；接下来，作为插曲中的插曲，是一种乡村滑稽剧；之后，再次占据舞台的是表演爱与美之神维纳斯、酒神巴克斯及其追随者们的古典神话剧以及一出表演帕里斯的裁决的哑剧。直到那以后才演安菲特鲁奥传说的后半段，确定无疑地提及埃斯特家族一个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将要诞生。这同一个戏剧前一次在宫廷庭院表演时（1487年），“缀着星星和其他轮状物的天堂”一直燃烧着，其用意或许在于用烟火来照明，但它无疑吸引了观众的大部分注意力。如果这些表演像在其他宫廷里那样分开来进行，当然会好得多。当我们要论及一般的节日庆典时，我们得谈谈红衣主教彼得罗·里亚里奥、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和其他人所提供的娱乐节目。

This scenic magnificence, now become universal, had a disastrous effect on Italian tragedy. 'In Venice formerly,' writes Francesco Sansovino, about 1570,

这种在现在很普遍的舞台的富丽堂皇，对意大利悲剧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以前在威尼斯”，弗朗西斯科·圣索维诺写道（约1570年）：

besides comedies, tragedies by ancient and

modern writers were put on the stage with great pomp. The fame of the scenic arrangements *(apparati)* brought spectators from far and near. Nowadays, performances are given by private individuals in their own houses, and the custom has long been fixed of passing the carnival in comedies and other cheerful entertainments.

除喜剧外，古代和现代作家写的悲剧以及其盛大的形式在舞台上上演。舞台布景的名声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现在，表演是由私人在他们自己的私邸上演，而以喜剧和其他令人开心的娱乐节目度过狂欢节早已成为固定的习俗。

In other words, scenic display had helped to kill tragedy.

换句话说，舞台上的展示促成了悲剧的毁灭。

The various starts or attempts of these modern tragedians, among which the *Sofonisba* of Trissino (1515) was the most celebrated, belong to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genteel comedy, modeled on Plautus and Terence. Even Ariosto could do nothing of the first order in this style. On the other hand, popular prose-comedy, as treated by Machiavelli, Bibbiena and Aretino, might have had a future, if its matter had not condemned it to destruction. This was, on the one hand, licentious to the last degree, and on the other, aimed at certain classes in society, which,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ceased to afford a ground

for public attacks. If in the *Sofonisba* the portrayal of character gave place to brilliant declamation, the latter, with its half-sister caricature, was used far too freely in comedy also.

那些现代悲剧作家的各种开始或尝试都成为了文学的历史，其中最著名的是特里西诺的《苏芳尼斯巴》（1515年）。对模仿普劳图斯和特伦提乌斯的高雅喜剧也可以这么说。甚至阿里奥斯托在这种体裁上也没能写出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诸如马基雅弗利、比别纳和阿雷蒂诺加工的通俗的散文喜剧，如果不是它的内容迫使它毁灭，可能它还有未来。它的内容一方面极度放肆，另一方面，它以社会上某些阶层为目标，这些阶层在16世纪中期以后不再有让公众攻击的理由。如果说在《苏芳尼斯巴》里，人物的描绘已经为才华横溢的雄辩所取代，那后者和它的异母姐妹，即夸张讽刺的描绘，在喜剧里也用得太过随便了。

The writing of tragedies and comedies, and the practice of putting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plays on the stage, continued without intermission; but they served only as occasions for display. The national genius turned elsewhere for living interest. When the opera and the pastoral fable came up, these attempts were at length wholly abandoned.

悲剧和喜剧的写作，以及将古代和现代的戏剧搬上舞台表演的活动并没有中断过；但它们只不过是作为展示的重大活动而已。这个民族的天才转向别处获得生活情趣。当歌剧和田园故事出现时，这些努力最后完全被放弃了。

One form of comedy only was and remained national—the

unwritten, improvised *commedia dell'arte.* It was of no great service in the delineation of character, since the masks used were few in number and familiar to everybody. But the talent of the nation had such an affinity for this style that often in the middle of written comedies the actors would throw themselves on their own inspiration, so that a new mixed form of comedy came into existence in some places. The plays given in Venice by Burchiello, and afterwards by the company of Armonio, Val. Zuccato, Lod. Dolce and others, were perhaps of this character. Of Burchiello we know expressly that he used to heighten the comic effect by mixing Greek and Slavonic words with the Venetian dialect. A complete *commedia dell'arte,* or very nearly so, was represented by Angelo Beolco, known as *il Ruzzante* (1502-42), whose customary masks werePaduan peasants, with the names Menato, Vezzo, Billora, etc. He studied their dialect when spending the summer at the villa of his patron Luigi Cornaro (Aloysius Cornelius) at Codevico. Gradually all the famous local masks made their appearance, whose remains still delight the Italian populace in our day: Pantalone, the Doctor, Brighella, Pulcinella, Arlecchino and the rest. Most of them are of great antiquity, and possibly are historically connected with the masks in the old Roman farces; but it was not till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at several of them were combined in one piece. At the present time this is less often the case; but every great city still keeps to its local mask—Naples to the Pulcinella, Florence to the Stentorello, Milan to its often so admirable Meneghino.

只有一种喜剧形式曾经属于并依然属于这个民族，即没有剧本的、即兴表演的“假面戏”。它没有大力进行人物描绘，因为所用的面具数量不多，而且每个人都很熟悉。但是，这个民族的有才之人对这种形式如此亲近，以至常常在有剧本的戏剧中间，演员们会听凭自己的灵感来演出，结果在某些地方产生了一种新的混合形式的喜剧。布

尔奇埃诺在威尼斯演出的戏剧以及后来由亚尔莫尼奥、瓦尔·朱加托、卢德·多尔切等人的剧团演出的戏或许就具有这种特征。我们明确知道，布尔奇埃诺过去常常把希腊语和斯拉夫语与威尼斯方言混在一起来加强喜剧效果。一个完全的或差不多是完全的“假面戏”，由被称为“鲁赞特二世”的安吉洛·贝奥科（1502-1542）演出。他通常的假面是帕多瓦的农夫，叫梅那托、韦佐或比洛拉什么的。当他在科德维科他的保护人路易吉·科尔纳罗（阿洛伊修斯·科尔内利乌斯）的别墅里度夏时，他研究了他们的方言。逐渐地，所有著名的地方假面戏都出现了，遗留下来的诸如庞达龙医生、布利格拉、普奇涅拉以及阿尔莱奇诺等等剧目仍然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意大利民众所喜爱。它们中大多数非常古老，而且可能在历史上和古罗马滑稽剧中的假面有关联。但是，直到16世纪，才把它们中的几个合成一出戏。现在，这种情况不常见了，但每一个大城市仍然坚守其地方假面戏——那不勒斯是普奇涅拉、佛罗伦萨是斯登托雷诺尔、米兰是它常常都让人赞扬的米讷吉诺。

This is indeed scanty compensation for a people which possessed the power, perhaps to a greater degree than any other, to reflect and contemplate its own highest qualities in the mirror of the drama. But this power was destined to be marred for centuries by hostile forces, for whose predominance the Italians were only in part responsible. The universal talent for dramatic representation could not indeed be uprooted, and in music Italy long made good its claim to supremacy in Europe. Those who can find in this world of sound a compensation for the drama, to which all future was denied, have, at all events, no meagre source of consolation.

这对于拥有可能比其他任何民族更大力量能在戏剧的镜子前反映和思忖其最高才能的意大利民族来说，的确是一种小小的补偿。但这种力量注定受到敌对势力长达几个世纪的毁坏，对于这种敌对势力的

主导地位，意大利人只用负部分责任。戏剧描绘的通用才能，实际上是无法被根除的，而且在音乐上，意大利始终在欧洲保持最高地位。尽管戏剧的一切前途都遭到否定，但那些能在这个声音的世界里找到对戏剧的补偿的人，无论如何都得到了不少的安慰。

But perhaps we can find in epic poetry what the stage fails to offer us. Yet the chief reproach made against the heroic poetry of Italy is precisely on the score of the insignificance and imperfect representation of its characters.

但是，或许我们能在叙事诗里发现舞台所不能给我们的东西。不过，对意大利英雄史诗的主要责难恰恰在于它的人物表现得无足轻重和不完美。

Other merits are allowed to belong to it, among the rest, that for three centuries it has been actually read and constantly reprinted, while nearly the whole of the epic poetry of other nations has become a mere matter of literary or historical curiosity. Does this perhaps lie in the taste of the readers, who demand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what would satisfy a northern public? Certainly, without the power of entering to some degree into Italian sentiment, it is impossible to appreciate the characteristic excellence of these poems, and many distinguished men declare that they can make nothing of them. And in truth, if we criticize Pulci, Boiardo, Ariosto and Berni solely with an eye to their thought and matter, we shall fail to do them justice. They are artists of a peculiar kind, who write for a people which is distinctly and eminently artistic.

在英雄史诗中，其他予以承认的优点是：三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得到实际阅读，并且不断重印；而同时，其他民族几乎所有的叙事诗都不过成了文学或历史上的古董。这或许是在于读者的品位吗？他们所要求的和使北方公众满意的东西有所不同。当然，没有对意大利感情深入到某种程度的能力，就不可能欣赏这些诗篇特有的卓越，而且许多杰出人士宣称他们可能对这些诗篇毫不在意。事实上，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诗篇的思想和内容去批评普尔西、博亚尔多、阿里奥斯托和贝尔尼，我们将不能公正地对待他们。他们是为一个明显而超凡的艺术民族而写作的一类特殊的艺术家。

The medieval legends had lived on after the gradual extinction of the poetry of chivalry, in the form partly of rhyming adaptations and collections, and partly of novels in prose. The latter was the case in Italy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but the newly awakened memories of antiquity were rapidly growing up to a gigantic size, and soon cast into the shade all the fantastic creations of the Middle Ages. Boccaccio, for example, in his *Amorosa visione,* names among the heroes in his enchanted palace Tristram, Arthur, Galeotto and others, but briefly, as if he were ashamed to speak of them; and following writers either do not name them at all, or name them only for purposes of ridicule. But the people kept them in its memory, and from the people they passed into the hands of the poet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se were now able to conceive and represent their subjects in a wholly new manner. But they did more. They introduced into it a multitude of fresh elements, and in fact recast it from beginning to end. It must not be expected of them that they should treat such subjects with the respect once felt for them. All other countries must envy them the advantage of having a popular interest of this kind to appeal to; but they could not without hypocrisy treat these myths with any respect.

在骑士诗逐渐消亡后，中世纪传说一部分以改编的押韵诗或诗集的形式，一部分以散文小说形式存留下来。在14世纪期间，意大利就是后一种情形；但是，重新唤醒的对古物的记忆很快就成排山倒海之势，而且不久就使中世纪所有极好的创作相形见绌。例如，薄伽丘在他的《爱的梦想》里，托那些在他让人迷醉的宫殿里的主角之口叫出特里斯特拉姆、亚瑟、加莱奥托和其他名字，但很简单，好像他羞于提到他们似的。以后的作家们要么根本就不提，要么仅仅为了嘲笑的目的而提到他们。但这个民族却把它们留在记忆里，并从这个民族这儿传到了15世纪的诗人手中。这些诗人们当时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构想和表现他们的主题。但他们做得更多。他们引进了大量新鲜元素，而且事实上是从头到尾进行重铸。我们不能期待他们以人们曾有的对这些主题的尊重态度来对待它们。所有其他国家一定羡慕他们有这种使大众感兴趣的事的优势，但他们却不会怀着尊重的心理不带虚伪地来对待这些神话故事。

Instead of this, they moved with victorious freedom in the new field which poetry had won. What they chiefly aimed at seems to have been that their poems, when recited, should produce the most harmonious and exhilarating effect. These works indeed gain immensely when they are repeated, not as a whole, but piecemeal, and with a slight touch of comedy in voice and gesture. A deeper and more detailed portrayal of character would do little to enhance this effect; though the reader may desire it, the hearer, who sees the rhapsodist standing before him, and who hears only one piece at a time, does not think about it at all. With respect to the figures, which the poet found ready made for him, his feeling was of a double kind; his humanistic culture protested against their medieval character, and their combats as counterparts of the battles and tournaments of the poet's own age exercised all his knowledge and artistic power,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lled forth all the highest qualities in the reciter. Even in Pulci, accordingly, we find

no parody, strictly speaking, of chivalry, nearly as the rough humor of his paladins at times approaches it. By their side stands the ideal of pugnacity—the droll and jovial Morgante—who masters whole armies with his bell-clapper, and who is himself thrown into relief by contrast with the grotesque and most interesting monster Margutte. Yet Pulci lays no special stress on these two rough and vigorous characters, and his story, long after they had disappeared from it, maintains its singular course. Boiardo treats his characters with the same mastery, using them for serious or comic purposes as he pleases; he has his fun even out of supernatural beings, whom he sometimes intentionally depicts as louts. But there is one artistic aim which he pursues as earnestly as Pulci, namely, the lively and exact description of all that goes forward. Pulci recited his poem, as one book after another was finished, before the society of Lorenzo il Magnifico, and in the same way Boiardo recited his at the court of Hercules of Ferrara. It may be easily imagined what sort of excellence such an audience demanded, and how little thanks a profound exposition of character would have earned for the poe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poems naturally formed no complete whole, and might just as well be half or twice as long as they now are. Their composition is not that of a great historical picture, but rather that of a frieze, or of some rich festoon entwined among groups of picturesque figures. And precisely as in the figures or tendrils of a frieze we do not look for minuteness of execution in the individual forms, or for distant perspectives and different planes, so we must as little expect anything of the kind from these poems.

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在诗歌已经赢得的新天地里成功地自由自在地行动。他们的主要目标似乎是：他们的诗歌在吟诵时应该产生最优美悦耳和最令人振奋的效果。在诵读零星段落而非整个作品时，伴

着声音和姿势上的一丝淡淡的喜剧感，这时这些作品确实极受欢迎。对性格更深刻、更细致的描绘也不能加强这种效果；虽然读者可能要求这样做，但那个看到吟诵者站在他前面，而且一次只听到一段的听者却全然没有想到。谈到人物，诗人发现他对那些现成的人物的感情有两种，他的人文主义修养反对他们的中世纪性格，而他们的战斗，作为诗人自己时代的战争和中世纪骑士比武的相似物，使他用出所有知识和艺术力量；同时，它们唤起吟诵者内心一切最高尚的品质。因此，即使在普尔西的作品中，严格说来，我们也没有发现骑士气概的拙劣模仿，尽管他的武士们粗野的诙谐谈吐有时和骑士气概很相近。在这些武士们身边，站立着一个好战的典型——滑稽而快活的莫尔甘特——他用铃锤主宰所有军队，而和那荒诞不经又最有趣的怪物马尔固特相比，他自己却甚觉欣慰。不过，普尔西并没有特别着重描写这两个粗鲁而充满活力的人物；而他们从他的故事里消失很久以后，他的故事还是保持着其独特的处理方式。博亚尔多同样熟练地处理他的人物，随心所欲地把他们用于严肃或可笑的目的；他甚至在超自然的鬼神身上开玩笑，有时故意把他们描述成乡巴佬。但是，他和普尔西同样热切地追求一种艺术目标，即对一切发生的事都做生动而准确的描述。普尔西在其诗歌一卷接着一卷写完时，就会在伟大的洛伦佐的社交圈子前吟诵他的诗歌。同样，博亚尔多也在费拉拉的赫拉克勒斯宫廷里吟诵自己的诗歌。或许轻易就能想到，听众需要的什么样的好诗，而且对性格的深刻阐述很少能为诗人赢得感谢。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诗歌自然无法形成完全的整体，而且可能是它们现在长度的一半或一倍。他们的创作不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图画，而是一条雕带，或者是在一组组生动如画的图形之间盘绕的某些华美的彩饰。恰好像在一条雕带的图形或须饰上，我们不会在单独的形状中寻找精雕细刻或远景和不同的平面一样，我们从这些诗歌里也不能期待任何这类东西。

The varied richness of invention which continually astonishes us, most of all in the case of Boiardo, turns to ridicule all our school definitions as to the essence of epic poetry. For that age, this form of literature was the most agreeable diversion from archeological

studies, and, indeed, the only possible means of re-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class of narrative poetry. For the versification of ancient history could only lead to the false tracks which were trodden by Petrarch in his *Africa,* written in Latin hexameters, and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later by Trissino in his *Italy Delivered from the Goths,* composed in *versi sciolti* —a never-ending poem of faultless language and versification, which only makes us doubt whether this unlucky alliance has been more disastrous to history or to poetry.

不断让我们感到惊讶的各种丰富多彩的创作，特别是博亚尔多的作品，转而奚落我们对史诗的本质做出的所有学院式定义。对那个时代来说，这种文学形式是考古学研究最能让人接受的一种消遣，而且也确实是重建一类独立的叙事诗的唯一可能手段。因为古代历史写入诗歌只会导致重蹈彼特拉克和特里西诺的覆辙，彼特拉克以拉丁文写了六音步诗《阿非利加》，而150年后，特里西诺以“无韵诗”写的《从哥特人手中救出来的意大利》，是一首毫无语言和诗律瑕疵的没完没了的诗歌，这只会让我们怀疑这种不幸的结合究竟更有害于历史还是诗歌。

And whither did the example of Dante beguile those who imitated him? The visionary *Trionfi* of Petrarch were the last of the works written under this influence which satisfy our taste. The *Amorosa visione* of Boccaccio is at bottom no more than an enumeration of historical or fabulous characters, arranged under allegorical categories. Others preface what they have to tell with a baroque imitation of Dante's first canto, and provide themselves with some allegorical comparison, to take the place of Virgil. Uberti, for example, chose Solinus for his geographical poem, the *Dittamondo,* and Giovanni Santi, Plutarch for his encomium on

Frederick of Urbino. The only salvation of the time from these false tendencies lay in the new epic poetry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Pulci and Boiardo. The admiration and curiosity with which it was received, and the like of which will perhaps never fall again to the lot of epic poetry to the end of time, is a brilliant proof of how great was the need of it. It is idle to ask whether that epic ideal which our own day has formed from Homer and the *Nibelungenlied* is or is not realized in these works; an ideal of their own age certainly was. By their endless descriptions of combats, which to us are the most fatiguing part of these poems, they satisfied, as we have already said, a practical interest of which it is hard for us to form a just conception—as hard, indeed, as of the esteem in which a lively and faithful reflection of the passing moment was then held.

但丁的例子有哪里吸引了那些模仿他的人呢？彼特拉克那充满想象的《凯旋》就是在这种影响下写成的最后一部满足我们口味的作品。薄伽丘的《爱的梦想》实际上不过是按所有寓言种类来罗列历史或寓言中的人物。其他人以精细地模仿但丁《神曲》第一篇来为他们的讲述作序，并为他们自己提供某种寓言式的比较来取代维吉尔。比如，乌贝蒂在其地理诗《狄达蒙多》中选择了索利努斯，而乔瓦尼·桑蒂在他对乌尔比诺的腓特烈的颂词中选择了普鲁塔克。把这个时代从这些错误倾向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普尔西和博亚尔多代表的新的叙事诗。对这种新叙事诗已获承认的赞美和好奇心，以及这类叙事诗可能永不会再落得史诗一般命运，就是人们有多需要它的一个明证。询问在这些作品中是否实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从荷马和《尼伯龙根之歌》就业已形成的史诗理想毫无意义。这无疑是他们自己时代的理想。他们对战争没完没了的描述对我们来说是这些诗中最让人厌倦的部分，通过这些描述他们满足了——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一种实用兴趣，而对此我们很难形成一种正确的概念——实际上他们当时尊重那些对过去时刻的充满趣味而又忠实的反映，对此人们也难以形成正确概念。

Nor can a more inappropriate test be applied to Ariosto than the degree in which his *Orlando Furioso* serve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aracter. Characters, indeed, there are, and drawn with an affectionate care; but the poem does not depend on these for its effect, and would lose, rather than gain, if more stress were laid upon them. But the demand for them is part of a wider and more general desire which Ariosto fails to satisfy as our day would wish it satisfied. From a poet of such fame and such mighty gifts we would gladly receive something better than the adventures of Orlando. From him we might have hoped for a work expressing the deepest conflicts of the human soul, the highest thoughts of his time on human and divine things—in a word, one of those supreme syntheses like the *Divine Comedy* or *Faust.* Instead of which he goes to work like the plastic artists of his own day, not caring for originality in our sense of the word, simply reproducing a familiar circle of figures, and even, when it suits his purpose, making use of the details left him by his predecessors. The excellence which, in spite of all this, can nevertheless be attained, will be the more incomprehensible to people born without the artistic sense, the more learned and intelligent in other respects they are. The artistic aim of Ariosto is brilliant, living action, which he distributes equally through the whole of his great poem. For this end he needs to be excused, not only from all deeper expression of character, but also from maintaining any strict connection in his narrative. He must be allowed to take up lost and forgotten threads when and where he pleases; his heroes must come and go, not because their character, but because the story requires it. Yet in this apparently irrational and arbitrary style of composition he displays a harmonious beauty, never losing himself in description, but giving only such a sketch of scenes and persons as does not hinder the flowing movement of the narrative. Still less does he lose himself in

conversation and monologue, but maintains the lofty privilege of the true epos, by transforming all into living narrative. His pathos does not lie in the words, not even in the famous twenty-third and following cantos, where Roland's madness is described. That the love-stories in the heroic poem are without all lyrical tenderness must be reckoned a merit, though from a moral point of view they cannot be always approved. Yet at times they are of such truth and reality, notwithstanding all the magic and romance which surrounds them, that we might think them personal affairs of the poet himself. In the full consciousness of his own genius, he does not scruple to interweave the events of his own day into the poem, and to celebrate the fame of the house of Este in visions and prophecies. The wonderful stream of his octaves bears it all forward in even and dignified movement.

没有什么比用阿里奥斯托所著的《狂怒的奥兰多》里表现性格的程度来作为著者的检验标准更不恰当的了。确实，那里面有人物，而且经过了作者满怀深情的仔细刻画，但这首诗不是靠这些来产生效果的；而且如果对他们着笔太多，效果不会增强，反而会失去。但对这些描绘的需求是一种更广泛更一般的愿望的一部分，阿里奥斯托没有满足这个需求，尽管我们这个时代希望它得到满足。从一个如此有名和具有如此卓越才能的诗人这儿，我们会很乐意得到比奥兰多的冒险经历更好的东西。从他那儿，我们可能希望得到一部作品，表达人类灵魂最深刻的冲突和他那个时代关于人类和神物的最高思想——总而言之，就是如《神曲》或《浮士德》那般高度综合的一部作品。他没有那样做，而是像他那个时代的造型艺术家一样，不注重我们所认为的独创性，仅仅是复制一群熟悉的人物；甚至在满足他的目的需要时，利用前人给他留下的那些细节描写。尽管如此，他仍然能够达到的出色程度，对于那些生来就没有艺术感的人来说，他们在其他方面越博学、越才智过人，就越难理解。阿里奥斯托的艺术目的是精彩鲜活的行动，他将其平均分布、贯穿整个伟大诗篇。为这个结果，他不

仅不必对人物性格作更深刻的表现，而且不必在叙述中保持任何严谨的关联性。必须容许他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捡起他丢掉和忘记的线索，他的主角们必须来来往往，不是因为性格使然，而是故事情节需要。然而，就是在这种显然风格不合情理和随意的作品中，他展示了一种和谐的美，从未在描述中迷失自己，而是在不阻碍叙事流畅进行的情形下对场面和人物只作简略叙述。他更加没有迷失在对话和独白中，而是通过把一切转变成生动的叙事来保持真正的叙事诗的崇高特权。他的哀婉不在字里行间，甚至不在那著名的描写罗兰的疯狂的第二十三篇和随后各篇里。这个记叙英雄及其事迹的诗篇里的爱情故事不带任何抒情诗般的温柔，我们必须认定它是一个优点，虽然从道德观点来看，这些爱情故事不一定总是得到认可。尽管一切魔法和浪漫将这些故事围绕，但它们有时是如此真实、现实，以至于我们可能认为它们就是诗人自己的私事。他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天赋，没有顾忌地把他那个时代的事件交织在诗篇中，并且在幻想和预言中歌颂埃斯特家族的名望。他那十四行诗中精彩流出的前八行推动全诗平顺而庄重地向前发展。

With Teofilo Folengo, or, as he here calls himself, Limerno Pitocco, the parody of the whole system of chivalry attained the end it had so long desired. But here comedy, with its realism, demanded of necessity a stricter delineation of character. Exposed to all the rough usage of the half-savage street-lads in a Roman country town, Sutri, the little Orlando grows up before our eyes into the hero, the priest-hater and the disputant. The conventional world which had been recognized since the time of Pulci and had served as a framework for the epos, here falls to pieces. The origin and position of the paladins is openly ridiculed, as in the tournament of donkeys in the second book, where the knights appear with the most ludicrous armament. The poet utters his ironical regrets over the inexplicable faithlessness which seems implanted in the house of Gano of Mainz, over the toilsome acquisition of the sword

Durindana, and so forth. Tradition, in fact, serves him only as a substratum for episodes, ludicrous fancies, allusions to events of the time (among which some, like the close of cap. vi., are exceedingly fine) and indecent jokes. Mixed with all this, a certain derision of Ariosto is unmistakable, and it was fortunate for the *Orlando Furioso* that the *Orlandino,* with its Lutheran heresies, was soon put out of the way by the Inquisition. The parody is evident when (cap. v. str. 28) the house of Gonzaga is deduced from the paladin Guidone, since the Colonna claimed Orlando, the Orsini Rinaldo, and the house of Este—according to Ariosto—Ruggiero as their ancestors. Perhaps Ferrante Gonzaga, the patron of the poet, was a party to this sarcasm on the house of Este.

凭借泰奥菲洛·弗伦哥，或如他在这儿自称的利墨尔诺·皮托科，这一模仿骑士制度整个体系的滑稽作品达到了它久已希求的结果。但这里，喜剧以其务实精神必然要求对性格做更严格的描绘。置身于罗马乡镇苏特立那些半开化的流浪儿的陋习中的小奥兰多，在我们眼前长成一个英雄，一个憎恶牧师的人，一个辩论者。那个自普尔西时代以来就得到承认并作为构建这首叙事诗的框架的传统社会在这里散了架。武士们的出身和地位遭到公开嘲笑，就如在第二卷里的毛驴锦标赛中那样，那里面，骑士们是带着最可笑的武器装备出现的。诗人以讽刺的口吻对似乎植入美因兹的加诺家族那无法解释的背信弃义以及对费力获取都伦达诺宝剑之事等等表示遗憾。事实上，传说只是被他用作基石，支撑插曲、可笑的幻想、对时事的影射（其中有一些，比如第六章结尾，写得极好）以及猥亵的玩笑而已。和所有这些相混合的对阿里奥斯托的某种嘲笑是很明显的；而且对《狂怒的奥兰多》来说幸运的是，《小奥兰多》和它的路德会邪说不久就遭到异端裁判所的禁止。当（第五章，第二十八首）追溯贡扎加家族源于武士圭都时，嘲弄是很明显的，因为科隆纳家族声称奥兰多，奥尔西尼家族声称利纳多，以及埃斯特家族声称——按阿里奥斯托的说法——鲁吉洛是他们的先祖。诗人的保护者，费兰特·贡扎加或许也曾是对埃斯特家

族进行讽刺的一方。

That in the *Jerusalem Delivered* of Torquato Tasso the delineation of character is one of the chief tasks of the poet proves only how far his mode of thought differed from that prevalent half a century before. His admirable work is a true monument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 which had meanwhile been accomplished, and of the spirit and tendency of that movement.

在托尔夸托·塔索的《耶路撒冷得救》中，诗人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性格进行描绘，这只是证明了他的思维模式和半个世纪以前盛行的思维模式不同到什么程度。他这部令人叹服的著作是其时业已完成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以及那场运动的精神和趋势的真正纪念碑。

Biography in the Middle Ages and in the Renaissance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传记

Outside the sphere of poetry also, the Italians were the first of all European nations who displayed any remarkable power and inclination accurately to describe man as shown in history, according to his inward and outward characteristics.

在诗歌范围之外，意大利人也是欧洲所有民族中第一个展示出传记方面的卓越才能的，他们倾向于根据人的内在与外在特征，遵照历史事实对其进行准确描述。

It is true that in the Middle Ages considerable attempts were made in the same direction; and the legends of the Church, as a kind of standing biographical task, must, to some extent, have kept alive the interest and the gift for such descriptions. In the annals of the monasteries and cathedrals, many of the churchmen, such as Meinwerk of Paderborn, Godehard of Hildesheim and others, are brought vividly before our eyes; and descriptions exist of several of the German emperors, modeled after old authors—particularly Suetonius—which contain admirable features. Indeed these and other profane *vitae* came in time to form a continuous counterpart to the sacred legends. Yet neither Einhard nor Wippo nor Radevicus can be named by the side of Joinville's picture of St Louis, which certainly stands almost alone as the first complete spiritual portrait of a modern European nature. Characters like St Louis are rare at all times, and his was favored by the rare good fortune that a sincere and naive observer caught the spirit of all the events and actions of his life, and represented it admirably. From what scanty sources are we left to guess at the inward nature of Frederick II or of Philip the Fair. Much of what, till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passed for biography, is properly speaking nothing but contemporary narrative, written without any sense of what is individual in the subject of the memoir.

诚然，在中世纪，就这同一方面做过相当多的尝试。教会的传奇故事，作为一种经久的传记任务，必定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描写的兴趣与天赋生生不息。在修道院与大教堂的编年史中，许多圣职人员，比如帕德博恩的美因渥克，希尔德斯海姆的高德哈德等，都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还有仿照古代作家，尤其是古罗马传记家苏埃托尼乌斯的作品，对德意志几位皇帝的描述包含了绝妙的特写。的确，这些和其他世俗“传记”来得及时，不断与神圣的传奇人物相辅相成。但是，无论是艾因哈德、维波还是拉得维库斯，都不能与儒安维尔对圣

王路易的描写相提并论。这部传记作为第一部从精神角度完整描绘现代欧洲人本性的著作，当然几乎是无可匹敌的。一直以来，如圣王路易一般的人物在任何时候都是难得的，而且他还受到罕见的好运垂青，一位真挚而单纯的观察者，抓住了他一生中所有事件和行动的精神，并出色地表现出来。而我们只能从很少的现有资料中去猜测腓特烈二世，或美男子菲利普的内在特质。直到中世纪末，许多被认为是传记的作品，确切说来不过是当代的叙事，对于传记文学中何为个性毫无认识。

Among the Italians, on the contrary, the search for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remarkable men was a prevailing tendency; and this it is which separates them from the other Western peoples, among whom the same thing happens but seldom, and in exceptional cases. This keen eye for individuality belongs only to those who have emerged from the half-conscious life of the race and become themselves individuals.

相反，在意大利人中，探索杰出人物的典型特征是一种普遍趋势，也正是这一点使他们与其他西方民族区别开来，在这些西方民族中，也会发生同样的事，但非常少见，而且都是在意外情况下出现。这种对个性的敏锐眼光只属于那些脱离了这个民族半觉醒的生活并且自己成为独立个体的人们。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vailing conception of fame an art of comparative biography arose which no longer found it necessary, like Anastasius, Agnellus and their successors, or like the biographers of the Venetian doges, to adhere to a dynastic or ecclesiastical succession. It felt itself free to describe a man if and because he was remarkable. It took as models Suetonius, Nepos (the

viri illustres) and Plutarch, so far as he was known and translated; for sketches of literary history, the lives of the grammarians, rhetoricians and poets, known to us as the 'Appendices' to Suetonius, seem to have served as patterns, as well as the widely read life of Virgil by Donatus.

在盛行的名声概念的影响下，一种叫做比较传记的艺术作品应运而生。这种艺术作品不再觉得有必要像阿纳斯塔修斯、阿涅卢斯及他们的继承者那样，或者像威尼斯总督的传记作者那样，坚持王朝或教会的传承。这类写作认为，如果一个人与众不同，或者引人注目，就可以自由描述这个人。它以苏埃托尼乌斯，奈波斯（名人传），普鲁塔克（到目前为止他为人所知和所翻译的作品）等人的作品为典范。对于文学史的概述，我们所知道的苏埃多尼乌斯作品“附录”中的文法家、雄辩家和诗人们的传记，以及人们广泛阅读的多纳图斯笔下的维吉尔传记，似乎都充当了典范。

It has been already mentioned that biographical collections—lives of famous men and famous women—began to appear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here they do not describe contemporaries, they are naturally dependent on earlier narratives. The first great original effort is the life of Dante by Boccaccio. Lightly and rhetorically written, and full, as it is, of arbitrary fancies, this work nevertheless gives us a lively sense of the extraordinary features in Dante's nature. Then follow, at the end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 *vite* of illustrious Florentines, by Filippo Villani. They are men of every calling: poets, jurists, physicians, scholars, artists, statesmen and soldiers, some of them then still living. Florence is here treated like a gifted family, in which all the members are noticed in whom the spirit of the house expresses itself vigorously. The descriptions are brief, but show a remarkable eye for what is characteristic, and

are noteworthy for including the inward and outward physiognomy in the same sketch. From that time forward, the Tuscans never ceased to consider the description of man as lying within their special competence, and to them we owe the most valuable portraits of the Italians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Giovanni Cavalcanti, in the appendices to his Florentine history, written before the year 1450, collects instances of civil virtue and abnegation, of political discernment and of military valour, all shown by Florentines. Pius II gives us in his *Commentaries* valuable portraits of famous contemporaries; and not long ago a separate work of his earlier years, which seems preparatory to these portraits, but which has colors and features that are very singular, was reprinted. To Jacob of Volterra we owe piquant sketches of members of the Curia in the time of Sixtus IV. Vespasiano Fiorentino has been often referred to already, and as a historical authority a high place must be assigned to him; but his gift as a painter of character is not to be compared with that of Machiavelli, Niccolo Valori, Guicciardini, Varchi, Francesco Vettori and others, by whom Europe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has been probably as much influenced in this direction as by the ancients. It must not be forgotten that some of these authors soon found their way into northern countries by means of Latin translations. And without Giorgio Vasari of Arezzo and his all-important work, we should perhaps to this day have no history of northern art, or of the art of modern Europe, at all.

前文已提过，传记集——著名的男性和著名的女性传记——在14世纪开始出现，他们不描写同时代的人的时候，就自然依靠较早发生的故事。第一部伟大的独创杰作是薄伽丘写的但丁的传记。尽管是轻描淡写，富于修辞，而且确实充满主观臆测，但这部作品还是给了我们一种但丁性格上突出特征的逼真感觉。然后，在14世纪末，菲利波·

维兰尼写的著名的佛罗伦萨人《列传》接踵而至。他们是从事各行各业的人：诗人、法学家、医生、学者、艺术家、政治家和军人，其中一些人当时尚在人世。这里，佛罗伦萨被视为一个有才华的家族，里面的所有成员都被注意到，在他们身上，这个家族的精神有力表现出来。这些描述虽然简洁，但对于独特的东西表现出一种非凡的眼力，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篇简略描述中，包括了内在和外在的面貌。从那时起，托斯卡纳人就一直认为人物描写属于他们的特殊能力，而且我们把15世纪和16世纪意大利人最有价值的人物描写也归功于他们。乔瓦尼·卡瓦尔康在他于1450年前完成的《佛罗伦萨史》的附录中，收集了所有在佛罗伦萨身上表现的文明美德和自我克制，政治眼光和军人般英勇的范例。庇护二世在他的《个人生平传记》中给了我们他同时代有名人物的宝贵的描绘，不久前，他早年的一部单行本作品得以重新印刷，这部作品似乎是在为那些人物描述作准备，但色彩更加浓重，性格特征更加突出。我们把对西斯科特四世的教廷成员所做的尖刻描述归于伏尔泰拉的雅各布。维斯帕夏诺·菲奥兰提诺，早就常常被人提起，而且作为历史权威人士，他应该被授予很高的地位，但是他在人物描写方面的才能远不如马基雅弗利、尼科洛·瓦洛利、圭恰迪尼·瓦尔奇、弗朗西斯科·韦托里等人，欧洲历史文学在这方面受到这些人的影响或许大到与古人相同。必须记住的是，这些作者的一些作品不久就通过翻译成拉丁文进入北方国家。如果没有阿雷佐的乔治奥·瓦萨里和他非常重要的著作，或许我们至今都根本没有北方艺术史或近代欧洲艺术史。

Among the biographers of North Ital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Bartolommeo Facio of Spezia holds a high rank. Platina, born in the territory of Cremona, gives us, in his *Life of Paul II,* examples of biographical caricature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last Visconti, written by Piercandido Decembrio—an enlarged imitation of Suetonius—is of special importance. Sismondi regrets that so much trouble has been spent on so unworthy an object, but the author would hardly have been equal to deal with a greater man, while he

was thoroughly competent to describe the mixed nature of Filippo Maria, and in and through it to represent with accuracy the conditions, the form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particular kind of despotism. The pictur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ould be incomplete without this unique biography,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down to its minutest details. Milan afterwards possessed, in the historian Corio, an excellent portrait-painter; and after him came Paolo Giovio of Como, whose larger biographies and shorter *Elogia* have achieved a worldwide reputation, and become models for subsequent writers in all countries. It is easy to prove by a hundred passages how superficial and even dishonest he was; nor from a man like him can any high and serious purpose be expected. But the breath of the age moves in his pages, and his Leo, his Alfonso, his Pompeo Colonna, live and act before us with such perfect truth and reality that we seem admitted to the deepest recesses of their nature.

在15世纪北意大利的传记作家中，斯培西亚的巴尔托洛梅奥·法奇奥地位很高。出生于克雷莫纳领地的普拉提那在他的《保罗二世传》中给我们提供了传记的漫画式描述的范例。比埃坎第多·德琴布里奥对最后一位维斯孔蒂的描述——也是对苏埃多尼斯作品放大式的模仿——是特别重要的。西斯蒙第痛惜在毫无价值的东西上如此费心，但这位作家对处理更伟大的人物几乎无法胜任，而他完全有能力描述菲利波·马里亚的复杂性格，而且在这种性格中准确表现这种特殊专制统治的状况、形式和后果。没有这一部独一无二的、描写特性细致入微的传记，15世纪的人物描写就会是不完整的。米兰后来（在史学家科里奥作品中）有了一位卓越的人物描写作家。在他之后，出现了科摩的保罗·乔维奥，他的稍长的传记和稍短的“颂词”已经闻名世界，并成为各国后来的作家的典范。通过很多章节，很容易证明他有多肤浅，甚至不诚实，也不能在他身上期待任何崇高而严肃的写作目的。但他的书充满了时代气息，他的列奥、他的阿方索、他的蓬佩奥·科隆纳以

如此完美的真实性在我们眼前活着、行动着，我们似乎已经通向他们的灵魂深处。

Among Neapolitan writers, Tristano Caracciolo, so far as we are able to judge, holds indisputably the first place in this respect, although his purpose was not strictly biographical. In the figures which he brings before us, guilt and destiny are wondrously mingled. He is a kind of unconscious tragedian. That genuine tragedy which then found no place on the stage, 'swept by' in the palace, the street and the public square. The *Words and Deeds of Alfonso the Great,* written by Antonio Panormita during the lifetime of the king, is remarkable as one of the first of such collections of anecdotes and of wise and witty sayings.

在那不勒斯的作家中，特里斯坦·卡拉乔洛，就目前我们能判断的来说，在这方面无可争辩地居于首位，虽然他的志向并不是严格来说的传记。在他呈现的人物身上，罪恶和命运神奇地交织在一起。他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悲剧作家，那时真正的悲剧在舞台上找不到立足之处，却“席卷”宫廷、街道和广场。安东尼奥·帕诺尔密达的《大阿尔方索言行录》在国王生前完成，它作为最早的奇闻轶事和妙语箴言集之一而引人注目。

The rest of Europe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Italy in this respect but slowly, although great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movements had broken so many bonds, and had awakened so many thousands to new spiritual life. Italians, whether scholars or diplomatists, still remained, on the whole, the best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the characters of the leading men all over Europe. It is well known how speedily and unanimously in recent times the reports of the

Venetian embassie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authorities of the first order for personal description. Even autobiography takes here and there in Italy a bold and vigorous flight, and puts before us, together with the most varied incidents of external life, striking revelations of the inner man. Among other nations, even in Germany at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it deals only with outward experiences, and leaves us to guess at the spirit within from the style of the narrative. It seems as though Dante's *Vita nuova,* with the inexorable truthfulness which runs through it, had shown his people the way.

欧洲的其余地方在这一方面都效仿意大利，但进度缓慢，尽管伟大的政治与宗教运动打破了许多束缚并唤醒了千千万万人对新的精神生活的意识。意大利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外交家，总的来说，仍然是全欧洲重要人物的性格资料的最好提供者。众所周知，在16、17世纪威尼斯驻外使节的报告在近年来迅速而一致地被奉为个人描述的一流权威著作。甚至自传在意大利各地也有了一个大胆而有力的飞跃，并连同外在生活最多变的事件一起，将人的内心世界的引人注目的意外发现置于我们面前。在其他国家中，即使是处于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也只处理外部生活，而要我们从叙述风格猜测它的内在精神。看来好像但丁的《新生》以贯穿全书的不可动摇的真实感，给意大利人民指引道路。

The beginnings of autobiography are to be traced in the family histories of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which are said to be not uncommon as manuscripts in the Florentine libraries—unaffected narratives written for the sake of the individual or of his family, like that of Buonaccorso Pitti.

自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4世纪与15世纪的家族史，这些家族史据说在佛罗伦萨图书馆的手抄本中很常见，是为了个人或其家族所写的真实叙述，如博纳科尔索·皮蒂家史。

A profound self-analysis is not to be looked for in the *Commentaries* of Pius II. What we here learn of him as a man seems at first sight to be chiefly confined to the account which he gives of the various steps in his career. But further reflection will lead us to a different conclusion with regard to this remarkable book. There are men who are by nature mirrors of what surrounds them. It would be irrelevant to ask incessantly after their convictions, their spiritual struggles, their inmost victories and achievements. Aeneas Sylvius lived wholly in the interest which lay near, without troubling himself about the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of life. His Catholic orthodoxy gave him all the help of this kind which he needed. And at all events, after taking part in every intellectual movement which interested his age, and notably furthering some of them, he still at the close of his earthly course retained character enough to preach a crusade against the Turks, and to die of grief when it came to nothing.

在庇护二世所写的《个人生平传记》中，找不到深刻的自我分析。我们在这里对他作为一个人的了解，乍看之下，似乎主要限于他对自己创作生涯中不同阶段所做的叙述。但是，进一步思考将引导我们对这部非凡的书得出不同结论。有人天生就是他们周围事物的一面镜子，不停地追问他们的信念、他们的心灵挣扎、他们心底的胜利和成就都是无关紧要的。埃尼亚斯·西尔维于斯完全为近前利益而生存，不去为生活的问题和矛盾劳神。他的正统天主教观念给了他需要的一切这类帮助。无论如何，在他参加每一个使他那个时代感兴趣的知识运动，尤其是推动其中一些运动之后，他在俗世生命结束之际，仍保

持自己的性格，并且这足以使他发动一次反土耳其人的改革运动，而在它成为泡影时悲伤至死。

Nor is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venuto Cellini, any more than that of Pius II, founded on introspection. And yet it describes the whole man—not always willingly—with marvellous truth and completeness. It is no small matter that Benvenuto, whose most important works have perished half-finished, and who, as an artist, is perfect only in his little decorative speciality, but in other respects, if judged by the works of his which remain, is surpassed by so many of his greater contemporaries—that Benvenuto as a man will interest mankind to the end of time. It does not spoil the impression when the reader often detects him bragging or lying; the stamp of a mighty, energetic and thoroughly developed nature remains. By his side our modern autobiographers, though their tendency and moral character may stand much higher, appear incomplete beings. He is a man who can do all and dares do all, and who carries his measure in himself. Whether we like him or not, he lives, such as he was, as a significant type of the modern spirit.

本文努托·切利尼的自传在内省方面没有比庇护二世的多到哪儿去，可是，这篇传记以不可思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描写了整体的人——虽并非都出于自愿。本文努托最重要的作品都在半成品时毁掉了；作为一位艺术家，他只在他作装饰的小特制品上做到了完美，但如果从他流传下来的作品判断，在其他方面，他都被同时代许多更伟大的人超越了，而作为一个人而言，他将永远使人产生兴趣——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读者时常发现他自吹或撒谎，但这并不破坏他给人的印象；一种强大有力、充分发展的本性的特征保留了下来。和他相比，我们现代自传作家们，尽管其旨趣和道德品质可能立得更高，但表现出的是不完整的人。本文努托是一个能做一切与敢做一切的人，

他有着自己的衡量标准，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他，他都如他过去那样作为一个现代精神的重要类型而活着。

Another man deserves a brief men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subject—a man who, like Benvenuto, was not a model of veracity: Girolamo Cardano of Milan (b. 1500). His little book, *De propria vita,* will outlive and eclipse his fame in philosophy and natural science, just as Benvenuto's life, though its value is of another kind, has thrown his works into the shade. Cardano is a physician who feels his own pulse, and describes his own physical, moral and intellectual nature, together with all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had developed, and this, to the best of his ability, honestly and sincerely. The work which he avowedly took as his model—the *Confessions* of Marcus Aurelius—he was able, hampered as he was by no stoical maxims, to surpass in this particular. He desires to spare neither himself nor others, and begins the narrative of his career with the statement that his mother tried, and failed, to procure abortion. It is worth remark that he attributes to the stars which presided over his birth only the events of his life and his intellectual gifts, but not his moral qualities; he confesses (cap. 10) that the astrological prediction that he would not live to the age of forty or fifty years did him much harm in his youth. But there is no need to quote from so well-known and accessible a book; whoever opens it will not lay it down till the last page. Cardano admits that he cheated at play, that he was vindictive, incapable of all compunction, purposely cruel in his speech. He confesses it without impudence and without feigned contrition, without even wishing to make himself an object of interest, but with the same simple and sincere love of fact which guided him in his scientific researches. And, what is to us the most repulsive of all, the old man, after the most shocking experiences and with his confidence in his fellow-

men gone, finds himself after all tolerably happy and comfortable. He has still left him a grandson, immense learning, the fame of his works, money, rank and credit, powerful friends, the knowledge of many secrets and, best of all, belief in God. After this, he counts the teeth in his head, and finds that he has fifteen.

与这个主题有关的另一个人也值得一提，这人如本文努托一样不是诚实的模范，他就是米兰的吉罗拉莫·卡尔达诺（生于1500年）。他的小书《个人小传》会比他在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声誉还要持久，使他的名声黯然失色。正如本文努托的传记，虽然它的价值属于另外一种，但却使他的其他作品相形见绌。卡尔达诺是一名医生，他为自己把脉，描述自己身体上、精神上和智力上的天性及其赖以发展的一切条件，而且老实而真诚地说，这尽了他自己最大的能力。他坦言要用作模范的作品是马库斯·奥雷里乌斯的《忏悔录》，因为不受禁欲主义准则的限制，所以他在这一点上能够超越它。他既不欲饶了自己，也不欲饶了他人，并以他母亲曾试图堕胎而失败的事情开始他的叙述生涯。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自己一生的事件以及智力天赋归因于他出生的星象，而他的道德品质与星象无关。他承认（第10章），根据星象预兆，他活不到40岁或50岁，这种说法对少年时的他伤害很大。但没有必要从这部广为人知又容易理解的书中引用原文，无论谁翻开它都会一口气读完。卡尔达诺承认，他在游戏中作弊，报复心强、不会良心不安、故意言语刻薄。他坦白承认这些，不是厚颜无耻，也不是虚假的悔恨，更不是想让自己成为受人关注的对象，而是一种对事实简单真诚的热爱，这种热爱也给予他科学研究方面的引导。最令我们觉得别扭的是，这位老人有了最可怕的经历，对他的同胞失去信任之后，发现他自己毕竟还是幸福自在的。他还留有一个孙子、丰富的学识、著作的名望、金钱、地位、信用、很有影响力的朋友、对许多隐私的了解，最可贵的是，他对上帝的信仰。之后他数了数口里的牙齿，发现还有15颗。

Yet when Cardano wrote, Inquisitors and Spaniards were already busy in Italy, either hindering the production of such natures, or, where they existed, by some means or other putting them out of the way. There lies a gulf between this book and the memoirs of Alfieri.

然而，在卡尔达诺写这本自传时，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者和西班牙人已经在意大利忙着阻止这类作品的出现，或是在它们出现的地方，用各种方法销毁它们。这本书和阿尔菲耶里的自传还是有巨大差距的。

Yet it would be unjust to close this list of autobiographers without listening to a word from one man who was both worthy and happy. This is the well-known philosopher of practical life, Luigi Cornaro, whose dwelling at Padua, classical as an architectural work, was at the same time the home of all the muses. In his famous treatise *On the Sober Life,* he describes the strict regimen by which he succeeded, after a sickly youth, in reaching an advanced and healthy age, then of eighty-three years. He goes on to answer those who despise life after the age of sixty-five as a living death, showing them that his own life had nothing deadly about it.

然而，不听听一位德高望重生活幸福的人说些什么就结束对自传作者的介绍是不公平的。他就是知名的处世哲学家路易吉·科尔纳罗，他在帕多瓦的住所是一座古典的建筑，同时是所有诗人的家。在他著名的论文《有节制的生活》里，他描述了严格的养生之道，凭此道，他度过多病的青年时代后，成功地健康活到83岁的高龄。继而，他回复那些在65岁以后就厌弃人生，认为自己虽生犹死的人，表明他自己的生活完全不是那般死气沉沉。

Let them come and see, and wonder at my good health, how I mount on horseback without help, how I run upstairs and up hills, how cheerful, amusing and contented I am, how free from care and disagreeable thoughts. Peace and joy never quit me.... My friends are wise, learned and distinguished people of good position, and when they are not with me I read and write, and try thereby, as by all other means, to be useful to others. Each of these things I do at the proper time, and at my ease, in my dwelling, which is beautiful and lies in the best part of Padua, and is arranged both for summer and winter with all the resources of architecture, and provided with a garden by the running water.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I go for a while to my hill in the most beautiful part of the Euganean mountains, where I have fountains and gardens, and a comfortable dwelling; and there I amuse myself with some easy and pleasant chase, which is suitable to my years. At other times I go to my villa on the plain; there all the paths lead to an open space, in the middle of which stands a pretty church; an arm of the Brenta flows through the plantations—fruitful, well-cultivated fields, now fully peopled, which the marshes and the foul air once made fitter for snakes than for men. It was I who drained the country; then the air became good, and people settled there and multiplied, and the land became cultivated as it now is, so that I can truly say: 'On this spot I gave to God an altar and a temple, and souls to worship Him.' This is my

consolation and my happiness whenever I come her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I also visit the neighbouring towns, to see and converse with my friends, through whom I make the acquaintance of other distinguished men, architects, painters, sculptors, musicians and cultivators of the soil. I see what new things they have done, I look again at what I know already, and learn much that is of use to me. I see palaces, gardens, antiquities, public grounds, churches and fortifications. But what most of all delights me when I travel is the beau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laces, lying now on the plain, now on the slopes of the hills, or on the banks of rivers and streams, surrounded by gardens and villas. And these enjoyments are not diminished through weakness of the eyes or the ears; all my senses (thank God!) are in the best condition, including the sense of taste; for I enjoy more the simple food which I now take in moderation, than all the delicacies which I ate in my years of disorder.

让他们来看一看，吃惊于我的健康，看看我如何不用人扶就上马，看看我如何跑上楼和跑上山，我有多快活、有趣和满足，我有多无忧无虑。我永远都是平静快乐的……我的朋友们聪明博学，声名显赫；当他们不和我一起时，我就读书写作，并从而尽力，就好像用尽其他方法一样，去为别人服务。这每一件事，我都是在适当的时间、无拘无束地在我的住宅里做的。我的住宅很漂亮，位于帕多瓦最好的地方，夏季和冬季的建筑设备都很齐全，还有一所傍流水而建

的花园。在春秋季节，我暂时住在尤根尼亚山最美丽的小山坡上，那里有泉水，有花园，还有一处舒适的住所；我在那里以轻松愉快的打猎自娱，这很适合我的年龄。其他时候，我就到平原上的别墅去住，那里所有道路都通向一个露天广场，广场中间矗立着一所漂亮的教堂。布伦塔河的一条支流从大农场流过——富饶而培育很好的田园，现在已经住满了人，在过去它曾是适合毒蛇盘踞而不适合人居住的空气污浊的沼泽区。当时是我排掉了地里的水；然后，空气变得洁净，人们在那里定居并繁衍，而土地如现在一样得到开垦，以至我可以由衷地说：在这里，我敬奉上帝一个祭坛，一个教堂还有众多的灵魂，予他以膜拜。无论何时来到这里，这都使我感到很安慰，很幸福。春秋季节，我也访问相邻城镇，看望我的朋友们，和他们交谈，并通过他们结识其他知名人士：建筑师、画家、雕刻家、音乐家和开垦土地的农民。我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新鲜事，再看看自己会的东西，并学到很多对我有用的东西。我参观宫殿、花园、古迹、公共场所、教堂和防御工事。但在我旅行时，最令我愉悦的是那些乡村的自然之美，有的在平原上，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河流溪水的两旁，四周环绕着花园和别墅。这些享受没有因眼花耳聋而减少；我的所有感官（感谢上帝！），包括味觉在内，都很健康。因为和之前生活无规律时吃的美味佳肴相比，我现在享用更多的简单食物，这些现在我吃得也很有节制。

After mentioning the works he had undertaken on behalf of the republic for draining the marshes, and the projects which he had constantly advocated for preserving the lagoons, he thus concludes:

在提过他为共和国所做的排干沼泽的工作，以及他一直所拥护的保存礁湖的方案后，他如此总结：

> These are the true recreations of an old age which God has permitted to be healthy, and which is free from those mental and bodily sufferings to which so many young people and so many sickly older people succumb. And if it be allowable to add the little to the great, to add jest to earnest, it may be mentioned as a result of my moderate life that in my eighty-third year I have written a most amusing comedy, full of blameless wit. Such works are generally the business of youth, as tragedy is the business of old age. If it is reckoned to the credit of the famous Greek that he wrote a tragedy in his seventy-third year, must I not, with my ten years more, be more cheerful and healthy than he ever was? And that no consolation may be wanting in the overflowing cup of my old age, I see before my eyes a sort of bodily immortality in the persons of my descendants. When I come home I see before me, not one or two, but eleven grand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two and eighteen, all from the same father and mother, all healthy, and, so far as can already be judged, all gifted with the talent and disposition for learning and a good life. One of the younger I have as my playmate *(buffoncello),* since children from the third to the fifth year are born to tricks; the elder ones I treat as my companions, and, as they have admirable voices, I take delight in hearing them sing and play on different

instruments. And I sing myself, and find my voice better, clearer and louder than ever. These are the pleasures of my last years. My life, therefore, is alive, and not dead; nor would I exchange my age for the youth of such as live in the service of their passions.

这些是一个老翁真正的消遣，上帝允其健康，而且这又免于遭受许多青年人和上了年纪的病人所屈服的身心折磨。如果允许我于大事外再说一件小事，于认真中加点玩笑，可能要提及：我节制生活的结果是在我83岁的时候写了一部最有趣的，充满了无可非议的机智的喜剧。这类作品一般是年轻人写的，正如写悲剧则是年长者的事。如果那位著名的希腊人在73岁的时候写了一部悲剧值得赞誉，那我比他大十岁而写出喜剧来，不是比他更快活更健康吗？在我福杯满溢的晚年或许不缺少慰藉，我在眼前我的后代们身上看到了一种肉体的不朽。一回到家，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或两个，而是11个孙子孙女，年龄从2岁到18岁不等，同父同母，都很健康，而且就目前就可以判断，都具有获得高学识和美好生活的才能和倾向。较小的一个，我把他当作玩伴，因为3岁到5岁的孩子们天生顽皮；较大的孩子们我把他们当作伙伴，因为他们都有美妙的歌喉，我喜欢听他们歌唱，演奏各种乐器。我自己也唱歌，而且发现自己的声音比从前更好听、更清晰和更响亮了，这些就是我晚年的快乐。所以我的生活是生气勃勃而不是死气沉沉的，我也不愿以我的晚年换取纵欲的青春。

In the 'Exhortation' which Cornaro added at a much later time,

in his ninety-fifth year, he reckons it among the elements of his happiness that his treatise had made many converts. He died at Padua in 1565, at the age of over a hundred years.

很久以后，科尔纳罗在95岁时所写的《告诫书》里增加了一件快乐的事，那就是他的著作赢得了许多皈依者。1565年，科尔纳罗在帕多瓦逝世，享寿百岁以上。

This national gift did not, however, confine itself to the criticism and description of individuals, but felt itself competent to deal with the qual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hole peoples. Throughout the Middle Ages the cities, families and nations of all Europe were in the habit of making insulting and derisive attacks on one another, which, with much caricature, contained commonly a kernel of truth. But from the first the Italians surpassed all others in their quick apprehension of the mental differences among cities and populations. Their local patriotism, stronger probably than in any other medieval people, soon found expression in literature, and allied itself with the current conception of 'fame'. Topography became the counterpart of biography; while all the more important cities began to celebrate their own praises in prose and verse, writers appeared who made the chief towns and districts the subject partly of a serious comparative description, partly of satire, and sometimes of notices in which jest and earnest are not easy to distinguish. After this, next to some famous passages in the *Divine Comedy,* comes the *Dittamondo* of Uberti (about 1360). As a rule, only single remarkable facts and characteristics are here mentioned: the Feast of the Crows at Sant' Apollinare in Ravenna, the springs at Treviso, the great cellar near Vicenza, the high duties at Mantua, the forest of towers at Lucca. Yet mixed up with all this we find

laudatory and satirical criticisms of every kind. Arezzo figures with the crafty disposition of its citizens, Genoa with the artificially blackened eyes and teeth (?) of its women, Bologna with its prodigality, Bergamo with its coarse dialect and hard-headed peopl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fashion was to belaud one's own city even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Michele Savonarola allows that, in comparison with his native Padua, only Rome and Venice are more splendid, and Florence perhaps more joyous—by which our knowledge is naturally not much extended.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Jovianus Pontanus, in his *Antonius,* writes an imaginary journey through Italy, simply as a vehicle for malicious observations. Bu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we meet with a series of exact and profound studies of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no other people of that time could rival. Machiavelli sets forth in some of his valuable essays the character and the political condition of the Germans and French in such a way that the born northerner, familiar with the history of his own country, is grateful to the Florentine thinker for his flashes of insight. The Florentines begin to take pleasure in describing themselves; and basking in the well-earned sunshine of their intellectual glory, their pride seems to attain its height when they derive the artistic pre-eminence of Tuscany among Italians, not from any special gifts of nature, but from hard, patient work. The homage of famous men from other parts of Italy, of which the sixteenth *capitolo* of Ariosto is a splendid example, they accepted as a merited tribute to their excellence.

然而，这种民族才能并不局限于对个人的批判与描述上，而是深感自己有能力描写所有民族的品质与特征。整个中世纪，全欧洲的城市、家庭和民族都习惯于以侮辱、嘲笑来攻击彼此，虽然带有讽刺夸张的描绘，但通常包含一点儿道理。但是一开始，意大利人就在迅速理解城市与居民的精神差异方面超过了其他人，他们的地方爱国主义

或许比任何其他中世纪的民族都强，不久，就得以表现在文学中，并和流行的“声誉”概念相结合。地形学成为与传记极相似的著作；当所有比较重要的城市都开始在散文或诗歌中歌颂他们自己的颂词时，也出现了一些作家，他们把主要的城市和地区部分作为严肃的对比描写，部分作为讽刺文学的主题，有时部分作为通告的主题，其中是玩笑是诚挚很难分辨。在这之后，出现了仅次于但丁的《神曲》中一些著名段落的作品，这就是乌贝蒂的《狄达蒙多》（1360年左右）。照例，这里只提到单个的引人注目的事实和突出的特征：拉文那的圣亚波利那教堂里的乌鸦宴、特雷维索的泉水、维琴察附近的大地窖、曼图亚的高额关税、卢卡的塔林。不过，和所有这些混在一起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颂扬的和讽刺的批判：阿雷佐以它的公民的狡诈性格出现，热那亚的女人以人工描黑眼睛牙齿的面貌出现，博洛尼亚以挥霍、贝加莫以鄙俗方言和讲求实际的人民出现。在15世纪，时兴高度赞扬自己的城市，甚至不惜贬损其他城市。米凯莱·萨沃纳罗拉承认，与他的故乡帕多瓦相比，只有罗马和威尼斯更出色一些，佛罗伦萨或许更快活一些——如此说我们的知识并没有因此增加多少。在这个世纪末，乔维诺·庞达诺在《安多尼乌斯》中写了自己穿越意大利的幻想之旅，仅仅是作为他发表恶意评论的手段。但在16世纪，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对民族特征准确而深刻的研究，这些是当时其他民族所不能匹敌的。马基雅弗利在他的一些有价值的随笔中，将德意志人和法兰西人的性格以及政治状况描述非常详细，使得生为熟悉本国历史的北方人，也不得不为这位佛罗伦萨思想家闪光的见解心存感激。佛罗伦萨人开始以自我描写为乐；而且沐浴在他们智慧荣光正当得来的光芒中，当他们不是由于任何特别天赋，而是由于辛勤耐心的工作在意大利人中得到托斯卡纳区的艺术的突出地位时，他们的骄傲似乎达到顶峰。意大利其他地方的有名人物曾对他们无比崇敬，阿里奥斯托的“加比托洛”就是一个典范，而佛罗伦萨人也将此作为对他们卓越成就所应得的颂词来接受。

Of an admirable description of the Italians, with their various pursuits and characteristics, though in few words and with special

stress laid on the Lucchese, to whom the work was dedicated, we can give only the title: *Forcianae Questiones.* Leandro Alberti is not so fruitful as might be expected in his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different cities. An anonymous *Commentario* contains among many absurdities some valuable information on the unfortunate conditions prevailing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century.

在对意大利人的一篇极好的描述中，包括他们的各种追求与性格特征，尽管寥寥几个字，而且特别强调这部作品专门为卢瑟卡人所写，我们能给予的只是一个标题：《佛西纳问答集》。里昂德罗·阿尔伯蒂对不同城市特征的描写没有如期待的那样成功。一篇匿名的《评论》在其中许多荒谬言论中包含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与这个世纪中叶普遍的不幸环境有关。

To what extent this comparative study of national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may, by means of Italian humanism, have influenced the rest of Europe, we cannot say with precision. To Italy, at all events, belongs the priority in this respect, as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in general.

这种对民族和地方特征的比较研究，通过意大利人的人文主义，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欧洲的其他地方，我们无法断言。就意大利而言，无论如何，在这一方面都应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正如在对这个世界总体描述的这方面一样。

Description of the Outward Man

人的外表描写

But the discoveries made with regard to man were not confined to th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 and nations; his outward appearance was in Italy the subject of an entirely different interest from that shown in it by northern peoples.

但是，关于人的发现，并不囿于个人和民族的精神特征；在意大利，人的外表成为人们感兴趣的主题，完全不同于北方人民所表现的那种兴趣。

Of the position held by the great Italian physicians with respect to the progress of physiology we cannot venture to speak; and the artistic study of the human figure belongs, not to a work like the present, but to the history of art. But something must here be said of that universal education of the eye, which rendered the judgement of the Italians as to bodily beauty or ugliness perfect and final.

对于意大利那些伟大的医学家们对生理学的进步所持的态度，我们不能妄加评论；而且对人物形象的艺术研究，并不属于像现在这本书一样的著作，而属于艺术史的研究范围。但是，这里必须谈谈对审美眼光的普遍训练，它使意大利人对身体的美丑做出正确而毋庸置疑的判断。

On reading the Italian authors of that period attentively, we are astounded at the keenness and accuracy with which outward features are seized, and at the completeness with which personal appearance in general is described. Even today the Italians, and especially the Romans, have the art of sketching a man's picture in

a couple of words. This rapid apprehension of what is characteristic is an essential condition for detecting and representing the beautiful. In poetry, it is true, circumstantial description may be a fault, not a merit, since a single feature, suggested by deep passion or insight, will often awaken in the reader a far more powerful impression of the figure described. Dante gives us nowhere a more splendid idea of his Beatrice than where he only describes the influence which goes forth from her upon all around. But here we have not to treat particularly of poetry, which follows its own laws and pursues its own ends, but rather of the general capacity to paint in words real or imaginary forms.

潜心研读那个时期意大利作家的作品时，我们惊异于他们捕捉人物外表特征的敏锐性和准确性，以及描述人一般外貌的完整性。甚至今天的意大利人，尤其是罗马人，仍然保有这种用几个词来勾画一个人的形象的艺术。这种对什么是事物特征的快速领悟，是发现和描绘美的事物的基本条件。确实，在诗作中，事无巨细的充分描写可能是一种缺点而不是一个优点，因为从强烈的情感和深刻的洞见中显示的唯一特点，常常使读者对所描述的人物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但丁只描写贝亚特里切对周围人与事产生的影响，没有什么想法比这来得更好。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必特别谈论诗歌，它遵循自己的规律并追寻自己的目的，相反地，我们特别论及用语言来描绘真实或想象的人物外形的一般能力。

In this Boccaccio is a master—not in the *Decameron,* where the character of the tales forbids lengthy description, but in the romances, where he is free to take his time. In his *Ameto* he describes a blonde and a brunette much as an artist a hundred years later would have painted them—for here, too, culture long precedes art. In the account of the brunette—or, strictly speaking, of the less

blonde of the two—there are touches which deserve to be called classical. In the words *'la spaziosa testa e distesa'* lies the feeling for grander forms, which go beyond a graceful prettiness; the eyebrows with him no longer resemble two bows, as in the Byzantine ideal, but a single wavy line; the nose seems to have been meant to be aquiline; the broad, full breast, the arms of moderate length, the effect of the beautiful hand as it lies on the purple mantle—all both foretells the sense of beauty of a coming time, and unconsciously approaches that of classical antiquity. In other descriptions Boccaccio mentions a flat (not medievally rounded) brow, a long, earnest, brown eye and round, not hollowed neck, as well as—in a very modern tone—the 'little feet' and the 'two roguish eyes' of a black-haired nymph.

在这方面，薄伽丘是一个高手——不是在《十日谈》中，那里面的故事性质不允许对其长篇累牍的描述，而是在那些他任意从容写作的爱情故事里。在他的《爱弥多》里，他对一个白肤金发碧眼的女子和一个深褐色头发的白人女子的描写，和一百年后画家描绘的差不多——因为在这里，文化也远远领先于艺术。在描述那个深褐色头发的白人女子——或者严格来说，两人中较不白皙的那一个时，有着应该被称作为经典的笔触。在文字“宽广开阔的前额”中，展现出一种对超越了优雅美丽的庄严仪表的感受；他笔下的眉毛不再如拜占庭人理想中那样像双弓，而是一条波浪线；鼻子似乎有意带鹰钩型；那宽大丰满的胸脯，长短适度的双臂以及放在紫色披风上那漂亮的手的效果——所有这些既预示了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里的审美感，也无意识地接近了古典时代的审美观。在其他描写中，薄伽丘提到一种扁平的（不是中世纪那种弧形的）的眉毛，一种热情洋溢的、细长的棕色眼睛和圆的、没有颈窝的脖子以及——用一种非常现代的语气——提到一个黑发仙女的“纤小双足”和“两只顽皮的眼睛”。

Whether the fifteenth century has left any written account of its ideal of beauty, I am not able to say. The works of the painters and sculptors do not render such an account as unnecessary as might appear at first sight, since possibly, as opposed to their realism, a more ideal type might have been favored and preserved by the writer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Firenzuola came forward with his remarkable work on female beauty. We must clearly distinguish in it what he had learned from old authors or from artists, such as the fixing of proportions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of the head, and certain abstract conceptions. What remains is his own genuine observation, illustrated with examples of women and girls from Prato. As his little work is a kind of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women of this city—that is to say, before very severe critics—he must have kept pretty closely to the truth. His principle is avowedly that of Zeuxis and of Lucian—to piece together an ideal beauty out of a number of beautiful parts. He defines the shades of colour which occur in the hair and skin, and gives to the *biondo* the preference, as the most beautiful color for the hair, understanding by it a soft yellow, inclining to brown. He requires that the hair should be thick, long and locky; the forehead serene, and twice as broad as high; the skin bright and clear *(candida),* but not of a dead white *(bianchezza);* the eyebrows dark, silky, most strongly marked in the middle, and shading off towards the ears and the nose; the white of the eye faintly touched with blue, the iris not actually black, though all the poets praise *occhi neri* as a gift of Venus, despite that even goddesses were known for their eyes of heavenly blue, and that soft, joyous, brown eyes were admired by everybody. The eye itself should be large and full, and brought well forward; the lids white, and marked with almost invisible tiny red veins; the lashes neither too long, nor too thick, nor too dark. The hollow round the eye should have the same color as the cheek. The ear, neither too large nor too small, firmly and neatly fitted on, should

show a stronger color in the winding than in the even parts, with an edge of the transparent ruddiness of the pomegranate. The temples must be white and even, and for the most perfect beauty ought not to be too narrow. The red should grow deeper as the cheek gets rounder. The nose, which chiefly determines the value of the profile, must recede gently and uniformly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eyes; where the cartilage ceases, there may be a slight elevation, but not so marked as to make the nose aquiline, which is not pleasing in women; the lower part must be less strongly coloured than the ears, but not of a chilly whiteness, and the middle partition above the lips lightly tinted with red. The mouth, our author would have rather small, and neither projecting to a point, nor quite flat, with the lips not too thin, and fitting neatly together; an accidental opening, that is, when the woman is neither speaking nor laughing, should not display more than six upper teeth. As delicacies of detail, he mentions a dimple in the upper lip, a certain fullness of the under lip, and a tempting smile in the left corner of the mouth—and so on. The teeth should not be too small, regular, well marked off from one another, and of the color of ivory; and the gums must not be too dark or even like red velvet. The chin is to be round, neither pointed nor curved outwards, and growing slightly red as it rises; its glory is the dimple. The neck should be white and round and rather long than short, with the hollow and the Adam's apple but faintly marked; and the skin at every movement must show pleasing lines. The shoulders he desires broad, and in the breadth of the bosom sees the first condition of its beauty. No bone may be visible upon it, its fall and swell must be gentle and gradual, its color *candidissimo*. The leg should be long and not too hard in the lower parts, but still not without flesh on the shin, which must be provided with white, full calves. He likes the foot small, but not bony, the instep (it seems) high, and the color white as alabaster. The arms are to be white, and in the upper parts tinted with red; in

their consistence fleshy and muscular, but still soft as those of Pallas, when she stood before the shepherd on Mount Ida—in a word, ripe, fresh and firm. The hand should be white, especially towards the wrist, but large and plump, feeling soft as silk, the rosy palm marked with a few, but distinct and not intricate lines; the elevations in it should be not too great, the space between thumb and forefinger brightly colored and without wrinkles, the fingers long, delicate and scarcely at all thinner towards the tips, with nails clear, even, not too long nor too square, and cut so as to show a white margin about the breadth of a knife's back.

15世纪是否留下了任何它对于美的理想的书面记载，我无法言说。画家和雕刻家的作品不会使这种记载如乍看之下可能表现的那般不必要，因为或许和他们的现实主义相反，一种更理想的类型可能受到这些作家们的青睐并保存下来。在16世纪，费伦佐拉以他论女性美的卓越著作出现。我们必须从书中明确分辨他已经从以前的作家或艺术家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如按照头部的长短来确定比例，和某些抽象的概念。剩下的则是他自己以普拉托市的妇女和姑娘们的例子加以说明的真正见解。由于他的小作是在这个城市的妇女们面前发表的一种演讲——也就是说，是在非常苛刻的批评家面前——所以他必须力求贴近事实。他公然承认他的原理是朱克西斯和卢西安的——把许多美的部分拼成一种理想的美。他定义了头发和皮肤颜色的细微差别，并偏爱“金黄”色，视其为头发最美丽的一种颜色，认为这是一种浅黄，接近于棕色。他要求，头发必须是长而浓密的卷发；前额清朗且宽为高的一倍；肤色明艳有光泽，但不是惨白色；眉毛如丝般黑亮，中间最浓并向耳朵和鼻子的两端逐渐变淡；眼白略带蓝色，虹膜竟不是黑色，尽管所有诗人都赞誉“黑眼珠”是爱神维纳斯的赐予，虽然一众女神也是以天蓝色眼睛闻名，但那目光轻柔、笑意盈盈的棕色眼睛也是为大家所称赞的。眼睛本身应该大而圆，不能太深陷；眼睑透明，带有几不可见的细微红丝；眼睫毛既不太长，也不太浓，也不太黑。眼窝应该有脸颊一样的颜色。耳朵不太大也不太小，生得坚定整洁，弯

曲部分的颜色应该比平坦部分略深，耳郭应带有透明的石榴红。鬓角必须白净平顺，对于最完美的美人来说，它不宜过窄。脸型越圆脸颊红晕越深。鼻子是主要确定脸型轮廓的标准的，必须沿两眼方向均匀地渐渐低下去，鼻尖可能微微隆起，但不会太明显以至形成鹰钩鼻，这长在女性身上就不赏心悦目；鼻子下部必须比耳朵颜色略浅，但不是冷冷的苍白，嘴唇上面的人中处应略着红色。嘴唇，我们的作者宁取其小，且既不太向前突出，也不是很扁平，嘴唇不是很薄，小巧优雅地合在一起；偶然张开时，换句话说，当这个女人不说不笑时，最多不应露出六颗上牙。作为细节的珍馐，他提到了上唇的酒窝，下唇必然的饱满和左嘴角上那一抹诱人的微笑，等等。牙齿不应该太小，要整齐，一颗一颗分得很清楚，而且呈象牙色；牙龈颜色一定不要太深，或者甚至像红色的天鹅绒。下巴要呈弧形，既不是尖的，也不是弧形朝外，随下巴渐渐隆起，颜色微微变红；酒窝是它的荣耀。颈部应该白皙圆润，宁长勿短，有颈窝和喉头，但不明显；皮肤在一举一动中必须表现让人喜爱的纹路。他渴望宽阔的肩膀，宽是胸部美的首要条件。胸部看不到任何骨头，它的一起一伏必须柔和平缓，肤色必须“十分洁白”。腿要长，小腿不要太硬，但却不是胫骨无肉，而是必须有白净丰满的小腿肚。他喜欢脚小，但不是骨瘦如柴，脚背（似乎）要高，色白如雪花石膏。双臂要白，上部略带红色，肌肉软硬适度，但仍要如帕拉斯女神站在伊达山峰上面对牧羊人时的双臂那样柔软——简言之，丰满、鲜嫩而结实。手应该是白色，尤其是接近手腕的地方，但也要大而丰满，如丝般柔滑，玫瑰色的手掌上带有一些清晰而不杂乱的掌纹；手上隆起部分不能太高，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部分颜色明亮，没有皱纹；手指修长而纤细，近指尖处稍稍变细，指甲干净平整，不太长也不太方，且被修剪得显出像小刀背那么宽的一条白边。

Aesthetic principles of a general character occupy a very subordinate place to these particulars. The ultimate principles of beauty, according to which the eye judges *'senza appello',* are for Firenzuola a secret, as he frankly confesses; and his definitions of

leggiadria, grazia, vaghezza, venusta, aria, maestà are partly, as has been remarked, philological, and partly vain attempts to utter the unutterable. Laughter he prettily defines, probably following some old author, as a radiance of the soul.

一种共性的审美原则对于这些细节描写来说，占有极不重要的地位。美的终极原则（人的眼光据此来评判“美丽”），正如费伦佐拉坦言，对他来说是一个秘密；他对“漂亮”“妩媚”“美丽”“迷人”“优美”“庄严”这些词所下的定义，如已经谈论过的那样，部分是语言学的，部分是想要说出那些无法言说的东西的徒劳尝试。他很恰当地把笑解释成灵魂的光辉，这大概是模仿古代某位作家所得。

The literature of all countries can, at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show single attempts to lay down theoretic principles of beauty; but no other work can be compared to that of Firenzuola. Brantome, who came a good half-century later, is a bungling critic by his side, because governed by lasciviousness and not by a sense of beauty.

在中世纪末期，所有国家的文学作品都为奠定美的理论原则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努力，但没有一部可以和费伦佐拉的作品相提并论。而足足半个世纪后出现的布兰托姆与他相比，就是一个拙劣的批评家，因为支配他的是淫欲而不是美感。

Description of Human Life

人类生活的描写

Among the new discoveries made with regard to man, we must reckon, in conclusion, the interest taken in descriptions of the daily course of human life.

在业已做出的关于人的新发现中，我们最后必须考虑描述人类日常生活这一兴趣。

The comical and satirical literature of the Middle Ages could not dispense with pictures of everyday events. But it is another thing when the Italians of the Renaissance dwelt on this picture for its own sake—for its inherent interest—and because it forms part of that great, universal life of the world whose magic breath they felt everywhere around them. Instead of and together with the satirical comedy, which wanders through houses, villages and streets, seeking food for its derision in parson, peasant and burgher, we now see in literature the beginnings of a true *genre,* long before it found any expression in painting. That *genre* and satire are often met with in union does not prevent them from being wholly different things.

中世纪的滑稽和讽刺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对日常事务的描述。但是，当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出于自己的目的——为了与生俱来的兴趣——而沉湎这种描写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它已成为这个世界上伟大而普遍的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感到周围处处有这种生活神秘的气息。讽刺喜剧游走于家庭、村庄和街道，在牧师、农民和市民中寻求它的嘲笑资料，现在，不是这种讽刺喜剧，而是连同这种喜剧一起，我们在文学中看到一种真正的以日常情景为主题的序幕，很久以后它才在绘画中得以表现。日常情景描写和讽刺常常结合在一起，这并没有阻止它们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How much of earthly business must Dante have watched with attentive interest before he was able to make us see with our own eyes all that happened in his spiritual world. The famous pictures of the busy movement in the arsenal at Venice, of the blind men laid side by side before the church door, and the like, are by no means the only instances of this kind: for the art, in which he is a master, of expressing the inmost soul by the outward gesture cannot exist without a close and incessant study of human life.

在但丁能够让我们亲眼看到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发生的一切之前，他一定很有兴趣地小心密切地注意过太多凡尘俗事吧。在威尼斯兵工厂里忙碌的活动，盲人们肩并肩躺在教堂门前等等这些有名的画面，绝不是这类描写仅有的例子：因为如果没有对人类生活密切而持续不断的仔细观察，通过外部举止来表达最深处的灵魂的艺术就无法存在，而但丁就是这种艺术的大师。

The poets who followed rarely came near him in this respect, and the novelists were forbidden by the first laws of their literary style to linger over details. Their prefaces and narratives might be as long as they pleased, but what we understand by *genre* was outside their province. The taste for this class of description was not fully awakened till the time of 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随后的那些诗人们在这方面很少能接近他的高度，而小说家们受他们文体的首要规则的限制，不能在细节描写上多做考虑。他们的序言和故事可以随心所欲地拖长，但我们所理解的对日常情景的描绘却不在他们的范围内。直到古代风俗习惯复兴之前，对这类描写的喜好都没有被完全唤醒。

And here we are again met by the man who had a heart for everything—Aeneas Sylvius. Not only natural beauty, not only that which has an antiquarian or a geographical interest, finds a place in his descriptions, but any living scene of daily life. Among the numerous passages in his memoirs in which scenes are described which hardly one of his contemporaries would have thought worth a line of notice, we will here only mention the boat-race on the Lake of Bolsena. We are not able to detect from what old letter-writer or story-teller the impulse was derived to which we owe such lifelike pictures. Indeed, the whole spiritual communion between antiquity and the Renaissance is full of delicacy and of mystery.

在这一点上，我们又遇到那个对每件事都有心的人——埃尼亚斯·西尔维于斯。不仅是自然美，不仅是那种使人对古文物研究或地理学有兴趣的东西，而且任何日常生活的鲜活场面，都能在他的描述中找到。在他的回忆录里有大段大段关于场景的描写，他同时代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认为这值得一提，我们在此将只提及在博尔塞纳湖上的划船比赛。我们无法查明他的这种念头来自哪个古代书信作家或说书人，使他绘出如此栩栩如生的画面。实际上，在古代习俗和文艺复兴之间的整个神交充满了审慎和神秘。

To this class belong those descriptive Latin poems of which we have already spoken—hunting-scenes, journeys, ceremonies and so forth. In Italian we also find something of the same kind, as, for example,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famous Medicean tournament by Politian and Luca Pulci. The true epic poets, Luigi Pulci, Boiardo and Ariosto, are carried on more rapidly by the stream of their narrative; yet in all of them we must recognize the lightness and precision of their descriptive touch, as one of the chief elements of

their greatness. Franco Sacchetti amuses himself with repeating the short speeches of a troop of pretty women caught in the woods by a shower of rain.

属于这一类的有我们谈起过的那些状物类拉丁文诗歌——狩猎场面、旅行、仪式等等。在意大利文中我们也发现了同类的作品，例如波利提安和卢卡·普尔西关于著名的美第奇家族骑士大比武的描述。真正的叙事诗人，路易吉·普尔西、博亚尔多和阿里奥斯托，都是以流畅的叙述更迅速地推动情节发展的；然而在他们所有人中，我们必须承认，轻巧而精确的描写笔触是他们的作品成其为伟大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弗朗哥·萨克蒂的自娱方式则是重复一群因一场阵雨而困于森林中的漂亮女人之间的简短谈话。

Other scenes of moving life are to be looked for in the military historians. In a lengthy poem, dating from an earlier period, we find a faithful picture of a combat of mercenary soldier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hiefly in the shape of the orders, cries of battle and dialogue with which it is accompanied.

其他动人生活的场景可在军事历史学作品中找到。在一篇较早时期写成的长篇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一幅14世纪雇佣军战斗的真实画面，主要形式是战斗中才会用到的号令、呐喊和对话。

But the most remarkable productions of this kind are the realistic descriptions of country life, which are found most abundantly in Lorenzo il Magnifico and the poets of his circle.

但是这类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于乡村生活的现实主义描述，这些描述在贵族洛伦佐和他那个圈子的诗人的作品中尤为丰富。

Since the time of Petrarch, an unreal and unconventional style of bucolic poetry had been in vogue, which, whether written in Latin or Italian, was essentially a copy of Virgil. Parallel to this, we find the pastoral novel of Boccaccio and other works of the same kind down to the *Arcadia* of Sannazaro, and later still, the pastoral comedy of Tasso and Guarini. They are works whose style, whether poetry or prose, is admirably finished and perfect, but in which pastoral life is only an ideal dress for sentiments which belong to a wholly different sphere of culture.

自彼特拉克时代以来，一种不真实的、非传统风格的田园诗已然盛极一时，它们无论是用拉丁语或是意大利语写成，本质上都是在仿效维吉尔。类似于这种诗的，我们发现了薄伽丘的田园小说以及这一类的其他作品，直到桑纳扎罗的《阿卡迪亚》，以及更晚些的塔索和瓜里尼的田园喜剧。这些作品的风格，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都完成得让人叹服，完美极了。但是，在这些作品中，田园生活只是给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领域的感情披上的一件理想的外衣。

But by the side of all this there appeared in Italian poetry,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signs of a more realistic treatment of rustic life. This was not possible out of Italy; for here only did the peasant, whether laborer or proprietor, possess human dignity, personal freedom and the right of settlement, hard as his lot might sometimes be in other respec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own and country is far from being so marked here as in northern countries. Many of the smaller towns are peopled almost exclusively

by peasants who, on coming home at nightfall from their work, are transformed into townfolk. The masons of Como wandered over nearly all Italy; the child Giotto was free to leave his sheep and join a guild at Florence; everywhere there was a human stream flowing from the country into the cities, and some mountain populations seemed born to supply this current. It is true that the pride and local conceit supplied poets and novelists with abundant motives for making game of the *villano,* and what they left undone was taken charge of by the comic improvisers. But nowhere do we find a trace of that brutal and contemptuous class-hatred against the *vilains* which inspired the aristocratic poets of Provence, and often, too, the French chroniclers. On the contrary, Italian authors of every sort gladly recognize and accentuate what is great or remarkable in the life of the peasant. Gioviano Pontano mentions with admiration instances of the fortitude of the savage inhabitants of the Abruzzi; in the 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and in the novelists we meet with the figure of the heroic peasant-maiden who hazards her life to defend her family and her honor.

但是，和所有这些作品相比，在15世纪末，意大利诗歌中出现了一种对乡村生活更现实的处理痕迹。这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在这里的农民，无论是雇佣工还是自耕地农主，才拥有人的尊严、个人的自由以及定居的权利，虽然在其他方面他的命运也许很艰难。市镇和乡村的差异远没有北方国家那么显著。住在许多小一点的城镇的几乎完全是农民，他们在傍晚时分干完活回家时，就转变成城镇居民。科摩的共济会成员几乎游走于整个意大利；还是孩子的乔托可以自由地离开他的羊群到佛罗伦萨去参加一个行会；到处都是从乡村涌入城市的人流，一些山里人似乎生来就是为了供给这种人流的。固然，自满和地方性的自负为诗人和小说家们提供了大量取笑“乡巴佬”的主题，而且他们没做的事由那些喜剧的即兴表演家来负责完成。但是，对那种反对“贱民”的残忍而充满鄙视的阶级仇恨，我

们无迹可寻；而这赋予了普罗旺斯的贵族诗人灵感，也常常给法国历史学家以启迪。相反，意大利的各类作家们欣然承认并强调什么是农民生活中的伟大或非凡。乔维诺·庞达诺用钦佩的口气提到阿布鲁齐的野蛮居民坚忍不拔的例子；在传记集子里和小说家们的作品中，我们碰到了那个英勇的农民少女人物，她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她的家庭，捍卫她的荣誉。

Such conditions made the poetical treatment of country life possible. The first instance we shall mention is that of Battista Mantovano, whose eclogues, once much read and still worth reading, appeared among his earliest works about 1480. They are a mixture of real and conventional rusticity, but the former tends to prevail. They represent the mode of thought of a well-meaning village clergyman, not without a certain leaning to liberal ideas. As a Carmelite monk, the writer may have had occasion to mix freely with the peasantry.

这些情况使人们可能富有诗意地对待乡村生活。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巴蒂斯塔·曼托瓦诺，他的田园诗大约在1480年出现在他最早创作的作品中，这些田园诗一度得到广泛阅读，而现在仍然值得阅读。它们是现实和传统的乡村特色混合体，但前者往往更具优势。他们代表一个好心的乡村牧师的思想方式，不乏某种自由思想的倾向。作为一名加尔默罗会的托钵僧，作者可能曾有和农民自由交往的机会。

But it is with a power of a wholly different kind that Lorenzo il Magnifico transports himself into the peasant's world. His *Nencia di Barberino* reads like a crowd of genuine extracts from the popular songs of the Florentine country, fused into a great stream of

octaves. The objectivity of the writer is such that we are in doubt whether the speaker—the young peasant Vallera, who declares his love to Nencia—awakens his sympathy or ridicule. The deliberate contrast to the conventional eclogue is unmistakable. Lorenzo surrenders himself purposely to the realism of simple, rough country life, and yet his work makes upon us the impression of true poetry.

但是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力量，贵族洛伦佐将自己带入农民的世界。他的《巴比利诺的南茜娅》读起来像摘自佛罗伦萨乡村流行歌曲的真正选段一样，融合进一连串的八行诗里。作者如此客观，以至我们都怀疑那个说话者——向南茜娅表明他的爱意的青年农民，瓦勒拉——唤起的是他的同情还是嘲笑。很明显这是他故意和传统田园诗形成对比。洛伦佐故意听任自己陷入简单而艰难的乡村生活，但他的作品却给我们一种真正的诗歌的印象。

The *Beca da Dicomano* of Luigi Pulci is an admitted counterpart to the *Nencia* of Lorenzo. But the deeper purpose is wanting. The *Beca* is written not so much from the inward need to give a picture of popular life, as from the desire to win the approbation of the educated Florentine world by a successful poem. Hence the greater and more deliberate coarseness of the scenes, and the indecent jokes. Nevertheless,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rustic lover is admirably maintained.

路易吉·普尔西的《狄科曼诺的贝卡》被公认是洛伦佐的《南茜娅》的副本。但是前者缺少较深层的写作目的。《贝卡》的写作动机若说是因为内心的需求去描绘大众生活，倒不如说是渴望通过一首成功的诗篇去获得佛罗伦萨教育界的认可。因此，就描绘了更多有意粗

俗的场景，以及下流的笑话。尽管如此，这个乡村爱人的观点还是十分出色地保留了下来。

Third in this company of poets comes Angelo Poliziano, with his *Rusticus* in Latin hexameters. Keeping clear of all imitation of Virgil's *Georgics,* he describes the year of the Tuscan peasant, beginning with the late autumn, when the countryman gets ready his new plough and prepares the seed for the winter. The picture of the meadows in spring is full and beautiful, and the 'Summer' has fine passages; but the vintage-feast in autumn is one of the gems of modern Latin poetry. Politian wrote poems in Italian as well as Latin, from which we may infer that in Lorenzo's circle it was possible to give a realistic picture of the passionate life of the lower classes. His gipsy's love-song is one of the earliest products of that wholly modern tendency to put oneself with poetic consciousness into the position of another class. This had probably been attempted for ages with a view to satire,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it was offered in Florence at every carnival by the songs of the maskers. But the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feelings of another class was new; and with it the *Nencia* and this *Canzone zingaresca* mark a new starting-point in the history of poetry.

这群诗人中的第三个是安吉洛·波利齐亚诺，他的《乡下人》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六音步诗行。他避开对维吉尔《农事诗》的一切模仿，描述了托斯卡纳农民的一年，始于晚秋，那时那个农民准备好了新犁和冬天用的种子。对春天的牧场的描绘很详尽、很美丽，“夏天”也有很好的描写段落；但是秋天的葡萄收获节庆季却是现代拉丁诗歌的珍宝之一。波利齐亚诺除了用拉丁文，也用意大利语写诗，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洛伦佐那个圈子里，对草根阶层的热情生活进行现实主义的描述是可能的。他的吉普赛人的情诗是最早具有现代倾向的作品之

一，带着诗人的意识使自己置身于另一个阶层。为了讽刺目的而写作，或许这已经尝试了很长时间。在佛罗伦萨的每个狂欢节上，带假面的人的歌唱为这提供了机会。但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感情感同身受并十分理解却是新的；正因有此，《南茜娅》和《吉卜赛之歌》就标志着诗歌史上的一个新起点。

Here, too, we must briefly indicate how culture prepared the way for artistic development. From the time of the *Nencia,* a period of eighty years elapses to the rustic genre-painting of Jacopo Bassano and his school.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简单指出，文化是如何为艺术的发展铺路的。从《南茜娅》的时代到雅各布·巴萨诺和他那一流派的乡村风俗画，过去了80年时间。

In the next part of this work we shall show how differences of birth had lost their significance in Italy. Much of this was doubtless owing to the fact that men and mankind were here first thoroughly and profoundly understood. This one single result of the Renaissance is enough to fill us with everlasting thankfulness. The logical notion of humanity was old enough—but here the notion became a fact.

在本书以下部分中我们将要说明，出身差别是如何在意大利失去重要性的。这大部分无疑是因为人类在这里首次得到彻底而深刻的理解。文艺复兴单就这一结果就足以让我们永怀感激。关于人文学科的合乎逻辑的观念存在已久——但是在这里，这一观念成为事实。

The loftiest conceptions on this subject were uttered by Pico della Mirandola in his speech on the dignity of man, [1_3] which may justly be called one of the noblest of that great age. God, he tells us, made man at the close of the creation, to know the laws of the universe, to love its beauty, to admire its greatness. He bound him to no fixed place, to no prescribed form of work, and by no iron necessity, but gave him freedom to will and to love. 'I have set thee,' says the Creator to Adam,

关于这一学科最崇高的构想是由比科·德拉·米兰多拉在他论人的尊严 [2_5] 的演说中提出来的，它也许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作那个伟大时代的最高贵的构想之一。他告诉我们，上帝在创世之末造了人，使人知道天地万物的规律，热爱它的美丽，赞赏它的伟大。上帝不把人束缚在固定的地方，没有固定形式的工作，也不靠铁的自然规律，而是给人以希望和爱的自由。“我已经把你置于世间，”造物主对亚当说，

> in the midst of the world, that thou mayst the more easily behold and see all that is therein. I created thee a being neither heavenly nor earthly, neither mortal nor immortal only, that thou mightest be free to shape and to overcome thyself. Thou mayst sink into a beast, and be born anew to the divine likeness. The brutes bring from their mother's body what they will carry with them 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higher spirits are from the beginning, or soon after, what they will be for ever. To thee alone is given a growth and a development depending on thine own free will. Thou bearest in thee the germs of a universal life.

是为了让你能更轻易地注视和领会那里的一切。我把你造成一个既非天上又非兽穴的、既非转瞬即逝也非永垂不朽的存在，使你能自由地去塑造和战胜自己。你也许会堕落为野兽，也能再生为神明。野兽将终生带着从母体得来的东西；较高级的神明从一开始或开始后不久才成为他们永恒的状态。依靠自己的自由意志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只赋予了你。你身上育有一个宇宙生命的起源。

[1_1].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taly continued to be the home of geographical literature, at a time when the discoverers themselves belonged almost exclusively to the countries on the shores of the Atlantic. Native geography produced in the middle of the century the great and remarkable work of Leandro Alberti, *Descrizione di tutta l'Italia* [Bologna, 1550].

[1_2].The most important passages are the following. Pii II, Commentarii [cf. Gragg and Gabel, Memoirs of a Renaissance Pope]: spring in his native country; summer residence at Tivoli; the meal at the spring of Vicovaro; the neighbour¬hood of Viterbo; the mountain monastery of St Martin; the Lake of Bolsena; a splendid description of Monte Amiata; the situation of Monte Oliveto; the view from Todi; Ostia and Porto; description of the Alban hills; Frascati and Grottaferrata.

[1_3].Jo. Pici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in his Opera; also printed separately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Opera, 2 vols., Bologna, 1496; Italian transla¬tion, ed. E. Garin, Florence, 1942; see also Garin's Portraits from the Quattrocento,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

[2_1].在十六世纪，当时发现者本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属于大西洋沿岸诸国，而意大利继续成为地理学著作的故乡，该世纪中期，意大利本国的地理学产生了里昂德罗·阿尔贝蒂的伟大名著：《全意大利志》（博洛尼亚，1550）。

[2_2].即地、水、火、风。——译者注

[2_3].最重要的几段如下：《庇护二世回忆录》（参见《格拉格和加贝尔，一位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回忆录》）：故乡之春；蒂沃利的夏日居所；维科瓦罗泉水旁的进飨；维泰博的近郊；圣马丁的山寺；博尔塞纳之湖；阿绵达山的壮丽描绘；奥里维托山的位置；从托迪看风景；奥斯蒂亚和波尔图；阿尔本群山的描述；弗拉斯卡蒂和格罗塔费拉塔。

[2_4].路德：英＞长度和面积单位。——译者注

[2_5].《皮科论人的尊严的讲演》，首先出现在他的《歌剧》中；也分开印刷（乔瓦尼·比科·德拉·米兰多拉，《歌剧》2卷，博洛尼亚，1496；意大利语翻译，E·加林译，1942；又见加林《15世纪以来的绘画》，纽约，伦敦，1972）

Part 5 Society and Festivals

第五编　社会与节日

Equality of Classes

阶级的平等

Every period of civilization which forms a complete and consistent whole manifests itself not only in political life, in religion, art and science, but also sets its characteristic stamp on social life. Thus the Middle Ages had their courtly and aristocratic manners and etiquette, differing but little in the various countries of Europe, as well as their peculiar forms of middle-class life.

各个时期的文明不仅在政治、宗教、艺术以及科学上体现出来，而且也在社会生活中留下它特色鲜明的印记，这些不同时期的文明就形成了一个完整、一致的整体。因此，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各国不仅有宫廷贵族的礼节和礼仪，也有中产阶级的特有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大同小异。

Italian customs at the time of the Renaissance offer in these respects the sharpest contrast to medievalism.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they rest is wholly different. Social intercourse in its highest and most perfect form now ignored all distinctions of caste, and was based simply on the existence of an educated class as we now understand the word. Birth and origin were without influence, unless combined with leisure and inherited wealth. Yet this assertion must not be taken in an absolute and unqualified sense,

since medieval distinctions still sometimes made themselves felt to a greater or less degree, if only as a means of maintaining equality with the aristocratic pretensions of the less advanced countries of Europe. But the main current of the time went steadily towards the fusion of classes in the modern sense of the phrase.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风俗习惯在这些方面与中世纪时期的习俗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比。它们的立足之本大相径庭。当时最高等、最完美的社交形式不问出身，不管一切等级差别，只是简单地建立在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受教育阶级的存在这个基础之上。家世和出身对一个人没有太大的影响，除非是和安逸与所继承的财富联系在一起时。但是，也不能在绝对的、无条件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断言，因为要是把中世纪的阶级差别作为一种手段来维持欧洲欠发达国家那些虚荣做作、自命不凡的贵族的平等关系时，那么这种差异有时依然会或多或少地让人感觉出来。但是，这个时期的主流趋势还是朝着具有现代意义的阶级融合稳步迈进的。

The fact was of vital importance that, from certainly the twelfth century onwards, the nobles and the burghers dwelt together within the walls of the cities. The interests and pleasures of both classes were thus identified, and the feudal lord learned to look at society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than that of his mountain castle. The Church, too, in Italy never suffered itself, as in northern countries, to be used as a means of providing for the younger sons of noble families. Bishoprics, abbacies and canonries were often given from the most unworthy motives, but still not according to the pedigrees of the applicants; and if the bishops in Italy were more numerous, poorer and, as a rule, destitute of all sovereign rights, they still lived in the cities where their cathedrals stood, and formed, together with their chapter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cultivated society of the place. In the age of despots and absolute princes which followed, the nobility in most of the cities had the motives and the leisure to give themselves up to a private life free from the political danger and adorned with all that was elegant and enjoyable, but at the same time hardly distinguishable from that of the wealthy burgher. And after the time of Dante, when the new poetry and literature were in the hands of all Italy, when to this was added the revival of ancient culture and the new interest in man as such, when the successful *condottiere* became a prince, and not only good birth, but legitimate birth, ceased to be indispensable for a throne, it might well seem that the age of equality had dawned, and the belief in nobility vanished for ever.

从12世纪以来，贵族和市民就在许多城市杂居在一起，这一事实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阶级的利益和乐事也因此得到了彼此的认同，而封建地主也学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社会，不再只是从他山上城堡的狭隘角度来看这个社会。在意大利，教会也从来不会像北方国家的教会那样甘心情愿地作为一种为贵族家庭长子以外的子弟提供生计的手段。尽管常常会以最微不足道的理由而授予一些人主教、修道院长、大教堂住持等称号，但依然是按照候补人的门第来任命的；虽然意大利的主教人数更多、更穷，通常也没有任何主权，但是他们依然住在教堂所在的城市里，并且和他们的全体僧侣一起成为构成当地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随之而来的暴君专制的时代里，大多数城市的贵族们都有理由和时间过着一种摆脱了政治危险的、优雅、快乐的私人生活，但同时，也就和富裕市民的生活没有任何区别了。但丁时代之后，当时的新诗歌和文学著作就由意大利所主导，除此之外，还有古典文化的复兴以及对于人作为人的这种研究兴起了一种新的兴趣，成功的雇佣军首领变成了君主，然而不仅是高贵的出身，连合法的世系也不再是继承君位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我们似乎已经看到：平等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对贵族的信仰已永远消失。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when the appeal was made to antiquity, the conception of nobility could be both justified and condemned from Aristotle alone. Dante, for example, adapts from the Aristotelian definition, 'Nobility rests on excellence and inherited wealth', his own saying, 'Nobility rests on personal excellence or on that of predecessors'. But elsewhere he is not satisfied with this conclusion. He blames himself, because even in Paradise, while talking with his ancestor Cacciaguida, he made mention of his noble origin, which is but a mantle from which time is ever cutting something away, unless we ourselves add daily fresh worth to it. And in the *Convito* he disconnects *'while'* and *'nobiltà'* from every condition of birth, and identifies the idea with the capacity for moral and intellectual eminence, laying a special stress on high culture by calling *nobiltà* the sister of *filosofia.*

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若呼吁人们从古代典籍里寻找根据的话，那么单单就亚里士多德一个人来说，贵族的观念就可能被一分为二：既可以是合理的，也可以是遭谴责的。比如说，但丁 [3_1] 把亚里士多德对贵族的定义“贵族之为贵族在于美德及所继承的财富”，改编为他自己的说法，“贵族之为贵族在于个人或祖先的美德”。但在别处，他对自己的这个结论并不感到满意。他谴责自己，因为即使在“天堂”里 [3_2] ，当他和他的始祖卡却圭达谈话时，他提到了自己的贵族血统，他认为那不过就是一件斗篷，时间一直不断地从它上面剪掉一些东西，除非我们自己每天给它添加一些新鲜的、有价值的东西。他在《宴会》 [3_3] 中把“贵族”和“贵族身份”同出身门第条件分开，并把这个概念同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卓越等同起来，把“贵族身份”称为“哲学”的姊妹，因而特别强调崇高的文化水平。

And as time went on, the greater the influence of humanism on the Italian mind, the firmer and more widespread became the

conviction that birth decides nothing as to the goodness or badness of a ma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is was the prevailing opinion. Poggio, in his dialogue *On Nobility,* agrees with his interlocutors—Niccolo Niccoli and Lorenzo Medici, brother of the great Cosimo—that there is no other nobility than that of personal merit. The keenest shafts of his ridicule are directed against much of what vulgar prejudice thinks indispensable to an aristocratic life.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文主义对意大利人的思想影响越大，认为出身对于一个人的好坏没有任何关系的信念就会变得越坚定、越广泛。在15世纪，这是一种盛行很广的观念。波焦在他的《论贵族》对话中[3_4]，赞同了他的对话者——尼科洛·尼科利，以及大科西莫的兄弟洛伦佐·美第奇两个人的观点，他认为除了个人美德之外再无其他的高贵。他最为尖刻的嘲讽矛头指向了庸俗人们认为贵族生活所不可或缺的那些粗俗的东西。

> A man is all the farther removed from true nobility, the longer his forefathers have plied the trade of brigands. The taste for hawking and hunting savours no more of nobility than the nests and lairs of the hunted creatures of spikenar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oil, as practiced by the ancients, would be much nobler than this senseless wandering through the hills and woods, by which men make themselves liker to the brutes than to the reasonable creatures. It may serve well enough as a recreation, but not as the business of a lifetime.

> 一个人的祖先从事于盗贼勾当的时间越长，那么

他离贵族身份的距离就越远。飞鹰走犬的嗜好不见得比满地松香的鸟巢兽穴更有贵族的气息。古代人躬耕陇亩的辛勤劳作比现在出没于深山密林的无意识的闲荡要更高贵一些，这种闲荡使他们自己看上去更像是野兽而非有理性的动物。作为一种消遣方式，它是身心受益的，但不能作为一个人毕生追求的事业。

The life of the English and French chivalry in the country or in the woody fastnesses seems to him thoroughly ignoble, and worst of all the doings of the robber-knights of Germany. Lorenzo here begins to take the part of the nobility, but not—which is characteristic—appealing to any natural sentiment in its favor, but because Aristotle in the fifth book of the *Politics* recognizes the nobility as existent, and defines it as resting on excellence and inherited wealth. To this Niccoli retorts that Aristotle gives this not as his own conviction, but as the popular impression; in his *Ethics,* where he speaks as he thinks, he calls him noble who strives after that which is truly good. Lorenzo urges upon him vainly that the Greek word for nobility *(eugeneia)* means good birth; Niccoli thinks the Roman word *nobilis* (i.e. remarkable) a better one, since it makes nobility depend on a man's deeds. Together with these discussions, we find a sketch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nobles in various parts of Italy. In Naples they will not work, and busy themselves neither with their own estates nor with trade and commerce, which they hold to be discreditable; they either loiter at home or ride about on horseback. The Roman nobility also despise trade, but farm their own property; the cultivation of the land even opens the way to a title; 'it is a respectable but boorish nobility'. In Lombardy the nobles live upon the rent of their inherited estates; descent and the abstinence from any regular calling constitute nobility. In Venice, the *nobili,* the ruling caste, were all merchants.

Similarly in Genoa the nobles and non-nobles were alike merchants and sailors, and only separated by their birth; some few of the former, it is true, still lurked as brigands in their mountain castles. In Florence a part of the old nobility had devoted themselves to trade; another, and certainly by far the smaller part, enjoye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ir titles, and spent their time, either in nothing at all, or else in hunting and hawking.

在他看来，英法两国的骑士在乡间或在密林城寨中的生活是非常不光彩的。最为糟糕的是德国那些强盗骑士的行为。洛伦佐开始在此庇护贵族。但不是——这是一个特点——对贵族某些天生的东西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五卷里承认贵族是一种存在物，并把“贵族之为贵族”定义为在于美德和所继承的财富。针对这一点，尼科利提出了反驳，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给出的解释，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想法，而是源自大众印象；在这本真正可以代表他思想的《伦理学》一书里，他把那些追求真正美好事物的人称为贵族。洛伦佐竭力强调“贵族”这个词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是“出身高贵”，这一强调都是徒劳的；尼科利认为罗马语里的“贵族身份”（即卓越者）这个词比较好，因为它使得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贵族取决于其行为举止[3_5]。综合这些论述，我们找到了对意大利各地贵族情况的大致描述。在那不勒斯，他们不愿意工作，既不愿经管自己的财产也不愿从事贸易和商业，他们认为做这些事情是有损名誉的；他们要么在家里鬼混要么就骑着马到处溜达[3_6]。罗马的贵族们也鄙视贸易行业，但却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这种躬耕陇亩的辛勤劳作甚至还得到了一种头衔[3_7]：“那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但却带有乡土气息的贵族。”在伦巴第，贵族们依靠他们所继承的产业的租金过活；所谓的贵族身份就是由高贵的血统和不从事任何正规职业的行为所构成的[3_8]。在威尼斯，“贵族”，即统治阶级，都是商人。在热那亚也是如此，贵族和非贵族同样都可以成为商人和水手，只是他们的出身不同罢了；的确有极少数的贵族们依然作为强盗潜伏在他们位于山间的城堡之中。在佛罗伦萨，一部分旧贵族已经投身于贸易事业中；另外一部分，当然是

相当小的一部分，知足地享受着自己的贵族头衔，要么无所事事，要么在鹰犬追逐中消磨时光。

The decisive fact was that, nearly everywhere in Italy, even those who might be disposed to pride themselves on their birth could not make good the claims against the power of culture and of wealth, and that their privileges in politics and at court were not sufficient to encourage any strong feeling of caste. Venice offers only an apparent exception to this rule, for there the *nobili* led the same life as their fellow-citizens, and were distinguished by few honorary privileges. The case was certainly different at Naples, where the strict isolation and the ostentatious vanity of its nobility excluded it, above all other causes, from the spiritual movement of the Renaissance. The traditions of medieval Lombardy and Normandy, and the French aristocratic influences which followed, all tended in this direction; and the Aragonese government, which was established by the middl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completed the work, and accomplished in Naples what followed a hundred years later in the rest of Italy—a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obedience to Spanish ideas, of which the chief features were the contempt for work and the passion for titles. The effect of this new influence was evident, even in the smaller towns, before the year 1500. We hear complaints from La Cava that the place had been proverbially rich, as long as it was filled with masons and weavers; whilst now, since instead of looms and trowels nothing but spurs, stirrups and gilded belts was to be seen, since everybody was trying to become a doctor of laws or of medicine, notary, officer or knight, the most intolerable poverty prevailed. In Florence an analogous change appears to have taken place by the time of Cosimo, the first grand duke; he is thanked for adopting the young people, who now despise trade and commerce, as knights of his order of St Stephen.

This goes straight in the teeth of the good old Florentine custom, by which fathers left property to their children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y should have some occupation. But a mania for titles of a curious and ludicrous sort sometimes crossed and thwarted, especially among the Florentines, the leveling influence of art and culture. This was the passion for knighthood, which became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follies of the day, at a time when the dignity itself had lost every shadow of significance.

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几乎在意大利各个地方，甚至那些动辄以自己的高贵出身而引以为豪的人们也不能凭借这种理由来对抗文化和财富的力量，而他们在政治和法庭上所享有的特权还不足以激起封建等级的任何强烈的情感。威尼斯只是这条规则的一个很显然的例外情况，因为在那里，“贵族们”过着和他们的同胞相同的生活，不同之处在于“贵族们”只是享有了寥寥无几的名誉特权而已。当然在那不勒斯，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贵族们的绝对隔离和他们的炫耀浮华是把他们排除在文艺复兴精神运动之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中世纪时期，伦巴第和诺曼底的传统，以及继之而来的法兰西的贵族影响，都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在15世纪中期所建立起来的阿拉贡政府完成了这项任务，并且依照西班牙理念在那不勒斯成功实现了社会转型——100年之后意大利其余各地才完成这种社会转型，这种理念的主要特点就是蔑视劳动和热衷头衔。在1500年前，甚至是在较小的城镇，这种新影响所产生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听到了拉卡瓦抱怨的心声——曾经这个地方的富裕人尽皆知，当时这里到处都是泥瓦匠和纺织工；然而现在，这里已看不到纺织机和泥瓦刀了，除了马刺、马镫和镀金腰带以外别无他物，因为每个人都试图成为一名法学博士或医学博士、公证员、军官或者骑士，所以让人无法忍受的贫困盛行各地[3_9]。在佛罗伦萨，在第一个大公科西莫时代，似乎发生了相类似的变化；他因为接纳那些现在蔑视贸易和商业的年轻人作为他圣史蒂芬勋章获得者的骑士而受到感激。这正好违反了佛罗伦萨古老的优良风俗习惯[3_10]，按照习俗，父亲把财产留给儿女的前提条件

是他们应该从事某种职业。但是这种追求爵位的狂热有时候多多少少会让人觉得有几分挫败感，尤其是在佛罗伦萨，这种狂热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超出了和它不差上下的文化和艺术所带来的影响。这就是追求骑士身份的热情，在这个高贵本身已完全丧失任何意义的时代，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最为愚蠢的事情。

'A few years ago,' writes Franco Sacchetti, towards the end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在14世纪末期，佛朗哥·萨克蒂写道 [3_11] ：

> everybody saw how all the workpeople down to the bakers, how all the wool-carders, usurers, money-changers and blackguards of all descriptions, became knights. Why should an official need knighthood when he goes to preside over some little provincial town? What has this title to do with any ordinary bread-winning pursuit? How art thou sunken, unhappy dignity! Of all the long list of knightly duties, what single one do these knights of ours discharge? I wished to speak of these things that the reader might see that knighthood is dead. And as we have gone so far as to confer the honor upon dead men, why not upon figures of wood and stone, and why not upon an ox?

> 几年前，每个人都目睹了一切劳动人民——下到

面包师傅、一切羊毛起毛工、高利贷者、货币兑换商以及形形色色的恶棍们都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骑士的。如果一个官员只是去管理一个小市镇，那他为什么需要一个骑士身份呢？这个头衔和任何一个混饭吃的职业有什么关系呢？罪恶的尊严，你是何等衰退啊！骑士们应履行的一系列的职责，有哪一项是骑士们已经尽到的呢？所以这些事情为的是让读者看到：骑士身份已死。如果真的要把荣誉赠给死人，那为什么不赠给一个木雕、一块石头呢，也为什么不赠给一头牛呢？

The stories which Sacchetti tells by way of illustration speak plainly enough. There we read how Bernabo Visconti knighted the victor in a drunken brawl, and then did the same derisively to the vanquished; how German knights with their decorated helmets and devices were ridiculed—and more of the same kind. At a later period Poggio makes merry over the many knights of his day without a horse and without military training. Those who wished to assert the privilege of the order, and ride out with lance and colors, found in Florence that they might have to face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jokers.

萨克蒂用例证来阐释的那些故事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从中了解到：贝尔纳博·维斯孔蒂把醉酒后在吵架中获胜的一方封为骑士，然后又冠以失败的一方同样的称号，令人嗤之以鼻；德意志的骑士们和他们的头盔及装备是如何成为笑柄的——此类的嘲弄还有很多。后来，波焦 [3_12] 取笑过他那个时代的许多骑士，嘲笑他们没有马、没有经过军事训练。那些想要捍卫自己骑士勋位特权的人们，持着长枪，佩戴着徽章，骑着马出现在佛罗伦萨，他们极有可能发现自己面临的却是政府的干涉和嘲笑者的讥讽 [3_13] 。

On considering the matter more closely, we shall find that this belated chivalry, independent of all nobility of birth, though partly the fruit of an insane passion for titles, had nevertheless another and a better side. Tournaments had not yet ceased to be practiced, and no one could take part in them who was not a knight. But the combat in the lists, and especially the difficult and perilous tilting with the lance, offered a favorable opportunity for the display of strength, skill and courage, which no one, whatever might be his origin, would willingly neglect in an age which laid such stress on personal merit.

只要更缜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便发现虽然这种迟来的、与高贵身世没有丝毫关系的骑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疯狂追求头衔的产物，但仍然有其较好的另一面。骑士联赛还在继续，只有骑士才能参加比赛。但是，竞技场上的决斗，尤其是用长枪艰难而危险地刺戳这一决斗，为骑士们展现自己的力气、技能和胆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视个人功绩的年代里，无论自己是什么样的出身，没有人愿意忽视这些。

It was in vain that from the time of Petrarch downwards the tournament was denounced as a dangerous folly. No one was converted by the pathetic appeal of the poet: 'In what book do we read that Scipio and Caesar were skilled at the joust?' The practice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Florence. Every honest citizen came to consider his tournament—now, no doubt, less dangerous than formerly—as a fashionable sport. Franco Sacchetti has left us a ludicrous picture of one of these holiday cavaliers—a notary seventy years old. He rides out on horseback to Peretola, where the tournament was cheap, on a jade hired from a dyer. A thistle is

stuck by some wag under the tail of the steed, who takes fright, runs away and carries the helmeted rider, bruised and shaken, back into the city. The inevitable conclusion of the story is a severe curtain-lecture from the wife, who is not a little enraged at these break-neck follies of her husband.

从彼特拉克时代以来，比武就被抨击为危险且荒唐的比赛，但这些抨击都是劳而无功的。没有人被诗人的感伤呼吁感化："在哪本书上我们看到过西庇阿和恺撒是马上比枪的神手？"这种惯例在佛罗伦萨越来越普遍了。每一个正派的公民都把这种骑士比赛——毫无疑问，这时的比赛不像以前那么危险了——看作一项时尚的运动。弗朗哥·萨克蒂给我们留下了一幅荒唐可笑的图画，画上画的是许多节日骑士中的一员——一个七十岁高龄的公证人。他骑着一匹从染匠那里赁来的瘦马，到佩雷拖拉参加廉价的比武赛。有个爱说笑打趣的人把一根蓟绑在这匹战马的尾巴下面，马一受惊，就跑了起来，把这个戴着头盔的骑手一直带回到城里，弄得他遍体鳞伤，饱尝惊恐。结果，妻子对丈夫的这种极端、荒唐、愚蠢的冒险行为大发雷霆，严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这样的故事结局也是在所难免的[3_14]。

It may be mentioned in conclusion that a passionate interest in this sport was displayed by the Medici, as if they wished to show—private citizens as they were, without noble blood in their veins—that the society which surrounded them was in no respect inferior to a court. Even under Cosimo (1459), and afterwards under the elder Pietro, brilliant tournaments were held at Florence. The younger Pietro neglected the duties of government for these amusements and would never suffer himself to be painted except clad in armour. The same practice prevailed at the court of Alexander VI, and when the Cardinal Ascanio Sforza asked the Turkish Prince Djem how he liked the spectacle, the barbarian

replied with much discretion that such combats in his country only took place among slaves, since then, in the case of accident, nobody was the worse for it. The Oriental was unconsciously in accord with the old Romans in condemning the manners of the Middle Ages.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美第奇家族对这种比赛也有极大的兴趣，似乎要证明：虽然他们只是平民百姓，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贵族的血液，但是围绕在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绝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宫廷。即使在科西莫时代（1945年）和后来的大彼得罗时代，都在佛罗伦萨举行过辉煌的比武。小彼得罗因为这种消遣而忽略了政务，并且他一般不会让人给他画像，除非是穿着盔甲的时候。这样的惯例也在亚历山大六世的宫廷里盛行过，当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询问土耳其王子杰姆是否喜欢这种壮观的场面时，那个野蛮人很慎重地回答说，在他的国度里，这种搏斗只在奴隶中进行，因为若遭不测，没有人会受到丝毫的影响。在谴责中世纪的这种习俗时，东方人和古罗马人的观点无意间不谋而合。

Apart, however, from this particular prop of knighthood, we find here and there in Italy, for example at Ferrara, orders of court servants, whose members had a right to the title.

但是，除了骑士的特别支持者以外，在意大利各地，比如在费拉拉，我们随处都能看到宫廷服务团，里面的成员都有权利获得这个头衔。

But, great as were individual ambitions, and the vanities of nobles and knights, it remains a fact that the Italian nobility took its place in the centre of social life, and not at the extremity. We find it

habitually mixing with other classes on a footing of perfect equality, and seeking its natural allies in culture and intelligence. It is true that for the courtier a certain rank of nobility was required, but this exigence is expressly declared to be caused by a prejudice rooted in the public mind—*per l'opinion'universale* —and never was held to imply the belief that the personal worth of one who was not of noble blood was in any degree lessened thereby, nor did it follow from this rule that the prince was limited to the nobility for his society. It meant simply that the perfect man—the true courtier—should not be wanting in any conceivable advantage, and therefore not in this. If in all the relations of life he was specially bound to maintain a dignified and reserved demeanour, the reason was not found in the blood which flowed in his veins, but in the perfection of manner which was demanded from him. We are here in the presence of a modern distinction, based on culture and on wealth, but on the latter solely because it enables men to devote their life to the former, and effectually to promote its interests and advancement.

尽管贵族和骑士们的个人抱负和虚荣心都很大，然而意大利贵族在社交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然而不是最高地位，这仍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发现它习惯性地把自己和其他阶层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融为一体，并在文化和学术上寻求自己的天然盟友。确实，对于朝臣来说，一定阶级的贵族身份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人们明确声称，这种苛求源于公众心中根深蒂固的成见——“一种普遍的观点”，它从来没有被认为蕴含这种看法，如果一个人不是贵族血统，那么他的个人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就会被贬低，也不能依此就推断说，君主的交际圈只限于贵族阶层的人们。它仅仅意味着一个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朝臣——不应该缺少任何想象得到的优势，所以也就不能缺少这一项。在一切生活关系中，他之所以一定会特意维持一种高贵的、有节制的风度，原因并不在于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什么样的

血液，而是在于要求他有一种近乎完美的举止。在这里我们已经呈现出一种基于文化和财富的现代差异，但是基于财产这一基础仅仅是因为它能够使人们致力于文化生活以及有效地促进它的利益和进步。

Costumes and Fashions

服装与时尚

But in proportion as distinctions of birth ceased to confer any special privilege, was the individual himself compelled to make the most of his personal qualities, and society to find its worth and charm in itself. The demeanour of individuals, and all the higher forms of social intercourse, became ends pursued with a deliberate and artistic purpose.

因为高贵的出身不再让人们享有任何特权，所以个人就不得不充分展示自己的个人素养，而社会也想方设法去发现自身的价值和魅力所在。个人的行为举止和一切更高形式的社交礼仪就成了人们带着艺术性目的、刻意地追求的目标。

Even the outward appearance of men and women and the habits of daily life were more perfect, more beautiful and more polished than among the other nations of Europe. The dwellings of the upper classes fall rather within the province of the history of art; but we may note how far the castle and the city mansion in Italy surpassed in comfort, order and harmony the dwellings of the northern noble. The style of dress varied so continually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any complete comparison with the fashions of other countries, all the more because since the clos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imitations of the latter were frequent. The costumes of the time, as given us by the Italian painters, are the most convenient, and the most pleasing to the eye which were then to be found in Europe; but we cannot be sure if they represent the prevalent fashion, or if they are faithfully reproduced by the artist. It is nevertheless beyond a doubt that nowhere was so much importance attached to dress as in Italy. The nation was, and is, vain; and even serious men among it looked on a handsome and becoming costume as an element in the perfection of the individual. At Florence, indeed, there was a brief period when dress was a purely personal matter, and every man set the fashion for himself, and till far in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re were exceptional people who still had the courage to do so; and the majority at all events showed themselves capable of varying the fashion according to their individual tastes. It is a symptom of decline when Giovanni della Casa warns his readers not to be singular or to depart from existing fashions. Our own age, which, in men's dress at any rate, treats uniformity as the supreme law, gives up by so doing far more than it is itself aware of. But it saves itself much time, and this, according to our notions of business, outweighs all other disadvantages.

即使是他们的外表和日常生活习惯也比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更完美、更美丽、更优雅。上流社会的住宅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意大利的城堡和城市大楼的舒适度、整洁度以及协调度远远超过了北方贵族们的住宅。服装的款式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因此不可能和其他国家的服装款式完全相比较，尤其是15世纪末以来，模仿其他国家的服装款式屡见不鲜。就如意大利画家所展现给我们的那样，那时的服装是当时在欧洲所能看到的最舒适方便、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服装了；但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不是代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款式，或者它们是否被艺术家忠实地展现出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其

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像意大利这样重视自己的服装。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意大利人都是爱慕虚荣的；在意大利，甚至那些严谨的男士们也会把一件帅气得体的衣服看作美化自己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佛罗伦萨，确实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服装纯粹是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为自己设计时尚的服装款式，一直到16世纪，还有个别人士仍有足够的勇气这样做；他们能够依照个人的喜好来变化服装的样式，不管怎样大部分人都展现出了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乔瓦尼·德拉·卡萨警告自己的读者不要鹤立鸡群、脱离当前现有的服装样式，这就预示着个人时尚将走下坡路。在我们这个年代，至少男士的服装把统一看作是最高标准，它实际放弃的远远比它意识到要放弃的多得多。但是它却为自己节省了许多时间，而按照我们的做事理念，这一点是超过其他一切不利条件的。

In Venice and Florence at the time of the Renaissance there were rules and regulations prescribing the dress of the men and restraining the luxury of the women. Where the fashions were more free, as in Naples, the moralists confess with regret that no difference can be observed between noble and burgher. They further deplore the rapid changes of fashion, and—if we rightly understand their words—the senseless idolatry of whatever comes from France, though in many cases the fashions which were received back from the French were originally Italian. It does not further concern us how far these frequent changes, and the adoption of French and Spanish ways, contributed to the national passion for external display; but we find in them additional evidence of the rapid movement of life in Italy in the decades before and after the year 1500.

在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和佛罗伦萨都有约束男人服装和女人奢侈浪费之风的规章和条款。在那不勒斯，这种对服装款式约束相对比

较少的地方，伦理学者遗憾地坦言道：贵族和平民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之处。他们进一步谴责时尚服饰的变化速度过快——如果我们能够恰到好处地理解他们的话语——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来自于法兰西，他们都盲目崇拜，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从法兰西接受回来的服装样式最终都源自于意大利。我们不愿更进一步关注这些频繁变化的时尚以及采用法兰西和西班牙样式的做法究竟对国民的这种展示外在的热情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在他们身上我们找到了在1500年前后的几十年里意大利生活迅速变化的其他佐证。

We may note in particular the efforts of the women to alter their appearance by all the means which the toilette could afford. In no country of Europe since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was so much trouble taken to modify the face, the colour of the skin and the growth of the hair, as in Italy at this time. All tend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conventional type, at the cost of the most striking and transparent deceptions. Leaving out of account costume in general, which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as in the highest degree varied in color and loaded with ornament, and at a later period assumed a character of more harmonious richness, we here limit ourselves more particularly to the toilette in the narrower sense.

我们不妨特意留意一下，女士们会不惜一切努力用化妆品来改变自己的姿容。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欧洲再没有其他一个国家的人们像当时的意大利人那样，如此不厌其烦地修饰容颜、改变肤色，增加头发长度。所有人不惜一切代价用最引人注目、最一目了然的虚假修饰手段来追求流行的样式。在14世纪，一般服饰的颜色极大可能地发生了变化，并且衣服上带有很多小饰品，而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则采用了一种更协调的华美特质，我们暂且抛开这个话题，避而不谈，我们这里先专门谈一谈狭义上的化妆。

No sort of ornament was more in use than false hair, often made of white or yellow silk. The law denounced and forbade it in vain, till some preacher of repentance touched the worldly minds of the wearers. Then was seen, in the middle of the public square, a lofty pyre *(talamo),* on which, besides lutes, dice-boxes, masks, magical charms, song-books and other vanities, lay masses of false hair, which the purging fires soon turned into a heap of ashes. The ideal color sought for both i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hair was blond. And as the sun was supposed to have the power of making the hair this color, [2_1] many ladies would pass their whole time in the open air on sunshiny days. Dyes and other mixtures were also used freely for the same purpose. Besides all these, we meet with an endless list of beautifying waters, plasters and paints for every single part of the face—even for the teeth and eyelids—of which in our day we can form no conception. The ridicule of the poets, the invectives of the preachers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baneful effects of these cosmetics on the skin were powerless to hinder women from giving their faces an unnatural form and color.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frequent and splendid representations of mysteries, at which hundreds of people appeared painted and masked, helped to further this practice in daily life. It is certain that it was widely spread, and that the countrywomen vied in this respect with their sisters in the towns. It was vain to preach that such decorations were the mark of the courtesan; the most honorable matrons, who all the year round never touched paint, used it nevertheless on holidays when they showed themselves in public. But whether we look on this bad habit as a remnant of barbarism, to which the painting of savages is a parallel, or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desire for perfect youthful beauty in feature and in color, as the art and complexity of the toilette would lead us to think—in either case there was no lack of good advice on the part of the men.

在所有饰品中，用得最多的是假发，一般的假发都是由白色或黄色的蚕丝制作而成。法律谴责并禁止佩戴假发，但都是徒劳的，直到有一天某个劝人忏悔的讲道者感化了戴假发的人们的浮世思想，情况才有所改变。那时，人们在广场的中心可以看到一个很高的柴堆，上面除了琵琶、骰子盒、面具、妖符、歌本和其他浮华的东西之外，还堆积了许多假发，一把火就能把这些假发立刻化为灰烬。人们苦苦找寻的理想的假发颜色，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都是金黄色的。因为人们认为，太阳光可以把头发变成这种颜色[3_15]，所以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许多女士都会整天在阳光中度过。染料和其他混合药物也可以轻轻松松地达到同样的效果。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看到名目繁多的各种美容护肤水、油膏和脂粉，这些化妆品可以涂抹脸上各个部位，甚至用来涂抹牙齿和眼线，这些化妆品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无法想象的。诗人的嘲笑、传教士的谩骂，以及这些化妆品给皮肤带来的毒副作用都无法阻止女士们用化妆品把自己的脸抹成一种不自然的形状和颜色。成百上千个化过妆、戴着面具的人们频频出现在场面壮观的秘密宗教仪式上，这种现象很可能助长了日常生活中的这种陋习。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陋习流行甚广，甚至是那些乡村妇女也要在这方面和城市姑娘争妍。劝诫她们说这种打扮是高等妓女的特有标志，也是徒劳的；最高贵体面的主妇终年不施脂粉，但若逢假日去公共场所时，也会照样涂脂抹粉。然而，不管我们把这类陋习看作是和野蛮人文身一样的行为习惯，都是野蛮的残留物，还是像艺术和繁琐的化妆术所引导我们想的那样，把化妆看作是人们渴望自己在容貌和肤色上达到一种青春美的产物——不管是上面的哪一种观点，都离不开男士们的多方鼓励。

The use of perfumes, too, went beyond all reasonable limits. They were applied to everything with which human beings came into contact. At festivals even the mules were treated with scents and ointments. Pietro Aretino thanks Cosimo I for a perfumed roll of money.

人们对香水的使用也超出了一切合情合理的极限。人们把香水喷洒在每一件他们能接触到的物品上。在节日庆典期间，甚至是骡子身上也会被喷上香水，涂上油膏。彼得罗·阿雷蒂诺曾为收到一卷洒了香水的纸币而感谢科西莫一世 [3_16] 。

The Italians of that day lived in the belief that they were more cleanly than other nations. There are in fact general reasons which speak rather for than against this claim. Cleanliness is indispensable to our modern notion of social perfection, which was developed in Italy earlier than elsewhere. That the Italians were one of the richest of existing peoples is another presumption in their favor. Proof, either for or against these pretensions, can of course never be forthcoming, and if the question were one of priority in establishing rules of cleanliness, the chivalrous poetry of the Middle Ages is perhaps in advance of anything that Italy can produce. It is nevertheless certain that the singular neatness and cleanliness of some distinguish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enaissance, especially in their behaviour at meals, was noticed expressly, and that 'German' was the synonym in Italy for all that is filthy. The dirty habits which Massimiliano Sforza picked up in the course of his German education, and the notice they attracted on his return to Italy, are recorded by Giovio. It is at the same time very curious that, at least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inns and hotels were left chiefly in the hands of Germans, who probably, however, made their profit mostly out of the pilgrims journeying to Rome. Yet the statements on this point may refer rather to the country districts, since it is notorious that in the great cities Italian hotels held the first place. The want of decent inns in the country may also be explained by the general insecurity of life and property.

在当时，意大利人相信他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要干净。实际上，人们普遍都会来赞同他们的这类观点，而不是反对。对于我们现代近乎完美的社交理念来说，干净整洁是必要的，相比于其他地方，它在意大利发展得比较早。意大利是当时最为富裕的民族之一，这是另外一个对意大利人有利的假设。当然，不管是赞成或反对这些自命主张的证据都不是唾手可得的，若是关于在制定清洁度的规则上谁先谁后的问题，那么中世纪赞美武士精神的诗歌或许先于意大利所能创作的一切东西。不过，毫无异议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杰出的代表穿戴非常整齐、干净，尤其是他们用餐时的行为举止，让人们格外关注， [3_17] 而“日耳曼人”在意大利则成了一切肮脏事物的代名词。乔维奥记录了马西米利亚诺·斯福尔扎在德意志受教育的过程中所染上的陋习，以及在他重新回到意大利后，由于自身的这些陋习所引来的众人的关注。然而，让人感到非常蹊跷的是，起码是在15世纪，当时的旅馆和饭店基本上都是由日耳曼人来经营，而他们大概主要是赚那些去罗马参拜的朝圣者的钱。不过，这里提到的可能是乡村地区，因为在大都市，意大利人开的旅馆是人们的首选，这是人所共知的。人们普遍对生命和财产觉得没有安全感或许是对乡间缺少像样的旅馆的较好诠释。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longs the manual of politeness which Giovanni della Casa, a Florentine by birth,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Il *Galateo.* [2_2] Not only cleanliness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word, but the dropping of all the tricks and habits which we consider unbecoming, is here prescribed with the same unfailing tact with which the. moralist discerns the highest ethical truths. In the literature of other countries the same lessons are taught, though less systematically, by the indirect influence of repulsive descriptions.

16世纪上半叶，生于佛罗伦萨的乔瓦尼·德拉·卡萨发表了一本标

题为《加拉提奥》 [3_18] 的社交礼节手册。这本书中用的是伦理学家们辨别最高道德真理所用的那套相同的经久不衰的鉴赏力，从严格意义上对整洁进行了定义，而且也规定要丢弃那些在我们看来是不得体的骗人招数和不良习惯。在其他国家的文学著作里面，通过一种令人生厌的描述所带来的间接影响的方式讲述了同样的教训，不过不是那么系统的讲述。

In other respects also, the *Galateo* is a graceful and intelligent guide to good manners—a school of tact and delicacy. Even now it may be read with no small profit by people of all classes, and the politeness of European nations is not likely to outgrow its precepts. So far as tact is an affair of the heart, it has been inborn in some men from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and acquired through force of will by others; but the Italian first recognized it as a universal social duty and a mark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Italy itself had altered much in the course of two centuries. We feel at their close that the time for practical jokes between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for *burle* and *beffe* —was over in good society, that the people had emerged from the walls of the cities and had learned a cosmopolitan politeness and consideration. We shall speak later on of the intercourse of society in the narrower sense.

在其他方面，《加拉提奥》也是一本关于礼仪的优雅且充满智慧的指导手册——一所教人如何机智和变通的学校。即使是现在各个阶层的人们阅读它也还是受益匪浅的，欧洲各个国家的礼貌观念也未必能超越它里面的所有格言。就机智是一件心灵之事来说，某些人在文明开始的黎明时期就有了这种天赋，而另外一些人是通过意志力获得的；但意大利人率先承认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义务、一种文化和教育的标志。在这两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意大利本身也经历了许多变化。在这两个世纪末期，我们感觉到朋友和熟人之间无伤大雅的玩笑

——“开玩笑和恶作剧”的时代在上层社会中已经成为历史，意大利人已经走出自己城市的围墙，学会了一种大同礼貌和体贴。稍后，我们将从比较狭隘的意义上讲述一下社会交往。

Outward life, indeed, in the fifteenth and the early part of the sixteenth centuries, was polished and ennobled as among no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A countless number of those small things and great things which combine to make up what we mean by comfort we know to have first appeared in Italy. In the well-paved streets of the Italian cities, driving was universal, while elsewhere in Europe walking or riding was the custom, and at all events no one drove for amusement. We read in the novelists of soft, elastic beds, of costly carpets and bedroom furniture, of which we hear nothing in other countries. We often hear especially of the abundance and beauty of the linen. Much of all this is drawn within the sphere of art. We note with admiration the thousand ways in which art ennobles luxury, not only adorning the massive sideboard or the light brackets with noble vases, clothing the walls with the moving splendor of tapestry, and covering the toilet-table with numberless graceful trifles, but absorbing whole branches of mechanical work—especially carpentering—into its province. All Western Europe, as soon as its wealth enabled it to do so, set to work in the same way at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But its efforts produced either childish and fantastic toy-work, or were bound by the chains of a narrow and purely Gothic art, while the Renaissance moved freely, entering into the spirit of every task it undertook and working for a far larger circle of patrons and admirers than the northern artists. The rapid victory of Italian decorative art over northern in the cours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is due partly to this fact, though partly the result of wider and more general causes.

在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对外表生活的修饰和提高，的确在其他国家是不多见的。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融合起来构成了我们所谓的舒适，这是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的。在意大利城市中平坦的大路上，驱车行驶是很普遍的事情，然而在欧洲其他地方，步行和骑马是一种习惯，不管怎样，是没有人为了消遣而驱车行驶的。我们还在小说家的著作中读到柔软且富有弹性的床、名贵的地毯、高档的卧室家具，这些东西在其他国家都是未曾听说过的。尤其是，我们经常听到亚麻制品的充裕和美丽。这些东西很多都被纳入艺术领域。我们看到了艺术能让生活变得更为奢华的多种途径，心中不胜仰慕，不仅仅是用名贵的花瓶来装饰巨大的餐具柜和轻巧的灯架，用动人心弦的绣帷来装饰墙壁，梳妆台上摆满了无数个优美的小摆件，并且把各领域的工匠们——尤其是木工——都吸纳到了它的领域里。在中世纪末期，在整个西欧，只要财力允许，它就立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然而，这种努力不是产生一些幼稚的、异想天开的不实用的东西，就是受到狭隘的、纯粹的哥特式艺术枷锁的束缚，而文艺复兴运动却在自由地发展着，渗透到它所肩负的每一项任务中，相比于北方的艺术家，它得到了更多的拥护者和崇拜者。在16世纪，意大利的装饰艺术之所以能够迅速地超过北方，部分原因就是由于这个事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一些更为广泛、更为普遍的原因。

Language and Society

语言和社交

The higher forms of social intercourse, which here meet us as a work of art—as a conscious product and one of the highest products of national life—have no more important foundation and condition than language.

更高形式的社交，作为一种艺术作品、作为一种意识产物、作为

一种民族生活的最高形式的产物之一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其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条件非语言莫属。

In the most flourishing period of the Middle Ages, the nobility of Western Europe had sought to establish a 'courtly' speech for social intercourse as well as for poetry. In Italy, too, where the dialects differed so greatly from one another, we fi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 so-called *curiale,* which was common to the courts and to the poets. It is of decisive importance for Italy that the attempt was there seriously and deliberately made to turn this into the language of literature and society.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Cento novelle antiche,* which were put into their present shape before 1300, avows this object openly. Language is here considered apart from its uses in poetry; its highest function is clear, simple, intelligent utterance in short speeches, epigrams and answers. This faculty was admired in Italy as nowhere else but among the Greeks and Arabs: 'how many in the course of a long life have scarcely produced a single *bel parlare?'*

在中世纪最繁荣的时期，西欧的贵族曾试图为社交和诗歌创建一种“宫廷式”语言。在13世纪，我们也在各地方言差异很大的意大利发现了一种所谓的“宫廷式语言”，这种语言通常被宫廷和诗人们所使用。认真地、有意识地试图把这种语言转变为一种文学和社交语言，对于意大利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早在1300年前就已经成型的《古代故事百篇》这本书的序言部分就公开宣称具有这一目的。在这里，人们认为语言脱离了诗歌用语；语言最强大的功能就是用清晰、简单、易懂的话语、警句和答语来简明扼要地进行说明。除了在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中，这种功能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在意大利这样受到崇拜：“有多少人在漫长的一生中没有说过一句‘漂亮话’？”

But the matter was rendered more difficult by the diversity of the aspects under which it was considered. The writings of Dante transport us into the midst of the struggle. His work on the Italian language is not only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for the subject itself, but is also the first complete treatise on any modern language. His method and results belong to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 science, in which they will always hold a high place. We must here content ourselves with the remark that long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this book the subject must have been one of daily and pressing importance, that the various dialects of Italy had long been the objects of eager study and dispute, and that the birth of the one classical language was not accomplished without many throes.

但是由于每个人从不同的方面来考虑问题，所以就使得问题更难以解决。但丁的著作把我们带到了挣扎的中心。它的《论意大利的语言》 [3_19] 这本作品不仅对问题本身很重要，而且也是关于现代语言的第一部完整的著作。它的方法和结论都隶属于语言学历史的范畴，在这里，它们将永远居于一个崇高的地位。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早在这本书出现以前，这个问题曾经一定是每天都会遇到的、迫切的、重要的问题。许久以来，意大利各种各样的方言成了人们迫切研究、激烈争论的目标；而那种经典语言的诞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经历了种种挣扎和磨炼之后才形成的。

Nothing certainly contributed so much to this end as the great poem of Dante. The Tuscan dialect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new national speech. If this assertion may seem to some to go too far, as foreigners we may be excused, in a matter on which much difference of opinion prevails, for following the general belief.

毫无疑问，但丁的伟大诗篇是造成这一结局的最重要的原因。托斯卡纳方言是形成新一种民族语言的基础。这种论断似乎太过分了，但在一个存在很多不同观点的问题上，我们作为外国人去服从一般人都相信的说法，或许是可以得到谅解的。

Literature and poetry probably lost more than they gained by the contentious purism which was long prevalent in Italy, and which marred the freshness and vigor of many an able writer. Others, again, who felt themselves masters of this magnificent language, were tempted to rely upon its harmony and flow, apart from the thought which it expressed. A very insignificant melody, played upon such an instrument, can produce a very great effect. But however this may be, it is certain that socially the language had great value. It was, as it were, the crown of a noble and dignified behaviour, and compelled the gentleman, both in his ordinary bearing and in exceptional moments, to observe external propriety. No doubt this classical garment, like the language of Attic society, served to drape much that was foul and malicious; but it was also the adequate expression of all that is noblest and most refined. But politically and nationally it was of supreme importance, serving as an ideal home for the educated classes in all the states of the divided peninsula. Nor was it the special property of the nobles or of any one class, but the poorest and humblest might learn it if they would. Even now—and perhaps more than ever—in those parts of Italy where, as a rule, the most unintelligible dialect prevails, the stranger is often astonished at hearing pure and well-spoken Italian from the mouths of peasants or artisans, and looks in vain for anything analogous in France or in Germany, where even the educated classes retain traces of a provincial speech. There are certainly a larger number of people able to read in Italy than we should be led to expect from the condition of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as for instance, the States of the Church—in other respects; but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e general and undisputed respect for pure language and pronunciation as something precious and sacred. One part of the country after another came to adopt the classical dialect officially. Venice, Milan and Naples did so at the noontime of Italian literature, and partly through its influences. It was not till the present century that Piedmont became of its own free will a genuine Italian province by sharing in this chief treasure of the people—pure speech. The dialects wer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purposely left to deal with a certain class of subjects, serious as well as comic, and the style which was thus developed proved equal to all its tasks. Among other nations a conscious separation of this kind did not occur till a much later period.

许久以来，在意大利盛行一种有争议的修辞癖，损害了许多有能力的作家的活力以及新奇的语言，给文学和诗歌所带来的损失或许远远大于给它们所带来的益处。再者就是，另外一些人认为自己精通这种高尚的语言，于是就只倾向于依赖这种语言形式的和谐和流畅，而偏离了其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一支很不起眼的曲调，一经这种乐器演奏，就能产生一种强大的效果。然而，尽管如此，也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从社交角度上来说，这种语言极具价值。这种语言可以说是贵族和高贵行为的最高权威，迫使有身份的绅士们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特殊场合，其行为举止都要遵从外部的社交礼节。毫无疑问，这件经典的外衣，如同亚狄加社会的语言，用来遮挡许许多多肮脏、邪恶的东西；当然，这件经典的外衣也恰当地表现出了所有最高尚、最优雅的东西。但是，从政治观点和民族观点上来说，在这四分五裂的半岛上的所有国家里，这种语言作为知识阶层的理想家园，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语言并不是贵族阶级或者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有财产，只要最贫穷、最卑微的人们愿意学，也是都能够学会的。甚至现在——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在意大利的某些地方仍照例流行着最

难以理解的方言，在这些地方，一个外邦人常常因为听到农民或者技工说一口纯正、流利的意大利语而感到惊讶，这个外邦人在法兰西和德意志是找不到类似的情景的，在那里即使是知识阶层的人们也留有浓厚的地方口音。当然，在意大利能够读书的人的数量比我们根据这个国家的多方面情况所推断出的读书的人数要多，比如教皇国；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普遍地并且不加质疑地把纯正的语言和发音当作宝贵而神圣的东西来尊重。在这个国家，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逐渐地正式采用这种经典的方言。威尼斯、米兰和那不勒斯是在意大利文学的鼎盛时期采用的这种语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文学的影响。直到19世纪，皮埃蒙特由于分享了人民的这一主要财富——纯正的语言，由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成为意大利的一个真正的省。从16世纪开始，这些方言就被有意地遗留下来应对某一类严肃的和滑稽的话题，通过这种方式发展而来的风格被证明能够完成它的一切任务。在其他国家，这种有意识的划分直到后来很晚的时期才出现。

The opinion of educated people as to the social value of language is fully set forth in the *Cortigiano*. There were then pers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ho purposely kept to the antiquated expressions of Dante and the other Tuscan writers of his time, simply because they were old. Our author forbids the use of them altogether in speech, and is unwilling to permit them even in writing, which he considers a form of speech. Upon this follows the admission that the best style of speech is that which most resembles good writing. We can clearly recognize the author's feeling that people who have anything of importance to say must shape their own speech, and that language is something flexible and changing because it is something living. It is allowable to make use of any expression, however ornate, as long as it is used by the people; nor are non-Tuscan words, or even French and Spanish words, forbidden, if custom has once applied them to definite purposes. [2_3] Thus care and intelligence will produce a

language, which, if not the pure old Tuscan, is still Italian, rich in flowers and fruit like a well-kept garden. It belongs to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cortigiano* that his wit, his polished manners and his poetry must be clothed in this perfect dress.

至于语言的社会价值，受教育群体的观点在《廷臣论》[3_20]一书里充分表达了出来。在16世纪初，有些人刻意坚持使用但丁和但丁那个时代的其他托斯卡纳作家的陈词滥调，仅仅是因为这些陈旧的词句是古老的。我们的作家完全禁止在讲话中使用这些陈旧的词句，允许在写作中使用它们也是情非得已，他把写作看作是讲话的一种形式。由此得出结论：最完美的讲话风格是和好的文章最相似、最吻合的。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认出作家的情感，有任何重要事情要说的人们必须形成他们自己的语言，并且语言是一种灵活的、能随实际情况变通的表达手段，因为语言是一种活的表达方式。无论是多么华丽的辞藻，只要人们使用过它，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它；即使不是托斯卡纳词汇，或者不是法兰斯和西班牙词汇，只要在习惯上曾经把它们用于一定的用途，那么就不禁止。[3_21]因此，谨慎和智慧可以创作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即使不是纯正的古托斯卡纳语，但仍然是意大利语，就像是一个被精心照料的花园，依然可以开出鲜艳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这是一个完美的“廷臣”所必须具备的东西，他的机智、他的优雅举止、他的诗歌都必须穿上这套完美的衣服。

When style and language had once become the property of a living society, all the efforts of purists and archaists failed to secure their end. Tuscany itself was rich in writers and talkers of the first order, who ignored and ridiculed these endeavors. Ridicule in abundance awaited the foreign scholar who explained to the Tuscans how little they understood their own language. The life and influence of a writer like Machiavelli was enough to sweep away all these cobwebs. His vigorous thoughts, his clear and simple mode of

expression, wore a form which had any merit but that of the *trecentisti.*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ere too many North Italians, Romans and Neapolitans who were thankful if the demand for purity of style in literature and conversation was not pressed too far. They repudiated, indeed, the forms and idioms of their dialect; and Bandello, with what a foreigner might suspect to be false modesty, is never tired of declaring: 'I have no style; I do not write like a Florentine, but like a barbarian; I am not ambitious of giving new graces to my language; I am a Lombard, and from the Ligurian border into the bargain.' But the claims of the purists were most successfully met by the express renunciation of the higher qualities of style, and the adoption of a vigorous, popular language in their stead. Few could hope to rival Pietro Bembo who, though born in Venice, nevertheless wrote the purest Tuscan, which to him was a foreign language, or the Neapolitan Sannazaro, who did the same. But the essential point was that language, whether spoken or written, was held to be an object of respect. As long as this feeling was prevalent, the fanaticism of the purists—their linguistic congresses and the rest of it—did little harm. Their bad influence was not felt till much later, when the original power of Italian literature relaxed and yielded to other and far worse influences. At last it became possible for the Accademia della Crusca to treat Italian like a dead language. But this association proved so helpless that it could not even hinder the invasion of Gallicis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风格和语言一旦成为一个有生命的社会的财产时，修辞癖者和爱写古体文者的一切努力都会白费，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托斯卡纳有很多一流的作家和能说会道的健谈者，他们无视并嘲讽这些人所付出的努力。如果一个国外学者向托斯卡纳人解释说他们托斯卡纳人对自己国家的语言知之甚少，那么等待这个外国学者的将是大量的讥讽。

像马基雅弗利这样的作家的生活和影响力足以消除所有的陈腐之论。他强有力的思想、他清晰而简洁的表达方式使他具有一切作家的优点，唯独不具备14世纪意大利作家的优点。另一方面，许多北部意大利人、罗马人和那不勒斯人认为，如果对文学和谈话上的纯洁风格的要求不是那么苛刻的话，那么他们是心存感激的。的确，他们否定了自己方言中特有的表达形式和惯用的风格；班戴洛用一种可能被外国人疑为是假谦虚的态度不厌其烦地宣告："我没有任何风格；我不像佛罗伦萨人那样写作，而是像一个野蛮人一样写东西；我不渴望给自己的语言增添新的优美辞藻；我是一个伦巴第人，而且是来自利古里亚的边缘地带。"然而与修辞癖者的主张相抗衡的，且获得成功的诉求是：宣布放弃高雅的风格，取而代之的是采用那种强有力的、通俗的语言。很少有人希望和彼得罗·本博相媲美，虽然彼得罗·本博出生在威尼斯，但是他却能写出最纯正的托斯卡纳语，这种语言对他来说却是一种外语，或者和那不勒斯人桑纳扎罗相比，他也能做得一样好。但是，无论是口头语还是书面语，问题的根本之处在于语言是被尊重的对象。只要这种情感占上风，修辞癖者的这种狂热盲信——他们的语言代表大会及其他种种情形——并不会带来很大危害。直到很久之后，人们才感受到它们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这时意大利文学的原动力已衰竭，并受到其他甚至更恶劣的影响。最后，秕糠学会把意大利语看作一种死语言。但是，这个学会变得如此无助，以至于在18世纪它不能阻止法语的入侵。

This language—loved, tended and trained to every use—now served as the basis of social intercourse. In northern countries, the nobles and the princes passed their leisure either in solitude, or in hunting, fighting, drinking and the like; the burghers in games and bodily exercises, with a mixture of literary or festive amusements. In Italy there existed a neutral ground, where people of every origin, if they had the needful talent and culture, spent their time in conversation and the polished interchange of jest and earnest. As eating and drinking formed a small part of such entertainments, it

was not difficult to keep at a distance those who sought society for these objects. If we are to take the writers of dialogues literally, the loftiest problems of human existence were not excluded from the conversation of thinking men, and the production of noble thoughts was not, as was commonly the case in the North, the work of solitude, but of society. But we must here limit ourselves to the less serious side of social intercourse—to the side which existed only for the sake of amusement.

这种语言深受人们的喜爱、关注，并且被人们娴熟地应用于每一个场合，现在这种语言被作为社交基础。在北方国家，贵族和君主们要么在孤寂独处的氛围中度过闲暇时光，要么通过打猎、搏斗、饮酒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来消磨时光；市民们则通过游戏比赛、健身运动，以及文学消遣和节日庆典来打发闲暇时间。在意大利，有一个中立场所，只要具有一定的天赋，各种出身的人们都可以在那里畅所欲言，在诙谐、真挚、优美的交流中度过闲暇时光。因为在这种场合吃饭和饮酒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对那些为了吃好喝好才来寻求交往的人们敬而远之，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真正领会了对话篇作家的作品，那么我们也就明白了有思想的人的谈话中并不排除人生最高深莫测的问题，而崇高的思想也不像在北方那样普遍都是从孤寂独处中产生的，而是从相互交往之中产生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把我们所谈的东西限制在社交中不是很严肃的那一边——限制在只是为了娱乐而存在的那一面。

Social Etiquette

社交礼仪

This society, at all eve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as a matter of art; and had, and rested on, tacit or

avowed rules of good sense and propriety, which are the exact reverse of all mere etiquette. In less polished circles, where society took the form of a permanent corporation, we meet with a system of formal rules and a prescribed mode of entrance, as was the case with those wild sets of Florentine artists of whom Vasari tells us that they were capable of giving representations of the best comedies of the day. In the easier intercourse of society it was not unusual to select some distinguished lady as president, whose word was law for the evening. Everybody knows the introduction to Boccaccio's *Decameron,* and looks on the presidency of Pampinea as a graceful fiction. That it was so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s a matter of course; but the fiction was nevertheless based on a practice which often occurred in reality. Firenzuola, who nearly two centuries later (1523) prefaces his collection of tales in a similar manner, with express reference to Boccaccio, comes assuredly nearer to the truth when he puts into the mouth of the queen of the society a formal speech on the mode of spending the hours during the stay which the company proposed to make in the country. The day was to begin with a stroll among the hills passed in philosophical talk; then followed breakfast, with music and singing, after which came the recitation, in some cool, shady spot, of a new poem, the subject of which had been given the night before; in the evening the whole party walked to a spring of water where they all sat down and each one told a tale; last of all came supper and lively conversation 'of such a kind that the women might listen to it without shame and the men might not seem to be speak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ine'. Bandello, in the introductions and dedications to single novels, does not give us, it is true, such inaugural discourses as this, since the circles before which the stories are told are represented as already formed; but he gives us to understand in other ways how rich, how manifold and how charming the conditions of society must have been. Some readers may be of opinion that no good was

to be got from a world which was willing to be amused by such immoral literature. It would be juster to wonder at the secure foundations of a society which, notwithstanding these tales, still observed the rules of order and decency, and which knew how to vary such pastimes with serious and solid discussion. The need of noble forms of social intercourse was felt to be stronger than all others. To convince ourselves of it, we are not obliged to take as our standard the idealized society which Castiglione depicts as discussing the loftiest sentiments and aims of human life at the court of Guidobaldo of Urbino, and Pietro Bembo at the castle of Asolo. The society described by Bandello, with all the frivolities which may be laid to its charge, enables us to form the best notion of the easy and polished dignity, of the urbane kindliness, of the intellectual freedom, of the wit and the graceful dilettantism, which distinguished these circles. A significant proof of the value of such circle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women who were the centres of them could become famous and illustrious without in any way compromising their reputation. Among the patronesses of Bandello, for example, Isabella Gonzaga (born an Este) was talked of unfavorably not through any fault of her own, but on account of the too free-lived young ladies who filled her court. Giulia Gonzaga Colonna, Ippolita Sforza married to a Bentivoglio, Bianca Rangona, Cecilia Gallerana, Camilla Scarampa and others were either altogether irreproachable, or their social fame threw into the shade whatever they may have done amiss. The most famous woman of Italy, Vittoria Colonna (b. 1490, d. 1547), the friend of Castiglione and Michelangelo, enjoyed the reputation of a saint. It is hard to give such a picture of the unconstrained intercourse of these circles in the city, at the baths or in the country, as will furnish literal proof of the superiority of Italy in this respect over the rest of Europe. But let us read Bandello, and then ask ourselves if anything of the same kind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say, in France, before

this kind of society was there introduced by people like himself. No doubt the supreme achievements of the human mind were then produced independently of the help of the drawing-room. Yet it would be unjust to r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latter on art and poetry too low, if only for the reason that society helped to shape that which existed in no other country—a widespread interest in artistic production and an intelligent and critical public opinion. And apart from this, society of the kind we have described was in itself a natural flower of that life and culture which was then purely Italian, and which since then has extended to the rest of Europe.

在16世纪初期，无论如何这种社交都不失为一种艺术；它不仅拥有默认的也有公然公开的良好的理智和礼节规则，并且建立于这些规则之上，与一切纯粹的礼节截然相反。在那些不是很高雅的社交圈里，社交以一种永恒的社团的形式存在，我们遇到的是一套正式的规章制度和正规的入会模式，那一群放纵不笃的佛罗伦萨艺术家们就是这种情况，瓦萨里告诉我们说：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们可以表演出当时最好的喜剧。在相对比较轻松的社交集会中，通常情况下会选择一个高贵的女士作为集会主席，当晚她的话就是集会中的规则。每个人都知道薄伽丘《十日谈》一书中的前言，并把潘比妮亚的引领看作是一个优美的虚构故事。在特殊情况下，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这种虚构的故事情节仍然要以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为依据。费伦佐拉在将近两个世纪之后（1523年）用相似的方式为他的故事集添加的序言，专门引证了薄伽丘的故事，毫无疑问这篇序言更接近于真实的生活，集会中的这一群人提议说要去乡间逗留一段时间，会上女集会主席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正式演说，阐述了如何度过这段闲暇时光。早上起床后先在山中漫步一段时间，漫步中可以闲谈一些哲学问题；然后再伴着音乐和歌声吃早饭；吃过早饭之后，找一个凉爽的、树荫浓郁的地方吟诵一篇新诗，前一天晚上就已经选定好诗歌的题目；到了晚上，所有与会人员漫步到一潭泉水旁边，坐在叮咚作响的泉水旁边，然后每个人都讲述一个故事；最后，到了晚饭时间，席间

人们进行着绘声绘色的谈话，这种谈话活泼自在，女人们似乎不再有丝毫的羞怯，男人们好像不用借助酒劲也可以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在个别小说的序言和致辞中，班戴洛确实没有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开场白，因为故事的听众早已经形成；但是他用其他方法让我们了解到了社交集会是一个丰富多彩、多种多样、极具吸引力的场合。一些读者或许会抱有这样的成见：对于这样一个敢于用不道德的文学来自娱自乐的社交团体，我们是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的。可是，尽管这些社交团体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负面故事，但是他们依然能够遵守秩序规则和礼貌规矩，并且他们知道如何用严肃、可靠的辩论来使这种消遣方式富于变化，因此对这种集会能够拥有稳固的根基而感到惊讶也是不足为奇的。人们对高贵的社交形式的需求比对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交的需求都强烈。为了确信这一点，我们不需要以卡斯蒂廖内所刻画的在乌尔比诺圭多巴尔多宫廷上的社交集会为标准，卡斯蒂廖内把这种集会描述成讨论人类生活中最崇高的情感和目标的理想场所；我们也不需要以彼得罗·本博所描写的阿索洛城堡里的那种理想集会为基准。班戴洛所描写的集会，尽管会受到人们种种轻率的指责，但是仍然可以让我们对这些社交团体的特点形成一种最好的观念，这些把各类团体区分开的特点包括从容、高贵的尊严，温文尔雅的和善，思想学术的自由，敏锐的才智，以及优雅的艺术爱好。展现这类团体价值观的一个重要依据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女士们是它们的中心，女士们能够在它们的名誉不受到丝毫威胁的情况下变成名誉卓绝的人物。比如，在班戴洛的女赞助人中，出生在埃斯特家族的伊莎贝拉·贡扎加曾遭到对她十分不利的非议，这不是因为她自己的过错，而是因为宫廷中的年轻贵妇们过着放纵的生活。朱莉亚·贡扎加·科隆纳嫁给了意大利本蒂沃利奥的伊波丽塔·斯福尔扎、比安卡·兰戈尼、切奇利亚·格列丽娜、加米拉·斯加兰芭以，其他的妇女要么是有过失的，要么是她们在社交界的盛名掩盖了她们的过错，意大利最有名气的贵妇维特多利亚·科隆纳（1490-1547）享有圣女的盛名，她还是卡斯蒂廖内和米开朗基罗的朋友。若要描绘出这些社交团体在大都市、在浴疗场所或在乡间无拘无束的交往是困难的，若要提供出书面证据来证实意大利在这方面优于欧洲其他各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让我们读一读班戴洛的作品，然后扪心自问，这类社交在被他这样的人引进到其他国家

之前，是否在这些国家也可能存在同样的事情，比如说在法国。毫无疑问，人类思想的至高成就不是依靠会客室的帮助而形成的。但是，社交促进了人们对艺术作品的广泛兴趣和一种智慧的、批判性的公众舆论，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即使从这一个原因来看，低估社交给艺术和诗歌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公平的。除此之外，我们所描述过的这类社交本身就是生活和文化的自然精华，这种生活和文化在当时只是存在于意大利，从此以后就蔓延到了欧洲其他国家。

In Florence society was powerfully affected by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was supreme over his circle, not, as we might be led to believe, through the princely position which he occupied, but rather through the wonderful tact he displayed in giving perfect freedom of action to the many and varied natures which surrounded him. We see how gently he dealt with his great tutor Politian, and how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oet and scholar was reconciled, though not without difficulty, with the inevitable reserve prescribed by the approaching change in the position of the house of Medici and by consideration for the sensitiveness of the wife. In return for the treatment he received, Politian became the herald and the living symbol of Medicean glory. Lorenzo, after the fashion of a true Medici, delighted in giving an outward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to his social amusements. In his brilliant improvisation —'The Hawking Party'—he gives us a humorous description of his comrades, and in the 'Symposium' a burlesque of them, but in both cases in such a manner that we clearly feel his capacity for more serious companionship. Of this intercourse his correspondence and the records of his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conversation give ample proof. Some of the social unions which were afterwards formed in Florence were in part political clubs, though not without a certain po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character also. Of this kind was the so-called Platonic Academy which met after Lorenzo's death in

the gardens of the Rucellai.

在佛罗伦萨，社交受到文学和政治的强烈影响。伟大的洛伦佐在他的那个交际圈里享受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可能认为这是因为他身为君主，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因为他在给自己周围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传授完美的自由行为时所展现出的绝妙的机智老练。我们看到他是多么温婉地对待他伟大的老师波利提安，美第奇家族即将迎来的变化，以及洛伦佐对妻子的敏感的考虑，对此都有所保留，我们看到这个声势显赫的诗人兼学者的主权是如何得到和解的。作为对他所受的不公对待的回报，波利提安成了美第奇家族的光荣使者和活生生的象征。按照真正的美第奇家族的惯例，洛伦佐是乐于对自己的社交娱乐活动给以外在的、艺术的表现的。在他即兴而作的《鹰猎大会》这部杰出作品里，他滑稽地描述了自己的同伴，而在《宴会》这部作品里又写了一首滑稽诗来描述他们；但在两种情形下，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真切地感到他进行更为严肃的交往的能力。他的书信，以及关于文学和哲学方面的谈话记录给这种交往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后来在佛罗伦萨形成的社交团体，虽然其中一部分也具有文学和哲学的性质，但却是属于政治俱乐部。所谓的“柏拉图学会”就隶属于这一类学会，在洛伦佐去世之后，柏拉图学会在鲁切拉伊的花园里举行过一次聚会。

At the courts of the princes, society naturally depended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ruler.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y became few in number, and these few soon lost their importance. Rome, however, possessed in the unique court of Leo X a society to which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offers no parallel.

当然在君主的宫廷里，社交取决于统治者的性格。从16世纪初期以来，他们的数量就变得寥若晨星，并且这寥寥无几的几个人不久之

后也丧失了他们的重要性。然而，在罗马独一无二的利奥十世宫廷里，有一个全世界无可匹敌的社交团体。

Education of the *Cortigiano*

“廷臣”的教育

It was for this society—or rather for his own sake—that the *cortigiano,* as described to us by Castiglione, educated himself. He was the ideal man of society, and was regarded by the civilization of that age as its choicest flower; and the court existed for him rather than he for the court. Indeed, such a man would have been out of place at any court, since he himself possessed all the gifts and the bearing of an accomplished ruler, and because his calm supremacy in all things, both outward and spiritual, implied a too independent nature. The inner impulse which inspired him was directed, though our author does not acknowledge the fact, not to the service of the prince, but to his own perfection. One instance will make this clear. In time of war the courtier refuses even useful and perilous tasks, if they are not beautiful and dignified in themselves, such as for instance the capture of a herd of cattle; what urges him to take part in war is not duty but *l'onore.* The moral relation to the prince, as described in the fourth book, is singularly free and independent. The theory of well-bred love-making, set forth in the third book, is full of delicate psychological observation, which perhaps would be more in place in a treatise on human nature generally; and the magnificent praise of ideal love, which occurs at the end of the fourth book, and which rises to a lyrical elevation of feeling, has no connection whatever with the special object of the work. Yet here, as in the *Asolani* of Bembo, the culture of the time shows itself in the delicacy with which this

sentiment is represented and analyzed. It is true that these writers are not in all cases to be taken literally; but that the discourses they give us were actually frequent in good society cannot be doubted, and that it was no affectation, but genuine passion, which appeared in this dress we shall see further on.

就像卡斯蒂廖内为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廷臣”为了这个社交，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他自己才进行自我教育的。他是社交的理想人选，并且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最佳精华；与其说他是为了宫廷而存在，不如说宫廷是为他而存在。确实，这样的一个人物是任何宫廷都无法容纳得下的，因为他具有一个有修养的统治者所具有的一切天赋和举止，并且在处理一切事务时，都泰然自若、出类拔萃，由内而外散发着一种行不苟合、独立自主的性格。鼓舞着他不断向前的内在动机不是为了给君主提供服务，而是为了提升自己，使自己变得更为完美，尽管我们的作家不承认这一事实。简单地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清晰地说明这一点。抗战时期，如果一些任务本身不是那么美好，且不是很体面，比如去抢夺一群牛，那么廷臣可以拒绝那些虽极其有益但却危险重重的任务。激励他参加战争的不是责任和义务，而是所谓的“荣誉”。如本书第四卷里所讲述的那样，他和君主在道义上的关系是绝对自由的，不受任何东西约束的。在本书第三卷里所阐述的高贵的恋爱理论充满了微妙的心理观察，这种理论或许放在广泛论述人之天性的著作里会显得更为恰当得体；在第四卷结尾部分所出现的对理想爱情的华丽赞颂，在情感表达上达到了抒情诗的高度，与本书的特殊对象已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在这里，就像在本波的《阿苏拉尼》这本著作里所描述的那样，当时的文化在微妙中展现自己，通过这种微妙的方式某种情感才得以显现和分析。诚然，这些作家的作品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被完全理解的，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是他们给我们所提出的论述在上流社会确实也是时常发生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我们在接下来的文章中也将会看到，这其实并不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虚情假意，而是以这种形式而展现出来的真实的情感。

Among outward accomplishments, the so-called knightly exercises were expected in thorough perfection from the courtier, and besides these much that could only exist at courts highly organized and based on personal emulation, such as were not to be found out of Italy. Other points obviously rest on an abstract notion of individual perfection. The courtier must be at home in all noble sports, among them running, leaping, swimming and wrestling; he must, above all things, be a good dancer and, as a matter of course, an accomplished rider. He must be master of several languages, at all events of Latin and Italian; he must be familiar with literature and have some knowledge of the fine arts. In music a certain practical skill was expected of him, which he was bound, nevertheless, to keep as secret as possible. All this is not to be taken too seriously, except what relates to the use of arms. The mutual interaction of these gifts and accomplishments results in the perfect man, in whom no one quality usurps the place of the rest.

在外在的技艺方面，要求廷臣具备非常完美的所谓的骑士运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只存在于组织性极高的宫廷中和基于个人竞争上的要求，诸如此类的东西在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地方都是找不到的。其他各点显然是建立在个人完美的抽象观念之上的，廷臣必须精通各类贵族运动，包括赛跑、跳跃、游泳与摔跤；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是一个优秀的舞蹈者，理所当然，他也必须是一个技术精湛的赛车手。他必须要精通几种语言，无论如何都要精通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他必须通晓文学，也要懂得一点美术。对于音乐，他要有某种实际技能，然而对于这种技能，他一定要尽可能地保密。所有这些技艺都不要看得太过认真，但那些需要使用武器的技艺除外。这些天赋和技艺之间相互作用，造就了一个各种技能全面、均衡发展的完美之人。

So much is certain, tha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Italians

had all Europe for their pupils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in every noble bodily exercise and in the habits and manners of good society. Their instructions and their illustrated books on riding, fencing and dancing served as the model to other countries. Gymnastics as an art, apart both from military training and from mere amusement, was probably first taught by Vittorino da Feltre and after his time became essential to a complete education. The important fact is that they were taught systematically, though what exercises were most in favor, and whether they resembled those now in use, we are unable to say. But we may infer, not only from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but from positive evidence which has been left for us, that not only strength and skill, but grace of movement was one of the main objects of physical training. It is enough to remind the reader of the great Federigo of Urbino directing the evening games of the young people committed to his care.

可以肯定的是，在16世纪，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在所有高贵的体育锻炼和上流社会的习俗礼仪方面，意大利人是整个欧洲的老师。他们有关骑术、剑术和舞蹈方面的指南，以及配有插图的书籍被其他国家作为范本来使用。体操作为一种艺术，既有别于军事训练，又不同于纯粹的娱乐活动，大概体操最早是由维托里奥·达·费尔特教授的，从他那个时代之后，体操就成了全方位教育中所必不可少的一个运动项目。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这些运动项目是系统地教授的，虽然哪些运动是最受人们喜爱的，这些运动是否和现在的运动相似，这些我们都无法说明，但是我们不仅可以从人们的一般特征上，而且还可以从遗留给我们的确凿的证据上推断出来：不仅体力和技巧而且优美的动作在当时也是体育锻炼的主要对象之一。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提醒读者，乌尔比诺的大费德里戈曾指导由他照看的年轻人做晚间游戏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The games and contests of the popular classes did not differ essentially from those which prevailed elsewhere in Europe. In the maritime cities boat-racing was among the number, and the Venetian regattas were famous at an early period. The classical game of Italy was and is the ball; [2_4] and this was probably played at the time of the Renaissance with more zeal and brilliancy than elsewhere. But on this point no distinct evidence is forthcoming.

大众阶级所进行的游戏和竞赛与欧洲其他地方所流行的游戏和竞赛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在沿海城市，划船比赛是其中一个运动项目，并且威尼斯的快艇比赛在早期时候就非常有名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意大利的经典游戏都是球类运动 [3_22] ；或许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以更高的热情、更精湛的技术来进行球类运动。但是，对于这个观点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Music

音乐

A few words on music will not be out of place in this part of our work. Musical composition down to the year 1500 was chiefly in the hands of the Flemish school, whose originality and artistic dexterity were greatly admired. Side by side with this, there nevertheless existed an Italian school, which probably stood nearer to our present taste. Half a century later came Palestrina, whose genius still works powerfully among us. We learn among other facts that he was a great innovator; but whether he or others took the decisive part in shaping the musical language of the modern world lies beyond the judgement of the unprofessional critic. Leaving on one side the history of musical composition, we shall confine

ourselves to the position which music held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e day.

在本书的这一部分我们略谈一下音乐也是比较恰当的。直到1500年音乐作品主要出自佛兰德斯乐派，这个乐派的独创性和艺术技巧极受人们钦佩。但是，和佛兰德斯乐派并驾齐驱的还有一个意大利乐派，这个乐派的乐曲或许更接近我们现在的音乐品味。半个世纪之后，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帕莱斯特里那出现了，直到今天他的音乐天赋还在我们中间起着强有力的作用。我们从很多事实中了解到，帕莱斯特里那还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但是否他和其他一些人在近代音乐语言的塑造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却不是外行的评论家所能评判的。暂且把音乐创作的历史放在一边不谈，我们将专门谈一下音乐在当时的社交活动中所占的地位。

A fact most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naissance and of Italy is the specialization of the orchestra, the search for new instruments and modes of sound, and, in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is tendency, the formation of a class of *virtuosi,* who devoted their whole attention to particular instruments or particular branches of music.

一个最能展现文艺复兴时期的特点以及意大利的特点的事实就是乐队的专业化、对新乐器和新乐调模式的探索，以及与这种趋势密切相关的一班“音乐大家”的形成，这些“大家”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在独特的乐器或特有的音乐分支上。

Of the more complex instruments which were perfected and widely diffused at a very early period, we find not only the organ, but a corresponding string instrument, the *gravicembalo* or

clavicembalo. Fragments of these, dat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have come down to our own days, adorned with paintings from the hands of the greatest masters. Among other instruments the first place was held by the violin, which even then conferred great celebrity on the successful player. At the court of Leo X, who, when cardinal, had filled his house with singers and musicians, and who enjoyed the reputation of a critic and performer, the Jew Giovan Maria and Jacopo Sansecondo were among the most famous. The former received from Leo the title of count and a small town; the latter has been taken to be the Apollo in the *Parnassus* of Raphael. In the cours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celebrities in every branch of music appeared in abundance, and Lomazzo (about the year 1580) names the then most distinguished masters of the art of singing, of the organ, the lute, the lyre, the *viola da gamba,* the harp, the cithern, the horn and the trumpet, and wishes that their portraits might be painted on the instruments themselves. Such many-sided comparative criticism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anywhere but in Italy, although the same instruments were to be found in other countries.

在很早就已经完善且广泛传播的较为复杂的乐器中，我们不仅发现了风琴，还发现了一些与之相对应的弦乐器，大键琴或古钢琴。这些乐器的碎片从14世纪初期一直保留到我们这个时代，上面还装饰有最著名的艺术大师的亲笔绘画。在其他乐器中，小提琴是最重要的，它在当时甚至可以使成功的演奏者获得巨大的名誉。在利奥十世做红衣主教时，他的宫廷里挤满了歌手和音乐家，他自己也享有评论家和演奏家的声誉。在利奥十世宫廷里的这些歌手和音乐家中，最著名的是犹太人乔凡·马里亚和雅各布·桑斯康多，列奥赐封乔凡·马里亚为伯爵，并且赐给他一个小镇作为封地；雅各布·桑斯康多则被看作拉斐尔的画作《帕纳塞斯山》中的阿波罗。在16世纪，各音乐领域人才辈出，洛马佐（约1580年）列举了当时最杰出的歌唱家，以及风琴、琵

琶、七弦琴、膝琴、竖琴、似吉他乐器、法国号、小号等乐器的最著名的演奏大师，并且希望每个乐器上都画有该乐器的演奏大师的肖像。这种多方面的比较评论只有在意大利是可以的，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在其他国家也可以找到同样的乐器。

The number and variety of these instruments i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collections of them were now made from curiosity. In Venice, which was one of the most musical cities of Italy, there were several such collections, and when a sufficient number of performers happened to be on the spot, a concert was at once improvised. In one of these museums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instruments, made after ancient pictures and descriptions, but we are not told if anybody could play them, or how they sounded. It must not be forgotten that such instruments were often beautifully decorated, and could be arranged in a manner pleasing to the eye. We thus meet with them in collections of other rarities and works of art.

当时人们是出于好奇心才收集了这些乐器，所收集的这些乐器数目和种类繁多。威尼斯是意大利最爱好音乐的城市之一，在那里有几处地方收藏着这些乐器，一旦现场有足够多的人数可以演奏这些乐器时，立刻就即兴举办一次演唱会。在其中一个博物馆里，有很多是按照古代的图画和描述而制成的乐器，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人会演奏这些乐器，或者这些乐器是发出什么样的乐声。但是不要忘了，这些乐器往往都是装潢美观，并且摆放的方式让人看起来非常赏心悦目。因此，我们往往是在其他稀世珍品和艺术作品中看到它们。

The players, apart from the professional performers, were either single amateurs, or whole orchestras of them, organized into

a corporate academy. Many artists in other branches were at home in music, and often masters of the art. People of position were averse to wind instruments, for the same reason which made them distasteful to Alcibiades and Pallas Athene. In good society singing, either alone or accompanied with the violin, was usual; but quartettes of string instruments were also common, and the *clavicembalo* was liked on account of its varied effects. In singing the solo only was permitted, 'for a single voice is heard, enjoyed and judged far better'. In other words, as singing, notwithstanding all conventional modesty, is an exhibition of the individual man of society, it is better that each should be seen and heard separately. The tender feelings produced in the fair listeners are taken for granted, and elderly people are therefore recommended to abstain from such forms of art, even though they excel in them. It was held important that the effect of the song should be enhanced by the impression made on the sight. We hear nothing, however, of the treatment in these circles of musical composition as an independent branch of art. On the other hand it happened sometimes that the subject of the song was some terrible event which had befallen the singer himself.

除了专业的演奏家之外，演奏这些乐器的人有的是业余的单人演奏者，有的是由业余演奏者组成的乐队，演奏这些乐器的人们组成了一个协会。许多其他领域的艺术家也精通音乐，他们通常都是这一门艺术的大师级人物。许多有身份地位的人不愿意吹奏乐器，他们不喜欢吹奏乐器的理由同阿尔西比亚德斯和帕拉斯·雅典娜不喜欢这些乐器的理由是一样的。在上流社会中，不管有没有小提琴伴奏，唱歌都是很普遍的。但弦乐四重奏也是很常见的，而古钢琴由于其各种各样的音效而备受人们喜爱。在歌唱中，只允许独唱，因为一个人的声音听得更清晰、更易于欣赏，也更易于人们做出好坏的评判。换句话说，尽管在唱歌时有一系列传统上的谦虚之礼，但它仍是社交中展现个人

能力的一个大好机会，所以每个人单独出场来表演或许会更好一些。在女性听众身上产生温柔的情感是理所当然的，而年长者虽然也擅长此艺术，但最好不从事这种艺术形式。人们认为用视觉所产生的印象来加强歌曲的效果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音乐界中，把音乐作品当作是独立的艺术分支来对待我们是前所未闻的。另一方面，我们有时也会碰到，歌曲的主题恰恰就是歌手本人所遭受过的某一件可怕的事情。

This dilettantism, which pervaded the middle as well as the upper classes, was in Italy both more widespread and more genuinely artistic than in any other country of Europe. Wherever we meet with a description of social intercourse, there music and singing are always and expressly mentioned. Hundreds of portraits show us men and women, often several together, playing or holding some musical instrument, and the angelic concerts represented in the ecclesiastical pictures prove how familiar the painters were with the living effects of music. We read of the lute-player Antonio Rota, at Padua (d. 1549), who became a rich man by his lessons, and published a handbook on the practice of the lute.

这种业余的艺术爱好形式，遍及整个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这种业余的艺术爱好不仅仅是在意大利传播得更为广泛，而且也更具真正的艺术性。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关于社交的描写总是明确提到音乐和唱歌。数以百计的肖像向我们展示了几个男男女女在一起演奏或者手持某种乐器的画面，而教会图画里的天使音乐会也向我们展示出了画家们对于音乐给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是多么地熟悉。我们曾经也读到过帕多瓦的琵琶演奏者，安东尼奥·罗达（卒于1549年）的故事，他由于教授琵琶而变得富有，并且出版了一本琵琶练习手册。

At a time when there was no opera to concentrate and monopolize musical talent, this general cultivation of the art must have been something wonderfully varied, intelligent and original. It is another question how much we should find to satisfy us in these forms of music, could they now be reproduced for us.

在一个没有歌剧来聚集和垄断音乐人才的时代里，这类艺术的综合培养形式肯定是极其多样的、充满智慧的，且具有独创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能够重新为我们演奏一番这种形式的音乐，那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让我们感到满足。

Equality of Men and Women

男女平等

To understand the higher forms of social intercourse at this period, we must keep before our minds the fact that women stood on a footing of perfect equality with men. We must not suffer ourselves to be misled by the sophistical and often malicious talk about the assumed inferiority of the female sex, which we meet with now and then in the dialogues of this time, nor by such satires as the third of Ariosto, who treats woman as a dangerous grown-up child, whom a man must learn how to manage, in spite of the great gulf between them. There is, indeed, a certain amount of truth in what he says. Just because the educated woman was on a level with the man, that communion of mind and heart which comes from the sense of mutual dependence and completion could not be developed in marriage at this time, as it has been developed later in the cultivated society of the North.

若要了解这一时期的更高形式的社交，我们必须要先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女人和男人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我们不要为那些狡辩女性处于低劣地位的、强词夺理的、滋生恶意的说辞所误导，我们经常在这个时代的对话体文章中遇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也不能被像阿里奥斯托的第三篇那样的讽刺文所迷惑，他把女人看作是一群长大了的危险孩子，一个男人必须要学会如何去驾驭一个女人，尽管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的确，他所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正是因为受过教育的女人与男人们的水平相当，而这一时期的婚姻，男人和女人是从相互依赖和相互完善中产生的情投意合，所以这种情投意合就不能像日后北方的文明社会那样得以发展。

The education given to women in the upper classes was essentially the same as that given to men. The Italian, at the time of the Renaissance, felt no scruple in putting sons and daughters alike under the same course of literary and even philological instruction. Indeed, looking at this ancient culture as the chief treasure of life, he was glad that his girls should have a share in it. We have seen what perfection was attained by the daughters of princely houses in writing and speaking Latin. Many others must at least have been able to read it, in order to follow the conversation of the day, which turned largely on classical subjects. An active interest was taken by many in Italian poetry, in which, whether prepared or improvised, a large number of Italian women, from the time of the Venetian Cassandra Fedele onwards (about the clos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made themselves famous. One, indeed, Vittoria Colonna, may be called immortal. If any proof were needed of the assertion made above, it would be found in the manly tone of this poetry. Even the love-sonnets and religious poems are so precise and definite in their character, and so far removed from the tender twilight of sentiment, and from all the dilettantism which we commonly find in the poetry of women, that we should not hesitate to attribute them to male

authors, if we had not clear external evidence to prove the contrary.

在上层社会中，对女人们所进行的教育和对男人们所进行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学习同样的文学课程，甚至是语言学方面的课程。确实，因为意大利人把这种古文化看作是生活中最为珍贵的东西，所以能让自己的女儿们也享有这种财富，他是很高兴的。我们已经看到王室的女孩子在拉丁语的说和写上达到了非常完美的程度。其他阶级的女士们必须能够读懂拉丁语文章，为的就是能够听懂当时的谈话，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古典作品的话题。许多人都非常热衷于意大利诗歌，自从威尼斯的卡桑德拉·菲德尔时代以来（约15世纪末），无论是事先准备好的诗歌还是即兴而作的诗歌，许多意大利妇女都因此而名声大起。其中一个叫做维特多利亚·科隆纳的人确实可以堪称是不朽的。如果要为上面所说的话寻找证据的话，那么是可以在她那具有男子气概的诗歌里找到答案的。甚至是关于爱情的十四行诗和宗教诗歌的特征也是如此严格、明确，迄今为止已完全摆脱了那种脆弱的情感，也完全摆脱了我们经常会在女性诗歌里看到的那种肤浅的、不求甚解的态度，看了这些作品之后，如果没有明确的外部证据来证明是女性作品的话，那么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这就是男性作家的作品。

For, with education, the individuality of women in the upper classes was developed in the same way as that of men. Till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the personality of women out of Italy, even of the highest rank, comes forward but little. Exceptions like Isabella of Bavaria, Margaret of Anjou and Isabella of Castille are the forced result of very unusual circumstances. In Italy,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wives of the rulers, and still more those of the *condottieri,* have nearly all a distinct, recognizable personality, and take their share of notoriety and glory. To these came gradually to be added a crowd of famous women of the most

varied kind; among them those whose distinction consisted in the fact that their beauty, disposition, education, virtue and piety combined to render them harmonious human beings. There was no question of 'woman's rights' or female emancipation, simply because the thing itself was a matter of course. The educated woman, no less than the man, strove naturally after a characteristic and complete individuality. The same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which perfected the man was demanded for the perfection of the woman. Active literary work, nevertheless, was not expected from her, and if she were a poet, some powerful utterance of feeling, rather than the confidences of the novel or the diary, was looked for. These women had no thought of the public; their function was to influence distinguished men, and to moderate male impulse and caprice.

由于受到了教育，上流社会的女人们陶冶自己个性的方式和男士们培养自己个性的方式是一样的。直到宗教改革时期，除了意大利之外，其他任何地方的妇女的性格，即使是地位最高的女士们，也很少有脱颖而出的。有几个例外情况，像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安茹朝的玛格丽特、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等人是在极其不同寻常的环境中所逼迫出来的。在意大利，整个15世纪中，统治者的妻子，大部分是雇佣军队长的妻子，几乎都有一种独特的、鲜明可识的个性特征，有的是臭名昭著，有的是光芒四射。除了这些人之外，又逐渐增加了一群彼此特征大相径庭、又非常有名气的女士们；她们彼此之间的差别主要是美貌、性情、教育、美德、虔诚，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就让她们成为和谐的人类。在那里，不存在“妇女权利”或者妇女解放之类的问题，仅仅是因为妇女享有和男士们平等的权利本身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当然要和男士们一样追求独具特色的、完美无缺的个性。使男士们变得完美的那种智力和情感上的发展同样被要求用在女士的美化上。然而，人们并不期待她们积极地从事文学工作，即使她是一个诗人，那么要求她们做的也只是某种强烈感情的外

在流露，而不是那种写在小说或日记中的私密话语。这些女士们不考虑国家和社会上的大事；她们所发挥的作用也只是对杰出男性施以影响，以及对男性们的冲动和人性加以节制。

The highest praise which could then be given to the great Italian women was that they had the mind and the courage of men. We have only to observe the thoroughly manly bearing of most of the women in the heroic poems, especially those of Boiardo and Ariosto, to convince ourselves that we have before us the ideal of the time. The title *virago,* which is an equivocal compliment in the present day, then implied nothing but praise. It was borne in all its glory by Caterina Sforza, wife and afterwards widow of Girolamo Riario, whose hereditary possession, Forli, she gallantly defended first against his murderers, and then against Cesare Borgia. Though finally vanquished, she retained the admiration of her countrymen and the title *prima donna d'Italia.* This heroic vein can be detected in many of the women of the Renaissance, though none found the same opportunity of showing their heroism to the world. In Isabella Gonzaga this type is clearly recognizable.

在当时，能够给予意大利伟大妇女的最高赞美是她们具有男士们的思想和勇气。我们只需看一下英雄诗歌，尤其是博亚尔多和阿里奥斯托的英雄诗歌，就可以从中了解到大多数妇女十足的男子气概，然后就会相信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典范和理想状态。现在“有男子气概的女子”这种说法既有褒义又有贬义，语义双关，但是在那个时代，只含有赞美的意思。吉罗拉莫·里亚里奥的妻子卡泰丽娜·斯福尔扎被这一荣誉称号的所有光环笼罩着，后来她又成了一个寡妇，首先她在杀害吉罗拉莫·里亚里奥的真凶面前，然后又在切萨雷·波吉亚面前勇敢地捍卫了她丈夫的世袭领地——意大利的弗利。最后虽然是失败了，但是她却赢得了自己同胞的钦佩和“意大利第一妇

女”的荣誉称号。我们能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众多妇女身上找到这种英雄气概，尽管没有同样的机会可以把她们的这种英雄事迹公之于世。在伊莎贝拉·贡扎加身上，这种英雄气概清晰可辨。

Women of this stamp could listen to novels like those of Bandello, without social intercourse suffering from it. The ruling genius of society was not, as now, womanhood, or the respect for certain presuppositions, mysteries and susceptibilities, but the consciousness of energy, of beauty, and of a social state full of danger and opportunity. And for this reason we find, side by side with the most measured and polished social forms, something our age would call immodesty, forgetting that by which it was corrected and counterbalanced—the powerful characters of the women who were exposed to it.

这一类型的妇女大可倾听像班戴洛所写的那种小说，并且对她们的社交没有丝毫的害处。当时社交的主要风气不是像现在这样，女人气十足，或者是尊重某些假设、难以理解的事物或者脆弱的感情，当时的社交风气就是对于精力、美丽，以及充满危险和机遇的社会情形的一种认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发现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的猥琐事情也夹杂在最标准、最高雅的社交形式里面，忘记了那些容易遭受猥亵和侮辱的妇女们的坚强个性会使这种猥亵行为受到谴责和制止。

That in all the dialogues and treatises together we can find no absolute evidence on these points is only natural, however freely the nature of love and the position and capacities of women were discussed.

所以，在一切对话和著作中，我们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确凿证据，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虽然这些对话和著作都曾经直言不讳地对恋爱的性质、妇女的地位和能力进行过讨论。

What seems to have been wanting in this society were the young girls, who, even when not brought up in the monasteries, were still carefully kept away from it. It is not easy to say whether their absence was the cause of the greater freedom of conversation, or whether they were removed on account of it.

在这种社交中，似乎年轻的姑娘们一直都未曾谋面，即使她们不是在修道院里长大的姑娘，似乎也是很谨慎地与这种社交与世隔绝。很难说，究竟是因为她们不在场才使得这种场合的谈话非常随便呢，还是因为这种场合的谈话太随便才使得她们不敢靠近这种场合呢。

Even the intercourse with courtesans seems to have assumed a more elevated character, reminding us of the position of the hetaerae in classical Athens. The famous Roman courtesan Imperia was a woman of intelligence and culture, had learned from a certain Domenico Campana the art of making sonnets, and was not without musical accomplishments. The beautiful Isabella de Luna, of Spanish extraction, who was reckoned amusing company, seems to have been an odd compound of a kind heart with a shockingly foul tongue, which latter sometimes brought her into trouble. At Milan, Bandello knew the majestic Caterina di San Celso, who played and sang and recited superbly. It is clear from all we read on the subject that the distinguished people who visited these women, and from time to time lived with them, demanded from them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intelligence and instruction, and that the famous

courtesans were treated with no slight respect and consideration. Even when relations with them were broken off, their good opinion was still desired, which shows that departed passion had left permanent traces behind. But on the whole this intellectual intercourse is not worth mentioning by the side of that sanctioned by the recognized forms of social life, and the traces which it has left in poetry and literature are for the most part of a scandalous nature. We may well be astonished that among the 6,800 persons of this class who were to be found in Rome in 1490—that is,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syphilis—scarcely a single woman seems to have been remarkable for any higher gifts. Those whom we have mentioned all belong to the period which immediately followed. The mode of life, the morals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public women, who with all their sensuality and greed were not always incapable of deeper passions, as well as the hypocrisy and devilish malice shown by some in their later years, are best set forth by Giraldi, in the novels which form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Hecatommithi.* Pietro Aretino, in his *Ragionamenti,* gives us rather a picture of his own depraved character than of this unhappy class of women as they really were.

即便是和妓女们交往，我们也会采取一种较为高雅的姿态，这不禁使我想到了古雅典的妓女们的地位。罗马名妓因佩里亚是一个极其富有智慧和才华的女人，她曾经师从多米尼克·坎帕纳学习如何创作十四行诗，还通晓音乐知识，具有创作乐曲的才能。美人伊莎贝拉·露娜出生在西班牙，人缘很好，深受身边朋友的爱戴和喜欢，她似乎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混合体，有着一副菩萨心肠但却有一个非常邪恶的舌头，也就是所谓的刀子嘴豆腐心，邪恶的舌头有时会使她惹祸上身。在米兰，班戴洛认识一个名叫卡泰丽娜·第·圣切尔索的姑娘，她端庄大气、雍容不俗，她擅长演奏乐器、唱歌以及吟诵诗文。从我们所读过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记载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那些拜访

这些妇女的且有时和她们同居一室的那些杰出人物要求她们具有一定程度的才华和教养，而对于那些有名的妓女们，人们也不会有所怠慢和轻视。即使已经和她们断绝关系，已没有任何瓜葛，他们还总是希望能够获得她们的好感，这也充分表明了已逝的温情留下了永久不可磨灭的痕迹。但是，总的来说，这种文字之交与那种人们所公认的社交生活形式相比而言，是不值得一提的，而这种文字之交在诗歌和文学上所留下的痕迹大部分也都是丑陋的、可耻的。令我们十分惊讶的是，在1490年——即梅毒出现以前——在罗马所看到的6,800个这类人中，几乎没有一个妓女是因自身较高的才艺天赋而出名的。上面所提及的这些女人，全部都是1490年之后不久的那个时代的人。吉拉尔第在构成他《故事百篇》这本书序言的几则故事中很好地阐述了妓女的生活方式、道德及哲学，她们中的一些人在晚年时表现出了虚伪的行为和邪恶的怨艾，她们虽然过着淫荡的生活并且也有贪婪之心，但是也不乏比较深厚的情感。彼得罗·阿雷蒂诺在他的《论述》这本著作里描绘出来的情景，与其说是这帮不幸女人的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是他自己堕落的人格的真实缩影。

The mistresses of the princes, as has already been pointed out, were sung by poets and painted by artists, and thus have become personally familiar to their contemporaries and to posterity. We hardly know more than the name of Alice Perries; and of Clara Dettin, the mistress of Frederick the Victorious, and of Agnes Sorel, we have only a half-legendary story. With the monarchs of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Francis I and Henry II—the case is different.

如前文所述，君主们所保养的情人，是经常被诗人们所吟诵、被艺术家们所描绘的，因此她们被她们那个时代的人们以及被后人所熟知。我们仅仅知晓阿丽斯·帕雷尔斯，以及胜利者腓特烈的情妇克拉拉·德亭这两个妓女的名字，而对于阿尼丝·索雷尔，我们只知道一个不完整的传说故事。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们——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

世——他们二人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Domestic Life

家庭生活

After treating of the intercourse of society, let us glance for a moment at the domestic life of this period. We are commonly disposed to look on the family life of the Italians at this time as hopelessly ruined by the national immorality, and this side of the question will be more fully discussed in the sequel. For the moment we must content ourselves with pointing out that conjugal infidelity has by no means so disastrous an influence on family life in Italy as in the North, so long at least as certain limits are not overstepped.

在阐述了社交生活以后，我们现在可以对这一时期的家庭生活了解一二。我们往往会认为这一时期的意大利人的家庭生活遭受了堕落的民族道德的破坏，这种破坏是无法弥补的；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后文做更为充分的讨论。现在我们暂且只能阐述，夫妻彼此对婚姻的不忠给家庭生活所带来的影响绝不是灾难性的，在意大利这种情况并不像在北方那样严重，至少只要某种界限还没有逾过。

The domestic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was a product of popular morals, or if we prefer to put it otherwise, a result of the inborn tendencies of national life, modified by the varied circumstances which affected them. Chivalry at the time of its splendor left domestic economy untouched. The knight wandered from court to court, and from one battlefield to another. His homage was given systematically to some other woman than his own wife, and things

went how they might at home in the castle. The spirit of the Renaissance first brought order into domestic life, treating it as a work of deliberate contrivance. Intelligent economical views and a rational style of domestic architecture served to promote this end. But the chief cause of the change was the thoughtful study of all questions relating to social intercourse, to education, to domestic service and organization.

中世纪的家庭生活是一种民众道德的产物，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是一种民众生活因受到各类不同环境的影响而有所变化的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骑士制度在它最为显赫的时代没有影响到家庭生活。骑士从一个宫廷闲荡到另外一个宫廷，从一个战场游荡到另外一个战场。他向除自己妻子之外的某一个女人有条不紊地传达自己的敬意，至于在自己的城堡中，家中的一切事情都听之任之，任其自由发展。文艺复兴的精神首次把这种秩序带到了家里，把它看作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而精心设计的作品，充满智慧的勤俭节约的观点，以及设计合理的家庭建筑的风格促进了这一目的的达成。但是引起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对一切有关于社交、教育、家庭事务和家庭组成的问题的细心研究。

The most precious document on this subject is the treatise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home by Agnolo Pandolfini (actually written by L. B. Alberti, in 1472).He represents a father speaking to his grown-up sons, and initiating them into his method of administration. We are introduced into a large and wealthy household, which, if governed with moderation and reasonable economy, promises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A considerable landed estate, whose produce furnishes the table of the house and serves as the basis of the family fortune, is combined with some industrial pursuit, such as the weaving of wool

or silk. The dwelling is solid and the food good. All that has to do with the plan and arrangement of the house is great, durable and costly, but the daily life within it is as simple as possible. All other expenses, from the largest in which the family honor is at stake, down to the pocket-money of the younger sons, stand to one another in a rational, not a conventional relation. Nothing is considered of so much importance as education, which the head of the house gives not only to the children, but to the whole household. He first develops his wife from a shy girl, brought up in careful seclusion, to the true woman of the house, capable of commanding and guiding the servants. The sons are brought up without any undue severity, carefully watched and counselled, and controlled 'rather by authority than by force'. And finally the servants are chosen and treated on such principles that they gladly and faithfully hold by the family.

关于这一问题的最为宝贵的证明材料就是阿尼奥洛·潘多尔菲尼缩写的那部关于家庭管理的著作，其实这本著作是由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于1472年所写。他扮成一个父亲向自己成年的儿子们讲话，把自己管理家庭的方法教授给他们。我们出生在一个庞大而富裕的家庭里面，如果这个家庭的主人持家有度、方法得当的话，那么是有希望给后代带来幸福和繁荣的。他们有庞大的地产，不仅是家庭财产的基础，而且其产出的产品足以供全家食用，还有一些像纺织羊毛或丝绸之类的工业。住所是坚固的，食物是有营养的。房子的设计和布置都是壮观的、经久耐用的，以及价格不菲的，但是房子里的日常生活却是尽可能地简单。其他一切开销，无论是关系到这个家族荣誉的最大开支，还是孩子们的零花钱，都有一个合理的且不符传统习惯的理由。教育被人们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家长不仅要对孩子而且还要对家庭其他所有成员进行教育。他首先要使他的妻子从一个长于深闺、大门不出的腼腆、娇羞的少女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家庭主妇，具有命令和领导婢奴、仆人的能力。对自己的儿子们并没有过分、严厉的教

育，只是小心翼翼地监督和教诲他们，用权威而不是武力和压制来管教他们。最后，筛选和对待仆人的原则就是：要让他们开心地、忠诚地乐于被管家来管制。

One feature of this book must be referred to, which is by no means peculiar to it, but which it treats with special warmth—the love of the educated Italian for country life. In northern countries the nobles lived in the country in their castles, and the monks of the higher orders in their well-guarded monasteries, while the wealthiest burghers dwelt from one year's end to another in the cities. But in Italy, so far as the neighborhood of certain towns at all events was concerned, the security of life and property was so great, and the passion for a country residence was so strong, that men were willing to risk a loss in time of war. Thus arose the villa, the country-house of the well-to-do citizen. This precious inheritance of the old Roman world was thus revived, as soon as the wealth and culture of the people were sufficiently advanced.

在这里必须要提到的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特点绝不是这本书所特有的，但是这本书却以特别的热情对它进行了阐述，那就是——有教养的意大利人对乡间生活的热爱。在北方国家，贵族们居住在自己的乡村城堡里，具有更高级别的僧侣们居住在他们把守森严的修道院里，而最富有的市民则长年累月地居住在城市里。然而，在意大利，就某些城镇的郊区而言，那里的生命和财产都是很安全的，人们对于乡村的生活是如此喜欢，以至于他们在战争时期甘愿冒险也要到乡村去。因此，随之就兴起了乡间别墅，富裕市民就住在这里。只要人类的物质和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古罗马社会的这种宝贵遗产就会因此得以复苏。

Pandolfini (Alberti) finds at his villa a peace and happiness for an account of which the reader must hear him speak himself. The economical side of the matter is that one and the same property must, if possible, contain everything—corn, wine, oil, pasture-land and woods—and that in such cases the property was paid for well, since nothing needed then to be got from the market. But the higher enjoyment derived from the villa is shown by some words of the introduction:

潘多尔菲尼（阿尔伯蒂）在他的乡间别墅里找到了一种安宁和幸福，为了证实这一情况的真实性，读者一定要听一听他自己的说法。这个问题比较经济的一个方面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同一块房产上必须包括一切产品——谷物、葡萄酒、石油、牧场及树林，如果真有这样的房产的话，那么人们很乐意出高价来购买，因为以后就可以不用再从市场上购买什么东西了。下面的话真实地体现出了别墅给人们带来的更高层次的幸福感受：

> Round about Florence lie many villas in a transparent atmosphere, amid cheerful scenery, and with a splendid view; there is little fog, and no injurious winds; all is good, and the water pure and healthy. Of the numerous buildings many are like palaces, many like castles costly and beautiful to behold.

> 在佛罗伦萨的周边地区，空气非常清澈，在这样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里，视野开阔，别墅林立；这里很少有雾，也没有狂风暴雨；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湖水清澈见底，益于身心健康。在众多林林总总

的建筑群中，有很多像宫殿，也有很多像城堡，看起来不仅漂亮而且豪华。

He is speaking of those unrivaled villas, of which the greater number were sacrificed, though vainly, by the Florentines themselves in the defence of their city in the year 1529.

他这是在谈论那些上好的别墅，这些别墅大多数都于1529年在佛罗伦萨人保卫自己城市的战争中，被他们自己白白地破坏掉了。

In these villas, as in those on the Brenta, on the Lombard hills, at Posillipo and on the Vomero, social life assumed a freer and more rural character than in the palaces within the city. We meet with charming descriptions of the intercourse of the guests, the hunting-parties, and all the open-air pursuits and amusements. But the noblest achievements of poetry and thought are sometimes also dated from these scenes of rural peace.

住在这样的别墅里，就如同是居住在布伦塔河岸边、伦巴第山上、波西利波以及沃米洛山上的别墅里一样。比起城市中宫廷里的社交生活，这里的社交生活更为自由自在、更具有乡村气息。我们看到一些关于客人来往、外出打猎，以及所有一切户外活动与文娱活动的引人入胜的描写。最杰出的诗歌创作和最崇高的思想有时也常常被认为是取材于宁静的乡村美景。

Festivals

节日

It is by no arbitrary choice that in discussing the social life of this period we are led to treat of the processions and shows which formed part of the popular festivals. The artistic power of which the Italians of the Renaissance gave proof on such occasions was attained only by means of that free intercourse of all classes which formed the basis of Italian society. In northern Europe the monasteries, the courts and the burghers had their special feasts and shows as in Italy; but in the one case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these displays differed according to the class which took part in them, in the other an art and culture common to the whole nation stamped them with both a higher and a more popular character. The decorative architecture, which served to aid in these festivals, deserves a chapter to itself in the history of art, although our imagination can only form a picture of it from the descriptions which have been left to us. We are here more especially concerned with the festival as a higher phase in the life of the people, in which its religious, moral and poetical ideas took visible shape. The Italian festivals in their best form mark the point of transition from real life into the world of art.

在讨论这一时期的社交生活时，我们转而开始研究那些构成民间节日庆典的演出队伍和演出节目，对这些东西进行研究不是由我们自己任意决定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在这种节日庆典演出场合所展现出来的文艺才华和能力，也只有通过所有阶级之间的自由形式的交往才能够达到，这些自由交往是构成意大利社会的主要成分。北欧的修道院、宫廷和市民与意大利的是一样的，也有自己特殊的节日庆典和演出。但是，一方面，根据参加演出的阶级的不同，演出的形式和内容也随之不同，另一方面，全民共有的艺术和文化使这些演出具有一种更高级别、更受欢迎的特性。为这些节日庆典服务的装饰艺

术本身就值得我们在艺术史中专门设置一个章节来对其进行论述，尽管我们能想象到的东西只能从它遗留给我们的描述中构成一幅有关它的完整画面。在这里，我们尤其要着重谈论的是意大利人们生活中层次比较高的节日庆典，这种节日庆典的宗教的、道德的，以及诗意的理想都以一种具体可见的形式呈现出来。在意大利的节日庆典中，其最佳形式标志着从现实生活向艺术世界过渡的转折点。

The two chief forms of festal display were originally here, as elsewhere in the West, the mystery, or the dramatization of sacred history and legend, and the procession, the motive and character of which was also purely ecclesiastical.

最初，这里的节日演出的两种主要形式和西方其他地方的主要演出形式都是一样的，一个是奇迹剧，或者说是宗教历史和传说的戏剧化；另一个是宗教游行，其动机和性质也是纯宗教的。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mysteries in Italy were from the first more frequent and splendid than elsewhere, and were most favorably affected by the progress of poetry and of the other arts. In the course of time not only did the farce and the secular drama branch off from the mystery, as in other countries of Europe, but the pantomime also, with its accompaniments of singing and dancing, the effect of which depended on the richness and beauty of the spectacle.

从一开始，意大利奇迹剧的表演就比其他地方的奇迹剧的表演更频繁、更壮观，而且受到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巨大影响。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不仅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从奇迹剧里分化出了滑稽剧

和普通戏剧，而且还分化出了哑剧，这种剧目不仅要有歌舞伴奏，而且还要依赖富丽堂皇的壮观场面来产生不一样的戏剧效果。

The procession, in the broad, level and well-paved streets of the Italian cities, was soon developed into the *trionfo,* or train of masked figures on foot and in chariots, the ecclesiastical character of which gradually gave way to the secular. The processions at the carnival and at the feast of Corpus Christi were alike in the pomp and brilliancy with which they were conducted, and set the pattern afterwards followed by the royal or princely progresses. Other nations were willing to spend vast sums of money on these shows, but in Italy alone do we find an artistic method of treatment which arranged the processions as a harmonious and significative whole.

在意大利宽阔、平坦、整齐划一的城市道路上举行的游行活动，不久之后就逐渐发展成了“凯旋式的游行”，或者成队的戴面具的人们步行或者乘车进行游行，宗教游行的宗教性质逐渐被世俗性所替代。狂欢节和基督圣体节的游行也拥有同样壮观、宏大的场面。它们给以后皇室和君主的巡游做出了榜样，供他们模仿。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如果他们也遇到此类的机会，他们也会不惜花费重金来举行节日演出，但是意大利人把这种游行队伍排列成了一个和谐且富有意义的整体，我们也只有在意大利才能看到这种极具艺术性的处理办法。

What is left of these festivals is but a poor remnant of what once existed. Both religious and secular displays of this kind have abandoned the dramatic element—the costumes—partly from dread of ridicule, and partly because the cultivated classes, who formerly gave their whole energies to these things, have for several reasons lost their interest in them. Even at the carnival, the great procession

of masks is out of fashion. What still remains, such as the costumes adopted in imitation of certain religious confraternities, or even the brilliant festival of Santa Rosalia at Palermo, shows clearly how far the higher culture of the country has withdrawn from such interests.

这些节日所遗留下来的只不过是那些曾经存在的东西所剩下的可怜的残余。这类宗教表演和世俗表演都抛弃了戏剧性成分——戏服，一方面是因为怕遭到讥笑，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些以前把自己全部精力都放在这种事情上的受教育阶级的人们现在出于种种原因对这些事情没有了兴趣。甚至是在狂欢节上，这种壮观的化装游行也已经过时。目前依然尚存的，比如像为模仿某些宗教组织而采用的戏服，或者甚至是像巴勒莫那样辉煌、壮观的圣罗萨利亚节，它们都清晰地表明了在这个国家，高层次的人们是如何渐渐地远离这一类的演出的。

The festivals did not reach their full development till after the decisive victory of the modern spirit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unless perhaps Florence was here, as in other things, in advance of the rest of Italy. In Florence, the several quarters of the city were, in early times, organized with a view to such exhibitions, which demanded no small expenditure of artistic effort. Of this kind w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hell, with a scaffold and boats in the Arno, on 1 May 1304, when the Ponte alla Carraia broke down under the weight of the spectators. That at a later time Florentines used to travel through Italy as directors of festivals *(festaiuoli)* shows that the art was early perfected at home.

直到15世纪，现代精神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节日庆典的演出才得以全面、充分地发展，或许唯独只有佛罗伦萨，因为也像其他事

情上一样，在这件事情上，佛罗伦萨也先于意大利其余各地而率先发展起来。在早些时候，为进行这种演出，佛罗伦萨的各市区曾经都自发地组织在一起；这需要人们在艺术方面付出极大的努力。1304年5月1日人们在戏台上和阿尔诺河的船上所进行的关于地狱的表演就属于这一类表演，就在这一天，加拉亚桥被观众踩塌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佛罗伦萨人常常作为节日庆典的指挥者游览整个意大利地区，这也说明在佛罗伦萨这种艺术很早就已经达到了完美的程度。

In setting forth the chief points of superiority in the Italian festivals over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the first that we shall have to remark is the developed sense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n other words, the capacity to invent a given mask, and to act the part with dramatic propriety. Painters and sculptors not merely did their part towards the decoration of the place where the festival was held, but helped in getting up the characters themselves, and prescribed the dress, the paints and the other ornaments to be used. The second fact to be pointed out is the universal familiarity of the people with the poetical basis of the show. The mysteries, indeed, were equally well understood all over Europe, since the biblical story and the legends of the saints were the common property of Christendom; but in all other respects the advantage was on the side of Italy. For the recitations, whether of religious or secular heroes, she possessed a lyrical poetry so rich and harmonious that none could resist its charm. The majority, too, of the spectators—at least in the cities—understood the meaning of mythological figures, and could guess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at the allegorical and historical, which were drawn from sources familiar to the mass of Italians.

意大利的节日庆典优于其他国的节日庆典，在阐述这一主要要点之前，首先，我们应该提到的是具有个性特征的发展意识，换句话说

就是能够发明一个根据个人特点而定制的面具，并且能够利用戏剧技巧而进行表演。画家和雕刻家们不仅从事节日庆典会场的装饰工作，而且还协助扮演剧中的角色、给演员设计服装、准备化妆品以及所需的其他饰品。其次，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人们普遍都比较熟悉演出节目所依据的剧本。确实，整个欧洲的人们对于奇迹都非常熟悉，因为圣经和圣徒传说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的共同财产；但是在其他各个方面，意大利有绝对的优势。不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的诗歌朗诵，还是世俗英雄的诗歌朗诵，都拥有丰富、和谐的抒情诗篇，人们都为它的魅力而深深着迷。至少是在大城市里，大多数观众都知晓神话人物所蕴含的意义，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难猜出那些取材于意大利人民所熟知的寓言故事中的人物和历史人物。

This point needs to be more fully discussed. The Middle Ages were essentially the ages of allegory.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treated their categories as independent beings, and poetry and art had but little to add, in order to give them personality. Here all the countries of the West were on the same level. Their world of ideas was rich enough in types and figures, but when these were put into concrete shape, the costume and attributes were likely to be unintelligible and unsuited to the popular taste. This, even in Italy, was often the case, and not only so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of the Renaissance, but down to a still later time. To produce the confusion, it was enough if a predicate of the allegorical figures was wrongly translated by an attribute. Even Dante is not wholly free from such errors, and, indeed, he prides himself on the obscurity of his allegories in general. Petrarch, in his *Trionfi,* attempts to give clear, if short, descriptions of at all events the figures of Love, of Chastity, of Death and of Fame. Others again load their allegories with inappropriate attributes. In the *Satires* of Vinciguerra, for example, Envy is depicted with rough, iron teeth; Gluttony as biting its own lips, and with a shock of tangled hair, the latter probably to

show its indifference to all that is not meat and drink. We cannot here discuss the bad influence of these misunderstandings on the plastic arts. They, like poetry, might think themselves fortunate if allegory could be expressed by a mythological figure—by a figure which antiquity saved from absurdity—if Mars might stand for war, and Diana for the love of the chase.

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详细地、全面地进行讨论。中世纪基本上是一个充满寓言故事的世纪。神学和哲学把各自的范畴看作是独立存在的；为了使它们独具个性，诗歌和艺术对它们添加的艺术性和诗性也不是很多。在这里，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处于同一水平上。他们对于类型和人物的世界观，都极其丰富，但是当这些观念以具体的形态呈现出来的时候，它们的戏服和属性特征很有可能是众人所难以理解的，也可能难以符合他们普遍的审美标准。即使是在意大利，这也是时常会有的情形，并且不仅仅是在文艺复兴发生的整个时期，而且一直到文艺复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这样的情形。如果用一种错误的属性特征来表演某一个寓言人物的话，那么势必会引起一片混乱。甚至是但丁也未能完全自由地摆脱这种错误，并且他一般确实会以自己讽喻的隐晦性而感到自豪。彼特拉克在他的《凯旋》三部曲中，不管怎样都试图对代表爱情、贞洁、死亡和名誉的人物进行简洁明了的描述。同样，其他一些人也在他们的寓言里运用了一些不相称的表征。比如，在芬奇奎拉夫人的讽刺诗里，“嫉妒”被刻画成铁齿、粗野的形象；“暴食”被描绘成咬着自己的嘴唇，一副披头散发的震惊的神情，后者或许是在表明除了对酒肉感兴趣之外，对其他一切东西都没有兴趣。在这里，我们不能讨论这些错误观念给立体造型艺术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这个比喻能用一个神话中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古文化已经使人们认为这不再是一个可笑的形象了，如果玛尔斯战神能够代表战争，狄安娜狩猎女神能够代表人们对狩猎的爱好的话，那么立体造型艺术会像诗歌一样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Nevertheless art and poetry had better allegories than these to offer, and we may assume with regard to such figures of this kind as appeared in the Italian festivals, that the public required them to be clearly and vividly characteristic, since its previous training had fitted it to be a competent critic. Elsewhere, particularly at the Burgundian court, the most inexpressive figures, and even mere symbols, were allowed to pass, since to understand, or to seem to understand them, was a part of aristocratic breeding.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amous 'Oath of the Pheasant' in the year 1454, the beautiful young horsewoman, who appears as 'Queen of Pleasure', is the only pleasing allegory. The huge dishes, with automatic or even living figures within them, are either mere curiosities or are intended to convey some clumsy moral lesson. A naked female statue guarding a live lion was supposed to represent Constantinople and its future saviour, the Duke of Burgundy. The rest,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pantomime—*Jason in Colchis* —seems either too recondite to be understood or to have no sense at all. Olivier himself, to whom we ow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cene, appeared costumed as 'The Church', in a tower on the back of an elephant, and sang a long elegy on the victory of the unbelievers.

然而，尽管如此，艺术和诗歌还是能够提供出比这更好的比喻，并且对于这些形象，我们可以假设，公众要求那些出现在意大利节日庆典上的形象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特征，因为之前所受的教育促使他们适合做一个合格的批评者。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勃艮第的宫廷中，最缺乏表情的形象，甚至仅仅是一个象征标志，也会允许它通过，因为理解这些形象和标志就好像是理解这些贵族教育的一部分。在1454年，在著名的《雉鸡的誓言》演出的时候，以“快乐女王”的姿态而出现的年轻漂亮的女骑士是唯一一个令人感到愉悦的托寓。装有自动机械，甚至活生生的人物的巨大的盘子，要么是一种挑起人们好奇之心的壮举，要么是旨在给人们传达某种不得当的道德教训。一个

赤身裸体的女人塑像守护着一只活狮被人们认为是代表君士坦丁堡和它的未来的救世主，勃艮第公爵。除了哑剧《杰森在科尔奇斯》之外，其他的不是深奥难懂，就是毫无意义可言。奥利维尔本人曾经描写过这样的场面，他被打扮成“教会”，出现在由一头大象驮着的塔里面，哼唱着一首歌颂异教徒胜利的长长的挽歌。

But although the allegorical element in the poetry, the art and the festivals of Italy is superior both in good taste and in unity of conception to what we find in other countries, yet it is not in these qualities that it is most characteristic and unique. The decisive point of superiority lay rather in the fact that, besides the personifications of abstract qualities, histor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m were introduced in great number—that both poetry and plastic art were accustomed to represent famous men and women. The *Divine Comedy,* the *Trionfi* of Petrarch, the *Amorosa visione* of Boccaccio—all of them works constructed on this principle—and the great diffusion of culture which took pla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tiquity, had made the nation familiar with this historical element. These figures now appeared at festivals, either individualized, as definite masks, or in groups, as characteristic attendants on some leading allegorical figure. The art of grouping and composition was thus learnt in Italy at a time when the most splendid exhibitions in other countries were made up of unintelligible symbolism or unmeaning puerilities.

但是，虽然我们在意大利的诗歌、艺术和节日庆典里所看到的寓言成分在品味高雅和概念统一方面都优于我们在其他国家所看到的，然而它最具特色、最独一无二的特点其实并不是在这些方面。不如说它优越性的决胜点是存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除了采用具有抽象性质的拟人手法之外，还运用了大量的历史代表人物来展现这些性质——

不仅是诗歌还有造型艺术都习惯于展现有名气的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凯旋》，以及薄伽丘的《爱的理想》，这些作品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创作而成的，并且在古代文化的影响之下而出现的文化广泛传播的现象，促使这个民族熟悉了这种历史元素。现在这些人物形象出现在节日庆典之中，要么作为一定的假面人而被个性化了，要么就是作为某个主要的寓言形象的随从，成群地出现。当其他国家最为辉煌、壮观的表演是由莫名其妙的象征符号或毫无意义的幼稚的言行组成时，意大利就已经这样学会了艺术分类和艺术创作。

Let us begin with that kind of festival which is perhaps the oldest of all—the mysteries. They resembled in their main features those performed in the rest of Europe. In the public squares, in the churches and in the cloisters, extensive scaffolds were constructed, the upper storey of which served as a paradise to open and shut at will, and the ground-floor often as a hell, while between the two lay the stage properly so called, representing the scene of all the earthly events of the drama. In Italy, as elsewhere, the biblical or legendary play often began with an introductory dialogue between Apostles, Prophets, Sibyls, Virtues and Fathers of the Church, and sometimes ended with a dance. As a matter of course the half-comic *intermezzi* of secondary characters were not wanting in Italy, yet this feature was hardly so broadly marked as in northern countries. The artificial means by which figures were made to rise and float in the air—one of the chief delights of these representations—were probably much better understood in Italy than elsewhere; and at Florenc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 hitches in these performances were a stock subject of ridicule. Soon after Brunellesco invented for the Feast of the Annunciation in the Piazza San Felice a marvelous apparatus consisting of a heavenly globe surrounded by two circles of angels, out of which Gabriel flew

down in a machine shaped like an almond. Cecca, too, devised the mechanism for such displays. The spiritual corporations or the quarters of the city which undertook the charge and in part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plays spared, at all events in the larger towns, no trouble and expense to render them as perfect and artistic as possible. The same was no doubt the case at the great court festivals, when mysteries were acted as well as pantomimes and secular dramas. The court of Pietro Riario and that of Ferrara were assuredly not wanting in all that human invention could produce. When we picture to ourselves the theatrical talent and the splendid costumes of the actors, the scenes constructed in the style of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period, and hung with garlands and tapestry, and in the background the noble buildings of an Italian piazza, or the slender columns of some great courtyard or cloister, the effect is one of great brilliance. But just as the secular drama suffered from this passion for display, so the higher po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ystery was arrested by the same cause. In the texts which are left we find for the most part the poorest dramatic groundwork, relieved now and then by a fine lyrical or rhetorical passage, but no trace of the grand symbolic enthusiasm which distinguishes the *autos sacramentales* of Calderon.

就让我们从那种或许是所有节日演出中最为古老的奇迹剧开始吧。它们的主要特点和欧洲其他地方的演出节目的特点是极为相似的。在公共广场上、在教堂里，以及在修道院里，都搭建起了大型戏台，上层作为天堂，可以随意地打开或关闭，最底层常常作为地狱，这来年高层之间就是所谓的舞台，代表着剧中所有世俗事件所发生的场所。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意大利，关于圣经故事或传说故事的表演通常都是以传道者、预言者、女巫，以及力天使与教父之间的对话作为开场白而开始的，有的时候是以一支舞蹈而结束演出。当然，由次要角色表演的半喜剧式的“幕间剧”在意大利也不是没有的，但是这

一特征并不像在北方那样广泛受到人们的关注。用人工辅助的方式使人物升起来并在空中悬浮、漂游——这是这些表演节目中最受人们喜爱的一项节目，或许在意大利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为人们所熟知；14世纪时，在佛罗伦萨，这些表演的中断成了人们的笑柄。不久，布鲁内莱斯科在圣佛利斯广场上为天使报喜节演出节目，发明了一套奇特的装置，包括一个由两圈天使围绕而成的天体，加百列天使从一个形状如扁桃仁的机械中飞下来。切卡也曾为这样的表演设计过机械装置，那些负责并参与这些戏剧表演的宗教团体或各市区，不管怎么样在较大的城市里，他们是不怕麻烦，也不怕花费资金来尽可能地使它们完美、富有意境。毫无疑问，当奇迹剧、哑剧以及世俗戏剧在盛大的宫廷节日中上演时，也是同样的情形。可以肯定地说，彼得罗·里亚里奥宫廷和费拉拉宫廷是不缺少那些人类所能创造出来的东西的。演员们的戏剧天赋和华丽的戏服、按照当时的建筑风格所设计出来的舞台场景、悬挂着的拉花和绣帏，当我们以意大利广场上的宏伟建筑或者某一个宽大庭院或修道院的细长走廊作为背景来描绘这样的场景时，所产生的效果是非常壮观的。但是，就像普通戏剧由于对布景的热衷而受到了损害一样，奇迹剧向更高层次的诗意的发展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了遏制。在流传下来的剧本当中，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结构拙劣的戏剧作品，一篇美丽的抒情诗或修辞优美的文章时不时地会让人感到轻松愉快，但是却找不到那种让卡尔德隆的《圣餐神秘剧》成为杰作而宏大的象征性热忱的痕迹。

In the smaller towns, where the scenic display was less, the effect of these spiritual plays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spectators may have been greater. We read that one of the great preachers of repentance, of whom more will be said later on, Roberto da Lecce, closed his Lenten sermons during the plague of 1448, at Perugia, with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sion. The piece followed the New Testament closely. The actors were few, but the whole people wept aloud. It is true that on such occasions emotional stimulants were resorted to which were borrowed from the crudest realism. We are

reminded of the pictures of Matteo da Siena, or of the groups of clay-figures by Guido Mazzoni, when we read that the actor who took the part of Christ appeared covered with weals and apparently sweating blood, and even bleeding from a wound in the side.

在比较小的城镇中，那里没有很多舞台戏剧演出，这些宗教剧给观众的性格所带来的影响或许是较多的。我们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记载，伟大的劝人忏悔的牧师罗伯特·达·莱切，我们在以后还要详细地对这个人进行论述，在1448年瘟疫流行期间，在佩鲁贾，以耶稣受难的表演来结束他的四旬斋布道。这个故事是严格按照新约圣经中所讲述的来进行表演的。剧里面没有几个演员，但是在场的所有观众都大声地哭了出来。当然，在这种场合，演出确实是采用了从最为粗暴的现实主义借来的感情刺激法。当我们看到那个扮演耶稣的演员满身鞭痕，血汗昭然，甚至还有血从肋旁的伤口处向外淌出时，这种场景使我们想起了锡耶纳的马泰奥的绘画或者是圭多·马佐尼用泥创作的群像的画面。

The special occasions on which these mysteries were performed, apart from the great festivals of the Church, princely weddings and the like, were of various kinds. When, for example, St Bernardino of Siena was canonized by the pope (1450), a sort of dramatic imitation of the ceremony took place *(rappresentazione),* probably on the great square of his native city, and for two days there was feasting with meat and drink for all comers. We are told that a learned monk celebrated his promotion to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theology by giving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legend about the patron saint of the city. Charles VIII had scarcely entered Italy before he was welcomed at Turin by the widowed Duchess Bianca of Savoy with a sort of half-religious pantomime, in which a pastoral scene first symbolized the Law of Nature, and then a

procession of patriarchs the Law of Grace. Afterwards followed the story of Lancelot of the Lake, and that 'of Athens'. And no sooner had the king reached Chieri than he was received with another pantomime, in which a woman in childbed was shown, surrounded by distinguished visitors.

除了教会的盛大节日庆典以及君主的婚礼等场合之外，演出这种奇迹剧的场合是各具特色的。比如，当锡耶纳的圣贝尔纳迪诺于1450年被教皇列为圣徒时，大概就在他出生地的城市广场上举行过模仿这一仪式的表演，并且为出席者宴席两天。我们还知道有一个学识渊博的僧侣，因为自己晋升到了神学博士学位，所以用本城的保护圣徒的轶事来庆祝自己的升迁。查理八世一进入意大利就立刻在都灵市受到了萨瓦的寡居公爵夫人比安卡的欢迎，当时是用一种半宗教性质的哑剧对他表示欢迎的，在这个哑剧里首先出现的是一个象征着自然法则的田园景色，然后出现的是圣祖的游行仪式，象征着恩典的法则。接下来是圆桌骑士兰斯洛特的故事和“雅典”故事。这位国王一到奇埃利就受到了另一个哑剧的演员们的欢迎，剧中表演的是一群贵客围绕着一个产妇分娩的场景。

If any church festival was held by universal consent to call for exceptional efforts, it was the feast of Corpus Christi, which in Spain gave rise to a special class of poetry. We possess a splendid descripti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that feast was celebrated at Viterbo by Pius II in 1462. The procession itself, which advanced from a vast and gorgeous tent in front of San Francesco along the main street to the cathedral, was the least part of the ceremony. The cardinals and wealthy prelates had divided the whole distance into parts, over which they severally presided, and which they decorated with curtains, tapestry and garlands. Each of them had also erected a stage of his own, on which, as the procession passed

by, short historical and allegorical scenes were represented. It is not clear from the account whether all the characters were living beings or some merely draped figures; the expense was certainly very great. There was a suffering Christ amid singing cherubs, the Last Supper with a figure of St Thomas Aquinas, the combat between the Archangel Michael and the devils, fountains of wine and orchestras of angels, the grave of Christ with all the scene of the Resurrection, and finally, on the square before the cathedral, the tomb of the Virgin. It opened after high mass and the benediction, and the Mother of God ascended singing to paradise, where she was crowned by her Son, and led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Eternal Father.

要说是否有哪个教会的节日是被大家所一致公认的，并且需要人们专门庆祝的，那么就是基督圣体节，它在西班牙兴起了一种特殊种类的诗歌。在1462年，庇护二世在维泰博庆祝了这个节日，我们看到了一段对这次庆祝的方式的杰出描述。游行队伍从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前面一个巨大、华丽的帐篷里出发，沿着通向大教堂的主干道前行，游行队伍本身就是这个仪式中最小的一部分。红衣主教和富有的高级教士把整个路程分成了许多段，他们各自主持一段，并且用帐篷、绣帏和拉花来装饰这些路段。他们各自搭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当游行队伍经过时，就会在舞台上表演简短的历史剧和讽喻剧。从记载中我们无法清楚地了解到是否剧中所有角色都是活生生的人或者仅仅是披着垂褶裙的人物形象，举办游行的开支一定是数目巨大的。在这里，有在唱歌的小天使中间受难的基督、最后的晚餐中的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形象、大天使米凯莱与魔鬼们的决斗、葡萄酒的喷泉、天使们所组成的乐团、有着一切复活场景的基督坟墓，而最后，在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出现了圣母玛利亚的坟墓。在大弥撒和圣体赐福之后，坟墓就打开了，上帝之母唱着歌向着天堂升去，在那里被她的儿子加冕并且被引荐到永恒天父的面前。

Among these representations in the public street, that given by theCardinal Vice-Chancellor Roderigo Borgia, afterwards Pope Alexander VI, was remarkable for its splendor and obscure symbolism. It offers an early instance of the fondness for salvos of artillery which w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house of Borgia.

那些由红衣主教的副大法官罗德里格·波吉亚，即后来成为教皇的亚历山大六世在公众街头所表演的节目都以其壮观的演技和晦涩的象征而引人注目。这种表演为喜欢礼炮齐鸣的波吉亚家族提供了早期的例证。

The account is briefer which Pius II gives us of the procession held the same year in Rome on the arrival of the skull of St Andrew from Greece. There, too, Roderigo Borgia distinguished himself by his magnificence; but this festival had a more secular character than the other, as, besides the customary choirs of angels, other masks were exhibited, as well as 'strong men', who seemed to have performed various feats of muscular prowess.

就在同一年，当圣安德鲁的颅骨从希腊运送到罗马时，举行过游行仪式，庇护二世对于这个仪式的记载是比较简单的。在那里，罗德里格·波吉亚也是以他的富丽堂皇而出名的；但是这个节日庆典比其他的节日庆典更具世俗性，因为除了一贯的天使歌唱队之外，还有其他戴着面具的表演，还有“大力士”的表演，他们似乎把各种各样的特技和武功都表演了一番。

Such representations as were wholly or chiefly secular in their character were arranged, especially at the more important princely

courts, mainly with a view to splendid and striking scenic effects. The subjects were mythological or allegorical, and the interpretation commonly lay on the surface. Extravagances, indeed, were not wanting—gigantic animals from which a crowd of masked figures suddenly emerged, as at Siena in the year 1465, when at a public reception a ballet of twelve persons came out of a golden wolf; living table ornaments, not always, however, showing the tasteless exaggeration of the Burgundian court—and the like. Most of them showed some artistic or poetical feeling. The mixture of pantomime and the drama at the court of Ferrara has been already referred to in the treating of poetry. The entertainments given in 1473 by the Cardinal Pietro Riario at Rome when Leonora of Aragon, the destined bride of Prince Hercules of Ferrara, was passing through the city were famous far beyond the limits of Italy. The plays acted were mysteries on some ecclesiastical subject; the pantomimes, on the contrary, were mythological. There were represented Orpheus with the beasts, Perseus and Andromeda, Ceres drawn by dragons, Bacchus and Ariadne by panthers, and finally the education of Achilles. Then followed a ballet of the famous lovers of ancient times, with a troop of nymphs, which was interrupted by an attack of predatory centaurs, who in their turn were vanquished and put to flight by Hercules. The fact, in itself a trifle, may be mentioned, 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taste of the time, that the human beings who at all festivals appeared as statues in niches or on pillars and triumphal arches, and then showed themselves to be alive by singing or speaking, wore their natural complexion and a natural costume, and thus the sense of incongruity was removed; while in the house of Riario there was exhibited a living child, gilt from head to foot, who showered water round him from a spring. [2_5]

像安排这种完全是或主要是世俗性质的演出，特别是安排在比较重要的君主宫廷中的演出，大体上都是为了产生辉煌壮观、扣人心弦的舞台效果。演出的主题都是神话的或者有寓意的，并且解说通常也是肤浅的。的确，放肆的夸张行为也是时常会有的——一个庞大动物的体内突然冒出一群戴面具的人，就像1465年在锡耶纳所发生的那样，在一个公众招待会上，就出现了由十二个人组成的舞蹈团从一只金色的狼体内窜出来的情形；虽然用大活人来装饰餐桌的现象并不常见，但是却展现了勃艮第宫廷让人丝毫没有兴趣的夸张行为——以及类似的行为。大多数的表演都表现出了某种艺术的、诗意的情感。在讨论诗歌时，我们不仅提到了费拉拉宫廷上的哑剧表演，而且也提到了费拉拉宫廷上的话剧表演。在1473年，当费拉拉的王子，赫拉克勒斯命中注定的新娘阿拉贡的利奥诺拉经过罗马时，红衣主教彼得罗·里亚里奥在罗马为其举行的娱乐活动，在意大利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是颇有名气的。戏剧节目是关于某种宗教主题的奇迹剧；而哑剧则恰恰相反，是以神话故事为主题。在哑剧里出现了和野兽在一起的奥尔菲斯、珀尔修斯和安德洛米达、驾着龙的谷类女神刻瑞斯、由黑豹拉车的酒神巴克斯和阿里阿德涅，以及最后阿基里斯受到教育的故事。接着上场的是古代有名的情人芭蕾舞，有一群仙女因为受到了半人半马的食肉怪物的攻击而被阻挡，这些怪物被赫拉克勒斯击败后落荒而逃。作为这一时代的审美的特点，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件本身并不重要的事实，所有出现在这些演出里的人们，扮成雕像坐在壁龛里或站在台柱和凯旋门上，然后都会通过唱歌或讲话的方式显示自己是个大活人，这些演员都呈现出自然的肤色，穿着随身的服装，因此也不会使人觉得不协调；然而，在里亚里奥家里还摆放着一个活生生的儿童，从头到脚都镀满了黄金，并且从一个喷泉里给自己的周围洒水。[3_23]

Brilliant pantomimes of the same kind were given at Bologna, at the marriage of Annibale Bentivoglio with Lucrezia of Este. Instead of the orchestra, choral songs were sung, while the fairest of Diana's nymphs flew over to the Juno Pronuba, and while Venus

walked with a lion—which in this case was a disguised man—among a troop of savages. The decorations were a faithful representation of a forest. At Venice, in 1491, the princesses of the house of Este were met and welcomed by the Bucentaur, and entertained by boat-races and a splendid pantomime, called *Meleager,* in the court of the ducal palace. At Milan Leonardo da Vinci directed the festivals of the duke and of some leading citizens. One of his machines, which must have rivaled that of Brunellesco, represented the heavenly bodies with all their movements on a colossal scale. Whenever a planet approached Isabella, the bride of the young duke, the divinity whose name it bore stepped forth from the globe, and sang some verses written by the court-poet Bellincioni (1489). At another festival (1493) the model of the equestrian statue of Francesco Sforza appeared with other objects under a triumphal arch on the square before the castle. We read in Vasari of the ingenious automata which Leonardo invented to welcome the French kings as masters of Milan. Even in the smaller cities great efforts were sometimes made on these occasions. When Duke Borso came in 1453 to Reggio, to receive the homage of the city, he was met at the gate by a great machine, on which St Prospero, the patron saint of the town, appeared to float, shaded by a baldachin held by angels, while below him was a revolving disk with eight singing cherubs, two of whom received from the saint the sceptre and keys of the city, which they then delivered to the duke, while saints and angels held forth in his praise. A chariot drawn by concealed horses now advanced, bearing an empty throne, behind which stood a figure of Justice attended by a genius. At the corners of the chariot sat four greyheaded lawgivers, encircled by angels with banners; by its side rode standard-bearers in complete armour. It need hardly be added that the goddess and the genius did not suffer the duke to pass by without an address. A second car, drawn by a unicorn, bore a Caritas with a burning

torch; between the two came the classical spectacle of a car in the form of a ship, moved by men concealed within it. The whole procession now advanced before the duke. In front of the church of San Pietro, a halt was again made. The saint, attended by two angels, descended in an aureole from the facade, placed a wreath of laurel on the head of the duke, and then floated back to his former position. The clergy provided another allegory of a purely religious kind. Idolatry and Faith stood on two lofty pillars, and after Faith, represented by a beautiful girl, had uttered her welcome, the other column fell to pieces with the lay figure upon it. Further on, Borso was met by Caesar with seven beautiful women, who were presented to him as the seven Virtues which he was exhorted to pursue. At last the cathedral was reached, but after the service the duke again took his seat on a lofty golden throne, and a second time received the homage of some of the masks already mentioned. To conclude all, three angels flew down from an adjacent building, and, amid songs of joy, delivered to him branches of palm, as symbols of peace.

同样杰出的哑剧也在博洛尼亚、在安尼巴莱·本蒂沃利奥和来自埃斯特家族的卢克雷齐娅的婚礼上表演过。当狄安娜的仙女中最为美丽的仙女飞向婚姻女神朱诺·普罗努巴时，当维纳斯女神与狮子在一群野人当中行走时——在这种情况，狮子是由人来假扮成的，这时没有演奏管弦音乐，而是由合唱团唱起了歌曲，舞台装饰效果是一个真实的森林布景。1491年，在威尼斯，在公爵的宫廷里的演出中，曾经有人用一艘牛头人身的礼船来接待埃斯特家族的公主们，并用赛船和名为“梅利埃格”的哑剧来款待他们，在米兰，列奥纳多·达·芬奇指导了公爵和某些重要市民的节日庆典的表演。他的其中一个机器，足以和布鲁内莱斯科的发明相媲美，这个机器大规模地代表了天体和这些天体的一切运转。每当有行星靠近那个年轻公爵的新娘伊莎贝拉时，那么给这个行星命名的天神就会天体中走出来，并吟诵由宫廷诗人柏林希

奥尼在1489年所写的一些诗文。在另外一次节日庆典中（1493年），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的骑马塑像模型和其他物品出现在了城堡前面的广场上的一个凯旋门下面。我们在瓦萨里的著作中可以读到列奥纳多发明了具有独创性的自动装置，来欢迎作为米兰的大师的法兰西王国的国王们。即使是在比较小的城市里，若遇到这样的场合，人们也会为此而付出巨大努力的。当博尔索公爵于1453年来到雷焦时，就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给他的敬意，他在城门那里就碰到了一个巨大的机器，这个城市的守护神圣普罗斯佩罗凌空出现在机器的上面，天使们手持织锦为他遮挡太阳，同时，在他的下面是一个旋转的圆盘，圆盘上有八个唱歌的小天使，其中两个小天使从圣徒手里接过这个城市的权杖和钥匙，然后又把它们递给公爵，这时圣徒和小天使们都为他致以赞美。一辆被隐蔽的马儿拉着的凯旋车赶上来，上面有一个空着的宝座，宝座后面站着一位由精灵守护着的正义女神形象。在凯旋车的四个角落上，坐着四位头发花白的制定法律者，一群手持旗帜的天使们围绕着他们；在礼车的旁边是穿着完整盔甲的全副武装的旗手。不用说，正义女神和精灵是不会毫无表示就让公爵顺利通过的。第二辆车是由独角兽拉着的，车上有一个“博爱之神”，手里举着一个燃烧的火炬；在这两辆车中间，是一辆壮观的古典船形车，它是由一群藏在车里面的人推动的。这时整个车队行走在公爵的前面。又一次在圣彼得大教堂前面停下来。两位天使守护着圣徒，从一个光轮的正面走出来，并且把一顶花冠戴在公爵的头上，然后又飘回到原来的位置。牧师们准备了另外一种纯宗教性质的讽喻表演。“偶像崇拜”和“信仰”站在两个不同的高耸的柱子上，在由一个漂亮的女孩扮演的“信仰”致完欢迎辞之后，另外一个柱子及其上面站着的偶像一起倒地，摔了个粉碎。再接下来，就是恺撒和他用来迎接博尔索公爵的七位美女，她们代表着七种美德被呈给博尔索公爵，并勉励他追求这七种美德。最后终于到达了大教堂，但是在举行完仪式之后，那位公爵又重新坐上了崇高的金碧辉煌的王座，并第二次接受某些已经提及的化装人物的致敬。在这一切结束时，有三个天使从旁边的建筑物上飞下来，在欢快的歌声中把象征和平的棕榈枝交给了他。

Let us now give a glance at those festivals the chief feature of which was the procession itself.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那些以游行本身作为主要特征的节日庆典。

There is no doubt that from an early period of the Middle Ages the religious processions gave rise to the use of masks. Little angels accompanied the sacrament or the sacred pictures and reliques on their way through the streets; or characters in the Passion—such as Christ with the Cross, the thieves and the soldiers, or the faithful women—were represented for public edification. But the great feasts of the Church were from an early time accompanied by a civic procession, and the *naivete* of the Middle Ages found nothing unfitting in the many secular elements which it contained. We may mention especially the naval car *(carrus navalis),* which had been inherited from pagan times, and which, as an instance already quoted shows, was admissible at festivals of very various kinds, and is associated withone of them in particular—the carnival. Such ships, decorated with all possible splendor, delighted the eyes of spectators long after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m was forgotten. When Isabella of England met her bridegroom, the Emperor Frederick II, at Cologne, she was met by a number of such chariots, drawn by invisible horses, and filled with a crowd of priests who welcomed her with music and singing.

毫无疑问，从中世纪的早期开始，宗教的游行仪式就兴起了对面具的使用。小天使们伴随着圣礼或圣像和圣物在大街上行进着；或者表演耶稣受难时的人物形象——像背负十字架的基督、强盗、士兵或信女——表演这些人物形象都是为了对市民进行教育。然而，很早以

前，教会的盛大节日庆典就开始伴随有市民的游行，但在中世纪纯真的表演中，里面包含着的许多世俗元素是看不出与其纯真的表演有什么不相称之处的。我们尤其要提及一下从异教徒时代流传下来的海军车，如前面所引述的那样，它在许多类的节日演出中都被使用过，尤其是和其中一个节日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那就是万圣节。这种船装饰得非常华丽，让观众觉得赏心悦目，但是它原本的意义早已被人们所忘记。当英格兰的伊莎贝拉在科隆与自己的新郎腓特烈二世会面时，迎接她的就是这种凯旋车，这种车是由隐藏着的马拉着的，上面坐着一群教士，教士们用音乐和歌声来迎接她。

But the religious processions were not only mingled with secular accessories of all kinds, but were often replaced by processions of clerical masks. Their origin is perhaps to be found in the parties of actors who wound their way through the streets of the city to the place where they were about to act the mystery; but it is possible that at an early period the clerical procession may have constituted itself as a distinct species. Dante describes the *trionfo* of Beatrice, with the twenty-four Elders of the Apocalypse, with the four mystical Beasts, with the three Christian and four Cardinal Virtues, and with St Luke, St Paul and other Apostles, in a way which almost forces us to conclude that such processions actually occurred before his time. We are chiefly led to this conclusion by the chariot in which Beatrice drives, and which in the miraculous forest of the vision would have been unnecessary or rather out of place. It is possible, on the other hand, that Dante looked on the chariot as a symbol of victory and triumph, and that his poem rather served to give rise to these processions, the form of which was borrowed from the triumph of the Roman emperors. However this may be, poetry and theology continued to make free use of the symbol. Savonarola in his *Triumph of the Cross* represents Christ on a chariot of victory, above his head the shining sphere of the

Trinity, in his left hand the Cross, in his right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below him the Virgin Mary; on both sides the Martyrs and Doctors of the Church with open books; behind him all the multitude of the saved; and in the distance the countless host of his enemies—emperors, princes, philosophers, heretics—all vanquished, their idols broken and their books burned. A great picture of Titian, which is known only as a woodcut, [2_6] has a good deal in common with this description. The ninth and tenth of Sabellico's thirteen elegies on the Mother of God contain a minute account of her triumph, richly adorned with allegories, and especially interesting from that matter-of-fact air which also characterizes the realistic painting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但是，宗教游行不仅和各类世俗的附带表演交织在一起，而且还常常被牧师们的化装游行所替代。他们或许起源于一群在前往自己演出场所的城市道路上绕道而行的派对演员；但是，很有可能是这种牧师的游行在早期就已经自成一格。但丁用启示录中的二十四位长者、用四个神秘的野兽、用基督教三德和四项基本美德、用圣路加、圣保罗以及其他的使徒来描述贝亚特里切的“凯旋游行”，这种描写手法使我们几乎不能不相信在他之前的那个时代的确举行过这样的游行。我们主要是从贝亚特里切所坐的凯旋车上得出的这样的结论；在那神奇的、梦境般的森林里，是不需要这种车子的，或者说是不相称的。另一方面，有可能是但丁把这种凯旋车看作胜利和凯旋的象征，并且不如说他的诗篇也促成了这些游行队伍的兴起，其形式是模仿罗马皇帝的凯旋。但是，尽管如此，诗歌和神学继续自由地采用这种象征。萨沃纳罗拉在他的《十字架的胜利》里描写到基督坐在一辆凯旋车里，头上戴着闪闪发光的三位一体球体，左手拿着十字架，右手拿着《旧约》和《新约》这两本书；他的下方是圣母玛利亚；两边是教会的殉道者和手持打开了的书本的圣师；他的身后是所有获救的民众；远处是无数个被征服了的敌人——皇帝、君主、哲学家，以及异教徒，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已经被击碎，他们的书籍也被焚烧。意大利画家提香

有一幅以木版画而著名的优秀图画， [3_24] 画中的内容和这一段描写有很多相似之处。萨贝利科有十三篇关于天主母的挽歌，其中第九篇和第十篇对于她的胜利做了详细描述，诗里面有很多讽喻内容，尤其使人感兴趣的是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是15世纪现实主义的绘画所具有的特征。

Nevertheless, the secular *trionfi* were far more frequent than the religious. They were modeled on the procession of the Roman Imperator, as it was known from the old reliefs and from the writings of ancient authors. The historical conceptions then prevalent in Italy, with which these shows were closely connected, have already been discussed.

但是，相比于宗教性质的“凯旋游行”，世俗性质的“凯旋游行”更普遍一些。他们模仿古罗马皇帝的游行，因为它从古老的浮雕作品和古代作家的作品中而得以著名。当时在意大利广为盛行的历史概念与这些演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历史概念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

We now and then read of the actual triumphal entrance of a victorious general, which was organized as far as possible on the ancient pattern, even against the will of the hero himself. Francesco Sforza had the courage (1450) to refuse the triumphal chariot which had been prepared for his return to Milan, on the ground that such things were monarchial superstitions. Alfonso the Great, on his entrance into Naples (1443), declined the wreath of laurel, which Napoleon did not disdain to wear at his coronation in Notre-Dame. For the rest, Alfonso's procession, which passed by a breach in the wall through the city to the cathedral, was a strange mixture of antique, allegorical and purely comic elements. The car, drawn by

four white horses, on which he sat enthroned, was lofty and covered with gilding; twenty patricians carried the poles of the canopy of cloth of gold which shaded his head. The part of the procession which the Florentines then present in Naples had undertaken was composed of elegant young cavaliers, skilfully brandishing their lances, of a chariot with the figure of Fortune, and of seven Virtues on horseback. The goddess hersel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exorable logic of allegory to which even the painters at that time conformed, wore hair only on the front part of her head, while the back part was bald, and the genius who sat on the lower steps of the car, and who symbolized the fugitive character of fortune, had his feet immersed in a basin of water. Then followed, equipped by the same Florentines, a troop of horsemen in the costumes of various nations, dressed as foreign princes and nobles, and then, crowned with laurel and standing above a revolving globe, a Julius Caesar, who explained to the king in Italian verse the meaning of the allegories, and then took his place in the procession. Sixty Florentines, all in purple and scarlet, closed this splendid display of what their home could achieve. Then a band of Catalans advanced on foot, with lay figures of horses fastened on to them before and behind, and, engaged in a mock combat with a body of Turks, as though in derision of the Florentine sentimentalism. Last of all came a gigantic tower, the door of which was guarded by an angel with a drawn sword; on it stood four Virtues, who each addressed the king with a song. The rest of the show had nothing specially characteristic about it.

我们时不时地会读到一个获胜将军的真实的凯旋仪式，这种凯旋仪式是尽可能地按照古代的模式组织的，甚至有时会违反那位英雄本人的意愿。在1450年，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鼓起勇气拒绝了之前已经为他准备好的回米兰的凯旋车，原因就是这些东西是君主们虚妄的

迷信之物。大阿方索在1443年进入那不勒斯时，拒绝佩戴桂冠，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时非常乐于把桂冠戴在头上。阿方索的游行的剩余部分是由古老的、讽喻的和纯喜剧的成分奇怪地混合而成的，游行队伍要从城墙的缺口中进入城内然后直达大教堂。他坐的是由四匹白马拉着的车子，这辆车高大气派、金光闪闪；并且由二十个贵族撑着的绣金的遮蓬遮挡在他的头顶。当时住在那不勒斯的佛罗伦萨人曾经在这个仪仗中承担着一部分任务，这一部分都是由高雅的、年轻的、熟练地挥舞着长矛的骑士，载着命运女神的凯旋车，以及骑在马背上的象征七种美德的七个力天使组成。按照当时关于讽喻表演无法改变的理论，这种理论画家们也不得不遵守，这位女神自己也是只留头前部的头发，后部是秃顶的，而坐在车下层的是象征命运变化无常的精灵，他把自己的双脚浸在水盆里。接下来，是由同一群佛罗伦萨人武装起来的一群骑兵，他们穿着不同民族的服装，装扮成外国的君主和贵族，然后是尤利乌斯·恺撒，他头上戴着桂冠，站在一个旋转着的圆球上，他用意大利诗歌向那个国王解释这些讽喻表演所蕴含的含义，然后就回到队伍中。六十个佛罗伦萨人，都穿着紫红相间的服装，用他们国家所能达到的最为壮观的表演来结束这次演出。随后，是一群徒步前进的加泰隆人，把假马拴在自己的前面和后面，然后和一群土耳其人进行模拟格斗，仿佛是在嘲笑佛罗伦萨人的多愁善感。最后出现的是一个高耸的巨塔，由一个执剑的天使守护着塔门；塔上面站着四个象征美德的人，每个人都唱一支歌向国王致以敬意。这个演出所剩下的一部分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演可以表明它的特征了。

At the entrance of Louis XII into Milan in the year 1507 we find, besides the inevitable chariot with Virtues, a living group representing Jupiter, Mars and a figure of Italy caught in a net. After which came a car laden with trophies, and so forth.

在1507年，当路易十二进入米兰的时候，除了必然会出现的载有代表美德的人物形象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一群活人，他们代表着丘比

特、玛尔斯，与一个被捉在网里的意大利人物形象。在这之后出现的是一个载满战利品等物品的汽车。

And when there were in reality no triumphs to celebrate, the poets found a compensation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patrons. Petrarch and Boccaccio had described the representation of every sort of fame as attendants each of an allegorical figure; the celebrities of past ages were now made attendants of the prince. The poetess Cleofe Gabrielli of Gubbio paid this honor to Borso of Ferrara. She gave him seven queens—the seven liberal arts—as his handmaids, with whom he mounted a chariot; further, a crowd of heroes, distinguished by names written on their foreheads; then followed all the famous poets; and after them the gods driving in their chariots. There is, in fact, at this time simply no end to the mythological and allegorical charioteering, and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of art of Borso's time—the frescoes in the Palazzo Schifanoia—shows us a whole frieze filled with these motives. Raphael, when he had to paint the Camera della Segnatura, found this mode of artistic thought completely vulgarized and worn out. The new and final consecration which he gave to it will remain a wonder to all ages.

当实际生活中没有什么胜利可以庆祝的时候，诗人们也可以为自己和他们的庇护人找到一种弥补方式。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曾经把各种美誉描述为每一个有寓意的人物；过去时代的名人现在也成了君主的随从。古比奥的女诗人克莱奥菲·加布里埃利曾经用这样的方式向费拉拉的博尔索致敬。她给了他七个代表七种文艺的女王作为他的侍女，他和这七个侍女坐在同一辆凯旋车上；而且，还有一群英雄人物，通过他们额前的名字可以认出他们；然后，一切有名的诗人都跟在他们后面；跟在著名诗人后面的是一切驾驭凯旋车的各路神灵。实际上，在这个时代，要说神话的和寓意的凯旋式是说不完的，而博尔索时代

最为重要的一件艺术品就是斯基法诺亚豪华宫廷里的壁画，这里的壁画给我们呈现了一整幅关于这些主题的画面。当拉斐尔奉命去教皇的签字大厅绘壁画时，他发现这种模式的艺术构思已经完全被庸俗化、完全枯竭。他给艺术思维所带来的新的、决定性的奉献将会是万世的奇迹。

The triumphal processions, strictly speaking, of victorious generals formed the exception. But all the festive processions, whether they celebrated any special event or were mainly held for their own sakes, assumed more or less the character and nearly always the name of a *trionfo*. It is a wonder that funerals were not also treated in the same way.

严格地说，给凯旋的将军所举行的凯旋游行是不多见的。但是，所有的节日游行，无论是为了庆祝一个特殊的事件还是主要为了游行而游行，这些节日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凯旋游行”的性质，而且几乎总是采用“凯旋游行”这个名字。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葬礼并没有按照这种方式举行。

It was the practice, both at the carnival and on other occasions, to represent the triumphs of ancient Roman commanders, such as that of Paulus Aemilius under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t Florence, and that of Camillus on the visit of Leo X. Both were conducted by the painter Francesco Granacci. In Rome, the first complete exhibition of this kind was the triumph of Augustus after the victory over Cleopatra, under Paul II, where, besides the comic and mythological masks, which, as a matter of fact, were not wanting in the ancient triumphs, all the other requisites were to be found—kings in chains, tablets with decrees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a

senate clothed in the ancient costume, praetors, aediles and quaestors, four chariots filled with singing masks and, doubtless, cars laden with trophies. Other processions rather aimed at setting forth, in a general way, the universal empire of ancient Rome; and in answer to the very real danger which threatened Europe from the side of the Turks, a cavalcade of camels bearing masks representing Ottoman prisoners appeared before the people. Later, at the carnival of the year 1500, Cesare Borgia, with a bold allusion to himself, celebrated the triumph of Julius Caesar, with a procession of eleven magnificent chariots, doubtless to the scandal of the pilgrims who had come for the jubilee. Two *trionfi,* famous for their taste and beauty, were given by rival companies in Florence, on the election of Leo X to the papacy. One of them represented the three Ages of Man, the other the four Ages of the World, ingeniously set forth in five scenes of Roman history, and in two allegories of the golden age of Saturn and of its final return. The imagination displayed in the adornment of the chariots, when the great Florentine artists undertook the work, made the scene so impressive that such representations became in time a permanent element in the popular life. Hitherto the subject cities had been satisfied merely to present their symbolical gifts—costly stuffs and wax-candles—on the day when they annually did homage. The guild of merchants now built ten chariots, to which others were afterwards to be added, not so much to carry as to symbolize the tribute, and Andrea del Sarto, who painted some of them, no doubt did his work to perfection. These cars, whether used to hold tribute or trophies, now formed a part of all such celebrations, even when there was not much money to be laid out. The Sienese announced, in 1477, the alliance between Ferrante and Sixtus IV, with which they themselves were associated, by driving a chariot round the city, with 'one clad as the goddess of peace standing on a hauberk and other arms'.

那时人们的习惯做法是，无论是在狂欢节上还是其他场合，都表演古罗马指挥官的凯旋游行，比如在伟大的洛伦佐的时代，在佛罗伦萨所表演的保罗斯·埃米里乌斯的凯旋游行，以及在利奥十世访问时所表演的卡米卢斯的凯旋游行，这两次凯旋游行都是由画家弗朗西斯科·格拉纳奇指挥表演的。在罗马，第一次开展这种大规模游行是在保罗二世时，关于奥古斯都战胜克利奥帕特拉之后的凯旋游行的表演，在这次凯旋游行中，除了喜剧和神话化装表演之外，事实上，这种喜剧和神话化装表演是古代凯旋游行中所不可或缺的表演节目，还有其他必须表演的节目——身负枷锁的国王、写有元老院和人民赦令的匾、身穿古代服装的元老、执政官、市政官、会计官，以及四辆载满化装歌手的凯旋车，毫无疑问，还有载满战利品的汽车。其他游行一般以展现古代罗马帝国的大统为目的；为了抵制来自突厥人的且对欧洲构成威胁的真正的危险，一头装有化装成奥斯曼俘虏的假面人物的骆驼群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后来，在1500年的狂欢节上，萨切雷·波吉亚大胆地把自己比喻成尤利乌斯·恺撒，用11辆华丽的凯旋车组成的游行队伍来庆祝尤利乌斯·恺撒的胜利，这无疑引起了前来参加欢乐佳节的参拜者们的公愤。当利奥十世当选为教皇时，在佛罗伦萨由两个相互竞争的团体表演了两个以趣味和美丽而出名的“三部曲”。其中一个表演展示了人类经历的三个时代，另一个表演展示了宇宙所经历的四个时代，这几个时代是由五个罗马历史场景和农业之神的黄金时代与它最后返回的两个寓言故事巧妙地表现出来的。当佛罗伦萨伟大的艺术家们担负起这个任务时，展现在凯旋车的装饰上的想象力使那个场面给人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这种表演成了大众生活中永恒的成分。迄今为止，隶属的城市每年都会向佛罗伦萨献礼，每当献礼时他们只会供奉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贵重的物品和蜡烛。商人协会建造了十辆凯旋车，后来又增加了一些车辆，增加车辆的目的与其说是向佛罗伦萨运送贡品，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象征贡品数目的繁多，毫无疑问，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对其中的几辆车做了精心的描绘。这些车子，不管是否之前被用来装载贡品或者战利品，现在都是所有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即使是没有很多钱筹办这些活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在1477年，锡耶纳人通过驾驭战车环游城市的方式宣布费

兰特和西斯科特四世结盟，他们自己也加入到这个联盟中，战车上站着一个身披锁子甲和其他武器装扮成和平女神的人。

At the Venetian festivals the processions, not on land but on water, were marvelous in their fantastic splendor. The sailing of the *Bucentaur* to meet the princesses of Ferrara in the year 1491 seems to have been something belonging to fairyland. Countless vessels with garlands and hangings, filled with the richly dressed youth of the city, moved in front; genii with attributes symbolizing the various gods floated on machines hung in the air; below stood others grouped as tritons and nymphs; the air was filled with music, sweet odors and the fluttering of embroidered banners. The *Bucentaur* was followed by such a crowd of boats of every sort that for a mile all round *(octo stadia)* the water could not be seen. With regard to the rest of the festivities, besides the pantomime mentioned above, we may notice as something new a boat-race of fifty powerful girl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nobility were divided into corporations with a view to these festivals, whose most noteworthy feature was some extraordinary machine placed on a ship. So, for instance, in the year 1541, at the festival of the *Sempiterni,* a round 'universe' floated along the Grand Canal, and a splendid ball was given inside it. The carnival, too, in this city was famous for its dances, processions and exhibitions of every kind. The Square of St Mark was found to give space enough not only for tournaments but for *trionfi,* similar to those common on the mainland. At a festival held on the conclusion of peace, the pious brotherhoods *(scuole)* took each its part in the procession. There, among golden chandeliers with red candles, among crowds of musicians and winged boys with golden bowls and horns of plenty, was seen a car on which Noah and David sat together enthroned; then came Abigail, leading a camel laden with treasures, and a

second car with a group of political figures—Italy sitting between Venice and Liguria—and on a raised step three female symbolical figures with the arms of the allied princes. This was followed by a great globe with the constellations, as it seems, round it. The princes themselves, or rather their bodily representatives, appeared on other chariots with their servants and their coats of arms, if we have rightly interpreted our author.

威尼斯的节日游行不是在陆地上举行而是在水上举行，这种游行非常壮观，令人惊叹不已。在1491年，驾着牛头人身的礼舟去迎接费拉拉公主的情景使人感到如同身处仙境一般。无数个船只上挂着拉花和帘布，载着城市中衣着华丽的年轻人，冲在前面领航；象征众神的神灵在悬挂在空中的机器上漂浮；站在下面的是分组列队的仙女和半人半鱼形的海神；空中，音乐飘荡、香味氤氲、绣旗飘飘。一群种类各异的船只跟在牛头人身礼船的后面，方圆一英里（奥克托视距）之内都看不到水面。至于其余的一些庆祝活动，除了上面提到的哑剧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一种新的表演节目，这是一种由五十个强有力的少女表演的划船比赛的节目。在16世纪，考虑到这些节日演出的不同目的，贵族们被分成许多个团体，这些节日表演中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一种装在船上的特别的机器。因此，比如在1541年的“永生节”上，一个圆形的“宇宙”沿着大运河飘去，并在那里举办了一场辉煌壮丽的舞会。这个城市的狂欢节也因其各类舞蹈、游行和展览会而闻名。圣马可广场上空间宽敞，在这里不仅可以举行比武大赛，而且还可以举行“凯旋游行”，这种与大陆上比较常见的游行活动相类似。在一次为庆祝签订和约而举办的庆祝活动中，那些虔诚的兄弟集团（学校）都参加了这次游行。在插着红色蜡烛的金光闪闪的烛台中间，在众多乐师和长着翅膀的男孩中间，可以看到一辆宝座上坐着诺亚和大卫的车子；然后出现的是阿比盖尔，牵着一头背上驮满宝物的骆驼，又有一辆载有一群政治人物的车子——意大利坐在威尼斯和利古里亚之间——在高层上有三个象征性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拿着各联盟君主的武器。在此之后出现的是一个巨大的球体，似乎有星座围绕着它。君

主本人，更确切地说，是扮演君主的人，和他们的仆人以及他们的盾徽一起出现在凯旋车上，如果我们没有把作者的意思理解错的话。

The carnival, properly so called, apart from these great triumphal marches, had nowhere, perhap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so varied a character as in Rome. There were races of every kind—of horses, asses, buffaloes, old men, young men, Jews and so on. Paul II entertained the people in crowds before the Palazzo di Venezia, in which he lived. The games in the Piazza Navona, which had probably never altogether ceased since the classical times, were remarkable for their warlike splendor. We read of a sham fight of cavalry, and a review of all the citizens in arms. The greatest freedom existed with regard to the use of masks, which were sometimes allowed for several months together. Sixtus IV ventured, in the most populous part of the city—at the Campofiore and near the Banchi—to make his way through crowds of masks, though he declined to receive them as visitors in the Vatican. Under Innocent VIII, a discreditable usage, which had already appeared among the cardinals, attained its height. In the carnival of 1491, they sent one another chariots full of splendid masks, of singers and of buffoons, chanting scandalous verses. They were accompanied by men on horseback. Apart from the carnival, the Romans seem to have been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e effect of a great procession by torchlight. When Pius II came back from the Congress of Mantua in 1459, the people waited on him with a squadron of horsemen bearing torches, who rode in shining circles before his palace. Sixtus IV, however, thought it better to decline a nocturnal visit of the people, who proposed to wait on him with torches and olive-branches.

姑且先把这些凯旋游行放在一边不谈，我们完全可以说，在15世

纪，或许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狂欢节像罗马的狂欢节一样丰富多彩。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比赛——赛马、赛驴、斗水牛、老年人赛跑、年轻人赛跑，以及犹太人赛跑等等。保罗二世在他自己所居住的威尼斯豪华宫殿前面招待过众多的人民，威尼斯广场上的比赛因其如同战场的壮观场面而举世瞩目，这种比赛或许从古代开始以来就从未停止过。我们从书中了解到有骑兵的战斗演习，也有对全体公民武装的阅兵。对于面具的使用有最大的自由限度，有时候允许使用好几个月。西斯科特四世在城内居住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位于坎波费奥里和班奇附近——在大批的戴有面具的人群中艰难行进，尽管他拒绝在梵蒂冈把他们当作客人来接待。在因诺森特八世时代，之前已经先在红衣主教中出现的歪风邪气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高潮。在1491年的狂欢节上，他们互相赠送了载满化装演员、歌手和滑稽剧演员的辉煌壮丽的凯旋车，车上的这些人吟诵着诽谤性的诗句，有人骑着马护送他们。除了狂欢节之外，罗马人似乎是第一个发现盛大的火炬游行效果的人。在1459年，当庇护二世参加完曼图亚的代表大会归来的时候，有一群手持火炬的骑兵为他接风，这一群骑兵手持火炬，像火龙一样在他的宫殿前面游行。但是，西斯科特四世却认为最好拒绝那些手持火炬和橄榄枝来进行夜间拜访的人们。

But the Florentine carnival surpassed the Roman in a certain class of processions, which have left their mark even in literature.[2_7] Among a crowd of masks on foot and on horseback appeared some huge, fantastic chariots, and upon each an allegorical figure or group of figures with the proper accompaniments, such as Jealousy with four spectacled faces on one head; the four temperaments with the planets belonging to them; the three Fates; Prudence enthroned above Hope and Fear, which lay bound before her; the four Elements, Ages, Winds, Seasons and so on; as well as the famous chariot of death with the coffins, which presently opened. Sometimes we meet with a splendid scene from classical mythology—Bacchus and Ariadne, Paris and Helen, and others. Or

else a chorus of figures forming some single class or category, as the beggars, the hunters and nymphs, the lost souls, who in their lifetime were hard-hearted women, the hermits, the astrologers, the vagabonds, the devils, the sellers of various kinds of wares, and even on one occasion *il popolo,* the people as such, who all reviled one another in their songs. The songs, which still remain and have been collected, give the explanation of the masquerade sometimes in a pathetic, sometimes in a humorous, and sometimes in an excessively indecent tone. Some of the worst in this respect are attributed to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probably because the real author did not venture to declare himself. However this may be, we must certainly ascribe to him the beautiful song which accompanied the masque of Bacchus and Ariadne, whose refrain still echoes to us from the fifteenth century, like a regretful presentiment of the brief splendor of the Renaissance itself:

但是，佛罗伦萨的狂欢节的某些游行仪式是胜过罗马的，这些游行仪式甚至在文学著作上留下了痕迹。[3_25] 在一大群戴着化装面具的人群中，有步行的，也有骑马的，出现了几辆巨大的、古怪的凯旋车，每辆车上都有一个寓言人物或一群带着自己特有的附属品的人物，比如头上长着四个戴着眼镜的面孔的嫉妒之神；四种有着各自星宿的气质之神；三个命运女神；居于宝座之上的智慧之神，希望与恐惧被束缚在她的面前；四行之神、时代之神、风神和四季之神等等；并且还有载满棺材的有名的死神之车，车上的棺材刚打开不久。有时，我们也会遇到古典神话故事中的壮丽景象——酒神巴克斯和阿里阿德涅、帕里斯和海伦，以及其他的神话故事中的人物。要不然就是属于某一阶级或某一范畴的合唱团的人物形象，像乞丐、猎人和仙女、生前都是铁石心肠的女人的亡灵、隐士、占星家、流浪汉、恶魔、兜售各类商品的商贩，甚至是曾经在歌曲中互相诽谤的人们。这些流传至今、被收集起来的歌曲，有时用一种伤感的音调、有时用一种幽默滑稽的音调、有时用一种极其下流的音调来解释那个化装舞

会。关于这一方面的最糟糕的歌曲被认为是由洛伦佐创作的，或许是因为真正的作者不敢宣布自己的名字。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当然还必须得把为酒神巴克斯和阿里阿德涅的化装舞会伴奏的美丽歌曲归功于这位创作者，从15世纪开始，这首歌曲的叠句就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耳边，像是在惋惜文艺复兴时期匆匆而逝的辉煌：

Quanto è bella giovinezza,

虽说青春多美丽，

Che si fugge tuttavia!

似水年华终不留，

Chi vuol esser lieto, sia:

人生得意须尽欢，

Di doman non c'è certezza.

谁知明日有闲无。

[2_1].Sansovino, Venezia, fol. 152: 'capelli biondissimi per forza di sole'.['Very blonde hair, bleached by the sun'. The famous painting by Carpaccio in the Museo

Correr, Venice, of two women on a terrace, shows them with blonde hair exposed to the sun.]

[2_2].[G. della Casa, Il galateo, Venice, 1558.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 Pine-Coffin in Penguin Classics, 1958.]

[2_3].There was a limit, however, to this. The satirists introduce bits of Spanish, and Folengo (under the pseudonym Limerno Pitocco, in his Orlandino) of French, but only by way of ridicule. It is an exceptional fact that a street in Milan, which at the time of the French (1500-1512, 1515-22) was called Rue Belle, now bears the name Rugabella. The long Spanish rule has left almost no traces on the language, and but rarely the name of some governor in streets and public buildings. It was not until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at, together with French modes of thought, many French words and phrases found their way into Italian. The purism of our century is still busy removing them. [Via Rugabella still exists: it is a small street between the modern Corso Roma and Corso Italia, not far from the ancient Basilica di San Lorenzo.]

[2_4].[i.e. Palla, a ball-game which has now been superseded by football.]

[2_5].Vasari, iv, p. 37, Vita di Pontormo, tells how a child, during such a festival at Florence in the year 1513, died from the effects of the exertion—or shall we say, of the gilding? The poor boy had to represent the 'golden age'! [The Life of Pontormo, in G. Bull's second volume of Vasari, in Penguin Classics, 1987, p. 243.]

[2_6].[The reference to Titian's Triumph of the Cross is not clear; it seems to refer to the woodcut, more than 12 feet long, of the Triumph of Faith,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his was ever a painting; in any case, the description given by Burckhardt is not very close to the woodcut.]

[2_7].[See, for example, Vasari on Piero di Cosimo, in G. Bull's second volume of Vasari, in Penguin Classics, 1987, p. 105 ff.]

[3_1].但丁《君主论》第二卷，第三章。——译者注

[3_2].《天堂篇》第16歌，开头处。——译者注

[3_3].但丁《宴会》，《论丛》第4章的将近全部以及其他等处。布鲁纳托·拉蒂尼说（《宝典》第1卷第2编，第50章，沙巴伊版，第343页）：“贵族之所以成为贵族，首先由于美德而非由于祖先。”并警告人们（第2卷第2编，第196章，第440页），行为不当会使他们失去应有的高贵。同样，佩脱拉克在《论处祸福之道》，第1卷对话17

中说："真正的贵族并非天生，而是自为的。"——译者注

[3_4].波焦《全集》《对话篇·贵族论》。普拉提那在《真正贵族论》中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公开进行反驳。——译者注

[3_5].这种对贵族们的蔑视，在人文主义学者里面是很普遍的。见埃尼亚斯·西尔维于斯《全集》，第84页（《波希米亚史》第2章）和640页的几段极具讽刺意味的话语（露克瑞佳和优里亚路斯的故事）。——译者注

[3_6].这是那不勒斯首都的情况，见班戴洛，第2编，故事第7篇；乔维诺·庞达诺《安东尼奥》，其中记述了贵族权利的衰落始于阿拉戈纳王朝的建立。——译者注

[3_7].当时在整个意大利，大地主一般都和贵族享有同样的平等。康帕纳斯对庇护二世的叙述（《回忆录》，第1页）附带说明他小时候曾帮贫困的父母在田间劳动，不过只是一种阿谀而已。进一步的事实也说明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消遣，并说明在当时这不过只是青年贵族的一种习惯而已（瓦格特，第2卷，第339页）。——译者注

[3_8].班戴洛对北意大利贵族的评价以及对同低身份者通婚者一再非难的事实不失为一项重要的资料。（第1编，故事第4和26篇；第3编，故事第60篇，以及第4编，故事第8篇）米兰贵族同时又是商人只是一个例外（第3编，故事第37篇），关于贵族参加农民的娱乐活动，见前。——译者注

[3_9].马苏奇奥，故事第19篇（塞丹布利尼版，那不勒斯，1874年，第220页）故事集的第一版出版于1476年。——译者注

[3_10].在十五世纪，维斯帕西雅诺·菲奥兰提诺（第518、632页）暗示富人不应该设法增加他们所继承的财富，而应该花掉他们全年的收入，这句话出自一个佛罗伦萨人之口。——译者注

[3_11].佛朗哥·萨克蒂，故事第153篇，参见故事第82和150篇。——译者注

[3_12].波焦，《贵族论》，第27页，埃尼亚斯·西尔维于斯：《弗里德利希三世传》（科拉版，第294页）对弗里德利希欣然在意大利授封骑士头衔进行非难。——译者注

[3_13].瓦萨里，第3卷，第49页及注，《德罗传》。佛罗伦萨市要求有授封骑士地位的权利。关于在1378和1389年所举行的这种仪式，详见拉蒙特：《洛伦佐》第2卷，第444页以下。——译者注

[3_14].这是对竞技会最早的楷模作品之一。60年之后，查理七世时代的一位市民

阶级出身的财政大臣雅克·科尔在位于布尔日的个人庭院里举办了一个骡马赛会（1450年前后）。所有这些楷模作品中最为上乘的作品就是刚才所引用的《小奥兰多》。——译者注

[3_15].圣索维诺《威尼斯》，第152页："由于太阳的光照而形成的极为艳丽的金黄色头发"，参见第89页和伊利雅泰所引的罕见作品《一位威尼斯贵族的一生》（1874年），第56页。

[3_16].《加比托洛》（一）致科西莫有"日前您赐给我的那卷一百块崭新的纸币"之句。当时留下的一些物品直到现在还留有芬芳的气味。——译者注

[3_17].维斯帕夏诺·菲奥兰提诺，第453页，见德那多·阿西亚约利传，又625页，见尼古莱传。——译者注

[3_18].乔万尼·卡萨，《加拉提奥》，威尼斯，1558。

[3_19].《俗语论》科尔比内利版，巴黎，1577年。据薄伽丘的《但丁传》第77页所综述，这一作品写于他去世前不久。它在《宴会》中提到他在世时，意大利语言中所发生的迅速和显著的变化。——译者注

[3_20].卡斯蒂廖内的《廷臣论》第1卷，第27页以下。通过整个对话，我们可以推测出作者个人的观点。佩托拉克和薄伽丘的反对意见是十分怪异的（他们的观点里面一次也没有提到但丁）。我们从作品中得知，波利齐亚诺和洛伦佐·美第奇等人也都是托斯卡纳人，并却也像他们那样"大抵学问见识都不小"而值得人们效仿。——译者注

[3_21].但是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限制。讽刺作家在自己的讽刺作品中插入几句西班牙语。而弗伦哥，其笔名为利莫尔诺·皮多科，在他的《小奥兰多》一书中则插进去几句法语，这样的做法不过只是为了取乐于读者而已。在法兰西统治时期（1500-1512年，1515-1522年），比较破例的一件事情就是米兰的一条街在当时被称作Rue Belle（美街），今名Rugabella。西班牙的长期统治在语言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仅仅只有极少数的街道和公共建筑仍然以某些西班牙统治者的名字而命名。直到十八世纪，许多法语词汇和成语才随着法兰西的思想渗透到了意大利。现在的粹语学正极力清除这些外来语。

[3_22].也被称作"帕拉"，是一种球类游戏，现在已经被足球所替代。

[3_23].瓦萨里，第9卷，第37页。《蓬托尔莫的生活》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在1513年，有一个孩子在佛罗伦萨的一次这样的庆典中由于筋疲力尽而死亡——还是我们应该说，是由于镀金而致小孩于死地的呢？这个可怜的孩子是需要扮演"黄金时代"的。

[3_24].[这里所提到的意大利画家提香的“十字架的胜利”不是很明确，这里提到的好像是一个木版画“信仰的胜利”，长12英尺，但是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曾经有这样的一幅图画；总之，布克哈特所描述的这幅画和木版画十分相像。]

[3_25].“一切队伍、车辆都化装吧。”（《世界之都》，1750年），马基雅维里：《短篇集》，第505页；瓦萨里，第7卷，115页；拉蒙特：《洛伦佐》第2卷，第443页。其中收藏了一些证明狂欢节不久之后就被取缔的史料。

Part 6 Morality and Religion [3_1]

第六编　道德与宗教 [4_1]

Morality and Judgement

道德与评价

The relation of the various peoples of the earth to the supreme interests of life, to God, virtue and immortality, may be investigated up to a certain point, but can never be compared to one another with absolute strictness and certainty. The more plainly in these matters our evidence seems to speak, the more carefully must we refrain from unqualified assumptions and rash generalizations.

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研究世界上各民族如何对待人生的最高利益、上帝、美德与永垂不朽的问题，但是人们决不能绝对严密地、确定地对它们进行比较。我们关于这些事情的佐证似乎越显而易见，我们就必须要越谨慎，以免做出绝对的假设和草率的总结。

This remark is especially true with regard to our judgement on questions of morality. It may be possible to indicate many contrasts and shades of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nations, but to strike the balance of the whole is not given to human insight. The ultimate truth with respect to the character, the conscience and the guilt of a people remains for ever a secret; if only for the reason that its defects have another side, where they reappear as peculiarities or even as virtues. We must leave those who find pleasure in passing sweeping censures on whole nations to do so as they like. The

people of Europe can maltreat, but happily not judge, one another. A great nation, interwoven by its civilization, its achievements and its fortunes with the whole life of the modern world, can afford to ignore both its advocates and its accusers. It lives on with or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orists.

当涉及我们对于道德问题的判断时，这句话就特别正确。要指出不同民族之间的许多对比和细微差别也许是可能的，但是要想对整体做一个比较从而定出孰轻孰重，我们人类还没有这方面的洞察力。至于一个民族的性格、良知与罪行的最终的真实情况永远都是一个秘密；只要谈到一个民族除了缺点之外还有另外一面的话，他们就会作为特性甚至是作为美德而重新出现。对于那些喜欢随其索性对整个民族做全面责难的人们，我们必须置之不理。欧洲人民可以相互虐待，但是很庆幸，他们没有相互审判。一个以它的文明、它的成就、它的命运与现代世界的整个生活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伟大民族，是可以对它的拥护者和指责者不予理睬的。

Accordingly, what here follows is no judgement, but rather a string of marginal notes, suggested by a study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extending over some years. The value to be attached to them is all the more qualified as they mostly touch on the life of the upper classes, with respect to which we are far better informed in Italy than in any other country in Europe at that period. But though both fame and infamy sound louder here than elsewhere, we are not helped thereby in forming an adequate moral estimate of the people.

因此，接下来所谈的不是判断，而是许多年以来，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心得所得出的一系列旁注。对它们自身的价值更要进行详

细描述，因为它们涉及的大部分都是上层社会的生活，对于这种生活，我们在意大利所获得的信息远比在同一时代的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获得的信息都要详细。不过，虽然相比于其他地方，这里不仅名声在外而且恶名昭彰，但是我们没法由此就对意大利人民做出一个恰当的道德评判。

What eye can pierce the depths in which the character and fate of nations are determined?—in which that which is inborn and that which has been experienced combine to form a new whole and a fresh nature?—in which even those intellectual capacities, which at first sight we should take to be most original, are in fact evolved late and slowly? Who can tell if the Italian before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ossessed that flexible activity and certainty in his whole being—that play of power in shaping whatever subject he dealt with in word or in form—which was peculiar to him later? And if no answer can be found to these questions, how can we possibly judge of the infinite and infinitely intricat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character and intellect are incessantly pouring their influence one upon the other. A tribunal there is for each one of us, whose voice is our conscience; but let us have done with these generalities about nations. For the people that seems to be most sick the cure may be at hand; and one that appears to be healthy may bear within it the ripening germs of death, which the hour of danger will bring forth from their hiding-place.

什么样的眼光可以看透决定民族性格和民族命运的奥秘呢？——可以看透先天才能和后天经验是如何相互结合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整体和清新自然的天性的奥秘呢？——可以看透甚至是那些乍看是最初的智能但事实上是晚而缓慢的智能的奥秘呢？谁可以说出在13世纪以前，意大利人在它的整个历史长河中是否拥有那种随意变通的、后来

为他所特有的活性和确定性——那种可以用言语或形式来塑造他所应对的任何对象的能力呢？如果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判断那些无限的、极其错综复杂的通道呢？通过这些渠道，性格和智力是连续不断地相互影响着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法庭，法庭的声音就是我们的良心；对于民族来说，我们还是收起这些泛泛而谈的概论吧。对于一个看似病入膏肓的民族，也许一治即愈；而对于一个看似十分健康的民族，或许它的内部已带有成熟的致死病菌，危险时刻一到，致死病菌就会从隐藏的地方冒出来。

Morality and Immorality

道德与不道德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hen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had reached its highest pitch,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political ruin of the nation seemed inevitable, there were not wanting serious thinkers who saw a connection between this ruin and the prevalent immorality. It was not one of those methodistical moralists who in every age think themselves called to declaim against the wickedness of the time, but it was Machiavelli, who, in one of his most well-considered works, said openly: 'We Italians are irreligious and corrupt above others.' Another man would have perhaps said, 'We are individually highly developed; we have outgrown the limit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 which were natural to us in our undeveloped state, and we despise outward law, because our rulers are illegitimate, and their judges and officers wicked men.' Machiavelli adds, 'because the Church and her representatives set us the worst example'.

在16世纪初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已经达到高潮，与此同时，

民族的政治衰败看似已不可避免，一些严肃认真的思想家已经看到了这种政治衰败和盛行的伤风败俗的行为之间的关联。那些循规蹈矩的伦理学者在每一个时代里都认为自己有责任猛烈抨击当时的不道德行为，但是却是一个叫做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学家在他其中一个最深思熟虑的作品里，公然说道："比起其他国家的人，我们意大利人无宗教信仰、堕落腐败。"另外还有一个人大概曾这样说过："我们的个性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我们已经突破了道德和宗教的约束，在我们还处于未发展的状态时，这些道德和宗教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我们鄙视外部的法律，因为我们的标尺是不合法的，而且他们的法官和军官都是邪恶之人。"马基雅弗利补充道："因为教会和她的代表们给我们树立了最坏的榜样。"

Shall we add also, 'because the influence exercised by antiquity was in this respect unfavorable'? The statement can only be received with many qualifications. It may possibly be true of the humanists, especially as regards the profligacy of their lives. Of the rest it may perhaps be said, with some approach to accuracy, that, after they became familiar with antiquity, they substituted for holiness—the Christian ideal of life—the cult of historical greatness. We can understand, therefore, how easily they would be tempted to consider those faults and vices to be matters of indifference, in spite of which their heroes were great. They were probably scarcely conscious of this themselves, for if we are summoned to quote any statement of doctrine on this subject, we are again forced to appeal to humanists like Paolo Giovio, who excuses the perjury of Giangaleazzo Visconti, through which he was enabled to found an empire, by the example of Julius Caesar. The great Florentine historians and statesmen never stoop to these slavish quotations, and what seems antique in their deeds and their judgements is so because the nature of their political life necessarily fostered in them a mode of thought which has some analogy with that of antiquity.

是不是我们也要补充说“因为古文化给这方面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利的”呢？这种说法只能有条件地被接受。对于人道主义者来说，这种说法或许是正确的，尤其是对于他们肆意挥霍的生活。至于其余的人，也许可以大致地说，在他们熟悉了古文化之后，他们对历史上伟大人物的狂热崇拜替代了神圣——基督教的生活理想。因此，我们可以明白，这很容易引诱他们把那些错误和罪恶行径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尽管他们的英雄人物身上有着这样的过错和不道德行为，但是他们的英雄人物还是伟大的。他们自己可能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如果要求我们关于这个问题引用任何教条式陈述的话，我们只有再一次向像保罗·乔维奥这样的人道主义者求助，保罗·乔维奥为詹加莱亚佐·维斯孔蒂所提供的伪证开脱，通过这个伪证，詹加莱亚佐·维斯孔蒂按照尤利乌斯·恺撒所树立的榜样建立了一个帝国。伟大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从未屈尊于援引旧例，他们的行为和判断之所以看似具有古风古韵，是因为他们政治生活的性质必定会在他们身上滋生出一种与古文化的思想方式有着某种相似之处的思维方式。

Nevertheless,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Ita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found itself in the midst of a grave moral crisis, out of which the best men saw hardly any escape.

虽然如此，但我们不能否认在16世纪初期，意大利已经发现自己身处一种严重的道德危机之中，品性最端正的人也逃不过这场道德危机。

Let us begin by saying a few words about that moral force which was then the strongest bulwark against evil. The highly gifted men of that day thought to find it in the sentiment of honor. This is that enigmatic mixture of conscience and egotism which

often survives in the modern man after he has lost, whether by his own fault or not, faith, love and hope. This sense of honor is compatible with much selfishness and great vices, and may be the victim of astonishing illusions; yet, nevertheless, all the noble elements that are left in the wreck of a character may gather around it, and from this fountain may draw new strength. It has become, in a far wider sense than is commonly believed, a decisive test of conduct in the minds of the cultivated Europeans of our own day, and many of those who yet hold faithfully by religion and morality are unconsciously guided by this feeling in the gravest decisions of their lives.

首先，我们可以简要地谈一下那种道德力量，在当时这种道德力量是用来抵制邪恶的最坚固的壁垒。当时最具天赋的人想要在荣誉感里找到它。这是良心和唯我主义的混合物，高深莫测，它往往会在一个不管是否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失去信仰、爱情和希望的现代人身上残留着。这种荣誉感与很多利己主义和严重的罪恶行径是共存的，并且有可能是惊人的幻想的受害者；但是，虽然如此，性格遭到破坏后所遗留下来的所有高贵因素还簇拥在它的残骸的周围，从这一源泉还可以汲取新力量。在一个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教养的欧洲人的心目中，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行为检测，对于许多依然坚信宗教和道德的人们来说，当他们做出生命中最重大的决定时，是不知不觉地被这种情感所支配的。

It lies without the limits of our task to show how the men of antiquity also experienced this feeling in a peculiar form, and how, afterwards, in the Middle Ages, a special sense of honor became the mark of a particular class. Nor can we here dispute with those who hold that conscience, rather than honor, is the motive power. It would indeed be better and nobler if it were so; but since it must be

granted that even our worthier resolutions result from 'a conscience more or less dimmed by selfishness', it is better to call the mixture by its right name. It is certainly not always easy, in treating of the Italian of this period, to distinguish this sense of honor from the passion for fame, into which, indeed, it easily passes. Yet the two sentiments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要表明古代人是如何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体验这种情感的，以及随后，在中世纪，一种特殊的荣誉感是如何变成一个特殊阶级的标志的，这些问题都不在本书研究的范围之内。在这里，我们也不能和那些认为原动力是良心，而不是荣誉感的人们争论不休。如果原动力真的是良心的话，那确实是更好、更高尚的；但是，既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我们比较有价值的决心也是从“由于利己主义或多或少变得暗淡的良心”而产生的，那么我们最好用恰当的名字来给这个混合物命名。当然，论述这个时代的意大利人往往不会轻而易举地就把这种荣誉感和对于名誉的渴望之情区分开的，前者的确很容易地就转变成了后者。但是，这两种情感在本质上是有所不同的。

There is no lack of witnesses on this subject. One who speaks plainly may here be quot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st. We read i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Aphorisms* of Guicciardini: 'He who esteems honor highly succeeds in all that he undertakes, since he fears neither trouble, danger, nor expense; I have found it so in my own case, and may say it and write it; vain and dead are the deeds of men which have not this as their motive.' It is necessary to add that, from what is known of the life of the writer, he can here be only speaking of honor, and not of fame. Rabelais has put the matter more clearly than perhaps any Italian. We quote him, indeed, unwillingly in these pages. What the great, baroque Frenchman gives us is a picture of what the Renaissance would be

without form and without beauty. But his description of an ideal state of things in the Thelemite monastery is decisive as historical evidence. In speaking of his gentlemen and ladies of the Order of Free Will, he tells us as follows: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不缺少证据的。这里可以引用一个说话坦率直接的人的话语来代表其他人的意见。我们在最近出版的圭恰迪尼的《格言》这本书里读到："一个高度重视荣誉的人，能够在他所从事的一切事情中获得成功，因为他既不畏惧困难、危险，也不惧怕损失；我在自己所处的情况中发现是这样的，并且或许可以把它说出来、写出来；徒劳无用、了无生机的事情是那些没有荣誉感作为行为动机的人所做的事。"有必要在这里补充说明的是，从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作家的生活来看，他这里所讲述的只能是荣誉，而不是名声。对于这个问题，拉伯雷比任何一个意大利人都表达得更清楚。我们确实不愿意在这里引述他的话语。这个伟大的巴洛克式的法国人给我们呈现的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图画不仅没有生气，也不美丽。但他对泰勒玛寺院里的事物的理想状态的描述作为历史证据是具有决定性的。谈到他自由意志修道会的男女会员时，他这样告诉我们：

> *En leur reigle n'estoit que ceste clause: Fay ce que vouldras. Parce que gens liberes, bien nez, bien instruictz, conversans en compaignies honnestes, ont par nature ung instinct et aguillon qui toujours les poulse à faitz vertueux, et retire de vice; lequel ilz nommoyent honneur.*

> 他们的规则只有一个：那就是你按照自己的意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自由之人出身清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习惯于和良朋益友交流，他们有一种天

生的本性，这种本性促进他趋向善行而远离邪恶，他们把这种本性称之为荣誉。

This is that same faith in 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which inspired the men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helped to prepare the way for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ong the Italians, too, each man appeals to this noble instinct within him, and though with regard to the people as a whole—chiefly in consequence of the national disasters—judgements of a more pessimistic sort became prevalent, the importance of this sense of honor must still be rated highly. If the boundless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ty, stronger than the will of the individual, be the work of a historical providence, not less so is the opposing force which then manifested itself in Italy. How often, and against what passionate attacks of selfishness it won the day, we cannot tell, and therefore no human judgement can estimate with certainty the absolute moral value of the nation.

正是对人性之善有同样的一种信仰，才启发了18世纪后半叶的人们，也为法国革命奠定了基础。在意大利人中，每个人也都求助于自己内心的高尚本能，虽然对于整个民族的人来说——主要是因为民族灾难的缘故——流行着一种更为悲观的说法，但是这种荣誉感的重要性必须予以高度的评价。如果那种比个人意志还要强大的个性的无限发展是历史注定的产物的话，那么当时在意大利所出现的反势力也未必不是这样的。它究竟战胜了多少次，以及战胜了怎样的利己主义充满激情的攻击，对于这些我们无法讲述，因此，人类无法对这个民族的绝对道德价值进行准确的估计。

A force which we must constantly take into account in judging

of the morality of the more highly developed Italian of this period is that of the imagination. It gives to his virtues and vices a peculiar color, and under its influence his unbridled egotism shows itself in its most terrible shape.

当对这一时期的意大利人更为高度发展的道德进行评判时，想象力是一种我们不得不时时都得考虑在内的力量。它给他们的美德和罪恶增添了一种特殊的色彩，并且在它的影响下，无拘无束的利己主义展现出了自身最为可怕的一面。

The force of his imagination explains, for example, the fact that he was the first gambler on a large scale in modern times. Pictures of future wealth and enjoyment rose in such lifelike colors before his eyes that he was ready to hazard everything to reach them. The Muhammadan nations would doubtless have anticipated him in this respect, had not the Koran, from the beginning, set up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gambling as a chief safeguard of public morals, and directed the imagination of its followers to the search after buried treasures. In Italy, the passion for play reached an intensity which often threatened or altogether broke up the existence of the gambler. Florence had already, at the end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ts Casanova—a certain Buonaccorso Pitti, [3_2] who, in the course of his incessant journeys as merchant, political agent, diplomatist and professional gambler, won and lost sums so enormous that none but princes like the dukes of Brabant, Bavaria and Savoy were able to compete with him. That great lottery-bank, which was called the court of Rome, accustomed people to a need of excitement, which found its satisfaction in games of hazard during the intervals between one intrigue and another. We read, for example, how Franceschetto Cibo, in two games with the Cardinal Raffaello

Riario, lost no less than 14,000 ducats, and afterwards complained to the pope that his opponent had cheated him. Italy has since that time been the home of the lottery.

比如，他们的想象力说明了他们是近代第一批大规模的赌徒这样一个事实。未来的财富和享受的画面是如此逼真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以至于他们准备不顾一切冒险去得到它们。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古兰经》里面就把禁止赌博这一项定为公共道德的主要保障措施，并把伊斯兰教信徒的想象力引向探索埋藏的宝藏上面，那么在这方面伊斯兰国家无疑将走在他们的前面。在意大利，人们对于赌博的激情达到了非常强烈的程度，常常会威胁到或者是完全颠覆了赌徒的生活。在14世纪末期，在佛罗伦萨已经有了卡萨诺瓦式人物——某一个叫做博纳科尔索·皮蒂的人[4_2]，这个人接连不断地更换过很多职业，做过商人、政治代表、外交家、专业赌徒，赌注的数目是如此之庞大，以至于除了布拉班特公爵、巴伐利亚公爵和萨瓦公爵之外，再没有人能和他对抗。那个被称为“罗马宫廷”的大摇彩银行，让人们习惯于这种需要刺激的感觉，这种对于刺激的需求可以从一次诡计到另一次诡计的间隔中的冒险赌博上获得满足。比如，我们在书上读到过弗兰切斯克托·奇博如何在与红衣主教拉法埃洛·里亚里奥的两次赌博中输掉了不少于14,000个硬币，事后如何向教皇诉苦说自己是被对手欺骗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意大利就成了彩票的发源地。

It was to the imagination of the Italians that the peculiar character of their vengeance was due. The sense of justice was, indeed, one and the same throughout Europe, and any violation of it, so long as no punishment was inflicted, must have been felt in the same manner. But other nations, though they found it no easier to forgive, nevertheless forgot more easily, while the Italian imagination kept the picture of the wrong alive with frightful vividness. The fact that, according to the popular morality, the

avenging of blood is a duty—a duty often performed in a way to make us shudder—gives to this passion a peculiar and still firmer basi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tribunals recognize its existence and justification, and only attempt to keep it within certain limits. Even among the peasantry, we read of Thyestean banquets and mutual assassination on the widest scale. Let us look at an instance.

意大利人与众不同的复仇性格也是从他们的想象力中产生的。确实，在整个欧洲，正义感都是完全一样的，对于违反这种正义感的行为，只要还没有对其加以处罚，人们的感受也是一样的。但是，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尽管他们不会轻易地原谅这种行为，不过他们会轻易地把它忘记，而意大利人的想象力则会使他们把自己受伤害、受侮辱的情形记得一清二楚。按照一般的道德要求，报仇雪恨是一种责任——这是一种常常用让我们感到胆战心惊的方式来完成的责任——这一事实给这种激情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俨然坚实的基础。政府和法庭承认它的存在和它的合理性，仅仅尝试着把它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即使是在农民中，我们在书上也读到过吃人肉的宴会和大规模的互相行刺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In the district of Acquapendente three boys were watching cattle, and one of them said, 'Let us find out the way in which people are hanged.' While one was sitting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other, and the third, after fastening the rope round the neck of the first, was tying it to an oak, a wolf came, and the two who were free ran away and left the other hanging. Afterwards they found him dead, and buried him. On the Sunday his father came to bring him bread, and one of the two confessed what had happened, and showed him the grave. The old man then killed him with a knife, cut him up, brought away the liver, and entertained the boy's father with it at home. After dinner, he told him whose liver it was.

Hereupon began a series of reciprocal murders between the two families, and within a month 36 persons were killed, women as well as men.

在阿夸彭登泰地区，有三个男孩子在放牛，其中一个男孩子说："我们来看一下人是怎么被绞死的吧。"于是，其中第一个男孩就坐在了第二个男孩的肩膀上，第三个男孩就把绳子勒在了第一个男孩的脖子上，然后把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了一棵橡树上，这时来了一只狼，那两个身上没有系绳子的男孩子跑掉了，留下那个男孩一个人吊在树上。后来，他们发现他死了，就把他埋了起来。在星期天，死掉的那个男孩的爸爸来给他送面包，其中一个男孩就承认了所发生的事情，并把坟指给他看。这个老人当时就用刀子把他杀死了，并剖腹，取走了他的肝脏，在家里用它来招待这个孩子的父亲。吃过晚饭后，他告诉他这是谁的肝脏。随即，就在这两个家族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相互仇杀事件，在一个月之内，就杀死了36个人，有女人也有男人。

And such vendettas,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and extending to friends and distant relations, were not limited to the lower classes, but reached to the highest. The chronicles and novels of the period are full of such instances, especially of vengeance taken for the violation of women. The classic land for these feuds was Romagna, where the vendetta was interwoven with intrigues and party divisions of every conceivable sort. The popular legends present an awful picture of the savagery into which this brave and energetic people had relapsed. We are told, for instance, of a nobleman at Ravenna who had got all his enemies together in a tower, and might have burned them; instead of which he let them out, embraced them and entertained them sumptuously; whereupon shame drove them mad, and they conspired against him. Pious and saintly monks exhorted unceasingly to reconciliation, but they can

scarcely have done more than restrai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feuds already established; their influence hardly prevented the growth of new ones. The novelists sometimes describe to us this effect of religion—how sentiments of generosity and forgiveness were suddenly awakened, and then again paralyzed by the force of what had once been done and could never be undone. The pope himself was not always lucky as a peacemaker.

这种父子相传的，并波及朋友和远亲身上的族间仇杀事件，并不仅仅局限于下层社会中，也波及上层社会中。这一时代的编年史和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尤其是因玷污了女人而引起的报复行为。因为这些仇杀事件而出名的地方是罗马涅，在罗马涅“族间仇杀”是和一系列想象得到的尔虞我诈和党内分歧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民间流行的传说故事描绘出了一种可怕的野蛮场面，勇敢的、精力充沛的人民陷于这种野蛮的状态。比如，据说拉文那的一个贵族把他所有的敌人都幽禁在一个塔楼里，或许会把他们烧死在里面；但是他没有把他们烧死在里面，而是把他们都放了出来，拥抱他们，并且盛情设宴款待他们；在宴会上，他对他们的侮辱使他们发狂，于是他们就蓄谋反抗他。虔诚、圣洁的僧侣不停地劝告他们和解，但是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把已结下的怨恨遏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们的势力很难阻止新的怨恨发生。小说家们有时会向我们描述宗教的影响——慷慨和宽恕的感情是如何突然被唤醒，然后一不做二不休的力量又将之打回原形。作为和事佬，教皇本人的调和有时也是无效的。

Pope Paul II desired that the quarrel between Antonio Caffarello and the family of Alberino should cease, and ordered Giovanni Alberino and Antonio Caffarello to come before him, and bade them kiss one another, and promised them a fine of 2,000 ducats in case they renewed this strife, and two days after Antonio was stabbed by the same Giacomo Alberino, son of Giovanni, who

had wounded him once before; and the pope was full of anger, and confiscated the goods of Alberino, and destroyed his houses, and banished father and son from Rome.

教皇保罗二世希望安东尼奥·卡法尔雷洛和阿尔伯利诺家族之间的纷争可以停止，并命令乔瓦尼·阿尔伯利诺和安东尼奥·卡法尔雷洛来见他，然后命令他们互相亲吻对方，并和他们约定，如果他们再有纠纷，就罚款2,000个硬币，然而两天之后，安东尼奥就被乔瓦尼的儿子，即吉亚科莫·阿尔伯利诺刺伤，这个吉亚科莫·阿尔伯利诺以前就曾经刺伤过他一次。教皇因此大发雷霆，没收了阿尔伯利诺的全部财产，摧毁了他的房子，并把父子二人逐出了罗马。

The oaths and ceremonies by which reconciled enemies attempted to guard themselves against a relapse are sometimes utterly horrible. When the parties of the *Nove* and the *Popolari* met and kissed one another by twos in the cathedral at Siena on New Year's Eve 1494, an oath was read by which all salvation in time and eternity was denied to the future violator of the treaty—'an oath more astonishing and dreadful than had ever yet been heard'. The last consolations of religion in the hour of death were to turn to the damnation of the man who should break it. It is clear, however, that such a ceremony rather represents the despairing mood of the mediators than offers any real guarantee of peace, inasmuch as the truest reconciliation is just that one which has least need of it.

为了防止再度复仇，已经和解了的敌人需要宣誓和举行仪式，这有时是非常可怕的。1494年的平安夜，“新党”和“人民党”相会于锡耶纳的教堂，两两结对相互亲吻对方，并宣誓要是谁违反了誓言就不得及时超生，且永世不得超生——“这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惊人、可怕的

誓言。”谁要是违反了誓言，临终时宗教的最后安慰就成了这个人的诅咒。不过，很显然，这种宣誓的仪式与其说是提供任何真正的和平保障，不如说是代表了调停者失望至极的情绪，因为最诚心实意的和解是那种最不需要这种宣誓的和解。

This personal need of vengeance felt by the cultivated and highly placed Italian, resting on the solid basis of an analogous popular custom, naturally displays itself under a thousand different aspects, and receives the unqualified approval of public opinion, as reflected in the works of the novelists. All are at one on the point that, in the case of those injuries and insults for which Italian justice offered no redress, and all the more in the case of those against which no human law can ever adequately provide, each man is free to take the law into his own hands. Only there must be art in the vengeance, and the satisfaction must be compounded of the material injury and moral humiliation of the offender. A mere brutal, clumsy triumph of force was held by public opinion to be no satisfaction. The whole man with his sense of fame and of scorn, not only his fist, must be victorious.

有教养、有身份地位的意大利人的复仇必要是建立在一个与此相类似的民间习惯的坚实基础之上的，就像小说家们的小说作品中所反映的那样，它自然而然地就会以无数个千差万别的面貌展现出来，并得到公众舆论的无条件的赞同。对于这一点，大家一致认为，对于那些伤害和侮辱，当意大利的法律没有及时给予补偿时，尤其是当人们还没有适当的法律来对付这些伤害和侮辱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都可以来掌控法律。只是，报仇雪恨还要讲究艺术，而赎罪必须要包括给犯罪分子以物质损害和精神侮辱的惩罚。公众用于表达自己不满足的舆论是一种残忍的、笨拙的武力胜利。一个人，包括他对名誉感和轻蔑的认识都必须是胜利的，不单单是拳头上的胜利。

The Italian of that time shrank, it is true, from no dissimulation in order to attain his ends, but was wholly free from hypocrisy in matters of principle. In these he attempted to deceive neither himself nor others. Accordingly, revenge was declared with perfect frankness to be a necessity of human nature. Cool-headed people declared that it was then most worthy of praise when it was disengaged from passion, and worked simply from motives of expedience, 'in order that other men may learn to leave us unharmed'. Yet such instances must have formed only a small minority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in which passion sought an outlet. This sort of revenge differs clearly from the avenging of blood, which has already been spoken of; while the latter keeps more or less within the limits of retaliation—the *jus talionis* —the former necessarily goes much further, not only requiring the sanction of the sense of justice, but craving admiration, and even striving to get the laugh on its own side.

当然，那个时代的意大利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怕弄虚作假的，但是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他们是不会伪善弄假的。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他们既不想欺骗自己，也不想欺骗别人。于是，报仇雪恨被开诚布公地宣布为人性的需要。头脑冷静的人宣称，最值得让人称赞的是那种不受感情支配而仅仅是根据权宜之计为动机，“以让别人懂得不要伤害我们”的那种复仇行为。但是，比起那些感情用事的复仇行为，这种情况下的复仇行为一定只占很少一部分。这类复仇行为显然不同于我们之前已经说过的那种报仇雪恨；后者或多或少限于同态复仇——“以牙还牙”——的范围之内，前者必定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不仅要求有正义感的支持，而且还渴望得到称赞，甚至力求使得自己能反笑对方。

Here lies the reason why men were willing to wait so long for their revenge. A *bella vendetta* demanded as a rule a combination of circumstances for which it was necessary to wait patiently. The gradual ripening of such opportunities is described by the novelists with heartfelt delight.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愿意为了报仇雪恨而长久等待的原因。一个“漂亮的复仇”也不例外是需要机缘巧合的，为此就有必要耐心地等待。小说家们带着由衷的喜悦来描述这种时机的逐渐成熟。

There is no need to discuss the morality of actions in which plaintiff and judge are one and the same person. If this Italian thirst for vengeance is to be palliated at all, it must be by proving the existence of a corresponding national virtue, namely gratitude. The same force of imagination which retains and magnifies wrong once suffered might be expected also to keep alive the memory of kindness received. It is not possible, however, to prove this with regard to the nation as a whole, though traces of it may be seen in the Italian character of today. The gratitude shown by the inferior classes for kind treatment, and the good memory of the upper for politeness in social life, are instances of this.

如果原告和法官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来讨论行为的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了。如果意大利的这种复仇的渴望终究可以得到辩解的话，那么就必须证明有一种与之相呼应的民族美德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感恩之心的存在。同样的想象力既能够把以往所受的伤害牢记在心中，并把它夸大，也会把之前所受到的好意记在心里，永不忘记。尽管在现在的意大利人的性格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痕迹，但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要想证实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下层社会

的人们对友好的对待所表示的感激之情，以及上层社会对社交生活中优雅、礼貌的美好记忆，就是这方面的佐证。

This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moral qualities of the Italian repeats itself continually. If, nevertheless, we find more cold calculation in cases where the northerner rather follows his impulses, the reason is that individual development in Italy was not only more marked and earlier in point of time, but also far more frequent. Where this is the case in other countries, the results are also analogous. We find, for example, that the early emancipation of the young from domestic and paternal authority is common to North America and Italy. Later on, in the more generous natures, a tie of freer affection grows u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意大利人的想象力和道德品质之间的联系是接连不断地重复出现的。然而，如果我们发现，在一些情况下，北方人宁愿意气用事、感情冲动，而意大利人却能够头脑冷静地对此进行考虑，其原因是在意大利个体发展不仅更为突出，时间上更早一些，而且也是更为频繁的。如果在其他国家也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也会有相似的结果的。比如，我们发现了这样的情形，年轻人很早就从家庭和父亲的权威中解放出来，这种情况在北美和意大利是一样的。后来，在比较慷慨、大度的人身上，父母和子女之间就产生了一种较为自由的慈爱关系。

It is in fact a matter of extreme difficulty to judge fairly of other nations in the sphere of character and feeling. In these respects a people may be developed highly, and yet in a manner so strange that a foreigner is utterly unable to understand it. Perhaps all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are in this point equally favored.

实际上，要想对其他民族的性格和情感领域做出公平的判断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在这些方面，一个民族或许已经高度发展，但是它的发展方式是如此陌生，以至于一个外国人对它完全不能理解。或许，西方所有民族在这一点上是持赞同态度的。

But where the imagination has exercised the most powerful and despotic influence on morals is in the illicit intercourse of the two sexes. It is well known that prostitution was freely practiced in the Middle Ages,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syphilis. A discussion, however, on these questions does not belong to our present work. What seems characteristic of Italy at this time is that here marriage and its rights were more often and more deliberately trampled underfoot than anywhere else. The girls of the higher classes were carefully secluded, and of them we do not speak. All passion was directed to the married women.

但是，想象力对于道德产生的最强烈、最专横的影响是在两性偷情的问题上。大家都知道，在梅毒出现以前，在中世纪卖淫嫖娼是一种自由行为，是不受限制的。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在我们本书讨论的范围。似乎在这个时代，意大利的特点就是婚姻和婚姻的权利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频繁、更有意地被践踏。上层社会的女孩子们是被小心翼翼地与这些隔离开的，我们不讨论这些女孩子。我们把所有的激情都放在已婚女人的身上。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t is remarkable that, so far as we know, there was no diminution in the number of marriages, and that family life by no means underwent that disorganization which a similar state of things would have produced in the North. Men

wished to live as they pleased, but by no means to renounce the family, even when they were not sure that it was all their own. Nor did the race sink, either physically or mentally, on this account; for that apparent intellectual decline which showed itself towards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may be certainly accounted for by political and ecclesiastical causes, even if we are not to assume that the circle of achievements possible to the Renaissance had been completed. Notwithstanding their profligacy, the Italians continued to b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one of the healthiest and best-born populations in Europe, and have retained this position, with improved morals, down to our own time.

在这些情况下，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据我们所知，结婚人的数目并没有减少，家庭生活也没有遭受到破坏，而在同样的情况下，北方国家的家庭必将会遭到破裂。男人希望生活随性、自由，但绝不是放弃这个家庭，甚至是当他们不确定这个家庭是不是完全属于他们时，他们也没有产生放弃这个家庭的念头。无论是在身体上或者是在精神上，这个民族也没有因此而堕落下去；至于在16世纪中期所出现的智力明显衰退的现象当然可以用政治原因和宗教原因来解释，即使我们不承认文艺复兴时期所取得的那些成就已经圆满完成。虽然意大利人过的是一种放纵不笃的生活，但是在体格和精神上，意大利仍然是欧洲最健康、最具天赋的民族之一，并且以不断改善的道德一直把这种地位保留到我们这个年代。

When we come to look more closely at the ethics of love at the time of the Renaissance, we are struck by a remarkable contrast. The novelists and comic poets give us to understand that love consists only in sensual enjoyment, and that to win this, all means, tragic or comic, are not only permitted, but are interesting in proportion to their audacity and unscrupulousness. But if we turn to

the best of the lyric poets and writers of dialogues, we find in them a deep and spiritual passion of the noblest kind, whose last and highest expression is a revival of the ancient belief in an original unity of souls in the Divine Being. And both modes of feeling were then genuine, and could co¬exist in the same individual. It is not exactly a matter of glory, but it is a fact that, in the cultivated man of modern times, this sentiment can be not merely unconsciously present in both its highest and lowest stages, but may thus manifest itself openly, and even artistically. The modern man, like the man of antiquity, is in this respect too a microcosm, which the medieval man was not and could not be.

当我们更为严密地去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恋爱的道德标准时，我们不能不为鲜明的对比而感到惊讶。小说家和喜剧诗人让我们明白了爱情仅仅只存在于肉体的享受之中，为了得到这个，一切手段，不管是悲剧的还是喜剧的，不仅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厚颜无耻、肆无忌惮地使人对此感兴趣。但是，如果我们转向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和对话体作家，我们会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一种最为高贵的深挚、纯洁的情感，它最终、最高的表现形式是人灵从根本上是与神灵合一的这一古老信念的复活。这两种感情都是真实的，并且能够共存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确切地说，它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个事实，在现代有教养的人身上，这种情感不仅能够无意识地表现在它的最高阶段和最低阶段，而且因此或许可以公开地以一种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在这一方面，现代人像古代人一样，也是一个作为宇宙缩影的人类，而中世纪的人则不是这样的，而且也不可能是这样的。

To begin with the morality of the novelists. They treat chiefly, as we have said, of married women, and consequently of adultery.

我们先谈一下小说家们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像我们之前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主要是以已婚女人为对象，然后就谈到了男女私通的问题。

The opinion mentioned above of the equality of the two sex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relation to this subject. The highly developed and cultivated woman disposes of herself with a freedom unknown in northern countries; and her unfaithfulness does not break up her life in the same terrible manner, so long as no outward consequences follow from it. The husband's claim on her fidelity has not that firm foundation which it acquires in the North through the poetry and passion of courtship and betrothal. After the briefest acquaintance with her future husband, the young wife quits the convent or the paternal roof to enter upon a world in which her character begins rapidly to develop. The rights of the husband are for this reason conditional, and even the man who regards them in the light of a *jus quaesitum* thinks only of the outward conditions of the contract, not of the affections. The beautiful young wife of an old man sends back the presents and letters of a youthful lover, in the firm resolve to keep her honor *(honesta)*. But she rejoices in the love of the youth for his great excellence; and she perceives that a noble woman may love a man of merit without loss to her honor. But the way is short from such a distinction to a complete surrender.

上面所提到的关于两性平等的观点，与这个话题是有重大关系的。高度发展和有教养的女人以一种北方国家的人们所没有听说过的自由意志来支配自己；只要没有产生外部的后果，她的不忠就不会以同样可怕的方式破坏她的家庭生活。丈夫要求自己妻子忠于自己并没有牢固的基础，这种基础在北方国家是通过诗歌、求婚和订婚时的激

情来取得的。在和自己未来的丈夫认识不久之后，年轻的妻子就离开了女修道院或者父母的家庭，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里她的性格开始了快速的发展。为此，丈夫的权利是有条件的，甚至这个按照“询问权”的观点来看待这些权利的男人也只是想到这个婚姻契约的外在条件，而没有想到爱情。一个老男人的年轻貌美的妻子，由于坚决要维护自己的荣誉（正直），就把年轻情人的礼物和情书退了回去。但是，因为这个年轻情人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所以她也为得到这个青年人的爱情而欢欣；她感到一个高贵的女人在不失掉自己荣誉的同时，或许可以爱一个优秀的男人。但是这种高贵的特点很容易就完全屈服了。

The latter seems indeed as good as justified when there is unfaithfulness on the part of the husband. The woman, conscious of her own dignity, feels this not only as a pain, but also as a humiliation and deceit, and sets to work, often with the calmest consciousness of what she is about, to devise the vengeance which the husband deserves. Her tact must decide as to the measure of punishment which is suited to the particular case. The deepest wound, for example, may prepare the way for a reconciliation and a peaceful life in the future, if only it remain secret. The novelists, who themselves undergo such experiences or invent them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the age, are full of admiration when the vengeance is skilfully adapted to the particular case; in fact, when it is a work of art. As a matter of course, the husband never at bottom recognizes this right of retaliation, and only submits to it from fear or prudence. Where these motives are absent, where his wife's unfaithfulness exposes him or may expose him to the derision of outsiders, the affair becomes tragical, and not seldom ends in murder or other vengeance of a violent sort.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al motive from which these deeds arise that not only the husband but the brothers and the father of the woman feel

themselves not only justified in taking vengeance, but bound to take it. Jealousy, therefor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atter, moral reprobation but little; the real reason is the wish to spoil the triumph of others. 'Nowadays,' says Bandello,

当丈夫有不忠的行为时，上面所说的完全屈服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理由充分的。一个有尊严意识的女人，会感到这不仅是一种痛苦，而且也是一种耻辱和欺骗，她常常会以一种胸有成竹的冷静态度，来着手规划如何报复自己罪有应得的丈夫。对于特定的情况应给予怎么样的惩罚才算恰当，这就必须要由她的机智来决定。比如，如果可以保持住这个秘密，那么最深的伤害也是可以和解，而且也可以为以后的和平生活铺平道路。对于那些小说家们来说，他们自己亲身遭遇过同样的经历，或者是按照那个时代的精神虚构出了经历，他们都得到了高度的赞美。实际上，当一种报复行为能够很巧妙地顺应于某一特定情况时，其实它也就成了一种艺术作品。当然，丈夫也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这种报复的权利，他也仅仅是由于恐惧和谨慎才屈服的，要是没有这些原因，要是妻子的不忠行为使他或者可能使他遭受到外人的嘲笑，那么事情就变成悲剧了，并且往往会以凶杀或者其他暴力的报复行为而结束。不仅丈夫本人，而且女方的父亲和兄弟认为他们自己有理由和责任来进行复仇，这是产生这些事情的真正动机的特点所在。因此，嫉妒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道德谴责和这件事情也没多大关系；真正的理由是希望破坏其他人的胜利。“今天，”班戴洛说：

> we see a woman poison her husband to gratify her lusts, thinking that a widow may do whatever she desires. Another, fearing the discovery of an illicit amour, has her husband murdered by her lover. And though fathers, brothers and husbands arise to extirpate the shame with poison, with the

sword and by every other means, women still continue to follow their passions, careless of their honor and their lives.

我们见过一个女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而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她以为成了寡妇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还有一个女人，害怕自己的私情被丈夫发现，就让情人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尽管做父亲的、做兄长的、做丈夫的都起来用毒药、刀剑以及其他一切手段来去除这种耻辱，但是女人们弃她们的荣誉和生命于不顾，依然继续听任她们性欲的支配。

Another time, in milder strain, he exclaims:

另外有一次，他用较为温和的口气感叹说：

Would that we were not daily forced to hear that one man has murdered his wife because he suspected her of infidelity; that another has killed his daughter, on account of a secret marriage; that a third has caused his sister to be murdered, because she would not marry as he wished! It is great cruelty that we claim the right to do whatever we list, and will not suffer women to do the same. If they do anything which does not please us, there we are at once with cords and daggers and poison. What folly it is of men to suppose their own and their house's honor depend on the appetite of a

woman!

> 但愿我们不用每天都被迫听到这样的一些事情，有一个男人因为怀疑妻子不忠，就把她杀害了；另外一个男人因为女儿秘密结婚，就杀死了她；还有一个男人因为自己的妹妹不愿按照他的意愿完婚就把她给杀死了！我们要求有权利做自己所列举出的任何事情，但是却不允许女人们这么做，这是非常残酷的事情。只要她们有做出任何我们不喜欢的事，我们就立刻用绳索、刀剑和毒药来伺候。一个男人认为自己的以及家族的荣誉取决于一个女人的欲望，这是何等愚蠢啊！

The tragedy in which such affairs commonly ended was so well known that the novelist looked on the threatened gallant as a dead man, even while he went about alive and merry. The physician and lute-player Antonio Bologna had made a secret marriage with the widowed Duchess of Amalfi, of the house of Aragon. Soon afterwards her brother succeeded in securing both her and her children, and murdered them in a castle. Antonio, ignorant of their fate, and still cherishing the hope of seeing them again, was staying at Milan, closely watched by hired assassins, and one day in the society of Ippolita Sforza sang to the lute the story of his misfortunes. A friend of the house, Delio, 'told the story up to this point to Scipione Atellano, and added that he would make it the subject of a novel, as he was sure that Antonio would be murdered'. The manner in which this took place, almost under the eyes of Delio and Atellano, is thrillingly described by Bandello.

这类事情所共有的悲剧性结果是人所共知的，以至于小说家把那个处于危境之中的情郎看作是一个死人，即使是他还活着，并到处快乐地走动。那个医生兼琵琶演奏着，安东尼奥·博洛尼亚曾经和阿拉贡家族的一个叫做阿玛菲的女寡妇公爵秘密结婚。不久之后，女公爵的兄长就把她和她的孩子们关押了起来，并在一个城堡里把他们杀死。安东尼奥对他们的命运全然不知，仍然抱着和他们再次相见的希望，安东尼奥住在米兰，被雇佣的刺客密切监视着，有一天，他在伊波丽塔·斯福尔扎的社交会上弹奏着自己的琵琶，唱着自己不幸的遭遇。斯福尔扎家族的一个叫做德利奥的朋友，“把上面的故事讲给西皮奥内·阿特拉诺听，并补充说他把这个故事当作一本小说的主题，因为他确信安东尼奥将一定会被刺杀”。这个几乎是在德利奥和阿特拉诺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凶杀案被班戴洛描述得让人胆战心惊。

Nevertheless, the novelists habitually show a sympathy for all the ingenious, comic and cunning features which may happen to attend adultery. They describe with delight how the lover manages to hide himself in the house, all the means and devices by which he communicates with his mistress, the boxes with cushions and sweetmeats in which he can be hidden and carried out of danger. The deceived husband is described sometimes as a fool to be laughed at, sometimes as a bloodthirsty avenger of his honor; there is no third situation except when the woman is painted as wicked and cruel, and the husband or lover is the innocent victim. It may be remarked, however, that narratives of the latter kind are not strictly speaking novels, but rather warning examples taken from real life.

虽然如此，小说家习惯于对所有可能和通奸一起发生的新颖的、滑稽和巧妙的特征表示同情。他们用一种愉悦的心情来描述情人是如何把自己藏在房子里的，描述出了他用于和自己的情妇互通消息的一

切手段和设备，也描述了那些可以让他藏身并且安全脱险的铺有锦垫和装有点心的箱子。那个被骗得团团转的丈夫有时被刻画成一个被嘲笑的傻子形象，有时也被描述成一个为了顾全自己荣誉的报仇雪恨的复仇者；一般都把那个女人刻画成一个邪恶、残忍的人物形象，把丈夫和情人刻画成一个无辜的牺牲者形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三种情况。但是，我们可以评论说后面一个故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引用的让人值得警惕的例子。

When in the cours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Italian life fell more and more under Spanish influence, the violence of the means to which jealousy had recourse perhaps increased. But this new phase must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punishment of infidelity which existed before, and which was founded in the spirit of the Renaissance itself. As the influence of Spain declined, these excesses of jealousy declined also, till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y had wholly disappeared, and their place was taken by that indifference which regarded the *cicisbeo* as an indispensable figure in every household, and took no offence at one or two supernumerary lovers *(patiti)*.

在16世纪，当意大利的生活越来越受到西班牙的影响时，因为嫉妒而采取的暴力手段或许比以前更为暴烈了。但是这种新情况必须要和以前已经存在的，且在文艺复兴精神里找得到的对于不忠的惩罚区分开来。随着西班牙影响力的衰弱，这些极端的嫉妒也随之减弱了，直到17世纪末期完全销声匿迹，并被一种冷漠所代替，这种冷漠把“情夫”看作是每一个家庭所不可或缺的人物，对于一两个多余的情人，人们并没有生气。

But who can undertake to compare the vast sum of wickedness

which all these facts imply with what happened in other countries? Was the marriage-tie, for instance, really more sacred in France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an in Italy? The *fabliaux* and farces would lead us to doubt it, and rather incline us to think that unfaithfulness was equally common, though its tragic consequences were less frequent, because the individual was less developed and his claims were less consciously felt than in Italy. More evidence, however, in favor of the Germanic peoples lies in the fact of the social freedom enjoyed among them by girls and women, which impressed Italian travelers so pleasantly in England and in the Netherlands. And yet we must not attach too much importance to this fact. Unfaithfulness was doubtless very frequent, and in certain cases led to a sanguinary vengeance. We have only to remember how the northern princes of that time dealt with their wives on the first suspicion of infidelity.

但是，谁能够把这些事实当中所蕴含的大量不道德行为和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不道德行为做一个比较呢？比如说，在15世纪的时候，法国的婚姻关系是不是真的就比意大利的婚姻关系神圣呢？那些粗俗而幽默的故事诗和滑稽剧会让我们对它产生怀疑，更确切地说是让我们更容易认为不忠行为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虽然它的悲剧性后果是比较罕见的，因为和意大利相比较起来，个人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并且要求也不是那样被自觉地意识到的。但是，更多有利于日耳曼民族的佐证存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之中：女孩子们和妇女们享有社交自由的权利，这种社交自由在英国和荷兰给意大利游客留下了如此愉快的印象。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重视这样的一个事实。不忠行为无疑是屡见不鲜的，并且在某种情况下引起了残暴的报仇雪恨行为。我们只要一想起北方的君主们在最初怀疑自己的妻子不忠时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妻子的就已经足够了。

But it was not merely the sensual desire, not merely the vulgar appetite of the ordinary man, which trespassed upon forbidden ground among the Italians of that day, but also the passion of the best and noblest; and this, not only because the unmarried girl did not appear in society, but also because the man, in proportion to the completeness of his own nature, felt himself most strongly attracted by the woman whom marriage had developed. These are the men who struck the loftiest notes of lyrical poetry, and who have attempted in their treatises and dialogues to give us an idealized image of the devouring passion—*l'amor divino.* When they complain of the cruelty of the winged god, they are not only thinking of the coyness or hard-heartedness of the beloved one, but also of the unlawfulness of the passion itself. They seek to raise themselves above this painful consciousness by that spiritualization of love which found a support in the Platonic doctrine of the soul, and of which Pietro Bembo is the most famous representative. His thoughts on this subject are set forth by himself in the third book of the *Asolani,* and indirectly by Castiglione, who puts in his mouth the splendid speech with which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ortigiano* concludes: neither of these writers was a stoic in his conduct, but at that time it meant something to be at once a famous and a good man, and this praise must be accorded to both of them; their contemporaries took what these men said to be a true expression of their feeling, and we have not the right to despise it as affectation. Those who take the trouble to study the speech in the *Cortigiano* will see how poor an idea of it can be given by an extract. There were then living in Italy several distinguished women, who owed their celebrity chiefly to relations of this kind, such as Giulia Gonzaga, Veronica da Correggio and, above all, Vittoria Colonna. The land of profligates and scoffers respected these women and this sort of love—and what more can be said in their favor? We cannot tell how far vanity had to do with the matter, how far Vittoria was

flattered to hear around her the sublimated utterances of hopeless love from the most famous men in Italy. If the thing was here and there a fashion, it was still no trifling praise for Vittoria that she, at least, never went out of fashion, and in her latest years produced the most profound impressions. It was long before other countries had anything similar to show.

但是，在那个时代侵犯了意大利人的禁地的不仅仅只是对于肉体的欲望，也不仅仅只是普通人的低俗的欲望，而且也是最为优秀的、最为高贵的人们的情欲；不仅仅只是因为未婚的女孩子不出现在这些社交中，而且是因为男人们随其个性全面发展，感到自己被一个已婚的女性强烈地吸引着。这些男人在抒情诗里弹着最高贵的调子，而且试图在他们的论著和对话录里面把自己的这种贪婪的情欲——“神圣的爱情”——向我们描述成一个理想的形象。当他们因为爱神的残酷而向我们诉苦时，他们不仅仅想到了自己心爱之人的矜持和无情，而且也想到了这种情欲本身的不合法性。他们设法在柏拉图的精神学说里面找到支撑这种精神恋爱的证据，从而使自己超脱这种痛苦的感觉，彼得罗·本博就是这种精神恋爱的最有名的代表人物。他在自己的《阿苏拉尼》这本书的第十三卷里面陈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而卡斯蒂廖内模仿他的口吻发表了一篇漂亮的演说词，作为《廷臣论》这本书的第四卷的结束语，并且也间接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本书的第四卷的结束语是这样论述的：这两位作者在行为上都不是禁欲主义者，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多少可以说他是一个名人，并且是一个好男人，他们两个人是受得起这样的赞誉的；他们同时代的人把他们所说的话看作是他们感情的真实体现，我们没有权利把这种感情的真实体现看作是矫揉造作的行为，从而不予重视。那些不辞劳苦来研究《廷臣论》中这篇演讲的人们将会明白，摘录所能给出的观点是多么匮乏。当时在意大利生活着几个高贵的女人，他们主要就是凭借这一类的故事而声名鹊起，比如朱莉亚·贡扎加、维拉尼卡·柯勒乔，尤其是维特多利亚·科隆纳。肆意挥霍者和嘲笑者的国土都尊重这些女人和这一类的爱情——还能说出什么有利于他们的话语来呢？我们不

知道虚荣和这件事情究竟有多大的关系，以及当维特多利亚听到她周围的那些最有名的意大利男人因为绝望的爱情而表达的美妙动听的言辞是何等高兴。即使这样的事情盛行于各个地方，但是对于维特多利亚来说它仍然绝非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称赞，至少她一直都是紧跟时尚的步伐的，并且在她晚年的时候，还能够给人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很久之后，类似的事情才在其他国家出现。

In the imagination then, which governed this people more than any other, lies one general reason why the course of every passion was violent, and why the means used for the gratification of passion were often criminal. There is a violence which cannot control itself because it is born of weakness; but in Italy what we find is the corruption of powerful natures. Sometimes this corruption assumes a colossal shape, and crime seems to acquire almost a personal existence of its own.

在当时，这个国家的想象力对国民的控制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因而这个民族的每一次充满激情的发展进程都是猛烈的，而用来满足这种激情的方法往往都是犯罪。自身无法控制的激烈情绪是因为它来自于懦弱的性格；但是在意大利我们看到的却是强烈性格的堕落。有的时候，堕落呈现的是一种庞大的形式，而犯罪行为看似几乎是无处不在的。

The restraints of which men were conscious were but few. Each individual, even among the lowest of the people, felt himself inwardly emancipated from the control of the state and its police, whose title to respect was illegitimate, and itself founded on violence; and no man believed any longer in the justice of the law. When a murder was committed, the sympathies of the people,

before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were known, ranged themselves instinctively on the side of the murderer. A proud, manly bearing before and at the execution excited such admiration that the narrator often forgets to tell us for what offence the criminal was put to death. But when we add to this inward contempt of law and to the countless grudges and enmities which called for satisfaction, the impunity which crime enjoyed during times of political disturbance, we can only wonder that the state and society were not utterly dissolved. Crises of this kind occurred at Napl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Aragonese to the French and Spanish rule, and at Milan, on the repeated expulsions and returns of the Sforzas; at such times those men who have never in their hearts recognized the bonds of law and society come forward and give free play to their instincts of murder and rapine. Let us take, by way of example, a picture drawn from a humbler sphere.

人们所意识到的限制是很少的。甚至在最底层的人们中，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已经从国家及警察力量的控制之中解脱出来了，国家对于尊敬的要求是不合法的，国家本身就是建立在暴力行为之上的；没有人再相信法律的公平正义了。当发生谋杀案时，在案情水落石出之前，人们本能地会同情凶手。在执行死刑之前和执行死刑时所展现出的骄傲、英勇的姿态激起了人们的钦佩，以至于讲故事的人忘记告诉我们罪犯是因为犯了什么罪行而被处以死刑的。然而，不仅这种内在的对法律的蔑视，以及无尽的怨恨和仇怨需要我们去整治，而且政治动荡时期幸免于受到惩罚的罪行也需要处理，我们只是对这个国家和社会没有彻底解体而感到惊讶。这类危机发生在那不勒斯和米兰，那不勒斯处于从阿拉贡王朝向法兰西和西班牙统治的过渡时期，而米兰处于斯福尔扎家族屡次被驱逐和复辟的时期；在这种时期，那些在内心深处从未承认过法律和社会约束力的人就涌现了出来，并肆意进行谋杀和劫掠。我们举例看一看下层社会的情形。

When the duchy of Milan was suffering from the disorders which followed the death of Galeazzo Maria Sforza, about the year 1480, all safety came to an end in the provincial cities. This was the case in Parma, where the Milanese governor, terrified by threats of murder, consented to throw open the gaols and let loose the most abandoned criminals. Burglary, the demolition of houses,public assassination and murders were events of everyday occurrence. At first the authors of these deeds prowled about singly, and masked; soon large gangs of armed men went to work every night without disguise. Threatening letters, satires and scandalous jests circulated freely; and a sonnet in ridicule of the government seems to have roused its indignation far more than the frightful condition of the city. In many churches the sacred vessels with the host were stolen, and this fac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temper which prompted these outrages.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what would happen now in any country of the world if the government and police ceased to act, and yet hindered by their pres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ovisional authority; but what then occurred in Italy wears a character of its own, through the great share which the personal hatred and revenge had in it. The impression, indeed, which Italy at this period makes on us is that even in quiet times great crimes were commoner than in other countries. We may, it is true, be misled by the fact that we have far fuller details on such matters here than elsewhere, and that the same force of imagination, which gives a special character to crimes actually committed, causes much to be invented which never really happened. The amount of violence was perhaps as great elsewhere. It is hard to say for certain whether in the year 1500 men were any safer, whether human life was after all better protected, in powerful, wealthy Germany, with its robber knights, extortionate beggars and daring highwaymen. But one thing is certain, that premeditated crimes, committed professionally and for hire by third parties, occurred in Italy with

great and appalling frequency.

大约在1480年左右，当米兰公爵领地继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死后陷入一片混乱之时，各省城都失去了一切安全腹地。帕尔马也是处于这样的情况，在帕尔马米兰总督遭到了凶杀的威胁，并同意打开监狱大门，把最遭诟骂的罪犯释放了出去。入室盗窃、毁坏房屋、在公众场所发生的行刺和谋杀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起初，干这些坏事的人还是单独地、戴着面具偷偷摸摸地进行；不久之后，一帮武装人员就每天夜里没有任何掩饰地、明目张胆地进行。恐吓信、讽刺诗和诽谤性的戏谑被到处散播；一首讽刺政府的十四行诗似乎比这个城市所处的可怕情形更能引起人们的愤怒了。在许多教堂里，祭祀容器连同圣尊一起被盗走，这个事实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激起愤怒行为的怒火。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政府和警察已没有任何作用，但还会凭着自己的存在来干涉一个临时职权的建立，那么很难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当时在意大利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个人仇恨和报复行为占有很大比重而带有它自己的特性。确实，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即使在和平时期，重大的犯罪活动也比其他国家更为普遍。的确，相比于其他地方的事情，我们对于这里的事情了解得更为全面，这种想象力赋予犯罪分子以特有的性质，虚构了许多从未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我们可能会因此而产生误解。在其他地方发生的暴力事件或许不亚于在意大利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强大、富裕的德意志也有骑士强盗、敲诈勒索的乞丐、彪悍的马贼，我们很难确切地说，在1500年的德意志，人们是否会更安全一点，人们的生活是不是更好地得到了保障。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由职业罪犯和雇佣的第三者所进行的有预谋的犯罪行为在意大利是频频发生的事情，强度之大，骇人听闻。

So far as regards brigandage, Italy, especially in the more fortunate provinces, such as Tuscany, was certainly not more, and probably less, troubled than the countries of the North. But the

figures which do meet us a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untry. It would be hard, for instance, to find elsewhere the case of a priest gradually driven by passion from one excess to another, till at last he came to head a band of robbers. That age offers us this example among others. On 12 August 1495, the priest Don Niccolo de' Pelegati of Figarolo was shut up in an iron cage outside the tower of San Giuliano at Ferrara. He had twice celebrated his first mass; the first time he had the same day committed murder, but afterwards received absolution at Rome; he then killed four people and married two wives, with whom he traveled about. He afterwards took part in many assassinations, violated women, carried others away by force, plundered far and wide, and infested the territory of Ferrara with a band of followers in uniform, extorting food and shelter by every sort of violence. When we think of what all this implies, the mass of guilt on the head of this one man is something tremendous. The clergy and monks had many privileges and little supervision, and among them were doubtless plenty of murderers and other malefactors—but hardly a second Pelegati. It is another matter, though by no means creditable, when ruined characters sheltered themselves in the cowl in order to escape the arm of the law, like the corsair whom Masuccio knew in a convent at Naples. What the real truth was with regard to Pope John XXIII in this respect is not known with certainty. [3_3]

就抢劫行为来说，在意大利，尤其是像托斯卡纳区这样较为幸运的省市区，这里遭受的抢劫行为肯定不比北方国家遭受的多，或许更少。但是我们所遇见的那些人物却是这个国家所特有的。例如，在其他地方，我们很难发现这样的情况，一个牧师，逐渐被情欲驱使着做尽坏事，程度一次比一次恶劣，直到最后沦为一帮劫匪的头目。这是那个时代给我们提供的其中一个例子。在1495年8月12日，来自费加罗洛的唐·尼科洛·佩莱加蒂牧师被关在费拉拉的圣朱利亚诺钟楼外的

一个铁笼子里。他曾举行过两次开台弥撒，在第一次举行开台弥撒的当天他就犯下了杀人罪，但是后来在罗马获得了赦免；然后，他又杀了四个人，娶了两个妻子，带着他的两个妻子到处旅行。后来，他参加了多次行刺事件，侵犯妇女，强抢其他的妇女，大规模地进行抢劫，并且率领一帮武装党羽横行出没于费拉拉地区，用各种暴力手段掠食劫舍。当我们想到这些行为所暗示的意思时，我们不得不感到这个人的弥天大罪是有点骇人听闻的。牧师和僧侣享有许多特权，并且极少受到监督，在他们中间无疑存在着无数个杀人犯和罪犯——但是再没有第二个佩莱加蒂。当毁掉了自己一生的这些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隐居于牧师的队伍中，就像马苏奇奥在那不勒斯的一个修道院里所认识的那个海盗一样，这是另外一回事，虽然绝不可信。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这一方面的情况是否属实，我们还无法确定。 [4_3]

The age of the famous brigand chief did not begin till later,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hen the political strife of Guelph and Ghibelline, of Frenchman and Spaniard, no longer agitated the country. The robber then took the place of the partisan.

一直到17世纪，当归尔甫派和吉伯林党，以及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政治斗争不再搅乱这个国家时，著名的强盗领袖时代才终于开始。这时，强盗取代了党派。

In certain districts of Italy, where civilization had made little progress, the country people were disposed to murder any stranger who fell into their hands. This was especially the case in the more remote parts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where the barbarism dated probably from the days of the Roman *latifundia,* and when the stranger and the enemy *(hospes* and *hostis)* were in all good faith held to be one and the same. These people were far from being

irreligious. A herdsman once appeared in great trouble at the confessional, avowing that, while making cheese during Lent, a few drops of milk had found their way into his mouth. The confessor, skilled in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discovered in the course of his examination that the penitent and his friends were in the practice of robbing and murdering travelers, but that, through the force of habit, this usage gave rise to no twinges of conscience within them. We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what a degree of barbarism the peasants elsewhere could sink in times of political confusion.

在意大利某些文化发展滞后的地区，乡下人会杀害任何一个落到他们手里的外邦人。尤其在那不勒斯王国较偏远的地方更是如此，在这里，这种野蛮行为大概起源于罗马的“大庄园”时期，当时确实是把外邦人和敌人（外来客人和外来敌人）同等对待的。这些人也绝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曾经有一个牧民在忏悔室里表现出了极大的痛苦，坦白承认在大斋节期间做奶酪时，喝了几滴牛奶。这个倾听忏悔者的神父熟知当地的风俗习惯，所以在他审查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忏悔者与他的朋友经常抢劫和谋杀旅客，已成恶习，然而，由于习惯的力量，这种风俗并没有使他们良心不安，感到内疚。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在政治混乱时期，其他地方的农民已经堕落到了什么样的野蛮程度。

A worse symptom than brigandage of the morality of that time was the frequency of paid assassination. In that respect Naples was admitted to stand at the head of all the cities of Italy. 'Nothing,' says Pontano, 'is cheaper here than human life.' But other districts could also show a terrible list of these crimes. It is hard, of course, to classify them according to the motives by which they were prompted, since political expediency, personal hatred, party hostility, fear and revenge all play into one another. It is no small honor to the Florentines, the most highly developed people of Italy,

that offences of this kind occurred more rarely among them than anywhere else, perhaps because there was a justice at hand for legitimate grievances which was recognized by all, or because the higher culture of the individual gave him different views as to the right of men to interfere with the decrees of fate. In Florence, if anywhere, men were able to feel the incalculable consequences of a deed of blood, and to understand how uncertain the author of a so-called profitable crime is of any true and lasting gain. After the fall of Florentine liberty, assassination, especially by hired agents, seems to have rapidly increased, and continued till the government of Cosimo I had attained such strength that the police were at last able to repress it.

在那个时代，在道德上比抢劫更糟糕的一个现象就是屡屡发生的雇人行刺事件。在这个方面，普遍认为在意大利所有城市中那不勒斯居于首位。庞达诺说："在这里没有比性命更低贱的东西了。"但是，在其他地区，也能看到一系列可怕的犯罪行为。当然，我们很难根据他们的作案动机来对这些犯罪活动加以分类，由于政治权宜、个人仇恨、党派纷争、恐惧、报仇雪恨都相互交织在一起。佛罗伦萨人是意大利最为高度发展的人群，和其他任何地方相比，佛罗伦萨是发生犯罪活动最少的地方，对佛罗伦萨人来说这是个不小的荣誉，或许是因为对正当的控诉有一个大家认可的现成的法律，或者是因为个人的高层次文化让他对人们与命运的法令相抗衡的权利持不同的观点。只有在佛罗伦萨，人们才能够感受到流血事件的难以估量的后果，明白了一件所谓有利可图的犯罪活动的真正的、最终的利润对罪犯来说是何等不可靠。在佛罗伦萨人丧失自由之后，刺杀，尤其是雇人行刺，似乎快速增加，并且一直延续到科西莫一世政府的势力强大到足以镇压它的时候。

Elsewhere in Italy paid crimes were probably more or less

frequent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powerful and solvent buyers. Impossible as it is to make any statistical estimate of their amount, yet if only a fraction of the deaths which public report attributed to violence were really murders, the crime must have been terribly frequent. The worst example of all was set by princes and governments, who without the faintest scruple reckoned murder as one of the instruments of their power. And this, without being in the same category with Cesare Borgia. The Sforzas, the Aragonese monarchsand, later on, the agents of Charles V resorted to it whenever it suited their purpose.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eople at last became so accustomed to facts of this kind that the death of any powerful man was seldom or never attributed to natural causes. There were certainly absurd notions current with regard to the effect of various poisons. There may be some truth in the story of that terrible white powder used by the Borgias, which did its work at the end of a definite period, and it is possible that it was really a *venenum atterminatum* which the Prince of Salerno handed to the Cardinal of Aragon, with the words: 'In a few days you will die, because your father, King Ferrante, wished to trample upon us all.' But the poisoned letter which Caterina Riario sent to Pope Alexander VI would hardly have caused his death even if he had read it; and when Alfonso the Great was warned by his physicians not to read in the Livy which Cosimo de' Medici had presented to him, he told them with justice not to talk like fools. Nor can that poison with which the secretary of Piccinino wished to anoint the sedan-chair of Pius II have affected any other organ than the imagination. The proportion which mineral and vegetable poisons bore to one another cannot be ascertained precisely. The poison with which the painter Rosso Fiorentino destroyed himself (1541) was evidently a powerful acid, which i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to administer to another person without his knowledge. The secret use of weapons, especially of the dagger, in the service of

powerful individuals was habitual in Milan, Naples and other cities. Indeed, among the crowds of armed retainers who were necessary for the personal safety of the great, and who lived in idleness, it was natural that outbreaks of this mania for blood should from time to time occur. Many a deed of horror would never have been committed, had not the master known that he needed but to give a sign to one or other of his followers.

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雇佣犯罪发生的次数是否频繁，或许与势力是否强大、是否出得起钱雇佣罪犯的雇主的数量成比例的。虽然不可能对它们的次数做出任何统计估计，但是只要公开报道由暴力而致死的案件中有一小部分是死于真正的谋杀，那么这种犯罪活动一定是非常频繁的了。君主和政府树立了最为糟糕的榜样，他们肆无忌惮地把谋杀当作是维持自己统治政权的一个手段。而这还和切萨雷·波吉亚不属于同一种类型。斯福尔扎家族的人们、阿拉贡王朝的君主，以及后来查理五世的代理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适用于他们的目的，他们就会诉诸谋杀这种手段。人们的想象力终于对这类事实习以为常了，以至于他们很少认为或者从未认为任何一个大人物的死是由自然因素造成的。对于各类毒药的效力理所当然流行着一种荒谬的观点。对于波吉亚家族所使用的可怕的白色粉末的故事，或许有几分属实，这种白色粉末在一定时间段之内就会发生效力，而萨勒诺的君主交给阿拉贡的红衣主教的可能真的是一种“缓效性的毒药”，他在交给阿拉贡的红衣主教时说：“几天之后你就会死的，因为你的父亲，费兰特的国王，像要蹂躏我们所有人。”但是卡泰丽娜·里亚里奥送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带有毒药的信，即使是他读了这封信，也不会被毒死的；当大阿尔方索的医生提醒他不要读科西莫·美第奇呈送给他的李维那部作品时，他就很公正地对他们说不要像傻瓜一样乱说话。皮奇尼诺的秘书希望涂在教皇庇护二世的轿子上的毒药除了引起心理上的不安之外，并没有影响到其他任何一个器官。矿物毒药和蔬菜农药之间的比例是不能精确查明的。画家罗索·菲奥兰提诺（1541年）自杀用的毒药很显然是一种强酸，是不可能用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而不被察觉的。

在米兰、那不勒斯以及其他城市，有势力的人秘密使用武器，尤其是秘密使用匕首，是习以为常的。的确，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为了个人的人身安全是有必要留成群的全副武装的侍卫在自己身边的，这些人整天无所事事，有时爆发杀人的狂躁也是自然的。如果不是主人知道自己只需向他的这个或那个随从示意杀人，那么许多恐怖事件将永远不会发生。

Among the means used for the secret destruction of others—so far, that is, as the intention goes—we find magic, practiced, however, sparingly. Where *maleficii, malie* and so forth are mentioned, they appear rather as a means of heaping up additional terror on the head of some hated enemy. At the courts of France and England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magic, practiced with a view to the death of an opponent, plays a far more important part than in Italy.

在那些用来秘密杀害别人的手段中——迄今为止，仅就有这种打算而言——我们发现了一种妖术，虽然用得不多。当我们提到“巫术”“卜术”等魔力时，它们毋宁说是被看作给某个可恨的敌人头上增添另外的恐怖的一种手段。与意大利相比较而言，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宫廷里，想用来置敌人于死地的妖术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In this country, finally, where individuality of every sort attained its highest development, we find instances of that ideal and absolute wickedness which delights in crimes for their own sake, and not as means to an end, or at any rate as means to ends for which our psychology has no measure.

最终，在这样一个每种个性都获得最高度发展的国家里，我们看到了那种理想的、绝对邪恶的例子，喜欢为了犯罪而犯罪，而不是把犯罪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或者至少是达到某些我们想象不到的目的的手段。

Among these appalling figures we may first notice certain of the *condottieri,* such as Braccio da Montone, Tiberto Brandolino and that Werner von Urslingen whose silver hauberk bore the inscription: 'The enemy of God, of pity and of mercy'. This class of men offers us some of the earliest instances of criminals deliberately repudiating every moral restraint. Yet we shall be more reserved in our judgement of them when we remember that the worst part of their guilt—in the estimate of those who record it—lay in their defiance of spiritual threats and penalties, and that to this fact is due that air of horror with which they are represented as surrounded. In the case of Braccio, the hatred of the Church went so far that he was infuriated at the sight of monks at their psalms, and had them thrown down from the top of a tower;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loyal to his soldiers and a great general'. As a rule, the crimes of the *condottieri* were committed for the sake of some definite advantage, and must be attributed to a position in which men could not fail to be demoralized. Even their apparently gratuitous cruelty had commonly a purpose, if it were only to strike terror. The barbarities of the House of Aragon, as we have seen, were mainly due to fear and to the desire for vengeance. The thirst for blood on its own account, the devilish delight in destruction, is most clearly exemplified in the case of the Spaniard Cesare Borgia, whose cruelties were certainly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the end which he had in view. In Sigismondo Malatesta, tyrant of Rimini, the same disinterested love of evil may also be detected. It is not only the court of Rome, but the verdict of history, which convicts

him of murder, rape, adultery, incest, sacrilege, perjury and treason, committed not once but often. The most shocking crime of all—the unnatural attempt on his own son Roberto, who frustrated it with his drawn dagger—may have been the result, not merely of moral corruption, but perhaps of some magical or astrological superstition. The same conjecture has been made to account for the rape of the Bishop of Fano by Pierluigi Farnese of Parma, son of Paul III.

在这些骇人听闻的人物当中，我们可以首先注意到某个雇佣军队长，如布拉齐奥·达·蒙托纳、提伯尔托·布兰德利诺以及还有那个维尔纳·冯·乌尔斯林根，乌尔斯林根的铠甲上刻有这样的铭文："上帝、同情与怜悯三者的敌人。"这一类人为我们提供了某些故意批判种种道德约束的罪犯的最早的佐证。但是，他们的罪行中最为恶劣的部分——根据记载这些罪行的人们的估计——在于挑战精神上的威胁和惩罚，由于这个事实，人们觉得他们周围萦绕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当我们想起这一点的时候，在对他们的判断上将会采取一种更为保留的态度。对于布拉齐奥的这种情况，他对教会憎恨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一看到僧侣唱赞歌他就感到愤怒，曾经把他们从一个钟楼上扔了下去；但与此同时，"他却忠实于他的士兵，是一个伟大的将军"。一般来说，雇佣军队长的犯罪是为了某种确切的好处，并且必定归因于必然使人们道德败坏的处境。即使他们显然是无缘无故的残忍行为，一般也有一个目的，哪怕它只是为了引起恐惧。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阿拉贡家族的野蛮主要是由畏惧和报仇雪恨的欲望所引起的。西班牙人切萨雷·波吉亚的例子最为清晰地证明了由于自己本身嗜好杀人而杀人的行为，以及穷凶极恶地喜欢毁灭的行为，切萨雷·波吉亚的残忍与他所怀有的目的是不成比例的。在里米尼的暴君，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同样喜欢无缘无故地喜好作恶的行为。不仅罗马的法庭，而且历史的裁决，都证明他不只是一次而且是时常犯谋杀、强奸、私通、乱伦、亵渎神灵、背信弃义，以及叛国等罪。他不近人情，试图杀害自己的儿子罗伯托，但是因为他的儿子

拔剑反抗而谋杀未遂——在所有犯罪行为中，这是一个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这不仅仅是道德堕落的后果，而且可能也是对某种妖术和占星术迷信的后果。教皇保罗三世的儿子，帕尔马的皮埃路易吉·法尔内塞，曾经以同样的猜想来解释法诺主教犯下的强奸罪。

If we now attempt to sum up the principal features in the Italian character of that time, as we know it from a study of the life of the upper classes, we shall obtain something like the following result. The fundamental vice of this character was at the same time a condition of its greatness, namely, excessive individualism. The individual first inwardly casts off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which, as a fact, is in most cases tyrannical and illegitimate, and what he thinks and does is, rightly or wrongly, now called treason. The sight of victorious egotism in others drives him to defend his own right by his own arm. And, while thinking to restore his inward equilibrium, he falls, through the vengeance which he executes, into the hands of the powers of darkness. His love, too, turns mostly for satisfaction to another individuality equally developed, namely, to his neighbour's wife. In face of all objective facts, of laws and restraints of whatever kind, he retains the feeling of his own sovereignty, and in each single instance forms his decision independently, according as honor or interest, passion or calculation, revenge or renunciation, gain the upper hand in his own mind.

要是我们现在试图总结一下当时意大利人性格的主要特征，就像我们研究上层社会的生活中所得知的那样，我们将会得到如下的结果。这种性格的根本的缺点与此同时也是构成它伟大之处的一个条件，这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个人首先从内心上摆脱了一个国家权威的束缚，实际上，这种权威是专横的、不合法的，他的所想和所做，

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现在都被称为叛国罪。看到别人胜利的唯我主义，就驱使他用自己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当他想恢复内心的平静时，由于自己所进行的复仇行为，他就坠入了魔鬼的手掌之中。他的爱情通常也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求爱于另外一个个性得到同样发展的人，也就是说，求爱于他邻居的妻子。在一切客观事实、法律、任何一类约束的面前，他保留着由自己做主的感情，而在每一个个别例子上，则要根据荣誉或利益、激情或深思熟虑、报仇或不报仇哪一个在他心里占上风，然后再独自做出决定。

If therefore egotism in its wider as well as narrower sense is the root and fountain of all evil, the more highly developed Italian was for this reason more inclined to wickedness than the members of other nations of that time.

因此，如果广义的唯我主义和狭义的唯我主义同样都是一切罪恶行径的根源，那么由于这个原因，更为高度发展的意大利人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民族的人相比起来，更倾向于不道德。

But this individual development did not come upon him through any fault of his own, but rather through an historical necessity. It did not come upon him alone, but also, and chiefly, by means of Italian culture, upon the other nations of Europe, and has constituted since then the higher atmosphere which they breathe. In itself it is neither good nor bad, but necessary; within it has grown up a modern standard of good and evil—a sense of moral responsibility—which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which was familiar to the Middle Ages.

但是，这种个人发展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而发生在他身上的，而更多是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这种现象并非只是发生在意大利人的身上，而且也发生在欧洲其他民族的人身上。这主要是由于意大利的文明所带来的影响使然，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成了他们所呼吸的浓厚的空气。它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只是一种必需的东西；在它那里产生了善与恶的现代标准——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这一标准和中世纪时期所熟知的标准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

But the Italian of the Renaissance had to bear the first mighty surging of a new age. Through his gifts and his passions, he has become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representative of all the heights and all the depths of his time. By the side of profound corruption appeared human personalities of the noblest harmony, and an artistic splendor which shed upon the life of man a lustre which neither antiquity nor medievalism either could or would bestow upon it.

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必须承受新时代的第一个巨大浪潮的冲击。由于他的天赋和激情，他成了他那个时代代表一切高度和一切深度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与深刻的堕落一同出现的是具有最崇高的和谐的人类个性和一种艺术光辉，这种光辉给人类生活笼罩了一层光泽，这是一种古文化和中世纪精神所不能或不愿赐予的光泽。

Religion in Daily Life

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

The morality of a people stands in the closest connection with its consciousness of God, that is to say, with its firmer or weaker

faith in the divine government of the world, whether this faith looks on the world as destined to happiness or to misery and speedy destruction. The infidelity then prevalent in Italy is notorious, and whoever takes the trouble to look about for proofs, will find them by the hundred. Our present task, here as elsewhere, is to separate and discriminate; refraining from an absolute and final verdict.

一个民族的道德与它对上帝的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与它对神统治世界的信仰是否坚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这种信仰把这个世界看作是注定幸福的世界或者注定痛苦并迅速毁灭的世界。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不信奉宗教的现象是臭名昭著的。不管谁若是不辞辛苦地去寻找证据，那么将找到成百个证据。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在这里区分、辨别，避免做出绝对的、最终的判断。

The belief in God at earlier times had its source and chief support in Christianity and the outward symbol of Christianity, the Church. When the Church became corrupt, men ought to have drawn a distinction, and kept their religion in spite of all. But this is more easily said than done. It is not every people which is calm enough, or dull enough, to tolerate a last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a principle and its outward expression. But history does not record a heavier responsibility than that which rests upon the decaying Church. She set up as absolute truth, and by the most violent means, a doctrine which she had distorted to serve her own aggrandizement. Safe in the sense of her inviolability, she abandoned herself to the most scandalous profligacy, and, in order to maintain herself in this state, she leveled mortal blows against the conscience and the intellect of nations, and drove multitudes of the noblest spirits, whom she had inwardly estranged, into the arms of unbelief and despair.

早期对于上帝的信仰是从基督教和基督教的外部标志，即教堂里得到它的来源和主要支撑的。当教会变得腐败不堪时，人们应该区分清楚，无论如何都要保守住自己的宗教。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不是每一个民族都足够冷静，或者足够迟钝，来忍受原则和它外部表征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持久性的矛盾。但是，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腐败不堪的教堂肩负着最为重大的责任。她用最为暴烈的手段建立了一种学说作为绝对真理，她已经扭曲了这种学说，让这个学说为她自己权利的扩大服务。她认为自己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所以觉得是安全的，于是就沉湎于最可耻的放纵不羁之中，并且为了能够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她就予民族良心和民族智力以致命的打击，逼迫众多她已经在精神上与之疏远的最高贵的人物走向迷惑和绝望的深渊。

Here we are met by the question, why did not Italy, intellectually so great, react more energetically against the hierarchy; why did she not accomplish a reformation like that which occurred in Germany, and accomplish it at an earlier date?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智力方面这么强大的意大利竟然没有精力充沛地去反抗等级制度呢？为什么没有实现或更早地实现一种像发生在德意志的那样的宗教改革呢？

A plausible answer has been given to this question. The Italian mind, we are told, never went further than the denial of the hierarchy, while the origin and the vigor of the German Reformation was due to its positive religious doctrines, most of all to the doctrines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nd of the inefficacy of good works.

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一个似是而非的回答。人们告诉我们说，意大利人的思想从未超越否认宗教统治的范围，而德意志宗教改革的源泉和活力源自于它积极的宗教教义，大部分宗教教义传授的都是信仰可以赎罪而善举不能赎罪的思想。

It is certain that these doctrines only worked upon Italy through Germany, and this not till the power of Spain was sufficiently great to root them out without difficulty, partly by itself and partly by means of the papacy and its instruments. Nevertheless, in the earlier religious movements of Italy, from the mystic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down to Savonarola, there was a large amount of positive religious doctrine which, like the very definite Christianity of the Huguenots, failed to achieve success only because circumstances were against it. Mighty events like the Reformation elude, as respects their details, their outbreak and their development, the deductions of the philosophers, however clearly the necessity of them as a whole may be demonstrated. The movements of the human spirit, its sudden flashes, its expansions and its pauses, must for ever remain a mystery to our eyes, since we can but know this or that of the forces at work in it, never all of them together.

确切地说，这些宗教教义仅仅是通过德意志才在意大利发挥其作用的，而且等到西班牙的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们根除掉了，一方面要靠它自己，另一方面要靠教皇权利和教皇权利的工具。然而，在早期的意大利宗教运动中，从13世纪的奥秘派到萨沃纳罗拉，都有许多积极的宗教教义，像胡格诺派非常明确的基督教教义，这些学说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是因为当时的情形对他们是不利的。像宗教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大事件，它们的细节、它们的爆发、

它们的发展，是哲学家们推论不出来的，然而是可以很清楚地证明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是很有必要的。人类的精神活动，它突然闪现的光芒、它的扩展，以及它的中断，在我们看来永远都将是一个谜，因为我们只能知道这个或那个力量在它的内部是起作用的，却永远无法同时得知它们所有力量集合的作用。

The feeling of the upper and middle classes in Italy with regard to the Church at the time when the Renaissance culminated was compounded of deep and contemptuous aversion, of acquiescence in the outward ecclesiastical customs which entered into daily life, and of a sense of dependence on sacraments and ceremonies. The great personal influence of religious preachers may be added as a fact characteristic of Italy.

在文艺复兴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上层社会和中层阶级对教会的感情混有深深的、鄙视的反感，对日常生活中外在的宗教习俗的顺从，以及一种依赖圣礼和典礼的意识。宗教传教士的个人强大影响也可以作为意大利的一项典型的事实添加到里面。

That hostility to the hierarchy which displays itself more especially from the time of Dante onwards in Itali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as been fully treated by several writers. We have already said something of the attitude of public opinion with regard to the papacy. Those who wish for the strongest evidence which the best authorities offer us can find it in the famous passages of Machiavelli's *Discorsi,* and in the unmutilated edition of Guicciardini. Outside the Roman Curia, some respect seems to have been felt for the best men among the bishops, and for many of the parochial clergy.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re holders of benefices,

the canons and the monks were held in almost universal suspicion, and were often the objects of the most scandalous aspersions, extending to the whole of their order.

从但丁时代以来，尤其是显现在意大利文学和历史里面的对等级制度的敌意，已经被好几个作家充分地论述过。我们先前也已经谈论过一些关于公众舆论对教皇政权所持的态度。那些希望最权威的人士给我们提供最有说服力的证据的人，可以在马基雅弗利的《史论》里几篇著名的文章里找到它，也可以在圭恰迪尼的完整的全集里找到它。在罗马教廷外部，似乎还可以感受到对主教中最好的人，以及许多教区的牧师的一些尊敬。另一方面，仅仅是拿圣禄的人们、住持和僧侣们几乎是普遍都受到怀疑的，并且往往是最可耻的诽谤对象，波及他们修道会的全体人员。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monks were made the scapegoats for the whole clergy, for the reason that none but they could be ridiculed without danger. But this is certainly incorrect. They are introduced so frequently in the novels and comedies because these forms of literature need fixed and well-known types where the imagination of the reader can easily fill up an outline. Besides which, the novelists do not as a fact spare the secular clergy. In the third place, we have abundant proof in the rest of Italian literature that men could speak boldly enough about the papacy and the court of Rome. In works of imagination we cannot expect to find criticism of this kind. Fourthly, the monks, when attacked, were sometimes able to take a terrible vengeance.

据说，僧侣被当成全体教士的替罪羊，因为只有他们可以被嘲笑，并且嘲笑他们的人还不用担任何风险。但是，这种传说肯定是不

正确的。他们之所以经常被写进小说里和喜剧里，是因为这些文学形式需要确定的、众人皆知的人物典型，以至于读者可以容易地勾勒出一个轮廓。并且，实际上小说家们也没有把教区教士排除在外。再者就是，在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里，我们也可以找到大量的佐证，人们是可以大胆地评论教皇政权和罗马宫廷的。在虚构的作品里，我们不期待能够找到此类的评论。最后，僧侣们一旦受到攻击，有时候是会进行令人害怕的报复行为的。

It is nevertheless true that the monks were the most unpopular class of all, and that they were reckoned a living proof of the worthlessness of conventual life, of the whole ecclesiast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system of dogma, and of religion altogether, according as men pleased, rightly or wrongly, to draw their conclusions. We may also assume that Italy retained a clearer recollect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two great mendicant orders than other countries, and had not forgotten that they were the chief agents in the reaction against what is called the heresy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at is to say, against an early and vigorous movement of the modern Italian spirit. And that spiritual police which was permanently entrusted to the Dominicans certainly never excited any other feeling than secret hatred and contempt.

不过，在所有阶层中，僧侣确实是最不受人们欢迎的阶层，按照人们所乐于得出的结论，不管正确与否，他们被认为是有关修道院的生活、整个教会组织、整个教理体系和整个宗教的有价值的、活生生的证据。我们或许也可以假设，相比于其他国家，意大利对两大托钵修会的起源保存有更清晰的回忆，而且也没有忘记在反抗所谓的13世纪的异教时，也就是说，在反对近代意大利精神的早期、有力的运动中，他们是主要的代理人。当然，长期任命于多明我会的精神警察除了引起暗中仇恨和轻视之外，再不会引起其他任何情感。

After reading the *Decameron* and the novels of Franco Sacchetti, we might imagine that the vocabulary of abuse directed at the monks and nuns was exhausted. But towards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this abuse became still fiercer. To say nothing of Aretino, who in the *Ragionamenti* uses conventual life merely as a pretext for giving free play to his own poisonous nature, we may quote one author as typical of the rest—Masuccio, in the first ten of his fifty novels. They are written in a tone of the deepest indignation, and with the purpose to make this indignation general; and are dedicated to men in the highest position, such as King Ferrante and Prince Alfonso of Naples. The stories are many of them old, and some of them familiar to readers of Boccaccio. But others reflect, with a frightful realism, the actual state of things at Naples. The way in which the priests befool and plunder the people by means of spurious miracles, added to their own scandalous lives, is enough to drive any thoughtful observer to despair. We read of the Minorite friars who traveled to collect alms: 'They cheat, steal and fornicate, and when they are at the end of their resources, they set up as saints and work miracles, one displaying the cloak of St Vincent, another the handwriting of St Bernardino, [3_4] a third the bridle of Capistrano's donkey.' Others 'bring with them confederates who pretend to be blind or afflicted with some mortal disease, and after touching the hem of the monk's cowl, or the relics which he carries, are healed before the eyes of the multitude. All then shout *"Misericordia!",* the bells are rung, and the miracle is recorded in a solemn protocol.' Or else a monk in the pulpit is denounced as a liar by another who stands below among the audience; the accuser is immediately possessed by the devil, and then healed by the preacher. The whole thing was a pre-arranged comedy, in which, however, the principal with his assistant made so much money that he was able to buy a bishopric from a cardinal, on which the two

confederates lived comfortably to the end of their days. Masuccio makes no great distinction between Franciscans and Dominicans, finding the one worth as much as the other. 'And yet the foolish people lets itself be drawn into their hatreds and divisions, and quarrels about them in public places, and calls itself *franceschino* or *domenichino.'* The nuns are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 monks. Those of the former wh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laity are prosecuted and put in prison, while others are wedded in due form to the monks, with the accompaniments of mass, a marriage-contract and a liberal indulgence in food and wine. 'I myself,' says the author, 'have been there not once, but several times, and seen it all with my own eyes. The nuns afterwards bring forth pretty little monks or else use means to hinder that result. And if anyone charges me with falsehood, let him search the nunneries well, and he will find there as many little bones as in Bethlehem at Herod's time.' These things, and the like, are among the secrets of monastic life. The monks are by no means too strict with one another in the confessional, and impose a paternoster in cases where they would refuse all absolution to a layman as if he were a heretic. 'Therefore may the earth open and swallow up the wretches alive, with those who protect them!' In another place Masuccio, speaking of the fact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monks depends chiefly on the dread of another world, utters the following remarkable wish: 'The best punishment for them would be for God to abolish purgatory; they would then receive no more alms, and would be forced to go back to their spades.'

在读了《十日谈》和佛朗哥·萨克蒂的小说之后，我们或许会想，辱骂僧侣和修女的词语已被用尽。但是，在宗教改革前后，这种辱骂就变本加厉了。先不谈阿雷蒂诺，因为在他的《论述》这本著作里，他借用修道院的生活只是作为随意发挥自己有害天性的托辞，我们可

以引用作家马苏奇奥五十篇小说的前十篇作为其余作家的代表。这些小说是以极端愤慨的语调写出来的，目的就在于让所有人都感到愤怒；这些小说献给了地位最高的人，像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国王和阿方索君王那样的人。许多故事都是古老的，其中有一些故事是薄伽丘的读者们所熟知的。但是，另外一些故事以一种可怕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那不勒斯的实际情况。教士们通过捏造的奇迹来愚弄和剥削人们，加上他们自己无耻的生活，足以让任何一个有思想的旁观者感到绝望。我们在书上读到了有关方济会的修道士周游各地募捐钱款的记载："他们欺诈、盗窃以及通奸，当他们用尽了各种手段之后，他们扮成圣人，假造奇迹，一个展示出了圣文森的袈裟，另一个展现出了圣贝尔纳迪诺的手稿，[4_4] 还有一个呈现出了卡皮斯特拉诺的驴缰绳。"其他的人"则带着他们的同党，假扮成盲人或者深受病痛折磨的人，当着众人的面，在触摸了圣人的袈裟的边缘，或者他随身携带的圣物之后，疾病就完全治愈了。然后，众人欢呼'上帝慈悲'，然后铃声就响了，这个奇迹就被记录在了庄严肃穆的协议里"。要不然就是一个正在讲道台上布道的僧侣，受到另一个站在群众中间的僧侣的攻击，当众揭发这个布道的僧侣是一个骗子；这位攻击者即刻被魔鬼附身，然后就被布道者治愈。事情的整个经过是之前已经安排好的喜剧，然而，在这个喜剧里面，当事人和他的助手可以得到很多钱，足够从红衣主教那里买到一个主教的职位，这两个共谋者就可以靠这些钱过一辈子舒服的日子。马苏奇奥对方济会和多明我会没有做太多的区别，他发现他们其实是一丘之貉。"但是愚蠢之人依然会被卷入他们的怨恨和纷争之中，在公共场合展开了关于两个派别的争吵，自诩属于方济会派或多明我会派。"修女是修道院的私有财产。那些和俗人发生任何关系的修女都是要受到控告并被投进监狱里的，而其他的一些修女则通过适当形式和修道士们举行正式的婚礼，伴有弥撒和一纸婚约，并大吃大喝一顿。作者说："我自己参加这种场合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而是好几次，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后来，这些修女们生出了可爱的小修道士，或者他们采取一些方法阻止小生命的降临。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指责我在说谎，那就请他好好地去搜查一下女修道院，那么他会在那里找到和希律王时代的伯利恒一样多的小尸骨。"这些事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僧侣生活的秘密。这些僧

侣在忏悔室里对彼此并没有太多严格的要求，然而他们拒绝给一个俗人进行一切赦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做祷告，好像那个人就是个异教徒一样。“因此惟愿大地开裂，吞噬活着的卑鄙之人，一并吞掉那些保护他们的人！”在另一个地方，马苏奇奥谈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僧侣们的影响主要是取决于人们对另一个世界的恐惧，接下来表达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愿望：“对他们最好的惩罚就是上帝取消炼狱；然后他们再也得不到善款，于是他们就不得不回家种地。”

If men were free to write, in the time of Ferrante, and to him, in this strain, the reason is perhaps to be found in the fact that the king himself had been incensed by a false miracle which had been palmed off on him. An attempt had been made to urge him to a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like that carried out in Spain and imitated by the popes, by producing a tablet with an inscription bearing the name of St Cataldus, said to have been buried at Taranto, and afterwards dug up again. When he discovered the fraud, the monks defied him. He had also managed to detect and expose a pretended instance of fasting, as his father Alfonso had done before him. The court, certainly, was no accomplice in maintaining these blind superstitions.

在费兰特时期，如果人们可以用这种语调来自由地给他写文章，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国王自己也被人们在他的身上捏造的奇迹激怒过。僧侣们曾经企图蛊惑他迫害犹太人，就像在西班牙实施的且被教皇所效仿的对犹太人进行的迫害那样，他们制造了一个上面刻有圣加达德的名字的碑，碑上刻有一行碑文，说他曾经被埋葬在塔兰托，后来又被挖了出来。当他发现这是一个欺骗行为时，僧侣们就公然反抗他。他还是像他父亲阿方索先前所做的那样，想方设法探测和揭露一个假装斋戒禁食的例子。当然，那不勒斯宫廷肯定不会共谋支持这些盲目的迷信行为。

We have been quoting from an author who wrote in earnest, and who by no means stands alone in his judgement. All the Italian literature of that time is full of ridicule and invective aimed at the begging friars. It can hardly be doubted that the Renaissance would soon have destroyed these two orders,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German Reformation, an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which that provoked. Their saints and popular preachers could hardly have saved them. It would only have been necessary to come to an understanding at a favorable moment with a pope like Leo X, who despised the mendicant orders. If the spirit of the age found them ridiculous or repulsive, they could no longer be anything but an embarrassment to the Church. And who can say what fate was in store for the papacy itself, if the Reformation had not saved it?

我们一直都在引用一个认真创作的作家，他的评判绝对不会是孤立的一家之言的。那个时代所有的意大利文学著作里都写满了对托钵僧侣的讥笑和谩骂。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它所激发的反宗教改革运动，那么，文艺复兴很快就可以消灭这两个僧侣团。他们的圣徒和受人欢迎的传教士们几乎不能拯救他们。他们需要的只是在有利的时机和一个像利奥十世那样蔑视托钵僧侣团的教皇达成共识。如果时代的精神发现他们是荒谬的或者是令人厌恶的，那么他们对于教会来说就只是一种尴尬了。如果不是宗教改革拯救了教皇政权，那么谁能说出等待教皇政权本身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The influence which the Father Inquisitor of a Dominican monastery was able habitually to exercise in the city where it was situated was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just considerable enough to hamper and irritate cultivated people, but not strong enough to extort any lasting fear or obedience. It was no

longer possible to punish men for their thoughts, as it once was, and those whose tongues wagged most impudently against the clergy could easily keep clear of heretical doctrine. Except when some powerful party had an end to serve, as in the case of Savonarola, or when there was a question of the use of magical arts, as was often the case in the cities of North Italy, we seldom read at this time of men being burnt at the stake. The Inquisitors were in some instances satisfied with the most superficial retraction, in others it even happened that the victim was saved out of their hands on the way to the place of execution. In Bologna (1452) the priest Niccolo da Verona had been publicly degraded on a wooden scaffold in front of San Domenico as a wizard and profaner of the sacraments, and was about to be led away to the stake when he was set free by a gang of armed men, sent by Achille Malvezzi, a noted friend of heretics and violator of nuns. The legate, Cardinal Bessarion, was only able to catch.and hang one of the party; Malvezzi lived on in peace.

在15世纪后半叶，多明我会修道院的神父审判者能够在这个修道院所在的城市产生一些影响，产生的这种影响非常大，足以阻碍、激怒有教养的人，但是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让人们保持任何永恒的敬畏和顺从的程度。不像以前那样，可以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惩罚了，那些敢于放肆地对牧师进行反抗的人们可以轻易地避开异端邪说。除了当某个党派别具用心，就像萨沃纳罗拉的那种情况，或者当存在有使用妖术问题时，就像常常发生在北部意大利的那种情况之外，我们很少在书上读到这一时期有人被处以火刑的记载。在一些例子中，异端裁判所的审讯人员也对以最浅薄的理由而撤销的控诉感到满意，在另外的一些例子中，甚至是在受刑者走上刑场的途中被从他们手中成功救出的事情。在博洛尼亚，维罗纳的尼科洛牧师曾在圣多米尼克教堂前面的木制断头台上被当众宣布撤职，正要被带走处以火刑，这时他被一个有名的异教徒朋友，这个强奸修女的人，阿希尔·马尔维奇所派来的

一帮武装人员解救了。教皇的使节，红衣主教的贝萨里翁仅仅能够抓到这一帮人中的其中一个人，并对其处以绞刑；马尔维奇继续安然无恙地生活着。

It deserves to be noticed that the higher monastic orders—e.g. Benedictines, with their many branches—were, notwithstanding their great wealth and easy lives, far less disliked than the mendicant friars. For ten novels which treat of *frati,* hardly one can be found in which a *monaco* is the subject and the victim. It was no small advantage to these orders that they were founded earlier, and not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ce, and that they did not interfere with private life. They contained men of learning, wit and piety, but the average has been described by a member of it, Firenzuola, who says:

值得注意的是，高层次的僧团——例如，本笃会僧侣，以及他们的许多分会——他们非常富有，且过着安逸的生活，但是和托钵僧侣们比起来，远不像他们那样被人们所厌恶。在十部以僧侣为题材的小说里，几乎是找不到一篇以修道僧侣为题材和攻击目标的小说。这些僧团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它们成立的时间比较早，而且它们不作为警察的工具，也不去干扰私生活。他们之中有学识渊博的人、机智聪慧的人，以及虔诚孝敬的人。但是，其中一个叫做费伦佐拉的成员对它里面的一般人有过这样的描述，他说：

> These well-fed gentlemen with the capacious cowls do not pass their time in barefooted journeys and in sermons, but sit in elegant slippers with their hands crossed over their paunches, in charming cells wainscoted with cyprus-wood. And

> when they are obliged to quit the house, they ride comfortably, as if for their amusement, on mules and sleek, quiet horses. They do not overstrain their minds with the study of many books, for fear lest knowledge might put the pride of Lucifer in the place of monkish simplicity.

> 这些衣食无忧的、穿着宽僧袍的绅士们，不去赤足游行也不去布道，而是穿着优雅的拖鞋，双手抱臂，坐在装有丝柏护壁板的小屋里。当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小屋时，他们会舒服地骑着骡子或鬃毛光滑的、温顺的马，好像是骑着它们溜达、消遣。他们不会读很多书籍让自己精神过度紧张，以免担心知识让路西法的傲慢代替了僧侣们的淳朴。

Those who are familiar with the literature of the time will see that we have only brought forward wha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That the reputation attaching to the monks and the secular clergy must have shattered the faith of multitudes in all that is sacred is, of course, obvious.

那些熟悉这一时期的文学著作的人们将会看到，我们仅仅只是提出了理解这一主题所绝对必要的材料。僧侣和教区教士们的声誉一定已经粉碎了广大群众对一切神圣之物的信仰，当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And some of the judgements which we read are terrible; we will quote one of them in conclusion, which has been published

only lately and is but little known. The historian Guicciardini, who was for many years in the service of the Medicean popes, says (1529) in his *Aphorisms:* [3_5]

在我们读到的评判里面，有一些是很可怕的；我们将在结尾部分用其中一个，这个评判意见是最近刚刚发表的，很少有人知道这一评判意见。许多年以来都为出身于美第奇家族的教皇服务的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在他的《格言》里这样说道（1529年）：[4_5]

No man is more disgusted than I am with the ambition, the avarice and the profligacy of the priests, not only because each of these vices is hateful in itself, but because each and all of them are most unbecoming in those who declare themselves to be men in special relations with God, and also because they are vices so opposed to one another that they can only co-exist in very singular natures. Nevertheless, my position at the court of several popes forced me to desire their greatness for the sake of my own interest. But, had it not been for this, I should have loved Martin Luther as myself, not in order to free myself from the laws which Christianity, as generally understood and explained, lays upon us, but in order to see this swarm of scoundrels *(questa caterva di scellerati)* put back into their proper place, so that they may be forced to live either without vices or without power.

没有人比我更厌恶牧师们的野心、贪婪、肆意放荡的了。这不仅仅只是因为每一种恶习本身都是可恶的，而且因为每一种恶习以及所有恶习出现在那些宣称自己和上帝有着特殊关系的人身上是最得体的，并且也因为这些恶习是彼此排斥的，只有在非常奇异的

人身上才能共存。然而，我们在几个教皇的宫廷中的地位迫使我们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渴望他们是伟大的。但是，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我本应该像热爱我自己一样去热爱马丁·路德，不是为了让我自己从基督教所束缚在我们身上的那些律法中解脱出来，就像一般人所理解、所解释的那样，而是为了看到这一群恶棍们（一群混蛋们）被逐回到适合他们的地方，为了他们可以被迫过一种没有罪恶或者没有权势的生活。

The same Guicciardini is of opinion that we are in the dark as to all that is supernatural, that philosophers and theologians have nothing but nonsense to tell us about it, that miracles occur in every religion and prove the truth of none in particular, and that all of them may be explained as unknown phenomena of nature. The faith which moves mountains, then common among the followers of Savonarola, is mentioned by Guicciardini as a curious fact, but without any bitter remark.

这个圭恰迪尼的观点就是，对于所有超自然的东西我们还是一无所知的，哲学家们和神学家们告诉我们的关于超自然的东西都是一派胡言，每一种宗教都有奇迹发生，这些奇迹并不能证明任何真理性的东西，而所有的这些奇迹都可以当作人们所未知的自然现象来解释。圭恰迪尼提到了当时在萨沃纳罗拉的信徒中普遍存在的感动山体的信仰，他认为那是一件古怪的事实，但是并没有对它进行激烈的言论攻击。

Notwithstanding this hostile public opinion, the clergy and the monks had the great advantage that the people were used to them,

and that their existence was interwoven with the everyday existence of all. This is the advantage which every old and powerful institution possesses. Everybody had some cowled or frocked relative, some prospect of assistance or future gain from the treasure of the Church; and in the centre of Italy stood the court of Rome, where men sometimes became rich in a moment. Yet it must never be forgotten that all this did not hinder people from writing and speaking freely. The authors of the most scandalous satires were themselves mostly monks or beneficed priests. Poggio, who wrote the *Facetiae,* was a clergyman; Francesco Berni, the satirist, held a canonry; Teofilo Folengo, the author of the *Orlandino,* was a Benedictine, certainly by no means a faithful one; Matteo Bandello, who held up his own order to ridicule, was a Dominican, and nephew of a general of this order. Were they encouraged to write by the sense that they ran no risk? Or did they feel an inward need to clear themselves personally from the infamy which attached to their order? Or were they moved by that selfish pessimism which takes for its maxim, 'it will last our time'? Perhaps all of these motives were more or less at work. In the case of Folengo, the unmistakable influence of Lutheranism must be added.

尽管存在这种怀有敌意的公众舆论，但是教士们和僧侣们还是拥有绝对的有利条件的，那就是人们已习惯了他们，他们的存在和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这是所有古老、强大的机构所具有的有利条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戴斗篷的或穿僧衣的亲戚，每一个人都希望从教会的财富中获得补助或未来的某种利益；在意大利的中心地带矗立着的是罗马宫廷，人们有时在这里能够一夜暴富。但是，一定不能忘记的是，所有这些并没有妨碍人们写作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生活。对于那些最具诽谤性的讽刺诗的作家们，他们中大部分本身就是僧侣或者享有圣俸的牧师。撰写《诙谐集》的波焦就是一名牧师；讽刺作家佛朗西斯科·贝尔尼担任大教堂住持一职；《小奥兰多》一书的作者，

泰奥菲洛·弗伦哥是本笃会的一名教士，当然他绝非一个虔诚的教士；马泰奥·班戴洛是多明我会的一个僧侣，也是这个僧团的其中一个团长的侄子，他嘲笑自己所在的这个僧团。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不用担负任何风险才敢于这样写的呢？或者是不是他们心里感到有必要把他们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僧团的恶行区分开来呢？或者是不是他们受到了把“这个时代将完了”作为自己格言的悲观主义的触动呢？所有这些动机或许都或多或少地发挥着作用。具体到弗伦哥的情况时，一定要加上路德教教义给他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影响。

The sense of dependence on rites and sacraments, which we have already touched upon in speaking of the papacy, is not surprising among that part of the people which still believed in the Church. Among those who were more emancipated, it testifies to the strength of youthful impressions, and to the magical force of traditional symbols. The universal desire of dying men for priestly absolution shows that the last remnants of the dread of hell had not, even in the case of one like Vitellozzo, been altogether extinguished. It would hardly be possible to find a more instructive instance than this. The doctrine taught by the Church of the *character indelibilis* of the priesthood, independently of the personality of the priest, had so far borne fruit that it was possible to loathe the individual and still desire his spiritual gifts. It is true, nevertheless, that there were defiant natures like Galeotto of Mirandola, who died unabsolved in 1499, after living for sixteen years under the ban of the Church. All this time the city lay under an interdict on his account, so that no mass was celebrated and no Christian burial took place.

我们在之前谈论教皇政权时已经涉及对仪式和圣礼依赖的意识，这种意识在那一部分依然相信教会的人中间是不足为奇的。在那些不

怎么受习俗约束的人们中，这种信仰就证明了年轻时的印象的力量和传统象征的神奇力量。奄奄一息的人都普遍希望得到教士的赦免，这也就表明了人们对地狱之恐惧的最后残余意识还没有被完全灭绝，即使是像维特洛佐那样的人所处的情况也不例外。几乎不能再找到一个比这更有启发性的例子了。教会所教导的就是，不论这个教士的人格魅力如何，教士职务的“不可泯灭的特性”的信条到目前为止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因此人们很有可能厌恶教士个人但是依然希望从他这里得到神的恩赐。然而，确实，还有像米兰多拉的加莱奥托那样鄙视教会的人物，在教会的禁令下过了十六年的生活之后，他于1499年未经赦免而死去。在这段时间内，米兰多拉这座城市也由于他的原因而处于禁令之下，因而没有举行过弥撒礼，也没有举行基督教葬礼。

A splendid contrast to all this is offered by the power exercised over the nation by its great preachers of repentance. Other countries of Europe were from time to time moved by the words of saintly monks, but only superficiall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eriodical upheaval of the Italian conscience. The only man, in fact, who produced a similar effect in Germany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was an Italian, born in the Abruzzi, named Giovanni Capistrano. Those natures which bear within them this religious vocation and this commanding earnestness wore then in northern countries an intuitive and mystical aspect. In the South they were practical and expansive, and shared in the national gift of language and oratorical skill. The North produced an 'Imitation of Christ', which worked silently, at first only within the walls of the monastery, but worked for the ages; the South produced men who made on their fellows a mighty but passing impression.

和这一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伟大的讲道忏悔的传教士给这个民族所带来的力量。欧洲的其他民族也时常被圣洁的僧侣们的话语所触

动，但是和意大利时常发生剧变的道德心相比较而言，它只是表面上的。在15世纪，那个唯一给德意志带来同样影响的人实际上是一个意大利人，他出生于阿布鲁齐，叫做乔瓦尼·卡皮斯特拉诺。当时在北方的国家里，那些具备这种宗教才能和这种博得人心的真挚的人们，都带有一种凭直觉获知的、神秘的样子。在南方的国家里，他们是实际的、豪爽的，并且也具有这个民族的语言天赋和演讲技巧。在北方，产生了一种“效法基督”的现象，它在静静地起着作用，最初仅仅只是在修道院里面发挥作用，它的作用是累世不绝的；在南方，造就出了一些人，他们给那个时代的人留下的是一种伟大的却转瞬即逝的印象。

This impression consisted chiefly in the awakening of the conscience. The sermons were moral exhortations, free from abstract notions and full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rendered more impressive by the saintly and ascetic character of the preacher, and by the miracles which, even against his will, the inflamed imagination of the people attributed to him. The most powerful argument used was not the threat of hell and purgatory, but rather the living results of the *maledizione,* the temporal ruin wrought on the individual by the curse which clings to wrongdoing. The grieving of Christ and the saints has its consequences in this life. And only thus could men, sunk in passion and guilt, be brought to repentance and amendment—which was the chief object of these sermons.

这种印象主要是产生于唤醒道德心的过程中。他们的布道辞是有关道德的劝告，没有抽象的概念，有的都是实际有用的东西，因为布道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和苦行者的特性，并且因为人们通过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甚至是在违背他意愿的情形之下，而附加在他身上的奇迹更让人们感动。他所使用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不是地狱和炼狱的威胁，

而是诅咒在当前所产生的效果，以及对某个人的不道德行为所下的诅咒在这个人身上所显现的现世毁坏。基督和圣徒的悲痛是会在现世生活中产生后果的。并且，只有这样，坠入情欲和罪行的深渊的人们才能够忏悔、改过自新——这就是这些布道的主要目的所在。

Among these preachers were Bernardino da Siena, Alberto da Sarzana, Jacopo della Marca, Giovanni Capistrano, Roberto da Lecce and others; and finally, Girolamo Savonarola. No prejudice of the day was stronger than that against the mendicant friar, and this they overcame. They were criticized and ridiculed by a scornful humanism; but when they raised their voices, no one gave heed to the humanists. The thing was no novelty, and the scoffing Florentines had already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learned to caricature it whenever it appeared in the pulpit. But no sooner did Savonarola come forward than he carried the people so triumphantly with him that soon all their beloved art and culture melted away in the furnace which he lighted. Even the grossest profanation done to the cause by hypocritical monks, who got up an effect in the audience by means of confederates, could not bring the thing itself into discredit. Men kept on laughing at the ordinary monkish sermons, with their spurious miracles and manufactured relics; but did not cease to honor the great and genuine preachers. These are a true speciality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在这些布道者里面，有贝尔纳迪诺·达·锡耶纳、阿尔伯托·达·萨尔扎纳、雅各布·德拉·马卡、乔瓦尼·卡皮斯特拉诺、罗伯托·达·莱切，以及其他的一些人；最后，还有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当时，反对托钵僧侣的意见最为强烈，但是他们克服了这种意见。他们受到了藐视一切的人文主义的批评和讥笑；但是，当他们抬高自己声音的时候，没有人再注意人文主义了。这并不是一件新颖的事情，喜欢嘲笑别人的

佛罗伦萨人在14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一遇到讲道坛上的布道者，就把讲道滑稽化。但是萨沃纳罗拉一出现就立即成功地赢得了人们的拥护，不久之后就把他们所钟爱的艺术和文化都融入了他所点燃的熔炉之中。即使是那些在观众中结伙假造神效的伪善的僧侣所附加给这个事业的最荒唐的亵渎神圣的行为，也无法使这种布道变得声名狼藉。人们继续讥笑普通教士的布道，以及他们伪造的奇迹和圣物；但是，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尊敬那些伟大的、真正的先知们。这些都是意大利在15世纪所真实存在的特点。

The order—generally that of St Francis, and more particularly the so-called Observantines—sent them out according as they were wanted. This was commonly the case when there was some important public or private feud in a city, or some alarming outbreak of violence, immorality or disease. When once the reputation of a preacher was made, the cities were all anxious to hear him even without any special occasion. He went wherever his superiors sent him. A special form of this work was the preaching of a crusade against the Turks; but here we have to speak more particularly of the exhortations to repentance.

僧团——通常都是圣方济会的僧团，尤其是所谓的严修会的修道士——根据人们的需要派出布道者。通常情况下，都是在一个城市里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公众斗争或个人斗争，或者是爆发了某种令人担忧的暴力事件、不道德行为或疾病。一旦一个传教士出了名，即使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各个城市也都希望听到他的布道。他会服从尊长的派遣，到任何一个派他去的地方。这类工作的一个特殊形式就是通过布道来劝解人们组织反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但是，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谈一下劝人忏悔的布道。

The order of these, when they were treated methodically, seems to have followed the customary list of the deadly sins. The more pressing, however, the occasion is, the more directly does the preacher make for his main point. He begins perhaps in one of the great churches of the order, or in the cathedral. Soon the largest piazza is too small for the crowds which throng from every side to hear him, and he himself can hardly move without risking his life. The sermon is commonly followed by a great procession; but the first magistrates of the city, who take him in their midst, can hardly save him from the multitude of women who throng to kiss his hands and feet, and cut off fragments from his cowl.

在有组织地进行这些布道时，他们似乎是按照惯例所列举的致死的罪行来依次进行的。但是，时间越紧迫，布道者也就越会直接地进入他的布道主题。或许，他是在这个僧团的大教堂里或者礼拜堂里开始自己的布道的。很快，大批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拥来听他布道，以至于最大的广场对于听众来说也会觉得小了，而布道者自己几乎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艰难地挪动着。一般布道完之后，接下来就是壮大的游行仪式；但虽然这个城市的第一地方法官把他围在他们中间，几乎也不能把他从众多妇女手中解救出来，这些妇女蜂拥而至，亲吻他的手和脚，并从他连有头巾的修道士服上割下一些碎片来。

The most immediate consequences which follow from the preacher's denunciations of usury, luxury and scandalous fashions are the opening of the gaols—which meant no more than the discharge of the poorer debtors—and the burning of various instruments of luxury and amusement, whether innocent or not. Among these are dice, cards, games of all kinds, written incantations, masks, musical instruments, song-books, false hair and so forth. All these would then be gracefully arranged on a scaffold

(talamo), a figure of the devil fastened to the top, and then the whole set on fire.

这个布道者对于高利贷的、奢侈的、可耻的、风行一时的事物的谴责所产生的最即刻的后果就是打开监狱的大门——这样做的意思无非就是将比较贫困的债务人释放出来——以及焚烧各类奢侈的、供娱乐用的工具，不管它们是不是有害处的。这些工具里面包括骰子、纸牌、各类比赛用具、歌词本、假发等等。然后把所有这些东西优美地排列在一个架子上，在架子的顶端拴着一个魔鬼画像，最后把一切东西都付之一炬。

Then came the turn of the more hardened consciences. Men who had long never been near the confessional now acknowledged their sins. Ill-gotten gains were restored, and insults which might have borne fruit in blood retracted. Orators like Bernardino of Siena entered diligently into all the details of the daily life of men, and the moral laws which are involved in it. Few theologians nowadays would feel tempted to give a morning sermon 'on contracts, restitutions, the public debt (*monte*)and the portioning of daughters', like that which he once delivered in the cathedral at Florence. Imprudent speakers easily fell into the mistake of attacking particular classes, professions or offices, with such energy that the enraged hearers proceeded to violence against those whom the preacher had denounced. A sermon which Bernardino once preached in Rome (1424) had another consequence besides a bonfire of vanities on the Capitol: 'After this,' we read, 'the witch Finicella was burnt, because by her diabolical arts she had killed many children and bewitched many other persons; and all Rome went to see the sight.'

接下来就要谈一下铁石心肠的人了。那些以前从来没有走近忏悔室的人们现在也承认自己的罪恶了。把自己非法获得的东西退了回来，也收回了可能造成流血事件的侮辱。像锡耶纳的贝尔纳迪诺那样的演说家是会孜孜不倦地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细节和日常生活所涉及的道德法则进行研究的。现在的神学家们很少有人愿意像自己曾经在佛罗伦萨的大教堂里所宣告的那样，在“契约、赔偿、公债和女儿们所分得的那部分财产”的这类问题上做晨间布道。轻率鲁莽的布道者很容易陷入这样的错误之中，这就是他们全力以赴地来攻击特殊阶级、特殊职业或者特殊职位的人，以至于激怒了听众，听众就诉诸暴力手段来反抗这个布道者所谴责的那些人。贝尔纳迪诺曾经在罗马所做的一个布道（1424年），除了引起卡比托利欧山上那些毫无价值的浮华之物付之一炬之外，还造成了另外一个后果：“在此之后，女巫菲尼切拉被活活地烧死了，因为她用恶毒的魔术杀害了很多儿童，也蛊惑了许多其他的人；全罗马的人都来观看这一场面。”这一情况是我们在记载中读到的。

But the most important aim of the preacher was, as has been already said, to reconcile enemies and persuade them to give up thoughts of vengeance. Probably this end was seldom attained till towards the close of a course of sermons, when the tide of penitence flooded the city, and when the air resounded with the cry of the whole people: *'Misericordia!'* Then followed those solemn embracings and treaties of peace which even previous bloodshed on both sides could not hinder. Banished men were recalled to the city to take part in these sacred transactions. It appears that these *paci* were on the whole faithfully observed, even after the mood which prompted them was over; and then the memory of the monk was bless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ut there were sometimes terrible crises like those in the families della Valle and Croce in Rome (1482), where even the great Roberto da Lecce raised his voice in vain. Shortly before Holy Week he had preached to

immense crowds in the square before the Minerva. But on the night before Maundy Thursday a terrible combat took place in front of the Palazzo della Valle, near the Ghetto. In the morning Pope Sixtus gave orders for its destruction, and then performed the customary ceremonies of the day. On Good Friday Roberto preached again with a crucifix in his hand; but he and his hearers could do nothing but weep.

但是，正如之前已经谈到的那样，布道者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敌人和解，并说服他们放弃报仇雪恨的念头。或许这个目的只有在布道临近结束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时全城进入了忏悔的高潮，到处都可以听到全城人民高呼“上帝慈悲！”的欢呼声。紧接着他们就郑重地相互拥抱，签订和平契约，即使双方在以前发生过流血事件，也不能阻止他们签订和平契约。流放在外的人们被召回到城里参加这个神圣的和解仪式。似乎即使促成签订这些合约的情绪已成为过去时，但他们所签订的合约也被忠实地遵守着；然后，对于这个僧侣的恩泽，人们就世世代代永不忘记。但是，有时也有像发生在罗马的德拉·巴列和克罗斯家族之间的那些惨不忍睹的危险（1482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伟大的罗伯特·达·莱切的讲道也是无济于事的。就在圣周之前不久，他曾经在智慧女神密涅瓦塑像前的广场上给众人讲道。但是，在基督教濯足节的前一晚上，在犹太人居住区附近的德拉·巴列家族的宫殿前面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搏斗。次日早上，西斯科特下令摧毁了这座宫殿，然后照常举行濯足节这一天的仪式。在耶稣受难日这一天，罗伯托手里拿着十字架重新布道；但他和他的听众却只是在哭泣。

Violent natures, which had fallen into contradiction with themselves, often resolved to enter a convent, under the impression made by these men. Among such were not only brigands and criminals of every sort, but soldiers without employment. This resolve was stimulated by their admiration of the holy man, and by

the desire to copy at least his outward position.

陷入自我矛盾状态的性格暴烈的人们，往往在受到这些布道者的感化之后，就下定决心去修道院修行。这些人中，不仅有各类的强盗和不法之徒，而且还有失业的军人。这种去修道院修行的决心是受到他们对圣人的崇拜的激励，至少是受到渴望模仿圣人的外在姿态的激励。

The concluding sermon is a general benediction, summed up in the words *'la pace sia con voi!'* Throngs of hearers accompany the preacher to the next city, and there listen for a second time to the whole course of sermons.

最后一个讲道是对众生的祝福，用几个词来概括就是“祝你平安！”成群结队的听众伴随着这个布道者来到下一个城市，然后在那里再一次聆听整个布道。

The enormous influence exercised by these preachers made it important, both for the clergy and for the government, at least not to have them as opponents; one means to this end was to permit only monks or priests who had received at all events the lesser consecration to enter the pulpit, so that the order or corporation to which they belonged was, to some extent, responsible for them. But it was not easy to make the rule absolute, since the Church and pulpit had long been used as a means of publicity in many ways, judicial, educational and others, and since even sermons were sometimes delivered by humanists and other laymen. There existed, too, in Italy a dubious class of persons, who were neither monks nor

priests, and who yet had renounced the world—that is to say, the numerous class of hermits who appeared from time to time in the pulpit on their own authority, and often carried the people with them. A case of this kind occurred at Milan in 1516, after the second French conquest, certainly at a time when public order was much disturbed. A Tuscan hermit, Hieronymus of Siena, possibly an adherent of Savonarola, maintained his place for months together in the pulpit of the cathedral, denounced the hierarchy with great violence, caused a new chandelier and a new altar to be set up in the church, worked miracles, and only abandoned the field after a long and desperate struggle. During the decades in which the fate of Italy was decided, the spirit of prophecy was unusually active, and nowhere where it displayed itself was it confined to any one particular class. We know with what a tone of true prophetic defiance the hermits came forward before the sack of Rome. In default of any eloquence of their own, these men made use of messengers with symbols of one kind or another, like the ascetic near Siena (1429), who sent a 'little hermit', that is a pupil, into the terrified city with a skull upon a pole, to which was attached a paper with a threatening text from the Bible.

这些讲道者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让这些教士和政府都感到他们讲道者的布道是很重要的，至少不会让教士和政府把他们布道者当作敌人来对待；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仅仅允许僧侣们或者不管怎么样被授予过较低圣职职位的牧师们登上讲道坛，这样一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所隶属于的僧团或者社团就可以为他们负责。但是，要绝对遵守这个规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教会和讲道坛长久以来都被当作一种宣扬许多途径的工具，如司法的、教育的以及其他类别的，因为有时讲道是由人文主义者和其他世俗之人来进行的。在意大利，也存在一种身份不明之人，他们既不是僧侣也不是教士，并且他们已经抛弃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是数不胜数的隐士阶级，他们时不时

地主动出现在讲道坛上，并且受到人们的拥护。在1516年，米兰在被法国第二次征服之后，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然，当时正值社会治安异常混乱的时代。一个托斯卡纳的隐士，锡耶纳的希罗尼穆斯，有可能是萨沃纳罗拉的一个信徒，他在大教堂的讲道坛上一共演讲了好几个月，对登记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让人在讲道坛上装置一个新的烛台和新的圣坛，创造了种种奇迹，不料在一次漫长的、激烈的斗争之后放弃了这块领域。在决定意大利命运的那几十年，预言的风气异乎寻常地流行，并且在任何一个流行这种风气的地方，这种风气不仅仅局限在一个阶级的身上，我们知道在罗马遭受洗劫之前，隐士们曾以怎样的一种真正蔑视一切的预言性口吻挺身而出的。因为他们自己缺乏雄辩的才能，所以这些人就利用象征一种或另一种的使者，像锡耶纳附近的那个苦行者（1429年），他曾经派遣一个“小隐士”，也就是他的一个弟子，用竿子挑着一个骷髅进入了那个城市，并且在这个骷髅上附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从圣经里面引用的经文，让人感到威胁。

Nor did the monks themselves scruple to attack princes, governments, the clergy, or even their own order. A direct exhortation to overthrow a despotic house, like that uttered by Jacopo Bussolaro at Pavia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hardly occurs again in the following period; but there is no want of courageous reproofs, addressed even to the pope in his own chapel, and of naive political advice given in the presence of rulers who by no means held themselves in need of it. In the Piazza del Castello at Milan, a blind preacher from the Incoronata—consequently an Augustinian—ventured in 1494 to exhort Lodovico il Moro from the pulpit: 'My lord, beware of showing the French the way, else you will repent it.' There were further prophetic monks who, without exactly preaching political sermons, drew such appalling pictures of the future that the hearers almost lost their senses. After the election of Leo X, in the year 1513, a whole association of these

men, twelve Franciscan monks in all, journeyed through the various districts of Italy, of which one or other was assigned to each preacher. The one who appeared in Florence, Fra Francesco da Montepulciano, struck terror into the whole people. The alarm was not diminished by the exaggerated reports of his prophecies which reached those who were too far off to hear him. After one of his sermons he suddenly died 'of pain in the chest'. The people thronged in such numbers to kiss the feet of the corpse that it had to be secretly buried in the night. But the newly awakened spirit of prophecy, which seized upon even women and peasants, could not be controlled without great difficulty.

僧侣们也毫无顾忌地对君主们、政府、传教士们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僧团进行攻击。就像雅各布·布索拉罗于14世纪在帕维亚所表达的那样，直接鼓动人们推翻一个暴君的家庭，在接下来的时代里几乎没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但是，以下这种情况是不罕见的：甚至是在教皇自己的小教堂里，人们也会对他所说的话进行勇敢的反驳，而且人们也敢于当着统治者的面提出戆直的忠告，而这些统治者绝不会认为他们自己需要这种忠告。在米兰的卡斯泰洛露天广场上，来自因科洛那塔岛的一个盲人布道者——因此是奥斯定会的一个僧侣——于1494年冒着危险在讲道坛上劝告洛多维科·摩罗，说道："殿下，要小心谨慎地示给法国人以进路，否则将追悔莫及。"还有一些更胜一筹的有预知能力的僧侣，他们未必恰好做政治方面的讲道，但是他们对未来所描绘出的画面是如此之骇人，以至于听众几乎都要神经错乱。1513年，在利奥十世当选为教皇之后，一个总共有十二个方济会僧侣的组织，行遍意大利各个地区，一个地区分派给一个讲道者来负责布道。出现在佛罗伦萨的那个弗朗西斯科·蒙特普齐亚诺布道者引起了全体人民的恐慌。那些因为住的地方很遥远而无法听他布道的人们，在听到他的预言的夸大其辞的报道之后，也会感到非常惊恐。在一次布道之后，他因"胸部疼痛"而突然死去。众多的民众拥挤着要亲吻这个尸体的双脚，以至于不得不在夜间秘密地将其埋葬。但是，要对那些甚至

影响到妇女和农民的刚刚被唤醒的预言风气加以控制的话，是极其困难的。

In order to restore to the people their cheerful humor, the Medici—Giuliano, Leo's brother, and Lorenzo—gave on St John's Day, 1514, those splendid festivals, tournaments, processions and hunting-parties which were attended by many distinguished persons from Rome, and among them, though disguised, by no less than six cardinals.

为了让人们重新获得快乐的幽默心情，美第奇家族的人——列奥的兄弟朱利亚诺，以及洛伦佐——于1514年在圣约翰节举行了盛大的节日庆典、比武比赛、游行和打猎，参加这些项目的人中有许多是从罗马来的杰出人物，其中红衣主教也不少于六个，虽然他们都是化过装的。

But the greatest of the prophets and apostles had already been burnt in Florence in the year 1498—Fra Girolamo Savonarola of Ferrara. We must content ourselves with saying a few words respecting him. [3_6]

但是，最伟大的预言者和传道者之一——费拉拉的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士已经于1498年在佛罗伦萨被火烧死了。关于他，我们必须要在这里说几句。 [4_6]

The instrument by means of which he transformed and ruled the city of Florence (1494-8) was his eloquence. Of this the meagre

reports that are left to us, which were taken down mostly on the spot, give us evidently a very imperfect notion. It was not that he possessed any striking outward advantages, for voice, accent and rhetorical skill constituted precisely his weakest side; and those who required the preacher to be a stylist went to his rival Fra Mariano da Genazzano. The eloquence of Savonarola was the expression of a lofty and commanding personality, the like of which was not seen again till the time of Luther. He himself held his own influence to be the result of a divine illumination, and could therefore, without presumption, assign a very high place to the office of the preacher, who, in the great hierarchy of spirits, occupies, according to him, the next place below the angels.

他用来改变和统治佛罗伦萨这个城市（1494-1498）的方式就是他雄辩的口才。关于这一点，留给我们的主要都是当场记录下来的那些浅陋的报告，我们从中获得的显然是一个极其不完整的概念。并不是因为他拥有任何突出的外在优势，因为声音、语调和修辞技巧正好是他最软弱的一面；那些要求布道者应是个文体学家的人们都到他的对手马里亚诺·达·吉纳扎诺修士那里听布道去了。萨沃纳罗拉的雄辩才能在于他对崇高、威严的人格的表露，直到路德时代才又重新见到这种人格。他自己认为他所产生的影响是受到了神灵的启发的结果，因此，不必自夸就可以给讲道者的职务以非常崇高的地位，在他看来，讲道者的地位在伟大的神灵等级制度里，仅次于天使的地位。

This man, whose nature seemed made of fire, worked another and greater miracle than any of his oratorical triumphs. His own Dominican monastery of San Marco, and then all the Dominican monasteries of Tuscany, became like-minded with himself, and undertook voluntarily the work of inward reform. When we reflect what the monasteries then were, and what measureless difficulty

attends the least change where monks are concerned, we are doubly astonished at so complete a revolution. While the reform was still in progress large numbers of Savonarola's followers entered the order, and thereby greatly facilitated his plans. Sons of the first houses in Florence entered San Marco as novices.

这个看似性格暴躁的人，创造了另一个比他讲道上所获得的成功更伟大的奇迹，他自己的圣马可教堂的多明我会修道院，以及托斯卡纳区所有的多明我会修道院都和他抱有同样的思想，并主动承担内部改革工作。当我们回想当时的修道院所处的状况，以及僧侣们最微小的变动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困难时，我们不能不对这样一个全面的改革倍感吃惊。当改革正在进行期间，萨沃纳罗拉的许多追随者加入了僧团，从而大大有利于他的改革计划。佛罗伦萨的首要家族的弟子们作为见习修道士进入了圣马可教堂。

This reform of the order in a particular province was the first step to a national Church, in which, had the reformer himself lived longer, it must infallibly have ended. Savonarola, indeed, desired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whole Church, and near the end of his career sent pressing exhortations to the great potentates urging them to call together a Council. But in Tuscany his order and party were the only organs of his spirit—the salt of the earth—while the neighboring provinces remained in their old condition. Fancy and asceticism tended more and more to produce in him a state of mind to which Florence appeared as the scene of the kingdom of God upon earth.

这种在某一个特定地方所实施的僧团改革是全国教会改革的第一步，如果改革者本人能够再多活几年的话，那么必然会达到这一步。

萨沃纳罗拉的确希望整个教会都有获得重生的机会，并且在他的一生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向有权有势的大人物发出了迫切的劝告，说服他们召集一个会议。然而，只有托斯卡纳区的僧团和党派响应他的精神号召——尘世的盐——至于周边地区则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本的陈旧状态。幻想和禁欲主义在他身上越来越多地促成一种思想状态，在这种思想状态下，会认为佛罗伦萨是上帝在尘世中的王国。

The prophecies, whose partial fulfilment conferred on Savonarola a supernatural credit, were the means by which the ever-active Italian imagination seized control of the soundest and most cautious natures. At first the Franciscans of the Osservanza, trusting in the reputation which had been bequeathed to them by St Bernardino of Siena, fancied that they could compete with the great Dominican. They put one of their own men into the cathedral pulpit, and outbid the Jeremiads of Savonarola by still more terrible warnings, till Pietro de' Medici, who then still ruled over Florence, forced them both to be silent. Soon after, when Charles VIII came to Italy and the Medici were expelled, as Savonarola had clearly foretold, he alone was believed in.

一向积极活跃的意大利想象力凭借预言的力量来抓住对最全面、最谨慎的人的控制，对于这种预言，若有一部分应验的话，那么就使人们认为萨沃纳罗拉富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最初，方济会的僧侣信赖锡耶纳的贝尔纳迪诺给他们留下的声誉，幻想着他们能够和这个伟大的多明我会的僧侣竞争。他们想让他们自己僧团中的一个人登上大教堂的讲道坛，并用他们对将来更可怕的警告来超越萨沃纳罗拉对未来的灾难性预言，直到当时还在统治着佛罗伦萨的彼得罗·美第奇强迫他们不要再作声为止。很快，查理八世来到了意大利，美第奇家族被赶了出去，一切正如萨沃纳罗拉所预言的那样，人们只信奉他一个人了。

It must be frankly confessed that he never judged his own premonitions and visions critically, as he did those of others. In the funeral oration on Pico della Mirandola, he deals somewhat harshly with his dead friend. Since Pico, notwithstanding an inner voice which came from God, would not enter the order, he had himself prayed to God to chasten him for his disobedience. He certainly had not desired his death, and alms and prayers had obtained the favor that Pico's soul was safe in purgatory. With regard to a comforting vision which Pico had upon his sick-bed, in which the Virgin appeared and promised him that he should not die, Savonarola confessed that he had long regarded it as a deceit of the Devil, till it was revealed to him that the Madonna meant the second and eternal death. If these things and the like are proofs of presumption,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is great soul at all events paid a bitter penalty for his fault. In his last days Savonarola seems to have recognized the vanity of his visions and prophecies. And yet enough inward peace was left to him to enable him to meet death like a Christian. His partisans held to his doctrine and predictions for thirty years longer.

必须坦白承认，他从来没有像评判别人那样来用批判性的眼光评判他自己的预感和幻觉。在他对比科·德拉·米兰多拉葬礼上的演说中，他对自己死去的朋友多少有点苛刻。因为虽然比科受到来自上帝的内心声音的召唤，但他却没有加入僧团，他自己曾经祈祷上帝惩罚他的不服从。他当然不希望自己死去，并且他的救济物和祷告已经得到了比科灵魂得救的恩赐。关于比科在病床上所得到的一个受到安慰的幻想，在这个幻想里，圣母玛利亚出现了，并允诺说他不会死去，萨沃纳罗拉承认许久以来他都把这看作是魔鬼撒旦对他的欺骗，直到他受到启示，明白了圣母玛利亚所说的死指的是第二次永久的死。如果说这些事情以及类似的一些事情证明了他的傲慢行为，那么我们必

须承认，无论如何这个伟大的人物都因他的错误而受到了惩罚。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些日子里，萨沃纳罗拉似乎意识到了他的幻觉和预言都空虚无用。但是他的内心依然足够平静，让他能够像一个基督教徒一样迎接死亡的到来。他虔诚的信徒可以信奉他的教义和预言长达30年之久。

He only undertook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 for the reason that otherwise his enemies would have got the government into their own hands. It is unfair to judge him by the semi-democratic constitution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1495. Nor is it either better or worse than other Florentine constitutions.

他担任国家整顿工作的唯一一个理由就是，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的敌人就会把政府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根据1495年初制定的半民主宪法来对他做出评判是不公平的。虽然这个半民主宪法没有其他佛罗伦萨的宪法好，但也不比这些宪法坏。

He was at bottom the most unsuitable man who could be found for such a work. His ideal was a theocracy, in which all men were to bow in blessed humility before the Unseen, and all conflicts of passion were not even to be able to arise. His whole mind is written in that inscription on the Palazzo della Signoria, the substance of which was his maxim as early as 1495, and which was solemnly renewed by his partisans in 1527: *'Jesus Christus Rex populi Florentini S.P.Q. decreto creatus'.* He stood in no more relation to mundane affairs and their actual conditions than any other inhabitant of a monastery. Man, according to him, has only to attend to those things which make directly for his salvation.

他是最不适合做这种工作的人。他的理想就是建立神权政体，在神权政体里，所有人都以神圣的谦卑服从于看不见的上帝，甚至根本不会发生一切激情的冲突。他的一切思想都书写在市政厅大厦上面的题词里面，题词的主旨就是他早在1495年所提出的，以及在1527年庄严重申的箴言："按照元老会和人民的意愿，耶稣基督当选为佛罗伦萨人民的君主。"他和世俗之事以及他们的实际情况之间的关系并不比修道院中其他人与这些事情之间的关系多。在他看来，人类只能从事那些可以直接拯救自己的事情。

This temper comes out clearly in his opinions on ancient literature:

这种性情可以从他对古代文学的评价中清晰地看出来：

> The only good thing which we owe to Plato and Aristotle is that they brought forward many arguments which we can use against the heretics. Yet they and other philosophers are now in hell. An old woman knows more about the Faith than Plato. It would be good for religion if many books that seem useful were destroyed. When there were not so many books and not so many arguments (*ragioni naturali*)and disputes, religion grew more quickly than it has done since.

> 我们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的唯一一件好处就是他们提出了许多论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论据来反对异教徒。现在他们与其他的哲学家们都在地

狱里。关于信仰，一个老妇所知道的要比柏拉图知道得多。如果把许多貌似有用的书籍都销毁，那么这对于宗教来说是有好处的。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书籍、没有这么多的争论（自然推理），那么宗教就会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发展，比以前的发展还要快。

He wished to limit the classical instruction of the schools to Homer, Virgil and Cicero, and to supply the rest from Jerome and Augustine. Not only Ovid and Catullus, but Terence and Tibullus, were to be banished. This may be no more than the expressions of a nervous morality, but elsewhere in a special work he admits that science as a whole is harmful. He holds that only a few people should have to do with it, in order that the tradition of human knowledge may not perish, and particularly that there may be no want of intellectual athletes to confute the sophisms of the heretics. For all others, grammar, morals and religious teaching *(litterae sacrae)* suffice. Culture and education would thus return wholly into the charge of the monks, and as, in his opinion, the 'most learned and the most pious' are to rule over the states and empires, these rulers would also be monks. Whether he really foresaw this conclusion, we need not inquire.

他希望学校的经典教育只限于荷马、维吉尔以及西塞罗等人的教育书籍，并把哲罗姆和奥古斯丁的著作作为补充。不仅是奥维德和卡图卢斯的著作应该取消，而且泰伦提乌斯和提布鲁斯的著作也应该取消。这或许只不过是一种道德上的神经过敏的外在表现，但是，在另一部专著里，他承认说整个科学都是有害的。他认为只有少部分的人应该从事研究，为了不让人类知识的传统消失，尤其是为了不缺乏能够驳倒异教徒诡辩的有识之士。对于其他的人来说，语法、道德和宗教教义（圣书）就够他们用了。因此，文化和教育将重新由僧侣来负

责，因为在他看来，“学识最渊博的人和最虔诚的人”将会统治各个国家和帝国，这些统治者的职位也将由僧侣来担任。是否他也真的预知到了这种结局，我们无需再追问。

A more childish method of reasoning cannot be imagined. The simple reflection that the new-born antiquity and the boundless enlargement of human thought and knowledge which was due to it might give splendid confirmation to a religion able to adapt itself thereto seems never even to have occurred to the good man. He wanted to forbid what he could not deal with by any other means. In fact, he was anything but liberal, and was ready, for example, to send the astrologers to the same stake at which he afterwards himself died.

我们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幼稚的推理方式了。新生的古典文化和由其所带来的人类思想和知识的无限膨大，对于能够适应于这种情况的宗教可能会予以极好的确认，这个好人似乎甚至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简单的反思。他要禁止他不能用其他任何方式来处理的事情。实际上，他就是心胸不够宽阔，比如，他准备把占星家送到火刑台上去，后来他自己也死在了这个火刑台上。

How mighty must have been the soul which dwelt side by side with this narrow intellect! And what a flame must have glowed within him before he could constrain the Florentines, possessed as they were by the passion for culture, to surrender themselves to a man who could thus reason!

能和思想狭隘的知识分子共处一处的将会是多么强大的灵魂啊？

在他能够束缚佛罗伦萨人并且让他们屈服于一个能够这样推理的人之前，他的内心该是燃烧着怎样的激情啊！佛罗伦萨人对文化充满了挚爱之情。

How much of their heart and their worldliness they were ready to sacrifice for his sake is shown by those famous bonfires by the side of which all the *talami* of Bernardino da Siena and others were certainly of small account.

佛罗伦萨人为他牺牲了多少感情和物欲，可以从那些众人皆知的焚烧中显现出来，与这些焚烧比起来，锡耶纳的贝尔纳迪诺和其他人的火刑台肯定都不算什么的。

All this could not, however, be effected without the agency of a tyrannical police. He did not shrink from the most vexatious interferences with the much-prized freedom of Italian private life, using the espionage of servants on their masters as a means of carrying out his moral reforms. That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which the iron Calvin was but just able to effect at Geneva, with the aid of a permanent state of siege, necessarily proved impossible at Florence, and the attempt only served to drive the enemies of Savonarola to a more implacable hostility. Among his most unpopular measures may be mentioned those organized parties of boys who forced their way into the houses and laid violent hands on any objects which seemed suitable for the bonfire. As it happened that they were sometimes sent away with a beating, they were afterwards attended, in order to keep up the figment of a pious 'rising generation', by a bodyguard of grown-up persons.

然而，如果没有一个残暴的警察机构的话，那么所有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他毫无顾忌地对意大利最珍贵的私生活进行着最无理取闹的纠缠，把仆人来监视主人的行为作为他实现道德改革的手段。借助长期的戒严状态，残酷的卡尔文也只能够在日内瓦实现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改革，在佛罗伦萨必然证明是行不通的，这种尝试只是把萨沃纳罗拉的敌人逼迫至更难于和解的仇视状态。在他最不受人欢迎的措施中也许提及了那些有组织的儿童团，这些儿童强行进入人们的住宅，用暴力手段攫取任何看似适合焚烧的东西。因为有时候这些儿童是被人打回来的，所以后来他们就由大人守护着，以此维持一个虔诚的“新兴一代”的假象。

On the last day of the carnival in the year 1497, and on the same day the year after, the great *auto-da-fé* took place on the Piazza della Signoria. In the centre of it rose a great pyramidal flight of stairs, like the *rogus* on which the Roman emperors were commonly burned. On the lowest tier were arranged false beards, masks and carnival disguises; above came volumes of the Latin and Italian poets, among others Boccaccio, the *Morgante* of Pulci, and Petrarch, partly in the form of valuable printed parchments and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then women's ornaments and toilet articles, scents, mirrors, veils and false hair; higher up, lutes, harps, chess-boards, playing-cards; and finally, on the two uppermost tiers, paintings only, especially of female beauties, partly fancy-pictures, bearing the classical names of Lucretia, Cleopatra or Faustina, partly portraits of the beautiful Bencina, Lena Norella, Bina and Maria de' Lenzi. On the first occasion a Venetian merchant who happened to be present offered the Signoria 22,000 gold florins for the objects on the pyramid; but the only answer he received was that his portrait, too, was painted, and burned along with the rest. While the pile was lighted, the Signoria appeared on the balcony, and the air echoed with song, the sound of trumpets and the pealing

of bells. The people then adjourned to the Piazza di San Marco, where they danced round in three concentric circles. The innermost was composed of monks of the monastery, alternating with boys, dressed as angels; then came young laymen and ecclesiastics; and on the outside old men, citizens and priests, the latter crowned with wreaths of olive.

在1497年的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以及第二年的同一天，在市政厅广场上举行了大规模的判决执行式，在广场的中心位置竖起了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形状的阶梯建筑，似焚烧罗马教皇尸体的火葬台。在建筑的最底层，摆放着假胡须、面具以及狂欢节的化装服；上面一层陈列着拉丁诗人和意大利诗人的诗卷，还有其他一些作者的作品，其中有薄伽丘的作品，有普尔西的《摩尔根特》（《巨人传》），有彼特拉克的作品，其中一部分是用贵重的羊皮纸印刷的版本和手工绘本；然后是妇女的饰品和化妆用品，香水、镜子、面纱和假发；再往上一层，摆放的是琵琶、竖琴、象棋和扑克牌；最后，在最高两层全部摆放着绘画作品，尤其是美人的画像，一部分是带有古典名字，像罗马传说中的贞妇卢克雷齐娅、克利奥帕特拉或者是福斯蒂娜等人的想象画，一部分是美女本琪娜、莉娜·莫瑞拉、比娜和玛丽亚·德兰兹的肖像画。一个碰巧在场的威尼斯商人向执政团提出愿意出纳22,000金弗罗林来购买这个金字塔上的物品；但是他得到的唯一回答却是，给他所画的肖像也和这些物品一起烧掉了。当这一大堆物品被点燃的时候，执政团也出现在了露台上，空中回荡着歌声、喇叭声和钟声。然后人们就退到了圣马可教堂的广场上，在广场上他们围绕着一个中心分成三圈翩翩起舞。最里面一圈是由那个修道院的僧侣们和打扮得像天使一样的男孩子们依次交替组成的，然后中间一层是由世俗之人和牧师组成的；最外面的一圈是由老先生、市民和教士组成的，教士们的头上还戴着橄榄枝花环。

All the ridicule of his victorious enemies, who in truth had no

lack of justification or of talent for ridicule, was unable to discredit the memory of Savonarola. The more tragic the fortunes of Italy became, the brighter grew the halo which in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survivors surrounded the figure of the great monk and prophet. Though his predictions may not have been confirmed in detail, the great and general calamity which he foretold was fulfilled with appalling truth.

虽然这些获胜的敌人的确有理由也有能力去讥笑他人，但是获胜一方的所有讥笑都无法损害到人们对萨沃纳罗拉的追忆。意大利的命运变得越为悲惨，那么在幸存者的记忆中，环绕着这个伟大僧侣和预言家的形象的光环就变得越明亮。虽然我们可能无法对他的预言进行详细的核实，但是他所预言的那个巨大的、普遍发生的灾难却是真实地应验了，令人十分震惊。

Great, however, as the influence of all these preachers may have been, and brilliantly as Savonarola justified the claim of the monks to this office, nevertheless the order as a whole could not escape the contempt and condemnation of the people. Italy showed that she could give her enthusiasm only to individuals.

然而，虽然所有这些讲道者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并且萨沃纳罗拉又出色地证明了僧侣们是有权利担任这个职务的，然而对于整个僧团来说，依然逃不过人们的藐视和谴责。意大利表明了她仅仅只能把她的热情给予个人。

Strength of the Old Faith

古老信仰的力量

If, apart from all that concerns the priests and the monks, we attempt to measure the strength of the old faith, it will be found great or small according to the light in which it is considered. We have spoken already of the need felt for the sacraments as something indispensable. Let us now glance for a moment at the position of faith and worship in daily life. Both were determined partly by the habits of the people and partly by the policy and example of the rulers.

如果我们抛开一切与教士和僧侣有关的话题不谈，却要试图权衡古老的信仰所带来的力量，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古老的信仰所带给我们的力量或大或小是随着我们审视它的角度而转移的。我们已经谈过人们觉得有必要把圣礼当作必不可少的东西。让我们现在暂且审视一下信仰和崇拜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信仰和崇拜这两者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的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政策和榜样。

All that has to do with penitence and the attainment of salvation by means of good works was in much the same stage of development or corruption as in the North of Europe, both among the peasantry and among the poorer inhabitants of the cities. The instructed classes were here and there influenced by the same motives. Those sides of popular Catholicism which had their origin in the old pagan ways of addressing, rewarding and reconciling the gods have fixed themselves ineradicably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eople. The eighth eclogue of Battista Mantovano, which has already been quoted elsewhere, contains the prayer of a peasant to the Madonna, in which she is called upon as the special patroness of all rustic and agricultural interests. And what conceptions they were

which the people formed of their protectress in heaven! What was in the mind of the Florentine woman who gave *ex voto* a keg of wax to the Annunziata, because her lover, a monk, had gradually emptied a barrel of wine without her absent husband finding it out! Then, too, as still in our own days,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human life were presided over by their respective patrons. The attempt has often been made to explain a number of the commonest rit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s remnants of pagan ceremonies, and no one doubts that many local and popular usages,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religious festivals, are forgotten fragments of the old pre-Christian faiths of Europe. In Italy, on the contrary, we find instances in which the affiliation of the new faith to the old seems consciously recognized. So, for example, the custom of setting out food for the dead four days before the feast of the Chair of St Peter, that is to say, on 18 February, the date of the ancient Feralia. Many other practices of this kind may then have prevailed and have since then been extirpated. Perhaps the paradox is only apparent if we say that the popular faith in Italy had a solid foundation just in proportion as it was pagan.

无论是在农民中间或者在城市里比较贫穷的市民中间，一切与赎罪和通过行善而达到拯救目的有关系的事情，很多都是和欧洲北部一样，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或腐败阶段。有教养的阶级无处不受着同样的动机所带给他们的影响。民间的天主教起源于古代异教的求神、神酬和祈神这些方式，这些方面已经在人民的意识之中根深蒂固。我们已经在别的地方引用过巴蒂斯塔·曼托瓦诺的第八篇田园诗，这首田园诗里包含有一个农民对圣母玛利亚的祈祷，在这首诗里面，因为圣母玛利亚被看作是保护所有乡村利益和农业利益的特殊守护神，所以他受到了人们的祈祷。人们对于他们在天堂中的守护神都形成了什么样的想法啊！那个佛罗伦萨女人因为自己的情夫，一个僧侣，渐渐地喝干了一桶酒，也没有被当时不在家的丈夫发觉，为了还愿就在天使报

喜节献出了一桶蜜蜡，她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那个时候也和我们现在的时代一样，人类生活在不同的部门，由各自的守护人来管制着。我们常常试图把天主教会的一些最平常的仪式解释成异教仪式的残留物。并且没有人怀疑许多和宗教节日有关的当地的民间习俗是基督以前欧洲的古老信仰中所被人遗忘的碎片。在意大利，恰恰相反，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似乎有意识地承认新信仰与旧信仰相结合的例子。因此，比如在圣彼得教堂的建座节开始举行的四天前，也就是2月18日，有给已逝的人祭食的习俗，这一天是古代的鬼节。这一类的许多其他习俗可能在当时是盛行的，也可能是从那时起就消失了。如果我们说意大利的民间信仰越带有异教的性质其基础就越坚固，或许只能是显而易见的悖论了。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form of belief prevailed in the upper classes can to a certain point be shown in detail. It had, as we have said in speaking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lergy, the power of custom and early impressions on its side. The love for ecclesiastical pomp and display helped to confirm it, and now and then there came one of those epidemics of revivalism, which few even among the scoffers and the skeptics were able to withstand.

这一形式的信仰在上层阶级中所盛行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详细说明。正如我们在谈论教士的影响时所论述的那样，这种信仰受到风俗习惯的力量和早期印象的支持。人们对盛大的、浮华的宗教仪式的喜爱也有利于对它进行巩固，并且时不时地会出现其中一种信仰复兴运动的蔓延，甚至嘲笑者和怀疑论者也很少有人能够抵制住这种运动。

But in questions of this kind it is perilous to grasp too hastily at absolute results. We might fancy, for example, that the feeling of

educated men towards the relics of the saints would be a key by which some chambers of their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might be opened. And in fact, some difference of degree may be demonstrable, though by no means as clearly as might be wished. The government of Venic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seems to have fully shared in the reverence felt throughout the rest of Europe for the remains of the bodies of the saints. Even strangers who lived in Venice found it well to adapt themselves to this superstition. If we can judge of scholarly Padua from the testimony of its topographer Michele Savonarola, things must have been much the same there. With a mixture of pride and pious awe, Michele tells us how in times of great danger the saints were heard to sigh at night along the streets of the city, how the hair and nails on the corpse of a holy nun in Santa Chiara kept on continually growing, and how the same corpse, when any disaster was impending, used to make a noise and lift up the arms. When he sets to work to describe the chapel of St Anthony in the Santo, the writer loses himself in ejaculations and fantastic dreams. In Milan the people at least showed a fanatical devotion to relics; and when once, in the year 1517, the monks of San Simpliciano were careless enough to expose six holy corpses during certain alterations of the high altar, which event was followed by heavy floods of rain, the people attributed the visitation to this sacrilege, and gave the monks a sound beating whenever they met them in the street. In other parts of Italy, and even in the case of the popes themselves, the sincerity of this feeling is much more dubious, though here, too, a positive conclusion is hardly attainable. It is well known amid what general enthusiasm Pius II solemnly deposited the head of the Apostle Andrew, which had been brought from Greece, and then from San Mauro, in the Church of St Peter (1462); but we gather from his own narrative that he only did it from a kind of shame, as so many princes were competing for the relic. It was not till afterwards that

the idea struck him of making Rome the common refuge for all the remains of the saints which had been driven from their own churches. Under Sixtus IV, the population of the city was still more zealous in this cause than the pope himself, and the magistracy (1483) complained bitterly that Sixtus had sent to Louis XI, the dying King of France, some specimens of the Lateran relics. A courageous voice was raised about this time at Bologna, advising the sale of the skull of St Dominic to the King of Spai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ney to some useful public object. But those who had the least reverence of all for the relics were the Florentines. Between the decision to honor their saint, St Zanobi, with a new sarcophagus and the final execution of the project by Ghiberti nineteen years elapsed (1409-28), and then it only happened by chance, because the master had executed a smaller order of the same kind with great skill.

但是，对于这一类问题，急于得出绝对的结论是危险的。比如，我们可能会幻想有教养的人们对于圣徒纪念物的感情将会是一把钥匙，用来开启他们宗教意识的一些内庭的门。实际上，某种程度上的不同之处也可以得到论证，虽然绝对不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清晰。在15世纪，威尼斯政府似乎完全卷入了风靡欧洲其余地方的对圣徒遗体的崇拜之中。即使是侨居在威尼斯的外邦人也发现自己习惯于这种迷信了。如果我们根据地志学者米凯莱·萨沃纳罗拉所提供的证据对博学的帕多瓦进行评判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那里的事情很多和威尼斯的都是一样的。米凯莱带着既骄傲又虔诚的敬畏心情告诉我们，在重大的危险时刻来临的时候，她是如何听到圣徒们夜间在城市的街道上叹息不已，陈列在圣基娅拉教堂里的一个圣洁的修女的尸体，她的头发和指甲如何在继续生长着，以及在任何灾祸即将来临的时候，这个圣洁修女的尸体如何发出声音以及抬起手臂。当他着手描写桑托的圣安东尼小教堂时，这位作者竟然茫然若失地突然发出喊叫声，然后坠入到虚幻的梦境之中。在米兰，人们至少对于遗物表现出了一种狂

热的钟爱；在1517年，曾经有一次圣希姆普列齐亚诺修道院的僧侣们在改造主祭坛时，不小心暴露出了六具神圣的尸体，这件事发生之后，紧接着下了一场倾盆大雨，于是人们把这次天罚归于这次对圣体的亵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在街上遇到了僧侣，就会给这些僧侣一顿痛打。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甚至是教皇本人，对这种感情的真挚性是非常怀疑的，尽管要在这一方面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也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庇护二世是在怎样的普遍的热情当中把先从希腊，然后又从圣毛罗教堂取出来的信徒安德烈的头颅庄严地安置在圣彼得教堂里的（1462年）；但是我们从他本人的叙述中得知他之所以这样做都是出于面子问题，因为有很多君主都在争抢这个遗骸。一直到后来他才产生那个想法，想让罗马成为那些从自己的教堂里被驱赶出来的圣徒们的遗骸的一般避难所。在西斯科特四世时代，这个城市的人民比教皇本人对这件事情还要积极，西斯科特把罗马拉特兰教堂里的一些圣物送给了法兰西奄奄一息的国王路易十四，地方行政长官（1483年）对这件事表示非常不满。这时，在博洛尼亚发出了一个勇敢的声音，建议把圣多米尼克的头盖骨卖给西班牙的国王，并把卖头盖骨的钱用于有益的公共事业中。但是，佛罗伦萨人是最不尊敬遗物的人。从他们决定用一个新大理石棺材陈列，圣徒扎诺比的遗体到最后由吉贝尔蒂执行这个计划，中间一共历时19年（1409-1428），而且这还是一件意外发生的事情，因为那个雕刻大师曾用极大的技巧才完成了同样一个较小的订单。

Perhaps through being tricked by a cunning Neapolitan abbess (1352), who sent them a spurious arm of the patroness of the cathedral, Santa Reparata, made of wood and plaster, they began to get tired of relics. Or perhaps it would be truer to say that their aesthetic sense turned them away in disgust from dismembered corpses and mouldy clothes. Or perhaps their feeling was rather due to that sense of glory which thought Dante and Petrarch worthier of a splendid grave than all the twelve apostles put together. It is probable that throughout Italy, apart from Venice and from Rome,

the condition of which latter city was exceptional, the worship of relics had long been giving way to the adoration of the Madonna, [3_7] at all events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elsewhere in Europe; and in this fact lies indirect evidence of an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aesthetic sense.

佛罗伦萨人之所以会开始对遗骸感到厌烦，或许是因为被一个狡诈的那不勒斯女修道院院长欺骗了（1352年），她送给他们了一个用木头和石膏制成的大教堂的女保护人，圣女雷帕拉塔的手臂。或许更确切地说，就是他们的审美意识让他们怀着恨意离开那些被肢解的尸体和腐朽的衣服的。或者多少可能是由于那种源于荣耀的意识，认为但丁和彼特拉克比那十二个加在一起的信徒更值得拥有一个辉煌壮观的墓碑。除了威尼斯和情况比较特殊的罗马以外，在整个意大利，人们可能早已开始崇拜圣母玛利亚，早已不再崇拜遗骸， [4_7] 不管怎样，崇拜的程度也比欧洲其他地方的强烈；这个事实间接地证明了审美意识早期发展的情况。

It may be questioned whether in the North, where the vastest cathedrals are nearly all dedicated to Our Lady, and where an extensive branch of Latin and indigenous poetry sang the praises of the Mother of God, a greater devotion to her was possible. In Italy, however, the number of miraculous pictures of the Virgin was far greater, and the part they played in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much more important. Every town of any size contained a quantity of them, from the ancient, or ostensibly ancient, paintings by St Luke, down to the works of contemporaries, who not seldom lived to see the miracles wrought by their own handiwork. The work of art was in these cases by no means as harmless as Battista Mantovano thinks; sometimes it suddenly acquired a magical virtue. The popular craving for the miraculous, especially strong in women,

may have been fully satisfied by these pictures, and for this reason the relics been less regarded. It cannot be said with certainty how far the respect for genuine relics suffered from the ridicule which the novelists aimed at the spurious.

或许会有人提出质疑，在北方国家，几乎所有最为宏大的教堂都奉献给了圣母玛利亚，而且那里的拉丁文诗歌和当地的诗歌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赞颂上帝之母的，那么北方国家是不是可能比意大利更尊敬圣母玛利亚。但是，在意大利，关于圣母玛利亚的神奇的图画的数量要比北方国家的多得多，并且这些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重要得多。每一个城市，不管大小，都有很多这样的画，从古代的圣路加所创作的绘画，或者假装是古代的圣路加所创作的绘画，一直到同时代的人所创作的绘画，常常会有同时代的人亲眼看到自己的手工艺品所创造的奇迹。在这种情况下，绝不像巴蒂斯塔·曼托瓦诺所认为的那样，手工艺品是不会带来危害的；有时候，突然它会具有一种神奇的美德。人们对于奇迹的渴望，尤其是女人对奇迹更为强烈的渴望，可能是这些画能给他们带来彻底的满足，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对遗物不再那么重视了。我们不能确切地说，这些小说家对伪造的遗物的讥笑，究竟给真正的遗物所受的尊敬带来了多大的损害。

The attitude of the educated classes towards Mariolatry is more clearly recognizable than towards the worship of images. One cannot but be struck with the fact that in Italian literature Dante's *Paradiso* is the last poem in honor of the Virgin, while among the people hymns in her praise have been constantly produced down to our own day. The names of Sannazaro and Sabellico and other writers of Latin poems prove little on the other side, since the object with which they wrote was chiefly literary. The poems written in Italian in the fifteenth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ies, in which we meet with genuine religious feeling, such as

the hymns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 the sonnets of Vittoria Colonna and of Michelangelo, might have been just as well composed by Protestants. Besides the lyrical expression of faith in God, we chiefly notice in them the sense of sin, the consciousness of deliverance through the death of Christ, the longing for a better world. The intercession of the Mother of God is only mentioned by the way. The same phenomenon is repeated in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the French at the time of Louis XIV. Not till the time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 did Mariolatry reappear in the higher Italian poetry. Meanwhile the plastic arts had certainly done their utmost to glorify the Madonna. It may be added that the worship of the saints among the educated classes often took an essentially pagan form.

受教育的阶级对“圣母崇拜”的态度比对偶像崇拜的态度更能被清晰地看出来，在意大利文学中，但丁的《天堂篇》是最后一篇纪念圣母玛利亚的诗篇，而在民众中却还是接连不断地创造赞美圣母玛利亚的诗篇，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一个事实不能不令我们感到惊讶。桑纳扎罗、萨贝利科以及其他拉丁诗的作者的名字却不能成为推翻这一事实的证据，因为他们创作的目的主要是文学方面的。在15世纪和16世纪初期用意大利语所创作的诗篇具有真挚的宗教感情，比如伟大的洛伦佐所写的赞美诗，维特多利亚·科隆纳和米开朗基罗所创作的十四行诗，和新教徒所创作的诗篇一样好。除了表达对上帝的信任的抒情诗句之外，我们注意到在这些诗篇里，还有对罪恶的认识、通过基督之死而获得拯救的意识，以及对更好的世界的渴望。上帝之母的代祷只是顺便提及的。在路易十四时代，同样的现象也在法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再现过。一直到反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圣母玛利亚崇拜才出现在比较高雅的意大利诗歌当中。与此同时，造型艺术当然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赞美圣母玛利亚。在这里可以补充一下，在受教育阶级中，对圣体的崇拜往往采取的是本质上是异教的一种形式。

We might thus critically examine the various sides of Italian Catholicism at this period, and so establish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probability the attitude of the instructed classes towards popular faith. Yet an absolute and positive result cannot be reached. We meet with contrasts hard to explain. While architects, painters and sculptors were working with restless activity in and for the churches, we hea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bitterest complaints of the neglect of public worship and of these churches themselves.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天主教的各个方面，并因此以某种程度的可能性来确立受教育阶级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但是，依然不能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我们所遇到的矛盾现象是无法解释的。当建筑师、画家和雕刻家进行着坐立不安的活动在教堂里工作、为教堂而工作的时候，我们在16世纪初期听到了对无视公开崇拜和这些教堂本身的行为的最激烈的抱怨。

It is well known how Luther was scandalized by the irreverence with which the priests in Rome said mas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feasts of the Church were celebrated with a taste and magnificence of which northern countries had no conception. It looks as if this most imaginative of nations was easily tempted to neglect everyday things, and as easily captivated by anything extraordinary.

众所周知，由于对罗马教士所举行的弥撒产生了不敬行为，路德是如何受到诽谤的。与此同时，教会举行的节日庆典，其品味和壮观场面也是北方国家所无法想象到的。看来这个想象力最为丰富的民族好像很容易忽略日常事情，并且也很容易被任何非凡的东西所迷惑。

It is to this excess of imagination that we must attribute the epidemic of religious revivals, upon which we shall again say a few words. They must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 excitement called forth by the great preachers. They were rather due to general public calamities, or to the dread of such.

我们必须把这种流行性的宗教复兴运动归因于这种极端的想象力，关于宗教复兴运动我们还要再讲几句。这种宗教复兴运动必须和伟大的传教士们所激起的兴奋之情区分开来。他们产生于一般的大众灾难，或者是产生于对这种灾难的恐惧。

In the Middle Ages all Europe was from time to time flooded by these great tides, which carried away whole peoples in their waves. The Crusades and the Flagellant revival are instances. Italy took part in both of these movements. The first great companies of Flagellants appear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fall of Ezzelino and his hous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same Perugia which has been already spoken of as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revivalist preachers. Then followed the Flagellants of 1310 and 1334, and then the great pilgrimage without scourging in the year 1399, which Corio has recorded. It is not impossible that the jubilees were founded partly in order to regulate and render harmless this sinister passion for vagabondage which seized on the whole population at times of religious excitement. The great sanctuaries of Italy, such as Loreto and others, had meantime become famous, and no doubt diverted a certain part of this enthusiasm.

在中世纪时期，整个欧洲都时不时地会被这种巨大的浪潮所淹

没，全欧洲的人民都被卷入到了这种浪潮中。十字军和苦行派的复兴就是这样的例子。意大利都参与到了这两种运动之中。艾泽利诺和他的家族衰落之后，紧接着就在同一个佩鲁贾的周边地区出现了第一个庞大的鞭笞派，就像之前已经谈到的那样，成为了复兴派传教士的大本营。然后，接下来出现了1310年和1334年的鞭笞派运动，然后就是科里奥所记载的1399年没有鞭笞的、伟大的朝圣之行。在宗教振奋时期，全体人民都对流浪者的邪恶的激情而着迷，之所以创立大赦年，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控制这种迷恋，并使之变得没有害处。意大利的圣殿，像洛雷托以及其他圣殿都同时变得声名鹊起，这无疑转移了一部分热情。

But terrible crises had still at a much later time the power to reawaken the glow of medieval penitence, and the conscience-stricken people, often still further appalled by signs and wonders, sought to move the pity of Heaven by wailing and scourgings. So it was at Bologna when the plague came in 1457, so in 1496 at a time of internal discord at Siena, to mention two only out of countless instances. No more moving scene can be imagined than that we read of at Milan in 1529, when famine, plague and war conspired with Spanish extortion to reduce the city to the lowest depths of despair. It chanced that the monk who had the ear of the people, Fra Tommaso Nieto, was himself a Spaniard. The Host was borne along in a novel fashion, amid barefooted crowds of old and young. It was placed on a decorated bier, which rested on the shoulders of four priests in linen garments—an imitation of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which the children of Israel once carried round the walls of Jericho. Thus did the afflicted people of Milan remind their ancient God of His old covenant with man; and when the procession again entered the cathedral, and it seemed as if the vast building must fall in with the agonized cry of *'Misericordia!',* many who stood there may have believed that the Almighty would indeed subveit

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history, and send down upon them a miraculous deliverance.

但是，在很晚的一个时期，可怕的危机仍然有力量重新唤醒中世纪时期的赎罪的热情，良心上受到谴责的人们依然时常会被天兆和奇观所惊吓，他们试图通过恸哭和鞭打行为来感动上帝，以求怜悯。因此，当1457年的瘟疫发生时，在博洛尼亚也是如此，在1496年，锡耶纳发生内部纷争时也是如此，这里只是列举了无数个例子中的两个例子而已。我们读到了在1529发生的动人景象，我们想象不到有比这更为动人的场景了，当时，饥荒、瘟疫和战争与西班牙人的抢夺勒索交织在一起，使这个城市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之中。恰巧在当时，那个人们愿意听他讲道的僧侣，托马索·涅托修士本人是西班牙人。一群群赤足的老年人和青年人以一种新颖的时尚方式抬着圣体。圣体被安放在一个被装饰好的棺材架上，棺材架是由四个身穿亚麻布外衣的教士扛抬在肩上的——这是模仿过去以色列儿童抬着约柜绕着耶利哥城墙行走的这一行为。米兰被苦难折磨的人们也这么做，提醒他们古老的上帝牢记自己和人类所制定的古老盟约；当这个游行的队伍再一次走进大教堂时，那个庞大的建筑物看起来仿佛要和着“上帝慈悲！”这样的苦闷的哭喊声而坍塌，许多站在那里的人们可能会相信万能的主真的会颠覆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然后给他们降临一个奇迹般的拯救。

There was one government in Italy, that of Duke Ercole I of Ferrara, which assumed the direction of public feeling, and compelled the popular revivals to move in regular channels. At the time when Savonarola was powerful in Florence, and the movement which he began spread far and wide among the population of central Italy, the people of Ferrara voluntarily entered on a general fast (at the beginning of 1496). A Lazarist announced from the pulpit the approach of a season of war and famine such as the world had never seen; but the Madonna had assured some pious

people that these evils might be avoided by fasting. Upon this, the court itself had no choice but to fast, but it took the conduct of the public devotions into its own hands. On Easter Day, 3 April, a proclamation on morals and religion was published, forbidding blasphemy, prohibiting games, sodomy, concubinage, the letting of houses to prostitutes or panders, and the opening of all shops on feast-days, excepting those of the bakers and greengrocers. The Jews and Moors, who had taken refuge from the Spaniards at Ferrara, were now compelled to again wear the yellow O upon the breast. Contraveners were threatened not only with the punishments already provided by law, but also 'with such severer penalties as the duke might think good to inflict'. After this, the duke and the court went several days in succession to hear sermons in church, and on 10 April all the Jews in Ferrara were compelled to do the same. On 3 May the director of police,Zampante, sent the crier to announce that whoever had given money to the police-officers in order not to be denounced as a blasphemer, might, if he came forward, have it back with a further indemnification. These wicked officers, he said, had extorted as much as two or three ducats from innocent persons by threatening to lodge an information against them. They had then mutually informed against one another, and so had all found their way into prison. But as the money had been paid precisely in order not to have to do with Zampante, it is probable that his proclamation induced few people to come forward. In the year 1500, after the fall of Lodovico il Moro, when a similar outbreak of popular feeling took place, Ercole ordered a series of nine processions, in which there were 4,000 children dressed in white, bearing the standard of Jesus. He himself rode on horseback, as he could not walk without difficulty. An edict was afterwards published of the same kind as that of 1496. It is well known how many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were built by this ruler. He even sent for a live saint, the Suor Colomba, shortly before

he married his son Alfonso to Lucrezia Borgia (1502). A special messenger fetched the saint with fifteen other nuns from Viterbo, and the duke himself conducted her on her arrival at Ferrara into a convent prepared for her reception. We shall probably do him no injustice if we attribute all these measures very largely to political calculation. To the conception of government formed by the House of Este,this employment of religion for the ends of statecraft belongs by a kind of logical necessity.

在意大利有一个政府，即费拉拉的公爵埃尔科莱一世的政府，这个政府指导着人民的思想，并强迫民间的复兴运动按照常规的途径进行发展。萨沃纳罗拉在佛罗伦萨得势之后，当他率先开展的运动在中部意大利的群众中广泛展开时，费拉拉人民自发进入了普遍的绝食现象（于1496年初）。一个遣使会的修士在礼拜堂的讲道坛上宣布，一个世界从未经历过的战争和饥荒时期将要来临；但是圣母玛利亚已经向一些虔诚的人民保证，人们可以通过斋戒绝食的方式来避免这些灾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除了斋戒绝食之外，宫廷本身也再无其他办法，然而它却把公众的信仰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4月3号的复活节这一天，发布了一个有关道德和宗教的公告，禁止亵渎神明、禁止赌博、严禁鸡奸、严禁纳妾、禁止将房屋租赁给妓女或老鸨，除了面包店和蔬菜水果店，禁止一切商店在节日期间营业。犹太人和摩尔人在费拉拉避开了西班牙人的劫难，现在又被迫在胸前佩戴黄色的“O”。抗拒者不仅会受到法律所规定的惩罚的威胁，而且还会受到“公爵认为应该施加给抗拒者的更加严厉的惩罚”。在此之后，这个公爵和他的廷臣们连续几天都会待在教堂里聆听讲道，在4月10日这一天，费拉拉的所有犹太人都被强令拉去听讲道了。在5月3日，警察总监扎邦特派传唤员去宣布，任何一个为了免于被揭发为亵渎者而向警官行贿的人，如果他站出来的话，那么他都可以取回他的钱，而且还可以得到一笔补偿金。他说这些邪恶的军官曾经用告发无辜百姓的手段相要挟，以此向他们敲诈两三个达克特。他们曾经也相互举报，结果都进了监狱。但是，他们花钱恰恰是为了不再和扎邦特打交道，

所以他的布告所诱导出来前来领回钱款的人很有可能不是很多。1500年，在洛多维科·斯福尔扎衰落之后，这时爆发了相似的群众情绪，埃尔科莱下令组织了一连九次的游行，在这九次游行中，有4000个身着白色衣服，手举耶稣圣像的孩子参加。埃尔科莱他自己因为行走不便，就骑在马背上。后来，颁布了一个和1496年的公告性质相同的法令。人们知道了这个统治者建造了多少个教堂、多少个修道院。甚至就在他的儿子阿方索和卢克雷齐娅·波吉亚结婚前不久（1502年），他还派人去请活圣女，苏尔·科隆巴。一个特殊的信使偕同其他十五个修女前往维泰博迎接她，在他到达费拉拉时，公爵亲自带领她到为接待她而准备好的女修道院里。如果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些举措归之于政治因素上的考虑的话，那么可能对他不算不公平。根据埃斯特家族对政府所形成的观念，这种利用宗教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在逻辑上是一种必然。

Religion and the Spirit of the Renaissance

宗教和文艺复兴的精神

But in order to reach a definite conclusion with regard to the religious sense of the men of this period, we must adopt a different method. From their intellectual attitude in general, we can infer their relation both to the divine idea and to the existing religion of their age.

但是，为了对这一时期的人们的宗教意识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我们必须采取一种与众不同的方法。从他们大体上的精神态度来看，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与神的思想以及与他们那个时代现有的宗教之间的关系。

These modern me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ulture of Italy, were born with the same religious instincts as other medieval Europeans. But their powerful individuality made them in religion, as in other matters, altogether subjective, and the intense charm which the discovery of the inner and outer universe exercised upon them rendered them markedly worldly. In the rest of Europe religion remained, till a much later period, something given from without, and in practical life egotism and sensuality alternated with devotion and repentance. The latter had no spiritual competitors, as in Italy, or only to a far smaller extent.

这些现代人，意大利文化的代表者，他们一出生就具有和其他中世纪的欧洲人相同的宗教本能。但是他们强大的个性让他们在宗教上，就像在其他问题上那样，完全趋于主观，而对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发现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强烈魅力明显让他们趋于世俗化。在欧洲其他地方，直到很晚的一个时期，宗教始终都是一种从外部授予人们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唯我主义和感官享受是与奉献和忏悔交替出现的。后者不像意大利那样有精神上的竞争对手，即使有精神对手，也是在很小的范围内。

Further, the close and frequent relations of Italy with Byzantium and the Muhammadan peoples had produced a dispassionate tolerance which weakened the ethnographical conception of a privileged Christendom. And when classical antiquity with its men and institutions became an ideal of life, as well as the greatest of historical memories, ancient speculation and skepticism obtained in many cases a complete mastery over the minds of Italians.

并且，意大利与拜占庭人民和伊斯兰教人民紧密而频繁的联系产生了一种平心静气的宽容态度，这种宽容态度削弱了享有特权的基督教国家在民族志学方面的观念。当古典时期、古典时期的人和古典时期的制度变成一种生活的理想，以及最伟大的历史记忆时，在许多情况下，意大利人就会完全崇尚古代的推测和古代的怀疑论。

Since, again, the Italians were the first modern people of Europe who gave themselves boldly to speculations on freedom and necessity, and since they did so under violent and lawless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in which evil seemed often to win a splendid and lasting victory, their belief in God began to waver, and their view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world became fatalistic. And when their passionate natures refused to rest in the sense of uncertainty, they made a shift to help themselves out with ancient, oriental or medieval superstition. They took to astrology and magic.

再者就是，因为在欧洲意大利人是第一个大胆地对自由和必然做出推测的民族，而且因为意大利人是在没有暴力和法制约束的政治体制下这样做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似乎邪恶时常能够取得辉煌的、持久的胜利，因此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开始动摇，并且对这个世界的政府的观点也成了宿命论的了。当他们那些有热情性格的人拒绝停留在一种不确定的认识当中时，他们就转而求助于古代的、东方的或者中世纪的迷信观念中。他们喜欢上了占星术和魔术。

Finally, these intellectual giants, thes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enaissance, show, in respect to religion, a quality which is common in youthful natures. Distinguishing keenly between good and evil, they yet are conscious of no sin. Every disturbance of their inward harmony they feel themselves able to make good out of the

plastic resources of their own nature, and therefore they feel no repentance. The need of salvation thus becomes felt more and more dimly, while the ambitions and the intellectual activity of the present either shut out altogether every thought of a world to come, or else caused it to assume a poetic instead of a dogmatic form.

最后，这些知识巨人，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对宗教就表现出了一种在青年人身上常见的品质特征。他们能够敏锐地分清善与恶，但他们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当内心的和谐每一次遭受扰乱时，他们都认为可以依靠自己随机应变的、足智多谋的天性来弥补这种干扰，因此他们并不为此而感到悔恨。因而也就越来越觉得没有必要来进行拯救，而目前的抱负和智力活动没有完全排除各种对于未来的思考，或者让它采取一种诗的形式来代替教义的形式。

When we look on all this as pervaded and often perverted by the all-powerful Italian imagination, we obtain a picture of that time which is certainly more in accordance with truth than are vague declamations against modern paganism. And closer investigation often reveals to us that underneath this outward shell much genuine religion could still survive.

当我们把这都看作被全能的意大利想象力所渗透了的和扭曲了的，那么我们就获得了一幅关于那个时代的画面，这当然比模糊不清地谴责现代的异教信仰更合乎真理。更深入的调查向我们揭露出许多隐藏在这个表象下面的真正的宗教依然能够继续幸存下去。

The fuller discussion of these points must be limited to a few of the most essential explanations.

对于这些问题的更全面的讨论必须限制在个别最基本的说明上。

That religion should again become an affair of the individual and of his own personal feeling was inevitable when the Church became corrupt in doctrine and tyrannous in practice, and is a proof that the European mind was still alive. It is true that this showed itself in many different ways. While the mystical and ascetical sects of the North lost no time in creating new outward forms for their new modes of thought and feeling, each individual in Italy went his own way, and thousands wandered on the sea of life without any religious guidance whatever. All the more must we admire those who attained and held fast to a personal religion. They were not to blame for being unable to have any part or lot in the old Church, as she then was; nor would it be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they should all of them go through that mighty spiritual labor which was appointed to the German reformers. The form and aim of this personal faith, as it showed itself in the better minds, will be set forth at the close of our work.

当教会在教义上腐化不堪、在做法上残暴专制的时候，宗教必然会再次成为个人的以及与个人情感有关的事情，而且宗教也证明了欧洲精神必然存在的这样一个事实。当然，这是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的。当北方神秘的禁欲教派不失时机地急于给他们的新思想和新感情模式创造新的外在形式时，意大利的每一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并且有成千上万的人游荡在生活的海洋之中，没有任何宗教的指引。我们必须要称赞那些获得宗教信仰，并恪守自己宗教信仰的人。他们不能因为没有按照教会当时的样子加入旧教会或者没有分担旧教会的命运而受到责备；期望他们所有的人都经受那种德意志宗教改革者所经历的强大的精神劳动也是不公道的。我们将会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

阐明更杰出的人们的思想中所显现出的个人信仰的形式和目的。

The worldliness, through which the Renaissance seems to offer so striking a contrast to the Middle Ages, owed its first origin to the flood of new thoughts, purposes and views which transformed the medieval conception of nature and man. The spirit is not in itself more hostile to religion than that 'culture' which now holds its place, but which can give us only a feeble notion of the universal ferment which the discovery of a new world of greatness then called forth. This worldliness was not frivolous, but earnest, and was ennobled by art and poetry. It is a lofty necessity of the modern spirit that this attitude, once gained, can never again be lost, that an irresistible impulse forces us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men and things, and that we must hold this inquiry to be our proper end and work. How soon and by what paths this search will lead us back to God, and in what ways the religious temper of the individual will be affected by it, are questions which cannot be met by any general answer. The Middle Ages, which spared themselves the trouble of induction and free inquiry, can have no right to impose upon us their dogmatical verdict in a matter of such vast importance.

世俗性首先起源于那些转变了中世纪关于自然和人类的概念的新思想、新意志和新观点的浪潮中，这些世俗性使文艺复兴时期和中世纪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精神本身并不比文化对于宗教更具敌对性，这种文化现在取代了宗教的地位，但是这种文化对伟大新世界的发现所引起的普遍的激昂之情却仅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薄弱的概念。这种世俗性并非是轻率的，而是真诚恳切的，而且艺术和诗歌也提升了这种世俗性。一旦得到了这种态度，那么就永远不会再失去它，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促使我们去研究人和物，而我们也必须得把这种研究当作自己合适的目的和工作，这正是现在精神所必需的崇高

性。这种研究在多久之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身边，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它会给个人意志的宗教气质带来影响，这些问题是不能用任何一个一般的答案来解决的。不肯在归纳法和自由探究方面下工夫的中世纪时期，在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是没有权利把它们的教条主义结论强加于我们的。

To the study of man, among many other causes, was due the tolerance and indifference with which the Muhammadan religion was regarded. The knowledge and admiration of the remarkable civilization which Islam, particularly before the Mongol inundation, had attained, was peculiar to Italy from the time of the Crusades. This sympathy was fostered by the half-Muhammadan government of some Italian princes, by dislike and even contempt for the existing Church, and by constant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e harbors of 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Mediterranean. It can be shown that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Italians recognized a Muhammadan ideal of nobleness, dignity and pride, which they loved to connect with the person of a sultan. A Mameluke sultan is commonly meant; if any name is mentioned, it is the name of Saladin. Even the Osmanli Turks, whose destructive tendencies were no secret, gave the Italians only half a fright, and a peaceable accord with them was looked upon as no impossibility.

在许多原因当中，意大利对于人类的研究是它以一种宽容和冷漠的态度来对待伊斯兰教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从十字军时代开始，尤其是在意大利的蒙古人泛滥之前，意大利就了解和赞赏伊斯兰教所达到的高度文明。一些意大利君主的半伊斯兰教式的统治、对现存教会的不满甚至是鄙视，以及与东地中海和南地中海各口岸的频繁的商业往来培养了这种同情心。我们可以看到，在13世纪，意大利人就承认了伊斯兰教关于高尚、尊严和自豪的理想，并喜欢把这些理想和一个苏

丹本人联系在一起。这通常都是指苏丹马穆鲁克所说的这种意思；如果提到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那这个人就是萨拉丁。甚至是对自己的破坏意图毫不掩饰的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带给意大利人的也仅仅只是一半恐惧，并且和他们和平共处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The truest and most characteristic expression of this religious indifference is the famous story of the Three Rings, which Lessing has put into the mouth of his Nathan, after it had been already told centuries earlier, though with some reserve, in *The Hundred Old Tales* (nov. 72 or 73), and more boldly in Boccaccio (*Decameron,* i, nov. 3). In what language and in what corner of the Mediterranean it was first told, can never be known; most likely the original was much more plain-spoken than the two Italian adaptations. The religious postulate on which it rests, namely deism, will be discussed later on in its wider significance for this period. The same idea is repeated, though in a clumsy caricature, in the famous proverb of the 'three who have deceived the world, that is, Moses, Christ and Muhammad'. If the Emperor Frederick II, in whom this saying is said to have originated, really thought so, he probably expressed himself with more wit. Ideas of the same kind were also current in Islam.

有名的“三个指环”的故事最真实、最典型地表现出了宗教无差异的特点。几个世纪之前，《古代故事百篇》（第72或73篇故事）就曾讲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虽然或多或少有所保留，但薄伽丘对其《十日谈》里的第3篇故事的讲述更为大胆，莱辛又借助他的著作里的南森这个人物之口重新讲述了这个故事。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这个故事最初是用什么样的语言，以及在地中海的哪个角落里开始讲述的；也许最初的这个故事比这两个改编过的意大利故事讲得更直言不讳、更直截了当。它所依赖的宗教假设条件，即自然神论，我们稍后将会

从它给这一时期所带来的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进行论述。“三个欺骗了世界的人，即摩西、基督和穆罕默德”，这个著名的谚语重新阐述了这个思想，虽然使用的漫画手法不是很巧妙。据说这个谚语最早是由皇帝腓特烈二世讲述的，如果腓特烈二世真是这么想的话，那么他可能会更加机智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这类思想也在伊斯兰教中流行过。

At the height of the Renaissance,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Luigi Pulci offers us an example of the same mode of thought in the *Morgante Maggiore.* The imaginary world of which his story treats is divided, as in all heroic poems of romance, into a Christian and a Muhammadan camp.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dieval temper, the victory of the Christian and the final reconciliation among the combatants was attended by the baptism of the defeated Islamites, and the *improvisatori,* who preceded Pulci in the treatment of these subjects, must have made free use of this stock incident. It was Pulci's object to parody his predecessors, particularly the worst among them, and this he does by those appeals to God, Christ and the Madonna with which each canto begins; and still more clearly by the sudden conversions and baptisms, the utter senselessness of which must have struck every reader or hearer. This ridicule leads him further to the confession of his faith in the relative goodness of all religions, which faith, notwithstanding his profession of orthodoxy, rests on an essentially theistic basis. In another point too he departs widely from medieval conceptions. The alternatives in past centuries were: Christian, or else pagan and Muhammadan; orthodox believer or heretic. Pulci draws a picture of the Giant Margutte who, disregarding each and every religion, jovially confesses to every form of vice and sensuality, and only reserves to himself the merit of having never broken faith. Perhaps the poet intended to make something of this

—in his way—honest monster, possibly to have led him into virtuous paths by Morgante, but he soon got tired of his own creation, and in the next canto brought him to a comic end. Margutte has been brought forward as a proof of Pulci's frivolity; but he is needed to complete the picture of the poetry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It was natural that it should somewhere present in grotesque proportions the figure of an untamed egotism, insensible to all established rule, and yet with a remnant of honorable feeling left. In other poems sentiments are put into the mouths of giants, fiends, infidels and Muhammadans which no Christian knight would venture to utter.

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在15世纪末期，路易吉·普尔西在《摩尔根特》（《巨人传》）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想法一样的例子。他的故事中所探讨的那个想象中的世界被分成了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教阵营，就像所有浪漫英雄诗里所做的那样。根据中世纪的精神，基督教的胜利及交战双方最终的和解，都是伴随着战败的伊斯兰教徒受洗礼的情形的。出现在普尔西以前的即兴诗人，在对待这些主题时，一定毫无约束地使用过这一老套子。普尔西的目的就是戏仿他以前的那些作者，尤其是其中最坏的作者，在每一篇开始他都会恳求上帝、基督和圣母，因而他做到了这一点；而他更为明显的做法是那种突然改变的信仰和受洗礼的情形，这使每一读者或者每一个听众都感到完全没有任何意义。这种嘲笑使他更进一步地供认他是相信一切宗教的相对优点的，这些宗教的信仰是建立在有神论的基础之上的，尽管他所宣布的是正教。在另外一点上，他远远脱离了中世纪的概念。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可供选择的主题有：可以写基督徒，或者写异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也可以写正教的信徒或者邪教徒。普尔西描绘了一个巨人马尔古特的形象，他忽视一切宗教信仰，高兴地供认出了自己的种种恶习和淫荡行为，而一直保留着一个从不背信弃义的优点。或许，这个诗人打算让这个诚实的怪物——挡在他的道路上的——有所表现，或许由摩尔根特把他带到善良之路上去，但作者不久就厌烦了自己的创

作，而下一章对这个形象有了喜剧性的结尾。马尔古特曾经被提出来以用来证明普尔西的轻浮行为；但是还需要由他来完成15世纪诗歌的全貌。当然书中的某些地方就应该会不成比例地呈现这个不能抑制的唯我主义的形象，对一切清规戒律毫不理会，但是还遗留一些高贵情感的残余物。在其他诗文里，作者有时也借助巨人、恶魔、异教徒以及伊斯兰教徒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而这些是任何一个基督教骑士所不敢冒险来讲述的。

Antiquity exercised an influence of another kind than that of Islam, and this not through its religion, which was but too much like the Catholicism of this period, but through its philosophy. Ancient literature, now worshipped as something incomparable, is full of the victory of philosophy over religious tradition. An endless number of systems and fragments of systems were suddenly presented to the Italian mind, not as curiosities or even as heresies, but almost with the authority of dogmas, which had now to be reconciled rather than discriminated. In nearly all these various opinions and doctrines a certain kind of belief in God was implied; but taken altogether they formed a marked contrast to the Christian faith in a divine government of the world. And there was one central question, which medieval theology had striven in vain to solve, and which now urgently demanded an answer from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namely, the relation of providence to the freedom or necessity of the human will.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this question even superficially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onwards would require a whole volume. A few hints must here suffice.

与伊斯兰教相比较而言，古典文化还产生了另外一种影响，这并不是因为它和这个时代的天主教有极为相似的宗教信仰，而是因为它的哲学。当时被尊崇为无可匹敌的古代文学著作里写满了哲学战胜宗

教传统的例子。无可计数的制度和制度碎片，不是作为新奇的学说甚至是作为异端邪说，而几乎是作为具有权威性的教义，忽然呈现在意大利人的思想里，对于这些权威性的教义，我们现在必须与之和解，而不能对之加以歧视。几乎在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教义当中，都隐含着某一类对上帝的信仰；但是总而言之，它们和基督教相信神统治世界的信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有一个中世纪神学努力解决的主要问题，并且这个问题现在急需从古人的智慧中找到一个答案，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关于天意和人类意志的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即使把14世纪以来有关这个问题的历史很浅薄地写出来，那么也需要写一册书。在这里只能略作提示。

If we take Dante and his contemporaries as evidence, we shall find that ancient philosophy first came into contact with Italian life in the form which offered the most marked contrast to Christianity, that is to say, Epicureanism. The writings of Epicurus were no longer preserved, and even at the close of the classical age a more or less one-sided conception had been formed of his philosophy. Nevertheless, that phase of Epicureanism which can be studied in Lucretius, and especially in Cicero, is quite sufficient to make men familiar with a godless universe. To what extent his teaching was actually understood, and whether the name of the problematic Greek sage was not rather a catchword for the multitude, it is hard to say.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Dominican Inquisition used it against men who could not be reached by a more definite accusation. In the case of skeptics born before the time was ripe, whom it was yet hard to convict of positive heretical utterances, a moderate degree of luxurious living may have sufficed to provoke the charge. The word is used in this conventional sense by Giovanni Villani, when he explains the Florentine fires of 1115 and 1117 as a divine judgement on heresies, among others, 'on the luxurious and gluttonous sect of Epicureans'. The same writer says of Manfred,

'His life was Epicurean, since he believed neither in God, nor in the saints, but only in bodily pleasure.'

如果我们把但丁和他同时代的人作为证据的话，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古代哲学首次和意大利人的生活接触时，采取的是一种和基督教形成鲜明对比的形式，也就是享乐主义。伊壁鸠鲁的作品没能被保存下来，甚至是在古典时期的末期就对于他的哲学或多或少地形成了片面的了解。但是我们能够在卢克莱修的诗篇中，尤其是在西塞罗的著作中了解到的那种享乐主义已经足以使人们熟悉一个无神的世界。究竟他的教义被人们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否这个有疑问的希腊人的名字对于群众来说只是一个口号而已，这是很难说的。或许多明我会异端裁判曾经用它来指控那些无法用更为确切的罪名来控告的那些人。对于那些在时机成熟以前所产生的那些怀疑论者，还很难用确定的异端学说来对其进行处罚，但是他们一般程度的奢侈生活就足以激起对他们的控诉。当乔瓦尼·维拉尼把1115和1117年发生在佛罗伦萨的大火解释成是神对异端邪说的惩罚时，尤其是对那些奢侈的、暴食的伊壁鸠鲁派的惩罚时，他就是在这种传统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的。同一个作家在谈到曼弗雷德时说道："他过的是伊壁鸠鲁的生活，因为他既不信任上帝，也不信任圣徒，而只是信任肉体的享受。"

Dante speaks still more clearly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antos of the *Inferno*. That terrible fiery field covered with half-opened tombs, from which issued cries of hopeless agony, was peopled by the two great classes of those whom the Church had vanquished or expelle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one were heretics who opposed the Church by deliberately spreading false doctrine; the other were Epicureans, and their sin against the Church lay in their general disposition, which was summed up in the belief that the soul dies with the body. The Church was well aware that this one doctrine, if it gained ground, must be more ruinous to her authority than all the

teachings of the Manichaeans and Paterines, since it took away all reason for her interference in the affairs of men after death. That the means which she used in her struggles were precisely what had driven the most gifted natures to unbelief and despair was what she naturally would not herself admit.

但丁在《地狱篇》的第九篇和第十篇里讲的依然很清楚。那个可怕的、炽烈的原野，到处都布满了半开着的坟墓，从那里发出绝望的、极度痛苦的哭泣声，里面挤满了教会在13世纪击败的或者驱逐的两大人类。一类是故意散布谬论来反对教会的异教徒，另外一类是享乐主义者，他们反对教会的罪孽在于他们的一般倾向，概括起来就是认为灵魂与肉体同死。教会深知如果这个学说取得进展，那么它一定比摩尼教徒和巴达派的所有教义对它的权威更加有害，因为摩尼教取消了她干涉人们死后事情的所有理由。她在挣扎中所使用的手段恰恰是把最有天赋的人才逼到不信奉宗教、绝望的道路上的方法，当然她自己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

Dante's loathing of Epicurus, or of what he took to be his doctrine, was certainly sincere. The poet of the life to come could not but detest the denier of immortality; and a world neither made nor ruled by God, no less than the vulgar objects of earthly life which the system appeared to countenance, could not but be intensely repugnant to a nature like his. But if we look closer, we find that certain doctrines of the ancients made even on him an impression which forced the biblical doctrine of the divine government into the background, unless, indeed, it was his own reflection, the influence of opinions then prevalent, or loathing for the injustice that seemed to rule this world, which made him give up the belief in a special providence. His God leaves all the details of the world's government to a deputy, Fortune, whose sole work it

is to change and change again all earthly things, and who can disregard the wailings of men in unalterable beatitude. Nevertheless, Dante does not for a moment loose his hold on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man; he believes in free will.

但丁对伊壁鸠鲁或者他所认为的伊壁鸠鲁学说的厌恶一定是真实的。一个歌颂来世生活的诗人忍不住憎恨那个否认生命永生的人；一个既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上帝统治的世界无异于是这个制度所支持的来自俗世生活的庸俗之物，不能不是他那种性格的人所厌恶的。但是，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进行观察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除非确实是受他自己的考虑、当时所盛行的观点的影响，或者是对那种看似支配着这个世界的不公正现象的厌恶，才使他放弃对一种特殊主恩的信仰，否则的话古人的某些学说是会在他身上产生一种影响的，这种影响迫使圣经上关于神统治世界的学说退到后台去。他的上帝把统治世界的所有细节东西都委托给一个代理人，即命运之神，命运之神的唯一一项工作就是一再地改变俗世的事务，并且不顾那些处于安富尊荣的人们的哭号。不过，但丁一刻也未放松他对人类道德上的责任；他相信自由意志。

The belief in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in the popular sense of the words, has always prevailed in Western countries. At all times men have been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ir actions, as though this freedom were a matter of course. The case is otherwise with the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doctrine which labors under the difficulty of harmonizing the nature of the will with the laws of the universe at large. We have here to do with a question of more or less, which every moral estimat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Dante is not wholly free from those astrological superstitions which illumined the horizon of his time with deceptive light, but they do not hinder him from rising to a worthy conception of human

nature. 'The stars,' he makes his Marco Lombardo say *(Purgatorio,* xvi, 73), 'the stars give the first impulse to your actions,' but 'a light is given you to know good and evil, and Freewill, which, if it endure the strain in its first battlings with the heavens, at length gains the whole victory, if it be well nurtured.'

从通俗意义上来讲的对自由意志的信仰一直盛行于西方国家。不管什么时候，人们都要对他们的言行举止负责，好像自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当具体到历经艰辛来调和意志的本质与一般的宇宙法则时，宗教学说和哲学信条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这里关系到一个多或少的问题，每一个道德评判都要顾及到这个问题。但丁并没有完全摆脱那些关于占星术的迷信，这些迷信迷惑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的人，但是这些迷信并没有阻碍它们提出关于人性的、有价值的概念。他让他的马尔科·隆巴尔多说（《炼狱篇》，第16歌，第73行），“繁星，繁星赋予了你的行为以最初的动力”，但是“上天也赋予你一种光芒，使你得以辨别善与恶，也赋予你一种意志，这种意志也许一开始和上天搏斗时会感到疲惫不堪，如果能够忍耐住压力，得到很好的培养，那么这种意志最终将会战胜一切”。

Others might seek the necessity which annulled human freedom in another power than the stars, but the question was henceforth an open and inevitable one. So far as it was a question for the schools or the pursuit of isolated thinkers, its treatment belongs to the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But inasmuch as it entered into the consciousness of a wider public,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say a few words respecting it.

其他人或许会在繁星以外探寻另外一种废除人类自由意志的力量的必然物，但这个问题自此以后就是一个公开的、不可避免的问题。

只要它是各学派和孤立的思想家们所研究的问题，那么就要由哲学史研究者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因为它已成为公众广泛意识到的问题，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谈几句。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as chiefly stimulated by the writings of Cicero, who, though in fact an eclectic, yet, by his habit of setting forth the opinions of different schools, without coming to a decision between them, exercised the influence of a skeptic. Next in importance came Seneca, and the few works of Aristotle which had been translated into Latin. The immediate fruit of these studies was the capacity to reflect on great subjects, if not in direct opposition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at all events independently of it.

14世纪主要是受到了西塞罗作品的鼓舞，虽然实际上西塞罗是一个折中主义者，但是他习惯于提出各个学派的观点，而不在它们之间做出决定，所以他就造成了怀疑论者的影响。其次比较重要的是塞涅卡，以及亚里士多德已经被译成拉丁语的少数作品。这些研究所产生的直接成果就是反思大问题的能力，如果不是直接反抗教会的权威的话，那么不管怎么样也不会在受到教会影响的情况下而获得这种能力的。

In the cours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works of antiquity were discovered and diffused with extraordinary rapidity. All the writings of the Greek philosophers which we ourselves possess were now, at least in the form of Latin translations, in everybody's hands. It is a curious fact that some of the most zealous apostles of this new culture were men of the strictest piety, or even ascetics. Fra Ambrogio Camaldolese, as a spiritual dignitary chiefly occupied with ecclesiastical affairs, and as a literary man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the Greek fathers of the Church, could not repress the humanistic impulse, and at the request of Cosimo de' Medici, undertook to translate Diogenes Laertius into Latin. His contemporaries, Niccolo Nicoli, Giannozzo Manetti, Donato Acciaiuoli and Pope Nicholas V, united to a many-sided humanism profound biblical scholarship and deep piety. In Vittorino da Feltre the same temper has been already noticed. The same Matthew Vegio, who added a thirteenth book to the *Æneid,* had an enthusiasm for the memory of St Augustine and his mother Monica which cannot have been without a deeper influence upon him. The result of all these tendencies was that the Platonic Academy at Florence deliberately chose for its object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spirit of antiquity with that of Christianity. It was a remarkable oasis in the humanism of the period.

在15世纪，人们创作了古典文化的作品，并且这种作品非常迅速地传播开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希腊哲学家的所有作品，在当时至少都译成了拉丁语，并且传到了每个人的手中。非常奇怪的是，这种新文化的最积极的倡导者是最虔诚的信徒，甚至是禁欲主义者。作为精神上的高僧，安布洛吉奥·卡玛尔迪斯修士主要忙于教会的事务，作为一个文人墨客，他曾翻译过教会的希腊教父的作品，他按捺不住自己对于人文主义的冲动，应科西莫·美第奇的要求，承担起了把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作品翻译成拉丁语的工作。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尼科洛·尼科利、詹诺佐·马内蒂、多纳托·阿奇亚奥里，以及教皇尼古拉斯五世，都把意义深远的圣经学、深奥的虔诚行为与多方面的人文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在维托里奥·达·费尔特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同样的倾向。同一个马修·维吉奥给《埃涅伊德》这部罗马史诗做了十三卷的续，热衷于纪念圣奥古斯丁和他的母亲莫尼卡，如果不是他们对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是不会来纪念他们的。所以这些倾向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刻意地把古代精神和基督教精神之间的调和作为自己的目标。在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中，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绿洲。

This humanism was in fact pagan, and became more and more so as its sphere widene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ts representatives, whom we have already described as the advance guard of an unbridled individualism, display as a rule such a character that even their religion, which is sometimes professed very definitely, becomes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to us. They easily got the name of atheists, if they showed themselves indifferent to religion, and spoke freely against the Church; but not one of them ever professed, or dared to profess, a formal, philosophical atheism. If they sought for any leading principle, it must have been a kind of superficial rationalism—a careless inference from the many and contradictory opinions of antiquity with which they busied themselves, and from the discredit into which the Church and her doctrines had fallen. This was the sort of reasoning which was near bringing Galeottus Martius to the stake, had not his former pupil, Pope Sixtus IV, perhaps at the request of Lorenzo de' Medici, saved him from the hands of the Inquisition. Galeotto had ventured to write that the man who walked uprightly, and acted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law born within him, would go to heaven, whatever nation he belonged to.

这种人文主义实际上是异教的，在15世纪随着它的范围不断扩大，人文主义就越来越成为异教的了。我们已经把它的代表人物作为一种无拘束的个人主义的先锋来进行描述，它的代表通常表现出了这样一种性格，以至于即使是他们有时非常明确地宣称的宗教信仰，对于他们来说也变得无所谓了。如果他们对宗教信仰表现出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并随意诋毁教会，那么他们很容易就会被冠以无神论的称号；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人曾经承认过，或者没有人敢于承认过自己是一个正式的、哲学的无神论者。如果他们想寻求任何一种指导原则的话，那么这种指导原则一定是肤浅的唯理主义——是从他们所从事

的众多古代互相对立的观点中，以及从教会和教会学说所陷入的怀疑状态中所得出的一种草率的结论。这就是差点把加莱奥图斯·马尔提乌送上火刑台的那个理由，多亏了加莱奥图斯·马尔提乌以前的学生，教皇西斯科特四世，也许是应了洛伦佐·美第奇的请求，这才把加莱奥图斯·马尔提乌从异端裁判的手里营救出来。加莱奥图斯曾经冒着危险写道：一个正直地生活，并且按照自己内心所产生的自然法则行事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个民族，他都能够进入天堂。

Let us take, by way of example, the religious attitude of one of the smaller men in the great army. Codrus Urceus was first the tutor of the last Ordelaffo, Prince of Forli, and afterwards for many years professor at Bologna. Against the Church and the monks his language is as abusive as that of the rest. His tone in general is reckless to the last degree, and he constantly introduces himself in all his local history and gossip. But he knows how to speak to the edification of the true God-Man, Jesus Christ, and to commend himself by letter to the prayers of a saintly priest. On one occasion, after enumerating the follies of the pagan religions, he thus goes on: 'Our theologians, too, fight and quarrel *de lana caprina,* about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antichrist, sacraments, predestination and other things, which were better let alone than talked of publicly.' Once, when he was not at home, his room and manuscripts were burnt. When he heard the news he stood opposite a figure of the Madonna in the street, and cried to it: 'Listen to what I tell you; I am not mad, I am saying what I mean. If I ever call upon you in the hour of my death, you need not hear me or take me among your own, for I will go and spend eternity with the Devil.' After which speech he found it desirable to spend six months in retirement at the home of a woodcutter. With all this, he was so superstitious that prodigies and omens gave him incessant frights, leaving him no belief to spare for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When his hearers

questioned him on the matter, he answered that no one knew what became of a man, of his soul or his body, after death, and the talk about another life was only fit to frighten old women. But when he came to die, he commended in his will his soul or his spirit to Almighty God, exhorted his weeping pupils to fear the Lord, and especially to believe in immortality and future retribution, and received the sacrament with much fervour. We have no guarantee that more famous men in the same calling, however significant their opinions may be, were in practical life any more consistent. It is probable that most of them wavered inwardly between incredulity and a remnant of the faith in which they were brought up, and outwardly held for prudential reasons to the Church.

让我们拿众人之中的一个比较小的人物对宗教的态度作为例子。科德鲁斯·乌尔塞斯刚开始是奥德拉福家族最后一代，弗利君王的家庭教师，后来在博洛尼亚任教多年。他和其他人一样，辱骂教会和僧侣。他的语气一般都是肆无忌惮、不顾一切的，并且他不断地了解当地的故事和流言蜚语。但是他自己知道如何应对真正的神人，耶稣的教诲，并且给一个圣洁的牧师写信，祈祷牧师给他带来福祉。有一次，在列举了异教的种种罪恶之后，从而他就继续说道："关于纯洁受胎，反对基督、圣礼、宿命论以及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们的神学家也进行着毫无价值可言的战斗和争论，对于这些问题最好置之不理，不去公开地谈论它们。"还有一次，当他不在家时，他的房间和草稿被烧掉了。当他得知这个消息时，他站在街上的一幅圣母玛利亚的圣像前，对着它哭喊到："听着，我告诉你；我没有疯，我说的话都是我想说的。如果我在临死前想到了你，那么你不需要听我说，或者把我当成你自己的人，因为我将永远和恶魔撒旦在一起。"说了这番话之后，他发现有必要在一个伐木工家里躲上六个月。除了这个之外，他还非常迷信，以至于不断地对奇事和征兆怀有恐惧感，让他不再相信能够得到灵魂永生。当听他讲课的人向他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没有人知道在一个人死后，这个人以及他的灵魂和躯体会变成什

么样子，对于来世生命的谈论只适于吓唬一个老妇而已。但是，在他临死前，他会在自己的遗嘱中把他的灵魂或者精神推荐给万能的上帝，并忠告他哭泣的弟子们要敬畏上帝，尤其要相信灵魂不死和来世的因果报应，然后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圣礼。我们不能保证那些和他志同道合的、更著名的人在实际生活中更加始终如一，不管他们的意见有多么重要。可能大多数人的内心都在怀疑和他们从幼年时期就开始信奉的信仰的残余之间摇摆不定，而为了慎重起见，在表面上依然不离开教会。

Through the connection of rationalism with the newly born science of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some timid attempts at biblical criticism may here and there have been made. A saying of Pius II has been recorded, which seems intended to prepare the way for such criticism: 'Even if Christianity were not confirmed by miracles, it ought still to be accepted on account of its morality. 'The legends of the Church, in so far as they contained arbitrary versions of the biblical miracles, were freely ridiculed, and this reacted on the religious sense of the people. Where Judaizing heretics are mentioned, we must understand chiefly those who denied the divinity of Christ, which was probably the offence for which Giorgio da Novara was burnt at Bologna about the year 1500. But again at Bologna in the year 1497 the Dominican Inquisitor was forced to let the physician Gabriele da Salo, who had powerful patrons, escape with a simple expression of penitence, although he was in the habit of maintaining that Christ was not God, but son of Joseph and Mary, and conceived in the usual way; that by his cunning he had deceived the world to its ruin; that he may have died on the Cross on account of crimes which he had committed; that his religion would soon come to an end; that his body was not really contained in the sacrament, and that he performed his miracles, not through any divine power, but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the heavenly bodies.

This latter statement is most characteristic of the time. Faith is gone, but magic still holds its ground.

因为唯理主义和新产生的史学调查研究的结合，到处都可能会有一些批判圣经的胆怯尝试。记载上有一句庇护二世所讲的话，这句话似乎打算给这种批判扫除障碍，庇护二世说："即使基督教没有被奇迹所证实，那么基督教也应该因其道德而被人们所接受。"教会的传奇里面包含有多少个随意编造的圣经奇迹，就会受到多少次恣意的嘲讽，并且这是反应在人们的宗教意识上的。当提及犹太教的异教徒时，我们首先必须要明白那些否认基督教是神学的人，可能就是由于冒犯了他们，乔治奥·达·诺瓦拉才于1500年左右在博洛尼亚被烧死的。但此外，多明我会异端裁判所法官被迫于1497年在博洛尼亚释放了加布列·达·萨洛医生，这个医生有势力强大的庇护人，他只是做了一次简单的忏悔就逃脱了刑罚，尽管他总是习惯说基督不是上帝，而是约瑟夫和圣母玛利亚的儿子，并且受孕方式和常人的一样；由于基督狡猾诡诈，他把这个世界欺骗到了濒于毁灭的状态；可能由于他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他才死在了十字架上；他的宗教很快就会结束；他的躯体并不是真的包含在圣餐的面包里，他不是依靠任何神圣的力量来创造他的奇迹的，而是依靠天体的力量。后面一句话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特点。信仰已逝，但是魔法依然占有一席之地。

With respect to the moral government of the world, the humanists seldom get beyond a cold and resigned consideration of the prevalent violence and misrule. In this mood the many works *On Fate,* or whatever name they bear, are written. They tell of the turning of the wheel of fortune, and of the instability of earthly, especially political, things. Providence is only brought in because the writers would still be ashamed of undisguised fatalism, of the avowal of their ignorance, or of useless complaints. Gioviano Pontano ingeniously illustrates the nature of that mysterious

something which men call fortune by a hundred incidents, most of which belonged to his own experience. The subject is treated more humorously by Aeneas Sylvius, in the form of a vision seen in a dream. The aim of Poggio, on the other hand, in a work written in his old age, is to represent the world as a vale of tears, and to fix the happiness of various classes as low as possible. This tone became in future the prevalent one. Distinguished men drew up a debit and credit of the happiness and unhappiness of their lives, and generally found that the latter outweighed the former. The fate of Italy and the Italians, so far as it could be told in the year 1510, has been described with dignity and almost elegiac pathos by Tristan Caracciolo. Applying this general tone of feeling to the humanists themselves, Pierio Valeriano afterwards composed his famous treatise. Some of these themes, such as the fortunes of Leo, were most suggestive. All the good that can be said of him politically has been briefly and admirably summed up by Francesco Vettori; the picture of Leo's pleasures is given by Paolo Giovio and in the anonymous biography; and the shadows which attended his prosperity are drawn with inexorable truth by the same Pierio Valeriano.

至于精神统治的世界，人文主义者几乎不能超越盛行的暴力和暴政手段而采取一种冷静的、听天由命的考虑方法。许多有关《论命运》或者其他标题的作品都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创作而成的。他们讲述了命运之神的车轮在转动，以及尘世中的不稳定，尤其是政治事务的不稳定。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到上帝，因为这些作者依然会以露骨的宿命论、他们公开宣布的无知以及无用的抱怨而感到羞耻。乔维诺·庞达诺用一百个大部分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偶发事件来巧妙地说明那个被人们叫做命运的神秘东西。埃尼亚斯·西尔维于斯用梦见的幻象这种形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为幽默风趣的论述。另一方面，波焦在自己晚年时期所写的一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世界描述成眼泪之

谷，并确定各类人的幸福是少得不能再少了。这种风格从此以后就盛行起来了。一些杰出的人士把他们生活中的幸福与不幸福描绘成了一张借贷表，通常都是发现不幸福超过了幸福。特里斯坦·卡拉乔洛用一种近似挽歌的悲怆庄严地描述了在1510年所能够目睹到的意大利及意大利人的命运。后来彼埃利奥·瓦莱里亚诺把这种一般的感情基调运用到了人文主义者自己身上，创作出了那部著名的作品。在这些主题中，有一些主题，像列奥的机遇，是最具启示性的。所有关于他政治生涯上的优点已经由弗朗西斯科·韦托里简略地、美妙地总结过了；保罗·乔维奥和匿名氏所写的传记描绘出了一幅有关列奥的快乐生活的图画；同一个彼埃利奥·瓦莱里亚诺用无法改变的事实描写出了他的成功所映射出的暗影。

We cannot, on the other hand, read without a kind of awe how men sometimes boasted of their fortune in public inscriptions. Giovanni II Bentivoglio, ruler of Bologna, ventured to carve in stone on the newly built tower by his palace that his merit and his fortune had given him richly of all that could be desired—and this a few years before his expulsion. The ancients, when they spoke in this tone, had nevertheless a sense of the envy of the gods. In Italy it was probably the *condottieri* who first ventured to boast so loudly of their fortune.

另一方面，有时人们会在公共铭文中吹嘘自己的幸运，我们读到之后不能不对之感到敬畏。博洛尼亚的统治者乔瓦尼·本蒂沃利奥二世竟敢冒险在他的宫殿旁边新建的塔楼上的石头上刻着他的优点和幸运使他富有，所愿皆遂——这件事发生在他被放逐之前的那几年。然而，当古人用这种口气讲话时，他们会有一种要遭到上帝嫉妒的感觉。在意大利，可能是雇佣军队长敢于率先这样明目张胆地夸耀自己的幸运。

But the way in which resuscitated antiquity affected religion most powerfully was not through any doctrines or philosophical system, but through a general tendency which it fostered. The men, and in some respects the institutions, of antiquity were preferred to those of the Middle Ages, and in the eager attempt to imitate and reproduce them, religion was left to take care of itself. All was absorbed in the admiration for historical greatness. To this the philologians added many special follies of their own, by which they became the mark for general attention. How far Paul II was justified in calling his Abbreviators and their friends to account for their paganism is certainly a matter of great doubt, as his biographer and chief victim, Platina, has shown a masterly skill in explaining his vindictiveness on other grounds, and especially in making him play a ludicrous figure. The charges of infidelity, paganism, denial of immortality and so forth were not made against the accused till the charge of high treason had broken down. Paul, indeed, if we are correctly informed about him, was by no means the man to judge of intellectual things. It was he who exhorted the Romans to teach their children nothing beyond reading and writing. His priestly narrowness of views reminds us of Savonarola, with the difference that Paul might fairly have been told that he and his like were in great part to blame if culture made men hostile to religion. It cannot, nevertheless, be doubted that he felt a real anxiety about the pagan tendencies which surrounded him. And what, in truth, may not the humanists have allowed themselves at the court of the profligate pagan, Sigismondo Malatesta? How far these men, destitute for the most part of fixed principle, ventured to go, depended assuredly on the sort of influences they were exposed to. Nor could they treat of Christianity without paganizing it. It is curious, for instance, to notice how far Gioviano Pontano carried this confusion. He speaks of a saint not only as '*divu*' but as *'deus';* the angels he holds to be identical with the genii of antiquity; [3_8]

and his notion of immortality reminds us of the old kingdom of the shades. This spirit occasionally appears in the most extravagant shapes. In 1526, when Siena was attacked by the exiled party, the worthy canon Tizio, who tells us the story himself, rose from his bed on 22 July, called to mind what is written in the third book of Macrobius, celebrated mass and then pronounced against the enemy the curse with which his author had supplied him, only altering *'Tellus mater teque Juppiter obtestor'* into *'Tellus teque Christe Deus obtestor'*. After he had done this for three days, the enemy retreated. On the one side, these things strike us as an affair of mere style and fashion; on the other, as a symptom of religious decadence.

但是，复苏的古典文化并不是通过任何学说或者哲学方法来给宗教带来强烈的影响的，而是通过它所滋生出来的大体上的倾向。古人，以及古代某些方面的制度被认为是优于中世纪时期的人和制度的。人们迫切地试图模仿它们，使它们再现，这时就没有人再关注宗教了。所有事物都被吸引到了对历史伟大的赞美中去了。对此，语言学家还添加了许多他们自己的特别的时事讽刺剧，由此他们就成了一般人所关注的目标。保罗二世到底有多少合乎情理的理由来要求他的秘书们和秘书们的朋友对异教信仰做出解释，当然这是一件极其可疑的事情，因为给他写传记的作者——也是主要的受害者——普拉蒂纳在解释他由于其他理由而进行报仇雪恨的行为时，尤其是解释让他扮演成一个荒唐可笑的人物形象时，他曾经表现出了精湛娴熟的技巧。直到叛国之罪的控诉失败以后，这时才控诉被告以不信上帝、异教信仰、否认灵魂永生等等的罪名。如果我们正确了解了保罗二世的情况，那么他确实绝非是一个能够理性地做出判断的人。就是他告诫罗马人除了读和写之外，不要教授他们的孩子任何东西。他似教士的狭隘观点让我们想起了萨沃纳罗拉，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可以很公正地告诉保罗，如果文化让人们对宗教怀有敌意，那么他和像他一样的人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不过，毫无疑问，他对于自己周围的异教徒的倾向也感到一种真实的焦虑。实际上，在恣意放荡的异教徒西吉斯蒙

多·马拉泰斯塔的宫廷上，还有什么事情是人文主义者做不出来的呢？这些绝大多数都没有固定原则的人们究竟还要冒多大的险，当然要取决于他们所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影响。不见得他们不能让基督教精神极端化。比如，我们要看到乔维诺·庞达诺把这种混乱状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会不能不感到奇怪。他不仅把圣徒说成是“神明的”，而且还把他说成“神”；他认为天使和古代的鬼是一样的；[4_8] 他关于灵魂不死的观点让我们想起了古老的阴曹地府。这种精神偶尔会以最为放纵的形式出现。在1526年，当锡耶纳被流亡党攻击时，一个杰出人物——住持提吉奥亲自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他在7月22日这一天，起床之后，回想了马克罗比乌斯在其第三卷著作里所写的内容，举行了弥撒礼，然后用从书中读到的咒语来诅咒敌人，只是把“大地女神忒勒斯和爱神丘比特，我恳求你”改成了“大地女神忒勒斯和基督主，我恳求你”。他这样诅咒了三天之后，敌人就撤退了。一方面，这些事情让我们明白了它只不过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形式而已；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预示宗教堕落的征兆。

Influence of Ancient Superstition

古老迷信的影响

But in another way, and that dogmatically, antiquity exercised a perilous influence. It imparted to the Renaissance its own forms of superstition. Some fragments of this had survived in Italy all through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suscitation of the whole was thereby made so much the more easy. The part played by the imagination in the process need not be dwelt upon. This only could have silenced the critical intellect of the Italians.

但是，另一方面，古老文化教条式地给人们带来了危机四伏的影响。它把自己的迷信方式传授给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迷信的某些残

余整个中世纪时期都在意大利幸存了下来，整个迷信的复苏就因此变得更为容易一些。我们不必详细阐述想象力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单单这种想象力就能够抑制意大利人的批判精神。

The belief in a divine government of the world was in many minds destroyed by the spectacle of so much injustice and misery. Others, like Dante, surrendered at all events this life to the caprices of chance, and if they nevertheless retained a sturdy faith, it was because they held that the higher destiny of man would be accomplished in the life to come. But when the belief in immortality began to waver, then fatalism got the upper hand, or sometimes the latter came first and had the former as its consequence.

世间有如此多的不公平现象和悲惨现象，以至于许多人心中信奉神统治世界的信仰遭到了破坏。另外一些人，像但丁，不管怎样今生都听从反复无常的命运的摆布，不过，如果他们依然保持一种坚定的信仰，那是因为他们觉得人类更崇高的命运将会在来生实现。但是当坚信灵魂不死的信仰开始动摇时，宿命论就占了上风，或者有时候是先有了宿命论，然后其结果是坚信灵魂不死的信仰开始动摇。

The gap thus opened was in the first place filled by the astrology of antiquity, or even of the Arabs. From the relations of the planets among themselves and to the signs of the zodiac, future events and the course of whole lives were inferred, and the most weighty decisions were taken in consequence. In many cases the line of action thus adopted at the suggestion of the stars may not have been more immoral than that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followed. But too often the decision must have been made at

the cost of honor and conscience. It is profoundly instructive to observe how powerless culture and enlightenment were against this delusion, since the latter had its support in the ardent imaginat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passionate wish to penetrate and determine the future. Antiquity, too, was on the side of astrology.

因此，首先用古老的占星术来填补打开的间隙，甚至是用阿拉伯人的占星术来填补这个间隙。从各星宿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星宿对十二宫的关系来推断未来的事件和生命的整个过程，从而做出最为重大的决定。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由于受到星宿的启发而采取的行动路线可能不比所采取的其他方法更邪恶。但是，这种决定往往是在牺牲荣誉和良知的前提之下做出的。观察一下文化和启蒙运动在反对这种迷信时是多么无能为力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后者有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有洞悉和决定未来的强烈愿望作为后盾。古代文化也是拥护占星术的。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is superstition suddenly appeared in the foreground of Italian life. The Emperor Frederick II always travelled with his astrologer Theodorus; and Ezzelino da Romano with a large, well-paid court of such people, among them the famous Guido Bonatto and the long-bearded Saracen, Paul of Baghdad. In all important undertakings they fixed for him the day and the hour, and the gigantic atrocities of which he was guilty may have been in part practical inferences from their prophecies. Soon all scruples about consulting the stars ceased. Not only princes, but free cities, had their regular astrologers, and at the universities,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professors of this pseudo-science were appointed, and lectured side by side with the astronomers.The popes commonly made no secret of their star-gazing, though Pius II, who also despised magic, ome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s an honorable exception.Even Leo X seems to have thought the flourishing condition of astrology a credit to his pontificate, and Paul III never held a consistory till the star-gazers had fixed the hour.

在13世纪初期，这种迷信突然就开始引领意大利人的生活了。皇帝腓特烈二世总是带着他的占星学家提奥多路斯旅行；而艾泽利诺·达·罗曼诺则带着一大群待遇优厚的宫廷中的人旅行，其中有著名的圭多·博纳托和那个留有长胡子的撒拉森人，还有巴格达的保罗。在一切重要事情上，他们会给他规定日期和时间，而他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可能一部分也是从他的预言中实际推断出的结论。不久之后，对占星也就没有任何顾虑了。不仅君主，而且有独立主权的自由城市也有了正式的占星家，而且从14世纪到16世纪，大学里也任用了这门伪科学的教授，教授和天文学家们一起授课。教皇一般毫不掩饰自己的占星行为，尽管鄙视魔法、征兆和释梦的庇护二世也是一种可敬的例外。甚至是利奥十世似乎也认为占星术的盛行是他任教皇期间的一件光荣的事情，在占星家没有定出时间以前，保罗三世是从来不会召开红衣教会议的。

It may fairly be assumed that the better natures did not allow their actions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stars beyond a certain point, and that there was a limit where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made them pause. In fact, not only did pious and excellent people share the delusion, but they actually came forward to profess it publicly. One of these was Maestro Pagolo of Florence, in whom we can detect the same desire to turn astrology to moral account which meets us in the late Roman Firmicus Maternus. His life was that of a saintly ascetic. He ate almost nothing, despised all temporal goods, and only collected books. A skilled physician, he only practised among his friends, and made it a condition of his treatment that

they should confess their sins. He frequented the small but famous circle which assembled in the Monastery of the Angeli around Fra Ambrogio Camaldolese. He also saw much of Cosimo the Elder, especially in his last years; for Cosimo accepted and used astrology, though probably only for objects of lesser importance. As a rule, however, Pagolo only interpreted the stars to his most confidential friends. But even without this severity of morals, the astrologers might be highly respected and show themselves everywhere. There were also far more of them in Italy than in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where they only appeared at the great courts, and there not always. All the great householders in Italy, when the fashion was once established, kept an astrologer, who, it must be added, was not always sure of his dinner. Through the literature of this science, which was widely diffused even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a dilettantism also grew up which as far as possible followed in the steps of the masters. The worst class of astrologers were those who used the stars either as an aid or a cloak to magical arts.

人们完全可以认为，人格高尚的人不会允许星宿在决定他们的活动时超过某种成度，良知和宗教把它们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实际上，虔诚的、杰出的人们不仅有这种迷惑的想法，而且他们竟然还站出来公开承认它。佛罗伦萨的马埃斯特罗·帕哥洛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在他身上我们察觉到了一种和罗马后期的弗米卡斯·马特努斯身上所具有的相同愿望，他们都希望占星术有利于道德。他过着一种圣洁的苦行者的生活。他几乎不吃东西，鄙视俗世的一切物品，只是收藏书籍。他是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他只给他的朋友们治病，并且他给他们治病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们应该坦白承认自己的罪行。他时常出现在安布洛吉奥·卡玛尔迪斯周围的昂厄利修道院里聚会的那个虽小但名气十足的小社团里。他也经常和老科西莫会面，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岁月里；因为科西莫也接受和使用占星术，或者仅仅是为了不怎么重

要的目的。但帕哥洛通常只是给他最信任的朋友解释星相。但是，即使是没有这种严格的道德，占星家们也会高度地受到尊敬，并且出现在各个地方。意大利的占星家也要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占星家多得多，在欧洲其他国家，占星家们只是出现在大宫廷中，并且也不是很常见。曾经当占星术盛行时，意大利所有的大户人家都会雇佣一个占星家，必须要补充说明的是，并不能确定这个占星家每次都能吃得上晚餐。由于这一学科的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就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所以也就出现了一种业余的占星家，他们尽量步占星大师们的后尘。最糟糕的一类占星家就是那些依靠占星术来施展魔法或者是把占星术当作魔法的斗篷的人们。

Yet apart from the latter, astrology is a miserable feature in the life of that time. What a figure do all these highly gifted, many-sided, original characters play when the blind passion for knowing and determining the future dethrones their powerful will and resolution! Now and then, when the stars send them too cruel a message, they manage to brace themselves up, act for themselves, and say boldly, '*Vir sapiens dominabitur astris*' —the wise man is master of the stars—then again relapse into the old delusion.

但是暂且抛开后者不谈，占星术在当时生活中也是一个悲惨的特征。当这种预知未来和决定未来的盲目激情废黜了人们的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时，那么所有这些极具天赋的、多才多艺的、有创造力的人们扮演的是怎样一个角色呢！有时候，当星辰给他们发送一个残酷的消息时，他们想方设法振作精神，自己继续努力下去，并大胆地说“圣贤之人支配星辰”——智者是繁星的主人——然后又再度堕落到以往的迷惘中。

In all the better families the horoscope of the children was

drawn as a matter of course, and it sometimes happened that for half a lifetime men were haunted by the idle expectation of events which never occurred. The stars were questioned whenever a great man had to come to any important decision, and even consulted as to the hour at which any undertaking was to be begun. The journeys of princes, the reception of foreign ambassadors, the laying of the foundation-stones of public buildings, depended on the answer. A striking instance of the latter occurs in the life of the aforenamed Guido Bonatto, who by his personal activity and by his great systematic work on the subject deserves to be called the restorer of astrolog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In order to put an end to the struggle of the Guelphs and Ghibellines at Forli, he persuaded the inhabitants to rebuild the city walls and to begin the works under a constellation indicated by himself. If then two men, one from each party, at the same moment put a stone into the foundation, there would henceforth and for ever be no more party divisions in Forli. A Guelph and a Ghibelline were selected for this office; the solemn moment arrived, each held the stone in his hands, the workmen stood ready with their implements. Bonatto gave the signal, and the Ghibelline threw down his stone on to the foundation. But the Guelph hesitated, and at last refused to do anything at all, on the ground that Bonatto himself had the reputation of a Ghibelline and might be devising some mysterious mischief against the Guelphs. Upon which the astrologer addressed him: 'God damn thee and the Guelph party, with your distrustful malice! This constellation will not appear above our city for 500 years to come.' In fact God soon afterwards did destroy the Guelphs of Forli, but now, writes the chronicler about 1480, the two parties are thoroughly reconciled, and their very names are heard no longer.

在一些较好的家庭中，给孩子算命被认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时候人们的前半生都为某些事情毫无根据的预料而烦恼，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伟人不得不做出任何一个重大的决定时，他就会去问星辰，甚至是对于任何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开始做也要去询问星辰。君主的旅行、对外国大使的接待、公共建筑的奠基都要依靠星辰的回答来进行。上面所提到过的圭多·博纳托，由于他的个人活动和他关于这个主题的伟大的系统性著作，那么他应该被称作13世纪占星术的复兴者，在他的一生之中，存在一个关于建筑方面的引人注目的例子。为了结束弗利的归尔甫派（教皇派）与吉伯林派（保皇派）之间的斗争，他就说服当地居民重新修建城墙，并在他自己指明的星座之下开始动工。如果当时有两个人，一个党派一个，于同一时间在城墙地基上放下一块石头，那么从此之后弗利将永远不会再有党派之争。一个归尔甫派成员与一个吉伯林派成员被挑选出来担任这一职务；那个庄严肃穆的时刻到来了，他们两个人都把石头拿在手里，工人们则拿着工具站在一边。博纳托发出了指令，那个吉伯林派成员把石头扔在了城墙的地基上。但是那个归尔甫派成员犹豫不决，最后他完全拒绝做任何事情，原因就是博纳托本人一向被认为是一个吉伯林派成员，且名声在外，他可能是在密谋某种反抗归尔甫派的不可思议的恶作剧。于是，那个占星家就对他说："因为你内心怀有对人不信任的恶念，上帝将惩罚你和归尔甫派！在未来500年之内，这个星座将不会出现在我们城市的上空。"实际上，后来不久之后，上帝确实毁灭了弗利的归尔甫派，但是当时的作家在1480年左右写到，现在两个党派已经彻底和解了，并且人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名字了。

Nothing that depended upon the stars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decisions in time of war. The same Bonatto procured for the great Ghibelline leader Guido da Montefeltro a series of victories by telling him the propitious hour for marching. When Montefeltro was no longer accompanied by him he lost the courage to maintain his despotism, and entered a Minorite monastery, where he lived as a

monk for many years till his death. In the war with Pisa in 1362, the Florentines commissioned their astrologer to fix the hour for the march, and almost came too late through suddenly receiving orders to take a circuitous route through the city. On former occasions they had marched out by the Via di Borgo Santi Apostoli, and the campaign had been unsuccessful. It was clear that there was some bad omen connected with the exit through this street against Pisa, and consequently the army was now led out by the Porta Rossa. But as the tents stretched out there to dry had not been taken away, the flags—another bad omen—had to be lowered. The influence of astrology in war was confirmed by the fact that nearly all the *condottieri* believed in it. Jacopo Caldora was cheerful in the most serious illness, knowing that he was fated to fall in battle, which in fact happened. Bartolommeo Alviano was convinced that his wounds in the head were as much a gift of the stars as his military command. Niccolo Orsini-Pitigliano asked the physicist and astrologer Alessandro Benedetto to fix a favorable hour for the conclusion of his bargain with Venice (1495). When the Florentines on 1 June 1498 solemnly invested their new *condottiere* Paolo Vitelli with his office, the marshal's staff which they handed him was, at his own wish, decorated with pictures of the constellations.

在依靠占星术来决定的许多事情当中，最重要的是在战争时期依靠占星术而做出的决定。同一个纳博托通过告诉伟大的吉伯林派领导者圭多·达·蒙泰费尔特罗一个吉利的进军时刻，为他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当蒙泰费尔特罗不再有纳博托的陪同时，就丧失了继续他的独裁统治的勇气，然后就进了方济会修道院，在那里做了很多年的和尚，直到死去。在1362年与比萨的战争中，佛罗伦萨人委任的占星家确定进军的时间，却因为突然接到了命令，让他们走一条绕行的路线穿过这个城市，所以差点延误了时间。在以前的这种情况下，他们曾从圣保罗街出发，结果战争失利。很显然，某种不吉利的征兆是和从

这条街出发去攻打比萨有关联的，所以现在军队都是从罗萨门出发的。但是，因为有许多支在那里晾晒的帐篷还没有被取走，所以就不能放倒军旗——这又是一个不吉祥的征兆。几乎所有的雇佣军首领都相信占星术，这样的一个事实就肯定了占星术在战争中的影响。雅各布·卡尔多拉虽患上了最严重的疾病，但却怡然自得，他知道他注定是要死在战场上的，实际上果然如此。巴尔托洛梅奥·阿尔维亚诺相信他头部的伤和他的军队指挥权同样都是星辰赋予的。尼科洛·奥尔西尼·皮蒂利亚诺要求物理学家、占星家阿里桑德罗·贝内代托为他确定一个和威尼斯签订契约的吉利的时间（1495年）。当佛罗伦萨人在1498年6月1日郑重其事地任命保罗·维特利作为他们的新雇佣军队长时，他们授予保罗·维特利的司仪指挥棒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用星座的图案来装饰的。

Sometimes it is not easy to make out whether in important political events the stars were questioned beforehand, or whether the astrologers were simply impelled afterwards by curiosity to find out the constellation which decided the result. When Giangaleazzo Visconti by a master-stroke of policy took prisoner his uncle Bernabo, with the latter's family (1385), we are told by a contemporary that Jupiter, Saturn and Mars stood in the house of the Twins, but we cannot say if the deed was resolved on in consequence. It is also probable that the advice of the astrologers was often determined by political calculation not less than by the course of the planets.

有时候也不容易辨认出重要的政治事件究竟是否需要事先去占星，或者是否仅仅是事后的好奇心迫使占星家们去查明决定那个结果的星座。詹加莱亚佐·维斯孔蒂通过一种巧妙的策略把他的叔叔贝尔纳博及其家人（1385年）一起囚禁在监狱里，与他同时代的一个人告诉我们，宙斯神朱庇特、农业之神以及战神玛尔斯都站在双子星座里，

但是我们无法说出来是否那件事是受此影响而被决定的。有可能占星家的建议受政治决定的次数不少于受星辰运转决定的次数。

All Europe, through the latter part of the Middle Ages, had allowed itself to be terrified by predictions of plagues, wars, floods and earthquakes, and in this respect Italy was by no means behind other countries. The unlucky year 1494, which for ever opened the gates of Italy to the stranger, was undeniably ushered in by many prophecies of misfortune—only we cannot say whether such prophecies were not ready for each and every year.

中世纪的整个后半叶，由于对瘟疫、战争、洪涝灾害以及地震的预言使得整个欧洲都胆战心惊，在这个方面，意大利也绝不会落后于其他国家。1494年是不幸的一年，在这一年意大利为外国人的入侵永远地敞开了大门，无可否认地，这一年有许多不幸的预言——只是我们无法说明是否这样的预言每年都会有。

This mode of thought was extended with thorough consistency into regions where we should hardly expect to meet with it. If the whole outward and spiritual life of the individual is determined by the facts of his birth, the same law also governs groups of individuals and historical products—that is to say, nations and religions; and as the constellation of these things changes, so do the things themselves. The idea that each religion has its day first came into Italian culture in connection with these astrological beliefs. The conjunction of Jupiter with Saturn brought forth, we are told, the faith of Israel; that of Jupiter and Mars, the Chaldean; with the Sun, the Egyptian; with Venus, the Muhammadan; with Mercury, the Christian; and the conjunction of Jupiter with the Moon will one

day bring forth the religion of Antichrist. Cecco d'Ascoli had already blasphemously calculated the nativity of Christ, and deduced from it his death upon the cross. For this he was burnt at the stake in 1327, at Florence. Doctrines of this sort ended by simply darkening men's whole perceptions of spiritual things.

这种思维方式彻底延伸到了我们几乎没有想象到它会扩展到的领域里。如果一个人的全部外部生活和精神生活决定着他出生时的事实情况，那么同样的法则也将会控制着大批的人和历史产物——也就是说，民族和宗教；而随着这些事物所对应的星座的变化，这些事物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每一种宗教都有它的诞生日，这种观点和占星术的信仰结合在一起首次进入意大利的文化中。人们告诉我们，木星和土星的会合产生了以色列人的信仰；木星和火星的会合带来了迦勒底人的信仰；木星和太阳会合，产生了埃及人的信仰；木星和金星会合，产生了伊斯兰教的信仰；木星和水星会合，产生了基督教的信仰；木星和月亮的会合总有一天将会产生反基督教的信仰。切科·德·阿斯科利曾经推算过基督的诞生日期，并从这种推算中推理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结论，而这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为此，切科·德·阿斯科利于1327年在佛罗伦萨被烧死在火刑台上。这种学说的结局只能使人们对精神事物的全部看法变得阴暗。

So much more worthy then of recognition is the warfare which the clear Italian spirit waged against this army of delusions. Notwithstanding the great monumental glorification of astrology, as in the frescoes in the Salone at Padua, and those in Borso's summer palace (Schifanoia) at Ferrara, notwithstanding the shameless praises of even such a man as the elder Beroaldus, there was no want of thoughtful and independent minds to protest against it. Here, too, the way had been prepared by antiquity, but it was their own common sense and observation which taught them what to

say. Petrarch's attitude towards the astrologers, whom he knew by personal intercourse, is one of bitter contempt; and no one saw through their system of lies more clearly than he. The novels, from the time when they first began to appear—from the time of the *Cento novelle antiche* —are almost always hostile to the astrologers. The Florentine chroniclers bravely keep themselves free from the delusions which, as part of historical tradition, they are compelled to record. Giovanni Villani says more than once, 'No constellation can subjugate either the free will of man, or the counsels of God.' Matteo Villani declares astrology to be a vice which the Florentines had inherited, along with other superstitions, from their pagan ancestors, the Romans. The question, however, did not remain one for mere literary discussion, but the parties for and against disputed publicly. After the terrible floods of 1333, and again in 1345, astrologers and theologians discussed with great minuteness the influence of the stars, the will of God and the justice of his punishments. These struggles never ceased throughout the whole time of the Renaissance, and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protestors were in earnest, since it was easier for them to recommend themselves to the great by defending than by opposing astrology.

所以当时更加值得我们称赞的是意志清醒的意大利人为反对迷信的大军而发起的斗争。虽然有赞颂占星术的伟大的不朽之作，像帕多瓦的萨洛内美术馆里的壁画，以及费拉拉的博尔索（斯基法诺亚）夏日皇宫里的壁画，虽然有像资格较老的贝罗阿尔都斯那样无耻下流的人的赞扬，但也不缺乏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们反对它。在此古人也已经为占星术做了铺垫，但是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依据他们的常识性知识和观察总结出来的。彼特拉克对于通过私交所认识的那些占星家们所持的态度是一种充满仇恨的蔑视态度；对于他们的那套谎言没有人比他看得更清楚的了。小说，从它们开始出现的时候起——从《古代故事百篇》创作起——几乎永远都是对占星家怀有敌意的。佛罗伦萨

的一些编年史家却能够英勇地摆脱那些他们被迫不得不把它作为历史传说的其中一个部分记录下来的妄想。乔瓦尼·维拉尼不止一次地说过："没有星座能够征服人类的自由意志或者上帝的决策。"马泰奥·维拉尼断言说：占星术是佛罗伦萨人从他们的异教祖先罗马人那里，与其他迷信一同继承过来的陋习。然而，这个问题并不只是停留在文字讨论的层面，但是赞成方和反对方公开进行了争论。在1333年和1345年再次发生的惨不忍睹的洪水过去之后，占星家们和神学家们对星辰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上帝的意愿和他惩罚的公正性进行了非常详细入微的讨论。这些斗争在文艺复兴的整个时期都没有停止过，我们可以推断出，那些反对占星术的人们是认真的，因为他们赞成占星术比他们反对占星术更容易得到伟人的认可。

In the circle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mong his most distinguished Platonists, opinions were divided on this question.Marsilio Ficino defended astrology, and drew the horoscope of the children of the house, promising the little Giovanni, afterwards Leo X, that he would one day be pope. Pico della Mirandola, on the other hand, made an epoch in the subject by his famous refutation. He detects in this belief the root of all impiety and immorality. If the astrologer, he maintains, believes in anything at all, he must worship not God, but the planets, from which all good and evil are derived. All other superstitions find a ready instrument in astrology, which serves as handmaid to geomancy, chiromancy and magic of every kind. As to morality, he maintains that nothing can more foster evil than the opinion that heaven itself is the cause of it, in which case the faith in eternal happiness and punishment must also disappear. Pico even took the trouble to check off the astrologers inductively, and found that in the course of a month three-fourths of their weather prophecies turned out false. But his main achievement was to set forth, in the *Fourth Book,* a positive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verse which seems to have made a greater impression on the educated classes throughout Italy than all the revivalist preachers put together. The latter, in fact, often failed to reach these classes.

在伟大的洛伦佐那一圈人里面，在他最著名的柏拉图学派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分歧的。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拥护占星术，并占算出他们家族里的孩子的命运，预言说小乔瓦尼有朝一日将会接替利奥十世的职位，成为教皇。另一方面，比科·德拉·米兰多拉通过他著名的驳斥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他找到了这种信仰是一切不虔诚、不道德行为的根源。他主张如果占星家有任何信仰的话，那么他一定不会崇拜上帝，而是会崇拜星辰。因为星辰是一切善与恶产生的根源。其他所有迷信都把占星术当作一种现成的工具，这种工具像是给风水、手相术以及各种魔法服务的侍女。至于道德，有人认为天堂本身是造成人们是否有道德心的原因，他认为这种观点是最能引起罪恶的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对永恒的幸福和惩罚的信仰也一定会消失的。比科甚至煞费苦心地用归纳的方法来抵制占星家，并且发现在短短一个月之内，他们对天气的预言有四分之三都是错误的。但是，他的主要功绩就是在这本书的第四卷里提出了一个关于自由意志和宇宙统治世界的积极的基督教学说，这种学说比所有复兴派传教士加在一起对意大利的受教育阶级所产生的影响还要巨大。实际上，复兴派教士往往不能给这些阶级带来什么影响。

The first result of his book was that the astrologers ceased to publish their doctrines, and those who had already printed them were more or less ashamed of what they had done. Gioviano Pontano, for example, in his book on fate, had recognized the science, and in a great work of hishad expounded the whole theory of it in the style of the old Firmicus, ascribing to the stars the growth of every bodily and spiritual quality. He now in his dialogue

Ægidius surrendered, if not astrology, at least certain astrologers, and sounded the praises of free will, by which man is enabled to know God. Astrology remained more or less in fashion, but seems not to have governed human life in the way it formerly had done. The art of painting, which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had done its best to foster the delusion, now expressed the altered tone of thought. Raphael, in the cupola of the Cappella Chigi, represents the gods of the different planets and the starry firmament, watched, however, and guided by beautiful angel-figures, and receiving from above the blessing of the Eternal Father. There was also another cause which now began to tell against astrology in Italy. The Spaniards took no interest in it, not even the generals, and those who wished to gain their favor declared open war against the half-heretical, half-Muhammadan science. It is true that Guicciardini writes in the year 1529: 'How happy are the astrologers, who are believed if they tell one truth to a hundred lies, while other people lose all credit if they tell one lie to a hundred truths.' But the contempt for astrology did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a return to the belief in providence. It could as easily lead to an indefinite fatalism.

他的著作所带来的首个影响就是占星家们不再发表学说，而那些已经出版了这种书籍的人们或多或少也会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感到惭愧。乔维诺·庞达诺在其《论命运》一书里承认了这门科学，并且在其巨著中依照老弗米卡斯风格详细地阐述了这门科学的整个理论，把每一个肉体和精神的特性都归因于星辰。现在在他的对话体作品《亚吉狄乌斯》中，如果他没有放弃占星术的话，那么他至少是放弃了某些占星家们，并且大声称赞自由意志，以此让人们能够对上帝有所了解。占星术依然或多或少地在流行着，但是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控制人们的生活了。曾经在15世纪大肆助长迷信活动的绘画艺术，现在也呈现出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思想风格。在画齐吉小礼拜堂的圆屋顶时，拉斐尔描绘出了代表不同行星的神灵，以及繁星闪烁的天空，天

空被美丽的天使形象所把守和指引着，并且从天上的永恒天父那里接受赐福。现在在意大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开始反对占星术。西班牙人对它并不感兴趣，甚至将军们对它也没有什么兴趣，那些希望能够讨好西班牙人的人就公开地向半异教、半伊斯兰教的科学宣战。确实，圭恰迪尼在1529年写道："占星家们是多么幸福啊，如果在他们所说的一百句谎言里有一句是真实的，那么人们就会相信他们；而如果其他人说了一百句真话，里面有一句话是假的，那么他们就会失掉一切信誉。"但是，蔑视占星术并不一定能够让人们重新信奉上帝。它同样能够容易地引起一种不确定的宿命论。

In this respect, as in others, Italy was unable to make its own way healthily through the ferment of the Renaissance, because the foreign invasion an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came upon it in the middle. Without such interfering causes its own strength would have enabled it thoroughly to get rid of these fantastic illusions. Those who hold that the onslaught of the strangers and the Catholic reactions were necessities for which the Italian people was itself solely responsible will look on the spiritual bankruptcy which they produced as a just retribution. But it is a pity that the rest of Europe had indirectly to pay so large a part of the penalty.

在文艺复兴的动荡时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意大利并没有能够在这一方面得以健康地发展，因为在文艺复兴运动的中期，外国对意大利进行了侵略，意大利也出现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干扰，那么意大利自身的力量一定会使它彻底摆脱这些虚妄的幻想。有些人认为外国的袭击和天主教的反动活动都是必然出现的事物，意大利人民自己是唯一要对这种必然负责的人，这些人把他们自己所造成的精神损失看作是一种应得的因果报应。但是，欧洲其余各地也不得不间接地蒙受如此之大的一部分惩罚，这是一件令人同情的事情。

The belief in omens seems a much more innocent matter than astrology. The Middle Ages had everywhere inherited them in abundance from the various pagan religions; and Italy did not differ in this respect from other countries. W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Italy is the support lent by humanism to the popular superstition. The pagan inheritance was here backed up by a pagan literary development.

与占星术比起来，相信预兆似乎更是一件不会带来什么害处的事情。中世纪时期曾经大量地继承了各类异教的东西，这些都随处可见；与其他国家相比，意大利在这一方面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人文主义支持大众迷信，是意大利所特有的。异教所遗留下来的遗产在这里得到了异教文学发展的支撑。

The popular superstition of the Italians rested largely on premonitions and inferences drawn from ominous occurrences, with which a good deal of magic, mostly of an innocent sort, was connected. There was, however, no lack of learned humanists who boldly ridiculed these delusions, and to whose attacks we partly owe the knowledge of them. Gioviano Pontano, the author of the great astrological work already mentioned above, enumerates with pity in his *Charon* a long string of Neapolitan superstitions—the grief of the women when a fowl or goose caught the pip; the deep anxiety of the nobility if a hunting falcon did not come home, or if a horse sprained its foot; the magical formulae of the Apulian peasants, recited on three Saturday evenings, when mad dogs were at large. The animal kingdom, as in antiquity, was regarded as specially significant in this respect, and the behaviour of the lions, leopards and other beasts kept by the state gave the people all the

more food for reflection, because they had come to be considered as living symbols of the state. During the siege of Florence, in 1529, an eagle which had been shot at fled into the city, and the Signoria gave the bearer four ducats, because the omen was good. Certain times and places were favorable or unfavorable, or even decisive one way or the other, for certain actions. The Florentines, so Varchi tells us, held Saturday to be the fateful day on which all important events, good as well as bad, commonly happened. Their prejudice against marching out to war through a particular street has been already mentioned. At Perugia one of the gates, the Porta Eburnea, was thought lucky, and the Baglioni always went out to fight through it. Meteors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heavens were as significant in Italy as elsewhere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saw warring armies in an unusual formation of clouds, and heard the clash of their collision high in the air. The superstition became a more serious matter when it attached itself to sacred things, when figures of the Virgin wept or moved the eyes, or when public calamities were associated with some alleged act of impiety, for which the people demanded expiation. In 1478, when Piacenza was visited with a violent and prolonged rainfall, it was sai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dry weather till a certain usurer, who had been lately buried in San Francesco, had ceased to rest in consecrated earth. As the bishop was not obliging enough to have the corpse dug up, the young fellows of the town took it by force, dragged it round the streets amid frightful confusion,and at last threw it into the Po. Even Politian accepted this point of view in speaking of Giacomo Pazzi, one of the chiefs of the conspiracy of 1478, in Florence, which is called after his family. When he was put to death, he devoted his soul to Satan with fearful words. Here, too, rain followed and threatened to ruin the harvest; here, too, a party of men, mostly peasants, dug up the body in the church, and immediately the clouds departed and the sun shone—'so gracious

was fortune to the opinion of the people', adds the great scholar. The corpse was first cast into unhallowed ground, the next day again dug up, and after a horrible procession through the city thrown into the Arno.

在意大利人民中所流行的迷信大多数都是建立在从预兆与不吉利的事情中所得出的结论之上的，许多基本没有害处的魔法都和这些预兆和结论有关联。但是，博学的人文主义大胆地嘲笑这些迷信，也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是从他们的攻击当中才对这些迷信有所了解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的那部占星术巨著的作者，乔维诺·庞达诺，在他的《渡神》一书里，充满同情地列举出了一长串那不勒斯的迷信——当家禽或鹅患了小病时，妇女们就会感到悲伤；如果一只猎鹰没有回家，或者一匹马扭伤了马蹄，那么贵族们就会感到非常焦虑；当疯狗没有被逮住时，阿普利亚的农民会在三个周六晚上念咒语。和在古代一样，一般认为动物王国在这一方面是尤其重要的，国家所圈养的狮子、豹，以及其他野兽的行为会给人们带来很多思考的材料，因为它们被看作是一个国家活生生的象征。在1529年被佛罗伦萨围攻期间，一只正在向城里飞进的老鹰被击中，执政官给了那个人四个达克特，因为这是一个好兆头。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对于某种行动是有利的，或者是不利的，甚至不管怎样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瓦尔奇告诉我们，佛罗伦萨人认为星期六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日子，一切重大事情，有好事情也有坏事情，通常都发生在这一天。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他们反对通过一条特别的街道出兵作战的偏见。在佩鲁贾，其中一个城门，“象牙门”，被认为是吉祥之门，巴廖尼家族永远都是从这扇门里出去作战。在中世纪时期，与在其他地方一样，流星和天象在意大利具有重大的意义，人们把天空中异常密集的乌云看作是作战的军队，并且能够从高空中听到他们打斗时所发出的铿锵声。当这种迷信和神圣的事情结合在一起时，当圣母画像哭泣或者眨眼睛时，或者当某种所谓的对神灵不敬的行为招致公共灾难，人们要为这种不敬行为赎罪时，这种迷信就变得更为严肃、庄重了。在1487年，皮亚琴察长期遭遇暴雨的袭击时，人们就说在近期埋葬在

圣方济各教堂里的某个高利贷者的尸体没有从神圣的地方移出去之前，这里是不会有晴天的。因为主教不是很愿意把那个尸体挖出来，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就强行把这个尸体从圣地挖出来，并在可怕的混乱中把它在街上到处乱托，最后把尸体投在了波河里。甚至是波利提安在谈到吉亚科莫·帕奇时，也接受了这个观点，吉亚科莫·帕奇是1478年发生在佛罗伦萨的叛变的其中一个领袖，这个叛变是以他的家族命名的。当他被处以死刑时，他通过说一些可怕的话语把自己的灵魂交给撒旦。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紧接着也是下起了大雨，眼看着庄稼就要被毁坏了；这里也有一群人，大部分都是农民，把埋在教堂里的尸体挖了出来，然后立刻就云散天晴，阳光照耀——那个伟大的学者接着说道："命运对待人们的观点是如此之慈悲。"这个尸体一开始被投在了污浊的坑里，第二天又被挖了出来，被扔进了阿尔诺河里。

These facts and the like bear a popular character, and might have occurred in the tenth, just as well a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ut now comes the literary influence of antiquity. We know positively that the humanists were peculiarly accessible to prodigies and auguries, and instances of this have been already quoted. If further evidence were needed, it would be found in Poggio. The same radical thinker who denied the rights of noble birth and the inequality of men, not only believed in all the medieval stories of ghosts and devils, but also in prodigies after the ancient pattern, like those said to have occurred on the last visit of Eugenius IV to Florence. 'Near Como there were seen one evening four thousand dogs, who took the road to Germany; these were followed by a great herd of cattle, and these by an army on foot and horseback, some with no heads and some with almost invisible heads, and then a gigantic horseman with another herd of cattle behind him.' Poggio also believes in a battle of magpies andjackdaws. He even relates, perhaps without being aware of it, a well-preserved piece of ancient mythology. On the Dalmatian coast a Triton had appeared, bearded

and horned, a genuine sea-satyr, ending in fins and a tail; he carried away women and children from the shore, till five stout-hearted washer-women killed him with sticks and stones. A wooden model of the monster, which was exhibited at Ferrara, makes the whole story credible to Poggio. Though there were no more oracles, and it was no longer possible to take counsel of the gods, yet it became again the fashion to open Virgil at hazard, and take the passage hit upon as an omen *(sortes Virgilianae)*. Nor can the belief in demons current in the later period of antiquity have been without influence on the Renaissance. The work of Jamblichus or Abammon on the mysteries of the Egyptians, which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is result, was printed in a Latin translation at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Platonic Academy at Florence was not free from these and other neoplatonic dreams of the Roman decadence. A few words must here be given to the belief in demons and to the magic which was connected with this belief.

这些真实的事情以及与此相类似的事情都带有一种民间性质，可能在10世纪和16世纪发生过此类的事情。但是，现在却受到了古代文化的影响。我们当然知道，人文主义者特别容易受到怪异现象和征兆的影响，我们也已经引用过这样的例子。如果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据的话，我们可以在波焦身上找到。就是这一个否认高贵出身的权利和人人不平等的激进的思想家，不仅相信中世纪时期一切关于幽灵和魔鬼的故事，而且还相信拟古形式的怪异之事，像人们所说的那些曾经在尤金四世最后一次访问佛罗伦萨时所发生的事情："曾经有一天晚上，在科摩附近看到了4,000条狗向德意志走去；这些狗后面跟着一大群牛，牛后面跟着一支军队，有的是步兵，有的是骑兵，有的士兵没有脑袋，有的士兵虽然有脑袋但是几乎看不到，然后这支军队后面跟着的是一个庞大的骑士，骑士后面跟着的是另外一群牛。"波焦还相信发生在喜鹊和乌鸦之间的战争。他甚至还讲过一个流传已久的古代神话故事，或许他自己也不了解这个神话故事。曾经在达尔马西亚

海岸出现了一个半人半鱼的海神，长着胡须和角，下面长着鱼鳍和尾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怪；他每天都从海岸上抢走妇女和儿童，直到有五个勇敢的洗衣服的妇女用木棍和石头把他打死。陈列在费拉拉展览馆的这个怪物的木制雕像让波焦相信整个故事是可信的。尽管不再有神谕和占神的可能，但是随便翻开维吉尔的一篇著作，把所翻到的这篇文章当作一个征兆（“维吉尔占卜”），这就又重新成为一件流行的事情了。在古代末期流行的相信恶魔的信仰，也并不是没有给文艺复兴时期带来影响的。扎姆布利克斯或者阿巴蒙关于埃及人的秘术的著作可能有助于造成这种结果，这种作品在15世纪末期被译成了拉丁语。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没能摆脱罗马衰亡时的这些及其他一些新柏拉图主义理想。这里必须要简单介绍一下有关相信恶魔以及与这种迷信有关的魔法。

The popular faith in what is called the spirit-world was nearly the same in Italy as elsewhere in Europe. In Italy as elsewhere there were ghosts, that is, reappearances of deceased persons; and if the view taken of them differed in any respect from that which prevailed in the North, the difference betrayed itself only in the ancient name *ombra.* Even nowadays if such a shade presents itself, a couple of masses are said for its repose. That the spirits of bad men appear in a dreadful shape is a matter of course, but along with this we find the notion that the ghosts of the departed are universally malicious. The dead, says the priest in a novel of Bandello, kill the little children. It seems as if a certain shade was here thought of as separate from the soul, since the latter suffers in purgatory, and when it appears, does nothing but wail and pray.At other times what appears is not the ghost of a man, but of an event—of a past condition of things. So the neighbours explained the diabolical appearances in the old palace of the Visconti near San Giovanni in Conca, at Milan, since here it was that Bernabo Visconti had caused countless victims of his tyranny to be tortured and

strangled, and no wonder if there were strange things to be seen. One evening a swarm of poor people with candles in their hands appeared to a dishonest guardian of the poor at Perugia, and danced round about him; a great figure spoke in threatening tones on their behalf—it was St Alo, the patron saint of the poorhouse. These modes of belief were so much a matter of course that the poets could make use of them as something which every reader would underst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slain Lodovico Pico under the walls of the besieged Mirandola is finely represented by Castiglione. It is true that poetry made the freest use of these conceptions when the poet himself had outgrown them.

意大利民间对于所谓的鬼神世界的信仰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几乎是一样的。和其他地方一样，意大利也有鬼，也就是已故之人的重新出现；如果意大利对鬼的看法在任何方面与在北方国家所流行的对鬼的看法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其不同之处体现在对“阴魂”这一古代名称上。即使是现在，如果有这样一个阴魂出现，那么就要做两台弥撒礼以求得阴魂的安息。恶人的鬼魂相貌狰狞可怕也是理所当然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一种观念，就是已故之人所变成的鬼一般都是恶毒的。班戴洛小说中的教士说，死人杀死了小孩子。这似乎是认为有种和灵魂与众不同的阴魂，因为灵魂在炼狱中遭受了苦难，当灵魂从炼狱中出来时，就只是哭泣和祈祷。在其他时候，出现的不是一个人的灵魂，而是一个事件——事情的过去的一种事态。所以，在米兰，康加圣乔瓦尼教堂附近，住在古老的维斯孔蒂宫殿旁边的邻居们讲出了出现在那里的恶魔的外貌，因为在这里贝尔纳博·维斯孔蒂曾经让无数的受害者在他的暴政之下严受酷刑的拷打或者被绞死，如果在这里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那么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了。一天晚上，一群手里拿着蜡烛的穷人出现在了佩鲁贾一个诚实的贫民救济委员的面前，并围着他跳舞；一个高大的形象用一种威胁性的口吻代表他们说话——这个人就是救济院的保护圣徒圣亚罗。这种信仰模式都是很理所当然的，因此诗人都会把它们当作每个读者都明白的事情来进行引用。卡

斯蒂廖内非常传神地再现了被杀死的洛多维科·比科在被围攻的米兰多拉的城墙下的形象。的确，当诗人本身已经摆脱了这些观念时，就会最自由地在诗歌中采用这些故事。

Italy, too, shared the belief in demons with the other nations of the Middle Ages. Men were convinced that God sometimes allowed bad spirits of every class to exercise a destructive influence on parts of the world and of human life. The only reservation made was that the man to whom the Evil One came as tempter could use his free will to resist. In Italy the demonic influence, especially as shown in natural events, easily assumed a character of poetical greatness. In the night before the great inundation of the Val d'Arno in 1333, a pious hermit above Vallombrosa heard a diabolical tumult in his cell, crossed himself, stepped to the door, and saw a crowd of black and terrible knights gallop by in armour. When conjured to stand, one of them said, 'We go to drown the city of Florence on account of its sins, if God will let us.' With this, the nearly contemporary vision at Venice (1340) may be compared, out of which a great master of the Venetian school, probably Giorgione, [3_9] made the marvellous picture of a galley full of demons, which speeds with the swiftness of a bird over the stormy lagoon to destroy the sinful island-city, till the three saints, who have stepped unobserved into a poor boatman's skiff, exorcized the fiends and sent them and their vessel to the bottom of the waters.

和中世纪的其他民族一样，意大利人也相信恶魔。人们相信上帝有时允许各类邪恶的灵魂给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和人类生活带来一种破坏性的影响。被恶魔引诱的人唯一的做法就是能够使用他的自由意志来抵御这种诱惑。在意大利，恶魔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体现在自然事件上的影响，很容易就会呈现一种诗意的伟大的性质。1333年，在

阿尔诺河流域发大洪水的前一夜，住在瓦隆布罗萨溪谷上面的一个虔诚的隐士在他的小屋里听到了一阵恶魔似的吵闹声，他在胸前画着十字走向门口，然后看到了一群黑色的、身穿盔甲的可怕的骑士，策马奔腾。当恳求他们停下来的时候，其中一个骑士说："因为佛罗伦萨有罪，所以如果上帝允许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将前去淹没这个城市。"可以和这件事情相比的是差不多同一时代发生在威尼斯的一个想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大师，大概是乔尔乔内，[4_9] 把这个想象画成了一幅绝妙的图画，画中是一只满载恶魔的大帆船像鸟儿一样敏捷地飞翔在风雨交加的环礁湖上，要去毁灭那个罪孽深重的岛城，直到有三个圣者在无人察觉的时候跨进了一个穷船夫的小船上，驱逐了这些妖魔鬼怪，然后把他们同船舶一起沉入海底。

To this belief the illusion was now added that by means of magical arts it was possible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the evil ones, and use their help to further the purposes of greed, ambition and sensuality. Many persons were probably accused of doing so before the time when it was actually attempted by many; but when the so-called magicians and witches began to be burned, the deliberate practice of the black art became more frequent. With the smoke of the fires in which the suspected victims were sacrificed were spread the narcotic fumes by which numbers of ruined characters were drugged into magic; and with them many calulating impostors became associated.

除了这种迷信之外，现在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即人们可以通过魔术和恶魔发生关系，并凭借他们的帮助来达到贪婪、野心和肉欲享受的目的。在许多人跃跃欲试以前，大概已经有很多人被控告犯有这种罪行；但是当这种所谓的魔法师和女巫开始被烧时，故意采取这种妖术的行为就变得更加频繁起来。有嫌疑的受害者被烧死在火中，冒出来的烟中弥漫着一种使许多堕落之人沉溺于魔法的毒烟；他们和许

多精明狡猾的骗子联系在了一起。

The primitive and popular form in which the superstition had probably lived on uninterruptedly from the time of the Romans was the art of the witch *(strega)*. The witch, so long as she limited herself to mere divination, might be innocent enough, were it not that the transition from prophecy to active help could easily, though often imperceptibly, be a fatal downward step. She was credited in such a case not only with the power of exciting love or hatred between man and woman, but also with purely destructive and malignant arts, and was especially charged with the sickness of little children, even when the malady obviously came from the neglect and stupidity of the parents. It is still questionable how far she was supposed to act by mere magical ceremonies and formulae, or by a conscious alliance with the fiends, apart from the poisons and drugs which she administered with a full knowledge of their effect.

从罗马时代以来，以一种原始的、通俗的形式一直连续不断地流传下来的迷信可能就是女巫的妖术。女巫，只要她只是把自己限制在占卜术上，可能是不会带来什么危害的，如果预言不是容易地，尽管通常是不知不觉地，转变成了积极的帮助这一致命的堕落步骤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她不仅被认为具有激起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的力量，而且还被认为具有绝对毁灭性的、恶性的妖术，尤其可以让小孩子患病，尽管有时候这种疾病是由于父母的疏忽和愚蠢行为而造成的。她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单靠神奇的仪式和咒语，或者是靠有意识的引诱让魔鬼来做法，究竟到了怎样的一个程度依然是可疑的，除非她充分了解她所使用的毒药和药物的效力。

The more innocent form of the superstition, in which the mendicant friar could venture to appear as the competitor of the witch, is shown in the case of the witch of Gaeta whom we read of in Pontano. His traveller Suppatius reaches her dwelling while she is giving audience to a girl and a serving-maid, who come to her with a black hen, nine eggs laid on a Friday, a duck and some white thread—for it is the third day since the new moon. They are then sent away, and bidden to come again at twilight. It is to be hoped that nothing worse than divination is intended. The mistress of the servant-maid is pregnant by a monk; the girl's lover has proved untrue and has gone into a monastery. The witch complains:

我们在庞达诺的作品中读到了一个关于加埃塔的女巫的故事，在这个例子里讲述的是一个比较没有什么害处的迷信方式，有个托钵僧敢于出来在这种方式上和她进行较量。旅客萨巴提乌斯来到了她的住处，这时她正在接见一个女孩和一个女仆，这个女孩和这个女仆给她带来了一个黑母鸡、在周五这一天下的九个鸡蛋、一只鸭子，以及一些白线——因为这是新月以来的第三天。她打发走了女孩和女仆，并告诉她们黄昏时分再来。希望除了占卜之外没有什么更为糟糕的事情。这个女仆的女主人和一个和尚通奸怀上了孩子，那个女孩的恋人背弃了她，进入了一个修道院里。女巫抱怨道：

> Since my husband's death I support myself in this way, and should make a good thing of it, since the Gaetan women have plenty of faith, were it not that the monks balk me of my gains by explaining dreams, appeasing the anger of the saints for money, promising husbands to the girls, men-children to the pregnant women, offspring to the barren, and besides all this visiting the women at

night when their husbands are away fish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ssignations made in daytime at church.

自从我丈夫死后，我就以此谋生，因为加埃塔的女人都非常相信我，如果不是那些僧侣妨碍了我的赚钱之路，那么我赚的钱也不少，这些僧侣通过给人圆梦、替人平息圣徒的愤怒的方式来敛收钱财，他们保证姑娘们能够找到丈夫、怀孕的女人能生男孩、不孕的女人能够怀孕，除此之外，他们还会趁这些女人的丈夫外出打鱼时，按照白天在教堂约好的去和这些女人约会。

Suppatius warns her against the envy of the monastery, but she has no fear, since the guardian of it is an old acquaintance of hers.

萨巴提乌斯警告她不要嫉妒修道院，但是她不害怕，因为修道院里的守护人是她的旧相识。

But the superstition further gave rise to a worse sort of witches, namely those who deprived men of their health and life. In these cases the mischief, when not sufficiently accounted for by the evil eye and the like, was naturally attributed to the aid of powerful spirits. The punishment, as we have seen in the case of Finicella, was the stake; and yet a compromise with fanaticism was sometimes practicabl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Perugia, for example, a witch could settle the affair by paying down 400 pounds. The matter was not then treated with the seriousness and

consistency of later times. I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Church, at Norcia (Nursia), the home of St Benedict in the upper Apennines, there was a perfect nest of witches and sorcerers, and no secret was made of it. It is spoken of in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letters of Aeneas Sylvius, belonging to his earlier period. He writes to his brother:

但是迷信进一步造就了更坏的一类女巫，也就是那种夺去人们健康和生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能通过邪恶的眼神和一些类似的东西来充分明白这种伤害，那么这种伤害自然而然就被归因于得到了某种强大的鬼神的帮助。就像我们在菲尼切拉所看到的那样，对这种伤害的惩罚是火刑；但是有时候也会对这种狂热盲信行为采取妥协、和解的方法。比如，根据佩鲁贾的法律规定，要是女巫能够缴纳400镑的罚款，那么就可以了事了。这种问题并没有采用那种在后来一贯的、严肃的方式来处理。在教会地区，在亚平宁山脉的上层位置，圣本尼迪克特的家乡，也就是诺尔恰，这里有一个地方是女巫和巫师的真正栖息地，这里还是公开的。埃尼亚斯·西尔维于斯在他早期最引人注目的其中一封信里提到过这个地方。他写信告诉他的兄弟：

> The bearer of this came to me to ask if I knew of a Mount of Venus in Italy, for in such a place magical arts were taught, and his master, a Saxon and a great astronomer, was anxious to learn them. I told him that I knew of a Porto Venere not far from Carrara, on the rocky coast of Liguria, where I spent three nights on the way to Basle; I also found that there was a mountain called Eryx in Sicily, which was dedicated to Venus, but I did not know whether magic was taught there. But it came into my mind while talking that in Umbria, in the old duchy (Spoleto), near the town of Nursia, there is a

cave beneath a steep rock, in which water flows. There, as I remember to have heard, are witches (*striges*), demons and nightly shades, and he that has the courage can see and speak to ghosts (*spiritus*), and learn magical arts. I have not seen it, nor taken any trouble about it, for that which is learned with sin is better not learned at all.

送信人来问我是否知道意大利的维纳斯山，因为有人在这个地方传授魔法，并且他的主人是一个撒克逊人，也是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急于学到它。我告诉他我知道离卡拉拉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韦内雷港，它位于利古里亚岩石海岸上，我去巴塞尔的途中在那里住过三个晚上；我还发现在西西里岛有一个叫做俄依克斯的山，这座山是献给爱神维纳斯的，但是至于那里是不是传授魔法，我是不知道的。但是，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起了在温布里亚的那个位于诺尔恰城附近的古老的公爵领地（斯波莱托），在陡峭的岩石下面有一个洞穴，里面还流着水。我记得听人说起过，那里有女巫（妖妇）、恶魔以及夜间出没的幽灵，胆子大的人能够看到鬼魂（幽灵），和鬼魂说话，并从鬼魂那里学到妖术。我没有看到这个山洞，也不想设法找到它，因为犯罪才能学到的东西最好根本就不去学。

He nevertheless names his informant, and begs his brother to take the bearer of the letter to him, should he be still alive. Aeneas goes far enough here in his politeness to a man of position, but personally he was not only freer from superstition than his contemporaries, but he also stood a test on the subject which not

every educated man of our own day could endure. At the time of the Council of Basel, when he lay sick of the fever for seventy-five days at Milan, he could never be persuaded to listen to the magic doctors, though a man was brought to his bedside who a short time before had marvellously cured 2,000 soldiers of fever in the camp of Piccinino. While still an invalid, Aeneas rode over the mountains to Basel, and got well on the journey.

然而，他却说出了那个告诉他这件事情的人的名字，并央求他的兄弟，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把这个送信人带到他那里。在这里，对于一个有地位的人，埃尼亚斯是非常有礼貌的，但是他自己不仅比他同时代的人更不受迷信的影响，而且对于这个问题他还经受过一次考验，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够经受得起的考验。在巴塞尔会议期间，他患了热病在米兰卧床休息了七十五天，他使用不愿意听从别人的劝说去接受魔法医生给他治病，尽管那个被带到他床前的人不久前在皮奇尼诺的露营里不可思议地治好了2,000名患有热病的战士。虽然埃尼亚斯的热病还没有好，他就骑着马越过一座座山峰到巴塞尔去了，在途中热病就好了。

We learn something more about the neighborhood of Norcia through the necromancer who tried to get Benvenuto Cellini into his power. A new book of magic was to be consecrated, and the best place for the ceremony was among the mountains in that district. The master of the magician had once, it is true, done the same thing near the Abbey of Farfa, but had there found difficulties which did not present themselves at Norcia; further, the peasants in the latter neighborhood were trustworthy people who had practice in the matter, and who could afford considerable help in case of need. The expedition did not take place, else Benvenuto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able to tell us something of the impostor's assistants. The

whole neighbour¬hood was then proverbial. Aretino says somewhere of an enchanted well, 'there dwell the sisters of the sibyl of Norcia and the aunt of the Fata Morgana'. And about the same time Trissino could still celebrate the place in his great epic with all the resources of poetry and allegory as the home of authentic prophecy.

我们从一个想设法掌控本文努托·切利尼的巫师那里得知了更多有关诺尔恰附近地方的情况。他们想把一本新的魔法著作供奉给神灵，举行这个赠送仪式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区的山里。这个魔法师的师父曾经确实在法尔法寺院做过同样的法事，但是在那里遇到了不曾在诺尔恰遇到的困难；并且，诺尔恰的农民都是值得信赖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都很熟悉，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能够给予一定的帮助。这个入山供奉仪式没有举行，否则的话本文努托或许会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这个骗子的助手们的事情。当时，诺尔恰整个周边地区都是人尽皆知的。阿雷蒂诺提到了某处一个施了魔法的井："那里住着诺尔恰女巫的姊妹和法达·莫尔根娜的姑姑。"大约同时，特里西诺还依然能够在他伟大的史诗中用一切诗歌和寓言的手法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可信预言的发源地来予以赞美。

After the famous bull of Innocent VIII (1484), witchcraft and the persecution of witches grew into a great and revolting system. The chief representatives of this system of persecution were German Dominicans; and Germany and, curiously enough, those parts of Italy nearest Germany were the countries most afflicted by this plague. The bulls and injunctions of the popes themselves refer, for example, to the Dominican Province of Lombardy, to Cremona, to the dioceses of Brescia and Bergamo. We learn from Sprenger's famous theoretico-practical guide, the *Malleus maleficarum,* that forty-one witches were burnt at Como in the first year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ull; crowds of Italian women took refuge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Archduke Sigismund, where they believed themselves to be still safe. Witchcraft ended by taking firm root in a few unlucky Alpine valleys, especially in the Val Camonica; the system of persecution had succeeded in permanently infecting with the delusion those populations which were in any way predisposed to it. This essentially German form of witchcraft is what we should think of when reading the stories and novels of Milan or Bologna. That it did not make further progress in Italy is probably due to the fact that here a highly developed *stregheria* was already in existence, resting on a different set of ideas. The Italian witch practiced a trade, and needed for it money and, above all, sense. We find nothing about her of the hysterical dreams of the northern witch, of marvellous journeys through the air, of incubus and succubus; the business of the *strega* was to provide for other people's pleasure. If she was credited with the power of assuming different shapes, or of transporting herself suddenly to distant places, she was so far content to accept this reputation, as her influence was thereby increased;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perilous for her when the fear of her malice and vengeance, and especially of her power for enchanting children, cattle and crops, became general. Inquisitors and magistrates were then thoroughly in accord with popular wishes if they burnt her.

在因诺森特八世的著名训谕之后，巫术以及对女巫的迫害演变成了一种巨大的、令人讨厌的制度。这种迫害制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意志的多明我会僧侣；说来也奇怪，德意志以及意大利最靠近德意志的那些地方是蒙受这种灾难最多的地方。比如，教皇自己的训谕和禁令提到了伦巴第的多米尼亚省、克雷莫纳、布雷西亚和贝加莫的主教教区。我们从斯普朗吉尔著名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南《女巫之槌》中了解到，在训谕颁布之后的第一年，有四十一个女巫在科摩被烧死；成

群的意大利妇女在大公爵西吉斯蒙德的领土上避难，她们认为在大公爵西吉斯蒙德的领土上她们还是比较安全的。巫术最后在阿尔卑斯山的几个不幸的山谷里，尤其是在卡摩尼加山谷里扎下了牢固的根基；这种迫害制度成功地让那些无论如何都会倾向于痴迷这种迷信的人们永久不再受迷信的影响。当读到米兰或博洛尼亚的故事和小说时，我们可能会想到这种本质上是德意志形式的巫术。它之所以没能在意大利得以进一步的发展，或许是因为在意大利已经存在一种建立在不同理念之上的、高度发展的巫术。意大利的女巫是一种职业，需要钱，尤其是需要理智。在她身上我们看不到北方女巫的那种病态的幻想，也看不到空中的神奇之旅以及梦境中的神魂颠倒的幻想；妖妇的职业就是给其他人带来快乐。如果一个意大利女巫被认为具有呈现不同形状的能力，或者具有能够突然遁身到远方的能力，那么她也会非常满意地接受这种名誉，因为从而可以增强她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她的恶意和报复手段，尤其是她迷惑儿童、牲畜以及庄稼的魔法普遍受到人们的怀疑时，那么这对她也是危机四伏的。如果异端裁判所的法官和地方行政长官把她烧死的话，是完全顺应民心的。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field for the activity of the *strega* lay, as has been said, in love-affairs, and included the stirring up of love and of hatred, the producing of abortion, the pretended murder of the unfaithful man or woman by magical arts, and even the manufacture of poisons. Owing to the unwillingness of many persons to have to do with these women, a class of occasional practitioners arose who secretly learned from them some one or other of their arts, and then used this knowledge on their own account. The Roman prostitutes, for example, tried to enhance their personal attractions by charms of another description in the style of Horatian Canidia. Aretino may not only have known, but have also told the truth about them in this particular. He gives a list of the loathsome messes which were to be found in their boxes—hair, skulls, ribs, teeth, dead men's eyes, human skin, the navels of little

children, the soles of shoes and pieces of clothing from tombs. They even went themselves to the graveyard and fetched bits of rotten flesh, which they slyly gave their lovers to eat—with more that is still worse. Pieces of the hair and nails of the lover were boiled in oil stolen from the ever-burning lamps in the church. The most innocuous of their charms was to make a heart of glowing ashes, and then to pierce it while singing:

之前已经讲过，迄今为止妖妇最为重要的活动范围就是关于爱情的事情，包括挑起爱恨情仇之事、造成堕胎、企图用魔法来杀死不忠实的男人或者女人，甚至关于制造毒药的作坊。因为许多人都不愿意和这些妖妇有任何瓜葛，所以就会有一些偶尔使用妖术的人们，秘密地从这些妖妇身上学到某种诡计，然后用这种诡计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比如，罗马的妓女曾经就通过使用罗马诗人贺瑞斯作品中的加妮狄亚的样式，试图来提升她们的个人魅力。阿雷蒂诺不仅知道这件事情，而且还说出了她们在这方面的真实情况。他列举出了一系列在她们的箱子中找到的令人呕吐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头发、骷髅头、肋骨、牙齿、死人的眼睛、人皮、小孩子的肚脐，还有从坟墓里拿出来的鞋底和衣服碎片。她们自己甚至会跑到墓地去捡一些腐烂的人肉，秘密地给她们的情人吃——里面还会掺杂一些更糟糕的东西。她们用从教堂长明灯里偷来的油煎情人的头发和指甲。她们的巫术中最无害的一项就是用灼热的骨灰做成一个心，一边戳着一边唱到：

Prima che'l fuoco spenghi,

趁着火焰还未熄灭，

Fa ch'a mia porta venghi;

赶快来到我的门前，

Tal ti punga mio amore

我如何刺这颗红心，

Quale io fo questo cuore.

你就同样刺我的爱。

There were other charms practiced by moonshine, with drawings on the ground, and figures of wax or bronze, which doubtless represented the lover, and were treated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还有趁着月光下的符咒，在地上画画，用蜡或铜制成人像，毫无疑问，这些都代表着那个情人，根据不同情况，这些符咒也会被不同对待的。

These things were so customary that a woman who, without youth and beauty, nevertheless exercised a powerful charm on men, naturally became suspected of witchcraft. The mother of Sanga, secretary to Clement VII, poisoned her son's mistress, who was a woman of this kind. Unfortunately the son died too, as well as a

party of friends who had eaten of the poisoned salad.

这些事情是非常普遍的，所以一个失去了青春和美貌但依然对男人有强烈的吸引力的女人理所当然就会被疑为施有妖术。克莱门特七世的秘书桑加的母亲曾经毒死了她的儿媳妇，这个儿媳妇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不幸的是，他的儿子和一群朋友都因吃了下了毒药的沙拉而一起死去了。

Next comes, not as helper, but as competitor to the witch, the magician or enchanter—*incantatore* —who was still more familiar with the most perilous business of the craft. Sometimes he was as much or more of an astrologer than of a magician; he probably often gave himself out as an astrologer in order not to be prosecuted as a magician, and a certain astrology was essential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favorable hour for a magical process. But since many spirits are good or indifferent, the magician could sometimes maintain a very tolerable reputation, and Sixtus IV in the year 1474 had to proceed expressly against some Bolognese Carmelites, who asserted in the pulpit that there was no harm in seek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demons. Very many people believed in the possibility of the thing itself; an indirect proof of thi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most pious men believed that by prayer they could obtain visions of good spirits. Savonarola's mind was filled with these things; the Florentine Platonists speak of a mystic union with God; and Marcellus Palingenius gives us to understand clearly enough that he had to do with consecrated spirits. The same writer is convinc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whole hierarchy of bad demons, who have their seat from the moon downwards, and are ever on the watch to do some mischief to nature and human life. He even tells of his own personal acquaintance with some of them, and as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 work does not allow of a systematic exposition of the then prevalent belief in spirits, the narrative of Palingenius may be given as one instance out of many.

接下来出现的是魔法师或者妖术师，他们是女巫的竞争对手，而非女巫的助手，他对那些可怕的魔术更为熟悉。有时，他同样也是一个占星家，或者更多的是一个占星家而非魔法师。或许，他时常以一个占星家的姿态出现，以免因为是一个魔法师而遭到迫害，并且为了给魔术的实施过程确定一个有利的时间，某种占星术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因为许多鬼灵都是善良的，或者是冷漠的，所以魔法师有时也享有盛名，在1474年，西斯科特四世就不得不特意地对波伦亚的某些加尔默罗会修士提出控诉，因为这些修士在讲道坛上声称从恶魔那里获得消息是不会造成伤害的。非常多的人相信这种事情本身就是有可能的；这个谎言的间接的佐证就是最虔诚的人都相信，通过祷告他们是能够看到善良鬼魂的幻影的。萨沃纳罗拉的心里充满了这些东西；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者提到了与上帝的神秘的结合；马塞勒斯·帕林吉尼斯让我们足够清楚地明白了他和神圣的灵魂有交往。这个作家相信存在一个完全由恶魔统治着的世界，这些恶魔就坐在月亮的下面，并且时刻等着来危害大自然以及人类的生命。他甚至谈到了他个人认识一些恶魔，因为本书所涉及的范围不允许我们对当时所盛行的相信鬼神一事进行系统的阐述，所以帕林吉尼斯的故事可以拿出来作为众多例子中的其中一个例子。

At San Silvestro, on Soracte, he had been receiving instruction from a pious hermit on the nothingness of earthly things and the worthlessness of human life; and when the night drew near he set out on his way back to Rome. On the road, in the full light of the moon, he was joined by three men, one of whom called him by name, and asked him whence he came. Palingenius made answer: 'From the wise man on the mountain.' 'O fool,' replied the stranger,

'dost thou in truth believe that anyone on earth is wise? Only higher beings (*divi)* have wisdom, and such are we three, although we wear the shapes of men. I am named Saracil, and these two Sathiel and Jana. Our kingdom lies near the moon, where dwell that multitude of intermediate beings who have sway over earth and sea.' Palingenius then asked, not without an inward tremor, what they were going to do at Rome. The answer was: 'One of our comrades, Ammon, is kept in servitude by the magic arts of a youth from Narni, one of the attendants of Cardinal Orsini; for mark it, O men, there is proof of your own immortality therein, that you can control one of us; I myself, shut up in crystal, was once forced to serve a German, till a bearded monk set me free. This is the service which we wish to render at Rome to our friend, and we shall also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sending one or two distinguished Romans to the nether world.' At these words a light breeze arose, and Sathiel said: 'Listen, our messenger is coming back from Rome, and this wind announces him.' And then another being appeared, whom they greeted joyfully and then asked about Rome. His utterances are strongly anti-papal: Clement VII was again allied with the Spaniards and hoped to root out Luther's doctrines, not with arguments, but by the Spanish sword. This is wholl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demons, whom the impending bloodshed would enable to carry away the souls of thousands into hell. At the close of this conversation, in which Rome with all its guilt is represented as wholly given over to the Evil One, the apparitions vanish, and leave the poet sorrowfully to pursue his way alone.

在位于索拉克特山上的圣西尔维斯特罗寺院里，他曾经从一个虔诚的隐士那里学习目空尘世和人生不足道的教诲；夜幕降临的时候，他才动身返回罗马。在路上，在皎洁的月光下，他遇到了三个同路人，其中一个人叫他的名字并询问他从何方而来。帕林吉尼斯回答

道："从山上的哲人那里而来。""哦，傻瓜，"这个陌生人回到道，"难道你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是聪明的吗？只有神灵才是有智慧的，我们三个人就是这样的神灵，尽管我们呈现的是人形。我叫萨拉希尔，这两个是萨舍尔和雅纳。我们的王国位于月亮附近，那里住着无数个中间神灵，掌管着大地和海洋。"帕林吉尼斯当时内心十分害怕地问他们到罗马去做什么。这三个人回答说："我们的其中一个伙伴，阿蒙，被一个从纳尔尼来的年轻人，红衣主教奥尔西尼的其中一个随从，用魔法囚禁起为他服务；啊，人们要注意了，你们能够把我们的一个伙伴控制起来，那这里就证明了你们自己的不朽；我自己曾经被关押在一个晶球里，一度被强迫着为德意志人效力，直到有个长着胡须的僧侣把我释放了出来。我们此行去罗马就是要去解救我们的朋友，也借机把罗马的一两个著名人物送到地狱里去。"说这些话的时候，一阵微风吹过，萨舍尔说道："听，我们的使者要从罗马回来了，这阵风就是告诉我们他到了。"然后，出现了另外一个精灵，他们高兴地和他打招呼，并询问有关罗马的情况。他的话语是强烈反对教皇的：克莱门特七世又和西班牙结成了联盟，并希望用西班牙人的魔法剑来根除路德学说，而不再使用争论的方式来根除它。这完全是有利于恶魔的，因为即将到来的流血事件将会让他们把成千上万个人的灵魂送到地狱中去。这段谈话表明了罗马由于它的一切罪恶已经完全处于恶魔的控制之下了，谈话结束后，这几个幽灵就消失了，只剩下诗人暗自悲伤地独自赶路。

Those who would form a conception of the extent of the belief in those relations to the demons which could be openly avowed in spite of the penalties attaching to witchcraft may be referred to the much-read work of Agrippa of Nettesheim, *On Secret Philosophy*. He seems originally to have written it before he was in Italy, but in the dedication to Trithemius he mentions Italian authorities among others, if only by way of disparagement. In the case of equivocal persons like Agrippa, or of the knaves and fools into whom the majority of the rest may be divided, there is little that is interesting

in the system they profess, with its formulae, fumigations, ointments and the rest of it. But this system was filled with quotations from the superstitions of antiquity, the influence of which on the life and the passions of Italians is at times most remarkable and fruitful. We might think that a great mind must be thoroughly ruined before it surrendered itself to such influences; but the violence of hope and desire led even vigorous and original men of all classes to have recourse to the magician, and the belief that the thing was feasible at all weakened to some extent the faith, even of those who kept at a distance,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world. At the cost of a little money and danger it seemed possible to defy with impunity the universal reason and morality of mankind, and to spare oneself the intermediate steps which otherwise lie between a man and his lawful or unlawful ends.

尽管对巫术实施了惩罚，但是还会有人公开宣称自己和恶魔有联系，那些想知道究竟对于恶魔的信任达到了怎样的一个程度的人可以参见内提斯海姆的阿格利巴那部被广为传阅的《论秘密的哲学》这本书，似乎他最初创作这本书是在他到意大利以前，但是在他给特里特米乌斯的献辞中，他特别地提到了意大利的权威人士，即使仅仅当作表示轻蔑的方式。至于像阿格利巴这样可疑的人，或者其余可以分成恶棍和傻瓜的大部分人，他们所声称的魔法制度，以及与这个魔法制度相关的规则、烟熏法、油膏以及其余的一些东西并不能让人感到有多大的兴趣。但是这个制度里引用了大量的古代迷信例证，有时它们给意大利人的生活和感情所带来的影响是最显而易见、最卓有成效的。或许我们会想，一个伟大的人一定是在彻底被毁灭了之后才会向这种势力屈服的；但是强烈的希望和欲望甚至能够让各阶级精力充沛的、有独创力的人们诉诸妖人，而完全相信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削弱了人们对世界的道德秩序的信仰，即使是那些和它保持一定距离的人们也不例外。似乎付出一点金钱、冒一点险就可能安然无恙地对人类普遍存在的理性和道德进行公然反抗，并且

还可以越过中间的一些步骤，而直接达到他合法的、不合法的目的。

Let us here glance for a moment at an older and now decaying form of superstition. From the darkest period of the Middle Ages, or even from the days of antiquity, many cities of Italy had kept the remembrance of the connection of their fate with certain buildings, statues or other material objects. The ancients had left records of consecrating priests or *telestae,* who were present at the solemn foundation of cities, and magically guaranteed their prosperity by erecting certain monuments or by burying certain objects *(telesmata)*. Traditions of this sort were more likely than anything else to live on in the form of popular, unwritten legend; but in the course of centuries the priest naturally became transformed into the magician, since the religious side of his function was no longer understood. In some of his Virgilian miracles at Naples, the ancient remembrance of one of these *telestae* is clearly preserved, his name being in course of time supplanted by that of Virgil. The enclosing of the mysterious picture of the city in a vessel is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a genuine, ancient *telesma;* and Virgil the founder of Naples is only the officiating priest, who took part in the ceremony, presented in another dress.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went on working at these themes, till Virgil became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brazen horse, for the heads at the Nolan gate, for the brazen fly over another gate, and even for the Grotto of Posillipo—all of them things which in one respect or other served to put a magical constraint upon fate, and the first two of which seemed to determine the whole fortune of the city. Medieval Rome also preserved confused recollections of the same kind. At the church of Sant' Ambrogio at Milan, there was an ancient marble Hercules; so long, it was said, as this stood in its place, so long would the Empire last. That of the Germans is probably meant, as the coronation of

their emperors at Milan took place in this church. The Florentines were convinced that the temple of Mars, afterwards transformed into the Baptistery, would stand to the end of time, according to the constellation under which it had been built; they had, as Christians, removed from it the marble equestrian statue; but sinc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latter would have brought some great calamity on the city—also according to a constellation—they set it upon a tower by the Arno. When Totila conquered Florence, the statue fell into the river, and was not fished out again till Charlemagne refounded the city. It was then placed on a pillar at the entrance to the Ponte Vecchio, and on this spot Buondelmonti was slain in 1215. The origin of the great feud between Guelph and Ghibelline was thus associated with the dreaded idol. During the inundation of 1333 the statue vanished for ever.

这里让我们暂且匆匆地看一下比较古老的、现在已经衰退了的迷信形式吧。从中世纪最黑暗的时期起，甚至是从古代起，意大利的许多城市一直以来就认为他们的命运和某些建筑物、雕像或者其他具体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古代保存下来了关于祭司或者辟邪师的记载，祭司或者辟邪师参加庄严肃穆的城市奠基仪式，并且通过建造某种纪念碑或者埋藏某种物件（阵物）的方法来魔法般地确保这些城市的繁荣。这类传统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有可能以民间口头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但是几个世纪之后，僧侣理所当然地转变成了魔法师，因为他宗教方面的任务已经不再被人理解。在某些发生在那不勒斯的维吉尔风格的奇迹中，人们一直清晰地记得其中一个古代魔法师创造的奇迹，他的名字最后被维吉尔的名字所替代。把关于这个城市的一幅玄妙的图画封闭在一个器皿里恰好就是一种真正的古代辟邪术；并且这个城市的缔造者维吉尔只不过就是一个参加这个仪式的、穿着另外一种服装出现的牧师主持而已。人民对于这些问题的想象继续发展着，直到铜马、诺兰门上的人头像、另一个城门上的铜苍蝇，甚至波西利波的洞穴都被认为是维吉尔遗留下来的——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这一方

面或那一方面对命运起着限制的作用，而前两样东西似乎决定着这个城市的全部命运。中世纪时期的罗马也保留着这一类混乱的回忆。在米兰的圣安布洛吉奥教堂里，有一尊古代赫拉克里勒斯的大理石塑像；据说，只要这个雕像能够一天安然无恙地树立在这里，那么这个帝国就会存在一天。这里大概指的是德意志人的帝国，因为他们的皇帝在米兰的加冕仪式是在这个教堂里举行的。佛罗伦萨人对后来改造成洗礼堂的占神的圣殿深信不疑，根据它建造时的星宿来看，它将永世不倒。作为基督教徒，他们从这个圣殿里挪走了那尊大理石的骑手雕像；但因为毁掉这个雕像日后将会给这个城市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也是根据星宿看出来的——所以他们把这尊雕像安放在了阿尔诺河旁边的一个塔楼上。当托提拉攻占佛罗伦萨时，这个雕像被沉入海里，一直到查理大帝重新建造这个城市时，才被重新捞起来。当时它被放在韦基奥桥的桥头柱子上，本德尔蒙特就是在1215年被杀死在这里的。归尔甫派与吉伯林派之间的深仇大恨的起源就是由此与这个可怕的神像联系起来的。在1333年洪水泛滥期间，这个雕像永远地消失了。

But the same *telesma* reappears elsewhere. Guido Bonatto, already mentioned, was not satisfied, at the refounding of the walls of Forli, with requiring certain symbolic acts of reconciliation from the two parties. By burying a bronze or stone equestrian statue, which he had produced by astrological or magical arts, he believed that he had defended the city from ruin, and even from capture and plunder. When Cardinal Albornoz was governor of Romagna some sixty years later, the statue was accidentally dug up and then shown to the people, probably by the order of the cardinal, that it might be known by what means the cruel Montefeltro had defended himself against the Roman Church. And again, half a century later, when an attempt to surprise Forli had failed, men began to talk afresh of the virtue of the statue, which had perhaps been saved and reburied. It was the last time that they could do so; for a year later Forli was

really taken. The foundation of buildings all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was associated not only with astrology but also with magic. The large number of gold and silver medals which Paul II buried in the foundation of his buildings was noticed, and Platina was by no means displeased to recognize an old pagan *telesma* in the fact. Neither Paul nor his biographer were in any way conscious of the medieval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such an offering.

但是，同样的“镇物”又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现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圭多·博纳托这个人，在重新修建弗利城墙时，要求两个党派做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和解举措。他把通过占星术或法术已经获得的一个铜骑手雕像或者石骑手雕像掩埋起来，他相信这样就已经捍卫了这个城市，让这个城市免于灭亡甚至是免于被占领或者被掠夺的厄运。六十年之后，当红衣主教阿尔沃诺斯担任罗马涅的地方长官时，恰巧碰上这个雕像被挖了出来，大概是奉红衣主教的命令，才向人民展示这个雕像的，让人们知道残暴的蒙泰费尔特罗曾经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保护自己，以及是怎样来反对教会的。又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当一次奇袭弗利的企图失败之后，人们又重新开始谈论起这个大概已经被保全下来的、又重新掩埋起来的雕像的德行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可以谈论这件事情了；因为一年之后，弗利真的就被占领了。在整个15世纪，建筑物的奠基仪式不仅与占星术有关联，而且也与法术有关。人们谈到过教皇保罗二世在他的建筑物的地基里埋藏了大量的金、银勋章，实际上普拉蒂纳绝对乐于把这件事情看作是一件古老的异教的“镇邪之术”。无论是保罗还是他的传记作者无论如何都没有意识到这种供奉具有中世纪的宗教意义。

But this official magic, which in many cases only rests on hearsay, was comparatively unimportant by the side of the secret arts practiced for personal ends.

但是，与那种为了达到私人目的而使用的秘密法术比起来，这种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依靠传闻的正式法术相对来说并不是重要的。

The form which these most often took in daily life is shown by Ariosto in his comedy of the necromancers. His hero is one of the many Jewish exiles from Spain, although he also gives himself out for a Greek, an Egyptian and an African, and is constantly changing his name and costume. He pretends that his incantations can darken the day and lighten the darkness, that he can move the earth, make himself invisible, and change men into beasts; but these vaunts are only an advertisement. His true object is to make his account out of unhappy and troubled marriages, and the traces which he leaves behind him in his course are like the slime of a snail, or often like the ruin wrought by a hailstorm. To attain his ends he can persuade people that the box in which a lover is hidden is full of ghosts, or that he can make a corpse talk. It is at all events a good sign that poets and novelists could reckon on popular applause in holding up this class of men to ridicule. Bandello not only treats this sorcery of a Lombard monk as a miserable, and in its consequences terrible, piece of knavery, but he also describes with unaffected indignation the disasters which never cease to pursue the credulous fool.

阿里奥斯托在他的关于巫师的喜剧里展现了这些法术在日常生活中最常采用的形式。他的男主角是从西班牙流放出来的众多犹太人里面的其中一个，尽管他也自称自己是个希腊人、埃及人和非洲人，并且不断地变换自己的名字和装束。他假装自己的咒语可以把白昼变成黑夜、把黑夜变成白昼，假装自己可以转动地球、可以让自己隐形、可以把人变成野兽；但是这些自吹自擂的说法不过只是自我宣传而已。他的真正的目的是从不幸和苦恼的婚姻中谋取利益，他路途中留下来的踪迹像蜗牛的黏液，或者常常像是一阵冰雹过后所造成的废墟

现象。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能够说服人们相信那个装情人的箱子里满是鬼魂，或者他能够让一具死尸开口说话。诗人和小说家们对这类人进行讥讽从而能够得到众人的赞扬，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好现象。班戴洛不仅把一个伦巴第僧侣的法术看作是一种卑鄙无耻的、会造成可怕后果的流氓行为，而且他还用一种毫不掩饰的愤慨来描述这种容易上当受骗的愚人毕生都将会遭遇灾难。

> A man hopes with *Solomon's Key* and other magical books to find the treasures hidden in the bosom of the earth, to force his lady to do his will, to find out the secret of princes, and to transport himself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from Milan to Rome. The more often he is deceived, the more steadfastly he believes'.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 Signor Carlo, when a friend of ours, in order to win a favor of his beloved, filled his room with skulls and bones like a churchyard?

> 有个人希望用所罗门的钥匙或者其他神奇的魔法著作来寻找埋藏在底下的宝藏、来强迫他的女人顺从他的意志、来找出君主的秘密，以及转瞬之间从米兰来到罗马。他越是经常受到欺骗，他就越坚决地相信……卡洛先生，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一个朋友为了赢得他的宠儿的欢心，在他的屋子里放满了头骨和尸骨像是坟墓一样吗？

The most loathsome tasks were prescribed—to draw three teeth from a corpse or a nail from its finger, and the like; and while the hocus-pocus of the incantation was going on, the unhappy

participants sometimes died of terror.

这种神秘的法术规定人们做最让人恶心的事情——从一具死尸上拔下三颗牙或者从死尸的手指上取下一个指甲，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念诵骗人的咒语时，那些不幸的参加者有时都被吓死了。

Benvenuto Cellini did not die during the well-known incantation (1532) in the Coliseum at Rome, [3_10] although both he and his companions witnessed no ordinary horrors; the Sicilian priest, who probably expected to find him a useful coadjutor in the future, paid him the compliment as they went home of saying that he had never met a man of so sturdy a courage. Every reader will make his own reflections on the proceedings themselves. The narcotic fumes and the fact that the imaginations of the spectators were predisposed for all possible terrors, are the chief points to be noticed, and explain why the lad who formed one of the party, and on whom they made most impression, saw much more than the others. But it may be inferred that Benvenuto himself was the one whom it was wished to impress, since the dangerous beginning of the incantation can have had no other aim than to arouse curiosity. For Benvenuto had to think before the fair Angelica occurred to him; and the magician told him afterwards that love-making was folly compared with the finding of treasures. Further, it must not be forgotten that it flattered his vanity to be able to say, 'The demons have kept their word, and Angelica came into my hands, as they promised, just a month later'. Even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Benvenuto gradually lied himself into believing the whole story, it would still be permanently valuable as evidence of the mode of thought then prevalent.

本文努托·切利尼在那次在罗马大竞技场里举行的著名的咒语施法（1532年）中并没有被吓死，[4_10] 尽管他和他的同伴目睹了许多极其可怕的事情；那个西西里岛的教士大概希望将来他是一个有用的合作者，当他们回家时夸奖他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胆子这么大的人。对于这些程序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见解。有麻醉作用的香气，以及观众的想象倾向于接受一切恐怖的景象的这样一个事实，是我们注意的关键之处，并且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那群人中间的一个小孩子对这些东西的印象最深，他比别人看到的都要多。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出，它所要影响的是本文努托本人，因为开始念诵咒语时所出现的危险的情形除了想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目的。因为在找到美丽的安琪莉嘉之前，本文努托不得不有所考虑；事后，那个法师告诉他，和寻求宝藏比起来求爱是一件荒唐愚蠢的事情。而且，千万不要忘记的是，本文努托之所以要说“恶魔履行了他们的诺言，果不其然就像他们所保证的那样安琪莉嘉刚好就在一个月之后回到了我的身边”，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虚荣心。即使我们猜想本文努托也渐渐地把自己骗得相信了这个故事，但是作为当时盛行的思维模式的一个佐证，它将永远都是有价值的。

As a rule, however, the Italian artists, even 'the odd, capricious and eccentric' among them, had little to do with magic. One of them, in his anatomical studies, may have cut himself a jacket out of the skin of a corpse, but at the advice of his confessor he put it again into the grave. [3_11] Indeed the frequent study of anatomy probably did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o destroy the belief in the magical influence of various parts of the bod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essant observ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human form made the artist familiar with a magic of a wholly different sort.

但是，通常，意大利的艺术家们，即使是其中一些“古怪的、任

性的、反复无常的”艺术家，也几乎不和法术有任何的联系。其中一个艺术家在研究解剖学时可能曾经想用死尸的皮来为自己剪裁一件短外套，但是在忏悔教士的劝告之下，他又把死尸的皮放回到了坟墓中。 [4_11] 确实，经常研究解剖学或许比做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打破对人体各个部分的神奇力量的迷信，与此同时，不断地对人体进行观察和描写也让艺术家们熟悉了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不可思议的魔力。

In general, notwithstanding the instances which have been quoted, magic seems to have been markedly on the declin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that is to say, at a time when it first began to flourish vigorously out of Italy; and thus the tours of Italian sorcerers and astrologers in the North seem not to have begun till their credit at home was thoroughly impaired.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t was thought necessary carefully to watch the lake on Mount Pilatus, near Scariotto, to hinder the magicians from consecrating their book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we find, for example, that the offer was made to produce a storm of rain, in order to frighten away a besieged army; and even then the commander of the besieged town—Niccolo Vitelli in Citta di Castello—had the good sense to dismiss the sorcerers as godless person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o more instances of this official kind appear, although in private life the magicians were still active. To this time belongs the classic figure of German sorcery, Dr Johann Faust; the Italian ideal, on the other hand, Guido Bonatto, dates back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一般而言，虽然已经引用了一些例子，但是在16世纪初期——也就是巫术首先开始在意大利之外的其他地方盛行的时候，意大利的巫术似乎显然已经走向衰落了；因此，直到意大利的巫师和占星家们在

意大利彻底名誉扫地时，他们似乎才开始到北方国家游行、传播自己的法术。在14世纪，人们认为有必要对位于斯卡利奥托附近的皮拉图斯山峰上的湖水进行严密的把守，以防止魔法师在那里祭献他们有关巫术的作品。比如，在15世纪，我们看到了为了吓走一支被包围的军队而进行的制造一场暴风雨的献祭；甚至当时这个被包围了的城市的统帅——卡斯泰洛城的尼科洛·维特利——也能够正确地把那些巫师当作亵渎神灵的人而对其进行斥退。在16世纪，再也看不到这种正式的使用法术的例子了，虽然魔法师在私生活中依然是积极活跃的。德意志著名的法师约翰·浮士德博士就属于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意大利的典型人物，圭多·博纳托则要追溯到13世纪。

It must nevertheless be added that the decrease of the belief in magic was not necessarily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e of the belief in a moral order, but that in many cases, like the decaying faith in astrology, the delusion left behind it nothing but a stupid fatalism.

然而，必须要附带说明的是，对巫术的信仰减少了，并不一定就是对道德秩序的信仰增加了，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像对占星术的信仰衰落一样，这种迷信所遗留下来的无非就是一种愚蠢的宿命论而已。

One or two minor forms of this superstition, pyromancy, chiromancy and others, which obtained some credit as the belief in sorcery and astrology was declining, may be here passed over, and even the pseudo-science of physiognomy has by no means the interest which the name might lead us to expect. For it did not appear as the sister and ally of art and psychology, but as a new form of fatalistic superstition, and, what it may have been among the Arabs, as the rival of astrology. The author of a physiognomical

treatise, Bartolommeo Code, who styled himself a 'metoposcopist', and whose science, according to Giovio, seemed like one of the most respectable of the free arts, was not content with the prophecies which he made to the manypeople who daily consulted him, but wrote also a most serious 'catalogue of such whom great dangers to life were awaiting'. Giovio, although grown old in the free thought of Rome—*'in hac luce romana'* —is of opinion that the predictions contained therein had only too much truth in them. We learn from the same source how the people aimed at in these and similar prophecies took vengeance on the seer. Giovanni Bentivoglio caused Lucas Gauricus to be five times swung to and fro against the wall, on a rope hanging from a lofty winding staircase, because Lucas had foretold to him the loss of his authority. Ermes Bentivoglio sent an assassin after Code, because the unlucky metoposcopist had unwillingly prophesied to him that he would die an exile in battle. The murderer seems to have derided the dying man in his last moments, saying that the prophet had foretold him that he would shortly commit an infamous murder. The reviver of chiromancy, Antioco Tiberto of Cesena, came by an equally miserable end at the hands of Pandolfo Malatesta of Rimini, to whom he had prophesied the worst that a tyrant can imagine, namely, death in exile and in the most grievous poverty. Tiberto was a man of intelligence, who was supposed to give his answers less according to any methodical chiromancy than by means of his shrewd knowledge of mankind; and his high culture won for him the respect of those scholars who thought little of his divination.

当人们对巫术和占星术的信仰逐渐减弱的时候，这种迷信的一两个次要的形式，被人们认为是受到一点信誉的火焰占卜、手相术以及其他的一些巫术，在这里可以略去不谈，甚至相面术这一伪科学也绝对不具有它的名字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兴趣。因为它并不是作为艺术和

心理学的姊妹和同盟者，而是作为宿命论迷信的一种新形式和作为占星术的竞争对手而已，不管它在阿拉伯人中间是作为一种什么东西。一部相术著作的作者，巴尔托洛梅奥·科德，宣称自己是一个骨相学家，在乔维奥看来，巴尔托洛梅奥·科德的学术似乎是其中一门最值得尊敬的自有艺术，巴尔托洛梅奥·科德为许多每天都向他请教的人做预言，他并不因此而感到满足，而且还非常认真地列了“一张名单，列出了那些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危险的人们”。尽管乔维奥自幼受到罗马自由思想的熏陶，但是他依然相信这里所包含的预言是完全可信的。我们从同一个原始资料得知，这些以及和与这些相似的预言所指出的那些人是怎样向这个预言家寻求报复的。乔瓦尼·本蒂沃利奥用绳子把卢卡斯·果里卡斯吊在了很高的螺旋式楼梯上，并来回摆动向墙上撞击五次，因为卢卡斯曾经预言他会失去他的权威。艾尔米斯·本蒂沃利奥派了一个刺客前去行刺科德，因为曾经这个不幸的骨相学家不得不预言他将死在战争中。似乎凶手曾经在这个人奄奄一息的最后时刻嘲弄他说，预言家曾经预言说他不久之后将会犯杀人罪，将会声名狼藉。手相术的复兴者，切塞纳的安蒂奥科·提伯尔托在里米尼的潘多弗·马拉泰斯塔手里遭遇到了同样可悲的结果，因为他曾经向他预言说将会受到一个暴君所能想象到的最坏的遭遇，也就是说，客死他乡，死于最悲惨的贫困之中。提伯尔托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与其说他是根据任何系统的手相术而给出的答案，不如说更多地应该是根据他对人类的透彻了解而给出的答案；而且他崇高的文化内涵为他赢得了那些鄙视占卜术的学者的尊重。

Alchemy, in conclusion, which is not mentioned in antiquity till quite late under Diocletian, played only a very subordinate part at the best period of the Renaissance. Italy went through the disease earlier, when Petrarch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onfessed, in his polemic against it, that gold-making was a general practice. Since then that particular kind of faith, devotion and isolation which the practice of alchemy required became more and more rare in Italy, just when Italian and other adepts began to make their full profit

out of the great lords in the North. Under Leo X the few Italians who busied themselves with it were called *ingenia curiosa,* and Aurelio Augurelli, who dedicated to Leo X, the great despiser of gold, his didactic poem on the making of the metal, is said to have received in return a beautiful but empty purse. The mystic science which besides gold sought for the omnipotent philosopher's stone is a late northern growth, which had its rise in the theories of Paracelsus and others.

总之，在古代，一直到后来很晚的罗马皇帝的统治时期，才被提及的点金术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只起了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作用。意大利早些时候就遭受过这种灾难的洗礼，那是在14世纪，当时彼特拉克在他的反对点金术的辩论中公开承认点金术是个普遍存在的风尚。从那以后，搞点金术所需要的那种特殊的信念、献身精神以及与世隔绝的状态在意大利越来越罕见了，就在这个时候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的点金术高手开始在北方国家获取丰厚的利益。在利奥十世时代，少数从事点金术的人被称作“天真的好奇者”，奥雷利奥·欧格雷利曾向最视金钱为粪土的利奥十世进献关于炼金的说理诗，据说奥雷利奥·欧格雷利只是得到了一个空空如也的美丽的钱袋作为回报。除了寻找黄金之外，在晚些时候，北方国家还寻找万能哲人的那个点石成金的神秘科学，它源于帕拉塞尔苏斯以及其他人的理论。

General Spirit of Doubt

普遍的信仰怀疑

With these superstitions, as with ancient modes of thought generally, the decline in the belief of immortality stands in the closest connection. This question has the widest and deepest relations with the whol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pirit.

灵魂不死这一信念的衰落与这些迷信以及一般的古代思维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问题和现代精神的整个发展过程有着最广泛、最深刻的关系。

One great source of doubt in immortality was the inward wish to be under no obligations to the hated Church. We have seen that the Church branded those who thus felt as Epicureans. In the hour of death many doubtless called for the sacraments, but multitudes during their whole lives, and especially during their most vigorous years, lived and acted on the negative supposition. That unbelief on this particular point must often have led to a general scepticism is evident of itself, and is attested by abundant historical proof. These are the men of whom Ariosto says, 'Their faith goes no higher than the roof.' In Italy, and especially in Florence, it was possible to live as an open and notorious unbeliever, if a man only refrained from direct acts of hostility against the Church. The confessor, for instance, who was sent to prepare a political offender for death, began by inquiring whether the prisoner was a believer, 'for there was a false report that he had no belief at all'.

对灵魂不死的信念产生怀疑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从内心不愿对令人恨之入骨的教会承担任何义务。我们已经目睹了教会把怀有这种想法的人诋毁为享乐主义者。毫无疑问许多人在临死的时候是要求接受圣礼的，但是大多数群众在他们的一生中，尤其是在他们壮年时期，是根据消极的假设生活、立身行事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问题上，如果没有信仰则往往会导致一般的怀疑主义，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是大量的历史证据所证明了的。这些也是阿里奥斯托等人所说的："他们不相信天上的任何事情。"在意大利，尤其是在佛罗伦萨，一个人只要不与教会直面交锋，那么他是有可能作为一个公开

的、众人皆知的无信仰者生活下去的。比如，有个被派去给政治犯送终的听忏悔的神父一开始就问这个政治犯是不是一个信徒，“因为有一份虚假报告显示说他没有任何信仰”。

The unhappy transgressor here referred to—the same Pierpaolo Boscoli who has been already mentioned—who in 1513 took part in an attempt against the newly restored family of the Medici, is a faithful mirror of the religious confusion then prevalent. Beginning as a partisan of Savonarola, he became afterwards possessed with an enthusiasm for the ancient ideals of liberty, and for paganism in general; but when he was in prison his early friends regained the control of his mind, and secured for him what they considered a pious ending. The tender witness and narrator of his last hours is one of the artistic family of the della Robbia, the learned philologist Luca. 'Ah,' sighs Boscoli, 'get Brutus out of my head for me, that I may go my way as a Christian.' 'If you will,' answers Luca, 'the thing is not difficult; for you know that these deeds of the Romans are not handed down to us as they were, but idealized (*con arte accresciute)* .' The penitent now forces his understanding to believe, and bewails his inability to believe voluntarily. If he could only live for a month with pious monks he would truly become spiritually minded. It comes out that these partisans of Savonarola knew their Bible very imperfectly; Boscoli can only say the paternoster and ave maria, and earnestly begs Luca to exhort his friends to study the sacred writings, for only what a man has learned in life does he possess in death. Luca then reads and explains to him the story of the Passion according to the Gospel of St John; the poor listener, strange to say, can perceive clearly the Godhead of Christ, but is perplexed at his manhood; he wishes to get as firm a hold of it 'as if Christ came to meet him out of a wood'. His friend thereupon exhorts him to be humble, since this was only a doubt sent him by the Devil. Soon

after it occurs to the penitent that he has not fulfilled a vow made in his youth to go on a pilgrimage to the Impruneta; his friend promises to do it in his stead. Meantime the confessor—a monk, as was desired, from Savonarola's monastery—arrives, and after giving him the explanation quoted above of the opinion of St Thomas Aquinas on tyrannicide, exhorts him to bear death manfully. Boscoli makes answer: 'Father, waste no time on this; the philosophers have taught it me already; help me to bear death out of love to Christ.' What follows—the communion, the leave-taking and the execution—is very touchingly described; one point deserves special mention. When Boscoli laid his head on the block, he begged the executioner to delay the stroke for a moment: 'During the whole time since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sentence he had been striving after a close union with God, without attaining it as he wished, and now in this supreme moment he thought that by a strong effort he could give himself wholly to God.' It is clearly some half-understood expression of Savonarola which was troubling him.

这里所说的这个不幸的罪犯——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个皮耶尔保罗·博斯克利——他在1513年参与了对新复位的美第奇家族的谋害活动。他是一面忠实地反映当时流行的宗教混乱的镜子。刚开始他是萨沃纳罗拉的同党，后来对古代的自由思想和一般的异教信仰充满了满腔的热情；但是当他坐牢时，他早期的朋友又重新控制了他的思想，给了他一个他们所谓的善终。他临终时的和蔼的证人、解说者，博学多识的语言学家卢卡，是那个钟爱艺术的德拉·洛比亚家族的一员。“啊，”博斯克利叹息道，“替我把布鲁特斯从我的脑子里拿走吧，让我像基督教徒一样死去吧。”“如果你愿意，”卢卡回答说，“这件事是不难的；因为你知道罗马人的这些事迹并不是按照它们原来的样子传给我们的，而是把它们理想化了（艺术上的夸大）之后传给我们的。”现在这个忏悔者勉强让自己去相信，并为自己没能自愿地去相信而感到悲伤。如果他能够和一个虔诚僧侣仅仅是一起生活一个月，

那么他必将真正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人们发现萨沃纳罗拉的这些同党们对圣经的理解不是很完美；博斯克利只会念“我们的在天之父”和“万福玛利亚”这两则经文，他诚挚地恳求卢卡去劝告他的朋友们读圣书，因为一个人只有在生前所学到的东西才能在临死时为他所有。然后卢卡按照圣约翰的马太福音为他诵读和讲解基督受难的故事；说来也奇怪，那个可怜的听者能够清晰地领会基督的神性，但是却对他的人性感到困惑不解；他希望紧紧地抓住它，“就好像基督是从树林里出来和他会面的”。随即他的朋友劝告他要谦逊，因为这仅仅只是恶魔撒旦给他送来的疑惑。很快，这个忏悔者想起了他年轻时许下了一个参拜因普鲁内塔的诺言，但还没有还愿；他的朋友答应代替他还这个愿。与此同时，那个听忏悔的神父——如博斯克利所希望的那样，是一个来自萨沃纳罗拉的和尚——来了，在给他解释了前面所引用的关于圣托马斯·阿奎那对于诛弑暴君的观点之后，就劝诫他勇敢地面对死亡。博斯克利答道：“神父，不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哲学家已经把它传授给我了；请帮我，让我是出于对基督的热爱而死去吧。”接下来是对圣餐仪式、告别辞和行刑进行了扣人心弦的描述；有一点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当博斯克利把头放在断头台上时，他请求行刑者稍等片刻再落刀：“自从死刑的判决宣布以来，他的整个时间都用在寻找与上帝的密切结合上面，但未能如愿以偿，现在在这神圣的时刻，他想通过一次强大的努力，以此能够让他把自己完全地托付给上帝。”很显然，萨沃纳罗拉的一些似懂非懂的话让他苦恼不已。

If we had more confessions of this character the spiritual picture of the time would be the richer by many important features which no poem or treatise has preserved for us. We should see more clearly how strong the inborn religious instinct was, how subjective and how variable the relation of the individual to religion, and what powerful enemies and competitors religion had. That men whose inward condition is of this nature are not the men to found a new church is evident; but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spirit would

be imperfect without a view of that fermenting period among the Italians, while other nations, who have had no share in the evolution of thought, may be passed over without loss. But we must return to the question of immortality.

如果我们拥有更多此类的忏悔，那么这一时期的精神面貌会因为许多重要的特征而变得更为丰富多样，那些诗歌或者专著没能把这些特征给我们记录下来。我们应该更清晰地看到先天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强烈，个人与宗教的关系是何等地主观、变化不定，以及宗教的敌人和竞争对手是多么强大。内心属于这类性质的人是无法建立一个新的教会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去着重观察一下意大利人的那个动荡时期，西方的思想史就是不完整的，而思想没有演变的其他民族可以略去不谈，并且对思想史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我们必须得回到灵魂不死的问题上。

If unbelief in this respect made such progress among the more highly cultivated natures, the reason lay partly in the fact that the great earthly task of discovering the world and representing it in word and form absorbed most of the higher spiritual faculties. We have already spoken of the inevitable worldliness of the Renaissance. But this investigation and this art were necessarily accompanied by a general spirit of doubt and inquiry. If this spirit shows itself but little in literature, if we find, for example, only isolated instances of the beginnings of biblical criticism, we are not therefore to infer that it had no existence. The sound of it was only overpowered by the need of representation and creation in all departments—that is, by the artistic instinct; and it was further checked, whenever it tried to express itself theoretically, by the already existing despotism of the Church. This spirit of doubt must, for reasons too obvious to need discussion, have inevitably and

chiefly busied itself with the question of the state of man after death.

如果这种不信奉灵魂不死的信仰在文化教养更高的人们中间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的话，那么一部分原因就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这种用语言和形式来展现不信奉灵魂不死的伟大世俗任务吸引了大部分具有更崇高的精神的人们。我们已经谈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不可避免的世俗之心。但是这种调查研究和这种艺术必然会伴有一种普遍的怀疑精神和探究精神。如果这种精神只是很少在文学上得以呈现，比方说，如果我们只是找到了开始批判圣经的个别例子，那么我们无法因此就得出它不存在的结论。仅仅是各个部门的表现和创造的需要——也就是说，艺术的本能把它的这种声音压制下去了；无论何时，当它试图在理论上表达自己的时候，教会现有的专制势力就会对它进行更进一步的阻碍。因为原因非常显而易见，我们不需进行讨论，这种怀疑精神必然多半是研究人死后是怎样一种状况这样的问题的。

And here came in the influence of antiquity, and worked in a twofold fashion on the argument. In the first place men set themselves to master the psychology of the ancients, and tortured the letter of Aristotle for a decisive answer. In one of the Lucianic dialogues of the time Charon tells Mercury how he questioned Aristotle on his belief in immortality, when the philosopher crossed in the Stygian boat; but the prudent sage, although dead in the body and nevertheless living on, declined to compromise himself by a definite answer—and centuries later how was it likely to fare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 writings? All the more eagerly did men dispute about his opinion and that of others on the true nature of the soul, its origin, its pre-existence, its unity in all men, its absolute eternity, even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there were men who treated of these things in the pulpit. The dispute was warmly carried on

eve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some proved that Aristotle taught the doctrine of an immortal soul; others complained of the hardness of men's hearts who would not believe that there was soul at all, till they saw it sitting down on a chair before them; Filelfo in his funeral oration on Francesco Sforza brings forward a long list of opinions of ancient and even of Arab philosophers in favor of immortality, and closes the mixture, which covers a folio page and a half of print, with the words, 'Besides all this we have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which are above all truth.' Then came the Florentine Platonists with their master's doctrine of the soul, supplemented at times, as in the case of Pico, by Christian teaching. But the opposite opinion prevailed in the instructed worl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stumbling-block which it put in the way of the Church was so serious that Leo X set forth a constitution at the Lateran Council in 1513, in defence of the immortality and individuality of the soul, the latter against those who asserted that there was but one soul in all men. A few years later appeared the work of Pomponazzo, in which the impossibility of a philosophical proof of immortality is maintained; and the contest was now waged incessantly, with replies and apologies, till it was silenced by the Catholic reaction. The pre-existence of the soul in God, conceived more or less in accordance with Plato's theory of ideas, long remained a common belief, and proved of service even to the poets. The consequences which followed from it as to the mode of the soul's continued existence after death were not more closely considered.

这里古典文化开始发挥其影响作用了，并且是以双重的样式在争论上发挥着其作用的。首先，人们试图掌握古人的心理状态，并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句中苦苦寻求一个确切的答案。在这个时代的其中一篇卢西安风格的、笔调讽刺诙谐的对话录中，冥府渡神告诉使神墨丘

利，当亚里士多德坐着幽暗的船只渡河时，他是如何向这个哲学家追问是不是相信灵魂不死的；但是这个谨慎的圣人，虽然肉体已死但精神长存，拒绝给出明确的回答，以此来保留自己的声誉——几个世纪以后，怎么有可能利用他著作中的解释呢？人们曾经更加热心地争论他的以及其他人的关于灵魂真正的性质、灵魂的起源、灵魂的存在、灵魂与所有人的结合、灵魂绝对的永恒，甚至灵魂的投胎等方面的观点；有人在讲道坛上谈论这些事情。甚至是在15世纪，这种争论还在激烈地进行着；有些人证明了亚里士多德曾向人们教授灵魂不死的学说；其他人抱怨说有的人是铁石心肠，这些人根本不会相信有灵魂的，直到他们看到有灵魂坐在他们面前的椅子上；菲莱尔福在对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的追悼词中列举了一系列古代甚至是阿拉伯哲学家们赞成灵魂不死的观点，他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这些占了一页半纸的各家之言："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旧约》和《新约》，它们是最为重要的真理。"然后还有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者，他们相信他们老师的关于灵魂的学说，有时还有比科那样的以基督教为补充的学说。但是，在受教育者中间盛行着一种相反的观点。在16世纪初期，这种观点给教会带来了如此严重的阻碍，以至于利奥十世在1513年的拉特兰会议上颁布了一条法令，以此来保护灵魂不死与灵魂个体的学说，后者是为了反对那些声称所有人共有一个灵魂的说法。几年之后，庞波纳佐的作品出现了，其认为哲学上关于灵魂不死的证明是不可能的；于是以答和辩展开的争论不间断地进行着，直到天主教的反动势力把这种争论压制下去为止。这种或多或少是根据柏拉图的理念学说而设想出来的灵魂先存在于上帝身上的学说，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共同的信念，并且也证明出了这种信念甚至也曾被诗人所用。对于这种信念所产生的关于人死后灵魂继续存在的方式的问题，人们并没有对其进行仔细的考虑。

There was a second way in which the influence of antiquity made itself felt, chiefly by means of that remarkable fragment of the sixth book of Cicero's *Republic* known by the name of 'Scipio's Dream'. Without the commentary of Macrobius it would probably

have perished like the rest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e work; it was now diffused in countless manuscript copies, and, after the discovery of typography, in printed form, and edited afresh by various commentators. It is the description of a transfigured hereafter for great men, pervaded by the harmony of the spheres. This pagan heaven, for which many other testimonies were gradually extracted from the writings of the ancients, came step by step to supplant the Christian heaven in proportion as the ideal of fame and historical greatness threw into the shade the ideal of the Christian life, without, nevertheless, the public feeling being thereby offended as it was by the doctrine of personal annihilation after death. Even Petrarch founds his hope chiefly on this Dream of Scipio, on the declarations found in other Ciceronian works, and on Plato's *Phaedo,* without making any mention of the Bible. 'Why,' he asks elsewhere, 'should not I as a Catholic share a hope which was demonstrably cherished by the heathen?' Soon afterwards Coluccio Salutati wrote his *Labours of Hercules* (still existing in manuscript), in which it is proved at the end that the valorous man, who has well endured the great labours of earthly life, is justly entitled to a dwelling among the stars. If Dante still firmly maintained that the great pagans, whom he would have gladly welcomed in paradise, nevertheless must not come beyond the limbo at the entrance to hell, the poetry of a later time accepted joyfully the new liberal ideas of a future life. Cosimo the Elder, according to Bernardo Pulci's poem on his death, was received in heaven by Cicero, who had also been called the 'father of his country', by the Fabii, by Curius, Fabricius and many others; with them he would adorn the choir where only blameless spirits sing.

古典文化产生影响的另一种方式主要是通过西塞罗的《共和国》的第六卷残存的宝贵片段来起作用的，人们称之为《西庇阿的梦

想》。如果没有马克罗比乌斯的评注，或许这一篇也像第二篇的其余部分一样消失殆尽了；它当时以无数个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着，而自从发明了活版印刷术以后，现在是以印刷本的形式流传于世，并且不同的论者会重新发行不同的版本。它描述的是伟人们的美好的来世，里面弥漫着天体的和谐。人们逐渐从古代人的作品中摘录出了其他许多关于这个异教天堂的一些佐证，随着享誉盛名和取得伟大的历史成就的理想逐渐让基督教生活的理想黯然失色，这个异教天堂也就一步步地代替了基督教的天堂，然而它却没有因此而伤害了人们的感情，因为它是以人死后就消失了的学说为依据的。甚至是彼特拉克也把自己的希望首先寄托在西庇阿的梦想上、寄托在从西塞罗的作品中发现的主张上，以及柏拉图的《斐多篇》上，他一点也没有提到圣经。“为什么，”他在其他地方问道，“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就不能有明显是异教徒所怀有的希望呢？”不久以后，科留乔·萨卢塔蒂创作了他的《赫拉克勒斯的劳苦》这本书，至今还保存有这本书的手抄本，在这本书的结尾证明了勇敢无畏之人，在尘世的生活中劳苦功高，是有权利住在有星辰为伴的天堂里的。如果但丁依然坚定地认为伟大的异教徒坚决不能离开地狱入口处的候判所，虽然他很乐意在天堂里迎接他们，那么以后一段时期的诗歌则会欣然接受未来生活的一个崭新的自由的理想。根据博纳多·普尔西在他临终时所写的诗篇，老科西莫受到天堂中的西塞罗的欢迎，并被西塞罗尊称为“国父”，受到法比乌斯家族的欢迎，也受到了库里乌斯、法布里修斯以及其他人的欢迎；他将会和他们一起为那个只有清白的人才能在那里唱歌的合唱团增光添彩。

But in the old writers there was another and less pleasing picture of the world to come—the shadowy realms of Homer and of those poets who had not sweetened and humanized the conception. This made an impression on certain temperaments. Gioviano Pontano somewhere attributes to Sannazaro the story of a vision, which he beheld one morning early while half awake. He seemed to see a departed friend, Ferrandus Januarius, with whom he had often discoursed o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and whom he now

asked whether it was true that the pains of hell were really dreadful and eternal. The shadow gave an answer like that of Achilles when Odysseus questioned him. 'So much I tell and aver to thee, that we who are parted from earthly life have the strongest desire to return to it again.' He then saluted his friend and disappeared.

但是，在古代作家的笔下，也有另外一种让人不太愉快的对来世的描述——一种被荷马和那些没有对这种观念进行美化并使之具有人情味的作家们所描绘的阴暗的国度。这给具有某种气质的人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乔维诺·庞达诺在某个地方认为梦幻故事是桑纳扎罗的作品，这是他在一个清晨半睡半醒时所看到的。他似乎是看到了一个已经去世的朋友，费兰达斯·雅努阿里亚斯，乔维诺·庞达诺以前经常和这位朋友谈论有关灵魂不死的话题，他现在问他地狱的痛苦是否真的是非常可怕、永不超生的。那个阴魂所给出的回答很像阿基里斯给奥德修斯的那个回答。“我所能告诉你的、向你断言的就是我们这些离开尘世生活的人是非常渴望再重新回到尘世中去的。”他向他的朋友行礼，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It cannot but be recognized that such views of the state of man after death partly presuppose and partly promot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st essential dogmas of Christianity. The notion of sin and of salvation must have almost entirely evaporated. We must not be misled by the effects of the great preachers of repentance or by the epidemic revivals which have been described above. For even granting that the individually developed classes had shared in them like the rest, the cause of their participation was rather the need of emotional excitement, the rebound of passionate natures, the horror felt at great national calamities, the cry to heaven for help. The awakening of the conscience had by no means necessarily the sense of sin and the felt need of salvation as its consequence, and even a

very severe outward penance did not perforce involve any repentance in the Christian meaning of the word. When the powerful natures of the Renaissance tell us that their principle is to repent of nothing, they may have in their minds only matters that are morally indifferent, faults of unreason or imprudence; but in the nature of the case this contempt for repentance must extend to the sphere of morals, because its origin, namely the consciousness of individual force, is common to both sides of human nature. The passive and contemplative form of Christianity, with its constant reference to a higher world beyond the grave, could no longer control these men. Machiavelli ventured still farther, and maintained that it could not be serviceable to the state and to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freedom.

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对于人死后的状况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的解除。有罪和拯救的观念一定已经差不多完全烟消云散了。我们一定不能因那些劝人忏悔的伟大传教士们的影响或者前面已经描述过的盛行一时的宗教复兴运动而误入歧途。因为即使承认那些个性得以发展的阶级和其他阶级一样参与了这个运动之中，但是他们参加这个运动的原因不如说是一种情绪兴奋的需要、热情天性的反应、对民族灾难的恐惧，以及向上帝寻求帮助的呼吁声。良知醒悟的结果绝不会是对罪恶产生意识，也不会是感到有拯救的必要，即使是一个表面上看似非常严重的忏悔也不会包括忏悔这个单词的任何有关基督教的意义。当文艺复兴时期强大的人物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原则就是不会对任何事情做忏悔时，他们心里想的或许仅仅只是那些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缺乏理性的或者鲁莽的错误；但是，这种对忏悔的蔑视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延伸到道德范围之内，因为它的起源，也就是对个人力量的认识，对于人性的两个方面是常见的。基督教的消极、沉思内省的形式，以及常常提及的坟墓以外的一个更高的天国，不能再控制这些人了。马基雅弗利敢于大胆地更进一步，认为基督教不能对维护国家和公共自由有所

帮助。

The form assumed by the strong religious instinct which, notwithstanding all, survived in many natures, was theism or deism, as we may please to call it. The latter name may be applied to that mode of thought which simply wiped away the Christian element out of religion, without either seeking or finding any other substitute for the feelings to rest upon. Theism may be considered that definite heightened devotion to the one Supreme Being which the Middle Ages were not acquainted with. This mode of faith does not exclude Christianity, and can either ally itself with the Christian doctrines of sin, redemption and immortality, or else exist and flourish without them.

尽管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残留在许多人身上的强烈的宗教本能所呈现出来的形式依然是有神论或者自然神论，我们喜欢怎么叫就可以怎么叫它。后面这个名字可以用在一种只是从宗教信仰中抹去基督教成分的思维模式上，既不去寻找也不去发现其他任何用来寄托感情的替代物。有神论可以被看作是对上帝的明确的、崇高的信仰，这种信仰在中世纪时期没有被人们认识到。这种信仰方式不排斥基督教，它要么与基督教关于罪恶、救赎和灵魂不灭的学说联合起来，要么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之下而独自存在、蓬勃发展。

Sometimes this belief presents itself with childish *naivete* and even with a half-pagan air, God appearing as the almighty fulfiller of human wishes. Agnolo Pandolfini tells us how, after his wedding, he shut himself in with his wife, and knelt down before the family altar with the picture of the Madonna, and prayed, not to her, but to God, that He would vouchsafe to them the right use of their

property, a long life in joy and unity with one another, and many male descendants; 'for myself I prayed for wealth, honor and friends, for her blamelessness, honesty, and that she might be a good housekeeper'. When the language used has a strong antique flavor, 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keep apart the pagan style and the theistic belief.

有时，这种信仰以一种孩子气的纯真无邪的、半异教的性质呈现出来，上帝似乎是人类愿望的万能的实现者。阿尼奥洛·潘多尔菲尼告诉我们，结婚以后，他是如何与妻子一起关在屋里，跪在挂有圣母玛利亚圣像的家庭祭坛前面祈祷的，他们不是向圣母玛利亚祈祷，而是向上帝祈祷，祈祷上帝能够允许他们正当地使用他们的财产，愉快地度过一生，长命百岁，不离不弃，并且多子多孙；“祈求我自己能够家累千金、名满天下、高朋满座，祈求我的妻子能够贤良淑德、诚信正直，能够成为一个温柔贤惠的家庭主妇。”当措辞有一种强烈的古代韵味时，人们就难以区分哪种是异教风格，哪种是有神论的宗教信仰。

This temper sometimes manifests itself in times of misfortune with a striking sincerity. Some addresses to God are left us from the latter period of Firenzuola, when for years he lay ill of fever, in which, though he expressly declares himself a believing Christian, he shows that his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is essentially theistic. His sufferings seem to him neither as the punishment of sin, nor as preparation for a higher world; they are an affair between him and God only, who has put the strong love of life between man and his despair. 'I curse, but only curse Nature, since thy greatness forbids me to utter thy name…. Give me death, Lord, I beseech thee, give it me now!'

这种性情有时是在不幸之中用一种扣人心弦的诚挚之情展现出来的。费伦佐拉因晚年患热病而卧床数年之久，晚年时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他对上帝说的话，在这些话里面，尽管他明确地声称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意识在本质上都是有神论的。在他看来，他所经历的苦难既不是对罪恶的惩罚，也不是为死后进入天堂而做的准备；它们只是他和上帝之间的事情，上帝在人类和其绝望之间放置了对生活的浓烈的爱。“我诅咒，但是只是咒骂造化，因为你的伟大禁止我对你直呼其名……让我死吧，主啊，我求求你，现在就让我死吧！”

In these utterances and the like, it would be vain to look for a conscious and consistent theism; the speakers partly believed themselves to be still Christians, and for various other reasons respected the existing doctrines of the Church. But at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when men were driven to come to a distinct conclusion on such points, this mode of thought was accepted with a fuller consciousness; a number of the Italian Protestants came forward as anti-trinitarians and socinians, and even as exiles in distant countries made the memorable attempt to found a church on these principles. From the foregoing exposition it will be clear that, apart from humanistic rationalism, other spirits were at work in this field.

在这些话里，以及诸如此类的话里，是找不到有意识的、始终如一的有神论的；在一定程度上，说话者相信自己依然是基督教徒，并且由于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尊重教会现有的学说。但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当人们被迫在此类问题上得出明确的结论时，这种思想方式就被人们更自觉地接受了；许多意大利新教徒以反三位一体论者与索齐尼派教徒的身份站了出来，甚至是作为流放到遥远的异国他乡的流亡者也做出了重大的努力，基于这些原则建立一个教堂。从前面的论

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人道主义的理性主义之外，其他精神也在这个领域发挥了作用。

One chief centre of theistic modes of thought lay in the Platonic Academy at Florence, and especially in Lorenzo il Magnifico himself. The theoretical works and even the letters of these men show us only half their nature. It is true that Lorenzo, from his youth till he died, expressed himself dogmatically as a Christian, and that Pico was drawn by Savonarola's influence to accept the point of view of a monkish ascetic. But in the hymns of Lorenzo, which we are tempted to regard as the highest product of the spirit of this school, an unreserved theism is set forth—a theism which strives to treat the world as a great moral and physical cosmos. While the men of the Middle Ages look on the world as a vale of tears, which pope and emperor are set to guard against the coming of antichrist; while the fatalists of the Renaissance oscillate between seasons of overflowing energy and seasons of superstition or of stupid resignation, here, in this circle of chosen spirits, the doctrine is upheld that the visible world was created by God in love, that it is the copy of a pattern pre-existing in Him, and that He will ever remain its eternal mover and restorer. The soul of man can by recognizing God draw Him into its narrow boundaries, but also by love of Him itself expand into the Infinite—and this is blessedness on earth.

在有神论的思想方式中，其中一个主要的中心就是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尤其是伟大的洛伦佐本人。这些人的理论作品乃至信件只是向我们展示了他们一半的性质。当然，洛伦佐从少年时代开始，一直到他去世时，都武断地宣称自己是基督信徒，而比科也在萨沃纳罗拉的影响之下接受了僧侣的苦行者的观点。但是，我们不能不把洛伦

佐的赞美诗看作是这个学派的最崇高的精神产物，在洛伦佐的赞美诗中提出了一种无限制的有神论——这种有神论竭尽全力想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和物质的和谐体。当中世纪时期的人们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个有教皇和皇帝被安置在此以抵御反基督者的到来的泪之谷的时候；当文艺复兴时期的宿命论者在时而精神迸发、时而迷信异端信仰、时而愚蠢地听天由命之间来回摇摆不定时，在这里，在这一群优秀的人物中，他们所信奉的教条就是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上帝用爱创造出来的，是上帝心中已有的世界模型的复本，上帝将是它永恒的原动力、修补者。人类能够通过承认上帝的存在而把上帝吸引到自己灵魂的狭窄的范围之中，但是人类也能够通过对上帝的爱而把自己的灵魂延伸到上帝无限的领域之中——这就是尘世中的幸福。

Echoes of medieval mysticism here flow into one current with Platonic doctrines, and with a characteristically modern spirit. One of the most precious fruits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and of man here comes to maturity, on whose account alone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must be called the leader of modern ages.

中世纪神秘论的反响在这里和柏拉图学说合流了，与一种典型的现代精神合流了。关于世界、关于人类的知识的其中一个最宝贵的成果在这里逐渐趋于成熟，单单只是因为这一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一定得被称为现代史的前驱。

[3_1].[It is in this section that the voice of the Swiss Lutheran bourgeois is most evident; but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Burckhardt's 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papacy was that of Ranke, since the History of the Popes by Ludwig von Pastor, written from the Vatican archives, did not begin to appear until 1886.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egan in 1891; of the forty volumes, the first ten or twelve are relevant to our period. D. Hay, The Church in Ital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77, is an up-to-date survey of the problems in this field, and attacks the problem of the differing interpretations by Burckhardt and Pastor of the 'paganism' of the Renaissance.]

[3_2].See extracts from his diary in Delecluze, Florence et ses vicissitudes, vol. ii. [Buonaccorso Pitti's Diary has been translated in Two Memoirs of Renaissance Florence: The Diaries of Buonaccorso Pitti and Gregorio Dati, ed. G. Brucker, New York, 1967.]

[3_3].If he appeared as a corsair in the war between the two lines of Anjou for the possession of Naples, he may have done so as a political partisan, and this, according to the notions of the time, implied no dishonor. The Archbishop Paolo Fregoso of Geno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robably allowed himself quite as much freedom, or more. [John XXIII, Antipope, 1410-15, was certainly a pirate. He was deposed in 1415, to make way for the legitimate Martin V and is best remembered for his splendid tomb, by Donatello and Michelozzo, in the Florentine Baptistery.]

[3_4].L'Ordine. Probably the tablet with the inscription IHS is meant. [This is certainly a reference to the special tablet with the letters IHS (Iesus Hominum Salvator), which S. Bernardino used to hold up during his sermons; see, for example, the painting by Neroccio de' Landi in Siena, Palazzo del Commune.]

[3_5].Ricordi, no. 28, in the Opere inedite, vol. i. [For Guicciardini, see C. Grayson, ed., F. Guicciardini,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1965, p. 12.]

[3_6].Perrens, Jerome Savonarole, 2 vols. Perhaps the most systematic and sober of all the many works on the subject. P. Villari, La storia di Girol. Savonarola (2 vols., octavo, Florence). [Villari's Savonarola was twic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second edition London, 1897), but the modern monograph is by R. Ridolfi,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 Grayson, London, 1959. See also D. Weinstein, Savonarola and Florence, Princeton, 1970.]

[3_7].We must make a furthe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Italian cultus of the bodies of historical saints of recent date, and the northern practice of collecting bones and relics of a sacred antiquity. Such remains were preserved in great abundance in the Lateran, which, for that reason, was of special importance for pilgrims. But on the tombs of St Dominic and St Anthony of Padua rested, not only the halo of sanctity, but the splendor of historical fame. [Both these shrines were major works of art: the Area di San Domenico, in San Domenico, Bologna, was designed by Nicola Pisano and partly executed by his shop. Among others, Michelangelo helped to complete it. The Basilica of St Anthony in Padua (Il Santo) was built in 1232-1307 and contains his tomb in a chapel built in 1500-46; the High Altar, by Donatello, is not now in its original form.]

[3_8].While the visual arts at all events distinguished between angels and putti, and used the former for all serious purposes. In the Annal. Estens. in Murat. xx, col. 468, the amorino is naively called instar Cupidinis angelus [a Cupid-like angel].

[3_9].[This picture, which represents SS Mark, George and Nicholas saving Venice from a sea-storm raised by demons, was originally attributed to Giorgione by Vasari, who later changed his mind and gave it to Palma Vecchio. Current opinion rejects the Giorgione attribution and hesitates between Palma and Paris Bordone, following a cleaning undertaken in 1955. Formerly in the Accademia, it is now in the Biblioteca dell' Ospedale Civile in Venice.]

[3_10].Ben. Cellini, i, cap. 64. [Cellini's Autobiography, translated by G. Bull, Penguin Classics, 1956.]

[3_11].Vasari, viii, 143, Vita di Andrea da Fiesole. It was Silvio Cosini, who also 'went after magical formulae and other follies'. [Vasari, Milanesi edition, iv, 483; English translation by G. de Vere, London, 1913, v, 7: 'Silvio... belonged to the Company of the Misericordia, which in that city accompanies those condemned to death ... there once came into his head, being sacristan at that time, the strangest caprice in the world. One night he took out of the grave the body of one who had been hanged the day before; and, after having dissected it for the purposes of his art, being a whimsical fellow, and perhaps a wizard, and ready to believe in enchantments and suchlike follies, he flayed it completely, and with the skin, prepared after a method that he had been taught, he made a jerkin, which he wore for some time over his shirt, believing that it had some great virtue, without anyone ever knowing of it. But having once been upbraided by a good Father to whom he had confessed the matter, he pulled off the jerkin and laid it to rest in a grave, as the monk had urged him to do.']

[4_1].[在这一部分，瑞士路德教会中产阶级的心声表露是最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牢记布克哈特对于罗马教皇历史的观点和兰克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由牧师路德维希所创作的《教皇的历史》这本书取材于梵蒂冈的档案馆，这本书直到1886年才问世。其英文版本出现于1891年；这本书一共有40卷，前十卷或前十二卷都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情。D·海的《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教堂》一书于1977年在剑桥出版，是关于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书中还抨击了布克哈特和帕斯托尔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异教崇拜的不同意见。]

[4_2].参见他的日志摘录，德拉克鲁兹：《佛罗伦萨及其兴衰》第2卷。（布纳科尔索·彼蒂的《日志》已经被翻译收录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两个回忆录：布纳科尔索·彼蒂和格雷戈里奥·达蒂》，G·布鲁克，纽约，1967。）

[4_3].如果曾经他作为海盗出现在安茹两个家族争夺那不勒斯的战争之中，那么他很有可能以一个政治党派人士的身份这样做过。在现在看来，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耻辱之事。热那亚的保罗·弗雷哥索大教主在十五世纪后半叶大概肆意妄为地做了一样多或者甚至更多的此类事情。（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1410-1415，确实是一个海盗。他于1415年被废黜，由正统的马丁五世接替其位，他也因自己辉煌壮丽的坟墓而被后人铭记。由多那太罗和米开罗佐创作于佛罗伦萨洗礼堂。）

[4_4].意大利文作L'Ordine，意思大概是指上面写有“耶稣、人类的救世主”之类题词的碑。

[4_5].《回忆录》，第28号，《未刊作品集》，第1卷中。

[4_6].培兰斯：《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两卷集。这里大概是关于这个主题的许多著作中最有系统性、最严谨的一本书。维拉利：《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共两卷，八开本，佛罗伦萨，勒摩尼埃版）后一作者所持的观点和原书作者所持的观点纵然是不相同的。也可以参考兰克在《历史传记研究》（莱比锡，1878，181-358页）一书中的记述。关于吉纳扎诺，见维兰尼，第一卷，第57页；第二卷，第343页。拉蒙特《洛伦佐》，第2卷，第522-526页。

[4_7].我们应该将意大利人对近代历史上的圣徒遗骸的崇拜同北方所盛行的对神圣的古代遗骸和遗物等的崇拜搜集起来进行更深一步的对比。在罗马拉特兰教堂里，收藏着许多这样的遗物，因为它受到了朝圣者特别的重视。但是在帕多瓦的圣徒多米尼克和圣徒安东尼的坟墓上，不仅笼罩着神圣的荣光，而且还映着历史的美名。[这两个圣迹都是艺术作品：圣多米尼克的圣迹，位于博洛尼亚地区，由尼古拉·皮萨诺设计，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团体执行完成的。另外，米开朗基罗也帮助完成它。圣安东尼的长方形会堂位于帕多瓦（圣像II），建造于1232-1307年，包括他位于一个小教堂中的坟墓，建造于1500-1546；主祭坛由意大利雕刻家多那太罗设计，目前还处于原型。]

[4_8].不管怎么样当时的视觉艺术是对天使和带翅童子假意区别的，前者用于所有庄重的目的。在《埃斯特年代记》（见穆拉托里，第22卷，第468栏中，恋爱之神被天真烂漫地称为“丘比特爱神般的天使”。）

[4_9].[这幅画展现了纳粹党卫军马克、乔治以及尼古拉斯从由恶魔兴起的海上风暴中拯救威尼斯的场景，瓦萨里最初认为这幅画是由乔尔乔涅创作的，后来他又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又认为是帕尔马·韦基奥创作的。现在的观点不再认为这幅画是由乔尔乔涅创作的，究竟是帕尔马还是帕里斯·博尔多纳创作的这幅画，还不是很确定，为了弄清楚事实的真相，在1955年开始着手进行研究。以前是在学院美术馆，现在是在威尼斯的奇维莱图书馆。]

[4_10].本文努托·切利尼，第1卷，第64章。（这一段故事见本文努托·切利尼的自

传中，由G·布尔所译，企鹅出版社，1956年。 ）

[4_11].瓦萨里，《安德烈·费埃苏来传》，第8卷，第143页。希尔维奥·科西尼就是那种追求法术咒语等荒唐愚蠢事情的人。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英国工业革命演讲稿

Arnold Toynbee

阿诺德·汤因比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英国工业革命演讲稿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阿诺德·汤因比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Chapter I Introductory 第一章　导言
- Chapter II England in 1760 Population 第二章　1760年的英国人口
- Chapter III England in 1760 Agriculture 第三章　1760年的英国农业
- Chapter IV England in 1760 Manufactures and Trade 第四章　1760年的英国制造业与贸易
- Chapter V England in 1760 the Decay of the Yeomanry 第五章　1760年英国自耕农的没落
- Chapter VI England in 1760 The Condition of the Wage-Earners 第六章　1760年英国雇佣工人的生活状况
- Chapter VII The Mercantile System and Adam Smith 第七章　重商主义与亚当·斯密
- Chapter VIII The Chief Features of the Revolution 第八章　产业革命的最主要特征
- Chapter IX The Growth of Pauperism 第九章　贫困的扩大
- Chapter X Malthus and the Law of Population 第十章　马尔萨斯及其人口论
- Chapter XI The Wage-Fund Theory 第十一章　工资基金理论
- Chapter XII Ricardo and the Growth of Rent 第十二章　李嘉图和地租增长
- Chapter XIII Two Theories of Economic Progress 第十三章　经济进步的两种理论

- Chapter XIV The Fu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es 第十四章　工人阶级的前景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Chapter I Introductory

第一章　导言

The subject of these lectures is the Industrial and Agrarian Rev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and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 cours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deals with Adam Smith and the England of his time. It will describe England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system of regula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dustry as it existed in 1760. It will give also an outline of Adam Smith's book, its aims and character, and especially his theory of free trade. The second part will group itself round the work of Malthus, who dealt not so much with the causes of wealth as with the causes of poverty,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rather than with its production. It will describe England in the mids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will inquire into the problem of pauperism and the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it. The third part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the name of Ricardo, and will deal with England at the time of the Peace. It will discuss the doctrine of rent and wages together with certain theories of economic progress, and will cover the questions of currency, so much agitated at that period,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anges which followed the Peace.

本讲稿阐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亚当·斯密及当时背景下的英国。本部分将描述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和1760年形成的工业管理和保护制度。此外还将简要介绍亚当·斯密的著作及其主旨和特点，特别是他的自由贸易理论。第二部分围绕马尔萨斯的研究进行论述。相比财富的根源

和产生，他更多地探讨了贫困的根源和财富的分配。这一部分将描写工业革命中的英国，探讨贫困及与之相关的话题。第三部分论及经济学家李嘉图，并将介绍和平时期的英国。这一部分将讨论地租和工资学说以及几个经济发展理论，此外还会讲述和平时期备受争议的货币问题以及后和平时期商业和金融的变革。

I have chosen the subject because it was in this period that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took its rise. It has been a weakness of the science, as pursued in England, that it has been too much dissociated from History. Adam Smith and Malthus, indeed, had historical minds; but the form of modern text-books is due to Ricardo, whose mind was entirely unhistorical. Yet there is a double advantage in combining the two studies. In the first place Political Economy is better understood by this means. Abstract propositions are seen in a new light when studied in relation to the facts which were before the writer at the time when he formulated them. So regarded they are at once more vivid and less likely to mislead. Ricardo becomes painfully interesting when we read the history of his time.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history also is better understood when studied in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Economy; for the latter not only teaches us in reading history to look out for the right kind of facts, but enables us to explain many phenomena like those atten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enclosures and machinery, or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ystems of currency, which without its assistance would remain unintelligible. The careful deductive reasoning, too, which Political Economy teach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historian, and the habits of mind acquired from it are even more valuable than the knowledge of principles which it gives, especially to students of facts, who might otherwise be overwhelmed by the mass of their materials.

我选择这一主题是因为现代政治经济学正是兴起于这个时期。英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一直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历史，这始终是其一大缺陷。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确具有历史思维，相比之下，李嘉图则与其恰恰相反，即便现代经济学教材的诞生要归功于他。然而，将二者思想进行整合的方法具有双重优势。首先，我们可以借此更好地理解政治经济学。若能结合命题提出之前所发生的历史事实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命题，便可以新的视角考量这些命题。由此，这些命题不但更加鲜明，而且不易产生误导。我们如果研读李嘉图时代的历史，会发现他的理论虽然费力难懂，但却饶有趣味。第二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可以更好地解读历史。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不仅指引我们在阅读历史时关注合适的历史事实，而且也帮助我们解释诸多历史现象，譬如圈地运动和机器作业的兴起，以及不同货币体系所产生的影响，如不借助政治经济学，这些现象都难以理解。政治经济学中严谨的演绎推理对于历史学者也十分重要，历史学者从中得到的思维习惯远比从中获得的经济学原理知识有价值得多，特别是对于探究事实的历史学者而言，尤其如此，否则的话由于历史材料浩如烟海，他们可能会不知所措。

Of late year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a steady sustained attack upon the abstract Deductive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pursued by Ricardo and Mill, and an attempt to set up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in its place as the only true method of economic inquiry. This attack rests on a misconception of the function of the Deductive Method. The best exposition of the place of Abstract Political Economy is to be found in Bagehot'sEconomic Studies. Bagehot points out that this abstract science holds good only upon certain assumptions, but though the assumptions are often not entirely correct, the results may yet be approximately true. Thus the economists, firstly, regard only one part of man's nature, and treat him simply as a money-making animal; secondly, they disregard the influence of custom, and only take account of competition. Certain

laws are laid down under these assumptions; as, for instance, that the rate of wages always tends to an equality, the permanent difference obtaining in various employments being only sufficient to balance the favourable or un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attending each of them-a law which is only true after a certain stage of civilization and in so far as the acquisition of wealth is the sole object of men. Such hypothetical laws, though leading only to rough conclusions, are yet useful in giving us a point of view from which to observe and indicate the existence of strong over-mastering tendencies. Advocates of the Historical Method, like Mr. Cliffe Leslie, therefore, go too far when they condemn the Deductive Method as radically false. There is no real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apparent opposition is due to a wrong use of deduction; to a neglect on the part of those employing it to examine closely their assumptions and to bring their conclusions to the test of fact; to arguments based on premises which are not only not verified but absolutely untrue (as in the wage-fund theory); and generally to the failure to combine induction with deduction. But this misuse of the method does not imply any radical faultiness in it. The right method in any particular case must be largely determined by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Neither is it fair to make abstract Political Economy responsible for the confusion in many minds between its laws and the precepts which are based on them. It is a pure science, and its end is knowledge. Bu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ress and the platform is a practical science, that is, a body of rules and maxims to guide conduct. Journalists and members of Parliament confound the laws of the pure science with the maxims of the practical science. It was thus that Mr. Gladstone in the Land Act controversy of 1881 was constantly accused of violating the laws of Political Economy. It was impossible for Mr. Gladstone to do any such thing. The laws of Political Economy can no more be violated than those of physical science. What the

journalists meant was that he had departed from a great economic precept - that which recommends freedom of contract.

然而近年来，李嘉图和穆勒政治经济学中的抽象演绎法不断受到抨击，不断有人试图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取而代之，认为历史学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这种抨击在于对演绎法功能有所曲解。白哲特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对抽象政治经济学所处的地位做出了最好的阐释。他指出，政治经济学这一抽象的科学只有依据特定假设才能够成立，虽然这些假设通常不够准确，其推论却仍可能近似为真。因此，首先，经济学家只关注人性的一个方面，仅仅把人看作赚钱的动物。其次，他们没有将习惯的影响考虑在内，而只是考虑竞争，一些定律就是在这些假设之下建立起来的。比如，假设工资率总是趋于持平，不同雇佣关系间存在永久性差异，但仅仅足以平衡其各自的有利或不利条件。但是仅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且获得财富是人的唯一目标的条件下这一定律才会成立。虽然这些假想定律只能推导出粗略的结论，但仍会提供给我们一种视角，让我们能看到这一强大而不可扭转的趋势，表明这一趋势的存在。所以，历史探究法的拥护者，如克利夫·莱斯利先生（CliffeLeslie），全盘否定演绎法，这是极不应当的。这两种探究方法并不对立，其间明显的冲突是由于人们对演绎法的误用；由于人们在运用演绎法发挥严格验证假设、使其结论接受事实检验的作用；并且由于其立论根基未经验证且绝不实际（如工资基金理论）；总地来说，就是由于没有把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起来。然而对演绎法的误用无法说明其中存在根本的缺陷。对于任一特定问题，正确的研究方法势必主要取决于问题本身的特性。很多人在政治经济学法律及通用规则之间产生了混淆，而又将这归咎于政治经济学抽象法，这也是不公平的。它是一门纯粹的科学，以知识为其终端。但媒体和政坛中的政治经济学是实践科学，换言之，是由法则和原理来指导实践的体系。新闻记者和议会议员在纯粹科学的各种法则与实践科学的各种法则之间产生了混淆。正因为此，格莱斯顿（Gladstone）1881年颁布的土地法令一直被指违反了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而这是格莱斯顿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自然科

学法则一样都是无法违背的。媒体意指格莱斯顿偏离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定律，即承认契约自由的定律。

The Historical Method pursues a different line of investigation. It examines the actual cau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iders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medieval guilds, our present land-laws, or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of any given country, in determi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Without the aid of the Historical Method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instance, to understand why one-half of the land in the United Kingdom is owned by 2512 persons.

历史研究方法则追寻截然不同的研究途径。在决定财富分配的过程中，历史的研究方法审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会考虑制度的影响，如中世纪的行会、现行的土地法或某一国家的政治法规。如果不借助历史的研究方法，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有些问题，比如英国的半数土地为何只为2512人所有。

And not only does it investigate the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given country, but it compares them with those which have obtained in other countries and times, and seeks by such comparison to discover laws of universal application. Take, as an instance of the discoveries of th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the tendency which Sir H. Maine and M. de Laveleye have pointed out to pass from collective to individual ownership of land. This is a law which is true of nearly all civilised countries. We must be careful, however, not to generalise too hastily in these matters. A clever pamphlet lately published in Dublin appeals to another generalisation of Sir H. Maine—“Maine's Law” as it is

denominated—in condemnation of recent legislation. “Sir H. Maine,” says the writer, “in his Ancient Law has remarked that the movement of all progressive societies has hitherto been a movement from status to contract. The demand of this agitation is that Ireland should be legislatively declared a retrograde society, and that the social movement should be from contract back again to status.” “Is it expedient,” asks another, “to reform our laws so as to assimilate them to those in use among nations of an inferior social development?” A deeper study of existing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and of other civilisations, past and present, would have shown that the step was not a retrograde one—that whilst the sphere of contract has been widening, it has been also narrowing, and that such a condition of things as we see in Ireland has never existed anywhere else without deep social misery, outrage, and disturbance. Custom or law or public opinion, or all three, have intervened in the past, and will intervene in the future. It is true that there is a movement from status to contract; yet if we look closely, we find that the State has over and over again had to interfere to restrict the power of individuals in which this movement results. The real course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first from status to contract, then from contract to a new kind of status determined by the law or, in other words, from unregulated to regulated contract. The Historical Method is also of value because it makes us see where economic laws and precepts are relative. The old economists were wont to speak as if these laws and precepts were universal. Free trade, for instance, is a sound policy, no doubt, for England, and for all nations at a certain stage of development; but it is open to anyone to say that free trade is only good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No English economist, it is true, has dared to say this. Mr. Jevons, to take an example, would admit restrictions only for considerations of the most paramount importance. But it is an unjustifiable prejudgment of the question to lay down that this

policy must be wise at all times and places. I do not mean to assert, however, that there are not some laws which are universally true, such as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历史探究法不仅研究某一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此外还要与其他国家其他时期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比较，从中探求可以普遍适用的原理。以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现来举例说明，亨利·梅恩（SirH. Maine）爵士和埃米尔·德·拉维勒耶（M. deLaveleye）指出，土地所有制的转变是集体所有到个人所有的转变。这一规律几乎适用于所有文明国家。但我们看待此问题要谨慎，不可轻率做出结论。最近都柏林出版了一本言辞精妙的小册子，书中引用了梅恩的另一个归纳法则（书中称之为梅恩法则）以批评近期的立法。其作者写道，“梅恩在他的《古代法》中指出，到此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一煽动性的论点要求爱尔兰在立法上承认其社会的倒退，承认其社会的运动是由契约退回到身份的运动。”而另有观点质问，“改革我们的法律，使之类同于其他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这到底是否有益？”深入研究现在的英国文明与他国文明，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我们都不难发现这一进程并不是倒退——契约范围开始扩大，在另一方面它也在缩小；此外，爱尔兰如今的局面是其他任何国家都要经历深重的社会灾难、暴行、骚乱才可以实现的。习惯、法律或公众舆论，抑或这三者同时对过去产生了干预，并也将对未来产生干预。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是真确的，但如果我们仔细审查就会发现，政府也需不断干预由这种运动所导致的个体权力。真正的社会进程首先是由身份到契约，然后由契约到法律规定新形式的身份关系；或者说，由没有规定的契约到有规定的契约。历史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看到经济学法律及通用规则之间是怎样相关的，因此历史研究方法也是极有价值的。从旧派经济学家的言论来看，似乎经济学法律及通用规则都是普遍适用的。例如自由贸易，毫无疑问它对于英国，或者所有国家的某一特定阶段而言都是一项有利政策，但我们都知道，自由贸易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才适用。但其实并没有一个英国经济学家这样讲过，比如杰文斯也只是承认重大交易中才需限制自由贸

易。但断言这一政策适用于任何时期任何地区，却是对这一问题的非理性判断。不过，我并不否认存在普遍适用的法则，比如报酬递减律。

This discussion about method may seem barren, but it is not really so. Take such a question as the functions of the State. Mr. Senior spent much time in attempting to discover a universal formula which should define their proper limit all the world over. Such an attempt must be abandoned. The proper limits of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are relative to the nature of each particular state and the stage of its civilization. It is a matter of great importance at the present day for us to discover what these limits are in our own case, for administration bids fair to claim a large share of our attention in the future. It would be well if, in studying the past, we could always bear in mind the problems of the present, and go to that past to seek large views of what is of lasting importance to the human race. It is an old complaint that histories leave out of sight those vital questions which are connected with the condition of the people. The French Revolution has indeed profoundly modified our views of history, but much still remains to be done in that direction. If I could persuade some of those present to study Economic History, to follow out the impulse originally given by Malthus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mass of the people, I should be indeed glad. Party historians go to the past for party purposes; they seek to read into the past the controversies of the present. You must pursue facts for their own sake, but penetrated with a vivid sense of the problems of your own time. This is not a principle of perversion, but a principle of selection. You must have some principle of selection, and you could not have a better one than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 problems which are agitating the world now, for you may

be sure that they are problems not of temporary but of lasting importance.

这场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表面上毫无结果，但其实则不然。以国家职能为例，西尼尔先生（Senior）苦心研究，试图找出一个普遍公式来确定国家职能的适当界限，使之适用于世界各国。这样的尝试是无益的。政府干预的适当界限应取决于国家的政情及其文明发展阶段。就目前的英国而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界限，因为今后行政问题有望更为我们所关注。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也应始终带着今天的问题，并在历史长河中寻找对人类具有永久重要性的广泛观点。过去总有这样的抱怨，即历史无法覆盖与人类现状有关的重要问题，法国革命虽已深刻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但在这一方向上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果我能说服在座的一些人去研究经济史，去追寻由马尔萨斯激发出的热情，去研究广大民众的历史，那么我将甚感欣慰。有些历史学者具有派别趋向，他们在研究中怀有党派目的，试图在历史中曲解今天的争论。但是诸位在研究历史时要实事求是，带着清醒的识别力来解析本时代的问题。你们所需要的不是歪曲原则，而是选择原则。你必须掌握一些选择原则，在困扰当今世界的社会问题面前，除了对这些问题的历史加以特别注意以外，并没有有更好的办法，因为你要知道这些问题并不只是一时重要，其重要性是一直存在的。

Chapter II England in 1760 Population

第二章　1760年的英国人口

Previously to 1760 the old industrial system obtained in England; none of the great mechanical inventions had been introduced; the agrarian changes were still in the future. It is this industrial England which we have to contrast with the industrial England of to-day. For determining the population of the time we have no accurate materials. There are no official returns before 1801. A census had been proposed in 1753, but rejected as “subversive of the last remains of English liberty”. In this absence of trustworthy data all sorts of wild estimates were formed. During the American War a great controversy raged on this subject. Dr Price, an advocate of the Sinking Fund, maintained that population had in the interval between 1690 and 1777 declined from 6,596,075 to 4,763,670. On the other hand, Mr. Howlett, Vicar of Dunmow, in Essex, estimated the population in 1780 at 8,691,000, and Arthur Young, in 1770, at 8,500,000 on the lowest estimate. These, however, are the extremes in either direction. The computations now most generally accepted are those made by Mr. Finlaison (Actuary to the National Debt Office), and published in the Preface to the Census Returns of 1831. These are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gisters of baptisms and burial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ut the data are deficient in three respects: because the number of people existing at the date when the computation begins is a matter of conjecture; because in some parishes there were no registers; and because the registration, being voluntary, was incomplete. Mr. Finlaison, however, is stated to have subjected his materials to “every test suggested by the present comparatively advanced state

of physical and statistical science.”

1760年以前，英国还属于旧的工业体系，伟大的机械发明还未得到引进，农业方面也同样有待改革。现在我们把当时工业英国和今天来做比较。我们没有切实可靠的材料说明当时的人口状况，因为1801年以前并无官方的人口报告。1753年曾有人口普查的提案，但因被指“颠覆了英国最后残留的自由”而遭否决。在缺乏可靠数据的情况下，各种估测纷纷出现，其中一场大的争论就发生在美国战争时期。普赖斯博士（DrPrice）是偿债基金制的拥护者，他认为从1690年到1777年间，英国人口从659.6075万减少到476.3670万；据埃塞克斯郡邓莫教区的牧师（VicarofDunmow）豪利特先生（Mr. Howlett）估算，1780年的人口应为869.1万；而阿瑟·杨格估算1770年的人口至少为850万。但这些估测都太过极端。现在人们普遍接受的是英国国家债务办公室的统计师芬利森先生（Mr. Finlaison）的估测数据，这发表于《1831年人口报告》的序言部分，是根据十八世纪教会洗礼和葬礼的记录得出的。但此数据有三个方面缺乏严谨：一，人口的推算是在猜测基础之上的；二，有些教区并无登记政策；三，由于登记政策不是强制性的，所以登记并不完全。但芬利森先生自称，他的数据是能经得起当前较先进的物理学和统计学检验的。

Now according to Mr. Finlaison,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 and Wales was, in 1700, 5,134,516, in 1750, 6,039,684, an increase of not quite a million, or between 17 and 18 per c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in 1801,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 and Wales was 9,187,176, showing an increase of three millions, or more than 52 per centin the second half 18. The difference in the rate of increase is significant of the great contrast presented by the two periods. In the former, England, though rapidly increasing in wealth owing to her extended commercial relations, yet retained her old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the latter is the age of transition to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to improved methods of agriculture.

据他的估算，在18世纪上半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在1700年时为513.4516万，1750年时为603.9684万，增长了近100万，增幅介于17%至18%之间。到18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增至918.7176万，增长了300万。这就是说，人口在18世纪下半叶的增长超过了52%。这两个时期的增幅对比显示出人口增长幅度的极大变化。在前一时期，英格兰通过扩大商业关系而使财富急速增加，但是旧的工业格局仍在延续；在后一时期，旧的工业体系向现代工业体系转化，农业技术也得到了改良。

The next point to consider is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 great difference will be found here between the state of thing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r in Adam Smith'stime, and that prevailing now. Everyone remembers Macaulay's famous description in the beginning of his history of the desolate condition of the northern counties. His picture is borne out by Defoe, who, in his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1725), remarks: “The country south of Trent is by far the largest, as well as the richest and most populous,” though the great cities were rivalled by those of the north. If we consider as the counties north of Trent Northumberland, Durham, Yorkshire, Cumberland, Westmoreland, Lancashire, Cheshire, Derbyshire, Nottinghamshire, and Staffordshire (about one-third of the total area of England), we shall find on examination that in 1700 they contained about one-fourth of the population,10 and in 1750 less than one-third, while in 1881, they contained more than two-fifths; or, taking only the six northern counties, we find that in 1700 their population was under one-fifth of that of all England, in 1750 it was about one-fifth, in 1881 it was all but one-third.

下面我们来看人口的分布情况。十八世纪初，亚当·斯密时期与现在的人口分布之间有极大的差别。我们都记得麦考利（Macaulay）在他的历史研究中一开始就对北方的荒凉状况有著名的描述。笛福在他的《大不列颠全岛游记》（1725）中提到了这一描述，并说道："英国特伦特以南是目前最大的地区，也是最富裕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但一些北方城市并不示弱。如果我们把诺森伯兰郡、达勒姆郡、约克郡、坎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兰开夏郡、柴郡、德比郡、诺丁汉郡、斯塔福德郡（这些地区占到英格兰全部面积的三分之一）作为特伦特以北的地区，经过验证我们发现，1700年时这些地区占英格兰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1750年时占到接近三分之一，到1881年已经超过五分之二；或者只以六个北方郡来说，1700年其人口占英格兰总人口的比例低于五分之一，1750年时达到五分之一，到1881年则已达到几乎三分之一。

In 1700 the most thickly peopled counties (excluding the metropolitan counties of Middlesex and Surrey) were Gloucestershire, Somerset, and Wilts, the manufacturing districts of the west; Worcestershire and Northamptonshire, the seats of the Midland manufactures; and the agriculture counties of Herts and Bucks—all of them being south of the Trent. Between 1700 and 1750 the greatest increase of population took place in the following counties:

1700年人口最密集的郡（除米德尔塞克斯郡和萨里郡这两个都城之外）为：位于西部工业区的格洛斯特郡、萨默塞特郡和威尔特郡；位于中部工业区的伍斯特郡和北安普敦郡；位于农业区的赫特福德郡和巴克斯郡——所有这些都在特伦特以南。从1700年到1750年，人口增幅最大的地区为以下各郡：

[illegible]	56,000	70,000	75
[illegible]	236,700	361,500	52
[illegible]			
[illegible]	95,000	135,000	70
[illegible]	117,200	160,000	36
[illegible]	155,200	240,800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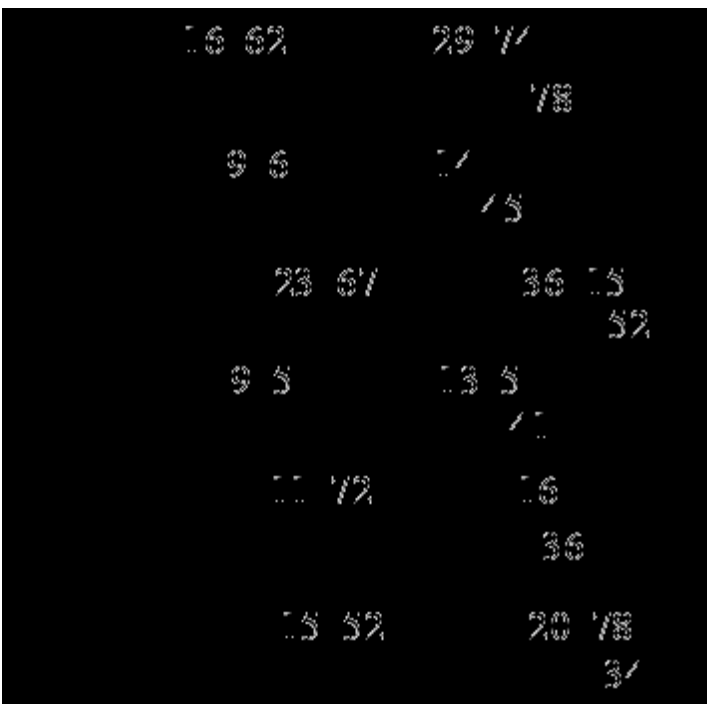

Cornwall, Kent, Berks, Herts, Worcestershire, Salop, Cheshire, Northumberland, Cumberland, and Westmoreland each increased upwards of 20 per cent.

康沃尔郡、肯特郡、伯克郡、赫特福德郡、伍斯特郡、萨洛普郡、柴郡、诺森伯兰郡、坎伯兰郡和威斯特摩兰郡增长均超过20%。

The chang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betwe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Adam Smith's time, and again between his time and our own, may be further illustrated by the following table. The twelve most densely populated counties and their density to the square mile were:

十八世纪初到亚当·斯密时期再到今天的人口分布变化可由下表进一步表明。十二个人口最密集的郡及其单位面积（平方英里）人口密度为：

1700		1750		1801	
Middlesex	2221	Middlesex	2283	Middlesex	10,381
Surrey	287	Surrey	276	Surrey	1,919
Gloucester	123	Warwick	159	Lancashire	1,813
Nottingham	121	Gloucester	157	Durham	891
Somerset	119	Lancashire	156	Stafford	862
Worcester	119	Worcester	148	Warwick	825
Devon	115	Devon	141	West Riding	815
Wilts	113	Stafford	140	Kent	600
Bucks	110	Durham	138	Cheshire	582
Rutland	110	Somerset	137	Worcester	515
Warwick	109	West Riding	135	Nottingham	475
Oxford	107	Berks	131	Gloucester	455

1700 年		1750 年		1881 年	
米德尔塞克斯郡	2221	米德尔塞克斯郡	2283	米德尔塞克斯	10, 387
萨里郡	207	萨里郡	276	萨里郡	1, 919
格洛斯特郡	123	沃里克郡	159	兰开夏郡	1, 813
北安普顿郡	121	格洛斯特郡	157	达勒姆郡	891
萨默塞特郡	119	兰开夏郡	156	斯塔福德郡	862
伍斯特郡	119	伍斯特郡	148	沃里克郡	825
赫特福德郡	115	赫特福德郡	141	约克郡西区	815
威尔特郡	113	斯塔福德郡	140	肯特郡	600
巴克斯郡	110	达勒姆郡	138	柴郡	825
拉特兰郡	110	萨默塞特郡	137	伍斯特郡	515
沃里克郡	109	约克郡西区	135	诺丁汉郡	475
牛津郡	107	伯克郡	131	格洛斯特郡	455

The most suggestive fact in the period between 1700 and 1750 is the great increase in the Lancashire and the West Riding, the seats of the cotton and coarse woollen manufactures. Staffordshire and Warwickshire, with their potteries and hardware, had also largely grown. So had the two northern counties of Durham and Northumberland, with their coalfields. The West of England woollen districts of Somerset, and Wilts, on the other hand, though they had grown also, showed nothing like so great an increase. The population of the eastern counties Norfolk, Suffolk, and Essex, had increased very little; though Norwich was still a large manufacturing town, and there were many smaller towns engaged in the woollen trade scattered throughout Norfolk and Suffolk. Among the few agricultural counties which showed a decided increase during this period was Kent, the best farmed county in England at that time.

从1700年到1750年间，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是兰开夏郡和约克郡西区的人口大幅增长，这两个郡是棉纺织业和粗毛纺业所在地。在斯塔福德郡和沃里克郡，由于陶制品产业和五金产业的发展，其人口也大幅增长；北部的达勒姆郡和诺森伯兰郡由于其煤田产业，人口也表现出同样的变化。但是另一方面，在英格兰西部，羊毛产区萨默塞特郡和威尔特郡尽管也有增长，但其增幅并不很大。东部各郡，如诺福克、萨福克、埃塞克斯，其人口则增长极小；即便诺里奇那时是一个大型制造县区，并有很多较小的县城也加入到分散在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的羊毛贸易中来。在这一时期，人口出现显著增长的少数几个农业郡还包括肯特郡，这是当时英格兰最发达的农业郡。

If we turn to the principal towns we shall find in many of them an extraordinary growth between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time of Adam Smith. While the population of

Norwich had only increased, according to the best authority, by about one-third, and that of Worcester by one-half, the population of Sheffield had increased seven-fold, that of Liverpool ten-fold, of Manchester five-fold, of Birmingham seven-fold, of Bristol more than three-fold.The latter was still the second city in the kingdom. Newcastle (including Gateshead and North and South Shields) numbered 40,000 people.

我们来看这些主要城镇，从十七世纪末到亚当·斯密时期，其中很多城镇的人口显示出显著的增长。根据最权威机构的数据，诺里奇人口仅增长了三分之一，而伍斯特增长了二分之一，谢菲尔德增长了7倍，利物浦增长了10倍，曼彻斯特增长了5倍，伯明翰增长了7倍，布里斯托尔（当时还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增长超过3倍。纽卡斯尔（包括盖茨黑德和南北希尔兹）达到4万人口。

The following are the estimates of population for 1685, 1760, and 1881 in twelve great provincial towns—

下表是十二个行政地区1685年、1760年及1881年的估算人口。

	1685a	1760	1881g
Liverpool	4,000	40,000c	
		30-35,000d	552,425
		34,000e	
Manchester	6,000	30,000c	393,676
		40-45,000d	
Birmingham	4,000	28,000b	400,757
		30,000d	
Leeds	2,000	—	309,126
Sheffield	4,000	30,000c	284,410
		20,000d	
Bristol	29,000	100,000d	206,503
Nottingham	8,000	17,000f	111,631
Norwich	28,000	40,000c	87,845
		60,000d	
Hull	—	20,000c	161,519
		24,000d	
York	10,000	—	59,596
Exeter	10,000	—	47,098
Worcester	8,000	11-12,000c	40,422

	1685(a)	1760	1881(g)
利物浦	4,000	40,000(c)	
		30−35,000(d)	552,425
		34,000(e)	
曼彻斯特	6,000	30,000(c)	393,676
		40−45,000(d)	
伯明翰	4,000	28,000(b)	400,757
		30,000(d)	
利兹	2,000	−	309,126
设菲尔德	4,000	30,000(c)	284,410
		20,000(d)	
布里斯托尔	29,000	100,000(d)	206,503
诺丁汉	8,000	17,000(f)	111,631
诺维奇	28,000	40,000(c)	87,845
		60,000(d)	
赫尔	−	20,000(c)	161,519
		24,000(d)	
约克	10,000	−	59,596
埃克塞特	10,000	−	47,098
伍斯特	8,000	11−12,000(c)	40,422

a．Macaulay's History of England c. 3.

a．麦考利著《英国史》c.3.

b．Defoe's Tour (1725)

b．笛福著《大不列颠全岛游记》（1725）

c．Arthur Young (1769)

c．阿瑟·杨格（1769）

d．Macpherson's Annals of Commerce (1769)

d．麦克弗森著《商业史》（1769）

e．Levi's History of British Commerce

e．列维著《英国商业史》

f．Eden's State of the Poor (1797)

f．伊登著《贫困状况报告》（1797）

g . The Returns for 1881 are those of the parliamentary district.

g . 1881年的人口报告（议员选举区的统计数据）

Another point to be considered is the relation of rural to urban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Gregory King, writing in 1696, London contained 530,000 inhabitants, other cities and market-towns, 870,000, while villages and hamlets numbered 4,100,000. Arthur Young, seventy years later, calculated that London contained one-sixth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and remarked that, “in flourishing countries,” as England, “the half of a nation is found in towns.” Both estimates are very unreliable,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both, and especially that of Arthur Young, overestimate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population, bu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m justly indicates the tendency of towns even then to grow out of proportion to the rural districts. That disproportion has, of course, become even more marked since Arthur Young's day. In 1881 the total urban population was 17,285,026, or 66.6 per cent, while the rural was 8,683,026, or 33.3 per cent.

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城市和乡村的人口比例。根据格列高利·金（GregoryKing）1696年的统计，伦敦居民为53万，其他城市和集镇居民为87万，农村居民为410万。但七十年后，阿瑟·杨格推算伦敦拥有当时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他说，如英格兰这样的“繁荣国家，其半数人口都在城市”。但这两种判断都不可靠，特别是阿瑟·杨格，他对人口总数的估计是偏高的。但这两者的对比恰恰显示了城镇与农村人口增长不成比例的趋势。这一失衡状况从阿瑟·杨格时期开始变得更加明显。1881年城市总人口为1728.5026万，占66.6％，农村人口

868.3026万，占33.3%。

The only estimates of occupations with which I am acquainted are again those of Gregory King in 1696, and Arthur Young in 1769. They are too vague, and too inconsistent with one another, to be relied on, but I give them for what they are worth.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freeholders and their families numbered 940,000, farmers and their families, 750,000, labouring people and out servants, 1,275,000, cottagers and paupers, 1,300,000; making a total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of 4,265,000, against only 240,000 artisans and handicraftsmen. Arthur Young estimates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classes as follows:—

我了解到的估算人口比例仍然只有格列高利·金1696年和阿瑟·杨格1769年的数据。这两者都很不精确，相互之间很不一致，因此并不能当作依据，但我还是把其原始数据展示给大家。根据格列高利·金的数据，世袭地产所有者及其家族人口为94万，农民及其家族人口75万，劳工及外出佣工人口127.5万，佃农及贫民人口130万，其共组成农业人口426.5万，而技工和手工业者仅为24万。而阿瑟·杨格估算的各阶层人口如下：

Farmers (whether freeholders or leaseholders),

农业从业者（包括地产所有者及租赁人）

Their servants and labourers……2,800,000

及其雇工与劳工……2,800,000

Manufacturers of all kinds……3,000,000

各类制造业者……3,000,000

Landlords and their dependents, fishermen and miners…800,000

地主及其从属者、渔民、矿工……800,000

Persons engaged in commerce……..200,000

商人……200,000

Non-industrious poor…….500,000

无业贫困人群……..500,000

Clergy and lawyers……200,000

牧师、律师…….200,000

Civil servants, army and navy……..500,000

公务人员、陆军、海军……500,000

Total……8,500,000

总计……8,500,000

But the number set down to manufactures here is probably as much too high. In proportion to the total population, as the total itself is in excess of the fact.

但在此处，制造业者人数占总人口数比例可能过高，虽然总人口数同样超出实际。

Chapter III England in 1760 Agriculture

第三章　1760年的英国农业

In describing the agriculture of the time the first point of importance is the proportion of cultivated land to waste. Gregory King, who rather overestimated the total acreage of England and Wales, put the arable land at 11,000,000 acres, pasture and meadow at 10,000,000, houses, gardens, orchards, etc., at 1,000,000, being a total of 22,000,000 acres of cultivated land, or nearly three-fifths of the whole country. A land-agent in 1727 believed one-half of the country to be waste. Arthur Young, writing fifty years later, puts the cultivated area at a much higher figure. Estimating the total acreage of England alone at 54,000,000 acres, he considered that 52,000,000 of these were in arable and pasture, in equal proportions.

要描述当时的农业，最重要的一点是耕地与荒地面积比例。格列高利·金（GregoryKing）过高估计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土地面积，认为可耕面积为1100万英亩，牧场和草场面积为1000万英亩，房屋、花园、果园等为100万英亩，这些共组成耕地面积2200万英亩，近似等于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三。1727年一位地产商人认为全国半数的土地都是荒地。阿瑟·杨格在其写于五十年后的文章中提到的估算数字远远高于当初。他估算英格兰的面积为5400万英亩，其中5200万英亩为耕地和牧场，二者各占一半比例。

One or other of the two first-mentioned estimates is certainly nearer the truth than the last. The exact proportion is, however,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显然前两个估算数字都比杨格的估算更接近真实值，然而确切的可耕地与荒地比例是不可能确定的。

There is no respect in which the agricultural England of today differs more from that of the period which we are considering, than in the greatly reduced amount of common land. The enclosure of commons had been going on for centuries before 1760, but with nothing like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it has been going on since, it is known that 554,974 acres were enclosed between 1710 and 1760, while nearly 7,000,000 were enclosed between 1760 and 1845.4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atter period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is land, since enclosed, was under the primitive tillage of the common-fields. Throughout considerable districts the agrarian system of the middle ages still existed in full force. Some parishes had no common or waste lands belonging to them, but where common lands were cultivated, one and the same plan was generally pursued. The arable land of each village was divided into three great stripes subdivided by “baulks” three yards wide. Every farmer would own at least one piece of land in each field, and all were bound to follow the customary tillage. One strip was left fallow every year; on the other two were grown wheat and barley; sometimes oats, pease, or tares were substituted for the latter. The meadows were also held in common. Up to hay harvest, indeed, every man had his own plot, but, while in the arable land the plots rarely changed hands, in the meadows the different shares were apportioned by lot every year. After hay-harvest the fences in the meadow land were thrown down, and all householders had common rights of grazing on it. Similarly the stubbles were grazed,

but here the right was rarely open to all. Every farmer had the right of pasture on the waste.

以今天的英国农业与当时作比较，差别最大的当属公有土地面积的大幅削减。1760年以前共有地的圈围虽已持续了几个世纪，但其扩大速度远比不上1760年以后。据悉，1710年到1760年圈地面积共为55.4974万英亩，1760年到1845年为700万英亩。自1760年开始，起初大部分的圈围土地仍处于公有土地的原始耕作模式，大范围地区仍然完全沿用中世纪的农耕体系。一些教区没有自己的公有土地或荒地，而在公有土地已实行耕作的地方，普遍都使用同样的耕种方式。每个村庄的耕地被分为三个狭长区域，每一区域又再分为若干“埂”，一埂相当于宽度3码。每个农民至少分得一块田地，并需遵循历来的耕种模式。每年有三块地中的一块留作休耕地，另两块耕种小麦和大麦，有时也耕种燕麦、豌豆或巢菜以替换大麦。草地也同样为共同所有。虽然干草收割以前每人拥有一块土地，但可耕地的所有权实际上很少转让，草地所有权的转换则每年由抽签决定。在干草收割之后，草地上的篱笆会被拆除，所有农户都有在草地之上放牧的公有权利。作物残梗同样会作放牧使用，只是一般不为所有人享有，但每位农民都有在荒地放牧的权利。

Though these common fields contained the best soil in the kingdom, they exhibited the most wretched cultivation. “Never,” says Arthur Young, “were more miserable crops seen than all the spring ones in the common fields; absolutely beneath contempt. The causes of this deficient tillage were three in number: (1) the same course of crops was necessary. No proper rotation was feasible; the only possible alternation being to vary the proportions of different white-straw crops.—There were no turnips or artificial grasses, and consequently no sheep-farming on a large scale. Such sheep as there were miserably small; the whole carcase weighed only 28 lbs., and

the fleeces 3 1/2 lbs. each, as against 9 lbs. on sheep in enclosed fields. (2) Much time was lost by labourers and cattle" in travelling to many dispersed pieces of land from one end of a parish to another". (3) Perpetual quarrels arose about rights of pasture in the meadows and stubbles, and respecting boundaries; in some fields there were no "baulks" to divide the plots, and men would plough by night to steal a furrow from their neighbours.

尽管这些公用地包括了英国最优良的土地，其耕作效果却是最差的。阿瑟·杨格曾说过："再没有比公用地的这些春作物更糟糕的了，可谓毫无可取之处。这些劣质庄稼的造成原因有三：（1）作物的耕种顺序应当相同，作物轮作是不可行的，唯一可行的是改变不同白茎作物的耕种比例。由于没有芜菁或人工草皮，因此也就没有大规模的牧羊。牧养的羊都比较小，一只羊总重不过28磅，羊毛不过3.5磅，而圈围地饲养的羊每只羊毛多达9磅。（2）由于田地分散，人畜从一处分区到另一处分区就会浪费很多时间"。（3）草皮、作物残茎的放牧权及其界线的划分引起无休止的争端。一些区域没有田埂来区分不同所属区，因此农民常会夜间耕作，为了能从邻区盗取一犁土地。

For these reason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practice of enclosing and improved agriculture was very close. The early enclosures, made under the Statutes of Merton (1235), and Westminster (1285), were taken by the lords of the manor from the waste. But in these uses the lord had first to prove that sufficient pasturage had been left for the commoners; and if rights of common existed independent of the possession of land, no enclosure was permitted. These early enclosures went on steadily, but the enclosures which first attract notic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ere of a different kind. They were often made on cultivated land, and, if Nasse is correct, they took the form not only

of permanent conversions from arable into pasture, but of temporary conversions of arable into pasture, followed by reconversion from pasture into arable. The result was a great increase of produce. The lord having separated his plots from those of his neighbours, and having consolidated them, could pursue any system of tillage which seemed good to him. The alternate and convertible husbandry, mentioned above, was introduced; the manure of the cattle enriched the arable land, and “the grass crops on the land ploughed up and manured were much stronger and of a better quality than those on the constant pasture.” Under the old system the manure was spread on the ground pasture, while in the enclosures it was used for the benefit of land broken up for tillage. The great enclosure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ok place in Suffolk, Essex, Kent, and Northamptonshire, which were in consequence the most wealthy counties. They were frequent also in Oxford, Berks, Warwickshire, Bedfordshire, Bucks, and Leicestershire, and with similar results. In Arthur Young's time Norfolk, Suffolk, Essex, and Kent were the best cultivated parts of England.

因此，圈地运动和农业改革之间关系重大。早期的圈地运动依照1235年的默顿条例与1285年的威斯敏斯特条例，由庄园领主从荒地开始施行。这其中庄园领主首先要表明已为佃户留有足够的牧场，而且当公有权独立于土地所有权时，圈地是不允许的。这些早期的圈地运动在平稳地推进，而十五世纪末率先引起大范围关注的新一轮圈地运动则是另外一种形式。这一轮被圈围的大都是可耕地，纳斯（Nasse）对此的描述是，圈地形式一方面是将耕地永久地转化为牧地，另一方面也有耕地临时转变为牧地，之后再从牧地恢复为耕地，这使农产品有了大量产出。领主将自己的土地与农民的土地划分开来，并且将自己的土地合并，进而实行有利自身的耕作方法。由于引入了上述的交替与轮作经营体系，加之施用牲畜粪肥，因而耕地变得更加富饶，“翻地后种植的草科作物经过这种施肥就比非轮作土地的

作物生长得更加旺盛，其质量也更高”。在传统的耕种体系中，肥料被分散在牧场之上，而在圈围地上肥料被用于为划分好的土地补给营养。到16世纪，萨福克郡、埃塞克斯郡、肯特郡和北安普敦郡发生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使这些地区成为了当时最富有的地区。牛津郡、伯克郡、沃里克郡、贝德福德郡、巴克斯郡和莱斯特郡也不断实行圈地，并取得了同样的效果。到阿瑟·杨格时期，诺福克郡、萨福克郡、埃塞克斯郡和肯特郡已是全英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Taking a general view of the state of agriculture in 1760, we find that improvements were confined to a few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first enclosure Bill (1710) was to legalise the enclosure of a parish in Hampshire. I have looked through twelve of these Bills of the reign of George I, and I find that they applied to parishes in Derbyshire, Lancashire, Yorkshire, Staffordshire, Somersetshire, Gloucestershire, Wilts, Warwickshire, and Norfolk. But though enclosures were thus widely distributed, certain counties continued to bear a much higher reputation than others, and in some improvements were confined to one or two parishes, and not spread over a wide district. The best cultivated counties were those which had long been enclosed. Kent, which was spoken of by William Stafford in 1581 as a county where much of the land was enclosed, is described by Arthur Young as having “long been reckoned the best cultivated in England.“… “It must astonish strangers,” he says, “to East Kent and Thanet, to find such numbers of common farmers that have more drilled crops than broadcast ones, and to see them so familiar with drill-ploughs and horse-hoes. The drill culture carried on in so complete a manner is the great peculiarity of this country. Hops are extremely well cultivated.” Is in, another passage he says that Kent and Hertfordshire “have the reputation of a very accurate cultivation.” The Marquis of Rockingham brought a Hertfordshire farmer to teach his tenants in the West Riding to hoe

turnips. The husbandry both of that district and of the East Riding was very backward. The courses of crops, and the general management of the arable land were very faulty; very few of the farmers hoed turnips, and those who did executed the work in so slovenly a way that neither the crop nor the land was the least the better for it; beans were never hoed at all. The husbandry of Northumberland, on the other hand, was much superior to that of Durham and Yorkshire. Turnips were hoed, manure was better managed, and potatoes were cultivated on a large scale. Essex, held up by Tusser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as an example of the advantages of enclosures, and described by Young in 1807 as having “for ages been an enclosed country,” is mentioned as early as 1694 as a county where “some have their fallow after turnips, which feed their sheep in winter,“—the first mention of turnips as a field crop.

纵观1760年时英国的农业形式，我们发现改革只发生在有限的几个地区。第一份圈地议案（1710年）批准了汉普郡内一个教区的圈地行为。我看过12份乔治一世时代的这类议案，发现这些议案曾用于德比郡、兰开夏郡、约克郡、斯塔福德郡、萨默塞特郡、格洛斯特郡、威尔特郡、沃克里郡和诺福克郡的各个教区。虽然圈地运动的开展范围如此广泛，但总有一些郡比其他郡的声誉要好，况且有些改革仅限于一两个教区，而并非在整个地区全面开展。但开垦得最好的郡长期以来实行圈地。比如肯特郡，1581年时，威廉·斯塔福德指出肯特郡的大部分土地已被圈围，阿瑟·杨格称肯特郡“素来被公认为英国最佳的农业区”。他说：“外来人一定会惊讶于东部肯特和萨尼特如此大量的普通农民，其条播作物比撒播作物还要多，也一定会惊讶于那里的农民对操纵条播犁和马耕机如此熟悉。这样完备的条播栽培模式是英国的一大特点……尤其是啤酒花的种植，情况良好。”在他的另一篇著述中，阿瑟·杨格提到肯特郡和赫特福德郡“因其精良的耕作而备受好评”。当时的罗金汉侯爵令一名赫特福德郡农民为他的约克郡西区

的佃农讲授芜菁的种植方法。约克郡西区与东区的农耕都很落后，其耕地的种植方式与综合管理有很大问题，很少有农户种植芜菁，种植芜菁的农户其种植方式又极不规范，这无论对于作物还是土地都很不利；豆科植物则无人种植。相比之下，诺森伯兰郡就比达勒姆郡和约克郡好得多。诺森伯兰郡种植芜菁，肥料管理妥善，并且大规模培植马铃薯。埃塞克斯郡被伊丽莎白时期的托马斯·图塞（Tusser）描述为受益于圈地运动的典范；1807年，阿瑟·杨格谈到该郡“多年以来实行圈地政策”；此外早在1694年，已有记录说该郡“有些农户种植芜菁后休耕，作为冬季饲羊之用。这是将芜菁列为大田作物的最早记录。

But the greatest progres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eems to have taken place in Norfolk. Everyone has heard of Townshend growing turnips at Raynham, after his quarrel with Walpole; and Young, writing in 1812, after speaking of the period 1700-1760 as one of stagnation, owing to low prices (“it is absolutely vain to expect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e unless prices are more disposed to rise than to remain long without variations that give encouragement to the farmer”), admits that the improvements made in Norfolk during that time were an exception, in his Eastern Tour (1770), he had spoken of the husbandry “which has rendered the name of this county so famous in the farming world”. And given seven reasons for the improvements. These were: (1) Enclosing without assistance of Parliament.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through the knavery of commissioners and attorneys,” was very expensive. “Undoubtedly many of the finest loams on the richest marls would at this day have been sheep-walks had there been any right of commonage on them.” (2) Marling, for there was plenty of marl under the sand everywhere; (3) An excellent rotation of crops-the famous Norfolk four years” course of turnips, barley, clover (or clover and rye-grass), and wheat; (4) The culture of turnips well hand-hoed; (5) the culture of clover and rye-grass; (6)

The granting of long leases; (7) The division of the county chiefly into large farms. “Great farms,” he says, “have been the soul of the Norfolk culture, though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ounty there were little occupiers of £100 a year.”

而十八世纪上半叶最大的进步似乎发生在诺福克郡。我们都知道北方大臣汤曾德（Townshend）与沃波尔总统（Walpole）发生分歧后开始在雷纳姆（Raynham）种植芜菁。阿瑟·杨格评论1700-1760年的农业由于价格低廉而发展滞缓（“农作物价格高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价格不能长期不变而更应该趋于上涨，否则农业进步根本是不可能的”），后又于1812年发表著作，其中他认识到当时诺福克的农业改良是个例外。在他的《东部漫游记》（EasternTour）（1770）中，杨格提到农业的进步“使得诺福克郡在农业领域名声大噪”，并给出了七个原因，分别是：（1）圈地运动不依靠议会。圈地运动一旦通过国会，有专员和代理人从中周转，必然花销甚多。“很多土地下面是最肥沃的泥灰土，是最佳的土壤，如果先前已对其实行公用权，那么它现在必已成为牧羊场了。”（2）泥灰。土地下有丰富的泥灰。（3）优良的作物轮耕。在诺福克，芜菁-大麦-苜蓿（或苜蓿同黑麦草）-小麦这种四年轮种模式十分著名。（4）手犁芜菁的培植。（5）苜蓿与黑麦草培植。（6）发放长期租约。（7）主要把全郡划分为大型农场。杨格说：“虽然诺福克东部几乎没有年付100磅的租地人，但大农场依然是诺福克郡耕作模式的精要。”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the South of England, however, there had been a certain amount of progress. Hoeing turnips, according to Young, was common in many parts of the south of the kingdom, although the extensive use of turnips—i.e. all their uses for fattening cattle as well as feeding lean sheep—“is known but little of, except in Norfolk, Suffolk, and Essex.” Clover husbandry, on the other hand, was “universal from the North of England to the further

end of Glamorganshire." Clover, the "great clover",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England by Sir Richard Weston about 1645, as had probably been turnips also. Potato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were only garden crops. Hemp and flax were frequently grown, as were also hops, which had been introduc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但整个英国南方地区在农业上是有一定的总体进步的。据杨格看来，芜菁的培植在英国南部是很普遍的，虽然对芜菁的广泛应用（即将芜菁作为肥育牛或瘦羊饲料），“除诺福克郡、萨福克郡、埃塞克斯郡以外，其他地区对此还了解甚少”。另一方面，苜蓿的种植“从英国北部一直遍及格拉摩根郡各区”。苜蓿，“意义重大的苜蓿”，于1645年左右由理查德·韦斯顿爵士（SirRichardWeston）引入英国，芜菁的引入大概也是如此。17世纪初马铃薯还只是园林作物。大麻、亚麻同啤酒花一样都被广泛种植，均于16世纪初引入英国。

If we turn from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oil to the management and breeding of live stock, we shall find that no great progress had been made in this branch during the years 1700-1760. Davenant in 1700 estimated the net carcase of black cattle at 370 lb., and of a sheep at 28 lb. A century later Eden calculated that "bullocks now killed in London weigh, at an average, 800 lb., sheep 80 lb., and lambs about 50 lb. each". And Young in 1786 put the weight of bullocks and sheep at 840 lb. and 100 lb. respectively. It was not until 1760-85 that Bakewell perfected the new breed of sheep—the Leicesters—and improved the breed of long-horned cattle, and that the brothers Culley obtained the short-horn, or Durham cattle, from the breed in the valley of the Tees. Some improvements in the breed of sheep, however, had already been made. "The wool of Warwickshire, Northamptonshire, Lincolnshire, and Rutland, with

some parts of Huntingdon, Bedford, Buckinghamshire, Cambridgeshire, and Norfolk has been accounted the longest and finest combing wool. But of late years" (this was written in 1739) "there have been improvements made in the breed of sheep by changing or rams and sowing of turnips and grass seeds, and now there is some large fine combing wool to be found in most counties in England, which is fine, long, and soft, fit to make all sorts of fine stuff and hose of." Still improvements in feeding sheep were by no means universally adopted for half a century later. Agricultural implements, too, were still very primitive, wooden ploughs being commonly in use, while the small, narrow-wheeled waggon of the North held 40 or 50 bushels with difficulty.

了解了土地的耕作，下面我们再来看牲畜的饲养和繁殖。我们发现，从1700到1760年，在牲畜的养殖方面并没有太大进展。1700年时，戴夫南特（Davenant）估测一头黑牛净重370磅，羊净重28磅。一百年后，伊登估测“伦敦屠宰的阉牛平均每只重800磅，羊80磅，羔羊约50磅”。1786年，阿瑟·杨格估算阉牛与羊的重量分别为840磅和100磅，但是似乎1760年以后才开始增重。到1760年至1785年，贝克韦尔（Bakewell）地区完成了羊的新品种莱斯特羊的改良，并改进了长角牛的培育。科林兄弟（Culley）从蒂斯山谷的种牛培育出了短角牛，也称为达勒姆牛。在羊的育种方面则已经有了许多进展。沃里克郡、北安普敦郡、林肯郡、拉特兰郡，以及亨廷登、贝德福德、白金汉郡、剑桥郡、诺福克郡的部分地区出产的羊毛可以说是最长、最细的精梳羊毛。但近年来，通过种公羊的轮换和芜菁、草籽的播种，羊的品种有了更多改良，如今英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大规模的精梳羊毛出产，其品质细长且柔软，适用于各种细料和长筒袜（1739）。然而牧羊领域的各种改良要到半世纪后才被普遍采用，在那之前农业机具还十分原始，木犁还在大范围使用，北方的窄轮小车只能勉强装载40到50蒲式耳。

Arthur Young constantly attributes much of the bad agriculture to the low rentals prevalent. “Of so little encouragement to them,” he writes of the farmers of Cleveland, “is the lowness of their rents, that many large tracts of land that yielded good crops of corn within thirty years are now overrun with whins, brakes, and other trumpery. If I be demanded how such ill courses are to be stopped, I answer, Raise their rents. First with moderation, and if that does not bring forth industry, double them.” At the same time Young strongly advocated long leases. But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besides tenant farmers there were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freeholders and still more copyholders either for life or by inheritance.

阿瑟·杨格始终将农业的惨淡景况大部分归咎于当时低地租的通行。他曾这样描述克利夫兰的农民：“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没有任何的鼓励政策，低地租就是其中一种表现，于是大面积谷物收成极好的土地，如今在不到三十年间已经被荆豆、灌木或其他废草侵占……要是问我如何才能结束这样的恶性耕作，我要说，那就必须要增加地租。首先可以小幅度增加，如果仍不能带动农业发展则可以加倍。”除此之外杨格还坚定地支持长期租约。但是我们要注意，土地所有人除了包括佃户之外，还包括大量的世袭所地产有者与土地享有者，他们或者享有终身所有权，或者因继承关系而享有所有权。

On the whole, though the evidence on some points is somewhat contradictory, 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e between 1700 and 1760 may be said to have been slow. Writing in 1770 Arthur Young ascribes to the last ten years “more experiments, more discoveries, and more general good sense displayed in the walk of agriculture than in an hundred preceding ones.” Though drill-husbandry was practised by Jethro Tull, “a gentleman of Berkshire,” as early as 1701, and his book was published in 1731, “he seems to have had

few followers in England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nd Young in 1770 speaks of "the new husbandry" as having sunk with Tull, and "not again put in motion till within a few years."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as early as 1687 Petty'snotice of "the draining of fens, watering of dry grounds, and improving of forests and commons." Macpherson in the year 1729 speaks of the great sums lately expended in the enclosing and improving of lands; and Laurence in 1727 asserts that "it is an undoubted truth that the Art of Husbandry is of late years greatly improved, and accordingly many estates have already admitted their utmost improvement, but," he adds, "much the greater number still remains of such as are so far from being brought to that perfection that they have felt few or none of the effects of modern arts and experiments."

尽管关于某些问题的实证略有出入，但1700年到1760年的农业生产总体来说还是有缓慢发展的。阿瑟·杨格在其1770年的著作中诠释道："农业领域近十年来的试验、发现和认识超过了前一百年的总和。""伯克郡的杰思罗·塔尔先生（JethroTull）"早在1701年就采用条播耕作，他的书于1731年出版，但"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全英国似乎并没有多少人追随他"，杨格说"新的农耕方法"随杰思罗·塔尔而一并消亡，"直到几年之后才又获新生"。另一方面，早在1687年，佩蒂（Petty）就意识到要"将沼泽排水改为农田，灌溉干地，改造树林和公用地"。1729年，麦克弗森（Macpherson）提到了近来在圈地运动与土地改造方面花费的巨额资金。1727年时劳伦斯（Laurence）断言："毫无疑问，耕作方法近年来发生了巨大的改进，相应地，许多土地也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劳伦斯又指出，"还有很多地区的农业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程度，那些地区几乎不知道甚至完全不了解现代农业或试验的效果。"

Still, in spite of the ignorance and stupidity of the farmers and

their use of wretched implements, the average produce of wheat was large. In 1770 it was twenty-five bushels to the acre, when in France it was only eighte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some of our colonies imported wheat from the mother country. The average export of grain from 1697 to 1765 was nearly 500,000 quarters, while the imports came to a very small figure. The exports were sent to Russia, Holland, and America.

尽管农民缺乏农业知识并且农业机具简陋，但小麦的平均产量还是很高的。1770年小麦产量为每英亩25蒲式耳，当时的法国仅为每英亩18蒲式耳。18世纪初，英国的一些殖民地还需要从母国进口小麦。从1697年到1765年，谷物的平均出口量约为50万夸特，而平均进口量很小。其出口对象国是俄罗斯、荷兰和美国。

Chapter IV England in 1760 Manufactures and Trade

第四章　1760年的英国制造业与贸易

Among the manufactures of the time the woollen business was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All our measures,” wrote Bishop Berkeley in 1737, “should tend towards the immediate encouragement of our woollen manufactures, which must be looked upon as the basis of our wealth.” In 1701 our woollen exports were worth £2,000,000, or “above a fourth part of the whole export trade.” In 1770 they were worth £4,000,000, or between a third and a fourth of the whole. The territorial distribution of the manufacture was much the same as now. This industry had probably existed in England from an early date. It is mentioned in a law of 1224. In 1331 John Kennedy brought the art of weaving woollen cloth from Flanders into England, and receiv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king, who at the same time invited over fullers and dyers. There is extant a petition of the worsted weavers and merchants of Norwich to Edward III in 1348. The coarse cloths of Kendal and the fine cloths of Somerset, Dorset, Bristol, and Gloucester are mentioned in the statutes of the same century. In 1391 we hear of Guildford cloths, and in 1467 of the woollen manufacture in Devonshire-at-Lifton, Tavistock, and Rowburgh. In 1402 the manufacture was settled to a great extent in and near London, but it gradually shifted, owing to the high price of labour and provisions, to Surrey, Kent, Essex, Berkshire, and Oxfordshire, and afterwards still further, into the counties of Dorset, Wilts, Somerset, Gloucester, and Worcester, and even as far as Yorkshire.

英国当时最重要的工业是毛纺织业。贝克莱主教（BishopBerkeley）于1737年写道，“我们所有的政策都应以鼓励毛纺织业的发展为目的，这是我们创造财富的基础。”1701年，英国的羊毛出口额达到200万镑，“超过英国出口贸易的四分之一”。1770年时这一数字达到400万镑，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制造业的地域分布与现在相差无几。毛纺织业大概于英国早期就已出现，1224年的律法规定就有与此相关的条款。1331年，约翰·肯尼迪将羊毛纺织技术从佛兰德斯引入英国，当时的国王对此极力保护，同时引进了漂洗工和染工。现今还存有1348年诺里奇的毛绒纺织工和商人向爱德华三世提出的请愿书。十四世纪的法令则涉及肯德尔粗布以及萨默塞特郡、多塞特郡、布里斯托尔市、格洛斯特郡细料的有关规定。1391年我们有了吉尔福德棉布，1467年在德文郡的利夫顿（Lifton）、泰维斯托克（Tavistock）及罗伯格（Rowburgh）都出现了羊毛制造业。1420年毛纺织业大量进军伦敦周边地区，但由于劳动力与食料成本的增加，该工业逐渐转到萨里郡、肯特郡、埃塞克斯郡、伯克郡及牛津郡，之后又向更远的多塞特郡、威尔特郡、萨默塞特郡、格洛斯特郡及伍斯特郡各郡扩展，甚至远及约克郡。

There were three chief districts in which the woollen trade was carried on about 1760. One of these owed its manufacture to the wars in the Netherlands. In consequence of Alva's persecutions (1567-8) many Flemings settled in Norwich (which had been desolate since Ket's rebellion in 1549), Colchester. Sandwich, Canterbury, Maidstone, and Southampton, The two former towns seem to have benefited most from the skill of these settlers so far as the woollen manufacture was concerned. It was at this time, according to Macpherson, that Norwich “learned the making of those fine and slight stuffs which have ever since gone by its name,” such as crapes, bombayines, and camblets; while the baiye-makers settled at Colchester and its neighbourhood. The stuffs thus introduced into England were known as the “new drapery”, and

included baiye, serges, and other slight woollen goods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ld drapery,” a term applied to broad cloth, kersies, etc.

1760年，毛纺织业的主要经营区有三个，其中一个由荷兰战争兴起。由于阿尔瓦的迫害（1567-1568），很多佛兰芒人逃难到科尔切斯特的诺里奇（诺里奇因1549年的凯特起义而荒废）、切斯特、桑威奇、坎特伯雷、梅德斯通和南安普敦。就毛纺织业而言，其中诺里奇和切斯特似乎由于移民而获得了最多的利益。据麦克弗森（Macpherson）说，就是在这个时期，诺里奇“开始形成了轻细毛料的制造技术，这些毛料也自此而闻名”，如黑绉绸、邦巴辛绸和羽纱；台面呢制造业则位于切斯特及其周边地区。随后引入英国的毛料产品被称为“新毛料”，这包括台面呢、毛哔叽及其他细羊毛种类，以区别于“老毛料”，包括细平布、克尔赛手织粗呢（kersies）等。

The chief seats of the West of England manufacture were Bradford in Wilts, the centre of the manufacture of super-fine cloth; Devizes, famous for its serges; Warminster and Frome, with their fine cloth; Trowbridge; Stroud, the centre of the dyed-cloth manufactures; and Taunton, which in Defoe's time possessed 1100 looms. The district reached from Cirencester in the north to Sherborne in the south, and from Witney in the east to Bristol in the west, being about fifty miles in length where longest, and twenty in breadth where narrowest—” a rich enclosed country,” as Defoe says, “full of rivers and towns, and infinitely populous, insomuch that some of the market towns are equal to cities in bigness, and superior to many of them in numbers of people.” It was a “prodigy of a trade,” and the “fine Spanish medley cloths” which this district produced were worn by “all the persons of fashion in England.” It was no doubt the presence of streams and the Cotswold wool which

formed the attractions of the district. A branch of the industry extended into Devon, where the merchants of Exeter bought in a rough state the serges made in the country round, to dye and finish them for home consumption or export.

英格兰西部的主要工业地在威尔特郡的布拉德福德（超细布料的制造中心）、迪韦齐斯地区（以毛哔叽著称）、沃明斯特与弗罗姆（细布料产地）、特罗布里奇、斯特劳德（染布工业中心）以及汤顿（在笛福时期已拥有1100台织布机）。该地区北至赛伦塞斯特，南至舍伯恩，东起威特尼，西至布里斯托尔，最宽处为50英里，最狭处为20英里。笛福说："这是一个富饶的圈围地区，河流与乡镇众多，人口高度密集，其中一些商业城镇可与大城市相比拟，很多地区的人口甚至比大城市还要多。"这里堪称"商业极盛之地"，产出的"西班牙细染布受到全英国时尚界人士的青睐。"这里潮流的出现和科茨沃尔德羊毛的出产无疑是当地极大的亮点。该产业的一个分支延伸到德文郡，其首府埃克塞特的商人把周边产出的毛哔叽未成品进行染色和加工，以供国内消费或出口。

The third chief seat of the manufacture was the West Riding of Yorkshire, where the worsted trade centred round Halifax, which, according to Camden, began to manufacture about 1537; and where Leeds and its neighbourhood manufactured a coarse cloth of English wool. In 1574 the manufacturers of the West Riding made 56,000 pieces of broad cloth and 72,000 of narrow. It will be seen from this short survey that, however greatly the production of these different districts may have changed in proportion since 1760, the several branches of the trade are even now distributed very much as they were then, the West Riding being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worsted and coarse cloth trade, while Norwich still keeps the crape industry, and the West manufactures fine cloth.

第三个主要工业地是约克郡西区，其精纺毛料产业以哈利法克斯为中心。据卡姆登（Camden）说，哈利法克斯的该产业始于1537年，而利兹及其周边地区可出产一种英国羊毛加工成的粗布。到1574年，约克郡西区已生产了5.6万匹宽幅布和7.2万匹窄幅布。从简短的调查可以看出，尽管自1760年起这些地区的产出极大地改变了产业分布，但其某些分支的分布仍然与当年相差无几，也就是说西区仍然是精纺毛料与粗布的产地，诺里奇仍是黑绉绸的主要产地，而西部仍是细布料的主要产地。

The increased demand for English wool consequent upon the extension of this industry led to large enclosures of land, especially in Northamptonshire, Rutlandshire, Leicestershire, and Warwickshire, which counties supplied most of the combing wools used for worsted stuffs and stockings; but parts of Huntingdon, Bedford, Bucks, Cambridgeshire, Romney Marsh, and Norfolk competed with them, and by 1739 most counties produced the fine combing wool. Defoe mentions the sale of wool from Lincolnshire, “where the longest staple is found, the sheep of those parts being of the largest breed”. And in Arthur Young's time Lincolnshire and Leicestershire wools were still used at Norwich. The Cotswold and Isle of Wight sheep yielded clothing or short wools, “but they were inferior to the best Spanish wools,” and could not “enter into the composition without spoiling and degrading in some degree the fabric of the cloth.” Consequently in the West of England, occupied as it was with the production of the finest cloths, Spanish wool was largely used, though shortly before Young's time it was discovered that “Norfolk sheep yielded a wool about their necks equal to the best from Spain.”

行业的扩大使得对英国羊毛需求量的增加，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特别是在北安普敦郡、拉特兰郡、莱斯特郡和沃里克郡，这些都是为精纺毛料和长袜生产提供精梳羊毛的主要地区。而亨廷登、贝德福德、巴克斯、剑桥郡、罗姆尼沼泽和诺福克一带与之竞争，并且到1739年，大部分地区都已产出精梳羊毛。笛福曾提到林肯郡的羊毛销售状况，称“林肯郡发现有最长的羊毛，且这些地区牧养着最大的羊种群。”到阿瑟·杨格时代，诺里奇的织布工业仍在使用林肯郡和莱斯特郡出产的羊毛。科茨沃尔德羊和怀特岛羊产出衣料和短羊毛，但是“劣于上等的西班牙羊毛”，且无法“布料结构不受损的情况下添加其他成分”。因此在英格兰西部，由于主要从事细布的生产，所以仍主要使用西班牙羊毛，不过在杨格时代以前，人们就已发现“诺福克羊颈部的羊毛可与西班牙的上等毛料相媲美。”

Next in importance was the iron trade, which was largely carried on, though by this time a decaying industry, in the Weald of Sussex, where in 1740 there were ten furnaces, producing annually 1400 tons. The trade had reached its chief exten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ut in 1724 was still the principal manufacturing interest of the county. The balustrades which surround St. Paul's were cast at Lamberhurst, and their weight, including the seven gates, is above 200 tons. They cost £11,000. Gloucestershire, Shropshire, and Yorkshire had each six furnaces. In the latter county, which boasted an annual produce of 1400 tons, the most famous works were at Rotherham. There were also great ironworks at Newcastle.

钢铁产业次之，尽管钢铁业此前处于衰退趋势，但萨塞克斯郡的威尔德地区（WealdofSussex）在1740年已拥有10个熔炉，年产量为1400吨。钢铁业在十七世纪达到顶峰，到1742年仍然创造该郡的主要制造收益。圣保罗外的栏杆就铸造于兰伯赫斯特，其总重（含7扇大门）超过200吨，耗资1.1万英镑。格洛斯特郡、什罗普郡、约克郡

共有6个熔炉。其中约克郡年产量达1400吨，罗瑟勒姆地区的钢铁厂最为出名。另外，纽卡斯尔也有很好的钢铁厂。

In 1755 an ironmaster named Anthony Bacon had got a lease for ninety-nine years of a district eight miles in length, by five in breadth, at Merthyr-Tydvil, upon which he erected iron and coal works. In 1709 the Coalbrookdale works in Shropshire were founded, and in 1760 Carron iron was first manufactured in Scotland. Altogether, there were about 1737 fifty-nine furnaces in eighteen different counties, producing 17,350 tons annually. It has been computed that we imported 20,000 tons. In 1881 we exported 3,820,315 tons of iron and steel, valued at £27,590,908, and imported to the value of £3,705,332.

1755年，钢铁厂厂长安东尼·培根签了一份99年的契约，租用梅瑟蒂德菲尔长8英里宽5英里的一片地区，建立了钢铁煤矿厂。1709年，什罗普郡的煤溪谷（Coalbrookdale）建立了钢铁厂。1760年，苏格兰首次产出了开伦铁（Carroniron）。在1737年，18个郡共59座熔炉的年产出总计17350吨钢铁，据计算，出口量达2万吨。1881年钢铁出口3820315吨，价值2759.0908万英镑，进口价值370.5332万英镑。

The cotton trade was still so insignificant as to be mentioned only once, and that incidentally by Adam Smith. It was confined to Lancashire, where its headquarters were Manchester and Bolton. In 1760 not more than 40,000 persons were engaged in it, and the annual value of the manufactures was estimated at £600,000. The exports, however, were steadily growing; in 1701 they amounted to £23,253, in 1751 to £45,986, in 1764 to £200,354. Burke about this

time spoke of “that infinite variety of admirable manufactures that grow and extend every year among the spirited, inventive, and enterprising traders of Manchester.” But even in 1764 our exports of cotton were still only one-twentieth of the value of the wool exports.

棉纺织业在当时还并不十分发达，因此亚当·斯密也只偶然提过一句。纺织业仅发展于兰开夏，以曼彻斯特和博尔顿为核心。1760年时其从业者不足4万，年产值估计为60万英镑，但出口逐渐增加；1701年出口额为23253英镑，1751年为45986英镑，到1764年已增至200354英镑。在这一时期，伯克（Burke）曾提到：“曼彻斯特商人积极进取、勇于创造、大胆拼搏，多种多样的杰出的制造业每年都在发展与扩大。”但直到1764年，我们的棉织品出口额仍然只是毛纺品出口额的二十分之一。

The hardware trade then as now was located chiefly in Sheffield and Birmingham, the latter town employing over 50,000 people in that industry. The business, however, was not so much concentrated as now, and there were small workshops scattered about the kingdom. “Polished steel,” for instance, was manufactured at Woodstock, locks in South Staffordshire, pins at Warrington, Bristol, and Gloucester, where they were “the staple of the city.” The hosiery trade, too, was as yet only in process of concentration. By 1800 the manufacture of silk hosiery had centred in Derby, that of woollen hosiery in Leicester, though Nottingham had not yet absorbed the cotton hosiery. B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there were still many looms round London, and in other parts of the South of England. In 1750 London had 1000 frames, Surrey 350, Nottingham 1500, Leicester 1000, Derby 200, other places in the Midlands, 7300; other English and Scotch towns,

1850; Ireland, 800; Total, 14,000. Most of the silk was woven in Spitalfields, but first spun in the North at Stockport, Knutsford, Congleton, and Derby. In 1770 there was a silk-mill at Sheffield on the model of Derby, and a manufactory of waste silk at Kendal. Coventry had already, in Defoe's time, attracted the ribbon business. In 1721 the silk manufacture was said to be worth £700,000 a yew more than at the Revolution.

五金贸易与现在一样，主要集中在谢菲尔德和伯明翰，其中伯明翰从业者超过5万。但该行业当时并不如现在集中，很多小工厂分散在全国各地。例如伍德斯托克城生产“抛光铁件”，南斯塔福德郡生产锁具，沃灵顿、布里斯托尔与格洛斯特生产钢钉，这些都成为其各自“城市的主要产业”。针织产业当时还在聚集过程中。到1800年，丝织业已在德比集中，毛织业集中在莱斯特，而棉织业尚未聚集在诺丁汉。到十九世纪初，伦敦周边及英格兰南部其他地区还有很多织布机器。在1750年，伦敦拥有1000台纺织机，萨里郡350台，诺丁汉1500台，莱斯特1000台，德比200台，英格兰中部部分地区7300台，其他英格兰、苏格兰城镇1850台，爱尔兰800台，总计14000台。丝绸的纺纱首先在北方，即斯托克波特、纳茨福德、康格尔顿和德比，其最终的生产主要是在斯毕塔菲尔德。1770年效仿德比的工厂，在谢菲尔德建立了丝绸制造厂，在肯德尔建立了废丝再利用工厂。考文垂在笛福时期已吸引了丝带制造业在那里集聚。据称，1721年的丝绸制造业已比大革命时期每年产值高出70万英镑。

Linen was an ancient manufacture in England, and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Dunde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1746 the British Linen Company was incorporated to supply Africa and the American plantations with linen made at home, and Adam Smith considered it a growing manufacture. It was, of course, the chief manufacture of Ireland, where it had been

further developed by French Protestants, who settled there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亚麻布的制造在英国由来已久，且在十七世纪初就已引入邓迪。当然，1746年英国亚麻布制造公司成立，将国内生产的亚麻供应至非洲及美洲农场。亚当·斯密认为这是个有发展前景的行业。这是爱尔兰的主要制造业，十七世纪末法国新教徒移民过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行业。

The mechanical arts were still in a very backward state.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woollen trade was the staple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it was in Adam Smith's time “nearly the same as it was a century before, and the machinery employed not very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same author there had been only three inventions of importance since Edward IV's reign: the exchange of the rock and spindle for the spinning-wheel; the use of machines for facilitating the proper arrangement of the warp and woof before being put into the loom; and the employment of fulling mills for thickening cloth instead of treading it in water. In this enumeration, however, he forgot to mention the fly-shuttle, invented in 1738 by Kay, a native of Bury, in Lancashire, the first of the great inventions which revolutionised the woollen industry. Its utility consisted in its enabling a weaver to do his work in half the time, and making it possible for one man instead of two to weave the widest cloth.

当时机械工艺的发展还很滞后。尽管毛纺织业是当时国家的主导工业，但亚当·斯密时期的劳动分工“几乎与一个世纪前相同，生产方式也变化无几”。亚当·斯密提到，自爱德华四世上任以来只三个重要

发明：代替手纺车的纺条及纺锤、经纱和纬纱放入织布机前做适当调整的机械设备、增厚布料处理中取代水中脚踏的漂洗机。而在这些列举中，亚当·斯密却忘了提到飞梭。飞梭于1738年由柏立人凯（Kay）在兰开夏发明，是最先引起毛纺织领域革命的最伟大的发明。它使纺织工人的工作时间减少一半，甚至最宽幅的布匹也只需一名工人操作，而不再需要两名。

“The machines used in the cotton manufacture,” says Baines, “were, up to the year 1760, nearly as simple as those of India; though the loom was more strongly and perfectly constructed, and cards for combing the cotton had been adapted from the woollen manufacture. None but the strong cottons, such as fustians and dimities, were as yet made in England, and for these the demand must always have been limited.” In 1758 John Wyatt invented spinning by rollers, but the discovery never proved profitable. In 1760 the manufacturers of Lancashire began to use the fly-shuttle. Calico printing was already largely developed.

贝恩斯（Baines）说：“1760年以前，棉纺织业使用的机器几乎与印度一样简陋，但织布机的制造较为坚固和完善，梳理棉毛的梳理刷还是由毛纺织业改造而来。英格兰迄今只生产如粗斜纹棉布、凸花条纹棉布这样的坚实棉布，因此对其需求也一直受到限制。”1758年，约翰·怀亚特发明了滚轴纺纱，但由此获得的利益并不大。到1760年，兰开夏制造商开始使用飞梭。棉布印花已有了大力发展。

The reason why division of labour was carried out to so small an extent, an invention so rare and so little regarded, is given by Adam Smith himself. Division of labour, as he points out,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and, owing chiefly to ba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e market for English manufactures was still a very narrow one. Yet England, however slow the development of her manufactures, advanced nevertheless more rapidly in this respect than other nations. One great secret of her progress lay in the facilities for water-carriage afforded by her rivers, for all communication by land was still in the most neglected condition. A second cause was the absence of internal customs barriers, such as existed in France, and in Prussia until Stein's time. The home trade of England was absolutely free.

对于劳动分工不明、发明数量少且关注程度低的状况，亚当·斯密给出了原因说明。他指出，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又同时受到低劣交通条件的影响，并且英国制造业市场还很狭小。虽然英国制造业发展缓慢，却仍比其他国家进步迅速。其进步的一个重大原因在于河流发展的水运设施，不过陆地交通仍然受到忽视。第二个原因是英国国内没有关税壁垒，而法国和普鲁士在斯坦（Stein）时代以前是存在关税的。英国的国内贸易是绝对自由的。

Arthur Young gives abundant evidence of the execrable state of the roads. It took a week or more for a coach to go from London to Edinburgh. On “that infernal” road between Preston and Wigan the ruts were four feet deep, and he saw three carts break down in a mile of road. At Warrington the turnpike was “most infamously bad,” and apparently “made with a view to immediate destruction.” “Very shabby,” “execrable,” “vile,” “most execrably vile,” are Young's ordinary comments on the highways. But the water routes for traffic largely mad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land routes.

阿瑟·杨格为恶劣的道路状况提供了大量实证。一列货车从伦敦到

爱丁堡要花费一周以上。在普雷斯顿与威根之间“如此糟糕的”路面上，车辙可深达4英尺，他曾在一英里内的路面上看到三辆货车损坏。沃灵顿的收税道路“低劣得臭名昭著”，且显然“注定要立刻损坏”，“十分破旧”、“恶劣”、“简陋”、“糟糕透顶”是杨格评论交通路面时常用的字眼。不过水上运输线大大弥补了陆路的不足。

Attempts to improve water communication began with deepening the river beds. In 1655 there was a project for rendering the Avon navigable from its junction with the Severn at Tewkesbury through Gloucestershire, Worcestershire, and Warwickshire, but it was abandoned owing to the civil war. From 1660 to 1755 various Acts were passed for deepening the beds of rivers. In 1720 there was an Act for making the Mersey and Irwell navigable between Liverpool and Manchester.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navigation of the Aire and Calder was opened out. In 1755 the first canal was made, eleven miles in length, near Liverpool. Three years later the Duke of Bridgewater had another constructed from his coal mines at Worsley to Manchester, seven miles distant. Between 1761 and 1766 a still longer one of twenty-nine miles was completed from Manchester through Chester to the Mersey above Liverpool. From this time onwards the canal system spread with great rapidity.

改善水上交通的尝试由加深河床开始。1655年的一项工程计划使埃文河通航，航线始于其在蒂克斯伯里与塞汶河的交界处，一直贯通格洛斯特郡、伍斯特郡、沃里克郡，但这一计划在内战时期被放弃。1660年到1755年之间通过了加深河床的各项法案。1720年出台了建造默西河到厄韦尔河水路以连接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法令。几乎同时，艾尔河与科尔德河航线开掘。1755年利物浦附近开通了首条运河，长11英里。三年后，布里奇沃特公爵（theDukeofBridgewater）从沃斯利境内他的煤矿到曼彻斯特之间开通了一条运河，长7英里。

1761年到1766年间，另一长达29英里的运河建设完成，由曼彻斯特通过切斯特直通默西河，中途流经利物浦。从此英国的运河系统开始迅速扩展。

When we turn to investigate the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of the time, we and that the class of capitalist employers was as yet but in its infancy. A large part of our goods were still produced on the domestic system. Manufactures were little concentrated in towns, and only partially separated from agriculture. The “manufacturer, was, literally, the man who worked with his own hands in his own cottage. Nearly the whole cloth trade of the West Riding, for instance, was organised on this syste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再来探究当时的工业构成，可以发现资本家雇主阶级还在处于萌芽时期。我们的大部分商品仍然是在家庭生产体系下生产的。制造业极少聚集于城市，且只部分与农业分离。“所谓的制造业者其实就是在自家中劳作的个体生产者。比如，在18世纪初，约克郡西区的几乎整个布匹行业都是在这一体系下组织起来的。”

An important feature in the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of the time was the existence of a number of small master-manufacturers, who were entirely independent, having capital and land of their own, for they combined the culture of small freehold pasture-farms with their handicraft. Defoe has left an interesting picture of their life. The land near Halifax, he says, was “divided into small Enclosures from two Acres to six or seven each, seldom more, every three or four Pieces of Land had an House belonging to them;hardly an House standing out of a Speaking distance from another;we could

see at every House a Tenter, and on almost every Tenter a piece of Cloth or Kersie or Shaloon.Every clothier keeps one horse, at least, to carry his Manufactures to the Market; and every one, generally, keeps a Cow or two or more for his Family. By this means the small Pieces of enclosed Land about each house are occupied, for they scarce sow Corn enough to feed their Poultry. The houses are full of lusty Fellows, some at the Dye-vat, some at the looms, others dressing the Cloths; the women and children carding or spinning; being all employed from the youngest to the oldest. Not a Beggar to be seen nor an idle person.”

当时工业构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批小规模手工业生产者的出现。这一群体是完全独立的，拥有自己的资本和土地，因为他们兼营着自由保有的牧农场耕作与其手工制造业。笛福曾对这样的生活图景有过很有趣的描述。他描述道，哈里法克斯附近的土地“被分割成小块的圈围地，通常每块两英亩，或者六七英亩，很少有更大的，每三四块地会被一户占有……两户之间的距离几乎都可以彼此听见……我们看到，每户都有一个张布架，几乎每个架上都有一块毛料，或者粗哔叽，或者夏龙布……每位织布业者至少养有一匹马，用以将其织物运到市场；通常每人又有一两头牛或者更多以供一家使用。在这种模式下，每户播种的谷物并不够饲养家禽，因此每户周围的圈围地都被利用……每户都有健壮的男劳力，有染布的，有织布的，也有裁制衣服的；女人和孩子则要梳毛或者纺线；从老人到孩子，可谓齐家上阵……没有一个坐享其成的闲人”。

This system, however, was no longer universal in Arthur Young's time. That writer found at Sheffield a silk-mill employing 152 hands, including women and children; at Darlington “one master-manufacturer employed above fifty looms”; at Boyton there were 150 hands in one factory. So, too, in the West of England

cloth-trade the germs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were visible. The rich merchant gave out work to labourers in the surrounding villages, who were his employes, and were not independent. In the Nottingham hosiery trade there were, in 1750, fifty manufacturers, known as “putters out”, who employed 1200 frames; in Leicestershire 1800 frames were so employed. In the hand-made nail business of Staffordshire and Worcestershire, the merchant had warehous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district, and give out nail-rod iron to the nail-master, sufficient for a week's work for him and his family. In Lancashire we can trace, step by step, the growth of the capitalist employer. At first we see, as in Yorkshire, the weaver furnishing himself with warp and weft, which he worked up in his own house and brought himself to market. By degrees he found it difficult to get yarn from the spinners; so the merchants at Manchester gave him out linen warp and raw cotton, and the weaver became dependent on them. Finally, the merchant would get together thirty or forty looms in a town. This was the nearest approach to the capitalist system before the great mechanical inventions.

而到了阿瑟·杨格时代，这一体制就变得不再普遍。阿瑟·杨格发现谢菲尔德的一个丝绸制造厂，包括妇女和孩子共有152人；达灵顿的“一个制造业者，拥有50台以上的织布机可供操作”；博因顿的一个工厂，其工人多达150名。同样，在英格兰西部的布匹行业也可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富有的商人向周围村庄提供大量的工作，其雇员与他们之间属于依附关系。在1750年，诺丁汉的针织行业有50个制造业者，他们拥有1200台纺织机，被称作“出资人”（puttersout）；莱斯特郡也有1800台纺织机。斯塔福德郡和伍斯特郡的手制钉行业的商人，其仓库分布在该区各处，并将钉杆分发给那些手制钉加工者，数量足够他们一家一周的加工量。在兰开夏，我们可以逐步追踪到资本家雇主的成长过程。起初，兰开夏的一位织工

自己纺好经纬线，在自己家里完成，之后再把它拿到市场。他逐渐发现从纺纱工得到纱线开始变得困难，所以又有曼彻斯特商人提供亚麻纱和原棉，纺织过程于是开始依赖于商人。最终，商人能够把30到40台织布机聚集在一个城市。这是伟大的机械发明出现以前最接近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途径。

Coming to the system of exchange, we find it based on several different principles, which existed side by side, but which were all, as we should think, very simple and primitive. Each trade had its centre in a provincial town. Leeds, for instance, had its market twice a week, first on the bridge over the Aire, afterwards in the High Street, where, at a later time, two halls were built. Every clothier had his stall, to which he would bring his cloth (seldom more than one piece at a time, owing to the frequency of the markets). At six or seven o'clock a bell rang, and the market began; the merchants and factors came in and made their bargains with the clothiers, and in little more than an hour the whole business was over. By nine the benches were cleared and the hall empty. There was a similar hall at Halifax for the worsted trade. But a large portion of the inland traffic was carried on at fairs, which were still almost as important a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most famous of all was the great fair of Sturbridge, which lasted from the middle of August to the middle of September. Hither came representatives of all the great trades. The merchants of Lancashire brought their goods on a thousand pack-horses; the Eastern counties sent their worsteds, and Birmingham its hardware. An immense quantity of wool was sold, orders being taken by the wholesale dealers of London. In fact, a large part of the home trade found its way to this market. There were also the four great annual fairs, which retained the ancient title of “marts,” at Lynn, Boston, Gainsborough, and Beverley.

再来看交换制度，我们发现它基于多个不同的原理，这些原理共同存在，但正如我们所想，它们都是很简单和原始的。每个行业都有一个市镇作为中心，例如利兹，每周会有两次集市，起初是在艾尔河桥上，后来改在主要街道上，之后又在街上建起了两座商馆。每一个织布业者都有一个摊位，在那里贩卖自己的布匹（由于集市开放频繁，人们每次拿出的布基本不会超过一匹）。到了六七点钟鸣钟开市，商人和经纪人进来这里，和织布业者进行交易，一个多小时后整个集市结束。九点以前所有长凳撤清，商馆的人全部走空。哈里法克斯有一个类似的精纺毛料交易商馆，不过大部分内陆交易还是在定期集市里进行的，其重要性仍不亚于中世纪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斯特布里奇大市场，从八月中旬一直持续到九月中旬，各大行业的代表都会来到这里。兰开夏商人用上千匹驮马运来商品；东部各郡运来精纺毛料，伯明翰运来五金器材。其中羊毛的销量巨大，有伦敦批发商承接订货。事实上，该市场进行的贸易占国内贸易比例很高。另外也有四个大型年市，保留了古老的“marts”[^1]的说法，分别设在林恩（Lynn）、波士顿、盖恩斯伯勒、贝弗利。

The link between these fairs and the chief industrial centres was furnished by travelling merchants. Some would go from Leeds with droves of pack-horses to all the fairs and market-towns throughout England. In the market-towns they sold to the shops; elsewhere they would deal directly with the consumer, like the Manchester merchants, who sent their pack-horses the round of the farmhouses, buying wool or other commodities in exchange for their finished goods. Sometimes the London merchants would come to the manufacturers, paying their guineas down at once, and taking away the purchases themselves. So too in the Birmingham lock trade, chapmen would go round with pack-horses to buy from manufacturers; in the brass trade likewise the manufacturer stayed at home, and the merchant came round with cash in his saddle-

bags, and put the brasswork which he purchased into them, though in some cases he would order it to be sent by carrier.

流动商人的出现使得市场和主要工业中心密切地联系起来。有些商人带着大批驮马从利兹赶赴英国各地的集市和集镇。在集镇上他们会出售货物给店铺，在其他地方则直接和买方交易。比如曼彻斯特商人，他们带着马上的货物往农舍周围巡走，用其成品交换羊毛和其他产品。有时候伦敦商人也会来找制造商，当即支付货款，自行转卖商品。同样在伯明翰的锁具业，也有商人们牵着马匹来向制造商购买；铜器行业也是类似，制造商在家里坐等，会有商人带着口袋装着钱找上门来，然后把买得的铜器装进口袋，当然有时也会雇人运送回去。

Ready cash was essential, for banking was very little developed. The Bank of England existed, but before 1759 issued no notes of less value than £20. By a law of 1709 no other bank of more than six partners was allowed; and in 1750, according to Burke, there were not more than “twelve bankers” shops out of London.The Clearing-House was not established till 1775.

由于银行基本没有发展，因此现金还是很重要的。英格兰银行虽已建立，但是1759年以前低于20英镑面值的纸币尚未发行。根据1709年颁布的一项新法，除此一家之外，不允许有银行拥有超过六位股东；到1750年，据伯克（Burke）写道，“除伦敦以外，银行业者经营的机构还不到12家”。票据交易所直到1775年才建立。

Hampered as the inland trade was by imperfect communications, extraordinary efforts were made to promote exchange. It is striking to find waste silk from London made into

silk-yarn at Kendal and sent back again, or cattle brought from Scotland to Norfolk to be fed. Many districts, however, still remained completely excluded, so that foreign products never reached them at all. Ev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he Yorkshire yeoman, as described by Southey was ignorant of sugar, potatoes, and cotton; the Cumberland dalesman, as he appears in Wordsworth's Guide to the Lakes, lived entirely on the produce of his farm. It was this domestic system which the great socialist writers Sismondi and Lassalle had in their minds when they inveighed against the modern organisation of industry. Those who lived under it, they pointed out, though poor, were on the whole prosperous; over-production was absolutely impossible. Yet at the time of which I am speaking, many of the evils which modern Socialists lament were already visible, especially in those industries which produced for the foreign market. Already there were complaints of the competition of men who pushed themselves into the market to take advantage of high prices; already we hear of fluctuations of trade and irregularity of employment. The old simpl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were on the eve of disappearance before the all-corroding force of foreign trade.

内地商业受不完备的交通条件阻碍，因此在促进贸易方面曾做出许多特别的努力。伦敦的废丝在肯德尔被制成绢丝而后送返伦敦，又有苏格兰的牛群迁到诺福克进行牧养，这些都是显著的事实。然而许多地区仍与外界隔绝，以至外地产品从来不能进入。即使在十八世纪初，如骚塞（Southey）的记述，约克郡的自耕农并不知道糖、马铃薯和棉花；沃兹沃思的《湖区指南》（GuidetotheLakes）也描写，坎伯兰郡的谷地山民完全以自己的农场作物为生。伟大的社会主义作家西斯蒙迪和拉萨尔虽痛斥当代的工业构成，但心中仍向往上述的家庭工业制度。他们指出，在此制度下生存的人们虽然贫穷，但总体上却是兴盛的，生产过剩则绝不可能出现。而在我所讲的那个时代，现

代社会主义者所感叹的许多弊端已经出现，特别是在面向国外市场的工业领域。人们为了打入市场以获取高价带来的利润，因此就出现了对竞争状况的抱怨，我们也已听说了贸易波动和就业的不规则性。陈旧简单的生产状况和交易状况即将走远，国外贸易的影响即将全面渗入。

The home trade was still indeed much greater in proportion than now; but the exports had grown from about £7,000,000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to £14,500,000 in 1760. During that interval great changes had taken place in the channels of foreign commerce. In 1700 Holland was our great market, taking more than one-third of all our exports, but in 1760 the proportion was reduced to about one-seventh. Portugal, which in 1703 took one-seventh, now took only about one-twelfth. The trade with France was quite insignifica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lonies were now our chief markets, and a third of our exports went there. In 1770 America took three-fourths of all the manufactures of Manchester. In 1767 the exports to Jamaica were nearly as great as they had been to all the English plantations together in 1704. The shipping trade had doubled, and the ships themselves were larger. In 1732 ships 750 tons were considered remarkable; in 1770 there were many in Liverpool of 900 tons; but in this as in other branches of business progress was still slow, partial, local, thus presenting a striking contrast to the rapid and general advance of the next half-century.

事实上，当时国内贸易的比重比现在要大，但出口额也从十八世纪初的700万英镑增长至1760年的1450万英镑。在这期间，对外贸易方向发生了巨大变化。1700年，荷兰是英国的超大市场，英国三分之一的商品都出口到荷兰。但到1760年，这一比例已降低到七分之一。葡萄牙在1703年占英国出口额的七分之一，现在只占十二分之一左

右。英国对法国的贸易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当时的殖民地现在变成我们的主要市场，占英国出口额的三分之一。1770年，四分之三曼彻斯特的商品都输出到美国。1767年，英国对牙买加的出口近似等于1704年对所有英国殖民地的出口总和。航运业翻了一番，船只本身的重量也有所增大。1732年时，750吨的轮船就已很了不起，到1770年，利物浦的很多船只都达到了900吨。但这一领域和其他商业分支一样，都呈现出发展缓慢、发展不完全化与地域化的特点，因此与下半个世纪飞速的、整体性的进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Chapter V England in 1760 the Decay of the Yeomanry

第五章　1760年英国自耕农的没落

It is a reflection that must have occurred to everyone that the popular philosophy of the day, while in the region of speculation it has undermined ancient beliefs, has exerted in the practical world a distinctly conservative influence. The conception of slow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definite laws, undoubtedly tends to strengthen the position of those who offer resistance to radical changes. It may, however, well be doubted whether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s really such a support as it seems to be to those who would uphold the existing framework of society. It is certainly remarkable that the most recent legislation has been at once revolutionary in its character and justified by appeals to historical experience. I do not forget that the most distinguished exponent of the doctrine of evolution as applied to politics has developed a theory of government opposed to recent legislative reforms, but that theory is an a priori one. Those, on the other hand, who have applied the historical method to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cience of society, have shown an unmistakable disposition to lay bare the injustice to which the humbler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have been exposed, and to defend methods and institutions adopted for their protection which have never received scientific defence before.

当今的通俗哲学虽在理论意义上推翻了旧有观念，但现实中仍可清楚看到守旧观念的影响，这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体现。新的理念按照一定的规律缓慢发展，这无疑坚定了一些人对于彻底变革的抵制立场。然而，变革理论是否真如表面所示，能够维系当前的社会框架，

这还很值得怀疑。最新的立法已凸显了变革的特性，且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是合理的，这也是显著的事实。我记得最杰出的改革论者曾将之推及政治，提出一套反对法制改革的统治理论，但该理论只是推演而来的。另一方面，也有人将这种历史的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他们明显地倾向于揭露社会底层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并对于低层人士之前从未受到过科学上的保护，他们也维护各类科学保护措施和制度。

The fact is, that the more we examine the actual course of affairs, the more we are amazed at the unnecessary suffering that has been inflicted upon the people. No generalities about natural law or inevitable development can blind us to the fact, that the progress in which we believe has been won at the expense of much injustice and wrong, which was not inevitable. Perhaps this is most conspicuous in our land system, and we shall find with regard to it, as with regard to some other matters, that the more we accept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inquiry, the more revolutionary shall we tend to become in practice, For while the modern historical school of economists appear to be only exploring the monuments of the past, they are really shaking the foundations of many of our institutions in the present. The historical method is often deemed conservative, because it traces the gradual and stately growth of our venerable institutions; but it may exercise a precisely opposite influence by showing the gross injustice which was blindly perpetrated during this growth. The historical method is supposed to prove that economic changes have been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natural laws. It just as often proves them to have been brought about by the self-seeking action of dominant classes.

事实上，我们越去研究事情的真实过程，就会越感叹于人们受到

的苦难，而这苦难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引以为荣的进步是以太多不公和过失为代价换来的，任何自然规律的概论或不可阻挡的发展都不能令我们无视这一事实。或许这在英国的土地制度上最为明显。我们发现，就像其他某些方面一样，我们对历史探究方法的接受程度越高，在实践上就越具有革命性，因为现在的历史派经济学家只探究过去的记录，这实际是在动摇许多当代制度的基石。人们常认为历史的方法是保守的，因为对于我们看重的各项制度，历史的方法追寻的是其缓慢、严肃的形成过程，但这种方法显示了该过程中各种无端的不公平，从而带来了实际相反的影响。历史的方法应该证明经济变化是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但它通常只说明这些改变是由统治阶级的逐利行为所导致的。

It is a singular thing that no historian has attempted an adequate explanation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mall freeholders who, down to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ormed with their families one-sixth of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 and whose stubborn determination enabled Cromwell and Fairfax to bring the Civil War to a successful close. This neglect is the more remarkable, as economists have so emphatically dwelt upon the extraordinar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ed property in England and in countries like Germany and France. The modern reformer is content to explain the facts by the existence in England of a law of primogeniture and a system of strict settlement, but the explanation is obviously a superficial one. To show why in England the small landed proprietors have vanished, whilst in Germany and France they have increased and thriven,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r inquiries far back into the history of law, politics, and commerce. The result of a closer examination of the question is a little startling, for we find that the present distribution of landed property in England is in the main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system of political government which has made us a free peopl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ed property in France and Germany, which writer after writer points to as the great bulwark against revolution, is in the main due to a form of government that destroyed political liberty and placed the people in subjection to the throne.

小规模世袭地产所有者及其家族，到十七世纪末已占到英格兰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坚定的决心给克伦威尔（Cromwell）和费尔法克斯（Fairfax）带来了内战的胜利，但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对该群体的没落给出充分的解释。经济学家着重对英格兰与他国（如德、法）的土地分配做了对比研究，这又更加凸显了对此问题的忽视。现代改革者满足于英格兰的长子继承法和严格的居住权制度对此作出的解释，但这解释显然过于肤浅。为什么英格兰的小规模土地保有者逐渐消亡，而德法的土地保有者却反而增长并且繁荣？要研究这一问题，就有必要对法律、政治和商业进行历史的探究。深入探讨之后我们会有些惊讶，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英格兰的地产分配，主要缘于使我们都成为了自由国民的政治体系。而另一方面，许多著作相继指出，德法两国的土地分配制度是改革的一大壁垒，主要缘于破坏政治自由、将人民置于王权统治之下的另一统治形式。

Evidence in support of this conclusion is not difficult to adduce. The first fact which arouses our interest is that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t was estimated by Gregory King that there were 180,000 freeholders in England, and that, less than a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pamphleteers of the time, and even careful writers like Arthur Young, speak of the small freeholders as practically gone. The bare statement of this contrast is in itself most impressive. A person ignorant of our history during the intervening period might surmise that a great exterminatory war had taken place, or a violent social revolution which had caused a transfer of

the property of one class to another. But though the surmise in this particular form would be incorrect, we are nevertheless justified in saying that a revolution of incalculable importance had taken place, —a revolution, though so silent, of as great importance as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of 1831. “The able and substantial freeholders,” described by Whitelock, “the freeholders and freeholders” sons, well armed within with the satisfaction of their own good consciences, and without by iron arms, who stood firmly and charged desperately,“—this devoted class, who had broken the power of the king and the squires in the Civil Wars, were themselves, within a hundred years from that time, being broken, dispersed, and driven off the land. Numerous and prosperou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y had suffered something by the enclosures of the sixteenth; but though complaints are from time to time made in the seventeenth of the laying together of farms,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ir number underwent any great diminution during that time. In the picture of country life which we find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first yea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small freeholder is still a prominent figure. Sir Roger de Coverley, in riding to Quarter Sessions, points to the two yeomen who are riding in front of him, and Defoe, in his admirable Tour through England, first published a few years later, describes with satisfaction the number and prosperity of the Grey-coats of Kent (as they were called from their home-spun garments), whose political power forced the gentlemen to treat them with circumspection and deference. “Of the freeholders of England,” says Chamberlayne, in the State of Great Britain, first published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re are more in number and richer than in any country of the like extent in Europe. £40 or £50 a year is very ordinary, £100 or £200 in some counties is not rare; sometimes in Kent, and in the Weald of Sussex, £500 or £600 per annum, and £3000 or £4000 stock.” The evidence is conclusive that up to the Revolution of 1688

the freeholders were in mos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 important feature in social life.

支持这一结论的实例不难举证。第一个引起我们注意的实例就是十七世纪末，格列高利国王（GregoryKing）估测英格兰的世袭地产所有者有18万人，而不到100年的时间，小评论作家，甚至是阿瑟·杨格那样谨慎的作家，又曾写到小规模世袭地产所有者几乎已经消失。单是这一对照的简单陈述就已令我们感慨。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会猜测，也许此间发生了毁灭性的战争，或是剧烈的社会变革导致了资本由一阶级向另一阶级的转移。但尽管对此特殊情况的猜测有误，我们依然可以说此间一定发生了无比重要的变革——一场悄无声息、却和1831年的政治革新同等重要的变革。怀特洛克（Whitelock）曾记述道，“能干的、富裕的世袭地产所有者及其后代子孙，在内有着自身良心的满足，即便没有铁兵器的武装，他们仍在战乱中坚守和顽攻。”而这个甘于献身的阶层，他们在内战中推翻了王权和地主，此后不到一百年，其自身却遭到迫害、驱逐，甚至被剥夺了土地。虽有十五世纪的人数众多和繁荣，但到十六世纪却因圈地运动而蒙受苦难。尽管在十七世纪，他们对农场的兼并时有不满，但并无例证说明此期间有人数上的大幅减少。根据十八世纪初年的文献对当时生活的描写，我们知道小规模世袭地产所有者仍扮演者重要角色。罗杰·德·科弗利爵士（SirRogerdeCoverley）曾提到他在前往州法庭的路上遇到的骑在他前面的两个自耕农；另外，数年后首次出版的备受好评的《大不列颠全岛游记》中，笛福也欣喜地描写了肯特郡“灰衣族”（由其家纺的服装而得名）的庞大和兴盛，其政治力量使得乡绅阶级也不得不尊重周到地对待他们。张伯伦（Chamberlayne）在《大不列颠王国》（StateofGreatBritain）（第一版出版于十七世纪末期）中说道：“英格兰的世袭地产所有者，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该群体的数量都多、都更加富裕。每年40英镑或50英镑的收入是很普遍的，有些郡100到200英镑的年收入已不稀奇；肯特郡、萨塞克斯郡的威尔德地区有时年收入高达500至600英镑，资本积累高达3000至4000英镑。”这毋庸置疑地证明了：直到1688年革命前，世袭地产所有者遍

及英国大部分地区仍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

If, however, we ask whether they had possessed, as a class, any political initiative, we must answer in the negative. In the lists of the Eastern Counties" Association, formed in the Civil War (the eastern counties were the districts, perhaps, where the freeholders were strongest), we find no name which has not appended to it the title of gentleman or esquire. The small landed proprietor, though courageous and independent in personal character, was ignorant, and incapable himself of taking the lead. There was little to stimulate his mind in his country life; in agriculture he pursued the same methods as his forefathers, was full of prejudices, and difficult to move. The majority of this class had never travelled beyond their native village or homestead and the neighbouring market-town. In some districts those freeholders were also artisans, especially in the eastern counties, which were still the richest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most subject to foreign influence. But, on the whole, if we may judge from the accounts of rather later times, the yeomen, though thriving in good seasons, often lived very hard lives, and remained stationary in their habits and ways of thinking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y were capable in the Civil War, under good leadership, of proving themselves the most powerful body in the kingdom; but afte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had been secured, and the great landowners were independent of their support, they sank into political insignificance. The Revolution of 1688, which brought to a conclusion the constitutional strugg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as accomplished without their aid, and paved the way for their extinction. A revolution in agricultural life was the price paid for political liberty.

但是，如果要问世袭地产所有者作为一个阶层是否拥有政治上的主动性，那么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内战时成立的东部地区协会（这里的东部地区或许指世袭地产所有者最密集的地区），我们在其名单上找不到不带地主或乡绅头衔的名字。小规模的土地所有者，虽然有性格上的勇敢和自立，但终究是缺乏知识的，不能担任领袖的角色。农村生活不能给人思想上的点化；农业劳作方式也和祖辈一样，充满了偏激，固执难改。他们大多数人一生都未曾走出自己的村庄、农场或是临近的集镇。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世袭地产所有者同时也是工匠。东部地区是国内最富裕的地方，受到外国的影响也最大。但是总地来说，若我们以后来的记述判断，自耕农虽曾繁荣过一段时期，但他们的生活却常是艰难的，代代沿袭的行为习惯和思想方式难以改变。内战时期，在英明的领导下，他们证明了自己是国家最强大的阶层；但此后当立宪政体得到巩固，大地主不再依赖于他们的支持，他们因此失去了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地位。1688年的革命为十七世纪的立宪斗争画上了句点，这场革命没有他们的支援，这为他们日后的消亡埋下了伏笔。为了换取政治自由，必须有一场农业革命作为代价。

At first, however, the absorption of the small freeholders went on slowly. The process of disappearance has been continuous from about 1700 to the present day, but it is not true to say, as Karl Marx does, that the yeomanry had disappeared by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t was not till the very period which we are considering, that is to say about 1760, that the process of extinction became rapid. There is conclusive evidence that many were still to be found about 1770. There were at that time still 9000 freeholders in Kent.

然而，小规模世袭地产所有者的消亡起初是缓慢的，这个过程从约1700年一直持续到今天。但如卡尔·马克思所说，自耕农在十八世

纪中期前后就已消失，也是不正确的。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也就是1760年左右，这个消亡进程开始加快。有确凿的事实证明，1770年左右仍有自耕农存在，当时肯特郡尚有9000名世袭地产所有者。

Even as late as 1807, estates in Essex, if divided, were bought by farmers at high prices, and there was some prospect of landed property coming back to the conditions of a century before, “when our inferior gentry resided upon their estates in the country”; and about the same date there were in Oxfordshire “many proprietors of a middling size, and many small proprietors, particularly in the open fields.” They were especially strong in Cumberland, the West Riding, and parts of the East Riding. In the Vale of Pickering in 1788 nearly the whole district belonged to them, and no great landowner had been able to get a footing. But in 1788 this was already an exceptional case, and in other writers of that period we find a general lament at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yeoman. Arthur Young “sincerely regrets the loss of that set of men who are called yeomen… who really kept up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nation,” and is “loth to see their lands now in the hands of monopolising lords;” and in 1787 he admits that they had practically disappeared from mos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with the yeomen went the small squires, victims of the same causes.

甚至到了1807年，埃塞克斯的地产被分割时仍被农民以高价购买，其大有可能回到一个世纪前的状态，“那时小地主们仍居住在乡村自己的土地上”；同一时期，牛津郡，“特别是在开放耕地中小规模土地所有者还在那里。”坎伯兰郡、约克郡西区、部分约克郡东区，这些地区的该群体势力尤其强大。1788年，皮克灵谷（ValeofPickering）几乎整片土地都为他们所有，没有一个大地主能

获一席之地。但1788年时这已是个别现象，当时的其他作品中我们看到有对自耕农群体没落的惋惜。阿瑟·杨格“由衷地为这个名为‘自耕农’的群体的消失感到遗憾，他们真正是维护了民族独立的群体”，他“不愿看到他们的土地现在却到了垄断地主的手里。”1787年，阿瑟·杨格承认自耕农在国内大部分地区几乎已经消失。小乡绅们与之一样，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走向没落。

These causes, as I stated above, are to be sought less in economical tha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facts. The chief of them was our peculiar form of government.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landed gentry were practically supreme. Not only national but local administration was entirely in their hands, and, as a natural consequence, land, being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was eagerly sought after. We may contrast France and Prussia, where the landowners had no political power as such, and where, in consequence, small properties remained unassailed. The second fact is the enormous development of the mercantile and moneyed interest. The merchants could only obtain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position by becoming landowners. It is true that Swift says that “the power which used to follow land had gone over to money,” and that the great Turkey merchants, like Addison's Sir Andrew Freeport, occupied a good position; but few mere merchants were in Parliament, and Dr Johnson made the significant remark that “an English merchant is a new species of gentleman.” To make himself a gentleman, therefore, the merchant who had accumulated his wealth in the cities, which, as we have seen, were growing rapidly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ith an expanding commerce, bought land as a matter of course. Hence the mercantile origin of much of our nobility. James Lowther, created Earl of Lonsdale in 1784, was great-grandson of a Turkey merchant; the ancestor of the Barings was a clothier in Devonshire;

Anthony Petty, father of Sir W. Petty, and the ancestor on the female side of the Petty-Fitzmaurices, was a clothier at Romsey, in Hampshire; Sir Josiah Child's son became Earl of Tilney. The landowners in the West of England, “who now,” in Defoe's words, “carry their heads so high,” made their fortunes in the clothing trade. And not only did a new race of landowners thus spring up, but the old families enriched themselves, and so were enabled to buy more land by intermarriage with the commercial magnates. The Fitzmaurices, for instance, inherited the wealth of the Pettys: Child's daughter married the Marquis of Worcester, and, by a second marriage, Lord Grenville of Potheridge; Lord Conway and Walpole married daughters of John Shorter, merchant of London. “I think I remember,” said Sir R. Temple between 1675 and 1700, “the first noble families that married into the City for money.” “Trade,” said Defoe, “is so far here from being inconsistent with a gentleman, that, in short, trade in England makes gentlemen; for, after a generation or two, the tradesmen's children, or at least their grandchildren, come to be as good gentlemen, statesmen, parliament-men, privy-councillors, judges, bishops, and noblemen, as those of the highest birth, and the most ancient families.” Contrast this fusion of classes with the French society of the last century, with its impoverished nobility, living often on the seignorial rights and rent-charges of their alienated estates, but hardly ever intermarrying with the commercial classes; or that of Prussia, where the two classes remained entirely separate, and could not even purchase one another's land.

如我前面所说，这些原因很少在经济层面，而更多是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探讨。其中的首要原因是英国特殊的政治形态。大革命之后，地主阶级实际拥有了最高的地位。国家行政和地方行政都掌握在地主手里，自然地，作为社会和政治影响力根基的土地就更加受到追

抢。我们可以和法国与普鲁士进行对比，这两个国家的地主阶级没有这样的政治权力，因此小规模的地产并未受到侵犯。第二个事实是商界和金融界的快速发展。商界阶层只有成为地主才能获得政治力量和社会地位。斯威夫特说："曾经因土地而获有的权利现在已需要靠金钱来获得。"这是很正确的，确实有土耳其的贸易商们，比如艾迪生（Addison）的安德鲁·弗里波特爵士，就这样取得了优越的地位；但议会议员中却极少有人只是单纯的商人，约翰逊博士（DrJohnson）曾有著名言论说："英格兰商人可谓是新一代的绅士阶层。"我们看到，都市因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贸易的扩大而迅速发展，那里聚集着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为了成为乡绅，他们自然会去购买土地。自此英国的许多贵族都出身于商界。詹姆士·劳瑟于1784年创立了朗斯代尔家族，他就是一位土耳其贸易商人的曾孙；巴林家族的先人是德文郡的织布业者；安东尼·佩蒂，即威廉姆·佩蒂爵士的父亲，同时也是佩蒂-菲茨莫里斯家族（Petty-Fitzmaurices）的女系祖先，他在汉普夏的拉姆西（Romsey）从事织布行业；乔赛亚·蔡尔德爵士（SirJosiahChild）之子后来则成为了蒂尔尼伯爵（EarlofTilney）。英格兰西部的地主因织布行业而发家致富，用笛福的话说他们"如今可以扬眉吐气了"。一个新的地主阶层就此产生，不仅如此，旧家族的财富积累，加之与商界巨头的联姻，又使他们有能力购买更多的土地。比如菲茨莫里斯家族，他们继承了佩蒂家族的家产：蔡尔德的女儿与伍斯特侯爵成婚，后又与莱斯布里奇的格伦维尔男爵（LordGrenvilleofPotheridge）再婚；康韦（Conway）男爵与沃波尔（Walpole）男爵则分别娶了伦敦商人约翰·肖特的女儿。1675年到1700年间，理查德·坦普尔爵士曾说："我想我还记得第一代贵族世家为了金钱而与富商们联姻。"笛福说："在这里，贸易不会和贵族有所冲突，简单来说，是英格兰的贸易造就了贵族；这是因为一两代人之后，贸易商人的孩子，或至少是其孙子，都像那些身世高贵或门第富足的人一样，都成为了地主、政客、议员、枢密院顾问、法官、主教和贵族。"这两个阶层的结合可与上一世纪的法国进行对比，法国的贵族生活拮据，通常只靠领土权利和转让的土地租费过活，很少和商界人士联姻；或者与普鲁士相对比，其贵族与商界几乎毫无交往，甚至不能彼此购买土地。

I have established two facts: the special reason for desiring l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as a condi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prestige, and the means of buying land on the part of the wealthy merchants or of the nobility and greater gentry enriched by matrimonial alliances with the great commercial class. Now here is a piece of evidence to show that it was the accepted policy of the large landowners to buy out the yeoman. The land agent, whom I have so often quoted, lays down as a maxim for the model steward that he “should not forget to make the best inquiry into the disposition of the freeholders, within or near any of his lord's manors, to sell their lands, that he may use his best endeavours to purchase them at as reasonable a price as may be for his lord's advantage and convenience.”

以上我已陈述了两个事实：大革命之后，土地成为政治力量和社会名望的根基，人们由此热衷于买地；富商、贵族或豪绅通过与商界人士联姻的方式购买土地。事实证明：买断自耕农的土地是大地主们的一致政策。我经常引用到的土地代理人，他们严格遵守模范管事的行为准则，即“一定要尽力调查地主领地内或领地附近世袭地产所有者出卖土地的意向，从主人的利益和便利出发，尽最大的努力以尽量少的钱为主人买到土地”。

On the other hand, as a result of the supremacy of the great landowners in Parliament, their own estates were artificially protected. The system of strict settlements, introduced by Sir Orlando Bridgman in 1666, though not so important as it is often made out to be, prevented much land from coming into the market, though it did not prevent merchants from buying when they wished. The custom of primogeniture checked the division of

estates by leading to the disuse of inheritance by gavelkind, and similar customs. In Cumberland primogeniture was introduced among the freeholder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Kent there was, in 1740, nearly as much gavelkind as before the disgavelling Acts began, but thirty years later it was being superseded by primogeniture. It was during these thirty years that the process of concentration in that county first assumed formidable proportions. In Pickering, on the other hand, where the law of equal division still held its own, small landowners al so, as we have seen, survived after their extinction in most parts of England.

另一方面，由于议会中的大地主阶层拥有至高的权利，他们自己的土地就受到了人为的保护。奥兰多·布里奇曼爵士于1666年引入了严格的居住权制度，其重要程度虽不及当初制定时所预想的，且也没能阻止富商想方设法地买地，但此制度终归还是避免了许多土地流入市场。长子继承的习俗导致了男子均分土地继承制和其他类似制度的废除，从而遏制了土地的分割。长子继承制于十六世纪起在坎伯兰的世袭地产所有者中间实行。在1740年的肯特郡，实行均分制的案例几乎与非均分制启用之前数量相当，但30年后该制度就被长子继承制所代替。就是在这三十年间，肯特郡的聚集过程首次占据了极大的比例。而在皮克灵（Pickering），平均分配法还在继续适用，我们看到，虽然小地主阶级在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已不存在，但皮克灵却仍存在着这一群体。

A third result of landlord supremacy was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ommon-field system was broken up. Allusion has already been made to enclosures, and enclosures meant a break-up of the old system of agriculture and a redistribution of the land. This is a problem which involves delicate questions of justice. In Prussia, the change was effected by impartial legislation; in England, the work

was done by the strong at the expense of the weak. The change from common to individual ownership, which was economically advantageous, was carried out in an iniquitous manner, and thereby became socially harmful. Great injury was thus done to the poor and ignorant freeholders who lost their rights in the common lands. In Pickering, in one instance, the lessee of the tithes applied for an enclosure of the waste. The small freeholders did their best to oppose him, but, having little money to carry on the suit, they were overruled, and the lessee, who had bought the support of the landless “house-owners” of the parish, took the land from the freeholders and shared the spoil with the cottagers. It was always easy for the steward to harass the small owners till he forced them to sell, like Addison's Touchy, whose income had been reduced by lawsuits from £80 to £30, though in this case it is true he had only himself to blame. The enclosure of waste land, too, did great damage to the small freeholders, who, without the right of grazing, naturally found it so much the more difficult to pay their way.

地主取得权力导致的第三个结果是共有地体制的瓦解，于是就有圈围土地的趋势，圈地意味着旧的农业制度的废止和土地的重新分配。这个过程涉及公正这一敏感问题。在普鲁士，公正的立法保证了这一过程的进行，而在英格兰，强者得到利益却是以弱者受到压制为代价的。土地所有权由公有到私有的转变在经济层面上是有益的，但实施过程极不公正，因此在社会意义上是有害的。穷困且知识贫乏的世袭地产所有者受到极大的利益损害，丧失了对共有地的权利。在皮克灵曾有一个事例，教区的承租人有意圈占荒地，小规模世袭地产所有者虽然尽全力反对，但他们缺少诉讼资金，因此仍以失败告终，而承租人通过金钱收买，赢得了牧区内不占有土地的“房主们”的支持，进而从小规模土地所有人手中得到了土地，再与佃农们瓜分。土地管事总是有办法滋扰小规模土地所有人，直到迫使他们答应出卖土地，就像艾迪生的塔奇（Touchy），他的收入因诉讼而由80英镑减少到

30英镑，但他的确只能责备自己。荒地的圈占同样给小规模世袭地产所有者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他们失去了放牧的权利，自然更难以维持生计。

Though the economical causes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yeomen were comparatively unimportant, they served to accelerate the change. Small arable farms would not pay, and must, in any case, have been thrown together. The little farmers, according to Arthur Young, worked harder and were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as low in the comforts of life as the day-labourers. But their wretchedness was entirely owing to their occupying arable instead of grass lands. And apart from this, undoubtedly, the new class of large farmers were superior, in some respects, to the too unprogressive yeomen, —“quite a different sort of men.In point of knowledge and ideas,” with whose improved methods of agriculture the yeomen found it difficult to compete. A further economic cause which tended to depress many of the yeomen was the gradual destruction of domestic industries, which injured them as it injures the German peasant at the present day, in Cumberland the yeomen began to disappear when the spinning-wheel was silenced. The decay of the home manufacture of cloth seems to have considerably affected the Grey-coats of Kent. And finally, as the small towns and villages decayed, owing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farms and of industry, the small freeholders lost their market, for the badness of the roads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send their produce far. Hence the small freeholders survived longest where they owned dairy-farms, as in Cumberland and the West Riding, and where domestic industry flourished, and they had a market for their products in their own neighbourhood.

虽然自耕农消亡背后的经济原因相对而言并不重要，却起到了加速变革的作用。小规模的可耕土地收益无多，因此无论如何要把土地合并起来。据阿瑟·杨格说，底层农民比日工更卖力地劳作，但实际和日工一样过着低劣的生活。他们的悲苦都是因为所占有的是耕地而非草地。此外在某些方面，新的大农户阶层无疑比落后的自耕农民优越得多。“在知识和思想方面，自耕农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他们凭借改良的农耕模式根本很难抗衡下去。导致自耕农没落的一个更深层的经济原因是家庭工业的垮塌，正如当今德国所发生的一样，这大大打击了自耕农群体。当坎伯兰的手纺车退出使用，那里的自耕农也就开始消失。家庭织布业的衰退似乎也给肯特的“灰衣族”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最终，随着小城市和村庄的衰落，由于农场和工业的联合，加之交通状况给货运造成的困难，小规模世袭地产所有者自此失去了市场。于是，在小规模世袭地产所有者还保有乳牛场的地区，如坎伯兰和约克郡西区，或家庭工业繁荣的地区，小规模世袭地产所有者的产品在临近区域仍占有部分市场，这些地区的小规模世袭地产所有者因此得以余留得最久。

When once the ranks of the yeomanry had been appreciably thinned, the process of extinction went on with ever-growing rapidity. The survivors became isolated. They would have no one of their own station to whom they could marry their daughters, and would become more and more willing to sell their lands, however strong the passion of possession might be in some places. The more enterprising, too, would move off to the towns to make their fortunes there, just as at the present day the French peasants are attracted to the more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life of the town. Thus Sir Robert Peel's grandfather was originally a yeoman farming his own estate, but being of an inventive turn of mind he took to cotton manufacturing and printing. This was particularly the case with the small squires, who grew comparatively poorer and poorer, and found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keep pace with the rise in the

standard of comfort. Already,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complaint had been raised that the landowners were beginning to live in the county towns. Afterwards, the wealthier came up to London; Sir Roger de Coverley had a house in Soho Square. The small country gentleman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him and his richer neighbours more and more; and as he had none of the political power attaching to land-for the great landowners had the whole administration in their hands-there was every inducement for him to sell and invest his money in a more profitable manner.

当自耕农群体被渐渐削弱，其消亡过程就更加迅速起来，余留下来的也就因此变得孤立。他们在自己的群体里已找不到门当户对者迎娶自己的女儿，此外他们虽然极想拥有某些地方的所有权，但也不得不出卖土地。有野心的人则像今天的法国农民一样，受到城市新奇刺激生活的吸引，于是迁移到城镇去淘金。罗伯特皮尔爵士的祖父原来是在自家农庄耕作的农民，但头脑灵光的他后来转向木棉制造业和印刷业。这是小乡绅阶层当中常有的事，因此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贫困，且发现自己更远地落在了生活水平线之后。对于土地所有人开始迁到城镇，在十七世纪末已有许多怨言。随后更富有的人来到伦敦，罗杰·德·科弗利爵士还在苏荷广场建起了一座宅邸。小乡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与周围富人之间的差距，他们自己虽有土地却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所有行政权都在大地主手里，因此他们受到利益的驱使，于是出售土地，改换更为盈利的投资手段。

To summarize the movement: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yeomen would in any case have partly disappeared, owing to the inevitable working of economic causes. But these alone would not have led to their disappearance on so large a scale. It was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the age, the overwhelming importance of land, which made it impossible for the yeoman to keep his grip upon the soil.

对于这一趋势，总结说来，作为各种经济原因的必然结果，当时的自耕农或许已经部分减少，但只是经济原因是不会造成如此大规模的群体绝迹的。使自耕农无法维系土地所有权的原因，应该是当时的政治形式以及土地的绝对重要性。

Chapter VI England in 1760 The Condition of the Wage-Earners

第六章　1760年英国雇佣工人的生活状况

The condi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 had very much improv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is average daily wage had been 10 1/4d., while the average price of corn had been 38s. 2d. During the first sixty yea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is average wages were 1s., the price of corn 32s. Thus, while the price of corn had, thanks to a succession of good seasons, fallen 16 per cent, wages had risen to about an equal extent, and the labourer was thus doubly benefited. Adam Smith attributes this advance in prosperity to “an increase in the demand for labour, arising from the great and almost universal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allows that wealth had only advanced gradually, and with no great rapidity. The real solution is to be found in the slow rate of increase in the numbers of the people. Wealth had indeed grown slowly, but its growth had nevertheless been more rapid than that of population.

农业工人的生活状况从十八世纪初以来已有了极大改善。十七世纪时其平均日工资为10.25便士，当时的玉米平均价格是38先令2便士。十八世纪的前六十年，工人的平均日收入是1先令，玉米价格为32先令。像这样，由于连年的丰收，玉米价格下降了16%，工资却有了同等程度的增长，因此工人的福利当然翻了一倍。亚当·斯密将这种繁荣归结为“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这是由全国范围的经济繁荣带来的”。但他同时承认，财富的增长是缓慢的，而并非是疾速的。其真正原因存在于人口数量增长缓慢。财富的积累虽慢，但比人口的增长却也快得多。

The improvement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er was thus due to an increase in real and not only in nominal wages. It is true that certain articles, such as soap, salt, candles, leather, fermented liquors, had, chiefly owing to the taxes laid on them, become a good deal dearer, and were consumed in very small quantities; but the enhanced prices of these things were more than counterbalanced by the greater cheapness of grain, potatoes, turnips, carrots, cabbages, apples, onions, linen and woollen cloth, instruments made of the coarser metals, and household furniture. Wheaten bread had largely superseded rye and barley bread, which were “looked upon with a sort of horror.” wheat being as cheap as rye and barley had been in former times. Every poor family drank tea once a day at least—a “pernicious commodity,” a “vile superfluity,” in Arthur Young'seyes. Their consumption of meat was “pretty considerable”; that of cheese was “immense”. In 1737 the day-labourers of England, “by their large wages and cheapness of all necessaries,” enjoyed better dwellings, diet, and apparel in England, than the husbandmen or farmers did in other countries.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as indeed about his best time, though a decline soon set in. By 1771 his condition had already been somewhat affected by the dear years immediately preceding, when prices had risen much faster than wages, although the change had as yet, according to Young, merely cut off his superfluous expenditure.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men had begun to look back with regret upon this epoch in the history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 as one of a vanished prosperity. At no time since the passing of the 43d of Elizabeth, wrote Eden in 1796, “could the labouring classes acquire such a portion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es of life by a day'swork, as they could before the late unparalleled advance in the price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不仅由于名义工资的提高，更因为实际工资的增长。诚然，由于对某些商品如肥皂、食盐、蜡烛、皮革、酒类等进行征税，其价格因此而上涨；而另一些商品如谷物、马铃薯、胡萝卜、卷心菜、苹果、洋葱、亚麻、毛料、粗金属制品、家具等价格低廉，这又抵消了上述高价商品的花销且有剩余。小麦面包已基本代替了黑麦和大麦面包，因为其价格已和那时的黑麦和大麦一样低廉，人们对黑麦和大麦“都感到痛恨不已”。即使是贫穷家庭，每天也会喝上一次茶。在阿瑟·杨格看来，茶是一种“有害产品”和“不良过剩品”。工人的肉类消费是“很可观的”，其奶酪消费则是“巨大的”。1737年，英格兰日工“挣着高工资，享受着低价的日常必需品”，他们的衣食住行比别国的农民都要更好。十八世纪中期的确是工人的鼎盛时期，即使很快已有走下坡路的趋势。1771年，他们的生活状况已受到之前价格上涨期的影响（那时物价上涨超过了工资的增长速度），不过据阿瑟·杨格说，这一变化只是令他们不再有不必要支出。到十八世纪末，人们回头看农业工人的这段历史，只能对其曾经的繁盛感到遗憾。伊登于1796年写到，自伊丽莎白的第43年度法案通过以后，再也没有一个时期“使工人阶级如生活必需品涨价之前那样凭一天的工资可以获得如此多的必需品和便利品了”。

Nor were high wages and cheap food their only advantages. Their cottages were often rent-free, being built upon the waste. Each cottage had its piece of ground attached, though the piece was often a very small one, for the Act of Elizabeth, providing that every cottage should have four acres of land, was doubtless unobserved, and was repealed in 1775. Their common rights, besides providing fuel, enabled them to keep cows and pigs and poultry on the waste, and sheep on the fallows and stubbles. But these rights were already being steadily curtailed, and there was “an open war against cottages.” consequent on the tendency to consolidate holdings into large sheepfarms. It was becoming customary, too, for unmarried

labourers to be boarded in the farmers'houses.

工人的优势不仅是享有高工资和廉价食品。工人的房子通常建在荒地，所以是免地租的。每座房屋都有一块附属地，不过很多情况下附属地的面积并不大。伊丽莎白法案规定每座房屋有一块4英亩的附属土地，当然该法案并未执行，且在1775年被废止。农业工人的公共权利除了能得到燃料，还包括在荒地上养牛、猪和禽类，利用休耕地和残梗牧羊。但这些权利已受到遏制，随着所有地被合并为大牧羊场，“一场公开的战争”已经打响。未婚工人寄宿在农户家里也已变得平常。

On the whole,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 at any rate in the south of England, was much better off in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an his descendants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At the later date wages were actually lower in Suffolk, Essex, and perhaps parts of Wilts, than they were at the former; in Berks they were exactly the same; in Norfolk, Bucks, Gloucestershire, and South Wilts, there had been a very trifling rise; with the exception of Sussex and Oxfordshire, there was no county south of the Trent in which they had risen more than one-fourth. Meanwhile rent and most necessaries, except bread, had increased enormously in cost, while most of the labourer'sold privileges were lost, so that his real wages had actually diminished. But in the manufacturing districts of the north his condition had improved. While nominal wages in the south had risen on the average 14 per cent., here they had risen on the average 66 per cent. In some districts the rise had been as great as 200 per cent. In Arthur Young'stime the agricultural wages of Lancashire were 4s. 6d.—the lowest rate in England; in 1821 they had risen to 14s. It may be roughly said that the relative positions of the labourer north and

south of the Trent had been exactly reversed in the course of a century.

总的来看，十八世纪中期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工人，无论如何也比十九世纪中期他的后代要富足得多。后来的萨福克、埃塞克斯，也许还有威尔特郡部分地区，其工资实际已比前一时期要低；伯克郡的工资在这两个时期未有变化；诺福克、巴克斯、格洛斯特、威尔特南部，这些地区的工资略有上涨；在特伦特河以南的地区，除了萨塞克斯和牛津，没有一个郡的工资上涨超过四分之一。同时，地租和面包以外的大多必需品都大幅涨价，而工人的特殊权利却几乎都已失去，因此他们的工资实际是在减少的。但北方制造产业区的工人状况却有所不同。当南方的名义工资平均上涨了14%，北方的工资则平均上涨了66%。在一些地区，涨幅甚至达到了200%。在阿瑟·杨格时期，兰开夏的农业收入是4先令6便士，为英格兰的最低水平；1821年收入涨至14先令。大概可以说，特伦特以南及以北的工人，其相对地位在一百年间完全反了过来。

In Arthur Young'stime the highest wages were to be found in Lincolnshire, the East Riding, and, following close upon these, the metropolitan and eastern counties. At first sight the high rate of wages in the first two counties seems to contradict the general law about their relative condition in north and south. But on investigation we find it to be due to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Arguing on the deductive method, we should conjecture a large demand for or a small supply of labour; and, in fact, we find both these influences in operation. The population had actually diminished, in Lincolnshire from 64 to 58 to the square mile, in the East Riding, from 80 to 71; this was partly due to the enclosures and the conversion of arable to pasture, partly to the increase of manufactures in the West Riding. Thus the labourers had been

drawn off to the latter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y were being driven out of the agricultural districts. And for the remaining labourers there was a great demand in public works, such as turnpike-roads and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s on a large scale.

在阿瑟·杨格时代，最高收入者聚集在林肯郡、约克郡东区，另外就是大都市和东部地区。起先看来，这两个郡的高收入率与南北部相对状况的一般规律似有冲突，但调查之后我们发现，这是由一些例外的情况引起的。以推演法来研究，我们可以推测，可能是劳动者资源少，抑或是对劳动力需求很大造成的；而事实上，我们发现两个因素都在起作用。人口确实在减少，林肯郡的人口由64人/平方英里减少到58人/平方英里，约克郡东区人口由80人/平方英里减少到71人/平方英里。这一事实，一是由于圈地行为以及耕地向牧场的转化，二是由于约克郡西区制造业的增长。于是，工人们被驱赶到大都市和东部地区，同时被驱逐出耕地。余下的工人们为公共事业岗位所需要，比如收取道路通行税、大规模的农业改良等等。

But there were many local variations of wages which are far less easy to bring under the ordinary ru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re was often the greatest inequality in the same county. In Lincolnshire, for instance, wages varied from 12s. 3d. to 7s., and even 6s. It was at this very time that Adam Smith, arguing deductively from his primary axiom that men follow their pecuniary interest, enunciated the law that wages tend to an equality in the same neighbourhood and the same occupation. Why then these variations? Adam Smith himself partly supplies the answer. His law pretends to exactness only “when society is left to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Now this was impossible when natural tendencies were diverted by legal restrictions on the movement of labour, such as the law of settlement, which resulted in confining every labourer

to his own parish. But we must not seek the cause of these irregularities of wages merely in legal restrictions. Apart from disturbing influences such as this, men do not always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pecuniary interest; there are other influences at work affecting their conduct. One of the strongest of these is attachment to locality. It was this influence which partly frustrated the recent efforts of the Labourers' Union to remove the surplus labour of the east and south to the north. Again, there are apathy and ignorance, factors of immense importance in determining the action of the uneducated majority of men. In 1872 there were labourers in Devon who had never heard of Lancashire, where they might have been earning double their own wages. Human beings, as Adam Smith says, are “of all baggage the most difficult to be transported,” though their comparative mobility depends upon the degree of their education,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s, and the industrial conditions of any particular time. The English labourer to-day is far easier to move than he was a hundred years ago. In a stirring new country like America there is much more mobility of labour than in England.

但是工资的地域差异不能简单地由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法则来解释。同一郡的工资常常相差悬殊。如林肯郡的工资，高的达到12先令3便士，低的仅有7便士，甚至只有6便士。就是在此时期，亚当·斯密由他之前的原理，即人总是追随自己的现金利益的进行推演，进而阐述出这样一个法则：同一地域同一行业的从业者其工资总是趋同的。那么差异又是从何而来呢？亚当·斯密给出了一部分原因。他说该法则只在“社会完全遵循自然进程的情况下”适用。而现在这个条件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自然的导向会被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法律所带偏，例如居住法，就把每个劳工限制在自己的牧区。但我们不能仅从立法角度寻找工资的不规则性原因。除了法律的干扰因素以外，人们并不总是追求金钱利益，还有其他因素左右着人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对乡土的依恋。工会曾试图将南北两地的剩余劳动力向北部转移，但这一努力并未成功。正是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当然还有冷漠和无知这样极为重要的因素决定着这一未受教育群体的行为。1872年，德文郡的有些工人从未听说过兰开夏，而兰开夏的劳工工资是他们的两倍。虽然人类的相对流动性取决于特定时代人类的受教育程度、通讯状况和产业形势，但正如亚当·斯密所言，人类仍然是“所有运输物中运送难度最大的”。今天的英格兰劳工流动比起一百年前要容易得多了。而在美国这样活跃的新型国家里，其劳工流动性又要更强于英格兰。

Turning from the agricultural wage-earners to those engaged in manufactures, we find their condition at this period on the whole much inferior to what it is now, in spite of the widening gulf between capitalist and labourer, the status of the artisan has distinctly improved since Adam Smith's time. His nominal wages have doubled or trebled. A carpenter then earned 2s. 6d. a day; he now earns 5s. 6d. A cotton weaver then earned 5s. a week, he now earns 20s., and so on. But it is difficult to compare the condition of the artisan as a whole at the two periods, because so many entirely new classes of workmen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for instance, the engineers, whose Union now includes 50,000 men earning from 25s. to 40s. a week. And if wages have on the whole very greatly increased, there were, on the other hand, some obvious advantages which the artisan possessed in those days, but has since lost. For 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still lived to a very great extent in the country. The artisan often had his small piece of land, which supplied him with wholesome food and healthy recreation. His wages and employment too were more regular. He was not subject to the uncertainties and knew nothing of the fearful sufferings which his descendants were to endure from commercial fluctuations, especially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free

trade. For the whole inner life of industry was, as we have seen,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what it now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workmen and their employers was much closer, so that in many industries they were not two classes but one. As among the agriculturists the farmer and labourer lived much the same life-for the capitalist farmers as a class were not yet in existence-and ate at the same board, so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journeyman was often on his way to become a master.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was, indeed, in all respects more equal. Landed property, though gradually being concentrated, was still in a far larger number of hands, and even the great landlords possessed nothing like their present riches. They had no vast mineral wealth, or rapidly developing town property. A great number of the trading industries, too, were still in the hands of small capitalists. Great trades, like the iron trade, requiring large capital, had hardly come into existence.

讨论过农业工人的情况再来看工业工人，我们发现这一时期他们的情况整体来看不如现在，虽然资本家和工人间差距增大，但技工的状况自亚当·斯密时期以来有了极大改观，其名义工资已增长到两倍甚至三倍。过去木工每天工资是2先令6便士，现在是5先令6便士；纺织工人过去每周收入5先令，现在是20先令，等等。但要对技工之前和现在的状况做整体的比较是有困难的，因为过去的一百年间又形成了很多新的阶级，如工程师群体，其工会现已有5万人，每周工资由25先令到40先令不等。如果说技工的工资整体上有了大幅上涨，那么另一方面，他们曾经必然享有的利益，今天却已享受不到了，这是由于制造业从业人口大部分仍居住在农村。技工原来拥有自己的一块土地，供给他们健康的食物和有益的消遣，其工资和工作也是很稳定的，他们不会因不确定因素而焦虑，也不会有可怕的痛苦，而他们的子孙后代，特别是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前，却要因商业波动而一一承受这些苦恼。我们又看到，工业的内部生活与现在完全不同。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要近得多，所以对很多工业而言，工人与雇主并非两个

阶级，而实际是一个阶级。正如农业从业者当中，农场主与劳工都是一样地生活吃住（因为资本家农场主作为一个阶级尚未出现），同样在制造业，学徒期满的工人也往往能成为技师。此外，各个方面的财富分配也更均衡。土地财产虽然处于缓慢合并的过程当中，但依然掌握在众多人手里，即便大地主阶级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多的财富。他们没有丰盈的矿产，也没有在迅速发展的城市中占有财产。很多贸易产业也仍然为小资本家所有。需要大量资金的大型贸易行业（如钢铁业）则几乎尚未出现。

Chapter VII The Mercantile System and Adam Smith

第七章　重商主义与亚当·斯密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industrial England of 1760 and the industrial England of to-day is not only one of external conditions. Side by side with the revolution which the intervening century has effected in the methods and organisation of production, there has taken place a change no less radical in men'seconomic principles, and in the attitude of the State to individual enterprise. England in 1760 was still to a great extent under the medieval system of minute and manifold industrial regulations. That system was indeed decaying, but it had not yet been superseded by the modern principle of industrial freedom.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 of the medieval system we must go back to a time when the State was still conceived of as a religious institution with ends that embraced the whole of human life. In an age when it was deemed the duty of the State to watch over the individual citizen in all his relations, and provide not only for his protection from force and fraud, but for his eternal welfare, it was but natural that it should attempt to insure a legal rate of interest, fair wages, honest wares. Thing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man'slife were not to be left to chance or self-interest to settle. For no philosophy had as yet identified God and Nature: no optimistic theory of the world had reconciled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smallness of the world and the community, and the comparative simplicity of the social system made the attempt to regulate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of men less absurd than it would appear to us in the present day.

对比1760年与今天的英国产业，其区别不只在于外部形态。在这期间，伴随着生产模式和生产组织的变革，人们对于经济原理以及国家对于私有企业的态度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变。1760年时，英国很大程度上还处于中世纪琐碎而名目繁多的产业规范体系之下。这一体系虽在瓦解，但尚没有被现代工业的自由原则所取代。要理解中世纪体系的渊源，我们就必须回顾历史，去探究国家被看作是涵盖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宗教制度的时代。当时的人们认为，国家有责任监护每个公民的所有往来、保护公民免受暴力与诈骗，并要为人民提供永久的福利；当然国家还要努力保证利率合法、工资公平以及买卖诚信。对切实关系人民生活的问题，只凭偶然性和个人私欲来解决是不行的，因为目前尚没有一种哲学能使神与自然相互融合，这就是说：任何乐观的世界观都不能使公利与私利相统一。同时，世界与社会还很狭小，社会制度相对简单，因此将人类的产业关系规范化这一尝试并非如我们今天认为的这样意义微小。

This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the policy of regulation and restriction which sprang from it, still largely affected English industry at the time when Adam Smith wrote. There was, indeed, great freedom of internal trade; there were no provincial customs-barriers as in contemporary France and Prussia. Adam Smith singled out this fact a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English prosperity, and to Colbert and Stein, and other admirers of the English system, such freedom appeared as an ideal to be constantly striven after. But though internal trade was free for the passage of commodities, yet there still existed a network of restrictions on the mobility of labour and capital. By the law of apprenticeship no person could follow any trade till he had served his seven years. The operation of the law was limited, it is true, to trades already established in the fifth year of Elizabeth, and obtained only in market-towns and cities. But wherever there was a municipal corporation, the restrictions which they imposed made it generally impossible for a

man to work unless he was a freeman of the town, and this he could as a rule become only by serving his apprenticeship. Moreover, the corporations supervised the prices and qualities of wares. In the halls, where the smaller manufacturers sold their goods, all articles exposed for sale were inspected. The medieval idea still obtained that the State should guarantee the genuineness of wares: it was not left to the consumer to discover their quality. And in the Middle Ages, no doubt, when men used the same things from year to year, a proper supervision did secure good work. Bu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rade it ceased to be effective. Sir Josiah Child already recognised that changes of fashion must prove fatal to it, and that a nation which intended to have the trade of the world must make articles of every quality. Yet the belief in the necessity of regulation was slow in dying out, and fresh Acts to secure it were passed as late as George II'sreign.

这一国家理论以及由此衍生的规范政策与限制政策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亚当·斯密时期的英国工业。当时的国内贸易实际已有极高的自由度，同一时期的法国与普鲁士其各省之间也并没有关税壁垒。亚当·斯密选取这一事实作为英国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科尔伯特（Colbert）、斯坦（Stein）及其他英国制度的推崇者则认为，这样的贸易自由是不断努力追求才能实现的理想。国内贸易虽在产品流通领域更趋自由化，但在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上仍然存在一定限制。另外在学工制度下，人们必须经过七年的学徒才能进入贸易圈。其实，学徒制度的实行仅限于先于伊丽莎白女皇登基第五年存在的行业，而且只在乡镇和城市才得到推行。任何的地方自治地区，在其施加的限制政策下，除非是市镇的自由民，基本不可能得到工作，况且按照惯例，公民只有做过学徒才能成为自由民。此外，市政当局要负责监管商品的物价和质量。在小制造业者进行买卖的商馆中，所有要出售的商品都要受到监督。中世纪的观念还认为商品的质量应该由国家来保证，而不应留给消费者来甄别。那时的人们每年使用同样的物品，适

当的监管制度无疑确保了良好工作的进行。但随着贸易的扩大，监管制度失去了效用。乔赛亚·蔡尔德爵士已经认识到，主流思想的改变必会对此造成致命的打击，一个民族想要领先世界贸易就必须制造各种质量的商品。然而，人们对监管效用降低的认识是缓慢的，到乔治二世执政时才通过了确保监管的新法令。

It is not clear how far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mobility of capital and Labour were operative. No doubt they succeeded to a large extent; but when Adam Smith wrote his bitter criticism of the corporations, he was probably thinking of the particular instance of Glasgow, where Watt was not allowed to set up trade. There were, however, even at that time, many free towns, Like Birmingham and Manchester, which flourished greatly from the fact of their freedom. And even in the chartered towns, if Eden is to be trusted, the restrictions were far less stringent than we should gather from Adam Smith. “I am persuaded,” he says, “that a shoemaker, who had not served an apprenticeship, might exercise his industry at Bristol or Liverpool, with as little hazard of being molested by the corporation of either place, as of being disturbed by the borough-reve of Manchester or the head-constable at Birmingham.” Then after quoting and criticising Adam Smith, he adds: “I confess, I very much doubt whether there is a single corporation in England, the exercise of whose rights does at present operate in this manner. In this instance, as in many others, the insensible progress of society has reduced chartered rights to a state of inactivity.” We may probably conclude that nonfreemen were often unmolested, but that, when trade was bad, they were liable to be expelled.

关于对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实施限制的程度如何，这我们还并不清楚。但无疑的是，该限制取得了极大的效果。而亚当·斯密对自治机构

提出了辛辣的批判，大概就是因为他想到了格拉斯哥的瓦特没有得到开业许可。而即使在当时，自由度极高的市镇也有很多，如伯明翰和曼彻斯特，这些地区都因其自由化而取得了巨大的繁荣。若按伊登所说，即使在特许市镇，其限制政策也远没有亚当·斯密所说的严格。伊登指出，“我相信，在波士顿或利物浦，一个制鞋业者即使没有经过学徒期也不会受到自治机构的限制，就像不会遭到曼彻斯特市长或伯明翰警官的阻碍一样。”伊登后又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言论并加以批判，之后又说：“坦白地讲，在英格兰是否存在一种自治机构通过行使权利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这还很值得怀疑……和其他许多情形一样，特许权因潜在的社会进步而陷入停滞状态”。我们大概可以总结说，非自由民一般不会受到妨碍，但在贸易境况不佳时，他们却又容易受到驱逐。

Another relic of Medievalism was the regulation of wages by Justices of the Peace, a practice enjoined by the Act of Elizabeth already referred to. Adam Smith speaks of it as part of a general system of oppression of the poor by the rich. Whatever may have been the case in some instances this was not generally true. The country gentry were, on the whole, anxious to do justice to the working classes. Combinations of labourers were forbidden by law, because it was thought to be the wrong way of obtaining the object in view, not from any desire to keep down wages. The Justices often ordained a rise in wages, and the workmen themselves were strongly in favour of this method of fixing them. The employers on their part also often approved of it. In fact we have an exactly similar system at the present day in boards of arbitration. The Justice was an arbitrator, appointed by law; and it is a mistaken assumption that such authoritative regulation may not have been good in its day.

中世纪的另一个遗制是由治安法官决定工资，这是由上述的伊丽莎白法案所规定的。亚当·斯密认为，这一规定是富人压迫穷人一贯制度的一部分。但在不同情况下要针对不同的情形，毕竟这也不是一贯正确的。总地来说，农村小地主渴望给劳动阶层以公平对待。劳工的联合为法律所禁止，这不是为了压低工资，而是因为劳工联合被认为是获取预期目的的不正当手段。法官通常规定抬高工资，工人本身对这种调整热烈支持，雇主们一般也表示认同。事实上，我们现在有几乎相同的机构，即仲裁委员会。治安法官就相当于法律指定的仲裁人，我们不应否认这一政府规定在当时的收效。

The principle of regulation was applied much more thoroughly to our external than to our internal trade. The former was entirely carried on by great chartered companies, whether they were on a joint-stock footing, Like the East India Company, or were “regulated” like the Turkey Company, in which every man traded on his own capital. Here, again, Adam Smith carried too far his revolt against the restrictive system, which led him to denounce corporate trading as vicious in principle. “The directors of such companies,” he says, “being the managers rather of other people'smoney than of their own, it cannot well be expected that they should watch over it with the same anxious vigilance with which the partners in a private co-partnery frequently watch over their own. Negligence and profusion must always prevail, more or less,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affairs of such a company.” This is an instance of pure a Priori reasoning, but Smith's main argument is derived from the history of Joint-Stock Companies. He sought to show that, as a matter of fact, unless they had a monopoly, they had failed; that is, he proceeded inductively, and wound up with an empirical law: “it seems contrary to all experience that a Joint-Stock Company should be able to carry on successfully any branch of foreign trade, when private adventurers can come into any sort

of open and fair competition with them.” But he was too honest not to admit exceptions to his rule, as in the instance of banking, which he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it could be reduced to routine.

相比于国内贸易，管制条例在对外贸易上贯彻得更为深入。国内贸易的参与者都是大型特许公司，有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合资企业，也有土耳其公司这样的“管制公司”，其中每人都以其个人资金从事贸易。对此，亚当·斯密再次表达了对限制政策的极端批判，他指责公司贸易从根本上是有害的：“像这样的企业，其董事经营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他人的资金，因此要期待他们像自营企业合伙人那样对资金保持高度的谨慎是不大可能的……对于此类公司的管理层面，大量的疏忽是时有发生的”。这是一个纯粹推演法的论证实例，但亚当·斯密的主要论据却由合资公司的历史而来。他试图论证：公司只有形成垄断才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这就是说，亚当·斯密以归纳法来推进，并以经验法则作为总结。他说：“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似乎是矛盾的，因为合资企业曾经在外国贸易领域大获成功，独资者也能进入任何产业与之展开公平公开的竞争。”但他又极诚实地承认了此法则的一个例外项，即银行业。对此，他以“银行业务只是日常事务”来作解释。

Smith'sempirical law is, as we all now know, far from being universally true, though it was a reasonable induction enough at the time when it was made. Since then a large number of Joint-Stock Companies have succeeded, as for instance in the iron trade. Nor is it difficult to see the reason of this change. The habit of combination is stronger than it was, and we have discovered how to interest paid servants by giving them a share in the results of the enterprises they direct. Experience has shown also that a big company can buy the best brains. In the recent depression of trade the ironworks of Dowlais, which are managed on the Joint-stock

system, alone remained successful amid many surrounding failures, and that because they had the ablest man in the district as manager.

众所周知，尽管亚当·斯密的经验法则在当时颇有所恃，但此法则绝不是一贯正确的。此后大批的合资公司繁荣发展，比如钢铁行业。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变化背后的原因。联合行为比以往更强势，我们看到企业将份额分给带薪员工，从而达到吸引雇员的目的。历史经验还显示，大企业往往能吸引更高级的人才。在最近的贸易大萧条中，诸多企业纷纷破产，而道勒斯（Dowlais）的合资钢铁厂却能在此局面下独居不败地位，正是由于它有着最精英的人士在进行经营管理。

In Adam Smith'stime, however, the existence of Joint-Stock Companies was due not to any notion of their economical superiority, but to the tendency to place restrictions upon individual enterprise, based upon that belief in the antagonism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which w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time. The same idea of opposition obtained equall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rosperity of one country was thought to be incompatible with that of another. If one profited by trade, it seemed to do so at the expense of its neighbours. This theory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mercantile system. It had its origin in the spirit of Nationalism—the idea of self-sustained and complete national life—which came in with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formation.

然而在亚当·斯密时期，公利与私利之间的冲突仍然是其时代特点，因此合资企业的出现并非由于其经济优势，而是由于独资企业越来越受到限制。同样的观念也体现在国际关系上。人们认为一国的繁荣不能与另一国的繁荣并存，一国的贸易盈利也必须以邻国的损失为

代价。这条理论形成了重商主义的基础。其根源是随着文艺复兴和改革而建立起来的民族精神，即自持与独立的民族生活观念。

But how came this Nationalism to he connected with a belief in the special importance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essence of the mercantile system? The object of that system was national greatness, but national greatness depends on national riches generally, not on one particular kind of riches only, such as coin. The explanation must be sought in the fact that, owing to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trade and the money system, gold and silver became peculiarly essential to the machinery of commerce. With the growth of standing armies, moreover, State finance acquired a new importance, and the object of State finance was to secure a ready suppl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Thus the theory sprang up that gold and silver were the most solid and durable parts of the moveable wealth of a nation, and that, as they had more value in use than any other commodities, every state should do all in its power to acquire a great store of them. At first the Government tried to attain this object by accumulating a hoard; but this policy soon proved too wasteful and difficult. It then turned its attention to increasing the quantity of bullion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for it came to see that if there was plenty of bullion in the country it could always draw upon it in case of need. The export of gold and silver was accordingly forbidden; but if hoarding had proved impracticable, this new method of securing the desired end was soon found to be useless, as the prohibition could be easily evaded. In the last resort, therefore, it was sought to insure a continuous influx of the precious metals through the ordinary channels of trade. If we bought less than we sold, it was argued, the balance of trade must be paid in coin. To accomplish this end every encouragement was given to the importation of raw materials and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but the purchase of foreign manufactures was, for the most part, prohibited, and individuals were entreated not to buy imported luxuries. The result was retaliation abroad, and a deadlock in the commercial machine. Wars of tariff were common; for instance, we prohibited the importation of gold-lace from Flanders, and the Flemings in return excluded our wool. The system, however, resisted the teaching of experience, despite the fact that in abolishing the prohibition of the export of gold and silver, the Government acknowledged the true principle of free trade put forward by the East Indian Company. The latter contended that the law forbidding the export of bullion was not only useless, since it was easily stultified by smuggling, but even, if enforced, was hurtful, since the Orientals would only sell their valuable goods for silver. The success of this contention marks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Mercantile System proper to modern Protection. The advocates of that system had shifted their ground, and instead of seeking merely to prohibit the export of the precious metals, they established a general protection of native industries.

但是民族精神是如何与极度重视金银的观念结合起来的呢（金银一般被认为是重商主义的本质）？重商主义的目的是国家强盛，但国家强盛取决于国家的总体财富，而非某一单独产业（如钢铁业）的富足程度。此问题可以由以下事实来作阐释：由于贸易与货币制度同时发展，金银对于商业机构而言变得格外重要。此外，随着常备军队的壮大，国家财政有了新的重要性，它需要随时保证贵金属的供给。因此有理论指出，金银是一国动产中最稳固最持久的部分，其使用价值超过了其他任何商品，因此每个国家都应尽力贮备金银。起初，政府试图通过储备金银来达到目的，但又很快认识到该政策难以实行，并且过于浪费；随后政府把注意力转向增加人民手中的金银保有量，因为如果全国拥有大量金银，则在需要之时总可以聚敛起来。金银出口也被随即勒令禁止，但如果金银储备不可行，那么这一新手段必也很

快被证明是无效的，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因为这样的禁令很容易被人逃避。于是，作为最后的手段，政府试图通过贸易这一普通渠道来确保贵金属的持续流入。有人主张：如果国家的买入小于卖出，则贸易差额一定要由钱币支付。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国家只鼓励进口原材料与生活必需品，而对大多数的国外产品仍然禁止买入，并且要求个人不去购买进口奢侈品。其结果是国外市场进行反击并使商业机构陷入僵局。关税战是平常之事，例如，英国禁止从佛兰德斯进口金线花边（gold-lace），则佛兰芒人就不进口英国的羊毛。实际上，尽管在废除金银出口禁令方面，政府承认东印度公司提出的自由贸易原则，但重商主义还是未能汲取经验的教训。东印度公司认为，由于人们容易通过走私绕过该法令，因此禁止金银出口的法令毫无意义可言。而且东方人只肯为换取白银而出卖其贵重商品，所以执行该法令将反而是有害的。这种观点盛行标志着重商主义向近代保护主义的过渡。重商主义的拥护者也改变了立场，他们不再只是寻求对贵金属出口的禁止，而是也为民族产业制定了总的保护措施。

Their measures were not all alike bad. The Navigation Acts, for instance, were defended by Adam Smith, and Mill has indorsed his defence, on the ground that national defen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national opulence.

但并非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有害的。比如，亚当·斯密就曾为航海条例辩护，穆勒也认可他的观点，因为民族自护总比民族富裕更加重要。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Acts was the law of 1651, by which no goods of the growth or manufacture of Asia, Africa, or America were to be imported into England, Ireland, or the Plantations, except in ships belonging to English subjects, and manned by a

crew three-fourths of whom were English; while no goods of any country in Europe were to be imported except in English ships, or ships belonging to the country from which the goods came. The argument used by the promoters of the law was that by excluding the Dutch from the carrying trade to this country we should throw it into the hands of English shipowners, and there would he an increase of English ships. It was admitted, indeed, that this would be giving a monopoly to English shipowners and English sailors, and that therefore freights would be dearer, and a check given to the growth of commerce. It was further admitted that owing to their higher charges English ships might be driven out of neutral ports; but the contention was, that we should secure to ourselves the whole of the carrying trade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and England, and that this would amply compensate for our expulsion from other branches of commerce.

这其中最著名的条例颁布于1651年。据此条例，亚、非、美洲的农产品或制造品，若非由英国船只运输，或船员组的英国人未达到四分之三的，则不能进口到英格兰、爱尔兰或其殖民地；欧洲国家的产品，若非由英国船只，或商品出口国船只运输的，则不准许进口。该条例倡导者的说法是，通过把荷兰排斥在航运业之外，我们就可以使航运业独揽在英国人手中，英国船只数量也将有大幅增长。不可否认，英国船主与船员得以就此形成了垄断，货运业务随之涨价，商业发展也就因而受到阻碍。而更难否认的是，由于运费高涨，英国船只在中立国海港就会遭到驱逐。但又有说法辩称，只要确保占得英国与美洲、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全部航运业务，就足以被弥补因被他国贸易排斥而造成的损失。

These anticipations were on the whole fulfilled. The price of freights was raised, because English ships cost more to build and

man than Dutch ships, and thus the total amount of our trade was diminished. We were driven out of neutral ports, and lost the Russian and the Baltic trades, because the English shipowners, to whom we had given a monopoly, raised their charge.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 monopolised the trade to ports com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ct, the main object of which was “the preservation of our plantation trade entire.” Our shipping received a great stimulus, and our maritime supremacy grew with it. At the time when the Navigation Act was passed our colonial trade was insignificant; New York and Jersey were Dutch; Georgia, the Carolinas, Pennsylvania, Nova Scotia were not yet planted; Virginia, Maryland, New England were in their infancy.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the Barbados alone employed 400 vessels; while with the growth of the colonies the English power at sea had increased, until it rivalled the Dutch. In the next century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and East Indian trades gave us a position of unquestionable maritime superiority.

这些预期大体都成为了现实。由于英国比荷兰的船只制造与官员雇佣的费用更高，因而英国运费被提高，贸易总额就因此而减少。英国被逐出中立国海港，并失去了俄国与波罗的海的航运业务，这也都由获得了独占权的英国船主提高运费所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垄断了条例规定范围内地区的全部贸易，目标就是“占有所有殖民地的全部贸易”。英国的航运业得到了极大的刺激，海上优势也随之扩大。航海条例通过时，英国在殖民地的贸易量极少，纽约和泽西岛还是荷兰的殖民地，乔治亚、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新斯科舍尚未殖民地化，弗吉尼亚、马里兰、新英格兰还处于形成初期。到此世纪末，仅巴巴多斯岛已经有400艘船只，且随着英国殖民地的扩大，其海上势力也在增强，并能与荷兰抗衡。到下一世纪，美洲与东印度的贸易继续发展，英国从而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海上霸权。

There is another argument in favour of Protection, at any rate in its early days. Its stimulus helped to overcome the apathy and dulness of a purely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nd draw a part of the people into trade. But here, as everywhere, Protection involves this great disadvantage, that, once given, it is difficult to withdraw, and thus in the end more harm is done than good. English industries would not have advanced so rapidly without Protection, but the system, once established, led to perpetual wrangling on the part of rival industries, and sacrificed India and the colonies to our great manufacturers. And our national dislike to Protection deepens into repugnance when we examine the details of the system. Looking at its result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688 to 1776, when it was in full force, we are forced to acknowledge that Adam Smith's invectives against the merchants, violent as they were, were not stronger than the facts demanded.

但在初期，总有支持保护主义的观点。保护主义的刺激打破了纯粹农业人口的冷漠及其思想的滞后，并使部分农民得以从事商业。但与别国一样，英国的保护主义也有极大的缺陷，一旦对商业予以保护就很难再撤出，因此这一做法实际是弊大于利的。虽然英国产业因为有了保护主义才发展得如此迅速，但这一机制一经建立就导致了对手企业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并使得其殖民地与印度成为了英国大规模制造商的牺牲品。我们若进一步审视保护主义，又会看到英国的国民对此制度的厌恶更深化为憎恶。1688年到1776年间，保护主义的作用正发挥到极致。从保护主义所致的结果看来，我们不得不说，亚当·斯密对商人曾有辛辣的抨击，但其评价与事实比起来也还相差甚远。

But the maintenance of Protection cannot be entirely set down to the merchants. Though the trading classes acquired much influence at the Revolution, the landed gentry were still supreme in

Parliament; and the question arises, why they should have lent themselves to a policy which in many cases, as i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export of wool, was distinctly opposed to the interests of agriculture. Adam Smith's explanation is very simple. The country gentleman, who was naturally “least subject of all people to the wretched spirit of monopoly,” was imposed upon by the “clamours and sophistry of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and “the sneaking arts of underling tradesmen,” who persuaded him into a simple but honest conviction that their interest and not his was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Now this is true, but it is not the whole truth. The landowners, no doubt, thought it their duty to protect trade, and, not understanding its details, they implicitly followed the teaching of the merchants. But, besides this, there was the close connection, already referred to, between them and the commercial classes. Their younger sons often went into trade; they themselves, in many cases, married merchants' daughters. Nor did they give their support gratuitously. They wanted Protection for themselves, and if they acquiesced i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wool export, they persuaded the merchants to allow them in return a bounty of 5s. a quarter on the export of corn.

但我们不能把持续的保护主义都归因于商人。虽然商人阶层在大革命时期获得了势力，但地主阶级仍在议会占有绝对权力。于是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这一政策在很多方面（如禁止羊毛出口）显然违背了农业的利益，那么他们为何还对此持支持态度呢？亚当·斯密的解释非常简单：农村地主“受垄断思想的腐蚀最少”，但因受到“商人与制造业者的抗议和诡辩”以及“低等商人的卑劣行为”的欺骗，他们单纯而正直地认为，商人阶级的利益而非地主阶级的利益，才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这起初看来是正确的，但却不完全是真理。地主们已认为其职责是保护商业，在毫无深入了解的情况下，他们盲目地追信商人的说法。但此外，如前文所述，地主与商人之间早有更紧密的联系。地主

的年轻后代常常有人从商，地主本身也常与商人之女通婚。但他们并非无条件地支持商人，他们希望保护主义同时也维护他们的利益，对于禁止羊毛出口，他们虽不反对，但同时会向商人要求对谷物的出口给予每夸特5先令的奖励金。

One of the worst features of the system was the struggle of rival interests at home. A great instance of this was the war between the woollen and cotton trades, in which the former, supported by the landed interest, for a long time had the upper hand, so that an excise duty was placed on printed calicoes, and in 1721 they were forbidden altogether. It was not till 1774 that they were allowed again, and the excise duty was not repealed till 1831. To take another instance: it was proposed in Parliament in 1750 to allow the importation of pig and bar iron from the colonies. The tanners at once petitioned against it, on the ground that if American iron was imported, less iron would be smelted in England, fewer trees would be cut down, and therefore their own industry would suffer; and the owners of woodland tracts supported the tanners, lest the value of their timber should be affected. These are typical examples of the way in which, under a protective system, politics are complicated and degraded by the intermixture of commercial interests. And the freer a government is, and the more exposed to pressure on the part of its subjects, the worse will be the result. As an American observer has lately said, Protection may be well enough under a despotism, but in a republic it can never be successful.

这种制度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国家内部的利益争斗。其中最具代表性就是毛纺贸易与棉花贸易的斗争，农业地主支持的毛纺织业一直占有优势，因此对印花布征收消费税，1721年印花布被全面禁止，到

1774年才再次准许使用，消费税则到1831年才被废除。另一个事例是，1750年议会决议允许从殖民地进口生铁和条行铁。制革工人立刻上书反对，理由是如果进口了美洲铁矿，英格兰的熔铁量会减少，树木采伐量会减退，因此蒙受损失的就是国内工业。林地所有人对此表示支持，唯恐其木材价格受到损失。这些典型事例都显示出，在保护主义制度之下，政治是如何因商业利益的混入而变得复杂和退化的。而且，政府自由度越高，来自人民方面的压力越大，其结果就越糟糕。正如一位美国观察员近来所说，保护主义在专制统治下或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但在共和国家是绝不会取得成功的。

We find still stronger illustration of the evils of Protection in our policy towards Ireland and the colonies. After the Cromwellian settlement, there had been an export of Irish cattle into England; “but for the pacifying of our landed gentlemen,” after the Restoration the import of Irish live stock, meat and dairy produce was prohibited from 1660 to 1685. As cattle-farming then became unprofitable, the Irish turned their lands into sheepwalks, and not only exported wool, but started woollen manufactures at home. Immediately a law was passed (1699) confining the export of Irish wool to the English market; and this was followed by the imposition of prohibitive duties on their woollen manufactures. The English manufacturers argued that as Ireland was protected by England, and its prosperity was due to English capital, the Irish ought to reconcile themselves to restrictions on their trade, in the interests of Englishmen. Besides, the joint interests of both kingdoms would be best considered if England and Ireland respectively monopolised the woollen and linen industries, and the two nations thus became dependent on one another. If we turn to the colonies, we find them regarded simply as markets and farms of the mother country. The same argument was used: that they owed everything to England, and therefore it was no tyranny to exploit them in her interests.

They were, therefore, not allowed to export or import in any but British vessels; they might not export such commodities as Englishmen wanted to any part of Europe other than Great Britain; while those of their raw materials in which our landowners feared competition were excluded from the English markets. All imports into the colonies from other parts of Europe, except Great Britain, were forbidden, in order that our manufacturers might monopolise the American market. Moreover, every attempt was made to prevent them from starting any manufactures at home.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ome Americans had set on foot a woollen industry. In 1719 it was suppressed; all iron manufactures-even nail-making-were forbidden; a flourishing hat manufacture had sprung up, but at the petition of English hatters, these competitors were not allowed to export to England, or even from one colony to another. Adam Smith might well say, that “to found a great empire,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raising up a people of customers, may at first sight appear a project fit only for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Nothing contributed more than this commercial system to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it is significant that the same year which saw its promulgation saw als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在爱尔兰和殖民地方面，我们发现了保护主义政策的更大弊端。克伦威尔（Cromwellian）战乱平定后，爱尔兰从英国进口牛群，但在王朝复辟之后，“为了安抚地主阶层”，1660年到1685年间，爱尔兰的牲畜、肉类、奶制品进口都是被禁止的。随着牧牛业不再盈利，爱尔兰人转向用土地来牧羊，不仅提供羊毛出口，同时也开始发展国内的羊毛纺织业。很快（1699年），政府制定了限制爱尔兰羊毛进入英国市场的法律，随后又对爱尔兰羊毛制品施加了高额关税。英国制造业者称，爱尔兰受到英国的保护，其繁荣就是得益于英国资本，因此爱尔兰应当顾及英国利益，在对其国的贸易限制上作出让步。另

外，英国与爱尔兰分别垄断毛纺织业与亚麻业，同时照顾到两国的共同利益，从而使两国形成依赖关系。我们再来看殖民地的情况，就会发现殖民地只被看作是母国的市场和大农场。这里我们听到了同样的说法：他们的一切都是英国给予的，所以英国从其利益出发利用殖民地也不能算是暴政。于是，殖民地的进出口只能用英国船只运输；对英国所需的商品，殖民地不能对其他欧洲国家输出；英国地主竞争力弱的殖民地原材料不能进入英国市场。为使英国制造业垄断美洲市场，除英国以外，其他欧洲国家对殖民地的商品输入都被禁止。再有，在殖民地境内开展制造业被以各种手段严格禁止。十七世纪末，有美洲人开始开办毛纺织工业。1719年此行为被叫停，所有的钢铁行业，甚至制钉行业都被禁止。制帽业虽已兴起，但在英国帽商的请求下，这些竞争者不能向英格兰输入产品，甚至不能向另一殖民地输出。亚当·斯密可能会这样说："要建立一个大帝国，若只为打造出一个用于商品输出的民族，这初看起来就像在建造一个商人的国度。"这种商业制度对《独立宣言》的贡献是超乎一切的，《国富论》在《独立宣言》发表的同年出版，这又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

Many people on first read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are disappointed. They come to it expecting lucid arguments, the clear exposition of universal laws; they find much tedious and confused reasoning and a mass of facts of only temporary interest. But these very defects contributed to its immediate success. It was because Adam Smith examined in detail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age, and wrote a handbook for the statesman, and not merely, as Turgot did, a systematised treatise for the philosopher, that he appealed so strongly to the practical men of his time, who, with Pitt, praised his "extensive knowledge of detail," as well as "the depth of his philosophical research." It w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which gave him his power. He was the first great writer on the subject; with him political economy passed from the exchange and the market-place to the professor's study; but he was only groping his

way, and we cannot expect to meet with neat arrangement and scientific precision of treatment in his book. His language is tentative, he sometimes makes distinctions which he forgets elsewhere, as was inevitable before the language of economics had been fixed by endless verbal discussions. He had none of Ricardo's power of abstract reasoning. His gift lay in the extent and quickness of his observation, and in his wonderful felicity of illustration. We study him because in him, as in Plato, we come into contact with a great original mind, which teaches us how to think and work.

很多初读《国富论》的人会感到失望，他们原想从中读到清晰的论证和对普遍规律的清晰阐释，但他们只找到单调难懂的推证，以及大量只有一时趣味的实例，但正是这些不足成就了此书的迅速成功。这是因为，亚当·斯密详细审视了当时时代的真实状况，他不像杜尔哥（Turgot）那样仅为哲学家撰写系统化的专著，他的手册也是为政客而写。当时的实践者们被他强烈地感染着，他们和皮特（Pitt）一同称赞他“在细节方面的体察入微”以及“深入的哲学研究”。亚当·斯密的力量正是结合了这两点而得来的。他是涉及此领域的第一位伟大的作家，从他开始，政治经济学开始从交换场所与市场走进专家学者的书房。但他只是在进行自我摸索，我们不能期待他的书中有太整齐的结构或科学而精确的处理。他的语言是试探性的，在某一处列出的区别，有时会在另一处忘记，因为经济学术语在最终确定之前要经过无数次的用语探讨，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不具备李嘉图的抽象推理能力，他的天赋在于广泛而尖锐的观察以及恰到好处的例证。我们研究他，是因为在他身上，正如在柏拉图身上一样，我们可以触摸到伟大而独创的思想，指引着我们思考和实践。

Original people always are confused because they are feeling their way.

独创的人往往又困惑，因为他们是在探索中前行。

If we look for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Adam Smith, those which distinguish him most clearly from earlier writers, we are first struck by his cosmopolitanism. He was the precursor of Cobden in his belief that commerce is not of one nation, but that all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one great community. We may see how widely he had departed from the old national system of economy, by contrasting the mere title of his book,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h that of Mun's treatise, England's Treasure in Foreign Trade. This cosmopolitanism necessitated a detailed refutation of the mercantile system. He had to prove that gold and silver were not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 forms of wealth; and that if we wanted to buy them, we could always do so, if we had other consumable goods to offer in exchange. But it might be objected: “What if a nation refuses to take your other goods, and wants your gold?” Adam Smith replied: “in that case, gold will leave your country and go abroad; as a consequence, prices will fall at home, foreigners will be attracted by the low prices to buy in your markets, and thus the gold will return.” I can give you an actual example from recent history to prove the truth of his deduction. During the potato famine of 1847, we had to import enormous quantities of grain from America, and as a consequence had to send there £16,000,000 worth of bullion. Immediately prices rose in America and fell in England, English merchants discontinued buying in America, while American merchants bought largely in England, so that in the following year all the gold came back again.

探究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即他最能区别于早期著作家的部分，我们首先会为他的“世界大同观”而惊叹。他是科布登（Cobden）的先

驱者，他认为商业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范畴，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被看作一个共同体。把他的《国富论》与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来对比，单就书名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思想与旧的国家经济体制有极大的分离。这种世界大同主义需要从各个角度驳斥重商主义。他需要证明金银并不比其他的财富形式重要，而且如果我们要购买金银，在持有其他可供交换的消费商品的情况下，我们总是有力购买的。但可能会有驳论称："如果别国拒绝一国的其他财物而只要黄金又当如何？"亚当·斯密的回答是："在这种情况下，黄金就会流失国外，国内物价于是下跌，外国受到该国市场低价的吸引，那么黄金就会回归国内。"我可以举出最近的真实事例来证明他的推论。在1847年的马铃薯短缺时期，我们要从美国进口大批量的谷物，因此要运往美国价值1600万英镑的黄金。很快，美国物价上涨，英国物价下跌，英国商人不再购买美国商品，而美国商人却来到英国大量消费，于是到第二年全部黄金又都回归英国。

Equally prominent in Adam Smith is his individualism, his complete and unhesitating trust in individual self-interest. He was the first to appeal to self-interest as a great bond of society. As a keen observer, he could point to certain facts, which seemed to bear out his creed. If we once grant the principl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n it follows that one man can live only by finding out what other men want; it is on this fact, for instance, that the food supply of London depends. This is the basis of the doctrine of laisser faire. It implies competition, which would result, so Adam Smith believed, in men's wants being supplied at a minimum of cost. In upholding competition he was radically opposed to the older writers, who thought it a hateful thing; but his conclusion was quite true. Again it implies the best possible distribution of industry; for under a system of free competition, every man will carry on his trade in the locality most suitable for it.

亚当·斯密的另一个著名论点是个人主义，也就是他绝对深信不疑的个人利己主义。他最先认为，个人主义是社会的黏合剂。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能指出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认可劳动分配原则，那么就会认为，一个人想要生存就必须发现别人的需求，比如伦敦的食品供应就是基于这个事实。这就是自由主义学说的基础。该学说意味着竞争，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竞争的存在使人们能以最少的消费获得所需的物品。早期作家认为竞争是一种不良现象，而亚当·斯密对此坚决反对并支持竞争。亚当·斯密的结论是十分正确的。竞争意味着产业分布能以最佳的方式出现，因为在自由竞争机制下，人们可以在最适宜的地区开展商业。

But the principle of laisser faire breaks down in certain points not recognised by Adam Smith. It fails, for instance, in assuming that it is the interest of the producer to supply the wants of the consumer in the best possible manner, that it is the interest of the producer to manufacture honest wares. It is quite true that this is his interest, where the trade is an old-established one and has a reputation to maintain, or where the consumer is intelligent enough to discover whether a commodity is genuine or not. But these conditions exist only to a small extent in modern commerce. The trade of the present day is principally carried on with borrowed capital; and it may be a clever man's interest to sell as large a quantity of goods as possible in a few years and then throw up his business. Thus the interests of producer and consumer conflict, and it has been found necessary to pass Adulteration Acts, which recognise the non-identity of interest of seller and buyer. It was argued, indeed, in Parliament, when these acts were proposed, that consumers ought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but the consumers are far too ignorant to do so, especially the poor who are the great consumers of the articles protected against adulteration. Adam Smith, moreover, could not foresee that internal free trade might

result in natural monopolies. A conspicuous feature of our times is the concentration of certain industries in the hands of a few great capitalists, especially in America, where such rings actually dictate the prices of the market. Eighty-five per cent of the Pennsylvania coal-mines, for instance, are in the hands of six or seven companies who act in combination. The easiest remedy for such monopolies would be international free trade;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ew could be maintained. Finall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ere must necessarily be a permanent antagonism of interests. Adam Smith himself saw this, when he said that the rate of wages depended on contracts between two parties whose interests were not identical. This being granted, we see that in distribution the “harmony”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public good is a figment. At the present day each class of workmen cares only for the wages of its own members. Hence the complete breakdown of the laisser faire system in the question of wages. We have been driven to attempt the establishment of Boards of Conciliation all over the country, thus virtually surrendering the principle. Nor is it true that self-interest tends to supply all our wants; some of our best institutions, such as hospitals, owe their existence to altruistic sentiment. These antagonisms were to come out more strongly than ever after Adam Smith's time. There were dark patches even in his age, but we now approach a darker period-a period as disastrous and as terrible as any through which a nation ever passed; disastrous and terrible, because, side by side with a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was seen an enormous increase of pauperism; and production on a vast scale, the result of free competition, led to a rapid alienation of classes and to the degradation of a large body of producers.

但自由主义学说在有些方面仍有漏洞，这是亚当·斯密未能发现

的。例如，该说法未能指出：生产者应尽量以最佳方式向消费者供应所需品，并生产信用度高的商品，这都是合乎其利益的，特别是对享有盛誉的传统工业和消费者能明辨产品真伪的产业，这一点尤其正确。但现代商业中很少存在这样的情况。现代贸易主要依靠借贷资金来运转，为了获得利益，聪明人会在数年之内尽量多卖产品，之后选择停业。因此，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于是有必要通过各种反造价条例以承认买家与卖家利益的非对等性。而在提出这种条例之时，国会中曾有说法认为消费者应当自己提防造假，但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很难达到这种程度，特别是贫困人群，他们恰恰是易造假商品最大的应受保护群体。此外，亚当·斯密未能预见国内自由贸易会自然地导致垄断。我们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某些产业掌握在少数的大资本家手中，特别是美国，其国内这样的小集团是市场物价的实际操纵者，比如宾夕法尼亚州85％的煤矿只掌握在六、七家联合公司手中。遏制垄断的最佳举措是国际贸易自由化，有了国际范围的竞争，垄断模式就很难保持。最后，在财富分配方面，长久的利益对立是必然存在的。亚当·斯密说，工资率由利益不对等的双方的契约来决定，这时的亚当·斯密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就明白，在分配上，个人与集体利益的所谓“调和”只是个幻想。当今，各个工人阶层都只关心自己行业的工资，所以在工资问题上，自由主义机制彻底倒塌。我们被迫要在全国建立起调解委员会，这实际上是已经放弃了这个原则。但我们不能说利己主义能为我们提供一切，我们的一些重要机构，例如医院，就是依靠利他主义而存在的。这样的对立点在亚当·斯密以后的时期体现得愈加明显。在他的时代已有一段暗淡时期，而我们现在正在走向更加暗淡的阶段——这是一个国家从未经历过的最不幸最可怕的阶段。说它不幸和可怕，是因为随着财富的增长，我们同时看到贫困在大幅蔓延；而且，因自由竞争而形成的庞大的生产规模，导致了阶级间的迅速分离和生产者群体的堕落。

Chapter VIII The Chief Features of the Revolution

第八章　产业革命的最主要特征

The essenc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the substitution of competition for the medieval regulations which had previously controlled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On this account it. IS not on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s of English history, but Europe owes to it the growth of two great systems of thought—Economic Science, and its antithesis, Socialism.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cience in England has four chief landmarks, each connected with the name of one of the four great English economists. The first is the publication of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in 1776, in which he investigated the causes of wealth and aimed at the substitution of industrial freedom for a system of restriction.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 not the welfare of man, was what Adam Smith had primarily before his mind's eye; in his own words, “the great object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very country is to increase the riches and power of that country.” His great book appeared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second stage in the growth of the science is marked by Malthus's Essay on Population, published in 1798,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the product of that revolution, then already in full swing. Adam Smith had concentrated all his attention on a large production; Malthus directed his inquiries, not to the causes of wealth but to the causes of poverty, and found them in his theory of population. A third stage is marked by Ricardo'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which appeared in 1817, and in which Ricardo sought to ascertain the law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dam Smith had shown how wealth could be produced under a system of

industrial freedom, Ricardo showed how wealth is distributed under such a system, a problem which could not have occurred to any one before his time. The fourth stage is marked by John Stuart Mill'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ublished in 1848. Mill himself asserted that" the chief merit of his treatise" was the distinction drawn between the laws of production and those of distribution, and the problem he tried to solve was, how wealth ought to be distributed. A great advance was made by Mill's attempt to show what was and what was not inevitable under a system of free competition. In it we see the influence which the rival system of Socialism was already beginning to exercise upon the economists. The whole spirit of Mill's book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ny economic works which had up to his time been written in England. Though a re-statement of Ricardo's system, it contained the admission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s the result of "particular social arrangements," and it recognised that competition alone is not a satisfactory basis of society.

产业革命的实质是竞争取代了先前控制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的中世纪规范制度。据此来看，这不仅是英国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它同时也促进了欧洲两个思想体系的发展——经济学及与之对立的社会主义。英国经济学思想的发展有四个重要标志，每个标志都与一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紧密相连。首先是1776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在书中探索了财富的根源，并提出了产业自由最终取代限制性制度的目标。亚当·斯密的主要构想是财富的创造，而非人民的福祉，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政治经济学上，各个国家的崇高目标都是增加财富与增强国力"。他的伟大著作就是问世于产业革命前夕。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出版，这标志着科学进步进入第二阶段，此书被认为是当时如火如荼进行中的产业革命的产物。亚当·斯密把精力集中在财富的大生产上，而马尔萨斯探究的不是财富的原因，而是贫困的根源，并在他的人口理论中找到了答案。1817年出版

了李嘉图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是进入了第三阶段的标志，李嘉图在书中试图总结出财富分配的法则。亚当·斯密阐述的是产业自由体系下何以创造财富，李嘉图则展示了此体系下如何分配财富，这是在他以前从未有人想过的问题。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于1848年，这标志着第四个阶段的到来。穆勒自称“其专著的最大功劳”是对财富创造法则与财富分配法则的明确区分，另外他还试图解决财富应该被如何分配这一问题。在展示自由竞争机制下的必然趋向与非必然趋向方面，穆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体制的竞争已对经济学家产生了影响。相比于穆勒之前的英国作家的经济学论著，穆勒的著作其整体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只是李嘉图思想的再度阐述，但穆勒在书中承认了财富分配是“一定的社会布局”的结果，并认识到只凭竞争是不足以构成社会的根基的。

Competition, heralded by Adam Smith, and taken for granted by Ricardo and Mill, is still the dominant idea of our time; though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 we hear more of it under the name of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 wish here to notice the fallacies involved in the current arguments on this subject.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assumed that all competition is a competition for existence. This is not true.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a struggle for mere existence and a struggle for a particular kind of existence. For instance, twelve men are struggling for employment in a trade where there is only room for eight; four are driven out of that trade, but they are not trampled out of existence. A good deal of competition merely decides what kind of work a man is to do; though of course when a man can only do one kind of work, it may easily become a struggle for bare life. It is next assumed that this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s a law of nature, and that therefore all human interference with it is wrong. To that I answer that the whole meaning of civilisation is interference with this brute

struggle. We intend to modify the violence of the fight, and to prevent the weak being trampled underfoot.

承袭亚当·斯密、李嘉图和穆勒的观点，竞争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思想。但自《物种起源》出版以来，我们更多的是从“生存竞争”这个说法听到这个概念。在此我希望更正大家对此问题的理解偏差。首先，有人认为所有的竞争都是生存竞争，这是不正确的。单纯的生存竞争与针对某一种生存状态的竞争，两者是有极大分别的。例如，12人到一个行业应聘，而实际只能录用8人，其中4人被淘汰，但他们却并未失去生存的途径。大多竞争其实只决定了一个人做何种工作。当然若一个人只能做一种工作，其竞争或许就真的是生存竞争了。其次，还有人认为生存竞争是一条自然法则，所以一切人为的干涉其实都是错误的。对这种理解，我要说，文明的全部意义就是对这种残酷竞争的干涉。我们要做的是缓解竞争的猛烈，防止弱者遭到践踏。

Competition, no doubt, has its uses. Without competition no progress would be possible, for progress comes chiefly from without; it is external pressure which forces men to exert themselves. Socialists, however, maintain that this advantage is gained at the expense of an enormous waste of human life and labour, which might be avoided by regulation. But here we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competition in production and competition in distribution, a difference recognised in modern legislation, which has widened the sphere of contract in the one direction, while it has narrowed it in the other. For the struggle of men to outie one another in production is beneficial to the community; their struggle over the division of the joint produce is not. The stronger side will dictate its own terms;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competition the capitalists used all their power to oppress the

labourers, and drove down wages to starvation point. This kind of competition has to be checked; there is no historical instance of its having lasted long without being modified either by combination or legislation, or both. In England both remedies are in operation, the former through Trades Unions, the latter through factory legislation. In the past other remedies were applied. It is this desire to prevent the evils of competition that affords the true explanation of the fixing of wages by Justices of the Peace, which seemed to Ricardo a remnant of the old system of tyranny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strong. Competition, we have now learnt, is neither good nor evil in itself; it is a force which has to be studied and controlled; it may be compared to a stream whose strength and direction have to be observed, that embankments may be thrown up within which it may do its work harmlessly and beneficially. But at the period we are considering it came to be believed in as a gospel, and, the idea of necessity being superadded, economic laws deduced from the assumption of universal unrestricted competition were converted into practical precepts, from which it was regarded as little short of immoral to depart.

无疑，竞争是确有其作用的。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进步，因为进步主要来自外部因素，人们迫于外部压力就会对迫使自己努力。而社会主义者认为，这种进步的取得是以人类的生命与劳动力为代价换来的，这种损失或许可以通过完善管理制度而避免。但这里我们必须对生产上的竞争与分配上的竞争加以区分，现代立法中承认这种区分，这在某一方面扩大了契约范围，在另一方面又缩小了契约范围。人们在生产上的竞争对社会有益，但为了分割共同生产成果而竞争就并非如此了。一切条款都由较强一方制定，而且在竞争初期，资本家实际上是尽一切可能地压迫劳动者，劳动者的工资被压得极低，甚至不能满足温饱。这样的竞争应该被遏止。在历史上，这样的竞争有因联合而改良的、有被法律所规制的，或二者皆有，否则从未有持续得久

的。英格兰历史上，这两种办法皆发挥效用，前者的实施是通过工会，后者是通过工厂立法。在过去也有实行其他办法的。治安法官对工资的调整正是出于阻止竞争不良后果的目的，而这在李嘉图看来是强者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专横手段的旧制度的残留。我们现已了解，竞争本身并无好坏，它只是一种需要被研究和控制的力量；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条河流，我们要观察它的强力与方向，我们建造河堤，是要使河流发挥无害的、积极的作用。但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竞争已成为了福音，而且在这种必然的观念之下，由普遍的非限制性竞争假说推演出来的经济法则已转变为行为准则，人们甚至认为偏离此准则就是不道德的。

Coming to the fac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first thing that strikes us is the far greater rapidity which marks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Before 1751 the largest decennial increase, so far as we can calculate from our imperfect materials, was 3 per cent. For each of the next three decennial periods the increase was 6 per cent.; then between 1781 and 1791 it was 9 per cent.; between 1791 and 1801, 11 per cent.; between 1801 and 1811, 14 per cent.; between 1811 and 182l, 18 per cent. This is the highest figure ever reached in England, for since 1815 a vast emigration has been always tending to moderate it; between 1815 and 1880 over eight millions (including Irish) have left our shores. But for this our normal rate of increase would be 16 or 18 instead of 12 per cent,in every decade.

来看产业革命的实际情况，我们首先会惊讶于人口的飞速增长。从我们手中不完整的资料来看，1751年以前，最大的人口增幅是十年间增长3%；此后的三十年间，每十年的增长率都是6%；之后1781年到1791年为9%，1791年到1801年为11%；1801年到1811年为14%；1811年到1821年为18%，这是英国至此为止最高的增幅。而1815年以来，大量的移民使人口增长有减缓的趋势。从1815年到

1880年，超过8百万人（包括爱尔兰人）移居海外。若不是这个原因，每十年正常的增长率应该是16%或18%，而不会是12%。

Next we notice the relative and positive decline in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 1811 it constituted 35 per cent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 in 1821, 33 per cent.; in 1831, 28 per c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its actual numbers have decreased. In 1831 there were 1,243,057 adult males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in Great Britain; in 1841 there were 1,207,989. In 1851 the whole number of persons engaged in agriculture in England was 2,084,153; in 1861 it was 2,010,454, and in 1871 it was 1,657,138. Contemporaneously with this change, the centre of density of population has shifted from the Midlands to the North; there are at the present day 458 persons to the square mile in the counties north of the Trent, as against 312 south of the Trent. And we have lastly to remark the change in the relative population of England and Ireland.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three kingdoms, Ireland had in 1821 32 per cent, in 1881 only 14.6 per cent.

接下来我们注意到农业人口的相对减少与绝对减少。1811年，农业人口占全英国的35%，1821年时占33%，1831年时占28%。同时，农业人口的实际数量也在减少。1831年，英国农业人口中的成年男性为124.3057万，1841年为120.7989万。1851年英国的全部农业人口为208.4153万，1861年为201.0454万，1871年为165.7138万。伴随着这一变化，人口密度的中心由中部向北部转移。目前，特伦特北部的人口密度为458人/平方英里，南部为312人/平方英里。我们最后再来说英格兰与爱尔兰相对人口的变化。1821年，爱尔兰占三个王国总人口的32%，到1881年则仅占14.6%。

An agrarian revolution plays as large part in the great industrial change of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does the revolutio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o which attention is more usually directed. Our next inquiry must therefore be: What were the agricultural changes which led to this noticeable decrease in the rural population? The three most effective causes wer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ommon-field system of cultivation; the enclosure, on a large scale, of common and waste land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small farms into large. We have already seen that while between 1710 and 1760 some 300,000 acres were enclosed, between 1760 and 1843 nearly 7,000,000 underwent the same proces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enclosure system was the substitution of large for small farm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 Laurence, though approving of consolidation from an economic point of view, had thought that the odium attaching to an evicting landlord would operate as a strong check upon it. But these scruples had now disappeared. Eden in 1795 notices how constantly the change was effected, often accompanied by the conversion of arable to pasture; and relates how in a certain Dorsetshire village he found two farms where twenty years ago there had been thirty. The process went on uninterruptedly into the present century. Cobbett, writing in 1826, says: “In the parish of Burghclere one single farmer holds, under Lord Carnarvon, as one farm, the lands that those now living remember to have formed fourteen farms, bringing up in a respectable way fourteen families.” The consolidation of farms reduced the number of farmers, while the enclosures drove the labourers off the land, as it became impossible for them to exist without their rights of pasturage for sheep and geese on common lands.

在十八世纪末的产业变革中，农业革命与制造产业的革命发挥着

同样大的作用，只是人们对后者的关注更多一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样显著的农村人口的减少是由哪些农业变革导致的呢？这里最主要的三个因素是：共有地耕作制度的消亡、对共有地与荒地的大规模圈地、小农场到大农场的合并。我们已经看到，1710年到1760年间被圈围的土地约为30万英亩，1760年到1843年间为将近700万英亩。与圈地运动密切相关的是大农场对小农场的取代。这一世纪上半叶，劳伦斯虽然从经济学角度赞同小农场的兼并，但他也考虑到，由于对驱逐农民的地主的憎恨，兼并进程会遭到很大的阻滞。然而这些顾忌现在都已消失了。1795年时，伊登注意到这些变革在不断进行，并时常有耕地转变为牧场；他还讲到多塞特郡的一个村庄，他发现那里二十年前有30个农场，而现在已只剩下2个了。这样的合并直到本世纪还在不断继续。科贝特在其1826年的著作中写道："在伯克莱尔教区卡那封伯爵的管理下，一个农民保有的全部土地作为一个大农场，据现在人们的记忆，这在过去原本是14个农场，养育着足有14个农户。"农场的合并导致了农民的减少，圈地运动又把劳动力从田地驱逐出去，他们失去了在公有地放羊养鹅的放牧权，这是根本无法生存下去的。

Severely, however, as these changes bore upon the rural population, they wrought, without doubt, distinct improvement from an agricultural point of view. They meant the substitution of scientific for unscientific culture. "It has been found," says Laurence, "by long experience, that common or open fields are great hindrances to the public good, and to the honest improvement which every one might make of his own." Enclosures brought an extension of arable cultivation and the tillage of inferior soils; and in small farms of 40 to 100 acres, where the land was exhausted by repeated corn crops, the farm buildings of clay and mud walls and three-fourths of the estate often saturated with water, consolidation into farms of 100 to 500 acres meant rotation of crops, leases of nineteen years, and good farm buildings. The period was one of

great agricultural advance; the breed of cattle was improved, rotation of crops was generally introduced, the steam-plough was invented, agricultural societies were instituted. In one respect alone the change was injurious. In consequence of the high prices of corn which prevailed during the French war, some of the finest permanent pastures were broken up. Still, in spite of this, it was said in 1813 that during the previous ten years agricultural produce had increased by one-fourth, and this was an increase upon a great increase in the preceding generation.

然而这些变化虽严重影响着农业人口，但它意味着科学耕作取代了非科学耕作，因此毫无疑问，这对于农业发展也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劳伦斯曾说，“长期的经验告诉人们，无论对于公众利益，还是各人对自己土地可能做出的可贵的改良而言，共有地和开放地都是巨大的阻碍。”圈地运动扩大了可耕地以及劣等土地的耕作；而且，那些40到100英亩的小农场，原来因重复的谷物耕作而枯竭，其农场的建筑都是黏土和土墙构筑，并且地界内四分之三都被水占据；而在合并为100到500英亩的大农场后，耕作方式改为轮作，农户会有十九年的租契，也会有更好的农家筑楼。这是农业取得巨大进步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牲畜品种得到改良，作物轮作方式得到引进，人们发明了蒸汽犁，建立了许多农业协会。但这些变化从一方面看是有害的，这就是英法战争期间的谷物价格高涨，导致了一些最好的永久性牧场遭到破坏。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1813年的农业生产仍比过去十年增长了四分之一，这是在前一时期幅大增产基础上的继续增长。

Passing to manufactures, we find here the all-prominent fact to be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factory for the domestic system, the consequence of the mechanical discoveries of the time. Four great inventions altered the character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the spinning-jenny, patented by Hargreaves in 1770; the waterframe,

invented by Arkwright the year before; Crompton's mule introduced in 1779, and the self-acting mule, first invented by Kelly in 1792, but not brought into use till Roberts improved it in 1825. None of these by themselves would have revolutionised the industry. But in 1769-the year in which Napoleon and Wellington were born-James Watt took out his patent for the steam-engine. Sixteen years later it was applied to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1785 Boulton and Watt made an engine for a cotton-mill at Papplewick in Notts, and in the same year Arkwright's patent expired. These two facts taken together mark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factory system. But the most famous invention of all, and the most fatal to domestic industry, the power-loom, though also patented by Cartwright in 1785, did not come into use for several years, and till the power-loom was introduced the workman was hardly injured. At first, in fact, machinery raised the wages of spinners and weavers owing to the great prosperity it brought to the trade. In fifteen years the cotton trade trebled itself; from 1788 to 1803 has been called its “golden age”, for, before the power-loom but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ule and other mechanical improvements by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yarn sufficiently fine for muslin and a variety of other fabrics was spun, the demand became such that “old barns, cart-houses, out-buildings of all descriptions were repaired, windows broke through the old blank walls, and all fitted up for loom-shops; new weavers” cottages with loom-shops arose in every direction, every family bringing home weekly from 40 to 120 shillings per week.” At a later date,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man was very different. Meanwhile, the iron industry had been equally revolutionised by the invention of smelting by pit-coal brought into use between 1740 and 1750, and by the application in 1788 of the steam-engine to blast furnaces. In the eight years which followed this later date, the amount of iron manufactured nearly doubled itself.

下面再来谈制造业，我们发现制造业最突出的事实是家庭工业制度为工厂所取代，这是时代下机器大发明的结果。棉纺工业因四项伟大发明而改变了其特质，这分别是1770年由哈格里夫斯取得专利的珍妮纺织机，1769年由阿克赖特发明的水力纺织机，1779年引入的克朗普顿发明的走锭纺纱机，1792年由凯利发明、后经罗伯茨改进并于1825年初次投入使用的自动走锭纺纱机。所有这些发明都不能单独促成产业革命。但在1769年，也就是拿破仑和威灵顿公爵诞生的那一年，詹姆斯·瓦特取得了蒸汽机的专利，16年后，蒸汽机应用于棉纺工业；1785年，博尔顿和瓦特为诺丁汉郡派威克镇（Papplewick）的纺织厂制造了发动机；同年，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织机专利期满。这两个事件共同标志着工厂制度已被采用。但最著名的发明，也是对家庭工业制度造成最致命一击的发明，就是1785年卡特赖特获得专利的动力织布机，但此后数年并未投入使用，在其引进工厂之前，工人们几乎不会受到伤害。事实上在初期，得益于大机器生产给工业带来的巨大的繁荣，纺纱工与织布工的工资有所提高。在十五年间，棉纺贸易额增长到三倍；1788年到1803年被称作棉纺业的“黄金时期”，这是因为动力织布机虽然尚未投入使用，但走锭纺纱机已被引入，其他一些大机器也已改良，这使一种（用于制造平纹布的）细纱和其他许多织物首次得以生产，人们对其需求量极大，于是“为了筹备织布厂的建设，各种旧仓房、车库和附属建筑得到修缮，并在旧的实墙上开了许多窗户；各处都是织布厂工人的新建房屋，每个家庭的周收入有40到120先令”。到了后来，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已经大为改观。同时，在钢铁业，由于1740年到1750年发明使用了沥青煤进行熔铁，加之1788年引入蒸汽机并将之应用于炼铁熔炉，钢铁业也发生了同样的革命。在1788年以后的八年间，钢铁产额几乎翻了一倍。

A further growth of the factory system took place independent of machinery, and owed its origin to the expansion of trade, an expansion which was itself due to the great advance made at this time i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e canal system was being rapidly develop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1777 the Grand Trunk

canal, 96 miles in length, connecting the Trent and Mersey, was finished; Hull and Liverpool were connected by one canal while another connected them both with Bristol; and in 1792, the Grand Junction canal, 90 miles in length, made a water-way from London through Oxford to the chief midland towns. Some years afterwards, the roads were greatly improved under Telford and Macadam; between 1818 and 1829 more than a thousand additional miles of turnpike road were constructed; and the next year, 1830, saw the opening of the first railroad. These improve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caused an extraordinary increase in commerce, and to secure a sufficient supply of goods it became the interest of the merchants to collect weavers around them in great numbers, to get looms together in a workshop, and to give out the warp themselves to the workpeople. To these latter this system meant a change from independence to depende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the report of a committee asserts tha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omestic and the factory system is, that in the latter the work is done “by persons who have no property in the goods they manufacture.” Another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is expansion of trade was the regular recurrence of periods of over-production and of depression, a phenomenon quite unknown under the old system, and due to this new form of production on a large scale for a distant market.

而工厂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并未依赖于大机器，而是源于贸易的扩大化。而商业扩大又得益于当时交通方式取得的极大进步。运河系统在全国迅速发展。1777年，长达96英里的大干流运河建成，连接起了特伦特河与墨西河；另一条运河连接了赫尔（Hull）与利物浦，并通过另一条运河将赫尔、利物浦与布里斯托尔相连；1792年开凿了90英里的大枢纽运河，形成了起自伦敦、途经牛津、直达中部各市的一条水路。几年后，道路大都改善成泰尔福式与碎石式路面；1818年

到1829年间建设了一千多英里的收取通行税道路；次年即1830年，第一条铁路开通。这些交通方式的改进推动了商业的极快增长。为了保证商品的充足供应，商人们从其利益出发，在周围集合大量织工，在工厂里集中织布机，向工人们提供纱线。对工人来说，这种体系意味着从依赖到独立的转变；19世纪初，有一委员会在报告指出，家庭工业制度与工厂制度的本质区别就是在工厂制度下商品的“制造者对商品完全不占有所有权”。商业扩大化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生产过剩与萧条期的规则循环，这一现象在旧制度环境下不为所知，是在新的生产形式下因生产规模和市场范围扩大而出现。

These altered conditions in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 necessarily involved an equal revolution in its distribution. In agriculture the prominent fact is an enormous rise in rents. Up to 1795, though they had risen in some places, in others they had been stationary since the Revolution. But between 1790 and 1833, according to Porter, they at least doubled. In Scotland, the rental of land, which in 1795 had amounted to £2,000,000, had risen in 1815 to £5,278,685. A farm in Essex, which before 1793 had been rented at 10s. an acre, was let in 1812 at 50s., though, six years after, this had fallen again to 35s. In Berks and Wilts, farms which in 1790 were let at 14s., were let in 1810 at 70s., and in 1820 at 50s. Much of this rise, doubtless, was due to money invested in improvements—the first Lord Leicester is said to have expended £400,000 on his property—but it was far more largely the effect of the enclosure system, of the consolidation of farms, and of the high price of corn during the French war. Whatever may have been its causes, however, it represented a great social revolution, a change in the balance of political power and in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classes. The farmers shared in the prosperity of the landlords; for many of them held their farms under beneficial leases, and made large profits by them. In consequence, their character completely

changed; they ceased to work and live with their labourers, and became a distinct class. The high prices of the war time thoroughly demoralised them, for their wealth then increased so fast, that they were at a loss what to do with it. Cobbett has described the change in their habits, the new food and furniture, the luxury and drinking, which were the consequences of more money coming into their hands than they knew how to spend. Meanwhile, the effect of all these agrarian changes upo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er was an exactly opposite and most disastrous one. He felt all the burden of high prices, while his wages were steadily falling, and he had lost his common-rights. It is from this period, viz.,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hat the alienation between farmer and labourer may be dated.

这些财富生产上的条件的改变必然包含着财富分配上的同样变革。在农业上，最显著的事实是地租的大幅上涨。到1795年，虽然有些地区的地租已有所增长，但其他地区自革命以来一直保持平稳。而据波特（Porter）指出，1790年到1833年间地租至少翻了一倍。在苏格兰，1795年的土地租费已达到200万英镑，到1815年又升至527.8685万英镑。埃塞克斯的一个农场，1793年以前每英亩地租是10先令，1812年涨到50先令，但六年后又回落到35先令。在伯克郡和威尔特郡，1790年以14先令出租的农场，1810年涨到70先令，1820年降为50先令。在许多地方，地租的上涨无疑是由巨额投资改良土地造成的（据称第一任莱斯特爵士在其所有地上花费了40万英镑），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受到了圈地制度、农场合并、英法战争期间谷物涨价的影响。但无论其原因何在，这都代表着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一次平衡政治权力与各阶级相对地位的大变革。很多农民通过优惠租契租赁土地，由此获取了极大的利润，农民们因而能够分得地主的繁荣。于是，农民的性质完全改变，他们不再和劳工一起工作生活，而是成为了一个不同的阶级。战争期间的高物价使他们彻底地迷失，因为他们的财富增长太快，甚至不知该如何处理。科贝特曾描述

过农民习性上的改变以及他们的新食品、家具、奢侈品和饮品，这都是他们手上更加宽裕不知怎样用来花销的结果。同时，这些农业变化对于劳动工人的状况却起到了相反的、无比惨重的影响。工人的工资在匀速下降，丧失了公共权利，又因高物价而感到负担沉重。正是从这个时期，也就是十九世纪初开始，农民和工人阶级变得渐渐疏离。

Exactly analogous phenomena appeared in the manufacturing world. The new class of great capitalist employers made enormous fortunes, they took little or no part personally in the work of their factories, their hundreds of workmen were individually unknown to them; and as a consequence, the old relations between masters and men disappeared, and a “cash nexus” was substituted for the human tie. The workmen on their side resorted to combination, and Trades-Unions began a fight which looked as if it were between mortal enemies rather than joint producers.

制造业领域也发生着完全相同的现象。作为新的阶级，大资本家雇主赚取了巨额财富，他们在自己的工厂里不承担或极少承担工作，对自己的几百名工人也一无所知。于是，主人与佣人的旧关系不复存在，“金钱关系”取代了人的联系。工人们因其各自立场而相互结盟，商业协会之间也开始了斗争，使之看起来不像是联合生产者，倒更像是势不两立的仇敌。

The misery which came upon large sections of the working people at this epoch was often, though not always, due to a fall in wages, for, as I said above, in some industries they rose. But they suffered likewise from the conditions of labour under the factory system, from the rise of prices, especially from the high price of bread before the repeal of the corn-laws, and from those sudden

fluctuations of trade, which, ever since production has been on a large scale, have exposed them to recurrent periods of bitter distress. The effec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rove that free competition may produce wealth without producing well-being. We all know the horrors that ensued in England before it was restrained by legislation and combination.

在这一时代，工人阶级承受的苦难通常是由工资降低引起的，但这并不绝对，如我前面所说，有些行业的工资还是有所提高的。不过，工人们一样要承受工厂制度下恶劣的劳动条件，一样要承受物价的高涨，特别是谷物法废除以前的面包高价，此外还要承受不时而来的贸易波动，自生产规模扩大以来，贸易波动就使工人周期性地遭受贫困。产业革命的结果证明，自由竞争可以创造财富却不为人民谋福祉。众所周知，在未以立法与联盟限制自由竞争以前，全英国都产生了极大的恐慌。

Chapter IX The Growth of Pauperism

第九章　贫困的扩大

Malthus tells us that his book was suggested by Godwin's Inquiry, but it was really prompted by the rapid growth of pauperism which Malthus saw around him, and the book proved the main influence which determined the reform of the English Poor Laws. The problem of pauperism came upon men in its most terrible form between 1795 and 1834. The following statistics will illustrate its growth:

马尔萨斯虽然说他的书是受了戈德温的探究（Godwin’sInquiry）的启发，但真正促使他写成此书的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周围贫困急速加剧，而此书也成为了决定英国济贫法改革的主要动因。贫困问题在1795年至1834年间最为严重。以下数据反映了贫困的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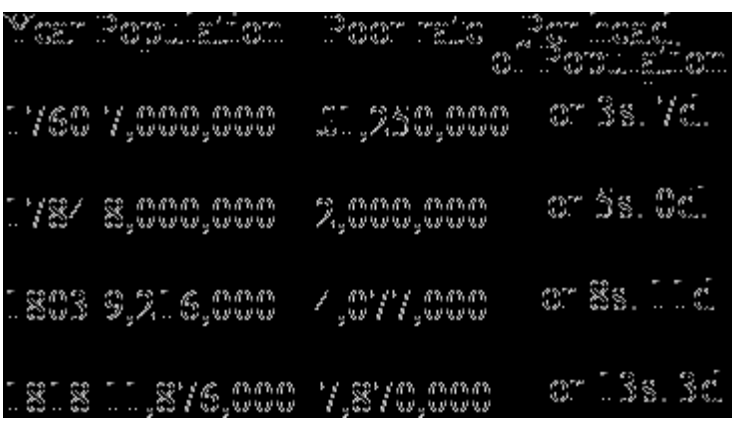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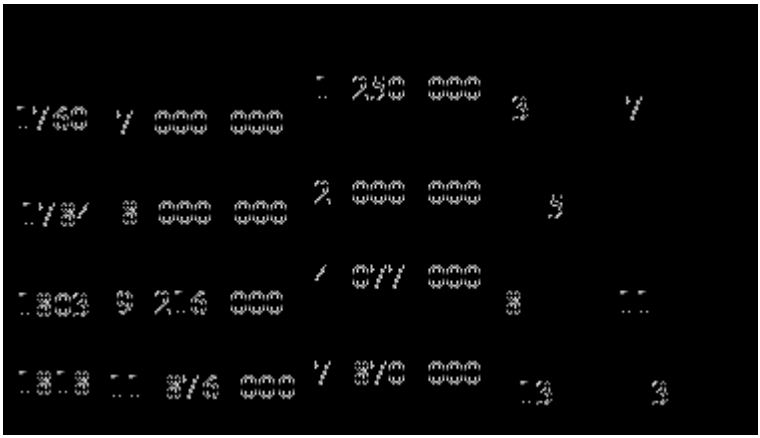

This was the highest rate ever reached. But really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we must examine the previous history of pauperism, its caus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main influences which determined its increase.

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税率。但想要理解问题的实质，我们必须考察贫困的早期历史、不同时期贫困的原因，以及导致贫困加剧的主要因素。

Prejudices have arisen against Political Economy because it seemed to tell men to follow their self-interest and to repress their instincts of benevolence. Individual self-interest makes no provision for the poor, and to do so other motives and ideas must take its place; hence the idea that Political Economy taught that no such provision should be made. Some of the old economists did actually say that people should be allowed to die in the street. Yet Malthus, with all his hatred of the Poor Law, thought that “the evil was now

so deeply seated, and relief given by the Poor Laws so widely extended, that no man of humanity could venture to propose their immediate abolition." The assumed cruelty of political economy arises from a mistaken conception of its province, and from that confusion of ideas to which I have before alluded, which turned economic laws into practical precepts, and refused to allow for the action of other motives by their side. What we now see to be required is not the repression of the instincts of benevolence, but their organization. To make benevolence scientific is the great problem of the present age. Men formerly thought that the simple direct action of the benevolent instincts by means of self-denying gifts was enough to remedy the misery they deplored; now we see that not only thought but historical study is also necessary. Both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pauperism and to discover its effectual remedies, we must investigate its earlier history. But in doing this we should take to heart two warnings: first, not to interpret medieval statutes by modern ideas; and secondly, not to assume that the causes of pauperism have always been the same.

人们对政治经济学已产生成见，因为它似乎告诉人们要追逐私利，抑制内心的仁爱本能。私欲使人不去顾及对穷人的照拂，因此就要代之以其他的动机和观念。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理解：政治经济学认为不应考虑对贫困人口的照顾。旧时的一些经济学家也确实说过可以允许人们因贫困而死在街头。而马尔萨斯尽管对济贫法十分不满，但连他也认为“贫困的危害如今已根深蒂固，济贫法的救济范围广泛，所有怀有仁慈心的人都不该提议将其即时废除”。人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残酷的，因为人们错误地理解了其使用范围并且混淆了上面提到的概念，于是人们把经济原理当作实际中的准则，并拒绝接受出于其他动机所做出的举动。我们现在并不需要压制仁慈的天性，而是要将它组织起来。使慈善科学化是现阶段的巨大难题。人们以前认为，通过自甘奉献的给予这样简单而直接的慈善举动就足以改变人们深恶的

贫困状况；而我们现在看到，重要的不仅是人的思想，对历史的研究也很必要。要了解贫困的特性，探索有效的救济措施，我们必须探查贫困的早期历史。但在探究过程中我们必须牢记两点：第一，不能用现代的思想解释中世纪的法令；第二，不能假设贫困的原因总是一成不变的。

The history of the Poor Laws divides itself into three epochs; from 1349 to 1601, from 1601 to 1782, and from 1782 to 1834. Now, what was the nature of pauperism in medieval society, and what were then the means of relieving it?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are permanent in all society, and thus in medieval life as elsewhere there was a class of impotent poor, who were neither able to support themselves nor had relatives to support them. This was the only form of pauperism in the early beginnings of medieval society, and it was provided for as follows. The community was then broken up into groups—the manor, the guild, the family, the Church with its hospitals, and each group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maintenance of all its members; by these means all classes of poor were relieved. In the towns the craft and religious guilds provided for their own members; large estates in land were given to the guilds, which "down to the Reformation formed an organised administration of relief" ("the religious guilds were organised for the relief of distress as well as for conjoint and mutual prayer")—while outside the guilds there were the churches, the hospitals, and the monasteries. The "settled poor" in towns were relieved by the guilds, in the country by the lords of the manor and the beneficed clergy. "Every manor had its constitution," says Professor Stubbs, and, referring to manumission, he adds, "the native lost the privilege of maintenance which he could claim of his lord." Among what were called "the vagrant poor" there were the professional beggars, who were scarcely then considered what we should now call paupers, and

“the valiant labourers” wandering only in search of work. Who then were the paupers? In the towns there were the craftsmen, who could not procure admission into a guild. In the country there was the small class of landless labourers nominally free. It is a great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at the movement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is also a movement from security to insecurity of maintenance.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growth of freedom and the growth of pauperism; it is scarcely too much to say that the latter is the price we pay for the former. The first Statute that is in any sense a Poor Law was enacted at a time when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serfs was proceeding rapidly. This is the Statute of Labourers, made in 1349;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the poor. Its object was to repress their vagrancy.

济贫法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349年至1601年、1601年至1782年、1782年至1834年。那么中世纪社会的贫困有何特点，当时缓解贫困的措施又有哪些呢？有些特征是所有社会所共有的，因此中世纪社会也与其他社会一样，存在着穷困潦倒的贫民阶级，他们无法自食其力，也没有亲戚供其维持生活。这是中世纪社会初期唯一的贫困形式，其救济方式如下：当时的社会分为几类团体——庄园、行会、家族及有救济院的教会；每类团体负责供养其所有成员。通过这种方式，所有阶层的穷人就都获得了救济。在城市中，同业行会和宗教行会供养其成员，行会分到大片的庄园土地，如此“形成了有组织的救济管理体系，直至宗教的改革”（“宗教行会是为救济苦难和共同、互相祷告而建立起来的”）——而在行会范围之外还有教会、救济院和修道院。城市里的“贫困居民”由行会救助，在农村则由庄园主和享有圣奉的牧师救助。斯塔布斯教授说：“每个庄园都有自己的规程”，在谈到奴隶的解放时他又补充道：“领地居民们们失去了向其领主要求供养的权利”。在所谓的“流动游民”中包括以行乞为生的人，我们现在称之为穷人，但当时还并不这样看；“流动游民”中还包括为找工作而漂泊的“有能力的劳动者”。那么，当时的穷人都是指哪些人呢？这是

指城市里无法进入行会的工匠，以及农村中小部分名义上自由但实际却没有土地的农民。这就体现了社会进步的一条重要法则：从被奴役到自由的转变同时也是生活供养从有保障到无保障的转变。自由的发展和贫困的扩大之间有莫大的联系，我们完全可以说前者的实现以后者的牺牲为代价。有一部法令不论如何都应算是第一步济贫法，它制定于农奴解放飞速进展的时期，这就是制定于1349年的《工人条例》，该法令对穷人的供养并无任何意义，它的目的只是控制人口的漂泊现状。

This Statute has been variously interpreted. According to some, it was simply an attempt of the landowners to force the labourers to take the old wages of the times before the Plague. Others object, with Brentano, to this interpretation, and believe that it was not an instance of class legislation, but merely expressed the medieval idea that prices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what was thought reasonable and not by competition; for this same Statute regulates the prices of provisions and almost everything which was sold at the time. Probably Brentano is in the main right. It is true that the landowners did legislate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the Statute would be to their own advantage; but the law is none the less in harmony with all the ideas of the age. The Statute affected the labourer in two directions: it fixed his wages, and it prevented him from migrating. It was followed by the Statute of 1388, which is sometimes called the beginning of the English Poor Law. We here find the first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impotent and the able-bodied poor. This law decreed that if their neighbours would not provide for the poor, they were to seek maintenance elsewhere in the hundred; no one is considered responsible for them; it is assumed that the people of the parish will support them. Here too we catch the first glimpse of a law of settlement in the provision that no labourer or pauper shall wander out of his hundred unless he carry

a letter-patent with him.

人们对这一法规有多种解读。一些看法认为，该法规只是地主欲使工人接受大瘟疫爆发前的低工资所作的尝试。布伦塔诺（Brentano）等人不赞成这种看法，并且认为此法规并不属于阶级立法，它只是体现了一种中世纪观念，即价格应由某种合理的规则来决定，而不应由竞争决定——该法规就规定了当时的供给物及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布伦塔诺的观点大概是正确的。确实，地主订立此法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但该法规依然与当时的所有观念一致。这一法规对工人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它规定了工人的工资，并防止了工人的移民。在这之后又有1388年的法规，该法规常被称作是英国济贫法的开端。这里我们发现了对无劳动能力的穷人和有劳动能力的穷人的第一次区别。该法规规定：若穷人不能从身边得到供养，则应该在邑（hundred）以内的其他地方寻求救济；人们都不认为该为穷人负责；人们认为穷人可由教区内的人来供养。工人或贫民除非持有特许证，否则不可在本邑以外的地方游荡——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居住法的最初形态。

No exact date can be assigned to the growth of able-bodied pauperism. It was the result of gradual social changes, and of the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m. Medieval legislators could not grasp the necessity for the mobility of labour, nor could they see that compulsory provision for the poor was essential, though the Statute of l388 shows that the bond between lord and dependent was snapped, and security for their maintenance in this way already at an end. The Church and private charity were deemed sufficient; though it is true that laws were passed to prevent the alienation of funds destined for the poor. And with regard to the mobility of labour,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 vagrancy of the times did not imply the distress of the labourers, but their prosperity. The scarcity

of labour allowed of high wages, and the vagrant labourer of the time seems never to have been satisfied, but always wandering in search of still higher wages. The stability of medieval society depended on the fixity of all its parts, as that of modern society is founded on their mobility. The Statutes afford evidence that high wage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old ties did in fact lead to disorder, robbery and violence; and by and by we find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er reversed; in the next period he is a vagrant, because he cannot find work.

我们无从知道有劳动能力的贫民其贫困加剧的确切时期，因为社会的变革是逐步进行的，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这些变革。1388年的法令表明，领主与其所供养者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以此保障供养的方式已至尽头；但尽管如此，中世纪的立法者仍然未能看到劳动流动的必要性，也未能看到立法供养穷人的必要性。人们认为已有足够的教会和私人慈善团体，但实际也通过了一些法律以防止济贫资金的转用。至于劳动流动，我们必须记住：当时的漂泊现象并非体现劳动者的贫困，反而体现了劳动者的繁荣。劳动力短缺使得高工资出现，当时的流动工人并不满足，他们还在追求更高的工资。中世纪社会的稳定正是基于方方面面的稳定，正如现代社会的稳定基于各方面的流动性。这些法规证明，高工资和旧关系终结确实导致了混乱、抢劫以及暴力，而且很快我们发现工人的状况发生了逆转，在接下来的时期里工人由于没有工作而开始漂泊。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auperism was becoming a really serious matter. If we ask, what were its causes then, and what the remedies proposed, we shall find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a great agrarian revolution was going on, during which pauperism largely increased. Farms were consolidated, and arable converted into pasture; in consequence, where two hundred men

had lived there were now only two or three herdsmen. There was no employment for the dispossessed farmers, who became simple vagabonds, “valiant beggars,” until later they were absorbed into the towns by the increase of trade. A main cause of the agrarian changes was the dissolution of monasteries, though it was one that acted only indirectly, by the monastic properties passing into the hands of new men who did not hesitate to evict without scruple.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prices of provisions rose through the influx of the precious metals and the debasement of the coinage. And while the prices of corn in 1541-82 rose 240 per cent as compared with the past one hundred and forty years, wages rose only 160 per cent. In this fact we discover a second great cause of the pauperism of the time; just as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e find wages the last to rise, and the labouring man the greatest sufferer from increased prices. As regards the growth of pauperism in towns, the main cause may be found in the confiscation of the estates of the guilds by the Protector Somerset. These guilds had been practically friendly societies, and depended for their funds upon their landed properties.

贫困问题到十六世纪已变得尤为严重。我们若考察当时的贫困原因以及救济措施，那么就会发现，十六世纪初正发生着农业上的巨大变革，贫困问题就在这期间开始加剧。农场被合并，耕地转变为牧场，于是原本有两百人的地方现在只余两三个放牧者。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完全没有工作，于是成为了纯粹的漂泊者与“有劳动能力的乞讨者”，直到后来，他们才由于贸易的增长而进入城市。对于这些农业变革，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修道院的解散，虽然这只起到间接的作用。此后修道院的资产转移到那些坚决而残忍地驱逐贫民的新人手中。几乎同一时期，贵金属的大量涌入与钱币的损耗使得基本物资的价格上涨。相比过去的140年，从1541年到1582年间谷物的价格上涨了240%，而薪水只上涨了160%。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造

成当时贫困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正如十八世纪末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工资是增长得最缓慢的要素，因此工人是当时物价上涨的最大受害者。至于城市，行会的庄园被萨默塞特护国公（ProtectorSomerset）没收，这或许就是城市中贫困扩大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行会属于互助团体，它的资金就是来源于土地资产。

And how did statesmen then deal with these phenomena? The legislation of the age about “vagabonds” is written in blood. The only remedy suggested was to punish the vagrant by cruel tortures-by whipping and branding. Even death was resorted to after a second or third offence; and though these penalties proved very ineffectual, the system was not abandoned till the law of 43 Elizabeth recognised that punishment had failed as a remedy. The other class of paupers, the impotent poor, had been directed by a Statute of Richard II to beg within a certain limited area; in the reigns of Edward VI and Elizabeth the necessity of compulsory provision for this class of poor slowly dawned upon men's minds. At first the churchwardens were ordered to summon meetings for the purpose of collecting alms, and overseers were appointed who 'shall gently ask and demand” of every man and woman what they of their charity will give weekly towards the relief of the poor. Mayors, head-officers, and churchwardens were to collect money in boxes “every Sunday and holyday”. The parsons, vicar and curate, were to reason with those who would not give, and if they were not successful, the obstinate person was to be sent to the bishop, who was to “induce and persuade him”; or by the provisions of a later law, he was to be assessed at Quarter Sessions (1562). Such was the first recogni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ompulsory support,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men in the community whom no one will relieve. There appears upon the scen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isolated individual, a figure unknown to medieval society, but who

constitutes so striking a phenomenon in the modern world. And hence springs up a new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Since the latter is no longer a member of a compact group, the State itself has to enter into direct connection with him. Thus, by the growth at once of freedom and of poverty, the whole statu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had been changed,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 legislation came to be this: to discover how we can have a working class of free men, who shall yet find it easy to obtain sustenance; in other words, how to combine political and material freedom.

那么政治家们是如何处理这些现象的呢？当时针对“漂泊人群”制定的法律是残酷的。法律提出的唯一解决办法是：用鞭笞与烙刑来严加拷问，以此作为对流浪者的残酷惩罚；触犯法律两三次以上的甚至会被处死。虽然这些刑罚被证明毫无效果，但直到伊丽莎白女王43年的法律认识到惩罚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一制度才最终被废除。对于另一类贫民，即无劳动能力的贫民，理查德二世通过了一项法律，将这一人群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内乞讨；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当政时期，人们慢慢认识到为贫困人群提供规定性扶持的必要性。起初，教会委员为募集救济物资而召集会议，并有监督人员被任命“亲切地询问和要求”，每个男女出于慈善每周拿出一些物品用以助贫。市长、高官和教会委员“每个星期日和宗教节日”都要用捐款箱进行募捐。教区长、教区牧师和助理牧师则要对那些不肯捐钱的人进行劝说，如果没能劝说成功，那么就会把这些顽固的人送到主教那里，主教又会对其进行“劝导和说服”，或者根据后来一部法律中的条文令其在地方法院（QuarterSessions）缴纳罚金（1562）。这是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强制扶贫的原因，即社会上总有一些人是无人救济的。孤立无援的个人首次出现，这是中世纪社会没有意识到的，但却是现代社会的突出现象。自此，国家和个人之间出现了新的联系。个人已不再是固定团体中的一员，国家必须与个人建立直接的联系。于是，由于自由提升，同时贫困扩大，工人阶级的状况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因此，现代立法

的问题就是：探究如何建立自由的工人阶级，使之摆脱艰难维持生活的境地；换言之，就是探究怎样将政治自由和物质上的自由结合起来。

All the principles of our modern Poor Laws are found in the next Statute we have to notice, the great law of the 43rd year of Elizabeth, which drew the sharp distinction, ever since preserved, between the able-bodied and the impotent poor. The latter were to be relieved by a compulsory rate collected by the overseers, the former were to be set to work upon materials provided out of the rates; children and orphans were to be apprenticed. From this date 1601, there were no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law till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law of settlement, however, which sprang directly out of the Act of Elizabeth, was added; it was the first attempt to prevent the migration of labourers by other means than punishment. It began with the Statute of 1662, which allowed a pauper to obtain relief only from that parish where he had his settlement, and defined settlement as forty days" residence without interruption; but after this Statute there were constant changes in the law, leading to endless complications; and more litigation took place on this question of settlement than on any other point of the Poor Law. It was not till 1795 that the hardship of former enactments was mitigated by an Act under which no new settler could be removed until he became actually chargeable to the parish.

我们下面要提到一部法令，近代济贫法的所有原则都是建立在这一法令之上的，这就是伊丽莎白女王43年的重大法律，这部法律对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和无劳动能力的穷人作了严格的区分，这种区别被我们一直沿用至今。后者受到监督官所募集的规定性救济金的补助，前

者得到由救济金所调配的材料，从而从事工作；孩子和孤儿则会被收为学徒。从1601年直到十八世纪末，法律一直没有过根本的改变。但后来从伊丽莎白的法令直接衍生出的居住法被附加进去，成为了用惩罚以外的措施防止工人移民的初次尝试。这由1662年的法令开始，该法令规定贫民只可从所居住的教区获得救济，并且定义：连续四十天无间断的居住则为定居。但在这一条文之后，法律一直不断变更，进而导致了无休止的问题。而且由居住问题引发的诉讼也多于济贫法提到的其他问题。直到1795年的一部法令规定新定居者在实际得到教区救济以前不可迁移，这些状况才终于得以缓解。

Two other modifications of the Act of Elizabeth require to be noticed. In 1691 the administration of relief was partially taken out of the hands of the overseers and given to 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 the alleged reason being that the overseers had abused their power. Henceforth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relieve except by order of a Justice of the Peace, and this provision was construed into a power conferred upon the Justices to give relief independently of any applic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overseers, and led, in fact, to Justices ordering relief at their own discretion. The other important change in the Poor Law wa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orkhouse test in 1722. It is clear that pauperism had grown since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There are many pamphlets of the period full of suggestions as to a remedy, but the only successful idea was this of the workhouse test. Parishes were now empowered to unite and build a workhouse, and refuse relief to all who would not enter it; but the clauses for building workhouses remained inoperative, as very few parishes would adopt them.

此外我们还要提及伊丽莎白法令的另外两项修订。1691年，救济管理工作一部分从监督官手中移交到治安法官手里，其原因是监督官

滥用职权。此后，除非有治安法官的委任，否则监督官不得发放救济，这一条款被解释为：治安法官有权不经监督官方面的申请而独立发放救济。而这实际导致了治安法官可随自己的意愿来安排救济。济贫法的另一重要修订是1722年济贫院的试行。从查尔斯二世执政以来，贫困的扩大十分明显。这一时期有很多书册提处了有关救济措施的提议，但唯一成功的只有济贫院的试行。于是，教区被授权联合和修建济贫院，对不进入济贫院者不予以发放救济。但是，由于极少有教区采用此法，因此修建济贫院的条款并无成效。

The question remains to be asked: Why was pauperism still slowly increasing in the cours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spite of a rise in wages, and,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low price of corn? Enclosure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farms, though as yet these had been on a comparatively small scale, were partly responsible for it, as they were in an earlier century. Already, in 1727, it was said that some owners were much too eager to evict farmers and cottagers, and were punished by an increase of rates consequent on the evicted tenants sinking into pauperism. By Eden's time the practice of eviction had become general,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viction and pauperism is an indisputable fact, though it has been overlooked by most writers. Eden's evidence again shows that pauperism was greatest where enclosures had taken place. At Winslow, for instance, enclosed in 1744 and 1766, “the rise of the rates was chiefly ascribed to the enclosure of the common fields, which, it was said, had lessened the number of farms, and from the conversion of arable into pasture had much reduced the demand for labourers.” Again, at Kilworth-Beauchamp in Leicestershire, “the fields being now in pasturage, the farmers had little occasion for labourers, and the poor being thereby thrown out of employment had, of course, to be supported by the parish.” Here too the evil was

aggravated by the fate of the ejected farmers, who sank into the condition of labourers, and swelled the numbers of the unemployed. “Living in a state of servile dependence on the large farmers, and having no prospect to which their hopes could reasonably look forward, their industry was checked, economy was deprived of its greatest stimulation, and their only thought was to enjoy the present moment.” Again, at Blandford, where the same consolidation of farms had been going on, Eden remarks that “its effects, it is said, oblige small industrious farmers to turn labourers or servants, who, seeing no opening towards advancement, become regardless of futurity, spend their little wages as they receive them without reserving a pension for their old age; and, if incapacitated from working by a sickness which lasts a very short time, inevitably fall upon the parish.”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工资已经上涨，而且十八世纪前期谷物价格十分低廉，但为何在这期间贫困依然在缓慢扩大呢？就像在前一个世纪一样，农场的合并以及圈地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仍然是贫困缓慢扩大的一部分原因。据说早在1727年就已有地主迫不及待地驱逐农场主和佃农，后来被驱逐的佃农陷入贫困，这些地主又因此要受到不断增长的济贫税的惩罚。到了伊登（Eden）时期，驱逐现象变得普遍起来，驱逐与贫困之间大有关联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大多书作却将其忽视掉了。伊登的例证再一次表明，贫困状况在发生圈地运动的地方是最为严重的。例如温斯洛（Winslow）于1744年至1766年实行圈地，“该地济贫税的上涨就主要是由于公用田地被圈围，并且使得农场的数量减少，而耕地转变为牧场又降低了对劳工的需求量”。此外，在莱斯特郡的基尔沃斯-比彻姆地区（Kilworth-Beauchamp），“土地现在被用于放牧，农场主对工人的需求量降低，因此贫穷者找不到工作，自然就要接受教区的扶持”。在此，被驱逐的农民便自然落入和工人一样的境地，失业人数由此扩大，农民的这种命运加剧了贫困的危害。“他们处于对大农场

主的从属状态，前景无望，工作受限，丧失了赚钱的最大动力，于是仅有的想法就是享受当下。”在布兰福德（Blandford），农场的合并也同样在进行。伊登评论说：“这使那些勤劳的小农沦为工人或者仆役，他们看不到进步的曙光，于是并不会为长远打算，总是将其微薄的工资全部花掉，而不会储蓄起来留以养老之用；如果因临时的疾病而无法工作，则必然会成为教区的负担。”

Besides the enclosure of the common-field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farms, the enclosure of the commons and wastes likewise contributed to the growth of pauperism. Arthur Young and Eden thought that commons were a cause of idleness; the labourers wasted their time in gathering sticks or grubbing furze; their pigs and cows involved perpetual disputes with their neighbours, and were a constant temptation to trespass. No doubt this was true where the common was large enough to support the poor without other occupat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where the labourer was regularly employed, a small common was a great extra resource to him. Arthur Young himself mentions a case at Snettisham in Norfolk, where, when the waste was enclosed, the common rights had been preserved, and as a result of this, combined with the increased labour due to the enclosure, the poor-rates fell from 1 s. 6d. to 1 s. or 9d., while population grew from five to six hundred. He goes on to say that enclosures had generally been carried out with an utter disregard for the rights of the poor. According to Thornton, the formation of parks contributed to the general result, but I know of no evidence on this head. A further cause of pauperism, when we come to the end of the century, was the great rise in prices as compared with that in wages. In 1782 the price of corn was 53s. 9 1/4d., which was considerably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of the preceding fifty years; but in 1795 it had risen to 81s. 6d., and in the next year it was even more. The corn average from

1795 to 1805 was 81s. 2 1/2d., and from 1805 to 1815 97s. 6d. in 1800 and 1801 it reached the maximum of 127s.and 128s. 6d., which brought us nearer to a famine than we had been since the fourteenth century. Many other articles had risen too. The taxes necessitated by the debt contracted during the American war raised the prices of soap, leather, candles, etc., by one-fifth; butter and cheese rose 1 1/2d. a pound, meat 1 d. And meanwhile, “what advance during the last ten or twelve years,” asks a writer in 1788, “has been made in the wages of labourers? Very little indeed; in their daily labour nothing at all, either in husbandry or manufactures.” Only by piece-work could they obtain more in nominal wages. Lastly, in the towns there had come the introduction of machinery, the final establishment of the cash-nexus, and the beginning of great fluctUations in trade. In the old days the employer maintained his men when out of work, now he repudiated th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decline in the position of the artisan could be attributed by contemporary writers to “the iniquitous oppressive practices of those who have the direction of them.”

除了圈围公用田地和合并农场，共有地和荒地的圈围同样助长了贫困的扩大。阿瑟·杨格和伊登认为，公有地的存在是造成失业的一个原因，工人都把时间浪费在捡树枝或挖荆豆上，养猪养牛使得邻里之间纷争不断，并且还要随时提防他人入侵。若公有地面积足以供养无其他工作的贫民，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工人被正常雇佣的地方，一小块公有地对工人来说就是巨大的额外资源。阿瑟·杨格提到了诺福克郡斯内蒂瑟姆（Snettisham）的一个例子，那里的荒地被圈围，人们的共同使用权利得以保留，结果圈地使得劳工数量增加，贫民救济税由1先令6便士降至1先令或9便士，人口从500人增长到600人。杨格又继续谈到，在普遍进行的圈地运动中，贫民的权利完全不被理会。桑顿（Thornton）认为，住宅庭园（parks）的建造

也对普遍的结果造成了影响，但我尚无这一方面的证据。到这一世纪末，可以看到引起贫困的另一个原因是物价相对于工资而言的大幅上涨。1782年，谷物的价格是53先令9.25便士，这已经比前50年的平均价格高出很多；到1795年，谷物价格涨到81先令6便士，到次年其价格甚至更高。从1795年到1805年，谷物的平均价格为81先令2.5便士；从1805年到1815年为97先令6便士。1800年和1801年，价格分别为127先令和128先令6便士，达到了最高水平。这是十四世纪以来最接近饥荒状态的一个时期。另外，其他很多商品的物价也在上涨。由于美国战争期间所欠下的债务，多种税款要被征收，因此肥皂、皮革、蜡烛等的价格上涨了1／5，黄油和奶酪每磅上涨了1.5便士，肉类每磅上涨了1便士。同时，1788年时有作者著文问道，“在过去十或十二年的时间里，工人的工资增长了多少呢？事实上，几乎没有增长；无论是农业还是制造业，工人以日计酬的劳动都没有任何改善。”工人只有通过计件加工才能获得更多的名义工资。最后，城市中引入了机器，最终建立起了金钱关系，同时贸易上也开始出现大波动。在过去，即使在无工作时雇主也要供养工人，而现在雇主否认这项义务；至于工匠状况的下降，有当代作家将其归因于“管理者对工匠残忍的压迫行为”。

Such seem to have been the causes of the growth of pauperism and of the degradation of the labourer; the single effective remedy attempted was the workhouse test, and this was abandoned in 1782. But might not landlords and farmers have done something more to check the downward course? Were there no possible remedies? One cannot help thinking the problem might have been solved by common justice in the matter of enclosures. Those who were most in favour of enclosing for the sake of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s, like Eden and Young, yet held that, in place of his common field and pasture rights, the labourer should have had an acre, or two acres, or half an acre, as the case might be, attached to his cottage. By such compensation much misery w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A more difficult question is, whether anything could have been done directly to relieve the stress of high prices? Burke contended that nothing could be done, that there was no necessary connection between wages and prices; and he would have left the evil to natural remedies.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in the North where there was no artificial interference with wages, the development of mining and manufactures saved the labourer.

以上似乎就是贫穷扩大以及工人衰退的原因，唯一有效的尝试是建立济贫院，而这却在1782年被废止。那么地主和农场主就未曾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种衰退吗？已无任何可行的救济办法了吗？我们不禁想到，通过在圈地中保证普遍公平，这一问题或许可以解决。有些人因圈地利于农业进步而极力赞成圈地，比如伊登和杨格。赞成者指出，工人应拥有一英亩、两英亩哪怕半英亩附属于其屋舍的土地，用以代替公有地的使用权和放牧权。这样的补偿可以防止很多悲剧的发生。但一个更大的难题是，我们是否有直接的办法来缓解高物价造成的压力？伯克（Burke）认为，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工资和物价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他主张将这些弊害留待自然去解决。其实在英国的北方，工人的工资不受人为的干涉，是那里采矿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拯救了工人。

In the Midlands and South, where this needful stimulus was absent, the case was different; some increase in the labourer's means of subsistence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here, in order that he might exist. It would have been dangerous to let things alone; and the true way to meet the difficulty would have been for the farmers to have raised wages—a course of action which they have at times adopted. But an absence alike of intelligence and generosity, and the vicious working of the Poor Laws in the midland and southern counties, prevented this. The farmers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claims alike of humanity and self-interest, so the justices and country gentlemen took the matter into their own hands, while the labourers threw themselves upon the Poor Law, and demanded that the parish should do what the farmers refused to do, and should supplement insufficient wages by an allowance. This was the principle which radically vitiated the old Poor Law. The farmers supported the system; they wished every man to have an allowance according to his family, and declared that “high wages and free labour would overwhelm them.” A change had also come over the minds of the landowners as to their relation to the people. In addition to unthinking and ignorant benevolence, we can trace the growth of a sentiment which admitted an unconditional right on the part of the poor to an indefinite share in the national wealth; but the right was granted in such a way as to keep them in dependence and diminish their self-respect. Though it was increased by the panic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is idea of bribing the people into passiveness was not absolutely, new. It had prompted Gilbert's Act in 1782, which abolished the workhouse test, and provided work for those who were willing near their homes. It was this Tory Socialism, this principle of protection of the poor by the rich, which gave birth to the frequent use of the term “labouring poor”, so common in the Statutes and in Adam Smith, an expression which Burke attacked as a detestable canting phrase.

而英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缺乏这种必要的刺激，因而情形也就不甚相同了。在这些地区，增加工人的谋生途径绝对有必要，因为这样才能维持工人的生存。听任事态的发展会很危险，正确应对这一问题的途径应是由农场主提高工资，而农场主也经常采取这种方法。但由于中部和南部地区人们知识的匮乏和同情心的缺失，加之济贫法的不良影响，工资的增加就受到了阻碍。农场主拒绝承认出于人道和私欲的各种要求，因而法官和乡绅接管了此类事宜，同时工人依赖于济贫

法，要求教区承担农场主不愿承担的责任，发放津贴以补贴其微薄的工资。就是这一原则根本改变了旧的济贫法。农场主表示支持这一制度，他们愿意让工人根据家庭情况领到补贴，并宣布“工人都将拥有高工资和自由劳动”。同时地主的心理也有所变化，他们渴望与工人建立新的关系。除了这样轻率而无知的慈善方式，我们还可看到，对贫民的照顾还体现在使之无条件、无限期享有国家财富份额，但这一权利是通过置身于从属地位、削弱其自尊心才获得的。这种收买民众、将其置于被动地位的想法，虽然因民众对法国革命的恐慌而有所扩大，但却绝不是首次出现的。受此影响，1782年时吉尔伯特条例（Gilbert’sAct）出台，这一条例废除了贫济院的试行，并为愿意劳动的人们提供住所附近的工作。正是在这种保守社会主义（ToySocialism）的由富人保护穷人的原则之下，“劳动贫民”一词开始被频繁使用。这种说法在各法条和亚当·斯密的文字中十分常见，而伯克将其评价为可恶的伪善用词。

The war with Napoleon gave a new impulse to this pauperising policy. Pitt and the country gentlemen wanted strong armies to fight the French, and reversed the old policy as regards checks upon population. Hitherto they had exercised control over the numbers of the labourers by refusing to build cottages; in 1771, “an open war against cottages” had been carried on, and landlords often pulled down cottages, says Arthur Young, “that they may never become the nests, as they are called, of beggar brats.” But now by giving extra allowance to large families, they put a premium on early marriages, and labourers were pai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their children. Further extension of the allowance system came from actual panic at home. Farmers and landowners were intimidated by the labourers: the landowners had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Malthus at once inflamed the minds of their labourers and preached to them submission. Rick-burning was frequent; at Swallowfield, in Wiltshire, the justic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anic struck by

the fires, so far yielded to the importunity of the farmers as to adopt the allowance-system during the winter months." In 1795 some Berkshire justices "and other discreet persons" issued a proclamation, which came to be considered as a guide to all the magistrates of the South of England. They declared it to be their unanimous opinion that the state of the poor required further assistance than had been generally given them; and with this view they held it inexpedient to regulate wages according to the statutes of Elizabeth and James; they would earnestly recommend farmers and others to increase the pay of their labourers in proportion to the present price of provisions; but if the farmers refused, they would make an allowance to every poor family in proportion to its numbers. They stated what they thought necessary for a man and his wife and children, which was to be produced "either by his own and his family's labour on an allowance from the poor-rates." These were the beginnings of the allowance system, which under its many forms ended in thoroughly demoralising the people; it had not been long in operation before we hear the labourers described as lazy, mutinous, and imperious to the overseers. When grants in aid of wages were deemed insufficient, the men would go to a magistrate to complain, the magistrate would appeal to the humanity of the overseer, the men would add threats, and the overseer would give in. In the parish of Bancliffe "a man was employed to look after the paupers, but they threatened to drown him, and he was obliged to withdraw." The whole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was lowered by the admission that they had a right to relief independent of work.

与拿破仑之间的战争为这一救济政策注入了新的动力。皮特（Pitt）和农村乡绅们希望有强大的军队以对抗法国，因此取消了旧政策对于人口的限制。此前，为了控制工人的数量，修建村舍是不允许的；且1771年时还展开了“针对村舍的公开战争”，地主们时常拆毁

农舍，据阿瑟·杨格所述，“这使地主不再是所谓穷人们的庇护所”。而现在，通过为大家庭提供额外津贴，早婚者会得到奖金鼓励，工人会根据子女数领到补贴。津贴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是由国内产生的实际恐慌所致。农场主和地主受到来自工人的威胁：据马尔萨斯描述，地主一面激怒了工人，又一面劝说工人顺从。焚烧稻草的事件经常发生。在威尔特郡的斯沃洛菲尔德村（Swallowfield），法官“因惧怕此类放火事件已不得不对农场主的纠缠做出让步，同意实行冬季的津贴措施”。1795年，有伯克郡的法官和“其他一些慎重人士”发布公告，该公告被认为是英国南部所有地方法官的指导原则。公告称，他们一致认为，由于贫困人口目前的状况，贫困者在已有所得的基础上还需得到进一步的援助；鉴于此，他们认为由伊丽莎白和詹姆士的法令来决定工资是不合理的；他们诚心劝说农场主等人按照供给物的现行价格提高其工人的工资；如果农场主拒绝此做法，就需按照贫困家庭的人数予以补贴。此外他们还说明，他们认为一个男子及其妻儿的必要所得应是“由贫济税所得的津贴以外，他自己和家庭的劳动所得”。这就是补贴制度的开端，该制度具有多种形式，它最终导致了民众的完全堕落。在补贴制度实行不久，我们就听说关于工人懒惰、不服从、对监督官态度蛮横的描述。当人们觉得所获的工资补贴不足，他们会向地方官员抱怨，地方官员会要求监督官拿出人道主义精神，加之工人施加威吓，这样监督官就会做出妥协。在班克利夫（Bancliffe）教区，“一位男子被雇佣监督贫穷者，但却被贫穷者威胁要溺死他，对此他也就只好让步了”。如今，工人认为他们可不依赖工作而得到救济，工人的整体品行也就因此而变差了。

Chapter X Malthus and the Law of Population

第十章　马尔萨斯及其人口论

It was during this state of things, with population rapidly increasing, that Malthus wrote. Yet he was not thinking directly of the Poor Law, but of Godwin, who,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ousseau, had in his Inquirer ascribed all human ills to human government and institutions, and drawn bright pictures of what might be in a reformed society. Malthus denied their possibility. Under no system, he contended, could such happiness be insured; human misery was not the result of human injustice and of bad institutions, but of an inexorable law of nature, viz., that population tends to outstrip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This law would in a few generations counteract the effects of the best institutions that human wisdom could conceive. It is remarkable that though in his first edition he gave a conclusive answer to Godwin, Malthus afterwards made an admission which deducted a good deal from the force of his argument. To the “positive check” of misery and vice, he added the “preventive check” of moral restraint, namely, abstinence from marriage. To this Godwin made the obvious reply that such a qualification virtually conceded the perfectibility of society. But Malthus still thought his argument conclusive as against Godwin's Communism. If private property was abolished, he said, all inducements to moral restraint would be taken away. His prophecy has, however, since his time, been refuted by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ic societies in America, which proves that the absence of private property is not incompatible with moral restraint.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正写于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他没有直接考虑济贫法，而是从戈德温的学说入手。受卢梭的影响，戈德温在他的研究中将人类的所有劣习归因于政府与体制，并构想了社会变革将带来的美好图景。马尔萨斯否认这些美好图景的可能性。他认为，没有任何制度能保证这样的福祉，人类的灾难并非由不公与恶劣体制所致，而是一种必然的自然法则，即人口的增长总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在该法则之下，无论人类智慧创造出怎样完美的体制，其成效都会在几代人之内被抵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马尔萨斯在其第一版人口论中对戈德温的理论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但他后来承认的一个观念却又大大降低了其论点的力度。基于对灾难与恶习的“积极抑制”，马尔萨斯又提出了道德抑制，即“预防性抑制”，也就是限制婚姻。对此，戈德温明确地回应说婚姻限制实质上是承认了社会的完全性。但马尔萨斯仍认为他的这一论点是与戈德温的共产主义完全对立的。他指出，如果将私有财产废除，则所有鼓励道德抑制的因素都将不复存在。然而在那以后，他的预言已被美国的共产主义社会历程所推翻，这一历程表明，私有财产的取缔与道德抑制并不矛盾。

Is Malthus's law really true? We see that it rests on two premises. The first is, that the potential rate of increase of the human race is such that population, if unchecked, would double itself in twenty-five years; and Malthus assumes that this rate is constant in every race and at all times. His second premise is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i.e. that after a certain stage of cultivation a given piece of land will, despite any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s, yield a less proportionate return to human labour; and this law is true. Malthus did not deny that food might, for a time, increase faster than population; but land could not be increased, and if the area which supplied a people were restricted, the total quantity of food which it produced per head must be at length diminished, though this result might be long deferred. Malthus himself regarded both his conclusions as equally self-

evident. “The first of these propositions,” he says, “Ii considered as proved the moment the American increase was related; and the second proposition as soon as it was enunciated.” Why then did he write so long a book? “The chief object of my work,” he goes on to say, “was to inquire what effects these laws, which I considered as established in the first six pages, had produced, and were likely to produce, on society—a subject not very readily exhausted.”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essay is an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the checks on it which have obtained in different ages and countries; and he applies his conclusion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oor Laws in England.

那么马尔萨斯的法则真的正确吗？我们看到这取决于两个前提。首先，人口可能以极高的速率增长，如果不加限制，则会在25年之内增加一倍。马尔萨斯认为这样的速率在任何种族任何时期都是不变的。他的第二个前提是收益递减规律，也就是说，在文明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不论农业怎样进步，一块土地的收成对劳动力的比率都将减少。这条规律是正确的。马尔萨斯并不否认食品的增长在一定时期内会超过人口的增长，但土地是不会增多的。如果供养一定人口的单位土地面积有限，食物总产出量（人均所得即基于该总产量计算而得）必将最终减少，不论这一结果会来得怎样迟缓。马尔萨斯称，这两个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其中的第一个命题，我认为用美国人口的增长就可说明；第二个命题一经提出即可阐明”。既然如此，那他又为何要写如此一本巨著呢？马尔萨斯又说：“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究前六页所建立的法则对社会产生了哪些效果以及可能产生哪些效果——这一课题并不容易阐明。”此书的大量篇幅是对人口增长和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所实行的人口限制所进行的历史调查。此外，马尔萨斯还将其结论应用于英格兰济贫法的管理上。

Now there are grave doubts as to the universal truth of his first

premise. Some of his earlier opponents, as Doubleday, laid down the proposition that fecundity varies inversely to nutriment. Thus baldly stated their assertion is not true; but it is au observed fact, as Adam Smith noticed long ago, that the luxurious classes have few children, while a “half-starved Highland woman” may have a family of twenty. Mr. Herbert Spencer again has asserted that fecundity varies inversely to nervous organization, and this statement has been accepted by Carey and Bagehot. But it is not so much the increase of brain power as the worry and exhaustion of modern life which tends to bring about this result. Some statistics quoted by Mr. Amasa Walker tend to prove this. He has shown that in Massachusetts, while there are about 980,000 persons of native birth as against only 260,000 immigrants, the number of births in the two classes is almost exactly the same, the number of marriages double as many in the latter, as in the former, and longevity less and mortality greater among the Americans. Mr. Cliffe-Leslie attributes this fact to a decline in fecundity on the part of American citizens. The whole question, however, is veiled in great obscurity, and is rather for physiologists and biologists to decide; but there do seem to be causes at work which preclude us from assuming with Malthus that the rate of increase is invariable.

在此，针对其第一个前提是否普遍正确曾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一些早期的反对者，如道布尔迪（Doubleday）等曾提出这样的见解：人类的繁衍力与食物成反比例变化。这一大胆的断言是错误的，但亚当·斯密也早注意到，豪奢阶层的人们少有子嗣，而“苏格兰高地的半饥荒妇女”却或许有近乎二十个孩子，这是可真切观察到的事实。此外又有赫伯特·斯宾塞先生（HerbertSpencer）指出，人类的繁衍力与神经组织成反比例关系，这一点已被凯里（Carey）和白哲特所接受。但导致人口增长的往往并不是对人才的需求，而是现代生活的种种忧虑和惫累。对此，阿马萨·沃克先生（AmasaWalker）所引用的数

据可以作为证明。他的数据显示，马萨诸塞州当地人口为98万，移民人口只有26万，但这两个阶层的出生人口却几乎完全相同，后者的结婚率是前者的两倍；再有，美国人口的寿命一般较短，死亡率一般较高。克里夫·莱斯利先生（Cliffe-Leslie）把这一事实归诸于美国国民财富的减少。然而整个问题仍是晦涩不明的，我们不如将其留待生理学者与生物学者来做判断；但似乎确有因素使得我们不能和马尔萨斯一样认为人口增长率是一成不变的。

Another American writer, Mr. Henry George, has recently argued that Malthus was wrong and Godwin right, that poverty is due to human injustice, to an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e result of private property in land, and not to Malthus's law of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or to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both of which he altogether rejects. With regard to the latter he urges with truth that in certain communities, for instance California, where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evidently does not come into operation, the same phenomenon of pauperism appears. Now against Mr. George it can be proved by facts that there are cases where his contention is not true. It is noticeable that he makes no reference to France, Norway, and Switzerland-all countries of peasant proprietors, and where consequently the land is not monopolised by a few. But it is certain that in all these countries, at any rate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skill,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does obtain; and it is useless to argue that in these cases it is the injustice of man, and not the niggardliness of nature, that is the cause of poverty, and necessitates baneful checks on population. Still I admit that Mr. George's argument is partially true—a large portion of pauperism and misery is really attributable to bad government and injustice; but this does not touch the main issue, or disprove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近来另有一位美国作家亨利·乔治先生指出，马尔萨斯是错误的，而戈德温是正确的。他认为贫穷源于社会的不公和财富的不均衡分配（这是由土地私有化造成的），而并非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增长规律和收益递减规律，他对这两点都表示反对。至于第二条规律，乔治先生提出，在有些地方如加利福尼亚，土地收益递减规律显然未起作用，但也同样出现了贫困现象。而对于乔治先生的观点，又有一些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我们注意到他没有提到法国、挪威和瑞士，这些都是自耕农国家，其土地并不被少数人所独占。但我们能肯定，在所有这些国家，不论其现阶段的农业知识和技术状况如何，土地收益递减规律都在发挥作用；在这些情形下，辩说导致贫困进而限制人口增长的是社会的不公而非自然的残酷是无意义的。我仍然认为乔治先生的论点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大部分的贫穷和苦难实际都是由恶劣的政府管理和不公导致的，但这并没有触及到要害问题，也并不是对收益递减规律的反证。

To return to Malthus's first proposition. The phrase that “population tends to outstrip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is vague and ambiguous. It may mean that population, if unchecked, would outstrip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or it may mean that population does increase faster than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It is quite clear that, in its second sense, it is not true of England at the present day. The average quantity of food consumed per head is yearly greater; and capital increases more than twice as fast as population. But the earlier writers on population invariably use the phrase in the latter sense, and apply it to the England of their time. At the present day it can only be true in this latter sense of a very few countries. It has been said to be true in the case of India, but even there the assertion can only apply to certain districts. Mr. George, however, is not content to refute Malthus's proposition in this sense; he denies it altogether, denies the statement in the sense that population, if unchecked, would outstrip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and lays down

as a general law that there need be no fear of over-population if wealth were justly distributed. The experience of countries like Norway and Switzerland, however, where over-population does exist, although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s tolerably even, shows that this doctrine is not universally true. Another criticism of Mr. George, however, is certainly good, as far as it goes. Malthus's proposition was supposed to be strengthened by Darwin's theory, and Darwin himself says that it was the study of Malthus's book which suggested it to him; but Mr. George rightly objects to the analogy between man and animals and plants. It is true that animals, in their struggle for existence, have a strictly limited amount of subsistence, but man can, by his ingenuity and energy, enormously increase his supply. The objection is valid, though it can hardly be said to touch the main issue.

回到马尔萨斯的第一个命题——“人口的增长总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这种说法是模棱两可的。它的意思可以是人口若不被限制就会超过生活资料，或者也可以是人口的增长确实已超过了生活资料。很明显，就第二种解释而言，它对当今的英国就不适用。平均每人消耗的食物量每年都在增加，而资本的增长速度是人口的两倍。但早期的人口理论者普遍使用第二个解释，并将之应用于当时的英国。到今天，第二种解释对某一些国家来说仍然正确。我们说印度国内就是如此，但该言论也只是对印度的某些地区才是这样。不过，乔治先生并不满足于只驳斥马尔萨斯这种理解下的此命题，他将该命题一概否定，即也包括其另一种解释：人口若不加限制就会超过生活资料。他提出这样的一般法则：如果财富可以被公平分配，那么人口过剩也就不足为惧。而在确实出现了人口过剩的国家如挪威和瑞士，虽然财富分配颇为均等，但这种说法也不普遍正确。当然，乔治先生的另一项批驳到目前看来还是不错的。马尔萨斯的命题因达尔文的理论而得到强化，达尔文自己也说马尔萨斯的著作给了他以启发，但是当然，乔治先生反对人类与动植物之间的类比。的确，动物在生存竞争中其

生存资料是极度受限的，而人类却能凭借智慧与能力使生活资料大大增加。对于这样的反对，我们很难认为它触及了主要论题，但这种反对毕竟是有效的。

I have spoken of the rapid growth of population in the period we are studying. We have to consider how Malthus accounted for it, and how far his explanation is satisfactory, as well as what practical conclusions he came to. In the rural districts he thought the excessive increase wa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bad administration of the Poor Laws, and of the premium which they put on early marriages. This was true, but not the whole truth; there are other point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old days the younger labourers boarded in the farmhouses, and were of course single men; no man could marry till there was a cottage vacant, and it was the policy of the landlords in the “close villages” to destroy cottages, in order to lessen the rates. But now the farmers had risen in social position and refused to board the labourers in their houses. The ejected labourers, encouraged by the allowance system, married recklessly, and though some emigrated into the towns, a great evil arose. The rural population kept increasing while the cottage accommodation as steadily diminished, and terrible overcrowding was the result. Owing to the recklessness and demoralisation of the labourer the lack of cottages no longer operated as any check on population. The change in the social habits of the farmers had thus a considerable effect on the increase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tended to aggravate the effects of the allowance system.

上面我已提到我们所研究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现在我们来看马尔萨斯对此如何描述、他的解释是否令人满意，以及他得出了哪些实

际的结论。对于农村地区，他认为人口的过速增长是由于济贫法实施不当与对早婚的资金奖励。这虽然不错，但也并不全然正确，另有一些问题需要考虑进去。在过去，年轻的工人寄宿在农舍，他们当然都是独身者，在没有可用住房以前则无法结婚；此外，为减少济贫税而破坏住房也是“人口密集的村庄”的地主们的政策。而现在农场主的社会地位已经提高，他们不再为工人提供住宿。被驱逐的工人受到津贴制的吸引而草率结婚，虽然有些工人迁往城市，但还是催生出了许多弊端。农业人口保持增长，而农舍供应缓慢减少，其结果就是拥挤状况更加糟糕。由于工人的草率与堕落，加之农舍短缺，对人口的限制也就不再发挥作用。这样，农场主社会习惯的改变就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的人口增长，并也使津贴制的结果更加恶化。

In the towns the greatest stimulus came from the extension of trade du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machinery. The artisan's horizon became indistinct; there was no visible limit to subsistence. In a country like Norway, with a stationary society built up of small local units, the labourer knows exactly what openings for employment there are in his community; and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Norwegian peasant hesitates about marriage till he is sure of a position which will enable him to support a family. But in a great town, among “the unavoidable variations of manufacturing labour,“, all these definite limits were removed. The artisan could always hope that the growth of industry would afford employment for any number of children-an expectation which the enormously rapid growth of the woollen and cotton manufactures justified to a large extent. And the great demand for children's labour in towns increased a man's income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his family, just as the allowance system did in the country.

在城市，机器的引入使贸易得以扩大，最大限度刺激人口增长。

工匠的谋生界限开始模糊化，对其维生途径已经没有明显的限制。在挪威这样的国家，其地区单位小，社会总体呈静止状态，工人对当地的工作缺口十分了解，且挪威农民在确定自己有能力抚养家庭之前并不会草率结婚。但在更大的城市，“制造业劳动的各种变化不可避免”，因此所有这些限制都被废除。工匠总希望工业的发展能使无论多少孩子都能得到工作——这样的期望已在极速发展的毛纺业和棉纺工业得到充分印证。城市里对童工的需求量大，这使人们的工资与家庭人数的比例有所增长，正如津贴制在农村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What remedies did Malthus propose? The first was the abolition of the Poor Law, and he was not singular in this opinion. Many eminent writers of the time believed it to be intrinsically bad. He suggested that at a given date it should be announced that no child born after the lapse of a year should be entitled to relief; the improvident were to be left to “the punishment of nature” and “the uncertain support of private charity.'. Others saw that such treatment would be too hard; that a Poor Law of some sort was necessary, and that the problem was how to secure to the respectable poor the means of support without demoralising them. His second remedy was moral restraint-abstention from marriage till a man had means to support a family, accompanied by perfectly moral conduct during the period of celibacy.

那么马尔萨斯给出了怎样的救济政策呢？他的第一个政策是废除济贫法。宣扬此做法的并非只他一人。当时的很多备受推崇的作家都认为济贫法根本上是不对的。马尔萨斯提出，应该规定一个日期，在此日期之后出生的孩子没有资格得到救济。挥霍者应受到“自然的惩罚”，并由“私人慈善团体提供并不稳定的扶持”。另一些人认为这样的处理过于苛刻，有些形式的济贫法还是必要的，问题只是如何为并不卑贱的穷人提供生活资料而同时又不使其消沉。马尔萨斯的第二个政

策是道德抑制，即一名男子在有能力抚养家庭以前不准结婚，并要求其在婚前有完全良好的道德品行。

Let us now see what have been the actual remedies. The chief is the reform of the Poor Laws in 1834, perhaps the most beneficent Act of Parliament which has been passed since the Reform Bill. Its principles were (a)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orkhouse test and the gradual abolition of outdoor relief to able-bodied labourers; (b) the formation of unions of parishes to promote economy and efficiency, these unions to be governed by Boards of Guardians elected by the ratepayers, thus putting an end to the mischievous reign of 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 (c) a central Board of Poor Law Commissioners, with very large powers to deal with the Boards of Guardians and control their action; (d) a new bastardy law; (e) a mitigation of the laws of settlement. The effect of the new law was very remarkable. As an example, take the case of Sussex. Before 1834 there were in that county over 6000 able-bodied paupers; two years later there were 124. A similar change took place in almost all the rural districts, and the riots and rick-burning which had been so rife began to grow less frequent. Equally remarkable was the effect upon the rates. In 1818 they were nearly £8,000,000 in England and Wales; in 1837 they had sunk to a little over £4,000,000, and are now only £7,500,000 in spite of the enormous growth of population. The number of paupers, which in 1849 was 930,000, has dwindled in 1881 to 800,000, though the population has meanwhile increased by more than 8,000,000. Notwithstanding this improvement the Poor Laws are by no means perfect, and great reforms are still needed.

我们现在来看实际的政策有哪些。这其中最主要的是1834年的济

贫法改革，这或许也是改革法案通过以来最为慈惠的议会立法。其原则是：（a）逐步废除对有能力劳动者的户外救济并试行济贫院；（b）为促进节约和提高效率而建立教区联合，该联合由纳税人选举出的监管委员会进行管理，以此杜绝治安法官的专擅管制；（c）成立济贫法中央委员会，使之具有绝对权力与监管委员会进行交涉并管理其一切行为；（d）颁布新的私生子法；（e）使居住法有所缓和。新济贫法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我们以萨塞克斯郡为例，1834年以前，该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超过6000人，两年后已只有124人。类似的改变几乎在所有农村地区都有发生，并且先前频繁出现的暴动和焚草事件也少了很多。该法对济贫税的影响也同样值得关注。1818年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济贫税为将近800万英镑，1837年这一数字降至略多于400万英镑，而现在虽然人口大幅增长，济贫税却仅为750万英镑。1849年时，贫困人口为93万，到1881年，虽然人口增长超过了800万，但贫困人口数量却减少到80万。然而，尽管济贫法做出了如此多的改良，但也决不能说它是无缺陷的，实际上它仍需要大量的改进。

Next in importance as an actual remedy we must place emigration. Malthus despised it. He thought that “from the natural unwillingness of people to desert their native country, and the difficulty of clearing and cultivating fresh soil, it never is or can, that, even if effectual for the time, the be adequately adopted”; relief it afforded would only be temporary, “and the disorders would return with increased virulence.“. He could not of course foresee the enormous development which would be given to it by steam navigation, and the close connection established thereby between England and America. Since 1815 eight and a quarter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emigrated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since 1847 three and a half millions have gone from England and Wales alone; and this large emigration has of course materially lightened the labour market. Nor could Malthus any more foresee the great

importation of food which would take place in later times. In his day England was insulated by war and the corn laws; now, we import one-half of our food, and pay for it with our manufactures.

对于接下来的一项重要的实际政策，我们必须要说到移民。马尔萨斯对这一点并不重视，他认为“人们本来不愿离开故土，而且新土地也不易开垦和耕作，因此，即使在当时有效果，该法也绝不能普遍实施”；由此带来的救济只是暂时的，“混乱终将再次出现，并将带来更大的危害”。当然，马尔萨斯未能预见轮船航运使得移民数量大大增加，也未能预见由此导致的英美两国之间的密切联系。自1815年以来825万人从英国移民，1847年以来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有350万人移民，这样大规模的移民自然大大减轻了劳动力市场的负担。此外，马尔萨斯也未能预见在他以后的时期将有大量的食品进口。在马尔萨斯那个时代，英格兰因战争和谷物法而被孤立，而现在我们一半的食物都来自进口，用我们的制造品支付。

As to moral restraint, it is very doubtful, whether it has been largely operative. According to Professor Jevons, writing fifteen years ago, it has been so only to a very small extent. Up to 1860 the number of marriages was rather on the increase; but if among the masses, owing to cheap food, marriages have become more frequent, restraint has on the other hand certainly grown among the middle classes and the best of the artisan class.

至于道德抑制能否起到很大的效果，这很值得我们怀疑。据15年前杰文斯（Jevons）教授所述，道德抑制的作用十分有限。截至1860年，结婚数一直在不断增多。在一般群众之中，由于食物价格低廉，更多人选择结婚。至于中产阶级和上等工匠阶层，这种限制确实则是增加的。

I wish to speak of one more remedy, which Malthus himself repudiated, namely, that of artificial checks o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t has been said that such questions should only be discussed “under the decent veil of a dead language.“. Reticence on them is necessary to wholesomeness of mind; but we ought nevertheless to face the problem, for it is a vital one. These preventive checks on births excite our strong moral repugnance. Men may call such repugnance prejudice, but it is perfectly logical, because it is a protest against the gratification of a strong instinct while the duties attaching to it are avoided. Still our moral repugnance should not prevent our considering the question. Let us examine results. What evidence is there as to the effects of a system of artificial checks? We know that at least one European nation, the French, has to some extent adopted them. Now we find that in the purely rural Department of the Eure, where the population, owing presumably to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artificial checks, is on the decline, although the district is the best cultivated in France and enjoys considerable material prosperity, the general happiness promised is not found. This Department comes first in statistics of crime; one-third of these crimes are indecent outrages; another third are paltry thefts; and infanticide also is rife. Though this is very incomplete evidence, it shows at least that you may adopt these measures without obtaining the promised results. The idea that a stationary and materially prosperous population will necessarily be free from vice is unreasonable enough in itself, and there is 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 against it. Indeed, one strong objection to any such system is to be found in the fact that a stationary population is not a healthy condition of things in regard to national life; it means the removal of a great stimulus to progress. One incentive to invention, in particular, is removed in France by attempts to adapt population to the existing means of

subsistence; for in this respect it is certainly true that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s essential to progress. Such practices, moreover, prove injurious to the children themselves. The French peasant toils ceaselessly to leave each of his children a comfortable maintenance. It would be better for them to be brought up decently, and then left to struggle for their own maintenance. Much of the genius and inventive power in English towns has come from the rural districts with men belonging to large families, who started in life impressed with the idea that they must win their own way. It is wrong to consider this ques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wealth alone; we cannot overrate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life as the source of all that is best in national life. Often the necessity of supporting and educating a large family is a training and refining influence in the lives of the parents, and the one thing that makes the ordinary man conscious of his duties, and turns him into a good citizen. In the last resort we may say that such practices are unnecessary in England at the present day. A man in the superior artisan or middle classes has only to consider when he will have sufficient means to rear an average number of children; that is, he need only regulate the time of his marriage. Postponement of marriage, and the willing emigration of some of his children when grown up, does, in his case, meet the difficulty. He need not consider whether there is room in the world for more, for there is room; and, in the interests of civilisation, it is not desirable that a nation with a great history and great qualities should not advance in numbers. For the labouring masses, on the other hand, with whom prudential motives have no weight, the only true remedy is to carry out such great measures of social reform as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dwellings, better education and better amusements, and thus lift them into the position now held by the artisan, where moral restraints are operative. Above all,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this is not a purely economic problem, nor is it to be solved by mechanical

contrivances. To reach the true solution we must tenaciously hold to a high ideal of spiritual life. What the mechanical contrivances might perchance give us is not what we desire for our country. The true remedies, on the other hand, imply a growth towards that purer and higher condition of society for which alone we care to strive.

下面我还要提到另一项救济政策，这是马尔萨斯所反对的，即对新生儿数量的人为控制。有人说该问题只能用“优美面纱下的灭绝语言”来讨论，为了保持思想的健康，对此问题需要闭口不谈，但这问题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又必须去面对。这些针对新生儿出生的预防性抑制引起我们强烈的道德反感。人们也许把这反感称为偏见，但这反感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反抗在避免附带义务同时满足强烈的本能。另外我们在道德上的反感也不应阻止我们思考这些问题。下面我们来寻找答案，有哪些证据可以证明人为控制政策的效果？我们知道，至少一个欧洲国家——法国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此法。我们发现，在法国一个纯粹的农业省厄尔省（Eure），大概由于普遍实行了人为限制，其人口因此减少，虽然该地区是法国耕作最好的地区，并享有极大的物质繁荣，但这里却并未有预想中的普遍幸福。该省的犯罪统计居首位，三分之一的犯罪是猥亵暴行，另有三分之一是小型盗窃，此外杀婴也相当多见。这些虽尚不足以作为证据，但这至少表明，即使采用这些措施也仍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认为物质生活富裕的稳定人口就应该没有罪行，这种想法本身就极不合理，并有经验可证明这一点。其实，任何这样的政策用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作为强有力的攻击：即稳定的人口对于国民生活而言是一个不健康因素，意味着抹杀对进步的巨大刺激。在法国，要使人民受用现有的生活资料，这已抹杀了对发明的鼓励与刺激，在此方面，生存竞争对于社会进步来说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如此做法对孩子本身也不公平。法国农民为了给子女安适的生活环境而努力耕作，让孩子在舒适的环境中被抚养长大，而后让他们自己去为生活而打拼，这或许会更好。英国城市的很多天才与创造都来自农村人口，其家庭人数多，从一开始到社会上谋生就怀

着要凭自己开创出路的想法。对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从财富角度考虑，也不能认为家庭生活是国民生活一切美善的来源而将其重要性估计得过高。通常，对一个大家庭的抚养和教育需要使其双亲在生活中受到训练和磨砺，并让一个普通人能意识到自己的义务，从而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最后，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做法在当今的英国尚不必要。上层工匠或中产阶级的男子只需考虑自己何时有充足的能力抚养一般数量的子女，也就是说，他们只需调整自己的结婚时间即可。在这种情况下，晚婚或者让他的孩子长大后自愿移民，这些困难都能够克服。他无需考虑世界是否有空间容纳更多人，因为确有足够的空间。此外，为了国家的文明，一个历史悠久、国民资质优秀的国家是颇为期望其人口增加的。至于劳动者大众，微小的举动无足轻重，对他们唯一的救济就是施行如社会改革这样的大政策，改善其居住环境，为其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娱乐，从而将他们提升到现在工匠所有的地位，即可有效地实行道德抑制。但我们尤其要记住，这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不能依靠机器发明来解决。要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对精神生活抱有崇高的理想。机器发明偶尔带给我们的并不是我们国家所希望的。真正的救济办法标志着要向更纯洁更高尚的社会状态发展，那才是我们唯一乐意去奋斗的目标。

Chapter XI The Wage-Fund Theory

第十一章　工资基金理论

Besides originating the theory of population which bears his name, Malthus was the founder of that doctrine of wages which, under the name of “the wage-fund theory”, was accepted for fifty years in England. To ascertain what the theory is we may take Mill's statement of it, as given in his review of Thornton On Labour in 1869. “There is supposed to be,” he says, “at any given instant, a sum of wealth which is unconditionally devoted to the payment of wages of labour. This sum is not regarded as unalterable, for it is augmented by saving, and increases with the progress of wealth; but it is reasoned upon as at any given moment a predetermined amount. More than that amount it is assumed that the wages-receiving class cannot possibly divide among them; that amount, and no less, they cannot possibly fail to obtain. So that the sum to be divided being fixed, the wages of each depend solely on the divisor,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This theory was implicitly believed from Malthus's time to about 1870; we see it accepted, for instance, in Miss Martineau's Tales. And from the theory several conclusions were deduced which, owing to their practical importance, it is well to put in the forefront of our inquiry as to its truth. It is these conclusions which have made the theory itself and the science to which it belongs an offence to the whole working class. It was said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according to the wage-fund theory, Trades-Unions could not at any given time effect a general rise in wages. It was, indeed, sometimes admitted that in a particular trade the workmen could obtain a rise by combination, but this could only be, it was alleged, at the expense of workmen in

other trades. If, for instance, the men in the building trade got higher wages through their Union, those in the iron foundries or in some other industry must suffer to an equivalent extent. In the next place it was argued that combinations of workmen could not in the long-run increase the fund out of which wages were paid. Capital might be increased by saving, and, if this saving was more rapid than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labourers, wages would rise, but it was denied that Unions could have any effect in forcing such an increase of saving. And hence it followed that the only real remedy for low wages was a limitation of the number of the labourers. The rate of wages, it was said, depended entirely on the efficacy of checks to population.

马尔萨斯不仅因人口论而著称，他还是工资学说即“工资基金理论”的创始者，这一理论在英国流行了50年之久。要了解该理论的含义，我们需要参考穆勒的注评，这发表于1869年穆勒对桑顿的劳动论的评论中。穆勒写道：“在任何情形下，都应该有一定款项用以无条件地支付劳动者的工资。这一款项未必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其数额会因储蓄而增多，也会随财富的积累而增长；但在任何时期，这一数额都应是预先定好的。可以认为，工薪阶层在分配中不能分得超过这一数额的工资，他们所拿到的工资也不会少于这个既定数额。因此，被分配的数额已经确定时，每个劳动者的工资只取决于除数，即参与分配的劳动者人数。”从马尔萨斯时代到1870年前后，人们一直对此理论确信无疑。例如从马蒂诺女士所写的故事中，我们就能看出这一点。而鉴于由此理论所推出的结论在实际中的重要性，我们应首先探究这一理论是否正确。由于这些结论，该理论及其所属的学科遭到了整个工人阶级的不满。首先，依据工资基金理论，工会在任何时期都将不能使工资普遍上涨。诚然，有时在特定的行业中，工人确实可以通过联盟而使工资上涨，但这要牺牲其他行业工人的利益才能实现。举例来说，假如建筑工人通过工会实现了工资增长，那么铸铁业或其他行业工人必会承受同等程度的工资降低。第二，由此理论，从长远

来看，工人联合不应增加用以支付工资的基金。资金会因储蓄而增长，若储蓄的增长速度超过工人人数的增长速度，工资就会增加，但工会对于促进储蓄增长的作用是不被承认的。因此，下面的结论，即改变低工资状况的唯一途径就是限制劳动者的数量。这就是说，工资率完全取决于限制人口的成效。

The error lay in the premises. The old economists, it may be observed, very seldom examined their premises. For this theory assumes—(1) that either the capital of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available for the payment of wages is fixed, or, at any rate, the total capital of the community so available is fixed; and (2) that wages are always paid out of capital. Now it is plainly not true that a particular employer makes up his mind to spend a fixed quantity of money on labour; the amount spent varies with a number of circumstances affecting the prospect of profit on the part of the capitalist, such, for instance, as the price of labour. Take the instance of a strike of agricultural labourers in Ireland, given by Mr. Trench to Nassau Senior. He was employing one hundred men at 10d. a day, thus spending on wages £25 a week. The men struck for higher pay—a minimum of 1s. 2d., and the more capable men to have more. Trench offered to give the wages asked for, but greatly reduced his total expenditure, as it would not pay to employ so many men at the higher rate. Thus only seventeen were employed; the other eighty-three objected, and it ended in all going back to work at the old rate. The fact is, that no individual has a fixed wage-fund, which it is not in his power either to diminish or increase. Just as he may reduce the total amount which he spends on labour, rather than pay a rate of wages which seems incompatible with an adequate profit, so he may increase that total amount, in order to augment the wages of his labourers, by diminishing the sum he spends upon himself or by employing

capital which is lying idle, if he thinks that even with the higher rate of wages he can secure a sufficiently remunerative return upon his investment. Thus the workman may,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get higher or lower wages than the current rate, without any alteration in the quantity of employment given. When wages in Dorset and Wilts were 7s., the labourers, if they had had sufficient intelligence and power of combination, might have forced the farmers to pay them 8s. or 9s., for the latter were making very high profits. As a matter of fact, where the workmen have been strong, and the profits made by the employers large, the former have often forced the employers to give higher wages.

这一错误结论是由其前提造成的。可以看到，旧时的经济学家很少检验其前提的正确性。而这一理论的假设：（1）用于支付工资的个人资本是固定的，抑或在任何条件下用于支付工资的全社会总资本是固定的；（2）工资总是由资本支付。很显然，一位雇主决定在劳动中投入的资金数额不会是确定的；资本家的预期收益会受到不同情况（比如劳动价格变动）的影响，因此其投资数额也会不同。特伦奇先生向纳索·西尼尔列举了爱尔兰农业工人罢工一事，我们以此事件为例。雇主以每天10便士的价格雇佣100名工人，则每周的工资支出就是25英镑。工人为了获得更高工资而罢工，要求工资不得少于1先令2便士，技术更高的工人则要求更多。特伦奇同意支付工人所要求的工资，但他的总开支却大大降低了，因为在更高的工资率下雇佣如此多的工人是不合算的。于是他只雇佣了17个人，其余的83人对此提出反对。最终，工人们只有按原来的工资率重新复工。这一事实是说，任何个人都不会有确定的工资基金，因为基金的减少或增加都不能为个人所左右。正如雇主会减少在劳动力上所花费的总资本一样，雇主不会支付更高的工资率，因为那会使工资总额增加，与获取丰厚利润的意图是矛盾的。于是，如果雇主想要提高工资率，且要保证自己的投资获取优厚的回报，那么提高工人的工资，就会减少其自身的开支或是利用闲置资本。于是，工人获得的工资比现行的工资率视情况而有

高有低，而工人的雇佣数量并没有改变。多塞特郡和威尔特郡的工资为7先令，如果工人具备充足的知识与联合能力，那么就可能使农场主付给他们8先令或9先令的工资，因为农场主所赚取的利润是极高的。事实上，如果工人力量强大、雇主所得的利润丰厚，那么工人常常可使雇主支付较高的工资。

Neither is it true that there is in the hands of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at any given time, a fixed quantity of capital for supplying the wants of the labourers, so much food, boots, hats, clothes, etc., which neither employers nor workmen can increase. It used to be said that a rise in money wages would simply mean that the price of all the commodities purchased by the labourers would rise proportionately, owing to the increase of demand, and that their real wages, i.e. the number of things they could purchase with their money, would be no greater than before.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supply can be increased as fast as the demand. It is true that between two harvests the available quantity of corn is fixed, but that of most other commodities can be increased at a short notice. For commodities are not stored up for consumption in great masses, but are being continually produced as the demand for them arises.

另外，对于这样的说法：在任何特定时期，总会有固定的社会资金用以满足劳动者的需求，即食物、鞋、帽、衣服等，并且雇主与工人都不会使这些需求品增加——这也是不正确的。人们常认为，货币工资的增长只意味着劳动者购买商品的价值总额（由于需求的增加）有相应的增长，而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即可用来支付交换的商品数量并不会比以前增加。但实际上，供给可以与需求有相同的增长速度。诚然，在两个收获期之间，谷物的供应量是不变的，但其他大多数商品的供应量却可以立刻增加。这是因为，商品并不会因大量消费而积存，而是会随需求的增加而持续生产。

So far I have been speaking of the theory as applied to wages at a particular time. Now, what did it further imply of wages in the long-run? According to Ricardo's law, which has been adopted by Lassalle and the Socialists, wages depend on the ratio between population and capital. Capital may be gradually increased by saving, and population may be gradually diminished; but Ricardo thought that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er was surely on the decline, because population was advancing faster than capital. While admitting occasionally that there had been changes in the standard of comfort, he yet disregarded these in his general theory, and assumed that the standard was fixed; that an increase of wages would lead to an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nd that wages would thus fall again to their old rate, or even lower. The amount of corn consumed by the labourer would not diminish, but that of all other commodities would decline. Later economists have qualified this statement of the supposed law. Mill showed that the standard of comfort was not fixed, but might vary indefinitely. This being the case, the labourer might sink even lower than Ricardo supposed possible, for population might increase till the labourer had not only less of everything else, but was forced down to a lower staple of life than corn, for instance, potatoes. And this has, as a matter of fact, taken place in some countri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andard might rise, as it has risen in England; and Mill thought that it would rise yet more. At first this was his only hope for the working classes. At a later period he trusted that the labourer, by means of co-operation, might become more and more self-employing, and so obtain both profits and wages.

至此，我已讲到，该工资理论只适用于特定时期。那么，从长远来看，该理论对工资又有何深层意义呢？根据拉萨尔和社会主义者所

采用的李嘉图法则，工资取决于人口与资本之间的比率。资本可能因储蓄而慢慢增加，人口则可能慢慢减少；但李嘉图认为劳动者的状况一定在下降，因为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资本的增长速度。虽然他承认在有些情况下生活水准确有改善，但在他的一般理论里却忽视了这些改善。他认为：生活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工资的增加会导致人口的增加，因而工资会跌落到原来的水平甚至更低；劳动者的谷物消费不会减少，但其他商品的消费量则会下降。对此，后有经济学者修正了这一假定法则的陈述。穆勒表明，生活水准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变化多样的。如果情况如此，劳动者会陷入比李嘉图的估计更悲惨的境地，因为人口会一直增加，直到劳动者（除谷物外）的一切生活所需品都会减少（如马铃薯），因而又会陷入极低的生活水平。事实上，这一情况已经在其他国家发生了。但是另一方面，生活标准也可能会上升，比如英国的标准就有所好转，穆勒认为它还将继续上升。起初这只是他对工人阶级的期望，但到后来，他已确信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可以通过合作而成为自己的雇主，从而获得利润与工资的双丰收。

It is interesting to inquire how this wage-fund theory grew up. Why was it held that employers could not give higher real wages? Its origin is easy to understand. When Malthus wrote his essay on population, there had been a series of bad harvests, and in those days but small supplies of corn could be obtained from abroad. Thus year after year there seemed to be a fixed quantity of food in the country and increasing numbers requiring food. Population was growing faster than subsistence, and increased money wages could not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food that was to be had. Thus in 1800, when corn was l27s.the quarter, it was clear that the rich could not help the poor by giving them higher wages, for this would simply have raised the price of the fixed quantity of corn. Malthus assumed that the amount of food was practically fixed; therefore, unless population diminished, as years went on, wages would fall, because worse soils would be cultivated and there would be increased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food. But the period he had before his eyes was quite exceptional; after the peace, good harvests came and plenty of corn; food grew cheaper, though population advanced at the same rate. So that the theory in this shape was true only of the twenty years from 1795 to 1815. But, when it had once been said that wages depended on the propor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food, it was easy to substitute capital for food and say that they depended on the propor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capital, food and capital being wrongly identified. Then when the identification was forgotten, it was supposed that there is at any given moment a fixed quantity of wage-capital-food, boots, hats, furniture, clothes, etc.—destined for the payment of wages, which neither employers nor workmen can diminish or increase, and thus the rate of wages came to be regarded as regulated by a natural law, independent of the will of either party.

带着兴趣，我们再来探究工资基金理论的发展过程。为什么该理论认为雇主不能付给劳动者更高的实质工资呢？其原因很好理解。当年马尔萨斯在撰写人口论时正值连年歉收，那时只有从国外才能获得少量的谷物供应。因此，国家的粮食供给看起来年年不变，只是需要粮食的人口增长了。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生活必需品的增长速度，而增加的货币报酬却不能使所需要的粮食供给量也随之增加。于是在1800年，谷物价格为每夸特127先令，显而易见，富人已无法通过增加工资来帮助穷人，因为这只会使供给量固定的谷物价格上涨。马尔萨斯假定食物总量实际是确定的，因此，除非人口减少，否则随着时间推移，贫瘠的土地会被开垦，获取食物的难度会增加，因而工资就会降低。但他所经历的年代是非常例外的，和平到来以后，粮食丰收，谷物丰产，尽管人口以同样的比率增长，但是食品价格还是下降了。因此，这种形式的理论只在1795年到1815年的20年间是正确的。但是，当人们说工资取决于人口与食品之间的比率时，很容易会用资本代替食品，而说成工资取决于人口与资本的比率，这就是没有

对食品与资本加以正确的区分。当这二者的区别被忽视，人们就会认为在任何时期总有确定量的工资-资本-食物（即鞋、帽、家具、衣服等）用以支付工资，这一定量是雇主和工人都不能增加或减少的，于是工资率就被视为由自然法则决定，而不受任何一方意志的影响。

We have already seen that this theory is false; we have now to substitute for it some truer theory, and explain thereby the actual phenomena of the labour market, such, for instance, as the fact that wages at Chicago or New York are twice as high as they are in England, while the prices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are lower. Though modern economists have pointed out the fallacies of the old wage-fund theory, no economist has yet succeeded in giving us a complete theory of wages in its place. I believe indeed that so complicated a set of conditions as are involved cannot be explained by any one formula, and that the attempt to do so leads to fallacies. Yet I am also aware that the public seem to feel themselves aggrieved that economists will not now provide them with another convenient set phrase in place of the wage-fund theory, and are inclined to doubt the validity of their explanations in consequence. Now, wages in a given country depend on two things: the total amount of produce in the country,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that produce is divided. To work out the former problem we must investigate all the causes which affect the whole amount of wealth produced,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it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skill, intelligence, and inventive genius of its inhabitants. The division of the produce, on the other hand, is determined mainly by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labourers seeking employment and the quantity of capital seeking investment; or, to put the case in a somewhat different way, instead of saying that wages are paid out of stored-up capital, we now say that they are the labourer's share of the produce. What the

labourer's share will be depends first on the quantity of produce he can turn out, and secondly, on the nature of the bargain which he is able to make with his employer. We are now in a position to explain the question put above, why wages in America are double what they are in England. An American ironmaster, if asked to give a reason for the high wages he pays, would say that the land determines the rate of wages in America, because under the Free Homestead Law, any man can get a piece of land for a nominal sum, and no puddler will work for less than he can get by working on this land. Now, in the Western States the soil is very fertile, and though the average yield is lower than in Wiltshire, the return in proportion to the labour expended is greater. Moreover, labour being scarce, the workman has to be humoured; he is in a favourable position in making his bargain with the employer, and obtains a large share of the produce. Thus agricultural wages are very high, and this explains also the cause of high wages in the American iron-trade and other American industries. In consequence of these high wages the manufacturer is obliged to make large use of machinery, and much of our English machinery, e.g. that of the Leicester boot and shoe trade, has been invented in America. Now, better machinery makes labour more efficient and the produce per head of the labourers greater. Further, according to the testimony of capitalists, the workmen work harder in America than in England, because they work with hope; they have before them the prospect of rising in the world by their accumulations. Thus it is that the produce of American manufactures is great, and allows of the labourer obtaining a large share. High wages in America are therefore explained by the quantity of produce the labourer turns out being great and by the action of competition being in his favour.

我们既已知道该理论是错误的，那么接下来就要用更准确的理论来取代它，从而解释劳动市场的实际现象，比如芝加哥或纽约的工资是英国的两倍，而其生活必需品价格却比英国低廉。尽管当代经济学者已指出工资基金理论的诸多错误，但尚没有学者能提出另一完整的工资理论取而代之。我相信，包含于其中的一系列复杂条件是无法用任何一个公式来解释的，况且这样的尝试也会导致错误的产生。然而我也注意到，由于至今还没有经济学者提出适当的理论以取代旧的工资基金说，这似乎已招致了公众的不满，也使得公众对学者所作解释的可靠性有怀疑的倾向。那么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工资取决于两点：国家的生产总量和产品的分配方式。要解决国家生产总量的问题，我们就要分析所有影响财富总产出的因素，即国家的自然资源、政治制度、劳动者的技术、知识以及人民的创造力等。另一方面，生产物的分配主要取决于寻求工作的劳动者数量与寻求投资的资本数量之间的比率；换一种方式来说，我们现在不说工资由储备资金来支付，而说工资是劳动者在生产物中所得的份额。劳动者获得的份额首先取决于其能够产出的产品总量，其次取决于其与雇主所能达成的契约性质。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解释上文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美国的工资是英国的两倍。如果要一个美国的钢铁厂厂长解释他为什么给出如此高的工资，他会说，在美国，工资率由土地决定，《宅地法》使任何人都能以极少象征性的金额得到一块土地，因此没有工人愿以比耕种其土地还低的报酬为他工作。如今西部各州土地十分肥沃，虽然其平均收益低于威尔特郡，但其收益与劳动投入之间的比率却高于该郡。此外，由于劳动力不足，雇主不得不迁就工人，工人与雇主订立契约时处于有利地位，因而能在产品分配中分得更多。这就是为什么农业领域工资会这样高，同时也解释了美国铸铁业和其他工业的高工资现象。由于这样的高工资，制造商不得不大量使用机器，英国的许多机器，比如莱斯特制鞋业所使用的机器就是由美国发明的。如今，先进的机器使得劳动效率和人均生产额都有所提高。而且，据资本家的陈述，美国工人比英国工人要努力，因为美国工人在怀着憧憬工作，他们很有通过储蓄而崭露头角的前景，所以美国的制造业产量很大，同时劳动者能获得很高的份额。因此，美国的高工资可以由劳动者生产量大、竞争对劳动者有利这两点来解释。

There are, however, other causes influencing the rate of wages in America which are less favourable to the workmen. Protection, for instance, diminishes real wages by enhancing the cost of many articles in common use, such as cutlery. It is owing to Protection also that capitalists are able to obtain exceptionally high profits at the expense of the workmen. By combining and forming rings they can govern the market, and not only control prices but dictate the rate of wages. Six or seven years ago, the whole output of Pennsylvanian anthracite was in the hands of a few companies. Hence it was that, in the Labour War of 1877, the workmen declared that, while they did not mind wages being fixed by competition, they would not endure their being fixed by rings, and that such rings would produce a revolution. And the monopoly of these companies was only broken through by a great migration of workmen to the West. The experience of America in this instance is of interest in showing how, as industry advances, trade tends to get concentrated into fewer hands; hence the danger of monopolies. It has even been asserted that Free Trade must lead to great natural monopolies. This may be true of a country like America which has internal but not external free trade, but only of such a country; for foreign competition would prevent a knot of capitalists from ever obtaining full control of the market.

但是，美国也有另一些影响工资率的因素是对工人不利的。比如，保护主义就使得许多生活用品（如刀具）的价格上涨，从而降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同时也是由于保护主义，资本家通过牺牲工人的利益获取了极高的利润。通过联合与形成垄断集团（formingrings），资本家可以控制市场，进而不仅能操控价格，而且能决定工资率。在六七年前的宾夕法尼亚州，全部无烟煤的生产只由几家公司所操控。于是在1877年的劳动战争中，工人们宣布，他们

虽能接受工资面临竞争的约束，但绝不容忍垄断集团决定工资率，这样的集团是会引发革命的。最终，这些公司的垄断因工人大量向西迁移而被打破。在该事例中，美国的这一事件极有趣地向人们表明了贸易是如何随工业的发展慢慢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以致垄断带来诸多危害的。因此，有人甚至断定，自由贸易一定会导致大量自然垄断的产生。这种说法对于美国，也只有对美国这样国内贸易自由而非对外贸易自由的国家而言或许才是正确的，因为国外竞争会阻止资本家形成小集团从而完全控制市场。

I have shown why wages are higher in America than in England. We may go on to inquire why they are higher in England than in any other part of Europe. The great reaso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wealth produced in this country is larger, and that from a variety of causes, material and moral. The chief material causes are our unrivalled stores of coal and iron, and perhaps, above all, our geographical position. On the moral side, ou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eing favourable to liberty, have developed individual energy and industry in a degree unknown in any other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exclusion of the labourer from the land in England must have tended to lower wages. And no doubt the adoption of a system of large farms has driven the labourers into the towns, and made the competition for employment there very keen. But, to set against this, the efficiency of English manufacturing labour is largely due to this very fact, that it is not able to shift on to the land. While in America the whole staff of a cotton factory may be changed in three years, in England the artisan “sticks to his trade”, and brings up his children to it; and thus castes are formed with inherited aptitudes, which render labour more efficient, and its produce greater. I believe the higher wages obtained in Englan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inent, are mainly due to greater efficiency of labour—that this is the chief

cause why the total produce is greater. But if we go further, and ask what determines the division of the produce, the answer must be: mainly competition. To return to the comparison with America, the reason why the English labourer gets lower wages than the American is the great competition for employment in the overstocked labour-market of this country.

前面我已解释了美国工资高于英国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就可研究：英国的工资何以高于欧洲其他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英国创造的财富总量更高，这得益于物质与精神上的诸多原因。物质上的首要原因在于英国无比丰富的煤铁矿藏，特别还有英国优越的地理位置。精神方面，英国的政治制度鼓励自由，它激发出每个人的活力和勤奋是其他国家无法想象的。但另一方面，英国的一些劳动者失去了土地，这确有使得工资降低的趋势。毫无疑问，大农场制度的采用使劳动者竞相走向城镇，也由此加剧了紧张的就业局面。但是，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人们不能再转向土地耕作这一事实，英国制造业才能有这样高的劳动效率。在美国，一个棉纺织厂的全体员工也许三年就要轮换一批，而在英国，工匠们“坚守自己的行业”，并且让下一代也从事这一职业，因此形成的各社会阶层其能力为继承而得，这使得劳动效率和劳动产量都得以提高。我认为，相比欧洲大陆，英国能有较高的工资主要是由于其较高的劳动效率，这也是英国生产总量较大的主要原因。但如果深入探究是什么决定了生产物的分配，那么答案一定是：主要由竞争决定。再回到之前与美国的对比，英国工人的工资低于美国，原因就是英国的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以致就业竞争激烈。

I must notice an objection to the theory of wages as stated above. Wages, I have explained, are the labourers'share of the produce, and are paid out of it. But, it may be said, while our new Law Courts, or an ironclad, are being built—operations which take a long time before there is any completed result—how can it be

correctly held that the labourer is paid out of the produce? It is of course perfectly true that he is maintained during such labours only by the produce of others; and that unless some great capitalist had either accumulated capital, or borrowed it, the labourer could not be paid. But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ate of wages. That is determined by the amount of the produce and is independent of the method of payment. What the capitalist does is merely to pay in advance the labourer's share, as a matter of convenience.

我必须对前面提到的工资理论提出反对。我已解释过，工资是劳动者在生产中所得的份额，是由产品来支付的。但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我们在建设新法庭或建造装甲舰，这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那么又将如何解释劳动者的工资由产品支出这一说法呢？确实，在这样的劳动过程中，工人是靠其他行业劳动者的产品来支持生活的，除非大资本家保有积累资金或借入资金，否则工人就无法得到工资。但这却与工资率无关。工资率是由生产量决定的，并与支付方式无关。资本家所做的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提前支付劳动者应得的份额。

We will next inquire what are the limits to a rise of wages in any particular trade? The answer depends on two things. First, is the capitalist getting more than the ordinary rate of profits? If he is not, he will resist a rise on the ground that he “cannot afford” to pay more wages. This is what an arbitrator, for instance, might say if he examined the books, and he would mean by it that, if the employer had to raise his wages, he would have to be content with lower profits than he could make in other trades. As a matter of fact, however, capitalists often do make exceptionally high profits, and it is in such cases that Trades-Unions have been very successful in forcing them to share these exceptional profits with their men. Secondly, though the employer be getting only ordinary profits, his

workmen may still be strong enough to force him to give higher wages, but he will only do so permanently if he can compensate himself by raising the price of his commodity. Thus the second limit to a rise in wages in a particular trade is the amount which the consumer can be forced to pay for its products. Workmen have often made mistakes by not taking this into account, and have checked the demand for the articles which they produced, and so brought about a loss both to their masters and themselves. In a particular trade then the limit to a rise in wages is reached when any further rise will drive the employer out of the trade, or when the increased price of the commodity will check the demand. When dealing with the general trade of a country, however, we can neglect prices altogether, since there can be no such thing as a general rise in prices while the value of the precious metal is stationary. Could, then, the whole body of the workmen throughout the kingdom, by good organization, compel employers to accept lower profits? If there was a general strike, would it be the interest of the employers to give way? It is impossible to answer such a question beforehand. It would be a sheer trial of strength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 outcome of which cannot be predicted, for nothing of the kind has ever actually taken place. And though there is now a nearer approximation than ever before to the supposed conditions, there has as yet been nothing like a general organisation of workmen.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某一行业工资上涨的界限是什么。该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两点。首先，资本家的所得是否高于一般利润率？如果不是，那他就会以“支付不起”更高工资为由拒绝提高工资。这就是如仲裁机构查过账目后所会说的，意思就是雇主若要提高工资，就须满足于低于其他行业的利润所得。而实际上，资本家通常都能赚取极高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就能促使资本家将额外的高利润分与工

人。其次，若雇主只能获得一般利润，工人或许依然能迫使雇主提高工资，而雇主只有提高产品价格以作补偿才会长期提高工人的工资。因此，第二个影响某行业工资上涨界限的因素就是消费者能够为产品所支付的金额。工人往往忽视这一问题，这一失误制约了对其所产产品的需求量，进而对雇主和其本身都造成了损失。在一个行业中，当进一步提高工资会使雇主难以支撑产业，或商品的价格上涨会限制需求量时，就是工资的增长已达到了界限。但是，在讨论一国的整体贸易时，我们可以忽略价格因素，因为若贵金属价格保持不变，就不会出现物价的总体上涨。那么，英国的全体工人能否在良好的组织下迫使雇主接受较低利润呢？在一场大罢工中，雇主做出让步又是否对其自身有利呢？对此，我们无法预先做出回答。这对双方来说是力量的完全对抗，对抗的结果无法预知，因为此前尚未有此类事情发生过。而且，虽然现在比过去更接近我们所预想的情况，但却仍然缺乏对全体工人的统一组织。

Assuming, however, that the workmen succeeded in such a strike, we can then ask what would be the effect of a general rise of wages in the long-run? One of several results might ensue. The remuneration of employers having declined, their numbers might diminish, and the demand for labour would then diminish also and wages fall. Or again the decline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might check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hus again diminishing the demand for labour. Or, on the other hand, the rise in wages might be permanent, the remuneration of employers still proving sufficient,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remaining unchecked. Or lastly, higher wages might lead to greater efficiency of labour, and in this case profits would not fall. It is impossible to decide on a priori grounds which of these results would actually take place.

然而若假设工人在罢工中取得胜利，那么就又要问，普遍的工资

上涨从长远来看有何意义？由此引发的结果可能是雇主的收益减少，以致雇主的数量减少，对劳动的需求降低，因此工资随之降低；或者利率的下降影响资本的积累，进而使得对劳动的需求降低；抑或相反地，工资的上涨是长期性的，雇主的收益将仍然很高，资本的积累也不会受到阻碍；最后，又或者高工资将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而利润也不会下降。而我们无法凭借推演的论据判断哪种结果将会真实地发生。

Returning to our period, we may apply these principles to explain the fall in wages between 1790 and 1820. During this period, while rent was doubled, interest also was nearly doubled (this by the way disproves Mr. George's theory on that point), and yet wages fell. We may take Mr. Porter's estimate.: “In some few cases there had been an advance of wages, but this occurred only to skilled artisans, and even with them the rise was wholly incommensurate with the increased cost of all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The mere labourer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is partial compensation for high prices, but was… at the same or nearly the same wages as had been given before the war.” In 1790 the weekly wage skilled artisans and farm labourers respectively would buy 82 and 169 pints of corn: in 1800 they would buy 53 and 83. According to Mr. Barton, a contemporary writer, wages between 1760 and 1820, “estimated in money, had risen 100 per cent.; estimated in commodities, they had fallen 33 per cent.” What were the causes of this fall? Let us first take the case of the artisans and manufacturing labourers. One cause in their case was a series of bad harvests. To explain how this would affect wages in manufactures we must fall back on the deductive method, and assume certain conditions from which to draw our conclusions. Let us suppose two villages side by side, one agricultural, the other manufacturing, in the former of which the land is owned by landowners, and tilled by

labour employed by farmers. Suppose the manufacturing village to be fed by its neighbours in exchange for cutlery. Then, if there is a bad harvest in the agricultural village, every labourer in the manufacturing village will have to spend more on corn. The owners of land will gain enormously; the farmers will be enriched in so far as they can retain the increased prices for themselves, which they will do, if holding on leases. But everyone else will be poorer, for there has been a loss of wealth. In order to get his corn, the labourer will have to give more of his share of the produce; and hence the demand for all other goods, which are produced for the labourers'consumption, will diminish. Nothing affects the labourer so much as good or bad harvests, and it is because of its tendency to neutralise the consequences of deficient crops at home, that the labourer has gained so much by Free Trade. When we have a bad harvest here, we get plenty of corn from America, and the labourer pays nearly the same price for his loaf, and has as much money as before left to spend on other commodities. Still, even at the present day, some depression of trade is generally associated with bad harvests. And though Free Trade lessens the force of their incidence on a particular locality, it widens the area affected by them-a bad harvest in Brazil may prejudice trade in England.

回到我们这个时期，我们或许可以用这些原理解释1790年到1820年的工资下降情况。在此期间，地租翻了一倍，利润也近似翻了一倍（这证明乔治先生在此点上的理论是错误的），而工资却下降了。我们可以来看波特（Porter）先生的估计："在极少数情况下工资会有所上涨，但这只发生在技术优良的工匠身上，即使如此，他们的工资上涨也不能抵消一切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而普通的工人……不能参与这种对商品高物价的补偿，而是……所取得的工资等同或近似等同于战前所得。"1790年时，熟练技工和农业劳动者的周薪分别能够购买82品脱和169品脱谷物，而1800年时仅能购买53和83品脱谷

物。据当时的作家巴顿先生所述，从1760年到1820年的工资“以货币来换算是上涨了100%，而以商品来换算则下降了33%。”那么这种下降的原因何在？我们先来看技工和制造业劳动者的情况。对他们而言，这种下降的原因就是连年的农业歉收。要解释农业歉收如何影响制造业的工资情况，我们必须再次用推演的方法，假设一定的情况从而得出结论。我们假设有两个毗邻的村庄，一个从事农业，一个从事制造业。前者的土地归地主所有，由农场主雇佣劳动耕作。假定从事制造业的村庄用所产的餐具作为交换，从邻村得到食物供给。那么，如果从事农业的村庄歉收，则从事制造业的村庄其劳动者就会在谷物上有更多的花销。土地所有者会获取巨大的利益；农场主们只要保持已上涨的价格不变，他们也会有财富的增长，这一点只要他们拥有租地权（holdingonleases）就可以办到。但总会有人比以前变得贫困，因为这其中确有财富流失了。为了获得谷物，劳动者要拿出更多的产品分配所得，因此供劳动者消费的其他商品需求量就会下降。收成的好坏对工人有着不可比拟的影响，工人从自由贸易获得极大的利益，就是由于这能缓和国内粮食产量的不足。在国内歉收之时，英国从美国进口大量谷物，工人为面包支付的价钱与之前基本相同，也就能像以前一样留有货币购买其他商品。即使在今天，贸易的衰退也都基本与收成不佳有关。尽管自由贸易降低了歉收对某一特定地区的影响力，但却使得受之影响的地区范围扩大了——巴西的粮食歉收就会对英国的贸易造成影响。

The next point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s the huge taxation which fell upon the workmen at this time; even as late as 1834 half the labourers'wages went in taxes. There was also increase in the National Debt. During the war we had nominally borrowed £600,000,000, although owing to the way in which the loans were raised, the actual sum which came into the national exchequer was only £350,000,000. All this capital was withdrawn from productive industry, and the demand for labour was diminished to that extent. Lastly, the labourer was often actually

paid in bad coin, quantities of which were bought by the manufacturers for the purpose; and he was robbed by the truck system, through which the employer became a retail trader, with power to over-price his goods to an indefinite extent.

我们要考虑的第二点是当时工人承受的巨大税收压力。即使到1834年，劳动者也还要将一半工资用于交税。而且国家债务也增加了。战争期间，英国名目上举借公债6亿英镑，但由于筹集方式不善，实际收入国库的仅为3.5亿英镑。所有这些资金都来自工业，因此对劳动的需求就相应地下降了。最后，工人实际得到的常常是劣币，因此大量劣币都被制造商所收购；工人还遭到实际工资制的剥削，雇主因而变成了零售商，可以无限地抬高产品价格。

Some of these causes affected the agricultural and manufacturing labourers alike; they suffered, of course, equally from bad harvests. But we have seen in former lectures that there were agrarian and social changes during this period, which told upon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 exclusively. The enclosures took away his common-rights, and where the land, before enclosure, had been already in cultivation, they diminished the demand for his labour, besides depriving him of the hope of becoming himself a farmer, and, to mention a seemingly small but really serious loss, cutting off his supply of milk, which had been provided by the “little people” who kept cows on the commons. He was further affected by the enormous rise in cottage rents. Mr. Drummond, a Surrey magistrate, told the Commission on Labourers'Wages in 1824, that he remembered cottages with good gardens letting for 30s. before the war, while at the time when he was speaking the same were fetching £5, £7, or £10.

有些因素对农业工人和制造业工人都有影响，当然，他们都要承受农业歉收带来的恶果。但从前面的演讲中我们已看到，在此期间发生了农业和社会上的诸多变化，其中一些变化会单独影响到农业劳动者。圈地使劳动者丧失了基本权利；在圈地前已被开垦的土地上，劳动需求由于圈地而降低，工人失去了成为农场主的可能；另外我们还要提到，一个看似微小而实则严重的损失是，由于那些“小农”不能再在公用地上牧牛，他们因而失去了牛奶的供应来源；此外工人还受到房屋租金大幅上涨的影响。萨里郡的一位行政官员德拉蒙德先生在1824年时向工薪委员会报告说，他记得在战前配有独立花园的住房租金是30先令，而现在同样的住房已涨到5英镑、7英镑或10英镑。

This rise was due to causes we have before had in review, to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the expulsion of servants from the farmhouses, and the demolition of cottages in close villages. When the labourers, to meet the deficiency, built cottages for themselves on the wastes, the farmers pulled them down, and, if the labourers rebuilt them, refused to employ them, with the result that such labourers became thieves and poachers. Again, during this period, it was not uncommon for the farmers absolutely to determine what wages should be paid, and the men in their ignorance were entirely dependent on them. Here are two facts to prove their subservience. In one instance, two pauper families who had cost their parish no less than £20 a year each, were given instead an acre of land rent free, and the rates were relieved to that amount; but though successful, the experiment was discontinued, “lest the labourer should become independent of the farmer.“. And this is the statement of an Essex farmer in 1793: “I was the more desirous to give them an increase of pay, as it was unasked for by the men, who were content with less than they had a right to expect.”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 at this time was in an entirely helpless condition in bargaining with his employer. Nor were the farmers

the only class who profited by his deterioration; for the high rents of the time were often paid out of the pocket of the labourer. The period was one of costly wars, bad seasons, and industrial changes. The misfortunes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were partly inevitable, but they were also largely the result of human injustice, of the selfish and grasping use made of a power which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had placed in the hands of landowners, farmers, and capitalists.

租金上涨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讲过，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佣工被驱逐出农场住房，且人口稠密的村庄中房屋遭到破坏。工人为了应对住房短缺的情况，就会在荒地上自己建造住房，农场主将之拆除，并会拒绝雇佣再次重建住房的工人，结果这些工人就变成了窃贼和偷入者。再有，在此期间，由农场主规定工资支付的现象并不少见，而工人由于知识匮乏就只有听之任之。这里有两个实例证明工人对农场主的依从。第一个实例是，两家贫困农户每年要教区负担不少于20英镑的救济，而后他们无偿地分到了1英亩田地，也就相应地减少了救济税。这一尝试虽然是成功的，但却并没有进行下去，“这是为了防止工人脱离农场主而独立”。另一个实例是取自1793年埃塞克斯郡农场主的陈述：“我很希望付给工人更多的工资，但他们并没有这样要求，他们虽有权利期望更多，但是很满意现在较低的报酬。”在此，农业工人在与雇主的交涉上就完全陷于无援的境地。当时的高地租常常来自工人的口袋，但从工人穷困而获利的并不只是农场主阶级。那时正值战争代价高昂、时节状况不济、产业经历变革的时期，工人阶级的窘境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避免，但这也主要是由人性的不公正、自私与贪婪造成的——在特别情况下，地主、农场主和资本家总能利用某种手段满足其自身的贪欲。

Chapter XII Ricardo and the Growth of Rent

第十二章　李嘉图和地租增长

In Political Economy, as in other sciences, a careful study of method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 And this subject of method will come into special prominence in the present lecture, because we have now to consider the writings of a man of extraordinary intellect and force, who, beyond any other thinker, has left the impress of his mind on economic method. Yet even he would have been saved from several fallacies, if he had paid more careful attention to the necessary limitations of the method which he employed. It may be truly said that David Ricardo has produced a greater effect even than Adam Smith on the actual practice of men as well as on th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of social problems. His book has been at once the great prop of the middle classes, and their most terrible menace; the latter, because from it have directly sprung two great text-books of Socialism, Das Kapital of Karl Marx, and the Progress and Poverty of Mr. Henry George. And yet for thirty or forty years Ricardo's writings did more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author to justify in the eyes of men the existing state of society.

政治经济学同其他科学一样，都需要严谨的研究方法。因为本章所讲到的论著出自一位才识卓越的学者，他在经济学上的研究思想超越了其他任何思想家，只是他若能对所用方法的必要界限再谨慎些，或许就可避免一些谬论。我们确实可以说，无论在人类的实际实践方面还是对社会问题的理论思考方面，大卫·李嘉图都比亚当·斯密有着更大的影响。他的著作一度成为中产阶级的巨大支柱，但同时也构成

了最大的威胁。说它是最大的威胁，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两本伟大的教科书，即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就是由此著作直接衍生的。在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李嘉图的论著在人们眼中对社会现状的评判方面，仍比其他著作家有着更大的贡献。

Ricardo's life has little in it of external interest. He made his fortune on the Stock Exchange by means of his great financial abilities, and then retired and devoted himself to literature. During the few years that he sat in Parliament, he worked (we have it on Huskisson's testimony) a great change in the opinions of legislators, even in those of the country squires-a remarkable fact, since his speeches are highly abstract, and contain few allusions to current politics, reading in fact like chapters from his book. We may notice one direct effect of his speeches: they were the most powerful influence in determining the resumption of cash payments. In his private life he associated much with Bentham and James Mill.

李嘉图的一生对外界事物少有兴趣。他凭借极强的财政能力在股票交易中获得财富，引退之后开始潜心写书。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他就职于议会的几年间，他改变了立法者甚至农村乡绅的许多观点（这出自于赫斯基森的记述），这是因为他的演说极为抽象，且不包含时事政治，就像从其书中摘录出的一样。我们或许会注意到，他的演说产生了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对恢复现金支付起了决定性作用。此外，李嘉图在生活中与本瑟姆（Benthan）及詹姆斯·穆勒私交甚密。

James Mill, like Bentham and Austin, was a staunch adherent of the deductive method, and it was partly through Mill's influence

that Ricardo adopted it. Mill was his greatest friend; it was he who persuaded him both to go into Parliament, and to publish his great book. Ricardo's political opinions in fact merely reflect those of James Mill, and the other philosophical Radicals of the time, though in Political Economy he was their teacher. Ricardo reigned without dispute in English Economics from 1817 to 1848, and though his supremacy has since then been often challenged, it is by no means entirely overthrown. His influence was such that his method became the accepted method of economists; and to understand how great the influence of method may be, you should turn from his writings and those of his followers to Adam Smith, or to Sir Henry Maine, where you come in contact with another cast of mind, and will find yourselves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mental atmosphere. Now what is this deductive method which Ricardo employed? It consists in reasoning from one or two extremely simple propositions down to a series of new laws. He always employed this method, taking as his great postulate that all men will on all matters follow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defect of the assumption lies in its too great simplicity as a theory of human nature. Men do not always know their own interest. Bagehot points out that the £10 householders, who were enfranchised by the first Reform Bill, were after 1832 the most heavily taxed class in the community, though the remedy was in their own hands; because they were ignorant and apathetic. And even when men know their interests, they will not always follow them; other influences intervene, custom, prejudice, even fear. Cairnes frankly admits these defects in Ricardo's method; but it took economists some thirty or forty years to learn the necessity of testing their conclusions by facts and observations. Since 1848 their attitude has improved; it is now seen that we must insist upon the verification of our premises, and examine our deductions by the light of history.

同本瑟姆与奥斯丁一样，詹姆斯·穆勒也是演绎法的忠实信徒，在一定程度上，李嘉图是受了穆勒的影响而采用演绎法的。穆勒是他最伟大的朋友，他不仅说服李嘉图出席议会，而且还劝说他出版自己的伟大作品。事实上，李嘉图的政治意见只是穆勒及同时代其他哲学激进主义者（philosophicalRadicals）观点的反映，但在政治经济学上，李嘉图却可算是他们的先驱。自1817至1848年，李嘉图无疑是英国经济领域的领军人物，尽管此后他的权威性不断遭到质疑，但其学说并没有被推翻过。他的影响之大使其研究方法为经济学家纷纷采纳。要了解李嘉图研究方法的巨大影响，诸位不妨去研读李嘉图及其追随者的作品，之后再去品读亚当·斯密或者亨利·梅因爵士的著作。于此你可以接触到不同人的不同观点，也会发觉自己身处于迥异的思想氛围之中。那么李嘉图采用的演绎方法是怎样的呢？这就是从一两个极简单的命题出发推导出一系列新的法则。这是李嘉图常使用的演绎方法，其大前提是人们在任何情况下总会追求自身的利益。而这一假定的缺陷在于：对于人性的理论而言，该假定是过于简单的。人们不能永远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白哲特指出，年收入10英镑的户主，由第一次改革法案而获得了选举权，尽管他们拥有改变现状的权利，但由于无知与冷漠，到1832年之后他们仍是社会中负税最重的阶层。而且，甚至人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时，由于风俗、偏见与恐惧等因素的阻碍，人们也并不能总是追逐自身利益。凯恩斯（Cairnes）坦然承认李嘉图思想中的这些缺陷，但经济学家们还是在30-40年之后才认识到通过事实与观察对结论进行检验的必要性。到1848年以后，经济学者的看法已经有所转变。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对前提加以验证，并通过借鉴历史来检查推论的正确性。

Ricardo has deduced from very simple data a famous law of industrial progress. In an advancing community, he says, rent must rise, profits fall, and wages remain about the same. We shall find from actual facts that this law has been often true, and is capable of legitimate application, though Mr. Cliffe-Leslie would repudiate it altogether; but it cannot be accepted as a universal law. The

historical method, on the other hand, is impotent of itself to give us a law of progress, because so many of the facts on which it relies are, in Economics, concealed from us. By the historical method we mean the actual observation of the course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deduction from it of laws of economic progress; and this method, while most useful in checking the results of deduction is, by itself, full of danger from its tendency to set up imperfect generalisations. Sir H. Maine and M. Laveleye, for instance, have taken an historical survey of land-tenure, and drawn from i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movement of property in land is always from collective to individual ownership; and Mr. Ingram, again, alluding to this law, accepts it as true that there is a natural tendency towards private property in land. He can build his argument on the universal practice from Java to the Shetlands, and it would seem a legitimate conclusion that the tendency will be constant. Yet there is at the present day a distinct movement towards replacing private by collective ownership, due to the gradual change in the opinions of men as to the basis on which property in land should rest. Mill, in 1848, argued that where the cultivator was not also the owner, there was no justification for private ownership; later in his life, he advocated the confiscation of the unearned increment in land. If we ask, “Was he right?” the answer must be: Every single institution of society is brought to the test of utility and general national well-being; hence, private property in land, if it fails under this test, will not continue. So too with the rate of interest: older economists have insisted on the necessity of a certain rate,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but we may fairly ask whether the rate of remuneration for the use of capital is not too high-whether we could not obtain sufficient capital on easier terms? These considerations show that, in predicting the actual course of industrial progress, we must not be content to say that because there has been a movement in a certain direction in the past-for

example, one from status to contract-it will therefore continue in the future. We must always apply the test, does it fit in with the urgent present requirements of human nature?

李嘉图通过非常简单的论据推导出了著名的产业进步法则。他认为，在一个进步社会中，地租必会上涨，利润必会下降，工资则基本保持不变。虽然克里夫·莱斯利先生（Cliffe-Leslie）对此予以全盘否认，但从事实来看，该法则往往是正确的，而且可以适当进行运用，不过我们不能认为它是普遍意义上的法则。另一方面，历史的研究方法无法为我们提供进步法则，因为在经济学上，其所依据的事实是我们无法得知的。我们所说的历史探究法是指对经济的历史进程进行研究，并由此推导出经济进步的法则。这种方法虽能对推导结果做出有效的检验，但由此归纳出的原理可能存在缺陷，因此有很大的风险。例如，亨利·梅因爵士及拉维勒耶（M. Laveleye）运用历史方法对土地所有权问题进行了研究，其结论认为土地资产的转移多是由公有到私有的转移。英格拉姆先生（Ingram）提到了该法则并承认其合理性，认为土地的私有化是一种必然的倾向。他的理论可以由爪哇岛（Java）和设得兰群岛（Shetlands）的普遍实际来说明，而且他认为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下去，这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如今，由于人们对土地资产所有权的依据问题慢慢转变了看法，我们看到土地也开始由私有转向公有。1848年，穆勒认为，在土地所有者并不同时是耕种者的情况下，土地私有就是不合理的。后来穆勒又主张没收土地的自然增值。我们会问："穆勒是否正确？"其答案一定是：任何社会制度都要经受有效性及国民总体生活水平的考验，因此，如果土地私有未能通过考验，那么就不会再持续下去。同样在利率方面，为了促进资本的积累，旧时的经济学家坚持需要某种利率。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质疑，资金利用的报酬率是否不足，我们又能否以更低的条件获得充足的资本？这些问题表明，在对产业进步的实际进程进行预测时，我们不能满足于认为：由于过去发生了某个方向的变化，比如由身份向契约的变化，那么将来的变化就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时刻进行检验，看其是否符合人类当前的迫切需求。

Ricardo's influence on legislation, to which I have already alluded, was twofold; it bore directly upon the special subject of currency and finance; and, what is more remarkable, it affected legislation in general. As regards finance, his pamphlets are the real justification of our monetary system, and are still read by all who would master the principles of currency. With respect to other legislation, he and his friends have the great credit of having helped to remove not merely restrictions on trade in general, but those in particular which bore hardest on the labourer. When Joseph Hume, in 1824, proposed the repeal of the Combination Laws, he said he had been moved thereto by Ricardo. But though Ricardo advocated the removal of restrictions which injured the labourer, he deprecated all restrictions in his favour; he ridiculed the Truck Acts, and supported the opposition of the manufacturers to the Factory Acts—an opposition which, be it remembered, though prompted by mere class interest, was also supported in the name and on the then accepted principles of economic science.

正如我之前所讲到的，李嘉图对立法的影响是双重的，他不仅直接触及了货币与金融这样的特殊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嘉图对立法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在金融方面，他撰写的书册是对英国货币制度的真正辩护，也始终是学习货币原理者的必读之作。在其他立法方面，他和与他志同道合者也都大有功绩，不但从总体上废除了贸易上的诸多限制，还特别废止了对于工人的过分限制。1824年，约瑟夫·休姆（JosephHume）提议废除联合法案（CombinationLaws），说他正是受了李嘉图的影响。尽管李嘉图主张取消对工人阶级的种种不利限制，但他也不赞成对工人有利的一些限制。他曾经讥讽实物工资法（Truckacts），并且支持制造业者对工厂法案的反对。我们知道，这一反对只是由阶级利益引起的，但却在当时广为接受的经济学原理的名义下得到支持。

In this way Ricardo became the prop, as I have called him, of the middle classes. Throughout his treatise there ran the idea of natural law, which seemed to carry with it a sort of justification of the existing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as inevitable. Hence his doctrines have proved the readiest weapons wherewith to combat legislative interference or any proposals to modify existing institutions. Hence, too, his actual conclusions, although gloomy and depressing, were accepted without question by most of his contemporaries. Another school, however, has grown up, accepting his conclusions as true under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 but seeing through the fallacy of his “natural law”. These are the Socialists, through whom Ricardo has become a terror to the middle classes. The Socialists believe that, by altering the social conditions which he assumed to be unalterable, Ricardo's conclusions can be escaped. Karl Marx and Lassalle have adopted Ricardo's law of wages; but they have argued that, since by this law wages, under our present social institutions, can never be more than sufficient for the bare subsistence of the labourer, we are bound to reconsider the whole foundation of society. Marx also simply accepts Ricardo's theory of value. The value of products, said Ricardo, is determined by the quantity of the labour expended on them; and Marx uses this statement to deduce the theorem that the whole value of the produce rightly belongs to labour, and that by having to share the produce with capital the labourer is robbed.

就这样，照我的说法，李嘉图就成为了所谓中产阶级的支柱。他的专著中充满了自然法则的理念，似乎是将现行的社会体制解读为一种必然。因此可以说，他的学说是对调整现行体制的立法干预与一切提案的有力武器。又因为此，他得出的实际结论尽管悲观而消沉，但仍然被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另一学派也已产生，赞成此学

说在当前社会现状下的正确性，同时也看到了该学说的“自然法则”所存在的缺陷。这一学派就是社会主义学派，它的出现使得李嘉图的理论成为了中产阶级的恐慌。社会主义者认为，如果改变一些（李嘉图认为无法改变的）社会条件，那么李嘉图的结论就不再成立。卡尔·马克思与拉萨尔都接受李嘉图的工资法则，但他们认为，根据该法则，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工资最多只能满足工人赖以维生的生活所需，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探讨社会的整体根基。马克思还接受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李嘉图认为，产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过程所消耗的劳动量。马克思在这一说法的基础上推演出另一法则，即产品的全部价值都归工人所有，资本参与产品分配是对工人的剥削。

Mr. Henry George, again, the latest Socialist writer, is purely and entirely a disciple of Ricardo. The whole aim of his treatise, Progress and Poverty, is to prove that rent must rise as society advances and wealth increases. It is not the labourer, Ricardo reasoned, who will be the richer for this progress, nor the capitalist, but the owner of land. Mr. George's theory of progress is the same. Putting aside his attempt to show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aws of interest and wages, which he contends will rise and fall together,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his conclusions and Ricardo. Others before Mr. George had clearly enough seen this bearing of the law of rent. Roesler, the German economist, says: “Political Economy would only be a theory of human degradation and impoverishment, if the law of rent worked without modification.”

最近的社会主义者亨利·乔治先生纯粹是李嘉图思想的继承者。其论著《进步与贫困》的宗旨是：证明地租将会随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而上涨。李嘉图的推理认为，在这一进程之中，会增长财富的不是工人或资本家，而是土地所有者。乔治先生的进步理论与李嘉图相同。但他试图表明利率法则和工资法则之间的关联，认为这两者是同

升同降的，除这一点之外，他与李嘉图在结论上几无差别。在乔治先生之前，已有其他学者清楚认识到地租法则的这一意义。德国经济学家勒斯勒尔（Roesler）曾说，“如果不对地租法则加以修正，那么政治经济学将只是关于人类的衰落与贫困的理论。”

Now let us see what are the assumptions on which Ricardo grounded his law about the course of rent, wages, and profits in a progressive community. The pressure of population, he argued, makes men resort to inferior soils; hence the cost of agricultural produce increases, and therefore rent rises. But why will profits fall? Because they depend upon the cost of labour, and the main element in determining this is the cost of the commodities consumed by the workmen. Ricardo assumes that the standard of comfort is fixed. If, therefore, the cost of a quartern loaf increases, and the labourer is to obtain the same number of them, his wages must rise, and profits therefore must fall. Lastly, why should wages remain stationary? Because, assuming that the labourer's standard of comfort is fixed, a rise of wages or a fall in prices will only lead to a proportionat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rent is very interesting, but it is out of our road, so I can only lightly touch upon it. Adam Smith had no clear or consistent theory at all on the subject, and no distinct views as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rent and price. The modern doctrine is first found in a pamphlet by a practical farmer named James Anderson, published in 1777, the year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ut it attracted little attention till it was simultaneously re-stated by Sir Edward West, and by Malthus in his pamphlet on the Corn Laws. Had the theory, however, been left in the shape in which they stated it, it would have had little influence. It was Ricardo, who, puzzled by the question of rent, snatched at the theory, and gave it currency by embodying it in his whole doctrine of value a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现在我们来看李嘉图定律（关于进步社会中地租、工资、利润）的前提是怎样的。他认为，人们迫于人口压力而开始开垦劣质土地，于是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地租因而随之增长。那么利润何以会下降呢？这是由于利润取决于劳动费用，而劳动费用的主要决定因素又是工人在商品上的花销，李嘉图假定生活标准不变，那么，如果每四分之一夸特的面包价格上涨，而工人所需要的面包量不变，则他的工资必将上涨，因此利润就必将下跌。最后，工资又为何会保持平稳？其原因是，假定工人的生活标准不变，那么工资的增减就只会导致人口的相应变化。关于地租理论的渊源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这超出了我们的探讨范围，所以我只是简略提及。亚当·斯密在此问题上没有明确而一致的理论，在地租与物价的关系上也没有明确的观点。关于这一点的近代理论最初由一个实际从事农业者在其书中作了阐述，这发表于1777年，即《国富论》出版的第二年。但直到爱德华·韦斯特爵士（SirEdwardWest）再次阐释，并有马尔萨斯在讨论谷物法的书册中有所提及时，这一理论才引起公众的注意。但如果这一理论只停留在最初阐述时的形态，那它也就几乎失去影响了。是李嘉图出于对地租问题的困惑对该理论重新进行了整理，使之与他的经济发展说与价值说融为一体，于是地租理论才有了现在的形态。

Ricardo's two great positive conclusions are: first, that the main cause of rent is the necessity of cultivating inferior soil as civilization advances; and secondly, that rent is not the cause but the result of price. The theory has been disputed and criticised, but nearly all the objections have come from persons who have not understood it. We may say conclusively that, as a theory of the causes of rent, apart from that general doctrin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which in Ricardo it forms a part, the theory is true. The one formidable objection which can be urged against it is that

the rise in rents in modern times has been due not so much to the necessity of resorting to inferior soils, as to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e; but when Professor Thorold Rogers attacks the theory on this ground, he merely proves that Ricardo has overlooked some important causes which have led to an increase of rents since the Middle Ages.

李嘉图的两个伟大而积极的结论是：第一，随着文明进步，开垦劣质土壤变得必要，这是地租产生的主要原因；第二，地租是物价的结果，而并非物价的原因。虽然这一理论遭到争议和批评，但这些反对几乎无不来自不理解的人们。可以肯定地说，作为李嘉图的产业发展总理论的一部分，且不论对此总理论评价如何，这一地租成因理论本身还是正确的。然而对此理论的一个极大的反证是：近代地租的上涨不是开垦劣质土地所致，而是由农业进步引起的；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ThoroldRogers）也由于这个原因而反对该理论，但他只是证明李嘉图忽视了中世纪以来导致地租上涨的一些重要原因。

What, then, are we justified in stating to be the ultimate causes of rent? First, the fertility of the soil and the skill of the cultivator, by which he is able to raise a larger produce than is necessary for his own subsistence; this makes rent physically possible. Next, the fact that land is limited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that is, that the supply of the land most desirable from its situation and fertility is less than the demand: this allows of rent being exacted. The early colonists in America paid no rent, because there was an abundance of land open to everyone; but twenty years later, rent was paid because population had grown. Let us see exactly what happens in such a case. A town is founded on the sea-coast; as it grows, the people in that town have to get some of their food from a distance. Assume that the cost of raising that corn and bringing it to the town

is 20s., and that the cost of raising it close to the town is 15s. for every five bushels (we will suppose that in the latter instance the cost of carriage is nil); then, as both quantities will be sold at the same price, the surplus 5s. In the latter case will go for rent. Thus we find that rent has arisen because corn is brought into the market at different costs. In twenty years more, rents will have risen still further, because soils still more inferior in fertility or situation will have been brought into cultivation. But the rise of rent is not directly due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ferior soils; the direct cause is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which has made that cultivation necessary.

那么地租的最终成因又该是什么呢？首先，土壤肥沃与耕种者的技能使耕种者可以获得比生活所需更多的产品，便可产生地租。第二，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土地地势与肥沃程度下，土地的供应总是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就有必要征收地租。美洲的早期殖民地居民不需缴纳地租，因为当时土地充足，任何人都可以分到土地；但到二十年后，由于人口增长，征收地租就变得必要。我们来看这其中是怎样的情形。比如一座城镇建于海岸附近，随着城镇的发展，其居民需要从更远的地方获取食物。假定种植谷物与运输到该城的花费为每5蒲式耳20先令，在城镇附近种植谷物的花费为每5蒲式耳15先令（后一种情况的运输费用不计），那么，由于这两种情况下的谷物价格相同，则第二种情况下多出的5先令就会成为地租。再到二十年后，随着地势与肥力更差的土地将被开垦，地租就会更高。但地租上涨并非由开垦劣质土地直接引起，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的增长，因为这使得开垦更多的土地成为必要。

Going back to the question raised by Professor Rogers, as to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s on rent, we may notice that the controversy on this question was first fought out between Ricardo

and Malthus. Ricardo thought that improvements would lead to a fall in rents; Malthus maintained the opposite, and he was right. Take an acre of land close to the town, such as we were considering above, with an original produce of five bushels of wheat, but which, under improved cultivation, yields forty bushels. If the price of wheat remains the same, and all the land under cultivation has been improved to an equivalent extent, the rent will now be 5s. multiplied by eight. Yet there are a few historical instances where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s have been followed by a fall in rents. For instance,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War the Swiss supplied Western Germany with corn, and introduced improvements into their agriculture, in order to meet the pressure of the demand. After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the demand fell off; the Swiss found they were producing more than they could sell; prices fell, and, as a consequence, rents fell also.

关于农业进步对地租的影响，我们再回来看罗杰斯教授提出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由此问题引发的争论首先发生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之间。李嘉图认为农业进步会使地租下降，马尔萨斯的看法与之相反，而马尔萨斯是正确的。就如我们方才所思考的那样，假设接近城镇的土地每英亩产出5蒲式耳小麦，那么随着耕作的进步，每英亩土地现可产出40蒲式耳。如果小麦价格保持不变，而且被开垦的土地都有相同程度的改良，那么现在的地租就是5先令的8倍。但是，历史上也有事例表明，虽然农业有所进步，但地租却下降了。例如，在三十年战争时期，瑞士向西德供应谷物，并对农业进行了改良以应对其需求压力。到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议和以后，需求开始下降，瑞士的产出无法全部卖出，于是谷物价格下跌，地租也因此而下降。

Professor Rogers has further objected to Ricardo's theory that it does not explain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rent. The term "rent" is

ambiguous; it has been used for the payment of knight-service, for the performances of religious offices, for serfs'labour and the sum of money for which it was commuted. In Ricardo's mouth it meant only the money rent paid by a capitalist farmer, expecting the usual rates of profits; but it is quite true that these modern competition rents did not arise till about the time of James I.

罗杰斯教授对李嘉图的理论又提出进一步的反对，说其并未阐释地租的历史渊源。“地租”一词不够明确，它曾经指骑士任务（knight-service）的报酬，依据是宗教仪式的执行、农奴劳动及所代偿的金额等等。而在李嘉图看来，它只是资本主义农场主为获得通常的利润率而支付的货币租金。但这种现代的竞争地租到詹姆斯一世时期左右才真正出现。

The last point in the theory of ren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rent and price. Before Ricardo's time most practical men thought that rent was a cause of price. Ricardo answered, there is land cultivated in England which pays no rent, or at least there is capital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which pays none; therefore there is in the market corn which has paid no rent, and it is the cost of raising this corn, which is grown on the poorest land, that determines the price of all the corn in the same market. Probably he was right in his statement that there is land in England which pays no rent; but even if all land and all farmers'capital paid rent, it would not affect the argument, which says that “rent is not the cause but the result of price”. We may conclude that at the present day rent is determined by two things: the demand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and available. These determine it by fixing the price of corn.

关于地租理论的最后一点是地租与价格的关系。在李嘉图以前，大多数实用主义者认为地租是价格的原因。李嘉图的回应是，英国有些被开垦的田地无需支付地租，或至少有一部分用于农业的资本无需支付地租，因此，市场上必定有未交地租而产出的谷物，其实在同一市场上，所有谷物的价格只取决于在最贫瘠土地耕种谷物的费用。或许在这一点上（英国存在土地不征地租）李嘉图是对的，但即便所有土地所有农民的资本都不征收地租，这也并不影响“地租不是价格的原因而是价格的结果”这一结论。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说，现今的地租取决于两点：人口的需求与可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这两点决定谷物价格，以此影响地租。

Now let us turn to facts, to see how our theories work. We will take the rise in rents between 1790 and 1830, and ask how it came about. The main causes were—(1)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e, the chief of which wer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ommonfield system, rendering possible the rotation of crops, the consolidation of farms with the farmhouse in the centre of the holding,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machinery and manures; (2) the great growth of population, stimulated by mechanical inventions; (3) a series of bad harvests, which raised the price of corn to an unparalleled height; (4) the limitation of supply, the population having to be fed with the produce of England itself, since, during the first part of the period all supplies from abroad were cut off by war, and later, higher and higher protective duties were imposed, culminating in the famous corn bill of 1815. After 1815, however, a fall in rents—not a very great one-took place, a process which greatly puzzled people at the time. It was the consequence of a sudden coincidence of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s and good harvests; there was for a time an over production of corn, and wheat fell in price from 90s. to 35s. This fact is the explanation of Ricardo's mistaken idea that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s tend to reduce rents. Having no

historical turn of mind, such as Malthus had, he did not recognise that this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s was quite accidental. This case, indeed, and the instance of Switzerland given above, with the similar events in Germany about 1820, are the only historical examples of such an effect. For a time there was great agricultural distress; the farmers could not get their rents reduced in proportion to the fall in prices, and many, in spite of the enormous profits they had before made under beneficial leases, were ruined; the farming class never wholly recovered till the repeal of the Corn Laws. But the fall was temporary and exceptional. Taking the period as a whole its striking feature is the rise of rents, and this rise was due to the causes stated: increased demand on the part of an increased population, and limitation of quantity, with improved quality, of the land available.

我们现在来看这些理论在实际中的运用。来看1790年到1830年的地租上涨情况及其是如何发生的。主要的原因是：（1）农业进步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公用地制度的垮塌，此后出现了作物轮种，所有地中央建有农舍的农场的合并，以及农业机具和肥料的引入；（2）受机器发明的刺激，人口大幅增长；（3）连年歉收，导致谷物价格空前上涨；（4）供应有限，人口只能依靠英国本土的产出，因为这一时期前期，国外供应因战争而切断，这一时期后期，征收的保护性关税越来越高，到1815年通过著名的谷物条例时达到顶峰。而到1815以后，地租出现了下降（虽然是小幅度的），这让当时的人们大惑不解。其实这是农业进步与大丰收恰好同时发生的结果，谷物的产量一度过剩，小麦价格从90先令降至35先令。这一事实证明李嘉图（认为农业进步会使地租下降）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不像马尔萨斯那样有着历史学的思考，因此并未认识到农业进步的影响只是偶然。其实，这个事例与前面给出的瑞士的事例，还有1820年前后德国的类似情况，都只是农业进步产生影响仅有的历史例证。农业曾有一段很严重的萧条期，农场主无法使地租随物价的下降而相应减少，尽管他们先前因

优惠租契而赚取了巨大的利润，但还是有很多农场主就此衰落，直到谷物法令废除之后，农耕阶层才得以完全恢复。但地租的下降是暂时而且例外的，从整体上看，上涨仍然是地租的显著特征，而使得地租上涨的两个原因是：人口增加以致需求上涨，可耕地的数量有限而质量有所改善。

I have hitherto been considering the theory of agricultural rents; I now pass to a subject of perhaps greater present importance—ground-rents in towns. If the rise in the rent of agricultural lands has been great, the rise in that of urban properties has been still more striking. A house in Lombard Street, the property of the Drapers'Company, was in 1668 let for £25; in 1887 the site alone was let for £2600. How do we account for this? It is the effect of the growth of great towns and of the improvements which enable greater wealth to be produced in them, ow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s, and to the extension of banking and credit. Are town rents then a cause of the rise in prices? Certainly not. Rent may be an element in price, but the actual amount of rent paid depends upon these two things: the demand of the population for commodities, which determines price, and the value of a particular site for purposes of business.

至此我一直在讲农业的地租理论，现在我要说的是对当今更加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城镇地租。如果说农村地租涨幅巨大，那么城市地租的上涨则更为明显。伦敦伦巴第大街德雷珀公司的（Drapers' Company）的一处房地产，1668年时租金为25英镑，到1887年仅场地租金已达2600英镑。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这是因为，在大城市中，由于技术的发展与银行业、信贷业的扩大，城市不断发达，并取得了各种进步以致能创造出更多财富。那么城市的物价上涨是否是由地租所致呢？当然不是。地租也许是影响物价的一个因素，但实际支付的

地租金额取决于两点：人口对商品的需求量（这决定了物价）与商业目的下某一地段的价值。

These considerations bring us to the question now sometimes raised: is rent a thing which the State can abolish? Is it a human institution, or the result of physical causes beyond our control? If we abolish agricultural rent, the result would simply be, as Ricardo says, that the rent would go into the pockets of the farmers, and some of them would live like gentlemen. Rent itself is the result of physical causes, but it is within our power to say who shall receive the rent. This seems a fact of immense importance, but the extent of its significance depends largely on the future course of rent in England; and so we are bound to inquire whether Ricardo was right in assuming that rents must necessarily rise in a progressing state. Many think the contrary, and that we are now on the eve of a certain and permanent fall in agricultural rents; and if rents continue steadily to fall, the question will become one of increasing insignificance. As means of communication improve, we add more and more to the supply of land available for satisfying the wants of a particular place; and as the supply increases, which it is likely to do to an increasing extent, the price of land must fall. Social causes have also influenced rents in England, and social changes are probably imminent, which will at once reduce the value of land for other than agricultural purposes, and increase the amount of it devoted to agriculture. Such changes would likewise tend to diminish rent. We may say therefore that, since there are these indications of a permanent fall in rents, so great a revolution as the transference of rent from the hands of private owners to the nation would not be justified by the amount which the nation would acquire. The loss and damage of such a revolution would not be adequately repaid.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又想到如今常被提起的问题：地租能否被国家所废止？这是人为规定的制度，还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自然因素所致的？如果我们废除农业地租，那么如李嘉图所言，其结果只会是地租费都跑到农场主的口袋，一些农场主会因此过上绅士般的生活。地租本身的确是自然因素所致，但我们有能力决定地租由谁收取。这个事实似乎无比重要，但其意义究竟有多重大还主要由英国未来的地租动向决定，因此，对于李嘉图的进步国家的地租必会上涨的说法，我们一定要调查其正确与否。很多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农业地租很快会有所下降，并且这种下降是永久性的。而如果地租持续下降，那么这个问题也就渐失意义了。随着交通方式的改善，我们可以增加耕地的产出供应以满足某一地的需求；随着供应的增加（很可能是大幅度的增加），地价则势必下降。此外，社会因素也同样影响着英国地租，当前很可能有社会变革即将发生，于是非农业用地的地价将会降低，农业用地的数量将会上升。这样的变化同样有使地租减少的趋势。因此我们可以说，既然地租趋向于永久性下降，那么地租从私人所有向国有转移，如此大的一场变革就不能由国家所能够获取的数额来解释。这场变革中的损失是无法得到充足补偿的。

But will rent in towns fall? Here it is impossible to predict. For instance, we cannot say whether London will continue to grow as rapidly as it has done heretofore. Now it is the monetary centre of the world; owing to the greater use of telegraphy, it is possible that it may not retain this pre-eminence. The decay of the provincial towns was largely due to the growth of great estates, which enabled their proprietors to live and spend in London; but if changes come to break up these large properties, London will cease to be the centre of fashion, or at any rate to have such a large fashionable population. Politics, moreover, are certainly tending to centre less in London. And further inventions in the means of locomotion and the greater use of electricity may result in causing a greater

diffusion of population.

那么城镇地租是否会下降呢？这一问题是不可预测的。例如，我们不能说伦敦是否会如之前那样继续飞速发展。虽然伦敦现在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但由于电信技术的使用更加广泛，伦敦的卓越地位很可能无法保持下去。地方城镇的衰退很大程度是由于大房地产的发展，这使地产所有者能够到伦敦居住和消费，但一旦发生变革导致大房地产的分割，那么伦敦就不会再是潮流中心，至少不会再聚集如此多的潮流界人士。另外，伦敦也一定会越来越偏离政治中心的地位。并且，未来交通工具的进一步发明与电力的广泛应用又可能导致人口更加分散。

Chapter XIII Two Theories of Economic Progress

第十三章　经济进步的两种理论

Since Mill, in 1848, wrote his chapter on the fu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es, the ques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has become of still greater importance. We cannot look round on the political phenomena of today without seeing that this question is at the root of them. We see the perplexity in which men stand, and the divisions springing up in our great political parties,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of politicians how to grapple with it. Political power is now widely diffused; and whatever may be the evils of democracy, this good has come of it, that it has forced men to open their eyes to the misery of the masses, and to inquire more zealously as to the possibility of a bette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Economists hav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ether it is possible for the mas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to raise themselves under the present conditions of competi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Ricardo and Henry George have both answered, No; and the former has formulated a law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which, as we have seen, rent must rise, profits and interest fall, and wages remain stationary, or perhaps fall. Now is there any 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between this rise in rent and fall in wages? Ricardo thought not. According to his theory, profits and wages are fixed independently of rent; a rise in rent and a fall in wages might be due to the same cause, but the one was not the result of the other, and the rise in rent would not be at the expense of the labourers. Yet practical opinion goe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the evidence of farmers and land-agents we see that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 high rents exacted from farmers have been partly taken out of the pockets of the

labourers. “If there is a fall in the price of corn, agricultural wages will fall, unless there is a corresponding fall in rent,” was said before a Parliamentary Commission in 1834. Ten years ago the connection was admitted in Ireland; and the Land Act of 1870 was founded on the belief that rack-rents were not really the surplus left when capital and labour had received their fair returns, and that the only limit to the rise of rents was the bare necessities of the peasantry. In England it has been assumed that wages and profits have fixed lines of their own independent of rent, but this is not universally true; where the farmers have suffered from high rents, they in their turn have ground down the labourers. Thus even in England rent has been exacted from the labourer; and this is not an opinion but a fact, testified by the evidence of agents, clergy, and farmers themselves. What appears accurate to say about the matter is, that high rents have in some cases been one cause of low wages.

穆勒曾于1848年著文描述了工人阶级的未来，此后关于财富的分配问题就愈发凸显出其重要性。我们来看当今的政治，必会发现这些政治现象的根源就是财富分配问题。我们看到，人们处于困苦的境地，由于政治家不知如何应对此种情况进而导致了大政党中的分裂不断。如今，政治力量分布广泛，不论民主主义有着何种弊端，它毕竟使人们开始关注大众的疾苦，并积极探索更好的财富分配途径。经济学家需要对这样问题做出回应，即工人阶级的群众能否在当下的竞争与私有制条件下进一步提升自我？李嘉图与亨利·乔治对此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同时，李嘉图确切阐述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根据该理论，我们知道地租必定会上涨，利润及利息会下降，而工资会持平甚至下降。那么，地租的上涨与工资的下降之间有何因果关系吗？李嘉图认为二者并无关联。他的理论认为，收益与工资的确定与地租无关。地租增长或工资下降也许为同一原因所致，但这两方面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地租的增长也不会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前提。但是，人们实际的观点却与之相反。通过对农民及土地代理人的分析，我们看到，人们

普遍认为对农场主强征的高额地租有一部分是来自工人的口袋。1834年的一次议会委员会上曾有评论说："如果谷物的价格下跌，除非地租随之下降，否则农业收入便会减少。"早在10年前，爱尔兰就已承认这种关联，1870年制订的《土地法》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高额租金并不是资本与劳动得到合理报酬后所得的剩余，而且农民的最低需求是限制地租上涨的唯一因素。在英格兰，人们认为工资与利润有其自身固定的规律，不受地租影响，但这并不是普遍的真理；农场主在承受高额地租之苦时就会榨取工人的利益。因此，即使在英格兰，工人也已成为强征地租的对象。这并不只是推断，而是经土地代理人、牧师及农场主们证实的事实。在这一问题上，不妨也可以这样说：在一些情况下，高地租确实是低工资的一个原因。

This direct effect of rent on wage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is quite distinct from the "brazen law of wages" which Lassalle took from Ricardo. It is impossible, according to Ricardo, for labourers to improve their position under existing industrial conditions, for if wages rise, population will advance also, and wages return to their own level; there cannot therefore be any permanent rise in them. Ricardo, indeed, did not deny that the standard of comfort vari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in the same country at different times; but these admissions he only made parenthetically, he did not seem to think they seriously touched the question of population, and they did not affect his main conclusions. For instance, he argues that a tax on corn will fall entirely on profits, since the labourer is already receiving the lowest possible wages. This statement may be true with regard to the very lowest class of labourers, but it certainly does not apply to artisans, nor to a large proportion of English working men at the present time. With them, at any rate, it is not true that they are already receiving the lowest possible wage, nor that there is an invincible bar to their progress. Let us turn to the test of facts and see if wages have risen since 1846. Henry George

says that free trade has done nothing for the labourer'. Mill, in 1848, predicted the same. Professor Cairnes came to a very similar conclusion; writing in 1874 he said, that “the large addition to the wealth of the country has gone neither to profit nor to wages, nor yet to the public at large, but to swell the rent-roll of the owner of the soil.” Yet it is a fact that though the cost of living has undoubtedly increased, wages have risen in a higher ratio. Take the instance of a carpenter as a fair average specimen of the artisan class. The necessaries of a carpenter's family in 1839 cost 24s. 10d. per week; in 1875 they cost 29s. But meanwhile the money wages of a carpenter had risen from 24s. to 35s. Thus there had been not only a nominal but a real rise in his wages. Turning to the labourer, his cost of living was about 15s. In 1839, it was a little under 15s. In 1875. The articles he consumes have decreased in cost, while in the case of the artisan they have increased, because the labourer spends a much larger proportion of his wages on bread. The labourer's wages meanwhile have risen from 8s. to 12s. or 14s.; in 1839 he could not properly support himself on his wages alone. These facts seem conclusive, but certainty is difficult from the very varying estimates of consumption and money wages. For strong proof of a rise in agricultural wages we may take a particular instance. On an estate in forfar the yearly wages of a first ploughman were by the wages-book, in

但在一定条件下，地租对工资的直接影响与拉萨尔由李嘉图发展而来的“工资钢铁定律”截然不同。李嘉图认为，在现有产业条件下，工人们无力改善自身的地位。这是因为，如果工资上涨，人口则随之增长，工资就会回到其原有水平，因此无法保证工资持续性的增长。事实上，李嘉图并不否认人们的生活水准因国家而异，在同一国家也因时代而异。但他只附带解释了这一情况，他似乎并不认为这与人口问题有莫大的关联，而且这也没有影响到他的重要结论。例如他认

为，由于工人的工资已经达到最低点，因此对谷物的征税则完全由利润承担。对于地位最低的工人而言这种说法似乎是正确的，但这显然不适用于工匠以及现在大批的英国工人阶级。对他们来说，无论如何不能说他们的工资已达到最低，也不能说存在某些困难阻碍他们的进步。我们来看事实的验证，考察1846年以来工资是否有所增长。亨利·乔治认为，自由贸易并未给工人带来任何利益。1848年，穆勒做出了同样的预测。凯恩斯教授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874年时他在专著中写道：“国家财富的大量增加并未体现在利润或工资的增长上，也并没有惠及大众，而是以地租形式丰盈了地主的账簿”。然而，生活成本无疑是上涨了，但事实上工资也呈现出更高的增长。我们以木匠为例，视其为工匠阶级平均水平的代表。1839年，木匠一家每周购置必需品的花销为24先令10便士；1875年，此项费用增至29先令。但同时，木匠的工资从24先令涨至35先令。因此，工资的增长不仅是名目上的，也是实质上的。下面来看工人，1839年其生活花销约为15先令，1875年略低于15先令。工人的消费成本下降，工匠的消费成本反而增加，这是因为工人将大部分工资都用于解决温饱了。同时工人的工资也从8先令涨至12先令或14先令。1839年时，工人已无法仅靠工资维持生计。这些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但由于对消费与货币工资的推算存在分歧，我们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下面我们来举个特例，来证明农业工资的增长。在福弗尔郡的某块所有地，据工资账簿来看，一个最优秀的农业工人其年收入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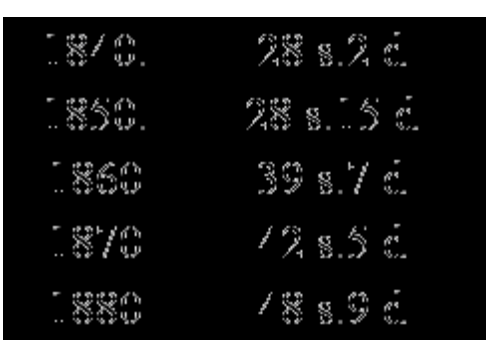

1840 年	28 镑 2 先令
1850 年	28 镑 15 先令
1860 年	39 镑 7 先令
1870 年	42 镑 5 先令
1880 年	48 镑 9 先令

According to his own admission the standard of comfort of the first ploughman employed on this estate in 1810 had risen, for he complained, in a letter describing his position, of his increased expenditure, increased not because things were dearer, but because he now needed more of them.

他本人表示，1810年时，该所有地雇佣的一流农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已有所提高，因为他曾在一封信中描述过其工作状况，抱怨费用支出越来越高，这种升高不是由于物价上涨，而是由于他所需要的物品更多了。

We may take as further evidence the statistics of the saving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t is impossible to get more than an approximate estimate of them, but they probably amount to about £130,000,000. To these we may add the savings actually invested in houses. In Birmingham there are 13,000 houses owned by artisans. All this is small compared with the whol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which, in 1875, was estimated at £8,500,000,000 at least, with an annual increase of £235,000,000—this latter sum far exceeding the total saving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The comparison will make us take a sober view of their improvement; yet the facts make it clear

that the working classes can raise their position, though not in the same ratio as the middle classes. Mr. Mulhall also estimates that there is less inequality between the two classes now than forty years ago. He calculates that the average wealth of a rich family has decreased from £28,820 to £25,803, or 11 per cent.; that of a middle-class family has decreased from £1439 to £1005, or 30 per cent.; while that of a working-class family has increased from £44 to £86, or nearly 100 per cent. But without pinning our faith to any particular estimate, we can see clearly enough that the facts disprove Ricardo's proposition that no improvement is possible; and there are not wanting some who think that the whole tendency of modern society is towards an increasing equality of condition.

我们可以用工人阶级的储蓄数字来做进一步的证明。太过精确的估算是不可能，但这一数字大约应为1.3亿英镑。这里我们认为，实际投资于房产的储蓄也可计算在内。在伯明翰地区，13000处住宅都为工匠所有，但与1875年时国家的全部资本（至少85亿英镑）相比，这仍显得微不足道，且国家总资本以每年23.5万镑的速度增长，已远远超过了工人阶级的储蓄总额。从对比中，我们可以对工人阶级的改善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事实依然证明工人阶级是可以改善自身状况的，只是改善的比率不及中产阶级而已。马尔霍尔先生还估测，如今，两个阶级的不平等状况已比40年前改善了很多。据他计算，一个富裕家庭的平均财富由28820镑降至25803镑，减少了11％；中产阶级家庭财富由1439镑降至1005镑，减少了30％；而工人阶级的家庭财富却从44镑增至86镑，几乎增加了100％。但我们即使不相信任何个别的估计，也仍然会发现李嘉图认为任何改善都不可能的论断是不正确的。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社会是朝着境遇趋于平等的方向不断发展的。

Was Ricardo any more correct in saying that interest and

profits (between which he never clearly distinguished) must fall? As a matter of fact, for the last century and a half interest in England has been almost stationary, except during the great war. In Walpole's time it was three per cent.; during the war it doubled, but after the peace it dropped to four per cent., and has remained pretty steady at that rate ever since. Ricardo thought that the cost of the labourer's subsistence would necessarily increase, owing to the necessity of cultivating more land, and as he would thus require a greater share of the gross produce, less wealth would be left for the capitalist. He overlooked the fact that the rate of interest depends not merely on the cost of labour, but on the field of employment as well. As civilization advances, new inventions and new enterprises create a fresh demand for capital: some £700,000,000 have been invested in English railways alone. No doubt, if the field for English capital were confined to England, the rate of interest might fall; but Ricardo forgot the possibility of capital emigrating on a large scale. Thus Ricardo's teaching on this point is deficient both in abstract theory and as tested by facts. What we really find to have taken place is, that though rent has risen, there is good reason to suppose that in the future it may fall; that interest has not fallen much; and that the standard of comfort and the rate of wages, both of artisans and labourers—of the former most decidedly,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also of the latter, has risen.

那么，李嘉图所提出的利息和利润（他并未明确二者的区别）必然降低的说法还是否成立呢？事实上，在英国过去的150年间，除大战期间以外，其利息始终较为稳定。沃波尔时代的利息为3%；虽然战时增加一倍，但恢复和平后又落回到4%，且此后，利息几乎没有变化。李嘉图认为，由于需要开垦更多的土地，工人的生活费就会有所增加，且由于他们想从总产物中获得更多份额，故而留给资本家的财富就会相应减少。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利率不仅由劳动力成本

决定，同时也取决于劳动力雇佣的范围。随着文明进步，新发明与新企业催生了新的资本需求，比如，英国仅铁路业就吸引了7亿英镑的投资。毫无疑问，如果英国资金仅限于本国流通，则利率或许会下降；但李嘉图忘记了资本大规模流动的可能性。因此，不论从抽象理论还是事实检验来看，李嘉图的理论都存在着缺陷。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形是，尽管地租在上涨，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日后还会下降；我们还看到利息有了小幅度减少，而且工匠与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资率都有所上升——前者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增长，后者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幅。

I wish next to examine Mr. George's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Mr. George is a disciple of Ricardo, both in his method and his conclusions; he has as great a contempt for facts and verification as Ricardo himself. By this method he succeeds in formulating a law, according to which, in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interest and wages will fall together, and rents will rise. Not only is the labourer in a hopeless condition, but the capitalist is equally doomed to a stationary or declining fortune. “Rent,” he says, “depends upon the margin of cultivation, rising as it falls, and falling as it rises. Interest and wages depend on the margin of cultivation, falling as it falls, and rising as it rises.” The returns which the capitalist obtains for his capital and the labourer for his work depend on the returns from the worst land cultivated; that is, on the quality of land accessible to capital and labour without payment of rent.

下面我想来考察乔治先生的经济进步理论。不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结论来看，乔治都应是李嘉图思想的继承人，他与李嘉图一样都轻视事实现象和证明过程。他用这一方法成功制定出一条法则，即利息和工资会随文明的进步而下降，而地租则会上涨。不仅仅是工人处于无

望的境地，就连资本家也难逃停滞或衰退的命运。他讲道：“地租与耕作限度有关，随耕作限度的上升而下降，并随之下降而上升；利息和工资则与耕作限度成正比例关系，随其下降而下降，随其上升而上升。”资本家从投资中获得的收益与工人从劳动中获取的报酬由耕作最劣等耕地的收益来决定，即取决于可在不支付地租的情况下获得资本与劳动力的耕地的质量。

Now Mr. George's observations are derived from America, and what he has done is to generalise a theory, which is true of some parts of America, but not of old countries. His book seems conclusive enough at first sight. There is little flaw in the reasoning, if we grant the premises; but there are great flaws in the results when tested by facts. Do interest and wages always rise and fall together? As an historical fact they do not. Between 1715 and 1760, while rents (according to Professor Rogers) rose but slowly (Arthur Young denies that they rose at all), interest fell, and wages rose. Between 1790 and 1815 rent doubled, interest doubled, wages fell. Between 1846 and 1882 rents have risen, interest has been stationary, wages have risen. Thus in all these three periods the facts contradict Mr. George's theory. Rent indeed has generally risen, but neither profits nor wages have steadily fallen, nor have their variations borne any constant relation to one another. Coming to Mr. George's main position, that rent constantly tends to absorb the whole increase of national wealth, how does this look in the light of fact? Does all the increase of wealth, for instance, in the Lancashire cotton manufactures, go simply to raise rents? Evidently not. Wages have risen owing to improvements in machinery, and in most cases profits have also risen. We can prove by statistics that in England the capitalists” wealth has increased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landowners, for in the assessments to the income-tax there has been a greater increase under Schedule D, which comprises the profits of

capitalists and the earnings of professional men, than under Schedule A, which comprises revenues from land. At the same time, Mr. George has made out a strong case against private property in land in great towns; but here he has only restated more forcibly what Adam Smith and Mill advocated, when they recommended taxes on ground rents as the least objectionable of all taxes. Under existing conditions the working people in great towns may be said to be taxed in the worst of ways by the bad condition of their houses. An individual or a corporation lets a block of buildings for a term of years; the lessee sublets it, and the sub-lessee again for the third time. Each class is here oppressing the one beneath it, and the lowest unit suffers most. This is why the proble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s sure, in the near future, to take the form of the question, how to house the labourers of our towns.

乔治先生的结论得自美国，他只是归纳出这些理论，这对于美国部分地区还可适用，但却不适于那些古国。他书中的论述初看起来也许可信，我们如果承认它的前提，会发现其论证几乎没有缺点；但如果加以事实的检验，我们就可发现其结论存在很大的漏洞。利息总是与工资同升同降吗？从历史来看，事实并非如此。（据罗格斯教授所述，）1715至1760年间，地租有缓慢的上涨（阿瑟·杨格完全否认地租上涨），利息有所下降，而工资却有所上升。1790至1815年，地租与利息均翻了一倍，工资却有所下降；1846至1882年，地租上涨，利息持平，而工资有所上涨。因此，以上三个时期的事实均与乔治的理论相反。总的来看，地租普遍上涨，但利润与工资并未稳步下降，而且这些变动之间也并没有必然联系。关于乔治先生的主要观点，即地租总是倾向于吸收国家财富的增长，这在实际中又是怎样体现的呢？例如兰开夏的棉纺织工业，其增加的财富全部体现在地租的增长上吗？显然不是这样。机械的改良使工资得以提高，在多数情况下，利润也随之增长。数据显示，英国资本家的财富增长速度要高于地主，因为根据所得税的税额表，适用于资本家利润和专业型人才收

入的税率表D税率增长明显高于适用于土地收入的税率表A。同时，乔治先生在论证中极力反对大都市的土地私有。亚当·斯密与穆勒均提出，在所有税种之中，地租税引发的争议最少。而在此问题上，乔治先生只是重申了他二人的观点。在现有的条件下，由于大都市中工人阶级的住房条件恶劣，可以说他们经受了最艰苦的纳税方式。如果个人或公司法人租借房屋，那么在几年的租赁期内，租借者会将房屋转租，转租者又会继续转租。也就是说，每个阶级都在压迫其下一阶级，这样，最底层的人们也就是最苦不堪言的。因此，在不久的将来，财富分配问题终将体现为城市工人的住房问题。

Chapter XIV The Fu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es

第十四章　工人阶级的前景

I have thus far tried to show that the material condition of the workman is capable of improvement under present social conditions. I wish now to explain the causes which have contributed to its actual improvement since 1846. The most prominent of these causes has been Free Trade. In the first place, Free Trade has enormously increased the aggregate wealth of the country, and therefore increased the demand for labour; this is an indisputable fact. Secondly, it has created greater steadiness in trade—a point which is often overlooked in discussions of the subject. Since 1846 workmen have been more regularly employed than in the preceding half-century. Free trade in wheat has, moreover, given us a more steady price of bread, a point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the labouring man; and this steadiness is continually becoming greater. From 1850 to 1860 the variation between the highest and lowest prices of wheat was 36s., between 1860 and 1870 it was 24s., and in the last decade it has been only 15s. And since the sum which the workman has spent on bread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nstant, the amount which he has had left to spend on manufactured produce has also varied less, and its price in consequence has been steadier. But why then, it may be asked, the late great depression of trade since 1877? I believe the answer is, because other countries, to which we sell our goods,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bad harvests, and have had less capacity for buying. The weavers in Lancashire have had to work less time and at lower wages because far-off nations have not been able to purchase cotton goods, and the depression in one industry has spread to other

branches of trade.

至此，我一直试图证明工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是可以提高的。下面我来对1846年以来工人实际改善的原因加以说明。在众多的原因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自由贸易。第一，自由贸易使国家总财富实现了极大的增长，继而使得对劳工的需求量增加，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第二，自由贸易使得贸易更加稳定，这是讨论该问题时常被忽视的。1846年以来，相比此前的半个世纪，雇佣工人的方式已经更为正规。而且，还有一点对劳动者来说至关重要，那就是小麦的自由贸易使得面包价格更为稳定，并且这一稳定性在不断加强。从1850年到1860年间，小麦的最高价格与最低价格之差为36先令，1860年到1870年为24先令，而最近的十年中仅为15先令。由于工人花在面包上的钱越来越固定，所剩的购买制造产品的花费又很少变动，因此这些物品的价格也就趋于稳定。但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接下来在1877年以后发生了贸易大萧条？我认为其答案是，购买我们产品的国家遭受歉收之苦，致其购买力降低。由于远方国家无力购买棉纺织品，兰开夏的织布工人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拿到的薪水也就随之减少，而且一个产业的萧条也会蔓延到其他贸易产业。

The greater steadiness of wages which has been caused by Free Trade is seen even in trades where there has been no great rise. But besides the amount of the workman's wages per day we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number of days in the year and hours in the day, during which he works. He now finds employment on many more days (before 1846 artisans often worked only one or two days in the week), but each working day has fewer hours; so that his pay is at once steadier and more easily earned. And hence even where his daily wages have remained nearly the same, with more constant employment and with bread both cheap and fixed in price, his general position has improved.

自由贸易使得工资更为稳定，这即使在并无较大增长的贸易中也可见到。但是，除了付给工人们的日工资数目，我们还须考虑一年中工人的劳动天数，以及一天中工人的劳动小时数。现在的工人劳动天数较以前增多了（1846年之前，工匠们每周只工作一两天），但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却缩短了，这使得工人的工资较为稳定且容易赚得。因此，即使是日工资几乎未变的行业，由于工作更加稳定、面包价格便宜而平稳，工人的整体地位还是提升了。

What other agencies besides Free Trade have been at work to bring about this improvement? Factory legislation has raised the condi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by imposing a limit on the hours of work, and especially the sanitary environment of the labourer; the factory laws seek to regulate the whole life of the workshop. Trades-Unions, again, have done much to avert social and industrial disorder, and have taught workmen, by organization and self-help, to rely upon themselves. Herein li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the Continental workman; the former, because he has been free from voluntary associations, does not look to the State or to revolutionary measures to better his position. For proof of this, it is enough to compare the parliamentary programme of the last Trades-Unions Congress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t Geneva. English Trades-Unions resort to a constitutional agitation which involves no danger to the State; indeed, as I have said, their action averts violent industrial dislocations. And beyond this, Trades-Unions have achieved some positive successes for the cause of labour. By means of their accumulated funds workmen have been able to hold out for better prices for their labour, and the Unions have further acted as provident societies by means of which their members can lay up sums against sickness or old age. The mischief and wastefulness of strikes is generally enough insisted on, but it is

not as often remembered that the largest Unions have sanctioned the fewest strikes; the Amalgamated Engineers, who have 46,000 members, and branches in Canada and India, expended only six per cent of their income on strikes from 1867 to 1877. The leaders of such a great Union are skilful, well-informed men, who know it to be in their interest to avoid strikes.

那么，除了自由贸易带来地位的提升，还有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工厂立法通过强制限制劳动时间改善了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条件，特别是劳动者的卫生环境；工厂法规旨在规范工厂的各方面生活。此外，工会也再一次为防止社会和工业混乱做出了很大贡献，并且教给工人通过联合和自助来实现独立。在这一点上，英国工人和欧洲大陆工人存在着区别。英国工人不受自治组织的管理，因此并不依靠国家或革命来提高地位——把上一届的工会会议纲要与日内瓦国际工会议程比较一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英国工会在宪法范围内采取鼓动措施，这于国家并没有危害；如上所述，这些行为确实避免了极端的产业混乱。除此之外，工会也为工人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工人们依靠积累起来的资金，已经能够暂时待工，以给自己的劳动争取更高的工资；工会也进一步扮演起储蓄互助会的角色，为其成员储备基金，以作疾病医治和养老之用。人们总在强调罢工所致的危害和浪费，但很少有人知道，最大的工会批准的罢工也最少。机械总工会（AmalgamatedEngineers）拥有46000名成员，并在加拿大和印度都设有分会。从1867年至1877年间，该工会在罢工上的花费仅为其收入的6%。一个这样的大工会，其领导者都是颇有远见卓识的精明人士，他们都知道避免罢工是合乎工人利益的。

Lastly, we must not forget to mention the great Co-operative Societies, which in their modern shape date from the Rochdale Pioneers Store, founded in 1844, 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Robert Owen's teaching, though the details of his plan were therein

abandoned. These, like Trades-Unions, have taught the power and merit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 and self-help. At present, however, they are only big shops for the sale of retail goods, through which the workman gets rid of the retail dealer, and shares himself in the profits of the business, by receiving at the end of each quarter a dividend on his purchases. Such stores, however useful in cheapening goods, and at the same time encouraging thrift, do not represent the ultimate object of co-operation. That object is to make the workman his own employer. Hitherto the movement has not been successful in establishing productive societies; the two great difficulties in the way being apparently the inability of a committee of workmen to manage a business well, and their unwillingness to pay sufficiently high wages for superintendence. The chief obstacles are thus moral, and to be found in the character of the workmen, and their want of education; but as their character and education improve,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se difficulties should not vanish.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提到伟大的消费合作社，它的成立是受到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学说的启发，其近代形式始于1844年建立的罗奇代尔先锋社（RochdalePioneers' Store），但这里未包括欧文计划的细节部分。就如工会一样，合作社告诉工人自愿联合和自助的力量及价值。但目前合作社只是贩卖零售商品的大型商店，工人可以以此脱离零售商，每季度末根据其购买额来获得红利，从而参与交易中的利益分配。但不论这些大商店怎样降低商品价格、怎样鼓励勤俭节约，这都不代表合作社的最终目的。合作社的最终目的是让工人们成为自己的雇主。迄今为止，这种运动都未能促成生产合作社（productivesocieties）的成功建立，其中最大的两个困难显然是工人委员会无力经营，且又不愿付给主管足够高的工资。因此，最主要的障碍是精神上的，即工人的品行与教育的欠缺；但随着工人品行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些困难迟早都会解决。

Such are the chief agencies to which we trace the improvement in the position of the labourer during the last forty yea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period Mill insisted on one thing a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namely restriction upon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nd without this he believed all improvement to be impossible. Yet we find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ate of increase has not slackened. It is nearly as great now as between 1831 and 1841. It was greater during the last decade than it had been since 1841.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has undoubtedly been an enormous emigration which has lightened the supply of labour. Three millions and a half of people have emigrated from Great Britain since 1846.

这就是过去四十年中促使劳动者地位提高的主要原因。在这段时期之初，穆勒已坚持表明限制人口的增长是重中之重。他认为如果不对人口加以限制，那么一切改善都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发现，这段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并没有放慢，而是仍与1831年至1841年持平，上个十年的增长率甚至比1841年以后还要高。另一方面，大量的移民无疑减少了劳工的供应。自1846年以来有350万人口从英国移居国外。

The question which now most deeply concerns us is, Will the same causes operate in the future? Will Free Trade continue to be beneficial? Will our wealth continue to increase and our trade to expand? On this point a decided prediction is of course impossible. Competition in neutral markets is becoming keener and keener, and we may be driven out of some of them, and thus the national aggregate of wealth be lessened.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increased supplies of corn from America and Australia will give an enormous impetus to trade. As in the past so in the future corn is the commodity of most importance to the

labourer; and if the supply of corn becomes more constant, trade will be steadier and wages will probably rise. Besides, cheap corn means that all over the world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consumers is increased, and this again will stimulate trade. So that in this respect the labourers outlook is a hopeful one. As to emigration also, there is no reason to suppose that there will be any check on this relief to the labourer for the next fifty years at least. Again, there is every prospect of co-operation and even productive co-operation making great progress in the future, though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latter is likely for some time to b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the workmen. The moral obstacles to cooperative production which I mentioned will disappear but slowly. In certain directions, however, it is likely to develop; I mean in the direction of manufacturing for the great Wholesale Co-operative Societies, because here the market is secured. Trades-Unions too are likely to expand.

现在我们最关切的问题是，相同的原因在将来也会发挥作用吗？自由贸易是否会继续体现优势？我们的财富是否会继续增长，贸易是否会继续扩大？在此问题上，预测是不可能十拿九稳的。但中立市场的竞争将更为激烈，我们也许会被其中某些市场所驱逐，国家总财富就会因此而减少。而另一方面，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谷物供给增加，将极大地推动贸易发展。如同过去一样，在将来，谷物仍是工人最重要的商品；如果谷物保持持续供应，贸易就会更加稳定，工资也大有可能增长。此外，谷物廉价也意味着全世界消费者购买力的增长，这也将会刺激贸易。由此看来，工人的前景是充满希望的。至于移民，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妨碍工人状况的好转，至少在未来五十年内是这样。再者如合作社与生产合作社，虽然我认为后者有时并非提高工人地位的重要因素，但这两者都将大有发展前景。我上面提到的精神上的阻碍将会逐渐消失。可能会朝一些方向有所发展，这里我是指制造业向大批发合作社方向发展，因为这一市场是有

所保障的，工会同样也将有扩大趋势。

Turning to the moral condition of the workpeople, we find an improvement greater even than their material progress. When we see or read of what goes on in the streets of our great towns, we think badly enough of their morality; but those who have had most experience in manufacturing districts are of opinion that the moral advance, as manifested, for example, in temperance, in orderly behaviour, in personal appearance, in dress, has been very great. For the improvement in the inner life of workshops as early as 1834, take the evidence of Francis Place, a friend of James Mill, before a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in that year. He told the Committee that, when he was a boy, he used to hear songs, such as he could not repeat, sung in respectable shops by respectable people; it was so no longer, and he was at a loss how to account for the change. Similar statements are made by workmen at the present day. Conversation, they say, is bad at times, but opinion is setting more and more against immoral talk. The number of subjects which interest workpeople is much greater than before,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newspaper is supplanting the old foul language of the workshop. We have here an indirect effect of the extension of the suffrage. Add to this the statistics of drunkenness. In 1855 there were nearly 20,000 persons convicted for drunkenness, in 1880 there were not many more than 11,000.

再来说工人的道德情况，我们发现工人道德的提升比物质上的改善要大。我们看到或读到大城镇的街头事件，会认为他们的素质很差；但熟知工业区的人们会知道，工人的道德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这表现在戒酒、行动有序、个人外表与穿着等方面。关于工厂的内部生活，早在1834年，就有詹姆斯·穆勒的朋友弗朗西斯·普莱斯，

在给下议院某委员会的证言中有所提及。他告诉委员会，在他的少年时代常听到有人唱一些他不好唱出的歌曲，并且都是那些体面的商店和体面的人在唱，但这如今已经听不到了，他说他不知该如何描述这一变化。当代工人也在讲述同样的事情。他们说，那时的谈话内容有时很不好，但舆论已越来越不容许不道德的言论；工人感兴趣的话题比以前多了很多，人们谈论新闻中的事件，已取代了过去工厂里不文明的交谈。这里还有选举权延伸产生的一个间接影响。来看关于酗酒的统计数字。1855年，近20000人因酗酒而被判罪，而到1880年只有不到11000人。

Aga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workmen and employers are certainly much better. The old life, as described by Owen and Cobbett, of an apprentice in the workshop, or a boarded labourer in the farmhouse, is at first sight most attractive; and the facts told to the Commission of 1806 seem to realise the ideal life of industry.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sters and workmen were then extremely close, but this close relationship had its bad side. There was often great brutality and gross vice. The workman was at his employer's mercy. In Norfolk the farmer used to horsewhip his labouring men, and his wife the women. There existed a state of feudal dependence, which, like all feudalism, had its dark and light sid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as distinctly the result of the small system of industry, and hence it was shattered by the power-loom and the steam-engine. When huge factories were established there could no longer be a close tie between the master and his men; the workman hated his employer, and the employer looked on his workmen simply as hands. From 1800 to 1843 their mutual relations, as was admitted by both parties, were as bad as they could be. There could be no union, said employers, between classes whose interests were different, and farmers, contrary to ancient usage, ruthlessly turned off their men when work was slack. The “cash nexus” had come in,

to protest against which Carlyle wrote his Past and Present; but Carlyle was wrong in supposing that the old conditions of labour could be re-established. Feudalism, though it lingers in a few country places, has virtually disappeared alike in agriculture and in trade. The employer cannot offer and the workman cannot accept the old relations of protection and dependence: for, owing to the modern necessity of the constant movement of labour from place to place and from one employment to another, it has become impossible to form lasting relations, and the essence of the old system lay in the permanency of the workmen's engagements. Trades-Unions too have done much to sever what was left of the old ties. Workmen are now obliged, in self-defence, to act in bodies. In every workshop there are men who are attached to their masters, and who on occasion of a strike do not care to come out, but are yet compelled to do so in the common interest. Before this obligation was recognised by public opinion, the effect of Unions was, no doubt, to embitt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sters and men. This was especially the case between 1840 and 1860.

再则，工人和雇主的关系已比从前大为改善。正如欧文（Owen）和科尔伯特所述，在过去，一个工厂学徒或农舍长工的生活起先看来是极富魅力的；1806年给委员会报告的事实也显示，那似乎实现了理想的工业生活。那时雇主和工人的关系非常紧密，但这种紧密关系也有其弊端，这就是其间常有一些野蛮粗暴的行为。工人完全受雇主的支配，诺福克郡的农场主就曾鞭打其男劳工，农场主的妻子则鞭打其女劳工。封建的奴隶依附情况依然存在，它像所有封建制度一样具有利弊两重性。雇主与工人间的紧密关系显然是小规模工业的结果，它已随着动力织布机和蒸汽发动机的发明而消逝。大型工厂建成以后，这种紧密关系不复存在；工人憎恨雇主，雇主只把工人单纯的视为工具。从1800年到1843年间，雇主与工人都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坏到极点。雇主表示，利益不同的两个阶级是不会有联结

的；农场主也已不顾旧例，在没有工作时就会无情地解雇劳工。对于已经到来的“金钱关系”的时代，卡莱尔写了《过去与现在》一书进行抵制；但卡莱尔想要恢复从前的劳动状况，这是不正确的。封建制度虽在某些农村地区还有残留，但无论对于农业还是商业，封建制度实际已经消失了。雇主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提供保护和奴隶依附关系，工人们也不能再忍受，这是因为：由于现代工业需要工人从一地到另一地、一份工作到另一工作的变动，因此长久的关系是不可能维系下去的，而旧制度的本质却是对工人的永久雇佣。工会也为切断旧的联合关系做了很多努力。出于自卫，工人们被迫采取集体行动。每个工厂里都有依附于雇主的工人，他们不愿在罢工中站出来，但为了大众的利益也不得不有所行动。而在这一义务被公众所认可之前，工会的作用无疑恶化了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1840年至1860年间。

Since the latter date, however, Trades-Unions have distinctly improv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lasses. Employers are beginning to recognise the necessity of them, and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able to treat with a whole body of workmen through their most intelligent members. Boards of Conciliation, in which workmen and employers sit side by side, would be impossible without Unions to enforce obedience to their decisions. In the north of England, at the present moment, it is the non-unionists who are rejecting arbitration. And the reason why such Boards have succeeded is, because the employers have of their own accord abandoned all ideas of the feudal relation. They used to say that it would degrade them to sit at the same board with their workmen; but it is noticeable that directly the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the latter was recognised, as soon as he possessed the franchise, these objections began to disappear. The new union of employers and workmen which is springing up in this way, is based on the independence of both as citizens of a free state. The employers meet their workmen also in political committees, on School Boards and

similar bodies, and the two classes are learning to respect one another. Thus this new union bids fair to be stronger than the old one.

然而1860年以后，工会已明显改善了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雇主开始认识到工会的必要性，也认识到通过工人中的骨干与工人进行交涉的好处所在。在调解委员会中，工人和雇主并排坐在一起，但如果没有工会，调解委员会就不可能使其服从各项决定。在英格兰北部，现在是非工会主义者在反对仲裁。这样的委员会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原因就在于雇主们已自愿放弃了一切封建思想。他们过去曾认为与工人同座使他们身份受贬，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人拥有了选举权之后，工人的政治独立性立刻得到了承认，这些抵触也即开始消失。这样建立起来的雇主与工人的新的联结关系是基于双方都是自由国家的独立公民的基础上的。此外，在政治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上或其他类似机构中，雇主也会与工人会面，两个阶级都在学习尊重彼此。这样一来，这种新的联结极可能比原来更为牢固。

Still the question remains, Can this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the workman be combined with secure material independence? Until this is done he will be always at the mercy of his employer, who may practically stultify his political power by influencing his vote, as Mr. George asserts is done in New England. Among the many solutions of this problem proposed in our own country two deserve especial prominence. The first is that of the English Positivists. Comte, although he had but a glimpse of the English Trades-Unions, understood the meaning of them far better than Mill. Inspired by him, Mr. Frederic Harrison and his friends deny the possibility of solving the labour question by co-operative production or any such schemes. They rely on a gradual change in the moral nature of capitalists; not that they expect the old system

of feudal protection to return, but they hope that the “captains of industry” of the future will rise to another conception of their position, will recognis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workman,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willing to hand over to him an increased share of their joint produce. This belief may seem ridiculous, and we must expect for a long time yet to see capitalists still striving to obtain the highest possible profits. But observe, that the passion for wealth is certainly in some senses new. It grew up very rapid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century; it was not so strong in the last century, when men were much more content to lead a quiet easy life of leisure. The change has really influenc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men; but in the future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the scramble for wealth may grow less intense, and a chang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ake place. The Comtists are right when they say that men's moral ideas are not fixed. The attitude of public opinion towards slavery was completely changed in twenty or thirty years. Still I am obliged to believe that such a moral revolution as the Commits hope for is not possible within a reasonable space of time.

于是又有这样的问题：工人政治上独立的同时能确保物质独立吗？在这一点达成之前，工人将仍然受雇主的摆布，雇主可以通过影响投票使工人的政治权力无效化，正如乔治先生所断言的，这在新英格兰已经发生了。在英国提出的众多解决方案中，有两个是特别值得提及的。第一个是英国实证主义的方案。虽然圣西门对英国工会了解甚少，但他远比穆勒更要理解工会的意义。受他的启发，弗雷德里克·哈里斯先生（Mr. FredericHarrison）及其志同道合者认为，通过合作生产或其他类似方案解决劳工问题是不可能的。他们期待逐步改善资本家的品行，从而解决这一问题；这不是说他们期望恢复旧的封建保护制度，而是他们希望未来的“工业巨头”能重新看待工人的地位，认识到工人的独立性，同时愿意分给工人更多的联合产值。这个观念也许看来可笑，因为我们应该想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资本家将仍会

竭尽所能地获取最高利润。但我们也注意到，从某种意义上讲，追求财富的热情已经完全不同了。这种热情在本世纪初开始迅速高涨，而在上个世纪，人们满足于闲适简单的生活，因此对财富的渴求并不强烈。这种改变确实影响了人与人的关系，但在未来，对财富的争抢极有可能趋向缓和而向反方向发展。实证主义者认为人的道德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观点很对。在20或30年间，舆论对于奴隶制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但我还是不得不相信，实证主义者所期望的道德革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

I should have more hope of industrial Partnership as elaborately described by Mr. Sedley Taylor. This also implies a certain change in the moral nature of the employers, but one not so great as the alternative system would require. It has been adopted in over a hundred Continental workshops, though the experiment of Messrs Briggs in England ended in failure. There is hope of its being more successful in the future, because by promoting the energy of the workmen and diminishing waste, it coincides with the interest of the employer. I think that in some industries it will extend, but that it will not be generally adopted.

塞德利·泰勒先生曾对产业合伙经营有详尽的描述，我对此寄予更多的期望。这一制度同样需要雇主道德的转变，但这一制度对道德转变的要求要低于其他替代体制。虽然布里格斯先生（MessrsBriggs）在英国所做的尝试以失败收场，但产业合伙经营已经在一百多个大陆工厂中被采用，并且在未来还有希望取得更多成功，因为这种制度可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并减少浪费，因此合乎雇主的利益。我认为该制度将会在一些工业领域得到展开，但它并不能被广泛应用。

There remains the ordinary Communist solution. This has taken

various forms; the simplest being a voluntary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property, and in which every person works for the community according to fixed rules. There are many successful instances of this, on a small sca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we cannot suppose such a solution to be possible for society as a whole. It has only been tried with picked materials, whereas our object is rather to improve the great mass of the population. The Communism of recent European theorists, of whom the best known is Lassalle, presents a somewhat different aspect. It aims at the appropriation of all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by the State, which is to take charge of the whole national industry and direct it. But the practical difficulty of such a scheme is obviously overwhelming. The objections to a Communistic solution do not apply to Socialism in a more modified shape. Historically speaking, Socialism has already shown itself in England in the extension of State interference. It has produced the Factory Laws, and it is now beginning to advance further and interfere directly in the division of produce between the workmen and their employers. The Employers'Liability Act recognises that workmen, even when associated in Trades-Unions, cannot without other aid secure full justice, and in the name of justice it has distinctly handed over to the workmen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employers'wealth. The extension of relative interference however, though it is to be expected in one or two directions, is not likely to be of much further importance. With regard to taxation, on the other hand, Socialist principles will probably attain a wide-reaching application, and here we shall see great changes.

此外还有一般的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它有多种形式，最简单的形式是基于共有财产原则的个人自愿联合，在这种联合中，每个人都遵照既定的规定为社会劳动。在美国这已有很多成功的实例，但那些

都是小规模的联合，我们不能认为这一形式在全社会都可适用。这些尝试是在选定的材料下进行的，但我们的目的是使最广泛的大众都得到改善。最近欧洲理论家的共产主义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方向，这其中以拉萨尔最为著名。这种共产主义旨在实现全部生产工具的国有化，进而管理和引导国家产业。但是显然，这一计划充满了无比的困难因而难以实行。而在变相的社会主义形态下，反对共产主义的方案是不适合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讲，随着国家干预的延伸，社会主义已经在英国有所表现。工厂法已经产生，而国家又开始更进一步，直接干预工人与雇主间的生产分配。雇主责任法（TheEmployers' LiabilityAct）承认，即使工人与工会联合，若无其他手段，也无法得到完全的公正。并且该条例在公正的名义下，明确地将雇主财富的一定份额分给工人。但国家干涉在其他方面的延伸，虽然在一两个方面值得期待，但长远来说并无太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关于税款，社会主义原理或将得到广泛应用，这一点上我们会看到巨大的改变。

The readjustment of taxation would enable the State to supply for the people many things which they cannot supply for themselves. Without assuming the charge of every kind of production, the State might take into its hands such businesses of vital importance as railways, or the supply of gas and water. And should not the State attempt in the future to grapple with such questions as the housing of the labourers? Municipalities might be empowered to buy ground and let it for building purposes below the full competition market value. I think that such a scheme is practicable without demoralising the people, and it would attack a problem which has hitherto baffled every form of private enterprise; for all the Societies put together, which have been formed in London with this object since 1842, have succeeded in housing only 60,000 persons. And this brings up the whole ques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for the people. A new form of association, which has become common of late years, is that of a certain number of private

individuals combining to provide for some want of the public, such as Coffee Taverns, or Artisans'Dwellings, or cheap music. Such Societies are founded primarily with philanthropic objects, but they also aim at a fair interest on their capital. Might not municipalities seek in a similar way to provide for the poor? In discussing all such schemes, however,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 real problem is not how to produce some improvement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man—for that has to a certain extent been attained already—but how to secure his complete material independence.

税款的再调整使得国家能够给人民提供其无法自给的物品。国家不必控制每一项生产，但可能会控制那些关乎命脉的产业，比如铁路、天然气和水的供应。在将来，难道国家不应设法解决诸如工人住房这样的问题吗？自治团体也许可以被授权购买土地，并以低于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将其用于建房。我认为这样的方案是可行的，并不会令人们失望，同时也解决了目前为止阻滞所有私有企业的难题；把伦敦1842年以来设立的所有以此为目的的团体算在一起，也不过解决了6万人的住房问题。这样就又引发了用于民众的财政经费的问题。近几年来，一种新的联合形式逐渐变得普遍，这就是由一定人数联合起来为公众提供需求的团体，例如咖啡馆（CoffeeTaverns）、工人宿舍（Artisans' Dwellings），或简易音乐等。这样的团体主要以慈善为目的，但同时也寻求在资本之外获得适当的利益。自治团体是否也能以类似的方式为穷人提供住房呢？在讨论过所有这些方案时，我们也必须记住，真正的问题不是怎样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因为这已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而是怎样使其获得物质上的完全独立。

[15_1].译者注：即“市场”。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有闲阶级论

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Thorstein Veblen

托斯丹·邦德·凡勃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托斯丹·邦德·凡勃仑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REFACE 序
- Chapter I Introductory 第一章　绪言
- Chapter II Pecuniary Emulation 第二章　金钱竞赛
- Chapter III Conspicuous Leisure 第三章　炫耀性有闲
- Chapter IV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第四章　炫耀性消费
- Chapter V The Pecuniary Standard of Living 第五章　生活的金钱标准
- Chapter VI Pecuniary Canons of Taste 第六章　金钱的品位准则
- Chapter VII Dress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ecuniary Culture 第七章　服装：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
- Chapter VIII Industrial Exemption and Conservatism 第八章　劳动免除与保守主义
- Chapter IX The Conservation of Archaic Traits 第九章　远古性格特征的保存
- Chapter X Modern Survivals of Prowess 第十章　现代残留的勇武精神
- Chapter XI The Belief in Luck 第十一章　相信运气
- Chapter XII Devout Observances 第十二章　宗教仪式
- Chapter XIII Survivals of the Non-Invidious Interests 第十三章　非歧视性利益的残存
- Chapter XIV The Higher Learning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ecuniary Culture 第十四章　高级学识：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REFACE

序

I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inquiry to discuss the place and value of the leisure class as an economic factor in modern life, but it has been found impracticable to confine the discussion strictly within the limits so marked out. Some attention is perforce given to the origin and the line of derivation of the institution, as well as to features of social life that are not commonly classed as economic.

本研究旨在讨论有闲阶级的地位与价值，后者是现代生活中的一个经济因素，但我们无法把讨论严格地限定在上述范畴之内。我们必须讨论该制度的起源与派生线索，也要讨论那些通常不被划入经济学范畴的社会生活特质。

At some points the discussion proceeds on grounds of economic theory or ethnological generalisation that may be in some degree unfamiliar.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 indicates the nature of these theoretical premises sufficiently, it is hoped, to avoid obscurity. A more explicit statement of the theoretical position involved is made in a series of papers published in Volume IV of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on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nd the Irksomeness of Labour,” “The Beginnings of Ownership,” and “The Barbarian Status of Women.” But the argument does not rest on these — in part novel — generalisations in such a way that it would altogether lose its possible value as a detail of economic theory in case these novel generalisations should, in the reader's apprehension, fall away

through being insufficiently backed by authority or data.

有些时候，本书的讨论会以经济学理论或民族学概论为依据，很多读者或许对此不够熟知。本书的绪言部分充分阐明了这些理论前提的本质，我希望这能给读者答疑解惑。我还曾发表过以下几篇更能详述这些理论的文章：《美国社会学杂志》第四期的《论工作本能与劳动厌恶》、《所有权的兴起》、《妇女的野蛮状态》。本书这些论点虽依据（或部分依靠）这些创新理论，但我不会忽视它作为经济理论细目有可能存在的价值，以防读者看来，这些创新理论缺乏足够的权威与数据的支撑而被摒弃。

Partly for reasons of convenience, and partly because there is less chance of misapprehending the sense of phenomena that are familiar to all men, the data employed to illustrate or enforce the argument have by preference been drawn from everyday life, by direct observation or through common notoriety, rather than from more recondite sources at a farther remove. It is hoped that no one will find his sense of literary or scientific fitness offended by this recourse to homely facts, or by what may at times appear to be a callous freedom in handling vulgar phenomena or phenomena whose intimate place in men's life has sometimes shielded them from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iscussion.

本研究用以阐述或实施论证的材料，更倾向于取自日常生活中的直接观察或普遍听闻，而非取自逻辑上更深一层次、更晦涩的来源，这部分是为了论证的简便，也部分因为大家越熟稔这些现象，发生误解的可能性便越小。希望本书援引这些家常的例证不会触犯到任何读者喜好文学与科学的情感，因为我使用这些平凡无奇的现象时显得有些随心所欲，而这些现象也不再纳入经济学探讨之列。

Such premises and corroborative evidence as are drawn from remoter sources, as well as whatever articles of theory or inference are borrowed from ethnological science, are also of the more familiar and accessible kind and should be readily traceable to their source by fairly well-read persons. The usage of citing sources and authorities has therefore not been observed. Likewise the few quotations that have been introduced, chiefly by way of illustration, are also such as will commonly be recognised with sufficient facility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citation.

本文所用的理论前设和确凿例证汲取自逻辑上更深一层的来源，还有些理论或推论源自民族学，而为了有学识的读者们能轻易追索到它们的源头，我也尽量采纳更为人知或更易稽考的例证。因此我不会在引证处表明出处。同样地，书中偶有几处引文，主要是为阐述说明，也不必添加注释，读者自然充分明了它们的效用。

Chapter I Introductory

第一章　绪言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is found in its best development at the higher stages of the barbarian culture; as, for instance, in feudal Europe or feudal Japan. In such communiti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lasses is very rigorously observed; and the feature of most striking economic significance in these class differences is the distinction maintained between the employments proper to the several classes. The upper classes are by custom exempt or excluded from industrial occupations, and are reserved for certain employments to which a degree of honor attaches. Chief among the honorable employments in any feudal community is warfare; and priestly service is commonly second to warfare. If the barbarian community is not notably warlike, the priestly office may take the precedence, with that of the warrior second. But the rule holds with but slight exceptions that, whether warriors or priests, the upper classes are exempt from industrial employments, and this exemption is the economic expression of their superior rank. Brahmin India affords a fair illustration of the industrial exemption of both these classes. In the communities belonging to the higher barbarian culture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differentiation of sub-classes within what may be comprehensively called the leisure class; and there is a corresponding differentiation of employments between these sub-classes. The leisure class as a whole comprises the noble and the priestly classes, together with much of their retinue. The occupations of the class are correspondingly diversified; but they have the common economic characteristic of being non-industrial. These non-industrial upper-class occupations

may be roughly comprised under government, warfare, religious observances, and sports.

在蛮夷文化的较高阶段，如欧洲和日本的封建时代，有闲阶级制度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里，阶级的划分十分严格；在这些阶级差别中，最显著的经济意义的特点是不同阶级所从事的职业也不相同。按照惯例，上层阶级不必也不会从事生产工作，只从事某些较为体面的职业。在任何封建社会中，最为体面的职业是战士；神职通常被认为是仅次于战士的。若某一蛮夷民族并不特别好战，神职可能成为最为体面的职业，战士则退而居其次。但有一原则应予以遵循且鲜有例外，即：上层阶级，不管是武士还是牧师，都免于从事生产工作。这种豁免权是他们的优越地位在经济上的表现。关于这两个阶层都不用从事生产劳动，印度的婆罗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处于蛮夷文化较高阶段的社会里，有一阶层可以笼统地称为有闲阶级，其下又包含许多分支阶级；这些不同的分支阶级从事的职业也相应不同。整个有闲阶级是由贵族和牧师以及他们的大部分随从人员组成的。这一阶级所从事的职业同样是形形色色的，但这些职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经济特征，即非生产性。这些非生产性的上层阶级职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政治、军事、宗教事务以及体育竞赛。

At an earlier, but not the earliest, stage of barbarism, the leisure class is found in a less differentiated form. Neither the class distinctions nor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leisure-class occupations are so minute and intricate. The Polynesian islanders generally show this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in good form, with the exception that, owing to the absence of large game, hunting does not hold the usual place of honor in their scheme of life. The Icelandic community in the time of the Sagas also affords a fair instance. In such a community there is a rigorous distinction between classes and between the occupations peculiar to each class.

Manual labor, industry, whatever has to do directly with the everyday work of getting a livelihood, is the exclusive occupation of the inferior class. This inferior class includes slaves and other dependents, and ordinarily also all the women. If there are several grades of aristocracy, the women of high rank are commonly exempt from industrial employment, or at least from the more vulgar kinds of manual labor. The men of the upper classes are not only exempt, but by prescriptive custom they are debarred, from all industrial occupations. The range of employments open to them is rigidly defined. As on the higher plane already spoken of, these employments are government, warfare, religious observances, and sports. These four lines of activity govern the scheme of life of the upper classes, and for the highest rank—the kings or chieftains—these are the only kinds of activity that custom or the common sense of the community will allow. Indeed, where the scheme is well developed even sports are accounted doubtfully legitimate for the members of the highest rank. To the lower grades of the leisure class certain other employments are open, but they are employments that are subsidiary to one or another of these typical leisure-class occupations. Such are, for instance, the manufacture and care of arms and accoutrements and of war canoes, the dressing and handling of horses, dogs, and hawks, the preparation of sacred apparatus, etc. The lower classes are excluded from these secondary honorable employments, except from such as are plainly of an industrial character and are only remotely related to the typical leisure-class occupations.

在蛮夷社会的较早而不是最早时期，有闲阶级的分化还不是如此剧烈。无论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别，还是有闲阶级内部的职业差别，都不是那么细微和复杂。波利尼西亚岛民的生活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发展阶段，只有一点例外，即：由于缺少体形巨大的猎物，狩猎在他

们的生活中并不占据它通常应该享有的荣誉地位。萨迦中记载的中世纪时期的冰岛社会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个社会里，各阶级之间以及各阶级所独有的职业之间都有着严格的区别。但凡体力劳动、生产劳动以及与谋生直接相关的一切日常工作，都是下层阶级的专有职业。下层阶级包括奴隶及其他依附于贵族不能独立的人，通常还包括所有妇女。如果将贵族分为几个等级，那么上层贵族妇女通常不用从事生产性劳动，至少不必参加比较粗重的体力劳动。上层阶级的男性不但不用参加所有的生产劳动，而且按照传统习惯是不准参加的。他们可以从事的职业范围有着严格的规定。这类高级职业前面业已提到，包括政治、军事、宗教事务以及体育竞赛。这四方面的活动支配着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对最高阶级——国王或酋长们——来说，社会惯例或常识只允许他们从事这几项活动。实际上，在生活方式较为先进的社会里，人们甚至会对最高等级成员从事体育竞赛的正当性表示怀疑。有闲阶级内部较低的几个等级可以从事某些其他的职业，但是这些职业必须是某一典型有闲阶级职业的从属行业。例如武器装备及战船的生产和保养、马匹及鹰犬的照料及驯养、祭祀用品的筹备等等。下层阶级则不能从事这些次一等级的体面职业，除非这些职业具有明显的生产性质，并且和典型的有闲阶级职业之间关系甚远。

If we go a step back of this exemplary barbarian culture, into the lower stages of barbarism, we no longer find the leisure class in fully developed form. But this lower barbarism shows the usages, motives, and circumstances out of which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has arisen, and indicates the steps of its early growth. Nomadic hunting tribe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illustrate these more primitive phases of the differentiation. Any one of the North American hunting tribes may be taken as a convenient illustration. These tribes can scarcely be said to have a defined leisure class. There is a differentiation of function, and 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classes on the basis of this difference of function, but the exemption of the superior class from work has not gone far enough

to make the designation “leisure class” altogether applicable. The tribes belonging on this economic level have carried the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to the point at which a marked distinction is made between the occupations of men and women, and this distinction is of an invidious character. In nearly all these tribes the women are, by prescriptive custom, held to those employments out of which the industrial occupations proper develop at the next advance. The men are exempt from these vulgar employments and are reserved for war, hunting, sports, and devout observances. A very nice discrimination is ordinarily shown in this matter.

如果我们从这种典型的蛮夷文化阶段倒退一步，追溯到蛮夷文化的较低阶段，我们将不会看到有闲阶级的充分发展形式。然而，这种蛮夷文化的较低阶段已经表现出了有闲阶级制度形成后的运作、动机及情况，并且出现了有闲阶级早期发展的迹象。世界各地的游牧狩猎部落就是例证，可以说明这种分化的较为原始的阶段。北美洲的任何一个狩猎部落都可以当作很好的例子。很难说这些部落中存在着一个明确的有闲阶级。在这些部落里，人们担负着不同的职责，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阶级的差别。然而，“有闲阶级”一词并不完全适用于这些部落，因为它们还没有发展到上层阶级不用劳动的程度。处于这一经济水平的部落，经济分化进一步加剧，男女职业有了显著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是令人不快的。在几乎所有部落中，按照传统习惯，妇女们只能从事某些工作，而这些工作后来发展为纯粹的生产工作；男性则免于从事这些粗重的工作，而只从事战争、狩猎、体育竞赛及宗教仪式等活动。在这个方面，通常存在着十分微妙的差别。

This division of labor coincides wit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working and the leisure class as it appears in the higher barbarian culture. As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of employments proceed, the line of demarcation so drawn comes to

divide the industrial from the non-industrial employments. The man's occupation as it stands at the earlier barbarian stage is not the original out of which any appreciable portion of later industry has developed. In the later development it survives only in employments that are not classed as industrial—war, politics, sports, learning, and the priestly office. The only notable exceptions are a portion of the fishery industry and certain slight employments that are doubtfully to be classed as industry; such as the manufacture of arms, toys, and sporting goods. Virtually the whole range of industrial employments is an outgrowth of what is classed as woman's work in the primitive barbarian community.

这种劳动分工与蛮夷文化较高阶段中劳动阶级和有闲阶级之间的区别相一致。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多样化和专门化，由此形成的分界线将生产性工作同非生产性工作区分开来。蛮夷文化较早阶段的男性工作并非后期生产工作主要环节的雏形。在后期发展中，早期的男性工作只在非生产性的工作中保存下来，如军事、政治、体育竞赛、学术研究以及神职工作。捕鱼业的一些环节是个明显的例外，还有某些不能称为产业的次要工作，如武器、玩具以及运动产品的生产制造。实际上，整个生产工作是原始野蛮社会中女性工作发展的结果。

The work of the men in the lower barbarian culture is no less indispensable to the life of the group than the work done by the women. It may even be that the men's work contributes as much to the food supply and the other necessary consumption of the group. Indeed, so obvious is this “productive” character of the men's work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economic writings the hunter's work is taken as the type of primitive industry. But such is not the barbarian's sense of the matter. In his own eyes he is not a laborer, and he is not to be classed with the women in this respect; nor is his

effort to be classed with the women's drudgery, as labor or industry, in such a sense as to admit of its being confounded with the latter. There is in all barbarian communities a profound sense of the disparity between man's and woman's work. His work may conduce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group, but it is felt that it does so through an excellence and an efficacy of a kind that cannot without derogation be compared with the uneventful diligence of the women.

在蛮夷文化的较低阶段，对群体生存来说，男性工作同女性工作一样必不可少。也可以说，男性工作对该群体的食物供给及其他必要消费做出了同等的贡献。实际上，男性工作具有明显的生产特性，在传统的经济著作中，猎人的工作被视为一种原始的产业。但是，处于蛮夷文化中的猎人却不这样看。在他看来，他不是劳动者，在这方面，妇女与他不能相提并论；他的劳动不同于妇女单调乏味的苦工杂役，不能作为一种生产工作与妇女的工作混为一谈。在所有蛮夷社会，男性工作与女性工作有着显著的差别。男性工作也许对维系其所属群体的生命做出了贡献；然而，男人认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的卓越才智和超高功效，若将之与妇女的平凡的劳作相比，未免是种贬损。

At a farther step backward in the cultural scale—among savage groups—the differentiation of employments is still less elaborate and the invidious distinction between classes and employments is less consistent and less rigorous. Unequivocal instances of a primitive savage culture are hard to find. Few of these groups or communities that are classed as “savage” show no traces of regression from a more advanced cultural stage. But there are groups—some of them apparently not the result of retrogression—which show the traits of primitive savagery with some fidelity.

Their culture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barbarian communities in the absence of a leisure class and the absence, in great measure, of the animus or spiritual attitude on which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rests. These communities of primitive savages in which there is no hierarchy of economic classes make up but a small and inconspicuous fraction of the human race. As good an instance of this phase of culture as may be had is afforded by the tribes of the Andamans, or by the Todas of the Nilgiri Hills. The scheme of life of these groups at the time of their earliest contact with Europeans seems to have been nearly typical, so far as regards the absence of a leisure class. As a further instance might be cited the Ainu of Yezo, and, more doubtfully, also some Bushman and Eskimo groups. Some Pueblo communities are less confidently to be included in the same class. Most, if not all, of the communities here cited may well be cases of degeneration from a higher barbarism, rather than bearers of a culture that has never risen above its present level. If so, they are for the present purpose to be taken with the allowance, but they may serve none the less as evidence to the same effect as if they were really “primitive” populations.

文化进程倒退一步回到野蛮群体时代，当时，职业分化并没有这么复杂，阶级和职业的歧视性差别也缺少一致性和严格性。要找到原始野蛮文化确切的例子并非易事。绝大部分被列为“野蛮”的群体和社会都有迹象表明，他们是从较高文化阶段退化而来的。但有些群体——其中一些群体显然不是退化的结果——显示出原始野蛮时代最为忠实的特征。他们的文化与蛮夷社会的不同，没有有闲阶级，也缺少形成有闲阶级制度的动机或精神态度。这些处于原始野蛮状态的社会不存在经济阶级等级制度，在整个人类中，只占到不起眼、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安达曼群岛（Andamans）各部落或者尼尔吉里（Nilgiri）山脉的托达人（Todas）为文化的这一可能阶段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这些部落最初与欧洲人接触时并不存在有闲阶级，就这一

点来说，它们的生活方式是极具代表性的。也许虾夷岛上的阿依努族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更加不确定的例子还有布须曼（Bushman）和爱斯基摩的一些部落。一些普韦布洛社会是否可以归入同类社会，则更加难以确定。这里所列举的部落中，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大部分都是从较高阶段的蛮夷文化退化而来，其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在本部落文化发展过程中并非前所未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里将它们作为例证有些勉强；然而，把它们当作例证，似乎它们就是真正的原始族群，还是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的。

These communities that are without a defined leisure class resemble one another also in certain other features of their social structure and manner of life. They are small groups and of a simple (archaic) structure; they are commonly peaceable and sedentary; they are poor; and individual ownership is not a dominant feature of their economic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se are the smallest of existing communities, or that their social structure is in all respects the least differentiated; nor does the class necessarily include all primitive communities which have no defined system of individual ownership. But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he class seems to include the most peaceable—perhaps all the characteristically peaceable—primitive groups of men. Indeed, the most notable trait common to members of such communities is a certain amiable inefficiency when confronted with force or fraud.

这些社会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有闲阶级，它们在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其他某些特征上也有相似之处。它们族群规模不大，社会结构简单原始；它们通常是爱好和平的，过着定居的生活；它们生活贫穷落后；个体所有制并非它们的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现存社会中规模最小的，也不意味着它们的社会结构在所有方面都是分化程度最低的；这类族群并不一定包括所有没有明确的个

体所有制的原始部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族群包括了最热爱和平的——也许是具有所有爱好和平特点的——原始部落人。实际上，此类部落成员最为显著的特征是，面对武力和欺骗，他们表现得温顺而又毫无抵抗能力。

The evidence afforded by the usages and cultural traits of communities at a lo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dicates that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has emerged graduall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rimitive savagery to barbarism; or more precisel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 peaceable to a consistently warlike habit of life. The conditions apparently necessary to its emergence in a consistent form are: (1) the community must be of a predatory habit of life (war or the hunting of large game or both); that is to say, the men, who constitute the inchoate leisure class in these cases, must be habituated to the infliction of injury by force and stratagem; (2) subsistence must be obtainable on sufficiently easy terms to admit of the exemption of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e community from steady application to a routine of labor.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is the outgrowth of an early discrimination between employments, according to which some employments are worthy and others unworthy. Under this ancient distinction the worthy employments are those which may be classed as exploit; unworthy are those necessary everyday employments into which no appreciable element of exploit enters.

处于文化低级阶段的社会表现出来的一些习俗和文化特征表明：有闲阶级制度是在由原始野蛮向蛮夷转化的过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由爱好和平的生活习性向一贯好战的生活习性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有闲阶级制度要以稳定的形态出现，以下条件明显不可或缺：（1）该社会必须具有掠夺的生活习性（如发动战争或捕杀大型

猎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也就是说，男人，作为早期有闲阶级成员，必须对武力或阴谋诡计造成的伤害习以为常；（2）该社会必须能轻而易举地获得生活资料，唯有如此，该社会的相当一部分成员才能免于经常从事常规劳动。有些职业是崇高的，有些职业则是卑微的。有闲阶级制度正是这种早期职业差别发展的结果。根据这一古老的差别，崇高的职业指的是可以归为侵占一类的职业；而卑微的职业指的是那些日常必需的职业，这些职业并不需要具有明显的侵占成分。

This distinction has but little obvious significance in a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y, and it has, therefore, received but slight attention at the hands of economic writers. When viewed in the light of that modern common sense which has guided economic discussion, it seems formal and insubstantial. But it persists with great tenacity as a commonplace preconception even in modern life, as is shown, for instance, by our habitual aversion to menial employments. It is a distinction of a personal kind—of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In the earlier stages of culture, when the personal force of the individual counted more immediately and obviously in shaping the course of events, the element of exploit counted for more in the everyday scheme of life. Interest centered about this fact to a greater degree. Consequently a distinction proceeding on this ground seemed more imperative and more definitive then than is the case to-day. As a fact in the sequence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distinction is a substantial one and rests on sufficiently valid and cogent grounds.

这一差别在现代工业社会显得无足轻重，因此，经济学者对它不甚重视。因为，从支配经济讨论的现代常识来看，这一差别似乎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性的。然而，即使在现代社会，这一普遍的偏见依然

根深蒂固；我们通常厌恶苦工杂役，这个例子便是明证。这种差别本质上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些人高人一等，有些人卑微下贱。在文化的早期阶段，个体的个人力量对事件的进展有着明显而又直接的作用，侵占元素在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比起今天，这一事实在当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此，当时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差别比今天更明确也更重要。所以说，作为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事实，这一差别是实质性的，并且是建立在确凿无疑的、令人信服的根据上的。

The ground on which discrimination between facts is habitually made changes as the interest from which the facts are habitually viewed changes. Those features of the facts at hand are salient and substantial upon which the dominant interest of the time throws its light. Any given ground of distinction will seem insubstantial to any one who habitually apprehends the facts in question from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and values them for a different purpose. The habit of distinguishing and classifying the various purposes and directions of activity prevails of necessity always and everywhere; for it is indispensable in reaching a working theory or scheme of life. The particular point of view or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 that is pitched upon as definitive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facts of life depends upon the interest from which a discrimination of the facts is sought. The grounds of discrimination, and the norm of procedure in classifying the facts, therefore, progressively change as the growth of culture proceeds; for the end for which the facts of life are apprehended changes, and the point of view consequently changes also. So that what are recognized as the salient and decisive features of a class of activities or of a social class at one stage of culture will not retain the same relative importance for the purposes of classification at any subsequent stage.

人们是通过利害关系形成对事物的习惯看法的，当利害关系发生变化时，以往用于区别事物的依据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果当时的主要利害关系，对当前某些事实的说明能有所帮助，那么这些事实的特征就显得是鲜明而真实的。任何一个人，如果习惯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类事物，并带着不同的目的去评价它们，那么任何原有的区分依据对他来说，都会显得毫无实际意义。无论何时何地，人们普遍存在着对活动的目的和方向进行区分归类的习惯，这样做是出于需要，因为该习惯对建立一种可行的理论或生活方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到底选用哪种特定的、明确的观点或特征来对生活中的事物进行分类，是由区分该类事物所依据的利害关系决定的。因此，区分事物的依据以及对事物进行分类的程序规范，是随着文化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变化的；这是因为对生活中的事物进行了解的目的发生了变化，观点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所以，在文化的某一阶段，某一类活动或某一社会阶级具有的被认为是显著而又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到了随后的任何一个阶段，在对事物进行分类时，都不会再具有同等的相对重要性。

But the change of standards and points of view is gradual only, and it seldom results in the subversion of entire suppression of a standpoint once accepted. A distinction is still habitually made between industrial and non-industrial occupations; and this modern distinction is a transmuted form of the barbarian distinction between exploit and drudgery. Such employments as warfare, politics, public worship, and public merrymaking, are felt, in the popular apprehension, to differ intrinsically from the labor that has to do with elaborating the material means of life. The precise line of demarc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it was in the early barbarian scheme, but the broad distinction has not fallen into disuse.

但是，标准及观点的改变只是缓慢渐进的，这种变化很少会将曾经被接受的观点全盘颠覆。人们依然习惯于将生产性职业与非生产性

职业区分开来，这种现代的区别是蛮夷文化时代侵占与苦工杂役之间的区别的变化形态。在一般人看来，诸如战争、政治、宗教仪式以及公共娱乐等职业和创造生活所需物质资料的辛勤劳动具有本质的区别。确切的分界线与蛮夷文化早期不同，但大致的区别并未消失。

The tacit, common-sense distinction to-day is, in effect, that any effort is to be accounted industrial only so far as its ultimate purpose is the utilization of non-human things. The coercive utilization of man by man is not felt to be an industrial function; but all effort directed to enhance human life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non-human environment is classed together as industrial activity. By the economists who have best retained and adapte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man's “power over nature” is currently postulated as the characteristic fact of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This industrial power over nature is taken to include man's power over the life of the beasts and over all the elemental forces. A line is in this way drawn between mankind and brute creation.

时至今日，这一区别已经成为心照不宣、不言而喻的常识了；实际上，任何努力，只要它的终极目的在于利用“非人类”的事物，就可以看作是生产性的。人对人的强制利用不能算是具有生产性的功能；但是，所有利用“非人类”环境来改善人类生活的努力都可以归类为生产性活动。有些经济学家最为充分地保持并改造了古典传统，在他们看来，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目前可以断定为工业生产力的特征。征服自然的生产能力应当包括人类征服兽类及一切自然力的力量。这就在人类和动物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

In other times and among men imbued with a different body of preconceptions, this line is not drawn precisely as we draw it to-

day. In the savage or the barbarian scheme of life it is drawn in a different place and in another way. In all communities under the barbarian culture there is an alert and pervading sense of antithesis between two comprehensive groups of phenomena, in one of which barbarian man includes himself, and in the other, his victual. There is a felt antithesis between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phenomena, but it is not conceived in the modern fashion; it lies not between man and brute creation, but between animate and inert things.

但在以往各个时代，人们满脑子都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偏见，他们对这条界线的划分和我们今天的划分并不完全相同。在野蛮或蛮夷的生活方式下，这条界线是在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划分的。处于蛮夷文化阶段的所有社会，两类包罗万象的现象之间存在着鲜明而又普遍的对立，其中一类现象包括蛮夷人自己，另一类包括他的食物。经济现象和非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着对立感，但与现代的对立方式不同，这种对立不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对立，而是“有生气的”事物与“无生气的”事物之间的对立。

It may be an excess of caution at this day to explain that the barbarian notion which it is here intended to convey by the term “animate” is not the same as would be conveyed by the word “living”. The term does not cover all living things, and it does cover a great many others. Such a striking natural phenomenon as a storm, a disease, a waterfall, are recognized as “animate”; while fruits and herbs, and even inconspicuous animals, such as house-flies, maggots, lemmings, sheep, are not ordinarily apprehended as “animate” except when taken collectively. As here used the term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an indwelling soul or spirit. The concept includes such things as in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animistic savage

or barbarian is formidable by virtue of a real or imputed habit of initiating action. This category comprises a large number and range of natural objects and phenomena. Such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inert and the active is still present in the habits of thought of unreflecting persons, and it still profoundly affects the prevalent theory of human life and of natural processes; but it does not pervade our daily life to the extent or with the far-reaching practical consequences that are apparent at earlier stages of culture and belief.

在蛮夷文化中，“有生气的”（animate）一词所要表达概念与“有生命的”（living）一词的内涵不同，时至今日，还要这样解释，似乎显得过分谨慎了。“有生气的”一词不包括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但却包括许多别的事物。诸如暴风雨、疾病、瀑布等剧烈的自然现象都是“有生气的”，而果实、草本植物，甚至一些不显眼的动物，如苍蝇、蛆虫、旅鼠、绵羊之类，除非作为整体来看，通常不被看作是“有生气的”。在这里使用“有生气的”一词，并不一定意味着此类事物具有内在的精神或灵魂。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事物在信奉万物有灵论的野蛮或蛮夷人看来是令人敬畏的，因为它们具有一种或实在或假想的发动攻击的习性，这一范畴包括数量众多、范围广泛的自然物体和自然现象。迟钝的事物与活跃的事物之间的这一区别依然存在于不求甚解的人们的思维习惯中，并且对人类生活和自然进程的盛行理论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文化与信仰的早期阶段，这种区别影响广泛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实际后果，而它对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却没有那么明显。

To the mind of the barbarian, the elab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hat is afforded by inert nature is activity on quite a different plane from his dealings with “animate” things and forces. The line of demarcation may be vague and shifting, but the broad distinction is

sufficiently real and cogent to influence the barbarian scheme of life. To the class of things apprehended as animate, the barbarian fancy imputes an unfolding of activity directed to some end. It is this teleological unfolding of activity that constitutes any object or phenomenon an “animate” fact. Wherever the unsophisticated savage or barbarian meets with activity that is at all obtrusive, he construes it in the only terms that are ready to hand—the terms immediately given in his consciousness of his own actions. Activity is, therefore, assimilated to human action, and active objects are in so far assimilated to the human agent. Phenomena of this character—especially those whose behavior is notably formidable or baffling—have to be met in a different spirit and with proficiency of a different kind from what is required in dealing with inert things. To deal successfully with such phenomena is a work of exploit rather than of industry. It is an assertion of prowess, not of diligence.

在蛮夷人看来，对“无生气的”自然所提供的事物进行加工和利用固然是种活动，但这种活动与他们应对“有生气的”事物或势力不可相提并论。两者之间的分界线也许是模糊不清而又变幻不定的，然而两者之间大致的区别却是真实有力的，足以对蛮夷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蛮夷人认为，正是由于“有生气的”事物的存在，才会有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开展的活动。而这种带有目的性的活动的开展，使得某些物体和现象“具有生气”。单纯质朴的野蛮人或蛮夷人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活动，就会用唯一现成的说法来进行解释，而这种说法是他自己的行为意识直接提供的。如此一来，活动与人类行为成为一体，活跃的物体也就与作为行为主体的人成为一体了。要应付这类性质的现象，尤其是行为令人畏惧或令人困惑的现象，必须采取和应付无生气的事物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要想成功应付这类现象需要的是勇武精神而不是吃苦耐劳。这是对勇武精神而非勤劳的肯定。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naiv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the inert and the animate, the activities of the primitive social group tend to fall into two classes, which would in modern phrase be called exploit and industry. Industry is effort that goes to create a new thing, with a new purpose given it by the fashioning hand of its maker out of passive (“brute”) material; while exploit, so far as it results in an outcome useful to the agent, is the conversion to his own ends of energies previously directed to some other end by another agent. We still speak of “brute matter” which something of the barbarian's realization of a profound significance in the term.

事物被分为“有生气的”与“无生气的”，在这种简单区分的指导下，原始社会群体的活动通常分为两类，按照现代的措辞可以称之为侵占与勤劳。勤劳是指付诸创造新事物的努力，这种新事物具有新的用途，是创造者通过双手利用被动的（“死的”）材料制作而成的；而侵占，就其结果对行为主体有利这一点而言，指的是将原先另一个行为实施者为了另一种目的所做的努力转而为己所用。“死物”（brute matter）这个词对蛮夷人来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我们依然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xploit and drudgery coincides with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xes. The sexes differ, not only in stature and muscular force, but perhaps even more decisively in temperament, and this must early have given rise to a corresponding division of labor. The general range of activities that come under the head of exploit falls to the males as being the stouter, more massive, better capable of a sudden and violent strain, and more readily inclined to self-assertion, active emulation, and aggression. The difference in mass, in physiological character, and in temperament may be slight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primitive

group; it appears, in fact, to be relatively slight and inconsequential in some of the more archaic communities with which we are acquainted—as for instance the tribes of the Andamans. But so soon as a differentiation of function has well begun on the lines marked out by this difference in physique and animus, the origin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xes will itself widen. A cumulative process of selective adaptation to the new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s will set in, especially if the habitat or the fauna with which the group is in contact is such as to call for a considerable exercise of the sturdier virtues. The habitual pursuit of large game requires more of the manly qualities of massiveness, agility, and ferocity, and it can therefore scarcely fail to hasten and wide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unctions between the sexes. And so soon as the group comes into hostile contact with other groups, the divergence of function will take on the developed form of a distinction between exploit and industry.

侵占与苦工杂役之间的区别是与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别相一致的。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身材及肌肉力量，性情上的差异也许更具有决定意义，而这种差异必然导致早期相应的劳动分工。一般活动，只要归于侵占名下，都由男性承担，因为和女性比起来，男性更勇敢、更壮硕、更能吃苦耐劳、更有主见、更加积极进取而又好勇斗狠。原始部落成员之间在体格、生理特征及性情上的差异也许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在我们所熟知的一些较为古老的部落里，如安达曼部落，这些差异是微乎其微而又微不足道的。但是，一旦在体格和性情的基础上产生了职能的分化，两性间原来的差异自然而然会日趋扩大。对这种新的职业分配进行选择性适应的积累过程就会从此开始，如果该群体应付所接触的自然环境和动物群落需要顽强的意志品质，情况尤其如此。经常捕猎大型动物更加需要诸如壮硕、敏捷及凶残等男性品质，这势必会加速两性间职能差异的扩大。一旦这一部落与其他部落发生了敌对性接触，职能分化将以侵占与生产之间的区别这一

更为发达的形式出现。

In such a predatory group of hunters it comes to be the able-bodied men's office to fight and hunt. The women do what other work there is to do—other members who are unfit for man's work being for this purpose classed with the women. But the men's hunting and fighting are both of the same general character. Both are of a predatory nature; the warrior and the hunter alike reap where they have not strewn. Their aggressive assertion of force and sagacity differs obviously from the women's assiduous and uneventful shaping of materials; it is not to be accounted productive labor but rather an acquisition of substance by seizure. Such being the barbarian man's work, in its best development and widest divergence from women's work, any effort that does not involve an assertion of prowess comes to be unworthy of the man. As the tradition gains consistency, the common sense of the community erects it into a canon of conduct; so that no employment and no acquisition is morally possible to the self-respecting man at this cultural stage, except such as proceeds on the basis of prowess—force or fraud. When the predatory habit of life has been settled upon the group by long habituation, it becomes the able-bodied man's accredited office in the social economy to kill, to destroy such competitors i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s attempt to resist or elude him, to overcome and reduce to subservience those alien forces that assert themselves refractorily in the environment. So tenaciously and with such nicety is this theoret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exploit and drudgery adhered to that in many hunting tribes the man must not bring home the game which he has killed, but must send his woman to perform that baser office.

在掠夺性的狩猎群体中，战斗和打猎成了身强体壮的男性应尽的职责。其他工作则由女性承担，而部落中不能胜任男性工作的其他成员都因此与女性归为一类。但是，男子的狩猎和战斗这两种活动都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两者本质上都是掠夺性的；武士与猎人同样是不劳而获。和妇女们辛勤而又平淡无奇的材料加工明显不同，他们凭借武力和智慧从事侵略活动；与其说这是一种生产劳动，不如说是一种对别人财产的强取豪夺。这便是蛮夷部落男子的工作，在充分发展的形态下，它与女性的工作有着天壤之别。这时，任何不需要勇气的工作都不值得男子去做。随着这种传统逐渐得以巩固，它就会通过社会常识成为行为规范；所以，在这一文化阶段，对一个有自尊的男子来说，任何工作和获取，除非是在勇猛——即武力或欺骗——的基础上进行的，否则在道义上都是不容许的。通过长期的适应，这种掠夺的生活习性在群体中根深蒂固；杀戮、消灭在生存竞争中那些企图反抗或逃避他的竞争者，打败生活环境中难对付的外来敌人并将他们降为奴隶，这些也就成为身强体壮的男子在社会经济中责无旁贷的职责。许多狩猎部落顽固而又严格地遵守侵占与苦工杂役这两者在理论上的区别，男子绝不能够自己将捕杀的猎物带回家，而必须派遣他的妻子去完成这卑微的职责。

As has already been indicat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xploit and drudgery is an invidious distinction between employments. Those employments which are to be classed as exploit are worthy, honorable, noble; other employments, which do not contain this element of exploit, and especially those which imply subservience or submission, are unworthy, debasing, ignoble. The concept of dignity, worth, or honor, as applied either to persons or conduct, is of first-rate consequ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es and of class distinctions, and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say something of its derivation and meaning. Its psychological ground may be indicated in outline as follows.

上文已经指出，侵占与苦工杂役之间的这种区别是职业之间的歧视性差别。被列为侵占一类的职业是值得尊敬的、光荣的、高尚的；而其他不含侵占因素的职业，尤其是含有卑下和屈从意味的职业，是不值得尊敬的、卑贱的、不体面的。在阶级发展及阶级分化过程中，尊严、价值或荣誉的概念，不论是应用到个人还是应用到行为，都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对这类概念的起源及意义进行一定的阐述。这类概念的心理基础可以概述如下。

As a matter of selective necessity, man is an agent. He is, in his own apprehension, a center of unfolding impulsive activity —“teleological” activity. He is an agent seeking in every act the accomplishment of some concrete, objective, impersonal end. By force of his being such an agent he is possessed of a taste for effective work, and distaste for futile effort. He has a sense of the merit of serviceability or efficiency and of the demerit of futility, waste, or incapacity. This aptitude or propensity may be called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Wherever the circumstances or traditions of life lead to a habitual comparison of one person with another in point of efficiency,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works out in an emulative or invidious comparison of persons.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result follows depends in some considerable degree on the temperament of the population. In any community where such an invidious comparison of persons is habitually made, visible success becomes an end sought for its own utility as a basis of esteem. Esteem is gained and dispraise is avoided by putting one's efficiency in evidence. The result is that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works out in an emulative demonstration of force.

出于选择需要，男性是行为主体。在他自己看来，他是开展受感情驱使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中心。他是一个行为主体，他的每一个

行为都是要实现某个具体的、客观的、与其个人无关的目的。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行为主体，所以他喜欢富有成效的工作，而厌恶徒劳无功的努力。他能够意识到有用性和有效性是优点，而无用、浪费和无能是缺点。我们可以称这种本性或习性为技艺的本能（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一旦生活环境或生活传统引发人与人之间在效率上习惯性的对比，技艺本能便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竞赛性或歧视性对比。这一结果会达到什么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群体成员的性情。在任何一个习惯于对人与人进行歧视性比较的社会，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赢得尊敬的基础，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要想赢得尊敬，避免指责，就必须表现出个人的效率。其结果是，技艺本能导致了竞赛性的力量展示。

During that primitive pha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when the community is still habitually peaceable, perhaps sedentary, and without a developed system of individual ownership,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dividual can be shown chiefly and most consistently in some employment that goes to further the life of the group. What emulation of an economic kind there is between the members of such a group will be chiefly emulation in industrial service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entive to emulation is not strong, nor is the scope for emulation large.

在社会发展的这个原始阶段，社会还习惯于和平的、也许是定居的生活，高度发达的个体所有制还没有形成，要想表现个人效率，主要的和较为可靠的手段是从事某些促进该群体生活的职业。在这样一个群体的成员之间，如果存在经济性竞赛的话，那么这种竞赛将主要是生产实用性上的竞争。然而此时，竞赛的动机不强，竞赛的范围也不广。

When the community passes from peaceable savagery to a predatory phase of life, the conditions of emulation change.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incentive to emulate increase greatly in scope and urgency. The activity of the men more and more takes on the character of exploit; and an invidious comparison of one hunter or warrior with another grows continually easier and more habitual. Tangible evidences of prowess—trophies—find a place in men's habits of thought as an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paraphernalia of life. Booty, trophies of the chase or of the raid, comes to be prized as evidence of pre-eminent force. Aggression becomes the accredited form of action, and booty serves as *prima facie* evidence of successful aggression. As accepted at this cultural stage, the accredited, worthy form of self-assertion is contest; and useful articles or services obtained by seizure or compulsion, serve as a conventional evidence of successful contest. Therefore, by contrast, the obtaining of goods by other methods than seizure comes to be accounted unworthy of man in his best estate. The performance of productive work, or employment in personal service, falls under the same odium for the same reason. An invidious distinction in this way arises between exploit and acquisition by seizure on the one hand and industrial employment on the other hand. Labor acquires a character of irksomeness by virtue of the indignity imputed to it.

当社会由和平的野蛮文化阶段过渡到掠夺性的生活阶段时，竞赛的条件发生了变化。竞赛的机会大大增加，竞赛的动机更加迫切。男子的活动越来越带有侵略的色彩，猎人之间或武士之间的歧视性比较也就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习以为常。表现勇武精神，具体切实的证物——战利品——作为生活点缀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在男性的思维习惯中找到了一席之地。掠夺物，这些狩猎或袭击得来的战利品，作为武功卓著的明证渐渐受到了重视。侵略成为公认的行为方式，而掠夺物则是侵略成功的可靠证据。在这一文化阶段，战斗是公

认的、值得尊敬的自我肯定方式。通过强取豪夺得到的有用物品或服务成为战斗胜利的传统证据。因而与此相反，凡是通过掠夺以外的途径获得的物品是为年富力强的男子所不齿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从事生产工作或提供个人服务的职业都是令人厌恶的。这样，一方面是侵略和占有，另一方面是生产劳动，两者之间产生了歧视性差别。劳动被认为是有辱尊严的，因此就有了令人厌恶的性质。

With the primitive barbarian, before the simple content of the notion has been obscured by its own ramifications and by a secondary growth of cognate ideas, “honorable” seems to connote nothing else than assertion of superior force. “Honorable” is “formidable”; “worthy” is “prepotent”. A honorific act is in the last analysis little if anything else than a recognized successful act of aggression; and where aggression means conflict with men and beasts, the activity which comes to be especially and primarily honorable is the assertion of the strong hand. The naive, archaic habit of construing all manifestations of force in terms of personality or “will power” greatly fortifies this conventional exaltation of the strong hand. Honorific epithets, in vogue among barbarian tribes as well as among peoples of a more advanced culture, commonly bear the stamp of this unsophisticated sense of honor. Epithets and titles used in addressing chieftains, and in the propitiation of kings and gods, very commonly impute a propensity for overbearing violence and an irresistible devastating force to the person who is to be propitiated. This holds true to an extent also in the more civilized communities of the present day. The predilection shown in heraldic devices for the more rapacious beasts and birds of prey goes to enforce the same view.

在原始的蛮夷人看来，“光荣”这一概念，在其简单意义还没有因

其派生词或次生同源概念而变得模糊之前，似乎只有对优势力量进行肯定的含义。所谓“光荣的”就是“可敬的”；所谓“可敬的”就是“具有优势的”。所谓光荣的行为说到底只不过是被认可为成功的侵略行为罢了；当侵略意味着同他人或兽类进行斗争时，其中尤为光荣之处就在于坚持使用武力。朴素古老的习惯将一切力量展示解释为“人格品质”或“意志力量”，这极大地加强了以往对使用武力的重视。尊称，不论是在蛮夷部落中，还是在文化较为发达的民族中间，都十分流行，它们通常带有这种朴素的光荣感的印记。在称呼部落首领或向国王或神灵请求宽恕时所使用的尊称，常常表明前者专横地对待对祈求宽恕的人，具有不可抗拒的毁灭力量。即使在今天较为文明的社会里，在某种程度上情形依然如此。喜欢使用凶禽猛兽作为纹章图案，这一点可以用来佐证这种观点。

Under this common-sense barbarian appreciation of worth or honor, the taking of life—the killing of formidable competitors, whether brute or human—is honorable in the highest degree. And this high office of slaughter,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slayer's prepotence, casts a glamor of worth over every act of slaughter and over all the tools and accessories of the act. Arms are honorable, and the use of them, even in seeking the life of the meanest creatures of the fields, becomes an honorific employment. At the same time, employment in industry becomes correspondingly odious, and, in the common-sense apprehension, the handling of the tools and implements of industry falls beneath the dignity of able-bodied men. Labor becomes irksome.

根据蛮夷人这种对价值和光荣的常识性理解，夺取生命——杀死强大的敌人，无论是野兽还是人类——是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屠杀是种高贵的职务，它成了杀戮者具有优越性的表现，给所有的屠杀行为以及与屠杀有关的所有工具和配饰都涂上了一层迷人的价值色彩。武

器是光荣的，武器的使用，即使是用来夺取田野间最卑微动物的生命，也是一种光荣的职业，而同时，生产工作则相应地变得令人厌恶。按照常识性理解，在生产中使用工具器械是有损身强体壮的男子的尊严的。于是劳动也就变得让人厌恶了。

It is here assumed that in the sequence of cultural evolution primitive groups of men have passed from an initial peaceable stage to a subsequent stage at which fighting is the avowed and characteristic employment of the group. But it is not implied that there has been an abrupt transition from unbroken peace and good-will to a later or higher phase of life in which the fact of combat occurs for the first time. Neither is it implied that all peaceful industry disappears on the transition to the predatory phase of culture. Some fighting, it is safe to say, would be met with at any early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Fights would occur with more or less frequency through sexual competition. The known habits of primitive groups, as well as the habits of the anthropoid apes, argue to that effect, and the evidence from the well-known promptings of human nature enforces the same view.

在这里我们是假设，在文化演进过程中，原始部落人已经由早期的和平阶段过渡到下一阶段，在这一阶段，战斗成了群体公认的、典型的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长期和平与善意的阶段是一下子过渡到随后的更高阶段的，而在这个更高阶段第一次出现了战斗这一现象。这也不意味着，一旦过渡到掠夺性的文化阶段，所有和平的生产工作就不复存在了。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发生一些战斗活动是在所难免的。为了争夺女性，或多或少会发生战斗。已知的一些原始部落的习惯以及类人猿的习惯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人类天性中的刺激因素作为证据更加印证了这一观点。

It may therefore be objected that there can have been no such initial stage of peaceable life as is here assumed. There is no point in cultural evolution prior to which fighting does not occur. But the point in question is not as to the occurrence of combat, occasional or sporadic, or even more or less frequent and habitual; it is a question as to the occurrence of an habitual bellicose frame of mind—a prevalent habit of judging facts and event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fight. The predatory phase of culture is attained only when the predatory attitude has become the habitual and accredited spiritual attitude for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when the fight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note in the current theory of life; when the common-sense appreciation of men and things has come to be an appreciation with a view to combat.

因此，也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异议：也许并不存在这种假设的、和平的初期文化阶段。在文化演进过程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在这一时间点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战斗。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战斗的发生是偶然的、零星的还是频繁的、常态的；问题在于是否出现了一种惯常的好战心态——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从战斗的角度来评判事实与事件的习惯。只有当掠夺态度已经成为群体成员惯常的、公认的精神态度，只有当战斗已经成为当时生活理论的主要特征，只有当人们已经习惯于从战斗的角度来评判人和事时，才能说已经过渡到了掠夺性的文化阶段。

The substa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aceable and the predatory phase of culture, therefore, is a spiritual difference, not a mechanical one. The change in spiritual attitude is the outgrowth of a change in the material facts of the life of the group, and it comes on gradually as the material circumstances favorable to a predatory attitude supervene. The inferior limit of the predatory culture is an

industrial limit. Predation cannot become the habitual, conventional resource of any group or any class until industrial method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such a degree of efficiency as to leave a margin worth fighting for, above the subsistence of those engaged in getting a liv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eace to predation therefore depends on the growth of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the use of tools. A predatory culture is similarly impracticable in early times, until weapon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such a point as to make man a formidable animal.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ools and of weapons is of course the same fact seen from two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因此，和平性与掠夺性在文化阶段上的实质性区别在于精神，而不是机械的。精神态度的转变是群体所生活的物质世界发生了变化的结果，这种转变是逐渐产生的，随后出现了有利于掠夺型精神态度形成的物质环境。掠夺文化的最低极限是生产性的极限。除非生产方法的效率已经十分发达，超出了谋生者维持生活的需要，而且这种盈余之多，多到值得为之战斗，否则掠夺就不会成为任何群体和阶级的惯常的、传统的谋生手段。因此，从和平向掠夺的转变依赖于技术知识和工具使用的发展。同理，在武器还没有发展到使人类成为强大的动物之前，掠夺文化在早期出现也是不可能的。当然，工具和武器的早期发展是从两个不同视角观察到的同一事实。

The life of a given group w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peaceable so long as habitual recourse to combat has not brought the fight into the foreground in men's every day thoughts, as a dominant feature of the life of man. A group may evidently attain such a predatory attitude with a greater or less degree of completeness, so that its scheme of life and canons of conduct may be controlled to a greater or less extent by the predatory animus. The predatory phase

of culture is therefore conceived to come on gradually, through a cumulative growth of predatory aptitudes, habits, and traditions; this growth being due to a change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group's life, of such a kind as to develop and conserve those traits of human nature and those traditions and norms of conduct that make for a predatory rather than a peaceable life.

只要战斗还没有在男性的日常思维中占据最为显著的位置但还没有成为男子生活的主要特征，即使某个群体习惯于诉诸武力，该部落的生活就可以认为是和平的。一个群体可能或多或少具有明显的掠夺态度，它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也因此或多或少受到掠夺意志的支配。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掠夺性的文化阶段是通过掠夺态度、习性及传统的积累性发展而逐步出现的，这种发展是由于该群体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发展并保存了上述人类性格特征，发展并保存了有利于掠夺生活而非和平生活的传统和行为规范。

The evidence for the hypothesis that there has been such a peaceable stage of primitive culture is in great part drawn from psychology rather than from ethnology, and cannot be detailed here. It will be recited in part in a later chapter, in discussing the survival of archaic traits of human nature under the modern culture.

我们假设文化演进过程中存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原始文化阶段，这种假设的证据主要取自于心理学而不是人种学，在这里无法详述。本书后面有一章是讨论人类本性的古老特征如何在现代文化中得以保存的，在那一章还将对这一点略作论述。

Chapter II Pecuniary Emulation

第二章　金钱竞赛

In the sequence of cultural evolution the emergence of a leisure class coincides with the beginning of ownership. This is necessarily the case, for these two institutions result from the same set of economic forces. In the inchoate phase of their development they are but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ame general facts of social structure.

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有闲阶级的出现和所有制的开始是同时发生的。情况必然如此，因为这两种制度是同一套经济力量的产物。在这两种制度发展的最初阶段，它们只不过是社会结构的同一事实的两个不同方面。

It is as elements of social structure—conventional facts—that leisure and ownership are matters of interest for the purpose in hand. A habitual neglect of work does not constitute a leisure class; neither does the mechanical fact of use and consumption constitute ownership. The present inquiry, therefore, is not concerned with the beginning of indolence, nor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appropriation of useful articles to individual consumption. The point in question is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a conventional leisure clas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beginnings of individual ownership as a conventional right or equitable claim on the other hand.

有闲阶级及所有制制度是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这是由来已久的事实——而成为当前探讨关注的焦点的。习惯性轻视劳动并不构成有闲阶级；使用和消费这一机械事实也不构成所有制。因此，我们现在所要探讨的与懒惰习性的起源无关，也不是要探讨占有有用物品供个人消费到底是何时开始的。我们在这里一方面要探讨传统意义上的有闲阶级的起源和本质，另一方面是要探讨作为传统权利和合理要求的个体所有制的开始。

The early differentiation out of whic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eisure and a working class arises is a division maintained between men's and women's work in the lower stages of barbarism. Likewise the earliest form of ownership is an ownership of the women by the able-bodied men of the community. The facts may be expressed in more general terms, and truer to the import of the barbarian theory of life, by saying that it is an ownership of the woman by the man.

有闲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区别源自早期的分化，这种分化是蛮夷文化较低阶段的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同理，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是社会中身强体壮的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说得通俗点，就是女性为男性所占有，这种说法更加切合蛮夷人生活理论的要义。

There was undoubtedly some appropriation of useful articles before the custom of appropriating women arose. The usage of existing archaic communities in which there is no ownership of women is warrant for such a view. In all communities the members, both male and female, habitually appropriate to their individual use a variety of useful things; but these useful things are not thought of as owned by the person who appropriates and consumes them. The habitual appropri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certain slight personal

effects goes on without raising the question of ownership; that is to say, the question of a conventional, equitable claim to extraneous things.

毫无疑问，在占有女性的习俗还没出现之前就出现了将有用物品占为己有的行为。在现存的古老部落中，并没有占有女性的习俗，这便是以上观点的确凿证据。在所有社会中，其成员，不论男女，都习惯于将各种各样的有用物品占为己有供个人使用；然而，人们并不认为这些东西为占有和消费它们的人所有。对某些细碎的个人财物习惯性地进行占有和消费，这一行为并没有引起所有权争议；也就是说，对外在事物符合传统的合理要求这一问题并不会出现。

The ownership of women begins in the lower barbarian stages of culture, apparently with the seizure of female captives. The original reason for the seizure and appropriation of women seems to have been their usefulness as trophies. The practice of seizing women from the enemy as trophies, gave rise to a form of ownership-marriage, resulting in a household with a male head. This was followed by an extension of slavery to other captives and inferiors, besides women, and by an extension of ownership-marriage to other women than those seized from the enemy. The outcome of emulation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a predatory life, therefore, has been on the one hand a form of marriage resting on coerc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custom of ownership. The two institutions are not distinguishable in the initial phase of their development; both arise from the desire of the successful men to put their prowess in evidence by exhibiting some durable result of their exploits. Both also minister to that propensity for mastery which pervades all predatory communities. From the ownership of women the concept of ownership extends itself to include the

products of their industry, and so there arises the ownership of things as well as of persons.

占有女性始于蛮夷文化的较低阶段，明显是从掳掠女性俘虏开始的。掳掠和占有女性的最初原因似乎在于她们可以作为战利品。把敌方的女性当作战利品而攫为己有，这种做法催生了“占有制婚姻”，其结果是形成了男性当家做主的家庭制度。后来，除了女性，奴役的范围还扩大到其他俘虏以及身份卑微的人，而占有制婚姻也由从敌方俘获的女性扩展到其他女性。因此，在掠夺生活的环境下进行竞赛的结果，一方面是出现了建立在强迫基础上的婚姻形式，另一方面是产生了所有权制的习俗。这两种制度在其初始发展阶段是很难加以区别的，两者都源自成功男人的欲望，他们想通过展示经久存在的战果来证明他们的勇武。两者也都助长了所有掠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征服与统治的习性。所有权的概念由对女性的占有扩展到对她们的劳动成果的占有，因此产生了对人与物的所有权。

In this way a consistent system of property in goods is gradually installed. And although in the latest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the serviceability of goods for consumption has come to be the most obtrusive element of their value, still, wealth has by no means yet lost its utility as an honorific evidence of the owner's prepotence.

一个稳定的以财物为基础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就这样逐渐确立了。发展到最近阶段，消费品的有用性成了它们价值的最为显著的要素，然而财富，作为其主人优越尊贵的证明，绝对没有丧失其功能。

Wherever the institu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s found, even in a

slightly developed form, the economic process bears the character of a struggle between men for the possession of goods. It has been customary in economic theory, and especially among those economists who adhere with least faltering to the body of modernized classical doctrines, to construe this struggle for wealth as being substantially a struggle for subsistence. Such is, no doubt, its character in large part during the earlier and less efficient phases of industry. Such is also its character in all cases where the "niggardliness of nature" is so strict as to afford but a scanty livelihood to the community in return for strenuous and unremitting application to the business of getting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But in all progressing communities an advance is presently made beyond this early stag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efficiency is presently carried to such a pitch as to afford something appreciably more than a bare livelihood to those engaged in the industrial process. It has not been unusual for economic theory to speak of the further struggle for wealth on this new industrial basis as a competition for an increase of the comforts of life,—primarily for an increase of the physical comforts which the consumption of goods affords.

只要是私有制度存在的地方，即使这种制度并不十分发达，其经济发展过程就会具有人与人之间为了占有财物而进行斗争的特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那些将新古典学派学说奉为圭臬的经济学家们，总是习惯于将这种为财富而进行斗争的本质解释为生存竞争。不可否认，在生产发展的初期且生产效率比较低下的时候，这种竞争大都具有这样的性质。为了求生存，人们永无休止地辛勤劳作，而"吝啬的大自然"给予社会的回报仅够他们勉强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也具有这样的性质。然而，在所有进步的社会，技术发展已经超越了这一早期阶段。生产效率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向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者提供的东西明显超出了其维持生计的需要。因此，经济学理论往

往把这种在新的生产基础上为财富而进行的斗争说成是为了能提高生活享受——主要是为了提高消费品所提供的物质享受——而进行的竞争。

The end of acquisition and accumulation is conventionally held to be the consumption of the goods accumulated—whether it is consumption directly by the owner of the goods or by the household attached to him and for this purpose identified with him in theory. This is at least felt to be the economically legitimate end of acquisition, which alone it is incumbent on the theory to take account of. Such consumption may of course be conceived to serve the consumer's physical wants—his physical comfort—or his so-called higher wants—spiritual, aesthetic, intellectual, or what not; the latter class of wants being served indirectly by an expenditure of goods, after the fashion familiar to all economic readers.

获取和积累的目的通常是对所积累的财物进行消费——不论是由财物主人自己直接消费，还是由其家庭成员消费，因为从理论上来讲，这一目的也是受到他的认同的。至少可以认为，消费是获取财物的合理的经济目的，理论所要考虑的也只有这一点。这种消费当然可以认为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他的物质享受），或者他的所谓的高级需求（精神的、审美的、智力的，等等）；所有经济学读者都知道，后一类需求可以通过财物的消费间接得以满足。

But it is only when taken in a sense far removed from its naive meaning that consumption of goods can be said to afford the incentive from which accumulation invariably proceeds. The motive that lies at the root of ownership is emulation; and the same motive of emulation continues active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ion to which it has given rise a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ll those feature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which this institution of ownership touches. The possession of wealth confers honor; it is an invidious distinction. Nothing equally cogent can be said for the consumption of goods, nor for any other conceivable incentive to acquisition, and especially not for any incentiv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然而，只有从与消费的朴素含义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去理解，才可以说积累永无休止的动机在于对财物的消费。产生所有权的根本动机在于竞赛；竞赛动机导致了所有权制度的出现，在所有权制度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在所有权制度涉及的所有社会结构特征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竞赛动机依然十分活跃。占有财富就赋予占有者荣誉，这是一种歧视性区别。要解释财物的消费行为以及任何其他获取财物的动机，尤其是积累财富的动机，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信服的理由了。

It is of course not to be overlooked that in a community where nearly all goods are private property the necessity of earning a livelihood is a powerful and ever present incentive for the poorer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he need of subsistence and of an increase of physical comfort may for a time be the dominant motive of acquisition for those classes who are habitually employed at manual labor, whose subsistence is on a precarious footing, who possess little and ordinarily accumulate little; but it will appear in the course of the discussion that even in the case of these impecunious classes the predominance of the motive of physical want is not so decided as has sometimes been assumed. On the other hand, so far as regards those members and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who are chiefly concerned in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the incentive of subsistence or of physical comfort never

plays a considerable part. Ownership began and grew into a human institution on grounds unrelated to the subsistence minimum. The dominant incentive was from the outset the invidious distinction attaching to wealth and, save temporarily and by exception, no other motive has usurped the primacy at any later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当然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在一个几乎所有财物都是私有财产的社会里，对该社会中比较贫穷的成员来说，维持生计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动机是始终存在的。有些阶级经常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过着入不敷出、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占有很少，积累通常也不多。对他们来说，维持生计和提高物质享受的需要可能是他们一时的主要动机；然而，在探讨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即使对于这些贫穷的阶级来说，物质需求动机的主导地位也没有我们有时候想象的那样绝对。另一方面，对社会中那些一心想着积累财富的成员和阶级来说，维持生计或物质享受的动机从来就没有起过重要的作用。所有权的产生及其发展成为一种人类制度并非是建立在最低限度维持生计的基础上的。其主要动机从一开始就是基于财富基础上的歧视性区别，在以后的发展阶段，除了临时或例外的情况，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动机能够篡夺它那至高无上的地位。

Property set out with being booty held as trophies of the successful raid. So long as the group had departed but little from the primitive communal organization, and so long as it still stood in close contact with other hostile groups, the utility of things or persons owned lay chiefly in an invidious comparison between their possessor and the enemy from whom they were taken. The habit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ose of the group to which he belongs is apparently a later growth. Invidious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ossessor of the honorific booty

and his less successful neighbors within the group was no doubt present early as an element of the utility of the things possessed, though this was not at the outset the chief element of their value. The man's prowess was still primarily the group's prowess, and the possessor of the booty felt himself to be primarily the keeper of the honor of his group. This appreciation of exploit from the communal point of view is met with also at later stages of social growth, especially as regards the laurels of war.

最初，财产被视为袭击成功的战利品。只要该群体离原始社会组织还不太远，只要该群体与其他敌对群体还有着密切的接触，那么占有人与物的作用就主要在于可以用来对人和物的所有者与丧失这些人与物的敌人进行歧视性对比。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区分开来的习俗显然是后来发展的结果。获得光荣战利品的人与本群体内成就稍逊的人之间的歧视性对比，毫无疑问，很早就是作为这类战利品有用性的一个元素而存在，尽管一开始这并非是它们价值的主要因素。一个男子的勇武依然是其所属群体的勇武，战利品的拥有者认为他所保护的仍然是本群体的荣誉。这是从集体的角度来理解侵占行为的，这种理解方式在社会发展的较后阶段依然可以见到，涉及战争的荣誉时尤其明显。

But as soon as the custom of individual ownership begins to gain consistency, the point of view taken in making the invidious comparison on which private property rests will begin to change. Indeed, the one change is but the reflex of the other. The initial phase of ownership, the phase of acquisition by naive seizure and conversion, begins to pass into the subsequent stage of an incipient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private property (in slaves); the horde develops into a more or less self-sufficing industrial community; possessions then come to be valued not so much as

evidence of successful foray, but rather as evidence of the prepotence of the possessor of these goods over other individuals within the community. The invidious comparison now becomes primarily a comparison of the owner with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Property is still of the nature of trophy, but, with the cultural advance, it becomes more and more a trophy of successes scored in the game of ownership carried on between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under the quasi-peaceable methods of nomadic life.

但是一旦个体所有权的逐渐形成定势，进行私有财产所赖以存在的歧视性比较时，所采取的观点就要开始改变。一种转变确实只是另一种转变的反映。所有制的初始阶段，也就是通过简单的掠夺和侵占获取财物的阶段，开始向下一阶段过渡，出现了以私有财产（奴隶）为基础的早期生产组织；游牧部落发展成为基本上能自给自足的生产型社会；财产之所以有价值，不在于它是战斗胜利的证明，而在于它可以用来证明财物所有者比同一社会中其他个体更加优越。歧视性对比现在变成了主要在所有者和该群体中其他成员之间进行的对比。财产仍然具有战利品的性质，然而随着文化的发展，它越来越成为在所有权竞赛中所取得的战利品，这种所有权竞赛是在游牧生活方式下同一部落的成员之间以类似于和平的方式进行的。

Gradually, as industrial activity further displaced predatory activity in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life and in men's habits of thought, accumulated property more and more replaces trophies of predatory exploit as the conventional exponent of prepotence and success. With the growth of settled industry, therefore, the possession of wealth gains in relative importance and effectiveness as a customary basis of repute and esteem. Not that esteem ceases to be awarded on the basis of other, more direct evidence of prowess; not that successful predatory aggression or warlike exploit

ceases to call out the approval and admiration of the crowd, or to stir the envy of the less successful competitors; but the opportunities for gaining distinction by means of this direct manifestation of superior force grow less available both in scope and frequency. At the same time opportunities for industrial aggression, and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property by the quasi-peaceable methods of nomadic industry, increase in scope and availability. And it is even more to the point that property now becomes the most easily recognized evidence of a reputable degree of success as distinguished from heroic or signal achievement. It therefore becomes the conventional basis of esteem. Its possession in some amount becomes necessary in order to any reputable standing in the community. It becomes indispensable to accumulate, to acquire property, in order to retain one's good name. When accumulated goods have in this way once become the accepted badge of efficiency, the possession of wealth presently assumes the character of an independent and definitive basis of esteem. The possession of goods, whether acquired aggressively by one's own exertion or passively by transmission through inheritance from others, becomes a conventional basis of reputability. The possession of wealth, which was at the outset valued simply as an evidence of efficiency, becomes, in popular apprehension, itself a meritorious act. Wealth is now itself intrinsically honorable and confers honor on its possessor. By a further refinement, wealth acquired passively by transmission from ancestors or other antecedents presently becomes even more honorific than wealth acquired by the possessor's own effort; but this distinction belongs at a later stag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pecuniary culture and will be spoken of in its place.

渐渐地，在社会的日常生活和男性的思维习惯中，生产活动进一

步取代了掠夺活动，积累的财产逐步取代了掠夺得来的战利品，成为优越与成功的传统证据。因此，随着安定的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占有也变得更加重要、更加有效，成了赢得声望和尊敬的传统基础。这并不是说表现勇武的其他的、更加直接的证据再也不能赢得尊敬，也不是说成功的掠夺性攻击和军事行动再也不能唤起群众的赞许与钦佩，再也不能激起成就稍差的竞争者的羡慕与嫉妒。但是，通过直接展示这种优势力量来扬名立万的机会，范围越来越小，次数也越来越少。然而，通过游牧经济下类似于和平的方式进行生产性侵略和财产积累，这样的机会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唾手可得。更确切地讲，财产不同于英勇的战绩和显赫的战功，它现在成了衡量成就的可敬程度时最易识别的证据。因此它就成了赢得尊敬的传统基础。要想在社会上获得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声望，就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要想保住好名声，就必须积累财产，获取财产。一旦积累的财物通过这种方式成为能力的公认标志，财富的积累就立刻成为赢得尊敬的独立的、确切的基础。占有财富，不论是自己积极进取通过努力获得的，还是继承别人的遗产被动获得的，成了赢得声望的传统基础。占有财产在一开始只是体现效率的证据，而现在在公众看来，占有财产本身就是一种彰显功绩的行为。现在，财富本身就是荣耀，并将这种荣耀赋予其所有者。经过进一步演变，从祖上或其他先辈处被动获得的财富变得比自己努力得来的财富更具荣耀性；这一区别出现在金钱文化发展的后期，本讨论后面将会涉及这一点。

Prowess and exploit may still remain the basis of award of the highest popular esteem, although the possession of wealth has become the basis of common place reputability and of a blameless social standing. The predatory instinct and the consequent approbation of predatory efficiency are deeply ingrained in the habits of thought of those peoples who have passed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a protracted predatory culture. According to popular award, the highest honors within human reach may, even yet, be those gained by an unfolding of extraordinary predatory efficiency

in war, or by a quasi-predatory efficiency in statecraft; but for the purposes of a commonplace decent standing in the community these means of repute have been replaced by the acquisi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goods. In order to stand well in the eyes of the community, it is necessary to come up to a certain, somewhat indefinite, conventional standard of wealth; just as in the earlier predatory stag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barbarian man to come up to the tribe's standard of physical endurance, cunning, and skill at arms. A certain standard of wealth in the one case, and of prowess in the other,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reputability, and anything in excess of this normal amount is meritorious.

尽管占有财富已经成为获得一般声望以及无可挑剔的社会地位的基础，勇武和侵占也许依然是赢得最高的敬意。有些民族经历了漫长的掠夺文化的洗礼，掠夺本能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掠夺能力的赞赏，在这些民族的思维习惯中已经根深蒂固。按理说，即使到了这个阶段，人类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依然来自战争中非凡的掠夺能力或治国安邦中的准掠夺能力；然而，如果只是为了在社会中获得稍微体面一点儿的地位，财物的获取和积累就取代了上述获取声望的手段。要想让社会成员瞧得起，就必须达到某种不确定的、传统的财富标准；这就像在掠夺阶段早期一样，当时，蛮夷部落的男子在体力上、机智上和武器的使用技能上必须达到该部落的标准。获得声望的必要条件，在前一种情况下是达到一定标准的财富，在后一种情况下是达到一定标准的勇武精神。

Thos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ho fall short of this, somewhat indefinite, normal degree of prowess or of property suffer in the esteem of their fellow-men; and consequently they suffer also in their own esteem, since the usual basis of self-respect is the respect accorded by one's neighbors. Only individuals with an

aberrant temperament can in the long run retain their self-esteem in the face of the disesteem of their fellows. Apparent exceptions to the rule are met with, especially among people with strong religious convictions. But these apparent exceptions are scarcely real exceptions, since such persons commonly fall back on the putative approbation of some supernatural witness of their deeds.

社会成员要是在勇武程度或财产上达不到这个不太明确的正常程度，就不免要受到同伴的轻视；其结果是，他们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因为自尊的基础通常是来自同伴的尊敬。只有性格孤僻的人才能够长期被同伴看不起而依然保持自尊。这一规则也有明显的例外，尤其是对那些具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但是，这些明显的例外很少是真正的例外，因为这类人的自尊心别有寄托，他们认为某种超自然的见证会酬报他们的德行。

As soon as the possession of property becomes the basis of popular esteem, therefore, it becomes also a requisite to the complacency which we call self-respect. In any community where goods are held in severalty it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his own peace of mind, that an individual should possess as large a portion of goods as others with whom he is accustomed to class himself; and it is extremely gratifying to possess something more than others. But faster as a person makes new acquisitions, and becomes accustomed to the resulting new standard of wealth, the new standard forthwith ceases to afford appreciably greater satisfaction than the earlier standard did. The tendency in any case is constantly to make the present pecuniary standard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a fresh increase of wealth; and this in turn gives rise to a new standard of sufficiency and a new pecuniary classification of one's self as compared with one's neighbors. So far as concerns the present

question, the end sought by accumulation is to rank high in comparison with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 in point of pecuniary strength. So long as the comparison is distinctly unfavorable to himself, the normal, average individual will live in chronic dissatisfaction with his present lot; and when he has reached what may be called the normal pecuniary standard of the community, or of his class in the community, this chronic dissatisfaction will give place to a restless straining to place a wider and ever-widening pecuniary interval between himself and this average standard. The invidious comparison can never become so favorable to the individual making it that he would not gladly rate himself still higher relatively to his competitors in the struggle for pecuniary reputability.

因此，一旦占有财产成为广受尊敬的基础，它也就成了自满情绪——我们称之为自尊心——的必要条件。在财物为个人占有的社会，为求心理平衡，个人拥有的财物必须与通常和自己列为同一等级的那类人所拥有的财物相当。如果拥有的比别人多，那就更加令人心满意足了。但是，一旦一个人财物有了新的增添，并且对随之而来的新的财富标准习以为常，这个新标准所带来的满足就不会明显比以前的旧标准所带来的满足多。无论情况如何，都有这样一个趋势：总是不断地以现有的金钱标准作为起点寻求更多财富。这样又产生了用于和同伴比较的新的富足标准和金钱等级。这里涉及的问题是，积累财富的目的是在与社会其他成员进行金钱力量对比时能胜人一筹。只要在比较发现自己处于劣势，一个正常的普通人就会对现状不满，长期在怨尤中度日；一旦他达到了该社会或其所属阶级的所谓的正常金钱标准，这种长期的不满就会让位于永无休止的努力，以期自身和这个平均的金钱标准之间的距离扩大、再扩大。这种歧视性比较绝不会对进行比较的人有利，以至于在对金钱荣誉的角逐中，永远不会对比他的竞争者更高一筹而无动于衷。

In the nature of the case, the desire for wealth can scarcely be satiated in any individual instance, and evidently a satiation of the average or general desire for wealth is out of the question. However widely, or equally, or “fairly”, it may be distributed, no general increase of the community's wealth can make any approach to satiating this need, the ground of which is the desire of every one to excel everyone else in the accumulation of goods. If, as is sometimes assumed, the incentive to accumulation were the want of subsistence or of physical comfort, then the aggregate economic wants of a community might conceivably be satisfied at some point in the advance of industrial efficiency; but since the struggle is substantially a race for reputability on the basis of an invidious comparison, no approach to a definitive attainment is possible.

与此相同，在任何情况下，积累财富的欲望很少能够得到彻底满足；很明显，满足于平均的或一般的欲望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社会财富分配得多么普遍、多么平均、多么公平，它的增加都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为每个人都想在财富积累方面超越他人。如果像人们有时候认为的那样，积累是出于生存或物质享受的需要，那么就不难想象，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一个社会的经济总需求终有得到满足的时候。然而，因为这种竞争本质上是建立在歧视性对比基础之上的荣誉竞赛，所以没有一种方法一定能够达到这一目标。

What has just been said must not be taken to mean that there are no other incentives to acquisition and accumulation than this desire to excel in pecuniary standing and so gain the esteem and envy of one's fellow-men. The desire for added comfort and security from want is present as a motive at every stage of the process of accumulation in a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y; although the standard of sufficiency in these respects is in turn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habit of pecuniary emulation. To a great extent this emulation shapes the methods and selects the objects of expenditure for personal comfort and decent livelihood.

上面这番话绝不可以理解为，除了希望在金钱地位上高于他人，从而赢得同伴的尊敬与羡慕之外，取得财富和积累财富再无其他动机。增进物质享受和远离贫困的欲望也是一个动机，它存在于现代工业社会积累过程的每一个阶段。虽然这些方面的满足标准，反过来又大大地受到了金钱竞赛的习惯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竞赛在谋求个人享受和体面生活的过程中影响了消费方式并决定了消费对象的选择。

Besides this, the power conferred by wealth also affords a motive to accumulation. That propensity for purposeful activity and that repugnance to all futility of effort which belong to man by virtue of his character as an agent do not desert him when he emerges from the naive communal culture where the dominant note of life is the unanalyzed and undifferentiated solidarity of the individual with the group with which his life is bound up. When he enters upon the predatory stage, where self-seeking in the narrower sense becomes the dominant note, this propensity goes with him still, as the pervasive trait that shapes his scheme of life. The propensity for achievement and the repugnance to futility remain the underlying economic motive. The propensity changes only in the form of its expression and in the proximate objects to which it directs the man's activity. Under the regime of individual ownership the most available means of visibly achieving a purpose is that afforded by the acquisi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goods; and as the self-regarding antithesis between man and man reaches fuller consciousness, the propensity for achievement—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tends more and more to shape itself into a straining to excel others in pecuniary achievement. Relative success, tested by an invidious pecuniary comparison with other men, becomes the conventional end of action. The currently accepted legitimate end of effort becomes the achievement of a favorable comparison with other men; and therefore the repugnance to futility to a good extent coalesces with the incentive of emulation. It acts to accentuate the struggle for pecuniary reputability by visiting with a sharper disapproval all shortcomings and all evidence of shortcoming in point of pecuniary success. Purposeful effort comes to mean, primarily, effort directed to or resulting in a more creditable showing of accumulated wealth. Among the motives which lead men to accumulate wealth, the primacy, both in scope and intensity, therefore, continues to belong to this motive of pecuniary emulation.

除此之外，财富所带来的权力也是积累的一个动机。在原始公社文化中，生活的主要特征是个人与其所属的群体紧密结合，不分彼此。男子作为行为主体，天性喜欢有目的的活动，而厌恶徒劳无功的努力；当他脱离这种原始公社文化后，这种天性并未从身上消失。当社会进入掠夺文化阶段后，狭义的利己主义成为其主要特征。但男子的这种天性依然如影随形，成了影响他的生活方式的普遍特征。喜欢成就而厌恶徒劳依然是潜在的经济动机。这种天性的改变只在于其表现形式，只在于男子的活动因这种天性而指向的直接目标。在个体所有这一制度下，财物的获取和积累成了明显实现目标的最为有效的方法；随着人与人之间的利己的对比越来越明显，爱好成就的本性——技艺的本能——逐步演变成在金钱成就上超越别人的努力。成就的高低在与他人进行的歧视性金钱对比的过程中接受考验，成了行为的传统目标。此时，一切努力的公认的合法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与他人进行歧视性的对比；因此，对徒劳无功的厌恶在很大程度上就与竞赛的动机结合起来了。这就使为获得金钱荣誉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对于金

钱成就上的任何不足或显示不足的任何证据都更加深恶痛绝。有目的的努力主要是指这样一种努力：其目标和结果是让财富积累有更加令人钦佩的展示。因此，在所有促使人们进行财富积累的动机中，金钱竞赛的动机，不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强度上，都是最为主要的动机。

In making use of the term “invidious”, it may perhaps be unnecessary to remark, there is no intention to extol or depreciate, or to commend or deplore any of the phenomena which the word is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term is used in a technical sense as describing a comparison of persons with a view to rating and grading them in respect of relative worth or value—in an aesthetic or moral sense—and so awarding and defining the relative degrees of complacency with which they may legitimately be contemplated by themselves and by others. An invidious comparison is a process of valuation of persons in respect of worth.

也许这点无须解释，即在使用“歧视性”一词描述任何现象时，并无吹捧或贬低、颂扬或谴责之意。该词只是一个专门术语，用于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对比，以期按照人们在审美观念或道德观念上的相关价值将他们分等分级，从而评定和确认自满自足的相对程度，这种自满自足的程度可能来自于其自身或他人的感受。歧视性对比是一个通过价值来评价人的过程。

Chapter III Conspicuous Leisure

第三章　炫耀性有闲

If its working were not disturbed by other economic forces or other features of the emulative process, the immediate effect of such a pecuniary struggle as has just been described in outline would be to make men industrious and frugal. This result actually follows, in some measure, so far as regards the lower classes, whose ordinary means of acquiring goods is productive labor. This is more especially true of the laboring classes in a sedentary community which is at an agricultural stage of industry, in which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subdivision of industry, and whose laws and customs secure to these classes a more or less definite share of the product of their industry. These lower classes can in any case not avoid labor, and the imputation of labor is therefore not greatly derogatory to them, at least not within their class. Rather, since labor is their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mode of life, they take some emulative pride in a reputation for efficiency in their work, this being often the only line of emulation that is open to them. For those for whom acquisition and emulation is possible only within the field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 and thrift, the struggle for pecuniary reputability will in some measure work out in an increase of diligence and parsimony. But certain secondary features of the emulative process, yet to be spoken of, come in to very materially circumscribe and modify emulation in these directions among the pecuniarily inferior classes as well as among the superior class.

关于金钱竞赛，我们在上一章刚作了概括的叙述；如果这种金钱

竞赛的运作没有受到其他经济力量或竞赛过程中其他特征的干扰，其直接后果是促使人们趋于勤俭节约。下层阶级获取财物的通常手段是生产劳动，就他们而言，金钱竞赛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产生了上述结果。对处于农业发展阶段、过着定居生活的劳动阶级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在这样的社会里，生产分工较为明显，其法律与风俗习惯保障这些阶级可以从其劳动成果中获得一个较为确定的份额。这些下层阶级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免劳动的，因此，劳动并不会让他们觉得有失身份，至少在其阶级内部情况如此。实际情况反倒是这样的，由于劳动是他们所公认并接受的生活方式，如果因工作能力而受到赞誉，他们反倒有种超越他人的自豪感，因为劳动通常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竞赛方式。对那些只能通过生产效率和勤俭节约来获取财物并展开竞赛的人来说，要进行竞争以赢得金钱声誉，在某种程度上就必须更加克勤克俭。然而，竞赛过程中的某些次要特征——这些特征将在下文提及——会对无论是在金钱上处于地位低下还是地位优越的阶级在这些方面的竞赛，起到明显的限制和缓和作用。

But it is otherwise with the superior pecuniary class, with which we are here immediately concerned. For this class also the incentive to diligence and thrift is not absent; but its action is so greatly qualified by the secondary demands of pecuniary emulation, that any inclination in this direction is practically overborne and any incentive to diligence tends to be of no effect. The most imperative of these secondary demands of emulation, as well as the one of widest scope, is the requirement of abstention from productive work. This is true in an especial degree for the barbarian stage of culture. During the predatory culture labor comes to be associated in men's habits of thought with weakness and subjection to a master. It is therefore a mark of inferiority, and therefore comes to be accounted unworthy of man in his best estate. By virtue of this tradition labor is felt to be debasing, and this tradition has never died out. On the contrary, with the advance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t has acquired the axiomatic force due to ancient and unquestioned prescription.

不过，对于那些在金钱上处于优势地位的阶级而言，情况并非如此，而这正是我们目前所要讨论的。对这一阶级来说，勤俭节约的动机依然存在；但其作用受到了金钱竞赛过程中次要需求的极大限制，任何勤俭节约的本性都受到了压制，任何勤劳刻苦的动机都不能发挥作用。在竞赛的这些次要需求中，最具强制力、范围最广泛的一项便是避免生产劳动的需求。在蛮夷文化阶段，情况尤其如此。在掠夺文化时期，在男子的思维习惯中，劳动是与软弱无能和服从主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劳动成了卑微下贱的标志，也就为年富力强的男子所不齿了。由于这一传统，人们感到劳动是有失身份的，这一传统沿袭至今，从未消失。恰恰相反，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这种传统因古老的、规则不容置疑而具有了公理的力量。

In order to gain and to hold the esteem of men it is not sufficient merely to possess wealth or power. The wealth or power must be put in evidence, for esteem is awarded only on evidence. And not only does the evidence of wealth serve to impress one's importance on others and to keep their sense of his importance alive and alert, but it is of scarcely less use in building up and preserving one's self-complacency. In all but the lowest stages of culture the normally constituted man is comforted and upheld in his self-respect by “decent surroundings” and by exemption from “menial offices”. Enforced departure from his habitual standard of decency, either in the paraphernalia of life or in the kind and amount of his everyday activity, is felt to be a slight upon his human dignity, even apart from all conscious consideration of the approval or disapproval of his fellows.

要想赢得人们的尊敬并保持这种尊敬，仅仅拥有财富或权势是不够的。拥有财富或权势还必须证明给人看，因为唯有证明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财富的证明不但可以让别人感到财富拥有者的重要地位并时刻保持这种意识，而且可以建立并保持一个人的自满自得的心情，在这一点上其作用也是不小的。除非是在文化的最低阶段，一个身心正常的人，如果能够有一个“体面的环境”，能够免于从事“卑贱的工作”，就会活得舒适自在、活得有自尊。不论是在生活用品方面，还是在日常活动的类别和数量方面，如果一个人被迫脱离了一贯的体面标准，即使不在乎同伴们的毁誉，也会感到这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

The archaic theoret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base and the honorable in the manner of a man's life retains very much of its ancient force even to-day. So much so that there are few of the better class who are not possessed of an instinctive repugnance for the vulgar forms of labor. We have a realizing sense of ceremonial uncleanness attaching in an especial degree to the occupations which are associated in our habits of thought with menial service. It is felt by all persons of refined taste that a spiritual contamina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certain offices that are conventionally required of servants. Vulgar surroundings, mean (that is to say, inexpensive) habitations, and vulgarly productive occupations are unhesitatingly condemned and avoided. They are incompatible with life on a satisfactory spiritual plane—with “high thinking”. From the days of the Greek philosophers to the present, a degree of leisure and of exemption from contact with such industrial processes as serve the immediate everyday purposes of human life has ever been recognized by thoughtful men as a prerequisite to a worthy or beautiful, or even a blameless, human life. In itself and in its consequences the life of leisure is beautiful and ennobling in all civilized men's eyes.

人类生活方式的这种古老的、理论上的尊卑之别，时至今日，依然较好地保持着其古老的势力。所以，在上层阶级中，很少有人对各种卑微的劳动不是本能地心怀厌恶。凡是在我们思维习惯中与卑微服务联系在一起的职业，我们总觉得特别肮脏下贱，不合礼仪。所有品位高雅之士都认为，精神上的污染是和传统上由仆役所从事的某些职业密不可分的。粗鄙的环境、简陋的（即低廉的）住所以及粗笨的生产工作，这一切都应当毫不犹豫地加以唾弃并予以避免。它们与精神上满足的生活——高尚的情操——是格格不入的。从希腊的哲学家时代开始直到现在，有思想的人都认为，要过上有价值的、美好的，抑或是无可挑剔的生活，其先决条件是一定程度的清闲以及把避免接触的生产过程作为实现人类日常生活目标。在所有文明人的眼里，有闲生活，无论是其本身还是其结果，都是美好的、高贵的。

This direct, subjective value of leisure and of other evidences of wealth is no doubt in great part secondary and derivative. It is in part a reflex of the utility of leisure as a means of gaining the respect of others, and in part it is the result of a mental substitution. The performance of labor has been accepted as a conventional evidence of inferior force; therefore it comes itself, by a mental short-cut, to be regarded as intrinsically base.

毫无疑问，有闲以及其他彰显财富的证据所具有的这种直接的、主观的价值大都是从属性的、派生的。它一部分反映了有闲的功用，即清闲可以作为一种手段赢得别人尊敬，一部分是精神替代的结果。从事劳动被认为是处于劣势地位的传统证据；因此，出于精神上的武断，它也就被认为在本质上自然是低贱的。

During the predatory stage proper, and especially during the earlier stages of the quasi-peaceabl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hat

follows the predatory stage, a life of leisure is the readiest and most conclusive evidence of pecuniary strength, and therefore of superior force;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gentleman of leisure can live in manifest ease and comfort. At this stage wealth consists chiefly of slaves, and the benefits accruing from the possession of riches and power take the form chiefly of personal service and the immediate products of personal service. Conspicuous abstention from labor therefore becomes the conventional mark of superior pecuniary achievement and the conventional index of reputability; and conversely, since application to productive labor is a mark of poverty and subjection, it becomes inconsistent with a reputable standing in the community. Habits of industry and thrift, therefore, are not uniformly furthered by a prevailing pecuniary emulation. On the contrary, this kind of emulation indirectly discountenances participation in productive labor. Labor would unavoidably become dishonorable, as being an evidence of poverty, even if it were not already accounted indecorous under the ancient tradition handed down from an earlier cultural stage. The ancient tradition of the predatory culture is that productive effort is to be shunned as being unworthy of able-bodied men, and this tradition is reinforced rather than set aside in the passage from the predatory to the quasi-peaceable manner of life.

在掠夺文化阶段，尤其是在紧跟其后的准和平生产发展的早期，有闲生活是金钱力量的最方便的、最确凿的证据，因此它也是处于优势地位的最方便的、最确凿的证据；只要这位有闲的绅士日子过得明显安逸舒适就行了。在这一阶段，财富主要由奴隶构成，拥有财富和权势所带来的利益，主要以个人服务及个人服务所产生的直接成果的形式表现出来。明显地不参加劳动因此成了在金钱方面成就卓越的传统标志以及声誉的传统指标；相反地，由于从事生产劳动是贫穷及屈从的标志，它同在社会中取得荣誉地位是不相容的。因此，盛行的金

钱竞赛并没有普遍促进勤俭节约的习惯。正好相反，这种竞赛间接地使得参加生产劳动成为丢脸的事情。从文化早期阶段沿袭下来的古老传统一直把劳动看作是不合礼节的一个证据，劳动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不光荣的色彩。根据掠夺文化的古老传统，生产活动应当予以避免，因为它们不值得身强体壮的男子去做。在从掠夺的生活方式向准和平的生活方式过渡的过程中，这一传统不但没有被摒弃，反而得到了加强。

Even if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had not come in with the first emergence of individual ownership, by force of the dishonor attaching to productive employment, it would in any case have come in as one of the early consequences of ownership. And it is to be remarked that while the leisure class existed in theory from the beginning of predatory culture, the institution takes on a new and fuller meaning with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redatory to the next succeeding pecuniary stage of culture. It is from this time forth a “leisure class” in fact as well as in theory. From this point dates the institution of the leisure class in its consummate form.

即使有闲阶级没有随着个体所有制的出现而兴起，由于生产工作带上了不光荣的色彩，有闲阶级无论如何也是所有制的早期产物之一。应当注意到，理论上，有闲阶级在掠夺文化初期已经存在，但随着掠夺文化阶段转变为紧随其后的金钱文化阶段，这种制度有了新的、更加充实的意义。正是从此时起，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事实上出现了“有闲阶级”。有闲阶级的完整形态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

During the predatory stage prope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eisure and the laboring class is in some degree a ceremonial distinction only. The able-bodied men jealously stand aloof from

whatever is, in their apprehension, menial drudgery; but their activity in fact contributes appreciably to the sustenance of the group. The subsequent stage of quasi-peaceable industry is usually characterized by established chattel slavery, herds of cattle, and a servile class of herdsmen and shepherds; industry has advanced so far that the community is no longer dependent for its livelihood on the chase or on any other form of activity that can fairly be classed as exploit. From this point on,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leisure class life is a conspicuous exemption from all useful employment.

在严格意义上的掠夺文化阶段，有闲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形式上的区别。身强体壮的男子对于他们所认为的一切苦工杂役心存猜忌、避而远之；然而，他们的活动对该群体的生计维持却又贡献良多。在接下来的准和平的生产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动产的确立，动产的内容包括奴隶、牛群和服务类的牧人；生产发展迅速，社会不再依靠狩猎或其他可以归结为侵占的活动形式来维持生计。从这一刻起，有闲阶级生活的显著特征是炫耀性地不从事任何实用的工作。

The normal and characteristic occupations of the class in this mature phase of its life history are in form very much the same as in its earlier days. These occupations are government, war, sports, and devout observances. Persons unduly given to difficult theoretical niceties may hold that these occupations are still incidentally and indirectly “productive”; but it is to be noted as decisive of the question in hand that the ordinary and ostensible motive of the leisure class in engaging in these occupations is assuredly not an increase of wealth by productive effort. At this as at any other cultural stage, government and war are, at least in part, carried on for the pecuniary gain of those who engage in

them; but it is gain obtained by the honorable method of seizure and conversion. These occupations are of the nature of predatory, not of productive, employment. Something similar may be said of the chase, but with a difference. As the community passes out of the hunting stage proper, hunting gradually becomes differentiated into two distinct employments. On the one hand it is a trade, carried on chiefly for gain; and from this the element of exploit is virtually absent, or it is at any rate not present in a sufficient degree to clear the pursuit of the imputation of gainful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ase is also a sport—an exercise of the predatory impulse simply. As such it does not afford any appreciable pecuniary incentive, but it contains a more or less obvious element of exploit. It is this latter development of the chase—purged of all imputation of handicraft—that alone is meritorious and fairly belongs in the scheme of life of the developed leisure class.

在该阶级生活史的成熟阶段，其从事的特有的正常职业在形式上与早期阶段别无二致。这些职业依然是政治、战争、体育竞技以及宗教事务。那些喜欢在理论上钻牛角尖的人也许会说，这些职业依然偶然地、间接地具有“生产性”；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有闲阶级之所以从事这些职业，其通常的、表面的动机肯定不在于通过生产劳动来增加财富。在这一文化阶段，和在任何文化阶段一样，之所以从事政治和战争活动，至少部分是为了从事这些职业的人能在金钱上有所收益；但是这种收益是通过掠夺和强占的光荣方式取得的。这些职业本质上是掠夺性的而非生产性的职业。狩猎活动与此相似，却又有所不同。当社会脱离真正意义上的狩猎阶段以后，狩猎逐渐分化为两种不同的职业。一方面，它是一种谋生之道，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利；从这一点来看，侵占的成分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即使存在，无论如何也不足以洗清其作为营利行业的污名。另一方面，狩猎也是一种消遣——只不过是出于掠夺冲动而进行的锻炼罢了。就这一点而言，它并不带有明显的金钱动机，却或多或少含有侵占的意

味。狩猎的后一种发展形态将手工劳动的污名洗涤殆尽，唯有这种形态的狩猎才是值得称赞的，才属于发达的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

Abstention from labor is not only an honorific or meritorious act, but it presently comes to be a requisite of decency. The insistence on property as the basis of reputability is very naive and very imperious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Abstention from labor is the convenient evidence of wealth and is therefore the conventional mark of social standing; and this insistence on the meritoriousness of wealth leads to a more strenuous insistence on leisure. *Nota notœ est nota rei ipsius* . According to well established laws of human nature, prescription presently seizes upon this conventional evidence of wealth and fixes it in men's habits of thought as something that is in itself substantially meritorious and ennobling; while productive labor at the same time and by a like process becomes in a double sense intrinsically unworthy. Prescription ends by making labor not only disreputable in the eyes of the community, but morally impossible to the noble, freeborn man, and incompatible with a worthy life.

到了此刻，不参加劳动不仅是光荣的、值得称赞的行为，而且成为不失身份的必要条件。在财富积累的最初阶段，坚持以财产为声誉的基础，这是十分朴素而又十分迫切的。不参加劳动是财富的便捷的证据，因此也就成了社会地位的传统标志；对财富具有价值这一观念的坚持导致了对有闲更加热诚地坚持。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该标志本身（Nota notœ est nota rei ipsius）。按照人类天性中的既定法则，规则立刻采用了财富的这一传统标志，认为它本身就是有价值的、高尚的，并将其植入人们的思维习惯中；而同时，生产劳动通过同样的过程变成本质上双重意义的无价值。这种规定最终使得劳动在世人的眼里不仅是不光彩的，而且是一个高贵的、生而自由的人在道德上所无

法忍受的，是和有价值的生活格格不入的。

This tabu on labor has a further consequence in the industrial differentiation of classes. As the population increases in density and the predatory group grows into a settled industrial community, the constituted authorities and the customs governing ownership gain in scope and consistency. It then presently becomes impracticable to accumulate wealth by simple seizure, and, in logical consistency, acquisition by industry is equally impossible for high-minded and impecunious men. The alternative open to them is beggary or privation. Wherever the canon of conspicuous leisure has a chance undisturbed to work out its tendency, there will therefore emerge a secondary, and in a sense spurious, leisure class—abjectly poor and living a precarious life of want and discomfort, but morally unable to stoop to gainful pursuits. The decayed gentleman and the lady who has seen better days are by no means unfamiliar phenomena even now. This pervading sense of the indignity of the slightest manual labor is familiar to all civilized peoples, as well as to peoples of a less advanced pecuniary culture. In persons of a delicate sensibility who have long been habituated to gentle manners, the sense of the shamefulness of manual labor may become so strong that, at a critical juncture, it will even set aside the instinct of self-preservation. So, for instance, we are told of certain Polynesian chiefs, who, under the stress of good form, preferred to starve rather than carry their food to their mouths with their own hands. It is true, this conduct may have been due, at least in part, to an excessive sanctity or tabu attaching to the chief's person. The tabu would have been communicated by the contact of his hands, and so would have made anything touched by him unfit for human food. But the tabu is itself a derivative of the unworthiness or moral incompatibility of labor; so that even when

construed in this sense the conduct of the Polynesian chiefs is truer to the canon of honorific leisure than would at first appear. A better illustration, or at least a more unmistakable one, is afforded by a certain king of France, who is said to have lost his life through an excess of moral stamina in the observance of good form. In the absence of the functionary whose office it was to shift his master's seat, the king sat uncomplaining before the fire and suffered his royal person to be toasted beyond recovery. But in so doing he saved his Most Christian Majesty from menial contamination.

劳动的这一禁忌对各阶级的产业分化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以掠夺为目的的群体逐渐发展为定居的产业社会，支配着所有制的合法权力机构和风俗习惯的范围逐渐扩大，也变得越来越稳定。这时一味依靠武力来积累财富已经行不通了，就逻辑的一致性而言，对自命清高和身无分文的人来说，通过生产取得财物也同样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沦为乞丐，要么贫穷度日。只要炫耀性有闲的准则能够通行无阻，就必然会出现一个附属的有闲阶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称之为伪有闲阶级：这类人贫困潦倒，过着朝不保夕、艰难窘迫的生活，但在道德上又不能自降身价去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作。有些绅士和贵妇也曾享受过荣华富贵，而今家道中落，这样的现象即使在今天也是屡见不鲜。对最为轻微的体力劳动也会产生深恶痛绝之感，不论是文明的民族，还是金钱文化不太发达的民族，对这种普遍存在的感觉都是十分熟悉的。有些人举止优雅、感情细腻，他们早就习惯了温文尔雅的作风，他们对体力劳动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以至于在危急关头，甚至会放弃自我生存的本能。例如，我们听说，波利尼西亚的某些酋长为了举止得体，宁愿挨饿，也不肯亲手把食物送到嘴里。诚然，这种行为可能是因为——至少部分是因为——这位酋长的身体被赋予了太多的圣洁和禁忌。这种禁忌会通过他的手的触摸进行传播，因此只要他碰过的东西便不再适合人类食用。但是，这种禁忌本身就是源于劳动的无价值和道德不相容性；所以，即使从这个意义上来解释，波利尼西亚酋长们的行为比

表面看到的更加忠实于“有闲是光荣的”这个准则。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或者至少是个更加确凿的例子。据说法国某国王，因为过分坚持道德准绳，为了保持举止得体，竟丢了性命。当时专门为这位主人移动座椅的侍从官恰巧不在他身边，这位国王就这样忍着痛苦坐在火炉前，直到他的万金之躯被烘烤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但是，如此一来，他确实可以让他那最为高贵的帝王尊严免受贱役的玷污。

Summum crede nefas animam præferre pudori,

为了苟且偷生竟丧失了人生的意义，

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

这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It has already been remarked that the term “leisure”, as here used, does not connote indolence or quiescence. What it connotes is non-productive consumption of time. Time is consumed non-productively (1) from a sense of the unworthiness of productive work, and (2) as an evidence of pecuniary ability to afford a life of idleness. But the whole of the life of the gentleman of leisure is not spent before the eyes of the spectators who are to be impressed with that spectacle of honorific leisure which in the ideal scheme makes up his life. For some part of the time his life is perforce withdrawn from the public eye, and of this portion which is spent in private the gentleman of leisure should, for the sake of his good name, be able to give a convincing account. He should find some means of

putting in evidence the leisure that is not spent in the sight of the spectators. This can be done only indirectly, through the exhibition of some tangible, lasting results of the leisure so spent—in a manner analogous to the familiar exhibition of tangible, lasting products of the labor performed for the gentleman of leisure by handicraftsmen and servants in his employ.

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使用的“有闲”一词并不含有懒惰或无所事事之意。该词所隐含的意思是非生产性的时间消耗。之所以要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是因为：（1）感到生产工作无价值；（2）可以借此证明有足够的财力来维持闲散的生活。有闲绅士的理想生活是由可敬的有闲组成的，旁观者目睹了这种有闲便会留下深刻印象，然而有闲绅士的全部生活并非都是在旁观者的注视下度过的。有时候，他的生活必然会淡出公众的视线，为了维持其好名声，有闲绅士应该对私下度过的时间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他应该想出些办法来，将在旁观者视线之外度过的有闲生活彰显于世。这一点只能间接地做到，即把这种有闲所产生的某些有形的、持久的成果展示出来；这和他所雇佣的工匠和奴仆们一样，他们也是将工作中某些有形的、持久的劳动成果展示出来。

The lasting evidence of productive labor is its material product—commonly some article of consumption. In the case of exploit it is similarly possible and usual to procure some tangible result that may serve for exhibition in the way of trophy or booty. At a later phase of the development it is customary to assume some badge or insignia of honor that will serve as a conventionally accepted mark of exploit, and which at the same time indicates the quantity or degree of exploit of which it is the symbol. As the population increases in density, and as human relations grow more complex and numerous, all the details of life undergo a process of

elaboration and selection; and in this process of elaboration the use of trophies develops into a system of rank, titles, degrees and insignia, typical examples of which are heraldic devices, medals, and honorary decorations.

生产劳动的持久的证据是它的物质产品，通常是一些消费品。就侵占行为而言，获得可供展示的某种有形的成果，如战利品或掠夺物，同样是可能的，通常也是这样做的。到了发展的后期阶段，佩戴荣誉徽章或勋章成了一种风尚，这类徽章或勋章可以当作侵占活动的公认的传统标记，同时还可以显示其所代表的侵占活动的大小和等级。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随着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样，所有的生活细节都是经过精心安排和精挑细选的；在这一过程中，战利品的使用发展成为等级、头衔、学位和勋章等制度，典型的例子如五花八门的纹章、奖章及荣誉性饰品。

As seen from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leisure, considered as an employment, is closely allied in kind with the life of exploit; and the achievements which characterize a life of leisure, and which remain as its decorous criteria, have much in common with the trophies of exploit. But leisure in the narrower sense, as distinct from exploit and from any ostensibly productive employment of effort on objects which are of no intrinsic use, does not commonly leave a material product. The criteria of a past performance of leisure therefore commonly take the form of “immaterial” goods. Such immaterial evidences of past leisure are quasi-scholarly or quasi-artistic accomplishments and knowledge of processes and incidents which do not conduce directly to the furtherance of human life. So, for instance, in our time there is the knowledge of the dead languages and the occult sciences; of correct spelling; of syntax and prosody; of the various forms of domestic music and

other household art; of the latest properties of dress, furniture, and equipage; of games, sports, and fancy-bred animals, such as dogs and race-horses. In all these branches of knowledge the initial motive from which their acquisition proceeded at the outset, and through which they first came into vogue, may have been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wish to show that one's time had not been spent in industrial employment; but unless these accomplishments had approved themselves as serviceable evidence of an unproductive expenditure of time, they would not have survived and held their place as conventional accomplishments of the leisure class.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职业的有闲实质上是同侵占生活密切相关的；有闲生活所特有的成就一直被当作这种生活的礼仪标准，和侵占得来的战利品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狭义的“有闲”与“侵占”不同，与表面上生产无实际用途物品的工作不同，它通常不会留下物质产品。因此，“有闲”的既往成就通常以“非物质性”财物的形式出现。既往有闲的这些非物质性证据包括各种准学术性的或准艺术性的成就，以及关于社会进程和事件方面的知识，而这些对人类生活的改进并无直接帮助。例如，我们的时代里就有关于消失的语言和神秘学方面的知识、如何正确拼写的知识、句法学和韵律学的知识、各种形式的家庭音乐以及其他家庭艺术的知识、时尚的服饰、家具及设备方面的知识、游戏、运动及饲养诸如狗和赛马等良种动物的知识。人们当初学习所有这些门类众多的知识的最初动机，亦即这些知识开始流传的动机，也许与想要表明一个人的时间没有花在生产性工作上的愿望迥然不同；但是，除非这些成就经证实可以用来证明时间是消耗在非生产性事物上面的，否则它们是不可能流传下来并成为有闲阶级的传统成就。

These accomplishments may, in some sense, be classed as

branches of learning. Beside and beyond these there is a further range of social facts which shade off from the region of learning into that of physical habit and dexterity. Such are what is known as manners and breeding, polite usage, decorum, and formal and ceremonial observances generally. This class of facts is even more immediately and obtrusively presented to the observation, and they therefore more widely and more imperatively insisted on as required evidences of a reputable degree of leisure. It is worthwhile to remark that all that class of ceremonial observances which are classed under the general head of manners hold a more important place in the esteem of men during the stage of culture at which conspicuous leisure has the greatest vogue as a mark of reputability, than at later stages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barbarian of the quasi-peaceable stage of industry is notoriously a more high-bred gentleman, in all that concerns decorum, than any but the very exquisite among the men of a later age. Indeed, it is well known, or at least it is currently believed, that manners have progressively deteriorated as society has receded from the patriarchal stage. Many a gentleman of the old school has been provoked to remark regretfully upon the under-bred manners and bearing of even the better classes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ies; and the decay of the ceremonial code—or as it is otherwise called, the vulgarization of life—among the industrial classes prop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chief enormities of latter-day civilization in the eyes of all persons of delicate sensibilities. The decay which the code has suffered at the hands of a busy people testifies—all deprecation apart—to the fact that decorum is a product and an exponent of leisure class life and thrives in full measure only under a regime of status.

这些成就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是学术的一些支流。除此之

外，还存在一类社会现象，它们逐渐脱离了学术领域而融入了生活习惯和技巧的领域。这便是所谓的礼貌与教养，礼貌的习惯、礼节以及正式的或一般的礼仪。这类现象观察起来更加直接、显眼，因此，它们作为荣誉性有闲程度的证据，得到了更为广泛、更为迫切的坚持。值得一提的是，在炫耀性有闲作为声誉标志而盛行的文化阶段，所有礼貌名下的礼节都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种重视程度要高于文化发展的较后阶段。一位生活在准和平生产阶段的蛮夷人是出了名的绅士，在礼节方面，他极为有教养，只比后世最为讲究礼仪的人稍稍逊色。确实，众所周知或者至少人们现在认为，随着社会退出父权制阶段，习俗礼节也是江河日下。许多老派的绅士，看到现代工业社会的上层阶级也不懂礼仪，举止粗鲁，不免痛心疾首，感慨万千；在所有举止优雅、感情细腻的人看来，在正统的工业阶级之间存在着礼仪规范的败坏或者是所谓的生活粗俗化现象，这已经成为近代文明中的主要恶行之一。这些规范在终日忙碌的人手里衰败，这一点足以证明——且不谈上述那些批评指责——礼节是有闲阶级生活的产物和象征，只有在讲求身份的制度下才能蓬勃生长。

The origin, or better the derivation, of manners is, no doubt, to be sought elsewhere than in a conscious effort on the part of the well-mannered to show that much time has been spent in acquiring them. The proximate end of innovation and elaboration has been the higher effectiveness of the new departure in point of beauty or of expressiveness. In great part the ceremonial code of decorous usages owes its beginning and its growth to the desire to conciliate or to show goodwill, as anthropologists and sociologists are in the habit of assuming, and this initial motive is rarely if ever absent from the conduct of well-mannered persons at any stage of the later development. Manners, we are told, are in part an elaboration of gesture, and in part they are symbolical and conventionalized survivals representing former acts of dominance or of personal service or of personal contact. In large part they are an expression

of the relation of status,—a symbolic pantomime of mastery on the one hand and of subservience on the other. Wherever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predatory habit of mind, and the consequent attitude of mastery and of subservience, gives its character to the accredited scheme of life, there the importance of all punctilios of conduct is extreme, and the assiduity with which the ceremonial observance of rank and titles is attended to approaches closely to the ideal set by the barbarian of the quasi-peaceable nomadic culture. Some of the continental countries afford good illustrations of this spiritual survival. In these communities the archaic ideal is similarly approached as regards the esteem accorded to manners as a fact of intrinsic worth.

毫无疑问，礼貌的起源，或者更确切地说，礼貌的由来，不能求之于有教养的人为了表明他们学习礼貌花了很长时间而作出的自觉努力。创新与精心安排的直接目的是要使增加美观或表现力的新尝试更加有效率。礼节习俗的这些礼仪规范的出现与发展，就像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惯常推断的那样，大部分是出于博取好感和表示善意的愿望；在后来的任何发展阶段，那些有教养的人们的行为举止几乎都具备这种最初的动机。据说所谓礼貌，部分是精心摆出的姿态，部分是象征性和约定俗称的遗风，代表的是对下统治、对上服务和个人交往的既往行为。它们大部分是身份地位关系的表现——它们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所要表现的一方面是统治，另一方面是服从。现在，假如一种公认的生活方式具有掠夺性思维习惯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和服从态度之特征，行为上的繁文缛节就显得极其重要，其严格遵守等级、头衔等礼仪制度，与准和平游牧文化时期的蛮夷人所确定的完美标准十分接近。某些欧洲大陆国家为这种精神残余现象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在这些社会里，人们认为礼貌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对礼貌的重视也同样接近古老的理想标准。

Decorum set out with being symbol and pantomime and with having utility only as an exponent of the facts and qualities symbolized; but it presently suffered the transmutation which commonly passes over symbolical facts in human intercourse. Manners presently came, in popular apprehension, to be possessed of a substantial utility in themselves; they acquired a sacramental character, in great measure independent of the facts which they originally prefigured. Deviations from the code of decorum have become intrinsically odious to all men, and good breeding is, in everyday apprehension, not simply an adventitious mark of human excellence, but an integral feature of the worthy human soul. There are few things that so touch us with instinctive revulsion as a breach of decorum; and so far have we progressed in the direction of imputing intrinsic utility to the ceremonial observances of etiquette that few of us, if any, can dissociate an offence against etiquette from a sense of the substantial unworthiness of the offender. A breach of faith may be condoned, but a breach of decorum cannot. “Manners maketh man.”

礼节在开始时是一种象征、一种姿态，其作用只在于代表所象征的事实和品质；而它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人际交往中的象征性事实不再受到重视。不久，在一般人的理解中，礼貌本身具有了一种实质性的作用；礼貌取得了如圣礼一般神圣的特性，这种特性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它们原先所象征的事实之外。违背礼节规范成了人人憎恶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认为有教养不仅是人类美德的外在标志，而且是灵魂高洁的必要特征。很少有别的事物能像违背礼节那样让我们本能地感到厌恶；我们越来越认为遵守礼节具有其内在价值，因此，人们一看到有违礼节的行为，就会认为违礼者是令人不齿的，很少有人能将违礼行为与这种令人不齿的感觉分隔开来。背信弃义可以原谅，有违礼节则不可宽恕。“有礼方为人。”

None the less, while manners have this intrinsic utility, in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performer and the beholder alike, this sense of the intrinsic rightness of decorum is only the proximate ground of the vogue of manners and breeding. Their ulterior, economic ground is to be sought in the honorific character of that leisure or non-productive employment of time and effort without which good manners are not acquired. The knowledge and habit of good form come only by long-continued use. Refined tastes, manners, and habits of life are a useful evidence of gentility, because good breeding requires time, application and expense, and can therefore not be compassed by those whose time and energy are taken up with work. Knowledge of good form is *prima facie* evidence that that portion of the well-bred person's life which is not spent under the observation of the spectator has been worthily spent in acquiring accomplishments that are of no lucrative effect. In the last analysis the value of manner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y are the voucher of a life of leisure. Therefore, conversely, since leisure is the conventional means of pecuniary repute, the acquisition of some proficiency in decorum is incumbent on all who aspire to a modicum of pecuniary decency.

虽然礼貌具有这种内在的功用，但礼仪执行者和旁观者都认为，礼节具有内在正当性的观念只是礼节与教养成为风尚的一个近因，其更深层次的、经济的原因在于有闲的荣誉性，或消耗时间和精力的非生产性活动所具有的荣誉性，没有这类活动就不能获得较高的礼貌修养。只有经过长期不断实践，才能懂得礼节，才能养成礼貌的习惯。高雅的品位、仪态举止和生活习惯是身份高贵的有力证据，因为好的教养是需要消耗时间和金钱并不断实践的，因而好的教养是那些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劳动上的人所无法获得的。熟谙礼节是一望便知的可靠证据，它可以证明这位有教养的人在旁观者视线之外度过的那部分生活是消耗在获取无利可图的成就上了，因而是有价值的。归根到

底，礼貌的价值在于它们是有闲生活的证据。相反地，既然有闲是获取金钱荣誉的传统手段，对所有渴望获得一定金钱地位的人来说，熟谙礼节就是必不可少的。

So much of the honorable life of leisure as is not spent in the sight of spectators can serve the purposes of reputability only in so far as it leaves a tangible, visible result that can be put in evidence and can be measured and compared with products of the same class exhibited by competing aspirants for repute. Some such effect, in the way of leisurely manners and carriage, etc., follows from simple persistent abstention from work, even where the subject does not take thought of the matter and studiously acquire an air of leisurely opulence and mastery. Especially does it seem to be true that a life of leisure in this way persisted in through several generations will leave a persistent, ascertainable effect in the conformation of the person, and still more in his habitual bearing and demeanor. But all the suggestions of a cumulative life of leisure, and all the proficiency in decorum that comes by the way of passive habituation, may be further improved upon by taking thought and assiduously acquiring the marks of honorable leisure, and then carrying the exhibition of these adventitious marks of exemption from employment out in a strenuous and systematic discipline. Plainly, this is a point at which a diligent application of effort and expenditure may materially further the attainment of a decent proficiency in the leisure-class proprieties. Conversely, 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proficiency and the more patent the evidence of a high degree of habituation to observances which serve no lucrative or other directly useful purpose, the greater the consumption of time and substance impliedly involved in their acquisition, and the greater the resultant good repute. Hence, under the competitive struggle for proficiency in good manners, it comes about that much

pains is taken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habits of decorum; and hence the details of decorum develop into a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conformity to which is required of all who would be held blameless in point of repute. And h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conspicuous leisure of which decorum is a ramification grows gradually into a laborious drill in deportment and an education in taste and discrimination as to what articles of consumption are decorous and what are the decorous methods of consuming them.

因此，在旁观者视线之外度过的光荣的有闲生活，要想用来获取荣誉声望，唯一的方法是留下具体的、看得见的成果，这一成果是可以作为证据供人衡量的，并且是可以和其他渴望声誉的竞争者所展示的同类成果相比较的。由于这类成果是坚决避免劳动而得来的，尽管一个人没有想过也没有刻意摆出一副有闲的富裕尊贵的姿态，但他依然能表现出有闲的仪态举止。这样的有闲生活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并留存了下来，它会给个人的形态，尤其是他的习惯性的行为举止留下持久而又确定不移的影响。但是，所有日积月累的有闲生活的迹象以及所有通过被动适应而达到的礼节谙熟程度都可以得到进一步提高，这就要苦思冥想、绞尽脑汁并坚持不懈地取得光荣的有闲的标志，然后通过严格而又系统的方法把免除劳动的这些外在标志展示出来。显然，这时如果更加勤奋努力并且不惜费用，就可以使有闲阶级在礼节的谙熟程度上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反过来说，谙熟礼节的程度越高，适应无利可图或没有直接实用目的的礼仪的程度越明显，这意味着花费在这上面的时间和物力就越多，而其结果获得的声誉就越高。因此，在竞相争取谙熟礼节的过程中，在培养礼仪习惯方面自然要煞费苦心；礼仪上的繁文缛节也就因此发展成为一种内容广泛的训练，任何人要想在声誉方面无可指责，就必须经历这些训练。另一方面，产生礼仪的这种炫耀性有闲也就因此逐渐发展成为对仪态举止的艰苦训练，发展成为对品位和鉴赏力的培养，有了品位和鉴赏力就会知道哪些消费品是适宜的，用哪些方法消费它们是恰当的。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worthy of notice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producing pathological and other idiosyncrasies of person and manner by shrewd mimicry and a systematic drill have been turned to account in the deliberate production of a cultured class—often with a very happy effect. In this way, by the process vulgarly known as snobbery, a syncopated evolution of gentle birth and breeding is achieved in the case of a goodly number of families and lines of descent. This syncopated gentle birth gives results which, in point of serviceability as a leisure-class factor in the population, are in no wise substantially inferior to others who may have had a longer but less arduous training in the pecuniary proprieties.

在这方面有一点值得注意，这种刻意模仿和系统训练可能会在身体和行为方面产生病态的或其他的特质；蓄意利用这一点来造就一个高雅而有教养的阶级，往往会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这样，通过俗称为装腔作势的过程，许多家族和宗族迅速变成了有教养的名门望族。这种迅速形成的名门望族所产生的效果，就其作为民族中一个有闲阶级因素的实用性而言，绝不比另一类人逊色，后一类人在金钱礼仪上也许经受过更为长久的训练，但却不够认真刻苦。

There are, moreover, measureable degrees of conformity to the latest accredited code of the punctilios as regards decorous means and methods of consump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one person and another in the degree of conformity to the ideal in these respects can be compared, and persons may be graded and scheduled with some accuracy and effect according to a progressive scale of manners and breeding. The award of reputability in this regard is commonly made in good faith, on the ground of conformity to accepted canons of taste in the matters concerned, and without conscious regard to the pecuniary standing or the degree of leisure

practiced by any given candidate for reputability; but the canons of taste according to which the award is made are constantly under the surveillance of the law of conspicuous leisure, and are indeed constantly undergoing change and revision to bring them into closer conformity with its requirements. So that while the proximate ground of discrimination may be of another kind, still the pervading principle and abiding test of good breeding is the requirement of a substantial and patent waste of time. There may be some considerable range of variation in detail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principle, but they are variations of form and expression, not of substance.

再者，从适宜的消费方式方法角度讲，对最近公认的礼仪规范的符合程度是不同的，这种符合程度是可以衡量的。人和人对这些方面的理想标准的符合程度是存在差异的，这些差异是可以比较的；根据人们在礼貌和教养方面的渐进尺度，可以较为准确有效地将他们分级排序。这方面荣誉的授予通常是真实可信的，荣誉授予的依据是看某个荣誉候选人对相关事物的品位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公认的准则，而不是有意识地考虑其金钱地位或有闲程度。但是，授予荣誉所依据的品位准则是一直处于炫耀性有闲法则的监督之下的，实际上品位准则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与修正，以期能更加符合有闲法则的要求。所以，区分等级的依据可能并不在此，但是良好教养的普遍原则和经久考验依然是需要实质性地、显著地消耗时间。在这一原则的范围内，细节上可能有较大程度的变化，但是这类变化只是形式与表现上的，而非实质性的。

Much of the courtesy of everyday intercourse is of course a direct expression of consideration and kindly good-will, and this element of conduct has for the most part no need of being traced back to any underlying ground of reputability to explain either its

presence or the approval with which it is regarded; but the same is not true of the code of proprieties. These latter are expressions of status. It is of course sufficiently plain, to anyone who cares to see, that our bearing towards menials and other pecuniary dependent inferiors is the bearing of the superior member in a relation of status, though its manifestation is often greatly modified and softened from the original expression of crude dominance. Similarly, our bearing towards superiors, and in great measure towards equals, expresses a more or less conventionalized attitude of subservience. Witness the masterful presence of the high-minded gentleman or lady, which testifies to so much of dominance and independence of economic circumstances, and which at the same time appeals with such convincing force to our sense of what is right and gracious. It is among this highest leisure class, who have no superiors and few peers that decorum finds its fullest and maturest expression; and it is this highest class also that gives decorum that definite formulation which serves as a canon of conduct for the classes beneath. And here also the code is most obviously a code of status and shows most plainly its incompatibility with all vulgarly productive work. A divine assurance and an imperious complaisance, as of one habituated to require subservience and to take no thought for the morrow, is the birthright and the criterion of the gentleman at his best; and it is in popular apprehension even more than that, for this demeanor is accepted as an intrinsic attribute of superior worth, before which the base-born commoner delights to stoop and yield.

当然，日常生活中礼貌客套多数是体贴与善意的直接表示，要解释这一行为因素为何会存在，又为何会受到称赞，大都不需要追溯到荣誉的任何内在依据上去；但是，谈到礼节规范，情形却不同。后者是身份地位的表现。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十

分清楚地发现，我们对待仆役和其他经济不能独立的下级的态度是一位地位优越的人所持的态度；只是其表现已经得到了极大地缓和，不再像原先那么粗鲁、那么具有支配性了。同样，我们对待地位比我们优越的人以及大多数和我们地位相当的人则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习惯性的谦卑态度。请看看那些自命清高的先生和太太们，他们那种颐指气使、唯我独尊的表情足以证明其优越与独立的经济境况，同时这种表情具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让我们意识到什么叫得体，什么叫优雅。这一最高等级的有闲阶级，既没有地位出其右者，也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正是在这一阶级中间，礼节得到了最为充分、最为成熟的表现，也正是这一最高阶级使得礼节有了确定的形式，并成为其以下各阶级的行为准则，也正是在这一阶级当中，明确了礼仪准则就是身份地位的准则，清楚地表明它是与一切粗鄙的生产劳动格格不入的。自信非凡、颐指气使却又彬彬有礼，习惯于要求别人曲意逢迎而又从不考虑将来，这一切成了至高无上的绅士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衡量他们的标准；在一般人的理解中还不止如此，因为这样一种风度举止已经被认为是高贵品质的本质属性，在它面前出身卑微的平民是心悦诚服的。

As has been indicated in an earlier chapter,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institution of ownership has begun with the ownership of persons, primarily women. The incentives to acquiring such property have apparently been: (1) a propensity for dominance and coercion; (2) the utility of these persons as evidence of the prowess of their owner; (3) the utility of their services.

前一章已经提到，我们有理由相信所有权制度是从对人、主要是对女人的占有开始的。获得这类财产的动机显然在于：（1）统治与强迫的习性；（2）这些人的存在可以用来证明主人的勇武；（3）这些人可以提供服务。

Personal service holds a peculiar plac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stage of quasi-peaceable industry, and especially during the earlier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within the limits of this general stage, the utility of their services seems commonly to be the dominant motive to the acquisition of property in persons. Servants are valued for their services. But the dominance of this motive is not due to a decline in the absolute importance of the other two utilities possessed by servants. It is rather that the altered circumstances of life accentuate the utility of servants for this last-named purpose. Women and other slaves are highly valued, both as an evidence of wealth and as a means of accumulating wealth. Together with cattle, if the tribe is a pastoral one, they are the usual form of investment for a profit. To such an extent may female slavery give its character to the economic life under the quasi-peaceable culture that the women even comes to serve as a unit of value among peoples occupying this cultural stage—as for instance in Homeric times. Where this is the case there need be little question but that the basis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is chattel slavery and that the women are commonly slaves. The great, pervading human relation in such a system is that of master and servant. The accepted evidence of wealth is the possession of many women, and presently also of other slaves engaged in attendance on their master's person and in producing goods for him.

个人劳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准和平的生产阶段，尤其是在这一阶段的生产发展早期，之所以要获取以人为内容的财产，其主要动机往往是个人劳役自有其作用。奴仆之所以有价值是由于他们能够提供服务。但是，这一动机之所以是主要的，并不是因为奴仆所具有的其他两个功用的绝对重要性有所降低，而是因为生活环境的变化使得奴仆所具有的用于满足上述最后一个目的的功用变得更为重要了。妇女和其他奴隶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既可以当作财富的

证明，也可以作为积累财富的手段。如果该部落是个农牧部落，妇女与其他奴隶和牲畜一起，成为为了获得利润而进行的常见的投资方式。在准和平的文化阶段，女性受奴役成了经济生活的一个特征，处于这一文化阶段的民族中间，妇女甚至可以用来充当一种价值单位——例如荷马时代便是如此。但凡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其生产制度的基础必然是动产奴隶制，而妇女们通常都是奴隶。在这一制度下，人与人之间重要的、普遍的关系就是主仆关系。财富的公认证据就是占有许多妇女，到了此刻还要加上照顾主人生活起居、为他生产财物的其他奴隶。

A division of labor presently sets in, whereby personal service and attendance on the master becomes the special office of a portion of the servants, while those who are wholly employed in industrial occupations proper are removed more and more from all immediate relation to the person of their owner. At the same time those servants whose office is personal service, including domestic duties, come gradually to be exempted from productive industry carried on for gain.

不久就发生了劳动分工，提供个人服务和照料主人成为部分奴仆的专职，而有些人则全职从事于纯粹的生产工作，他们和主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同时，那些从事个人服务（包括家务劳动）的奴仆渐渐地脱离为了获利而进行的生产活动。

This process of progressive exemption from the common run of industrial employment will commonly begin with the exemption of the wife, or the chief wife. After the community has advanced to settled habits of life, wife-capture from hostile tribes becomes impracticable as a customary source of supply. Where this cultural

advance has been achieved, the chief wife is ordinarily of gentle blood, and the fact of her being so will hasten her exemption from vulgar employment.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oncept of gentle blood originates, as well as the place which it occup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riage, cannot be discussed in this place. For the purpose in hand it will be sufficient to say that gentle blood is blood which has been ennobled by protracted contact with accumulated wealth or unbroken prerogative. The woman with these antecedents is preferred in marriage, both for the sake of a resulting alliance with her powerful relatives and because a superior worth is felt to inhere in blood which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many goods and great power. She will still be her husband's chattel, as she was her father's chattel before her purchase, but she is at the same time of her father's gentle blood; and hence there is a moral incongruity in her occupying herself with the debasing employments of her fellow-servants. However completely she may be subject to her master, and however inferior to the male members of the social stratum in which her birth has placed her, the principle that gentility is transmissible will act to place her above the common slave; and so soon as this principle has acquired a prescriptive authority it will act to invest her in some measure with that prerogative of leisure which is the chief mark of gentility. Furthered by this principle of transmissible gentility the wife's exemption gains in scope, if the wealth of her owner permits it, until it includes exemption from debasing menial service as well as from handicraft. As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goes on and property becomes massed in relatively fewer hands, the conventional standard of wealth of the upper class rises. The same tendency to exemption from handicraft, and in the course of time from menial domestic employments, will then assert itself as regards the other wives, if such there are, and also as regards other servants in immediate attendance upon the person of their master. The exemption comes more tardily the remoter the

relation in which the servant stands to the person of the master.

这种逐渐脱离一般生产工作的过程通常是从妻妾或原配妻子开始的。社会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定居的生活方式，这时，从敌对部落掳掠妇女作为妻妾的传统补给来源已经行不通了。文化发展到这一阶段，原配妻子通常具有贵族血统，出身名门望族这一事实加速了她脱离粗鄙劳动的进程。贵族血统这一概念是如何出现的，它在婚姻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如何，这些问题在这里不便探讨。为了达到本探讨的目的，只需说明一点：所谓的贵族血统指的是因长期接触积累的财富或一直拥有特权而变得高贵的血统。有着这样出身的女子是一位理想的结婚对象，因为这样一来便可以和她有权势的亲戚攀上关系，也因为人们认为这种血统与丰富的财物和显赫的权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本身便具有高贵的价值。然而，她依然是她丈夫的动产，就像她在嫁入夫家之前是她父亲的动产一样；但是，她同时也拥有她父亲的高贵血统，因此让她从事仆人们所做的工作是不合道义的。尽管她完全隶属于主人，尽管在所出生的那个社会阶层中地位低于男性成员，但高贵血统可以遗传这一原则使得她的地位高于普通奴隶；一旦这一原则获得了约定俗成的权威，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她有闲的特权，这种特权是出身高贵的主要标志。在贵族血统可以遗传这一原则的推动下，作为原配妻子，如果主人的财力允许，她可以免除劳动的范围就会扩大，直到可以免除一切卑贱的仆役工作和手工劳动。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财产开始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上层阶级的传统财富标准也随之提高。首先是脱离手工劳动，经过一段时间又脱离了低贱的家务劳动，这种趋势首先发生在原配妻子身上；如果还有其他妻妾，相同的趋势也会出现在她们身上；这一趋势还会出现在贴身照料主人生活起居的奴仆身上。奴仆和主人的关系越亲密，就能越早免于劳役。

If the pecuniary situation of the master permits it, the development of a special class of personal or body servants is also

furthered by the very grave importance which comes to attach to this personal service. The master's person, being the embodiment of worth and honor, is of the most serious consequence. Both for his reputable standing in the community and for his self-respect, it is a matter of moment that he should have at his call efficient specialized servants, whose attendance upon his person is not diverted from this their chief office by any by-occupation. These specialized servants are useful more for show than for service actually performed. In so far as they are not kept for exhibition simply, they afford gratification to their master chiefly in allowing scope to his propensity for dominance. It is true, the care of the continually increasing household apparatus may require added labor; but since the apparatus is commonly increased in order to serve as a means of good repute rather than as a means of comfort, this qualification is not of great weight. All these lines of utility are better served by a larger number of more highly specialized servants. There results, therefore, a constantly increasing differentiation and multiplication of domestic and body servants, along with a concomitant progressive exemption of such servants from productive labor. By virtue of their serving as evidence of ability to pay, the office of such domestics regularly tends to include continually fewer duties, and their service tends in the end to become nominal only.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of those servants who are in most immediate and obvious attendance upon their master. So that the utility of these comes to consist, in great part, in their conspicuous exemption from productive labor and in the evidence which this exemption affords of their master's wealth and power.

如果主人的经济状况允许，私人或贴身仆役这一特殊阶级就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这种个人劳役是极其重要的。主人的身体是价

值与荣誉的化身，因此是至关重要的。为了社会上的荣誉地位，也为了自尊，他应该有一些能干的、专业的仆役随时听候差遣，这些仆役的主要职责是照料他的生活起居，是不应该为其他闲杂事务分心的。这些专业的仆役更多在于他们可以用来炫耀，多于他们实际提供的服务。他们也不仅仅是用来炫耀的，他们更要讨好主人让其满意，主要是要让他的支配欲有发泄的余地。家庭设备不断增加，确实需要增加人手；但是这一理由并不充分，因为设备是获取荣誉的手段而非提供享受的工具。仆役的人数越多、越专业，所有这些功能就能得到更好的发挥。结果，家庭或贴身仆役就不断分化，人数不断增加，这类仆役也随之逐渐脱离了生产劳动。因为这些仆役是用来证明主人具有支付能力的，这些家奴们的职责越来越少，最后他们的服务变得只是徒有其名了。对有些仆役来说，情况尤其如此，这些仆役对主人的照料是最直接、最明显的。所以，这些仆役的功用主要在于他们炫耀性地脱离生产劳动，在于这种脱离生产能够证明他们主人的财富与权势。

After some considerable advance has been made in the practice of employing a special corps of servant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a conspicuous leisure in this manner, men begin to be preferred above women for services that bring them obtrusively into view. Men, especially lusty, personable fellows, such as footmen and other menials should be, are obviously more powerful and more expensive than women. They are better fitted for this work, as showing a larger waste of time and of human energy. Hence it comes about that in the economy of the leisure class the busy housewife of the early patriarchal days, with her retinue of hard-working handmaidens, presently gives place to the lady and the lackey.

专门雇佣一批仆役来展示这种方式的炫耀性有闲，这种做法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在从事抛头露面的服务方面，男性开始比女性更受

欢迎。充当跟班或其他贱役的男性，尤其是那些健壮英俊的小伙子，显然要比女性更壮观，而价格也更昂贵。他们更加适合这类工作，可以表明时间和人力的更大浪费。如此一来，在有闲阶级的经济中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在早期的父权制时代，家庭主妇整日劳碌，围绕在她身边的是一班辛勤劳作的女仆；而现在，家庭主妇摇身一变成了贵妇，而跟在她身后的也变成了一群男仆。

In all grades and walks of life, and at any stag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eisure of the lady and of the lackey differs from the leisure of the gentleman in his own right in that it is an occupation of an ostensibly laborious kind. It takes the form, in large measure, of a painstaking attention to the service of the master, or to the maintenance and elaboration of the household paraphernalia; so that it is leisure only in the sense that little or no productive work is performed by this class, not in the sense that all appearance of labor is avoided by them. The duties performed by the lady, or by the household or domestic servants, are frequently arduous enough, and they are also frequently directed to ends which are considered extremely necessary to the comfort of the entire household. So far as these services conduce to the physical efficiency or comfort of the master or the rest of the household, they are to be accounted productive work. Only the residue of employment left after deduction of this effective work is to be classed as a performance of leisure.

在一切阶级和各行各业里，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贵妇及其随从的有闲与绅士的有闲不同，前者是种表面上看起来很辛苦的职业，后者是一种自有的权利。前者的表现形式主要在于侍奉主人时尽心尽力，维护及布置屋内陈设时殚精竭虑；所以，这里的所谓有闲指的是这一阶级很少或从不从事生产性劳动，而不是指他们可以避免从事任

何形式的劳动。贵妇或家仆所承担的职责往往是十分费力的，而且这些职责所要达到的目的往往被认为是对整个家庭的享受极其必要的。这些服务是有助于主人及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和物质享受的，就这一点而言，可以将它们视为生产性工作。只有除去这种有效工作后所留下来的那部分才能看作是有闲的表现。

But much of the services classed as household cares in modern everyday life, and many of the “utilities” required for a comfortable existence by civilized man, are of a ceremonial character. They are, therefore, properly to be classed as a performance of leisure in the sense in which the term is here used. They may be none the less imperatively necessar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ecent existence; they may be none the less requisite for personal comfort even, although they may be chiefly or wholly of a ceremonial character. But in so far as they partake of this character they are imperative and requisite because we have been taught to require them under pain of ceremonial uncleanness or unworthiness. We feel discomfort in their absence, but not because their absence results directly in physical discomfort; nor would a taste not trained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conventionally good and the conventionally bad take offence at their omission. In so far as this is true the labor spent in these services is to be classed as leisure; and when performed by others than the economically free and self-directed head of the establishment, they are to be classed as vicarious leisure.

但是，在现代日常生活中，被列为家务活的大部分劳动以及文明人为了过上舒适的生活所必需的许多“有用物品”，其性质是礼仪性的。因此，按照“有闲”一词此处的意义，可以将它们视为有闲的表现。为了过上体面的生活，它们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对物质享受来说，它们也是必需的，尽管它们主要或完全属于礼仪性质。正是由于

它们具有这种性质，它们才具有强制性和必要性，生活告诉我们它们是必要的，如果不做就是有违礼节的。少了它们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但是这不是因为缺少它们会直接导致物质上的不舒适；有些人的品位还没有达到可以辨别传统上的善与恶，少了这类劳务他们也不会感到恼火。既然如此，这些服务所消耗的劳动可以看作是有闲的；如果提供服务的是别人而不是经济独立的、可以自我决断的一家之主，那么这类服务应该看作是代理有闲。

The vicarious leisure performed by housewives and menials, under the head of household cares, may frequently develop into drudgery, especially where the competition for reputability is close and strenuous. This is frequently the case in modern life. Where this happens, the domestic service which comprises the duties of this servant class might aptly be designated as wasted effort, rather than as vicarious leisure. But the latter term has the advantage of indicating the line of derivation of these domestic offices, as well as of neatly suggesting the substantial economic ground of their utility; for these occupations are chiefly useful as a method of imputing pecuniary reputability to the master or to the household on the ground that a given amount of time and effort is conspicuously wasted in that behalf.

归于家务琐事的名下，由家庭主妇和仆役们执行的这种代理有闲，往往会发展为贱役苦工，在博取荣誉的竞赛十分紧张激烈的时候尤其如此。在现代生活中情况往往如此。如果出现了这一情形，也许应该把这一仆役阶级承担的家庭服务称为劳力浪费，而不应该称为代理有闲。但是这后一种叫法有一个优点，它可以表明这些家庭职责的起源演化，也能够间接地指出这些服务所具有的功用的实质性经济基础；因为这类工作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们可以给主人或者整个家庭带来金钱的荣誉，其理由是因为有一定量的时间和精力炫耀性地消耗在这

类工作上了。

In this way, then, there arises a subsidiary or derivative leisure class, whose office is the performance of a vicarious leisure for the behoof of the reputability of the primary or legitimate leisure class. This vicarious leisure class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leisure class proper by a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its habitual mode of life. The leisure of the master class is, at least ostensibly, an indulgence of a proclivity for the avoidance of labor and is presumed to enhance the master's own well-being and fullness of life; but the leisure of the servant class exempt from productive labor is in some sort a performance exacted from them, and is not normally or primarily directed to their own comfort. The leisure of the servant is not his own leisure. So far as he is a servant in the full sense, and not at the same time a member of a lower order of the leisure class proper, his leisure normally passes under the guise of specialized service directed to the furtherance of his master's fullness of life. Evidence of this relation of subservience is obviously present in the servant's carriage and manner of life. The like is often true of the wife throughout the protracted economic stage during which she is still primarily a servant—that is to say, so long as the household with a male head remains in force.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eisure class scheme of life, the servant should show not only an attitude of subservience, but also the effects of special training and practice in subservience. The servant or wife should not only perform certain offices and show a servile disposition, but it is quite as imperative that they should show an acquired facility in the tactics of subservience—a trained conformity to the canons of effectual and conspicuous subservience. Even to-day it is this aptitude and acquired skill in the formal manifestation of the servile relation that constitutes the chief element of utility in our highly

paid servants, as well as one of the chief ornaments of the well-bred housewife.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附属的或派生的有闲阶级，其职责就是为了主要的或正统的有闲阶级的荣誉而执行一种代理有闲。这与纯正的有闲阶级与代理有闲阶级不同，它的习惯性生活方式有着自己的特征。雇佣阶级的有闲至少在表面上体现了一种避免劳动的性格本性，人们认为这种有闲可以让主人的生活更加健康幸福，更加丰富多彩；但是脱离劳动的仆役阶级的有闲或多或少是强加给他们的，一般来说，这种有闲主要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享受。仆役的有闲不是他自己的有闲。只要他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仆役，同时又不是处于纯正有闲阶级底层的一员，他的有闲就往往会打着专业服务的幌子，实际上是为了让其主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仆役的举手投足间和生活方式上明显存在着这种从属关系的证据。这种情况往往也发生在主妇身上，在整个漫长的经济发展阶段，她的主要身份依然是奴仆—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家庭依然是男人当家做主，她的情况也往往如此。为了满足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的要求，仆役不但应该表现出服从的态度，而且还要显示出他在这方面是经过特殊训练的，是有实践经验的。仆役和主妇不应该仅仅履行某些职责，不应该仅仅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性格，他们还必须表现出谙熟服从的技巧——他们训练有素，能够遵守有效而又具有炫耀性的服从准则。即使在今天，这种在形式上表示服从关系的资质以及习得的技能依然是构成那些高薪仆役的功用的一个主要因素，也是有教养的家庭主妇的光环所在。

The first requisite of a good servant is that he should conspicuously know his place. It is not enough that he knows how to effect certain desired mechanical results; he must, above all, know how to effect these results in due form. Domestic service might be said to be a spiritual rather than a mechanical function. Gradually there grows up an elaborate system of good form,

specifically regulating the manner in which this vicarious leisure of the servant class is to be performed. Any departure from these canons of form is to be deprecated, not so much because it evinces a shortcoming in mechanical efficiency, or even that it shows an absence of the servile attitude and temperament, but because, in the last analysis, it shows the absence of special training. Special training in personal service costs time and effort, and where it is obviously present in a high degree, it argues that the servant who possesses it, neither is nor has been habitually engaged in any productive occupation. It is *prima facie* evidence of a vicarious leisure extending far back in the past. So that trained service has utility, not only as gratifying the master's instinctive liking for good and skillful workmanship and his propensity for conspicuous dominance over those whose lives are subservient to his own, but it has utility also as putting in evidence a much larger consumption of human service than would be shown by the mere present conspicuous leisure performed by an untrained person. It is a serious grievance if a gentleman's butler or footman performs his duties about his master's table or carriage in such unformed style as to suggest that his habitual occupation may be ploughing or sheepherding. Such bungling work would imply inability on the master's part to procure the service of specially trained servants; that is to say, it would imply inability to pay for the consumption of time, effort, and instruction required to fit a trained servant for special service under the exacting code of forms. I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rvant argues lack of means on the part of his master, it defeats its chief substantial end; for the chief use of servants is the evidence they afford of the master's ability to pay.

一个称职的仆役的首要条件是他应该明确地了解自己的位置。仅仅知道如何实现需要完成的机械任务是不够的；首先，他必须知道怎

样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这些任务。家庭服务的功用也许可以说是精神的而非机械的。于是逐渐出现了一套复杂的礼仪制度，这种制度是专门用来规范仆役阶级执行代理有闲的行为的。任何违背这些礼仪准则的行为都会受到指责，并不是因为这种行为显示了机械效率上的缺陷，甚至也不是因为它显示了奴性态度或性情的缺失，归根到底是因为它表明了这些仆役缺乏特殊训练。进行私人服务方面的特殊训练既耗时又费力，这种特殊训练的效果如果在仆役身上明显高度存在，那就说明，经历过这种训练的仆役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经常性地从事任何生产工作。这是代理有闲很久以前就存在的确凿证据。所以，经过训练的服务具有功用，它不但可以满足主人对优良和娴熟技巧的本能的爱好，不但可以满足他支配处于屈从地位的人的癖好，而且还有一种功用，那就是它可以证明，比起未经过训练的人所表现的简单的炫耀性有闲，它是消耗了更多的人类服务的。一位绅士的膳食总管或跟班在桌旁或马车前履行职责时，行为方式不合礼仪，这是件十分糟糕的事情，因为该行为会让人想到，他以前可能是种田的或放牧的。这种笨手笨脚的工作说明了这位主人没有能力雇佣受过专门训练的仆役来为他服务；也就是说，这位主人无力支付时间、精力和指导方面的消费，来培养一位能够按照严格的礼仪准则从事专门服务工作的仆役。如果仆役的表现说明了他的主人缺乏财力，雇佣仆役的主要目的就失败了；因为，仆役的主要用途在于他们可以证明主人具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What has just been said might be taken to imply that the offence of an under-trained servant lies in a direct suggestion of inexpensiveness or of usefulness. Such, of course, is not the case. The connection is much less immediate. What happens here is what happens generally. Whatever approves itself to us on any ground at the outset presently comes to appeal to us as a gratifying thing in itself; it comes to rest in our habits of thought as substantially right. But in order that any specific canon of deportment shall maintain itself in favor, it must continue to have the support of, or at least

not be incompatible with, the habit or aptitude which constitutes the norm of its development. The need of vicarious leisure, or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service, is a dominant incentive to the keeping of servants. So long as this remains true it may be set down without much discussion that any such departure from accepted usage as would suggest an abridged apprenticeship in service would presently be found insufferable. The requirement of an expensive vicarious leisure acts indirectly, selectively, by guiding the formation of our taste,—of our sense of what is right in these matters,—and so weeds out unconformable departures by withholding approval of them.

也许有人会认为上述所说的话意味着，一个缺乏训练的仆役之所以惹人讨厌，是因为他意味着价格低廉或实用性太强。实际上，情形并非如此。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远远没有这么直接。这里发生的情况和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任何事物，无论一开始以什么理由得到我们的认同，很快就会受到我们的欢迎，让我们觉得其本身就是令人满意的；它在我们的思维习惯中生了根，我们认为它在本质上是合理的。但是，任何一个具体的行为准则要想永久地得到人们的拥护，就必须继续得到习惯或性格本性的支持，至少不能与之相抵触，因为这种习惯或性格本性构成了行为准则的发展规范。代理有闲的需要或服务的炫耀性消费是蓄养奴仆的主要动机。只要情况确实如此，就可以肯定地说，违背公认的习俗意味着见习期的缩短，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这种昂贵的代理有闲的需求具有间接的、淘汰的作用，通过引导我们养成一种爱好——引导我们养成在这些事情上什么才是正确合理的观念——所以遇到有违礼节的行为就会制止，并把它们淘汰掉。

As the standard of wealth recognized by common consent advances, the possession and exploitation of servants as a means of showing superfluity undergoes a refinement. The possession and

maintenance of slaves employed in the production of goods argues wealth and prowess, but the maintenance of servants who produce nothing argues still higher wealth and position. Under this principle there arises a class of servants, the more numerous the better, whose sole office is fatuously to wait upon the person of their owner, and so to put in evidence his ability unproductively to consume a large amount of service. There supervenes a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the servants or dependents whose life is spent in maintaining the honor of the gentleman of leisure. So that, while one group produces goods for him, another group, usually headed by the wife, or chief, consumes for him in conspicuous leisure; thereby putting in evidence his ability to sustain large pecuniary damage without impairing his superior opulence.

随着公认的财富标准的提高，为显示财富而拥有和使用仆役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拥有并蓄养一批奴隶，让他们从事财物的生产，这可以证明主人的富有与勇武；蓄养一批奴隶，不让他们从事任何生产工作，却可以证明主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地位。在这一原则下，仆役阶级开始兴起，这个阶级的人数越多越好，他们的唯一职责就是傻傻地等待着伺候主人的生活起居，并以此证明这位主人不用生产却有能力消费大量的服务。随之出现了仆役或依附者之间的劳动分工，这些人的一生都用在维护有闲绅士的荣誉上了。这样，一群人为他生产财物，另一群人，通常是以妻妾或原配妻子为首的，以明显有闲的方式为他消费；这样可以证明他有能力承受巨大的金钱损失，他的富裕程度也不会因为这种损失而受到削弱。

This somewhat idealized and diagrammatic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nature of domestic service comes nearest being true for that cultural stage which has here been named the “quasi-peaceable” stage of industry. At this stage personal service first rises

to the position of an economic institution, and it is at this stage that it occupies the largest place in the community's scheme of life. In the cultural sequence, the quasi-peaceable stage follows the predatory stage proper, the two being successive phases of barbarian life. Its characteristic feature is a formal observance of peace and order, at the same time that life at this stage still has too much of coercion and class antagonism to be called peaceable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d. For many purposes, and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than the economic one, it might as well be named the stage of status. The method of human relation during this stage, and the spiritual attitude of men at this level of culture, is well summed up under the term. But as a descriptive term to characterize the prevailing methods of industry, as well as to indicate the trend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t this point in economic evolution, the term “quasi-peaceable” seems preferable. So far as concerns the communities of the Western culture, this ph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bably lies in the past; except for a numerically small though very conspicuous fraction of the community in whom the habits of thought peculiar to the barbarian culture have suffered but a relatively slight disintegration.

上面对家庭服务的发展和本质作了理想化的概括叙述，这种叙述与本探讨中称作准和平稳定生产阶段的文化阶段的情况最为接近。在这一阶段，个人服务首先上升为一种经济制度，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个人服务在社会生活方式中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准和平文化阶段是紧跟着纯掠夺文化阶段出现的，两者是蛮夷文化中相继的阶段。准和平文化阶段的特征是在形式上遵守和平与秩序，同时这一阶段的生活依然充满了强迫和阶级对立，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和平阶段。出于其他目的，从非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倒不妨把这一阶段称为身份制阶段。这一术语很好地概括了这一阶段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法以及处于这一文化水平上的人们的精神态度。但

是作为一个描述性词语，用来描述流行的生产方式并指出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一时刻的生产发展趋势，则比较恰当的是“准和平的”一词。就属于西方文化的各国而言，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可能只存在于过去，除非是该社会里为数不多却又极其显眼的一部分人，蛮夷文化所特有的思维习惯在这些人身上只出现了较细微的分解。

Personal service is still an element of great economic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regards the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goods; but its relative importance even in this direction is no doubt less than it once was. The best development of this vicarious leisure lies in the past rather than in the present; and its best expression in the present is to be found in the scheme of life of the upper leisure class. To this class the modern culture owes much in the way of the conservation of traditions, usages, and habits of thought which belong on a more archaic cultural plane, so far as regards their widest acceptance and their most effective development.

个人服务依然是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一个因素，在财物的分配与消费方面尤其如此；但是，即使在这个方面，毫无疑问，它今日的相对重要性已经不如往昔了。这种有闲代理的最高发展形态存在于过去而非现在；现在，它最高度的表现可以在上层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中看到。这一阶级对现代文化贡献良多，它保存了属于比较古老的文化阶段的传统、习俗和思维习惯，使得这些传统、习俗和思维习惯被广泛接受并得到极为有力的发展。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ies the mechanical contrivances available for the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of everyday life are highly developed. So much so that body servants, or,

indeed, domestic servants of any kind, would now scarcely be employed by anybody except on the ground of a canon of reputability carried over by tradition from earlier usage. The only exception would be servants employed to attend on the persons of the infirm and the feeble-minded. But such servants properly come under the head of trained nurses rather than under that of domestic servants, and they are, therefore, an apparent rather than a real exception to the rule.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为日常生活提供舒适与便利的机械装置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因此，除非是为了维护早期的习惯传统所遗留下来的荣誉准则，现在人们已经很少雇佣贴身侍从或任何形式的家庭仆役。唯一的例外是雇来照料体弱多病者或智力低下者的仆役。但是，这类仆役应该列入训练有素的护士一类，而不应该列入家庭仆役一类；因此，他们只是上述规则表面的而非真实的例外。

The proximate reason for keeping domestic servants, for instance, in the moderately well-to-do household of to-day, is (ostensibly) that the members of the household are unable without discomfort to compass the work required by such a modern establishment. And the reason for their being unable to accomplish it is (1) that they have too many “social duties”, and (2) that the work to be done is too severe and that there is too much of it. These two reasons may be restated as follows: (1) Under the mandatory code of decency, the time and effort of the members of such a household are required to be ostensibly all spent in a performance of conspicuous leisure, in the way of calls, drives, clubs, sewing-circles, sports,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like social functions. Those persons whose time and energy are employed in these matters privately avow that all these observances, as well as the

incidental attention to dress and other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re very irksome but altogether unavoidable. (2) Under the requirement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goods, the apparatus of living has grown so elaborate and cumbrous, in the way of dwellings, furniture, bric-a-brac, wardrobe and meals, that the consumers of these things cannot make way with them in the required manner without help. Personal contact with the hired persons whose aid is called in to fulfil the routine of decency is commonly distasteful to the occupants of the house, but their presence is endured and paid for, in order to delegate to them a share in this onerous consumption of household goods. The presence of domestic servants, and of the special class of body servants in an eminent degree, is a concession of physical comfort to the moral need of pecuniary decency.

例如，现在的小康之家之所以要雇佣家庭仆役，其直接（表面上的）原因是家庭成员不能轻松舒适地做完一个现代家庭所需要完成的工作。他们不能完成工作的理由有：（1）他们有太多的“社交责任”；（2）所需要完成的工作太艰难、太繁重。这两个理由可以重新表述如下：（1）在强制性的礼貌准则之下，这样一个家庭的成员必须把时间和精力全部用于表现炫耀性有闲上，方式有：走亲访友，驱车旅行，运动，参加俱乐部、缝纫会、慈善组织，以及其他类似的社交聚会。那些将时间和精力消耗在这些事情上的人私下承认，所有这些礼仪俗套以及对服饰和其他炫耀性消费的偶然关注都是十分令人厌烦的，却又完全无法避免。（2）因为对物品进行炫耀性消费的需要，各种生活设备，如住宅、家具、古玩、服饰和餐食等方面的设备，已经变得十分精致复杂，操作起来十分困难，所以，没有他人帮助，这些东西的拥有者就不能正确使用。雇佣这些人，可以让他们帮助完成礼仪上要求的日常工作，然而对房屋的主人来说，和这些人同处一室，他往往感到不愉快；但是，为了让他们分担消费家庭物品其中一部分繁重工作，就不得不忍受他们的存在，并给予报酬。家庭仆

役以及贴身侍从这一特殊阶层的大量存在，是物质享受对金钱礼仪上精神需求的妥协。

The largest manifestation of vicarious leisure in modern life is made up of what are called domestic duties. These duties are fast becoming a species of services performed, not so much for the individual behoof of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as for the reputability of the household taken as a corporate unit—a group of which the housewife is a member on a footing of ostensible equality. As fast as the household for which they are performed departs from its archaic basis of ownership-marriage, these household duties of course tend to fall out of the category of vicarious leisure in the original sense; except so far as they are performed by hired servants. That is to say, since vicarious leisure is possible only on a basis of status or of hired service,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relation of status from human intercourse at any point carries with it the disappearance of vicarious leisure so far as regards that much of life. But it is to be added, in qualification of this qualification, that so long as the household subsists, even with a divided head, this class of non-productive labor performed for the sake of the household reputability must still be classed as vicarious leisure, although in a slightly altered sense. It is now leisure performed for the quasi-personal corporate household, instead of, as formerly, for the proprietary head of the household.

在现代生活中，代理有闲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由所谓的家庭职责构成的。这些职责很快变成了一类服务，这些职责与其说是为了一家之主的个人利益，不如说是为了作为一个集体单位的整个家庭的荣誉——在这个家庭中，家庭主妇是在表面上处于平等地位的一员。一

旦执行这些职责的家庭脱离了其古老的占有制婚姻的基础，这些家庭职责当然也就脱离了原始意义上的代理有闲的范畴；除非这些职责是由雇佣来的仆役执行的。也就是说，既然代理休闲只可能建立在身份地位和雇佣劳动的基础上，身份地位关系在任何时候的人类交往中消失以后，在那一部分生活中的代理有闲也就消失了。但是，要补充说明的是，只要家庭制度依然存在，即使家长的权力已经分散，这种为了家庭荣誉的非生产性的劳动就依然应该归类为代理有闲，只是意义稍有变化而已。此刻，有闲是为了准个人的全体家庭而执行的有闲，而不像以前是为唯一的一家之主所执行的有闲了。

Chapter IV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第四章　炫耀性消费

In what has been said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vicarious leisure class and its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general body of the working classes, reference has been made to a further division of labor,—that between different servant classes. One portion of the servant class, chiefly those persons whose occupation is vicarious leisure, come to undertake a new, subsidiary range of duties—the vicarious consumption of goods. The most obvious form in which this consumption occurs is seen in the wearing of liveries and the occupation of spacious servants' quarters. Another, scarcely less obtrusive or less effective form of vicarious consumption, and a much more widely prevalent one, is the consumption of food, clothing, dwelling, and furniture by the lady and the rest of the domestic establishment.

在前一章谈到代理有闲阶级的发展以及这一阶级和普通劳动阶级的区别时，已经提及进一步的劳动分工——不同仆役阶级之间的劳动分工。仆役阶级的一部分，主要是那些以代理有闲为业的人，开始承担一系列新的附属职责——对财物的代理性消费。仆役们身穿制服，居住在宽敞的仆役宿舍里，这是代理消费的最为明显的形式。另一种形式的代理消费是贵妇和其他家庭成员对食物、衣着、住宅以及家具的消费，这种形式的代理消费几乎是同样明显、同样有效，并且是更为普遍、更为广泛的。

But already at a point in economic evolution far antedat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lady, specialized consumption of goods as an evidence of pecuniary strength had begun to work out in a more or less elaborate system. The beginning of a differentiation in consumption even antedates the appearance of anything that can fairly be called pecuniary strength. It is traceable back to the initial phase of predatory culture, and there is even a suggestion that an incipient differentiation in this respect lies back of the beginnings of the predatory life. This most primitive differentiation in the consumption of goods is like the later differentiation with which we are all so intimately familiar, in that it is largely of a ceremonial character, but unlike the latter it does not rest on a difference in accumulated wealth. The utility of consumption as an evidence of wealth is to be classed as a derivative growth. It is an adaption to a new end, by a selective process, of a distinction previously existing and well established in men's habits of thought.

但是，远在贵妇出现之前的某一经济发展阶段，对财物的专门消费作为金钱力量的证明，已经逐渐形成一种相对复杂的制度。甚至在任何可以称为金钱力量的事物出现以前，消费的分化现象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分化可以追溯到掠夺文化的初始阶段，甚至有人认为这方面的最初分化在掠夺文化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种财物消费最为原始的分化和我们大家都极为熟悉的、后来发生的分化相似，其相似之处在于它主要是礼仪性的，而和后者不同的是，它并不以积累财富的差异为基础。消费可以用来证明财富，消费的这种功用可以看作一种派生的发展。这是通过淘汰过程来适应新的区分目的，这种区分在人们的思维习惯之中早已存在并且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In the earlier phases of the predatory culture the only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is a broad distinction between an honorable superior class made up of the able-bodied men on the one side, and a base

inferior class of laboring women on the other. According to the ideal scheme of life in force at that time it is the office of the men to consume what the women produce. Such consumption as falls to the women is merely incidental to their work; it is a means to their continued labor, and not consumption directed to their own comfort and fullness of life. Unproductive consumption of goods is honorable, primarily as a mark of prowess and a perquisite of human dignity; secondarily it becomes substantially honorable to itself, especially the consumption of the more desirable things. The consumption of choice articles of food, and frequently also of rare articles of adornment, becomes tabu to the women and children; and if there is a base (servile) class of men, the tabu holds also for them. With a further advance in culture this tabu may change into simple custom of a more or less rigorous character; but whatever b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distinction which is maintained, whether it be a tabu or a larger conventionality, the features of the conventional scheme of consumption do not change easily. When the quasi-peaceable stage of industry is reached, with its fundamental institution of chattel slavery, the general principle, more or less rigorously applied, is that the base, industrious class should consume only what may be necessary to their subsistence.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luxuries and the comforts of life belong to the leisure class. Under the tabu, certain victuals, and more particularly certain beverages, are strictly reserved for the use of the superior class.

在掠夺文化的早期阶段，唯一的经济差别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大致区别，这两个阶级一方面是由身强体壮的男子组成的光荣的上层阶级，另一方面是由劳动妇女组成的卑贱的下层阶级。按照当时流行的生活方式，男子的职责就是消费女子所生产的东西。女性以劳动为主，消费为辅；女性的消费只是她们继续劳动的手段，这种消费的目

的不是为了她们自己生活上的享受和充实。并非为了继续生产而进行的财物消费是光荣的，首先它是勇武的标志，是对人类尊严的额外奖赏；其次，这种消费，尤其是对具有更高价值的物品的消费，其本身就是十分光荣的。对妇女和儿童来说，优质食品，通常还包括珍贵的装饰品的消费就成了一种禁忌；对于属于卑贱（奴隶）阶级的男性来说，这一禁忌同样适用。随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禁忌可能会变成较为严格的简单习俗，但是，无论这种区别的理论基础何在，无论它是禁忌还是含义更为广泛的习俗，这种传统消费方式的特征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当社会进入准和平生产阶段以后，其基本制度是动产奴隶制，这一阶段实行的较为严格的一般原则是，卑贱的劳动阶级只能消费维系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奢侈品和供享受的生活用品理所当然是属于有闲阶级的。在这一禁忌之下，某些食物，尤其是某些饮料，是严格规定由上层阶级专享的。

The ceremon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dietary is best seen in the use of intoxicating beverages and narcotics. If these articles of consumption are costly, they are felt to be noble and honorific. Therefore the base classes, primarily the women, practice an enforced continence with respect to these stimulants, except in countries where they are obtainable at a very low cost. From archaic times down through all the length of the patriarchal regime it has been the office of the women to prepare and administer these luxuries, and it has been the perquisite of the men of gentle birth and breeding to consume them. Drunkenness and the other pat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free use of stimulants therefore tend in their turn to become honorific, as being a mark, at the second remove, of the superior status of those who are able to afford the indulgence. Infirmities induced by over-indulgence are among some peoples freely recognized as manly attributes. It has even happened that the name for certain diseased conditions of the body arising from such an origin has passed into everyday speech as

a synonym for “noble” or “gentle”. It is only at a relatively early stage of culture that the symptoms of expensive vice are conventionally accepted as marks of a superior status, and so tend to become virtues and command the deference of the community; but the reputability that attaches to certain expensive vices long retains so much of its force as to appreciably lessen the disapprobation visited upon the men of the wealthy or noble class for any excessive indulgence. The same invidious distinction adds force to the current disapproval of any indulgence of this kind on the part of women, minors, and inferiors. This invidious traditional distinction has not lost its force even among the more advanced peoples of to-day. Where the example set by the leisure class retains its imperative force in the regulation of the conventionalities, it is observable that the women still in great measure practice the same traditional continence with regard to stimulants.

饮食上的这种礼仪性区别在酒精类饮料和麻醉品的使用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如果这些消费品价格不菲，人们就会觉得它们是高贵而又光荣的。因此，下层阶级，尤其是女性，对这类兴奋用品的使用必须实行强制性的节制，除了在这类用品可以以十分低廉的价格购得的国家。自远古时代以来，贯穿整个父权制时期，这些奢侈品的准备和管理一直是女性的职责，而消费这些奢侈品则是出身高贵而又有教养的男性所具有的特权。因此，由于这些兴奋品的无限制使用而造成的酩酊醉态和其他病态后果反而成了一种光荣，进而成了有能力沉迷于此类物品之人具有优越地位的标志。有些民族把那些因过度放纵而造成的疾病看作是男性特质。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因这种原因而造成的某些身体病态的名称已经进入日常语言，成了“高贵”和“文雅”的同义词。只有在较早的文化阶段，这些由奢侈的恶行所造成的症状才在传统上被看作是优越地位的标志，并因此成了德行，赢得了社会的尊敬；但是，这种奢侈的恶行所带来的荣誉长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力量，可以明显减轻富有阶级或贵族阶级男性因过度放纵而受到

的责难。也正是这种差别性歧视，加重了妇女、未成年人以及地位低下者因这类放纵而受到的谴责。这种传统的歧视性差别，即使在今天较为先进的民族里，仍然没有丧失其力量。只要有闲阶级所树立的榜样在习俗管理方面依然保持着其强制性的力量，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对于兴奋品的使用，妇女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持着传统的节制。

Thi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greater continence in the use of stimulants practiced by the women of the reputable classes may seem an excessive refinement of logic at the expense of common sense. But facts within easy reach of any one who cares to know them go to say that the greater abstinence of women is in some part due to an imperative conventionality; and this conventionality is, in a general way, strongest where the patriarchal tradition—the tradition that the woman is a chattel—has retained its hold in greatest vigor. In a sense which has been greatly qualified in scope and rigor, but which has by no means lost its meaning even yet, this tradition says that the woman, being a chattel, should consume only what is necessary to her sustenance,—except so far as her further consumption contributes to the comfort or the good repute of her master. The consumption of luxuries, in the true sense, is a consumption directed to the comfort of the consumer himself, and is, therefore, a mark of the master. Any such consumption by others can take place only on a basis of sufferance. In communities where the popular habits of thought have been profoundly shaped by the patriarchal tradition we may accordingly look for survivals of the tabu on luxuries at least to the extent of a conventional deprecation of their use by the unfree and dependent class. This is more particularly true as regards certain luxuries, the use of which by the dependent class would detract sensibly from the comfort or pleasure of their masters, or which are held to be of doubtful legitimacy on other grounds. In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great conservative middle

clas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use of these various stimulants is obnoxious to at least one, if not both, of these objections; and it is a fact too significant to be passed over that it is precisely among these middle classes of the Germanic culture, with their strong surviving sense of the patriarchal proprieties, that the women are to the greatest extent subject to a qualified tabu on narcotics and alcoholic beverages. With many qualifications—with more qualifications as the patriarchal tradition has gradually weakened—the general rule is felt to be right and binding that women should consume only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masters. The objection of course presents itself that expenditure on women's dress and household paraphernalia is an obvious exception to this rule; but it will appear in the sequel that this exception is much more obvious than substantial.

荣誉阶级的妇女在兴奋品的使用方面受到了更为严厉的节制，这种描述也许是对逻辑的过度修饰，是有悖常识的。但是，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就很容易发现一些事实，这些事实说明，妇女在兴奋品的使用方面更为严厉的节制，部分是因为强制性的习俗；一般来说，越是在父权制传统——视妇女为动产的传统——保持极大活力的地方，这种习俗的力量越是强大。虽然这一传统的范围和严格程度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它绝对没有丧失其意义。这一传统认为，妇女作为一种动产，只应该消费维系其生存所必需的东西，除非她的进一步消费有助于其主人的享受和名声。真正意义上的奢侈品消费是指为了消费者本人的享受而进行的消费，因此，这种消费是主人的标志。主人以外的其他人想要进行此类消费必须得到许可。在大众思维习惯深受父权制传统影响的社会里，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奢侈品禁忌的残余，这些社会至少在传统上是反对没有人身自由的阶级或从属的阶级使用奢侈品的。对某些奢侈品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如果从属阶级使用了这类奢侈品，就会明显降低其主人的享受和乐趣，或者是出于其他原因，使用这类奢侈品的合法性存在疑问。在西方文明中的广大保守中产阶级看来，使用各种兴奋品至少违背了以上两个反对理由之一。有

一个事实十分重要，不容忽视，即这些日耳曼文化下的中产阶级身上残存着强烈的父权制礼仪意识，正是在这些阶级中间，妇女在麻醉品和酒精类饮料上受到了最为严格的禁忌。妇女应该只为其主人的利益而进行消费，这一基本法则被认为是正当而又具有约束力的，它经过了多次修正，在父权制传统日渐衰微的过程中又经历了更多次的修正。当然，会有这样一种反对意见：妇女在衣着打扮和家庭装饰上的消费是该法则的一个明显例外；但是，说到底，这种例外与其说是实质性的，不如说是表面上的。

During the earlier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umption of goods without stint, especially consumption of the better grades of goods—ideally all consumption in excess of the subsistence minimum—pertains normally to the leisure class. This restriction tends to disappear, at least formally, after the later peaceable stage has been reached, with private ownership of goods and an industrial system based on wage labor or on the petty household economy. But during the earlier quasi-peaceable stage, when so many of the traditions through which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has affected the economic life of later times were taking form and consistency, this principle has had the force of a conventional law. It has served as the norm to which consumption has tended to conform, and any appreciable departure from it is to be regarded as an aberrant form, sure to be eliminated sooner or later in the further course of development.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对财物不加限制的消费，尤其是对优质财物的消费——理论上包括所有超出最低限度维持生存需要的消费——通常都是属于有闲阶级的。在社会进入和平阶段后期以后，这种限制至少在形式上趋于消失。在这一阶段，出现了财物的私人所有制，形成了建立在雇佣劳动或小家庭经济基础上的生产制度。但是在

准和平文化的较早阶段，这一原则已经具有了习惯法的效力。当时，许多传统正在形成并趋于稳定，而有闲阶级制度正是通过这些传统对后来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的。这一原则已经成了消费所必须遵守的规范，对这一原则的任何明显违背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反常行为，迟早要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予以消除。

The quasi-peaceable gentleman of leisure, then, not only consumes of the staff of life beyond the minimum required for subsistence and physical efficiency, but his consumption also undergoes a specialization as regards the quality of the goods consumed. He consumes freely and of the best, in food, drink, narcotics, shelter, services, ornaments, apparel, weapons and accoutrements, amusements, amulets, and idols or divinities. In the process of gradual amelioration which takes place in the articles of his consumption, the motive principle and proximate aim of innovation is no doubt the higher efficiency of the improved and more elaborate products for personal comfort and well-being. But that does not remain the sole purpose of their consumption. The canon of reputability is at hand and seizes upon such innovations as are, according to its standard, fit to survive. Since the consumption of these more excellent goods is an evidence of wealth, it becomes honorific; and conversely, the failure to consume in due quantity and quality becomes a mark of inferiority and demerit.

如此一来，准和平的有闲绅士不仅要消费超出维持其生存和体能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而且考虑到消费品品质其消费还要经过特殊化处理。他可以毫无限制地消费质量上乘的食物、饮料、麻醉品、住所、服务、装饰品、服装、武器及其设备、娱乐、护身符以及偶像或神像等。他所消费的物品逐渐得到改良，在这一过程中，毫无疑问，革新的主要动机和直接目的在于经过改良的、更为精美的物品

更有利于个人享受和康乐。但是，这并非是他们进行消费的唯一目的。荣誉法则就在眼前，它会接受一些革新，按照它的标准，这些革新是适合继续存在的。既然消费这些品质更为精良的财物是财富的证明，这种消费就成了一种光荣；相反地，没有能力消费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财物就成了低人一等和美德缺失的标志。

This growth of punctilious discrimination as to qualitative excellence in eating, drinking, etc, presently affects not only the manner of life, but also the training and intellectual activity of the gentleman of leisure. He is no longer simply the successful, aggressive male,—the man of strength, resource, and intrepidity. In order to avoid stultification he must also cultivate his tastes, for it now becomes incumbent on him to discriminate with some nicety between the noble and the ignoble in consumable goods. He becomes a connoisseur in creditable viands of various degrees of merit, in manly beverages and trinkets, in seemly apparel and architecture, in weapons, games, dancers, and the narcotics. This cultivation of aesthetic faculty requires time and application, and the demands made upon the gentleman in this direction therefore tend to change his life of leisure into a more or less arduous application to the business of learning how to live a life of ostensible leisure in a becoming wa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gentleman must consume freely and of the right kind of goods, there is the requirement that he must know how to consume them in a seemly manner. His life of leisure must be conducted in due form. Hence arise good manners in the way pointed out in an earlier chapter. High-bred manners and ways of living are items of conformity to the norm of conspicuous leisure and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对饮食等方面品质优良与否的辨别是十分严格的，这种日益严苛的辨别现在不仅影响到了有闲绅士的生活方式，还影响到了他的训练和智力活动。他不再仅仅是一位成功的、勇于进取的男性，也不再仅仅是一位身强体壮、足智多谋、英勇无畏的男性。为了避免变得愚蠢可笑，他还必须培养品位，因为他应当能够准确辨别哪些消费品是高贵的，哪些是低贱的，这已经成了他的义务。在品质不等的珍馐美味方面，在男性饮料和饰品方面，在得体的衣着打扮和建筑方面，在武器、竞赛、舞蹈及兴奋品方面，他成了一位鉴赏家。这种审美能力的培养是需要时间和实践的，因此，对绅士提出的上述要求往往会将他的有闲生活变成一种较为勤奋的学习，以学会如何才能以适当的方式过上表面有闲的生活。绅士必须毫无限制地消费适当品种的财物，和这一要求紧密相关的另一要求是，他还必须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消费这些财物。他必须以恰当的方式度过他的有闲生活。这样，礼貌就按照前一章指出的方式出现了。高雅的生活方式是与炫耀性有闲和炫耀性消费的规范相一致的。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valuable goods is a means of reputability to the gentleman of leisure. As wealth accumulates on his hands, his own unaided effort will not avail to sufficiently put his opulence in evidence by this method. The aid of friends and competitors is therefore brought in by resorting to the giving of valuable presents and expensive feasts and entertainments. Presents and feasts had probably another origin than that of naive ostentation, but they acquired their utility for this purpose very early, and they have retained that character to the present; so that their utility in this respect has now long been the substantial ground on which these usages rest. Costly entertainments, such as the potlatch or the ball, are peculiarly adapted to serve this end. The competitor with whom the entertainer wishes to institute a comparison is, by this method, made to serve as a means to the end. He consumes vicariously for his host at the same time that he is

witness to the consumption of that excess of good things which his host is unable to dispose of single-handed, and he is also made to witness his host's facility in etiquette.

对贵重财物的炫耀性消费是有闲绅士赢得声望的手段。随着积累在他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仅凭他个人努力而没有他人帮助，他是无法通过炫耀性消费的方法来充分证明他是富有的。于是，他通过赠送贵重礼物、举行奢华的宴会和各种招待来赢得其朋友和竞争者的另眼相待。赠送礼物和举行宴会不仅仅是为了单纯的夸耀，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是它们在很早就具有了满足单纯夸耀这一目的的功用，并且直到今天它们依然保持着这一特点；因此，它们在这一方面的功用很久以来一直是这些习俗存在的实质性基础。奢华的款待，如冬季赠礼节或舞会等，是特地为满足这一目的而举行的。通过这种方法，款待者希望与之进行比较的那位竞争对手就成了满足这一目的的工具。在为东道主进行代理消费的同时，他目睹了品质优良的东西被消费掉的全过程，这些过剩的东西单凭东道主一己之力是无法消耗掉的，这位竞争者还成了东道主精通礼节的见证人。

In the giving of costly entertainments other motives, of more genial kind, are of course also present. The custom of festive gatherings probably originated in motives of conviviality and religion; these motives are also present in the later development, but they do not continue to be the sole motives. The latter-day leisure-class festivities and entertainments may continue in some slight degree to serve the religious need and in a higher degree the needs of recreation and conviviality, but they also serve an invidious purpose; and they serve it none the less effectually for having a colorable non-invidious ground in these more avowable motives. But the economic effect of these social amenities is not therefore lessened, either in the vicarious consumption of goods or

in the exhibition of difficult and costly achievements in etiquette.

举行奢华的宴会当然还有其他较为友善的动机。节日聚会的习俗也许是源于欢乐和宗教的动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动机依然存在，但它们不再是唯一的动机。现代有闲阶级举行的欢宴可能在较低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宗教需求，在较高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娱乐与欢庆的需求，但是它们也被用来满足进行歧视性比较的目的；它们仍然可以有效地满足这一目的，因为在那些更加堂而皇之的动机之中存在着一个似是而非的非歧视性理由。但是，不论是在代理消费财物方面，还是在展示艰难而又昂贵的礼仪成就方面，这些社交活动的炫耀财富效果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减损。

As wealth accumulates, the leisure class develops further in function and structure, and there arises a differentiation within the class. There is a more or less elaborate system of rank and grades. This differentiation is furthered by the inheritance of wealth and the consequent inheritance of gentility. With the inheritance of gentility goes the inheritance of obligatory leisure; and gentility of a sufficient potency to entail a life of leisure may be inherited without the complement of wealth required to maintain a dignified leisure. Gentle blood may be transmitted without goods enough to afford a reputably free consumption at one's ease. Hence results a class of impecunious gentlemen of leisure incidentally referred to already. These half-caste gentlemen of leisure fall into a system of hierarchical gradations. Those who stand near the higher and the highest grades of the wealthy leisure class, in point of birth, or in point of wealth, or both, outrank the remoter-born and the pecuniarily weaker. These lower grades, especially the impecunious, or marginal, gentlemen of leisure, affiliate themselves by a system of dependence or fealty to the great ones; by so doing

they gain an increment of repute, or of the means with which to lead a life of leisure, from their patron. They become his courtiers or retainers, servants; and being fed and countenanced by their patron they are indices of his rank and vicarious consumers of his superfluous wealth. Many of these affiliated gentlemen of leisure are at the same time lesser men of substance in their own right; so that some of them are scarcely at all, others only partially, to be rated as vicarious consumers. So many of them, however, as make up the retainers and hangers-on of the patron may be classed as vicarious consumers without qualification. Many of these again, and also many of the other aristocracy of less degree, have in turn attached to their persons a more or less comprehensive group of vicarious consumers in the persons of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their servants, retainers, etc.

随着财富的积累，有闲阶级在职能和结构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样，在这一阶级内部就出现了分化。有闲阶级内部出现了较为复杂的等级制度。财富的继承以及由此而来的门第的继承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分化。继承门第的同时也就继承了义务的有闲；有些名门望族有充分能力负担有闲的生活，但遗留下来的财富也许不足以让后代维持有尊严的有闲生活。贵族血统或许可以传承，但未必有足够的财富供其后代轻松支付毫无节制的荣誉性消费。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贫穷的有闲绅士阶级，这一点在上文已经略微提到过。这些变种的有闲绅士成了等级制度的一部分。有些变种的有闲阶级在出身或财富方面，或者是在这两方面都接近较高等级或最高等级的富裕有闲阶级，而比出身较低或金钱力量较弱的人地位高。这些较低等级的绅士，尤其是贫穷的、边缘的有闲绅士，通过投靠或效忠的方式依附于大绅士门下；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他们的保护人提升自己的声望，或者得到过上有闲生活的金钱。他们成了大绅士的奉承者、侍从或奴仆；他们由他豢养，接受他的资助，于是就成了他的那一等级中的寄生者，成了他的剩余财富的代理消费者。在这些依附于人的有闲绅士当中，有许多人

本身也是个小财主；所以，他们之中有些人根本就不能算作代理消费者，其他人也不是完全的代理消费者。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保护人的侍从和食客，因此可以被列为没有资质的代理消费者。这类人当中的许多人以及许多其他较低等级的贵族又多多少少有一群形形色色的代理消费者依附于他们，如他们的妻子、子女、侍从以及奴仆等。

Throughout this graduated scheme of vicarious leisure and vicarious consumption the rule holds that these offices must be performed in some such manner, or under some such circumstance or insignia, as shall point plainly to the master to whom this leisure or consumption pertains, and to whom therefore the resulting increment of good repute of right inures. The consumption and leisure executed by these persons for their master or patron represents an investment on his part with a view to an increase of good fame. As regards feasts and largesses this is obvious enough, and the imputation of repute to the host or patron here takes place immediately, on the ground of common notoriety. Where leisure and consumption is performed vicariously by henchmen and retainers, imputation of the resulting repute to the patron is effected by their residing near his person so that it may be plain to all men from what source they draw. As the group whose good esteem is to be secured in this way grows larger, more patent means are required to indicate the imputation of merit for the leisure performed, and to this end uniforms, badges, and liveries come into vogue. The wearing of uniforms or liveries implies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dependence, and may even be said to be a mark of servitude, real or ostensible. The wearers of uniforms and liveries may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the free and the servile, or the noble and the ignoble. The services performed by them are likewise divisible into noble and ignoble. Of course the distinction

is not observed with strict consistency in practice; the less debasing of the base services and the less honorific of the noble functions are not infrequently merged in the same person. But the general distinction is not on that account to be overlooked. What may add some perplexity is the fact that this fundamental distinction between noble and ignoble, which rests on the nature of the ostensible service performed, is traversed by a secondary distinction into honorific and humiliating, resting on the rank of the person for whom the service is performed or whose livery is worn. So, those offices which are by right the proper employment of the leisure class are noble; such as government, fighting, hunting, the care of arms and accoutrements, and the like—in short, those which may be classed as ostensibly predatory employm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employments which properly fall to the industrious class are ignoble; such as handicraft or other productive labor, menial services, and the like. But a base service performed for a person of very high degree may become a very honorific office; as for instance the office of a Maid of Honor or of a Lady in Waiting to the Queen, or the King's Master of the Horse or his Keeper of the Hounds. The two offices last named suggest a principle of some general bearing. Whenever, as in these cases, the menial service in question has to do directly with the primary leisure employments of fighting and hunting, it easily acquires a reflected honorific character. In this way great honor may come to attach to an employment which in its own nature belongs to the baser sort.

在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的整个等级制度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法则：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的职能必须以特定的方式或者在特定的场合下执行，以便清楚地表明这种有闲或消费是属于主人的，由此而提升的声誉也是属于主人的。这些人为他们的主人或保护人执行的消费和有闲代表了主人的一种投资，其目的是为了提升其自身的声誉。在宴会和

馈赠的场合，这一点是再明显不过的；在这种场合所赢得的荣誉在众目注视之下直接属于主人或保护人。只要有闲和消费是由侍从和门客们代理执行的，由此产生的荣誉就属于保护人，因为侍从和门客们就在保护人的身旁，他们所依赖的来源别人是一望而知的。随着以这种方式赢得声誉的人群日益扩大，就需要有更为明显的手段来表明执行有闲的荣誉应当归属何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制服、徽章和号衣等等就开始流行起来。不论是实质性的还是表面上，穿着制服或号衣意味着高度的依赖，甚至可以说是奴役的标志。穿着制服或号衣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级——自由的和受奴役的，或高贵的和卑贱的。他们所从事的服务同样也可以分为高贵的和卑贱的两类。当然，这种区别在实践中划分得并不那么严格一致；卑贱服务中较为体面的工作和高贵职责中不太光荣的工作往往由同一人承担。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忽视了一般的区别。令人更加困惑的是，根据实际劳务的性质而做出的高贵与卑贱之间的这一基本区分会被光荣与耻辱之间的次要区别所掩盖，服务是为这一对象提供的，号衣是为他穿的，次要区别正是基于这个人的等级地位的基础。因此，凡是按理来说适合有闲阶级的职业都是高贵的，例如政治、战争、狩猎、武器装备的保养以及诸如此类的职业——简言之，所有表面上具有掠夺性的职业都是高贵的。另一方面，应当由劳动阶级从事的职业都是卑贱的，例如手工业或其他生产劳动，仆役工作以及诸如此类的职业。然而，如果服务的对象地位极高，则卑贱的服务也可能变成十分光荣的职责，例如宫女或皇后的贴身侍女，掌管国王的御马或者饲养猎犬的官吏。上面最后提到的两种职务表明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只要该卑贱职务与战争、狩猎等主要的有闲职业有着直接的关系，如上述的几种情形，它就很容易因此获得一种光荣的特性。这样，本质上卑贱的职业可能会具有极其光荣的属性。

In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peaceable industry, the usage of employing an idle corps of uniformed men-at-arms gradually lapses. Vicarious consumption by dependents bearing the insignia of their patron or master narrows down to a corps of liveried menials. In a

heightened degree, therefore, the livery comes to be a badge of servitude, or rather of servility. Something of an honorific character always attached to the livery of the armed retainer, but this honorific character disappears when the livery becomes the exclusive badge of the menial. The livery becomes obnoxious to nearly all who are required to wear it. We are yet so little removed from a state of effective slavery as still to be fully sensitive to the sting of any imputation of servility. This antipathy asserts itself even in the case of the liveries or uniforms which some corporations prescribe as the distinctive dress of their employees. In this country the aversion even goes the length of discrediting—in a mild and uncertain way—those government employments, military and civil, which require the wearing of a livery or uniform.

在和平生产阶段的后期，雇佣一批无所事事的武装随从的习俗逐渐消失。佩戴保护人或主人的徽章来执行代理消费的依附者规模减少到一批穿着制服的仆役。制服越发成为奴役的标志，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了屈从的标志。武装随从所穿的制服总是带有某种光荣的属性，但是，在制服成为仆役的特有标志以后，这种光荣的属性便不复存在。对必须穿着制服的人来说，几乎所有人都对它感到憎恶。我们脱离实际的奴隶制度的时间还不长，依然能够完全感受到受人奴役的痛苦。有些公司规定其员工必须穿着制服以示区别，这种做法也是令人憎恶的。在这个国家，这种厌恶之情以温和的、不太确定的方式甚至使得一些政府职务有失体面，不论这些职务是军事的还是民事的，因为这些职务要求其雇员必须穿着制服或号衣。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servitude, the number of vicarious consumers attached to any one gentleman tends, on the whole, to decrease. The like is of course true and perhaps in a still higher degree, of the number of dependents who perform vicarious leisure

for him. In a general way, though not wholly nor consistently, these two groups coincide. The dependent who was first delegated for these duties was the wife, or the chief wife; and, as would be expected, in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ion, when the number of persons by whom these duties are customarily performed gradually narrows, the wife remains the last. In the higher grades of society a large volume of both these kinds of service is required; and here the wife is of course still assisted in the work by a more or less numerous corps of menials. But as we descend the social scale, the point is presently reached where the duties of vicarious leisure and consumption devolve upon the wife alone. In the communities of the Western culture, this point is at present found among the lower middle class.

总体来说，随着奴役制的消失，依附于任何一位绅士的代理消费者的数量趋于减少。而为他执行代理有闲的依附者的数量也同样趋于减少，也许减少的数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两群人的数量大体一致，但并非完全一致，也并非总是一致的。最先被委以代理消费和代理有闲职责的是妻妾或原配妻子；可以意料到的是，当这种制度发展到后来，惯常履行这些职责的人数逐渐减少，如果最终还存在一位履行这些职责的人，那一定是其妻妾。在社会的较高等级中，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这两种服务都有着大量的需求；所以，妻子的工作依然需要一小批奴仆从旁协助。但是当我们循着社会等级自上而下观察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等级，妻子集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的职责于一身。在西方文化社会里，这一等级目前存在于中产阶级下层之中。

And here occurs a curious inversion. It is a fact of common observation that in this lower middle class there is no pretense of leisure on the part of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Through force of

circumstances it has fallen into disuse. But the middle-class wife still carries on the business of vicarious leisure, for the good name of the household and its master. In descending the social scale in any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y, the primary fact—the conspicuous leisure of the master of the household—disappears at a relatively high point. The head of the middle-class household has been reduced by economic circumstances to turn his hand to gaining a livelihood by occupations which often partake largely of the character of industry, as in the case of the ordinary business man of to-day. But the derivative fact—the vicarious leisure and consumption rendered by the wife, and the auxiliary vicarious performance of leisure by menials—remains in vogue as a conventionality which the demands of reputability will not suffer to be slighted. It is by no means an uncommon spectacle to find a man applying himself to work with the utmost assiduity, in order that his wife may in due form render for him that degree of vicarious leisure which the common sense of the time demands.

在这一等级里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反常现象。在中产阶级下层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即一家之主不再摆出有闲的样子。由于环境所迫，有闲已经废而不用。但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为了维护一家之主和整个家庭的荣誉，依然履行着代理有闲的职责。在所有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等级中，一家之主的明显有闲这一主要现象的消失程度相对较高。中产阶级家庭的一家之主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双手谋生活，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生产性，今天的普通商人的情况便是如此。但是，派生现象——由主妇提供的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以及由仆役执行的辅助代理有闲——却依然流行，为了赢得荣誉，这一现象作为一种习俗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一情形：一位男子拼命工作，为的就是让他的妻子可以以适当的方式向他提供一定程度的代理有闲，而这一定程度的代理有闲在当时被认为是必要的。

The leisure rendered by the wife in such cases is, of course, not a simple manifestation of idleness or indolence. It almost invariably occurs disguised under some form of work or household duties or social amenities, which prove on analysis to serve little or no ulterior end beyond showing that she does not and need not occupy herself with anything that is gainful or that is of substantial use. As has already been noticed under the head of manner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ustomary round of domestic cares to which the middle-class housewife gives her time and effort is of this character. Not that the results of her attention to household matters, of a decorative and mundificatory character, are not pleasing to the sense of men trained in middle-class proprieties; but the taste to which these effects of household adornment and tidiness appeal is a taste which has been formed under the selective guidance of a canon of propriety that demands just these evidences of wasted effort. The effects are pleasing to us chiefly because we have been taught to find them pleasing. There goes into these domestic duties much solicitude for a proper combination of form and color, and for other ends that are to be classed as aesthetic in the proper sense of the term; and it is not denied that effects having some substantial aesthetic value are sometimes attained. Pretty much all that is here insisted on is that, as regards these amenities of life, the housewife's efforts a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raditions that have been shaped by the law of conspicuously wasteful expenditure of time and substance. If beauty or comfort is achieved—and it is a more or less fortuitous circumstance if they are—they must be achieved by means and methods that commend themselves to the great economic law of wasted effort. The more reputable, “presentable” portion of middle-class household paraphernalia are, on the one hand, items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apparatus for putting in evidence the vicarious leisure rendered by

the housewife.

当然，在这些情形之下，主妇们提供的有闲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无所事事或怠惰。这种有闲几乎总是以某种形式的工作，或家庭职责，或社交应酬为掩护，但是细究起来就可以发现，除了表明她没有或不必从事任何以获利为目的的、实质性的工作，这种有闲很少或根本就不存在其他目的。消耗了中产阶级主妇时间和精力的家庭日常事务大多具有这一属性，这一点在前面礼貌的标题下已经提及。并不是说这位主妇照料家务所产生的装饰性的或整洁的效果不能取悦对中产阶级礼仪训练有素的男子；而是说，家庭装饰与整洁的效果所要迎合的品位，是在礼仪准则的淘汰性指导下形成的品位，而这种礼仪准则所要求的正是这些精力浪费的证明。这些效果之所以能取悦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所受的教导告诉我们，它们是令人愉快的。在履行这些家庭职责时，样式与色彩的恰当搭配以及其他可以归类为真正意义上的审美的目的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不可否认的是，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有时候确实获得了一些具有某种实质性美学价值的效果。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家庭主妇在生活设施方面的努力是在传统的指导下进行的，而这一传统是通过炫耀性浪费时间和物力这一法则形成的。如果要实现美观或舒适的效果——这种情况即使有，也是比较偶然的事情——其实现的方式方法就必须和浪费精力这个伟大的经济定律相一致。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陈设中，那些比较能为主人增光添彩的、“能摆出去示人的”部分，一方面是供炫耀性消费的物品，另一方面用来证明家庭主妇执行代理有闲的设备。

The requirement of vicarious consumption at the hands of the wife continues in force even at a lower point in the pecuniary scale than the requirement of vicarious leisure. At a point below which little if any pretense of wasted effort, in ceremonial cleanness and the like, is observable, and where there is assuredly no conscious attempt at ostensible leisure, decency still requires the wife to

consume some goods conspicuously for the reputability of the household and its head. So that, as the latter-day outcome of this evolution of an archaic institution, the wife, who was at the outset the drudge and chattel of the man, both in fact and in theory—the producer of goods for him to consume—has become the ceremonial consumer of goods which he produces. But she still quite unmistakably remains his chattel in theory; for the habitual rendering of vicarious leisure and consumption is the abiding mark of the unfree servant.

代理有闲的要求在财富低到某一点时就不存在了，但是由主妇执行代理消费的要求却依然存在。这时，在礼仪整洁等方面所进行的炫耀性精力浪费即使有也已经很少能够看到，肯定不会再存在为显示表面有闲而作出的有意识的努力了；但是，礼仪依然要求家庭主妇炫耀性地消费某些财物，这样做是为了一家之主和整个家庭的荣誉。这样一来，古老制度的这种演变产生了一个近代的后果：在开始时，不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理论上，妻子都是其丈夫的苦力和动产，为他生产财物以供他消费，现在摇身一变则成了一位礼仪性的消费者，所消费的就是她丈夫生产的财物。但在理论上，毫无疑问她依然是她丈夫的动产，因为经常执行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是没有自由的奴仆永恒不变的标志。

This vicarious consumption practiced by the household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cannot be counted as a direct expression of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of life, since the household of this pecuniary grade does not belong within the leisure class. It is rather that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of life here comes to an expression at the second remove. The leisure class stands at the head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point of reputability; and its manner of life and its standards of worth therefore afford the norm of reputability for the

community. The observance of these standards, in some degree of approximation, becomes incumbent upon all classes lower in the scale. In modern civilized communities the lines of demarcation between social classes have grown vague and transient, and wherever this happens the norm of reputability imposed by the upper class extends its coercive influence with but slight hindrance down through the social structure to the lowest strata. The result is that the members of each stratum accept as their ideal of decency the scheme of life in vogue in the next higher stratum, and bend their energies to live up to that ideal. On pain of forfeiting their good name and their self-respect in case of failure, they must conform to the accepted code, at least in appearance.

这种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家庭所实行的代理消费不能看作是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的直接表现，因为处于这一金钱等级的家庭不属于有闲阶级之列。实际上，有闲阶级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就荣誉方面来说，有闲阶级处于社会结构的顶层，因此，这个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就为整个社会提供了荣誉准则。遵守这些标准，接近这些标准，就成了社会等级较低的一切阶级应尽的义务。在现代文明社会里，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而又变幻不定；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所设定的荣誉准则一直向下扩展其强制性的影响力，直到社会结构的最下层阶级，而在扩展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是微乎其微的。其结果是，每一阶层的成员都把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当作其礼仪典范，并竭尽全力达到这一理想标准。如果他们不能达到这一标准，他们的名声和自尊就会受损，所以，他们必须遵守这一公认的准则，至少在表面上要做到这一点。

The basis on which good repute in any highly organized industrial community ultimately rests is pecuniary strength; and the means of showing pecuniary strength, and so of gaining or retaining

a good name, are leisure and a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goods. Accordingly, both of these methods are in vogue as far down the scale as it remains possible; and in the lower strata in which the two methods are employed, both offices are in great part delegated to the wife and children of the household. Lower still, where any degree of leisure, even ostensible, has become impracticable for the wife, th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goods remains and is carried on by the wife and children. The man of the household also can do something in this direction, and indeed, he commonly does; but with a still lower descent into the levels of indigence—along the margin of the slums—the man, and presently also the children, virtually cease to consume valuable goods for appearances, and the woman remains virtually the sole exponent of the household's pecuniary decency. No class of society, not even the most abjectly poor, forgoes all customary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The last items of this category of consumption are not given up except under stress of the direst necessity. Very much of squalor and discomfort will be endured before the last trinket or the last pretense of pecuniary decency is put away. There is no class and no country that has yielded so abjectly before the pressure of physical want as to deny themselves all gratification of this higher or spiritual need.

在任何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产业社会里，良好声誉最终总是建立在金钱力量的基础上；展示金钱力量从而赢得或保持良好声誉的手段是有闲和对财物的炫耀性消费。因此，社会等级由上而下，在任何等级中，只要有可能，这两种方法依然流行；在使用这两种方法的较低阶层，有闲和炫耀性消费这两项职责大部分落在了妻子和家中儿女身上。在更低的阶层里，任何程度的有闲，甚至是表面有闲，对家庭主妇来说都是不现实的，而对财物的炫耀性消费却依然存在，依然由妻子和儿女进行。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也可以进行一些炫耀性消费，实际上，他通常也是这样做的；不过，如果再降低一层，处于贫困的

水平——处于赤贫的边缘——男人，此时还包括其儿女，实际上都不再为了面子而消费贵重物品了，这样，家庭主妇实际上成了该家庭金钱荣誉的唯一代言人。社会上没有一个阶层，甚至包括最为穷困潦倒的阶层，会放弃一切习惯性的炫耀性消费。除非为最急切的需要所迫，否则人们是不会放弃这类消费的最基本的物品的。只有在遭受了极度的贫困和痛苦之后，人们才会放弃金钱礼仪的最后一点儿装饰或伪装。没有一个阶级，也没有一个国家，会卑下地向物质贫乏的压力屈服，并放弃完全满足这更高一层的或精神上的需求。

From the foregoing survey of the growth of conspicuous leisure and consumption, it appears that the utility of both alike for the purposes of reputability lies in the element of waste that is common to both. In the one case it is a waste of time and effort, in the other it is a waste of goods. Both are methods of demonstrating the possession of wealth and the two are conventionally accepted as equivalents. The choice between them is a question of advertising expediency simply, except so far as it may be affected by other standards of propriety, springing from a different source. On grounds of expediency the preference may be given to the one or the other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question is, which of the two methods will most effectively reach the persons whose convictions it is desired to affect. Usage has answered this question in different ways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从上文关于炫耀性有闲和炫耀性消费发展情况的概述来看，两者之所以都具有赢得荣誉的功用，是因为两者都具有浪费这一元素。前一种情况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后一种情况是对财物的浪费。两者都是展示拥有财富的方法，传统上认为两者具有相同的功效。在两者之间如何抉择，只是哪种方法对于自我宣传更为便利的问题，除非在

对它们进行选择时受到了来源不同的其他礼仪标准的影响。基于便利的理由，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会偏爱不同的方法。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取得人们的认可，哪一种方法更为有效。习俗已经在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

So long as the community or social group is small enough and compact enough to be effectually reached by common notoriety alone, that is to say, so long as the human environment to which the individual is required to adapt himself in respect of reputability is comprised within his sphere of personal acquaintance and neighborhood gossip—so long the one method is about as effective as the other. Each will therefore serve about equally well during the earlier stages of social growth. But when the differentiation has gone farther and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reach a wider human environment, consumption begins to hold over leisure as an ordinary means of decency.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during the later, peaceable economic stage.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mobility of the population now expose the individual to the observation of many persons who have no other means of judging of his reputability than the display of goods (and perhaps of breeding) which he is able to make while he is under their direct observation.

只要社会或社会群体还足够小，彼此联系足够紧密有效，公众能轻而易举地了解社会情况，也就是说，只要个人在荣誉方面必须使自己与之相适应的人类环境还局限于熟人和邻里闲谈的范围内，两种方法就同样有效。因此，在社会发展早期阶段，两者具有相同的功效。但是，随着社会进一步分化，接触更为广泛的人类环境成为必要，这时，消费就占了上风，它取代了有闲，成为赢得荣誉的通常手段。到了和平经济阶段的后期，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此时，交通工具

和人口流动使个人处于众人的观察之下，这些人想要判断他的声誉，除了通过亲眼目睹他所能够展示的财物（也许还有教养）之外，别无他法。

The modern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works in the same direction also by another line. The exigencies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frequently place individuals and households in juxtaposition between whom there is little contact in any other sense than that of juxtaposition. One's neighbors, mechanically speaking, often are socially not one's neighbors, or even acquaintances; and still their transient good opinion has a high degree of utility. The only practicable means of impressing one's pecuniary ability on these unsympathetic observers of one's everyday life is an unremitting demonstration of ability to pay. In the modern community there is also a more frequent attendance at large gathering of people to whom one's everyday life is unknown; in such places as churches, theaters, ballrooms, hotels, parks, shops, and the like. In order to impress these transient observers, and to retain one's self-complacency under their observation, the signature of one's pecuniary strength should be written in characters which he who runs may read. It is evident, therefore, that the present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is in the direction of heightening the utility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s compared with leisure.

现代产业组织通过另一种途径在这方面产生了作用。现代产业制度的迫切要求经常让不同的个人或不同的家庭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而这些个人或家庭除了在同一个地方外，很少有其他意义上的联系。机械地说，一个人的邻居往往不是其社交意义上的邻居，甚至算不上是点头之交；然而，他们一时的好评依然具有很高的功用。一个人要让日常生活中这些漠不相关的旁观者对自己的金钱力量留下印象，唯一

可行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展示其支付能力。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参加大型集会的机会比较多，例如在教堂、剧院、舞厅、旅馆、公园、商场以及诸如此类的场合，而参加集会的众人对这个人的日常生活一无所知。这些旁观者只是生活中的过客，要想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要想在他们的注视之下依然能保持一份自满自得的心情，就必须将自己的金钱力量清清楚楚地展示出来，让人在顷刻之间便能一览无遗。因此，很明显，现在的发展趋势是，比起炫耀性有闲，炫耀性消费的功用得到了增强。

It is also noticeable that the serviceability of consumption as a means of repute, as well as the insistence on it as an element of decency, is at its best in those portions of the community where the human contact of the individual is widest and the mobility of the population is greatest.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claims a relatively larger portion of the income of the urban than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claim is also more imperative. The result is that, in order to keep up a decent appearance, the former habitually live hand-to-mouth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the latter. So it comes, for instance, that the American farmer and his wife and daughters are notoriously less modish in their dress, as well as less urbane in their manners, than the city artisan's family with an equal income. It is not that the city population is by nature much more eager for the peculiar complacency that comes of a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nor has the rural population less regard for pecuniary decency. But the provocation to this line of evidence, as well as its transient effectiveness, is more decided in the city. This method is therefore more readily resorted to, and in the struggle to outdo one another the city population push their normal standard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to a higher point, with the result that a relatively greater expenditure in this direction is required to indicate a given degree of pecuniary decency in the city. The requirement of

conformity to this higher conventional standard becomes mandatory. The standard of decency is higher, class for class, and this requirement of decent appearance must be lived up to on pain of losing caste.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个人之间接触最广泛、人口流动最频繁的社会，消费，作为赢得声望的手段以及保持体面的一个因素，其作用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相对而言，炫耀性消费占收入的份额比占农村居民收入的份额要大，并且城镇居民对炫耀性消费的需求更加迫切。其结果是，为了装点门面，较之农村人，更多的城镇居民经常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例如，众所周知，比起具有同等收入的城市工匠家庭，一位美国农场主及其妻女的穿着打扮就不够时髦，行为举止就不够文雅。这不是因为城里人天生就更加渴望得到炫耀性消费所带来的独特的满足感，也不是因为农村人对金钱荣誉看得更淡一些，而是因为，在城市里，这类现象所引起的反应更为强烈，其产生的短暂的效果也更为明显。因此，城里人更乐于使用这种方法，在你追我赶的竞赛中，城里人一再将炫耀性消费的正常标准推向更高的标准，其结果是，在城市里，为了表明一定程度的金钱礼仪，就需要在这方面支出相对更多的费用。符合这一更高的传统标准就成为强制性的要求。这种礼仪标准随着阶级等级的提高而提高，必须要符合外表体面这一要求，否则就会失去应有的身份地位。

Consumption becomes a larger element i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the city than in the country. Among the country population its place is to some extent taken by savings and home comforts known through the medium of neighborhood gossip sufficiently to serve the like general purpose of Pecuniary repute. These home comforts and the leisure indulged in—where the indulgence is found—are of course also in great part to be classed as items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much the same is to be

said of the savings. The smaller amount of the savings laid by the artisan class is no doubt due, in some measure, to the fact that in the case of the artisan the savings are a less effective means of advertisement, relative to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he is placed, than are the savings of the people living on farms and in the small villages. Among the latter, everybody's affairs, especially everybody's pecuniary status, are known to everybody else. Considered by itself simply—taken in the first degree—this added provocation to which the artisan and the urban laboring classes are exposed may not very seriously decrease the amount of savings; but in its cumulative action, through raising the standard of decent expenditure, its deterrent effect on the tendency to save cannot but be very great.

比起农村，消费在城市生活标准中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农村人中间，储蓄和增添家用设施取代了消费，并通过邻里间家长里短的闲聊这一媒介为人所知，从而有效地达到了赢得金钱荣誉的一般目的。这类家庭设施以及尽情享受这些设施所带来的有闲——假如可以尽情享受的话——当然大体上也可以归为有闲消费项目；储蓄的情况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工匠阶级储蓄的数额较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对于一个工匠来说，在他所处的环境中，储蓄是一种不太有效的宣传方式，而生活在农场或小村庄的人就不同了，他们的储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宣传方式。在后者中间，每个人的私事，尤其是金钱状况，都是众所周知的。工匠和城市其他劳动阶级会受到这一额外的刺激，单就这一刺激本身而言，最初也许不会显著降低他们的储蓄额；但这种刺激在积累过程中，通过提高礼仪消费标准，对储蓄本性的抑制作用不得不说是很巨大的。

A felicitous illustrati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this canon of reputability works out its results is seen in the practice of dram-

drinking, “treating,” and smoking in public places, which is customary among the laborers and handicraftsmen of the towns, and among the lower middle class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Generally journeyman printers may be named as a class among whom this form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has a great vogue, and among whom it carries with it certain well-marked consequences that are often deprecated. The peculiar habits of the class in this respect are commonly set down to some kind of an ill-defined moral deficiency with which this class is credited, or to a morally deleterious influence which their occupation is supposed to exert, in some unascertainable way, upon the men employed in it. The state of the case for the men who work in the composition and press rooms of the common run of printing-houses may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Skill acquired in any printing-house or any city is easily turned to account in almost any other house or city; that is to say, the inertia due to special training is slight. Also, this occupation requires more than the average of intelligence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and the men employed in it are therefore ordinarily more ready than many others to take advantage of any slight variation in the demand for their labor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The inertia due to the home feeling is consequently also slight. At the same time the wages in the trade are high enough to make movement from place to place relatively easy. The result is a great mobility of the labor employed in printing; perhaps greater than in any other equally well-defined and considerable body of workmen. These men are constantly thrown in contact with new groups of acquaintances, with whom the relations established are transient or ephemeral, but whose good opinion is valued none the less for the time being. The human proclivity to ostentation, reenforced by sentiments of good fellowship, leads them to spend freely in those directions which will best serve these needs. Here as elsewhere prescription seizes upon the custom as soon as it gains a vogue, and

incorporates it in the accredited standard of decency. The next step is to make this standard of decency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a new move in advance in the same direction—for there is no merit in simple spiritless conformity to a standard of dissipation that is lived up to as a matter of course by everyone in the trade.

在公共场合浅酌、“做东”和吸烟等行为就是这一荣誉准则产生效果最恰当例证，这些活动在城里的体力劳动者、手工业者以及城市人口的中下层阶级中十分常见。通常，熟练印刷工也可以列为这一阶级，在他们中间，这种形式的炫耀性消费蔚然成风，而这种形式的消费往往会在他们中间产生明显的、为人诟病的不良后果。人们通常认为，这一阶级之所以有这方面的独特习惯，是因为这一阶级存在着某种不甚明确的道德缺陷，或者是由于这种职业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对雇佣人员的道德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在普通印刷厂的排字房和印刷间工作的人，其情况可以总结如下。他们在任何印刷厂或任何城市习得的技能，到了另一个印刷厂或另一个城市马上就可以利用；也就是说，由于特殊训练所形成的惰性是很轻微的。并且，这种职业所需要的智力和常识要高于平均水平，因此，从事这一职业的人通常更善于利用不同地方对他们行业的劳动需求的细微变化。这样，乡土观念所带来的惰性也很轻微。同时，这一行业的工资较高，足以让他们相对容易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其结果是，印刷业的雇佣劳动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也许比同样其他界限分明的、人数众多的工人群体的流动性更大。这些人经常要和新结识的人接触，虽然他们之间建立的关系是短促的或暂时的，但是这些新结识的人的好评在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是很重要的。人类具有喜欢炫耀的性格本性，再加上朋友意气，使得他们在最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方面挥金如土。这里和其他场合一样，习惯一旦流行就成了一种规则，并与公认的礼仪标准成为一体。下一步是以这一新的礼仪标准作为出发点，向同一方向开始一个新的行动——因为仅仅死守同行中人人都认为理所当然应达到的那个浪费标准而无发展，则是没什么可取的。

The greater prevalence of dissipation among printers than among the average of workmen is accordingly attributable, at least in some measure, to the greater ease of movement and the more transient character of acquaintance and human contact in this trade. But the substantial ground of this high requirement in dissipation is in the last analysis no other than that same propensity for a manifestation of dominance and pecuniary decency which makes the French peasant-proprietor parsimonious and frugal, and induces the American millionaire to found colleges, hospitals and museums. If the canon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were not offset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by other features of human nature, alien to it, any saving should logically be impossible for a population situated as the artisan and laboring classes of the cities are at present, however high their wages or their income might be.

因此，印刷工人中间的挥霍浪费现象之所以比一般工人更加普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该行业工作变动更为容易，与人相识及交往更为短暂。但是，之所以对浪费具有高度需求，其实质性理由归根结底是人们具有展示优越性及金钱礼仪的性格本性；法国自耕农之所以朴素节俭，美国的百万富翁之所以建立大学、医院和博物馆，都是因为这种性格本性。人性中还存在其他与此相抵触的特征，如果炫耀性消费的准则没有被这类特征大大抵消，则对于处境如城市工匠和劳动阶级的人们来说，不论他们的收入与工资有多高，要想有任何储蓄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的。

But there are other standards of repute and other, more or less imperative, canons of conduct, besides wealth and its manifestation, and some of these come in to accentuate or to qualify the broad, fundamental canon of conspicuous waste. Under the simple test of effectiveness for advertising, we should expect to find leisure and

th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goods dividing the field of pecuniary emulation pretty evenly between them at the outset. Leisure might then be expected gradually to yield ground and tend to obsolescence a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goes forward, and the community increases in size; while th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goods should gradually gain in importance, both absolutely and relatively, until it had absorbed all the available product, leaving nothing over beyond a bare livelihood. But the actual course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is ideal scheme. Leisure held the first place at the start, and came to hold a rank very much above wasteful consumption of goods, both as a direct exponent of wealth and as an element in the standard of decency , during the quasi-peaceable culture. From that point onward, consumption has gained ground, until, at present, it unquestionably holds the primacy, though it is still far from absorbing the entire margin of production above the subsistence minimum.

但是，除了财富及其展示以外，还有其他荣誉标准和较具强制性的行为准则，其中多多少少会助长炫耀性浪费这一广泛的基本准则，有些则会对它产生限制性作用。我们应该可以想象，但以宣传的有效性这一简单考验而言，有闲和对财物的炫耀性消费一开始在金钱竞赛中的作用是平分秋色的。随着经济向前发展，随着社会规模的逐渐扩大，有闲会逐渐向炫耀性消费让步，直至作废不用；而对财物的炫耀性消费的重要性会与日俱增，无论这种重要性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直到最后，除了仅够维持生计的东西，一切可以得到的产品都成了其消费对象。然而，实际的发展过程和这一理想方案稍有不同。在准和平文化阶段，有闲一开始是居于首位的，无论是作为财富的直接标志还是作为礼仪标准中的一个因素，其地位都远远高于对财物的浪费性消费。从此，消费的势力逐渐增强，到了今天，消费无疑已经占据首要位置，但是距离它吸收超出维持最低限度生活需要以外的所有产品还很远。

The early ascendency of leisure as a means of reputability is traceable to the archaic distinction between noble and ignoble employments. Leisure is honorable and becomes imperative partly because it shows exemption from ignoble labor. The archaic differentiation into noble and ignoble classes is based on an invidious distinction between employments as honorific or debasing; and this traditional distinction grows into an imperative canon of decency during the early quasi-peaceable stage. Its ascendency is furthered by the fact that leisure is still fully as effective an evidence of wealth as consumption. Indeed, so effective is it in the relatively small and stable human environment to which the individual is exposed at that cultural stage, that, with the aid of the archaic tradition which deprecates all productive labor, it gives rise to a large impecunious leisure class, and it even tends to limit the production of the community's industry to the subsistence minimum. This extreme inhibition of industry is avoided because slave labor, working under a compulsion more rigorous than that of reputability, is forced to turn out a product in excess of the subsistence minimum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subsequent relative decline in the use of conspicuous leisure as a basis of repute is due partly to an increasing relative effectiveness of consumption as an evidence of wealth; but in part it is traceable to another force, alien, and in some degree antagonistic, to the usage of conspicuous waste.

作为赢得声誉的一个手段，有闲在早期之所以占有优势，其原因可追溯于高贵职业和卑贱职业这一古老区别。有闲之所以是光荣的并且具有强制性，部分是因为有闲可以表明并未参与卑贱的劳动。高贵阶级和卑贱阶级的这种古老划分，其依据是职业有贵贱的歧视性区别；在准和平阶段早期，这一传统区别逐渐变成了强制性的礼仪准则。有闲和消费一样，依然是财富的充分有效地证明，这一事实进一

步助长了有闲的优势。实际上，在这一文化阶段，个体所处的人类环境相对狭小、相对稳定，有闲的效用十分明显。在轻视一切生产劳动这一古老传统的帮助下，它产生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贫穷的有闲阶级，它甚至本性于将社会生产的产品限制在最低限度维持生计的范围内。这种对生产的极端限制最终得以避免，是因为奴隶的劳动；赢得荣誉具有强制性，而奴隶们在比赢得荣誉更为严厉的强制下劳动，被迫生产出超出劳动阶级最低限度维持生活需要的产品。后来，利用炫耀性有闲作为赢得荣誉的基础，这种做法之所以逐渐减少，部分是由于消费作为财富的证明，其效果相对提高；部分是由于出现了另一种势力，这种势力是与炫耀性浪费的习俗相抵触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之相对立的。

This alien factor is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Other circumstances permitting, that instinct disposes men to look with favor upon productive efficiency and on whatever is of human use. It disposes them to deprecate waste of substance or effort.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is present in all men, and asserts itself even under very adverse circumstances. So that however wasteful a given expenditure may be in reality, it must at least have some colorable excuse in the way of an ostensible purpose. The manner in which,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instinct eventuates in a taste for exploit and an invidious discrimination between noble and ignoble classes has been indicated in an earlier chapter. In so far as it comes into conflict with the law of conspicuous waste,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expresses itself not so much in insistence on substantial usefulness as in an abiding sense of the odiousness and aesthetic impossibility of what is obviously futile. Being of the nature of an instinctive affection, its guidance touches chiefly and immediately the obvious and apparent violations of its requirements. It is only less promptly and with less constraining force that it reaches such substantial violations of its requirements

as are appreciated only upon reflection.

这一相抵触的因素就是技艺的本能。只要环境允许，这种本能就会使人重视生产效率，重视一切对人类有用的东西。这种本能也会使人反对物质或精力的浪费。任何人都具有这种技艺的本能，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之中，这种本能依然存在。所以，不论某一开支实际上是多么浪费，它至少会有一个表面的效用作为冠冕堂皇的借口。在特殊环境下，这种本能会使人们嗜好侵占，喜欢对贵贱阶级进行歧视性对比，这一点在前一章已经指出。一旦这种技艺的本能与炫耀性浪费的法则相抵触，它不只是表现为对实际功用的坚持，更多地表现为它对明显无用的事物始终感到憎恶，认为其丑陋。技艺的本能在本质上是一种直觉情感，它主要是对明显违背其要求的情况进行直接的引导。有些行为实质性地违背了技艺本能的要求，而这些违背行为只有经过反思才能发现；技艺本能在应对这类违背行为时就不够及时，而且约束力不强。

So long as all labor continues to be performed exclusively or usually by slaves, the baseness of all productive effort is too constantly and deterrently present in the mind of men to allow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seriously to take effect in the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usefulness; but when the quasi-peaceable stage (with slavery and status) passes into the peaceable stage of industry (with wage labor and cash payment), the instinct comes more effectively into play. It then begins aggressively to shape men's views of what is meritorious, and asserts itself at least as an auxiliary canon of self-complacency. All extraneous considerations apart, those persons (adults) are but a vanishing minority to-day who harbor no inclination to the accomplishment of some end, or who are not impelled of their own motion to shape some object or fact or relation for human use. The propensity may in large measure be

overborne by the more immediately constraining incentive to a reputable leisure and an avoidance of indecorous usefulness, and it may therefore work itself out in make-believe only; as for instance in “social duties,” and in quasi-artistic or quasi-scholarly accomplishments, in the care and decoration of the house, in sewing-circle activity or dress reform, in proficiency at dress, cards, yachting, golf, and various sports. But the fact that it may under stress of circumstances eventuate in inanities no more disproves the presence of the instinct than the reality of the brooding instinct is disproved by inducing a hen to sit on a nestful of china eggs.

只要一切劳动都是专门由奴隶来从事的或者通常是由奴隶来从事的，一切生产劳动的卑劣性就会永恒地存在于人们的意念之中，从而使技艺的本能不能够在生产有用性方面发生真正的作用；但是，当以奴隶制和身份制为特征的准和平阶段过渡到以雇佣劳动和现金支付为特征的和平生产阶段时，这种本能开始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从那时起，这项本能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帮助人们形成了何者才是有价值的这一观念，至少它成了自满自足的辅助性准则。撇开一切无关紧要的问题不谈，丝毫没有实现某个目标的意愿，自己也没有塑造于人有益的物、事和关系的动机，这样的人（成年人）在当今社会是少之又少的。这种技艺本能的性格本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更加直接、更具约束力的动机所压制，如获得光荣有闲、避免不合礼仪的实用等动机；所以，这种本能只能以伪装的形式发挥作用，例如“社交义务”、准艺术或准学术成就、住宅的照管与装饰、缝纫会活动或服饰改良、精通衣着打扮、打牌、驾驶游艇、打高尔夫以及其他各种运动。迫于环境，这种本能会让人们从事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一事实并不否认技艺本能的存在，就像诱使一只母鸡伏在一窝瓷制的鸡蛋上一样，这一事实也不否认孵卵本能的存在。

This latter-day uneasy reaching-out for some form of

purposeful activity that shall at the same time not be indecorously productive of either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gain marks a difference of attitude between the modern leisure class and that of the quasi-peaceable stage. At the earlier stage, as was said above, the all-dominating institution of slavery and status acted resistlessly to discountenance exertion directed to other than naively predatory ends. It was still possible to find some habitual employment for the inclination to action in the way of forcible aggression or repression directed against hostile groups or against the subject classes within the group; and this served to relieve the pressure and draw off the energy of the leisure class without a resort to actually useful, or even ostensibly useful employments. The practice of hunting also served the same purpose in some degree. When the community developed into a peacefu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when fuller occupation of the land had reduced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 hunt to an inconsiderable residue, the pressure of energy seeking purposeful employment was left to find an outlet in some other direction. The ignominy which attaches to useful effort also entered upon a less acute phase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compulsory labor; and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then came to assert itself with more persistence and consistency.

在现代社会，从事某种不为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且同时又不失体面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正是现代有闲阶级和准和平阶段有闲阶级具有不同态度的原因。前文提到，在较早阶段，奴隶制和身份制完全处于支配地位，它们毫无阻力地排斥着不以简单掠夺为目的的一切努力。那时，还可以找到一些日常工作来让这种本性发挥作用，其方式是对敌对部落进行武力侵略，或对本部落内部的被统治阶级进行武力镇压；这就使有闲阶级不用求助于实际有用或表面上有用的工作就可以让他们的压力得以舒缓，精力得以消耗。狩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在社会发展到和平生产阶段以

后，土地得到充分利用，狩猎机会因此大为减少，狩猎活动零零星星，从事有目的的活动以消耗精力所带来的压力只有通过其他方式得以宣泄。随着强迫劳动的消失，对有用劳动的羞耻感已经没有以前那样强烈，这时，技艺的本能变得更加牢固、更加稳定。

The line of least resistance has changed in some measure, and the energy which formerly found a vent in predatory activity, now in part takes the direction of some ostensibly useful end. Ostensibly purposeless leisure has come to be deprecated, especially among that large portion of the leisure class whose plebeian origin acts to set them at variance with the tradition of the *otium cum dignitate* . But that canon of reputability which discountenances all employment that is of the nature of productive effort is still at hand, and will permit nothing beyond the most transient vogue to any employment that is substantially useful or productive.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a change has been wrought in the conspicuous leisure practiced by the leisure class; not so much in substance as in form. A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two conflicting requirements is effected by a resort to make-believe. Many and intricate polite observances and social duties of a ceremonial nature are developed; many organizations are founded, with some specious object of amelioration embodied in their official style and title; there is much coming and going, and a deal of talk, to the end that the talkers may not have occasion to reflect on what is the effectual economic value of their traffic. And along with the make-believe of purposeful employment, and woven inextricably into its texture, there is commonly, if not invariably, a more or less appreciable element of purposeful effort directed to some serious end.

阻力最小的途径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以前在掠夺活动上宣

泄的精力，现在部分转向了表面上有用的活动。表面上没有意义的有闲开始受到排斥，尤其受到了大部分有闲阶级的排斥，这部分人是平民出身，他们与“闲散即尊严”的传统格格不入。但是，对一切带有生产劳动性质的职业加以排斥的荣誉准则依然存在，这一准则排斥一切实用的或生产性的工作，除非这类工作只是昙花一现。其结果是，有闲阶级所执行的炫耀性有闲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形式的而非实质性的。通过伪装，有闲的两个相互冲突的要求得到了调和。于是形成了许多繁文缛节以及礼节性的社交义务，成立了许多组织，这些组织的官样文章和正式名称中总是包含着一些华而不实的改良目标；大家你来我往，谈得十分起劲，其目的无非是使说话的人没有机会思考他们的交谈到底有什么实际的经济价值。同这种伪装成有目的的工作密切交织在一起的，通常——如果不是一定的话——是有目的的活动所具有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因素，这种有目的的活动所指向的是某个严肃的目的。

In the narrower sphere of vicarious leisure a similar change has gone forward. Instead of simply passing her time in visible idleness, as in the best days of the patriarchal regime, the housewife of the advanced peaceable stage applies herself assiduously to household cares. The salient features of this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service have already been indicated.

在代理有闲这个更为狭窄的领域里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在父权制鼎盛时期，家庭主妇只是以明显的无所事事来消磨时光，而在发达的和平文化阶段，家庭主妇则勤勤恳恳地操持家务。至于家务劳动发展的显著特征，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

Throughout the entire evolution of conspicuous expenditure, whether of goods or of services or human life, runs the obvious

implication that in order to effectually mend the consumer's good fame it must be an expenditure of superfluities. In order to be reputable it must be wasteful. No merit would accrue from the consumption of the bare necessaries of life, except by comparison with the abjectly poor who fall short even of the subsistence minimum; and no standard of expenditure could result from such a comparison, except the most prosaic and unattractive level of decency. A standard of life would still be possible which should admit of invidious comparison in other respects than that of opulence; as, for instance, a comparison in various directions in the manifestation of moral, physical, intellectual, or aesthetic force. Comparison in all these directions is in vogue to-day; and the comparison made in these respects is commonly so inextricably bound up with the pecuniary comparison as to be scarcely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latter.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as regards the current rating of expressions of intellectual and aesthetic force or proficiency; so that we frequently interpret as aesthetic or intellectual a difference which in substance is pecuniary only.

在炫耀性消费的整个演变过程中，不论是对财物、服务还是对人类生活的消费，都包含着这样一个显著的含义：为了有效地提升消费者荣誉，就必须消费不必要的奢侈品；为了获得荣誉就得浪费。仅仅消费生活必需品毫无可取之处，除非是与此相对的那些极端穷困潦倒的人，这些穷人连维持生计需要的最低限度都达不到；这种比较不会产生消费的标准，这种比较所产生的只是最普通、最不起眼的礼仪水平。有一种生活标准依然可能存在，这种标准可以让人们在除财富以外的其他方面进行歧视性比较，例如对道德、体格、智力和审美取向等各方面进行比较。这些方面的对比在现在十分流行，这些方面的对比通常和金钱的对比密切结合在一起，两者难分你我。现如今在对智力、审美能力的表现进行评定时，情况尤其如此，所以我们经常会将实质上只是金钱方面的差别理解为审美能力或智力上的差别。

The use of the term “waste” is in one respect an unfortunate one. As used in the speech of everyday life the word carries an undertone of deprecation. It is here used for want of a better term that will adequately describe the same range of motives and of phenomena, and it is not to be taken in an odious sense, as implying an illegitimate expenditure of human products or of human life. In the view of economic theory the expenditure in question is no more and no less legitimate than any other expenditure. It is here called “waste” because this expenditure does not serve human life or human well-being on the whole, not because it is waste or misdirection of effort or expenditure as view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individual consumer who chooses it. If he chooses it, that disposes of the question of its relative utility to him, as compared with other forms of consumption that would not be deprecated on account of their wastefulness. Whatever form of expenditure the consumer chooses, or whatever end he seeks in making his choice, has utility to him by virtue of his preference. As see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individual consumer, the question of wastefulness does not arise within the scope of economic theory proper. The use of the word “waste” as a technical term, therefore, implies no deprecation of the motives or of the ends sought by the consumer under this canon of conspicuous waste.

“浪费”一词的使用，在某方面来说，是不恰当的。该词在日常生活语言中暗含贬损之意。这里之所以使用这个词，是因为找不到更为恰当的词来描述同一类动机和现象，这个词并不含有令人厌恶反感之意，并不含有物力、人力不当消费之意。按照经济理论的观点，这里所说的消费和其他各种消费一样正当合法。这里之所以将其称作“浪费”，是因为这种消费无益于整个人类的生活或幸福，而不是因为从

选择这种消费的个体消费者的立场来说这种消费是精力和费用的浪费或滥用。如果消费者选择了这种消费，与不会因浪费而受到指责的其他形式的消费比起来，这种消费对于他的相对功用的问题就解决了。不论消费者选择何种形式的消费，也不论他作出选择所要追求的是何种目的，只要他喜欢的就是对他有用的。从个体消费者的观点来看，浪费的问题并没有在正统经济理论范围内出现。因此，把“浪费”当作一个术语来使用，对消费者在炫耀性浪费准则指导下所追求的动机和目的并无贬损之意。

But it is, on other grounds, worth noting that the term “waste” in the language of everyday life implies deprecation of what is characterized as wasteful. This common-sense implication is itself an outcropping of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The popular reprobation of waste goes to say that in order to be at peace with himself the common man must be able to see in any and all human effort and human enjoyment an enhancement of life and well-being on the whole. In order to meet with unqualified approval, any economic fact must approve itself under the test of impersonal usefulness—usefulness as see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generically human. Relative 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one individual in comparison with another does not satisfy the economic conscience, and therefore competitive expenditure has not the approval of this conscience.

但是，基于其他理由，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日常生活语言中，“浪费”一词对具有浪费特点的现象含有贬责之意。这种常识性含义本身就是技艺本能的表现。这种对浪费的普遍责难说明，一个普通人要想求得内心安宁，就必须能够在一切人类努力和人类享乐中看到整个人类生活和幸福的提升。任何一个经济行为，要想获得绝对的认可，就必须经得起考验，它必须具有非利己的功用；也就是说，从全

人类的观点来看，它是有用的。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比所具有的相对优势或竞争优势并不能满足经济的道德心，因此，竞争性消费不会得到这种道德心的认可。

In strict accuracy nothing should be included under the head of conspicuous waste but such expenditure as is incurred on the ground of an invidious pecuniary comparison. But in order to bring any given item or element in under this head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waste in this sense by the person incurring the expenditure. It frequently happens that an element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which set out with being primarily wasteful ends with becoming, in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consumer, a necessary of life; and it may in this way become as indispensable as any other item of the consumer's habitual expenditure. As items which sometimes fall under this head, and are therefore available as illustrations of the manner in which this principle applies, may be cited carpets and tapestries, silver table service, waiter's services, silk hats, starched linen, many articles of jewelry and of dress.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these things after the habit and the convention have been formed, however, has little to say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expenditures as waste or not waste in the technical meaning of the word. The test to which all expenditure must be brought in an attempt to decide that poin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it serves directly to enhance human life on the whole—whether it furthers the life process taken impersonally. For this is the basis of award of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nd that instinct is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any question of economic truth or adequacy. It is a question as to the award rendered by a dispassionate common sense. The question is, therefore, not whether, under the existing circumstances of individual habit and social custom, a given expenditure conduces to the particular consumer's gratification or

peace of mind; but whether, aside from acquired tastes and from the canons of usage and conventional decency, its result is a net gain in comfort or in the fullness of life. Customary expenditure must be classed under the head of waste in so far as the custom on which it rests is traceable to the habit of making an invidious pecuniary comparison—in so far as it is conceived that it could not have become customary and prescriptive without the backing of this principle of pecuniary reputability or relative economic success.

严格说来，除了因为歧视性金钱对比而产生的消费，所有消费都不应归于炫耀性浪费的名下。但是要某一项目或要素归于炫耀性浪费名下，并不需要执行消费的人承认这一项目或因素是浪费的。时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构成生活标准的某一要素一开始原本是浪费性的，而结果在消费者看来却变成了生活必需品；这样，它就与消费者其他平常支出一样，成为不可或缺的消费项目。有些项目有时可以归入这种消费名下，并可以用来说明这一原则起作用的方式，这些项目有地毯和挂毯、银制餐具、服务生的服务、丝质礼帽、上浆的日用织品、许多珠宝首饰和礼服等等。一旦这些东西的消费成了习惯和传统，这些东西就是不可或缺的，这种不可或缺性与是否将这种消费列为浪费（专业术语意义上的“浪费”）没有多大关系。要确定其是否是浪费的，所有消费都要接受以下问题的考验：它是否直接有助于整个人类生活的提高，是否推进了非个人的生活进程。因为，这是技艺的本能做出判断的基础，而这种本能是所有有关经济真理和经济适当性问题的终审法庭。这是一个不带个人感情而依靠常识做出判断的问题。所以，问题不在于某一消费在现有个人习惯和社会习俗的环境下是否有助于某位消费者的满足或内心安宁；而在于，撇开习得的品位不谈，撇开习俗和传统礼仪不谈，这种消费的结果是否真正有利于生活的享受和充实。如果一种消费所依据的习惯源于歧视性的金钱对比，如果这种消费没有金钱荣誉或相对经济成就这一原则作为后盾就不可能成为习惯和规定，那么这种习惯性的消费就必须归入浪费名下。

It is obviously not necessary that a given object of expenditure should be exclusively wasteful in order to come in under the category of conspicuous waste. An article may be useful and wasteful both, and its utility to the consumer may be made up of use and waste in the most varying proportions. Consumable goods, and even productive goods, generally show the two elements in combination, as constituents of their utility; although, in a general way, the element of waste tends to predominate in articles of consumption, while the contrary is true of articles designed for productive use. Even in articles which appear at first glance to serve for pure ostentation only, it is always possible to detect the presence of some, at least ostensible, useful purpose; and on the other hand, even in special machinery and tools contrived for some particular industrial process, as well as in the rudest appliances of human industry, the traces of conspicuous waste, or at least of the habit of ostentation, usually become evident on a close scrutiny. It would be hazardous to assert that a useful purpose is ever absent from the utility of any article or of any service, however obviously its prime purpose and chief element is conspicuous waste; and it would be only less hazardous to assert of any primarily useful product that the element of waste is in no way concerned in its value, immediately or remotely.

很明显，某个消费物品不一定完全是浪费性的，才能归属于炫耀性浪费的范畴。同一件物品可能既是有用的，又是浪费的；这一物品对于消费者的功用可能是有不同比例的功用和浪费构成的。在用于消费的物品中，甚至在用于生产的物品中，这两种因素通常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这些物品的功用；不过，在消费品中，浪费这一元素通常占据主导地位，而用于生产的物品情况正好相反。有些物品乍一看好像是专供虚饰之用的，即使在这样的物品中，也总是可以发现某个至少是表面上实用的目的；另一方面，即使是专为某一生产程序而制

作的机器和工具，即使是供人类生产之用的最为简陋的器械，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炫耀性浪费的痕迹，至少可以发现虚饰习惯的痕迹。如果看到任何物品或服务的根本目的和主要成分是炫耀性浪费，无论这一点是多么显而易见，就断定它绝不存在任何实用性，这种结论是冒险的；断言浪费因素与任何一个原本有用的产品的价值毫无直接或间接关系也是冒险的，只不过冒险程度稍稍低些而已。

Chapter V The Pecuniary Standard of Living

第五章　生活的金钱标准

For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in any modern community, the proximate ground of expenditure in excess of what is required for physical comfort is not a conscious effort to excel in the expensiveness of their visible consumption, so much as it is a desire to live up to the conventional standard of decency in the amount and grade of goods consumed. This desire is not guided by a rigidly invariable standard, which must be lived up to, and beyond which there is no incentive to go. The standard is flexible; and especially it is indefinitely extensible, if only time is allowed for habituation to any increase in pecuniary ability and for acquiring facility in the new and larger scale of expenditure that follows such an increase. It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recede from a scale of expenditure once adopted than it is to extend the accustomed scale in response to an accession of wealth. Many items of customary expenditure prove on analysis to be almost purely wasteful, and they are therefore honorific only, but after they have onc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scale of decent consumption, and so have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one's scheme of life, it is quite as hard to give up these as it is to give up many items that conduce directly to one's physical comfort, or even that may be necessary to life and health. That is to say, the conspicuously wasteful honorific expenditure that confers spiritual well-being may become more indispensable than much of that expenditure which ministers to the “lower” wants of physical well-being or sustenance only. It is notoriously just as difficult to recede from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as it is to lower a standard which is already relatively low; although in the former case the difficulty is a

moral one, while in the latter it may involve a material deduction from the physical comforts of life.

对任何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之所以要进行超出物质享受需要限度的消费，与其说其直接原因是因为他们刻意要在炫耀性消费的奢华程度上超过别人，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想在所消费财物的数量和品质方面达到传统的礼仪标准。支配这种欲望的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一成不变的标准，也不是说一定要达到这一标准，更不是说人们除了达到这个标准便再无其他动机。这一标准是具有弹性的；尤其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金钱力量的增长，随着金钱力量的增长而出现的更高的、新的消费标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从中获得便利，这一标准是可以无限制地提高的。消费标准一经接受，想要降低这个标准，比提高惯常的消费标准以适应财富的增长要难得多。经过分析之后便可以发现，许多惯常的消费品几乎是纯浪费性的，因此，它们只是荣誉性的；但是一旦它们纳入到礼仪消费的标准，因而成为某人生活方式必要的组成部分以后，要停止消费这些物品是十分困难的，其困难程度不亚于放弃消费许多直接有助于物质享受的物品，甚至不亚于放弃消费对生命和健康十分必要的物品。也就是说，与用于满足物质享受或仅仅维持生计等低级需求的消费相比，用于满足精神需求的、炫耀性浪费的荣誉性消费更为不可或缺。众所周知，降低“高的”生活水准和降低已经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准一样困难，前者的困难是精神上的困难，而后者的困难在于它可能牵涉到物质生活享受的实质性减少。

But while retrogression is difficult, a fresh advance in conspicuous expenditure is relatively easy; indeed, it takes place almost as a matter of course. In the rare cases where it occurs, a failure to increase one's visible consumption when the means for an increase are at hand is felt in popular apprehension to call for explanation, and unworthy motives of miserliness are imputed to those who fall short in this respect. A prompt response to the

stimulus, on the other hand, is accepted as the normal effect. This suggests that the standard of expenditure which commonly guides our efforts is not the average, ordinary expenditure already achieved; it is an ideal of consumption that lies just beyond our reach, or to reach which requires some strain. The motive is emulation—the stimulus of an invidious comparison which prompts us to outdo those with whom we are in the habit of classing ourselves. Substantially the same proposition is expressed in the commonplace remark that each class envies and emulates the class next above it in the social scale, while it rarely compares itself with those below or with those who are considerably in advance. That is to say, in other words, our standard of decency in expenditure, as in other ends of emulation, is set by the usage of those next above us in reputability; until, in this way, especially in any community where class distinctions are somewhat vague, all canons of reputability and decency, and all standards of consumption, are traced back by insensible gradations to the usages and habits of thought of the highest social and pecuniary class—the wealthy leisure class.

在炫耀性消费方面后退是困难的，而前进一步则相对容易；实际上，在炫耀性消费方面更进一步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虽然某人具备了足够的财力，却没有增加炫耀性消费，这在一般人看来是需要解释说明的，不能做出解释说明的人就会被指责为寒酸、吝啬。反之，对财富增加所带来的刺激迅速做出反应则被认为是正常的结果。由此可见，指导我们努力方向的消费标准并不是已经达到的、普通的平均消费，而是一个我们不可企及的或者是需要费点儿力气才能达到的理想消费标准。其动机在于竞赛——歧视性对比所带来的刺激促使我们超越那些我们视为同一等级的人。实际上，这个观点可以用日常语言来表示，那就是，每一阶级都嫉妒并想赶超社会等级比其高一级的那个阶级，却很少会和比自己地位低的阶级比较，

也很少会和比自己高出许多的阶级比较。换言之，我们在消费上的礼仪标准，和在其他目标上的竞赛一样，是按照荣誉地位比我们高一等级的那些人的习俗设置的。这样，一切荣誉和礼仪准则，一切消费标准都可以不知不觉地逐层向上追溯，一直追溯到社会地位最高、财力最雄厚的阶级（富有的有闲阶级）的习俗和思维习惯，在阶级区别较为模糊的社会里情况尤其如此。

It is for this class to determine, in general outline, what scheme of life the community shall accept as decent or honorific; and it is their office by precept and example to set forth this scheme of social salvation in its highest, ideal form. But the higher leisure class can exercise this quasi-sacerdotal office only under certain material limitations. The class cannot at discretion affect a sudden revolution or reversal of the popular habits of thought with respect to any of these ceremonial requirements. It takes time for any change to permeate the mass and change the habitual attitude of the people; and especially it takes time to change the habits of those classes that are socially more remote from the radiant body. The process is slower where the mobility of the population is less or where the intervals between the several classes are wider and more abrupt. But if time be allowed, the scope of the discretion of the leisure class as regards questions of form and detail in the community's scheme of life is large; while as regards the substantial principles of reputability, the changes which it can effect lie within a narrow margin of tolerance. Its example and precept carries the force of prescription for all classes below it; but in working out the precepts which are handed down as governing the form and method of reputability—in shaping the usages and the spiritual attitude of the lower classes—this authoritative prescription constantly works under the selective guidance of the canon of conspicuous waste, tempered in varying degree by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To

these norms is to be added another broad principle of human nature—the predatory animus—which in point of generality and of psychological content lies between the two just named. The effect of the latter in shaping the accepted scheme of life is yet to be discussed. The canon of reputability, then, must adapt itself to the economic circumstances, the traditions, and the degree of spiritual maturity of the particular class whose scheme of life it is to regulate. It is especially to be noted that however high its authority and however true to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of reputability it may have been at its inception, a specific formal observance can under no circumstances maintain itself in force if with the lapse of time or on its transmission to a lower pecuniary class it is found to run counter to the ultimate ground of decency among civilized peoples, namely, serviceability for the purpose of an invidious comparison in pecuniary success.

大体上，这一阶级决定了何种生活方式才应该被社会公认为体面而光荣的；他们的职责是通过言传身教来阐明社会救助方案的最高级的理想形式。但是，较高等级的有闲阶级，只有在特定的物质限制下，才可以行使这种准祭司的职责。公众对所有这些礼仪要求都有着一定的思维习惯，较高等级的有闲阶级不能随意让这些思维习惯发生突然的变革或逆转。任何变化要想深入人心并改变人们的思想习惯，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要改变社会地位与这一闪耀群体（较高等级的有闲阶级）相去甚远的那些阶级的习惯，就更加需要时间。人口流动性越小，各阶级之间的差别越大、越悬殊，改变的过程就越慢。但是，如果时间允许，有闲阶级在社会生活方式的形式和细节等问题上就具有更为广泛的自由裁决力；而至于关系到荣誉的重大原则，这个阶级所能带来的变化只限于可容忍的狭小范围内。这个阶级的言传身教对地位比其低的所有阶级来说，都具有法令的效力；但是在为下面各阶级制定教条以决定赢得荣誉的形式和方法的过程中，在下层各阶级习俗和精神态度形成的过程中，这种权威的法令一直在炫耀性浪费

准则的淘汰性指导下发挥作用，并且不同程度地受到技艺本能的调节。除了炫耀性浪费和技艺本能这两个规范以外，还要加上另一个普遍的人性原则，即掠夺意志。这种掠夺本性在普遍程度和心理内容方面都介于上述两个规范之间。后者是如何影响公认生活方式形成过程的，这个问题将在下文加以探讨。所以，荣誉准则必须适应某一特定阶级的经济环境、传统习惯以及其精神成熟度，而这一特定阶级的生活方式正是荣誉准则所要调节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无论这种教条在开始时具有多么高的权威，无论它在开始时是多么合乎荣誉的基本要求，如果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者随着它传到较低的金钱阶级，发现它与文明民族礼仪上的根本依据——也就是它在进行金钱成就的歧视性对比时所具有的功用性——背道而驰，那它就绝不能继续存在。

It is evident that these canons of expenditure have much to say in determining the standard of living for any community and for any class. It is no less evident that the standard of living which prevails at any time or at any given social altitude will in its turn have much to say as to the forms which honorific expenditure will take, and as to the degree to which this “higher” need will dominate a people's consumption. In this respect the control exerted by the accepted standard of living is chiefly of a negative character; it acts almost solely to prevent recession from a scale of conspicuous expenditure that has once become habitual.

显然，这些消费准则对任何社会、任何阶级的生活标准都具有很大的决定作用。同样明显的是，在任何时期或任何特定社会等级里盛行的生活标准，反过来会对荣誉消费所采取的形式以及这一“较高级的”需求对人们消费的支配程度具有很大的决定权。在这一方面，公认的生活标准所发挥的控制作用主要是消极的；它的作用几乎仅仅在于它可以阻止已成习惯的炫耀性消费标准再向后退。

A standard of living is of the nature of habit. It is a habitual scale and method of responding to given stimuli. The difficulty in the way of receding from an accustomed standard is the difficulty of breaking a habit that has once been formed. The relative facility with which an advance in the standard is made means that the life process is a process of unfolding activity and that it will readily unfold in a new direction whenever and wherever the resistance to self-expression decreases. But when the habit of expression along such a given line of low resistance has once been formed, the discharge will seek the accustomed outlet even after a change has taken place in the environment whereby the external resistance has appreciably risen. That heightened facility of expression in a given direction which is called habit may offset a considerable increase in the resistance offered by external circumstances to the unfolding of life in the given direction. As between the various habits, or habitual modes and directions of expression, which go to make up an individual's standard of living, there is an appreciable difference in point of persistence under counteracting circumstances and in point of the degree of imperativeness with which the discharge seeks a given direction.

生活标准本质上是一种习惯。它是对特定刺激作出反应的一种惯常的标准和方法。从一个已经习惯的标准向后退是困难的，这是因为打破一个已经形成的习惯是困难的。提高标准相对较为容易，这意味着生活的进程是开展活动的过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自我表现的阻力减少了，生活进程就会立即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但是，沿着某一低阻力线路的表现习惯一旦形成，即使环境发生了变化，外部阻力有了明显的增强，它依然会向惯常的出路寻求发泄的机会。那种现象称为习惯、朝着某一方向的表现变得更加便利时，它可能会抵消外部环境对朝这一方向开展生活所产生的阻力。不同的习惯或习惯表现方式及方向构成了个人的生活水准，它们在逆境下的稳定程度明显不同，而

且寻求发泄方向的迫切性也明显不同。

That is to say, in the language of current economic theory, while men are reluctant to retrench their expenditures in any direction, they are more reluctant to retrench in some directions than in others; so that while any accustomed consumption is reluctantly given up, there are certain lines of consumption which are given up with relatively extreme reluctance. The articles or forms of consumption to which the consumer clings with the greatest tenacity are commonly the so-called necessaries of life, or the subsistence minimum. The subsistence minimum is of course not a rigidly determined allowance of goods, definite and invariable in kind and quantity; but for the purpose in hand it may be taken to comprise a certain, more or less definite, aggregate of consumption requir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ife. This minimum, it may be assumed, is ordinarily given up last in case of a progressive retrenchment of expenditure. That is to say, in a general way, the most ancient and ingrained of the habits which govern the individual's life—those habits that touch his existence as an organism—are the most persistent and imperative. Beyond these come the higher wants—later-formed habits of the individual or the race—in a somewhat irregular and by no means invariable gradation. Some of these higher wants, as for instance the habitual use of certain stimulants, or the need of salvation (in the eschatological sense), or of good repute, may in some cases take precedence of the lower or more elementary wants. In general, the longer the habituation, the more unbroken the habit, and the more nearly it coincides with previous habitual forms of the life process, the more persistently will the given habit assert itself. The habit will be stronger if the particular traits of human nature which its action involves, or the particular aptitudes that find exercise in it,

are traits or aptitudes that are already largely and profoundly concerned in the life process or that are intimately bound up with the life history of the particular racial stock.

按照现代经济理论的术语，也就是说人们不愿意缩减任何方面的开支，而比起其他方面的开支，他们更不愿意缩减某些方面的开支；所以，放弃任何一种习惯性消费都并非是心甘情愿的，而放弃某些方面的消费则是极不情愿的。在各种消费物品和消费方式中，消费者最难放弃的通常就是所谓的生活必需品或最低限度生活资料。当然，最低限度生活资料并非严格规定的财物定额，其种类和数量并非是确定不变的；但是，为了讨论方便，不妨认为它指的是维持生命需要的某个较为确定的消费总量。可以推断，假如消费不断缩减，这个最低限度通常是直到最后才放弃的。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支配个人生活的那些最为古老、最为根深蒂固的习惯——这些习惯关系到他作为一个有机体的生存——是最为顽固而又最具强制性的。此外还有更高层次的需求，这些需求是个人或种族随后形成的习惯，它们具有不同的等级，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较高层次的需求，如某些兴奋品的习惯性使用，救赎的需求（末世论意义上的救赎），或者赢得荣誉的需求等等，和较低层次的需求或更为根本的需求比起来，有时候需要优先得到满足。一般来说，习惯形成的时间越久，就越不容易被打破；某一特定习惯与生活进程中先前的习惯形式越一致，它就越具有稳定性。一种习惯，如果跟它的活动有关的，或在活动中已经发挥作用的那些人性中的特征或本性，已经在生活进程中有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或者是已经和某一特定族群的生活历史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些习惯就更加牢不可破。

The varying degrees of ease with which different habits are formed by different persons, as well as the varying degrees of reluctance with which different habits are given up, goes to say that the formation of specific habits is not a matter of length of

habituation simply. Inherited aptitudes and traits of temperament count for quite as much as length of habituation in deciding what range of habits will come to dominate any individual's scheme of life. And the prevalent type of transmitted aptitudes, or in other words the type of temperament belonging to the dominant ethnic element in any community, will go far to decide what will be the scope and form of expression of the community's habitual life process. How greatly the transmitted idiosyncrasies of aptitude may count in the way of a rapid and definitive formation of habit in individuals is illustrated by the extreme facility with which an all-dominating habit of alcoholism is sometimes formed; or in the similar facility and the similarly inevitable formation of a habit of devout observances in the case of persons gifted with a special aptitude in that direction. Much the same meaning attaches to that peculiar facility of habituation to a specific human environment that is called romantic love.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养成这些习惯的难易程度也不相同，而放弃不同习惯的不情愿程度也不相同，这说明具体习惯的形成不只是适应过程时间长短的问题。在决定何种习惯将支配个人生活方式方面，遗传的性格本性及禀性特征和习惯养成的时间长短同样重要。普遍的遗传性格类型，换言之，在任何社会的种族中占支配地位的禀性类型，足以决定该社会习惯生活进程的表现范围和方式。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遗传的性格特征在个人习惯迅速最终形成方面到底有多大的作用，例如，有时候严重酗酒习惯的养成是极其容易的；又如，有些人天生就具有信仰宗教的性格本性，养成这一方面的习惯对他们来说同样是极其容易的，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人们特别容易沉溺于所谓浪漫爱情这种特定的人类环境，这一例子也有相同的意义。

Men differ in respect of transmitted aptitudes, or in respect of

the relative facility with which they unfold their life activity in particular directions; and the habits which coincide with or proceed upon a relatively strong specific aptitude or a relatively great specific facility of expression become of great consequence to the man's well-being. The part played by this element of aptitude in determining the relative tenacity of the several habits which constitut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goes to explain the extreme reluctance with which men give up any habitual expenditure in the way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The aptitudes or propensities to which a habit of this kind is to be referred as its ground are those aptitudes whose exercise is comprised in emulation; and the propensity for emulation—for invidious comparison—is of ancient growth and is a pervading trait of human nature. It is easily called into vigorous activity in any new form, and it asserts itself with great insistence under any form under which it has once found habitual expression. When the individual has once formed the habit of seeking expression in a given line of honorific expenditure—when a given set of stimuli have come to be habitually responded to in activity of a given kind and dire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se alert and deep-reaching propensities of emulation—it is with extreme reluctance that such an habitual expenditure is given up. And on the other hand, whenever an accession of pecuniary strength puts the individual in a position to unfold his life process in larger scope and with additional reach, the ancient propensities of the race will assert themselves in determining the direction which the new unfolding of life is to take. And those propensities which are already actively in the field under some related form of expression, which are aided by the pointed suggestions afforded by a current accredited scheme of life, and for the exercise of which the material means and opportunities are readily available—these will especially have much to say in shaping the form and direction in which the new accession to the individual's aggregate force will

assert itself. That is to say, in concrete terms, in any community wher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s an element of the scheme of life, an increase in an individual's ability to pay is likely to take the form of expenditure for some accredited line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由于人与人的遗传性格本性不同，他们在某些方面开展生命活动的难易程度也不相同；如果有些习惯与比较强烈的性格本性相一致并且是源于这种性格本性的，如果这些习惯极其容易表现出来，它们就会对个人的幸福产生重大影响。构成生活标准的某些习惯相对较为顽固，而在这一点上，性格本性这一因素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这就说明了人们为什么极不情愿放弃炫耀性消费的任何习惯性开支。作为这类习惯形成基础的性格特征和本性是那些在竞赛中表现出来的性格本性；这种爱好竞赛的本性，即喜欢进行歧视性比较的本性自古就有，是人性中的一个普遍特征。这种性格本性很容易以某种新的形态活跃起来，一旦它在任何一种形态下找到了习惯的表现手段，它就会在深深植根于这种形态。个人一旦养成从某种荣誉性消费中寻求表现的习惯——如果个人会在这些活跃而又影响深远的竞赛本性的支配下，通过某一类型或某一方面的活动，习惯性地对某类刺激做出反应——要他放弃这种习惯性的消费，他就会感到极不情愿。另一方面，如果金钱力量有了增强，使得个人能够向更广阔、更远的领域扩展其生活进程，该种族中的那些古老的性格本性就会发生作用，就会决定个人新生活开展的方向。这些性格本性已经以某种相关的形式活跃起来，并且得到了来自时下公认生活方式明确的支持，而表现这些本性的物质条件和机会又都是现成的——这样，当个人整体力量有了新的增长而急于表现时，这些性格本性在形成其表现形式或方向方面有着很大的作用。具体来说，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如果炫耀性消费是其生活方式中的一个因素，个人支付能力的增长就很可能以炫耀性消费的公认形式表现出来。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instinct of self-preservation, the propensity for emulation is probably the strongest and most alert and persistent of the economic motives proper. In an industrial community this propensity for emulation expresses itself in pecuniary emulation; and this, so far as regards the Western civilized communities of the present, is virtually equivalent to saying that it expresses itself in some form of conspicuous waste. The need of conspicuous waste, therefore, stands ready to absorb any increase in the community's industrial efficiency or output of goods, after the most elementary physical wants have been provided for. Where this result does not follow,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the reason for the discrepancy is commonly to be sought in a rate of increase in the individual's wealth too rapid for the habit of expenditure to keep abreast of it; or it may be that the individual in question defers th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the increment to a later date—ordinarily with a view to heightening the spectacular effect of the aggregate expenditure contemplated. As increased industrial efficiency makes it possible to procure the means of livelihood with less labor, the energies of the industrious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re bent to the compassing of a higher result in conspicuous expenditure, rather than slackened to a more comfortable pace. The strain is not lightened as industrial efficiency increases and makes a lighter strain possible, but the increment of output is turned to use to meet this want, which is indefinitely expansible, after the manner commonly imputed in economic theory to higher or spiritual wants. It is owing chiefly to the presence of this element i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that J. S. Mill was able to say that “hitherto it is questionable if all the mechanical inventions yet made have lightened the day's toil of any human being.” The accepted standard of expenditure in the community or in the class to which a person belongs largely determines what his standard of living will be. It does this directly by commending itself

to his common sense as right and good, through his habitually contemplating it and assimilating the scheme of life in which it belongs; but it does so also indirectly through popular insistence on conformity to the accepted scale of expenditure as a matter of propriety, under pain of disesteem and ostracism. To accept and practic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which is in vogue is both agreeable and expedient, commonly to the point of being indispensable to personal comfort and to success in lif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any class, so far as concerns the element of conspicuous waste is commonly as high as the earning capacity of the class will permit—with a constant tendency to go higher. The effect upon the serious activities of men is therefore to direct them with great singleness of purpose to the largest possible acquisition of wealth, and to discountenance work that brings no pecuniary gain. At the same time the effect on consumption is to concentrate it upon the lines which are most patent to the observers whose good opinion is sought; while the inclinations and aptitudes whose exercise does not involve an honorific expenditure of time or substance tend to fall into abeyance through disuse.

除了自卫的本能以外，爱好竞赛的性格本性可能是纯经济动机中最强烈、最活跃而又最为持久的了。在产业社会里，这种爱好竞赛的本性表现在金钱的竞赛上；就现代西方文明社会而言，实际上这等于是说这种竞赛本性表现在某种形式的炫耀性浪费上。因此，在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社会生产效率和财物产量的任何增长都会被炫耀性浪费的需求吸收。在当代，如果没有出现这种结果，那么之所以出现这种不一致的现象通常是因为个人财富增长的速度太快，消费习惯不能与之保持一致；或者是因为所涉及的个人推迟了对增长财富的炫耀性消费，这样做通常是为了使得总体消费能够带来更加壮观的效果。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以较少的劳动就可以获得生活所需的资料成为可能，那些勤劳的社会成员就会将精力放在炫耀性消费上以期获

得更高的效果，而不是松懈下来放慢速度。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降低劳动强度成为可能，但是实际上劳动强度并没有因此而减轻；所有增加的产量都被用于满足炫耀性消费的需要，这种需求是可以无限扩大的，经济学理论通常称之为高级需求或精神需求。正因为生活标准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因素，所以J. S. 穆勒才能够说："所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人类的日常辛劳程度，迄今为止依然是个疑问。"个人所属的社会或阶级，其公认的消费标准大体上决定了这个人的生活水准。之所以这样，直接原因是他经常考虑这一标准，并接受了执行这个消费标准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这一消费标准是适宜的，是合理的；间接原因是公众坚持认为应该遵守公认的消费标准，这一点事关礼节，如果不遵守就会受到轻视和排斥。接受并践行流行的生活标准是既令人愉快又大有裨益的事情，对个人享受和生活成就来说，通常是不可或缺的。就炫耀性浪费这个因素来说，任何一个阶级的生活水准通常会高到这一阶级收益能力所能承受的最高地步，而且还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这对人们的严肃活动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引导他们目标专一，那就是要获取尽可能多的财富，并使得他们排斥不能带来金钱收益的工作。同时也对消费产生了影响，消费因此集中在几类物品上，要赢得旁观者的好评这几类物品是最为明显的；而那些不需要通过时间和财物的荣誉性消费就可以表现出来的性格本性则会因为派不上用场而慢慢地消失。

Through this discrimination in favor of visible consumption it has come about that the domestic life of most classes is relatively shabby, as compared with the éclat of that overt portion of their life that is carried on before the eyes of observers. As a secondary consequence of the same discrimination, people habitually screen their private life from observation. So far as concerns that portion of their consumption that may without blame be carried on in secret, they withdraw from all contact with their neighbors, Hence the exclusiveness of people, as regards their domestic life, in most of the industrially developed communities; and hence, by remoter

derivation, the habit of privacy and reserve that is so large a feature in the code of proprieties of the better classes in all communities. The low birthrate of the classes upon whom the requirements of reputable expenditure fall with great urgency is likewise traceable to the exigencies of a standard of living based on conspicuous waste. Th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the consequent increased expense, required in the reputable maintenance of a child are very considerable and act as a powerful deterrent. It is probably the most effectual of the Malthusian prudential checks.

偏重明显可见的消费所带来的后果是，和他们在旁观者视线中公开度过的那部分光鲜夺目的生活比起来，多数阶级的家庭内部生活显得比较简陋。另一个同理而生的后果是，人们往往将他们的私生活隐蔽起来不让他人看到。有一部分消费可以私下进行而不会受到指责，在进行这部分消费时，他们是与邻居完全隔绝的。因此，在大多数工业发达的社会，人们的家庭生活具有排外的性质；所以才会有离群索居、落落寡合的习惯，这是所有社会中上层阶级礼仪准则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对荣誉性消费有着迫切要求的阶级，其人口出生率低下，同样是因为这些阶级对以炫耀性浪费为基础的生活水准有着迫切的需要。体面地抚养一个小孩所需的炫耀性消费以及随之增加的开支是相当可观的，这成为人口出生率提高的一个强大阻力。这也许是马尔萨斯限制人口增长主张的最为有效的举措。

The effect of this factor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both in the way of retrenchment in the obscurer elements of consumption that go to physical comfort and maintenance, and also in the paucity or absence of children, is perhaps seen at its best among the classes given to scholarly pursuits. Because of a presumed superiority and scarcity of the gifts and attainments that characterize their life, these classes are by convention subsumed under a higher social

grade than their pecuniary grade should warrant. The scale of decent expenditure in their case is pitched correspondingly high, and it consequently leaves an exceptionally narrow margin disposable for the other ends of life. By force of circumstances, their habitual sense of what is good and right in these matters, as well as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way of pecuniary decency among the learned, are excessively high—as measured by the prevalent degree of opulence and earning capacity of the class, relatively to the non-scholarly classes whose social equals they nominally are. In any modern community where there is no priestly monopoly of these occupations, the people of scholarly pursuits are unavoidably thrown into contact with classes that are pecuniarily their superiors. The high standard of pecuniary decency in force among these superior classes is transfused among the scholarly classes with but little mitigation of its rigor; and as a consequence there is no class of the community that spends a larger proportion of its substance in conspicuous waste than these.

生活水准的这一因素产生了两个效果，一方面使得物质享受和维持生计所需的比较隐蔽的消费有所紧缩，另一方面也使得子女的人数减少或根本没有子女；在从事学术研究的阶级身上，上述两个效果最为明显。人们认为，他们在生活中天赋过人、成就卓越，因此，按照惯例，这些阶级被列入金钱力量所达不到的阶级。相应地，他们的礼仪消费标准就定得很高，结果，为其他生活目标留下的余地就极其狭窄。由于环境所迫，他们对于何种礼仪消费是适宜而合理的习惯性观念过高；以他们的富裕程度和收入能力来衡量，相对于那些名义上与他们社会地位相同的非学术阶级来说，社会在金钱礼仪方面对他们的期望也是过高的。在任何现代社会，如果这些职业没有被神职人员垄断的话，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和财力在其之上的阶级打交道。在上层阶级中实行的金钱礼仪高标准渗透到了学者阶级中间，其严格程度几乎没有减轻；其结果是，学者阶级在炫耀性浪费上的支出

占其资产的比例要大于社会中所有其他阶级。

Chapter VI Pecuniary Canons of Taste

第六章　金钱的品位准则

The caution has already been repeated more than once, that while the regulating norm of consumption is in large part the requirement of conspicuous waste, it must not be understood that the motive on which the consumer acts in any given case is this principle in its bald, unsophisticated form. Ordinarily his motive is a wish to conform to established usage, to avoid unfavorable notice and comment, to live up to the accepted canons of decency in the kind, amount, and grade of goods consumed, as well as in the decorous employment of his time and effort. In the common run of cases this sense of prescriptive usage is present in the motives of the consumer and exerts a direct constraining force, especially as regards consumption carried on under the eyes of observers. But a considerable element of prescriptive expensiveness is observable also in consumption that does not in any appreciable degree become known to outsiders—as, for instance, articles of underclothing, some articles of food, kitchen utensils, and other household apparatus designed for service rather than for evidence. In all such useful articles a close scrutiny will discover certain features which add to the cost and enhance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the goods in question, but do not proportionately increase the serviceability of these articles for the material purposes which alone they ostensibly are designed to serve.

上文一再提醒大家注意，虽然消费的约束性规范大体是出于炫耀性浪费的需要，但绝不可以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消费者采取行动的

动机都是这一原则，而且是该原则未加修饰的、单纯的形态。消费者的动机通常是一种愿望，他希望能遵守已经确立的习俗，希望能避免遭人白眼或受人指责，希望在消费物品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等级方面，在时间与精力的使用方面，都能符合公认的礼仪准则。在一般情况下，对规范性习俗的这种意识确实存在于消费者动机之中，并且对消费产生了直接的约束力，至于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的消费，情况尤其如此。有些消费外人很难清楚知晓，例如贴身衣裤、某些食品、厨房用具及其他实用的而非炫耀性的家庭设备；但是即使在这类消费中，依然可以发现相当明显的规范性浪费因素。我们仔细观察这些有用物品就可以发现，某些特征增加了这类物品的成本从而提高了其商业价值，却没有在实际用途上相应地提高这些物品的功用，而实际用途正是这些物品表面上应该具有的功用。

Under the selective surveillance of the law of conspicuous waste there grows up a code of accredited canons of consumption, the effect of which is to hold the consumer up to a standard of expensiveness and wastefulness in his 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in his employ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his growth of prescriptive usage has an immediate effect upon economic life, but it has also an indirect and remoter effect upon conduct in other respects as well. Habits of thought with respect to the expression of life in any given direction unavoidably affect the habitual view of what is good and right in life in other directions also. In the organic complex of habits of thought which make up the substance of an individual's conscious life the economic interest does not lie isolated and distinct from all other interests. Something, for instance, has already been said of its relation to the canons of reputability.

在炫耀性浪费法则的淘汰性监督之下，产生了一种公认的消费准则，其作用是使得消费者在财物的消费方面以及时间和精力的使用方

面都能达到奢华及浪费的标准。规范性习俗的发展对经济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时也对其他方面的行为产生了间接的、比较轻微的影响。与生活表现任何一个方面有关的思维习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生活其他方面关于是非善恶的习惯看法。思维习惯是个人有意识生活的内容，在思维习惯的有机复合体内，经济利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并不是与所有其他利益截然不同。例如，它与荣誉准则的关系，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论述。

The principle of conspicuous waste guides the formation of habits of thought as to what is honest and reputable in life and in commodities. In so doing, this principle will traverse other norms of conduct which do not primarily have to do with the code of pecuniary honor, but which have, directly or incidentally, an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some magnitude. So the canon of honorific waste may, immediately or remotely, influence the sense of duty, the sense of beauty, the sense of utility, the sense of devotional or ritualistic fitness, and the scientific sense of truth.

炫耀性浪费原则指导思维习惯的形成，这种思维习惯告诉人们何种生活和商品是正派的、光荣的。在指导思维习惯形成过程中，这一原则势必会侵犯其他行为准则，这类行为准则从根本上说与金钱荣誉准则无关，但是却直接地或附带地具有一定程度的经济意义。因此，荣誉浪费准则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责任观念、审美观念、实用观念、宗教礼仪观念以及追求真理的科学观念。

It is scarcely necessary to go into a discussion here of the particular points at which, or the particular manner in which, the canon of honorific expenditure habitually traverses the canons of moral conduct. The matter is one which has received large attention

and illustration at the hands of those whose office it is to watch and admonish with respect to any departures from the accepted code of morals. In modern communities, where the dominant economic and legal feature of the community's life is the institu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one of the salient features of the code of morals is the sacredness of property. There needs no insistence or illustration to gain assent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habit of holding private property inviolate is traversed by the other habit of seeking wealth for the sake of the good repute to be gained through its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Most offenses against property, especially offenses of an appreciable magnitude, come under this head. It is also a matter of common notoriety and byword that in offenses which result in a large accession of property to the offender he does not ordinarily incur the extreme penalty or the extreme obloquy with which his offenses would be visited on the ground of the naive moral code alone. The thief or swindler who has gained great wealth by his delinquency has a better chance than the small thief of escaping the rigorous penalty of the law; and some good repute accrues to him from his increased wealth and from his spending the irregularly acquired possessions in a seemly manner. A well-bred expenditure of his booty especially appeals with great effect to persons of a cultivated sense of the proprieties, and goes far to mitigate the sense of moral turpitude with which his dereliction is viewed by them. It may be noted also—and it is more immediately to the point—that we are all inclined to condone an offense against property in the case of a man whose motive is the worthy one of providing the means of a “decent” manner of life for his wife and children. If it is added that the wife has been “nurtured in the lap of luxury,” that is accepted as an additional extenuating circumstance. That is to say, we are prone to condone such an offense where its aim is the honorific one of enabling the offender's wife to perform for him such an amount of vicarious consumption of time and substance as

is demanded by the standard of pecuniary decency. In such a case the habit of approving the accustomed degree of conspicuous waste traverses the habit of deprecating violations of ownership, to the extent even of sometimes leaving the award of praise or blame uncertain. This is peculiarly true where the dereliction involves an appreciable predatory or piratical element.

荣誉消费准则往往会侵犯道德行为准则，它是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侵犯道德行为准则的，这个问题在这里没有必要加以探讨。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人极大的重视并且得到了详细的阐述，这些人的职责就是监督和规劝人们不要对公认的道德规范有任何违背。在现代社会，如果其社会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经济与法律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那么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便是其道德规范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这种保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习惯受到了另一个习惯的蹂躏，这便是追求财富的习惯，这一习惯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炫耀性消费赢得荣誉，这一论点无需反复论证，也无需解释说明。大部分对财产的侵犯，尤其是较为严重的侵犯，都属于这一类情况。根据朴素的道德规范，如果侵犯者因侵犯行为而获得了大量的财产，那么他是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或谴责的，而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这一事实人尽皆知，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窃贼或骗子通过其犯罪行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却比起小偷更有机会逃避法律的严厉制裁；而且通过财富的增加，通过对这些不当收入的体面消费，他还赢得了一定的好名声。以有教养的方式消费不义之财，特别容易得到深受礼节熏陶的人士的支持，从而减轻了这些人对其侵犯行为的道德鄙视感。也许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这一点更能切中问题的要害——那就是，如果一个人侵犯财产的动机是为了让其妻子和儿女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我们往往会宽恕其侵犯行为。如果再加上其妻子是在“奢华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那就更减轻了他的罪行。也就是说，如果侵犯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让侵犯者的妻子能够代理消费符合金钱礼仪标准的、一定数量的时间和财物，我们就很容易给予宽恕。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在惯常程度上的炫耀性浪费这一习惯的认可严重地阻挠了反对侵犯所有权的习

惯，以至于无法确定到底是该赞扬侵犯行为，还是该谴责侵犯行为。当侵犯行为含有明显的掠夺或盗窃成分时，情况尤其如此。

This topic need scarcely be pursued further here; but the remark may not be out of place that all that considerable body of morals that clusters about the concept of an inviolable ownership is itself a psychological precipitate of the traditional meritoriousness of wealth. And it should be added that this wealth which is held sacred is valued primarily for the sake of the good repute to be got through its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这一话题在这里不需要进一步进行探讨；但有一点应当说明，围绕所有权不可侵犯这一概念的是一大堆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本身就是传统上崇尚财富的心理沉淀物。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财富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通过炫耀性消费这种财富可以赢得良好的声誉。

The bearing of pecuniary decency upon the scientific spirit or the quest of knowledge will be taken up in some detail in a separate chapter. Also as regards the sense of devout or ritual merit and adequacy in this connection, little need be said in this place. That topic will also come up incidentally in a later chapter. Still, this usage of honorific expenditure has much to say in shaping popular tastes as to what is right and meritorious in sacred matters, and the bearing of the principle of conspicuous waste upon some of the commonplace devout observances and conceits may therefore be pointed out.

金钱礼仪与科学精神或追求知识之间的关系将用单独一章的篇幅予以较为详细的论述。至于金钱礼仪在宗教或礼仪上的优点和适当性，在这里无需多讲。这一话题将在后面章节里附带提及。大众品位告诉人们在宗教事务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有价值的，荣誉性消费的习俗对这些大众品位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这里可以指出炫耀性浪费原则对一般宗教仪式或宗教思想所起的作用。

Obviously, the canon of conspicuous waste is accountable for a great portion of what may be called devout consumption; as, e.g., the consumption of sacred edifices, vestments, and other goods of the same class. Even in those modern cults to whose divinities is imputed a predilection for temples not built with hands, the sacred buildings and the other properties of the cult are constructed and decorated with some view to a reputable degree of wasteful expenditure. And it needs but little either of observation or introspection—and either will serve the turn—to assure us that the expensive splendor of the house of worship has an appreciable uplifting and mellowing effect upon the worshipper's frame of mind. It will serve to enforce the same fact if we reflect upon the sense of abject shamefulness with which any evidence of indigence or squalor about the sacred place affects all beholders. The accessories of any devout observance should be pecuniarily above reproach. This requirement is imperative, whatever latitude may be allowed with regard to these accessories in point of aesthetic or other serviceability.

很明显，大部分所谓的宗教消费，例如宗教建筑、教士法衣和其他同类财物的消费，都是出于炫耀性浪费准则的关系。有些现代教派认为其所崇拜的神偏爱非人工建造的神庙，即使在这些教派中，宗教建筑和祭祀道具的建造和装饰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荣誉性浪费支出的目

的。只要稍加留意或稍加思考——两者都可以适用——我们便会确信，富丽堂皇的教堂对信徒的心绪有着明显的振奋和抚慰作用。同样的，我们只要稍加思考便可知道，在神圣场所，任何寒酸污秽的迹象都会让所有身临其境者产生极其难堪的感觉。任何宗教信仰的配件用品在金钱价值上应当是无可挑剔的。这一要求是强制性的，尽管这些配件用品在美观或其他功用上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It may also be in place to notice that in all communities, especially in neighborhoods where the standard of pecuniary decency for dwellings is not high, the local sanctuary is more ornate, more conspicuously wasteful in its architecture and decoration, than the dwelling houses of the congregation. This is true of nearly all denominations and cults, whether Christian or Pagan, but it is true in a peculiar degree of the older and maturer cults. At the same time the sanctuary commonly contributes little if anything to the physical comfort of the members. Indeed, the sacred structure not only serves the physical well-being of the members to but a slight extent, as compared with their humbler dwelling-houses; but it is felt by all men that a right and enlightened sense of the true, the beautiful, and the good demands that in all expenditure on the sanctuary anything that might serve the comfort of the worshipper should be conspicuously absent. If any element of comfort is admitted in the fittings of the sanctuary, it should be at least scrupulously screened and masked under an ostensible austerity. In the most reputable latter-day houses of worship, where no expense is spared, the principle of austerity is carried to the length of making the fittings of the place a means of mortifying the flesh, especially in appearance. There are few persons of delicate tastes, in the matter of devout consumption to whom this austerely wasteful discomfort does not appeal as intrinsically right and good. Devout consumption is of the nature of vicarious consumption. This

canon of devout austerity is based on the pecuniary reputability of conspicuously wasteful consumption, backed by the principle that vicarious consumption should conspicuously not conduce to the comfort of the vicarious consumer.

还有一点应当注意，在所有的社会里，特别是那些在住宅方面的金钱礼仪标准不高的地区，那里的地方教堂比教众的住宅更加华丽，在建筑和装饰方面，其炫耀性浪费更是高出一筹。几乎所有教派，无论是基督教还是非基督教，情况都是如此；那些历史较为悠久、较为成熟的教派情况更是如此。然而，教堂圣殿往往对信徒们的物质享受贡献甚少。确实，和信徒们更为简陋的住宅比起来，这种神圣建筑对他们的物质福利贡献极少；不仅如此，所有人都认为，正确而开明的真善美观念要求教堂圣殿的一切开支应当明显缺少有助于崇拜者享受的任何因素。如果教堂圣殿的设施布置含有任何享受的成分，也至少应该小心翼翼地用庄严的外表加以掩饰或伪装。在近代一些最负盛名的、不惜巨资建造的礼拜场所中，庄严的原则得到很好的贯彻，使得这一场所的设施布置成了抑制肉欲的工具，在外表上尤其如此。在宗教消费上具有高雅品位的人，绝大部分都认为这种庄严掩饰下的浪费所带来的不适在本质上是合理的，是适当的。宗教消费本质上是一种代理消费。宗教消费应当以庄严为前提，这一准则是建立在炫耀性浪费消费所带来的金钱荣誉的基础上的，并且以代理消费不应明显有助于代理消费者享受这一原则为其后盾。

The sanctuary and its fittings have something of this austerity in all the cults in which the saint or divinity to whom the sanctuary pertains is not conceived to be present and make personal use of the property for the gratification of luxurious tastes imputed to him. The character of the sacred paraphernalia is somewhat different in this respect in those cults where the habits of life imputed to the divinity more nearly approach those of an earthly patriarchal

potentate—where he is conceived to make use of these consumable goods in person. In the latter case the sanctuary and its fittings take on more of the fashion given to goods destined for th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a temporal master or owner. On the other hand, where the sacred apparatus is simply employed in the divinity's service, that is to say, where it is consumed vicariously on his account by his servants, there the sacred properties take the character suited to goods that are destined for vicarious consumption only.

有些教派为神祇和圣徒建造了圣殿，但这些教派并不认为其神祇和圣徒会出现在这些场所，亲自享用这些财产以满足其假想的奢侈品位；所有这些教派的圣殿及其设备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庄严的特点。而有些教派，其圣殿的设备在这一方面的性质略有不同；在这些教派中，假想中的神祇，其生活习惯更加接近于世俗父权制下的统治者，人们认为这位神祇会亲自享用这些消费品。在这种情况下，圣殿及其设施布置的样式更像世俗中的主人或财物拥有者用于炫耀性消费的财物。相反，如果这些神圣的器具用品只是供敬神仪式使用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器具用品是由神祇的仆人代为消费的，那么这些神圣财产就具有了专供代理消费的财物的属性。

In the latter case the sanctuary and the sacred apparatus are so contrived as not to enhance the comfort or fullness of life of the vicarious consumer, or at any rate not to convey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end of their consumption is the consumer's comfort. For the end of vicarious consumption is to enhance, not the fullness of life of the consumer, but the pecuniary repute of the master for whose behoof the consumption takes place. Therefore priestly vestments are notoriously expensive, ornate, and inconvenient; and in the cults where the priestly servitor of the divinity is not conceived to

serve him in the capacity of consort, they are of an austere, comfortless fashion. And such it is felt that they should be.

在这后一种情况下，圣殿和神圣的器具用品的设置不是为了增进代理消费者的物质享受，也不是为了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无论如何不能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购置圣殿和神圣的器具用品的目的是为了消费者的享受。因为代理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代理消费者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而是为了提高其主人的金钱荣誉，这类消费是代替这位主人进行的。因此，教士的法衣是出了名的昂贵、华丽，而且穿起来极不方便；有些教派认为祭司仆役并不是以神的伙伴的身份来为其服务的，在这样的教派里，教士的法衣是庄严的，并且毫无舒适可言。人们觉得法衣理应如此。

It is not only in establishing a devout standard of decent expensiveness that the principle of waste invades the domain of the canons of ritual serviceability. It touches the ways as well as the means, and draws on vicarious leisure as well as on vicarious consumption. Priestly demeanor at its best is aloof, leisurely, perfunctory, and uncontaminated with suggestions of sensuous pleasure. This holds true, in different degrees of course, for the different cults and denominations; but in the priestly life of all anthropomorphic cults the marks of a vicarious consumption of time are visible.

浪费的原则侵入了宗教仪式实用性的领域，这一原则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宗教礼仪奢华标准的建立。它还触及到宗教礼仪的方式方法；它不仅涉及代理有闲，还涉及代理消费。教士风度的最高境界是超然物外、悠闲从容、照章办事，并且是六根清净，不为感官享乐所动。这一点适用于所有教派，当然，对于不同的教派，其适用程度也不尽

相同；但是，所有主张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教派，其教士或僧侣的生活中都可以看到代理消费时间的痕迹。

The same pervading canon of vicarious leisure is also visibly present in the exterior details of devout observances and need only be pointed out in order to become obvious to all beholders. All ritual has a notable tendency to reduce itself to a rehearsal of formulas. This development of formula is most noticeable in the maturer cults, which have at the same time a more austere, ornate, and severe priestly life and garb; but it is perceptible also in the forms and methods of worship of the newer and fresher sects, whose tastes in respect of priests, vestments, and sanctuaries are less exacting. The rehearsal of the service (the term “service” carries a suggestion significant for the point in question) grows more perfunctory as the cult gains in age and consistency, and this perfunctoriness of the rehearsal is very pleasing to the correct devout taste. And with a good reason, for the fact of its being perfunctory goes to say pointedly that the master for whom it is performed is exalted above the vulgar need of actually proficuous service on the part of his servants. They are unprofitable servants, and there is an honorific implication for their master in their remaining unprofitable. It is needless to point out the close analogy at this point between the priestly office and the office of the footman. It is pleasing to our sense of what is fitting in these matters, in either case, to recognize in the obvious perfunctoriness of the service that it is a *pro forma* execution only. There should be no show of agility or of dexterous manipulation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priestly office, such as might suggest a capacity for turning off the work.

在宗教仪式的外在细节上显然也存在着普遍的代理有闲准则，对所有旁观者来说，只需稍加指点，这一点便可变得清楚明了。所有宗教仪式都具有沦为程序演练的明显趋势。这种程序的发展在较为成熟的教派中最为明显，在这样的教派中，教士的生活和服装也更加庄严、更加华贵、更加简单；有些教派是新近成立的，对教士、法衣以及圣殿的品位要求还不是那么严格，在这些教派举行礼拜的方式方法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程序的发展。随着教派成立的时间越久，基础越根深蒂固，其礼拜仪式（“礼拜仪式”一词的含义对当前探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就变得越来越机械，而这种机械的演练很合正派教徒们的口味。这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因为礼拜仪式变得机械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为之举行仪式的那位主子（神）已经超越了庸俗的需要，他不需要仆人们为其举行有实际益处的礼拜仪式。奴仆们不会给他带来利益，正是因为他们不会带来利益，他们的主子才有了光荣的意蕴。不言而喻，在这一点上，教士的职责和仆役的职责是极其相似的。不论是教士还是仆役，在提供服务时都是明显地照章办事，都只是走走形式，这正好迎合了我们的观念，这些观念告诉我们在这些事务上如何做才是合适的。教士在履行职责时不应当表现得驾轻就熟、游刃有余，这样可能让人觉得这项工作无足轻重，谁都能做。

In all this there is of course an obvious implication as to the temperament, tastes, propensities, and habits of life imputed to the divinity by worshippers who live under the tradition of these pecuniary canons of reputability. Through its pervading men's habits of thought, the principle of conspicuous waste has colored the worshippers' notions of the divinity and of the relation in which the human subject stands to him. It is of course in the more naive cults that this suffusion of pecuniary beauty is most patent, but it is visible throughout. All peoples, at whatever stage of culture or degree of enlightenment, are fain to eke out a sensibly scant degree of authentic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ersonality and habitual surroundings of their divinities. In so calling in the aid of fancy to

enrich and fill in their picture of the divinity's presence and manner of life they habitually impute to him such traits as go to make up their ideal of a worthy man. And in seeking communion with the divinity the ways and means of approach are assimilated as nearly as may be to the divine ideal that is in men's minds at the time. It is felt that the divine presence is entered with the best grace, and with the best effect, according to certain accepted methods and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certain material circumstances which in popular apprehension are peculiarly consonant with the divine nature. This popularly accepted ideal of the bearing and paraphernalia adequate to such occasions of communion is, of course, to a good extent shaped by the popular apprehension of what is intrinsically worthy and beautiful in human carriage and surroundings on all occasions of dignified intercourse. It would on this account be misleading to attempt an analysis of devout demeanor by referring all evidences of the presence of a pecuniary standard of reputability back directly and baldly to the underlying norm of pecuniary emulation. So it would also be misleading to ascribe to the divinity, as popularly conceived, a jealous regard for his pecuniary standing and a habit of avoiding and condemning squalid situations and surroundings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under grade in the pecuniary respect.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明示了神的性情禀性、喜好、性格本性以及生活习惯，而这一切都是生活在金钱荣誉准则传统下的信徒们假想的。炫耀性浪费准则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习惯中，影响到信徒们关于神的观念，影响到信徒们关于人神之间关系的观念。“金钱是美的”这一观念在所有教派中都可以见到，当然，在较为原始的教派里，这一观念最为显著。所有民族，不论处于何种文化阶段或开明程度，都只能依靠少之又少的可靠信息来了解他们所崇拜的神的个性和生活环境。他们便借助于想象以丰富充实他们心目中的神的样貌和生活方式，这样，他们通常会将他们理想中的高尚的伟大人物所具有的特征赋予他们所

崇拜的神。他们试图与神灵进行交流，其方式方法会尽可能与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神圣理想一致。人们认为，按照某种公认的方法，加之以一般人认为的特别符合神性的某种物质环境，神就会以最为优雅的方式、最佳的效果现身显灵。在与神灵交流的场合，什么样的行为举止与设备物品是适当的，这是有着公认的理想标准的；在所有隆重庄严的社交场合，什么样的仪态举止和环境在本质上是优美而又有价值的，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上述理想标准的形成。但是，在分析敬神的行为方式时，如果认为所有金钱荣誉标准存在的证据都直接地、单纯地起源于金钱竞赛的基本规范，这是一种误解。公众误以为所崇拜的神十分在乎其金钱地位，他之所以要避开并排斥肮脏卑劣的环境，只是因为这些环境在金钱方面不达标，这种想法也是一种误解。

And still, after all allowance has been made, it appears that the canons of pecuniary reputability do, directly or indirectly, materially affect our notions of the attributes of divinity, as well as our notions of what are the fit and adequate manner and circumstances of divine communion. It is felt that the divinity must be of a peculiarly serene and leisurely habit of life. And whenever his local habitation is pictured in poetic imagery, for edification or in appeal to the devout fancy, the devout word-painter, as a matter of course, brings out before his auditors' imagination a throne with profusion of the insignia of opulence and power, and surrounded by a great number of servitors. In the common run of such presentations of the celestial abodes, the office of this corps of servants is a vicarious leisure, their time and efforts being in great measure taken up with an industrially unproductive rehearsal of the meritorious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its of the divinity; while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esentation is filled with the shimmer of the precious metals and of the more expensive varieties of precious stones. It is only in the crasser expressions of devout fancy that this

intrusion of pecuniary canons into the devout ideals reaches such an extreme. An extreme case occurs in the devout imagery of the Negro population of the South. Their word-painters are unable to descend to anything cheaper than gold; so that in this case the insistence on pecuniary beauty gives a startling effect in yellow—such as would be unbearable to a soberer taste. Still, there is probably no cult in which ideals of pecuniary merit have not been called in to supplement the ideals of ceremonial adequacy that guide men's conception of what is right in the matter of sacred apparatus.

然而，即使从各个方面作了考虑，神的属性是什么，什么样的方式和环境是适合与神灵进行交流的，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念似乎依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金钱荣誉准则的影响。人们觉得神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格外宁静和悠闲的。为了宣扬教义或唤起教徒对本教的热忱，虔诚的说教者会以诗意的想象来描绘神的住所，当然，此时浮现在倾听者脑海中的必然是尽显财富与权力的王位，围绕在王位周围的是一大批仆从。通常在描绘天国住所时，这一群侍从的职责就是代理有闲，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了不辞辛劳地颂扬神的德行和功绩这类非生产性的工作上了；整个画面充满了珠光宝气，其背景是绚烂夺目的贵重金属以及各式各样更为珍贵的宝石。只有在宗教想象较为粗糙的表现形式中，金钱准则对宗教理想的干扰才会达到这样极端的程度。美国南方黑人族群的宗教想象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们的说教者不能降格接受任何比黄金低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对金钱之美的坚持造就了画面的一片金黄，从而产生了惊人的效果——简直到了品位素雅之士难以忍受的地步。尽管如此，可能没有一个教派会不用金钱价值的标准来补充礼仪恰当性的标准，这后一种标准支配着人们关于宗教设备的观念，告诉人们什么样的宗教设备才是恰当的。

Similarly it is felt—and the sentiment is acted upon—that the priestly servitors of the divinity should not engage in industrially productive work; that work of any kind—any employment which is of tangible human use—must not be carried on in the divine presence, or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the sanctuary; that whoever comes into the presence should come cleansed of all profane industrial features in his apparel or person, and should come clad in garments of more than everyday expensiveness; that on holidays set apart in honor of or for communion with the divinity no work that is of human use should be performed by any one. Even the remoter, lay dependents should render a vicarious leisure to the extent of one day in seven.

同样，人们觉得——情感告诉他们——教士，作为神的仆人，不应该从事辛劳的生产性工作；不论何种工作，只要是对人类有实际用途的，都绝对不可以当着神的面或在圣殿区域内进行；所有进入这一区域的人都应该将其衣服或身体上亵渎神灵的生产特征洗涤殆尽，都应该穿上比平时更为昂贵华丽的衣服；有些节日是用来敬神或与神灵交流的，在这些节日里，任何人都不应该从事任何对人类有用的工作。甚至是关系比较疏远的世俗的人们，每隔七天都要抽出一天来执行代理有闲。

In all these deliverances of men's uninstructed sense of what is fit and proper in devout observance and in the relations of the divinity, the effectual presence of the canons of pecuniary reputability is obvious enough, whether these canons have had their effect on the devout judgment in this respect immediately or at the second remove.

什么才是适合宗教仪式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才是恰当适宜的？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有着自发的观念，在这类自发观念的所有表现中，金钱荣誉准则的有效存在是十分明显的，它或直接或间接地对这方面的宗教见解产生了影响。

These canons of reputability have had a similar, but more far-reaching and more specifically determinable, effect upon the popular sense of beauty or serviceability in consumable goods. The requirements of pecuniary decency have, to a very appreciable extent, influenced the sense of beauty and of utility in articles of use or beauty. Articles are to an extent preferred for use on account of their being conspicuously wasteful; they are felt to be serviceable somewhat in proportion as they are wasteful and ill adapted to their ostensible use.

这些荣誉准则对消费品的美感或实用性方面的一般观念也有着同样的影响，而且其影响更加深远，更具决定性。人们对于实用物品或装饰物品的审美观念或实用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金钱礼仪要求的影响。人们乐于使用某些物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物品具有炫耀性浪费的特点；这些物品具有浪费的性质，而且与它们表面的用途不一致，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觉得它们具有相应的实用性。

The utility of articles valued for their beauty depends closely upon the expensiveness of the articles. A homely illustration will bring out this dependence. A hand-wrought silver spoon, of a commercial value of some ten to twenty dollars, is not ordinarily more serviceable—in the first sense of the word—than a machine-made spoon of the same material. It may not even be more serviceable than a machine-made spoon of some “base” metal, such

as aluminum, the value of which may be no more than some ten to twenty cents. The former of the two utensils is, in fact, commonly a less effective contrivance for its ostensible purpose than the latter. The objection is of course ready to hand that, in taking this view of the matter, one of the chief uses, if not the chief use, of the costlier spoon is ignored; the hand-wrought spoon gratifies our taste, our sense of the beautiful, while that made by machinery out of the base metal has no useful office beyond a brute efficiency. The facts are no doubt as the objection states them, but it will be evident on reflection that the objection is after all more plausible than conclusive. It appears (1) that while the different materials of which the two spoons are made each possesses beauty and serviceability for the purpose for which it is used, the material of the hand-wrought spoon is some one hundred times more valuable than the baser metal, without very greatly excelling the latter in intrinsic beauty of grain or color, and without being in any appreciable degree superior in point of mechanical serviceability; (2) if a close inspection should show that the supposed hand-wrought spoon were in reality only a very clever imitation of hand-wrought goods, but an imitation so cleverly wrought as to give the same impression of line and surface to any but a minute examination by a trained eye, the utility of the article, including the gratification which the user derives from its contemplation as an object of beauty, would immediately decline by some eighty or ninety per cent, or even more; (3) if the two spoons are, to a fairly close observer, so nearly identical in appearance that the lighter weight of the spurious article alone betrays it, this identity of form and color will scarcely add to the value of the machine-made spoon, nor appreciably enhance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 user's “sense of beauty” in contemplating it, so long as the cheaper spoon is not a novelty, and so long as it can be procured at a nominal cost.

以美为贵的物品，其功用与它的昂贵程度有着密切关系。下面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关系。一只手工制作的银质汤匙，其商业价值大约是十到二十美元，它通常不会比材质相同却是机器制造的汤匙更具有用性——原始意义上的“有用性”。它甚至不如以铝一类的“贱”金属为原料的机制汤匙更具有用性，而后者的价值可能只有大约十到二十美分。事实上，作为一种用具，手工制造的银质汤匙在表面用途上还不如机器制造的汤匙。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现成的反对理由：上述那种看问题的方法忽视了这把更为昂贵的汤匙（手工制造的银质汤匙）所具有的主要用途，至少是忽视了其主要用途之一，即手工制造的汤匙可以满足我们的品位，可以满足我们对美的感觉，而以贱金属为原料的机制汤匙除了较为实用之外，再无其他功能。毫无疑问，这种反驳意见所说的都是事实，但是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这种反驳意见似乎有理，但并非定论。看起来情形好像是这样的：（1）两种由不同材料制成的汤匙都具有符合其用途的美观和有用性，而手工制造的汤匙所使用的材料价值大约是贱金属的一百倍，但是就质地和色彩的内在美而言，前者并未远远超过后者；就器具的有用性而言，前者并不明显优于后者；（2）假如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本以为是手工制造的汤匙实际上只不过是对手工品的精巧模仿，不过仿造得十分精巧，其外观和真的手工制品一模一样，只有经过具有专业眼光的行家仔细查验才能识破；一旦被识破，这件物品的功用，包括使用者把它当作工艺品所得到的满足感都会立即降低十之八九，甚至更多；（3）假如在一个较为细心的观察者看来，这两把汤匙在外观上几乎完全相同，仿制品唯一的破绽是其分量较轻，然而只要这种机制汤匙不是什么新品，只要这种汤匙以极低的价格便可购得，式样与色泽相同就绝不能提高其价值，也不能明显提高使用者观赏它时获得的美感满足程度。

The case of the spoons is typical. The superior gratification derived from the use and contemplation of costly and supposedly beautiful products is, commonly, in great measure a gratification of our sense of costliness masquerading under the name of beauty. Our

higher appreciation of the superior article is an appreciation of its superior honorific character, much more frequently than it is an unsophisticated appreciation of its beauty. The requirement of conspicuous wastefulness is not commonly present, consciously, in our canons of taste, but it is none the less present as a constraining norm selectively shaping and sustaining our sense of what is beautiful, and guiding our discri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what may legitimately be approved as beautiful and what may not.

上述关于汤匙的例子是很典型的。我们从使用和观赏昂贵且被认为是美丽的产品中获得的高度满足，在很大程度上，通常是对假借美丽之名的高价感的满足。我们比较欣赏优质产品，但是我们所欣赏的是优质产品所具有的高度荣誉性，而不是单纯地欣赏它所具有的美感。炫耀性浪费的要求往往不会有意识地存在于我们的品位准则之中；但是，它依然作为一个有约束力的规范存在着，它选择性地形成并保持我们关于美的观念，支配着我们的鉴赏力，这种鉴赏力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可以看作是真正美丽的，什么东西不可以。

It is at this point, where the beautiful and the honorific meet and blend, that discrimination between serviceability and wastefulness is most difficult in any concrete case. It frequently happens that an article which serves the honorific purpose of conspicuous waste is at the same time a beautiful object; and the same application of labor to which it owes its utility for the former purpose may, and often does, go to give beauty of form and color to the article. The question is further complicated by the fact that many objects, as, for instance, the precious stones and metals and some other materials used for adornment and decoration, owe their utility as items of conspicuous waste to an antecedent utility as objects of beauty. Gold, for instance, has a high degree of sensuous

beauty; very many if not most of the highly prized works of art are intrinsically beautiful, though often with material qualification; the like is true of some stuff used for clothing, of some landscapes, and of many other things in less degree. Except for this intrinsic beauty which they possess, these objects would scarcely have been coveted as they are, or have become monopolized objects of pride to their possessors and users. But the utility of these things to the possessor is commonly due less to their intrinsic beauty than to the honor which their possession and consumption confers, or to the obloquy which it wards off.

就任何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正是在美丽与荣誉相交融的这一点上，要区别实用与浪费是最为困难的。一件物品是用于满足炫耀性浪费的荣誉性目的的，但同时又是一件美的东西，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为了使物品能够满足炫耀性浪费的荣誉性目的而付出的劳动往往会赋予这件物品式样和色泽上的美感。有许多物品，例如装饰用的宝石、金属及其他材料，之所以具有炫耀性浪费品的功用，因为它们先具有了美丽物品的功用，这一事实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例如，黄金具有高度的美感，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极其珍贵的艺术品都具有内在美，尽管它们往往是由较高级的材质制成的。用于制作衣服的某些材料、某些风景画以及许多其他东西，情况都是如此，只是没有那么明显罢了。要不是这些物品具有内在美，人们就不会那样对它们垂涎三尺，拥有者和使用者就不会将它们占为己有，并把它们当作引以为傲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于其拥有者的功用往往不在于它们具有内在美，而主要在于拥有和消费这些东西可以免遭诟病并可以带来荣誉。

Apart from their serviceability in other respects, these objects are beautiful and have a utility as such; they are valuable on this account if they can be appropriated or monopolized; they are,

therefore, coveted as valuable possessions, and their exclusive enjoyment gratifies the possessor's sense of pecuniary superiority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ir contemplation gratifies his sense of beauty. But their beauty, in the naive sense of the word, is the occasion rather than the ground of their monopolization or of their commercial value. “Great as is the sensuous beauty of gems, their rarity and price adds an expression of distinction to them, which they would never have if they were cheap.” There is, indeed, in the common run of cases under this head, relatively little incentive to the exclusive possession and use of these beautiful things, except on the ground of their honorific character as items of conspicuous waste. Most objects of this general class, with the partial exception of articles of personal adornment, would serve all other purposes than the honorific one equally well, whether owned by the person viewing them or not; and even as regards personal ornaments it is to be added that their chief purpose is to lend éclat to the person of their wearer (or owner) by comparison with other persons who are compelled to do without. The aesthetic serviceability of objects of beauty is not greatly nor universally heightened by possession.

除了其他方面的功用，这些物品又是美丽的，它们在这一方面也是具有功用的；因此，它们作为宝贵的财产，成了人们垂涎的对象，独自享受这些物品满足了拥有者的金钱优越感，同时，观赏这些物品也给他带来了美感。但是这些物品的美——原始意义上的“美”——只是它们被占有并具有商业价值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宝石具有极大的感官之美，它们珍稀罕见而又价格不菲，因而弥显珍贵，但是如果这些宝石价格低廉，就不会享有如此尊贵的地位。”的确，这类美丽物品要不是具有炫耀性浪费品的光荣属性，人们很少会产生将其占为己有并加以使用的动机。大多数这类物品（部分个人装饰品除外），不论是否为观赏者拥有，都具有增加荣誉的用途，除此之外，它们同样还具有其他用途。说到个人装饰品，我们需要补充一点，即

其主要用途依然在于，在与无法获得这类装饰品的人们进行比较时，它们可以为其佩戴者或拥有者增光添彩。美丽物品在审美上的功用并不会因其被占有而得到极大的、普遍的提高。

The generalization for which the discussion so far affords ground is that any valuable object in order to appeal to our sense of beauty must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beauty and of expensiveness both. But this is not all. Beyond this the canon of expensiveness also affects our tastes in such a way as to inextricably blend the marks of expensiveness, in our appreciation, with the beautiful features of the object, and to subsume the resultant effect under the head of an appreciation of beauty simply. The marks of expensiveness come to be accepted as beautiful features of the expensive articles. They are pleasing as being marks of honorific costliness, and the pleasure which they afford on this score blends with that afforded by the beautiful form and color of the object; so that we often declare that an article of apparel, for instance, is "perfectly lovely," when pretty much all that an analysis of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he article would leave ground for is the declaration that it is pecuniarily honorific.

由上文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贵重物品，要想引起我们的美感，就必须同时符合美丽与昂贵这两个要求。但是还不止如此。除此之外，昂贵这一准则还对我们的品位产生了影响，使得我们在欣赏一件物品时会将其昂贵的特征与美的特征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并将这两个特点所产生的效果单单归结为是对美的欣赏所产生的效果。昂贵的标志逐渐被看作是昂贵物品美的特征。昂贵物品讨人喜欢因为它们具有光荣的高价特点，一件物品在这方面给人们带来的愉悦感和它的式样美以及色泽美给人们带来的愉悦感混合在一起；我们经常说一件物品（如一件衣服）"漂亮极了"，当我们对这一物品的美

学价值进行分析之后就会发觉，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件物品在金钱上具有光荣的属性。

This blending and confusion of the elements of expensiveness and of beauty is, perhaps, best exemplified in articles of dress and of household furniture. The code of reputability in matters of dress decides what shapes, colors, materials, and general effects in human apparel are for the time to be accepted as suitable; and departures from the code are offensive to our taste, supposedly as being departures from aesthetic truth. The approval with which we look upon fashionable attire is by no means to be accounted pure make-believe. We readily, and for the most part with utter sincerity, find those things pleasing that are in vogue. Shaggy dress-stuffs and pronounced color effects, for instance, offend us at times when the vogue is goods of a high, glossy finish and neutral colors. A fancy bonnet of this year's model unquestionably appeals to our sensibilities to-day much more forcibly than an equally fancy bonnet of the model of last year; although when view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a quarter of a century, it would, I apprehend, be a matter of the utmost difficulty to award the palm for intrinsic beauty to the one rather than to the other of these structures. So, again, it may be remarked that, considered simply in their physical juxtaposition with the human form, the high gloss of a gentleman's hat or of a patent-leather shoe has no more of intrinsic beauty than a similarly high gloss on a threadbare sleeve; and yet there is no question but that all well-bred people (in the Occidental civilized communities) instinctively and unaffectedly cleave to the one as a phenomenon of great beauty, and eschew the other as offensive to every sense to which it can appeal. It is extremely doubtful if anyone could be induced to wear such a contrivance as the high hat of civilized society, except for some urgent reason based on other

than aesthetic grounds.

昂贵的因素和美丽的因素混合在一起并导致了混淆，这种情况在衣服和家具这类物品中大概是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服饰而言，荣誉准则决定了何种式样、颜色、材质和穿着效果在当时被认为是适宜得体的；对这一准则的违背是和我们的品位相抵触的，因为这可能是与审美真理相背离的。绝不可以认为我们对时髦服装的认可是假装出来的。我们很容易觉得那些正在流行的东西是讨人喜欢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喜欢是完全发自内心的。以衣服为例，如果正在流行的是质感细腻光滑的料子以及中性色彩（如白、灰、黑等色彩），那么粗糙的衣料和鲜艳的色彩就会让我们感到不快。比起一顶去年流行款式的精美女帽，一顶今年流行款式的同样精美的女帽无疑更让我们动心；不过，如果过了二三十年再对这两顶女帽进行评判，要决定哪一顶更具内在美恐怕是极其困难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但就其与人体外形的搭配来考虑，一顶细腻光滑的绅士帽或一只油光锃亮的漆皮鞋和一个具有同样光泽的磨破的袖子比起来，前者的光泽并不比后者的光泽更具内在美；但是，毫无疑问，所有西方文明社会里有教养的人都会本能地、自然而然地选择前者，认为它是美的现象，而回避后者，认为它对人的所有感官来说都是令人反感的。除非是由于美学原因以外的某种紧迫的原因，任何人都不太可能会愿意戴上一顶文明社会发明的高礼帽。

By further habituation to an appreciative perception of the marks of expensiveness in goods, and by habitually identifying beauty with reputability, it comes about that a beautiful article which is not expensive is accounted not beautiful. In this way it has happened, for instance, that some beautiful flowers pass conventionally for offensive weeds; others that can be cultivated with relative ease are accepted and admired by the lower middle class, who can afford no more expensive luxuries of this kind; but

these varieties are rejected as vulgar by those people who are better able to pay for expensive flowers and who are educated to a higher schedule of pecuniary beauty in the florist's products; while still other flowers, of no greater intrinsic beauty than these, are cultivated at great cost and call out much admiration from flower-lovers whose tastes have been matured under the critical guidance of a polite environment.

随着人们进一步习惯于对物品昂贵的特征持赞赏的态度，随着人们习惯于将美丽与荣誉等同起来，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一件美丽的物品，如果不是昂贵的，就不能算作是美丽的。这样，就出现了以下的情况：某些美丽的花卉在习俗上却被看作是惹人讨厌的杂草；而有些比较容易栽培的花卉则被中产阶级下层接受，受到他们的喜爱，这一中产阶级下层买不起花卉中更为珍贵的品种；但是，有些人对这些较易栽培的品种不屑一顾，认为它们俗不可耐，这些人经济境况较好，能够买得起昂贵的花卉，他们在花店产品的金钱美感方面接受过良好的训练；还有一些花卉，其内在美感并不高于上述种种花卉，但是其栽培的成本很高，因而受到了爱花者的欣赏，这些人的品位是在高雅环境的严格指导变得成熟起来的。

The same variation in matters of taste, from one class of society to another, is visible also as regards many other kinds of consumable goods, as, for example, is the case with furniture, houses, parks, and gardens. This diversity of views as to what is beautiful in these various classes of goods is not a diversity of the norm according to which the unsophisticated sense of the beautiful works. It is not a constitutional difference of endowments in the aesthetic respect, but rather a difference in the code of reputability which specifies what objects properly lay within the scope of honorific consumption for the class to which the critic belongs. It is

a difference in the traditions of propriety with respect to the kinds of things which may, without derogation to the consumer, be consumed under the head of objects of taste and art. With a certain allowance for variations to be accounted for on other grounds, these traditions are determined, more or less rigidly, by the pecuniary plane of life of the class.

社会阶级不同，品位也不相同，这一情形在许多其他物品的消费上也可以看到，例如家具、住宅、公园和花园等等，都是如此。关于这些不同种类的物品哪一类才是美的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这并不是由于形成关于美的朴素观念所依据的规范有所不同。这并不是因为这些物品的构造在审美方面天生就存在差异，而是因为在荣誉准则上存在着差异，这一准则明确规定了哪些物品适合归入评论者所属阶级的荣誉消费范围内。这是礼仪传统上的差别，这类传统告诉我们哪些东西是可以作为有品位而又美丽的物品来消费而不会有损消费者的声誉的。除了出于其他原因而略有变通外，这些传统是比较严格地由该阶级的金钱生活水准决定的。

Everyday life affords many curious illustrations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code of pecuniary beauty in articles of use varies from class to class, as well as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conventional sense of beauty departs in its deliverances from the sense untutored by the requirements of pecuniary repute. Such a fact is the lawn, or the close-cropped yard or park, which appeals so unaffectedly to the taste of the Western peoples. It appears especially to appeal to the tastes of the well-to-do classes in those communities in which the dolicho-blond element predominates in an appreciable degree. The lawn unquestionably has an element of sensuous beauty, simply as an object of apperception, and as such no doubt it appeals pretty directly to the eye of nearly all races and all classes; but it is,

perhaps, more unquestionably beautiful to the eye of the dolicho-blond than to most other varieties of men. This higher appreciation of a stretch of greensward in this ethnic element than in the other elements of the population, goes along with certain other features of the dolicho-blond temperament that indicate that this racial element has once been for a long time a pastoral people inhabiting a region with a humid climate. The close-cropped lawn is beautiful in the eyes of a people whose inherited bent it is to readily find pleasure in contemplating a well-preserved pasture or grazing land.

日常生活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奇特的例子，说明了日常用品的金钱美丽准则是如何随着阶级不同而有所变化的，也说明了关于传统的审美观念在表现上是如何与没有受过金钱荣誉要求指导的观念相背离的。西方各民族由衷地喜爱草地，喜欢草坪被修剪得很平的庭院或公园，这便是一个奇特的例子。上述一类的庭院或公园特别迎合有些社会的富有阶级的品位，在这样的社会里，金色长发因素的特征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单单就其作为一个可以被感知的对象来说，草地毫无疑问具有感官美感的因素，因此，它几乎对所有种族、所有阶级都具有直接的吸引力；但是，草地在金色长发的人们眼中也许比起在大多数其他人种眼中显得更加无可挑剔、更加美丽。这一种族的人比其他种族的人对一望无垠的草坪更加情有独钟，这是和金色长发的人们在气质上的其他某些特征分不开的，这些特征表明这一种族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曾经是个游牧民族，他们居住的地区气候潮湿。一个民族，如果其继承的性格本性使得他们一想到保护得很好的草原或牧场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快乐，那么，修剪整齐的草地在他们眼中也将是美丽的。

For the aesthetic purpose the lawn is a cow pasture; and in some cases to-day—where the expensiveness of the attendant circumstances bars out any imputation of thrift—the idyl of the

dolicho-blond is rehabilitated in the introduction of a cow into a lawn or private ground. In such cases the cow made use of is commonly of an expensive breed. The vulgar suggestion of thrift, which is nearly inseparable from the cow, is a standing objection to the decorative use of this animal. So that in all cases, except where luxurious surroundings negate this suggestion, the use of the cow as an object of taste must be avoided. Where the predilection for some grazing animal to fill out the suggestion of the pasture is too strong to be suppressed, the cow's place is often given to some more or less inadequate substitute, such as deer, antelopes, or some such exotic beast. These substitutes, although less beautiful to the pastoral eye of Western man than the cow, are in such cases preferred because of their superior expensiveness or futility, and their consequent repute. They are not vulgarly lucrative either in fact or in suggestion.

从审美角度来看，草地就像是一片牧牛场；即使在今天的某些情况下，现场环境的奢华容不下任何寒酸气，但是如果在草地或私人土地上放上一头牛，就又会激起金色长发的人们对田园风光的憧憬。在这些场合所使用的牛通常属于名贵的品种。然而，有关节俭寒酸的粗俗联想几乎是和牛分不开的，这是反对把牛当作点缀的一个现成的理由。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除非奢华的环境能够打消这种联想，否则就必须避免把牛当作有品位的东西来使用。人们偏好使用某种食草动物来充实对草原牧场的联想，这种偏好之情十分强烈，难以压抑，牛的地位通常会被某种不太恰当的动物所取代，这类动物有鹿、羚羊或某种珍奇的兽类等等。虽然在喜爱田园的西方人的眼中，这些替代动物没有牛那样美丽，但是在这些场合它们更受人们喜爱，因为它们极其昂贵，而且毫无用处，因而具有荣誉性。不论是在实际上还是在人们的联想中，它们都不能干粗重的活，都不能让人赚钱获利。

Public parks of course fall in the same category with the lawn;

they too, at their best, are imitations of the pasture. Such a park is of course best kept by grazing, and the cattle on the grass are themselves no mean addition to the beauty of the thing, as need scarcely be insisted on with anyone who has once seen a well-kept pasture. But it is worth noting,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ecuniary element in popular taste that such a method of keeping public grounds is seldom resorted to. The best that is done by skilled workmen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 trained keeper is a more or less close imitation of a pasture, but the result invariably falls somewhat short of the artistic effect of grazing. But to the average popular apprehension a herd of cattle so pointedly suggests thrift and usefulness that their presence in the public pleasure ground would be intolerably cheap. This method of keeping grounds is comparatively inexpensive, therefore it is indecorous.

公园当然和草地属于同一类别，因为它们和草地一样，只不过是对草原牧场的模仿罢了。要保养这样一座公园，最好的办法是放牧，草地上的牛群本身就使得美景增色不少，对那些曾经见过保养得很好的牧场的人来说，这一点无需细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众品位中金钱因素的表现，人们很少使用放牧的方式来保养公共土地。在训练有素的所有者的监督之下，熟练工匠竭尽全力所能做到的就是对草原牧场比较接近的模仿，但是其结果总是在放牧的艺术效果上有所欠缺。但是，在一般大众看来，一群牛有着强烈的寒酸与实用的意味，如果让它们出现在公共娱乐场所，就会让人感到俗不可耐。因为这种保养场地的方法相对来说较为低廉，因此是不合礼仪的。

Of the same general bearing is another feature of public grounds. There is a studious exhibition of expensiveness coupled with make-believe of simplicity and crude serviceability. Private grounds also show the same physiognomy wherever they are in the

management or ownership of persons whose tastes have been formed under middle-class habits of life or under the upper-class traditions of no later a date than the childhood of the generation that is now passing. Grounds which conform to the instructed tastes of the latter-day upper class do not show these features in so marked a degree. The reason for this difference in tastes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incoming generation of the well-bred lies in the changing economic situation. A similar difference is perceptible in other respects, as well as in the accepted ideals of pleasure grounds. In this country as in most others, until the last half century but a very small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were possessed of such wealth as would exempt them from thrift. Owing to imperfect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is small fraction were scattered and out of effective touch with one another. There was therefore no basis for a growth of taste in disregard of expensiveness. The revolt of the well-bred taste against vulgar thrift was unchecked. Wherever the unsophisticated sense of beauty might show itself sporadically in an approval of inexpensive or thrifty surroundings, it would lack the "social confirmation" which nothing but a considerable body of like-minded people can give. There was, therefore, no effective upper-class opinion that would overlook evidences of possible inexpensiveness in the management of grounds; and there was consequently no appreciabl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leisure-class and the lower middle-class ideal in the physiognomy of pleasure grounds. Both classes equally constructed their ideals with the fear of pecuniary disrepute before their eyes.

公共场地的另一个特征也和上述情形相同。那就是，公共场地一方面要刻意表现奢华，另一方面又要伪装成朴素且具有一些天然的实用性。私有场地，如果其管理者或所有者的品位是在中产阶级的生活习惯下形成的，或者是在上层阶级的上一代的传统下形成的，就会呈

现出这样的外观。有些场地迎合了现代上层阶级受过指导的品位，这些场地的上述特征就没有那么明显。上一代有教养人士与新一代有教养人士的品位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经济状况的变化。不仅在娱乐场地的公认标准方面，在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在美国，和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半个世纪以前，只有极少部分人拥有足够的财富，使得他们能够不必节俭度日。由于交通工具不完备，这一小部分人分散在各地，彼此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接触。因此，无视奢华的品位就缺乏发展的基础。有教养的品位对庸俗节俭的反抗是不可抑制的。朴素的审美观念可能偶尔会对低廉或节俭的环境表示赞许，这样的观念是缺乏“社会认可”的，而要得到社会认可就必须得到为数众多而且持相同观点的人的认可。因此，上层阶级现行的舆论不会对场地管理中可能存在的花费不多的证据视而不见；其结果是，有闲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之间在娱乐场地外观的理想标准上并没有显著的分歧。这两个阶级在建立各自的理想标准时，都害怕看到对金钱荣誉有所毁损。

To-day a divergence in ideals is beginning to be apparent. The portion of the leisure class that has been consistently exempt from work and from pecuniary cares for a generation or more is now large enough to form and sustain an opinion in matters of taste. Increased mobility of the members has also added to the facility with which a “social confirmation” can be attained within the class. Within this select class the exemption from thrift is a matter so commonplace as to have lost much of its utility as a basis of pecuniary decency. Therefore the latter-day upper-class canons of taste do not so consistently insist on an unremitting demonstration of expensiveness and a strict exclusion of the appearance of thrift. So, a predilection for the rustic and the “natural” in parks and grounds makes its appearance on these higher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levels. This predilection is in large part an outcropping of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nd it works out its result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consistency. It is seldom altogether unaffected, and at times it shades off into something not widely different from that make-believe of rusticity which has been referred to above.

而现在，这两个阶级在理想标准上的分歧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有一部分有闲阶级一直以来都不用劳动，也不用为金钱担心费神，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代或一代以上，因此在品位问题上，这部分有闲阶级人数较多，足以形成一种舆论并能对其维护。这一阶级成员的流动性得到增强，这也使得在该阶级内部获得“社会认可”变得更加便利。在这一优等阶级内部，免于节俭是司空见惯的事，其作为金钱礼仪基础的功用已经大部分丧失。因此，现代上层阶级的品位准则并非总是要求不断地展示奢华并严格避免表现出节俭的。这样，在社会地位和智力水平较高的人士中出现了对公园或场地中存在的乡野和“自然”因素的偏好。这种偏好的很大部分是技艺本能的表现；由此形成的结果具有不同程度的稳定性。这种偏好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会发生转化，和上面提到的伪装成具有乡野风味没有太大的不同。

A weakness for crudely serviceable contrivances that pointedly suggest immediate and wasteless use is present even in the middle-class tastes; but it is there kept well in hand under the unbroken dominance of the canon of reputable futility. Consequently it works out in a variety of ways and means for shamming serviceability—in such contrivances as rustic fences, bridges, bowers, pavilions, and the like decorative features. An expression of this affectation of serviceability, at what is perhaps its widest divergence from the first promptings of the sense of economic beauty, is afforded by the cast-iron rustic fence and trellis or by a circuitous drive laid across level ground.

粗陋而又实用的设计具有一个缺陷，即会让人立即联想到直接的而又不浪费的用途，甚至在中产阶级的品位之中也存在这一缺陷；但是，它依然完全处于荣誉性无实用准则的掌控之下，这一准则的统治地位是牢不可破的。其结果是，要找到各种方式方法来将一些设计伪装成具有实用性，比如具有乡村风味的篱笆、桥梁、凉亭、帐篷以及诸如此类的装饰性事物。铸铁打造的具有乡村风味的篱笆和格子棚架以及在平坦地面上铺设的迂回曲折的车道都是伪装具有实用性的表现，这是和提倡简约美的观念大相径庭的。

The select leisure class has outgrown the use of these pseudo-serviceable variants of pecuniary beauty, at least at some points. But the taste of the more recent accessions to the leisure class proper and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still requires a pecuniary beauty to supplement the aesthetic beauty, even in those objects which are primarily admired for the beauty that belongs to them as natural growths.

上层有闲阶级已经不再使用这些金钱美感的伪实用性变化手段了，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的。但是后起的有闲阶级以及中产阶级下层的品位依然需要金钱美感来弥补艺术美的不足，即使是那些因具有天然之美而受到欣赏的事物也需要具有金钱美感。

The popular taste in these matters is to be seen in the prevalent high appreciation of topiary work and of the conventional flower-beds of public grounds. Perhaps as happy an illustration as may be had of this dominance of pecuniary beauty over aesthetic beauty in middle-class tastes is seen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rounds lately occupied by the Columbian Exposition. The evidence goes to show that the requirement of reputable expensiveness is still

present in good vigor even where all ostensibly lavish display is avoided. The artistic effects actually wrought in this work of reconstruction diverge somewhat widely from the effect to which the same ground would have lent itself in hands not guided by pecuniary canons of taste. And even the better class of the city's population views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with an unreserved approval which suggests that there is in this case little i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tastes of the upper and the lower or middle classes of the city. The sense of beauty in the population of this representative city of the advanced pecuniary culture is very chary of any departure from its great cultural principle of conspicuous waste.

人们普遍高度欣赏树木修剪工作以及公共场地的传统花圃布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在这些方面的品位。最近对哥伦比亚博览会进行了重建，这也许是证明金钱之美高于艺术美的最为恰当的例子了。这个证据表明，即使已经尽力避免表现出明显的浪费，荣誉性奢华的要求依然十分活跃地存在着。如果指导这项重建工程的并非是品位的金钱准则，则从这项工程中实际获得的艺术效果将和我们看到的迥然不同。看到该项工程的进展，即使是城市居民中的上层阶级也毫不吝惜赞誉之词；这说明，就这件事情而言，城市的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的品位即使有些差异，也是微乎其微的。在芝加哥这座金钱文化发达的代表性城市里，居民的审美观念绝不会轻易背离炫耀性浪费这个伟大的文化原则。

The love of nature, perhaps itself borrowed from a higher-class code of taste, sometimes expresses itself in unexpected way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canon of pecuniary beauty, and leads to results that may seem incongruous to an unreflecting beholder. The well-accepted practice of planting trees in the treeless areas of this

country, for instance, has been carried over as an item of honorific expenditure into the heavily wooded areas; so that it is by no means unusual for a village or a farmer in the wooded country to clear the land of its native trees and immediately replant saplings of certain introduced varieties about the farmyard or along the streets. In this way a forest growth of oak, elm, beech, butternut, hemlock, basswood, and birch is cleared off to give room for saplings of soft maple, cottonwood, and brittle willow. It is felt that the inexpensiveness of leaving the forest trees standing would derogate from the dignity that should invest an article which is intended to serve a decorative and honorific end.

对自然的爱好，其本身也许就是来自于上层阶级的品位准则；在金钱美感准则的指导下，有时这种爱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在一位缺乏思考的旁观者看来也许是不合逻辑的。例如，在这个国家寸草不生区域种植树木已经成了广为接受的做法，而在树木繁茂的区域，这种做法已经成了一项荣誉性消费；所以，在树木繁茂的国家，村庄和农户会把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树木砍掉，随即在院子里或路旁重新种上某些引进品种的树苗，这种情况司空见惯。这样，整片的橡树、榆树、山毛榉、白胡桃、铁杉、椴树和桦树被砍伐殆尽，为的是腾出土地改种银槭、棉白杨和脆柳等树种的树苗。人们认为，可以满足装饰性或荣誉性目的的物品会给人带来尊严，而让一片森林毫无花费地树立在那里是有损尊严的。

The like pervading guidance of taste by pecuniary repute is traceable in the prevalent standards of beauty in animals. The part played by this canon of taste in assigning her place in the popular aesthetic scale to the cow has already been spoken of. Something to the same effect is true of the other domestic animals, so far as they are in an appreciable degree industrially useful to the community—

as, for instance, barnyard fowl, hogs, cattle, sheep, goats, draught-horses. They are of the nature of productive goods, and serve a useful, often a lucrative end; therefore beauty is not readily imputed to them. The case is different with those domestic animals which ordinarily serve no industrial end; such as pigeons, parrots and other cage-birds, cats, dogs, and fast horses. These commonly are items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are therefore honorific in their nature and may legitimately be accounted beautiful. This class of animals are conventionally admired by the body of the upper classes, while the pecuniarily lower classes—and that select minority of the leisure class among whom the rigorous canon that abjures thrift is in a measure obsolescent—find beauty in one class of animals as in another, without drawing a hard and fast line of pecuniary demarcation between the beautiful and the ugly.

金钱荣誉对品位有着普遍的影响，类似的影响在时下流行的关于动物的美的标准中也可以看到。牛在大众审美的标准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个品位准则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上文已经讲过。其他驯养动物，只要对社会来说是具有生产用途的，例如在谷仓周围饲养的家禽、猪、牛、绵羊、山羊以及用于干农活的马等等，情况也大致如此。它们具有生产性物品的性质，通常是实用的，可以用来获利的；因此，“美丽”一词通常不会轻易地用在它们的身上。至于那些通常不具有生产用途的驯养动物，例如猫、狗、骏马、鸽子、鹦鹉以及其他养在笼子里的鸟等等，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动物通常是炫耀性消费的项目，因此具有光荣的属性，它们理所当然是美丽的。这类动物一向为上层阶级所喜爱，而那些金钱地位较低的阶级以及少数处于最上层的有闲阶级——对后者来说，避免节俭的严格准则已经明显过时了——却没有按照金钱标准在美丑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的界线，他们认为这两类动物都是美丽的。

In the case of those domestic animals which are honorific and are reputed beautiful, there is a subsidiary basis of merit that should be spoken of. Apart from the birds which belong in the honorific class of domestic animals, and which owe their place in this class to their non-lucrative character alone, the animals which merit particular attention are cats, dogs, and fast horses. The cat is less reputable than the other two just named, because she is less wasteful; she may even serve a useful e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at's temperament does not fit her for the honorific purpose. She lives with man on terms of equality, knows nothing of that relation of status which is the ancient basis of all distinctions of worth, honor, and repute, and she does not lend herself with facility to an invidious comparison between her owner and his neighbors. The exception to this last rule occurs in the case of such scarce and fanciful products as the Angora cat, which has some slight honorific value on the ground of expensiveness, and have, therefore, some special claim to beauty on pecuniary grounds.

谈到那些荣誉性的、以美丽著称的驯养动物，还应该提及其优点的辅助性基础。鸟类在驯化动物中是属于荣誉性一类的，它们之所以能在这一类中占有一席之地，完全是因为它们具有非盈利的性质。除了鸟类之外，尤其值得注意的动物还有猫、狗和骏马。猫比刚刚提到的其他两种动物（狗和骏马）的荣誉性要差些，因为饲养猫浪费较少；它甚至还可能具有实际用途。同时，猫的性情使得它不适合被用于满足荣誉性目的。它是在平等的条件下与人相处的，它对身份关系一无所知，而这种身份关系一向是价值、荣誉以及声望等方面一切差别的基础；并且，在其主人与邻居们进行歧视性比较时，它并不能有所贡献。不过，就上述最后一条法则而言，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安哥拉猫，这一品种稀少而又奇特，由于价格不菲而具有一些荣誉性价值，所以它们在金钱的基础上获得了可以夸耀美丽的权利。

The dog has advantages in the way of uselessness as well as in special gifts of temperament. He is often spoken of, in an eminent sense, as the friend of man, and his intelligence and fidelity are praised. The meaning of this is that the dog is man's servant and that he has the gift of an unquestioning subservience and a slave's quickness in guessing his master's mood. Coupled with these traits, which fit him well for the relation of status—and which must for the present purpose be set down as serviceable traits—the dog has some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of a more equivocal aesthetic value. He is the filthiest of the domestic animals in his person and the nastiest in his habits. For this he makes up in a servile, fawning attitude towards his master, and a readiness to inflict damage and discomfort on all else. The dog, then, commends himself to our favor by affording play to our propensity for mastery, and as he is also an item of expense, and commonly serves no industrial purpose, he holds a well-assured place in men's regard as a thing of good repute. The dog is at the same time associated in our imagination with the chase—a meritorious employment and an expression of the honorable predatory impulse.

比起猫，狗是具有优势的，因为它没有实际用途，并且具有特殊的性格禀赋。人们在谈论狗时，往往会将赞扬其为人类的朋友，并对它的智慧和忠诚表示赞赏。这就意味着狗是人类的仆役，具有绝对服从的禀性，像奴隶一样善于揣测主人的情绪。这些特征使得它能够在身份关系中扮演适当的角色，就本讨论而言，这些特征可以看作是有用的特征；除此之外，狗还具有一些其他特征，这些特征具有更加值得怀疑的美学价值。它是驯化动物中最为污秽的，其习性也是最为龌龊的。它随时准备给所有其他人造成伤害和不安，却对其主人摆出奴颜婢膝、谄媚讨好的姿态，这便弥补了它的缺点。这样它就使我们的支配欲望得到了表现的机会，从而博得了我们的欢心；它又是一项消费，通常不具有生产的功用，因此人们将其看作是赢得荣誉的东西，

它享有的这一地位不可动摇。同时，在我们的想象中，狗是和狩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而狩猎则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工作，是光荣的掠夺冲动的表现。

Standing on this vantage ground, whatever beauty of form and motion and whatever commendable mental traits he may possess are conventionally acknowledged and magnified. And even those varieties of the dog which have been bred into grotesque deformity by the dog-fancier are in good faith accounted beautiful by many. These varieties of dogs—and the like is true of other fancy-bred animals—are rated and graded in aesthetic value somewhat in proportion to the degree of grotesqueness and instability of the particular fashion which the deformity takes in the given case. For the purpose in hand, this differential utility on the ground of grotesqueness and instability of structure is reducible to terms of a greater scarcity and consequent expense.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canine monstrosities, such as the prevailing styles of pet dogs both for men's and women's use, rests on their high cost of production, and their value to their owners lies chiefly in their utility as items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directly, through reflection upon their honorific expensiveness, a social worth is imputed to them; and so, by an easy substitution of words and ideas, they come to be admired and reputed beautiful. Since any attention bestowed upon these animals is in no sense gainful or useful, it is also reputable; and since the habit of giving them attention is consequently not deprecated, it may grow into a habitual attachment of great tenacity and of a most benevolent character. So that in the affection bestowed on pet animals the canon of expensiveness is present more or less remotely as a norm which guides and shapes the sentiment and the selection of its object. The like is true, as will be noticed presently, with respect to affection for persons also; although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norm acts in that case is somewhat different.

因为狗占有了这样的有利地位，所以它在形体或动作上的任何美感，它所拥有的任何值得称道的智力特征，通常都会受到人们的肯定，并且通常会被夸大。甚至对于那些由喜欢养狗的人培育出来的奇形怪状的变种，许多人也会真心认为是美的。这些变种的狗在美学价值上的等级大体上是和某种畸形的怪异程度和变化程度成正比的，而其他变种动物的情形也是如此。就当前的探讨而言，这种以形体怪异和变化为依据的差别效用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这些动物数量稀少，因而价格昂贵。这类畸形的狗，就像时下为男人和女人所喜爱的流行品种，其商业价值是建立在其高昂的生产成本的基础上的，而它们对于主人的价值则主要在于它们具有作为炫耀性消费项目的功用。考虑到这类动物是昂贵的，因此又是具有荣誉性的，它们因此间接地具有了社会价值；于是，经过简单的措辞和概念转换，他们就成了宠物，就被认为是美的了。对这些动物的任何关注都绝不是唯利是图的，也非出于实用的目的，是具有荣誉性的；正因为如此，对这些动物加以关注的习惯就不会受到排斥，这样它就逐渐发展成了一种顽固而又具有极具仁慈性质的日常嗜好。因此，浪费准则，作为一种规范，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对宠物的钟爱之中，指导并影响着这种情感的形成以及这种情感的目标选择。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关于人对人的情感，其情形也是如此；尽管在这一情形之下，浪费准则这一规范发生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

The case of the fast horse is much like that of the dog. He is on the whole expensive, or wasteful and useless—for the industrial purpose. What productive use he may possess, in the way of enhanc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community or making the way of life easier for men, takes the form of exhibitions of force and facility of motion that gratify the popular aesthetic sense. This is of course a substantial serviceability. The horse is not endowed with the

spiritual aptitude for servile dependence in the same measure as the dog; but he ministers effectually to his master's impulse to convert the “animate” forces of the environment to his own use and discretion and so express his own dominating individuality through them. The fast horse is at least potentially a race-horse, of high or low degree; and it is as such that he is peculiarly serviceable to his owner. The utility of the fast horse lies largely in his efficiency as a means of emulation; it gratifies the owner's sense of aggression and dominance to have his own horse outstrip his neighbor's. This use being not lucrative, but on the whole pretty consistently wasteful, and quite conspicuously so, it is honorific, and therefore gives the fast horse a strong presumptive position of reputability. Beyond this, the race-horse proper has also a similarly non-industrial but honorific use as a gambling instrument.

骏马和狗的情形十分相似。总的来说，这种马是昂贵的；并且，就生产目的而言，它毫无用处，是具有浪费性的。如果要说它有什么生产上的用途，那就是它可以增进社会的福利，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便利，这种用途是以力量展示和行动敏捷的形式出现的，而力量的展示以及行动的敏捷可以满足大众的审美观念。这当然是一种实质性的功用。马并不具有和狗同等程度的屈从依赖主人的精神特质；但是，它能够有效满足其主人的冲动本能，这种本能是要将环境中的“有生”力量转而供自己支配和使用，并通过这些力量表现他自己强悍的个性。善跑的骏马至少具有成为赛马的潜质，尽管潜质有高有低。善跑的骏马之所以具有功用，主要在于它是有效的竞赛工具；看到自己的马跑赢了邻居的马，主人征服和支配的欲望就得到了满足。马在这方面是无利可图的，总的来说是较为浪费的，十分具有炫耀性，这就使这样的用途具有荣誉性，因此赋予了骏马荣誉的地位，这一地位是假定的，却又是牢固的。除此之外，专供比赛用的马匹，作为一种赌博工具，其用途也同样是非生产性的，是荣誉性的。

The fast horse, then, is aesthetically fortunate, in that the canon of pecuniary good repute legitimates a free appreciation of whatever beauty or serviceability he may possess. His pretensions have the counten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conspicuous waste and the backing of the predatory aptitude for dominance and emulation. The horse is, moreover, a beautiful animal, although the race-horse is so in no peculiar degree to the uninstructed taste of those persons who belong neither in the class of race-horse fanciers nor in the class whose sense of beauty is held in abeyance by the moral constraint of the horse fancier's award. To this untutored taste the most beautiful horse seems to be a form which has suffered less radical alteration than the race-horse under the breeder's sele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animal. Still, when a writer or speaker—especially of those whose eloquence is most consistently commonplace wants an illustration of animal grace and serviceability, for rhetorical use, he habitually turns to the horse; and he commonly makes it plain before he is done that what he has in mind is the race-horse.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骏马是幸运的，因为在金钱荣誉准则之下，它所具有的任何美感或实用性都备受赞赏。它的种种优点得到了炫耀性浪费原则的支持，并且是以支配与竞赛的掠夺本性为其后盾的。况且，马确实是一种美丽的动物，不过对于那些在品位方面没有受过指导的人来说，竞赛用的马并不是特别美，这些人并不是爱马成痴的一类人，这类人的审美观念也没有受到马迷们的道德约束的钳制。对于这些品位没有受过指导的人来说，比起饲养者选择性培育的赛马，形体变化较小的马似乎是最为美丽的。然而，每当一位作家或演说家为了辞令上的需要，想要举例说明动物的优雅和实用性，他通常会以马为例，那些文采或口才极其平庸之辈尤其如此；而且他往往会特意说明，他所指的是竞赛用的马。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n the graduated appreciation of varieties of horses and of dogs, such as one meets with among people of even moderately cultivated tastes in these matters, there is also discernible another and more direct line of influence of the leisure-class canons of reputability. In this country, for instance, leisure-class tastes are to some extent shaped on usages and habits which prevail, or which are apprehended to prevail, among the leisure class of Great Britain. In dogs this is true to a less extent than in horses. In horses, more particularly in saddle horses—which at their best serve the purpose of wasteful display simply—it will hold true in a general way that a horse is more beautiful in proportion as he is more English; the English leisure class being, for purposes of reputable usage, the upper leisure class of this country, and so the exemplar for the lower grades. This mimicry in the methods of the apperception of beauty and in the forming of judgments of taste need not result in a spurious, or at any rate not a hypocritical or affected, predilection. The predilection is as serious and as substantial an award of taste when it rests on this basis as when it rests on any other,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is taste is a taste for the reputably correct, not for the aesthetically true.

我们应当注意，在对马和狗的变种不同程度的爱好中——在这方面的品位未受过太多指导的人们身上也可以发现这种爱好——我们会发现有闲阶级的荣誉准则也在以另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发生影响。例如，在这个国家，有闲阶级的品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英国有闲阶级的风俗习惯的影响，这些风俗习惯是英国当下流行的，或者被认为是在当下流行的。比起狗，马的情况尤甚。对于马，尤其是供骑乘的马——这类马充其量只能满足浪费性炫耀的目的——一般来说，如果马匹具有的英国气息越浓就越美丽；就荣誉方面的习俗而言，英国有闲阶级是这一国家的上层有闲阶级，因此它是所有下层阶级的榜样。这种对审美感知方法以及品位判断形成方式的模仿不一定会导致一种虚

假的偏爱，至少不会导致一种虚伪而又装腔作势的偏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偏爱和在别的基础上形成的偏爱一样，是一种严肃的、实质性的品位判断；不同之处在于这种爱好是在荣誉上恰当的而不是在美感上真实的爱好。

The mimicry, it should be said, extends further than to the sense of beauty in horseflesh simply. It includes trappings and horsemanship as well, so that the correct or reputably beautiful seat or posture is also decided by English usage, as well as the equestrian gait. To show how fortuitous may sometimes be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decide what shall be becoming and what not under the pecuniary canon of beauty, it may be noted that this English seat, and the peculiarly distressing gait which has made an awkward seat necessary, are a survival from the time when the English roads were so bad with mire and mud as to be virtually impassable for a horse travelling at a more comfortable gait; so that a person of decorous tastes in horsemanship to-day rides a punch with docked tail, in an uncomfortable posture and at a distressing gait, because the English roads during a great part of the last century were impassable for a horse travelling at a more horse-like gait, or for an animal built for moving with ease over the firm and open country to which the horse is indigenous.

应该说，这种模仿不只限于马的躯体美感。所要模仿的还包括装饰用的马具与骑术，因此正确而又优美的骑乘姿势也是由英国习俗决定的，就连马的步法也是由英国习俗决定的。在金钱美感的这一准则之下，环境决定了何者是得体的、何者是不得体的，而这种环境的形成是极具偶然性的；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英国式的骑乘姿势以及使得这种别扭的姿势成为必要的令人难受的独特步法，两者都是过去时代的遗风，当时英国的道路状况很差，路上满是泥泞，马几乎

不可能以从容的步法通过这样的道路；所以，今天在骑术方面有着高雅品位的人在骑乘一匹截短尾巴的矮脚马时，会摆出一副不舒适的坐姿并且会踩着别扭的步法，这是因为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道路都不可能让马以马所应有的步法通过，而马本来的习性是宜于在坚实开阔的乡间道路上自由驰骋的。

It is not only with respect to consumable goods—including domestic animals—that the canons of taste have been colored by the canons of pecuniary reputability. Something to the like effect is to be said for beauty in persons. In order to avoid whatever may be matter of controversy, no weight will be given in this connection to such popular predilection as there may be for the dignified (leisurely) bearing and portly presence that are by vulgar tradition associated with opulence in mature men. These traits are in some measure accepted as elements of personal beauty. But there are certain elements of feminine beauty, on the other hand, which come in under this head, and which are of so concrete and specific a character as to admit of itemized appreciation. It is more or less a rule that in communities which are at th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which women are valued by the upper class for their service, the ideal of female beauty is a robust, large-limbed woman. The ground of appreciation is the physique, while the conformation of the face is of secondary weight only. A well-known instance of this ideal of the early predatory culture is that of the maidens of the Homeric poems.

品位准则受到了金钱荣誉准则的影响，这不仅仅限于消费品（包括驯养动物）方面。在人体美方面，情形也是如此。大众对威严（有闲）姿态和翩翩风度是有所偏爱的，这是因为，出于世俗传统，上述姿态和风度是和成年男子的富有联系在一起的；为了避免任何争议，

我们将不会对此进行详细的探讨。上述这些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认为是人体美的构成要素。不过，另一方面，女性美的某些构成要素也属于这一范畴，这些要素十分具体明确，可以在这里逐条评述。如果在社会所处的某个经济发展阶段中，妇女受到上层阶级的重视是因为她们能够提供服务，那么女性美的典范就是那种身强体壮、四肢发达的女子，这几乎是一个通则。评价的依据是体格，而外貌仅仅居于次要的地位。荷马诗歌中所吟咏的少女，就是早期掠夺文化时期的女性美典范的一个为人熟知的例子。

This ideal suffers a change in the succeeding development, when, in the conventional scheme, the office of the high-class wife comes to be a vicarious leisure simply. The ideal then includes the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supposed to result from or to go with a life of leisure consistently enforced. The ideal accepted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may be gathered from descriptions of beautiful women by poets and writers of the chivalric times. In the conventional scheme of those days ladies of high degree were conceived to be in perpetual tutelage, and to be scrupulously exempt from all useful work. The resulting chivalric or romantic ideal of beauty takes cognizance chiefly of the face, and dwells on its delicacy, and on the delicacy of the hands and feet, the slender figure, and especially the slender waist. In the picture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women of that time, and in modern romantic imitators of the chivalric thought and feeling, the waist is attenuated to a degree that implies extreme debility. The same ideal is still extant among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ies; but it is to be said that it has retained its hold most tenaciously in those modern communities which are least advanced in point of economic and civil development, and which show the most considerable survivals of status and of predatory institutions. That is to say, the chivalric

ideal is best preserved in those existing communities which are substantially least modern. Survivals of this lackadaisical or romantic ideal occur freely in the tastes of the well-to-do classes of Continental countries.

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当上层阶级主妇的职责以传统的方式逐渐变成只是执行代理有闲时，女性美的典范就发生了变化。这时，这种典范所具有的特征应该是稳定的有闲生活的产物，或者是伴随着稳定的有闲生活而出现的。从骑士时代的诗人和作家对美女的描绘中，我们可以找到在这种环境下得到认可的女性美典范。按照那个时代的传统，人们认为有身份的妇女永远都是受保护的对象，要严格避免从事一切实用的工作。这样就产生了骑士制度下的女性美典范或浪漫的女性美典范，这种典范所注重的主要是容貌，所强调的是五官要秀美，手足要纤巧，身材要苗条，尤其是腰肢要纤细。在那个时代对女性的生动描绘中，在骑士思想和感情的现代浪漫的仿效者心中，女性的腰肢已经纤细到了弱不禁风的地步。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大部分人们心中，这种典范依然存在；但是，我们应当指出，在那些经济与文化最不发达、身份制和掠夺制残存最明显的现代社会里，这种典范的地位最为巩固。也就是说，在那些实际上最不现代的现存社会里，这种骑士时代的典范得到了最好的保存。在欧洲大陆各国的富裕阶级的品位之中，这种多愁善感式的或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典范依然活跃存在。

In modern communities which have reached the higher level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upper leisure class has accumulated so great a mass of wealth as to place its women above all imputation of vulgarly productive labor. Here the status of women as vicarious consumers is beginning to lose its place in the sections of the body of the people; and as a consequence the ideal of feminine beauty is beginning to change back again from the infirmly delicate, translucent, and hazardously slender, to a woman

of the archaic type that does not disown her hands and feet, nor, indeed, the other gross material facts of her person.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deal of beauty among the peoples of the Western culture has shifted from the woman of physical presence to the lady, and it is beginning to shift back again to the woman; and all in obedience to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of pecuniary emulation. The exigencies of emulation at one time required lusty slaves; at another time they required a conspicuous performance of vicarious leisure and consequently an obvious disability; but the situation is now beginning to outgrow this last requirement, since, under the higher efficiency of modern industry, leisure in women is possible so far down the scale of reputability that it will no longer serve as a definitive mark of the highest pecuniary grade.

在工业生产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的现代社会里，上层有闲阶级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使得这一阶级的妇女不用从事任何粗鄙的生产工作。这时，在这一群体之中，妇女作为代理消费者的身份已经逐渐失去地位；结果，女性美的典范又开始回到过去，从娇小柔弱、肤如凝脂、纤纤细腰向古代类型转变，女性的手和脚以及其身体的其他部分再也不是形同虚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属于西方文化的各民族，其女性美典范从体格健壮的女性转变成了淑女贵妇，现在又逐渐变回了体格健壮的女性；所有这一切都是随着金钱竞赛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某个时期，金钱竞赛需要的是健壮的奴隶；而在另一个时期，需要的却是代理有闲的明显执行，因此，也需要炫耀性地表现出对生产工作的无能为力；然而，现在的环境已经发展到了不再需要最后这项要求的地步，因为，在现代工业生产的较高效率之下，荣誉等级较低的女性也有可能享受有闲，有闲已经不再是最高金钱等级的明确标志了。

Apart from this general control exercised by the norm of

conspicuous waste over the ideal of feminine beauty, there are one or two details which merit specific mention as showing how it may exercise an extreme constraint in detail over men's sense of beauty in women. It has already been noticed that at the stages of economic evolution at which conspicuous leisure is much regarded as a means of good repute, the ideal requires delicate and diminutive hands and feet and a slender waist. These features, together with the other, related faults of structure that commonly go with them, go to show that the person so affected is incapable of useful effort and must therefore be supported in idleness by her owner. She is useless and expensive, and she is consequently valuable as evidence of pecuniary strength. It results that at this cultural stage women take thought to alter their persons, so as to conform more nearly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structed taste of the time;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anon of pecuniary decency, the men find the resulting artificially induced pathological features attractive. So, for instance, the constricted waist which has had so wide and persistent a vogue in the communities of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so also the deformed foot of the Chinese. Both of these are mutilations of unquestioned repulsiveness to the untrained sense. It requires habituation to become reconciled to them. Yet there is no room to question their attractiveness to men into whose scheme of life they fit as honorific items sanctioned by the requirements of pecuniary reputability. They are items of pecuniary and cultural beauty which have come to do duty as elements of the ideal of womanliness.

除了炫耀性浪费准则会对女性美典范产生上述这种一般性支配作用之外，还有一两个细节特别值得一提，可以说明炫耀性浪费准则是怎样对男人的女性美观念产生全面而又极端约束力的。上文已经提到，在有些经济发展阶段，炫耀性有闲作为赢得声誉的手段依然受到

人们的高度重视，这时，女性美的典范所要求的是娇柔小巧的手脚和纤细轻盈的腰肢。这些特征以及其他通常会随之而来的、相关的体格缺陷足以说明，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女人是不能够从事实用性劳动的，因此，她势必无所事事，由其主人供养。她一无所用却又耗费颇多，然而，正因为如此，作为金钱力量的证明，她是有价值的。其结果是，处于这一文化阶段的妇女挖空心思改变她们的形体，为的是能尽量符合该时代经过指导的品位的要求；而在金钱礼仪准则的指导下，男子们会感到这种人为的病态是具有吸引力的。这样，在西方文化社会里，就出现了束腰现象，这曾经是一种广泛而又持久的时尚，而在中国，也出现了缠足现象。对于审美观念未经过训练的人来说，束腰和缠脚这两种毁损肢体的行为，毫无疑问都是令人厌恶的。要想接受这些行为，是需要习惯去适应的。但是，作为金钱荣誉准则认可的光荣项目，这些行为已经在男子们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容身之所，它们对这些人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它们具有金钱和文化美感，逐渐成为女性气质典范的构成要素。

The connection here indicated between the aesthetic value and the invidious pecuniary value of things is of course not present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valuer. So far as a person, in forming a judgment of taste, takes thought and reflects that the object of beauty under consideration is wasteful and reputable, and therefore may legitimately be accounted beautiful; so far the judgment is not a *bona fide* judgment of taste and does not come up for consideration in this connection. The connection which is here insisted on between the reputability and the apprehended beauty of objects lies through the effect which the fact of reputability has upon the valuer's habits of thought. He is in the habit of forming judgments of value of various kinds—economic, moral, aesthetic, or reputable concerning the objects with which he has to do, and his attitude of commendation towards a given object on any other ground will affect the degree of his appreciation of the object when

he comes to value it for the aesthetic purpose. This is more particularly true as regards valuation on grounds 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esthetic ground as that of reputability. The valuation for the aesthetic purpose and for the purpose of repute is not held apart as distinctly as might be. Confusion is especially apt to arise between these two kinds of valuation, because the value of objects for repute is not habitually distinguished in speech by the use of a special descriptive term. The result is that the terms in familiar use to designate categories or elements of beauty are applied to cover this unnamed element of pecuniary merit,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fusion of ideas follows by easy consequence. The demands of reputability in this way coalesce in the popular apprehension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sense of beauty, and beauty which is not accompanied by the accredited marks of good repute is not accepted. But the requirements of pecuniary reputability and those of beauty in the naive sense do not in any appreciable degree coincide. The elimination from our surroundings of the pecuniarily unfit, therefore, results in a more or less thorough elimination of that considerable range of elements of beauty which do not happen to conform to the pecuniary requirement.

当然，这里所指出的事物的审美价值和歧视性金钱价值之间的联系并不会存在于评判者的意识里。如果一个人在作出品位判断时，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他所考虑的那个美的对象具有浪费性和荣誉性，因此可以有理由将其看作是美丽的，那么这种判断就不是真正的品位判断，也不是此处所要讨论的。通过荣誉对评判者思维习惯的影响，荣誉性和在物体身上感受到的美之间就产生了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联系。评判者习惯于对与他有关的事物作出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经济的、道德的、审美的或荣誉的；他会由于其他理由而对某一特定对象持赞赏态度，当他从审美的角度来评价这一对象时，这种态度就会影响到他对这一对象的欣赏程度。如果这种价值判断的依据是和审美

的依据以及荣誉的依据密切相关的，情况尤其如此。从审美角度作出的价值判断和从荣誉角度作出的价值判断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这两种价值判断方式特别容易引起混淆，因为在日常语言中，人们往往不会使用特殊的描述性词语来对具有荣誉性的对象作出价值判断。其结果是，通常用来表示美的类别或美的构成要素的词语被用来描绘金钱价值所包含的这个未曾言明的因素，出现相应的概念混淆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这样，在一般人看来，荣誉上的要求就和审美观念上的要求合二为一了；如果一种美不带有荣誉的公认标志，它就不会被人们接受。但是，金钱荣誉的要求和原始意义上的美的要求并非是明显一致的。因此，如果要将在金钱上不符合要求的事物从我们周围环境中清除出去，就会将很大一部分不符合金钱要求的美的因素较为彻底地清除掉。

The underlying norms of taste are of very ancient growth, probably far antedating the advent of the pecuniary institutions that are here under discussion. Consequently, by force of the past selective adaptation of men's habits of thought, it happens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beauty, simply, are for the most part best satisfied by inexpensive contrivances and structures which in a straightforward manner suggest both the office which they are to perform and the method of serving their end.

品位的基本规范是种十分古老的产物，远在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金钱制度出现以前也许就已经存在了。结果，通过人们思维习惯在过去的淘汰性适应，美的大部分要求都可以简单地通过低廉的设计和构造得以满足，这些设计和构造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它们的功用所在以及达成目的的方法。

It may be in place to recall the modern psychological position.

Beauty of form seems to be a question of facility of apperception. The proposition could perhaps safely be made broader than this. If abstraction is made from association, suggestion, and “expression,” classed as elements of beauty, then beauty in any perceived object means that the mind readily unfolds its apperceptive activity in the directions which the object in question affords. But the directions in which activity readily unfolds or expresses itself are the directions to which long and close habituation has made the mind prone. So far as concerns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beauty, this habituation is an habituation so close and long as to have induced not only a proclivity to the apperceptive form in question, but an adaptation of physiologic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s well. So far as the economic interest enters into the constitution of beauty, it enters as a suggestion or expression of adequacy to a purpose, a manifest and readily inferable subservience to the life process. This expression of economic facility or economic serviceability in any object—what may be called the economic beauty of the object—is best served by neat and unambiguous suggestion of its office and its efficiency for the material ends of life.

这里最好还是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形式美似乎是一个关乎便不便于感知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对这个命题的范畴进行扩展。如果将被列为美感因素的联想、暗示和“表现”抽象化，则任何感知对象的美都意味着思维按照该对象所提供的方向积极地进行感知活动。但是，感知活动积极开展和自我表现的方向，就是长期、严格的适应过程使得思维向之倾斜的那些方向。就美感的主要因素而言，这一适应过程十分漫长、十分严格，其结果是，不仅产生了对这一感知形式的偏爱，还导致了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的适应性。只要经济利益参与了美的构成，它就会暗示或表现出能够满足某一目的，对生活进程明显是有所帮助的。最有助于任何事物的这种经济上的便利和功用——我们可以称之为事物的经济美感——的表现可以通过它的任务以

及它对生活的物质目的所具有的有效性的简洁而明确的暗示。

On this ground, among objects of use the simple and unadorned article is aesthetically the best. But since the pecuniary canon of reputability rejects the inexpensive in articles appropriated to individual consumption, the satisfaction of our craving for beautiful things must be sought by way of compromise. The canons of beauty must be circumvented by some contrivance which will give evidence of a reputably wasteful expenditure,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 meets the demands of our critical sense of the useful and the beautiful, or at least meets the demand of some habit which has come to do duty in place of that sense. Such an auxiliary sense of taste is the sense of novelty; and this latter is helped out in its surrogateship by the curiosity with which men view ingenious and puzzling contrivances. Hence it comes that most objects alleged to be beautiful, and doing duty as such, show considerable ingenuity of design and are calculated to puzzle the beholder—to bewilder him with ir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hints of the improbable—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y give evidence of an expenditure of labor in excess of what would give them their fullest efficiency for their ostensible economic end.

基于这一理由，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在使用的物品中，简单朴素的物品是最好的。但是，由于金钱荣誉准则排斥使用廉价物品供个人消费，我们对于美丽事物的渴望必须通过妥协来获得满足。我们必须使用某种设计来规避美丽准则，这种设计既要表现出荣誉性浪费消费的迹象，又要能够满足我们对于实用与美观的批判感觉的要求，或者至少能够满足某种习惯的要求，这种习惯是代替上述感觉发挥作用的。品位的这种辅助性感觉就是新奇感；人们在观察巧妙而又令人费解的设计时所持有的好奇心助长了这种起着替代作用的新奇感。因

此，大部分号称美丽的、具有美的功用的事物在设计上都是别具匠心的，它们就是为迷惑观赏者而设计的——通过毫无意义的、荒诞的暗示让观赏者感到迷惑不解——同时，它们却显示了这样的痕迹，即在它们身上消耗的劳动，超出了最大程度获得其表面经济目的所需要的劳动。

This may be shown by an illustration taken from outside the range of our everyday habits and everyday contact, and so outside the range of our bias. Such are the remarkable feather mantles of Hawaii, or the well-known carved handles of the ceremonial adzes of several Polynesian islands. These are undeniably beautiful, both in the sense that they offer a pleasing composition of form, lines, and color, and in the sense that they evince great skill and ingenuity i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s are manifestly ill fitted to serve any other economic purpose. But it is not always that the evolution of ingenious and puzzling contrivan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anon of wasted effort works out so happy a result. The result is quite as often a virtually complete suppression of all elements that would bear scrutiny as expressions of beauty, or of serviceability, and the substitution of evidences of misspent ingenuity and labor, backed by a conspicuous ineptitude; until many of the objects with which we surround ourselves in everyday life, and even many articles of everyday dress and ornament, are such as would not be tolerated except under the stress of prescriptive tradition. Illustrations of this substitution of ingenuity and expense in place of beauty and serviceability are to be seen, for instance, in domestic architecture, in domestic art or fancy work, in various articles of apparel, especially of feminine and priestly apparel.

我们可以用日常习惯和日常接触范围以外的例子，因此也是我们偏见以外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夏威夷那独特的羽毛斗篷，或有些波利尼西亚岛屿上著名的、仪式用的雕柄扁斧，就是这方面的例子。不可否认，这些东西是美的；它们不但在式样、线条和色彩构成方面令人赏心悦目，而且在设计和制作上也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和丰富的创造力。同时，这些东西显然不能用来满足任何其他经济目的。但是，这些别具匠心但令人费解的设计在劳力浪费准则指导下发生的演进并非都能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其产生的效果往往是，所有经得起推敲的、能够表现美观和实用性的因素完全受到了抑制，取而代之的是创造力和劳力浪费的痕迹，隐藏在后面的是炫耀性的笨拙；以至于日常生活中我们周围的许多事物，甚至许多平常穿戴的衣服和饰品，要不是迫于约定俗成的传统，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例如，住宅建筑、家庭工艺品或装饰品、各种服饰，尤其是妇女和教士的服饰，都是这种以技巧和铺张代替美观与实用的例证。

The canon of beauty requires expression of the generic. The “novelty” due to the demands of conspicuous waste traverses this canon of beauty, in that it results in making the physiognomy of our objects of taste a congeries of idiosyncrasies; and the idiosyncrasies are, moreover, under the selective surveillance of the canon of expensiveness.

审美准则所要求表现出共性。因炫耀性浪费要求而产生的“新奇性”违反了这一审美准则，因为这种“新奇性”使得我们品位的对象呈现出特异性的集合体的外观；而且这种特异性是处于昂贵准则的淘汰性监督之下的。

This process of selective adaptation of designs to the end of conspicuous waste, and the substitution of pecuniary beauty for

aesthetic beauty, has been especially effectiv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e. It would be extremely difficult to find a modern civilized residence or public building which can claim anything better than relative inoffensiveness in the eyes of any one who will dissociate the elements of beauty from those of honorific waste. The endless variety of fronts presented by the better class of tenements and apartment houses in our cities is an endless variety of architectural distress and of suggestions of expensive discomfort. Considered as objects of beauty, the dead walls of the sides and back of these structures, left untouched by the hands of the artist, are commonly the best feature of the building.

有些设计可以满足炫耀性浪费的目的，这类设计的这种淘汰性适应过程以及金钱美感代替美学美感的本性在建筑的发展中尤其明显。任何人，如果将美感因素和荣誉浪费因素割裂开来，要在现代文明的住宅或公共建筑中找到一处看得比较顺眼的建筑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在我们的城市里，那些比较高级的出租房和公寓的正面呈现出千奇百怪的式样，尽是对古老建筑的模仿，虽然奢华却让人感觉很不舒适。作为审美对象来看，这些建筑的两侧和后面是几堵没有窗户的墙，它们没有被艺术家之手碰过，却通常是整栋建筑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What has been said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law of conspicuous waste upon the canons of taste will hold true, with but a slight change of terms, of its influence upon our notions of the serviceability of goods for other ends than the aesthetic one. Goods are produced and consumed as a means to the fuller unfolding of human life; and their utility consists, in the first instance, in their efficiency as means to this end. The end is,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e fullness of life of the individual, taken in absolute terms. But the

human proclivity to emulation has seized upon the consumption of goods as a means to an invidious comparison, and has thereby invested consumable goods with a secondary utility as evidence of relative ability to pay. This indirect or secondary use of consumable goods lends an honorific character to consumption and presently also to the goods which best serve the emulative end of consumption. The consumption of expensive goods is meritorious, and the goods which contain an appreciable element of cost in excess of what goes to give them serviceability for their ostensible mechanical purpose are honorific. The marks of superfluous costliness in the goods are therefore marks of worth—of high efficiency for the indirect, invidious end to be served by their consumption; and conversely, goods are humilific, and therefore unattractive, if they show too thrifty an adaptation to the mechanical end sought and do not include a margin of expensiveness on which to rest a complacent invidious comparison. This indirect utility gives much of their value to the “better” grades of goods. In order to appeal to the cultivated sense of utility, an article must contain a modicum of this indirect utility.

前面谈到了炫耀性浪费定律对品位准则的影响，物品具有满足审美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的功用，我们对于物品的这种实用性观念也受到炫耀性浪费定律的影响，只不过是措辞稍有不同而已。生产物品和消费物品是使人类生活获得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手段；物品的功用首先在于它们能够满足这一目的。而这一目的首先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生活的充实。但是，人类的竞赛本性利用了物品消费，将其当作歧视性对比的一个手段，从而使消费品具有了一种次要的功用，成了相对支付能力的证明。消费品所具有的这一间接的或次要的用途使得消费行为具有了荣誉的属性，同时也使得最能满足消费竞赛目的的物品具有了荣誉的属性。昂贵物品的消费是值得称赞的；有些物品含有明显的成本因素，其成本超出了使之具有表面的机械目的的程度，这些物品

也是具有荣誉性的。因此，物品所具有的过度昂贵的标志也就是它们具有很高价值的标志，说明这些物品的消费能够很好地满足间接的、歧视性对比的目的。相反地，如果物品在适应其所追求的机械目的时显得过于经济节俭，并没有进行自满的歧视性对比所依据的贵贱差别，那么这种物品就具有耻辱性，因此是没有吸引力的。品质“较高”的物品，其价值因这种间接的功用而得到了大大提高。为了迎合有关功用的有教养的观念，物品必须具有一些这种间接的功用。

While men may have set out with disapproving an inexpensive manner of living because it indicated inability to spend much, and so indicated a lack of pecuniary success, they end by falling into the habit of disapproving cheap things as being intrinsically dishonorable or unworthy because they are cheap. As time has gone on, each succeeding generation has received this tradition of meritorious expenditure from the generation before it, and has in its turn further elaborated and fortified the traditional canon of pecuniary reputability in goods consumed; until we have finally reached such a degree of conviction as to the unworthiness of all inexpensive things, that we have no longer any misgivings in formulating the maxim, “Cheap and nasty.” So thoroughly has the habit of approving the expensive and disapproving the inexpensive been ingrained into our thinking that we instinctively insist upon at least some measure of wasteful expensiveness in all our consumption, even in the case of goods which are consumed in strict privacy and without the slightest thought of display. We all feel, sincerely and without misgiving, that we are the more lifted up in spirit for having, even in the privacy of our own household, eaten our daily meal by the help of hand-wrought silver utensils, from hand-painted china (often of dubious artistic value) laid on high-priced table linen. Any retrogression from the standard of living which we are accustomed to regard as worthy in this respect is felt

to be a grievous violation of our human dignity. So, also, for the last dozen years candles have been a more pleasing source of light at dinner than any other. Candle-light is now softer, less distressing to well-bred eyes, than oil, gas, or electric light. The same could not have been said thirty years ago, when candles were, or recently had been, the cheapest available light for domestic use. Nor are candles even now found to give an acceptable or effective light for any other than a ceremonial illumination.

人们开始也许会反对简朴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没有大额支付的能力，也意味着缺乏金钱成就；但结果却养成了不认同廉价物品的习惯，认为它们是低廉的，因此在本质上是不光彩的，是没有价值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代人都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了这一面子消费的传统，并进一步完善和巩固了关于消费品这一传统的金钱荣誉准则；直到最后，我们深信一切低廉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因此，我们对于“便宜无好货”这一谚语不再有丝毫怀疑。认同昂贵物品、反对低廉物品的习惯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思维之中，所以我们会本能地要求一切消费都至少应该具有某种程度的浪费性奢华，甚至对于有些物品，其消费是完全隐秘的，并且不带有丝毫炫耀的意图，我们也有如此要求。甚至在我们家中的私生活里，如果每天进餐时用的是手工制造的银制餐具以及手绘的瓷器（其艺术价值往往令人怀疑），摆放在价格不菲的桌布上，我们都会由衷地、毫不怀疑地感到情绪高昂一些。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一生活水准，认为它在这方面是有价值的，如果这一生活水准有了任何倒退，我们都会感到是对我们人类尊严的严重损害。所以，过去十多年来，蜡烛成了最讨人喜欢的光源。现在，在有教养的人们眼里，烛光比油灯、煤气灯或电灯的光线更加柔和，不是那么刺眼。而三十年前的情形却不是这样，那时，蜡烛是供家庭使用的最廉价的光源，不久以前也一直如此。即使是在现在，除了在仪式上用于照明之外，蜡烛不会发出令人满意的、实际可用的光芒。

A political sage still living has summed up the conclusion of this whole matter in the dictum: “A cheap coat makes a cheap man,” and there is probably no one who does not feel the convincing force of the maxim.

一位依然健在的大政治家把这一切总结为一句格言：“衣贱使人贱”；大概没有人会感觉不到这句格言的说服力。

The habit of looking for the marks of superfluous expensiveness in goods, and of requiring that all goods should afford some utility of the indirect or invidious sort, leads to a change in the standards by which the utility of goods is gauged. The honorific element and the element of brute efficiency are not held apart in the consumer's appreciation of commodities, and the two together go to make up the unanalyzed aggregate serviceability of the goods. Under the resulting standard of serviceability, no article will pass muster on the strength of material sufficiency alone. In order to completeness and full acceptability to the consumer it must also show the honorific element. It results that the producers of articles of consumption direct their efforts to the production of goods that shall meet this demand for the honorific element. They will do this with all the more alacrity and effect, since they are themselves under the dominance of the same standard of worth in goods, and would be sincerely grieved at the sight of goods which lack the proper honorific finish. Hence it has come about that there are to-day no goods supplied in any trade which do not contain the honorific element in greater or less degree. Any consumer who might, Diogenes-like, insist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honorific or wasteful elements from his consumption, would be unable to supply his most trivial wants in the modern market. Indeed, even if he

resorted to supplying his wants directly by his own efforts, he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divest himself of the current habits of thought on this head; so that he could scarcely compass a supply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for a day's consumption without instinctively and by oversight incorporating in his home-made product something of this honorific, quasi-decorative element of wasted labor.

人们习惯于在物品中寻找过度奢华的标志，习惯于要求所有物品都具有某种间接的或歧视性的功用，这种习惯使得衡量物品功用的标准发生了变化。消费者在评价商品时，不会将荣誉因素和物质功用因素分割开来，这两个因素一同构成了物品不可分割的整体功用。这样就形成了实用性标准，在这一标准下，仅仅具有物质性功用的物品是不合格的。为了让消费者满意，为消费者所接受，物品还必须现示出荣誉因素。其结果是，消费品的生产者都致力于生产能够满足荣誉性要求的物品。他们非常乐意这样做，并且效果也非常好，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处于相同的物品价值标准的支配之下的，如果看到物品的最后一道工序缺乏适当的荣誉性，他们也会由衷地感到懊丧的。所以，现在任何行业提供的物品都或多或少地含有荣誉性因素。任何消费者，如果像第欧根尼一样，坚决摒弃其消费中的一切荣誉性或浪费性因素，那么，在现代市场中，即使是满足他的最普通需求的物品，他也无法得到。实际上，即使他直接通过自身努力来满足其需求，他也会发现，要使自己摆脱这方面的当前流行的思维习惯，纵然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难重重的；如果他不在家庭生产的产品中本能地或不小心地融入某些浪费劳力的荣誉性或半装饰性因素，他就很难获得供一天消费的生活必需品。

It is notorious that in their selection of serviceable goods in the retail market purchasers are guided more by the finish and workmanship of the goods than by any marks of substantial

serviceability. Goods, in order to sell, must have some appreciable amount of labor spent in giving them the marks of decent expensiveness, in addition to what goes to give them efficiency for the material use which they are to serve. This habit of making obvious costliness a canon of serviceability of course acts to enhance the aggregate cost of articles of consumption. It puts us on our guard against cheapness by identifying merit in some degree with cost. There is ordinarily a consistent effort on the part of the consumer to obtain goods of the required serviceability at as advantageous a bargain as may be; but the conventional requirement of obvious costliness, as a voucher and a constituent of the serviceability of the goods, leads him to reject as under grade such goods as do not contain a large element of conspicuous waste.

众所周知，买主们在零售市场上选购日用品时，他们注意的更多的是物品的外观和工艺，而不是其实质性功用的任何标志。物品要想卖得出去，就要花点儿工夫，除了要使它们具有满足物质用途的功用外，还要使它们具有适度的昂贵标志。这种使明显的代价昂贵成为实用性准则的习惯当然会提高消费物品的总成本。这种习惯使得我们将价值与成本等同起来，因而对低廉的物品持提防的态度。消费者往往会不断努力，希望能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得具有所需功用的物品；但是，传统上，价格昂贵的要求，作为物品实用性的保证和它的组成部分，使得消费者拒绝购买缺少大量炫耀性浪费因素的物品，因为它们是不够级别的。

It is to be added that a large share of those features of consumable goods which figure in popular apprehension as marks of serviceability, and to which reference is here had as elements of conspicuous waste, commend themselves to the consumer also on other grounds than that of expensiveness alone. They usually give

evidence of skill and effective workmanship, even if they do not contribute to the substantial serviceability of the goods; and it is no doubt largely on some such ground that any particular mark of honorific serviceability first comes into vogue and afterward maintains its footing as a normal constituent element of the worth of an article. A display of efficient workmanship is pleasing simply as such, even where its remoter, for the time unconsidered, outcome is futile. There is a gratification of the artistic sense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skillful work. But it is also to be added that no such evidence of skillful workmanship, or of ingenious and effective adaptation of means to an end, will, in the long run, enjoy the approbation of the modern civilized consumer unless it has the sanction of the canon of conspicuous waste.

需要补充的是，在一般人看来，消费品的大部分特征，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炫耀性浪费因素，都是消费品具有实用性的标志，这些特征之所以被消费者接受，除了因为昂贵这一点外，还有其他原因。这些特征不会让物品变得更加实用，但是它们通常表现出了熟练的技巧和高超的工艺；毫无疑问，荣誉实用性的独特标志之所以会开始流行，之所以后来能保持其作为物品价值中一个正常构成要素，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高超技艺的表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使人感到愉悦，其间接的结果在其他场合则是毫无用处的。欣赏一件精巧的工艺品可以使人的艺术感得到满足。但是，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这种熟练工艺的表现，或者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别出心裁而又有效的方法的表现，除非能得到炫耀性浪费准则的认可，否则，从长远来看，就不会获得现代文明消费者的青睐。

The position here taken is enforced in a felicitous manner by the place assigned in the economy of consumption to machine products. The point of material difference between machine-made

goods and the hand-wrought goods which serve the same purposes is, ordinarily, that the former serve their primary purpose more adequately. They are a more perfect product—show a more perfect adaptation of means to end. This does not save them from disesteem and depreciation, for they fall short under the test of honorific waste. Hand labor is a more wasteful method of production; hence the goods turned out by this method are more serviceable for the purpose of pecuniary reputability; hence the marks of hand labor come to be honorific, and the goods which exhibit these marks take rank as of higher grade than the corresponding machine product. Commonly, if not invariably, the honorific marks of hand labor are certain imperfections and irregularities in the lines of the hand-wrought article, showing where the workman has fallen short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design. The ground of the superiority of hand-wrought goods, therefore, is a certain margin of crudeness. This margin must never be so wide as to show bungling workmanship, since that would be evidence of low cost, nor so narrow as to suggest the ideal precision attained only by the machine, for that would be evidence of low cost.

机器制造的产品在消费经济中的地位正好印证了这一观点。用于满足同一目的的机器制造的产品和手工制造的产品之间的主要区别，通常在于前者能更好地满足其主要用途。机器制造的产品更为完美——其满足目的的手段更加完善。但是，这一点并不能使它们避免遭受厌恶或轻视，因为它们经不起荣誉浪费的考验。手工劳动是一种更加浪费的生产方式；因此，用这种方法制造出来的物品更能满足金钱荣誉的目的；因此，手工劳动的标志逐渐具有了荣誉的性质，具有这些标志的物品在等级上高于同类机器制造的产品。手工劳动的荣誉性标志，如果不是一定也是通常在于，手工生产的物品的外形不规则，存在瑕疵，表明工人在设计方面存在不足。因此，手工制造的物品之所以较为优越，是因为其具有一定的粗糙程度。这一粗糙程度不能过

大到表现出笨拙的技艺，因为笨拙的技艺是成本低的标志；这一粗糙程度也不能过小到表现出只有机器才能达到的理想精确度，因为这也是成本低的标志。

The appreciation of those evidences of honorific crudeness to which hand-wrought goods owe their superior worth and charm in the eyes of well-bred people is a matter of nice discrimination. It requires train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right habits of thought with respect to what may be called the physiognomy of goods. Machine-made goods of daily use are often admired and preferred precisely on account of their excessive perfection by the vulgar and the underbred who have not given due thought to the punctilios of elegant consumption. The ceremonial inferiority of machine products goes to show that the perfection of skill and workmanship embodied in any costly innovations in the finish of goods is not sufficient of itself to secure them acceptance and permanent favor. The innovation must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canon of conspicuous waste. Any feature in the physiognomy of goods, however pleasing in itself, and however well it may approve itself to the taste for effective work, will not be tolerated if it proves obnoxious to this norm of pecuniary reputability.

手工制造的物品具有荣誉性粗糙的证据，在有教养的人们眼中，这些证据正是这类物品超高价值和魅力所在，要觉察到这些证据是需要有细致的鉴赏力的。这需要训练，需要在物品外观方面形成正确的思维习惯。那些品位不高、没有教养的人们不太在意优雅消费的细枝末节，机器制造的日用品为这些人所喜欢和青睐，正是因为它们是极其完美的。从礼仪的角度来看，机器制造的产品是低等的；这足以说明，物品工艺的任何昂贵革新中所包含的技巧和工艺的完善都不足以保证它们会为人们所接受，会永远为人们所喜爱。这种革新必须得到

炫耀性浪费准则的支持。物品外观的任何特征，不论其本身是多么惹人喜爱，不论它是多么迎合人们对有效工作的爱好，如果与金钱荣誉这一规范相抵触，就不会被认可。

The ceremonial inferiority or uncleanness in consumable goods due to “commonness,” or in other words to their slight cost of production, has been taken very seriously by many persons. The objection to machine products is often formulated as an objection to the commonness of such goods. What is common is within the (pecuniary) reach of many people. Its consumption is therefore not honorific, since it does not serve the purpose of a favorable invidious comparison with other consumers. Hence the consumption, or even the sight of such goods, is inseparable from an odious suggestion of the lower levels of human life, and one comes away from their contemplation with a pervading sense of meanness that is extremely distasteful and depressing to a person of sensibility. In persons whose tastes assert themselves imperiously, and who have not the gift, habit, or incentive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grounds of their various judgments of taste, the deliverances of the sense of the honorific coalesce with those of the sense of beauty and of the sense of serviceability—in the manner already spoken of; the resulting composite valuation serves as a judgment of the object's beauty or its serviceability, according as the valuer's bias or interest inclines him to apprehend the object in the one or the other of these aspects. It follows not infrequently that the marks of cheapness or commonness are accepted as definitive marks of artistic unfitness, and a code or schedule of aesthetic proprieties on the one hand, and of aesthetic abominations on the other, is constructed on this basis for guidance in questions of taste.

许多人对消费品在制造过程中的低劣或不洁的属性是十分在意的，消费品具有这种属性是因为它们是“普通的”，或者换句话说，是因为它们的生产成本低廉。对机器生产的产品的反感往往可以解释为对这类物品平凡属性的反感。普通的东西就是许多人买得起的东西。对这类物品的消费是不光荣的，因为它不能满足和其他消费者进行有利的歧视性对比的目的。所以，对于这类物品，不要说消费，就连看上一眼，都会让人产生低水准人类生活的不快联想，人们对这类产品唯恐避之不及，因为一想到这类产品就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卑贱感，而对一个敏感的人来说，这种卑贱感是极其令人不快，极其令人沮丧的。有些人的品位意识十分强烈，而对不同品位判断的依据却又没有加以区别的天赋、习惯和动机；对这些人来说，荣誉观念的表达和审美观念及实用观念的表达（以前文提到的方式）合二为一；以这种方式形成的综合评价就成了对该物体美感和实用性的评价，到底是从美感方面还是从实用性方面来理解事物，这要视评价者的本性和兴趣而定。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低廉或平凡的标志被当作不够艺术的明确标志；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准则，规定何者是符合审美要求的，何者是违反审美要求的，并以这一准则来指导有关品位的种种问题。

As has already been pointed out, the cheap, and therefore indecorous, articles of daily consumption in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ies are commonly machine products; and the generic feature of the physiognomy of machine-made goods as compared with the hand-wrought article is their greater perfection in workmanship and greater accuracy in the detail execution of the design. Hence it comes about that the visible imperfections of the hand-wrought goods, being honorific, are accounted marks of superiority in point of beauty, or serviceability, or both. Hence has arisen that exaltation of the defective, of which John Ruskin and William Morris were such eager spokesmen in their time; and on this ground their propaganda of crudity and wasted effort has been taken up and carried forward since their time. And hence also the

propaganda for a return to handicraft and household industry. So much of the work and speculations of this group of men as fairly comes under the characterization here given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at a time when the visibly more perfect goods were not the cheaper.

前文已经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便宜的、因而是不合礼仪要求的日常消费品往往是机器制造的产品；与手工制造的物品比较起来，机器制造的物品在外观上的一般特征是其工艺更为完善，对设计的具体执行更为精确。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手工制造的物品具有显而易见的瑕疵，而这种瑕疵却具有光荣的属性，被看作物品在美感方面或在实用性方面，或者同时在这两方面具有优越性的标志。所以就出现了对缺陷的赞美，约翰·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最热诚的代言人；他们对粗糙和劳力浪费的倡议就是基于这个理由而提出的，并且从那时起，这一倡议不断获得推进。因此也出现了回归手工业和家庭产业的倡议。假如明显更加完美的物品并非更为低廉的话，则这类人所做的上述工作和推论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It is of course only as to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is school of aesthetic teaching that anything is intended to be said or can be said here. What is said is not to be taken in the sense of depreciation, but chiefly as a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tendency of this teaching in its effect on consumption and on the production of consumable goods.

当然，这里所要说的或所能说的只是这一审美学派学说的经济价值。我们不能把这里所说的理解为一种贬损，这里主要是对这一学说给消费及消费品生产所带来的影响加以叙述。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bias of this growth of taste has worked itself out in production is perhaps most cogently exemplified in the book manufacture with which Morris busied himself during the later years of his life; but what holds true of the work of the Kelmscott Press in an eminent degree, holds true with but slightly abated force when applied to latter-day artistic book-making generally—as to type, paper, illustration, binding materials, and binder's work. The claims to excellence put forward by the later products of the book maker's industry rest in some measure on the degree of its approximation to the crudities of the time when the work of book-making was a doubtful struggle with refractory materials carried on by means of insufficient appliances. These products, since they require hand labor, are more expensive; they are also less convenient for use than the books turned out with a view to serviceability alone; they therefore argue ability on the part of the purchaser to consume freely, as well as ability to waste time and effort. It is on this basis that the printers of to-day are returning to “old-style,” and other more or less obsolete styles of type which are less legible and give a cruder appearance to the page than the “modern.” Even a scientific periodical, with ostensibly no purpose but the most effective presentation of matter with which its science is concerned, will concede so much to the demands of this pecuniary beauty as to publish its scientific discussions in old-style type, on laid paper, and with uncut edges. But books which are not ostensibly concerned with the effective presentation of their contents alone, of course go farther in this direction. Here we have a somewhat cruder type, printed on hand-laid, deckel-edged paper, with excessive margins and uncut leaves, with bindings of a painstaking crudeness and elaborate ineptitude. The Kelmscott Press reduced the matter to an absurdity—as see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rute serviceability alone—by issuing books for modern use, edited with the obsolete spelling, printed in black-letter, and bound

in limp vellum fitted with thongs. As a further characteristic feature which fixes the economic place of artistic book-making, there is the fact that these more elegant books are, at their best, printed in limited editions. A limited edition is in effect a guarantee—somewhat crude, it is true—that this book is scarce and that it therefore is costly and lends pecuniary distinction to its consumer.

品位的这种发展本性对生产过程的影响，也许可以在图书出版业中找到最为贴切的例证，而图书出版业正是莫里斯晚年所经营的事业；在凯尔姆斯科特印刷厂的工作中，这种情形十分显著，而就现代一般艺术书籍而言，在字体、纸张、插图、装订材料和封面设计等方面，情形也是如此，只不过是没有那么显著而已。现在出版业声称其产品质量上乘，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其产品的粗糙程度和过去相似，而在过去，生产材料难以处理，生产工具不完备，书籍制作工作在不确定中挣扎。这些产品因为需要手工劳动，所以更为昂贵，而且使用起来也没有专为实用目的而制作的书籍方便，因此，购买这类书可以证明购买者具有自由消费的能力，并具有浪费时间和精力的条件。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今天的印刷商开始回归“旧式风格”，使用几近淘汰的字体，这些字体没有“现代的”字体那么容易辨认，并且使书籍的页面呈现出更为拙朴的外观。一本科学期刊，除了对与其学科相关的问题进行最高效的传达外，应该再无其他表面的目的，但即使是这样一本期刊也会屈从于金钱美感的要求，将其科学论文以旧式字体刊印在直纹纸上，并且是毛边装订的。有些书的表面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有效地传达其内容，它们在这方面所做的更是变本加厉。我们看到的是更为拙朴的字体，印在手工制作的毛边纸上，四周留着很大的空白，书页是不切边的。装订时，人们煞费苦心，让其显得粗糙；刻意经营，让其显得拙朴。从纯实用性角度来看，凯尔姆斯科特印刷社在这方面的做法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它发行的是供现代使用的书籍，竟然以旧式拼法来排版，以黑体字印出，以柔软的羊皮纸做封面并以皮绳缝起来。还有一个特点可以巩固艺术书籍制作的经济地位，那就是，这些更为雅致讲究的书籍最好以限量版发行。限量版发行实际上是一种

有效的保证，可以保证这个版本的书是稀少的，因而是昂贵的，能够提高消费者的金钱荣誉。

The special attractiveness of these book-products to the book-buyer of cultivated taste lies, of course, not in a conscious, naive recognition of their costliness and superior clumsiness. Here, as in the parallel case of the superiority of hand-wrought articles over machine products, the conscious ground of preference is an intrinsic excellence imputed to the costlier and more awkward article. The superior excellence imputed to the book which imitates the products of antique and obsolete processes is conceived to be chiefly a superior utility in the aesthetic respect; but it is not unusual to find a well-bred book-lover insisting that the clumsier product is also more serviceable as a vehicle of printed speech. So far as regards the superior aesthetic value of the decadent book, the chances are that the book-lover's contention has some ground. The book is designed with an eye single to its beauty, and the result is commonly some measure of success on the part of the designer. What is insisted on here, however, is that the canon of taste under which the designer works is a canon formed under the surveillance of the law of conspicuous waste, and that this law acts selectively to eliminate any canon of taste that does not conform to its demands. That is to say, while the decadent book may be beautiful, the limits within which the designer may work are fixed by requirements of a non-aesthetic kind. The product, if it is beautiful, must also at the same time be costly and ill adapted to its ostensible use. This mandatory canon of taste in the case of the book-designer, however, is not shaped entirely by the law of waste in its first form; the canon is to some extent shaped in conformity to that secondary expression of the predatory temperament, veneration for the archaic or obsolete, which in one of its special developments is called

classicism.

这类图书产品对品位高雅之士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当然，这种吸引力并不是出于对这类图书的昂贵和极其拙朴的有意识的、天真的认可。这里的情况和手工制造的物品优于机制产品的情况相似，偏好的自觉依据在于人们认为较为昂贵的、较为笨拙的物品具有内在的优点。人们认为通过对古代产品的模仿并运用旧式工序制作而成的书籍品质卓越，这类书籍的卓越品质主要在于它们在审美方面具有超高功用；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爱书之人会坚持认为这类较为笨拙的产品也是出版语言的更为实用的载体。就这类旧式书籍的超高美学价值而言，爱书之人所持的论点可能是有些理由的。设计这类书时所全力注意的是它的美感，结果设计者们往往会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这里要强调的是，设计者进行设计时所遵循的爱好准则是在炫耀性浪费定律的监督下形成的，并且炫耀性浪费定律会有选择地淘汰不符合其要求的任何品位准则。也就是说，这类旧式书籍可能是美的，但设计者的工作范围是由非审美性质的要求决定的。一件美的产品还必须是昂贵的，必须是不适于其表面用途的。然而，就书籍设计者而言，品位的这一强制性准则并非是在原始的浪费定律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一准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和掠夺性格的次要表现相符合的，这就是对古老或陈旧事物的崇拜，我们把它的特殊发展阶段之一称为“古典主义”。

In aesthetic theory it might be extremely difficult, if not quite impracticable, to draw a line between the canon of classicism, or regard for the archaic, and the canon of beauty. For the aesthetic purpose such a distinction need scarcely be drawn, and indeed it need not exist. For a theory of taste the expression of an accepted ideal of archaism, on whatever basis it may have been accepted, is perhaps best rated as an element of beauty; there need be no question of its legitimation. But for the present purpose—for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 what economic grounds are present in the

accepted canons of taste and what is their significance for the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goods—the distinction is not similarly beside the point. The position of machine products in the civilized scheme of consumption serves to point out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 which subsists between the canon of conspicuous waste and the code of proprieties in consumption. Neither in matters of art and taste proper, nor as regards the current sense of the serviceability of goods, does this canon act as a principle of innovation or initiative. It does not go into the future as a creative principle which makes innovations and adds new items of consumption and new elements of cost. The principle in question is, in a certain sense, a negative rather than a positive law. It is a regulative rather than a creative principle. It very rarely initiates or originates any usage or custom directly. Its action is selective only. Conspicuous wastefulness does not directly afford ground for variation and growth, but conformity to its requirements is a condition to the survival of such innovations as may be made on other grounds. In whatever way usages and customs and methods of expenditure arise, they are all subject to the selective action of this norm of reputability; and the degree in which they conform to its requirements is a test of their fitness to survive in the competition with other similar usages and customs.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the more obviously wasteful usage or method stands the better chance of survival under this law. The law of conspicuous waste does not account for the origin of variations, but only for the persistence of such forms as are fit to survive under its dominance. It acts to conserve the fit, not to originate the acceptable. Its office is to prove all things and to hold fast that which is good for its purpose.

在美学理论中，要在古典主义准则或尊古准则与美观准则之间划

出一条界线，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仅仅为了美学目的，就没有作出这种区别的必要，实际上，两者之间不一定存在区别。就品位理论而言，不论一种古风典范被接受的依据何在，我们也许最好将这种典范的表现视为美的一个构成因素，其合法性是没有必要质疑的。但是，我们这里讨论的目的是要确定公认的品位准则具有何种经济依据以及这些依据在物品的消费和分配方面有何意义；就这一目的而言，上述的区别就不再是偏离主题的了。机器制造的产品在文明的消费体系中所具有的地位说明了炫耀性浪费准则和消费的礼节规范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的性质。不论是在纯艺术和品位方面，还是在关于物品实用性的流行观念方面，炫耀性浪费准则并不是进行革新和创造所要遵循的原则。它不会在未来成为一个创造性的原则，不会带来革新，不会增加新的消费项目，不会增加新的成本元素。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原则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定律。它是一种制约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原则。这一原则很少会直接创造或产生任何风俗和习惯。它的作用只是淘汰性的。炫耀性浪费并不直接为变化和发展提供依据，但是，那些在别的依据下可能产生的革新要想继续存在，其条件之一就是要符合炫耀性浪费的要求。消费的风俗、习惯和方式不论是以何种方式出现的，都要受到这一荣誉规范的淘汰作用的影响；它们符合荣誉规范要求的程度对它们是一种考验，决定了它们与其他相似的风俗习惯相比是否更适合生存下去。在同等条件下，明显更加浪费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在这个定律下生存的机会就越大。炫耀性浪费定律并不是变化的起因，但是只有那些适于在这一定律下生存的变化形式才能继续生存下去。该定律的作用在于保存适于生存的事物，而不在于创造可以接受的事物。它的任务就是对一切事物加以检验，并且会牢牢抓住与其目的相适应的事物。

Chapter VII Dress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ecuniary Culture

第七章　服装：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

It will be in place, by way of illustration, to show in some detail how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so far set forth apply to everyday facts in some one direction of the life process. For this purpose no line of consumption affords a more apt illustration than expenditure on dress. It is especially the rule of the conspicuous waste of goods that finds expression in dress, although the other, related principles of pecuniary repute are also exemplified in the same contrivances. Other methods of putting one's pecuniary standing in evidence serve their end effectually, and other methods are in vogue always and everywhere; but expenditure on dress has this advantage over most other methods, that our apparel is always in evidence and affords an indication of our pecuniary standing to all observers at the first glance. It is also true that admitted expenditure for display is more obviously present, and is, perhaps, more universally practiced in the matter of dress than in any other line of consumption. No one finds difficulty in assenting to the commonplace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expenditure incurred by all classes for apparel is incurred for the sake of a respectable appearance rather tha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rson. And probably at no other point is the sense of shabbiness so keenly felt as it is if we fall short of the standard set by social usage in this matter of dress. It is true of dress in even a higher degree than of most other items of consumption, that people will undergo a very considerable degree of privation in the comforts or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in order to afford what is considered a decent amount of wasteful consumption; so that it is by no means an uncommon

occurrence, in an inclement climate, for people to go ill clad in order to appear well dressed. And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the goods used for clothing in any modern community is made up to a much larger extent of the fashionableness, the reputability of the goods than of the mechanical service which they render in clothing the person of the wearer. The need of dress is eminently a “higher” or spiritual need.

我们应该通过例证的办法，来详细说明前面提到的经济原则在生活过程某一方面的日常事实中是如何应用的。就这个目的而言，在所有类型的消费中，服装消费是最为恰当的例证。财物的炫耀性浪费法则在服装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尽管其设计中还存在着其他相关的金钱荣誉准则。要证明一个人的金钱地位，除服装消费外，其他方法也可以有效地达到目的，并且这些其他方法也是无时无处不在流行着；但是，服装消费要比大多数其他方法更具优势，因为我们的服装总是惹人注意的，它是我们金钱地位的标志，所有旁观者一瞥之下便会了然于胸。还有一点也是实情，公认的炫耀性消费在服装方面比在任何其他类型的消费方面更为显著，也许更为普遍。所有阶级在服装上的消费大部分是为了有个体面的外表，而不是为了御寒保暖，没有人会觉得这一简单事实难以赞同。如果我们服装方面没能达到社会习俗所设定的标准，我们就会有种寒酸之感，而在其他方面得来的寒酸之感也许没有这么强烈。为了能够进行数量可观的浪费消费，人们愿意在相当程度上被剥夺物质享受或生活必需品，比起其他消费项目，这句话用在服装方面更为真实；所以，在寒冷的天气里，人们穿着单薄，这样做是为了看上去衣冠楚楚，这种现象十分常见。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有关服装的物品，其商业价值在更大程度上在于该物品所具有的时髦和荣誉的特点，而不在于它们具有遮蔽穿着者躯体的机械功用。对服装的需求明显是一种“更高级的”或精神的需求。

This spiritual need of dress is not wholly, nor even chiefly, a

naive propensity for display of expenditure. The law of conspicuous waste guides consumption in apparel, as in other things, chiefly at the second remove, by shaping the canons of taste and decency. In the common run of cases the conscious motive of the wearer or purchaser of conspicuously wasteful apparel is the need of conforming to established usage, and of living up to the accredited standard of taste and reputability. It is not only that one must be guided by the code of proprieties in dress in order to avoid the mortification that comes of unfavorable notice and comment, though that motive in itself counts for a great deal; but besides that, the requirement of expensiveness is so ingrained into our habits of thought in matters of dress that any other than expensive apparel is instinctively odious to us. Without reflection or analysis, we feel that what is inexpensive is unworthy. “A cheap coat makes a cheap man.” “Cheap and nasty” is recognized to hold true in dress with even less mitigation than in other lines of consumption. On the ground both of taste and of serviceability, an inexpensive article of apparel is held to be inferior, under the maxim “cheap and nasty.” We find things beautiful, as well as serviceable, somewhat in proportion as they are costly. With few and inconsequential exceptions, we all find a costly hand-wrought article of apparel much preferable, in point of beauty and of serviceability, to a less expensive imitation of it, however cleverly the spurious article may imitate the costly original; and what offends our sensibilities in the spurious article is not that it falls short in form or color, or, indeed, in visual effect in any way. The offensive object may be so close an imitation as to defy any but the closest scrutiny; and yet so soon as the counterfeit is detected, its aesthetic value, and its commercial value as well, declines precipitately. Not only that, but it may be asserted with but small risk of contradiction that the aesthetic value of a detected counterfeit in dress declines somewhat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the counterfeit is cheaper than its original. It loses

caste aesthetically because it falls to a lower pecuniary grade.

对于服装的这种精神需求并非完全是，甚至也并非主要是由于爱好炫耀消费的自然性格本性所致。炫耀性浪费法则，就像支配其他东西的消费一样，对服装的消费起着支配作用，它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对品位与礼仪准则的形成产生影响。在通常情况下，穿着或购买具有炫耀性浪费成分的衣服的人，其自觉动机在于能符合已经确立的习俗，在于要符合公认的品位与荣誉标准。人们必须受服装的礼仪准则的支配，不仅仅是为了避免白眼或恶语中伤所带来的羞辱——尽管这一动机本身十分重要；除此之外，昂贵奢华的要求在我们关于服装的思维习惯中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任何服装，只要不够昂贵奢华，就会让我们本能地感到厌恶。不需要经过思考或分析，我们就会感到但凡价格低廉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衣贱使人贱。”“便宜无好货”这句话适用于各种消费，而在服装方面，这句话更是无可争议的。不论是从品位还是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在“便宜无好货”这一信条下，价格低廉的服饰总是被认为是劣等货。我们觉得东西是美丽而又实用的，其美丽和实用程度大体上与其昂贵程度成正比。除了为数不多而又无关紧要的例外，我们都会觉得一件昂贵的、手工缝制的服饰在美观和实用方面要比一件较为低廉的仿品要好得多，不论这件冒牌货对昂贵真品的模仿是多么高明；冒牌货之所以会让我们感到反感，不是因为它在式样和色彩方面，或者在视觉效果的任何方面有所欠缺。令人反感的冒牌货可能会达到可以乱真的地步，不经过最仔细的检查是看不出其破绽的；但是一旦被发现是冒牌货，其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都将一落千丈。不但如此，一件服装，如果被发现是冒牌货，其审美价值的降低程度和该冒牌服装与真品的价差成正比；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不大会引起异议。仿制品审美价值降低是因为它在金钱等级上的地位较低。

But the function of dress as an evidence of ability to pay does not end with simply showing that the wearer consumes valuable

goods in excess of what is required for physical comfort. Simple conspicuous waste of goods is effective and gratifying as far as it goes; it is good *prima faci* e evidence of pecuniary success, and consequently *prima facie* evidence of social worth. But dress has subtler and more far-reaching possibilities than this crude, first-hand evidence of wasteful consumption only. If, in addition to showing that the wearer can afford to consume freely and uneconomically, it can also be shown in the same stroke that he or she is not under the necessity of earning a livelihood, the evidence of social worth is enhanced in a very considerable degree. Our dress, therefore, in order to serve its purpose effectually, should not only be expensive, but it should also make plain to all observers that the wearer is not engaged in any kind of productive labor. I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by which our system of dress has been elaborated into its present admirably perfect adaptation to its purpose, this subsidiary line of evidence has received due attention.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what passes in popular apprehension for elegant apparel will show that it is contrived at every point to convey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wearer does not habitually put forth any useful effort.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no apparel can be considered elegant, or even decent, if it shows the effect of manual labor on the part of the wearer, in the way of soil or wear. The pleasing effect of neat and spotless garments is chiefly, if not altogether, due to their carrying the suggestion of leisure—exemption from personal contact with industrial processes of any kind. Much of the charm that invests the patent-leather shoe, the stainless linen, the lustrous cylindrical hat, and the walking-stick, which so greatly enhance the native dignity of a gentleman, comes of their pointedly suggesting that the wearer cannot when so attired bear a hand in any employment that is directly and immediately of any human use. Elegant dress serves its purpose of elegance not only in that it is expensive, but also because it is the insignia of

leisure. It not only shows that the wearer is able to consume a relatively large value, but it argu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he consumes without producing.

服装具有证明支付能力的功能，但是它在这方面的功能不仅仅在于表明穿着者能够消费超出物质享受需要的昂贵物品。对物品的单纯炫耀性浪费本身就是有效的、令人满足的；它是金钱成就的很好的明证，因此也是社会价值的明证。但是，服装不仅仅是浪费性消费的天然的、直接的证明，它具有更加微妙的、更加深远的潜在作用。如果衣服除了可以表明穿着者有能力自由而又不加节制地进行消费以外，还可以表明他或她没有谋求生计的必要，那么服装作为社会价值的证明，其作用就大大地提高了。因此，为了有效地满足其目的，我们的服装不仅应该是昂贵的，而且应该使所有旁观者都清楚，穿着者是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的。我们的服装制度到了今天已经变得复杂，完全能够很好地适应其目的，在这一演进过程中，这种附属的证明作用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注意。如果对一般人所认为的优雅服装进行仔细检查，我们就会发现它的每一个细节设计的都是为了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穿着者并不常常从事任何具有实用性的劳动。不用说，如果一件衣服已经被弄脏或磨损，显示出穿着者从事体力劳动的痕迹，那么这件衣服就谈不上是优美的，甚至连体面都谈不上。整洁干净的衣服之所以能够产生令人赏心悦目的效果，即使不完全是，也主要是因为它们能让人联想到有闲——避免亲身接触任何类型的生产过程。一双黑漆皮的鞋、一件洁白无瑕的亚麻衬衫、一顶光泽夺目的圆筒礼帽，再加上一根手杖，可以大大地提高一位绅士原有的威严度；它们的魅力大部分是因为它们具有强烈的暗示——如此穿着打扮的人是绝不可能从事任何直接对人类有用的工作的。优雅的服装之所以能满足其优雅的目的，不仅仅因为它是昂贵的，还因为它是有闲的标志。它不仅仅表明了穿着者有能力从事相对较大额度的消费，同时还表明了他只消费不生产。

The dress of women goes even farther than that of men in the way of demonstrating the wearer's abstinence from productive employment. It needs no argument to enforce the generalization that the more elegant styles of feminine bonnets go even farther towards making work impossible than does the man's high hat. The woman's shoe adds the so-called French heel to the evidence of enforced leisure afforded by its polish; because this high heel obviously makes any, even the simplest and most necessary manual work extremely difficult. The like is true even in a higher degree of the skirt and the rest of the drapery which characterizes woman's dress. The substantial reason for our tenacious attachment to the skirt is just this: it is expensive and it hampers the wearer at every turn and incapacitates her for all useful exertion. The like is true of the feminine custom of wearing the hair excessively long.

服装可以表明穿着者不从事生产工作，而在这一点上，女性服装比起男性服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起男性的高顶礼帽，较为优雅的无边女帽有碍于从事生产工作，这是无须论证就能得出的结论。女鞋擦得油光发亮，可以表明强制执行的有闲，此外还要给它加上了高高的后跟（即所谓的法式弯高跟）；因为，很明显，这种高跟使得任何体力劳动，哪怕是最为简单、最为必要的体力劳动都变得极度困难。长裙和其他具有女性服装特色的皱褶垂饰，其情形亦复如是，甚至更加显著。我们特别喜欢长裙，其根本原因在于长裙价格不菲，并且可以束缚穿着者的一举一动，使她无法从事任何实用性劳动。女性习惯把头发留得很长，其原因也是如此。

But the woman's apparel not only goes beyond that of the modern man in the degree in which it argues exemption from labor; it also adds a peculiar and highly characteristic feature which differs in kind from anything habitually practiced by the men. This

feature is the class of contrivances of which the corset is the typical example. The corset is, in economic theory, substantially a mutilation, undergone for the purpose of lowering the subject's vitality and rendering her permanently and obviously unfit for work. It is true, the corset impairs the personal attractions of the wearer, but the loss suffered on that score is offset by the gain in reputability which comes of her visibly increased expensiveness and infirmity. It may broadly be set down that the womanliness of woman's apparel resolves itself, in point of substantial fact, into the more effective hindrance to useful exertion offered by the garments peculiar to women. This difference between masculine and feminine apparel is here simply pointed out as a characteristic feature. The ground of its occurrence will be discussed presently.

但是，比起现代男性的服装，女性服装更能证明脱离从事劳动这一点；不仅如此，它还增加了一个极其独特、极具特色的特征，其性质与男性惯常使用的所有东西都不相同。这一特征表现在服装的某些设计上，塑身衣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从经济理论角度来看，穿着塑身衣本质上是种伤残肢体的行为，其目的在于降低使用者的活动能力，使她永远地、显然地不适合从事劳动。诚然，塑身衣会降低穿着者的个人魅力；但是它却可以使穿着者明显地显得更加雍容华贵而又弱不禁风，从而为她赢得了荣誉，个人荣誉之所得就这样抵消了个人魅力之所失。我们大体上可以确定，女性服装所具有的女性特征逐渐演化，通过妇女专用服装的形式，实际上成了实用性劳动更为有效的约束。男女服装的这一差别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显著特征予以指出的。至于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下面将加以探讨。

So far, then, we have, as the great and dominant norm of dress, the broad principle of conspicuous waste. Subsidiary to this principle, and as a corollary under it, we get as a second norm the

principle of conspicuous leisure. In dress construction this norm works out in the shape of divers' contrivances going to show that the wearer does not and, as far as it may conveniently be shown, can not engage in productive labor. Beyond these two principles there is a third of scarcely less constraining force, which will occur to anyone who reflects at all on the subject. Dress must not only be conspicuously expensive and inconvenient, it must at the same time be up to date. No explanation at all satisfactory has hitherto been offered of the phenomenon of changing fashions. The imperative requirement of dressing in the latest accredited manner,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this accredited fashion constantly changes from season to season, is sufficiently familiar to everyone, but the theory of this flux and change has not been worked out. We may of course say, with perfect consistency and truthfulness, that this principle of novelty is another corollary under the law of conspicuous waste. Obviously, if each garment is permitted to serve for but a brief term, and if none of last season's apparel is carried over and made further use of during the present season, the wasteful expenditure on dress is greatly increased. This is good as far as it goes, but it is negative only. Pretty much all that this consideration warrants us in saying is that the norm of conspicuous waste exercises a controlling surveillance in all matters of dress, so that any change in the fashions must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 of wastefulness; it leaves unanswered the question as to the motive for making and accepting a change in the prevailing styles, and it also fails to explain why conformity to a given style at a given time is so imperatively necessary as we know it to be.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把炫耀性浪费这一广泛的原则作为服装的伟大而又具支配作用的规范的。我们还有第二个规范，即炫耀性有闲原则，该项原则是附属于炫耀性浪费原则的，并且是它的必然结果。在

服装构造中，这一规范所起的作用是通过形形色色的设计表现出来的，这些设计要能够表明穿着者没有从事生产劳动，最好能够表明穿着者根本无法从事生产劳动。除了这两项原则之外，还有第三项原则，其约束力并不亚于前两项，任何人只要对这个话题稍加思索就可以想到这一点。服装必须明显是昂贵而又不方便运动的，不仅如此，它还必须能跟得上潮流。关于时新样式不断变化这一现象，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必须按照最近公认的式样穿衣打扮，这是一项人尽皆知的强制性要求；而这一公认的时新式样会随着季节的更迭而不断产生变化，这也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形成关于这种变迁和改变的理论。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一崇尚新奇的原则是炫耀性浪费原则的另一个必然结果，这一说法毫无矛盾的，是完全真实的。很明显，如果一件衣服只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穿，如果上一季节流行的衣服不能留到本季节继续使用，那么在服装上的浪费性支出将会大大增加。这种说法虽然言之有理，却完全是消极的。这种说法最多可以让我们有理由认为，炫耀性浪费这一规范对服装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控制性监督的作用，所以服装样式的任何变化都必须符合浪费原则的要求；但是，对于流行式样变化和人们接受这种变化的动机何在这个问题却未能予以解答，它也未能解释为什么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的穿着迫切需要符合某一特定式样。

For a creative principle, capable of serving as motive to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in fashions, we shall have to go back to the primitive, non-economic motive with which apparel originated—the motive of adornment. Without going into an extended discussion of how and why this motive asserts itself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law of expensiveness, it may be stated broadly that each successive innovation in the fashions is an effort to reach some form of display which shall be more acceptable to our sense of form and colour or of effectiveness, than that which it displaces. The changing styles are the expression of a restless search for something which shall commend itself to our aesthetic sense; but as each

innovation is subject to the selective action of the norm of conspicuous waste, the range within which innovation can take place is somewhat restricted. The innovation must not only be more beautiful, or perhaps oftener less offensive, than that which it displaces, but it must also come up to the accepted standard of expensiveness.

要找到一个创造性原则，一个能够说明时尚款式不断发明和革新的动机的创造性原则，我们就得追溯到发明创造衣服的那个原始的、非经济的动机——装饰的动机。我们不准备深入探讨这一动机是如何而又为何会在浪费定律的指导下产生作用的；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服装式样的每一次后继的革新都是为了实现某种表现形式所作的努力，这种新的表现形式比起被其所取代的表现形式更容易被我们在式样、色彩及效果方面的观念所接受。我们总是不断追求可以迎合我们审美感官的东西，而式样的变化正是这种不懈追求的表现；但是因为每次革新都要受到炫耀性浪费规范的淘汰作用的影响，所以能够进行革新的范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新的式样应该比它所取代的式样更加美观，或许更常见的是，新式样没有旧式样那么令人反感；不仅如此，新式样还必须符合公认的昂贵标准。

It would seem at first sight that the result of such an unremitting struggle to attain the beautiful in dress should be a gradual approach to artistic perfection. We might naturally expect that the fashions should show a well-marked trend in the direction of some one or more types of apparel eminently becoming to the human form; and we might even feel that we have substantial ground for the hope that to-day, after all the ingenuity and effort which have been spent on dress these many years, the fashions should have achieved a relative perfection and a relative stability, closely approximating to a permanently tenable artistic ideal. But

such is not the case. It would be very hazardous indeed to assert that the styles of to-day are intrinsically more becoming than those of ten years ago, or than those of twenty, or fifty, or one hundred years ago. On the other hand, the assertion freely goes uncontradicted that styles in vogue two thousand years ago are more becoming than the most elaborate and painstaking constructions of to-day.

乍一看，这种为了实现服装美观的不懈努力，其结果应该是不断接近艺术的完美境界。我们也许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时尚款式应该表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应该朝着非常适合人类形体的某种或更多种服装式样的方向演进；我们甚至会觉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经过这许多年来花费在服装上的智慧和精力，今天的时尚款式应该已经达到比较完善、比较稳定的地步，应该已经十分接近永不过时的艺术理想境界。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要说今天的式样本质上比十年前、二十年前、半世纪前抑或一世纪前的式样更加适宜，这样的断言是非常冒险的。另一方面，如果说两千年前所流行的式样比今天最精美的、最精心制作的式样更为适宜，这样的断言却不会受到任何反驳。

The explanation of the fashions just offered, then, does not fully explain, and we shall have to look farther. It is well known that certain relatively stable styles and types of costume have been worked out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as, for instance, among the Japanese, Chinese, and other Oriental nations; likewise among the Greeks, Romans, and other Eastern peoples of antiquity; so also, in later times, among the peasants of nearly every country of Europe. These national or popular costumes are in most cases adjudged by competent critics to be more becoming, more artistic, than the fluctuating styles of modern civilized apparel.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also, at least usually, less obviously wasteful; that is

to say, other elements than that of a display of expense are more readily detected in their structure.

然而，上文对于时尚款式的解释还不够全面，我们应该作进一步的探讨。众所周知，世界上一些地区，如日本、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服装款式和服装类型；同样，希腊、罗马和其他古代东方民族的情况也是如此；后来，几乎欧洲每个国家的农民在这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根据权威专家的判断，这些民族或民众的服装大多比款式变化不定的现代文明服装更加适宜、更具艺术性。同时，这些服装所含有的炫耀性浪费成分也较少，至少通常如此；也就是说，在这类服装的结构中更容易发现炫耀性消费以外的其他因素。

These relatively stable costumes are, commonly, pretty strictly and narrowly localized, and they vary by slight and systematic gradations from place to place. They have in every case been worked out by peoples or classes which are poorer than we, and especially they belong in countries and localities and times where the population, or at least the class to which the costume in question belongs, is relatively homogeneous, stable, and immobile. That is to say, stable costumes which will bear the test of time and perspective are worked out under circumstances where the norm of conspicuous waste asserts itself less imperatively than it does in the large modern civilized cities, whose relatively mobile wealthy population to-day sets the pace in matters of fashion. The countries and classes which have in this way worked out stable and artistic costumes have been so placed that the pecuniary emulation among them has taken the direction of a competition in conspicuous leisure rather than i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goods. So that it will hold true in a general way that fashions are least stable and least

becoming in those communities where the principle of a conspicuous waste of goods asserts itself most imperatively, as among ourselves. All this points to an antagonism between expensiveness and artistic apparel. In point of practical fact, the norm of conspicuous waste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requirement that dress should be beautiful or becoming. And this antagonism offers an explanation of that restless change in fashion which neither the canon of expensiveness nor that of beauty alone can account for.

这些相对稳定的服装通常具有相当严格的、狭隘的地方色彩，并且随着地区的不同会呈现出细微的、系统的变化。这类服装无一例外都是由比我们贫穷的民族或阶级设计出来的，尤其是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地区或时代的居民，或者至少穿着这些服装的阶级，是比较统一、稳定和安居乐业的。也就是说，能够经得起时间和观念考验的稳定的服装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设计出来的，在这种环境下，炫耀性浪费规范不像它在现代文明大都市里表现得那么具有强制性；这些现代文明大都市里的居民流动性较强，也比较富裕，他们是时尚的引领者。有些国家和阶级通过这种方式设计出了稳定而又具有艺术性的服装，这些国家和阶级所处的环境是这样的：在那里，彼此间的金钱竞赛侧重的是炫耀性有闲的竞争，而不是对财物进行炫耀性消费的竞争。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一般情况下，在炫耀性浪费原则表现得最具强制性的那些社会里，就像我们自己现在所处的社会，服装的款式最不稳定，也是最不适宜的。所有这一切表明，昂贵的服装和具有艺术性的服装是水火不相容的。从实际情况来看，炫耀性浪费的规范和服装必须美观适宜的要求是不相容的。这种对立状态可以解释服装款式为何会不断变化，而不论是浪费原则，还是美观原则，都不能单独解释这种变化。

The standard of reputability requires that dress should show

wasteful expenditure; but all wastefulness is offensive to native taste. The psychological law has already been pointed out that all men—and women perhaps even in a higher degree abhor futility, whether of effort or of expenditure—much as Nature was once said to abhor a vacuum. But the principle of conspicuous waste requires an obviously futile expenditure; and the resulting conspicuous expensiveness of dress is therefore intrinsically ugly. Hence we find that in all innovations in dress, each added or altered detail strives to avoid condemnation by showing some ostensible purpose,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requirement of conspicuous waste prevents the purposefulness of these innovations from becoming anything more than a somewhat transparent pretense. Even in its freest flights, fashion rarely if ever gets away from a simulation of some ostensible use. The ostensible usefulness of the fashionable details of dress, however, is always so transparent a make-believe, and their substantial futility presently forces itself so baldly upon our attention as to become unbearable, and then we take refuge in a new style. But the new style must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 of reputable wastefulness and futility. Its futility presently becomes as odious as that of its predecessor; and the only remedy which the law of waste allows us is to seek relief in some new construction, equally futile and equally untenable. Hence the essential ugliness and the unceasing change of fashionable attire.

荣誉标准所要求的是，服装所表现的应当是浪费性消费；然而，一切浪费都是与朴素的品位相抵触的。前文已经指出，根据心理学定律，不论是在劳力方面，还是在消费方面，所有男子——也许女子更加——对徒劳无益的事情都很厌恶，正如过去“自然厌恶真空”的说法一样。但是，炫耀性浪费的原则所要求的是明显徒劳无益的消费；因此，由此在服装上出现的炫耀性浪费在本质上是丑陋的。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服装上的一切革新，其增添或变更的每一个细节，为了避免

受到指责，都会表现出某种表面的目的；同时，炫耀性浪费的要求会防止这些革新具有超出明显伪装以外的功用。即使是最为自由奔放的服装款式，也通常会伪装成具有某种表面的用途。然而，服装的时尚细节所具有的表面用途总是一种明显的伪装，这些时尚细节毫无用处，这一点是一览无疑的，令人感到难以忍受，于是新的款式就成了我们的避难之所。但是，这新的款式必须符合荣誉浪费和毫无用处的要求。新款式的毫无用处很快变得和旧款式一样令人厌恶，唯一补救的办法是，在浪费法则的支配下，我们可以在某种新的结构中寻求慰藉，而这新的结构同样毫无用处，同样不能持久。因此，时尚的服装在本质上是丑陋的，是要不断翻新变化的。

Having so explained the phenomenon of shifting fashions, the next thing is to make the explanation tally with everyday facts. Among these everyday facts is the well-known liking which all men have for the styles that are in vogue at any given time. A new style comes into vogue and remains in favor for a season, and, at least so long as it is a novelty, people very generally find the new style attractive. The prevailing fashion is felt to be beautiful. This is due partly to the relief it affords in being different from what went before it, partly to its being reputable. As indicated in the last chapter, the canon of reputability to some extent shapes our tastes, so that under its guidance anything will be accepted as becoming until its novelty wears off, or until the warrant of reputability is transferred to a new and novel structure serving the same general purpose. That the alleged beauty, or “loveliness,” of the styles in vogue at any given time is transient and spurious only is attested by the fact that none of the many shifting fashions will bear the test of time. When seen in the perspective of half-a-dozen years or more, the best of our fashions strike us as grotesque, if not unsightly. Our transient attachment to whatever happens to be the latest rests on other than aesthetic grounds, and lasts only until our abiding

aesthetic sense has had time to assert itself and reject this latest indigestible contrivance.

上文已经解释了服装款式变化的现象，接下来我们将会用日常事实来印证上面的解释。在日常事实中，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所有人都喜欢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流行的款式。一个新的款式开始流行，并且在一段时期内都会受到人们的喜爱，至少只要新的款式依然是新鲜事物，人们就会觉得它是美丽动人的。人们觉得流行的款式是美丽的。这一点部分是因为新的款式和以前的款式不同，人们可以从中得到慰藉，部分是因为新的款式具有荣誉性。正如在上一章所指出的，荣誉准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品位；在它的支配下，任何事物，在其新奇感尚未消失之前，在其荣誉性尚未转移到可以满足相同目的的另一个新奇结构上之前，都会被认为是适宜的。不断变化的款式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一事实证明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流行的款式，其所谓的美丽或“动人之处”都只是短暂的、虚假的。过了六七年或更长时间以后再回过头来一看，我们认为最为时尚的款式，即便并非不堪入目，也会让我们觉得怪诞可笑。我们对于任何最新事物所感到的短暂的喜爱之情并非是出于审美的原因，只有当我们永恒的审美观念找到机会发挥作用，感到这个最新设计难以接受并加以排斥，这种喜爱之情才会消失。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n aesthetic nausea takes more or less time; the length of time required in any given case being inversely as the degree of intrinsic odiousness of the style in question. This time relation between odiousness and instability in fashions affords ground for the inference that the more rapidly the styles succeed and displace one another, the more offensive they are to sound taste. The presumption, therefore, is that the farther the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wealthy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 in wealth and mobility and in the range of their human

contact, the more imperatively will the law of conspicuous waste assert itself in matters of dress, the more will the sense of beauty tend to fall into abeyance or be overborne by the canon of pecuniary reputability, the more rapidly will fashions shift and change, and the more grotesque and intolerable will be the varying styles that successively come into vogue.

形成审美反感的过程所需要的时间长短不一；在任何情况下，这一过程所需时间的长短是与该款式内在的丑陋程度成反比的。时尚款式的丑陋程度与其不稳定程度之间的这种时间关系为下列推论提供了基础：款式互相接替和相互取代的速度越快，对健全的品位来说就越令人讨厌。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一个社会，尤其是该社会的富有阶级，富裕程度越高、流动性越大、人际交往的范围越广，炫耀性浪费法则在服装方面发挥的作用就越具有强制性，审美观念将会更加趋于停滞状态，更加受到金钱荣誉准则的抑制，时尚款式的更替和变化也就更快，而一个接一个流行起来的不同款式也就更加怪诞可笑，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There remains at least one point in this theory of dress yet to be discussed. Most of what has been said applies to men's attire as well as to that of women; although in modern times it applies at nearly all points with greater force to that of women. But at one point the dress of women differs substantially from that of men. In woman's dress there is obviously greater insistence on such features as testify to the wearer's exemption from or incapacity for all vulgarly productive employment. This characteristic of woman's apparel is of interest, not only as completing the theory of dress, but also as confirming what has already been said of 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both in the past and in the present.

关于这里提出的服装理论，至少还有一点有待探讨。上面提及的大部分观点既适用于男性服装，也适用于女性服装；只是在现代社会，几乎所有上述观点都更加适用于女性服装。但是，女性服装有一点是和男性服装根本不同的。女性服装明显更加强调某些特征，这些特征证明穿着者不用从事或者不能从事一切粗鄙的生产劳动。女性服装的这一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完善了关于服装的理论，而且证实了上文已经提及的女性在过去和现在所拥有的经济地位。

As has been seen in the discussion of woman's status under the heads of Vicarious Leisure and Vicarious Consumption, it has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ome the office of the woman to consume vicariously for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and her apparel is contrived with this object in view. It has come about that obviously productive labor is in a peculiar degree derogatory to respectable women, and therefore special pains should be take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dress, to impress upon the beholder the fact (often indeed a fiction) that the wearer does not and cannot habitually engage in useful work. Propriety requires respectable women to abstain more consistently from useful effort and to make more of a show of leisure than the men of the same social classes. It grates painfully on our nerves to contemplate the necessity of any well-bred woman's earning a livelihood by useful work. It is not “woman's sphere.” Her sphere is within the household, which she should “beautify,” and of which she should be the “chief ornament.” The male head of the household is not currently spoken of as its ornament. This feature take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other fact that propriety requires more unremitting attention to expensive display in the dress and other paraphernalia of women, goes to enforce the view already implied in what has gone before. By virtue of its descent from a patriarchal past, our social system makes it the woman's function in an especial degree to put in evidence her

household's ability to pay.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civilized scheme of life, the good name of the household to which she belongs should be the special care of the woman; and the system of honorific expenditure and conspicuous leisure by which this good name is chiefly sustained is therefore the woman's sphere. In the ideal scheme, as it tends to realize itself in the life of the higher pecuniary classes, this attention to conspicuous waste of substance and effort should normally be the sole economic function of the woman.

我们在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这两个标题下探讨了女性地位的问题，从中我们已经发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一家之主执行代理消费已经成为女性的职责；她的服装就是为了这个目而设计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明显具有生产性质的劳动特别有损于尊贵女性的身份，因此，在制作女性服装时，必须想方设法让旁观者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一事实往往是虚构的）：穿着者没有也不能经常从事实用性工作。按照礼仪的要求，尊贵的女性必须比处于同一社会阶级的男性更加坚决地避免从事一切有用的劳动，必须比处于同一社会阶级的男性表现出更大程度的有闲。一想到一个有教养的女性需要通过实用性劳动来维持生计，我们就会感到痛心疾首。这不是“妇女的活动范围”。妇女的活动范围应当在家庭以内，她应该装饰这个家庭，应该是这个家庭的“主要装饰品”。而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则一般不会被说成是该家庭的装饰品。这一特征，再加上礼仪要求女性必须更加用心使其服装和其他随身饰品表现出奢华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上面提到的观点。我们的社会制度是由过去的父权制发展而来的，它特别强调女性证明其家庭支付能力的职能。按照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女性应该格外关注她所在家庭的良好声誉；因此，女性的活动范围在于进行荣誉性消费和执行炫耀性有闲，因为进行荣誉性消费和执行炫耀性有闲是维持良好声誉的主要手段。在理想的生活方式下，关注物质和精力的炫耀性浪费通常应该是女性的唯一经济职能，在较高金钱阶级的生活中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At th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which the women were still in the full sense the property of the men, the performance of conspicuous leisure and consumption came to be part of the services required of them. The women being not their own masters, obvious expenditure and leisure on their part would redound to the credit of their master rather than to their own credit; and therefore the more expensive and the more obviously unproductive the women of the household are, the more creditable and more effective for the purpose of reputability of the household or its head will their life be. So much so that the women have been required not only to afford evidence of a life of leisure, but even to disable themselves for useful activity.

当社会还处于女性依然完全是男性的财产那个经济发展阶段时，执行炫耀性有闲和进行炫耀性消费就成了女性必须执行的职能的一部分。女性并非其自身的主人，她们执行的炫耀性消费和炫耀性有闲会提高她们主人的声誉，却不会提高她们自身的声誉；因此，一个家庭的女性越是奢侈浪费，越是明显地不从事生产，她们的生活就越具有荣誉性，就越能满足提高该家庭或该家庭一家之主声誉的目的。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女性不仅必须证明她过着有闲的生活，甚至要让自己失去从事实用性劳动的能力。

It is at this point that the dress of men falls short of that of women, and for a sufficient reason. Conspicuous waste and conspicuous leisure are reputable because they are evidence of pecuniary strength; pecuniary strength is reputable or honorific because, in the last analysis, it argues success and superior force; therefore the evidence of waste and leisure put forth by any individual in his own behalf cannot consistently take such a form or

be carried to such a pitch as to argue incapacity or marked discomfort on his part; as the exhibition would in that case show not superior force, but inferiority, and so defeat its own purpose. So, then, wherever wasteful expenditure and the show of abstention from effort is normally, or on an average, carried to the extent of showing obvious discomfort or voluntarily induced physical disability, there the immediate inference is that the individual in question does not perform this wasteful expenditure and undergo this disability for her own personal gain in pecuniary repute, but in behalf of someone else to whom she stands in a relation of economic dependence; a relation which in the last analysis must, in economic theory, reduce itself to a relation of servitude.

正是这一点为男性服装不如女性服装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炫耀性消费和炫耀性有闲是具有荣誉性的，因为它们是金钱力量的证明；金钱力量是具有荣誉性的或光荣的，因为归根到底，它是成功和优势的证明；因此，任何个人都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让自己丧失劳动能力的形式，也不会让自己感到明显的不适来证明他是有闲或浪费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展示的不是优势力量，而是劣势地位，这样反而适得其反，不能实现其初衷。因此，只要浪费消费和避免劳动的表现在正常或一般情况下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或自觉地使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伤残，我们就可以立即推断，该个体之所以进行这种浪费消费并忍受身体的伤残，并不是为了她自己在金钱荣誉方面的个人利益，她这样做是代表别人的，她和这个人存在着经济依附关系；按照经济学理论，这种经济依附关系归根到底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奴役关系。

To apply this generalization to women's dress, and put the matter in concrete terms: the high heel, the skirt, the impracticable bonnet, the corset, and the general disregard of the wearer's

comfort which is an obvious feature of all civilized women's apparel, are so many items of evidence to the effect that in the modern civilized scheme of life the woman is still, in theory, the economic dependent of the man—that, perhaps in a highly idealized sense, she still is the man's chattel. The homely reason for all this conspicuous leisure and attire on the part of women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y are servants to whom,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conomic functions, has been delegated the office of putting in evidence their master's ability to pay.

现将上述归纳应用于女性服装，具体地来说明这个问题：高跟鞋、长裙、不实用的无边女帽、塑身衣以及一切文明女性服装的显著特征，即对穿着者的舒适感的普遍忽视，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证明，在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下，在理论上，女性在经济上依然是依附于男性的——按照高度理想化的说法，女性依然是男性的动产。女性之所以要执行这样的炫耀性有闲，之所以要穿着这种服装，其简单的理由在于她们都是奴仆，在经济职能分化的过程中，她们被委以证明其主人支付能力的职责。

There is a marked similarity in these respects between the apparel of women and that of domestic servants, especially liveried servants. In both there is a very elaborate show of unnecessary expensiveness, and in both cases there is also a notable disregard of the physical comfort of the wearer. But the attire of the lady goes farther in its elaborate insistence on the idleness, if not on the physical infirmity of the wearer, than does that of the domestic. And this is as it should be; for in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ideal scheme of the pecuniary culture, the lady of the house is the chief menial of the household.

在这些方面，女性的服装与家庭仆役的服装，尤其是穿着制服的仆役的服装，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两者都精心表现出不必要的浪费，两者都显然不顾及穿着者身体的舒适度。然而，贵妇的服装即使不一定要表现出穿着者的孱弱之躯，也会更加精心地表现出她的赋闲无事，这是家庭仆役的服装所望尘莫及的。而且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在理论上，按照金钱文化的理想模式，家庭主妇应该是该家庭的首要奴仆。

Besides servants, currently recognized as such, there is at least one other class of persons whose garb assimilates them to the class of servants and shows many of the features that go to make up the womanliness of woman's dress. This is the priestly class. Priestly vestments show, in accentuated form, all the features that have been shown to be evidence of a servile status and a vicarious life. Even more strikingly than the everyday habit of the priest, the vestments, properly so called, are ornate, grotesque, inconvenient, and, at least ostensibly, comfortless to the point of distress. The priest is at the same time expected to refrain from useful effort and, when before the public eye, to present an impassively disconsolate countenance, very much after the manner of a well-trained domestic servant. The shaven face of the priest is a further item to the same effect. This assimilation of the priestly class to the class of body servants, in demeanor and apparel, is due to the similarity of the two classes as regards economic function. In economic theory, the priest is a body servant, constructively in attendance upon the person of the divinity whose livery he wears. His livery is of a very expensive character, as it should be in order to set forth in a beseeming manner the dignity of his exalted master; but it is contrived to show that the wearing of it contributes little or nothing to the physical comfort of the wearer, for it is an item of vicarious consumption, and the repute which accrues from its consumption is

to be imputed to the absent master, not to the servant.

除了这里所提到的奴仆阶级以外，至少还有一个阶级，这一阶级的服装使得他们与仆役阶级十分相似，其服装表现出许多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得女性服装具有女人味。这就是教士阶级。教士的法衣突出地显示了表明奴役地位和代理生活的一切特征。教士的法衣确实是名副其实，它外表华丽、造型怪诞而又穿着不便，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它会让人不舒服到痛苦的地步，它比教士的日常生活习惯更加惹人注目。同时，人们认为教士应当避免从事实用性劳动，在公众面前，他应该表现出冷峻、沉闷的表情，这和一个训练有素的家庭仆役的行为举止十分相似。还有一点，教士的胡子应该剃得干干净净，这也可以产生相同的效果。教士阶级之所以在举止和装束方面与贴身仆役相似，是因为这两个阶级的经济职能相似。按照经济学理论，教士就是贴身仆役，他积极地贴身照料神祇，他身上穿的是这位神祇赋予他的制服。教士的制服具有十分昂贵的特点，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以适当的方式表现他那高贵的主人所具有的尊严；然而，教士制服的设计应该表明，穿着这种制服对穿着者的身体舒适度贡献甚微或者根本就没有贡献，因为它是代理消费的项目，对它进行消费所带来的荣誉应该属于那位不在场的主人，而不属于眼前的这位仆人。

The line of demarcation between the dress of women, priests, and servants, on the one hand, and of men, on the other hand, is not always consistently observed in practice, but it will scarcely be disputed that it is always present in a more or less definite way in the popular habits of thought. There are of course also free men, and not a few of them, who, in their blind zeal for faultlessly reputable attire, transgress the theoretical line between man's and woman's dress, to the extent of arraying themselves in apparel that is obviously designed to vex the mortal frame; but everyone

recognizes without hesitation that such apparel for men is a departure from the normal. We are in the habit of saying that such dress is “effeminate”; and one sometimes hears the remark that such or such an exquisitely attired gentleman is as well dressed as a footman.

一方面是女性、教士和仆役的服装，另一方面是男子的服装，两者之间的界线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但是这一界线一直相当明确地存在于大众思维之中，对于这一点，人们是不大会有异议的。当然，也会有一些狂放不羁的男子，而且这类人还为数不少，盲目追求完美无缺的荣誉性服装，逾越了男女服装之间理论上的界线，甚至穿上了明显有损于人类躯体的服装；但是，所有人都会立即意识到，男子这样的装束是有违常规的。我们通常会说，这样的服装“女性化”，并且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评论：某位穿着讲究的绅士看起来倒像一位穿着体面的男仆。

Certain apparent discrepancies under this theory of dress merit a more detailed examination, especially as they mark a more or less evident trend in the later and maturer development of dress. The vogue of the corset offers an apparent exception from the rule of which it has here been cited as an illustration. A closer examination, however, will show that this apparent exception is really a verification of the rule that the vogue of any given element or feature in dress rests on its utility as an evidence of pecuniary standing. It is well known that in the industrially more advanced communities the corset is employed only within certain fairly well defined social strata. The women of the poorer classes, especially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do not habitually use it, except as a holiday luxury. Among these classes the women have to work hard, and it avails them little in the way of a pretense of leisure to so crucify the

flesh in everyday life. The holiday use of the contrivance is due to imitation of a higher-class canon of decency. Upwards from this low level of indigence and manual labor, the corset was until within a generation or two nearly indispensable to a socially blameless standing for all women, including the wealthiest and most reputable. This rule held so long as there still was no large class of people wealthy enough to be above the imputation of any necessity for manual labor and at the same time large enough to form a self-sufficient, isolated social body whose mass would afford a foundation for special rules of conduct within the class, enforced by the current opinion of the class alone. But now there has grown up a large enough leisure class possessed of such wealth that any aspersion on the score of enforced manual employment would be idle and harmless calumny; and the corset has therefore in large measure fallen into disuse within this class.

在这一服装的理论中，还存在着某些明显不一致的现象，这些现象值得我们进行仔细的考察，尤其是因为这些现象在服装的较近或较成熟的发展阶段已经成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对于这里援引用以说明的法则来说，塑身衣的流行就是一个例外。然而，细查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显然的例外实际上恰恰证实了这一法则：服装的任何一个因素或特征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它具有能够证明金钱地位的功用。众所周知，在生产较为发达的社会里，塑身衣的使用也仅限于某些界线相当分明的社会阶层里。较为贫穷阶级的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通常不会穿戴塑身衣，除非是把它当作奢侈品，每逢节日，偶尔一用。在这些阶级当中，妇女们不得不辛勤劳作，在日常生活中，以折磨肉体的方式来假装有闲，对她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在节日穿着塑身衣，是出于对上层阶级礼仪准则的模仿。从这个贫穷的、从事体力劳动的低等阶级往上看，在最近一两代以前，塑身衣几乎成了所有女性，包括最为富有、最为尊贵的女性，拥有一个无可挑剔的社会地位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只要还没有出现一个庞大的阶级，该阶级还

没有富裕到不必从事体力劳动的程度，同时这个阶级又足够庞大，可以形成一个封闭而又自给自足的社会团体，这个阶级的群众可以为在该阶级内部建立特殊的行为准则提供基础，而这一行为准则只是由于该阶级现行舆论才能得以推行，那么上述的法则就是有效的。但是，现在一个足够庞大的有闲阶级成长起来了，这一阶级拥有的财富足以让所有对强制体力劳动的诽谤都变得毫无意义而又无关痛痒；因此，塑身衣在这一阶级内部大多废弃不用了。

The exceptions under this rule of exemption from the corset are more apparent than real. They are the wealthy classes of countries with a lower industrial structure—nearer the archaic, quasi-industrial type—together with the later accessions of the wealthy classes in the more advanced industrial communities. The latter have not yet had time to divest themselves of the plebeian canons of taste and of reputability carried over from their former, lower pecuniary grade. Such survival of the corset is not infrequent among the higher social classes of those American cities, for instance, which have recently and rapidly risen into opulence. If the word be used as a technical term, without any odious implication,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corset persists in great measure through the period of snobbery—the interval of uncertainty and of transition from a lower to the upper levels of pecuniary culture. That is to say, in all countries which have inherited the corset it continues in use wherever and so long as it serves its purpose as an evidence of honorific leisure by arguing physical disability in the wearer. The same rule of course applies to other mutilations and contrivances for decreasing the visible efficiency of the individual.

不穿塑身衣是上述法则的例外，这个例外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表面的。有些国家的产业结构较为低级，比较接近古老的类似工

业类型，在这些国家的富有阶级以及比较发达的产业社会中那些后起的富有阶级中间，依然存在着穿着塑身衣的现象。后者还没有来得及摆脱先前金钱等级较低时期沿袭下来的平民化的品位准则和荣誉准则。例如，美国有些城市最近迅速繁荣富裕起来，在这些城市的上层阶级中，依然存在着穿着塑身衣的遗风，而且这种现象还颇为常见。可以说，穿着塑身衣的做法在整个冒充绅士贵妇的时期继续存在，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是由金钱文化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过渡的时期，“冒充绅士贵妇”一词只是作为专门术语来使用的，不含任何厌恶的意义。也就是说，在所有接受穿塑身衣这一做法的国家里，只要它能够证明穿着者身体存在缺陷，从而满足证明荣誉性有闲的目的，它就会继续存在。当然，这一法则同样适用于其他损毁肢体的行为和明显降低个人能力的设计。

Something similar should hold true with respect to divers items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inde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does seem to hold to a slight degree of sundry features of dress, especially if such features involve a marked discomfort or appearance of discomfort to the wearer. During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there is a tendency perceptib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n's dress especially, to discontinue methods of expenditure and the use of symbols of leisure which must have been irksome, which may have served a good purpose in their time, but the continuation of which among the upper classes to-day would be a work of supererogation; as, for instance, the use of powdered wigs and of gold lace, and the practice of constantly shaving the face. There has of late years been some slight recrudescence of the shaven face in polite society, but this is probably a transient and unadvised mimicry of the fashion imposed upon body servants, and it may fairly be expected to go the way of the powdered wig of our grandfathers.

属于炫耀性消费的各种项目，其情况也与此相似；实际上虽然真实程度稍差，未尝不可把上述观点用于服装的各种特征上，如果这些特征让穿着者感到明显不适或这让穿着者表现出不舒适的样子，情况尤其如此。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尤其是在男性服装的发展过程中，那就是，有些消费方式和有闲象征的使用已经不复存在，它们必定让人感到厌烦；它们在流行时期也许可以很好地实现其目的，但是要在今天的上层阶级中继续使用，那将会成为一种额外的负担；例如，粉染假发和金色花边的使用以及经常修面剃须的习惯，等等，情况都是如此。近几年来，修面剃须的习惯在上流社会中又有些死灰复燃的迹象，但是，这或许是一时草率的模仿，所模仿的是贴身仆役们的时尚；我们可以预料，这种习惯和我们祖辈头上的粉染假发一样，将会成为陈年旧事。

These indices and others which resemble them in point of the boldness with which they point out to all observers the habitual uselessness of those persons who employ them, have been replaced by other, more delicate methods of expressing the same fact; methods which are no less evident to the trained eyes of that Smalles, select circle whose good opinion is chiefly sought. The earlier and cruder method of advertisement held its ground so long as the public to which the exhibitor had to appeal comprised large portions of the community who were not trained to detect delicate variations in the evidences of wealth and leisure. The method of advertisement undergoes a refinement when a sufficiently large wealthy class has developed, who have the leisure for acquiring skill in interpreting the subtler signs of expenditure. “Loud” dress becomes offensive to people of taste, as evincing an undue desire to reach and impress the untrained sensibilities of the vulgar. To the individual of high breeding, it is only the more honorific esteem accorded by the cultivated sense of the members of his own high class that is of material consequence. Since the wealthy leisure class

has grown so large, or the contact of the leisure-class individual with members of his own class has grown so wide, as to constitute a human environment sufficient for the honorific purpose, there arises a tendency to exclude the baser elements of the population from the scheme even as spectators whose applause or mortification should be sought. The result of all this is a refinement of methods, a resort to subtler contrivances, and a spiritualization of the scheme of symbolism in dress. And as this upper leisure class sets the pace in all matters of decency, the result for the rest of society also is a gradual amelioration of the scheme of dress. As the community advances in wealth and culture, the ability to pay is put in evidence by means which require a progressively nicer discrimination in the beholder. This nicer discrimination between advertising media is in fact a very large element of the higher pecuniary culture.

另外有些事物与这些事物相似，它们都毫无遮掩地向所有旁观者表明，它们对于使用者来说通常是毫无用处的；它们都已经被其他一些事物所取代，后者可以用更加巧妙的方法表达同样的事实；这些方法在为数不多的受过训练的精英人士的眼里，是同样明显的，而人们争取的正是这一群人的好评。只要展示者必须取悦的对象是社会中的广大人群，而这群人又没有经过训练，不能察觉财富与有闲证明方式的细微变化，那么较早时期比较拙劣的自我表现形式就依然能站稳脚跟。一旦富有阶级发展成了一个足够庞大的群体，他们拥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来学习技巧以理解消费中较为微妙的标志，自我表现的方式就会经历一次改进。“花哨艳丽的”服装开始引起有品位人士的反感，因为它表明穿着者太想吸引和打动庸俗人士未经训练的感官。一个有着良好教养的人，其所属的上层阶级成员具有经过训练的判断力，对于他来说，只有这种判断力赋予他的更高的荣誉与尊重才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由于富裕的有闲阶级已经十分庞大，有闲阶级个体与其自身阶级成员之间的接触已经十分广泛，形成了一个足以满足荣誉目的的人类环境，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本性：将该阶级中较为卑微的分子排

除在该阶级以外，甚至将他们当作旁观者而不必听取他们的赞誉和羞辱。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在服装的制作方法上精益求精，服装的设计更加巧妙，服装的象征方式趋于精神化。这一上层有闲阶级是在礼仪方面是位引领者，其结果是，社会中其他阶级的服装也都会逐渐得到改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证明支付能力的方式越来越要求旁观者具有更加精确的判断力。这种关于各种自我表现媒介的精准的判断力，实际上是较高金钱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Chapter VIII Industrial Exemption and Conservatism

第八章　劳动免除与保守主义

The life of man in society, just like the life of other species, is a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nd therefore it is a process of selective adaptatio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has been a process of natural selection of institutions. The progress which has been and is being made in human institutions and in human character may be set down, broadly, to a natural selection of the fittest habits of thought and to a process of enforced adaptation of individuals to an environment which has progressively changed with the growth of the community and with the changing institutions under which men have lived. Institutions are not only themselves the result of a selective and adaptive process which shapes the prevailing or dominant types of spiritual attitude and aptitudes; they are at the same time special methods of life and of human relations, and are therefore in their turn efficient factors of selection. So that the changing institutions in their turn make for a further selection of individuals endowed with the fittest temperament, and a further adaptation of individual temperament and habits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formation of new institutions.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类，其生活就像其他物种的生活一样，都在为了生存而挣扎，因此，人类生活是一种选择性适应的过程。社会结构的进化，一直以来都是对各种制度进行自然选择的过程。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已经取得并正在取得进步，这一点大致可以归因于对最具适应性的思维习惯的自然选择以及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这种环境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的变化而逐渐发生了

变化。各种制度本身就是选择与适应过程的结果，这一过程形成了普遍的或居主导地位的精神态度和性格本性；不仅如此，各种制度同时又是人类生活和人类关系的特殊手段，因此它们反过来也是影响选择过程的有利因素。所以，变化的制度会对具有最具适应性禀性的个人进行进一步的选择，并通过形成新的制度，使得个人的禀性和习惯进一步适应变化的环境。

The forces which have shape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life and of social structure are no doubt ultimately reducible to terms of living tissue and material environment; but proximately, for the purpose in hand, these forces may best be stated in terms of an environment, partly human, partly non-human, and a human subject with a more or less definite physical and intellectual constitution. Taken in the aggregate or average, this human subject is more or less variable; chiefly, no doubt, under a rule of selective conservation of favorable variations. The selection of favorable variations is perhaps in great measure a selective conservation of ethnic types. In the life history of any community whose population is made up of a mixture of divers ethnic elements, one or another of several persistent and relatively stable types of body and of temperament rises into dominance at any given point. The situation, including the institutions in force at any given time, will favor the survival and dominance of one type of character in preference to another; and the type of man so selected to continue and to further elaborate the institutions handed down from the past will in some considerable measure shape these institutions in his own likeness. But apart from selection as between relatively stable types of character and habits of mind, there is no doubt simultaneously going on a process of selective adaptation of habits of thought within the general range of aptitudes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dominant ethnic type or types. There may be a

variation in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 of any population by selection between relatively stable types; but there is also a variation due to adaptation in detail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type, and to selection between specific habitual views regarding any given social relation or group of relations.

毫无疑问，促进人类生活和社会结构发展的力量，最终可以归结为生命组织和物质环境；但是为了当下的目的，最好将这些力量表述为一种环境，这种环境部分是人类的，部分是非人类的，和一种人类，这种人类具有较为确定的体格和智力。总的来说或一般来说，这种人类或多或少是变化不定的；毫无疑问，主要是在对有利变化进行选择性保护的法则下变化。对有利变化的选择，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种族类型的选择性保护。任何社会，如果其人口是由不同的种族元素混合组成的，那么在其生活史的某一特定阶段，在几种持久的、相对稳定的体格和禀性类型中，就会有这一种或那一种类型上升到统治地位。当时的环境，包括在某一特定时期实行的制度，更加有利于某种性格类型生存和统治；为了继续保持并进一步完善过去遗留下来的制度，有一种类型的人被按照这种方式挑选出来，在很大程度上，他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发展这些制度。但是，除了在思维习惯和相对稳定的性格类型之间进行选择外，对思维习惯的选择性适应过程，毫无疑问也在同时进行，这一过程是在某些性格本性的一般范围之内进行的，而这些性格本性是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或多种种族类型所特有的。通过在相对稳定的性格类型之间进行选择，任何民族的基本性格都可能会产生变化；但是还有一种变化，是由于在同一种性格类型的范围之内进行细节上的调整而产生的，也是由于对具体的习惯观念进行选择而产生的，而这些习惯观念是关于任何一种社会关系或某一组关系的。

For the present purpose, however, the question as to the nature of the adaptive process—whether it is chiefly a selection between

stable types of temperament and character, or chiefly an adaptation of men's habits of thought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is of less importance than the fact that, by one method or another, institutions change and develop. Institutions must change with changing circumstances, since they are of the nature of a habitual method of responding to the stimuli which thes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affo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institutions i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institutions are, in substance, prevalent habits of thought with respect to particular relations and particular functions of the individual and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scheme of life, which is made up of the aggregate of institutions in force at a given time or at a given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y society, may, on the psychological side, be broadly characterized as a prevalent spiritual attitude or a prevalent theory of life. As regards its generic features, this spiritual attitude or theory of life is in the last analysis reducible to terms of a prevalent type of character.

然而，对当下的讨论来说，适应过程的本质何在这一问题——到底主要是在稳定的禀赋性格类型之间进行选择，抑或主要是人的思维习惯对改变的环境进行适应——还是次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制度会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发生变化发展这一事实。各种制度一定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种对变化的环境所提供的刺激做出反应的习惯方式。这些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发展。各种制度实质上是关于个人或社会的某些关系和功能的普遍的思维习惯；在任何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实行的各种制度共同构成了生活方式，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大体上可以把生活方式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这种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就其一般特征来说，说到底，可以归结为一种流行的性格类型。

The situation of to-day shapes the institutions of tomorrow

through a selective, coercive process, by acting upon men's habitual view of things, and so altering or fortifying a point of view or a mental attitude handed down from the past. The institutions—that is to say the habits of thought—under the guidance of which men live are in this way received from an earlier time; more or less remotely earlier, but in any event they have been elaborated in and received from the past. Institutions are products of the past process, are adapted to past circumstances, and are therefore never in full accor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esent. In the nature of the case, this process of selective adaptation can never catch up with the progressively changing situation in which the community finds itself at any given time; for the environment, the situation, the exigencies of life which enforce the adaptation and exercise the selection, change from day to day; and each successive situation of the community in its turn tends to obsolescence as soon as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When a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has been taken, this step itself constitutes a change of situation which requires a new adaptation; it become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a new step in the adjustment, and so on interminably.

今天的形势促成了明天制度的形成，其方式是通过一个选择性的、强制的过程，对人们关于事物的习惯观念发生作用，从而改变或强化过去遗留下来的观点或精神态度。支配人们生活的各种制度——也就是各种思维习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较早时期沿袭下来；这些制度起源的时间可能或远或近，但它们都是在过去得到完善并遗留下来的。各种制度是既往过程的产物，是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的，因此，它们永远不会完全符合现在的要求。按道理，这一选择性适应过程永远赶不上社会在任何一个时期不断变化的形式；因为需要人们强制适应并具有选择作用的环境、形势和生活要求天天在变化，社会中每一个相继的形势从确立的那一刻起就开始逐渐变得过时。在发展过程中跨出的每一步本身就是形势的一种变化，而这种变化是需要重新

去适应的；它又成为在调整过程中迈出新一步的出发点，情形就这样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

It is to be noted then, although it may be a tedious truism, that the institutions of to-day—the present accepted scheme of life—do not entirely fit the situation of to-day. At the same time, men's present habits of thought tend to persist indefinitely, except as circumstances enforce a change. These institutions which have thus been handed down, these habits of thought, points of view, mental attitudes and aptitudes, or what not, are therefore themselves a conservative factor. This is the factor of social inertia, psychological inertia, conservatism.

尽管可能是令人厌烦的老生常谈，我们还是应当指出，今天的各种制度——也就是目前公认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适应今天的形势。同时，人们现有的思维习惯，若不是迫于环境而有所变化，就会永远存在下去。因此，这些遗留下来的制度，这些思维习惯、观点、精神态度和性格本性，等等，其本身就是一个保守因素。这就是社会惯性、心理惯性因素，也就是保守主义。

Social structure changes, develops, adapts itself to an altered situation, only through a change in the habits of thought of the several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or in the last analysis, through a change in the habits of thought of the individuals which make up the community.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is substantially a process of mental adaptation on the part of individuals under the stress of circumstances which will no longer tolerate habits of thought formed under and conforming to a different set of circumstances in the past. For the immediate purpose it need not be a question of

serious importance whether this adaptive process is a process of selection and survival of persistent ethnic types or a process of individual adaptation and an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traits.

社会结构要变化发展，要适应已经发生变化的形势，只有通过社会中各个阶级思维习惯的变化，或者说到底，只有通过组成该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思维习惯的改变才能实现。社会的进化，实际上是个人迫于某种环境而进行精神适应的过程，这种环境再也容不下在过去一套不同的环境下形成的、并与过去环境相适应的思维习惯。这一精神适应的过程到底是各种持久存在的种族类型之间淘汰与生存的过程，还是个人对已有特性进行适应和继承的过程，这个问题对当前的讨论并不一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Social advance, especially as see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conomic theory, consists in a continued progressive approach to an approximately exact “adjustment of inner relations to outer relations”; but this adjustment is never definitively established, since the “outer relations” are subject to constant change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progressive change going on in the “inner relations.” But the degree of approximation may be greater or less, depending on the facility with which an adjustment is made. A readjustment of men's habits of thought to conform to the exigencies of an altered situation is in any case made only tardily and reluctantly, and only under the coercion exercised by a situation which has made the accredited views untenable. The readjustment of institutions and habitual views to an altered environment is made in response to pressure from without; it is of the nature of a response to stimulus. Freedom and facility of readjustment, that is to say capacity for growth in social structure, therefore depends in great measure on the degree of freedom with

which the situation at any given time acts on the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the degree of exposure of the individual members to the constraining forces of the environment. If any portion or class of society is sheltered from the a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any essential respect, that portion of the community, or that class, will adapt its views and its scheme of life more tardily to the altered general situation; it will in so far tend to retard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wealthy leisure class is in such a sheltered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economic forces that make for change and readjustment. And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forces which make for a readjustment of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a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y, are, in the last analysis, almost entirely of an economic nature.

社会进步，尤其是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就是不断地、逐渐地接近近乎精确的“由内部关系向外部关系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最终绝不会实现，因为由于“内部关系”在不断发生变化，外部关系也因此不断地发生变化。接近精确调整的程度有高有低，这取决于做出调整的便利程度。无论如何，人们在为了符合变化了的形式的迫切要求而调整其思维习惯的时候，总是极其缓慢且极其勉强的，并且只有在形势的压迫之下才会这么做，这种形势已经使得公认的观点站不住脚。为适应已经变化的形势而对制度和习惯观念做出的调整是对外来的压力做出的反应，这种调整本质上是对刺激做出的反应。因此，做出调整的自由和便利程度，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的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任何一个时期的形势对社会个体成员产生影响的自由度；所谓自由度，就是个体成员受环境约束力影响的程度。如果社会中的任何一部分人或任何一个阶级，在任何重要的方面能够得到庇护而免受环境的影响，那么社会中的这部分人或这一阶级的观念或生活方式对已经改变的一般形势的适应过程也就更加缓慢；如此一来，它就会延缓社会转型的过程。在面对促进变化和调整的经济力量时，富裕的有闲阶级就是出于这样一个受庇护的地位。可以说，促进制度进行调

整的各种力量，归根到底几乎完全是属于经济性质的，尤其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情形。

Any community may be viewed as an industrial or economic mechanism, the structure of which is made up of what is called its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ese institutions are habitual methods of carrying on the life process of the community in contact with the material environment in which it lives. When given methods of unfolding human activity in this given environment have been elaborated in this way, the life of the community will express itself with some facility in these habitual directions. The community will make use of the forces of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its life according to methods learned in the past and embodied in these institutions. But as population increases, and as men's knowledge and skill in directing the forces of nature widen, the habitual methods of relation between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and the habitual method of carrying on the life process of the group as a whole, no longer give the same result as before; nor are the resulting conditions of life distributed and apportioned in the same manner or with the same effect among the various members as before. If the scheme according to which the life process of the group was carried on under the earlier conditions gave approximately the highest attainable result—under the circumstances—in the way of efficiency or facility of the life process of the group; then the same scheme of life unaltered will not yield the highest result attainable in this respect under the altered conditions. Under the altered conditions of population, skill, and knowledge, the facility of life as carried on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scheme may not be lower than under the earlier conditions; but the chances are always that it is less than might be if the scheme were altered to suit the altered conditions.

任何一个群体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产业或经济机制，其结构是由所谓的经济制度组成的。这些制度是社会在与其所处的物质环境进行接触的过程中开展生活进程的习惯方式。在特定的环境下，如果开展人类活动的某些方法已经变得相当复杂，那么，在这些习惯的方向上，社会生活的自我表现就会变得十分容易。为了生活，社会将会按照过去已经习得的、已经融入这些制度中的方法对环境的力量进行利用。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随着人类支配自然力量的知识和技巧不断扩大和提高，处理群体成员相互关系的习惯方式以及整个群体开展生活进程的习惯方式，就不再能产生和以前相同的结果；随之产生的生活条件也不再能以和从前相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和摊派，其分配和摊派的效果也和从前不同。在先前的环境中，一个群体生活进程是按照某一方式推进的；如果在当时的环境下，该方式在该群体的生活进程的效率和便利程度方面曾经获得过接近于可能达到的最高成效，那么在已经改变了的环境下，相同的、没有改变的生活方式在这方面就不再能产生可能达到的最高成效。在人口、技巧和知识已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生活，这种生活的便利程度或许并不比先前的情况下的便利程度低，但是总是有这样一种可能：如果改变方式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那么生活反而会变得更加不便利。

The group is made up of individuals, and the group's life is the life of individuals carried on in at least ostensible severalty. The group's accepted scheme of life is the consensus of views held by the body of these individuals as to what is right, good, expedient, and beautiful in the way of human life. In the redistribu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life that comes of the altered method of dealing with the environment, the outcome is not an equable change in the facility of life throughout the group. The altered conditions may increase the facility of life for the group as a whole, but the redistribution will usually result in a decrease of facility or fullness

of life for some members of the group. An advance in technical methods, in population, or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will require at least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o change their habits of life, if they are to enter with facility and effect into the altered industrial methods; and in doing so they will be unable to live up to the received notions as to what are the right and beautiful habits of life.

群体是由个人组成的，群体的生活就是个人的生活，而个人的生活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在各不相关的情况下进行的。什么样的人类生活方式才是正确的、高尚的、有利的和美好的，群体公认的生活方式就是该群体的个人对这一问题所持有的一致观点。应付环境的方法发生了改变，因此就要对生活条件进行重新分配，这种重新分配的结果并不是整个群体在生活便利方面发生同等程度的变化。变化了的生活条件也许会从整体上提高该族群的生活便利程度，但是，对生活条件进行重新分配的结果通常是该群体某些成员的生活便利和充实程度不升反降。技术手段、人口以及工业组织的发展，必然要求至少某些社会成员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够便利有效地适应改变了的生产方法；一旦他们改变了生活方式，他们就必然不能按照关于生活习惯何者为善、何者为美的固有观念生活。

Anyone who is required to change his habits of life and his habitual relations to his fellow men will feel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method of life required of him by the newly arisen exigencies, and the traditional scheme of life to which he is accustomed. It is the individuals placed in this position that have the liveliest incentive to reconstruct the received scheme of life and are most readily persuaded to accept new standards; and it is through the need of the means of livelihood that men are placed in such a position. The pressure exerted by the environment upon the

group, and making for a readjustment of the group's scheme of life, impinges upon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in the form of pecuniary exigencies; and it is owing to this fact—that external forces are in great part translated into the form of pecuniary or economic exigencies—it is owing to this fact that we can say that the forces which count toward a readjustment of institutions in any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y are chiefly economic forces; or more specifically, these forces take the form of pecuniary pressure. Such a readjustment as is here contemplated is substantially a change in men's views as to what is good and right, and the means through which a change is wrought in men's apprehension of what is good and right is in large part the pressure of pecuniary exigencies.

任何一个人，如果要他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和他的同伴们之间的原有关系，他必然会感觉到，新的迫切形势要求他采取的生活方式和他所习惯的传统生活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具有最强烈的动机去重建既有生活方式的人，正是处于这一境地的人士，他们也最容易被说服去接受新的标准；而正是出于生计的需要，人们才会处于这一境地。环境会对群体施加压力，促使该群体对其生活方式进行调整，这种压力是以金钱的迫切要求这一形式向组成群体的个人进行冲击的。外部的力量大部分会以金钱的或经济的迫切要求这一形势表现出来；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我们才可以说，促使任何现代产业社会进行制度调整的力量主要是经济力量，或者说的再具体一些，这些力量表现为金钱的压力。这里所考虑的调整，实质上是人们关于何者为善、何者为美的观念的改变，是通过来自于金钱迫切要求所带来的压力改变人们关于何者为美、何者为善的见解来达成的。

Any change in men's views as to what is good and right in human life makes its way but tardily at the best. Especially is this true of any change in the direction of what is called progress; that is

to say, in the direction of divergence from the archaic position—from the position which may be accounted the point of departure at any step in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ty. Retrogression, reapproach to a standpoint to which the race has been long habituated in the past, is easier.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case the development away from this past standpoint has not been due chiefly to a substitution of an ethnic type whose temperament is alien to the earlier standpoint.

人们关于人类生活何者为美、何者为善的观念的改变，充其量只会缓慢地发生。任何变化，当它是朝着所谓前进的方向时，情况尤其如此；也就是说，如果是朝着与古老的状态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就是缓慢的，而这一古老的状态可以看作是社会进化过程中任一阶段的起始点。而向后倒退，重新接近该民族过去长期习惯的状态，则是比较容易的。当发展与过去的观点相背离，其主要原因并非是气质与先前观点相抵触的种族类型取代了旧的种族类型时，情况尤其如此。

The cultural stage which lies immediately back of the present in the lif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what has here been called the quasi-peaceable stage. At this quasi-peaceable stage the law of status is the dominant feature in the scheme of life. There is no need of pointing out how prone the men of to-day are to revert to the spiritual attitude of mastery and of personal subservience which characterizes that stage. It may rather be said to be held in an uncertain abeyance by the economic exigencies of to-day, than to have been definitely supplanted by a habit of mind that is in full accord with these later-developed exigencies. The predatory and quasi-peaceable stages of economic evolution seem to have been of long duration in life history of all the chief ethnic elements which

go to make up the populations of the Western culture. The temperament and the propensities proper to those cultural stages have, therefore, attained such a persistence as to make a speedy reversion to the broad features of the corresponding psychological constitution inevitable in the case of any class or community which is removed from the action of those forces that make for maintenance of the later-developed habits of thought.

在西方文明生活史中，紧接现代的前一个文化阶段就是我们在这里已经提到的准和平阶段。在这一准和平阶段，身份制是生活方式中的主要特征。统治和个人服从的精神态度是这一阶段的特征，今天的人们是多么向往能够恢复这一精神态度，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与其说这种精神态度已经完全由与近期出现的迫切要求完全一致的思维习惯所取代，倒不如说这种精神态度因为今天经济的迫切要求而处于不稳定的休眠状态之中。构成西方文化全体人民的一切主要民族，在其生活史上，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掠夺阶段和准和平阶段持续的时间似乎都很长。因此，这些文化阶段所固有的脾性和性格本性已经变得相当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阶级和社会，如果远离了那些有利于保存后期形成的思维习惯之力量的影响，就会不可避免地迅速恢复相应心理构造的主要特征。

It is a matter of common notoriety that when individuals, or even considerable groups of men, are segregated from a higher industrial culture and exposed to a lower cultural environment, or to an economic situation of a more primitive character, they quickly show evidence of reversion toward the spiritual features which characterize the predatory type; and it seems probable that the dolicho-blond type of European man is possessed of a greater facility for such reversion to barbarism than the other ethnic elements with which that type is associated in the Western culture.

Examples of such a reversion on a small scale abound in the later history of 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Except for the fear of offending that chauvinistic patriotism which is so characteristic a feature of the predatory culture, and the presence, of which is frequently the most striking mark of reversion in modern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might be cited as an example of such a reversion on an unusually large scale, though it was not a reversion of very large scope.

众所周知，一旦个人或者是为数众多的一群人与较高的工业文化隔离，置身于较低的文化环境，或者置身于较为原始的经济形势之下，他们很快就会表现出复归掠夺型精神特征的迹象。金色长发的欧洲人看起来似乎比西方文化中与之有联系的其他种族更容易复归蛮夷状态。在近代移民和殖民史中，这种小规模复归的例子比比皆是。盲目的爱国主义是掠夺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而它的存在也往往是现代社会复归本性的最为显著的标志；要不是因为害怕冒犯这种爱国主义，我们也许可以援引美国殖民地的情况作为这种复归本性的例子，虽然这一复归范围不太广，规模却异常之大。

The leisure class is in great measure sheltered from the stress of those economic exigencies which prevail in any modern, highly organized industrial community. The exigencies of the struggle for the means of life are less exacting for this class than for any other; and as a consequence of this privileged position we should expect to find it one of the least responsive of the classes of society to the demands which the situation makes for a further growth of institutions and a readjustment to an altered industrial situation. The leisure class is the conservative class. The exigencies of the general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 community do not freely or directly impinge upon the members of this class. They are not

required under penalty of forfeiture to change their habits of life and their theoretical views of the external world to suit the demands of an altered industrial technique, since they are not in the full sense an organic pa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unity. Therefore these exigencies do not readily produce, in the members of this class, that degree of uneasiness with the existing order which alone can lead anybody of men to give up views and methods of life that have become habitual to them. The office of the leisure class in social evolution is to retard the movement and to conserve what is obsolescent. This proposition is by no means novel; it has long been one of the commonplaces of popular opinion.

经济的迫切要求普遍存在于任何现代的、高度组织的工业社会中，而有闲阶级大都可以免受这些迫切要求所带来的压力。这一阶级对于生活资料的竞争没有其他阶级那么迫切紧张；由于它处于这一优越地位，我们可以预料到，当形势要求各种制度进一步发展并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时，在社会各阶级中，这一阶级的反应总是最迟钝的。有闲阶级是保守阶级。社会一般经济形势的迫切要求并不会毫无约束地、直接地对这一阶级的成员造成侵犯。他们不需要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或关于外部世界的理论观点以适应变化了的生产技术的要求，他们不这样做也不会有所损失，因为他们并不是产业社会完全意义上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这些迫切要求并不会轻易地使这个阶级的成员对现状产生某种程度的不安，而唯有这种一定程度的不安情绪，才会使得任何人放弃业已习惯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在社会进化中，有闲阶级的功能在于延缓运动的进程，保存业已过时的事物。这一观点并不新奇，长久以来，它一直是大众观念中老生常谈的东西。

The prevalent conviction that the wealthy class is by nature conservative has been popularly accepted without much aid from

any theoretical view as to the place and relation of that class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When an explanation of this class conservatism is offered, it is commonly the invidious one that the wealthy class opposes innovation because it has a vested interest, of an unworthy sort, in maintaining the present conditions. The explanation here put forward imputes no unworthy motive. The opposition of the class to changes in the cultural scheme is instinctive, and does not rest primarily on an interested calculation of material advantages; it is an instinctive revulsion at any departure from the accepted way of doing and of looking at things—a revulsion common to all men and only to be overcome by stress of circumstances. All change in habits of life and of thought is irksome. The difference in this respect between the wealthy and the common run of mankind lies not so much in the motive which prompts to conservatism as in the degree of exposure to the economic forces that urge a change. The members of the wealthy class do not yield to the demand for innovation as readily as other men because they are not constrained to do so.

富有阶级本质上是保守的，这一普遍的信念并没有借助于有关该阶级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关系的任何理论观点，就已经被大众所接受。人们对这个阶级的保守主义做出的解释通常是具有歧视性的，他们认为富有阶级之所以反对变革，是因为通过维持现状，他们可以拥有令人不齿的既得利益，而我们这里所提供的解释并没有指责其动机卑劣的意思。这一阶级反对文化结构的改变是出于本能，并不是主要出于对物质利益的精心盘算；这是一种本能的反感，是对任何与公认的做事方式和看待事物的方式相背离的反感，是人所共有的反感，这种反感只有在环境的压力下才能克服。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的任何改变都是令人讨厌的。富人和普通人在这方面的区别，主要并不在于激起保守主义的动机，而主要在于对强迫促使事物变化的那些经济力量的暴露程度不同。富有阶级的成员不像其他人那样容易屈服于革新的

要求，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强迫那样做。

This conservatism of the wealthy class is so obvious a feature that it has even come to be recognized as a mark of respectability. Since conservatism is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wealthier and therefore more reputable portion of the community, it has acquired a certain honorific or decorative value. It has become prescriptive to such an extent that an adherence to conservative views is comprised as a matter of course in our notions of respectability; and it is imperatively incumbent on all who would lead a blameless life in point of social repute. Conservatism, being an upper-class characteristic, is decorous; and conversely, innovation, being a lower-class phenomenon, is vulgar. The first and most unreflected element in that instinctive revulsion and reprobation with which we turn from all social innovators is this sense of the essential vulgarity of the thing. So that even in cases where one recognizes the substantial merits of the case for which the innovator is spokesman—as may easily happen if the evils which he seeks to remedy are sufficiently remote in point of time or space or personal contact—still one cannot but be sensible of the fact that the innovator is a person with whom it is at least distasteful to be associated, and from whose social contact one must shrink. Innovation is bad form.

富有阶级的这种保守主义是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甚至已经渐渐被看作是受人尊敬的标志。因为保守主义是社会中较为富裕、因而较有声望的那部分人所具有的特征，因此它也具有了一定的荣誉价值或装饰性价值。保守主义已经具有规范性，坚持保守观念已经自然而然存在于我们关于尊敬的观念之中；任何人要想在社会声誉方面无可指责，坚持保守主义已经成为其强制性的义务。保守主义是上层阶级的一个特征，是正派高雅的；反过来，革新是下层阶级的现象，是卑劣

低俗的。我们对一切革新者都本能地持反感和排斥的态度，构成这种反感和排斥的最初的、最直接的因素是我们感到这一事物在本质上是庸俗的。因此，有时候即使我们发现革新者所主张的事情确实具有实质性的可取之处——如果他要补救的缺点在时间、空间和个人接触方面离我们足够远的话，这样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我们仍然不免会觉得跟这样一位革新者交往至少是令人不快的，并且必须避免和他进行社会接触。革新有失体统。

The fact that the usages, actions, and views of the well-to-do leisure class acquire the character of a prescriptive canon of conduct for the rest of society, gives added weight and reach to the conservative influence of that class. It makes it incumbent upon all reputable people to follow their lead. So that, by virtue of its high position as the avatar of good form, the wealthier class comes to exert a retarding influence upon social development far in excess of that which the simple numerical strength of the class would assign it. Its prescriptive example acts to greatly stiffen the resistance of all other classes against any innovation, and to fix men's affections upon the good institutions handed down from an earlier generation.

富裕的有闲阶级的习俗、行为和观念是社会其他成员规范性的行为准则，这一事实增加了该阶级保守主义影响的重要性，扩大了保守主义影响的范围。凡是声誉良好的人都要以他们为榜样。这样，由于具有崇高的地位，是举止得体的模范，这一富有阶级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延缓进程的影响力，这一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单凭该阶级人数所能产生的影响。富裕阶级的规范性示范作用大大增强了其他阶级对于任何革新的抗拒，使得人们钟情于上一代遗留下来的那些优良的制度。

There is a second way in which the influence of the leisure

class acts in the same direction, so far as concerns hindrance to the adoption of a conventional scheme of life more in accord with the exigencies of the time. This second method of upper-class guidance is not in strict consistency to be brought under the same category as the instinctive conservatism and aversion to new modes of thought just spoken of; but it may as well be dealt with here, since it has at least this much in common with the conservative habit of mind that it acts to retard innovation and the growth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code of proprieties, conventionalities, and usages in vogue at any given time and among any given people has more or less of the character of an organic whole; so that any appreciable change in one point of the scheme involves something of a change or readjustment at other points also, if not a reorganization all along the line. When a change is made which immediately touches only a minor point in the scheme, the consequent derange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conventionalities may be inconspicuous; but even in such a case it is safe to say that some derangement of the general scheme, more or less far-reaching, will follow. On the other hand, when an attempted reform involves the suppression or thorough-going remodelling of an institution of first-rate importance in the conventional scheme, it is immediately felt that a serious derangement of the entire scheme would result; it is felt that a readjustment of the structure to the new form taken on by one of its chief elements would be a painful and tedious, if not a doubtful process.

有闲阶级还可以在同一方面以第二种方式产生影响，那就是阻挠人们采纳更符合时代迫切要求的传统生活方式。严格来说，上层阶级指导下的第二种方法，与刚刚提到的本能的保守主义和对新思维方式的憎恶并不属于同一范畴；但是我们最好能在这里对之进行讨论，因为至少它有一点是和保守的思维习惯相同的，那就是，它也会延缓革

新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和任一特定民族流行的礼仪规范、风俗和习惯大都具有有机统一体的属性；所以，如果在结构的某一点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使没有带来全线的重组，也会引起其他点上的某种变化或调整。如果发生的变化只是直接关系到结构中的一个次要的点，由此引起的对习俗结构的干扰也许并不明显；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变动将会对总体结构产生较大的干扰。另一方面，如果推行的改革牵涉到废止或彻底改造传统结构中居于首要地位的一种制度，人们会立刻感到它将使整体结构受到严重干扰，就会感到，要调整这一结构适应它的一个主要因素的新形态，即使不是一个令人生疑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冗长乏味的过程。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ifficulty which such a radical change in any one feature of the conventional scheme of life would involve, it is only necessary to suggest the suppression of the monogamic family, or of the agnatic system of consanguinity, or of private property, or of the theistic faith, in any country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or suppose the suppression of ancestor worship in China, or of the caste system in India, or of slavery in Africa, or the establishment of equality of the sexes in Mohammedan countries. It needs no argument to show that the derangement of 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conventionalities in any of these cases would be very considerable. In order to effect such an innovation a very far-reaching alteration of men's habits of thought would be involved also at other points of the scheme than the one immediately in question. The aversion to any such innovation amounts to a shrinking from an essentially alien scheme of life.

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任何一个特征进行根本的改变是困难的。要想体会这种改变有多困难，我们只需想一想要废除任何一个西方文明国

家的一夫一妻制、父系制度、一神论信仰就行了，只需想一想要在中国禁止祭祀祖先，要在印度废除种姓制度，要在非洲废除奴隶制，或者要在伊斯兰教国家推行性别平等就行了。毋庸置疑，所有以上的情形对习俗基本结构的干扰都是十分巨大的。为了实现这样一种变革，势必会引起人们思维习惯的深刻变化，不只是在与之直接相关的一点上发生变化，在整个结构的其他点上也会发生变化。对这样一种革新感到反感，实际上就等于是对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感到畏惧。

The revulsion felt by good people at any proposed departure from the accepted methods of life is a familiar fact of everyday experience. It is not unusual to hear those persons who dispense salutary advice and admonition to the community express themselves forcibly upon the far-reaching pernicious effects which the community would suffer from such relatively slight changes as the disestablishment of the Anglican Church, an increased facility of divorce, adoption of female suffrage, prohibition of the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intoxicating beverages, abolition or restriction of inheritance, etc. Any one of these innovations would, we are told, “shake the social structure to its base,” “reduce society to chaos,” “subvert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 “make life intolerable,” “confound the order of nature,” etc. These various locutions are, no doubt, of the nature of hyperbole; but, at the same time, like all overstatement, they are evidence of a lively sense of the gravity of the consequences which they are intended to describe. The effect of these and like innovations in deranging the accepted scheme of life is felt to be of much graver consequence than the simple alteration of an isolated item in a series of contrivances for the convenience of men in society. What is true in so obvious a degree of innovations of first-rate importance is true in a less degree of changes of a smaller immediate importance. The aversion to change is in large part an aversion to the bother of making the readjustment which

any given change will necessitate; and this solidarity of the system of institutions of any given culture or of any given people strengthens the instinctive resistance offered to any change in men's habits of thought, even in matters which, taken by themselves, are of minor importance.

善良的人们对于试图背离其公认的生活方式必然会感到反感，这是日常经验中司空见惯的事实。我们时常会听到有些人在社会中散布有益的建议和警告，极力表明即使是比较细微的变化，如英国国教的废除、离婚手续的简化、妇女参政权的确立、酒精类饮料制造与贩卖的禁止以及继承制的限制和废除等等，也会对社会深远的有害影响。他们告诉我们，上述任何一项革新都将“动摇社会结构的基石”，“使社会陷于混乱状态”，“破坏道德基础”，“使生活变得让人无法忍受”，“扰乱自然秩序”，等等。这些不同的措辞毫无疑问都具有夸张的性质；但是，同所有的夸张论调一样，这些措辞同时又表明人们强烈感觉到了它们所要描绘的后果的严重性。他们感觉到上述革新以及诸如此类的革新干扰了公认的生活方式，比起对一系列方便人类的器械中单独的一项进行简单的更改，其后果要严重得多。那些具有最重要意义的革新其情况明显如此，那些没有那么重要的改变也未尝不然，只是程度稍逊而已。任何变革都必然引起重新调整，对变革的反感大部分是出于对这种重新调整所带来的烦扰感到反感；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个民族，其各种制度体系休戚相关，这增强了人们对思维习惯的任何改变所产生的本能的抵制，即使是本身不太重要的事物的变革也是如此。

A consequence of this increased reluctance, due to the solidarity of human institutions, is that any innovation calls for a greater expenditure of nervous energy in making the necessary readjustment than would otherwise be the case. It is not only that a change in established habits of thought is distasteful. The process of

readjustment of the accepted theory of life involves a degree of mental effort—a more or less protracted and laborious effort to find and to keep one's bearings under the altered circumstances. This process requires a certain expenditure of energy, and so presumes, for its successful accomplishment, some surplus of energy beyond that absorbed in the daily struggle for subsistence. Consequently it follows that progress is hindered by underfeeding and excessive physical hardship, no less effectually than by such a luxurious life as will shut out discontent by cutting off the occasion for it. The abjectly poor, and all those persons whose energies are entirely absorbed by the struggle for daily sustenance, are conservative because they cannot afford the effort of taking thought for the day after tomorrow; just as the highly prosperous are conservative because they have small occasion to be discontented with the situation as it stands to-day.

各种人民组织的团结一致增强了这种抗拒，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任何革新都必须进行的必要调整，比起不存在抗拒，要花费更大的精力。这不仅是因为改变已经确立的思维习惯是令人讨厌的。对公认的生活理论进行调整的过程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心智努力的——这种漫长而又艰苦的努力是为了能在变化了的环境中找到并保持自己的位置。这一调整过程需要消耗一定的精力，因此，要成功地完成调整的使命，就意味着，除了在为生计的日常操劳过程中消耗掉的精力外，还应有些剩余的精力。所以，缺衣少食以及物质生活过于艰苦都会阻碍进步，其效果和奢侈的生活一样，这种奢侈的生活因为没有不满的理由而将不满拒之门外。极度贫困的人以及所有那些把全部精力消耗在谋求日常生计上的人都是保守的，因为他们没有精力去考虑明天以后的事情；他们正如那些飞黄腾达的人们一样也是保守的，因为他们没有多少理由对今天的状况感到不满。

From this proposition it follows that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acts to make the lower classes conservative by withdrawing from them as much as it may of the means of sustenance, and so reducing their consumption, and consequently their available energy, to such a point as to make them incapable of the effort required for the learning and adoption of new habits of thought.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at the upper end of the pecuniary scale implies privation at the lower end of the scale. It is a commonplace that, wherever it occurs,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privation among the body of the people is a serious obstacle to any innovation.

根据这一论点我们可以推断，有闲阶级制度会让下层阶级趋于保守，其方式是尽可能多地剥夺下层阶级的生活资料，这样就缩减了其消费，并因此减少其可用精力，以至于他们再也没有足够多的精力去学习并采纳新的思维习惯。财富积累在金钱等级的上端，这意味着金钱等级下端必然陷于贫困。无论哪里的人民群众中存在的较高程度的贫困现象，对于任何革新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阻碍，这是人尽皆知的。

This direct inhibitory effect of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s seconded by an indirect effect tending to the same result. As has already been seen, the imperative example set by the upper class in fixing the canons of reputability fosters the practice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The prevalence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s one of the main elements in the standard of decency among all classes is of course not traceable wholly to the example of the wealthy leisure class, but the practice and the insistence on it are no doubt strengthened by the example of the leisure class. The requirements of decency in this matter are very considerable and very imperative; so that even among classes whose

pecuniary position is sufficiently strong to admit a consumption of goods considerably in excess of the subsistence minimum, the disposable surplus left over after the more imperative physical needs are satisfied is not infrequently diverted to the purpose of a conspicuous decency, rather than to added physical comfort and fullness of life. Moreover, such surplus energy as is available is also likely to be expended in the acquisition of goods for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r conspicuous hoarding. The result is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pecuniary reputability tend (1) to leave but a scanty subsistence minimum available for other tha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2) to absorb any surplus energy which may be available after the bare physical necessities of life have been provided for. The outcome of the whole is a strengthening of the general conservative attitude of the community.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hinders cultural development immediately (1) by the inertia proper to the class itself, (2) through its prescriptive example of conspicuous waste and of conservatism, and (3) indirectly through that system of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sustenance on which the institution itself rests.

财富分配不均产生了这一直接的抑制性效果，伴随这一直接效果的还有一个间接效果，它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上层阶级在确定荣誉准则时所树立的强制性的榜样助长了炫耀性消费的习惯。炫耀性消费的盛行是所有阶级的礼仪准则中主要元素之一，这一点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富裕的有闲阶级所树立的榜样作用，但是，有闲阶级的榜样作用，毫无疑问巩固了炫耀性消费的习惯并强化了对这种习惯的坚持。礼仪在炫耀性消费方面的要求是十分有力、十分具有强制性的；所以，即使有些阶级财力雄厚，可以消费远远超过维持最低生活需求以外的物品，也往往会把满足更为迫切的物质需求以后剩下的可以支配余额用于礼仪要求的炫耀性消费方面，而不会用于进一步增加物质享受和进一步充实生活方面。此外，那些可供使用

的剩余精力也很可能会用于获取物品以供炫耀性消费或炫耀性储存方面。其结果是，金钱荣誉的要求会导致（1）除供炫耀性消费之外，剩下的只可以勉强维持最低生活需要，（2）所有精力，除了用于基本的物质需求外，如有剩余，都会被消耗掉。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是，加强了社会普遍的保守态度。有闲阶级制度直接阻碍了文化的发展是由于：（1）这一阶级本身固有的惯性，（2）这一阶级在炫耀性浪费和保守主义方面树立的强制性示范作用，（3）有闲阶级制度赖以存在的、财富和生活资料分配不均的制度所发生的间接作用。

To this is to be added that the leisure class has also a material interest in leaving things as they ar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prevailing at any given time this class is in a privileged position, and any departure from the existing order may be expected to work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class rather than the reverse. The attitude of the class, simply as influenced by its class interest, should therefore be to let well-enough alone. This interested motive comes in to supplement the strong instinctive bias of the class, and so to render it even more consistently conservative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be.

此外还要补充的是，有闲阶级让事物保持原状，是因为他们能够获得物质利益。不论是在哪一个时期，在当时的环境下，有闲阶级总是处于特权地位，任何对现存秩序的违背都可能对这一阶级有害而无利。单单为了这一阶级本身的利益着想，这一阶级也应该采取“维持现状、得过且过”的态度。这种私利动机就会发挥作用，加强这一阶级强烈的本能偏见，使它变得更加保守；要不是由于这种私利关系，这一阶级就不会那么保守。

All this, of course, has nothing to say in the way of eulogy or deprecation of the office of the leisure class as an exponent and

vehicle of conservatism or reversion in social structure. The inhibition which it exercises may be salutary or the reverse. Whether it is the one or the other in any given case is a question of casuistry rather than of general theory. There may be truth in the view (as a question of policy) so often expressed by the spokesmen of the conservative element, that without some such substantial and consistent resistance to innovation as is offered by the conservative well-to-do classes, social innovation and experiment would hurry the community into untenable and intolerable situations; the only possible result of which would be discontent and disastrous reaction. All this, however, is beside the present argument.

有闲阶级是社会结构中保守主义或复归本性的代言人或媒介。当然，这里所说的一切，并没有对这一阶级的职责进行颂扬或加以谴责之意。它所产生的抑制作用可能是有益的，但也可能是有害的。就任何一个特定的例子而言，这种抑制作用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不属于一般理论问题。保守派的代言人经常发表观点（是作为政策问题发表的），认为如果没有保守的富有阶级对革新一贯作实质性的抵制，社会革新和社会实验势必会使社会很快陷入濒临崩溃、让人无法忍受的境地；到那时，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不满情绪蔓延，灾难性的反抗四起。这种观点也许有些道理。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超出了我们目前讨论的范围。

But apart from all deprecation, and aside from all question as to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some such check on headlong innovation, the leisure clas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consistently acts to retard that adjustment to the environment which is called social advance or development. The characteristic attitude of the class may be summed up in the maxim: “Whatever is, is right”; whereas the law of natural selection, as applied to human institutions, gives the

axiom: “Whatever is, is wrong.” Not that the institutions of to-day are wholly wrong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life of to-day, but they are, always and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wrong to some extent. They are the result of a more or less inadequate adjustment of the methods of living to a situation which prevailed at some point in the past development; and they are therefore wrong by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interval which separat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from that of the past. “Right” and “wrong” are of course here used without conveying any reflection as to what ought or ought not to be. They are applied simply from the (morally colorless) evolutionary standpoint, and are intended to designate compatibility or incompatibility with the effective evolutionary process.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by force of class interest and instinct, and by precept and prescriptive example, makes for the perpetuation of the existing maladjustment of institutions, and even favors a reversion to a somewhat more archaic scheme of life; a scheme which would be still farther out of adjustment with the exigencies of life under the existing situation even than the accredited, obsolescent scheme that has come down from the immediate past.

有些人对保守主义加以谴责，有些人认为对轻率的革新进行一定的抑制是必要的。撇开所有这些谴责、所有这些观点不说，按照常理，有闲阶级对那些适应环境的调整，也就是通常说的社会进步或发展，总是起着延缓作用的。这一阶级典型的态度可以用一句格言来概括：“存在即合理”，而适用于人类制度的物竞天择定律则给出了这样的公理：“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这并不是说，今天的各种制度是完全不能满足今天的生活目的，而是说，按照常理，这些制度总是有某种程度的不足之处。当过去社会发展到某一点时，为适应当时的情况，人们会对生活的方式方法做出不太充分的调整，各种制度正是这种调整的产物；因此，它们之所以有问题，并不是因为现在形势和过

去形势之间存在的时间间隔。当然，这里所使用的“合理”或“不合理”这些字眼，并不含有任何何者应该或何者不应该的意义。我们只是单纯地从进化的观点（不含道德色彩）来使用这些字眼的，用于表明制度是否与实际进化过程协调一致。有闲阶级制度，借助于阶级利益和阶级本能，通过言传身教，使得各种现存的制度失调永远存在，它甚至赞成回归到某种较为古老的生活方式；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与从刚刚过去遗留下来的公认的、过时的生活方式相比，更加不能适应当前形势下生活的迫切要求。

But after all has been said on the head of conservation of the good old ways, it remains true that institutions change and develop. There is a cumulative growth of customs and habits of thought; a selective adaptation of conventions and methods of life. Something is to be said of the office of the leisure class in guiding this growth as well as in retarding it; but little can be said here of its relation to institutional growth except as it touches the institutions that are primarily and immediately of an economic character. These institutions—the economic structure—may be roughly distinguished into two classes or categories, according as they serve one or the other of two divergent purposes of economic life.

尽管前面所说的都是关于以前合理方法的保存，但是实际上各种制度是在变化发展的。各种风俗习惯和思维习惯总是在不断发展，传统和生活方式也永远处于选择性适应的过程中。有闲阶级的职能在于对这种发展进行指导，也会延缓这种发展，关于这种职能我们是有话可说的；但是，至于有闲阶级的职能和制度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说的却不多，除非它涉及的制度主要是直接属于经济性质的。这些制度——也就是经济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或两个范畴，这要看它们到底是为经济生活中两个不同目的中的哪一个服务的。

To adapt the classical terminology, they are institutions of acquisition or of production; or to revert to terms already employed in a different connection in earlier chapters, they are pecuniary or industrial institutions; or in still other terms, they are institutions serving either the invidious or the non-invidious economic interest. The former category has to do with “business,” the latter with industry, taking the latter word in the mechanical sense. The latter class is not often recognized as institutions, in great part because they do not immediately concern the ruling class, and are, therefore, seldom the subject of legislation or of deliberate convention. When they do receive attention they are commonly approached from the pecuniary or business side; that being the side or phase of economic life that chiefly occupies men's deliberations in our time, especially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upper classes. These classes have little else than a business interest in things economic, and on them at the same time it is chiefly incumbent to deliberate upon the community's affairs.

若采用经典的术语，可以称它们为获取制度或生产制度；或者重新使用前几章谈到其他方面时曾经使用的术语，可以称它们为金钱制度或产业制度；或者还可以使用其他术语，可以称它们为满足歧视性经济利益的制度或满足非歧视性经济利益的制度。前一范畴与“商业”有关，后一范畴与产业有关，这里“产业”一词是按照其机械意义来使用的。人们通常并不认为后一类制度是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并不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因此它们很少会成为立法或社会惯例讨论的话题。即使它们得到了关注，那也是从金钱或商业方面来研究它们的；处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主要考虑的，尤其是上层阶级所考虑的，正是经济生活中的这一方面。上层阶级考虑经济事物，除了是关心其商业利益外，很少还有什么其他目的；而考虑社会问题却主要是这些阶级应尽的义务。

The relation of the leisure (that is, propertied non-industrial) class to the economic process is a pecuniary relation—a relation of acquisition, not of production; of exploitation, not of serviceability. Indirectly their economic office may, of course, be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to the economic life process; and it is by no means here intended to depreciate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the propertied class or of the captains of industry. The purpose is simply to point out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 of these classes to the industrial process and to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eir office is of a parasitic character, and their interest is to divert what substance they may to their own use, and to retain whatever is under their hand. The conventions of the business world have grown up under the selective surveillance of this principle of predation or parasitism. They are conventions of ownership; derivatives, more or less remote, of the ancient predatory culture. But these pecuniary institutions do not entirely fit the situation of to-day, for they have grown up under a past situation differing somewhat from the present. Even for effectiveness in the pecuniary way, therefore, they are not as apt as might be. The changed industrial life requires changed methods of acquisition; and the pecuniary classes have some interest in so adapting the pecuniary institutions as to give them the best effect for acquisition of private gain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continuance of the industrial process out of which this gain arises. Hence there is a more or less consistent trend in the leisure-class guidance of institutional growth, answering to the pecuniary ends which shape leisure-class economic life.

有闲（也就是拥有财产且不事生产工作的）阶级和经济过程的关系是一种金钱关系——是获取的关系而非生产的关系，是剥削的关系而不是服务的关系。当然，这一阶级的经济职能对经济生活进程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间接意义；我们在这里绝不是要贬低有产阶级或工业

巨头们的经济功能。我们的目的仅仅在于指出这些阶级和工业过程之间以及这些阶级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何种性质的。它们的职能是寄生性的，它们所关心的就是把任何可以转移的财物转而为己所用，并把它们所拥有的一切维持在手里。商业世界的惯例就是在这一掠夺原则或寄生原则的选择性监督下成长起来的。这些惯例是关于所有权的惯例，是古代掠夺文化较为间接的派生物。但是，这些金钱制度并不完全适合今天的形势，因为它们是在过去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而过去的形势和现在的形式多少有些不同。所以，即使是就其在金钱方面所产生的效果而言，这些制度也没有想象中应有的那么合适。工业生活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改变获取的方法；有闲阶级有意改造金钱制度，对这些制度进行改造是为了让这些制度在他们获取私人利益时发挥最佳效果，而获取的私人利益应该和工业进程的延续相容的，因为后者是前者的源泉。因此，有闲阶级会对制度发展进行引导，使之适应构成有闲阶级经济生活的金钱目的，这是一个较为稳定的趋势。

The effect of the pecuniary interest and the pecuniary habit of mind upon the growth of institutions is seen in those enactments and conventions that make for security of property, enforcement of contracts, facility of pecuniary transactions, vested interests. Of such bearing are changes affecting bankruptcy and receiverships, limited liability, banking and currency, coalitions of laborers or employers, trusts and pools. The community's institutional furniture of this kind is of immediate consequence only to the propertied classes, and in proportion as they are propertied; that is to say, in proportion as they are to be ranked with the leisure class. But indirectly these conventions of business life are of the gravest consequence for the industrial process and for the life of the community. And in guiding the institutional growth in this respect, the pecuniary classes, therefore, serve a purpose of the most serious importance to the community, not only i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accepted social scheme, but also in shaping the industrial process

proper. The immediate end of this pecuniary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of its amelioration is the greater facility of peaceable and orderly exploitation; but its remoter effects far outrun this immediate object. Not only does the more facile conduct of business permit industry and extra-industrial life to go on with less perturbation; but the resulting elimination of disturbances and complications calling for an exercise of astute discrimination in everyday affairs acts to make the pecuniary class itself superfluous. As fast as pecuniary transactions are reduced to routine, the captain of industry can be dispensed with. This consummation, it is needless to say, lies yet in the indefinite future. The ameliorations wrought in favor of the pecuniary interest in modern institutions tend, in another field, to substitute the “soulless” joint-stock corporation for the captain, and so they make also for the dispensability of the great leisure-class function of ownership. Indirectly, therefore, the bent given to the growth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by the leisure-class influence is of very considerable industrial consequence.

从一些法规和惯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金钱利益和金钱思维习惯对制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这些法规和惯例可以保证财产的安全，可以保证契约的履行，可以保证金钱交易顺畅便利，可以保证既得利益。有些变化也具有相同的作用，它们会对破产与破产管理、有限责任、银行与货币、劳工与雇主的联合、信托和企业合资等产生影响。社会中诸如此类的制度设施只与有产阶级发生直接关系，其关系的深浅与他们持有财产的多寡成正比；也就是说，与他们在有闲阶级内部所处等级的高低成正比。但是，这些商业生活的惯例却对工业过程和社会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间接影响。因此，金钱阶级在对制度发展进行这方面的引导时，对社会也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在于保持既定社会结构方面，还在于形成工业过程本身方面。这种金钱制度结构及其改进的直接目的在于使和平有序的剥削变得更为便利；但是，其间接影响却远远大于这个直接目的。商业行为因此变得更为便

利，从而使得工业生活和工业以外的生活少了许多动荡不安；不仅如此，在日常事务中，那些需要敏锐的判断力才能解决的纷扰和错综复杂的情况也因此得以消除，这就使得金钱阶级本身成为多余。金钱交易一旦沦为例行工作，工业巨头就可以消失了。不用说，这种极端情形只存在于无限遥远的未来。在另一领域，为了金钱利益而对现代制度做出的改进往往会使“毫无灵魂的”股份公司取代工业巨头，这样一来，就会让有闲阶级在所有权方面的功能消失不见。因此，有闲阶级的影响间接导致了经济制度发展中这种趋势的出现，这一趋势对于工业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Chapter IX The Conservation of Archaic Traits

第九章　远古性格特征的保存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has an effect not only upon social structure but also upon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 of the members of society. As soon as a given proclivity or a given point of view has won acceptance as an authoritative standard or norm of life it will react upon the character of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which has accepted it as a norm. It will to some extent shape their habits of thought and will exercise a selective surveillance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men's aptitudes and inclinations. This effect is wrought partly by a coercive, educational adaptation of the habits of all individuals, partly by a selective elimination of the unfit individuals and lines of descent. Such human material as does not lend itself to the methods of life imposed by the accepted scheme suffers more or less elimination as well as repression. The principles of pecuniary emulation and of industrial exemption have in this way been erected into canons of life, and have become coercive factors of some importance in the situation to which men have to adapt themselves.

有闲阶级制度不但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也会对社会成员的个人性格产生影响。一旦某种癖性或观点获得认可，成为权威的生活标准或规范，它就会对将其接受为规范的那个社会的成员性格产生影响。这种癖性或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该社会成员的思维习惯，并对人们性格本性的发展产生选择性监督作用。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效果，部分是通过对所有个人的习惯进行强制性的教育改造，部分是通过对不能适应的个人或家族进行选择性淘汰。凡是无法和公认方式所规定

的生活方法相适应的人类素质大都会遭到淘汰和抑制。金钱竞赛的原则和免除生产的原则就这样成了生活准则，并且成了环境中相当重要的强制性因素，而这一环境是人们必须要适应的。

These two broad principles of conspicuous waste and industrial exemption affect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both by guiding men's habits of thought, and so controlling the growth of institutions, and by selectively conserving certain traits of human nature that conduce to facility of life under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and so controlling the effective temper of the community. The proximate tendency of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in shaping human character runs in the direction of spiritual survival and reversion. Its effect upon the temper of a community is of the nature of an arrested spiritual development. In the later culture especially, the institution has, on the whole, a conservative trend. This proposition is familiar enough in substance, but it may to many have the appearance of novelty in its present application. Therefore a summary review of its logical grounds may not be uncalled for, even at the risk of some tedious repetition and formulation of commonplaces.

炫耀性浪费和免除生产这两项宽泛的原则对文化的发展产生着影响，它们一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从而控制着各种制度的发展，另一方面选择性地保留有助于有闲阶级生活方式下生活便利的某些人类性格特征，从而对社会中现有的性情进行控制。有闲阶级制度对人类性格的塑造，大体上是朝着精神上的留存和复归这个方向进行的。它对社会性情的影响具有遏制精神发展的性质。尤其是在近代文化中，总的来说，这种制度具有一种保守的本性。这一论点实际上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但是在此处引用这一观点，许多人也许会觉得新奇。因此，虽然有可能让人觉得是冗长的重复，虽然有可能让人觉得

是老生常谈，我们或许还是有必要在这里对这一论点的逻辑依据作一下简明扼要的回顾。

Social evolution is a process of selective adaptation of temperament and habits of thought under the stress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associated life. The adaptation of habits of thought is the growth of institutions. But along with the growth of institutions has gone a change of a more substantial character. Not only have the habits of men changed with the changing exigencies of the situation, but these changing exigencies have also brought about a correlative change in human nature. The human material of society itself varies with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of life. This variation of human nature is held by the later ethnologists to be a process of selection between several relatively stable and persistent ethnic types or ethnic elements. Men tend to revert or to breed true, more or less closely, to one or another of certain types of human nature that have in their main features been fixed in approximate conformity to a situation in the past which differed from the situation of to-day. There are several of these relatively stable ethnic types of mankind comprised in the populations of the Western culture. These ethnic types survive in the race inheritance to-day, not as rigid and invariable moulds, each of a single precise and specific pattern, but in the form of a greater or smaller number of variants. Some variation of the ethnic types has resulted under the protracted selective process to which the several types and their hybrids have been subjected during the prehistoric and historic growth of culture.

社会进化的过程是脾性与思维习惯在集体生活环境的压迫下进行选择性适应的过程。思维习惯适应的过程就是各种制度发展的过程。

但是，伴随制度发展的是一个更具实质性的变化。人们的习惯随着形势要求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不仅如此，这些正在变化的形势要求也给人类性格带来了相应的变化。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人类社会素质本身也会发生变化。在近代人种学家看来，这种人类性格的变化是在几种相对稳定持久的种族类型和种族元素之间进行选择的过程。人类总是本性于复归或较为严格地保持人类性格类型中的某一种，这些性格类型的主要特征是在与今天形势不同的过去形势下被固定下来的，是基本适应当时的形势的。在属于西方文化范畴的人口中，就包含若干种这些较为稳定的人类种族类型。这些种族类型依然存在于今天的种族遗传中，但是这些种族类型不是作为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模型而存在的，也不是每一个种族类型都是以单一刻板的具体形态而存在的，而是以或多或少的变体形式存在着。种族类型的某种变化是长期适应过程的结果，这个适应过程是若干种种族类型及其变体在史前时期和有史时期的文化发展阶段中已经经历过的。

This necessary variation of the types themselves, due to a selective process of considerable duration and of a consistent trend, 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noticed by the writers who have discussed ethnic survival. The argument is here concerned with two main divergent variants of human nature resulting from this, relatively late, selective adaptation of the ethnic types comprised in the Western culture; the point of interest being the probable effect of the situation of to-day in furthering variation along one or the other of these two divergent lines.

较为长期稳定的选择性过程使得这些种族类型本身必然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并没有引起探讨人种残存的作家们足够的关注。我们这里的研究涉及了人类性格中的两个主要的、不同的变体，这两种变体都是较近时期对构成西方文化的种族类型进行选择性适应的结果；我们所要关注的是，今天的形势可能会对这两种不同变体的进一步变

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The ethnological position may be briefly summed up; and in order to avoid any but the most indispensable detail the schedule of types and variants and the scheme of reversion and survival in which they are concerned are here presented with a diagrammatic meagerness and simplicity which would not be admissible for any other purpose. The man of our industrial communities tends to breed true to one or the other of three main ethnic types: the dolichocephalic-blond, the brachycephalic-brunette, and the Mediterranean—disregarding minor and outlying elements of our culture. But within each of these main ethnic types the reversion tends to one or the other of at least two main directions of variation; the peaceable or ante-predatory variant and the predatory variant. The former of these two characteristic variants is nearer to the generic type in each case, being the reversional representative of its type as it stood at the earliest stage of associated life of which there is available evidence, either archaeological or psychological. This variant is taken to represent the ancestors of existing civilized man at the peaceable, savage phase of life which preceded the predatory culture, the regime of status, and the growth of pecuniary emulation. The second or predatory variant of the types is taken to be a survival of a more recent modification of the main ethnic types and their hybrids—of these types as they were modified, mainly by a selective adaptation,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the predatory culture and the latter emulative culture of the quasi-peaceable stage, or the pecuniary culture proper.

我们在这里可以对人种学的现状进行简要的概括；但是为了避免

过于繁琐，此处仅就最为不可或缺的细节进行描述；关于各种种族类型与变体以及它们残存和复归的方式，这里只作简明扼要的概括性叙述，不足以供其他目的之用。在我们的工业社会，人们本性于保存的主要种族类型不出以下三种：长颅金发型、短颅褐发型和地中海沿岸的高加索型——撇开我们文化中次要的、外围的种族成分不谈。但是，在每一种主要种族类型内部，复归往往会沿着至少两个变化方向中的一个来进行：和平或前掠夺型变体以及掠夺型变体。在这两种典型的变体中，前者比较接近于两种变体的一般种族类型，它出现在集体生活的早期阶段，是自己的种族类型复归的代表，这在考古学或心理学上都是有据可查的。这一变体被认为是代表现代文明人的祖先的，他们生活在掠夺文化、身份制盛行及金钱竞赛发展之前的那个和平的、蛮夷的生活阶段。种族类型的第二种变体，也就是掠夺型变体，则被认为是在较近时期对那些主要种族类型及其杂合类型进行改良后残存下来的，这些主要的种族类型是在掠夺文化以及准和平阶段的后期竞赛文化或纯正金钱文化的熏陶下，主要是通过选择性适应而得到改良的。

Under the recognized laws of heredity there may be a survival from a more or less remote past phase. In the ordinary, average, or normal case, if the type has varied, the traits of the type are transmitted approximately as they have stood in the recent past—which may be called the hereditary present. For the purpose in hand this hereditary present is represented by the later predatory and the quasi-peaceable culture.

根据公认的遗传法则，有些属于较为遥远的过去阶段的性格类型也可能会残存下来。在通常、一般或正常情况下，如果种族类型发生了变化，这一种族类型的性格特征会遗传下来，其形态和最近的过去大致相同——我们可以称之为遗传的礼物。就当前讨论的目的而言，这种遗传礼物是以后期掠夺文化或准和平文化为代表的。

It is to the variant of human nature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this recent—hereditarily still existing—predatory or quasi-predatory culture that the modern civilized man tends to breed true in the common run of cases. This proposition requires some qualification so far as concerns the descendants of the servile or repressed classes of barbarian times, but the qualification necessary is probably not so great as might at first thought appear. Taking the population as a whole, this predatory, emulative variant does not seem to have attained a high degree of consistency or stability. That is to say, the human nature inherited by modern Occidental man is not nearly uniform in respect of the range or the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 various aptitudes and propensities which go to make it up. The man of the hereditary present is slightly archaic as judg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latest exigencies of associated life. And the type to which the modern man chiefly tends to revert under the law of variation is a somewhat more archaic human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to judge by the reversional traits which show themselves in individuals that vary from the prevailing predatory style of temperament, the ante-predatory variant seems to have a greater stability and greater symmetry in the distribution or relative force of its temperamental elements.

在一般情况下，现代文明人所要保存的往往是近代掠夺文化或准掠夺文化所特有的人类性格的变体，这一变体在遗传上依然存在。在谈到蛮夷时期的奴隶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后裔时，我们需要对这一论点进行补充，但是，这种修正的必要性或许不如最初想象的那样显要。就全体人类来说，这一掠夺型和竞赛型的变体似乎并不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或稳定性。也就是说，现代西方人所继承的人类性格，在构成它的各种脾性和本性的范围和相对力量方面，并不是近乎一致的。如果从集体生活的最近要求来判断，具有现存遗传的人是略微有些古代风

范的。在变异法则下，现代人本性于复归的主要是较为古老的人类性格类型。另一方面，有些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复古性格特点与普遍的掠夺型气质不同，由此可见，掠夺时期以前的性格类型变体，在气质元素的分配和相对力量方面，似乎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对称性。

This divergence of inherited human nature, as between an earlier and a later variant of the ethnic type to which the individual tends to breed true, is traversed and obscured by a similar di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or three main ethnic types that go to make up the Occidental populations. The individuals in these communities are conceived to be, in virtually every instance, hybrids of the prevailing ethnic elements combined in the most varied proportions;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y tend to take back to one or the other of the component ethnic types. These ethnic types differ in temperament in a way somewhat similar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datory and the ante-predatory variants of the types; the dolicho-blond type showing mor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datory temperament—or at least more of the violent disposition—than the brachycephalic-brunette type, and especially more than the Mediterranean. When the growth of institutions or of the effective sentiment of a given community shows a divergence from the predatory human nature, therefore,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with certainty that such a divergence indicates a reversion to the ante-predatory variant. It may be due to an increasing dominance of the one or the other of the “lower” ethnic elements in the population. Still, although the evidence is not as conclusive as might be desired, there are indications that the variations in the effective temperament of modern communities is not altogether due to a selection between stable ethnic types. It seems to be to some appreciable extent a selection between the predatory and the peaceable variants of the several types.

一方面是个人本性保持的种族类型的早期变体和后期变体之间的分歧，另一方面是构成西方民族的两三个主要民族类型之间的分歧，前一分歧因为被后一分歧掩盖而变得不那么起眼。这些社会中的个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普遍的种族成分以极不相同的比例组合而成的杂合体；结果他们往往会复归到其构成种族类型中这一种或那一种类型。这些种族类型在气质上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和掠夺时期的种族类型变体与掠夺时期之前的种族变体之间的差别有些相似；比起短颅褐发型人种类型，尤其是和地中海沿岸高加索人种比起来，长颅金发的人种类型表现出更多的掠夺型气质特征，至少在性情上是比较暴躁的。因此，如果某一个社会的制度和普遍情感的发展显得与掠夺型人类性格有差异，我们就无法断定这种差异是不是预示着对掠夺时期以前的变体的复归。这可能是由于人口中某个“较低级的”种族元素逐渐占据优势的缘故。虽然得到的证据没有我们所期望的那么确凿，依然有迹象表明，现代社会中一些普遍气质的变化并非完全是由于在稳定的种族类型之间进行的选择。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几种种族类型的掠夺型变体与和平型变体之间进行的选择。

This conception of contemporary human evolution is not indispensable to the discussion. The general conclusions reached by the use of these concepts of selective adaptation would remain substantially true if the earlier, Darwinian and Spencerian, terms and concepts were substitut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some latitude may be admissible in the use of terms. The word “type” is used loosely, to denote variations of temperament which the ethnologists would perhaps recognize only as trivial variants of the type rather than as distinct ethnic types. Wherever a closer discrimination seems essential to the argument, the effort to make such a closer discrimination will be evident from the context.

关于现代人类进化的这一概念，对当前的讨论来说并非是不可或缺的。使用有关选择性适应的概念所得出的一般结论，如果代之以更早的达尔文派和斯宾塞学派的术语和概念，也同样能够成立。基于这一情形，术语的使用可以稍微自由宽松一点儿。“类型”（type）一词的意义是比较宽泛的，这里指的是气质的变化，在人种学家看来，这些气质变化只不过是不甚重要的种族类型变体，而不是截然不同的、独立的种族类型。只要进一步的辨别对论证来说似乎是必要的，这种进一步辨别的努力就会在上下文中看出。

The ethnic types of to-day, then, are variants of the primitive racial types. They have suffered some alteration, and have attained some degree of fixity in their altered form,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the barbarian culture. The man of the hereditary present is the barbarian variant, servile or aristocratic, of the ethnic elements that constitute him. But this barbarian variant has not attained the highest degree of homogeneity or of stability. The barbarian culture—the predatory and quasi-peaceable cultural stages—though of great absolute duration, has been neither protracted enough nor invariable enough in character to give an extreme fixity of type. Variations from the barbarian human nature occur with some frequency, and these cases of variation are becoming more noticeable to-day, because the conditions of modern life no longer act consistently to repress departures from the barbarian normal. The predatory temperament does not lead itself to all the purposes of modern life, and more especially not to modern industry.

这样看来，今天的种族类型是原始种族类型的变体。在蛮夷文化的熏陶之下，这些种族类型已经经历了某种改变，它们在变化了的形态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具有现存遗传的人是构成他的那些民族元素的蛮夷变体——不是具有奴性的，就是具有贵族气质的。但

是，这一蛮夷变体尚未获得最高程度的同质性或准和平性。蛮夷文化，也就是掠夺文化阶段和准和平文化阶段，虽然持续的时间非常长，但是，不论是其持续时间的长度，还是其性质上的恒定程度，都不足以使种族类型产生极端的固定性。蛮夷的人类性格发生变异的频率较高，而这些变异的情况在今天更加显著，因为现代生活的条件不再一贯压制有违蛮夷标准的现象。掠夺型气质并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一切目的，与现代工业更加是格格不入。

Departures from the human nature of the hereditary present are most frequently of the nature of reversions to an earlier variant of the type. This earlier variant is represented by the temperament which characterizes the primitive phase of peaceable savagery. The circumstances of life and the ends of effort that prevailed before the advent of the barbarian culture shaped human nature and fixed it as regards certain fundamental traits. And it is to these ancient, generic features that modern men are prone to take back in case of variation from the human nature of the hereditary present.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men lived in the most primitive stages of associated life that can properly be called human, seem to have been of a peaceful kind; and the character—the temperament and spiritual attitude of men under these early conditions of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s seems to have been of a peaceful and unaggressive, not to say an indolent, cast. For the immediate purpose this peaceable cultural stage may be taken to mark the initial pha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So far as concerns the present argument, the dominant spiritual feature of this presumptive initial phase of culture seems to have been an unreflecting, unformulated sense of group solidarity, largely expressing itself in a complacent, but by no means strenuous, sympathy with all facility of human life, and an uneasy revulsion against apprehended inhibition or futility of life. Through its ubiquitous presence in the habits of thought of

the ante-predatory savage man, this pervading but uneager sense of the generically useful seems to have exercised an appreciable constraining force upon his life and upon the manner of his habitual contact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背离通过现存遗传得来的人类性格，其性质通常是对种族类型早期变体的复归。这种早期的变体就是和平性蛮夷的原始阶段所特有的气质。在蛮夷文化出现以前，常见的生活环境和奋斗目标塑造了人类性格，并在某些基本性格特点方面将人类性格固定下来。如果现代人通过遗传得来的人类性格发生变异，他们本性于复归的正是这些古老的、一般的性格特征。在最原始的集体生活阶段，当人们的生活可以称为人类生活时，其生活环境似乎具有和平的性质；人类的性格特征，也就是处于早期生活环境和制度下的人们所具有的气质和精神态度，虽不能说是懒散的，却似乎是和平的、非侵略性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一和平的文化阶段看作是社会发展初始阶段的标志。就目前的讨论而言，这一假定的文化初始阶段，其主要的精神特征似乎是懵懵懂懂的、未成系统的集体团结意识，它会对人类生活的一切便利措施都表现出满意的但绝非热情的赞赏，而如果体会到了生活的压抑和徒劳，它就会表现出不安和反感。由于在掠夺阶段之前的蛮夷人的思维习惯中，普遍存在着这种不甚热切的效用意识，这种意识似乎对他的生活以及他与族群其他成员平常交往的方式产生了显著的约束力量。

The traces of this initial, undifferentiated peaceable phase of culture seem faint and doubtful if we look merely to such categorical evidence of its existence as is afforded by usages and views in vogue within the historical present, whether in civilized or in rude communities; but less dubious evidence of its existence is to be found in psychological survivals, in the way of persistent and pervading traits of human character. These traits survive perhaps in

an especial degree among those ethnic elements which were crowded into the background during the predatory culture. Traits that were suited to the earlier habits of life then became relatively useless in the individual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nd those elements of the population, or those ethnic groups, which were by temperament less fitted to the predatory life were repressed and pushed into the background.

至于这一初始的、未经分化的和平文化阶段，如果我们只是把文明社会或未开化社会的现有历史时期中流行的习俗和观念作为其存在的确凿证据，其痕迹似乎是模糊而又难以确定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心理残存中去寻找，也就是从稳定的、普遍的人类性格特征中去寻找，则可以找到较为明确的证据。在某些种族成分中，这些性格特征残存的程度特别高，这些种族成分在掠夺文化阶段被迫过上了退隐的生活。在个人为生存进行奋斗的过程中，那些适合于早期生活习惯的性格特征已经变得相对不重要了。那些气质不太适合掠夺生活的民族元素或种族群体，就受到了压制，而黯然失色了。

On the transition to the predatory culture the character of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changed in some degree from a struggle of the group against a non-human environment to a struggle against a human environment. This change was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ing antagonism and consciousness of antagonism between the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group. The conditions of success within the group, as well as the conditions of the survival of the group, changed in some measure; and the dominant spiritual attitude of the group gradually changed, and brought a different range of aptitudes and propensities into the position of legitimate dominance in the accepted scheme of life. Among these archaic traits that are to be regarded as survivals from the peaceable

cultural phase, are that instinct of race solidarity which we call conscience, including the sense of truthfulness and equity, and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in its naive, non-invidious expression.

一旦进入掠夺文化阶段，生存斗争的性质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由群体对非人类环境的斗争转变为群体对人类环境的斗争。伴随着这一变化的是群体个体成员之间日益增强的敌意和敌对意识。这时，在群体内部获得成功的条件以及群体的生存条件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群体的主要精神态度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使得一系列不同的习性和本性在公认的生活方式中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在这些可以看作是从和平文化阶段残存下来的古老性格特征中，存在着一种种族团结的本能，我们称之为良知，它包括诚实观念和公正观念；还存在着质朴的、非歧视性表现的技艺本能。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later b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 human nature will have to be restated in terms of habit; and in the restatement, this, in outline, appears to be the only assignable place and ground of these traits. These habits of life are of too pervading a character to be ascribed to the influence of a late or brief discipline. The ease with which they are temporarily overborne by the special exigencies of recent and modern life argues that these habits are the surviving effects of a discipline of extremely ancient date, from the teachings of which men have frequently been constrained to depart in detail under the altered circumstances of a later time; and the almost ubiquitous fashion in which they assert themselves whenever the pressure of special exigencies is relieved, argues that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traits were fixed and incorporated into the spiritual makeup of the type must have lasted for a relatively very long time and without serious intermission. The point is not seriously affected by any question as

to whether it was a process of habituation in the old-fashioned sense of the word or a process of selective adaptation of the race.

根据最新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指引，人类性格特征应该用习惯一词重新加以阐释；概括地讲，在重新阐释过程中，习惯似乎是这些性格特征的唯一起因和理由。这些生活习惯具有十分普遍的属性，不能将之归因于后期或短期训练的影响。这些习惯在近现代生活的特别要求下很容易暂时得到克服，这一点表明，这些习惯是极其古老的时代训练的残存结果，在后来改变了的环境下，人们常常被迫在细节上违背其教义；只要生活特别要求的压力消失了，这些习惯就又会普遍存在，这一点表明，让这些性格特征定型并与该种族类型的精神结构相结合的过程一定是持续了相当漫长的时间，且这一过程没有经历过严重的中断。至于这一过程到底是传统意义上的习惯养成过程，还是该种族选择性适应的过程，对这一点不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The character and exigencies of life, under that regime of status and of individual and class antithesis which covers the entire interval from the beginning of predatory culture to the present, argue that the traits of temperament here under discussion could scarcely have arisen and acquired fixity during that interval. It is entirely probable that these traits have come down from an earlier method of life, and have survived through the interval of predatory and quasi-peaceable culture in a condition of incipient, or at least imminent, desuetude, rather than that they have been brought out and fixed by this later culture. They appear to be heredit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ce, and to have persisted in spite of the altered requirements of success under the predatory and the later pecuniary stages of culture. They seem to have persisted by force of the tenacity of transmission that belongs to a hereditary trait that is present in some degree in every member of the species, and which

therefore rests on a broad basis of race continuity.

从掠夺文化开始至今，整个期间都存在着身份制、个人对立和阶级对立制度，这一时期人类生活的性质和要求表明，我们目前讨论的气质特征绝不会是在这一期间出现的，也绝不会是在这一期间得到巩固的。这些性格特征极有可能是起源于一种更早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在近代文化阶段中出现并固定下来的；这些性格特征，在经历掠夺和准和平文化阶段后，依然以刚刚被废止或者至少是即将被废止的状态存在着。这些性格特征看起来是一个种族的遗传特征，虽然在掠夺文化阶段和金钱文化阶段后期，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它们依然继续存在着。遗传得来的性格特征在遗传上具有一种韧性，人类所有成员都具有这类性格特征，而正是这种韧性使得这些性格特征能够继续存在，因此它是基于种族延续的广泛基础上的。

Such a generic feature is not readily eliminated, even under a process of selection so severe and protracted as that to which the traits here under discussion were subjected during the predatory and quasi-peaceable stages. These peaceable traits are in great part alien to the methods and the animus of barbarian life. The salie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barbarian culture is an unremitting emulation and antagonism between classes and between individuals. This emulative discipline favors those individuals and lines of descent which possess the peaceable savage traits in a relatively slight degree. It therefore tends to eliminate these traits, and it has apparently weakened them, in an appreciable degree, in the populations that have been subject to it. Even where the extreme penalty for non-conformity to the barbarian type of temperament is not paid, there results at least a more or less consistent repression of the non-conforming individuals and lines of descent. Where life is largely a struggle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in the group, the

possession of the ancient peaceable traits in a marked degree would hamper an individual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在掠夺阶段和准和平阶段，选择的过程十分严格、十分漫长，我们此处讨论的性格特征都泯灭不见了，即便如此，这种一般特征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消除得了的。这些和平的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蛮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格格不入的。蛮夷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个人与个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永无休止的竞争和对立。这一竞赛规律对某些个人和家族有利，这些个人和家族拥有的和平蛮夷的性格特征相对较弱。因此，竞赛规律表现出消灭这些性格特征的本性，在受这种竞赛规律支配的民族中，这类性格特征已经明显减弱。在有些场合，不符合蛮夷类型的气质不会招致严厉的惩罚，即便如此，其结果至少是不符合这种气质的个人或家族会受到一贯的压制。如果一种生活主要是集体内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争，那么明显拥有古代和平性格特征就会妨碍个人的生活竞争。

Under any known phase of culture, other or later than the presumptive initial phase here spoken of, the gifts of good-nature, equity, and indiscriminate sympathy do not appreciably further the life of the individual. Their possession may serve to protect the individual from hard usage at the hands of a majority that insists on a modicum of these ingredients in their ideal of a normal man; but apart from their indirect and negative effect in this way, the individual fares better under the regime of competition in proportion as he has less of these gifts. Freedom from scruple, from sympathy, honesty and regard for life, may, within fairly wide limits, be said to further the success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pecuniary culture. The highly successful men of all times have commonly been of this type; except those whose success has not been scored in terms of either wealth or power. It is only within

narrow limits, and then only in a Pickwickian sense, that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在任何已知的文化阶段，除了这里说到的假定的初始阶段以外，或者这个阶段以后，善良、公正以及泛滥的同情心等先天禀赋对个人的生活并没有明显的帮助。拥有这类先天禀赋可能会保护个人免受大多数人的苛刻对待，因为大多数人都坚持认为，一个理想的正常人应该稍微具有一些这类禀赋要素；但是，撇开它们在这方面所具有的间接与消极的作用不谈，在竞争制度下，个人拥有这些先天禀赋越少，他就会越成功。在金钱文化中，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性格——不会良心不安，没有同情心，没有诚实观念，没有对生命的关怀，可以说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会促进其事业的成功的。在任何时代，非常成功的人通常都属于这一类型；有些人是例外，这些人的成就不是以财富或权势来衡量的。只有在很狭窄的范围内，只是在特殊意义上，我们才会说“诚实是上策”。

As see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life under modern civilized conditions in an enlightened community of the Western culture, the primitive, ante-predatory savage, whose character it has been attempted to trace in outline above, was not a great success. Even for the purposes of that hypothetical culture to which his type of human nature owes what stability it has—even for the ends of the peaceable savage group—this primitive man has quite as many and as conspicuous economic failings as he has economic virtues—as should be plain to any one whose sense of the case is not biased by leniency born of a fellow-feeling. At his best he is “a clever, good-for-nothing fellow.” The shortcomings of this presumptively primitive type of character are weakness, inefficiency, lack of initiative and ingenuity, and a yielding and indolent amiability, together with a lively but inconsequential animistic sense. Along

with these traits go certain others which have some value for the collective life proces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further the facility of life in the group. These traits are truthfulness, peaceableness, good-will, and a non-emulative, non-invidious interest in men and things.

属于西方文化的开明社会具有现代文明的环境，从这种现代文明环境下的观点来看，原始的、掠夺阶段之前的蛮夷人并不是特别成功，这类人的性格我们在前文已经尝试作了追溯。原始人的这种人类性格特征类型是在那个假定的文化阶段获得巩固的；即使是就这个文化的目的而言，即使是就和平的蛮夷群体的目的而言，这样的一个原始人在经济上的失败和在经济上的成就一样多，一样显著。他充其量是位“聪明却又一无是处的家伙”。这一假定的原始性格类型具有缺陷，其缺陷在于软弱无能、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温顺而懒惰以及一种强烈而又不合理的万物有灵观念。还有某些其他性格特征和这些性格特征同时存在，它们对集体生活进程具有一些价值，因为它们可以提高群体生活的便利程度。这些性格特征就是诚实、爱好和平、友善以及对人对事具有一种非竞争性的、非歧视性的关切。

With the advent of the predatory stage of life there comes a change i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uccessful human character. Men's habits of life are required to adapt themselves to new exigencies under a new scheme of human relations. The same unfolding of energy, which had previously found expression in the traits of savage life recited above, is now required to find expression along a new line of action, in a new group of habitual responses to altered stimuli. The methods which, as counted in terms of facility of life, answered measurably under the earlier conditions, are no longer adequate under the new conditions. The earlier situa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a relative absence of antagonism or differentiation of interests, the later situation by an emulation constantly

increasing in intensity and narrowing in scope. The traits which characterize the predatory and subsequent stages of culture, and which indicate the types of man best fitted to survive under the regime of status, are (in their primary expression) ferocity, self-seeking, clannishness, and disingenuousness—a free resort to force and fraud.

随着掠夺生活阶段的到来，对成功的人类性格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人类的生活习惯必须适应在人类关系新方式下出现的新要求。精力的消耗原先可以在前面所说的蛮夷生活的性格特征中获得表现，而现在必须沿着新的活动方向，在另一组对改变了的刺激所做出的习惯性反应中表现出来。如果按照其对人类生活带来的便利来衡量，有些方法在早期形势下是十分适合的，而在新形势下就不再能胜任了。早期形势的特点在于利益对立或利益分化现象相对较为少见，而后期形势的特点是竞争的强度不断提高，竞争的范围不断缩小。掠夺文化阶段及其以后的文化阶段所特有的那些性格特征，也就是那些可以表明哪些类型的人最适合在身份制下生存的性格特征，就其最主要的表现而言，即是凶狠残暴、自私自利、党同伐异以及虚伪奸诈，是肆无忌惮地付诸武力和欺骗。

Under the severe and protracted discipline of the regime of competition, the selection of ethnic types has acted to give a somewhat pronounced dominance to these traits of character, by favoring the survival of those ethnic elements which are most richly endowed in these respects. At the same time the earlier-acquired, more generic habits of the race have never ceased to have some usefulness for the purpose of the life of the collectivity and have never fallen into definitive abeyance.

在竞争制度严格而又漫长的熏陶下，种族类型的选择发挥了作用，它有利于那些拥有大量上述性格特征的种族成分生存，从而使得这些性格特征取得了相当显著的统治地位。同时，那些在以前养成的、更为普遍的种族性格对于集体生活目的从来就没有失去过效用，也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

It may be worthwhile to point out that the dolicho-blond type of European man seems to owe much of its dominating influence and its masterful position in the recent culture to its posse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datory man in an exceptional degree. These spiritual traits, together with a large endowment of physical energy—itself probably a result of selection between groups and between lines of descent—chiefly go to place any ethnic element in the position of a leisure or master class, especially during the earlier pha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This need not mean that precisely the same complement of aptitudes in any individual would insure him an eminent personal success. Under the competitive regime, the conditions of success for the individual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as those for a class. The success of a class or party presumes a strong element of clannishness, or loyalty to a chief, or adherence to a tenet; whereas the competitive individual can best achieve his ends if he combines the barbarian's energy, initiative, self-seeking and disingenuousness with the savage's lack of loyalty or clannishness. It may be remarked by the way, that the men who have scored a brilliant (Napoleonic) success on the basis of an impartial self-seeking and absence of scruple, have not uncommonly shown more of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achycephalic-brunette than of the dolicho-blond. The greater proportion of moderately successful individuals, in a self-seeking way, however, seems, in physique, to belong to the last-named ethnic element.

有一点值得一提，欧洲人中长颅金发这一类型之所以在近代文化中具有压倒优势的影响力，之所以居于主宰地位，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具有极其显著的掠夺型人类性格特征。这些精神特征，再加上天生旺盛的体力——这一点本身也许就是在群体之间和家族之间进行选择的结果——足以使任何一个种族成分成为有闲阶级或统治阶级，在有闲阶级制度发展早期，情况尤其如此。但这并不是说，任何人只要具有完全相同的性格本性，就一定能出人头地。在竞争制度下，个人成功的条件和一个阶级成功的条件并不一定完全相同。一个阶级或政党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强烈的党同伐异意识、对领袖的忠诚以及对某一信条的坚持；而对于进行竞争的人来说，如果他具有蛮夷人的精力、主动性、自私自利以及虚伪奸诈，同时又像野蛮人一样缺乏忠诚和党同伐异意识，他就能最有效地实现其目的。可以顺便提一下，凡是依靠完全的自私自利和肆无忌惮取得辉煌（拿破仑式）成功的人，通常表现为短颅褐发型体格特征，而不是长颅金发型的。有些个人依靠自私自利的方式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体格上似乎属于后一种种族成分。

The temperament induced by the predatory habit of life makes for the survival and fullness of life of the individual under a regime of em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makes for the survival and success of the group if the group's life as a collectivity is also predominantly a life of hostile competition with other groups. But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life in the industrially more mature communities has now begun to take such a turn that the interest of the community no longer coincides with the emulative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ir corporate capacity, these advanced industrial communities are ceasing to be competitors for the means of life or for the right to live—except in so far as the predatory propensities of their ruling classes keep up the tradition of war and rapine. These communities are no longer hostile to one another by force of circumstances,

other than the circumstances of tradition and temperament. Their material interests—apart, possibly, from the interests of the collective good fame—is not only no longer incompatible, but the success of any one of the communities unquestionably furthers the fullness of life of any other community in the group, for the present and for an incalculable time to come. No one of them any longer has any material interest in getting the better of any other. The same is not true in the same degree as regards individual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one another.

由掠夺型生活习惯培育出来的气质有利于竞争制度下个人的生存和生活充实；同时，如果一个群体的集体生活也主要是和其他群体进行敌对竞争的生活，那么这种气质也有利于该群体的生存和成功。但是，在工业较为成熟的社会里，经济生活的发展已经出现了转变，社会的利益不再和个人的竞争利益相一致。就其共同的能力来说，这些工业发达的社会不再是生活资料和生存权利的竞争者——除非其统治者具有的掠夺本性保持着战争和掠夺的传统。这些社会不会迫于环境的压力而互相敌视，除非是迫于传统和气质因素的压力。他们的物质利益——也许集体荣誉的利益除外——不再互相冲突，不仅如此，任何一个社会的成功都毫无疑问会让整体中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现在如此，在无限遥远的将来也如此。任何一个社会在战胜其他社会的过程中都不能再取得任何物质利益。就个人及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情况却并非完全如此。

The collective interests of any modern community center lie in industrial efficiency. The individual is serviceable for the ends of the community somewhat in proportion to his efficiency in the productive employments, vulgarly so called. This collective interest is best served by honesty, diligence, peacefulness, good-will, an absence of self-seeking, and a habitual recognition and

apprehension of causal sequence, without admixture of animistic belief and without a sense of dependence on any preternatural intervention in the course of events. Not much is to be said for the beauty, moral excellence, or general worthiness and reputability of such a prosy human nature as these traits imply; and there is little ground of enthusiasm for the manner of collective life that would result from the prevalence of these traits in unmitigated dominance. But that is beside the point. The successful working of a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y is best secured where these traits concur, and it is attained in the degree in which the human material is characterized by their possession. Their presence in some measure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have a tolerable adjustment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situation. The complex, comprehensive, essentially peaceable, and highly organized mechanism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y works to the best advantage when these traits, or most of them, are present in the highest practicable degree. These traits are present in a markedly less degree in the man of the predatory type than is useful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modern collective life.

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集体利益都集中在工业效率上。个人对社会的作用的大小是和他在世俗所谓生产劳动上的效率成正比的。最有助于实现这种集体利益的性格特征是诚实勤劳、和平友善而不自私自利，是能时时刻刻认清并理解因果关系，是在事件进展过程中不会掺杂万物有灵的信念，不存在对任何超自然的干预方面的依赖感。这些性格特征所蕴含的平凡的人类天性是多么美丽、在道德上是多么高尚、多么光荣而又有价值，这一切无需多言；如果这些普遍的特征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那么集体生活将会什么样子，这一点也无需深究。不过，这都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要点。只有当这类性格特征能够同时存在，并且能达到一定的程度，使得拥有这类性格特征成了人类的典型特征，一个现代工业社会才能够成功运转。为了进行适当的调

整以适应现代工业形势下的环境，存在一定程度的这类性格特征是必要的。如果这些性格特征，或大部分这类性格特征，能够以尽可能高的程度存在着，现代工业社会复杂的、广泛的、实质上和平而又高度组织化的机制就会以最好的方式运转。有些人是属于掠夺型的，在他们身上，这些性格特征存在的程度十分低，明显不能适应现代集体生活的目的。

On the other hand, the immediate interest of the individual under the competitive regime is best served by shrewd trading and unscrupulous manage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named above as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ty are disserviceable to the individual, rather than otherwise. The presence of these aptitudes in his make-up diverts his energies to other ends than those of pecuniary gain; and also in his pursuit of gain they lead him to seek gain by the indirect and ineffectual channels of industry, rather than by a free and unfaltering career of sharp practice. The industrial aptitudes are pretty consistently a hindrance to the individual. Under the regime of emulation the members of a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y are rivals, each of whom will best attain his individual and immediate advantage if, through an exceptional exemption from scruple, he is able serenely to overreach and injure his fellows when the chance offers.

另一方面，在竞争制度下，个人要想尽快地利益，最好的办法是采取精明狡猾的交易方式，进行不择手段的经营管理。上面提到的性格特征对社会利益是不无裨益的，而对个人却是有害无益。因为在一个人的性格构成中，如果有了这些性格本性的存在，他的精力就会分散到其他目标上，而不会专注于金钱利益；同时，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这类性格特征会引导他通过间接而又毫无效果的生产渠道而不是通过无拘无束、专心致志地从事不正当的职业来获得利益。生产性的

性格本性对个人来说始终是个障碍。在竞争制度下，现代工业社会的成员都是竞争对手，每一位社会成员，如果他能抛开一切顾忌，只要一有机会就会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欺骗或伤害他的同伴，那么要实现他的个人直接利益就是最为容易的。

It has already been noticed that modern economic institutions fall into two roughly distinct categories—the pecuniary and the industrial. The like is true of employments. Under the former head are employments that have to do with ownership or acquisition; under the latter head, those that have to do with workmanship or production. As was found in speaking of the growth of institutions, so with regard to employments.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leisure class lie in the pecuniary employments; those of the working classes lie in both classes of employments, but chiefly in the industrial. Entrance to the leisure class lies through the pecuniary employments.

上文已经提到，现代经济制度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独立的类别——金钱的和产业的。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前一类别的职业与所有制和获取有关，后一类别的职业与工艺或生产有关。在谈到制度发展时得出的结论也适用于职业。有闲阶级的经济利益在于从事金融类工作；而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有金融类工作但主要在于生产类工作。只有从事金融类工作才能跨进有闲阶级的门槛。

These two classes of employment differ materially in respect of the aptitudes required for each; and the training which they give similarly follows two divergent lines. The discipline of the pecuniary employments acts to conserve and to cultivate certain of the predatory aptitudes and the predatory animus. It does this both

by educating those individuals and classes who are occupied with these employments and by selectively repressing and eliminating those individuals and lines of descent that are unfit in this respect. So far as men's habits of thought are shaped by the competitive process of acquisition and tenure; so far as their economic functions are comprised within the range of ownership of wealth as conceived in terms of exchange value, and its management and financiering through a permutation of values; so far their experience in economic life favors the survival and accentuation of the predatory temperament and habits of thought. Under the modern, peaceable system, it is of course the peaceable range of predatory habits and aptitudes that is chiefly fostered by a life of acquisition. That is to say, the pecuniary employments give proficiency in the general line of practices comprised under fraud, rather than in those that belong under the more archaic method of forcible seizure.

这两类职业对性格本性的要求存在着实质性差别；同样，两类职业的训练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进行的。在金钱性职业方面的锻炼所起的作用在于保存并培养某些掠夺本性和掠夺意志。要发挥这样的作用，一方面要对从事这类职业的个人和阶级进行教育，另一方面还要选择性地压制和淘汰那些不适合这类职业的个人和家族。只要人们的思维习惯是通过获取和占有的竞争过程形成的，只要人们的经济功能是在财富所有制的范围内，而这类财富是具有交换价值的，其管理和资金供给是通过价值交换实现的，他们的经济生活经验就会有利于掠夺气质和掠夺思维习惯的生存与强化。在现代的和平制度下，从事获取活动的生活所培养出来的当然主要是在和平范围内的掠夺习惯和掠夺本性。也就是说，金钱的职业让人精通的是欺骗行为，而不是利用武力进行夺取这一更为古老的途径。

These pecuniary employments, tending to conserve the

predatory temperament, are the employments which have to do with ownership—the immediate function of the leisure class proper—and the subsidiary functions concerned with acquisition and accumulation. These cover the class of persons and that range of duties in the economic process which have to do with 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s engaged in competitive industry; especially those fundamental lines of economic management which are classed as financiering operations. To these may be added the greater part of mercantile occupations. In their best and clearest development these duties make up the economic office of the "captain of industry." The captain of industry is an astute man rather than an ingenious one, and his captaincy is a pecuniary rather than an industrial captaincy. Such administration of industry as he exercises is commonly of a permissive kind. The mechanically effective details of production and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re delegated to subordinates of a less "practical" turn of mind—men who are possessed of a gift for workmanship rather than administrative ability. So far as regards their tendency in shaping human nature by education and selection, the common run of non-economic employments is to be classed with the pecuniary employments. Such are politics and ecclesiastical and military employments.

这些本性于保存掠夺气质的金钱性职业，是与所有制有关的职业；而纯正的有闲阶级，其直接职能正与所有制有关，其辅助职能则与获取和积累有关。金钱性职业所包括的那一类人和经济过程中的那一系列职责是与企业的所有权有关，这些企业指的是从事竞争行业的企业，尤其是指从事被列为金融活动的基本经济管理行业的企业。另外还包括大部分贸易工作。如果这类职责能够得到最佳、最充分的发展，就会构成“工业巨头”的职能。一个工业巨头与其说是天资聪明，不如说是精明狡诈；他的领袖地位与其说是生产性质的，不如说是金

钱性质的。他对产业的管理往往具有放任自流的性质。至于那些生产或工业组织方面属于机械效果的具体事务，则委任于“实用”本性不太明显的副手们——这些人在技艺方面具有天赋，却没有管理的才能。一般的非经济职业具有通过教育和淘汰来塑造人类性格特征的本性，就这一点而言，它们也应当列入金钱性职业一类。这类职业包括政治、宗教和军事方面的职业。

The pecuniary employments have also the sanction of reputability in a much higher degree than the industrial employments. In this way the leisure-class standards of good repute come in to sustain the prestige of those aptitudes that serve the invidious purpose; and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of decorous living, therefore, also furthers the survival and culture of the predatory traits. Employments fall into a hierarchical gradation of reputability. Those which have to do immediately with ownership on a large scale are the most reputable of economic employments proper. Next to these in good repute come those employments that are immediately subservient to ownership and financiering—such as banking and the law. Banking employments also carry a suggestion of large ownership, and this fact is doubtless accountable for a share of the prestige that attaches to the business. The profession of the law does not imply large ownership; but since no taint of usefulness, for other than the competitive purpose, attaches to the lawyer's trade, it grades high in the conventional scheme. The lawyer is exclusively occupied with the details of predatory fraud, either in achieving or in checkmating chicanery and success in the profession is therefore accepted as marking a large endowment of that barbarian astuteness which has always commanded men's respect and fear. Mercantile pursuits are only half-way reputable, unless they involve a large element of ownership and a small element of usefulness. They grade high or low somewhat in

proportion as they serve the higher or the lower needs; so that the business of retailing the vulgar necessaries of life descends to the level of the handicrafts and factory labor. Manual labor, or even the work of directing mechanical processes, is of course on a precarious footing as regards respectability. A qualification is necessary as regards the discipline given by the pecuniary employments. As the scale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 grows larger, pecuniary management comes to bear less of the character of chicanery and shrewd competition in detail. That is to say, for an ever-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he persons who come in contact with this phase of economic life, business reduces itself to a routine in which there is less immediate suggestion of overreaching or exploiting a competitor. The consequent exemption from predatory habits extends chiefly to subordinates employed in business. The duties of ownership and administration are virtually untouched by this qualification.

金钱性职业同时还能赢得荣誉，其荣誉程度远远高于生产性职业。有闲阶级的荣誉标准就通过这种方式维护了可以满足歧视性目的的那些性格本性的威望，因此也就促进了掠夺型性格特征的存在与培养。这样，各种职业在荣誉性上就有了高低等级的差别。在纯经济职业中，最具有荣誉性的是那些与大规模所有权直接相关的职业。在荣誉性上紧随其后的是那些对所有权和金融活动具有直接帮助的职业——例如银行业务和法律职务。银行职业也含有庞大所有权的意味，毫无疑问，这一事实可以说明这一行业为何能分享威望。法律这一职业并不意味着庞大的所有权；但是，因为律师这一行业除了具有满足竞争目的的用途外，没有被沾上实用性的污点，所以它在传统的等级体系中地位也较高。作为一名律师，他整天忙于处理的无一例外都是些有关掠夺型欺诈的具体事务，不是以狡辩取胜，就是挫败对方的狡辩；所以，在这一职业上取得成功，通常被看作是在蛮夷的狡诈气质方面具有极高禀赋的标志，而这种狡诈气质总是让人觉得可敬又可

畏。商业行为所具有的荣誉性就要大打折扣，除非它们涉及的是大量的所有权以及少量的实用性。商业行为荣誉等级的高低大体上与它们所满足的需要的级别高低成正比；所以，经营大众生活必需品的零售业，其荣誉等级就降得很低，和手工业以及工厂劳动处于同一水平。体力劳动，甚至是指挥机械操作的工作，就其荣誉性而言，当然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的。至于在金钱性职业中受到的锻炼，我们有必要进行补充说明。随着生产企业规模的扩大，金钱管理的具体工作所具有的狡诈和精明竞争的属性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显著。也就是说，随着与经济生活这一方面接触的人数不断增加，商业沦为一种例行工作，在这种工作中，欺骗或剥削竞争者的意味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直接。因此而摆脱掠夺习惯的主要是受雇于这一行业的下级职员。我们这里的补充说明完全没有涉及所有权和管理的职责。

The case is different as regards those individuals or classes who are immediately occupied with the technique and manual operations of production. Their daily life is not in the same degree a course of habituation to the emulative and invidious motives and maneuvers of the pecuniary side of industry. They are consistently held to the apprehension and coordination of mechanical facts and sequences, and to their appreciation and utiliza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human life. So far as concerns this 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the educative and selective action of the industrial process with which they are immediately in contact acts to adapt their habits of thought to the non-invidious purposes of the collective life. For them, therefore, it hastens the obsolescence of the distinctively predatory aptitudes and propensities carried over by heredity and tradition from the barbarian past of the race.

至于那些直接从事于生产技术工作和手工操作的个人和阶级，其情形就不同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处于对工业金钱方面竞赛性的、歧视

性的动机和策略的适应过程之中，但是其适应的程度不同。他们必须不断地理解机械事实并协调机械顺序，为了人类生活，他们还必须不断地对其进行评价和利用。这一部分人直接接触工业过程，而工业过程的教育与淘汰行为会发挥作用，使得他们的思维习惯能够适应集体生活的非歧视性目的。因此，就他们而言，工业过程的教育与淘汰行为加速了本能的掠夺习性和掠夺本性的淘汰，这些习性和本性是通过遗传和传统从该种族的蛮夷时期流传下来的。

The educative action of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community, therefore, is not of a uniform kind throughout all its manifestations. That range of economic activities which is concerned immediately with pecuniary competition has a tendency to conserve certain predatory traits; while those industrial occupations which have to do immediately with the production of goods have in the main the contrary tendency. But with regard to the latter class of employments it is to be noticed in qualification that the persons engaged in them are nearly all to some extent also concerned with matters of pecuniary competition (as, for instance, in the competitive fixing of wages and salaries, in the purchase of goods for consumption, etc.) Therefore the distinction here made between classes of employments is by no means a hard and fast distinction between classes of persons.

因此，社会经济生活的教育行为，其所有表现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和金钱竞赛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具有保存某些掠夺型性格特征的本性；而总的来说，和物品生产直接相关的生产工作具有相反的本性。但是，在评判后一类职业时应当注意，几乎所有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与金钱竞赛问题有关（例如薪酬和工资的竞争性评定、购买消费品等等）。因此，这里对不同种类的职业所进行的区分，绝不是对不同类别的人进行硬性的区分。

The employments of the leisure classes in modern industry are such as to keep alive certain of the predatory habits and aptitudes. So far as the members of those classes take part in the industrial process, their training tends to conserve in them the barbarian temperamen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said on the other side. Individuals so placed as to be exempt from strain may survive and transmit their characteristics even if they differ widely from the average of the species both in physique and in spiritual make-up. The chances for a survival and transmission of atavistic traits are greatest in those classes that are most sheltered from the stress of circumstances. The leisure class is in some degree sheltered from the stress of the industrial situation, and should, therefore, afford an exceptionally great proportion of reversions to the peaceable or savage temperament. It should be possible for such aberrant or atavistic individuals to unfold their life activity on ante-predatory lines without suffering as prompt a repression or elimination as in the lower walks of life.

有闲阶级在现代工业中从事的职业，就是那些能够使某些掠夺习惯和掠夺本性的职业保持活跃。就这些阶级中参与生产过程的成员而言，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往往会保存他们身上的蛮夷气质。但是反过来也有值得探讨之处。有些人的处境可以让他们免除过度劳累，这些人的体格和精神构造即使和该种族一般人大不相同，也依然可以使他们的特征存在并流传下去。能够最大限度免于承受环境压力的那些阶级，返祖性格特征存在与遗传的可能性最大。有闲阶级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护，可以免于承受工业环境的压力，因此在他们身上应当能够发现相当多的复归和平或蛮夷气质的现象。这些性格异常的个人，或者说具有返祖性格特征的个人在以掠夺期之前的方式开展活动时，应当不会像下层阶级那样立即受到压制或淘汰。

Something of the sort seems to be true in fact. There are, for instance, an appreciable proportion of the upper classes whose inclinations lead them into philanthropic work, and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body of sentiment in the class going to support efforts of reform and amelioration. And much of this philanthropic and reformatory effort, moreover, bears the marks of that amiable "cleverness" and incoherence t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primitive savage. But it may still be doubtful whether these facts are evidence of a larger proportion of reversions in the higher than in the lower strata. Even if the same inclinations were present in the impecunious classes, it would not as easily find expression there; since those classes lack the means and the time and energy to give effect to their inclinations in this respect. The *prima facie* evidence of the facts can scarcely go unquestioned.

实际情况好像也确实如此。例如，上层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其本性引导他们从事慈善工作，在这一阶级中，对改革和改良的活动给予支持的，也大有人在。而且，他们在慈善或改革方面做出的努力往往具有和蔼可亲的"聪明"和"散漫"的痕迹，而这正是原始蛮夷人的特征。但是，这些事实能否证明返祖现象的比例在上层阶级中要比下层阶级中高，这依然是个疑问。即使贫困阶级在这方面具有同样的本性，也难以表现出来；因为这些阶级缺乏财力、时间和精力来将他们在这方面的本性付诸实践。事实的表面证据很难让人信服。

In further qualification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he leisure class of to-day is recruited from those who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a pecuniary way, and who, therefore, are presumably endowed with more than an even complement of the predatory traits. Entrance into the leisure class lies through the pecuniary employments, and these employments, by selection and adaptation, act to admit to the

upper levels only those lines of descent that are pecuniarily fit to survive under the predatory test. And as soon as a case of reversion to non-predatory human nature shows itself on these upper levels, it is commonly weeded out and thrown back to the lower pecuniary levels. In order to hold its place in the class, a stock must have the pecuniary temperament; otherwise its fortune would be dissipated and it would presently lose caste. Instances of this kind are sufficiently frequent.

在进一步探讨的过程中，有一点应当注意，今天的有闲阶级是由在金钱方面已经取得成功的人组成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些人所具有的掠夺型性格特征应当在平均水准以上。要想进入有闲阶级行列就得从事金钱性职业，这些职业通过选择和适应发挥作用，只允许那些在金钱上能够经得住掠夺的考验的家族进入上层阶级。在上层阶级中，一旦出现了复归非掠夺型人类性格特征的情形，通常就会被淘汰而重新回到较低的金钱等级。为了在这一阶级里站稳脚跟，一个家族必须具有金钱的气质；否则，该家族的财富必将化为乌有，并且会很快地失去其原有的社会地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The constituency of the leisure class is kept up by a continual selective process, whereby the individuals and lines of descent that are eminently fitted for an aggressive pecuniary competition are withdrawn from the lower classes. In order to reach the upper levels the aspirant must have, not only a fair average complement of the pecuniary aptitudes, but he must have these gifts in such an eminent degree as to overcome very material difficulties that stand in the way of his ascent. Barring accidents, the *nouveaux arrivés* are a picked body.

有闲阶级的组成成员是通过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来维系的，通过这一过程，那些格外能适应激烈的金钱竞赛的个人和家族就从下层阶级中脱颖而出。一个渴望进入上层阶级的人，不但应当具有平均水平的金钱气质，而且他所具有的这些性格天赋必须达到明显的程度，可以让他克服那些挡在通往上层阶级道路上的非常大的重重困难。撇开意外情况不谈，暴发户就是这样一个受上帝眷顾的群体。

This process of selective admission has, of course, always been going on; ever since the fashion of pecuniary emulation set in—which is much the same as saying, ever since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was first installed. But the precise ground of selection has not always been the same, and the selective process has therefore not always given the same results. In the early barbarian, or predatory stage proper, the test of fitness was prowess, in the naive sense of the word. To gain entrance to the class, the candidate had to be gifted with clannishness, massiveness, ferocity, unscrupulousness, and tenacity of purpose. These were the qualities that counted toward the accumulation and continued tenure of wealth. The economic basis of the leisure class, then as later, was the possession of wealth; but the methods of accumulating wealth, and the gifts required for holding it, have changed in some degree since the early days of the predatory culture. In consequence of the selective process the dominant traits of the early barbarian leisure class were bold aggression, an alert sense of status, and a free resort to fraud. The members of the class held their place by tenure of prowess. In the later barbarian culture society attained settled methods of acquisition and possession under the quasi-peaceable regime of status. Simple aggression and unrestrained violence in great measure gave place to shrewd practice and chicanery, as the best approved method of accumulating wealth. A different range of aptitudes and propensities would then be conserved in the leisure

class. Masterful aggression, and the correlative massiveness, together with a ruthlessly consistent sense of status, would still count among the most splendid traits of the class. These have remained in our traditions as the typical “aristocratic virtues”. But with these were associated an increasing complement of the less obtrusive pecuniary virtues; such as providence, prudence, and chicanery. As time has gone on, and the modern peaceable stage of pecuniary culture has been approached, the last-named range of aptitudes and habits has gained in relative effectiveness for pecuniary ends, and they have counted for relatively more in the selective process under which admission is gained and place is held in the leisure class.

当然，自从金钱竞赛风气出现以来——这就等于说，自从有闲阶级制度成立以来，这一选择接纳的过程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但是，进行选择的确切理由却并非总是相同的，因此，选择过程产生的结果也并非总是相同的。在早期的蛮夷阶段或掠夺阶段，适应性的考验就是勇武精神，原始意义上的勇武精神。要想进入有闲阶级，候选人必须具有党同伐异、魁伟强壮、凶狠残暴、蛮横霸道和百折不挠等天赋品质。这些品质对积累财富并继续保有财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有闲阶级的经济基础在于拥有财富，那个时期如此，那个时期以后也如此；但是，从掠夺文化阶段早期开始，积累财富的方法和保有财富所必需的品质都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由于选择过程的结果，处于早期蛮夷阶段的有闲阶级，其主要的性格特征是勇敢的侵略、敏锐的身份意识以及肆无忌惮的欺骗。有闲阶级成员要想维系其地位，必须拥有勇武精神。在蛮夷文化后期，在准和平的身份制下，社会在财富获取与占有方面有了固定的方法。精明狡猾和欺骗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直率的侵略和毫无节制的暴力，成了最受认可的财富积累方式。这样，有闲阶级必须保存一系列不同的脾性和气质。专横的侵略以及相应的魁梧强壮，还有强烈而又稳定的身份意识，仍然被看作是这一阶级最为优秀的性格特征。在我们的传统之中，它们一直被看作是典

型的“贵族品质”。但是，和这些性格特征结合在一起的是逐渐增多的、不那么咄咄逼人的金钱美德，例如深谋远虑、小心谨慎以及狡诈欺骗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现代和平的金钱文化阶段即将到来，最后提到的这一类脾性和习惯越来越能有效地适应金钱目的，它们在人们被有闲阶级接纳并保有该阶级地位的选择过程中显得更为重要。

The ground of selection has changed, until the aptitudes which now qualify for admission to the class are the pecuniary aptitudes only. What remains of the predatory barbarian traits is the tenacity of purpose or consistency of aim which distinguished the successful predatory barbarian from the peaceable savage whom he supplanted. But this trait cannot be said characteristically to distinguish the pecuniarily successful upper-class man from the rank and file of the industrial classes. The training and the selection to which the latter are exposed in modern industrial life give a similarly decisive weight to this trait. Tenacity of purpose may rather be said to distinguish both these classes from two others: the shiftless ne'er-do-well and the lower-class delinquent. In point of natural endowment the pecuniary man compares with the delinquent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the industrial man compares with the good-natured shiftless dependent. The ideal pecuniary man is like the ideal delinquent in his unscrupulous conversion of goods and persons to his own ends, and in a callous disregard of the feelings and wishes of others and of the remoter effects of his actions; but he is unlike him in possessing a keener sense of status, and in working more consistently and far-sightedly to a remoter end. The kinship of the two types of temperament is further shown in a proclivity to “sport” and gambling, and a relish of aimless emulation. The ideal pecuniary man also shows a curious kinship with the delinquent in one of the concomitant variations of the predatory human nature. The delinquent is very commonly of a

superstitious habit of mind; he is a great believer in luck, spells, divination and destiny, and in omens and shamanistic ceremony. Where circumstances are favorable, this proclivity is apt to express itself in a certain servile devotional fervor and a punctilious attention to devout observances; it may perhaps be better characterized as devoutness than as religion. At this point the temperament of the delinquent has more in common with the pecuniary and leisure classes than with the industrial man or with the class of shiftless dependents.

选择的依据发生了变化，如今要想取得加入有闲阶级的资格，只需具有金钱的品质就行了。掠夺型蛮夷性格特征所遗留下来的，只剩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或者说目标专一这一点了，而这也正是成功的掠夺型蛮夷人和被他所取代的和平型野蛮人之间存在的不同之处。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一性格特征是在金钱上较有成就的上层阶级和普通的劳动阶级之间的典型差别。后者在现代工业生活中所接受的训练和选择，也同样使得这一性格特征具有了决定性意义。百折不挠的品质倒可以说成是这两个阶级和另外两类人——游手好闲的无用之人和下层阶级中的惯犯——有所区别的标志。就资质天赋而言，有钱的人和惯犯之间的区别与一个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和善良而又游手好闲的依附者之间的区别基本相同。典型的有钱人和典型的惯犯一样，都会厚颜无耻地将财力和人力转而为己所用，全然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和意愿，对其行为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也完全无动于衷；但是，有钱人和惯犯又是不同的，他具有更为强烈的身份意识，在为遥远的目标努力时，他更加锲而不舍，更加深谋远虑。这两种气质类型还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都爱好“娱乐”和赌博，都喜欢毫无目的的竞赛。在掠夺型性格特征的一个伴随变体方面，典型的有钱人也和惯犯之间表现出了奇妙的共同之处。惯犯通常都具有迷信的思维习惯，对运气、符咒、占卜、命运、预兆以及萨满教式的仪式等等都笃信不疑。只要是处于有利的环境中，这种习性就会表现为某种奴性的信仰狂热，并且会拘泥于敬神仪式的形式；这种习性与其说是宗教，倒不如说是虔诚

的信仰。在这一点上，惯犯的气质倒是与金钱阶级和有闲阶级存在更多的共同之处，而与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或游手好闲的依附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却要少一些。

Life in a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y, or in other words life under the pecuniary culture, acts by a process of selection to develop and conserve a certain range of aptitudes and propensities. The present tendency of this selective process is not simply a reversion to a given, immutable ethnic type. It tends rather to a modification of human nature differing in some respects from any of the types or variants transmitted out of the past. The objective point of the evolution is not a single one. The temperament which the evolution acts to establish as normal differs from any one of the archaic variants of human nature in its greater stability of aim—greater singleness of purpose and greater persistence in effort. So far as concerns economic theory, the objective point of the selective process is on the whole single to this extent; although there are minor tendencies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diverging from this line of development. But apart from this general trend the line of development is not single. As concerns economic theory, the development in other respects runs on two divergent lines. So far as regards the selective conservation of capacities or aptitudes in individuals, these two lines may be called the pecuniary and the industrial. As regards the conservation of propensities, spiritual attitude, or animus, the two may be called the invidious or self-regarding and the non-invidious or economical. As regards the intellectual or cognitive bent of the two directions of growth, the former may be characterized as the personal standpoint, of conation, qualitative relation, status, or worth; the latter as the impersonal standpoint, of sequence, quantitative relation, mechanical efficiency, or use.

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换言之，处于金钱文化阶段的生活，通过选择过程发挥作用，培育并保存了一系列本性和习性。这一选择过程的目前趋势，并不只是复归某种固定不变的种族类型。其实，它本性于对人类的某些性格特征进行修正，这类性格特征在某些方面是与从过去遗传的任何种族类型或变体有所不同的。进化的目标不是单一的。通过进化作用而确立为正常的气质和人类性格中任何一种古老的变体都有所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具有更为稳定的目标——目标更为单一，所做的努力更加锲而不舍。就经济理论而言，在这一范围内，选择过程的目标总的来说是单一的；尽管还有一些具有一定重要性的次要本性，它们是和这一发展途径存在分歧的。但是，撇开这一总体趋势不谈，发展的途径不是单一的。就经济理论而言，其他方面的发展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途径进行的。若从选择性保存个人能力和本性这一方面来看，可以称之为金钱性路线和生产性路线。若从保存习性、精神态度和意志这一方面来看，又可以称之为歧视性的或自私自利的途径和非歧视性的或经济的途径。就这两个发展方向的智力或认知本性而言，前者可以说成是关于意图、定性关系、身份或价值的个人观点；后者可以说成是关于因果关系、定量关系、机械效率或功用的非个人观点。

The pecuniary employments call into action chiefly the former of these two ranges of aptitudes and propensities, and act selectively to conserve them in the population. The industrial employments, on the other hand, chiefly exercise the latter range, and act to conserve them. An exhaustiv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will show that each of these two ranges of aptitudes and propensities is but the multiform expression of a given temperamental bent. By force of the unity or singleness of the individual, the aptitudes, animus, and interests comprised in the first-named range belong together as expressions of a given variant of human nature. The like is true of the latter range. The two may be conceived as alternative

directions of human life, in such a way that a given individual inclines more or less consistently to the one or the other. The tendency of the pecuniary life is, in a general way, to conserve the barbarian temperament, but with the substitution of fraud and prudence, or administrative ability, in place of that predilection for physical damage that characterizes the early barbarian. This substitution of chicanery in place of devastation takes place only in an uncertain degree. Within the pecuniary employments the selective action runs pretty consistently in this direction, but the discipline of pecuniary life, outside the competition for gain, does not work consistently to the same effect. The discipline of modern life in the consumption of time and goods does not act unequivocally to eliminate the aristocratic virtues or to foster the bourgeois virtues. The conventional scheme of decent living calls for a considerable exercise of the earlier barbarian traits. Some details of this traditional scheme of life, bearing on this point, have been noticed in earlier chapters under the head of Leisure, and further details will be shown in later chapters.

金钱的职业所激发的主要是前一类本性和习性，并在民众身上选择性地保存这些本性和习性。另一方面，工业的职业所激发的主要是后一类本性和习性，并会发挥作用，保存这些本性和习性。通过详尽的心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两类本性和习性都只不过是某一种气质本性多种形态的表现罢了。由于个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属于第一类的本性、意志和兴趣都是人类性格特征中某种变体的不同表现。后一类本性和习性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两类本性和习性可以看作是人类生活可供选择的两个方向，每一个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始终如一地本性于其中的一类。一般来说，金钱生活本性于保存蛮夷气质，但是会以欺骗和深谋远虑，或者说管理能力来取代早期蛮夷人所特有的那种进行身体伤害的偏好。这种以狡诈欺骗取代毁灭破坏的现象，其发生的几率是不确定的。在金钱性职业当中，选择行为确实是始终如一地沿着

这个方向进行的；但是，不是为了利得竞争而接受的金钱生活锻炼却不会始终如一地产生同样的效果。现代生活在时间和财物消费方面的锻炼，其作用并不是毫不含糊地消除贵族品质，培育资产阶级品质。传统的体面生活方式需要大量运用早期的蛮夷性格特征。这一传统生活方式中的某些细节和这一点相关，在前几章谈到有闲这个话题时，我们已经有所论述；在后面几章中，我们会谈到更多的细节。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it appears that the leisure-class life and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of life should furthe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barbarian temperament; chiefly of the quasi-peaceable, or bourgeois, variant, but also in some measure of the predatory variant. In the absence of disturbing factors, therefore, it should be possible to trace a difference of temperament between the classes of society. The aristocratic and the bourgeois virtues—that is to say the destructive and pecuniary traits—should be found chiefly among the upper classes, and the industrial virtues—that is to say the peaceable traits—chiefly among the classes given to mechanical industry.

从前面已经说过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有闲阶级生活和有闲阶级生活方式应当促进蛮夷气质的保存；主要是保存准和平的或资产阶级的变体，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保存掠夺型变体。因此，如果没有干扰因素，找出社会各阶级之间存在的气质差异根源应该是可能的。贵族品质和资产阶级品质，也就是毁灭性的、金钱性的性格特征，应当主要存在于上层阶级当中；工业的品质，也就是和平的品质，应当主要存在于从事机械工业的阶级当中。

In a general and uncertain way this holds true, but the test is not so readily applied nor as conclusive as might be wished. There

are several assignable reasons for its partial failure. All classes are in a measure engaged in the pecuniary struggle, and in all classes the possession of the pecuniary traits counts towards the success and survival of the individual. Wherever the pecuniary culture prevails, the selective process by which men's habits of thought are shaped, and by which the survival of rival lines of descent is decided, proceeds proximately on the basis of fitness for acquisition. Consequently, if it were not for the fact that pecuniary efficiency is on the whole incompatible with industrial efficiency, the selective action of all occupations would tend to the unmitigated dominance of the pecuniary temperament. The result would be the installation of what has been known as the “economic man,” as the normal and definitive type of human nature. But the “economic man,” whose only interest is the self-regarding one and whose only human trait is prudence, is useless for the purposes of modern industry.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但也不能确定；想要进行检验并不那么容易，这种检验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检验之所以不会完全成功，我们可以列出几个原因。一切阶级都或多或少会从事于获取金钱的斗争，对一切阶级来说，拥有金钱的性格特征对个人的生存和成功具有重要意义。选择过程塑造了人的思维习惯，决定了敌对家族的存亡。在金钱文化盛行的地方，这一选择过程大体上是在适于获取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如果不是因为金钱效率在总体上是与工业效率不相容的，所有职业的选择行为，必然本性于让金钱气质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其结果是将所谓的“经济人”确立为正常的、确定的人类性格特征类型。但是，“经济人”所关切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深谋远虑是他唯一的人类性格特征，他对现代工业目的来说毫无用处。

The modern industry requires an impersonal, non-invidious

interest in the work in hand. Without this the elaborate processes of industry would be impossible, and would, indeed, never have been conceived. This interest in work differentiates the workman from the criminal on the one hand, and from the captain of industry on the other. Since work must be done in order to the continued life of the community, there results a qualified selection favoring the spiritual aptitude for work, within a certain range of occupations. This much, however, is to be conceded, that even within the industrial occupations the selective elimination of the pecuniary traits is an uncertain process, and that there is consequently an appreciable survival of the barbarian temperament even within these occupations. On this account there is at present no broad distinction in this respect between the leisure-class character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common run of the population.

现代工业的要求是，对于手头的工作要抱有非个人的、非歧视性的兴趣。如果没有这一点，复杂的工业程序就不可能运转，实际上这些程序也不会被设计出来。这种对工作的兴趣，一方面将工人和罪犯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也将工人与工业巨头区别开来。为了社会生活的延续就必须进行工作，于是在某一类职业中就出现了有限度的选择，这种选择有利于喜欢工作的精神态度。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在工业职业中，对金钱性特征的选择性淘汰也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因此，即使在这些职业中，也有蛮夷气质的明显残留。因为这个原因，有闲阶级的性格和普通大众的性格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太大的差别。

The whole question as to a class distinction in respect to spiritual make-up is also obscured by the presence, in all classes of society, of acquired habits of life that closely simulate inherited traits and at the same time act to develop in the entire body of the

population the traits which they simulate. These acquired habits, or assumed traits of character, are most commonly of an aristocratic cast. The prescriptive position of the leisure class as the exemplar of reputability has imposed many features of the leisure-class theory of life upon the lower classes;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re goes on, always and throughout society, a more or less persistent cultivation of these aristocratic traits. On this ground also these traits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survival among the body of the people than would be the case if it were not for the precept and example of the leisure class. As one channel, and an important one, through which this transfusion of aristocratic views of life, and consequently more or less archaic traits of character goes on, may be mentioned the class of domestic servants. These have their notions of what is good and beautiful shaped by contact with the master class and carry the preconceptions so acquired back among their low-born equals, and so disseminate the higher ideals abroad through the community without the loss of time which this dissemination might otherwise suffer. The saying “Like master, like man” has a greater significance than is commonly appreciated for the rapid popular acceptance of many elements of upper-class culture.

在社会的一切阶级中都存在着后天习得的生活习惯，这些习惯与通过遗传得来的性格特征极其相似，并且还能促进与其相似的性格特征在全体民众之中得到发展；各个阶级在精神构成方面到底存在什么差别，整个问题就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了。这些后天习得的习惯，或伪性格特征，绝大多数都属于贵族类型。有闲阶级约定俗成地享有荣誉典范的地位，下层阶级被迫接受了有闲阶级生活理论的许多特征；其结果是，整个社会总是较为一贯地培育这些贵族性格特征。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特征在民众之中有了更好的生存机会；如果不是因为有闲阶级的言传身教，情况就会不同。这些贵族生活观念的灌输以及随之而来的、较为古老的性格特征的存在，具有一个重要的渠道，

这个重要渠道就是家庭仆役阶级。这些仆役通过和其主人阶级接触，形成了关于善与美的观念，并将这些习得的先入之见带给出身卑微的同辈，这样就能及时地在社会中传播这些崇高的理想；要不是他们，这一传播过程是要花更长时间的。俗话说“有其主必有其仆”，对上层阶级的许多元素能够快速被大众接受而言，这句话的意义比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

There is also a further range of facts that go to lessen class differences as regards the survival of the pecuniary virtues. The pecuniary struggle produces an underfed class, of large proportions. This underfeeding consists in a deficiency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or of the necessaries of a decent expenditure. In either case the result is a closely enforced struggle for the means with which to meet the daily needs; whether it be the physical or the higher needs. The strain of self-assertion against odds takes up the whole energy of the individual; he bends his efforts to compass his own invidious ends alone, and becomes continually more narrowly self-seeking. The industrial traits in this way tend to obsolescence through disuse. Indirectly, therefore, by imposing a scheme of pecuniary decency and by withdrawing as much as may be of the means of life from the lower classes,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acts to conserve the pecuniary traits in the body of the population. The result is an assimilation of the lower classes to the type of human nature that belongs primarily to the upper classes only.

还有一类现象，可以缩小金钱品质在各阶级中残存的差异。金钱斗争产生了一个很大比例的饥饿阶级。这里所说的饥饿，指的是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或体面消费品的匮乏。不论是缺乏生活必需品还是缺乏体面消费品，都会导致更为激烈的斗争，为的是取得用于满足日常需要——不论是物质需要还是更高层次的需要——的生活资料。为了应

付困境的而做出的自我努力耗尽了个人的能量；他倾其全力，为的只是达到自己的歧视性目的，并因此慢慢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自私自利。这样，工业的性格特征因为没有用武之地，就趋于消失了。因此，有闲阶级制度，通过强制推行金钱礼仪的生活方式，通过尽可能多地榨取下层阶级的生活资料，在民众中保存了金钱的性格特征。其结果是，下层阶级被原本只属于上层阶级的人类性格特征类型所同化。

It appears, therefore, that there is no wide difference in temperament between the upper and the lower classes; but it appears also that the absence of such a difference is in good part due to the prescriptive example of the leisure class and to the popular acceptance of those broad principles of conspicuous waste and pecuniary emulation on which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rests. The institution acts to lower the industrial efficiency of the community and retard the adaptation of human nature to the exigencies of modern industrial life. It affects the prevalent or effective human nature in a conservative direction, (1) by direct transmission of archaic traits, through inheritance within the class and wherever the leisure-class blood is transfused outside the class, and (2) by conserving and fortifying the traditions of the archaic regime, and so making the chances of survival of barbarian traits greater also outside the range of transfusion of leisure-class blood.

因此，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在气质方面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之所以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似乎主要是因为有闲阶级的规范性榜样作用，主要是因为有闲阶级制度赖以存在的炫耀性浪费和金钱竞赛这两项广泛原则已经为大众所接受。有闲阶级制度具有降低社会生产效率的作用，并会延缓人类性格特征适应现代工业生活要求的过程。它以保守的方式影响着普遍的或现在流行的人类性格特征，其方式

是：（1）通过在有闲阶级内部或者在任何具有有闲阶级血统的其他阶级中遗传，将这种古老特征直接传播开来；（2）保存并巩固古老制度的传统，从而使得蛮夷特征在有闲阶级血统范围以外也有较大的生存机会。

But little if anything has been done towards collecting or digesting data that are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question of survival or elimination of traits in the modern populations, little of a tangible character can therefore be offered in support of the view here taken, beyond a discursive review of such everyday facts as lie ready to hand. Such a recital can scarcely avoid being commonplace and tedious, but for all that it seems necessary to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argument, even in the meager outline in which it is here attempted. A degree of indulgence may therefore fairly be bespoken for the succeeding chapters, which offer a fragmentary recital of this kind.

现代民众性格特征残存和淘汰情况是怎样的，对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即使有，也是少之又少。因此，除了对现成的日常事实进行的推理性评论外，几乎没有具体的资料来支持我们这里所持的观点。这类叙述难免平淡无奇，难免乏味冗长，但是，即使是此处所作的简要概述，对于论证的完整性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还是要进行这类片段式的叙述，不妨在此先向各位简单说明一下。

Chapter X Modern Survivals of Prowess

第十章　现代残留的勇武精神

The leisure class lives by the industrial community rather than in it. Its relations to industry are of a pecuniary rather than an industrial kind. Admission to the class is gained by exercise of the pecuniary aptitudes—aptitudes for acquisition rather than for serviceability. There is, therefore, a continued selective sifting of the human material that makes up the leisure class, and this selection proceeds on the ground of fitness for pecuniary pursuits. But the scheme of life of the class is in large part a heritage from the past, and embodies much of the habits and ideals of the earlier barbarian period. This archaic, barbarian scheme of life imposes itself also on the lower orders, with more or less mitigation. In its turn the scheme of life, of conventions, acts selectively and by education to shape the human material, and its action runs chiefly in the direction of conserving traits, habits, and ideals that belong to the early barbarian age—the age of prowess and predatory life.

有闲阶级是依靠工业社会来生活的，而不是生活在工业社会里。它与工业的关系是金钱性质的，而不是工业性质的。要想进入这一阶级，就必须具有金钱的本性；这些本性是进行获取的本性，而非实用性本性。因此，构成有闲阶级的人类素质不断地接受着选择性筛选，这种选择的依据在于是否适合从事金钱的工作。但是，这一阶级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是从过去继承来的，体现了蛮夷阶段早期的大部分习惯和理想。这一古老的、蛮夷的生活方式也对各个下层阶级产生了影响，只不过影响小一些而已。传统和生活方式反过来会通过教育来塑造人类素质，从而产生淘汰作用，其作用主要在于保存早期蛮夷时代

——也就是崇尚勇武精神和掠夺生活的时代——的特征、习惯和理想。

The most immediate and unequivocal expression of that archaic human nature which characterizes man in the predatory stage is the fighting propensity proper. In cases where the predatory activity is a collective one, this propensity is frequently called the martial spirit, or, latterly, patriotism. It needs no insistence to find assent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in the countries of civilized Europe the hereditary leisure class is endowed with this martial spirit in a higher degree than the middle classes. Indeed, the leisure class claims the distinction as a matter of pride, and no doubt with some grounds. War is honorable, and warlike prowess is eminently honorific in the eyes of the generality of men; and this admiration of warlike prowess is itself the best voucher of a predatory temperament in the admirer of war. The enthusiasm for war, and the predatory temper of which it is the index, prevail in the largest measure among the upper classes, especially among the hereditary leisure class. Moreover, the ostensible serious occupation of the upper class is that of government, which, in point of origin and developmental content, is also a predatory occupation.

人们在掠夺阶段所特有的古老的人类性格特征，其最直接、最明显的表现在于真正的好战本性。如果掠夺活动是集体性质的，那么人们往往会把这种本性称作尚武精神，近来又被称作爱国主义。在经受过文明洗礼的欧洲各国，世袭的有闲阶级比中产阶级具有更多的尚武精神；这一论点无需强调就可以获得大家的认同。实际上，这一卓越品质正是有闲阶级引以为豪的，毫无疑问，他们感到自豪是有些理由的。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战争是光荣的，好战的勇武精神是极受人尊敬的；这种对于好战的勇武精神的钦佩之情本身就是崇尚战争的人

具有掠夺气质的最佳证据。掠夺性情以及作为其指标的战争热情最为普遍地存在于上层阶级，尤其是世袭的有闲阶级之中。不仅如此，上层阶级表面上最严肃的职业是政治方面的职业，但是，就其起源与发展而言，政治方面的职业也是掠夺性的职业。

The only class which could at all dispute with the hereditary leisure class the honor of a habitual bellicose frame of mind is that of the lower-class delinquents. In ordinary times, the large body of the industrial classes is relatively apathetic touching warlike interests. When unexcited, this body of the common people, which makes up the effective force of the industrial community, is rather averse to any other than a defensive fight; indeed, it responds a little tardily even to a provocation which makes for an attitude of defense. In the more civilized communities, or rather in the communities which have reached an advanc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spirit of warlike aggression may be said to be obsolescent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This does not say that there are not an appreciable number of individuals among the industrial classes in whom the martial spirit asserts itself obtrusively. Nor does it say that the body of the people may not be fired with martial ardor for a time under the stimulus of some special provocation, such as is seen in operation to-day in more than one of the countries of Europe, and for the time in America. But except for such seasons of temporary exaltation, and except for those individuals who are endowed with an archaic temperament of the predatory type, together with the similarly endowed body of individuals among the higher and the lowest classes, the inertness of the mass of any modern civilized community in this respect is probably so great as would make war impracticable, except against actual invasion. The habits and aptitudes of the common run of men make for an unfolding of activity in other, less picturesque

directions than that of war.

在习惯性好战情绪方面，只有下层阶级的惯犯能够与世袭的有闲阶级一较高下。在平常时期，广大的工业阶级对战争的兴趣相对而言是比较淡薄的。这一群普通人是工业社会的有生力量，在没有受到煽动的情况下，他们厌恶一切非防御性的战争；实际上，甚至在受到了挑衅，需要摆出防御的姿态时，他们的反应也会稍显迟钝。在比较文明的社会里，或者说在工业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好战的侵略精神在普通民众中已经逐渐消失了。这并不是说，在工业阶级中，具有明显好战精神的个人为数不多。也不是说，广大民众即使在某段时期受到了特殊挑衅的刺激，也不会被激怒；就像今天的几个欧洲国家和目前的美国一样，这些地方正在上演着这一幕。但是，除了因为一时的意气激昂，除了那些具有古老的掠夺型气质的个人，还有上层阶级和底层阶级中那些具有相似气质的个人，任何现代文明社会的群众在这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惰性，使得战争成为不可能，除非是为了反抗实际的侵略。普通民众的习惯和本性使得活动朝着比较平淡的方向开展，而不是朝着战争的方向开展。

This class difference in temperament may be due in part to a difference in the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traits in the several classes, but it seems also, in some measure, to correspond with a difference in ethnic derivation. The class difference is in this respect visibly less in those countries whose population is relatively homogeneous, ethnically, than in the countries where there is a broader divergence between the ethnic elements that make up the several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same connection it may be noted that the later accessions to the leisure class in the latter countries, in a general way, show less of the martial spirit than contemporar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istocracy of the ancient line. These *nouveaux arrivés* have recently emerged from the commonplace

body of the population and owe their emergence into the leisure class to the exercise of traits and propensities which are not to be classed as prowess in the ancient sense.

这种气质上的阶级差异，可能部分是由于各个阶级在后天习得的性格特征方面存在着遗传差异，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又是和种族起源的差异相吻合的。在那些人口的种族成分相对单一的国家，这一方面的阶级差别就不是那么明显；而有些国家，构成其社会各阶级的种族成分之间差别较大，这一方面的阶级差别也相对比较明显。在这一方面，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后一类的国家里，与出身世家的现代贵族代表相比，那些新近跻身有闲阶级行列的人，一般来说表现出了较少的好战精神。这些暴发户不久前才从普通民众中脱颖而出，他们之所以能跻身于有闲阶级行列，靠的是某些性格特征和习性，这些性格特征和习性是不同于古代意义上的勇武精神的。

Apart from warlike activity proper, the institution of the duel is also an expression of the same superior readiness for combat; and the duel is a leisure-class institution. The duel is in substance a more or less deliberate resort to a fight as a final settlement of a difference of opinion. In civilized communities it prevails as a normal phenomenon only where there is a hereditary leisure class, and almost exclusively among that class. The exceptions are (1) military and naval officers who are ordinarily members of the leisure class, and who are at the same time specially trained to predatory habits of mind and (2) the lower-class delinquents—who are by inheritance, or training, or both, of a similarly predatory disposition and habit. It is only the high-bred gentleman and the rowdy that normally resort to blows as the universal solvent of differences of opinion. The plain man will ordinarily fight only when excessive momentary irritation or alcoholic exaltation act to

inhibit the more complex habits of response to the stimuli that make for provocation. He is then thrown back upon the simpler, less differentiated forms of the instinct of self-assertion; that is to say, he reverts temporarily and without reflection to an archaic habit of mind.

除了真正的战争活动，决斗制度也表现了这种极其强烈的好战精神；而决斗是一种有闲阶级制度。决斗实质上将战斗作为解决意见分歧的最后一个慎重手段。在文明社会里，只有当存在世袭的有闲阶级时，决斗的盛行才被看作是正常现象，决斗的发生也几乎只限于该阶级内部。例外的情况有：（1）陆军和海军军官，这些人通常是有闲阶级成员，同时，他们在掠夺思维习惯方面受过特殊训练；（2）下层阶级的惯犯，通过遗传或训练，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具有了同样的掠夺本性和掠夺习惯。只有出身高贵的绅士和粗暴之徒才会经常将打斗作为解决意见分歧屡试不爽的方法。而普通人通常只有在一时被过度激怒或酒后亢奋的情况下才会打斗，因为此时较为复杂的应对挑衅刺激的反应习惯受到了抑制。接着，他就又恢复了较为简单、不分青红皂白的自我表现本能；也就是说，他一时之间会不假思索地复归古老的思维习惯。

This institution of the duel as a mode of finally settling disputes and serious questions of precedence shades off into the obligatory, unprovoked private fight, as a social obligation due to one's good repute. As a leisure-class usage of this kind we have, particularly, that bizarre survival of bellicose chivalry, the German student duel. In the lower or spurious leisure class of the delinquents there is in all countries a similar, though less formal, social obligation incumbent on the rowdy to assert his manhood in unprovoked combat with his fellows. And spreading through all grades of society, a similar usage prevails among the boys of the community.

The boy usually knows to nicety, from day to day, how he and his associates grade in respect of relative fighting capacity; and in the community of boys there is ordinarily no secure basis of reputability for anyone who, by exception, will not or cannot fight on invitation.

决斗制度，作为最终解决争端和严重遗留问题的一个方式，逐渐变成了义务性的、无缘无故的私人打斗，成了保持个人荣誉的一种社会责任。这种有闲阶级的风气当中还残存着一种奇特的、好战的骑士精神，德国学生之间盛行的决斗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所有国家中，在惯犯所属的下层有闲阶级或伪有闲阶级中，粗暴之徒也具有类似的、却不太正式的社会责任：为了展现其男子汉气概，他必须和他的同伴进行无缘无故的格斗。相同的风气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社会的男孩子们之间流行。男孩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清楚地知道他自己及其伙伴们是怎样通过相对战斗能力的高低来决定地位等级的；在男孩子们的圈子里，如果任何人不愿或不能接受挑战邀请，他就失去了赢得荣誉的可靠基础。

All this applies especially to boys above a certain somewhat vague limit of maturity. The child's temperament does not commonly answer to this description during infancy and the years of close tutelage, when the child still habitually seeks contact with its mother at every turn of its daily life. During this earlier period there is little aggression and little propensity for antagonism. The transition from this peaceable temper to the predaceous and in extreme cases malignant, mischievousness of the boy is a gradual one, and it is accomplished with more completeness, covering a larger range of the individual's aptitudes, in some cases than in others. In the earlier stage of his growth, the child, whether boy or girl, shows less of initiative and aggressive self-assertion and less of

an inclination to isolate himself and his interests from the domestic group in which he lives, and he shows more of sensitiveness to rebuke, bashfulness, timidity, and the need of friendly human contact. In the common run of cases this early temperament passes, by a gradual but somewhat rapid obsolescence of the infantile features, into the temperament of the boy proper; though there are also cases where the predaceous features of boy life do not emerge at all, or at the most emerge in but a slight and obscure degree.

这里所说的一切特别适用于其成熟度已经超过某一模糊界线的男孩子。如果一个孩子还处于婴幼儿时期，还处于父母严密的监护之下，其气质一般都不符合上面的描述；此时，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习惯于依赖其母亲。在这样的幼小时期，他们的侵略性不足，对抗的性格本性不明显。男孩子们由这种爱好和平的性情向捕食性性情的转变——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向恶意的、恶毒的性情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转变更加彻底，涉及的个人性格本性更多。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其成长的早期阶段，都表现出较少的主动而又具有侵略性的自我表现，而那种将他自己和他的兴趣与他家庭隔离的意愿也不够明显；他对斥责表现得比较敏感，更加害羞、怯懦，更加需要亲切的人类接触。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婴幼儿特征逐渐而又快速地消失，这种早年气质就转变成真正的男孩子气质；不过，有的男孩，其生活中从未出现过这些捕食性的特征，或者即使出现了，也是轻微而又模棱两可的。

In girls the transition to the predaceous stage is seldom accomplished with the same degree of completeness as in boys; and in a relatively large proportion of cases it is scarcely undergone at all. In such cases the transition from infancy to adolescence and maturity is a gradual and unbroken process of the shifting of interest from infantile purposes and aptitudes to the purposes,

functions, and relations of adult life. In the girls there is a less general prevalence of a predaceous interval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n the cases where it occurs, the predaceous and isolating attitude during the interval is commonly less accentuated.

就女孩子而言，这种向捕食性阶段的转变很少会像男孩子那样彻底；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转变根本就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由婴幼儿时期向青春期和成熟期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是个人兴趣由婴幼儿时期的目的和本性向成人生活的目的、职能和关系转变的过程。在女孩发育的过程中，很少会出现这种捕食性的间隔期，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在这一期间表现出来的捕食性和不合群的态度通常表现得也不是那么强烈。

In the male child the predaceous interval is ordinarily fairly well marked and lasts for some time, but it is commonly terminated (if at all) with the attainment of maturity. This last statement may need very material qualification. The cases are by no means rare in which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boyish to the adult temperament is not made, or is made only partially—understanding by the “adult” temperament the average temperament of those adult individuals in modern industrial life who have some serviceability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collective life process, and who may therefore be said to make up the effective average of the industrial community.

就男孩子而言，其捕食性间隔期通常颇为明显，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但是，这一间隔期的终止（如果真的出现了终止的情况）通常要等到进入成熟期之后。我们也许需要对最后这种说法进行较大的修正。有些人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由男孩气质向成人气质的转变，有些人的转变并不彻底，这些情况并不少见。这里所谓的“成人气质”指的是

现代工业社会中那些成年个体普遍具有的气质，这些人对于集体生活进程的目的来说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因此，可以称之为工业社会中有用的普通成员。

The ethnic composition of the European populations varies. In some cases even the lower classes are in large measure made up of the peace-disturbing dolicho-blond; while in others this ethnic element is found chiefly among the hereditary leisure class. The fighting habit seems to prevail to a less extent among the working-class boys in the latter class of populations than among the boys of the upper classes or among those of the populations first named.

欧洲人口的种族构成是多种多样的。在某些情况下，下层阶级大部分是由破坏和平的长颅金发型种族构成的；而在其他情况下，这一种族成分主要存在于世袭的有闲阶级当中。在后一类人口构成中，打斗风气在工人阶级的孩子中间不太普遍，而相比较而言，打斗风气在上层阶级和上述第一类人口构成中各阶级的孩子们中间却比较流行。

If this generalization as to the temperament of the boy among the working classes should be found true on a fuller and closer scrutiny of the field, it would add force to the view that the bellicose temperament is in some appreciable degree a race characteristic; it appears to enter more largely into the make-up of the dominant, upper-class ethnic type—the dolicho-blond—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an into the subservient, lower-class types of man which are conceived to constitute the body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same communities.

如果通过全面而又仔细的观察，会发现这一关于工人阶级男孩气质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它将使得另一观点变得更加有力，即好战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种族特征；好战气质看起来更多地存在于欧洲国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的种族类型——长颅金发型的性格之中，而在卑微的下层阶级种族类型的性格中却较为少见，人们认为，构成同一社会人口主体的正是这后一类种族类型。

The case of the boy may seem not to bear seriously on the question of the relative endowment of prowess with which the several classes of society are gifted; but it is at least of some value as going to show that this fighting impulse belongs to a more archaic temperament than that possessed by the average adult man of the industrious classes. In this, as in many other features of child life, the child reproduces, temporarily and in miniature, some of the earlier pha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dult man. Under this interpretation, the boy's predilection for exploit and for isolation of his own interest is to be taken as a transient reversion to the human nature that is normal to the early barbarian culture—the predatory culture proper. In this respect, as in much else, the leisure-class and the delinquent-class character shows persistence into adult life of traits that are normal to childhood and youth, and that are likewise normal or habitual to the earlier stages of culture. Unless the difference is traceable entirely to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persistent ethnic types, the traits that distinguish the swaggering delinquent and the punctilious gentleman of leisure from the common crowd are, in some measure, marks of an arrested spiritual development. They mark an immature phase, as compared with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attained by the average of the adults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y. And it will appear presently that the puerile spiritual make-up of thes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pper and the lowest social strata shows itself also in the presence of other

archaic traits than this proclivity to ferocious exploit and isolation.

男孩的这种情况，似乎和社会各阶级天赋的勇武精神有强有弱这一问题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它至少还是具有一些价值的，可以表明这一战斗冲动是一种较为古老的气质，它比工业阶级一般成年人所具有的气质更为古老。男孩的这种气质和儿童生活中的许多其他特征一样，是成年人发展早期阶段某些特征暂时的、具体而微的再现。按照这样的解释，应当把男孩对英勇行径和将自己的兴趣和家族隔离的偏好看作是对早期蛮夷文化——纯正的掠夺文化——的正常人类性格特征的暂时回归。在这一方面，正如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有闲阶级和惯犯阶级在成年生活阶段表现出了对某些性格特征的坚持，这些性格特征是儿童时期和青年时期正常的性格特征，同样也是早期文化阶段正常的或常见的性格特征。狂妄自大的惯犯和谨小慎微的有闲阶级绅士具有与普通大众不同的性格特征，除非这一差异的根源完全在于稳定的种族类型之间的根本区别，否则就应当把这些性格特征看成是精神发展受到抑制的标志。和现代工业社会普通成年人达到的发展阶段相比，这些性格特征是处于不成熟阶段的标志。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上层社会和最下层社会的代表人物具有这种幼稚的精神状态，除了通过对残暴的侵占和隔离的本性表现出来以外，它还会通过其他古老的特征表现出来。

As if to leave no doubt about the essential immaturity of the fighting temperament, we have, bridging the interval between legitimate boyhood and adult manhood, the aimless and playful, but more or less systematic and elaborate, disturbances of the peace in vogue among schoolboys of a slightly higher age. In the common run of cases, these disturbances are confined to the period of adolescence. They recur with decreasing frequency and acuteness as youth merges into adult life, and so they reproduce, in a general way, in the life of the individual, the sequence by which the group

has passed from the predatory to a more settled habit of life. In an appreciable number of cases the spiritual growth of the individual comes to a close before he emerges from this puerile phase; in these cases the fighting temper persists through life. Those individuals who in spiritual development eventually reach man's estate, therefore, ordinarily pass through a temporary archaic phase corresponding to the permanent spiritual level of the fighting and sporting men. Different individuals will, of course, achieve spiritual maturity and sobriety in this respect in different degrees; and those who fail of the average remain as an undissolved residue of crude humanity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y and as a foil for that selective process of adaptation which makes for a heightened industrial efficiency and the fullness of life of the collectivity. This arrested spiritual development may express itself not only in a direct participation by adults in youthful exploits of ferocity, but also indirectly in aiding and abetting disturbances of this kind on the part of younger persons. It thereby furthers the formation of habits of ferocity which may persist in the later life of the growing generation, and so retard any movement in the direction of a more peaceable effective temperament on the part of the community. If a person so endowed with a proclivity for exploits is in a position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habits in the adolescent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he influence which he exerts in the direction of conservation and reversion to prowess may be very considerable. This is the significance, for instance, of the fostering care latterly bestowed by many clergymen and other pillars of society upon “boys' brigades” and similar pseudo-military organizations.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encouragement given to the growth of “college spirit,” college athletics, and the like, in the higher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在法定的少年时期向成人时期过渡的期间，在年龄稍长的男学生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破坏和平的行为，这些行为毫无目的性，具有游戏的性质，但是却是比较复杂、比较有规律的。这无疑证明了好战气质在本质上是不成熟的。在通常情况下，这类破坏的行为只出现在青春期。随着青年时期向成人生活的转变，这类行为发生的频率和剧烈程度逐渐降低；这样，群体由掠夺生活习惯向稳定的生活习惯转变的过程通常在个人生活中再次上演。在很多情况下，个人的精神发展在他脱离这一幼稚阶段之前就已经停止了；在这些情况下，好战的气质就会伴其一生。因此，在精神发展方面最终达到成人状态的那些个人，通常都要经历一个短暂的、古老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和爱好战斗以及爱好冒险之人持久的精神水平相对应的。当然，不同的个人在这方面所达到的精神成熟程度和健全程度不尽相同；那些未达到平均水平的人就成了现代工业社会天然人性的未经溶解的残渣，就成了选择适应过程中的陪衬物，这一适应过程有助于工业效率和集体生活充实程度的提高。这种受到抑制的精神发展不仅仅表现在成年人直接参与凶悍的、青年式的英勇行为，也表现在间接地协助和教唆青年人从事这类破坏和平的行为。因此，这种精神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凶悍习惯的形成，这种习惯会在成长的一代往后的生活中继续存在，这样就延缓了社会向更加和平有效的气质发展的进程。如果一个人极富侵略本性，并且处于引导社会青少年习惯发展的位置，他在勇武精神的保存和回归方面所施加的影响也许是极其可观的。例如，近来许多牧师和其他“社会的栋梁”给予“基督少年军”以及类似的伪军事的组织扶植关照，就具有上述意义。在高等学府中，鼓励“大学精神”和大学体育以及类似活动的发展，其情形也是如此。

These manifestations of the predatory temperament are all to be classed under the head of exploit. They are partly simple and unreflected expressions of an attitude of emulative ferocity, partly activities deliberately entered upon with a view to gaining repute for prowess. Sports of all kinds are of the same general character, including prize-fights, bull-fights, athletics, shooting, angling,

yachting, and games of skill, even where the element of destructive physical efficiency is not an obtrusive feature. Sports shade off from the basis of hostile combat, through skill, to cunning and chicanery, without its being possible to draw a line at any point. The ground of an addiction to sports is an archaic spiritual constitution—the possession of the predatory emulative propensity in a relatively high potency. A strong proclivity to adventuresome exploit and to the infliction of damage is especially pronounced in those employments which are in colloquial usage specifically called sportsmanship.

这些掠夺气质的表现都应当列入侵占一类。这些表现部分是凶悍的竞争态度简单直率的表现，部分是处心积虑参与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赢得勇武的好名声。所有运动竞赛都具有相同的一般属性，例如，职业拳击比赛、斗牛、田径运动、射击、钓鱼、帆船竞赛以及其他各种技能比赛，甚至包括那些不以体力消耗为显著特征的竞赛。运动竞赛是建立在敌对性的斗争基础上的，过去靠的是技巧，现在逐渐趋向于依靠狡猾与欺诈，要想在这两种竞赛间划出一条分界线是不可能的。对运动竞赛的热衷是出于一种古老的精神气质——具有比较高度的掠夺性竞赛习性。冒险侵占和进行伤害的强烈本性在某些职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按照通俗的说法，这些职业叫做体育运动。

It is perhaps truer, or at least more evident, as regards sports than as regards the other expressions of predatory emulation already spoken of, that the temperament which inclines men to them is essentially a boyish temperament. The addiction to sports, therefore, in a peculiar degree marks an arrested development of the man's moral nature. This peculiar boyishness of temperament in sporting men immediately becomes apparent when attention is directed to the large element of make-believe that is present in all

sporting activity. Sports share this character of make-believe with the games and exploits to which children, especially boys, are habitually inclined. Make-believe does not enter in the same proportion into all sports, but it is present in a very appreciable degree in all. It is apparently present in a larger measure in sportsmanship proper and in athletic contests than in set games of skill of a more sedentary character; although this rule may not be found to apply with any great uniformity. It is noticeable, for instance, that even very mild-mannered and matter-of-fact men who go out shooting are apt to carry an excess of arms and accoutrements in order to impress upon their own imagination the seriousness of their undertaking. These huntsmen are also prone to a histrionic, prancing gait and to an elaborate exaggeration of the motions, whether of stealth or of onslaught, involved in their deeds of exploit. Similarly in athletic sports there is almost invariably present a good share of rant and swagger and ostensible mystification—features which mark the histrionic nature of these employments. In all this, of course, the reminder of boyish make-believe is plain enough. The slang of athletics, by the way, is in great part made up of extremely sanguinary locutions borrowed from the terminology of warfare. Except where it is adopted as a necessary means of secret communication, the use of a special slang in any employment is probably to be accepted as evidence that the occupation in question is substantially make-believe.

使得人们热衷于从事某些活动的气质实质上是一种儿童时代的气质；比起上面提到的掠夺性竞赛的其他表现，运动竞赛更是如此，或者至少是更加明显。因此，对运动竞赛的热衷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人在道德天性发展的方面受到了抑制。所有竞赛活动都具有大量的伪装因素，只要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从事体育运动的人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儿童时代气质。体育竞赛以及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们，

通常喜欢从事的比赛和侵占活动都具有这种伪装的属性。并不是说所有的体育竞赛都具有相同比例的伪装成分，但是所有体育竞赛都具有较为明显的伪装成分。比起那些坐着举行的技能竞赛，在纯正的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中，这些伪装成分的存在更为明显；虽然这一法则并非放之四海皆准。例如，我们会注意到，即使是那些十分温文尔雅而又实事求是之人，他们在外出狩猎时，往往会带上超过必要数量的武器和装备，其目的是为了在自己的想象中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严肃的。而且这些猎人在进行侵占活动时，不论是偷袭还是突击，都会采取一种戏剧性的、神气十足的步伐，并且精心摆出夸张的动作。相同地，在体育竞赛中，几乎总是充斥着呐喊和装腔作势，总是在表面上表现出几分神秘色彩——这些特征标志着这些职业所具有的戏剧性。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人联想到儿童时代的伪装。顺便提一下，体育运动的行话很大一部分都是借用军事术语的，都是些充满血腥味的语言。除了是被用作秘密联系的必要工具外，在任何职业中使用特殊行话也许都可以被视为证据，证明该职业本质上具有伪装的属性。

A further feature in which sports differ from the duel and similar disturbances of the peace is the peculiarity that they admit of other motives being assigned for them besides the impulses of exploit and ferocity. There is probably little if any other motive present in any given case, but the fact that other reasons for indulging in sports are frequently assigned goes to say that other grounds are sometimes present in a subsidiary way. Sportsmen—hunters and anglers—are more or less in the habit of assigning a love of nature, the need of recreation, and the like, as the incentives to their favorite pastime. These motives are no doubt frequently present and make up a part of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sportsman's life; but these cannot be the chief incentives. These ostensible needs could be more readily and fully satisfied without the accompaniment of a systematic effort to take the life of those

creatures that make up an essential feature of that “nature” that is beloved by the sportsman. It is, indeed, the most noticeable effect of the sportsman's activity to keep nature in a state of chronic desolation by killing off all living things whose destruction he can compass.

与决斗以及其他类似的破坏和平的行为不同，体育竞赛还有一个特征，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体育竞赛除了可以归因于侵占和凶悍的冲动外，还存在其他的动机。就任何一种体育竞赛来说，似乎很难找出其他动机，但是人们通常会为沉溺于体育运动而列出其他理由，这一事实说明，有时候还存在着其他的从属原因。运动爱好者——猎人和垂钓者——往往会将爱好自然、消遣需要以及类似的理由作为他们喜欢此类消遣的动机。毫无疑问，这些动机往往是存在的，爱好运动的人，其生活之所以令人向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这些动机并非主要动机。通过其他方式也可以更容易、更充分地满足这些表面的需求，而不需要经过系统的努力来夺取一些生物的生命——这些生物构成了自然的基本特征，而这种“自然”正是运动爱好者所喜爱的。这些运动爱好者，其活动产生的最明显的效果是，他们尽其所能，将所有生物都赶尽杀绝，使自然长期处于荒芜的状态。

Still, there is ground for the sportsman's claim that under the existing conventionalities his need of recreation and of contact with nature can best be satisfied by the course which he takes. Certain canons of good breeding have been imposed by the prescriptive example of a predatory leisure class in the past and have been somewhat painstakingly conserved by the usage of the latter-day representatives of that class; and these canons will not permit him, without blame, to seek contact with nature on other terms. From being an honorable employment handed down from the predatory culture as the highest form of everyday leisure, sports have come to

be the only form of outdoor activity that has the full sanction of decorum. Among the proximate incentives to shooting and angling, then, may be the need of recreation and outdoor life. The remoter cause which imposes the necessity of seeking these objects under the cover of systematic slaughter is a prescription that cannot be violated except at the risk of disrepute and consequent lesion to one's self-respect.

运动爱好者认为，在现存的习俗制度下，他所采取的方式可以最好地满足其消遣和接触自然的需要；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掠夺性的有闲阶级，通过其规范性示范作用，在过去已经树立起良好的教养准则，这个阶级后代的代表们继续使用这一准则，使得这些准则能够勉强得以保存；在这些准则之下，他们如果通过其他方式接触自然，就难免会受到责难。体育运动是从掠夺文化阶段流传下来的，被看作是日常有闲生活的最高形态，现在已经变成了唯一得到礼仪完全认可的户外活动。狩猎和垂钓的动机之中也许包含了消遣和户外生活的需要。之所以必须以有组织的杀戮为掩护来追求这些目标，其更深一层次的原因在于一种传统规定；除非是声誉和自尊有受到损害的危险，这一传统规定是不容违背的。

The case of other kinds of sport is somewhat similar. Of these, athletic games are the best example. Prescriptive usage with respect to what forms of activity, exercise, and recreation are permissible under the code of reputable living is of course present here also. Those who are addicted to athletic sports, or who admire them, set up the claim that these afford the best available means of recreation and of “physical culture.” And prescriptive usage gives countenance to the claim. The canons of reputable living exclude from the scheme of life of the leisure class all activity that cannot be classed as conspicuous leisure. And consequently they tend by prescription

to exclude it also from the scheme of life of the community generally. At the same time purposeless physical exertion is tedious and distasteful beyond tolerance. As has been noticed in another connection, recourse is in such a case had to some form of activity which shall at least afford a colorable pretense of purpose, even if the object assigned be only make-believe. Sports satisfy these requirements of substantial futility together with a colorable make-believe of purpose. In addition to this they afford scope for emulation, and are attractive also on that account. In order to be decorous, an employment must conform to the leisure-class canon of reputable waste; at the same time all activity, in order to be persisted in as an habitual, even if only partial, expression of life, must conform to the generically human canon of efficiency for some serviceable objective end. The leisure-class canon demands strict and comprehensive futility,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demands purposeful action. The leisure-class canon of decorum acts slowly and pervasively, by a selective elimination of all substantially useful or purposeful modes of action from the accredited scheme of life;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cts impulsively and may be satisfied, provisionally, with a proximate purpose. It is only as the apprehended ulterior futility of a given line of action enters the reflective complex of consciousness as an element essentially alien to the normally purposeful trend of the life process that its disquieting and deterrent effect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agent is wrought.

其他体育运动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其中，体育比赛是最好的例子。在荣誉生活准则下，当然也存在某种规范性的习俗，它规定了哪些形式的活动、运动和消遣是可以允许的。那些酷爱体育竞赛或欣赏体育竞赛的人都认为这些运动是消遣和“身体培育”（即体育）现有的最好方式。这一说法得到了规范性习俗的支持。一切不能列为炫耀性

有闲的活动，都被荣誉生活准则排除在有闲阶级生活方式之外。结果，由于传统规定，这些准则也往往会把这种活动排除在一般社会的生活方式之外。同时，毫无目的的体力活动是沉闷乏味的，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在前文谈论别的问题时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借助于某种形式的活动，尽管其目标只是伪装的，这种活动至少应该具有一种虚假的目的。体育运动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即实质上徒劳无益却又具有虚假目的。不仅如此，它们还为竞赛提供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才具有了吸引力。一种职业，如果要符合礼仪，就必须与有闲阶级的荣誉浪费准则相一致；同时，所有活动，作为一种习惯的甚至只是不完全的生活表现形式，如果要长期存在，就必须符合一般人类效能准则，这一准则要求事物必须具有满足某种实用性目的的效能。有闲阶级准则所要求的是严格的、全面的徒劳无益，而技艺本能要求的是有目的的活动。有闲阶级的礼仪准则缓慢地发生渗透性作用，通过选择性淘汰将一切实质上有用的或有目的的行为方式排除在公认的生活方式之外；技艺的本能会自发地产生作用，也许可以通过一个直接的目的而得到暂时的满足。只有当这种感知到的某一类行为内在的徒劳无益，作为一个本质上与生活过程中正常的、有目的的趋势相违背的因素，进入意识反射复合体时，才会对施动者的意识产生不安的影响和遏制的作用。

The individual's habits of thought make an organic complex, the trend of which is necessarily in the direction of serviceability to the life process. When it is attempted to assimilate systematic waste or futility, as an end in life, into this organic complex, there presently supervenes a revulsion. But this revulsion of the organism may be avoided if the attention can be confined to the proximate, unreflected purpose of dexterous or emulative exertion. Sports—hunting, angling, athletic games, and the like—afford an exercise for dexterity and for the emulative ferocity and astuteness characteristic of predatory life. So long as the individual is but slightly gifted with reflection or with a sense of the ulterior trend of

his actions, so long as his life is substantially a life of naive impulsive action—so long the immediate and unreflected purposefulness of sports, in the way of an expression of dominance, will measurably satisfy his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f his dominant impulses are the unreflecting emulative propensities of the predaceous tempera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canons of decorum will commend sports to him as expressions of a pecuniarily blameless life. It is by meeting these two requirements, of ulterior wastefulness and proximate purposefulness, that any given employment holds its place as a traditional and habitual mode of decorous recreation. In the sense that other forms of recreation and exercise are morally impossible to persons of good breeding and delicate sensibilities, then, sports are the best available means of recreation under existing circumstances.

个人的思维习惯构成了一个有机复合体，其趋势必然是朝着对生活进程有用这一方向的。一旦它试图将系统的浪费和徒劳无益作为一个生活目标，纳入这一有机复合体，就会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应。但是，如果能将注意力集中在直接的、未经思考的灵敏动作或竞赛努力等方面的目的上，有机体的这种反应也是可以避免的。掠夺生活具有动作敏捷、竞赛性凶悍以及机敏狡猾等特质，而体育运动，如打猎、垂钓、体育竞赛以及类似的活动，为这些特质的发挥提供了机会。只要个人的反思能力较差，只要他对自己行为的内在趋势的感觉较为迟钝，只要他的生活实质上是一种自然冲动行为支配下的生活，那么各种体育运动的直接的、不加思考的目的性，通过支配性的表现，大体上就可以满足他的技艺本能。如果他的主要冲动是掠夺冲动中不加思考的竞赛本性，则情况更是如此。同时，礼仪准则会将体育运动作为无可挑剔的金钱生活之表现推荐给他。任何一种活动，之所以能保持其作为传统和习惯性的符合礼节的消遣方式，是因为它满足了这两个要求：具有内在的浪费性和直接的目的性。既然其他形式的消遣和运

动方式，对于具有良好教养的人和感情细腻的人来说，在道义上是不可能的，那么体育运动就是在现存环境下最可用的消遣方式了。

But those members of respectable society who advocate athletic games commonly justify their attitude on this head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ir neighbors on the ground that these games serve as an invaluable means of development. They not only improve the contestant's physique, but it is commonly added that they also foster a manly spirit, both in the participants and in the spectators. Football is the particular game which will probably first occur to anyone in this community when the question of the serviceability of athletic games is raised, as this form of athletic contest is at present uppermost in the mind of those who plead for or against games as a means of physical or moral salvation. This typical athletic sport may, therefore, serve to illustrate the bearing of athletics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stant's character and physique. It has been said, not inaptly, that the relation of football to physical culture is much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bull-fight to agriculture. Serviceability for these lusory institutions requires sedulous training or breeding. The material used, whether brute or human, is subjected to careful selection and discipline, in order to secure and accentuate certain aptitudes and propensities which a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ferine state, and which tend to obsolescence under domestication.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result in either case is an all around and consistent rehabilitation of the ferine or barbarian habit of mind and body. The result is rather a one-sided return to barbarism or to *the fera natura* —a rehabilitation and accentuation of those ferine traits which make for damage and desolation, without a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of the traits which would serve the individual's self-preservation and fullness of life in a ferine environment. The culture bestowed in football gives a product of

exotic ferocity and cunning. It is a rehabilitation of the early barbarian temperament, together with a suppression of those details of temperament, which, as see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xigencies, are the redeeming features of the savage character.

但是，提倡体育竞赛的上流社会成员，通常会向他们自己或其邻人证明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态度是正确的，理由是这些竞赛是非常宝贵的发展方式。它们不仅改善了参赛者的体质，而且还能够培养参与者和观众的男子汉气概。一旦谈到体育竞赛的实用性这个问题时，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足球这一项比赛，因为对于竞赛是拯救身体或精神的方式这个观点，不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首先印入他们脑海的，就是这种形式的体育竞赛。因此，这一典型的体育竞赛可以用来说明体育运动对参赛者性格和体格发展的影响。有人说，足球与体育的关系就像是斗牛与农业的关系一样，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这些游戏性的制度要想具有实用性，需要经过持之以恒的训练与培养。所使用的材料，不论是牲畜还是人类，都是经过精心的挑选和训练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并加强某些气质和本性，这些气质和本性是野生状态下所特有的，在驯化状态下会逐渐退化。这并不是说，无论是人类还是牲畜，挑选和训练的结果都是在身心方面全面而又彻底地恢复野生或蛮夷的习惯。其结果实际上是对蛮夷状态或野生状态某一方面的恢复——所恢复和加强的是那些会带来伤害和破坏的野生特征，而对于那些有助于个人在野生环境下进行自我保护和充实生活的性格特征，则不会进行相应的发展。在足球运动中得到的锻炼，其结果是加强了外来的凶悍与狡猾。它是对早期蛮夷气质的恢复，也是对气质中某些细节的压制，从社会和经济要求的观点来看，这些细节却是蛮夷性格中应该加以弥补的特征。

The physical vigor acquired in the training for athletic games—so far as the training may be said to have this effect—is of

advantage both to the individual and to the collectivity, in that,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it conduces to economic serviceability. The spiritual traits which go with athletic sports are likewise economically advantageous to the individual, as contradistinguished from the interests of the collectivity. This holds true in any community where these traits are present in some degree in the population. Modern competition is in large part a process of self-assertion on the basis of these traits of predatory human nature. In the sophisticated form in which they enter into the modern, peaceable emulation, the possession of these traits in some measure is almost a necessary of life to the civilized man. But while they are indispensable to the competitive individual, they are not directly serviceable to the community. So far as regards the service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collective life, emulative efficiency is of use only indirectly if at all. Ferocity and cunning are of no use to the community except in its hostile dealings with other communities; and they are useful to the individual only because there is so large a proportion of the same trait actively present in the human environment to which he is exposed. Any individual who enters the competitive struggle without the due endowment of these traits is at a disadvantage, somewhat as a hornless steer would find himself at a disadvantage in a drove of horned cattle.

从体育竞赛的训练中获得的体力——如果说训练具有这种效果的话——对个人或集体来说都是有利的，因为，如果其他情形相同，这种体力是有助于经济实用性的。伴随体育竞赛的精神特征在经济上对个人也是有利的，却是与集体利益背道而驰的。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其人口中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这些性格特征，情况都是这样。现代竞争大多是以这些掠夺型的人类性格特征为基础进行自我肯定的过程。它们以复杂的形式渗入现代的和平竞赛当中，对于一个现代文明人来

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类性格特征几乎是生活的必要条件。然而，它们虽然对于参与竞赛的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对社会却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就个人对集体生活目的的实用性而言，竞赛效能即使有用也是间接性的。除非是与其他社会发生了敌对行为，否则，凶悍和狡猾对社会就没有用处；它们之所以对个人是有用的，只是因为在其所处的环境中活跃着大量相同的性格特征。任何一个参与竞赛斗争的个人，如果不具备这些性格特征，就会处于不利地位，这有点儿像一只没有角的小牛一样，当它身处于一群有角的牛群中时，会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The possess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redatory traits of character may, of course, be desirable on other than economic grounds. There is a prevalent aesthetic or ethical predilection for the barbarian aptitudes, and the traits in question minister so effectively to this predilection that their serviceability in the aesthetic or ethical respect probably offsets any economic unserviceability which they may give. But for the present purpose that is beside the point. Therefore nothing is said here as to the desirability or advisability of sports on the whole, or as to their value on other than economic grounds.

当然，之所以要具备和培养掠夺型性格特征，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还有其他原因。人们对蛮夷本性普遍存在着审美和道德上的偏好，上述特征可以有效地满足这种偏好，因此，它们在审美和道德方面的实用性也许可以抵消它们可能产生的经济上的实用性的缺失。但是，这一点与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无关。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准备提及体育运动的可取之处及其适当性，也不准备提及它在经济以外的其他方面所具有的价值。

In popular apprehension there is much that is admirable in the type of manhood which the life of sport fosters. There is self-reliance and good-fellowship, so termed in the somewhat loose colloquial use of the words. From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the qualities currently so characterized might be described as truculence and clannishness. The reason for the current approval and admiration of these manly qualities, as well as for their being called manly, is the same as the reason for their usefulness to the individual.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nd especially that class of the community which sets the pace in canons of taste, are endowed with this range of propensities in sufficient measure to make their absence in others felt as a shortcoming, and to make their possession in an exceptional degree appreciated as an attribute of superior merit. The traits of predatory man are by no means obsolete in the common run of modern populations. They are present and can be called out in bold relief at any time by any appeal to the sentiments in which they express themselves—unless this appeal should clash with the specific activities that make up our habitual occupations and comprise the general range of our everyday interests. The common run of the population of any industrial community is emancipated from these, economically considered, untoward propensities only in the sense that, through partial and temporary disuse, they have lapsed into the background of sub-conscious motive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potency in different individuals, they remain available for the aggressive shaping of men's actions and sentiments whenever a stimulus of more than everyday intensity comes in to call them forth. And they assert themselves forcibly in any case where no occupation alien to the predatory culture has usurped the individual's everyday range of interest and sentiment. This is the case among the leisure class and among certain portions of the population which are ancillary to that class. Hence the facility with which any new accessions to the

leisure class take to sports; and hence the rapid growth of sports and of the sporting sentiment in any industrial community where wealth has accumulated sufficiently to exempt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population from work.

在一般人看来，运动生活所培养的那种男子汉气概是十分值得钦佩的。如果用不太准确的口语词汇来说，这种男子汉气概含有独立和朋友意气的成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刚刚描绘的这些品质也可以说成是野蛮残酷和党同伐异。之所以现在会认可和钦佩这些男性品质，之所以将其称为男子汉气概，是因为它们对个人来说是有用的。社会的成员，尤其是在品位准则方面起示范作用的社会阶级，具有充分多的这类习性，如果别人缺乏这类习性就会被看作是一种缺陷，如果具有异常多的这类天性，就会被看作是具有卓越资质的象征。掠夺型的人类性格特征在普通的现代民众中并没有销声匿迹。这类性格特征是存在的，任何时候，只要诉诸它们进行自我表现的情感，它们就会极其鲜明地表现出来——除非这一诉求是与某些具体活动相抵触的，而正是这些具体活动构成了我们常见的工作，是我们日常兴趣的一般范围所在。在任何工业社会里，普通民众之所以没有受到这些对经济不利的习性的束缚，只是因为这些习性通过部分或暂时的搁置不用，退入了人的潜意识动机之中。这些习性的力量大小因人而异，只要受到的刺激超过了日常的强度，它就会对人的行为和情感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只要个人没有从事与掠夺文化不相容的工作，只要个人日常的兴趣和情感范围没有被这种工作侵占，这些习性就会强有力地表现出来。在有闲阶级中间，在依附于这个阶级的某部分人群中间，情况都是如此。因此，刚刚跻身于有闲阶级的人很容易爱上体育运动；因此，在任何工业社会里，如果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足以使很大一部分人脱离工作，体育运动以及与体育运动有关的情感就会得到快速发展。

A homely and familiar fact may serve to show that the

predaceous impulse does not prevail in the same degree in all classes. Taken simply as a feature of modern life, the habit of carrying a walking-stick may seem at best a trivial detail; but the usage has significance for the point in question. The classes among whom the habit most prevails—the classes with whom the walking-stick is associated in popular apprehension—are the men of the leisure class proper, sporting men and the lower-class delinquents. To these might perhaps be added the men engaged in the pecuniary employments. The same is not true of the common run of men engaged in industry and it may be noted by the way that women do not carry a stick except in case of infirmity, where it has a use of a different kind. The practice is of course in great measure a matter of polite usage; but the basis of polite usage is, in turn, the proclivities of the class which sets the pace in polite usage. The walking-stick serves the purpose of an advertisement that the bearer's hands are employed otherwise than in useful effort, and it therefore has utility as an evidence of leisure. But it is also a weapon, and it meets a felt need of barbarian man on that ground. The handling of so tangible and primitive a means of offense is very comforting to anyone who is gifted with even a moderate share of ferocity.

一个平凡而又司空见惯的实例也许可以说明掠夺冲动在所有阶级中流行的程度不尽相同。例如，携带手杖的习惯，如果仅仅把它当作现代生活的一个特征，似乎充其量只是个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但是，手杖的使用对于当前的话题却有其重要意义。这一习惯最为流行的阶级，也就是大众一看到手杖就会联想到的阶级，是正统有闲阶级的成员、从事体育运动的人以及下层阶级的惯犯。除此之外，或许还可以加上那些从事金钱性职业的人。而那些从事生产的普通人群就不一样了；或许可以顺便提一下，妇女们是不携带手杖的，除非她身体虚弱，而在这种情况下手杖就具有了一个不同的用途。当然，携带手杖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礼俗的问题；但是，礼俗的基础，反过

来也还是在礼俗上起示范作用的那个阶级的气质本性。手杖起着宣传的作用，它可以表明持有者的双手没有从事实用性劳动，因此，手杖具有证明有闲的功用。但是，手杖也是一种武器，因此，它可以满足蛮夷人的切身需要。摆弄这么一件有形的原始攻击武器，会让具有一定凶悍脾性的人感到莫大的安慰。

The exigencies of the language make it impossible to avoid an apparent implication of disapproval of the aptitudes, propensities, and expressions of life here under discussion. It is, however, not intended to imply anything in the way of deprecation or commendation of any one of these phases of human character or of the life process.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prevalent human nature are taken up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traits discussed are gauged and graded with regard to their immediate economic bearing on the facility of the collective life process. That is to say, these phenomena are here apprehended from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and are valued with respect to their direct action in furtherance or hindrance of a more perfect adjustment of the human collectivity to the environment and to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required by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 collectivity for the present and for the immediate future. For these purposes the traits handed down from the predatory culture are less serviceable than might be. Although even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not to be overlooked that the energetic aggressiveness and pertinacity of predatory man is a heritage of no mean value. The economic value—with some regard also to the social value in the narrower sense—of these aptitudes and propensities is attempted to be passed upon without reflecting on their value as seen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When contrasted with the prosy mediocrity of the latter-day industrial scheme of life, and judged by the accredited standards of morality, and more especially by the standards of aesthetics and of

poetry, these survivals from a more primitive type of manhood may have a very different value from that here assigned them. But all this being foreign to the purpose in hand, no expression of opinion on this latter head would be in place here. All that is admissible is to enter the caution that these standards of excellence, which are alien to the present purpose, must not be allowed to influence our economic appreciation of these traits of human character or of the activities which foster their growth. This applies both as regards those persons wh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ports and those whose sporting experience consists in contemplation only. What is here said of the sporting propensity is likewise pertinent to sundry reflections presently to be made in this connection on what would colloquially be known as the religious life.

由于一时之间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所以对于目前讨论的本性、习性和生活表现难免带有明显的责难意味。然而，其本意并非要对人类性格和生活进程的任何方面进行斥责或颂扬。我们是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对普遍人类性格特征中的不同因素进行讨论的，我们所讨论的性格特征，则是按照其对集体生活进程的便利性所产生的直接经济影响来进行衡量和划分等级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这些现象的；我们是按照这些现象在人类集体生活进行更加完美的调整以适应环境和制度结构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直接的促进或阻碍作用来进行评价的，而这种调整是在集体生活目前或不久将来的经济形势下所必须进行的。就这些目的而言，从掠夺文化阶段流传下来的性格特征并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适用性。然而，即使是在这一方面，也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掠夺者那种奋发进取的态度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一笔价值不菲的遗产。我们这里只是试图对这些气质和习性的经济价值——还有它们狭义上的社会价值——进行探讨，而不考虑它们在其他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如果与平淡无奇的现代工业生活方式进行比较，如果按照公认的道德标准来评价，尤其是按照审美和诗歌的标准来评价，这些较为原始的男子汉气概的残留所具有的价值也许和我们

此处赋予它们的价值大相径庭。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与目前讨论的问题无关，因此，在此处对这些问题发表任何意见都是不合适的。我们这里所要关注的是，有些优越性标准与当前的研究目的相左，我们在对人类性格特征或者对促进这些性格特征发展的活动进行经济评价时，绝不能受到这些标准的影响。这句话适用于那些积极参加体育竞赛的人，也适用于另外一些人，这些人的体育运动经验只是通过观察研究得来的。此处就体育竞赛本性所进行的讨论，同样适用于随后进行的种种反思，这些反思是关于世俗所谓宗教生活的。

The last paragraph incidentally touches upon the fact that everyday speech can scarcely be employed in discussing this class of aptitudes and activities without implying deprecation or apology. The fact is significant as showing the habitual attitude of the dispassionate common man toward the propensities which express themselves in sports and in exploit generally. And this is perhaps as convenient a place as any to discuss that undertone of deprecation which runs through all the voluminous discourse in defense or in laudation of athletic sports, as well as of other activities of a predominantly predatory character. The same apologetic frame of mind is at least beginning to be observable in the spokesmen of most other institutions handed down from the barbarian phase of life. Among these archaic institutions which are felt to need apology are comprised, with others, the entire existing syste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ogether with the resulting class distinctions of status; all or nearly all forms of consumption that come under the head of conspicuous waste; the status of women under 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many features of the traditional creeds and devout observances, especially the exoteric expressions of the creed and the naive apprehension of received observances. What is to be said in this connection of the apologetic attitude taken in commending sports and the sporting character will therefore apply,

with a suitable change in phraseology, to the apologies offered in behalf of these other, related elements of our social heritage.

前一段附带提到，在使用日常用语讨论这类性格本性和活动时，难免含有反对和辩护的意味。这一事实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表明了毫无偏见的普通人对在体育竞赛和一般侵占活动中自动表现出来的习性所持的态度。也许此处是最适当的地方，可以谈一谈所有鸿篇巨制中弥漫着的反对的语气，而这些文章是对体育竞赛和其他明显具有掠夺属性的活动进行辩护和颂扬的。同样的辩护式思维态度，至少开始出现在某些代言者身上，他们是为那些从蛮夷生活阶段遗留下来的大多数其他制度代言的。人们觉得需要进行辩护的古老制度有整套现存的财富分配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阶级身份的差别；炫耀性浪费名下的所有或几乎所有的消费形式；父权制度下妇女的地位；传统教义和宗教仪式的许多特征，特别是教义的大众化表现和对公认宗教仪式简单的理解。因此，凡是与推崇体育竞赛和竞赛属性所采取的辩护态度有关的言论，也适用于那些对我们社会遗产中其他元素进行的辩护，只要在措辞上进行适当的转换就可以了。

There is a feeling—usually vague and not commonly avowed in so many words by the apologist himself, but ordinarily perceptible in the manner of his discourse—that these sports, as well as the general range of predaceous impulses and habits of thought which underlie the sporting character, do not altogether commend themselves to common sense. “As to the majority of murderers, they are very incorrect characters.” This aphorism offers a valuation of the predaceous temperament, and of the disciplinary effects of its overt expression and exercise, as seen from the moralist's point of view. As such it affords an indication of what is the deliverance of the sober sense of mature men as to the degree of availability of the predatory habit of mind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collective life. It is

felt that the presumption is against any activity which involves habituation to the predatory attitude, and 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lies with those who speak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predaceous temper and for the practices which strengthen it. There is a strong body of popular sentiment in favor of diversions and enterprises of the kind in question; but there is at the same time present in the community a pervading sense that this ground of sentiment wants legitimation. The required legitimation is ordinarily sought by showing that although sports are substantially of a predatory, socially disintegrating effect; although their proximate effect runs in the direction of reversion to propensities that are industrially disserviceable; yet indirectly and remotely—by some not readily comprehensible process of polar induction, or counter-irritation perhaps—sports are conceived to foster a habit of mind that is serviceable for the social or industrial purpose. That is to say, although sports are essentially of the nature of invidious exploit, it is presumed that by some remote and obscure effect they result in the growth of a temperament conducive to non-invidious work. It is commonly attempted to show all this empirically or it is rather assumed that this is the empirical generalization which must be obvious to anyone who cares to see it. In conducting the proof of this thesis the treacherous ground of inference from cause to effect is somewhat shrewdly avoided, except so far as to show that the "manly virtues" spoken of above are fostered by sports. But since it is these manly virtues that are (economically) in need of legitimation, the chain of proof breaks off where it should begin. In the most general economic terms, these apologies are an effort to show that, in spite of the logic of the thing, sports do in fact further what may broadly be called workmanship. So long as he has not succeeded in persuading himself or others that this is their effect the thoughtful apologist for sports will not rest content, and commonly, it is to be admitted, he does not rest content. His

discontent with his own vindication of the practice in question is ordinarily shown by his truculent tone and by the eagerness with which he heaps up asseverations in support of his position.

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些体育竞赛以及构成竞赛性格基础的那一类掠夺冲动和思维习惯，并没有完全得到大众的认可。这通常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辩护者本人通常是不会在言谈中承认这一点的，但是我们往往可以从他的说话方式中感觉得到。“大多数杀人凶手都具有明显的性格缺陷。”这一格言从道德家的角度，对掠夺型气质以及公开表现和运用这种气质所产生的惩戒效果进行了评价。掠夺型思维习惯在集体生活中的利用情况如何，上面的格言表明了头脑清醒的成熟人士对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人们会觉得，凡是涉及对掠夺态度进行适应的活动都应予以反对，那些为恢复掠夺本性以及增强这些习性的活动进行辩护的人，应当负起举证的责任。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大众情感，这种情感是支持上述这类娱乐活动和冒险行为的；但是，社会中同时也普遍存在着一种观念，这种情感缺乏正当的依据。这些必要的合理理由通常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表明虽然体育运动实质上具有掠夺性的、社会分化的效果，虽然它们的直接效果是导致某些对工业无所裨益的习性的恢复，但是人们认为，体育运动通过某种不易理解的正反诱导或对抗刺激的过程，间接地助长了一种思维习惯的形成，这种思维习惯是对社会目的或工业目有用的。也就是说，虽然体育运动实质上具有歧视性侵占的属性，但是通过产生某种间接的、不太明显的效果，它们促进了某种气质的发展，这种气质是有助于歧视性工作的。人们通常试图根据经验来证明这一点，或者将这一点看作是经验的归纳，任何人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一点。在为这一论点提供证据时，人们巧妙地躲过了因果推论的站不住脚的依据，除了表明体育运动培育了上面提到的“男子汉气质”。但是，这些男子汉气质需要从经济的角度加以辩护，证明它们是合理的，而论证的链条却在应该开始的地方断开了。用最普通的经济术语来说，这些辩护不顾事实逻辑，试图表明体育运动确实促进了某种事物的发展，这就是广义上所谓的“技艺”。只要这位富于思考的体育运动辩护者未能成功说

服自己或他人，让他们相信这就是体育运动的效果，他是不会感到满足的；而一般来说，他是得不到满足的。他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辩护感到不满意，这种不满通常表现在蛮横的语调以及堆砌断言以支持他的立场时所表现出的急切心情。

But why are apologies needed? If there prevails a body of popular sentiment in favor of sports, why is not that fact a sufficient legitimation? The protracted discipline of prowess to which the race has been subjected under the predatory and quasi-peaceable culture has transmitted to the men of to-day a temperament that finds gratification in these expressions of ferocity and cunning. So, why not accept these sports as legitimate expressions of a normal and wholesome human nature? What other norm is there that is to be lived up to than that given in the aggregate range of propensities that express themselves in the sentiments of this generation, including the hereditary strain of prowess? The ulterior norm to which appeal is taken is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which is an instinct more fundamental, of more ancient prescription, than the propensity to predatory emulation. The latter is but a special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 variant, relatively late and ephemeral in spite of its great absolute antiquity. The emulative predatory impulse—or the instinct of sportsmanship, as it might well be called—is essentially unstabl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rimordial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out of which it has been developed and differentiated. Tested by this ulterior norm of life, predatory emulation, and therefore the life of sports, falls short.

但是，为什么需要进行辩护呢？如果存在着一种支持体育运动的强烈的大众情感，为什么这一事实本身还不足以使体育运动具有正当性呢？种族在掠夺文化阶段和准和平文化阶段经受长期磨练而养成的

勇武精神遗传给了现代人，这种气质可以在凶狠与狡猾的表现中得到满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接受这些体育运动，将它们看作是正常和健全人类性格的正当表现呢？除了在这一代人的情感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习性（包括勇武精神这类遗传性格）所构成的规范外，究竟还有什么其他规范是应当遵守的呢？这个隐藏在背后的、必须遵守的规范就是技艺的本能，比起掠夺竞赛的习性，这一本能更为根本，更为古老。掠夺竞赛的习性只是技艺本能的特殊产物，是一种变体，尽管其存在的绝对历史非常久远，而相对来说，它却是晚近的、短暂的。这种竞赛掠夺冲动——我们不妨称之为运动精神本能——是从原始的技艺本能演变并分化出来的，和技艺本能比起来，它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在这种隐藏在背后的生活规范的考验下，掠夺竞赛，因此也就是体育运动生活，就显得有所欠缺了。

The manner and the measure in which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conduces to the conservation of sports and invidious exploit can of course not be succinctly stated. From the evidence already recited it appears that, in sentiment and inclinations, the leisure class are more favorable to a warlike attitude and animus than the industrial classes. Something similar seems to be true as regards sports. But it is chiefly in its indirect effects, through the canons of decorous living, that the institution has its influence on the prevalent sentiment with respect to the sporting life. This indirect effect goes almost unequivocally in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ing a survival of the predatory temperament and habits; and this is true even with respect to those variants of the sporting life which the higher leisure-class code of proprieties proscribes; as, *e.g.* , prize-fighting, cock-fighting, and other like vulgar expressions of the sporting temper. Whatever the latest authenticated schedule of detail proprieties may say, the accredited canons of decency sanctioned by the institution say without equivocation that emulation and waste are good and their opposites are disreputable.

In the crepuscular light of the social nether spaces the details of the code are not apprehended with all the facility that might be desired, and these broad underlying canons of decency are therefore applied somewhat unreflectingly, with little question as to the scope of their competence or the exceptions that have been sanctioned in detail.

有闲阶级制度有利于体育运动和歧视性侵占活动的存在，当然，关于该制度发挥这一作用的方式方法，我们是无法言简意赅地加以阐述的。从上文已经引用的证据看来，比起工业阶级，有闲阶级在情感和性格本性上似乎更具好战态度和好战精神。体育运动的情形似乎与此有些相似。但是，有闲阶级制度主要是运用间接效应并通过礼仪生活规范，来对关于体育运动的普遍情绪产生影响的。这种间接效应有助于掠夺气质和掠夺习惯的存在，这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对于体育运动生活中那些为上层有闲阶级礼仪准则所排斥的变体来说，其情形也是如此，这些变体包括职业拳击比赛、斗鸡以及其他类似的竞赛本性的粗俗表现形式。不论最近经过鉴定的礼仪细节条目是如何规定的，有闲阶级制度认可的公认礼仪准则毫不含糊地表明竞赛和浪费是好的，而与之相反的事物则是不光彩的。在昏暗的社会底层里，礼仪准则的细节并不像所期望的那样容易被理解，因此，人们会在某种程度上生搬硬套这些基本的礼仪准则，而很少会去考虑这些准则的适用范围和已经获得认可的某些细节上的例外。

Addiction to athletic sports, not only in the way of direct participation, but also in the way of sentiment and moral support, is, in a more or less pronounced degree,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leisure class; and it is a trait which that class shares with the lower-class delinquents, and with such atavistic elements throughout the body of the community as are endowed with a dominant predaceous trend. Few individuals among the populations of Western civilized countries are so far devoid of the predaceous

instinct as to find no diversion in contemplating athletic sports and games, but with the common run of individuals among the industrial classes the inclination to sports does not assert itself to the extent of constituting what may fairly be called a sporting habit. With these classes sports are an occasional diversion rather than a serious feature of life. This common body of the people can therefore not be said to cultivate the sporting propensity. Although it is not obsolete in the average of them, or even in any appreciable number of individuals, yet the predilection for sports in the commonplace industrial classes is of the nature of a reminiscence, more or less diverting as an occasional interest, rather than a vital and permanent interest that counts as a dominant factor in shaping the organic complex of habits of thought into which it enters.

酷爱运动竞赛是有闲阶级的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对运动竞赛的直接参与上，还表现在对运动竞赛的情感和精神支持上；这一特征是有闲阶级和下层阶级的惯犯以及社会群体中具有返祖遗传性格的成员所共有的，这些具有返祖遗传性格的成员富有强烈的掠夺本性。在西方文明国家的人口中，缺少掠夺本能而不将运动比赛和竞技视为乐事的人少之又少；然而，在各工业阶级中，普通个体对运动竞赛所表现出的爱好还没有达到可以称为运动习惯的程度。对这些阶级来说，运动竞赛并非是其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只不过是偶尔为之的消遣罢了。因此，我们不能说这部分普通民众促进了运动竞赛这一性格本性的发展。作为工业阶级中的普通成员，甚至是为数众多的成员，对体育运动的爱好并没有消失，一般来说对这种爱好具有怀旧的属性，或多或少将其视为偶尔为之的兴趣爱好，而并非将其看作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持久的兴趣爱好，更不能说是将其看作构成思维习惯有机复合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As it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sporting life of to-day, this

propensity may not appear to be an economic factor of grave consequence. Taken simply by itself it does not count for a great deal in its direct effects on the industrial efficiency or the consumption of any given individual; but the prevalence and the growth of the type of human nature of which this propensity is a characteristic feature is a matter of some consequence. It affects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collectivity both as regards the r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s regards the character of the results attained by the development. For better or worse, the fact that the popular habits of thought are in any degree dominated by this type of character cannot but greatly affect the scope, direction, standards, and ideals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life, as well as the degree of adjustment of the collective life to the environment.

这种对运动竞赛的爱好本性，正如其在今天的运动竞赛生活中所表现得那样，似乎并不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因素。单就其本身而言，它对任何个人的工业效率和消费并没有产生重要的直接影响；但是，以这种偏好为主要特征的人类性格特征类型的流行和发展却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不论是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还是在这种发展所产生的后果的性质方面，它都对集体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影响。不管怎样，大众思维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一性格类型的支配，这一事实必然会对集体生活的范围、方向、标准和理想产生重大影响，也必然会对集体生活适应环境的程度产生重大影响。

Something to a like effect is to be said of other traits that go to make up the barbarian character. For the purposes of economic theory, these further barbarian traits may be taken as concomitant variations of that predaceous temper of which prowess is an expression. In great measure they are not primarily of an economic character, nor do they have much direct economic bearing. They

serve to indicate the stage of economic evolution to which the individual possessed of them is adapted. They are of importance, therefore, as extraneous tests of the degree of adaptation of the character in which they are comprised to the economic exigencies of to-day, but they are also to some extent important as being aptitudes which themselves go to increase or diminish the economic service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构成蛮夷性格的其他性格特征也具有相似的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其他的这些蛮夷性格特征可以看作是掠夺性格的各种伴生的变异，而勇武精神则是这种掠夺性格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蛮夷的性格特征并不主要是经济性质的，它们也没有多少直接的经济意义。但是它们可以用来表明具有这类性格特征的个人所要适应的经济发展阶段。因此，作为其所构成的性格特征对今天的经济要求适应程度的外在标准，这类性格特征具有其重要意义；同时，作为可以提高或降低个人经济实用性的某些性格本性，它们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As it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life of the barbarian, prowess manifests itself in two main directions—force and fraud. In varying degrees these two forms of expression are similarly present in modern warfare, in the pecuniary occupations, and in sports and games. Both lines of aptitudes are cultivated and strengthened by the life of sport as well as by the more serious forms of emulative life. Strategy or cunning is an element invariably present in games, as also in warlike pursuits and in the chase. In all of these employments strategy tends to develop into finesse and chicanery. Chicanery, falsehood, browbeating, hold a well-secured place in the method of procedure of any athletic contest and in games generally. The habitual employment of an umpire, and the minute technical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limits and details of permissible fraud and strategic advantage, sufficiently attest the fact that fraudulent practices and attempts to overreach one's opponents are not adventitious features of the game. In the nature of the case habituation to sports should conduce to a fuller development of the aptitude for fraud; and the prevalence in the community of that predatory temperament which inclines men to sports connotes a prevalence of sharp practice and callous disregard of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Resort to fraud, in any guise and under any legitimation of law or custom, is an expression of a narrowly self-regarding habit of mind. It is needless to dwell at any length on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is feature of the sporting character.

在蛮夷生活中，勇武精神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武力和欺骗。这两种表现形式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现代战争、金钱性职业以及运动比赛和竞技之中。这两种性格本性都是通过运动生活以及较为严肃的竞赛生活形式得到培育和巩固的。谋略或狡诈是运动竞赛中必然存在的一个因素，它同样存在于战争行为和狩猎活动中。在所有这些职业中，谋略往往会发展成诡计和奸诈。在任何运动竞赛和一般竞技的开展方法中，奸诈、谎言、恐吓都占有牢固的地位。在竞赛中，按照惯例通常要聘请一名裁判员，并运用详细的技术条款来规定可容许的欺诈与战略优势的限度和细节；这一点足以证明，用欺诈的行为和方法来战胜对手并非竞技的偶发性特征。按道理，习惯运动竞赛应当有助于欺诈性格本性的进一步充分发展；并且这种导致人们爱好运动竞赛的掠夺型气质在社会上盛行，意味着欺诈风气的盛行，意味着普遍存在着对他人利益——不论是集体利益，还是个人利益——的漠视。使用欺诈手段，不论是用何种托辞，不论是以何种法律和习俗作为正当理由，都是一种狭隘的利己思维习惯的表现。至于运动竞赛的这一特征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在此无需赘言。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he most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 the physiognomy affected by athletic and other sporting men is that of an extreme astuteness. The gifts and exploits of Ulysses are scarcely second to those of Achilles, either in their substantial furtherance of the game or in the éclat which they give the astute sporting man among his associates. The pantomime of astuteness is commonly the first step in that assimila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sporting man which a youth undergoes after matriculation in any reputable school, of the secondary or the higher education, as the case may be. And the physiognomy of astuteness, as a decorative feature, never ceases to receive the thoughtful attention of men whose serious interest lies in athletic games, races, or other contests of a similar emulative nature. As a further indication of their spiritual kinship, it may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members of the lower delinquent class usually show this physiognomy of astuteness in a marked degree, and that they very commonly show the same histrionic exaggeration of it that is often seen in the young candidate for athletic honors. This, by the way, is the most legible mark of what is vulgarly called “toughness” in youthful aspirants for a bad name.

在这一方面，有一点值得注意：运动员和从事其他体育运动的人，其外貌会受到影响，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极度的狡黠。尤利西斯的天赋和功绩，不论是在对竞赛活动的实质性推动方面，还是在为这位狡黠的竞赛者赢得同伴的赞誉方面，都绝不亚于阿基里斯。一个年轻人在被任何一所有名的中学或大学录取后，要经历一个被职业运动员同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第一步通常是要使他具有狡黠的姿态。狡黠的外貌，作为一种装点门面的特征，一直都受到某些人的深切关注，这些人对竞技比赛、赛跑或其他具有相同竞争属性的比赛具有浓厚的兴趣。还可以指出一点，可以进一步表明精神上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在下层惯犯阶级的成员们身上，这种狡黠的外貌往往表现得非

常突出，他们往往会表现出戏剧性的夸张表情，这是在获得体育荣誉的年轻选手身上常常见到的。顺便提一下，人们将声名狼藉的年轻选手身上的特征称为“冷酷无情”，上述外貌表情就是其最显而易见的标志。

The astute man, it may be remarked, is of no economic value to the community—unless it is for the purpose of sharp practice in dealings with other communities. His functioning is not a furtherance of the generic life process. At its best, in its direct economic bearing, it is a conversion of the economic substance of the collectivity to a growth alien to the collective life process—very much after the analogy of what in medicine would be called a benign tumor, with some tendency to transgress the uncertain line that divides the benign from the malign growths. The two barbarian traits, ferocity and astuteness go to make up the predaceous temper or spiritual attitude. They are the expressions of a narrowly self-regarding habit of mind. Both are highly serviceable for individual expediency in a life looking to invidious success. Both also have a high aesthetic value. Both are fostered by the pecuniary culture. But both alike are of no use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collective life.

狡黠之人可以说对社会毫无经济价值——在和其他社会打交道时进行欺诈则另当别论。他所具有的功用并不能促进一般生活进程。就其直接经济意义而言，他的功用充其量只是在于将集体的经济实质转化为一种与集体生活进程背道而驰的发展——这一点与医学上所谓的良性肿瘤十分相似，常常具有跨越划分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的那个不确定的界限的趋势。凶残与狡黠这两种蛮夷性格特征构成了掠夺型气质或掠夺型精神态度。它们都是狭隘的利己思维习惯的表现。两者对于个人在生活中快速实现歧视性成就方面都极具适用性。同时，两者都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都是由金钱文化培育而成的。但是，两者对

于集体生活来说，都是毫无用处的。

Chapter XI The Belief in Luck

第十一章　相信运气

The gambling propensity is another subsidiary trait of the barbarian temperament. It is a concomitant variation of character of almost universal prevalence among sporting men and among men given to warlike and emulative activities generally. This trait also has a direct economic value. It is recognized to be a hindrance to the highest industrial efficiency of the aggregate in any community where it prevails in an appreciable degree.

赌博的癖好是蛮夷气质的另一个附属特征。这种癖好是性格的一种伴生的变体，在那些爱好运动竞赛和那些热衷战争和竞赛活动的人们身上，几乎普遍存在着这种癖好。这一性格特征也有其直接的经济价值。人们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只要这种性格特征颇为流行，它就会成为总体最高工业效率的一个障碍。

The gambling proclivity is doubtfully to be classed as a feature belonging exclusively to the predatory type of human nature. The chief factor in the gambling habit is the belief in luck; and this belief is apparently traceable, at least in its elements, to a stage in human evolution antedating the predatory culture. It may well have been under the predatory culture that the belief in luck was developed into the form in which it is present, as the chief element of the gambling proclivity, in the sporting temperament. It probably owes the specific form under which it occurs in the modern culture to the predatory discipline. But the belief in luck is in substance a

habit of more ancient date than the predatory culture. It is one form of the animistic apprehension of things. The belief seems to be a trait carried over in substance from an earlier phase into the barbarian culture, and transmuted and transmitted through that culture to a later stage of human development under a specific form imposed by the predatory discipline. But in any case, it is to be taken as an archaic trait, inherited from a more or less remote past, more or less incompatibl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process, and more or less of a hindrance to the fullest efficiency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life of the present.

赌博的癖好是否可以列为掠夺型人类性格独有的一个特征，这一点尚且不能确定。赌博习惯的主要特征就是相信运气；这一信仰，至少就其构成元素而言，显然可以追溯到掠夺文化时期以前的人类发展阶段。对运气的信仰很可能早在掠夺文化时期就已经发展成为目前的形态，成了运动竞赛气质中赌博癖好的主要构成元素。它之所以能以这种具体形态出现在现代文化中，可能要归功于掠夺文化的熏陶。但是，相信运气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习惯，它早在掠夺文化阶段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它是万物有灵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信仰实际上似乎是从更早的阶段留传到蛮夷文化阶段的一个性格特征，它经过蛮夷文化的阶段，以掠夺训练赋予的一种具体的形态，留传给了人类发展的后期阶段。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应当将它看作是一种古老的性格特征，是从较为遥远的过去承袭而来的，或多或少是与现代工业进程的要求不相符合的，对于现代集体经济生活的最高效率来说或多或少是个障碍。

While the belief in luck is the basis of the gambling habit, it is not the only element that enters into the habit of betting. Betting on the issue of contests of strength and skill proceeds on a further motive, without which the belief in luck would scarcely come in a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sporting life. This further motive is the desire of the anticipated winner, or the partisan of the anticipated winning side, to heighten his side's ascendency at the cost of the loser. Not only does the stronger side score a more signal victory, and the losing side suffer a more painful and humiliating defeat, in proportion as the pecuniary gain and loss in the wager is large; although this alone is a consideration of material weight. But the wager is commonly laid also with a view, not avowed in words nor even recognized in set terms *in petto* , to enhancing the chances of success for the contestant on which it is laid. It is felt that substance and solicitude expended to this end cannot go for naught in the issue. There is here a special manifestation of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backed by an even more manifest sense that the animistic congruity of things must decide for a victorious outcome for the side in whose behalf the propensity inherent in events has been propitiated and fortified by so much of conative and kinetic urging. This incentive to the wager expresses itself freely under the form of backing one's favorite in any contest, and it is unmistakably a predatory feature. It is as ancillary to the predaceous impulse proper that the belief in luck expresses itself in a wager. So that it may be set down that in so far as the belief in luck comes to expression in the form of laying a wager, it is to be accounted an integral element of the predatory type of character. The belief is, in its elements, an archaic habit which belongs substantially to early, undifferentiated human nature; but when this belief is helped out by the predatory emulative impulse, and so is differentiated into the specific form of the gambling habit, it is, in this higher-developed and specific form, to be classed as a trait of the barbarian character.

相信运气是赌博习惯的基础，然而，它并非养成赌博习惯的唯一。就力量和技巧竞赛的结果进行打赌是出于更深一层的动机，倘若

没有这一动机，对运气的信仰就绝不会成为运动竞赛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更深一层的动机就是一种期望，是预期会获得胜利的人或预期会获得胜利的一方的支持者们所抱有的一种期望，希望牺牲失败者以增加己方的优势。赌注中的金钱得失越大，强者一方所取得的胜利就越辉煌，失败的一方在失败中所蒙受的痛苦和耻辱也就越大；然而，就金钱得失本身而言，其重要性也不容小觑。但是，下赌注通常也是为了让押注的竞赛者获得更多的胜利机会，这一目的并没有明说出来，甚至在下注者的内心深处也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下注者觉得，为这一目的而花费的物质以及因这一目的而感到的忐忑不安不可能对竞赛结果不产生任何影响。在这里，技艺的本能表现得特别明显，这种表现是以一种更为明显的观念作为其后盾的：这么多的意念和能动力量会调和并巩固事件的内在本性；根据万物有灵论，事物具有一致性，这就决定了从事件内在本性的调和与巩固中获利的一方会获得最终的胜利。这种下赌注的动机以支持所青睐的参赛者的形式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它毫无疑问是一种掠夺性特征。对运气的信仰是作为纯掠夺冲动的附属物而在下赌注中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只要对运气的信仰是以下赌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就应该被看作是掠夺型性格特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就其构成要素而言，这种信仰是一种古老的习惯，实质上属于一种早期的、未经分化的人类性格；但是，如果这一信仰得到了掠夺型竞赛冲动的支持，并因此分化成赌博习惯的具体形态，它就应当以这种高度发达的具体形态被归类为蛮夷性格的一个特征。

The belief in luck is a sense of fortuitous necessity in the sequence of phenomena. In its various mutations and expressions, it is of very serious importance for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any community in which it prevails to an appreciable extent. So much so as to warrant a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of its origin and content and of the bearing of its various ramifications upo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s well as a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 of the leisure class to its growth, differentiation and persistence. In the

developed, integrated form in which it is most readily observed in the barbarian of the predatory culture or in the sporting man of modern communities, the belief comprises at least two distinguishable elements—which are to be taken as two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same fundamental habit of thought, or as the same psychological factor in two successive phases of its evolution. The fact that these two elements are successive phases of the same general line of growth of belief does not hinder their coexisting in the habits of thought of any given individual. The more primitive form (or the more archaic phase) is an incipient animistic belief, or an animistic sense of relations and things, that imputes a quasi-personal character to facts. To the archaic man all the obtrusive and obviously consequential objects and facts in his environment have a quasi-personal individuality. They are conceived to be possessed of volition, or rather of propensities, which enter into the complex of causes and affect events in an inscrutable manner. The sporting man's sense of luck and chance, or of fortuitous necessity, is an inarticulate or inchoate animism. It applies to objects and situations, often in a very vague way; but it is usually so far defined as to imply the possibility of propitiating, or of deceiving and cajoling, or otherwise disturbing the holding of propensities resident in the objects which constitute the apparatus and accessories of any game of skill or chance. There are few sporting men who are not in the habit of wearing charms or talismans to which more or less of efficacy is felt to belong. And the proportion is not much less of those who instinctively dread the “hoodooing” of the contestants or the apparatus engaged in any contest on which they lay a wager; or who feel that the fact of their backing a given contestant or side in the game does and ought to strengthen that side; or to whom the “mascot” which they cultivate means something more than a jest.

对运气的信仰源于一种观念，即各种现象出现的顺序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这种信仰具有不同的变化和表现，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如果这种信仰颇为流行，对该社会的经济效率来说，它就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有理由对这种信仰的起源和内容，以及它的各种各样的派生表现与经济结构和经济职能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详尽的讨论；也有理由对有闲阶级与这种信仰发展、分化和持续存在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在掠夺文化时期的蛮夷人身上或者在现代社会运动爱好者身上，最容易看到这种信仰发达的、完整的形态，它至少包含两种不同的元素——应当将这两种元素看作是同一基本思维习惯的两个不同阶段，或者将其看作是该信仰发展过程中两个连续阶段的同一心理因素。这两个元素是信念的相同基本发展方向上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这一事实并不会妨碍它们同时存在于某一特定个体的思维习惯中。这两种元素中更为原始的形式（也就是更为古老的阶段）就是初期的万物有灵观念，也就是各种关系和各种事物皆有灵性的观念，这一观念将类似于人的性格赋予种种事实。在古人看来，存在于他周围的所有引人注意的、明显具有重要性的东西和事实都具有一种类似于人的个性。他认为这些东西和事实都是具有意志力的，或者说都是具有种种本性的，这些本性渗入了起因复合体内，并以神秘莫测的方式对事件的发展产生影响。运动爱好者所具有的运气和机遇的观念，即，偶然中存在必然的观念，是一种模糊的或初始的万物有灵观念。它往往以一种十分隐晦的方式适用于一切事物和情形；但是，人们往往认为万物有灵观念有可能会抚慰、欺骗、哄骗，再不然就是打扰存在于物体内的习性本性，而在任何需要技术或运气取胜的竞赛中使用的器械和附属物正是由这些物体构成的。绝大部分运动爱好者都有佩戴护身符或辟邪物的习惯，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多少有些灵验。还有一类人，其所占比例不比上述人群少多少，这些人对某一场竞赛下了赌注，他们会本能地害怕参赛选手或比赛设备“撞了邪”，或者觉得他们对某一竞赛中的参赛选手或参赛方的支持应当会也确实会增强该方的力量，或者觉得他们为之供奉的“吉祥物”绝不仅仅是儿戏。

In its simple form the belief in luck is this instinctive sense of

an inscrutable teleological propensity in objects or situations. Objects or events have a propensity to eventuate in a given end, whether this end or objective point of the sequence is conceived to be fortuitously given or deliberately sought. From this simple animism the belief shades off by insensible gradations into the second, derivative form or phase above referred to, which is a more or less articulate belief in an inscrutable preternatural agency. The preternatural agency works through the visible objects with which it is associated, but is not identified with these objects in point of individuality. The use of the term "preternatural agency" here carries no further implication as to the nature of the agency spoken of as preternatural. This is only a farther development of animistic belief. The preternatural agency is not necessarily conceived to be a personal agent in the full sense, but it is an agency which partakes of the attributes of personality to the extent of somewhat arbitrarily influencing the outcome of any enterprise, and especially of any contest. The pervading belief in the *hamingia* or gipta (gœfa, auöna) which lends so much of color to the Icelandic sagas specifically, and to early Germanic folk-legends, is an illustration of this sense of an extra-physical propensity in the course of events.

对运气的信仰，其简单的形态就是这种本能的观念，认为一切物体或情形都具有神秘莫测的目的性本性。一切物体或事件都具有最终实现某一目的的本性，不管人们认为这一目的或最后目标是偶然实现的，还是刻意追求的，都是如此。从这种朴素的万物有灵观念开始，不知不觉间，这一信仰逐渐地演变为上面提到的第二种派生的形式或阶段，这是一种对神秘莫测的超自然力量较为明确的信仰。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是通过与之有联系的有形物体发挥作用的，但是，就其个性而言，并不能将它与这些物体视为一体。这里使用的"超自然力量"一词，并没有进一步涉及被称为"超自然力量"的属性。这只不过是万物有灵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罢了。超自然的力量并不一定是完全意义上的

人类主体，不过，这种力量具有人的属性特征，可以较为任意地对一切冒险活动尤其是一切竞赛的结果产生影响。对“哈民查”（hamingia）或“吉普塔”（gipta）的普遍信仰，尤其使冰岛英雄故事和早期日耳曼民间传奇增色不少；这正是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超自然本性这一观念的例证。

In this expression or form of the belief the propensity is scarcely personified, although to a varying extent individuality is imputed to it; and this individuated propensity is sometimes conceived to yield to circumstances, commonly to circumstances of a spiritual or preternatural character. A well-known and striking exemplification of the belief—in a fairly advanced stage of differentiation and involving an anthropomorphic personification of the preternatural agent appealed to—is afforded by the wager of battle. Here the preternatural agent was conceived to act on request as umpire, and to shape the outcome of the contest in accordance with some stipulated ground of decision, such as the equity or legality of the respective contestants' claims. The like sense of an inscrutable but spiritually necessary tendency in events is still traceable as an obscure element in current popular belief, as shown, for instance, by the well-accredited maxim, “Thrice is he armed who knows his quarrel just,“—a maxim which retains much of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average unreflecting person even in the civilized communities of to-day. The modern reminiscence of the belief in the *hamingia* , or in the guidance of an unseen hand, which is traceable in the acceptance of this maxim is faint and perhaps uncertain; and it seems in any case to be blended with other psychological moments that are not clearly of an animistic character.

在信仰的这种表现或形式里，虽然这种本性在不同程度上被赋予了个性，但是它却绝没有被人格化；人们认为，这种具有个性的本性有时会屈服于环境——这种环境通常具有精神的或超自然的属性。给战争下赌注就是这一信仰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突出的例证；这种信念此时已经处于分化较为充分的阶段，所要祈求的超自然力量在神人同形同性论之下被人格化了。人们认为，这种超自然力量此时按照请求所扮演的是裁判的角色，会按照某种约定的判决依据，如竞争者双方所要求的公正和合法，来决定竞争的结果。还存在一种相似的观念，认为事件之中存在着一种神秘莫测、在精神上却又是必然的趋势，在时下流行的信仰中依然可以依稀找到这种观念的痕迹；“既然知道自己理直气壮，他便有了三倍的力量”，这句被广泛认可的格言就表明这一点；即使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这句话对那些缺乏认真思考的普通人来说，仍然具有其重要意义。人们接受了这一格言，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察觉到，现代人怀念那种对“哈民查”的信仰或对那只看不见的、具有支配作用的手的信仰，但是这种怀念是模糊的，或许也是不确定的；这种怀念似乎总是和其他心理要素混合在一起，而这些心理要素并非具有万物有灵论的性质。

For the purpose in hand it is unnecessary to look more closely into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or the ethnological line of descent by which the later of these two animistic apprehensions of propensity is derived from the earlier. This question may be of the gravest importance to folk-psychology or to the theory of the evolution of creeds and cults.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 whether the two are related at all as successive phases in a sequence of development. Reference is here made to the existence of these questions only to remark that the interest of the present discussion does not lie in that direction. So far as concerns economic theory, these two elements or phases of the belief in luck, or in an extra-causal trend or propensity in things, are of substantially the same character. They have an economic

significance as habits of thought which affect the individual's habitual view of the facts and sequences with which he comes in contact, and which thereby affect the individual's serviceability for the industrial purpose. Therefore, apart from all question of the beauty, worth, or beneficence of any animistic belief, there is place for a discussion of their economic bearing on the service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as an economic factor, and especially as an industrial agent.

在万物有灵论对上述本性的两种理解之中，后者是由前者衍生而来的；就当前的研究目的而言，我们没有必要对其心理过程或人种谱系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该问题对于民族心理学或宗教教义和教派演变的理论探讨来说，也许是极其重要的。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其情形也是如此。这个问题就是：上述两种理解在发展顺序上究竟是不是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指出这些问题的存在，目的是为了说明目前的讨论所关注的领域并不在此。就经济理论而言，相信运气的这两个元素或阶段，或者说相信事物具有超越因果关系的趋势或本性的这两个元素或阶段，实质上具有相同的属性。作为思维习惯，它们会影响个人对于他所接触到的事物或关系的习惯看法，从而也会影响到个人在工业目的上的实用性，因此，它们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所以，撇开任何万物有灵论所具有的美感、价值或优点等问题不谈，它们在作为一个经济因素的个人，尤其是作为一个生产主体的个人所具有的实用性方面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自有其值得探讨的地方。

It has already been noted in an earlier connection, that in order to have the highest serviceability in the complex industrial processes of to-day, the individual must be endowed with the aptitude and the habit of readily apprehending and relating facts in terms of causal sequence. Both as a whole and in its details, the

industrial process is a process of quantitative causation. The “intelligence” demanded of the workman, as well as of the director of an industrial process, is little else than a degree of facility in the apprehension of and adaptation to a quantitatively determined causal sequence. This facility of apprehension and adaptation is what is lacking in stupid workmen, and the growth of this facility is the end sought in their education—so far as their education aims to enhance their industrial efficiency.

上文已经提到，为了在当今复杂的工业过程中具有最高程度的实用性，个人必须具备能随时依据因果关系来理解事实和解释事实的能力和习惯。工业过程，不论是从整体来看，还是从细节上来看，都是一种定量因果关系。工人以及某一工业过程的指导者所必须具有的“智慧”，只不过是要求他能够轻松地理解并适应由数量所决定的因果关系罢了。笨拙的工人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在理解和适应方面的娴熟程度，只要他们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其工业效率，则这种教育所追求的目的就在于提高在理解和适应方面的娴熟程度。

In so far as the individual's inherited aptitudes or his training incline him to account for facts and sequences in other terms than those of causation or matter-of-fact, they lower his productive efficiency or industrial usefulness. This lowering of efficiency through a penchant for animistic methods of apprehending facts is especially apparent when taken in the mass—when a given population with an animistic turn is viewed as a whole. The economic drawbacks of animism are more patent and its consequences are more far-reaching under the modern system of large industry than under any other.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ies, industry is, to a constantly increasing extent, being organized in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organs and functions

mutually conditioning one another; and therefore freedom from all bias in the causal apprehension of phenomena grows constantly more requisite to efficiency on the part of the men concerned in industry. Under a system of handicraft an advantage in dexterity, diligence, muscular force, or endurance may, in a very large measure, offset such a bias in the habits of thought of the workmen.

如果个人先天的本性或所接受的训练使得他不能够用因果关系或者实际情况来解释事实及关系，就会降低其生产效率或生产实用性。从整体上来看，某一具有万物有灵论本性的民族，这种由于喜欢用万物有灵论的方法来理解事实而导致效率降低的情况尤其明显。在现代大型工业制度下，万物有灵论的经济弊端最为明显，其产生的后果也最为深远。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工业越来越成为一个由许许多多互相依存的机构和功能构成的综合系统；因此，那些从事工业生产的人要想提高效率，在通过因果关系来理解各种现象的过程中，就必须完全不受偏见的影响，这一点变得越来越必要。而在手工业制度下，在灵巧、勤劳、肌肉力量或耐力方面的优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存在于工人思维习惯中的这种偏见。

Similarly in agricultural industry of the traditional kind, this closely resembles handicraft in the nature of the demands made upon the workman. In both, the workman is himself the prime mover chiefly depended upon, and the natural forces engaged are in large part apprehended as inscrutable and fortuitous agencies, whose working lies beyond the workman's control or discretion. In popular apprehension there is in these forms of industry relatively little of the industrial process left to the fateful swing of a comprehensive mechanical sequence which must be comprehended in terms of causation and to which the operations of industry and the movements of the workmen must be adapted. As industrial

methods develop, the virtues of the handicraftsman count for less and less as an offset to scanty, intelligence or a halting acceptance of the sequence of cause and effect.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ssumes more and more of the character of a mechanism, in which it is man's office to discriminate and select what natural forces shall work out their effects in his service. The workman's part in industry changes from that of a prime mover to that of discrimination and valuation of quantitative sequences and mechanical facts. The faculty of a ready apprehension and unbiased appreciation of causes in his environment grows in relative economic importance and any element in the complex of his habits of thought which intrudes a bias at variance with this ready appreciation of matter-of-fact sequence gains proportionately in importance as a disturbing element acting to lower his industrial usefulness. Through its cumulative effect upon the habitual attitude of the population, even a slight or inconspicuous bias towards accounting for everyday facts by recourse to other ground than that of quantitative causation may work an appreciable lowering of the collective industrial efficiency of a community.

传统农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它对劳动者的要求与手工业对工人的要求在属性上极为相似。在这两种产业中，劳动者主要依靠的原动力就是他本身，而所利用的自然力量大都被理解为一种神秘莫测而又难以预料的力量，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不是劳动者所能控制的，也不是他们所能自由处理的。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在这两种形态的产业中，生产过程受综合的机械程序摆布的程度相对较小，而这一机械程序是必须依据因果关系来理解的，工业操作和工人的动作是必须要与这一机械程序相适应的。随着工业方法的进步，手工业者身上的那些优点越来越不足以抵消他在智力上的不足以及他在接受因果关系时的犹豫不决。工业组织越来越具有机械结构的性质，在这里，人的职责就是辨别和选择某些自然力量，这些自然力量能够产生对他有用的效果。劳

动者在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由原动力变成了定量关系和机械事实的辨别者和评价者。他应当能够迅速理解周围的因果关系，并能不带任何偏见来进行评价，这种能力的相对经济意义与日俱增；如果他的思维习惯复合体内掺入了与快速评价因果关系的能力相冲突的偏见，那么复合体内的任何元素，作为一个干扰因素，其重要性也会相应增加，它足以降低劳动者在工业上的有用性。如果不以定量因果关系为依据而通过偏见来解释日常事实，即使这种偏见是轻微的、不甚明显的，通过它对民众的习惯态度所产生的累积性影响，也会明显降低一个社会的集体生产效率。

The animistic habit of mind may occur in the early, undifferentiated form of an inchoate animistic belief, or in the later and more highly integrated phase in which there is an anthropomorphic personification of the propensity imputed to facts. The industrial value of such a lively animistic sense, or of such recourse to a preternatural agency or the guidance of an unseen hand, is of course very much the same in either case. As affects the industrial service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the effect is of the same kind in either case; but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habit of thought dominates or shapes the complex of his habits of thought varies with the degree of immediacy, urgency, or exclusiveness with which the individual habitually applies the animistic or anthropomorphic formula in dealing with the facts of his environment. The animistic habit acts in all cases to blur the appreciation of causal sequence; but the earlier, less reflected, less defined animistic sense of propensity may be expected to affect the intellectual processes of the individual in a more pervasive way than the higher forms of anthropomorphism. Where the animistic habit is present in the naive form, its scope and range of application are not defined or limited. It will therefore palpably affect his thinking at every turn of the person's life—wherever he has to do

with the material means of life. In the later, maturer development of animism, after it has been define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anthropomorphic elaboration, when its application has been limited in a somewhat consistent fashion to the remote and the invisible, it comes about that an increasing range of everyday facts are provisionally accounted for without recourse to the preternatural agency in which a cultivated animism expresses itself. A highly integrated, personified preternatural agency is not a convenient means of handling the trivial occurrences of life, and a habit is therefore easily fallen into of accounting for many trivial or vulgar phenomena in terms of sequence. The provisional explanation so arrived at is by neglect allowed to stand as definitive, for trivial purposes, until special provocation or perplexity recalls the individual to his allegiance. But when special exigencies arise, that is to say, when there is peculiar need of a full and free recourse to the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then the individual commonly has recourse to the preternatural agency as a universal solvent, if he is possessed of an anthropomorphic belief.

万物有灵论的思维习惯可能出现在初始的万物有灵观念时期，这时，万物有灵观念所具有的是早期未经分化的形态；它也可能出现在后来更加完整的阶段中，这时，事物的本性在神人同形同体的观念下被人格化了。不论这样一种较为活跃的万物有灵观念，还是这种对超自然力量的祈求，或者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其经济价值当然是大体相同的。就其对个人的生产实用性所产生的影响而言，这两种情况所产生的效果是属于同一类的；但是，这种思维习惯支配或影响个人思维习惯复合体的程度因人而异，这要视个人在处理其周围事态时，习惯性运用万物有灵论或神人同形同性规则所体现出的迅速性、迫切性和专一性程度而定。在任何情况下，万物有灵习惯的作用总是使对因果关系的评价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和神人同形同性论的高级形态比起来，早期不太复杂的、不太明确的万物有灵观念对个人智力过程

的影响应当更加普遍深入。只要万物有灵习惯是以朴素的形态存在的，它的应用范围和限度就是不确定的，就是没有界限的。因此，只要一个人必须处理生活物质资料，这种习惯在这个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明显地影响到他的思想。万物有灵观念后期较为成熟的发展形态，通过神人同形同性观念的完善，已经确定下来；它所应用的范围已经以较为稳定的方式被限制在遥不可及的、无形的事物上，于是，人们可以对越来越多的日常事实做出临时性解释，而不必借助于万物有灵论自我表现的超自然力量了。高度完整的、人格化的超自然力量并不是处理生活琐碎事件的便利手段，因此，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即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许多琐碎或世俗的现象。除非特殊刺激或困惑重新唤起了个人对超自然力量的忠贞，由于不加留意，对于琐碎事件给出的这种临时性解释都被认为是可靠的。但是，一旦出现特殊要求，也就是说，一旦特别需要充分地、自由地利用因果律时，如果一个人具有神人同形同性观念，他就往往会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将它视为解释问题的万能良药。

The extra-causal propensity or agent has a very high utility as recourse in perplexity, but its utility is altogether of a non-economic kind. It is especially a refuge and a fund of comfort where it has attained the degree of consistency and specialization that belongs to an anthropomorphic divinity. It has much to commend it even on other grounds than that of affording the perplexed individual a means of escape from the difficulty of accounting for phenomena in terms of causal sequence. It would scarcely be in place here to dwell on the obvious and well-accepted merits of an anthropomorphic divinity, as see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esthetic, moral, or spiritual interest, or even as seen from the less remote standpoint of political, military, or social policy. The question here concerns the less picturesque and less urgent economic value of the belief in such a preternatural agency, taken as a habit of thought which affects the industrial serviceability of

the believer. And even within this narrow, economic range, the inquiry is perforce confined to the immediate bearing of this habit of thought upon the believer's workmanlike serviceability, rather than extended to include its remoter economic effects. These remoter effects are very difficult to trace. The inquiry into them is so encumbered with current preconceptions as to the degree in which life is enhanced by spiritual contact with such a divinity, that any attempt to inquire into their economic value must for the present be fruitless.

这种超因果的本性或力量，作为解决困惑的手段，具有非常高的功用，但是，它的功用是完全属于非经济性质的。一旦这种本性和力量达到了神人同形同性的神祇所具有的稳定性和专门性时，它就尤其可能会成为一个避难所和安乐窝。它是困惑之人的一个逃避方式，可以逃避用因果关系解释现象的困难；除此之外，它还有许多其他值得推荐的理由。神人同形同性观念中的神祇，从美学、道德或精神利益的观点来看，甚至从政治、军事和社会政策等较为间接的观点来看，都具有许多明显的、公认的优点；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应当对这些优点进行详细的论述。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问题是，对这种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作为影响信仰者生产实用性的思维习惯，其所具有的不甚明显、不甚迫切的经济价值如何。即使是在这一狭隘的经济范围内，此处的探讨也不得不局限于这种思维习惯对信仰者在劳动适用性方面产生的影响，而不能扩大到将它的间接经济影响也包含在内。要找出这些间接的经济影响是极其困难的。与这样一位神祇接触能够将生活提高到何种程度，关于这个问题的先入之见会干扰我们对这些间接经济影响的探讨，因此，就目前而言，任何探讨其经济价值的尝试必然是徒劳无果的。

The immediate, direct effect of the animistic habit of thought upon the general frame of mind of the believer goes in the direction

of lowering his effective intelligence in the respect in which intelligence is of especial consequence for modern industry. The effect follows, in varying degree, whether the preternatural agent or propensity believed in is of a higher or a lower cast. This holds true of the barbarian's and the sporting man's sense of luck and propensity, and likewise of the somewhat higher developed belief in an anthropomorphic divinity, such as is commonly possessed by the same class. It must be taken to hold true also—though with what relative degree of cogency is not easy to say—of the more adequately developed anthropomorphic cults, such as appeal to the devout civilized man. The industrial disability entailed by a popular adherence to one of the higher anthropomorphic cults may be relatively slight, but it is not to be overlooked. And even these high-class cults of the Western culture do not represent the last dissolving phase of this human sense of extra-causal propensity. Beyond these the same animistic sense shows itself also in such attenuations of anthropomorphism as the eighteenth-century appeal to an order of nature and natural rights, and in their modern representative, the ostensibly post-Darwinian concept of a meliorative trend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This animistic explanation of phenomena is a form of the fallacy which the logicians knew by the name of *ignava ratio* . For the purposes of industry or of science it counts as a blunder in the apprehension and valuation of facts.

万物有灵论的思维习惯对信仰者的一般心绪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他在某方面的有效智力，而在这方面，智力对现代工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无论人们信仰的超自然力量或超自然本性属于较高形态还是较低形态，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效果。蛮夷人和运动爱好者，其运气和事物本性的观念也是如此；对神人同形同性观念下的神祇较为高级的信仰也是如此，这通常是蛮夷人和运动爱好者所具有的信仰。

这种说法也适用于某些发展较为充分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教派，这些教派对虔诚的现代文明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这种说法的可靠程度如何却难以肯定。大量民众信奉某一较高级的神人同形同性教派，因此而丧失的生产能力是较为轻微的，但是这一点不容忽视。即使是西方文化中这些高级形态的教派，也不是超因果本性这一人类观念即将消失的最后阶段。除此之外，同样的万物有灵观念也在神人同形同性论冲淡了的形态中表现出来，例如18世纪对自然秩序和天赋权利的诉求；它也在这些形态现代的代表——关于进化过程中在改良本性表面上的后达尔文观念中表现出来。这种从万物有灵观念的角度对现象做出的解释是某种谬论的一种形式，逻辑学家称这种谬论为“理性的愚蠢”。就生产和科学的目的而言，这种谬论可以说是在理解和评价事物时所犯下的一个大错。

Apart from its direct industrial consequences, the animistic habit has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economic theory on other grounds. (1) It is a fairly reliable indication of the presence, and to some extent even of the degree of potency, of certain other archaic traits that accompany it and that are of substantial economic consequence; and (2) the material consequences of that code of devout proprieties to which the animistic habit gives r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anthropomorphic cult are of importance both *(a)* as affecting the community's 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the prevalent canons of taste, as already suggested in an earlier chapter, and *(b)* by inducing and conserving a certain habitual recognition of the relation to a superior, and so stiffening the current sense of status and allegiance.

万物有灵的习惯，除了其对工业的直接影响外，基于其他原因，对于经济理论还有某种重要意义。（1）这种习惯的存在是一种较为可靠的标志，可以表明其他某些古老特征的存在，甚至可以在某种程

度上表明这些古老特征的力量的强弱，这些古老特征是和这种习惯相伴而生的，因而具有实质性的经济意义；（2）万物有灵习惯产生了宗教礼仪准则，这一准则在神人同形同性教派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后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意义在于（a）影响到社会对物品的消费和流行的品位准则，这一点前面章节已经提及；（b）导致并保持对与上级关系的某种习惯性认可，从而强化了关于身份和忠诚的流行观念。

As regards the point last named *(b)* , that body of habits of thought which makes up the character of any individual is in some sense an organic whole. A marked variation in a given direction at any one point carries with it, as its correlative, a concomitant variation in the habitual expression of life in other directions or other groups of activities. These various habits of thought, or habitual expressions of life, are all phases of the single life sequence of the individual; therefore a habit formed in response to a given stimulus will necessarily affect the character of the response made to other stimuli. A modification of human nature at any one point is a modification of human nature as a whole. On this ground, and perhaps to a still greater extent on obscurer grounds that cannot be discussed here, there are these concomitant variations as between the different traits of human nature. So, for instance, barbarian peoples with a well-developed predatory scheme of life are commonly also possessed of a strong prevailing animistic habit, a well-formed anthropomorphic cult, and a lively sense of status. On the other hand, anthropomorphism and the realizing sense of an animistic propensity in material things are less obtrusively present in the life of the peoples at the cultural stages which precede and which follow the barbarian culture. The sense of status is also feebler; on the whole, in peaceable communities. It is to be remarked that a lively, but slightly specialized, animistic belief is to

be found in most if not all peoples living in the ante-predatory, savage stage of culture. The primitive savage takes his animism less seriously than the barbarian or the degenerate savage. With him it eventuates in fantastic myth-making, rather than in coercive superstition. The barbarian culture shows sportsmanship, status, and anthropomorphism. There is commonly observable a like concomitance of variations in the same respects in the individual temperament of men in the civilized communities of to-day. Those modern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redaceous barbarian temper that make up the sporting element are commonly believers in luck; at least they have a strong sense of an animistic propensity in things, by force of which they are given to gambling. So also as regards anthropomorphism in this class. Such of them as give in their adhesion to some creed commonly attach themselves to one of the naively and consistently anthropomorphic creeds;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porting men who seek spiritual comfort in the less anthropomorphic cults, such as the Unitarian or the Universalist.

就上面最后提到的（b）这一点而言，构成任何个人性格的那类思维习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有机整体。如果生活的习惯表现在某一时刻的某一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在这类表现的其他方面或者在其他各类活动中，也将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些不同的思维习惯或者说生活的习惯表现所体现的是个人单一生活进程的所有方面；因此，由于对某种刺激做出反应而养成的习惯必然会影响到对其他刺激做出反应而形成的性格。对人类性格的任意一点做出修正，都是对整体人类性格做出修正。基于这一理由，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还基于某些更加模糊的理由（这些理由是无法在此处探讨的），人类性格的不同特征之间就有了这种伴随的变化。例如，在充分发展的掠夺型生活方式下生活的蛮夷人，往往也都具有强烈而又普遍的万物有灵习惯，拥有一个形态较为完善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教派，还具有敏锐的身份意识。另一方面，在那些处于蛮夷文化之前和之后各文化阶段

的民族的生活中，神人同形同性论和关于物质的万物有灵现实观念并没有那么明显。总的来说，在和平的社会里，身份的意识也更为薄弱。有一点应当注意，那些生活在掠夺时期以前的野蛮文化阶段的民族，如果不是全部也至少是大多数都存在着一种活跃的、却又略微专门化的万物有灵信仰。一个原始的野蛮人对待他的万物有灵信仰没有蛮夷人或退化了的野蛮人那么认真。在原始的野蛮人身上，万物有灵信仰最终变成了奇妙的神话创作，而不是具有强制性的迷信。而蛮夷文化所表现的是运动精神、身份制和神人同形同性信仰。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其气质中也往往可以看到和以上几方面类似的伴生性变异。这些现代的代表人物具有构成运动竞赛因素的掠夺型蛮夷气质，他们往往是运气的信仰者；至少他们都具有一种强烈的观念，认为事物都具有万物有灵本性，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热衷于赌博。这类人的神人同形同性信仰也是如此。如果他们要皈依某一教派，他们往往会选择较为朴素、较为稳定的教派之一，而这个教派所信奉的是神人同形同性论；运动爱好者，很少会从诸如唯一神教或普遍论者等神人同形同性信仰较为淡薄的教派中寻求精神慰藉。

Closely bound up with this correlation of anthropomorphism and prowess is the fact that anthropomorphic cults act to conserve, if not to initiate, habits of mind favorable to a regime of status. As regards this point, it is quite impossible to say where the disciplinary effect of the cult ends and where the evidence of a concomitance of variations in inherited traits begins. In their finest development, the predatory temperament, the sense of status, and the anthropomorphic cult all together belong to the barbarian culture; and something of a mutual causal relation subsists between the three phenomena as they come into sight in communities on that cultural level. The way in which they recur in correlation in the habits and attitudes of individuals and classes to-day goes far to imply a like causal or organic relation between the same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considered as traits or habits of the

individual. It has appeared at an earlier point in the discussion that the relation of status, as a feature of social structure,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predatory habit of life. As regards its line of derivation, it is substantially an elaborated expression of the predatory attitude. On the other hand, an anthropomorphic cult is a code of detailed relations of status superimposed upon the concept of a preternatural, inscrutable propensity in material things. So that, as regards the external facts of its derivation, the cult may be taken as an outgrowth of archaic man's pervading animistic sense, defined and in some degree transformed by the predatory habit of life, the result being a personified preternatural agency, which is by imputation endowed with a full complement of the habits of thought that characterize the man of the predatory culture.

神人同形同性论和勇武精神是相互关联的，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事实是，信仰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教派即使不能创造有利于身份制的思维习惯，也会保存这种思维习惯。就这一点而言，要想指明宗教的熏陶效果终于何处以及遗传性格特征中伴生变异的迹象始于何处，是不太可能的。掠夺气质、身份观念和神人同形同性信仰，在其最完善的形态下，都是属于蛮夷文化的；当这三种现象在处于蛮夷文化阶段的社会里出现时，彼此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些现象以相互关联的方式重新出现在现代各个人和各阶级的习惯和态度当中，其出现的方式进一步表明，被看作是个人性格特征或习惯的那些相同的心理现象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因果关系或有机联系。在先前的讨论中已经提到，身份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征，是掠夺型的生活习惯的一个结果。就其演变的路线而言，它实质上是掠夺态度的一个复杂的表现。另一方面，神人同形同性论信仰就是一种复杂的身份关系准则，这一准则被加在了有形物体具有超自然的、神秘莫测的本性这一观念上。因此，就其演变的外部事实而言，信仰可以看作是在古人身上普遍存在的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它通过掠夺生活而确定下来，并因为掠夺生活而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人格化

的超自然力量，这种力量被充分赋予了掠夺型文化下的人们所特有的思维习惯。

The grosser psychological features in the case, which have an immediate bearing on economic theory and are consequently to be taken account of here, are therefore: *(a)* as has appeared in an earlier chapter, the predatory, emulative habit of mind here called prowess is but the barbarian variant of the generically human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which has fallen into this specific form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habit of invidious comparison of persons; *(b)* the relation of status is a formal expression of such an invidious comparison duly gauged and graded according to a sanctioned schedule; *(c)* an anthropomorphic cult, in the days of its early vigor at least, is an institution the characteristic element of which is a relation of status between the human subject as inferior and the personified preternatural agency as superior. With this in mind, there should be no difficulty in recognizing the intimate relation which subsists between these three phenomena of human nature and of human life; the relation amounts to an identity in some of their substantial elements. On the one hand, the system of status and the predatory habit of life are an expression of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s it takes form under a custom of invidious comparis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anthropomorphic cult and the habit of devout observances are an expression of men's animistic sense of a propensity in material things, elaborat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substantially the same general habit of invidious comparison. The two categories—the emulative habit of life and the habit of devout observances—are therefore to be taken as complementary elements of the barbarian type of human nature and of its modern barbarian variants. They are expressions of much the same range of aptitudes, made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sets of

stimuli.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较为重要的心理特征与经济理论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应当予以讨论，这些心理特征包括：（a）掠夺与竞赛的思维习惯，正如前面章节已经提到的，我们此处称之为勇武精神，它只不过是人类所共有的技艺本能的蛮夷变体而已；它是在某种习惯的支配下而逐渐变成这一形态的，这种习惯就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歧视性对比的习惯；（b）身份关系，它是人与人之间歧视性对比的一种形式表现，这种歧视性对比是要按照得到认可的程序，进行适当的评估和分级；（c）神人同形同性信仰，它至少在其生机勃勃的早期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特色元素是一种身份关系，即人类主体为卑、人格化的超自然力量为尊的身份关系。记住了这一点，要理解人类性格和人类生活中这三种现象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就不难了；这种密切关系就是，这三种现象之间的某些重要元素是相同的。一方面，身份制度和掠夺型的生活习惯是技艺本能的一种表现，因为它是在歧视性对比下形成的；另一方面，神人同形同性信仰和宗教崇拜的习惯是人类万物有灵观念的一种表现，这种万物有灵观念认为有形物体是具有本性的，上述信仰和习惯实质上也是在同样的一般歧视性对比习惯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应当把竞赛的生活习惯和宗教崇拜的习惯这两个范畴看作是人类性格的蛮夷类型及其现代蛮夷变体的补充因素。两者都是对不同种类的刺激做出反应时，基本相同的本性所形成的不同表现。

Chapter XII Devout Observances

第十二章　宗教仪式

A discursive rehearsal of certain incidents of modern life will show the organic relation of the anthropomorphic cults to the barbarian culture and temperament. It will likewise serve to show how the survival and efficacy of the cults and the prevalence of their schedule of devout observances are related to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and to the springs of action underlying that institution. Without any intention to commend or to deprecate the practices to be spoken of under the head of devout observances, or the spiritual and intellectual traits of which these observances are the expression, the everyday phenomena of current anthropomorphic cults may be taken up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interest which they have for economic theory. What can properly be spoken of here are the tangible, external features of devout observances. The moral, as well as the devotional value of the life of faith lies outside of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 inquiry. Of course no question is here entertained as to the truth or beauty of the creeds on which the cults proceed. And even their remoter economic bearing cannot be taken up here; the subject is too recondite and of too grave import to find a place in so slight a sketch.

只需随意列举现代生活中的某些事件，就可以说明各种神人同形同性论信仰与蛮夷文化和蛮夷气质之间的有机联系。此举同样也可以用来说明这些信仰的残存和功效以及其宗教仪式程序的流行与有闲阶级制度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与有闲阶级制度背后的行为动机之间有

着怎样的关系。我们此处无意对宗教仪式的各种习惯做法或通过这些仪式表现出来的精神和智力特征加以褒贬，至于现存神人同形同性论信仰的日常现象，我们或许可以从它们对经济理论的意义这个角度来加以探讨。我们在此处能够详细探讨的，就是宗教仪式的那些有形的外部特征。而宗教信仰生活的道德价值以及宗教价值则不在当前讨论的范围之内。当然，至于这些教派提倡的教义所具有的真与美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也不打算论及。我们甚至不能对这些教义较为深远的经济意义加以探讨；因为这一话题过于深奥，意义过于重大，很难在短短的篇幅中解释清楚。

Something has been said in an earlier chapter as to the influence which pecuniary standards of value exert upon the processes of valuation carried out on other bases, not related to the pecuniary interest. The relation is not altogether one-sided. The economic standards or canons of valuation are in their turn influenced by extra-economic standards of value. Our judgments of the economic bearing of facts are to some extent shaped by the dominant presence of these weightier interests. There is a point of view, indeed, from which the economic interest is of weight only as being ancillary to these higher, non-economic interests. For the present purpose, therefore, some thought must be taken to isolate the economic interest or the economic bearing of these phenomena of anthropomorphic cults. It takes some effort to divest oneself of the more serious point of view, and to reach an economic appreciation of these facts, with as little as may be of the bias due to higher interests extraneous to economic theory.

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约略讲到金钱价值标准对某些评价过程所产生的影响，这些评价过程所依据的其他标准是和金钱利益无关的。这种关系绝不是单向的。各种经济标准或评价准则反过来也会受到经济

以外的价值标准的影响。我们对事物经济意义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那些居于主导地位的、更为重要的利益的影响。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经济的利益，只有在它有助于那些更高层次的非经济利益时，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就当前研究的目的而言，必须想办法将神人同形同性论信仰的这些现象所具有的经济利益和经济意义隔离开来。要让自己摆脱较为严肃的观点，并从经济上对这些事实做出评价而尽可能不受因经济理论以外更高利益的影响，是需要花费一些精力的。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sporting temperament, it has appeared that the sense of an animistic propensity in material things and events is what affords the spiritual basis of the sporting man's gambling habit. For the economic purpose, this sense of propensity is substantially the same psychological element as expresses itself, under a variety of forms, in animistic beliefs and anthropomorphic creeds. So far as concerns those tangible psychological features with which economic theory has to deal, the gambling spirit which pervades the sporting element shades off by insensible gradations into that frame of mind which finds gratification in devout observances. As see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conomic theory, the sporting character shades off into the character of a religious devotee. Where the betting man's animistic sense is helped out by a somewhat consistent tradition, it has developed into a more or less articulate belief in a preternatural or hyperphysical agency, with something of an anthropomorphic content. And where this is the case, there is commonly a perceptible inclination to make terms with the preternatural agency by some approved method of approach and conciliation. This element of propitiation and cajoling has much in common with the crasser forms of worship—if not in historical derivation, at least in actual psychological content. It obviously shades off in unbroken continuity into what is recognized

as superstitious practice and belief, and so asserts its claim to kinship with the grosser anthropomorphic cults.

在讨论运动气质时，我们曾经提到，万物有灵观念认为一切有形事物或事件都是具有本性的，而为运动爱好者所具有的赌博习性提供精神基础的正是这一观念。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万事万物皆有本性的观念，实质上与万物有灵信仰以及神人同形同体论的教义以不同形态表现出来的精神元素是相同的。就那些经济理论必须论及的具体心理特征而言，那些充斥于运动元素中的赌博精神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可以通过宗教仪式得到满足。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体育竞赛的性格逐渐变成了一个宗教信徒的性格。只要一个赌徒的万物有灵观念得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传统的支持，它就会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明确的信仰，这种信仰所相信的是超自然的或超物质的力量，其间还具有某些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一种明显的本性，即通过某种公认的亲近及安抚方式，与这种超自然的力量达成妥协。这种安抚和谄媚哄骗的元素与较为粗糙的崇拜方式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即使不是在历史渊源方面，也至少在实际心理内容方面是这样的。它逐渐地、连续不断地转变为我们所见到的迷信习俗和迷信信仰，因此可以断言，它和较为粗糙的神人同形同性信仰是一脉相承的。

The sporting or gambling temperament, then, comprises some of the substantial psychological elements that go to make a believer in creeds and an observer of devout forms, the chief point of coincidence being the belief in an inscrutable propensity or a preternatural interposition in the sequence of events. For the purpose of the gambling practice the belief in preternatural agency may be, and ordinarily is, less closely formulated, especially as regards the habits of thought and the scheme of life imputed to the preternatural agent; or, in other words, as regards his moral

character and his purposes in interfering in ev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individuality or personality of the agency whose presence as luck, or chance, or hoodoo, or mascot, etc., he feels and sometimes dreads and endeavors to evade, the sporting man's views are also less specific, less integrated and differentiated. The basis of his gambling activity is, in great measure, simply an instinctive sense of the presence of a pervasive extraphysical and arbitrary force or propensity in things or situations, which is scarcely recognized as a personal agent. The betting man is not infrequently both a believer in luck, in this naive sense, and at the same time a pretty staunch adherent of some form of accepted creed. He is especially prone to accept so much of the creed as concerns the inscrutable power and the arbitrary habits of the divinity which has won his confidence. In such a case he is possessed of two, or sometimes more than two, distinguishable phases of animism. Indeed, the complete series of successive phases of animistic belief is to be found unbroken in the spiritual furniture of any sporting community. Such a chain of animistic conceptions will comprise the most elementary form of an instinctive sense of luck and chance and fortuitous necessity at one end of the series, together with the perfectly developed anthropomorphic divinity at the other end, with all intervening stages of integration. Coupled with these a belief in preternatural agency goes an instinctive shaping of conduct to conform with the surmised requirements of the lucky chance on the one hand and a more or less devout submission to the inscrutable decrees of the divinity on the other hand.

由此可见，运动气质或赌博气质中含有宗教信徒或宗教仪式奉行者所具有的主要心理元素，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认为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神秘莫测的本性或超自然的干预。就赌博这类行为而言，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也许没有那么系统，而且往往没有那

么系统，有些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源于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其情况尤其如此；也就是说，赌徒的品性和他干涉事件进程的目的并没有那么系统。至于以运气、机会、凶兆或吉兆等形式存在的力量，一个参加运动竞赛的人是能够感觉得到的，他有时候会对此感到恐惧并力图逃避，因此，他对这种力量的个性或品格的看法也不是那么明确、那么完整细致的。赌徒赌博活动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本能的意识，即事物和情形当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超物质的、强制性的力量或本性，这绝不是一种人类的力量。赌徒往往既是朴素意义上的运气的信仰者，同时也是某一公认教义的相当忠实的信徒。他特别容易接受某部分教义，这部分教义涉及的是，他所信奉的神祇具有神秘莫测的力量和主观独断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具有了两种（有时还不止两种）不同形态的万物有灵观念。事实上，在任何运动竞赛社会的精神构造中，都可以找到万物有灵观念一整套连续的形态。在这一连串的万物有灵观念中，一端是本能意识的最基本形态，这种本能意识是关于运气、机会和偶然中的必然的；另一端则是神人同形同性信仰中的神祇的充分发展形态，还包括整个系列的中间阶段。与这些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同时存在的，一方面是要本能地使得行为符合幸运机会的假想要求，另一方面要对神秘莫测的神谕持有相当虔诚的服从态度。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in this respect between the sporting temperament and the temperament of the delinquent classes; and the two are related to the temperament which inclines to an anthropomorphic cult. Both the delinquent and the sporting man are on the average more apt to be adherents of some accredited creed, and are also rather more inclined to devout observances, than the general average of the community. It is also noticeable that unbelieving members of these classes show more of a proclivity to become proselytes to some accredited faith than the average of unbelievers. This fact of observation is avowed by the spokesmen of sports, especially in apologizing for the more naively predatory

athletic sports. Indeed, it is somewhat insistently claimed as a meritorious feature of sporting life that the habitual participants in athletic games are in some degree peculiarly given to devout practices. And it is observable that the cult to which sporting men and the predaceous delinquent classes adhere, or to which proselytes from these classes commonly attach themselves, is ordinarily not one of the so-called higher faiths, but a cult which has to do with a thoroughly anthropomorphic divinity. Archaic, predatory human nature is not satisfied with abstruse conceptions of a dissolving personality that shades off into the concept of quantitative causal sequence, such as the speculative, esoteric creeds of Christendom impute to the First Cause, Universal Intelligence, World Soul, or Spiritual Aspect. As an instance of a cult of the character which the habits of mind of the athlete and the delinquent require, may be cited that branch of the church militant known as the Salvation Army. This is to some extent recruited from the lower-class delinquents, and it appears to comprise also, among its officers especially, a larger proportion of men with a sporting record than the proportion of such men in the aggregate population of the community.

在这一方面，运动气质和惯犯阶级的气质是有联系的；两者都与本性于神人同形同性论信仰的气质有关。一般来说，惯犯和运动爱好者，比起社会中的一般民众，都更加容易成为某一公认教义的信徒，也都更加乐于从事宗教仪式。我们还会发现，这两类人当中没有信仰的成员比一般没有信仰的人更容易成为某一公认教义的皈依者。这一观察到的事实得到了运动竞赛代言人的公开承认，尤其是在他们为较为朴素的掠夺型体育竞赛进行辩护的时候。实际上，经常从事体育竞赛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尤其热衷于宗教活动；而有些人坚称这正是运动竞赛生活的一个值得赞誉的特征。我们会发现，运动爱好者和掠夺型惯犯阶级所持有的信仰，或者这两类人中的皈依者通常持有的信仰，

往往都不是所谓的高级信仰，而是一种对不折不扣的神人同形同性的神祇的信仰。古老的掠夺型的人类性格是不能满足于某些深奥概念的，在这类概念中，人格逐渐消失而转化为定量因果关系概念，例如，基督教世界纯理论的、晦涩难懂的教义，它们将事物归因于造物主、万能之神、宇宙之灵或心灵之界等。有一类教派，具有运动爱好者和惯犯所要求的性质，战斗教会的分支教派，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救世军”，便是一个例子。这支救世军的部分成员是从下层阶级惯犯中招募来的，而在其军官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具有从事运动竞赛活动的背景，这类人在救世军中所占的比例要比他们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大。

College athletics afford a case in point. It is contended by exponents of the devout element in college life—and there seems to be no ground for disputing the claim—that the desirable athletic material afforded by any student body in this country is at the same time predominantly religious; or that it is at least given to devout observances to a greater degree than the average of those students whose interest in athletics and other college sports is less. This is what might be expected on theoretical grounds. It may be remarked, by the way, that from one point of view this is felt to reflect credit on the college sporting life, on athletic games, and on those persons who occupy themselves with these matters. It happens not infrequently that college sporting men devote themselves to religious propaganda, either as a vocation or as a by-occupation; and it is observable that when this happens they are likely to become propagandists of some one of the more anthropomorphic cults. In their teaching they are apt to insist chiefly on the personal relation of status which subsists between an anthropomorphic divinity and the human subject.

大学中的体育竞赛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大学生活中宗教成员的拥护者们辩称，本国的任何学生团体所提供的优秀体育人才都是笃信宗教的，比起那些对体育竞赛和其他形式的大学运动不太感兴趣的一般学生，他们更加热衷宗教活动；我们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去反驳这一说法。这也是根据理论可以得出的观点。我们在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从某一观点来看，这种观点可以为大学运动竞赛生活、体育竞技活动和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增添荣誉。大学从事运动竞赛活动的人往往会致力于宗教宣传，以此作为一种职业或副业；我们还发现，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往往会成为神人同形同性色彩较为浓厚的某一教派的宣传者。在布道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强调神人同形同性的神祇与人类之间的身份关系。

This intimate relation between athletics and devout observance among college men is a fact of sufficient notoriety; but it has a special feature to which attention has not been called, although it is obvious enough. The religious zeal which pervades much of the college sporting element is especially prone to express itself in an unquestioning devoutness and a naive and complacent submission to an inscrutable Providence. It therefore by preference seeks affiliation with some one of those lay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which occupy themselves with the spread of the exoteric forms of faith—*as, e.g.* ,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r the Young People's Society for Christian Endeavor. These lay bodies are organized to further “practical” religion; and as if to enforce the argument and firmly establish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orting temperament and the archaic devoutness, these lay religious bodies commonly devote some appreciable portion of their energies to the furtherance of athletic contests and similar games of chance and skill. It might even be said that sports of this kind are apprehended to have some efficacy as a means of grace. They are apparently useful as a means of proselyting, and as a means of

sustaining the devout attitude in converts once made. That is to say, the games which give exercise to the animistic sense and to the emulative propensity help to form and to conserve that habit of mind to which the more exoteric cults are congenial. Hence, in the hands of the lay organizations, these sporting activities come to do duty as a novitiate or a means of induction into that fuller unfolding of the life of spiritual status which is the privilege of the full communicant along.

在大学生身上，体育竞赛和宗教活动之间存在着这种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但是这种关系中还有一个特点，虽然足够明显，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宗教热忱普遍存在于大学中从事运动竞赛的成员身上，这种热忱尤其容易表现在对神秘莫测的上帝的绝对虔诚和心悦诚服的顺从上。因此，这种热诚首先会和某一世俗的宗教组织相结合，而这些世俗的宗教组织是以传播通俗的信仰形式为己任的，例如，基督教青年会或者基督教青年力行会等等。成立这些世俗团体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实用”宗教的发展；好像是为了强化这一观点，并在运动竞赛气质和古老的宗教信仰之间牢固地树立起密切的关系，这些世俗的宗教团体往往会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推动体育竞赛和各种类似的、需要凭借机会与技巧取胜的竞赛上。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这类运动竞赛被当成了一种求取神恩的有效手段。它们是明显有用的，可以作为一种招募皈依者的手段，也可以当作皈依之后维持虔诚态度的手段。也就是说，需要运用万物有灵观念和竞赛本性的运动竞赛有助于某种思维习惯的形成和保持，这种思维习惯是和较为通俗的教派相投合的。因此，在世俗宗教组织那里，这些运动竞赛活动成了修道的见习场所，成了引导人们更充分地开展精神地位生活的一个手段，这种精神地位是完全有资格领受圣餐的信徒所具有的特权。

That the exercise of the emulative and lower animistic

proclivities are substantially useful for the devout purpose seems to be placed beyond question by the fact that the priesthood of many denominations is following the lead of the lay organizations in this respect. Those ecclesiastical organizations especially which stand nearest the lay organizations in their insistence on practical religion have gone some way towards adopting these or analogous practic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devout observances. So there are “boys' brigad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under clerical sanction, acting to develop the emulative proclivity and the sense of status in the youthful members of the congregation. These pseudo-military organizations tend to elaborate and accentuate the proclivity to emulation and invidious comparison, and so strengthen the native facility for discerning and approving the relation of personal mastery and subservience. And a believer is eminently a person who knows how to obey and accept chastisement with good grace.

竞赛本性或较低级的万物有灵本性的运用，对宗教目的而言，是非常有用的；还有一个事实似乎使得这一点更加确定无疑，那就是，许多教派的神职人员效法世俗组织在这方面的榜样。这些教会组织，尤其是那些在坚持实用性宗教的立场上与世俗组织站得最近的教会组织，已经向着采取与传统宗教仪式有关的这类措施或与之类似的措施迈进了一步。这样，在教会的认可下，就出现了许多“基督少年军”和其他组织，其作用是培养会众中青年成员的竞赛本性和身份观念。这些准军事组织往往会发展并加强进行竞赛和歧视性对比的本性，从而增强了这种与生俱来的、对人际间主从关系进行识别和认可的能力。一个宗教信徒一定是一位知道如何以优雅的方式服从并接受惩罚的人。

But the habits of thought which these practices foster and conserve make up but one half of the substance of the

anthropomorphic cults. The other, complementary element of devout life—the animistic habit of mind—is recruited and conserved by a second range of practices organized under clerical sanction. These are the class of gambling practices of which the church bazaar or raffle may be taken as the type. As indicating the degree of legitimacy of these practices in connection with devout observances proper, it is to be remarked that these raffles, and the like trivial opportunities for gambling, seem to appeal with more effect to the common run of the members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than they do to persons of a less devout habit of mind.

但是，通过这些措施培养和保持的思维习惯只构成了神人同形同性信仰内容的一半。宗教生活的另一个补充元素是万物有灵观念，它是通过教会认可的另一系列措施来培养和保持的。这些措施是属于赌博类型的，教堂义卖会或抽彩售货会都可以看作是这类措施的典型例子。为了说明这些与纯宗教活动相关的措施的合理程度，我们应当指出，抽彩售货，或者类似的微不足道的赌博机会，似乎会对宗教组织里的一般成员更具吸引力，而对宗教观念比较淡薄的人来说，它们的吸引力却要小一些。

All this seems to argue, on the one hand, that the same temperament inclines people to sports as inclines them to the anthropomorphic cult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the habituation to sports, perhaps especially to athletic sports, acts to develop the propensities which find satisfaction in devout observances. Conversely; it also appears that habituation to these observances favors the growth of a proclivity for athletic sports and for all games that give play to the habit of invidious comparison and of the appeal to luck. Substantially the same range of propensities finds expression in both these directions of the spiritual life. That

barbarian human nature in which the predatory instinct and the animistic standpoint predominate is normally prone to both. The predatory habit of mind involves an accentuated sense of personal dignity and of the relative standing of individuals.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which the predatory habit has been the dominant factor in the shaping of institutions is a structure based on status. The pervading norm in the predatory community's scheme of life is the relation of superior and inferior, noble and base, dominant and subservient persons and classes, master and slave. The anthropomorphic cults have come down from that stag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have been shaped by the same scheme of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a differentiation into consumer and producer—and they are pervaded by the same dominant principle of mastery and subservience. The cults impute to their divinity the habits of thought answering to the stage of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at which the cults took shape. The anthropomorphic divinity is conceived to be punctilious in all questions of precedence and is prone to an assertion of mastery and an arbitrary exercise of power—a habitual resort to force as the final arbiter.

上面所说的这一切似乎是在证明：一方面，使人们热衷于运动的气质也就是使他们本性于神人同形同性信仰的气质；另一方面，从事运动的习惯，特别是从事体育的习惯，能够培养某些本性，这些本性可以从宗教活动中得到满足。反过来说，宗教信仰的习惯似乎也有助于体育运动和所有竞技活动的偏好的发展，而这些竞技活动使得歧视性对比的习惯和祈求运气的习惯有了发挥的机会。实际上，属于同一范畴的各种本性，可以在精神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得到表现。受掠夺本能和万物有灵观念支配的蛮夷人类性格通常是本性于这两个方面的。掠夺型心理习惯涉及的是一种强烈的个人尊严和个人相对地位意识。如果在一种社会结构中，掠夺习惯是影响各种制度建立的主导因素，那么这种社会结构就是一种建立在身份制基础上的结构。在掠夺型社

会的生活方式中，普遍的准则是上下级关系、尊卑关系、个人和阶级的统治与服从关系以及主仆关系。神人同形同性信仰就是从这一生产发展阶段沿袭而来的，也是在统一经济分化方式下（分化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形成的，这些信仰中都渗入了统治与服从这一相同的主导原则。这些信仰赋予他们的神祇某些思维习惯，这些思维习惯是与它们形成时的经济分化阶段相适应的。神人同形同性的神祇被认为在一切有关尊卑的问题上都是一丝不苟的，他们往往会主张其统治地位，并会强制性使用武力——他们习惯于以最后裁决者的身份使用武力。

In the later and maturer formulations of the anthropomorphic creed this imputed habit of dominance on the part of a divinity of awful presence and inscrutable power is chastened into “the fatherhood of God.” The spiritual attitude and the aptitudes imputed to the preternatural agent are still such as belong under the regime of status, but they now assume the patriarchal cast characteristic of the quasi-peaceable stage of culture. Still it is to be noted that even in this advanced phase of the cult the observances in which devoutness finds expression consistently aim to propitiate the divinity by extolling his greatness and glory and by professing subservience and fealty. The act of propitiation or of worship is designed to appeal to a sense of status imputed to the inscrutable power that is thus approached. The propitiatory formulas most in vogue are still such as carry or imply an invidious comparison. A loyal attachment to the person of an anthropomorphic divinity endowed with such an archaic human nature implies the like archaic propensities in the devotee. For the purposes of economic theory, the relation of fealty, whether to a physical or to an extraphysical person, is to be taken as a variant of that personal subservience which makes up so large a share of the predatory and the quasi-peaceable scheme of life.

在后期较为成熟的神人同形同性教义中，赋予威灵显赫且具有神秘莫测的力量的神祇这种统治的习惯，已经变成了更为柔和的“上帝的父权”。赋予超自然力量的精神态度和各种本性依然没有超越身份制的藩篱，不过它们已经带上了准和平文化阶段所特有的那种父权特色。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一点，即使是在信仰的这一高级阶段，用于表现虔诚之心的各种宗教仪式，其一贯的目的在于，通过颂扬神的伟大与荣耀，通过宣誓顺从与效忠，来取悦这位神祇。所要亲近的这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具有身份观念，取悦与崇拜的行为都是为了迎合这种观念的。最为流行的取悦方式依然是那些歧视性对比或具有歧视性对比意味的方式。神人同形同性的神祇具有古老的人类性格，对他表示忠诚爱戴就意味着这位信徒也具有相同的古老性格本性。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效忠关系，不论是对有形的凡人的效忠，还是对超物质的神祇的效忠，都应当看作是个人奴性的一个变体，这种奴性是掠夺型生活方式和准和平生活方式的一个极其显著的构成元素。

The barbarian conception of the divinity, as a warlike chieftain inclined to an overbearing manner of government, has been greatly softened through the milder manners and the soberer habits of life that characterize those cultural phases which lie between the early predatory stage and the present. But even after this chastening of the devout fancy and the consequent mitigation of the harsher traits of conduct and character that are currently imputed to the divinity, there still remains in the popular apprehension of the divine nature and temperament a very substantial residue of the barbarian conception. So it comes about, for instance, that in characterizing the divinity and his relations to the process of human life, speakers and writers are still able to make effective use of similes borrowed from the vocabulary of war and of the predatory manner of life, as well as of locutions which involve an invidious comparison. Figures of speech of this import are used with good effect even in addressing the less warlike modern audiences, made up of

adherents of the blander variants of the creed. This effective use of barbarian epithets and terms of comparison by popular speakers argues that the modern generation has retained a lively appreciation of the dignity and merit of the barbarian virtues; and it argues also that there is a degree of congruity between the devout attitude and the predatory habit of mind. It is only on second thought, if at all, that the devout fancy of modern worshippers revolts at the imputation of ferocious and vengeful emotions and actions to the object of their adoration. It is a matter of common observation that sanguinary epithets applied to the divinity have a high aesthetic and honorific value in the popular apprehension. That is to say, suggestions which these epithets carry are very acceptable to our unreflecting apprehension.

在蛮夷人的概念中，神祇是一位威震四方、不可一世的好战首领，而在早期掠夺阶段和现代之间的那些文化阶段，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温和，生活习惯更加沉稳，经过它们的洗礼，神祇的概念已经变得比以前柔和了许多。对于神的想象经历了这种变化，当时赋予神祇的那些较为粗暴的行为和性格特征也因此有所减弱；但是，即使如此，在人们对于神祇的性格和气质的理解中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蛮夷概念的残余。例如，在描绘神祇以及他与人类生活进程之间的关系时，演说者和作家依然能够有效地使用某些明喻和惯用语，这些明喻是从涉及战争和掠夺型生活方式的词汇中借来的，而这些惯用语则是与歧视性对比有关的。有些不太好战的现代观众所信奉的是比较温和的教义，即使是在他们面前使用具有这种意蕴的辞藻，也会产生较好的效果。一般的演讲者可以有效使用这些蛮夷性质的表述词语和用于歧视性对比的术语，这说明我们这一代人对蛮夷品质特征所具有的尊贵和优点依然赞赏有加；这也说明宗教态度和掠夺型心理习惯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现代信徒，只有在进一步思考之后，才会反对将凶残和复仇的情感和行为赋予他们所崇拜的对象。有一点是司空见惯的：在一般人看来，用于描绘神祇的血腥词语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和荣誉价

值。也就是说，在我们没有仔细思考的情况下，这些词语所包含的意蕴是我们极易接受的。

Mine eyes have seen the glory of the coming of the Lord:

我亲眼目睹了我主降临的荣耀；

He is trampling out the vintage where the grapes of wrath are stored;

他正在肃清那遭天谴的败类；

He hath loosed the fateful lightning of his terrible swift sword;

他那令人心寒的利剑发出了致命的光芒；

His truth is marching on.

他的真理正在前进。

The guiding habits of thought of a devout person move on the plane of an archaic scheme of life which has outlived much of its usefulness for the economic exigencies of the collective life of to-

day. In so far as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fits the exigencies of the collective life of to-day, it has outlived the regime of status, and has no use and no place for a relation of personal subservience. So far as concerns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the community, the sentiment of personal fealty, and the general habit of mind of which that sentiment is an expression, are survivals which cumber the ground and hinder an adequate adjustment of human institutions to the existing situation. The habit of mind which best lends itself to the purposes of a peaceable, industrial community, is that matter-of-fact temper which recognizes the value of material facts simply as opaque items in the mechanical sequence. It is that frame of mind which does not instinctively impute an animistic propensity to things, nor resort to preternatural intervention as an explanation of perplexing phenomena, nor depend on an unseen hand to shape the course of events to human us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highest economic efficiency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the world process must habitually be apprehended in terms of quantitative, dispassionate force and sequence.

一个宗教信徒，其居于主导地位的思维习惯是在古老生活方式的水平上活动的，对于现代集体生活的经济要求来说，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经济组织是要和现代集体生活的要求相适应的，就这一点而言，身份制已经过时，个人奴役关系已经失去作用，没有了存在的空间。对社会的经济效率来说，个人忠诚的情感以及表现这种情感的心理习惯都是上述生活方式的残余，它们妨碍了为适应当前局势而对人类制度做出的适当调整。最能适应和平工业社会要求的心理习惯就是那种实事求是的性情，具有这种性情的人只是把有形事物当作机械因果关系中不甚清楚的一环来认识其价值的。正是这种心理习惯，才不会本能地赋予各种事物万物有灵本性，才不会借助于超自然力量的干预来解释难以理解的现象，也不会依靠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影响事件的进程以供人类使用。要满足现代条件下最高经济

效率的要求，必然会经常使用定量的、不带丝毫感情的力量和因果关系来解释世界进程。

As see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later economic exigencies, devoutness is, perhaps in all cases, to be looked upon as a survival from an earlier phase of associated life—a mark of arrested spiritual development. Of course it remains true that in a community where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s still substantially a system of status; where the attitude of the average of persons in the community is consequently shaped by and adapted to the relation of personal dominance and personal subservience; or where for any other reason—of tradition or of inherited aptitude—the population as a whole is strongly inclined to devout observances; there a devout habit of mind in any individual, not in excess of the average of the community, must be taken simply as a detail of the prevalent habit of life. In this light, a devout individual in a devout community cannot be called a case of reversion, since he is abreast of the average of the community. But as see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situation, exceptional devoutness—devotional zeal that rises appreciably above the average pitch of devoutness in the community—may safely be set down as in all cases an atavistic trait.

从近代经济要求的角度来看，似乎在一切情况下都应当把宗教信仰看作是团体生活早期阶段的残余，它是精神发展受到抑制的标志。当然，实际上，当社会的经济结构在实质上依然是种身份制度时，当社会中一般人的态度仍然受到个人统治与个人服从关系的左右，并且不得不适应这种关系，或者由于任何其他原因，如传统或遗传得来的本性，整个民族具有十分强烈的宗教本性时，任何个人的宗教心理习惯，如果不超过该社会的平均水平，就只能看作是流行生活习惯的一

个细节而已。按照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把一个宗教里的信徒看作是古老性格特征复归的一个范例，因为他和社会中的一般人是步调一致的。但是，从现代工业环境的角度来看，异乎寻常的虔诚——如果其宗教热忱明显高于该社会平均虔诚程度——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隔代遗传的性格特征。

It is, of course, equally legitimate to consider these phenomena from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They may be appreciated for a different purpose, and the characterization here offered may be turned about. In speaking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devotional interest, or the interest of devout taste, it may, with equal cogency, be said that the spiritual attitude bred in men by the modern industrial life is unfavorable to a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life of faith. It might fairly be objected to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process that its discipline tends to “materialism,” to the elimination of filial piety. From the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again, something to a similar purport might be said. But, however legitimate and valuable these and the like reflections may be for their purpose, they would not be in place in the present inquiry, which is exclusively concerned with the valuation of these phenomena from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当然，我们同样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考虑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带着不同的目的来对它们进行评价，得出的结论也许和上述所描绘的完全不同。若从宗教利益或者宗教品位的利益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现代工业生活所孕育出来的精神态度不利于信仰生活的自由发展，这种说法同样具有说服力。我们有理由反对工业进程的现代发展，因为它的原则有助于“唯物主义”的发展，并且会根除顺从的虔诚精神。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得出意思相同的论述。但是，上述这些思考以及类似的见解，从它们各自的立场上来看，不论是多么合

理、多么有价值，都不适于在此处讨论，因为我们此处唯一关注的是怎样从经济的角度来评价这些现象。

The grav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the anthropomorphic habit of mind and of the addiction to devout observances must serve as apology for speaking further on a topic which it cannot but be distasteful to discuss at all as an economic phenomenon in a community as devout as ours. Devout observances are of economic importance as an index of a concomitant variation of temperament, accompanying the predatory habit of mind and so indicating the presence of industrially disserviceable traits. They indicate the presence of a mental attitude which has a certain economic value of its own by virtue of its influence upon the industrial service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But they are also of importance more directly, in modifying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ty, especially as regards the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goods.

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里，宗教氛围十分浓厚，要把宗教信仰当作一个经济现象来讨论势必会引起人们反感；但是神人同形同性的心理习惯和宗教信仰热忱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我们不得不以此为辩解的理由，来对该话题作进一步的讨论。宗教信仰之所以具有经济意义，是因为它是气质中一种伴生变体的标志，这种气质是伴随掠夺思维习惯而来的，因此它表明了某些不利于生产的性格特征的存在。宗教信仰表明了一种精神态度的存在，这种精神态度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因为它会对个人的生产实用性产生影响。但是，宗教信仰还有更加直接的经济意义：它可以限制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在物品的分配和消费方面。

The most obvious economic bearing of these observances is

seen in the devout 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e consumption of ceremonial paraphernalia required by any cult, in the way of shrines, temples, churches, vestments, sacrifices, sacraments, holiday attire, etc., serves no immediate material end. All this material apparatus may, therefore, without implying deprecation, is broadly characterized as items of conspicuous waste. The like is true in a general way of the personal service consumed under this head; such as priestly education, priestly service, pilgrimages, fasts, holidays, household devotions, and the like. At the same time the observances in the execution of which this consumption takes place serve to extend and protract the vogue of those habits of thought on which an anthropomorphic cult rests. That is to say, they further the habits of thought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gime of status. They are in so far an obstruction to the most effectiv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under modern circumstances; and are, in the first instance, antagonistic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the direction required by the situation of to-day. For the present purpose, the indirect as well as the direct effects of this consumption are of the nature of a curtailment of the community's economic efficiency. In economic theory, then, and considered in its proximate consequences, the 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effort in the service of an anthropomorphic divinity means a lowering of the vitality of the community. What may be the remoter, indirect, moral effects of this class of consumption does not admit of a succinct answer, and it is a question which cannot be taken up here.

在物品和服务的宗教消费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信仰最为明显的经济意义。任何教派所要求的在仪式设备上的消费，诸如神殿、庙宇、教堂、法衣、祭品以及节日盛装等，都不能满足直接的物质目的。因此，所有这些物品大体上都可以归为炫耀性浪费品，我们这样

说，并没有贬责之意。这方面的个人服务消费，如教士教育、教士服务、圣地朝拜、禁食斋戒、宗教节日以及家庭祈祷等等，其情况大体上也是这样。同时，宗教仪式——上述消费就是在这些仪式中进行的——可以让某些思维习惯流行的范围更广、流行的时间更长，这些思维习惯是神人同形同性信仰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宗教仪式助长了身份制特有的思维习惯。对于现代环境下最具效率的工业组织来说，它们是一个障碍，并且也是与当今形势所要求的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就当前讨论的目的而言，这种消费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都具有降低社会经济效率的性质。因此，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并考虑到其直接后果，为神人同形同性的神祇进行的物品和精力的消费意味着社会活力的下降。至于这类消费的深远的、间接的、道德的影响究竟是什么，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清楚的，并且我们在这里也不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It will be to the point, however, to note the general economic character of devout consumption, in comparison with consumption for other purposes. An indication of the range of motives and purposes from which devout consumption of goods proceeds will help toward an appreciation of the value both of this consumption itself and of the general habit of mind to which it is congenial. There is a striking parallelism, if not rather a substantial identity of motive, between the consumption which goes to the service of an anthropomorphic divinity and that which goes to the service of a gentleman of leisure—a chieftain or patriarch—in the upper class of society during the barbarian culture. Both in the case of the chieftain and in that of the divinity there are expensive edifices set apart for the behoof of the person served. These edifices, as well as the properties which supplement them in the service, must not be common in kind or grade; they always show a large element of conspicuous waste. It may also be noted that the devout edifices are invariably of an archaic cast in their structure and fittings. So also

the servants, both of the chieftain and of the divinity, must appear in the presence clothed in garments of a special, ornate character. The characteristic economic feature of this apparel is a more than ordinarily accentuated conspicuous waste, together with the secondary feature—more accentuated in the case of the priestly servants than in that of the servants or courtiers of the barbarian potentate—that this court dress must always be in some degree of an archaic fashion. Also the garments worn by the lay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hen they come into the presence should be of a more expensive kind than their everyday apparel. Here, again, the parallelism between the usage of the chieftain's audience hall and that of the sanctuary is fairly well marked. In this respect there is required a certain ceremonial “cleanness” of attire,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which, in the economic respect, is that the garments worn on these occasions should carry as little suggestion as may be of any industrial occupation or of any habitual addiction to such employments as are of material use.

然而，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那就是，宗教消费与为了其他目的而进行的消费比较起来，其一般的经济特征是什么。指出进行宗教消费的动机和目的有助于我们评价这种消费本身，也有助于我们评价与之相投合的一般心理习惯。为神人同形同性的神祇进行的消费与为蛮夷文化时期上层阶级的有闲绅士（酋长或族长）进行的消费，即使在动机上并不完全相同，也有着极其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是为了这位酋长还是为了这位神祇，都要准备奢华的宏伟建筑，作为他们的容身之所。这些宏伟建筑以及供奉时所需要的附属物，在种类和等级上绝不可以是普通平凡的；它们总是表现出大量的炫耀性浪费因素。我们还会发现，这些宗教建筑在结构或装饰方面无一例外都带些远古之风。仆从们也是如此，不论是侍奉酋长的仆从，还是侍奉神祇的仆从，现身时必须穿上特制的、华丽的服装。这种服装具有一个典型的经济特征，即异乎寻常地强调炫耀性浪费；它还具有一个从属特征，

即这类礼服必须具有几分远古之风；神职人员比蛮夷文化阶段君主的仆役或朝臣更加强调这一点。社会中的世俗成员在出席盛会时所穿的衣服也应当比平时昂贵一些。酋长的谒见大厅和供奉神祇的圣殿在使用方面再度表现出相当显著的相似之处。在这些场合，服装必须具有某种礼仪上的“整洁度”；从经济角度来看，其基本特征是，在这些场合穿戴的服装应当尽量不让人产生有关任何生产职业联想，或者不让人觉得平时是经常从事这类实用性工作的。

This requirement of conspicuous waste and of ceremonial cleanness from the traces of industry extends also to the apparel, and in a less degree to the food, which is consumed on sacred holidays; that is to say, on days set apart—tabu—for the divinity or for some member of the lower ranks of the preternatural leisure class. In economic theory, sacred holidays are obviously to be construed as a season of vicarious leisure performed for the divinity or saint in whose name the tabu is imposed and to whose good repute the abstention from useful effort on these days is conceived to inure.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all such seasons of devout vicarious leisure is a more or less rigid tabu on all activity that is of human use. In the case of fast-days the conspicuous abstention from gainful occupations and from all pursuits that (materially) further human life is further accentuated by compulsory abstinence from such consumption as would conduce to the comfort or the fullness of life of the consumer.

炫耀性浪费的要求以及不沾染生产痕迹这一礼仪清洁度的要求，不仅扩展到服装方面，在较低程度上也扩展到宗教节日所消费的食品方面；这里所说的宗教节日指的是为神祇或超自然的有闲阶级较低等级的某些成员设立的日子，也就是禁忌日。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很明显，宗教节日应当被解释成为神祇或圣徒执行代理有闲的一段时

间；禁制是为他们实行的，在这些日子避免从事实用的劳动也是为了他们的好名声。执行宗教性代理有闲的这段时间，其主要特征是较为严格地禁止从事一切对人类有用的活动。在实行斋戒的日子里，不仅要明显避免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作以及能够（在物质上）促进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还要强制性避免进行那些能让消费者生活得更舒适、更充实的消费。

It may be remarked, parenthetically, that secular holidays are of the same origin, by slightly remoter derivation. They shade off by degrees from the genuinely sacred days, through an intermediate class of semi-sacred birthdays of kings and great men who have been in some measure canonized, to the deliberately invented holiday set apart to further the good repute of some notable event or some striking fact, to which it is intended to do honor, or the good fame of which is felt to be in need of repair. The remoter refinement in the employment of vicarious leisure as a means of augmenting the good repute of a phenomenon or datum is seen at its best in its very latest application. A day of vicarious leisure has in some communities been set apart as Labor Day. This observance is designed to augment the prestige of the fact of labor, by the archaic, predatory method of a compulsory abstention from useful effort. To this datum of labor-in-general is imputed the good repute attributable to the pecuniary strength put in evidence by abstaining from labor.

在这里也许可以补充一点，世俗的节日也具有同一来源，只不过其间的渊源较为间接而已。它们是从纯正的宗教节日逐渐转化而来的，中间经过了在某种程度上被神圣化了的君主和伟人的半宗教性质的生日，还有那些刻意设立的节日，设立这样的节日是为了提升某些著名事件或惊人事迹的好名声，是为了给它们增添荣誉，或者是因为

觉得有需要恢复这些事件或事迹的名誉。使用有闲代理作为提升某一现象或已知事件荣誉的手段，其进一步改良的方式，在最近的应用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某些社会中，执行有闲代理的某一个日子被定为劳动节。这种措施是为了通过强制性避免实用性劳动这种古老的掠夺型方式来提升劳动这一事实本身的声望。脱离生产劳动是具有金钱力量的证据；这些措施使得一般生产劳动也具有了金钱荣誉。

Sacred holidays, and holidays generally, are of the nature of a tribute levied on the body of the people. The tribute is paid in vicarious leisure, and the honorific effect which emerges is imputed to the person or the fact for whose good repute the holiday has been instituted. Such a tithe of vicarious leisure is a perquisite of all members of the preternatural leisure class and is indispensable to their good fame. *Un saint qu'on ne chome pas* is indeed a saint fallen on evil days.

宗教节日以及一般节日都具有向人民大众征收贡品的性质。贡品是以执行代理有闲的形式来缴纳的，由此而来的荣誉效果归属于某人或某一事件，而节日就是为这个人或这一事件的荣誉而设立的。这一点点的代理有闲是超自然有闲阶级所有成员的特权，对他们的荣誉来说，这一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圣徒竟没有人在节日为之庆祝，实在是一个倒霉透顶的圣徒。

Besides this tithe of vicarious leisure levied on the laity, there are also special classes of persons—the various grades of priests and hierodules—whose time is wholly set apart for a similar service. It is not only incumbent on the priestly class to abstain from vulgar labor, especially so far as it is lucrative or is apprehended to contribute to the temporal well-being of mankind. The tabu in the

case of the priestly class goes farther and adds a refinement in the form of an injunction against their seeking worldly gain even where it may be had without debasing application to industry. It is felt to be unworthy of the servant of the divinity, or rather unworthy the dignity of the divinity whose servant he is, that he should seek material gain or take thought for temporal matters. “Of all contemptible things a man who pretends to be a priest of God and is a priest to his own comforts and ambitions is the most contemptible.” There is a line of discrimination, which a cultivated taste in matters of devout observance finds little difficulty in drawing, between such actions and conduct as conduce to the fullness of human life and such as conduce to the good fame of the anthropomorphic divinity; and the activity of the priestly class, in the ideal barbarian scheme, falls wholly on the hither side of this line. What falls within the range of economics falls below the proper level of solicitude of the priesthood in its best estate. Such apparent exceptions to this rule as are afforded, for instance, by some of the medieval orders of monks (the members of which actually labored to some useful end), scarcely impugn the rule. These outlying orders of the priestly class are not a sacerdotal element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term. And it is noticeable also that these doubtfully sacerdotal orders, which countenanced their members in earning a living, fell into disrepute through offending the sense of propriety in the communities where they existed.

除了由俗人执行的这种少量的代理有闲外，还有某些特殊阶级的人士——不同等级的神职人员和居住在神庙里侍奉神祇的奴隶——他们的时间全部被用于类似的服务上了。教士阶级应当戒绝一切世俗的劳动，尤其是那些有利可图的、对人类的物质幸福有所贡献的劳动。不仅如此，教士阶级还应当更进一步地执行清规戒律，禁止他们追求尘世利得，即使这种利得并不是通过有损荣誉的劳动获得的也不可

以。如果一个神祇的仆役竟然去追求物质利益或者为俗世事务所操心，就会被认为是不值得尊敬的，或者说，他所侍奉的那位神祇是不值得尊敬的。“一个人，披着上帝神职人员的外衣，为的却是让自己过上舒适的日子，为的却是满足自己的野心，这样的人是一切可耻事物中最为可耻的。”有些措施和行为是有利于人类生活的充实的，有些措施和行为是有利于神人同形同性的神祇的荣誉的，一个在宗教活动方面具有高雅品位的人是不难在这两者之间划出一条界线的；在典型的蛮夷制度下，教士阶级的活动完全是为了后一类目的。任何属于经济领域的事物都不是一个德行高尚的教士所应当关心的。这一规则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某些中世纪僧侣骑士团，他们实际上参加了具有某些实用性的劳动，然而这一点绝没有破坏上述规则。因为这些边缘的教士阶级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神职成员。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神职身份存在问题的僧侣骑士团因支持其成员从事谋生活动，触犯了他们所处社会的礼仪观念而名声扫地。

The priest should not put his hand to mechanically productive work; but he should consume in large measure. But even as regards his consumption it is to be noted that it should take such forms as do not obviously conduce to his own comfort or fullness of life; it should conform to the rules governing vicarious consumption, as explained under that head in an earlier chapter. It is not ordinarily in good form for the priestly class to appear well fed or in hilarious spirits. Indeed, in many of the more elaborate cults the injunction against other than vicarious consumption by this class frequently goes so far as to enjoin mortification of the flesh. And even in those modern denominations which have been organized under the latest formulations of the creed, in a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y, it is felt that all levity and avowed zest in the enjoyment of the good things of this world is alien to the true clerical decorum. Whatever suggests that these servants of an invisible master are living a life, not of devotion to their master's good fame, but of application to

their own ends, jars harshly on our sensibilities as something fundamentally and eternally wrong. They are a servant class, although, being servants of a very exalted master, they rank high in the social scale by virtue of this borrowed light. Their consumption is vicarious consumption; and since, in the advanced cults, their master has no need of material gain, their occupation is vicarious leisure in the full sense. “Whether therefore ye eat, or drink, or whatsoever ye do, do all to the glory of God.” It may be added that so far as the laity is assimilated to the priesthood in the respect that they are conceived to be servants of the divinity, so far this imputed vicarious character attaches also to the layman's life. The range of application of this corollary is somewhat wide. It applies especially to such movements for the reform or rehabilitation of the religious life as are of an austere, pietistic, ascetic cast—where the human subject is conceived to hold his life by a direct servile tenure from his spiritual sovereign. That is to say, where the institution of the priesthood lapses, or where there is an exceptionally lively sense of the immediate and masterful presence of the divinity in the affairs of life, there the layman is conceived to stand in an immediate servile relation to the divinity, and his life is construed to be a performance of vicarious leisure directed to the enhancement of his master's repute. In such cases of reversion there is a return to the unmediated relation of subservience, as the dominant fact of the devout attitude. The emphasis is thereby thrown on an austere and discomforting vicarious leisure, to the neglect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s a means of grace.

教士不应当染指机械生产工作；但是他却应当大量地消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其消费而言，所采取的方式不应当明显有利于他自己的享受和生活充实；这种消费应当符合代理消费的各条法则，这些法则在前面章节已经有所说明。教士阶级竟然都吃得肥肥胖胖，

并且带有喜不自禁的神情，这往往会被看作是有失体统的。实际上，在许多更为复杂的教派中，除了可以执行代理有闲，教士阶级往往要受到许多清规戒律的约束，有的戒律甚至会要求实行禁欲。在现代工业社会，有些教派是在最新的教义形式下组织起来的，即使是这些教派，也认为一切轻佻的举动以及对世间美好事物的沉迷都是有悖于真正的教士礼仪的。如果有迹象表明，这些为隐形的主人服务的仆人，其生活目的不是为了宣扬其主人的良好声誉，而是为了他自身的私利，我们就会强烈地感到这是一个根本的、永恒的错误。尽管他们是仆役阶级，但是他们的主人是至高无上的，沾了这一点的光，他们就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消费是代理消费，因为在进步的教派中，他们的主人是没有物质利益需要的，所以他们的工作是完全意义上的代理有闲。“因此，吃也好，喝也罢，不管你做什么，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也可以说，只要一个俗世之人在这方面被教士同化了，并因此被看作是神的仆人，他的生活就有了这种被赋予的代理属性。这个推论的适用范围比较广泛。它尤其适用于宗教生活的某些改革或革新运动，这些运动十分严肃、认真，具有禁欲的本性——这些运动认为，作为子民的人类是在其精神主宰者的直接奴役操纵下生活的。也就是说，当教士制度日趋衰微时，或者当某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在生活中威严的神无处不在）特别活跃的时候，这位俗世之人就会被认为是处于受神祇直接奴役的地位，其生活就会被解释为执行代理有闲，以提升其主人的荣誉。在这种复归的情况下，神人之间又回复到直接奴役关系，这种关系是宗教态度中的主导因素。因此，人们会强调以严肃的、令人不适的代理有闲作为博取恩宠的手段，而会忽视炫耀性消费。

A doubt will present itself as to the full legitimacy of thi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acerdotal scheme of life, on the ground that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the modern priesthood departs from the scheme in many details. The scheme does not hold good for the clergy of those denominations which have in some measure diverged from the old established schedule of beliefs or

observances. These take thought, at least ostensibly or permissively, for the temporal welfare of the laity, as well as for their own. Their manner of life, not only in the privacy of their own household, but often even before the public, does not differ in an extreme degree from that of secular-minded persons, either in its ostensible austerity or in the archaism of its apparatus. This is truest for those denominations that have wandered the farthest. To this objection it is to be said that we have here to do not with a discrepancy in the theory of sacerdotal life, but with an imperfect conformity to the scheme on the part of this body of clergy. They are but a partial and imperfect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iesthood, and must not be taken as exhibiting the sacerdotal scheme of life in an authentic and competent manner. The clergy of the sects and denominations might be characterized as a half-caste priesthood, or priesthood in process of becoming or of reconstitution. Such priesthood may be expected to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cerdotal office only as blended and obscured with alien motives and traditions, due to the disturbing presence of other factors than those of animism and status in the purposes of the organizations to which this non-conforming fraction of the priesthood belongs.

对于宗教生活方式的这种描述是否完全合理，自然会引起怀疑，因为相当一部分现代教士的生活在很多细节方面与上述所描绘的不同。有些教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旧的、既定的信仰或宗教仪式方式，对这些教派的教士来说，上述所描绘的就不适用。这些教士所关心的是俗世之人的福利，也关心他们自己的福利，他们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做的，他们这样做也是允许的。他们在自己私密的家中，甚至往往在公众面前表现的生活方式，不论是在其表面的严肃性方面，还是在其设备的远古之风方面，都和俗世之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那些与宗教传统偏离最远的教派，这句话是最适用不过的了。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们应当指出，我们此处所要探讨的不是宗教生活理论

的矛盾之处，而是这一群体的教士不能够完全符合宗教生活方式的要求。他们仅仅是全体教士中的部分而非完美的代表，我们不能认为，他们所展示的生活方式是正统的、合格的。我们可以把这些教派的教士看作是一个混杂的，或者是处于转变或改造过程中的神职人员。在这一部分非正规的神职人员所属的组织的宗旨中，除了万物有灵观念和身份观念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干扰因素；因此，不难想象，这样一位教士在宗教职能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必然夹杂着性质不同的动机和传统，因而是不清晰的。

Appeal may be taken direct to the taste of any person with a discriminating and cultivated sense of the sacerdotal proprieties, or to the prevalent sense of what constitutes clerical decorum in any community at all accustomed to think or to pass criticism on what a clergyman may or may not do without blame. Even in the most extremely secularized denominations, there is some sense of a distinction that should be observed between the sacerdotal and the lay scheme of life. There is no person of sensibility but feels that where the members of this denominational or sectarian clergy depart from traditional usage, in the direction of a less austere or less archaic demeanor and apparel, they are departing from the ideal of priestly decorum. There is probably no community and no sect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Western culture in which the bounds of permissible indulgence are not drawn appreciably closer for the incumbent of the priestly office than for the common layman. If the priest's own sense of sacerdotal propriety does not effectually impose a limit, the prevalent sense of the proprieties on the part of the community will commonly assert itself so obtrusively as to lead to his conformity or his retirement from office.

一个教士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才不会受到责难，这直接

取决于在宗教礼仪方面有着鉴赏能力和高雅观念的任何个人的品位，也取决于任何社会中惯于在这一问题上思考和评论的关于宗教礼仪构成因素的普遍观念。即使是在最为世俗化的教派里，也存在着些这样的观点：宗教生活方式和俗世生活方式之间应当存在某种区别。敏感之人都会感觉到，一旦某一教派的教士成员脱离了传统的习俗，他们的行为举止和穿衣打扮都不够严肃、不够古朴，他们就违背了理想的教士礼仪。为教士所设立的可以放纵的限度明显要比普通俗世之人严格，大概所有属于西方文化的社会或教派都是如此。如果教士自己的宗教礼仪观念没有有效地为自己设置一个限度，那么社会中流行的礼仪观念往往会产生强制性作用，迫使他遵守规范，否则就要他从自己的职位上退下来。

Few if any members of any body of clergy, it may be added, would avowedly seek an increase of salary for gain's sake; and if such avowal were openly made by a clergyman, it would be found obnoxious to the sense of propriety among his congregation. It may also be noted in this connection that no one but the scoffers and the very obtuse are not instinctively grieved inwardly at a jest from the pulpit; and that there are none whose respect for their pastor does not suffer through any mark of levity on his part in any conjuncture of life, except it be levity of a palpably histrionic kind—a constrained unbending of dignity. The diction proper to the sanctuary and to the priestly office should also carry little if any suggestion of effective everyday life, and should not draw upon the vocabulary of modern trade or industry. Likewise, one's sense of the proprieties is readily offended by too detailed and intimate a handling of industrial and other purely human questions at the hands of the clergy. There is a certain level of generality below which a cultivated sense of the proprieties in homiletical discourse will not permit a well-bred clergyman to decline in his discussion of temporal interests. These matters that are of human and secular

consequence simply, should properly be handled with such a degree of generality and aloofness as may imply that the speaker represents a master whose interest in secular affairs goes only so far as to permissively countenance them.

在这里可以补充一句，在教士群体中，很少有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公然要求加薪的；如果一个教士公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就违背了其教众的礼仪观念。还有一点，如果在讲道坛上出现了开玩笑的情况，除了玩世不恭的人和十分愚钝的人外，没有人会对此不从内心深处本能地感到悲哀；如果一位牧师在其生活的任何方面流露出了轻佻的迹象，所有人对他的尊敬都会大打折扣，除非这种轻佻的举动明显是戏剧性的、无伤大雅的。在圣殿中以及在教士工作中，所使用的适当的语言也应当尽量少让人产生实际日常生活的联想，并且不应该使用与现代商业或生产有关的词汇。同样，对于生产或其他纯俗世的问题，如果一个教士事无巨细、万事躬亲，就很容易触犯一个人的礼仪观念。一个有教养的教士在探讨俗世之事时，只能泛泛而谈，不能超过有关说教语言的礼仪观念所允许的某一限度。这些事务只对人类和俗世之人具有意义，应当以淡漠与超然的态度来处理这些事务，以表明说话者是代表他的主人发言的，而他的那位主人对俗世之事的关注最多不过是默默地容忍罢了。

It is further to be noticed that the non-conforming sects and variants whose priesthood is here under discussion, vary among themselves in the degree of their conformity to the ideal scheme of sacerdotal life. In a general way it will be found that the divergence in this respect is widest in the case of the relatively young denominations, and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such of the newer denominations as have chiefly a lower middle-class constituency. They commonly show a large admixture of humanitarian, philanthropic, or other motives which cannot be classed as

expressions of the devotional attitude; such as the desire of learning or of conviviality, which enter largely into the effective interest shown by members of these organizations. The non-conforming or sectarian movements have commonly proceeded from a mixture of motives, some of which are at variance with that sense of status on which the priestly office rests. Sometimes, indeed, the motive has been in good part a revulsion against a system of status. Where this is the case the institution of the priesthood has broken down in the transition, at least partially. The spokesman of such an organization is at the outset a servant and representative of the organization, rather than a member of a special priestly class and the spokesman of a divine master. And it is only by a process of gradual specialization that, in succeeding generations, this spokesman regains the position of priest, with a full investiture of sacerdotal authority, and with its accompanying austere, archaic and vicarious manner of life. The like is true of the breakdown and reintegration of devout ritual after such revulsion. The priestly office, the scheme of sacerdotal life, and the schedule of devout observances are rehabilitated only gradually, insensibly, and with more or less variation in details, as the persistent human sense of devout propriety reasserts its primacy in questions touching the interest in the preternatural—and it may be added, as the organization increases in wealth, and so acquires more of the point of view and the habits of thought of a leisure class.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教士是属于非正规教派和教派变体的，这些非正规教派和教派变体符合典型宗教生活方式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一般来说，我们会发现，在这方面差距最大的是那些相对年轻的教派，尤其是那些主要由中产阶级下层组成的较新的教派。它们当中混有大量人道主义的、博爱的或其他的动机，这些其他的动机是不能归为宗教态度的表现的，例如学习或交际的愿望，这

些组织的成员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那些非正统的或宗派的运动都是源于各种不同的动机，其中有些动机是和教士工作所依据的身份观念相抵触的。实际上，这种动机有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身份制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士制度的传承就受到了破坏，至少是部分地受到了破坏。这样一个组织的代言人，一开始只是该组织的仆人或代表，而不是特殊的教士阶级中的一员，也不是某个作为主人的神的代言人。只有通过一连好几代人逐步专业化的过程，这一代言人才取得了教士的地位，才被完全授予了宗教的职权，并随之过上了严肃的、古老的、代理的生活方式。宗教仪式在经历这一巨变后，其受破坏和重新整合过程的情形也是如此。只有在稳定的人类宗教礼仪观念于解决超自然现象的问题中重新居于主导地位时，教士工作、宗教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仪式程序也就逐渐地、不知不觉地恢复旧观，但在细节上已经有所不同；这里还可以补充一句，随着组织的财富越积越多，它就会更多地采纳有闲阶级的观点和思维习惯。

Beyond the priestly class, and ranged in an ascending hierarchy, ordinarily comes a superhuman vicarious leisure class of saints, angels, etc. —or their equivalents in the ethnic cults. These rise in grade, one above another, according to an elaborate system of status. The principle of status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hierarchical system, both visible and invisible. The good fame of these several orders of the supernatural hierarchy also commonly requires a certain tribute of vicarious consumption and vicarious leisure. In many cases they accordingly have devoted to their service sub-orders of attendants or dependents who perform a vicarious leisure for them, after much the same fashion as was found in an earlier chapter to be true of the dependent leisure class under the patriarchal system.

按照僧侣等级制度的上升顺序，在教士阶级之上往往还存在着一

个超人类的代理有闲阶级，如圣徒和天使等等，或者是异教信仰中的相应形象。按照复杂的身份制度，他们被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级。身份原则是整个僧侣等级制度的一条主线，它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这几个等级的超自然群体，为了取得或保持荣誉，往往也需要在代理消费和代理有闲方面有所贡献。在许多情况下，那些比他们等级低的侍从或依附者也要相应地为他们执行代理有闲，其情形和前面章节谈到父权制下的依附有闲阶级的情况极其相似。

It may not appear without reflection how these devout observances and the peculiarity of temperament which they imply, or the 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which is comprised in the cult, stand related to the leisure class of a modern community, or to the economic motives of which that class is the exponent in the modern scheme of life. To this end a summary review of certain facts bearing on this relation will be useful.

这些宗教仪式以及它们所暗含的气质特点，或者是宗教里财物和服务的消费，和现代社会的有闲阶级或者现代生活方式下该阶级所代表的经济动机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不经过思考是难以发现的。为了弄清这一点，总结一下与这种联系相关的事实应当是有帮助的。

It appears from an earlier passage in this discussion tha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collective life of to-day, especially so far as concerns the industrial efficiency of the modern community, the characteristic traits of the devout temperament is a hindrance rather than a help. It should accordingly be found that the modern industrial life tends selectively to eliminate these traits of human nature from the spiritual constitution of the classes that are

immediately engaged in the industrial process. It should hold true, approximately, that devoutness is declining or tending to obsolescence among the members of what may be called the effective industrial community.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appear that this aptitude or habit survives in appreciably greater vigor among those classes which do not immediately or primarily enter into the community's life process as an industrial factor.

我们在上文的讨论中曾经提到，就现代集体生活的目的而言，尤其是涉及现代社会的生产效率时，宗教气质的那些典型特征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种帮助。因此，我们应当看到，现代工业生活往往会选择性地将这些人类性格特征从直接从事生产过程的那些阶级的精神结构中清除出去。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在所谓的富有效率的产业社会中，其成员身上的虔诚之心在衰退或趋于消失。然而，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在那些没有作为一个生产因素而直接或经常参与社会生活进程的阶级当中，这种本性和习惯依然存在，并且明显更具活力。

It has already been pointed out that these latter classes, which live by, rather than in, the industrial process, are roughly comprised under two categories: (1) the leisure class proper, which is shielded from the stress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2) the indigent classes, including the lower-class delinquents, which are unduly exposed to the stress. In the case of the former class an archaic habit of mind persists because no effectual economic pressure constrains this class to an adaptation of its habits of thought to the changing situation; while in the latter the reason for a failure to adjust their habits of thought to the altered requirements of industrial efficiency is innutrition, absence of such a surplus of energy as is needed in order to make the adjustment with facility, together with a lack of opportunity to acquire and become

habituated to the modern point of view. The trend of the selective process runs in much the same direction in both cases.

前面已经指出，属于上述后一类的各阶级是依靠生产过程生活的，而不是生活在生产过程之中的，这些阶级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1）纯正的有闲阶级，他们受到庇护，不用承受经济形势所带来的压力；（2）贫穷阶级，包括下层阶级惯犯，他们承受着过度的压力。就前一阶级而言，古老的心理习惯依然存在，因为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迫使这一阶级调整其思维习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式；而后一类阶级之所以未能调整其思维习惯以适应生产效率变化了的要求，是因为他们营养不良，缺乏灵活调整其思维习惯所需的过剩精力，同时也缺乏取得或适应现代观点的机会。在这两类阶级中，选择性过程的趋势是朝着大体同一个方向的。

From the point of view which the modern industrial life inculcates, phenomena are habitually subsumed under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 of mechanical sequence. The indigent classes not only fall short of the modicum of leisure necessary in order to appropriate and assimilate the more recent generalizations of science which this point of view involves, but they also ordinarily stand in such a relation of personal dependence or subservience to their pecuniary superiors as materially to retard their emancipation from habits of thought proper to the regime of status. The result is that these classes in some measure retain that general habit of mind the chief expression of which is a strong sense of personal status, and of which devoutness is one feature.

按照现代生产生活反复灌输的观点，各种现象通常被纳入机械顺序的定量关系之下。贫穷阶级缺乏那么一点点必要的闲暇来使用并吸

收这个观点所涉及的最新科学概念；不仅如此，在他们与财力比其优越的人们的关系中，他们往往处于依附或顺从的地位，这就极大地妨碍了他们从身份制所固有的思维习惯中解放出来。结果这类阶级就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某种一般心理习惯，这一心理习惯的主要表现是强烈的个人身份观念，虔诚之心也是其特征之一。

In the older communities of the European culture, the hereditary leisure class, together with the mass of the indigent population, is given to devout observances in an appreciably higher degree than the average of the industrious middle class, wherever a considerable class of the latter character exists. But in some of these countries, the two categories of conservative humanity named above comprise virtually the whole population. Where these two classes greatly preponderate, their bent shapes popular sentiment to such an extent as to bear down any possible divergent tendency in the inconsiderable middle class, and imposes a devout attitude upon the whole community.

在欧洲文化较为古老的社会里，只要存在着一个相当庞大的、具有虔诚之心的阶级，世袭有闲阶级和大多数贫穷人口的信教热忱就要明显高于从事生产的普通中产阶级。但是，某些较为古老的国家，其全部人口实际上就是由上面提到的两类保守的人群组成的。当这两个阶级具有压倒性优势时，他们的性格本性就会影响到大众情感，足以抑制无足轻重的中产阶级中可能出现的任何不同的本性，迫使整个社会信仰宗教。

This must, of course, not be construed to say that such communities or such classes as are exceptionally prone to devout observances tend to conform in any exceptional degree to the

specifications of any code of morals that we may be accustomed to associate with this or that confession of faith. A large measure of the devout habit of mind need not carry with it a strict observance of the injunctions of the Decalogue or of the common law. Indeed, it is becoming somewhat of a commonplace with observers of criminal life in European communities that the criminal and dissolute classes are, if anything, rather more devout, and more naively so, than the average of the population. It is among those who constitute the pecuniary middle class and the body of law-abiding citizens that a relative exemption from the devotional attitude is to be looked for. Those who best appreciate the merits of the higher creeds and observances would object to all this and say that the devoutness of the low-class delinquents is a spurious, or at the best a superstitious devoutness; and the point is no doubt well taken and goes directly and cogently to the purpose intended. Bu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inquiry these extra-economic, extra-psychological distinctions must perforce be neglected, however valid and however decisive they may be for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y are made.

当然，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宗教信仰尤其强烈的社会或阶级，其信仰态度就一定会与我们所习惯遵守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宗教信条的道德准则在细则上保持高度一致。大部分宗教心理习惯是不一定要严格遵守十诫或习惯法的各种禁令的。实际上，欧洲社会的罪犯生活观察者们有一句老生常谈，即如果那些罪犯或放荡的人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他们更加虔诚，并且这种虔诚之心更加纯粹。只有在金钱力量处于中等地位的阶级和遵纪守法的市民当中，才能够找到宗教态度相对较弱的现象。有些人高度重视高级教义和仪式的优点，他们会反驳这里所说的一切，他们会说下层阶级惯犯们的宗教信仰是虚假的，最多不过是种迷信崇拜罢了；这个说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而且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但是，就当前讨论的目的而言，这些非经济的、

非心理的区别，不论它们对其本身的目的来说是多么有效、多么具有决定性，我们在此必须予以忽略。

What has actually taken place with regard to class emancipation from the habit of devout observance is shown by the latter-day complaint of the clergy—that the churches are losing the sympathy of the artisan classes, and are losing their hold upon them. At the same time it is currently believed that the middle class, commonly so called, is also falling away in the cordiality of its support of the church, especially so far as regards the adult male portion of that class. These are currently recognized phenomena, and it might seem that a simple reference to these facts should sufficiently substantiate the general position outlined. Such an appeal to the general phenomena of popular church attendance and church membership may be sufficiently convincing for the proposition here advanced. But it will still be to the purpose to trace in some detail the course of events and the particular forces which have wrought this change in the spiritual attitude of the more advanced industrial communities of to-day. It will serve to illustrate the manner in which economic causes work towards a secularization of men's habits of thought. In this respect the American community should afford an exceptionally convincing illustration, since this community has been the least trammeled by external circumstances of any equally important industrial aggregate.

近来有牧师抱怨，说教会正在失去技术工人阶级的共鸣，对这个阶级的控制力也正在消失；这反映了阶级从宗教信仰习惯中解放出来的实际情况。同时，人们目前认为，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尤其是该阶级中的成年男子，支持教会的热忱也在衰退。这些都是时下公认的

现象，只需提及事实似乎就足以充分证实前面概括的一般论点。但就教会中普通会众或成员中存在着埋怨情绪这一普遍现象，就能够让人完全信服此处提出的论点。但是，在现代比较发达的工业社会里，精神态度发生了变化，对事件进程和造成这种变化的各种特殊力量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也是必要的。由此可以说明经济力量在人们的思维习惯世俗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在这一方面，美国社会应当为我们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因为就任何同等重要的工业集团的外部环境而言，美国社会受到的束缚最小。

After making due allowance for exceptions and sporadic departures from the normal, the situation here at the present time may be summarized quite briefly. As a general rule the classes that are low in economic efficiency, or in intelligence, or both, are peculiarly devout—as, for instance, the Negro population of the South, much of the lower-class foreign population, much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especially in those sections which are backward in education, in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their industry, or in respect of their industrial contact with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 So also such fragments as we possess of a specialized or hereditary indigent class, or of a segregated criminal or dissolute class; although among these latter the devout habit of mind is apt to take the form of a naive animistic belief in luck and in the efficacy of shamanistic practices perhaps more frequently than it takes the form of a formal adherence to any accredited creed. The artisan class, on the other hand, is notoriously falling away from the accredited anthropomorphic creeds and from all devout observances. This class is in an especial degree exposed to the characteristic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stress of modern organized industry, which requires a constant recognition of the undisguised phenomena of impersonal, matter-of-fact sequence and an unreserved conformity to the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This class is at

the same time not underfed nor overworked to such an extent as to leave no margin of energy for the work of adaptation.

撇开一些例外和偶尔的反常情况不说，这个国家目前的情形可以简单地总结如下。一般来说，经济效率低下或智力较差，或者两者都较差的阶级都特别虔诚，例如南方的黑人、大部分下层阶级的外来人口、大部分农村人口，尤其是在那些教育和工业发展落后或与国内其他社会接触不够频繁的地区。还有一个高度分化的或世袭的贫穷阶级，或者被隔离的罪犯或行为放荡的阶级，其情况也是如此；在后一类人当中，宗教思维习惯往往更为频繁地表现为一种朴素的万物有灵信仰，这种信仰是关于运气和萨满教仪式的功效的；而正式信奉某一公认教义的则较少见。另一方面，技术工人阶级正在脱离公认的神人同形同性教义及一切宗教信仰，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这个阶级受到的智力和精神上的压力特别巨大，这种压力是现代有组织的生产所特有的；这种压力要求人们时时刻刻认清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演进过程中存在的真实现象，并毫无保留地遵守因果定律。同时，这个阶级既不会营养不良，也不会操劳过度，因此还不至于没有余力从事适应环境的工作。

The case of the lower or doubtful leisure class in America—the middle class commonly so called—is somewhat peculiar. It differs in respect of its devotional life from its European counterpart, but it differs in degree and method rather than in substance. The churches still have the pecuniary support of this class; although the creeds to which the class adheres with the greatest facility are relatively poor in anthropomorphic cont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effective middle-class congregation tends, in many cases, more or less remotely perhaps, to become a congregation of women and minors. There is an appreciable lack of devotional fervor among the adult males of the middle class, although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ere survives

among them a certain complacent, reputable assent to the outlines of the accredited creed under which they were born. Their everyday life is carried on in a more or less close contact with the industrial process.

美国较低等级或名不副实的有闲阶级（通常称为中产阶级）的情况有些特殊。这个阶级在宗教生活方面和欧洲的相应阶级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只是程度和方式上的不同，而不是实质上的不同。教会依然会得到这一阶级的金钱支持；不过，这个阶级最喜闻乐见的教义含有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内容相对贫乏。同时还有一个现象，或许这一现象不太明显，那就是，在很多情况下，由中产阶级组成的教堂会众往往是一群妇女和未成年人。中产阶级的成年男子明显缺乏宗教热情，然而，他们身上仍然很大程度地保留着对于公认教义纲领的赞同和尊崇，他们正是在这些纲领下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生产过程的接触是比较密切的。

This peculiar sexual differentiation, which tends to delegate devout observances to the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is due, at least in part, to the fact that the middle-class women are in great measure a (vicarious) leisure class. The same is true in a less degree of the women of the lower, artisan classes. They live under a regime of status handed down from an earlier stag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reby they preserve a frame of mind and habits of thought which incline them to an archaic view of things generally. At the same time they stand in no such direct organic relation to the industrial process at large as would tend strongly to break down those habits of thought which, for the modern industrial purpose, are obsolete. That is to say, the peculiar devoutness of women is a particular expression of that conservatism which the women of civilized communities owe, in great measure,

to their economic position. For the modern man the patriarchal relation of status is by no means the dominant feature of life; but for the women on the other hand, and for the upper middle-class women especially, confined as they are by prescription and by economic circumstances to their “domestic sphere,” this relation is the most real and most formative factor of life. Hence a habit of mind favorable to devout observances and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cts of life is generally in terms of personal status. The logic, and the logical processes, of her everyday domestic life are carried over into the realm of the supernatural, and the woman finds herself at home and content in a range of ideas which to the man are in great measure alien and imbecile.

这种奇特的性别分化往往会将宗教信仰的任务委派给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之所以会如此，至少部分是由于中产阶级妇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代理）有闲阶级。下层工匠阶级的妇女，其情况也是如此，只是没有这么明显。她们生活在由早期生产发展阶段传承而来的身份制下，因此，她们保存了某种心绪和思维习惯，这种心绪和思维习惯使得她们一般都采用古老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同时，她们总体上与生产过程并没有直接的有机关系，往往不会强烈要求破除于现代生产目的无用的思维习惯。也就是说，文明社会中的妇女，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所处的经济地位而形成了保守性，妇女们虔诚的心恰恰是这种保守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对现代男性来说，父权制下的身份关系绝不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女性，尤其是中上层阶级的妇女，被传统和经济环境局限在“家庭领域”以内，身份关系是其生活中的最为真实、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心理习惯，这种心理习惯有利于宗教信仰，有利于通过个人身份来解释生活中的一般事实。女性将日常家庭生活中的逻辑或逻辑过程套用到超自然领域，那些在她看来是熟悉的、令人满意的一系列观念，对男性来说却大都是陌生的、愚蠢的。

Still, the men of this class are also not devoid of piety, although it is commonly not piety of an aggressive or exuberant kind. The men of the upper middle class commonly take a more complacent attitude towards devout observances than the men of the artisan class. This may perhaps be explained in part by saying that what is true of the women of the class is true to a less extent also of the men. They are to an appreciable extent a sheltered class; and the patriarchal relation of status which still persists in their conjugal life and in their habitual use of servants, may also act to conserve an archaic habit of mind and may exercise a retarding influence upon the process of secularization which their habits of thought are undergoing. The relations of the American middle-class man to the economic community, however, are usually pretty close and exacting; although it may be remarked, by the way and in qualification that their economic activity frequently also partakes in some degree of the patriarchal or quasi-predatory character. The occupations which are in good repute among this class and which have most to do with shaping the class habits of thought, are the pecuniary occupations which have been spoken of in a similar connection in an earlier chapter.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the relation of arbitrary command and submission, and not a little of shrewd practice, remotely akin to predatory fraud. All this belongs on the plane of life of the predatory barbarian, to whom a devotional attitude is habitual. And in addition to this, the devout observances also commend themselves to this class on the ground of reputability. But this latter incentive to piety deserves treatment by itself and will be spoken of presently.

然而，这个阶级的男性也并不是没有虔诚之心，但是这种虔诚不是积极的、热情洋溢的。比起技术工人阶级的男性，上层阶级的男性对宗教信仰通常抱有更为自满自得的态度。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或

许可以这样来解释：这一阶级男性的情况与女性相似，只是程度稍有不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受到庇护的阶级；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在他们平时对仆人的使用中，依然存在着父权制下的身份关系，这种身份关系也会发挥保存古老的心理习惯的作用，并对他们的思维习惯正在经历的世俗化过程产生延缓的影响。然而，美国中产阶级男性和经济社会的关系通常是相当密切、相当严格的；但是，作为补充，我们可以顺便提一下，他们的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父权制或准掠夺的性质。该阶级中最光荣的职业、最能影响该阶级思维习惯的工作，就是那些金钱的职业，这一点在前面章节讨论相似的话题时已经提及。在这类职业中，强制命令和服从的关系随处可见，还有许多与掠夺性欺骗大致类似的狡猾作风。所有这一切都是属于掠夺型蛮夷人的生活阶段的，而这些蛮夷人往往都具有宗教态度。此外还有一点，宗教信仰之所以为这一阶级接受，也是因为它可以带来荣誉。但是，关于信仰宗教的这一种动机值得单独讨论，我们马上就会谈到。

There is no hereditary leisure class of any consequence in the American community, except in the South. This Southern leisure class is somewhat given to devout observances; more so than any class of corresponding pecuniary standing in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It is also well known that the creeds of the South are of a more old-fashioned cast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North. Corresponding to this more archaic devotional life of the South is the lowe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at section.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uth is at present, and especially it has been until quite recently, of a more primitive character than that of the American community taken as a whole. It approaches nearer to handicraft, in the paucity and rudeness of its mechanical appliances, and there is more of the element of mastery and subservience. It may also be noted that, owing to the peculiar economic circumstances of this section, the greater devoutness of

the Southern population, both white and black, is correlated with a scheme of life which in many ways recalls the barbarian stag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mong this population offenses of an archaic character also are and have been relatively more prevalent and are less deprecated than they are elsewhere; as, for example, duels, brawls, feuds, drunkenness, horse-racing, cock-fighting, gambling, male sexual incontinence (evidenced by the considerable number of mulattoes). There is also a livelier sense of honor—an expression of sportsmanship and a derivative of predatory life.

在美国社会，不存在一个有影响力的世袭有闲阶级，除非是在南方各州。南方的有闲阶级对宗教信仰颇为热衷，其程度比国内其他地区任何具有相应金钱地位的阶级更为显著。而南方所信奉的教义比北方相应的教义更具旧式风貌，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南方的宗教生活更具古风，相应地，这一地区的生产发展也较为落后。在目前，尤其是到最近的这段时间，与美国全国的一般情况比起来，南方的生产组织更为原始。它更接近于手工业：机械设备既匮乏又简陋，其间存在着更多的统治与服从的成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由于这个地区独特的经济环境，南方的民众，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对宗教信仰更加热情，这一点是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都会让人想到蛮夷的生产发展阶段。一直以来，在这一民众之中，具有古老属性的犯罪恶行，如决斗、口角、酗酒、赛马、斗鸡、赌博以及男性的纵欲等等，相对较为流行，现在也是如此；但是，比起其他地方，这些犯罪恶行在这一地区受到的责难较少。这一地区也存在着更为强烈的荣誉观念，这是运动精神的一种表现，是掠夺生活的一个衍生物。

As regards the wealthier class of the North, the American leisure class in the best sense of the term, it is, to begin with, scarcely possible to speak of a hereditary devotional attitude. This

class is of too recent growth to be possessed of a well-formed transmitted habit in this respect, or even of a special home-grown tradition. Still, it may be noted in passing that there is a perceptible tendency among this class to give in at least a nominal, and apparently something of a real, adherence to some one of the accredited creeds. Also, weddings, funerals, and the like honorific events among this class are pretty uniformly solemnized with some especial degree of religious circumstance.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how far this adherence to a creed is a *bona fide* reversion to a devout habit of mind, and how far it is to be classed as a case of protective mimicry assumed for the purpose of an outward assimilation to canons of reputability borrowed from foreign ideals. Something of a substantial devotional propensity seems to be present, to judge especially by the somewhat peculiar degree of ritualistic observance which is in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n the upper-class cults. There is a tendency perceptible among the upper-class worshippers to affiliate themselves with those cults which lay relatively great stress on ceremonial and on the spectacular accessories of worship; and in the churches in which an upper-class membership predominates, there is at the same time a tendency to accentuate the ritualistic, at the cost of the intellectual features in the service and in the apparatus of the devout observances. This holds true even where the church in question belongs to a denomination with a relatively slight general development of ritual and paraphernalia. This peculiar development of the ritualistic element is no doubt due in part to a predilection for conspicuously wasteful spectacles, but it probably also in part indicates something of the devotional attitude of the worshippers. So far as the latter is true, it indicates a relatively archaic form of the devotional habit. The predominance of spectacular effects in devout observances is noticeable in all devout communities at a relatively primitive stage of culture and with a slight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t is especially

characteristic of the barbarian culture. Here there is pretty uniformly present in the devout observances a direct appeal to the emotions through all the avenues of sense. And a tendency to return to this naive, sensational method of appeal is unmistakable in the upper-class churches of to-day. It is perceptible in a less degree in the cults which claim the allegiance of the lower leisure class and of the middle classes. There is a reversion to the use of colored lights and brilliant spectacles, a freer use of symbols, orchestral music and incense, and one may even detect in “processionals” and “recessionals” and in richly varied genuflexional evolutions, an incipient reversion to so antique an accessory of worship as the sacred dance.

至于北方更为富有的阶级，也就是最高意义上的美国有闲阶级，根本就谈不上具有遗传得来的宗教态度。因为这一阶级刚刚崛起，在宗教方面，还没来得及形成一个完整的、遗传得来的习性，甚至还没有一个特殊的家族传统。我们还可以顺便提一下，在这一阶级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本性，即他们至少是表面上较为真心地信从某一公认教义的。同时，这一阶级的婚丧嫁娶以及类似的隆重典礼一律较为庄严，具有明显的宗教仪式色彩。我们很难判断，这种对教义的信从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宗教心理习惯的真实复归，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为了在外表上符合从国外的典范中借来的荣誉准则而做出的一种保护性模仿。其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真正的宗教习性，从上层阶级宗教中正在发展的、比较特殊的祭祀仪式来看，尤其如此。在上层阶级的信徒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本性：相对来说，他们本性于皈依某些教派，这些教派十分重视仪式和敬神时所使用的壮观的附属设备；以上层阶级为主的教堂也有一种本性，它们看重仪式，而宁愿牺牲服务或宗教仪式设备中的智力特征。即使这一教堂是属于一个在仪式或设备方面发展相对较差的教派，其情况也是如此。毫无疑问，仪式成分的这种特殊发展部分是由于对炫耀性浪费壮观场面的偏好，但它也可能部分地表明了信徒是存有一些虔诚态度的。如果后面这种情况确属实情，它

所表现的就是宗教习惯的一个比较古老的形式。当社会仍然处于较为原始的文化阶段时，其智力发展较为缓慢，在所有具有宗教信仰的这类社会中，都可以看到宗教仪式上的这种显著的壮观效果。这是蛮夷文化的一个极其明显的特征。蛮夷文化下的宗教仪式通常都是通过各种感官渠道直接诉诸情感的。在现代的上层阶级教派中，复归朴素、感官的诉求方式的本性十分明显。而在下层有闲阶级和中产阶级所信奉的教派中，这种本性就不是那么明显。这种回归的本性比比皆是，如彩灯和华丽场面的使用，象征物、管弦乐和香料的大量使用；在进场和退场的赞美歌中，在礼拜时变化丰富的跪拜起伏动作中，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对十分古老的礼拜仪式（如圣舞）的初步复归本性。

This reversion to spectacular observances is not confined to the upper-class cults, although it finds its best exemplification and its highest accentuation in the higher pecuniary and social altitudes. The cults of the lower-class devout portion of the community, such as the Southern Negroes and the backward foreign elements of the population, of course also show a strong inclination to ritual, symbolism, and spectacular effects; as might be expected from the antecedents and the cultural level of those classes. With these classes the prevalence of ritual and anthropomorphism are not so much a matter of reversion as of continued development out of the past. But the use of ritual and related features of devotion are also spreading in other direction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American community the prevailing denominations started out with a ritual and paraphernalia of an austere simplicity; but it is a matter familiar to everyone that in the course of time these denominations have, in a varying degree, adopted much of the spectacular elements which they once renounced. In a general way, this development has gone hand in hand with the growth of the wealth and the ease of life of the worshippers and has reached its fullest expression among those classes which grade highest in wealth and

repute.

这种对壮观宗教仪式的复归不仅仅局限于上层阶级的教派中，不过，在金钱地位和社会地位较高的教派中，这种复归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是最受重视的。下层宗教社会群体，例如南方的黑人和落后的外来人口成分，其教派当然也对仪式、象征物以及壮观的场面表现出强烈的本性；考虑到这些阶级的身世及其文化水平，出现这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些阶级当中，仪式和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流行不是一种复归，而是一种对过去的延续。但是，仪式和相关的宗教特征也扩展到其他方面。在早期美国社会，一些流行的教派一开始使用的仪式或设备是严肃的、简朴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教派不同程度地采纳了它们曾经排斥的许多壮观元素，这一点是大家都熟知的。一般来说，这种发展是与信徒财富的积累以及生活改善的过程同时进行的，在那些财富和声誉等级最高的阶级中这种发展表现得最为充分。

The causes to which this pecuniary stratification of devoutness is due have already been indicated in a general way in speaking of class differences in habits of thought. Class differences as regards devoutness are but a special expression of a generic fact. The lax allegiance of the lower middle class, or what may broadly be called the failure of filial piety among this class, is chiefly perceptible among the town populations engaged in the mechanical industries. In a general way, one does not, at the present time, look for a blameless filial piety among those classes whose employment approaches that of the engineer and the mechanician. These mechanical employments are in a degree a modern fact. The handicraftsmen of earlier times, who served an industrial end of a character similar to that now served by the mechanician, were not similarly refractory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devoutness. The habitual

activity of the men engaged in these branches of industry has greatly changed, as regards its intellectual discipline, since the modern industrial processes have come into vogue; and the discipline to which the mechanician is exposed in his daily employment affects the methods and standards of his thinking also on topics which lie outside his everyday work. Familiarity with the highly organized and highly impersonal industrial processes of the present, acts to derange the animistic habits of thought. The workman's offic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xclusively that of discretion and supervision in a process of mechanical, dispassionate sequences. So long as the individual is the chief and typical prime mover in the process; so long as the obtrusive feature of the industrial process is the dexterity and force of the individual handicraftsman; so long the habit of interpreting phenomena in terms of personal motive and propensity suffers no such considerable and consistent derangement through facts as to lead to its elimination. But under the later developed industrial processes, when the prime movers and the contrivances through which they work are of an impersonal, non-individual character, the grounds of generalization habitually present in the workman's mind and the point of view from which he habitually apprehends phenomena is an enforced cognizance of matter-of-fact sequence. The result, so far as concerns the workman's life of faith, is a proclivity to undevout scepticism.

关于宗教信仰的这种按金钱分层的原因，在谈到思维习惯的阶级差别时，已经进行过概括性论述。宗教信仰上的阶级差别只是一般现象的一种特殊表现。中产阶级下层宗教虔诚心的松懈，或者可以笼统地称之为这一阶级宗教虔诚心的缺失，主要见诸于从事机械生产的城镇人口当中。在目前，一般来说，在职业与工程师和机械师相近的人群中，已经很难找到无可挑剔的宗教虔诚心了。这些机械工作可以说

是一个现代现象。早期的手工业者可以满足某种生产目的，这种生产目的的性质和今天机械师所能满足的生产目的相似；这些手工业者却很难抗拒宗教信仰的熏陶。自从现代生产方式流行以来，从事各生产部门工作的人们，因为在智力方面受到了锻炼，其平时所从事的活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机械师在日常工作中所受到的锻炼影响了他对日常工作以外的话题进行思考时所采取的方式和标准。人们一旦谙熟高度组织化的、高度客观的现代生产过程，万物有灵论的思维习惯就会受到干扰。工人的职责越来越局限在对机械的、客观过程的处理和监督上。只要个人是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的、典型的原动力，只要生产过程的显著特征在于手工业者个人的技巧和力量，即以个人动机和个人本性来解释现象的习惯，就不会受到事实的严重的、持续不断的干扰而趋于消失。但是，在近代发达的生产过程中，生产过程所使用的原动力和各种设计是不具人格的、非个人性质的；这时，在一个工人的思维之中，惯常的推理依据和理解现象的习惯观点就是一种对于事实因果关系的强制性认识。对于工人的信仰生活而言，其结果是产生了没有宗教观念的怀疑主义本性。

It appears, then, that the devout habit of mind attains its best development under a relatively archaic culture; the term “devout” being of course here used in its anthropological sense simply, and not as implying anything with respect to the spiritual attitude so characterized, beyond the fact of a proneness to devout observances. It appears also that this devout attitude marks a type of human nature which is more in consonance with the predatory mode of life than with the later-developed, more consistently and organically industrial life process of the community. It is in large measure an expression of the archaic habitual sense of personal status—the relation of mastery and subservience—and it therefore fits into the industrial scheme of the predatory and the quasi-peaceable culture, but does not fit into the industrial scheme of the present. It also appears that this habit persists with greatest tenacity

among those classes in the modern communities whose everyday life is most remote from the mechanical processes of industry and which are the most conservative also in other respects; while for those classes that are habitually in immediate contact with modern industrial processes, and whose habits of thought are therefore exposed to the constraining force of technological necessities, that animistic interpretation of phenomena and that respect of persons on which devout observance proceeds are in process of obsolescence. And also—as bearing especially on the present discussion—it appears that the devout habit to some extent progressively gains in scope and elaboration among those classes in the modern communities to whom wealth and leisure accrue in the most pronounced degree. In this as in other relations,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acts to conserve, and even to rehabilitate, that archaic type of human nature and those elements of the archaic culture which the industrial evolution of society in its later stages acts to eliminate.

这样看来，虔诚的心理习惯在较为古老的文化下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当然，我们在这里只是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来使用“虔诚”一词的，除了用于描绘宗教信仰本性以外，并不涉及其他的精神态度。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虔诚的态度代表的是一种人类性格，这种人类性格更为适应的是掠夺型生活方式，而不是那在近代才发展起来的更加稳定、更加有组织的工业生活进程。这种虔诚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身份——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这个古老的固有观念的一种表现，因此，它所适应的是掠夺型或准和平文化下的生产方式，而不是现代生产方式。还有一点，在现代社会的某些阶级当中，这种习惯最为根深蒂固，这些阶级的日常生活与机械生产过程的关系最为疏远，在其他方面也是最为保守的；而有些阶级经常和现代生产过程直接接触，因而其思维习惯受制于工艺技术要求所具有的约束性力量，在这个阶级当中，那种对现象的万物有灵阐释以及开展宗教仪式所依

据的身份关系，都处于消失的过程中。还有一点与目前的讨论特别有关，在现代社会中，有些阶级的财富和有闲都有着极其明显的增长，其宗教习惯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复杂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就像在别的方面一样，有闲阶级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保存，甚至是恢复古老的人类性格和古老文化中的这些元素，而这些性格和元素正是近代社会生产进程所要根除的。

Chapter XIII Survivals of the Non-Invidious Interests

第十三章　非歧视性利益的残存

In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as time goes on, the anthropomorphic cult, with its code of devout observances, suffers a progressive disintegration through the stress of economic exigencies and the decay of the system of status. As this disintegration proceeds, there come to be associated and blended with the devout attitude certain other motives and impulses that are not always of an anthropomorphic origin, nor traceable to the habit of personal subservience. Not all of these subsidiary impulses that blend with the habit of devoutness in the later devotional life are altogether congruous with the devout attitude or with the anthropomorphic apprehension of the sequence of phenomena. The origin being not the same, their action upon the scheme of devout life is also not in the same direction. In many ways they traverse the underlying norm of subservience or vicarious life to which the code of devout observances and the ecclesiastical and sacerdotal institutions are to be traced as their substantial basis. Through the presence of these alien motives the social and industrial regime of status gradually disintegrates, and the canon of personal subservience loses the support derived from an unbroken tradition. Extraneous habits and proclivities encroach upon the field of action occupied by this canon, and it presently comes about that the ecclesiastical and sacerdotal structures are partially converted to other uses, in some measure alien to the purposes of the scheme of devout life as it stood in the days of the most vigorous and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priesthood.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经济要求的压力以及身份制度的衰退，神人同形同性的宗教及其宗教礼仪准则逐渐分崩离析。在这种分崩离析的过程中，某些其他动机和冲动开始与宗教信仰掺杂并融合在一起，这些动机或冲动并不都是源于神人同形同性信仰，也不都是源于个人服从的关系。在后期的宗教生活中，混合在一起的从属性冲动，并非与宗教态度或者关于现象因果关系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理解都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起源不同，它们也就不会在同一方面对宗教生活方式产生影响。它们在很多方面违背了个人顺从和代理生活的基本规范，而这一规范正是宗教礼仪规范和教会及祭祀制度的实质性基础。由于这些异类动机的存在，社会和生产的身份制度逐渐分崩离析，个人服从的准则失去了来自不间断传统的支持。外来的习惯和本性侵占了这一准则所占领的活动领域，于是很快就出现了以下的情况：教会和祭祀结构被转为他用，而这些用途是与教会制度发展最有活力、最典型时期的宗教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

Among these alien motives which affect the devout scheme in its later growth, may be mentioned the motives of charity and of social good-fellowship, or conviviality; or, in more general terms, the various expressions of the sense of human solidarity and sympathy. It may be added that these extraneous uses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ructure contribute materially to its survival in name and form even among people who may be ready to give up the substance of it. A still more characteristic and more pervasive alien element in the motives which have gone to formally uphold the scheme of devout life is that non-reverent sense of aesthetic congruity with the environment, which is left as a residue of the latter-day act of worship after elimination of its anthropomorphic content. This has done good service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acerdotal institution through blending with the motive of subservience. This sense or impulse of aesthetic congruity is not primarily of an economic character, but it has a considerable

indirect effect in shaping the habit of mind of the individual for economic purposes in the later stag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ts most perceptible effect in this regard goes in the direction of mitigating the somewhat pronounced self-regarding bias that has been transmitted by tradition from the earlier, more competent phases of the regime of status. The economic bearing of this impulse is therefore seen to transverse that of the devout attitude; the former goes to qualify, if not to eliminate, the self-regarding bias, through sublation of the antithesis or antagonism of self and not-self; while the latter, being an expression of the sense of personal subservience and mastery, goes to accentuate this antithesis and to insist upon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self-regarding interest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generically human life process.

这类影响了宗教生活方式后期发展的异类动机，其中可以提一提的包括慈善动机、亲睦或友好的动机；或者说得更宽泛些，就是人类团结和同情意识的各种不同的表现。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有些人可能要放弃宗教结构的实质内容，但是，在这群人当中，这些外在用途却为宗教结构名义和形式上的存在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一种更具特色、更为普遍的异类元素，它在形式上为宗教生活方式提供了支持，这便是与环境具有审美一致性的不带虔诚心的观念，这一观念是在去除崇拜行为中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内容后所留下来的残余。这一观念与服从的动机相混合，对祭祀制度的保存很有帮助。审美一致性这一意识或冲动原本不具有经济的性质，但是，在生产发展的较晚阶段，它在塑造个人具有经济意义的心理习惯方面产生了很大的间接效果；该意识或冲动在这方面最显著的影响是，它缓和了较为明显的自私自利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从早期更具效力的身份制的传统方面承袭而来的。因此，这种冲动的经济意义是，它对宗教信仰态度起着阻碍作用；前者通过消除自我或非我的对照或对立，即使不会消除也会限制自私自利的本性，而后者，作为个人统治与服从观念的一种表现，却

强化了这种对立，并坚决主张个人利益与人类生活进程的整体利益之间存在着分歧。

This non-invidious residue of the religious life—the sense of commun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or with the generic life process—as well as the impulse of charity or of sociability, act in a pervasive way to shape men's habits of thought for the economic purpose. But the action of all this class of proclivities is somewhat vague, and their effects are difficult to trace in detail. So much seems clear, however, as that the action of this entire class of motives or aptitudes tends in a direction contrary to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the institution of the leisure class as already formulated. The basis of that institution, as well as of the anthropomorphic cults associated with it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s the habit of invidious comparison; and this habit is incongruous with the exercise of the aptitudes now in question. The substantial canons of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of life are a conspicuous waste of time and substance and a withdrawal from the industrial process; while the particular aptitudes here in question assert themselves, on the economic side, in a deprecation of waste and of a futile manner of life, and in an impulse to participation in o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life process, whether it be on the economic side or in any other of its phases or aspects.

宗教生活的这种非歧视性残余——与环境或一般生活进程和谐统一的观念——以及仁慈或友善的冲动，产生了普遍的作用，形成了人们具有经济意义的思维习惯。但是，所有这一类本性的作用都有些模糊不清，其效果也是难以详细追查。然而，有一点似乎很明显，所有这一类动机和本性都是与已经谈到的有闲阶级制度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有闲阶级制度以及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与之相关的神人同形同性

教派，都是歧视性对比的习惯；这一习惯与当前讨论的性格本性的运用并不是协调一致的。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的实质性规范是对时间和物质的炫耀性浪费以及脱离生产过程；而这里讨论的各种特殊性格本性，在经济方面表现为对浪费和徒劳无功的生活方式的强烈反对，并表现为参与和融入生活进程（不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其他任何方面）的冲动。

It is plain that these aptitudes and habits of life to which they give rise where circumstances favor their expression, or where they assert themselves in a dominant way, run counter to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of life; but it is not clear that life under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as seen in the later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 tends consistently to the repression of these aptitudes or to exemption from the habits of thought in which they express themselves. The positive discipline of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of life goes pretty much all the other way. In its positive discipline, by prescription and by selective elimination,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favors the all-pervading and all-dominating primacy of the canons of waste and invidious comparison at every conjuncture of life. But in its negative effects the tendency of the leisure-class discipline is not so unequivocally true to the fundamental canons of the scheme. In its regulation of human activity for the purpose of pecuniary decency the leisure-class canon insists on withdrawal from the industrial process. That is to say, it inhibits activity in the directions in which the impecunious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habitually put forth their effort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women, and more particularly as regards the upper-class and upper-middle-class women of advanced industrial communities, this inhibition goes so far as to insist on withdrawal even from the emulative process of accumulation by the quasi-predatory methods of the pecuniary occupations.

当环境有利于这些性格本性表现时，或者它们表现得特别强烈时，就会形成某些生活习惯，很明显，这些性格本性和生活习惯是和有闲阶级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但是，有闲阶级制度下的生活，从其后期发展阶段来看，是否总是本性于抑制这些性格本性，是否总是本性于摆脱它们所表现的思维习惯，这一点就不那么明显了。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的积极锻炼则与此正好相反。有闲阶级制度具有积极锻炼的作用，通过习惯规定和选择性淘汰，它有利于浪费和歧视性对比准则普遍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有闲阶级的锻炼也具有消极的效果，它的趋势并不是明确地与有闲阶级制度的基本规范相符合。有闲阶级准则在为金钱礼仪的目的而调节人类活动时，会坚决要求脱离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它会禁止从事某些方面的活动，而这些方面正是贫穷的社会成员全力以赴的。尤其对于女性，特别是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上层阶级或中上层阶级妇女，这一禁令坚决要求她们不得参与通过金钱性职业这种准掠夺型的方式进行的竞赛性财富积累过程。

The pecuniary or the leisure-class culture, which set out as an emulative variant of the impulse of workmanship, is in its latest development beginning to neutralize its own ground, by eliminating the habit of invidious comparison in respect of efficiency, or even of pecuniary stand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fact that members of the leisure class, both men and women, are to some extent exempt from the necessity of finding a livelihood in a competitive struggle with their fellows,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mbers of this class not only to survive, but even, within bounds, to follow their bent in case they are not gifted with the aptitudes which make for success in the competitive struggle. That is to say, in the latest and fullest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ion, the livelihood of members of this class does not depend on the possession and the unremitting exercise of those aptitudes which characterize the successful

predatory man. The chances of survival for individuals not gifted with those aptitudes are therefore greater in the higher grades of the leisure class than in the general average of a population living under the competitive system.

金钱文化或有闲阶级文化一开始是技艺冲动的一个竞赛性变体，而在其最近的发展中，它通过消除效率或金钱地位方面的歧视性对比习惯，开始削弱自己的根基。另一方面，有闲阶级成员，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某种程度上都没有必要为了生活而和同伴竞争，这一事实使得该阶级成员，在不具备可以让他们在竞争中取胜的性格本性的情况下，不仅能够生存，而且在一定限度内还能够生活得更加舒心。也就是说，在有闲阶级制度最近的、最为充分的发展中，有闲阶级成员的生计并不依赖于拥有并不断运用这些性格本性；因此，就不具备这类性格本性的人而言，较高等级的有闲阶级比生活在竞争制度下的普通人拥有更大的生存机会。

In an earlier chapter, in discussing the conditions of survival of archaic traits, it has appeared that the peculiar position of the leisure class affords exceptionally favorable chances for the survival of traits which characterize the types of human nature proper to an earlier and obsolete cultural stage. The class is sheltered from the stress of economic exigencies, and is in this sense withdrawn from the rude impact of forces which make for adaptation to the economic situation. The survival in the leisure class and under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of life, of traits and types that are reminiscent of the predatory culture has already been discussed. These aptitudes and habits have an exceptionally favorable chance of survival under the leisure-class regime. Not only does the sheltered pecuniary position of the leisure class afford a situation favorable to the survival of such individuals as are not gifted with the complement

of aptitudes required for serviceability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process; but the leisure-class canons of reput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enjoin the conspicuous exercise of certain predatory aptitudes. The employments in which the predatory aptitudes find exercise serve as an evidence of wealth, birth, and withdrawal from the industrial process. The survival of the predatory traits under the leisure-class culture is furthered both negatively, through the industrial exemption of the class, and positively, through the sanction of the leisure-class canons of decency.

在前面章节谈到古老性格特征残存的条件时，我们已经指出，有闲阶级的独特地位，为与早期文化阶段或已经不存在的文化阶段相适应的某些性格特征的残存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机会。这个阶级受到了庇护，不用承受来自经济要求的压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一阶级可以免受某些力量的无情冲击，这些力量就是要求人们做出调整以适应经济形势的力量。关于在有闲阶级中以及在这一阶级生活方式下残存的让人想起掠夺文化的性格特征和性格类型，我们在前文已经讨论过了。在有闲阶级制度下，这些性格本性和习惯有着极其有利的生存机会。不仅有闲阶级受庇护的金钱地位为某些个人的生存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不仅如此，有闲阶级的荣誉准则要求大量运用某些掠夺型的性格本性。要运用掠夺型性格特征的那些职业可以证明一个人十分富有、出身高贵，而且不用从事生产过程。这些掠夺型性格特征在有闲阶级文化下继续存在，从消极方面来看，是由于这一阶级不用从事生产，从积极方面来看，是由于它们得到了有闲阶级礼仪准则的认可。

With respect to the survival of traits characteristic of the ante-predatory savage culture the case is in some degree different. The sheltered position of the leisure class favors the survival also of these traits; but the exercise of the aptitudes for peace and good-will does not have the affirmative sanction of the code of

proprieties. Individuals gifted with a temperament that is reminiscent of the ante-predatory culture are placed at something of an advantage within the leisure class, as compared with similarly gifted individuals outside the class, in that they are not under a pecuniary necessity to thwart these aptitudes that make for a non-competitive life; but such individuals are still exposed to something of a moral constraint which urges them to disregard these inclinations, in that the code of proprieties enjoins upon them habits of life based on the predatory aptitudes. So long as the system of status remains intact, and so long as the leisure class has other lines of non-industrial activity to take to than obvious killing of time in aimless and wasteful fatigation, so long no considerable departure from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of reputable life is to be looked for. The occurrence of non-predatory temperament within the class at that stage is to be looked upon as a case of sporadic reversion. But the reputable non-industrial outlets for the human propensity to action presently fail, through the adv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isappearance of large game, the decline of war, the obsolescence of proprietary government, and the decay of the priestly office. When this happens, the situation begins to change. Human life must seek expression in one direction if it may not in another; and if the predatory outlet fails, relief is sought elsewhere.

至于掠夺时期以前蛮夷文化所特有的性格特征的残存，其情况又略有不同。有闲阶级受庇护的地位也有利于这些性格特征的存在；但是，和平亲善的性格特征并没有得到礼仪准则肯定的认可。有些人具有的气质会让人想起掠夺时期以前的文化，如果他们属于有闲阶级，那么和有闲阶级以外的那些具有相同气质的人比起来，他们所处的地位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他们不必因为金钱需要而扼杀这些有助于竞争生活的性格本性；但是，这样的人依然会受到某种道德的约束，这种道德约束促使他们不重视这些性格本性，因为礼仪准则禁止他们养成

基于掠夺型性格本性基础上的生活习惯。只要身份制度依然保持完整，只要有闲阶级除了通过漫无目的、有损无益的体力透支来消磨时间之外，还可以从事其他方面的非生产性活动，明显背离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的情形就不会出现。如果这个时候在这个阶级内部出现了非掠夺型的气质，我们就应当将它看作是一种偶发性的返祖现象。但是，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型猎物的绝迹，战争活动的减少，独裁政体的废止，教士职权的衰落，等等，使这种人类本性得以表现的荣誉性的、非生产性的出路也就逐渐消失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局势就会开始变化。人类生活如果不能在这一方面获得表现，就必然要在另一个方面表现出来；如果掠夺型出路已经不复存在，那么就必然要在其他地方释放出来。

As indicated above, the exemption from pecuniary stress has been carried farther in the case of the leisure-class women of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communities than in that of any other considerable group of persons. The women may therefore be expected to show a more pronounced reversion to a non-invidious temperament than the men. But there is also among men of the leisure class a perceptible increase in the range and scope of activities that proceed from aptitudes which are not to be classed as self-regarding, and the end of which is not an invidious distinction. So, for instance, the greater number of men who have to do with industry in the way of pecuniarily managing an enterprise take some interest and some pride in seeing that the work is well done and is industrially effective, and this even apart from the profit which may result from any improvement of this kind. The efforts of commercial clubs and manufacturers' organizations in this direction of non-invidious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 efficiency are also well known.

综上所述，就免受金钱压力方面而言，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有闲阶级妇女，比任何其他重要群体的人们，都要表现得彻底。因此，比起男性，女性应当对非歧视性的气质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复归本性。但是，在有闲阶级的男人当中，也可以看到某些活动的范围再扩大，这类活动的开展是基于某些性格本性的基础上的，这类性格本性是不属于自私自利一类的，其目的并不在于进行歧视性比较。例如，有些男性从事企业金钱管理工作，因而与生产产生了联系，看到工作出色，生产效率高，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会感兴趣，并且会引以为傲；这种心情甚至和因这种改进而获得的利润无关。有些商业俱乐部和生产商组织在提高非歧视性的生产效率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这一点也是人所共知的。

The tendency to some other than an invidious purpose in life has worked out in a multitude of organizations,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some work of charity or of social amelioration. These organizations are often of a quasi-religious or pseudo-religious character, and are participated in by both men and women. Examples will present themselves in abundance on reflection, but for the purpose of indicating the range of the propensities in question and of characterizing them, some of the more obvious concrete cases may be cited. Such, for instance, are the agitation for temperance and similar social reforms, for prison reform, for the spread of educa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 and for the avoidance of war by arbitration, disarmament, or other means; such are, in some measure, university settlements, neighborhood guilds, the various organizations typified by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and the Young People's Society for Christian Endeavor, sewing circles, social clubs, art clubs, and even commercial clubs; such are also, in some slight measure, the pecuniary foundations of semi-public establishments for charity, education, or amusement, whether they are endowed by wealthy individuals or by

contributions collected from persons of smaller means—in so far as these establishments are not of a religious character.

现在有许多组织，其目的在于某种慈善工作或社会改良工作，这些组织本性于生活中歧视性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这些组织通常是准宗教或伪宗教性质的，参加的人有男有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简直可以信手拈来，但是为了说明目前所讨论的性格本性的范围并指出其特征，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比较明显的具体事例。具有这类本性的例子有：禁酒令以及类似的社会改革、监狱改革、普及教育、打黑除恶、通过仲裁、裁军及其他手段避免战争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这类本性的例子有大学服务社、邻里互助会以及以基督教青年会和青年力行会为代表的各种团体、妇女义务缝纫会、艺术俱乐部，甚至还包括商业俱乐部；这类本性不太明显的例子有：半公共机构性质的慈善、教育和娱乐基金会；不论它们的成立是由富有的个人捐助的，还是由不太富有的人集体捐助的，只要这些机构不是宗教性的，都属于这一类。

It is of course not intended to say that these efforts proceed entirely from other motives than those of a self-regarding kind. What can be claimed is that other motives are present in the common run of cases, and that the perceptibly greater prevalence of effort of this kin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life than under the unbroken regime of the principle of status, indicates the presence in modern life of an effective skepticism with respect to the full legitimacy of an emulative scheme of life. It is a matter of sufficient notoriety to have become a commonplace jest that extraneous motives are commonly present among the incentives to this class of work—motives of a self-regarding kind, and especially the motive of an invidious distinction. To such an extent is this true, that many ostensible works of disinterested

public spirit are no doubt initiated and carried on with a view primarily to the enhanced repute or even to the pecuniary gain, of their promoters. In the case of some considerable groups of organizations or establishments of this kind the invidious motive is apparently the dominant motive both with the initiators of the work and with their supporters. This last remark would hold true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such works as lend distinction to their doer through large and conspicuous expenditure; as, for example, the foundation of a university or of a public library or museum; but it is also, and perhaps equally, true of the more commonplace work of participation in such 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s as are distinctively upper-class organizations. These serve to authenticate the pecuniary reputability of their members, as well as gratefully to keep them in mind of their superior status by pointing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lower-lying humanity in whom the work of amelioration is to be wrought; as, for example, the university settlement, which now has some vogue. But after all allowances and deductions have been made, there is left some remainder of motives of a non-emulative kind. The fact itself that distinction or a decent good fame is sought by this method is evidence of a prevalent sense of the legitimacy, and of the presumptive effectual presence, of a non-emulative, non-invidious interest, as a consistent factor in the habits of thought of modern communities.

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努力完全源于其他非自私自利性质的动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其他的动机确实存在，这类努力在现代工业生活的环境下要比在完整的身份制下明显更为流行，这一点表明在现代生活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怀疑主义，怀疑的是竞赛生活方式的充分合理性。这一类工作之中往往存在着外在动机，即自私自利性质的动机，尤其是歧视性区别的动机；这是一个众

所周知的事实，已经成了一个经常听到的笑话。这句话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许多工作表面上是为了无私的公共利益，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工作的启动和开展主要是为了提升发起人的声誉，甚至是为了增加其金钱利得。在某些较为重要的这类组织或机构中，不论是对于工作的发起者来说，还是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歧视性对比的动机明显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动机。最后这句话对于某些工作尤其适用，这类工作通过大量的炫耀性消费为执行者增添了荣誉，如一所大学的建立、公共图书馆或博物馆的创办等等；不过，这句话也许也同样适用于比较平凡的工作，如参与明显是由上层阶级组织的机构或运动。这些工作，如目前比较流行的大学服务社，表明了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和卑微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差别，而改良工作正是在这些卑微的人们当中开展的；如此一来，这些工作就印证了该组织成员的金钱荣誉，同时也让人们怀着感恩之心将他们的高贵身份铭记在心。但是，不管怎么说，其间终究还存在着一些非竞赛性动机。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赢得荣誉或好名声，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证明，人们普遍意识到非竞赛性的、非歧视性的利益是合理的，作为现代社会思维习惯的一个稳定的构成元素，它应当是有作用的。

In all this latter-day range of leisure-class activities that proceed on the basis of a non-invidious and non-religious interest,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he women participate more actively and more persistently than the men—except, of course, in the case of such works as require a large expenditure of means. The dependent pecuniary position of the women disables them for work requiring large expenditure. As regards the general range of ameliorative work, the members of the priesthood or clergy of the less naively devout sects, or the secularized denomin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class of women. This is as the theory would have it. In other economic relations, also, this clergy stands in a somewhat equivocal position between the class of women and that of the men engaged in economic pursuits. By tradition and by the prevalent sense of the

proprieties, both the clergy and the women of the well-to-do classes are placed in the position of a vicarious leisure class; with both classes the characteristic relation which goes to form the habits of thought of the class is a relation of subservience—that is to say, an economic relation conceived in personal terms; in both classes there is consequently perceptible a special proneness to construe phenomena in terms of personal relation rather than of causal sequence; both classes are so inhibited by the canons of decency from the ceremonially unclean processes of the lucrative or productive occupations as to make participation in the industrial life process of to-day a moral impossibility for them. The result of this ceremonial exclusion from productive effort of the vulgar sort is to draft a relatively large share of the energies of the modern feminine and priestly classes into the service of other interests than the self-regarding one. The code leaves no alternativ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impulse to purposeful action may find expression. The effect of a consistent inhibition on industrially useful activity in the case of the leisure-class women shows itself in a restless assertion of the impulse to workmanship in other directions than that of business activity.

这一系列近代范围的有闲阶级活动是在非歧视性、非宗教性的利益的基础上开展的，在这类活动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女性的参与比男性更活跃、更持久——当然，需要花费大量资金的工作除外。因为妇女在金钱上处于依附地位，这就使得她们不能够从事需要大笔开销的工作。在一般的改良工作方面，那些不太纯朴的或世俗化的教派的教士或牧师，和女性阶级总是志同道合的。从理论上看，也应当如此。在其他经济关系方面，一个牧师所处的地位也是模棱两可的，介于女性阶级和从事经济活动的男性阶级之间。由于传统和一般的礼仪观念，教士和富有阶级的女性都被置于代理有闲阶级的位置；形成这两个阶级思维习惯的特定关系都是服从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经

济关系；因此，在这两个阶级中都可以看到通过个人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来解释各种现象的特殊本性；这两个阶级都被禁止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作或生产工作，这是礼仪准则所禁止的，因为这些工作具有礼仪上的不洁性，这就使得他们从事今天的生产生活过程成为一种道义上的不可能。出于礼仪，现代的女性和教士阶级被排斥在粗俗的生产工作以外，其结果是这两类人的大部分精力都转移到了为非自私自利的利益服务上来。礼仪准则使进行有目的的行为的那种冲动没有了可以表现的方向。有闲阶级女性一直被禁止从事具有生产实用性的活动，其结果是她们的技艺冲动不断地在非商业性活动中表现出来。

As has been noticed already,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well-to-do women and the clergy contains a larger element of status than that of the average of the men, especially than that of the men engaged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occupations proper. Hence the devout attitude survives in a better state of preservation among these classes than among the common run of men in the modern communities. Hence an appreciable share of the energy which seeks expression in a non-lucrative employment among these members of the vicarious leisure classes may be expected to eventuate in devout observances and works of piety. Hence, in part, the excess of the devout proclivity in women was spoken of in the last chapter. But it is more to the present point to note the effect of this proclivity in shaping the action and coloring the purposes of the non-lucrative movements and organizations here under discussion. Where this devout coloring is present it lowers the immediate efficiency of the organizations for any economic end to which their efforts may be directed. Many organizations, charitable and ameliorative, divide their attention between the devotional and the secular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whose interests they aim to further. It can scarcely be doubted that if they were to give an equally serious attention and effort undividedly to the secular interests of these people, the

immediate economic value of their work should be appreciably higher than it is. It might of course similarly be said, if this were the place to say it, that the immediate efficiency of these works of amelioration for the devout might be greater if it were not hampered with the secular motives and aims which are usually present.

前文已经提到，比起普通男性，尤其是从事现代纯生产工作的男性，富裕的女性和牧师的日常生活含有更多的身份因素。因此，宗教态度在这两个阶级当中，比在现代社会的普通男性当中，得以更好地保存。因此，可以预见，在这些代理有闲阶级成员当中，要在有利可图的工作中寻求表现的大部分精力最终都转向了宗教信仰和宗教工作。所以，女性身上有着极其显著的宗教信仰本性，这一点在上一章已经谈过。但是，目前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本性在此处讨论的非图利性的运动和组织的活动形成，以及目的渲染方面所产生的效果。有些组织是致力于某种经济目的的，一旦有了这种宗教色彩，就会降低这些组织的直接效率。许多慈善性质的和改良性质的组织，在增进某些人的利益时，会同时关注其宗教福利和俗世福利。毫无疑问，如果它们能够给予这些人的俗世福利同样严肃的关注并能集中精力，其工作的直接经济价值将会比现在高得多。假如这是个合适的地方，我们也同样可以这样说，为了宗教目的而进行的这些改良工作，如果没有受到经常存在的一些世俗动机和目的的阻碍，其直接效率也许会更高。

Some deduction is to be made from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is class of non-invidious enterprise, on account of the intrusion of the devotional interest. But there are also deductions to be made on account of the presence of other alien motives which more or less broadly traverse the economic trend of this non-emulative expression of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To such an extent is this

seen to be true on a closer scrutiny, that, when all is told, it may even appear that this general class of enterprises is of an altogether dubious economic value—as measured in terms of the fullness or facility of life of the individuals or classes to whose amelioration the enterprise is directed. For instance, many of the efforts now in reputable vogue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indigent population of large cities are of the nature, in great part, of a mission of culture. It is by this means sought to accelerate the rate of speed at which given elements of the upper-class culture find acceptance in the everyday scheme of life of the lower classes. The solicitude of "settlements," for example, is in part directed to enhance the industrial efficiency of the poor and to teach them the more adequate utilization of the means at hand; but it is also no less consistently directed to the inculcation, by precept and example, of certain punctilios of upper-class propriety in manners and customs. The economic substance of these proprieties will commonly be found on scrutiny to be a conspicuous waste of time and goods. Those good people who go out to humanize the poor are commonly, and advisedly, extremely scrupulous and silently insistent in matters of decorum and the decencies of life. They are commonly persons of an exemplary life and gifted with a tenacious insistence on ceremonial cleanness in the various items of their daily consumption. The cultural or civilizing efficacy of this inculcation of correct habits of thought with respect to the consumption of time and commodities is scarcely to be overrated; nor is its economic value to the individual who acquires these higher and more reputable ideals inconsider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existing pecuniary culture, the reputability, and consequently the success, of the individual is in great measure dependent on his proficiency in demeanor and methods of consumption that argue habitual waste of time and goods. But as regards the ulterior economic bearing of this training in worthier methods of life, it is to

be said that the effect wrought is in large part a substitution of costlier or less efficient methods of accomplishing the same material results, in relations where the material result is the fact of substantial economic value. The propaganda of culture is in great part an inculcation of new tastes, or rather of a new schedule of proprieties, which have been adapted to the upper-class scheme of lif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leisure-class formul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status and pecuniary decency. This new schedule of proprieties is intruded into the lower-class scheme of life from the code elaborated by an element of the population whose life lies outside the industrial process; and this intrusive schedule can scarcely be expected to fit the exigencies of life for these lower classes more adequately than the schedule already in vogue among them, and especially not more adequately than the schedule which they are themselves working out under the stress of modern industrial life.

这一类非歧视性的事业，由于有了宗教利益的介入，其经济价值自然会有所降低。但是，其经济价值还会因为某些其他的异类动机而有所降低，这些动机在广泛的范围内或多或少会抑制技艺本能这种非竞赛性表现所具有的经济本性。经过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如果进行全面的考察，我们甚至会发现，这类事业的目的是要改善某些个人或阶级的生活，如果以这些个人或阶级的生活充实程度或便利程度来衡量，则这类事业的经济价值是完全让人感到怀疑的。例如，目前广为流行的改善大都市贫困人口生活的种种努力，大部分都具有文化使命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上层阶级文化中的某些因素能够更加快速地为下层阶级日常生活方式所吸收。例如各种“服务社”，它们所关注的有一部分在于提高贫穷人口的生产效率，并教会他们如何更加充分地利用手头资源；但是，它们同样关注如何通过言传身教将上层阶级在礼貌和习惯礼仪方面的某些细节灌输给他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礼仪的经济实质往往是

对时间和财物的炫耀性浪费。这些走出来教化穷人的好心人，往往都会一丝不苟地默默坚守适宜得体的行为举止和生活礼仪，他们是刻意这样做的。这些人往往过着典范的生活，他们固执地坚持，他们日常消费的不同项目必须在礼仪上是洁净的。这种有关时间或商品消费的正确思维习惯的灌输，其文化或教化功效绝对不容低估；对于那些获得了更高、更加光荣的理想的人来说，其经济价值也很重要。在现存金钱文化环境下，个人的荣誉，因而也就是个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消费的方式方法方面的谙熟程度，这些方式方法主张的是对时间和财物的习惯性浪费。这种在更加值得尊敬的生活方法方面的训练，就其深远的经济意义而言，可以说，它产生的效果大都是用代价更高、效率更低的方式来实现相同的物质效果，而物质效果实际上就是其实际经济价值。文化宣传，大部分是在灌输一种新的品位，或者称之为一种新的礼仪方案更为恰当；这个方案，在有闲阶级的身份原则和金钱礼仪原则的指导下，是与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这一新的礼仪方案是某些人精心设计的，这些人置身于生产过程之外，但是他们却把这一礼仪方案强行加入下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之中；比起已经在下层阶级当中流行的礼仪方案，这个强行加入的方案，绝对不会更加适应这一阶级的生活要求；尤其不会比这些阶级在现代工业生活的压力下制定出来的方案更能适应生活要求。

All this of course does not question the fact that the proprieties of the substituted schedule are more decorous than those which they displace. The doubt which presents itself is simply a doubt as to the economic expediency of this work of regeneration—that is to say, the economic expediency in that immediate and material bearing in which the effects of the change can be ascertained with some degree of confidence, and as viewed from the standpoint not of the individual but of the facility of life of the collectivity. For an appreciation of the economic expediency of these enterprises of amelioration, therefore, their effective work is scarcely to be taken at its face value, even where the aim of the enterprise is primarily

an economic one and where the interest on which it proceeds is in no sense self-regarding or invidious. The economic reform wrought is largely of the nature of a permutation in the methods of conspicuous waste.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怀疑这样一个事实：替代的礼仪方案比它所取代的那些方案更符合礼节。这里所说的怀疑只是对这种革新工作的经济利益的怀疑，也就是说，从集体生活便利的立场而非个人的立场来看，那种直接的、实质性的影响所具有的经济利益是让人怀疑的，而从这种影响中可以较有把握地确定改革的效果。因此，我们不能以这些改良工作的表面价值来评价其经济利益，即使该项工作主要是为了实现经济目的，即使该项工作的开展绝不是出于自私自利或歧视性的目的，我们也不能以其表面的价值来评价其经济利益。由此完成的经济改革，大都具有变换炫耀性浪费方法的性质。

But something further is to be said with respect to the character of the disinterested motives and canons of procedure in all work of this class that is affected by the habits of thought characteristic of the pecuniary culture; and this further consideration may lead to a further qualification of the conclusions already reached. As has been seen in an earlier chapter, the canons of reputability or decency under the pecuniary culture insist on habitual futility of effort as the mark of a pecuniarily blameless life. There results not only a habit of disesteem of useful occupations, but there results also what is of more decisive consequence in guiding the action of any organized body of people that lays claim to social good repute. There is a tradition which requires that one should not be vulgarly familiar with any of the processes or details that have to do with the material necessities of life. One may meritoriously show a quantitative interest in the well-being of the

vulgar, through subscriptions or through work on managing committees and the like. One may, perhaps even more meritoriously, show solicitude in general and in detail for the cultural welfare of the vulgar, in the way of contrivances for elevating their tastes and affording them opportunities for spiritual amelioration. But one should not betray an intimate knowledge of the material circumstances of vulgar life, or of the habits of thought of the vulgar classes, such as would effectually direct the efforts of these organizations to a materially useful end. This reluctance to avow an unduly intimate knowledge of the lower-class conditions of life in detail of course prevails in very different degrees in different individuals; but there is commonly enough of it present collectively in any organization of the kind in question profoundly to influence its course of action. By its cumulative action in shaping the usage and precedents of any such body, this shrinking from an imputation of unseemly familiarity with vulgar life tends gradually to set aside the initial motives of the enterprise, in favor of certain guiding principles of good repute, ultimately reducible to terms of pecuniary merit. So that in an organization of long standing the initial motive of furthering the facility of life in these classes comes gradually to be an ostensible motive only, and the vulgarly effective work of the organization tends to obsolescence.

但是，所有这类工作都受到了金钱文化所特有的思维习惯的影响，关于这类工作中不存私心的动机和开展工作的准则的性质如何，我们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论述；进一步考虑之后，可能要对已经得出的结论进行进一步的修正。正如我们在前一章节里所看到的，在金钱文化下，荣誉或礼仪准则坚决要求以习惯性的精力浪费作为无可挑剔的金钱生活的标志。这样，不但形成了轻视实用性工作的习惯，而且在指导任何有组织的、追求社会声誉的人群的行为方面产生了更具决定性意义的后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一传统要求，对于与物质

生活必需品相关的过程或细节，个人不应当过于了如指掌而流于庸俗。一个人可以通过捐献或通过委员会管理工作等等方式，对平民百姓的福利表示出一定的关切之情，这种做法是值得称颂的。一个人也可以通过设法提高平民百姓的品位并向他们提供精神改造的机会，来对其总体的或具体的文化福利表示关切，这种做法或许是更加值得称颂的。但是，他却不能表现出对平民百姓生活的物质环境具有很深的了解，也不能表现出具有平民阶级的思维习惯，这些都是可以将这类组织的精力有效地用于物质实用性目的的思维习惯。不愿承认过于熟悉下层阶级具体生活环境，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存在的程度因人而异；但是，它往往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此处所讨论的这一类机构中，足以影响到该组织的行动方针。对平民生活了如指掌是不体面的，想要避免这类污名的心理，通过它在这类机构的习俗和惯例形成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累积作用，往往会使人们逐渐偏离这类机构的最初动机，而本性于可以赢得荣誉的某些指导原则，最终会本性于以金钱价值为依据的原则。因此，在历史悠久的机构当中，提高平民阶级生活便利性的初始动机逐渐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动机，而该组织为平民百姓进行的实际工作也就逐渐停止下来。

What is true of the efficiency of organizations for non-invidious work in this respect is true also as regards the work of individuals proceeding on the same motives; though it perhaps holds true with more qualification for individuals than for organized enterprises. The habit of gauging merit by the leisure-class canons of wasteful expenditure and unfamiliarity with vulgar life, whether on the side of production or of consumption, is necessarily strong in the individuals who aspire to do some work of public utility. And if the individual should forget his station and turn his efforts to vulgar effectiveness, the common sense of the community—the sense of pecuniary decency—would presently reject his work and set him right. An example of this is see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bequests made by public-spirited men for the single purpose (at least

ostensibly) of furthering the facility of human life in some particular respect. The objects for which bequests of this class are most frequently made at present are schools, libraries, hospitals, and asylums for the infirm or unfortunate. The avowed purpose of the donor in these cases is the amelioration of human life in the particular respect which is named in the bequest; but it will be found an invariable rule that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work not a little of other motives, frequently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itial motive, is present and determines the particular disposition eventually made of a good share of the means which have been set apart by the bequest. Certain funds, for instance, may have been set apart as a foundation for a foundling asylum or a retreat for invalids. The diversion of expenditure to honorific waste in such cases is not uncommon enough to cause surprise or even to raise a smile. An appreciable share of the funds is sp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difice faced with some aesthetically objectionable but expensive stone, covered with grotesque and incongruous details, and designed, in its battlemented walls and turrets and its massive portals and strategic approaches, to suggest certain barbaric methods of warfare. The interior of the structure shows the same pervasive guidance of the canons of conspicuous waste and predatory exploit. The windows, for instance, to go no farther into detail, are placed with a view to impress their pecuniary excellence upon the chance beholder from the outside, rather than with a view to effectiveness for their ostensible end in the convenience or comfort of the beneficiaries within; and the detail of interior arrangement is required to conform itself as best it may to this alien but imperious requirement of pecuniary beauty.

上文论述了一些机构从事非歧视性工作的效率问题，这一论述也适用于以同样动机从事这类工作的个人，不过用于个人时，我们应该

比在用于有组织的机构时进行更多的修正。以有闲阶级的浪费消费规范和对平民百姓生产生活或消费生活的不熟悉程度来衡量价值的习惯，在渴望做些公益工作的个人身上必然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个人忘记了他所扮演的角色而将他的精力投到了对平民生活实际有用的方面，社会常识—也就是金钱礼仪观念—就会立刻抵制他所做的工作并纠正其行为。遗赠的管理就是一个例子，有些富于公德心的人捐出遗产，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那就是，在某一方面提高人类生活的便利程度。目前，这类遗产捐赠的目标最常见的是建立学校、图书馆、医院以及贫病者收容所。在这些情况下，捐赠者的公开目的是在遗赠用途所指明的那个方面对人类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在开展该工作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其他的动机，这些动机往往是与该工作的初始动机相抵触的，并决定了遗赠中很大一部分资金的最终走向，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变的法则。例如，某些基金可能是为了建立孤儿院或残疾人休养所而设立的。但是这些基金往往会将经费用于荣誉性的浪费，这种情况简直让人感到惊讶，甚至让人感到可笑。基金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建造一座大厦，这些大厦的外表贴上了毫无美感却价格不菲的石块，上面布满了奇形怪状、极不协调的图案，再加上城垛式的高墙与塔楼、宏伟的大门以及要塞式的通道，这一切让人联想到蛮夷时代战争方式下应用的一座城堡。建筑的内部也同样表明，一切都是在炫耀性浪费和掠夺性侵占准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其他细节不必详谈，我们仅以窗户为例，其设计的目的在于使屋外偶然路过的人对其显示的雄厚财力留下印象，有效地实现其表面目的，而不是为了让屋内的受益人感到方便和舒适；室内布置的细节必须尽可能符合金钱美感这一与初始目的相抵触的迫切要求。

In all this, of course, it is not to be presumed that the donor would have found fault, or that he would have done otherwise if he had taken control in person; it appears that in those cases where such a personal direction is exercised—where the enterprise is conducted by direct expenditure and superintendence instead of by bequest—the aims and methods of management are not different in

this respect. Nor would the beneficiaries, or the outside observers whose ease or vanity are not immediately touched, be pleased with a different disposition of the funds. It would suit no one to have the enterprise conducted with a view directly to the most economical and effective use of the means at hand for the initial, material end of the foundation. All concerned, whether their interest is immediate and self-regarding, or contemplative only, agree that some considerable share of the expenditure should go to the higher or spiritual needs derived from the habit of an invidious comparison in predatory exploit and pecuniary waste. But this only goes to say that the canons of emulative and pecuniary reputability so far pervade the common sense of the community as to permit no escape or evasion, even in the case of an enterprise which ostensibly proceeds entirely on the basis of a non-invidious interest.

但是，以上所言并不是说捐赠者应当对此表示不满，也不是说，如果由他亲自管理的话，情况就会有所不同；看来，即使是在捐赠者的亲自指导下——也就是说，这项工程不是通过捐赠的方式来实施的，而是由捐赠人直接投资、直接监管的——其管理目的和方法在这方面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如果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置这些基金，也不会使其受益人或舒适度和虚荣心未受到其直接影响的旁观者感到满意。如果一项事业是为了以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直接运用手头资金来实现该基金初始的物质目的，它就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满意。所有对这项事业表示关切的人，不论其利害关系是直接的还是自私的，或者只是凭空想象的，都认为基金的相当一部分经费应当用于满足高级的或精神的需求，这种需求源自于某种习惯，即在掠夺型侵占和金钱浪费方面进行歧视性对比的习惯。但是，这仅仅说明了竞赛准则和金钱荣誉准则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常识之中，即使是表面上完全基于非歧视性利益基础上的事业，也无法避开或抗拒这些准则。

It may even be that the enterprise owes its honorific virtue, as a means of enhancing the donor's good repute, to the imputed presence of this non-invidious motive; but that does not hinder the invidious interest from guiding the expenditure. The effectual presence of motives of an emulative or invidious origin in non-emulative works of this kind might be shown at length and with detail, in any one of the classes of enterprise spoken of above. Where these honorific details occur, in such cases, they commonly masquerade under designations that belong in the field of the aesthetic, ethical or economic interest. These special motives, derived from the standards and canons of the pecuniary culture, act surreptitiously to divert effort of a non-invidious kind from effective service, without disturbing the agent's sense of good intention or obtruding upon his consciousness the substantial futility of his work. Their effect might be traced through the entire range of that schedule of non-invidious, meliorative enterprise that is so considerable a feature, and especially so conspicuous a feature, in the overt scheme of life of the well-to-do. But the theoretical bearing is perhaps clear enough and may require no further illustration; especially as some detailed attention will be given to one of these lines of enterprise—the establishments for the higher learning—in another connection.

情况甚至可能是这样的，这一事业作为提升捐赠者荣誉的一个手段，之所以具有荣誉的性质，是由于其中存在着这种非歧视性的动机；但是，这并不会妨碍歧视性的利益对基金开支的支配。这类非竞赛性事业中存在着强烈的竞赛性或歧视性动机，这一点在上述各类事业中都有详细而又具体的表现。在这些情况下，这类荣誉性设计的出现，往往会假借审美、伦理和经济利益的名义。这些特殊的动机源于金钱文化的标准和准则，会不知不觉地使非歧视性精力有效服务方向发生转移，但却不会干扰实施者一心为善的意识，他也不会因为其工

作没有实质性用途而感到不安。在非歧视性改良事业的整个规划范围内都存在着这类动机的影响，而这类事业却是富有阶级公开生活方式中的十分重要而又极其明显的一个特征。但是，其在理论方面的意义也许已经十分明显，我们在此不必再进一步举例说明；况且，我们在另一章里还将对这类事业之一——高等学识机构——进行较为详尽的论述。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sheltered situation in which the leisure class is placed there seems, therefore, to be something of a reversion to the range of non-invidious impulses that characterizes the ante-predatory savage culture. The reversion comprises both the sense of workmanship and the proclivity to indolence and good-fellowship. But in the modern scheme of life canons of conduct based on pecuniary or invidious merit stand in the way of a free exercise of these impulses; and the dominant presence of these canons of conduct goes far to divert such efforts as are made on the basis of the non-invidious interest to the service of that invidious interest on which the pecuniary culture rests. The canons of pecuniary decency are reducible for the present purpose to the principles of waste, futility, and ferocity. The requirements of decency are imperiously present in meliorative enterprise as in other lines of conduct, and exercise a selective surveillance over the details of conduct and management in any enterprise. By guiding and adapting the method in detail, these canons of decency go far to make all non-invidious aspiration or effort nugatory. The pervasive, impersonal, un-eager principle of futility is at hand from day to day and works obstructively to hinder the effectual expression of so much of the surviving ante-predatory aptitudes as is to be classed under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but its presence does not preclude the transmission of those aptitudes or the continued recurrence of an impulse to find expression for them.

有闲阶级处于受庇护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存在着一种对非歧视性冲动的复归本性，这类冲动是掠夺阶段以前的蛮夷文化所特有的。这种复归现象包括两个方面：对技艺观念的复归以及对散漫习性和亲善本性的复归。但是，在现代生活方式下，以金钱和歧视性对比为依据的行为准则阻碍了这些冲动的自由发挥；这些行为规范显著地存在着，它们将那些基于非歧视性的利益基础上的努力转而为金钱文化赖以存在的歧视性的利益服务。就当前的讨论而言，金钱礼仪准则可以归结为浪费原则、不求实用原则和凶残原则。迫切的礼仪要求存在于社会改良事业中，也存在于其他方面的行为中，这些要求会对任何事业的经营管理细节产生选择性监督作用。通过对具体方式的指导和调节，这些礼仪准则使得所有非歧视性的愿望和努力都变得徒劳无功。不求实用这个普遍的、非个人性质的、毫无生气的原则无时无刻不在妨碍着某些残存性格本性的有效表现，这类性格本性是属于掠夺时期之前的，可以归类为技艺的本能；但是，该原则的存在并不会阻止这类性格特征的遗传，也不会阻止某种冲动的不断再现，这种冲动便是这些性格本性寻求表现的冲动。

In the later and fa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pecuniary culture, the requirement of withdrawal from the industrial process in order to avoid social odium is carried so far as to comprise abstention from the emulative employments. At this advanced stage the pecuniary culture negatively favors the assertion of the non-invidious propensities by relaxing the stress laid on the merit of emulative, predatory, or pecuniary occupations, a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an industrial or productive kind. As was noticed above, the requirement of such withdrawal from all employment that is of human use applies more rigorously to the upper-class women than to any other class, unless the priesthood of certain cults might be cited as an exception, perhaps more apparent than real, to this rule. The reason for the more extreme insistence on a futile life for this

class of women than for the men of the same pecuniary and social grade lies in their being not only an upper-grade leisure class but also at the same time a vicarious leisure class. There is in their case a double ground for a consistent withdrawal from useful effort.

在金钱文化后期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为了避免引起社会反感而脱离生产过程这一要求变得更加严格，甚至禁止从事竞赛性的工作。在这一高级阶段，比起产业的或生产性质的职业，金钱文化对竞赛类职业、掠夺型职业或金钱性职业的重视程度已经有所下降，它消极地有利于非歧视性本性的表现。正如上文所说，避免从事对人类具有实用性的工作这一要求，在运用到上层阶级妇女身上时，其严格程度要高于任何其他阶级；而某些教派的教士阶级可以说是该法则的一个例外，然而这种例外是表面上的而非实质性的。这一阶级的妇女会坚持一种不求实际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她们做得比金钱等级和社会等级相同的男子更为极端，原因在于她们不仅是上层有闲阶级，而且同时还是代理有闲阶级。她们具有双重的理由来脱离实用性劳动。

It has been well and repeatedly said by popular writers and speakers who reflect the common sense of intelligent people on questions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hat the position of woman in any community is the most striking index of the level of culture attained by the community, and it might be added, by any given class in the community. This remark is perhaps truer as regards th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n as regards development in any other respect. At the same time the position assigned to the woman in the accepted scheme of life, in any community or under any culture, is in a very great degree an expression of traditions which have been shaped by the circumstances of an earlier phase of development, and which have been but partially adapted to the existing economic circumstances,

or to the existing exigencies of temperament and habits of mind by which the women living under this modern economic situation are actuated.

许多著名的作家和演说家，在社会结构和功能等问题上，是可以代表有识之士的意见的；他们一再反复说，而且说得也很恰当：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地位都是该社会文化水平最为显著的指标。我们还可以说，妇女的地位也是该社会任何一个阶级文化水平最为显著的指标。当我们描述经济发展阶段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发展时，这种说法也许是最为确切的。同时，在任何社会、任何文化的公认生活方式下赋予女性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某些传统的一种表现，这些传统是在早期发展环境下形成的，对于现代的经济环境，以及现代的气质和心理习惯的要求，只是部分地相适应，而生活在现代经济环境中的妇女，她们是受现代气质和心理习惯驱使的。

The fact has already been remarked upon incidentally in the course of the discussion of the growth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generally, and in particular in speaking of vicarious leisure and of dress, that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the modern economic scheme is more widely and more consistently at variance with the promptings of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than is the position of the men of the same classes. It is also apparently true that the woman's temperament includes a larger share of this instinct that approves peace and disapproves futility. It is therefore not a fortuitous circumstance that the women of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ies show a livelier sense of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accepted scheme of life and the exigencies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在探讨一般经济制度发展的时候，尤其是在谈到代理有闲和服装的时候，我们已经偶然提到，妇女在现代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是和技艺本能的要求相抵触的，与同阶级的男子的地位相比，它和技艺本能的要求相抵触的范围更广，也更具一致性。技艺的本能赞成和平，反对不求实际，女性气质当中具有更多的技艺本能成分，这明显也是实情。因此，现代工业社会的女性会更强烈地感到公认生活方式与经济形势要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点绝非偶然。

The several phases of the “woman question” have brought out in intelligible form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life of women in modern society, and in the polite circles especially, is regulated by a body of common sense formulated under the economic circumstances of an earlier phase of development. It is still felt that woman's life, in its civil, economic, and social bearing, is essentially and normally a vicarious life, the merit or demerit of which i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to be imputed to some other individual who stands in some relation of ownership or tutelage to the woman. So, for instance, any action on the part of a woman which traverses an injunction of the accepted schedule of proprieties is felt to reflect immediately upon the honor of the man whose woman she is. There may of course be some sense of incongruity in the mind of any one passing an opinion of this kind on the woman's frailty or perversity; but the common-sense judgment of the community in such matters is, after all, delivered without much hesitation, and few men would question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sense of an outraged tutelage in any case that might arise. On the other hand, relatively little discredit attaches to a woman through the evil deeds of the man with whom her life is associated.

“妇女问题”的几个方面已经以清楚明了的形式说明了现代社会妇

女的生活，尤其是上流社会妇女的生活，是怎样受到一系列常识的支配，这一系列常识是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经济环境中形成的。现在人们依然认为妇女的生活，就其民事、经济和社会关系而言，本质上往往是一种代理生活；按照常理，这种生活的功过荣辱都应当属于另一个人，这个人处于占拥或保护该妇女的地位。因此，如果妇女的任何行为违反了公认礼法的某一禁令，人们就会觉得，这一行为会直接影响到该妇女所属男子的荣誉。有一种观点认为妇女意志薄弱、性情怪僻，当然在就这一观点发表意见时每个人的想法都有些不同；但是，社会在对这些问题做出常识判断时，是不会犹豫不决的，男人们有时会感到他们保护妇女的权利受到了损害，很少有人会对这种意识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如果与一位妇女生活在一起的男子有了什么罪恶行径，这位妇女的荣誉受到的损害却相对要小些。

The good and beautiful scheme of life, then—that is to say the scheme to which we are habituated—assigns to the woman a “sphere” ancillary to the activity of the man; and it is felt that any departure from the traditions of her assigned round of duties is unwomanly. If the question is as to civil rights or the suffrage, our common sense in the matter—that is to say the logical deliverance of our general scheme of life upon the point in question—says that the woman should be represented in the body politic and before the law, not immediately in her own person, but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to which she belongs. It is unfeminine in her to aspire to a self-directing, self-centered life; and our common sense tells us that her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the affairs of the community, civil or industrial, is a menace to that social order which expresses our habits of thought as they have been form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raditions of the pecuniary culture. “All this fume and froth of 'emancipating woman from the slavery of man' and so on, is, to use the chaste and expressive language of Elizabeth Cady Stanton inversely, 'utter rot.'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sexes are fixed by nature. Our entire civilization—that is whatever is good in it—is based on the home." The "home" is the household with a male head. This view, but commonly expressed even more chastely, is the prevailing view of the woman's status, not only among the common run of the men of civilized communities, but among the women as well. Women have a very alert sense of what the scheme of proprieties requires, and while it is true that many of them are ill at ease under the details which the code imposes, there are few who do not recognize that the existing moral order, of necessity and by the divine right of prescription, places the woman in a position ancillary to the man. In the last analysis, according to her own sense of what is good and beautiful, the woman's life is, and in theory must be, an expression of the man's life at the second remove.

因此，善与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我们所习惯的生活方式，给妇女指定的“领域”是从属于男性活动的；妇女如果对指定义务的传统有任何违背，都被认为是不守妇道。当问题牵涉到公民权利或选举权时，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常识——也就是我们的一般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的合理表现——就会告诉我们，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妇女不宜直接参与，而应该由她所属家庭的家长充当媒介。一个向往过上自主自决或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的女子是没有女人魅力的；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女性直接参与社会的民事或生产事务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而社会秩序所表现的是我们在金钱文化传统的指导下形成的思维习惯。反用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朴素而又富有表现力的话来说，“‘将妇女从男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之类的叫嚣与空谈，‘简直是一派胡言’。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先天注定的。我们的整个文明——指的是其中好的东西——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家庭”指的是以男性为首的家园。这一观点通常表达得更为简洁朴素，它是关于妇女身份的流行观点，这种观点不仅在文明社会里的男性中间流行，也在妇女中间流行。妇女对于礼法的要求有着极其敏锐的感觉，虽然她们确实对礼法

所规定的细节感到不舒服，但是她们当中很少有人会不承认，出于必要以及神授的传统惯例，现存道德秩序将妇女置于附属于男人的地位。归根结底，按照妇女自己的善与美的观念，她的生活是男子生活次一级的表现，在理论上也必然如此。

But in spite of this pervading sense of what is the good and natural place for the woman, there is also perceptibly an incipient development of sentiment to the effect that this whole arrangement of tutelage and vicarious life and imputation of merit and demerit is somehow a mistake. Or, at least, that even if it may be a natural growth and a good arrangement in its time and place, and in spite of its patent aesthetic value, still it does not adequately serve the more everyday ends of life in a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y. Even that large and substantial body of well-bred, upper and middle-class women to whose dispassionate, matronly sense of the traditional proprieties this relation of status commends itself as fundamentally and eternally right—even these, whose attitude is conservative, commonly find some slight discrepancy in detail between things as they are and things as they should be in this respect. But that less manageable body of modern women who, by force of youth, education, or temperament, are in some degree out of touch with the traditions of status received from the barbarian culture, and in whom there is, perhaps, an undue reversion to the impulse of self-expression and workmanship—these are touched with a sense of grievance too vivid to leave them at rest.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妇女所处的地位是既适宜又自然的，但是也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发展的另一种观点，即关于监护制、代理生活以及功过荣辱归属的整个安排都是错误的。或者这种观点至少认为，整个安排，就其时空背景而言，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是一种适当的安排，但

是，尽管这一安排具有其明显的审美价值，它仍然不能充分满足现代生产社会中更多的日常生活目的。即使是为数众多的有教养的上层和中层阶级妇女（她们对传统礼仪持有冷静而又严肃的观念，她们认为身份关系是基本合理的，是永远合理的），即使是她们这些态度保守的人，也往往会发现这一方面的实际情形和应有状态之间存在着细小的差距。但是，还有一群不太受约束的现代妇女，由于她们年纪较轻，受过的教育和天生气质都和以前的妇女不同，与从蛮夷文化承袭而来的身份制的传统没有太多的接触，她们也许在自我表现冲动和技艺冲动方面存在着过度复归的本性；这群人当中存在着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过于强烈，使得她们不能平静。

In this “New-Woman” movement—as these blind and incoherent efforts to rehabilitate the woman's pre-glacial standing have been named—there are at least two elements discernible, both of which are of an economic character. These two elements or motives are expressed by the double watchword, “Emancipation” and “Work.” Each of these words is recognized to stand for something in the way of a wide-spread sense of grievance. The prevalence of the sentiment is recognized even by people who do not see that there is any real ground for a grievance in the situation as it stands to-day. It is among the women of the well-to-do classes, in the communities which are farthest advanced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at this sense of a grievance to be redressed is most alive and finds most frequent expression. That is to say,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a demand, more or less serious, for emancipation from all relation of status, tutelage, or vicarious life; and the revulsion asserts itself especially among the class of women upon whom the scheme of life handed down from the regime of status imposes with least mitigation a vicarious life, and in those communities whos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departed farthest from the circumstances to which this traditional scheme is adapted.

The demand comes from that portion of womankind which is excluded by the canons of good repute from all effectual work, and which is closely reserved for a life of leisure and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在这些“新女性”运动当中——这是用来称呼某些盲目的、零散的努力的，这些努力是要将妇女的地位恢复到冰河世纪以前的状态——至少可以看到两个元素，这两个元素都是属于经济性质的。这两个元素或动机可以用“解放”和“工作”这两个口号来表示。人们认为这两个字眼都代表着某种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即使是那些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的理由来对现状表示不满的人，也都认识到这种情感的普遍存在。生活在生产发展最进步的社会里的富有阶级妇女，有着最为强烈的不满情绪，在她们当中，这种情绪也表现得最为频繁。也就是说，她们存在着一种较为严肃的需求，需要从身份关系、监护权和代理生活中解放出来；这种反叛情绪在某些妇女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妇女的生活方式是从身份制承袭而来的，极为严格地实行代理生活；这些反叛情绪在某些社会里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已经远离这一传统生活方式所适应的环境。在荣誉准则之下，有一部分妇女被排斥在一切实用工作之外，她们过着严格的有闲和炫耀性消费的生活；上述需求正是在这一部分妇女当中产生的。

More than one critic of this new-woman movement has misapprehended its motive. The case of the American “new woman” has lately been summed up with some warmth by a popular observer of social phenomena: “She is petted by her husband, the most devoted and hard-working of husbands in the world… She is the superior of her husband in education, and in almost every respect. She is surrounded by the most numerous and delicate attentions. Yet she is not satisfied… The Anglo-Saxon 'new woman' is the most ridiculous production of modern times, and

destined to be the most ghastly failure of the century." Apart from the deprecation—perhaps well placed—which is contained in this presentment, it adds nothing but obscurity to the woman question. The grievance of the new woman is made up of those things which this typ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ovement urges as reasons why she should be content. She is petted, and is permitted, or even required, to consume largely and conspicuously—vicariously for her husband or other natural guardian. She is exempted, or debarred, from vulgarly useful employment—in order to perform leisure vicariously for the good repute of her natural (pecuniary) guardian. These offices are the conventional marks of the un-free,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y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human impulse to purposeful activity. But the woman is endowed with her share—which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is more than an even share—of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to which futility of life or of expenditure is obnoxious. She must unfold her life activity in response to the direct, unmediated stimuli of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with which she is in contact. The impulse is perhaps stronger upon the woman than upon the man to live her own life in her own way and to enter the industrial process of the community at something nearer than the second remove.

许多新女性运动的批评家都误解了该运动的动机。最近，一位著名的社会现象观察家情绪较为激动地对美国“新女性”的情况作了一番概括：“她受到丈夫的宠爱，她的丈夫是世界上最忠诚的、工作最努力的……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在几乎所有方面，她都要胜过她的丈夫。她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注和照顾。但是，她还是不知足……盎格鲁一撒克逊式的‘新女性’是现代最荒谬的产物，注定要成为本世纪最糟糕的失败者。”这番话也许言之有理，但是，除了其中包含的谴责之意以外，它只能让妇女问题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上述对该运动的典型描述中，有些东西被认为是新女性应该感到满足的理

由，而新女性所不满的竟然正是这些东西。她备受宠爱，她可以甚至被要求进行大量的炫耀性消费——为她的丈夫或其他自然监护人进行代理消费。她可以免于从事甚至是不准从事粗鄙的实用性工作，为的是执行代理有闲以维护或提升其自然（金钱）监护人的荣誉。这类职能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传统标志，同时，它们是与人类从事有目的的活动这一冲动是不相容的。但是，妇女也是有着一份技艺本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她具有的技艺本能要超过平均的水平），对这种技艺本能来说，毫无意义的生活或消费是令人讨厌的。为了对她接触的经济环境所产生的直接的、赤裸裸的刺激做出反应，她必须表现出生命力。妇女身上存在着一种冲动，即以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并能更直接地参与社会生产过程，妇女身上的这种冲动可能要比男性更为强烈。

So long as the woman's place is consistently that of a drudge, she is, in the average of cases, fairly contented with her lot. She not only has something tangible and purposeful to do, but she has also no time or thought to spare for a rebellious assertion of such human propensity to self-direction as she has inherited. And after the stage of universal female drudgery is passed, and a vicarious leisure without strenuous application becomes the accredited employment of the women of the well-to-do classes, the prescriptive force of the canon of pecuniary decency, which requires the observance of ceremonial futility on their part, will long preserve high-minded women from any sentimental leaning to self-direction and a “sphere of usefulnes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during the earlier phases of the pecuniary culture, while the leisure of the leisure class is still in great measure a predatory activity, an active assertion of mastery in which there is enough of tangible purpose of an invidious kind to admit of its being taken seriously as an employment to which one may without shame put one's hand. This condition of things has obviously lasted well down into the present in some communities. It

continues to hold to a different extent for different individuals, varying with the vividness of the sense of status and with the feebleness of the impulse to workmanship with which the individual is endowed. But where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community has so far outgrown the scheme of life based on status that the relation of personal subservience is no longer felt to be the sole “natural” human relation; there the ancient habit of purposeful activity will begin to assert itself in the less conformable individuals against the more recent, relatively superficial, relatively ephemeral habits and views which the predatory and the pecuniary culture have contributed to our scheme of life. These habits and views begin to lose their coercive force for the community or the class in question so soon as the habit of mind and the views of life due to the predatory and the quasi-peaceable discipline cease to be in fairly close accord with the later-developed economic situation. This is evident in the case of the industrious classes of modern communities; for them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of life has lost much of its binding force, especially as regards the element of status. But it is also visibly being verified in the case of the upper classes, though not in the same manner.

一般情况下，只要一位妇女始终处于从事苦工杂役的地位，她就会对她的命运境遇感到相当满意。因为她有些具体而又有目的的事情要做，不仅如此，她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思考能力，使自己产生反抗的情绪，让她遗传而得的自主自决的人类习性难以控制地表现出来。妇女普遍从事苦工杂役的阶段过去之后，代理有闲成为富有阶级妇女公认的职业，金钱礼仪准则的规约性力量要求妇女遵守礼仪性的不求实用，并会永久地阻止心高气傲的妇女在情感上本性于自主自决和“实用性领域”。在金钱文化的初期阶段，情况尤其如此；那个时候，有闲阶级的有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掠夺活动，是统治力量的积极表现，具有足够明确的歧视性目的，使得人们能够严肃对待

它，将其视作一种职业，人们可以参与其中而不会受到指责。在某些社会里，这种情形明显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情况也存在于个人身上，因为个人所具有的身份观念的强弱程度不同，技艺冲动的强弱程度也不相同，所以，不同的个人身上这种情况存在的程度也不相同。但是，如果社会的经济结构发展太快，已经不能和以身份制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相适应，因而人们不再认为个人服从关系是唯一“自然的”人际关系，那么，那些相对不顺从的个人身上就会重新出现进行有目的活动的古老习惯，从而掩盖了掠夺文化和金钱文化赋予我们生活方式的那些比较晚近的、比较肤浅的、比较短暂的习惯和观点。一旦经由掠夺文化和准和平文化的熏陶而形成的心理习惯和生活观念，不再能够很好地适应后来发展的经济形势，这些习惯和观点对该社会或该阶级就会失去其强制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的各个工业阶级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对他们来说，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身份制这一元素，已经失去了其大部分的约束力。这种情况也可以在上层阶级中得到印证，只不过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

The habits derived from the predatory and quasi-peaceable culture are relatively ephemeral variants of certain underlying propensities and 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ce; which it owes to the protracted discipline of the earlier, proto-anthropoid cultural stage of peaceable, relatively undifferentiated economic life carried on in contact with a relatively simple and invariable material environment. When the habits superinduced by the emulative method of life have ceased to enjoy the sanction of existing economic exigencies, a process of disintegration sets in whereby the habits of thought of more recent growth and of a less generic character to some extent yield the ground before the more ancient and more pervading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ce.

源自掠夺文化和准和平文化的各种习惯，都是该种族某些基本本

性和精神特征的较为短暂的变体；这些本性和特征是在早期的原始类人猿文化阶段的熏陶下形成的，当时的经济生活是和平的，其分化程度不高，是在相对简单而又稳定的物质环境中进行的。一旦因竞赛生活方式而形成的习惯不再适应当前的经济要求，一个解构的过程就会随即开始，那些新近出现的、不太普遍的思维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有所让步，为该种族更加古老的、更为普遍的精神特征所取代。

In a sense, then, the new-woman movement marks a reversion to a more generic type of human character, or to a less differentiated expression of human nature. It is a type of human nature which is to be characterized as proto-anthropoid, and, as regards the substance if not the form of its dominant traits, it belongs to a cultural stage that may be classed as possibly sub-human. The particular movement or evolutional feature in question of course shares this characteriz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later social development, in so far as this social development shows evidence of a reversion to the spiritual attitude that characterizes the earlier, undifferentiated stage of economic evolution. Such evidence of a general tendency to reversion from the dominance of the invidious interest is not entirely wanting, although it is neither plentiful nor unquestionably convincing. The general decay of the sense of status in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ies goes some way as evidence in this direction; and the perceptible return to a disapproval of futility in human life, and a disapproval of such activities as serve only the individual gain at the cost of the collectivity or at the cost of other social groups, is evidence to a like effect. There is a perceptible tendency to deprecate the infliction of pain, as well as to discredit all marauding enterprises, even where these expressions of the invidious interest do not tangibly work to the material detriment of the community or of the individual who passes an opinion on them. It may even be said that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ies the

average, dispassionate sense of men says that the ideal human character is a character which makes for peace, good-will,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rather than for a life of self-seeking, force, fraud, and mastery.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新女性运动标志的是，向更加普遍的人类性格类型复归的一种本性，或者说是人类性格在分化程度不高的形态上的表现。我们可以将这种人类性格称作原始类人猿的性格，就其主要性格特征的实质而非形式而言，它所属的文化阶段或许可以称作“次人类的”。只要社会发展显示出复归经济发展早期未分化阶段所特有的精神态度的迹象，此处所说的运动或进化的特征，和其他近期社会发展一样，都符合上面的描述。这种由歧视性的利益的支配复归古老性格特征的一般本性，其证据不多，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并非完全无迹可寻。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身份制观念的普遍衰退就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证据；对于徒劳无功的人类生活表示不认可，对那些仅仅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集体或其他群体利益的活动表示不认可，这种看得见的复归，也是具有同样效果的证据。还有一种看得见的本性，即谴责将痛苦施加给他人，反对一切掠夺型事业，即使这些歧视性的利益的表现没有给社会带来明显的物质损失，没有给对它们提出意见的个人带来明显的物质损失。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现代工业社会里，普通的、不带偏见的人都会认为，理想的人类性格是那种有助于和平、善意和经济效率的性格，而不是有助于追逐私利、暴力、欺骗和奴役别人的性格。

The influence of the leisure class is not consistently for or against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is proto-anthropoid human nature. So far as concerns the chance of survival of individuals endowed with an exceptionally large share of the primitive traits, the sheltered position of the class favors its members directly by withdrawing them from the pecuniary struggle; but indirectly, through the

leisure-class canons of conspicuous waste of goods and effort,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lessens the chance of survival of such individuals in the entire body of the population. The decent requirements of waste absorb the surplus energy of the population in an invidious struggle and leave no margin for the non-invidious expression of life. The remoter, less tangible, spiritual effects of the discipline of decency go in the same direction and work perhaps more effectually to the same end. The canons of decent life are an elabor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invidious comparison, and they accordingly act consistently to inhibit all non-invidious effort and to inculcate the self-regarding attitude.

有闲阶级的影响并不是一贯支持这种原始类人猿人类性格的复归，也不是一贯阻碍这种原始类人猿人类性格的复归。有些个人具有格外明显的原始性格特征，就他们的生存机会而言，有闲阶级受庇护的地位可以使其成员避免金钱竞争，因而直接有利于其成员的生存；但是，通过有闲阶级的财物和精力炫耀性浪费准则的作用，有闲阶级制度间接地减少了全体民众中这些个人的生存机会。浪费这一礼仪要求，在歧视性竞争中消耗了人们的剩余精力，使得他们再也没有余力在非歧视性生活方面有所表现。礼仪方面的锻炼具有更为间接的、不太具体的、精神上的效果，这类效果也会在相同的方面发挥作用，在实现同一目的的过程中，它们也许更加有效。礼仪生活的准则是对歧视性对比原则的发展，这类准则相应地会一贯抑制一切非歧视性的努力，并且会向人们反复灌输关注自身利益的态度。

Chapter XIV The Higher Learning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ecuniary Culture

第十四章　高级学识：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

To the end that suitable habits of thought on certain heads may be conserved in the incoming generation, a scholastic discipline is sanctioned by the common sense of the community and incorporated into the accredited scheme of life. The habits of thought which are so form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achers and scholastic traditions have an economic value—a value as affecting the service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no less real than the similar economic value of the habits of thought formed without such guidance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everyday life. Whatev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credited scholastic scheme and discipline are traceable to the predilections of the leisure class or to the guidance of the canons of pecuniary merit are to be set down to the account of that institution, and whatever economic value these features of the educational scheme possess are the expression in detail of the value of that institution. It will be in place, therefore, to point out any peculiar feature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which are traceable to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of life, whether as regards the aim and method of the discipline or as regards the compass and character of the body of knowledge inculcated. It is in learning proper, and more particularly in the higher learning, that the influence of leisure-class ideals is most patent; and since the purpose here is not to make an exhaustive collation of data showing the effect of the pecuniary culture upon education, but rather to illustrate the method and trend of the leisure-class influence in education, a survey of certain salient features of the higher

learning, such as may serve this purpose, is all that will be attempted.

为了令属于某些范畴的适宜的思维习惯在下一代中得以保存，学术熏陶得到了社会常识的认可，并且和公认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在教师和学术传统指导下形成的思维习惯是有其经济价值的——一种影响到个人实用性的价值；这种价值和未经过这种指导、在日常生活锻炼下形成的思维习惯所具有的相似经济价值同样真实。公认的学术方案和学术熏陶的任何特征，只要是源于有闲阶级的偏好，或者是受金钱礼仪准则的指导的，都可以归因于有闲阶级制度，该教育方案所具有的这类特征的任何经济价值都是有闲阶级制度价值的具体表现。因此，教育制度所有源于有闲阶级制度的特征，不论是在训练的目的和方法方面，还是在所灌输的知识体系的范围和性质方面，都是我们此处所要探讨的。有闲阶级理想在学识方面，尤其是在高级学识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明显；有些资料可以表明金钱文化对教育产生的影响，而我们此处探讨的目的并不是要对这类资料进行详尽的整理，而是为了说明有闲阶级影响教育的方法和趋势，因此，我们只需对高级学识某些可以满足此处探讨目的的特征作一调查就足够了。

In point of derivation and early development, learning is somewha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otional function of the community, particularly to the body of observances in which the service rendered the supernatural leisure class expresses itself. The service by which it is sought to conciliate supernatural agencies in the primitive cults is not an industrially profitable employment of the community's time and effort. It is, therefore, in great part, to be classed as a vicarious leisure performed for the supernatural powers with whom negotiations are carried on and whose good-will the service and the professions of subservience are conceived to procure. In great part, the early learning consisted in an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and facility in the service of a supernatural agent. It was therefore closely analogous in character to the training required for the domestic service of a temporal master. To a great extent, the knowledge acquired under the priestly teachers of the primitive community was knowledge of ritual and ceremonial; that is to say, knowledge of the most proper, most effective, or most acceptable manner of approaching and of serving the preternatural agents. What was learned was how to make oneself indispensable to these powers, and so to put oneself in a position to ask, or even to require, their intercession in the course of events or their abstention from interference in any given enterprise. Propitiation was the end, and this end was sought, in great part, by acquiring facility in subservience. It appears to have been only gradually those other elements than those of efficient service of the master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stock of priestly or shamanistic instruction.

就其起源和早期发展而言，学识和社会的宗教功能关系颇为密切，它和为超自然的有闲阶级提供服务的那部分宗教仪式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原始教派用来取悦超自然力量的服务所花费的社会时间和精力对生产并无益处。因此，这种服务大都可以看作是为超自然力量执行的代理有闲，人们想与这些超自然的力量达成协议，并通过这种服务和顺从的告白来获得其恩宠。早期学识的大部分内容是由知识和技能构成的，而这些知识和技能是在为超自然力量服务的过程中所习得的。因此，早期的学识在性质上与侍奉一位俗世的主人所需的训练是极其相似的。从原始社会的神职教师那里习得的知识大都是关于宗教仪式方面的知识；也就是如何以最得体、最有效、最受欢迎的方式来接近和服务超自然力量的知识。人们从中所学到的是如何让自己成为这些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就可以在事件进程中请求（甚至是要求）这些力量进行调解，或者不要对某一特定的活动进行干预。赎罪是最终目的，而这一目的主要是通过习得表示顺从的技巧来实现的。除了有效地服务主人外，其他元素看来只是慢慢地进入教士

或萨满教的教学内容的。

The priestly servitor of the inscrutable powers that move in the external world came to stand in the position of a mediator between these powers and the common run of unrestricted humanity; for he was possessed of knowledge of the supernatural etiquette which would admit him into the presence. And as commonly happens with mediators between the vulgar and their masters, whether the masters be natural or preternatural, he found it expedient to have the means at hand tangibly to impress upon the vulgar the fact that these inscrutable powers would do what he might ask of them. Hence, presently, knowledge of certain natural processes which could be turned to account for spectacular effect, together with some sleight of hand, came to be an integral part of priestly lore. Knowledge of this kind passes for knowledge of the “unknowable”, and it owes its serviceability for the sacerdotal purpose to its recondite character. It appears to have been from this source that learning, as an institution, arose, and its differentiation from this its parent stock of magic ritual and shamanistic fraud has been slow and tedious, and is scarcely yet complete even in the most advanced of the higher seminaries of learning.

教士所侍奉的是某些在外部世界活动的神秘莫测的力量，他逐渐成为这些力量和自由的普通民众之间的中介人；因为他具有关于超自然礼仪的知识，所以他能够与神灵相通。和一般民众及其主人之间的中介人一样，不论主人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教士发现自己具有现成的方法，可以很容易让普通民众觉得，这些神秘莫测的力量会按照他的请求行事。于是，关于自然过程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用来解释神奇的现象——再加上一些娴熟的手法，就逐渐成了教士学识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类知识被看作是关于“不可知”现象的知识，它

对神职人员是具有实用性的，这是因为它具有深奥难懂的性质。学识，作为一种制度，看来是由此而生的，它从其母体——魔幻仪式和萨满黄教式骗局——分化出来的过程是缓慢而又漫长的，即使是在最先进的高等学府里，这一分化过程依然没有完成。

The recondite element in learning is still, as it has been in all ages, a very attractive and effective element for the purpose of impressing or even imposing upon, the unlearned; and the standing of the savant in the mind of the altogether unlettered is in great measure rated in terms of intimacy with the occult forces. So, for instance, as a typical case, even so late as the middle of this century, the Norwegian peasants have instinctively formulated their sense of the superior erudition of such doctors of divinity as Luther, Melanchthon, Peder Dass, and even so late a scholar in divinity as Grundtvig, in terms of the Black Art. These, together with a very comprehensive list of minor celebrities, both living and dead, have been reputed masters in all magical arts; and a high position in the ecclesiastical personnel has carried with it, in the apprehension of these good people, an implication of profound familiarity with magical practice and the occult sciences. There is a parallel fact nearer home, similarly going to show the close relationship, in popular apprehension, between erudition and the unknowable; and it will at the same time serve to illustrate, in somewhat coarse outline, the bent which leisure-class life gives to the cognitive interest. While the belief is by no means confined to the leisure class, that class to-day comprises a disproportionately large number of believers in occult sciences of all kinds and shades. By those whose habits of thought are not shaped by contact with modern industry, the knowledge of the unknowable is still felt to be the ultimate if not the only true knowledge.

为了要打动、甚至是愚弄没有知识的人，学识所具有的深奥难懂的元素，同它在过去一切时代一样，依然是一个极具吸引力、极其有效的元素；在目不识丁的人们心中，学者的地位是按照他与那些神秘力量关系的亲密程度来衡量的。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直到本世纪中叶，挪威的农民仍然本能地认为诸如路德（Luther）、麦兰克吞（Malanchthon）、佩德·达斯（Peder Dass），甚至是近代神学家格伦特维（Grundtvig）等神学博士的渊博学识是一种妖术。这些人以及许许多多已故的或活着的二流名人，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各种魔幻法术的大师；在那些天真的人看来，在宗教界享有很高地位的人必然十分精通法术和神秘学。即使是近在本国，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形，在一般人看来，学识渊博与不可知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这一点大体上也可以说明有闲阶级生活在认知方面所具有的本性。上述信念绝不仅仅局限于有闲阶级，但是，在各种各样神秘学的信仰者当中，当代有闲阶级占有着极大的比例。有些人的思维习惯并不是在与现代生产接触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些人依然觉得，关于不可知现象的知识，即使不是唯一的真知识，也是最根本的知识。

Learning, then, set out by being in some sense a by-product of the priestly vicarious leisure class; and, at least until a recent date, the higher learning has since remained in some sense a by-product or by-occupation of the priestly classes. As the body of systematized knowledge increased, there presently arose a distinction, traceable very far bac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between esoteric and exoteric knowledge, the former—so far as there is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comprising such knowledge as is primarily of no economic or industrial effect, and the latter comprising chiefly knowledge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and of natural phenomena which were habitually turned to account for the material purposes of life. This line of demarcation has in time become, at least in popular apprehension, the normal line between the higher learning and the lower.

由此可见，在某种意义上，学识一开始是教士代理有闲阶级的副产品；并且至少直到最近为止，高级学识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教士阶级的副产品或副业。随着系统化知识的增加，出现了神秘知识和通俗知识之别，这种区别可以追溯到教育史的极早时期；如果说这两种知识之间存在着什么实质性区别，这种区别就是，神秘知识主要是那些对经济或生产没有意义的知识，而通俗知识主要是关于生产过程和自然现象的知识，这些生产过程和自然现象往往会被用于满足生活的物质目的。至少在一般人看来，这一分界线久而久之成了高级学识和低级学识之间的标准界线。

It is significant, not only as an evidence of their close affiliation with the priestly craft, but also as indicating that their activity to a good extent falls under that category of conspicuous leisure known as manners and breeding, that the learned class in all primitive communities are great sticklers for form, precedent, gradations of rank, ritual, ceremonial vestments, and learned paraphernalia generally. This is of course to be expected, and it goes to say that the higher learning, in its incipient phase, is a leisure-class occupation—more specifically an occupation of the vicarious leisure class employ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supernatural leisure class. But this predilection for the paraphernalia of learning goes also to indicate a further point of contact or of continuity between the priestly office and the office of the savant. In point of derivation, learning, as well as the priestly office, is largely an outgrowth of sympathetic magic; and this magical apparatus of form and ritual therefore finds its place with the learned class of the primitive community as a matter of course. The ritual and paraphernalia have an occult efficacy for the magical purpose; so that their presence as an integral factor in the earlier pha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gic and science is a matter of expediency, quite as much as of

affectionate regard for symbolism simply.

在一切原始社会里，知识阶级都十分拘泥于形式、惯例、品位等级以及仪式、礼服和一般的学术工具；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证明了知识阶级和教士行业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而且表明了大部分知识阶级的活动都属于讲求礼貌和教养的炫耀性有闲的范畴。当然，这是预料之中的情形，同时它也说明初始阶段的高级学识是有闲阶级的职业，更确切地说，是侍奉超自然有闲阶级的那个代理有闲阶级的职业。然而，这种对学术工具的偏好也说明了教士职务和学者职务之间的另一个接触点或结合点。就其起源而言，学识以及教士职务主要是感应幻术的产物；因此，这种在形式和仪式上使用的幻术道具也就理所当然地在原始社会的知识阶级当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仪式和道具在幻术用途上有着神秘的功效；因此，它们的存在是幻术和科学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这就像象征主义受到高度重视一样。

This sense of the efficacy of symbolic ritual, and of sympathetic effect to be wrought through dexterous rehearsal of the traditional accessories of the act or end to be compassed, is of course present more obviously and in larger measure in magical practice than in the discipline of the sciences, even of the occult sciences. But there are, I apprehend, few persons with a cultivated sense of scholastic merit to whom the ritualistic accessories of science are altogether an idle matter. The very great tenacity with which these ritualistic paraphernalia persist through the later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is evident to anyone who will reflect on what has been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in our civilization. Even to-day there are such things in the usage of the learned community as the cap and gown, matriculation, initiation, and graduation ceremonies, and the conferring of scholastic degrees, dignities, and prerogatives in a

way which suggests some sort of a scholarly apostolic succession. The usage of the priestly orders is no doubt the proximate source of all these features of learned ritual, vestments, sacramental initiation, the transmission of peculiar dignities and virtues by the imposition of hands, and the like; but their derivation is traceable back of this point, to the source from which the specialized priestly class proper received them in the course of differentiation by which the priest came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sorcerer on the one hand and from the menial servant of a temporal master on the other hand. So far as regards both their derivation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content, these usages and the conceptions on which they rest belong to a stage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no later than that of the angekok and the rain-maker. Their place in the later phases of devout observance, as well a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al system, is that of a survival from a very early animistic pha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nature.

象征性仪式具有某种功效，而熟练运用可以促成某一行为或实现某一目的传统工具能够产生交感效果；比起在科学领域，甚至是神秘学领域，这种观念更为明显、更为重要地存在于幻术活动中。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是在那些具有良好学术品质的人当中，也很少有人会认为科学的仪式性辅助用具是完全无用的。任何人，只要回顾一下我们文化中的学术史，就会发现这些仪式性的工具在其晚近的发展过程中顽强地存在着。即使是在今天，学术界的习俗之中依然存在着这类东西，如使用学位帽和学位服，举行入学、入会和毕业仪式，授予学位、荣誉或特权等等；这类情况都带有学术衣钵传承的意味。学术仪式、服装、神圣的入会仪式以及通过按手礼来传承某些尊严和德行等等，所有这些特征，其直接根源毫无疑问都在于教士仪典的习俗；但是，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一个时间点，当时，专业化的教士阶级一方面和巫师不同，另一方面也与侍奉俗世主人的卑贱奴仆不同。就其起源和心理内容而言，这些习俗及其所依据的观念所属的文

化发展阶段应当不晚于爱斯基摩巫师和印第安人祈雨术士盛行的时代。就其在宗教信仰的晚期阶段以及高等教育制度中所处的地位而言，这些习俗是人类性格发展过程中早期万物有灵论形态的残余。

These ritualistic feature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the present and of the recent past, it is quite safe to say, have their place primarily in the higher, liberal, and classic institutions and grades of learning, rather than in the lower, technological, or practical grades, and branches of the system. So far as they possess them, the lower and less reputable branches of the educational scheme have evidently borrowed these things from the higher grades; and their continued persistence among the practical schools, without the sanction of the continued example of the higher and classic grades, would be highly improbable, to say the least. With the lower and practical schools and scholars, the adoption and cultivation of these usages is a case of mimicry—due to a desire to conform as far as may be to the standards of scholastic reputability maintained by the upper grades and classes, who have come by these accessory features legitimately, by the right of lineal devolution.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就最近和当前的教育制度而言，重视这些仪式特征的，主要是高级的、文科的和一流的教育机构和学术等级，而不是教育系统中较低级别的、技术型的或实用型的学术等级和部门。如果教育系统中某些较低等级的、不太有名的部门也具有这类特征，那么显然这是从较高等级的部门学来的；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级的、一流的学术等级不断的示范作用，这些特征不太可能继续存在于实用型的学校之中。较低等级的、实用型的学校和学者采用这些习俗和培育这些习俗主要是出于模仿，目的是为了能够尽可能符合高级别学校和学者所保持的学术荣誉标准，而后者是通过直系

传承的权利而获得这些附属特征的。

The analysis may even be safely carried a step farther. Ritualistic survivals and reversions come out in fullest vigor and with the freest air of spontaneity among those seminaries of learning which have to do primarily with the education of the priestly and leisure classes. Accordingly it should appear, and it does pretty plainly appear, on a survey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ife, that wherever schools founded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lower classes in the immediately useful branches of knowledge grow into institutions of the higher learning, the growth of ritualistic ceremonial and paraphernalia and of elaborate scholastic “functions” goes hand in hand with the transition of the schools in question from the field of homely practicality into the higher, classical sphere. The initial purpose of these schools, and the work with which they have chiefly had to do at the earlier of these two stages of their evolution, has been that of fitting the young of the industrious classes for work. On the higher, classical plane of learning to which they commonly tend, their dominant aim becomes the preparation of the youth of the priestly and the leisure classes—or of an incipient leisure class—for the consumption of goods,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according to a conventionally accepted, reputable scope and method. This happy issue has commonly been the fate of schools founded by “friends of the people” for the aid of struggling young men, and where this transition is made in good form there is commonly, if not invariably, a coincident change to a more ritualistic life in the schools.

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也不为过。在那些主要与教士和有闲阶级教育

有关的学院里，这类仪式上的残余和复归现象表现得最为有力、最为自然。有些学校是为了向下层阶级传授立等可用的知识而设立的，如果它们发展成了传授高级学识的学府，这类学校就会从简单的实用领域转向高深的、古典的范畴，仪式和装备以及复杂的学术“职能”也就会随之发展；如果对大学院校生活的最近发展进行回顾，应当能够看到这一点，而且事实上这一情形是十分明显的。这些学校的初衷是劳动阶级的青年能够胜任工作，在这些学校两个发展阶段的前一个阶段中，学校主要工作的初衷也在于此。等到学校达到了较高的、古典的水平后，它们的主要目标就变成了为教士和有闲阶级或新兴有闲阶级的青年做准备，让他们能够在传统认可的荣誉范围内，以荣誉的方式进行有形财物和无形财物的消费。这一圆满的结局往往是某类学校的命中注定的结局，这些学校是由“民众之友”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向奋斗中的青年人提供帮助；如果这一转变一切正常，学校生活，即使不是必然，也往往会向更加注重仪式的方向发展。

In the school life of to-day, learned ritual is in a general way best at home in schools whose chief end is the cultivation of the “humanities”. This correlation is shown, perhaps more neatly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life-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recent growth. There may be many exceptions from the rule, especially among those schools which have been founded by the typically reputable and ritualistic churches, and which, therefore, started on the conservative and classical plane or reached the classical position by a short-cut; but the general rule as regards the colleges founded in the newer American communities during the present century has been that so long as the community has remained poor, and so long as the constituency from which the colleges have drawn their pupils has been dominated by habits of industry and thrift, so long the reminiscences of the medicine-man have found but a scant and precarious acceptance in the scheme of college life. But so soon as wealth begins appreciably to accumulate

in the community, and so soon as a given school begins to lean on a leisure-class constituency, there comes also a perceptibly increased insistence on scholastic ritual and on conformity to the ancient forms as regards vestments and social and scholastic solemnities. So, for instance, there has been an approximate coincidence between the growth of wealth among the constituency which supports any given college of the Middle West and the date of acceptance—first into tolerance and then into imperative vogue—of evening dress for men and of the décolleté for women, as the scholarly vestments proper to occasions of learned solemnity or to the seasons of social amenity within the college circle. Apart from the mechanical difficulty of so large a task, it would scarcely be a difficult matter to trace this correlation. The like is true of the vogue of the cap and gown.

在今日的学校生活中，凡是主要目的在于培育“人文学科”的学校，一般来说，对学术上的仪式也是最为重视的。在美国近代建立的大学院校的生活史中，这种关联比任何其他地区表现得更加显著。这一通则也许有很多例外，尤其是那些由久负盛名、格外注重仪式的教会所建立的学校，它们一开始就处于保守和古典的阶段，或者是通过捷径直达古典状态；但是就那些本世纪在美国新兴社会建立的大学而言，其一般通则是这样的：只要大学招收的学生大都具有勤劳节俭的习惯，则巫医的遗风在这些学校的生活方式中就不会获得充分的、普遍的认可。但是，一旦社会财富积累明显增加，一旦某一学校的生源开始依赖于有闲阶级，人们就会更加强调学术仪式，就会更加强调要在服装、社会礼仪和学术礼仪的方面符合古代的形式。例如，支撑中西部任何一所大学的生源地，随着其财富的增加，则下列情况几乎会同时发生：男性会穿上晚礼服，女性会穿上袒胸露肩的衣服，这类服装被看作是学术服装，适合在举行学术典礼或校内社交集会时穿戴；这些类型的服装先是勉强被接受，后来便强制性地流行起来。要想追溯这种相互关联，绝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当然，这么艰巨的任务是

存在技术上的困难的。学位服和学位帽的流行，其情况也是如此。

Cap and gown have been adopted as learned insignia by many colleges of this section with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is could scarcely have occurred at a much earlier date, or until there had grown up a leisure-class sentiment of sufficient volume in the community to support a strong movement of reversion towards an archaic view as to the legitimate end of education. This particular item of learned ritual, it may be noted, would not only commend itself to the leisure-class sense of the fitness of things, as appealing to the archaic propensity for spectacular effect and the predilection for antique symbolism; but it at the same time fits into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of life as involving a notable element of conspicuous waste. The precise date at which the reversion to cap and gown took place,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it affected so large a number of schools at about the same time, seems to have been due in some measure to a wave of atavistic sense of conformity and reputability that passed over the community at that period.

最近几年，本地区的许多大学采用了将学位帽和学位服作为博学的标志；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情况在早些时候是不会发生的，或者说，如果这个社会中的有闲阶级情绪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还不足以支持强烈的复归运动——对教育合法目的古老观念的复归——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可以看到，这一特殊的学术仪式迎合了有闲阶级关于何种事物是适当的这一观念，而且还迎合了追求壮观效果的古老本性，迎合了对于古老象征的偏爱；不仅如此，它同时是与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因为它具有明显的炫耀性浪费的因素。学位服和学位帽恰恰在那个时候恢复使用，并且几乎同时对那么多的学校产生影响，这一切似乎是由于那一时期出现了一股席卷全社会的浪潮，这就

是在信仰和荣誉方面的返祖本性浪潮。

It may not be entirely beside the point to note that in point of time this curious reversion seems to coincide with the culmination of a certain vogue of atavistic sentiment and tradition in other directions also. The wave of reversion seems to have received its initial impulse in the psychologically disintegrating effects of the Civil War. Habituation to war entails a body of predatory habits of thought, whereby clannishness in some measure replaces the sense of solidarity, and a sense of invidious distinction supplants the impulse to equitable, everyday serviceability. As an outcome of the cumulative action of these factors, the generation which follows a season of war is apt to witness a rehabilitation of the element of status, both in its social life and in its scheme of devout observances and other symbolic or ceremonial forms. Throughout the eighties, and less plainly traceable through the seventies also, there was perceptible a gradually advancing wave of sentiment favoring quasi-predatory business habits, insistence on status, anthropomorphism, and conservatism generally. The more direct and unmediated of these expressions of the barbarian temperament, such as the recrudescence of outlawry and the spectacular quasi-predatory careers of fraud run by certain “captains of industry”, came to a head earlier and were appreciably on the decline by the close of the seventies. The recrudescence of anthropomorphic sentiment also seems to have passed its most acute stage before the close of the eighties. But the learned ritual and paraphernalia here spoken of are a still remoter and more recondite expression of the barbarian animistic sense; and these, therefore, gained vogue and elaboration more slowly and reached their most effective development at a still later date.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culmination is now already past. Except for the new impetus given

by a new war experience, and except for the support which the growth of a wealthy class affords to all ritual, and especially to whatever ceremonial is wasteful and pointedly suggests gradations of status,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late improvements and augmentation of scholastic insignia and ceremonial would gradually decline. But while it may be true that the cap and gown, and the more strenuous observance of scholastic proprieties which came with them, were floated in on this post-bellum tidal wave of reversion to barbarism, it is also no doubt true that such a ritualistic reversion could not have been effected in the college scheme of life until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in the hands of a propertied class had gone far enough to afford the requisite pecuniary ground for a movement which should bring the colleges of the country up to the leisure-class requirements in the higher learning. The adoption of the cap and gown is one of the striking atavistic features of modern college life,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marks the fact that these colleges have definitely become leisure-class establishments, either in actual achievement or in aspiration.

还有一点应当注意，这一点也许与本讨论并非完全无关，那就是，当这种奇特的复归现象发生时，其他方面的遗传情绪和传统也处于最为流行的时期，这两者似乎是同时发生的。这次复古浪潮的最初推动力似乎来自于内战中产生的心理崩解效果。对战争的适应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掠夺型思维习惯，这样，宗派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团结观念，歧视性区别的观念取代了追求平等的日常实用性的冲动。这些因素产生了累积性作用，其结果是，在战后的这一代人身上，不论是在社交生活中，还是在宗教仪式的方式上以及其他象征性的或礼节性的仪式上，都很容易看到身份制元素的再次显现。在19世纪的整个80年代，可以看到某种情感日益增高的浪潮，这种情感偏爱准掠夺型的商业习惯，坚持身份制、神人同形同性论，以及保守主义；70年代也有这种情况，只是不太明显。蛮夷气质的这些更加直接、更加露骨

的表现，如不法行为的再度猖獗，由“工业巨头”操纵的准掠夺型欺诈行业的兴盛等等，在之前已经达到巅峰，到了70年代末期已经明显有所收敛。到了80年代末期，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情绪复兴的全盛期似乎已经过去。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有关学术的仪式和用具，却依然是蛮夷万物有灵观念较为间接的、较为隐秘的表现；因此，它们流行和发展的速度较慢，到了更晚的时期才达到充分发展的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的巅峰期现在已经过去了。除非是新的战争经历为其带来了新的动力，除非富有阶级的发展为所有仪式提供支持，尤其是为浪费性的、清楚表明身份等级的仪式提供支持，否则近来对学术标志和仪式的各种改进和扩展会逐渐偃旗息鼓。不过，学位帽和学位服以及随之而来的更为繁琐的种种学术礼仪，可能是在南北战争后回归蛮夷状态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这一运动使得这个国家的大学院校能够符合有闲阶级在高级学识方面的要求，如果有产阶级手中积累的财富还不足以为这一运动提供必要的金钱基础，上述这种在仪式上的复古现象就不可能在大学院校的生活方式中出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学位帽和学位服的采用是现代大学生活的一个显著的返祖特征，同时，这也标志着这些大学，不论是在实际成就上还是在办学目的上，都已经完全成为有闲阶级的机构。

As further evidence of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cultural standards of the community, it may be remarked that there is some tendency latterly to substitute the captain of industry in place of the priest, as the head of seminaries of the higher learning. The substitution is by no means complete or unequivocal. Those heads of institutions are best accepted who combine the sacerdotal office with a high degree of pecuniary efficiency. There is a similar but less pronounced tendency to intrust the work of instruction in the higher learning to men of some pecuniary qualification. Administrative ability and skill in advertising the enterprise count for rather more than they once did, as qualifications for the work of teaching. This applies

especially in those sciences that have most to do with the everyday facts of life, and it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schools in the economically single-minded communities. This partial substitution of pecuniary for sacerdotal efficiency is a concomitant of the modern transition from conspicuous leisure to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s the chief means of reputability. The correlation of the two facts is probably clear without further elaboration.

教育制度和社会文化水平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的进一步证据或许值得一提，那就是，近来出现了某种本性，工业巨头取代了教士，成为高等学府的校长。这种替代绝不是完全的，绝不是确定无疑的。兼具教士职务和超高金钱效率的学院领导是最受欢迎的。还存在着一种相似却又不太明显的趋势：将高级学识的传授工作委托给具有一定金钱资质的人。作为教学工作的资质，管理能力和宣传技巧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这句话在那些与日常生活事务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上尤其适用，那些在经济目标单一的社会里所建立的学校，其情形尤其如此。这种以金钱效能部分取代教士效能的现象，是和现代赢得荣誉的手段由炫耀性有闲向炫耀性消费转变的过程同时发生的。这两种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可以说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在这里不需要作进一步阐述。

The attitude of the schools and of the learned class towards the education of women serves to show in what manner and to what extent learning has departed from its ancient station of priestly and leisure-class prerogative and it indicates also what approach has been made by the truly learned to the modern, economic or industrial, matter-of-fact standpoint. The higher schools and the learned professions were until recently tabu to the women. These establishments were from the outset, and have in great measure continued to be, devoted to the education of the priestly and leisure

classes.

学校和学术阶级对待女子教育问题的态度可以表明，学识是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脱离教士和有闲阶级特权的古老地位的，它也表明真正的学者距离现代的、经济的或工业的客观观点到底有多远。高等学府和学术职业直到最近才允许妇女涉足。这类学术机构从一开始就是致力于教士和有闲阶级教育的，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

The women, as has been shown elsewhere, were the original subservient class, and to some extent, especially so far as regards their nominal or ceremonial position, they have remained in that relation down to the present. There has prevailed a strong sense that the admission of women to the privileges of the higher learning (as to the Eleusinian mysteries) would be derogatory to the dignity of the learned craft. It is therefore only very recently, and almost solely in the industrially most advanced communities, that the higher grades of schools have been freely opened to women. And even under the urgent circumstances prevailing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mmunities, the highest and most reputable universities show an extreme reluctance in making the move. The sense of class worthiness, that is to say of status, of a honorific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exes according to a distinction between superior and inferior intellectual dignity, survives in a vigorous form in these corporations of the aristocracy of learning. It is felt that the woman should, in all propriety, acquire only such knowledge as may be classed under one or the other of two heads: (1) such knowledge as conduces immediately to a better performance of domestic service—the domestic sphere; (2) such accomplishments and dexterity, quasi-scholarly and quasi-artistic, as plainly come in under the head of a performance of vicarious leisure. Knowledge is felt to be

unfeminine if it is knowledge which expresses the unfolding of the learner's own life, the acquisition of which proceeds on the learner's own cognitive interest, without prompting from the canons of propriety, and without reference back to a master whose comfort or good repute is to be enhanced by the employment or the exhibition of it. So, also, all knowledge which is useful as evidence of leisure, other than vicarious leisure, is scarcely feminine.

前文已经指出，妇女是原始的从属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她们直到现在还依然处于这样的地位；在名义上的或礼仪性的地位方面，情况尤其如此。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让妇女享受高等学识的特权（犹如参加依洛西斯秘密仪式）必然会有损学术的尊严。因此，直到最近，高等学校才向妇女自由开放，但是，这种做法几乎仅限于工业最发达的社会。即使是处于现代工业社会迫切的环境中，那些最高级的、最著名的大学在采取这一行动时仍然表现出极端的不情愿。这种阶级价值的观念，也就是说，身份观念、将男女两性按照智力的高低进行荣誉性划分的观念，在贵族学术社团里依然活跃地存在着。人们觉得，妇女只适合习得下列两类知识当中的一种：（1）直接有助于提高家务处理质量的知识，即属于家庭范围以内的知识；（2）明显属于执行代理有闲名下的准学术性和准艺术性的才艺和技巧。如果一种知识表现的是学习者自身生活的开展，习得这类知识是出于学习者自身的认知兴趣，而不是因为受到了礼仪准则的驱使，如果使用或展示这类知识并不能提高主人的享受和荣誉，那么这类知识就是不适于妇女习得的。因此，一切可以证明有闲却不可以证明代理有闲的知识都是不适合妇女习得的。

For an appreciation of the relation which these higher seminaries of learning bear to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community, the phenomena which have been reviewed are of importance rather as indications of a general attitude than as being in themselves facts

of first-rate economic consequence. They go to show what is the instinctive attitude and animus of the learned class towards the life process of an industrial community. They serve as an exponent of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for the industrial purpose, attained by the higher learning and by the learned class, and so they afford an indication as to what may fairly be looked for from this class at points where the learning and the life of the class bear more immediately upon the economic life and efficiency of the community, and upon the adjustment of its scheme of lif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 What these ritualistic survivals go to indicate is a prevalence of conservatism, if not of reactionary sentiment, especially among the higher schools where the conventional learning is cultivated.

为了评价这些高等学府和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们上面所评论的一些现象是重要的，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本身具有头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在于它们可以表明一般的态度。它们可以表明知识阶级对工业社会生活过程的本能态度和意图。它们可以作为一个指标，说明高级学识和学术阶级在工业方面所达到的发展阶段，因此，它们可以表明，当这个阶级的学识和生活更为直接地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效率，并且直接影响到为适应时代需要而对生活方式做出调整时，我们可以从这个阶级身上期待些什么。这些仪式上的残存所表明的如果不是反对改革的情绪，也至少是保守主义的流行；在那些培育传统学识的高等学校里，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To these indications of a conservative attitude is to be added another characteristic which go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but which is a symptom of graver consequence than this playful inclination to trivialities of form and ritual. By far the greater number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instance, are affiliated to

some religious denomination and are somewhat given to devout observances. Their putative familiarity with scientific methods and the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should presumably exempt the faculties of these schools from animistic habits of thought; but there is still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them who profess an attachment to the anthropomorphic beliefs and observances of an earlier culture. These professions of devotional zeal are, no doubt, to a good extent expedient and perfunctory, both on the part of the schools in their corporate capacity, and on the part of the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corps of instructors; but it cannot be doubted that there is after all a very appreciable element of anthropomorphic sentiment present in the higher schools. So far as this is the case it must be set down as the expression of an archaic, animistic habit of mind. This habit of mind must necessarily assert itself to some extent in the instruction offered, and to this extent its influence in shaping the habits of thought of the student makes for conservatism and reversion; it acts to hinder his development in the direction of matter-of-fact knowledge, such as best serves the ends of industry.

除了这些保守态度的标志，还有一个同一方面的特征，但是，这一特征与重视形式和礼仪细节的嬉戏本性不同，它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例如，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美国大专院校都是附属于某种宗教教派的，并且都相当热衷于宗教仪式。照理说，这些学校精通科学方法，具有科学的观点，其全体教师应当能够摆脱万物有灵的思维习惯；但是，在他们当中，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早期文化的神人同形同性信仰和仪式习俗表现出了依恋之情。这些宗教热诚的表现，无论是从具有法人资格的学校来说，还是从教学团队的个体成员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权宜性的、敷衍性的；但是，不可否认，在高校当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神人同形同性的观念。只要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应当将其看作是一种古老的万物有灵心理习惯的表现。这种心理习惯在教学中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并且会同等程度地影响到学

生的思维习惯，使之具有保守和复古的本性；它也会阻碍学生在实用知识方面的发展，这类知识最能满足生产的要求。

The college sports, which have so great a vogue in the reputable seminaries of learning to-day, tend in a similar direction; and, indeed, sports have much in common with the devout attitude of the colleges, both as regards their psychological basis and as regards their disciplinary effect. But this expression of the barbarian temperament is to be credited primarily to the body of students, rather than to the temper of the schools as such; except in so far as the colleges or the college officials—as sometimes happens—actively countenance and foster the growth of sports. The like is true of college fraternities as of college sports, but with a difference. The latter are chiefly an expression of the predatory impulse simply; the former are more specifically an expression of that heritage of clannishness which is so large a feature in the temperament of the predatory barbarian. It is also noticeable that a close relation subsists between the fraternities and the sporting activity of the schools. After what has already been said in an earlier chapter on the sporting and gambling habit, it is scarcely necessary further to discuss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is training in sports and in factional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大学体育竞赛在有名的高等学府里极为流行，它们也具有相同的本性；实际上，体育竞赛，不论是在心理基础方面，还是在锻炼效果方面，都和宗教态度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蛮夷气质的这种表现应当主要归功于学生群体，而不能归因于这类学校的校风；除非是这些院校或院校领导积极地支持和培育体育竞赛的发展——有时候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大学生联谊会的情形与大学体育竞赛相似，但是却有一点不同。后者主要只是掠夺冲动的一个表现而已；前者却是宗派观

念残余更为具体的表现，而宗派观念是掠夺时期蛮夷气质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还可以看到，学校联谊会和体育竞赛活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前面的一章里，我们已经谈及运动竞赛和赌博习性，因此，这里完全没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在体育竞赛以及宗派组织和活动中得到的锻炼所具有的经济价值。

But all these features of the scheme of life of the learned class, and of the establishments dedicated to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higher learning, are in a great measure incidental only. They are scarcely to be accounted organic elements of the professed work of research and instruction for the ostensible pursuit of which the schools exist. But these symptomatic indications go to establish a presumption as to the character of the work performed—as seen from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and as to the bent which the serious work carried on under their auspices gives to the youth who resort to the schools. The presumption raised by the considerations already offered is that in their work also, as well as in their ceremonial, the higher schools may be expected to take a conservative position; but this presumption must be checked by a comparison of the economic character of the work actually performed, and by something of a survey of the learning whose conservation is intrusted to the higher schools. On this head,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accredited seminaries of learning have, until a recent date, held a conservative position. They have taken an attitude of depreciation towards all innovations. As a general rule a new point of view or a new formulation of knowledge have been countenanced and taken up within the schools only after these new things have made their way outside of the schools. As exceptions from this rule are chiefly to be mentioned innovations of an inconspicuous kind and departures which do not bear in any tangible way upon the conventional point of view or upon the

conventional scheme of life; as, for instance, details of fact in the mathematico-physical sciences, and new reading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s, especially such as have a philological or literary bearing only. Except within the domain of the "humanities", in the narrow sense, and except so far as the traditional point of view of the humanities has been left intact by the innovators, it has generally held true that the accredited learned class and the seminaries of the higher learning have looked askance at all innovation. New views, new departures in scientific theory, especially new departures which touch the theory of human relations at any point, have found a place in the scheme of the university tardily and by a reluctant tolerance, rather than by a cordial welcome; and the men who have occupied themselves with such efforts to widen the scope of human knowledge have not commonly been well received by their learned contemporaries. The higher schools have not commonly given their countenance to a serious advance in the methods or the content of knowledge until the innovations have outlived their youth and much of their usefulness—after they have become commonplaces of the intellectual furniture of a new generation which has grown up under, and has had its habits of thought shaped by, the new, extra-scholastic body of knowledge and the new standpoint. This is true of the recent past. How far it may be true of the immediate present it would be hazardous to say, for it is impossible to see present-day facts in such perspective as to get a fair conception of their relative proportions.

但是，学术阶级以及致力于保存高级学识的机构，其生活方式中的所有这些特征，绝大部分都是偶发的。绝不能将它们看作是学校公开的教研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类教研工作是为了实现学校所标榜的追求的。但是，通过这些征兆式的迹象，我们可以从经济的观点出

发，推定学校开展的这类工作的性质以及在其指导之下所开展的严肃工作对求学青年所产生的影响。根据上面进行的考察可以推定，高等学校在它们的工作和仪式中所采取的应该是保守的立场；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一推定进行检验，其方式是比较实际完成工作的经济属性，并考察高等学校受委托所要保存的学识。谈到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公认的学术院校直到最近都坚持着保守的立场。它们对一切革新都采取藐视的态度。一个新的观点或者一套新的知识，只有在校外已经获得成功以后，才会在校内得到支持和采纳，这一点已经成为一项通则。这一通则也有例外，这些例外主要是指那些不太显眼的革新以及对传统观点和传统生活方式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的变更；例如，数学物理学科的具体内容、经典著作，尤其是与语言学或文学有关的经典著作的新理解和新阐释等等。除非是在狭义的“人文学科”领域，除非革新者没有触动人文学科的传统观念，否则公认的学术阶级和学术院校一般来说，都会对一切革新侧目而视。科学理论中的新观点、新的变更，尤其是触及人类关系理论的新变更，在大学中获得一席之地的过程是十分缓慢的，它所受到的是极不情愿的容忍，而不是热烈的欢迎；那些整日忙于拓展人类知识范围的人，在其同时代的学术同僚中，往往是不受欢迎的。直到知识在方法和内容方面的重大进步已经过了青年期并且丧失了其大部分功用时，高等学校往往才会对这类革新加以支持和鼓励。这时，这类革新已经成为新一代智力内容中的平凡事物，而这新生的一代是在新的校外知识体系和新的观点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思维习惯也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这句话适用于最近过去的情况。这句话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目前的情况，这一点就难说了，因为我们不可能有如此洞察力来观察当前的事实，从而对其间的相互关系具有清楚的认识。

So far, nothing has been said of the Maecenas function of the well-to-do, which is habitually dwelt on at some length by writers and speakers who trea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of social structure. This leisure-class function is not without an important bearing on the higher learning and on the spread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The manner and the degree in which the class furthers learning through patronage of this kind are sufficiently familiar. It has been frequently presented in affectionate and effective terms by spokesmen whose familiarity with the topic fits them to bring home to their hearers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this cultural factor. These spokesmen, however, have presented the matt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ultural interest, or of the interest of reputability, rather than from that of the economic interest. As apprehended from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and valued for the purpose of industrial serviceability, this function of the well-to-do, as well as the intellectual attitude of members of the well-to-do class, merits some attention and will bear illustration.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及关于富裕阶级梅塞纳斯式的职能。这是研究文化和社会结构发展的那些作家和演说家们习惯于以较长篇幅详细探讨的一个问题。这一有闲阶级的职能对高级学识以及知识和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有闲阶级通过这类资助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其促进的方式和程度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有些代言人常常使用深情而又有力的言辞来陈述这一事实，他们对这一话题了如指掌，所以他们能够让听者对这一文化因素的深远意义感到确信无疑。然而，这些代言人是从文化利益或荣誉利益的角度，而不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如果从经济观点来理解并且按照其工业实用性来评价，富裕阶级的这一职能以及富裕阶级成员对知识的态度就值得我们关注，值得进行一番分析说明。

By way of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aecenas relation, it is to be noted that, considered externally, as an economic or industrial relation simply, it is a relation of status. The scholar under the patronage performs the duties of a learned life vicariously for his patron, to whom certain repute inures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good

repute imputed to a master for whom any form of vicarious leisure is performed. It is also to be noted that, in point of historical fact, the furtherance of learning or the maintenance of scholarly activity through the Maecenas relation has most commonly been a furtherance of proficiency in classical lore or in the humanities. The knowledge tends to lower rather than to heighten the industrial efficiency of the community.

在这种赞助关系的描述中，有一点应当注意，那就是说，如果从其外部来考察，将它视为是一种经济关系或工业关系，那么这种赞助关系就是一种身份关系。获得赞助的学者有义务为他的赞助人执行代理性学术生活，赢得的荣誉属于其主人，而任何形式的代理有闲都是为这位主人执行的。我们还应当看到，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通过赞助关系来促进学术发展或者维持学术活动，其最常见的结果是使得人们更加精通古典学识或人文学科。而这类知识往往会降低而非提高社会生产效率。

Further, as regards the direct participat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leisure class in the furtherance of knowledge, the canons of reputable living act to throw such intellectual interest as seeks expression among the class on the side of classical and formal erudition, rather than on the side of the sciences that bear some relation to the community's industrial life. The most frequent excursions into other than classical fields of knowledge on the part of members of the leisure class are made into the discipline of law and the political, and more especially the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These so-called sciences are substantially bodies of maxims of expediency for guidance in the leisure-class office of government, as conducted on a proprietary basis. The interest with which this discipline is approached is therefore not commonly the intellectual

or cognitive interest simply. It is largely the practical interest of the exigencies of that relation of mastery in which the members of the class are placed. In point of derivation, 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is a predatory function, pertaining integrally to the archaic leisure-class scheme of life. It is an exercise of control and coercion over the population from which the class draws its sustenance. This discipline, as well as the incidents of practice which give it its content, therefore has some attraction for the class apart from all questions of cognition. All this holds true wherever and so long as the governmental office continues, in form or in substance, to be a proprietary office; and it holds true beyond that limit, in so far as the tradition of the more archaic phase of governmental evolution has lasted on into the later life of those modern communities for whom proprietary government by a leisure class is now beginning to pass away.

现在可以进一步谈谈有闲阶级成员对促进知识增长的直接参与。荣誉生活的准则发挥作用，将该阶级表现出来的智力兴趣投向古典的礼仪性学识上，而不是投向那些与社会生产生活有着某种关系的学科上。有闲阶级成员如果对古典知识领域以外的领域有所涉足，最常见的涉足领域有法律和政治学科，尤其是行政管理科学。所谓的科学，实际上是一大堆基本原理，为的是方便有闲阶级在财产的基础上执行管理职能。因此，涉猎这一学科的兴趣往往不仅仅是智力的兴趣或认知的兴趣。这种兴趣大多是实用性的，是为了满足该阶级成员所处的统治地位的需要。管理职能，就其起源来说，是一种掠夺型的职能，是古老的有闲阶级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是对民众的控制与压迫，而有闲阶级的生活资料就是从这些民众中取得的。因此，撇开所有有关认知的问题不谈，这一学科以及构成其内容的实践案例对于有闲阶级还是有些吸引力的。只要管理职能在形式上或实质上依然是一种所有权的职能，上面的话就是适用的；上述言论的适用范围超过了这一限度，由有闲阶级进行的所有制管理现在已经逐渐消失，但

是，只要在管理的演进过程中出现的较为古老的传统继续存在于现代社会生活中，上述言论就是适用的。

For that field of learning within which the cognitive or intellectual interest is dominant—the sciences properly so called—the case is somewhat different, not only as regards the attitude of the leisure class, but as regards the whole drift of the pecuniary culture. Knowledge for its own sake, the exercise of the faculty of comprehension without ulterior purpose, should, it might be expected, be sought by men whom no urgent material interest diverts from such a quest. The sheltered industrial position of the leisure class should give free play to the cognitive interest in members of this class, and we should consequently have, as many writers confidently find that we do have, a very large proportion of scholars, scientists, savants derived from this class and deriving their incentive to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speculation from the discipline of a life of leisure. Some such result is to be looked for, but there are features of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of life, already sufficiently dwelt upon, which go to divert the intellectual interest of this class to other subjects than that causal sequence in phenomena which makes the content of the sciences. The habits of thought which characterize the life of the class run on the personal relation of dominance, and on the derivative, invidious concepts of honor, worth, merit, character, and the like. The causal sequence which makes up the subject matter of science is not visibl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Neither does good repute attach to knowledge of facts that are vulgarly useful. Hence it should appear probable that the interest of the invidious comparison with respect to pecuniary or other honorific merit should occupy the attention of the leisure class, to the neglect of the cognitive interest. Where this latter interest asserts itself it should commonly be diverted to fields of

speculation or investigation which are reputable and futile, rather than to the ques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uch indeed has been the history of priestly and leisure-class learning so long as no considerable body of systematized knowledge had been intruded into the scholastic discipline from an extra-scholastic source. But since the relation of mastery and subservience is ceasing to be the dominant and formative factor in the community's life process, other features of the life process and other points of view are forcing themselves upon the scholars.

而由认知兴趣或智力兴趣主导的学术领域——也就是所谓的真正的科学——其情形就有所不同，其不同之处不但在于有闲阶级的态度方面，也在于金钱文化的整体趋势方面。有些人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他们别无其他目的，只是要运用其理解能力；可以预料的是，这些人没有迫切的物质利益会让他们分心，从而停止对知识的求索。有闲阶级处于受庇护的地位，他们不用从事生产，这个阶级成员的认知兴趣应当能够得到自由的发挥；因此，大部分学者、科学家和博学之士都应当是来自于这一阶级，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思索的动机来源于有闲生活的熏陶，而许多作家也坚信情况确实如此。结果应当如此，但是，有闲阶级生活方式具有某些特征（这一点在前文已经进行过充分的讨论），会将这一阶级的智力兴趣转移到其他方面，而不是投向现象的因果关系方面，这些因果关系构成了各种科学的内容。这一阶级特有的思维方式强调个人统治关系，强调诸如荣誉、价值、功绩、地位等衍生的、歧视性的概念。从这一视角是看不到构成科学主要题材的因果关系的。况且，通俗的实用知识并不会给人带来荣誉。因此，引起有闲阶级关注的应当是在金钱或其他荣誉价值方面进行歧视性对比的兴趣，而不是认知兴趣。即使他们表现出了认知兴趣，这种兴趣也往往会被转移到某些荣誉性的却不求实用的思索和研究上，而不是投向知识求索方面。实际上，这就是教士阶级和有闲阶级的学术史；只要学校外的大量系统化知识还没有侵入学校的学科体系内，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因为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不再是社会生活进程的

主导因素和形成性因素，生活进程的其他特征和其他观点就强行进入了学者的视野。

The true-bred gentleman of leisure should, and does, see the worl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ersonal relation; and the cognitive interest, so far as it asserts itself in him, should seek to systematize phenomena on this basis. Such indeed is the case with the gentleman of the old school, in whom the leisure-class ideals have suffered no disintegration; and such is the attitude of his latter-day descendant, in so far as he has fallen heir to the full complement of upper-class virtues. But the ways of heredity are devious, and not every gentleman's son is to the manor born. Especially i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habits of thought which characterize the predatory master somewhat precarious in the case of a line of descent in which but one or two of the latest steps have lain within the leisure-class discipline. The chances of occurrence of a strong congenital or acquired bent towards the exercise of the cognitive aptitudes are apparently best in those members of the leisure class who are of lower class or middle class antecedents—that is to say, those who have inherited the complement of aptitudes proper to the industrious classes, and who owe their place in the leisure class to the possession of qualities which count for more to-day than they did in the times when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of life took shape. But even outside the range of these later accessions to the leisure class there are an appreciable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 whom the invidious interest is not sufficiently dominant to shape their theoretical views, and in whom the proclivity to theory is sufficiently strong to lead them into the scientific quest.

纯正的有闲阶级绅士应当从个人关系的角度来看世界，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如果他的身上表现出了认知兴趣，这种兴趣应当在此基础上将各种现象系统化。老派绅士的情形确实是这样的，在他们身上，有闲阶级的理想还没有解体；他们那些生存在现代的子孙，如果完全继承了上层阶级的品质，也会采取相同的态度。但是，继承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并不是每个绅士的儿子都是生而享有采邑的。尤其是某些思维习惯的传承，这些思维习惯是掠夺型征服者所特有的，其留传情况很难说得准，在有闲阶级思维习惯中遗存的只不过是最后的一两点痕迹而已。有闲阶级的某些成员出身于下层阶级或中产阶级，他们最有机会拥有强烈的运用认知能力的本性，这些本性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习得的；这类人继承了劳动阶级所特有的全部性格本性，他们之所以能跻身于有闲阶级的行列，是因为他们具有某些品质，这些品质在今天比起有闲阶级生活方式形成之时显得更为重要。但是，除了这些有闲阶级新成员之外，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的个人，他们具有的歧视性的利益并不足以形成他们的理论观点，但是他们对理论具有强烈的爱好，这种爱好足以引导他们走上科学探索的道路。

The higher learning owes the intrusion of the sciences in part to these aberrant scions of the leisure class, who have come under the dominant influence of the latter-day tradition of impersonal relation and who have inherited a complement of human aptitudes differing in certain salient features from the temperament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gime of status. But it owes the presence of this alien bod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lso in part, and in a higher degree, to members of the industrious classes who have been in sufficiently easy circumstances to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other interests than that of finding daily sustenance, and whose inherited aptitudes run back of the regime of status in the respect that the invidious and anthropomorphic point of view does not dominate their intellectual processes. A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which approximately comprise the effective force of scientific progress, it

is the latter that has contributed the most. And with respect to both it seems to be true that they are not so much the source as the vehicle, or at the most they are the instrument of commutation, by which the habits of thought enforced upon the community, through contact with its environment under the exigencies of modern associated life and the mechanical industries, are turned to account for theoretical knowledge.

科学之所以能够闯入高级学识的领域，部分是由于有闲阶级中出现了一些离经叛道的子孙，他们深受非个人关系这一近代传统的影响，他们继承的性格本性在某些主要特征方面不同于身份制下所特有的气质。然而，科学知识这一异类元素之所以能够存在于高级学识领域之中，更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劳动阶级的成员，这些人的处境十分安逸，足以让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维持日常生计以外的兴趣上，他们所继承的性格已经恢复到身份制以前的状态，歧视性的观点和神人同形同性论的观点并不能左右他们的智力过程。科学进步的有效力量大致由这两类人构成，在这两类人当中，后者贡献最大。就这两类人而言，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与其说他们是知识的源泉，不如说他们是工具，他们充其量只是交流的工具；通过他们，有些思维习惯被用于解释说明理论知识，这些思维习惯在现代集体生活和机械产业的要求下与社会环境接触，通过这种接触，社会被迫接受它们。

Science, in the sense of an articulate recognition of causal sequence in phenomena, whether physical or social, has been a feature of the Western culture only since the industrial process in the Western communities has come to be substantially a process of mechanical contrivances in which man's office is that of discrimination and valuation of material forces. Science has flourished somewhat in the same degree as the industrial life of the community has conformed to this pattern, and somewhat in the

same degree as the industrial interest has dominated the community's life. And science, and scientific theory especially, has made headway in the several departments of human life and knowledge in proportion as each of these several departments has successively come into closer contact with the industrial process and the economic interest; or perhaps it is truer to say, in proportion as each of them has successively escaped from the dominance of the conceptions of personal relation or status, and of the derivative canons of anthropomorphic fitness and honorific worth.

科学是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的因果关系的明确认识；这个意义上的科学，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特征，是在西方社会的生产过程实质上成了机械设计的一个过程之后才有的事，其间人类的职能是对物质力量进行辨别和评价。科学繁荣的程度与社会工业生活顺应科学的程度相同，与工业利益对社会生活的支配程度相同。随着人类生活和人类知识的几个领域陆续与生产过程和经济利益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或者说得更准确些，随着这几个领域相继摆脱了个人关系和身份制观念的支配，摆脱了神人同形同性论信念或荣誉价值的准则的支配，科学，尤其是科学理论，也就相应地在这几个领域中发展起来。

It is only as the exigencies of modern industrial life have enforced the recognition of causal sequence in the practical contact of mankind with their environment that men have come to systematize the phenomena of this environment and the facts of their own contact with it, in terms of causal sequence. So that while the higher learning in its best development, as the perfect flower of scholasticism and classicism, was a by-product of the priestly office and the life of leisure, so modern science may be said to be a by-product of the industrial process. Through these groups of men,

then—investigators, savants, scientists, inventors, speculators—most of whom have done their most telling work outside the shelter of the schools, the habits of thought enforced by the modern industrial life have found coherent expression and elaboration as a body of theoretical science having to do with the causal sequence of phenomena. And from this extra-scholastic field of scientific speculation, changes of method and purpose have from time to time been intruded into the scholastic discipline.

只有当现代工业生活的要求强化了人类在与其环境的实际接触中对因果关系的认知，人们才会按照因果关系将该环境中的现象和自己接触到的事实系统化。具有最完美发展形态的高级学识是经院哲学和古典主义的精华，是教士职务和有闲生活的副产品；同样，现代科学也可以说成是工业过程的副产品。现代工业生活强化的思维习惯，通过研究者、博学之士、科学家、发明家以及抽象理论家这类人的努力——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在学校的庇护之下完成其最显著的工作的——使同现象的因果关系有关的那部分理论科学，得到了有条理的表现和发展。正是由于这种学校范围以外的科学思索，学校的学科才会不时地在方法和目的上发生变化。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to be remarked that there is a very perceptible difference of substance and purpose between the instruction offered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on the one hand, and in the higher seminaries of learn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fference in point of immediate practicality of the information imparted and of the proficiency acquired may be of some consequence and may merit the attention which it has from time to time received; but there is a more substantial difference in the mental and spiritual bent which is favored by the one and the other discipline. This divergent trend in discipline between the

higher and the lower learning is especially noticeable as regards the primary education in its latest development in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communities. Here the instruction is directed chiefly to proficiency or dexterity,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in the apprehension and employment of impersonal facts, in their causal rather than in their honorific incidence. It is true, under the traditions of the earlier days, when the primary education was also predominantly a leisure-class commodity, a free use is still made of emulation as a spur to diligence in the common run of primary schools; but even this use of emulation as an expedient is visibly declining in the primary grades of instruction in communities where the lower education is no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ecclesiastical or military tradition. All this holds true in a peculiar degree, and more especially on the spiritual side, of such portion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s have been immediately affected by kindergarten methods and ideals.

在这一方面有一点应当注意，中小学与高等学府在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上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别。两者在所传授的知识的直接实用性和所达到的熟练程度方面都存在差别，这种差别也许是比较重要的，值得人们不时地加以注意；但是，在两种教育所偏爱的智力和精神本性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是更具实质性的。这种高级学识和低级学识在教育方面的分歧本性，在发达工业社会小学教育的最近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最近，小学教育主要是培养智力或体力方面的能力和技巧，培养理解和运用客观事实的能力和技巧，培养通过因果关系而不是荣誉程度来理解和运用这些事实的能力和技巧。事实上，在旧的传统下，小学教育也主要是有闲阶级的商品，今天，一般的小学学校依然频繁地自由使用竞赛这一方式作为刺激学生勤奋学习的手段；但是，在初级教育不受宗教传统或军事传统支配的社会中，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竞赛在其小学教育中的使用明显也在逐渐减少。在教育系统中，有些部分已经受到了幼儿园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的直

接影响，在这些部分中，尤其是在这些部分的精神方面，上述情况显得尤其明显。

The peculiarly non-invidious trend of the kindergarten discipline, and the similar character of the kindergarten influence in primary education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 kindergarten proper, should be taken in connection with what has already been said of the peculiar spiritual attitude of leisure-class womankin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modern economic situation. The kindergarten discipline is at its best—or at its farthest remove from ancient patriarchal and pedagogical ideals—in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communities, where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body of intelligent and idle women, and where the system of status has somewhat abated in rigor under the disintegrating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life and in the absence of a consistent body of military and ecclesiastical traditions. It is from these women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at it gets its moral support. The aims and methods of the kindergarten commend themselves with especial effect to this class of women who are ill at ease under the pecuniary code of reputable life. The kindergarten, and whatever the kindergarten spirit counts for in modern education, therefore, is to be set down, along with the "new-woman movement," to the account of that revulsion against futility and invidious comparison which the leisure-class life under modern circumstances induces in the women most immediately exposed to its discipline. In this way it appears that, by indirection, the institution of a leisure class here again favors the growth of a non-invidious attitude, which may, in the long run, prove a menace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institution itself, and even to the institution of individual ownership on which it rests.

幼儿园教育尤其具有非歧视性本性，这种本性对幼儿园范围以外的初等教育产生了影响，使之具有了相似的性质；这一切都要和处于现代经济环境中的有闲阶级妇女的精神态度联系起来看待，有闲阶级妇女的这种独特的精神态度我们在前文已经讨论过了。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幼儿园教育发展得最好，或者说幼儿园教育最彻底地脱离了古老的父权制理念和古老的教学理念；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出现了一批有知识、有空闲时间的妇女，稳定的军事传统和宗教传统已经不复存在，再加上工业生活的分解作用，身份制的严格程度已经有所下降。幼儿园教育就是从这些处境安逸的妇女那里获得精神上的支持的。这群妇女受到了荣誉生活的金钱准则的约束，而幼儿园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却特别受到她们的青睐。因此，幼儿园以及对现代教育具有重要意义的幼儿园精神，与“新女性运动”一起，都应当看作是对不求实用和歧视性对比的一种反抗；而不求实用和歧视性对比正是有闲生活要求直接受到这种生活熏陶的妇女去做的。这样看来，有闲阶级制度再次间接地有助于非歧视性态度的发展，从长远看来，这或许会威胁到该制度本身的稳定性，甚至会威胁到该制度赖以存在的个体所有制。

During the recent past some tangible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scope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eaching. These changes have in the main consisted in a partial displacement of the humanities—those branches of learning which are conceived to make for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character, tastes, and ideals—by those more matter-of-fact branches which make for civic and industrial efficiency. To put the same thing in other words, those branches of knowledge which make for efficiency (ultimately productive efficiency) have gradually been gaining ground against those branches which make for a heightened consumption or a lowered industrial efficiency and for a type of character suited to the regime of status. In this adaptation of the scheme of instruction the higher schools have commonly been found on the conservative side; each

step which they have taken in advance has been to some extent of the nature of a concession. The sciences have been intruded into the scholar's discipline from without, not to say from below. It is noticeable that the humanities which have so reluctantly yielded ground to the sciences are pretty uniformly adapted to shape the character of the student in accordance with a traditional self-centered scheme of consumption; a scheme of contemplation and enjoyment of the true, the beautiful, and the good, according to a conventional standard of propriety and excellence, the salient feature of which is leisure—*otium cum dignitate* . In language veiled by their own habituation to the archaic, decorous point of view, the spokesmen of the humanities have insisted upon the ideal embodied in the maxim, *fruges consumere nati* . This attitude should occasion no surprise in the case of schools which are shaped by and rest upon a leisure-class culture.

最近，大专院校在教学范围内发生了某些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在于，那些有助于提高公民效率与生产效率的、更加实用的学科部分地取代了人文学科（有助于传统“文化”、性格、品位和理想的学科）。换句话说，与那些可以增加消费、降低生产效率并且有利于适应身份制的性格特征存在的学科比起来，有助于提高效率（归根到底指的是生产效率）的知识学科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在教育方式的调整方面，大学往往是趋于保守的；它们向前迈出的每一步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妥协的性质。自然科学侵入学校教育，即使不是从下而上的，也是由外而内的。有一点值得注意，那些勉强向自然科学做出让步的人文学科，却几乎一律适合塑造学生的性格，使其符合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消费方式；这种消费方式是一种按照礼仪和德行的传统标准对真善美的欣赏和享受方式，其主要特征是有闲——悠然自适（otium cum dignitate）。人文学科的代言人，用那种被他们习惯的古老的、适宜的观点所掩盖的语言，坚持着下面这句格言中的理念：人是为了消费世上的成果而生的（fruges consumer nati）。对由有闲

阶级文化塑造的并且以此种文化为基础的学校而言，这种态度是不足为奇的。

The professed grounds on which it has been sought, as far as might be, to maintain the received standards and methods of culture intact are likewise characteristic of the archaic temperament and of the leisure-class theory of life. The enjoyment and the bent derived from habitual contemplation of the life, ideals, speculations, and methods of consuming time and goods, in vogue among the leisure class of classical antiquity, for instance, is felt to be “higher”, “nobler”, “worthier”, than what results in these respects from a like familiarity with the everyday life and the knowledge and aspirations of commonplace humanity in a modern community. That learning the content of which is an unmitigated knowledge of latter-day men and things is by comparison “lower”, “base”, “ignoble”—one even hears the epithet “sub-human” applied to this matter-of-fact knowledge of mankind and of everyday life.

人们为了让公认的文化标准和文化方式保持原样，会尽力寻找公开的理由，这些理由同样是古老气质和有闲阶级生活理论所特有的。对生活、理想、思考、时间和财物消费方式的习惯性期待，在崇尚经典时间和财物消费的有闲阶级中盛行，在崇尚古风的有闲阶级中间流行，它可以给人带来享受和爱好；对现代社会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知识和志向的熟悉也会给人带来享受和爱好，但是，从对生活、理想、思考、时间和财物消费方式的习惯性期待中获得的享受和爱好“更加高级”、“更加高贵”、“更加有价值”。相比之下，如果一种学识的内容纯粹是关于近代人物和事件的知识，那么它就是“更加低级的”、“卑劣的”、“不光彩的”——甚至有人使用“次人类的”来形容有关人类和日常生活的实用知识。

This contention of the leisure-class spokesmen of the humanities seems to be substantially sound. In point of substantial fact, the gratification and the culture, or the spiritual attitude or habit of mind, resulting from an habitual contemplation of the anthropomorphism, clannishness, and leisurely self-complacency of the gentleman of an early day, or from a familiarity with the animistic superstitions and the exuberant truculence of the Homeric heroes, for instance, is, aesthetically considered, more legitimate than the corresponding results derived from a matter-of-fact knowledge of things and a contemplation of latter-day civic or workmanlike efficiency. There can be but little question that the first-named habits have the advantage in respect of aesthetic or honorific value, and therefore in respect of the "worth" which is made the basis of award in the comparison. The content of the canons of taste, and more particularly of the canons of honor, i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a resultant of the past lif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race, transmitted to the later generation by inheritance or by tradition; and the fact that the protracted dominance of a predatory, leisure-class scheme of life has profoundly shaped the habit of mind and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race in the past, is a sufficient basis for an aesthetically legitimate dominance of such a scheme of life in very much of what concerns matters of taste in the present. For the purpose in hand, canons of taste are race habits, acquired through a more or less protracted habituation to the approval or disapproval of the kind of things upon which a favorable or unfavorable judgment of taste is passed.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the longer and more unbroken the habituation, the more legitimate is the canon of taste in question. All this seems to be even truer of judgments regarding worth or honor than of judgments of taste generally.

人文学科有闲阶级代言人的这一论点在本质上似乎是正确的。一个早期的绅士可以从对神人同形同性论、宗派主义、悠然自得状态的习惯性思考中，从对万物有灵迷信和荷马式英雄充满活力的好勇斗狠的熟悉中获得满足和修养，并形成自己的精神态度和心理习惯；从关于事物的实用知识中，从对现代公民效率或工作效率的思考中，也可以取得相应的结果，但是实际上，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前者的结果是更为合理的。上面提到的第一类习惯在审美价值和荣誉价值方面具有优势，我们这样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此，它在作为比较基础的“价值”方面，也是占有优势的。按理说，品位准则的内容，尤其是荣誉准则的内容，是该种族过去生活和环境的产物，并通过遗传或传统留传给下一代；掠夺型的有闲阶级生活方式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对该种族过去的心理习惯和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事实为这种生活方式在目前与品位有关的问题方面居于统治地位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从审美角度来看，这种生活方式具有的统治地位是合理的。就目前的讨论而言，品位准则是种族的习惯，对事物做出有利的或不利的品位评价是基于对这类事物的认可或反对的基础上的，而种族的习惯正是在对这种认可或反对的漫长的适应过程中形成的。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适应的过程越长，越具有连续性，由此形成的品位准则就越合理。一般的品位评价是这样，价值评价或荣誉评价更是如此。

But whatever may be the aesthetic legitimacy of the derogatory judgment passed on the newer learning by the spokesmen of the humanities, and however substantial may be the merits of the contention that the classic lore is worthier and results in a more truly human culture and character, it does not concern the question in hand. The question in hand is as to how far these branches of learning, and the point of view for which they stand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help or hinder an efficient collective life under modern industrial circumstances—how far they further a more facile adaptation to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to-day. The question

is an economic, not an aesthetic one; and the leisure-class standards of learning which find expression in the deprecatory attitude of the higher schools towards matter-of-fact knowledge are, for the present purpose, to be valued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only. For this purpose the use of such epithets as “noble”, “base”, “higher”, “lower”, etc., is significant only as showing the animus and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disputants; whether they contend for the worthiness of the new or of the old. All these epithets are honorific or humilific terms; that is to say, they are terms of invidious comparison, which in the last analysis fall under the category of the reputable or the disreputable; that is, they belong within the range of ideas that characterizes the scheme of life of the regime of status; that is, they are in substance an expression of sportsmanship—of the predatory and animistic habit of mind; that is, they indicate an archaic point of view and theory of life, which may fit the predatory stage of culture and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from which they have sprung, but which ar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conomic efficiency in the broader sense, disserviceable anachronisms.

但是，不论人文学科代言人对新学识做出的贬损的评价在美学上有何合理性，也不论古典学识更有价值且有助于形成更为真实的人类文化和性格这一观点在实质上有何价值，都与此处讨论的问题无关。目前所要讨论的问题是，教育系统中的这些学科分支以及它们所持的观点对现代工业环境中的集体生活的效率到底有多大的帮助，到底有多大的阻碍——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使得适应现代经济形势的过程变得更加容易。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一个审美问题；高等学校对实用知识所持的批评态度表现了有闲阶级在学识方面的标准，本讨论将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评价这些标准。因此，“高尚的”、“卑劣的”、“高级的”、“低级的”以及诸如此类的性质形容词的使用，只有在用于表明争论者的态度和观点时才具有意义；不管他们是为了表明新学识具有

价值而辩护，还是为了表明旧学识具有价值而辩护。所有这些性质形容词都是些表示敬意的或表示贬损的词语；也就是说，它们是在进行歧视性对比时使用的词语，归根到底，它们属于表示荣誉的词类或表示不光彩的词类；换言之，它们属于身份制下的生活方式所特有的概念范围；它们实质上是体育竞赛精神的一种表现，是掠夺性的、万物有灵心理习惯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它们所体现的是古老的观点和生活方式，这类观点和生活方式出现在掠夺阶段，是和该阶段的文化和经济组织相适应的，但是，从广义上的经济效率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已经毫无用处并且已经过时了。

The classics, and their position of prerogative in the scheme of education to which the higher seminaries of learning cling with such a fond predilection, serve to shape the intellectual attitude and lower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the new learned generation. They do this not only by holding up an archaic ideal of manhood, but also by the discrimination which they inculcate with respect to the reputable and the disreputable in knowledge. This result is accomplished in two ways: (1) by inspiring an habitual aversion to what is merely useful, as contrasted with what is merely honorific in learning, and so shaping the tastes of the novice that he comes in good faith to find gratification of his tastes solely, or almost solely, in such exercise of the intellect as normally results in no industrial or social gain; and (2) by consuming the learner's time and effort in acquiring knowledge which is of no use, except in so far as this learning has by convention becom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um of learning required of the scholar, and has thereby affected the terminology and diction employed in the useful branches of knowledge. Except for this terminological difficulty—which is itself a consequence of the vogue of the classics in the past—a knowledge of the ancient languages, for instance, would have no practical bearing for any scientist or any scholar not engaged on work

primarily of a linguistic character. Of course, all this has nothing to say as to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classics, nor is there any intention to disparage the discipline of the classics or the bent which their study gives to the student. That bent seems to be of an economically disserviceable kind, but this fact—somewhat notorious indeed—need disturb no one who has the good fortune to find comfort and strength in the classical lore. The fact that classical learning acts to derange the learner's workmanlike attitudes should fall lightly upon the apprehension of those who hold workmanship of small accoun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decorous ideals:

古典学及其特权地位在教育体系中受到了高等学府无比的青睐，它们可以影响新一代学者的智力态度并降低其经济效率。它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它们保存了古老的人类理想，不仅如此，它们还会反复灌输不同知识之间的区别，将知识分为荣誉性的和非荣誉性的。这个结果是通过两种途径取得的：（1）激起人们对纯实用型学识（与纯荣誉性学识相对照）的习惯性反感，从而影响到初学者的品位，使得他深深地感到，只有或者几乎只有那种通常不会带来生产或社会利益的智力的发挥，才能够满足他的品位；（2）让学习者把时间消耗在习得没有实际用途的知识上，除非这种学识出于习俗已经融入学者所需要的学识总体当中，并因此对实用知识领域所使用的措辞和术语产生了影响，否则它们就是没有实际用途的。除了这种术语上的困难外（这本身就是过去古典学流行所造成的结果），有关古代语言的知识对于任何一个不是主要从事语言工作的科学家或学者来说，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当然，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与古典学的文化价值无关，并没有贬低古典学学科的意思，也没有贬低古典学研究赋予学生的本性的意思。这种本性似乎在经济方面是毫无用处的，这一点几乎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并不会困扰任何有幸从古典文学中找到安慰和力量的人。古典学识会扰乱学习者的工作态度，这一事实对有些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这些人认为，与培育高尚的理想比起来，工艺技巧是微不足道的：

Iam fides et pax et honos pudorque

上一代的信仰、和平、荣誉，

Priscus et neglecta redire virtus

所有以往被人忽视的东西，

Audet.

都将一去不复返。

Owing to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is knowledge has become part of the elementary requirements in our system of education, the ability to use and to understand certain of the dead languages of southern Europe is not only gratifying to the person who finds occasion to parade his accomplishments in this respect, but the evidence of such knowledge serves at the same time to recommend any savant to his audience, both lay and learned. It is currently expected that a certain number of years shall have been spent in acquiring this substantially useless information, and its absence creates a presumption of hasty and precarious learning, as well as of a vulgar practicality that is equally obnoxious to the conventional standards of sound scholarship and intellectual force.

这类知识已经成为我们教育制度中基本要求的一部分，在这一情形下，使用和理解南欧某种消亡语言的能力，可以使那些有机会展示这方面成就的人感到满足，不仅如此，拥有这类知识也会让任何一位学者受到其听众（不论是外行的还是内行的）的欢迎。就目前而言，要习得这种实际上毫无用途的知识，一般来说得花上好几年时间，如果缺乏这类知识，就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学习急于求成，知识不够扎实，也会让人觉得他身上流露出粗俗的实用本性，这同样是有悖于健康学识和健全智力的传统标准的。

The case is analogous to what happens in the purchase of any article of consumption by a purchaser who is not an expert judge of materials or of workmanship. He makes his estimate of the value of the article chiefly on the ground of the apparent expensiveness of the finish of those decorative parts and features which have no immediate relation to the intrinsic usefulness of the article; the presumption being that some sort of ill-defined proportion subsists between the substantial value of an article and the expense of adornment added in order to sell it. The presumption that there can ordinarily be no sound scholarship where a knowledge of the classics and humanities is wanting leads to a conspicuous waste of time and labor on the part of the general body of students in acquiring such knowledge. The conventional insistence on a modicum of conspicuous waste as an incident of all reputable scholarship has affected our canons of taste and of serviceability in matters of scholarship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the same principle has influenced our judgment of the serviceability of manufactured goods.

这种情况就好比一位对材质或工艺没有专业鉴赏力的买主购买任何一件消费品一样。他对一件物品价值的估算，主要依据的是那些装

饰性部件或特征在完工后所表现出来的奢华程度，而这些部件和特征与该物品的内在用途并无直接关系；他认为一件物品的实际价值和为了易于销售而增加的装饰费用并不成正比。如果缺乏古典学和人文学科方面的知识，这种学识往往不会是健全的学识，这一推断导致全体学子炫耀性地浪费时间和精力以习得此类知识。传统认为，应当以一定程度的炫耀性浪费作为一切荣誉学识的附带条件，这一原则对我们在学识方面的品位准则和实用性准则产生了影响，同样的原则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了我们对于制造品实用性的评价。

It is true, sinc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has gained more and more on conspicuous leisure as a means of repute, the acquisition of the dead languages is no longer so imperative a requirement as it once was, and its talismanic virtue as a voucher of scholarship has suffered a concomitant impairment. But while this is true, it is also true that the classics have scarcely lost in absolute value as a voucher of scholastic respectability, since for this purpose it is only necessary that the scholar should be able to put in evidence some learning which is conventionally recognized as evidence of wasted time; and the classics lend themselves with great facility to this use. Indeed,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it is their utility as evidence of wasted time and effort, and hence of the pecuniary strength necessary in order to afford this waste, that has secured to the classics their position of prerogative in the scheme of higher learning, and has led to their being esteemed the most honorific of all learning. They serve the decorative ends of leisure-class learning better than any other body of knowledge, and hence they are an effective means of reputability.

作为一个赢得荣誉的手段，炫耀性消费变得越来越比炫耀性有闲重要，因此，习得消亡语言的要求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迫切，它那作

为学识证明的魔力般的功效也随之有所减弱。虽然如此，古典学并没有丧失其作为学术声望证明的绝对价值，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学者只需要能够表现出某类学识，而这类学识通常被看作是浪费时间的证据；用古典学来满足这一用途是极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正是因为古典学具有证明时间和精力浪费的功用，因而也具有了证明进行这种浪费所必需的金钱力量的功用，它们才能够在高级学识体系中占据特权地位，才会被尊为一切学识中最具荣誉性的学识，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比起其他类型的知识，它们能更好地满足有闲阶级学识的装饰性目的，因此，它们成了赢得荣誉的一个有效手段。

In this respect the classics have until lately had scarcely a rival. They still have no dangerous rival on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but lately, since college athletics have won their way into a recognized standing as an accredited field of scholarly accomplishment, this latter branch of learning—if athletics may be freely classed as learning—has become a rival of the classics for the primacy in leisure-class education in American and English schools. Athletics have an obvious advantage over the classics for the purpose of leisure-class learning, since success as an athlete presumes not only a waste of time, but also a waste of money, as well as the possession of certain highly unindustrial archaic traits of character and temperament. In the German universities the place of athletics and Greek-letter fraternities, as a leisure-class scholarly occupation, has in some measure been supplied by a skilled and graded inebriety and a perfunctory duelling.

在这一方面，古典学直到最近都是无与伦比的。现在，在欧洲大陆，它们依然没有遇到危险的竞争对手，但是最近，自从大学体育竞赛，作为一个公认的学术成就领域，赢得了公认的地位，在英美学校的有闲阶级教育中，这后一种学术领域——如果也可以将体育竞赛归

类为学识的话——已经成为要与古典学争夺首要地位的对手。就有闲阶级学识的目的而言，比起古典学，体育竞赛具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因为如果一个运动员取得了成功，就可以证明他浪费了时间，而且浪费了金钱，同时还具有某种高度非生产性的古代性格特征和气质。在德国的大学里，体育竞赛以及以希腊字母命名的大学生联谊会，作为有闲阶级的学术职业，已经为技巧性的、分等级饮酒风气和按照惯例进行的决斗所取代。

The leisure class and its standards of virtue—archaism and waste—can scarcely have been concerned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lassics into the scheme of the higher learning; but the tenacious retention of the classics by the higher schools, and the high degree of reputability which still attaches to them, are no doubt due to their conforming so closely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rchaism and waste.

在古典学被引入高级学识体系的过程中，有闲阶级及其价值标准——古风和浪费——几乎没有产生过什么影响；但是，高等学校之所以坚持保留古典学，古典学之所以依然具有高度的荣誉性，毫无疑问是因为它们极其符合古风和浪费的要求。

“Classic” always carries this connotation of wasteful and archaic, whether it is used to denote the dead languages or the obsolete or obsolescent forms of thought and diction in the living language, or to denote other items of scholarly activity or apparatus to which it is applied with less aptness. So the archaic idiom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spoken of as “classic” English. Its use is imperative in all speaking and writing upon serious topics, and a facile use of it lends dignity to even the most commonplace and

trivial string of talk. The newest form of English diction is of course never written; the sense of that leisure-class propriety which requires archaism in speech is present even in the most illiterate or sensational writers in sufficient force to prevent such a lap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ghest and most conventionalized style of archaic diction is—quite characteristically—properly employed only in communications between an anthropomorphic divinity and his subjects. Midway between these extremes lies the everyday speech of leisure-class conversation and literature.

不论是用来形容消亡语言或者现存语言中过时的或废弃的思想和语言形式，还是用来不太恰当地形容其他学术活动或学术用具，“古典”一词总是带有浪费和古风的意味。所以，英语中的古代成语被称为“古典英语”。在关于严肃话题的演讲或写作中，古典英语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轻松使用古典英语会让最为平凡、最为琐碎的谈话显得具有品位。当然，最新的英语措辞绝不可以用于写作；有闲阶级的礼仪观念要求言语要带有古风，这一点即使是对那些最不学无术、最哗众取宠的作家也是具有约束力的，使得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另一方面，最高级的、最为传统的古代措辞是极其独特的，它只适宜在神人同形同性的信徒和他的神祇交流时使用。介于这两个极端中间的就是有闲阶级在谈话和写作中使用的日常语言。

Elegant diction, whether in writing or speaking, is an effective means of reputability. It is of moment to know with some precision what the degree of archaism conventionally required in speaking on any given topic is. Usage differs appreciably from the pulpit to the market-place; the latter, as might be expected, admits the use of relatively new and effective words and turns of expression, even by fastidious persons. A discriminative avoidance of neologisms is honorific, not only because it argues that time has been wasted in

acquiring the obsolescent habit of speech, but also as showing that the speaker has from infancy habitually associated with persons who have been familiar with the obsolescent idiom. It thereby goes to show his leisure-class antecedents. Great purity of speech is presumptive evidence of several successive lives spent in other than vulgarly useful occupations; although its evidence is by no means entirely conclusive to this point.

不论是在写作还是在谈话中，优雅的措辞总是赢得荣誉的一个有效方式。就任何一个话题发言时，要能够较为确切地知道应该古雅到何种程度才符合习惯要求，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从布道坛到市场集市，措辞的使用是明显不同的；可以想象得到，在后一场合，即使是挑剔之人也会允许使用相对较新的、较具活力的词语和表达方法。有区别地避免使用新词是值得尊敬的，不仅仅是因为它说明了说话者为了习得行将废弃的言语习惯浪费了时间，也因为它表明了他自幼就和熟悉古旧语言的人们相处在一起。因而也表明他是有闲阶级出身。言语的高度纯洁性是一个证据，根据这一证据可以推定，其好几代人都没有从事粗鄙的实用性职业；但是，它对这一点的证明作用绝非完全确凿可信。

As felicitous an instance of futile classicism as can well be found, outside of the Far East, is the conventional spelling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 breach of the proprieties in spelling is extremely annoying and will discredit any writer in the eyes of all persons who are possessed of a developed sense of the true and beautiful. English orthography satisfies a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anons of reputability under the law of conspicuous waste. It is archaic, cumbrous, and ineffective; its acquisition consumes much time and effort; failure to acquire it is easy of detection. Therefore it is the first and readiest test of reputability in learning, and

conformity to its ritual is indispensable to a blameless scholastic life.

在远东地区以外，可以找到一个极其恰当的例子来证明古典主义是毫无实际作用的，那就是英语语言的传统拼法。违反拼写规则是极其令人烦恼的一件事，任何作家都会因此在所有具有高度真与美的观念的人们心中名誉扫地。英语正字法满足了炫耀性浪费法则下的荣誉准则的一切要求。它古老、难懂而又表现力不足；习得正字法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未能习得又容易被察觉。因此，它是学术荣誉的首要的、最便捷的检验手段，要想拥有一个无可挑剔的学术生活，就必须符合正字法规范。

On this head of purity of speech, as at other points where a conventional usage rests on the canons of archaism and waste, the spokesmen for the usage instinctively take an apologetic attitude. It is contended, in substance, that a punctilious use of ancient and accredited locutions will serve to convey thought more adequately and more precisely than would be the straightforward use of the latest form of spoken English; whereas it is notorious that the ideas of to-day are effectively expressed in the slang of to-day. Classic speech has the honorific virtue of dignity; it commands attention and respect as being the accredited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leisure-class scheme of life, because it carries a pointed suggestion of the industrial exemption of the speaker. The advantage of the accredited locutions lies in their reputability; they are reputable because they are cumbrous and out of date, and therefore argue waste of time and exemption from the use and the need of direct and forcible speech.

谈到语言纯洁性这一话题，就像谈到基于古典主义和浪费基础上的其他传统习俗一样，其代言人会本能地采取一种辩护的态度。他们的主张实质上是这样的：比起直接使用最新型的英语口语，拘泥于形式地使用古代的、公认的语言能更充分、更准确地表达思想；然而，只有使用今天的俚语才能够有效地表达今天的观念，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古典言语具有尊贵的荣誉性价值；古典言语，作为有闲阶级生活方式下公认的交流方式，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尊敬，因为它有力地向人们表明使用该言语的人是不事生产的。这种公认语言的优点在于它们具有荣誉性；它们之所以具有荣誉性，是因为它们是难懂的、过时的，因而证明说学习这种语言的人是消耗了时间的，也证明了其本人没有使用、也没有必要使用直接有力的言语。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Unto This Last

给这最后来的

John Ruskin

约翰·拉斯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给这最后来的

Unto This Last

约翰·拉斯金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reface 序言
- Essay I The Roots of Honour 第一章　荣耀之根
- Essay II The Veins of Wealth 第二章　财富之脉
- Essay III Qui Judicatis Terram 第三章　正义审判
- Essay IV Ad Valorem 第四章　价值论说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reface

序言

The four following essays were published eighteen months ago in the “Cornhill Magazine”, and were reprobated in a violent manner, as far as I could hear, by most of the readers they met with.

以下四篇文章十八个月前曾发表于《康希尔杂志》，据我所知，它们饱受大多数读者们的激烈诘难。

Not a whit the less, I believe them to be the best, that is to say, the truest, the rightest-worded, and most serviceable things I have ever written; and the last of them, having had especial pains spent on it, is probably the best I shall ever write.

我没觉得挫败，仍自诩这几篇是我所写过的最好的文章，换言之，它们也是最真切、最正确、最经世致用的文辞；尤其是最末那篇，灌注了我诸多的心血，或许以后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文辞。

'This,' the reader may reply, 'it might be, yet not therefore well written.' Which, in no mock humility, admitting, I yet satisfied with the work, though with nothing else that I have done; and purposing shortly to follow out the subjects opened in these papers, as I may find leisure, I wish the introductory statements to be within the

reach of any one who may care to refer to them. So I republish the essays as they appeared. One word only is changed, correcting the estimate of a weight; and no word is added.

或许有读者会说："即便你是这么想，也无法证明你的文章。"但即使我对这些文章丝毫不作改动，也可以毫不谦卑地说，自己很满意这部文集；并且我打算在空闲之时就尽早延续这几篇文章所开出的论题写作，希冀方便那些想要参考它们的读者引用，因此我按原样重新刊印了这四篇文章。除去纠正一处重量估算谬误之外，不添一词。

Although, however, I find nothing to modify in these papers, it is a matter of regret to me that the most startling of all statements in them,—that respecting the necessity of the organization of labour, with fixed wages,—should have found its way into the first essay; it being quite one of the least important, though by no means the least certain, of the positions to be defended. The real gist of these papers, their central meaning and aim, is to give, as I believe for the first time in plain English,—it has often been incidentally given in good Greek by Plato and Xenophon, and good Latin by Cicero and Horace,—a logical definition of WEALTH: such definition being absolutely needed for a basis of economical science. The most reputed essay on that subject which has appeared in modern times, after opening with the statement that 'writers on political economy profess to teach, or to investigate [1_1] , the nature of wealth,' thus follows up the declaration of its thesis—'Every one has a notion, sufficiently correct for common purpose, of what is meant by wealth.' … 'It is no part of the design of this treatise to aim at metaphysical nicety of definition.'

我觉得它们没什么可改，却仍抱有遗憾，因为最震撼的结论被我放到了首篇文章之中（以固定工资论证劳工组织的必要性）；可惜它是最不重要的论点之一，却也绝非最不确定的观点。这些文章真正的要旨、它们核心的意涵与目标，是给财富下一个合乎情理的定义，我相信这是人类第一次用简明的英语给它下定义，而柏拉图与色诺芬曾以优雅的希腊文、西塞罗和贺拉斯曾以杰出的拉丁文给出财富的定义：经济科学绝对要以这重定义为基础。讨论该主题最负盛名的文章出现在当代，它以如下声明开篇："政治经济学家声称，他们或传授或研究 [2_1] ，财富的本质"，旋即奉上其论点——"每个人都对什么是财富有自己的理解，它对公共目的而言已足够明确"……"本书不会拘泥于该定义的理论层面"。

Metaphysicial nicety, we assuredly do not need; but physical nicety, and logical accuracy, with respect to a physical subject, we as assuredly do.

我们确实不需要它精确的理论定义；但考虑到自然对象的时候，我们也的确需要其合情合理的物质层面的定义。

Suppose the subject of inquiry, instead of being House-law (Oikonomia), has been Star-law (Astronomia), and that, ignoring distinction between stars fixed and wandering, as here between wealth radiant and wealth reflective, the writer had begun thus: 'Every one has a notion, sufficiently correct for common purpose, of what is meant by stars. Metaphysical nicety in the definition of a star is not the object of this treatise'; —the essay so opened might yet have been far more true in its final statements, and a thousand fold more serviceable to the navigator, than any treatise on wealth, which founds its conclusion on the popular conception of wealth,

can ever become to the economist.

假设我们研究的主题不是经济规律，而换成天文规律，那么忽视固定星辰与游荡星辰之间的分别，就像忽视财富辐射和反射之间的区别一样，因此开头就说："每个人都对星辰的意义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它对公共目的而言已足够明确。本书不会涉及星辰定义的理论层面"——这样开篇的文章得到的结论或许非常正确，对航海者或许会有用，但它对财富总结出的通俗概念，之于经济学家而言则一文不值。

It was, therefore, the first object of these following papers to give an accurate and stable definition of wealth. Their second object was to show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wealth was finally possible only under certain moral conditions of society, of which quite the first was a belief in the existence, and even, for practical purpose, in the attainability of honesty.

因此我这几篇文章首要目标是给财富下一个准确而牢固的定义。其次则是要证明获取财富最终只是在特定的社会道德情况下才成为可能，起初它作为一种信念存在，甚至相信我们可以在实践中培养出诚信。

Without venturing to pronounce—since on such matter human judgement is by no means conclusive—what is, or is not, the noblest of God's works, we may yet admit so much of Pope's assertion as that an honest man is among His best works presently visible, and, as things stand, a somewhat rare one; but not an incredible or miraculous work; still less an abnormal one. Honesty

is not a disturbing force, which deranges the orbits of economy; but a consistent and commanding force, by obedience to which—and by no other obedience—those orbits can continue clear of chaos.

我们不贸然宣布上帝的哪部作品最高贵（因为人类智慧无法企及），但我们仍可以大致承认蒲柏所言不虚——照目前看来上帝造物中最高贵的非诚信之人莫属，而且他们似乎是极为罕见的事物，但他们并非不可思议的神迹，他们仍是上帝正常的作品。诚信不是扰动的力量，它没法使得经济偏离其轨道；相反它是一贯的、控制性的力量，人们顺从于它、且只服从于它，能够清除混乱，保持正轨。

It is true, I have sometimes heard Pope condemned for the lowness, instead of the height, of his standard:—'Honesty is indeed a respectable virtue; but how much higher may men attain! Shall nothing more be asked of us than that we be honest?'

我的确曾听闻有人批判蒲柏的标准太低，而不是骂它太高：“诚信确实是备受推崇的美德；可是人们能做到的岂止于此呢！我们是不是除了诚信以外一无所求了呢？”

For the present, good friends, nothing. It seems that in our aspirations to be more than that, we have to some extent lost sight of the propriety of being so much as that. What else we may have lost faith in, there shall be here no question; but assuredly we have lost faith in common honesty, and in the working power of it. And this faith, with the facts on which it may rest, it is quite our first business to recover and keep: not only believing, but even by experience assuring ourselves, that there are yet in the world men

who can be restrained from fraud otherwise than by the fear of losing employment;[1] nay, that it is even accurately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such men in any State, that the said State does or can prolong its existence.

诸位朋友们，现如今的确别无所求。我们似乎好高骛远，却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应该做到的这一点（诚信）。此外我们还可能对哪些东西已经丧失信念，在这里就不赘述了；不过，我们无疑对普遍的诚信失去了信心，不信任它运作起来的力量。而这种信心，以及这种信念所倚赖的事实基础，是我们首要去恢复和保持的东西：不仅是信任，更要通过经历向我们自身保证，这世界上仍有人们能限制欺诈，而不是整天恐惧丢失工作；[1] 不仅如此，在任何国家之内，这种人的数量与其国家的长治久安成比例。

1: 'The effectual discipline which is exercised over a workman is not that of his corporation, but of his customers. It is the fear of losing their employment which restrains his frauds, and corrects his negligence.'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 chap. 10.) Note to Second Edition. - The only addition I will make to the words of this book shall be a very earnest request to any Christian reader to think within himself what an entirely damned state of soul any human creature must have got into, who could read with acceptance such a sentence as this; much more, write it; and to oppose to it, the first commercial words of Venice, discovered by me in her first church:

1: “能有效施加于工人身上的纪律，并非来自其公司，而源自顾客。正是出于对失业的恐惧，工人们才约束自己的欺诈行径，纠正自己的疏忽大意。”（[英]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卷，第十章）。

'Around this temple, let the Merchant's law be just, his weights true, and his contracts guileless. If any of my present readers think that my language in this note is either intemperate, or unbecoming, I will beg them to read with attention the Eighteenth paragraph of "Sesame and Lilies"; and to be assured that I never, myself, now use, in writing, any word which is not, in my deliberate judgement, the fittest for the occasion.

以上内容是第二版的注释。而这一版我只会添加如下文字：任何笃信基督教的读者看到这些文字，都会把它当作是严肃的要求，要求他们深入自己的内心思考——人类皮囊之下埋藏着多么龌蹉的灵魂状态，谁又能赞同这句话；更有甚者，把它写下来；甚至反对它，它便是我在威尼斯城最古老教堂里发现的全威尼斯第一句商业箴言：“就在这神殿里，让商贸法律公正起来，磅秤重量真实，协议童叟无欺。”如果读者觉得我在这条注疏里的言语狂妄或失礼，我建议你们好好去读18世纪那篇关于“芝麻与百合”的报道，回头再来确认——我这个人从不会在写作中妄自主观臆断，我的任何说法都会是最贴合语境的。

Venice, Sunday, 18th March, 1877.

1877年3月18日，周日，威尼斯

To these two points, then, the following essays are mainly directed. The subjec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labour is only casually touched upon; because, if we once can get sufficient quantity of honesty in our captains, the organization of labour is easy, and will develop itself without quarrel or difficulty; but if we cannot get honesty in our captains, the organization of labour is for evermore impossible.

以上两点便是我的文章主要论述方向。我只是偶尔谈及劳工组织的问题；因为一旦领导者足够诚信，组织劳工就会变得容易，它们自行发展的环境里就没有争执或困难这些因素；然而一旦领导者缺乏诚信，要组织劳工就难见天日。

The several conditions of its possibility I purpose to examine at length in the sequel. Yet, lest the reader should be alarmed by the hints thrown out during the following investigation of first principles, as if they were leading him into unexpectedly dangerous ground, I will, for his better assurance, state at once the worst of the political creed at which I wish him to arrive.

关于成功的各种条件，我将会在后续书稿中逐条详细检验。我恐怕读者们可能会担心本书接下来要在基本原则的探究中给出的建议——就好像我把他们带入了始料未及的危险地带，为了使他们宽心，

我现在就把政治理念里最糟糕的东西讲给他们听。

(1.) First,—that there should be training schools for youth established, at Government cost, [1_2] and under Government discipline, over the whole country; that every child born in the country should, at the parent's whish, be permitted (and, in certain cases, be under penalty required) to pass through them; and that, in these schools, the child should (with other minor pieces of knowledge hereafter to be considered) imperatively be taught, with the best skill of teaching that the country could produce, the following three things:—(a) The laws of health, and the exercices anjoined by them; (b) Habits of gentleness and justice; and (c) The calling by which he is to live.

（1）首先，要用政府的资金在全国建立青年职业学校， [2_2] 由政府管理；在国内出生的每一个小孩都应该在父母的意愿下入学（某些个案应强制执行）；在学期间必须由国内最优秀的老师教导，学习以下三项（以及本文随后提到的那部分次要知识）：——（a）健康的要点，以及配合这些要点的锻炼；（b）谦和正直的禀性；（c）他个人想要从事的行业。

(2.) Secondly,—that, in connection with these training schools, there should be established, also entirely under Government regulation, manufactories and workshops for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every necessary of life, and for the exercise of every useful art. And that, interfering no whit with private entreprise, nor setting any restraints or tax on private trade, but leaving both to do their best, and beat the Government if they could,—there should, at these Government manufactories and shops, be authoritatively good

and examplary work done, and pure and true substance sold; so that a man could be sure, if he chose to pay the Government price, that he got for his money bread that was bread, ale that was ale, and work that was work.

（2）其次，同样由政府出资兴办、并受政府全面管辖的工厂与作坊，它们匹配上述职业学校的教育，为日常生活制作和销售各类必需品，也为各类实用技艺提供演练场所。这些工厂完全不会妨碍私有企业的发展，它们不会对私有企业设定任何限制或税赋，相反它们则会使得私有企业大放异彩，让私有企业尽可能地击败公立企业。公立工厂与作坊应制作出具有公信力的商品，销售起纯正且名实相副的物品；这样一来，如果有人愿意支付公立商品的价格，他必然能拿到对得住这些价格的面包、美酒和劳务。

(3.) Thirdly,—that any man, or woman, or boy, or girl, out of employment, should be at once received at the nearest Government school, and set to such work as it appeared, on trial, they were fit for, at a fixed rate of wages determinable every year;—that, being found incapable of work through ignorance, they should be taught, or being found incapable of work through sickness, should be tended; but that being found objecting to work, they should be set, under compulsion of the strictest nature, to the more painful and degrading forms of necessary toil, especially to that in mines and other places of danger (such danger being, however, diminished to the utmost by careful regulation and discipline), and the due wages of such work be retained, cost of compulsion first abstracted—to be at the workman's command, so soon as he has come to sounder mind respecting the laws of employment.

（3）第三，任何失业的男子、女子、男孩、女孩应当立即被最近的公立职业学校接收，进行试用，而后安排给他们合适的工作，并给予他们每年预定下得固定工资。如果发现他们因无知而无法从事工作，就要予以教育；如果发现他们因病无法工作，就要予以医治；如果发现他们根本不愿意工作，就要以最严格的方法强制他们从事更为费力且低下的必要性苦工（其危险性已按照严格的规章与制度降到最低），其应得工资要等到这些工作者明白就业的道理之后，方可由其自行支配（而强制执行所产生的费用已经从其工资中首先被抽除）。

(4.) Lastly,—that for the old and destitute, comfort and home should be provided; which provision, when misfortune had been by the working of such a system sifted from guilt, would be honourable instead of disgraceful to the receiver. For (I repeat this passage out of my “Political Economy of Art”, to which the reader is referred for farther detail) 'a labourer serves his country with his spade, just as a man in the middle ranks of life serves it with sword, pen, or lancet. If the service be less, and, therefore, the wages during health less, then the reward when health is broken may be less, but not less honourable; and it ought to be quite as natural and straightforward a matter for a labourer to take his pension from his parish, because he has deserved well of his parish, as for a man in higher rank to take his pension from his country, because he has deserved well of his country.'

（4）最后，我们应当为老弱者与赤贫者提供安适的居所；由于体制缺乏这些保障导致他们遭受不幸，这些居所对于接受救济者而言非但不是耻辱相反则是光荣。因为（以下我要重述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的艺术》写过的那段话，读者们若要知悉细节，可参阅拙著）。“劳力者拿工铲为国家服务，他们和那些拿剑、拿笔、那手术刀为国家服务的中产阶级（劳心者）是一样的。假如他们服务得少，

那么他们身体强健时得到的工资就少，因此他们年老体虚时得到的报偿或许也少了，但我们并不认为他们得到的荣誉会减少；劳力者理应从当地政府手中得到自己的抚恤金，因为他们理应受到当地政府的尊重，这正如品级更高的人们理应从其国家手中得到自己的抚恤金，因为他们理应受到自己国家的尊崇”。

To which statement, I will only add, for conclusion, respecting the discipline and pay of life and death, that, for both high and low, Livy's last words touching Valerius Publicola, 'de publico est elatus,' [1_3] ought not to be a dishonourable close of epitaph.

此外，我只针对生死的规范及其报偿作一点补充，权且算是结论。无论人地位之高低，李维给普布利科拉下的最后之评语：“（他）是公众出力安葬的”，[2_3] 这绝非羞耻的墓志铭。

These things, then, I believe, and am about, as I find power, to explain and illustrate in their various bearings; following out also what belongs to them of collateral inquiry. Here I state them only in brief, to prevent the reader casting about in alarm for my ultimate meaning; yet requesting him, for the present, to remember, that in a science dealing with so subtle elements as those of human nature, it is only possible to answer for the final truth of principles, not for the direct success of plans: and that in the best of these last, what can be immediately accomplished is always questionable, and what can be finally accomplished, inconceivable.

我相信以上这些东西，并且打算尽我所能地解释与阐述其个中意义，也顺带把相关的问题探究清楚。在此我只做简略陈述，以免读者

着急追究我的最终意图。我也要提醒读者们暂时记住，这门科学探讨人性中这么精微的要素，我们只可能回答这些原理的最终真相，而无法直接获得拟定规划的成功：我们的规划制定得再好，凡是立即得到结论的东西常常站不住脚，而往往好不容易证明的结论——却令人难以置信。

Denmark Hill, 10th May, 1862.

丹麦山，5月10日，1862年。

[1_1].Which? for where investigation is necessary, teaching is impossible.

[1_2].It will probably be inquired by near-sighted persons, out of what funds such schools could be supported. The expedient modes of direct provision for them I will examine hereafter; indirectly, they would be far more than self-supporting. The economy in crime alone, (quite one of the most costly articles of luxury in the modern European market,) which such schools would induce, would suffice to support them ten times over. Their economy of labour would be pure again, and that too large to be presently calculable.

[1_3].P. Valerius, omnium consensu princeps belli pacisque artibus, anno post moritur; gloriâ ingenti, copiis, familiaribus adeo exiguis, ut funeri sumtus deesset: de publico est elatus. Luxere matronae ut Brutum.' - Lib. ii. c. xvi.

[2_1].哪些文章？在这里，研究是必要的，传授不太可能。

[2_2].鼠目寸光的人们或许会质疑，兴办这些学校的经费要从哪来。稍后我会细究直接资助经费的合理模式；至于间接的经费来源，这些学校自给自足绰绰有余。这些学校减少犯罪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堪称现代欧洲市场上价格最高的奢侈品了），已足够供给十倍的兴办经费。职业学校的劳工经济效益又将会变得纯粹，目前我们难以估算其规模。

[2_3].“普布利科拉是公认的一流人物，他文武双全，隔年过世了，名声虽然显赫，家中却缺钱办理丧事——他是公众出力安葬的；妇女们为他哀悼，宛如当初对待布鲁图斯一般。”——李维《自建城以来史》第二卷，第十六章。

Essay I The Roots of Honour

第一章　荣耀之根

Among the delusions which at different periods have possessed themselves of the minds of large masses of the human race, perhaps the most curious—certainly the least creditable—is the modern *soi-disant*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based on the idea that an advantageous code of social action may be determined irrespectively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affection.

纵观人类历史不同时期，诸多谬论盛行一时，迷惑世人。其中最令人不解，亦最不可信之说，当属今日自诩为“科学”的所谓政治经济学。该学说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想要确立社会行为的最佳法则，就没必要考虑人的社会情感因素。

Of course, as in the instances of alchemy, astrology, witchcraft, and other such popular creeds, political economy has a plausible idea at the root of it. “The social affections,” says the economist, “are accidental and disturbing elements in human nature; but avarice and the desire of progress are constant elements. Let us eliminate the inconstants, and, considering the human being merely as a covetous machine, examine by what laws of labour, purchase, and sale, the greatest accumulative result in wealth is obtainable. Those laws once determined, it will be for each individual afterwards to introduce as much of the disturbing affectionate element as he chooses, and to determine for himself the result on the new conditions supposed.”

当然，正如炼金术、星相学、魔法等诸如此类的流行骗术，政治经济学的立论逻辑也似乎言之不谬。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各种社会情感在人性中属于偶发的干扰性因素，而人的贪欲和对发展的追求却是恒定不变的。所以，让我们首先剔除那些变量，再将人类视作只有贪欲之心的机器，然后探究遵循何种劳动规律、买卖交易规律等，才能获得最多的财富积累。这些基本规律确定后，个人尽可加入种种情感变量，由此得出具体情况下的具体结论。”

This would be a perfectly logical and successful method of analysis, if the accidentals afterwards to be introduced were of the same nature as the powers first examined. Supposing a body in motion to be influenced by constant and inconstant forces, it is usually the simplest way of examining its course to trace it first under the persistent conditions, and afterwards introduce the causes of variation. But the disturbing elements in the social problem are not of the same nature as the constant ones: they alter the essence of the creature under examination the moment they are added; they operate, not mathematically, but chemically, introducing conditions which render all our previous knowledge unavailable. We made learned experiments upon pure nitrogen, and have convinced ourselves that it is a very manageable gas; but, behold! The thing which we have practically to deal with is its chloride; and this, the moment we touch it on our established principles, sends us and our apparatus through the ceiling.

如果之后要引入的诸种变量因素与先前考虑的重要因素本质无二，以上所述该是多么合乎逻辑、多么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啊！比如我们假设某一物体在运动中受到恒力和变力的作用，若要研究其运动过程，最便捷的方法当然莫过于首先将其置于恒定条件下进行考察，

其次再考虑各种变量的作用。然而，社会问题研究中的干扰因素与恒定因素的性质并不相同，因为变量一进入社会问题，就会使所考察的生命体本质发生变化。换句话说，这不是数学变化，而是化学反应——引入干扰因素会使此前的研究结论失去意义。就如我们为学术研究而做的纯氮实验，实验结果使我们相信氮气是一种性质稳定的气体。然而，各位请注意，我们在现实环境中所面对的不是纯氮，而是其氯化物。一旦我们还用先前的氮气实验原理来应对，恐怕会立刻把人和装置炸到室外。

Observe, I neither impugn nor doubt the conclusion of the science if its terms are accepted. I am simply uninterested in them, as I should be in those of a science of gymnastics which assumed that men had no skeletons. It might be shown, on that supposition, that it would be advantageous to roll the students up into pellets, flatten them into cakes, or stretch them into cables; and that when these results were effected, the re-insertion of the skeleton would be attended with various inconveniences to their constitution. The reasoning might be admirable, the conclusions true, and the science deficient only in applicability.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stands on a precisely similar basis. Assuming, not that the human being has no skeleton, but that it is all skeleton, it founds an ossified theory of progress on this negation of a soul; and having shown the utmost that may be made of bones, and constructed a number of interesting geometrical figures with death's-head and humeri, successfully proves the inconvenience of the reappearance of a soul among these corpuscular structures. I do not deny the truth of this theory; I simply deny its applicability to the present phase of the world.

请注意，我绝不怀疑给定条件下科学实验得出的结论，我只是对这些条件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假设人体没有骨骼的体操运动之类

的研究。体操运动学假设人体没有骨骼，据此提出可先训练学习体操者如何曲身成球、展平似饼，或拉伸如绳，把这些功夫一一练成之后，再考虑将骨骼纳入人体后给体型带来的诸多不便。这种推理也许无可挑剔，结论也会真实可信，但唯一的缺憾是不能在实践中操作演练。当今政治经济学与体操运动的假设几乎同出一辙，只不过它的假设不是人无骨骼，而是人只有骨骼，再无其他，其“骨骼生成论”以否认灵魂的存在为基础。在将这种骨生成理论推至极限，并构建了几幅有趣的带有骷髅和肱骨的几何图形后，政治经济学终于顺利地向世人证明：将灵魂纳入如此简明的人体结构中该是多么掣肘不便。我不否认该理论的正确性，我只是认为这种理想化的研究不适用于现阶段的社会形势。

This inapplicability has been curiously manifested during the embarrassment caused by the late strikes of our workmen. Here occurs one of the simplest cases, in a pertinent and positive form, of the first vital problem which political economy ha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employer and employed); and, at a severe crisis, when lives in multitudes and wealth in masses are at stake, the political economists are helpless—practically mute; no demonstrable solution of the difficulty can be given by them, such as may convince or calm the opposing parties; obstinately the masters take one view of the matter; obstinately the operatives another; and no political science can set them at one.

这种不适应性已在近来的工人罢工所造成的困境中得以凸显。罢工所带来的问题是一个最简单的案例，以直接、积极的形式说明了政治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劳资关系）。如果遇到严重危机，许多人的生命和大量财富面临风险的话，那些政治经济学信徒们就无可奈何、无话可说了。他们实在找不出任何摆脱困境的出路，既说服不了对立的双方，也不能平息他们的怒气。雇主与工人各执一

端，互不相让，任何与政治相关的所谓科学都难以让二者同休共戚。

It would be strange if it could, it being not by “science” of any kind that men were ever intended to be set at one. Disputant after disputant vainly strives to show that the interests of the masters are, or are not, antagonistic to those of the men: none of the pleaders ever seeming to remember that it does not absolutely or always follow that the persons must be antagonistic because their interests are. If there is only a crust of bread in the house, and mother and children are starving, their interests are not the same. If the mother eats it, the children want it; if the children eat it, the mother must go hungry to her work. Ye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follow that there will be “antagonism” between them, that they will fight for the crust, and that the mother, being strongest, will get it, and eat it. Neither, in any other case, whatever the relations of the persons may be, can it be assumed for certain that, because their interests are diverse, they must necessarily regard each other with hostility, and use violence or cunning to obtain the advantage.

若真有某一科学能让二者殊途同归，反而不合情理，因为人本来就不是任何“科学”能让其别无二致的。对于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利益是否相互抵触，人们争辩不休，其实这种争辩徒劳无益，因为争辩的人似乎都忘了，雇主与工人即使利益抵触也不一定就一直势不两立。比如说家里只有一片面包，而母亲与几个孩子都饥肠辘辘，则他们的利益关系就不相同。若母亲吃面包，孩子会伸手要；若孩子们吃面包，母亲就要饿着肚子去工作。然而即使这样，母子之间也不一定就“反目成仇”，为了抢这块面包而打起来，最终最为强壮的母亲将面包独吞。推至其他情况，不论人们之间是何种关系，我们都不能有把握地认定，利益上出现分歧的双方为占据优势就一定会相互敌视，甚至诉诸武力，或耍尽花招。

Even if this were so, and it were as just as it is convenient to consider men as actuated by no other moral influences than those which affect rats or swine, the 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question are still indeterminable. It can never be shown generally either that the interests of master and labourer are alike, or that they are opposed; for,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they may be either. It is, indeed, always the interest of both that the work should be rightly done, and a just price obtained for it; but, in the division of profits, the gain of the one may or may not be the loss of the other. It is not the master's interest to pay wages so low as to leave the men sickly and depressed, nor the workman's interest to be paid high wages if the smallness of the master's profit hinders him from enlarging his business, or conducting it in a safe and liberal way. A stoker ought not to desire high pay if the company is too poor to keep the engine-wheels in repair.

即便双方水火不容，即便为了方便讨论而完全有理由认为，影响人类的道德因素与影响老鼠和猪的因素无异，上述争论的逻辑条件仍难以确定。我们往往说明不了雇主与工人的利益是相同还是相冲突，因为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并且很可能既相同又相互冲突。的确，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是产品应保质保量，产品的价格也要公正合理。但至于利益分配，一方多取则可能会使另一方少得。当然，降低工资，以致工人体弱多病、情绪低落，这并不符合雇主的利益；同样，工资过高，使得雇主利润太少，难以扩大生产规模，或者难以保证安全生产和自由经营，也不符合工人的利益。比如说，一个公司如果资金短缺，没钱修理机车，司炉工肯定不会指望拿到高薪。

And the varieties of circumstances which influence these reciprocal interests are so endless, that all endeavour to deduce

rules of action from balance of expediency is in vain. And it is meant to be in vain. For no human actions ever were intended by the maker of men to be guided by balances of expediency, but by balances of justice. He has therefore rendered all endeavours to determine expediency futile for evermore. No man ever knew, or can know, what will be the ultimate result to him, or to others, of any given line of conduct. But every man may know, and most of us do know, what a just and unjust act is. And all of us may know also,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justice will be ultimately the best possible, both to others and ourselves, though we can neither say what is best, or how it is likely to come to pass.

由于影响劳资双方利益关系的可变情况层出不穷，所以，为了研究方便而努力简化问题从而推导出行动法则的做法往往徒劳无益。这种努力注定徒劳无益，因为造物主本来就没想让人的行为受到种种权宜之计的支配，反而受正义制衡支配。这样看来，造物主使所有力图方便的做法都无果而终。没有人曾经知道或能够知道任何既定的行动法则最终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何种结局。但每个人可能都知道，并且我们中的多数人确实知道，某种行为是否合乎正义。我们所有人也都可能会明白，只有遵循正义才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最美好的结局，尽管我们说不出何为最好结局，也说不出它会如何出现。

I have said balances of justice, meaning, in the term justice, to include affection,—such affection as one man owes to another. All right relations between master and operative, and all their best interests, ultimately depend on these.

我刚才说到“正义制衡”，意指包括情感在内的正义，而那种情感即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雇主与工人之间的一切合法关系以及各

自的最大利益，最终都取决于“正义制衡”。

We shall find the best and simplest illustra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master and operative in the position of domestic servants.

我们可以家庭佣人为例对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加以最恰当、最简洁的阐释。

We will suppose that the master of a household desires only to get as much work out of his servants as he can, at the rate of wages he gives. He never allows them to be idle; feeds them as poorly and lodges them as ill as they will endure, and in all things pushes his requirements to the exact point beyond which he cannot go without forcing the servant to leave him. In doing this, there is no violation on his part of what is commonly called “justice.” He agrees with the domestic for his whole time and service, and takes them;—the limits of hardship in treatment being fixed by the practice of other masters in his neighbourhood. That is to say, by the current rate of wages for domestic labour. If the servant can get a better place, he is free to take one, and the master can only tell what the real market value of his labour is, by requiring as much as he will give.

我们假设在给定工资水平的前提下，主人唯一希望的就是尽可能地压榨佣人的劳动力。他从不让佣人有片刻停歇，并提供最差的食宿，只要佣人还能忍受，不至于罢工离去，就无所不用其极。主人这么做，并不违背通常所说的“公正”，因为主人与佣人有约在先，有权支配佣人的所有时间和所有劳作成果，而待遇之差的极限又受邻居的做法影响，即由家务劳作的国内平均收入水平决定。如果佣人可以自

由选择更好的去处，主人则只有要求佣人完成与报酬相当的家务劳动，才能确定其劳务的真实市场价格。

This is the politico-economical view of the case, according to the doctors of that science; who assert that by this procedure the greatest average of work will be obtained from the servant, and therefore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the community, and through the community, by reversion, to the servant himself.

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专家对该例所持的观点。他们声称以此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压榨佣人的劳动，进而给社会带来最大效益；相应地，社会效益最大化又能在最大程度上惠及佣人本身。

That, however, is not so. It would be so if the servant were an engine of which the motive power was steam, magnetism, gravitation, or any other agent of calculable force. But he being, on the contrary, an engine whose motive power is a Soul, the force of this very peculiar agent, as an unknown quantity, enters into all the political economist's equations, without his knowledge, and falsifies every one of their results. The largest quantity of work will not be done by this curious engine for pay, or under pressure, or by help of any kind of fuel which may be supplied by the caldron. It will be done only when the motive force, that is to say, the will or spirit of the creature, is brought to its greatest strength by its own proper fuel: namely, by the affections.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除非佣人是一架由蒸汽、磁力、重力，或任何其他可以计算的动力来驱动的机器。但是，恰恰相反，驱动佣人

的动力是灵魂！这种难以量化的特殊动力悄悄潜入政治经济学家的一切等式之中，篡改了每一项运算的结果。仅靠支付薪酬，或施以重压，或借助任何来自锅炉的燃料，都不会使这台奇异的机器完成最大量的工作。必须用其特有的燃料——情感，才能使动力——人的意志或精神——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才能使佣人完成最多的工作。

It may indeed happen, and does happen often, that if the master is a man of sense ad energy, a large quantity of material work may be done under mechanical pressure, enforced by strong will and guided by wise method; also it may happen, and does happen often, that if the master is indolent and weak (however good-natured), a very small quantity of work, and that bad, may be produced by the servant's undirected strength, and contemptuous gratitude. But the universal law of the matter is that, assuming any given quantity of energy and sense in master and servant, the greatest material result obtainable by them will be, not through antagonism to each other, but through affection for each other; and that if the master, instead of endeavouring to get as much work as possible from the servant, seeks rather to render his appointed and necessary work beneficial to him, and to forward his interests in all just and wholesome ways, the real amount of work ultimately done, or of good rendered, by the person so cared for, will indeed be the greatest possible.

当然，有可能发生也常常发生的是，如果主人聪明又精力充沛，通过由坚强的意志所形成、由明智的方法所引导的机械式压力，能使佣人完成大量可见的工作；同样，如果主人懒惰又软弱（尽管善良敦厚），佣人就会很少做活，甚至胡乱应付，因为他的力气缺乏引导，他对主人即使感激也心怀鄙夷。但是，在主仆二人的精力和情感关系一定的前提下，就存在一个普遍的规律，即最好的、可见的结果并非

来自于二人的对立关系，而是来自于相互之间的情感。如果主人不是竭力让佣人尽可能多地做活，而是一方面出于自身的需要让佣人完成指定的必要工作，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正当有益的方式将所得利益惠及对方，受到关爱的佣人最终完成的实际工作，或者说他对主人的回报，就会真正最大化。

Observe, I say, “of good rendered,” for a servant's work is not necessarily or always the best thing he can give his master. But good of all kinds, whether in material service, in protective watchfulness of his master's interest and credit, or in joyful readiness to seize unexpected and irregular occasions of help.

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对主人的回报”，因为佣人给主人最好的回报不必也不总是他的劳动力。“回报”多种多样，既指具体的有形劳务，又指对主人利益和信用的维护，还包括乐于随时在预想不到的情况下，助主人一臂之力。

Nor is this one whit less generally true because indulgence will be frequently abused, and kindness met with ingratitude. For the servant who, gently treated, is ungrateful, treated ungently, will be revengeful; and the man who is dishonest to a liberal master will be injurious to an unjust one.

当然通常也会有主人的迁就宽容被仆人利用、对主人的慈爱善良仆人不知感激的情况。对那些即便恩泽及身也少怀感激的佣人来说，如若再对其冷淡无情，他肯定会伺机报复的；而原本对开明的主人不忠的仆人，若再受不义之举，他当然更不会善罢甘休。

In any case, and with any person, this unselfish treatment will produce the most effective return. Observe, I am here considering the affections wholly as a motive power; not at all as things in themselves desirable or noble, or in any other way abstractedly good. I look at them simply as an anomalous force, rendering every one of the ordinary political economist's calculations nugatory; while, even if he desired to introduce this new element into his estimates, he has no power of dealing with it; for the affections only become a true motive power when they ignore every other motive and cond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Treat the servant kindly, with the idea of turning his gratitude to account, and you will get, as you deserve, no gratitude, nor any value for your kindness; but treat him kindly without any economical purpose, and all economical purposes will be answered; in this, as in all other matters, whosoever will save his life shall lose it, whoso loses it shall find it.[1]

但无论什么情况，对于任何人，坦诚相待总会带来最有益的回报。注意，我这里谈论的是仅把感情当作动力，而根本还未涉及感情本身令人向往或高尚的东西，或是其他抽象意义上的美德。我认为这些都是难以规范的因素，使得普通政治经济学家的每项运算都变得了无意义。即使他们想把“情感”考虑进去，但却对处理过程无能为力，因为只有忽略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其他动机和条件，种种感情因素的作用才会真正凸显。如果你善待佣人，却又希望他感恩，那你将得不到感激，你的善心也会一文不值，这都是你应得的；但你若善待佣人，又无任何利益之心，那么你的所有利益都会得以实现。推而广之，凡要活命的，必失去生命；凡（为我）失去生命的，必使他生命复活。[1]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modes of

treatment, and between their effective material results, may be seen very accurately by a comparison of the relations of Esther and Charlie in *Bleak House* , with those of Miss Brass and the Marchioness in *Master Humphrey's Clock* .

1: 对待佣人的这两种不同模式及其所带来的不同物质结果，通过比较《荒凉山庄》中埃丝特和查利的关系与《汉普雷老爷的钟》中布拉斯小姐与侯爵夫人的关系，就会看得十分清楚。

The essential value and truth of Dickens's writings have been unwisely lost sight of by many thoughtful persons, merely because he presents his truth with some colour of caricature. Unwisely, because Dickens's caricature, though often gross, is never mistaken. Allowing for his manner of telling them, the things he tells us are always true. I wish that he could think it right to limit his brilliant exaggeration to works written only for public amusement; and when he takes up a subject of high national importance, such as that which he handled in *Hard Times* , that he would use severer and more accurate analysis. The usefulness of that work (to my mind, in several respects, the greatest he has written) is with many persons seriously diminished because Mr. Bounderby is a dramatic monster, instead of a characteristic example of a worldly

master; and Stephen Blackpool a dramatic perfection, instead of a characteristic example of an honest workman. But let us not lose the use of Dickens's wit and insight, because he chooses to speak in a circle of stage fire. He is entirely right in his main drift and purpose in every book he has written; and all of them, but especially *Hard Times* , should be studied with close and earnest care by persons interested in social questions. They will find much that is partial, and, because partial, apparently unjust; but if they examine all the evidence on the other side, which Dickens seems to overlook, it will appear, after all their trouble, that his view was the finally right one, grossly and sharply told.

狄更斯作品的重要价值和真实性不幸被许多颇有思想的人所忽视，仅仅因为他用近乎漫画式的笔调来展示真相。这种忽视之所以不幸，是因为狄更斯的漫画尽管粗略，但绝对恰如其分。接受了他的叙事方式，他告诉我们的就都是真实的。我认为（但愿他同意）他的卓越的夸张手法只限于大众娱乐作品，而在涉及更具国家意义的主题时，例如像《艰难时世》中的主题，他会采用更严肃、更准确的分析手法。由于《艰难时世》中的庞得贝先生只是舞台上的恶魔而不是现实中工厂主的典型，斯蒂芬·布莱克普尔只是舞台上的完美形象而不是现实中诚实工人的典型，所以这部作品（我认为这本书在许多方面都堪称他最好的作品）的价值在很多人看来大打折扣。但我们不要忽视

狄更斯的智慧和洞察力，他是有意利用舞台的激情来叙事。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主旨明确，意图清晰；所有作品，特别是《艰难时世》，都值得那些关心社会问题的人细致认真地进行研究。他们虽会发现大量偏激之处，而且由于偏激而显得不够公正，但若从另一方面考察所有例证（这似乎被狄更斯所忽略了），就会在努力研究之后发现，狄更斯的观点不论粗糙还是尖锐，最终都是正确的。

The next clearest and simplest example of relation between master and operative is that which exists between the commander of a regiment and his men.

下一个实例是关于军队中官兵关系的，同样极为简洁明了地阐释了雇主与工人的关系。

Supposing the officer only desires to apply the rules of discipline so as, with least trouble to himself, to make the regiment most effective, he will not be able, by any rules or administration of rules, on this selfish principle, to develop the full strength of his subordinates. If a man of sense and firmness, he may, as in the former instance, produce a better result than would be obtained by the irregular kindness of a weak officer; but let the sense and firmness be the same in both cases, and assuredly the officer who has the most direct personal relations with his men, the most care for their interests, and the most value for their lives, will develop their effective strength, through their affection for his own person, and trust in his character, to a degree wholly unattainable by other means. This law applies still more stringently as the numbers

concerned are larger: a charge may often be successful, though the men dislike their officers; a battle has rarely been won, unless they loved their general.

假如军官为图省事而只是简单地按照军纪对下属发号施令，则不论这种一厢情愿的军令何等森严，也都很难让部下不遗余力地执行。但如果这位军官处事明智、意志坚定，就可能如前例那样，比某位意志薄弱、偶尔流露怜悯之心的军官收获更好的结果。不过，要是这两位军官的智力与意志无异，则可以肯定，那位与下属私交甚密、对下属的利益关怀备至、对下属的生命格外珍视的军官才会赢得下属的爱戴与信赖，从而充分调动下属的力量，而这是任何其他手段都得不到的。涉及的人数越多，这一规律的效果越明显，也就是说，如果士兵不喜欢长官，发动一次冲锋还可以成功；而士兵若不爱戴长官，整场战役就很难取胜了。

Passing from these simple examples to the more complicated relations existing between a manufacturer and his workmen, we are met first by certain curious difficulties, resulting, apparently, from a harder and colder state of moral elements. It is easy to imagine an enthusiastic affection existing among soldiers for the colonel. Not so easy to imagine an enthusiastic affection among cotton-spinners for the proprietor of the mill. A body of men associated for purposes of robbery (as a Highland clan in ancient times) shall be animated by perfect affection, and every member of it be ready to lay down his life for the life of his chief. But a band of men associated for purposes of legal production and accumulation is usually animated, it appears, by no such emotions, and none of them are in any wise willing to give his life for the life of his chief. Not only are we met by this apparent anomaly, in moral matters, but by others connected with it, in administration of system. For a servant or a

soldier is engaged at a definite rate of wages, for a definite period; but a workman at a rate of wages variable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for labour, and with the risk of being at any time thrown out of his situation by chances of trade. Now, as, under these contingencies, no action of the affections can take place, but only an explosive action of disaffections, two points offer themselves for consideration in the matter.

将这几个简单的例子联系到更为复杂的工厂主与雇工的关系上，我们首先面临的显然是由更为僵硬冷漠的道德因素所带来的特殊难题。我们不难想象士兵对团长忠心耿耿，但却很难想象纺织工对工厂主的耿耿忠心。一伙人为打家劫舍而聚在一起（就如古时的苏格兰高地宗族）全靠义气驱使，每个人都乐意为保护首领而肝脑涂地。而一伙人只是为了合法的生产与财富积累而共同劳动，却常常看上去不受此种情感的激励，更无人愿为保护工厂主而献身了。我们遇到的不仅是这种道德上的明显的反常现象，还有与此关联的经营管理体系上的反常。受雇的佣人或士兵有明确的薪酬，有确定的服务期限，但一个工人的工资水平却随劳动力需求而变化，还要承担由于行业形势的动荡而随时被解雇的风险。面对这些不确定条件，工人当然不会对工厂主心怀感激，而只会粗暴地发泄不满。鉴于此，这里有两点供雇主们思考：

The first—How far the rate of wages may be so regulated as not to vary with the demand for labour.

第一，能在多大程度上调控工资水平，且其不受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The second—How far it is possible that bodies of workmen may be engaged and maintained at such fixed rate of wages (whatever the state of trade may be), without enlarging or diminishing their number, so as to give them permanent interest in the establishment with which they are connected, like that of the domestic servants in an old family, or an *esprit de corps* , like that of the soldiers in a crack regiment.

第二，在固定工资水平（不受经营状况的影响）的条件下，下面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雇用并留住工人，同时雇佣人数不增不减，使得工人们对所在的企业怀有持久的感情，就如多年的佣人对主人一家的感情，或使工人们拥有集体荣誉感，就如精锐之师的团队精神。

The first question is, I say, how far it may be possible to fix the rate of wages, irrespectively of the demand for labour.

我说过，第一个问题是，不考虑劳动力的需求状况，固定工资水平的可能性有多大。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curious fact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error is the denial by the common political economist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us regulating wages; while, for all the important, and much of the unimportant, labour, on the earth, wages are already so regulated.

那些平庸的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不可能如此调整工资，我认为这也

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怪异的错误之一，因为对于人类所有重要的劳动以及很多不重要的劳动，其工资早就是如此规定的。

We do not sell our prime-ministership by Dutch auction; nor, on the decease of a bishop, whatever may be the general advantages of simony, do we (yet) offer his diocese to the clergyman who will take the episcopacy at the lowest contract. We (with exquisite sagacity of political economy!) do indeed sell commissions; but not openly, generalships: sick, we do not inquire for a physician who takes less than a guinea; litigious, we never think of reducing six-and-eight-pence to four-and-sixpence; caught in a shower, we do not canvass the cabmen, to find one who values his driving at less than sixpence a mile.

我们不用荷兰人的降价拍卖方式出售首相职位，且无论出卖圣职对公众有多少益处，我们也不会在主教死后，把他管辖的教区交给以最低工资价格获得圣职的牧师。我们（出于精明的政治经济学）的确出卖委任状，但从不公开出售军队的指挥权；生病时我们不会去找收费还不到一个几尼的医生；打官司时，我们不会把律师的佣金由六先令八便士降为四先令六便士；遭遇大雨时，我们也不会讨价还价，非要找到一个出价每英里六便士以下的车夫。

It is true that in all these cases there is, and in every conceivable case there must be, ultimate reference to the presumed difficulty of the work, or number of candidates for the office. If it were thought that the labour necessary to make a good physician would be gone through by a sufficient number of students with the prospect of only half-guinea fees, public consent would soon withdraw the unnecessary half-guinea. In this ultimate sense, the

price of labour is indeed always regulated by the demand for it; but, so far as the practical and immediate administration of the matter is regarded, the best labour always has been, and is, as all labour ought to be, paid by an invariable standard.

不错，在这些事例或其他任何能想到的事例中，最终都要考虑到这些工作假定的难易程度，或者可供选择的人数多少。假如有足够数量的实习生，只收半几尼就能完成一个合格医生的工作，公众很快就会收回多余的半几尼。归根结底，劳动力的价格确实受劳动力需求的调整。然而若考虑到经营管理的现实状况和简洁方便，则优秀劳动力的价格标准过去固定不变，现在固定不变，而且所有的劳动力也应赋予同样的价格。

“What!” the reader perhaps answers amazedly: “pay good and bad workmen alike?”

“什么？”读者诸君也许会惊呼，“给表现良好和表现糟糕的工人同样的薪水？”

Certain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e prelate's sermons and his successor's—or between one physician's opinion and another's—is far greater, as respects the qualities of mind involved, and far more important in result to you personally, th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od and bad laying of bricks (though that is greater than most people suppose). Yet you pay with equal fee, contentedly, the good and bad workmen upon your soul, and the good and bad workmen upon your body; much more may you pay, contentedly, with equal fees, the good and bad workmen upon your house.

的确如此。考虑到相关的心智差异，一位主教的讲经布道不同于其继位者，或者一位医生的诊断结果不同于另一位医生，其差异远大于盖房时砌砖技术高低的差异（尽管后者的差异比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要大一些），对你个人的重要性也远大于后者的差异所带来的后果。然而，不论是为你灵魂或是身体劳作的表现良好的工人或是表现糟糕的工人，你都心安理得地给他们支付同样的薪酬；对给你盖房子的工人，你也不论优劣仍心安理得地支付同样的薪酬，只不过支付的更多而已。

“Nay, but I choose my physician and my clergyman, thus indicating my sense of the quality of their work.” By all means, also, choose your bricklayer; that is the proper reward of the good workman, to be “chosen.” The natural and right system respecting all labour is, that it should be paid at a fixed rate, but the good workman employed, and the bad workman unemployed[2] . The false, unnatural, and destructive system is when the bad workman is allowed to offer his work at half-price, and either take the place of the good, or force him by his competition to work for an inadequate sum.

“不对啊，我对医生和牧师是有选择的，这也说明我能分出他们谁好谁差啊。”是啊，你还设法挑选了盖房子的瓦工，而能被“选中”，就是好工人应得的回报。而最自然、最正当的劳动力制度是必须固定工资水平，同时雇工只选好的不要差的。[2] 而不正确、不自然，且有破坏作用的制度是出一半的价格雇用了劣等工人，结果是要么挤占了好工人的位置，要么使好工人在竞争中降低薪酬。

2: I have been naturally asked several times, with

respect to the sentence in the first of these papers, "the bad workmen unemployed," "But what are you to do with your bad unemployed workmen?" Well, it seems to me the question might have occurred to you before. Your housemaid's place is vacant—you give twenty pounds a year—two girls come for it, one neatly dressed, the other dirtily; one with good recommendations, the other with none. You do no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usually ask the dirty one if she will come for fifteen pounds, or twelve; and, on her consenting, take her instead of the well-recommended one. Still less do you try to beat both down by making them bid against each other, till you can hire both, one at twelve pounds a year, and the other at eight. You simply take the one fittest for the place, and send away the other, not perhaps concerning yourself quite as much as you should with the question which you now impatiently put to me, "What is to become of her?" For all that I advise you to do, is to deal with workmen as with servants; and verily the question is of weight: "Your bad workman, idler, and rogue—what are you to do with him?"

2: 关于第一篇文章中的那句“不雇用差工人”，我自然多次受到质疑：“那你打算如何处置那些不被雇用的差工人呢？”我想类似问题你们以前可能也都遇到过。比如你想雇个保姆，薪酬每年二十镑。有两个女孩应聘，一个衣着整洁，另一个衣着邋遢，一个有人

强力推荐，另一个则没任何推荐。在这种条件下，你通常不会问那个衣着邋遢的女孩，若出十五镑，或十二镑雇她，她是否愿意留下，并且如果她同意的话，就放弃那位有人强力推荐的女孩。你更不可能让这两位相互压价，直到你能把两人都雇用下来，一个每年十二镑，一个每年八镑。你会直接雇那个最合适作保姆的女孩，而让另一个走人。你也许不会为那个你迫切问我的问题而惴惴不安："没被雇用的女孩会结果如何呢？"我的建议是：像对待佣人那样对待工人。确实，这个问题颇为沉重："对那些差工人，那些无业游民，那些游手好闲者——你们该怎么办呢？"

We will consider of this presently: remember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complete system of national commerce and industry cannot be explained in full detail within the space of twelve pages. Meantime, consider whether, there being confessedly some difficulty in dealing with rogues and idlers, it may not be advisable to produce as few of them as possible. If you examine into the history of rogues, you will find they are as truly manufactured articles as anything else, and it is just because our present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gives so large a stimulus to that manufacture that you may know it to be a false one. We had better seek for a system which will develop honest men, than for one which will deal cunningly with vagabonds. Let us reform our schools, and we shall find little reform needed in our prisons.

我们现在来考虑这个问题，但请注意，国家的整个商业和工业管理体制是不能在短短十二页的篇幅内详细说明的。同时，既然我们都知道处理无业游民和游手好闲者很是棘手，那么是否应建议让这类人产生得越少越好呢？如果考察游手好闲者的产生历史，就会发现其与任何产品的生产没什么不同，而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却大量刺激了这类人的产生，所以可知这个体系就是谬论。我们应找寻能造就诚实可信之人的体系，而不要那种绞尽脑汁应对游手好闲之人的体系。让我们改革学校教育吧，那样就没有多少必要去改革监狱了。

This equality of wages, then, being the first object toward which we have to discover the most direct available road; the second is, as above stated, that of maintaining constant numbers of workmen in employment, whatever may be the accidental demand for the article they produce.

因此，“薪酬平等”是要首先实现的目标，我们要探寻通向该目标的捷径。第二个目标如上所述，就是无论产品需求出现何种偶然性波动，都要保持雇工人数的稳定。

I believe the sudden and extensive inequalities of demand, which necessarily arise in the mercantile operations of an active nation, constitute the only essential difficulty which has to be overcome in a just organization of labour. The subject opens into too many branches to admit of being investigated in a paper of this

kind; but the following general facts bearing on it may be noted.

那种突然的、影响广泛的劳动力需求不均的现象，是经济活跃国家商业活动的必然产物，我认为这正是公正的劳动力组织唯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一问题涉及的分支太多，如本篇这样的小文实难详尽研究，然而我们不妨先看一下一些有关的基本事实。

The wages which enable any workman to live are necessarily higher, if his work is liable to intermission, than if it is assured and continuous; and however severe the struggle for work may become, the general law will always hold, that men must get more daily pay if, on the average, they can only calculate on work three days a week than they would require if they were sure of work six days a week. Supposing that a man cannot live on less than a shilling a day, his seven shillings he must get, either for three days' violent work, or six days' deliberate work. The tendency of all modern mercantile operations is to throw both wages and trade into the form of a lottery, and to make the workman's pay depend on intermittent exertion, and the principal's profit on dexterously used chance.

如果雇工的工作难以稳定，其维持生存的薪酬就应高于连续、稳定的工作的薪酬；而这一规律不论工作竞争多么激烈都不会改变，即如果平均每周只能工作三天，其日工资就必须高于每周能工作六天的日工资。假如一个人每天的最低生活成本不能少于一先令，那么无论他一周拼命工作三天还是从容工作六天，都必须得到七先令的薪酬。而当今一切商业行为的趋势就是使得劳动力工资和商品交易像中彩票一样变幻不定：雇工的工资根据不确定的工作时间而不同，雇主的利润则要看其是否善于把握机会。

In what partial degree, I repeat, this may be necessary in consequence of the activities of modern trade, I do not here investigate; contenting myself with the fact, that in its fatallest aspects it is assuredly unnecessary, and results merely from love of gambling on the part of the masters, and from ignorance and sensuality in the men. The masters cannot bear to let any opportunity of gain escape them, and frantically rush at every gap and breach in the walls of Fortune, raging to be rich, and affronting, with impatient covetousness, every risk of ruin, while the men prefer three days of violent labour, and three days of drunkenness, to six days of moderate work and wise rest. There is no way in which a principal, who really desires to help his workmen, may do it more effectually than by checking these disorderly habits both in himself and them; keeping his own business operations on a scale which will enable him to pursue them securely, not yielding to temptations of precarious gain;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ding his workmen into regular habits of labour and life, either by inducing them rather to take low wages in the form of a fixed salary, than high wages, subject to the chance of their being thrown out of work; or, if this be impossible, by discouraging the system of violent exertion for nominally high day wages, and leading the men to take lower pay for more regular labour.

重申一下，这种不确定性是当今经济行为的必然产物，至于不确定性的程度，暂不予探究。不过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考虑到其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这种不确定性绝非不可或缺，它只是雇主的博弈心理、工人的无知放纵的产物。一方面，雇主绝不会放过任何获利的机会，一旦有利可图就会不择手段，甚至欲壑难填，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工人们宁愿拼命干三天活，其余三天喝酒玩乐，也不愿不紧不

慢、劳逸结合地工作六天。主人若真想有效地帮助他的工人，恐怕最好的办法就是遏制双方的无序心态，这样才能使其经营活动的规模不受一时利益的驱使，而保持在安全范围之内。同时，主人还须引导工人合理安排工作与生活，比如说让他们乐于接受虽然较低但却固定的薪酬，而不要冒着随时被解雇的风险要求高工资；或者，如果可能的话，不鼓励对高强度劳动支付所谓的高额日工资，而要引导工人接受工资较低但规范有序的劳动。

In effecting any radical changes of this kind, doubtless there would be great inconvenience and loss incurred by all the originators of movement. That which can be done with perfect convenience and without loss, is not always the thing that most needs to be done, or which we are most imperatively required to do.

毫无疑问，进行任何这种激烈的变革，都会给发起人带来很大困难，造成很大损失。但没有障碍、没有损失的改革往往都是最没必要、最不迫切的。

I have already alluded to the difference hitherto existing between regiments of men associated for purposes of violence, and for purposes of manufacture; in that the former appear capable of self-sacrifice—the latter, not; which singular fact is the real reason of the general lowness of estimate in which the profession of commerce is held,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arms. Philosophically, it does not, at first sight, appear reasonable (many writers have endeavoured to prove it unreasonable) that a peaceable and rational person, whose trade is buying and selling, should be held in less honour than an unpeaceable and often irrational person, whose

trade is slaying. Nevertheless, the consent of mankind has always, in spite of the philosophers, given precedence to the soldier.

我前面提及为抢劫而聚在一起的不法之徒与为生产而一起工作的工人之间的差异，即前者能为头领献身，后者却不能。这一典型的事例正是公众崇尚军人而看低商人的真正原因。一个平和理智、以买卖经营为职业的人，其所获得的荣耀竟然不如一个争强斗狠、感情用事、以杀戮为职业的军人，哲学家们认为，乍一看，这实在不合逻辑（很多人已撰文著书来证明其荒谬）。然而，不管哲学家们怎么看，广大群众一直认为军人比商人更光荣。

And this is right.

而公众的观点是正确的。

For the soldier's trade, verily and essentially, is not slaying, but being slain. This, without well knowing its own meaning, the world honours it for. A bravo's trade is slaying; but the world has never respected bravos more than merchants; the reason it honours the soldier is, because he holds his life at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 Reckless he may be—fond of pleasure or of adventure—all kinds of bye-motives and mean impulses may have determined the choice of his profession, and may affect (to all appearance exclusively) his daily conduct in it; but our estimate of him is based on this ultimate fact—of which we are well assured—that put him in a fortress breach, with all the pleasures of the world behind him, and only death and his duty in front of him, he will keep his face to the front; and he knows that his choice may be put to him at any moment—

and has beforehand taken his part—virtually takes such part continually—does, in reality, die daily.

因为从本质上讲，军人并非以杀戮为职业，而是受人杀戮。正因如此，尽管世人不完全明白军人职业的真正含义，还是赋予了军人荣耀。亡命之徒也会杀戮，但世人对歹徒绝不会比对商人多一分尊敬。我们之所以尊重军人，是因为他们是为国献身的。军人也许头脑简单，他们或贪一时痛快，或图冒险猎奇，但可能就是诸如此类偶发的动机、平庸的冲动使他们选择了军人职业，并可能影响（单从表面看）他们在军中的日常行为。但毫无疑问，公众对军人的评价取决于这样一个最终的事实：堡垒出现缺口时，虽然身后是世上一切享乐诱惑，前面只有死亡和天职，但这时，军人仍选择前进而不后退。他知道作为军人，随时都要面临这样的抉择，以前没有后退过、每次都没有后退过。实际上，军人每天都在面对死亡。

Not less is the respect we pay to the lawyer and physician, founded ultimately on their self-sacrifice. Whatever the learning or acuteness of a great lawyer, our chief respect for him depends on our belief that, set in a judge's seat, he will strive to judge justly, come of it what may. Could we suppose that he would take bribes, and use his acuteness and legal knowledge to give plausibility to iniquitous decisions, no degree of intellect would win for him our respect. Nothing will win it, short of our tacit conviction, that in all important acts of his life justice is first with him; his own interest, second.

我们对律师和医生同样敬佩有加，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的职业也是在奉献。一位好律师，无论他学识多么渊博、辩词多么犀利，我们敬佩他，主要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果让他坐在法官的位置上，他在任

何情况下都会坚持做出公正的判决。假如他收受贿赂，利用自己的才华做出不公正的裁决，那么不管他有多聪明睿智，也不会赢得人们的尊敬。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律师若要获得荣誉，唯一途径就是在一生所有重要的事情中，都能把公正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

In the case of a physician, the ground of the honour we render him is clearer still. Whatever his science, we would shrink from him in horror if we found him regard his patients merely as subjects to experiment upon; much more, if we found that, receiving bribes from persons interested in their deaths, he was using his best skill to give poison in the mask of medicine.

我们将荣耀赋予医生的理由更明显了。不论医学知识多么地丰富，我们一旦发现他仅把病人当作实验品看待，就会对他心怀恐惧而敬而远之；甚至，我们若发现有医生以治病救命为名，行巧妙施毒之实，收受贿赂，图财害命，就更会唯恐避之不及了。

Finally, the principle holds with utmost clearness as it respects clergymen. No goodness of disposition will excuse want of science in a physician, or of shrewdness in an advocate; but a clergyman, even though his power of intellect be small, is respected on the presumed ground of his unselfishness and serviceableness.

最后，用这一原则考察教会牧师就再明确不过了。性格善良不可能成为医生医术高超、律师精明能干的理由；而一个传教士也许智力平平，却由于我们认为他仁爱无私、乐于助人而得到尊敬。

Now,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but that the tact, foresight, decision, and other mental powers, required for the successful management of a large mercantile concern, if not such as could b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a great lawyer, general, or divine, would at least match the general conditions of mind required in the subordinate officers of a ship, or of a regiment, or in the curate of a country parish. If, therefore, all the efficient members of the so-called liberal professions are still, somehow, in public estimate of honour, preferred before the head of a commercial firm, the reason must lie deeper than in the measurement of their several powers of mind.

这样，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一家大型企业成功运作所必备的机智成熟、深谋远虑、决策果断等心智、能力，即使不能与优秀的律师、指挥官、牧师相提并论，至少也与船上的下级船员，或部队里的下级军官，或乡村教区的助理牧师的普遍水平相当。因此，如果说直至今天，这些所谓的自由职业中能干的从业人员仍比商业公司的老板更受公众青睐的话，其背后必定有比心智、能力更深刻的原因。

And the essential reason for such preference will be found to lie in the fact that the merchant is presumed to act always selfishly. His work may be very necessary to the community; but the motive of it is understood to be wholly personal. The merchant's first object in all his dealings must be (the public believe) to get as much for himself, and leave as little to his neighbour (or customer) as possible. Enforcing this upon him, by political statute, as the necessary principle of his action; recommending it to him on all occasions, and themselves reciprocally adopting it, proclaiming vociferously, for law of the universe, that a buyer's function is to cheapen, and a seller's to cheat,—the public, nevertheless,

involuntarily condemn the man of commerce for his compliance with their own statement, and stamp him forever as belonging to an inferior grade of human personality.

这种偏爱最根本的原因是，商人总是被看作自私的人。商人的工作也许是社会所需，然而人们认为其动机完全出于个人目的。（公众认为）商人做事的首要目的是使自己获利最多，从而使同行（或顾客）获利最少。公众通过政治立法使这一目的成为商人做事的原则，在各种场合推而广之并奉行不悖，甚至公开宣扬“买者必求低价，卖者必须奸诈”，并视其为普遍真理；然而公众仍不由自主地谴责商人的自私，视商人为低劣人性的化身。

This they will find, eventually, they must give up doing. They must not cease to condemn selfishness; but they will have to discover a kind of commerce which is not exclusively selfish. Or, rather, they will have to discover that there never was, or can be, any other kind of commerce; that this which they have called commerce was not commerce at all, but cozening; and that a true merchant differs as much from a merchant according to laws of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as the hero of the *Excursion* from Autolycus. They will find that commerce is an occupation which gentlemen will every day see more need to engage in, rather than in the businesses of talking to men, or slaying them; that, in true commerce, as in true preaching, or true fighting, it is necessary to admit the idea of occasional voluntary loss;—that sixpences have to be lost, as well as lives, under a sense of duty; that the market may have its martyrdoms as well as the pulpit; and trade its heroisms as well as war.

但是人们最终会发现，必须摈弃对商人的反感。虽然不必停止对他们的自私行为谴责，但却会发现有一种全然无私的商业模式。也就是说，人们会发现以前从未有过，也不会有任何一种商业经济形式；人们会发现此前的所谓商业根本不是什么商业，只是尔虞我诈；真正的商人与现代政治经济学规律中的商人也相去甚远，就如《远游》中的主人公与奥托吕科斯之间的天壤之别。人们会发现商业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正人君子们认为很有必要参与的职业，而不是向别人说教或以杀人取胜；人们会发现，真正的商业活动就如真正的传教和真正的战斗，偶有损失，必须自愿接受——正如军人有义务献出生命，商人则有义务舍弃一些六便士硬币；教士在教堂宣讲殉道，市场也需有某种牺牲精神；战争使人们培养奋不顾身的品质，买卖交易也应有舍己为人的大度。

May have—in the final issue, must have—and only has not had yet, because men of heroic temper have always been misguided in their youth into other fields; not recognising what is in our day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fields; so that, while many a jealous person loses his life in trying to teach the form of a gospel, very few will lose a hundred pounds in showing the practice of one.

这种情形可能会出现，而且最终必会出现，只是现在还没有出现，因为有英雄气质的人在年轻时被人误导而进入了其他领域，没有认识到当今在各领域中什么最为重要；以至于不乏虔诚狂热之人终其一生来教授某一种真理，但却很少有人乐意花费一百英镑来以将此付诸实际。

The fact is, that people never have had clearly explained to them the true functions of a merchant with respect to other people. I should like the reader to be very clear about this.

问题在于，我们从未向这些人明确阐述商人对于民众的真正作用。我希望能让读者诸君对这种关系有非常清楚的了解。

Five great intellectual professions, relating to daily necessities of life, have hitherto existed—three exist necessarily, in every civilised nation:

迄今有五种与日常生存相关的、需要才智的重要职业，其中三种是每一个文明国度都不可或缺的：

The Soldier's profession is to *defend* it.

军人的职业是保卫你的生活；

The Pastor's to *teach* it.

牧师的职业是教你如何生活；

The Physician's to *keep it in health* .

医生的职业是使你健康地生活；

The Lawyer's to *enforce justice* in it.

律师的职业是让你在公平正义中生活；

The Merchant's to *provide* for it.

商人的职责是为你的生活提供所需物品。

And the duty of all these men is, on due occasion, to *die* for it.

在一定场合下，这些人都有义务为你的生活献出自己的生命。

“On due occasion,” namely:—

“在一定场合下”，就是说：

The Soldier, rather than leave his post in battle.

作为军人，宁可牺牲也不可临阵脱逃；

The Physician, rather than leave his post in plague.

作为医生，宁可殉职也不可逃避瘟疫；

The Pastor, rather than teach Falsehood.

作为牧师，宁可殉道也不可传播谎言；

The Lawyer, rather than countenance Injustice.

作为律师，宁可就义也不可亵渎正义；

The Merchant—what is *his* “due occasion” of death?

作为商人，宁可舍命也不可——什么“场合”需要商人舍命呢？

It is the main question for the merchant, as for all of us. For, truly, the man who does not know when to die, does not know how to live.

这是提给商人的重要问题，也是提给所有人的问题。的确，人不知何时死，焉知如何生！

Observe, the merchant's function (or manufacturer's, for in the broad sense in which it is here used the word must be understood to

include both) is to provide for the nation. It is no more his function to get profit for himself out of that provision than it is a clergyman's function to get his stipend. This stipend is a due and necessary adjunct, but not the object of his life, if he be a true clergyman, any more than his fee (or *honorarium*) is the object of life to a true physician. Neither is his fee the object of life to a true merchant. All three, if true men, have a work to be done irrespective of fee—to be done even at any cost, or for quite the contrary of fee. The pastor's function being to teach, the physician's to heal, and the merchant's, as I have said, to provide. That is to say, he has to understand to their very root the qualities of the thing he deals in, and the means of obtaining or producing it; and he has to apply all his sagacity and energy to the producing or obtaining it in perfect state, and distributing it at the cheapest possible price where it is most needed.

请大家注意，商人（或工厂主，广义上，这里的商人应理解为包括工厂主在内）的作用是提供民之所需。正如教士的作用不是索取薪俸，商人的作用也绝不是在提供民之所需时从中谋取私利。对于一个真正的教士，薪俸只是应得的、生活所需的附加品，而不是他的生活目标；正如一个真正的医生，为人治病所得的薪酬也不是他的生活目标。同理，对于一个真正的商人，盈利也不应是其生活目标。这三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所从事的工作，其实都与薪酬无关——因为完成这样的工作必须不计任何代价，或者说是与薪酬相对立的：牧师教我们如何生活，医生为我们医治疾患，商人——我也说过——为我们提供生活所需。也就是说，商人必须明白他所经营的商品的最根本特性，以及得到或制造该商品的方法；他必须将其智慧和精力完美运用于制造或获得过程中，并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分配给最需要的人。

And because the production or obtaining of any commodity

involves necessarily the agency of many lives and hands, the merchant becomes in the course of his business the master and governor of large masses of men in a more direct, though less confessed way, than a military officer or pastor; so that on him falls, in great par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kind of life they lead; and it becomes his duty, not only to be always considering how to produce what he sells, in the purest and cheapest forms, but how to make the various employments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r transference of it, most beneficial to the men employed.

因为任何商品的生产交易都必然牵涉到很多人的生活和劳动。在这个过程中，商人就以比军官或牧师更直接（但却不那么明显）的方式支配和管理大量人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商人应对员工的生活负责；他不仅有义务要一直考虑如何以最纯洁、最低成本的方式生产，还有义务考虑商品生产或交易中所产生的各种雇佣活动如何给受雇者带来最多益处。

And as into these two functions, requiring for their right exercise the highest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patience, kindness, and tact, the merchant is bound to put all his energy, so for their just discharge he is bound, as soldier or physician is bound, to give up, if need be, his life, in such way as it may be demanded of him. Two main points he has in his providing function to maintain: first, his engagements (faithfulness to engagements being the real root of all possibilities, in commerce); and, secondly, the perfectness and purity of the thing provided; so that, rather than fail in any engagement, or consent to any deterioration, adulteration, or unjust and exorbitant price of that which he provides, he is bound to meet fearlessly any form of distress, poverty, or labour, which may, through maintenance of these points, come upon him.

完成这两个义务，不仅要具备适当的耐心、善心、策略，还要有极高的智慧，为此商人必须全力以赴；同理，如果形势所迫，商人也必须像军人或医生那样做出牺牲，甚至不惜献出生命。商人在提供民之所需时要坚持两点：第一，信守诺言（信守诺言是进行所有商业活动的立足之本）；第二，保证商品的完美性与纯洁性。这样，他才不会违约失信、道德败坏、以次充好，才不会提供价格不公的商品，或漫天要价。进而由坚持这两点而招致的任何形式的萧条、贫困以及劳动，他都必定能勇敢面对。

Again: in his office as governor of the men employed by him, the merchant or manufacturer is invested with a distinctly paternal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In most cases, a youth entering a commercial establishment is withdrawn altogether from home influence; his master must become his father, else he has, for practical and constant help, no father at hand; in all cases the master's authority, together with the general tone and atmosphere of his business,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men with whom the youth is compelled in the course of it to associate, have more immediate and pressing weight than the home influence, and will usually neutralize it either for good or evil; so that the only means which the master has of doing justice to the men employed by him is to ask himself sternly whether he is dealing with such subordinate as he would with his own son, if compelled by circumstances to take such a position.

再有，身为雇工管理者的商人或工厂主自然被赋予了为人父母般的权威和责任。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进入商业机构的青年已完全脱离了家庭的影响，于是他的主人就必须承担父亲的角色；否则，年轻人就不能像孩子那样随时得到具体的帮助。总之，主人的权威，以及其

经营活动的总体氛围，再加上与年轻人一起工作的工友的人品，这些都会比家庭的影响更直接、更有压力，并常常决定了他是善是恶。这样，主人要想公正对待自己的雇工，唯一的途径就是严格审视自己是否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将他们视如己出。

Supposing the captain of a frigate saw it right, or was by any chance obliged, to place his own son in the position of a common sailor; as he would then treat his son, he is bound always to treat every one of the men under him. So, also, supposing the master of a manufactory saw it right, or was by any chance obliged, to place his own son in the position of an ordinary workman; as he would then treat his son, he is bound always to treat every one of his men. This is the only effective, true, or practical Rule which can be given on this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假设一只小型护卫舰的舰长觉得有必要，或可能必须让自己的儿子做一名普通的水手，那么他怎样对待自己的儿子，也必须同样对待手下其他人。同理，一个工厂主如果认为有必要，或可能必须让自己的儿子做一名普通的工人，那么他怎样对待自己的儿子，也必须同样对待手下其他人。这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这一问题上，所能给出的唯一有效、真实、实用的法则。

And as the captain of a ship is bound to be the last man to leave his ship in case of wreck, and to share his last crust with the sailors in case of famine, so the manufacturer, in any commercial crisis or distress, is bound to take the suffering of it with his men, and even to take more of it for himself than he allows his men to feel; as a father would in a famine, shipwreck, or battle, sacrifice himself for his son.

船只遇难时，除非万不得已，舰长肯定不想弃船而逃；缺乏食品时，舰长肯定会与水手们同甘共苦。同理，经济出现危机或不景气时，工厂主必定要与雇工们共同面对风雨，甚至要比员工承受更多，就如在食品匮乏、船只遇难、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父亲为了儿子而将生死置之度外。

All which sounds very strange; the only real strangeness in the matter being, nevertheless, that it should so sound. For all this is true, and that not partially nor theoretically, but everlastingly and practically; all other doctrine than this respecting matters political being false in premises, absurd in deduction, and impossible in practice, consistently with any progressive state of national life; all the life which we now possess as a nation showing itself in the resolute denial and scorn, by a few strong minds and faithful hearts, of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taught to our multitudes, which principles, so far as accepted, lead straight to national destruction. Respecting the modes and forms of destruction to which they lead, and, on the other hand, respecting the farther practical working of true polity, I hope to reason farther in a following paper.

这一切听起来十分怪异。然而，认为这一观点怪异荒谬才是真正的怪异。因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甚至并不是部分有效或空洞的理论，而是恒久不变、实事求是的。除此之外，有关政治关系的其他信念都是前提错误，推理荒谬，在实践上与国民生活的任何进步状态都格格不入。在一些具有坚强意志和忠诚胸怀的人的引导下，我们现在这个民族通过坚决摒弃和蔑视那些教授给大众的经济原则而走向新生，因为这些经济原则只要被接受就会导致国家的毁灭。关于这种毁灭的方式和形态，以及另一方面，真正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应用，容我在下一篇文章中细细分析。

Essay II The Veins of Wealth

第二章　财富之脉

The answer which would be made by any ordinary political economist to the statements contained in the preceding paper, is in few words as follows:

对于我上一篇文章中的论述，任何一位普通的政治经济学专家都会简短地回答如下：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ertain advantages of a general nature may be obtain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ffections. But political economists never professed, nor profess, to take advantages of a general nature into consideration. Our science is simply the science of getting rich. So far from being a fallacious or visionary one, it is found by experience to be practically effective. Persons who follow its precepts do actually become rich, and persons who disobey them become poor. Every capitalist of Europe has acquired his fortune by following the known laws of our science, and increases his capital daily by an adherence to them. It is vain to bring forward tricks of logic, against the force of accomplished facts. Every man of business knows by experience how money is made, and how it is lost.”

“诚然，发展社会情感确能使我们获得普遍意义上的某些好处。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声称把普遍意义上的好处

纳入其研究领域。我们这门科学只研究如何致富。所以，它根本不是什么谬论或空想论，而是基于经验从而在实践中颇有成效的科学。任何按这个理论去做的人都已发财致富，而违背该理论的则成了穷人。欧洲的每一位资本家都遵循这门科学所发现的规律而发了财，并坚守这些规律，从而使财富与日俱增。面对这些既成的事实，任何所谓合乎逻辑的诡辩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每个经营者都通过经验得知他是怎样赚到钱的，而又是怎样把钱赔了的。”

Pardon me. Men of business do indeed know how they themselves made their money, or how, on occasion, they lost it. Playing a long-practised game,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e chances of its cards, and can rightly explain their losses and gains. But they neither know who keeps the bank of the gambling-house, nor what other games may be played with the same cards, nor what other losses and gains, far away among the dark streets, are essentially, though invisibly, dependent on theirs in the lighted rooms. They have learned a few, and only a few, of the laws of mercantile economy; but not one of those of political economy.

对不起，我的阐释如下：商人的确知道他们的钱是怎么赚来的，有时又是怎么赔进去的。就像玩一种玩了很久的纸牌游戏，他们对好牌、烂牌出现的几率了然于心，也能合理地解释输赢得失。但是他们不知道谁掌握着赌场的庄家赌本，也不知道同样的牌还有什么其他玩法，更不知道他们在灯火通明的赌场里的游戏，其结果会对远处昏暗街道上的人的得失盈亏有何种影响——虽然看不见但却是本质上的影响。他们学会的只不过是商业经济学的一些（也仅仅是一些）法则，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法则。

Primarily, which is very notable and curious, I observe that

men of business rarely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rich.” At least, if they know, they do not in their reasonings allow for the fact, that it is a relative word, implying its opposite “poor” as positively as the word “north” implies its opposite “south.” Men nearly always speak and write as if riches were absolute, and it was possible, by following certain scientific precepts, for everybody to be rich. Whereas riches are a power like that of electricity, acting only through inequalities or negations of itself. The force of the guinea you have in your pocket depends wholly on the default of a guinea in your neighbour's pocket. If he did not want it, it would be of no use to you; the degree of power it possesses depends accurately upon the need or desire he has for it,—and the art of making yourself rich, in the ordinary mercantile economist's sense, is therefore equally and necessarily the art of keeping your neighbour poor.

最主要的，同时也是非常值得注意、非常令人不解的一点是：我发现那些商人几乎不懂得“富有”一词的意思。就算他们知道这个词的意思，至少在思考问题时没有考虑到“富有”是一个相对概念：“富有”与“贫穷”相对，正如“北”与“南”相对。他们在言谈或写作时，似乎总是以为“富有”是绝对的，任何人只要按照某种科学道理去做，就都会变得富有起来。然而“富有”实际上是一种“力”，犹如电能那样，只有通过不平衡状态或自身对立面的存在才会起作用。所以你腰包里几尼的“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你邻居腰包里缺乏几尼。如果你的邻居不需要几尼，那你腰包里的几尼就毫无用处；一个几尼的“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别人需要或想要得到这一几尼的迫切程度。所以，在普通商业经济学专家看来，使自己变富的艺术就必须是让你的邻居变穷的艺术。

I would not contend in this matter (and rarely in any matter)

for the acceptance of terms. But I wish the reader clearly and deeply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economies, to which the terms “Political” and “Mercantile” might not unadvisedly be attached.

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几乎在所有问题上）并不强求你们接受术语。但我希望读者诸君能清楚而深刻地理解这两种经济学的不同，不再随意地使用“政治”和“商业”这两个术语。

Political economy (the economy of a State, or of citizens) consists simply in the production, preservation, and distribution, at fittest time and place, of useful or pleasurable things. The farmer who cuts his hay at the right time; the shipwright who drives his bolts well home in sound wood; the builder who lays good bricks in well-tempered mortar; the housewife who takes care of her furniture in the parlour, and guards against all waste in her kitchen; and the singer who rightly disciplines, and never overstrains her voice, are all political economists in the true and final sense: adding continually to the riches and well-being of the nation to which they belong.

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或公民的经济学）研究的只是如何在最佳的时间和地点生产、保存、分配对人们有用或给使人愉悦的东西。农民在适当的时节晾晒干草；造船工在上好的木板上旋紧螺栓；泥瓦匠在平整的砖块上涂抹调匀的泥浆；女主人在客厅擦拭家具，做饭时力戒浪费；歌唱家则训练有素，决不用嗓过度。从根本意义上说，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家，因为他们不断地给自己所属的国家增添财富，不断地使国民生活富裕。

But mercantile economy, the economy of “merces” or of “pay,” signifies the accumulation, in the hands of individuals, of legal or moral claim upon, or power over, the labour of others; every such claim implying precisely as much poverty or debt on one side, as it implies riches or right on the other.

可是商业经济却不然。它是一种“偿还”或“支付”的经济，意即不断增加某个人对他人劳动力在法律或道德上的占有或支配权，所有这种权力，意味着一方拥有多少财富或权利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另一方有多么贫穷或有多少债务。

It does not, therefore, necessarily involve an addition to the actual property, or well-being, of the State in which it exists. But since this commercial wealth, or power over labour, is nearly always convertible at once into real property, while real property is not always convertible at once into power over labour, the idea of riches among active men in civilized nations generally refers to commercial wealth; and in estimating their possessions, they rather calculate the value of their horses and fields by the number of guineas they could get for them, than the value of their guineas by the number of horses and fields they could buy with them.

所以，商业经济不一定能增加国家的财产或国民的富裕程度。然而，这种商业财富，或者说对劳动力的支配权力，却几乎总是能很快转换成不动产；而不动产却不能总是很快转换成对劳动力的支配权。所以，在文明国度中那些活跃分子看来，财富一般就是指商业财富。在给自己的财产估价时，他们以能带来多少几尼来计算马匹和土地的价值，而不以能购买多少马匹和土地来计算几尼的价值。

There is, however, another reason for this habit of mind: namely, that an accumulation of real property is of little use to its owner, unless, together with it, he has commercial power over labour. Thus, suppose any person to be put in possession of a large estate of fruitful land, with rich beds of gold in its gravel, countless herds of cattle in its pastures; houses, and gardens, and storehouses full of useful stores; but suppose, after all, that he could get no servants? In order that he may be able to have servants, someone in his neighbourhood must be poor, and in want of his gold—or his corn. Assume that no one is in want of either, and that no servants are to be had. He must, therefore, bake his own bread, make his own clothes, plough his own ground, and shepherd his own flocks. His gold will be as useful to him as any other yellow pebbles on his estate. His stores must rot, for he cannot consume them. He can eat no more than another man could eat, and wear no more than another man could wear. He must lead a life of severe and common labour to procure even ordinary comforts; he will be ultimately unable to keep either houses in repair, or fields in cultivation; and forced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a poor man's portion of cottage and garden, in the midst of a desert of waste land, trampled by wild cattle, and encumbered by ruins of palaces, which he will hardly mock at himself by calling “his own.”

然而这种思维定式的形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除非还拥有对劳动力的商业支配权，否则积累不动产就没什么意义。因此，假设某人拥有一片广袤的良田，良田下是丰富的金矿，草地上是无数的牛羊，豪宅大院幢幢，园子花果飘香，库里粮食满仓。可是不论他多么富有，如果他雇不到佣人会怎么样呢？他若想有人可以雇用，其附近就得有穷人存在，而且这个穷人盼望得到这个富人的金子或者粮食。如果没有人需要这个富人的金子或粮食，他也就无人可雇。那么，这个富人就只能自己动手烘焙面包、裁制衣服、耕地犁田、放牧牛羊。

对他来说，地下的黄金和地上的黄色石子一样毫无意义。仓里的粮食肯定会发霉腐烂，因为他实在吃不完。他不会比别人吃得多，也不会比别人穿得多。这样，即使要得到很一般的享受，他也必须像普通人那样辛苦劳作，以至到最后无力修缮幢幢房屋、无力耕耘广袤良田，能拥有像穷人那样的小农舍和小花园也就满足了，四周则尽是落荒的耕地，任由无人照管的牛羊践踏，豪宅大院的残垣断壁随处可见，而这些废墟他也只能苦笑着称为“私有财产”。

The most covetous of mankind would, with small exultation, I presume, accept riches of this kind on these terms. What is really desired, under the name of riches, is essentially, power over men; in its simplest sense, the power of obtaining for our own advantage the labour of servant, tradesman, and artist; in wider sense, authority of directing large masses of the nation to various ends (good, trivial or hurtful, according to the mind of the rich person). And this power of wealth of course is greater or less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poverty of the men over whom it is exercised, and in inverse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persons who are as rich as ourselves, and who are ready to give the same price for an article of which the supply is limited. If the musician is poor, he will sing for small pay, as long as there is only one person who can pay him; but if there be two or three, he will sing for the one who offers him most. And thus the power of the riches of the patron (always imperfect and doubtful, as we shall see presently, even when most authoritative) depends first on the poverty of the artist, and then on the limitation of the number of equally wealthy persons, who also want seats at the concert. So that, as above stated, the art of becoming “rich,” in the common sense, is not absolutely nor finally the art of accumulating much money for ourselves, but also of contriving that our neighbours shall have less. In accurate terms, it is “the art of establishing the maximum inequality in our own

favour.”

我猜想，人类中那些最为贪婪者乐意接受建立在上述条件之上的财富，且心中窃喜。这种财富的掩盖下，其实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对别人的支配权。简而言之，就是获得佣人、技工、艺术家的劳动来为自己谋利；广而言之，就是拥有支配全国大批劳动力的权力以达到自己的种种目的（这些目的或有益，或无益，或有害，全赖这个富人的意志）。当然，这种财富权力的大小或多或少与受支配者的人的贫穷程度成正比，与那些富裕程度相当、不哄抬稀缺商品价格的人的数量成反比。如果只有一个人出价，贫穷的歌手也会为出低薪者献唱；但若有两人或三人出价，他就会为出价最高者一展歌喉。因此，出资者（这些人即使再有权威，也都算不上完美无瑕，详见下面的论述）财富的权力大小首先取决于这位艺人的贫穷程度，然后又取决于同样有钱、同样要欣赏表演的人的数量有多少。因此，如上所述，我们自然可以得知，致“富”的艺术最终不是绝对地为自己积累钱财，而是还要想方设法让周围的人变穷，更准确地说，是“使对自身有利的不平等最大化的艺术”。

Now,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inequality cannot be shown in the abstract to be either advantageous or disadvantageous to the body of the nation. The rash and absurd assumption, that such inequalities are necessarily advantageous, lies at the root of most of the popular fallacies on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For the eternal and inevitable law in this matter is, that the beneficialness of the inequality depends, first, on the methods by which it was accomplished; and, secondly, on the purposes to which it is applied. Inequalities of wealth, unjustly established, have assuredly injured the nation in which they exist during their establishment; and, unjustly directed, injure it yet more during their existence. But inequalities of wealth, justly established, benefit the na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ir establishment; and, nobly used, aid it yet more by their existence. That is to say, among every active and well-governed people, the various strength of individuals, tested by full exertion and specially applied to various need, issues in unequal, but harmonious results, receiving reward or authority according to its class and service; while, in the inactive or ill-governed nation, the gradations of decay and the victories of treason work out also their own rugged system of subjection and success; and substitute, for the melodious inequalities of concurrent power, the iniquitous dominances and depressions of guilt and misfortune.

现在，还很难抽象地说，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建立对于整个国家有利还是不利。那种认为该不平等关系肯定有利的草率、荒诞的想法是基于那些广为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谬论。因为判断利害关系的永恒规律应是，不平等关系的受益大小首先取决于实现这种关系的方法，其次看实现这种关系的目的。以不公正的方式建立的财富不平等，在建立过程中必定已经伤及了国家利益，而若在运用时再不公正，就会进一步损害国家利益。反过来，以公正的方式建立的财富不平等，会在建立过程中给国家带来好处，若再运用得当，国家就受益更多。也就是说，在那些积极活跃、治理有方的群体中，力量不同的个体若能各尽所能、各献所长，其产生的结果虽不平等，但却是和谐的，从而他们能根据社会等级和服务获得不同的报酬或权力。而在那些呆滞懒惰、管理不当的群体中，种种腐败堕落和叛逆不忠现象同样会产生自己的一套体系，使隶属关系变得恶劣，使成功之路变得崎岖；进而消除和谐的权力不平等，而代之以不公正的统治以及愧疚、不幸带来的绝望情绪。

Thus the circulation of wealth in a nation resembles that of the blood in the natural body. There is a quickness of the current which comes of cheerful emotion or wholesome exercise; and another

which comes of shame or of fever. There is a flush of the body which is full of warmth and life; and another which will pass into putrefaction.

一个国家财富的流通和血液在人体中的循环颇为相似。血液循环加快有两种情况：要么心情愉快，或做健康运动；要么感到羞愧，或染病发热。身体发红发热既可能是感到温暖、精力旺盛，也可能是身体发炎化脓所致。

The analogy will hold down even to minute particulars. For as diseased local determination of the blood involves depression of the general health of the system, all morbid local action of riches will be found ultimately to involve a weakening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body politic.

这个类比甚至可以贯穿到每一个细节。正如血液中的某个部分出问题就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健康，获得财富的过程中，所有不正当的局部行为最终也会削弱国家的财富资源。

The mode in which this is produced may be at once understood by examining one or two instan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alth in the simplest possible circumstances.

我们考察一两个在最简单的环境中实现财富增长的例子，就会马上明白产生上述情况的模式。

Suppose two sailors cast away on an uninhabited coast, and obliged to maintain themselves there by their own labour for a series of years.

假定有两个水手落难来到一片荒岛的海滩上。几年来，他们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存。

If they both kept their health, and worked steadily and in amity with each other, they might build themselves a convenient house, and in time come to possess a certain quantity of cultivated land, together with various stores laid up for future use. All these things would be real riches or property; and, supposing the men both to have worked equally hard, they would each have right to equal share or use of it. Their political economy would consist merely in careful preservation and just division of these possessions. Perhaps, however, after some time one or other might be dis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 of their common farming; and they might in consequence agree to divide the land they had brought under the spade into equal shares, so that each might thenceforward work in his own field, and live by it. Suppose that after this arrangement had been made, one of them were to fall ill, and be unable to work on his land at a critical time—say of sowing or harvest.

假如两个人都身体健康，干活勤奋，并且能和睦相处，他们可能会造出一间实用的房子，逐渐有了一定数量的耕地，还可能盖上几间仓房以备将来储存之用。所有这些都是具体可见的财富，或称为不动产。而且假如他们干活同样卖力气，他们就有权平分这些财富。他们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仅仅是小心保存和公正分配这些所得。但也许过了一段时间，其中一个人可能不满足于共同耕作，因此，他们都会同意

把土地均分，各种各人的一份，各自养活自己。又假如他们分开生活之后，其中一人病倒了，在播种或收割这样关键的时候无法下地劳动。

He would naturally ask the other to sow or reap for him.

很自然地，他会要求另一个人帮他播种，帮他收割。

Then his companion might say, with perfect justice, “I will do this additional work for you; but if I do it, you must promise to do as much for me at another time. I will count how many hours I spend on your ground, and you shall give me a written promise to work for the same number of hours on mine, whenever I need your help, and you are able to give it.” Suppose the disabled man's sickness to continue, and that under various circumstances, for several years, requiring the help of the other, he on each occasion gave a written pledge to work, as soon as he was able, at his companion's orders, for the same number of hours which the other had given up to him. What will the positions of the two men be when the invalid is able to resume work?

于是，他的伙伴可能就会以绝对公正的口吻说：“我可以为你干这些额外的活，但你必须允诺以后为我干同样多的活。我会记下在你的地里干了多少小时，而你必须书面保证，无论何时我需要你的帮助，只要你有能力干，就必须在我的地里干同样长的时间。”假定这个生病的人一直未愈，连续好几年，在不同的情况下，他都请求另外那个人帮助他，而每次都得立下书面保证：只要有能力，就必须按照伙伴的要求，在他的地里工作同样长的时间，完成所欠对方的劳动

量。那么，等这个病人体力恢复、可以干活时，两个人的状况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Considered as a “Polis,” or state, they will be poorer than they would have been otherwise: poorer by the withdrawal of what the sick man's labour would have produced in the interval. His friend may perhaps have toiled with an energy quickened by the enlarged need, but in the end his own land and property must have suffered by the withdrawal of so much of his time and thought from them; and the united property of the two men will be certainly less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if both had remained in health and activity.

倘若把这两个人看作一个“城邦”或一个国家的话，他们的财富要比此前少，因为这期间病人不能劳动，产出自然减少。需求的增大可能迫使病人的伙伴加快速度，拼命劳动，以至最终没有足够的时间照看自己的田地和财产。这样，两个人的财富总和就肯定比两个人都身体健康并且勤奋劳作的时候要少。

But the relations in which they stand to each other are also widely altered. The sick man has not only pledged his labour for some years, but will probably have exhausted his own share of the accumulated stores, and will be in consequence for some time dependent on the other for food, which he can only “pay” or reward him for by yet more deeply pledging his own labour.

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几年来，那个生病的人不仅把自己未来几年的劳动力抵押给了对方，而且还可能耗光了自己的那份积蓄，以至一段时间内不得不靠对方获得食物，对此他只能承

诺用更多的劳动力作抵押加以偿付。

Supposing the written promises to be held entirely valid (among civilized nations their validity is secured by legal measures [3_1]), the person who had hitherto worked for both might now, if he chose, rest altogether, and pass his time in idleness, not only forcing his companion to redeem all the engagements he had already entered into, but exacting from him pledges for further labour, to an arbitrary amount, for what food he had to advance to him.

假定这个书面保证完全有效（在文明国家中，这种有效性由法律手段保证 [4_1] ），那个迄今为止还一人干两人活的人，倘若想彻底休息一下，倘若要过一种闲散的生活。他就不仅要强迫他的伙伴履行之前所有的协议，而且还可随意苛求对方承诺付出更多的劳动，以偿付以前提供给他的食物。

There might not, from first to last, be the least illegality (in the ordinary sense of the word) in the arrangement; but if a stranger arrived on the coast at this advanced epoch of their political economy, he would find one man commercially Rich; the other commercially Poor. He would see, perhaps, with no small surprise, one passing his days in idleness; the other labouring for both, and living sparely, in the hope of recovering his independence at some distant period.

这种情形从头至尾都合情合法（就“合法”的一般意义而言），但是如果有一个陌生人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式的后期来到这片海岸，他会

发现一个是商业富人，另一个是商业穷人。他也许会极为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个人过着悠闲懒散的日子，另一个却干着两个人的活，而且过着节俭的生活，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恢复自由之身。

This is, of course, an example of one only out of many ways in which inequality of possession may be established between different persons, giving rise to the mercantile forms of Riches and Poverty. In the instance before us, one of the men might from the first have deliberately chosen to be idle, and to put his life in pawn for present ease; or he might have mismanaged his land, and been compelled to have recourse to his neighbour for food and help, pledging his future labour for it. But what I want the reader to note especially is the fact, common to a large number of typical cases of this kin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rcantile wealth which consists in a claim upon labour, signifies a political diminution of the real wealth which consists in substantial possessions.

当然，不同人之间建立财富不平等关系，从而造成富有和贫穷的各种商业形式，上面情况只是众多途径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在前面的例子中，其中一个人可能从一开始就故意懒散，宁愿用自己的生命作抵押换得眼下的清闲；但也可能是不善于做农活，从而被迫依赖邻居获得食物和帮助，并允诺以后为其干活来补偿。但是我想让各位读者特别注意的是，许多类似的典型例子具有一个共同之处：即这种建立在对劳动力的占有的基础上的商业财富，意味着构成大量财产的实际财富在政治意义上的减少。

Take another example,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ordinary course of affairs of trade. Suppose that three men, instead of two, formed the little isolated republic, and found themselves obliged to

separate, in order to farm different pieces of land at some distance from each other along the coast: each estate furnishing a distinct kind of produce, and each more or less in need of the material raised on the other. Suppose that the third man, in order to save the time of all three, undertakes simply to superintend the transference of commodities from one farm to the other, on condition of receiving some sufficiently remunerative share of every parcel of goods conveyed, or of some other parcel received in exchange for it.

再举一个与普通贸易过程更为一致的例子。假定有三个人，而不是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与外界隔绝的共和国，但他们不得不分开生活，以便耕种海岸沿线相隔较远的不同土地。每块土地出产不同的作物，而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需要别人地里的产物。假定这第三人为了节省三个人的时间，只担当从一块土地到另一块土地之间的作物运输工作，条件是从运达的每包货物中抽取足够的份额作为报酬，或者以另外的成包货物作为交换。

If this carrier or messenger always brings to each estate, from the other, what is chiefly wanted, at the right time, the operations of the two farmers will go on prosperously, and the largest possible result in produce, or wealth, will be attained by the little community? But suppose no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landowners is possible, except through the travelling agent; and that, after a time, this agent, watching the course of each man's agriculture, keeps back the articles with which he has been entrusted until there comes a period of extreme necessity for them, on one side or other, and then exacts in exchange for them all that the distressed farmer can spare of other kinds of produce; it is easy to see that by ingeniously watching his opportunities, he might possess himself regularly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uperfluous produce of the two

estates, and at last, in some year of severest trial or scarcity, purchase both for himself and maintain the former proprietors thenceforward as his labourers or servants.

倘若这个运货人（或者叫信使）总是能及时地为这两块地上的人带来最需要的东西，那么这两个农民的经营就会就会蒸蒸日上，从而这三个人组成的小社会就会获得最大的产出，或者说财富。但假设除了通过这个往返两地的代理人，那两个人再无沟通的途径，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代理人经过对两块土地生长情况的观察，就会把受委托运输的作物私下囤积起来，等到有一天那两个人中的一个急需这些作物的时候，他就会强迫对方拿出其他所有的作物进行交换。很显然，只要善于寻找机会，这个代理人就可能不断地把两块地上产出的大部分富余作物据为己有。这样，到了最后，在某个天灾饥馑的年份，他把这两块地都买到自己名下，原来的地主也就从此成了他的劳动力或仆人。

This would be a case of commercial wealth acquired on the exactest principles of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But more distinctly even than in the former instance, it is manifest in this that the wealth of the State, or of the three men considered as a society, is collectively less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had the merchant been content with juster profit. The operations of the two agriculturists have been cramped to the utmost; and the continual limitations of the supply of things they wanted at critical times, together with the failure of courage consequent on the prolongation of a struggle for mere existence, without any sense of permanent gain, must have seriously diminished the effective results of their labour; and the stores finally accumulated in the merchant's hands will not in any wise be of equivalent value to those which, had his dealings been honest, would have filled at once the granaries of the farmers and

his own.

这也许就是一个严格按照现代政治经济学原则获取商业财富的例子。但比前一个例子更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个例子中，如果商人能满足于更公正的利润，那么国家的财富，或者说三人小社会的财富总和就会多一些。两个农夫的劳作量已经因为商人的勒索达到了极限，而且在关键的季节总是受到供应不足的制约，再加上长期为了糊口而劳作，因而变得情绪低落，没有一点盈利的成就感，这必然严重降低了他们的劳动效率。商人自己手里最终囤积的粮食也绝不等值于他诚实经营下的情况三人财富的总额，因为假如他诚实经营的话，三个人都会粮满囤米满仓的。

The whole question, therefore, respecting not only the advantage, but even the quantity, of national wealth, resolves itself finally into one of abstract justice. It is impossible to conclude, of any given mass of acquired wealth, merely by the fact of its existence, whether it signifies good or evil to the nation in the midst of which it exists. Its real value depends on the moral sign attached to it, just as sternly as that of a mathematical quantity depends on the algebraical sign attached to it. Any given accumulation of commercial wealth may be indicative, on the one hand, of faithful industries, progressive energies, and productive ingenuities; or, on the other, it may be indicative of mortal luxury, merciless tyranny, ruinous chicane. Some treasures are heavy with human tears, as an ill-stored harvest with untimely rain; and some gold is brighter in sunshine than it is in substance.

因此，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更多的国家财富掌握在何人手中，更关系到国家财富的总量，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抽象的“公正”问题。对于

我们获得的任何大量财富，我们很难仅仅以其物质存在而断定其对国家有益还是有害。财富的真正价值取决于附于其上的道德符号，二者关联紧密，就如同数学的值取决于附于其上的代数符号一样。任何特定的商业财富的积累，或表明人们的忠诚勤奋、不懈努力，以及心灵手巧、善于创造，或表示极度奢侈、残酷暴政、坑蒙欺诈。有的珠宝因饱含着人类的泪水而格外沉重，就如贮存不当的粮食偏逢背时的雨淋；有些金银则在阳光的照耀下比实际上更加熠熠生辉。

And these are not, observe, merely moral or pathetic attributes of riches, which the seeker of riches may, if he chooses, despise; they are, literally and sternly, material attributes of riches, depreciating or exalting, incalculably, the monetary signification of the sum in question. One mass of money is the outcome of action which has created, another, of action which has annihilated,—ten times as much in the gathering of it; such and such strong hands have been paralyzed, as if they had been numbed by nightshade; so many strong men's courage broken, so many productive operations hindered; this and the other false direction given to labour, and lying image of prosperity set up, on Dura plains dug into seven-times-heated furnaces. That which seems to be wealth may in verity be only the gilded index of far-reaching ruin: a wrecker's handful of coin gleaned from the beach to which he has beguiled an argosy; a camp-follower's bundle of rags unwrapped from the breasts of goodly soldiers dead; the purchase-pieces of potter's fields, wherein shall be buried together the citizen and the stranger.

大家注意，这些不仅仅是财富的道德或情感属性，追求财富的人也许对此无形属性不屑一顾；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也是财富的物质属性，对财富的总值有不可估量的增、贬值作用。一大笔钱可以是创造出十倍价值的生产活动的结果，也可能是毁灭了十倍价值的生产

活动的结果。一双双粗壮的手臂可能像人吃了有毒的茄属植物那样变得麻木痉挛，一个个身强体健的工人却可能情绪沮丧，一件件提高生产效率的发明设计受到抑制。滥于支配劳动力，就如在杜拉平原上立起的神像，表面上虚假的繁荣，而下面却挖成熊熊燃烧的土窑。这种表面上的财富，实际上在金色的光环下预示着最终的毁灭。就好比海盗在海滩拾到了大把的金币，但那却是他诱导大商船失事的所得；又如那随军流动的摊贩，身上披满了破布条子，但那却是从死去的忠勇士兵身上扒下的衣衫；再如购得了一片片窑户的田地，里面要埋葬的却是无辜的公民和那个外乡人。

And therefore, the idea that directions can be given for the gaining of wealth, irrespectively of the consideration of its moral sources, or that any general and technical law of purchase and gain can be set down for national practice, is perhaps the most insolently futile of all that ever beguiled men through their vices. So far as I know, there is not in history record of anything so disgraceful to the human intellect as the modern idea that the commercial text, “Buy in the cheapest market and sell in the dearest,” represents, or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could represent, an available principle of national economy. Buy in the cheapest market?—yes; but what made your market cheap? Charcoal may be cheap among your roof timbers after a fire, and bricks may be cheap in your streets after an earthquake; but fire and earthquake may not therefore be national benefits. Sell in the dearest? —yes, truly; but what made your market dear? You sold your bread well to-day: was it to a dying man who gave his last coin for it, and will never need bread more; or to a rich man who to-morrow will buy your farm over your head; or to a soldier on his way to pillage the bank in which you have put your fortune?

所以，那些认为可以对生财之道加以指导，而不用顾及其道德因素的想法；以及那些认为可以为国家财富的积累，而制定一般和具体的规律的想法，在所有那些诱导人类走向邪恶的观念中是最为野蛮、最一无是处的。据我所知，自有历史记录以来，还没有什么像商业经典名句“最低价买进，最高价卖出”所代表，或在任何条件下可能代表的当代国民经济原则那样，让人类智慧如此蒙羞。在市场价格最便宜的时候买进？对，就是这样；但什么使得市场上的价格便宜呢？一场大火烧毁了房屋的顶梁后，木炭可能会便宜；街区遭遇了地震后，砖瓦可能会便宜；但火灾和地震却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在市场价格最贵的时候卖出？对，就是这样；但什么造成通货膨胀呢？你今天的面包卖得不错，但是不是卖给了一个花光了最后一个硬币、行将饿死、再也不需要面包的穷人呢？是不是卖给了一个明天就轻而易举买走了你农场的富人呢？是不是卖给了一个去抢劫银行的大兵，而你的钱却正存在那个银行呢？

None of these things you can know. One thing only you can know: namely, whether this dealing of yours is a just and faithful one, which is all you need concern yourself about respecting it; sure thus to have done your own part in bringing about ultimately in the world a state of things which will not issue in pillage or in death. And thus every question concerning these things merges itself ultimately in the great question of justice, which, the ground being thus far cleared for it, I will enter upon the next paper, leaving only, in this, three final points for the reader's consideration.

这些你可能都不知晓。只有一样你是清楚的，那就是你的交易是否诚实公正？你所需要考虑的就是这一点，你要确保自己的交易最终不会助纣为虐，造成抢劫银行或饿死穷人的事发生。因此，所有问题最终归结为“公正”这一重大问题。其基本原因至此已明确阐述，具体讨论详见下一篇文章。在此仅留下三个关键问题供读者思考。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chief value and virtue of money consists in its having power over human beings; that, without this power, large material possessions are useless, and to any person possessing such power, comparatively unnecessary. But power over human beings is attainable by other means than by money. As I said a few pages back, the money power is always imperfect and doubtful; there are many things which cannot be reached with it, others which cannot be retained by it. Many joys may be given to men who cannot be bought for gold, and many fidelities found in them which cannot be rewarded with it.

前面所述表明，金钱的主要价值和优势在于其对人类的支配力，而若没有这种支配力，拥有大笔的物质财富就会毫无意义；而任何人一旦有了这种支配力，那么拥有大笔物质财富相对来说也就不重要了。然而对人类的支配力还可通过金钱以外的途径获得。我在前几页的阐述中说过，金钱的力量绝非完美无缺、不容置疑。有很多东西是金钱无法企及的，还有很多东西是金钱无法留住的。很多人的快乐无法用黄金交换，很多人的忠诚也无法用黄金酬谢。

Trite enough,—the reader thinks. Yes: but it is not so trite,—I wish it were,—that in this moral power, quite inscrutable and immeasurable though it be, there is a monetary value just as real as that represented by more ponderous currencies. A man's hand may be full of invisible gold, and the wave of it, or the grasp, shall do more than another's with a shower of bullion. This invisible gold, also, does not necessarily diminish in spending. Political economists will do well someday to take heed of it, though they cannot take measure.

这是老生常谈了——读者诸君可能会说。的确如此，不过下面所述还不算了无新意（但愿如此）：这种精神上的支配力，尽管神秘莫测、难以衡量，但包含的金钱价值却和具体可见的货币所代表的一样真实。一个人的手里可能握有无形的金子，他只需动动手或抓一下，就可能比拥有大量金条的人更有力量。而且这种无形的金子还不会越花越少。政治经济学家们将来肯定会注意到这一点，只不过无法精确衡量而已。

But further. Since the essence of wealth consists in its authority over men, if the apparent or nominal wealth fails in this power, it fails in essence; in fact, ceases to be wealth at all. It does not appear lately in England, that our authority over men is absolute. The servants show some disposition to rush riotously upstairs, under an impression that their wages are not regularly paid. We should augur ill of any gentleman's property to whom this happened every other day in his drawing-room.

更进一步说，既然财富的本质是其对人的支配权，那么如果表面上所谓的财富没有这种权力，它也就不具有财富的本质，事实上就不再是财富了。近来在我们英国，这种对人的支配权还没有达到独断专行的地步。佣人们若认为薪水没有按时发放，就可能吵吵嚷嚷地冲到楼上与主人论理。如果主人的客厅里经常发生这类事情，我们就应怀疑其财产的正当性。

So, also, the power of our wealth seems limited as respects the comfort of the servants, no less than their quietude. The persons in the kitchen appear to be ill-dressed, squalid and half-starved. One cannot help imagining that the riches of the establishment must be of a very theoretical and documentary character.

所以，考虑到佣人们的基本需求，财富的力量就似乎不是绝对无限的，这种受限制的程度绝不比他们安静工作时少。如果厨房的佣人们穿着寒酸、仪容不整、食不果腹，谁都不免认为这户人家的财富只是徒有虚名。

Finally. Since the essence of wealth consists in power over men, will it not follow that the nobler and the more in number the persons are over whom it has power, the greater the wealth? Perhaps it may even appear, after some consideration, that the persons themselves are the wealth that these pieces of gold with which we are in the habit of guiding them, are, in fact, nothing more than a kind of Byzantine harness or trappings, very glittering and beautiful in barbaric sight, wherewith we bridle the creatures; but that if these same living creatures could be guided without the fretting and jingling of the Byzantines in their mouths and ears, they might themselves be more valuable than their bridles. In fact, it may be discovered that the true veins of wealth are purple—and not in Rock, but in Flesh—perhaps even that the final outcome and consummation of all wealth is in the producing as many as possible full-breathed, bright-eyed, and happy-hearted human creatures. Our modern wealth, I think, has rather a tendency the other way;—most political economists appearing to consider multitudes of human creatures not conducive to wealth, or at best conducive to it only by remaining in a dim-eyed and narrow-chested state of being.

最后一点，既然财富的本质在于其对人的支配力，那不就是说，支配者地位越高则所支配的人越多，财富的数量就越大吗？经过一番思考后，甚至可以说，人本身就是财富，而我们习惯用来支配人的金子，事实上只不过是拜占庭式的马具或马具饰品；虽然这些东西在野

蛮人的眼里金光闪闪、美轮美奂，但其作用只是约束马匹而已。但如果这些有血有肉的马匹没有那些套在嘴上耳朵上、叮当作响的束缚，它们体现的价值可能比光彩夺目的马勒辔头还要大。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财富之脉是紫红色的，它不是在岩石里，而是在血肉之躯里流动。我们甚至还可以发现，所有财富的终极体现和目标其实就是尽可能多地产生畅快呼吸、眼神明亮、心情愉悦的人。但我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财富却有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倾向：多数政治经济学家似乎并未意识到大量的、有生命的人与财富有着直接关系，而即使有关系，也不过是一个个眼神暗淡、皮包骨头的人而已。

Nevertheless, it is open, I repeat, to serious question, which I leave to the reader's pondering, whether, among national manufactures, that of Souls of a good quality may not at last turn out a quite leadingly lucrative one? Nay, in some far-away and yet undreamt-of hour, I can even imagine that England may cast all thoughts of possessive wealth back to the barbaric nations among whom they first arose; and that, while the sands of the Indus and adamant of Golconda may yet stiffen the housings of the charger, and flash from the turban of the slave, she, as a Christian mother, may at last attain to the virtues and the treasures of a Heathen one, and be able to lead forth her Sons, saying,—“These are My Jewels.”

无论如何，容我重申，在国家生产出的各类产品中，身心健康、高品质的人能否最终成为首屈一指的财富来源，还是一个需认真讨论的问题，请读者诸君深思。不仅如此，我甚至可以想象，在某个遥远的、梦想不到的未来，我们英国不再像那些未开化的国度那样还保留着对拥有财富的原始观念；虽然印度河的金沙、戈尔孔达的硬石能使战马的盔甲坚实，使奴隶头巾上的饰物生辉，但我希望英国作为信仰基督教的母亲，最终能像一个非基督徒的母亲那样看待美德与财富，能像她那样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众人面前，说：“他们就是我的珠宝。”

[3_1].The disputes which exist respecting the real nature of money arise more from the disputants examining its functions on different sides, than from any real dissent in their opinions. All money, properly so called, is an acknowledgment of debt; but as such, it may either be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the labour and property of the creditor, or the idleness and penury of the debtor. The intricacy of the question has been much increased by the (hitherto necessary) use of marketable commodities, such as gold, silver, salt, shells, etc., to give intrinsic value or security to currency; but the final and best definition of money is that it is a documentary promise ratified and guaranteed by the nation to give or find a certain quantity of labour on demand. A man's labour for a day is a better standard of value than a measure of any produce, because no produce ever maintains a consistent rate of productibility.

[4_1].现存的对金钱真正本质的争议主要源于那些考察金钱不同层面功能的人，而不是源于其不同观点本身。就其本质来说，所有金钱是对债务的一种认可。虽说如此，金钱也可视为债权人勤奋和财富的象征，或债务人懒散和贫穷的象征。由于（到目前还是必需的）像金、银、盐、贝壳等市场化商品的使用，使流通的货币具有内在的价值或安全性，金钱的本质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但不管怎样，对金钱的最终和最好的定义是：金钱是国家认可和担保的、可随时根据需要而给出或寻找劳动力的书面文件承诺。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金钱的价值标准，比把对任何产品的衡量作为标准更准确，因为没有任何产品能保持始终不变的生产率。

Essay III Qui Judicatis Terram

第三章　正义审判

Some centuries before the Christian era, a Jew merchant largely engaged in business on the Gold Coast, and reported to have made one of the largest fortunes of his time, (held also in repute for much practical sagacity,) left among his ledgers some general maxims concerning wealth, which have been preserved, strangely enough, even to our own days. They were held in considerable respect by the most active traders of the middle ages, especially by the Venetians, who even went so far in their admiration as to place a statue of the old Jew on the angle of one of their principal public buildings. Of late years these writings have fallen into disrepute, being opposed in every particular to the spirit of modern commerce. Nevertheless I shall reproduce a passage or two from them here, partly because they may interest the reader by their novelty; and chiefly because they will show him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a very practical and acquisitive tradesman to hold, through a not unsuccessful career, that principle of distinction between well-gotten and ill-gotten wealth, which, partially insisted on in my last paper, it must be our work more completely to examine in this.

在基督纪元的几个世纪之前，一个犹太商人主要在黄金海岸做生意，据说成为当时巨富之一（而且其精明智慧也是远近闻名）。他在账簿里写下的一些关于财富的名言警句被人们保存下来，甚至一直保留到今天，真是不可思议。这些名言在中世纪很受积极活跃的商人追捧，尤其得到威尼斯商人们的青睐，他们甚至在一个重要的公共建筑的一角立了一座那位犹太老人的塑像，以示钦慕。然而，近年来，那

些箴言由于在各方面都与现代商业精神相抵牾而陷入非议。尽管如此，我在这里还是引用一两段箴言，既是因为其内容的新意可能让诸位有兴趣，更主要的是因为它会向诸位表明，每一位讲究实际并渴望致富的商人都有可能通过生财有道的经营，把握区分正当所得与不义之财的原则。这一点我已在前一篇文章中部分地作了论述，而在本文中我们将更全面地加以阐述。

He says, for instance, in one place: “The getting of treasures by a lying tongue is a vanity tossed to and fro of them that seek death;” adding in another, with the same meaning (he has a curious way of doubling his sayings): “Treasures of wickedness profit nothing; but justice delivers from death.” Both these passages are notable for their assertion of death as the only real issue and sum of attainment by any unjust scheme of wealth. If we read, instead of “lying tongue,” “lying label, title, pretence, or advertisement,” we shall more clearly perceive the bearing of the words on modern business. The seeking of death is a grand expression of the true course of men's toil in such business. We usually speak as if death pursued us, and we fled from him; but that is only so in rare instances. Ordinarily he masks himself—makes himself beautiful—all-glorious; not like the King's daughter, all-glorious within, but outwardly: his clothing of wrought gold. We pursue him frantically all our days, he flying or hiding from us. Our crowning success at three-score and ten is utterly and perfectly to seize, and hold him in his eternal integrity—robes, ashes, and sting.

例如，他曾在某处写道：“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取灭亡，所得之财，乃是被吹来吹去的浮云。”又在另一处以同样的意思写道（他有重复表述的奇特习惯）：“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正义，能救人不死。”这两段箴言最引人注意之处是，断言死亡为任何不义

之财的唯一本质问题和最终所得。如果我们读到的不是“诡诈之舌”，而是“诡诈的商品标签、头衔称号，假冒伪劣，虚假广告”，就会更真切地感受到古人的这些话对现代商业的意义了。虽然现代商人拼命劳作，但“自取灭亡”则是对其过程最为真实的、令人震撼的表达。我们常以为“死神向我们索命，而我们逃脱了死神的魔掌”，而事实却很少这样。通常的情形是，死神乔装打扮，看上去美丽诱人，衣着华丽。但与高贵的王女不同，虽然“衣服是用金线绣的”，但公主内秀其中，而死神金玉其外。所以，是我们每天疯狂追随死神，而死神则躲躲闪闪，避开我们。我们终其一生的圆满与成功完完全全是去抓住死神，与他永远融为一体——穿着死神的外袍，身体化为死灰，手里拿着象征死亡的镰刀。

Again: the merchant says, “He that oppressed the poor to increase his riches, shall surely come to want.” And again, more strongly: “Rob not the poor because he is poor; neither oppresses the afflicted in the place of business. For God shall spoil the soul of those that spoiled them.”

那位商人又说：“欺压穷人为自己增加财富者，虽然会得偿所愿。”接着他又以更强烈的语气说：“但是你不可因为贫穷人穷乏，就抢夺他的东西，也不可在买卖中欺压困苦人。因为上帝也必惩治其恶行。”

This “robbing the poor because he is poor,” is especially the mercantile form of theft, consisting in taking advantage of a man's necessities in order to obtain his labour or property at a reduced price. The ordinary highwayman's opposite form of robbery—of the rich, because he is rich—does not appear to occur so often to the old merchant's mind; probably because, being less profitable and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robbery of the poor, it is rarely practised by persons of discretion.

“因其穷而夺其财”是商人特有的抢劫方式，即利用他人对生存必需品的需求，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其劳动或财产；而一般的强盗则相反，他们往往“因其富而夺其财”。但那位古代商人似乎并未经常想到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抢劫富人比抢劫穷人获利少又危险大，所以谨慎的商人很少去干。

But the two most remarkable passages in their deep general significance are the following:—

但是箴言中如下两句因其含义深邃而最为著名：

“The rich and the poor have met. God is their maker.”

“富人和穷人相遇，同为上帝所造。”

“The rich and the poor have met. God is their light.”

“富人和穷人相遇，同蒙上帝之光。”

They “have met:” more literally, have stood in each other's way (*obviaverunt*). That is to say, as long as the world lasts, the action

and counteraction of wealth and poverty, the meeting, face to face, of rich and poor, is just as appointed and necessary a law of that world as the flow of stream to sea, or the interchange of power among the electric clouds:—“God is their maker.” But, also, this action may be either gentle and just, or convulsive and destructive; it may be by rage of devouring flood, or by lapse of serviceable wave;—in blackness of thunder stroke, or continual force of vital fire, soft, and shapeable into love-syllables from far away. And which of these it shall be depends on both rich and poor knowing that God is their light; that in the mystery of human life, there is no other light than this by which they can see each other's faces, and live;—light, which is called in another of the books among which the merchant's maxims have been preserved, the “sun of justice,“ [4_1] of which it is promised that it shall rise at last with “healing” (health-giving or helping, making whole or setting at one) in its wings. For truly this healing is only possible by means of justice; no love, no faith, no hope will do it; men will be unwisely fond—vainly faithful, unless primarily they are just; and the mistake of the best men through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has been that great one of thinking to help the poor by almsgiving, and by preaching of patience or of hope, and by every other means, emollient or consolatory, except the one thing which God orders for them, justice. But this justice, with its accompanying holiness or helpfulness, being even by the best men denied in its trial time, is by the mass of men hated wherever it appears; so that, when the choice was one day fairly put to them, they denied the Helpful One and the Just; [4_2] and desired a murderer, sedition-raiser, and robber, to be granted to them;—the murderer instead of the Lord of Life, the sedition-raiser instead of the Prince of Peace, and the robber instead of the Just Judge of all the world.

这里的“相遇”，其实从拉丁文（obviaverunt）字面意思说，是指他们互不相让。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世界存在，财富与贫穷的作用和反作用，富人与穷人的正面相遇，就是天定的、不可避免的。正如河水流入大海，或带电云层间的能量转换，一切“都是上帝所造”。然而，这种作用既可能是温和公正的，也可能是狂风暴雨般、翻天覆地的；既可能像怒吼的洪水摧毁一切，也可能如顺势而下的波涛为人所用；或如黑暗天空的电闪雷鸣，或如生命之火延绵不绝，婉转舒缓，好似天籁之音。最后出现哪种结果，取决于富人和穷人是否都知道上帝是光明，是否知道冥冥之中唯有上帝之光才能使他们看清对方，才能生活下去。在保存犹太商人箴言的另一本书里，这一上帝之光被称为“正义的太阳”[5_1]，并预言“正义的太阳”最终会升起，其光芒有“医治之能”（医治疾病或提供帮助，使世界合为一体或完整如初）。这种医治功能只有通过正义手段才能实现，而热爱、信念、希望都无此功能。如果不能首先做到正义，其他一切信仰都将是徒劳、盲目、愚蠢的。一代又一代的人类精英所犯的最大错误在于认为对穷人的帮助就是施舍救济、向他们传播忍耐的观念或希望，或采取其他种种温柔慰藉的手段，唯独没有想到上帝赋予他们的“正义”。然而这种伴有神圣和救助之力的正义，却在审判时为精英们所忽略，不论在何处显现都为众人所厌恨。以至于有一天面临抉择之际，他们放弃了这种具有救助之力的正义之名[5_2]；宁愿被称为杀人凶手、暴乱煽动者、抢劫偷盗之徒，也不愿被视为生命之主、和平之王、全世界的正义审判之神。

I have just spoken of the flowing of streams to the sea as a partial image of the action of wealth. In one respect it is not a partial, but a perfect image. The popular economist thinks himself wise in having discovered that wealth, or the forms of property in general, must go where they are required; that where demand is, supply must follow. He farther declares that this course of demand and supply cannot be forbidden by human laws. Precisely in the same sense, and with the same certainty, the waters of the world go

where they are required. Where the land falls, the water flows. The course neither of clouds nor rivers can be forbidden by human will. But the disposi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m can be altered by human forethought. Whether the stream shall be a curse or a blessing, depends upon man's labour and administrating intelligence. For centuries after centuries, great districts of the world, rich in soil, and favoured in climate, have lain desert under the rage of their own rivers; nor only desert, but plague-struck. The stream which, rightly directed, would have flowed in soft irrigation from field to field—would have purified the air, given food to man and beast, and carried their burdens for them on its bosom—now overwhelms the plain, and poisons the wind; its breath pestilence, and its work famine. In like manner this wealth “goes where it is required.” No human laws can withstand its flow. They can only guide it; but this, the leading trench and limiting mound can do so thoroughly, that it shall become water of life—the riches of the hand of wisdom; [4_3] or, on the contrary, by leaving it to its own lawless flow, they may make it, what it has been too often, the last and deadliest of national plagues: water of Marah—the water which feeds the roots of all evil.

我在前面曾说过，财富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犹如河水流入大海。但从某种角度看，二者不是部分相似，而是完全相似。普通经济学家们自作聪明地认为财富，或一般意义上的财产形式，必须以需要为转移，即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给。他们还进一步宣称，这种供求关系不受人类律法的制约。在与此完全相同的意义上，我们也同样确信，全世界的河流也是流向需要它的地方。哪里地势低，水就流向哪里。的确，云的飘浮、水的流向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人类可以以其意志对云或河水的运动加以限制。河水是福是祸，取决于人类的努力劳作和治理的智慧。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有那么多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的地区由于当地河水肆虐而沦为不毛之地，甚至瘟疫横

行。如果当初对河水加以恰当引导，河水就会潺潺流淌，灌溉农田，清洁空气，为人畜提供粮食，还可载舟运货；而如今，洪水泛滥，淹没了平原，污染了空气，造成了瘟疫，带来了饥荒。同理，财富之水也“按需而动”。人的律法不能加以阻止，对财富只能加以引导。如若挖渠筑堤周全得当，它将成为生命之泉，成为智慧者手中的财富；[5_3] 相反，如果放任自流，不加管理，就会像我们经常所见的那样，财富也会给国家带来致命的灾难，就如玛拉的苦水，成为罪恶渊薮。

The necessity of these laws of distribution or restraint is curiously over-looked in the ordinary political economist's definition of his own “science.” He calls it, shortly, the “science of getting rich.” But there are many sciences, as well as many arts, of getting rich. Poisoning people of large estates, was one employed largely in the Middle Ages; adulteration of food of people of small estates, is one employed largely now. The ancient and honourable Highland method of blackmail, the more modern and less honourable system of obtaining goods on credit, and the other variously improved methods of appropriation—which, in major and minor scales of industry, down to the most artistic pocket-picking, we owe to recent genius,—all come under the general head of sciences, or arts, of getting rich.

令人费解的是，关于引导和约束这些规律的必要性因普通政治经济学家们所自命的“科学”的定义忽视了，他们只是简单地将其称作“致富的科学”。然而致富之术不止一种，致富的科学也不止一门。对有大宗地产的人，投毒害命是常见于中世纪的一个手段，而对有少量地产的人，食品掺假则是常见于今天的一个手段。收取保护费是高地苏格兰人古老又体面的生存之道，而通过赊账获取商品则是更为现代但却不太光荣的生财之道，还有其他种种先进的致富手段，从大大小小的经营模式，到极有技巧的扒窃手段，我们都将其归功于现代人类的

聪明才智，而所有这些都在“致富学”或“发财术”这一总称之下。

So that it is clear the popular economist, in calling his science the science *par excellence* of getting rich, must attach some peculiar ideas of limitation to its character. I hope I do not misrepresent him, by assuming that he means *his* science to be the science of “getting rich by legal or just means.” In this definition, is the word “just,” or “legal,” finally to stand? For it is possible among certain nations, or under certain rulers, or by help of certain advocates, that proceedings may be legal which are by no means just. If, therefore, we leave at last only the word “just” in that place of our definition, the insertion of this solitary and small word will make a notable difference in the grammar of our science. For then it will follow that, in order to grow rich scientifically, we must grow rich justly; and, therefore, know what is just; so that our economy will no longer depend merely on prudence, but on jurisprudence—and that of divine, not human law. Which prudence is indeed of no mean order, holding itself, as it were, high in the air of heaven, and gazing forever on the light of the sun of justice; hence the souls which have excelled in it are represented by Dante as stars, forming in heaven for ever the figure of the eye of an eagle: they having been in life the discerners of light from darkness; or to the whole human race, as the light of the body, which is the eye; while those souls which form the wings of the bird (giving power and dominion to justice, “healing in its wings”) trace also in light the inscription in heaven: “DILIGITE JUSTITIAM QUI JUDICATIS TERRAM.” “Ye who judge the earth, give” (not, observe, merely love, but) “diligent love to justice”: the love which seeks diligently, that is to say, choosingly, and by preference, to all things else. Which judging or doing judgment in the earth is, according to their capacity and position, required not of judges only, nor of rulers only, but of all

men: [4_4] a truth sorrowfully lost sight of even by those who are ready enough to apply to themselves passages in which Christian men are spoken of as called to be “saints” (i.e. to helpful or healing functions); and “chosen to be kings” (i.e. to knowing or directing functions); the true meaning of these titles having been long lost through the pretences of unhelpful and unable persons to saintly and kingly character; also through the once popular idea that both the sanctity and royalty are to consist in wearing long robes and high crowns, instead of in mercy and judgment; whereas all true sanctity is saving power, as all true royalty is ruling power; and injustice i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denial of such power, which “makes men as the creeping things, as the fishes of the sea, that have no ruler over them.“ [4_5]

所以，显而易见，普通经济学家们在将自己的研究称作如何致富的精妙科学时，必须对其属性加以特别限定。我希望没有误解上述经济学家的观点，即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以合法或公正的手段致富”的科学。在这个定义中，“公正”和“合法”两个词最终能共存吗？因为在某些国度里，或在某些统治者的统治下，或借某些辩护人之力，人的行为有可能合法，但绝非正义。因此，如果我们最后在定义之中只留下了“正义”，那么，所插入的这个孤零零的小词将会给这门科学的基本原理带来明显不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想科学地致富，就必须正义地致富。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何为正义，以使我们的经济不再仅仅依赖经营的智慧，而是依赖律法的智慧——神的律法而非人的律法。这样的智慧绝非庸俗之举，而是高高矗立于青天之上，永远凝视着“正义的太阳”放射光芒。因此那些智慧超群的灵魂被但丁描述为星辰，在天上聚成一只永远不落的雄鹰的眼睛，能在人世间的黑暗里看到光明，就像人身体上的眼睛能带来光明一样。而那些聚成雄鹰翅膀（赋予正义力量和管辖权，有“医治之能”）的灵魂，在天空翱翔，在光明中排出“钟爱正义者，审判地球”。“审判地球者，钟爱（注意，不仅仅是喜爱）正义”字样，即是说，这种煞费苦心的爱是有选择

的，是超越一切的偏爱。这种地球上的审判，不仅以能力和地位的不同而对法官和统治者提出了要求，也对其他所有人提出了要求。 [5_4] 遗憾的是，这个真理为人所忽略遗忘，甚至包括那些随时准备以身殉道、从基督徒成为“圣徒”（即有帮助或医治的能力）的人，甚至也包括“天赋王权”（即有智慧或管理能力）的人。由于那些并不能给人以帮助、自身愚蠢无能的人假装具有圣徒和国王的品行；也由于过去人们通常认为，神圣和王权的体现就是穿长袍、戴高冠，而不是施仁慈、判明断，因此这些称号早就失去了本来的意思。真正的神圣是积蓄力量，真正的王权是行使力量，而非正义则主要是否认这种力量，以至“使人如爬行动物，如海中的鱼，不受任何约束”。 [5_5]

Absolute justice is indeed no more attainable than absolute truth; but the righteous man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unrighteous by his desire and hope of justice, as the true man from the false by his desire and hope of truth. And though absolute justice be unattainable, as much justice as we need for all practical use is attainable by all those who make it their aim.

虽然完全的正义如绝对的真理一样无法企及，但正义之人因渴盼正义而有别于不义之人，正如求实之人因渴盼真理而有别于虚伪之人。虽然完全的正义无法企及，但只要以追求正义为目标，就会有足够的正义满足人类实际所需。

We have to examine, then, in the subject before us, what are the laws of justice respecting payment of labour—no small part, these, of the foundations of all jurisprudence.

那么，我们必须就这个主题仔细考察一下劳动偿付方面的正义的

律法，这些律法是所有律法智慧的重要基础。

I reduced, in my last paper, the idea of money payment to its simplest or radical terms. In those terms its nature, and the conditions of justice respecting it, can be best ascertained.

在前篇文章中，我只用了最简单、最基本的语言谈及了货币支付。这种语言最有助于辨明货币支付中正义的本质和条件。

Money payment, as there stated, consists radically in a promise to some person working for us, that for the time and labour he spends in our service to-day we will give or procure equivalent time and labour in his service at any future time when he may demand it. [4_6]

如我所述，货币支付，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为我们劳动的人做出承诺：别人今天为我们服务了多长时间、干了多少活；以后只要他有要求，我们就应为他服务相同的时间、干等量的活。 [5_6]

If we promise to give him less labour than he has given us, we under-pay him. If we promise to give him more labour than he has given us, we over-pay him. In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demand and supply, when two men are ready to do the work, and only one man wants to have it done, the two men underbid each other for it; and the one who gets it to do, is under-paid. But when two men want the work done, and there is only one man ready to do it, the two men who want it done overbid each other, and the

workman is over-paid.

如果我们允诺给他的少于他给我们的，这叫低酬；如果我们允诺给他的多于他给我们的，这叫高薪。在实际生活中，根据供求规律，若有两个人提供劳动，而只有一个职位空缺，那两个人就会相互压价，以至于得到工作的人报酬不足。但是若两个人都需要雇人，而只有一人应征，那两个雇主就会互相抬价，那个工人就能得到高报酬。

I will examine these two points of injustice in succession; but first I wish the reader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 central principle, lying between the two, of right or just payment.

我将依次考察这两个体现不公正的例子，不过首先希望诸位明确介于二者之间的正当支付或公正支付的中心原则。

When we ask a service of any man, he may either give it us freely, or demand payment for it. Respecting free gift of service, there is no question at present, that being a matter of affection—not of traffic. But if he demand payment for it, and we wish to treat him with absolute equity, it is evident that this equity can only consist in giving time for time, strength for strength, and skill for skill. If a man works an hour for us, and we only promise to work half-an-hour for him in return, we obtain an unjust advantage. If, on the contrary, we promise to work an hour and a half for him in return, he has an unjust advantage. The justice consists in absolute exchange; or, if there be any respect to the stations of the parties, it will not be in favour of the employer: there is certainly no equitable reason in a man's being poor, that if he give me a pound of bread

to-day, I should return him less than a pound of bread to-morrow; or any equitable reason in a man's being uneducated, that if he uses a certain quantity of skill and knowledge in my service, I should use a less quantity of skill and knowledge in his. Perhaps, ultimately, it may appear desirable, or, to say the least, gracious, that I should give in return somewhat more than I received. But at present, we are concerned on the law of justice only, which is that of perfect and accurate exchange;—one circumstance only interfering with the simplicity of this radical idea of just payment—that inasmuch as labour (rightly directed) is fruitful just as seed is, the fruit (or "interest," as it is called) of the labour first given, or "advanced," ought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balanced by an additional quantity of labour in the subsequent repayment. Supposing the repayment to take place at the end of a year, or of any other given time, this calculation could be approximately made; but as money (that is to say, cash) payment involves no reference to time (it being optional with the person paid to spend what he receives at once or after any number of years), we can only assume, generally, that some slight advantage must in equity be allowed to the person who advances the labour, so that the typical form of bargain will be: If you give me an hour to-day, I will give you an hour and five minutes on demand. If you give me a pound of bread to-day, I will give you seventeen ounces on demand, and so on. All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reader to note is, that the amount returned is at least in equity not to be less than the amount given.

我们要求获得他人的服务时，他或者会无偿提供，或者要我们付给他报酬。关于他愿意无偿服务，目前暂不予讨论，因为那是感情问题，不是交易问题。但他若要求报偿，我们又希望给他绝对公平公正的报酬。那么，显然这种公平公正就是给他同样的时间、付出同样的体力、交换同样的技能。如果他为我们干了一个小时，而我们只允诺

给他干半小时，我们就因不够公正占了便宜。反过来，如果我们允诺为他多干半个小时，他就因不够公正占了便宜。公正就是绝对意义上的等量交换，而如果涉及双方的地位问题的话，也不应让雇主得利，因为没有公正的理由让任何人受穷。即如果他今天给我一磅面包，我没有理由明天还他不足一磅的面包；同样没有公正的理由让任何人不受教育，即如果他用一定的技能或知识为我服务，而我回报的技能或知识没有理由低他一筹。也许我最终应该多回报一些，这才合乎情理，或至少说显得宽厚。但眼下我们只关心公正的问题，即绝对精确的交易问题——一种只牵涉到“公正偿付”这一基本概念的简单性的情况——鉴于劳动（支配得当的话）像种子一样结出果实，那么先前付出或预支的劳动所产生的果实（或称作“利息”）就必须纳入账中，并在随后的偿付中以额外的劳动加以冲抵。假如在年底或其他任何约定的时间进行偿付时，就可以把这种额外的量计算进去。但由于货币（即现钞）支付与时间没关系（接受货币偿付的人可能拿到钱后马上消费，也可以过几年之后再花），我们只能大致认为，必须让先付出劳动的人多得一点好处，这样，典型的交易形式如下：你今天为我付出了一小时，我将偿付给你一小时外加五分钟；如果你今天给我一磅面包，我将还你十七盎司的面包，依此类推。各位读者有必要注意的是：偿付的总量至少不低于预先付出的量。

The abstract idea, then, of just or due wages, as respects the labourer, is that they will consist in a sum of money which will at any time procure for him at least as much labour as he has given, rather more than less. And this equity or justice of payment is, observe, wholly independent of any reference to the number of men who are willing to do the work. I want a horseshoe for my horse. Twenty smiths, or twenty thousand smiths, may be ready to forge it; their number does not in one atom's weight affect the question of the equitable payment of the one who does forge it. It costs him a quarter of an hour of his life, and so much skill and strength of arm to make that horseshoe for me. Then at some future time I am

bound in equity to give a quarter of an hour, and some minutes more, of my life (or of some other person's at my disposal), and also as much strength of arm and skill, and a little more, in making or doing what the smith may have need of.

那么，劳动者的公正工资或应得工资这一抽象概念就可以表述为一定数额的货币，而这些货币能使他在任何时间得到与他的付出相比只多不少，或至少等量的劳动。请大家注意，这种对等或正义的偿付方式与想要提供劳动的人的数量多少完全无关。假如我想要个马掌，而有二十个或两万个铁匠愿意为我打造，那不论人数多少，都丝毫不会影响我对打造马掌的那个人的公正偿付。他为我的马掌花去了生命中的一刻钟，还付出了一定的技术和臂力。那么以后某个时间，我必须依衡平法从我的（或由我支配的其他人的）生命中付给他一刻钟，再多加几分钟，以及等量的技术和臂力，再多加一些量，以满足那位铁匠的需要。

Such being the abstract theory of just remunerative payment, its application is practically modified by the fact that the order for labour, given in payment, is general, while labour received is special. The current coin or document is practically an order on the nation for so much work of any kind; and this universal applicability to immediate need renders it so much more valuable than special labour can be, that an order for a less quantity of this general toil will always be accepted as a just equivalent for a greater quantity of special toil. Any given craftsman will always be willing to give an hour of his own work in order to receive command over half-an-hour, or even much less, of national work. This source of uncertainty, together with the difficulty of determining the monetary value of skill,[1] renders the ascertainment (even approximate) of the proper wages of any given labour in

terms of a currency matter of considerable complexity. But they do not affect the principle of exchange. The worth of the work may not be easily known; but it *has* a worth, just as fixed and real as the specific gravity of a substance, though such specific gravity may not be easily ascertainable when the substance is united with many others. Nor is there so much difficulty or chance in determining it as in determining the ordinary maxima and minima of vulgar political economy. There are few bargains in which the buyer can ascertain with anything like precision that the seller would have taken no less;—or the seller acquire more than a comfortable faith that the purchaser would have given no more. This impossibility of precise knowledge prevents neither from striving to attain the desired point of greatest vexation and injury to the other, nor from accepting it for a scientific principle that he is to buy for the least and sell for the most possible, though what the real least or most may be he cannot tell. In like manner, a just person lays it down for a scientific principle that he is to pay a just price, and, without being able precisely to ascertain the limits of such a price, will nevertheless strive to attain the closest possible approximation to them. A practically serviceable approximation he *can* obtain. It is easier to determine scientifically what a man ought to have for his work, than what his necessities will compel him to take for it. His necessities can only be ascertained by empirical, but his due by analytical, investigation. In the one case, you try your answer to the sum like a puzzled schoolboy—till you find one that fits; in the other, you bring out your result within certain limits, by process of calculation.

这就是关于“公正报偿支付”的抽象理论。该理论在实际应用中会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即对有偿劳动的需求是一般的，而得到的劳动是特殊的。流通的货币或合同文件实际上是国家对各种劳动的需求订

单。将这种普遍适用性应用到具体的需求中时，就使得货币或文件比特殊的劳动更有价值，就是说，人们总是认为，对较少量的一般劳动的需求，与较多的特殊劳动的付出等值。每个工匠都乐意以自己一个小时的劳动换取半个小时、甚至更少的一般劳动偿付。这种偿付与付出之间的差额的不确定性，再加上技艺[1] 的货币价值难以衡量，使得确定（甚至大致估计）某一特定劳动的恰当工资成了相当复杂的货币问题。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交换原则。劳动的价值可能不易确定，但它的确含有固定、实在的价值，就像任何物质都有固定的重量，尽管该物质由于与许多其他物质混为一体，自身的重量难以衡量。而确定劳动价值也并没有像，确定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普通最大、最小值一样那么难。买卖交易中，买家一般都没把握确信卖家已无利可图，而卖家也无法确信买家肯定不能多出一分钱。买卖双方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他们无法避免竭力追求最大的利益而不惜相互伤害，无法避免地将“最高价卖出，最低价买入”视为金科玉律，尽管他们无法知道真实的最高价和最低价。同样，正义的人也有自己的金科玉律，那就是以公正的价格支付，无法准确断定价格的上限时，就一定要尽可能接近上限。正义的人总能找到一个在实际中行之有效的近似值。理论上确定一个人的劳动应得还比较容易，而要确定为了满足生活所需，必须获得的劳动偿付就难得多了。生活必需品的多少只能从亲身体验中确定，但他的劳动所得却可以通过分析得到。有时候，你会像小学生动脑筋做算术题一一代入得出答案那样，直到找出最合适的那个；有时候，你又会通过运算，在一定的范围内找到最后的结果。

1: Under the term "skill" I mean to include the united force of experience, intellect, and passion in their operation on manual labour; and under the term "passion," to include the entire range and agency of the moral feelings; from the simple patience and gentleness of mind which will give continuity and fineness to the touch, or enable one

person to work without fatigue, and with good effect, twice as long as another, up to the qualities of character which renders science possible—(the retardation of science by envy is one of the most tremendous losses in the economy of the present century)—and to the incommunicable emotion and imagination which are the first and mightiest sources of all value in art.

1: 使用“技艺”这个词时，我想应当包括经验、智识以及体力劳动中的热情共同构成的力量。而“热情”应包括各种道德情感及其作用，从能让人一丝不苟、连续工作，或不知疲倦、效率倍增的耐心平稳心态，到促进科学进步的宽容品质（嫉妒令科学迟滞，这是本世纪经济发展的巨大损失之一），以及不可言传的激情和想象，那是艺术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价值之源。

It is highly singular that political economists should not yet have perceived, if not the moral, at least the passionate element, to be an inextricable quantity in every calculation. I cannot conceive, for instance, how it was possible that Mr. Mill should have followed the true clue so far as to write,—"No limit can be set to the importance—even in a purely productive and material point of view—of mere thought," without seeing that it was logically necessary to add also, "and of mere feeling." And the more, because in his first definition of labour he

includes in the idea of it "all feelings of a disagreeable kind connected with the employment of one's thoughts in a particular occupation." True; but why not also, "feelings of an agreeable kind?" It can hardly be supposed that the feelings which retard labour are more essentially a part of the labour than those which accelerate it. The first are paid for as pain, the second as power. The workman is merely indemnified for the first; but the second both produce a part of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e work, and materially increase its actual quantity.

非常奇怪的是，那些政治经济学家们即使没有意识到道德因素在每次运算过程中的不可忽略性，至少也不会没意识到激情因素。例如，我想象不出密尔先生根据什么证据得出如下结论，“即便是从纯粹生产的和物质的观点来看，纯粹思维的重要意义也是无限的”，他没有认识到，根据逻辑有必要补充“纯粹情感的重要意义也是无限的”。这一点其实更为重要，因为在他给劳动下的第一个定义中，他认为劳动这一概念包括“在某一职业中因进行思考而引起的一切不愉快的情绪”。他说的不错，但为什么不包括“一切愉快的情绪”在内呢？总不能说使劳动速度减慢的情绪比能加快劳动速度的情绪更为重要吧。前者的回报是痛苦，后者的回报则是力量。劳动者情绪不快只是免于受罚，但愉快的情绪却既能产生所从事工作的一部分交换价值，还能增加物质产量。

"Fritz is with us. *He* is worth fifty thousand men." Truly, a large addition to the material force;—consisting, however, be it observed, not more in operations carried on in Fritz's head, than in operations carried on in his armies' heart. "No limit can be set to the importance of mere thought." Perhaps not! Nay, suppose someday it should turn out that "mere" thought was in itself a recommendable object of production, and that all Material production was only a step towards this more precious immaterial one?

“我们有弗里茨，他一人顶五万人。”的确，这个人大大增加了物质力量。然而，必须注意到，物质力量的增加并不见得是因为弗里茨有思维敏捷的头脑，而可能是因为弗里茨有军人般的耿耿忠心。“纯粹思维的重要意义是无限的”这个命题也许根本不对！不仅如此，假如有一天我们发现，所谓“纯粹”思维本身就是某一有价值的生产目的，而物质生产只不过是实现这一更有价值的非物质生产的一个步骤呢？

Supposing, then, the just wages of any quantity of given labour have been ascertained, let us examine the first results of just and unjust payment. When in favour of the purchaser or employer; i.e. when two men are ready to do the work, and only one wants to have it done.

那么，假设某一劳动量的公正的薪酬已经确定下来，我们来考察

一下公正薪酬与对劳动购买者或雇主有利的不公正薪酬，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所谓对雇主有利，就是说一项工作有两个人愿意干，而雇主只需要一个。

The unjust purchaser forces the two to bid against each other till he has reduced their demand to its lowest terms. Let us assume that the lowest bidder offers to do the work at half its just price.

不公正的雇主迫使这两人互相争着出低价，直到把他们的要价压到最低。假设出价最低者愿意以公正价格的一半干这份工作。

The purchaser employs him, and does not employ the other. The first or *apparent* result is, therefore, that one of the two men is left out of employ, or to starvation, just as definitely as by the just procedure of giving fair price to the best workman. The various writers who endeavoured to invalidate the positions of my first paper never saw this, and assumed that the unjust hirer employed *both* . He employs both no more than the just hirer. The only difference (in the outset) is that the just man pays sufficiently, the unjust man insufficiently, for the labour of the single person employed.

雇主就雇了他而没雇另外那个人。其最直或最明显的结果是，其中一个无活可做，只好挨饿。这与把最好的价格给最好的工人这一公正做法带来的结果一样明确无疑。那些著文反驳我第一篇文章的立场的人，根本没有看到这一点，并且认为不公正的雇主用原来的钱雇了两个人。其实，即使他把两人都一起雇了，也不会好于公正的雇主。二者唯一的区别（首先）是，对那一个受雇者的劳动，正义的人足额

支付报酬，而非正义的人支付不足。

I say, “in the outset;” for this first or apparent difference is not the actual difference. By the unjust procedure, half the proper price of the work is left in the hands of the employer. This enables him to hire another man at the same unjust rate, on some other kind of work; and the final result is that he has two men working for him at half price, and two are out of employ.

我说“首先”，是因为这个直接、明显的区别并非真正的不同。通过这种不公正的手段，劳动者的公正价格一半留在了雇主手里，使得他有可能再以同样不公正的价格比率雇用其他人干其他活，而最终的结果是他以一半的价格雇了两个人，而同时又造成两个人无工可做。

By the just procedure, the whole price of the first piece of work goes in the hands of the man who does it. No surplus being left in the employer's hands, *he* cannot hire another man for another piece of labour. But by precisely so much as his power is diminished, the hired workman's power is increased; that is to say, by the additional half of the price he has received: which additional half *he* has the power of using to employ another man in his service. I will suppose, for the moment, the least favourable, though quite probable, case—that, though justly treated himself, he yet will act unjustly to his subordinate; and hire at half-price, if he can. The final result will then be, that one man works for the employer, at just price; one for the workman, at half-price; and two, as in the first case, are still out of employ. These two, as I said before, are out of employ in *both* ca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just and unjust procedure does not lie in the number of men hired, but in the price paid to them,

and the *persons by whom* it is paid.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which I want the reader to see clearly, is that in the unjust case, two men work for one, the first hirer. In the just case, one man works for the first hirer, one for the person hired, and so on, down or up through the various grades of service; the influence being carried forward by justice, and arrested by injustice. The universal and constant action of justice in this matter is therefore to diminish the power of wealth, in the hands of one individual, over masses of men, and to distribute it through a chain of men. The actual power exerted by the wealth is the same in both cases; but by injustice it is put all into one man's hands, so that he directs at once and with equal force the labour of a circle of men about him; by the just procedure, he is permitted to touch the nearest only, through whom, with diminished force, modified by new minds, the energy of the wealth passes on to others, and so till it exhausts itself.

而若使用公正的方法，则第一份工作的全部报酬都应归干活的雇工所有。没有剩余落在雇主手里，他就不能再雇另外的人做其他活。随着雇主力量的减少，雇工的力量却因得到了报酬的另一半而得以增加，他就有能力支配这额外的另一半，雇用别人为他提供服务。现在，我来假设一种虽很不愿意看到但却非常可能的情况：那位雇工虽然得到了公正的回报，却可能对给他干活的人不公正，如有可能，也会只支付一半的劳动价格。最终结果就是：一个雇工以公正的价格为雇主干活；一个人半价为这个雇工干活。但与前面的例子相同的是，仍有两个人无活可做。如我前面所说，这两个正义和非正义的例子中都出现了两人无活可做的情况，差别不在于被雇佣的人数量有多少，而在于付给他们的报酬，以及支付报酬的人。请诸位明确这种根本上的差异，即非正义的例子中，两个雇工为一个人（即第一位雇主）干活；而在正义的例子中，一位雇工为第一位雇主干活，而这位雇工又雇别人为自己干活，如此循环往复，穿梭于各种不同的劳务阶层。正义会带来良性循环，非正义则使发展受到阻碍。因此，这种情况下，

广泛而持久的正义行为将减少个人手中用以支配多数人的财富力量，从而通过循环雇佣把财富力量分配出去。财富的实际力量在两种例子中是同样的，但非正义的手段使权力都落入一人之手，以至他随时都可用同样的力量支配周围人的劳动力；而采取正义的手段，一个人就只雇用与自己最近的人，受雇的人再把财富力量传给其他人，如此延续下去，力量不断被削弱，不断因人而调整，直至最后耗尽。

The immediate operation of justice in this respect is therefore to diminish the power of wealth, first in acquisition of luxury, and, secondly, in exercise of moral influence. The employer cannot concentrate so multitudinous labour on his own interests, nor can he subdue so multitudinous mind to his own will. But the secondary operation of justice is not less important. The insufficient payment of the group of men working for one, places each under a maximum of difficulty in rising above his position. The tendency of the system is to check advancement. But the sufficient or just payment, distributed through a descending series of offices or grades of labour,[2] gives each subordinated person fair and sufficient means of rising in the social scale, if he chooses to use them; and thus not only diminishes the immediate power of wealth, but removes the worst disabilities of poverty.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正义的最直接作用就是削减财富的力量，首先，削减其获得奢侈品的力量；其次，削减其支配精神的力量。雇主不能支配大量的劳动力用于为自己谋利，也不能迫使众人的思想以自己的意愿为转移。但正义的其他作用也并非就不重要。为一人劳动的一群人，若得不到足额报酬，就极难摆脱困境。这种体制发展下去就会制约进步。而足额或公正的偿付通过递降的一系列职务或劳动力阶层[2] 逐步得到分配，使每一个处在低一层次的人都有充分平等的机会提升自身的社会等级，如果他愿意使用这些机会的话。这样就不仅

削弱了财富的直接权力，也消除了贫困给社会带来的最严重后果。

2: I am sorry to lose time by answering, however curtly, the equivocations of the writers who sought to obscure the instances given of regulated labour in the first of these papers, by confusing kinds, ranks, and quantities of labour with its qualities. I never said that a colonel should have the same pay as a private, nor a bishop the same pay as a curate. Neither did I say that more work ought to be paid as less work (so that the curate of a parish of two thousand souls should have no more than the curate of a parish of five hundred). But I said that, so far as you employ it at all, bad work should be paid no less than good work; as a bad clergyman yet takes his tithes, a bad physician takes his fee, and a bad lawyer his costs. And this, as will be farther shown in the conclusion, I said, and say, partly because the best work never was, nor ever will be, done for money at all; but chiefly because, the moment people know they have to pay the bad and good alike, they will try to discern the one from the other, and not use the bad. A sagacious writer in the Scotsman asks me if I should like any common scribbler to be paid by Messrs. Smith, Elder and Co. as their good authors are. I should, if they employed him—but would seriously recommend them, for the scribbler's sake, as well as their own, not to employ him. The quantity of its

money which the country at present invests in scribbling is not, in the outcome of it, economically spent; and even the highly ingenious person to whom this question occurred, might perhaps have been more beneficially employed than in printing it.

2: 对不起，让我用点时间对某些作者的含糊其辞做一简要答复。他们通过把劳动的种类、层次、数量与劳动的质量相混淆，从而试图让我在第一篇文章中给出的几个关于规范劳动的例子晦涩难懂。我从未说过上校的工资应和列兵相同，主教的薪俸应和助理牧师相同。我也从未说过干得多应与干得少报酬相同（以至于管辖两千居民的教区牧师与管辖五百居民的教区牧师薪俸无异）。但是，我说过，只要你雇用别人劳动，则干得好坏都应报酬相同，就是说不好的教士也会收什一税，不好的医生也会收费，不好的律师也会收佣金。这一点，我前面说过，现在也在说，以后在结论中还会深入阐述。既是因为最优质的劳动过去不是、将来也绝不是为钱而做的，更主要是因为人们一旦明白劳动不分好坏都应同等付酬，他们就会对雇者加以挑选，择优劣汰。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报》作家曾问我是否愿意让任何一位三流作者从老史密斯先生出版公司那儿获得与好作家相同的报酬，我说当然愿意，如果他们已经雇了那人的话。但出于对那位三流作者利益的考虑，以及对出版公司自身利益的考虑，我还是会郑重建议他们不雇那个人。从结果来看，国家目前对三流作者投入的那些钱没有被经济地花掉，即使是极为足智多谋的人，在面对这个问题

时，恐怕也会致力于更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去将这些草率的创作付印。

It is on this vital problem that the entire destiny of the labourer is ultimately dependent. Many minor interests may sometimes appear to interfere with it, but all branch from it. For instance, considerable agitation is often caused in the minds of the lower classes when they discover the share which they nominally, and to all appearance, actually, pay out of their wages in taxation (I believe thirty-five or forty per cent). This sounds very grievous; but in reality the labourer does not pay it, but his employer. If the workman had not to pay it, his wages would be less by just that sum: competition would still reduce them to the lowest rate at which life was possible. Similarly the lower orders agitated for the repeal of the Corn Laws,[3] thinking they would be better off if bread were cheaper; never perceiving that as soon as bread was permanently cheaper, wages would permanently fall in precisely that proportion. The Corn Laws were rightly repealed; not, however, because they directly oppressed the poor, but because they indirectly oppressed them in causing a large quantity of their labour to be consumed unproductively. So also unnecessary taxation oppresses them, through destruction of capital. But the destiny of the poor depends primarily always on this one question of dueness of wages. Their distress (irrespectively of that caused by sloth, minor error, or crime) arises on the grand scale from the two reacting forces of competition and oppression. There is not yet, nor will yet for ages be, any real over-population in the world; but a local over-population, or, more accurately, a degree of population locally unmanageable under existing circumstances for want of forethought and sufficient machinery, necessarily shows itself by pressure of competition; and the taking advantage of this

competition by the purchaser to obtain their labour unjustly cheap, consummates at once their suffering and his own; for in this (as I believe in every other kind of slavery) the oppressor suffers at last more than the oppressed, and those magnificent lines of Pope, even in all their force, fall short of the truth—

劳动者的整个命运最终取决于这个关键问题。虽然时而也会有其他小的利益问题，但那都是这一关键问题的旁枝末节。例如，当下层阶级发现从自己工资中扣除的虽然是名义上的、但怎么看都非常真实的税款的份额时（我认为占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四十），情绪常常非常激动。这个数字听上去令人痛苦愤懑，但实际上支付税款的不是劳动者，而是雇主。如果劳动者不用支付这笔税款的话，其现在的薪水就应该正好减去这个数目：竞争仍会使薪水减少到仅够维持生存的地步。同样，下层人士还鼓动废除谷物法，[3] 以为面包便宜了，他们的日子就更好过，而从未想到如果面包便宜了，他们的薪水最终也会以同样的比例下降。谷物法被“合乎情理”地废除了，但并不是因为它对穷人的直接压榨，而是因为它耗费了穷人的大量无用劳动所造成的间接压榨。那些不必要的税收对穷人也是一种压榨，因它摧毁了资本积累。但穷人的命运好坏主要还是取决于其薪水公正与否。他们的贫困痛苦（暂不考虑由懒怠、过失、犯罪所带来的贫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竞争与压迫的相互作用。这个世界上，现在没有，以后多少年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过剩，而只会有局部人口过剩，或更准确地说，在现有条件下由于计划不周和设备不足而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局部人口安排不当，这种过剩由于竞争的压力而表现出来。雇主利用这种竞争以不公正的手段获取廉价劳动，给穷人也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任何其他形式的奴役都一样），压迫者最终遭受的苦难比被压迫者还要多。而诗人蒲柏的伟大诗句即使气势恢弘，也未能道出真相：

“Yet, to be just to these poor men of pelf,

“可是，请对那些穷人公正些吧，

Each does but HATE HIS NEIGHBOUR AS HIMSELF:

虽然他们彼此不和：

Damned to the mines, an equal fate betides

诅咒那些矿井，同样的命运降临，

The slave that digs it, and the slave that hides.”

不管奴隶在挖矿，还是已躲藏。”

3: I have to acknowledge an interesting communication on the subject of free trade from Paisley (for a short letter from "A Well-wisher" at—my thanks are yet more due). But the Scottish writer will, I fear, be disagreeably surprised to hear, that I am, and always have been, an utterly fearless and unscrupulous free-trader. Seven years ago, speaking of the various signs of infancy in the

European mind (*Stones of Venice* , vol. iii., page 168), I wrote: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commerce were acknowledged by the English parliament only a few months ago, in its free-trade measures, and are still so little understood by the million, that *no nation dares to abolish its custom-houses* ."

3: 我必须提及就自由贸易这个话题与佩斯利一位作者的一次有趣的通信（那封署名为“最衷心的祝愿者”的简短来信让我至今感激不已）。但恐怕这位苏格兰作者听说我现在是，也一直是义无反顾、彻头彻尾的自由贸易者时，可能会颇为不悦、惊讶不已吧。在七年前，谈及欧洲人心态幼稚的各种表现时（见《威尼斯的石头》第三卷第168页），我写道：“仅在数月之前英国国会就承认了商业的基本原则，并已实行自由贸易，如今欧洲大陆几百万人还几乎不知自由贸易为何物，还没有一个国家敢取消海关。”

It will be observed that I do not admit even the idea of reciprocity. Let other nations, if they like, keep their ports shut; every wise nation will throw its own open. It is not the opening them, but a sudden, inconsiderate, and blunderingly experimental manner of opening them, which does the harm. If you have been protecting a manufacture for a long series of years, you must not take the protection off in a moment, so as to throw every one of its operatives at once out of

employ, any more than you must take all its wrappings off a feeble child at once in cold weather, though the cumber of them may have been radically injuring its health. Little by little, you must restore it to freedom and to air.

你们会注意到我甚至不认同互利互惠这一观念。其他国家愿意关闭港口就关闭好了，只有英明的国家才会敞开国门。敞开国门本身不会有危害，而鲁莽唐突、不假思索的开门方式倒是有害无益。如果已连续保护了某家工厂很多年，突然一下子放弃保护，会使工人立刻失业，就如天气寒冷时即使层层包裹可能对孩子的健康极为不利，也不能把包在虚弱孩子身上的衣物一下子全部脱掉。你必须一点一点地让他恢复自由，与空气接触。

Most people's minds are in curious confusion on the subject of free trade, because they suppose it to imply enlarged competition. On the contrary, free trade puts an end to all competition. "Protection" (among various other mischievous functions) endeavours to enable one country to compete with another in the production of an article at a disadvantage. When trade is entirely free, no country can be competed with in the articl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hich it is naturally calculated; nor can it compete with any other, in the production of articles for which it is not naturally calculated.

Tuscany, for instance, cannot compete with England in steel, nor England with Tuscany in oil. They must exchange their steel and oil. Which exchange should be as frank and free as honesty and the sea-winds can make it. Competition, indeed, arises at first, and sharply, in order to prove which is strongest in any given manufacture possible to both; this point once ascertained, competition is at an end.

很奇怪，很多人对自由贸易的认识颇为混乱，因为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意味着扩大竞争范围。其实恰好相反，自由贸易终结了所有的竞争。“贸易保护”（诸种害处之一是）极力使一个国家的某种产品生产在不利的条件下与另一国家竞争，而一旦贸易完全自由化，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与生产某一产品有得天独厚优势的国家进行竞争，也同样不可能与生产某一产品毫无优势的国家进行竞争。例如，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就不会在钢铁行业与英国竞争，而英国也不会在石油行业与托斯卡纳竞争。他们只能交换钢铁和石油。这种交换必须以诚相待，必须像海风那样自由无碍。实际上，一开始出现的残酷竞争，是为了证明都有能力生产某个产品的两家工厂谁更强大，而一旦分出高低，竞争也就终止了。

The collateral and reversionary operations of justice in this matter I shall examine hereafter (it being needful first to define the nature of value); proceeding then to consider within what practical terms a juster system may be established; and ultimately the vexed

question of the destinies of the unemployed workmen.[4] Lest, however, the reader should be alarmed at some of the issues to which our investigations seem to be tending, as if in their bearing against the power of wealth they had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those advocating equality of individual wealth, I wish him to know in accurate terms, one or two of the main points which I have in view.

关于公正在这方面所产生的间接的、恢复性作用，容我以后再加考察（首先有必要确定价值的本质），然后再考虑在何种具体条件下才能建立更公正的体系，最后再探讨未被雇用的工人的命运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4] 然而，为防止读者诸君对我们将要探究的某些问题感到诧异，以为我们对财富力量的批评颇似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我恭请大家准确理解我所展望的如下一二要点。

4: I should be glad if the reader would first clear the ground for himself so far a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difficulty lies in getting the work or getting the pay for it. Does he consider occupation itself to be an expensive luxury, difficult of attainment, of which too little is to be found in the world? or is it rather that, while in the enjoyment even of the most athletic delight, men must nevertheless be maintained, and this maintenance is not always forthcoming? We must be clear on this head before going farther, as most people are loosely in the habit of talking of the difficulty of "finding employment." Is it employment that we want to find, or support during employment? Is it

idleness we wish to put an end to, or hunger? We have to take up both questions in succession, only not both at the same time. No doubt that work is a luxury, and a very great one. It is, indeed, at once a luxury and a necessity; no man can retain either health of mind or body without it. So profoundly do I feel this, that as will be seen in the sequel, one of the principal objects I would recommend to benevolent and practical persons, is to induce rich people to seek for a larger quantity of this luxury than they at present possess. Nevertheless, it appears by experience that even this healthiest of pleasures may be indulged in to excess, and that human beings are just as liable to surfeit of labour as to surfeit of meat; so that, as on the one hand, it may be charitable to provide, for some people, lighter dinner, and more work, for others, it may be equally expedient to provide lighter work, and more dinner.

4: 我十分希望读者能一开始就扫清障碍，把问题集中在判定困难到底是在于得到工作还是在于得到报酬上。难道他认为职业本身是昂贵的奢侈品，因而难以得到，且稀有难寻？抑或像享受运动之乐那样，人也必须有工作支撑，只是这种支撑并非随时可得？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才能继续讨论，因为很多人谈及“工作难找”时总是概念不清。这个“工作”是指工作本身还是指我们赖以生存的方式？我们是想用工作消磨无聊时光，还是解决饥饿？我们必须逐个回答这两

个问题，不能同时回答。无疑，工作是一种奢侈品，非常大的奢侈品。实际上，它既是奢侈品又是必需品，因为没有工作，谁都不能保持身体和心智的健康。这一点太深刻了（容后面详叙），以至于我建议那些仁慈的、现实的人，将引导富人寻求比现在更多的这种奢侈品作为首要目的之一。尽管如此，根据经验来看，即便是这种最有益于健康的快乐，也有人过度沉迷，就像有人耽于酒肉，有人则易陶醉于工作。所以，对有些人来说，提供清淡饮食和较多工作是善意之举，而对有些人来说，提供较少的工作和丰盛的食物也同样恰当。

Whether the issues of advocating equality have made more progress among the army and navy (where payment is made on my principles), or among the manufacturing operatives (who are paid on my opponents' principles), I leave it to those opponents to ascertain and declare. Whatever their conclusion may be, I think it necessary to answer for myself only this: that if there be any one point insisted on throughout my works more frequently than another, that one point is the impossibility of Equality. My continual aim has been to show the eternal superiority of some men to others, sometimes even of one man to all others; and to show also the advisability of appointing such persons or person to guide, to lead, or on occasion even to compel and subdue, their inferior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better knowledge and wiser will. M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ere all involved in a single phrase spoken three years ago at Manchester: “Soldiers of the Ploughshare as well as soldiers of the Sword;” and they were all summed in a single sentence in the last volume of *Modern Painters*—“Government and co-operation are in all things the Laws of Life;

Anarchy and competition the Laws of Death.”

至于社会主义观点在陆军和海军军队里（那里按我说的原则支付报酬），还是在工厂企业里（那里按我的反对者的原则支付报酬）取得的效益更多，我留给那些反对者去确定并公布出来。不管他们的结论如何，我觉得必须先声明如下观点：如果说在我的著述中有什么反复强调的要点，那就是平等的不可能性。我一直试图表明：人与人之间，有时甚至是一个人与其他所有人之间，尊卑优劣是永远存在的；指定某些或某个见多识广、聪明睿智的人去引导、去领导，乃至有时去强迫和压制低阶层的人，是明智恰当的。我的政治经济学原则三年前在曼彻斯特就用一个短语完全概括了——“既有手拿刀剑的士兵，也有手扶犁头的士兵”，而这些原则在《现代画家》最后一卷中则用一句话总结如下：“政府与合作是一切生存之法则；无序与竞争乃一切死亡之法则。”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mode in which these general principles affect the secure possession of property, so far am I from invalidating such security, that the whole gist of these papers will be found ultimately to aim at an extension in its range; and whereas it has long been known and declared that the poor have no right to the property of the rich, I wish it also to be known and declared that the rich have no right to the property of the poor.

至于这些总的原则会怎样影响财产的安全拥有，我想说，我远不是想废除财产的安全性，甚至可以说我这些文章的最终宗旨正是意在扩大安全性的范围：既然一直宣称穷人无权拥有富人的财产，并且这一点早已为人所知；那么我希望也有人宣称富人无权拥有穷人的财产，并使这一点一样能家喻户晓。

But that the working of the system which I have undertaken to develope would in many ways shorten the apparent and direct, though not the unseen and collateral, power, both of wealth, as the Lady of Pleasure, and of capital as the Lord of Toil, I do not deny: on the contrary, I affirm it in all joyfulness; knowing that the attraction of riches is already too strong, as their authority is already too weighty, for the reason of mankind. I said in my last paper that nothing in history had ever been so disgraceful to human intellect as the acceptance among us of the common doctrin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s a science. I have many grounds for saying this, but one of the chief may be given in few words. I know no previous instance in history of a nation's establishing a systematic disobedience to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its professed religion. The writings which we (verbally) esteem as divine, not only denounce the love of money as the source of all evil, and as an idolatry abhorred of the Deity, but declare mammon service to be the accurate and irreconcilable opposite of God's service; and, whenever they speak of riches absolute, and poverty absolute, declare woe to the rich, and blessing to the poor. Whereupon we forthwith investigate a science of becoming rich, as the shortest road to national prosperity.

然而，我全力倡导的制度若实施起来，将会在许多方面减弱财富作为“快乐女士”和资本作为“苦役男人”所具有的外显、直接（尽管不是内在、间接的）的力量，这一点我不否认；相反，我为此兴高采烈，因为我知道，对于人类的理智来说，财富的吸引力已太过强大，财富的权威已太过有力。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过，接受所谓政治经济科学的这些通行理念，是有史以来对人类智力的最大侮辱。我有很多理由作如是说，但其中主要一条可聊表如下。我不知道史上是否还有其他国家建立的体系违背了其所奉行宗教的基本教义。因为那些我们（在口头上）认为神圣的文字，不仅将贪财斥责为万恶之源，斥责为

受到神灵唾弃的一种盲目崇拜，还宣称侍奉金钱与侍奉上帝水火不容；这些文字每当说到绝对的财富和绝对的贫穷时，总是诅咒富人，保佑穷人。鉴于此，我们毫不犹豫地对，作为国家繁荣之捷径的致富学，进行研究探讨。

(Thus the Christian will condemn the Ethiopian,

“审判这些基督徒的将是埃塞俄比亚人，

when the two colleagues shall separate,

把他们一分为二：

the one eternally rich, the other forever poor.)

一类永远富有，一类永远赤贫。”

[4_1].More accurately, Sun of Justness; but, instead of the harsh word "Justness," the old English "Righteousness" being commonly employed, has, by getting confused with "godliness," or attracting about it various vague and broken meanings, prevented most persons from receiving the force of the passages in which it occurs. The word "righteousness" properly refers to the justice of rule, or right, as distinguished from "equity," which refers to the justice of balance. More broadly, Righteousness is King's justice; and Equity, Judge's justice; the King guiding or ruling all, the Judge dividing or discerning between opposites (therefore the double question, "Man, who made me a ruler—dikastes — or a divider—meristes—over

you?") Thus, with respect to the Justice of Choice (selection, the feebler and passive justice), we have from lego,—lex, legal, loi, and loyal;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Justice of Rule (direction, the stronger and active justice), we have from rego,—rex, regal, roi, and royal.

[4_2].In another place written with the same meaning, "Just, and having salvation."

[4_3]."Length of days in her right hand; in her left, riches and honour."

[4_4].I hear that several of our lawyers have been greatly amused by the statement in the first of these papers that a lawyer's function was to do justice. I did not intend it for a jest; nevertheless it will be seen that in the above passage neither the determination nor doing of justice are contemplated as functions wholly peculiar to the lawyer. Possibly, the more our standing armies, whether of soldiers, pastors, or legislators (the generic term "pastor" including all teachers, and the generic term "lawyer" including makers as well as interpreters of law), can be superseded by the force of national heroism, wisdom, and honesty, the better it may be for the nation.

[4_5].It being the privilege of the fishes, as it is of rats and wolves, to live by the laws of demand and supply; but the distinction of humanity, to live by those of right.

[4_6].It might appear at first that the market price of labour expressed such an exchange; but this is a fallacy, for the market price is the momentary price of the kind of labour required, but the just price is its equivalent of the productive labour of mankind. This difference will be analysed in its place. It must be noted also that I speak here only of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labour, not of that of commodities.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a commodity is that of the labour required to produce it, multiplied into the force of the demand for it. If the value of the labour = x and the force of demand = y,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e commodity is x y, in which if either x = 0, or y = 0, x y = 0.

[5_1].更准确地说，应是“公平的太阳”；然而由于“公平”听起来刺耳，古英语中经常用“公正”代替，以至于该词与“神圣”混为一谈，或产生各种模糊不清的意思，使大多数人不能从该词所出现的文字中感受到应有的力量。其实，“公正”一词指的是统治的正义性，或权利的正义性，它不同于公平，后者指平衡的正义性。从更广义的角度讲，公正是国王的正义性，而公平是法官的正义性；国王管理或统治一切人，而法官则区分或辨别好坏善恶。（所以才有了那句双重疑问：“朋友，是谁让我做你们的法官或财产仲裁人呢？”）因此，与选择（挑选，弱势的、被动的正义性）的正义性相联系，我们从lego演变出lex、legal、loi以及loyal等词；而与统治（指挥，有力的、主动的正义

性）的正义性相联系，我们从rego演变出rex、regal、roi以及royal等词。

[5_2].另一处以同样的意思写道：“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

[5_3].“智慧使你长寿，也使你富贵荣华。”

[5_4].听说有几位律师，将我在第一篇章中阐述的关于律师的作用就是维护公平正义的主张，视为笑谈，但我却无意为他们提供笑料。不管怎样，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决心做事公正还是已经在公正做事，都不仅仅只是律师的作用。也许，我们的常备军——军人也好，牧师也罢，议员也罢（广义的牧师包括所有教师，而广义的律师则包括立法者以及执法者），他们越是为国家而战、越是富有智慧、越是诚实正直，就对国家越有利。

[5_5].与鼠和狼一样，依需求供给定律生存，是鱼的特权，但依正义而活则是人的荣耀。

[5_6].起初，似乎劳动的市场价格表现出了这种交换关系，但这却是个谬论，因为这个市场价格只是所需劳动的临时价格，而公正的价格才是与人类的生产劳动等值的。这一区别会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分析。还需注意的是，我这里谈及的只是劳动的可交换价值，而不是商品的可交换价值。商品的可交换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劳动乘以对该商品的需求力得出，即如果劳动价值等于x，商品的需求力等于y，则商品总交换价值量就是xy；就如同如果x或y等于0，则xy等于0。

Essay IV Ad Valorem

第四章　价值论说

We saw that just payment of labour consisted in a sum of money which would approximately obtain equivalent labour at a future time; we have now to examine the means of obtaining such equivalence. Which question involves the definition of Value, Wealth, Price, and Produce.

前面说过，所谓公正的偿付即指一笔钱，用这笔钱可以在未来某个时候得到大致相等的劳动。现在我们来分析获得这种相等劳动的途径。这一问题涉及价值、财富、价格和产品的定义。

None of these terms are yet defined so as to be understood by the public. But the last, Produce, which one might have thought the clearest of all, is, in use, the most ambiguous; and the examination of the kind of ambiguity attendant on its present employment will best open the way to our work.

这些术语的现有定义都还未能做到通俗易懂，特别是可能有人认为最清楚不过的“产品”一词，其在使用中却最为模糊。我们的讨论就从目前该词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歧义开始。

In his chapter on Capital, [5_1] Mr. J. S. Mill instances, as a capitalist, a hardware manufacturer, who, having intended to spend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proceeds of his business in buying plate and jewels, changes his mind, and, “pays it as wages to additional workpeople.” The effect is stated by Mr. Mill to be, that “more food is appropriated to the consumption of productive labourers.”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先生在其书中论述“资本”的一章 [6_1] 里，曾以一个五金生产商为例。这位资本家原打算从经营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购买银质餐具和珠宝，后来改变了主意，把这笔钱用于“给增加的工人支付工资”。如密尔先生所述，这样做的结果是“更多的食物转而消费到生产性劳动者上”。

Now I do not ask, though, had I written this paragraph, it would surely have been asked of me, what is to become of the silversmiths? If they are truly unproductive persons, we will acquiesce in their extinction. And though in another part of the same passage, the hardware merchant is supposed also to dispense with a number of servants, whose “food is thus set free for productive purposes,” I do not inquire what will be the effect, painful or otherwise, upon the servants, of this emancipation of their food. But I very seriously inquire why ironware is produce, and silverware is not? That the merchant consumes the one, and sells the other, certainly does not constitute the difference, unless it can be shown (which, indeed, I perceive it to be becoming daily more and more the aim of tradesmen to show) that commodities are made to be sold, and not to be consumed. The merchant is an agent of conveyance to the consumer in one case, and is himself the consumer in the other; [5_2] but the labourers are in either case equally productive, since they have produced goods to the same value, if the hardware and the plate are both goods.

现在我倒不是想问他（不过若由我来写这一段，肯定会有人来问我）：“那些银器工匠结局如何呢？”如果他们从事的真是非生产性劳动，让其消失我们也会认可。而且在同一章节的另一处，他又假设这个五金商人不再雇用那么多仆人，而“将多出的食物用于生产性劳动”，这里我也不去追问那些失去食物的仆人境况如何，是痛苦还是怎样。但是我十分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五金是产品而银器不是产品？不错，那位五金商人消费的是银器，卖出的是五金，但这并不构成二者的差别，除非你能向世人表明（其实我发现商人们正试图加紧表明）商品是用于销售而非消费的。商人在一种情况下为消费者提供商品，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其本人也是消费者；[6_2] 而不论哪种情况，劳动者从事的都是生产性劳动，因为他们生产的五金和银质餐具只要都是商品，就价值相同。

And what distinction separates them? It is indeed possible that in the “comparative estimate of the moralist,” with which Mr. Mill says political economy has nothing to do (III. i. 2), a steel fork might appear a more substantial production than a silver one; we may grant also that knives, no less than forks, are good produce; and scythes and ploughshares serviceable articles. But, how of bayonets? Supposing the hardware merchant to effect large sales of these, by help of the “setting free” of the food of his servants and his silversmith,—is he still employing productive labourers, or, in Mr. Mill's words, labourers who increase “the stock of permanent means of enjoyment” (I. iii. 4)? Or if, instead of bayonets, he supply bombs, will not the absolute and final “enjoyment” of even these energetically productive articles (each of which costs ten pounds [5_3]) be dependent on a proper choice of time and place for their enfantement; choice, that is to say, depending on those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 with which political economy has nothing to do? [5_4]

然而是什么差别使二者不同呢？根据密尔先生认为与政治经济学毫无关系的（III.i.2）“由道德家所作的比较评价”来看，钢叉似乎比银叉更有价值，我们也可以认为刀和叉子一样也是好产品，镰刀和犁头也都是有用的物品。然而，军用刺刀呢？假如那位五金商人把从仆人和银匠身上节省下来的食物用于生产大量的军用刺刀，他所雇用的还是生产性劳动者吗？或者用密尔先生的话说，这些劳动者增加“永久性享受手段”（I.iii.4）了吗？而如果生产的不是刺刀而是炸弹（每个炸弹只卖十英镑）[6_3]，难道对这些杀伤力巨大的生产性产品的绝对、终极的“享受”竟与恰当的时间地点无关？也就是说跟与政治经济学毫无联系的道德价值无关？[6_4]

I should have regretted the need of pointing out inconsistency in any portion of Mr. Mill's work, had not the value of his work proceeded from its inconsistencies. He deserves honour among economists by inadvertently disclaiming the principles which he states, and tacitly introducing the moral considerations with which he declares his science has no connection. Many of his chapters are, therefore, true and valuable; and the only conclusions of his which I have to dispute are those which follow from his premises.

如果密尔先生的研究价值不是源于这些前后抵牾之处，我真是很不愿意指出其著作中随处可见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在经济学家中，只有他能阐明了原则又无意中违背，默默引入了道德因素又声称其研究与之无关，所以值得尊敬。所以他的论述中许多章节都真实可信，颇有价值，我持异议的只是他依据假设得出的结论。

Thus, the idea which lies at the root of the passage we have just been examining, namely, that labour applied to produce luxuries will not support so many persons as labour applied to

produce useful articles, is entirely true; but the instance given fails—and in four directions of failure at once—because Mr. Mill has not defined the real meaning of usefulness. The definition which he has given—“capacity to satisfy a desire, or serve a purpose” (III. i. 2)—applies equally to the iron and silver; while the true definition which he has not given, but which nevertheless underlies the false verbal definition in his mind, and comes out once or twice by accident (as in the words “any support to life or strength” in I. iii. 5)—applies to some articles of iron, but not to others, and to some articles of silver, but not to others. It applies to ploughs, but not to bayonets; and to forks, but not to filigree. [5_5]

生产奢侈品的劳动不如生产有用物品的劳动能养活那么多人——即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论述的基础，这一观点完全正确。但作者给出的例子却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密尔先生没有解释“有用”一词的真正意思。他所给出的该词的定义，即“能满足某种欲望或实现某种目的的能力”（III.i.2），对于铁器和银器同样适用；而真正的定义他虽然没有给出，却隐藏在这个错误的词语定义之中，并时而流露出来（例如I.iii.5中的“维持生命或体力的任何方式”）。这个真正的定义适用于某些铁器和银器，但不适用于另一些铁器和银器；它适用于耕犁，但不适用于刺刀；适用于银叉，但不适用于银饰品。 [6_5]

The eliciting of the true definitions will give us the reply to our first question, “What is value?” respecting which, however, we must first hear the popular statements.

对正确定义的探讨给第一个问题，即“何谓价值”，提供了答案，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通行的说法。

“The word 'value,' when used without adjunct, always means, in political economy, value in exchange” (Mill, III. i. 2). So that, if two ships cannot exchange their rudders, their rudders are, in politico-economic language, of no value to either.

“‘价值’一词在没有附加修饰语的情况下使用时，在政治经济学上，总是指交换价值。”（密尔，III.i.2）这样看来，两只船的船舵如果不相互交换，用政治经济学话语来说，这两只船舵就没有任何交换价值。

But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is wealth.“—(Preliminary remarks, page 1)

然而，“政治经济学的课题是财富”。（前言，第1页）

And wealth “consists of all useful and agreeable objects which possess exchangeable value.” —(Preliminary remarks, page 10)

而财富就是“具有交换价值的一切有用的和令人愉快的事物”。（前言，第10页）

It appears, then, according to Mr. Mill, that usefulness and agreeableness underlie the exchange value, and must be ascertained to exist in the thing, before we can esteem it an object of wealth.

可见，在密尔先生看来，有用性和愉悦性构成了交换价值的基础，而要看一个事物是否算作财富，就必须确定其是否具有有用性和愉悦性。

Now, the economical usefulness of a thing depends not merely on its own nature, but on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can and will use it. A horse is useless, and therefore unsaleable, if no one can ride,—a sword, if no one can strike, and meat, if no one can eat. Thus every material utility depends on its relative human capacity.

我们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有用性不单单取决于该物品的内在性质，还取决于能够和愿意使用该物品的人的数量。因此，一匹马如果没人骑，就没有用，也就不能买卖；同理，一把剑如果没人舞，一块肉如果没人吃，就没有用，就不能买卖。所以，每件物品的有用性都取决于与其与人的相关性大小。

Similarly: The agreeableness of a thing depends not merely on its own likeableness, but on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can be got to like it. The relative agreeableness, and therefore saleableness, of “a pot of the smallest ale,” and of “Adonis painted by a running brook,” depends virtually on the opinion of Demos, in the shape of Christopher Sly. That is to say, the agreeableness of a thing depends on its relatively human disposition.[1] Therefore,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 science of wealth, must be a science respecting human capacities and dispositions. But moral consideration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al economy (III. i. 2). Therefore, moral consideration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human capacities and dispositions.

同理，一件物品的愉悦性不单单取决于该物品受人喜欢的程度，还取决于喜欢该物品的人的数量。因此，“一杯最淡的麦芽酒”、“一幅河边的阿多尼斯神像”，其相对的愉悦性和可买卖性几乎完全取决于像克里斯托弗·斯莱这样的平民百姓的观点。即是说，一件物品的愉悦性取决于与其相关的人的性情。[1] 所以，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财富的科学，必须考虑人的能力和性情。可是人的道德思考与政治经济学毫无关系（III.i.2）。进而可以说，道德思考与人的能力和性情毫无关系。

1: These statements sound crude in their brevity; but will be found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when they are developed. Thus, in the above instance, economists have never perceived that disposition to buy is a wholly moral element in demand: that is to say, when you give a man half-a-crown, it depends on his disposition whether he is rich or poor with it—whether he will buy disease, ruin, and hatred, or buy health, advancement, and domestic love. And thus the agreeableness or exchange value of every offered commodity depends on production, not merely of the commodity, but of buyers of it; therefore on the education of buyers, and on all the moral elements by which their disposition to buy this, or that, is formed. I will illustrate and expand into final consequences every one of these definitions in its place; at present they can only be given with extreme brevity; for in order to put the subject at once in a connected form before the reader, I have thrown into one, the opening

definitions of four chapters; namely, of that on Value ("Ad Valorem"); on Price ("Thirty Pieces"); on Production ("Demeter"); and on Economy ("The Law of the House").

1: 这些论述看上去浅显易懂，但如果深入下去，就会发现其极为重要。因此，在以上例子中，经济学家们从未意识到，购买意愿在需求关系中完全是一种道德因素，即是说，如果给他半个克朗，那么有了这半个克朗，他是穷是富就看他自己的意向了：他可以购买疾病、毁灭、仇恨，也可以购买健康、进步和天伦之乐。因此，对于任何一件商品，其给人带来的愉悦程度或交换价值，不仅取决于商品的生产过程，还取决于买主的购买过程，进而取决于买主的教育程度，取决于构成其选择购买某一商品的意向的所有道德因素。对于这些定义，我会在适当的地方一一举例阐述，并挖掘其应有的重要价值。眼下我暂且用三言两语一带而过。为让读者感到所讨论的主题连贯一致，我把四个部分的开篇术语定义都放到一起，这四个部分是：论价值，论价格，论生产，论经济。

I do not wholly like the look of this conclusion from Mr. Mill's statements;—let us try Mr. Ricardo's.

从密尔先生的论述得出的这样的结论，我不敢完全苟同；不妨让我们再看一下李嘉图先生的论述：

“Utility is not the measure of exchangeable value, though 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it.“—(Chap. I. sect. i) essential in what degree, Mr. Ricardo? There may be greater and less degrees of utility. Meat, for instance, may be so good as to be fit for anyone to eat, or so bad as to be fit for no one to eat. What is the exact degree of goodness which is “essential” to its exchangeable value, but not “the measure” of it? How good must the meat be, in order to possess any exchangeable value; and how bad must it be—(I wish this were a settled question in London markets)—in order to possess none?

“效用对于交换价值来说虽是绝对不可或缺，但却不能成为度量交换价值的依据。”（第一章第一节）不可或缺到什么程度呢，李嘉图先生？效用可以有程度大小之分。例如，一块肉可能非常美味，适合任何人享用；但也可能变质发臭，不再适于食用。这块肉好坏到何种准确的程度才算是对于交换价值来说“不可或缺”，而又不成为交换价值的“度量依据”？这块肉要如何美味才会拥有交换价值？又要臭到何种程度——但愿在伦敦市场上这个问题已有答案——才不具任何交换价值？

There appears to be some hitch, I think, in the working even of Mr. Ricardo's principles; but let him take his own example. “Suppose that in the early stages of society the bows and arrows of the hunter were of equal value with the implements of the fisherman.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value of the deer, the produce of the hunter's day's labour, would be exactly equal to the value of the fish, the product of the fisherman's day's labour. The comparative value of the fish and game would be entirely regulated by the quantity of labour realized in each.” (Ricardo, chap.iii. On Value.)

我想，即便是李嘉图先生提出的原理，在运用时似乎也会有某种故障，但仍不妨看看他给的例证：“假定在社会的早期阶段，猎人的弓箭和渔夫的渔具价值相等。在这种情形下，猎人劳动一天的产品——鹿的价值——就会完全等于渔夫劳动一天的产品——鱼的价值。鱼和猎物的相对价值都完全由体现在两者之中的劳动量决定。”（李嘉图，第三章，《论价值》。）

Indeed! Therefore, if the fisherman catches one sprat, and the huntsman one deer, one sprat will be equal in value to one deer but if the fisherman catches no sprat, and the huntsman two deer, no sprat will be equal in value to two deer?

言之有理！这样，如果渔夫捕获一尾鲱鱼，猎人捕获一只鹿，则一尾鲱鱼的价值等于一只鹿；但如果渔夫一无所获，而猎人却捕获了两只鹿，那么是否意味着两只鹿的价值就等于零？

Nay; but—Mr. Ricardo' s supporters may say—he means, on an average; —if the average product of a day's work of fisher and hunter be one fish and one deer, the one fish will always be equal in value to the one deer.

不是这样——李嘉图先生的支持者可能会说——李嘉图的意思是从平均数量来看，如果渔夫和猎人每天劳动的平均产量是一尾鱼和一只鹿，那么一尾鱼的价值就必定与一只鹿的价值相等。

Might I inquire the species of fish? Whale? or white-bait?[2]

那我可以问一下是哪一种鱼吗？是鲸鱼？还是小鲱鱼？[2]

2: These statements sound crude in their brevity; but will be found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when they are developed. Thus, in the above instance, economists have never perceived that disposition to buy is a wholly moral element in demand: that is to say, when you give a man half-a-crown, it depends on his disposition whether he is rich or poor with it —whether he will buy disease, ruin, and hatred, or buy health, advancement, and domestic love. And thus the agreeableness or exchange value of every offered commodity depends on production, not merely of the commodity, but of buyers of it; therefore on the education of buyers, and on all the moral elements by which their disposition to buy this, or that, is formed. I will illustrate and expand into final consequences every one of these definitions in its place; at present they can only be given with extreme brevity; for in order to put the subject at once in a connected form before the reader, I have thrown into one, the opening definitions of four chapters; namely, of that on Value ("Ad Valorem"); on Price ("Thirty Pieces"); on Production ("Demeter"); and on Economy ("The Law of the House"). Perhaps it may be said, in farther support of Mr. Ricardo, that he meant, "when the utility is constant or given, the price

varies as the quantity of labour." If he meant this, he should have said it; but, had he meant it, he could have hardly missed the necessary result, that utility would be one measure of price (which he expressly denies it to be); and that, to prove saleableness, he had to prove a given quantity of utility, as well as a given quantity of labour: to wit, in his own instance, that the deer and fish would each feed the same number of men, for the same number of days, with equal pleasure to their palates. The fact is, he did not know what he meant himself. The general idea which he had derived from commercial experience, without being able to analyse it, was, that when the demand is constant, the price varies as the quantity of labour required for production; or,—using the formula I gave in last paper—when y is constant, x y varies as x. But demand never is, nor can be, ultimately constant, if x varies distinctly; for, as price rises, consumers fall away; and as soon as there is a monopoly (and all scarcity is a form of monopoly; so that every commodity is affected occasionally by some colour of monopoly), y becomes the most influential condition of the price. Thus the price of a painting depends less on its merits than on the interest taken in it by the public; the price of singing less on the labour of the singer than the number of persons who desire to hear him; and the price of gold less on the scarcity which affects it in common with cerium or iridium, than on the sunlight colour and

unalterable purity by which it attracts the admiration and answers the trust of mankind. It must be kept in mind, however, that I use the word "demand" in a somewhat different sense from economists usually. They mean by it "the quantity of a thing sold." I mean by it "the force of the buyer's capable intention to buy." In good English, a person's "demand" signifies, not what he gets, but what he asks for. Economists also do not notice that objects are not valued by absolute bulk or weight, but by such bulk and weight as is necessary to bring them into use. They say, for instance, that water bears no price in the market. It is true that a cupful does not, but a lake does; just as a handful of dust does not, but an acre does. And where it possible to make even the possession of the cupful or handful permanent (i.e. to find a place for them), the earth and sea would be bought up for handfuls and cupfuls.

2: 为了进一步支持李嘉图先生，也许有人会说，李嘉图的意思是“如果效用给定不变，则价格依劳动数量而变”。如果李嘉图先生确是此意，他早就应当表述出来；而另一方面，若真是这个意思，他当初就几乎不会忽略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即效用是衡量价格的尺度（但这一点他是明确否定的）。而且，为证明其具有可销售性，除了证明有一定数量的劳动，还必须证明有一定量的效用。也就是说，就他所举的例子而言，那头鹿和那条鱼应能供同样数量的人食用，可

食用的天数相同，吃在嘴里的味觉也相同。可事实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从商业经验得出的一个笼统的、经不起分析的观点是：如果需求不变，则价格随着生产所需的劳动数量发生变化；或者套用我在前篇文章中提出的公式，如果y不变，则xy的值随x发生变化。但问题是，如果x变化明显，则需求绝不会，也不可能始终不变，因为价格上扬，消费者就会减少；而一旦出现垄断（所有的短缺都是垄断的一种形式，所以任何一种商品都偶尔会受到某种垄断的影响），y就会成为对价格影响最大的条件。因此，一幅油画的价格与其说取决于其内在的品质，不如说更取决于公众对它的兴趣；歌曲表演的价格与其说取决于歌手的劳动，不如说更取决于想洗耳恭听的人的数量；黄金的价格与其说取决于其像铈、铱那样的稀缺性，不如说更取决于其令人赞叹的耀眼光泽，其毋庸置疑的恒久不变的纯度。然而，必须提醒大家记住，我这里用的“需求”一词与经济学家们的通常意思有所不同。他们的“需求”是指“一种商品所卖出的数量”，而我的“需求”则指“买者购买该商品的意愿大小”；或简而言之，一个人的“需求”非指其所得，而指其欲得。经济学家们也没有注意到，物品的价值大小并不单纯看其体积或重量，而要看与其使用价值相关的体积或重量。例如，他们说水在市场上没有价格。的确，一杯水没有价格，但一池湖水就有价格；一抔土没有价格，但一英亩土地就有价格。假如可以使一杯水或一抔土成为永久财产（即把它们放到正确的地方），所有的陆地和海水就会一抔、一杯地被人买光。

It would be waste of time to purpose these fallacies farther; we will seek for a true definition.

对这些荒诞的论述再予深究只会浪费时间，我们还是来探寻真正的定义吧。

Much store has been set for centuries upon the use of our English classical education. It were to be wished that our well-educated merchants recalled to mind always this much of their Latin schooling,—that the nominative of *valorem* (a word already sufficiently familiar to them) is *valor* ; a word which, therefore, ought to be familiar to them. Valor, from *valere* , to be well or strong;—strong, life (if a man), or valiant; strong, for life (if a thing), or valuable. To be “valuable,” therefore, is to “avail towards life.” A truly valuable or availing thing is that which leads to life with its whole strength. In proportion as it does not lead to life, or as its strength is broken, it is less valuable; in proportion as it leads away from life, it is unvaluable or malignant.

几百年来，我们一直非常重视古典文化教育。但愿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们还能记得拉丁语课程的主要内容，还能记得valorem一词（一个他们非常熟悉的单词）的主格形式是valor，这个词他们应该也很熟悉。valor从valere变化而来，意为健康或强壮：生命力强壮（用于修饰人）或勇敢；使生命强壮（修饰物）或有价值。因此，所谓“有价值”就是“对生命有益”。一个事物的真正价值或益处就在于它对生命的全部贡献。如果其对生命的有益之处较少，或力量不足，其价值就相应地小一些；如果其对生命无益，可能相应地就没有价值，甚至有害。

The value of a thing, therefore, is independent of opinion, and of quantity. Think what you will of it, gain how much you may of it, the value of the thing itself is neither greater nor less. For ever it avails, or avails not; no estimate can raise, no disdain repress, the power which it holds from the Maker of things and of men.

所以，一个事物的价值不依赖于观点，也不依赖于数量。一个事物，无论你观点如何，也无论其数量多少，其价值无升、无减。其价值只在于对生命是否有益。这是造物主赐予它的力量，不会因你的高估而有增，也不会因你的贬损而有减。

The real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which has yet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bastard science, as medicine from witchcraft, and astronomy from astrology, is that which teaches nations to desire and labour for the things that lead to life; and which teaches them to scorn and destroy the things that lead to destruction. And if, in a state of infancy, they supposed indifferent things, such as excrescences of shell-fish, and pieces of blue and red stone, to be valuable, and spent large measures of the labour which ought to be employed for the extension and ennobling of life, in diving or digging for them, and cutting them into various shapes,—or if, in the same state of infancy, they imagine precious and beneficent things, such as air, light, and cleanliness, to be valueless,—or if, finally, they imagine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own existence, by which alone they can truly possess or use anything, such, for instance, as peace, trust, and love, to be prudently exchangeable, when the markets offer, for gold, iron, or excrescences of shells—the great and only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teaches them, in all these cases, what is vanity, and what substance; and how the service of Death, the lord of Waste, and of eternal emptiness, differs

from the service of Wisdom, the lady of Saving, and of eternal fulness; she who has said, “I will cause those that love me to inherit SUBSTANCE; and I will FILL their treasures.”

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应与伪科学区别开来，就如医学不同于巫术，天文学不同于占星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教导国民如何寻求对生命有益的事物，并为之付出劳动；教导国民唾弃并消灭那些会带来毁灭的东西。如果人们愚昧，竟以为常见之物，如随处可见的贝壳、红色和蓝色的石子，是有价值的东西，把本应用于延续生命、使生命更有尊严的大量劳动花费在捕捞贝壳、挖掘石头、打磨造型上；同样，如果人们愚昧，竟然把诸如让我们无偿受益的空气、阳光、洁净的环境等珍贵之物视为毫无价值的东西；再或者，人们最终竟以为可以拿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光靠这些东西就可以真正拥有或使用任何东西），如和平、信任、爱，在市场上与金银、铁器或成堆的贝壳锱铢必较地交换。面对这些情况，唯一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应教导人们何为虚幻，何为真实；何为侍奉死神、侍奉奢费之主，以致最后两手空空，又何为侍奉智慧之主、侍奉节省之女神，永葆丰盈无缺。这位节省女神说过：“我将赋予爱我的以财物，并填满他们的府库。”

The “Lady of Saving,” in a profounder sense than that of the savings bank, though that is a good one: Madonna della Salute,—Lady of Health,—which, though commonly spoken of as if separate from wealth, is indeed a part of wealth. This word, “wealth,” it will be remembered, is the next we have to define.

侍奉“节省女神”比在银行储蓄更有意义——尽管后者也很不错，因为安康圣母，也即健康女神，虽然通常说起来好像与财富不同，却实实在在是财富的一部分。你们可能还记得，下一个要解释的就是“财富”这个词。

“To be wealthy,” says Mr. Mill, is “to have a large stock of useful articles.” I accept this definition. Only let us perfectly understand it. My opponents often lament my not giving them enough logic; I fear I must at present use a little more than they will like; but this business of Political Economy is no light one, and we must allow no loose terms in it.

“所谓拥有财富，”密尔先生说，“就是拥有大量有用的东西。”我接受这个解释，只是我们的理解不要有任何偏差。反对我的人常常抱怨我的论述逻辑性不强，恐怕在此我必须多说几句了。政治经济学绝非一个容易的话题，所以每个词都应定义准确。

We have, therefore, to ascertain in the above definition, first, what is the meaning of “having,” or the nature of Possession. Then, what is the meaning of “useful,” or the nature of Utility.

因此，在上面的定义中，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拥有”为何意，即“占有”的本质是什么。然后还要明确“有用”为何意，即“效用”的本质是什么。

And first of possession. At the crossing of the transepts of Milan Cathedral has lain, for three hundred years, the embalmed body of St. Carlo Borromeo. It holds a golden crosier, and has a cross of emeralds on its breast. Admitting the crosier and emeralds to be useful articles, is the body to be considered as “having” them? Do they, in the politico-economical sense of property, belong to it? If not, and if we may, therefore, conclude generally that a dead body

cannot possess property, what degree and period of animation in the body will render possession possible?

首先讨论“占有”。三百年来，在米兰大教堂的十字翼顶部，一直安放着圣徒卡洛·博罗梅奥涂有防腐香料的木乃伊。木乃伊手持金制权杖，胸佩绿宝石十字架。如果说这个权杖和十字架都是有用之物，是否可以认为这具木乃伊“拥有”这个权杖和十字架呢？用政治经济学的财产观来看，这个权杖和十字架是否归木乃伊所有呢？如果不是，并以此大致得出死人不能占有财产的结论，那人活着的时候在何种程度、何种阶段才能拥有财产呢？

As thus: lately in a wreck of a Californian ship, one of the passengers fastened a belt about him with two hundred pounds of gold in it, with which he was found afterwards at the bottom. Now, as he was sinking—had he the gold? Or had the gold him? [5_6]

再看这样一个例子：在前不久的加利福尼亚沉船事故中，一位乘客把一个装有二百磅黄金的袋子绑在身上，结果沉入海底。那么，在他沉入海底的过程中，是他拥有金子，还是金子拥有他呢？ [6_6]

And if, instead of sinking him in the sea by its weight, the gold had struck him on the forehead, and thereby caused incurable disease—suppose palsy or insanity,—would the gold in that case have been more a “possession” than in the first? Without pressing the inquiry up through instances of gradually increasing vital power over the gold (which I will, however, give, if they are asked for), I presume the reader will see that possession, or “having,” is not an absolute, but a gradated, power; and consists not only in the

quantity or nature of the thing possessed, but also (and in a greater degree) in its suitableness to the person possessing it and in his vital power to use it.

假设不是由于金子的重量将他拖入海底，而是金子砸中他的额头，造成不可治愈的伤病，比如瘫痪或精神失常，那是否可以说，和前面的例子相比，这个人更有可能“拥有”这些金子呢？没有必要通过不断增加人支配金子的生命力而将问题追问下去（不过若有人需要的话我会再继续举例），我觉得读者诸君已经明白，所谓占有，或者说“拥有”的力量，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有程度区分的；不仅要看被拥有之物的数量、性质，还要（在更大程度上）看那个人拥有那些财富的合适程度，以及他使用这些财富时的生命力。

And our definition of Wealth, expanded, becomes: “The possession of useful articles, which we can use.” This is a very serious change. For wealth, instead of depending merely on a “have,” is thus seen to depend on a “can.” Gladiator's death, on a “habet”; but soldier's victory, and State's salvation, on a “quo plurimum posset.” (Liv. VII. 6) And what we reasoned of only as accumulation of material, is seen to demand also accumulation of capacity.

所以，我们给财富的定义可以扩展为：“对有用、且我们能用的事物的拥有。”这是非常重要的更正。因为这里的“财富”，不再仅仅取决于是否“拥有”，而是取决于是否“能用”。角斗士之死是因其个人力量不够，“活该”，而军人的胜利、国家的得救，则取决于“最宝贵的人力”。（李维，第七章第6节）所以，我们仅当作物质积累加以讨论的东西，也需要人的能力的积累。

So much for our verb. Next for our adjectiv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useful”?

动词就讨论到此，下面来看其形容词。何谓“有用的”？

The inquiry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last. For what is capable of use in the hands of some persons, is capable, in the hands of others, of the opposite of use, called commonly “from-use,” or “ab-use.” And it depends on the person, much more than on the article, whether its usefulness or ab-usefulness will be the quality developed in it. Thus, wine, which the Greeks, in their Bacchus, made rightly the type of all passion, and which, when used, “cheereth god and man” (that is to say, strengthens both the divine life, or reasoning power, and the earthy, or carnal power, of man); yet, when abused, becomes “Dionysos,” hurtful especially to the divine part of man, or reason. And again, the body itself, being equally liable to use and to abuse, and, when rightly disciplined, serviceable to the State, both for war and labour,—but when not disciplined, or abused, valueless to the State, and capable only of continuing the private or single existence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at but feebly)—the Greeks called such a body an “idiotic” or “private” body, from their word signifying a person employed in no way directly useful to the State; whence finally, our “idiot,” meaning a person entirely occupied with his own concerns.

这一追问与前面的论述密切相关。某物可对一些人有用，但在另一些人手中，可能就是相反的情况，即通常所说的“利用”和“滥用”。“利用”还是“滥用”，主要取决于人，而不是某物自身。因此，酒神巴克斯的神话中，希腊人本用葡萄酒象征喜怒哀乐，用琼浆玉

液“使神和人喜乐”（即是说，既加强神的生命力，或思考能力，也加强人的世俗、肉体的力量）。然而，对酒“滥用”，就会成为酗酒无度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尤对人的神圣的精神思维有害无益。同样，对人的身体也有“利用”和“滥用”之分：若组织得当、约束得法，不论参加战争还是从事劳作，都会有益于国家；而若没有约束、随心所欲，身体对于国家就毫无价值，只能起到传宗接代的作用罢了（甚至连这都很勉强）。希腊人用idiotic（意为“个体的”）或者private来指这类人，意指对国家没有任何直接的用处，所以今天我们说的idiot就指只考虑自己的人。

Hence, it follows that if a thing is to be useful, it must be not only of an availing nature, but in availing hands. Or, in accurate terms, usefulness is value in the hands of the valiant; so that this science of wealth being, as we have just seen, when regarded as the science of Accumulation, accumulative of capacity as well as of material,—when regarded as the Science of Distribution, is distribution not absolute, but discriminate; not of everything to every man, but of the right thing to the right man. A difficult science, dependent on more than arithmetic.

因此，一件东西如果有用，就不仅必须自身有可用性，还必须用到益处。更准确地说，“有用性”是存在于勇士手中的价值。这样一来，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如果视财富的科学为财富积累的科学，它就不仅指物质的积累，还有能力的积累；如果视财富的科学为财富分配的科学，它就不是指分配的绝对同一性，而是指其相对区分性——不是指每人一物，而是指物尽其用，且用得其所。这样的科学绝非数学运算那样简单易行。

Wealth, therefore, is “THE POSSESSION OF THE VALUABLE BY

THE VALIANT"; and in considering it as a power existing in a nation, the two elements, the value of the thing, and the valour of its possessor, must be estimated together. Whence it appears that many of the persons commonly considered wealthy, are in reality no more wealthy than the locks of their own strong boxes are, they being inherently and eternally incapable of wealth; and operating for the nation, in an economical point of view, either as pools of dead water, and eddies in a stream (which, so long as the stream flows, are useless, or serve only to drown people, but may become of importance in a state of stagnation should the stream dry); or else, as dams in a river, of which the ultimate service depends not on the dam, but the miller; or else, as mere accidental stays and impediments, acting not as wealth, but (for we ought to have a correspondent term) as "illth," causing various devastation and trouble around them in all directions; or lastly, act not at all, but are merely animated conditions of delay, (no use being possible of anything they have until they are dead,) in which last condition they are nevertheless often useful as delays, and "impedimenta," if a nation is apt to move too fast.

因此，财富就是"勇士拥有的有价值的事物"；而且若从作为国家实力的角度来看财富，就必须将这两点结合起来考虑：一是事物自身的价值，二是拥有者的力量。基于此，可以看出，许多我们通常认为富有的人，其实并不比他们自己保险箱上的那把锁富有多少，因为他们本质上永远不能发挥财富的用处。对于国家来说，从经济角度看，他们的财富只是一潭死水，只是河流中的漩涡（只要河水在流动，这些漩涡就没有价值，反而只会把人卷入其中溺死。恐怕只有在国家经济停滞时，财富才能发挥一点价值）；他们的财富也可能是河中的堤坝，但河水的益处最终并不取决于堤坝，而是取决于磨坊主；有时他们的财富还可能是阻碍、障碍，从而不是"财富"，而成了"拆富"（这里需要这么一个与之相对的词），给国家各个领域带来损失、造成麻

烦；乃至最后这些人苟延残喘（一无所用直至气绝）时，他们也有作用，那就是拖累并“阻碍”国家的快速发展。

This being so, the difficulty of the tru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lies not merely in the need of developing manly character to deal with material value, but in the fact, that while the manly character and material value only form wealth by their conjunction, they have nevertheless a mutually destructive operation on each other. For the manly character is apt to ignore, or even cast away, the material value:—whence that of Pope:—

鉴于此，政治经济学作为真正的科学，关键问题不仅是需要培养能够利用物质价值的高尚品质，而且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财富由高尚的品质与物质的价值共同构成，但二者往往相互敌对，势不两立。一方面，高尚的品质常常忽视物质价值，甚至将物质价值抛掷一旁，正如蒲柏所言：

“Sure, of qualities demanding praise,

“是啊，应得赞誉的人性啊，

More go to ruin fortunes, than to raise.“

常常视财富如草芥，不以财富为荣。”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terial value is apt to undermine the manly character; so that it must be our work, in the issue, to examine what evidence there is of the effect of wealth on the minds of its possessors; also, what kind of person it is who usually sets himself to obtain wealth, and succeeds in doing so; and whether the world owes more gratitude to rich or to poor men, either for their moral influence upon it, or for chief goods, discoveries, and practical advancements. I may, however, anticipate future conclusions, so far as to state that in a community regulated only by laws of demand and supply, but protected from open violence, the persons who become rich are, generally speaking, industrious, resolute, proud, covetous, prompt, methodical, sensible, unimaginative, insensitive, and ignorant. The persons who remain poor are the entirely foolish, the entirely wise, [5_7] the idle, the reckless, the humble, the thoughtful, the dull, the imaginative, the sensitive, the well-informed, the improvident, the irregularly and impulsively wicked, the clumsy knave, the open thief, and the entirely merciful, just, and godly person.

另一方面，物质价值也会损害高尚品质。对此，我们必须检视财富对其拥有者的心智有何影响，同样也要研究何种品性的人一心谋财，并发财致富；还要研究我们这个世界更应感激的是穷人还是富人，是感激他们的道德影响，抑或感激那些主要的产品、各种发现和实践进步。不过，我倒可以先预测一下未来的结论，甚至可以这么说，在一个只靠供求规律运作的社会中，如果不出现大的动乱，一般来说，如下品性的人会成为富人：勤奋，果断，自信，贪婪，敏捷，有条理，有判断力，重实际，不急躁，孤陋寡闻。而如下品性的人只会贫穷如故：愚蠢透顶，智慧过人，[6_7] 游手好闲，有勇无谋，谦恭卑微，思想深刻，迟钝愚笨，思想浪漫，心思敏锐，见多识广，鼠目寸光，偶尔一时冲动而作恶，或是笨拙的仆人，明火执仗者，以及慈悲为怀、公平正义、虔诚敬神之人。

Thus far, then, of wealth. Next, we have to ascertain the nature of PRICE; that is to say, of exchange value, and its expression by currencies.

关于财富就说到这里。下面我们要明确价格的本质，即交换价值的本质，以及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

Note first, of exchange, there can be no profit in it. It is only in labour there can be profit—that is to say, a “making in advance,” or “making in favour of” (from proficio). In exchange, there is only advantage, i.e., a bringing of vantage or power to the exchanging persons. Thus, one man, by sowing and reaping, turns one measure of corn into two measures. That is Profit. Another, by digging and forging, turns one spade into two spades. That is Profit. But the man who has two measures of corn wants sometimes to dig; and the man who has two spades wants sometimes to eat:—they exchange the gained grain for the gained tool; and both are the better for the exchange; but though there is much advantage in the transaction, there is no profit. Nothing is constructed or produced. Only that which had been before constructed is given to the person by whom it can be used. If labour is necessary to effect the exchange, that labour is in reality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like all other labour, bears profit. Whatever number of men is concerned in the manufacture, or in the conveyance, have share in the profit; but neither the manufacture nor the conveyance are the exchange, and in the exchange itself there is no profit.

说到交换，首先请注意这一点：交换不产生利润。只有劳动才产

生利润，即“预支”或“为利而做”（根据“利润”一词的拉丁语意思）。交换只产生优势，即给参与交换的人带来好处或力量。这样来看，一个人春种秋收，一份谷物变成了两份，这是利润。另一人打铁锻造，一把铁锨变成了两把，这是利润。可是有两份谷物的人有时也要工具挖土，而有两把铁锨的人有时也要粮食果腹，于是通过交换各得所需。虽然交换对两人都有好处，却未产生任何利润，因为交换没有制造出、也没有产生出任何东西，只是此前产生的东西经过交换得以为人所用而已。如果说没有劳动就没有交换，那是因为劳动实际上存在于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并与其他劳动一样，创造了利润。无论有多少人参与生产和运输，他们的劳动都构成了利润的份额。但生产和运输都不是交换，所以交换本身不产生利润。

There may, however, be acquisition, which is a very different thing. If, in the exchange, one man is able to give what cost him little labour for what has cost the other much, he “acquires” a certain quantity of the produce of the other's labour. And precisely what he acquires, the other loses. In mercantile language, the person who thus acquires is commonly said to have “made a profit”; and I believe that many of our merchants are seriously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everybody, somehow, to make a profit in this manner. Whereas, by the unfortunate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we live in, the laws both of matter and motion have quite rigorously forbidden universal acquisition of this kind. Profit, or material gain, is attainable only by construction or by discovery; not by exchange. Whenever material gain follows exchange, for every plus there is a precisely equal minus.

然而，交换会有所得，但这是另一码事。如果有人通过交换，以自己轻松劳动的所得换取了对方辛苦劳作的产物，他就“得到”对方劳动产物的一部分。他得到多少，对方就失去多少。用商业语言来说，

如此获利者常被认为“获得了利润”，而且我相信许多商人真以为人人都能以此方式获得利润。可是，事与愿违，按照我们这个世界的法则，物质定律和运动定律绝不允许这种获利现象普遍存在。利润，即物质所得，只能通过制造和发现才能获得，而不能以交换的方式获取。对于任何交换之后的物质所得，你得到多少，对方就失去多少。

Unhappily for the progress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plus quantities, or,—if I may be allowed to coin an awkward plural—the pluses, make a very positive and venerable appearance in the world, so that everyone is eager to learn the science which produces results so magnificent; whereas the minuses have, on the other hand, a tendency to retire into back streets, and other places of shade,—or even to get themselves wholly and finally put out of sight in graves: which renders the algebra of this science peculiar, and difficultly legible; a large number of its negative signs being written by the account-keeper in a kind of red ink, which starvation thins, and makes strangely pale, or even quite invisible ink, for the present.

然而，不幸的是，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发展中，通过交换而来的物质所得数量，或“所得量”（请允许我杜撰这么一个别扭复数形式），却在这个世界上显得光明正大，堂而皇之，以至大家都趋之若鹜，纷纷效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与之相对应的“失去量”却隐没到后街之中及其他暗淡之处，甚至最后进入坟墓，彻底离开了人们的视野。这种情形使政治经济学的数学运算变得怪诞不经，难以捉摸；大量的负号都由簿记员以一种红色墨水标记，由于墨水不足，其颜色淡化了，而且慢慢变成奇怪的浅色，直至今天已模糊难见。

The Science of Exchange, or, as I hear it has been proposed to

call it, of “Catallactics,” considered as one of gain, is, therefore, simply nugatory; but considered as one of acquisition, it is a very curious science, differing in its data and basis from every other science known. Thus:—if I can exchange a needle with a savage for a diamond, my power of doing so depends either on the savage's ignorance of social arrangements in Europe, or on his want of pow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m, by selling the diamond to anyone else for more needles. If, farther, I make the bargain as completely advantageous to myself as possible, by giving to the savage a needle with no eye in it (reaching, thus a sufficiently satisfactory type of the perfect operation of catallactic science), the advantage to me in the entire transaction depends wholly upon the ignorance, powerlessness, or heedlessness of the person dealt with. Do away with these, and catallactic advantage becomes impossible. So far, therefore, as the science of exchange relates to the advantage of one of the exchanging persons only, it is founded on the ignorance or incapacity of the opposite person. Where these vanish, it also vanishes. It is therefore a science founded on nescience, and an art founded on artlessness. But all other sciences and arts, except this, have for their object the doing away with their opposite nescience and artlessness. This science, alone of sciences, must, by all available means, promulgate and prolong its opposite nescience; otherwise the science itself is impossible. It is, therefore, peculiarly and alone the science of darkness; probably a bastard science—not by any means a *Divina Scientia* , but one begotten of another father, that father who, advising his children to turn stones into bread, is himself employed in turning bread into stones, and who, if you ask a fish of him (fish not being producible on his estate), can but give you a serpent.

如果将这种交换科学，或如我耳闻曾有人建议称之为“交换经济

学”，看作关于如何获得“收入”的科学的话，则它毫无价值可言；而如果将其看作“获得”的科学，则又显得匪夷所思，因为它的数据和基础都与其他已知的科学迥异。因此，如果我能用一根针与土人交换一颗钻石，我之所以能成功，要么是因为土人对欧洲社会习俗的无知，要么是因为他的力量不够，无法通过正常的物物交换，从而把钻石卖给其他人换得更多的针。再进一步，如果我尽可能占尽所有便宜，给那个土人一根没有针眼的针这样就达到了在交换经济学看来利益最大化的圆满结果），我在交换中所占的便宜完全取决于对方的闭塞无知、软弱无能，甚至粗心大意。若非如此，交换优势就无法存在。由此可见，交换经济学只给交换的一方带来好处，其存在的基础只能是另一方的愚昧或无能。没有这种基础，就没有交换经济学。所以，交换经济学这门学问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不学无知”，交换经济学这门艺术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幼稚无术”。而除此之外的其他科学和艺术，都以消除对方的无知无术为己任。在众多科学中，唯独这一门不择手段地大肆鼓吹、长期维护对方的无知闭塞，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了。由此可见，交换经济学实属另类、愚昧的科学，或可称为伪科学：它绝不是神圣天父的真理，而是另一父之子，父亲让儿子把石头变为面包，自己却将面包变为石头；你要的是一条鱼（他的领地不产鱼类），他给你的却是一条毒蛇。

The general law, then, respecting just or economical exchange, is simply this:—There must be advantage on both sides (or if only advantage on one, at least no disadvantage on the other) to the persons exchanging; and just payment for his time, intelligence, and labour, to any intermediate person effecting the transaction (commonly called a merchant); and whatever advantage there is on either side, and whatever pay is given to the intermediate person, should be thoroughly known to all concerned. All attempts at concealment implies some practice of the opposite, or undivine science, founded on nescience. Whence another saying of the Jew merchant's—“As a nail between the stone joints, so doth sin stick

fast between buying and selling.” Which peculiar riveting of stone and timber, in men's dealings with each other, is again set forth in the house which was to be destroyed—timber and stones together—when Zechariah's roll (more probably “curved sword”) flew over it: “the curse that goeth forth over all the earth upon every one that stealeth and holdeth himself guiltless,” instantly followed by the vision of the Great Measure;—the measure “of the injustice of them in all the earth” (auti i adikia auton en pase te ge), with the weight of lead for its lid, and the woman, the spirit of wickedness, within it;—that is to say, Wickedness hidden by Dulness, and formalized, outwardly, into ponderously established cruelty. “It shall be set upon its own base in the land of Babel.“ [5_8]

所以，公正的经济交换的一般规律就应当是：必须使参与交换的双方都从中获益（若只能一方获益，也至少不让另一方受损）；对促成交换过程的中间人（通称为商人）所付出的时间、智力、体力给予公正的报偿；而且不论哪一方得到什么利益，不论给中间人什么报偿，都应向参与交换过程的所有人公开。任何企图隐瞒的做法都违背了这一规律，都是对神圣科学的亵渎，都是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伪科学。因此，那位犹太商人又说：“像木楔插在两块石头之间，罪恶亦钻进买卖之中。”人们交易中的关系如这种木与石的独特接榫方式，而接榫后的木楔与石头又构成了房屋，但当飞行的书卷来临时，房屋最终要彻底毁灭，连同木楔与石头一起毁灭。飞行的书卷（犹如“弧形利剑”）上写的是“行于遍地的诅咒：诅咒一切偷窃的人，一切虚伪的人”。随后立刻又有巨型量器展示出异象，量器“显示出地上的一切罪恶”，上有重重的铅盖，里面是那位代表罪恶的女人；也就是说，罪恶藏于笨重的容器中，容器的外表看上去庞大冷漠。“它将被牢牢安置在巴别的土地上。” [6_8]

I have hitherto carefully restricted myself, in speaking of

exchange, to the use of the term “advantage”; but that term includes two ideas; the advantage, namely, of getting what we need, and that of getting what we wish for. Three-fourths of the demands existing in the world are romantic; founded on visions, idealisms, hopes, and affections; and the regulation of the purse is, in its essence, regulation of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heart. Hence, the right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price is a very high metaphysical and psychical problem; sometimes to be solved only in a passionate manner, as by David in his counting the price of the water of the well by the gate of Bethlehem; but its first conditions are the following:—The price of anything is the quantity of labour given by the person desiring it, in order to obtain possession of it. This price depends on four variable quantities. **A** . The quantity of wish the purchaser has for the thing; opposed to **a** , the quantity of wish the seller has to keep it. **B** . The quantity of labour the purchaser can afford, to obtain the thing; opposed to **b** , the quantity of labour the seller can afford, to keep it. These quantities are operative only in excess: i.e. the quantity of wish (**A**) means the quantity of wish for this thing, above wish for other things; and the quantity of work (**B**) means the quantity which can be spared to get this thing from the quantity needed to get other things.

至此，我讨论“交换”时，一直很谨慎地只使用“有益”这个字眼。但这个词含有两个意思：一是有益于得到所需之物，二是有益于得到盼望之物。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需求有四分之三和精神有关：各种愿景，各种理想，各种希望，各种情爱。财富的支配基本上是对幻想和情感的支配。因此，正确讨论价格的本质其实是一个既极其抽象和心理意义上的问题，有时只能以热血激情解决，就如大卫王计算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价格那样。但无论怎样，首要的条件是：任何东西的价格都是由想得到此物的人为拥有该物所付出的劳动量。这样，价格与四种变量相关。购买者的占有欲大小（A）；它与出售者将该物留为

己有的愿望（a）相对；购买者为得到该物所能付出的劳动量（B），它与出售者为留下该物所能付出的劳动量（b）相对。这些变量只有在出现差额时才起作用，即是说A意味着对该物的占有欲超出对其他事物的占有欲，B意味着从为获得其他事物所付出的劳动中抽出来以获得该物的劳动。

Phenomena of price, therefore, are intensely complex, curious, and interesting—too complex, however, to be examined yet; every one of them, when traced far enough, showing itself at last as a part of the bargain of the Poor of the Flock (or “flock of slaughter”), “If ye think good, give ME my price, and if not, forbear”—Zech. xi. 12; but as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is to be calculated finally in labour,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the nature of that standard.

所以，关于价格的种种现象都是极为复杂、极为特殊、极为引人关注的，甚至这些现象复杂到难以研究的地步。对每个现象深究到一定程度，都会将这些现象归结到“那些困苦的群羊”（或“待宰杀的群羊”）的讨价还价之中，“你们若以为好，就给我工钱；不然，就算了！”——《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第12节；不过，既然一切事物的价格最终都以劳动计算，还是有必要确定这一标准的本质。

Labour is the contest of the life of man with an opposite;—the term “life” including his intellect, soul, and physical power, contending with question, difficulty, trial, or material force.

劳动是人的生命与某种对立物的对抗。“生命”包括智力、灵魂和体力，它们与问题、困难、考验或物质力量进行较量。

Labour is of a higher or lower order, as it includes more or fewer of the elements of life; and labour of good quality, in any kind, includes always as much intellect and feeling as will fully and harmoniously regulate the physical force.

根据所含生命因素的多少，劳动有高低层次之分。而任何高品质的劳动都包括充分、和谐地发挥体力所需要的智力和情感。

In speaking of the value and price of labour, it is necessary always to understand labour of a given rank and quality, as we should speak of gold or silver of a given standard. Bad [5_9] (that is, heartless, inexperienced, or senseless) labour cannot be valued; it is like gold of uncertain alloy, or flawed iron.

谈论劳动的价值与价格，总是有必要明确特定劳动的层次和品质，就如谈论金银必须明确其成色标准一样。劣等的劳动（如麻木冷漠、没有经验、蛮干）无法定其价值，就如无法确定某合金中金子的价值，或某块有裂缝的铸铁的价值一样。[6_9]

The quality and kind of labour being given, its value, like that of all other valuable things, is invariable. But the quantity of it which must be given for other things is variable; and in estimating this variation, the price of other things must always be counted by the quantity of labour; not the price of labour by the quantity of other things.

劳动的质量与类型一旦确定，其价值就如其他有价值的事物那样

成为一个定量了。但为得到其他事物，所应付出的劳动的数量则是个变量。要算出这一变量的大小，其他事物的价格就必须以劳动的数量来计算，而不是由事物的数量多少来确定劳动的价格。

Thus, if we want to plant an apple sapling in rocky ground, it may take two hours' work; in soft ground, perhaps only half an hour. Grant the soil equally good for the tree in each case. Then the value of the sapling planted by two hours' work is nowise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sapling planted in half an hour. One will bear no more fruit than the other. Also, one half-hour of work is as valuable as another half-hour; nevertheless the one sapling has cost four such pieces of work, the other only one. Now the proper statement of this fact is, not that the labour on the hard ground is cheaper than on the soft; but that the tree is dearer. The exchange value may, or may not, afterwards depend on this fact. If other people have plenty of soft ground to plant in, they will take no cognizance of our two hours' labour, in the price they will offer for the plant on the rock. And if, through want of sufficient botanical science, we have planted an upas-tree instead of an apple, the exchange value will be a negative quantity; still less proportionate to the labour expended.

这样看来，如果我们在岩石遍地之处栽种一棵苹果树苗，可能需要劳动两小时；而在松软沙地种一棵苹果树苗，可能只需劳动半小时。如果这两种情况下的土壤同样有利于果树生长，则花了两小时栽种的树苗价值绝不比只花了半小时栽种的树苗大，因为两棵树结的果实一样多。而且，任何一份半个小时的劳动都是价值相等的；然而，一棵树苗花了四份半个小时的劳动，另一棵树只花了一份，对此现象的适当表述是：并非在岩石地上付出的劳动比在松软土地上付出的劳动廉价，而是前者的果树价格更高。而此后的交换价值可能取决于，也可能不取决于，这个事实。如果其他人有足够多的松软土壤种植果

树，他们在给岩石上的果树报价的时候，就不会考虑我们在岩石地里的两个小时劳动。如果由于缺乏足够的植物学知识，我们种下的不是果树，而是带有剧毒的由巴斯树，那交换价值就成了负值，与我们付出的劳动就更不成比例了。

What is commonly called cheapness of labour, signifies, therefore, in reality, that many obstacles have to be overcome by it; so that much labour is required to produce a small result. But this should never be spoken of as cheapness of labour, but as dearness of the object wrought for. It would be just as rational to say that walking was cheap, because we had ten miles to walk home to our dinner, as that labour was cheap, because we had to work ten hours to earn it.

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的廉价在现实中就意味着要克服诸多障碍，以至为了较小的结果而付出较多的劳动。但这不应说成是劳动的廉价，而应看作劳动目标的增值。如果因为劳动十小时才换来一顿午餐，就说劳动廉价，那就可以说走十英里路才能到家吃晚餐，从而走路也廉价。

The last word which we have to define is “Production.”

最后要明确的术语是“生产”。

I have hitherto spoken of all labour as profitable;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to consider under one head the quality or value of labour, and its aim. But labour of the best quality may be various in

aim. It may be either constructive (“gathering” from con and struo), as agriculture; nugatory, as jewel-cutting; or destructive (“scattering” from de and struo), as war. It is not, however, always easy to prove labour, apparently nugatory, to be actually so; [5_10] generally, the formula holds well: “he that gathereth not, scattereth”; thus, the jeweller's art is probably very harmful in its ministering to a clumsy and inelegant pride. So that, finally, I believe nearly all labour may be shortly divided in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labour: positive, that which produces life; negative, that which produces death; the most directly negative labour being murder, and the most directly positive, the bearing and rearing of children; so that in the precise degree in which murder is hateful, on the negative side of idleness, in the exact degree child-rearing is admirable, on the positive side of idleness. For which reason, and because of the honour that there is in rearing [5_11] children, while the wife is said to be as the vine (for cheering), the children are as the olive branch, for praise: nor for praise only, but for peace (because large families can only be reared in times of peace); though since, in their spreading and voyaging in various directions, they distribute strength, they are, to the home strength, as arrows in the hand of the giant—striking here and there, far away.

我前面说过任何劳动都产生利润，因为对于劳动的质量或价值，以及劳动目标，不能一概而论。但最优质的劳动在劳动目标上却有不同。目标可能是“有益”的（来自拉丁语“收聚”），如农业；也可能是无益的，如打磨珠宝；甚至是“有害”的（来自拉丁语“分散”），如战争。然而，我们却总是很难证明那些明显无益的劳动就真的是微不足道。 [6_10] 一般说来，下面这个结论还是有道理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这样，珠宝商的劳动就可能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它使人们增长了庸俗不雅的傲气。这样，我认为最终可以将所有的劳动简单地分为正反两类：正面劳动能产生生命，反面劳动则带来死亡。杀

人是最直接的反面劳动，而生儿育女是最直接的正面劳动。所以，从负面角度看待懒散、不劳作，杀人肯定是千夫所指；而从正面角度看待懒散、不劳作，养育儿女又绝对令人肃然起敬。这样来看，又由于养育 [6_11] 孩子的荣耀，女人被比作葡萄藤（象征喜悦），孩子被比作橄榄枝，象征赞美；不仅象征赞美，也象征和平（因为只有在和平年代才能养育很多的孩子）。不过孩子后来四处奔波航行，就像巨人手里的利箭，射向四面八方，把生命的力量带到各处，大大提高了国家的实力。

Labour being thus various in its result, the prosperity of any nation is in exact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it spends in obtaining and employing means of life. Observe,—I say, obtaining and employing; that is to say, not merely wisely producing, but wisely distributing and consuming. Economists usually speak as if there were no good in consumption absolute. [5_12] So far from this being so, consumption absolute is the end, crown, and perfection of production; and wise consumption is a far more difficult art than wise production. Twenty people can gain money for one who can use it; and the vital question, for individual and for nation, is, never “how much do they make?” but “to what purpose do they spend?”

可见，劳动产生的结果多种多样，而任何国家的繁荣程度都与用于获得和运用谋生手段的劳动量大小有精确的比例关系。注意，我说“获得和运用”，即是说，不仅生产要有智慧，分配和消费也要有智慧。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单纯的消费一无是处， [6_12] 现在看来远非如此，单纯的消费是生产的目的，生产的荣耀，生产的完美体现。而有智慧地消费要比有智慧地生产更需要高超的技术。如果有二十个人赚钱供一个人花费，那么对于个人和整个国家，关键问题绝不是“他们能赚多少钱”，而是“他们怎么花钱”。

The reader may, perhaps, have been surprised at the slight reference I have hitherto made to “capital,” and its functions. It is here the place to define them.

各位也许纳闷，为什么我到现在很少谈及“资本”及资本的作用，现在就谈这个问题。

Capital signifies “head, or source, or root material”—it is material by which some derivative or secondary good is produced. It is only capital proper (caput vivum, not caput mortuum) when it is thus producing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itself. It is a root, which does not enter into vital function till it produces something else than a root; namely, fruit. That fruit will in time again produce roots; and so all living capital issues in reproduction of capital; but capital which produces nothing but capital is only root producing root; bulb issuing in bulb, never in tulip; seed issuing in seed, never in brea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 has hitherto devoted itself wholly to the multiplication, or (less even) the aggregation, of bulbs. It never saw, nor conceived, such a thing as a tulip. Nay, boiled bulbs they might have been—glass bulbs—Prince Rupert's drops, consummated in powder (well, if it were glass-powder and not gun powder), for any end or meaning the economists had in defining the laws of aggregation. We will try and get a clearer notion of them.

资本capital这个词本意为“事物的头部、源头、根部”，即能产生派生物或从属物的部分。只有能产生与自身不尽相同的事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capital（即有生命的capital，而不是僵死的capital）。换

言之，除非“根部”产出与自身不同的东西，即“果实”，否则就不能说其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果实最终又会再长出根须，所以，一切有生命的资本都会使资本再生。但资本若只能产生资本而无他用，那就如同根只生根；如同球茎只生球茎，而长不出郁金香花；有如种子只生种子，而变不成食物。而欧洲的政治经济学迄今一直致力于这种球茎的繁殖，甚至只是球茎的积累。它从未见到，也从未孕育出郁金香花这样的东西。不仅如此，这些被高温蒸煮的球茎，比如说玻璃泡，或鲁珀特玻璃泡，最终还可能碎成粉末（好在只是玻璃粉，不是炸药粉），以实现经济学家们在定义资本积累规律过程中的目的或意义。对此我们再来深入探讨。

The best and simplest general type of capital is a well-made ploughshare. Now, if that ploughshare did nothing but beget other ploughshares, in a polypous manner,—however the great cluster of polypous plough might glitter in the sun, it would have lost its function of capital. It becomes true capital only by another kind of splendor” —when it is seen “splendescere sulco”, to grow bright in the furrow; rather with diminution of its substance, than addition, by the noble friction. And the true home question, to every capitalist and to every nation, is not, “how many ploughs have you?” but, “where are your furrows?” not—“how quickly will this capital reproduce itself?” —but, “what will it do during reproduction?” What substance will it furnish, good for life? What work construct, protective of life? if none, its own reproduction is useless—if worse than none (for capital may destroy life as well as support it), its own reproduction is worse than useless; it is merely an advance from Tisiphone, on mortgage—not a profit by any means.

以最简单有效的常见资本——制作精良的犁铧为例。假设这架犁

铧除了像息肉滋生那样生出其他犁铧而别无他用，则不管这架犁铧的那堆息肉在阳光下如何耀眼，它已失去了作为资本的作用。它只有发出另一种光芒才会成为真正的资本，那就是“在沟渠里闪光”，即通过光荣的劳动产生摩擦而使犁铧自身的物质减少，而非由于闲置而使其徒增息肉般的锈迹。所以，对于每个资本家和每个国家来说，最根本的问题不是“你拥有多少犁铧”，而是“你开出的沟渠在哪里”；不是“你的资本自身繁殖有多快”，而是“你的资本在再生产中有何作用”。资本提供的东西是什么，对生命有益吗？资本产生的东西是什么，对生命来说安全吗？答案如果是否定的，再生产就毫无用处。更糟糕的情况是（因为资本既可以维持生命，也可能摧毁生命），其再生产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只能是徒增怨恨，损害未来的利益，而绝不会带来任何利润。

Not a profit, as the ancients truly saw, and showed in the type of Ixion;—for capital is the head, or fountain head of wealth—the “well-head” of wealth, as the clouds are the well-heads of rain; but when clouds are without water, and only beget clouds, they issue in wrath at last, instead of rain, and in lightning instead of harvest; whence Ixion is said first to have invited his guests to a banquet, and then made them fall into a pit, (as also Demas' silver mine), after which, to show the rage of riches passing from lust of pleasure to lust of power, yet power not truly understood, Ixion is said to have desired Juno, and instead, embracing a cloud (or phantasm), to have begotten the Centaurs; the power of mere wealth being, in itself, as the embrace of a shadow,—comfortless, (so also “Ephraim feedeth on wind and followeth after the east wind”; or “that which is not”— Prov. Xxiii. 5; and again Dante's Geryon, the type of avaricious fraud, as he flies, gathers the air up with retractile claws, —“l'aer a se raccolse,“ [5_13]) but in its offspring, a mingling of the brutal with the human nature; human in sagacity—using both intellect and arrow; but brutal in its body and hoof, for consuming,

and trampling down. For which sin Ixion is at last bound upon a wheel—fiery and toothed, and rolling perpetually in the air:—the type of human labour when selfish and fruitless (kept far into the Middle Ages in their wheels of fortune); the wheel which has in it no breath or spirit, but is whirled by chance only; whereas of all true work the Ezekiel vision is true, that the Spirit of the living creature is in the wheels, and where the angels go, the wheels go by them; but move no otherwise.

这样的资本有害无益，我们的先人早已看到这点，并通过伊克西翁这类形象表现出来。资本是头部，是财富的源头，即财富的源泉，就如云是雨的源泉。但是若云中无水，而只能生云，最终降下的将是愤怒，而不是甘霖，只产生霹雳闪电，而不能滋润沃土良田。据说伊克西翁首先以佳肴引诱客人赴宴，最后将他们推入火坑（又如底马的银矿），以此显示从贪求享乐到贪求力量的过程中财富所起的刺激作用。但力量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伊克西翁原本贪恋朱诺，却与一朵云彩（或幻影）做爱，生下了半人半马状的怪物。所以，财富本身的力量只能是与幻影相伴，徒劳无益。（又如“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或“虚无的钱财”，再又如但丁笔下的吉里昂，一个贪得无厌的骗子，他飞起时，能张开利爪卷起旋风。[6_13]）可是它的后代却是兽面人心的怪物：像人那样智勇皆备，又像野兽那样饕餮大餐、粗鲁残暴。伊克西翁因贪婪之罪而最终被缚于锯齿状的火轮之上，旋转不息，成为人类自私而无益的劳作的象征（这一形象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的财富之轮）。火轮内没有呼吸，没有灵魂，只听由命运女神转动。而以西结异象才是真正的劳动，即活物的灵在轮子内，天使往哪里去，轮子就往哪里去，从不偏离天使的方向。

This being the real nature of capital, it follows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true production, always going on in an active State: one of seed, and one of food; or production for the Ground, and for

the Mouth; both of which are by covetous persons thought to be production only for the granary; whereas the function of the granary is but intermediate and conservative, fulfilled in distribution; else it ends in nothing but mildew, and nourishment of rats and worms. And since production for the Ground is only useful with future hope of harvest, all essential production is for the Mouth; and is finally measured by the mouth; hence, as I said above, consumption is the crown of production; and the wealth of a nation is only to be estimated by what it consumes.

既然这是资本真正的本质，我们就可以说真实的生产也有两种，且一直活跃不辍：生产种子和生产粮食，也可以说是为土地生产和为口腹之欲生产。只有贪婪之徒才认为生产种子与粮食只为储存到仓库里。其实，仓库只是为分配起一个过渡和存放的作用，不然粮食最后只会生菌发霉，养肥了老鼠和蛆虫。既然为土地生产的意义只在于将来能收获粮食，我们可以说生产的本质就是为口腹之欲而生产，并最终由人来衡量。因此，如我前面所言，消费是生产的最高目的，国家的财富多少只能以它的消费量来衡量。

The want of any clear sight of this fact is the capital error, issuing in rich interest and revenue of error among the political economists. Their minds are continually set on money-gain, not on mouth-gain; and they fall into every sort of net and snare, dazzled by the coin-glitter as birds by the fowler's glass; or rather (for there is not much else like birds in them) they are like children trying to jump on the heads of their own shadows; the money-gain being only the shadow of the true gain, which is humanity.

政治经济学家们对这一事实缺少清楚的认识，就无法正确认识资

本，从而对利益、收益产生错误认识。他们的眼光只盯在钱的收入上，而不是嘴里的食物；他们禁不住种种诱惑而落入歧途，在耀眼的金钱面前不能自制，就如鸟儿被捕鸟镜弄花了眼而自投罗网；或者说（如果他们和鸟没有多少可比性）他们就像儿童，想要跳起来去踩自己影子的头部，因为钱的收入只是真正收入投下的幻影，而人才是真正收入的象征。

The final o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refore, is to get good method of consumption, and great quantity of consumption; in other words, to use everything, and to use it nobly; whether it be substance, service, or service perfecting substance. The most curious error in Mr. Mill's entire work, (provided for him originally by Ricardo) is his endeavour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irect and indirect service, and consequent assertion that a demand for commodities is not demand for labour (I. v. 9, et seq.). He distinguishes between labourers employed to lay out pleasure grounds, and to manufacture velvet; declaring that it makes material difference to the labouring classes in which of these two ways a capitalist spends his money; because the employment of the gardeners is a demand for labour, but the purchase of velvet is not. [5_14] Error colossal, as well as strange. It will, indeed, make a difference to the labourer whether we bid him swing his scythe in the spring winds, or drive the loom in pestilential air; but, so far as his pocket is concerned, it makes to him absolutely no difference whether we order him to make green velvet, with seed and a scythe, or red velvet, with silk and scissors. Neither does it anywise concern him whether, when the velvet is made, we consume it by walking on it, or wearing it, so long as our consumption of it is wholly selfish. But if our consumption is to be in anywise unselfish, not only our mode of consuming the articles we require interests him, but also the kind of article we require with a view to consumption. As thus (returning

for a moment to Mr. Mill's great hardware theory [5_15]): it matters, so far as the labourer's immediate profit is concerned, not an iron filing whether I employ him in growing a peach, or forging a bombshell; but my probable mode of consumption of those articles matters seriously. Admit that it is to be in both cases “unselfish,” and the difference, to him, is final, whether when his child is ill, I walk into his cottage and give it the peach, or drop the shell down his chimney, and blow his roof off.

所以，政治经济学的终极目标是，寻找合适的消费方法，获得足够的消费量。换言之，即使用一切事物，而且为了神圣的目的而使用：使用物质，使用服务，使用加工服务。密尔先生的整个著作中最令人费解的错误（最初由李嘉图提供给他的）是，他试图区分直接和间接服务，并进而得出结论：对商品的需求不是对劳动的需求（I.v.9及后文）。他将修建游乐园的劳动与生产天鹅绒的劳动分开，认为资本家的两种花钱方式使两种劳动类别有显著不同：雇人修剪花草是对劳动的需求，而购买天鹅绒则不然。 [6_14] 这个结论不仅怪异，简直是匪夷所思，不可理喻！是的，吩咐劳动者在春风中挥镰割草，或是让他在污浊的空气中开机织布，这对于劳动者确有不同，但对于其劳动报酬而言，不论是让他用种子和镰刀做成绿色天鹅绒，还是用蚕丝和剪刀做出红色天鹅绒，都绝对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他也不会在乎天鹅绒做好后，我们是铺在地上做地毯，还是围在身上做披肩，只要天鹅绒消费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但如果我们的消费绝不是为了自己，那么我们的消费模式，以及我们所消费产品的种类和劳动者就都有利益关系了。这样来看（暂时回到密尔先生那个重要的五金制造商理论 [6_15] ），不论是雇他来种植桃树，还是制作炸弹，就劳动者的直接利润而言都无关紧要，但我如何消费这些东西可能对他而言就关系重大了。假如这两样东西我都不是自己消费，那么对这位劳动者来说，区别可能就是性命攸关的：他的孩子生了病，我可能到他的农舍探望，送给他桃子，也可能把炸弹从他的烟囱扔进去，把房顶炸飞。

The worst of it, for the peasant, is, that the capitalist's consumption of the peach is apt to be selfish, and of the shell, distributive;[3] but, in all cases, this is the broad and general fact, that on due catallactic commercial principles, somebody's roof must go off in fulfilment of the bomb's destiny. You may grow for your neighbour, at your liking, grapes or grape-shot; he will also, catallactically, grow grapes or grape-shot for you, and you will each reap what you have sown.

对于这个农民来讲，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资本家把桃子留给自己吃，却把炸弹分配给了别人。[3] 但是不论哪种情况，按照商业交换原则，炸弹的使命必定是让某人的房顶上天，这是广泛存在的普遍事实。只要你愿意，你可能为你的邻居种葡萄，也可能种的是霰弹；而反过来，他也可能为你种葡萄，也可能种的是霰弹。当然，最后你们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3: It is one very awful form of the operation of wealth in Europe that it is entirely capitalists' wealth which supports unjust wars. Just wars do not need so much money to support them; for most of the men who wage such, wage them gratis; but for an unjust war, men's bodies and souls have both to be bought; and the best tools of war for them besides; which makes such war costly to the maximum; not to speak of the cost of base fear, and angry suspicion, between nations which have not grace nor honesty enough in all their multitudes to buy an hour's peace of mind with: as, at present, France and England, purchasing of each other ten

millions sterling worth of consternation annually (a remarkably light crop, half thorns and half aspen leaves,—sown, reaped, and granaried by the "science" of the modern political economist, teaching covetousness instead of truth). And all unjust war being supportable, if not by pillage of the enemy, only by loans from capitalists, these loans are repaid by subsequent taxation of the people, who appear to have no will in the matter, the capitalists' will being the primary root of the war; but its real root is the covetousness of the whole nation, rendering it incapable of faith, frankness, or justice, and bringing about, therefore, in due time, his own separate loss and punishment to each person.

3: 在欧洲，资本的运作有一种可怕的方式，即全靠资本家的财富来进行非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并不需要花费大量钱财，因为参与其中的多数人都有义不容辞、无偿奉献的信念；而在非正义战争中，士兵的躯体和意志都像劳动那样要花钱购买，还要给他们购买最好的武器作为工具，这就使得非正义战争花费巨大，更不用说还有交战国给社会底层带来的恐惧、国家之间的敌视与怀疑；德行尽失，忠诚不再，使广大民众的心境难有片刻安宁。眼下的法国和英国就是如此：每年的花费达到令人瞠目的一千万英镑（粮食产量显著下降，地里一半是刺人的荆棘，一半是瑟瑟的叶子，这就是按照当代政治经济学家建立的、教会人们贪婪而非教授真理的所谓“科学”进行播种、收割、

储藏的结果）。如果不去掠夺敌人的财富，那么所有非正义的战争都只能靠资本家的贷款才能维持，这些贷款随后又以税收的形式转嫁到民众头上，而民众似乎无意卷入战争，资本家的意志似乎才是战争的最根本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是整个民族的贪婪之心，以致信仰缺失、互相欺诈、正义不再，最终的结局是人人受损，人人受难。

It is, therefore, the manner and issue of consumption which are the real tests of production. Production does not consist in things laboriously made, but in things serviceably consumable; and the question for the nation is not how much labour it employs, but how much life it produces. For as consumption is the end and aim of production, so life is the end and aim of consumption.

所以，消费的方式和结果才是检验生产的试金石。生产不在于使用大量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本身，而在于生产出来的东西有多大的消费价值；生产对于国家而言不在于雇用了多少劳动力，而在于创造了多少生命。正如消费是生产过程的结果和目标，生命也是消费过程的结果和目标。

I left this question to the reader's thought two months ago, choosing rather that he should work it out for himself than have it sharply stated to him. But now, the ground being sufficiently broken (and the details into which the several questions, here opened, must lead us, being too complex for discussion in the pages of a periodical, so that I must pursue them elsewhere), I desire, in closing the series of introductory papers, to leave this one great fact clearly stated. **THERE IS NO WEALTH BUT LIFE** . Life, including

all its powers of love, of joy, and of admiration. That country is the richest which nourishes the greatest number of noble and happy human beings; that man is richest who, having perfected the functions of his own life to the utmost, has also the widest helpful influence, both personal and by means of his possessions, over the lives of others.

两个月前，我曾将这个问题留给读者思考，希望读者自己找出，而不是由我直接给出答案。不过到现在已具备条件（由这里提到的一些问题引发的详细讨论非常复杂，因杂志篇幅有限，我会另寻他处阐述），作为系列基本问题讨论的结束语，我想在此将这一重要事实明确陈述如下：生命之外别无财富 。这里的生命包括爱的力量，快乐的力量，敬慕的力量。一个国家养育的体面、快乐的人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有；一个人在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的同时，不论通过自身还是通过自己的财产，对别人的生存越能产生有益的影响，就越富有。

A strange political economy; the only one, nevertheless, that ever was or can be: all political economy founded on self-interest [5_16] being but the fulfilment of that which once brought schism into the Policy of angels, and ruin into the Economy of Heaven.

这样来看，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就变成了有史以来唯一不可理喻的经济学，所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是自身利益 [6_16] ，所有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只能是再次让天使们追求自身利益而产生分歧，毁坏天堂的经济秩序。

“The greatest number of human beings noble and happy.” But is the nobleness consistent with the number? Yes,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 it, but essential to it. The maximum of life can only be reached by the maximum of virtue. In this respect the law of human population differs wholly from that of animal life. The multiplication of animals is checked only by want of food, and by the hostility of rac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gnat is restrained by the hunger of the swallow, and that of the swallow by the scarcity of gnats. Man, considered as an animal, is indeed limited by the same laws: hunger, or plague, or war, are the necessary and only restraints upon his increase,—effectual restraints hitherto,—his principal study having been how most swiftly to destroy himself, or ravage his dwelling-places, and his highest skill directed to give range to the famine, seed to the plague, and sway to the sword. But, considered as others than an animal, his increase is not limited by these laws. It is limited only by the limits of his courage and his love. Both of these have their bounds; and ought to have; his race has its bounds also; but these have not yet been reached, nor will be reached for ages.

“让尽可能多的人快乐、高尚地生活。”然而，高尚与否和人数多少有直接关系吗？是的，不仅有直接关系，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只有美德最大化才能实现人口数量最大化。从这个角度说，人口的发展规律与动物迥然不同。动物的繁殖只是受制于食物不足和其他物种的敌意：蚋蠓的数量因燕子啄食受到制约，而燕子的数量又因蚋蠓数量稀少受到制约。人类作为动物的一种，实际上也受到相同规律的约束：饥饿、瘟疫、战争是唯一影响人口增长的必然因素，到现在为止也是有效的因素。人类一直在研究怎样迅速地实现自我毁灭，怎样迅速地摧毁房屋，而所谓最先进发达的技术却使饥荒增多，瘟疫潜伏，刀剑锋利。但是如果认为人类不同于动物，则人口的增长又不受这些法则的约束。相反，能制约人类的只有勇气和爱。当然，勇气和爱都有限度，也应当有限度。同时，人口增长也有限度，但是这些限度还都未达到，以后许多年也不会达到。

In all the ranges of human thought I know none so melancholy as the specul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on the population question. It is proposed to better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er by giving him higher wages. “Nay,” says the economist,—“if you raise his wages, he will either drag people down to the same point of misery at which you found him, or drink your wages away.” He will. I know it. Who gave him this will? Suppose it were your own son of whom you spoke, declaring to me that you dared not take him into your firm, nor even give him his just labourer's wages, because if you did, he would die of drunkenness, and leave half a score of children to the parish. “Who gave your son these dispositions?” —I should enquire. Has he them by inheritance or by education? By one or other they must come; and as in him, so also in the poor. Either these poor are of a race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ours, and unredeemable (which, however, often implied, I have heard none yet openly say), or else by such care as we have ourselves received, we may make them continent and sober as ourselves—wise and dispassionate as we are—models arduous of imitation. “But,” it is answered, “they cannot receive education.” Why not? That is precisely the point at issue. Charitable persons suppose the worst fault of the rich is to refuse the people meat; and the people cry for their meat, kept back by fraud, to the Lord of Multitudes.[4] Alas! It is not meat of which the refusal is cruelest, or to which the claim is validest. The life is more than the meat. The rich not only refuse food to the poor; they refuse wisdom; they refuse virtue; they refuse salvation. Ye sheep without shepherd, it is not the pasture that has been shut from you, but the Presence. Meat! Perhaps your right to that may be pleadable; but other rights have to be pleaded first. Claim your crumbs from the table, if you will; but claim them as children, not as dogs; claim your right to be fed, but claim more loudly your right to be holy, perfect, and pure.

在人类思想的各个领域，我发现只有政治经济学家对人口问题的看法最为悲观忧郁。有人建议通过增加薪酬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这可不行，”某位经济学家说，“如果给他增加薪酬，要么会使别人生活水平下降，和他一样糟糕，要么他会胡吃海喝，把钱都挥霍光。”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是谁让他这么说的呢？各位，假如那个劳动者是您的儿子，您对我说，您不敢让他进您的公司工作，也不敢给他应得的薪酬，因为您一旦这么做，他就会酗酒而死，留下的一大堆孩子只能靠教区救济。“那么是谁让您的儿子酗酒成瘾的呢？”我要问您这个问题。他生来就这样还是被人教成这样呢？两者必有其一。那些穷人和您的儿子是一样的道理。这些穷人要么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类，罪孽深重，无可救药（虽还未听到有人公开这么说，但这种观点常有流露），要么让他们和我们一样接受教育，从而让他们学会忍耐克制、生活节制朴素，就如我们这样睿智、平静，尽管做到我们这个程度实在很难。“但是，”有人会说，“他们不能接受教育。”为什么不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教会慈善家们认为富人的主要错误是不给穷人吃肉，而由于富人的欺诈，穷人只能向万民之主乞求施舍。[4] 唉！不给肉吃并不是最残忍的，也不是最击中要害的。生命比吃肉更重要。富人不仅拒绝给穷人食物，他们还不让穷人获得智慧，不让穷人获得美德，不让穷人得到救赎。无人放养的绵羊啊，并不是将你们与草地隔绝开来，而是让你们看不到神的存在！可是只要你们得到肉，也许你们可以为获得有肉吃的权利而申辩，但是还有更重要的权利应当首先申辩。你如果愿意，可以声称桌上掉下的碎屑归你所有，但你应像孩子那样去要，而不是像狗那样乞求；你可以声称有吃饱肚子的权利，但也请更理直气壮地说你有权利做一个圣洁完美、纯洁无邪的人。

4: James v.4. Observe, in these statements I am not taking up, nor countenancing one whit, the common idea of division of property; division of property is its destruction; and with it the

destruction of all hope, all industry, and all justice: it is simply chaos—a chaos towards which the believers in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are fast tending, and from which I am striving to save them. The rich man does not keep back meat from the poor by retaining his riches; but by basely using them. Riches are a form of strength; and a strong man does not injure others by keeping his strength, but by using it injuriously. The socialist, seeing a strong man oppress a weak one, cries out—"Break the strong man's arms;" but I say, "Teach him to use them to better purpose." The fortitude and intelligence which acquire riches are intended, by the Giver of both, not to scatter, nor to give away, but to employ those riches in the service of mankind; in other words, in the redemption of the erring and aid of the weak—that is to say, there is first to be the work to gain money; then the Sabbath of use for it—the Sabbath, whose law is, not to lose life, but to save. It is continually the fault or the folly of the poor that they are poor, as it is usually a child's fault if it falls into a pond, and a cripple's weakness that slips at a crossing; nevertheless, most passers-by would pull the child out, or help up the cripple. Put it at the worst, that all the poor of the world are but disobedient children, or careless cripples, and that all rich people are wise and strong, and you will see at once that neither is the socialist right in desiring to make everybody poor, powerless, and foolish as he

is himself, nor the rich man right in leaving the children in the mire.

4: 《雅各书》第五章第四节。注意，在这些论断中，我完全没有提及、也根本不赞同将财产平均分配的社会主义思想，因为平均分割财产只能使财产不复存在，进而所有的希望、所有的产业，以及所有的公平正义都不复存在；平均分割财产只能造成混乱，这种混乱使现代政治经济学家们越来越难以自拔，而我正努力设法让他们脱离困境。富人并非因吝啬守财而让穷人吃不到肉，而是卑鄙地利用财富不让穷人吃到肉。财富是力量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有力量的人若是藏而不露，则对人并无害处；但他若滥用力量，就会有害于人。社会主义者看到强者欺压弱者，就会大喊“拧断强者的胳臂”，而我却说“教育强者，力量要用得其所”。能获得财富的力量与智慧，其本质不是让财富分散，也不是施舍财富，而是利用财富为人类造福。换言之，财富应有益于犯错者忏悔、贫弱者富强，即首先让他们有活可做，有钱可赚，然后给他们休息的时间（安息日），让他们把钱花出去。要知道，安息日就是让人休养生息，而不是拼命劳作的。穷人受穷总是因其自身失误，或是愚蠢笨拙所致；就如幼童跌入池塘，跛子在街口滑倒，都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但不管怎样，大多数路人见状都会伸手相助，把孩子从水中拉出，把跛子从地上扶起。即使从最坏的角度看，认为天下的穷人都如任性调皮的顽童，都如粗心大意的跛子；天下所有的富人都聪明智慧，身强体壮，你也会立刻看到，你也不会愚蠢到像社会主义者那样，认为人人都应贫穷，皆无力，你同样也不

会像富人那样看见孩子在泥塘里挣扎而无动于衷。

Strange words to be used of working people: “What! Holy; without any long robes nor anointing oils; these rough-jacketed, rough-worded persons; set to nameless and dishonoured service? Perfect! — These, with dim eyes and cramped limbs, and slowly wakening minds? Pure! — These, with sensual desire and grovelling thought; foul of body, and coarse of soul?” It may be so; nevertheless, such as they are, they are the holiest, perfect, purest persons the earth can at present show. They may be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f so, they yet are holier than we, who have left them thus.

这些字眼似乎很难用在劳动者身上：“什么？圣洁？就这些没有黑袍、没有圣膏油的家伙？就这些穿着粗布外套、粗言粗语的家伙？就这些注定就应默默无闻、卑微低贱伺候人的家伙？完美？就这些眼神呆滞、手脚笨拙、头脑迟钝的家伙？纯洁无邪？就这些放纵欲望、低三下四、身体肮脏、灵魂粗俗的家伙？”是的，他们可能是这个样子，但尽管如此，他们却是这个世界上所能看到的最圣洁、最完美、最纯洁的人。他们可能如你所说，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比造成他们这种状况的人圣洁得多。

But what can be done for them? Who can clothe—who teach—who restrain their multitudes? What end can there be for them at last, but to consume one another?

但是能给他们做些什么呢？谁能给他们提供体面的衣服，让他们接受教育，控制他们生育的数量呢？他们最终是什么结局呢？难道只能是同类相残？

I hope for another end, though not, indeed, from any of the three remedies for over-population commonly suggested by economists.

我希望会有另外的结局，不过这个结局不是由经济学家们通常提议的解决人口过多问题的三个途径所得出的。

These three are, in brief—Colonization; Bringing in of waste lands; or Discouragement of Marriage.

所谓三个途径，简而言之，就是：海外殖民，开荒拓疆，提倡独身。

The first and second of these expedients merely evade or delay the question. It will, indeed, be long before the world has been all colonized, and its deserts all brought under cultivation. But the radical question is not how much habitable land is in the world, but how many human beings ought to be maintained on a given space of habitable land.

三个权宜之计中的前两个只能是回避问题，拖延矛盾。向全世界殖民，把全世界的沙漠变成良田，都不是短时间能做到的。眼前的迫切问题不是地球上有多少地方可以居住，而是一块给定的可居之地应当能养活多少人？

Observe, I say, ought to be, not how many can be. Ricardo, with his usual inaccuracy, defines what he calls the “natural rate of wages” as “that which will maintain the labourer.” Maintain him! Yes; but how? —the question was instantly thus asked of me by a working girl, to whom I read the passage. I will amplify her question for her. “Maintain him, how?” As, first, to what length of life? Out of a given number of fed persons how many are to be old —how many young; that is to say, will you arrange their maintenance so as to kill them early—say at thirty or thirty-five on the average, including deaths of weakly or ill-fed children?—or so as to enable them to live out a natural life? You will feed a greater number, in the first case, [5_17] by rapidity of succession; probably a happier number in the second; which does Mr. Ricardo mean to be their natural state, and to which state belongs the natural rate of wages?

注意，我说的是“应当”，而不是“能”养活多少人。表达常欠准确的李嘉图先生，把他所说的“自然工资水平”定义为“能养活劳动者的工资”。养活？不错，但怎样养活呢？我把李嘉图这段话讲给一个女工听时，她立刻这么问我。我代她问你们大家：“养活？怎样养活？”首先，养活多久？在所养活的一定数量的人中，有多少活到老年，有多少活到青年？也就是说，是只养活他们到一定时候就早早将其杀死吗——比如说平均寿命三十或三十五岁的时候，包括那些饿死病死的儿童？还是养活他们直到其寿终正寝？前一种情况中， [6_17] 由于生死交替加快，要养活的人数更多；而后一种情况中，所养活的人却可能更幸福。哪种情况是李嘉图先生所谓的自然状态呢？所谓的自然工资水平又属于哪种情况呢？

Again: A piece of land which will only support ten idle, ignorant, and improvident persons, will support thirty or forty

intelligent and industrious ones. Which of these is their natural state, and to which of them belongs the natural rate of wages?

还有：一块土地可能只够养活十个懒散、愚笨、缺乏远见的人，却可以养活三十或四十个智慧、勤劳的人。哪个才算是正常的自然状态呢？自然工资水平又属于哪种情况呢？

Again: If a piece of land support forty persons in industrious ignorance; and if, tired of this ignorance, they set apart ten of their number to study the properties of cones, and the sizes of stars; the labour of these ten, being withdrawn from the ground, must either tend to the increase of food in some transitional manner, or the persons set apart for sidereal and conic purposes must starve, or someone else starve instead of them. What is, therefore, the natural rate of wages of the scientific persons, and how does this rate relate to, or measure, their reverted or transitional productiveness?

再如：如果一块地养活的是四十个勤劳但无智慧的人，如果他们后来想摆脱这种愚昧无知的状态，于是分出十个人研究各种锥体的性质，研究星球的大小。由于这十个人不再耕地种粮，所以这十个人要么必须以某种过渡方式解决食物问题，要么这十个研究星球和锥体的人就要挨饿，或者其他某个人要挨饿。那么，什么又是这些科学研究劳动者的自然工资水平呢？自然工资水平又如何衡量他们转型或过渡的生产力，或与之相联系呢？

Again: If the ground maintains, at first, forty labourers in a peaceable and pious state of mind, but they become in a few years so quarrelsome and impious that they have to set apart five, to

meditate upon and settle their disputes;—ten, armed to the teeth with costly instruments, to enforce the decisions; and five to remind everybody in an eloquent manner of the existence of a God; what will be the result upon the general power of production, and what is the “natural rate of wages” of the meditative, muscular, and oracular labourers?

再如：如果那块地养活的四十个人最初和睦相处，敬奉天地，可数年后却开始争吵相斗，亵渎神灵。以至只好分出五个人从中斡旋，调解争端；再分出十个人持枪荷弹，装备精良，以保证决策得以实施；再分出五个人，用雄辩有力的语言提醒每个人，上帝的存在真实不虚。这样一来，总的生产能力会结果如何呢？又怎样看待那些通达事理、孔武有力、传达神谕者的“自然工资水平”呢？

Leaving these questions to be discussed, or waived, at their pleasure, by Mr. Ricardo's followers, I proceed to state the main facts bearing on that probable future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which has been partially glanced at by Mr. Mill. That chapter and the preceding one differ from the common writing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in admitting some value in the aspect of nature, and expressing regret at the probability of the destruction of natural scenery. But we may spare our anxieties, on this head. Men can neither drink stream, nor eat stone. The maximum of population on a given space of land implies also the relative maximum of edible vegetable, whether for men or cattle; it implies a maximum of pure air; and of pure water. Therefore: a maximum of wood, to transmute the air, and of sloping ground, protected by herbage from the extreme heat of the sun, to feed the streams. All England may, if it so chooses, become one manufacturing town; and Englishmen, sacrificing themselves to the good of general humanity, may live

diminished lives in the midst of noise, of darkness, and of deadly exhalation. But the world cannot become a factory, nor a mine. No amount of ingenuity will ever make iron digestible by the million, nor substitute hydrogen for wine. Neither the avarice nor the rage of men will ever feed them, and however the apple of Sodom and the grape of Gomorrah may spread their table for a time with dainties of ashes, and nectar of asps,—so long as men live by bread, the far away valleys must laugh as they are covered with the gold of God, and the shouts of His happy multitudes ring round the winepress and the well.

对于这些问题，李嘉图先生的追随者们讨论也罢，回避也罢，我只想对密尔先生偶尔提及的、影响劳动阶级未来的主要事实加以陈述。密尔先生写的那一章及前面一章与其他政治经济学家通常的论述有所不同。他承认自然也有价值，并对自然风景可能遭到的破坏表示忧虑。但对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忧虑重重，因为人不饮溪水，也不吃石头。一块地养活的人口的数量若达到极限，也就意味着可供人或牲畜食用的植物数量达到了极限，同时意味着清新的空气、纯净的饮用水的数量达到了极限。因此，能净化空气的树木数量达到了极限；确保青青的草场不受烈日暴晒、哺育潺潺溪水的山坡数量达到了极限。如果这样下去，整个英国就会成为一个大工厂；全体英国人为了满足全世界人的利益而牺牲了自己，在噪音中，在黑暗里，在受到污染的空气中生活，寿命大大缩减。但世界不可能都是工厂，不可能都是矿山。不论多少聪明才智都不能让几百万人靠吃铁生存，也不能以葡萄酒代替氢气。贪婪与暴怒都不能让人饱腹。尽管桌上满是所多玛的苹果和蛾摩拉的葡萄酒，可是光洁的苹果里尽是灰土，玉液琼浆般的酒里有毒蛇潜伏。只要人类以面包为食，远处洒满上帝之光的山谷就必定充满笑声，快乐子民的呼喊就必定在榨酒机旁、在水井边缭绕。

Nor need our more sentimental economists fear the too wide spread of the formalities of a mechanical agriculture. The presence of a wise population implies the search for felicity as well as for food; nor can any population reach its maximum but through that wisdom which “rejoices” in the habitable parts of the earth. The desert has its appointed place and work; the eternal engine, whose beam is the earth's axle, whose beat is its year, and whose breath is its ocean, will still divide imperiously to their desert kingdoms, bound with unfurrowable rock, and swept by unarrested sand, their powers of frost and fire; but the zones and lands between, habitable, will be loveliest in habitation. The desire of the heart is also the light of the eyes. No scene is continually and untiringly loved, but one rich by joyful human labour; smooth in field; fair in garden; full in orchard; trim, sweet, and frequent in homestead; ringing with voices of vivid existence. No air is sweet that is silent; it is only sweet when full of low currents of under sound—triplets of birds, and murmur and chirp of insects, and deep-toned words of men, and wayward trebles of childhood. As the art of life is learned, it will be found at last that all lovely things are also necessary;—the wild flower by the wayside, as well as the tended corn; and the wild birds and creatures of the forest, as well as the tended cattle; because man doth not live by bread only, but also by the desert manna; by every wondrous word and unknowable work of God. Happy, in that he knew them not, nor did his fathers know; and that round about him reaches yet into the infinite, the amazement of his existence.

那些多愁善感的经济学家不必担忧这种机械式的农业若大量出现会使生活枯燥乏味。智慧的人类不仅追求食物，也追求幸福快乐。只有与身边的山水融为一体、同欢共乐，人口数量才能达到极限。沙漠自有自己的位置与作用。大地就是永动机，它以地轴为传动杆，以四

季为节奏，以海洋为气息，用平滑的石砾围住沙漠，用狂沙扫平沙漠，使沙漠寒气袭人，使沙漠热浪滚滚。但沙漠之外却有良田美池，世外桃源，心之所愿亦即目之所及。单纯的自然之景不会始终备受青睐，除非那里到处可见快乐的劳动，有平整的良田，有美丽的花园，有结满果实的果树，有排列齐整、温馨甜蜜、人来人往的房舍家园，到处充满生机和笑语欢声。静寂的空气不会甜蜜，除非有小鸟啁啾，有呢喃虫鸣，除非有男人浑厚洪亮的说话声，有孩子嬉戏时调皮的尖叫声。生活的艺术是后天学得的，但最终我们会发现美好的事物也不可缺少。路边有庄稼生长，也要有野花开放；在树林草地放牧牛羊，也要有鸟儿和其他野生动物相伴。因为人类不只需要面包，还需要荒漠里的甘露，还需要上帝的每一句神奇的话语，每一处奇妙的神迹。当初的人们生活幸福快乐，正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他们的祖先也不知道。人的存在就是神迹，神迹的光辉环绕周围，与天地共存。

Note, finally, that all effectual advancement towards this true felicity of the human race must be by individual, not public effort. Certain general measures may aid, certain revised laws guide, such advancement; but the measure and law which have first to be determined are those of each man's home. We continually hear it recommended by sagacious people to complaining neighbours (usually less well placed in the world than themselves), that they should “remain content in the station in which Providence has placed them.” There are perhaps some circumstances of life in which Providence has no intention that people should be content. Nevertheless, the maxim is on the whole a good one; but it is peculiarly for home use. That your neighbour should, or should not, remain content with his position, is not your business; but it is very much your business to remain content with your own. What is chiefly needed in England at the present day is to show the quantity of pleasure that may be obtained by a consistent, well-administered competence, modest, confessed, and laborious. We need examples

of people who, leaving Heaven to decide whether they are to rise in the world, decide for themselves that they will be happy in it, and have resolved to seek—not greater wealth, but simpler pleasure; not higher fortune, but deeper felicity; making the first of possessions, self-possession; and honouring themselves in the harmless pride and calm pursuits of peace.

最后，请注意，所有这些通往人类真正幸福的有效的进步，只能经由个人而不是公众的努力才能获得。不错，某些宏观的措施、某些修正的法律能使进步更快、更顺利，但首要的措施和法律应以每个人的家为基础。我们常听到精明的人如此建议：周围的人（那些状况往往不如他们的人）如若抱怨不断，就对他们这么说："天意如此，要知足常乐。"可有些状况下，上帝并无意要人们逆来顺受。虽然这个准则基本不错，但只适合家用。你的邻居是否应该满意现状是他自己的事，你无权干涉，重要的是你应对自己的现状感到满足。当今的英国迫切需要表明，通过持续、有序的竞争所得到的愉悦生活应是奢侈有度、光明正大、勤勉有加。我们需要这样的楷模：他们认为能否出人头地由天意而定，自己则随遇而安；他们执意追求更简朴的快乐，而不是更多的财富，不是追求鸿运连连，而是追求气定神闲、心境坦然；他们把克己自制看作首要的财富，以对他人无害的自尊和祈求和平为荣。

Of which lowly peace it is written that "justice and peace have kissed each other;" and that the fruit of justice is "sown in peace of them that make peace;" not "peace-makers" in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reconcilers of quarrels; (though that function also follows on the greater one ;) but peace-Creators; Givers of Calm. Which you cannot give, unless you first gain; nor is this gain one which will follow assuredly on any course of business, commonly so called. No form of gain is less probable, business being (as is shown

in the language of all nations—polein from pelo, prasis from perao, venire, vendre, and venal, from venio, etc.) essentially restless—and probably contentious;—having a raven-like mind to the motion to and fro, as to the carrion food; whereas the olive-feeding and bearing birds look for rest for their feet; thus it is said of Wisdom that she “hath builded her house, and hewn out her seven pillars;” and even when, though apt to wait long at the door-posts, she has to leave her house and go abroad, her paths are peace also.

这种低调的和平被写成“公义与平和，彼此相亲”，公义之果实“种植于平和使者的平和心态中”。这里的“平和使者”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冲突调解人（尽管在更大的范围内有此功能），而是“平和”的创造者，“平静”的施予者。若施予平和，必先获得平和；而这种平和在平常所说的经营过程中是没把握得到的。经营中会有各种形式的所得，因为经营（例如很多民族的语言所表明的那样：polein来自古希腊语，意为买卖；prasis来自古希腊语，意为活动；意大利语venir、法语vendre、拉丁语venal都来自古希腊语venio，意为得到，等等）本质上就不是安分守己的，甚至可能是争吵不休的。就如聒噪的乌鸦，围着那腐烂的食物飞来飞去，而以橄榄为食、嘴衔橄榄枝的鸽子找寻的则是安身歇脚之处。因此，就如智慧之神所说的“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虽然常在门柱旁驻足守望；但即使离开房屋去往远方，路途也是平和之旅。

For us, at all events, her work must begin at the entry of the doors: all true economy is “Law of the house.” Strive to make that law strict, simple, generous: waste nothing, and grudge nothing. Care in nowise to make more of money, but care to make much of it; remembering always the great, palpable, inevitable fact—the rule and root of all economy—that what one person has, another cannot have; and that every atom of substance, of whatever kind,

used or consumed, is so much human life spent; which, if it issue in the saving present life, or gaining more, is well spent, but if not, is either so much life prevented, or so much slain. In all buying, consider, first, what condition of existence you cause in the producers of what you buy; secondly, whether the sum you have paid is just to the producer, and in due proportion, lodged in his hands; [5_18] thirdly, to how much clear use, for food, knowledge, or joy, this that you have bought can be put; and fourthly, to whom and in what way it can be most speedily and serviceably distributed; in all dealings whatsoever insisting on entire openness and stern fulfilment; and in all doings, on perfection and loveliness of accomplishment; especially on fineness and purity of all marketable commodity; watching at the same time for all ways of gaining, or teaching, powers of simple pleasure, and of showing *oson en asphodelps geg oneiar* —the sum of enjoyment depending not on the quantity of things tasted, but on the vivacity and patience of taste.

不管怎样，在我们看来，智慧的平和之旅始于自己的家门口，所以，一切真正的经济学都应始于“家庭法则”。我们应努力使这个法则严谨、简洁、宽容，既不产生浪费，又不带来抱怨。绝不可一心只图多赚钱，而要尽可能将钱用得其所。要牢记这个重要的、浅显的、不可回避的事实，也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规律和基础，即若一样东西归你所有，别人就不能同时拥有。任何由人类劳动创造的事物，或为人所使用，或为人所消费，只要能有助于维持现有的生命，或有助于产生更多的生命，就是正面的、积极的劳动；而如果阻止了现有生命的延续，甚至造成生命的杀戮，就是滥用劳动。在一切购买活动中，请考虑以下问题：第一，对生产者的生活状况带来何种变化；第二，付给生产者的钱是否公正，最后落入生产者手里的钱是否比例适当； [6_18] 第三，所购买的东西有多少能明确用作获得食物、增长知识、带来快乐；第四，所购买的东西能及时有效地分配给谁，且如何分配。所有

的交易都必须坚持完全公开和物尽其用的原则，每次交易都要尽善尽美，市场交易的商品更要品质优良，纯正无瑕，同时要尽可能获取或传导淳朴愉悦的力量，并能表明“平常之中有大美”，即是说，欣赏赞美不取决于所品尝之物的数量，而是来自品尝过程中生命的参与以及平和的心境。

And if, on due and honest thought over these things, it seems that the kind of existence to which men are now summoned by every plea of pity and claim of right, may, for some time at least, not be a luxurious one;—consider whether, even supposing it guiltless, luxury would be desired by any of us, if we saw clearly at our sides the suffering which accompanies it in the world. Luxury is indeed possible in the future—innocent and exquisite; luxury for all, and by the help of all; but luxury at present can only be enjoyed by the ignorant; the cruelest man living could not sit at his feast, unless he sat blindfold. Raise the veil boldly; face the light; and if, as yet, the light of the eye can only be through tears, and the light of the body through sackcloth, go thou forth weeping, bearing precious seed, until the time come, and the kingdom, when Christ's gift of bread, and bequest of peace, shall be “Unto this last as unto thee”; and when, for earth's severed multitudes of the wicked and the weary, there shall be holier reconciliation than that of the narrow home, and calm economy, where the Wicked cease—not from trouble, but from troubling—and the Weary are at rest.

在上述公正合理的思考基础上，似乎每一次对怜悯心的请求、每一次对权利的呼吁，都在引导人们过一种，至少在目前来看不算奢侈的生活。请想想，即使奢华生活来得正当，如果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世上，与奢华相伴的苦难，我们是否还应去追求它？未来的确可以有奢华的生活，但那是纯洁无瑕、尽善尽美的奢华，那是由民众所享有、

由民众所成就的奢华，而眼下的奢华却只为无知者独享。那些冷酷至极的人可能被蒙上了双眼，不然怎能心安理得地享用美酒佳肴？请勇敢地掀开蒙眼布，面对阳光吧！如果自古以来，眼睛中的光芒只能通过泪水获得，身体的光明只能透过粗布衣而现，那你就带着宝贵的种子、流着眼泪出去，直到那个时刻到来，直到天国“给你和给那最后来的一样”，那时耶稣会赠给我们面包，赠给我们平和。到那时，对世上分化出的罪恶与疲惫的人，将有更圣洁的和解，不再是死后解脱；在那里，恶人不是自己没有烦恼，而是不使别人烦恼，从而让困乏之人得享安息。

[5_1].Book I. chap. iv. s. 1. To save space, my future references to Mr. Mill's work will be by numerals only, as in this instance, I. iv. 1. Ed. in 2 vols. 8vo, Parker, 1848.

[5_2].If Mr. Mill had wished to show the difference in result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sale, he should have represented the hardware merchant as consuming his own goods instead of selling them; similarly, the silver merchant as consuming his own goods instead of selling them. Had he done this, he would have made his position clearer, though less tenable; and perhaps this was the position he really intended to take, tacitly involving his theory, elsewhere stated, and shown in the sequel of this paper to be false, that demand for commodities is not demand for labour. But by the most diligent scrutiny of the paragraph now under examination, I cannot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a fallacy pure and simple, or the half of one fallacy supported by the whole of a greater one; so that I treat it here on the kinder assumption that it is one fallacy only.

[5_3].I take Mr. Helps' estimate in his essay on War.

[5_4].Also when the wrought silver vases of Spain were dashed to fragments by our custom-house officers, because bullion might be imported free of duty, but not brains, was the axe that broke them productive?—the artist who wrought them unproductive? Or again. If the woodman's axe is productive, is the executioner's? as also, if the hemp of a cable be productive, does not the productiveness of hemp in a halter depend on its moral more than on its material application?

[5_5].Filigree; that is to say, generally, ornament dependent on complexity, not on art.

[5_6].Compare George Herbert, "*The Church Porch* ", Stanza 28.

[5_7]."*O Zeus dipou penetai* " -- Arist. Plut. 582. It would but weaken the grad words to lean on the preceding ones: — " *Oti tou Platon parecho Beltionas, andpas, kai tin gnomen, kai ten idean."*

[5_8].Zech. v. ii.

[5_9].Labour which is entirely good of its kind, that is to say, effective, or efficient, the Greeks called "weighable," or *axios* , translated usually "worthy," and because thus substantial and true, they called its price *time* , the "honourable estimate" of it (honorarium): this word being founded on their conception of true labour as a divine thing, to be honoured with the kind of honour given to the gods; whereas the price of false labour, or of that which led away from life, was to be, not honour, but vengeance; for which they reserved another word, attributing the exaction of such price to a peculiar goddess, called Tisiphone, the "requiter (or quittance-taker) of death"; a person versed in the highest branches of arithmetic, and punctual in her habits; with whom accounts current have been opened also in modern days.

[5_10].The most accurately nugatory labour is, perhaps, that of which not enough is given to answer a purpose effectually, and which, therefore, has all to be done over again. Also, labour which fails of effect through non-co-operation. The cure of a little village near Bellinzona, to whom I had expressed wonder that the peasants allowed the Ticino to flood their fields, told me that they would not join to build an effectual embankment high up the valley, because everybody said "that would help his neighbours as much as himself." So every proprietor built a bit of low embankment about his own field; and the Ticino, as soon as it had a mind, swept away and swallowed all up together.

[5_11].Observe, I say, "rearing," not "begetting." The praise is in the seventh season, not in *sporitos* , nor in *phutalia* , but in *opora* .. It is strange that men always praise enthusiastically any person who, by a momentary exertion, saves a life; but praise very hesitatingly a person who, by exertion and self-denial prolonged through years, creates one. We give the crown "*ob civem servatum* ";—why not "*ob civem natum* ?" Born, I mean, to the full, in soul as well as body. England has oak enough, I think, for both chaplets.

[5_12].When Mr. Mill speaks of productive consumption, he only means consumption which results in increase of capital, or material wealth. See I. iii.4.and

I. iii. 5.

[5_13].So also in the vision of the women bearing the ephah, before quoted, "the wind was in their wings," not wings "of a stork," as in our version; but "*milvi* ," of a kite, in the Vulgate, or perhaps more accurately still in the Septuagint, "hoopoe," a bird connected typically with the power of riches by many traditions, of which that of its petition for a crest of gold is perhaps the most interesting. The "Birds" of Aristophanes, in which its part is principal, are full of them; note especially the "fortification of the air with baked bricks, like Babylon," I. 550; and, again, compare the Plutus of Dante, who (to show the influence of riches in destroying the reason) is the only one of the powers of the Inferno who cannot speak intelligibly and also the cowardliest; he is not merely quelled or restrained, but literally "collapses" at a word; the sudden and helpless operation of mercantile panic being all told in the brief metaphor, "as the sails, swollen with the wind, fall, when the mast breaks."

[5_14].The value of raw material, which has, indeed, to be deducted from the price of the labour, is not contemplated in the passages referred to, Mr. Mill having fallen into the mistake solely by pursuing the collateral results of the payment of wages to middlemen. He says—"The consumer does not, with his own funds, pay the weaver for his day's work." Pardon me; the consumer of the velvet pays the weaver with his own funds as much as he pays the gardener. He pays, probably, an intermediate ship-owner, velvet merchant, and shopman; pays carriage money, shop rent, damage money, time money, and care money; all these are above and beside the velvet price (just as the wages of a head gardener would be above the grass price); but the velvet is as much produced by the consumer's capital, though he does not pay for it till six months after production, as the grass is produced by his capital, though he does not pay the man who mowed and rolled it on Monday, till Saturday afternoon. I do not know if Mr. Mill's conclusion,—"the capital cannot be dispensed with, the purchasers can", has yet been reduced to practice in the City on any large scale.

[5_15].Which, observe, is the precise opposite of the one under examination. The hardware theory required us to discharge our gardeners and engage manufacturers; the velvet theory requires us to discharge our manufacturers and engage gardeners.

[5_16]."In all reasoning about prices, the proviso must be understood, '*supposing all parties to take care of their own interest* .'"—Mill,III.i.5.

[5_17].The quantity of life is the same in both cases; but it is differently allotted.

[5_18].The proper offices of middle-men, namely, overseers (or authoritative workmen), conveyancers (merchants, sailors, retail dealers, etc.), and order-takers (persons employed to receive directions from the consumer), must, of course, be examined before I can enter farther into the question of just payment of the first producer. But I have not spoken of them in these introductory papers, because the evils attendant on the abuse of such intermediate functions result not from any alleged principle of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but from private carelessness or iniquity.

[6_1].第一编第四章第一节。节省篇幅起见，后面再涉及密尔先生的著作时，就只标数字，如此处就写作“I. iv. 1”，该书由帕克出版社出版，1848年版，八开两卷本。

[6_2].如果密尔先生想告诉我们消费与出售所产生结果的不同，那他就应该举五金制造商消费而非出售自己产品的例子，同样，银器制造商也消费而非出售自己的产品。他若真这么做了，就会使自己的观点虽然不很有力，但更明确。可能这就是他真正想要持有的论点，即对商品的需求并非对劳动的需求；这一论点暗含了他的理论，也在其他地方阐述过，而本文的结论已表明这个论断是错误的。然而如今经过对密尔先生这段论述的认真研究，我还不敢说其完全是谬论，或是建立在一个更为荒谬的基础上的二级谬论，所以这里还是姑且视它为一个普通的谬误而已。

[6_3].我采用的是赫尔普斯先生在论述战争一文中提到的价格。

[6_4].海关官员把精致的西班牙涂银花瓶打碎，是因为花瓶包含的银有逃税的嫌疑，而工匠制作花瓶花费的心思无此嫌疑。那么，用来把花瓶打碎的斧头有生产性吗？——制作花瓶的艺术家没有生产性？再有，如果樵夫的斧头是有生产性的，那刽子手的斧头呢？又比如说，如果一根绳子中的麻纤维具有生产性，难道一根绞索中麻纤维的生产性大小不是更多地取决于道德因素而非物质使用吗？

[6_5].有花边的金银丝细工饰品，也就是说，总体上以复杂程度，而非以艺术价值取胜的装饰品。

[6_6].比较乔治·赫伯特的诗集《教堂》第28节。

[6_7].“宙斯是贫穷的”——出自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财神普鲁特斯》，第582行，但这句希腊文的意思要参考前面一句来理解——“但他比财神更能让人心地善良，品相端正”。

[6_8].《撒迦利亚书》第五章5：11。

[6_9].最佳的劳动就是有效或有效率的劳动，希腊人称其具有“可衡量性”，或者是

希腊语中的“有价值的”。因此是实实在在的、真实不虚的，所以希腊人称这种劳动的价格为“荣耀的估价”，因为他们认为真正的劳动是神圣的，应当享有神仙般的荣耀。而错误劳动的价格，或那些与生命相悖的劳动的价格，则不是荣耀，而是复仇，对此他们另有一词可以形容，把这种劳动的要价归因于一位名叫底西福涅的女神，也叫“复仇死神”。她对各种恶行锱铢必较，恶有恶报，丝毫不爽；今天的人们作恶，就如向这位女神开了活期账户。

[6_10].最严格意义上的无效劳动，也许就是指不足以有效实现劳动目的、因此不得不从头再来的劳动；那种因不合作而造成的徒劳也是无效劳动。我曾对贝林佐纳地区一个小村庄的牧师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村民们任由提契诺河河水泛滥，冲毁农田。他告诉我，村民们不愿意合力修建高于山谷的有效的大坝，因为大家都认为“那样就等于帮助邻居得到了和自己同样的利益”。于是，每户都只能在自家田地周围堆出较矮的堤坝，而提契诺河随时都可能泛滥肆虐，把田地房屋一冲而光。

[6_11].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养育”，不是“产生”。赞美出现在第七个季节，这第七季既不是最前面的萌芽季节，也不是最后的种植季节，而是中间的结果季节。奇怪的是，人们只对那些凭一时之勇挽救生命者大加赞美，而对长期含辛茹苦养育生命者却不舍得赐福。我们给“拯救生命者”以桂冠，为什么不能给“创造生命者”以花冠？人的生命本来应是完整的，既有躯体还要有灵魂。英国有这么多橡树，足够让他们都戴上荣冠。

[6_12].密尔先生说到生产性消费时，只指那些能带来资本增长或物质财富增加的消费。见I. iii. 4及I. iii. 5.

[6_13].同样，在前面引述过两个妇人抬着巨型量器的异象，“她们的翅膀中有风”，不是我们的《圣经》版本中的“鹳鸟”翅膀，而是拉丁语《圣经》中的一种黑翅猛禽的翅膀，或更准确地说，是在七十士希腊文本圣经中的“戴胜鸟”。这种鸟在许多传说中常与财富力量相联系，这些传说中，它们对金黄色冠毛的追求恐怕是最为有趣的。在阿里斯托芬以鸟为主题的喜剧《鸟》中，就都是这种鸟，尤其有意思的是它们“制砖建城，形成了云中鹄鸪国，就如巴比伦王国”，第一章第550行。再请比较但丁笔下的普路托斯，他（为表现财富如何摧毁理智）是《地狱篇》中唯一不能正常说话而又怯懦无比的幽灵：一方面受到压迫抑制，一方面又口不能言，“张口结舌”。商业经济受到突然打击而惊恐慌乱、手足无措的样子在这个简洁比喻里尽显无遗：“如风鼓船帆，一俟桅杆坍塌，则缆断帆落”。

[6_14].原材料的价值实际上应从劳动价格中扣除，但所参考的部分并未考虑原材料价值问题。密尔先生只关注支付给中间人的工资所带来的结果，以致走入误区。他说：“消费者并不用自己的钱来支付纺织工每天的工资。”对不起，此言差矣。天鹅绒消费者就像给园丁支付工资那样，同样也用自己的钱给纺织工支付了工资。也许他把钱给了作为中间人的船主、天鹅绒商人，以及店主；他要支付运费、店面房租费、损耗

费、时间费，以及保管费，所有这些加起来已超出了天鹅绒的价格（就如给一位优秀园丁的工资要高于草坪的价格一样）。但是生产天鹅绒的资本来自消费者，就如草坪也来自消费者的资本一样，只不过消费者在天鹅绒生产半年后才支付，而对周一为他修理草坪的园丁就不必等到周六下午才支付了。而对于密尔先生的结论“资本不可或缺，买主则可有可无”，我不知是否只是指伦敦的实际情况而言。

[6_15].请注意，这一理论与我们正在讨论的恰好相对。五金商理论要我们解雇园丁而雇用生产商，天鹅绒理论则要我们解雇生产商而雇用园丁。

[6_16].“在一切有关价格的推论中，都必须了解如下的前提条件，即‘假定所有的当事人都关心自己的利益’”。——密尔，III.i.5

[6_17].两种情况中的生命数量相同，但分配方式不同。

[6_18].那些中间人，即监工（或有权势的工人）、货运商（商人、水手、零售商等），以及接单员（接收消费者订单的人），他们的合理地位本应在深入探讨给第一生产人公正报酬这一问题前就进行研究，但我之所以在这些导论文章里没有涉及，是因为这些中间环节出现的丑恶现象，并非由当代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原则所致，而是由个人的疏忽或心术不正所造成的。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英）沃尔特·佩特/著

THE RENAISSANCE

WALTER PATER

文艺复兴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文艺复兴（外研社双语读库）

The Renaissance

沃尔特·佩特 著

李丽 译

目 录

- Two Early French Stories 两则早期法国故事
- Sandro Botticelli 桑德罗·波提切利
- Luca Della Robbia 卢卡·德拉·罗比亚
- The Poetry Of Michelangelo 米开朗琪罗的诗歌
- Leonardo Da Vinci 列奥纳多·达·芬奇
- The School Of Giorgione1 乔尔乔涅画派
- Joachim Du Bellay 乔基姆·杜·贝莱
- Winckelmann 温克尔曼
- Conclusion 结论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Two Early French Stories

两则早期法国故事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ends in France, and carries us away from Italy to the beautiful cities of the country of the Loire. But it was in France also, in a very important sense, that the Renaissance had begun. French writers, who are fond of connecting the creations of Italian genius with a French origin, who tell us how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took not his name only, but all those notions of chivalry and romantic love which so deeply penetrated his thoughts, from a French source, how Boccaccio borrowed the outlines of his stories from the old French fabliaux, and how Dante himself expressly connects the origin of the art of miniature-painting with the city of Paris, have often dwelt on this notion of a Renaissance in the end of the twelf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 Renaissance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middle age itself—a brilliant, but in part abortive effort to do for human life and the human mind what was afterwards done in the fifteenth. The word Renaissance, indeed, is now generally used to denote not merely 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antiquity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d to which the word was first applied, but a whole complex movement, of which that revival of classical antiquity was but one element or symptom. For us the Renaissance is the name of a many-sided but yet united movement, in which the love of the things of the intellect and the imagination for their own sake, the desire for a more liberal and comely way of conceiving life, make themselves felt, urging those who experience this desire

to search out first one and then another means of intellectual or imaginative enjoyment, and directing them not only to the discovery of old and forgotten sources of this enjoyment, but to the divination of fresh sources thereof—new experiences, new subjects of poetry, new forms of art. Of such feeling there was a great out break in the end of the twelf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following century. Here and there, under rare and happy conditions, in pointed architecture, in the doc trines of romantic love, in the poetry of Provence, the rude strength of the middle age turns to sweetness; and the taste for sweetness generated there becomes the seed of the classical revival in it, prompting it constantly to seek after the springs of perfect sweetness in the Hellenic world. And coming after a long period in which this instinct had been crushed, that true “dark age”, in which so many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and imaginative enjoyment had actually disappeared, this outbreak is rightly called a Renaissance, a revival.

文艺复兴的历史结束于法国，我们随它从意大利来到卢瓦尔河畔之国的那些美丽城市。但从某种很重要的意义来说，文艺复兴也开始于法国。法国作家喜欢将意大利天才人物的作品与法国血统联系起来。他们告诉我们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不仅取了个法国式的名字，而且那些深刻影响他思想的骑士精神和罗曼蒂克爱情的全部概念也是来源于法国；还告诉我们薄伽丘是怎样借用法国古代讽刺性寓言诗，构想了他故事的框架；但丁如何明确地把巴黎归为微型画的发源地。法国作家总认为文艺复兴的概念开始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存在于中世纪自身的局限之中——虽然伟大，其中为追求人类生活和人类心灵的一些努力却是落空了，之后在15世纪方才取得了成就。的确，现在，文艺复兴这个词不仅泛指15世纪出现的古典文化复兴（这也是这个词最初使用时的含义所指），而且是指整个错综复杂的运动，这时古典文化复兴只是其中的一个元素或表现。对我们来说，文艺复兴是一场包含多个方面但却各方面统一的运动的代名词。在这场运动中，他们

感知到了对充满智慧的事物和丰富想象力本身的热爱，对用更自由、更美好的方式构想生活的渴望，文艺复兴促使那些感受到这种渴望的人去寻找一个又一个能带来这种智慧和想象之愉悦的方法，并指引他们不仅去发掘这种愉悦感受的古老且被遗忘的源泉，而且去预言其新来源——新的生活体验、新的诗歌主题和艺术形式。这种感觉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有一个巨大的迸发。在极少但令人欣喜的情况下，在尖顶的建筑上、在罗曼蒂克爱情的教义中，在普罗旺斯的诗歌里，到处可见的是中世纪的粗蛮之力变成了美妙芳醇。由此产生的对美妙芳醇的追求变成了文艺复兴中古典复苏的种子，推动着它不停地在古希腊世界里寻觅带来极致芳醇的源泉。在之后的漫长的真正黑暗时代，这种本能被碾得粉碎，无数智慧和想象之愉悦的源泉消失无踪。因此，这次迸发名副其实地被称为文艺复兴，也就是复活。

Theories which bring into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 modes of thought and feeling, periods of taste, forms of art and poetry, which the narrowness of men's minds constantly tends to oppose to each other, have a great stimulus for the intellect, and are almost always worth understanding. It is so with this theory of a Renaissance within the middle age, which seeks to establish a continuity between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work of that period, the sculpture of Chartres, the windows of Le Mans, and the work of the later Renaissance, the work of Jean Cousin and Germain Pilon, thus healing that rupture between the middle age and the Renaissance which has so often been exaggerated. But it is not so much the ecclesiastical art of the middle age, its sculpture and painting—work certainly done in a great measure for pleasure's sake, in which even a secular, a rebellious spirit often betrays itself—but rather its profane poetry, the poetry of Provence, and the magnificent after-growth of that poetry in Italy and France, which those French writers have in view when they speak of this medieval Renaissance. In that poetry, earthly passion, with its intimacy, its freedom, its

variety—the liberty of the heart—makes itself felt; and the name of Abelard, the great scholar and the great lover, connects the expression of this liberty of heart with the free play of human intelligence around all subjects presented to it, with the liberty of the intellect, as that age under stood it.

因人类思维狭隘性而总是对立的不同思维模式、情感模式、不同时期的风格、不同艺术和诗歌形式由理论联系在一起，这些理论对当时的知识界有着极大的刺激，并几乎总是值得人们去理解。中世纪文艺复兴的理论正是如此：寻求在夏尔特尔的雕塑和勒芒的窗等那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和后期文艺复兴中让·古尚、热尔曼·皮隆的作品之间建立一种连续性，以此来弥合通常被人们过分夸大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间的裂痕。但法国作家们谈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所指的，很大程度上不是中世纪的宗教艺术，如雕塑和绘画——这些作品本身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愉悦而创作，却经常会反映出世俗和叛逆的精神——而是那些世俗的普罗旺斯诗歌以及随后其在意大利和法国的繁荣兴起。在那些诗歌中，世俗的激情带着亲密、自由和它的变体——心灵的自由——使诗歌本身被感知。阿伯拉尔这位伟大的学者和伟大的情人的名字，把这种心灵自由的表达和所有可以体现人类智慧的主题的表达，与那个时代所理解的理性的自由结合在一起。

Everyone knows the legend of Abelard, a legend hardly less passionate, certainly not less characteristic of the middle age, than the legend of Tannhäuser; how the famous and comely clerk, in whom Wisdom herself, self-possessed, pleasant, and discreet, seemed to sit enthroned, came to live in the house of a canon of the church of Notre-Dame, where dwelt a girl, Heloïse, believed to be the old priest’s orphan niece; how the old priest had testified his love for her by giving her an education then unrivalled, so that rumor asserted that,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languages, enabling

her to penetrate into the mysteries of the older world, she had become a sorceress, like the Celtic druidesses; and how as Abelard and Heloïse sat together at home there, to refine a little further on the nature of abstract ideas, “Love made himself of the party with them.” You conceive the temptations of the scholar, who, in such dreamy tranquility, amid the bright and busy spectacle of the “Island,” lived in a world of something like shadows; and that for one who knew so well how to assign its exact value to every abstract thought, those restraints which lie on the consciences of other men had been relaxed. It appears that he composed many verses in the vulgar tongue: already the young men sang them on the quay below the house. Those songs, says M. de Rémusat, were probably in the taste of the Trouvères, “of whom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in date, or, so to speak, the predecessor.” It is the same spirit which has molded the famous a “letters”, written in the quaint Latin of the middle age.

大家都知道阿伯拉尔的传奇，他的传奇有着强烈的感情和典型的中世纪特色，毫不逊色于汤豪泽的传奇。这位著名牧师面目俊秀、沉着、亲切、谨慎，仿佛智慧本身即是其主宰。他来到巴黎圣母院，在大教士的房中住下。埃洛伊兹住在那里，据说她是老牧师的侄女，父母双亡。老牧师非常疼爱埃洛伊兹，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有传言说，通过对多种语言的掌握，埃洛伊兹能够解读古老世界的神秘事物，成为凯尔特女巫师那样的魔法师。阿伯拉尔和埃洛伊兹在家里坐在一起，进一步研究某些抽象概念的本质，“爱与他们相伴”。想象一下这位学者当时身处的诱惑吧：沉浸于如梦如幻的宁静中，感受着明丽熙攘的西岱岛的美丽景致，置身于一个幻影般的世界里，对这个深知如何给每个抽象思想以确切价值的学者来说，对别人良心的束缚在他这里却是松懈的。似乎阿伯拉尔用白话文创作了很多诗歌：修道院外码头上那些年轻人都开始把它们唱出来了。M.　德·雷米萨说，那些诗歌可能代表行吟诗人的风格取向，“他是有记载的最早的一位，可

以说是先驱”。同样的精神造就了以高雅的中世纪拉丁文创作的著名书信体诗歌。

At the foot of that early Gothic tower, which the next generation raised to grace the precincts of Abe lard’s school, on the “Mountain of Saint Geneviève,” the historian Michelet sees in thought “a terrible assembly; not the hearers of Abelard alone, fifty bishops, twenty cardinals, two popes, the whole body of scholastic philosophy; not only the learned Heloïse, the teaching of langu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but Arnold3 of Brescia—that is to say, the revolution.” And so from the rooms of this shadowy house by the Seine side we see that spirit going abroad, with its qualities already well defined, its intimacy, its languid sweetness, its rebellion, its subtle skill in dividing the elements of human passion, its care for physical beauty, its worship of the body, which penetrated the early literature of Italy, and finds an echo even in Dante.

后人为了使阿伯拉尔学派辖区优雅化，在“圣热讷维耶沃山”上建了哥特式尖塔。在这个早期的尖塔下面，历史学家米歇尔认为这是“一个可怕的集会——因为它不单单包含了阿伯拉尔的追随者，50位主教、20位红衣主教、两位教皇和整个经院哲学的所有成员；不仅仅囊括学识广博的埃洛伊兹、各种语言的教授和文艺复兴，而且还有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也就是说，还有革命。”从塞纳河边幽暗修道院的房间开始，我们看到这种精神向外传播。这种精神的品质已经得到严密定义，它的亲密、它倦怠的芳醇、它的离经叛道、它对人类情感的巧妙划分、它对躯体美的关注以及它对身体的崇拜贯穿了意大利的早期文学，甚至在但丁的诗歌中也能寻到影子。

That Abelard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Divine Comedy may

appear a singular omission to the reader of Dante, who seems to have inwoven into the texture of his work whatever had impressed him as either effective in color or spiritually significant among the recorded incidents of actual life. Nowhere in his great poem do we find the name, nor so much as an allusion to the story of one who had left so deep a mark on the philosophy of which Dante was an eager student, of whom in the Latin Quarter, and from the lips of scholar or teacher in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during his sojourn among them, he can hardly have failed to hear. We can only suppose that he had indeed considered the story and the man, and abstained from passing judgment as to his place in the scheme of "eternal justice."

对但丁的读者来说，《神曲》中未提及阿伯拉尔似乎仅仅是个疏忽，因为但丁似乎会把所有对他来说印象深刻的、色彩鲜明的或是具有重要精神意义的事情组织到自己的作品中，这些事情都是有史料记载的真实生活。在但丁所有伟大的诗篇中都见不到阿伯拉尔的名字，也很难找到有关在哲学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阿伯拉尔的暗示。而但丁本人曾热衷学习哲学。在巴黎拉丁区逗留时，他从巴黎大学讲学的学者和老师那里，几乎不可能没听到过阿伯拉尔。我们只能认为但丁确实考虑过阿伯拉尔和关于他的故事，但最终避免在"最终审判"框架中对他的评判"永恒正义"框架下对阿伯拉尔地位的批判。

In the famous legend of Tannhäuser, the erring knight makes his way to Rome, to seek absolution at the centre of Christian religion. "So soon," thought and said the Pope, "as the staff in his hand should bud and blossom, so soon might the soul of Tannhäuser be saved, and no sooner" ; and it came to pass not long after that the dry wood of a staff which the Pope had carried in his hand was covered with leaves and flowers. So, in the cloister of

Godstow, a petrified tree was shown of which the nuns told that the fair Rosamond, who had died among them, had declared that, the tree being then alive and green, it would be changed into stone at the hour of her salvation. When Abelard died, like Tannhäuser, he was on his way to Rome. What might have happened had he reached his journey's end is uncertain; and it is in this uncertain twilight that his relation to the general beliefs of his age has always remained. In this, as in other things, he prefigures the character of the Renaissance, that movement in which, in various ways, the human mind wins for itself a new kingdom of feeling and sensation and thought, not opposed to but only beyond and independent of the spiritual sys tem then actually realised. The opposition into which Abelard is thrown, which gives its color to his career, which breaks his soul to pieces, is a no less subtle op position than that between the merely professional, official, hireling ministers of that system, with their ignorant worship of system for its own sake, and the true child of light, the humanist, with reason and heart and senses quick, while theirs were almost dead. He reaches out towards, he attains, modes of ideal living, beyond the prescribed limits of that system, though in essential germ, it may be, contained within it. As always hap pens, the adherents of the poorer and narrower culture had no sympathy with, because no understanding of, a culture richer and more ample than their own. After the discovery of wheat they would still live upon acorns—après l'invention du blé voulaient encore vivre du gland; and would hear of no service to the higher needs of humanity with instruments not of their forging.

在著名的汤豪泽传奇中，这位犯下大错的骑士一路走向罗马这个基督教中心寻求赦免。“立刻，”教皇想道，“只要他的手杖发芽开花，汤豪泽的灵魂就会立刻得救，马上得救。”不久教皇手中的干木手杖

便为绿叶鲜花所覆盖。同样，在哥斯托的修道院里有一棵石化的树，修女们说她们当中死去的美丽的罗莎蒙德曾说过，那棵生机勃勃的绿树在她得救的时候会变成石头。跟汤豪泽一样，阿伯拉尔在去罗马的旅途中死去。没人知道如果他活着到达这次旅行的终点会发生些什么，他和那个时代的普遍信仰之间的关系也永远地处于这种模糊之中。正如在其他事情中一样，他预示了文艺复兴的特点：在这场运动中，人类心灵以各种方式为自己赢得了知觉、情感和思想的新领地，不是与当时存在的精神体系相对立，而是超出和独立在这个范围之外。阿伯拉尔投身于对立面，这使他的事业平添了异样色彩，也撕裂了他的灵魂。这种对立，跟体系内单是专职的、正式的、被雇佣来、但对体系自身盲目崇拜的牧师们与真正具备理性、情感和迅速感知能力这些牧师们已经丧失了的能力的光明之子——人文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如出一辙。阿伯拉尔向宗教体系之外探求，在体系规定的界限外获得了理想的生活模式，虽然这种生活模式最初的萌芽可能也蕴含在体系本身之中。事实往往是这样：贫瘠狭隘文化的拥护者，因为他不能了解比自己更富有、更丰富的文化，所以对这些文化也毫不同情。——就像发现小麦之后他们仍以橡果为生（法语），也乐意听说别人制造的工具对高层次的人类需求毫无用处。

But the human spirit, bold through those needs, was too strong for them. Abelard and Heloïse write their letters—letters with a wonderful outpouring of soul—in medieval Latin; and Abelard, though he composes songs in the vulgar tongue, writes also in Latin those treatises in which he tries to find a ground of reality below the abstractions of philosophy, as one bent on trying all things by their congruity with human experience, who had felt the hand of Heloïse, and looked into her eyes, and tested the resources of humanity in her great and energetic nature. Yet it is only a little later, earl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at French prose romance begins; and in one of the pretty volumes of the Bibliothèque Elzevirienne some of the most striking fragments of it may be

found, edited with much intelligence. In one of these thirteenth-century stories, Li Amitiez de Ami et Amile, that free play of human affection, of the claims of which Abelard's story is an assertion, makes itself felt in the incidents of a great friendship, a friendship pure and generous, pushed to a sort of passionate exaltation, and more than faithful unto death. Such comradeship, though instances of it are to be found everywhere, is still especially a classical motive; Chaucer expressing the sentiment of it so strongly in an antique tale, that one knows not whether the love of both Palamon and Arcite for Emelya, or of those two for each other, is the chiefer subject of the Knight's Tale—

但是，由于这些需求而变得勇敢无畏的人类精神对他们来说过于强大了。阿伯拉尔和埃洛伊兹用中世纪的拉丁文写下他们的书信，这些书信中他们内心的激情奔涌而出；尽管阿伯拉尔用白话文创作诗歌，但他也用拉丁文撰写专著论文，努力在哲学的抽象之中找到现实的基础，就像一个专注于用人类经验来检验事物一致性的人那样，阿伯拉尔触摸埃洛伊兹的手，看着她的双眼，从她伟大且充满活力的本性中寻找人性的本源。然而只是稍晚一些，也就是13世纪早期，法国散文传奇开始流行。在埃尔塞维尔图书馆馆藏的装帧精美的一卷中可以找到一些最为耀眼的片段，这些片段均已用心编辑。《阿米和阿米莱之友谊》是这些13世纪故事中的一篇，它是对人类情感的自由表达，对宣称阿伯拉尔的故事是一种主张的自由表达。这种表达在那种伟大友谊，那种纯洁、高尚友谊的事件中体现出来。这种友谊被推向一种热情四射的狂喜，甚至胜于至死不渝。虽然这样互相支持的伟大友谊随处可见，但它仍然特别是一个古典的主题。乔叟在一个古老的传说里充分表达了这种情感，人们不知道帕拉蒙和阿赛特对埃米莉亚的爱，还有他们两人之间的友爱，哪个是《骑士传奇》的主题——

He cast his eyen upon Emelya,

他把目光投向埃米莉亚，

And therewithal he bleynte and cried, ah!

转身回来，面色苍白“啊”地痛哭出来，

As that he stongen were unto the herte.

好像已被刺到心脏。

What reader does not refer something of the bitterness of that cry to the spoiling, already foreseen, of the fair friendship, which had made the prison of the two lads sweet hitherto with its daily offices?

什么样的读者能不把这哭泣中的痛苦，看成是对他们纯真友谊已在预见之中的破坏呢？而这种友谊的日常滋润曾经使囚禁两个少年的监狱变得舒适温馨。

The friendship of Amis and Amile is deepened by the romantic circumstance of an entire personal resemblance between the two heroes, through which they pass for each other again and again, and thereby into many strange adventures; that curious interest of the Doppelgänger4, which begins among the stars with the

Dioscuri5, being entwined in and out through all the incidents of the story, like an outward token of the inward similitude of their souls. With this, again, is connected, like a second reflection of that inward similitude, the conceit of two marvelously beautiful cups, also exactly like each other—children's cups, of wood, but adorned with gold and precious stones. These two cups, which by their resemblance help to bring the friends together at critical moments, were given to them by the Pope, when he baptised them at Rome, whither the parents had taken them for that purpose, in gratitude for their birth. They cross and recross very strangely in the narrative, serving the two heroes almost like living things, and with that well-known effect of a beautiful object, kept constantly before the eye in a story or poem, of keeping sensation well awake, and giving a certain air of refinement to all the scenes into which it enters. That sense of fate, which hangs so much of the shaping of human life on trivial objects, like Othello's strawberry handkerchief, is thereby heightened, while witness is borne to the enjoyment of beautiful handiwork by primitive people, their simple wonder at it, so that they give it an oddly significant place among the factors of a human history.

阿米和阿米莱两位英雄面容相似的神奇状况使他们的友谊加深，他们常被错认成对方，因此也经历了许多奇异的冒险。对同面之人充满好奇的兴趣开始于迪奥斯库里兄弟的双子星，如同他们内在灵魂相似性的外在特征一样始终贯穿在故事的所有事件里。此外与之相联系的、像是第二个表现这种内在相似表象的是对两个出奇美丽、而且十分相似的酒杯的巧妙构思。这两个酒杯是那种孩子用的木杯，但镶着黄金和宝石，它们的相同曾在关键时刻帮助两位朋友相聚。杯子是阿米和阿米莱两位英雄的父母把他们带到教皇那里接受洗礼、感激他们的降生时教皇赐给两人的。在故事里，两个杯子一次又一次奇异地彼此交会，像有生命的生灵一样帮助两位英雄。因为有着美丽物品众所

周知的作用，它们一直出现在小说或诗歌中，一直起到唤起感情、带给所有它出现的场景以某种高雅优美氛围的作用。那种非常依赖平凡事物，比如奥德赛的草莓手帕，来塑造人类生活的命运感因此得到了强化。而初民对精美手工艺品所感受的快乐，他们对它感到的纯粹的惊叹，就会在人类历史各种因素中给予它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

Amis and Amile, then, are true to their comradeship through all trials; and in the end it comes to pass that at a moment of great need Amis takes the place of Amile in a tournament for life or death. “After this it happened that a leprosy fell upon Amis, so that his wife would not approach him, and wrought to strangle him. He departed therefore from his home, and at last prayed his servants to carry him to the house of Amile” ; and it is in what follows that the curious strength of the piece shows itself:—

阿米和阿米莱经受了所有考验，证明了对这份友谊的忠诚。最后在紧急时刻阿米替代阿米莱参加了生死决斗。“这之后阿米患上了麻风病，他的妻子都不愿意接近他，还想办法勒死他。阿米离开了自己的家，最终恳求他的仆人把他送到阿米莱家里”；这种神奇的力量在下面这段里不言而喻：

“His servants, willing to do as he commanded, carried him to the place where Amile was; and they began to sound their rattles before the court of Amile’s house, as lepers are accustomed to do. And when Amile heard the noise he commanded one of his servants to carry meat and bread to the sick man, and the cup which was given to him at Rome filled with good wine. And when the servant had done as he was commanded, he returned and said, Sir, if I had not thy cup in my hand, I should believe that the cup which the sick

man has was thine, for they are alike, the one to the other, in height and fashion. And Amile said, Go quickly and bring him to me. And when Amis stood before his comrade Amile demanded of him who he was, and how he had gotten that cup. I am of Briquain le Chastel, answered Amis, and the cup was given to me by the Bishop of Rome, who baptised me. And when Amile heard that, he knew that it was his comrade Amis, who had delivered him from death, and won for him the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France to be his wife. And straightway he fell upon him, and began weeping greatly, and kissed him. And when his wife heard that, she ran out with her hair in disarray, weeping and distressed exceedingly, for she remembered that it was he who had slain the false Ardres. And thereupon they placed him in a fair bed, and said to him, Abide with us until God's will be accomplished in thee, for all we have is at thy service. So he and the two servants abode with them.

“他的仆人，欣然按照他的要求把他带到阿米莱那里，按当地麻风病人的习惯，他们开始在阿米莱家庭院前摇响拨浪鼓。阿米莱听到了声音，命令自己一个仆人拿肉和面包送给这个病人，还用在罗马得到的杯子盛满了美酒给他。仆人按照主人的命令做完这些事后回来对主人说，主人，如果我手里没有拿着您的杯子，我会认为那个病人的杯子是您的。因为两个杯子彼此很相似，不管是高度还是样式。阿米莱说，赶快去把他带到我这里。当阿米站到阿米莱面前，阿米莱问他是谁，怎么得到那个杯子的。阿米回答，我来自布里奎恩勒沙泰尔,为我做洗礼的罗马教皇给了我这个杯子。阿米莱听到这里知道了，这个人就是救他一命、为他娶到法兰西国王女儿的兄弟阿米。阿米莱立即扑到阿米身上开始嚎啕大哭，并亲吻他。阿米莱的妻子听到了这件事，披散着头发就跑了出来。她大声哭泣，极度悲伤，因为她记得是阿米杀死了假阿尔德雷。于是两人把阿米安置到华丽的床榻上对他说，在上帝的意志在你身上实现之前,和我们在一起吧。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供你使用。阿米以及两个仆人和他们住在了一起。

“And it came to pass one night, when Amis and Amile lay in one chamber without other companions, that God sent His angel Raphael to Amis, who said to him, Amis, art thou asleep? And he, supposing that Amile had called him, answered and said, I am not asleep, fair comrade! And the angel said to him, Thou hast answered well, for thou art the comrade of the heavenly citizens. — I am Raphael, the angel of our Lord, and am come to tell thee how thou mayest be healed; for thy prayers are heard. Thou shalt bid Amile, thy comrade, that he slay his two children and wash thee in their blood, and so thy body shall be made whole. And Amis said to him, Let not this thing be, that my comrade should become a murderer for my sake. But the angel said, It is convenient that he do this. And thereupon the angel departed.

“一天晚上，阿米和阿米莱两个人在房间里躺着，周围没有其他人。上帝派他的天使拉弗尔来见阿米。拉弗尔对他说，阿米，你睡了吗？阿米以为是阿米莱在叫他，于是回答，我没有睡着，亲爱的兄弟！天使对他说，你回答得很好，因为你是天国居民的好兄弟。——我是拉弗尔，我主的天使。我来告诉你，你会好起来的，你的祈祷上帝听到了。你要吩咐你的好兄弟阿米莱，让他杀掉自己的两个孩子，用他们的鲜血给你沐浴，你的身体就会复原。阿米对天使说：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样我的兄弟就为我变成凶手了。但是天使说，这样做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说完天使就离去了。

“And Amile also, as if in sleep, heard those words; and he awoke and said, Who is it, my comrade, that hath spoken with thee? And Amis answered, No man; only I have prayed to our Lord, as I am accustomed. And Amile said, Not so! but some one hath spoken with thee. Then he arose and went to the door of the

chamber; and finding it shut he said, Tell me, my brother, who it was said those words to thee to-night. And Amis began to weep greatly, and told him that it was Raphael, the angel of the Lord, who had said to him, Amis, our Lord commands thee that thou bid Amile slay his two children, and wash thee in their blood, and so thou shalt be healed of thy leprosy. And Amile was greatly disturbed at those words, and said, I would have given to thee my man-servants and my maid-servants and all my goods, and thou feignest that an angel hath spoken to thee that I should slay my two children. And immediately Amis began to weep, and said, I know that I have spoken to thee a terrible thing, but constrained thereto; I pray thee cast me not away from the she1ter of thy house. And Amile answered that what he had covenanted with him, that he would perform, unto the hour of his death: But I conjure thee, said he, by the faith which there is between me and thee, and by our comradeship, and by the baptism we received together at Rome, that thou tell me whether it was man or angel said that to thee. And Amis answered again, So truly as an angel hath spoken to me this night, so may God deliver me from my infirmity!

“似乎睡着了的阿米莱也听到了这番对话。他睁开眼睛问，刚才是谁，好兄弟，跟你说话的那个？阿米回答，没人跟我说话，只是我照习惯在跟上帝祷告。阿米莱说，不对！有人在跟你说话。他起身走到卧室门口，看见门是关着的。他说，告诉我，兄弟，今晚跟你说那些话的人是谁？阿米开始大声哭泣，他告诉阿米莱刚才是上帝的天使拉弗尔在对他说，阿米，我们的上帝要求你请求阿米莱杀掉他的两个孩子，用鲜血给你沐浴，就能治愈你的麻风病。阿米莱听到这些深感不安。他说，我本来要把我所有的男女仆人和所有的财产都给你，而你却假装有天使告诉你，让我杀掉我的两个孩子。阿米马上哭了起来，他说，我知道我对你说了很可怕的事，但是我也很难过，我恳求你不要把我赶出你的房子。阿米莱回答说会履行对阿米的承诺，直到

他死去的那一刻。但是阿米莱说，我恳求你，看在你我之间的信任、你我之间的兄弟之情和我们同在罗马接受洗礼的份上，你告诉我到底是人还是天使对你说了那些话。阿米再一次回答，今天晚上的的确确是一个天使对我说的那番话，愿上帝拯救我摆脱病魔！

“Then Amile began to weep in secret, and thought within himself : If this man was ready to die before the king for me, shall I not for him slay my children? Shall I not keep faith with him who was faithful to me even unto death? And Amile tarried no longer, but departed to the chamber of his wife, and bade her go hear the Sacred Office. And he took a sword, and went to the bed where the children were lying, and found them asleep. And he lay down over them and began to weep bitterly and said, Hath any man yet heard of a father who of his own will slew his children? Alas, my children! I am no longer your father, but your cruel murderer.

“然后阿米莱开始偷偷地哭泣。他自忖：如果这个人愿意在国王面前为我而死，我不应该为他牺牲我的孩子吗？我不应该忠诚于这个愿意到死都忠于我的人吗？于是阿米莱不再耽搁，走到妻子的卧室，让她去听圣所听道。然后他拿出剑，走到孩子们睡觉的床边，看见他们已睡着。他俯身在孩子身上，开始痛苦地哭泣起来，边哭边说，有人听说过哪个父亲会亲手杀掉自己的亲生孩子吗？天啊，我的孩子！我不再是你们的父亲，而是杀害你们的残忍的凶手了！

“And the children awoke at the tears of their father, which fell upon them; and they looked up into his face and began to laugh. And as they were of the age of about three years, he said, Your laughing will be turned into tears, for your innocent blood must now be shed, and therewith he cut off their heads. Then he laid

them back in the bed, and put the heads upon the bodies, and covered them as though they slept: and with the blood which he had taken he washed his comrade, and said, Lord Jesus Christ! who hast commanded men to keep faith on earth, and didst heal the leper by Thy word! cleanse now my comrade, for whose love I have shed the blood of my children.

“父亲的眼泪落到孩子们身上，孩子们醒来了。他们看着父亲的脸，笑了起来。两个孩子才不过3岁左右大。他说，你们的欢笑即将变成泪水了，因为你们无辜的鲜血将要流出。于是他斩下孩子的头，然后把他们重新放回床上，将头放在身体上，给他们盖好被子，他们看起来就如同睡着了一般。阿米莱用这取来的鲜血清洗他的兄弟，他说道，上帝耶稣救世主啊！您要求大地上的人们信守承诺，您一定要遵守承诺治好他的麻风病！现在治好我的兄弟吧，为了他的爱，我让自己的孩子流尽了鲜血。

“Then Amis was cleansed of his leprosy. And Amite clothed his companion in his best robes; and as they went to the church to give thanks, the bells, by the will of God, rang of their own accord. And when the people of the city heard that, they ran together to see the marvel. And the wife of Amile, when she saw Amis and Amile coming, asked which of the twain was her husband, and said, I know well the vesture of them both, but I know not which of them is Amile. And Amile said to her, I am Amile, and my companion is Amis, who is healed of his sickness. And she was full of wonder, and desired to know in what manner he was healed. Give thanks to our Lord, answered Amile, but trouble not thyself as to the manner of the healing.

“于是阿米的麻风病痊愈了，阿米莱给阿米穿上自己最好的袍子。然后他们去教堂谢恩，而教堂的钟按照上帝的旨意自动鸣响起来。城中的人们听到钟声，一起跑来看这件奇事。阿米莱的妻子看到阿米和阿米莱走过来，就问这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哪个是自己的丈夫。她说，我认得他们俩的衣服，但我不知道谁是阿米莱。阿米莱对她说，我是，跟我一起来的同伴是阿米，他的病已经全好了。阿米莱的妻子满腹不解，很想知道阿米的病是如何治好的。对上帝谢恩吧，阿米莱回答，不必知道是什么方法了。

“Now neither the father nor the mother had yet entered where the children were; but the father sighed heavily, because they were dead, and the mother asked for them, that they might rejoice together; but Amile said, Dame! let the children sleep. And it was already the hour of Tierce. And going in alone to the children to weep over them, he found them at play in the bed; only, in the place of the sword-cuts about their throats was as it were a thread of crimson. And he took them in his arms and carried them to his wife and said, Rejoice greatly, for thy children whom I had slain by the commandment of the angel are alive, and by their blood is Amis healed.”

“父亲和母亲都还没有进过孩子们的房间，可父亲重重地叹气，因为两个孩子已经死了。母亲要去找来两个孩子和大家一起庆祝。但是阿米莱说，夫人！让孩子们睡觉吧。已经到了第三次祷告时间，阿米莱一个人走到孩子房间，想要大哭一场。可他发现自己的孩子在床上玩耍，只是他们喉咙处的剑伤像一条暗红的细线。他把两个孩子抱起来，带到妻子那里说：天大的喜事啊！因为我遵照天使圣训杀掉的我们的孩子现在还活着，是他们的血救活了阿米。”

There, as I said, is the strength of the old French story. For the Renaissance has not only the sweetness which it derives from the classical world, but also that curious strength of which there are great resources in the true middle age. And as I have illustrated the early strength of the Renaissance by the story of Amis and Amile, a story which comes from the North, in which a certain racy Teutonic flavor is perceptible, so I shall illustrate that other element, its early sweetness, a languid excess of sweetness even, by another story printed in the same volume of the Bibliothèque Elzevirienne, and of about the same date, a story which comes, characteristically, from the South, and connects itself with the literature of Provence.

正如我说的，这就是古老法国故事的力量。文艺复兴不仅仅具有源自古典世界的美妙芳醇，还有大量来自真实的中世纪时代资源的神奇力量。我用这个来自北部，保持了某种日耳曼原有风格的阿米和阿米莱的故事，展现了文艺复兴的早期力量；所以我将用另外一个也保存在埃尔塞维尔图书馆同一卷书中，几乎是同一时期的，源于南部、和普罗旺斯文学有着联系的故事来解释文艺复兴的另一个元素——它早期的、甚至是过度倦怠的美妙芳醇。

The central love-poetry of Provence, the poetry of the Tenson and the Aubade, of Bernard de Ventadour and Pierre Vidal, is poetry for the few, for the elect and peculiar people of the kingdom of sentiment. But below this intenser poetry there was probably a wide range of literature, less serious and elevated, reaching, by lightness of form and comparative homeliness of interest, an audience which the concentrated passion of those higher lyrics left untouched. This literature has long since perished, or lives only in later French or Italian versions. One such version, the only representative of its species, M. Faurie1 thought he detected in the

story of Aucassin and Nicolette, written in the French of the latter half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nd preserved in a unique manuscript,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aris; and there were reasons which made him divine for it a still more ancient ancestry, traces in it of an Arabian origin, as in a leaf lost out of some early Arabian Nights . (Recently, Aucassin and Nicolette has been edited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much graceful scholarship, by Mr. F. W. Bourdillon. Still more recently we have had a translation—a poet's translation—from the ingenious and versatile pen of Mr. Andrew Lang. The reader should consult also the chapter on "The Out-door Poetry," in Vernon Lee's most interesting Euphorion; being Studies of the Antique and Mediaeval in the Renaissance, a work abounding in knowledge and insight on the subjects of which it treats.) The little book loses none of its interest through the criticism which finds in it only a traditional subject, handed on by one people to another; for after passing thus from hand to hand, its outline is still clear, its surface untarnished; and, like many other stories, books,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ceptions of the middle age, it has come to have in this way a sort of personal history, almost as full of risk and adventure as that of its own heroes. The writer himself calls the piece a cantefable, a tale told in prose, but with its incidents and sentiment helped forward by songs, inserted at irregular intervals. In the junctions of the story itself there are signs of roughness and want of skill, which make one suspect that the prose was only put together to connect a series of songs—a series of songs so moving and attractive that people wished to heighten and dignify their effect by a regular framework or setting. Yet the songs themselves are of the simplest kind, not rhymed even, but only imperfectly assonant, stanzas of twenty or thirty lines apiece, all ending with a similar vowel sound. And here, as elsewhere in that early poetry, much of the interest lies in the spectacle of the formation of a new artistic sense. A novel art is arising, the music of

rhymed poetry, and in the songs of Aucassin and Nicolette , which seem always on the point of passing into true rhyme, but which halt some-how, and can never quite take flight, you see people just growing aware of the elements of a new music in their possession, and anticipating how pleasant such music might become.

普罗旺斯主要的爱情诗，贝尔纳·德·旺塔杜尔和皮埃尔·维达尔所写的《对嘲诗》和《晨歌》，是为少数人而作的，是为情感王国里那些特权人士而作的。但是在这些更为强烈的诗歌之下可能是更广泛的文学，它们不那么严肃和高高在上，而是借助灵活的形式和相对朴素的趣味来影响读者，而这些读者是被那些更高一等的抒情诗里浓烈的激情所忽略的。这种文学已经湮灭很久了，或者说只在后来的法国或意大利译本中存在。M.　福里埃尔认为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译本，是这种文学的唯一代表。这就是《奥卡森与尼克莱特》，在13世纪下半叶用法语写成，现在唯一的手稿保存在巴黎国家博物馆。有理由令M.福里埃尔推测，它有一个更为古老的血统，在里面有阿拉伯根基的迹象，如同从早期的《一千零一夜》上掉落的一片叶子。（近期，《奥卡森与尼克莱特》一书由F. W. 鲍迪伦编辑翻译成英文版，具有很典雅的学术气息。最近，独具匠心多才多艺的诗人安德鲁·朗又对它进行了翻译。读者也可以参考弗农·李所著的饶有趣味的《欧福良：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古典研究》中“户外诗歌”的有关篇章，这本书对所探讨的主题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见解。——作者注）这本书并未因其中只包含一个在各民族间流传的传统主题的批判而丧失任何趣味性；因为，虽然经历了代代相传，这一主题的轮廓依然清晰，外表也一样光泽依旧。同其他中世纪的故事、书籍、文学和艺术概念一样，它也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一种个性化的历史，这段历史几乎和书中主人公的经历一样，充满了危险和冒险。作者自己把这一篇称作民间叙事传奇。这种传奇是散文的形式，只是以不规则地穿插进诗歌的方式表现事件和情感。故事本身在衔接处有些粗糙的痕迹，也表现出缺乏技巧，让人们怀疑散文的作用只是将一系列诗歌连接在一起。这些诗歌极为动人，极为引人入胜，人们都希望通过一个规则的框架或结构来

使它们具有更高、更尊贵的影响。然而这些诗歌本身极为简单，甚至都不押韵。它们只是采用不够完美的类韵，每节有20行或30行，以相似的元音结尾。正如其他早期诗歌一样，这里的兴趣主要在于新的艺术感觉的形成这幅壮美图景上。一种新的艺术正在兴起。那些押韵诗歌的韵律，还有《奥卡森与尼克莱特》中那些诗歌，好像一直在成为真正押韵的转折点上，但不知为何停顿下来，永远无法恰到好处。你可以看到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拥有的新韵律元素，而且对于这种韵律能够变得多么美好满怀期待。

The piece was probably intended to be recited by a company of trained performers, many of whom, at least for the lesser parts, were probably children. The songs are introduced by the rubric, Or se cante (ici on chante); and each division of prose by the rubric, Or dient et con tent et fabloient (ici on conte). The musical notes of a portion of the songs have been preserved; and some of the details are so descriptive that they suggested to M. Fauriel the notion that the words had been accompanied throughout by dramatic action. That mixture of simplicity and refinement which he was surprised to find in a composit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is shown sometimes in the turn given to some passing expression or remark; thus, “the Count de Garins was old and frail, his time was over” — Li quens Garins de Beaucaire estoit vix et frales; si avoit son tans trespassè. And then, all is so realised! One sees the ancient forest, with its dis used roads grown deep with grass, and the place where seven roads meet—u a forkeut set cemin qui s’en vont par le païs, we hear the light-hearted country people calling each other by their rustic names, and putting for ward, as their spokesman, one among them who is more eloquent and ready than the rest—li un qui plus fu en parlés des autres; for the little book has its burlesque element also, so that one hears the faint, far-off laughter still. Rough as it is, the piece certainly possesses this high quality of poetry, that it aims

at a purely artistic effect. Its subject is a great sorrow, yet it claims to be a thing of joy and refreshment, to be entertained not for its matter only, but chiefly for its manner, it is cortois, it tells us, et bien assis.

这个故事可能是要让一群训练有素的表演者来朗诵，他们中许多人，或者至少有一小部分，可能是儿童。这些民歌标有提示语：此处吟唱；散文的划分也是靠标题：此处叙述。这些民歌中一部分的律音保留了下来，其中一些细节描述得如此详尽，向M.福里埃尔暗示了这样一个概念：这些文字曾经一直是伴着戏剧表演的。他对在13世纪的作品中发现简约和高雅的结合感到讶异，这种结合有时是一些简短的表达或评价。因此，“德加林伯爵年老体弱，他的时代结束了。”于是，一切就这样完成了！人们看到远古的森林，废弃的小路长满杂草，七条路汇合在一起的交叉口。我们听到无忧无虑的乡下人呼唤着彼此土得掉渣的名字，其中一个最能言善辩反应机敏的人被推选出来，作为他们的发言人。这一本小书也有自我嘲讽的成分，所以还能听到微弱而遥远的笑声。虽然粗糙，但它的确具备了诗歌的这种高层次品质，它的目标就是达到纯粹的艺术效果。它的主题虽然极为悲伤，却声称自己可以让人感到快乐和心旷神怡。这种愉悦不仅仅来自于其内容，而主要是它的风格，它告诉我们“这是风格，而且有稳固的基础”。

For the student of manners, and of the old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t has much interest of a purely antiquarian order. To say of an ancient literary com position that it has an antiquarian interest, often means that it has no distinct aesthetic interest for the reader of to-day. Antiquarianism, by a purely historical effort, by putting its object in perspective, and setting the reader in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from which what gave pleasure to the past is pleasurable for him also, may often add greatly to the charm we

receive from ancient literature. But the first condition of such aid must be a real, direct, aesthetic charm in the thing itself. Unless it has that charm, unless some purely artistic quality went to its original making, no merely antiquarian effort can ever give it an aesthetic value, or make it a proper subject of aesthetic criticism. This quality, wherever it exists, it is always pleasant to define, and discriminate from the sort of borrowed interest which an old play, or an old story, may very likely acquire through a true antiquarianism. The story of Aucassin and Nicolette has something of this quality. Aucassin, the only son of Court Garins of Beaucaire, is passionately in love with Nicolette, a beautiful girl of unknown parentage, bought of the Saracens, whom his father will not permit him to marry. The story turns on the adventures of these two lovers, until at the end of the piece their mutual fidelity is rewarded. These adventures are of the simplest sort, adventures which seem to be chosen for the happy occasion they afford of keeping the eye of the fancy, perhaps the outward eye, fixed on pleasant objects, a garden, a ruined tower, the little hut of flowers which Nicolette constructs in the forest whither she escapes from her enemies, as a token to Aucassin that she has passed that way. All the charm of the piece is in its details, in a turn of peculiar lightness and grace given to the situations and traits of sentiment, especially in its quaint fragments of early French prose.

对于风格的研究者，以及古法语和法国文学的学生来说，它很有纯古物研究的趣味。说一篇古代文学作品具备古物研究的意义，通常意味着它对当今的读者来说没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古物研究通过纯粹的历史研究，正确地透视客体，把读者定位于在过去能带来愉快的东西对当今读者产生同样效果的观点中，因此古物研究可能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从古典文学中获得的魅力。但这种促进的先决条件必须是事物本身具有真实直接的美学魅力。只有具备这种魅力，只有

一些纯粹的艺术特质存在于它最初的构成中，古文物研究才能成就它的审美价值，或者使它成为一个合适的审美批评主题。不论这种特质存在于哪里，将其界定，把它和一部古老戏剧或故事由于真正古物研究而很可能获得的、某些借来的趣味区别开来总是令人愉悦的。奥卡森与尼克莱特的故事也具备这样的特质，奥卡森是博凯尔的德加林伯爵的独生子，他热切地爱上了尼克莱特。美丽动人却出身不明的尼克莱特是阿拉伯人买来的。奥卡森的父亲不准他和尼克莱特结婚。故事铺陈描述这对恋人的冒险之旅，直到故事最后两个人对彼此的忠诚终于获得了回报。这些冒险是最为简单不过的冒险，好像是专为吸引那些外在的、想象的目光而选择的；这些目光专注于一些赏心悦目的事物上，比如说一个花园，一个荒废的高塔，还有尼克莱特从敌人那里逃出来后，在森林里盖起的、告诉奥卡森她由此经过的小花房。这个故事所有的魅力都在它的细节中，在其加诸情感的情境和特性上的特殊的轻盈优雅的转承中，尤其是在早期法国散文怪异的零散作品中多有体现。

All through it one feels the influence of that faint air of overwrought delicacy, almost of wantonness, which was so strong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poetry of the Troubadours. The Troubadours themselves were often men of great rank; they wrote for an exclusive audience, people of much leisure and great refinement, and they came to value a type of personal beauty which has in it but littl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open air and sunshine. There is a languid Eastern deliciousness in the very scenery of the story, the full-blown roses, the chamber painted in some mysterious manner where Nicolette is imprisoned, the cool brown marble, the almost nameless colors, the odors of plucked grass and flowers. Nicolette herself well becomes this scenery, and is the best illustration of the quality I mean—the beautiful, weird, foreign girl, whom the shepherds take for a fay, who has the knowledge of simples, the healing and beautifying qualities of leaves and flowers, whose

skilful touch heals Aucassin's sprained shoulder, so that he suddenly leaps from the ground; the mere sight of whose white flesh, as she passed the place where he lay, healed a pilgrim stricken with sore disease, so that he rose up, and re turned to his own country. With this girl Aucassin is so deeply in love that he forgets all knightly duties. At last Nicolette is shut up to get her out of his way, and perhaps the prettiest passage in the whole piece is the fragment of prose which describes her escape:—

统篇作品中，人们都能感受到那种过于精细的、几近嬉戏的朦胧氛围的影响。这是行吟诗人作品的典型特色。行吟诗人本身常常是特权阶层，他们为少数人写作：这些人举止高雅，很有闲情逸致。他们欣赏一种身体美，这是一种很少接触外面的空气和阳光的身体美。这个故事的景致中有某些倦怠的东方韵味：盛开的玫瑰、囚禁尼克莱特的以某种神秘方式粉刷的房间、冰冷的棕色大理石、几乎无法言说的颜色、摘下的花草的气味。尼克莱特自己也恰如其分地融入这景色中，成为我所指的这种特质的最好例证——被牧羊人当成了仙子的美丽、奇异的异族女孩：她有简单的知识，有叶子和花朵那种医治伤痛和美化的特质。她娴熟的手法治好了奥卡森扭伤的肩膀，于是他马上从地上跳了起来。只是在她经过时看她白白的肌肤一眼，就治愈了一个躺在地上、被恶疾折磨的朝圣者，于是这个朝圣者站起来，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奥卡森如此深爱这个女孩，以至于忘记了他骑士的职责。最终尼克莱特被囚禁起来，以使她不能影响奥卡森。故事全篇最美的一段可能就是描述她逃跑的那段：

"Aucassin was put in prison, as you have heard, and Nicolette remained shut up in her chamber. It was summer time, in the month of May, when the days are warm and long and clear, and the nights coy and serene.

“正如你们所听说的，奥卡森被投入监牢，尼克莱特仍被关在她的房间里。当时是夏天，五月的天气白天很温暖，白昼很长，天空晴朗，夜晚安然宁静。

“One night Nicolette, lying on her bed, saw the moon shine clear through the little window, and heard the nightingale sing in the garden, and then came the memory of Aucassin, whom she so much loved. She thought of the Count Garins of Beaucaire, who mortally hated her, and, to be rid of her, might at any moment cause her to be burned or drowned. She perceived that the old woman who kept her company was asleep; She rose and put on the fairest gown she had; she took the bed clothes and the towels, and knotted them together like a cord, as far as they would go. Then she tied the end to a pillar of the window, and let herself slip down quite softly into the garden, and passed straight across it, to reach the town.

“一天晚上尼克莱特躺在她的床上，看见明亮的月光透过小窗清澈地照进来，听到夜莺在花园里歌唱，于是想起了深爱的奥卡森。她想起对自己恨之入骨的博凯尔的德加林伯爵。他为了除掉她，可能随时让人把她烧死或者溺死。她觉得看管她的老妇人已经睡着，就起来穿上她最美的长袍，拿上床单和毛巾，把它们系在一起做成尽量长的绳索。然后她把绳索的一头系到一根窗柱上，自己顺着绳子轻轻滑下，落到花园里，然后径直穿过花园走向镇上。

“Her hair was yellow in small curls, her smiling eyes blue-green, her face clear and feat, the little lips very red, the teeth small and white; and the daisies which she crushed in passing, holding her skirt high behind and before, looked dark against her feet; the

girl was so white!

“她的黄发微卷着，她微笑的眼睛蓝中带绿，她的脸庞干净美丽，她的小嘴红润，牙齿细碎洁白。她高高提起的裙子前后飘摇，经过之处踩压的雏菊跟她的双脚一比都变黑了，这个女孩好白啊！

“She came to the garden-gate and opened it, and walked through the streets of Beaucaire, keeping on the dark side of the way to be out of the light of the moon, which shone quietly in the sky. She walked as fast as she could, until she came to the tower where Aucassin was. The tower was set about with pillars, here and there. She pressed herself against one of the pillars, wrapped herself closely in her mantle, and putting her face to a chink of the tower, which was old and ruined, she heard Aucassin crying bitterly within, and when she had listened awhile she began to speak.”

“她走到花园的门口打开门，穿过博凯尔的街道。月亮正在天空中安静地照耀着，她一直走在街道的暗处来躲开明亮的月光。她尽量快走，来到奥卡森所在的尖塔。塔下面零零落落地支着些柱子，她紧贴着一根柱子，把自己紧紧裹在披肩里，将头伸向尖塔的裂口。在坏旧破损的裂口里，她听到奥卡森在里面痛苦地哭泣。听了一会儿，她开始说话了。”

But scattered up and down through this lighter matter, always tinged with humor and often passing into burlesque, which makes up the general substance of the piece, there are morsels of a different quality, touches of some intenser sentiment, coming it would seem from the profound and energetic spirit of the Provensal

poetry itself, to which the inspiration of the book has been referred. Let me gather up these morsels of deeper color, these expressions of the ideal intensity of love, the motive which really unites together the fragments of the little composition. Dante, the perfect flower of ideal love, has recorded how the tyranny of that “Lord of terrible aspect” became actually physical, blinding his senses, and suspending his bodily forces. In this, Dante is but the central expression and type of experiences known well enough to the initiated, in that passionate age. Aucassin represents this ideal intensity of passion—

但这个比较轻松的事情里随处可见的总是一些幽默色彩，它们还常常演变成滑稽可笑的成分，它们一起组成了这个故事的基本内容。但是故事里还有一些不同的特质和一些对强烈情感的触碰，这些可能是来自普罗旺斯诗歌本身深邃而充满活力的精神，而这本书的灵感也是由此而来。让我把这些更浓重的色彩、理想化的强烈爱情的表达和把这篇短小作品各个部分联结在一起的主题集中起来。但丁，这个理想之爱的完美花朵，记录了“长相可怖的上帝”的暴政怎么样变得实在了起来：他的感觉被剥夺，他身体的力量被阻断。在这里，但丁只是那个激进时代里开创者熟知的核心的表达和经验的典型。奥卡森代表了这种强烈感情的理想程度：

Aucassin , li biax, li blons,

奥卡森英俊翩翩，头发金黄，

Li gentix, li amorous;—

高贵勇敢而又满怀深情；——

the slim, tall, debonair, dansellon, as the singers call him, with his curled yellow hair, and eyes of vair, who faints with love, as Dante fainted, who rides all day through the forest in search of Nicolette, while the thorns tear his flesh, so that one might have traced him by the blood upon the grass, and who weeps at eventide because he has not found her, who has the malady of his love, and neglects all knightly duties. Once he is induced to put himself at the head of his people, that they, seeing him before them, might have more heart to defend themselves; then a song relates how the sweet, grave figure goes forth to battle, in dainty, tight- laced armor. It is the very image of the Provensal love-god, no longer a child, but grown to pensive youth, as Pierre Vidal met him, riding on a white horse, fair as the morning, his vestment embroidered with flowers. He rode on through the gates into the open plain beyond. But as he went, that great malady of his love came upon him. The bridle fell from his hands; and like one who sleeps walking, he was carried on into the midst of his enemies, and heard them talking together how they might most conveniently kill him.

歌者说他是纤细、高大、温文尔雅的舞者，他有着黄色卷发和蓝色眼睛，像但丁一样沉迷在爱中。奥卡森整天骑马穿梭在森林里寻找尼克莱特，荆棘刺破他的皮肉，使得人们可以循着草上的血迹找到他；他在黄昏里哭泣，因为仍未找到尼克莱特；他患上了爱情之疾，忘记了骑士所有的职责。他曾经被劝导去率领他的百姓，人们看到有他来率领大家，便会有更多的信心来保卫自己。接下来一段歌谣描述了这位温柔、庄重的骑士紧束着讲究的战甲去冲锋陷阵的场景。这正是普罗旺斯爱情之神的写照：他不再是孩子，而是长大的深沉青年，正如皮埃尔·维达尔看到的那样，他骑在白马上，穿着绣有花朵的外

衣，就如同清晨一样美好。他骑马走出大门，走向外面空旷的平原。但是爱情的顽疾降临到他头上，缰绳从手中滑落，他仿佛梦游的人一般，被带到敌人中间，听到他们在一起讨论如何最轻松地杀掉他。

One of the strongest characteristics of that outbreak of the reason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at assertion of the liberty of the heart, in the middle age, which I have termed a medieval Renaissance, was its antinomianism, its spirit of rebellion and revolt against the moral and religious ideas of the time. In their search after the pleasures of the senses and the imagination, in their care for beauty, in their worship of the body, people were impelled beyond the bounds of the Christian ideal; and their love became sometimes a strange idolatry, a strange rival religion. It was the return of that ancient Venus, not dead, but only hidden for a time in the caves of the Venusberg, of those old pagan gods still going to and fro on the earth, under all sorts of disguises. And this element in the middle age, for the most part ignored by those writers who have treated it pre-eminently as the “Age of Faith” —this rebellious and antinomian element, the recognition of which has made the delineation of the middle age by the writers of the Romantic school in France, by Victor Hugo for in stance in Notre-Dame de Paris so suggestive and ex citing—is found alike in the history of Abelard and the legend of Tannhäuser. More and more, as we come to mark changes and distinctions of temper in what is often in one all-embracing confusion called the middle age, that rebellion, that sinister claim for liberty of heart and thought, comes to the surface. The Albigensian movement, connected so strangely with the history of Provensal poetry, is deeply tinged with it. A touch of it makes the Franciscan6 order, with its poetry, its mysticism, its “illumina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eligious authority, justly suspect. It influences the thoughts of those obscure prophetical writers, like

Joachim of Flora, strange dreamers in a world of flowery rhetoric of that third and final dispensation of a “spirit of freedom,” in which law shall have passed away. Of this spirit Aucassin and Nicolette contains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expression: it is the answer Aucassin gives when he is threatened with the pains of hell, if he makes Nicolette his mistress. A creature wholly of affection and the senses, he sees on the way to paradise only a feeble and worn-out company of aged priests, “clinging day and night to the chapel altars,” barefoot or in patched sandals. With or even without Nicolette, “his sweet mistress whom he so much loves,” he, for his part, is ready to start on the way to hell, along with “the good scholars,” as he says, and the actors, and the fine horse men dead in battle, and the men of fashion (Parage, peerage:—which came to signify all that ambitious youth affected most on the outside of life, in that old world of the Troubadours, with whom this term is of frequent recurrence.), and “the fair courteous ladies who had two or three chevaliers apiece beside their own true lords,” all gay with music, in their gold, and silver, and beautiful furs—“the vair and the grey.”

那个被我称为中世纪文艺复兴的理性和想象力的勃发，以及中世纪心灵自由主张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反律法主义，那种对当时的道德和宗教观点的反叛精神。在寻找感官和想象快乐的过程中，在对美的关注里，在对身体的崇拜下，人们被推动去摆脱基督教理想的束缚。他们的爱有时变成一种奇怪的偶像崇拜，一种奇异的与基督教相对的信仰。它是远古的维纳斯的回归，她并未死去，只是在维纳斯堡山洞里隐藏了一段时间，它是那些披着各式伪装仍旧在尘世间来回往复的古老异教诸神的回归。中世纪的这种元素很大程度上被那些认为中世纪主要是信仰时代的作家忽略。这种反叛性的反律法元素，对中世纪的这种认识，使得法国浪漫主义流派作家对中世纪的描述，例如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描述，极具启发意义并令人兴奋——

在阿伯拉尔和汤豪泽的传奇中也能找到。渐渐地，当我们在通常被称作中世纪的、囊括一切的混乱中标记看法的改变和区别时，那种反叛、那种对心灵和思想自由的邪恶要求渐渐浮现出来。跟普罗旺斯诗歌的发展有着奇异联系的阿尔比教派运动就有着浓厚的这种色彩。与阿尔比教派稍有瓜葛，就有充分理由令方济会的秩序，连带它的诗歌、它的神秘主义、它的“启明”，遭到宗教当局充分的怀疑。它影响了那些含混的预言式作家，比如弗洛拉的乔基姆，在“自由精神”的第三种、也是最后一个部分的华丽辞藻世界里奇思异想着——在这种“自由精神”中法律已经死亡。《奥卡森与尼克莱特》中也许有对这种精神的最显著的表现：奥卡森受到威胁，如果让尼克莱特成为他的情人，他就将遭受地狱之苦时所作的回答。作为一个充满爱意和感知的生灵，奥卡森看到通往天堂的道路上只有几个身体虚弱、疲惫不堪的老牧师同行，他们“不论白天夜晚都站在教堂圣坛上”，光着脚或是穿着带补丁的便鞋。不管“他如此深爱的美丽情人”尼克莱特会不会与他同行，对他来说，他都已准备好与他口中的“伟大学者”、演员们、战死的骑兵、潮流者（贵族：用以表示那些对生命外在最为热爱的野心勃勃的青年，多见于古老的行吟诗人的世界中）和“每人都有三两个忠于主人的骑士陪伴左右，在音乐中欢心愉悦，穿戴金银还有“蓝银相间”的美丽皮毛的美丽高雅的女士”一起，踏上地狱之路。

But in the House Beautiful the saints, too, have their place; and the student of the Renaissance has this advantage over the student of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human mind in the Reformation, or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at in tracing the footsteps of humanity to higher levels, he is not beset at every turn by the inflexibilities and antagonisms of some well-recognised controversy, with rigidly defined opposites, exhausting the intelligence and limiting one’s sympathies. The opposi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defenders of a mere system to that more sincere and generous play of the forces of human mind and character, which I have noted as the secret of Abelard’s struggle, is, indeed, always powerful. But the

incompatibility with one another of souls really “fair” is not essential; and within the enchanted region of the Renaissance one needs not be for ever on one’s guard. Here there are no fixed parties, no exclusions: all breathes of that unity of culture in which “whatsoever things are comely” are reconciled, for the elevation and adorning of our spirits. And just in proportion as those who took part in the Renaissance become centrally representative of it, just so much the more is this condition realised in them. The wicked popes, and the loveless tyrants, who from time to time became its patrons, or mere speculators in its fortunes, lend them selves easily to disputations, and, from this side or that, the spirit of controversy lays just hold upon them. But the painter of the Last Supper, with his kindred, lives in a land where controversy has no breathing-place. They refuse to be classified. In the story of Aucassin and Nicoltte, in the literature which it represents, the note of defiance, of the opposition of one system to an other, is sometimes harsh. Let me conclude then with a morsel from Amis and Amile, in which the harmony of human interests is still entire. For the story of the great traditional friendship, in which, as I said, the liberty of the heart makes itself felt, seems, as we have it, to have been written by a monk—La vie des saints martyrs Amis et Amile. It was not till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at their names were finally excluded from the martyrology; and their story ends with this monkish miracle of earthly comradeship, more than faithful unto death: —

但是在《漂亮房子》中圣徒也有自己的位置。文艺复兴研究者比宗教改革或是法国大革命中寻求思想解放的研究者在追寻更高层次的人性方面更有优势。他不常被一些已普遍认识到的论战的不可变易性困扰，这些论战有着严格限定的对立面，耗尽才智并限制了同情心。那种单纯宗教体系的专职捍卫者和一种对人类思想、性格更为真诚和

无私的表现之间对立，就是我将其作为阿伯拉尔斗争的奥秘来记录的对立，的确是非常强大的。但是真正“美丽”灵魂之间的互不相容并不是最根本的，在文艺复兴令人沉醉的领域里人们无须永远保持警惕。这里没有一成不变的派系，没有排斥：在那种“一切皆美好”的文化整体中，所有的声音都调和一致，以此来升华和美化我们的灵魂。随着那些加入文艺复兴的人物越来越成为它的核心代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在他们身上实现。邪恶的主教和残酷的暴君常常变成它的赞助人，或者只是对其看好的投机者，他们很容易地卷入争论之中。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们都被争辩的精神掌控着。但是在《最后的晚餐》的绘制者及其同类的人存在的世界里，这种争辩毫无立足之地。他们拒绝被分门别类。在《奥卡森与尼克莱特》的故事里，在它代表的文学里，公然反抗的音符，各体系间对立的音符有时是很刺耳的。那么让我用《阿米和阿米莱》故事中人类趣味的和谐仍然完整的一段来作为结束。正如我所说的，在这个表现伟大传统友谊的故事里，心灵的自由展现出来。正如我们所知，《殉道圣徒阿米和阿米莱的故事》似是出于僧侣之手。直到17世纪末他们的名字才最终被排除到殉教史之外，他们的故事更多的是以这种世俗友情的僧侣式传奇结束，而非至死不渝的友谊：

“For, as God had united them in their lives in one ac cord, so they were not divided in their death, falling together side by side, with a host of other brave men, in battle for King Charles at Mortara, so called from that great slaughter. And the bishops gave counsel to the king and queen that they should bury the dead, and build a church in that place; and their counsel pleased the king greatly. And there were built two churches, the one by commandment of the king in honor of Saint Oseige, and the other by commandment of the queen in honor of Saint Peter.

“上帝把他们两个的生命连在了一起，所以他们死时也没有分

开。他们和许多勇士一起在莫尔塔拉保卫查理国王的战斗中并肩死去。经此一役查理国王才终成君主。主教们向国王和王后提出劝告：他们应该安葬死者，然后在上面建起一座教堂。他们的劝告极大地取悦了国王。于是那里建起了两座教堂：一座是按照国王的意旨纪念圣奥赛基，另一座按照王后的意旨纪念圣彼得。

“And the king caused the two chests of stone to be brought in the which the bodies of Amis and Amile lay; and Amile was carried to the church of Saint Peter, and Amis to the church of Saint Oseige; and the other corpses were buried, some in one place and some in the other. But lo! Next morning, the body of Amile in his coffin was found lying in the church of Saint Oseige, beside the coffin of Amis his comrade. Behold then this wondrous amity, which by death could not be dissevered!

“国王让人把装着阿米和阿米莱尸体的两具石棺抬进去：阿米莱被抬进圣彼得教堂，阿米被抬进圣奥赛基教堂，其他的尸体则分别埋葬在这两处。但是天啊！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阿米莱的棺材躺在圣奥赛基教堂里，挨着他朋友阿米的棺材。人们亲眼目睹，这种神奇的亲密是死亡也无法分开的！

“This miracle God did, who gave to His disciples power to remove mountains. And by reason of this miracle the king and queen remained in that place for a space of thirty days, and performed the offices of the dead who were slain, and honored the said churches with great gifts. And the bishop ordained many clerks to serve in the church of Saint Oseige, and commanded them that they should guard duly, with great devotion, the bodies of the two companions, Amis and Amile.”

“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他赋予他的信徒搬动山岳的力量。因为这个奇迹，国王和王后在那里呆了30天，为死去的人行葬礼，并赐给两个教堂很贵重的礼物。主教任命了很多牧师在圣奥赛基教堂服务，要求他们要尽职尽责、非常虔诚地守卫两个志同道合的伙伴——阿米和阿米莱的遗体。”

1. 0

1872 年

1.阿伯拉尔(1079—1142)，法国哲学家、神学家。2.汤豪泽(约1200—约1270)，德国吟游诗人。3.阿诺德(1090—1155)，意大利宗教改革家、罗马人民起义领袖。4.德语词，原义为两人同行。5.希腊神话中的双子星座。6.方济会，天主教托钵修会派别之一。

[1_1].萨摩斯，希腊爱琴海中的岛屿，位于土耳其西海岸近海处，隔着萨摩斯海峡与希腊大陆相望。爱奥尼亚人约于公元前11世纪在此居住。至公元前七世纪萨摩斯已成为希腊主要的商业中心。

[1_2].奥林匹克运动会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因举办地在奥林匹亚而得名，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办的包含多种体育运动项目的国际性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古希腊人于公元前776年举办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原因是为了和平和表示尊重奥林匹亚众神（即古希腊神话里的宙斯等神）。公元511年和522年年接连发生的两次强烈地震，使奥林匹亚遭到了彻底毁灭。从此顺延了1000余年的古奥运会不复存在。1896年4月6日至4月15日，希腊雅典举办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

[1_3].马库斯·加图（公元前234—149年），通常称为老加图（Cato Maior）或监察官加图（Cato Censorius），以与其曾孙小加图区别开来，小加图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演说家，公元前195年的执政官，他也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拉丁语散文作家。

[1_4].《农业志》，一本论述奴隶制大庄园经济的著作，全文尚存，是老加图最受赞誉的作品，大约完成于公元前160年。于研究意大利公元前2世纪的经济状态具有重大意义。

[1_5].法国）讷夏泰勒干酪（一种圆柱形软干酪）。

[1_6].农家干酪，由脱脂凝乳制成。

[1_7].（意大利）乳清干酪，由凝乳分离后排出的乳清制作而成。

[1_8].希腊）菲达奶酪，一种以山羊或绵羊奶制成后，在盐水中腌熟的软奶酪。

Sandro Botticelli

桑德罗·波提切利

In Leonardo’s treatise on painting only one contemporary is mentioned by name—Sandro Botticelli. This preëminence may be due to chance only, but to some will rather appear a result of deliberate judgment; for people have begun to find out the charm of Botticelli’s work, and his name, little known in the last century, is quietly becoming important. In the middl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he had already anticipated much of that meditative subtlety, which is sometimes supposed peculiar to the great imaginative workmen of its close. Leaving the simple religion which had occupied the followers of Giotto1 for a century, and the simple naturalism which had grown out of it, a thing of birds and flowers only, he sought inspiration in what to him were works of the modern world, the writings of Dante and Boccaccio, and in new readings of his own of classical stories: or, if he painted religious incidents, painted them with an under current of original sentiment, which touches you as the real matter of the picture through the veil of its ostensible subject. What is the peculiar sensation, what is the peculiar quality of pleasure, which his work has the property of exciting in us, and which we cannot get elsewhere? For this, especially when he has to speak of a comparatively unknown artist, is always the chief question which a critic has to answer.

在达·芬奇的绘画论著中只提及了一位同时代人物的名字，那就是

桑德罗·波提切利。这种突出可能只是出于偶然，但是一些人更愿意认为这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评价结果；因为人们已经开始发现波提切利作品的魅力，这个在上个世纪还鲜为人知的名字悄然变得重要起来。早在15世纪中期，他就已经预见到了大部分沉思的精妙，这种精妙有时被认为是这个世纪末那些富于想象力的伟大工匠所特有的。摆脱了影响乔托追随者一个世纪的原始宗教和由此孕育出来的只关于花鸟的简单自然主义，他从他那个时代的作品，如但丁和薄伽丘的著作中，以及从他自己新读到的古典故事中寻找灵感。或者，如果他描绘的是宗教事件，他会把原始情感潜藏其中，通过它表面的主题使其成为画作的真正动人之处。那种特殊的感受是什么？那种愉悦感的特有品质是什么？它们使他的作品有了使我们激动的特点，是我们在别处无法得到的，这是批评家们始终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尤其是说起一个相对不知名的艺术家时。

In an age when the lives of artists were full of adventure, his life is almost colorless. Criticism, indeed, has cleared away much of the gossip which Vasari2 accumulated, has touched the legend of Lippo and Lucrezia, and rehabilitated the character of Andrea del Castagno. But in Botticelli’s case there is no legend to dissipate. He did not even go by his true name: Sandro is a nick name, and his true name is Filipepi, Botticelli being only the name of the goldsmith who first taught him art. Only two things happened to him, two things which he shared with other artist:—he was invited to Rome to paint in the Sistine Chapel, and he fell in later lif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avonarola, passing apparently almost out of men’s sight in a sort of religious melancholy, which lasted till his death in 1515, according to the received date. Vasari says that he plunged into the study of Dante, and even wrote a comment on the Divine Comedy. But it seems strange that he should have lived on inactive so long; and one almost wishes that some document might come to light, which, fixing the date of his death earlier, might relieve one,

in thinking of him, of his dejected old age.

在那个艺术家的人生充满冒险的时代，他的一生几乎毫无色彩。事实上，批评家们澄清了许多瓦萨里的传闻，修改了利波和卢克雷茨娅的传说，重新审视了安德里亚·德尔·卡斯塔尼奥的人物形象。但是关于波提切利，却没有什么需要澄清。他甚至没有使用自己的真名：桑德罗是个昵称，他的本名是菲利佩皮，波提切利只是那位最初给他艺术启蒙的金匠的名字。在他身上只发生过两件事是他和其他画家相同的：——一件是受邀到罗马在西斯廷教堂作画；另一件是晚期受到萨沃那洛拉的影响，在某种宗教式的忧郁中几乎淡出了公众的视线，直到1515年（一般认为他于这一年去世）。瓦萨里说他全身心投入地研究但丁，甚至给《神曲》写过一篇评论。但他如此长期地生活在消极中就有点奇怪了。人们几乎希望能发现某些文献，把他的死亡日期提早一些，可以在人们想起他时对他令人沮丧的老年生活稍感释怀。

He is before all things a poetical painter, blending the charm of story and sentiment, the medium of the art of poetry, with the charm of line and color, the medium of abstract painting. So he becomes the illustrator of Dante. In a few rare examples of the edition of 1481, the blank spaces, left at the beginning of every canto for the hand of the illuminator, have been filled, as far as the nineteenth canto of the Inferno, with impressions of engraved plates, seemingly by way of experiment, for in the copy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one of the three impressions it contains has been printed upside flown, and much awry, in the midst of the luxurious printed page. Giotto, and the followers of Giotto, with their almost childish religious aim, had not learned to put that weight of meaning into outward things, light, color, everyday gesture, which the poetry of the Divine Comedy involves, and before the fifteenth century Dante could hardly have found an illustrator. Botticelli’s

illustrations are crowded with incident, blending, with a naive carelessness of pictorial propriety, three phases of the same scene into one plate. The grotesques, so often a stumbling-block to painters, who forget that the words of a poet, which only feebly present an image to the mind, must be lowered in key when translated into visible form, make one regret that he has not rather chosen for illustration the more subdued imagery of the Purgatorio. Yet in the scene of those who “go down quick into hell,” there is an inventive force about the fire taking hold on the upturned soles of the feet, which proves that the design is no mere translation of Dante’s words, but a true painter’s vision; while the scene of the Centaurs wins one at once, for, forgetful of the actual circum stances of their appearance, Botticelli has gone off with delight on the thought of the Centaurs themselves, bright, small creatures of the woodland, with arch baby faces and mignon forms, drawing tiny bows.

他首先是一个富于诗意的画家，他把故事情感的魅力和线条色彩的魅力，即诗歌艺术的媒介和抽象绘画的媒介融合在一起。所以他成了但丁的插图画家。在1481年版的《地狱》的几部珍本中，那些每章开头为作注留下的空白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九章都填满雕版插图。这些插图像是试验性的，因为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副本里三幅插图中有一幅是倒着的，歪歪扭扭地印在印刷精美的书页中。乔托和他的追随者们，怀着几近幼稚的宗教目的，还不会把意义的份量赋予外部事物，比如光、色彩和日常姿态上，而这些恰恰是《神曲》的诗歌中所涉及的。在15世纪以前，但丁也几乎不可能找到哪个人为他画插图。波提切利的插图中挤满了事件，他天真地忽视了图画的合理性，将一个场景的三个阶段同时表现在一张图里。有些画家会忘记诗歌辞藻只是思维的虚弱表象，转化成视觉形象必须要降低其基调，对他们而言，奇异风格常常是绊脚石。使人们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选择用更温和的意象来给《炼狱》配图。然而在“快速落入地狱”的场景中，火在

朝上的脚底燃烧的部分里有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证明他的构图不单是翻译但丁的文字，而是真正画家的想象。在半人马一举取胜的一幕，波提切利忘记它们实际的外表，怀着想到半人马本身时的快乐心情，他把它们画成是有着弯弯的婴儿脸和娇小身形、拉着小小弓箭的聪明的林中小生灵。

Botticelli lived in a generation of naturalists, and he might have been a mere naturalist among them. There are traces enough in his work of that alert sense of out ward things, which, in the pictures of that period, fills the lawns with delicate living creatures, and the hillsides with pools of water, and the pools of water with flowering reeds. But this was not enough for him; he is a visionary painter, and in his visionariness he resembles Dante. Giotto, the tried companion of Dante, Masaccio, Ghirlandajo even, do but transcribe, with more or less refining, the outward image; they are dramatic, not visionary painters; they are almost impassive spectators of the action before them. But the genius of which Botticelli is the type usurps the data before it as the exponent of ideas, moods, visions of its own; in this interest it plays fast and loose with those data, rejecting some and isolating others, and always combining them anew. To him, as to Dante, the scene, the color, the out ward image or gesture, comes with all its incisive and importunate reality; but awakes in him, moreover, by some subtle law of his own structure, a mood which it awakes in no one else, of which it is the double or repetition, and which it clothes, that all may share it, with visible circumstance.

波提切利生活在自然主义者得势的时代，他自己可能也是其中一名纯粹的自然主义者。他的作品里有足够的迹象表明他对外部事物的敏感警惕。这些外部事物存在于那个时代的绘画作品中：草坪上满是

小生物、山坡上到处是水塘、水塘里遍布开花的芦苇。但是波提切利对此并不满足。他是一个充满幻想的画家，他的幻想和但丁相似。乔托是但丁、马萨乔甚至吉兰达约的忠实伙伴，所做的只是多多少少修整了外在的形象。他们是戏剧化的画家，而不是幻想型的画家，他们对眼前的行为几乎只是漠然地观察。但是波提切利的天赋是这种类型，他在它面前篡改事实，解释它自己的观点、情绪和景象；出于这种兴趣反复无常地摆弄这些事实，丢弃一些，孤立另一些，然后总是将它们重新组合。情景、颜色、外在的形象或姿势对他和但丁来说一样，都有着激烈纠缠的真实存在。但此外由他自身结构的某种微妙法则唤醒的，是一种别人无法获得的情绪。它是双倍或重复的，它披以可见的外部环境，人人得以分享。

But he is far enough from accepting the conventional orthodoxy of Dante which, referring all human action to the simple formula of purgatory, heaven and hell, leaves an insoluble element of prose in the depths of Dante's poetry. One picture of his, with the portrait of the donor, Matteo Palmieri, below, had the credit or discredit of attracting some shadow of ecclesiastical censure. This Matteo Palmieri (two dim figures move under that name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was the reputed author of a poem, still unedited, "La Città Divina," which represented the human race as an incarnation of those angels who, in the revolt of Lucifer, were neither for Jehovah nor for His enemies, a fantasy of that earlier Alexandrian philosophy about which the Florentine intellect in that century was so curious. Botticelli's picture may have been only one of those familiar compositions in which religious reverie has recorded its impressions of the various forms of beatified existence—Glorias, as they were called, like that in which Giotto painted the portrait of Dante; but somehow it was suspected of embodying in a picture the wayward dream of Palmieri, and the chapel where it hung was closed. Artists so entire as Botticelli are usually careless

about philosophical theories, even when the philosopher is a Florentin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d his work a poem in terza rima. But Botticelli, who wrote a commentary on Dante, and became the disciple of Savonarola, may well have let such theories come and go across him. True or false, the story interprets much of the peculiar sentiment with which he infuses his profane and sacred persons, comely, and in a certain sense like angels, but with a sense of displacement or loss about them—the wistfulness of exiles, conscious of a passion and energy greater than any known issue of them explains, which runs through all his varied work with a sentiment of ineffable melancholy.

但他还不能接受但丁把所有人类行为划入炼狱、天堂和地狱的简单程式这一常规的正统思想。这种思想使得但丁诗歌的深处产生了一种无法融合的散文元素。他将捐助人马泰奥·帕尔米耶里的肖像画画在一幅作品里，这幅画因为引起了教会的责难而褒贬不一。这位马泰奥·帕尔米耶里（在现代历史中有两位，但都生平不详），据称创作了名为《神圣之城》的诗歌，这首仍未加编辑的诗中，人类被描绘为撒旦叛乱中某些天使的化身，他们既不支持耶和华，也没有帮助他的敌人。这是那个世纪佛罗伦萨知识分子非常感兴趣的早期亚历山大哲学的幻想。波提切利的作品可能只是那些我们熟知的创作之一。在这些创作中宗教幻想记录了它在各种形式的极乐存在上留下的印痕，即被称为光环的东西，就像在乔托创作的但丁肖像画里那样。但是不知何故它被怀疑在画中体现了帕尔米耶里的难以捉摸的梦境。另外保存它的教堂已经关闭了。波提切利这种纯粹的画家通常不关注哲学理论，即使这个哲人是15世纪的佛罗伦萨人，他的作品是三韵句形式诗歌，也是如此。但是波提切利写了一篇评论但丁的文章，也成为萨沃那洛拉的弟子，可能多多少少会让这样的理论影响到自己。不论真假，这个故事很大程度地解释了他注入到所画世俗人物或神圣人物身上的特殊情感。这些人物美丽俊秀，有些像天使，但是好像偏离或迷失了自我；贯穿于他所有作品中的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忧郁的对放逐的渴

望，感觉到一种任何所知事物都无法言说的热情和活力。

So just what Dante scorns as unworthy alike of heaven and hell, Botticelli accepts, that middle world in which men take no side in great conflicts, and decide no great causes, and make great refusals. He thus sets for himself the limits within which art, undisturbed by any moral ambition, does its most sincere and surest work. His interest is neither in the untempered goodness of Arigelico's saints, nor the untempered evil of Orcagna's Inferno; but with men and women, in their mixed and uncertain condition, always attractive, clothed sometimes by passion with a character of loveliness and energy, but saddened perpetually by the shadow upon them of the great things from which they shrink. His morality is all sympathy; and it is this sympathy, conveying into his work somewhat more than is usual of the true complexion of humanity, which makes him, visionary as he is, so forcible a realist.

就像但丁嘲讽天堂和地狱都无足轻重一样，波提切利接受中间世界的概念，即在重大冲突中，人不偏向任何一方，不决定重大的事件并拒绝很多事情。因此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些限制：艺术在其中不受任何道德野心的干扰，最真诚和坚定地创作。他既不对安杰利科圣人们的无约束的贤良感兴趣，也不热衷奥康雅《地狱》中过分的邪恶。他的兴趣是那些男人女人。他们处于混乱无常中，总是很吸引人；有时隐藏在热情之下显现出美好和活力的特性，但因伟大事物对自己的荫庇渐渐远去而陷入永远的悲伤。他的道德完全是同情心。渗入他作品中的这份同情心比通常情况下真实的人性中的同情还要浓烈，虽然他是个幻想家，但这份同情心却使他成为如此坚定的现实主义者。

It is this which gives to his Madonnas their unique expression

and charm. He has worked out in them a distinct and peculiar type, definite enough in his own mind, for he has painted it over and over again, some times one might think almost mechanically, as a pastime during that dark period when his thoughts were so heavy upon him. Hardly any collection of note is without one of these circular pictures, into which the attendant an gels depress their heads so naively. Perhaps you have sometimes wondered why those peevish-looking Ma donnas, conformed to no acknowledged or obvious type of beauty, attract you more and more, and often come back to you when the Sistine Madonna and the Virgins of Fra Angelico are forgotten. At first, contrasting them with those, you may have thought that there was some thing in them mean or abject even, for the abstract lines of the face have little nobleness, and the color is wan. For with Botticelli she too, though she holds in her hands the Desire of All Nations, is one of those who are neither for Jehovah nor for His enemies; and her choice is on her face. The white light on it is cast up hard and cheerless from below, as when snow lies upon the ground, and the children look up with surprise at the strange whiteness of the ceiling. Her trouble is in the very caress of the mysterious child, whose gaze is always far from her, and who has already that sweet look of devotion which men have never been able altogether to love, and which still makes the born saint an object almost of suspicion to his earthly brethren. Once, indeed, he guides her hand to transcribe in a book the words of her exaltation, the Ave, and the Magnificat, and the Gaude Maria, and the young angels, glad to rouse her for a moment from her dejection, are eager to hold the inkhorn and to support the book. But the pen almost drops from her hand, and the high cold words have no meaning for her, and her true children are those others, among whom, in her rude home, the intolerable honor came to her, with that look of wistful inquiry on their irregular faces which you see in startled animals—gipsy children, such as those

who, in Apennine villages, still hold out their long, brown arms to beg of you, but on Sundays become enfants du chceur, with their thick black hair nicely combed, and fair white linen on their sunburnt throats.

也是因为这样，他笔下的圣母马利亚有了自己独特的表情和魅力。他将她们创作成一种突出而又独特的类型。这种类型在他头脑中非常明确，因为他已经一次又一次，有时人们甚至可以认为，他是近乎机械的，把它画出来，在那个思想沉重堆积在他身上的黑暗时代里以此为消遣。几乎所有著名作品集里都会收录这些圆形图画,画中守护天使天真无邪，头颅低垂。可能你有时会好奇，为什么那些看上去执拗的马利亚不符合公认的或明显的美的特征，却越来越吸引你，而且常常是在西斯廷的马利亚和弗拉·安杰利科的圣女被遗忘了时你还是能想起她们。把她们和那些作品比较，起初你可能会认为这些圣母身上有些低俗甚至是粗鄙的成分，因为她们脸庞的抽象线条缺乏高贵的气质，脸色也苍白惨淡。在波提切利的笔下，尽管她手里掌握着“所有民族的欲望”，她既不站在耶和华的立场上，也不支持他的敌人。她的选择都在其面庞上。白光由下往上打在脸上，坚硬而缺乏生气，就如雪花覆盖大地，孩子惊奇地抬头看着云幕奇怪的白色。她的麻烦在于对神秘之子的爱抚。他的目光总是远离她，并且已经带着那种专注的美好表情，那种人类无法做到的挚爱的表情，使那降生的圣人几乎成了他世俗的弟兄怀疑的对象。的确，他曾引着她的手在一本书中写下她的兴奋，万福马利亚、光荣马利亚、快乐马利亚。小天使很高兴把她从她的沮丧中唤醒，急切地握着墨水壶并撑着书本。但是笔几乎从她手中掉落，那些深奥冰冷的词语对她来说没有意义，她真正的孩子是另外的人，在她粗陋的房子中，无法按捺的尊敬向她袭来，他们不匀称的脸上带着急切询问的表情，就像在那些受惊的动物身上看到的表情。这些流浪的吉卜赛孩童，比如亚平宁村庄里那些仍在伸出长长的黑黝黝的手臂向你乞讨的孩子，但在周末，却变成了唱诗班儿童，他们浓密的黑发梳理整齐，晒黑的脖颈遮着纯白的亚麻布。

What is strangest is that he carries this sentiment into classical subjects, its most complete expression being a picture in the uffizii, of Venus rising from the sea, in which the grotesque emblems of the middle age, and a landscape full of its peculiar feeling, and even its strange draperies, powdered all over in the Gothic manner with a quaint conceit of daisies, frame a figure that reminds you of the faultless nude studies of Ingres. At first, perhaps, you are attracted only by a quaintness of de sign, which seems to recall all at once whatever you have read of Florenc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afterwards you may think that this quaintness must be incongruous with the subject, and that the color is cadaverous or at least cold. And yet, the more you come to understand what imaginative coloring really is, that all color is no mere delightful quality of natural things, but a spirit upon them by which they become expressive to the spirit, the better you will like this peculiar quality of color; and you will find that quaint design of Botticelli's a more direct inlet into the Greek temper than the works of the Greeks themselves even of the finest period. Of the Greeks as they really were, of their difference from ourselves, of the aspects of their outward life, we know far more than Botticelli, or his most learned contemporaries; but for us long familiarity has taken off the edge of the lesson, and we are hardly conscious of what we owe to the Hellenic spirit. But in pictures like this of Botticelli's you have a record of the first impression made by it on minds turned back towards it, in almost painful aspiration, from a world in which it had been ignored so long; and in the passion, the energy, the industry of realisation, with which Botticelli carries out his intention, is the exact measure of the legitimate influence over the human mind of the imaginative system of which this is perhaps the central myth. The light is indeed cold— mere sunless dawn; but a later painter would have cloyed you with sunshine; and you can see the better for that quietness in the morning air each long

promontory, as it slopes down to the water's edge. Men go forth to their labors until the evening; but she is awake before them, and you might think that the sorrow in her face was at the thought of the whole long day of love yet to come. An emblematical figure of the wind blows hard across the grey water, moving forward the dainty -lipped shell on which she sails, the sea "showing his teeth," as it moves, in thin lines of foam, and sucking in, one by one, the falling roses, each severe in outline, plucked off short at the stalk, but embrowned a little, as Botticelli's flowers always are. Botticelli meant all this imagery to be altogether pleasurable; and it was partly an incompleteness of resources, inseparable from the art of that time, that subdued and chilled it. But this predilection for minor tones counts also; and what is un mistakable is the sadness with which he has conceived the goddess of pleasure, as the depositary of a great power over the lives of men.

最奇特的是他把这种情感带入古典的主题里，其中最为完整的表达就是保存在乌菲兹美术馆的维纳斯从海上诞生的一幅画。在这幅画中，怪诞的中世纪符号、充满中世纪特殊感觉的风景甚至包括它哥特式的缀满风格离奇的雏菊的奇异衣装，这些元素勾勒出一个形象，使人们想起安格尔对裸体的完美研究。最初，你可能只被古怪的构思吸引，好像它让你一下子想起所有读过的关于15世纪佛罗伦萨的书籍。然后你可能认为这种古怪必定和主题不符，而且色彩苍白，或者至少是冰冷的。然而，当你对富有想象力的着色的真正含义越了解，即所有颜色都不只是自然物的一种令人愉悦的属性，而是它们赖以向灵魂表达的一种精神，你就越会喜欢色彩的这种奇异特质，你会发现波提切利作品的奇异构图甚至比希腊艺术最发达的时期希腊人自己的作品更直接切入希腊人的性情。关于这些真正的希腊人，关于他们和我们的不同，关于他们外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了解得远比波提切利或他同时代最有学识的人多得多。但是于我们而言，却因为长久的熟悉，而失去了对知识的敏感。我们几乎已经意识不到我们受惠于希腊

精神之处了。但是在波提切利这样的作品中你能找到，它给人类思想留下的最初烙印从一个它已被遗忘很久的世界里，几乎痛苦地渴望着回头追溯它的记载。带着热情、活力和实现目标的勤奋，波提切利达成了他的目标，而正是这些特质也是想象体系对人类思维施加正统影响的确切方式，这些特质也是其精髓所在。光线冷峻，只是太阳还未升起的早晨；但是晚期的画家却用过多的阳光使你发腻。你在早晨空气的寂静中能更清楚地看到每个绵长的海角，看到它斜伸进海水的边缘。男人们一直工作到晚上，但她却在他们之前起身，你或许认为她脸上悲伤的表情是因为想到亲爱的人要一整天之后才能回来。风神狠狠刮过灰色的水域，把她所乘的美丽唇形贝壳吹向前。海“露出牙齿”，它在泡沫稀疏的细纹里翻动，把飘落的玫瑰一朵一朵吞没。这些玫瑰一如波提切利惯常的风格，每朵外形都朴实无华，茎被摘得很短但有些棕黄。波提切利认为，所有这些意象同样让人赏心悦目。它部分是不完整的资源，和那个时代的艺术不可分割，当时的艺术将其抑制和冷却下来。但是这种对次要色调的偏好也同样重要，而且，确定无疑的是，他怀着悲伤勾画了快乐女神，将她作为加诸人类生命之上的某种伟大力量的体现者。

I have said that the peculiar character of Botticelli is the result of a blending in him of a sympathy for humanity in its uncertain condition, its attractiveness, its investiture at rarer moments in a character of loveliness and energy, with his consciousness of the shadow upon it of the great things from which it shrinks, and that this conveys into his work somewhat more than painting usually attains of the true complexion of humanity. He paints the story of the goddess of pleasure in other episodes besides that of her birth from the sea, but never without some shadow of death in the grey flesh and wan flowers. He paints Madonnas, but they shrink from the pressure of the divine child, and plead in un mistakable undertones for a warmer, lower humanity. The same figure—tradition connects it with Simonetta, the Mistress of Giuliano de’

Medici—appears again as Judith, returning home across the hill country, when the great deed is over, and the moment of revulsion come, when the olive branch in her hand is becoming a burthen; as Justice, sitting on a throne, but with a fixed look of self-hatred which makes the sword in her hand seem that of a suicide; and again as Veritas, in the allegorical picture of Calumnia, where one may note in passing the suggestiveness of an accident which identifies the image of Truth with the person of Venus. We might trace the same sentiment through his engravings; but his share in them is doubtful, and the object of this brief study has been attained, if I have defined aright the temper in which he worked.

我已经说过波提切利的独特品质是某种混合的产物，是对不确定条件下的人性的怜悯、人性的魅力、它在少数条件下对于美好和热情品质的赋予，以及对加诸于人类身上使其畏缩的阴影的意识的混合。这种感情传达到他作品中，比绘画作品中通常获得的真实人性要更为深刻。除了维纳斯的诞于海洋，他还创作了快乐女神故事的其他阶段，但是在灰白的肉体和苍白的花朵上总是表现出死亡的阴影。他画下圣母马利亚，但是她们在圣子的压力下缩小，低声而明白地恳求一种更温暖、更为世俗化的人性。同样的形象——传统上认为是西莫内塔，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情人——再次以犹滴的面目出现。伟大的功德已完成，她翻山越岭赶回家中，她手里的橄榄枝变成了负担，她开始产生了厌恶；这个形象还以正义女神的形象出现，坐在王位上却带着一副僵硬的自憎的表情，使手中的剑看起来像是自我了结之剑；她再次作为“真理”出现在《毁谤》这幅讽喻画中。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在这里真理的形象等同于维纳斯本人的暗示。在他的雕版作品中，我们可能发现相同的情感。但是他在其中参与了多少是令人怀疑的。如果我对他进行创作的情绪作了正确界定的话，这个简短研究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But, after all, it may be asked, is a painter like Botticelli—a secondary painter, a proper subject for general criticism? There are a few great painters, like Michelangelo or Leonardo, whose work has become a force in general culture, partly for this very reason that they have absorbed into themselves all such workmen as Sandro Botticelli; and, over and above mere technical or antiquarian criticism, general criticism may be very well employed in that sort of interpretation which adjusts the position of these men to general culture, whereas smaller men can be the proper subjects only of technical or antiquarian treatment. But, besides those great men, there is a certain number of artists who have a distinct faculty of their own by which they convey to us a peculiar quality of pleasure which we cannot get elsewhere; and these, too, have their place in general culture, and must be interpreted to it by those who have felt their charm strongly, and are often the object of a special diligence and a consideration wholly affectionate, just because there is not about them the stress of a great name and authority. Of this select number Botticelli is one. He has the freshness, the uncertain and diffident promise, which belong to the earlier Renaissance itself, and make it perhaps the most interesting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he mind. In studying his work one begins to understand to how great a place in human culture the art of Italy had been called.

但是人们毕竟可以发问，波提切利这样的画家——一个二流画家，能被当作一般批判的合适主题吗？有一些伟大的画家，比如米开朗琪罗或列奥纳多，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整个文化的一股力量，部分原因正是在于他们向所有像桑德罗·波提切利这样的艺术家学习。并且，除单纯的技巧或古物批评之外，一般批评也可以很好地承担一种诠释工作，为这些伟人在整个文化中找到合适的位置，而成就较低的艺术家可以成为单纯技术或古物批评的合适主题。但在这些伟人之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艺术家，他们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传达给我们从别处

获得不了的某种快乐，而且他们在整个文化中也有自己的地位，必须由能感受到其强烈魅力的人进行诠释；并且，因为没有巨大名声和权威的压力，他们往往都超常勤奋、充满关爱。波提切利就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位。他初出茅庐，前途不能确定又缺乏自信，这是属于早期文艺复兴的特点，而且使文艺复兴成为人类思维史中可能是最有趣的阶段。通过对他的作品的研究，人们开始理解意大利艺术在人类文化中曾经处于多么伟大的地位了。

1. 0

1870 年

1.乔托（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雕刻家、画家、建筑师。2.瓦萨里（1511—1574），意大利画家、美术史家。

[2_1].菲多利公司，由Frito公司和H.W.Lay公司于1961年合并而成，是北美地区休闲食品的制造与销售业的巨头。已于1965年与百事公司合并，旗下主要产品包括乐事薯片、 立体脆风味玉米片、Tostitos玉米片、奇多奶油味小食品等。

[2_2].是美国的一种巧克力豆品牌。2004年，M&M's 被评为美国最受喜爱的广告标志。M&M's的广告语“只溶在口，不溶在手”也被广告周刊评为2004全美第一广告名句。

Luca Della Robbia

卢卡·德拉·罗比亚

The Italian sculptors of the earlier half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are more than mere forerunners of the great masters of its close, and often reach perfection, within the narrow limits which they chose to impose on their work. Their sculpture shares with the paintings of Botticelli and the churches of Brunelleschi that profound expressiveness, that intimate impress of an in dwelling soul, which is the peculiar fascination of the art of Italy in that century. Their works have been much neglected, and often almost hidden away amid the frippery of modern decoration, and we come with some surprise on the places where their fire still smolders. One longs to penetrate into the lives of the men who have given expression to so much power and sweetness. But it is part of the reserve, the austere dignity and simplicity of their existence, that their histori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lost, or told but briefly. From their lives, as from their work, all tumult of sound and color has passed away. Mino, the Raphael of sculpture, Maso del Rodario, whose works add a further grace to the church of Como, Donatello1 even,—one asks in vain for more than a shadowy outline of their actual days.

15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雕塑家不只是15世纪末期巨匠们的先驱。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种种限制，却在这狭小的范围内达到完美。他们的雕塑作品和波提切利的绘画，还有布鲁内莱斯基的教堂有共通

之处：深刻的表现力和对内心灵魂的深刻体现，这是那个世纪意大利艺术特有的魅力。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遭到忽视，几乎常常被埋没在现代装饰的俗艳之中，我们偶然间会邂逅这些仍旧闷燃的火焰，心怀惊异。人们渴望深入了解那些曾表达了如此大的力量和如此多愉悦的人们的生活。但是一方面因为他们的保守、他们冷峻的自尊和朴素的生活，关于他们的史实记载大部分散佚，或者只是寥寥几笔。他们的生命如同他们的作品一样，所有声音和色彩的喧嚣都已经从中逝去。米诺——雕塑界的拉斐尔，用作品给科莫教堂增添了另一份优雅的马索·德尔·罗达里奥，甚至多那太罗——人们只能触到他们真实生活的模糊轮廓。

Something more remains of Luca della Robbia; something more of a history, of outward changes and for tunes, is expressed through his work. I suppose nothing brings the real air of a Tuscan town so vividly to mind as those pieces of pale blue and white earthenware, by which he is best known, like fragments of the milky sky itself, fallen into the cool streets, and breaking into the darkened churches. And no work is less imitable: like Tuscan wine, it loses its savor when moved from its birthplace, from the crumbling walls where it was first placed. Part of the charm of this work, its grace and purity and finish of expression, is common to all the Tuscan sculpto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for Luca was first of all a worker in marble, and his works in terra cotta only transfer to a different material the principles of his sculpture.

卢卡·德拉·罗比亚留下的痕迹要多一些。他的作品表现了更多的历史、外部变化和命运沉浮。我想，没有什么能比他最为知名的淡蓝色和白色陶器更能形象地展现托斯卡纳小镇的真实风貌了。这些作品仿若乳白色天空的碎片，坠落在清冷的街道上，闯进黑暗的教堂。他的作品都无法模仿：像托斯卡纳的葡萄酒一样，从最初的产地、从最

初放置它的残垣上被移到别处就失去了原来的味道。这种作品的其中一部分魅力，它表达的优雅、纯洁和完整是15世纪所有托斯卡纳雕塑家的共同特点。卢卡首先是一位大理石工匠，他的赤土陶作品只是他把雕塑原则转换到另一种材料之中。

These Tuscan sculpto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orked for the most part in low relief, giving even to their monumental effigies something of its depression of surface, getting into them by this means a pathetic suggestion of the wasting and etherealisation of death. They are haters of all heaviness and emphasis, of strongly-opposed light and shade, and seek their means of delineation among those last refinements of shadow, which are almost invisible except in a strong light, and which the finest pencil can hardly follow. The whole essence of their work is expression, the passing of a smile over the face of a child, the ripple of the air on a still day over the curtain of a window ajar.

15世纪的这些托斯卡纳雕塑家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创作浅浮雕，他们甚至给这些纪念碑式的雕像一些沮丧的神情，用这种方法哀婉地暗示死亡的损耗和难以捉摸。他们嫌恶厚重和浓墨重彩，厌弃光影的强烈反差。他们在最后雕琢阴影时寻求自己的表现方法，这些阴影只有在强光下才看得见，就算最好的画笔也很难将它描绘出来。他们作品的全部本质就是表现力：表现孩子脸上转瞬即逝的微笑，表现静谧的白天里穿过微开的窗户拂过窗帘的一丝微风。

What is the precise value of this system of sculpture, this low relief? Luca della Robbia, and the other sculptors of the school to which he belongs, have before them the universal problem of their art; and this system of low relief is the means by which they meet

and over come the special limitation of sculpture.

这个浅浮雕雕塑体系的确切价值何在呢？卢卡·德拉·罗比亚和其他同流派的雕塑家眼前面对的是他们艺术的普遍问题，而这种浅浮雕体系正是他们满足和克服雕塑特殊限制的手段。

That limitation results from the material and other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all sculptured work, and consists in the tendency of such work to a hard realism, a one-sided presentment of mere form, that solid material frame which only motion can relieve, a thing of heavy shadows, and an individuality of expression pushed to caricature. Against this tendency to the hard presentment of mere form trying vainly to compete with the reality of nature itself, all noble sculpture constantly struggles; each great system of sculpture resisting it in its own way, etherealising, spiritualising, relieving its stiffness, its heaviness, and death. The use of color in sculpture is but an unskillful contrivance to effect, by borrowing from another art, what the nobler sculpture effects by strictly appropriate means. To get not color, but the equivalent of color; to secure the expression and the play of life; to expand the too firmly fixed individuality of pure, unrelieved, uncolored form:—this is the problem which the three great styles in sculpture have solved in three different ways.

那种限制来源于材料和其他所有雕塑作品的必要条件，存在于雕塑作品走向一种确定现实主义的趋势里，是对于纯形式的单方面的表现，只有用动作才能缓解的固体材料的框架，而表达的个性化变成了低劣的模仿。高贵的雕塑一直在抗争，反对这种徒劳地与自然本身的现实竞争的强烈表达纯形式的趋势。每个伟大的雕塑体系以自己的方

式抵抗它：虚无化、精神化、缓和它的僵硬、笨重和死亡气息。在雕塑中使用色彩只是从另一种艺术中借鉴来增强效果的笨拙发明，高雅雕塑是靠绝对适合的方式使其产生效果的。不是运用色彩而是运用与色彩相同效果的方法，保证对生命的表达和体现，扩大单纯、紧绷和无色形体过于严格固定的个体性——对于这个问题，三种伟大的雕塑风格以三种不同的办法解决了。

Allgemeinheit—breadth, generality, universality,—is the word chosen by Winckelmann, and after him by Goethe and many German critics, to express that law of the most excellent Greek sculptors, of Pheidias and his pupils, which prompted them constantly to seek the type in the individual, to abstract and express only what is structural and permanent, to purge from the individual all that belongs only to him, all the accidents, the feelings and actions of the special moment, all that (because in its own nature it endures but for a moment) is apt to look like a frozen thing if one arrests it.

大众性——意指广泛性、一般性和普遍性，温克尔曼以及随后的歌德和其他很多德国批评家都选择这个词来表述最为出色的希腊雕塑家菲狄亚斯和他弟子们的准则。这个准则促使他们不断在个体中寻求典型，仅仅去概括和表达结构性的和永恒的东西，从个体中去除所有仅属于个人的、所有偶然的、某一特殊时刻的感情和动作，这一切（因为本质上它只持续片刻）如果被捕捉到就容易被看成是凝固之物。

In this way their works came to be like some subtle extract or essence, or almost like pure thoughts or ideas; and hence the breadth of humanity in them, that detachment from the conditions

of a particular place or people, which has carried their influence far beyond the age which produced them, and insured them universal acceptance.

由于用了这种方式，他们的作品变得像某种难以捉摸的精华或本质，或几乎变得像纯粹的思想或观点。因此，脱离了某一特定地区或民族条件的人性的广泛性，使它们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它们产生的时代，确保它们被普遍接受。

That was the Greek way of relieving the hardness and unspirituality of pure form. But it involved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sacrifice of what we call expression; and a system of abstraction which aimed always at the broad and general type, at the purging away from the individual of what belonged only to him, and of the mere accidents of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imposed upon the range of effects open to the Greek sculptor limits some what narrowly defined. When Michelangelo came, therefore, with a genius spiritualised by the reverie of the middle age, penetrated by its spirit of inwardness and introspection, living not a mere outward life like the Greek, but a life full of intimate experiences, sorrows, consolations, a system which sacrificed so much of what was inward and unseen could not satisfy him. To him, lover and student of Greek sculpture as he was, work which did not bring what was inward to the surface, which was not concerned with individual expression, with individual character and feeling, the special history of the special soul, was not worth doing at all.

这是缓解纯形式的僵硬和非精神性的希腊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从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我们称为“表现力”的东西。抽象体系总是把目标定

位于广泛普遍的类型，在从个体中剔除只属于他的、某一特定时空的偶然事件的过程中，影响了希腊雕塑家，将他们局限在了很小的范围里。因此，米开朗琪罗，这个被中世纪幻想精神化了的天才，被它深刻和自省的精神渗透，不像希腊人那样只是生活在外部世界里，而是过着一种充满了私人经历、悲伤和宽慰的生活，因此，这样一个牺牲了大量内在的、不可见的东西的体系无法令他感到满意。对他这个热爱并学习希腊雕塑的人来说，倘若作品不能把内心世界呈现出来，倘若作品没有涉及到个人表达、个性、个人感觉和某个特殊心灵的特殊历史，那么这样的作品根本不值得去创作。

And so, in a way quite personal and peculiar to him self, which often is, and always seems, the effect of accident, he secured for his work individuality and intensity of expression, while he avoided a too heavy realism, that tendency to harden into caricature which the representation of feeling in sculpture is apt to display. What time and accident, its centuries of darkness under the furrows of the “little Melian farm,” have done with singular felicity of touch for the Venus of Melos, fraying its surface and softening its lines, so that some spirit in the thing seems always on the point of breaking out, as though in it classical sculpture had advanced already one step into the mystical Christian age, its expression being in the whole range of ancient work most like that of Michelangelo’s own: —this effect Michelangelo gains by leaving nearly all his sculpture in a puzzling sort of incompleteness, which suggests rather than realises actual form. Something of the wasting of that snow- image which he molded at the command of Piero de’ Medici, when the snow lay one night in the court of the Pitti palace, almost always lurks about it, as if he had determined to make the quality of a task, exacted from him half in derision, the pride of all his work. Many have wondered at that incompleteness, suspecting, however, that Michelangelo himself loved and was loath to change it, and feeling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y, too, would lose something if the half-realised form ever quite emerged from the stone, so rough-hewn here, so delicately finished there; and they have wished to fathom the charm of this incompleteness. Well! that incompleteness is Michelangelo's equivalent for color in sculpture; it is his way of etherealizing pure form, of relieving its stiff realism, and communicating to it breath, pulsation, the effect of life. It was a characteristic, too, which fell in with his peculiar temper and mode of living, his disappointments and hesitations. And it was in reality perfect finish. In this way he combines the utmost amount of passion and intensity with the sense of a yielding and flexible life: he gets not vitality merely, but a wonderful force of expression.

因此，他用一种对他来说非常私人和特别的方式，这种通常或者总是看上去偶然的方式，保证了自己作品中的个性化和表现力的强度，同时，他避免一种过于沉重的现实主义，避免那种在雕塑中表现情感而容易导致的拙劣模仿的倾向。在小米洛斯农场犁沟下沉寂了几个世纪之后，是什么时间和偶然事件不再满足于触摸米洛的维纳斯的那种单纯的快乐，磨损着它的表面，使它的线条不再棱角分明，让它里面的某种精神看上去呼之欲出，好像在这之中古典雕塑已经一步迈入了神秘的基督时代。它的表现力，在全部古典作品中，和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最为相似。米开朗琪罗达到这种效果是因为其几乎所有的雕塑作品都令人不解地处于半完成状态，这些作品与其说是实现，还不如说是暗示出真正的形态。他按皮耶罗·德·美第奇的要求，在一个雪花飘落在皮蒂宫庭院的晚上雕刻的雪花形象，虽然并未成形，但是其中总是对其若有所指，就好像他执意要把一个任务的特质，半嘲笑地从他那里强行索要来的特质，变成他全部作品的骄傲。很多人都对这种不完整性惊叹不已，却怀疑是米开朗琪罗自己喜欢、而且痛恨将其改变。他们同时感觉到，如果这种半完成的形态，真正从石头中跃然而成，在这里是粗粗雕就，在那里却是精雕细琢，他们也会若有所失。他们曾希望彻底地了解这种不完整的魅力。没错！这种不完整就

是米开朗琪罗在雕塑中的色彩，是他自己的方式，使纯形式超凡脱俗，摆脱僵硬的现实主义，给它呼吸、脉搏和生命效果。这种典型特点也符合他独特的性情和生活模式、符合他的失意和犹豫。事实上这是圆满的完成。用这种方式，他把最大的热情和激烈与一种变通灵活的生活感觉结合在一起：他不只获得了活力，还获得了一种惊人的表现力。

Midway between these two systems—the system of the Greek sculptors and the system of Michelangelo— comes the system of Luca della Robbia and the other Tuscan sculpto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aking both of the Allgemeinheit of the Greeks, their way of extracting certain select elements only of pure form and sacrificing all the rest, and the studied incompleteness of Michelangelo, relieving that sense of intensity, passion, energy, which might otherwise have stiffened into caricature. Like Michelangelo, these sculptors fill their works with intense and individualised expression. Their noblest works are the careful sepulchral portraits of particular persons—the monument of Conte Ugo in the Badía of Florence, of the youthful Medea Colleoni, with the wonderful, long throat, in the chapel on the cool north side of the Church of Santa Maria Maggiore at Bergamo—monuments such as abound in the churches of Rome, inexhaustible in suggestions of repose, of a subdued Sabbatic joy, a kind of sacred grace and refinement. And these elements of tranquility; of repose, they unite to an intense and individual expression by a sys tem of conventionalism as skilful and subtle as that of the Greeks, repressing all such curves as indicate solid form, and throwing the whole into low relief.

在希腊雕塑家和米开朗琪罗这两种体系之间的，是卢卡·德拉·罗

比亚和其他15世纪托斯卡纳雕塑家组成的体系。他们带有几分希腊人大众性的特点，吸取单纯形式中某些精选的元素而放弃掉其他的；他们也学习米开朗琪罗的不完整性，缓和那种激烈、激情和活力，以免僵化成拙劣的模仿。同米开朗琪罗一样，这些雕塑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倾注了激烈和个性化的表现力。他们最优秀的作品是精心雕琢的一些特定人物的遗像—现存于佛罗伦萨巴迪亚的乌戈伯爵的纪念碑，在贝加莫市圣马利亚马焦雷教堂阴凉北侧的小礼拜堂里存放的有着颀长优美颈部的美狄亚·科莱奥尼的纪念碑—这些遍布于罗马教堂的纪念碑暗示着无尽的平静、柔和的安息日般的快乐和神圣的高雅优美。这些静谧安详的元素借由希腊人那种纯熟精妙的传统主义体系结合成一种强烈的个性的表达，压制了所有显示固定的外形的曲线，将其全部揉入浅浮雕里。

The life of Luca, a life of labor and frugality, with no adventure and no excitement except what belongs to the trial of new artistic processes, the struggle with new artistic difficulties, the solution of purely artistic problems, fills the first seventy yea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After producing many works in marble for the Duomo and the Campanile of Florence, which place him among the foremost masters of the sculpture of his age, he became desirous to realise the spirit and manner of that sculpture, in a humbler material, to unite its science, its exquisite and expressive system of low relief, to the homely art of pottery, to introduce those high qualities into common things, to adorn and cultivate daily household life. In this he is profoundly characteristic of the Florence of that century, of that in it which lay below its superficial vanity and caprice, a certain old-world modesty and seriousness and simplicity. People had not yet begun to think that what was good art for churches was not so good, or less fitted, for their own houses. Luca’s new work was in plain white earthenware at first, a mere rough imitation of the costly, laboriously wrought marble, finished in a few hours. But

on this humble path he found his way to a fresh success, to another artistic grace. The fame of the oriental pottery, with its strange, bright colors—colors of art, colors not to be attained in the natural stone—mingled with the tradition of the old Roman pottery of the neighborhood. The little red, coral-like jars of Arezzo, dug up in that district from time to time, are much prized. These colors haunted Luca's fancy. "He still continued seeking some thing more," his biographer says of him; "and instead of making his figures of baked earth simply white, he added the further invention of giving them color, to the astonishment and delight of all who beheld them" — Cosa singolare, e multo utile per la state! —a curious thing, and very useful for summer- time, full of coolness and repose for hand and eye. Luca loved the forms of various fruits, and wrought them into all sorts of marvelous frames and garlands, giving them their natural colors, only subdued a little, a little paler than nature.

卢卡一生勤奋节俭，除了他对新艺术过程的尝试、与新艺术难题的斗争和对纯艺术问题的解决，一生别无冒险和刺激。他享年70岁，生活在15世纪的上半叶。在为佛罗伦萨大教堂和钟楼创作了大量大理石作品并一举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雕塑大师后，他开始渴望以较为粗陋的材料实现雕塑的精神和风格。他要把它的科学、它的精致和浅浮雕的表现力体系与陶艺这种朴素的艺术融合起来，把那些上乘特质放进普通事物中装饰和陶冶日常居家生活。在这方面，他完全具有那个世纪佛罗伦萨的典型特色，那种在表面的浮华和任性下隐藏着某种旧世界中谦恭、认真和简朴的特点。人们还没开始认识到出色的教堂艺术对他们自己的房子来说可能并不好，或者说没那么合适。卢卡的新作品最初是简单的白色陶器，只是在粗糙地模仿那种昂贵费力的精美大理石作品，几小时内就能完成，但是在这条粗陋艺术的道路上，他找到了通往一种全新的成功、通往另一种艺术的高雅的方法。享有盛名的东方陶器有着令人匪夷所思的明亮色彩—那是艺术的色彩，是无法

从天然石头中获得的色彩—这种色彩和近邻古罗马的陶器的传统混合在一起。那个地区常常出土阿雷佐的红珊瑚色小罐，非常珍贵。这些色彩使卢卡痴迷。“他仍在继续寻找更多东西。”为他写传记的作家这样说，“令所有看到他作品的人惊奇和高兴的是，他不是把烧制好的泥土人物作品简单地染成白色，而是创造性地进行了着色。”—这是古怪的东西，而且很适宜夏天！（法语）不论是触摸还是看上去都给人一种清凉安静的感觉。卢卡喜欢各种果实的形状，将它们做成各种绝妙的框子和花环，着上比自然色稍稍柔和一些、稍稍浅一些的颜色。

I said that the art of Luca della Robbia possessed in an unusual measure that special characteristic which be longs to all the workmen of his school, a characteristic which, even in the absence of much positive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actual history, seems to bring those workmen themselves very near to us. They bear the impress of a personal quality, a profound expressiveness, what the French call intimité, by which is meant some subtler sense of originality—the seal on a man’s work of what is most inward and peculiar in his moods, and manner of apprehension: it is what we call expression, carried to its highest intensity of degree. That characteristic is rare in poetry, rarer still in art, rarest of all in the abstract art of sculpture; yet essentially, perhaps, it is the quality which alone makes work in the imaginative order really worth having at all. It is because the works of the artist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ossess this quality in an unmistakable way that one is anxious to know all that can be known about them and explain to one’s self the secret of their charm.

我说过，卢卡·德拉·罗比亚的艺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具备属于同流派所有艺术家的特殊特色。即使缺乏关于他们生平的确切信息，这

种特色似乎也可以将那些艺术家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它们有一种个人特质的印记，一种在法语里称作“内心深处”的深刻表现力，意指某种更精微的创造性——即作品中一个人情绪里最内在、最独特的印记以及理解方式：正是这些我们叫做“表现力”的东西，使其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这种特质在诗歌中很少见，在艺术里更少见，而在抽象的雕塑艺术中最为少见。然而从本质上来说，它可能是使得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值得拥有的唯一特质。正是因为15世纪艺术家的作品明显地具有这种特质，所以人们才渴望了解关于它们的全部，并为自己解释其魅力的秘密所在。

1. 0

1872 年

[3_1].纽约洋基队和波士顿红袜队都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隶属于美国联盟东区，比赛中常互为对手。

The Poetry Of Michelangelo

米开朗琪罗的诗歌

Critics of Michelangelo have sometimes spoken as if the only characteristic of his genius were a wonderful strength, verging, as in the things of the imagination great strength always does, on what is singular or strange. A certain strangeness, something of the blossoming of the aloe, is indeed an element in all true works of art: that they shall excite or surprise us is indispensable. But that they shall give pleasure and exert a charm over us is indispensable, too; and this strangeness must be sweet also—a lovely strangeness. And to the true admirers of Michelangelo this is the true type of the Michelangelesque—sweetness and strength, pleasure with surprise, an energy of conception which seems at every moment about to break through all the conditions of comely form, recovering, touch by touch, a loveliness found usually only in the simplest natural things—ex forti dulcedo.

米开朗琪罗的批评家有时会认为，他天赋的唯一特色似乎是一种伟大力量，它和在想象性的事物中的伟大力量一样，接近异常性或奇异性的边缘。这种奇异性，如同芦荟开花一般的奇异性，的确是所有真正艺术品的一个元素：它注定能使我们兴奋，让我们惊讶，但也注定给我们带来愉悦或者让我们感受到其魅力所在。这种奇异性也是醇美的—一种可爱的奇异。对米开朗琪罗真正的仰慕者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米开朗琪罗风格：醇美有力、愉悦中伴随着惊喜、概念的能量好像随时都会突破美好形式的所有制约，一点点重新获得通常只在最简

单的自然物里——从有力的醇美里——才找得到的可爱和美好。

In this way he sums up for them the whole character of medieval art itself in that which distinguishes it most clearly from classical work, the presence of a convulsive energy in it, becoming in lower hands merely monstrous or forbidding, and felt, even in its most graceful products, as a subdued quaintness or grotesque. Yet those who feel this grace or sweetness in Michelangelo might at the first moment be puzzled if they were asked wherein precisely such quality resided. Men of inventive temperament—Victor Hugo, for instance, in whom, as in Michelangelo, people have for the most part been attracted or repelled by the strength, while few have under stood his sweetness—have sometimes relieved conceptions of merely moral or spiritual greatness, but with little aesthetic charm of their own, by lovely accidents or accessories, like the butterfly which alights on the blood-stained barricade in Les Misérables or those seabirds for whom the monstrous Gilliatt comes to be as some wild natural thing, so that they are no longer afraid of him, in Les Travailleurs de la Mer. But the austere genius of Michelangelo will not depend for its sweetness on any mere accessories like these. The world of natural things has almost no existence for him; “When one speaks of him,” says Grimm, “woods, clouds, seas, and mountains disappear, and only what is formed by the spirit of man remains behind” ; and he quotes a few slight words from a letter of his to Vasari as the single expression in all he has left of a feeling for nature. He has traced no flowers, like those with which Leonardo stars over his gloomiest rocks; nothing like the fret work of wings and flames in which Blake frames his most startling conceptions. No forest-scenery like Titian’s fills his backgrounds, but only blank ranges of rock, and dim vegetable forms as blank as they, as in a world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first five days.

他以这种方式为他的仰慕者们总结出了中世纪艺术本身的整体特色：这一时期的艺术和古典艺术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包含的剧烈能量，这种能量在粗陋的手法中只会变得畸形和可怕，在最高雅的作品里也只是让人感到一种受压抑的离奇或怪异。不过在米开朗琪罗作品中感受到高雅舒适的人，可能最初在被问到这些特质到底存在于何处时也会感到茫然。对于具有创造性气质的人，比如维克多·雨果，正如米开朗琪罗一样，人们大部分是被这种能量吸引或者对它产生抗拒，但很少有人理解它的美妙芳醇。这些人有时削弱了纯道德伟大性或宗教伟大性的概念，但自己却缺乏美学的魅力，通过细腻的偶然事件或点缀，比如《悲惨世界》里飞落在血迹斑斑的路障上的蝴蝶，或是《海上劳工》中的那些海鸟，残暴的吉列特变成了让他们不再害怕的野生动物。但是米开朗琪罗一丝不苟的天赋不会依靠任何这样的附加品来体现它的醇美。自然界对他来说几乎不存在。“人们说起他时，”格里姆说，“森林、云朵、海洋和高山都消失了，只存在着人类思想形成的一切。”他还引用了米开朗琪罗写给瓦萨里的信中一些轻描淡写的词语来作为他对自然所存留的感情的唯一表达。他没有描绘过花朵，不像达·芬奇那样用花朵来点缀最阴暗的石头；也不像布莱克那样用浮雕的翅膀和火焰架构自己最惊人的概念；他也从来不用提香那种森林景色填充自己的背景，只会用一排排单调的石头，还有一样暗淡单调的植物，就像创世前五天之前的世界。

Of the whole story of the creation he has painted only the creation of the first man and woman, and, for him at least, feebly, the creation of light. It belongs to the quality of his genius thus to concern itself almost exclusively with the making of man. For him it is not, as in the story itself, the last and crowning act of a series of developments, but the first and unique act, the creation of life itself in its supreme form, offhand and immediately, in the cold and lifeless stone. With him the beginning of life has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urrection; it is like the recovery of suspended

health or animation, with its gratitude, its effusion, and eloquence. Fair as the young men of the Elgin marbles, the Adam of the Sistine Chapel is unlike them in a total absence of that balance and completeness which express so well the sentiment of a self-contained, independent life. In that languid figure there is something rude and satyr-like, some thing akin to the rugged hillside on which it lies. His whole form is gathered into an expression of mere expectancy and reception; he has hardly strength enough to lift his finger to touch the finger of the creator; yet a touch of the finger-tips will suffice.

关于整个创世故事，他只画下了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以及至少对他而言，含糊的，光的创造。因此他天赋的特质就是专注于人的创造。对他来说，人的创造不是像创世故事中那种一系列阶段的最终的、画龙点睛的部分，而是首先的、独特的动作，是在冰冷无生命的石头上即兴创造的生命的最高形式。在他那里，生命的初始有着复苏的全部特点，如同处在恢复过程中的健康或活力带着感激、带着喷薄的感情和滔滔的雄辩。西斯廷教堂里的亚当尽管俊美如埃尔金大理石雕像中的青年男子，但却与他们并不相像，缺乏了那些雕像中充分表达生活的独立自足的平衡与完满。那个慵懒的形象里有着粗野的、萨梯似的气质，类似于他所躺的崎岖山坡。他的整体形象表达出来的是一种期待和接受，他几乎没有力气抬起手指去触碰创造者的手指；不过指尖相触便已足够了。

This creation of life—life coming always as relief or recovery, and always in strong contrast with the rough hewn mass in which it is kindled—is in various ways the motive of all his work, whether its immediate subject be Pagan or Christian, legend or allegory; and this, although at least one- half of his work was designed for the adornment of tombs—the tomb of Julius, the tombs of the Medici.

Not the Judgment but the Resurrection is the real subject of his last work in the Sistine Chapel; and his favorite Pagan subject is the legend of Leda, the delight of the world breaking from the egg of a bird. As I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he secures that ideality of expression which in Greek sculpture depends on a delicate system of abstraction, and in early Italian sculpture on lowness of relief, by an incompleteness, which is surely not always undesigned, and which, as I think, no one regrets, and trusts to the spectator to complete the half-emergent form. And as his persons have some thing of the unwrought stone about them, so, as if to realise the expression by which the old Florentine records describe a sculptor —master of live stone—with him the very rocks seem to have life. They have but to cast away the dust and scurf that they may rise and stand on their feet. He loved the very quarries of Carrara, those strange grey peaks which even at midday convey into any scene from which they are visible some thing of the solemnity and stillness of evening, some times wandering among them month after month, till at last their pale ashen colors seem to have passed into his painting; and on the crown of the head of the David there still remains a morsel of uncut stone, as if by one touch to maintain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place from which it was hewn.

生命的创造——生命总是作为解脱或复苏出现，总是与生命之火点燃之时所处之地周遭的粗糙形成强烈对比——以各种方式成为他所有创作的动机，不管作品的直接主题是异教还是基督教，传奇抑或寓言；虽然，他至少一半作品是为装饰墓地而创作的，比如尤里乌斯和美第奇家族的墓地。他在西斯廷教堂的最后一件作品，主题不是审判而是复活。他最喜欢的异教主题是勒达传奇这种世界从鸟蛋中破壳而出的喜悦。我已经指出，他通过某种不完整来确保表现力的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的希腊雕塑有赖于精巧的抽象体系来达到，而早期意大利雕像依靠浮雕的低浅来完成。这种不完整当然不总是无意的，

而且我认为，没人会感到遗憾，也相信观众会复原未完全浮现的形式。因为他的人物里还有一些未完工的石料，这仿佛是用来实践古佛罗伦萨人记载的对雕塑家的描述：赋予石头生命的大师，在他面前，石头似乎也有了生命。他们只要把尘土和碎屑抖掉就能起身站立起来。他喜爱卡拉拉的采石场，那些怪异的灰色山峰即便在中午也显现出某种夜晚才有的严肃和静谧。他有时在山上徘徊数月，直到那些暗淡、苍白的颜色好像最终走入他的作品；《大卫》头上的王冠还有一处没有雕完的石头，就像是保持它和取材地的关联的一笔。

And it is in this penetrative suggestion of life that the secret of that sweetness of his is to be found. He gives us indeed no lovely natural objects like Leonardo or Titian, but only the coldest, most elementary shadowing of rock or tree; no lovely draperies and comely gestures of life, but only the austere truths of human nature; “simple persons” —as he replied in his rough way to the querulous criticism of Julius the Second, that there was no gold on the figures of the Sistine Chapel—“simple persons, who wore no gold on their garments” ; but he penetrates us with a feeling of that power which we associate with all the warmth and fullness of the world, the sense of which brings into one’s thoughts a swarm of birds and flowers and insects. The brooding spirit of life itself is there; and the summer may burst out in a moment.

正是在这种对生命的深刻暗示中，我们可以寻到他作品中那种美妙芳醇的奥秘。他确实没像达·芬奇或提香那样给我们可爱的自然物，而只是最冰冷、最基本的石头或树木的阴影；他没给我们生活中可爱的褶皱低垂的衣裳或是得体的举止，而只是人性的严酷现实。“质朴的人，”正如他粗暴地回答尤里乌斯二世暴躁地批评西斯廷教堂的人物身上没有用金色时说道的，“质朴的人衣服上没有金色。”但是他把一种感知的力量渗透进我们，这种力量让我们联想到世界所有的温暖

和充实，让我们想到一群鸟、一丛花、亦或一窝昆虫。生命本身的孕育精神都在那里，夏天可能会呼之欲出。

He was born in an interval of a rapid midnight journey in March, at a plac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Arezzo, the thin, clear air of which was then thought to be favorable to the birth of children of great parts. He came of a race of grave and dignified men, who, claiming kin ship with the family of Canossa, and some color of imperial blood in their veins, had,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received honorable employment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His mother, a girl of nineteen years, put him out to nurse at a country house among the hills of Settignano, where every other inhabitant is a worker in the marble quarries, and the child early became familiar with that strange first stage in the sculptor's art. To this succeeded the influence of the sweetest and most placid master Florence had yet seen, Domenico Ghirlandajo. At fifteen he was at work among the curiosities of the garden of the Medici, copying and restoring antiques, winning the condescending notice of the great Lorenzo. He knew, too, how to excite strong hatreds; and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in a quarrel with a fellow student he received a blow on the face which deprived him for ever of the comeliness of outward form.

他出生于3月转瞬即逝的暗夜的间隙，在阿雷佐地区。当时那种淡淡的清新空气被认为适宜伟大婴儿的降生。他的家族尊贵显赫，自称和卡诺萨家族有血缘关系，而且血管里也流淌着部分皇室的血液，因此世代在佛罗伦萨政府里获得荣耀的职位。他的母亲当时19岁，把他寄养在塞提涅亚诺山区的乡间住所里。那里其他的居民都是大理石采石场的工人，这孩子早早熟悉了雕塑艺术奇妙的第一步。此后他又受到佛罗伦萨最细腻平和的大师——多梅尼科·吉兰达约的影响。15岁

时他在遍布古物奇珍的美第奇园林中工作，复制和修复古物，得到了伟大的洛伦佐的垂青。他也很能激起他人强烈的憎恨，同样在这个时期，和一个同学产生纷争，他的脸挨了一击，此后就再也没有英俊的外表了。

It was through an accident that he came to study those works of the early Italian sculptors which suggested much of his own grandest work, and impressed it with so deep a sweetness. He believed in dreams and omens. One of his friends dreamed twice that Lorenzo, then lately dead, appeared to him in grey and dusty apparel. To Michelangelo this dream seemed to portend the troubles which afterwards really came, and with the suddenness which was characteristic of all his movements, he left Florence. Having occasion to pass through Bologna, he neglected to procure the little seal of red wax which the stranger entering Bologna must carry on the thumb of his right hand. He had no money to pay the fine, and would have been thrown into prison had not one of the magistrates interposed. He remained in this man's house a whole year, rewarding his hospitality by readings from the Italian poets whom he loved. Bologna, with its endless colonnades and fantastic leaning towers, can never have been one of the lovelier cities of Italy. But about the portals of its vast unfinished churches and its dark shrines, half hidden by votive f lowers and candles, lie some of the sweetest works of the early Tuscan sculptors, Giovanni da Pisa and Jacopo della Quercia, things as winsome as f lowers; and the year which Michelangelo spent in copying these works was not a lost year. It was now, on returning to Florence, that he put forth that unique presentment of Bacchus, which expresses, not the mirthfulness of the god of wine, but his sleepy seriousness, his enthusiasm, his capacity for profound dreaming. No one ever expressed more truly than Michelangelo the notion of inspired

sleep, of faces charged with dreams. A vast fragment of marble had long lain below the Loggia of Orcagna, and many a sculptor had had his thoughts of a design which should just f ill this famous block of stone, cutting the diamond, as it were, without loss. Under Michel angelo's hand it became the David which stood till lately on the steps of the Palazzo Vecchio, when it was replaced below the Loggia. Michelangelo was now thirty years old, and his reputation was established. Three great works f ill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three works often interrupted, carried on through a thousand hesitations, a thousand disappointments, quarrels with his patrons, quarrels with his family, quarrels perhaps most of all with himself—the Sistine Chapel, the Mausoleum of Julius the Second, and the Sacristy of San Lorenzo.

因为偶然的机会他研究了早期意大利雕塑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影响了他最伟大的作品，在作品里印下了很深的美妙芳醇的印迹。他相信梦境和征兆，他的一个朋友曾两次梦到去世不久的洛伦佐穿着肮脏的灰色衣服出现在他面前。米开朗琪罗认为这个梦预示了麻烦。后来梦境变成了现实，于是就像他一贯的作风一样，米开朗琪罗突然离开了佛罗伦萨。有一次路过博洛尼亚，他忘了盖上路过博洛尼亚的外乡人都要印在右手拇指上的红色蜡章。他也没有钱付罚金，多亏一位地方行政官提供了帮助才免受牢狱之灾。米开朗琪罗在他家里呆了一年，并通过朗读自己喜欢的意大利诗人的作品来报答他的热情款待。博洛尼亚有无数的柱廊和美轮美奂的斜塔，虽然它算不上是意大利最美丽的城市，但是，在宏大而半完成的教堂门廊里，在黑暗的神祠里，被还愿的花朵和蜡烛半遮住的是很多早期托斯卡纳雕塑家，如乔万尼·达比萨和雅各布·德拉奎尔恰最为精妙的作品，这些作品如花朵一般迷人。米开朗琪罗临摹这些作品的一年没有浪费。他返回佛罗伦萨后，创作出了独一无二的酒神巴克斯像：不是展现酒神的欢乐，而是他的倦怠和严肃，他的活力和他深沉的梦态。没人能像米开朗琪罗那样真实地表现获得了灵感的睡梦，或展现梦境中的脸庞这些概念。

在奥尔卡尼亚的凉廊下有块巨大的大理石放了很久，很多雕塑家都想过要把这块著名的大理石完整雕刻出来，像切割钻石那样没一点损失。这块巨石在米开朗琪罗手下变成了《大卫》，一直立在韦基奥宫的台阶上，最近才被放回凉廊。此时米开朗琪罗30岁，他的名望已经树立起来。他的余生创作了3件伟大的作品——这3件作品在创作中常常中断，在经历重重犹豫、百般失望、与资助人争吵、与家人争吵和可能更多地与自己争吵之后才最终得以完成。这3件作品就是西斯廷教堂壁画、尤利乌斯二世陵墓和圣洛伦佐圣器所。

In the story of Michelangelo's life the strength, often turning to bitterness, is not far to seek. A discordant note sounds throughout it which almost spoils the music. He "treats the Pope as the King of France himself would not dare to treat him" : he goes along the streets of Rome "like an executioner," Raphael says of him. Once he seems to have shut himself up with the intention of starving himself to death. As we come, in reading his life, on its harsh, untempered incidents, the thought again and again arises that he is one of those who incur the judgment of Dante, as having "wilfully lived in sadness." Even his tenderness and pity are embittered by their strength. What passionate weeping in that mysterious figure which, in the Creation of Adam, crouches below the image of the Almighty, as he comes with the forms of things to be, woman and her progeny, in the fold of his garment! What a sense of wrong in those two captive youths, who feel the chains like scalding water on their proud and delicate flesh! The idealist who became a reformer with Savonarola, and a republican superintending the fortification of Florence—the nest where he was born, il nido ove naqqu'io, as he calls it once, in a sudden throb of affection—in its last struggle for liberty, yet believed always that he had imperial blood in his veins and was of the kindred of the great Matilda, had within the depths of his nature some secret spring of indignation or sorrow. We know

little of his youth, but all tends to make one believe in the vehemence of its passions. Beneath the Platonic calm of the sonnets there is latent a deep delight in carnal form and color. There, and still more in the madrigals, he often falls into the language of less tranquil affections; while some of them have the color of penitence, as from a wanderer returning home. He who spoke so decisively of the supremacy in the imaginative world of the unveiled human form had not been always, we may think, a mere Platonic lover. Vague and wayward his loves may have been; but they partook of the strength of his nature, and sometimes, it may be, would by no means become music, so that the comely order of his days was quite put out: par che amaro ogni mio dolce io senta.

在米开朗琪罗的人生故事中力量常常演化成痛苦，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现。一个几乎毁了整首音乐的不和谐乐符贯穿其中。他“对待教皇”的方式几乎连法兰西国王自己也不敢这样。拉斐尔说他“像行刑人一样”走在罗马的大街上。有一回他似乎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准备绝食而死。我们读到他人生中那些苛刻的不加节制的事情时总是一次次产生这样的想法：他就是被但丁评价为“决意生活在悲伤中”的人之一。即使他的温柔和怜悯，也因它们的力量变得苦涩。在《创造亚当》中，上帝把即将成形的女人和她的后代藏在衣褶里面，而在他肖像下面蜷缩着的神秘人物哭得是多么动情！两个被俘的少年感到锁链像滚烫的开水灼烧着他们骄傲柔弱的肉体，这是多么错误的感觉！这个理想主义者成为了和萨伏那洛拉并肩战斗的改革家，同时也是监督佛罗伦萨军事要塞工程的共和主义者。佛罗伦萨是他的出生地，“他出生的巢”，他某次突然表达爱意时的用词。虽然他一直认为自己流淌着皇室的血液，和伟大的玛蒂尔达同族，但在他内心深处有某种愤慨和悲伤在秘密地涌动。对他的青少年时代我们知之甚少，但所知的一切都使人们相信那段时光的激情澎湃。在十四行诗中，柏拉图式的平静下潜藏着对肉欲的形式和色彩的巨大喜悦。在这里，更多的是在短诗中，他常常陷进不那么宁静的爱情的语言中；并且其中有一些具

有忏悔的色彩，像是归家浪子的诉说。他坚定地宣称在想象世界里裸露的人类形体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认为他不总是纯粹的柏拉图式的情人。他的爱情可能是模糊和任性的，但却带有几分他天性的力量。有时候，它绝不可能变成音乐，这样他生活的良好秩序就被打乱了：这样我感到的美好都成了每天的痛苦。

But his genius is in harmony with itself; and just as in the products of his art we find resources of sweetness within their exceeding strength, so in his own story also, bitter as the ordinary sense of it may be, there are select pages shut in among the rest—pages one might easily turn over too lightly, but which yet sweeten the whole volume. The interest of Michelangelo's poems is that they make us spectators of this struggle; the struggle of a strong nature to adorn and attune itself; the struggle of a desolating passion, which yearns to be resigned and sweet and pensive, as Dante's was. It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occasional and informal character of his poetry, that it brings us nearer to himself, his own mind and temper, than any work done only to support a literary reputation could possibly do. His letters tell us little that is worth knowing about him—a few poor quarrels about money and commissions. But it is quite other wise with these songs and sonnets, written down at odd moments, sometimes on the margins of his sketches, themselves often unfinished sketches, arresting some salient feeling or unpremeditated idea as it passed. And it happens that a true study of these has become within the last few years for the first time possible. A few of the sonnets circulated widely in manuscript, and became almost within Michelangelo's own lifetime a subject of academical discourses. But they were first collected in a volume in 1623 by the great-nephew of Michelangelo,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the younger. He omitted much, re-wrote the sonnets in part, and sometimes com pressed two or more compositions into

one, always losing something of the force and incisiveness of the original. So the book remained, neglected even by Italians themselves in the last century,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that French taste which despised all composition of the kind, as it despised and neglected Dante. “His reputation will ever be on the increase, because he is so little read,” says Voltaire of Dante. —But in 1858 the last of the Buonarroti bequeathed to the municipality of Florence the curiosities of his family. Among them was a precious volume containing the autograph of the sonnets. A learned Italian, Signor Cesare Guasti, under took to collate this autograph with other manuscripts at the Vatican and elsewhere, and in 1863 published a true version of Michelangelo’s poems, with dissertations and a paraphrase. (The sonnet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much skill and poetic taste, by Mr. J. A. Symonds.)

但是他的天赋在内在上是和谐一致的，正如我们在他的艺术作品里发现美妙芳醇的源泉位于极度饱满的力量内一样，他自己的故事，虽然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充满苦涩，但有某些精挑细选的书页隐藏在其他页中间，这些书页可能会被随手翻过，但它们却使整个书卷变得芳醇起来。米开朗琪罗诗歌中的趣味在于，使我们成为这种挣扎的观众，这是一种修饰和协调自身的强大本性的挣扎，是一种孤单的热情，如同但丁那样，渴望着顺从、细腻和深思熟虑。这是他的诗歌偶然的、非正式的特点的结果，正是这种特点拉近了我们和他本人、他的思想以及他的气质之间的距离，这比任何只为在文学上获得荣誉的作品都更有效。他的信中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有关他自己的值得了解的事情，只有一些有关金钱和佣金的可怜争吵。但是这些诗歌和十四行诗则正相反。它们是在零星时间写成的，有时写在那些往往没有完成的素描旁边的空白上，捕捉某种一闪即逝的强烈感觉或者不期而至的想法。而对这些作品的真正研究在近些年才第一次成为可能。一些十四行诗的手稿流传广泛，甚至是在米开朗琪罗的时代就已经几乎变成了学术讨论的主题。但是在1623年它们才第一次被收集成册，由米开

朗琪罗的曾侄孙小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整理。他删除了很大部分，改写了一部分十四行诗，有时把两篇或两篇以上合并成一篇，这总是丧失了原文的某些力度和尖锐。所以在上世纪这本书甚至连意大利人自己都未曾注意到，因为他们受到法国的影响贬低这类作品，就像同时被轻视和忽略的但丁一样。伏尔泰曾经这样谈及但丁："他的知名度不可能增加，因为没有人阅读关于他的书籍。"但在1858年，博纳罗蒂家族最后一位继承人把家族的古物奇珍赠给了佛罗伦萨市政府。其中一卷珍贵的书中包含了十四行诗手稿。博学的意大利人切萨雷·瓜斯蒂先生负责把这本书稿和存放在梵蒂冈以及别处的其他手稿进行核勘，并在1863年出版了一本带有评论和注释的真正的米开朗琪罗诗歌集。(这些十四行诗已被J.A.西蒙兹译成英文，译作翻译技巧娴熟，富于诗性。——作者注)

People have often spoken of these poems as if they were a mere cry of distress, a lover's complaint over the obduracy of Vittoria Colonna. But those who speak thus forget that though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Michel-angelo had seen Vittoria, that somewhat shadowy figure, as early as 1537, yet their closer intimacy did not begin till about the year 1542, when Michelangelo was nearly seventy years old. Vittoria herself, an ardent neo-catholic, vowed to perpetual widowhood since the news had reached her, seventeen years before, that her husband, the youthful and princely Marquess of Pescara, lay dead of the wounds he had received in the battle of Pavia, was then no longer an object of great passion. In a dialogue written by the painter, Francesco d'Ollanda, we catch a glimpse of them together in an empty church at Rome, one Sunday afternoon, discussing, inde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schools of art, but still more the writings of Saint Paul, already following the ways and tasting the sunless pleasures of weary people, whose care for external things is slackening. In a letter still extant he regrets that when he visited her after death he had kissed her hands only. He

made, or set to work to make, a crucifix for her use, and two drawings, perhaps in preparation for it, are now in Oxford. From allusions in the sonnets, we may divine that when they first approached each other he had debated much with himself whether this last passion would be the most unsoftening, the most desolating of all—un dolce amaro, un si e no mi muovi. Is it carnal affection, or, del suo prestino stato (of Plato's ante-natal state) it raggio ardente? The older, conventional criticism, dealing with the text of 1623, had lightly assumed that all, or nearly all, the sonnets were actually addressed to Vittoria herself; but Signor Guasti finds only four, or at most five, which can be so attributed on genuine authority. Still, there are reasons which make him assign the majority of them to the period between 1542 and 1547, and we may regard the volume as a record of this resting-plate in Michel angelo's story. We know how Goethe escaped from the stress of sentiments too strong for him by making a book about them; and for Michelangelo, to write down his passionate thoughts at all, to express them in a sonnet, was already in some measure to command, and have his way with them —

评价米开朗琪罗的诗歌时，人们常常把它们当作只是悲痛的哭喊，只是一个爱人对维多利亚·科洛纳那种冷酷无情的抱怨。但是作出这种评价的人忘记了：虽然很有可能早在1537年，米开朗琪罗见过维多利亚这个有些神秘的人物，但是直到1542年，米开朗琪罗接近70岁时，两个人才开始变得亲密起来。维多利亚本人是虔诚的新天主教徒，在17年前听到她的丈夫——年轻而高贵的佩斯卡拉侯爵在巴维亚战斗中受伤死去的消息时，就发誓要永远孀居，此时她已心如止水。在画家弗朗切斯科·道兰达所写的一段对话里，我们的确能发现他们某个星期天下午在罗马一个空教堂里面讨论各种艺术流派的特色，但更多是在讨论圣保罗的书籍，他们已经在追求清淡的快乐，这快乐属于对外部世界关心渐少的厌倦之人。在一封现存的书信中，他表示后悔

在维多利亚死后去看望她时只吻了她的双手。他为她做好或者说已着手去做的十字架，还有两幅可能是为做十字架而准备的画现在保存在牛津。在十四行诗的隐喻中我们可以猜测出他们第一次向对方靠近时，他无数次内心挣扎：关于这份最后的激情是否会成为一生中最无柔情、最凄凉的情感——一种苦涩的甜蜜，一种是非激发了我的热情。这束燃烧的光芒，它是肉体的激情，还是灵肉结合的(柏拉图说的出生前状态)非凡的热情？针对1623年版本的早期的传统批判简单地假定，所有或者几乎所有十四行诗实际上都是写给维多利亚的。但瓜斯蒂先生只找到四篇或最多五篇可以真正认定为献给她的作品。而且，他有理由认为其中大部分创作于1542年到1547年之间。我们可以把这一卷看作米开朗琪罗一个人生驿站的记录。我们知道歌德把承受不了的情感压力写进书里，从而得到解脱。对米开朗琪罗来说，把他热情的想法写下来，把它们在十四行诗中表达出来，已经可以算是必须的了，而他对此有自己的办法——

La vita del mia amor non è il cor mio,

我爱情的生命不属于我的心灵，

Ch’ amor, di quel ch’ io t’ amo, è senza core.

我对你的这份爱情里没有心灵。

It was just because Vittoria raised no great passion that the space in his life where she reigns has such peculiar suavity; and the spirit of the sonnets is lost if we once take them out of that dreamy atmosphere in which men have things as they will, because the hold

of all outward things upon them is faint and uncertain. Their prevailing tone is a calm and meditative sweetness. The cry of distress is indeed there, but as a mere residue, a trace of bracing chalybeate salt, just discernible in the song which rises like a clear, sweet spring from a charmed space in his life.

因为维多利亚没有掀起澎湃的激情，所以在她掌控的他那段生活空间里有着这样奇异的温和。而且，如果我们把十四行诗从它们所存在的梦幻的、人们在其中随心所欲得到所有的环境中分离出来的话，十四行诗的精神就会失落，因为对所有外物的掌控都是含糊而不确定的。它们盛行的色调是平静和沉思的芳醇。痛苦的哭喊也的确存在其中，但却只是残余，是含有令人清醒的铁盐的痕迹，在从他生命中那个喜悦的空间里跳跃出来的、如同明媚柔美的春天一样的诗歌里清晰可见。

This charmed and temperate space in Michelangelo's life, without which its excessive strength would have been so imperfect, which saves him from the judgment of Dante on those who "wilfully lived in sadness," is then a well-defined period there, reaching from the year 1542 to the year 1547, the year of Vittoria's death. In it the lifelong effort to tranquillise his vehement emotions by withdrawing them into the region of ideal sentiment, becomes successful;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Vittoria is, that she realises for him a type of affection which even in disappointment may charm and sweeten his spirit.

如果没有这段愉快温和的时光，米开朗琪罗生命中过度旺盛的力量就会不完美，他就免受但丁对那些“故意生活在悲伤中”之人的评断。这段时间后来被精确划定，是在1542年到1547年之间，那是维

多利亚去世的时间。在这一时期，米开朗琪罗力图转移自己的炽烈情感、将它们投入理想情绪领域以使其获得宁静的毕生努力成功了。维多利亚的重要性在于，她使米开朗琪罗得到一种爱，这种爱即使在失望中仍能让他的灵魂变得可爱醇美。

In this effort to tranquillise and sweeten life by idealising its vehement sentiments, there were two great traditional types, either of which an Italia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might have followed. There was Dante, whose little book of the Vita Nuova had early become a pattern of imaginative love, maintained somewhat feebly by the later followers of Petrarch; and, since Plato had become something more than a name in Italy by the publication of the Latin translation of his works by Marsilio Ficino, there was the Platonic tradition also. Dante's belief in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through which, even in heaven, Beatrice loses for him no tinge of flesh-color, or fold of raiment even; and the Platonic dream of the passage of the soul through one form of life after another, with its passionate haste to escape from the burden of bodily form altogether; are, for all effects of art or poetry, principles diametrically opposite. Now it is the Platonic tradition rather than Dante's that has molded Michelangelo's verse. In many ways no sentiment could have been less like Dante's love for Beatrice than Michelangelo's for Vittoria Colonna. Dante's comes in early youth: Beatrice is a child, with the wistful, ambiguous vision of a child, with a character still unaccentuated by the influence of outward circumstances, almost expressionless. Vittoria, on the other hand, is a woman already weary, in advanced age, of grave intellectual qualities. Dante's story is a piece of figured work, inlaid with lovely incidents. In Michelangelo's poems, frost and fire are almost the only images—the refining fire of the goldsmith; once or twice the phoenix; ice melting at the fire; fire struck from the rock which it

afterwards consumes. Except one doubtful allusion to a journey, there are almost no incidents. But there is much of the bright, sharp, unerring skill, with which in boyhood he gave the look of age to the head of a faun by chipping a tooth from its jaw with a single stroke of the hammer. For Dante, the amiable and de vout materialism of the middle age, sanctifies all that is presented by hand and eye; while Michelangelo is always pressing forward from the outward beauty—il bel del fuor che agli occhi piace, to apprehend the unseen beauty; trascenda nella forma universale—that abstract form of beauty, about which the Platonists reason. And this gives the impression in him of something f lit ting and unfixed, of the houseless and complaining spirit, almost clairvoyant through the frail and yielding flesh. He accounts for love at first sight by a previous state of existence— la dove io t' amai prima.

通过使强烈的感情理想化，以使生命获得安宁芳醇的努力一般有两种类型的伟大传统，16世纪的意大利人可能会遵循任意一种。但丁就是这样，他的短小诗集《新生》早就成为了一种想象爱情的范式。这种范式被后来的彼特拉克保留了一些。而且因为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把柏拉图的作品翻译成拉丁文出版，柏拉图在意大利已不仅只是一个名字，这里也就有了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但丁信仰肉体复活，所以对他来说，即使在天堂里贝雅特丽齐也没有失去一丝血色，甚至衣服的褶皱也保留着；柏拉图式的梦想是灵魂经历生命的种种形式，还带着急切的热情要逃离全部身体形式的负担。对所有的艺术或诗歌效果来说，这两种传统是截然相反的原则。此时不是但丁传统，而是柏拉图传统塑造了米开朗琪罗的诗歌。在很多方面，米开朗琪罗对维多利亚·科洛纳的爱和但丁对贝雅特丽齐的爱都是截然不同的。但丁的爱发生在少年时代：贝雅特丽齐是个小孩，有着孩子的惆怅的、模糊不清的想法，个性还没有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几乎还没有表达力。而另一方面，维多利亚却是一个已经有些许疲倦、上了点年纪、有着庄重理性品质的女人。但丁的故事是形象的，里面嵌入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而在米开朗琪罗的诗歌里几乎只有霜和火的形象：铁匠打铁的火苗，一两次凤凰涅涅槃之火，冰在火里融化，火从岩石中喷薄而出又把岩石毁掉。除了有一个不明确的隐喻，提到一次旅程，几乎不再有任何事件。但是米开朗琪罗有很多聪明、睿智并且精准的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他在少年时代就曾从农牧神头像的下颚一锤敲掉一颗牙齿，而让它有了成年的表情。在但丁看来，中世纪亲切虔诚的唯物主义使所有用手或眼呈现出来的东西神圣起来。而米开朗琪罗则总是努力追求超越外在美；领会那种不可见之美；超越普遍的形式—那种美的抽象形式是柏拉图派学者思考的对象。这给他一种迁移不定的印象，一种无家可归、怨天尤人的灵魂的印象。这灵魂从虚弱屈从的肉体中就可以洞察出来。他把一见钟情解释成前世的存在—我在前世的爱你之地。

And yet there are many points in which he is really like Dante, and comes very near to the original image, beyond those later and feebler followers in the wake of Petrarch. He learns from Dante rather than from Plato, that for lovers, the surfeiting of desire—ove gran desir gran copia affrena, is a state less happy than poverty with abundance of hope—una miseria di speranza piena. He recalls him in the repetition of the words gentile and cortesia, in the personif ication of Amor, in the tendency to dwell minutely on the physical effects of the presence of a beloved object on the pulses and the heart. Above all, he resembles Dante in the warmth and intensity of his political utterances, for the lady of one of his noblest sonnets was from the first understood to be the city of Florence; and he avers that all must be asleep in heaven, if she, who was created “of angelic form,” for a thousand lovers, is appropriated by one alone, some Piero, or Alessandro de’ Medici. Once and again he introduces Love and Death, who dispute concerning him. For, like Dante and all the nobler souls of Italy, he is much occupied with thoughts of the grave, and his true mistress is death—death at first

as the worst of all sorrows and disgraces, with a clod of the field for its brain; afterwards, death in its high distinction, its detachment from vulgar needs, the angry stains of life and action escaping fast.

尽管如此，他和但丁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很接近原始的形象，超越了那些紧跟在彼特拉克身后，但又无力的模仿者。他从但丁而非柏拉图那里学到：对爱人来说沉溺于欲望，并不比在贫困中充满希望更快乐。他在重复温柔和优雅的话语时，在把爱人格化时，在仔细思考心爱的对象的出现对脉搏和心脏的身体反应时回想到自己。最重要的是他在政治言论的热情和强烈方面和但丁相像，因为，他最出色的十四行诗中的一首，按最初理解，里面的女士是佛罗伦萨城的化身；并且他主张，如果她作为成千上万个人的情人被创造成“天使般的外表”，却被一个人，比如说某位皮耶罗或者亚历桑德罗·德·美第奇据为己有的话，天堂中的一切肯定都是处在沉睡之中。他屡次提出爱情和死亡，两者的争执涉及到他。因为他和但丁以及所有意大利高贵的灵魂一样，心里装满死亡的念头，死亡是他真正的情人。一开始，死亡是所有悲伤和耻辱中最糟的一个，化为灵魂的一块泥淖之地。后来，死亡有了很大的区别，它超然于庸俗的需要之外，生命和行为的愤怒的污点迅速地剥离开去。

Some of those whom the gods love die young. This man, because the gods loved him, lingered on to be of immense, patriarchal age, till the sweetness it had taken so long to secrete in him was found at last. Out of the strong came forth sweetness, ex forti dulcedo. The world had changed around him. The “new Catholicism” had taken the place of the Renaissance. The spirit of the Roman Church had changed: in the vast world’s cathedral which his skill had helped to raise for it, it looked stronger than ever. Some of the first members of the Oratory were among his intimate associates. They were of a spirit as unlike as possible from

that of Lorenzo, or Savonarola even. The opposition of the Reformation to art has been often enlarged upon; far greater was that of the Catholic revival. But in thus fixing itself in a frozen orthodoxy, the Roman Church had passed beyond him, and he was a stranger to it. In earlier days, when its beliefs had been in a fluid state, he too might have been drawn into the controversy. He might have been for spiritualising the papal sovereignty, like Savonarola; or for adjusting the dreams of Plato and Homer with the words of Christ, like Pico of Mirandola. But things had moved onward, and such adjustments were no longer possible. For himself, he had . long since fallen back on that divine ideal, which above the wear and tear of creeds has been forming itself for ages as the possession of nobler souls. And now he began to feel the soothing influence which since that time the Roman Church has often exerted over spirits too independent to be its subjects, yet brought within the neighborhood of its action; consoled and tranquillised, as a traveller might be, resting for one evening in a strange city, by its stately aspect and the sentiment of its many fortunes, just because with those fortunes he has nothing to do. So he lingers on; a revenant, as the French say, a ghost out of another age, in a world too coarse to touch his faint sensibilities very closely; dreaming, in a worn- out society, theatrical in its life, theatrical in its art, theatrical even in its devotion, on the morning of the world's history, on the primitive form of man, on the images under which that primitive world had conceived of spiritual forces.

神所爱之人中有一些死得很早。因为神爱他，米开朗琪罗活到了德高望重的年龄，直到长久潜藏在他身上的芳醇被发掘出来。强大中产生芳醇，是出于力量的美好。世界在他身边改变。“新天主教”已经取代了文艺复兴的地位。罗马教庭的精神已经产生变化：在他用自己的技能帮助添砖加瓦建立起来的宏大的世界大教堂里，它看起来比以

往都更强大。奥拉托利会最初的一些成员成了他亲密的同伴。他们和洛伦佐，甚至萨沃那洛拉在精神上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此时，宗教改革对艺术的反抗已经加大了，但是天主教复苏的力量更强大。罗马教庭将自己置于僵化的正统宗教里，这是他不能理解的，他对它完全陌生。早期在其信仰不断变换的阶段，他也可能被卷入争论中，他可能会像萨沃那洛拉那样精神化教皇的权威，或是像皮科·米兰多拉那样，用耶稣的言语调适柏拉图和荷马的梦想。但是事情已向前发展，这种调整已无可能。就他个人而言，他早已依靠那种神圣的理想，这种理想，尽管在宗教信条的损耗下，已作为高贵灵魂的财产，自我塑造很多年了。现在，他开始感觉到，罗马教庭从那时起经常施加于过于独立、不受其影响的精神，却会将其吸引至自己的影响范围内的那种慰藉的力量。他感到慰藉而宁静，就像一个旅行者那样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休息一晚，为它庄严的气质和众多命运引起感触，只是因为这些命运和他毫无关系。所以他四处游荡，像法语说的那种亡魂。他是另一个年代的灵魂，处在一个太过粗粝而无法近距离触摸他微弱的感觉的时代。在一个生活如戏剧一般、艺术如戏剧一般甚至信仰都如戏剧一般疲惫不堪的社会里，梦想着世界历史的早晨、人类原始的外表以及由精神力量构建的原始世界的形象。

I have dwelt on the thought of Michelangelo as thus lingering beyond his time in a world not his own, be cause, if one is to distinguish the peculiar savor of his work, he must be approached, not through his followers, but through his predecessors; not through the marbles of Saint Peter’s, but through the work of the sculpto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over the tombs and altars of Tuscany. He is the last of the Florentines, of those on whom the peculiar sentiment of the Florence of Dante and Giotto descended: he is the consummate representative of the form that sentiment took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with men like Luca Signorelli and Mino da Fiesole. Up to him the tradition of sentiment is unbroken, the progress towards surer and more mature methods of expressing that

sentiment continuous. But his professed disciples did not share this temper; they are in love with his strength only, and seem not to feel his grave and temperate sweetness. Theatricality is their chief characteristic; and that is a quality as little attributable to Michelangelo as to Mino or Luca Signorelli. With him, as with them, all is serious, passionate, impulsive.

我之所以认为米开朗琪罗在不属于他的世界里，徘徊不去，是因为，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他的作品的奇异特质与众不同，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他的追随者，而是他的先驱；不是圣彼得大教堂的大理石雕像，而是15世纪雕塑家在托斯卡纳的陵墓和圣坛上留下的作品。他是最后一位继承了但丁和乔托那种佛罗伦萨式奇异情感的佛罗伦萨人。他和卢卡·西尼奥雷利及米诺·达·菲耶索莱一样，是15世纪那种情感所采用形式的最高代表。一直到他那里，这种情感的传统还保持着，追求更确定和更成熟地表达那种情感的方法的进程还在继续。但是自诩是他信徒的人却没有这种性情。他们热爱的只是他的力量，似乎没有感受到他暗淡而又温和的醇美。矫揉造作是他们的主要特色，而这个品性完全不能被认为属于米开朗琪罗、米诺或卢卡·西尼奥雷利中的任何一个。和这些伟人一样，米开朗琪罗是严肃的、热情的和冲动的。

This discipleship of Michelangelo, this dependence of his on the tradition of the Florentine schools, is nowhere seen more clearly than in his treatment of the Creation. The Creation of Man had haunted the mind of the middle age like a dream; and weaving it into a hundred carved ornaments of capital, or doorway, the Italian sculptors had early impressed upon it that pregnancy of expression which seems to give it many veiled meanings. As with other artistic conceptions of the middle age, its treatment became almost conventional, handed on from artist to artist, with slight changes, till it came to have almost an independent and abstract existence of

its own. It w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medieval mind thus to give an independent traditional existence to a special pictorial conception, or to a legend, like that of Trist ram or Tannhäuser, or even to the very thoughts and substance of a book, like the Imitation, so that no single workman could claim it as his own, and the book, the image, the legend, had itself a legend, and its fortunes, and a personal history; and it is a sign of the medievalism of Michelangelo, that he thus receives from tradition his central conception, and does but add the last touches, in transferring it to the frescoes of the Sistine Chapel.

米开朗琪罗这种门徒的身份，他对佛罗伦萨流派传统的依赖，在对《创世记》的处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上帝造人”像梦幻一般萦绕在中世纪的思维中。意大利雕塑家把它融汇进石柱顶部或门口的上百个雕塑装饰品中，早就给它赋予了具有很多隐含意义的丰富的表达。和中世纪其他艺术概念一样，对于它的处理方法几乎变成了惯例：在艺术家中传递下去，只有些微的改变，直到它自己几乎变成了一种独立、抽象的存在形式。因此这就成了中世纪思维的特色：赋予一个特定的图示概念，或是传奇故事，比如特里斯坦或汤豪泽的传奇，甚至是一本书的思想或内容，比如《效仿基督》以独立的传统的存在形式，这样没有哪位艺术家可以宣称它独属于自己。这本书、这个意象或者这个传奇本身都有了自己的传奇，有了自己的命运和历史。因此，这也是米开朗琪罗属于中世纪的标志。他从传统中获得他的中心思想，进行最后的打磨，把它转化成西斯廷教堂的壁画。

But there was another tradition of those earlier, more serious Florentines, of which Michelangelo is the inherit or, to which he gives the final expression, and which centres in the sacristy of San Lorenzo, as the tradition of the Creation centres in the Sistine Chapel. It has been said that all the great Florentines were

preoccupied with death. Outre-tombe! Outre-tombe! —is the bur den of their thoughts, from Dante to Savonarola. Even the gay and licentious Boccaccio gives a keener edge to his stories by putting them in the mouths of a party of people who had taken refuge in a country-house from the danger of death by plague. It was to this inherited sentiment, this practical decision that to be preoccupied with the thought of death was in itself dignifying, and a note of high quality, that the seriousness of the great Florentine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as partly due; and it was reinforced in them by the actual sorrows of their times. How often, and in what various ways, had they seen life stricken down, in their streets and houses. La bella Simonetta dies in early youth, and is borne to the grave with uncovered face. The young Cardinal Jacopo di Portogallo dies on a visit to Florence—insignis forma fui et mirabili modestia—his epitaph dares to say. Antonio Rossellino carves his tomb in the church of San Miniato, with care for the shapely hands and feet, and sacred attire; Luca della Robbia puts his skyiest works there; and the tomb of the youthful and princely prelate became the strangest and most beautiful thing in that strange and beautiful place. After the execution of the Pazzi conspirators, Botticelli is employed to paint their portraits. This preoccupation with serious thoughts and sad images might easily have resulted, as it did, for instance, in the gloomy villages of the Rhine, or in the overcrowded parts of medieval Paris, as it still does in many a village of the Alps, in something merely morbid or grotesque, in the Danse Macabre of many French and German painters, or the grim inventions of Dürer. From such a result the Florentine mast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ere saved by the nobility of their Italian culture, and still more by their tender pity for the thing itself. They must, often have leaned over the lifeless body, when all was at length quiet and smoothed out. After death, it is said, the traces of slighter and more superficial dispositions disappear; the lines become more simple and dignified;

only the abstract lines remain, in a great indifference. They came thus to see death in its distinction. Then following it perhaps one stage further, dwelling for a moment on the point where all this transitory dignity must break up, and discerning with no clearness a new body, they paused just in time, and abstained, with a sentiment of profound pity.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传统，是早期更为严肃的佛罗伦萨人的传统。米开朗琪罗继承下来，对它进行了最后的表达。这种传统在圣洛伦佐圣器安置所的装饰中占中心地位，像《创世记》的传统占据了西斯廷教堂中心那样。据说所有伟大的佛罗伦萨人都因死亡而心事重重。走出坟墓！走出坟墓！从但丁到萨沃那洛拉，无一不以此为思想的负担。即使是快乐放荡的薄伽丘，也借一群在郊外住所里躲避瘟疫的人，从他们口中表达出来，使故事更加有趣。因这种遗传的情感，这种因死亡而忧虑不安的现实思想本身也越发高贵，成为一种高品质的表现，所以15世纪佛罗伦萨伟人的严肃认真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应该的，而且他们所处时代的真正悲伤也使得它变得更强烈。他们曾经多少次看到生命以各种不同方式在街道上、房子里被击垮。美丽的西莫内塔早早夭折，下葬到坟墓里，连脸都没有盖上。年轻的红衣主教雅各布·迪·波托加洛在去佛罗伦萨的途中死掉。卓越的外表和亲切的谦逊同在——他的墓志铭居然这样写道。安东尼奥·罗塞利诺在圣米尼阿托教堂雕刻他的坟墓时，非常重视手脚和圣衣的美观。卢卡·德拉·罗比亚把他最好的作品放在那儿，而且这个年轻高贵的高级教士的坟墓成为了这个奇异美丽的地方的最奇异美丽的东西。帕齐阴谋家被执行死刑后，波提切利受雇去给他们画肖像。这种带着严肃思想和悲伤形象的全神贯注可能容易引发某种结果，而且事实也是如此：它在莱茵河畔的阴沉村庄或是中世纪巴黎拥挤的街区，就如现在仍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村庄里一样，只引起一些病态怪异的东西，在许多法国和德国画家笔下描绘的“死亡之舞”，或是丢勒那种可怕作品中出现。在这样的影响下，15世纪佛罗伦萨的大师们被意大利文化的高贵，更被他们对事物本身的温情怜悯拯救了。当一切归于平静之后，他们必定

常常俯身在无生命的尸体上。据说死后，较肤浅的、更为表面的本性痕迹会消失，线条变得更加简单高贵，只有抽象的线条冷漠地存在着。因此他们从其差异之处看待死亡。然后可能会更进一步，思考一下这种转瞬即逝的尊严必须分解的情况，模模糊糊地分辨出一个新的躯体，他们会适时停顿下来，带着深沉的怜悯刻意回避。

Of all this sentiment Michelangelo is the achievement; and, first of all, of pity. Pietà, pity, the pity of the Virgin Mother over the dead body of Christ, expanded into the pity of all mothers over all dead sons, the entombment, with its cruel “hard stones” :—this is the subject of his predilection. He has left it in ,many forms, sketches, half-finished designs, finished and unfinished groups of sculpture; but always as a hopeless, rayless, almost heathen sorrow —no divine sorrow, but mere pity and awe at the stiff limbs and colorless lips. There is a drawing of his at Oxford, in which the dead body has sunk to the earth between the mother’s feet, with the arms extended over her knees. The tombs in the sacristy of San Lorenzo are memorials, not of any of the nobler and greater Medici, but of Giuliano, and Lorenzo the younger, noticeable chiefly for their somewhat early death. It is mere human nature, therefore, which has prompted the sentiment here. The titles assigned traditionally to the four symbolical figures, Night and Day, The Twilight and The Dawn, are far too definite for them: for these figures come much nearer to the mind and spirit of their author, and are a more direct expression of his thoughts, than any merely symbolical conceptions could possibly have been. They concentrate and express, less by way of definite conceptions than by the touches, the promptings of a piece of music, all those vague fancies, misgivings, presentiments, which shift and mix and are defined and fade again, whenever the thoughts try to f ix themselves with sincerity on the conditions and surroundings of the disembodied spirit. I suppose no one would

come to the sacristy of San Lo renzo for consolation; for seriousness, for solemnity, for dignity of impression, perhaps, but not for consolation. It is a place neither of consoling nor of terrible thoughts, but of vague and wistful speculation. Here, again, Michelangelo is the disciple not so much of Dante as of the Platonists. Dante's belief in immortality is for mal, precise and firm, almost as much so as that of a child, who thinks the dead will hear if you cry loud enough. But in Michelangelo you have maturity, the mind of the grown man, dealing cautiously and dispassionately with serious things, and what hope he has is based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ignorance—ignorance of man, ignorance of the nature of the mind, its origin and capacities. Michelangelo is so ignorant of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new body and its laws, that he does not surely know whether the consecrated Host may not be the body of Christ. And of all that range of sentiment he is the poet, a poet still alive, and in possession of our inmost thoughts—dumb inquiry over the relapse after death into the formlessness which preceded life, the change, the revolt from that change, then the correcting, hallowing, consoling rush of pity; at last, far off, thin and vague, yet not more vague than the most definite thoughts men have had through three centuries on a matter that has been so near their hearts, the new body—a passing light, a mere intangible, external effect, over those too rigid, or too formless faces; a dream that lingers a moment, retreating in the dawn, incomplete, aimless, helpless; a thing with faint hearing, faint memory, faint power of touch; a breath, a f lame in the door way, a feather in the wind.

米开朗琪罗表现了所有这些情感，其中首先是怜惜之情。在《圣母恸子》中，圣母面对死去的耶稣基督的躯体的怜悯，延伸成所有母亲对死去儿子的怜悯。埋葬，包裹在冷冰冰的“坚硬的石头”中—是他偏爱的主题。他把这个主题放进多种形式里，比如素描、半完成的设

计、完成和未完成的群雕；但那种悲伤总是绝望的、灰暗的、几乎是异教式的悲伤——没有神圣的悲伤，有的只是对僵硬的四肢、苍白嘴唇的怜悯和敬畏。牛津有一幅他的画，画中的尸体在母亲双脚间垂到地上，手臂还耷拉到她的膝盖上。圣洛伦佐圣器安置所的坟墓，不属于美第奇家族哪个高贵伟大的成员，而是朱利亚诺和小洛伦佐的纪念碑，引人注意的主要是他们有些过早的夭亡。因此，纯粹是人类的天性触发了这种情感。传统上分给四个象征人物的名称《夜》与《昼》、《晨》和《昏》对于它们而言界定过窄。因为这些人物与它们作者的思想和精神更加接近，比任何单纯的象征性概念更能直接表现他的思想。它们更多的是通过触动，而非明确的概念，而专注于并且表现一段音乐的激励，表现其中所有那些模糊的幻想、疑虑和预感。每当思维想要认真地把它们固定在脱离肉体的精神的条件和环境下时，它们总是在变换、混合、被界定，然后重又消失。我想没人会去圣洛伦佐的圣物安置所寻找慰藉。他们可能去寻求严肃、庄重和尊严的印迹，但不会去寻求慰藉。那是一个既不能安慰人，也没有可怖思想，而是有着茫然和惆怅的思索的地方。在这里，米开朗琪罗更像是柏拉图学派的弟子，而非但丁的门徒。但丁对不朽的信仰是刻板的、准确的和坚定的，就像一个孩子，认为如果哭的声音足够大，死者就能听到似的。在米开朗琪罗身上，你看到的是成熟，是一个慎重冷静地对待严肃事物的成年人的思想。他所抱的希望建立在对无知的觉悟上：对人的无知，对思维的本质的无知，对其起源和能力的无知。米开朗琪罗对于宗教世界、对它新的体系和法则如此不了解，以至于他不能确定圣餐的圣饼是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在所有这些情感中，他是诗人，一位健在的诗人，掌握着我们最秘密的思想——这是种无声的质询，询问那种死后重新回复到生命存在之前的无形状态，变化、变化引发的反抗，然后是对怜惜的修正、神圣化、感到慰藉的冲动；最终在远处出现，稀薄，但不比人类在3个世纪里所拥有的、关于与他们心灵如此之近的最确切思想更为蒙眬：新的身体——一束转瞬即逝的光，对于那些过于刚硬、或者几乎不成型的面庞的一种几乎无法触及的外在的效果；一个徘徊片刻便在黎明时分退却、没有完成、没有目标也没人帮助的梦想；一件有着模糊的听力、蒙眬的记忆、几乎无力触摸的东西；一缕呼吸、门口的一束火焰、亦或风中的

一根羽毛。

The qualities of the great masters in art or literature, the combination of those qualities, the laws by which they moderate, support, relieve each other, are not peculiar to them; but most often typical standards, or revealing instances of the laws by which certain aesthetic effects are produced. The old masters indeed are simpler; their characteristics are written larger, and are easier to read, than the analogues of them in all the mixed, confused productions of the modern mind. But when once we have succeeded in defining for ourselves tho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aw of their combination, we have acquired a standard or measure which helps us to put in its right place many a vagrant genius, many an unclassified talent, many precious though imperfect products of art. It is so with the components of the true character of Michelangelo. That strange interfusion of sweetness and strength is not to be found in those who claimed to be his followers; but it is found in many of those who worked before him, and in many others down to our own time, in William Blake, for in stance, and Victor Hugo, who, though not of his school, and unaware, are his true sons, and help us to understand him as he in turn interprets and justifies them. Perhaps this is the chief use in studying old masters.

伟大的艺术或文学大师的品质，这些品质的结合，他们缓和、支持、为彼此解除痛苦的法则，不是他们所特有的，而常常是典型的标准，或者产生一定美学效果法则的启迪事例。这些古老的大师的确更简单。他们的特色更为鲜明，更容易读懂，比现代思维模仿他们创造出来的、混合的、令人迷惑的作品更好理解。但是当我们一旦为自己成功确立了那些特色还有它们结合的法则，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标准或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把许多游移的天才、未分类的天才和不完美但

宝贵的艺术品放到合适的位置。米开朗琪罗本色的成分也是如此。那种芳醇和力量的奇异混合在那些自称他追随者的身上找寻不到，但却在许多在他之前进行创作的人那里找得到。而其他许多，甚至到我们现在的时代，例如威廉·布莱克和维克多·雨果身上都找得到。虽然他们不属于他的流派，甚至也未意识到，但却是他真正的继承者。他们能帮助我们理解米开朗琪罗，相反，米开朗琪罗也阐释和佐证了他们。可能这就是研究古代大师的主要作用。

1. 0

1871 年

[4_1].哥伦布大交换是一场东西半球之间生物、农作物、人种、文化、传染病以及思想观念的大规模交流。1492年哥伦布首次航行到美洲大陆，这是世纪性大规模航海的开始，也是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联系的开始。这种生态学上的变革，便称为“哥伦布大交换”。

[4_2].沙司酱，意大利烹饪用的含西红柿、大蒜、洋葱等调制成的酱料。

[4_3].意大利肉酱面。

Leonardo Da Vinci

列奥纳多·达·芬奇

Homo Minister Et Interpres Nature

——人类的牧师，自然的阐释者

IN Vasari's life of Leonardo da Vinci as we now read it there are some variations from the first edition. There, the painter who has fixed the outward type of Christ for succeeding centuries was a bold speculator, holding lightly by other men's beliefs, setting philosophy above Christianity. Words of his, trenchant enough to justify this impression, are not recorded, and would have been out of keeping with a genius of which one characteristic is the tendency to lose itself in a refined and graceful mystery. The suspicion was but the time- honored mode in which the world stamps its appreciation of one who has thoughts for himself alone, his high indifference, his intolerance of the common forms of things; and in the second edition the image was changed into something fainter and more conventional. But it is still by a certain mystery in his work, and some thing enigmatical beyond the usual measure of great men, that he fascinates, or perhaps half repels. His life is one of sudden revolts, with intervals in which he works not at all, or apart from the main scope of his work. By a strange fortune the pictures on which his more popular fame rested disappeared early

from the world, like the Battle of the Standard1; or are mixed obscurely with the product of meaner hands, like the Last Supper. His type of beauty is so exotic that it fascinates a larger number than it delights, and seems more than that of any other artist to reflect ideas and views and some scheme of the world within; so that he seemed to his contemporaries to be the possessor of some unsanctified and secret wisdom; as to Michelet2 and others to have anticipated modern ideas. He trifles with his genius, and crowds all his chief work into a few tormented years of later life; yet he is so possessed by his genius that he passes unmoved through the most tragic events, overwhelming his country and friends, like one who comes across them by chance on some secret errand.

瓦萨里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一生》，我们现在所读的版本与第一版相比有了一些变化。在第一版里，为此后几个世纪里设定了基督的外在典型形象的画家是一个大胆的投机者，被其他人的信仰所轻轻托举，把哲学置于基督教教义之上。他那些犀利尖锐、足可以证明这样印象的话没有被记载下来，并且本来也会与一种天赋不符，这天赋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一种精致、优雅的神秘中迷失自我的倾向。这种观念由来已久：世界把对只为自己着想、对一切漠不关心和对事物的一般形式不能容忍之人的欣赏表现出来。在第二版里，这个形象变得更为模糊，也更为传统。但还是他作品里的某种神秘，以及一些超出了通常意义的伟大人物的玄妙费解之物使他让人着迷，或者可能使人半怀厌恶。他的一生是一种突然的反叛，其中有一些间隙根本未进行创作，或者远离主要的创作范围。某种奇怪的命运使他更具名气的画作，比如说《安吉里之战》，早早在世界上消失无踪，或是和出自粗陋之手的作品令人费解地混在了一起，比如《最后的晚餐》。他的那种美有着浓郁的异域风情，以至于他给人带来的更多的是炫惑，而非愉悦，并且比其他任何艺术家更能反映出内在的想法、观点和某种世界格局。所以，在同时代的人眼中，他似乎具有某种渎神的、隐秘的智慧，对米什莱和其他人来说，他预测了现代的思想。他视自己的天

赋如儿戏，在晚期饱受折磨的几年里集中创作了所有主要的作品。然而他又是如此沉迷于自己的天赋，以至于经历那些最悲惨的事情却无动于衷，就像一位担负某项秘密任务偶然经过的人一样，让他的国家和朋友不知所措。

His legend, as the French say, with the anecdotes which everyone remembers, is 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chapters of Vasari. Later writers merely copied it, until, in 1804, Carlo Amoretti applied to it a criticism which left hardly a date fixed, and not one of those anecdotes untouched. The various questions thus raised have since that time become, one after another, subject of special study, and mere antiquarianism has in this direction little more to do. For others remain the editing of the thirteen books of his manuscripts, and the separation by technical criticism of what in his reputed works is really his, from what is only half his, or the work of his pupils. But a lover of strange souls may still analyse for himself the impression made on him by those works, and try to reach through it a definition of the chief elements of Leonardo's genius. The legend, as corrected and enlarged by its critics, may now and then intervene to support the results of this analysis.

他的传奇，像法国人说的那样，有着人人传诵的轶事，是瓦萨里书中最出彩的一章。后来的作家只是简单照搬，直到1804年卡洛·阿莫雷蒂对它进行了批判。批评涉及到几乎每一个确定的日期和所有的轶事。其中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从那时起一个接一个变成了专门研究的主题，在这个方向纯粹的古物研究已经基本无事可做。余下的工作则是编辑达·芬奇的13本手稿，通过技术性的批评区分哪些归于他名下的著作真正属于他，哪些他只是创作了一半，哪些是他学生的作品。但是热爱不可思议的心灵的人可能还在分析那些作品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并且努力通过它界定列奥纳多天赋的主要成分。传奇被批评

家们更正和丰富着，可能会不时介入来支持这种分析的结果。

His life has three divisions—thirty years at Florence, nearly twenty years at Milan, then nineteen years of wandering, till he sinks to rest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Francis the First at the Château de Clou. The dishonor of illegitimacy hangs over his birth. Piero Antonio, his father, was of a noble Florentine house, of Vinci in the Val d'Arno, and Leonardo, brought up delicately among the true children of that house, was the love-child of his youth, with the keen, puissant nature such children often have. We see him in his boyhood fascinating all men by his beauty, improvising music and songs, buying the caged birds and setting them free, as he walked the streets of Florence, fond of odd bright dresses and spirited horses.

他的一生分为3个阶段：30年在佛罗伦萨，近20年在米兰，剩下的19年到处游走，直到接受弗兰西斯一世的保护在克鲁城堡安定下来。他因私生子的出身而蒙羞。他的父亲皮耶罗·安东尼奥出身瓦尔达尔诺的芬奇村一个贵族之家。列奥纳多和家族中的正统子弟一起被精心抚养长大。他是他父亲年轻时的私生子，有着这种孩子常常具备的敏锐、强大的天性。我们知道他儿时拥有俊美的容貌，让所有人着迷；他即兴创作音乐和歌曲；他买来笼中的小鸟，然后把它们放飞；他走在佛罗伦萨的街道上，喜爱奇异明艳的服装和生气勃勃的马。

From his earliest years he designed many objects, and constructed models in relief, of which Vasari mentions some of women smiling. His father, pondering over this promise in the child, took him to the workshop of Andrea del Verrocchio, then the most famous artist in Florence. Beautiful objects lay about there—

reliquaries, pyxes, silver images for the pope's chapel at Rome, strange fancy-work of the middle age, keeping odd company with fragments of antiquity, then but lately discovered. Another student Leonardo may have seen there—a lad into whose soul the level light and aerial illusions of Italian sunsets had passed, in after days famous as Perugino3. Verrocchio was an artist of the earlier Florentine type, carver, painter, and worker in metals, in one; designer, not of pictures only, but of all things for sacred or household use, drinking-vessels, ambries, instruments of music, making them all fair to look upon, filling the common ways of life with the reflection of some far-off brightness; and years of patience had refined his hand till his work was now sought after from distant places.

从小他设计了很多物品，并做了很多浮雕模子，瓦萨里曾经提及其中一些微笑的女人的浮雕。他的父亲仔细考虑了这个孩子在这方面的前途，把他送到当时佛罗伦萨最著名的艺术家安德里亚·德尔·韦罗基奥的工作室里。那里有很多漂亮的物品：圣物箱、圣餐盒、用于教皇在罗马的小教堂的银像和中世纪奇异的刺绣品，以及最近才被发现的古器件的碎片。列奥纳多在那里可能见过的另一个学生，那个为意大利落日的水平光线和空中幻象迷醉的年轻人，就是后来著名的佩鲁吉诺。韦罗基奥是早期佛罗伦萨风格的艺术家，既是雕工，也是画匠，而且制作金属品。他不只设计绘画作品，也设计其他所有宗教器物或日常用品，比如酒具、壁龛还有乐器。它们设计得很漂亮，给平凡的生活方式增添了某种遥远的光芒。数十年的耐心工作使他的技艺更加纯熟。到现在远方的人们还在追寻他的作品。

It happened that Verrocchio was employed by the brethren of Vallombrosa to paint the Baptism of Christ, and Leonardo was allowed to finish an angel in the left-hand corner. It was one of

those moments in which the progress of a great thing—here, that of the art of Italy—presses hard on the happiness of an individual, through whose discouragement and decrease, humanity, in more fortunate persons, comes a step nearer to its final success.

由于偶然的机会，韦罗基奥被瓦隆布罗萨兄弟请去绘制《基督的洗礼》。列奥纳多得到允许完成左手边角落的一个天使。这就是伟大事物的进步—这里指的是意大利艺术—极力促进个人幸福的一个例子，在比较幸运的人身上，人性冲破挫折和低谷，向最终的成功迈进了一步。

For beneath the cheerful exterior of the mere well-paid craftsman, chasing brooches for the copes of Santa Maria Novella, or twisting metal screens for the tombs of the Medici, lay the ambitious desire to expand the destiny of Italian art by a larger knowledge and insight into things, a purpose in art not unlike Leonardo's still unconscious purpose; and often, in the modelling of drapery, or of a lifted arm, or of hair cast back from the face, there came to him something of the freer manner and richer humanity of a later age. But in this Baptism the pupil had surpassed the master; and Verrocchio turned away as one stunned, and as if his sweet earlier work must thereafter be distasteful to him, from the bright animated angel of Leonardo's hand.

在一个为新圣母马利亚教堂的长袍雕刻镂空胸针、为美第奇家族坟墓制作金属屏风、收入丰厚的匠人的快乐外表下，隐藏着以更多对事物的知识和洞察，来扭转意大利艺术命运的雄心壮志。这个艺术目标和列奥纳多自己还未意识到的目标是一致的。常常在塑造一片衣饰、一只抬起的手臂和一缕从脸上甩到一旁的头发时，他会想到某种

属于后来的时代的更自由的方式和更丰富的人性。但在这幅《基督的洗礼》中，学生超越了老师。韦罗基奥看到出自列奥纳多之手那明丽生动的天使，他惊愕地离开了，好像从此他以前满意的作品都会让他生厌一样。

The angel may still be seen in Florence, a space of sunlight in the cold, labored old picture; but the legend is true only in sentiment, for painting had always been the art by which Verrocchio set least store. And as in a sense he anticipates Leonardo, so to the last Leonardo recalls the studio of Verrocchio, in the love of beautiful toys, such as the vessel of water for a mirror, and lovely needle-work about the implicated hands in the Modesty and Vanity, and of reliefs, like those cameos which in the Virgin of the Balances hang all round the girdle of Saint Michael, and of bright variegated stones, such as the agates in the Saint Anne, and in a hieratic preciseness and grace, as of a sanctuary swept and garnished. Amid all the cunning and intricacy of his Lombard manner this never left him. Much of it there must have been in that lost picture of Paradise, which he prepared as a cartoon for tapestry, to be woven in the looms of Flanders. It was the perfection of the older Florentine style of miniature-painting, with patient putting of each leaf upon the trees and each flower in the grass, where the first man and woman were standing.

在佛罗伦萨仍有可能看到那个天使。它是那幅冰冷、费力的陈旧作品中的一个亮点。但是传奇只在情感意义上是真实的，因为绘画是韦罗基奥最不重视的艺术。而且因为像在某种意义上他对列奥纳多期望的那样，列奥纳多谈到韦罗基奥的工作室的时候，谈到对漂亮的玩意儿的喜爱，比如当作镜子的水杯；在《谦虚与虚荣》中显示手的灵巧的精美的刺绣；喜爱浮雕，比如《天平圣母》中缀满圣米迦勒腰带

的宝石；喜爱明亮的杂色石头，比如《圣安妮》中的玛瑙；以及那种僧侣式的一丝不苟和优雅，比如打扫干净、布置一新的修道院。在他伦巴第风格的巧妙复杂里，他从未放弃这一点，而且在已经失传的《伊甸园》这幅画中得到很多体现。《伊甸园》是他为一张准备用佛兰德斯织布机编织的挂毯准备的草图。它是早期佛罗伦萨式微型画的完美代表：耐心地把每一片叶子都安放在树上，每一朵花都放置进草丛里，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立于其中。

And because it was the perfection of that style, it awoke in Leonardo some seed of discontent which lay in the secret places of his nature. For the way to perfection is through a series of disgusts; and this picture—all that he had done so far in his life at Florence—was after all in the old slight manner. His art, if it was to be something in the world, must be weighted with more of the meaning of nature and purpose of humanity. Nature was “the true mistress of higher intelligences” . He plunged, then, into the study of nature. And in doing this he followed the manner of the older students; he brooded over the hidden virtues of plants and crystals, the lines traced by the stars as they moved in the sky, over the correspondences which exist between the different orders of living things, through which, to eyes opened, they interpret each other; and for years he seemed to those about him as one listening to a voice silent for other men.

因为它是那种风格的完美之作，所以引起了列奥纳多埋藏在内心秘密角落里某种不满的种子。因为达到完美的路上要经过一些令人厌恶的阶段。这幅画是他到此时在佛罗伦萨创作的唯一作品，采用的毕竟是古老的娇弱风格。他的艺术如果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一定要有更多的自然的意义和人性的目的。自然是“高等智慧的真正女主人”，于是他投入到对自然的研究中。在这个过程中，他遵循过去研

究者的方法。他沉浸在对植物和水晶隐藏的特质、对星体在天空中移动轨迹的思考中，沉浸在对不同种类生物间存在联系的思考中。对有观察力的人来说，它们通过这种联系彼此进行诠释。很多年里，在周围人的眼中，他似乎是在聆听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

He learned here the art of going deep, of tracking the sources of expression to their subtlest retreats, the power of an intimate presence in the things he handled. He did not at once or entirely desert his art; only he was no longer the cheerful, objective painter, through whose soul, as through clear glass, the bright figures of Florentine life, only made a little mellower and more pensive by the transit, passed on to the white wall. He wasted many days in curious tricks of design, seeming to lose himself in the spinning of intricate devices of line and color. He was smitten with a love of the impossible—the perforation of mountains, changing the course of rivers, raising great buildings, such as the church of San Giovanni, in the air; all those feat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which natural magic professed to have the key. Later writers, indeed, see in these ef forts an anticipation of modern mechanics; in him they were rather dreams, thrown off by the overwrought and laboring brain. Two ideas were especially confirmed in him, as reflexes of things that had touched his brain in childhood beyond the depth of other impressions—the smiling of women and the motion of great waters.

在此他学会了深入研究的技巧，到最隐秘的静修处追寻表现力的源泉，到他掌控的事物中追寻隐秘的存在的力量。他没有马上或是全部放弃他的艺术，只不过不再是一个快乐客观的画家。佛罗伦萨生活的明丽形象穿过这样的画家的心灵，就如同穿过透明的玻璃，打到白色的墙上时，只是在传送中变得有些许的柔和，又更加忧郁了。他在新奇的设计手法上浪费了很多天时间，仿佛要使自己迷失在线条和色

彩的复杂构想的一团乱麻中。他因热衷于一些不可能的事而深受打击：他想给高山凿洞，给河流改道，把圣乔瓦尼教堂那样的高大建筑举向空中；自然魔力声称只有自己才掌握了完成这些功绩的钥匙。之后的作家的确在这些努力中看到了现代力学的雏形，但对他来说这些都更像是梦境，是过度劳累忙碌的大脑丢弃的梦境。有两个念头在他的头脑中特别地挥之不去，如同他童年时代比其他事物更深刻地触及了他的大脑的映象，那就是女人的微笑和强大水流的涌动。

And in such studies some interfusion of the extremes of beauty and terror shaped itself, as an image that might be seen and touched, in the mind of this gracious youth, so fixed that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it never left him. As if catching glimpses of it in the strange eyes or hair of chance people, he would follow such about the streets of Florence till the sun went down, of whom many sketches of his remain. Some of these are full of a curious beauty, that remote beauty which may be apprehended only by those who have sought it carefully; who, starting with acknowledged types of beauty, have refined as far upon these, as these refine upon the world of common forms. But mingled inextricably with this there is an element of mockery also; so that, whether in sorrow or scorn, he caricatures Dante even. Legions of grotesques sweep under his hand; for has not nature, too, her grotesques—the rent rock, the distorting lights of evening on lonely roads, the unveiled structure of man in the embryo, or the skeleton?

这样的研究中，美丽和可怖两个极端的混合使自己在这个高尚的年轻人心中作为一种可视可及的形象根深蒂固地存在，在以后的人生中挥之不去。仿佛在偶遇者陌生的眼睛或头发里瞥见它一样，他会在佛罗伦萨街头一直跟着他直到日落。他的很多记下了这些的草图流传至今，其中一些极具奇特之美，只有仔细探寻的人才能领会到这些细

微的美。那些从公认的美的各种类型开始的人，一直对这些进行锤炼加工，正如这些作品对一般形式的世界进行锤炼加工一样。但与此难分难解、混合在一起的有嘲讽的因素。所以不管是悲哀还是轻蔑，他甚至以漫画手法描绘但丁。在他笔下，奇异风格的大军席卷而来。碎裂的岩石、孤寂夜路上扭曲的光线、公诸于众的人体胚胎结构亦或是人体骨骼，自然不是也有自己的奇异形状吗？

All these swarming fancies unite in the Medusa of the Uflizii. Vasari's story of an earlier Medusa, painted on a wooden shield, is perhaps an invention; and yet, properly told, has more of the air of truth about it than anything else in the whole legend. For its real subject is not the serious work of a man, but the experiment of a child. The lizards and glow- worms and other strange small creatures which haunt an Italian vineyard bring before one the whole picture of a child's life in a Tus can dwelling— half castle, half farm—and are as true to nature as the pretended astonishment of the father for whom the boy has prepared a surprise. It was not in play that he painted that other Medusa, the one great picture which he left behind him in Florence. The subject has been treated in various ways; Leonardo alone cuts to its centre; he alone realises it as the head of a corpse, exercising its powers through all the circum stances of death. What may be called the fascination of corruption penetrates in every touch its exquisitely finished beauty. About the dainty lines of the cheek the bat flits unheeded. The delicate snakes seem literally strangling each other in terrified struggle to escape from the Medusa brain. The hue which violent death always brings with it is in the features; features singularly massive and grand, as we catch them inverted, in a dexterous foreshortening, crown foremost, like a great calm stone against which the wave of serpents breaks.

这一系列的奇思异想全部在乌菲兹美术馆的《美杜莎》里表现出来。瓦萨里有关早期画在木盾上的美杜莎的故事可能是编造出来的。然而，描述得当的话，它比整个传奇中其他任何情节都更具真实感。因为它的真正主题不是成人的严肃作品，而是一个孩子的试验之作。蜥蜴、萤火虫和其他奇异的小生物在意大利葡萄园里出没，把一个孩子在托斯卡纳住所里的生活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这里半是城堡，半是农庄。小生物对自然来说再真实不过，这和父亲见到小男孩精心准备的惊喜假装出来的惊讶一样真实。他并非是出于玩耍，画出了另一个美杜莎,这幅伟大作品被保留在佛罗伦萨。人们以各种方式表现着这个主题，只有列奥纳多直接指向它的中心。只有他将其展现为尸体的头颅，通过所有死亡的情境来体现它的力量。这种“腐朽之魔力”在每一笔中渗入它极致的美。蝙蝠悄然掠过线条优美的脸颊，细软的毒蛇展开惨烈的争斗，似乎要相互扼杀，以从美杜莎的头上逃开。五官上带有那种惨死之人常有的色调：当我们运用灵活的透视缩图法反过来看时，五官大得异乎寻常，尤其是头顶，就像一块平静的巨石毒蛇如浪，飞溅其上。

The science of that age was all divination, clairvoyance, unsubjected to our exact modern formulas, seeking in an instant of vision to concentrate a thousand experiences. Later writers, thinking only of the well-ordered treatise on painting which a Frenchman, Raffaelle du Fresne, a hundred years afterwards, compiled from Leonardo’s bewildered manuscripts, written strangely, as his manner was, from right to left, have imagined a rigid order in his inquiries. But this rigid order would have been litt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tlessness of his character; and if we think of him as the mere reasoner who subjects design to anatomy, and composition to mathematical rules, we shall hardly have that impression which those around Leonardo received from him. Poring over his crucibles, making experiments with color, trying, by a strange variation of the alchemist’s dream, to discover the secret,

not of an elixir to make man's natural life immortal, but of giving immortality to the subtlest and most delicate effects of painting, he seemed to them rather the sorcerer or the magician, possessed of curious secrets and a hidden knowledge, living in a world of which he alone possessed the key. What his philosophy seems to have been most like is that of Paracelsus4 or Cardan5; and much of the spirit of the older alchemy still hangs about it, with its confidence in short cuts and odd byways to knowledge. To him philosophy was to be something giving strange swiftness and double sight, divining the sources of springs beneath the earth or of expression beneath the human countenance, clairvoyant of occult gifts in common or uncommon things, in the reed at the brook side, or the star which draws near to us but once in a century. How, in this way, the clear purpose was over clouded, the fine chaser's hand perplexed, we but dimly see; the mystery which at no point quite lifts from Leon ardo's life is deepest here. But it is certain that at one period of his life he had almost ceased to be an artist.

那个时代的科学完全是预言和洞察力，它们独立于我们精确的现代公式之外，在一瞬间的幻象中寻求集合成千上万次的体验。后来的作家们只考虑到一篇关于绘画的组织精当的文章，由此想像出一种僵化的顺序。这篇文章是百年之后一个叫拉法埃莱·迪弗伦的法国人根据列奥纳多令人困惑的手稿编辑整理的：书稿怪异地按他自己由右到左的方式书写。但这种僵化顺序和他永不安分的个性非常不符。如果我们把他当成是一个让设计服从解剖学、让写作符合数学规则的纯粹理性的人，我们几乎无法得到列奥纳多身旁的人对他的印象了。他注视着坩埚，用色彩做试验，带着一种炼金术士的梦想的奇特变种追寻着秘密：不是使人自然生命不朽的长生不老药的秘密，而是要让绘画中最为精美细腻、美妙绝伦的效果保持不朽。对他们来说他就是巫师或者说是魔法师，掌控着新奇的秘密和不为人知的学问，生活在一个只有他才拥有钥匙的世界里。在哲学上他似乎和帕拉切尔苏斯和卡丹最

为相像。古老的炼金术的精神依然徘徊其中，相信通过捷径和旁门左道可以获得知识。对他来说，哲学应该要提供超常的敏捷性和双倍的洞察力，预见到地下奔涌的清泉或是人类面容之下的表情，可以透视出平凡或不平凡事物中玄妙的天赋，比如溪边的一支芦苇或是一个世纪才靠近我们一次的星体。就这样我们只能模糊地看到,明确的目标是如何变得模糊，雕塑师的手法如何变得迷惑。列奥纳多一生中从未消失的神秘在此也达到顶点。但确定的是，在人生的某一阶段，他几乎终止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The year 1483—the year of the birth of Raphael and the thirty-first of Leonardo's life—is fixed as the date of his visit to Milan by the letter in which he recommends himself to Ludovico Sforza6, and offers to tell him, for a price, strange secrets in the art of war. It was that Sforza who murdered his young nephew by slow poison, yet was so susceptible of religious impressions that he blended mere earthly passion with a sort of religious sentimentalism, and who took for his device the mulberry-tree—symbol, in its long delay and sudden yielding of f lowers and fruit together, of a wisdom which economises all forces for an opportunity of sudden and sure effect. The fame of Leonardo had gone before him, and he was to model a colossal statue of Francesco, the first Duke of Milan. As for Leonardo himself, he came not as an artist at all, or careful of the fame of one; but as a player on the harp, a strange harp of silver of his own construction, shaped in some curious likeness to a horse's skull. The capricious spirit of Ludovico was susceptible also to the power of music, and Leonardo's nature had a kind of spell in it. Fascination is always the word descriptive of him. No portrait of his youth remains; but all tends to make us believe that up to this time some charm of voice and aspect, strong enough to balance the disadvantage of his birth, had played about him. His physical strength was great; it was said that he could bend a horseshoe like a

coil of lead.

1483年拉斐尔出生，此时列奥纳多31岁。一般认为，他在这一年来到米兰：在一封信里他向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毛遂自荐，并且提出，以一定价钱，向他透露战争这门艺术里的奇异秘密。正是这位斯福尔扎用慢性毒药谋杀了年轻的侄子，然而他如此容易受宗教观念的影响，以致于把单纯的世俗热情和某种宗教感伤混在一起。他借用桑葚树这种经过长时间等待、在一瞬间同时开花结果之物来象征他的手段，象征一种有效利用所有力量，等待达到突发和确定效果的机会的智慧。列奥纳多当时早已声名远播，而且他要给弗朗西斯科这位第一位米兰公爵铸造一尊巨型雕像。对列奥纳多本人而言，他根本不是以艺术家的身份来到这里，或者说，并不在意艺术家的声名。他只是弹奏自己制造的形状古怪、有点像马头的奇异银质竖琴。卢多维科反复无常的性情也容易受到音乐力量的影响，而列奥纳多天性里就有一份音乐的魔力。“魅力”这个词永远可以用来形容他。他年轻时的肖像画并未留存下来，但一切都往往让我们相信，此时他声音和外貌的某些魅力已经非常强大，足以弥补他低贱的出身。他身强力壮，据说可以把马蹄铁像铅卷那样折弯。

The Duomo, work of artists from beyond the Alps, so fantastic to the eye of a Florentine used to the mellow, unbroken surfaces of Giotto and Arnolfo, was then in all its freshness; and below, in the streets of Milan, moved a people as fantastic, changeful, and dreamlike. To Leonardo least of all men could there be anything poisonous in the exotic f lowers of sentiment which grew there. It was a life of brilliant sins and exquisite amusements: Leonardo became a celebrated designer of pageants; and it suited the quality of his genius, composed, in almost equal parts, of curiosity and the desire of beauty, to take things as they came.

米兰多莫教堂是阿尔卑斯山以远艺术家的作品，对习惯了乔托和阿诺尔福那种柔美流畅线条的佛罗伦萨人来说，它是如此奇特。当时教堂才刚建成。在下面的米兰街道上游走着一个奇特、善变、梦幻般的民族。对列奥纳多来说那里的人最不可能毒害生长在那里的异域的情感之花。这是一种充满炫目的罪过和高雅消遣的生活：列奥纳多成为一名著名的庆典设计师；这很适合他的禀性，他天赋中的好奇和对美的渴望几乎分量相当，对于美的事物极为敏感。

Curiosity and the desire of beauty—these are the two elementary forces in Leonardo’s genius; curiosity, often in conflict with the desire of beauty, but generating, in union with it, a type of subtle and curious grace.

好奇心和对美的渴望—这是列奥纳多天赋里两种基本的力量；好奇常和对美的渴望冲突，但是与它融合却会产生一种恬淡神奇的优雅。

The movement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as twofold; partly the Renaissance, partly also the coming of what is called the “modern spirit”, with its realism, its appeal to experience. It comprehended a return to antiquity, and a return to nature. Raphael represents the return to antiquity, and Leonardo the return to nature. In this return to nature, he was seeking to satisfy a bound less curiosity by her perpetual surprises, a microscopic sense of finish by her finesse, or delicacy of operation, that subtilitas naturae which Bacon notices. So we find him often in intimate relations with men of science,—with Fra Luca Paccioli the mathematician, and the anatomist Marc Antonio della Torre. His observations and experiments fill thirteen volumes of manuscript; and those who can

judge describe him as anticipating long before, by rapid intuition, the later ideas of science. He explained the obscure light of the unilluminated part of the moon, knew that the sea had once covered the mountains which contain shells, and of the gathering of the equatorial waters above the polar.

15世纪的运动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艺复兴，另一方面也是所谓的“现代精神”的到来，这种精神包含着现实主义和对经验的诉求。它由一种对古典的回归和对自然的回归构成。拉斐尔代表对古典的回归，而列奥纳多代表对自然的回归。在对自然的回归中他寻求用自然永恒的出人意料来满足无限好奇，用精密技巧满足一种微观的完美感，或者说用精巧的操作，那种培根注意到的微妙本质来满足。所以我们常发现他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关系亲密，—比如数学家弗拉·吕卡·帕乔力，还有解剖学者马克·安东尼·德拉托雷。他做的观察和试验总共写满了13卷手稿。那些有判断力的人把他描述成以敏锐的直觉、很早预测到后世科学观点的人。他解释了月球阴暗部分的模糊光线的问题，他知道海洋曾经淹没包含着贝壳的山脉，他明白赤道水域的高度要高过两极。

He who thus penetrated into the most secret parts of nature preferred always the more to the less remote, what, seeming exceptional, was an instance of law more refined, the construction about things of a peculiar atmosphere and mixed lights. He paints flowers with such curious felicity that different writers have attributed to him a fondness for particular flowers, as Clement the cyclamen, and Rio the jasmin; while, at Venice, there is a stray leaf from his portfolio dotted all over with studies of violets and the wild rose. In him first appears the taste for what is bizarre or recherché in landscape; hollow places full of the green shadow of bituminous rocks, ridged reefs of trap-rock which cut the water into

quaint sheets of light,—their exact antitype is in our own western seas; all the solemn effects of moving water. You may follow it springing from its distant source among the rocks on the heath of the Madonna of the Balances, passing, as a little fall, into the treacherous calm of the Madonna of the Lake, as a goodly river next, below the cliffs of the Madonna of the Rocks, washing the white walls of its distant villages, stealing out in a network of divided streams in La Gioconda7 to the seashore of the Saint Anne—that delicate place, where the wind passes like the hand of some fine etcher over the surface, and the untorn shells are lying thick upon the sand, and the tops of the rocks, to which the waves never rise, are green with grass, grown fine as hair. It is the landscape, not of dreams or of fancy, but of places far withdrawn, and hours selected from a thousand with a miracle offinesse. Through Leonardo's strange veil of sight things reach him so; in no ordinary night or day, but as in faint light of eclipse, or in some brief interval of falling rain at daybreak, or through deep water.

因此，他总是偏好由远及近地深入研究自然最隐秘的部分，这种做法看起来与众不同，实则是一种更精确的法则的例证，是对有着奇特氛围和混合光线的东西的解释。他用某种奇异的手法去描绘花朵，以致于许多作家把对不同花的喜好归因于他，就像克莱门特喜爱仙客来而里奥喜欢茉莉一样。威尼斯就存有他手稿中散佚的一页，里面布满了对紫罗兰和蔷薇的研究。他是最先表现出在景色中追求古怪或稀有的品味的；沥青岩的绿色阴影遍布的空地，把水波割成奇怪的一片片的暗色岩形成的山脊状暗礁。它们的原型恰恰就在我们自己西部的海洋上，正是流水肃穆的效果。你可以跟随它，看它从《天平圣母》里遍布石南的岩石间遥远的源头中汩汩流来，汇成一条小瀑布落进《湖边圣母》暗藏危险的平静里，然后变成一条大河在《岩间圣母》的悬崖下奔腾翻滚，冲刷着遥远村落的白色围墙，再从《乔康达夫人》交错的河网中偷溜出来，走进《圣安妮》的海岸——在这个秀丽

的地方，风儿如同蚀刻师灵巧的手掠过它的表面，沙滩上密密麻麻满是完好无缺的贝壳，海浪从未触及过的岩石顶上长满了绿草，像厚厚的头发一样。这美景，不是来自梦境或者想象，而是来自遥远偏僻的地方，来自用奇迹般的灵气在上千小时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几小时里。通过列奥纳多奇特的视觉帷幕，事物如此呈现在他面前；绝非普通的夜晚或白昼，而像是在日食月食的微弱光线里，或在下着小雨的黎明的某个短暂间隔中，或在深水处。

And not into nature only; but he plunged also into human personality, and became above all a painter of portraits; faces of a modelling more skilful than has been seen before or since, embodied with a reality which almost amounts to illusion, on the dark air. To take a character as it was, and delicately sound its stops, suited one so curious in observation, curious in invention. He painted thus the portraits of Ludovico's mistresses, Lu cretia Crivelli and Cecilia Galerani the poetess, of Lu dovico himself, and the Duchess Beatrice. The portrait of Cecilia Galerani is lost, but that of Lucretia Crivelli has been identified with La Belle Feronière of the Louvre, and Ludovico's pale, anxious face still remains in the Ambrosian library. Opposite is the portrait of Beatrice d'Este, in whom Leonardo seems to have caught some presentiment of early death, painting her precise and grave, full of the refinement of the dead, in sad earth-colored raiment, set with pale stones.

他不仅沉溺于自然，也同样沉迷于对人类性格的研究中，并且首先成为一位肖像画家。他对脸部的勾画比前人和后人都要纯熟，在暗淡的氛围里实现了一种几近于幻想的真实。若要把握性格的原貌，并精确地区分它的界限，需要有充满好奇的观察力和创造力。因此他给卢多维科的情人们绘制了肖像画，包括露克丽霞·克里韦利和女诗人塞西莉亚·加莱拉尼，以及卢多维科自己还有比阿特丽斯公爵夫人。塞西

莉亚·加莱拉尼的肖像画没有保存下来，但是露克丽霞·克里韦利的肖像画被确认为就是收藏在卢浮宫里的《美丽的菲罗奈瑞》，卢多维科苍白焦燥的肖像仍保存在安布罗斯图书馆。与它们相反的是比阿特丽斯·德斯特的画像。列奥纳多似乎在她身上捕捉到了某种早亡的预感，所以把她刻画得很刻板严肃，充满了死亡的优雅，采用了悲伤的土色衣服，佩戴暗淡的宝石。

Sometimes this curiosity came in conflict with the de sire of beauty; it tended to make him go too far below that outside of things in which art really begins and ends. This struggle between the reason and its ideas, and the senses, the desire of beauty, is the key to Leonardo's life at Milan—his restlessness, his endless retouchings, his odd experiments with color. How much must he leave unfinished, how much recommence! His problem was the transmutation of ideas into images. What he had attained so far had been the mastery of that earlier Florentine style, with its naive and limited sensuousness. Now he was to entertain in this narrow medium those divinations of a humanity too wide for it, that larger vision of the opening world, which is only not too mud for the great, irregular art of Shakespeare; and every where the effort is visible in the work of his hands. This agitation, this perpetual delay, give him an air of weariness and ennui. To others he seems to be aiming at an impossible effect, to do something that art, that painting, can never do. Often the expression of physical beauty at this or that point seems strained and marred in the effort, as in those heavy German fore heads—too heavy and German for perfect beauty.

有时这种好奇心和对美的渴望相冲突。它往往令他过分深入事物内部，而偏离了本是艺术真正开始和结束之处的事物表面。这种理性

和它的观点、感觉以及对美的渴望之间的挣扎对理解米兰时期的列奥纳多至关重要——他的躁动不安、反复润饰和奇怪的色彩试验。他留下了多少未完成的作品，又重新开始了多少创作！他的问题是怎样把想法转化成形象。到目前为止他所掌握的是早期佛罗伦萨风格那种纯朴的、有限度的激发美感的表现手法。现在他要在这个狭窄的媒介里表现比它宽泛太多的人性预言，那种着眼开放世界的更宽广的视野只适合莎士比亚伟大而不同常规的艺术。他手里的作品无处不体现着这种努力。这种躁动，这种无穷无尽的拖延让他显得疲惫、倦怠。其他人看来他好像是在树立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想达到艺术，确切的说是绘画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效果。这样的尝试在表现身体美的时候常会使其扭曲，正如那些笨重的德国式额头——对完美来说太过沉重、太过德国化了。

For there was a touch of Germany in that genius which, as Goethe said, had “thought itself weary” —müde sich gedacht. What an anticipation of modern Germany, for instance, in that debate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sculpture or painting is the nobler art (How princely, how characteristic of Leonardo, the answer, Quanto più, un’ arte porta seco fatica di corpo, tanto più è vile!)! But there is this difference between him and the German, that, with all that curious science, the German would have thought nothing more was needed. The name of Goethe himself reminds one how great for the artist may be the danger of over-much science; how Goethe, who, in the Elective Affinities and the first part of Faust, does transmute ideas into images, who wrought many such transmutations, did not invariably find the spell- word, and in the second part of Faust presents us with a mass of science which has almost no artistic character at all. But Leonardo will never work till the happy moment comes—that moment of bien-être, which to imaginative men is a moment of invention. On this he waits with a perfect patience; other moments are but a preparation, or after-taste of it.

Few men distinguish between them as jealously as he. Hence so many flaws even in the choicest work. But for Leonardo the distinction is absolute, and, in the moment of bien-être, the alchemy complete: the idea is stricken into color and imagery: a cloudy mysticism is refined to a subdued and graceful mystery, and painting pleases the eye while it satisfies the soul.

在他的天赋里还有一些德国风格，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例如，对雕塑或绘画哪个更为高雅这个问题的讨论，完全是当代德国的预言！（这个答案是多么高贵，多么典型的列奥纳多式的啊：艺术越让身体疲惫，越是可鄙的！）但是这里有他和德国人之间的差异：如果有所有那些玄妙的科学存在，德国人可能会认为不再需要其他什么了。歌德的名字本身就会令人想起，对艺术家来说过度的科学可能成为多么巨大的危险。这位在《亲和力》和《浮士德》的第一部分把想法转化成形象，这位进行过大量此种转换的人也并不是总能找到准确的字眼。在《浮士德》的第二部分，他给我们展现的是大量的自然科学，几乎完全不具备艺术的特质。不过列奥纳多一定要等到快乐的一刻到来才去工作，也就是等到惬意时光，这对富于想象力的人来说就是创作的时刻。他非常耐心地等待这一刻的来临，其他时间仅仅是这一刻的准备，或是它的余韵。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如此审慎地把它们区分。因此在最经典的作品里也会有大量的瑕疵。但是对列奥纳多来说这种区分是绝对的，在惬意的一刻里魔法完成了：想法融入色彩和意象中：阴郁的神秘主义被精心加工成柔和优美的神秘，画作在满足灵魂的时刻也愉悦了视觉。

This curious beauty is seen above all in his drawings, and in these chiefly in the abstract grace of the bounding lines. Let us take some of these drawings, and pause over them awhile; and, first, one of those at Florence—the heads of a woman and a little child, set side by side, but each in its own separate frame . First of all, there is

much pathos in the reappearance, in the fuller curves of the face of the child, of the sharper, more chastened lines of the worn and older face, which leaves no doubt that the heads are those of a little child and its mother. A feeling for maternity is indeed al ways characteristic of Leonardo; and this feeling is further indicated here by the half-humorous pathos of the diminutive, rounded shoulders of the child. You may note a like pathetic power in drawings of a young man, seated in a stooping posture, his face in his hands, as in sorrow; of a slave sitting in an uneasy inclined attitude, in some brief interval of rest; of a small Ma donna and Child, peeping sideways in half-reassured terror, as a mighty griffin with batlike wings, one of Leonardo's finest inventions, descends suddenly from the air to snatch up a great wild beast wandering near them. But note in these, as that which especially belongs to art, the contour of the young man's hair, the poise of the slave's arm above his head, and the curves of the head of the child, following the little skull within, thin and fine as some sea-shell worn by the wind.

这种奇异之美在他的素描里尤其常见，主要表现在跳跃线条的抽象优美中。我们选取其中一些画来观察一阵。首先是佛罗伦萨时期的一幅素描——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的头部并排布局，但却各自有其独立的轮廓。在素描中，在孩子脸庞更为饱满的曲线以及疲倦、苍老的脸上更尖锐更洗练的曲线中，首先表现出的，是很多苦楚。从中可以看出，这一定是孩子和他的母亲的头像。对母性的同情的确一直是列奥纳多的特色。在这幅画中，这种情感以孩子小巧、浑圆的肩膀表现的富含幽默的痛苦进一步显现出来。你可能会在一些素描中注意到一种相似的令人怜悯的力量：屈背而坐、双手托脸似在悲痛之中的年青人，在短暂休息间隙、难受地斜坐着的奴隶；在一小幅圣母子的画像里也可以感觉到，他们半带惊慌地瞥向一边，这时长着蝙蝠状翅膀的强大怪兽（这是列奥纳多最优秀的创造之一）突然从天而降抓起了在他们身边徘徊的凶猛野兽。但在此注意一下艺术里的独有成分吧：年

轻人的发际线、奴隶把手臂放在头上的姿势以及孩子头部的曲线，这曲线沿着里面像是风蚀的贝壳那样细小的头颅流动。

Take again another head, still more full of sentiment, but of a different kind, a little drawing in red chalk which everyone will remember who has examined at all carefully the drawings by old masters at the Louvre. It is a face of doubtful sex, set in the shadow of its own hair, the cheek-line in high light against it, with some thing voluptuous and full in the eye-lids and the lips. Another drawing might pass for the same face in child hood, with parched and feverish lips, but much sweetness in the loose, short-waisted childish dress, with necklace and bulla, and in the daintily bound hair. We might take the thread of suggestion which these two drawings offer, when thus set side by side, and, following it through the drawings at Florence, Venice, and Milan, construct a sort of series, illustrating better than any thing else Leonardo's type of womanly beauty. Daughters of Herodias, with their fantastic head-dresses knot ted and folded so strangely to leave the dainty oval or the face disengaged, they are not of the Christian family, or of Raphael's. They are the clairvoyants, through whom, as through delicate instruments, one becomes aware of the subtler forces of nature, and the modes of their action, all that is magnetic in it, all those finer conditions wherein material things rise to that subtlety of operation which constitutes them spiritual, where only the final nerve and the keener touch can follow. It is as if in certain significant examples we actually saw those forces at their work on human flesh. Nervous, electric, faint always with some inexplicable faintness, these people seem to be subject to exceptional conditions, to feel powers at work in the common air unfelt by others, to become, as it were, the receptacle of them and pass them on to us in a chain of secret influences.

再以另外一幅头像为例，依旧充满伤感，却是另外一种伤感。这是以红色粉笔画就的小型肖像，只要是仔细看过罗浮宫内大师素描的人都会记得它。肖像的性别不好确定，面庞隐藏在自己头发的阴影里，面颊的轮廓处在强光下，眼睑和双唇艳丽饱满。还有一幅画被认为是同一个人孩童时的肖像，嘴唇干燥炽热，但在孩子气的宽松高腰、带着项链和垂饰的衣饰中，以及优美地束起的头发里有很多可爱的东西。我们可以追随这两幅画像中暗示的线索，把它们放在一起，并且在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时期的绘画中追寻下去，建立起一个系列，会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好地诠释列奥纳多女性美的典型。希罗底的女儿们奇异的头巾如此奇怪地打着结、包在一起来使漂亮的鹅蛋形脸庞显现出来。她们不是圣家族成员也不是拉弗尔手下的天使，她们是神视者，通过她们就像透过精密的仪器一样，可以使一个人了解到自然更微妙的力量，了解它们运作的模式、其中所有的魔力以及所有物质实体升华成精妙运作的更为高级的条件，这些运作使物质成为神经形式，而这一切只有最敏感的神经和最敏锐的感触才能追寻得到。好像在一些重要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真正看到这些力量在人类肉体上的作用。一些人紧张、容易兴奋并总是带着某种无法解释的衰弱，他们似乎容易受到异常条件的影响，容易在普通空气中感受到他人感受不到的正在发生作用的能量，他们容易承载这种能量，并通过一系列秘密影响把它们传递给我们。

But among the more youthful heads there is one at Florence which Love chooses for its own—the head of a young man, which may well be the likeness of Andrea Salaino, beloved of Leonardo for his curled and waving hair—belli capelli ricci e inanellati—and afterwards his favorite pupil and servant. Of all the interests in living men and women which may have filled his life at Milan, this attachment alone is recorded. And in return Salaino identified himself so entirely with Leonardo, that the picture of Saint Anne, in the Louvre, has been attributed to him. It illustrates Leonardo’s

usual choice of pupils, men of some natural charm of person or intercourse like Salaino, or men of birth and princely habits of life like Francesco Melzi—men with just enough genius to be capable of initiation into his secret, for the sake of which they were ready to efface their own individuality: Among them, retiring often to the villa of the Melzi at Canonica al Vaprio, he worked at his fugitive manuscripts and sketches, working for the present hour, and for a few only, perhaps chiefly for himself. Other artists have been as careless of present or future applause, in self-forgetfulness, or because they set moral or political ends above the ends of art; but in him this solitary culture of beauty seems to have hung upon a kind of self-love, and a carelessness in the work of art of all but art itself. Out of the secret places of a unique temperament he brought strange blossoms and fruits hitherto unknown; and for him, the novel impression conveyed, the exquisite effect woven, counted as an end in itself—a perfect end.

在更多的年轻人头像中有一幅佛罗伦萨时期的作品，被认定为爱神的画像。这个年轻人的头像可能是安德烈亚·沙莱诺的肖像。列奥纳多很喜欢他卷曲的波浪式头发，他后来成了列奥纳多最喜爱的学生和随从。列奥纳多在米兰生活期间也许曾结识过不少人，但只有这段情感被记录下来。作为回报沙莱诺也把自己和列奥纳多完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于卢浮宫里的《圣安妮》被认定是沙莱诺创作的。这体现了列奥纳多挑选学生的通常标准：选择沙莱诺那样具有天生个人魅力或交际能力的，或是弗朗切斯科·梅尔奇那种出身高贵并且有着贵族化的生活习惯的人。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天赋理解他的高深技艺，也已准备好为此而抹杀自己的个性。他和这些学生经常到梅尔奇在卡诺尼卡瓦普里奥的别墅隐居，他在那里即兴地写作和画素描，为当下工作，只为一小部分人工作，可能主要是为了他自己而工作。其他艺术家同样会无视现在或将来的掌声，处于忘我状态，或是因为他们将道德或政治目的放在艺术目标之上。但是对他而言，这种孤独的美的修

养似乎附着于一种自爱，一种在艺术创作中除了艺术本身对一切的漠视。那些至今没人认识的奇异花朵和果实来源于他独特性情的秘密之处。对他而言，传达出的新颖的印象，编织出的精致的效果，这本身就是终点——一个完美的句点。

And these pupils of his acquired his manner so thoroughly, that though the number of Leonardo's authentic works is very small indeed, there is a multitude of other men's pictures through which we undoubtedly see him, and come very near to his genius. Sometimes, as in the little picture of the Madonna of the Balances, in which, from the bosom of His mother, Christ weighs the pebbles of the brook against the sins of men, we have a hand, rough enough by contrast, working upon some fine hint or sketch of his. Sometimes, as in the subjects of the Daughter of Herodias and the Head of John the Baptist, the lost originals have been reechoed and varied upon again and again by Luini8 and others. At other times the original remains, but has been a mere theme or motive, a type, of which the accessories might be modified or changed; and these variations have but brought out the more the purpose, or expression of the original. It is so with the so-called Saint John the Baptist of the Louvre—one of the few naked figures Leonardo painted—whose delicate brown flesh and woman's hair no one would go out into the wilderness to seek, and whose treacherous smile would have us understand something far beyond the outward gesture or circum stance. But the long, reedlike cross in the hand, which suggests Saint John the Baptist, becomes faint in a copy at the Ambrosian Library, and disappears altogether in another version, in the Palazzo Rosso at Genoa. Re turning from the latter to the original, we are no longer surprised by Saint John's strange likeness to the Bacchus which hangs near it, and which set Theophile Gautier9 thinking of Heine's notion of decayed gods, who, to maintain

themselves, after the fall of paganism, took employment in the new religion. We recognise one of those symbolical inventions in which the ostensible subject is used, not as matter for definite pictorial realisation, but as the starting-point of a train of sentiment, subtle and vague as a piece of music. No one ever ruled over the mere subject in hand more entirely than Leonardo, or bent it more dexterously to purely artistic ends. And so it comes to pass that though he handles sacred subjects continually, he is the most profane of painters; the given person or subject, Saint John in the Desert, or the Virgin on the knees of Saint Anne, is often merely the pretext for a kind of work which carries one altogether beyond the range of its conventional associations.

他的这些学生完全学到了他的风格，所以虽然实际上列奥纳多的真迹数量很少，但是在其他许多人的画作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他的影子。而且，已非常接近列奥纳多的天赋。有时，例如在《天平圣母》这一小幅画中，基督在圣母的怀抱里，正用小溪里的鹅卵石来衡量人类的罪过那样，我们能看到一些相比之下粗糙得多的手法，在画他的一些较精细的提示或者草图。有时，比如在《希罗底的女儿》和《施洗者约翰头像》两幅画的例子中，尽管原作已失传，但在卢伊尼和其他人的作品中却一再得到呼应并且变化多样。另外一些时候原作虽然保留下来，但仅仅是作为一种主题或中心内容保留，作品的一些小配饰可能已进行了一些润饰或修改。这些变化带出了更多原作的目的或是将原作更好地表现了出来。卢浮宫中名为《施洗者圣约翰》的作品便是如此，这是列奥纳多所画为数不多的裸体形象之一。没人会在荒野中去寻找他那娇嫩的棕色肉体和女人似的头发。他暗藏玄机的微笑让我们明白一些远超出其姿态或外部环境的东西。但其手中所持的、证明施洗者圣约翰身份的细长如芦苇的十字架在安波罗修图书馆里的一幅复制品里变得模糊不清，在藏于热那亚罗索宫的另一版本中则完全消失了。从后继者回到原始的画作，我们不再对圣约翰和挂在他附近的《酒神巴克斯》神奇的相似而感到吃惊，这种相似令特奥

菲尔·戈蒂埃想到海涅的腐朽的诸神的概念。为了保持自我的存在，它们在异教体系崩塌之后在新宗教里重寻到安身之处。我们在使用表面主题的作品里辨认出其中的一个象征性创造，不是作为实现具体图示的内容，而是一系列情感的出发点，就像一曲音乐那样微弱模糊。没有人像列奥纳多那样更完整地支配这个主题，或是更巧妙地将它调整以适应纯粹的艺术目标。因此，事实上他虽然一直以神学主题进行创作，仍是对神灵最为不敬的画家。给定的人物或主题，比如沙漠里的圣约翰和圣安妮膝上的圣母，常常只是一种把人完全带出它的传统联想范围的托辞。

About the Last Supper, its decay and restorations, a whole literature has risen up, Goethe's pensive sketch of its sad fortunes being perhaps the best. The death in childbirth of the Duchess Beatrice was followed in Ludovico by one of those paroxysms of religious feeling which in him were constitutional. The low, gloomy Dominican church of Saint Mary of the Graces had been the favorite oratory of Beatrice. She had spent her last days there, full of sinister presentiments; at last it had been almost necessary to remove her from it by force; and now it was here that mass was said a hundred times a day for her repose. On the damp wall of the refectory, oozing with mineral salts, Leonardo painted the Last Supper. Effective anecdotes were told about it, his retouchings and delays. They show him refusing to work except at the moment of invention, scornful of any one who supposed that art could be a work of mere industry and rule, often coming the whole length of Milan to give a single touch. He painted it, not in fresco, where all must be impromptu, but in oils, the new method which he had been one of the first to welcome, because it allowed of so many afterthoughts, so refined a working out of perfection. It turned out that on a plastered wall no process could have been less durable. Within fifty years it had fallen into decay. And now we have to turn back to

Leonardo’s own studies, above all to one drawing of the central head at the Brera, which, in a union of tenderness and severity in the face lines, reminds one of the monumental work of Mino da Fiesole10, to trace it as it was.

关于《最后的晚餐》，画作的破败和修复本身就是一部文学作品了，歌德对它悲惨命运深思熟虑的概括可能是其中最好的。比阿特丽斯公爵夫人因难产而死，随后引起了卢多维科本质里宗教情感的一次迸发。多明我会低矮阴暗的圣马利亚感恩堂曾是比阿特丽斯最喜欢的礼拜堂。在这个到处都是不祥征兆的地方她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光，到最后几乎有必要强行把她从那里带出来，而现在就在这里每天要为她的安息做上百遍的弥撒。在修道院餐厅潮湿的泛着盐花的墙壁上，列奥纳多画出了《最后的晚餐》。关于他的反复润饰和进展缓慢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轶事。这些轶事显示，他只肯在有创作灵感的时刻工作，谁要认为艺术是单纯的勤奋和规则的产物就会被他嘲笑，他还常常穿过整个米兰就只为了在画作上添上一笔。他创作它的时候不是采用必须即兴作画的湿壁画画法，而是使用油彩。他是第一批运用这种手法的画家之一，因为画油画可以不断重新思考，可以不断修改润饰作品直到完美。事实上在灰泥墙上这种画法最不持久，不到50年这幅画就开始脱落。现在我们得回头求助于列奥纳多自己的研究，首要的是去查看布雷拉美术馆里一幅头像的素描来追寻它原来的风貌。这幅画在脸部线条中融合了温柔和严肃，让人想起米诺·达·菲耶索莱不朽的作品之一。

Here was another effort to lift a given subject out of the range of its traditional associations. Strange, after all the mystic developments of the middle age, was the effort to see the Eucharist, not as the pale Host of the altar, but as one taking leave of his friends. Five years afterwards the young Raphael, at Florence, painted it with sweet and solemn effect in the refectory of Saint

Onofrio; but still with all the mystical unreality of the school of Perugino. Vasari pretends that the central head was never finished. But finished or unfinished, or owing part of its effect to a mellowing decay, the head of Jesus does but consummate the sentiment of the whole company—ghosts through which you see the wall, faint as the shadows of the leaves upon the wall on autumn afternoons. This figure is but the faintest, the most spectral of them all.

这里是另外一次把主题从它原来的传统联想中分离出来的努力。在经历了所有中世纪神秘的发展之后，奇异的是认为圣餐不是祭坛上苍白的圣饼，而是一个人向朋友告别的尝试。5年以后，年轻的拉斐尔在佛罗伦萨圣·奥诺弗里奥的餐厅里以亲切而庄重的效果把它画出来，但是还是带有佩鲁吉诺画派那种神秘的、非现实的特色。瓦萨里宣称中央的头像始终未完成，但不论完成与否，或是部分由于潮湿损毁才变成这种效果，耶稣的头部确实、但也只有他完美体现了这一整个群体的情绪：这一群魂灵模糊得像秋天午后叶子洒落在墙上的影子，透过他们都可以看到后面的墙壁。这个形象只是其中最模糊、最诡异的一个。

The Last Supper was finished in 1497; in 1498 the French entered Milan, and whether or not the Gascon bowmen used it as a mark for their arrows, the model of Francesco Sforza certainly did not survive. What, in that age, such work was capable of being—of what nobility, amid what racy truthfulness to fact—we may judge from the bronze statue of Bartolomeo Colleoni on horseback, modelled by Leonardo's master, Verrocchio (he died of grief, it was said, because, the mold accidentally failing, he was unable to complete it), still standing in the piazza of Saint John and Saint Paul at Venice. Some traces of the thing may remain in certain of Leonardo's drawings, and perhaps also, by a singular circumstance,

in a far-off town of France. For Ludovico became a prisoner, and ended his days at Loches in Touraine. After many years of captivity in the dungeons below, where all seems sick with barbarous feudal memories, he was allowed at last, it is said, to breathe fresher air for awhile in one of the rooms of the great tower still shown, its walls covered with strange painted arabesques, ascribed by tradition to his hand, amused a little, in this way, through the tedious years. In those vast helmets and human faces and pieces of armor, among which, in great letters, the motto Infelix Sum is woven in and out, it is perhaps not too fanciful to see the fruit of a wistful after-dreaming over Leonardo's sundry experiments on the armed figure of the great duke, which had occupied the two so much during the days of their good fortune at Milan.

《最后的晚餐》于1497年完成。1498年法国入侵米兰。不论加斯科涅弓箭手是不是把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雕像的模型当做箭靶，它都没有保存下来。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作品，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能够达到的高贵程度，我们可以根据马背上的巴尔托洛梅奥·科莱奥尼铜像做出评判。这座铜像是列奥纳多的老师韦罗基奥创作的（他悲恸而亡，据说是因为模子不小心做失败了，他再无法完成作品）。目前这座铜像还立在威尼斯圣约翰和圣保罗教堂前的广场上。它的一些痕迹可能还保留在列奥纳多某些素描中，可能也会因为机缘巧合出现在法国某个偏远的小镇上。因为卢多维科曾被关进监狱，在都兰的洛什死去。他被关在仿佛充满野蛮封建回忆的地牢里很多年后，据说，最后，被允许在高塔的一个房间里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这个塔保存至今，墙上画满了奇异的阿拉伯图饰，这一般被认为是出自卢多维科之手，算是在冗长乏味时光里的一点小娱乐。在那些巨大的头盔、人类面孔和一件件的甲胄中，巨大字体的箴言“不幸的存在”交织其中；也许并不难看到列奥纳多关于塑造一尊这位伟大公爵的戎装像的奇思妙想。这两个人在米兰的快乐日子里，这个梦想一直盘踞心头。

The remaining years of Leonardo's life are more or less years of wandering. From his brilliant life at court he had saved nothing, and he returned to Florence a poor man. Perhaps necessity kept his spirit excited: the next four years are one prolonged rapture of ecstasy of invention. He painted now the pictures of the Louvre, his most authentic works, which came there straight from the cabinet of Francis the First, at Fontainebleau. One picture of his, the Saint Anne—not the Saint Anne of the Louvre, but a simple cartoon, now in London—revived for a moment a sort of appreciation more common in an earlier time, when good pictures had still seemed miraculous. For two days a crowd of people of all qualities passed in naive excitement through the chamber where it hung, and gave Leonardo a taste of the triumph of Cimabue11. But his work was less with the saints than with the living women of Florence. For he lived still in the polished society that he loved, and in the houses of Florence, left perhaps a little subject to light thoughts by the death of Savonarola— the latest gossip (1869) is of an undraped Manna Lisa, found in some out-of-the-way corner of the late Orleans collection—he saw Ginevra di Benci, and Lisa, the young third wife of Francesco del Giocondo. As we have seen him using incidents of sacred story, not for their own sake, nor as mere subjects for pictorial realisation, but as a cryptic language for fancies all his own, so now he found a vent for his thought in taking one of these languid women, and raising her, as Leda or Pomona, as Modesty or Vanity, to the seventh heaven of symbolical expression.

列奥纳多的余生基本上是在到处漂泊。在豪华的宫廷生活时期他没有攒下什么钱，回到佛罗伦萨时已很穷困。或许是生活的窘迫使他的精神保持着亢奋：接下来的4年是一个长时间全神贯注入迷创作的时期。他创作了现在保存在卢浮宫里的那些作品，那些最确定出自他之手的作品，这些作品直接从弗朗西斯一世在枫丹白露的陈列柜里送

进了卢浮宫。他的一幅《圣安妮》，不是卢浮宫的《圣安妮》，而是现存于伦敦的一幅寥寥几笔的草图，一时间使一种在早期更为普遍的欣赏品位复兴，那时优秀作品仍然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两天里各色人物怀着莫名的兴奋在放置这幅画的房间里穿梭往来，让列奥纳多有了一种契马布埃的《凯旋》的味道。但是他的作品更多地表现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女性而非圣人，因为他仍生活在他热爱的考究的社会里，在佛罗伦萨的居所里他曾经见过吉内芙拉·迪·本奇和弗朗切斯科·德尔·乔康达年轻的第三任妻子丽莎。那里可能还有一点因萨沃那洛拉之死而留下的话题。最近的流言(1869年)则是说一幅裸身的蒙娜丽莎被发现，藏于过世的奥尔良的收藏品没人注意的角落里。正如我们知道他使用宗教故事里的事件，不是为了表现事件本身，也不单是作为绘画的题材，而是作为表达自己的想象的一种隐语。所以此时他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一个出口，在这些疲倦女人中选择一个升华成勒达或波摩娜，升华成谦虚之神或虚荣之神，提升至象征性表达的第七重天。

La Gioconda is, in the truest sense, Leonardo’s masterpiece, the revealing instance of his mode of thought and work. In suggestiveness, only the Melancholia of Dürer12 is comparable to it; and no crude symbolism disturbs the effect of its subdued and graceful mystery. We all know the face and hands of the figure, set in its marble chair, in that circle of fantastic rocks, as in some faint light under sea. Perhaps of all ancient pictures time has chilled it least. (Yet for Vasari there was some further magic of crimson in the lips and cheeks, lost for us.) As often happens with works in which invention seems to reach its limit, there is an element in it given to, not invented by, the master. In that inestimable folio of drawings, once in the possession of Vasari, were certain designs by Verrocchio, faces of such impressive beauty that Leonardo in his boyhood copied them many times. It is hard not to connect with these designs of the elder, by-past master, as with its germinal principle, the unfathomable smile, always with a touch of

something sinister in it, which plays over all Leonardo's work. Besides, the picture is a portrait. From childhood we see this image defining itself on the fabric of his dreams, and but for express historical testimony, we might fancy that this was but his ideal lady, embodied and beheld at last. What was the relation ship of a living Florentine to this creature of his thought? By what strange affinities had the dream and the person grown up thus apart, and yet so closely together? Present from the first incorporeally in Leon ardo's brain, dimly traced in the designs of Verrocchio, she is found present at last in Il Giocondo's house. That there is much of mere portraiture in the picture is at tested by the legend that by artificial means, the presence of mimes and flute-players, that subtle expression was protracted on the face. Again, was it in four years and by renewed labor never really completed, or in four months and as by stroke of magic, that the image was projected?

《乔康达夫人》的的确确是列奥纳多的代表作，它展现了他的思维和工作的模式。引发联想方面只有丢勒的《忧郁》能与它相提并论，而且没有粗糙的象征主义扰乱柔和优美之神秘的效果。我们都熟知，这个人物的面庞和双手，安置于大理石椅中，被奇异的石头所环绕，仿佛笼罩在海底微弱的光线里。可能在所有古代绘画作品中，时间对它的侵蚀最小（然而瓦萨里还描述说其嘴唇和脸颊显现出一种神奇的深红色，我们现在已不得而见。—作者注）。正如创造力似乎达到极限的作品经常发生的那样，画里有一种成分不是画家创造出来的，而是他获得的。瓦萨里曾经拥有一些价值极高的素描，其中有一些确定是出自韦罗基奥之手，列奥纳多在孩提时代曾多次临摹这些美得惊人的脸庞。很难不将其与过去的老一辈大师的作品联系起来，就像它开创性的原则那样，那种总是带着某种不祥的、神妙莫测的笑容，这种元素在列奥纳多所有的作品中都见得到影子。此外，这是一幅肖像画。我们看到这个形象在他孩提时代就开始在他梦想中逐渐成形，但是为了和历史的事实相符我们可以把这个看成只是他的理想女

性，最终被具体地表现出来。一个现实中的佛罗伦萨人和这个他思维的创造物有什么关系呢？是什么样奇异的吸引力把距离如此之远的梦境和个人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形象首先出现在列奥纳多的头脑中，然后在韦罗基奥的作品中发现蛛丝马迹，最后她在乔康达的住所里被表现出来。这幅画里大部分只是肖像画法的说法从一个传说那里得到佐证：通过人工的方式，小丑和竖琴演奏者的在场，那种微妙的表情，才出现在脸上。这里还要问，这个投射出来的形象是4年时间不断的、从未真正完成的润饰的结果，还是在4个月里好像得到一瞬间灵感而来的呢？

The presence that rose thus so strangely beside the waters, is expressive of what in the ways of a thousand years men had come to desire. Hers is the head upon which all “the ends of the world are come”, and the eyelids are a little weary. It is a beauty wrought out from within upon the flesh, the deposit, little cell by cell, of strange thoughts and fantastic reveries and exquisite passions. Set it for a moment beside one of those white Greek goddesses or beautiful women of antiquity, and how would they be troubled by this beauty, into which the soul with all its maladies has passed! All the thoughts and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have etched and moulded there, in that which they have of power to refine and make expressive the outward form, the animalism of Greece, the lust of Rome, the mysticism of the middle age with its spiritual ambition and imaginative loves, the return of the Pagan world, the sins of the Borgias. She is older than the rocks among which she sits; like the vampire, she has been dead many times, and learned the secrets of the grave; and has been a diver in deep seas, and keeps their fallen day about her; and trafficked for strange webs with Eastern merchants, and, as Leda, was the mother of Helen of Troy, and, as Saint Anne, the mother of Mary; and all this has been to her but as the sound of lyres and flutes, and lives only in the delicacy with

which it has moulded the changing lineaments, and tinged the eyelids and the hands. The fancy of a perpetual life, sweeping together ten thousand experiences, is an old one; and modern philosophy has conceived the idea of humanity as wrought upon by, and summing up in itself, all modes of thought and life. Certainly Lady Lisa might stand as the embodiment of the old fancy, the symbol of the modern idea.

因此在水边奇异出现的这种呈现方式，表达了人类千百年来渴望使用的方法。她的肖像预示着“世界末日将来临”，她的眼睑有些疲倦。这是一个由内至外创造出来的美人，古怪的想法、奇异的幻想和强烈的热情，一点一点，堆积沉淀在肉体上。把她和一个白皙的希腊女神或是美丽的古代女性放在一起，她们会因为她的美，她的带着种种病痛的灵魂蕴含其间的美而感到苦恼！所有对世界的看法和经验都在此蚀刻塑造成形，在这里他们不得不润饰外部形象使它们更具表现力，比如希腊的兽性、罗马的纵欲、中世纪的神秘以及它的宗教野心和奇想的爱、异教世界的回归还有博尔吉亚斯的罪恶。她比自己周围的岩石还要古老；她像吸血鬼一样死过很多次，因而了解死亡的秘密；她曾在深海里潜水，把她曾逝去的时光保存；她曾和东方商人交换新奇的编织品；她是特洛伊海伦的母亲勒达，也是马利亚的母亲圣安妮。所有这一切对她来说只是里拉琴和长笛的韵律，和塑造了变换的面部轮廓、使眼皮和双手失去血色的某种敏感一起存在。对永生的幻想经历了上万种体验，已经不再新鲜。当代哲学认为人性是由所有思维和生活方式精炼加工、并在其中自我总结形成的。当然丽莎夫人或许被认为是老派幻想的具体体现，是当代观点的象征。

During these years at Florence Leonardo’s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his art; for himself, he is lost in the bright cloud of it. The outward history begins again in 1502, with a wild journey through central Italy, which he makes as the chief engineer of Cesar Borgia.

The biographer, putting together the stray jottings of his manuscripts, may follow him through every day of it, up the strange tower of Siena, elastic like a bent bow, down to the seashore at Piombino, each place appearing as fitfully as in a fever dream.

在佛罗伦萨的那些年里，列奥纳多的人生历程就是他的艺术发展历程；他自身已隐匿在艺术的灿烂光辉中。他外出的历史从1502年开始再次展开，当时他作为凯撒·博尔吉亚的首席工程师，进行了一次穿越意大利中部的狂野旅行。传记作者把他手稿里零散的略记整理到一起，也许可以追寻他每一天的足迹：登上锡耶纳奇怪的高塔，如同弯弓那样伸缩自如落到皮翁比诺的海边，每一个地点都像在狂热的梦境中一样断断续续地出现。

One other great work was left for him to do, a work all trace of which soon vanished, The Battle of the Standard, in which he had Michelangelo for his rival. The citizens of Florence, desiring to decorate the walls of the great council-chamber, had offered the work for competition, and any subject might be chosen from the Florentine wa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Michelangelo chose for his cartoon an incident of the war with Pisa, in which the Florentine soldiers, bathing in the Arno, are surprised by the sound of trumpets, and run to arms. His design has reached us only in an old engraving, which helps us less perhaps than our remembrance of the background of his Holy Family in the Uffizii to imagine in what superhuman form, such as might have beguiled the heart of an earlier world, those figures ascended out of the water. Leonardo chose an incident from the battle of Anghiari, in which two parties of soldiers fight for a standard. Like Michelangelo’s, his cartoon is lost, and has come to us only in sketches, and in a fragment of Rubens13. Through the accounts given we may discern some lust of

terrible things in it, so that even the horses tore each other with their teeth. And yet one fragment of it, in a drawing of his at Florence, is far different—a waving field of lovely armour, the chased edgings running like lines of sunlight from side to side. Michelangelo was twenty-seven years old; Leonardo more than fifty; and Raphael, then nineteen years of age, visiting Florence for the first time, came and watched them as they worked.

还有一个等待他完成的伟大作品是后来消失无踪了的《旗帜之战》，当时他的竞争对手是米开朗琪罗。佛罗伦萨市民想要装饰大会议厅的墙壁，提出比赛选定这幅作品的创作者，可以选择任意关于15世纪佛罗伦萨战争的主题。米开朗琪罗在他的草图中选择了与比萨的战争中的一幕，画里佛罗伦萨战士在亚诺河里洗澡，他们突然听到号角声随即奔向武器。我们只在一幅旧版画中看到了他的构图。这幅版画，对于我们想像那些人物，是以怎样的超越凡人的、足以震憾古人的形象，从水中爬上来，并没有回忆乌菲兹美术馆里他《圣家族》的背景对我们的帮助大。列奥纳多从安吉里之战中选取了一个事件，画里两方的士兵在为一面战旗而战。跟米开朗琪罗一样，他的草图也丢失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素描，在鲁本斯的一部残作中也可以一见端倪。透过这些描述，我们能察觉到某种对可怕事物的渴望，以致于马都在用牙齿相互撕咬。另一个零散片段见于他保存在佛罗伦萨的一幅素描里，但它非常不同：漂亮的盔甲组成波浪般的战场，雕镂过的盔甲边缘像阳光的光束一样从一边跳向另一边。当时米开朗琪罗27岁，列奥纳多50多岁。拉斐尔那时19岁，是第一次来佛罗伦萨，观摩了他们进行创作。

We catch a glimpse of Leonardo again, at Rome in 1514, surrounded by his mirrors and vials and furnaces, making strange toys that seemed alive of wax and quick silver. The hesitation which had haunted him all through life, and made him like one under a

spell, was upon him now with double force. No one had ever carried political indifferentism farther; it had always been his philosophy to “fly before the storm” ; he is for the Sforzas, or against them, as the tide of their fortune turns. Yet now, in the political society of Rome, he came to be suspected of secret French sympathies. It paralysed him to find himself among enemies; and he turned wholly to France, which had long courted him.

我们再来看一下列奥纳多1514年在罗马的情形，他被镜子、小瓶子和熔炉团团围住，用蜡和水银制作一些奇怪的仿佛有生命的玩意。伴随他一生、使他如同生活在魔咒下的犹豫不决，此时对他的影响加倍了。没人像他那样漠视政治，他的哲学永远是“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离开”。他是追随斯福尔扎家族还是反对他们，那要看他们的时运如何。可此时在罗马的政治社会里，他被怀疑暗中同情法国。发现自己身处敌对者中间令他十分气馁，后来他完全投向了一直召唤他的法国一边。

France was about to become an Italy more Italian than Italy itself. Francis the First, like Lewis the Twelfth before him, was attracted by the finesse of Leonardo’s work; La Gioconda was already in his cabinet, and he offered Leonardo the little Château de Clou, with its vineyards and meadows, in the pleasant valley of the Masse, just outside the walls of the town of Amboise, where, especially in the hunting season, the court then frequently resided. A Monsieur Lyonard, peinteur du Roy pour Amboyse—so the letter of Francis the First is headed. It opens a prospect,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in the history of art, where, in a peculiarly blent atmosphere, Italian art dies away as a French exotic.

法国正处于要变得比意大利本身更加意大利化的时候。弗朗西斯一世像他之前的路易十二一样，被列奥纳多作品的灵气所吸引。《蒙娜丽莎》已经被他收入陈列柜，他还将克洛城堡赠给列奥纳多。这是一座带葡萄园和草场的小城堡，位于安布瓦兹镇城墙外宜人的马赛山谷里，这个小镇在狩猎季节通常是弗朗西斯一世的行宫。“给列奥纳多先生，安布瓦兹荣誉画家”，弗朗西斯一世的信这样开头。艺术史上最有趣的一幅画卷因此得以打开：在一种特有的混杂的氛围中，意大利的艺术消亡，变成了法国的舶来品。

Two questions remain, after much busy antiquarian ism, concerning Leonardo’s death—the question of the exact form of his religion, and the question whether Francis the First was present at the time. They are of about equally little importance in the estimate of Leon ardo’s genius. The directions in his will concerning the thirty masses and the great candles for the church of Saint Florentin are things of course, their real purpose being immediate and practical; and on no theory of religion could these hurried offices be of much consequence. We forget them in speculating how one who had been always so desirous of beauty, but desired it always in such precise and definite forms, as hands or flowers or hair, looked forward now into the vague land, and experienced the last curiosity.

在许许多多的考据性研究之后，仍有两个关于列奥纳多之死的问题悬而未决：他真正信奉的宗教和弗朗西斯一世在他死亡时是否在场。但这两个问题对于评价列奥纳多的天赋都是无关紧要的。他遗嘱中有关圣佛罗伦丁教堂的30次弥撒和巨大蜡烛的意向当然是物质的，它们的真实目的是直接而实际的。这些匆忙而就的宗教仪式不会对宗教理论产生多少影响。我们在思考一位如此渴求美，而且渴求美的精准和确定的形式，比如双手、花朵或头发，此刻看向模糊不清的土地，感受最后一次奇特的人物时，这些问题早已置诸脑后。

1. 0

1869 年

1.《安吉里之战》，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在佛罗伦萨维奇欧宫五百人大厅的墙壁上绘制的壁画。由于种种原因未完成即被毁。2.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3.佩鲁吉诺（1466—1523），意大利画家。4.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瑞士医师、炼金家。5.卡丹（1501—1576），意大利数学家、医生。6.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米兰公爵。7.《乔康达夫人》，《蒙娜·丽莎》的别名。8.卢伊尼（1530—1593），意大利画家，达·芬奇得意门生。9.特奥菲尔·戈蒂埃（1811—1872），法国诗人、小说家。10.米诺·达·菲耶索莱（1429—1484），意大利雕刻家。11.契马布埃（1240?—1302?）意大利画家、西方绘画创始人，被称为“画家之父”。12.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13.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

[5_1].美国独立纪念日，在每年的7月4日，纪念美国第二次大陆会议（1776年7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

The School Of Giorgione1

乔尔乔涅画派

It is the mistake of much popular criticism to regard poetry, music, and painting—all the various products of art—as but translations into different languages of one and the same fixed quantity of imaginative thought, supplemented by certain technical qualities of color, in painting; of sound, in music; of rhythmical words, in poetry. In this way, the sensuous element in art, and with it al most everything in art that is essentially artistic, is made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and a clear apprehension of the opposite principle—that the sensuous material of each art brings with it a special phase or quality of beauty, untranslatable into the forms of any other, an order of impressions distinct in kind—is the beginning of all true aesthetic criticism. For, as art addresses not pure sense, still less the pure intellect, but the “imaginative reason” through the senses, there are differences of kind in aesthetic beauty, corresponding to the differences in kind of the gifts of sense themselves. Each art, therefore, having its own peculiar and untranslatable sensuous charm, has its own special mode of reaching the imagination, its own special responsibilities to its material. One of the functions of aesthetic criticism is to define these limitations; to estimate the degree in which a given work of art fulfils its responsibilities to its special material; to note in a picture that true pictorial charm, which is neither a mere poetical thought or sentiment, on the one hand, nor a mere result of communicable technical skill in color or design, on the other; to

define in a poem that true poetical quality, which is neither descriptive nor meditative merely, but comes of an inventive handling of rhythmical language, the element of song in the singing; to note in music the musical charm, that essential music, which presents no words, no matter of sentiment or thought, separable from the special form in which it is conveyed to us.

很多流行批评认为，诗歌、音乐和绘画所有这些艺术作品形式只是把同一种且已定量的想象思维演绎为不同的语言，并辅以一定的技术特质，比如绘画里运用色彩，音乐里借助声音，诗歌里使用韵律词。这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艺术中给人美感的成分以及艺术中所有本质上具有艺术性的一切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对其相反原则的清晰理解——每门艺术中给人美感的材料都带有一种独特的美，它无法转化成其他任何形式，各自都是一种独特的感受状态——是美学批判的真正起点。因为艺术所关注的不是纯粹的理性，更不是纯粹的心智，而是通过感官传递的“充满想象力的理性”。而美学意义上的美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对应不同类型的感官禀赋。因此，拥有各自独特而不可转化的感官魅力的各门艺术，也有着各自独特的呈现想象的模式，对各自的材料手段负有责任。美学批判的一个任务就是确定这些界限，来评估一个给定艺术品对自己特定材料形式的负责程度；来指出一幅画画面的真正魅力所在，它一方面既不单单只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构思或情感的表达，另一方面也不仅仅是色彩或构图上的技巧所营造的效果；还有，来界定一首诗真正属于诗歌的特质，这种特质不单纯是描述性或沉思式的，而是来自对韵律语言，即歌唱中的歌曲元素的创造性处理；来指出一首乐曲的音乐魅力，那种不表现为语言、并且与情绪和思想无关、可以从其具体的表达形式中脱离出来的本质音乐的魅力。

To such a philosophy of the variations of the beautiful, Lessing’s2 analysis of the spheres of sculpture and poetry, in the

Laocoon, wa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But a true appreciation of these things is possible only in the light of a whole system of such art-casuistries. Now painting is the art in the criticism of which this truth most needs enforcing, for it is in popular judgments on pictures that the false generalisation of all art into forms of poetry is most prevalent. To suppose that all is mere technical acquirement in delineation or touch, working through and addressing itself to the intelligence, on the one side, or a merely poetical, or what may be called literary interest, addressed also to the pure intelligence on the other:—this is the way of most spectators, and of many critics, who have never caught sight all the time of that true pictorial quality which lies between, unique pledge, as it is, of the possession of the pictorial gift, that inventive or creative handling of pure line and color, which, as almost always in Dutch painting, as often also in the works of Titian3 or Veronese4, is quite independent of anything definitely poetical in the subject it accompanies. It is the drawing—the design projected from that peculiar pictorial temperament or constitution, in which, while it may possibly be ignorant of true anatomical proportions, all things whatever, all poetry, all ideas however abstract or obscure, float up as visible scene or image: it is the coloring—that weaving of light, as of just perceptible gold threads, through the dress, the flesh, the atmosphere, in Titian's Lace-girl, that staining of the whole fabric of the thing with a new, delightful physical quality. This drawing, then —the arabesque traced in the air by Tintoret's5 flying figures, by Titian's forest branches; this coloring—the magic conditions of light and hue in the atmosphere of Titian's Lace-girl, or Rubens's Descent from the Cross: —these essential pictorial qualities must first of all de light the sense, delight it as directly and sensuously as a fragment of Venetian glass; and through this delight alone become the vehicle of whatever poetry or science may lie beyond them in the intention of the composer. In its primary aspect, a great picture

has no more definite message for us than an accidental play of sunlight and shadow for a few moments on the wall or floor: is itself, in truth, a space of such fallen light, caught as the colors are in an Eastern carpet, but refined upon, and dealt with more subtly and exquisitely than by nature itself. And this primary and essential condition fulfilled, we may trace the coming of poetry into painting, by fine gradations upwards: from Japanese fan-painting, for instance, where we get, first, only abstract color; then, just a little interfused sense of the poetry of flowers; then sometimes, perfect flower-painting; and so, onwards, until in Titian we have, as his poetry in the Ariadne, so actually a touch of true childlike humor in the diminutive, quaint figure with its silk gown, which ascends the temple stairs, in his picture of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Virgin, at Venice.

艺术之美丰富多样。莱辛在《拉奥孔》中对雕塑和诗歌领域进行的分析，对这样一种哲学的提出，贡献甚大。但是只有考虑到这种艺术思辨论的整个体系才可能真正理解这些东西。目前，在绘画领域的艺术批评中这一点最需加强，因为在对绘画作品的流行批评中，将所有艺术普遍错误地泛化为诗歌形式最为普遍。他们或者认为一切都只是来自对线条勾勒或笔法技巧的掌握，其间当然离不开理解力的参与；或者认为，一切只是一种诗意的兴致或是可以称为文学的兴趣，同样也用来展现智慧：大多数观众以及许多批评家都持此观点。他们一直没有看到绘画真正的内在之美，它源自对线条和色彩富有创意的运用与处理，而这需要真正的绘画才能——后者是前者独一无二的保证；它们在荷兰绘画中几乎总是出现，在提香或韦罗内塞的作品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而它几乎与其所表现的主题中任何明显具有诗意的东西无关。它是这样的构图——那是从其独特的气质或构造中投射出来的设计，虽然真正的解剖比例很可能被忽略，但是其中所有一切，无论多么抽象或模糊的诗意和想法都会成为可见的景色或形象浮现出来。它是这样的着色——是对光线的编织，就像提香的《花神》中那

抹穿透服饰、肉体和空气，让人很容易察觉到的金色光线，给整个画面赋予了一种全新的、令人赏心悦目的物理特质。这样的构图——由丁托列托飞舞的人物、提香森林里的树枝在空中勾勒出的精美的阿拉伯式花饰；这样的着色——提香的《花神》和鲁本斯的《下十字架》中那种光线和色调营造出的神奇氛围——这些本质的绘画特性首先必须能取悦感官，就像一小片色彩绮丽的威尼斯玻璃，能带来直接的、感官的愉悦；而且也是通过这种愉悦将创作者意图中那些超越诗歌或科学的东西表现出来。一幅伟大的画作，在其主要方面能向我们传达的确切信息，也无非就是光与影在墙壁和地板上偶然的短暂交汇的情景。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片这样的光线投射下来形成的空间，这些光线被捕捉到了，就像东方地毯里的色彩一样，并且与自然界本身所存在的相比，得到了更为精致巧妙的修饰和处理。如果这种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条件被满足了的话，我们可以从微妙的层次变化中一步步向上追寻诗歌转化成绘画的踪迹。例如，在日本的扇绘中，我们开始看到的只是抽象的色彩；然后，描写花朵的诗歌会带来那么一点诗画交融的感觉；接下来有时候就变成了完美的花卉画；如此下去一直到提香那里，就像他在《阿里亚德》中抒发出来的诗意那样，在他那幅保存在威尼斯的《圣母进殿》中，在那个身着丝袍、沿神殿台阶拾级而上的小巧而精致的人物身上，我们如此真实地感受到了孩子般的真性情。

But although each art has thus its own specific order of impressions, and an untranslatable charm, while a just apprehension of the ultimate differences of the arts is the beginning of aesthetic criticism; yet it is noticeable that, in its special mode of handling its given material, each art may be observed to pass into the condition of some other art, by what German critics term an Anders-streben—a partial alienation from its own limitations, through which the arts are able, not indeed to supply the place of each other, but reciprocally to lend each other new forces.

虽然每门艺术都因此有着各自特殊的印象风格和无法转换的魅力，而对这些艺术最终区别的正确理解是美学批评的起点；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可能会发现在其对给定材料的特殊处理方式中，每种艺术都会进入到某种其他艺术的状态里。这用德国批评家的术语说就是“出位之思”——从自身原本的界限中部分偏离出来；通过它，两种艺术其实不是取代彼此，而是为彼此提供新的力量。

Thus some of the most delightful music seems to be always approaching to figure, to pictorial definition. Architecture, again, though it has its own laws—laws esoteric enough, as the true architect knows only too well—yet sometimes aims at fulfilling the conditions of a picture, as in the Arena chapel; or of sculpture, as in the flawless unity of Giotto’s tower at Florence; and often finds a true poetry, as in those strangely twisted staircases of the châteaux of the country of the Loire, as if it were intended that among their odd turnings the actors in a theatrical mode of life might pass each other unseen; there being a poetry also of memory and of the mere effect of time, by which architecture often profits greatly. Thus, again, sculpture aspires out of the hard limitation of pure form towards color, or its equivalent; poetry also, in many ways, finding guidance from the other arts, the analogy between a Greek tragedy and a work of Greek sculpture, between a sonnet and a relief, of French poetry generally with the art of en graving, being more than mere figures of speech; and all the arts in common aspiring towards the principle of music; music being the typical, or ideally consummate art, the object of the great Anders-streben of all art, of all that is artistic, or partakes of artistic qualities.

因此，一些最美妙的音乐似乎总是近似于图画，接近于对绘画的界定。同样，建筑虽然也有自己的法则—足够深奥，只有真正的建筑

师才通晓—但其过程有时似乎像在创作一幅绘画作品，比如阿雷那的小教堂；或是一幅雕塑作品，比如佛罗伦萨乔托高塔的完美统一；它还常常会被解读为一首真正的诗歌，就好像那些卢瓦尔河乡村城堡里奇形怪状的楼梯，好像是特意那样设计，在它们奇怪的转弯之间，人生如戏，生活大舞台上的演员们彼此擦肩而过，却看不见对方。除此之外还有一首记忆和流逝的时间编织而成的诗歌，建筑常常会从中受益颇多。雕塑也一样渴望走出纯粹形式的森严界限，寻求色彩或具有同等效果的其他东西；在很多方面，诗歌也从其他艺术里获得指引，一部希腊悲剧和一件希腊雕塑作品之间、一首十四行诗和一幅浮雕之间、法国诗歌常和雕塑艺术之间的类比，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所有艺术都共同地向往着能契合音乐之律。音乐是典型的、或者说至臻完美的艺术。它是所有艺术、所有具有艺术性的事物“出位之思”的目标，是艺术特质的代表。

All art constantly aspires towards the condition of music. For while in all other kinds of art it is possible to distinguish the matter from the form, and the under standing can always make this distinction, yet it is the constant effort of art to obliterate it. That the mere matter of a poem, for instance, its subject, namely, its given incidents or situation—that the mere matter of a picture,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an event, the actual topography of a landscape—should be nothing without the form, the spirit, of the handling, that this form, this mode of handling, should become an end in itself, should penetrate every part of the matter: this is what all art constantly strives after, and achieves in different degrees.

所有艺术都坚持不懈地追求音乐的状态。因为在其他所有形式的艺术里，虽然将内容和形式区分开来是可能的，通过理解力总是可以进行这种区分，然而艺术不断追求的却是清除这种区分。诗歌的纯内容，例如它的主题，也就是给定的事件或场景——绘画的纯内容，即

一个事件的真实情境、一处景观的地形地貌——如果没有创作的形式、没有创作精神与主旨，它们就什么都不是。这种形式，这种处理的模式应该终结于其自身，应该渗透进内容的每个部分：这是所有艺术在不断追求、也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的东西。

This abstract language becomes clear enough, if we think of actual examples. In an actual landscape we see a long, white road, lost suddenly on the hill-verge. That is the matter of one of the etchings of M. Alphonse Legros6: only, in this etching, it is informed by an in dwelling solemnity of expression, seen upon it or half-seen, within the limits of an exceptional moment, or caught from his own mood perhaps, but which he maintains as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thing, throughout his work. Sometimes a momentary tint of stormy light may invest a homely or too familiar scene with a character which might well have been drawn from the deep places of the imagination. Then we might say that this particular effect of light, this sudden in weaving of gold thread through the texture of the haystack, and the poplars, and the grass, gives the scene artistic qualities, that it is like a picture. And such tricks of circum stance are commonest in landscape which has little salient character of its own; because, in such scenery, all the material details are so easily absorbed by that informing expression of passing light, and elevated, throughout their whole extent, to a new and delightful effect by it. And hence the superiority, for most conditions of the picturesque, of a river-side in France to a Swiss valley, because, on the French river-side, mere topography, the simple material, counts for so little, and, all being very pure, untouched, and tranquil in itself, mere light and shade have such easy work in modulating it to one dominant tone. The Venetian landscape, on the other hand, has in its material conditions much which is hard, or harshly definite; but the masters of the Venetian

school have shown themselves little burdened by them. Of its Alpine background they retain certain abstracted elements only, of cool color and tranquillising line; and they use its actual details, the brown windy turrets, the straw-colored fields, the forest arabesques, but as the notes of a music which duly accompanies the presence of their men and women, presenting us with the spirit or essence only of a certain sort of landscape—a country of the pure reason or half-imaginative memory.

如果我们想一下实际的例子，这些抽象的语言就会变得清晰明了。在一幅现有的风景画里，我们看到一条长长的白色小路突然消失在山边。这是M. 阿方斯·勒格罗的一幅蚀刻画中所描绘的内容。只是，在这幅蚀刻画中，这一内容却蕴含了一种内在的严肃性。这种严肃性或许是在某个特殊瞬间感触或部分地感触到的，或者也可能是来自他自己的情绪；但他在整个作品中一直把这种严肃性作为非常核心的东西。有时暴风雨前夕短暂出现的一抹光线可以给一个平常或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景象赋予一种很可能源自作者想象深处的特色。此时我们可以说这种独特的光线效果，这种即兴将金色线条编织进干草堆、白杨木和小草里的渲染处理，赋予了景色如诗如画的艺术特质。这种情境上的处理技巧在一些本身没有什么显著特色的风景画中最为常用。因为在这样的景色中，所有实实在在的细节都能非常轻易地被短暂闪过的、极具穿透力的光线所笼罩，画面由此而整个地达到一种赏心悦目的全新效果。因此就风景画的大多数要素而言，法国的河畔显然要优于瑞士的山谷，因为法国的河畔地形简单，内容简单，这些外在的东西本身并不很重要，不过这一切都非常纯粹、原始而自然并有种内在的宁静，仅利用光线和阴影就能很容易地为其营造出一种主色调。而另一方面，威尼斯风景中有很多硬调的东西，质地坚硬或棱角分明；但是威尼斯画派的大师们似乎没有受到它们的困扰。以阿尔卑斯山为背景，他们只保留了某些抽象的元素，比如冷峻的色彩和宁静的线条；他们运用其中真实的细节，比如风中棕色的小塔、淡黄色的田野和美丽的森林景致，但是就像音乐的音符适时地伴随其男男女女

出现一样，这些细节展现给我们的只是某一风景的精神或本质——一个纯粹理性或有着半想象记忆的国家。

Poetry, again, works with words address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to the pure intelligence; and it deals, most often with a definite subject or situation. Sometimes it may find a noble and quite legitimate function in the conveyance of moral or political aspiration, as often in the poetry of Victor Hugo. In such instances it is easy enough for the understanding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matter and the form, however much the matter, the subject, the element which is addressed to the mere intelligence, has been penetrated by the informing, artistic spirit. But the ideal types of poetry are those in which this distinction is reduced to its minimum; so that lyrical poetry, precisely because in it we are least able to detach the matter from the form, without a deduction of some thing from that matter itself, is, at least artistically, the highest and most complete form of poetry. And the very perfection of such poetry often appears to depend, in part, on a certain suppression or vagueness of mere subject, so that the meaning reaches us through ways not distinctly traceable by the understanding, as in some of the most imaginative compositions of William Blake, and often in Shakespeare's songs, as pre-eminently in that song of Mariana's page in Measure for Measure, in which the kindling force and poetry of the whole play seems to pass for a moment into an actual strain of music.

诗歌最初也是用文字表现纯才智的作品；它通常表现一个明确的主题或场景。有时它可以成为表达道德或政治抱负的一个高贵且明正言顺的工具，比如维克多·雨果的诗。在这样的例子中,人们很容易辨别内容和形式，不论其内容、主题和用来表现纯才思的元素已被赋予

了多少鲜明的艺术特质。但是诗歌的理想类型是那些把这种区分降到最低限度的作品；于是抒情诗成为了，至少从艺术性上讲，最高层次和最为完整的诗歌形式,这恰是因为，在不减除内容本身的什么东西的情况下，我们最难把它的内容和形式区分开来。这些诗歌的完美似乎常常要部分依赖于对单纯主题一定的弱化或模糊化，这样诗歌的含义就不会以理解力能明确追寻的方式传达给我们。这就像在威廉·布莱克一些最具想象力的作品以及常在莎士比亚诗歌里出现的情形，比如《一报还一报》中玛丽安娜侍从之歌就是典型的例子，那种令人兴奋的力量和整个戏剧的诗意好象在某个时刻变成了一段真实的旋律。

And this principle holds good of all things that par take in any degree of artistic qualities, of the furniture of our houses, and of dress, for instance, of life itself, of gesture and speech, and the details of daily inter-course; these also, for the wise, being susceptible of a suavity and charm, caught from the way in which they are done, which gives them a worth in themselves. Herein, again, lies what is valuable and justly attractive, in what is called the fashion of a time, which elevates the trivialities of speech, and manner, and dress, into “ends in themselves”, and gives them a mysterious grace and attractiveness in the doing of them.

这个原则对所有具备一定程度艺术特质的事物来说都适用，比如我们家里的家具、衣服，或者生命本身、手势、言语以及日常交流的细节；所有这些对智慧之人而言，都可能是赏心悦目、令人着迷的，它们的美是在日常生活中它们出现或在进行时被发现的，这种特质也赋予了它们自身以某种价值。在这里有价值和有公认魅力的东西还是存在于被称为时代风尚的东西里面。这种风尚把语言、礼节和衣着方面的琐碎细节升华为“追求的极致”，在言谈举止中赋予它们一种神秘的优雅气质和魅力。

Art, then, is thus always striving to be independent of the mere intelligence, to become a matter of pure perception, to get rid of its responsibilities to its subject or material; the ideal examples of poetry and painting being those in which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composition are so welded together, that the material or subject no longer strikes the intellect only; nor the form, the eye or the ear only; but form and matter, in their union or identity, present one single effect to the “imaginative reason”, that complex faculty for which every thought and feeling is twin-born with its sensible analogue or symbol.

因此，艺术总是追求独立于纯理智之外，成为一种纯感觉的东西，并极力摆脱其对主题或是材料的责任；诗歌和绘画的理想范例是那些构成元素在其中紧密融合，其材料或主题不仅仅对智力形成吸引力，其形式也不仅仅是为悦目或悦耳；而是形式和内容在融合或统一中向“富有想象力的理性”呈现一种整体的效果，而这种理性有着复杂的机能，每种想法和感觉都与其可感知的相似物或象征物孪生存在。

It is the art of music which most completely realises this artistic ideal, this perfect identification of matter and form. In its consummate moments, the end is not distinct from the means, the form from the matter, the subject from the expression; they inhere in and completely saturate each other; and to it, therefore, to the condition of its perfect moments, all the arts may be supposed constantly to tend and aspire. In music, then, rather than in poetry, is to be found the true type or measure of perfected art. Therefore, although each art has its incommunicable element, its untranslatable order of impressions, its unique mode of reaching the “imaginative reason”, yet the arts may be represented as continually struggling after the law or principle of music, to a condition which

music alone completely realises; and one of the chief functions of aesthetic criticism, dealing with the products of art, new or old, is to estimate the degree in which each of those products approaches, in this sense, to musical law.

而音乐这门艺术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这种艺术理想、这种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在极致完美的时刻，目的和手段、形式和内容、主题和表达并不能截然分开；它们互为对方的有机部分，彼此完全渗透。这是所有艺术都应该不懈向往和追求的——这种完美瞬间的状态。那么不是在诗歌中，而是在音乐里我们将会找到完美艺术的真正类型或标准。因此，虽然每门艺术都有不可言传的元素、不可转化的表现手法以及为“富想象力的理性”所感知的独特模式，但是可以说这些艺术都表现为对音乐的法则或原则不懈地追随，力求达到只有音乐才完全达到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面对或新或旧的艺术品时，美学批判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评估每一件作品接近音乐法则的程度。

By no school of painters have the necessary limitations of the art of painting been so unerringly though instinctively apprehended, and the essence of what is pictorial in a picture so justly conceived, as by the school of Venice; and the train of thought suggested in what has been now said is, perhaps, a not unfitting introduction to a few pages about Giorgione, who, though much has been taken by recent criticism from what was reputed to be his work, yet, more entirely than any other painter, sums up, in what we know of himself and his art, the spirit of the Venetian school.

没有哪个流派的画家像威尼斯画派那样，不着痕迹但却如此准确无误地领会了绘画艺术必然存在的局限，并如此充分地理解了一幅画

中绘画的本质所在；顺着这一思路，刚才所讲到的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合适的引言，来引出下面几页对乔尔乔涅的介绍。虽然最近的批评已从一部据认为是出自他之手的作品中吸取了很多观点，然而他用我们所了解的他自己和他的艺术，比任何其他画家都更全面地总结了威尼斯画派的精神。

The beginnings of Venetian painting link themselves to the last, stiff, half-barbaric splendors of Byzantine decoration, and are but the introduction into the crust of marble and gold on the walls of the Duomo of Murano, or of Saint Mark's, of a little more of human expression. And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its later development, al ways subordinate to architectural effect, the work of the Venetian school never escaped from the influence of its beginnings. Unassisted, and therefore unperplexed, by naturalism, religious mysticism, philosophical theories, it had no Giotto7, no Angelico8, no Botticelli9. Exempt from the stress of thought and sentiment, which taxed so severely the resources of the generations of Florentine artists, those earlier Venetian painters, down to Carpaccio10 and the Bellini11, seem never for a moment to have been so much as tempted to lose sight of the scope of their art in its strictness, or to forget that painting must be before all things decorative, a thing for the eye, a space of color on the wall, only more dexterously blent than the marking of its precious stone or the chance inter change of sun and shade upon it:—this, to begin and end with; whatever higher matter of thought, or poetry, or religious reverie might play its part therein, between. At last, with final mastery of all the technical secrets of his art, and with somewhat more than "a spark of the divine fire" to his share, comes Giorgione. He is the inventor of genre, of those easily movable pictures which serve neither for uses of devotion, nor of allegorical or historic teaching—little groups of real men and women, amid congruous

furniture or landscape—morsels of actual life, conversation or music or play, but refined upon oridealised, till they come to seem like glimpses of life from afar. Those spaces of more cunningly blent color, obediently filling their places, hitherto, in a mere architectural scheme, Giorgione detaches from the wall. He frames them by the hands of some skilful carver, so that people may move them readily and take with them where they go, as one might a poem in manuscript, or a musical instrument, to be used, at will, as a means of self-education, stimulus or solace, coming like an animated presence, into one's cabinet, to enrich the air as with some choice aroma, and, like persons, live with us, for a day or a lifetime. Of all art such as this, art which has played so large a part in men's culture since that time, Giorgione is the initiator. Yet in him too that old Venetian clearness or justice, in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essential limitations of the pictorial art, is still undisturbed. While he interfuses his painted work with a high-strung sort of poetry, caught directly from a singularly rich and high- strung sort of life, yet in his selection of subject, or phase of subject, in the subordination of mere subject to pictorial design, to the main purpose of a picture, he is typical of that aspiration of all the arts towards music, which I have endeavored to explain,—towards the perfect identification of matter and form.

威尼斯画派最初期的作品与拜占庭装饰末期僵硬呆板、野蛮粗放的风格相联。它们只是在慕拉诺多诺大教堂或圣马克教堂墙壁的大理石或金色表面的创作中，增加了些许人文色彩。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制于建筑效果的影响，威尼斯画派的作品从没脱离其早期风格的影响。因为没有受到自然主义、宗教神秘主义或是哲学理论的影响，也就没有变得复杂化，当然也就没有产生乔托·安吉利科或是波提切利。思想和情感的压力曾严重地困扰着佛罗伦萨画派的各代艺术家们，却没有影响到威尼斯画派早期的画家们，一直到卡尔帕乔和贝

利尼，他们好像从没有任何一刻受到过如此大的诱惑，以致于忽略了他们艺术范围的严格界线，或是忘记了绘画首先是装饰性的，是一件满足视觉的东西，是墙上的一片色彩空间，只是比它所装饰的珍贵宝石或是上面阳光和阴影偶然交替的景致更加巧妙地混合融汇了色彩——这是出发点也是最终目标，不管此间有什么更高级的思想内容、诗情画意或是宗教寓意参与其中。最后，在最终掌握了自己艺术的所有技巧后乔尔乔涅登场了，带来的不仅仅是“神圣之火的一粒火星。”他是一种新的绘画类型的创始人：那些作品很容易移动，既不为祈祷之用，也不用来进行寓言性或历史性教育——一些与周围的家具或风景和谐共处的现实中的男女——源自真实生活的片段、对话、音乐或戏剧，但会在此基础上加以修饰或理想化，直到它们看起来像是对生活远远地一瞥。那些在建筑框架内乖乖填充自己位置的、有着更巧妙颜色混合的色彩空间从此被乔尔乔涅从墙上剥离了下来。他借一些技艺娴熟的雕工之手给它们装上画框，这样人们可以很容易移动它们，去哪里都可以随身带走，就像一个人可以随身携带一首诗的手稿或是一件乐器，可以随意用作自学、自我激励或是安慰的手段，就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可以进到陈列柜中，可以像某种精选的香草一样为房间带来芬芳的气息，它们也像人一样和我们一起生活一天或是一生。对于所有像这样的艺术，这种从那时起就在人类文化中扮演了如此重要角色的艺术来说，乔尔乔涅是创始人。但是他身上那种古老的威尼斯式的清晰或公正，以及对绘画艺术本质局限性的认识都清楚可见。虽然他把一种直接来自于丰富而敏感的生活感受的激情诗意融进他的绘画作品里，但在选择主题或是选择主题的某个方面时，在单纯主题要服从画面整体设计、服从画的主要目的的考虑中，他表现出那种典型的所有艺术竭力向音乐靠拢的渴望，对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渴望——关于这一点我此前一直在努力阐述。

Born so near to Titian, though a little before him, that these two companion pupils of the aged Giovanni Bellini may almost be called contemporaries, Giorgione stands to Titian in something like the relationship of Sordello to Dante, in Browning’s poem. Titian,

when he leaves Bellini, becomes, in turn, the pupil of Giorgione. He lives in constant labor more than sixty years after Giorgione is in his grave; and with such fruit, that hardly one of the greater towns of Europe is without some fragment of his work. But the slightly older man, with his so limited actual product (what remains to us of it seeming, when narrowly explained, to reduce itself to almost one picture, like Sordello's one fragment of lovely verse), yet expresses, in elementary motive and principle, that spirit—itself the final acquisition of all the long endeavors of Venetian art—which Titian spreads over his whole life's activity.

乔尔乔涅几乎和提香同时出生，虽然比他稍早一些，这两个老乔万尼.贝利尼同期的学生几乎可以算是同时代的人。乔尔乔涅和提香的关系就像勃朗宁诗歌中索尔戴洛和但丁的关系。提香离开贝利尼以后，接着成为了乔尔乔涅的学生。他在乔尔乔涅死后又继续创作60多年；他的作品如此丰硕，几乎在所有欧洲较大的城镇中都能找到他作品的一些残片。而那位稍微年长的人只有少数有限的实实在在的作品（他留给我们的作品，严格说来似乎仅有一幅是确定的，就像索尔戴洛只留下了一篇爱情诗一样），但他却在基本主题和原则中表达了那种精神——它本身就是所有威尼斯艺术长久以来努力的最终结果——提香也在他一生的活动中广为传布。

And, as we might expect, something fabulous and illusive has always mingled itself in the brilliancy of Giorgione's fame. The exact relationship to him of many works—drawings, portraits, painted idylls—often fascinating enough, which in various collections went by his name, was from the first uncertain. Still, six or eight famous pictures at Dresden, Florence and the Louvre, were with no doubt attributed to him, and in these, if anywhere, something of the splendor of the old Venetian humanity seemed to

have been preserved. But of those six or eight famous pictures it is now known that only one is certainly from Giorgione's hand. The accomplished science of the subject has come at last, and, as in other instances, has not made the past more real for us, but assured us only that we possess less of it than we seemed to possess. Much of the work on which Giorgione's immediate fame depended, work done for instantaneous effect, in all probability passed away almost with- in his own age, like the frescoes on the facade of thefondaco dei Tedeschi at Venice, some crimson traces of which, however, still give a strange additional touch of splendor to the scene of the Rialto. And then there is a barrier or borderland, a perio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passing through which the tradition miscarries, and the true outlines of Giorgione's work and person are obscured. It became fashionable for wealthy lovers of art, with no critical standard of authenticity, to collect so-called works of Giorgione, and a multitude of imitations came into circulation. And now, in the "new Vasari" (Crowe and Cavalcaselle: History of Painting in North Italy.), the great traditional reputation, woven with so profuse demand on men's admiration, has been scrutinized thread by thread; and what remains of the most vivid and stimulating of Venetian masters, a live flame, as it seemed, in those old shadowy times, has been reduced almost to a name by his most recent critics.

另外正如我们可以预料的那样，乔尔乔涅的盛名之中总包含一些玄妙虚幻的东西。他和许多作品——素描、肖像画和田园画的确切关系一直都扑朔迷离，这些作品分别在不同的收录辑子里被归到了他的名下，真是很有意思。然而，有6或8幅保存在德累斯顿、佛罗伦萨和卢浮宫的著名作品被认定确是出自他的手笔，如果说古老的威尼斯画派一些辉煌的人文主义成就似乎保存在哪里的话，那就是在这些画作中了。但是我们目前知道，在这6或8幅著名作品中只有一幅确定是乔

尔乔涅的作品。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最终完成了，并且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它并没有使过去的历史更加真实，只是让我们确定，我们实际拥有的比看上去的更少。为乔尔乔涅即时赢得名誉的大部分作品，那些为瞬间效果而做的作品很可能几乎在他自己的时代里就消失了，例如威尼斯德国商会所正面墙上的壁画便是如此，上面深红色的痕迹仍能使人感受到交易所的壮观场景。然后在大约16世纪中期的一段时间里，有一种障碍或是临界在穿越传统遭受误解的时代时，乔尔乔涅的作品和本人的真实轮廓变得模糊不清。对于富有但对真伪并无鉴赏力的艺术爱好者而言，收集所谓乔尔乔涅的作品成为时尚，于是坊间出现了大量的仿制品。此时在“新瓦萨里”(克罗和卡瓦尔卡塞莱所著：《北部意大利绘画史》——作者注)中，伟大的传统名誉，交织着对大众赞赏的急切需求，已经被仔仔细细检查过了。最大胆、最有激情的威尼斯画派大师，在那些古老阴暗的时代里跳动的火焰，现在在那些批评家的检视之下，似乎已经只剩一个名字了。

Yet enough remains to explain why the legend grew up above the name, why the name attached itself, in many instances, to the bravest work of other men. The Concert in the Pitti Palace, in which a monk, with cowl and tonsure, touches the keys of a harpsichord, while a clerk, placed behind him, grasps the handle of the viol, and a third, with cap and plume, seems to wait, upon the true interval, for beginning to sing, is undoubtedly Giorgione’s. The outline of the lifted finger, the trace of the plume, the very threads of the fine linen, which fasten themselves on the memory, in the moment before they are lost altogether in that calm unearthly glow, the skill which has caught the waves of wandering sound, and fixed them for ever on the lips and hands—these are indeed the master’s own; and the criticism which, while dismissing so much hitherto believed to be Giorgione’s, has established the claims of this one picture, has left it among the most precious things in the world of art.

但是保留下来的东西已经能够充分解释为什么这个名字会演绎出传奇，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名字会和其他人最大胆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在皮蒂宫的《田园合奏》里，一个修道士穿着斗篷，剃了头发，手按大键琴的琴键；一个牧师在他后面，握着六弦琴的手柄；第三个人带着有羽饰的帽子，好像在等待过门，准备开口唱歌。这幅作品毫无疑问是乔尔乔涅的。举起的手指的轮廓、羽饰的痕迹以及精美亚麻布的一根根细线，在它们全部消失在那种平静的、非尘世的光芒中之前，已牢牢植根于人们的记忆之中；那种抓住四处游荡的音波并把它们永远固定在嘴唇和双手上的技艺——这些的确是这位大师自己拥有的。而批评虽然把大量迄今为止被认作乔尔乔涅的作品分离出去，但已建立了他对这一幅作品的所有权，使它成为艺术世界里最宝贵的作品之一。

It is noticeable that the distinction of this Concert, its sustained evenness of perfection, alike in design, in execution, and in choice of personal type, becomes for the “new Vasari” the standard of Giorgione’s genuine work. Finding here sufficient to explain his influence, and the true seal of mastery, its authors assign to Pelle grino da San Daniele the Holy Family in the Louvre, in consideration of certain points where it comes short of this standard. Such shortcoming, however, will hardly diminish the spectator’s enjoyment of a singular charm of liquid air, with which the whole picture seems instinct, filling the eyes and lips, the very garments, of its sacred personages, with some wind-searched brightness and energy; of which fine air the blue peak, clearly de fined in the distance, is, as it were, the visible pledge. Similarly, another favorite picture in the Louvre, the subject of a delightful sonnet by a poet (Dante Gabriel Rossetti.) whose own painted work often comes to mind as one ponders over these precious things—the Fête Champêtre, is assigned to an imitator of Sebastian del Piombo; and the Tempest, in the Academy at Venice, to Paris Bordone, or

perhaps to “some advanced craftsma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From the gallery at Dresden, the Knight embracing a Lady, where the knight’s broken gauntlets seem to mark some well-known pause in a story we would willingly hear the rest of, is conceded to “a Brescian hand”, and Jacob meeting Rachel to a pupil of Palma. And then, whatever their charm, we are called on to give up the Ordeal, and the Finding of Moses with its jewel-like pools of water, perhaps to Bellini.

这幅《田园合奏》的特质，在设计、执行和在人物类型选择中维持的持续不变的完美平衡值得注意，这种特质成为“新瓦萨里”判定乔尔乔涅真正作品的标准。这一发现足以解释他的影响和真正的特点所在，考虑到作品达不到这些标准的几方面，可以确定卢浮宫里《圣家族》的作者是佩莱格里诺·达·圣.达尼埃莱。然而这样的缺点并不影响观众对明丽格调中非凡魅力的享受，因为画作在这种格调下，整幅图画看起来充满了某种飘风追寻般的光辉和活力，举手投足，眼神顾盼，衣饰之间，随处可见；蓝色的山峰在远处的清新空气中清晰可见，宛如可见的保证。同样，卢浮宫中另外一幅受欢迎的作品，某位诗人（但丁·加百利·罗塞蒂——作者注）欢快的十四行诗的主题，《乡间聚会》被认为是塞巴斯蒂安·德尔·皮翁博的摹仿者——事实上人们回想这些珍品时时常会想到诗人自己的画作；威尼斯学院保存的《暴风雨》被认为是帕里斯·博尔多纳，或者可能是“16世纪某个高超工匠”的作品。德累斯顿的画廊里收藏着《骑士拥抱女士》这幅作品，里面骑士破旧的铁手套似乎标记着故事里某段著名的、我们渴望聆听下面故事的停顿，它被认为出自“某位布雷西亚人之手”。《雅各布遇见雷切尔》则是帕尔玛一名学生的作品。于是不论多有魅力，我们都被迫放弃《苦难》和有着宝石一般池塘的《摩西的发现》，这些可能被判为贝利尼的作品。

Nor has the criticism, which thus so freely diminishes the

number of his authentic works, added anything important to the well-known outline of the lif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man: only, it has fixed one or two dates, one or two circumstances, a little more exactly. Giorgione was born before the year 1477, and spent his child hood at Castelfranco, where the last crags of the Venetian Alps break down romantically, with something of parklike grace, to the plain. A natural child of the family of the Barbarelli by a peasant-girl of Vedelago, he finds his way early into the circle of notable persons—people of courtesy. He is initiated into those differences of personal type, manner, and even of dress, which are best understood there—that "distinction" of the Concert of the Pitti Palace. Not far from his home lives Cather ine of Conara, formerly Queen of Cyprus; and, up in the towers which still remain, Tuzio Costanzo, the famous condottiere—a picturesque remnant of medieval manners, amid a civilisation rapidly changing. Giorgione paints their portraits; and when Tuzio's son, Matteo, dies in early youth, adorns in his memory a chapel in the church of Castelfranco, painting on this occasion, perhaps, the altar-piece, foremost among his authentic works, still to be seen there, with the figure of the warrior-saint, Liberale, of which the original little study in oil, with the delicately gleaming, silver-grey armour, is one of the greater treasures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In that figure, as in some other knightly personages attributed to him, people have supposed the likeness of the painter's own presumably gracious presence. Thither, at last, he is himself brought home from Venice, early dead, but celebrated. It happened, about his thirty -fourth year, that in one of those parties at which he entertained his friends with music, he met a certain lady of whom he became greatly enamoured, and "they rejoiced greatly," says Vasari, "the one and the other, in their loves." And two quite different legends concerning it agree in this, that it was through this lady he came by his death; Ridolfi relating that, being robbed of her by one of his pupils, he died of grief at the

double treason; Vasari, that she being secretly stricken of the plague, and he making his visits to her as usual, Giorgione took the sickness from her mortally, along with her kisses, and so briefly departed.

这些批评很随意地把他实际创作作品的数量减少了，但并没有给画家众所周知的生活和个性情况增添任何重要的东西：它只不过更加精准地确定了一两个日期，一两种情境而已。乔尔乔涅在1477年之前出生，在自由堡度过了童年时代。那里阿尔卑斯山的威尼斯段最后的峭壁被园林般雅致的东西隔断，变成了平原。母亲是维戴拉哥的农家女孩，他做为巴巴雷里家族的非婚生子很早就进入了显赫人士——特权阶层的圈子。他开始了解个性类型、行为方式甚至衣着方面的不同，这些区别在皮蒂宫里的《田园合奏》中最为显而易见。离他家不远住着前塞浦路斯皇后科纳拉的凯瑟琳；在目前仍保留下来的高塔上住着图齐奥.科斯坦佐，著名的佣兵队长——在迅速变化的文明中成为中世纪派头的独特残余。乔尔乔涅给他们画肖像画。图齐奥的儿子马泰奥早夭,为了纪念他乔尔乔涅修饰了自由堡教堂的小礼拜堂，这次他的画可能是画在祭坛上。这是他的真迹中最早的一幅，现在在那还能看到。画中人物是圣徒武士利贝拉莱。这幅作品最初的小幅油画习作是国家博物馆的珍品，画中人身披闪着微光的银灰色盔甲。在那个人物身上，就像在其他被认为出自他之手的骑士身上一样，人们曾认为画家揉进了自己优雅的形象。最后他自己离开威尼斯回到家里，虽然早逝但是功成名就。大概在他34岁的时候，在一个他用音乐来款待朋友的聚会上，他遇到了一个令他深深迷恋的女子。瓦萨里说“他们在一起很快乐”，“两个人相互爱慕”。关于这件事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传说都认为，是这个女子导致了他的死亡。里多尔菲讲述说，乔尔乔涅因为她被自己的一个学生抢走，因为双重的背叛悲痛而亡；瓦萨里说，她其实患有瘟疫，而乔尔乔涅像往常一样去看望她，并因为亲吻染上了致命的疾病，匆匆离开了人世。

But, although the number of Giorgione's extant works has been thus limited by recent criticism, all is not done when the real and the traditional elements in what concerns him have been discriminated; for, in what is connected with a great name, much that is not real is often very stimulating. For the aesthetic philosopher, there fore, over and above the real Giorgione and his authentic extant works, there remains the Giorgionesque also—an influence, a spirit or type in art, active in men so different as those to whom many of his supposed works are, really assignable. A veritable school, in fact, grew together out of all those fascinating works rightly or wrongly attributed to him; out of many copies from, or variations on him, by unknown or uncertain workmen, whose drawings and designs were, for various reasons, prized as his; out of the immediate impression he made upon his contemporaries, and with which he continued in men's minds; out of many traditions of subject and treatment, which really descend from him to our own time, and by retracing which we fill out the original image. Giorgione thus becomes a sort of impersonation of Venice itself, its projected reflex or ideal, all that was intense or desirable in it crystallising about the memory of this wonderful young man.

但是，虽然乔尔乔涅现存作品的数量因近期的评论而减少，但当与他有关的真正的、传统的元素被区分出来的时候，一切都不算什么；因为和一个伟大名字相联系的不真实东西大多很具有刺激性。对美学家而言，在乔尔乔涅和他现存的真迹之外，还有乔尔乔涅风格：这是一种影响、一种艺术精神或类型。它们在如此不同的人身上活跃着，正如同许多被猜测是他的作品实际上是别人所作一样。事实上，一个真正的流派是由很多因素汇聚形成的，包括所有这些正确或错误地归为他的伟大作品；那些很多不知名或不确定的工匠创作的复制品或略加修改的仿制品，他们的素描或草图因为各种原因而被归至乔尔

乔涅名下；来自于他给同时代人留下的直接印象中，而这印象也使他活在人们的头脑中；包括主题和创作手法的众多传统，这些传统从他那里传到我们的时代，我们通过对它们的回溯还原原初的形象。乔尔乔涅因此成为威尼斯本身的化身，成为它投射出来的映像或者理想，以及在其中使得所有关于这个伟大年轻人的记忆变得清晰而明确的色彩强烈或魅力四射的一切。

And now, finally, let me illustrate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School of Giorgione, as we may call it, which, for most of us, notwithstanding all that negative criticism of the “new Vasari”, will still identify itself with those famous pictures at Florence, at Dresden and Paris. A certain artistic ideal is there defined for us—the conception of a peculiar aim and procedure in art, which we may understand as the Giorgionesque, wherever we find it, whether in Venetian work generally, or in work of our own time. Of this the Concert, that undoubted work of Giorgione in the Pitti Palace, is the typical instance, and a pledge, authenticating the connexion of the school, and the spirit of the school, with the master.

现在，让我最后再说明一下这个乔尔乔涅画派（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的一些特点。因为对我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尽管有“新瓦萨里”的种种负面批判，仍能用保存在佛罗伦萨、德累斯顿和巴黎的著名作品来标明它的身份。它为我们界定了某种艺术理想——对某一特定的艺术目的或过程的概念，不论我们在哪里发现它，不管是在威尼斯画派的作品里还是在我们自己时代的作品里，我们都可以理解为是乔尔乔涅风格。保存在皮蒂宫中的《田园合奏》，这幅确定出自乔尔乔涅之手的作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一个验证此流派及其流派精神与大师之间联系的保证。

I have spoken of a certain interpenetration of the matter or subject of a work of art with the form of it, a condition realised absolutely only in music, as the condition to which every form of art is perpetually aspiring. In the art of painting, the attainment of this ideal condition, this perfect interpenetration of the subject with the elements of colour and design, depends, of course, in great measure, on dexterous choice of that subject, or phase of subject; and such choice is one of the secrets of Giorgione's school. It is the school of genre, and employs itself mainly with painted idylls, but, in the production of this pictorial poetry, exercises a wonderful tact in the selecting of such matter as lends itself most readily and entirely to pictorial form, to complete expression by drawing and colour. For although its productions are painted poems, they belong to a sort of poetry which tells itself without an articulated story. The master is pre-eminent for the resolution, the case and quickness, with which he reproduces instantaneous motion—the lacing-on of armour, with the head bent back so stately—the fainting lady—the embrace, rapid as the kiss, caught with death itself from dying lips—some momentary conjunction of mirrors and polished armour and still water, by which all the sides of a solid image are exhibited at once, solving that casuistical question whether painting can present an object as completely as sculpture. The sudden act, the rapid transition of thought, the passing expression—this he arrests with that vivacity which Vasari has attributed to him, ilfuoco Giorgioneseo, as he terms it. Now it is part of the ideality of the highest sort of dramatic poetry, that it presents us with a kind of profoundly significant and animated instants, a mere gesture, a look, a smile, perhaps—some brief and wholly concrete moment—into which, however, all the motives, all the interests and effects of a long history, have condensed themselves, and which seem to absorb past and future in an intens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esent. Such ideal instants the school of

Giorgione selects, with its admirable tact, from that feverish, tumultuously coloured world of the old citizens of Venice—exquisite pauses in time, in which, arrested thus, we seem to be spectators of all the fulness of existence, and which are like some consummate extract or quintessence of life.

我曾说过，一件艺术作品的内容或主题与其形式之间的某种相互渗透，即只有在音乐中才能完全得以实现的状态，是每种艺术形式都在永恒追求的状态。在绘画艺术中，这种理想状态的获得，这种主题和色彩构图元素的完美渗透，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题或是主题阶段的灵活选择；而这种选择是乔尔乔涅画派的秘密之一。它是风俗画派，主要创作田园诗画，但是在创作这种绘画诗的过程中，在选择像最迅捷、最完全地适应图画形式，以便通过素描和色彩来完整表达内容等方面它练就了一种神奇的手法。因为虽然此流派的作品是诗画，却属于一种无需讲述就能展现其中故事的诗歌形式。大师在作出决定、把握时机、迅速反应方面是卓越不凡的，借此他再现了瞬间的动作—披上盔甲，头颅高贵地向后扬着—昏倒的女子—拥抱，快如亲吻，与死亡一起从垂死的嘴唇上捕捉到—镜子、光亮盔甲和平静水面的刹那联结使一个立体形象的各个角度同时展现出来，解决了绘画能否能像雕塑一样完全展现物体的令人迟疑的问题。突然的动作、思维的快速转变和一瞬即逝的表情—他捕捉到了瓦萨里评价他时所说的那种活泼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它属于乔尔乔涅，”他这样说。现在它是戏剧性诗歌最高门类的理想的部分，给我们展现了一种深刻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活生生的瞬间：一个简单手势、一道目光、也可能是一抹微笑—短暂但却具体的瞬间—然而，一段漫长历史的所有主题、所有的趣味和效果都浓缩其中，而且似乎在一种对现在的强烈意识中承载了过去和未来。这些是乔尔乔涅画派在掌握了高超手法的同时，从古老的威尼斯市民那个狂热、喧嚣、多姿多彩的世界里选取的理想瞬间—时间流逝中精致的停顿，我们被吸引于其中，似乎在观看存在那里的所有的丰盈内涵，而它们也像是生活的完美精华或典范。

It is to the law or condition of music, as I said, that all art like this is really aspiring; and, in the school of Giorgione, the perfect moments of music itself, the making or hearing of music, song or its accompaniment, are themselves prominent as subjects. On that background of the silence of Venice, so impressive to the modern visitor, the world of Italian music was then forming. In choice of subject, as in all besides, the Concert of the Pitti Palace is typical of everything that Giorgione, him self an admirable musician, touched with his influence. In sketch or finished picture, in various collections, we may follow it through many intricate variations—men fainting at music; music at the pool-side while people fish, or mingled with the sound of the pitcher in the well, or heard across running water, or among the flocks; the tuning of instruments; people with intent faces, as if listening, like those described by Plato in an ingenious passage of the Republic, to detect the smallest interval of musical sound, the smallest undulation in the air, or feeling for music in thought on a stringless instrument, ear and finger refining themselves infinitely, in the appetite for sweet sound; a momentary touch of an instrument in the twilight, as one passes through some unfamiliar room, in a chance company.

如我所言，所有这样的艺术都真正渴望达到音乐的法则或状态。而在乔尔乔涅画派中，音乐自身的完美时刻、对音乐的创作或聆听、歌曲或它的伴奏本身就和主题一样突出。威尼斯那种寂静的背景给现代参观者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意大利音乐的世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在主题的选择上，与所有其他方面的选择一样，皮蒂宫的《田园合奏》是乔尔乔涅融入自身影响之一切的典型，他本人就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在各式各样收藏中的素描或已完成的作品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复杂的变体——人沉迷于音乐中；人们钓鱼的水池边奏出音乐，或者是音乐混杂着井里水罐的声响，或是河流对面的声音，亦或羊群的叫声；乐器的调音；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一段精彩

描写那样，人们带着专注的表情，好像在聆听，以捕捉乐声里最短的间隔、空气中最小的波动；在无弦乐器上于思索中感受音乐，不断锻炼耳朵和手指，以此来满足对甜美声音的渴望；黎明中对乐器的刹那一触，如同一个人在邂逅的人群中行走的时候经过某个陌生的房间。

In these then, the favourite incidents of Giorgione's school, music or the musical intervals in our existence, life itself is conceived as a sort of listening—listening to music, to the reading of Bandello's novels, to the sound of water, to time as it flies. Often such moments are really our moments of play, and we are surprised at the unexpected blessedness of what may seem our least important part of time; not merely because play is in many instances that to which people really apply their own best powers, but also because at such times, the stress of our servile, everyday attentiveness being relaxed, the happier powers in things without are permitted free passage, and have their way with us. And so, from music, the school of Giorgione passes often to the play which is like music; to those masques in which men avowedly do but play at real life, like children "dressing up", disguised in the strange old Italian dresses, particoloured, or fantastic with embroidery and furs, of which the master was so curious a designer, and which, above all the spotless white linen at wrist and throat, he painted so dexterously.

那么在这些乔尔乔涅画派最喜欢的瞬间，即音乐或我们生活中揉合着音乐的间隙中，生活本身被构想成一种聆听——聆听音乐，聆听朗读班戴洛小说的声音，聆听水声，聆听时间的飞逝。这些时刻其实常常是我们玩乐的时刻，我们因自己的时光里看起来最不重要的部分受到意外的眷顾而惊喜。不只是因为很多情况下，人们在玩乐中真正投入了自己最佳的精力，而且因为在这些时候，我们卑屈的压力和平

时的注意力放松了，外部事物中更愉快的力量得以自由通过，随我们同行。因此，乔尔乔涅画派常从音乐过渡到进行和音乐类似的玩乐，举行那种假面舞会，人们在其中一本正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则游戏其中，就像小孩子“过家家”，舞会参加者穿戴起奇异的老式意大利服装，色彩丰富，或者装饰着古怪而漂亮的刺绣或皮毛，而这位大师则是如此奇异的设计师，在手腕或喉咙处一尘不染的白色亚麻布之上，他如此巧妙地创作着。

But when people are happy in this thirsty land water will not be far off; and in the school of Giorgione, the presence of water—the well, or marble-rimmed pool, the drawing or pouring of water, as the woman pours it from a pitcher with her jewelled hand in the Fête Champêtre, listening, perhaps, to the cool sound as it falls, blent with the music of the pipes—is as characteristic, and almost as suggestive, as that of music itself. And the landscape feels and is glad of it also—a landscape full of clearness, of the effects of water, of fresh rain newly passed through the air, and collected into the grassy channels. The air, moreover, in the school of Giorgione, seems as vivid as the people who breathe it, and literally empyrean, all impurities being burnt out of it, and no taint, no floating particle of anything but its own proper elements allowed to subsist within it.

但是当人们满足于这块干渴的土地时，水流也就在不远处了。在乔尔乔涅画派里水的表现——水井，或是用大理石镶嵌边缘的水池，汲水或是倒水，就像《乡间聚会》里一个手上带着珠宝的女人从水壶里倒水一样：她在倾听，可能是听水落下的清冷、混着笛声的声音——这些和音乐本身一样具有特色，而且几乎一样具有启发性。并且风光似乎也乐于承受这水流：一片被水冲刷过的清新风景里，新降的雨水穿越空气汇入长满草的水沟里。另外，在乔尔乔涅画派中，空气

就像正在呼吸它的人们一样鲜活，并且基本上像是在天堂里，所有杂质都被燃烧干净，没有污点也没有任何漂浮的微粒，只有它本身适合的成分才被准许存在于其中。

Its scenery is such as in England we call “park scenery”, with some elusive refinement felt about the rustic buildings, the choice grass, the grouped trees, the undulations deftly economised for graceful effect. Only, in Italy all natural things are as it were woven through and through the gold thread, even the cypress revealing it among the folds of its blackness. And it is with gold dust, or gold thread, that these Venetian painters seem to work, spinning its fine filaments, through the solemn human flesh, away into the white plastered walls of the thatched huts. The harsher details of the mountains re cede to a harmonious distance, the one peak of rich blue above the horizon remaining but as the sensible warrant of that due coolness which is all we need ask here of the Alps, with their dark rains and streams. Yet what real, airy space, as the eye passes from level to level, through the long-drawn valley in which Jacob embraces Rachel among the flocks! Nowhere is there a truer instance of that balance, that modulated unison of landscape and persons—of the human image and its accessories—already noticed 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Venetian school, so that, in it, neither personage nor scenery is ever a mere pretext for the other.

它的风景是那种我们在英格兰称作“园林景致”的东西，乡村建筑、优质的草地，成片的树木，为追求雅致的效果而灵巧地精简了的起伏，让人感到难以捉摸的精致。只有在意大利，所有的自然物才好像都被金色细线编织，就连柏树都在它黑色的褶层里显示着它。而且这些威尼斯派画家似乎都是用这种金粉或金色丝线创作的：他们抽出这种精美的丝线，描画出庄严的人类肉体，以及茅草小屋的白色灰泥

墙；群山更为粗糙的细节褪变成一种和谐的远景；位于地平线上的一座深蓝色山峰依然存在，但只是作为一种真实可感的证物，证明这里有我们需要向有着昏暗雨季和溪流的阿尔卑斯山索取的清冷。然而当眼光从一个层次移向另一个层次，穿越悠长的山谷，山谷里雅各和大天使在羊群中拥抱，这是多么的真实又虚幻的空间！哪里也没有比这种平衡，这种调整后的风景和人——人类形象和它的附属品——之间的和谐一致更加真实的例子了。它已被认作是威尼斯画派的特点，所以其中人和风景都不再是对方单纯的凭借。

Something like this seems to me to be the vraie vérité about Giorgione, if I may adopt a serviceable expression, by which the French recognize those more liberal and durable impressions which, in respect of any really considerable person or subject, anything that has at all intricately occupied men's attention, lie beyond, and must supplement, the narrower range of the strictly ascertained facts about it. In this, Giorgione is but an illustration of a valuable general caution we may abide by in all criticism. As regards Giorgione himself, we have indeed to take note of all those negotiations and exceptions, by which, at first sight, a "new Vasari" seems merely to have confused our apprehension of a delightful object, to have explained away in our inheritance from past time what seemed of high value there. Yet it is not with a full understanding even of those exceptions that one can leave off just at this point. Properly qualified, such exceptions are but a salt of genuineness in our knowledge; and beyond all those strictly ascertained facts, we must take note of that indirect influence by which one like Giorgione, for instance, enlarges his permanent efficacy and really makes himself felt in our culture. In a just impression of that, is the essential truth, the vraie vérité, concerning him.

如果我可以借用一个合宜的表达的话，这样的东西在我看来似乎是关于乔尔乔涅的真实事实。这个表达法是法国人用来认定那些更为自由和持久、关于任何真正值得考虑的个人或主题以及任何曾经错综复杂地占据人类注意力的事物的印象的。它处于有关这一事物严格确定事实的狭窄范围之外，并且必须对其进行补充。这里，乔尔乔涅的例子只是我们在所有批评中可能都要遵循的一个珍贵的、普遍的戒条。就乔尔乔涅个人而言，我们的确要注意所有的讨论和例外。这些第一眼看来，一个“新瓦萨里”似乎只是混淆了我们对一个令人愉快的事物的理解，其解释已偏离了我们从过去继承来、似乎具有极高价值的东西。然而没获得全面的、甚至是对那些例外的理解，人们都会在这一点上止步不前。恰当的描述是，这些例外只是我们知识里的真正的刺激因素。在所有那些严格确定的事实之外，我们必须注意那些间接的影响，通过这种影响，例如乔尔乔涅这样的人就扩大了他的影响，并使他自己真正进入了我们的文化。在那样的恰当看法中是关于他的本质事实。

1. 0

1877 年

1.乔尔乔涅（1478—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主要画家，代表作有《暴风雨》、《入睡的维纳斯》等。2.莱辛（1729—1781），德国文艺理论家、剧作家。3.提香（1488—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画家。4.韦罗内赛（1528—1588），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主要画家。5.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画家。6.M. 阿方斯·勒格罗（1837—1911），法国画家、雕刻家。7.乔托（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8.安吉利科（约1400—1455），意

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画派的著名画家。9.波提切利（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代表作有《春》、《维纳斯的诞生》等。10.卡尔帕乔(约1455—1525),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画派叙事体画家。11.贝利尼（1429—1507），威尼斯画派奠基人之一。

Joachim Du Bellay

乔基姆·杜·贝莱

IN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hen the spirit of the Renaissance was everywhere, and people had begun to look back with distaste on the works of the middle age, the old Gothic manner had still one chance more, in borrowing something from the rival which was about to supplant it. In this way there was produced, chiefly in France, a new and peculiar phase of taste with qualities and a charm of its own, blending the somewhat attenuated grace of Italian ornament with the general outlines of Northern design. It created the Château de Gaillon, as you may still see it in the delicate engravings of Israël Silvestre—a Gothic donjon veiled faintly by a surface of dainty Italian traceries—Chenon ceaux, Blois, Chambord, and the church of Brou. In painting, there came from Italy workmen like Maître Roux and the masters of the school of Fontainebleau, to, have their later Italian voluptuousness attempered by the naïve and silvery qualities of the native style; and it was characteristic of these painters that they were most successful in painting on glass, an art so essentially medieval. Taking it up where the middle age had left it, they found their whole work among the last subtleties of colour and line; and keeping within the true limits of their material, they got quite a new order of effect from it, and felt their way to refinements on colour never dreamed of by those older workmen, the glass-painters of Chartres or Le Mans. What is called the Renaissance in France is thus not so much the introduction of a wholly new taste ready-

made from Italy, but rather the finest and subtlest phase of the middle age itself, its last fleeting splendour and temperate Saint Martin's summer. In poetry, the Gothic spirit in France had produced a thousand songs; so in the Renaissance, French poetry, too, did but borrow something to blend with a native growth, and the poems of Ronsard, with their ingenuity, their delicately figured surfaces, their slightness, their fanciful combinations of rhyme, are the correlative of the traceries of the house of Jacques Coeur at Bourges, or the Maison de Justice at Rouen.

到16世纪中期，文艺复兴的精神已传播到各处，人们怀带厌恶回顾中世纪的作品。古老的哥特风格却仍旧有另外一个机会：借鉴将要取代自己的竞争对手。一种新奇的、有着自身特性和魅力的品味主要在法国出现了，它混合了意大利装饰的某种淡化的优雅和北方造型的大体轮廓。加永城堡就是这样出现的，就像我们仍旧可以在伊斯拉埃尔·西尔维斯特精致的版画里，在舍农索、布卢瓦、尚博尔和布鲁的教堂看到的一样：哥特式城堡的主建筑朦胧地隐藏在讲究的意大利窗饰下。绘画方面，来自意大利的工匠，比如迈特尔·鲁和枫丹白露派的画师，他们用当地风格的纯真清新来中和晚期意大利的骄奢淫逸。这些画家的特点就是他们在玻璃画这种本质里属于中世纪的艺术上最为成功。在中世纪的基础上重拾这种艺术，他们的作品中体现的绝不是色彩和线条的细致。在材料所限的范围内他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效果次序，探索到自己润饰色彩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老一辈工匠，那些沙特尔和勒芒的玻璃画者做梦都想不到的。因此，所谓法国文艺复兴不能算是从意大利引入的一个现成的、全新的风格取向，而是中世纪本身最美好、最精妙的阶段，是它最后的短暂的辉煌和温和的圣马丁的夏天。在诗歌领域，法国的哥特风格创造了上千首作品。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诗歌也只是借鉴一些因素与当地土特色融合。龙萨的诗歌，其独创性、其精致华丽的外表、其轻盈以及奇妙的韵律组合和位于布尔日的雅克·科尔的住所或者鲁昂法院的窗饰息息相关。

There was indeed something in the native French taste naturally akin to that Italian finesse. The characteristic of French work had always been a certain nicety, a remarkable daintiness of hand, une netteté remarquable d'exécution. In the paintings of François Clouet, for example, or rather of the Clouets—for there was a whole family of them—painters remarkable for their resistance to Italian influences, there is a silveriness of colour and a clearness of expression which distinguish them very definitely from their Flemish neighbours, Hemling or the Van Eycks. And this nicety is not less characteristic of old French poetry. A light, aerial delicacy, a simple elegance—une netteté remarquable d'exécution: these ar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like of Villon's1 poetry, and of the Hours of Anne of Brittany. They are characteristic, too, of a hundred French Gothic carvings and traceries. Alike in the old Gothic cathedrals, and in their counterpart, the old Gothic chansons de geste2, the rough and ponderous mass becomes as if by passing for a moment into happier conditions, or through a more gracious stratum of air, graceful and refined, like the carved ferneries on the granite church at Folgoat, or the lines which describe the fair priestly hands of Archbishop Turpin, in the song of Roland; although below both alike there is a fund of mere Gothic strength, or heaviness. (The purely artistic aspects of this subject have been interpreted, in a work of great taste and learning, by Mrs. Mark Pattison:—The Renaissance of Art in France.)

的确，在法国本土的风格中有一些东西跟意大利的那份灵气很相似。法国作品的特色一直是某种精细，一种手法的出奇讲究，一种非凡的明确表现。例如，在弗朗索瓦·克卢埃—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克卢埃家族，因为他们整个家庭中绘画传统悠久—那些拒绝受到意大利影响的画家，其作品中有一种色彩的清晰和表达的明确，这把他们和他们的佛兰德斯邻居—海姆林或者凡·爱克家族明确区分开来。这种精细在

法国古诗歌中也一样突出。一种轻盈无形的精致，一种简单的优雅—一种非凡的明确表现—这些基本特征在维永诗歌和《布列塔尼的安妮的时代》中同样显著。它们也是上百件法国哥特式雕塑作品和窗饰的特点。同样地，在古老的哥特式教堂和与它对应的古老哥特式武功歌中，这种沉重粗笨的样式好像经历了一段时间，达到了令人更加愉悦的状态，或者说穿过一层更高雅的空气变得优美儒雅，像是伏尔戈特花岗岩教堂上的石刻蕨类，或是《罗兰之歌》中描绘特平大主教的僧侣的优美的双手的线条，尽管两者脚下的根基是纯粹的哥特式的力量，或者说沉重。（马克·帕蒂森夫人在其具有很高品位和学识的作品《法国艺术的复兴》中，对这个主题的纯艺术方面进行了阐述。—作者注）

Now, Villon’s songs and Clouet’s painting are like these. It is the higher touch making itself, felt here and there, betraying itself, like nobler blood in a lower stock, by a fine line or gesture or expression, the turn of a wrist, the tapering of a finger. In Ronsard’s time that rougher element seemed likely to predominate. No one can turn over the pages of Rabelais without feeling how much need there was of softening, of castigation. To effect this softening is the object of the revolution in poetry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Ronsard’s name. Casting about for the means of thus refining upon and saving the character of French literature, he accepted that influx of Renaissance taste, which, leaving the buildings, the language, the art, the poetry of France, at bottom, what they were, old French Gothic still, gilds their surfaces with a strange, delightful, foreign aspect passing over all that Northern land, in itself neither deeper nor more permanent than a chance effect of light. He reinforces, he doubles the French daintiness by Italian finesse. Thereupon, nearly all the force and all the seriousness of French work disappear; only the elegance, the äerial touch, the perfect manner remain. But this elegance, this manner, this daintiness of execution are consummate,

and have an unmistakable aesthetic value.

维永的诗歌和克卢埃的绘画都与这些类似。更高层次的笔触通过一处柔美的线条、一个姿势或表情、手腕的转动以及手指由粗到细的变化，使其自身随处展现出来，如同高贵的血液在低贱的家族中流淌一般。在龙萨时代更为粗野的元素似乎占了主流。读过拉伯雷作品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认为书中的惩罚应当轻缓、宽厚些。实现这种宽厚是与龙萨这个名字有关的诗歌领域革命的目标。因此为了寻找改进和挽救法国文学特色的方法，他接受了文艺复兴品位的涌入，这种品位使法国的建筑、语言、艺术和诗歌在本质上保持了古老的法国哥特风格的原样，给它们表面镀上一层流传于整个北部地区的奇特而令人愉悦的外来特征。而在其中产生的作用却不比偶然的光线效果更为强烈或持久。他用意大利式的灵巧使法国式的精细成倍增加。因此法国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力量和严肃性都消失了，只有那种优雅、那种空洞的风格和完美的样式得以保留。但是这种优雅、样式和技巧的精细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有一种明白无误的美学价值。

So the old French chanson, which, like the old northern Gothic ornament, though it sometimes refined itself into a sort of weird elegance, was often, in its essence, some thing rude and formless, became in the hands of Ronsard a Pindaric ode3. He gave it structure, a sustained system, strophe and antistrophe, and taught it a changefulness and variety of metre which keep the curiosity always excited, so that the very aspect of it, as it lies written on the page, carries the eye lightly onwards, and of which this is a good instance:—

古老的法国歌曲，和古老的北部哥特装饰相似，虽然有时经过润饰使自己具备某种古怪的优雅，在本质上却常常是一些粗蛮杂乱的东

西。这些歌曲在龙萨手里成为格律谨严的品达体颂歌。他赋予它一个结构，一种持续的体系——诗节和对照节；并且教给它一种使好奇心永远激动的变化多端和多种多样的格律，所以这种特色跃然纸上时，很容易使目光轻轻挪动向前，下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Avril, la grace, et le ris

四月，爱神的细巧

De Cypris,

和欢笑，

Winckelmann

温克尔曼

Et Ego In Arcadia Fui

——《阿卡迪亚的牧人》

Goethe’s fragments of art-criticism contain a few pages of strange pregnancy on the character of Winckelmann. He speaks of the teacher who had made his career possible, but whom he had never seen, as of an abstract type of culture, consummate, tranquil, withdrawn already into the region of ideals, yet retaining colour from the incidents of a passionate intellectual life. He classes him with certain works of art, possessing an inexhaustible gift of suggestion, to which criticism may return again and again with renewed freshness. Hegel, in his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Art, estimating the work of his predecessors, has also passed a remarkable judgment on Winckelmann’s writings:—“Winckelmann, by contemplation of the ideal works of the ancients, received a sort of inspiration, through which he opened a new sense for the study of art. He is to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ose who, in the sphere of art, have known how to initiate a new organ for the human spirit.” That it has given a new sense, that it has laid open a new organ, is the highest that can be said of any critical effort. It is interesting, then, to ask what kind of man it was who thus laid open a new organ.

Under what conditions was that effected?

歌德在艺术批评方面的零散作品中有几页谈到了温克尔曼那不可思议的深刻丰富的个性。他谈到这个令他事业成功、但从未谋面的老师，就像谈及一种抽象的文化类型：完满、宁静、早已回归到理想的境地，但也保留了从充满激情的知性生活的事件中汲取的色彩。他将温克尔曼与一些具备永不枯竭的联想性的艺术品划分一类，评论界可以不断从中获得新的收获。黑格尔在关于《艺术哲学》的演讲中评价前人的成果，也曾对温克尔曼的作品做出不俗的评价："温克尔曼透过对古代完美作品的思考，获得了一种灵感，通过这种灵感他为艺术研究找到了一种新的感知方式。他应该被归入那些在艺术领域里，了解如何为人类精神创造一种新器官的大师中。"找到新的感知方式，创造新的器官是任何批判成果所能获得的最高赞誉。那么，询问是什么样的人创制了这种新器官就是很有趣的了。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取得了这样的成果呢？

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was born at Stendal in Brandenburg, in the year 1717. The child of a poor tradesman, he passed through many struggles in early youth, the memory of which ever remained in him as a fitful cause of dejection. In 1763, in the full emancipation of his spirit, looking over the beautiful Roman prospect, he writes—"One gets spoiled here; but God owed me this; in my youth I suffered too much." Destined to assert and interpret the charm of the Hellenic spirit, he served first a painful apprenticeship in the tarnished intellectual world of Germany in the earlier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sing out of that into the happy light of the antique, he had a sense of exhilaration almost physical. We find him as a child in the dusky precincts of a German school, hungrily feeding on a few colourless books. The master of this school grows blind; Winckelmann becomes his famulus. The old

man would have had him study theology. Winckelmann, free of the master's library, chooses rather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Greek classics. Herodotus1 and Homer win, with their vowelled Greek, his warmest enthusiasm; whole nights of fever are devoted to them; disturbing dreams of an Odyssey of his own come to him. "He felt in himself," says Madame de Staël2, "an ardent attraction towards the south. In Ger man imaginations even now traces are often to be found of that love of the sun, that weariness of the North(cette fatigue du nord), which carried the northern peoples away into the countries of the South. A fine sky brings to birth sentiments not unlike the love of one's Fatherland."

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1717年出生于勃兰登堡的施滕达尔。他是一个潦倒商贩的儿子，童年时代经历了很多磨难，那段记忆成了他断断续续感到沮丧的一个原因。1763年他精神完全放松地欣赏着罗马的美好景色时，写道："在这里，一个人是会乐而忘蜀的，但这正是上帝亏欠我的，我年幼时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温克尔曼命中注定要承担宣扬和阐释希腊精神的魅力的重担，在18世纪上半叶枯燥乏味的德国知识界，他首先扮演了一个备受煎熬的学徒角色。之后，他走进古代遗产快乐的阳光里，获得的几乎是一种肉体上的兴奋感。我们知道他小时候在一所德国学校的灰暗的角落里如饥似渴地读着几本黯淡发黄的书。这个学校的校长失明后，温克尔曼做了他的私人助手。这位老人本想让他学习神学。温克尔曼因此可以自由进出校长图书馆，但他却决定去熟悉那些希腊经典。希罗多德和荷马以他们"元音化"的希腊文赢得了他最大的热情；他整晚整晚地疯狂阅读，开始做起了自己的纷扰的奥德赛之梦。"他觉得自己，"斯塔尔夫人说，"不可遏抑地被南方吸引。即便是现在，依旧时常可以在德国人的想象中，寻觅到促使北部的人们迁移至南方国度的那种对阳光的热爱和对北方的厌倦的痕迹。一片晴朗天空催生的情感不弱于一个人对祖国的爱。"

To most of us, after all our steps towards it, the antique world, in spite of its intense outlines, its own perfect self-expression, still remains faint and remote. To him, closely limited except on the side of the ideal, building for his dark poverty “a house not made with hands,” it early came to seem more real than the present. In the fantastic plans of foreign travel continually passing through his mind, to Egypt, for instance, and to France, there seems always to be rather a wistful sense of something lost to be regained, than the desire of discovering anything new. Goethe has told us how, in his eagerness actually to handle the antique,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insignificant vestiges of it which the neighbourhood of Strasburg afforded. So we hear of Winckelmann’s boyish antiquarian wanderings among the ugly Brandenburg sandhills. Such a conformity between himself and Winckelmann, Goethe would have gladly noted.

对我们多数人而言，那个有着鲜明轮廓和完美自我表达的古代世界，尽管我们已尝试用各种方法进行探索，它还是模糊遥远的。对温克尔曼来说，除了理想外，古代世界其他方面都是严格受局限的，为他阴暗的贫穷建造了“一所非手工制作的房子”，它很早就比现实还要真实了。到其他国家游历的美妙想法总是时不时地出现在他脑中，比如到埃及和法国，里面似乎总有一种向往找回失去东西的感觉，而不是发现任何新事物的渴望。歌德曾经提到，在渴望真正了解古物的过程中，他是如何对斯特拉斯堡附近地区存有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古物残余碎片产生了兴趣。所以我们听说温克尔曼在勃兰登堡丑陋的沙丘上像孩子一样游荡收集古物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和温克尔曼的一致之处，歌德是乐意提及的。

At twenty-one he enters the University of Halle, to study theology, as his friends desire; instead, he becomes the enthusiastic

translator of Herodotus. The condition of Greek learning in Germa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had fallen, and there were no professors at Halle who could satisfy his sharp, intellectual craving. Of hi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he always speaks with scorn, claiming to have been his own teacher from first to last. His appointed teachers did not perceive that a new source of culture was within their hands. Homo vagus et inconstans! —one of them pedantically reports of the future pilgrim to Rome, unaware on which side his irony was whetted. Whe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onfers nothing but irritation on a Schiller, no one ought to be surprised; for Schiller, and such as he, are primarily spiritual adventurers. But that Winckelmann, the votary of the gravest of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should get nothing but an attempt at suppression from the professional guardians of learning, is what may well surprise us.

21岁时温克尔曼如朋友所愿进入哈雷大学学习神学；但是他却饶有兴致地翻译起了希罗多德的著作。德国学校和大学里学习希腊文的环境已经不如从前，哈雷大学里没有一个教授能满足他热切的求知欲。谈及自己的专业教育他总是语带嘲讽，宣称自始至终都是自己教自己。他的导师们没有发觉他们的手中有一种新的文化的源头。流浪不定变化无常的人！—他的一个老师曾经这样学究地形容这个后来去了罗马的朝圣者，不知道他的嘲讽缘何而起。倘若专业教育向他灌输的只有对席勒的愤怒，没人应该感到惊讶。因为席勒和他一样，都是本质上的精神冒险家。但是温克尔曼这个理性传统的信仰者，仅仅产生挣脱老学究们的禁锢的企图，这足以令我们吃惊了。

In 1743 he became master of a school at Seehausen. This was the most wearisome period of his life. Not withstanding a success in dealing with children, which seems to testify to something simple and primeval in his nature, he found the work of teaching very

depressing. Engaged in this work, he writes that he still has within him a longing desire to attain to the knowledge of beauty—sehnlich wünschte zur Kenntniss des Schönen zu gelangen. He had to shorten his nights, sleeping only four hours, to gain time for reading. And here Winckelmann made a step forward in culture. He multiplied his intellectual force by detaching from it all flaccid interests. He renounced mathematics and law, in which his reading had been considerable—all but the literature of the arts. Nothing was to enter into his life unpenetrated by its central enthusiasm. At this time he undergoes the charm of Voltaire. Voltaire belongs to that flimsier, more artificial, classical tradition, which Winckelmann was one day to supplant, by the clearring, the eternal outline, of the genuine antique. But it proves the authority of such a gift as Voltaire's that it allures and wins even those born to supplant it. Voltaire's impression on Winckelmann was never effaced; and it gave him a consideration for French literature which contrasts with his contempt for the literary products of Germany. German literature transformed, siderealised, as we see it in Goethe, reckons Wincke1mann among its initiators. But Germany at that time presented nothing in which he could have anticipated Iphigenie3, and the formation of an effectiv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German literature.

1743年温克尔曼成为塞豪森一个学校的校长。这是人生中最让他厌倦的一段。尽管和学生相处得很成功，这好像证实了他天性中简单而原始的部分，但他觉得教学工作很压抑。尽管从事着这个工作，他写到，自己仍怀有对获得美的知识的强烈渴望。他只得把睡眠时间缩减到4个小时，以挤出阅读的时间。同时，温克尔曼在修养方面向前迈了一步。他从那些不强烈的兴趣中抽身出来，从而节省了不少精力。他放弃了曾经大量阅读过的数学和法律，只学习艺术文献。所有进入他生命的东西都和他自己最热爱的事物有关。此时他领略到了伏

尔泰的魅力。伏尔泰属于那种比较浅薄、做作的古典传统，后来温克尔曼最终用真正的古代遗产清晰、永恒的外部框架把这种传统替代了。但是事实证明伏尔泰这种天赋的权威性甚至会吸引和胜过那些天生来替代它的东西。伏尔泰对温克尔曼的影响从未被抹去，它使他思考法国文学，这和他对德国文学作品的轻蔑形成对比。德国文学，像我们所知的那样，在歌德那里得到转型发展，温克尔曼是其中一位发起者。但是当时的德国没有呈现出任何迹象，让他能够预见《伊菲革涅亚》，以及一种有效的古典传统在德国文学中的形成。

Under this purely literary influence, Winckelmann protests against Christian Wolff and the philosophers. Goethe, in speaking of this protest, alludes to his own obligations to Emmanuel Kant. Kant's influence over the culture of Goethe, which he tells us could not have been resisted by him without loss, consisted in a severe limitation to the concrete. But he adds, that in born antiquaries, like Winckelmann, a constant handling of the antique, with its eternal outline, maintains that limitation as effectually as a critical philosophy. Plato, however, saved so often for his redeeming literary manner, is excepted from Winckelmann's proscription of the philosophers. The modern student most often meets Plato on that side which seems to pass beyond Plato into a world no longer pagan, based upon the conception of a spiritual life. But the element of affinity which he presents to Winckelmann is that which is wholly Greek, and alien from the Christian world, represented by that group of brilliant youths in the Lysis, still uninfected by any spiritual sickness, finding the end of all endeavour in the aspects of the human form, the continual stir and motion of a comely human life.

在这种纯粹的文学的影响下，温克尔曼反对克里斯蒂安·沃尔弗和

那些哲学家。歌德在谈到这种反对时，暗示他自己曾受伊曼纽尔·康德的影响。歌德告诉我们，康德对他的修养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他无法毫无损失地拒之门外，它存在于具体事物的严格限制中。但他还说，对温克尔曼这种天生的古物研究者来说，能够不断地接触古代艺术品，并且熟悉其永恒的轮廓，如批判哲学一样有效地保持了这种限制。然而柏拉图由于常常挽救了温克尔曼弥补性的文学样式，所以不在他反对的哲学家之列。这个现代学生常常在那个看上去超越了柏拉图，不再属于异教世界的、基于精神生活概念的区域与他相遇。但是柏拉图显现给温克尔曼的这种充满吸引力的元素完全是希腊的，和基督教世界背道而驰，它通过《吕西斯》里那群聪明的年轻人展现出来，他们还没有被任何精神疾病感染，并发现所有在人类外形方面的努力的终结，而美好人类生活的骚动和运作都在继续。

This new-found interest in Plato's dialogues could not fail to increase his desire to visit the countries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t is my misfortune," he writes, "that I was not born to great place, wherein I might have had cultivation, and the opportunity of following my instinct and forming myself." A visit to Rome probably was already designed, and he silently preparing for it. Count Bünau, the author of a historical work then of note, had collected at Nöthenitz a valuable library, now part of the library of Dresden. In 1748 Winckelmann wrote to Bünau in halting French:—He is emboldened, he says, by Bünau's indulgence for needy men of letters. He desires only to devote himself to study, having never allowed himself to be dazzled by favourable prospects in the Church. He hints at his doubtful position "in a metaphysical age, by which humane literature as trampled under foot. At present," he goes on, "little value is set on Greek literature, to which I have devoted myself so far as I could penetrate, when good books are so scarce and expensive." Finally, he desires a place in some corner of Bünau's library. "Perhaps, at some future time, I shall become more

useful to the public, if, drawn from obscurity in whatever way, I can find means to maintain myself in the capital.”

在柏拉图对话集中发现的新兴趣让他更加渴望游历那些有着古典传统的国家。“这是我的不幸，”他写道，“我没有出生在伟大的国家，在那里本可以让我得到滋养，让我跟随自己的本能，塑造自我。”参观罗马的行程可能已经计划妥当，他在默默为此做着准备。比瑙伯爵，这位当时一部知名的历史作品的作家在诺藤尼茨筹建了一个颇有价值的图书馆，现今它是德累斯顿图书馆的一部分。1748年，温克尔曼用蹩脚的法语写信给比瑙伯爵，他说自己因比瑙对穷困文人的恩惠而获得勇气。他只想投身研究，从未允许自己沉迷于教会带给他的美好前程里。他暗示了自己此时不明确的地位，“在一个形而上学的时代里，人性的文学遭到践踏。目前，”他继续说，“希腊文学的重要性被忽略，而我一直全身投入于此并尽可能深入，而现在好书是如此稀缺而昂贵。”最后，他希望在比瑙的图书馆里获得一个小职位。“可能在将来，如果我能以某种方式摆脱默默无闻的境况，并能在首府找到维持生计的办法，我会成为一个对公众更有用的人。”

Soon afterwards we find Winckelmann in the library at Nöthenitz. Thence he made many visits to the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at Dresden. He became acquainted with many artists, above all with Oeser, Goethe’s future friend and master, who, uniting a high culture with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of art, was fitted to minister to Winckelmann’s culture. And now a new channel of communion with the Greek life was opened for him. Hitherto he had handled the words only of Greek poetry, stirred indeed and roused by them, yet divining beyond the words some unexpressed pulsation of sensuous life. Suddenly he is in contact with that life, still fervent in the relics of plastic art. Filled as our culture is with the classical spirit, we can hardly imagine how deeply the human

mind was moved, when, at the Renaissance, in the midst of a frozen world, the buried f ire of ancient art rose up from under the soil. Winckelmann here reproduces for us the earlier sentiment of the Renaissance. On a sudden the imagination feels itself free. How facile and direct, it seems to say, is this life of the senses and the understanding, when once we have apprehended it! Here, surely, is that more liberal mode of life we have been seeking so long, so near to us all the while. How mistaken and roundabout have been our efforts to reach it by mystic passion, and monastic reverie; how they have def lowered the flesh; how little have they really emancipated us! Hermione4 melts from her stony posture, and the lost proportions of life right themselves. Here, then, in vivid realisation we see the native tendency of Winckelmann to escape from abstract theory to intuition, to the exercise of sight and touch. Lessing, in the Laocoon, has theorised finely on the relation of poetry to sculpture; and philosophy may give us theoretical reasons why not poetry but sculpture should be the most sincere and exact expression of the Greek ideal. By a happy, unperplexed dexterity, Winckelmann solves the question in the concrete. It is what Goethe calls his Gewahrwerden der griechischen Kunst, his finding of Greek art.

我们知道很快温克尔曼就在位于诺藤尼茨的图书馆里工作了。从那时起他多次去德累斯顿参观那里收藏的古物，和许多艺术家熟悉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厄泽尔这个歌德未来的朋友和老师。厄泽尔兼具高雅的修养和艺术的实用知识，适合教导温克尔曼提高修养。现在一个新的和希腊生活沟通的渠道向他敞开了。到目前为止他掌握的只是希腊诗歌的文字，他确实因这些诗歌而激动振奋，然而还会在言辞之外揣测到一些未被表达的感官生活的搏动。突然之间，他和那种仍然在雕塑艺术的遗迹中炽热存在着的生活有了接触。我们的文化中充满了古典精神，所以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在文艺复兴时代，身处一个僵化

的世界中，当被埋藏的古代艺术火种从地下升起时人类心灵受到了多深的震动。温克尔曼在此为我们重现了文艺复兴的早期情感。一霎那间，想象力感觉自己获得了自由。它好像在说，当我们能够领会时，这种感性和理性的生活是多么地简单而直接啊！这确实就是，我们一直追寻的更为自由的生活模式，它一直就离我们如此之近。我们一直通过神秘的热情和僧侣式的幻想来达成这个目标的努力是多么荒谬和迂回曲折，它们是如何亵渎了肉体，又是怎样无助于我们的解放啊！赫耳弥俄涅不再是面无表情的样子，生活中丢失的部分也得以自我恢复。然后在这里，在具体实现的成果中，我们发现温克尔曼与生俱来的逃离抽象理论，走向直觉，走向实际运用视觉和触觉的倾向。莱辛在《拉奥孔》中把诗歌和雕塑的关系完整地理论化，哲学可能会给出理论上的原因，告诉我们为什么是雕塑，而非诗歌才能最真实准确地表达希腊的理想。温克尔曼用一种轻松简单的聪敏具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歌德所说的他“对希腊艺术的认识”。

Through the tumultuous richness of Goethe’s culture, the influence of Winckelmann is always discernible, as the strong, regulative under- current of a clear, antique motive. “One learns nothing from him,” he says to Eckermann5, “but one becomes something.” If we ask what the secret of this influence was, Goethe himself will tell us—wholeness, unity with one’s self, intellectual integrity. And yet these expressions, because they fit Goethe, with his universal culture, so well, seem hardly to describe the narrow, exclusive interest of Wincke1mann. Doubtless Winckelmann’s perfection is a narrow perfection: his feverish nursing of the one motive of his life is a contrast to Goethe’s various energy. But what affected Goethe, what instructed him and ministered to his culture, was the integrity, the truth to its type, of the given forc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orce was the single interest of Winckelmann, unembarrassed by any thing else in him. Other interests, practical or intellectual, those slighter talents and motives not supreme,

which in most men are the waste part of nature, and drain away their vitality, he plucked out and cast from him. The protracted longing of his youth is not a vague, romantic longing: he knows what he longs for, what he wills. Within its severe limits his enthusiasm burns like lava. “You know,” says Lavater6, speaking of Winckelmann’s countenance, “that I consider ardor and indifference by no means incompatible in the same character. If ever there was a striking instance of that union, it is in the countenance before us.” “A lowly childhood,” says Goethe, “insufficient instruction in youth, broken, distracted studies in early manhood, the burden of school-keeping! He was thirty years old before he enjoyed a single favor of fortune: but so soon as he had attained to an adequate condition of freedom, he appears before us consummate and entire, complete in the ancient sense.”

透过歌德丰富多样的修养总是可以察觉出温克尔曼的影响，这种影响犹如一股清晰的古典动机的潜流，强烈并且具有调节性。“从他身上学不到什么，”他对爱克曼说，“但是他可以让人有巨大的改变。”如果我们问这种影响的秘密是什么，歌德自己会告诉我们：它是完整、自我统一和理性的融合。而这些词语描述歌德广博的修养如此恰当，似乎很难用来形容温克尔曼狭窄而专注的兴趣。毫无疑问，温克尔曼的完美是一种有限的完美：他对自己生活中一个兴趣的狂热培养和歌德多方面的能量形成了对照。但是影响歌德、指导他并对他的修养有所助益的，正是这种特定力量的完整性，是其实实在在的样式。这种力量的发展是温克尔曼唯一的兴趣，其他一切都不能干扰它。其他实际或知识方面的兴趣，那些小天分和不太重要的目标是很多人本性中无用的部分，消耗着人们的活力。温克尔曼从这些兴趣中脱身，将其抛掉。他年轻时一直以来的渴望不是模糊和空想的：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的意愿是什么。在它严格的界限里他的热情像熔岩一样燃烧。“你知道，”拉瓦特尔在谈及温克尔曼的面容时说道，“我认为热忱和冷漠绝不可能在一种性格中融合。如果说，曾经

有过这样融合的惊人例子，那就是在我们眼前的这张面孔里。”“童年时地位卑微，”歌德说，“少年时没有得到足够的教导，刚成年后断断续续、精力不够集中地学习，还有管理学校的负担！30岁之前从未得到过命运眷顾：但是一旦获得了足够的自由条件，他就完美、完全地呈现，达到了古代意义上的完满。”

But his hair is turning grey, and he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south. The Saxon court had become Roman Catholic, and the way to favour at Dresden was through Roman ecclesiastics. Probably the thought of a profession of the papal religion was not new to Winckelmann. At one time he had thought of begging his way to Rome, from cloister to cloister, under the pretence of a disposition to change his faith. In 1751, the papal nuncio, Archinto, was one of the visitors at Nöthenitz. He suggested Rome as the fitting stage for Winckelmann's accomplishments and held out the hope of a place in the Pope's library. Cardinal Passionei, charmed with Winckelmann's beautiful Greek writing, was ready to play the part of Maecenas, if the indispensable change were made. Winckelmann accepted the bribe, and visited the nuncio at Dresden. Unquiet still at the word "profession," not without a struggle, he joined the Roman Church, July the 11th, 1754.

但是当他的头发渐渐斑白，他却还没有到达南部。撒克逊宫廷已经皈依罗马天主教，想要在德累斯顿得势就要成为罗马教神职人员。可能温克尔曼曾经也考虑过在罗马教庭内谋一份职业。他曾经想过假称改变自己信仰，一家修道院一家修道院地乞讨到罗马。1751年，罗马教皇使节阿尔基诺和其他人一起访问了诺藤尼茨。他说罗马是适合温克尔曼发挥才艺的舞台，并给了他在教皇图书馆里谋得一个职位的希望。红衣主教帕西奥内很欣赏温克尔曼优美的希腊文作品，如果温克尔曼愿意改信天主教的话，主教会乐意资助他。温克尔曼接受了他

的资助，去拜访了在德累斯顿的教皇使节。虽然对“立誓信教”这个字眼感到不安，也并非没有内心的挣扎，但他还是在1754年7月11日加入了罗马教会。

Goethe boldly pleads that Winckelmann was a pagan, that the landmarks of Christendom meant nothing to him. It is clear that he intended to deceive no one by his disguise; fears of the inquisition are sometimes visible during his life in Rome; he entered Rome notoriously with the works of Voltaire in his possession; the thought of what Count Bünau might be thinking of him seems to have been his greatest difficulty. On the other hand, he may have had a sense of a certain antique and as it were pagan grandeur in the Roman Catholic religion. Turning from the crabbed Protestantism, which had been the ennui of his youth, he might reflect that while Rome had reconciled itself to the Renaissance, the Protestant principle in art had cut off Germany from the supreme tradition of beauty. And yet to that transparent nature, with its simplicity as of the earlier world, the loss of absolute sincerity must have been a real loss. Goethe understands that Winckelmann had made this sacrifice. Yet at the bar of the highest criticism, perhaps, Winckelmann may be absolved. The insincerity of his religious profession was only one incident of a culture in which the moral instinct, like the religious or political, was merged in the artistic. But then the artistic interest was that, by desperate faithfulness to which Winckelmann was saved from the mediocrity, which, breaking through no bounds, moves ever in a bloodless routine, and misses its one chance in the life of the spirit and the intellect. There have been instances of culture developed by every high motive in turn, and yet intense at every point; and the aim of our culture should be to attain not only as intense but as complete a life as possible. But often the higher life is only possible at all, on condition of the selection of that in

which one's motive is native and strong; and this selection involves the renunciation of a crown reserved for others. Which is better? — to lay open a new sense, to initiate a new organ for the human spirit, or to cultivate many types of perfection up to a point which leaves us still beyond the range of their transforming power? Savonarola is one type of success; Winckelmann is another; criticism can reject neither, because each is true to itself. Winckelmann himself explains the motive of his life when he says, "It will be my highest reward, if posterity acknowledges that I have written worthily."

歌德勇敢地辩解，称温克尔曼是个异教徒，基督教世界的界标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显然，他的伪装不是为了欺骗任何人；在罗马生活时他对宗教法庭的恐惧有时是很明显的；他去罗马时带着伏尔泰的作品，这让他名声蒙羞；担心比瑙伯爵此时对他可能有的看法似乎是他最大的难题。另一方面，他可能一直有某种古典的气质，而这种气质在罗马天主教里好像有一种异教的庄严。从他年轻时候就已厌倦了的晦涩难解的新教中回过头来，他可能想到，在罗马已经接受了文艺复兴的时候，艺术领域的新教原则却已经把德国和最重要的美学传统割裂开了。然而对于那种有着早期世界一般的朴素的透明本质来说，失去绝对的真诚一定已经成为真正的损失了。歌德认为温克尔曼作出了这样的牺牲。然而温克尔曼依然可能会被最高水平的文艺批评所赦免。他对宗教职业不忠仅仅是在一种文化里发生的一件小事情，在这里道德直觉，连同宗教和政治直觉，被淹没在了艺术直觉之中。但那时温克尔曼正是因为对艺术趣味的绝对忠诚而免于平庸，平庸的人不会越雷池一步，只是在一种毫无生气的惯例中周旋，错失了在精神和理性生活中的唯一机会。每次交替出现的强烈动机都会促进文化进步，而且每一次都很强烈，这样的例子一直很多；而我们文化的目标应该是追求尽可能强烈的、也是尽可能完整的生活。但是通常是这样，只有在做出含有单纯和强烈动机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包含放弃为别人预留的皇冠时，这种高层次的生活才会成为可能。哪一种更好

呢？是打开一种新知，为人类精神开启一种新的感官，还是培养出多种类型的完美的典范，这种完美，我们仍然被排除在它们的转化力量能触及到的范围之外？萨伏那洛拉是一种成功，温克尔曼是另一种成功。批评界不能否定其中任何一个，因为两种成功对自身来说都是真实的。温克尔曼自己解释了他生活的动力，他说，“如果后世承认我的所著有所价值，那将是对我最大的奖赏。”

For a time he remained at Dresden. There his first book appeared, Thoughts on the Imitation of Greek Works of Art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Full of obscurities as it was, obscurities which baffled, but did not offend Goethe when he first turned to art-criticism, its purpose was direct—an appeal from the artificial, classicism of the day to the study of the antique. The book was well received, and a pension supplied through the king's confessor. In September 1755 he started for Rome, in the company of a young Jesuit. He was introduced to Raphael Mengs, a painter then of note, and found a home near him, in the artists' quarter, in a place where he could "overlook, far and wide, the eternal city." At first he was perplexed with the sense of being a stranger on what was to him, spiritually, native soil. "Unhappily," he cries in French, often selected by him as the vehicle of strong feeling, "I am one of those whom the Greeks call ὀψιμαθεῖς. —I have come into the world and into Italy too late."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fterwards, Goethe also, after many aspirtions and severe preparation of mind, visited Italy. In early manhood, just as he, too, was finding Greek art, the rumour of that true artist's life of Winckelmann in Italy had strongly moved him. At Rome, spending a whole year drawing from the antique, in preparation for Iphigenie, he finds the stimulus of Winckelmann's memory ever active. Winckelmann's Roman life was simple, primeval, Greek. His delicate constitution per-mitted him the use only of bread and wine. Condemned by many as a renegade, he had

no desire for places of honour, but only to see his merits acknowledged, and existence assured to him. He was simple without being niggardly; he desired to be neither poor nor rich.

他在德累斯顿暂时呆了一阵，在这里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希腊绘画雕塑沉思录》。全书充满了晦涩之辞，当歌德最初转向艺术批评时这种晦涩令他感到困惑，但并没有让他不悦。它的目的直接—呼吁从当时虚伪的古典主义里走出来，进行古代作品研究。这本书受到广泛欢迎，他也从国王的忏悔神父那里得到了一笔养老金。1755年9月，他在一个年轻耶稣会士的陪伴下出发去罗马。他被介绍给一位当时知名的画家拉斐尔·门斯，并在画家附近的艺术家聚居区找到了住处，在那里他可以“放眼俯瞰这个不朽的城市”。一开始他不知所措，觉得自己在这块对他而言算是精神故土的土地上成为了陌生人。“不幸的很，”他用法语呼喊——法语是他特意选择来表达强烈感情的。“我是被希腊人称为迟来者的那种人—我来到世界，来到意大利太晚了。”30多年以后，歌德在历经渴求、在心灵上做了很多严肃准备后也去了意大利。歌德和他当年一样，处于青年时期，正在发掘希腊艺术，关于温克尔曼在意大利时期真正艺术家生活的传闻极大地鼓舞了他。他在罗马花了一整年时间从古代作品中汲取养分，为《伊菲革涅亚》做准备。他发现对温克尔曼记忆的刺激因素一直是活跃的。温克尔曼的罗马生活是简单的、原始的、希腊式的。他体质纤弱，只能食用面包和葡萄酒。他被很多人责难为叛教者，所以并无奢望获得名誉，只是希望看到自己的价值被认可，希望能够确定自己的存在。他很朴素却不吝啬，希望自己不贫穷也不富有。

Winckelmann’s first years in Rome present all the elements of an intellectual situation of the highest interest. The beating of the soul against its bars, the sombre aspect, the alien traditions, the still barbarous literature of Germany, are afar off; before him are adequate conditions of culture, the sacred soil itself, the first tokens

of the advent of the new German literature, with its broad horizons, its boundless intellectual promise. Dante, passing from the darkness of the Inferno, is filled with a sharp and joyful sense of light, which makes him deal with it, in the opening of the Purgatorio, in a wonderfully touching and penetrative way. Hellenism, which is the principle pre-eminently of intellectual light (our modern culture may have more colour, the medieval spirit greater heat and profundity, but Hellenism is pre-eminent for light), has always been most effectively conceived by those who have crept into it out of an intellectual world in which the sombre elements predominate. So it had been in the ages of the Renaissance. This repression, removed at last, gave force and glow to Winckelmann's native affinity to the Hellenic spirit. "There had been known before him," says Madame de Staël, "learned men who might be consulted like books; but no one had, if I may say so, made himself a pagan for the purpose of penetrating antiquity." "One is always a poor executant of conceptions not one's own." —On exécute mal ce qu' on n'a pas conçu soi-même (Words of Charlotte Corday before the Convention.)—are true in their measure of every genuine enthusiasm. Enthusiasm,—that, in the broad Platonic sense of the Phaedrus, was the secret of his divinatory power over the Hellenic world. This enthusiasm, dependent as it is to a great degree on bodily temperament, has a power of re-enforcing the purer emotions of the intellect with an almost physical excitement. That his affinity with Hellenism was not merely intellectual, that the subtler threads of temperament were inwoven in it, is proved by his romantic, fervent friendships with young men. He has known, he says, many young men more beautiful than Guido's archangel. These friendships, bringing him into contact with the pride of human form, and staining the thoughts with its bloom, perfected his reconciliation to the spirit of Greek sculpture. A letter on taste addressed from Rome to a young nobleman, Friedrich von Berg, is the record of such a

friendship.

温克尔曼在罗马的最初几年里表现出具备最高趣味的理性状态所包含的所有因素。心灵为冲破束缚而颤动，那阴沉的容貌、异国的传统和仍旧荒蛮的德国文学已经远去；摆在他眼前的是丰富的文化条件、神圣的土壤本身、新德国文学出现时最初的先兆及其广阔的前景和无限的理性前途。但丁从《地狱》的黑暗中走来，带着强烈的、令人欢欣的光明感，这种感觉使他在《炼狱》开头以一种非凡的笔触和深刻的方式将它处理得很完美。希腊风格是智慧之光的主要原则（我们当代的文化可能更加斑斓多彩，中世纪的精神更为炽热而深刻，但是希腊风格在追求光明方面是超群的），总是能被那些从一个严肃元素占主导的理性社会中悄悄走进它的人们最有效地理解。所以它曾出现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里。这种最后被移除了的压抑给温克尔曼对希腊精神的天生亲合力以力量和激情。“在他之前，”斯塔尔夫人这样说，“就曾有可以被人们当作书籍来请教的博学之人；但是没有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像他一样为了研究古代作品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异教徒。”“人们在执行不属于自己的想法时，表现总是比较糟糕。”（夏洛特·科黛在国民会议之前所说。——作者注）这在衡量每一份真正的热情时都是正确的—热情，从《斐多篇》广泛的柏拉图式意义来讲，是他对希腊世界之预言能力的秘密。这种热情很大程度上依赖一种肉体上的性情，具有一种用近乎肉体的兴奋来加强更为纯粹的理性情绪的能力。他和希腊精神的亲近不只是理性上的，那种更为敏感的性情之线被编织进来，这可以用他和年轻人浪漫而热诚的友谊来证明。他说自己认识很多比吉多的天使长还有魅力的年轻人。这些友谊使他接触到人类形体的精华，用它的繁盛给思想着色，使他和希腊雕塑精神的融合达到完美。从罗马寄出，写给年轻的贵族弗里德里希·冯·伯格的一封关于品位的信，就记录了这样一种友谊。

“I shall excuse my delay,” he begins, “in fulfilling my promise of an essay on the taste for beauty in works of art, in the words of

Pindar7. He says to Agesidamus, a youth of Locri—ι’δε’α ιτεκαλόν, ὥρα ι τε κεκραμ`ενον—whom he had kept waiting for an intended ode, that a debt paid with usury is the end of reproach. This may win your good-nature on behalf of my present essay, which has turned out far more detailed and circumstantial than I had at first intended.

“我要为自己的延误表示谦意，”他这样开始，“我没有兑现承诺，写一篇关于艺术作品中，用品达的话来说，对美的品位的论文。洛克里斯有一位叫阿热西达母斯的青年，品达曾让这个青年为了一首他想要的颂诗一直等待。品达对他说，为债务付出高额利息将平息责备。我现在的这篇随笔可能会博得你的欢欣，因为它远比我一开始计划的多出很多细节。

“It is from yourself that the subject is taken. Our intercourse has been short, too short both for you and me; but the first time I saw you, the affinity of our spirits was revealed to me: your culture proved that my hope was not groundless; and I found in a beautiful body a soul created for nobleness, gifted with the sense of beauty. My parting from you was, therefore, one of the most painful in my life; and that this feeling continues our common friend is witness, for your separation from me leaves me no hope of seeing you again. Let this essay be a memorial of our friendship, which, on my side, is free from every selfish motive, and ever remains subject and dedicate to yourself alone.”

“主题是从你身上获得的。我们结交的时间不长，对我们两个来讲都很短暂；但是第一次看到你，我就知道我们两个的精神息息相通：你的修养证明我的希望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在一个美丽的身体里

发现了一个为高贵而生、天生充盈着对美的感觉的灵魂。因此，离开你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事情之一。这种感觉还在继续，我们共同的朋友能够证明。因为你的离开让我感觉没有希望再见到你。这篇随笔将会是我们友谊的纪念，对我而言和任何自私的动机无关，它永远是凭你处置、献给你一个人的。”

The following passage is characteristic—

下面的一段很有特点：

As it is confessedly the beauty of man which is to be conceived under one general idea, so I have noticed that those who are observant of beauty only in women, and are moved little or not at all by the beauty of men, seldom have an impartial, vital, inborn instinct for beauty in art. To such persons the beauty of Greek art will ever seem wanting, because its supreme beauty is rather male than female. But the beauty of art demands a higher sensibility than the beauty of nature, because the beauty of art, like tears shed at a play, gives no pain, is without life, and must be awakened and repaired by culture. Now, as the spirit of culture is much more ardent in youth than in manhood, the instinct of which I am speaking must be exercised and directed to what is beautiful, before that age is reached, at which one would be afraid to confess that one had no taste for it.”

“众所公认，人的美应该是在同一个普遍观念下形成。所以我注意到，那些只关注女性美、而几乎不被或根本从未被男性美打动的人，很少能对艺术之美有一种不偏不倚、生机勃勃和与生俱来的直

觉。对这样的人而言，希腊艺术的美永远是欠缺的，因为它的至上之美是男性的而非女性的。但是艺术美要求比自然美更高的敏感性，因为艺术美像戏剧里的眼泪，不会带来痛苦也没有生命，必须通过文化将其唤醒和修复。此时，因为青年人的文化精神比成年人更为热切，所以在到达害怕承认对此没有品位的年纪之前，我所说的直觉必须被运用和投入到美的事物上面。”

Certainly, of that beauty of living form which regulated Winckelmann’s friendships, it could not be said that it gave no pain. One notable friendship, the fortune of which we may trace through his letters, begins with an antique, chivalrous letter in French, and ends noisily in a burst of angry f ire. Far from reaching the quietism, the bland indifference of art, such attachments are nevertheless more susceptible than any others of equal strength of a purely intellectual culture. Of passion, of physical excitement, they contain only just so much as stimulates the eye to the finest delicacies of colour and form. These friendships, often the caprices of a moment, make Winckelmann’s letters, with their troubled colouring, an instructive but bizarre addition to the History of Art, that shrine of grave and mellow light around the mute Olympian family. The impression which Winckelmann’s literary life conveyed to those about him was that of excitement, intuition, inspiration of general principles. The quick, susceptible enthusiast, betraying his temperament even in appearance, by his olive complexion, his deep-seated, piercing eyes, his rapid movements, apprehended the subtlest principles of the Hellenic manner, not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but by instinct or touch. A German biographer of Winckelmann has compared him to Columbus. That is not the aptest of comparisons; but it reminds one of a passage in which Edgar Quinet describes the great discoverer’s famous voyage. His science was often at fault; but he had a way of estimating at once

the slightest indication of land, in a floating weed or passing bird; he seemed actually to come nearer to nature than other men. And that world in which others had moved with so much embarrassment, seems to call out in Winckelmann new senses fitted to deal with it. He is in touch with it; it penetrates him, and becomes part of his temperament. He remodels his writings with constant renewal of insight; he catches the thread of a whole sequence of laws in some hollowing of the hand, or dividing of the hair; he seems to realise that fancy of the reminiscence of a forgotten knowledge hidden for a time in the mind itself; as if the mind of one, lover and philosopher at once in some phase of pre-existence—φιλοσοφήσας πότε μέτ᾽ ἔρωτος—fallen into a new cycle, were beginning its intellectual career over again, yet with a certain power of anticipating its results. So comes the truth of Goethe's judgments on his works; they are a life, a living thing, designed for those who are alive—ein Lebendiges für die Leben digen geschrieben, ein Leben selbst.

当然，我们不能说掌控了温克尔曼友情的活生生的美没有给他造成任何痛苦。我们可以从他的信件中寻到一段著名友谊的命运的蛛丝马迹，这段关系以一封古雅的、大献殷勤的法语信开始，却在怒火爆发中吵闹地终结。虽然远没有到达清静无为这种艺术上的温和的中立，然而这种依恋比其他纯粹只是知识修养上的势均力敌者更敏感。他们具备的热情、肉体的兴奋仅仅是颜色和外形的最精妙之处对眼睛的刺激。这些时常是一时任性的友谊，使温克尔曼的书信还有它们杂乱的色彩成为《艺术史》这个环绕着沉默的奥林匹亚家族的散发着庄严而柔美之光的神殿——有启发性但却奇异的注脚。温克尔曼的文学生活给周围的人留下的印象是对普遍原则的兴奋、直觉和灵感。这个敏捷、易受影响的狂热者的外表甚至也暴露了他的性情，比如他橄榄色的面庞、他深陷而敏锐的双眼以及他敏捷的动作。他并非通过理解，而是通过直觉或接触感悟希腊风格里最精妙的原则。温克尔曼的

一位德国传记作家曾把他和哥伦布作比较。虽然这比较不是最恰当的，但是它让人想起埃德加·基内描述这位伟大探索者著名旅程的一篇文章。哥伦布的知识常常出错误，但是他有一种根据最细微的迹象，比如漂浮的杂草或天空的飞鸟发现陆地的方法。他似乎比其他人更能亲近自然。那个令其他人在其中艰难前行的世界，好像在温克尔曼心中唤起了适合探究它的新感觉。他接触到它，它渗透进他，成为他性情的一部分。温克尔曼用持续更新的洞察力来修改自己的著作。他从手的镂空方式、亦或头发的疏理方式中去捕捉那一整套法则的线索。他似乎实现了恢复头脑中隐藏了一段时间、被遗忘知识的幻想。好像一个人的思维，作为爱人和哲学家一同处于某个存在的前世，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带着某种能够预测结果的力量正在重新开始它的理性生涯。这样便出现了歌德对他作品的正确评断，认为它们是一种生命，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是为那些活着的人而设计的。

In 1758 Cardinal Albani, who had formed in his Roman villa a precious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became Winckelmann's patron. Pompeii had just opened its treasures; Winckelmann gathered its first fruits. But his plan of a visit to Greece remained unfulfilled. From his first arrival in Rome he had kept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ever in view. All his other writings were a preparation for that. It appeared, finally, in 1764; but even after its publication Winckelmann was still employed in perfecting it. It is since his time that many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xamples of Greek art have been submitted to criticism. He had seen little or nothing of what we ascribe to the age of Pheidias; and his conception of Greek art tends, therefore, to put the mere elegance of the imperial society of ancient Rome in place of the severe and chastened grace of the palaestra. For the most part he had to penetrate to Greek art through copies, imitations, and later Roman art itself; and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is turbid medium has left in Winckelmann's actual results much that a more privileged criticism can correct.

1758年，在自己罗马乡间别墅里收集了许多珍贵文物的红衣主教阿尔巴尼成为温克尔曼的赞助人。庞贝城的宝库刚刚开启，温克尔曼收集了它最初的果实。但是他访问希腊的计划仍没有实现。从刚到罗马开始，他就一直考虑创作《古代艺术史》，其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其准备工作。最终这部著作于1764年问世，但是出版之后，温克尔曼仍一直受雇对它进行完善。就是从他那个时代开始，大多数希腊艺术里最重要的作品开始接受批判。他几乎未见到过我们归为菲迪亚斯时期的作品，因此他关于希腊艺术的概念倾向于用单纯的古罗马帝国的高雅来替代古罗马体育场严肃和精炼的雅致。多数时候他只能从复制品、模仿品和之后的罗马艺术本身来洞悉希腊艺术，所以这种混乱的媒介在他作品里留下了实在的结果，它们很多应该是更为权威的批判才能指正，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了。

He had been twelve years in Rome. Admiring Ger many had made many calls to him. At last, in 1768, he set out to revisit the country of his birth; and as he left Rome, a strange, inverted home-sickness, a strange reluctance to leave it at all, came over him. He reached Vienna. There he was loaded with honours and presents: other cities were awaiting him. Goethe, then nineteen years old, studying art at Leipsic, was expecting his coming, with that wistful eagerness which marked his youth, when the news of Winckelmann's murder arrived. All his "weariness of the North" had revived with double force. He left Vienna, intending to hasten back to Rome, and at Trieste a delay of a few days occurred. With characteristic openness, Winckelmann had confided his plans to a fellow-traveller, a man named Arcangeli, and had shown him the gold medals received at Vienna. Arcangeli's avarice was aroused. One morning he entered Winckelmann's room, under pretence of taking leave. Winckelmann was then writing "memoranda for the future editor of the History of Art," still seeking the perfection of his

great work. Arcangeli begged to see the medals once more. As Winckelmann stooped down to take them from the chest, a cord was thrown round his neck. Some time afterwards, a child with whose companionship Winckelmann had beguiled his delay, knocked at the door, and receiving no answer, gave the alarm. Winckelmann was found dangerously wound, and died a few hours later, after receiving the last sacraments. It seemed as if the gods, in reward of his devotion to them, had given him a death which, for its swiftness and its opportunity, he might well have desired. “He has,” says Goethe, “the advantage of figuring in the memory of posterity, as one eternally able and strong; for the image in which one leaves the world is that in which one moves among the shadows.” Yet, perhaps, it is not fanciful to regret that his proposed meeting with Goethe never took place. Goethe, then in all the pregnancy of his wonderful youth, still unruffled by the “stress and storm” of his earlier manhood, was awaiting Winckelmann with a curiosity of the worthiest kind. As it was, Winckelmann became to him something like what Virgil was to Dante. And Winckelmann, with his fiery friendships, had reached that age and that period of culture at which emotions hitherto fitful, sometimes concentrate themselves in a vital, unchangeable relation ship. German literary history seems to have lost the chance of one of those famous friendships, the very tradition of which becomes a stimulus to culture, and exercises an imperishable influence.

他在罗马居住了12年，崇敬他的德国曾多次召唤他回去。1768年，他最终启程重返自己出生的国家。当他离开罗马时，一种奇怪的相反的思乡之情——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想离开的情绪突然袭来。他到达维也纳，在那里获得了很多荣誉和奖赏。其他的城市还在等待他到来。歌德当时19岁，在莱比锡学习艺术，带着一种年青人特有的热情期盼着他到来，此时传来了温克尔曼被谋杀的消息。温克尔曼所有

的“对北方的厌倦”更加强烈地复苏了。他离开了维也纳，打算迅速赶回罗马，在的里雅斯特他耽搁了几天。性格开朗的温克尔曼把他的计划告诉给一个叫阿尔坎杰利的旅伴，还把自己在维也纳得到的金质勋章展示给他，这激起了阿尔坎杰利内心的贪欲。一个早上他进入温克尔曼的房间，假装说要离开。温克尔曼当时在写“给《艺术史》未来编者的备忘录”，还在尽力完善他的伟大作品。阿尔坎杰利央求再看一眼勋章，当温克尔曼弯腰去从盒子里把它们取出来时，一条绳索勒住了他的脖子。过了一会儿，陪伴温克尔曼愉快地消磨这段耽搁的日子的孩子来敲他的门，但是没有人回答，于是他报了警。温克尔曼被发现受了致命伤，几小时后在接受了最后的圣礼之后便死去了。这好像是众神为了回报他对它们的奉献，让他迅速地、并在恰当的时机里死去，这可能也是他所期望的。“他，”歌德说，“有作为一个永远才能出众的强大人物存在于后世子孙记忆中的优势，因为一个人留给世界的形象也是他变成灵魂后的形象。”然而，人们可能对他和歌德没有实现预期的见面感到遗憾也是可以理解的。歌德当时风华正茂，还未受到他成年之初的“狂飙运动”影响，他正怀着最大的好奇心等待着温克尔曼的到来。事实上，温克尔曼之于他就像维吉尔之于但丁。而温克尔曼带着他炽烈的友情，已经到达了具有这样一种修养的年纪：情绪迄今为止仍不稳定，有时还把情绪集中于一种重大而不可改变的关系里。德国文学史似乎已经失去了其中一个获得这种伟大友谊的机会，这种友谊的传统能刺激文化发展，发挥着一种不朽的影响力。

In one of the frescoes of the Vatican, Raphael has commemorated the tradition of the Catholic religion. Against a space of tranquil sky, broken in upon by the beatific vision are ranged the great personages of Christian history, with the Sacrament in the midst. Another fresco of Raphael in the same apartment presents a very different company, Dante alone appearing in both. Surrounded by the muses of Greek mythology, under a thicket of laurel, sits Apollo, with the sources of Castalia at his feet. On either side are grouped those on whom the spirit of

Apollo descended, the classical and Renaissance poets, to whom the waters of Castalia come down, a river making glad this other “city of God.” In this fresco it is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the orthodoxy of taste, that Raphael commemorates. Winckelmann’s intellectual history authenticates the claims of this tradition in human culture. In the countries where that tradition arose, where it still lurked about its own artistic relics, and changes of language had not broken its continuity, national pride might sometimes light up anew an enthusiasm for it. Aliens might imitate that enthusiasm, and classicism become from time to time an intellectual fashion. But Winckelmann was not further removed by language, than by local aspects and associations, from those vestiges of the classical spirit; and he lived at a time when, in Germany, classical studies were out of favour. Yet, remote in time and place, he feels after the Hellenic world, divines those channels of ancient art, in which its life still circulates, and, like Styles, the half-barbarous yet Hellenising king, in the beautiful story of Herodotus, is irresistibly attracted by it. This testimony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Hellenic tradition, its fitness to satisfy some vital requirement of the intellect, which Winckelmann contributes as a solitary man of genius, is offered also by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ind. The spiritual forces of the past, which have prompted and informed the culture of a succeeding age, live, in deed, within that culture, but with an absorbed, under ground life. The Hellenic element alone has not been so absorbed, or content with this underground life; from time to time it has started to the surface; culture has been drawn back to its sources to be clarified and corrected. Hellenism is not merely an absorbed element in our intellectual life; it is a conscious tradition in it.

在梵蒂冈的一幅壁画中，拉斐尔纪念了天主教的传统。一片安静的天空里突然显现出一片欢快的景象：基督教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排列

开来，围在圣餐周围。同一殿堂中另外一幅拉斐尔的壁画表现了一组完全不同的人物，只有但丁一个人在两幅作品中出现。在希腊神话里缪斯们的包围下，阿波罗坐在月桂树丛下，卡斯塔利亚泉的源头在他脚下。两边聚集了继承阿波罗精神的古典诗人和文艺复兴诗人，卡斯塔利亚泉泉水流到他们脚下，变成一条令这另一座“神之城”快乐的小河。在这幅壁画里，拉斐尔纪念的是古典传统和正统品味。温克尔曼的理性史验证了这种传统在人类文化领域的存在。在那些这一传统已然诞生、或者仍潜藏于自己艺术遗产的国家中，语言的变化并未打破它的连续性，民族自豪感有时可能重新点燃对它的热情。外邦人也许会仿效这种热情，古典风范时不时地成为理性潮流。但是，在这些古典精神的残存物中，语言对温克尔曼的触动，还没有当地风貌和关联对他的影响大。在他生活的时代，古典研究在德国并不受欢迎。然而，尽管时空相隔遥远，他仍能感受希腊精神的世界，预测那些古代艺术的路径。在那里它的生命还在循环，像司库列斯这个希罗多德美丽故事里半野蛮的希腊化君主一样，他仍然无法抗拒地被它吸引。这种对希腊传统权威性的陈述以及它对理性某种至关重要要求的满足，是温克尔曼作为一个孤独天才的贡献，它们同样也可以由思维的一般历史来实现。这种历史的精神力量，促进和鼓舞了后来时代的文化，它的确和那种文化共存着，但是以一种融合的方式存在于生活深处罢了。希腊元素本身没有如此融合进，或是满足于存在生活深处，它时不时地浮现到表面上来。文化被追溯到它的源头，以得到阐明和修正。希腊风格不仅是我们理性生活的一种专注的元素，它还是其中一种有意识的传统。

Again, individual genius works ever under conditions of time and place: its products are coloured by the varying aspects of nature, and type of human form; and out ward manners of life. There is thus an element of change in art; criticism must never for a moment forget that “the artist is the child of his time.” But besides these conditions of time and place, and independent of them, there is also an element of permanence, a standard of taste, which genius

confesses. This standard is maintained in a purely intellectual tradition. It acts upon the artist, not as one of the influences of his own age, but through those artistic products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which first excited, while they directed into a particular channel, his sense of beauty. The supreme artistic products of succeeding generations thus form a series of elevated points, taking each from each the reflection of a strange light, the source of which is not in the atmosphere around and above them, but in a stage of society remote from ours. The standard of taste, then, was fixed in Greece, at a definite historical period. A tradition for all succeeding generations, it originates in a spontaneous growth out of the influences of Greek society. What wer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is ideal, this standard of artistic orthodoxy, was generated? How was Greece enabled to force its thought upon Europe?

另外，个人天赋永远都是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它的作品被自然的各种形态、人类形态类型和外在的生活模式渲染。因此，在艺术中有一种变化的元素，批判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艺术家是时代之子”。但是除了这些时空条件，还有独立在它们之外、被天才坦白承认的永恒元素，即一种品位标准。这种标准存在于一种纯粹的理性传统中，它不是作为艺术家自己所处时代的一种影响，而是通过那些前代的艺术作品作用于艺术家身上，当这些艺术作品指向一个特殊的通道之时，首先激发了他的美感。所以随后各代最高层次的艺术作品形成一系列的不断上升的点，每一点都是对一种陌生光线的反射，这束光不是来自于他们周围和上面的大气，而是来自一个与我们的时代相距甚远的社会阶段。品位的标准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在希腊确定下来。留给后世各代的传统，是在希腊社会的影响下自发成长起来的。这种理想、这种艺术正统思想的标准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呢？希腊是如何使它的思想作用于欧洲的？

Greek art, when we first catch sight of it, is entangled with Greek religion. We are accustomed to think of Greek religion as the religion of art and beauty, the religion of which the Olympian Zeus and the Athena Polias are the idols, the poems of Homer the sacred books. Thus Cardinal Newman speaks of “the classical polytheism which was gay and graceful, as was natural in a civilised age.” Yet such a view is only a partial one. In it the eye is fixed on the sharp, bright edge of high Hellenic culture, but loses sight of the sombre world across which it strikes. Greek religion, where we can observe it most distinctly, is at once a magnificent ritualistic system, and a cycle of poetical conceptions. Religions, as they grow by natural laws out of man’s life, are modified by whatever modifies his life. They brighten under a bright sky, they become liberal as the social range widens, they grow intense and shrill in the clefts of human life, where the spirit is narrow and confined, and the stars are visible at noonday; and a fine analysis of these differences is one of the gravest functions of religious criticism. Still, the broad foundation, in mere human nature, of all religions as they exist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is a universal pagan sentiment, a paganism which existed before the Greek religion, and has lingered far onward into the Christian world, ineradicable, like some persistent vegetable growth, because its seed is an element of the very soil out of which it springs.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希腊艺术时，它和希腊宗教纠缠交错在一起。我们已经习惯把希腊宗教看成是艺术和美的宗教，这一宗教崇拜奥林匹亚的宙斯和雅典娜波利阿斯、以荷马史诗为圣经。所以红衣主教纽曼说，“欢欣高雅的古典多神论在一个文明化的时代里是自然而然的。”然而这样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因为它只把目光投向高层次希腊文化睿智辉煌的锋芒上，但却没有看见受它全面冲击的阴暗世界。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希腊宗教既是一种宏伟的仪式体系，又是一

整套诗歌概念。正如宗教是按照自然法则从人类生活中发展而来的，它们也被改变人类生活的一切所改变。在明亮的天空下它们变得明亮，当社会范围拓宽时它们变得自由，在精神狭隘受限、黑白颠倒的人类生活缝隙中则会变得激烈尖锐。对这些差异做出详细分析是宗教批判最严肃的功能之一。尽管如此，所有为大众而存在的宗教在纯人类本性中的的广泛根基是一种普遍的异教情感。这种异教情感在希腊宗教之前就已存在，而且迂回地深入到基督教世界里去，根深蒂固地存在，像某种植物的持续生长，因为它的种子正是它赖以成长的土壤的一种成分。

This pagan sentiment measures the sadness with which the human mind is filled, whenever its thoughts wander far from what is here, and now. It is beset by notions of irresistible natural powers, for the most part ranged against man, but the secret also of his fortune, making the earth golden and the grape fiery for him. He makes gods in his own image, gods smiling and flower-crowned, or bleeding by some sad fatality, to console him by their wounds, never clos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t is with a rush of home-sickness that the thought of death presents itself. He would remain at home for ever on the earth if he could. As it loses its colour and the senses fail, he clings ever closer to it; but since the mouldering of bones and flesh must go on to the end, he is careful for charms and talismans which may chance to have some friendly power in them when the inevitable shipwreck comes. Such sentiment is a part of the eternal basis of all religions, modified indeed by changes of time and place, but indestructib1e, because its root is so deep in the earth of man’s nature. The breath of religious initiators passes over them; a few “rise up with wings as eagles,” but the broad level of religious life is not permanently changed. Religious progress, like all purely spiritual progress, is confined to a few. This sentiment attaches itself in the earliest times to certain

usages of patriarchal life, the kindling of fire, the washing of the body, the slaughter of the f lock, the gathering of harvest, holidays and dances. Here are the beginnings of a ritual, at first as occasional and unfixed as the sentiment which it expresses, but destined to become the permanent element of religious life. The usages of patriarchal life change; but this germ of ritual remains, promoted now with a consciously religious motive, losing its domestic character, and therefo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 explicable with each generation. Such pagan worship, in spite of local variations, essentially one, is an element in all religions. It is the anodyne which the religious principle, like one administering opiates to the incurable, has added to the law which makes life sombre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mankind.

每当它的思想远远地游离出此时此地时，这种异教情感就成了衡量填充人类心灵的悲伤的尺度。它被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的概念包围，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与人类相对立，但也是人类财富的秘密，它使土地变成金色，把葡萄也变得火红。人类以自己的形象创造诸神：或是头戴花冠，灿然微笑，亦或受到致命打击，悲伤流血。人类用它们的伤口来安慰自己，一代一代，这些伤口从未痊愈。死亡的想法是带着一股急切的思乡之情出现的。如果可以，人会永远呆在自己的家乡，呆在人世间。当死亡的观念褪去颜色、各种感觉也变得淡薄之时，人们会更加贴近死亡。但是骨肉的腐朽一定会继续，直到最终结束，所以人们又很留意护身的符咒，希望当无可避免的灾难发生时它们可能碰巧会有一些挽救之力。这种情感是所有宗教永恒根基的一部分，它们的确会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更改，但却不会被毁灭，因为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天性的土壤中。宗教创始者的气息对它们未加理会，它们中的少数“像鹰一样振翼腾空而去”。但是宗教生活的主要层面没有被永久改变。宗教发展和所有纯精神的发展一样，局限于小范围内。这种情感在最初时期附着于父系社会生活的某些习惯做法，比如点火、净身、宰羊、粮食收割、假日和舞蹈。宗教仪式便这样开始

了，最初和它传达的情感一样是偶然的，不固定的，但注定会成为宗教生活的永恒元素。父系社会的生活习惯在改变，但是仪式的雏形保留了下来。现在它随着一种自觉的宗教动机而发展，失去了其家族的特性，因此随着世代更迭变得越来越无法解释。这种异教崇拜尽管在各个地区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相同，是所有宗教必有的一种因素。它是宗教原则加诸于使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严肃犹豫的法则之上的镇痛剂，就像给无法治愈的病人使用鸦片一样。

More definite religious conceptions come from other sources, and fix themselves upon this ritual in various ways, changing it, and giving it new meanings. In Greece they were derived from mythology, itself not due to a religious source at all, but developing in the course of time into a body of religious conceptions, entirely human in form and character. To the unprogressive ritual element it brought these conceptions, it self—ἡπτεροῦ δύναμις, the power of the wing—an element of refinement, of ascension, with the promise of an end less destiny. While the ritual remains unchanged, the aesthetic element, only accidentally connected with it, expands with the freedom and mobility of the things of the intellect. Always, the fixed element is the religious observance; the fluid, unfixed element is the myth, the religious conception. This religion is itself pagan, and has in any broad view of it the pagan sadness. It does not at once, and for the majority, become the higher Hellenic religion. The country people, of course, cherish the unlovely idols of an earlier time, such as those which Pausanias found still devoutly preserved in Arcadia. Athenaeus tells the story of one who, coming to a temple of Latona, had expected to find some worthy presentment of the mother of Apollo, and laughed on seeing only a shapeless wooden figure. The wilder people have wilder gods, which, however, in Athens, or Corinth, or Lace- daemon, changing ever with the worshippers in whom they live and move and have their

being, borrow some thing of the lordliness and distinction of human nature there. Greek religion, too, has its mendicants, its purifications, its antinomian mysticism, its garments offered to the gods, its statues worn with kissing, its exaggerated superstitions for the vulgar only, its worship of sorrow, its addolorata, its mournful mysteries. Scarcely a wild or melancholy note of the medieval church but was anticipated by Greek polytheism! What should we have thought of the vertiginous prophetess at the very centre of Greek religion? The supreme Hellenic culture is a sharp edge of light across this gloom. The fiery, stupefying wine becomes in a happier climate clear and exhilarating. The Dorian8 worship of Apollo, rational, chastened, debonair, with his unbroken daylight, always opposed to the sad Chthonian divinities, is the aspiring element, by force and spring of which Greek religion sublimes itself. Out of Greek religion, under happy conditions, arises Greek art, to minister to human culture. It was the privilege of Greek religion to be able to transform itself into an artistic ideal.

更为明确的宗教概念来源于别处，它们以各种方式把自己固定在这种仪式上，改变它，并赋予它新的意义。在希腊，它们来源于本身和宗教渊源完全无关的神话，但后来神话在历史过程中发展成一种宗教概念的载体，完全具有人类的形体和性格。它给落后的宗教仪式的元素带来了这些概念，带来了它自己——飞翔的力量——这种文雅和升华的元素，它有着对无尽命运的希望。虽然宗教仪式保持不变，但是和它仅凭偶然联系在一起的美学元素与思维对象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一并得到了拓展。固定的元素总是宗教的仪式，流动不确定的元素则是神话，即宗教的概念。这种宗教观念本身就是异教，从任何宽泛的角度来说都有着异教的哀伤。这些宗教观念大多数没有一下子变成更高层次的希腊宗教。乡民们理所当然地珍爱着早期丑陋的崇拜对象，比如保萨尼阿斯发现的那些在阿卡狄亚仍然被虔诚地保留着的神。阿忒那奥斯讲过一个故事，有个人来到勒托的庙宇中，本以为能找到一

些有价值的阿波罗之母的雕像。结果他只看到一个不成形的木雕，因此大笑起来。未开化的人有着相对野性的神，但是在雅典或科林斯湾，或者古斯巴达，神灵总是永远随着他们赖以生活和迁移、并使自己有了存在的崇拜者的改变而改变，他们从人类本性那里借来一些贵族气和特性。希腊宗教也有自己的托钵僧、涤罪仪式、反律法的神秘主义、它奉献给诸神的长袍、它因亲吻而磨损的雕像、它那只为平民准备的夸张迷信和它对悲痛的崇拜、它的痛苦和它令人悲伤的神秘。但希腊多神论对中世纪宗教野蛮或忧郁的特征是多么地无所期待！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处于希腊宗教核心位置的令人眩晕的女先知呢？希腊文化的至高境界是一道穿过这阴暗的锐利的亮光。灼烈的让人感到昏昏沉沉的葡萄酒在好气候里变得清冽喜人。阿波罗充满理性、经历磨炼、温文尔雅，带着他不去的白昼，总是和悲伤的冥府之神相对立，多里安人对他的崇拜是一种积极的元素，希腊宗教通过它的力量和爆发升华了自我。在希腊宗教之外，在令人欣悦的状态下希腊艺术崛起并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能够把自己转化为一种艺术典范是希腊宗教的特权。

For the thoughts of the Greeks about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world generally, were ever in the happiest readiness to be transformed into objects for the senses. In this lies the main distinction, between Greek art and the mystical art of the Christian middle age, which is always struggling to express thoughts be yond itself. Take, for instance, a characteristic work of the middle age, Angelico's Coronation of the Virgin in the cloister of Saint Mark's at Florence. In some strange halo of a moon Jesus and the Virgin Mother are seated, clad in mystical white raiment, half shroud, half priestly linen. Jesus, with rosy nimbus and the long, pale hair—tanquam lana alba et tanquam nix—of the figure in the Apocalypse, with slender finger-tips is setting a crown of pearl on the head of Mary, who, corpse-like in her refinement, is bending forward to receive it, the light lying like snow upon her forehead. Certainly, it

cannot be said of Angelico's fresco that it throws into a sensible form our highest thoughts about man and his relation to the world; but it did not do this adequately even for Angelico. For him, all that is outward or sensible in his work—the hair like wool, the rosy nimbus, the crown of pearl—is only the symbol or type of a really inexpressible world, to which he wishes to direct the thoughts; he would have shrunk from the notion that what the eye apprehended was all. Such forms of art, then, are inadequate to the matter they clothe; they re main ever below its level. Something of this kind is true also of oriental art. As in the middle age from an exaggerated inwardness, so in the East from a vagueness, a want of definition, in thought, the matter presented to art is unmanageable, and the forms of sense struggle vainly with it. The many-headed gods of the East, the orientalised, many-breasted Diana of Ephesus, like An gelico's fresco, are at best overcharged symbols, a means of hinting at an idea which art cannot fitly or completely express, which still remains in the world of shadows.

而希腊人对于他们自己的看法以及对于他们与世界的关系的普遍看法，则永远是处于可以转化为感官对象的完全就绪的最佳状态。这构成了希腊艺术和中世纪基督教的神秘艺术的主要区别，后者一直在努力表达超越自己本身的思想。以中世纪的一件典型作品——收藏在佛罗伦萨圣马可教堂修道院里的安吉利科的《圣母加冠》为例。耶稣和圣母坐在月亮形状的奇异的光晕中，他们穿着半似裹尸布、半似教士亚麻衫的神秘白色衣服。基督是《启示录》中那种有着玫瑰红色光轮，蓄着长长的灰白头发，穿着雪白的白麻布圣衣的形象。他正用细长的指尖把一个珍珠皇冠戴在马利亚头上。她举止优雅却如同死尸，身体前倾来接受皇冠，如雪一般的光线洒在她的额头上。当然还不能说安吉利科的壁画把关于人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最高层次的思考融入了一种可感知的形式中，但是即使就安吉利科来说他在这点上做得也不到位。对他来说，他作品中所有外在的或者可感知的一切，比如羊

毛一样的头发、玫瑰色的光轮和珍珠皇冠都只是他想为思想指出的一个实际上无法被表达出来的世界的象征或者典型。他本来可以从“目光捕捉的就是一切”这样的概念中抽身离去。这种艺术形式对它们所要表达的内容而言是不足的，它们永远处在内容的水平之下。这类情况在东方艺术中也是实际存在的。像中世纪过分的内在化一样，东方在思维方面的模糊不清和对概念的需求，使得呈现给艺术的内容难以驾驭，感觉形式随之的挣扎也是徒劳无谓的。正如安吉利科壁画中的那样，东方多头的神，东方化的、有多个乳房的埃斐索斯的狄安娜，最多是负载过多的象征，是用来暗示一种艺术无法正确或完全表达的、仍处于灵魂世界的观点的方式。

But take a work of Greek art,—the Venus of Melos. That is in no sense a symbol, a suggestion, of anything beyond its own victorious fairness. The mind begins and ends with the finite image, yet loses no part of the spiritual motive. That motive is not lightly and loosely attached to the sensuous form, as its meaning to an allegory, but saturates and is identical with it. The Greek mind had advanced to a particular stage of self-reflexion, but was careful not to pass beyond it. In oriental thought there is a vague conception of life everywhere, but no true appreciation of itself by the mind, no knowledge of the distinction of man’s nature: in its consciousness of itself, humanity is still confused with the fantastic, indeterminate life of the animal and vegetable world. In Greek thought, on the other hand, the “lordship of the soul” is recognised; that lordship gives authority and divinity to human eyes and hands and feet; inanimate nature is thrown into the background. But just there Greek thought finds its happy limit; it has not yet be come too inward; the mind has not yet learned to boast its independence of the flesh; the spirit has not yet absorbed everything with its emotions, nor reflected its own colour everywhere. It has indeed committed itself to a train of reflexion which must end in defiance

of form, of all that is outward, in an exaggerated idealism. But that end is still distant: it has not yet plunged into the depths of religious mysticism.

但是以一件希腊艺术作品《米洛的维纳斯》为例，它绝不是对除了以自身制胜的美丽之外的任何东西的象征或暗示。思维随着有限的形象开始和结束，然而没有损失精神动机的任一部分。这种动机不像意义之于寓言那样，轻轻地、松散地附着在带来美感的形式上，而是充分渗透进它并和它完全一致。希腊精神已经发展到一个自我反思的特殊阶段，但它也警惕着，绝不超越这个阶段。在东方思维中，有一种对生活的模糊概念随处可见，但是却没有思维对它本身的真正理解，没有对人类本性的特质的认识。在它的自我意识中，人性仍然和动物世界及植物世界里虚幻模糊的生命混为一谈。而另一方面，希腊思维中“灵魂的统治”已经得到认可：这种统治赋予人类的双眼、双手和双脚以特权和神力，而毫无活力的自然被放到了次要位置。但是希腊思维正是在此发现了自己不算糟的局限性：它还没有变得过于内在，思维还没有学会夸耀自己相对于肉体的独立，精神既没有凭自己的好恶同化万物，也没有随处展现它的本色。它的确已把自己奉献给了一系列反思，这种反思须在一种夸大的理想主义中以对形式和外在的一切的蔑视中结束。但是这个终结点还很遥远，它还没有陷入宗教的神秘主义之中。

This ideal art, in which the thought does not outstrip or lie beyond the proper range of its sensible embodiment, could not have arisen out of a phase of life that was uncomely or poor. That delicate pause in Greek re flexion was joined, by some supreme good luck, to the perfect animal nature of the Greeks. Here are the two conditions of an artistic ideal. The influences which perfected the animal nature of the Greeks are part of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ideal” was evolved. Those “Mothers” who, in the second part

of Faust, mould and remould the typical forms that appear in human history, preside, at the beginning of Greek culture, over such a concourse of happy physical conditions as ever generates by natural laws some rare type of intellectual or spiritual life. That delicate air, “nimbly and sweetly recommending itself” to the senses, the finer aspects of nature, the finer lime and clay of the human form, and modelling of the dainty frame-work of the human countenance:—these are the good luck of the Greek when he enters upon life. Beauty becomes a distinction, like genius, or noble place.

在这种理想的艺术里，思想没有超越或超出自己感觉化身的适当范围，因此这种艺术不会是在一个简陋或是贫穷的生活阶段中产生。这种希腊反思的精妙停顿，非常幸运地揉进了希腊人完美的动物本性。这是艺术理想的两个条件。这些使希腊人动物本性达到完美的影响是“理想”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那些在《浮士德》第二部分出现的“圣母”们，一次次铸造了人类历史中出现的典型形象，她们在希腊文化初期主导了如此的一个快乐的身体形态的集合，这些形态是在自然法则作用下产生的一些理性的、亦或精神生活的稀有类型。那种美妙的氛围，“敏捷轻快地将自己推荐”给各种感觉—交付给了本性中更细腻的一面；交付给塑造人类形态的更精细的石灰和陶土;塑造人类面容的优美框架—这些是希腊人开始生活时就遇到的好运。美像天赋或高贵之处一样变成了一种特质。

“By no people,” says Winckelmann, “has beauty been so highly esteemed as by the Greeks. The priests of a youthful Jupiter at A Egae, of the Ismenian Apollo, and the priest who at Tanagra led the procession of Mercury, bearing a lamb upon his shoulders, were always youths to whom the prize of beauty had been awarded. The citizens of Egesta erected a monument to a certain Philip, who was not their fellow-citizen, but of Croton, for his distinguished beauty;

and the people made offerings at it. In an ancient song, ascribed to Simonides or Epicharmus, of four wishes, the first was health, the second beauty. And as beauty was so longed for and prized by the Greeks, every beautiful person sought to become known to the whole people by this distinction, and above all to approve himself to the artists because they awarded the prize; and this was for the artists an occasion for having supreme beauty ever before their eyes. Beauty even gave a right to fame; and we find in Greek histories the most beautiful people distinguished. Some were famous for the beauty of one single part of their form; as Demetrius Phalereus, for his beautiful eyebrows, was called Charito-blepharos. It seems even to have been thought that the procreation of beautiful children might be promoted by prizes. This is shown by the existence of contests for beauty, which in ancient times were established by Cypselus, King of Arcadia, by the river Alpheus; and, at the feast of Apollo of Philae, a prize was offered to the youths for the deftest kiss. This was decided by an umpire; as also at Megara, by the grave of Diodes. At Sparta, and at Lesbos, in the temple of Juno, and among the Parrhasii, there were contests for beauty among women. The general esteem for beauty went so far, that the Spartan women set up in their bed chambers a Nireus, a Narcissus, or a Hyacinth, that they might bear beautiful children."

温克尔曼说："没有人像希腊人那样高度尊重美。爱琴的年轻的朱庇特和伊兹美尼亚阿波罗的祭司们，还有在塔纳格拉给墨丘利神引路的肩膀上搭着一只小羊的祭司，总是些得到美的奖赏的年轻人。埃格斯塔的市民们为了某位菲利普的卓绝之美，竖立起一块纪念碑，而他并非是和他们同城的居民，而是克罗顿人。人们还在纪念碑那里献祭品。一首被认为是西摩尼得斯或埃庇卡摩斯作品的古老歌谣里吟唱了四个愿望，第一个是健康，第二个就是美丽。因为美受到希腊人如此的渴望和珍视，每一位拥有美貌者都企图让所有人了解自己的这种

特质，最重要的是获得艺术家们的认可，因为他们会颁发美的奖章。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将至高之美呈现在眼前的机会。美甚至给人获得名誉的权利。我们在希腊史书里发现，最美丽的人都是卓尔不凡的。有些人因为他们外表的某个单独的部分的美丽而著名，比如德米特里厄斯·法勒琉斯因他的眉毛而闻名，他也因此被称为“美眉公”。似乎人们甚至曾经想过，奖励可能促使妇女生出漂亮的孩子。选美比赛的存在证明了这一点。在古代，这种比赛由阿卡狄亚国王塞普瑟鲁斯在阿尔菲厄斯河边创立。在菲莱的阿波罗庆典活动中，接吻最熟练的青年们会得到奖赏：这由一位仲裁人定夺。在迈加拉也有类似的竞赛在狄奥克莱斯的坟墓旁举行。在斯巴达和莱斯沃斯岛、朱诺的神殿里和柏拉西人中都有女子的选美比赛。对美的普遍尊崇已达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斯巴达妇女会在她们的卧室里放置一株水仙花或是风信子，以期生出漂亮的孩子。

So, from a few stray antiquarianisms, a few faces cast up sharply from the waves, Winckelmann, as his manner was, divines the temperament of the antique world, and that in which it had delight. It has passed away with that distant age, and we may venture to dwell upon it. That sharpness and reality it has is the sharpness and reality of suddenly arrested life. The Greek system of gymnastics originated as part of a religious ritual. The worshipper was to recommend himself to the gods by becoming fleet and fair, white and red, like them. The beauty of the palaestra, and the beauty of the artist’s workshop, reacted on one another. The youth tried to rival his gods; and his increased beauty passed back into them. —“I take the gods to witness, I had rather have a fair body than a king’s crown” —Ομνυμι πάνταςθεοὺςμὴἐλέσθαι ἂν τήν Ββασιλέως ἀρχὴν ἀντὶ τοῦαλὸςεῖναι—that is the form in which one age of the world chose the higher life. —A perfect world, if the gods could have seemed for ever only fleet and fair, white and red! Let us not regret that this unperplexed youth of humanity, satisfied

with the vision of itself, passed, at the due moment, into a mournful maturity; for already the deep joy was in store for the spirit, of finding the ideal of that youth still red with life in the grave.

因此，从一些零碎的考古研究中，一些面孔从波涛中急剧地冲上岸来，温克尔曼从天性出发，推测了古代世界的特质，认为在那个世界中，人们是愉悦的。它和那个久远的时代一起已经离我们远去了，而我们可以尝试来仔细思考它。它所具有的锐利和逼真是被突然扼住的生活的锐利和逼真。希腊的体育体系是作为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出现的。朝拜者要通过变得和神一样敏捷优美、白皙红润来获得神的青睐。角力学校的美和艺术家画室的美互相作用。年轻人尝试和神明竞赛，而他持续增加的美丽又传递到神的身上。“我以诸神为证，我宁愿要一个美丽的身体而不是国王的王冠。”—那是世界的一个时代选择更高层次生活的形式。如果诸神能够永远看起来敏捷优美、白皙红润，这个世界该多么完美！人类的青年时期无忧无虑，满足于眼前的景象；而在适当的时候，青年时期将过渡到充满悲哀的成熟期。但不要为此而感到遗憾。因为深层次的快乐已经为精神储备，发现那青年时代的理想状态在坟墓中仍然鲜活。

It followed that the Greek ideal expressed itself pre eminently in sculpture. All art has a sensuous element, colour, form, sound—in poetry a dexterous recalling of these, together with the profound, joyful sensuousness of motion, and each of them may be a medium for the ideal: it is partly accident which in any individual case makes the born artist, poet, or painter rather than sculptor. But as the mind itself has had a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ne form of art, by the very limitations of its material, may be more adequate than another for the expression of anyone phase of that development. Different attitudes of the imagination have a native affinity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sensuous form, so that they combine together,

with completeness and ease. The arts may thus be ranged in a series, which corresponds to a series of developments in the human mind itself. Architecture, which begins in a practical need, can only express by vague hint or symbol the spirit or mind of the artist. He closes his sadness over him, or wanders in the perplexed intricacies of things, or projects his purpose from him clean-cut and sincere, or bares himself to the sun light. But these spiritualities, felt rather than seen, can but lurk about architectural form as volatile effects, to be gathered from it by reflexion. Their expression is, indeed, not really sensuous at all. As human form is not the subject with which it deals, architecture is the mode in which the artistic effort centres, when the thoughts of man concerning himself are still indistinct, when he is still little preoccupied with those harmonies, storms, victories, of the unseen and intellectual world, which, wrought out into the bodily form, give it an interest and significance communicable to it alone. The art of Egypt, with its supreme architectural effects, is, according to Hegel's beautiful comparison, a Memnon waiting for the day, the day of the Greek spirit, the humanistic spirit, with its power of speech.

随后希腊理想在雕塑中得到出色的表达。所有艺术都有愉悦感官的元素，比如色彩、形状和声音。诗歌是对所有这些元素的灵活再现，同时带着深刻、令人欢欣的动作快感，它们每个都可能成为实现这种理想的媒介。在每个个例中，部分是因为偶然因素更可能成就一个天生的艺术家，诗人或画家，而不是雕塑家。但是因为思想本身也有一种历史发展，一种艺术形式，受到它物质材料的限制，可能比其他艺术形式更能充分表达那种发展的任何阶段。想象力的不同态度天生就与不同类型的感官形式息息相通，所以它们完完全全、轻而易举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艺术可以被排出和人类思想自身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序列。为了满足实际需求而产生的建筑只能通过模糊的暗示或者象征来表现艺术家的精神或思想。他把自己的忧伤掩藏，或是在事物

令人困惑的错杂关系中徘徊，亦或把自己的目标鲜明诚挚地表达出来，再或者把自己暴露在日光下。但是这些被感知而非亲眼所见的精神因素，只能作为不稳定的效果隐含在建筑形式里，通过反思才能捕捉得到。它们的表达确实根本不能算是带来了美感。因为人类形体并非建筑所涉及的主题，当人类关于自身的想法仍朦胧不清，当不可见的理性世界努力使自身具体化，赋予它一种唯有它可以传达的趣味和意义，而人类还不够关注这种理性世界里那些平静、风暴或胜利时，建筑采用以艺术效果为中心的模式。埃及艺术中建筑取得了至高的成就，根据黑格尔的优美比喻，埃及艺术是一位等待白昼的门农，他等待着希腊精神这种有着雄辩力量的人文精神的白昼来临。

Again, painting, music, and poetry, with their endless power of complexity, are the special arts of the romantic and modern ages. Into these, with the utmost attenuation of detail, may be translated every delicacy of thought and feeling, incidental to a consciousness brooding with delight over itself. Through their gradations of shade, their exquisite intervals, they project in an external form that which is most inward in passion or sentiment.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those romantic arts of painting, music, and poetry, comes sculpture, which, unlike architecture, deals immediately with man, while it contrasts with the romantic arts because it is not self-analytical. It has to do more exclusively than any other art with the human form, itself one entire medium of spiritual expression, trembling, blushing, melting into dew, with inward excitement. That spirituality which only lurks about architecture as a volatile effect, in sculpture takes up the whole given material, and penetrates it with an imaginative motive; and at first sight sculpture, with its solidity of form, seems a thing more real and full than the faint, abstract world of poetry or painting. Still the fact is the reverse. Discourse and action show man as he is, more directly than the play of the muscles and the moulding of the flesh; and over these poetry

has command. Painting, by the flushing of colour in the face and dilatation of light in the eye—music, by its subtle range of tones—can refine most delicately upon a single moment of passion, unravelling its subtlest threads.

绘画、音乐、诗歌以其复杂性所赋予它们的无尽的力量，又一次成为浪漫主义时代和当代的特殊艺术。每一种细微的思想和感情，都可以以最简的形式，在其中表达出来，易于催生对其自身感到愉悦的自我意识。通过光与影的交替，复杂的休止符，它们以一种外在的形式投射出热情或情感中最内在的东西。在建筑和绘画、音乐、诗歌等等浪漫主义艺术之间，雕塑产生了。它不同于建筑，它直接涉及人，但又和浪漫艺术不同，因为它并非自我分析的。它比其他涉及人类形态的艺术更专注，它自己就是精神表达的一种完整媒介，随着内心的激动而颤抖、羞愧、融入眼泪中。那种只作为一种不稳定的效果隐藏于建筑中的精神因素，在雕塑中则拿起所有给定的材料，并把一种想象性动机渗入其中。第一眼看上去，有着固体形状的雕塑，似乎是一种比诗歌或绘画的模糊抽象的世界更为真实丰富的东西。然而事实刚好相反。言语和行为对一个人原貌的展示，比对肌肉的拿捏或肉体的塑造更为直接，而诗歌达到了这些要求。绘画通过脸部颜色的润红和眼睛里光线的扩张，音乐通过它精妙的音域都可以最精妙地提炼出某一激情时刻，理出其最难解的头绪。

But why should sculpture thus limit itself to pure form? Because, by this imitation, it becomes a perfect medium of expression for one peculiar motive of the imaginative intellect. It, therefore, renounces all those attributes of its material which do not forward that motive. It has had, indeed, from the beginning an unfixed claim to colour; but this element of colour in it has always been more or less conventional, with no melting or modulation of tones, never permitting more than a very limited realism. It was

maintained chiefly as a religious tradition. In proportion as the art of sculpture ceased to be merely decorative, and subordinate to architecture, it threw itself upon pure form. It renounces the power of expression by lower or heightened tones. In it, no member of the human form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rest; the eye is wide, and without pupil; the lips and brow are hardly less significant than hands, and breasts, and feet. But the limitation of its resources is part of its pride: it has no backgrounds, no sky or atmosphere, to suggest and interpret a train of feeling; a little of suggested motion, and much of pure light on its gleaming surfaces, with pure form—only these. And it gains more than it loses by this limitation to its own distinguishing motives; it unveils man in the repose of his un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That white light, purged from the angry, bloodlike stains of action and passion, reveals, not what is accidental in man, but the tranquil godship in him, as opposed to the restless accidents of life. The art of sculpture records the first naive, unperplexed recognition of man by himself; and it is a proof of the high artistic capacity of the Greeks, that they apprehended and remained true to these exquisite limitations, yet, in spite of them, gave to their creations a mobile, a vital, individuality.

但是为什么雕塑要把自己限制在纯形式的表达中呢？因为通过这种限制，它成为想象性思维中一种特殊动机的最佳表达媒介。因此它放弃了材料中所有对表达这一主题无益的性质特征。诚然，它一开始对颜色的要求就是不确定的，但是它里面这种颜色的元素总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没有色调的融合或调整，从不允许超出写实主义这个有限的区域。雕塑主要是作为一种宗教传统保留着。而随着雕塑艺术不再只作装饰之用，不再仅是建筑的附属品，它成为了一种纯形式的艺术。它放弃了降低或提升色调这种表达方式。在雕塑里，人类外形的所有部分都同等重要：眼睛很大，没有瞳仁；嘴唇和眉毛与手、胸、脚同样重要。但是它资源的有限性也是它的骄傲：它没有背景，

没有天空或空气来暗示或解释一连串的感觉，只有很少的暗示出来的动作，有很多投向发光表面的纯光线，还有纯粹的形态，只有这些而已。然而这种对其特殊动机的局限性对雕塑而言得大于失，它揭开了人在其不变特性的和谐状态的面纱。从行为和感情里愤怒的血迹一般的污点中涤荡出来的那道白光，展现的不是人的偶然性情，而是他内心中与生活中喧嚣的琐事相反的宁静神性。雕塑艺术记录了人类对自身最初天真的、简单的认识。它也是希腊人高超艺术能力的证明，他们理解并真实面对这些高雅的局限，尽管如此，这却给他们的作品赋予了一种灵动的、充满活力的个性。

Heiterkeit—blitheness or repose, and Allgemeinheit—generality or breadth, are, then, the supre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llenic ideal. But that generality or breadth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lax observation, the unlearned thought, the flaccid execution, which have sometimes claimed superiority in art, on the plea of being broad or general. Hellenic breadth and generality come of a culture minute, severe, constantly renewed, rectifying and concentrating its impressions into certain pregnant types.

乐天性指愉快或宁静，大众性意为普遍或宽泛，这两者是当时希腊理想的至高特点。但是这种普遍或宽泛和马虎的观察、不成熟的思想以及拙劣的技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有时以宽泛和普遍为借口，它们在艺术中声称具有优先地位。希腊精神的宽泛和普遍源于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精准、严格、不断更新并将其自己的感觉调整和集中到一些富于内涵的艺术类型中。

The basis of all artistic genius lies in the power of conceiving humanity in a new and striking way, of putting a happy world of its

own creation in place of the meaner world of our common days, generating around itself an atmosphere with a novel power of refraction, selecting, transforming, recombining the images it transmits, according to the choice of the imaginative intellect. In exercising this power, painting and poetry have a variety of subject almost unlimited. The range of characters or persons open to them is as various as life itself; no character, however trivial, misshapen, or unlovely, can resist their magic. That is because those art can accomplish their function in the choice and development of some special situation, which lifts or glorifies a character, in itself not poetical. To realise this situation, to define, in a chill and empty atmosphere, the focus where rays, in themselves pale and impotent, unite and begin to burn, the artist may have, indeed, to employ the most cunning detail, to complicate and refine upon thought and passion a thousand fold. Let us take a brilliant example from the poems of Robert Browning. His poetry is pre-eminently the poetry of situations. The characters themselves are always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often they are characters in themselves of little interest; they seem to come to him by strange accidents from the ends of the world. His gift is shown by the way in which he accepts such a character, throws it into some situation, or apprehends it in some delicate pause of life, in which for a moment it becomes ideal. In the poem entitled Le Byron de nos Jours, in his Dramatis Personae, we have a single moment of passion thrown into relief after this exquisite fashion. Those two jaded Parisians are not intrinsically interesting: they begin to interest us only when thrown into a choice situation. But to discriminate that moment, to make it appreciable by us, that we may “find it”, what a cobweb of allusions, what double and treble reflexions of the mind upon itself, what an artificial light is constructed and broken over the chosen situation; on how fine a needle’s point that little world of passion is balanced! Yet, in spite of this intricacy, the poem has the clear ring

of a central motive. We receive from it the impression of one imaginative tone, of a single creative act.

所有艺术天赋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力量之上：它以一种全新的惊人的方法构建人性，用其自己创造的快乐世界来代替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简陋的世界，并在自己周围创造出一种含有全新的折射力量的氛围，这种力量根据想象思维的选择而筛选、转换、重新组合它传达的形象。在运用这种力量时，绘画和诗歌具有几乎不受限制的多样主题。对它们来说人物或角色的范围可以和生活中一样多种多样。不管人物多么微不足道、多么畸形或是讨人嫌，都不能抗拒它们的魔力。这是因为那些艺术可以通过选择和发展一些能够提升或润饰一种本身并无诗意的人物的特定场景，以这种方式实现它们的功能。为了实现这个场景，为了在一种寒冷空荡的气氛中找到这些暗淡虚弱的光线结合在一起、开始发热的焦点，艺术家可能的确只能借助最巧妙的细节，通过上千次的推敲，将思想和激情复杂化，精炼化。我们从罗伯特·勃朗宁的诗歌中选取一个光辉的范例吧。他的诗歌主要是有关情境的诗歌。人物本身总是次要的，通常他们本身是无足轻重的，似乎是因为机缘巧合才从世界的尽头来到他面前。勃朗宁的天赋在于他接受这样的人物，把他放在某个场景中，或者在生活的某个微妙的间歇中理解他，在这里他在一刹间变得完美了。在《剧中人》中一首题为《我们生活中的拜伦》的诗中，我们在体会到这种精致手法后，激情会一下子释放出来。那两个疲惫不堪的巴黎人本身并不有趣。他们只是被限定在一个特定场景下才开始吸引我们。但是为了区别出这个瞬间，使我们能够欣赏它，使我们可以“发现它”，在那个选定的情境上构建又打破了多少错综复杂的隐喻，表达了思维对自己双重甚至三重的反思，又是有怎样的人造光线；小小的情感世界是怎样在一个针尖上达到如此的平衡！然而尽管其如此地错综复杂，诗歌还是有着清晰的中心主题。我们从中获得单一想象性色调和专一创造性行为的印象。

To produce such effects at all requires all the resources of painting, with its power of indirect expression, of subordinate but significant detail, its atmosphere, its foregrounds and backgrounds. To produce them in a preeminent degree requires all the resources of poetry, language in its most purged form, its remote associations and suggestions, its double and treble lights. These appliances sculpture cannot command. In it, therefore, not the special situation, but the type,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subject to be delineated, is all-important. In poetry and painting, the situation predominates over the character; in sculpture, the character over the situation. Excluded by the proper limitation of its material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exquisite situations, it has to choose from a select number of types intrinsically interesting—interesting, that is, independently of any special situation into which they may be thrown. Sculpture finds the secret of its power in presenting these types, in their broad, central, incisive lines. This it effects not by accumulation of detail, but by abstracting from it. All that is accidental, all that distracts the simple effect upon us of the supreme types of humanity, all traces in them of the commonness of the world, it gradually purges away.

要想完全达到这些效果需要运用绘画的所有资源，其间接表达次要但重要的细节的力量，其氛围、前景和背景。要显著地达到这些效果也需要运用诗歌的所有资源：最为纯洁的语言、广泛的联想暗示以及双倍甚至三倍的观察力。这些手段都是雕塑所无法企及的。因此在雕塑中重要的不是特定场景，而是类型，是被详细刻画的主题的普遍特质。在诗歌和绘画中，场景凌驾于人物之上；在雕塑中，人物凌驾于场景之上。因为材料的特定限制它不能展开细腻的场景，它必须从精选出来的，本身有趣的类型中选取，有趣，指的是独立于任何可能用来表现它的特殊场景之外仍然引人兴趣。雕塑在表现这些类型的过程中，在它们宽阔的、中心的、精准的线条中发现自己力量的秘密。

它不是靠细节的堆积，而是通过从细节中抽象出来产生效果。所有偶然的，所有分散人类最高类型作用于我们身上而产生的简单效果的东西，所有它们身上世界共性的痕迹，都逐渐涤荡散尽。

Works of art produced under this law, and only these, are really characterised by Hellenic generality or breadth. In every direction it is a law of restraint. It keeps passion always below that degree of intensity at which it must necessarily be transitory, never winding up the features to one note of anger, or desire, or surprise. In some of the feeble allegorical designs of the middle age, we find isolated qualities portrayed as by so many masks; its religious art has familiarised us with faces fixed immovably into blank types of placid reverie. Men and women, again, in the hurry of life, often wear the sharp impress of one absorbing motive, from which it is said death sets their features free. All such instances may be ranged under the grotesque; and the Hellenic ideal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grotesque. It allows passion to play lightly over the surface of the individual form, losing thereby nothing of its central impassivity, its depth and repose. To all but the highest culture, the reserved faces of the gods will ever have something of insipidity.

只有在这个法则下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才真正具有希腊精神普遍而广博的特点。不论在哪个方面这个法则都起着制约作用。都是限制它，使其总是将激情保持在异常激烈的程度之下，激情必然是短暂易逝的，从不会使面部表情显示出一丝的愤怒、渴望或惊讶。在中世纪一些乏力的寓言式作品中，我们看到对一些孤立的特质的描绘，使这些作品如同戴上了面具。中世纪的宗教艺术中固定在平静幻想、无表情类型里的面孔比比皆是。匆忙生活中的男男女女依旧总是带着专注于某一动机的尖锐表情，据说只有死亡能把他们从这副表情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例子都可以列于怪异风格之中。而希腊理想和怪异风格

毫无关系，它允许热情在个体形象之外稍稍有所体现，这样不会丧失任何处于中心地位的泰然自若、深度和宁静。除了最高层次的文化外，诸神这种矜持的脸庞对其他文化而言总是有些枯燥无味的。

Again, in the best Greek sculpture, the archaic immobility has been stirred, its forms are in motion; but it is a motion ever kept in reserve, and very seldom committed to any definite action. Endless as are the attitudes of Greek sculpture, exquisite as is the invention of the Greeks in this direction, the actions or situations it permits are simple and few. There is no Greek Ma donna; the goddesses are always childless. The actions selected are those which would be without significance, except in a divine person—binding on a sandal or pre paring for the bath. When a more complex and significant action is permitted, it is most often represented as just finished, so that eager expectancy is excluded, as in the image of Apollo just after the slaughter of the Python, or of Venus with the apple of Paris already in her hand. The Laocoon, with all that patient science through which it has triumphed over an almost unmanageable subject, marks a period in which sculpture has begun to aim at effects legitimate, because delightful, only in painting.

另外，在希腊最好的雕塑中陈旧的静止风格被动摇，其形体处于运动中，但是这种动感是永远处于保留状态的，而且几乎从不用来表现哪个特定动作。希腊雕塑的姿态是如此众多，希腊人在这个方面的创造是如此精美，因此它准许的动作和场景是简单而少之又少的。希腊没有圣母，女神也永远没有子女。所选的动作如果不是出现在圣人身上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比如穿上凉鞋或者准备沐浴。如果准许一个更为复杂而重要的动作存在，它常常表现为刚刚完成的动作，这样就不会有焦急的期待了，就像是刚刚杀死皮同的阿波罗的形象，或是已经把帕里斯的苹果拿在手上的维纳斯。《拉奥孔》以无与伦比的耐心

技巧攻克了一个几乎无法掌控的主题，标志着雕塑开始进入追求曾经只存在于绘画中的令人愉悦的效果的时代。

The hair, so rich a source of expression in painting, because, relatively to the eye or the lip, it is mere drapery, is withdrawn from attention; its texture, as well as its colour, is lost, its arrangement but faintly and severely indicated, with no broken or enmeshed light. The eyes are wide and directionless, not fixing anything with their gaze, nor riveting the brain to any special external object, the brows without hair. Again, Greek sculpture deals almost exclusively with youth, where the moulding of the bodily organs is still as if suspended between growth and completion, indicated but not emphasised; where the transition from curve to curve is so delicate and elusive, that Winckelmann compares it to a quiet sea, which, although we understand it to be in motion, we nevertheless regard as an image of repose; where, therefore, the exact degree of development is so hard to apprehend. If a single product only of Hellenic art were to be saved in the wreck of all beside, one might choose perhaps from the beautiful multitude of the Panathenaic frieze, that line of youths on horseback, with their level glances, their proud, patient lips, their chastened reins, their whole bodies in exquisite service. This colourless, unclassified purity of life, with its blending and interpenetration of intellectual, spiritual, and physical elements, still folded together, pregnant with the possibilities of a whole world closed within it, is the highest expression of the indifference which lies beyond all that is relative or partial. Everywhere there is the effect of an awaking, of a child’s sleep just disturbed. All these effects are united in a single instance—the adorante of the museum of Berlin, a youth who has gained the wrestler’s prize, with hands lifted and open, in praise for the victory. Fresh, unperplexed, it is

the image of a man as he springs first from the sleep of nature, his white light taking no colour from any one-sided experience. He is characterless, so far as character involves subjection to the accidental influences of life.

头发是绘画中丰富的表现资源。但在希腊雕塑中因为它与眼睛和嘴唇相比只是修饰性的，所以不再是关注的焦点。头发的纹理和颜色消失了，发式只是被轻微地暗示出来，没有凌乱或是纠结在一起的光线。大大的眼睛不知看向哪里，凝视的目光并未固定在任何东西上，头部也不会固定于哪个特定外物上，眼眉处没有毛发。此外，希腊雕塑几乎专注于表现年轻人，身体器官的形状好像仍然停留在成长和完成之间；对此，希腊雕塑只有暗示而并未特别强调。曲线之间的过渡如此地精妙，难以捉摸，温克尔曼把它比作安静的海洋，我们虽然知道它应该处于运动中，但却把它看成一个静止的形象。因此，这里进展的准确程度难以把握。如果只有一件希腊艺术品可以在沉船中获救，人们可能会从泛雅典娜女神节柱中楣的“美丽群像”中进行选择。那一排青年骑在马背上，目光平视，嘴唇显得骄傲坚忍，他们勒紧缰绳、整个身体显示出一种优美的虔诚。在这种单调、普通的纯洁生命中，混合渗透了理智、精神和肉体的元素，静静地叠加在一起，如此丰富，包含着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它最完美地表达了超出所有与之相关或是它其中一部分范围之外的无动于衷。到处充满了一种觉醒，一种惊扰了孩子睡梦的效果。所有这些效果集中在一幅作品中，这就是柏林博物馆里的《胜利者》。一个年轻人获得了摔跤胜利的奖赏，他举起张开的双手庆祝胜利。这个形象清新、单纯，似乎第一次从本性的睡梦中醒来而激情迸发，他纯洁的目光并未影响片面经历的色彩。按照个性的形成受到生活的偶然影响的定义来看，他没有任何的个性。

“This sense,” says Hegel, “for the consummate model ling of divine and human forms was pre-eminently at home in Greece. In

its poets and orators, its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Greece cannot be conceived from a central point, unless one brings, as a key to the under standing of it, an insight into the ideal forms of sculpture, and regards the images of statesmen and philosophers, as well as epic and dramatic heroes, from the artistic point of view. For those who act, as well as those who create and think, have, in those beautiful days of Greece, this plastic character. They are great and free, and have grown up on the soil of their own individuality, creating themselves out of themselves, and moulding themselves to what they were, and willed to be. The age of Pericles was rich in such characters; Pericles him self, Pheidias, Plato, above all Sophocles, Thucydides also, Xenophon and Socrates, each in his own order, the perfection of one remaining undiminished by that of the others. They are ideal artists of themselves, cast each in one f lawless mould, works of art, which stand before us as an immortal presentment of the gods. Of this modelling also are those bodily works of art, the victors in the Olympic games; yes! and even Phryne9, who, as the most beautiful of women, ascended naked out of the water, in the presence of assembled Greece."

黑格尔说："这种完美塑造神和人类形态的感觉主要在希腊发端。对于希腊的诗人和演讲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而言，希腊不能从一个中心点上构想，除非有人带来对雕塑的理想形态的洞察作为理解它的关键，并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审视政治家和哲人、以及史诗和戏剧中的英雄的形象。因为那些采取行动、以及进行创造和思考的人在希腊的灿烂时代里具有这种可塑的性格。他们伟大而自由，在自己个性的土壤中成长，创造了自己，把自己塑造成自己成为和希望成为的样子。伯里克利时代不缺乏这样的人物：伯里克利自己、菲迪亚斯、柏拉图、还有最重要的索福克勒斯以及修昔底德、色诺芬和苏格拉底。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阶层里，一个人的完美不因其他人的完美而相形见绌。他们是自己理想的艺术家，每个人置于一个完美无暇的模子

里，他们是艺术品，作为神的不朽存在展现在我们面前。那些人体的艺术品、奥林匹克运动中的胜利者也属于这些雕塑作品之列。没错！甚至包括那个最美的女人，从水中裸身而出，出现在集会的希腊人面前的芙莱妮。”

This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ek spirit, Winckelmann possessed in his own nature, itself like a relic of classical antiquity, laid open by accident to our alien, modern atmosphere. To the criticism of that consummate Greek modelling he brought not only his culture but his temperament. We have seen how definite was the leading motive of that culture; how, like some central root-fibre, it maintained the well-rounded unity of his life through a thousand distractions. Interests not his, nor meant for him, never disturbed him. In morals, as in criticism, he followed the clue of instinct, of an unerring instinct. Penetrating into the antique world by his passion, his temperament, he enunciated no formal principles, always hard and one-sided. Minute and anxious as his culture was, he never became one-sidedly self-analytical. Occupied ever with himself, perfecting himself and developing his genius, he was not content, as so often happens with such natures, that the atmosphere between him and other minds should be thick and clouded; he was ever jealously refining his meaning into a form, express, clear, objective. This temperament he nurtured and invigorated by friendships kept him always in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spirit of youth. The beauty of the Greek statues was a sexless beauty: the statues of the gods had the least traces of sex. Here there is a moral sexlessness, a kind of ineffectual wholeness of nature, yet with a true beauty and significance of its own.

温克尔曼天生掌握着这把理解希腊精神的钥匙，他的本性就像古

典遗产，偶然被打开，呈现在我们完全不同的当代氛围里。他不仅把他的修养，而且把他的性情带进对完美的希腊雕塑的批判中。我们已经知道那种修养的主要动机是多么明确，知道像某些中心的根纤维一样，这种修养是如何令他的生活在无数分散精力的事物中保持全面的统一的。利益他不关心，也不是为他准备的，利益从未干扰过他。在道德方面，像在批判方面一样，他依循自己的直觉—他那从不出错的直觉。激情与性格促使他走进古代世界，他没有宣布什么正式的原则，这些原则总是顽固而有失偏颇的。他精准热切的修养使他从未倾向于片面的自我解析。他总是独自忙碌，完善自我、发展自己的天赋。他从不满足，就像具备这种天赋的其他人一样，因此他和其他那些人之间的氛围应是稠密浓厚、云雾迷茫的。温克尔曼永远在审慎地推敲自己的想法，将其提炼成一种清晰客观的形式。他通过友谊来培养和鼓舞的这种性情使他永远和年青的心情保持直接的接触。希腊雕像的美是一种无性的美，诸神的雕像具有最少的性别特征。这里有一种道德上的无性特点，天性上一种并无效果的完整性，但其本身却具备着一种真实的美和重要意义。

One result of this temperament is a serenity—Heiterkeit—which characterises Winckelmann's handling of the sensuous side of Greek art. This serenity is, perhaps, in great measure, a negative quality: it is the absence of any sense of want, or corruption, or shame. With the sensuous element in Greek art he deals in the pagan manner; and what is implied in that? It has been some times said that art is a means of escape from "the tyranny of the senses." It may be so for the spectator: he may find that the spectacle of supreme works of art takes from the life of the senses something of its turbid fever. But this is possible for the spectator only because the artist, in producing those works, has gradually sunk his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ideas in sensuous form. He may live, as Keats lived, a pure life; but his soul, like that of Plato's false astronomer,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mersed in sense, until

nothing which lacks the appeal to sense has interest for him. How could such a one ever again endure the greyness of the ideal or spiritual world? The spiritualist is satisfied as he watches the escape of the sensuous elements from his conceptions; his interest grows, as the dyed garment bleaches in the keener air. But the artist steeps his thought again and again into the fire of colour. To the Greek this immersion in the sensuous was, religiously, at least, indifferent. Greek sensuousness, therefore, does not fever the conscience: it is shameless and childlike. Christian asceticism, on the other hand, discrediting the slightest touch of sense, has from time to time provoked into strong emphasis the contrast or antagonism to itself, of the artistic life, with its inevitable sensuousness. —I did but taste a little honey with the end of the rod that was in mine hand, and lo! I must die. —It has sometimes seemed hard to pursue that life without something of conscious disavowal of a spiritual world; and this imparts to genuine artistic interests a kind of intoxication. From this intoxication Winckelmann is free: he fingers those pagan marbles with unsinged hands, with no sense of shame or loss. That is to deal with the sensuous side of art in the pagan manner.

这种性情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种宁静，即乐天性，它构成了温克尔曼在处理希腊艺术感官美方面的特色。这种宁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种消极的品质：它没有任何渴望、堕落或羞耻的感觉。他以异教方式研究着希腊艺术中的感官元素，这意味着什么呢？有时艺术被看成是一种逃离“感官专制”的方式，对观赏者来说可能是这样的：他可能发现最为优秀的艺术品的景观从感官生活中剥离出那种混乱狂热。但是只是对观赏者而言是如此，因为艺术家在创作那些作品时，已经逐渐把他的思维的、以及精神的观点融入感官形式中。他可能像济慈那样过着纯净的生活，但是他的灵魂像柏拉图说的不智的天文学者一样，越来越沉浸于感官中，直至对感官缺乏吸引力的东西都不能使他感兴趣。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再次忍受理想或精神世界的一片灰

白？看到感官元素从他的观念中逃离开，唯灵论者得到了满足。随着染色的衣服在强劲的风中褪去颜色，他的兴趣越发浓厚。但是这位艺术家一次又一次把他的思想沉浸在色彩的火焰中。对希腊人而言，这种对感官世界的沉醉是不带偏见的，至少从宗教角度来说是这样。因此，希腊的感官知觉没有使良心狂躁，它不感到羞耻，像个孩子一样。而另一方面，基督教禁欲主义耻于最轻微的感官触碰，不时主动激烈地强调自己和不可避免地带有感官知觉的艺术生活的对比或是对抗。我只是用手里小棒的一头蘸了一点蜜品尝，啊，我必须死了！有时，要追求那种生活而不有意否定精神世界似乎是很困难的，这赋予真正的艺术趣味以一种陶醉。温克尔曼没有受到这种陶醉的影响：他用双手默默地触摸那些异教大理石像，没有羞耻感或失落感。这就是以异教方式对艺术的感官部分的处理。

The longer we contemplate that Hellenic ideal, in which man is at unity with himself, with his physical nature, with the outward world, the more we may be inclined to regret that he should ever have passed be yond it, to contend for a perfection that makes the blood turbid, and frets the flesh, and discredits the actual world about us. But if he was to be saved from the ennui which ever attaches itself to realisation, even the realisation of the perfect life, it was necessary that a conflict should come, that some sharper note should grieve the existing harmony, and the spirit chafed by it beat out at last only a larger and profounder music. In Greek tragedy this conflict has begun: man finds himself face to face with rival claims. Greek tragedy shows how such a conflict may be treated with serenity, how the evolution of it may be a spectacle of the dignity, not of the impotence, of the human spirit. But it is not only in tragedy that the Greek spirit showed itself capable of thus bringing joy out of matter in itself full of discouragements. Theocritus10, too, strikes often a note of romantic sadness. But what a blithe and steady poise, above these discouragements, in a clear and sunny

stratum of the air!

越是花时间沉思人与自我合一、与身体天性合一、与外在世界合一的那种希腊理想，我们越是对人没能超越它而感到遗憾，越是要争取一种使热血沸腾、使肉体被侵蚀、使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蒙羞的完美。但是如果要把他从倦怠这个永远自行依附于实现，甚至是完美生活的实现的情绪中解放出来，那么冲突的出现就是必要的，某种更尖利的音调应该使现存的和谐感到悲伤，然后被它惹怒的精神最终只会奏出更为洪亮深刻的乐章。这种冲突在希腊悲剧里已经开始：人们发现自己正面临对手的断言。希腊悲剧展示的是如何用宁静来对待这样的冲突，它的演变是如何可能变成人类精神一种富有尊严的景象，而非虚弱无能的。但是希腊精神不只是在悲剧中展示它从充满沮丧的内容本身获得快乐的能力。忒奥克里托斯也常常书写出一种浪漫的忧伤语调。但是在晴朗的、阳光明媚的空气里，面对这些挫折的一个多么快乐而坚定的姿态！

Into this stage of Greek achievement Winckelmann did not enter. Supreme as he is where his true interest lay, his insight into the typical unity and repose of the highest sort of sculpture seems to have involved limitation in another direction. His conception of art excludes that bolder type of it which deals confidently and serenely with life, conflict, evil. Living in a world of exquisite but abstract and colourless form, he could hardly have conceived of the subtle and penetrative, yet somewhat grotesque art of the modern world. What would he have thought of Gilliatt, in Victor Hugo's Travailleurs de la Mer, or of the bleeding mouth of Fantine in the first part of Les Misérables, penetrated as those books are with a sense of beauty, as lively and transparent as that of a Greek? Nay, a sort of preparation for the romantic temper is noticeable even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Greek ideal itself, which for his part

Winckelmann failed to see. For Greek religion has not merely its mournful mysteries of Adonis, of Hyacinthus, of Demeter, but it is conscious also of the fall of earlier divine dynasties. Hyperion gives way to Apollo, Oceanus to Poseidon. Around the feet of that tranquil Olympian family still crowd the weary shadows of an earlier, more formless, divine world. The placid minds even of Olympian gods are troubled with thoughts of a limit to duration, of inevitable decay, of dispossession. Again, the supreme and colourless abstraction of those divine forms, which is the secret of their repose, is also a premonition of the fleshless, consumptive refinements of the pale, medieval artists. That high indifference to the outward, that impassivity, has already a touch of the corpse in it: we see already Angelico and the Master of the Passion in the artistic future. The suppression of the sensuous, the shutting of the door upon it, the ascetic interest, may be even now foreseen. Those abstracted gods, “ready to melt out their essence fine into the winds,” who can fold up their flesh as a garment, and still remain themselves, seem already to feel that bleak air in which, like Helen of Troy, they wander as the spectres of the middle age.

温克尔曼并没有涉足希腊成就的这个阶段。他在自己真正的兴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对于最优秀的雕塑艺术的典型的和谐和恬静的洞察似乎涉及到在另一个方面的局限。他对于艺术的概念将那种自信沉着地处理生活、冲突和邪恶的更为粗砺的类型排斥在外。生活在一个虽精致但却抽象而单调的世界里，他很难构想出现代世界那种微妙的、深刻的、但有些怪诞的艺术。对于维克多·雨果《海上劳工》中的吉列特和《悲惨世界》第一部分中芳汀流血的嘴巴，他会作何感想呢？而这些书里充盈的是和希腊作品中同样生动清晰的美感？不仅如此，在希腊式理想本身的界限里已经可以察觉到一种为浪漫主义做的准备。而温克尔曼则没有看到。因为希腊宗教不只有阿多尼斯、雅辛托斯、得墨忒耳的悲伤神话，它还知道更早几代神灵的坠

落。许珀里翁给阿波罗让位，俄刻阿诺斯给波塞冬让位。在平静的奥林匹亚家族脚下仍然围聚着更为久远、更加模糊的神灵世界那些疲惫的影子。甚至奥林匹亚诸神平静的心绪也会为统治时间的有限、无可避免的衰败和被驱逐这些想法所困扰。此外，那些神灵形象的最完美的苍白的抽象表现，既是他们安宁和谐的关键所在，也是中世纪那些面色苍白的艺术家那种瘦弱的、结核病人似的高雅情趣的前兆。那种对外在世界的极度漠不关心，那种冷漠，已经有了一点僵尸味：我们已经看到了后来艺术中的安吉利科和《激情之主》的影子。对感官感觉的压抑，将其置诸门外，，禁欲主义趣味，现在甚至就可以预见到。那些抽象化的神，“准备好将他们美好的本质融化在风中”，他们可以像脱去外衣一样脱去肉体而仍然存在，好像已经准备好去感受荒凉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他们如同特洛伊的海伦一样在中世纪里幽灵似地游荡。

Gradually, as the world came into the church, an artistic interest, native in the human soul, reasserted its claims. But Christian art was still dependent on pagan examples, building the shafts of pagan temples into its churches, perpetuating the form of the basilica, in later times working the disused amphitheatres as stone quarries. The sensuous expression of ideas which unreservedly discredit the world of sense, was the delicate problem which Christian art had before it. If we think of medieval painting, as it ranges from the early German schools, still with something of the air of the charnel- house about them, to the clear loveliness of Perugino, we shall see how that problem was solved. In the very “worship of sorrow” the native blitheness of art asserted itself. The religious spirit, as Hegel says, “smiled through its tears.” So perfectly did the young Raphael infuse that Heiterkeit, that pagan blitheness, into religious works, that his picture of Saint Agatha at Bologna became to Goethe a step in the evolution of IPhigenie (Italiänische Reise. Bologna, 19 Oct. 1776.). But in proportion as

the gift of smiling was found once more, there came also an aspiration towards that lost antique art, some relics of which Christian art had buried in itself, ready to work wonders when their day came.

渐渐地，随着世界进入宗教时代，人类灵魂中与生俱来的艺术趣味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但那时基督教艺术仍要依靠异教范例，异教庙宇的柱子搬进了教堂，古罗马长方形会堂的样式得以永存，接下来的时代，废弃不用的圆形露天剧场成为了采石场。这种对理性世界持完全怀疑态度的观念的感性表达，是基督教艺术面临的棘手问题。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中世纪绘画——从早期还带着一些陈尸所味道的德国流派，到佩鲁吉诺清新秀丽的画作，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正是在“悲伤崇拜”中，艺术固有的快乐因素坚持了自己的权利。宗教精神，如黑格尔所说，“在眼泪中微笑”。年轻的拉斐尔出神入化地将乐天性，那种异教的快乐融入宗教作品，他在博洛尼亚的作品《圣亚加大》成为歌德写作《伊菲革涅亚》（《意大利文学研究》赖泽，博洛尼亚，1776年10月19日）的阶石。但随着微笑的天分被再次发现，对失去的古代艺术的渴望也随之而来，某些被基督教艺术埋葬在自身内的古代艺术的遗迹，准备在时机到来时创造奇迹。

The history of art has suffered as much as any history by trenchant and absolute divisions. Pagan and Christian art are sometimes harshly opposed, and the Renaissance is represented as a fashion which set in at a definite period. That is the superficial view: the deeper view is that which preserves the identity of European culture. The two are really continuous; and there is a sense in which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Renaissance was an uninterrupted effort of the middle age, that it was ever taking place. When the actual relics of the antique were restored to the world, in the view of the Christian ascetic it was as if an ancient plague-pit

had been opened. All the world took the contagion of the life of nature and of the senses. And now it was seen that the medieval spirit, too, had done something for the new fortunes of the antique. By hastening the decline of art, by withdrawing interest from it and yet keeping unbroken the thread of its traditions, it had suffered the human mind to repose itself, that when day came it might awake, with eyes refreshed, to those ancient, ideal forms.

艺术的历史和其他历史一样遭到尖锐的、绝对的切分。异教艺术和基督教艺术有时被严格地对立起来，文艺复兴被描绘成是开始于某一确定时期的一种潮流。这是一种表面的观点，深层次的观点是它保持了欧洲文化的特征。两者的确是相继存在，从某个意义上可以说文艺复兴是中世纪一种未曾停止的努力，它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当古代艺术真正的遗产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基督教禁欲者看来就好像开始了一场古老的瘟疫。整个世界都被自然和感官的生活所传染。现在人们看到中世纪精神也为古代遗产的新机遇作出过努力。中世纪精神通过加速艺术的衰落，通过将趣味从艺术中剥离但仍保持着其传统线索的完整，使人类心灵遁入休眠。当时机到来，人们将会苏醒，以全新目光看待古代完美的艺术形式。

The aim of a right criticism is to place Winckelmann in an intellectual perspective, of which Goethe is the foreground. For, after all, he is infinitely less than Goethe; and it is chiefly because at certain points he comes in contact with Goethe, that criticism entertains consideration of him. His relation to modern culture is a peculiar one. He is not of the modern world; nor is he wholl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lthough so much of his outer life is characteristic of it. But that note of revolt agains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hich we detect in Goethe, was struck by Winckelmann. Goethe illustrates a union of the Romantic spirit, in its adventure,

its variety, its profound subjectivity of soul, with Hellenism, in its transparency, its rationality, its desire of beauty—that marriage of Faust and Helena, of which the 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s the child, the beautiful lad Euphorion, as Goethe conceives him, on the crags, in the “splendour of battle and in harness as for victory,” his brows bound with light (Faust, Th. ii. Act. 3.). Goethe illustrates, too, the preponderance in this marriage of the Hellenic element; and that element, in its true essence, was made known to him by Winckelmann.

正确批判的目的是把温克尔曼置于一个以歌德为前景的理性的视角之中。因为他毕竟远不如歌德，并且主要因为在某些地方他与歌德有所关联，批评界才会对其加以关注。他和现代文化的关联比较特别。他既不属于当代，也不完全属于18世纪，虽然他的外在生活大部分带有这个时代的特色。我们在歌德身上察觉到的对18世纪的反抗，是从温克尔曼开始的。浪漫主义精神中包含冒险、多变和深刻的心灵主观性，而希腊精神有着透明、理性和对美的渴望，歌德以浮士德和海伦的结合表现了这两种精神的融合，他们孕育出了19世纪的艺术——漂亮的青年欧福良。正如歌德的描绘，在峭壁上，在“战斗的宏大中，身着战甲为胜利而战”，他的眉毛随着阳光跳跃。(《浮士德》第二部第三幕)歌德也对这种结合中希腊元素所占主导地位进行了阐释，这种元素的真正本质特征，是温克尔曼使他了解的。

Breadth, centrality, with blitheness and repose, are the marks of Hellenic culture. Is such culture a lost art? The local, accidental colouring of its own age has passed from it; and the greatness that is dead looks greater when every link with what is slight and vulgar has been severed. We can on1y see it at all in the reflected, refined light which a great education creates for us. Can we bring down that ideal into the gaudy, perplexed light of modern life?

广泛性、向心性，以及快乐和和谐、是希腊文化的标志。这样的文化是一种失落的艺术吗？那种属于它自身时代的地域性、偶然性色彩已经离它而去，一旦将所有与无足轻重的、粗俗之物的联系全部切断，已然消亡的伟大看起来就更伟大了。我们只能在伟大的教育给我们创造的、仔细斟酌的优雅光芒里看到它。我们能否将那种完美屈就于当代生活华而不实、充满困惑的光线下呢？

Certainly, for us of the modern world, with its conflicting claims, its entangled interests, distracted by so many sorrows, with many preoccupations, so bewildering an experience, the problem of unity with ourselves, in blitheness and repose, is far harder than it was for the Greek within the simple terms of antique life. Yet, not less than ever, the intellect demands completeness, centrality. It is this which Winckelmann imprints on the imagination of Goethe, at the beginning of life, in its original and simplest form, as in a fragment of Greek art itself, stranded on that littered, indeterminate shore of German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Winckelmann, this type comes to him, not as in a book or a theory, but more importunately, because in a passionate life, in a personality. For Goethe, possessing all modern interests ready to be lost in the perplexed currents of modern thought, he defines, in clearest outline, the eternal problem of culture—balance, unity with one's self, consummate Greek modelling.

当然，当代世界有着相互冲突的主张，有着纠缠不清的趣味，身处其中的我们被无数的悲伤分散着精力，还有如此多的事务需要关注，这是一种令人十分茫然的经历。因此，对我们而言，在快乐和安宁里与自我合一的问题，比起古代过着简单生活的希腊人要困难很多。但是，现代的有智之士对于完整性和向心性的渴望并不比任何时

候少。这是温克尔曼在生活之初，用它原始和最简单的形式在歌德的丰富想象中留下的烙印，就像搁浅在18世纪德国杂乱的、模糊不清的海岸上的希腊艺术本身的碎片。在温克尔曼身上，这种特质不是在书本或理论中所讲的那样，而是更为纠缠不休，因为它蕴于一种热情生活中、出现在一种个性中。而歌德有着所有现代的趣味，随时会沉浸在现代思想错综复杂的潮流中，他用最清晰的轮廓，界定了文化的永恒问题——平衡、人与自我的统一，最完美的希腊文化。

It could no longer be solved, as in Phyrne ascending naked out of the water, by perfection of bodily form, or any joyful union with the external world: the shadows had grown too long, the light too solemn, for that. It could hardly be solved, as in Pericles or Pheidias, by the direct exercise of any single talent: amid the manifold claims of our modern intellectual life, that could only have ended in a thin, one-sided growth. Goethe's Hellenism was of another order, the Allgemeinheit and Heiterkeit, the completeness and serenity, of a watchful, exigent intellectualism. Im Ganzen, Guten, Wahren, resolut zu leben:—is Goethe's description of his own higher life; and what is meant by life in the whole—im Ganzen? It means the life of one for whom, over and over again, what was once precious has become indifferent. Everyone who aims at the life of culture is met by many forms of it, arising out of the intense, laborious, one-sided development of some special talent. They are the brightest enthusiasms the world has to show: and it is not their part to weigh the claims which this or that alien form of genius makes upon them. But the proper instinct of self-culture cares not so much to reap all that those various forms of genius can give, as to find in them its own strength. The demand of the intellect is to feel itself alive. It must see into the laws, the operation, the intellectual reward of every divided form of culture; but only that it may measure the relation between itself and them.

It struggles with those forms till its secret is won from each, and then lets each fall back into its place, in the supreme, artistic view of life. With a kind of passionate coldness, such natures rejoice to be away from and past their former selves, and above all, they are jealous of that abandonment to one special gift which really limits their capabilities. It would have been easy for Goethe, with the gift of a sensuous nature, to let it overgrow him. It comes easily and naturally, perhaps, to certain “other worldly” natures to be even as the Schöne Seele, that ideal of gentle pietism, in Wilhelm Meister: but to the large vision of Goethe, this seemed to be a phase of life that a man might feel all round, and leave behind him. Again, it is easy to indulge the commoplace metaphysical instinct. But a taste for metaphysics may be one of those things which we must renounce, if we mean to mould our lives to artistic perfection. Philosophy serves culture, not by the fancied gift of absolute or transcendental knowledge, but by suggesting questions which help one to detect the passion, and strangeness, and dramatic contrasts of life.

问题永远不可能再像芙莱妮从水中裸身而出，用身体形态的完美或是和外部世界的快乐合一那样解决了。阴影已经成长了太长时间，光线也太过庄严了。问题几乎不可能像在伯里克利和菲狄亚斯那里那样，直接由某个天才运用才能来解决：在现代理性生活的多种要求里，它只能获得单薄的、不完满的成长。歌德的希腊精神是另外一种类型，是广泛性和乐天性，是一种警觉的、急切的知性主义的完整和安宁。完整、美好、真实、果敢地面对生活，这是歌德对自己更高层次生活的描述。那么，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对一个人来说，生活中本来珍惜的事物一次次地变得无关紧要。每一个志在追求文化生活的人都会遇到它源于某种特殊天赋的强烈、艰苦、片面发展产生的各种形式。这些形式是世界必须展示的最醒目的热情：而且衡量这种或那种相异的天赋形式加诸他们身上的表现并非

是它们的责任。但是它们自我修养的本能不太关注收获各种天赋形式可能提供的成果，而是关注于从中发现自己的力量所在。理性需要的是感受到自身的存在。它必须仔细审视每一种独立文化形式的法则、运作和智力成果，但也只有那样它才可能去权衡自己和它们的关系。它和这些形式斗争，直到从它们那里获得全部的秘密，然后再让这些文化都退回到对生活有着至高艺术看法的位置里。带着一种充满激情的冷淡，这些天性很高兴从先前的自我中脱身而出，并超越先前，最重要的是，它们警惕着某种真正限制它们能力的特殊天赋放任自流。对具有审美天分的歌德来说，在他身上太容易产生过多的这种能力了。它可能自然轻松地进入一种美好的心灵中的“来世”本质，进入《威廉·迈斯特》中那种温柔虔敬的理想。但是歌德有宽阔的视野，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人可能完全沉浸其中、但是终会舍弃的人生阶段。此外，沉浸在平常的形而上学的直觉中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意欲把生活塑造成完美艺术的话,对形而上学的偏好可能是我们必须与之脱离关系的事物之一。哲学为文化服务，不是通过绝对或者先验知识花哨的礼物，而是通过提出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帮助人们发现生活中的激情、陌生感和戏剧性。

But Goethe’s culture did not remain “behind the veil” : it ever emerged in the practical functions of art, in actual production. For him the problem came to be:—Can the blitheness and universality of the antique ideal be communicated to artistic productions, which shall contain the fulness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modern world? We have see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arious forms of art has correspond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oughts of man concerning humanity, to the growing revelation of the mind to itself. Sculpture corresponds to the un perplexed, emphatic outlines of Hellenic humanism; painting to the mystic depth and intricacy of the middle age; music and poetry have their fortune in the modern world.

但是歌德的修养没有“掩藏在面纱后”：它总会出现在艺术的实际功用上，在真正的产出上。对他来说问题变为：古典的完美艺术的快乐和普遍性能否融入应该包含丰富的现代社会经验的艺术产品中？我们已经知道,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阶段与人类关于人性的思索的发展阶段和思维不断自我揭示的进程相呼应。雕塑艺术和希腊人文主义清晰、显著的轮廓相呼应，绘画艺术与中世纪神秘的深奥复杂相呼应，音乐和诗歌则在当代兴盛起来。

Let us understand by poetry all literary production which attains the power of giving pleasure by its form, as distinct from its matter. Only in this varied literary form can art command that width, variety, delicacy of resources, which will enable it to deal with the conditions of modern life. What modern art has to do in the ser vice of culture is so to rearrange the details of modern life, so to reflect it, that it may satisfy the spirit. And what does the spirit need in the face of modern life? The sense of freedom. That naive, rough sense of freedom, which supposes man’s will to be limited, if at all, only by a will stronger than his, he can never have again. The attempt to represent it in art would have so little verisimilitude that it would be f lat and uninteresting. The chief factor in the thoughts of the modern mind concerning itself is the intricacy, the universality of natural law, even in the moral order. For us, necessity is not, as of old, a sort of mythological personage without us, with whom we can do warfare. It is rather a magic web woven through and through us, like that magnetic system of which modern science speaks, penetrating us with a network, subtler than our subtlest nerves, yet bearing in it the central forces of the world. Can art represent men and women in these bewildering toils so as to give the spirit at least an equivalent for the sense of freedom? Certainly, in Goethe’s romances, and even more in the romances of Victor Hugo, we have high examples of modern art dealing thus

with modern life, regarding that life as the modern mind must regard it, yet reflecting upon it blitheness and repose. Natural laws we shall never modify, embarrass us as they may; but there is still something in the nobler or less noble attitude with which we watch their fatal combinations. In those romances of Goethe and Victor Hugo, in some excellent work done after them, this entanglement, this network of law, be comes the tragic situation, in which certain groups of noble men and women work out for themselves a supreme Dénouement. Who, if he saw through all, would fret against the chain of circumstance which endows one at the end with those great experiences?

我们以诗歌为切入点，了解所有通过与内容截然不同的形式来获得制造愉悦的力量的文学作品。只有在这种变化多样的文学样式中，艺术才掌握了能够使它应对现代生活状况的那些素材的宽泛性、多样性和微妙性。现代艺术在为文化服务中要做的，是重新安排现代生活的细节，是要反映现代生活，这样它才可能满足精神。那么在现代生活里，精神需要什么呢？它需要自由感，那种天真、质朴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认为人类意志如果受限，也只会受到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意志限制。这种自由感人不可能再次拥有。在艺术中再现它的尝试很难将它逼真地表现出来，它会变得单调乏味。现代思维在思考自身时，首先要面对的因素是自然法则的普遍性和复杂性，在道德领域也是如此。对我们来说，必要性不再像从前那样，是一种脱离于我们、我们可以与之对抗的虚构人物，而是一张融入我们身体内外的奇妙的网，就像现代自然科学所说的磁场一样，用一个网络渗透进我们，它比我们最纤细的神经还要纤细，但却蕴含着世界的核心力量。艺术能否在这个令人茫然的网中表现男男女女，至少给思想带来自由感的替代品？当然在歌德的浪漫文学作品，还有更多的维克多·雨果的浪漫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现代艺术表现现代生活的极好范例，它们以现代思维必然采取的方式看待那种生活，但是是在快乐和安宁中对其进行思考。尽管自然法则使我们感到难堪，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将其改

变。但是，我们可以带着某种高贵或者不高贵的态度来审视它注定的结合。在歌德和维克多·雨果的浪漫文学作品里，在他们之后的一些优秀作品里，这种牵连纠缠、这种法则的网络变成了悲剧的情境，因为某些高贵男女的群体为自己设计好了一种完美的结局。如果看清了这一切，谁还会为那些最终会给予某一个人带来美好经验的一系列境况而烦恼呢？

Conclusion

结论

Δέγει που Ἡράκλειτος ὅτι πάντα χωρεῖ καὶ οὐδὲν μένει

赫拉克利特说："万物流动，变化不息。"

To regard all things and principles of things as inconstant modes or fashions has more and more become the tendency of modern thought. Let us begin with that which is without—our physical life. Fix upon it in one of its more exquisite intervals, the moment, for instance, of delicious recoil from the flood of water in summer heat. What is the whole physical life in that moment but a combination of natural elements to which science gives their names? But those elements, phosphorus and lime and delicate fibres, are present not in the human body alone: we detect them in places most remote from it. Our physical life is a perpetual motion of them—the passage of the blood, the waste and repairing of the lenses of the eye,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tissues of the brain under every ray of light and sound—processes which science reduces to simpler and more elementary forces. Like the elements or which we are composed, the action of these forces extends beyond us: it rusts iron and ripens corn. Far out on every side of us those elements are broadcast, driven in many currents; and birth and gesture and death and the springing of violets from the grave are but a few out of ten

thousand resultant combinations. That clear, perpetual outline of face and limb is but an image of ours, under which we group them—a design in a web, the actual threads of which pass out beyond it. This at least of flame-like our life has, that it is but the concurrence, renewed from moment to moment, of forces parting sooner or later on their ways.

现代思想越来越倾向于把一切事物和事物的原则看成是变化无常的模式或者说是样式。让我们从外在事物——我们的肉体生命开始，我们将其固定在它最美妙的一个间歇，比如夏日酷热之中从暴雨中退出来的惬意时刻。肉体生命在那一刻不正只是一种由科学命名的自然元素组合吗?但是那些成分，磷、碳化钙和细微的纤维不只存在于人体中，我们还能在与人体差别最大的东西里发现它们。我们的肉体生命是这些元素一种永不止息的运动——血液的流动、眼睛里水晶体的新陈代谢、每一次光线和声音造成的大脑组织的改变，这些过程都被科学归纳成更为简单、更为基本的力。和构成我们身体的这些元素一样，这些力的运动也延伸到我们身体之外，它还可以使铁生锈，让谷物成熟。在很多涌流的推动下，这些元素散播到距我们周围很远的地方。死亡和坟墓里紫罗兰的萌芽只是成千上万种组合的点滴。脸庞和四肢的清晰、永恒的轮廓只是我们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之下我们将各种元素组合在一起——这恰如网中的图案，真正的织网的细线延伸出来，伸向他方。这样看来，至少我们的生命像火焰—它也只是力的组合，虽然其中的力量不断离去，这种力的组合却不时更新。

Or, if we begin with the inward world of thought and feeling, the whirlpool is still more rapid, the flame more eager and devouring. There it is no longer the gradual darkening of the eye, the gradual fading of colour from the wall—movements of the shore-side, where the water flows down indeed, though in apparent rest—but the race of the mid-stream, a drift of momentary acts of

sight and passion and thought. At first sight experience seems to bury us under a flood of external objects, pressing upon us with a sharp and importunate reality, calling us out of ourselves in a thousand forms of action. But when reflexion begins to play upon those objects they are dissipated under its influence; the cohesive force seems suspended like some trick of magic; each object is loosed into a group of impressions—colour, odour, texture—in the mind of the observer. And if we continue to dwell in thought on this world, not of objects in the solidity with which language invests them, but of impressions, unstable, flickering, inconsistent, which burn and are extinguished with our consciousness of them, it contracts still further: the whole scope of observation is dwarfed into the narrow chamber of the individual mind. Experience, already reduced to a group of impressions, is ringed round for each one of us by that thick wall of personality through which no real voice has ever pierced on its way to us, or from us to that which we can only conjecture to be without. Everyone of those impressions is the impression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 isolation, each mind keeping as a solitary prisoner its own dream of a world. Analysis goes a step farther still, and assures us that those impressions of the individual mind to which, for each one of us, experience dwindles down, are in perpetual flight; that each of them is limited by time, and that as time is infinitely divisible, each of them is infinitely divisible also; all that is actual in it being a single moment, gone while we try to apprehend it, of which it may ever be more truly said that it has ceased to be than that it is. To such a tremulous wisp constantly reforming itself on the stream, to a single sharp impression, with a sense in it, a relic more or less fleeting, of such moments gone by, what is real in our life fines itself down. It is with this movement, with the passage and dissolution of impressions, images, sensations, that analysis leaves off—that continual vanishing away, that strange, perpetual weaving and unweaving of ourselves.

或者，如果我们从内在的思维世界或感觉世界开始说起，其中更是旋涡湍急，火焰熊熊。那里不再是目光逐渐黯淡，颜色从墙上渐渐褪去这些虽然表面平静、但水下却湍急的岸边的运动，而是中流的竞赛，景象、激情和思想瞬息万变。初看起来，经验好像把我们埋在一个外部事物的洪流里，用一种尖锐的、纠缠不休的事实压迫我们，千方百计地召唤我们脱离自我。但是开始仔细沉思那些物体时，它们在它的作用下消散了，凝聚力如同着了魔一般停滞不动了。每个物体都在观察者的思想里成为一组松散的印象—颜色、气味和纹理。如果我们继续执着于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它还会缩得更小。这里，我们所说的，不是语言涵盖的实在物体的世界，而是包含随着我们对它们的知觉燃烧和消失的闪烁不定、纷繁错杂的印象的世界：整个观察的范围缩小到个人思想的一孔之间。已经缩减成一组印象的经验，在那堵厚实的人格之墙上为我们每个人发出回音，这堵墙真实声音永远无法穿透，我们聆听不到，也无法将我们的声音传达给我们单凭推断而认定的外在世界。每个由那些印象组成的个人都是处于孤立的单个印象，每个心灵都孤单地禁锢在自己梦想世界的牢狱中。分析还可以再进一步，使我们每个人确信：经验缩小而成的那些单个心灵的印象，永远处于飞逝之中。每一个印象都受时间的制约，因为时间是无限可分的，所以它们每一个也是无限可分的。它里面切实存在的一切仅仅存在于刹那间，当我们试着去捉住它时就会消逝无踪。关于它，我们与其说它存在着，不如说它已经停止存在来得更加真实。对于这种不停在川流上一次次自我形成的颤抖的小水波，对于包含着感觉的强烈的印象，对于包含着转瞬即逝的刹那的飞逝的遗迹，我们生命中真实的东西渐渐清晰。就是随着这种运动，随着印象、意象和感觉的转变和消亡，分析停止不前—那种持续的消失，那种我们自身奇异、永恒的组合和拆解停止了。

Philosophiren, says Novalis1, ist dephlegmatisiren, vivificiren. The service of philosophy, of speculative culture, towards the human spirit, is to rouse, to startle it to a life of constant and eager

observation. Every moment some form grows perfect in hand or face; some tone on the hills or the sea is choicer than the rest; some mood of passion or insight or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s irresistibly real and attractive to us,—for that moment only. Not the fruit of experience, but experience itself, is the end. A counted number of pulses only is given to us of a variegated, dramatic life. How may we see in them all that is to be seen in them by the finest senses? How shall we pass most swiftly from point to point, and be present always at the focus where the greatest number of vital forces unite in their purest energy?

诺瓦利斯说，“哲学家，就是要扫除惰性，发扬正气。哲学、纯理论文化对人类精神的作用，就是要激励它，推动它去追求一种崇尚始终如一的、热切的、观察的生活。每个时刻，人的手或面庞呈现完美的形态，山峰或海洋出现格外迷人的色调，热情、洞察力或智慧的亢奋，对我们来说有着不可抗拒的真实感和诱惑力，而且只有此时此刻才是这样。经验本身，而非经验的成果，才是目的所在。纵使生活色彩斑斓、富于戏剧性，我们所获得的也只是有限的脉动。我们怎样用最细腻的感觉来领会其中所有应该被领会的东西呢？我们怎样以最快的速度穿梭于各处，总是出现在最多重要力量以最纯粹的活力结合的焦点呢？

To burn always with this hard, gemlike flame, to maintain this ecstasy, is success in life. In a sense it might even be said that our failure is to form habits: for, after all, habit is relative to a stereotyped world, and meantime it is only the roughness of the eye that makes any two persons, things, situations, seem alike. While all melts under our feet, we may well grasp at any exquisite passion, or any contribution to knowledge that seems by a lifted horizon to set the spirit free for a moment, or any stirring of the senses, strange

dyes, strange colours, and curious odours, or work of the artist's hands, or the face of one's friend. Not to discriminate every moment some passionate attitude in those about us, and in the very brilliancy of their gifts some tragic dividing of forces on their ways, is, on this short day of frost and sun, to sleep before evening. With this sense of the splendour of our experience and of its awful brevity, gathering all we are into one desperate effort to see and touch, we shall hardly have time to make theories about the things we see and touch. What we have to do is to be for ever curiously testing new opinions and courting new impressions, never acquiescing in a facile orthodoxy of Comte, or of Hegel, or of our own. Philosophical theories or ideas, as points of view, instruments of criticism, may help us to gather up what might otherwise pass un regarded by us. "Philosophy is the microscope of thought." The theory or idea or system which requires of us the sacrifice of any part of this experience, in consideration of some interest into which we cannot enter, or some abstract theory we have not identified with ourselves, or of what is only conventional, has no real claim upon us.

能永远和这强烈的、宝石一样的火焰一起燃烧，能保持这种极度的喜悦，是人生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习以为常即意味着失败：因为，毕竟习惯是和一成不变的世界相关，而且只有在粗疏的眼光下，两个人、两件事和两种情况才会显得相类似。当万物在我们脚下融化，我们可能深刻地领会到任何强烈的热情，或者任何通过拓宽的视野使精神获得片刻自由的知识增长，或者任何对感官的刺激，比如奇异的染料、颜色或气味，或是出自艺术家之手的作品，亦或朋友的脸庞。如果不能每时每刻在我们周围的人中分辨出热情的姿态，不能在人们横溢的才华中区分出力量的悲剧性成分，不亚于在这个昼短霜重的日子里，在夜幕降临之前就早早入睡。既然感觉到人生经验的异彩纷呈和倏忽变幻，我们就要聚集起所有力量去观察，去触

摸，几乎没有时间为我们观察和触摸的事物创立理论。我们要做的就是永远充满好奇地检验新观点，争取新的印象，永不默认孔德、黑格尔的或我们自己的那些唾手可得的正统思想。哲学理论或概念，作为立论的观点，作为批评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收集很可能会疏忽未察的事物。“哲学是思想的显微镜。”如果某种理论、概念或是体系，为了某种我们无法分享的兴趣，或是什么我们自己并不认可的抽象理论，或者仅仅为了某种传统习惯，要求我们放弃这种体验的任何一部分，我们都是可以不必理会的。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assages of Rousseau is that in the sixth book of the Confessions, where he de scribes the awakening in him of the literary sense. An undefinable taint of death had clung always about him, and now in early manhood he believed himself smitten by mortal disease. He asked himself how he might make as much as possible of the interval that remained; and he was not biassed by anything in his previous life when he decided that it must be by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which he found just then in the clear, fresh writings of Voltaire. Well! we are all condamnés as, Victor Hugo says: we are all under sentence of death but with a sort of indefinite reprieve—les hommes sont tous condamnés à mort avec des sursis indéfinis: we have an interval, and then our place knows us no more. Some spend this interval in listlessness, some in high passions, the wisest, at least among the children of this world, in art and song. For our one chance lies in expanding that interval, in getting as many pulsations as possible into the given time. Great passions may give us this quickened sense of life, ecstasy and sorrow of love, the various forms of enthusiastic activity, disinterested or otherwise, which come naturally to many of us. Only be sure it is passion—that it does yield you this fruit of a quickened, multiplied consciousness. Of such wisdom, the poetic passion, the desire of beauty, the love of art for its own sake, has

most. For art comes to you proposing frankly to give nothing but the highest quality to your moments as they pass, and simply for those moments' sake.

卢梭最优美的段落之一是在他的《忏悔录》的第六卷里，他描述了文学感觉在他身体里的苏醒。一种无以名状的死亡的阴影总是在他身上挥之不去，此时刚刚成年的他感觉自己已染上了致命的疾病。他问自己怎样才能充分利用剩下的时间。先前的生活经历丝毫未影响他的判断，卢梭决定要将余生用于激扬理性，这是他刚刚在伏尔泰干净清新的作品中感受到的。那好吧！我们都已被定罪，如维克多.雨果所说："我们都被判了死刑，只是还有不知长短的缓刑期而已。"我们只短暂停留一阵，然后我们的世界就不再知道我们了。这段时间里有的人倦怠冷漠，有的人情绪高昂，最聪慧的人，至少是属于"尘世之子"的那些人则把时间放在艺术和诗歌里。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延长这段时间，尽量在给定的时间里获得最多的脉动。巨大的热情可能带给我们一种加速的生命感、爱情的狂喜和伤恸，各种各样的充满热情的活动，它们或者无私或者自私，都自然地发生在我们大多数人身上。请确信只有激情，才会确实给你这种加速的、成倍的感觉。对诗歌的热情、对美的渴望和对艺术本身的热爱是此类智慧之极。因为当艺术降临时，它会坦言，除了在那稍纵即逝的瞬间，它会带给你美的极致的享受之外，不会再有什么。

1. 0

1868 年

(This brief "Conclusion" was omitted in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is book, as I conceived it might possibly mislead some of those

young men into whose hands it might fall. On the whole, I have thought it best to reprint it here, with some slight changes which bring it closer to my original meaning. I have dealt more fully in Marius the Epicurean with the thoughts suggested by it.)

(这个简短的“结论”在本书第二版中没有出现，因为我认为它可能误导一些读到它的年轻人。总的来说，我认为最好能将其进行一些修改，使它更符合我的原意后再收录于此。我在《享乐主义者马里厄斯》中对这里指出的思想做了更多阐释。)

1.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诗人。早期浪漫派代表人物。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乌托邦

Utopia

[英]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乌托邦

Utopia

托马斯·莫尔 著

目 录

- Introduction 引言
- Chapter 1: Discourses of Raphael Hythloday, of the Best State of a Commonwealth 第一章：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某共和国理想城邦的谈话
- Chapter 2: Of Their Towns, Particularly of Amaurot 第二章：关于城镇，尤其是亚马乌罗提城
- Chapter 3: Of Their Magistrates 第三章：关于地方官员
- Chapter 4: Of Their Trades, and Manner of Life 第四章：关于职业及生活方式
- Chapter 5: Of Their Traffic 第五章：关于他们的交际方式
- Chapter 6: Of the Travelling of the Utopians 第六章：关于乌托邦人的旅行等
- Chapter 7: Of Their Slaves, and of Their Marriages 第七章：关于奴隶和婚姻
- Chapter 8: Of Their Military Discipline 第八章：关于战争
- Chapter 9: Of the Religions of the Utopians 第九章：关于乌托邦人的宗教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Introduction

引言

Sir Thomas More, son of Sir John More, a justice of the King's Bench, was born in 1478, in Milk Street, in the city of London. After his earlier education at St. Anthony's School, in Threadneedle Street, he was placed, as a boy, in the household of Cardinal John Morto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and Lord Chancellor. It was not unusual for persons of wealth or influence and sons of good families to be so established together in a relation of patron and client. The youth wore his patron's livery, and added to his state. The patron used, afterwards, his wealth or influence in helping his young client forward in the world. Cardinal Morton had been in earlier days that Bishop of Ely whom Richard III. sent to the Tower; was busy afterwards in hostility to Richard; and was a chief adviser of Henry VII., who in 1486 made him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and nine months afterwards Lord Chancellor. Cardinal Morton—of talk at whose table there are recollections in “Utopia”—delighted in the quick wit of young Thomas More. He once said, “Whoever shall live to try it, shall see this child here waiting at table prove a notable and rare man.”

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年生于伦敦牛奶街。他的父亲约翰·莫尔是王座法庭的法官。莫尔幼年就读于针线街的圣安东尼学校，寄住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大法官约翰·莫顿的家中。对于那些有权或有钱的上流社会的子孙来说，作为客人寄居在神职人员的家中是很常见的事。年轻的客人身着主人家的制服，让对方脸上有光。此后，主人会动用自己的金钱或权力帮助客人走向社会。大主教莫顿早年任伊利镇主教

时，被理查三世关进伦敦塔，重获自由后，对理查三世充满憎恨；后来莫顿成为亨利七世的首席顾问，并于1486年被亨利七世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九个月后，就任大法官。大主教莫顿——作者曾在《乌托邦》里回忆过他餐桌上的谈话——欣赏托马斯·莫尔的机敏。他曾这样说道，“你们要是能活到足够大的岁数，就能看到这个侍奉你们进餐的孩子将会成为多么举世瞩目的奇才。”

At the age of about nineteen, Thomas More was sent to Canterbury College, Oxford, by his patron, where he learnt Greek of the first men who brought Greek studies from Italy to England—William Grocyn and Thomas Linacre. Linacre, a physician, who afterwards took orders, was also the founder of 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In 1499, More left Oxford to study law in London, at Lincoln's Inn, and in the next year Archbishop Morton died.

约19岁时，托马斯·莫尔被莫顿送往牛津的坎特伯雷学院，向第一批将希腊文研究从意大利带到英格兰的学者——威廉·格罗辛和托马斯·里纳克尔（一名医生，后来也曾任神职，是英格兰皇家医学院的创始人）学习希腊文。1499年，莫尔离开牛津，来到伦敦的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第二年，大主教莫顿去世。

More's earnest character caused him while studying law to aim at the subduing of the flesh, by wearing a hair shirt, taking a log for a pillow, and whipping himself on Fridays. At the age of twenty-one he entered Parliament, and soon after he had been called to the bar he was made Under-Sheriff of London. In 1503 he opposed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Henry VII.'s proposal for a subsidy on account of the marriage portion of his daughter Margaret; and he opposed with so much energy that the House refused to grant it. One went

and told the king that a beardless boy had disappointed all his expectations. During the last years, therefore, of Henry VII. More was under the displeasure of the king, and had thoughts of leaving the country.

莫尔为人严肃认真，在学习法律的同时，还试图压抑自己的肉体，穿苦行者穿的粗布衬衣，用圆木当枕头，每星期五抽打自己。他22岁进入议会，成为律师后不久，就被任命为伦敦市副督察。1503年，亨利七世提出要为女儿玛格丽特贴补嫁妆，莫尔在下议院提出抗议；抗议过于强烈，被下议院驳回了。有人向国王传话说，有个嘴上没毛的小子扫了您的兴致。因此在亨利七世执政晚期，不受国王待见的莫尔曾考虑就此离开英格兰。

Henry VII. died in April, 1509, when More's age was a little over thirty. In the first years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he rose to large practice in the law courts, where it is said he refused to plead in cases which he thought unjust, and took no fees from widows, orphans, or the poor. He would have preferred marrying the second daughter of John Colt, of New Hall, in Essex, but chose her elder sister, that he might not subject her to the discredit of being passed over.

1509年4月，亨利七世驾崩，那一年莫尔刚三十出头。在亨利八世执政的头几年，他在法庭大展身手，据说他拒绝为不公正的一方辩护，也不向寡妇、孤儿和穷人收取一分钱费用。他本打算娶埃塞克斯郡纽荷尔镇约翰·柯尔特的次女为妻，最后却娶了长女，这是因为他不想跳过长女直接娶次女而使长女的名誉受损。

In 1513 Thomas More, still Under-Sheriff of London, is said to have written his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King Edward V., and of the Usurpation of Richard III.” The book, which seems to contain the knowledge and opinions of More's patron, Morton, was not printed until 1557, when its writer had been twenty-two years dead. It was then printed from a MS. in More's handwriting.

1513年，仍任伦敦市副督察的莫尔据说就已写下了《爱德华五世的一生，以及理查德三世的篡位》。直到1557年，莫尔去世22年后，这本似乎包含莫顿的知识和见解的书才得以出版。当时是以莫尔的手稿为蓝本印刷的。

In the year 1515 Wolsey, Archbishop of York, was made Cardinal by Leo X.; Henry VIII. made him Lord Chancellor, and from that year until 1523 the King and the Cardinal ruled England with absolute authority, and called no parliament. In May of the year 1515 Thomas More—not knighted yet—was joined in a commission to the Low Countries with Cuthbert Tunstal and others to confer with the ambassadors of Charles V., then only Archduke of Austria, upon a renewal of alliance. On that embassy More, aged about thirty-seven, was absent from England for six months, and while at Antwerp he established friendship with Peter Giles (Latinised Ægidius), a scholarly and courteous young man, who was secretary to the municipality of Antwerp.

1515年，约克郡大主教托马斯·沃尔西被利奥十世任命为大主教；同年，被亨利八世任命为大法官。1515至1523年期间，亨利八世和大主教共同享有统治英格兰的最高权威，连续8年没有召开议会。1515年5月，还未授爵的托马斯·莫尔与卡思伯特·滕斯托尔及其他

人士一道加入访问低地国家的代表团，与查尔斯五世（奥地利唯一的大公）的大使商谈联盟的重建事宜。作为随行人员，时年约37岁的莫尔在国外待了6个月。在安特卫普，他和彼得·贾尔斯（拉丁名埃吉迪厄斯）建立了友谊。这名博学而谦逊的青年当时是安特卫普市政府的秘书。

Cuthbert Tunstal was a rising churchman, chancellor to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who in that year (1515) was made Archdeacon of Chester, and in May of the next year (1516) Master of the Rolls. In 1516 he was sent again to the Low Countries, and More then went with him to Brussels, where they were in close companionship with Erasmus.

卡思伯特·滕斯托尔是一名前途无量的神职人员，时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司铎。1515年，被任命为切斯特市领班神父，第二年5月，被任命为掌案法官。1516年卡思伯特再次到访低地国家，莫尔随他来到布鲁塞尔，二人和伊拉斯谟交往甚密。

More's “Utopia” was written in Latin, and is in two parts, of which the second, describing the place (ονδποτε—or Nusquama, as he called it sometimes in his letters—“Nowhere”), was probably written towards the close of 1515; the first part, introductory, early in 1516. The book was first printed at Louvain, late in 1516,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Erasmus, Peter Giles, and other of More's friends in Flanders. It was then revised by More, and printed by Frobenius at Basle in November, 1518. It was reprinted at Paris and Vienna, but was not printed in England during More's lifetime.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this country wa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made in Edward's VI.'s reign (1551) by Ralph Robinson. It was translated

with more literary skill by Gilbert Burnet, in 1684, soon after he had conducted the defence of his friend Lord William Russell, attended his execution, vindicated his memory, and been spitefully deprived by James II. of his lectureship at St. Clement's. Burnet was drawn to the translation of “Utopia” by the same sense of unreason in high places that caused More to write the book. Burnet's is the translation given in this volume.

《乌托邦》原文由拉丁文写成，分为两部分，第二部分描绘当地（ονδποτε—或Nusquama， 有时在信里也称“乌有之乡”）风土人情，很可能是1515年年底完成的；第一部分的介绍则是1516年年初完成的。1516年，该书在卢万首次出版，由伊拉斯谟、彼得·贾尔斯以及其他弗兰德斯的友人共同编辑。后来，莫尔对其进行了修订。1518年11月，由弗罗贝尼乌斯在巴塞尔出版。这本书在巴黎和维也纳也再版过，但莫尔在世之时尚未在英格兰出版。《乌托邦》在英格兰首次出版时，人们看到的是它的英文译本，是拉尔夫·罗宾逊于爱德华六世时期译成的。吉尔伯特·伯恩奈特1684年的译文更富有文学技巧（那一年，伯恩奈特刚为他的朋友威廉·拉塞尔勋爵做完辩护，参加了他的处决仪式，缅怀了他的一生，又被心怀不满的詹姆斯二世夺去了在圣克利门特教堂讲道的资格）。伯恩奈特被乌托邦的译文所吸引，是因为和莫尔的写作初衷一样，他也发现了统治阶层的不合理之处。本书呈现的是伯恩奈特的译文。

The name of the book has given an adjective to our language—we call an impracticable scheme Utopian. Yet, under the veil of a playful fiction, the talk is intensely earnest, and abounds in practical suggestion. It is the work of a scholarly and witty Englishman, who attacks in his own way the chief political and social evils of his time. Beginning with fact, More tells how he was sent into Flanders with Cuthbert Tunstal, “whom the king's majesty

of late, to the great rejoicing of all men, did prefer to the office of Master of the Rolls;" how the commissioners of Charles met them at Bruges, and presently returned to Brussels for instructions; and how More then went to Antwerp, where he found a pleasure in the society of Peter Giles which soothed his desire to see again his wife and children, from whom he had been four months away. Then fact slides into fiction with the finding of Raphael Hythloday (whose name, made of two Greek words [Greek text] and [Greek text], means "knowing in trifles"), a man who had been with Amerigo Vespucci in the three last of the voyages to the new world lately discovered, of which the account had been first printed in 1507, only nine years before Utopia was written.

本书的书名为我们的语言贡献了一个新的形容词——我们称不切实际的计划为"乌托邦式的"。尽管如此，藏在游戏般的虚构作品的面纱之下的，则是极其严肃的谈话，其中不乏实用的建议。《乌托邦》的作者是一个渊博而诙谐的英格兰人，用自己的方式抨击着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弊端。故事始于现实，莫尔讲述了自己和卡思伯特·滕斯托尔如何被派往弗兰德斯，"众望所归，英明的国王将案卷主事官一职赐予卡思伯特"；他们如何在布鲁日与查尔斯代表团会面，又如何回到布鲁塞尔听候指示；自己如何来到安特卫普，和彼得·贾尔斯相谈甚欢，缓解了与妻儿分离四月的相思之苦。当他们见到拉斐尔·希斯拉德（这个名字由两个希腊单词组成，意为"知道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时，一切就由现实滑入了虚构。拉斐尔曾跟随亚美利哥·韦斯浦契三次（也是最后的三次）前往近期发现的新世界，他的见闻首次发表于1507年，距《乌托邦》写成只有9年。

Designedly fantastic in suggestion of details, "Utopia" is the work of a scholar who had read Plato's "Republic," and had his fancy quickened after reading Plutarch's account of Spartan life

under Lycurgus. Beneath the veil of an ideal communism, into which there has been worked some witty extravagance, there lies a noble English argument. Sometimes More puts the case as of France when he means England. Sometimes there is ironical praise of the good faith of Christian kings, saving the book from censure as a political attack on the policy of Henry VIII. Erasmus wrote to a friend in 1517 that he should send for More's “Utopia,” if he had not read it, and “wished to see the true source of all political evils.” And to More Erasmus wrote of his book, “A burgomaster of Antwerp is so pleased with it that he knows it all by heart.”

《乌托邦》在细节暗示上设计得相当精彩。作者是一名饱学之士，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看过普鲁塔克笔下吕库古统治的斯巴达人的生活后，他的想象力迅速膨胀。理想的社会主义面纱之下（机智地加入了一些夸张的成分），是一个英格兰人高贵的论争。有时他明着谈论法兰西，暗地影射英格兰。有时又讽刺式地颂扬基督教国王的虔诚，让此书不至被当作对亨利八世政策的政治抨击而受到审查。1517年，伊拉斯谟在给朋友的信中建议道，如果他还没读过莫尔的《乌托邦》，就应该订购一本，并“希望（对方）看到所有政治弊端的真正来源”。在给莫尔的信中，伊拉斯谟这样提到他的书，“安特卫普的一位镇长非常喜欢这本书，能从头背到尾。”

H.M.

H.M.

Chapter 1: Discourses of Raphael Hythloday, of the Best State of a Commonwealth

第一章：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某共和国理想城邦的谈话

Henry VIII, the unconquered King of England, a prince adorned with all the virtues that become a great monarch, having some differences of no small consequence with Charles, the most serene Prince of Castile, sent me into Flanders, as his ambassador, for treating and composing matters between them. I was colleague and companion to that incomparable man Cuthbert Tonstal, whom the King with such universal applause lately made Master of the Rolls, but of whom I will say nothing; not because I fear that the testimony of a friend will be suspected, but rather because his learning and virtues are too great for me to do them justice, and so well known that they need not my commendations unless I would, according to the proverb, “Show the sun with a lanthorn.” Those that were appointed by the Prince to treat with us, met us at Bruges, according to agreement; they were all worthy men. The Margrave of Bruges was their head, and the chief man among them; but he that was esteemed the wisest, and that spoke for the rest, was George Temse, the Provost of Casselsee; both art and nature had concurred to make him eloquent: he was very learned in the law; and as he had a great capacity, so by a long practice in affairs he was very dexterous at unravelling them.

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战无不胜，威震四方，集君王的各种美德于一身。近来，他与性格沉稳内敛的卡斯提尔王储查尔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争议，便派遣我作为他的大使去弗兰德斯解决争端，圆

和事宜。我将陪伴才华盖世的卡思伯特·滕斯托尔一同出使。最近，在大家的一致呼声中，他被国王任命为法院的掌案法官；我个人不会对他发表任何恭维的评论；倒不是担心作为朋友，我的赞美不容易被人信服，而是因为他的学识和德行已经超出了我能够公允评价的范围。他的才华人尽皆知，我也就不需要多加评论，正如谚语所说的，“打着灯笼找太阳——多此一举。”根据事先的安排，王储的使臣们在布鲁日接见了我们，他们也都是些德行高尚的人。布鲁日总督是他们的主管兼领头人，然而这群人里面最聪明睿智、最有发言权的是乔治·坦西斯–卡塞尔的教务长：他天赋过人，精通雄辩的艺术，而且熟知各种法典；由于具有非凡的才华，经过长时间的外交谈判，他处理事务变得游刃有余。

After we had several times met without coming to an agreement, they went to Brussels for some days to know the Prince's pleasure. And since our business would admit it, I went to Antwerp. While I was there, among many that visited me, there was one that was more acceptable to me than any other, Peter Giles, born at Antwerp, who is a man of great honor, and of a good rank in his town, though less than he deserves; for I do not know if there be anywhere to be found a more learned and a better bred young man: for as he is both a very worthy and a very knowing person, so he is so civil to all men, so particularly kind to his friends, and so full of candor and affection, that there is not perhaps above one or two anywhere to be found that are in all respects so perfect a friend. He is extraordinarily modest, there is no artifice in him; and yet no man has more of a prudent simplicity: his conversation was so pleasant and so innocently cheerful, that his company in a great measure lessened any longings to go back to my country, and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which an absence of four months had quickened very much. One day as I was returning home from mass at St. Mary's, which is the chief church, and the most frequented of any in

Antwerp, I saw him by accident talking with a stranger, who seemed past the flower of his age; his face was tanned, he had a long beard, and his cloak was hanging carelessly about him, so that by his looks and habit I concluded he was a seaman.

我们谈判过几次后，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于是他们决定动身回布鲁塞尔几天，听取王储的意见。正好，我也要前往安特卫普办些公事。在我逗留期间，有许多人前来拜访我，我对其中的一个访客很中意，他就是出生在安特卫普的彼得·贾尔斯。他在城中很有地位，并且受人爱戴，但我仍然觉得他应该被好好提拔，因为他是我见过的学识最渊博、最有教养的年轻人。他的教养和学识使得他能够礼貌地对待所有人，尤其是他的朋友。世上像他那样正直热忱的人估计没有几个，从各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完美的挚友：他是那样地谦恭有礼，毫不矫揉造作，为人审慎又天真淳朴。他谈吐风趣文雅，令人愉悦。有了他的陪伴，即便返回祖国、再次与妻儿团聚的时日遥遥无期，也能倍感安慰，于是四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有一天，从圣母院（当地主教堂，也是安特卫普人出入最频繁的教堂）做完弥撒返回家的路上，我碰巧遇见他跟一个陌生人在交谈。那人已经上了年纪，脸色黝黑，胡须很长，一件披风随意地披在身上。凭借他的外表和穿着，我推测出他是一名水手。

As soon as Peter saw me, he came and saluted me; and as I was returning his civility, he took me aside, and pointing to him with whom he had been discoursing, he said: “Do you see that man? I was just thinking to bring him to you.”

彼得一看见我，便向我走来打招呼，我正待回礼，他把我拉到一边，指着刚才跟他谈话的那个人说道：“你看到那个人了吗？我正要带他去见你呢。”

I answered, “He should have been very welcome on your account.”

我说道：“你引荐的人，我当然欢迎。”

“And on his own too,” replied he, “if you knew the man, for there is none alive that can give so copious an account of unknown nations and countries as he can do; which I know you very much desire.”

“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彼得说道，“等认识他以后，你会发现这世上没有人比他对那些未知的国家和民族更了解，我知道你对这些事情非常感兴趣。”

Then said I, “I did not guess amiss, for at first sight I took him for a seaman.”

“好吧，”我说道，“看来我没猜错，看他第一眼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水手。”

“But you are much mistaken,” said he, “for he has not sailed as a seaman, but as a traveller, or rather a philosopher. This Raphael, who from his family carries the name of Hythloday, is not ignorant of the Latin tongue, but is eminently learned in the Greek, having applied himself more particularly to that than to the former,

because he had given himself much to philosophy, in which he knew that the Romans have left us nothing that is valuable, except what is to be found in Seneca and Cicero. He is a Portuguese by birth, and was so desirous of seeing the world that he divided his estate among his brothers, ran the same hazard as Americus Vespucius, and bore a share in three of his four voyages, that are now published; only he did not return with him in his last, but obtained leave of him almost by force, that he might be one of those twenty four who were left at the farthest place at which they touched, in their last voyage to New Castile. The leaving him thus did not a little gratify one that was more fond of travelling than of returning home to be buried in his own country; for he used often to say that the way to heaven was the same from all places; and he that had no grave had the heaven still over him. Yet this disposition of mind had cost him dear, if God had not been very gracious to him; for after he, with five Castilians, had travelled over many countries, at last, by strange good fortune, he got to Ceylon, and from thence to Calicut, where he very happily found some Portuguese ships, and, beyond all men's expectations, returned to his native country.”

“那你可就真错了，”彼得说道，“他出海不是以水手的身份，而是以旅行家、哲学家的身份四处游历。他叫拉斐尔，他的家族姓氏是希斯拉德。他略懂拉丁语，精通希腊语。他在希腊语上下的功夫要比在拉丁语上下的多，这是因为他潜心研究哲学，而他觉得在哲学上，除了塞内加和西塞罗两位学者，罗马人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是一个纯种的葡萄牙人，迫切地想要认识这个世界。于是他将自己的财产分给了几个兄弟，然后就随着亚美利哥·韦斯浦契一起出海冒险了。在韦斯浦契为人所知的四次航行中，他参与了三次。最后一次他没有随韦斯浦契一起回来，而且他甚至武力要挟韦斯浦契同意将他留下，和另外二十三个人留在第四次航程的最远端——新要塞。能留下

来让他大为振奋，因为他宁可冒着生命危险去四处流浪，也不愿意回到家乡过安稳平庸的日子。他有两句老话经常挂在嘴边：“上天堂的路不管在哪儿远近都一样”和“人死不怕没棺材，上有青天做遮盖”。要不是上帝保佑，他这样不羁的性情肯定会让他吃尽苦头的；留在那里之后，他和其他五个新要塞人游历了许多国家。最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把他带到了锡兰（今斯里兰卡），又转到卡利卡特，在那里遇到了几条葡萄牙船只，使他兴奋不已；最后竟然出乎意料地又回到了祖国。”

When Peter had said this to me, I thanked him for his kindness, in intending to give me the acquaintance of a man whose conversation he knew would be so acceptable; and upon that Raphael and I embraced each other. After those civilities were passed which are usual with strangers upon their first meeting, we all went to my house, and entering into the garden, sat down on a green bank, and entertained one another in discourse. He told us that when Vespucius had sailed away, he and his companions that stayed behind in New Castile, by degrees insinuated themselves into the affections of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meeting often with them, and treating them gently: and at last they not only lived among them without danger, but conversed familiarly with them; and got so far into the heart of a prince, whose name and country I have forgot, that he both furnished them plentifully with all things necessary, and also with the conveniences of travelling; both boats when they went by water, and wagons when they travelled over land: he sent with them a very faithful guide, who was to introduce and recommend them to such other princes as they had a mind to see: and after many days' journey, they came to towns and cities, and to commonwealths, that were both happily governed and well-peopled. Under the equator, and as far on both sides of it as the sun moves, there lay vast deserts that were parched with the perpetual

heat of the sun; the soil was withered, all things looked dismally, and all places were either quite uninhabited, or abounded with wild beasts and serpents, and some few men that were neither less wild nor less cruel than the beasts themselves.

彼得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很感谢他让我跟那人结识的好意，他觉得我会对那人的谈话很感兴趣。于是我和拉斐尔相互拥抱，像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一样寒暄了几句，然后我们一起来到了我的住所，坐在花园中的草坡上，愉快地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们，自从韦斯浦契走后，他和同伴们渐渐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他们经常和当地人接触，并且对他们很友善。最终，他们不但跟当地人和平相处，还建立了友谊。此外，他们还赢得了一位国王的好感和赏识，（国王的名字和国家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国王慷慨解囊，为拉斐尔和其他五个同伴提供了充足的供应品和各种便利，既有走水路的船只，又有走陆路的马车。还派遣了一位忠诚的向导，引导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国家并予以引荐。他们游历多日，到过各色乡镇城市以及人口众多、治理有序的国家。在赤道以及赤道两边太阳运转所能照射到的地方，由于热气不断熏灼，沙漠广阔无垠。那里土壤干旱，万物萧条，要么是寸草不生、杳无人迹的不毛之地，要么栖息着野兽和蛇虫，以及比野兽更残暴的野蛮人。

But as they went farther, a new scene opened, all things grew milder, the air less burning, the soil more verdant, and even the beasts were less wild: and at last there were nations, towns, and cities, that had not only mutual commerce among themselves, and with their neighbors, but traded both by sea and land, to very remote countries. There they found the conveniences of seeing many countries on all hands, for no ship went any voyage into which he and his companions were not very welcome. The first vessels that they saw were flat-bottomed, their sails were made of

reeds and wicker woven close together, only some were of leather; but afterward they found ships made with round keels and canvas sails, and in all respects like our ships; and the seamen understood both astronomy and navigation. He got wonderfully into their favor, by showing them the use of the needle, of which till then they were utterly ignorant. They sailed before with great caution, and only in summer-time, but now they count all seasons alike, trusting wholly to the loadstone, in which they are perhaps more secure than safe; so that there is reason to fear that this discovery, which was thought would prove so much to their advantage, may by their imprudence become an occasion of much mischief to them. But it were too long to dwell on all that he told us he had observed in every place, it would be too great a digression from our present purpose: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be told, concerning those wise and prudent institutions which he observed among civilized nations, may perhaps be related by us on a more proper occasion. We asked him many questions concerning all these things, to which he answered very willingly; only we made no inquiries after monsters, than which nothing is more common; for everywhere one may hear of ravenous dogs and wolves, and cruel man-eaters; but it is not so easy to find States that are well and wisely governed.

不过，走得再远一些，新景象就出现了。一切都变得舒适宜人，气候也不再那么酷热，地面长满青草，兽类也变得温顺。最后，他们来到了人口聚居的乡镇和城市，这些城镇不但有内部贸易，而且和邻国以及遥远的国家都有水陆贸易往来。拉斐尔说，当时他们有很多访问周边国家的机会，因为无论哪条航线上的船只都很欢迎他和他的同伴搭乘。他们最初所看到的船只都是平底的，航行时使用一种芦苇或柳条编成的帆，也有一些用皮革制成的帆。不过之后他们又看到了尖龙骨和帆布篷的船，这种船和我们现在的船很相似。水手们都懂得天文知识和航海知识，拉斐尔指导他们如何使用指南针，因此获得了大

家的好感；此前他们对指南针一无所知，航行时都是谨小慎微，只在夏季出航；现在他们则完全信任指南针，认为一年四季都可出航，不会有任何危险。。因此我们有理由担心，新技术的运用不一定会跟设想的一样带来巨大好处，他们可能因为鲁莽，一不留神就惨遭不测。我们不想大费周章地记录下他在每处地方的所见所闻，这也偏离了本书的目的。我们希望在另外一个合适的场合讲述其他的故事，尤其是任何对读者有益的东西，比如他所观察到的那些文明国家设立的明智而谨慎的法律条文。关于这些我们向他询问了很多问题，他非常乐意回答。我们没有打听一些怪兽的见闻，像贪婪的狼狗以及凶残的食人兽这种传闻在哪里都可以听到，而治理有方的国家并不是随处可见的。

As he told us of many things that were amiss in those new discovered countries, so he reckoned up not a few things from which patterns might be taken for correcting the errors of these nations among whom we live; of which an account may be given, as I have already promised, at some other time; for at present I intend only to relate those particulars that he told us of the manners and laws of the Utopians: but I will begin with the occasion that led us to speak of that commonwealth. After Raphael had discoursed with great judgment on the many errors that were both among us and these nations; had treated of the wise institutions both here and there, and had spoken as distinctly of the customs and government of every nation through which he had passed, as if he had spent his whole life in it, Peter, being struck with admiration, said: “I wonder, Raphael, how it comes that you enter into no king's service, for I am sure there are none to whom you would not be very acceptable: for your learning and knowledge both of men and things, are such that you would not only entertain them very pleasantly, but be of great use to them, by the examples you could set before them and the advices you could give them; and by this

means you would both serve your own interest and be of great use to all your friends.”

拉斐尔提出，这些新发现的国家自身还存在诸多弊病，同时也列举出诸多我们国家可以借鉴的模式，以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之前也承诺过了，会在其他的场合再具体详谈。现在我只想谈谈他所说的关于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的细节，不过我首先得讲一讲我们是如何谈论到这个国家的。拉斐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国家和这些新发现的国家存在的弊病以及明智的举措；并且能非常清晰地谈论关于自己所到国家的治理和习俗，就好像在那里过了一辈子一样。彼得对他赞赏有加，感叹道：“啊，拉斐尔，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去辅佐一位国王呢？我相信没有一个国王不欢迎你：你拥有如此渊博的学识，通晓世间的风土人情，你不仅能愉悦他们的身心，还能为他们树立榜样，出谋划策；这样一来，不仅对你自身极其有利，还能帮衬到你的亲友。”

“As for my friends,” answered he, “I need not be much concerned, having already done for them all that was incumbent on me; for when I was not only in good health, but fresh and young, I distributed that among my kindred and friends which other people do not part with till they are old and sick, when they then unwillingly give that which they can enjoy no longer themselves. I think my friends ought to rest contented with this, and not to expect that for their sake I should enslave myself to any king whatsoever.”

“提起我的亲友，”他回答说，“我不用为他们太过操心，因为对他们我已经尽了应有的义务。在我年轻力壮、身强体健的时候就已经将我的财产分配给我的亲友了，而不是像其他人，等到自己年老体衰、

无福消受时再不得已地将财产赠予他人。因此在这一点上，我的亲友们应对我的慷慨感到满足，不会期望我为了他们的缘故再去侍奉国王。”

“Soft and fair,” said Peter, “I do not mean that you should be a slave to any king, but only that you should assist them, and be useful to them.”

“说得妙！”彼得说道，“但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去侍奉国王，而是去辅佐国王。”

“The change of the word,” said he, “does not alter the matter.”

“换个说法罢了，”他说，“意思还是一样的。”

“But term it as you will,” replied Peter, “I do not see any other way in which you can be so useful, both in private to your friends, and to the public, and by which you can make your own condition happier.”

彼得接着说：“不管你怎么称呼这种生活，但我觉得你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最大程度地为你的亲友和全国所有公民造福，同时让自己的生活更惬意。”

“Happier!” answered Raphael; “is that to be compassed in a

way so abhorrent to my genius? Now I live as I will, to which I believe few courtiers can pretend. And there are so many that court the favor of great men, that there will be no great loss if they are not troubled either with me or with others of my temper.”

“更惬意？”拉斐尔说道，“难道我要通过自己内心所厌恶的方式来使自己过得更惬意吗？如今我的生活随心所欲，我相信没有几个大臣可以像我这样。而且世上有那么多趋炎附势的人，权贵身边少几个像我这样的人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Upon this, said I: “I perceive, Raphael, that you neither desire wealth nor greatness; and indeed I value and admire such a man much more than I do any of the great men in the world. Yet I think you would do what would well become so generous and philosophical a soul as yours is, if you would apply your time and thoughts to public affairs, even though you may happen to find it a little uneasy to yourself: and this you can never do with so much advantage, as by being taken into the counsel of some great prince, and putting him on noble and worthy actions, which I know you would do if you were in such a post; for the springs both of good and evil flow from the prince, over a whole nation, as from a lasting fountain. So much learning as you have, even without practice in affairs, or so great a practice as you have had, without any other learning, would render you a very fit counsellor to any king whatsoever.”

对于这一点，我说道：“亲爱的拉斐尔，我相信你不是贪慕财富和权势的人。实际上，比起世界上其他有地位的大人物，我最尊敬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虽然投身于公共事业、为大家谋福利对你来说有

些强人所难，然而这确实与你宽宏的气度和富有哲理的气概相称。而且如果想要很好地实现这一点，只有成为伟大国王的谋臣，并且劝诫他实行高尚且有裨益的举措，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国王的一举一动，就如同永不枯竭的泉水一般，或正或邪，都会流遍全国。无论是像你一样学识渊博、但没有处事经验的人，还是学识短浅、但是处事经验丰富的人，都会成为国王的得力能臣。”

“You are doubly mistaken,” said he, “Mr. More, both in your opinion of me, and in the judgment you make of things: for as I have not that capacity that you fancy I have, so, if I had it, the public would not be one jot the better, when I had sacrificed my quiet to it. For most princes apply themselves more to affairs of war than to the useful arts of peace; and in these I neither have any knowledge, nor do I much desire it: they are generally more set on acquiring new kingdoms, right or wrong, than on governing well those they possess. And among the ministers of princes, there are none that are not so wise as to need no assistance, or at least that do not think themselves so wise that they imagine they need none; and if they court any, it is only those for whom the prince has much personal favor, whom by their fawnings and flatteries they endeavor to fix to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indeed Nature has so made us that we all love to be flattered, and to please ourselves with our own notions. The old crow loves his young, and the ape her cubs. Now if in such a court, made up of persons who envy all others, and only admire themselves, a person should but propose anything that he had either read in history or observed in his travels, the rest would think that the reputation of their wisdom would sink, and that their interest would be much depressed, if they could not run it down: and if all other things failed, then they would fly to this, that such or such things pleased our ancestors, and it were well for us if we could but match them. They would set

up their rest on such an answer, as a sufficient confutation of all that could be said, as if it were a great misfortune, that any should be found wiser than his ancestors; but though they willingly let go all the good things that were among those of former ages, yet if better things are proposed they cover themselves obstinately with this excuse of reverence to past times. I have met with these proud, morose, and absurd judgments of things in many places, particularly once in England.”

他回道：“亲爱的莫尔，有两点你说错了。一是你对我的看法，二是你对事情的判断。我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有才能，而且即便我有如此才能并且能够牺牲自己安逸的生活，我也不能为公众谋福祉。对大多数国王来说，比起寻求安民让内之术，他们更热衷于南征北伐；而我不谙武略，更无意参与战事。无论是通过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国王们都迫切地去讨伐他国，开拓疆土，无心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国土。而且大臣们要么足智多谋，不需要他人进言献策，要么就自恃聪明，不屑听取别人的建议。他们只对国王青睐的宠臣争相谄媚，卖乖讨好，以便争取自己的利益。其实这是天性使然，人人都喜欢被奉承，都自恃高明，就好比“猴不嫌儿丑，鸦不嫌仔黑”。如果朝廷中的大臣们都相互妒忌，人人骄矜自满，那么如果有人通过反思历史、结合游历经验提出一些独到的见地，恐怕其他大臣们会群起而攻之。因为他们会觉得受到了威胁，认为自己在才智方面所负的盛名将毁于一旦，自身的利益也将瓦解。如果所有的驳击都遭遇失败，那么他们会拿出这样的说辞：诸如此类的传统是从祖先那里沿袭下来的，应该予以保留，但求我们像祖先一样英明。他们总会以这样的回答结束，似乎这个理由已经很充分了，足以反驳其他所有有创造性的见地；而且似乎如果有人表现得比祖先还要英明，将是巨大的灾难一样。也就是说，当有更好的创见被提出时，他们总会拿对祖先的崇敬作为借口，来反驳和抵制这些创见。然而，对于往日的那些优良传统，他们却往往选择视而不见，漠然处之。如此自负、孤傲、荒谬地固执己见的人，在许多国家都屡见不鲜，我在英格兰就遇到过这样的人。”

“Were you ever there?” said I.

“你去过英格兰？”我问道。

“Yes, I was,” answered he, “and stayed some months there not long after the rebellion in the west was suppressed with a great slaughter of the poor people that were engaged in it. I was then much obliged to that reverend prelate, John Morto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Cardinal, and Chancellor of England: a man,” said he, “Peter (for Mr. More knows well what he was), that was not less venerable for his wisdom and virtues than for the high character he bore. He was of a middle stature, not broken with age; his looks begot reverence rather than fear; his conversation was easy, but serious and gravehe sometimes took pleasure to try the force of those that came as suitors to him upon business, by speaking sharply though decently to them, and by that he discovered their spirit and presence of mind, with which he was much delighted, when it did not grow up to impudence, as bearing a great resemblance to his own temper; and he looked on such persons as the fittest men for affairs. He spoke both gracefully and weightily; he was eminently skilled in the law, had a vast understanding and a prodigious memory; and those excellent talents with which nature had furnished him were improved by study and experience. When I was in England the King depended much on his counsels, and the government seemed to be chiefly supported by him; for from his youth he had been all along practised in affairs; and having passed through many traverses of fortune, he had with great cost acquired a vast stock of wisdom, which is not soon lost when it is purchased so dear.

他回答说："是啊，我在那儿住过几个月，那是英格兰西部人民起义惨遭失败后不久，当时起义受到镇压，很多人惨遭屠杀。我很感激尊敬的约翰·莫顿教主，他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又是当时的英格兰大法官。彼得，你知道吗，（拉斐尔是专对彼得说的，因为莫尔对于大主教非常了解，无需对其赘述），这位大主教博古通今、德高望重，非常值得尊敬。他大概中等身材，神采焕发；仪容尊贵端庄，又没有凌人的气势；他的言谈总是和蔼可亲，但是对于谒见有所请求的人，他喜欢摆出一幅凌厉严肃的姿态，意在考验对方；他的话语犀利却不失德行，使得对方的胆识和气度显露无遗；坦然无惧又不失仪是他所欣赏的，这与他自身的性情相近，他将此类人视作奉公理事之才。他的谈吐优雅沉稳；精于律法、博闻强识；卓越的天赋加上后天的勤奋和历练使他更加出类拔萃。国王非常器重他，我在英格兰的时候，他几乎是整个国家仰仗的栋梁；从年少起，他便开始奉公处事，一生经历了各种世运沉浮，饱经坎坷，如今才能成此大器，他的才华很难被埋没。

"One day when I was dining with him there happened to be at table one of the English lawyers, who took occasion to run out in a high commendation of the severe execution of justice upon thieves, who, as he said, were then hanged so fast that there were sometimes twenty on one gibbet; and upon that he said he could not wonder enough how it came to pass, that since so few escaped, there were yet so many thieves left who were still robbing in all places. Upon this, I who took the boldness to speak freely before the cardinal, said there was no reason to wonder at the matter, since this way of punishing thieves was neither just in itself nor good for the public; for as the severity was too great, so the remedy was not effectual; simple theft not being so great a crime that it ought to cost a man his life, no punishment how severe soever being able to restrain those from robbing who can find out no other way of

livelihood. 'In this,' said I, 'not only you in England, but a great part of the world imitate some ill masters that are readier to chastise their scholars than to teach them. There are dreadful punishments enacted against thieves, but it were much better to make such good provisions by which every man might be put in a method how to live, and so be preserved from the fatal necessity of stealing and of dying for it.'

“某日，我正和他共进晚餐，有一个在英格兰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在座。这人借机谈起了英格兰对于盗窃犯的严格刑法，并对此大肆称赞。他讲到盗窃犯落网后会很快被处以绞刑，有时候一个刑台要同时处死20个罪犯。关于这一点他也感到很困惑，既然很少有窃贼漏网，那么全国各地的盗窃活动怎么还是那么猖獗呢。对此，我不揣冒昧，在主教面前毫不隐讳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说这件事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将盗窃犯处以极刑一来有失公允，二来对公众也非常不利；盗窃的刑罚虽然严苛，然而却收效甚微。首先，盗窃罪还没有严重到罪犯必须性命相抵，况且那些人也是无处谋生，迫于无奈只能去做偷鸡摸狗的事情，任何刑罚都没法阻止他们。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英格兰的情况和其他大部分地区都类似。这很像那些误人子弟的教师们，对于犯错的学生，他们总是棍棒相加，而不是施以教化。与其对盗窃犯制定严厉的刑法，不如采取妥善的措施使得人人都能自谋生路，而不至于为了生存走极端去偷窃，最后死路一条。’

“'There has been care enough taken for that,' said he, 'there are many handicrafts, and there is husbandry, by which they may make a shift to live unless they have a greater mind to follow ill courses.'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已经采取了充分的措施，’那人说，‘我们有发达的手工艺和农牧业，从事这些行业完全可以谋生，除非有些人不

甘心，非想做些不法的勾当。’

“'That will not serve your turn,' said I, 'for many lose their limbs in civil or foreign wars, as lately in the Cornish rebellion, and some time ago in your wars with France, who being thus mutilated in the service of their king and country, can no more follow their old trades, and are too old to learn new ones: but since wars are only accidental things, and have intervals, let us consider those things that fall out every day. There is a great number of noblemen among you, that are themselves as idle as drones, that subsist on other men's labor, on the labor of their tenants, whom, to raise their revenues, they pare to the quick. This indeed is the only instance of their frugality, for in all other things they are prodigal, even to the beggaring of themselves: but besides this, they carry about with them a great number of idle fellows, who never learned any art by which they may gain their living; and these, as soon as either their lord dies or they themselves fall sick, are turned out of doors; for your lords are readier to feed idle people than to take care of the sick; and often the heir is not able to keep together so great a family as his predecessor did. Now when the stomachs of those that are thus turned out of doors grow keen, they rob no less keenly; and what else can they do? for when, by wandering about, they have worn out both their health and their clothes, and are tattered, and look ghastly, men of quality will not entertain them, and poor men dare not do it, knowing that one who has been bred up in idleness and pleasure, and who was used to walk about with his sword and buckler, despising all the neighborhood with an insolent scorn as far below him, is not fit for the spade and mattock: nor will he serve a poor man for so small a hire, and in so low a diet as he can afford to give him.'

“‘事情不会轻易如你们所愿的，’我反驳说，‘在对内战争和对外战争中很多人都失去了手脚。远的且不说，就说最近跟康沃尔人的作战，以及前不久跟法兰西的对战，很多士兵为国王和国家尽忠的同时弄得四肢不全，战后也就无法重操旧业，年纪太大又无法学习新手艺。然而战争毕竟是偶然事件，中间会有和平时期，我们姑且不考虑这些人，先着眼于眼前吧。现在，大批的贵族如同雄蜂一样，自己整天无所事事、饱食终日，靠着狠狠剥削佃农们过活，壮大家业。他们总是挥金如土，唯一“锱铢必较”的地方就是对自家佃户们的剥削无度。除此之外，他们还养活着一大批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随从；这些人一旦生病，或者一旦他们的主人去世，他们便会被驱逐出门；因为对于贵族们来说，宁可养闲人也不会养病人；他们的后嗣往往也无力像先人一样维持偌大的门户。那些被赶出门的随从很快会挨饿，于是便去偷抢，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混迹街头的日子使得他们贫病交迫、衣衫褴褛、面目全非。绅士们不愿去雇佣他们，穷人们也不敢使唤他们，因为他们太了解这类人了：这些人过惯了无所事事的日子，只知道寻欢作乐、带着剑盾四处游走，对周围所有地位低于他们的人都嗤之以鼻，傲慢无礼。这种人根本不会为了微薄的报酬和粗淡的饭食拿起锄头和铲子，老实巴交地干活。’

“To this he answered: 'This sort of men ought to be particularly cherished, for in them consists the force of the armies for which we have occasion; since their birth inspires them with a nobler sense of honor than is to be found among tradesmen or ploughmen.'

“那个人反驳我说：‘这类人正是我们应该大力扶持的，因为一旦需要作战，他们将成为主力军；比起商贩和农民，他们的出身使得他们有高尚的荣誉感。’

“'You may as well say,' replied I, 'that you must cherish thieves

on the account of wars, for you will never want the one as long as you have the other; and as robbers prove sometimes gallant soldiers, so soldiers often prove brave robbers; so near an alliance there is between those two sorts of life. But this bad custom, so common among you, of keeping many servants, is not peculiar to this nation. In France there is yet a more pestiferous sort of people, for the whole country is full of soldiers, still kept up in time of peace, if such a state of a nation can be called a peace: and these are kept in pay upon the same account that you plead for those idle retainers about noblemen; this being a maxim of those pretended statesmen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public safety to have a good body of veteran soldiers ever in readiness. They think raw men are not to be depended on, and they sometimes seek occasions for making war, that they may train up their soldiers in the art of cutting throats; or as Sallust observed, for keeping their hands in use, that they may not grow dull by too long an intermission. But France has learned to its cost how dangerous it is to feed such beasts.

“我说道：‘你倒不如说，为了作战需要就必须包庇盗窃犯。只要养着这些人，盗窃犯罪就无法绝迹。而且，战场上骁勇善战的士兵往往也是胆大包天的盗贼，这两种角色总是互通的，难分难解。然而，养闲人这种丑恶的习俗不仅出现在英格兰，在其他国家也屡见不鲜。在法兰西，即便是在和平时期（如果那种情形可以算作和平时期的话），整个国家也遍布着雇佣兵，这批人更加危险。很多国家都会以需要人打仗为由，养着一批懒散的随从。政治家们总是自作聪明的认为：为了政局安定，就必须有一批身强体壮而且经验丰富的士兵随时待命。他们认为新兵是靠不住的，因此有时还会故意挑起战争，为的就是让士兵们练练手，在战场上肆意杀戮。正如萨卢斯特所说的那样，“一天不练，手生脚慢。”然而法兰西吃了大亏才意识到养着这群野兽是多么危险的事。

“'The fate of the Romans, Carthaginians, and Syrians, and many other nations and cities, which were both overturned and quite ruined by those standing armies, should make others wiser: and the folly of this maxim of the French appears plainly even from this, that their trained soldiers often find your raw men prove too hard for them; of which I will not say much, lest you may think I flatter the English. Every day's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mechanics in the towns, or the clowns in the country, are not afraid of fighting with those idle gentlemen, if they are not disabled by some misfortune in their body, or dispirited by extreme want, so that you need not fear that those well-shaped and strong men (for it is only such that noblemen love to keep about them, till they spoil them) who now grow feeble with ease, and are softened with their effeminate manner of life, would be less fit for action if they were well bred and well employed. And it seems very unreasonable that for the prospect of a war, which you need never have but when you please, you should maintain so many idle men, as will always disturb you in time of peace, which is ever to be more considered than war. But I do not think that this necessity of stealing arises only from hence; there is another cause of it more peculiar to England.'

“‘罗马、迦太基、叙利亚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城邦的政权都曾被常备军队推翻，毁于一旦，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同时也能看出法兰西的行为实在是愚蠢。实际上，他们训练有素的士兵在跟你们的新兵对战时是非常吃力的。关于这点我也无需多说，不然会有奉承英格兰之嫌。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来自城镇的手工艺人还是乡下的乡巴佬，只要他们身体健全、体格健壮，精神没有被穷困的生活摧毁，那么跟那些游手好闲的“绅士”们打起仗来是毫不畏惧的。因此，只要他们平日里衣食无忧，并且本分踏实地工作，就不必担心他们打不过那些曾经身强力壮的佣兵（贵族们总偏爱身体强壮的随从，对他们施以

过分的恩宠），因为那些佣兵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悠闲日子，实际上已经变得柔弱不堪了。我认为当前的状况对于社会安定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只要不蓄意挑起战争，就不会有战乱。但是只要你养着这样一批游手好闲的人，社会就永不会安宁，这才是大家应该深思的。然而我也不认为盗窃猖獗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对于英格兰来说，还有其他特殊的因素。’

“'What is that?' said the cardinal.

“那是什么呢？”主教问道。

“'The increase of pasture,' said I, 'by which your sheep, which are naturally mild, and easily kept in order, may be said now to devour men, and unpeople, not only villages, but towns; for wherever it is found that the sheep of any soil yield a softer and richer wool than ordinary, there the nobility and gentry, and even those holy men the abbots, not contented with the old rents which their farms yielded, nor thinking it enough that they, living at their ease, do no good to the public, resolve to do it hurt instead of good. They stop the course of agriculture, destroying houses and towns, reserving only the churches, and enclose grounds that they may lodge their sheep in them. As if forests and parks had swallowed up too little of the land, those worthy countrymen turn the best inhabited places in solitudes, for when an insatiable wretch, who is a plague to his country, resolves to enclose many thousand acres of ground, the owners as well as tenants are turned out of their possessions, by tricks, or by main force, or being wearied out with ill-usage, they are forced to sell them. By which means those miserable people, both men and women, married and unmarried,

old and young, with their poor but numerous families (since country business requires many hands), are all forced to change their seats, not knowing whither to go; and they must sell almost for nothing their household stuff, which could not bring them much money, even though they might stay for a buyer. When that little money is at an end, for it will be soon spent, what is left for them to do, but either to steal and so to be hanged (God knows how justly), or to go about and beg? And if they do this, they are put in prison as idle vagabonds; while they would willingly work, but can find none that will hire them; for there is no more occasion for country labor, to which they have been bred, when there is no arable ground left. One shepherd can look after a flock which will stock an extent of ground that would require many hands if it were to be ploughed and reaped. This likewise in many places raises the price of corn.

“‘过度放牧，’我说道，‘羊这种动物天性温顺且易于驯服，然而据说你们的羊现在变得贪婪凶残，以至于要吃人，并把你们的村庄和城镇都践踏得惨不忍睹。凡是跟以往相比，能产出更多柔顺羊毛的地区，都会有很多贵族豪绅、甚至是神职人员和教士们，这些人不再满足于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变得贪得无厌。他们养尊处优，对社会不仅毫无贡献，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他们停止耕种活动，拆毁房屋、毁坏城镇，只保留教堂，并将所有土地都圈起来做牧场来圈养羊群。这些地主贵戚们似乎还嫌浪费在建设园囿庭院上的土地不够多似的，生生将美好的居住地变成了荒地。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些贪得无厌的小人就如同瘟疫一般可怕。他们将数千公顷的土地围起来做牧场，并用欺诈或是暴力的手段强行占有穷人的财产；或对穷人们施以苛待，折磨得他们迫于无奈只好卖掉房产地产。这些悲惨的人们，男女老少拖家带口、流离失所、无处安身。这些家庭虽贫穷却人口众多（务农需要很多人手）。他们等待着买主，然后以极其低贱的价格变卖家产，换来的钱少得可怜。这点钱很快会花完，然后他们又能怎么

办呢，只能去偷抢，最后难逃被绞死的命运（天知道到底公不公平！）；要么就沿街乞讨、四处流浪，然而这样一来又会被当作妨碍治安的游民被抓捕入狱。即便他们想要找份工作，也没有人愿意雇佣他们。因为国家已经没有那么多耕地了，他们也就没法再做拿手的农活了。一片土地如果用来耕种的话，会需要一大帮的劳动力，但如果用来圈养羊群，那么雇佣一个牧羊人就足够了。这种情况也导致了很多地区的粮价陡增。

“"The price of wool is also so risen that the poor people who were wont to make cloth are no more able to buy it; and this likewise makes many of them idle. For since the increase of pasture, God has punished the avarice of the owners by a rot among the sheep, which has destroyed vast numbers of them; to us it might have seemed more just had it fell on the owners themselves. But suppose the sheep should increase ever so much, their price is not like to fall; since though they cannot be called a monopoly, because they are not engrossed by one person, yet they are in so few hands, and these are so rich, that as they are not pressed to sell them sooner than they have a mind to it, so they never do it till they have raised the price as high as possible. And on the same account it is, that the other kinds of cattle are so dear, because many villages being pulled down, and all country labor being much neglected, there are none who make it their business to breed them. The rich do not breed cattle as they do sheep, but buy them lean, and at low prices; and after they have fattened them on their grounds sell them again at high rates. And I do not think that all the inconveniences this will produce are yet observed, for as they sell the cattle dear, so if they are consumed faster than the breeding countries from which they are brought can afford them, then the stock must decrease, and this must needs end in great scarcity; and by these means this your island, which seemed as to this particular the happiest in the world,

will suffer much by the cursed avarice of a few persons; besides this, the rising of corn makes all people lessen their families as much as they can; and what can those who are dismissed by them do, but either beg or rob? And to this last, a man of a great mind is much sooner drawn than to the former.

“‘羊毛的价格也迅速高涨，一向以织羊毛为生的英格兰穷人们再也买不起羊毛，于是大批赋闲。牧场如此扩张，上帝似乎想要惩罚那些农场主的贪婪，于是将瘟疫降临羊群，以致大批的羊死于瘟疫。其实，瘟疫降临在牧场主自己身上似乎才更公道些。尽管羊的繁殖量大幅增加，价格却依然居高不下。由于售户不止一家，因此无法被视作垄断。然而市场确实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他们个个非富即贵，并不急于脱手，而是待价而沽。出于同样的缘由，其他牲畜的价格也涨得厉害，当然这主要还因为许多村庄遭到破坏、农业萧条，无人从事畜牧饲养。富人们并不像养羊那样去养牛，他们通常以极低的价格买来那些瘦弱的牛，等把它们在自家土地上喂肥了再以高价卖出去。我认为这样一种生产模式的弊病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富人将买来的牛高价出售从中获利，可是一旦他们的采购需求高于进口国家牛的繁殖量，那么就会出现供小于求的状况，从而造成商品短缺。这样一来，由于少数人的贪得无厌，你们这样一个人间天堂似的岛国要遭受沉重苦难了。除此之外，粮食价格的上涨使得许多家庭不得不削减人手，那么那些被解雇的人该如何生存呢？除了去乞讨和偷抢还有别的选择吗？况且稍有胆识的人可能都会选择偷抢这条路。

“'Luxury likewise breaks in apace upon you, to set forward your poverty and misery; there is an excessive vanity in apparel, and great cost in diet; and that not only in noblemen's families, but even among tradesmen, among the farmers themselves, and among all ranks of persons. You have also many infamous houses, and, besides those that are known, the taverns and alehouses are no better; add

to these, dice, cards, tables, foot-ball, tennis, and quoits, in which money runs fast away; and those that are initiated into them, must in the conclusion betake themselves to robbing for a supply. Banish these plagues, and give orders that those who have dispeopled so much soil, may either rebuild the villages they have pulled down, or let out their grounds to such as will do it: restrain those engrossings of the rich, that are as bad almost as monopolies; leave fewer occasions to idleness; let agriculture be set up again, and the manufacture of the wool be regulated, that so there may be work found for those companies of idle people whom want forces to be thieves, or who, now being idle vagabonds or useless servants, will certainly grow thieves at last. If you do not find a remedy to these evils, it is a vain thing to boast of your severity in punishing theft, which though it may have the appearance of justice, yet in itself is neither just nor convenient. For if you suffer your people to be ill-educated, and their manners to be corrupted from their infancy, and then punish them for those crimes to which their first education disposed them, what else is to be concluded from this, but that you first make thieves and then punish them?'

“‘现在的情形是：一边穷困潦倒，另一边奢侈无度；各个阶层的人，无论是贵族、商贩还是农民，都过于讲究穿着，纵情吃喝。除了妓院、赌庄这些糜烂场所，许多酒馆茶肆也堕落不堪；人们沉溺于各种娱乐活动：骰子、纸牌、桌球、足球、网球、套环游戏等，然而这些娱乐都代价不菲；人们一旦沉迷于此，就只能通过偷抢维继这样的生活。应该严令禁止这些不法活动；制定条例，要求那些毁坏田地的人，要么重建被他们摧毁的村庄、要么将土地转交给那些愿意帮助重建的人；限制富人欺行霸市、几近于市场垄断的不法行为；少养活些好吃懒做的人；重振农业、整顿羊毛加工市场，这样一来，那些迫于无奈走上偷盗之路的闲散人员，以及那些最终也会走上这条歪路的流浪汉和被解雇的奴役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不想办法整治这些弊病，再

怎么鼓吹对窃贼的严苛刑罚都是徒劳。这样的极刑表面上是伸张正义，然而实则不公道且不得当。如果国家对国民的教化是失败的，并任其从孩童时期就一步步走向堕落，那么又怎能因为他们犯下罪行去惩罚他们呢？毕竟他们一开始就受到了不良熏陶。国家纵民为盗，又去充当惩治盗贼之人，岂不可笑？’

“While I was talking thus, the counsellor who was present had prepared an answer, and had resolved to resume all I had said, according to the formality of a debate, in which things are generally repeated more faithfully than they are answered; as if the chief trial to be made were of men's memories.

“就在我滔滔不绝的时候，那位法务人员就已经准备好说辞想要将我所说的全部推翻了；并且想要拿出辩论的那一套，也就是将已被说过的话再如实陈述一遍，而不是予以有力的辩驳，就好像只是在展示自己的好记性一样。

“'You have talked prettily for a stranger,' said he, 'having heard of many things among us which you have not been able to consider well; but I will make the whole matter plain to you, and will first repeat in order all that you have said, then I will show how much your ignorance of our affairs has misled you, and will in the last place answer all your arguments. And that I may begin where I promised, there were four things—'

“‘作为一个外乡人，你谈得很不错’，那人说道，‘毕竟你也只是道听途说，并没有去好好思量，但是我会将一切阐释明白。首先，我会将你所说的依次列举，然后，我会指明你对我们的见解是多么的无

知，最后，我会驳倒你所有的观点。正如刚刚所说的，现在我就从你讲过的四点说起——’

“'Hold your peace,' said the cardinal; 'this will take up too much time; therefore we will at present ease you of the trouble of answering, and reserve it to our next meeting, which shall be to-morrow, if Raphael's affairs and yours can admit of it. But, Raphael,' said he to me, 'I would gladly know upon what reason it is that you think theft ought not to be punished by death? Would you give way to it? Or do you propose any other punishment that will be more useful to the public? For since death does not restrain theft, if men thought their lives would be safe, what fear or force could restrain ill men? On the contrary, they would look on the mitigation of the punishment as an invitation to commit more crimes.'

“‘且住，’大主教打断说，‘你这样大费周章，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所以眼前你还是先保留意见吧，等到下次见面再详谈。如果你跟拉斐尔都方便的话，明天再见面怎么样？对了，拉斐尔，’他转身对我说，‘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你认为不该对盗窃犯处以死刑呢？你要任其逍遥法外吗？你觉得怎么用刑对于社会更有利呢？窃贼们现在就已经如此猖狂了，如果再没有了死刑约束他们，他们觉得自己性命无忧，那不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作恶了吗？他们只会反过来将减刑措施看作是对犯罪的鼓励。’

“I answered: 'It seems to me a very unjust thing to take away a man's life for a little money; for nothing in the world can be of equal value with a man's life: and if it is said that it is not for the money that one suffers, but for his breaking the law, I must say extreme justice is an extreme injury; for we ought not to approve of

these terrible laws that make the smallest offences capital, nor of that opinion of the Stoics that makes all crimes equal, as if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to be made between the killing a man and the taking his purse, between which, if we examine things impartially, there is no likeness nor proportion. God has commanded us not to kill, and shall we kill so easily for a little money? But if one shall say, that by that law we are only forbid to kill any, except when the laws of the land allow of it; upon the same grounds, laws may be made in some cases to allow of adultery and perjury: for God having taken from us the right of disposing, either of our own or of other people's lives, if it is pretended that the mutual consent of man in making laws can authorize manslaughter in cases in which God has given us no example, that it frees people from the obligation of the divine law, and so makes murder a lawful action; what is this, but to give a preference to human laws before the divine?

“我说：‘尊敬的大主教，在我看来，因为损失一点钱财而夺取别人的性命是非常不公道的；因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了。如果人们说这样的极刑是在惩罚罪犯违法，而不是惩罚他们偷盗钱财，那么我必须说这种极端的正义恰恰是一种极端的不义；我们既不该赞成那些糟糕的法律准则：小恶严惩，矫枉过正；也不该支持斯多葛派的教义：把一切罪行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将杀人和抢钱看成毫无区别的犯罪。实际上，如果还有公道可言的话，这两种犯罪既没有相似之处，也毫不相干。上帝命令人们戒杀，所以我们怎能因为一点财物而轻易取人性命呢？如果说，上帝只是告诫人们不要滥杀无辜，而根据地方制定的法律，某种情况下是可以杀人的；那么这样说来，也可以制定法律包庇通奸和伪誓了？上帝收走了我们自杀以及杀人的权利。如果人们可以通过共同意愿制定法律规定在哪些情况下可以杀人（在上帝那里是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那么人们就摆脱遵循上帝戒律的义务，可以将死刑纳入法律了。这是一种怎样的行为呢？无疑是

将人的法律置于神的戒律之上。

“'And if this is once admitted, by the same rule men may in all other things put what restrictions they please upon the laws of God. If by the Mosaical law, though it was rough and severe, as being a yoke laid on an obstinate and servile nation, men were only fined and not put to death for theft, we cannot imagine that in this new law of mercy, in which God treats us with the tenderness of a father, he has given us a greater license to cruelty than he did to the Jews. Upon these reasons it is that I think putting thieves to death is not lawful; and it is plain and obvious that it is absurd, and of ill-consequence to the commonwealth, that a thief and a murderer should be equally punished; for if a robber sees that his danger is the same, if he is convicted of theft as if he were guilty of murder, this will naturally incite him to kill the person whom otherwise he would only have robbed, since if the punishment is the same, there is more security, and less danger of discovery, when he that can best make it is put out of the way; so that terrifying thieves too much, provokes them to cruelty.

“‘这样的行为一旦被允许，那么人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上帝的戒律上随意附加各种条件。摩西立法本是用来治理顽固不化的奴隶制国家，虽然粗暴严酷，但是对于偷窃之人也只是处以罚金，而不会判处死刑。因此我们无法想象在仁慈的新法律下，在上帝慈爱之光的沐浴下，上帝会允许我们比犹太人更残忍地对待彼此。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将盗窃犯们判处死刑是不公道的。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将盗窃犯和杀人犯视同一律，这样做真是野蛮荒谬至极，并且对社会非常不利。如果盗窃犯发现自己最终会落得跟杀人犯一样的下场，所受的刑法一样可怕，那么这会诱使他将被抢的人索性杀掉。因为既然面临的刑罚是一样的，杀人灭口还能掩人耳目，自己反而更安全。因

此用太过严酷的刑法威吓盗窃犯，反而会促使他们残忍施暴。

“But as to the question, what more convenient way of punishment can be found? I think it is much easier to find out that than to invent anything that is worse; why should we doubt but the way that was so long in use among the old Romans, who understood so well the arts of government, was very proper for their punishment? They condemned such as they found guilty of great crimes, to work their whole lives in quarries, or to dig in mines with chains about them. But the method that I liked best, was that which I observed in my travels in Persia, among the Polylerits, who are a considerable and well-governed people. They pay a yearly tribute to the King of Persia; but in all other respects they are a free nation, and governed by their own laws. They lie far from the sea, and are environed with hills; and being contented with the productions of their own country, which is very fruitful, they have little commerce with any other nation; and as they, according to the genius of their country, have no inclination to enlarge their borders; so their mountains, and the pension they pay to the Persians, secure them from all invasions.

“‘关于这个问题，那究竟怎样惩罚这些罪犯更加简单易行呢？我认为与其发明一些残酷的刑罚，不如参考一下他国的做法。古罗马人非常精通治国之道，他们自古时就一直沿用的一种刑罚非常巧妙得当。罗马人给被判了重罪的犯人戴上镣铐，罚他们终身去采石场做工。然而对此，我最欣赏的还是游历波斯时在波利来赖塔人的国家所见的那种制度。他们的国家人口众多，而且安定祥和。除了每年向波斯国王进贡外，在哪方面看那都是一个极其自由的国度。他们遵循自己的法律，施行自治。他们国家远离海洋，四面环山；物产丰富，自给自足，很少跟别国通商来往。按照他们国家长久传承的精神传统，

他们没有扩张疆土的野心；四周又有群山做天然屏障，加上对波斯人进贡得到了后者的庇护，因此他们能够安然远离一切侵扰。

“"Thus they have no wars among them; they live rather conveniently than with splendor, and may be rather called a happy nation, than either eminent or famous; for I do not think that they are known so much as by name to any but their next neighbors. Those that are found guilty of theft among them are bound to make restitution to the owner, and not as it is in other places, to the prince, for they reckon that the prince has no more right to the stolen goods than the thief; but if that which was stolen is no more in being, then the goods of the thieves are estimated, and restitution being made out of them, the remainder is given to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and they themselves are condemned to serve in the public works, but are neither imprisoned, nor chained, unless there happened to be some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in their crimes. They go about loose and free, working for the public. If they are idle or backward to work, they are whipped; but if they work hard, they are well used and treated without any mark of reproach, only the lists of them are called always at night, and then they are shut up. They suffer no other uneasiness, but this of constant labor; for as they work for the public, so they are well entertained out of the public stock, which is done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places. In some places, whatever is bestowed on them, is raised by a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and though this way may seem uncertain, yet so merciful are the inclinations of that people, that they are plentifully supplied by it; but in other places, public revenues are set aside for them; or there is a constant tax of a poll-money raised for their maintenance. In some places they are set to no public work, but every private man that has occasion to hire workmen goes to the market-places and hires them of the public, a little lower than he

would do a freeman: if they go lazily about their task, he may quicken them with the whip.

“‘他们不受战乱之苦，生活虽不富庶，却平淡舒适；国家虽没有显赫的威名，却绝对称得上是一方乐土；我觉得除了邻国以外，估计没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在这个国家，盗窃犯在被定罪后要把赃物还给失主，而不是像其他地方规定地要上交国王。他们认为，国王和盗窃犯都没有获得赃物的权利。如果被盗物品已被销赃，那么就要对盗窃犯进行财产评估，并按价从其财产中取偿，而多余的钱则全部还给犯人的妻子及儿女。至于犯人，则被罚去做公共服务且人身不受约束，既不用坐牢也不用戴脚镣，除非他们的犯罪情节极其严重。如果犯人态度懒散或者消极怠工，他们就会受到鞭笞。若是他们认真工作，就会受到善待并免遭责骂，只是在晚上经过例行点名之后被关押起来。除了要经常劳动之外，他们不必遭什么罪；而且由于是为公众服务，他们衣食无缺，一般由公库开支。不过具体的情况也是各地相异，例如在一些地区，用于他们身上的开支来自于慈善捐款。虽然这种筹资方式看起来不太稳定，但是波利来赖塔人本性慈悲善良，可以保证足够供给；在其他一些地区，则有专项的财政资金用于负担他们的开支；有一些地区则按民意抽取特定的税收充当这笔经费。还有一些地区的犯人无须为公众服劳役，如果有任何公民需要帮工，就可到市场雇佣他们，并付给他们略低于自由公民的工钱。如果受雇的犯人消极怠工，那么雇主可以使用鞭子督促他们。

“'By this means there is always some piece of work or other to be done by them; and beside their livelihood, they earn somewhat still to the public. They all wear a peculiar habit, of one certain color, and their hair is cropped a little above their ears, and a piece of one of their ears is cut off. Their friends are allowed to give them either meat, drink, or clothes so they are of their proper color, but it is death, both to the giver and taker, if they give them money; nor

is it less penal for any freeman to take money from them, upon any account whatsoever: and it is also death for any of these slaves (so they are called) to handle arms. Those of every division of the country are distinguished by a peculiar mark; which it is capital for them to lay aside, to go out of their bounds, or to talk with a slave of another jurisdiction; and the very attempt of an escape is no less penal than an escape itself; it is death for any other slave to be accessory to it; and if a freeman engages in it he is condemned to slavery. Those that discover it are rewarded—if freemen, in money; and if slaves, with liberty, together with a pardon for being accessory to it; that so they might find their account, rather in repenting of their engaging in such a design, than in persisting in it.

“‘这样一来，犯人们就不愁无工可做了，不仅能维持生计，还能造福公众。他们需要穿清一色的特定服装，头发要剪短至稍高于双耳，并且一只耳朵要被削掉一块。他们可以接受朋友赠送的饮食以及符合规定颜色的衣物，不过赠送财物对于赠者和受者来说都是死罪。自由公民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凡是接受犯人的财物都会面临死罪；任何奴役（定罪犯人的通称）凡是接触武器，也会被处以死刑。这个国家每一地区的奴役都带有特殊标识，以便识别；如果奴役丢弃标识、越过本区的边界或者与其他辖区的奴役交谈，都将面临死刑的惩罚。此外，密谋逃亡将与实际逃亡同等论罪。若是有奴役牵涉其中，将被处以死刑；若是自由公民伙同参与，将被罚令充当奴役。相反，告发此事的人将获得奖励：自由公民获得财物，奴役恢复自由，同时免予追究同谋的罪行。也就是说，作恶到头的人决不能比及早回头的人得到更多的好处。

“'These are their laws and rules in relation to robbery, and it is obvious that they are as advantageous as they are mild and gentle; since vice is not only destroyed, and men preserved, but they

treated in such a manner as to make them see the necessity of being honest, and of employing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in repairing the injuries they have formerly done to society. Nor is there any hazard of their falling back to their old customs: and so little do travellers apprehend mischief from them, that they generally make use of them for guides, from one jurisdiction to another; for there is nothing left them by which they can rob, or be the better for it, since, as they are disarmed, so the very having of money is a sufficient conviction: and as they are certainly punished if discovered, so they cannot hope to escape; for their habit being in all the parts of it different from what is commonly worn, they cannot fly away, unless they would go naked, and even then their cropped ear would betray them. The only danger to be feared from them is their conspiring against the government: but those of one division and neighborhood can do nothing to any purpose, unless a general conspiracy were laid among all the slaves of the several jurisdictions, which cannot be done, since they cannot meet or talk together; nor will any venture on a design where the concealment would be so dangerous and the discovery so profitable. None are quite hopeless of recovering their freedom, since by their obedience and patience, and by giving good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y will change their manner of life for the future, they may expect at last to obtain their liberty: and some are every year restored to it, upon the good character that is given of them.'

“‘这就是他们关于盗窃的法律和刑罚，很显然，这种做法合乎人道且益处多多；这样一来，不仅消除了罪恶，保留了人力，而且犯人们也能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在余生中通过为公众服务来弥补过错。人们也无需担心他们会重蹈覆辙。即便是旅客也不会对他们心存芥蒂，通常还会雇他们做向导，从一个辖区去往另一个辖区。奴役们没有可用于抢劫的工具。他们不能携带武器，也不能私藏财物。一经被

捕，就会受到惩处，想逍遥法外是绝不可能的。由于他们的穿着异于常人，除非赤裸上路，不然就算插翅也难飞，不过即便赤裸上路，他们残缺的耳朵也会被人识破。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奴役们搞造反叛国的阴谋，然而如果不事先与其他几个辖区的奴役们密谋串通，仅凭一个地区及邻区的奴役们单薄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然而想要串通其他地区的奴役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机会见面或者交谈。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敢轻易将阴谋透露给同伴，毕竟包庇阴谋者是要被处死的，而告发者是可以获得好处的。相反，如果犯人能心甘情愿接受处罚，任劳任怨的服役，并且改过自新，那么就有希望重获自由。实际上，每年都有大批犯人由于服从管教而被给予自由。’

“When I had related all this, I added that I did not see why such a method might not be followed with more advantage than could ever be expected from that severe justice which the counsellor magnified so much. To this he answered that it could never take place in England without endangering the whole nation. As he said this he shook his head, made some grimaces, and held his peace, while all the company seemed of his opinion, except the cardinal, who said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form a judgment of its success, since it was a method that never yet had been tried.

“我讲完这些又补充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制度不能在英格兰实施，毕竟我认为比起这位法务人员夸口不绝的严酷刑罚，这种制度有更多裨益’。‘这套制度如果在英格兰施行的话，全国一定鸡犬不宁，’那位法务人员边摇头边努嘴说道，随后沉默下去。在场的人都认为他的话有道理。不过大主教发言说，‘要判断这个制度有利还是有弊实在是一件难事，毕竟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

“'But if,' said he, 'when the sentence of death was passed upon a

thief, the prince would reprieve him for a while, and make the experiment upon him, denying him the privilege of a sanctuary; and then if it had a good effect upon him, it might take place; and if it did not succeed, the worst would be, to execute the sentence on the condemned persons at last. And I do not see,' added he, 'why it would be either unjust, inconvenient, or at all dangerous, to admit of such a delay: in my opinion, the vagabonds ought to be treated in the same manner; against whom, though we have made many laws, yet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gain our end.' When the cardinal had done, they all commended the motion, though they had despised it when it came from me; but more particularly commended what related to the vagabonds, because it was his own observation.

“大主教接着说，‘如果宣判死刑后，英王下令暂缓执行，并且越过宗教庇护，在犯人身上试行此制度；倘若行之有效，那么便可正式实施了；倘若行之不利，那么将已判处死刑的人立即正法就是了，没什么损失。’他又补充道，‘在我看来，这种试行公正可行，不会带来任何不便，也不会招致任何危险。而且我认为可以在游民身上实施这种制度，因为尽管我们屡次制定法律来约束这些人，但是到头来却收效甚微。’大主教发表这番言论后，在场的人都交口称赞，然而刚刚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他们却不以为意。特别是大主教言论中涉及游民的部分，大家尤其恭维，因为这是他的补充意见。

“I do not know whether it be worth while to tell what followed, for it was very ridiculous; but I shall venture at it, for as it is not foreign to this matter, so some good use may be made of it. There was a jester standing by, that counterfeited the fool so naturally that he seemed to be really one. The jests which he offered were so cold and dull that we laughed more at him than at them; yet sometimes he said, as it were by chance, things that were not

unpleasant; so as to justify the old proverb, 'That he who throws the dice often, will sometimes have a lucky hit.' When one of the company had said that I had taken care of the thieves, and the cardinal had taken care of the vagabonds, so that there remained nothing but that some public provision might be made for the poor, whom sickness or old age had disabled from labor, 'Leave that to me,' said the fool, 'and I shall take care of them; for there is no sort of people whose sight I abhor more, having been so often vexed with them, and with their sad complaints; but as dolefully soever as they have told their tale, they could never prevail so far as to draw one penny from me: for either I had no mind to give them anything, or when I had a mind to do it I had nothing to give them: and they now know me so well that they will not lose their labor, but let me pass without giving me any trouble, because they hope for nothing, no more in faith than if I were a priest: but I would have a law made, for sending all these beggars to monasteries, the men to the Benedictines to be made lay-brothers, and the women to be nuns.'

“我不知道还该不该继续往下讲，因为后面发生的事挺可笑。不过我还是得讲，因为后面的事与我们讨论的问题相关，而且还有可取之处。当时我们身边站着一个弄臣，装疯卖傻太逼真了，以至于像是真的蠢。他的那些打趣的话既不合时宜又老套无趣，引旁人发笑的不是他的笑话，却是他本人。然而他嘴里偶然冒出来的一些话，也确实有几分道理。就像那句老话说的，‘经常掷骰子的人，总有蒙对点的时候。’当时有人说道，‘拉斐尔的建议是对付盗窃犯的良好措施，而大主教也讲到了可以实施在游民身上的好办法。接下来就该为那些由于老病而无处谋生、陷于贫困的人制定合适的社会方案了。’“这个交给我吧，’那个傻人说道，‘我最厌恶的就是见到这类人了。平日里老是跟他们生闲气，天天听他们念叨自己的不幸，听他们讲述自己悲惨的故事，然而他们却从没有成功在我这儿捞到半个子儿。要么是我根本不想施舍他们，要么是我想发善心的时候兜里没揣钱。现在他们知道

我的脾气了，也就不再费那口舌了。我从他们身边经过，都不会来缠着我了，因为他们已经不抱希望了，就好像把我当成没钱的教士一样。但是我觉得还是得制定法令，将这些臭乞丐打发到本笃会修道院去，男的做修士，女的做修女。’

“The cardinal smiled, and approved of it in jest; but the rest liked it in earnest. There was a divine present, who though he was a grave, morose man, yet he was so pleased with this reflection that was made on the priests and the monks, that he began to play with the fool, and said to him, 'This will not deliver you from all beggars, except you take care of us friars.'

“大主教微微一笑，把这些话全当玩笑；但是其余的人却是发自内心的赞同。其中有一个神学家，是一个十分阴郁孤僻的人，他对于那些针对修道士和僧侣的言论非常感兴趣，于是颇有玩味地对那人说，‘即便如此，你也没法彻底摆脱那些乞丐们，除非对我们修道士给予照顾。’

“'That is done already,' answered the fool, 'for the cardinal has provided for you, by what he proposed for restraining vagabonds, and setting them to work, for I know no vagabonds like you.'

“‘已经在照顾了，’那傻人反驳道，‘大主教决定把游民监管起来，让他们作工，这就是对你们最大的照顾了，因为我知道游民们都不喜欢你们。’

“This was well entertained by the whole company, who,

looking at the cardinal, perceived that he was not ill-pleased at it; only the friar himself was vexed, as may be easily imagined, and fell into such a passion that he could not forbear railing at the fool, and calling him knave, slanderer, backbiter, and son of perdition, and then cited some dreadful threatenings out of the Scriptures against him. Now the jester thought he was in his element, and laid about him freely.

“当时大家注视着大主教，见他对这些玩笑话并未反感，也就当听个乐子，只有那位修道士恼怒不已，毕竟轻易地被一个弄臣嘲讽了，于是怒不可遏，转而对他破口大骂，骂他是无赖、诽谤者、小人和该死的混蛋，并引用《圣经》上的严词厉句来谴责他。那个弄臣觉得自己发挥本事的时候到了，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地排遣他。

“'Good friar,' said he, 'be not angry, for it is written, “In patience possess your soul.”

“‘神父啊，’那个弄臣说道，‘你千万别生气啊，圣书上不是说了嘛：“常存忍耐可保全灵魂。”’

“The friar answered (for I shall give you his own words), 'I am not angry, you hangman; at least I do not sin in it, for the Psalmist says, “Be ye angry, and sin not.”

“修道士回击他道（原话引在下面）：‘你这混账东西，我才没有生气；至少我并无罪过，写赞美诗的圣人说过，“愤恨本无罪”。’

“Upon this the cardinal admonished him gently, and wished him to govern his passions.

“这时大主教很温和地劝诫那修道士平静下来，希望他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No, my lord,' said he, 'I speak not but from a good zeal, which I ought to have; for holy men have had a good zeal, as it is said, “The zeal of thy house hath eaten me up;” and we sing in our church, that those, who mocked Elisha as he went up to the house of God, felt the effects of his zeal; which that mocker, that rogue, that scoundrel, will perhaps feel.'

“‘不，大人，’那修道士说道，‘我说这番话完全是出于一片热切真挚之心，这也是神职人员本该有的。因为圣书上讲，“我为你的庙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当以利沙向神的处所走去，那些嘲笑他的人，便受到了惩罚；当我们在教堂里齐声高唱时，那些散布谣言之人、无耻之人、下流之人也会受到惩罚吧’。

“'You do this perhaps with a good intention,' said the cardinal; 'but in my opinion it were wiser in you, and perhaps better for you, not to engage in so ridiculous a contest with a fool.'

“‘你这番话也许确实出于好意，’大主教说，‘但是在我看来，别跟一个愚蠢之人陷入滑稽的争论更加明智，对你也更有益处。’

“'No, my lord,' answered he, 'that were not wisely done; for Solomon, the wisest of men, said, “Answer a fool according to his folly;” which I now do, and show him the ditch into which he will fall, if he is not aware of it; for if the many mockers of Elisha, who was but one bald man, felt the effect of his zeal, what will become of one mocker of so many friars, among whom there are so many bald men? We have likewise a bull, by which all that jeer us are excommunicated.'

“‘不，大人，’他回答说，‘我认为我已经做得很明智了。最聪明的所罗门曾经说过，“对付傻子就要用傻子的方式。”我确实这么做了，并且我为他指出了他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的深坑。因为，如果许多人由于嘲笑唯一秃头的以利沙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的话，那么，一个人取笑那么多修道士，其中秃头的不在少数，这个人会有怎样的下场呢！此外，我们还有教皇的谕旨，可根据谕旨把嘲笑我们的人开除教籍。’

“When the cardinal saw that there was no end of this matter, he made a sign to the fool to withdraw, turned the discourse another way, and soon after rose from the table, and, dismissing us, went to hear causes.

“大主教看这事没完没了，就示意让那个弄臣走开，并转到了另一个话题。不一会儿，他也起身离开桌子，将我们都打发走，去听诉状了。

“Thus, Mr. More, I have run out into a tedious story, of the length of which I had been ashamed, if, as you earnestly begged it

of me, I had not observed you to hearken to it, as if you had no mind to lose any part of it. I might have contracted it, but I resolved to give it to you at large, that you might observe how those that despised what I had proposed, no sooner perceived that the cardinal did not dislike it, but presently approved of it, fawned so on him, and flattered him to such a degree, that they in good earnest applauded those things that he only liked in jest. And from hence you may gather, how little courtiers would value either me or my counsels.”

“亲爱的莫尔先生，我讲的故事冗长又乏味，若不是你很想听，并且不肯放过每一个细节，我真不好意思一直喋喋不休地讲下去。我本该说得简练一些，然而我想最大程度上还原当时的情景，以便揭露那些人的真实嘴脸。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他们不以为然，但一看大主教对我的话不加非难，便立马表示赞同，纷纷开始拍马屁，竟如此趋炎附势。而且对于那个弄臣的言论，大主教只是当作玩笑，不曾驳斥，他们却也发自内心地表示赞赏。由此你们可以推断，这些人对我和我的言论是多么嗤之以鼻了。”

To this I answered: “You have done me a great kindness in this relation; for as everything has been related by you, both wisely and pleasantly, so you have made me imagine that I was in my own country, and grown young again, by recalling that good cardinal to my thoughts, in whose family I was bred from my childhood: and though you are upon other accounts very dear to me, yet you are the dearer, because you honor his memory so much; but after all this I cannot change my opinion, for I still think that if you could overcome that aversion which you have to the courts of princes, you might, by the advice which it is in your power to give, do a great deal of good to mankind; and this is the chief design that

every good man ought to propose to himself in living; for your friend Plato thinks that nations will be happy, when either philosophers become kings or kings become philosophers, it is no wonder if we are so far from that happiness, while philosophers will not think it their duty to assist kings with their councils.

我说道："拉斐尔先生，你的故事充满智慧又风趣幽默。听了你的讲述我开心极了，感觉好像置身于自己的国家，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我想起了童年时一位慈爱的大主教，我从小在他的家里长大，十分感念他的栽培。本来出于其他缘故，我已经对你极具好感了，现在你又勾起了我对他的回忆，所以你对我来说更加亲切了。然而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改变我的看法，我仍然觉得你应该摒弃对宫廷的偏见，积极进言献策，为社会造福，每个好公民都应该视此为一生中的首要责任。你喜爱的哲学家柏拉图曾经说过，只有哲学家成为国王或是国王成为哲学家，国家才能幸福安康。所以如果哲学家都不屑于向国王献计进言，那么国家幸福安康将是一件多么遥远的事！"

"'They are not so base-minded,' said he, 'but that they would willingly do it: many of them have already done it by their books, if those that are in power would but hearken to their good advice.' But Plato judged right, that except kings themselves became philosophers, they who from their childhood are corrupted with false notions would never fall in entirely with the councils of philosophers, and this he himself found to be true in the person of Dionysius.

"哲学家并非如此不通情达理，"他回答说，'他们实际上很乐意这么做，许多哲学家著书立说就是出于这个目的，然而当权者却不一定能虚心听取他们的良言。'柏拉图的预见是正确的，但是除非国王们自

己对哲学有研究，不然如果他们从小就被错误的观念熏染，也不会完全赞同哲学家的意见。柏拉图从自己和狄奥尼西奥斯交往的经验中，得到了以上的真理。

“Do not you think that if I were about any king, proposing good laws to him, and endeavoring to root out all the cursed seeds of evil that I found in him, I should either be turned out of his court or at least be laughed at for my pains? For instance, what could it signify if I were about the King of France, and were called into his Cabinet Council, where several wise men, in his hearing, were proposing many expedients, as by what arts and practices Milan may be kept, and Naples, that had so oft slipped out of their hands, recovered; how the Venetians, and after them the rest of Italy, may be subdued; and then how Flanders, Brabant, and all Burgundy, and some other kingdoms which he has swallowed already in his designs, may be added to his empire. One proposes a league with the Venetians, to be kept as long as he finds his account in it, and that he ought to communicate councils with them, and give them some share of the spoil, till his success makes him need or fear them less, and then it will be easily taken out of their hands. Another proposes the hiring the Germans, and the securing the Switzers by pensions. Another proposes the gaining the Emperor by money, which is omnipotent with him. Another proposes a peace with the King of Arragon, and, in order to cement it, the yielding up the King of Navarre's pretensions. Another thinks the Prince of Castile is to be wrought on, by the hope of an alliance; and that some of his courtiers are to be gained to the French faction by pensions. The hardest point of all is what to do with England: a treaty of peace is to be set on foot, and if their alliance is not to be depended on, yet it is to be made as firm as possible; and they are to be called friends, but suspected as enemies: therefore the Scots are to be kept

in readiness, to be let loose upon England on every occasion: and some banished nobleman is to be supported underhand (for by the league it cannot be done avowedly) who has a pretension to the crown, by which means that suspected prince may be kept in awe.

“假如我去辅佐任何一位君王，为他献策进言，想办法彻底根除他们身上的邪念，难道你不觉得我要么会被赶出宫廷，要么就会被人奚落吗？举例来讲，假如我去辅佐法兰西的国王，并且被召入枢密会议，在那里有一群精明的谋臣绞尽脑汁，思考究竟用什么妙策可以占住米兰不放，夺回失去的那不勒斯，然后击败威尼斯，征服全意大利；进而统治弗兰德斯、布拉班特，最终整个勃艮第——还有一些法兰西国王早就有意并吞的其他国家。在这个会上，一个谋臣建议和威尼斯人结成同盟，只要法兰西国王认为还有利可图，就应该把这个同盟维持下去。法兰西将与威尼斯进行正式洽谈，让威尼斯人从掠夺的获利中分一杯羹，等到法兰西强大到不需要威尼斯的帮助，也不畏惧对方的进攻的时候，就可以轻易再将送给他们的东西夺回来。另一个谋臣提出招募德意志的雇佣兵，还有谋臣想收买瑞士人，更有谋臣提议用黄金收买罗马皇帝。还有一位谋臣献计和阿拉贡国王修好，作为和平的保证，可以把纳瓦拉国割让于他。也有谋臣建议应争取一下卡斯提尔国王，让他误以为法兰西要与他结盟，并收买他宫廷中的贵族们，使他们为法兰西效力。“同时，还有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英格兰：和平条约的签订迫在眉睫，因为两国间的联盟是很脆弱的，需要用牢固的契约来加强。跟英格兰人必须表面上修好，实则以敌人相待。因此要让苏格兰人有所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对英格兰采取行动。此外，必须暗中支持某个被流放的贵族取得王位（既有条约，就不好公开支持），从而钳制一个不堪信任的国王。

“Now when things are in so great a fermentation, and so many gallant men are joining councils, how to carry on the war, if so mean a man as I should stand up, and wish them to change all their

councils, to let Italy alone, and stay at home, since the Kingdom of France was indeed greater than could be well governed by one man; that therefore he ought not to think of adding others to it: and if after this, I should propose to them the resolutions of the Achorians, a people that lie on the southeast of Utopia, who long ago engaged in war, in order to add to the dominions of their prince another kingdom, to which he had some pretensions by an ancient alliance. This they conquered, but found that the trouble of keeping it was equal to that by which it was gained; that the conquered people were always either in rebellion or exposed to foreign invasions, while they were obliged to be incessantly at war, either for or against them, and consequently could never disband their army; that in the meantime they were oppressed with taxes, their money went out of the kingdom, their blood was spilt for the glory of their King, without procuring the least advantage to the people, who received not the smallest benefit from it even in time of peace; and that their manners being corrupted by a long war, robbery and murders everywhere abounded, and their laws fell into contempt; while their King, distracted with the care of two kingdoms, was the less able to apply his mind to the interests of either.

“大家讨论地十分热烈，足智多谋的人们争相提出各种军事建议，如果像我这样无足轻重的人站出来，建议他们改变策略，将会怎样呢？假如我规劝大家不要去干涉意大利，攘外必先安内，法兰西本身已经大得不是一个人所能治理得宜的，所以国王也不该急于征服其他疆土，将会怎样呢？我认为应该以阿科里亚人的做法（居住在乌托邦东南部的人们）为例，给他们一些启示。阿科里亚人很久之前卷入了一场战争，为的是为国王征服另一个国家，他们与那个国家有着古老的联盟。他们最终占领了那个国家，不过却发现为保住它所花费的力气完全不亚于夺得它。要么是那些被征服的人民叛乱造反，要么就是其他国家趁机骚扰，于是他们一直被迫卷入各种战争；时而要保护

那些人民，时而要与他们兵刃相向，因此他们一直不得解散军队。与此同时，人民税赋沉重，钱财大量流失到国外，他们为了国王的荣誉流血捐躯，却不能得到丁点儿的好处，就算在和平时期，人民也得不到丝毫裨益。长久的战乱使他们的文明毁于一旦，抢掠和谋杀的阴霾笼罩全国，法律形同虚设。至于他们的国王，整日为两个王国劳心费神，完全不能花心思为两国人民谋福祉。

“When they saw this, an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end to these evils, they by joint councils made an humble address to their King, desiring him to choose which of the two kingdoms he had the greatest mind to keep, since he could not hold both; for they were too great a people to be governed by a divided king, since no man would willingly have a groom that should be in common between him and another. Upon which the good prince was forced to quit his new kingdom to one of his friends (who was not long after dethroned), and to be contented with his old one. To this I would add that after all those warlike attempts, the vast confusions, and the consumption both of treasure and of people that must follow them; perhaps upon some misfortune, they might be forced to throw up all at last; therefore it seemed much more eligible that the King should improve his ancient kingdom all he could, and make it flourish as much as possible; that he should love his people, and be beloved of them; that he should live among them, govern them gently, and let other kingdoms alone, since that which had fallen to his share was big enough, if not too big for him. Pray how do you think would such a speech as this be heard?”

“他们目睹这一切，发现这样下去灾难将无休无止，于是非常恭顺地请求国王做出选择，希望他在两个国家中选择最想保全的一个，因为他实在无法两国兼顾。正如没有人愿意与其他人共享一个仆人，

一个分身乏术的国王无法统治好如此众多的人民。于是，贤明的国王被迫放弃了新征服的国家，并将该国的王位传给了一个朋友（不久这个朋友就被废黜了），安心治理原来的国家。关于这一点，我必须补充几句：国家的穷兵黩武导致了大面积的动荡混乱，金钱大量流失，人民无辜牺牲，终究还是难逃厄运，到最后所有努力付诸东流。因此，作为国王，就应该竭尽所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让它繁荣昌盛；应该爱护自己的子民，并且博得他们的爱戴；应该跟人民同舟共济，施行仁政；不该去觊觎其他国家，因为光是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已经心无余力了。亲爱的莫尔，我这番话你听了作何感想呢？

“I confess,” said I, “I think not very well.”

“坦白讲，我无法完全赞同。”我说。

“But what,” said he, “if I should sort with another kind of ministers, whose chief contrivances and consultations were, by what art the prince's treasures might be increased. Where one proposes raising the value of specie when the King's debts are large, and lowering it when his revenues were to come in, that so he might both pay much with a little, and in a little receive a great deal: another proposes a pretence of a war, that money might be raised in order to carry it on, and that a peace be concluded as soon as that was done; and this with such appearances of religion as might work on the people, and make them impute it to the piety of their prince, and to his tenderness for the lives of his subjects. A third offers some old musty laws, that have been antiquated by a long disuse; and which, as they had been forgotten by all the subjects, so they had been also broken by them; and proposes the levying the penalties of these laws, that as it would bring in a vast

treasure, so there might be a very good pretence for it, since it would look like the executing a law, and the doing of justice. A fourth proposes the prohibiting of many things under severe penalties, especially such as were against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and then the dispensing with these prohibitions upon great compositions, to those who might find their advantage in breaking them. This would serve two ends, both of them acceptable to many; for as those whose avarice led them to transgress would be severely fined, so the selling licenses dear would look as if a prince were tender of his people, and would not easily, or at low rates, dispense with anything that might be against the public good.

“但是，如果我还得对付另外一帮大臣呢？”他继续说，“假设这样一个情景：一帮大臣们正唇枪舌剑，讨论的主题是怎样为国王聚敛更多的财富。其中一个献计：国王在偿还大量负债时将货币升值，征收税收时再将货币贬值，这样一来，既可以用少量的货币还债，又可以从应收进的小笔税收中大捞一笔。另一个大臣则提议拿战争做幌子，以战争为借口筹集款项，等目的达成立马宣布已经与敌国讲和修好。人民会被这样的假象迷惑，以为这都是因为国王仁爱慈悲，不忍国家生灵涂炭。还有一个大臣提出了一些陈年老旧的法典，因长期没有付诸实施而被废弃；这些法典已经被众人遗忘，也就没人去遵守。他提议对不遵守这些法典的人收取罚金，认为这是很好的生财之道，同时也是名正言顺：这是为了维护正义执法。还有一位大臣提议颁布诸多禁令，凡是违反者处以重罚，尤其是侵害人民利益的活动。然后，对于那些因禁令而利益受损的人，向他们索取钱财，特许他们开禁。这样一来，就有两笔进项，并且都能博得大众的欢心；正如对于那些因贪婪而违法之人处以重罚，向他们高价出卖开禁的特权也会显示出国王的贤明，因为这说明国王极不愿轻易给予私人侵害公共利益的特权。

“Another proposes that the judges must be made sure, that they may declare always in favor of the prerogative, that they must be often sent for to court, that the King may hear them argue those points in which he is concerned; since how unjust soever any of his pretensions may be, yet still some one or other of them, either out of contradiction to others or the pride of singularity or to make their court, would find out some pretence or other to give the King a fair color to carry the point: for if the judges but differ in opinion, the clearest thing in the world is made by that means disputable, and truth being once brought in question, the King may then take advantage to expound the law for his own profit; while the judges that stand out will be brought over, either out of fear or modesty; and they being thus gained, all of them may be sent to the bench to give sentence boldly, as the King would have it; for fair pretences will never be wanting when sentence is to be given in the prince's favor. It will either be said that equity lies on his side, or some words in the law will be found sounding that way, or some forced sense will be put on them; and when all other things fail, the King's undoubted prerogative will be pretended, as that which is above all law; and to which a religious judge ought to have a special regard.

“还有大臣建议采取相关措施，确保法官总能作出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判决，确保他们经常去往宫廷，在国王面前辩论那些牵涉国王的案例。无论国王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这些法官中总会有人要么出于存心辩驳他人，要么想彰显自己与众不同，要么想要献媚取宠，总能想到种种冠冕堂皇的托词来为国王开脱。如果法官们对于案例意见相左，对于一件再明晰不过的事情充满争议，同时质疑真理，那么这时国王就可趁机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曲解法律。站出来的法官们或是出于恐惧，或是生性恭顺，无不随声附和，然后就按照国王的意愿，明目张胆地作出判决。有利于国王的判决一经颁布，就不愁寻托词为国王开脱了。要么坚称国王是正义的一方，要么刻意曲解条文中的字眼，

要么对某法令强加解释，如果这些都不通，就会拿出国王的特权无可争议，而且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说辞。一个虔诚的法官总是格外恪守这条原则。

“Thus all consent to that maxim of Crassus, that a prince cannot have treasure enough, since he must maintain his armies out of it: that a king, even though he would, can do nothing unjustly; that all property is in him, not excepting the very persons of his subjects: and that no man has any other property, but that which the King out of his goodness thinks fit to leave him. And they think it is the prince's interest, that there be as little of this left as may be, as if it were his advantage that his people should have neither riches nor liberty; since these things make them less easy and less willing to submit to a cruel and unjust government; whereas necessity and poverty blunt them, make them patient, beat them down, and break that height of spirit, that might otherwise dispose them to rebel. Now what if after all these propositions were made, I should rise up and assert, that such councils were both unbecoming a king, and mischievous to him: and that not only his honor but his safety consisted more in his people's wealth, than in his own; if I should show that they choose a king for their own sake, and not for his; that by his care and endeavors they may be both easy and safe; and that therefore a prince ought to take more care of his people's happiness than of his own, as a shepherd is to take more care of his flock than of himself.

“所有的大臣都赞成克拉苏的名言：只要国王的军队常备不懈，那么他的钱再多也不够。即便国王想要行不义之事，也不存在不义之说。因为国王拥有一切，包括他统治下的所有人民。人民除了国王发善心留给他们的财物外一无所有。大臣们认为人民拥有的越少越好，

就好像剥夺人民的财富和自由对国王十分有利一样。因为人们一旦有了财富和自由，就不会轻易地或者甘心情愿地服从国王蛮横不公的统治。物质和财富的匮乏会使人民变得麻木、病态、身心受挫、萎靡不振，但是同时也可能使他们揭竿而起，叛乱造反。面对这么多的提议，假设我站出来并言明，这些不道德的做法不但与国王的身份不相称，而且还会有损于国王；只有国富民强，国王的英名和国家的稳定才能得以为继，假设我作出这些提议，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我告诉他们人民选出国王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国王。英明的国王励精图治，可以带给人民幸福和安康。因此国王应该将人民的利益置于自身之上，就像牧羊人关心羊群总是多过关心自己一样，如果我说出这些观点，将会怎么样呢？

“It is also certain that they are much mistaken that think the poverty of a nation is a means of the public safety. Who quarrel more than beggars? Who does more earnestly long for a change, than he that is uneasy in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who run to create confusions with so desperate a boldness, as those who have nothing to lose hope to gain by them? If a king should fall under such contempt or envy, that he could not keep his subjects in their duty, but by oppression and ill usage, and by rendering them poor and miserable, it were certainly better for him to quit his kingdom, than to retain it by such methods, as makes him while he keeps the name of authority, lose the majesty due to it. Nor is it so becoming the dignity of a king to reign over beggars, as over rich and happy subjects. And therefore Fabricius, a man of a noble and exalted temper, said, he would rather govern rich men than be rich himself; since for one man to abound in wealth and pleasure, when all about him are mourning and groaning, is to a gaoler and not a king. He is an unskilful physician, that cannot cure one disease without casting his patient into another: so he that can find no other way for correcting the errors of his people, but by taking from them the

conveniences of life, shows that he knows not what it is to govern a free nation. He himself ought rather to shake off his sloth, or to lay down his pride; for the contempt or hatred that his people have for him, takes its rise from the vices in himself. Let him live upon what belongs to him, without wronging others, and accommodate his expense to his revenue. Let him punish crimes, and by his wise conduct let him endeavor to prevent them, rather than be severe when he has suffered them to be too common: let him not rashly revive laws that are abrogated by disuse, especially if they have been long forgotten, and never wanted; and let him never take any penalty for the breach of them, to which a judge would not give way in a private man, but would look on him as a crafty and unjust person for pretending to it.

“许多大臣错误地认为人民穷了国家就能太平。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些事实：乞丐之间的争吵最频繁；那些处境困顿的人才最迫不及待地想要有所改变，那些一无所有而且看不到希望的人才会不顾一切制造事端。如果一位国王由于无法使子民安居乐业，只能通过暴力去镇压他们，让他们变得穷困凄惨，因而遭到人民的蔑视和憎恨，那么这个国王不做也罢，免得要使用这些手段，徒有国王的虚名，毫无尊严可言。如果国王统治的是一群乞丐，而不是富有幸福的人民，那么国王还有何高贵所在。高尚正直的腓布里喜说过，他宁可治理富有的人民，也不愿意自己富有。如果一个人唯独自己坐拥财富和快乐，四周都是哀鸿遍野的凄惨景象，那么他治理的不是国家，而是监狱。总之，给人治好头疼却引发脚痛的那是庸医，同样，如果一个人为了改善公民的生活而必须夺去他们生命中美好的东西，那么他对于如何治理好一个自由的国家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国王应该戒骄戒惰，因为人民对于国王的蔑视和仇恨就来自于国王本身的弊病。国王应该自立自强，量入为出，不要损害他人利益；应该严整法纪又循循善诱，对人民及时施以规劝，防患于未然；对于未付诸实施而被废弃的法律，尤其是那些长期被搁置，视同可无的法律，不应轻率地重新施行；不能

借口处分违法乱纪而没收法庭不容私人占有的财物，因为这会落得欺诈和不公的口实。

“To these things I would add that law among the Macarians, a people that live not far from Utopia, by which their King, on the day on which he begins to reign, is tied by an oath confirmed by solemn sacrifices, never to have at once above 1,000 pounds of gold in his treasures, or so much silver as is equal to that in value. This law, they tell us, was made by an excellent king, who had more regard to the riches of his country than to his own wealth, and therefore provided against the heaping up of so much treasure as might impoverish the people. He thought that a moderate sum might be sufficient for any accident, if either the King had occasion for it against rebels, or the kingdom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an enemy; but that it was not enough to encourage a prince to invade other men's rights, a circumstance that was the chief cause of his making that law. He also thought that it was a good provision for that free circulation of money, so necessary for the course of commerce and exchange: and when a king must distribute all those extraordinary accessions that increase treasure beyond the due pitch, it makes him less disposed to oppress his subjects. Such a king as this will be the terror of ill men, and will be beloved by all the good.

“对此，假如我又向他们提及马克里亚人的法典，又会怎样呢？马克里亚人居住的地方距乌托邦很近，他们的国王在登基的当天就要通过庄严的献祭作出承诺：自己拥有的黄金或者白银的总价值绝对不会超过一千英镑。这条法律是一位贤明的国王制定的，他对国家利益的关心远远高于自己的财富，于是立法来杜绝因国王聚敛财物而致使人民贫困潦倒的现象。这位国王认为这笔钱足够用于平定内乱和抵御

外敌，而且也不至于多到诱使他去侵犯他人的利益，这也是制定这条法律的主要目的。他也认为这样的措施有利于货币的自由流通，对于日常易货贸易是非常必要。凡是国王需使用超出法律所规定限额的金钱，必须从国库调度，这样就避免了压榨人民。这样的国王会使坏人害怕，好人爱戴。

“If, I say, I should talk of these or such like things, to men that had taken their bias another way, how deaf would they be to all I could say?”

“总而言之，如果我把这些意见以及诸如此类的意见，讲给那些跟我意见向左的人，岂不是对牛弹琴？”

“No doubt, very deaf,” answered I; “and no wonder, for one is never to offer at propositions or advice that we are certain will not be entertained. Discourses so much out of the road could not avail anything, nor have any effect on men whose minds were prepossessed with different sentiments. This philosophical way of speculation is not unpleasant among friends in a free conversation, but there is no room for it in the courts of princes where great affairs are carried on by authority.”

“的确会是对牛弹琴，”我答道，“如果你确信自己的言论不会讨人欢心，那么也不必费周章向他们提建议。因为如果人们对事情持有不同的态度和偏见，那么对他们说再多都无济于事，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如果是在跟熟悉的朋友畅快的交谈，你这套纸上谈兵的哲学言论不会招人反感，但如果是在议论大事，左右一切的国王会议上，你的这些想法是无法立足的。”

“That is what I was saying,” replied he, “that there is no room for philosophy in the courts of princes.”

“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回答说，“哲学在政治舞台总是没有立足之地。”

“Yes, there is,” said I, “but not for this speculative philosophy that makes everything to be alike fitting at all times: but there is another philosophy that is more pliable, that knows its proper scene, accommodates itself to it, and teaches a man with propriety and decency to act that part which has fallen to his share. If when one of Plautus's comedies is upon the stage and a company of servants are acting their parts, you should come out in the garb of a philosopher, and repeat out of 'Octavia,' a discourse of Seneca's to Nero, would it not be better for you to say nothing than by mixing things of such different natures to make an impertinent tragi-comedy? For you spoil and corrupt the play that is in hand when you mix with it things of an opposite nature, even though they are much better. Therefore go through with the play that is acting, the best you can, and do not confound it because another that is pleasanter comes into your thoughts. It is even so in a commonwealth and in the councils of princes; if ill opinions cannot be quite rooted out, and you cannot cure some received vice according to your wishes, you must not therefore abandon the commonwealth; for the same reasons you should not forsake the ship in a storm because you cannot command the winds. You are not obliged to assault people with discourses that are out of their road, when you see that their received notions must prevent your making an impression upon them. You ought rather to cast about

and to manage things with all the dexterity in your power, so that if you are not able to make them go well they may be as little ill as possible; for except all men were good everything cannot be right, and that is a blessing that I do not at present hope to see.”

“哲学确有立足之地，”我说道，“只不过这套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纸上谈兵式哲学在政治舞台是站不住脚的。还是另一种哲学思维更受欢迎——那些哲学家们深知适合自己的舞台，并能灵活适应，努力让自己举止得体、表达得宜。试想一下，如果舞台上正在上演普劳图斯的喜剧，一众丑角卖力表演着自己的戏份，而你一上来竟然一副哲学家的装扮，并朗诵《屋大维娅》悲剧中塞内加与尼禄皇帝的辩词，与其这样将不同性质的事物杂糅在一起，呈现一出十分尴尬的悲喜剧，还不如在一旁一言不发。你会将一出有序上演的戏毁掉，就因为你混入了另一种极端性质的东西，即便这些东西本身更有价值。因此你能做的就是让舞台上的戏进行到底，不要因为想到其他更有趣的戏就把台上的搞砸了。无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还是对于国王议会来说，都是如此。正如你不能因为无法控制风向而在暴风雨中放弃整条船，即使错误的观点无法被彻底消除，即使你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纠正那些被公认的错误，你也切不能因此将整个国家弃之不顾。出于同样的原因，当你发现传统的观念深入人心，自己的想法不被接受，人民冥顽不灵、不服教化，你也不能因此对他们加以指责。你应该极尽聪明才智，千方百计地变通行事，这样一来，即便他们不能完全改邪归正，也能开始步入正轨。因为事事如意是不可能的，除非世上人人都好，但我也不敢奢望在不久的将来世上人人都变好。”

“According to your arguments,” answered he, “all that I could be able to do would be to preserve myself from being mad while I endeavored to cure the madness of others; for if I speak truth, I must repeat what I have said to you; and as for lying, whether a philosopher can do it or not, I cannot tell; I am sure I cannot do it.

But though these discourses may be uneasy and ungrateful to them, I do not see why they should seem foolish or extravagant: indeed if I should either propose such things as Plato has contrived in his commonwealth, or as the Utopians practise in theirs, though they might seem better, as certainly they are, yet they are so different from our establishment, which is founded on property, there being no such thing among them, that I could not expect that it would have any effect on them; but such discourses as mine, which only call past evils to mind and give warning of what may follow, have nothing in them that is so absurd that they may not be used at any time, for they can only be unpleasant to those who are resolved to run headlong the contrary way; and if we must let alone everything as absurd or extravagant which by reason of the wicked lives of many may seem uncouth, we must, even among Christians, give over pressing the greatest part of those things that Christ hath taught us, though He has commanded us not to conceal them, but to proclaim on the house-tops that which he taught in secret.

“如果这样说的话，我能做的就非常有限了，”他回答道，“就好像我给别人治疗疯症，然而能做的最多就是避免自己也精神失常。倘若坚持真理，那么我必须得把刚才的一番话再讲一遍；至于扯谎这事，哲学家到底能不能做，我是真说不准，但我是不会做的。尽管我的上述言论对那些谋臣们来说可能难以接受，但我实在不觉得我的想法有任何愚蠢和激进之处。实际上，就算我把柏拉图对他国家的设想提出来，或者把乌托邦人施行的政策提出来，又能怎样呢？尽管他们的制度确实很优越，但是我们跟他们国家的体制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国家是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度上的，而他们的一切都是公有的，因此无法相提并论。至于我的种种言论，虽然仅仅起到警示作用，让他们鉴往知来，但是也没有荒谬到不管到了何时都无法被采用的地步。只有那些背道而驰且一意孤行的人会对我的言论感到反感。如果人们反常道德观认为奇怪的一切事物，都必须作为离经叛道而置之不论，那么包括

基督徒在内的所有人，就必须放弃宣扬基督的大部分教义了。可是，基督不容许我们对教义装作视而不见，他命令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宣扬他的教义，甚至包括他私下里对门徒的教导。

“The greatest parts of his precepts are more opposite to the lives of the men of this age than any part of my discourse has been; but the preachers seemed to have learned that craft to which you advise me, for they observing that the world would not willingly suit their lives to the rules that Christ has given, have fitted his doctrine as if it had been a leaden rule, to their lives, that so some way or other they might agree with one another. But I see no other effect of this compliance except it be that men become more secure in their wickedness by it. And this is all the success that I can have in a court, for I must always differ from the rest, and then I shall signify nothing; or if I agree with them, I shall then only help forward their madness. I do not comprehend what you mean by your casting about, or by the bending and handling things so dexterously, that if they go not well they may go as little ill as may be; for in courts they will not bear with a man's holding his peace or conniving at what others do. A man must barefacedly approve of the worst counsels, and consent to the blackest designs: so that he would pass for a spy, or possibly for a traitor, that did but coldly approve of such wicked practices: and therefore when a man is engaged in such a society, he will be so far from being able to mend matters by his casting about, as you call it, that he will find no occasions of doing any good: the ill company will sooner corrupt him than be the better for him: or if notwithstanding all their ill company, he still remains steady and innocent, yet their follies and knavery will be imputed to him; and by mixing counsels with them, he must bear his share of all the blame that belongs wholly to others.

“比起我的言论，基督的大部分箴言对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更加离经叛道。但是传教士们大多掌握了你建议我的那套把戏，他们发现世人不能心甘情愿地按照基督的教义去修身养德，于是便将那些教义加以变通去适应世人的道德观，教义因此似乎变成了一根软铅尺，让人们总能用合适的长度去丈量自身的道德。然而我觉得这种折衷和妥协没有任何作用，人们反而更加安心地抱残守缺。因此，我也就没法在国王议会上取得成效，因为如果我的言论与众不同，那会遭大家摒弃；如果我随声附和，那么对于纠正他们疯狂的思维也无济于事。我不能完全理解你说的那一套，究竟如何千方百计地变通，才能让他们即便无法完全改邪归正，也能迷途知返呢？毕竟在国王的议会上，大臣们不能容忍也不会允许有人完全沉默不语。人们只能厚颜无耻地赞成那些最不堪的提议，支持那些最肮脏的决策，纵容包庇那些邪恶的行为，如若不然会被视为间谍和叛徒。一个人一旦与这群人同流合污，那么也就无法通过你所谓的那些计谋去拨乱反正了，并且也根本没有机会做任何善事；还没来得及改变别人，就先被周围一帮乌合之众腐化了；就算无法忍受众人的不堪，也做不到长期出淤泥而不染，很快就会被他们的愚昧和丑恶所感染；而且由于所有的决议是大家一致默许的，因此他也要相应承担那些本该归罪于他人的指责。

“It was no ill simile by which Plato set forth the unreasonableness of a philosopher's meddling with government. If a man, says he, was to see a great company run out every day into the rain, and take delight in being wet; if he knew that it would be to no purpose for him to go and persuade them to return to their houses, in order to avoid the storm, and that all that could be expected by his going to speak to them would be that he himself should be as wet as they, it would be best for him to keep within doors; and since he had not influence enough to correct other people's folly, to take care to preserve himself.

“由此，柏拉图用了一件很形象的事来说明哲学家不宜掺和政事。某个哲学家看到一群外出的人天天淋雨，被淋湿了还乐在其中。这个哲学家很清楚，就算劝说他们回家避雨也是徒劳，而且他也预想到就算自己出去劝说他们，结局也不过是跟他们一样淋湿罢了，还不如自己呆在家中，什么也不做。因为他的影响力还没有大到医治这些人的痴傻，也无力保护自己不被雨淋。

“Though to speak plainly my real sentiments, I must freely own that as long as there is any property, and while money is the standard of all other things, I cannot think that a nation can be governed either justly or happily: not justly, because the best things will fall to the share of the worst men; nor happily, because all things will be divided among a few (and even these are not in all respects happy), the rest being left to be absolutely miserable. Therefore when I reflect on the wise and good constitution of the Utopians—among whom all things are so well governed, and with so few laws; where virtue hath its due reward, and yet there is such an equality, that every man lives in plenty—when I compare with them so many other nations that are still making new laws, and yet can never bring their constitution to a right regulation, where notwithstanding everyone has his property; yet all the laws that they can invent have not the power either to obtain or preserve it, or even to enable men certainly to distinguish what is their own from what is another's; of which the many lawsuits that every day break out, and are eternally depending, give too plain a demonstration; when, I say, I balance all these things in my thoughts, I grow more favorable to Plato, and do not wonder that he resolved not to make any laws for such as would not submit to a community of all things: for so wise a man could not but foresee that the setting all upon a level was the only way to make a nation happy, which cannot be obtained so long as there is property: for

when every man draws to himself all that he can compass, by one title or another, it must needs follow, that how plentiful soever a nation may be, yet a few dividing the wealth of it among themselves, the rest must fall into indigence.

“请恕我坦率直言，只要私有财产制度存在，只要金钱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准则，我的想法就不会改变，我认为这样的国家永远没有正义和幸福可言。无正义可言，是因为最美好的事物都沦为了最龌龊之人的囊中之物；无幸福可言，是因为国家的财产都被少数人瓜分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惨不忍睹，即使这少数人也不会事事如意。当我发现许多国家不断出台新法规，却依然不能将国家治理好，虽然实行私有制度，却无法容忍人人都有私有财产，我会将这些国家与乌托邦充满智慧的优越体制作比较——乌托邦的大小事务井井有条，法律规章少之又少；积德之人总有善报；人人生活富足、地位平等。这些国家出台的法律既不能帮助人民获得财产，也没法很好地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甚至不能帮助人民明确财产是归自己所有，还是归他人所有；这些弊端在每天各种随心所欲的判决里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反复权衡之下，我更加欣赏柏拉图的做法，也理解了他为什么拒绝为那些不承认财产公有的社会制定法律：因为这位智者预见到只有将一切平均、人人共有，国家才能幸福安乐。但是只要私有制存在，这点就不能实现：因为如果人人都处心积虑地借各种名目去抢占财产，那么无论一个国家多么繁荣，也总是少数人在瓜分财富、尽情享乐，剩下的大部分人贫苦不堪。

“So that there will be two sorts of people among them, who deserve that their fortunes should be interchanged; the former useless, but wicked and ravenous; and the latter, who by their constant industry serve the public more than themselves, sincere and modest men. From whence I am persuaded, that till property is taken away there can be no equitable or just distribution of things,

nor can the world be happily governed: for as long as that is maintained, the greatest and the far best part of mankind will be still oppressed with a load of cares and anxieties. I confess without taking it quite away, those pressures that lie on a great part of mankind may be made lighter; but they can never be quite removed. For if laws were made to determine at how great an extent in soil, and at how much money every man must stop, to limit the prince that he might not grow too great, and to restrain the people that they might not become too insolent, and that none might factiously aspire to public employments; which ought neither to be sold, nor made burdensome by a great expense; since otherwise those that serve in them would be tempted to reimburse themselves by cheats and violence, and it would become necessary to find out rich men for undergoing those employments which ought rather to be trusted to the wise—these laws, I say, might have such effects, as good diet and care might have on a sick man, whose recovery is desperate: they might allay and mitigate the disease, but it could never be quite healed, nor the body politic be brought again to a good habit, as long as property remains; and it will fall out as in a complication of diseases, that by applying a remedy to one sore, you will provoke another; and that which removes the one ill symptom produces others, while the strengthening one part of the body weakens the rest."

"贫富两极分化极其严重，但是实际上穷人应该享受富人的境遇。多数富人对社会毫无贡献，然而却生性歹毒贪婪；而多数穷人舍身忘己地长期为社会造福出力，为人真诚又谦逊。因此我坚信，如不取缔私有制度，公平、公正的财产分配制度就不会实现，国家也不会繁荣昌盛。因为只要私有制度得以延续，人类中的绝大部分，也是最优秀的部分永远会受压迫，生活在沉重的负担和苦难中。坦白地说，如果不将私有制完全取缔，虽然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减轻绝大部分人

身上的担子，但是永远无法完全消除他们的压力。应该制定严格的法律，来限制个人所能占有的最大土地面积、所能拥有的最大限额的财富，来限制国王所享有的权力，来约束一些人傲慢骄纵的态度，来抵制官员结党营私、买官卖官的不法行为，来防止他们铺张浪费、为社会增加负担。如果不对他们采取措施，他们很容易利欲熏心，通过欺诈和暴力中饱私囊，以至于本该由贤者担任的职务，势必要委任富人担当。在我看来，这些法规多少会有些作用，就好比对于病入膏肓的人来说，良好的饮食和细致的关怀总能缓解病情、减轻痛苦一样，但是彻底治愈是不可能的。同样，只要私有制存在，国家永远不会真的长治久安，而且病情会变得相当复杂：当你专心治疗某一局部的病痛时，其他部位又开始疼痛；缓解了一种症状，又会产生新的症状；一个身体部位过于强健，其他部位就会受到削弱。”

“On the contrary,” answered I, “it seems to me that men cannot live conveniently where all things are common: how can there be any plenty, where every man will excuse himself from labor? For as the hope of gain doth not excite him, so the confidence that he has in other men's industry may make him slothful: if people come to be pinched with want, and yet cannot dispose of anything as their own; what can follow upon this but perpetual sedition and bloodshed, especially when the reverence and authority due to magistrates fall to the ground? For I cannot imagine how that can be kept up among those that are in all things equal to one another.”

“在我看来，事实正相反，”我说道，“如果所有事物都是公有的，那么人民没法安享太平：如果人人都不愿付出劳动，那充足的物质财富从何而来？没有了收获和占有的欲望驱使，人们会变得好逸恶劳，总是寄希望于别人辛勤劳作，自己能坐享其成。如果人们饱受物质匮乏的折磨，却不能自由支配任何事物，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无休无止的暴乱和杀戮，特别是当行政官的威严荡然无存的时候，情形会更加

恶劣。因此，我无法想象一个人人共享的大同社会该如何为继。”

“I do not wonder,” said he, “that it appears so to you, since you have no notion, or at least no right one, of such a constitution: but if you had been in Utopia with me, and had seen their laws and rules, as I did, for the space of five years, in which I lived among them; and during which time I was so delighted with them, that indeed I should never have left them, if it had not been to make the discovery of that new world to the Europeans; you would then confess that you had never seen a people so well constituted as they.”

“这也难怪，”拉斐尔说道，“你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你对于这样一种社会体制是毫无概念的，至少是心存偏见的，因为你不曾与我一起在乌托邦生活过。我曾在那里度过了五年时光，在那里，我见识到了他们的法律和习俗，我与乌托邦人朝夕相处，关系十分融洽。实际上，如果不是想让欧洲人发现那个新世界，我是万万不会离开那里的。所以如果你到过那里，你会承认从来不曾见过生活得如此井然有序的一群人。”

“You will not easily persuade me,” said Peter, “that any nation in that new world is better governed than those among us. For as our understandings are not worse than theirs, so our government, if I mistake not, being more ancient, a long practice has helped us to find out many conveniences of life: and some happy chances have discovered other things to us, which no man's understanding could ever have invented.”

“你若说新世界的任何国家都比我们治理得好，我是无法信服的”，彼得说道，“我们的才智不比他们差，而且，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我们的统治要更加久远，累世的经验让我们掌握了让生活更加便利的方法。上天眷顾，我们的许多发现都是独一无二的，没人可以超越。”

“As for the antiquity, either of their government or of ours,” said he, “you cannot pass a true judgment of it unless you had read their histories; for if they are to be believed, they had towns among them before these parts were so much as inhabited. And as for those discoveries, that have been either hit on by chance, or made by ingenious men, these might have happened there as well as here. I do not deny but we are more ingenious than they are, but they exceed us much in industry and application. They knew little concerning us before our arrival among them; they call us all by a general name of the nations that lie beyond the equinoctial line; for their chronicle mentions a shipwreck that was made on their coast 1,200 years ago; and that some Romans and Egyptians that were in the ship, getting safe ashore, spent the rest of their days among them; and such was their ingenuity, that from this single opportunity they drew the advantage of learning from those unlooked-for guests, and acquired all the useful arts that were then among the Romans, and which were known to these shipwrecked men: and by the hints that they gave them, they themselves found out even some of those arts which they could not fully explain; so happily did they improve that accident, of having some of our people cast upon their shore.

“论及谁的国家历史更悠久”，拉斐尔说道，“除非你读过他们的历史记载，不然没法给出正确的判断。事实上，根据他们的记载，在我

们这边还没有人居住前，他们就已经建立城镇了。至于你说的那些伟大的发现，无论是偶然的所得，还是智者的功劳，无论我们这儿还是他们那儿都有。我不否认我们要比他们更加有智慧，然而他们在生产和应用上比我们先进太多了。在我们的人去那里之前，他们对我们一无所知，他们将我们统称为赤道另一边的国家。因为根据他们的编年史记载， 1200年以前，在他们的海岸线上发生了一起船难；船上的一些罗马人和埃及人安全上了岸，然后在乌托邦度过了余生；他们的智慧也正是体现在这里：就在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们向这些素未谋面的客人学习，取长补短。他们向船难中幸存的罗马人取经，几乎让他们道尽了毕生所学。在罗马人的启发下，他们还取得了一些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发现。因此他们很幸运，一次事故将我们的人带到了他们的海岸，他们得以从中获益。

“But if such an accident has at any time brought any from thence into Europe, we have been so far from improving it, that we do not so much as remember it; as in after-times perhaps it will be forgot by our people that I was ever there. For though they from one such accident made themselves masters of all the good inventions that were among us; yet I believe it would be long before we should learn or put in practice any of the good institutions that are among them. And this is the true cause of their being better governed, and living happier than we, though we come not short of them in point of understanding or outward advantages.”

“如果有任何人从乌托邦意外漂流到欧洲，我们肯定想不到借机向他们取经、谋求发展，可能根本不会记得这件事；就好像后世的人们肯定也不会记得我到过那儿一样。他们意外遇见了我们的人，便马上把我们种种好的发明据为己有，但是我相信，我们懂得学习他们的优越制度，并付诸实施的那一天还早着呢。因此，纵然跟乌托邦相比，我们才智无短，且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以上所述正是他们

比我们更加治理有序、幸福安乐的真正原因。”

Upon this I said to him: “I earnestly beg you would describe that island very particularly to us. Be not too short, but set out in order all things relating to their soil, their rivers, their towns, their people, their manners, constitution, laws, and, in a word, all that you imagine we desire to know. And you may well imagine that we desire to know everything concerning them, of which we are hitherto ignorant.”

于是，我对他说：“我恳请你将那个岛国不厌其详地描述一番。不要刻意说得简练，将所有事物一一道来吧，包括他们的地域、江河、城镇、居民、传统、风俗、法律。总而言之，但凡你认为是我们想知道的，就统统告诉我们吧。以前我们对此确实认识浅薄，但是我们现在真的迫切想要了解关于他们的一切。”

“I will do it very willingly,” said he, “for I have digested the whole matter carefully; but it will take up some time.”

“我非常乐意这样做，”他说道，“我已经将整件事梳理了一遍，但说来话长，需要一些时间。”

“Let us go then,” said I, “first and dine, and then we shall have leisure enough.”

“既然如此，”我建议说，“我们先用晚餐吧，随后我们可以尽情畅

谈。”

He consented. We went in and dined, and after dinner came back and sat down in the same place. I ordered my servants to take care that none might come and interrupt us. And both Peter and I desired Raphael to be as good as his word. When he saw that we were very intent upon it, he paused a little to recollect himself, and began in this manner:

拉斐尔表示赞同，随后我们进屋吃晚餐。晚餐后返回原地坐下接着聊。我命令仆人留心，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打断我们。我跟彼得催促拉斐尔赶紧兑现诺言。他见我们急切地要听，坐定沉思一会儿后，开始了如下的讲述：

The island of Utopia is in the middle 200 miles broad, and holds almost at the same breadth over a great part of it; but it grows narrower toward both ends. Its figure is not unlike a crescent: between its horns, the sea comes in eleven miles broad, and spreads itself into a great bay, which is environed with land to the compass of about 500 miles, and is well secured from winds. In this bay there is no great current; the whole coast is, as it were, one continued harbor, which gives all that live in the island great convenience for mutual commerce; but the entry into the bay, occasioned by rocks on the one hand, and shallows on the other, is very dangerous. In the middle of it there is one single rock which appears above water, and may therefore be easily avoided, and on the top of it there is a tower in which a garrison is kept; the other rocks lie under water, and are very dangerous. The channel is known only to the natives, so that if any stranger should enter into

the bay, without one of their pilots, he would run great danger of shipwreck; for even they themselves could not pass it safe, if some marks that are on the coast did not direct their way; and if these should be but a little shifted, any fleet that might come against them, how great soever it were, would be certainly lost.

乌托邦这座岛的大概地形为中间宽、两头渐窄，岛中部及全岛大部分地区宽度都约为200英里。全岛呈现出月牙的形状，两个尖角间一片汪洋，形成了11英里宽的海峡，被广袤的大陆环绕着，延伸出500英里长的海岸线。整个海湾不受风雨侵袭且平静无浪，海岸线连绵不断，让岛上居民的贸易往来十分便利。然而进入港湾的通道却危险重重，布满暗礁和浅滩。约当正中，有岩石矗立，清楚可见，其上筑有堡垒，有一队守卫驻扎。周围到处都是暗礁，十分凶险。只有当地人熟知入港的通道，如果是陌生人贸然闯入，很可能会全船覆灭。而且如果没有海岸上的标记做指引，就算是当地人也没法安全通过。如果这些标记发生了哪怕是一丁点的移位，无论敌舰多么坚不可摧，都会彻底葬送。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island there are likewise many harbors; and the coast is so fortified, both by nature and art, that a small number of men can hinder the descent of a great army. But they report (and there remain good marks of it to make it credible) that this was no island at first, but a part of the continent. Utopus that conquered it (whose name it still carries, for Abraxa was its first name) brought the rude and uncivilized inhabitants into such a good government, and to that measure of politeness, that they now far excel all the rest of mankind; having soon subdued them, he designed to separate them from the continent, and to bring the sea quite round them. To accomplish this, he ordered a deep channel to be dug fifteen miles long; and that the natives might not think he

treated them like slaves, he not only forced the inhabitants, but also his own soldiers, to labor in carrying it on. As he set a vast number of men to work, he beyond all men's expectations brought it to a speedy conclusion. And his neighbors who at first laughed at the folly of the undertaking, no sooner saw it brought to perfection than they were struck with admiration and terror.

岛的外侧也有很多港湾，整个海岸线守卫森严，得天独厚的地形再加上巧妙的工事，少数的守兵即可抵御强敌近岸。传说这里最初并非是一座岛屿，而是整个大陆的一部分（此说法依然有迹可循）。乌托普斯征服了这个岛（此岛最初名为阿布拉克萨岛，后被重新命名），并对岛上野蛮、未开化的居民施以妥善的管理和文明的教化，于是他们才得以发展成为今天如此卓越的民族。乌托普斯征服此岛之初，便决意将此岛与大陆分离，让海水将整个岛环绕起来。为了实现这一想法，他下令在连接大陆的一面深挖15英里长的沟渠。他不仅强制岛上居民参与劳动，也命令自己的士兵们亲自上阵，这样居民们就不会有被奴役的感觉。投入了大量人力后，工程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完成了。那些一开始嘲笑此工程愚蠢的邻国们，及见大功告成，无不感到羡慕和震惊。

There are fifty-four cities in the island, all large and well built: the manners, customs, and laws of which are the same, and they are all contrived as near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ground on which they stand will allow. The nearest lie at least twenty-four miles distance from one another, and the most remote are not so far distant but that a man can go on foot in one day from it to that which lies next it. Every city sends three of its wisest Senators once a year to Amaurot, to consult about their common concerns; for that is the chief town of the island, being situated near the centre of it, so that it is the most convenient place for their assemblies. The

jurisdiction of every city extends at least twenty miles: and where the towns lie wider, they have much more ground: no town desires to enlarge its bounds, for the people consider themselves rather as tenants than landlords. They have built over all the country, farmhouses for husbandmen, which are well contrived, and are furnished with all things necessary for country labor. Inhabitants are sent by turns from the cities to dwell in them; no country family has fewer than forty men and women in it, besides two slaves. There is a master and a mistress set over every family; and over thirty families there is a magistrate.

岛上共有54座城市，无不宏伟壮观。这些城市有着共同的语言、习俗和法律，如果地势允许的话，这些城市也必是等距布局的。两个相邻的城市之间，最近的相隔不到二十四英里，最远的也不会超过一天的脚程。每年，各个城市都会派遣三名最贤明的议员去亚马乌罗提，就全岛共同利益商议探讨。亚马乌罗提是全岛的中心城市，位于岛上中心位置，其地理位置方便各城市的代表们聚集在此。各个城市至少有方圆20英里的管辖范围，那些管辖范围更宽的城市，拥有更多的土地。每个城市都无意扩张自己的土地，因为乌托邦人更愿意成为土地使用者，而不是占有者。乡村中到处都是精心构建的农场，并配备了耕作所需的所有农具。岛上居民轮流从城市来到农场耕作，每家农户的成员不少于40个人，外加两名奴役。每家农户都有一位户主及一位主妇，每30家农户由一位治理官负责。

Every year twenty of this family come back to the town, after they have stayed two years in the country; and in their room there are other twenty sent from the town, that they may learn country work from those that have been already one year in the country, as they must teach those that come to them the next from the town. By this means such as dwell in those country farms are never ignorant

of agriculture, and so commit no errors, which might otherwise be fatal, and bring them under a scarcity of corn. But though there is every year such a shifting of the husbandmen, to prevent any man being forced against his will to follow that hard course of life too long, yet many among them take such pleasure in it that they desire leave to continue in it many years. These husbandmen till the ground, breed cattle, hew wood, and convey it to the towns, either by land or water, as is most convenient. They breed an infinite multitude of chickens in a very curious manner; for the hens do not sit and hatch them, but vast numbers of eggs are laid in a gentle and equal heat, in order to be hatched, and they are no sooner out of the shell, and able to stir about, but they seem to consider those that feed them as their mothers, and follow them as other chickens do the hen that hatched them.

每户每年有20人可以返回城市，他们都是在乡村劳作满两年的。与此同时，会有其他20人被派往乡村填补空缺，新来的人要向那些在乡村住了一年的人请教农事，而且在第二年也要向新来的人传授经验。这样一来，就确保了那些在乡村劳作的人们都通晓农事，不会犯使全国陷入粮食短缺危机的致命错误。虽然农业人员每年都会更换，以免有人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强迫长期从事这项颇为繁重的工作，然而也不乏有人寓乐其中，希望能常年在田间劳作。农业人员的职务有耕地、喂牛、伐木，并通过陆路或者水路等最为便捷的方式将木材运回城镇。他们以极其严谨精妙的方式进行统一孵化——母鸡不用坐窝孵蛋，所有的鸡蛋被统一置于适宜稳定的温度中孵化。小鸡破壳后立马便可四处走动，并将工作人员视同孵化它们的母亲，一直跟随着他们。

They breed very few horses, but those they have are full of mettle, and are kept only for exercising their youth in the art of

sitting and riding them; for they do not put them to any work, either of ploughing or carriage, in which they employ oxen; for though their horses are stronger, yet they find oxen can hold out longer; and as they are not subject to so many diseases, so they are kept upon a less charge, and with less trouble; and even when they are so worn out, that they are no more fit for labor, they are good meat at last. They sow no corn, but that which is to be their bread; for they drink either wine, cider, or perry, and often water, sometimes boiled with honey or licorice, with which they abound; and though they know exactly how much corn will serve every town, and all that tract of country which belongs to it, yet they sow much more, and breed more cattle than are necessary for their consumption; and they give that overplus of which they make no use to their neighbors. When they want anything in the country which it does not produce, they fetch that from the town, without carrying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it. And the magistrates of the town take care to see it given them; for they meet generally in the town once a month, upon a festival day. When the time of harvest comes, the magistrates in the country send to those in the towns, and let them know how many hands they will need for reaping the harvest; and the number they call for being sent to them, they commonly despatch it all in one day.

他们饲养的马匹数量虽少，但是全都是良种马，只供年轻人驰骋强身之用。他们使用牛来耕犁载物，而不是马；虽然他们的马强壮有力，然而牛却更加吃苦耐劳，而且极少生病，这样一来，省钱又省力。等到这些牛年老力衰，无法再继续劳作，也不失为美味的肉食供人们享用。他们种植谷物作为粮食，饮葡萄、苹果及梨子酿造的酒，喝清水，有时候还喝蜂蜜和遍地都是的甘草混合煮成的饮料。虽然他们对每个城镇的粮食需求量以及需要种植的土地面积了如指掌，但是他们总会种植和饲养超出自己需求量的谷物和牲畜。他们会将多余部

分分给临近城镇，同时，当无法在乡村觅得其他所需物品时，他们便会从城镇直接调取，也无需拿任何东西交换。城镇的治理官们每月都会挑节假日的某一天在镇中集会，管理监督物资的发放。收获的季节来临时，乡村的治理官们会向城镇发信求助，请求他们派遣收割所需的人手；所需人手的数量一经告知，城镇通常会在一天内完成调派。

Chapter 2: Of Their Towns, Particularly of Amaurot

第二章：关于城镇，尤其是亚马乌罗提城

He that knows one of their towns knows them all, they are so like one another, except where the situation makes some difference. I shall therefore describe one of them; and none is so proper as Amaurot; for as none is more eminent, all the rest yielding in precedence to this, because it is the seat of their Supreme Council, so there was none of them better known to me, I having lived five years altogether in it.

乌托邦所有的城市在外观上都如出一辙，除了受地势的影响，有些看起来略有差异，因此知晓了其中一座城市，其他所有城市就都不陌生了。我将以其中一座城市为例进行描绘。亚马乌罗提城似乎是最合适的，没有哪座城市像它一样卓越出众，在所有城市中脱颖而出，而且还是元老院会议所在之处，因此它无疑是最为人瞩目的，在那里我也生活了五年之久。

It lies upon the side of a hill, or rather a rising ground: its figure is almost square, for from the one side of it, which shoots up almost to the top of the hill, it runs down in a descent for two miles to the river Anider; but it is a little broader the other way that runs along by the bank of that river. The Anider rises about eighty miles above Amaurot, in a small spring at first, but other brooks falling into it, of which two are more considerable than the rest. As it runs by Amaurot, it is grown half a mile broad; but it still grows larger and larger, till after sixty miles course below it, it is lost in the

ocean, between the town and the sea, and for some miles above the town, it ebbs and flows every six hours, with a strong current. The tide comes up for about thirty miles so full that there is nothing but salt water in the river, the fresh water being driven back with its force; and above that, for some miles, the water is brackish; but a little higher, as it runs by the town, it is quite fresh; and when the tide ebbs, it continues fresh all along to the sea. There is a bridge cast over the river, not of timber, but of fair stone, consisting of many stately arches; it lies at that part of the town which is farthest from the sea, so that ships without any hindrance lie all along the side of the town.

亚马乌罗提位于山坡的一侧，随山势逐渐升高：外观上看几近方形，整个城市从山顶处蜿蜒直下，城市一侧一直延伸两英里到达阿尼德罗河沿岸；城市沿河而建的一侧比较宽阔。阿尼德罗河发源于距亚马乌罗提城八十英里上游的一股泉水，沿途不断有其他支流汇入，其中有两条支流水量巨大，流经亚马乌罗提城时，河面已相当宽阔，宽度达到半英里。随后河面还是逐渐加宽，顺势奔流六十英里后，最终汇入茫茫大海。从城市到大海这一段，甚至从城市上游几英里开始，每六小时就会出现大幅度的海水涨落，潮势凶猛。潮水来临时，河水被逼退，三十英里的河道中全部充斥着腥咸的海水，甚至再往上几英里，河水都是咸的。在往上，到了阿尼德罗河沿城的一段，河水就逐渐清澈了。退潮之后，自此往下直到入海口，河水都是清明澄澈的。河上有桥，不用木桩支撑，而是用巨大的石柱建成，形成一个个石拱。此桥位于城中离海最远的位置，因此船只可以在城中沿河一侧自由摆渡。

There is, likewise, another river that runs by it, which, though it is not great, yet it runs pleasantly, for it rises out of the same hill on which the town stands, and so runs down through it, and falls

into the Anider. The inhabitants have fortified the fountain-head of this river, which springs a little without the town; so that if they should happen to be besieged, the enemy might not be able to stop or divert the course of the water, nor poison it; from thence it is carried in earthen pipes to the lower streets; and for those places of the town to which the water of that shall river cannot be conveyed, they have great cisterns for receiving the rain-water, which supplies the want of the other. The town is cormpassed with a high and thick wall, in which there are many towers and forts; there is also a broad and deep dry ditch, set thick with thorns, cast round three sides of the town, and the river is instead of a ditch on the fourth side. The streets are very convenient for all carriage, and are well sheltered from the winds. Their buildings are good, and are so uniform that a whole side of a street looks like one house. The streets are twenty feet broad; there lie gardens behind all their houses; these are large but enclosed with buildings that on all hands face the streets; so that every house has both a door to the street, and a back door to the garden. Their doors have all two leaves, which, as they are easily opened, so they shut of their own accord; and there being no property among them, every man may freely enter into any house whatsoever. At every ten years' end they shift their houses by lots.

还有一条河沿城缓缓流淌，水流虽不壮阔却舒缓动人。它发源于城市所在的山坡上，贯穿整个城区然后流入阿尼德罗河。由于这条河的源头在城外，因此居民便在源头处筑起防御工事，以防敌人来犯时会将河流截断或改道，甚至是投毒。居民从源头处用泥管将水引流到低洼的街道上，凡是因地势使得河水不能被顺利引流的地方，都会放置巨大的储水池来承接雨水，为那里的人供给水源。整个城镇被又高又厚的城墙环绕，塔楼和堡垒密布。城的三面掘有又宽又深的沟渠，沟渠里面荆棘丛生，其余一面则被护城河环绕。街道的布局使得交通

十分便利，而且让人民免受风暴的侵袭。他们的建筑都极其美观，而且排列得整齐划一，以至于街道一整面看起来像只有一户人家一样。他们的街道有足足20尺宽，沿街房屋的后面都建有花园，花园四围为面对街道的建筑的背面。这样一来，每家每户都是前门通街，后门通花园。此外，他们的房门是折门，便于开启，而且能自动关上。因而，他们之间没有私人财产可言，任何人都能自由出入任何地方。每隔十年，他们就会用抽签的方式来调换房屋。

They cultivate their gardens with great care, so that they have vines, fruits, herbs, and flowers in them; and all is so well ordered, and so finely kept, that I never saw gardens anywhere that were both so fruitful and so beautiful as theirs. And this humor of ordering their gardens so well is not only kept up by the pleasure they find in it, but also by an emulation betwee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several streets, who vi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re is indeed nothing belonging to the whole town that is both more useful and more pleasant. So that he who founded the town seems to have taken care of nothing more than of their gardens; for they say, the whole scheme of the town was designed at first by Utopus, but he left all that belonged to the orna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 to be added by those that should come after him, that being too much for one man to bring to perfection. Their records, that contain the history of their town and State, are preserved with an exact care, and run backward 1,760 years. From these it appears that their houses were at first low and mean, like cottages, made of any sort of timber, and were built with mud walls and thatched with straw. But now their houses are three stories high: the fronts of them are faced with stone, plastering, or brick; and between the facings of their walls they throw in their rubbish. Their roofs are flat, and on them they lay a sort of plaster, which costs very little, and yet is so tempered that it is not apt to take fire, and yet resists the weather

more than lead. They have great quantities of glass among them, with which they glaze their windows. They use also in their windows a thin linen cloth, that is so oiled or gummed that it both keeps out the wind and gives free admission to the light.

乌托邦人十分喜欢侍弄花园，园中种有葡萄、各种果树及奇花异草。它们排列有序，栽培得法，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硕果累累的果树，以及如此美艳动人的花卉。他们热衷于侍弄花园并不仅仅是贪图享乐，街道之间相互争奇斗胜的景象也激发了他们的好胜心。实际上，对于这个城镇来说，这是最富有意义而又充满乐趣的事情了。这个城市的建立者似乎也视花园为珍宝，因为据乌托邦人讲，整个城市的草图起初就是乌托普斯国王绘制的，但由于国王终其一生也无法完成这样宏伟的工程，因此便将许多修缮和改进的工作留给后代去完成。他们城镇和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七百六十年以前，史料写得翔实认真，且保存完好。史料记载，他们最初的住房低矮粗糙，与棚舍无异，用木料随意搭建，并以泥浆糊墙，茅草盖顶。他们现在的房屋多为三层楼房，墙面用坚石搭建或泥灰涂抹，也有砖块砌成的，而墙心则用碎石填充。屋顶为平顶，覆盖着特殊的泥料，这种泥料廉价却调制极精，既可以防火，又能抵抗恶劣天气，比铅板要优越很多。他们大量使用玻璃，主要用来制作窗户。他们也会在窗户制作中添加细麻布，而布上涂抹油料或琥珀，这样一来，既可以抵御强风，又可以保证光照充足。

Chapter 3: Of Their Magistrates

第三章：关于地方官员

Thirty families choose every year a magistrate, who was anciently called the Syphogrant, but is now called the Philarch; and over every ten Syphogrants, with the families subject to them, there is another magistrate, who was anciently called the Tranibor, but of late the archphilarch. All the Syphogrants, who are in number 200, choose the Prince out of a list of four, who are named by the people of the four divisions of the city; but they take an oath before they proceed to an election, that they will choose him whom they think most fit for the office. They give their voices secretly, so that it is not known for whom everyone gives his suffrage. The Prince is for life, unless he is removed upon suspicion of some design to enslave the people. The Tranibors are new-chosen every year, but yet they are for the most part continued. All their other magistrates are only annual. The Tranibors meet every third day, and oftener if necessary, and consult with the prince, either concerning the affairs of the State in general or such private differences as may arise sometimes among the people; though that falls out but seldom. There are always two Syphogrants called into the council-chamber, and these are changed every day. It is a fundamental rule of their government that no conclusion can be made in anything that relates to the public till it has been first debated three several days in their Council. It is death for any to meet and consult concerning the State, unless it be either in their ordinary Council, or in the assembly of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每年由三十户人家选出一位地方官员，古称摄护格朗特，而现在叫做飞拉哈。每十位飞拉哈及其下属各户都隶属于另一位地方官员，古时叫做特朗尼菩尔，如今称为首席飞拉哈。乌托邦共有200名摄护格朗特，他们要从四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总督，候选人由城中四个选区的公民推选得出，但公民需要在投票前宣誓，他们会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人。他们的投票全部秘密进行，因此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保密的。总督除非涉嫌奴役公民会被罢黜外，一般为终身职位。而特朗尼菩尔每年都要重新选举，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留任。所有其他地方官都只有一年任期。特朗尼菩尔每三天与总督会面一次，若有必要则更加频繁，他们商讨国家总体事务或处理公民间私人矛盾，尽管会有意见不合，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总会有两名摄护格朗特受邀参加议事会，每天人选不同。政府的一条根本原则是任何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务须由议事会讨论三天方可作出结论。有关国家事务的任何会面及讨论不得在议事会或全体公民大会以外的地方进行，违者处死。

These things have been so provided among them, that the prince and the Tranibors may not conspire together to change the government and enslave the people; and therefore when anything of great importance is set on foot, it is sent to the Syphogrants; who after they have communicated it to the families that belong to their divisions, and have considered it among themselves, make report to the Senate; and upon great occasions, the matter is referred to the Council of the whole island. One rule observed in their Council, is, never to debate a thing on the same day in which it is first proposed; for that is always referred to the next meeting, that so men may not rashly, and in the heat of discourse, engage themselves too soon, which might bias them so much, that instead of consulting the good of the public, they might rather study to support their first opinions, and by a perverse and preposterous sort of shame, hazard their country rather than endanger their own reputation, or venture the being suspected to have wanted foresight

in the expedients that they at first proposed. And therefore to prevent this, they take care that they may rather be deliberate than sudden in their motions.

这些措施可以防止总督和特朗尼菩尔图谋颠覆政权、奴役人民，因此任何重大事项的决策都要经摄护格朗特，由他们传达给辖区住户，住户们内部讨论后，将报告提交给议事会。若事关重大，还要提交给全岛议事会审议。议事会还有一项规则，就是绝不在某事项提出的当天商讨该事宜，而是将其留至下次会议，如此一来，人们就不会草率行事，在头脑发热时主观定论，这样可以避免决策者受个人偏见影响，不顾公众利益，盲目坚持己见，刚愎自用、本末倒置，为防止个人名誉受损或避免他人认为其最初提议缺乏远见而危害国家利益。因此，为了做到以上各点，他们会深思熟虑而非轻举妄动。

Chapter 4: Of Their Trades, and Manner of Life

第四章：关于职业及生活方式

Agriculture is that which is so universally understood among them that no person, either man or woman, is ignorant of it; they are instructed in it from their childhood, partly by what they learn at school and partly by practice; they being led out often into the fields, about the town, where they not only see others at work, but are likewise exercised in it themselves. Besides agriculture, which is so common to them all, every man has some peculiar trade to which he applies himself, such as the manufacture of wool, or flax, masonry, smith's work, or carpenter's work; for there is no sort of trade that is not in great esteem among them. Throughout the island they wear the same sort of clothes without any other distinction, except wha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the two sexes, and the married and unmarried. The fashion never alters; and as it is neither disagreeable nor uneasy, so it is suited to the climate, and calculated both for their summers and winters. Every family makes their own clothes; but all among them, women as well as men, learn one or other of the trades formerly mentioned. Women, for the most part, deal in wool and flax, which suit best with their weakness, leaving the ruder trades to the men. The same trade generally passes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inclinations often following descent; but if any man's genius lies another way, he is by adoption translated into a family that deals in the trade to which he is inclined: and when that is to be done, care is taken not only by his father, but by the magistrate, that he may be put to a discreet and good man. And if after a person has learned one trade, he desires to acquire another, that is also allowed, and is manag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former. When he has learned both, he follows that which he likes best, unless the public has more occasion for the other.

农业的重要性在乌托邦是众所周知的，无论男女都精通农业。自孩提时代起，他们就在学校和日常实践中学习务农。他们会被带到城市附近的农田，不仅要看别人如何劳作，还要亲自实践。除了都要务农外，每个人还要各自学一门手艺，比如毛织、麻纺、砌石、炼铁或木工，每门手艺都同样受人尊重。整个岛上，人们着装除了有男女之分、已婚和未婚之别外完全一致，这一风潮一直延续下来，并且这种着装不仅不会不合时宜或令人不适，还能适应当地气候，无论冬夏，皆可穿着。每家每户都自制衣物，此外无论男女都需要学习一门上述手艺。女性由于体弱，多从事棉麻纺织，重体力活则交由男性承担。子承父业较为普遍，血缘的纽带也传承着职业偏好。若有人志不在此，则会被从事他感兴趣职业的家庭领养，一旦如此，他的生父甚至地方官都会关心他，尽力将他托付给朴实善良之人。若有人已经精通某门手艺，想掌握另一门手艺，也是可以的，人们会以同样的方式培养他。当他习得两门手艺后，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从事其中一门，除非社会对另一手艺有更大的需求。

The chief, and almost the only business of the Syphogrants, is to take care that no man may live idle, but that every one may follow his trade diligently: yet they do not wear themselves out with perpetual toil, from morning to night, as if they were beasts of burden, which, as it is indeed a heavy slavery, so it is everywhere the common course of life among all mechanics except the Utopians; but they dividing the day and night into twenty-four hours, appoint six of these for work; three of which are before dinner, and three after. They then sup, and at eight o'clock, counting from noon, go to bed and sleep eight hours. The rest of

their time besides that taken up in work, eating and sleeping, is left to every man's discretion; yet they are not to abuse that interval to luxury and idleness, but must employ it in some proper exercise according to their various inclinations, which is for the most part reading. It is ordinary to have public lectures every morning before daybreak; at which none are obliged to appear but those who are marked out for literature; yet a great many, both men and women of all ranks, go to hear lectures of one sort of other, according to their inclinations. But if others, that are not made for contemplation, choose rather to employ themselves at that time in their trades, as many of them do, they are not hindered, but are rather commended, as men that take care to serve their country. After supper, they spend an hour in some diversion, in summer in their gardens, and in winter in the halls where they eat; where they entertain each other, either with music or discourse. They do not so much as know dice, or any such foolish and mischievous games: they have, however, two sorts of games not unlike our chess; the one is between several numbers, in which one number, as it were, consumes another: the other resembles a battle between the virtues and the vices, in which the enmity in the vices among themselves, and their agreement against virtue, is not unpleasantly represented; together with the special oppositions between the particular virtues and vices; as also the methods by which vice either openly assaults or secretly undermines virtue, and virtue on the other hand resists it. But the time appointed for labor is to be narrowly examined, otherwise you may imagine, that since there are only six hours appointed for work, they may fall under a scarcity of necessary provisions. But it is so far from being true, that this time is not sufficient for supplying them with plenty of all things, either necessary or convenient, that it is rather too much; and this you will easily apprehend, if you consider how great a part of all other nations is quite idle.

摄护格朗特的首要也是几乎唯一的工作就是确保没有人无所事事，每个人都辛勤劳动，但又不必像负重牲畜般从早到晚不停劳作、筋疲力尽，否则那真的变成沉重的奴役了，而后者恰恰是乌托邦之外各处生活的常态。乌托邦的人用24小时划分一昼夜，其中6个小时用来劳作，午饭前后各3小时。随后是晚餐时间，到了晚上8点，也就是中午过后的第8个小时开始，有8小时睡眠时间。其余时间，由个人自由支配，但并不能用于奢侈享乐，每人必须根据各自不同的兴趣爱好进行适当活动，大部分情况下是阅读。通常每天黎明破晓前都会有公共演讲，那些被精心挑选出来、日后做学问的人必须到场，其他人不强制。但实际上众多来自各行各业的男男女女都会前去根据个人偏好聆听感兴趣的讲座。但如果不善沉思之人想要将这段时间用于从事各自的手艺，也不会受到约束，甚至会受到称赞，因为他们愿意为国家服务，事实上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晚饭后，人们有一小时的消遣时间，夏季在花园中徜徉，冬季则在用餐厅堂休息，或是演奏音乐，或是谈心消遣。他们对于骰子或此类愚蠢有害的游戏一无所知，但有两种类似象棋的游戏。其一是斗数，一个数字吃掉另一个数字。其二像是正邪之斗，首先邪恶一方内部互为仇敌却又一致对抗正义一方；同时，正义各方与邪恶各方一一对抗；邪恶势力采取策略或公然攻击或暗中摧毁正义，正义一方反过来要以对应的策略坚决抵抗。你可能认为，工作的时间需要严格控制，否则只工作6小时，可能无法保证必需品的充足供给。不过事实远非如此，6个小时的时间绰绰有余，足够保证全部必需品及便利品的充足供应。现在，你就可以理解其他国家有多少好吃懒做的人了。

First, women generally do little, who are the half of mankind; and if some few women are diligent, their husbands are idle: then consider the great company of idle priests, and of those that are called religious men; add to these all rich men, chiefly those that have estates in land, who are called noblemen and gentlemen, together with their families, made up of idle persons, that are kept

more for show than use; add to these, all those strong and lusty beggars, that go about pretending some disease, in excuse for their begging; and upon the whole account you will find that the number of those by whose labors mankind is supplied, is much less than you perhaps imagined. Then consider how few of those that work are employed in labors that are of real service; for we who measure all things by money, give rise to many trades that are both vain and superfluous, and serve only to support riot and luxury. For if those who work were employed only in such things as the conveniences of life require, there would be such an abundance of them that the prices of them would so sink that tradesmen could not be maintained by their gains; if all those who labor about useless things were set to more profitable employments, and if all they that languish out their lives in sloth and idleness, every one of whom consumes as much as any two of the men that are at work, were forced to labor, you may easily imagine that a small proportion of time would serve for doing all that is either necessary, profitable, or pleasant to mankind, especially while pleasure is kept within its due bounds.

首先，在其他国家，占到总人口半数的女性大部分都不工作，如果有个别女性勤劳能干，那么她们的丈夫则无所事事。还有大量不劳作的牧师及所谓的宗教人士，加上所有富人，主要是那些拥有土地的所谓贵族和绅士，及其家庭，构成了游手好闲群体的主力，他们皆为中看不中用之人。再有就是身强体壮、精力充沛却去行乞的人，他们四处游走，假装患病，实为乞讨的借口。算上以上全部，你就会发现，进行劳作以支持社会的人数远比想象得少。然后，再考虑一下劳作的人中，仅有为数不多的人从事的是真正为大众服务的行业。因为我们用金钱衡量一切，这就催生了很多仅供放纵骄奢的行业，它们其实无关紧要且毫无意义。假使那些工作的人都被派去生产生活便利品，那么这类商品的数量便会增多，价格便会下降，从事这一行业的

手艺人将入不敷出。那些好吃懒做、虚度人生的人每人的消耗量都是两个辛勤劳作之人的总和，显而易见，如果迫使这些人都去劳作，如果让所有从事无意义劳动的人都去做更有益的工作，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人类就可以得到各种生活必需品、便利品甚至是享乐品，而且是在合理的范围内享受快乐。

This appears very plainly in Utopia, for there, in a great city, and in all the territory that lies round it, you can scarce find 500, either men or women, by their age and strength, are capable of labor, that are not engaged in it; even the Syphogrants, though excused by the law, yet do not excuse themselves, but work, that by their examples they may excite the industry of the rest of the people. The like exemption is allowed to those who, being recommended to the people by the priests, are by the secret suffrages of the Syphogrants privileged from labor, that they may apply themselves wholly to study; and if any of these fall short of those hopes that they seemed at first to give, they are obliged to return to work. And sometimes a mechanic, that so employs his leisure hours, as to make a considerable advancement in learning, is eased from being a tradesman, and ranked among their learned men. Out of these they choose their ambassadors, their priests, their Tranibors, and the prince himself, anciently called their Barzenes, but is called of late their Ademus.

这一点在乌托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一个大城市及其周边的所有地区中，无论男女，年富力强适于劳作但却游手好闲的人，绝不超过500名。即使是受到法律豁免不用劳作的摄护格朗特也不会找借口不劳而获，他们同样会参加劳作，通过身体力行勉励他人努力劳动。有些由牧师推荐并由摄护格朗特秘密投票选出的人可以免除劳作，潜心治学。但如果治学之人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就会被遣回参加

劳作。若一位工人利用业余时间潜心钻研、学有所成，也可能免于劳作，从而专心学术。人们会从这些有学问的人中选出外交官、牧师、特朗尼菩尔以及总督。总督在古时又叫巴桑，现称阿丹麦。

And thus from the great numbers among them that are neither suffered to be idle, nor to be employed in any fruitless labor, you may easily make the estimate how much may be done in those few hours in which they are obliged to labor. But besides all that has been already said, it is to be considered that the needful arts among them are managed with less labor than anywhere else. The building or the repairing of houses among us employ many hands, because often a thriftless heir suffers a house that his father built to fall into decay, so that his successor must, at a great cost, repair that which he might have kept up with a small charge: it frequently happens that the same house which one person built at a vast expense is neglected by another, who thinks he has a more delicate sense of the beauties of architecture; and he suffering it to fall to ruin, builds another at no less charge. But among the Utopians all things are so regulated that men very seldom build upon a new piece of ground; and are not only very quick in repairing their houses, but show their foresight in preventing their decay: so that their buildings are preserved very long, with but little labor, and thus the builders to whom that care belongs are often without employment, except the hewing of timber and the squaring of stones, that the materials may be in readiness for raising a building very suddenly when there is any occasion for it.

所以，绝大多数乌托邦人都不是游手好闲之徒，亦非从事无意义劳动之人，可想而知，在短短几个小时的劳作时间里，他们产出巨大。此外，在乌托邦，掌握必要技艺的人数也比其他地方都少。在我

们国家，房屋的修建和修复需要大量的人力。这是因为子孙们常常肆意挥霍，不知爱惜，导致父辈建起的房屋日渐损坏，因此我们，这样后人本来可以仅花一点钱维护的房子就需要斥巨资来维修。在我们国家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人投入大量金钱建起的房子却为另一人所轻视，后者常常觉得自己对建筑的审美更胜一筹，便将已经建好的房屋损毁，再花甚至更多的钱建一栋新的。但在乌托邦，一切都井然有序，人们很少会辟地建新房。他们不仅有着极高的房屋维修效率，还能颇具远见，提前防止房屋老化。因此，那里的建筑物留存时间都很长，而且维修需要的人力少。于是，那里的建筑工经常失业，只能做些砍木砌石的工作，以便为突然需要盖楼备好材料。

As to their clothes, observe how little work is spent in them: while they are at labor, they are clothed with leather and skins. cast carelessly about them, which will last seven years; and when they appear in public they put on an upper garment, which hides the other; and these are all of one color, and that is the natural color of the wool. As they need less woollen cloth than is used anywhere else, so that which they make use of is much less costly. They use linen cloth more; but that is prepared with less labor, and they value cloth only by the whiteness of the linen or the cleanness of the wool, without much regard to the fineness of the thread: while in other places, four or five upper garments of woollen cloth, of different colors, and as many vests of silk, will scarce serve one man; and while those that are nicer think ten are too few, every man there is content with one, which very often serves him two years. Nor is there anything that can tempt a man to desire more; for if he had them, he would neither be the warmer nor would he make one jot the better appearance for it. And thus, since they are all employed in some useful labor, and since they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fewer things, it falls out that there is a great abundance of all things among them: so that it frequently happens

that, for want of other work, vast numbers are sent out to mend the highways. But when no public undertaking is to be performed, the hours of working are lessened. The magistrates never engage the people in unnecessary labor, since the chief end of the constitution is to regulate labor by the necessities of the public, and to allow all the people as much time as is necessar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minds, in which they think the happiness of life consists.

乌托邦人的衣物制作所需的劳动力也非常有限。劳作时，人们身穿皮革及动物毛皮制品，无需精心选材，这样的衣服可穿七年之久。在公共场合，他们会披上外套，将工装遮住。这些外套颜色统一，皆为天然羊毛色。由于乌托邦人对羊毛的需求较任何地方都少，因此购买所需羊毛花费也极少。他们对亚麻布的需求更大，但是亚麻布的制作所需的人力依然很少。并且，他们只注重亚麻是否洁白、羊毛是否干净，对于针线是否考究并不在意。相反，在其他地方，一个人拥有四五件颜色各异的羊毛上衣、四五件丝制衣衫仍不满足，更挑剔的人十件也觉不够。即便有一件称心如意的衣服，通常也只穿两年。在乌托邦，人们也不需要再多的衣物，因为就算有了，既不会穿得更暖，也不会看起来更美。因此，由于人们大多从事实用的劳作，并且需求有限，所有的东西都能充分供给。于是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有需要的时候，大量工人可以被调去修理公路。但若没有公共建设项目，工人们的工时便会缩短。政府从不要求人们进行多余的劳动，因为宪法的主要目的是根据公共利益所需管理劳力，让所有人有充足的时间获得精神上的提升，这也是乌托邦人所理解的幸福生活之所在。

Chapter 5: Of Their Traffic

第五章：关于他们的交际方式

But it is now time to explain to you the mutual intercourse of this people, their commerce, and the rules by which all things are distributed among them.

现在来讲讲乌托邦人如何交际、贸易，以及如何分配商品。

As their cities are composed of families, so their families are made up of those that are nearly related to one another. Their women, when they grow up, are married out; but all the males, both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live still in the same house, in great obedience to their common parent, unless age has weakened his understanding: and in that case, he that is next to him in age comes in his room. But lest any city should become either too great, or by any accident be dispeopled, provision is made that none of their cities may contain above 6,000 families, besides those of the country round it. No family may have less than ten and more than sixteen persons in it; but there can be no determined number for the children under age. This rule is easily observed, by removing some of the children of a more fruitful couple to any other family that does not abound so much in them.

乌托邦的城市由各家各户组成，家庭成员间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女子成年后会出嫁，而男性不论是子辈还是孙辈，都会长期住在

自己家里，很大程度上服从于他们共同的家长，除非家长年事已高、脑力退化，那就需要年纪仅次于他的人取而代之担任家长。为防止城市人口过于密集或稀疏，他们明文规定，除城郊外，城市住户不得超过6000户。每户人数为10到16人，但未成年人数量不限。这一规定很好执行，只需将一户多出的人补到其他人数不够的住户即可。

By the same rule, they supply cities that do not increase so fast, from others that breed faster; and if there is any increase over the whole island, then they draw out a number of their citizens out of the several towns, and send them over to the neighboring continent; where, if they find that the inhabitants have more soil than they can well cultivate, they fix a colony, taking the inhabitants into their society, if they are willing to live with them; and where they do that of their own accord, they quickly enter into their method of life, and conform to their rules, and this proves a happiness to both nations; for according to their constitution, such care is taken of the soil that it becomes fruitful enough for both, though it might be otherwise too narrow and barren for any one of them. But if the natives refuse to conform themselves to their laws, they drive them out of those bounds which they mark out for themselves, and use force if they resist. For they account it a very just cause of war, for a nation to hinder others from possessing a part of that soil of which they make no use, but which is suffered to lie idle and uncultivated; since every man has by the law of nature a right to such a waste portion of the earth as is necessary for his subsistence. If an accident has so lessened the number of the inhabitants of any of their towns that it cannot be made up from the other towns of the island, without diminishing them too much, which is said to have fallen out but twice since they were first a people, when great numbers were carried off by the plague, the loss is then supplied by recalling as many as are wanted from their colonies; for they will

abandon these, rather than suffer the towns in the island to sink too low.

他们以同样的方式，用人口增长快的城市的人口来补充人口增长慢的城市的人口。如果岛上人数超过规定数量，那么他们就会从几个市镇中选出一些公民送到临近的大陆上。若他们发现临近大陆的居民耕地过多，难以兼顾，乌托邦人便会在大陆上开辟一块区域，接纳愿意来此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大陆居民。这些大陆居民自愿学习乌托邦的生活方式，并能很快适应，遵守乌托邦的规则，这对双方都甚为有益。因为根据乌托邦宪法，如此一来，两国的土地都可获得高产，否则其中一方可能过于拥挤而另一方则土壤贫瘠。但是倘若迁入的居民拒绝遵守他们的法律，他们便会将他们逐出自己这片区域，若有抵抗，则会动用武力。在他们眼中，如果他国公民占有一块土地，却没有加以利用，使其遭到荒废，那么为阻止这种行为发起战争便是正义之战。因为依照自然规律，每个人都有权为个人生存之所需使用荒地。若因意外，任何城市的人口锐减，又无法从岛上其他城市获得补充，为防止人口剧烈减少，他们会从他国聚居区里召回居民，因为他们宁可减少聚居区，也不愿让岛上城市人口损失过大。事实上，该国建立以来，仅由于瘟疫发生过两次大量居民丧生的事件。

But to return to their manner of living in society, the oldest man of every family, as has been already said, is its governor. Wives serve their husbands, and children their parents, and always the younger serves the elder. Every city is divided into four equal parts, and in the middle of each there is a marketplace: what is brought thither, and manufactured by the several families, is carried from thence to houses appointed for that purpose, in which all things of a sort are laid by themselves; and thither every father goes and takes whatsoever he or his family stand in need of, without either paying for it or leaving anything in exchange. There is no reason for giving

a denial to any person, since there is such plenty of everything among them; and there is no danger of a man's asking for more than he needs; they have no inducements to do this, since they are sure that they shall always be supplied. It is the fear of want that makes any of the whole race of animals either greedy or ravenous; but besides fear, there is in man a pride that makes him fancy it a particular glory to excel others in pomp and excess. But by the laws of the Utopians, there is no room for this. Near these markets there are others for all sorts of provisions, where there are not only herbs, fruits, and bread, but also fish, fowl, and cattle.

现在再说回人们的生活方式，之前说到家中最为年长者为一家之主。妻子服侍丈夫，孩子侍候父母，总体而言，年轻人要照顾年长者。每座城市都均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中央都有集市，住户们要把各自的产出运到指定位置，自行分类。每家户主前往挑选自家所需，不必付钱也不用拿其他东西置换。人们不会拒绝给予他人所需物品，因为一切物品都供应充足。同时，人们也不会索取超出自己所需的物品，他们完全没有这么做的动机，毕竟他们确信商品会源源不断地供应。对于动物而言，对于供应短缺的恐惧让它们贪得无厌；而对于人来说，除了恐惧，还有来自炫耀自己占有多于他人的成就感也会驱使他们那么做。但是，根据乌托邦的原则，人们是不会这么做的。在这些集市附近还有各式各样的供给品，不仅有草药、水果和面包，还有鱼禽牲畜。

There are also, without their towns, places appointed near some running water, for killing their beasts, and for washing away their filth, which is done by their slaves: for they suffer none of their citizens to kill their cattle,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pity and good-nature, which are among the best of those affections that are born with us, are much impaired by the butchering of animals: nor

do they suffer anything that is foul or unclean to be brought within their towns, lest the air should be infected by ill-smells which might prejudice their health. In every street there are great halls that lie at an equal distance from each other, distinguished by particular names. The Syphogrants dwell in those that are set over thirty families, fifteen lying on one side of it, and as many on the other. In these halls they all meet and have their repasts. The stewards of every one of them come to the market-place at an appointed hour; an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those that belong to the hall, they carry home provisions. But they take more care of their sick than of any others: these are lodged and provided for in public hospitals they have belonging to every town four hospitals, that are built without their walls, and are so large that they may pass for little towns: by this means, if they had ever such a number of sick persons, they could lodge them conveniently, and at such a distance, that such of them as are sick of infectious diseases may be kept so far from the rest that there can be no danger of contagion. The hospitals are furnished and stored with all things that are convenient for the ease and recovery of the sick; and those that are put in them are looked after with such tender and watchful care, and are so constantly attended by their skilful physicians, that as none is sent to them against their will, so there is scarce one in a whole town that, if he should fall ill, would not choose rather to go thither than lie sick at home.

与此同时，在城外，还有指定用于牲畜屠宰及清洗的河流，当然这些都由奴隶去做，因为乌托邦不允许公民屠宰，因为恻隐之心与温和敦厚的本性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最佳品质，而参与动物屠宰会削弱这些品质。他们也不允许任何污秽不洁之物进入城内，以防空气污染，威胁人体健康。每条街上都有等距离而立的楼厅，以不同名字区别开来。摄护格朗特住在指定楼厅内，这些楼厅内部两侧各十五户人家，

因此摄护格朗特共管理三十户。人们在这些楼厅内会面并用餐。由管家在指定时间去市场根据楼厅内人数带回所需供给。他们对病人格外关照。病人可以入住公立医院，每个城市有四家医院，不设围墙，面积很大，好像独立的小镇。这么做即使病人很多，也可以保证舒适度。医院距离城区很远，可以隔离传染病人，防止疾病传播及交叉感染。医院设备齐全，应有尽有，有利于病人的恢复。住院病人受到精心细致的照顾，由医术高明的医生全程看护，病人还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医生，因此几乎所有人生病都会选择去医院而非躺在家里。

After the steward of the hospitals has taken for the sick whatsoever the physician prescribes, then the best things that are left in the market are distributed equally among the hall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numbers, only, in the first place, they serve the Prince, the chief priest, the Tranibors, the ambassadors, and strangers, if there are any, which indeed falls out but seldom, and for whom there are houses well furnished, particularly appointed for their reception when they come among them. At the hours of dinner and supper, the whole Syphogranty being called together by sound of trumpet, they meet and eat together, except only such as are in the hospitals or lie sick at home. Yet after the halls are served, no man is hindered to carry provisions home from the market-place; for they know that none does that but for some good reason; for though any that will may eat at home, yet none does it willingly, since it is both ridiculous and foolish for any to give themselves the trouble to make ready an ill dinner at home, when there is a much more plentiful one made ready for him so near at hand. All the uneasy and sordid services about these halls are performed by their slaves; but the dressing and cooking their meat, and the ordering their tables, belong only to the women, all those of every family taking it by turns. They sit at three or more tables, according to their number; the men sit toward the wall, and the

women sit on the other side, that if any of them should be taken suddenly ill, which is no uncommon case among women with child, she may, without disturbing the rest, rise and go to the nurses' room, who are there with the sucking children, where there is always clean water at hand, and cradles in which they may lay the young children, if there is occasion for it, and a fire that they may shift and dress them before it.

当医院的看护遵照医嘱选好病人所需物品后，集市上的剩余物品会按照各楼人数按比例分配，只是会先分给总督、主教、特朗尼菩尔及外交官，如果有外地人的话也会优先关照，但外地人很少。乌托邦会有专门修缮一新的房屋来接待外地人。午餐及晚饭时，听到喇叭声，除住院病人或卧床在家者外，摄护格朗特所辖全部居民都会前来一起用餐。在楼厅用餐后，人们还可以从集市上拿些供给品回家，没有人会限制他们这么做，因为人们这么做一定有正当的理由。有人可能要在家里用餐，尽管没人愿意拒绝近在咫尺的现成丰盛菜肴而在家里大费周折勉强糊口。楼厅里所有的脏活累活都由奴隶来做，但是肉类加工和烹饪以及餐桌的摆放是由每家每户的女性轮流承担的。根据具体人数，人们分三桌或更多桌子而坐。男性面朝墙而坐，女性则坐在他们对面。若有人突然感觉不适，则可以起身直接去休息室而不用打扰他人，对于带孩子的妇女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休息室里备有清洁用水，妇女可将孩子放到摇篮里，若有需要还可生火，她们可以为孩子更换衣物。

Every child is nursed by its own mother, if death or sickness does not intervene; and in that case the Syphogrants' wives find out a nurse quickly, which is no hard matter; for anyone that can do it offers herself cheerfully; for as they are much inclined to that piece of mercy, so the child whom the nurse considers the nurse as its mother. All the children under five years old sit among the nurses,

the rest of the younger sort of both sexes, till they are fit for marriage, either serve those that sit at table or, if they are not strong enough for that, stand by them in great silence, and eat what is given them; nor have they any other formality of din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first table, which stands across the upper end of the hall, sit the Syphogrant and his wife; for that is the chief and most conspicuous place: next to him sit two of the most ancient, for there go always four to a mess. If there is a temple within that Syphogranty, the priest and his wife sit with the Syphogrant above all the rest: next them there is a mixture of old and young, who are so placed, that as the young are set near others, so they are mixed with the more ancient; which they say was appointed on this account, that the gravity of the old people, and the reverence that is due to them, might restrain the younger from all indecent words and gestures. Dishes are not served up to the whole table at first, but the best are first set before the old, whose seat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young, and after them all the rest are served alike. The old men distribute to the younger any curious meats that happen to be set before them, if there is not such an abundance of them that the whole company may be served alike.

每个孩子由自己的母亲照料，如果生母去世或患病，则由摄护格朗特的夫人随即找一位保姆，一般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因为任何可以胜任此事的人都会充满同情，也乐于伸出援手，因此，孩子也会将看护他的保姆视为自己的母亲。所有未满五岁的孩子都与保姆坐在一起，其余年少男女在达到适婚年龄之前，要么在餐桌旁服侍，要么由于年纪尚小不能胜任，那么便静立一旁，食用别人递来的饭菜。这些年轻人没有额外的用餐形式。摄护格朗特和他的妻子坐在第一张桌子的中间，位于厅堂的前端，这是最为尊贵显眼的位置，他的身旁是两位最年长者，一桌通常四个人。若某一摄护格朗特辖区内设有教堂，则由牧师及其妻子与摄护格朗特同桌进餐。邻桌有长有幼，这是他们

的安排方式，年轻人要与年长者搭配起来。这么安排，年长者带给年轻人的庄重感和敬畏之心能够约束年轻人的言行，防止他们出言不逊。每餐开始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饭菜，而是将最好的菜肴呈给年长者，他们的座位与年轻人有别，之后其他人享用的饭菜便没什么区别。要是上好的饭菜不够，无法做到平均分配，年长者便会将自己面前的美味佳肴分给年轻人。

Thus old men are honored with a particular respect; yet all the rest fare as well as they. Both dinner and supper are begun with some lecture of morality that is read to them; but it is so short, that it is not tedious nor uneasy to them to hear it: from hence the old men take occasion to entertain those about them with some useful and pleasant enlargements; but they do not engross the whole discourse so to themselves, during their meals, that the younger may not put in for a share: on the contrary, they engage them to talk, that so they may in that free way of conversation find out the force of everyone's spirit and observe his temper. They despatch their dinners quickly, but sit long at supper; because they go to work after the one, and are to sleep after the other, during which they think the stomach carries on the concoction more vigorously. They never sup without music; and there is always fruit served up after meat; while they are at table, some burn perfumes and sprinkle about fragrant ointments and sweet waters: in short, they want nothing that may cheer up their spirits: they give themselves a large allowance that way, and indulge themselves in all such pleasures as are attended with no inconvenience. Thus do those that are in the towns live together; but in the country, where they live at great distance, everyone eats at home, and no family wants any necessary sort of provision, for it is from them that provisions are sent unto those that live in the towns.

如此一来，年长者受到了特别的礼遇，而其他人也享用到了美食。午餐和晚饭开始时，会有人朗读有关道德的训诫，但是比较短小精悍，不会让人感到不自在。由此年长者会适时补充一些生动而有益的内容助兴，但他们也不会从头到尾滔滔不绝不给年轻人发言的机会，而是乐于让年轻人参与讨论，在自由交流的过程中观察每个人的精神力量与性情秉性。人们匆匆吃完午餐便会离席，但用晚餐的时间较长，因为午饭后要继续回去劳作，而晚餐后则是睡觉。他们认为睡眠过程中肠胃消化较快。晚饭期间必有音乐，肉菜后必有水果。就餐时，有人会点燃香水、喷洒香膏及甜水。简而言之，这些都能够提振精神。在这方面，他们给予自己很大的包容，并沉浸在无害的愉悦中。城镇居民就这样共同生活。而在乡村，每家每户相隔甚远，都在自家用餐，也没有人需要任何供给品，因为城里人的供给品正是由他们提供的。

Chapter 6: Of the Travelling of the Utopians

第六章：关于乌托邦人的旅行等

If any man has a mind to visit his friends that live in some other town, or desires to travel and see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he obtains leave very easily from the Syphogrant and Tranibors when there is no particular occasion for him at home: such as travel, carry with them a passport from the Prince, which both certifies the license that is granted for travelling, and limits the time of their return. They are furnished with a waggon, and a slave who drives the oxen and looks after them; but unless there are women in the company, the wagon is sent back at the end of the journey as a needless encumbrance. While they are on the road, they carry no provisions with them; yet they want nothing, but are everywhere treated as if they were at home. If they stay in any place longer than a night, everyone follows his proper occupation, and is very well used by those of his own trade; but if any man goes out of the city to which he belongs, without leave, and is found rambling without a passport, he is severely treated, he is punished as a fugitive, and sent home disgracefully; and if he falls again into the like fault, is condemned to slavery. If any man has a mind to travel only over the precinct of his own city, he may freely do it, with his father's permission and his wife's consent; but when he comes into any of the country houses, if he expects to be entertained by them, he must labor with them and conform to their rules: and if he does this, he may freely go over the whole precinct; being thus as useful to the city to which he belongs, as if he were still within it. Thus you see that there are no idle persons among them, nor pretences of excusing any from labor. There are no taverns, no alehouses nor

stews among them; nor any other occasions of corrupting each other, of getting into corners, or forming themselves into parties: all men live in full view, so that all are obliged, both to perform their ordinary tasks, and to employ themselves well in their spare hours. And it is certain that a people thus ordered must live in great abundance of all things; and these being equally distributed among them, no man can want, or be obliged to beg.

如果有人想要去另一城市看望朋友，或去其他地方观光游览，若没有其他任务，可以轻而易举获得摄护格朗特和特朗尼菩尔的批准。去旅行须携带由总督签署的通行证，作为准许出行的证件，同时通行证上还有回来的时限。出门旅行时，人们还配有一辆马车、一名奴隶，奴隶负责赶牛并照顾他们，如果同行者中没有女性，人们一般都会觉得马车是个负担，会在外出归来后就将其退还。在旅途中，人们基本上不带任何东西，并不是因为不需要，而是所到之处都会受到盛情款待。若在某地停留超过一天，每个人都会做起本行，帮助当地的同行干活。但要是有人未经批准出城，在外游荡而没有通行证，将会面临重罚。他将作为逃犯被带回接受惩罚，若再有一次，将被贬为奴隶。任何人要想在本市界限内游览，只要征得父亲的允许和妻子的同意便可自由前往。但若在郊区想进入任何房屋受到款待，必须付出劳动并遵守当地人的规则，如果可以做到，便可以在郊区任意区域畅通无阻。这样，人们仍然可以为城市做贡献，就像没有出城时一样。因此，可以看出，乌托邦里既没有无所事事之人，亦没有逃避劳作之徒。这里没有酒馆、酒精饮料商店，也没有烟花柳巷，没有贪污腐化，人们也不会走投无路，或结党营私。所有人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不仅要尽职尽责完成日常任务，在业余时间内也要约束自己的言行。一个如此井然有序的群体定会有充足的供给，商品平均分配，也就没有人生活困难或被迫行乞。

In their great Council at Amaurot, to which there are three sent

from every town once a year, they examine what towns abound in provisions and what are under any scarcity, that so the one may be furnished from the other; and this is done freely, without any sort of exchange; for according to their plenty or scarcity they supply or are supplied from one another; so that indeed the whole island is, as it were, one family. When they have thus taken care of their whole country, and laid up stores for two years, which they do to prevent the ill- consequences of an unfavorable season, they order an exportation of the overplus, of corn, honey, wool, flax, wood, wax, tallow, leather, and cattle; which they send out commonly in great quantities to other nations. They order a seventh part of all these goods to be freely given to the poor of the countries to which they send them, and sell the rest at moderate rates. And by this exchange, they not only bring back those few things that they need at home (for indeed they scarce need anything but iron), but likewise a great deal of gold and silver; and by their driving this trade so long, it is not to be imagined how vast a treasure they have got among them: so that now they do not much care whether they sell off their merchandise for money in hand, or upon trust.

每年每个城市都要派三人参加亚马乌罗提的大议会，检查哪些城镇供给充足、哪些供给不足，有盈余的会无偿接济供给短缺的，市镇之间相互补充，因此，整个岛宛如一个大家庭。在满足整个地区的需要并做好两年的储备以防出现作物歉收之后，他们会将剩余产品，包括玉米、蜂蜜、羊毛、亚麻、木材、油脂、皮革及牲畜，大批量地运送到其他国家。他们要求将这些货物的七分之一免费发放给当地贫民，而剩余产品则廉价出售。如此一来，他们不仅仅运回了几样紧缺品（其实仅仅缺铁），还获得了大量金银。在这种贸易过程中，他们获得的财富数额之大超乎想象，因此他们也不在乎售出商品收回的是现款还是欠条。

A great part of their treasure is now in bonds; but in all their contracts no private man stands bound, but the writing runs in the name of the town; and the towns that owe them money raise it from those private hands that owe it to them, lay it Up in their public chamber, or enjoy the profit of it till the Utopians call for it; and they choose rather to let the greatest part of it lie in their hands who make advantage by it, than to call for it themselves: but if they see that any of their other neighbors stand more in need of it, then they call it in and lend it to them: whenever they are engaged in war, which is the only occasion in which their treasure can be usefully employed, they make use of it themselves. In great extremities or sudden accidents they employ it in hiring foreign troops, whom they more willingly expose to danger than their own people: they give them great pay, knowing well that this will work even on their enemies, that it will engage them either to betray their own side, or at least to desert it, and that it is the best means of raising mutual jealousies among them: for this end they have an incredible treasure; but they do not keep it as a treasure, but in such a manner as I am almost afraid to tell, lest you think it so extravagant, as to be hardly credible. This I have the more reason to apprehend, because if I had not seen it myself, I could not have been easily persuaded to have believed it upon any man's report.

现在，他们的财富很大程度上以债券的形式存在，但是所有的合约不能由私人担保，必须以市政部门的名义批准流通。债务人向市政部门还清欠款，市政部门将资金集齐，存入公库，或获取收益直到乌托邦人到期来取。而人们宁愿将大部分留在市政部门手里为他们盈利也不会将其取出，但是若发现自己的邻居需要，那么他们便会取回借给邻居。也只有在战时，他们才能让财富充分为己所用。在极端情况或突发意外时，他们会用这笔钱雇佣外国军队，因为他们宁愿让别人冲锋陷阵也不愿将本国居民置于险境。他们会花大价钱雇人，深知这

么做会奏效，因为会让敌方士兵叛变或至少逃离原来的部队，这是引发敌人内部相互妒忌的最佳手段。因此，乌托邦人准备了大量的资金，却不用保存财富的方法对待这笔资金。这种做法讲出来其实很难令人相信，我也是恐怕大家认为他们铺张浪费、挥霍无度才这么做的。大家很难相信我也完全理解，毕竟若非自己亲眼所见，我也很难相信任何人的说辞。

It is certain that all things appear incredible to us, in proportion as they differ from our own customs. But one who can judge aright will not wonder to find that, since their constitution differs so much from ours, their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should be measured by a very different standard; for since they have no use for money among themselves, but keep it as a provision against events which seldom happen, and between which there are generally long intervening intervals, they value it no farther than it deserves, that is, in proportion to its use. So that it is plain they must prefer iron either to gold or silver; for men can no more live without iron than without fire or water, but nature has marked out no use for the other metals, so essential as not easily to be dispensed with. The folly of men has enhanced the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because of their scarcity. Whereas, on the contrary, it is their opinion that nature, as an indulgent parent, has freely given us all the best things in great abundance, such as water and earth, but has laid up and hid from us the things that are vain and useless.

的确，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切都不可思议，因为这些与我们的惯例大相径庭。但鉴于他们的宪法与我们的也有巨大差异，因此能够做出准确判断的人都不会对他们衡量金银价值的方式大惊小怪。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没有金钱往来，但会将金钱作为应对偶发事件的物资。这些事件发生频率很低，因此他们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金钱的。所以显而

易见，与金银相比，他们更需要铁，因为铁对于他们而言就像水火一般不可或缺。由于大自然产出的其他金属的能力有限，因此分配这些关键金属时需要更为谨慎。因为金银稀有，世人就莫名其妙地夸大其价值。但在乌托邦里的人看来，大自然恰恰是一位宠爱孩子的家长，她慷慨地将最好的东西大量赠予我们，比如水和土，将没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搁置一旁或储藏起来。

If these metals were laid up in any tower in the kingdom, it would raise a jealousy of the Prince and Senate, and give birth to that foolish mistrust into which the people are apt to fall, a jealousy of their intending to sacrifice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to their own private advantage. If they should work it into vessels or any sort of plate, they fear that the people might grow too fond of it, and so be unwilling to let the plate be run down if a war made it necessary to employ it in paying their soldiers. To prevent all these inconveniences, they have fallen upon an expedient, which, as it agrees with their other policy, so is it very different from ours, and will scarce gain belief among us, who value gold so much and lay it up so carefully. They eat and drink out of vessels of earth, or glass, which make an agreeable appearance though formed of brittle materials: while they make their chamber-pots and close-stools of gold and silver; and that not only in their public halls, but in their private houses: of the same metals they likewise make chains and fetters for their slaves; to some of which, as a badge of infamy, they hang an ear-ring of gold, and make others wear a chain or coronet of the same metal; and thus they take care, by all possible means, to render gold and silver of no esteem. And from hence it is that while other nations part with their gold and silver as unwillingly as if one tore out their bowels, those of Utopia would look on their giving in all they possess of those (metals, when there was any use for them) but as the parting with a trifle, or as we would esteem the loss of a

penny. They find pearls on their coast, and diamonds and carbuncles on their rocks; they do not look after them, but, if they find them by chance, they polish them, and with them they adorn their children, who are delighted with them, and glory in them during their childhood; but when they grow to years, and see that none but children use such baubles, they of their own accord, without being bid by their parents, lay them aside; and would be as much ashamed to use them afterward as children among us, when they come to years, are of their puppets and other toys.

如果将这些金属藏匿于任何一座塔中，容易引发人们对总督和议事会的猜忌与质疑，觉得他们会为了一己之私利威胁公共利益。若将金银制成容器或任何餐具，他们担心人们会对其爱不释手，在战争爆发需要发给军队时，不愿交出这些器皿。为防止以上情况出现，他们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这一做法与其他政策相呼应，也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并且对我们这种高估金银并小心翼翼保管它们的人而言更是不可思议。他们吃喝用的器皿都由土或玻璃制成，尽管易碎，但外观精致。他们用金银制作公共厅堂及私人住宅的夜壶及便池、奴隶身上的锁链和镣铐，还用黄金制作象征耻辱的耳环、链条或头饰。也就是说，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使金银成为毫无尊严的代表。那么当其他国家的人不愿舍弃他们的金银，仿佛这么做是在掏心挖肺时，乌托邦里的人反而将给予这些金属（有必要时），视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他们能在海岸找到珍珠，在石壁上找到钻石和珠宝，但他们不会刻意寻找。若是偶然发现，他们会用来打扮孩子们，孩子们会非常开心而洋洋得意。但当他们长大一些，便会觉得这些只是给小孩儿的小玩意，华而不实，从而不需要父母要求，就会自愿丢而弃之，觉得继续使用很羞耻，就像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不再玩小孩儿玩的木偶和其他玩具一样。

I never saw a clearer instance of the opposite impressions that

different customs make on people, than I observed in the ambassadors of the Anemolians, who came to Amaurot when I was there. As they came to treat of affairs of great consequence, the deputies from several towns met together to wait for their coming. The ambassadors of the nations that lie near Utopia, knowing their customs, and that fine clothes are in no esteem among them, that silk is despised, and gold is a badge of infamy, used to come very modestly clothed; but the Anemolians, lying more remote, and having had little commerce with them,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were coarsely clothed, and all in the same manner, took it for granted that they had none of those fine things among them of which they made no use; and they being a vainglorious rather than a wise people, resolved to set themselves out with so much pomp, that they should look like gods, and strike the eyes of the poor Utopians with their splendor. Thus three ambassadors made their entry with 100 attendants, all clad in garments of different colors, and the greater part in silk; the ambassadors themselves, who were of the nobility of their country, were in cloth-of-gold, and adorned with massy chains, ear-rings, and rings of gold: their caps were covered with bracelets set full of pearls and other gems: in a word, they were set out with all those things that, among the Utopians, were the badges of slavery, the marks of infamy, or the playthings of children.

直到在亚马乌罗提看到来访的阿尼蒙利安外交使节，我才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不同习俗制度带给人们的截然相反的影响。他们前去商讨要事，乌托邦几个城镇的代表已经聚集起来恭候他们到来。乌托邦邻国的使节们了解这里的习俗，知道华贵的服饰并不是尊贵的象征，身着丝绸会被鄙视，黄金是耻辱的标志，因此他们通常穿着低调而朴素前来。但是阿尼蒙利安与乌托邦相距甚远，并且少有交集，他们觉得乌托邦人衣冠不整，而且穿着一致，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不用那些上

好的材质是因为没有。这些人虚荣又自负，不明事理，决定盛装前往，好像自己就是上帝，要让身无长物的乌托邦人叹服于他们的耀眼光芒。于是三名阿尼蒙利安使节带着100名随从，随从全都身着丝质的绚丽服饰。使节作为本国贵族，穿得宛如上帝一般，配有粗大的金项链、金耳环和金戒指，帽子上围有成串的珍珠和各类宝石。总而言之，他们所穿所戴在乌托邦要么是奴隶所配，要么是耻辱的标志，要么就是孩子的玩物。

It was not unpleasant to see, on the one side, how they looked big, when they compared their rich habits with the plain clothes of the Utopians, who were come out in great numbers to see them make their entry: and, on the other, to observe how much they were mistaken in the impression which they hoped this pomp would have made on them. It appeared so ridiculous a show to all that had never stirred out of their country, and had not seen the customs of other nations, that though they paid some reverence to those that were the most meanly clad, as if they had been the ambassadors, yet when they saw the ambassadors themselves, so full of gold and chains, they looked upon them as slaves, and forbore to treat them with reverence. You might have seen the children, who were grown big enough to despise their playthings, and who had thrown away their jewels, call to their mothers, push them gently, and cry out, “See that great fool that wears pearls and gems, as if he were yet a child.” While their mothers very innocently replied, “Hold your peace; this, I believe, is one of the ambassador's fools.” Others censured the fashion of their chains, and observed that they were of no use; for they were too slight to bind their slaves, who could easily break them; and besides hung so loose about them that they thought it easy to throw them away, and so get from them.

这种情况非常尴尬。一方面，他们看起来高高在上，流光溢彩的服饰与大量前来迎接他们的乌托邦人朴实无华的穿着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他们欲以这种做法震撼乌托邦人的想法是多么地错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所有未踏出过国门的乌托邦人都不了解其他国家的习俗，他们对那些穿着相对简朴的人致以尊重，以为他们才是使节，但当他们见到真正的使节，也就是那些穿金戴银的人，却把他们当成了奴隶，毫无尊重可言。甚至还有已经长到开始鄙视幼年玩物阶段的孩子们，他们已经把珠宝扔到了一边，轻轻拽着他们的母亲，大声叫道："那些穿戴珠宝的傻瓜就跟小孩儿一样。"他们的母亲也不明所以，说道："别说话，我猜他们可能是使节身边的小丑吧。"其他还有议论他们身上链子的人，他们觉得这些链子毫无用处，因为太过纤细根本无法将奴隶拴牢，而且太松，奴隶很容易挣脱。

But after the ambassadors had stayed a day among them, and saw so vast a quantity of gold in their houses, which was as much despised by them as it was esteemed in other nations, and beheld more gold and silver in the chains and fetters of one slave than all their ornaments amounted to, their plumes fell, and they were ashamed of all that glory for which they had formerly valued themselves, and accordingly laid it aside; a resolution that they immediately took, when on their engaging in some free discourse with the Utopians, they discovered their sense of such things and their other customs. The Utopians wonder how any man should be so much taken with the glaring doubtful lustre of a jewel or a stone, that can look up to a star or to the sun himself; or how any should value himself because his cloth is made of a finer thread: for how fine soever that thread may be, it was once no better than the fleece of a sheep, and that sheep was a sheep still for all its wearing it. They wonder much to hear that gold which in itself is so useless a thing, should be everywhere so much esteemed, that even men for whom it was made, and by whom it has its value, should yet be

thought of less value than this metal. That a man of lead, who has no more sense than a log of wood, and is as bad as he is foolish, should have many wise and good men to serve him, only because he has a great heap of that metal; and that if it should happen that by some accident or trick of law (which sometimes produces as great changes as chance itself) all this wealth should pass from the master to the meanest varlet of his whole family, he himself would very soon become one of his servants, as if he were a thing that belonged to his wealth, and so were bound to follow its fortune. But they much more admire and detest the folly of those who, when they see a rich man, though they neither owe him anything nor are in any sort dependent on his bounty, yet merely because he is rich give him little less than divine honors, even though they know him to be so covetous and base-minded that notwithstanding all his wealth he will not part with one farthing of it to them as long as he lives.

这些使节跟乌托邦人相处几天之后，发现他们家中满是金银财宝，却毫不珍惜，视如草芥，这与他们国家金钱至上的情形恰恰相反。那些奴役的镣铐枷锁中所用的金银都比他们全身穿戴的珠宝缀饰要多，这让他们感到灰心丧气，羞愧不已。在跟乌托邦人进行了亲切愉快的交谈后，他们了解了他们对金银的见解和其他的风俗，于是马上下定决心，将那些曾经引以为傲且万分珍视的华丽装饰全部取了下来。乌托邦人对此感到很困惑，人抬头就可望见璀璨的日月星辰，又何以会对闪烁着微光的宝石那么情有独钟呢。他们也不理解为何一个人会因为穿着细羊毛衣而感觉自己格外高贵，因为无论羊毛质地多么好，原来也是披在羊身上的，一只羊终归还是羊。他们也觉得奇怪，为何金子这样本身毫无用处的东西，在人们眼中竟如此珍贵；而且明明金子是为人所用，且是人赋予了它价值，那么人怎么会比这样一种金属还要低贱呢。一个如木头般麻木无知的人，一个邪恶愚蠢之人，就因为手中有大量的金银就可以驱使那些聪明的善人了吗。如果天有

不测，或是通过钻法律的空子（有时人为作梗比命运本身更能翻云覆雨），主人的财富都到了最卑贱的奴隶手中，那么原先的主人会很快沦为奴隶，就好像人只是财富的附属物一样，人生的境遇会随财富变化而起伏。同时他们也非常厌恶这样一类愚蠢的人：他们既不欠富人的钱，也毫不依仗富人的施舍，仅仅因为富人有钱，便授予这些富人几乎神圣的荣誉；而且他们很清楚这些富人贪婪下流的本性——只要苟活于世，就不会将财富分一丝一毫给穷人。

These and such like notions has that people imbibed, partly from their education, being bred in a country whose customs and laws are opposite to all such foolish maxims, and partly from their learning and studies; for though there are but few in any town that are so wholly excused from labor as to give themselves entirely up to their studies, these being only such persons as discover from their childhood an extraordinary capacity and disposition for letters; yet their children, and a great part of the nation, both men and women, are taught to spend those hours in which they are not obliged to work, in reading: and this they do through the whole progress of life. They have all their learning in their own tongue, which is both a copious and pleasant language, and in which a man can fully express his mind. It runs over a great tract of many countries, but it is not equally pure in all places. They had never so much as heard of the names of any of those philosophers that are so famous in these parts of the world, before we went among them; and yet they had made the same discoveries as the Greeks, in music, logic, arithmetic, and geometry. But as they are almost in everything equal to the ancient philosophers, so they far exceed our modern logicians; for they have never yet fallen upon the barbarous niceties that our youth are forced to learn in those trifling logical schools that are among us; they are so far from minding chimeras, and fantastical images made in the mind, that none of them could

comprehend what we meant when we talked to them of man in the abstract, as common to all men in particular (so that though we spoke of him as a thing that we could point at with our fingers, yet none of them could perceive him), and yet distinct from everyone, as if he were some monstrous Colossus or giant.

乌托邦人之所以有如此独到的见解，一方面源于他们从小的教育环境，他们成长在一个习俗和法律与那些愚昧的信条格格不入的国家；一方面源于他们后天的学习和钻研。虽然城中极少有人被免于体力劳动，专门潜心做研究，但这些人从儿时就被发现拥有无与伦比的才华以及超凡的读书用字能力。并且所有乌托邦的儿童，以及全国大部分公民，无论男女，都被劝导将体力劳动外的剩余时间全部花在阅读上，这个习惯会伴随他们一生。他们通过本国的语言习得各种知识，他们的语言词汇丰富且悦耳动听，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思想。这种语言在岛上很多地方都可以使用，不过在各个地方也有一定的差异。在我们的人去到他们那里以前，他们几乎不知道世界上任何著名的哲学家，然而他们在音乐、逻辑、算术以及几何等领域的发现完全可以跟希腊人比拟。他们不仅各方面的成就跟我们古代的哲学家基本可以同日而语，逻辑学同样也出类拔萃。他们从来不会像我们一样强迫年轻人去那些无关紧要的逻辑学校学习那些琐碎的、并不规范的准则。他们脑子中没有任何臆想出来的牛鬼蛇神或是捕风捉影的形象，当我们跟他们讲到抽象的“人”的概念，而不是特指某个个体时，他们也无法理解（虽然我们在谈论到代词“他”时脑中会有很清晰的形象，就好像用手指着说一样，然而乌托邦人无法理解），也无法从将“他”从所有人中剥离出来，就好像“他”是一个极其怪诞抽象的巨人一样。

Yet for all this ignorance of these empty notions, they knew astronomy, and were perfectly acquainted with the motions of the heavenly bodies, and have many instruments, well contrived and

divided, by which they very accurately compute the course and positions of the sun, moon, and stars. But for the cheat, of divining by the stars by their oppositions or conjunctions, it has not so much as entered into their thoughts. They have a particular sagacity, founded upon much observation, in judging of the weather, by which they know when they may look for rain, wind, or other alterations in the air; but as to the philosophy of these things, the causes of the saltness of the sea, of its ebbing and flowing, and of the origin and nature both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they dispute of them, partly as our ancient philosophers have done, and partly upon some new hypothesis, in which, as they differ from them, so they do not in all things agree among themselves.

虽然他们对于一些抽象的概念显得一无所知，却对天文，尤其是天体的运行极有研究。他们拥有各类设计巧妙且功能不一的仪器，用来十分精确地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及所在位置。至于观星象知人事那套唬人的把戏，他们想都不曾想过。他们有着超凡的睿哲，再加上长久的细致观察，能够准确预测风雨以及各种天气变化。但是至于各种自然原理，比如为何海水盐分那么高，为何会有潮起潮落，以及所有天体和地球的起源和本质等问题，他们的观点部分与古代哲学家一致，部分与一些新的学说相契合。实际上，关于这些问题，自古以来哲学家们也是看法不一，同样，乌托邦人也难以达成统一的认识。

As to moral philosophy, they have the same disputes among them as we have here: they examine what are properly good both for the body and the mind, and whether any outward thing can be called truly good, or if that term belong only to the endowments of the soul. They inquire likewise into the nature of virtue and pleasure; but their chief dispute is concerning the happiness of a man, and wherein it consists? Whether in some one thing, or in a

great many? They seem, indeed, more inclinable to that opinion that places, if not the whole, yet the chief part of a man's happiness in pleasure; and, what may seem more strange, they make use of arguments even from religion, notwithstanding its severity and roughness, for the support of that opinion so indulgent to pleasure; for they never dispute concerning happiness without fetching some arguments from the principles of religion, as well as from natural reason, since without the former they reckon that all our inquiries after happiness must be but conjectural and defective.

至于哲学上论及道德的部分，他们内部跟我们一样也是颇有争议。他们探索如何修身养善，以及外在事物怎样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善”，或者说“善”这个词是否只代指精神和灵魂的产物。他们探讨美德和快乐的本质，但是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人类幸福的来源：幸福到底是蕴含在某件小事中，还是由许许多多的事凝聚而成呢？事实上，他们大部分人倾向于认为人类幸福的主要来源是愉快的心情；令人感到非同寻常的是，他们甚至引用宗教中冷酷无情的论据来证明快乐是幸福的源泉。他们总是拿宗教中的准则作为论据来探讨相关幸福的话题，很少引用自然原理，因为他们认为缺少了宗教的支撑，任何关于幸福的探讨都只是妄加揣测，都是不经之谈。

These are their religious principles, that the soul of man is immortal, and that God of his goodness has designed that it should be happy; and that he has therefore appointed rewards for good and virtuous actions, and punishments for vice, to be distributed after this life. Though these principles of religion are conveyed down among them by tradition, they think that even reason itself determines a man to believe and acknowledge them, and freely confess that if these were taken away no man would be so insensible as not to seek after pleasure by all possible means, lawful

or unlawful; using only this caution, that a lesser pleasure might not stand in the way of a greater, and that no pleasure ought to be pursued that should draw a great deal of pain after it; for they think it the maddest thing in the world to pursue virtue, that is a sour and difficult thing; and not only to renounce the pleasures of life, but willingly to undergo much pain and trouble, if a man has no prospect of a reward. And what reward can there be for one that has passed his whole life, not only without pleasure, but in pain, if there is nothing to be expected after death? Yet they do not place happiness in all sorts of pleasures, but only in those that in themselves are good and honest.

以下是他们的宗教信条：人的灵魂是不灭的，上帝的仁慈注定了灵魂必然享有幸福。行善修德之人，死后有好报；为非作恶之人，死后受惩罚。虽然这些宗教的信条是从古到今传承下来的，但是他们相信即使没有传统的约束，理性本身也会使人们相信并认可这些信条。而且乌托邦人大胆直言：如果没有这些信条，人们就会丧失理智，通过各种非法及不道德的手段，千方百计地追求快乐。有了这样的信条，人们会更加谨慎，不会因为贪图小的欢愉而跟大的快乐失之交臂，而且也不该追求会招致痛苦后果的快乐。他们认为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修德，过程极其严峻艰辛。想要修德之人不仅要放弃所有的快乐，还要忍受各种痛苦，经历各种磨难，而且还要抱着死后亦无所图的决心。试问，如果死后无求，活着的时候又没有快乐，只有痛苦，那么人的一生到底图什么呢？也许他们的幸福并非来源于欢愉，而是源于自身的清白高尚。

There is a party among them who place happiness in bare virtue; others think that our natures are conducted by virtue to happiness, as that which is the chief good of man. They define virtue thus, that it is a living according to nature, and think that we

are made by God for that end; they believe that a man then follows the dictates of nature when he pursues or avoids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direction of reason; they say that the first dictate of reason is the kindling in us of a love and reverence for the Divine Majesty, to whom we owe both all that we have and all that we can ever hope for. In the next place, reason directs us to keep our minds as free from passion and as cheerful as we can, and that we should consider ourselves as bound by the ties of good-nature and humanity to use our utmost endeavors to help forward the happiness of all other persons; for there never was any man such a morose and severe pursuer of virtue, such an enemy to pleasure, that though he set hard rules for men to undergo much pain, many watchings, and other rigors, yet did not at the same time advise them to do all they could, in order to relieve and ease the miserable, and who did not represent gentleness and good-nature as amiable dispositions. And from thence they infer that if a man ought to advance the welfare and comfort of the rest of mankind, there being no virtue more proper and peculiar to our nature, than to ease the miseries of others, to free from trouble and anxiety, in furnishing them with the comforts of life, in which pleasure consists, nature much more vigorously leads them to do all this for himself.

有一类人将幸福置于纯粹的美德之上，其他人则认为是德行引导着我们自然的本性去追求幸福，这也是人类最大的善。乌托邦人将修德定义为随性的生活，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根源；他们相信，一个人在追求和规避任何事物的时候都是服从理性的指引，追随自然的指令。他们认为理性首先是在人们身上燃起对上帝的热爱和崇敬，我们拥有的一切以及追求的一切都来自上帝。其次，理性引导我们时刻保持理智，并能随心所欲地享受快乐，我们应该用真善的本性和人性的光辉时刻约束自己，极尽所能去帮助其他人获得幸福。一个修德路上的殉

道者，无论他的生活多么孤独艰苦，无论他多么抵制享受，且立下规矩，认为人们必须经历百般苦难和严酷的考验，才能修得正果，他也会同时规劝人们竭尽所能去帮助大众脱离苦海，也会将温和善良视为美好的性情。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可以帮助全人类获得财富和安乐，减轻他人的苦难，帮助众人剥离繁冗和焦虑，带给他们安逸又充满愉悦的生活，这是最贴近人的本性，并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美德。本性使然，引导着人们去做这些事情，这就是快乐。

A life of pleasure is either a real evil, and in that case we ought not to assist others in their pursuit of it, but on the contrary, to keep them from it all we can, as from that which is most hurtful and deadly; or if it is a good thing, so that we not only may, but ought to help others to it, why, then, ought not a man to begin with himself? Since no man can be more bound to look after the good of another than after his own; for nature cannot direct us to be good and kind to others,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to be unmerciful and cruel to ourselves. Thus, as they define virtue to be living according to nature, so they imagine that nature prompts all people on to seek after pleasure, as the end of all they do. They also observe that in order to our supporting the pleasures of life, nature inclines us to enter into society; for there is no man so much raised above the rest of mankind as to be the only favorite of nature who, on the contrary, seems to have placed on a level all those that belong to the same species. Upon this they infer that no man ought to seek his own conveniences so eagerly as to prejudice others; and therefore they think that not only all agreements between private persons ought to be observed, but likewise that all those laws ought to be kept, which either a good prince has published in due form, or to which a people that is neither oppressed with tyranny nor circumvented by fraud, has consented, for distributing those conveniences of life which afford us all our pleasures.

如果快乐的生活是罪恶的，那么我们不仅不该帮助他人去追求快乐，还要帮他们远离快乐，摆脱这种有害且致命的生活。如若快是美好的，那么除了应该帮助别人得到快乐，我们不也该追求快乐吗，毕竟人们不能如此厚彼薄己啊。自然指示我们去善待他人，但并没有引导我们去苛待自己啊。因为乌托邦人将修德定义为遵循自然的指示而生活，因此在他们的想象中，自然推动着所有人去追寻快乐，这也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在他们看来，自然号召人们融入社会，在相互帮助中寻求快乐的生活，因为没有人能超越他人成为自然唯一的宠儿，同一物种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基于这一点，他们认为任何人都不能为了寻求私利而有损于人。此外，乌托邦人认为不仅应该践守私人之间达成的约定，也应该遵守贤明的君王以合法的形式颁布的关于生活物资（也是快乐的唯一来源）分配的所有法令，或是免于暴政压迫和诡计迫害的自由人一致通过的所有法令。

They think it is an evidence of true wisdom for a man to pursue his own advantages as far as the laws allow it. They account it piety to prefer the public good to one's private concerns; but they think it unjust for a man to seek for pleasure by snatching another man's pleasures from him. And on the contrary, they think it a sign of a gentle and good soul, for a man to dispense with his own advantage for the good of others; and that by this means a good man finds as much pleasure one way as he parts with another; for as he may expect the like from others when he may come to need it, so if that should fail him, yet the sense of a good action, and the reflections that he makes on the love and gratitude of those whom he has so obliged, gives the mind more pleasure than the body could have found in that from which it had restrained itself. They are also persuaded that God will make up the loss of those small pleasures, with a vast and endless joy, of which religion easily convinces a good soul.

他们认为：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去追求个人利益的人才是真正明智的人。将公众利益置于个人得失之上是十分虔诚的表现。一个人为了成全自身的快乐而夺取他人的快乐是不正义的表现。一个人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舍弃自身利益代表这个人拥有一颗温柔高尚的灵魂；通过这种方式，德行高尚之人虽为别人放弃了一些东西，却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同样的快乐；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人也会向他伸出援手，即使他人没有伸出援手，每当想到到自己行了善举，想起受惠之人心怀爱意和感激的心情，他的心灵上获得的愉悦是远非放弃了的肉体愉快所能比的。他们也坚信上帝会给予行善之人巨大无穷的快乐来补偿曾经失去的微小短暂的欢乐，这也是宗教能让高尚之人虔诚信奉的原因。

Thus, upon an inquiry into the whole matter, they reckon that all our actions, and even all our virtues, terminate in pleasure, as in our chief end and greatest happiness; and they call every motion or state, either of body or mind, in which nature teaches us to delight, a pleasure. Thus they cautiously limit pleasure only to those appetites to which nature leads us; for they say that nature leads us only to those delights to which reason as well as sense carries us, and by which we neither injure any other person nor lose the possession of greater pleasures, and of such as draw no troubles after them; but they look upon those delights which men by a foolish though common mistake call pleasure, as if they could change as easily the nature of things as the use of words; as things that greatly obstruct their real happiness instead of advancing it, because they so entirely possess the minds of those that are once captivated by them with a false notion of pleasure, that there is no room left for pleasures of a truer or purer kind,

因此，经过对这个问题的认真考虑和权衡，乌托邦人主张人类所有的行为，甚至包括所有的道德行为，都以获得快乐作为最终目标，这也是人类的根本诉求和最大的幸福。他们认为快乐是在自然的教导下，身心产生的一种愉悦的活动或状态。他们认为只有在自然的引领下产生的愉悦感才是真正的快乐；因为自然引领人们产生的愉悦感总是与理性和理智带给人们的愉悦感相同。这样的快乐既不会有损于人，也不会令人们错失更大的快乐，更不会为人们招致任何麻烦。他们认为如果人们普遍对愉悦感抱有愚昧且错误的认知（比如错误地认为人可以如遣词用字一样轻易地改变事物的自然本性），那么这将严重阻碍人们获得真正的快乐，因为人们的思想一旦被错误的认知迷惑，进而完全占据，那么人们也就无法获得真正纯粹的快乐了。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in themselves have nothing that is truly delightful; on the contrary, they have a good deal of bitterness in them; and yet from our perverse appetites after forbidden objects, are not only ranked among the pleasures, but are made even the greatest designs of life. Among those who pursue these sophisticated pleasures, they reckon such as I mentioned before, who think themselves really the better for having fine clothes; in which they think they are doubly mistaken, both in the opinion that they have of their clothes, and in that they have of themselves; for if you consider the use of clothes, why should a fine thread be thought better than a coarse one? And yet these men, as if they had some real advantages beyond others, and did not owe them wholly to their mistakes, look big, seem to fancy themselves to be more valuable, and imagine that a respect is due to them for the sake of a rich garment, to which they would not have pretended if they had been more meanly clothed; and even resent it as an affront, if that respect is not paid them. It is also a great folly to be taken with outward marks of respect, which signify nothing: for what true or real pleasure can one man find in another's standing bare, or

making legs to him? Will the bending another man's knees give ease to yours? And will the head's being bare cure the madness of yours? And yet it is wonderful to see how this false notion of pleasure bewitches many who delight themselves with the fancy of their nobility, and are pleased with this conceit, that they are descended from ancestors who have been held for some successions rich, and who have had great possessions; for this is all that makes nobility at present; yet they do not think themselves a whit the less noble, though their immediate parents have left none of this wealth to them, or though they themselves have squandered it away.

事实上，很多事物本身来说并不能真正使人愉悦，而且还充斥着心酸和苦涩，然而人们由于对禁忌的邪恶渴望，不仅把这些事物看成是快乐的源泉，还视为人生中头等重要的大事。那些追求这样精雕细琢的快乐的人，比如说我之前提到的那些将穿着华衣丽服视为尊贵象征的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犯有双重错误，即对衣物的看法和对自身的认知犯有双重错误。其实从衣物的实用性看，细毛线为什么就比粗毛线尊贵呢？但这些穿着华丽服饰的人却狂妄自大，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当真以为自己比别人多了什么实在的好处，自以为优越尊贵，臆想着穿着华贵服饰的他们理所当然该赢得尊重（他们穿着欠讲究时可不敢奢望这种尊重）；如果穿着华丽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还会愤愤不平，将其看作是一种侮辱。太过在意这种外在的虚无的荣誉实在是很愚蠢，因为那并不代表什么：别人对你脱帽行礼或屈膝致意，能给你带来什么真正的快乐呢？别人屈膝于你的时候你的膝盖会因此舒适吗？别人向你脱帽行礼的时候能治好你的精神失常吗？那些对快乐抱有错误观念的人们因为这种自以为是的高贵而感到愉悦，因这种狂妄的自负而欢心，然而他们只是出身名门望族，继承了先人丰厚的遗产，这也是他们如今所谓高贵的唯一来源；即使他们的父母不曾创造财富，不曾给他们留下任何财物，即使他们将家业很快挥霍一空，他们也丝毫不以此为耻。

The Utopians have no better opinion of those who are much taken with gems and precious stones, and who account it a degree of happiness, next to a divine one, if they can purchase one that is very extraordinary; especially if it be of that sort of stones that is then in greatest request; for the same sort is not at all times universally of the same value; nor will men buy it unless it be dismounted and taken out of the gold; the jeweller is then made to give good security, and required solemnly to swear that the stone is true, that by such an exact caution a false one might not be bought instead of a true: though if you were to examine it, your eye could find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unterfeit and that which is true; so that they are all one to you as much as if you were blind. Or can it be thought that they who heap up a useless mass of wealth, not for any use that it is to bring them, but merely to please themselves with the contemplation of it, enjoy any true pleasure in it? The delight they find is only a false shadow of joy. Those are no better whose error i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 and who hide it, out of their fear of losing it; for what other name can fit the hiding it in the earth, or rather the restoring it to it again, it being thus cut off from being useful, either to its owner or to the rest of mankind? And yet the owner having hid it carefully, is glad, because he thinks he is now sure of it. If it should be stolen, the owner, though he might live perhaps ten years after the theft, of which he knew nothing, would find no difference between his having or losing it; for both ways it was equally useless to him.

对于那些贪恋珠宝玉石之人，乌托邦人也同样感到十分不屑。那些人如果能买到上等货色，特别是大家都趋之若鹜的宝贝，那么就欣喜若狂，自以为幸福得快要赛神仙了。由于同等品质的珠宝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并不总是拥有同等的价值，因此人们只会购买从金镶底座取下来的宝石，并要求珠宝商作出承诺，发誓保证珠宝的货真

价实，人们如此小心翼翼，唯恐买到以假乱真的货色。然而如果你的肉眼没法分辨真假，那么是真玉还是顽石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如同是对瞎子而言啊。有一种人，聚敛了大量无用的财富，从来不用于消费，仅仅是享受那种据为己有的愉悦感，这哪是真正的快乐啊？他们享受的那种愉悦感只是快乐的虚无泡影罢了。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所犯错误和上面那类人略有不同，他们将珠宝藏起来，生怕丢失，该如何评价这类人呢？他们将宝物永远埋在地下，永不见天日，那跟彻底失去又有什么两样？这样一来，被埋的宝物于人于己都再无用武之地了。珠宝的主人小心翼翼将宝贝埋藏起来，开心得认为这下总算万无一失了。然而假设有一天这些宝石被偷了，在珠宝失窃而主人还健在且对此一无所知的时间里（假设十年），拥有和失去这些宝物于他而言又有什么区别呢？对他而言，怎样都是毫无意义。

Among those foolish pursuers of pleasure they reckon all that delight in hunting, in fowling, or gaming: of whose madness they have only heard, for they have no such things among them. But they have asked us, what sort of pleasure is it that men can find in throwing the dice? For if there were any pleasure in it, they think the doing of it so often should give one a surfeit of it: and what pleasure can one find in hearing the barking and howling of dogs, which seem rather odious than pleasant sounds? Nor can they comprehend the pleasure of seeing dogs run after a hare, more than of seeing one dog run after another; for if the seeing them run is that which gives the pleasure, you have the same entertainment to the eye on both these occasions, since that is the same in both cases: but if the pleasure lies in seeing the hare killed and torn by the dogs, this ought rather to stir pity, that a weak, harmless and fearful hare should be devoured by strong, fierce, and cruel dogs. Therefore all this business of hunting is, among the Utopians, turned over to their butchers; and those, as has been already said, are all slaves; and they look on hunting as one of the basest parts of

a butcher's work: for they account it both more profitable and more decent to kill those beasts that are more necessary and useful to mankind; whereas the killing and tearing of so small and miserable an animal can only attract the huntsman with a false show of pleasure, from which he can reap but small advantage. They look on the desire of the bloodshed, even of beasts, as a mark of a mind that is already corrupted with cruelty, or that at least by the frequent returns of so brutal a pleasure must degenerate into it.

在乌托邦人看来，追求这种愚蠢乐趣的人，还有沉溺于狩猎、捕禽及赌博中的人（他们对这些人的疯狂只是有所耳闻，因为所有乌托邦人都不愿意做这些事情）。他们曾经问过我们，掷骰子有什么乐趣呢？即便真有乐趣可言，积久也总会生厌啊。还有，听一群猎犬咆哮狂吠又有什么乐趣呢？那声音不仅并不悦耳，还十分惹人厌烦。他们也不能理解为何看猎犬追兔子会比看猎犬互相追逐更有意思呢？如果其中的乐趣只是在于观看他们奔跑追逐，那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带来的乐趣不是一样的吗？然而如果其中的乐趣在于观看兔子被猎犬猎杀撕咬，那么看着弱小无害且胆小温顺的兔子被强壮凶猛且残暴无比的猎犬吞食，人们不应感到同情吗？因此，在乌托邦，所有狩猎相关的工作都由屠夫来做，而正如前述，这些屠夫都是奴役担任的。而且乌托邦人将狩猎视作屠夫最低贱的工作：如果猎杀的是那些生猛的野兽，不仅十分必要且对人们有益，而且屠夫还能从中牟利，也不失正派作风。然而如果是残忍杀害一只弱小可怜的动物，那么屠夫只是在享受那种邪恶的愉悦感，而且能收获的少之又少。在乌托邦人看来，人们对杀戮的渴望，即便是猎杀野兽，也意味着他们的心灵已被冷血和残暴所侵蚀，或者至少，随着人们沉溺于这种残忍的乐趣，他们的心灵也一定终将走向堕落，变得冷血残暴。

Thus, though the rabble of mankind look upon these, and on innumerable other things of the same nature, as pleasures, the

Utopians, on the contrary, observing that there is nothing in them truly pleasant, conclude that they are not to be reckoned among pleasures: for though these things may create some tickling in the senses (which seems to be a true notion of pleasure), yet they imagine that this does not arise from the thing itself, but from a depraved custom, which may so vitiate a man's taste, that bitter things may pass for sweet; as women with child think pitch or tallow tastes sweeter than honey; but as a man's sense when corrupted, either by a disease or some ill habit, does not change the nature of other things, so neither can it change the nature of pleasure.

尽管许多人把所有这些以及数不清的类似性质的消遣看成乐事，乌托邦人却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快乐，其中也无任何令人惬意之处。虽然这些事情确实会掀起一些感觉上的波澜（这似乎是快乐的真实定义），然而他们认为这种愉悦感不是源于事物本身，而是源于败坏的习俗。这种习俗将人们的味蕾彻底毁坏，竟然让他们以苦为甜，犹如怀孕的妇女会觉得树脂和动物脂肪比蜂蜜更甜美可口。然而，人的感官，纵使由于疾病或者不良嗜好而遭到破坏，亦不可能改变快乐的性质，如同不可能改变其他任何东西的性质一样。

They reckon up several sorts of pleasures, which they call true ones: some belong to the body and others to the mind. The pleasures of the mind lie in knowledge, and in that delight which the contemplation of truth carries with it; to which they add the joyful reflections on a well-spent life, and the assured hopes of a future happiness. They divide the pleasures of the body into two sorts; the one is that which gives our senses some real delight, and is performed, either by recruiting nature, and supplying those parts which feed the internal heat of life by eating and drinking; or when

nature is eased of any surcharge that oppresses it; when we are relieved from sudden pain, or that which arises from satisfying the appetite which nature has wisely given to lead us to the propagation of the species. There is another kind of pleasure that arises neither from our receiving what the body requires nor its being relieved when overcharged, and yet by a secret, unseen virtue affects the senses, raises the passions, and strikes the mind with generous impressions; this is the pleasure that arises from music. Another kind of bodily pleasure is that which results from an undisturbed and vigorous constitution of body, when life and active spirits seem to actuate every part. This lively health, when entirely free from all mixture of pain, of itself gives an inward pleasure, independent of all external objects of delight; and though this pleasure does not so powerfully affect us, nor act so strongly on the senses as some of the others, yet it may be esteemed as the greatest of all pleasures, and almost all the Utopians reckon it the foundation and basis of all the other joys of life; since this alone makes the state of life easy and desirable; and when this is wanting, a man is really capable of no other pleasure. They look upon freedom from pain, if it does not rise from perfect health, to be a state of stupidity rather than of pleasure.

乌托邦人将真正的快乐分为肉体上及精神上的快乐。精神上的快乐来自于汲取知识、体悟真理；这种快乐来自于快乐充实的人生回忆，来自于对美好未来的希冀和憧憬。他们将肉体上的快乐分为两类；一类是人能真切感觉到的愉悦感，即自然能量的恢复补充，比如通过吃喝来补足身体所需的热量，这时身体器官会产生愉悦感；有时这种愉悦感也来自于从超负荷的压力中解脱，例如从突然的疼痛中解脱，或者是自然赋予人类繁衍生息的欲望得到满足。还有一种快乐，既不是产生于身体得到补给的充实、也不是来自于从压力中解脱的释然，然而却以一种神秘的，不可名状的力量影响着我们的感官，使我

们产生强烈的情感，心灵受到极大的触动；例如音乐带给人们的愉悦感。另一类肉体上的快乐源于身体安然平和又充满生机的状态，强大的生命力让身心振奋。这种充满生命力的健康状态，使肉体远离各种痛苦，是一种内在的愉悦，不同于所有因外物产生的喜悦；虽然这种快乐无法对我们造成强烈的影响，也不会剧烈地冲击我们的感官，然而却可以看作是最大的快乐，几乎所有乌托邦人都将此看作是生命中其他所有欢乐的源泉和基础。只有身体健康，生活才能确保舒适，令人憧憬，如果身体孱弱多病，那么也无福消受其他的快乐。在没有健康的情况下而不觉得痛苦，乌托邦人认为这是麻木不仁而不是快乐。

This subject has been very narrowly canvassed among them; and it has been debated whether a firm and entire health could be called a pleasure or not? Some have thought that there was no pleasure but what was excited by some sensible motion in the body. But this opinion has been long ago excluded from among them, so that now they almost universally agree that health is the greatest of all bodily pleasures; and that as there is a pain in sickness, which is as opposite in its nature to pleasure as sickness itself is to health, so they hold that health is accompanied with pleasure: and if any should say that sickness is not really pain, but that it only carries pain along with it, they look upon that as a fetch of subtilty, that does not much alter the matter. It is all one, in their opinion, whether it be said that health is in itself a pleasure, or that it begets a pleasure, as fire gives heat; so it be granted, that all those whose health is entire have a true pleasure in the enjoyment of it: and they reason thus—what is the pleasure of eating, but that a man's health which had been weakened, do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food, drive away hunger, and so recruiting itself recovers its former vigor? And being thus refreshed, it finds a pleasure in that conflict; and if the conflict is pleasure, the victory must yet breed a greater pleasure, except we fancy that it becomes stupid as soon as it has obtained

that which it pursued, and so neither knows nor rejoices in its own welfare. If it is said that health cannot be felt, they absolutely deny it; for what man is in health that does not perceive it when he is awake? Is there any man that is so dull and stupid as not to acknowledge that he feels a delight in health? And what is delight but another name for pleasure?

乌托邦人就这个问题展开过细致的讨论，即拥有健壮完好的体魄能不能被称之为一种快乐。有些人认为只有外界可感知的刺激才能让身体感到快乐。但是这个说法很早就被否定了，他们今天几乎一致认为健康是身体所能获得的最大的快乐；在他们看来，既然疾病带来痛苦，而痛苦就其本性而言是快乐的大敌，正如疾病是健康的大敌，那么快乐与健康必然是相伴相生的好友。如果有人说疾病并不是真正的痛苦，只是伴随着痛苦，这种说法只是强词夺理罢了，事实的本质没变。无论说健康本身是一种快乐，还是说健康能带来快乐，这两种说法都是一样的，就像有火才能产生不息的热量一样；因此，只有身体完全健康的人才能享受真正的快乐，乌托邦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的推理如下：食物驱赶了饥饿，让虚弱的身体重新充满活力， 因此吃饭产生的快乐源于健康。如果身体重回健康状态的作战过程（比如吃饭）是快乐的，那么取得胜利以后（吃饱饭）更应该是快乐的，除非我们异想天开，认为人在恢复活力以后会变得愚蠢无知，对于自己的战利品熟视无睹，丝毫感不到快乐。乌托邦人非常不认同“健康是无法被感知的”这样的观点，因为人在清醒的状态下难道会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吗？谁会如此麻木无知，以至于否认健康对他是惬意可喜的呢？所谓可喜不就是快乐的别名吗？

But of all pleasures, they esteem those to be most valuable that lie in the mind, the chief of which arises out of true virtue, and the witnesses of a good conscience. They account health the chief pleasure that belongs to the body; for they think that the pleasure

of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all the other delights of sense, are only so far desirable as they give or maintain health. But they are not pleasant in themselves, otherwise than as they resist those impressions that our natural infirmities are still making upon us: for as a wise man desires rather to avoid diseases than to take physic, and to be freed from pain, rather than to find ease by remedies; so it is more desirable not to need this sort of pleasure, than to be obliged to indulge it. If any man imagines that there is a real happiness in these enjoyments, he must then confess that he would be the happiest of all men if he were to lead his life in perpetual hunger, thirst, and itching, and by consequence in perpetual eating, drinking, and scratching himself; which anyone may easily see would be not only a base but a miserable state of life. These are indeed the lowest of pleasures, and the least pure; for we can never relish them, but when they are mixed with the contrary pains. The pain of hunger must give us the pleasure of eating; and here the pain out-balances the pleasure; and as the pain is more vehement, so it lasts much longer; for as it begins before the pleasure, so it does not cease but with the pleasure that extinguishes it, and both expire together.

在所有的快乐中，他们认为心灵的快乐是最珍贵的，而心灵上快乐的源泉是自身良好的德行和对高尚情操的耳濡目染。他们认为健康是肉体上最大的快乐；吃喝产生的快乐，以及所有感官上的愉悦感，都是因为能够提供或维持健康才为人追捧。这些享乐本身并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只是能够帮助人们抵抗疾病的侵袭，所以才让人感到快乐。一个明智的人应力求避免生病，而不是求医问药，应力求远离痛苦，而不是缓解痛苦。因此比起被迫沉湎于这种快乐，不如让自己无需享受这种快乐。有人认为这些享乐正是真正的快乐，那么他势必要承认只有过这样的生活——一直遭受无尽的饥渴和瘙痒的折磨，并因此不断的吃喝和挠痒来缓解痛苦——是最幸福的；很显然，这样的生

活状态是最低劣悲惨的。这种快乐是最低级、最不单纯的快乐，因为除非我们遭受着极端的交织的痛苦，不然不会渴望这种享乐。就像只有饥饿难耐的人才能体会到饱食的快乐，这种痛苦和快乐是相互抵消的；痛苦越深刻，快乐越持久；痛苦产生于快乐之前，直到快乐和它一同消失它才结束。

They think, therefore, none of those pleasures is to be valued any further than as it is necessary; yet they rejoice in them, and with due gratitude acknowledge the tenderness of the great Author of nature, who has planted in us appetites, by which those thing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our preservation are likewise made pleasant to us. For how miserable a thing would life be, if those daily diseases of hunger and thirst were to be carried off by such bitter drugs as we must use for those diseases that return seldomer upon us? And thus these pleasant as well as proper gifts of nature maintain the strength and the sprightliness of our bodies.

因此，乌托邦人认为这种快乐仅仅是生命所需，并非弥足珍贵；然而他们还是享乐其中，并且对造物主的慈悲心怀感激，感激她赋予我们欲望，欲望让我们对那些延续生命所必须的事物感到快乐。如果人们整日都要忍饥挨饿，而只有治疗罕见疾病的苦口药材才可以驱散这种痛苦，那么生活将是多么悲惨。正是大自然令人愉快的馈赠让我们的生命永葆青春和活力。

They also entertain themselves with the other delights let in at their eyes, their ears, and their nostrils, as the pleasant relishes and seasonings of life, which nature seems to have marked out peculiarly for man; since no other sort of animals contemplates the figure and beauty of the universe; nor is delighted with smells, any

further than as they distinguish meats by them; nor do they apprehend the concords or discords of sound; yet in all pleasures whatsoever they take care that a lesser joy does not hinder a greater, and that pleasure may never breed pain, which they think always follows dishonest pleasures. But they think it madness for a man to wear out the beauty of his face, or the force of his natural strength; to corrupt the sprightliness of his body by sloth and laziness, or to waste it by fasting; that it is madness to weaken the strength of his constitution, and reject the other delights of life; unless by renouncing his own satisfaction, he can either serve the public or promote the happiness of others, for which he expects a greater recompense from God. So that they look on such a course of life as the mark of a mind that is both cruel to itself, and ungrateful to the Author of nature, as if we would not be beholden to Him for His favors, and therefore reject all His blessings; as one who should afflict himself for the empty shadow of virtue; or for no better end than to render himself capable of bearing those misfortunes which possibly will never happen.

乌托邦人也通过眼、耳、鼻等感官去享受生命中独特的味道和欢愉，这似乎是大自然唯独赋予人类的能力；因为其他动物都无法像人一样沉醉于宇宙绚丽的形态；它们除了区分食物外，再无其他感知气味的能力；更不懂得分辨音程和谐与否。然而乌托邦人认为：绝不能因贪图小乐而失去极乐，不能追求伴有苦果的快乐，来之不义的快乐往往伴随着痛苦。在他们看来，人们因为懒惰放弃运动的快乐，或者因禁食而伤身，都是在荒废生命，摒弃大自然赋予的强健体魄；削弱自己健壮的体格，拒绝生命中其他的快乐，这些行为都是疯狂之举，除非这个人放弃自我满足是为了服务大众，或实现他人的幸福，以这样的牺牲求得来自上帝的更好的回馈。但乌托邦人是极不认可这种生活态度的，他们认为这不仅对自己极其残忍，也是对造物主忘恩负义的一种表现。这种心境，不但不屑于感恩自然，还摒弃了自然所有的

馈赠。这种人为了这种虚无缥缈的修德之路折磨自己，到头来却不得善果，还遭受了种种本可避免的痛苦和不幸。

This is their notion of virtue and of pleasure; they think that no man's reason can carry him to a truer idea of them, unless some discovery from heaven should inspire him with sublimer notions. I have not now the leisure to examine whether they think right or wrong in this matter: nor do I judge it necessary, for I have only undertaken to give you an account of their constitution, but not to defend all their principles. I am sure, that whatsoever may be said of their notions, there is not in the whole world either a better people or a happier government: their bodies are vigorous and lively; and though they are but of a middle stature, and have neither the fruitfullest soil nor the purest air in the world, yet they fortify themselves so well by their temperate course of life, against the unhealthiness of their air, and by their industry they so cultivate their soil, that there is nowhere to be seen a greater increase both of corn and cattle, nor are there anywhere healthier men and freer from diseases: for one may there see reduced to practice, not only all the arts that the husbandman employs in manuring and improving an ill soil, but whole woods plucked up by the roots, and in other places new ones planted, where there were none before.

以上是乌托邦人对德行及快乐的看法。他们认为以人类的智慧再也不可能给出更正确的见解，除非上天能给予启示，让人们获得更加神圣的真知。我没有那份闲情去斟酌乌托邦人关于此问题的看法是对还是错，也着实没有这个必要。我要做的是为你们讲述他们的体制，而不是去捍卫他们的原则。我坚信，无论你们怎样评价他们的观点，世上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民族和更幸福的国家。尽管他们都是中等身材，但是却充满生机与活力；他们没有最肥沃的土地，也没有最宜人

的气候，但是他们却以一种节制适度的生活方式自立自强，寒暑无侵，他们吃苦耐劳，精耕细作。于是，乌托邦成为世界上粮食产量最高、牲畜最兴旺的国家，它的人民也是体格最健壮且最少生病的。在乌托邦，很多事情都能成为现实：农民们能够利用各种技艺精心施肥、细心改良贫瘠的土地；一整座树林也能全部连根拔起，新的树林随后便可在别处栽种。

Their principal motive for this is the convenience of carriage, that their timber may be either near their towns or growing on the banks of the sea or of some rivers, so as to be floated to them; for it is a harder work to carry wood at any distance over land, than corn. The people are industrious, apt to learn, as well as cheerful and pleasant; and none can endure more labor, when it is necessary; but except in that case they love their ease. They are unwearied pursuers of knowledge; for when we had given them some hints of the learning and discipline of the Greeks, concerning whom we only instructed them (for we know that there was nothing among the Romans, except their historians and their poets, that they would value much), it was strange to see how eagerly they were set on learning that language. We began to read a little of it to them, rather in compliance with their importunity, than out of any hopes of their reaping from it any great advantage. But after a very short trial, we found they made such progress, that we saw our labor was like to be more successful than we could have expected. They learned to write their characters and to pronounce their language so exactly, had so quick an apprehension, they remembered it so faithfully, and became so ready and correct in the use of it, that it would have looked like a miracle if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whom we taught had not been men both of extraordinary capacity and of a fit age for instruction. They were for the greatest part chosen from among their learned men, by their chief Council, though some

studied it of their own accord. In three years' time they became masters of the whole language, so that they read the best of the Greek authors very exactly. I am indeed apt to think that they learned that language the more easily, from its having some relation to their own. I believe that they were a colony of the Greeks; for though their language comes nearer the Persian, yet they retain many names, both for their towns and magistrates, that are of Greek derivation.

他们的树木要么临近城市，要么临近海边或河岸，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便于运输，因为无论距离远近，陆路运输木材都要比运输谷物难度更大。人们勤勉耐劳，心灵手巧，积极乐观，友善待人。有需要的时候，人们相互分担劳动，除非他们安于闲适。他们孜孜不倦，求知若渴。当我们提到希腊人的学识与风纪时，只是稍微讲解了一下（因为我们知道，除了历史学家和诗人，罗马人没什么特别珍视的了），便发现他们对于该语言的学习热情令人惊讶。我们便开始给他们大致讲解，但仅仅是因为他们强烈要求，并不是指望他们能有什么进步。但是经过短暂尝试，我们发现他们进步飞快，而我们的付出取得的效果看来远远超出预期。很快，他们便学会了正确地拼写与精准地发音，能够迅速理解，并准确无误地记忆，可以做到胸有成竹，正确运用。他们大部分人若不是能力超群的适龄学习者，这一切将很难想象。事实上，他们大部分人是由大议事会从学识渊博之人中选出来的，但也有些人是出于自愿前来学习的。仅用三年时间，他们便精通这门语言，因此他们完全能够读懂希腊名家的作品。我不禁想到，他们能够相对轻松地掌握这门语言，可能因为其与他们的母语有共通之处。我认为这里可能曾是希腊殖民地，因为尽管他们的语言与波斯语更为相近，但是这里仍保留了源自希腊语的城镇和地方官名称。

I happened to carry a great many books with me, instead of merchandise, when I sailed my fourth voyage; for I was so far from

thinking of soon coming back, that I rather thought never to have returned at all, and I gave them all my books, among which were many of Plato's and some of Aristotle's works. I had also Theophrastus “On Plants,” which, to my great regret, was imperfect; for having laid it carelessly by, while we were at sea, a monkey had seized upon it, and in many places torn out the leaves. They have no books of grammar but Lascares, for I did not carry Theodorus with me; nor have they any dictionaries but Hesichius and Dioscorides. They esteem Plutarch highly, and were much taken with Lucian's wit and with his pleasant way of writing. As for the poets, they have Aristophanes, Homer, Euripides, and Sophocles of Aldus's edition; and for historians Thucydides, Herodotus, and Herodian. One of my companions, Thricius Apinatus, happened to carry with him some of Hippocrates's works, and Galen's “Microtechne,” which they hold in great estimation; for though there is no nation in the world that needs physic so little as they do, yet there is not any that honors it so much: they reckon the knowledge of it one of the pleasantest and most profitable parts of philosophy, by which, as they search into the secrets of nature, so they not only find this study highly agreeable, but think that such inquiries are very acceptable to the Author of nature; and imagine that as He, like the inventors of curious engines among mankind, has exposed this great machine of the universe to the view of the only creatures capable of contemplating it, so an exact and curious observer, who admires His workmanship, is much more acceptable to Him than one of the herd, who, like a beast incapable of reason, looks on this glorious scene with the eyes of a dull and unconcerned spectator.

在第四次航行中，我没有带太多的物品，反倒恰巧带了很多书，因为我当时完全没想过很快返回这片土地，我觉得自己可能再也不会

回来了，因此我把所有的书都送给了他们，其中包括很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还有西奥弗拉斯塔斯的《论植物》，很遗憾，这本书有残缺。当时我们在海上，没有妥善保管，一只猴子把它抓起，撕坏了很多页。因为我没带西奥多勒斯的语法书，所以他们只有拉斯卡里的语法书。字典只有赫西基阿斯和狄奥斯科里迪斯编撰的。他们格外敬重普鲁塔克，并为卢奇安的智慧及曼妙的写作风格所折服。至于诗人，有阿里斯托芬、荷马、欧里庇得斯及阿尔德版的索福克勒斯。历史学家方面，有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和赫罗提安。我的一位同伴特里修斯·阿彼那塔斯正好带了一些希波克拉提斯的著作和盖伦的《小技艺》，这些书都颇受推崇。尽管这个国家的人民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都甚少生病，甚少依赖医学，但很少有国家的人民像他们这般如此崇尚医学。他们认为医学是最令人愉悦也是最有益处的学科之一，习得医学的过程也是探寻大自然奥秘的过程，因此他们不仅仅发现这种研究非常让人愉快，而且也为大自然的创造者所接受。他们想象这位创造者的心理：他就像人类精密机械的发明者一样，将宇宙这一伟大的机器展现在唯一能够思考宇宙的物种面前，所以对于他而言，有好奇心、懂得欣赏其杰作的观察者，要比没有理性的牲畜更适于观赏这宏伟的景象，因为后者如野兽般对如此景象既愚昧无知又漠不关心。

The minds of the Utopians, when fenced with a love for learning, are very ingenious in discovering all such arts as are necessary to carry it to perfection. Two things they owe to us, the manufacture of paper and the art of printing: yet they are not so entirely indebted to us for these discoveries but that a great part of the invention was their own. We showed them some books printed by Aldus, we explained to them the way of making paper, and the mystery of printing; but as we had never practised these arts, we described them in a crude and superficial manner. They seized the hints we gave them, and though at first they could not arrive at perfection, yet by making many essays they at last found out and

corrected all their errors, and conquered every difficulty. Before this they only wrote on parchment, on reeds, or on the bark of trees; but now they have established the manufacture of paper, and set up printingpresses, so that if they had but a good number of Greek authors they would be quickly supplied with many copies of them: at present, though they have no more than those I have mentioned, yet by several impressions they have multiplied them into many thousands .

乌托邦人内心充满了对于学习的热爱，他们非常善于将这些技艺发展到炉火纯青。但是在造纸和印刷这两方面，他们多亏了我们。但其实他们也不是完全受惠于我们，因为这两种发明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他们自己做到的。我们只是向他们展示了阿尔德印出的书，解释了造纸的方法及印刷的奥秘，但是由于我们从未实践过这些技艺，所以只是在书中粗略地描述了一下。他们充分利用了我们给出的提示，尽管起初并不怎么成功，但通过多次尝试，他们最终发现并改正了所有的错误，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成功。在此之前，他们只能在羊皮、苇材或树皮上书写，但是现在，他们有了造纸业，建起了印刷厂，所以只要有大量希腊作家作品底本，他们就能迅速批量供应。目前，虽然他们只有我上边提到的那些底本，但是利用仅有的这些，他们便产出了好几千本。

If any man was to go among them that had some extraordinary talent, or that by much travelling had observed the customs of many nations (which made us to be so well received), he would receive a hearty welcome; for they are very desirous to know the state of the whole world. Very few go among them on the account of traffic, for what can a man carry to them but iron or gold or silver, which merchants desire rather to export than import to a strange country: and as for their exportation, they think it better to

manage that themselves than to leave it to foreigners, for by this means, as they understand the state of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better, so they keep up the art of navigation, which cannot be maintained but by much practice.

任何才智超群或游历各处，了解多国风土人情之人都会受到乌托邦人的热烈欢迎（这也是我们颇受欢迎的原因），因为他们渴望了解全世界。很少有人以贸易为由前来，因为能够带来的也仅仅是铁或金银，而这里的商人们更愿意出口而非进口这些金属。关于出口，他们认为自己亲自操作比让外国人来取更好，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更好得了解周边国家。因此，他们不断发展航海技术，要知道，只有通过大量实践，才能充分掌握这项技术。

Chapter 7: Of Their Slaves, and of Their Marriages

第七章：关于奴隶和婚姻

They do not make slaves of prisoners of war, except those that are taken in battle; nor of the sons of their slaves, nor of those of other nations: the slaves among them are only such as are condemned to that state of life for the commission of some crime, or, which is more common, such as their merchants find condemned to die in those parts to which they trade, whom they sometimes redeem at low rates; and in other places have them for nothing. They are kept at perpetual labor, and are always chained, but with this difference, that their own natives are treated much worse than others; they are considered as more profligate than the rest, and since they could not be restrained by the advantages of so excellent an education, are judged worthy of harder usage. Another sort of slaves are the poor of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who offer of their own accord to come and serve them; they treat these better, and use them in all other respects as well as their own countrymen, except their imposing more labor upon them, which is no hard task to those that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it; and if any of these have a mind to go back to their own country, which indeed falls out but seldom, as they do not force them to stay, so they do not send them away empty-handed.

他们不会将战俘变为奴隶，在战斗中擒获的除外，也不会让奴隶的后代或其他国家的人来充当奴隶。他们的奴隶通常由罪犯充当，或商人在贸易所在地发现的被判处死刑的人，这种情况更为常见，有时候花一点钱就可以买回来，甚至有时候分文不用。奴隶是永久劳力，

总是带着镣铐。但有一点和别处不同，乌托邦人对待本地奴隶比其他奴隶更为严苛，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奴隶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都不能约束自己，因此一定比其他地方的奴隶更加放肆，需要严加处置。另一类奴隶是从邻国自愿前来的穷人，乌托邦人会稍加善待他们，除了会加重这些奴隶的劳动外，在其他方面都令其享有与本国公民同等的待遇，这些人由于已经习惯了加重的劳动，因此这对于他们也不是难事。若有人想要回国（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很少见），乌托邦人不会强迫他们留下，也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

I have already told you with what care they look after their sick, so that nothing is left undone that can contribute either to their ease or health: and for those who are taken with fixed and incurable diseases, they use all possible ways to cherish them, and to make their lives as comfortable as possible. They visit them often, and take great pains to make their time pass off easily: but when any is taken with a torturing and lingering pain, so that there is no hope, either of recovery or ease, the priests and magistrates come and exhort them, that since they are now unable to go on with the business of life, are become a burden to themselves and to all about them, and they have really outlived themselves, they should no longer nourish such a rooted distemper, but choose rather to die, since they cannot live but in much misery: being assured, that if they thus deliver themselves from torture, or are willing that others should do it, they shall be happy after death. Since by their acting thus, they lose none of the pleasures but only the troubles of life, they think they behave not only reasonably, but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religion and piety; because they follow the advice given them by their priests, who are the expounders of the will of God. Such as are wrought on by these persuasions, either starve themselves of their own accord, or take opium, and by that means die without pain. But no man is forced on this way of ending

his life; and if they cannot be persuaded to it, this does not induce them to fail in their attendance and care of them; but as they believe that a voluntary death, when it is chosen upon such an authority, is very honorable, so if any man takes away his own life without the approbation of the priests and the Senate, they give him none of the honors of a decent funeral, but throw his body into a ditch.

之前已经讲过乌托邦人是如何照顾病人的，他们会竭尽所能帮助病人缓解病痛或恢复健康。对于那些身患顽疾和绝症的人，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振作起来，让他们的生活尽可能舒适。人们经常去探望他们，费尽心思让他们好过一点，但是要是有人的病痛持久而剧烈，没有希望恢复或减轻，那么牧师及地方官便会前来劝诫，鉴于他们已经无法继续人生的使命，于己于人都是负担，而且已然到了将死之日，他们不应该继续让顽疾拖延下去，应该选择死亡，因为他们已经无力正常生活而且苦痛深重，若能从痛苦的深渊解脱出来，或愿意由他人帮助解脱，死后一定会获得快乐。由于这样做，病人没有失去任何快乐，只是结束了折磨，因此乌托邦人认为这么做不仅明智，还符合宗教信仰的要求。因为他们听从了牧师给出的建议，而牧师传达的是上帝的旨意。听从劝诫的人要么自愿绝食而死，要么用麻醉剂，没有痛苦地死去。但是谁也不会强迫他们结束生命，若他们没有听从劝诫，人们也不会停止对他们的照料与呵护。但是由于人们相信，获得这样的许可而自愿选择死亡是体面而光荣的，因此任何未经牧师及议事会同意而私自结束自己生命的人，都不能享有体面的葬礼，死后尸体只能被扔到水沟里。

Their women are not married before eighteen, nor their men before two-and-twenty, and if any of them run into forbidden embraces before marriage they are severely punished, and the privilege of marriage is denied them, unless they can obtain a

special warrant from the Prince. Such disorders cast a great reproach upon the master and mistress of the family in which they happen, for it is supposed that they have failed in their duty. The reason of punishing this so severely is,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if they were not strictly restrained from all vagrant appetites, very few would engage in a state in which they venture the quiet of their whole lives, by being confined to one person, and are obliged to endure all the inconveniences with which it is accompanied.

女子适婚年龄为十八岁，男子二十二岁。任何人若有婚前的私通行为都会受到严惩，以后禁止结婚，除非获得总督的特赦。此外，这样的行为也会令家中父母蒙羞，因为这说明父母未能尽到职责。对这种行为的惩罚力度如此之大是因为乌托邦人认为如果人们不能克制一切不当欲望，那么很少有人能完全忠于另一个人，两人也无法共同度过波澜不惊的一生并经受住随之而来的种种困难。

In choosing their wives they use a method that would appear to us very absurd and ridiculous, but it is constantly observed among them, and is accounted perfectly consistent with wisdom. Before marriage some grave matron presents the bride naked, whether she is a virgin or a widow, to the bridegroom; and after that some grave man presents the bridegroom naked to the bride. We indeed both laughed at this, and condemned it as very indecent. But they, on the other hand, wondered at the folly of the men of all other nations, who, if they are but to buy a horse of a small value, are so cautious that they will see every part of him, and take off both his saddle and all his other tackle, that there may be no secret ulcer hid under any of them; and that yet in the choice of a wife, on which depends the happiness or unhappiness of the rest of his life, a man should venture upon trust, and only see about a hand's-breadth of the face,

all the rest of the body being covered, under which there may lie hid what may be contagious as well as loathsome. All men are not so wise as to choose a woman only for her good qualities; and even wise men consider the body as that which adds not a little to the mind: and it is certain there may be some such deformity covered with the clothes as may totally alienate a man from his wife when it is too late to part from her. If such a thing is discovered after marriage, a man has no remedy but patience. They therefore think it is reasonable that there should be good provision made against such mischievous frauds.

在选择妻子时，乌托邦人使用的办法在我们看来可能有点荒谬可笑，但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并充满了智慧。婚前，无论是处女还是遗孀，都会赤裸着由老妇人带到新郎面前。随后，新郎也会赤裸着由老先生带到新娘面前。的确，我们不仅觉得可笑，而且认为这种行为粗鄙下流。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惊讶于其他国家的愚蠢。这些国家的人就算买一匹不太值钱的马，也会小心翼翼地检查马的每一部分，把马鞍及全部挽具取下，直到没有任何隐藏的部位。但是当选择自己的妻子，也就是决定他们余生是否幸福的人时，他们竟然会用信用冒险，单凭一手之宽的面庞便做决定，完全不看衣着掩盖着的其他部位，而这些地方可能恰恰隐藏着危险与污秽。很少有男性能做到仅凭一个女性的良好品德而作出明智的选择，而且即便是明智的人也认为外表会大大提高内在。的确，有些被衣着掩盖的残缺可能会让一个男人想要离开他的妻子，但此时往往为时过晚。若婚后才发现，那么男人除了默默忍受别无选择。因此，乌托邦人认为为防止这种欺骗，彼此充分坦诚是非常合理的。

There was so much the more reason for them to make a regulation in this matter, because they are the only people of those parts that neither allow of polygamy nor of divorces, except in the

case of adultery or insufferable perverseness; for in these cases the Senate dissolves the marriage, and grants the injured person leave to marry again; but the guilty are made infamous, and are never allowed the privilege of a second marriage. None are suffered to put away their wives against their wills, from any great calamity that may have fallen on their persons; for they look on it as the height of cruelty and treachery to abandon either of the married persons when they need most the tender care of their comfort, and that chiefly in the case of old age, which as it carries many diseases along with it, so it is a disease of itself. But it frequently falls out that when a married couple do not well agree, they by mutual consent separate, and find out other persons with whom they hope they may live more happily. Yet this is not done without obtaining leave of the Senate, which never admits of a divorce but upon a strict inquiry made, both by the Senators and their wives, into the grounds upon which it is desired; and even when they are satisfied concerning the reasons of it, they go on but slowly, for they imagine that too great easiness in granting leave for new marriages would very much shake the kindness of married people. They punish severely those that defile the marriage-bed. If both parties are married they are divorced, and the injured persons may marry one another, or whom they please; but the adulterer and the adulteress are condemned to slavery. Yet if either of the injured persons cannot shake off the love of the married person, they may live with them still in that state, but they must follow them to that labor to which the slaves are condemned; and sometimes the repentance of the condemned, together with the unshaken kindness of the innocent and injured person, has prevailed so far with the Prince that he has taken off the sentence; but those that relapse after they are once pardoned are punished with death.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因为这里是唯一既禁止多个配偶也禁止离婚的地方，除非发生通奸或难以接受的堕落行为。在这些情况发生时，议事会会批准离婚，并允许受伤害的一方再婚，但是犯错的一方会从此臭名昭著，而且永不得再婚。乌托邦人不允许丈夫在妻子遭受不幸时违背其意愿将其抛弃，因为他们认为在夫妻一方最需要关心爱护的时候将其抛弃是最为残忍也是最大的背叛。这种情况特别发生在老年人之间，由于年老伴随着很多疾病，因此年老本身就是一种疾病。但是经常会发生的情况是，如果婚姻双方很难琴瑟相和，会一致同意彼此分开，去寻找其他可以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的人。但这么做要经过议事会的允许，议员及他们的夫人只有对离婚的原因进行严格调查之后，才会批准离婚。有时即使他们对离婚的理由表示满意，仍然会缓慢地推进离婚过程，因为他们认为轻易获得离婚许可可能会影响已婚人士的美好意愿。他们会严惩破坏婚姻的人。若双方离婚，那么受害一方可以与他们喜欢的人再婚。但奸夫淫妇则会被贬为奴隶。但倘若他们的配偶对他们用情太深不愿离开，那么可以保持婚姻关系，但需要随成为奴隶的配偶一同劳作。有时总督会被犯错者的悔改之心与无辜受害一方不可动摇的善意而说服，取消对他们的惩罚，但是若获得饶恕之后再次犯错，则会被处死。

Their law does not determine the punishment for other crimes; but that is left to the Senate, to temper it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fact. Husbands have power to correct their wives, and parents to chastise their children, unless the fault is so great that a public punishment is thought necessary for striking terror into others. For the most part, slavery is the punishment even of the greatest crimes; for as that is no less terrible to the criminals themselves than death, so they think the preserving them in a state of servitude is more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commonwealth than killing them; since as their labor is a greater benefit to the public than their death could be, so the sight of their misery is a more lasting terror to other men than that which would be given by their

death. If their slaves rebel, and will not bear their yoke and submit to the labor that is enjoined them, they are treated as wild beasts that cannot be kept in order, neither by a prison nor by their chains, and are at last put to death. But those who bear their punishment patiently, and are so much wrought on by that pressure that lies so hard on them that it appears they are really more troubled for the crimes they have committed than for the miseries they suffer, are not out of hope but that at last either the Prince will, by his prerogative, or the people by their intercession, restore them again to their liberty, or at least very much mitigate their slavery. He that tempts a married woman to adultery is no less severely punished than he that commits it; for they believe that a deliberate design to commit a crime is equal to the fact itself: since its not taking effect does not make the person that miscarried in his attempt at all the less guilty.

他们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对于其他罪行的惩罚，由议事会来酌情处理。丈夫有权惩罚妻子，父母有权批评孩子，除非他们犯下重大罪行，需要公开惩处以儆效尤。大多数情况下，对于最严重罪行的惩罚也不过贬为奴隶，因为这样做对罪犯的震慑力不亚于处死，而且奴役要比直接处死更有利于公共利益，毕竟劳役可以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因此，对于其他人来说，罪犯们的惨痛经历能够比他们的死亡带来更加持久的震慑。若奴隶造反，不服从或者违抗命令，他们会像监狱和镣铐都无法驯服的野兽一般被杀死。但是对于那些默默忍受惩罚的罪犯，他们能够承受重压，看起来对于自己所犯罪行的不安要多于自己所遭受的痛苦，这类罪犯并非毫无希望，总督可以使用特权或者公民可以通过仲裁让他们重获自由，或至少可以减轻奴役。试图引诱已婚女性通奸的人与实际发生通奸的人面临同样的重罚，因为乌托邦人认为蓄意犯罪与实际犯罪本质是一样的，因为罪行没有发生并不能减轻图谋犯罪之人的罪过。

They take great pleasure in fools, and as it is thought a base and unbecoming thing to use them ill, so they do not think it amiss for people to divert themselves with their folly: and, in their opinion, this is a great advantage to the fools themselves: for if men were so sullen and severe as not at all to please themselves with their ridiculous behavior and foolish sayings, which is all that they can do to recommend themselves to others, it could not be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be so well provided for, nor so tenderly used as they must otherwise be. If any man should reproach another for his being misshaped or imperfect in any part of his body, it would not at all be thought a reflection on the person so treated, but it would be accounted scandalous in him that had upbraided another with what he could not help. It is thought a sign of a sluggish and sordid mind not to preserve carefully one's natural beauty; but it is likewise infamous among them to use paint. They all see that no beauty recommends a wife so much to her husband as the probity of her life, and her obedience: for as some few are caught and held only by beauty, so all are attracted by the other excellences which charm all the world.

他们非常喜欢小丑。他们认为戏弄小丑是一种低劣而不得体的行为，但同时，他们也觉得可以利用小丑的插科打诨娱乐自己。在他们看来，这也是小丑的优势所在。因为要是人们都郁郁寡欢、不苟言笑，连小丑的滑稽言行都无法取悦他们，（小丑也仅此一个能够受欢迎的特点）那么小丑们就很难有丰衣足食的生活，也不会被善待。若有人因为身体任何部位有残缺而受到他人责备，人们也不会嘲笑那些受责备的人，反而会鄙视那些责备他人又无法帮助他人改变的人。无法谨慎保护自己天生的美丽会被视为懒散卑鄙，但是涂脂抹粉同样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表现。他们一致认为，与美貌相比，正直诚实与顺从才是妻子吸引丈夫的最好品质，因为尽管有一小部分人仅关注美貌，但是大部分人则关注于其他方面的良好品质，这些良好品质为天下人

所赞赏。

As they fright men from committing crimes by punishments, so they invite them to the love of virtue by public honors: therefore they erect statues to the memories of such worthy men as have deserved well of their country, and set these in their market-places, both to perpetuate the remembrance of their actions, and to be an incitement to their posterity to follow their example.

在利用刑罚防止人们犯罪的同时，他们还通过颁发荣誉来激励人们修德。为此，乌托邦人制作了雕塑以纪念那些杰出人士，并将雕塑立在人流密集的市场，来永久纪念他们的善行，也用来激励后人向他们学习。

If any man aspires to any office, he is sure never to compass it: they all live easily together, for none of the magistrates are either insolent or cruel to the people: they affect rather to be called fathers, and by being really so, they well deserve the name; and the people pay them all the marks of honor the more freely, because none are exacted from them. The Prince himself has no distinction, either of garments or of a crown; but is only distinguished by a sheaf of corn carried before him; as the high-priest is also known by his being preceded by a person carrying a wax light.

这里并没有普通官场上的追名逐利。人们融洽地在一起生活，地方官都彬彬有礼、平易近人，他们喜欢被称为人们的保护者，当他们做得来，便真正配得上这一称呼，人们会自愿将各种荣誉献给他们，没有哪个地方官会强行索取。总督本人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既不

穿华服也不戴王冠，唯一将他区别开来的是拿在身前的一捆麦穗，就像主教的前边会有人手持蜡烛一样。

They have but few laws, and such is their constitution that they need not many. They very much condemn other nations, whose laws, together with the commentaries on them, swell up to so many volumes; for they think it an unreasonable thing to oblige men to obey a body of laws that are both of such a bulk and so dark as not to be read and understood by every one of the subjects.

他们的法律很少，有宪法就够了。在其他国家，写有法令及其注释的卷宗不计其数，他们会谴责这些国家，认为要求每个人遵守一整套卷帙浩繁且艰深晦涩的法律是不合情理的。

They have no lawyers among them, for they consider them as a sort of people whose profession it is to disguise matters and to wrest the laws; and therefore they think it is much better that every man should plead his own cause, and trust it to the judge, as in other places the client trusts it to a counsellor. By this means they both cut off many delays, and find out truth more certainly: for after the parties have laid open the merits of the cause, without those artifices which lawyers are apt to suggest, the judge examines the whole matter, and supports the simplicity of such well-meaning persons, whom otherwise crafty men would be sure to run down: and thus they avoid those evils which appear very remarkably among all those nations that labor under a vast load of laws. Every one of them is skilled in their law, for as it is a very short study, so the plainest meaning of which words are capable is always the sense of their laws. And they argue thus: all laws are promulgated

for this end, that every man may know his duty; and therefore the plainest and most obvious sense of the words is that which ought to be put upon them; since a more refined exposition cannot be easily comprehended, and would only serve to make the laws become useless to the greater part of mankind, and especially to those who need most the direction of them: for it is all one, not to make a law at all, or to couch it in such terms that without a quick apprehension, and much study, a man cannot find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 since the generality of mankind are both so dull and so much employed in their several trades that they have neither the leisure nor the capacity requisite for such an inquiry.

他们没有律师，因为他们认为律师的职业是用来掩盖事实、曲解法律的，因此每个人应该自己辩护，依靠法官来伸张正义，而在其他国家则依赖律师。没有律师可以提高效率，更加明确真相。因为当双方公开案件的是非之后，没有了律师的巧妙计策，法官便可以审核整个案件，为心地善良之人伸张正义，否则阴险狡诈者定会诬陷他们。因此，乌托邦人得以避免其他国家由于法律纷繁复杂而遇到的大量问题。由于乌托邦法律精简易学，出现在法条中的每个词最显而易见的意思便是所取之意，因此每个人都精通本国律法。他们声称，所有法律出台的目的都是让每个公民明确其义务，因此撰写时应选取每个词最为常用且最为明显的意思，毕竟精深的表达不易于理解，只会让法律对更多的人变得毫无意义，特别是对于最需要获得其指引的人们来说。不制定法律与制定晦涩难懂的法律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人们普遍而言是迟钝的，并且忙于各自职业，没有自行探索复杂法律的时间和能力。

Some of their neighbors, who are masters of their own liberties, having long ago, by the assistance of the Utopians, shaken off the yoke of tyranny, and being much taken with those virtues which

they observe among them, have come to desire that they would send magistrates to govern them; some changing them every year, and others every five years. At the end of their government they bring them back to Utopia, with great expressions of honor and esteem, and carry away others to govern in their stead. In this they seem to have fallen upon a very good expedient for their own happiness and safety; for since the good or ill condition of a nation depends so much upon their magistrates, they could not have made a better choice than by pitching on men whom no advantages can bias; for wealth is of no use to them, since they must so soon go back to their own country; and they being strangers among them, are not engaged in any of their heats or animosities; and it is certain that when public judicatories are swayed, either by avarice or partial affections, there must follow a dissolution of justice, the chief sinew of society.

乌托邦很久以前帮助一些邻国摆脱了暴君的统治，获得解放。邻国的人非常欣赏他们的美德，想让乌托邦人派一些地方官帮助他们治理国家，有些派往邻国的地方官一年一换，有些则是五年一换。任期结束后，邻国人会将卸任官员送回乌托邦，极尽溢美与赞扬之辞，并接下一批官员回国继任。这一举措似乎帮他们获得了幸福和安宁。由于一国状况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因此挑选毫无偏见的人来担任地方官便是最好的选择。对于来自乌托邦的地方官而言，金钱财富于他们无益，因为很快他们便要回国。在邻国，他们是新来的，不受任何威胁或仇视。毫无疑问，若公共司法体系受到利益或私心的左右，公正便无从谈起，而公正恰恰是社会正常运转的主要动力。

The Utopians call those nations that come and ask magistrates from them, neighbors; but those to whom they have been of more

particular service, friends. And as all other nations are perpetually either making leagues or breaking them, they never enter into an alliance with any State. They think leagues are useless things, and believe that if the common ties of humanity do not knit men together, the faith of promises will have no great effect; and they are the more confirmed in this by what they see among the nations round about them, who are no strict observers of leagues and treaties. We know how religiously they are observed in Europe, more particularly where the Christian doctrine is received, among whom they are sacred and inviolable; which is partly owing to the justice and goodness of the princes themselves, and partly to the reverence they pay to the popes; who as they are most religious observers of their own promises, so they exhort all other princes to perform theirs; and when fainter methods do not prevail, they compel them to it by the severity of the pastoral censure, and think that it would be the most indecent thing possible if men who are particularly distinguished by the title of the "faithful" should not religiously keep the faith of their treaties. But in that newfound world, which is not more distant from us in situation than the people are in their manners and course of life, there is no trusting to leagues, even though they were made with all the pomp of the most sacred ceremonies;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on this account the sooner broken, some slight pretence being found in the words of the treaties, which are purposely couched in such ambiguous terms that they can never be so strictly bound but they will always find some loophole to escape at; and thus they break both their leagues and their faith. And this is done with such impudence, that those very men who value themselves on having suggested these expedients to their princes, would with a haughty scorn declaim against such craft, or, to speak plainer, such fraud and deceit, if they found private men make use of it in their bargains, and would readily say that they deserved to be hanged.

乌托邦人将前来请求派遣地方官前往的国家称为邻国，而将自己提供过特别帮助的国家视作朋友。在其他国家不断结盟或破坏同盟时，乌托邦从不与任何国家订立盟约。他们认为联盟毫无意义，并认为如果人道主义的共同纽带不能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承诺也不会奏效。在看到周边国家不能坚定遵守盟约及条约之后，他们更加坚定了这一做法。我们都知道欧洲人严格遵守条约，尤其是在信仰基督教、宗教教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这一部分是因为国君本身公正仁慈，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对于教皇的尊崇。教皇本身是宗教信条的最坚定遵守者，因而也会劝告国君们践行他们的承诺。若劝诫不起作用，他们便会用教会的责骂强迫国君践行承诺，并且认为，如果头顶尊贵的“忠诚”之名者不能忠于条约，这是最为难堪的。但是新世界（指北美）虽然与我们相距甚远，实际距离之差却不如人们的生活方式之别大，那里的人不相信联盟，即便缔结联盟时极尽各种神圣的仪式。相反，越神圣的缔约仪式越是不能使联盟持久，人们对条约中的措辞进行细微的修饰，这是人们特意选择的含糊不清的用语，这样他们就不用严格受限于条约，还总能找到可以借以脱身的漏洞。这么一来，他们既破坏了盟约，也失去了信用。他们的做法极其厚颜无耻：那些因为向国君提出这些权宜之计而自视甚高的人，倘若发现这些办法用在了私人契约中，反倒会带着傲慢的鄙夷之心，斥责这种手段，或者更直白一点，斥责这等诡计和骗局，甚至还会马上建议将这些人绞死。

By this means it is, that all sorts of justice passes in the world for a low-spirited and vulgar virtue, far below the dignity of royal greatness. Or at least, there are set up two sorts of justice; the one is mean, and creeps on the ground, and therefore becomes none but the lower part of mankind, and so must be kept in severely by many restraints that it may not break out beyond the bounds that are set to it. The other is the peculiar virtue of princes, which as it is more majestic than that which becomes the rabble, so takes a freer

compass; and thus lawful and unlawful are only measured by pleasure and interest. These practices of the princes that lie about Utopia, who make so little account of their faith, seem to be the reasons that determine them to engage in no confederacies; perhaps they would change their mind if they lived among us; but yet though treaties were more religiously observed, they would still dislike the custom of making them; since the world has taken up a false maxim upon it, as if there were no tie of nature uniting one nation to another, only separated perhaps by a mountain or a river, and that all were born in a state of hostility, and so might lawfully do all that mischief to their neighbors against which there is no provision made by treaties; and that when treaties are made, they do not cut off the enmity, or restrain the license of preying upon each other, if by the unskilfulness of wording them there are not effectual provisos made against them. They, on the other hand, judge that no man is to be esteemed our enemy that has never injured us; and that the partnership of the human nature is instead of a league. And that kindness and good-nature unite men more effectually and with greater strength than any agreements whatsoever; since thereby the engagements of men's hearts become stronger than the bond and obligation of words.

这就意味着，世间全部的公正都被视为低劣粗俗的德行，远远不及国王的尊严。抑或至少存在两种公正，一种公正卑微低劣，匍匐于地面，因此仅适用于底层人类，只有对其施加多种限制，才能避免越界。另一种公正是国君特有的德行，由于其比适用于底层人民的公正更为尊贵，所以可以自由设定界限，因而行为是否正当全凭个人心情和兴趣而定。他国国君的这些不守信行为可能是乌托邦人不参与任何结盟的原因。要是这些乌托邦人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可能会改变主意吧。但是就算条约能够得到更加虔诚地遵守，乌托邦人仍不喜欢订立条约的习惯。因为世界各国已将条约的作用过分夸大，好像国家之间

没有天然的纽带联系彼此，只有山河相隔，并且处于一种与生俱来的敌对状态中，因而会理所当然地在没有条约约束的情况下想尽办法大肆伤害邻国；即使彼此之间有订立条约，若条约由于措辞不严谨，没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附带条款，他们仍会保持敌对，相互掠夺。乌托邦人却认为不能将从未伤害过自己的人视为敌人，并且人类本性中带有伙伴意识，这本身就是一种联盟。同时，善良温和的本性会比任何条约都拥有更大的能量，将人类紧密联系，因为心灵相通要比文字规定的关系和义务更为强大。

Chapter 8: Of Their Military Discipline

第八章：关于战争

They detest war as a very brutal thing; and which, to the reproach of human nature, is more practised by men than by any sort of beasts. They, in opposition to the sentiments of almost all other nations, think that there is nothing more inglorious than that glory that is gained by war. And therefore though they accustom themselves daily to military exercises and the discipline of war—in which not only their men but their women likewise are trained up, that in cases of necessity they may not be quite useless—yet they do not rashly engage in war, unless it be either to defend themselves, or their friends, from any unjust aggressors; or out of good-nature or in compassion assist an oppressed nation in shaking off the yoke of tyranny. They indeed help their friends, not only in defensive, but also in offensive wars; but they never do that unless they had been consulted before the breach was made, and being satisfied with the grounds on which they went, they had found that all demands of reparation were rejected, so that a war was unavoidable. This they think to be not only just, when one neighbor makes an inroad on another, by public order, and carry away the spoils; but when the merchants of one country are oppressed in another, either under pretence of some unjust laws, or by the perverse wresting of good ones. This they count a juster cause of war than the other, because those injuries are done under some color of laws.

乌托邦人对残酷的战争深恶痛绝，他们谴责人类好战的本性，认

为兽群都不像人类那样频频发动战争。乌托邦人一反几乎所有国家的情感倾向，认为凭借战争夺得的荣誉是极其可耻的。因此，虽然他们每日都进行军事训练——无论男女都积极参加训练，唯恐自己到了必要之时毫无用武之地——然而他们并不会轻易地投入战争，除非是保护国家或友邦、抗击非正义侵略的战争；以及出于善良和慈悲的本性，支援其他被压迫的国家摆脱暴政枷锁的战争。乌托邦人对邻邦施以援手，不仅限于防卫战，还包括反击战；但乌托邦人参战有一个前提，那便是战争发生前友邦曾问过乌托邦人的意见，乌托邦人对参战的理由感到满意，且发现友邦所有合理的赔偿请求均遭到敌方拒绝，一场战争在所难免。他们认为，若邻邦A向邻邦B发动袭击，破坏对方公共秩序，肆意掠夺战利品，那么协助邻邦B发动战争予以还击是正义之举。若A国商人在B国受到压迫，B国以不公正法律相待且搬弄是非，那么协助A国对B国发动战争则是更正义之举，因为人民的利益在法律的幌子下遭到了践踏。

This was the only ground of that war in which they engaged with the Nephelogetes against the Aleopolitanes, a little before our time; for the merchants of the former having, as they thought, met with great injustice among the latter, which, whether it was in itself right or wrong, drew on a terrible war, in which many of their neighbors were engaged; and their keenness in carrying it on being supported by their strength in maintaining it, it not only shook some very flourishing States, and very much afflicted others, but after a series of much mischief ended in the entire conquest and slavery of the Aleopolitanes, who though before the war they were in all respects much superior to the Nephelogetes, were yet subdued; but though the Utopians had assisted them in the war, yet they pretended to no share of the spoil.

不久之前，乌托邦人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参与了尼法罗哲德人同亚

拉奥柏利坦人之间的战争。尼法罗哲德商民自认为受到了亚拉奥柏利坦人不公正的对待，不管事实正确与否，就这样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众多邻国纷纷参与进来。各国维持战争的强大实力加剧了他们打持久战的热情，昔日繁荣的国家，因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火，基础渐渐动摇，其他国家亦难逃生灵涂炭。直到亚拉奥柏利坦人彻底投降，被贬为奴，一系列棘手的麻烦才终告结束。亚拉奥柏利坦人兴盛之时的实力虽为尼法罗哲德人望尘莫及，却在战争中被后者征服。乌托邦人虽在此次战争对尼法罗哲德人给予帮助，却并没有分享战利品，而是将这些奴隶交与尼法罗哲德人处置。

But though they so vigorously assist their friends in obtaining reparation for the injuries they have received in affairs of this nature, yet if any such frauds were committed against themselves, provided no violence was done to their persons, they would only on their being refused satisfaction forbear trading with such a people. This is not because they consider their neighbors more than their own citizens; but since their neighbors trade everyone upon his own stock, fraud is a more sensible injury to them than it is to the Utopians, among whom the public in such a case only suffers. As they expect nothing in return for the merchandise they export but that in which they so much abound, and is of little use to them, the loss does not much affect them; they think therefore it would be too severe to revenge a loss attended with so little inconvenience, either to their lives or their subsistence, with the death of many persons; but if any of their people is either killed or wounded wrongfully, whether it be done by public authority or only by private men, as soon as they hear of it they send ambassadors, and demand that the guilty persons may be delivered up to them; and if that is denied, they declare war; but if it be complied with, the offenders are condemned either to death or slavery.

但是，虽然乌托邦人如此积极地对受到伤害的友邦施以援手，助其在上类不公正事件中获取赔偿，倘若自己受骗，却常常选择隐忍，只要未涉及到人身伤害，那么他们的回击仅仅是同相关国家断绝贸易往来。这并非因为他们关心邻邦胜过自己的子民，而是因为邻邦的商人均以个人财产开展贸易，诈骗对这些人来说是更加痛心疾首的事情，而对乌托邦本国公民而言，损失的不过是国家的公有财产，并非私有财产。他们对出口的商品不期待任何回报，因为他们的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他们毫无用处，这些钱财的损失对乌托邦的公民几乎毫无影响。因此，在他们看来，倘若为几乎无谓的损失展开报复，使大量子民丧失生命，那么无论对子民的生命而言，还是对子民的生活而言，都是一件过于残酷的事情。但如果一位乌托邦公民被错杀或受到不公的伤害，不论是出自政府部门还是私人之手，乌托邦人在获知消息后都会立即向对方派出使节，要求其交出罪犯，如果对方拒绝，乌托邦人将不惜宣战，以维护其公民权益；如果对方交出罪犯，乌托邦人会对罪犯处以死刑，或将其贬为奴隶。

They would be both troubled and ashamed of a bloody victory over their enemies, and think it would be as foolish a purchase as to buy the most valuable goods at too high a rate. And in no victory do they glory so much as in that which is gained by dexterity and good conduct, without bloodshed. In such cases they appoint public triumphs, and erect trophies to the honor of those who have succeeded; for then do they reckon that a man acts suitably to his nature when he conquers his enemy in such a way as that no other creature but a man could be capable of, and that is by the strength of his understanding. Bears, lions, boars, wolves, and dogs, and all other animals employ their bodily force one against another, in which as many of them are superior to men, both in strength and fierceness, so they are all subdued by his reason and understanding.

对敌人血腥杀戮而获得的胜利被乌托邦人视为一种困扰和耻辱，这种行为同高价购买珍贵的物品一样，被他们视为一桩愚蠢的买卖。不经流血牺牲，只凭谋略击败敌人，这在乌托邦人看来才是最伟大的胜利。对于这种胜利他们常常公开庆祝，铸碑纪念胜利者。因为乌托邦人认为，只有靠这种智慧的力量征服敌人，人类的行为才同其本性相当，这是其他生物所不能及的。熊、狮、狼、狗以及野猪等野兽依仗气力进行搏斗，尽管相比人类，它们力大无比，凶猛异常，却并不如人类那般聪明睿智。

The only design of the Utopians in war is to obtain that by force, which if it had been granted them in time would have prevented the war; or if that cannot be done, to take so severe a revenge on those that have injured them that they may be terrified from doing the like for the time to come. By these ends they measure all their designs, and manage them so that it is visible that the appetite of fame or vainglory does not work so much on them as a just care of their own security.

如果乌托邦人能够早早凭谋略取胜，便会避免战争；但如果非战不可，他们将给予敌人重创打击，使其不敢再犯，他们在战场上的唯一目标就是靠武力取胜。通过这些手段，他们细心衡量自己所有的目标，谨慎操作，令这些目标显而易见，使其子民不会被虚无的荣耀迷惑，仅仅为保护自身安全而采取行动。

As soon as they declare war, they take care to have a great many schedules, that are sealed with their common seal, affixed in the most conspicuous places of their enemies' country. This is carried secretly, and done in many places all at once. In these they promise great rewards to such as shall kill the prince, and lesser in

proportion to such as shall kill any other persons, who are those on whom, next to the prince himself, they cast the chief balance of the war. And they double the sum to him that, instead of killing the person so marked out, shall take him alive and put him in their hands. They offer not only indemnity, but rewards, to such of the persons themselves that are so marked, if they will act against their countrymen; by this means those that are named in their schedules become not only distrustful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but are jealous of one another, and are much distracted by fear and danger; for it has often fallen out that many of them, and even the Prince himself, have been betrayed by those in whom they have trusted most; for the rewards that the Utopians offer are so unmeasurably great, that there is no sort of crime to which men cannot be drawn by them. They consider the risk that those run who undertake such services, and offer a recompense proportioned to the danger; not only a vast deal of gold, but great revenues in lands, that lie among other nations that are their friends, where they may go and enjoy them very securely; and they observe the promises they make of this kind most religiously.

一经宣战，乌托邦人就会进行周密计划，将无数印有乌托邦公印的布告张贴在敌国最显而易见的地方。这一行动将会秘密地在敌国各地同时进行。布告宣称，杀死国王者可获巨额奖金；杀死在挑起战争方面罪行次于国王的其他主犯者，可按比例获得相应奖金；生擒上述罪犯并上交者，奖金加倍；愿意起兵造反且战绩卓著者将获得奖金且受到保护。此举一出，被点名的官员顿时草木皆兵，不敢轻信他人，彼此妒忌，人人自危，日日惶恐，无心应战。据说敌国大多数人，甚至国王自己都被亲信出卖。因为乌托邦人提供的奖金实在太过丰厚，敌人受重金收买，自然无所不为。乌托邦人为这些人考虑，提供了与风险成比例的补偿；不仅给他们万贯家财，还许诺赠予友邦的千亩良田，这样这些人就可以在别国安享富贵；乌托邦人虔诚地信守自己的

承诺。

They very much approve of this way of corrupting their enemies, though it appears to others to be base and cruel; but they look on it as a wise course, to make an end of what would be otherwise a long war, without so much as hazarding one battle to decide it. They think it likewise an act of mercy and love to mankind to prevent the great slaughter of those that must otherwise be killed in the progress of the war, both on their own side and on that of their enemies, by the death of a few that are most guilty; and that in so doing they are kind even to their enemies, and pity them no less than their own people, as knowing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do not engage in the, war of their own accord, but are driven into it by the passions of their prince.

高价收买敌人在其他地方也许被看作卑劣且残忍的行为，但乌托邦人对此颇为赞赏，认为此举相当明智，可以避免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甚至使他们不战而胜。他们认为倘若仅杀死少数罪孽深重者，那么敌我双方大批无辜百姓便可免遭屠杀，这是对人类的慈爱之举。他们知道大部分敌人若非被国王的疯狂驱使，并不会自愿走上战场，因此，他们甚至对敌人也相当友善，对敌人的同情之心丝毫不亚于对本国人民。

If this method does not succeed with them, then they sow seeds of contention among their enemies, and animate the prince's brother, or some of the nobility, to aspire to the crown. If they cannot disunite them by domestic broils, then they engage their neighbors against them, and make them set on foot some old pretensions, which are never wanting to princes when they have

occasion for them. These they plentifully supply with money, though but very sparingly with any auxiliary troops: for they are so tender of their own people, that they would not willingly exchange one of them, even with the prince of their enemies' country.

如果此举失败，乌托邦人就会在敌国播撒不和的种子，挑唆内讧，怂恿国王兄弟或贵族大臣觊觎王位。如无法点燃内战的战火，他们又会鼓动敌人的邻邦重提领土分割的旧题，这是所有国王都无法逃避的问题。一旦引战成功，乌托邦人就会提供巨额的资金援助，却不轻易派出一兵一卒。他们十分珍惜国民，不愿牺牲任何一人，哪怕回报是杀死敌方国王或将其生擒也不行。

But as they keep their gold and silver only for such an occasion, so when that offers itself they easily part with it, since it would be no inconvenience to them though they should reserve nothing of it to themselves. For besides the wealth that they have among them at home, they have a vast treasure abroad, many nations round about them being deep in their debt: so that they hire soldiers from all places for carrying on their wars, but chiefly from the Zapolets, who live 500 miles east of Utopia. They are a rude, wild, and fierce nation, who delight in the woods and rocks, among which they were born and bred up. They are hardened both against heat, cold, and labor, and know nothing of the delicacies of life. They do not apply themselves to agriculture, nor do they care either for their houses or their clothes. Cattle is all that they look after; and for the greatest part they live either by hunting, or upon rapine; and are made, as it were, only for war. They watch all opportunities of engaging in it, and very readily embrace such as are offered them. Great numbers of them will frequently go out, and offer themselves for a very low pay, to serve any that will employ them:

they know none of the arts of life, but those that lead to the taking it away; they serve those that hire them, both with much courage and great fidelity; but will not engage to serve for any determined time, and agree upon such terms, that the next day they may go over to the enemies of those whom they serve, if they offer them a greater encouragement: and will perhaps return to them the day after that, upon a higher advance of their pay.

这是乌托邦人储存黄金白银的唯一目的，一旦需要，他们可轻易舍弃，毫不吝惜。因为即便耗尽所有积蓄，他们依然可以安然度日。因为除了国内人民积攒的众多财富外，他们在海外也有着丰富的金银财宝，许多国家都对乌托邦负有大量债务。所以乌托邦人用这些钱广泛的从海外雇兵参战，特别是在乌托邦东部五百里开外的塞波雷得人中招募雇佣兵。这一民族粗暴野蛮，喜欢出没于乱林深山中，并在此繁衍生息。他们历代忍受严寒酷暑，辛苦劳累，早已练就强壮体魄，并且对生活毫不讲究。塞波雷得人不善农耕，衣着住所颇为随便，主要从事畜牧，大部分靠狩猎或掠夺而生。这一民族的人天生好战，寻求一切厮杀的机会，一旦抓住，绝不放过。大量塞波雷得人频繁外出，为了少量报酬便可为战争的任何一方卖命。他们不懂生活的艺术，却知道掠杀生命的艺术；他们忠心耿耿地为雇佣方勇敢奋战，却不受特定期限的约束。他们接受雇佣的条件，就是一旦有一方提供更高的报酬，哪怕是敌对一方，他们都可以在次日便投敌叛营；而另一天，他们又可能为了较高的报酬转回原方阵营。

There are few wars in which they make not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armies of both sides: so it often falls out that they who are related, and were hired in the same country, and so have lived long and familiarly together, forgetting both their relations and former friendship, kill one another upon no other consideration than that of being hired to it for a little money, by princes of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such a regard have they for money, that they are easily wrought on by the difference of one penny a day to change sides. So entirely does their avarice influence them; and yet this money, which they value so highly, is of little use to them; for what they purchase thus with their blood, they quickly waste on luxy, which among them is but of a poor and miserable form.

在许多战争中，敌对双方的阵营中都有不少塞波雷得人。因此下面的情况比比皆是：本是亲密无间的同胞，却要分隔在一国互相敌对的阵营中，他们忘记同根同族的血缘关系，忘记曾经的友谊，在战场彼此残杀，不为别的，只为两国雇佣方提供的区区金钱。他们嗜钱如命，以至于一天收入多增加一分钱，他们就可能倒戈为另一方卖命。他们日渐贪婪，然而如此渴望的金钱却对他们毫无用，因为用鲜血换来的钱很快便被花在荒奢淫逸的生活中，而这种生活带给他们的只有贫穷和痛苦。

This nation serves the Utopians against all people whatsoever, for they pay higher than any other. The Utopians hold this for a maxim, that as they seek out the best sort of men for their own use at home, so they make use of this worst sort of men for the consumption of war, and therefore they hire them with the offers of vast rewards, to expose themselves to all sorts of hazards, out of which the greater part never returns to claim their promises. Yet they make them good most religiously to such as escape. This animates them to adventure again, whenever there is occasion for it; for the Utopians are not at all troubled how many of these happen to be killed, and reckon it a service done to mankind if they could be a means to deliver the world from such a lewd and vicious sort of people; that seem to have run together as to the drain of human nature. Next to these they are served in their wars with

those upon whose account they undertake them, and with the auxiliary troops of their other friends, to whom they join a few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send some men of eminent and approved virtue to command in chief. There are two sent with him, who during his command are but private men, but the first is to succeed him if he should happen to be either killed or taken; and in case of the like misfortune to him, the third comes in his place; and thus they provide against ill events, that such accidents as may befall their generals may not endanger their armies.

这一民族愿为乌托邦人作战，与世界为敌，因为乌托邦人所付的佣金最多。乌托邦人一直恪守这样的准则：广罗世间贤臣义士为己所用，招募各国混蛋流氓用于战争。因此乌托邦人以重金雇佣塞波雷得人，命其应对种种危险。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无法生还，不能领取自己的佣金。而生还者则会按承诺获得约定酬金。于是，生还的塞波雷得人为了金钱一次次冒险。乌托邦人丝毫不介意有多少塞波雷得人因此丧命，相反他们认为，如果能因此扫清世间见而生厌的人类渣滓，不失为一件好事。除雇用塞波雷得人外，乌托邦人也雇用支持他们作战的一国的士兵，以及其他一切友邦的援军。他们也会加派一些自己的国民，并从中推举一名骁勇善战的勇士指挥全军。将军之下有两名副手进行辅佐，在将军指挥期间为普通士兵，一旦将军遇害或被俘，两名副手的首位即接任将军一职，如果新任将军同样遇害或被俘，次位的副手便可接任。此举未雨绸缪，考虑到了各种危险情况，避免了因将军遇险而使全军丧失指挥陷入混乱。

When they draw out troops of their own people, they take such out of every city as freely offer themselves, for none are forced to go against their wills, since they think that if any man is pressed that wants courage, he will not only act faintly, but by his cowardice dishearten others. But if an invasion is made on their

country they make use of such men, if they have good bodies, though they are not brave; and either put them aboard their ships or place them on the walls of their towns, that being so posted they may find no opportunity of flying away; and thus either shame, the heat of actio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flying, bears down their cowardice; they often make a virtue of necessity and behave themselves well, because nothing else is left them. But as they force no man to go into any foreign war against his will, so they do not hinder those women who are willing to go along with their husbands; on the contrary, they encourage and praise them, and they stand often next their husbands in the front of the army. They also place together those who are related, parents and children, kindred, and those that are mutually allied, near one another; that those whom nature has inspired with the greatest zeal for assisting one another, may be the nearest and readiest to do it; and it is matter of great reproach if husband or wife survive one another, or if a child survives his parents, and therefore when they come to be engaged in action they continue to fight to the last man, if their enemies stand before them.

乌托邦人征用本国国民到他国作战时，在每一个城市征用自愿入伍的士兵，没有人会被强迫参军。因为乌托邦人认为，如果某人生性胆怯，不但自己不会表现得勇敢，还会削弱同伴的士气。但如果外敌来袭，乌托邦人也会征用这些懦夫，凡是身体结实的都会被送上战船，和勇士一起浴血杀敌，或是派去无可逃脱的城墙边进行驻守。这样一来，迫于羞愧，敌兵又近在咫尺，逃已无处可逃，这些人便抛开恐惧，拼死一战。他们常常在战争开始时被迫参战，最终却心甘情愿奋勇杀敌，战绩斐然，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任何人都不会被强迫到他国作战，而且，如果妻子愿意同丈夫本人一同出国征战，不但不会受到阻止，还会受到赞扬和鼓励，并且可以在前线与丈夫并肩作战。倘若战士们中有父母子女或家人亲属，他们将被派往一处共同作

战；热衷于协同作战的战士们在战场上被在彼此附近，因为他们非常愿意互相帮助。如果丈夫生还，妻子死于战场，或是妻子生还，丈夫死于战场，或是孩子生还，父母死于战场，这都是奇耻大辱。因此，在每一场战争中，即使敌人已经逼近眼前，乌托邦的战士们也丝毫不会退缩，哪怕只剩一个人，也会浴血奋杀，直到死去。

And as they use all prudent methods to avoid the endangering their own men, and if it is possible let all the action and danger fall upon the troops that they hire, so if it becomes necessary for themselves to engage, they then charge with as much courage as they avoided it before with prudence: nor is it a fierce charge at first, but it increases by degrees; and as they continue in action, they grow more obstinate and press harder upon the enemy, insomuch that they will much sooner die than give ground; for the certainty that their children will be well looked after when they are dead, frees them from all that anxiety concerning them which often masters men of great courage; and thus they are animated by a noble and invincible resolution. Their skill in military affairs increases their courage; and the wise sentiments which,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ir country, are instilled into them in their education, give additional vigor to their minds: for as they do not undervalue life so as prodigally to throw it away, they are not so indecently fond of it as to preserve it by base and unbecoming methods. In the greatest heat of action, the bravest of their youth, who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at service, single out the general of their enemies, set on him either openly or by ambuscade, pursue him everywhere, and when spent and wearied out, are relieved by others, who never give over the pursuit; either attacking him with close weapons when they can get near him, or with those which wound at a distance, when others get in between them; so that unless he secures himself by flight, they seldom fail at last to kill or

to take him prisoner.

乌托邦人寻求一切方法小心翼翼得避免本国国民陷入危险，只要情况允许，他们便派遣雇佣兵执行所有行动，面对所有危险。但如若必须亲自出征，乌托邦人作战之勇猛，不亚于竭力避免本国国民参战时所用之智。作战伊始，他们不甚勇猛，但随着战火蔓延，乌托邦人的实力便慢慢显现，他们的斗志愈加昂扬，作战愈加凶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乌托邦战士倘若战死，孩子可得到悉心照顾，因此他们在战场上无所顾虑（这种顾虑常削弱勇士之勇气），满腔热血，战无不胜。乌托邦人卓越的军事技能使他们勇气倍增，他们的教育依法向人们灌输智慧的观念，这让乌托邦人的思想更具活力。每位乌托邦战士既不轻视生命，白白牺牲自己；也不过分惜命，苟且偷生。在战火最凶猛的关头，最勇敢的年轻战士能够忠于使命，或明刀明枪地打斗，或暗中伏击，四处追击敌方将领，誓取对方首级。一旦这些战士精疲力竭，新生力量会立即前来补充，或在靠近敌方将领时以近距离武器袭击，或在他人阻隔、远离敌方将领时以远距离武器攻击，战斗不息，追击不止。所以他们很少失手，敌方将领常常插翅难逃，只能被杀或被生擒。

When they have obtained a victory, they kill as few as possible, and are much more bent on taking many prisoners than on killing those that fly before them; nor do they ever let their men so loose in the pursuit of their enemies, as not to retain an entire body still in order; so that if they have been forced to engage the last of their battalions before they could gain the day, they will rather let their enemies all escape than pursue them, when their own army is in disorder; remembering well what has often fallen out to themselves, that when the main body of their army has been quite defeated and broken, when their enemies imagining the victory obtained, have let themselves loose into an irregular pursuit, a few of them that lay

for a reserve, waiting a fit opportunity, have fallen on them in their chase, and when straggling in disorder and apprehensive of no danger, but counting the day their own, have turned the whole action, and wrestling out of their hands a victory that seemed certain and undoubted, while the vanquished have suddenly become victorious.

乌托邦人在已经取胜的情况下，尽力避免滥杀无辜，他们宁可俘虏逃兵也不愿处死他们。除此之外，为了保持阵容的整齐有序，他们在追击敌军时，绝不允许个别战士过于分散。所以，在军队混乱之时，即便最后一批人马参与战斗便胜利在望，乌托邦人也宁愿放走敌人，绝不出军。犹记得，多少次乌托邦人的军队大部分人马溃退，敌人以为胜利在望，洋洋得意得从四面八方松松散散得追来，却受到早已埋伏好的乌托邦士兵的突然袭击。疏于防备的敌人措手不及，本已十拿九稳的胜利就这样被乌托邦人夺走，从战胜者转变为战败者。

It is hard to tell whether they are more dexterous in laying or avoiding ambushes. They sometimes seem to fly when it is far from their thoughts; and when they intend to give ground, they do it so that it is very hard to find out their design. If they see they are ill posted, or are like to be overpowered by numbers, they then either march off in the night with great silence, or by some stratagem delude their enemies: if they retire in the daytime, they do it in such order, that it is no less dangerous to fall upon them in a retreat than in a march. They fortify their camps with a deep and large trench, and throw up the earth that is dug out of it for a wall; nor do they employ only their slaves in this, but the whole army works at it, except those that are then upon the guard; so that when so many hands are at work, a great line and a strong fortification are finished in so short a time that it is scarce credible. Their armor is

very strong for defence, and yet is not so heavy as to make them uneasy in their marches; they can even swim with it. All that are trained up to war practice swimming. Both horse and foot make great use of arrows, and are very expert. They have no swords, but fight with a pole-axe that is both sharp and heavy, by which they thrust or strike down an enemy. They are very good at finding out warlike machines, and disguise them so well, that the enemy does not perceive them till he feels the use of them; so that he cannot prepare such a defence as would render them useless; the chief consideration had in the making them is that they may be easily carried and managed.

很难说，乌托邦人是善用伏兵还是善于躲避伏兵。有时，你以为他们要撤退，而事实却远非如此；有时，他们决心要逃跑，你却觉得他们另有打算。当乌托邦人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或势不压敌时，他们便选择在夜晚偷偷撤退，或用计蒙蔽敌人。如果他们选择在白天撤兵，便会秩序井然，想要袭击他们并不比行军前进时容易多少。营房周围掘沟筑壕，挖出的土堆石块修墙防敌。乌托邦人不仅使用自己的奴隶完成这些工作，更是号召全军士兵一起工作，站岗的士兵除外，以防不测。这样一来，全军众志成城，巨大的防御工事很快便宣告竣工，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相信。士兵的盔甲坚固无比，足以御敌，却并不沉重，行军方便，甚至可以在水中游泳。士兵的一项训练即身披盔甲在水中游泳。不管步兵还是骑兵，都善用弓箭。他们不配刀剑，使用重且锋利的斧子作战，刺杀或砍杀敌人。乌托邦人善于研制战具，并巧于蒙蔽敌人，对方常常亲身感受到战具的威力后才恍然大悟，却为时已晚，无暇准备相应的防御战具，只能乖乖挨打。制作这些战具的一点首要考虑，便是易于携带和使用。

If they agree to a truce, they observe it so religiously that no provocations will make them break it. They never lay their enemies'

country waste nor burn their corn, and even in their marches they take all possible care that neither horse nor foot may tread it down, for they do not know but that they may have use for it-themselves. They hurt no man whom they find disarmed, unless he is a spy. When a town is surrendered to them, they take it into their protection; and when they carry a place by storm, they never plunder it, but put those only to the sword that opposed the rendering of it up, and make the rest of the garrison slaves, but for the other inhabitants, they do them no hurt; and if any of them had advised a surrender, they give them good rewards out of the estates of those that they condemn, and distribute the rest among their auxiliary troops, but they themselves take no share of the spoil.

一旦和敌人签订停战协定，乌托邦人便严格遵守，无论受到任何挑衅都绝不毁约。他们从不烧杀掠夺敌国，从不肆意践踏敌人的庄稼。即便是在行军的过程中，他们也要求自己的人马小心避开这些庄稼，以防未来自己使用。他们从不伤害手无缚甲之人，除非对方是敌方的密探。他们对投降自己的城市予以保护；即便是攻破的城市，他们也绝不允许士兵进行劫掠，仅将反对投降的敌人处死，将其余参加守卫的敌兵贬为奴隶，而至于平民百姓，他们绝不伤害。如果发现曾有意投诚之人，乌托邦人便从罚没财物中取出丰厚的一部分对其进行犒赏，而其余的没收财物全部赠与友军，自己则对战利品一无所取。

When a war is ended, they do not oblige their friends to reimburse their expenses; but they obtain them of the conquered, either in money, which they keep for the next occasion, or in lands, out of which a constant revenue is to be paid them; by many increases, the revenue which they draw out from several countries on such occasions, is now risen to above 700,000 ducats a year. They send some of their own people to receive these revenues, who

have orders to live magnificently, and like princes, by which means they consume much of it upon the place; and either bring over the rest to Utopia, or lend it to that nation in which it lies. This they most commonly do, unless some great occasion, which falls out but very seldom, should oblige them to call for it all. It is out of these lands that they assign rewards to such as they encourage to adventure on desperate attempts. If any prince that engages in war with them is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invading their country, they prevent him, and make his country the seat of the war; for they do not willingly suffer any war to break in upon their island; and if that should happen, they would only defend themselves by their own people, but would not call for auxiliary troops to their assistance.

战争结束后，乌托邦人并不要求友军归还战争支出（这笔支出为乌托邦人战前向友邦支付），所有支出都向战败国索取。他们要么从战败国手中征取赔款，留作下次战事备用；要么征收战败国的土地，获取土地贡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从许多国家征收的此项贡金不断增长，现如今每年总收入已达七十万元金币以上。乌托邦人派出子民去征收贡金，这些人受命在那里小住，如王公贵族般享受荣华富贵，将大量贡金消耗殆尽；其余贡金被带回乌托邦或是借给战败国。乌托邦人经常这么做，除非特殊情况迫使他们收回所有贡金，但这种情况相当少见。。同时，他们还将土地收入的一部分奖励给愿意为乌托邦履行冒险使命的人们。如果有国王起兵同乌托邦开战，准备入侵该国领土，乌托邦人会奋起反击，竭力避免在本国国土开战，因为他们不愿自己的国土受到践踏。但如果事与愿违，他们也不会要求友军的协助，而是使用自己的士兵保卫国家。

Chapter 9: Of the Religions of the Utopians

第九章：关于乌托邦人的宗教

There are several sorts of religions, not only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island, but even in every town; some worshipping the sun, others the moon or one of the planets: some worship such men as have been eminent in former times for virtue or glory, not only as ordinary deities, but as the supreme God: yet the greater and wiser sort of them worship none of these, but adore one eternal, invisible, infinite, and incomprehensible Deity; as a being that is far above all our apprehensions, that is spread over the whole universe, not by His bulk, but by His power and virtue; Him they call the Father of All, and acknowledge that the beginnings, the increase, the progress, the vicissitudes, and the end of all things come only from Him; nor do they offer divine honors to any but to Him alone. And indeed, though they differ concerning other things, yet all agree in this, that they think there is one Supreme Being that made and governs the world, whom they call in the language of their country Mithras. They differ in this, that one thinks the god whom he worships is this Supreme Being, and another thinks that his idol is that God; but they all agree in one principle, that whoever is this Supreme Being, He is also that great Essence to whose glory and majesty all honors are ascribed by the consent of all nations.

乌托邦全岛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每个城市也是如此。有人崇拜太阳，有人崇拜月亮或者其他的星辰。有人还崇拜那些以高尚德行或辉煌事迹著称的先贤，不仅把他们视作神灵，还当作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一样侍奉。然而大部分乌托邦人都聪慧得多，他们不信奉任何事

物，而是崇拜一个永恒的、不可见的、巨大无边的、无可思议的神明；他们认为它的力量和德行（而非其形体）都是超出凡人领悟力的，是遍及整个宇宙的；他们将它称为万物之父，并把万物的起源、生长、发育、演化、老死都归之于它；他们仅仅把它奉为真正的神明。实际上，虽然乌托邦人在很多事情上存在分歧，但是关于这一点他们却态度一致，他们都认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创造并主宰着万物，这个神在他们的语言里被称为“密特拉”。然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信奉的神灵、崇拜的贤人才是造物主，这一点大家莫衷一是。然而无论这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到底是谁，他的本质必然是各国众望所归的，所有荣耀与威严的化身。

By degrees, they fall off from the various superstitions that are among them, and grow up to that one religion that is the best and most in request; and there is no doubt to be made but that all the others had vanished long ago, if some of those who advised them to lay aside their superstitions had not met with some unhappy accident, which being considered as inflicted by heaven, made them afraid that the God whose worship had like to have been abandoned, had interposed, and revenged themselves on those who despised their authority. After they had heard from us an account of the doctrine, the course of life, and the miracles of Christ, and of the wonderful constancy of so many martyrs, whose blood, so willingly offered up by them, was the chief occasion of spreading their religion over a vast number of nations; it is not to be imagined how inclined they were to receive it. I shall not determine whether this proceeded from any secret inspiration of God, or whether it was because t seemed so favorable to that community of goods, which is an opinion so particular as well as so dear to them; since they perceived that Christ and his followers lived by that rule and that it was still kept up in some communities among the sincerest sort of Christians. From whichsoever of these motives it might be, true it is

that many of them came over to our religion, and were initiated into it by baptism. But as two of our number were dead, so none of the four that survived were in priest's orders; we therefore could only baptize them; so that to our great regret they could not partake of the other sacraments, that can only be administered by priests; but they are instructed concerning them, and long most vehemently for them. They have had great disputes among themselves, whether one chosen by them to be a priest would not be thereby qualified to do all the things that belong to that character, even though he had no authority derived from the Pope; and they seemed to be resolved to choose some for that employment, but they had not done it when I left them.

乌托邦人正在逐渐摆脱这种盲目信仰的现状，趋向于一致信奉一种最为大众接受和喜爱的宗教。毫无疑问，如果不是有人劝说别人改变信仰而恰巧遭遇不幸，导致人们认为这些人遭到了天谴，担心如果背弃之前的信仰，神灵同样会降罪于他们，惩罚他们蔑视上天的权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他五花八门的信仰早就该消失了。从我们这里，乌托邦人听说了关于基督的教义、生平以及发生的那些奇迹，也听说了许多坚定不移的伟大殉道者们的故事，他们为了将宗教信仰传播到各个国家，从不怕流血和牺牲。很难想象，当听说这一切以后，他们十分乐于接受这一信仰。我不知道这是由于上帝神秘的感召力，还是说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信仰最符合财产公有制的思想，毕竟这种思想是乌托邦人所特有的且备受推崇。他们发现基督跟他的追随者们就是在财产公有制思想的指导下生活的，而且这种生活方式还在部分虔诚的基督徒中保留着。无论是什么在驱使他们，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已经接纳了我们的信仰，并且准备接受洗礼。但是我们幸存的四个人（死去两人）中没有一个神父，因此也无法为他们进行洗礼的仪式。很遗憾，他们也没法参加其他的圣礼，因为那只能由神父执行。但是他们已被告知圣礼是怎么一回事，并且热切地盼望着圣礼能够实施。他们之间存在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是他们自行推举出来的神

父并非罗马教皇指派，是否有资格举办洗礼及各种圣礼仪式。他们似乎已经决定要选出这样的一个人来，但是在我离开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决定合适的人选。

Those among them that have not received our religion, do not fright any from it, and use none ill that goes over to it; so that all the while I was there, one man was only punished on this occasion. He being newly baptized, did, notwithstanding all that we could say to the contrary, dispute publicly concerning the Christian religion with more zeal than discretion; and with so much heat, that he not only preferred our worship to theirs, but condemned all their rites as profane; and cried out against all that adhered to them, as impious and sacrilegious persons, that were to be damned to everlasting burnings. Upon his having frequently preached in this manner, he was seized, and after trial he was condemned to banishment, not for having disparaged their religion, but for his inflaming the people to sedition: for this is one of their most ancient laws, that no man ought to be punished for his religion. At the first constitution of their government, Utopus having understood that before his coming among them the old inhabitants had been engaged in great quarrels concerning religion, by which they were so divided among themselves, that he found it an easy thing to conquer them, since instead of uniting their forces against him, every different party in religion fought by themselves; after he had subdued them, he made a law that every man might be of what religion he pleased, and might endeavor to draw others to it by force of argument, and by amicable and modest ways, but without bitterness against those of other opinions; but that he ought to use no other force but that of persuasion, and was neither to mix with it reproaches nor violence; and such as did otherwise were to be condemned to banishment or slavery.

有些乌托邦人，即使不接受基督教的教义，既不阻止别人信从，也不侵犯已经信从的人。我在那儿的日子里，只有一个教徒受到了惩罚。他刚接受洗礼，毫无审慎的思考，便高度狂热地公开谈说基督教义，丝毫不听我们的劝解。他态度激进，不仅宣扬基督教比其余的什么教都好，还公然谴责其余一切教会。他宣称其他的教会都是亵渎神灵的，信仰者都是不虔诚的、是不敬神的，应该永受地狱之火的惩罚。他由于长期以这样的方式宣扬教义，终于被捕，受审流放，所定的罪名不是蔑视宗教，而是在群众中煽动事端。这是乌托邦人一条最古老的法律：任何人不能由于信仰自由而受到责罚。在国家建立之初，乌托普国王了解到，在他到来之前，当地人由于信仰不一而激烈争吵。他还注意到，在打仗的时候，各个教派都是各自为战，而不是联合抗敌，因此他轻而易举地就征服了他们。在征服他们以后，他制定了一条法律，那就是任何人无论信奉什么宗教，可以通过强有力的辩说或者采取温和又谦逊的方式，去劝说他人皈依自己的宗教，但是不得恶意诋毁他人的看法。除了劝说以外不得使用其他方法，不得谴责他人或者诉诸武力，违者将被判处流放，或者贬为奴役。

This law was made by Utopus, not only for preserving the public peace, which he saw suffered much by daily contentions and irreconcilable heats, but because he thought the interest of religion itself required it. He judged it not fit to determine anything rashly, and seemed to doubt whether those different forms of religion might not all come from God, who might inspire men in a different manner, and be pleased with this variety; he therefore thought it indecent and foolish for any man to threaten and terrify another to make him believe what did not appear to him to be true. And supposing that only one religion was really true, and the rest false, he imagined that the native force of truth would at last break forth and shine bright, if supported only by the strength of argument, and attended to with a gentle and unprejudiced mind;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f such debates were carried on with violence and tumults, as the most wicked are always the most obstinate, so the best and most holy religion might be choked with superstition, as corn is with briars and thorns.

乌托普国王制定这种法律，虽然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定–他曾亲眼看到整个国家因日常的各种争论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鸡犬不宁，但另一方面他更觉得这种法律对宗教本身有利。乌托普从来不对任何事物作出草率定论，他常常怀疑，这些形形色色的信仰冥冥中是不是都受造物主指引，是造物主以不同的方式启发着人们，而人世间存在多样的信仰也是它希望看到的。因此他认为，威胁和恐吓他人去接受他们并不认同的真理，是蛮横又愚蠢的行为。即便只有一种信仰是真理，其他都是子虚乌有的，那么他相信只有通过有力的论证，以一种温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去说服别人，那么真理的原始力量才能最终喷薄而出，散发光芒。最邪恶的人往往是最顽固不化的人，因此，如果诉诸武力和动乱来解决宗教争端，最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可能会被湮没在无端的宗教斗争中，犹如嘉禾在丛生的荆棘中窒息而死。

He therefore left men wholly to their liberty, that they might be free to believe as they should see cause; only he made a solemn and severe law against such as should so far degenerate from the dignity of human nature as to think that our souls died with our bodies, or that the world was governed by chance, without a wise overruling Providence: for they all formerly believed that there was a state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to the good and bad after this life; and they now look on those that think otherwise as scarce fit to be counted men, since they degrade so noble a being as the soul, and reckon it no better than a beast's: thus they are far from looking on such men as fit for human society, or to be citizens of a well-ordered commonwealth; since a man of such principles must needs,

as oft as he dares do it, despise all their laws and customs: for there is no doubt to be made that a man who is afraid of nothing but the law, and apprehends nothing after death, will not scruple to break through all the laws of his country, either by fraud or force, when by this means he may satisfy his appetites. They never raise any that hold these maxims, either to honors or offices, nor employ them in any public trust, but despise them, as men of base and sordid minds: yet they do not punish them, because they lay this down as a maxim that a man cannot make himself believe anything he pleases; nor do they drive any to dissemble their thoughts by threatenings, so that men are not tempted to lie or disguise their opinions; which being a sort of fraud, is abhorred by the Utopians. They take care indeed to prevent their disputing in defence of these opinions, especially before the common people; but they suffer, and even encourage them to dispute concerning them in private with their priests and other grave men, being confident that they will be cured of those mad opinions by having reason laid before them.

因此乌托普崇尚宗教自由，认为每个人都应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不过，他也制定了一条神圣而严苛的法律，严令禁止任何贬低人性尊严、自我堕落的言论，例如宣扬人死后灵魂随身体消亡，或世界是被机遇摆布的，而不是受充满智慧、推翻一切的神意支配。乌托邦人之前都坚信死后善恶有报，各有所归；他们认为那些不认同此论的人不配做人，因为他们将自己高尚的灵魂贬低到与畜生别无二致。因此他们不承认此类人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也不将他们视为乌托邦这样井然有序的国家之公民。这一类人，如果不是还有所忌惮的话，将对一切法律和惯例置若罔闻。毫无疑问，当一个人除了法律以外，毫无忌惮，死后也别无所求，那么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会想方设法利用欺诈或是暴力的手段，来破坏国家法律。因此，对于怀有这种心理的人，乌托邦人取缔他们的一切荣誉，不给他们一官半职，也不让他们从事任何公职，而且对他们充满蔑视，把他们看作是下贱且肮脏

无比的。然而乌托邦人不会处罚他们，因为乌托邦人坚信这样的道理，即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愿意信仰什么。乌托邦人也不会采用威胁的手段强迫别人伪饰自己的思想，因此这个国家的国民不必撒谎，也不用伪装自己的观点，撒谎和伪装观点被看作是一种欺诈，这是乌托邦人深恶痛绝的。乌托邦人时刻注意不让怀有上述邪恶心理的人在普通国民前为他们的观点辩护，但勉强允许甚至积极鼓励这些人私下里在教士或其他重要人物面前辩说自己的观点，他们坚信如果这些人心中还有理智尚存，那么上述荒谬的观点就会被彻底纠正。

There are many among them that run far to the other extreme, though it is neither thought an ill nor unreasonable opinion, and therefore is not at all discouraged. They think that the souls of beasts are immortal, though far inferior to the dignity of the human soul, and not capable of so great a happiness. They are almost all of them very firmly persuaded that good men will be infinitely happy in another state; so that though they are compassionate to all that are sick, yet they lament no man's death, except they see him loth to depart with life; for they look on this as a very ill presage, as if the soul, conscious to itself of guilt, and quite hopeless, was afraid to leave the body, from some secret hints of approaching misery. They think that such a man's appearance before God cannot be acceptable to him, who being called on, does not go out cheerfully, but is backward and unwilling, and is, as it were, dragged to it. They are struck with horror when they see any die in this manner, and carry them out in silence and with sorrow, and praying God that he would be merciful to the errors of the departed soul, they lay the body in the ground; but when any die cheerfully, and full of hope, they do not mourn for them, but sing hymns when they carry out their bodies, and commending their souls very earnestly to God: their whole behavior is then rather grave than sad, they burn the body, and set up a pillar where the pile was made, with an

inscription to the honor of the deceased.

乌托邦人中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想法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是乌托邦人并不认为这群人的见解病态或者荒谬，甚至还举双手赞成。这群人相信野兽也有不朽的灵魂，但是远不及人类的灵魂高贵，因此无法得到人类那样圆满的幸福。几乎所有乌托邦人都十分肯定并深信，善良的人可以在死后往生极乐。因此尽管他们对患病的人表示悲悯，但是对死亡却无所惋惜，除非将死之人对人间恋恋不舍。他们将此视为不祥之兆，认为灵魂受到了某种神秘的提示，在离开身体之前意识到了自己罪恶深重，十分绝望，所以才会迟迟不愿离去，担心死后将要面临惩罚。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受到上帝的召唤，不是乐意往之，而是内心犹豫，极不情愿，被迫前往，那么上帝不会乐意他的到来。他们如看到一个人这样死去，会感到毛骨悚然，他们会在悲伤的沉默中将死者送到墓地，祈求上帝仁慈宽宥这个灵魂的罪过，然后把尸体埋掉。反之，对于那些心情愉快又满怀期待而死去的人，他们不仅不表示哀悼，还会唱着赞美诗为其送葬，真诚地向上帝赞扬死者的灵魂。整个过程庄严肃穆，而不是满怀悲痛，他们举火焚尸，立下刻碑，纪念死者充满荣耀的一生。

When they come from the funeral, they discourse of his good life and worthy actions, but speak of nothing oftener and with more pleasure than of his serenity at the hour of death. They think such respect paid to the memory of good men is both the greatest incitement to engage others to follow their example, and the most acceptable worship that can be offered them; for they believe that though by the imperfection of human sight they are invisible to us, yet they are present among us, and hear those discourses that pass concerning themselves. They believe it inconsistent with the happiness of departed souls not to be at liberty to be where they will, and do not imagine them capable of the ingratitude of not

desiring to see those friends with whom they lived on earth in the strictest bonds of love and kindness: besides they are persuaded that good men after death have these affections and all other good dispositions increased rather than diminished, and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they are still among the living, and observe all they say or do. From hence they engage in all their affairs with the greater confidence of success, as trusting to their protection; while this opinion of the presence of their ancestors is a restraint that prevents their engaging in ill designs.

他们回去后，会讲述死者高尚的生平以及种种善举，然而大家议论更多并且更称赞的，必然是死者在临死前安详平和的状态。乌托邦人认为，这样来纪念德行高尚的人，不但是鼓励生者向善的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也给予死者以其最乐于接受的敬意。乌托邦人认为，尽管由于人类的视力缺陷，看不到死去的人，但是死者是与我们同在的，能够听到朋友关于他们的诉说。乌托邦人坚信，获得极乐的灵魂如果不能凭自己的意愿随意走动，是非常不合逻辑的，他们还认为，灵魂不会如此忘恩负义，无心回来看望挚友，全然背弃生前朋友间深厚的关爱与善意。此外他们相信，对于德行高尚的人来说，死后这些美好的情感以及其他美好的性情只增不减，因此他们认为死去的人与我们同在，注视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因此，有了先人的庇佑，乌托邦人在处事的时候更加有信心，更加坚信能够成功，而且有先人的亡灵在身旁，他们也不敢产生邪恶的想法。

They despise and laugh at auguries, and the other vain and superstitious ways of divination, so much observed among other nations; but have great reverence for such miracles as cannot flow from any of the powers of nature, and look on them as effects and indications of the presence of the Supreme Being, of which they say many instances have occurred among them; and that sometimes

their public prayers, which upon great and dangerous occasions they have solemnly put up to God, with assured confidence of being heard, have been answered in a miraculous manner.

其他国家严守占卜法术，或者相信其他徒劳的、宣扬迷信的占卜手段，乌托邦人却对此轻蔑嘲笑。相反，他们非常崇敬非自然之力所造就的奇迹，并将其看做至高存在的灵验和启示，而有些奇迹真的曾经应验。有时在重要关头或者性命攸关的时刻，他们怀着心诚则灵的信念，共同向上帝庄严地祷告，最终奇迹真的降临，人们得偿所愿。

They think the contemplating God in His works, and the adoring Him for them, is a very acceptable piece of worship to Him.

他们认为于上帝的杰作，即自然中冥思上帝，因自然之物而敬慕上帝，是令上帝满意的礼拜方式。

There are many among them, that upon a motive of religion neglect learning, and apply themselves to no sort of study; nor do they allow themselves any leisure time, but are perpetually employed, believing that by the good things that a man does he secures to himself that happiness that comes after death. Some of these visit the sick; others mend highways, cleanse ditches, repair bridges, or dig turf, gravel, or stones. Others fell and cleave timber, and bring wood, corn, and other necessaries on carts into their towns. Nor do these only serve the public, but they serve even private men, more than the slaves themselves do; for if there is anywhere a rough, hard, and sordid piece of work to be done, from which many are frightened by the labor and loathsomeness of it, if

not the despair of accomplishing it, they cheerfully, and of their own accord, take that to their share; and by that means, as they ease others very much, so they afflict themselves, and spend their whole life in hard labor; and yet they do not value themselves upon this, nor lessen other people's credit to raise their own; but by their stooping to such servile employments, they are so far from being despised, that they are so much the more esteemed by the whole nation Of these there are two sorts; some live unmarried and chaste, and abstain from eating any sort of flesh; and thus weaning themselves from all the pleasures of the present life, which they account hurtful, they pursue, even by the hardest and painfullest methods possible, that blessedness which they hope for hereafter; and the nearer they approach to it, they are the more cheerful and earnest in their endeavors after it. Another sort of them is less willing to put themselves to much toil, and therefore prefer a married state to a single one; and as they do not deny themselves the pleasure of it, so they think the begetting of children is a debt which they owe to human nature and to their country; nor do they avoid any pleasure that does not hinder labor, and therefore eat flesh so much the more willingly, as they find that by this means they are the more able to work; the Utopians look upon these as the wiser sect, but they esteem the others as the most holy. They would indeed laugh at any man, who from the principles of reason would prefer an unmarried state to a married, or a life of labor to an easy life; but they reverence and admire such as do it from the motives of religion. There is nothing in which they are more cautious than in giving their opinion positively concerning any sort of religion. The men that lead those severe lives are called in the language of their country Brutheskas, which answers to those we call religious orders.

他们中有许多人，受宗教中某种动机的鼓舞，忽视学习的作用，自己也从不学习任何知识，但他们也从不偷闲，而是勤奋干活，多多行善，他们相信，人做了善事，在死后就必定能获得极乐。这些人中有的照顾病人，有的修路通渠、修整桥梁或挖草皮砂石。另一些人砍劈木材，用手推车将木材、谷物和其他必需品用运送至自己的城镇。他们比奴仆做的还多，不仅服务大众，甚至还帮助个人。碰到艰巨粗陋的活儿需要完成，许多人都会因其费力可憎望而却步，但是只要他们觉得这活儿能够完成，还不至于让人绝望，就会开心地主动承担。他人轻松了许多，他们却因此折磨着自己，一生都做着苦力活。然而他们却不因此自夸，也不贬低别人而抬高自己。而正是因为他们原意屈尊做卑微的事情，他们才有了尊严，并为全体国家公民格外尊敬。

Their priests are men of eminent piety, and therefore they are but few for there are only thirteen in every town, one for every temple; but when they go to war, seven of these go out with their forces, and seven others are chosen to supply their room in their absence; but these enter again upon their employment when they return; and those who served in their absence attend upon the high-priest, till vacancies fall by death; for there is one set over all the rest. They are chosen by the people as the other magistrates are, by suffrages given in secret, for preventing of factions; and when they are chosen they are consecrated by the College of Priests. The care of all sacred things, the worship of God, and an inspection into the manners of the people, are committed to them. It is a reproach to a man to be sent for by any of them, or for them to speak to him in secret, for that always gives some suspicion. All that is incumbent on them is only to exhort and admonish the people; for the power of correcting and punishing ill men belongs wholly to the Prince and to the other magistrates. The severest thing that the priest does is the excluding those that are desperately wicked from joining in their worship. There is not any sort of punishment more dreaded by

them than this, for as it loads them with infamy, so it fills them with secret horrors, such is their reverence to their religion; nor will their bodies be long exempted from their share of trouble; for if they do not very quickly satisfy the priests of the truth of their repentance, they are seized on by the Senate, and punished for their impiety. The education of youth belongs to the priests, yet they do not take so much care of instructing them in letters as in forming their minds and manners aright; they use all possible methods to infuse very early into the tender and flexible minds of children such opinions as are both good in themselves and will be useful to their country. For when deep impressions of these things are made at that age, they follow men through the whole course of their lives, and conduce much to preserve the peace of the government, which suffers by nothing more than by vices that rise out of ill opinions. The wives of their priests are the most extraordinary women of the whole country; sometimes the women themselves are made priests, though that falls out but seldom, nor are any but ancient widows chosen into that order.

他们中分为两派。一派人终身不婚，保持着肉体的纯洁，不吃肉只吃素；因此他们断绝了世上能享乐的一切，他们认为那都是有害的；他们甚至宁愿忍受极度的痛苦，去追寻来世的福音；那个日子越临近，他们就追寻得越快乐、越恳切。另一派人不是那么愿意吃苦，比起孤身一人，他们更愿有人相伴厮守；他们身在其中，自得其乐，因而也认为生儿育女是人类的天性、是对国家的责任；只要不妨碍他们劳作，他们对享乐之事都欣然接受，因此他们更喜肉食，因为他们发现吃肉食能让他们干活时更有劲。乌托邦人认为后一派人更加明智，但是第一派人最为圣洁光辉。假使有人是出于理性判断而选择独身不婚和一生苦力，那他们肯定会对此大声嘲笑。相反，若是此人出于宗教信仰而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们则会由衷地尊敬赞美。乌托邦人在给出宗教方面的褒奖时总是最为小心谨慎。过着简朴生活的第一派

人用乌托邦语来说就是“布鲁赛斯卡”，这相当于我们说的神职人员。

None of the magistrates has greater honor paid him than is paid the priests; and if they should happen to commit any crime, they would not be questioned for it. Their punishment is left to God, and to their own consciences; for they do not think it lawful to lay hands on any man, how wicked soever he is, that has been in a peculiar manner dedicated to God; nor do they find any great inconvenience in this, both because they have so few priests, and because these are chosen with much caution, so that it must be a very unusual thing to find one who merely out of regard to his virtue, and for his being esteemed a singularly good man, was raised up to so great a dignity, degenerate into corruption and vice. And if such a thing should fall out, for man is a changeable creature, yet there being few priests, and these having no authority but what rises out of the respect that is paid them, nothing of great consequence to the public can proceed from the indemnity that the priests enjoy.

乌托邦的牧师以虔诚闻名，每个城镇仅有十三座教堂，每座教堂配一名牧师，因此乌托邦的律师人数极少。但如遇战，七位牧师将会从戎随军，空缺的神职将会由另选的七人补齐。而当参战的牧师回来时，他们会重返原位。补空缺的七位牧师将升为主教侍从直至死亡。有一名主教负责统领其他人。为避免派系纷争，牧师和地方官员一样，都是国民选票秘密选举出的。一旦被选中，牧师将会接受牧师团举行的神圣的任职仪式。牧师的职责有管理宗教事务，崇拜上帝以及监督当地人的言行。被牧师召见或私下约谈是一件丢脸的事，因为人们会怀疑你的言行。然而牧师的责任也仅仅在于规劝人民。因为只有国王和其他地方官员才有权纠正以及惩罚品行不端的人。禁止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参加礼拜是牧师能做的最为严厉的事。这是牧师能做出的

最令人恐惧的惩罚，他们让恶人声名狼藉，恶人便会心生恐惧，从而对宗教产生敬意。恶人不仅会受到心灵上的折磨，肉体也将难逃一劫。因为假如他们不立即向牧师表明悔意，议事会便会逮捕他们，并且惩罚他们的不虔诚行为。牧师负责教育青少年，他们在德育方面花的精力比智育多。孩子的心灵大多柔软而易于锻造，因此从一开始，牧师便用尽一切办法将对国家和个人都有益的理念灌输给孩子。好的观念一旦在青少年阶段根深蒂固，便会伴随其一生，而只要没有持异见的恶人出现，这将极大地促进国家维持和平。牧师的妻子是整个国家中最为非凡特别的女性。虽然很少见，但是有时女性也能当选牧师，而且只有老年寡妇能任此职。牧师享有的荣誉和尊重是地方官难以匹敌的。因此，假使牧师犯罪了，惩罚和审判他的将会是上帝和他自己的良心。乌托邦人认为不论一个人的罪孽有多深重，只要他以特有的方式将自己献给了上帝，那么按照法理就不该逮捕他。乌托邦人认为这执行起来并无不便，因为他们的牧师数量很少，而且这些牧师都是谨慎挑选出来的人，挑选的唯一标准是他们的美德和本性的善良，因此这些人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样的人几乎不可能堕落为腐败邪恶的人。但是就算有牧师真的由于人性的善变而自甘堕落，也不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因为牧师的数量很少，而且他们唯一拥有的是人们给予的尊重，手中并无实权。

They have indeed very few of them, lest greater numbers sharing in the same honor might make the dignity of that order which they esteem so highly to sink in its reputation. They also think it difficult to find out many of such an exalted pitch of goodness, as to be equal to that dignity which demands the exercise of more than ordinary virtues. Nor are the priests in greater veneration among them than they are among their neighboring nations, as you may imagine by that which I think gives occasion for it.

其实，牧师是寥寥无几的，这是为了避免备受崇敬的神权为更多的人共享而变得不再崇高。另外，乌托邦人认为只有拥有超常美德的人才能享有如此尊荣，因而符合条件的人少之又少。乌托邦的牧师在邻国受到的尊敬也不亚于国内，我举一个例子，想必你就能想象到了。

When the Utopians engage in battle, the priests who accompany them to the war, apparelled in their sacred vestments, kneel down during the action, in a place not far from the field; and lifting up their hands to heaven, pray, first for peace, and then for victory to their own side, and particularly that it may be gained without the effusion of much blood on either side; and when the victory turns to their side, they run in among their own men to restrain their fury; and if any of their enemies see them, or call to them, they are preserved by that means; and such as can come so near them as to touch their garments, have not only their lives, but their fortunes secured to them; it is upon this account that all the nations round about consider them so much, and treat them with such reverence, that they have been often no less able to preserve their own people from the fury of their enemies, than to save their enemies from their rage; for it has sometimes fallen out, that when their armies have been in disorder, and forced to fly, so that their enemies were running upon the slaughter and spoil, the priests by interposing have separated them from one another, and stopped the effusion of more blood; so that by their mediation a peace has been concluded on very reasonable terms; nor is there any nation about them so fierce, cruel, or barbarous as not to look upon their persons as sacred and inviolable.

当乌托邦卷入战争中时，那些随军的牧师穿着神圣的仪式服，会

跪拜在离战场不远的地方。他们举起双手向上帝祷告，首先祈祷和平，接着祈祷本国在双方伤亡都不严重的情况下获胜。当本国行将胜利之时，牧师会冲入本国士兵的队伍中，规劝他们平复滥肆杀伐之心。而如果此时敌军士兵看见了他们，或者呼召他们，便可免于一死。那些能走近他们触碰到他们法衣的，不仅性命能保全，财产也能一并保全，免受战争破坏。正因为此，他们在战争中才被周围国家推崇备至，极尽尊重；也正因为此，无论哪一方胜利在望，他们都既能保护本国公民免受敌军的欺凌，又能保全敌国人民免受本国士兵的杀戮。有时候，在交战中，他们本国的军队秩序混乱、四散溃退，敌军因此肆意屠杀，疯狂掠夺，乌托邦的牧师此时就会站出来调停，阻止双方正面冲突，避免更多伤亡。正是他们的调解才让和平在合理的情况下降临。就算其他国家再凶狠残暴、野蛮无理，也会崇敬乌托邦的牧师，将他们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人。

The first and the last day of the month, and of the year, is a festival. They measure their months by the course of the moon, and their years by the course of the sun. The first days are called in their language the Cynemernes, and the last the Trapemernes; which answers in our language to the festival that begins, or ends, the season.

月初月末、年初岁尾，都是乌托邦人的节日。他们依据月亮的运行测算月份，依据太阳的运行测算年份。月初和年初在乌托邦语里是“西内梅尼”，月末岁尾是“特雷普梅尼”，意思分别是开启一段时期和结束一段时期。

They have magnificent temples, that are not only nobly built, but extremely spacious; which is the more necessary, as they have so few of them; they are a little dark within, which proceeds not

from any error in the architecture, but is done with design; for their priests think that too much light dissipates the thoughts, and that a more moderate degree of it both recollects the mind and raises devotion. Though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religion among them, yet all these, how various soever, agree in the main point, which is the worshipping of the Divine Essence; and therefore there is nothing to be seen or heard in their temples in which the several persuasions among them may not agree; for every sect performs those rites that are peculiar to it, in their private houses, nor is there anything in the public worship that contradicts the particular ways of those different sects. There are no images for God in their temples, so that everyone may represent Him to his thoughts,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his religion; nor do they call this one God by any other name than that of Mithras, which is the common name by which they all express the Divine Essence, whatsoever otherwise they think it to be; nor are there any prayers among them but such as every one of them may use without prejudice to his own opinion.

他们的教堂宏伟壮丽，不仅富丽堂皇，而且格外宽敞气派，这也是必然，因为教堂本身不多。教堂室内光线稍暗，这并不是建筑学上的失误，而是故意为之。教士认为光线过亮会扰人心神，而亮度适中则可以安气宁神，使信众愈发虔诚。尽管乌托邦人的信仰五花八门，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他们都崇拜神格。因此教堂中的所见所闻与各式各样的信仰并无冲突。任何教派，若有其独特的仪式，尽可在个人家中进行。公共崇拜中没有任何同各式各样的教派相矛盾之处。教堂中不设神像，因此众人皆可依着各自宗教的方式，自行领会神的形象。无论信仰如何，乌托邦人皆称神为“密特拉”，这是他们对神格的统称。他们的祷文也是通用，而且不会同各自的信仰相矛盾。

They meet in their temples on the evening of the festival that

concludes a season: and not having yet broke their fast, they thank God for their good success during that year or month, which is then at an end; and the next day being that which begins the new season, they meet early in their temples, to pray for the happy progress of all their affairs during that period upon which they then enter. In the festival which concludes the period, before they go to the temple, both wives and children fall on their knees before their husbands or parents, and confess everything in which they have either erred or failed in their duty, and beg pardon for it. Thus all little discontents in families are removed, that they may offer up their devotions with a pure and serene mind; for they hold it a great impiety to enter upon them with disturbed thoughts, or with a consciousness of their bearing hatred or anger in their hearts to any person whatsoever; and think that they should become liable to severe punishments if they presumed to offer sacrifices without cleansing their hearts, and reconciling all their differences. In the temples, the two sexes are separated, the men go to the right hand, and the women to the left; and the males and females all place themselves before the head and master or mistress of that family to which they belong; so that those who have the government of them at home may see their deportment in public; and they intermingle them so, that the younger and the older may be set by one another; for if the younger sort were all set together, they would perhaps trifle away that time too much in which they ought to beget in themselves that religious dread of the Supreme Being, which is the greatest and almost the only incitement to virtue.

每到庆祝四季轮转的节日，他们便会在晚上相聚于教堂。这时他们还未结束斋戒，会感恩在神的庇佑下，在即将过去的一年或月份中的收获。羿日清晨，新季来临，他们在教堂集会，祈祷在新一季里万事如意，一切顺利。在宣告一季终结的节日里，在去教堂前，妻子会

伏于丈夫脚边，孩子们会伏在父母身前，为自己的错误和失职忏悔认错，祈求原谅。于是，家庭内部的小小不满就此消散，这样他们便能以纯粹平静的心境朝拜神灵。他们认为献祭之时若是心绪不宁，或是对任何人胸怀愤恨，都是亵渎神灵；倘若不能净化心灵，调解一切分歧，那么理应受重罚。到达寺庙后，他们按性别分开，男右女左，分别就坐于自家长辈的前面。这样，在家中管束子女的家长们在公共场合也能监督他们的行为举止。年轻人和年长者相间而坐，因为若是年轻人坐到了一起，他们定会嬉笑打闹，浪费了太多本该用于培养虔诚敬神的时间，这是最伟大的也是近乎于唯一的激励人向善的方式。

They offer up no living creature in sacrifice, nor do they think it suitable to the Divine Being, from whose bounty it is that these creatures have derived their lives, to take pleasure in their deaths, or the offering up of their blood. They burn incense and other sweet odors, and have a great number of wax lights during their worship; not out of any imagination that such oblations can add anything to the divine nature, which even prayers cannot do; but as it is a harmless and pure way of worshipping God, so they think those sweet savors and lights, together with some other ceremonies, by a secret and unaccountable virtue, elevate men's souls, and inflame them with greater energy and cheerfulness during the divine worship.

他们并不供奉牲畜。他们认为既然上天对万物有好生之德，那么不宜用流血和杀戮取悦上帝。做礼拜时，他们会焚香，点燃其他芬芳的香料，点亮许多的蜡烛。他们清楚，神之所以为神，与香烛无关，甚至与祷文无关，但是这样拜神，纯粹且无害，所以他们认为，焚香燃烛，举办仪式，可以潜移默化地陶冶情操，升华灵魂，更加虔诚和喜悦地对神礼拜。

All the people appear in the temples in white garments, but the priest's vestments are parti-colored, and both the work and colors are wonderful. They are made of no rich materials, for they are neither embroidered nor set with precious stones, but are composed of the plumes of several birds, laid together with so much art and so neatly, that the true value of them is far beyond the costliest materials. They say that in the ordering and placing those plumes some dark mysteries are represented, which pass down among their priests in a secret tradition concerning them; and that they are as hieroglyphics, putting them in mind of the blessings that they have received from God, and of their duties both to Him and to their neighbors. As soon as the priest appears in those ornaments, they all fall prostrate on the ground, with so much reverence and so deep a silence that such as look on cannot but be struck with it, as if it were the effect of the appearance of a deity. After they have been for some time in this posture, they all stand up, upon a sign given by the priest, and sing hymns to the honor of God, some musical instruments playing all the while. These are quite of another form than those used among us: but as many of them are much sweeter than ours, so others are made use of by us.

人们身着白衣到教堂做礼拜。而教士的法衣则颜色混杂绚丽，做工细腻精致。衣服的材料并不贵重，既无绣花，也无珠宝，但却是由各种鸟羽交织而成，如此艺术且灵巧，其真正价值是所有的贵重材质都难以企及的。他们说，那些羽毛交织成章，掩映分明，暗含有神秘的寓意。对此的解释在教士间以一种私密的方式用象形文字代代流传，提醒他们上帝赐予的恩泽以及他们对上帝和他人的责任。当教士身着这样的法衣出现时，所有人都毕恭毕敬地伏在地上，鸦雀无声，抬头看上一眼似乎就会受到触动，仿佛这是神性显灵的效果。大家伏在地上一会儿后，待教士做出手势，便会起身，在乐器的伴奏下为神唱赞美诗。这些乐器和我们的乐器形状迥异，许多乐器的音色比我们

的更为悦耳，其他乐器我们也在用。

Yet in one thing they very much exceed us; all their music, both vocal and instrumental, is adapted to imitate and express the passions, and is so happily suited to every occasion, that whether the subject of the hymn be cheerful or formed to soothe or trouble the mind, or to express grief or remorse, the music takes the impression of whatever is represented, affects and kindles the passions, and works the sentiments deep into the hearts of the hearers. When this is done, both priests and people offer up very solemn prayers to God in a set form of words; and these are so composed, that whatsoever is pronounced by the whole assembly may be likewise applied by every man in particular to his own condition; in these they acknowledge God to be the author and governor of the world, and the fountain of all the good they receive, and therefore offer up to Him their thanksgiving; and in particular bless Him for His goodness in ordering it so that they are born under the happiest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and are of a religion which they hope is the truest of all others: but if they are mistaken, and if there is either a better government or a religion more acceptable to God, they implore Him goodness to let them know it, vowing that they resolve to follow Him whithersoever He leads them. But if their government is the best and their religion the truest, then they pray that He may fortify them in it, and bring all the world both to the same rules of life, and to the same opinions concerning Himself; unless, according to the unsearchableness of His mind, He is pleased with a variety of religions. Then they pray that God may give them an easy passage at last to Himself; not presuming to set limits to Him, how early or late it should be; but if it may be wished for, without derogating from His supreme authority, they desire to be quickly delivered, and to be taken to

Himself, though by the most terrible kind of death, rather than to be detained long from seeing Him by the most prosperous course of life. When this prayer is ended, they all fall down again upon the ground, and after a little while they rise up, go home to dinner, and spend the rest of the day in diversion or military exercises.

但有一点确实是我们遥不可及的。他们所有的音乐，无论是声乐还是器乐，都可以模仿和表达感情，完美地契合于每个场景。无论歌词的主题是轻松愉悦，或是抚慰人心，或是忧虑悲伤，或是懊悔抑郁，音乐都能准确地传达情感，触发思绪，引起共鸣，触碰听众内心深处的感情。此后，教士会和信众向上帝齐诵固定的庄严祷文。这篇祷文编写得甚是巧妙，诵者皆可适用。在祷文中，他们视上帝为万物的创造者、统治者，是人们一切福祉的源泉，他们因此感恩神赐，特别感谢神意让他们有幸出生在这个最快活的国家，并能追随他们心中最真实的信仰。但是，如若他们弄错了，如果还有更美好的国家，更为神所赞许的信仰，他们就祈求神灵告知自己，并向神灵起誓，他们情愿遵从神所指引的任何道路。但如果他们的国家是最完美的，他们的信仰是最纯正的，他们便祈求神使其坚定不移，引导所有人都过上同样的生活，抱有和他们相同的信仰，除非由于神意难测，神愿意看到人们抱有各式各样的信仰。此外，他们祈求神能使他们最终安详地脱离尘世，向神归依。他们不敢限定何时脱离，但如果不算冒犯神威，他们宁可死于非命而归依神灵，也不愿因贪恋尘世荣华而误了觐见神的时机。祈祷完成后，信众又伏在地上片刻，一会儿后便可起身，回家用餐，将接下来的时间消磨在娱乐或是军事操练中。

Thus have I described to you, as particularly as I could, the constitution of that commonwealth, which I do not only think the best in the world, but indeed the only commonwealth that truly deserves that name. In all other places it is visible, that while people talk of a commonwealth, every man only seeks his own

wealth; but there, where no man has any property, all men zealously pursue the good of the public: and, indeed, it is no wonder to see men act so differently; for in other commonwealths, every man knows that unless he provides for himself, how flourishing soever the commonwealth may be, he must die of hunger; so that he sees the necessity of preferring his own concerns to the public; but in Utopia, where every man has a right to everything, they all know that if care is taken to keep the public stores full, no private man can want anything; for among them there is no unequal distribution, so that no man is poor, none in necessity; and though no man has anything, yet they are all rich; for what can make a man so rich as to lead a serene and cheerful life, free from anxieties; neither apprehending want himself, nor vexed with the endless complaints of his wife? He is not afraid of the misery of his children, nor is he contriving how to raise a portion for his daughters, but is secure in this, that both he and his wife, hi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to as many generations as he can fancy, will all live both plentifully and happily; since among them there is no less care taken of those who were once engaged in labor, but grow afterward unable to follow it, than there is elsewhere of these that continue still employed.

关于这个国家的结构，我已尽我所能，为你们一二其详，在我看来，这个国家不仅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也是唯一名副其实的国家。在他国，人们对于公共福利只是夸夸其谈，追逐的却是个人利益。但是在乌托邦，不存在私有财产，人们竭力实现公共福祉。诚然，以上两种情况自有其成因。在他国，不管国家如何繁荣昌盛，若一个人不为自己谋算，定会忍饥挨饿，因此，个人利益势必被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在乌托邦，财产公有，所有物资公平分配。仓廪实，民众自然无欲无求。所以在乌托邦，没有贫困。众人皆一无所有，但又无所不有。假若人们的生活平静安宁，无忧无虑，物资丰厚；人们不会因妻

子的抱怨而受扰，不必担心儿女贫困，无需牵挂女儿的嫁妆，妻女、子孙乃至所有后代的幸福生活都有了保证，他们还会有何奢求？此外，那些曾经从事劳动而今却丧失劳动力的人们也能和仍从事劳动的人享受相同的待遇。

I would gladly hear any man compare the justice that is among them with that of all other nations; among whom, may I perish, if I see anything that looks either like justice or equity: for what justice is there in this, that a nobleman, a goldsmith, a banker, or any other man, that either does nothing at all, or at best is employed in things that are of no use to the public, should live in great luxury and splendor, upon what is so ill acquired; and a mean man, a carter, a smith, or a ploughman, that works harder even than the beasts themselves, and is employed in labors so necessary, that no commonwealth could hold out a year without them, can only earn so poor a livelihood, and must lead so miserable a life, that the condition of the beasts is much better than theirs? For as the beasts do not work so constantly, so they feed almost as well, and with more pleasure; and have no anxiety about what is to come, whilst these men are depressed by a barren and fruitless employment, and tormented with the apprehensions of want in their old age; since that which they get by their daily labor does but maintain them at present, and is consumed as fast as it comes in, there is no overplus left to lay up for old age.

我倒乐意听听谁能把这儿的公平正义和其他各国所谓的正义做个比较。我敢起誓，在其他国家压根就难觅公平正义的踪迹。他们所谓的正义，不过是贵族、金铺老板、银行家或是其他无所事事者，最多从事的也不过是于国家没有任何贡献的工作，靠不正当所得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而地位卑贱的劳动者，车夫、木匠和农民，他们辛苦劳

作，做着国家底层却必需的工作。任何国家若是没有了他们，甚至都维持不过一年。然而，他们的所得却难以糊口，生活之凄惨，竟不及牛马。牛马无需连轴劳作，吃食尚可，生活愉悦，也无需担忧未来。而这些劳动者拿着可怜的薪资，做牛做马，辛苦劳作，还不免要为日后贫苦的暮年生活担惊受怕。他们现在的薪资尚且如此单薄，生活捉襟见肘，又何谈有积蓄养老呢。

Is not that government both unjust and ungrateful, that is so prodigal of its favors to those that are called gentlemen, or goldsmiths, or such others who are idle, or live either by flattery, or by contriving the arts of vain pleasur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akes no care of those of a meaner sort, such as ploughmen, colliers, and smiths, without whom it could not subsist? But after the public has reaped all the advantage of their service, and they come to be oppressed with age, sickness, and want, all their labors and the good they have done is forgotten; and all the recompense given them is that they are left to die in great misery. The richer sort are often endeavoring to bring the hire of laborers lower, not only by their fraudulent practices, but by the laws which they procure to be made to that effect; so that though it is a thing most unjust in itself, to give such small rewards to those who deserve so well of the public, yet they have given those hardships the name and color of justice, by procuring laws to be made for regulating them.

这岂不是一个难寻公正、不懂感恩的国家吗？它如此偏爱所谓的绅士、金铺老板，以及其他无所事事，或以阿谀奉承、提供无益的享乐寄生在社会中的闲人。相反，国家对于地位卑劣的农民、矿工、普通劳动者、车夫以及木匠却毫不同情。没有他们，国将不国。他们的青春和精力被国家榨取，之后却还要忍受衰老和疾病的折磨，贫困潦倒。国家忘记了他们的劳动和贡献，给予他们的回报却是在贫困不堪

中离世。富人不仁，他们压榨劳动者，不仅私下耍花招，而且操纵立法侵吞其收入。劳动者贡献巨大但薪资微薄，这已非公平，可富人还强词夺理，制定法令，企图以正义之名行不义之事。

Therefore I must say that, as I hope for mercy, I can have no other notion of all the other governments that I see or know, than that they are a conspiracy of the rich, who on pretence of managing the public only pursue their private ends, and devise all the ways and arts they can find out; first, that they may, without danger, preserve all that they have so ill acquired, and then that they may engage the poor to toil and labor for them at as low rates as possible, and oppress them as much as they please. And if they can but prevail to get these contrivances established by the show of public authority, which is consider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whole people, then they are accounted laws. Yet these wicked men after they have, by a most insatiable covetousness, divided that among themselves with which all the rest might have been well supplied, are far from that happiness that is enjoyed among the Utopians: for the use as well as the desire of money being extinguished, much anxiety and great occasions of mischief is cut off with it. And who does not see that the frauds, thefts, robberies, quarrels, tumults, contentions, seditions, murders, treacheries, and witchcrafts, which are indeed rather punished than restrained by the severities of law, would all fall off, if money were not any more valued by the world? Men's fears, solicitudes, cares, labors, and watchings, would all perish in the same moment with the value of money: even poverty itself, for the relief of which money seems most necessary, would fall. But, in order to the apprehending this aright, take one instance.

因此，见识过各地各国之后，我断言这些不过是富人的阴谋，他们狼狈为奸，打着国家的名号，千方百计谋取私利。他们首先将自己所有依靠不法手段聚敛来的财富囤积起来，然后以及其低廉的报酬压榨劳动力。等到富人纷纷得到声称代表大众的政府当局的支持，将这些把戏规定下来的时候，这些把戏便摇身一变，成为了法律。然而，纵然这些无耻之徒玩尽手段，贪婪地瓜分了本可以供养全体民众的财富，他们还是远远享受不到乌托邦人的幸福。在乌托邦，用不到金钱，人们对它自然没有贪念，这就削减了多少烦恼和罪恶啊！谁不知道，一旦世人真的视金钱为粪土，那么欺骗、盗窃、抢劫、争吵、骚乱、喧闹、叛乱、暗杀、变节、巫术等等这些依靠严酷的法律只能事后惩罚不能真正打压的罪行就会销声匿迹。人们的恐惧、焦虑、烦恼、劳作和监视也会随着金钱的消失而立即无影无踪。并且，要想消除贫穷，金钱似乎必不可少，随着金钱的废除，贫穷也会瞬间消失不见。

Consider any year that has been so unfruitful that many thousands have died of hunger; and yet if at the end of that year a survey was made of the granaries of all the rich men that have hoarded up the corn, it would be found that there was enough among them to have prevented all that consumption of men that perished in misery; and that if it had been distributed among them, none would have felt the terrible effects of that scarcity; so easy a thing would it be to supply all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if that blessed thing called money, which is pretended to be invented for procuring them, was not really the only thing that obstructed their being procured!

试想，若有一年，庄稼歉收，数千人死于饥荒。若是在这荒年的年底清查富人的粮仓，我们定会发现那儿的存粮足够养活在饥荒中死去的人们，使他们免遭厄运。并且，若是能将这些粮食分发给民众，

歉收的影响也不会如此严重。都怪该死的金钱，它的发明宣称是为了给人们获得生活必需品提供便利，实际上却成了唯一的阻碍！

I do not doubt but rich men are sensible of this, and that they well know how much a greater happiness it is to want nothing necessary than to abound in many superfluities, and to be rescued out of so much misery than to abound with so much wealth; and I cannot think but the sense of every man's interest, added to the authority of Christ's commands, who as He was infinitely wise, knew what was best, and was not less good in discovering it to us, would have drawn all the world over to the laws of the Utopians, if pride, that plague of human nature, that source of so much misery, did not hinder it; for this vice does not measure happiness so much by its own conveniences as by the miseries of others; and would not be satisfied with being thought a goddess, if none were left that were miserable, over whom she might insult. Pride thinks its own happiness shines the brighter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misfortunes of other persons; that by displaying its own wealth, they may feel their poverty the more sensibly. This is that infernal serpent that creeps into the breasts of mortals, and possesses them too much to be easily drawn out; and therefore I am glad that the Utopians have fallen upon this for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I wish that all the world could be so wise as to imitate them; for they have indeed laid down such a scheme and foundation of policy, that as men live happily under it, so it is like to be of great continuance; for they having rooted out of the minds of their people all the seeds both of ambition and faction, there is no danger of any commotion at home; which alone has been the ruin of many States that seemed otherwise to be well secured; but as long as they live in peace at home, and are governed by such good laws, the envy of all their neighboring princes, who have often though in vain attempted their

ruin, will never be able to put their State into any commotion or disorder.

毫无疑问，富人也清楚这一点，他们深知衣食堆积如山哪里比得上无欲无求快活，腰缠万贯又怎么敌得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基督智慧无边，能够辨识什么是最佳的，并且不吝于启示我们。若不是我们的祸害之源——骄狂，人类天性的恶魔挡路，考虑到人类自身的利益，加上基督的启示，全世界早就实行乌托邦国家的法制了。骄狂的人们所据以衡量幸福的不是其自身的快乐，而是他人的痛苦。若没有了可以供他们欺凌嘲笑的可怜虫，就算被奉为神灵，他们也不会满意。骄狂之人认为，他们的快乐在别人悲惨遭遇的映衬下会更加光芒万丈；他们炫耀自己的财富，让穷人更加相形见绌。骄狂，这条来自地狱的毒蛇盘踞在凡人心间，植根之深竟难以轻易剔除。我庆幸乌托邦人建立起了这样的政体，巴不得全世界都来效仿他们，因为他们为政策锻造了如此健全的机制和稳固的基础，得以庇佑民众幸福安康地生活，因此也能实现持续不断的发展。在乌托邦，野心抱负和拉帮结派的种子已在人们心中根除，因此免去了祸起萧墙的危险。内乱似乎是摧毁众多国家的唯一原因，但是只要国内安定祥和，以健全的机制治理国家，纵使邻国的统治者心怀觊觎，频繁挑衅，也断不会使这样的国家出现暴动，一片混乱。

When Raphael had thus made an end of speaking, though many things occurred to me, both concerning the manners and laws of that people, that seemed very absurd, as well in their way of making war, as in their notions of religion and divine matters; together with several other particulars, but chiefly what seemed the foundation of all the rest, their living in common, without the use of money, by which all nobility, magnificence, splendor, and majesty, which,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opinion, are the true ornaments of a nation, would be quite taken away;—yet since I

perceived that Raphael was weary, and was not sure whether he could easily bear contradiction, remembering that he had taken notice of some who seemed to think they were bound in honor to support the credit of their own wisdom, by finding out something to censure in all other men's inventions, besides their own; I only commended their constitution, and the account he had given of it in general; and so taking him by the hand, carried him to supper, and told him I would find out some other time for examining this subject more particularly, and for discoursing more copiously upon it; and indeed I shall be glad to embrace an opportunity of doing it. In the meanwhile, though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he is both a very learned man, and a person who has obtained a great knowledge of the world, I cannot perfectly agree to everything he has related; however, 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Utopia that I rather wish, than hope, to see followed in our governments.

听拉斐尔讲完他的故事，我思绪良多。在我看来，乌托邦人的习俗和法律似乎十分荒谬，不论是他们的作战方式、宗教信仰、礼拜仪式，还是其他制度，主要是这一切的社会基础，即财产公有制，似乎都相当荒谬，完全无需金钱流通，这使得在一般人眼中一个国家引以为豪的高贵宏伟和威严壮丽荡然无存。——可是拉斐尔已露倦意，我又不敢确定是否他会乐意接受异见，犹记得他曾提及有些人为声名所累，为了彰显自己的智慧，对其他人的发明一律吹毛求疵，大放厥词。于是我只是夸赞了乌托邦的国家结构，赞同了他对于乌托邦的总体评价，然后便挽着他的手，一起去用晚餐，并且对他说，日后会找机会更加深入地考虑这一问题，并和他更加全面地探讨。但愿有朝一日可以促成此事啊！同时，尽管我必须承认，他学识渊博、世事通达，其之所言，我却难以完全苟同。然而，纵然希望渺茫，我还是期望乌托邦的诸多优秀的做法也能在我们的国家实现。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City of the Sun
太阳城

Tommaso Campanella
托马索·康柏内拉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太阳城

The City of the Sun

托马索·康柏内拉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The City of the Sun 太阳城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G.M. Prithee, now, tell me what happened to you during that voyage?

大头领： 现在，请您给我讲一讲您最近这次航海时的奇遇吧。

Capt. I have already told you how I wandered over the whole earth.

船长： 我已经告诉过您我是怎么周游全球的。

In the course of my journeying I came to Taprobane, and was compelled to go ashore at a place, where through fear of the inhabitants I remained in a wood.

在这次旅行中，我到了塔普罗班纳，而且不得不在那里找了个地方上岸，我因为害怕土著，就躲进了森林。

When I stepped out of this I found myself on a large plain immediately under the equator.

当我从森林中出来后，发现自己到了位于赤道上的一个广阔平原上。

G.M. And what befell you here?

大头领： 您在这里又发生了什么事？

Capt. I came upon a large crowd of men and armed women, many of whom did not understand our language, and they conducted me forthwith to the City of the Sun.

船长： 我碰到了一大群男人和佩带武器的女人，他们大多都不懂我们的语言。因此，他们就立刻领我到太阳城去。

G.M. Tell me after what plan this city is built and how it is governed.

大头领： 请讲一讲这个城是如何建立、如何治理吧。

Cap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ity is built upon a high hill, which rises from an extensive plain, but several of its circles extend for some distance beyond the base of the hill, which is of such a size that the diameter of the city is upward of two miles, so that its circumference becomes about seven.

船长： 太阳城大部分修建在这个广阔平原的一座高高的小山上；城市四周的部分区域延伸到了山脚之外，使得整个城市的直径差不多超过了两英里，周长则差不多达到了七英里。

On account of the humped shape of the mountain, however, the diameter of the city is really more than if it were built on a plain.

而且，由于整个城市坐落在整个山脊上，看上去似乎比这个平原还要大。

It is divided into seven rings or huge circles named from the seven planets, and the way from one to the other of these is by four streets and through four gates, that look toward the four points of the compass.

太阳城由七个广阔的环带，即七个同心圆的城区构成。城区以七大行星的名字命名。由一个城区到另一个城区，要通过四条街道，穿过各区东南西北所开的四座城门。

Furthermore, it is so built that if the first circle were stormed, it would of necessity entail a double amount of energy to storm the second; still more to storm the third; and in each succeeding case the strength and energy would have to be doubled; so that he who wishes to capture that city must, as it were, storm it seven times.

这样修建的优势在于，假如第一个城区被攻占，要以加倍的兵力才能攻占第二个，攻占第三个城区则要用上四倍的兵力。以此类推，每进攻到下一城区时，所用兵力势必要加倍。因此，无论是谁，要想攻占这个城池，就得进攻七次。

For my own part, however, I think that not even the first wall could be occupied, so thick are the earthworks and so well fortified is it with breastworks, towers, guns, and ditches.

然而，在我看来，由于它四周的围墙是那样厚实，还有那样多的护墙、塔楼、以石球为弹的大炮和沟壕来设防，即便是想占领第一个城区都是不可能的。

When I had been taken through the northern gate (which is shut with an iron door so wrought that it can be raised and let down, and locked in easily and strongly, its projections running into the grooves of the thick posts by a marvellous device), I saw a level space seventy paces [1_1] wide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walls.

在我从北门被带进去后（门是铁制的，由一种巧妙的装置操作，可以沿着城墙上的槽滑动而升降开合），我看到在第一道城墙至第二道城墙之间，留有宽约七十步 [2_1] 的空地。

From hence can be seen large palaces, all joined to the wall of the second circuit in such a manner as to appear all one palace.

从这里可以看到许多的宽敞房屋，都与第二个城区的城墙连接在一起，看上去好像是一座完整的大厦。

Arches run on a level with the middle height of the palaces, and are continued round the whole ring.

在与房屋中部相当的高度，围绕第二个城区城墙的是一圈互相连接起来的一些拱架。

There are galleries for promenading upon these arches, which are supported from beneath by thick and well-shaped columns, enclosing arcades like peristyles, or cloisters of an abbey.

拱架绕有可以散步的游廊，游廊下有华美的粗圆柱支持，像列柱廊或修道院拱廊一样围成一圈。

But the palaces have no entrances from below, except on the inner or concave partition, from which one enters directly to the lower parts of the building.

大厦下部没有入口，只能从内墙或即凹墙进入，然后直接到了整个建筑的底层。

The higher parts, however, are reached by flights of marble steps, which lead to galleries for promenading on the inside similar

to those on the outside.

而进入大厦大的高层需要通过大理石的阶梯，进入到内廊上与外廊相似的供散步用的游廊上。

From these one enters the higher rooms, which are very beautiful, and have windows on the concave and convex partitions.

通过这些阶梯，可以到达更高层的房间。这些房间非常华美，墙壁的凹凸之处都设有窗台。

These rooms are divided from one another by richly decorated walls.

这些房间由装饰华美的墙壁隔开。

The convex or outer wall of the ring is about eight spans thick; the concave, three; the intermediate walls are one, or perhaps one and a half.

凸墙，即外墙，厚八掌宽，而凹墙厚度不过三掌宽，内墙则薄至一至一个半掌。

Leaving this circle one gets to the second plain, which is nearly

three paces narrower than the first.

从这里可以通到比第一个过道约窄三步的、处在两墙之间的下一个过道。

Then the first wall of the second ring is seen adorned above and below with similar galleries for walking, and there is on the inside of it another interior wall enclosing palaces.

从这个过道可以看见第二个城区的第一堵城墙，其上下均建有可供行走的回廊；第二堵城墙修建在其内侧，将整个大厦包围起来。

It has also similar peristyles supported by columns in the lower part, but above are excellent pictures, round the ways into the upper houses.

第二堵墙下半部建有类似的圆柱予以支撑，而其上部则绘有美观的图画，一直通往上层的房屋。

And so on afterward through similar spaces and double walls, enclosing palaces, and adorned with galleries for walking, extending along their outer side, and supported by columns, till the last circuit is reached, the way being still over a level plain.

接下来，通过类似的空地、双层墙、被环绕的大厦（其内墙都围

绕着许多房屋并连接着向外支以圆柱的回廊），就可以从一个城区到达下一个城区，直至最后一个城区。路途走起来总是平坦的。

But when the two gates, that is to say, those of the outmost and the inmost walls, have been passed, one mounts by means of steps so formed that an ascent is scarcely discernible, since it proceeds in a slanting direction, and the steps succeed one another at almost imperceptible heights.

但是，在通过两道门后，也就是说，在经过最外侧的墙和和最外侧的墙后，就要爬台阶，不过台阶的坡度不大，高度也小，人走在上面几乎感觉不出来。

On the top of the hill is a rather spacious plain, and in the midst of this there rises a temple built with wondrous art.

山顶上有一个大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神殿，其建筑艺术非常惊人。

G.M. Tell on, I pray you!

大头领： 继续，请您继续！

Tell on!

继续！

I am dying to hear more.

我渴望知道更多的情况。

Capt. The temple is built in the form of a circle; it is not girt with walls, but stands upon thick columns, beautifully grouped.

船长： 这是一座圆形的神殿，四周没有围墙，而是修建在布局精巧的粗圆柱群上。

A very large dome, built with great care in the centre or pole, contains another small vault as it were rising out of it, and in this is a spiracle, which is right over the altar.

神殿顶上是惊人的技巧修建而成的巨型圆拱。在这个圆拱顶中央，即其最高点，又矗立着一个较小的圆顶，其下的敞口垂直对着地上的祭坛。

There is but one altar in the middle of the temple, and this is hedged round by columns.

在神殿的中央，有一个唯一的祭坛，周围圆柱环绕。

The temple itself is on a space of more than 350 paces.

神殿的周径为三百五十余步。

Without it, arches measuring about eight paces extend from the heads of the columns outward, whence other columns rise about three paces from the thick, strong, and erect wall.

在这之外，许多长约八步的拱从支持的圆柱顶上向外伸展，其他圆柱则从厚重、坚实、直立的墙上向上伸展了大约三步。

Between these and the former columns there are galleries for walking, with beautiful pavements, and in the recess of the wall, which is adorned with numerous large doors, there are immovable seats, placed as it were between the inside columns, supporting the temple.

在这两种圆柱之间，修建有供散步的游廊，并铺设有美观的过道。在城墙向内凹陷的地方修建了无数宽广的大门，在那里摆放着许多固定的长凳，仿佛摆放内柱之间，支持着神殿。

Portable chairs are not wanting, many and well adorned.

装饰美观的可移动椅子比比皆是。

Nothing is seen over the altar but a large globe, upon which the heavenly bodies are painted, and another globe upon which there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earth.

祭坛上，只看到一个巨大的球体，上面画着整个天体，在另一个球体上画着整个地球。

Furthermore, in the vault of the dome there can be discerned representations of all the stars of heaven from the first to the sixth magnitude, with their proper names and power to influence terrestrial things marked in three little verses for each.

此外，在主圆顶的拱顶壁上画着从第一至第六星等的星辰：每颗星的上面都有题诗三行，对它们的名字和它们对尘世各种现象所发生的力量进行了说明。

There are the poles and greater and lesser circles according to the right latitude of the place, but these are not perfect because there is no wall below.

神殿壁上也绘有对应相应维度的南北极以及大大小小的地理圈，但没有绘完，因为下面没有壁了。

They seem, too, to be made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globes on the altar.

这些地理圈似乎对应着祭坛上的球体。

The pavement of the temple is bright with precious stones.

神殿的地面镶嵌着宝石，闪闪发光。

Its seven golden lamps hang always burning, and these bear the names of the seven planets.

神殿中挂着永远点燃着的七盏金灯，这些灯以七颗行星为名。

At the top of the building several small and beautiful cells surround the small dome, and behind the level space above the bands or arches of the exterior and interior columns there are many cells, both small and large, where the priests and religious officers dwell to the number of forty-nine.

在神殿上面的小圆顶周围，筑有几间小巧美观的小房，而在内外圆柱支撑过道或拱架旁边，修建有许多大小不一的房子，供四十九名司祭和苦行者居住。

A revolving flag projects from the smaller dome, and this shows in what quarter the wind is.

在小圆屋顶上矗立着一个旋转的风向标，能指示出风向。

The flag is marked with figures up to thirty-six, and the priests know what sort of year the different kinds of winds bring and what will be the changes of weather on land and sea.

风向标上有多达三十六种的风向标记；祭司们就能判读不同的风带来什么样的年份，以及陆地和海洋都有什么样的变化。

Furthermore, under the flag a book is always kept written with letters of gold.

此外，在风向标的下面，存放着一本用金字写的记录卷。

G.M. I pray you, worthy hero, explain to me their whole system of government; for I am anxious to hear it.

大头领： 我请求您，了不起的英雄，请给我讲讲这个城的管理制度吧。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Capt. The great ruler among them is a priest whom they call by the name Hoh, though we should call him Metaphysic.

船长： 他们的最高统治者是一位司祭，他们称他为“太阳”，而用

我们的话则应该称他为“形而上学者”。

He is head over all, in temporal and spiritual matters, and all business and lawsuits are settled by him, as the supreme authority.

他是世俗和宗教界的首脑，作为最高权威，所有的问题和争端都要由他作最后的裁决。

Three princes of equal power — viz., Pon, Sin, and Mor — assist him, and these in our tongue we should call Power, Wisdom, and Love.

在他的下面，有三位权力相等的领导人辅佐他。他们分别是“篷”、“信”、“摩尔”，在我们的语言中，他们分别称为“威力”、“智慧”和“爱”。

To Power belongs the care of all matters relating to war and peace.

“威力”负责掌管与和平与战争相关的一切事务。

He attends to the military arts, and, next to Hoh, he is ruler in every affair of a warlike nature.

他致力于军事艺术，是战时的最高统帅，权力仅次于“太阳”。

He governs the military magistrates and the soldiers, and has the management of the munitions, the fortifications, the storming of places, the implements of war, the armories, the smiths and workmen connected with matters of this sort.

他领导军事官员和士兵，负责军需品的供应，防御工事的建设，抵御外来侵袭，发动战争，制造军械，管理与军事战争事务相关的工匠及其服务人员。

But Wisdom is the ruler of the liberal arts, of mechanics, of all sciences with their magistrates and doctors, and of the discipline of the schools.

“智慧”管理自由艺术部门、手工业部门和各个科学部门及其职员、科学家，也管理学校教育。

As many doctors as there are, are under his control.

职员不计其数，但都接受他的管理。

There is one doctor who is called Astrologus; a second, Cosmographus; a third, Arithmeticus; a fourth, Geometra; a fifth, Historiographus; a sixth, Poeta; a seventh, Logicus; an eighth,

Rhetor; a ninth, Grammaticus; a tenth, Medicus; an eleventh, Physiologus; a twelfth, Politicus; a thirteenth, Moralis.

这些职员有占星家、星源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诗人、逻辑学家、修辞学家、文法学家、医生、物理学家、政治家和道德学家。

They have but one book, which they call Wisdom, and in it all the sciences are written with conciseness and marvellous fluency of expression.

他们有一部名为《智慧》的书，扼要而流畅地记述了各门科学的常识。

This they read to the people after the custom of the Pythagoreans.

他们按毕达哥拉斯派的仪式，向人民宣讲这部书。

It is Wisdom who causes the exterior and interior, the higher and lower walls of the city to be adorned with the finest pictures, and to have all the sciences painted upon them in an admirable manner.

正是按照《智慧》的要求，他们在内外城墙的里里外外和上上下

下都悬挂上了华丽的图表，并按各科学之间的严整逻辑进行排列。

On the walls of the temple and on the dome, which is let down when the priest gives an address, lest the sounds of his voice, being scattered, should fly away from his audience, there are pictures of stars in their different magnitudes, with the powers and motions of each, expressed separately in three little verses.

在神殿的外墙以及为了使司祭讲道的声音不致分散能让听众听到而建造的穹顶上，画着各种大小不一的星辰，并在每颗星下题有三行诗，来说明它的力量和运行情况。

On the interior wall of the first circuit all the mathematical figures are conspicuously painted — figures more in number than Archimedes or Euclid discovered, marked symmetrically, and with the explanation of them neatly written and contained each in a little verse.

第一个城区的内墙上画着各种数学公式的图表，非常显眼——而且数量比昔日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德所发现的还要多，图表的大小比例非常匀称，而且在每个图表都有一首诗对其进行相应的说明。

There are definitions and propositions, etc.

还有一些定义和定理等。

On the exterior convex wall is first an immense drawing of the whole earth, given at one view.

在这道城墙外边的拐弯处，首先是一副全球的大地图，一目了然。

Following upon this, there are tablets setting forth for every separate country the custom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the laws, the origins and the power of the inhabitants; and the alphabets the different people use can be seen above that of the City of the Sun.

接下来，是各个单独地区的地图，对于这些地区的风俗、法律和习惯，以及居民的起源和他们的力量都有散文作简短的说明；在“太阳城”的字母表上，也画着所有不同地区所使用的字母表。

On the inside of the second circuit, that is to say of the second ring of buildings, paintings of all kinds of precious and common stones, of minerals and metals, are seen; and a little piece of the metal itself is also there with an apposite explanation in two small verses for each metal or stone.

在第二个城区的城墙里边，或者说在第二排建筑物的里边，可以看到各种普通的石头或宝石，以及各种矿产和金属的图画；同时，每一种金属或矿石都有一小块标本陈列在那里，下面用两行诗加以解说。

On the outside are marked all the seas, rivers, lakes, and streams which are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as are also the wines and the oils and the different liquids, with the sources from which the last are extracted, their qualities and strength.

在城墙的外边，画着海洋、河流，湖泊、泉水等存在于地球表面上的所有东西；也画着酒、油和各种液体的东西，并标明它们的产地、性质和特性。

There are also vessels built into the wall above the arches, and these are full of liquids from one to 300 years old, which cure all diseases.

在拱架上方的城墙里，修建有盛装液体的器皿，里面装满了保存了一百至三百年的液体，可以用来治各种疾病。

Hail and snow, storms and thunder, and whatever else takes place in the air, are represented with suitable figures and little verses.

墙上还画着雪、雹、雷电以及天空的各种现象，也都有相应的数字、诗句加以说明。

The inhabitants even have the art of representing in stone all the phenomena of the air, such as the wind, rain, thunder, the rainbow, etc.

人们甚至还拥有在石头上展现空中的所有现象，如风、雨、雷、彩虹等等的艺术能力。

On the interior of the third circuit all the different families of trees and herbs are depicted, and there is a live specimen of each plant in earthenware vessels placed upon the outer partition of the arches.

在第三个城区的城墙内侧上，画着各种花草树木；每一种植物都有一份标本，种植在瓦盆里，摆在城墙拱架向外突出的部分上。

With the specimens there are explanations as to where they were first found, what are their powers and natures, and resemblances to celestial things and to metals, to parts of the human body and to things in the sea, and also as to their uses in medicine, etc.

这些标本还标明了它们原来的产地，它们具有什么效力和性质，并对它们与天空的现象，与金属中、人体中以及海洋中发生的现象相类似进行了说明，并说明了它们在医药上的用途，等等。

On the exterior wall are all the races of fish found in rivers, lakes, and seas, and their habits and values, and ways of breeding, training, and living, the purposes for which they exist in the world, and their uses to man.

在这道城墙的外侧，还画着在江河湖海里生活的各种鱼类，每种鱼的习性和价值，如何繁殖、培养、饲养，以及它们对世界和对我们的用处都有说明。

Further, their resemblances to celestial and terrestrial things, produced both by nature and art, are so given that I was astonished when I saw a fish which was like a bishop, one like a chain, another like a garment, a fourth like a nail, a fifth like a star, and others like images of those things existing among us, the relation in each case being completely manifest.

此外，它们与天然的或人工制造的天上和地面上的各种东西的相似，都让我不禁大为惊奇。例如，我发现有主教鱼、链条鱼、铠甲鱼、钉子鱼、星星鱼，以及其他我们周围已有事务一模一样的图像。每一个这些对应事之间的联系都有完整的展示。

There are sea-urchins to be seen, and the purple shell-fish and mussels; and whatever the watery world possesses worthy of being known is there fully shown in marvellous characters of painting and drawing.

还可以看到各种海胆、蜗牛，牡蛎，等等。水生世界里一切值得研究的东西都有醒目的图形进行充分的展示、说明。

On the fourth interior wall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birds are painted, with their natures, sizes, customs, colors, manner of living, etc.; and the only real phoenix is possessed by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city.

在第四个城区的内墙上，画着各种鸟类，并标明它们的性质、大小、习性、颜色和生活方式等。太阳城居民还拥有唯一一只真正的凤凰。

On the exterior are shown all the races of creeping animals, serpents, dragons, and worms; the insects, the flies, gnats, beetles, etc., in their different states, strength, venoms, and uses, and a great deal more than you or I can think of.

在城墙的外边，画着各种爬行动物，蛇、龙、蠕虫；也画着各种昆虫，苍蝇、蚊子、牛虻和甲虫等。它们的特性各异，力量、毒性以及用途也得大相径庭。数量远超我们的想象。

On the fifth interior they have all the larger animals of the earth, as many in number as would astonish you.

第五个城区的城墙里边画着比较大型的地上动物，它们的种类多得惊人。

We indeed know not the thousandth part of them, for on the exterior wall also a great many of immense size are also portrayed.

我们所认识的，还不到其中的千分之一。它们的数目是这样多，

规模是这样大，以致不得不把它们画到墙外。

To be sure, of horses alone, how great a number of breeds there is and how beautiful are the forms there cleverly displayed!

单就马类来说，种类就如此之多，它们的形态被描画得如此美妙！

On the sixth interior are painted all the mechanical arts, with the several instruments for each and their manner of use among different nations.

第六个城区的城墙里边画着各种手工业及相应的工具，以及各国人民使用工具的情形。

Alongside, the dignity of such is placed, and their several inventors are named.

此外，相应的名人以及各种工具的发明者的肖像也都有呈现。

But on the exterior all the inventors in science, in warfare, and in law are represented.

而在墙外侧面上，则画着各类科学、武器的发明者以及某些立法

者。

There I saw Moses, Osiris, Jupiter, Mercury, Lycurgus, Pompilius, Pythagoras, Zamolxis, Solon, Charondas, Phoroneus, with very many others.

在那里，我看到了摩西、奥西里斯、丘必特、莫考莱、李库尔赫、庞皮利、毕达哥拉斯、扎莫尔克西、棱伦、卡隆达斯、甫洛纽斯及其他许多人的画像。

They even have Mahomet, whom nevertheless they hate as a false and sordid legislator.

他们甚至也画有穆罕默德的像，但是太阳城的人民看不起他，认为他是一个荒谬的和微不足道的立法者。

In the most dignified position I saw a representation of Jesus Christ and of the twelve Apostles, whom they consider very worthy and hold to be great.

在最值得尊崇的人物画像中，我看到了耶稣和十二使徒，太阳城的人民对其极为敬慕，并看作是伟人。

Of the representations of men, I perceived Caesar, Alexander, Pyrrhus, and Hannibal in the highest place; and other very

renowned heroes in peace and war, especially Roman heroes, were painted in lower positions, under the galleries.

在人物画像中，我看到凯撒、亚历山大、皮洛士、汉尼拔等画在高位上，其他一些在战争中和从事和平事业的杰出人物的画像，尤其是古罗马人，画在墙的下部、柱廊下面。

And when I asked with astonishment whence they had obtained our history, they told me that among them there was a knowledge of all languages, and that by perseverance they continually send explorers and ambassadors over the whole earth, who learn thoroughly the customs, forces, rule and histories of the nations, bad and good alike.

当时，我很惊奇地问，他们是从何处了解到我们的历史？我被告知，原来他们精通各种语言知识，他们经常派出自己的探索员和使者到世界各国，去了全面解各国的风俗习惯、实力、政治制度和历史，无论这些东西是好是坏。

These they apply all to their own republic, and with this they are well pleased.

他们把这些应用到自己的国家，并且对所有这一切特别满意。

I learned that cannon and typography were invented by the Chinese before we knew of them.

我也了解到，原来中国人早在我们以前就发明了以石球为弹的大炮和印刷术。

There are magistrates who announce the meaning of the pictures, and boys are accustomed to learn all the sciences, without toil and as if for pleasure; but in the way of history only until they are ten years old.

太阳城有许多教师负责讲授这些绘画的意义。因此，儿童们在十岁前就能毫不费力地掌握各种科学的基本知识，似乎还很愉悦。

Love is foremost in attending to the charge of the race.

“爱”首先掌管有关生育的事务。

He sees that men and women are so joined together, that they bring forth the best offspring.

他监督两性的结合，以便使后代成为最优秀的人物。

Indeed, they laugh at us who exhibit a studious care for our breed of horses and dogs, but neglect the breeding of human beings.

事实上，他们嘲笑我们对于马种和犬种的改良特别重视，而对于人种的改良却不重视。

Thus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ldren is under his rule.

他也管理对儿童的教育。

So also is the medicine that is sold, the sowing and collecting of fruits of the earth and of trees, agriculture, pasturage,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months, the cooking arrangements, and whatever has any reference to food, clothing, and the intercourse of the sexes.

医疗制药、播种、收割庄稼和收获水果、农业、畜牧业、时令、伙食等，以及任何关于衣、食以及性关系的工作，都由“爱”来掌管。

Love himself is ruler, but there are many male and female magistrates dedicated to these arts.

“爱”自己掌管一切，但许多男女教师致力于这一切工作。

Metaphysic, then, with these three rulers, manages all the above-named matters, and even by himself alone nothing is done; all business is discharged by the four together, but in whatever Metaphysic inclines to the rest are sure to agree.

有了这三位领导者，“形而上学者”主持太阳城的一切工作。一切工作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就能决定的。他们的共和国的一切事务，都要由这四个人来讨论，但“形而上学者”的意见，其余三人必须遵从。

G.M. Tell me, please, of the magistrates, their services and duties, of the education and mode of living, whether the government is a monarchy, a republic, or an aristocracy.

大头领： 请您讲一讲这个国家有哪些公职？居民的义务、教育，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个国家是君主政体，共和政体还是贵族政体？

Capt. This race of men came there from India, flying from the sword of the Magi, a race of plunderers and tyrants who laid waste their country, and they determined to lead a philosophic life in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船长： 这个民族来自印度，他们是在祖国遭受美吉人（一群掠夺者和暴徒）的破坏后逃出来的，因此他们决定过一种理性的公社生活。

Although the community of wives is not instituted among the other inhabitants of their province, among them it is in use after this manner:

虽然生活在他们这个地区的其他居民中并未规定公妻制度，但太阳城的居民却在一切公有的基础上采用这种制度。

All things are common with them, and their dispensation is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magistrates.

一切产品和财富都是大家属于大家共有，且由公职人员来进行分配。

Arts and honors and pleasures are common, and are held in such a manner that no one can appropriate anything to himself.

因为所有人都拥有知识和荣誉，过着的幸福生活，所以谁也不会把任何东西攫为己有。

They say that all private property is acquired and improved for the reason that each one of us by himself has his own home and wife and children.

他们认为，财产私有制之所以能形成和保持下来，是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住房，自己的妻子和儿女。

From this, self-love springs.

自私自利便由此产生。

For when we raise a son to riches and dignities, and leave an heir to much wealth, we become either ready to grasp at the property of the State, if in any case fear sh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power which belongs to riches and rank; or avaricious, crafty, and hypocritical, if anyone is of slender purse, little strength, and mean ancestry.

因为当我们都想使自己的儿子得到财富和地位，都想把大批的遗产留给自己的后代；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为了想成为富人或显贵，总是不顾一切地掠夺国家的财产；而在他还没有势力和财产的时候，还没有成为显贵的时候，都是吝啬鬼、叛徒和伪君子。

But when we have taken away self-love, there remains only love for the State.

但是，如果我们能摆脱自私自利，我们就会热爱公社了。

G.M.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no one will be willing to labor, while he expects others to work, on the fruit of whose labors he can live, as Aristotle argues against Plato.

大头领： 在这种情形下，就没有人愿意劳动了，每个人都期待着其他人去劳动，想靠别人的劳动成果来生活，就如同亚里士多德曾反驳过柏拉图的那样。

Capt. I do not know how to deal with that argument, but I declare to you that they burn with so great a love for their fatherland, as I could scarcely have believed possible; and indeed with much more than the histories tell us belonged to the Romans, who fell willingly for their country, inasmuch as they have to a greater extent surrendered their private property.

船长： 我不知道该怎么与您争辩，但我可以使您深信的是，他们令人难以想象地热爱自己的国家，这一点我几乎认为不可能，而且比我们从历史上所知的罗马人甘愿为祖国牺牲生命更为热烈，因此而放弃了自己的私有财产。

I think truly that the friars and monks and clergy of our country, if they were not weakened by love for their kindred and friends or by the ambition to rise to higher dignities, would be less fond of property, and more imbued with a spirit of charity toward all, as it was in the time of the apostles, and is now in a great many cases.

我深信，如果我们的法师、僧侣和教士不溺于对亲人和朋友的私爱，不一门心思想要获得更大的权势，就会不那么喜欢财产，将更乐善好施面向所有人。这正如耶稣门徒时代，现在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G.M. St. Augustine may say that, but I say that among this race of men, friendship is worth nothing, since they have not the chance of conferring mutual benefits on one another.

大头领： 圣奥古斯丁好像这么说过的，但是我认为，既然在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互助关系，那么在这种人之间就不会有什么友谊了。

Capt. Nay, indeed. For it is worth the trouble to see that no one can receive gifts from another.

船长： 事实上，不。确保相互之间不收受礼物是值得的。

Whatever is necessary they have, they receive it from the community, and the magistrate takes care that no one receives more than he deserves.

对于必需品而言，他们可以从公社领取，有公职人员监督确保不会有人多领取。

Yet nothing necessary is denied to anyone.

而不需要的东西任何人都无法获得。

Friendship is recognized among them in war, in infirmity, in the art contests, by which means they aid one another mutually by teaching.

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在战场上、病患中、技艺比赛中建立起来的，

他们相互帮助、相互学习。

Sometimes they improve themselves mutually with praises, with conversation, with actions, and out of the things they need.

有时，他们通过相互肯定、对话、行动来提升自我，从他们所需之物中成长。

All those of the same age call one another brothers.

一切同岁的人彼此称为兄弟。

They call all over twenty-two years of age, fathers; those that are less than twenty-two are named sons.

他们称二十二岁以上的人为父亲，二十二岁以下的人为儿子。

Moreover, the magistrates govern well, so that no one in the fraternity can do injury to another.

此外，有公职人员周密的管理，在这个集体中谁也不能欺负别人。

G.M. And how?

大头领： 他们怎么管理？

Capt. As many names of virtues as there are among us, so many magistrates there are among them.

船长： 太阳城的公职职务如此之多，正如我们所有的美德的名目一样多。

There is a magistrate who is named Magnanimity, another Fortitude, a third Chastity, a fourth Liberality, a fifth Criminal and Civil Justice, a sixth Comfort, a seventh Truth, an eighth Kindness, a tenth Gratitude, an eleventh Cheerfulness, a twelfth Exercise, a thirteenth Sobriety, etc.

每种职务都附有一种美德的名称，如宽大、勇敢、纯洁、慷慨、刑事的公正裁判、民事的公正裁判、热心、诚实、慈善、殷勤、朝气、节制、清醒等等。

They are elected to duties of that kind, each one to that duty for excellence in which he is known from boyhood to be most suitable.

凡是从童年起在学校中被公认为最适合于担任某种职务的人，后

来就挑选他担任类似的职务。

Wherefore among them neither robbery nor clever murders, nor lewdness, incest, adultery, or other crimes of which we accuse one another, can be found.

在他们中间，不会碰到抢劫、杀人、猥亵、乱伦和通奸，以及我们的人民常犯的其他罪行。

They accuse themselves of ingratitude and malignity when anyone denies a lawful satisfaction to another of indolence, of sadness, of anger, of scurrility, of slander, and of lying, which curseful thing they thoroughly hate.

他们对于忘恩负义、仇恨、彼此不尊重、懒惰、沮丧、狂暴、粗鄙行为、毁谤和撒谎都非常憎恨，并加以谴责。

Accused persons undergoing punishment are deprived of the common table, and other honors, until the judge thinks that they agree with their correction.

被告在接受处罚期间，被剥夺了常见的表和其他的荣誉，直到法官认为他们已经改正。

G.M. Tell me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magistrates are chosen.

大头领： 请给我讲一讲他们怎样选举负责人员。

Capt. You would not rightly understand this, unless you first learned their manner of living.

船长： 为了使您能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必须先介绍一下他们的生活方式。

That you may know, then, men and women wear the same kind of garment, suited for war.

首先，您必须知道的是，他们的服装几乎是男女一样，适于战斗。

The women wear the toga below the knee, but the men above; and both sexes are instructed in all the arts together.

女子的长袍长到了膝盖以下，而男子的长袍，为了便于作战，所以只到膝盖上方。无论男女，都在一起共同学习训练。

When this has been done as a start, and before their third year, the boys learn the language and the alphabet on the walls by walking round them.

太阳城的人在三岁前就在房屋墙壁的周围游玩时，就学会了语言和墙上的字母。

They have four leaders, and four elders, the first to direct them, the second to teach them, and these are men approved beyond all others.

他们有四位领导、四位老人，分别负责管理和教导他们。这些负责管理和教导的人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After some time they exercise themselves with gymnastics, running, quoits, and other games, by means of which all their muscles are strengthened alike.

稍大以后，他们就开始通过体操、跑步、掷铁饼和其他游戏，来均衡锻炼发展四肢。

Their feet are always bare, and so are their heads as far as the seventh ring.

在七个城区内，他们经常光着头、赤着脚行走。

Afterward they lead them to the offices of the trades, such as shoemaking, cooking, metal-working, carpentry, painting, etc.

再往后，他们被送到一些作坊去学着当鞋匠、厨师、铁匠、木匠和画师，等等。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bent of the genius of each one, after their seventh year, when they have already gone through the mathematics on the walls, they take them to the readings of all the sciences; there are four lectures at each reading, and in the course of four hours the four in their order explain everything.

为了挖掘每个人的天分所在，在他们七岁之后，在他们根据墙上的字画学完初等数学以后，就让他们去听各门自然科学的课。每门课程以四个小时为限，由有四位讲师轮流教授。

For some take physical exercise or busy themselves with public services or functions, others apply themselves to reading.

一部分人在进行体育锻炼或履行公职时，另外一部分人则专心地听课。

Leaving these studies all are devoted to the more abstruse subjects, to mathematics, to medicine, and to other sciences.

在这之后，所有人都开始研究比较抽象的学科：数学、医学和其他学术。

There are continual debate and studied argument among them, and after a time they become magistrates of those sciences or mechanical arts in which they are the most proficient; for everyone follows the opinion of his leader and judge, and goes out to the plains to the works of the field, and for the purpose of becoming acquainted with the pasturage of the dumb animals.

他们经常举行热烈的讨论或辩论，而之后他们将根据自己的专长在相应科学或手工业部门中获得职务。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首领式的领导人指导工作，有时也被派到田野和畜牧场去观察和学习农业和畜牧业。

And they consider him the more noble and renowned who has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the most arts and knows how to practise them wisely.

凡是精通技艺和手艺的人，凡是能很熟练地应用它们的人就会最受人重视和尊敬。

Wherefore they laugh at us in that we consider our workmen ignoble, and hold those to be noble who have mastered no pursuit, but live in ease and are so many slaves given over to their own pleasure and lasciviousness; and thus, as it were, from a school of vices so many idle and wicked fellows go forth for the ruin of the State.

所以，他们嘲笑我们鄙视工匠，嘲笑我们去尊崇那些没有追求、

游手好闲、役使大批奴仆过寄生和腐化生活的人。结果，这样的社会就好像一所培养罪恶的学校，培养出如此多懒汉和恶棍，以致使国家濒于灭亡。

The rest of the officials, however, are chosen by the four chiefs, Hoh, Pon, Sin and Mor, and by the teachers of that art over which they are fit to preside.

其他的负责人员由四个主要统治者，即“太阳”、“威力”、“智慧”和“爱”，以及主管相应科学、部门的领导人选拔。

And these teachers know well who is most suited for rule.

因为他们很了解谁最适合做领导。

Certain men are proposed by the magistrates in council, they themselves not seeking to become candidates, and he opposes who knows anything against those brought forward for election, or, if not, speaks in favor of them.

议事会中的公职人员负责向大会提名候选人，但他们本身不能成为候选人；在议事会上，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对某位人选表示赞成或反对。

But no one attains to the dignity of Hoh except him who knows

the histories of the nations, and their customs and sacrifices and laws, and their form of government, whether a republic or a monarchy.

但是，要获得“太阳”称号的人，一定要熟悉各民族的历史，他们的一切风俗、宗教礼仪和法律，要熟悉各个国家的治理情况，无论其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

He must also know the names of the lawgivers and the inventors in science, and the law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earth and the heavenly bodies.

他必须要熟知立法者、科学发明家，熟悉法律，以及地球和天体的历史。

They think it also necessary that he should understand all the mechanical arts, the physical sciences, astrology and mathematics.

人们认为，“太阳”也必须了解各种手工业、物理学、占星学和数学。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overwork themselves, but frequent practice and the paintings render learning easy to them.

他们不允许过度劳累自己，经常的锻炼和绘画使得他们的学习更

加轻松。

Not too much care is given to the cultivation of languages, as they have a goodly number of interpreters who are grammarians in the State.

对于各种语言的学习掌握倒并不怎么重要，因为他们有大量各种语言的译员。

But beyond everything else it is necessary that Hoh should understand metaphysics and theology; that he should know thoroughly the derivations, foundations, and demonstrations of all the arts and sciences; the likeness and difference of things; necessity, fate, and the harmonies of the universe; power, wisdom, and the love of things and of God; the stages of life and its symbols; everything relating to the heavens, the earth, and the sea; and the ideas of God, as much as mortal man can know of him.

在所有事物当中，“太阳”必须要懂得形而上学、神学，以及各种艺术和科学的起源、原理和论证，万物的同异关系、世界的必然性、命运和和谐，万物和神的威力、智慧和爱，以及存在物的等级、符号，所有与天、地和海以及神意有关且凡人也能了解的的事物。

He must also be well read in the prophets and in astrology.

他还必须熟读先知的书和占星术。

And thus they know long beforehand who will be Hoh.

因此，人们早就知道，谁能成为“太阳”。

He is not chosen to so great a dignity unless he has attained his thirty-fifth year.

任何人，如果未满三十五岁，是不能获得这个称号的。

And this office is perpetual, because it is not known who may be too wise for it or who too skilled in ruling.

这个职位是终身的，除非是发现另一个比自己的先驱者更贤明、更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才会更换。

G.M. Who indeed can be so wise? If even anyone has a knowledge of the sciences it seems that he must be unskilled in ruling.

大头领： 谁会如此明智博学？对科学熟知的人未必就善于管理国家。

Capt. This very question I asked them and they replied thus:

船长：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们。他们是这样回答我的：

“We, indeed, are more certain that such a very learned man has the knowledge of governing, than you who place ignorant persons in authority, and consider them suitable merely because they have sprung from rulers or have been chosen by a powerful faction.

“的确，我们比你们更清楚地知道，这样有学问的人，一定能英明地管理国家；而您们却给那些无知的人以权力，仅仅是因为他们出身于统治阶级或者由统治集团选拔出来，就认为他们是合适的人选。

But our Hoh, a man really the most capable to rule, is for all that never cruel nor wicked, nor a tyrant, inasmuch as he possesses so much wisdom.

而我们的“太阳“是管理国家能力最强的人，他是如此贤明，不会是残酷、邪恶的人，也不会成为暴君。

This, moreover, is not unknown to you, that the same argument cannot apply among you, when you consider that man the most learned who knows most of grammar, or logic, or of Aristotle or any other author.

而且，您们也很清楚，这一点在您们当中是不适用的，即您们把那些精通文法、逻辑、亚里士多德或其他某个作者人认为是最有学识

的人。

For such knowledge as this of yours much servile labor and memory work are required, so that a man is rendered unskilful, since he has contemplated nothing but the words of books and has given his mind with useless result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dead signs of things.

您们推崇的这种学识需要的只是下苦功、死记硬背，他们对于书本之外的事不作任何思考，只是去读死书。

Hence he knows not in what way God rules the universe, nor the ways and customs of nature and the nations.

这种人既不懂得上帝如何统治万物，也不了解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自然界的规律。

Wherefore he is not equal to our Hoh.

他们没法和我们的“太阳”相提并论。

For that one cannot know so many arts and sciences thoroughly, who is not esteemed for skilled ingenuity, very apt at all things, and therefore at ruling especially.

要知道，一个人是不可能掌握如多的艺术和科学，也不可能成为特殊的万能者，聪敏于万事万物却还能独擅国家治理。

This also is plain to us that he who knows only one science, does not really know either that or the others, and he who is suited for only one science and has gathered his knowledge from books, is unlearned and unskilled.

我们也很清楚，只研究某一门科学的人，也并不能完全掌握这门科学，更不能掌握其他的科学。只能从书本上研究某种科学的人，都是一些外行和学究。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intellects prompt and expert in every branch of knowledge and suitable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natural objects, as it is necessary that our Hoh should be.

但对于能随机应变、有才智的人，以及具体知识门类的专家却不是这样，对于了解自然事物也是如此。我们的‘太阳’必须是而且也应当是这样的人。

Besides in our State the sciences are taught with a facility (as you have seen) by which more scholars are turned out by us in one year than by you in ten, or even fifteen.

此外，在我们国家，科学教育有专门的队伍来负责（这一点您也见到了），我们在一年内培养出来的学者，比您们在十年、甚至十五

年内所培养的还要多。

Make trial, I pray you, of these boys.”

关于这一点，请您考一考我们的儿童吧！“

In this matter I was struck with astonishment at their truthful discourse and at the trial of their boys, who did not understand my language well.

我对几个不是很懂我国语言的孩子进行了测试，证明了他们的这种说法是对的，这使我非常惊异。

Indeed it is necessary that three of them should be skilled in our tongue, three in Arabic, three in Polish, and three in each of the other languages, and no recreation is allowed them unless they become more learned.

事实上，他们当中每三个孩子，必须懂我国的语言，或者懂阿拉伯语，或者懂波兰语，或者懂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还尽量利用其他休息时间去求取更多的知识。

For that they go out to the plain for the sake of running about and hurling arrows and lances, and of firing harquebuses, and for the sake of hunting the wild animals and getting a knowledge of

plants and stones, and agriculture and pasturage; sometimes the band of boys does one thing, sometimes another.

为此，他们到野外去练习赛跑、射击、掷标枪、用前膛火枪打靶、猎捕野兽、辨识草木和各种石头等，以及学习农业和畜牧业相关知识。他们分队轮流学习。

They do not consider it necessary that the three rulers assisting Hoh should know other than the arts having reference to their rule, and so they have only a historical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ch are common to all.

太阳城的人们认为，协助“太阳”的三位统治者应当研究的只是属于他们管理范围内的科学，因此他们只学习各门学科的历史知识，这也是大家都要学习的内容。

But their own they know well, to which certainly one is dedicated more than another.

但是，他们精通各自专门领域的科学，这一点他们必须比其他任何人更精通。

Thus Power is the most learned in the equestrian art, in marshalling the army, in the marking out of camps, in the manufacture of every kind of weapon and of warlike machines, in planning stratagems, and in every affair of a military nature.

例如，“威力”就必须精通骑术、建军、安营扎寨、各种武器和军械的制造，必须精通军事策略以及每一项与军事相关的事务。

And for these reasons, they consider it necessary that these chiefs should have been philosophers, historians, politicians, and physicists.

鉴于以上原因，太阳城的人民认为这些统治者还必须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物理学家。

Concerning the other two triumvirs, understand remarks similar to those I have made about Power.

考虑到其他两位执政官，就能理解我对“威力”的类似评价了。

G.M. I really wish that you would recount all their public duties, and w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them, and also that you would tell clearly how they are all taught in common.

大头领： 我想请您详细地讲一讲他们的各种设施并进行区分，同时也讲一讲他们的社会教育。

Capt. They have dwellings in common and dormitories, and couches and other necessaries.

船长： 他们有公共的房屋、宿舍、床铺和其他一切必需品。

But at the end of every six months they are separated by the masters.

而每隔六个月，他们都会由主管人员安排每个人的居室。

Some shall sleep in this ring, some in another; some in the first apartment, and some in the second; and these apartments are marked by means of the alphabet on the lintel.

一部分人谁住第一城区，一部分住第二城区；一部分住第一宿舍，一部分人住第二宿舍，每个宿舍的门楣上贴有字母。

There are occupations, mechanical and theoretical, common to both men and women, with this difference, that the occupations which require more hard work, and walking a long distance, are practised by men, such as ploughing, sowing, gathering the fruits, working at the threshing-floor, and perchance at the vintage.

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体力劳作，都不分性别，男女一视同仁；所不同的是，那些更辛苦、需要长途跋涉的工作，如耕耘、播种、收获、打谷、采葡萄等均由男性负责。

But it is customary to choose women for milking the cows and for making cheese.

而挤奶和制干酪的工作通常由女性承担。

In like manner, they go to the gardens near to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both for collecting the plants and for cultivating them.

同样，她们也在近郊区从事割草和园艺工作。

In fact, all sedentary and stationary pursuits are practised by the women, such as weaving, spinning, sewing, cutting the hair, shaving, dispensing medicines, and making all kinds of garments.

事实上，妇女从事各种需要久坐不动的劳动，如纺织、缫丝、缝纫、理发、修面、制药和缝制各种衣着。

They are, however, excluded from working in wood and the manufacture of arms.

而木匠、铁匠和制造武器等工作，妇女则被排除在外。

If a woman is fit to paint, she is not prevented from doing so; nevertheless, music is given over to the women alone, because they

please the more, and of a truth to boys also.

如果她们有绘画的才能，她们也可以从事绘画。至于音乐演奏，那只是妇女的工作，因为她们演奏起来能令人悦耳，而且儿童也可以参与这项各自。

But the women have not the practise of the drum and the horn.

但是，妇女都不吹喇叭和打鼓。

And they prepare their feasts and arrange the tables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做饭和准备餐桌吃饭等由她们按如下方式进行。

It is the peculiar work of the boys and girls under twenty to wait at the tables.

进餐时的服务工作，专则由二十岁以下的青年男女担任。

In every ring there are suitable kitchens, barns, and stores of utensils for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over every department an old man and an old woman preside.

太阳城的每个城区内都有自己的厨房、商店和贮藏用具、食物和饮料贮藏室。每一栋宿舍都有一位老人和一位老妇人负责掌管。

These two have at once the command of those who serve, and the power of chastising, or causing to be chastised, those who are negligent or disobedient; and they also examine and mark each one, both male and female, who excels in his or her duties.

两位老人对服务人员有直接的管理权，他们有权惩罚或命令惩罚玩忽职守和不听话的人；同时，他们负责检查、嘉奖那些履行义务比别人出色的男女青年。

All the young people wait upon the older ones who have passed the age of forty, and in the evening when they go to sleep the master and mistress command that those should be sent to work in the morning, upon whom in succession the duty falls, one or two to separate apartments.

所有年轻人要服侍四十岁以上的人。在晚上，在快要睡觉时，都有两位男女领导人安排第二天早上出去工作的人员及相应的工作安排，并安排他们轮流为每间宿舍服务。

The young people, however, wait upon one another, and that alas! with some unwillingness.

青年人都以彼此互助为己任，如果逃避自己的职责，必将自讨没

趣。

They have first and second tables, and on both sides there are seats.

食堂的餐桌摆成两排，每张桌子的旁边都排列着两行座位。

On one side sit the women, on the other the men; and as in the refectories of the monks, there is no noise.

一行是男人的，一行是妇女的，大家保持肃静，鸦雀无声，如修道院的食堂一样。

While they are eating a young man reads a book from a platform, intoning distinctly and sonorously, and often the magistrates question them upon the mo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reading.

用餐时，有一个青年人站在高处拖长声音清晰而响亮地念圣书，通常会有负责人就其中某些重要部分拷问大家。

And truly it is pleasant to observe in what manner these young people, so beautiful and clothed in garments so suitable, attend to them, and to see at the same time so many friends, brothers, sons, fathers, and mothers all in their turn living together with so much

honesty, propriety, and love.

一些穿得很漂亮的青年人敏捷地侍候人们用餐，看起来真是一幕非常动人的景象；他们是那样有礼貌，仪表优雅和亲切，朋友、兄弟、儿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

So each one is given a napkin, a plate, fish, and a dish of food.

每人都有一块餐巾、一个盘子，分得一条鱼和一碗饭。

It is the duty of the medical officers to tell the cooks what repasts shall be prepared on each day, and what food for the old, what for the young, and what for the sick.

由医生负责掌握每日的菜单，吩咐厨师给老人、青年人和病人做各种不同的膳食。

The magistrates receive the full-grown and fatter portion, and they from their share always distribute something to the boys at the table who have shown themselves more studious in the morning at the lectures and debates concerning wisdom and arms.

公职人员的膳食比较丰厚，但他们常常把自己的一部分膳食分给那些每天早上非常积极地参加学习、学术性座谈会和军事学习的儿童。

And this is held to be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honors.

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最大的光荣。

For six days they ordain to sing with music at table.

连续六天，他们用膳时都要欢唱。

Only a few, however, sing; or there is one voice accompanying the lute and one for each other instrument.

由几位或某一位歌手在诗琴等乐器的伴奏下歌唱。

And when all alike in service join their hands, nothing is found to be wanting.

由于每个人都热情地服务，所以保证了一切工作总是尽善尽美。

The old men placed at the head of the cooking business and of the refectories of the servants praise the cleanliness of the streets, the houses, the vessels, the garments, the workshops, and the warehouses.

由受人尊敬的中年以上的人监督厨师和食堂的工作，并仔细检查床铺、房屋、器皿、衣着、工作间和仓库的清洁工作。

They wear white under-garments to which adheres a covering, which is at once coat and legging, without wrinkles.

太阳城的人民穿白色衬衫，衬衫上面罩着一件连裤的无袖衣服。

The borders of the fastenings are furnished with globular buttons, extended round and caught up here and there by chains.

这种衣服从肩部到外胫和从脐部到两腿之间的后部开缝，每排缝都扣着一排扣钮。

The coverings of the legs descend to the shoes and are continued even to the heels.

腿部的覆盖物下降到这双鞋，并将继续甚至到脚跟。

Then they cover the feet with large socks, or, as it were, half-buskins fastened by buckles, over which they wear a half-boot, and besides, as I have already said, they are clothed with a toga.

他们脚穿大袜子，外穿半高筒靴，或者是带扣的半高统靴，身披

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长袍。

And so aptly fitting are the garments, that when the toga is destroyed,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hole body are straightway discerned, no part being concealed.

当他们脱下斗篷后，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连裤无袖的衣服多么合身，身体各部位一览无余。

They change their clothes for different ones four times in the year, that is when the sun enters respectively the constellations Aries, Cancer, Libra, and Capricorn, and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and necessity as decided by the officer of health.

他们在一年中要换四次衣服，就是在太阳进入白羊宫、巨蟹宫、天秤宫、磨羯宫的标志的时候；由医生和各个城区的衣着保管人根据需要的情况来分配衣着。

The keepers of clothes for the different rings are wont to distribute them, and it is marvellous that they have at the same time as many garments as there is need for, some heavy and some slight, according to the weather.

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各个季节所需要的衣着，无论数量多少或厚薄如何，都能准时供应。

They all use white clothing, and this is washed in each month with lye or soap, as are also the workshops of the lower trades, the kitchens, the pantries the barns, the store-houses, the armories, the refectories, and the baths.

他们穿的衣服是白色的，每月用强碱液或肥皂洗一次。建筑物的下层是作坊、厨房、贮藏室、仓库、军械库、食堂和澡堂。

Moreover, the clothes are washed at the pillars of the peristyles, and the water is brought down by means of canals which are continued as sewers.

不过，他们是在走廊的圆柱旁边洗衣物，脏水经过下水道流入沟里。

In every street of the different rings there are suitable fountains, which send forth their water by means of canals, the water being drawn up from nearly the bottom of the mountain by the sole movement of a cleverly contrived handle.

在每个城区的街头都有喷水池，用一种装有很巧妙的水阀的装置把水通过管子从山里引来。

There is water in fountains and in cisterns, whither the rain-water collected from the roofs of the houses is brought through pipes full of sand.

他们也使用蓄水池的水，这种水是从屋顶上流下来后通过用沙土做的导水管流入蓄水池的雨水。

They wash their bodies often, according as the doctor and master command.

他们经常根据医生和领导人的指示沐浴。

All the mechanical arts are practised under the peristyles, but the speculative are carried on above in the walking galleries and ramparts where are the more splendid paintings, but the more sacred ones are taught in the temple.

他们在柱廊的下层研究各种手工业，在挂着相应的图表的阳台和回廊的上层研究抽象的科学；而神学是要在神殿中研究的。

In the halls and wings of the rings there are solar time-pieces and bells, and hands by which the hours and seasons are marked off.

在房屋的进口处和城墙的雉堞下装置着指示时间和风向的日晷和风向仪。

G.M. Tell me about their children.

大头领： 请您讲讲关于生育的情况。

Capt. When their women have brought forth children, they suckle and rear them in temples set apart for all.

船长： 妇女在分娩以后，她们就在一所特设的公共大厦里休养并照料婴儿。

They give milk for two years or more as the physician orders.

她们的哺乳期为两年，但可以根据医师的指示加以延长。

After that time the weaned child is given into the charge of the mistresses, if it is a female, and to the masters, if it is a male.

在这之后，断乳的小孩便按性别交给男首长或女首长抚育。

And then with other young children they are pleasantly instructed in the alphabet, and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pictures, and in running, walking, and wrestling; also in the historical drawings, and in languages; and they are adorned with a suitable garment of different colors.

于是，这些孩子就和其他儿童一起轻松地学习字母、看图、赛跑、行走和角力；并根据画图认识历史和各种语言，而且他们身着颜色各异的衣服。

After their sixth year they are taught natural science, and then the mechanical sciences.

到了七岁就开始学习自然科学，然后学习其他的科学。

The men who are weak in intellect are sent to farms, and when they have become more proficient some of them are received into the State.

天分比较差的儿童被送到乡下去，待其知识智能又更大发展后，又可以接回城市。

And those of the same age and born under the same constellation are especially like one another in strength and in appearance, and hence arises much lasting concord in the State, these men honoring one another with mutual love and help.

同一个时日、同一个星座出生的儿童，其天分、面貌大多数相似；因此，他们总是互助互爱，而使这个国家呈现一片和谐的景象。

Names are given to them by Metaphysicus, and that not by

chance, but designedly, and according to each one's peculiarity, as was the custom among the ancient Romans.

太阳城人民的名字并不是随便取的，而是由形而上学者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来命名的，这一点和古罗马人的习惯一样。

Wherefore one is called Beautiful (Pulcher), another the Big-nosed (Naso), another the Fat-legged (Cranipes), another Crooked (Torvus), another Lean (Macer), and so on.

因此，有的叫“美男子”，有的叫“大鼻子”，有的叫“粗腿”，有的叫“猛人”，有的又叫“坏蛋”，等等。

But when they have become very skilled in their professions and done any great deed in war or in time of peace, a cognomen from art is given to them, such as Beautiful the Great Painter (Pulcher, Pictor Magnus), the Golden One (Aureus), the Excellent One (Excellens), or the Strong (Strenuus); or from their deeds, such as Naso the Brave (Nason Fortis), or the Cunning, or the Great, or Very Great Conqueror; or from the enemy anyone has overcome, Africanus, Asiaticus, Etruscus; or if anyone has overcome Manfred or Tortelius, he is called Macer Manfred or Tortelius, and so on.

至于那些手艺出众，或在战时及和平时建立某种功勋的人，就会根据他们的专业在他们的名字上加上一个相应的外号，如“漂亮而伟大的画家”、“很可贵的”、“优异的”、“伶俐的”；或根据功勋，如“大鼻子勇士”、“滑头”、“伟大的或最伟大的胜利者”；或因战胜某地敌

人，如“非洲的”，“亚洲的”和“托斯卡纳的”；如果有谁战胜了曼弗列德或托尔捷里，就叫他“恶劣的曼弗列德”、“托尔捷里”等。

All these cognomens are added by the higher magistrates, and very often with a crown suitable to the deed or art, and with the flourish of music.

这些外号由最高当局隆重授与，授与时往往还根据他们的功勋和技艺等，在乐声中授与花冠。

For gold and silver are reckoned of little value among them except as material for their vessels and ornaments, which are common to all.

不用金冠或银冠，因为他们只把金银当作用来制造器皿或各种公共装饰品的材料。

G.M. Tell me, I pray you, is there no jealousy among them or disappointment to that one who has not been elected to a magistracy, or to any other dignity to which he aspires?

大头领： 没有被选为首长或被选上自己所希望的位置的人，不会怀嫉妒心或表示懊丧吗？

Capt. Certainly not.

船长： 绝对不会。

For no one wants either necessaries or luxuries.

因为太阳城人没有人需要必需品或者奢侈品。

Moreover, the race is managed for the good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not of private individuals, and the magistrates must be obeyed.

而且，对生育的管控是基于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事情，因此必须服从政权的调配。

They deny what we hold — viz., that it is natural to man to recognize his offspring and to educate them, and to use his wife and house and children as his own.

但太阳城的人民却反驳我们关于天然权利的观点，即我们认为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以便了解和教养自己的后代，这是一种天然的权利。

For they say that children are bre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pecies and not for individual pleasure, as St. Thomas also asserts.

他们认为生儿育女的目的，正如圣托马斯所说，是为了保存种族而不是为了保存个人。

Therefore the breeding of children has reference to the commonwealth, and not to individuals, except in so far as they are constituents of the commonwealth.

因此，生育后代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利益的问题；个人仅仅是作为国家的一分子才与这个问题有关。

And since individuals for the most part bring forth children wrongly and educate them wrongly, they consider that they remove destruction from the State, and therefore for this reason, with most sacred fear, they commit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ldren, who, as it were, are the element of the republic, to the care of magistrates; for the safety of the community is not that of a few.

因为，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总是不善于教养后代，而他们要防止国家濒于灭亡，所以，负责人员的神圣职责是把后代的教育当作国家的重要基础来进行监督；而只有公社才能做到这一点，个人是无法做到的。

And thus they distribute male and female breeders of the best natures according to philosophical rules.

因此，男女的配合必须根据他们天赋的优良品质和哲学的原理来

决定。

Plato thinks that this distribution ought to be made by lot, lest some men seeing that they are kept away from the beautiful women, should rise up with anger and hatred against the magistrates; and he thinks further that those who do not deserve cohabitation with the more beautiful women, should be deceived while the lots are being led out of the city by the magistrates, so that at all times the women who are suitable should fall to their lot, not those whom they desire.

柏拉图认为，这种配偶的结合应该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以防那些得不到漂亮妻子的人，不会因嫉妒和愤怒而反抗政府；此外，他也认为，对于那些不配配给最美丽女子的男子，应该巧妙地用欺骗的办法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相称的女子，而不是他们自己所追求的女子。

This shrewdness, however, is not necessary among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ity of the Sun. For with them deformity is unknown.

但在太阳城，用不着采用这种办法，因为在太阳城的人民中根本看不到丑陋的人。

When the women are exercised they get a clear complexion, and become strong of limb, tall and agile, and with them beauty consists in tallness and strength.

妇女们由于都要工作，所以她们肤色健康，四肢有力，个头高挑、灵活，她们的美在于身高和力量。

Therefore, if any woman dyes her face, so that it may become beautiful, or uses high-heeled boots so that she may appear tall, or garments with trains to cover her wooden shoes, she is condemned to capital punishment.

因此，如果有妇女在脸上涂脂抹粉以变得漂亮、穿高跟鞋来显示身材，穿长裙来遮掩木鞋，就会被处以死刑。

But if the women should even desire them they have no facility for doing these things. For who indeed would give them this facility?

但即便妇女们想要做这些事，她们的愿望无法实现，因为没有人来供应她们这些东西。

Further, they assert that among us abuses of this kind arise from the leisure and sloth of women.

此外，他们认为，这种刁钻古怪的愿望之所以出现在我们国家里，是由于妇女们的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By these means they lose their color and have pale

complexions, and become feeble and small.

这就使得她们的面貌衰老、容光减色、肌肉松弛、也不能匀称地发展体格。

For this reason they are without proper complexions, use high sandals, and become beautiful not from strength, but from slothful tenderness.

因此，她们不得不涂脂抹粉，穿高跟鞋，她们不以发展体格为美，而以弱不经风为美。

And thus they ruin their own tempers and natures, and consequently those of their offspring.

从而，她们不仅破坏了自己的禀赋和健康，而且也破坏了她们后代的禀赋和健康。

Furthermore, if at any time a man is taken captive with ardent love for a certain woman, the two are allowed to converse and joke together and to give one another garlands of flowers or leaves, and to make verses.

此外，如果某个男子热爱某个女子，那他们可以在一起谈话、说笑话，可以彼此赠花、献诗。

But if the race is endangered, by no means is further union between them permitted.

但是如果一对情人的性结合不能保证生育，那就绝对禁止性交。

Moreover, the love born of eager desire is not known among them; only that born of friendship.

而且，他们的爱情主要是出于友情，而不是出于肉欲。

Domestic affairs and partnerships are of little account, because, excepting the sign of honor, each one receives what he is in need of.

他们很少关心日用品和食品，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光荣地获得奖品。

To the heroes and heroines of the republic, it is customary to give the pleasing gifts of honor, beautiful wreaths, sweet food, or splendid clothes, while they are feasting.

通常是在庆祝会聚餐时，由国家发给男女英雄们美丽的花冠，或最考究的佳肴，或漂亮的衣服。

In the daytime all use white garments within the city, but at night or outside the city they use red garments either of wool or silk.

太阳城的人民虽然在白天和在城内穿白色服装，但在夜间和在城外则改穿红色的毛织的或丝织的衣服。

They hate black as they do dung, and therefore they dislike the Japanese, who are fond of black.

他们很讨厌黑色，认为它是一种看起来很肮脏的颜色，所以他们讨厌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喜欢这种阴暗的颜色。

Pride they consider the most execrable vice, and one who acts proudly is chastised with the most ruthless correction.

他们认为骄傲是一种最可憎的毛病，因此骄傲的人将受到最严的惩戒。

Wherefore no one thinks it lowering to wait at table or to work in the kitchen or fields.

因此，没有人会认为在食堂和厨房工作或照顾病人等是不体面的工作。

All work they call discipline, and thus they say that it is honorable to go on foot, to do any act of nature, to see with the eye, and to speak with the tongue; and when there is need, they distinguish philosophically between tears and spittle.

他们把任何一种服务都称为学习。而且据他们说，一个人用两只脚走路，用屁股出恭，用眼睛看东西和用舌头说话，都同样受人尊敬；因为，需要用眼睛来分泌眼泪，用舌头来分泌唾沫，也和需要用屁股出恭是一样的。

Every man who, when he is told off to work, does his duty, is considered very honorable.

所以，每个人无论分配他做什么工作，都能把它看作是最光荣的任务去完成。

It is not the custom to keep slaves.

他们没有奴仆。

For they are enough, and more than enough, for themselves.

他们完全可以自己为自己服务，甚至服务的人还绰绰有余。

But with us, alas! it is not so.

但对我们来说，却不是这样。

In Naples there exist 70,000 souls, and out of these scarcely 10,000 or 15,000 do any work, and they are always lean from overwork and are getting weaker every day.

拿那波利城的七万居民来说，其中差不多只有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从事劳动；这些人由于日日过度劳作而形销骨立，或濒于死亡。

The rest become a prey to idleness, avarice, ill-health, lasciviousness, usury, and other vices, and contaminate and corrupt very many families by holding them in servitude for their own use, by keeping them in poverty and slavishness, and by imparting to them their own vices.

其余那些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为悭吝、疾病、淫佚放荡、高利盘剥所害。那些在贫困的压迫下不幸沦为奴仆的多数人也被他们所败坏，沾染了他们主人的各种恶习。

Therefore public slavery ruins them; useful works, in the field, in military service, and in arts, except those which are debasing, are not cultivated, the few who do practise them doing so with much aversion.

结果，人们被普遍的奴役制度所害。除了那些败坏人道德品质的工作外，没有人去从事有益的工作，如耕耘土地、服兵役、艺术创作等。极少数在从事有益工作的人也是心怀厌恶。

But in the City of the Sun, while duty and work are distributed among all, it only falls to each one to work for about four hours every day.

但在太阳城里，公职、劳作是在所有人中进行分配，每人每天工作不超过四小时。

The remaining hours are spent in learning joyously, in debating, in reading, in reciting, in writing, in walking, in exercising the mind and body, and with play.

其余的时间都用来愉快地学习，辩论、阅读、讲故事、写作、散步以及从事发展脑力和体力的活动。

They allow no game which is played while sitting, neither the single die nor dice, nor chess, nor others like these.

他们禁止玩骰子、下棋以及其他静止不动的游戏。

But they play with the ball, with the sack, with the hoop, with wrestling, with hurling at the stake.

但踢球、棒球、套环、摔跤、标枪等是可以的。

They say, moreover, that grinding poverty renders men worthless, cunning, sulky, thievish, insidious, vagabonds, liars, false witnesses, etc.; and that wealth makes them insolent, proud, ignorant, traitors, assumers of what they know not, deceivers, boasters, wanting in affection, slanderers, etc.

此外，他们认为，极端的贫困使人们卑贱、狡猾、圆滑、盗窃、阴险、无权、虚伪和作假等等；财富则使人们傲慢、自负、无知、背信、好吹牛、欺骗、夸耀、缺少情感、诽谤等等。

But with them all the rich and poor together make up the community.

但是对他们来说，所有的人既是富人，同时又都是穷人。

They are rich because they want nothing, poor because they possess nothing; and consequently they are not slaves to circumstances, but circumstances serve them.

他们都是富人，是因为大家什么都不需要；他们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因此，不是他们为一切东西服务，而是一切东西为他们服务。

And on this point they strongly recommend the religion of the Christians, and especially the life of the apostles.

正因为如此，他们竭力颂扬虔诚的基督教徒，特别是颂扬耶稣派出传教的使徒。

G.M. This seems excellent and sacred, but the community of women is a thing too difficult to attain.

大头领： 我看这一切固然很好，而且是虔诚的，但我觉得公妻是一个难题。

The holy Roman Clement says that wives ought to be comm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ostolic institution, and praises Plato and Socrates, who thus teach, but the Glossary interprets this community with regard to obedience.

罗马的圣克里门特说过，根据使徒的教谕，公妻是应该的；他赞成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宣扬的这种公妻主张。然而，《注释》认为这种公妻制度应该理解为妇女为大家服务，而不是大家公有的妻子。

And Tertullian agrees with the Glossary, that the first Christians had everything in common except wives.

德尔图良同意《注释》的主张，并提到早期基督教徒的一切财产

都是公有的，然而作为为大家服务的妻子却不包括在内。

Capt. These things I know little of.

船长： 我对这个问题知之甚少。

But this I saw among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ity of the Sun, that they did not make this exception.

但我发现，太阳城人民的公妻制度却没有这个例外。

And they defend themselves by the opinion of Socrates, of Cato, of Plato, and of St. Clement; but, as you say, they misunderstand the opinions of these thinkers.

他们借由苏格拉底、柏拉图、迦图和圣克里门特等人的见解来为自己辩护，但正如您说的那样，他们也许误解了这些思想家的意思。

And the inhabitants of the solar city ascribe this to their want of education, since they are by no means learned in philosophy.

太阳城的居民将此归因于他们在教育上的缺失，因为他们都不是学哲学的。

Nevertheless, they send abroad to discover the customs of nations, and the best of these they always adopt.

但他们经常派人出去了解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并将其他民族的好的风俗习惯纳为己用。

Practice makes the women suitable for war and other duties.

由于太阳城人民有了这样的习惯，所以妇女们既能懂得军事，也能负担其他的一些任务。

Thus they agree with Plato, in whom I have read these same things.

因此，他们是认同柏拉图的观点的，而且根据我对柏拉图的理解，也是如此。

The reasoning of our Cajetan does not convince me, and least of all that of Aristotle.

而凯耶塔的论据，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据，却不能使我信服。

This thing, however, existing among them is excellent and worthy of imitation — viz., that no physical defect renders a man

incapable of being serviceable except the decrepitude of old age, since even the deformed are useful for consultation.

然而，他们有一种优点值得我们仿效。那就是，除了年近老年的人外，任何人身体上的缺陷不会令其无所事事，即便残废的人都可以参加会议，提供意见。

The lame serve as guards, watching with the eyes which they possess.

跛子可以充当看守员，因为他还有视觉。

The blind card wool with their hands, separating the down from the hairs, with which latter they stuff the couches and sofas; those who are without the use of eyes and hands give the use of their ears or their voice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State, and if one has only one sense he uses it in the farms.

瞎子可以用手梳羊毛，装褥垫和枕头；失去手臂和眼睛的人，可利用他们的声音和听觉等等来为国家服务。最后，如果是只有一只手或一只脚的人，那就还可以到乡下去工作。

And these cripples are well treated, and some become spies, telling the officers of the State what they have heard.

这些残废的人也有很好的待遇，一部分人还可以充当间谍，把所听到的一切向国家报告。

G.M. Tell me now, I pray you, of their military affairs.

大头领： 现在给我讲讲他们的军事。

Then you may explain their arts, ways of life and sciences, and lastly their religion.

然后，再讲讲他们的艺术、各行各业，以及宗教等情况。

Capt. The triumvir, Power, has under him all the magistrates of arms, of artillery, of cavalry, of foot-soldiers, of architects, and of strategists; and the masters and many of the most excellent workmen obey the magistrates, the men of each art paying allegiance to their respective chiefs.

船长： 执政官“威力”领导着执掌军人装备的首长、炮兵首长、骑兵首长和兵步首长、军事工程师、战略家等等，他也间接领导这些首长下面向各自首长效忠的专家、能工巧匠。

Moreover, Power is at the head of all the professors of gymnastics, who teach military exercise, and who are prudent generals, advanced in age.

此外，他还领导负责对全体公民进行军事训练的大力士，这些人经验丰富、成熟稳重。

By these the boys are trained after their twelfth year.

他们负责训练十二岁以上的男孩。

Before this age, however, they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wrestling, running, throwing the weight, and other minor exercises, under inferior masters.

男孩们在十二岁前，已经在低级指导员的指导下受过角力、赛跑、掷石以及其他低级的训练。

But at twelve they are taught how to strike at the enemy, at horses and elephants, to handle the spear, the sword, the arrow, and the sling; to manage the horse, to advance and to retreat, to remain in order of battle, to help a comrade in arms, to anticipate the enemy by cunning, and to conquer.

到了十二岁，这些男孩开始学习同敌人搏斗，同马和象搏斗，使用标枪和矛，学习击剑，学习射击、掷石和骑术，训练进攻和退却，学习保持战斗队形、支援战友、防止敌人的进攻和退却。

The women also are taught these arts under their own magistrates and mistresses, so that they may be able if need be to render assistance to the males in battles near the city.

妇女也在她们的男女指导员的指导下受这一切训练，以便于帮助男子在城下作战。

They are taught to watch the fortifications lest at some time a hasty attack should suddenly be made.

她们接受保卫城池的训练，以应对突如其来的袭击。

In this respect they praise the Spartans and Amazons.

在这一方面，她们颂崇拜斯巴达人和亚马孙人。

The women know well also how to let fly fiery balls, and how to make them from lead; how to throw stones from pinnacles and to go in the way of an attack.

太阳城的妇女也会熟练发射火球，能制造铅弹，能从城堞向下投石，击退敌人的进攻．

They are accustomed also to give up wine unmixed altogether,

and that one is punished most severely who shows any fear.

她们已经习惯于绝不畏缩，临阵退缩的人会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ity of the Sun do not fear death, because they all believe that the soul is immortal,

太阳城的人不怕死，因为他们相信灵魂不灭，

and that when it has left the body it is associated with other spirits, wicked or good, according to the merits of this present life.

认为灵魂虽然离开躯体，但还要根据他在尘世生活时的行为，来决定他归附于善神或恶魔。

Although they are partly followers of Brahma and Pythagoras, they do not believe in 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 except in some cases by a distinct decree of God.

虽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信奉婆罗门和毕达哥拉斯派，但他们认为，除了在个别情况下根据神的意志以外，灵魂是不能轮回的。

They do not abstain from injuring an enemy of the republic and of religion, who is unworthy of pity.

他们对国家和宗教的敌人毫不宽恕，这些不配受人尊敬。

During the second month the army is reviewed, and every day there is practice of arms, either in the cavalry plain or within the walls.

他们每两个月检阅一次军队，他们每天都在野外或在城里受军事训练。

Nor are they ever without 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war.

他们也学习军事理论，

They take care that the accounts of Moses, of Joshua, of David, of Judas Maccabaeus, of Caesar, of Alexander, of Scipio, of Hannibal, and other great soldiers should be read.

阅读有关摩西、约书亚、大卫王、马卡比、凯撒、亚历山大、犹大·马加比和汉尼拔等人的历史。

And then each one gives his own opinion as to whether these generals acted well or ill, usefully or honorably, and then the teacher answers and says who are right.

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见解，如认为这些伟人的行为好坏，某人值得学习，是否值得受尊敬，然后由教师来解答所有这一切问题。

G.M. With whom do they wage war, and for what reasons, since they are so prosperous?

大头领： 他们既然如此幸福，那又根据什么理由去同什么人进行战争呢？

Capt. Wars might never occur, nevertheless they are exercised in military tactics and in hunting, lest perchance they should become effeminate and unprepared for any emergency.

船长： 尽管他们不会发动战争，但他们都不放弃军事训练和狩猎，以便使自己不致于变得软弱，不致于被敌人突然攻其不备。

Besides, there are four kingdoms in the island, which are very envious of their prosperity,

此外，还因为在那个岛上还有四个王国，非常忌妒他们所过的幸福安宁的生活，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 people desire to live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ity of the Sun, and to be under their rule

rather than that of their own kings.

因为这四个王国的居民竭力想按太阳城人民的那种风俗习惯生活；宁愿受他们政权的统治而不愿受本国政权的统治。

Wherefore the State often makes war upon these because, being neighbors, they are usurpers and live impiously, since they have not an object of worship and do not observe the religion of other nations or of the Brahmins.

为此，这些邻国经常借口太阳城侵占它的边界、不敬神而常常发动战争；因为他们不崇拜偶像，不信仰其他民族的宗教或婆罗门教。

And other nations of India, to which formerly they were subject, rise up as it were in rebellion, as also do the Taprobanese, whom they wanted to join them at first.

例如，从前与他们同国籍的印度人就经常发动叛乱；当初仇恨他们的塔普罗巴尼岛的居民，就常常向他们进攻。

The warriors of the City of the Sun, however, are always the victors.

然而，太阳城的人民总是取得胜利。

As soon as they suffered from insult or disgrace or plunder, or when their allies have been harassed, or a people have been oppressed by a tyrant of the State (for they are always the advocates of liberty), they go immediately to the Council for deliberation.

只要他们受到压制、凌辱和抢劫，或者当他们的同盟国受到压制时，或者被暴政压迫的城市请求他们援助时，他们马上就召开大会。

After they have knelt in the presence of God, that he might inspire their consultation, they proceed to examine the merits of the business, and thus war is decided on.

在跪下来祈求上帝，给他们以启示后，他们就开始对战事进行核查评估，接着就宣战。

Immediately after, a priest, whom they call Forensic, is sent away.

他们立刻就会派出一个名叫法医的司祭

He demands from the enemy the restitution of the plunder, asks that the allies should be freed from oppression, or that the tyrant should be deposed.

去要求敌人把掠得的东西交还，或者停止对盟国人民的压迫，或者废除暴政。

If they deny these things war is declared by invoking the vengeance of God — the God of Sabaoth — for destruction of those who maintain an unjust cause.

如果敌人拒绝就宣战，并祈求司惩罚之神，即万军之主，消灭那些不正义的人。

But if the enemy refuse to reply, the priest gives him the space of one hour for his answer, if he is a king, but three if it is a republic, so that they cannot escape giving a response.

如果敌人拒绝答复，出使的司祭就给他们一个考虑时限。如果对方是国王，则限一小时之内答复；如果是共和国政府，则限三小时内答复。如此以使敌人无法回避。

And in this manner is war undertaken against the insolent enemies of natural rights and of religion.

通过这种方式，对那些破坏天赋人权和宗教的人所进行的战争就开始了。

When war has been declared, the deputy of Power performs

everything, but Power, like the Roman dictator, plans and wills everything, so that hurtful tardiness may be avoided.

宣战以后，“威力”就负责指挥一切，但他可以像罗马的独裁者那样大权独握，以避免行动迟缓。

And when anything of great moment arises he consults Hoh and Wisdom and Love.

但如果发生特别重要的情况，他就要和“太阳”、“智慧”和“爱”进行协商。

Before this, however, the occasion of war and the justice of making an expedition are declared by a herald in the great Council.

而且，在出征以前，要由宣传者在群众大会上阐明战争的原因和进军的合理性。

All from twenty years and upward are admitted to this Council, and thus the necessaries are agreed upon.

所有二十岁以上的人都要出席这个大会，由此达成意见的一致。

All kinds of weapons stand in the armories, and these they use

often in sham fights.

武器库里存有各种武器，这些武器也是在他们受作战演习训练时经常使用的武器。

The exterior walls of each ring are full of guns prepared by their labors, and they have other engines for hurling which are called cannons, and which they take into battle upon mules and asses and carriages.

在每一个城区的外墙都置有炮手们备好枪。他们还有一种称为大炮的投射武器。这种大炮是用骡、驴和四轮大车运送到战场。

When they have arrived in an open plain they enclose in the middle the provisions, engines of war, chariots, ladders, and machines, and all fight courageously.

他们在原野上扎营以后，就把辎重、投射武器、大车、云梯和军用机械置于中央。所有人都英勇地战斗。

Then each one returns to the standards, and the enemy thinking that they are giving and preparing to flee, are deceived and relax their order: then the warriors of the City of the Sun, wheeling into wings and columns on each side, regain their breath and strength, and ordering the artillery to discharge their bullets they resume the fight against a disorganized host.

然后，大家集中到自己的军旗附近，敌人被误导，认为他们要退却或准备逃跑，于是就松懈了下来。而太阳城的勇士们却分为两翼和两支部队，重新集中兵力，并命令炮兵发射出暴雨般的炮弹，再和惊慌失措的敌人战斗。

And they observe many ruses of this kind.

他们也应用许多其他类似的战术。

They overcome all mortals with their stratagems and engines.

他们常常应用自己的军事机智和武器战胜所有的敌人。

Their camp is fortified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Romans. They pitch their tents and fortify with wall and ditch with wonderful quickness.

他们也仿照罗马人的办法安营扎寨，先扎起营帐，然后非常迅速地筑障壁和挖战壕对其进行加固。

The masters of works, of engines and hurling machines, stand ready, and the soldiers understand the use of the spade and the axe.

负责工事、战具和投射武器的首领随时待命；所有的兵士也都会使用丁字镐和斧子。

Five, eight, or ten leaders learned in the order of battle and in strategy consult together concerning the business of war, and command their bands after consultation.

由五个、八个或十个精通军事和战略的指挥员组成军事会议，制定计划，指挥自己的部队。

It is their wont to take out with them a body of boys, armed and on horses, so that they may learn to fight, just as the whelps of lions and wolves are accustomed to blood.

他们还将儿童进行武装，骑兵随军出征，为的是使这些儿童能学会战斗，就像狮狼幼崽适应血腥一样。

And these in time of danger betake themselves to a place of safety, along with many armed women.

但在危险的时候，就把他们和武装的妇女一起带到安全的地带。

After the battle the women and boys soothe and relieve the pain of the warriors, and wait upon them and encourage them with embraces and pleasant words.

战斗结束以后，就由这些妇女和儿童来照应战士，缓解他们的痛苦，服侍他们，拥抱他们或用言语来鼓舞他们。

How wonderful a help is this!

这是多美好的事呀！

For the soldiers, in order that they may acquit themselves as sturdy men in the eyes of their wives and offspring, endure hardships, and so love makes them conquerors.

对于战士们来说，为了在妻儿面前证明自己的勇敢，会拚命去建立战功；爱也可以激励他们成为胜利者。

He who in the fight first scales the enemy's walls receives after the battle of a crown of grass, as a token of honor, and at the presentation the women and boys applaud loudly;

凡是第一个攻上敌人城墙的人，就能在战争结束后，在妇女和儿童呼喊英勇的欢呼声中获得一项象征荣誉的草冠；

that one who affords aid to an ally gets a civic crown of oak-leaves;

凡是救全战友生命的人则获得一顶橡树叶编的普通的花冠；

he who kills a tyrant dedicates his arms in the temple and receives from Hoh the cognomen of his deed,

凡是杀死敌方暴君的人，就把自己的武器送到神殿去上供，接受“太阳”授与的表扬他功绩的相应的外号。

and other warriors obtain other kinds of crowns.

其他的勇士会获得相应的各种花冠。

Every horse-soldier carries a spear and two strongly tempered pistols, narrow at the mouth, hanging from his saddle.

每个骑兵都备有一支长矛和两支短枪。这种短枪的枪头非常锋利，挂在马鞍两旁。

And to get the barrels of their pistols narrow they pierce the metal which they intend to convert into arms.

为了使枪头锋利，他们将原本用于制作重锤的金属进行打磨，使其尖锐。

Further, every cavalry soldier has a sword and a dagger.

此外，每一位骑兵都配备有一把利剑和一把匕首。

But the rest, who form the light-armed troops, carry a metal cudgel.

但其余的人则携带铁棍，组成轻装军队。

For if the foe cannot pierce their metal for pistols and cannot make swords, they attack him with clubs, shatter and overthrow him.

如果敌人没有佩带铁枪和剑，他们就用铁棒袭击、击溃并制服他们。

Two chains of six spans length hang from the club, and at the end of these are iron balls, and when these are aimed at the enemy they surround his neck and drag him to the ground;

铁棍上系有两条铁链，各长六掌宽，铁链的顶端又各系有一个铁球；他们挥动铁棍，链子就缠住敌人的脖子，用力一拉，就把敌人拉翻在地。

and in order that they may be able to use the club more easily, they do not hold the reins with their hands, but use them by means of the feet.

为了更灵活使用这种铁棍，他们不是用手来控制缰绳，而是用脚来驾驭马匹。

If perchance the reins are interchanged above the trappings of the saddle, the ends are fastened to the stirrups with buckles, and not to the feet.

为了防止缰绳与马鞍上的装饰纠缠在一起，其顶端就用扣子扣在马镫上，而不是扣在脚上；

And the stirrups have an arrangement for swift movement of the bridle, so that they draw in or let out the rein with marvellous celerity.

马镫被调整得可以快速牵动缰绳，这样他们就可以非常迅速地把缰绳放松或勒紧。

With the right foot they turn the horse to the left, and with the left to the right.

用右脚可以使马向左转，用左脚可以使马向右转。

This secret, moreover, is not known to the Tartars.

而鞑靼人不知道这个窍门。

For, although they govern the reins with their feet, they are ignorant nevertheless of turning them and drawing them in and letting them out by means of the block of the stirrups.

因为他们虽然善于用腿来驾驭马，但不会利用马镫上的节放松和勒紧缰绳来驾驭马。

The lightarmed cavalry with them are the first to engage in battle, then the men forming the phalanx with their spears, then the archers for whose services a great price is paid, and who are accustomed to fight in lines crossing one another as the threads of cloth, some rushing forward in their turn and others receding.

战斗开始时，轻骑兵是第一批投入战斗。紧随其后的是由矛兵组成的方阵；矛兵的后面是很重视的投石手，因为他们作起战来，就如同纺织架上的线那样迅速地转动起来，有的依次奔向敌人的前方，有的则向后移动。

They have a band of lancers strengthening the line of battle, but they make trial of the swords only at the end.

他们用轻骑兵支援长矛部队作战，最后决战还是用利剑来进行。

After the battle they celebrate the military triumphs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Romans, and even in a more magnificent way.

战争结束后，太阳城的人民就按照罗马人的习惯庆祝战争的胜利，仪式则更加隆重。

Prayers by the way of thank-offerings are made to God, and then the general presents himself in the temple, and the deeds, good and bad, are related by the poet or historian, who according to custom was with the expedition.

大家都祈祷，感谢上帝。接着，统帅进入神殿，接着由一位按惯例随军远征的诗人或史学家讲述战争中有关胜利和失败的事迹。

And the greatest chief, Hoh, crowns the general with laurel and distributes little gifts and honors to all the valorous soldiers, who are for some days free from public duties.

然后，由最高领导人“太阳”给统帅戴上像征光荣与胜利的桂冠，而对英勇的军人则分别授与各种荣誉奖，并可以休假几天。

But this exemption from work is by no means pleasing to them, since they know not what it is to be at leisure, and so they help

their companions.

然而，这种休假对于他们来说极为不适，因为他们不习惯于游手好闲，所以他们还是去帮助朋友们劳动。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ho have been conquered through their own fault, or have lost the victory, are blamed;

相反，那些因自己的过失或放过获胜良机而遭受挫败的人，就会受到大家的鄙视。

and they who were the first to take to flight are in no way worthy to escape death, unless when the whole army asks their lives, and each one takes upon himself a part of their punishment.

那些一开始就临阵脱逃的人，要处以死刑。除非全军都为他求情免死，并且每个战士都要为他承担一部分惩罚，才能免去死刑。

But this indulgence is rarely granted, except when there are good reasons favoring it.

但是，这种情况极少出现，只是在具有许多可以减轻罪刑的情况下，才能从宽处理。

But he who did not bear help to an ally or friend is beaten with rods.

凡是对盟友或战友不及时救援的人，要受到用棍棒抽打的体罚；

That one who did not obey orders is given to the beasts, in an enclosure, to be devoured, and a staff is put in his hand, and if he should conquer the lions and the bears that are there, which is almost impossible, he is received into favor again.

不服从命令的人则被放到关有野兽的壕沟里，同时给他一根粗棒，如果他能战胜这里的熊和狮（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就可以获得赦免。

The conquered States or those willingly delivered up to them, forthwith have all things in common,

被征服的或者自愿归顺的国家，其全部财产必须改为公有。

and receive a garrison and magistrates from the City of the Sun, and by degrees they are accustomed to the ways of the city, the mistress of all, to which they even send their sons to be taught without contributing anything for expense.

这些国家要接受由太阳城派去的驻防军和负责人，要逐步采用太

阳城的风俗习惯，太阳城就成为它们共同的首都，它们可以派遣自己的子弟到那里去受教育，而且不必为此负担任何费用。

It would be too great trouble to tell you about the spies and their master, and about the guards and laws and ceremonies,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the State, which you can of yourself imagine.

关于侦察员和他们的首长，关于警卫队，关于太阳城内和城外的各种规章法令，我很难讲述，您可以自己去设想。

Since from childhood they are chosen according to their inclination and the star under which they were born, therefore each one working according to his natural propensity does his duty well and pleasantly, because naturally.

因为，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从童年起就根据他们的爱好和他们诞生的时辰而确定的，所以每个人在根据自己的禀赋进行工作时，都能胜任愉快履行自己的义务。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一种工作都是必然要做的。

The same things I may say concerning strategy and the other functions.

对于服军役或其他任何一种职业来说，也是这样。

There are guards in the city by day and by night, and they are placed at the four gates, and outside the walls of the seventh ring, above the breastworks and towers and inside mounds.

太阳城的四道城门和第七个城区的外围工事，各个棱堡和塔楼以及各城的内垣，日夜都有卫兵把守。

These places are guarded in the day by women, in the night by men.

白天由妇女守卫，夜间由男子守卫。

And lest the guard should become weary of watching, and in case of a surprise, they change them every three hours, as is the custom with our soldiers.

同时，为了避免守卫疲劳，也为了随时戒备，以防万一，他们也象我们的兵士一样，每三小时换岗一次。

At sunset, when the drum and symphonia sound, the armed guards are distributed.

在日落时，当在板鼓和音乐声响起时，全副武装的士兵就进驻到各自的岗哨。

Cavalry and infantry make use of hunting as the symbol of war and practise games and hold festivities in the plains.

步兵和骑兵借用狩猎在旷野上进行军事训练，举行庆祝活动等等。

Then the music strikes up, and freely they pardon the offences and faults of the enemy, and after the victories they are kind to them, if it has been decreed that they should destroy the walls of the enemy's city and take their lives.

音乐声响起，他们宽恕敌人对他们所犯的罪行和加给他们的凌辱。在获得胜利后，如果决定要破坏敌方的城墙或把某个敌人处以死刑，他们对战败国的人民却和睦友善。

All these things are done on the same day as the victory, and afterward they never cease to load the conquered with favors, for they say that there ought to be no fighting, except when the conquerors give up the conquered, not when they kill them.

这些决定在宣布胜利的当天就执行。在这以后，他们就不断地对敌国人民施加恩惠。因为在他们来看，战争已经不再存在，除非征服者放弃这些被征服的人，而不是在处死他们。

If there is a dispute among them concerning injury or any other matter (for they themselves scarcely ever contend except in matters

of honor), the chief and his magistrates chastise the accused one secretly, if he has done harm in deeds after he has been first angry.

如果太阳城的人民之间因伤害了别人或其他的原因（他们的纠纷几乎都是因为荣誉问题）而发生纠纷，而且如果是由于偶尔发怒侮辱了别人，那就由执政者和属他管辖的首长秘密地惩罚犯了过失的一方。

If they wait until the time of the battle for the verbal decision, they must give vent to their anger against the enemy, and he who in battle shows the most daring deeds is considered to have defended the better and truer cause in the struggle, and the other yields, and they are punished justly.

如果他们等到战争时再做判决，那他们就必须将怒气发泄在攻击敌人上。在战争种表现得更好的那一方就被认为是争端中有理的一方而胜诉，他的对方也就服气了。对他们的惩罚根据公平的原则进行。

Nevertheless,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come to single combat, since right is maintained by the tribunal, and because the unjust cause is often apparent when the more just succumbs, and he who professes to be the better man shows this in public fight.

但是，私下决斗却是不允许的，因为权力由法庭决定。不正义的一方通常因正义的一方放弃而显而易见，声称自己正义的应该在战争去证明。

G.M. This is worth while, so that factions should not be cherished for the harm of the fatherland, and so that civil wars might not occur, for by means of these a tyrant often arises, as the examples of Rome and Athens show.

大头领： 这是有价值的。这样，个别的党派就难以发展到灭亡国家的程度，导致暴君上台的内战也会发生。罗马和雅典的例子就是前车之鉴。

Now, I pray you, tell me of their works and matter connected therewith.

大头领： 现在给我讲讲他们的军事。

Capt. I believe that you have already heard about their military affairs and about their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life, and in what way these are common to them, and how they honor with the first grade of nobility whoever is considered to have knowledge of these.

船长： 我想已经对您说过他们的军事、农业和畜牧业了。他们每个人都能做这些工作，他们认为这些工作最光荣，他们尊重熟知这些工作知识的人。

They who are skilful in more arts than these they consider still nobler, and they set that one apart for teaching the art in which he is most skilful.

他们当中精通更多艺术的人格外受人尊重，他们对于教授自己最擅长的技术的人也更加另眼相看。

The occupations which require the most labor, such as working in metals and building, are the most praiseworthy among them.

需要大量体力的繁重的工作，如打铁或建筑等，也很受人称赞。

No one declines to go to these occupations, for the reason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their propensities are well known, and among them, on accoun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labor, no one does work harmful to him, but only that which is necessary for him.

所以谁也不会逃避这些工作。由于从一开始就考虑到每个人的禀赋，因此在这样的分工中，每个人所从事的劳动，都不会危害身体，反而会发展他们的体力。

The occupations entailing less labor belong to the women.

不太繁重的手工业则分配给妇女。

All of them are expected to know how to swim, and for this reason ponds are dug outside the walls of the city and within them near to the fountains.

太阳城的全体人民都必须学会游泳。为此，在城里、城外和喷泉的附近都挖有水池。

Commerce is of little use to them, but they know the value of money, and they count for the use of their ambassadors and explorers, so that with it they may have the means of living.

商业对太阳城的人民来说意义不大，尽管他们也懂得货币的价值，他们也铸有供自己的驻外使节和侦察员用的货币。

They receive merchants into their States from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nd these buy the superfluous goods of the city.

太阳城的人民也接纳各国的商人都到这里来购买他们的剩余东西。

The people of the City of the Sun refuse to take money, but in importing they accept in exchange those things of which they are in need, and sometimes they buy with money;

太阳城的人民不做现金交易，他们用自己的产品按相应的价值来交换他们所缺乏的产品；如果他们也用钱的话，那只是为了用来购买外国商品。

and the young people in the City of the Sun are much amused when they see that for a small price they receive so many things in exchange.

太阳城的年轻人看到很少的货币就能换取大量商品时，就加以嘲笑。

The old men, however, do not laugh.

但老人却不会嘲笑。

They are unwilling that the State should be corrupted by the vicious customs of slaves and foreigners.

他们担心奴隶和外国人的风俗会败坏太阳城的风尚。

Therefore they do business at the gates, and sell those whom they have taken in war or keep them for digging ditches and other hard work without the city, and for this reason they always send four bands of soldiers to take care of the fields, and with them there are the laborers.

所以，他们在城外同外国人进行贸易，卖掉在战争中俘获的奴隶，或者用来挖掘濠沟，或这用在城外做其他各种苦工。他们经常派有四队士兵和一些工作人员一起去保卫田野。

They go out of the four gates from which roads with walls on both sides of them lead to the sea, so that goods might easily be carried over them and foreigners might not meet with difficulty on their way.

四座城门外有四条用砖铺的大道直通海岸，这对于运输和与外国人交往来说，是很方便的。

To strangers they are kind and polite; they keep them for three days at the public expense; after they have first washed their feet, they show them their city and its customs, and they honor them with a seat at the Council and public table, and there are men whose duty it is to take care of and guard the guests.

对于外国人，他们是殷勤和慷慨的。外国人在三天之内的一切费用都由公家支付。外国人一到，首先洗脚，然后带他们参观全城，介绍这个城市的结构，容许他们进入议会厅，并招待在公共食堂吃饭，并派有专人负责为外国客人服务并保护他们。

But if strangers should wish to become citizens of their State, they try them first for a month on a farm, and for another month in the city, then they decide concerning them, and admit them with certain ceremonies and oaths.

来客如果希望做太阳城的公民，就必须接受考验，一个月下乡，一个月在城里，然后再作出是否接受的决定。如果接受，就为这些新

公民举行一定的仪式和宣誓等等。

Agriculture is much followed among them; there is not a span of earth without cultivation, and they observe the winds and propitious stars.

他们特别注意农业。没有任何一寸土地是不能用于耕种的。他们也观察风向和星座的位置来进行农业生产。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few left in the city all go out armed, and with flags and drums and trumpets sounding, to the fields, for the purposes of ploughing, sowing, digging, hoeing, reaping, gathering fruit and grapes;

到耕耘、播种、培土、除草、收获粮食和采摘葡萄的时节，除少数人留在本城之外，其余的居民一听鼓声和号声，一看到旗帜，就带着工具到田野去。

and they set in order everything, and do their work in a very few hours and with much care.

他们工作非常有序、仔细，一切工作都能在不多的几小时内完成。

They use wagons fitted with sails which are borne along by the

wind even when it is contrary, by the marvellous contrivance of wheels within wheels.

他们利用一种装有风帆可以迎风走动的四轮大车；在风向相反时，通过装置着一种可以非常巧妙地转动的车轮，大车依旧可以运行。

And when there is no wind a beast draws along a huge cart, which is a grand sight.

而当没有风的时候，只用一头牲畜就可以牵动。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啊！

The guardians of the land move about in the meantime, armed and always in their proper turn.

同时，有武装的田间卫兵来往巡逻，并经常换班。

They do not use dung and filth for manuring the fields, thinking that the fruit contracts something of their rottenness, and when eaten gives a short and poor subsistence, as women who are beautiful with rouge and from want of exercise bring forth feeble offspring.

他们不用粪肥或污泥作，认为这会败坏种籽。如果食用这种作

物，就会使体质变弱而缩短寿命，就像靠装饰打扮而不靠自己的活动锻炼出好身体的女子那样，生出来的后代是孱弱的。

Wherefore they do not as it were paint the earth, but dig it up well and use secret remedies, so that fruit is borne quickly and multiplies, and is not destroyed.

因此，他们的土地并不施肥而是进行深耕细作，并利用各种秘密方法，来使作物加速生长，来增加收获量和保护种籽。

They have a book for this work, which they call the Georgics.

为此，他们有一部名为《稼穑诗》的书。

As much of the land as is necessary is cultivated, and the rest is used for the pasturage of cattle.

他们只耕种所需的那部分土地，其余的土地则用来牧放牲畜。

The excellent occupation of breeding and rearing horses, oxen, sheep, dogs, and all kinds of domestic and tame animals is in the highest esteem among them as it was in the time of Abraham.

他们也像亚伯拉罕时代一样，很重视马、牛、羊、狗以及各种家

畜和训熟牲畜的良好的繁殖和饲养方法。

And the animals are led so to pair that they may be able to breed well.

在牲畜交配时，他们很注意如何使它们能产良好的仔畜。

Fine pictures of oxen, horses, sheep, and other animals are placed before them.

在进行交配时，把良种的牛、马、羊等等的画图放在牲畜面前。

They do not turn out horses with mares to feed, but at the proper time they bring them together in an enclosure of the stables in their fields.

他们不让种公马在牧场上去找母马交配，要在适当的时刻，才让它们在野外的马厩中进行交配。

And this is done when they observe that the constellation Archer is in favorable conjunction with Mars and Jupiter.

他们在观察到人马座处在星占表中火星和木星的良好方位上时，才进行牲畜交配。

For the oxen they observe the Bull, for the sheep the Ram, and so on in accordance with art.

公牛交配时，他们会观察金牛座的位置，让羊交配时就观察白羊座的位置等等。

Under the Pleiades they keep a drove of hens and ducks and geese, which are driven out by the women to feed near the city.

他们在昴星团的庇护下，也养很多鸡、鸭和鹅，由妇女们赶到置有禽舍的城下来饲养。

The women only do this when it is a pleasure to them.

妇女们只是在心情愉快时才做这件事。

There are also places enclosed, where they make cheese, butter, and milk-food.

同时，她们也在特定的地方制造干酪、食油和其他乳制品。

They also keep capons, fruit, and other things, and for all these matters there is a book which they call the Bucolics.

他们也饲养很多阉鸡、种植水果和其他事物。他们根据一本提名为《田园诗》的书来做这些工作。

They have an abundance of all things, since everyone likes to be industrious, their labors being slight and profitable.

他们的物产都极为丰富，因为每个人都非常勤劳，每个人的工作量也不大，但很有成效。

They are docile, and that one among them who is head of the rest in duties of this kind they call king.

他们都很顺从，把主持这类似的其他的人称为“王”。

For they say that this is the proper name of the leaders, and it does not belong to ignorant persons.

据他们说，这个称号应当给这种人，而不能给不学无术的人。

It is wonderful to see how men and women march together collectively, and always in obedience to the voice of the king.

很令人惊奇的是，所有的男女都加入编组工作，并绝对服从自己

的“王”。

Nor do they regard him with loathing as we do, for they know that although he is greater than themselves, he is for all that their father and brother.

而且他们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现（也和我们一样），因为他们知道尽管他比他们地位都高，但他就像他们的父兄一样。

They keep groves and woods for wild animals, and they often hunt.

太阳城有许多供野生动物生长的小树林和森林，他们常常在里边猎捕。

The science of navigation is considered very dignified by them, and they possess rafts and triremes, which go over the waters without rowers or the force of the wind, but by a marvellous contrivance.

太阳城的人民对航海也非常重视。他们有既不借助于桨、也不借助于风力的一些特殊的船舶和帆桨并用的大船，它们靠一种非常精巧的机械行驶。

And other vessels they have which are moved by the winds.

他们也有用桨或利用风力推动的船舶。

They have a correct knowledge of the stars, and of the ebb and flow of the tide.

他们很了解星辰和海洋涨潮和退潮的情况。

They navigate for the sake of becoming acquainted with nations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ings.

他们掌握航海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情况以及各地的物产。

They injure nobody, and they do not put up with injury, and they never go to battle unless when provoked.

他们对任何人都不使用暴力，也不会容忍任何人对他们使用的暴力；如果有人向他们进攻，他们就进行战斗。

They assert that the whole earth will in time come to li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customs, and consequently they always find out whether there be a nation whose manner of living is better and more approved than the rest.

他们坚信，全世界将来都会按他们的风俗生活。因此，他们常常试图去发现比太阳城更值得称赞和更适当的生活方式。

They admire the Christian institutions and look for a realization of the apostolic life in vogue among themselves and in us.

他们欣赏基督教体制，寻求在他们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使徒生活盛行的方式。

There are treaties between them and the Chinese and many other nations, both insular and continental, such as Siam and Calicut, which they are only just able to explore.

他们和中国人以及一些岛上和大陆上的许多民族，如暹罗（泰国）、卡利卡特结成同盟，其目的只是为了能从这些国家那里获取某些情报。

Furthermore, they have artificial fires, battles on sea and land, and many strategic secrets. Therefore they are nearly always victorious.

此外，他们在海战和陆战中会使用人造火器，并运用其他很多秘密的军事机密，因此，他们几乎是战无不胜。

G.M. Now it would be very pleasant to learn with what foods and drinks they are nourished, and in what way and for how long they live.

大头领： 现在，我很想听一听他们的饮食情况，他们如何生活，以及他们的寿命怎样。

Capt. Their food consists of flesh, butter, honey, cheese, garden herbs, and vegetables of various kinds.

船长： 他们的食物有肉类、黄油、蜂蜜、奶酪、香草和各种蔬菜。

They were unwilling at first to slay animals, because it seemed cruel; but thinking afterward that is was also cruel to destroy herbs which have a share of sensitive feeling, they saw that they would perish from hunger unless they did an unjustifiable action for the sake of justifiable ones, and so now they all eat meat.

起初，他们反对杀牲，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残忍的行为，但后来他们又想到植物也具有天赋的知觉，伤害植物同样是残忍的。但是，如果这样行事，那人们就会饿死，除非为了正当的事而采取不正当的行动，所以他们现在都食肉。

Nevertheless, they do not kill willingly useful animals, such as oxen and horses.

但他们还是不愿意宰杀有用的牲畜，如牛和马。

They observ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eful and harmful foods, and for this they employ the science of medicine.

他们对有益和有害的食物鉴别得很清楚，他们应用医学来判断。

They always change their food.

他们不停地变换自己的食物。

First they eat flesh, then fish, then afterward they go back to flesh, and nature is never incommoded or weakened.

第一天吃肉，第二天吃鱼，第三天吃蔬菜，然后又再吃肉，为的是不致伤胃而又不会使身体虚弱。

The old people use the more digestible kind of food, and take three meals a day, eating only a little.

容易消化的食物留给老年人吃，每天三餐，但数量不多。

But the general community eat twice, and the boys four times, that they may satisfy nature.

普通的人每日两餐，儿童则每日四餐，这样能满足自然的需求。

The length of their lives is generally 100 years, but often they reach 200.

他们一般都能活到一百岁，很多甚至活到二百岁。

As regards drinking, they are extremely moderate.

至于饮酒，他们很有节制。

Wine is never given to young people until they are ten years old, unless the state of their health demands it.

未满十岁的年轻人，除了健康的需要外，一律不得饮酒。

After their tenth year they take it diluted with water, and so do the women, but the old men of fifty and upward use little or no water.

十岁以后，年轻人可以饮搀水的酒，妇女也可以饮这种酒，而年逾五十岁的老人通常都喝醇酒。

They eat the most healthy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time of the year.

他们根据每个季节的时令，吃最有益健康的食物。

They think nothing harmful which is brought forth by God, except when there has been abuse by taking too much.

他们认为上帝创造的各种食物是对人不会有害的，害处只在于人们饮食无度。

And therefore in the summer they feed on fruits, because they are moist and juicy and cool, and counteract the heat and dryness.

因此，在夏天，他们多吃水果，因为水果新鲜多汁，能使人消暑解渴。

In the winter they feed on dry articles, and in the autumn they eat grapes, since they are given by God to remove melancholy and sadness;

在冬天，就多吃干食物；秋天多吃葡萄，因为上帝创造葡萄来消除烦恼和忧郁。

and they also make use of scents to a great degree.

他们也大量地使用香料。

In the morning, when they have all risen they comb their hair and wash their faces and hands with cold water.

早晨起来大家把头发梳匀，并用冷水洗脸洗手；

Then they chew thyme or rock-parsley or fennel, or rub their hands with these plants.

然后咀嚼或用手涂抹薄荷、洋茵或莳萝，或用这些植物擦手。

The old men make incense, and with their faces to the east repeat the short prayer which Jesus Christ taught us.

老人则上香，然后面向东方作简短的祈祷，这种祈祷和耶稣教导我们的很相似。

After this they go to wait upon the old men, some go to the dance, and others to the duties of the State.

此后，有的人去侍候老年人，有的去合唱，有的去办公。

Later on they meet at the early lectures, then in the temple, then for bodily exercise.

然后，他们去上第一次课，上完课后到神殿聚会，接着做体操。

Then for a little while they sit down to rest, and at length they go to dinner.

做完体操，就坐在那里休息一会儿，最后他们才去吃早饭。

Among them there is never gout in the hands or feet, nor catarrh, nor sciatica, nor grievous colics, nor flatulency, nor hard breathing.

他们不会得痛风、黏膜炎、坐骨神经痛、绞痛、胃气肿、哮喘等疾病。

For these diseases are caused by indigestion and flatulency, and by frugality and exercise they remove every humor and spasm.

因为这些疾病是由于消化不良和气胀造成的；而他们通过节食和经常锻炼，所以可以驱散任何风湿和炎症。

Therefore it is unseemly in the extreme to be seen vomiting or spitting, since they say that this is a sign either of little exercise, or of ignoble sloth, or of drunkenness, or gluttony.

因此，他们认为吐痰和咯吐这类不良习惯是非常可耻的。在他们看来，这类习惯是由于缺乏锻炼、懒惰、酗酒和暴食而造成的。

They suffer rather from swellings or from the dry spasm, which they relieve with plenty of good and juicy food.

他们中间最常见的病症是痉挛和各种炎症，对这些病症的治疗办法是吃那些对身体有益的、多汁的和富于营养的食物。

They heal fevers with pleasant baths and with milkfood, and with a pleasant habitation in the country and by gradual exercise.

他们采取使人惬意的沐浴和多吃乳制品的方式治疗发烧等热病，以及到乡村去作愉快的消遣，从事轻微的、能使心情愉快的锻炼。

Unclean diseases cannot be prevalent with them because they often clean their bodies by bathing in wine, and soothe them with

aromatic oil, and by the sweat of exercise they diffuse the poisonous vapor which corrupts the blood and the marrow.

因不洁而生的疾病在他们中不会流行，因为他们常常用酒擦身，同时也用香料油舒缓疲劳，并且通过体育锻炼使所流出的汗可以发散那种能够败坏血液和骨髓的有害的东西。

They do suffer a little from consumption, because they cannot perspire at the breast, but they never have asthma, for the humid nature of which a heavy man is required.

因为他们身体的胸部不出汗，他们当中有极少一部分人会害肺病；他们绝不会得哮喘病，因为在潮湿的气候中，胖子才容易得病。

They cure hot fevers with cold potations of water, but slight ones with sweet smells, with cheese-bread or sleep, with music or dancing.

他们用喝冷水的办法来治疗热病，但冷水量少且香甜好闻，再辅以软干酪、睡眠，以及音乐或娱乐来治疗。

Tertiary fevers are cured by bleeding, by rhubarb or by a similar drawing remedy, or by water soaked in the roots of plants, with purgative and sharp-tasting qualities.

较深度的热就要通过给病人放血来治疗，服用大黄或其他清理内部的药物，或吃能轻微下泻的植物根浸水和酸性的汤药。

But it is rarely that they take purgative medicines.

但他们很少使用泻药。

Fevers occurring every fourth day are cured easily by suddenly startling the unprepared patients, and by means of herbs producing effects opposite to the humors of this fever.

四日发一次的热容易治疗，就是让病人受一次突然的惊吓，同时服用治疗这种病所特有的抗湿的草药。

All these secrets they told me in opposition to their own wishes.

尽管他们不愿意，但还是告诉了我所有这些秘密。

They take more diligent pains to cure the lasting fevers, which they fear more, and they strive to counteract these by the observation of stars and of plants, and by prayers to God.

他们最怕的是长期发热的病，因此他们特别下功夫治疗这种病。

他们通过观察星象，吃各种草药，并进行祈祷。

Fevers recurring every fifth, sixth, eighth or more days, you never find whenever heavy humors are wanting.

至于五日、六日或八日以上发一次的热，那是绝对没有，因为他们那里的人不会积湿。

They use baths, and moreover they have warm ones according to the Roman custom, and they make use also of olive oil.

他们采用沐浴，而且是在按罗马习惯建筑公共浴室中。他们还使用油料擦洗。

They have found out, too, a great many secret cure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leanliness and health.

他们还发明了很多秘方，用来保持清洁和健康。

And in other ways they labor to cure the epilepsy, with which they are often troubled.

癫痫病经常令他们痛苦不堪，因此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想办法去治愈。

G.M. A sign this disease is of wonderful cleverness, for from it Hercules, Scotus, Socrates, Callimachus, and Mahomet have suffered.

大头领： 这是特别有才能的人物容易得的疾病。例如，赫拉克勒斯、斯科特斯、苏格拉底、卡利马科斯和穆罕默德就害过这种病。

Capt. They cure by means of prayers to heaven, by strengthening the head, by acids, by planned gymnastics, and with fat cheese-bread sprinkled with the flour of wheaten corn.

船长： 他们通过向天祈祷来与之斗争，通过增强病人的脑力，服用酸性药剂，进行系统健身活动，吃搀有最好的小麦面粉的肥汤等。

They are very skilled in making dishes, and in them they put spice, honey, butter, and many highly strengthening spices, and they temper their richness with acids, so that they never vomit.

他们的烹饪技术高明，用香料、蜜糖、奶油和很多能大大增强体力的辛香佐料调味；用味酸的佐料来中和油腻的东西，以免引起消化不良。

They do not drink ice-cold drinks nor artificial hot drinks, as the Chinese do; for they are not without aid against the humors of the body, on account of the help they get from the natural heat of

the water; but they strengthen it with crushed garlic, with vinegar, with wild thyme, with mint, and with basil, in the summer or in time of special heaviness.

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冷饮、人工热饮；因为他们不需要用这些抗湿气的办法来加强人体固有的热能，但他们常常吃蒜泥、醋、兰芹、薄荷和罗勒，来加强这种热能；在夏天和在疲乏的时候，这些东西吃得特别多。

They know also a secret for renovating life after about the seventieth year, and for ridding it of affliction, and this they do by a pleasing and indeed wonderful art.

他们也知道在人生七十岁后如何重新焕发生命的秘方。他们以一种令人愉快，几近艺术的方式来摆脱痛苦。

G.M. Thus far you have said nothing concerning their sciences and magistrates.

大头领： 到现在为止，您还没有讲太阳城的科学和政权。

Capt. Undoubtedly I have.

船长： 不，我已经讲过了。

But since you are so curious I will add more.

不过您对于这两个问题既然这样感兴趣，我就再来补充一些。

Both when it is new moon and full moon they call a council after a sacrifice.

每月朔望举行过祈祷仪式以后，他们就召开“大会议”。

To this all from twenty years upward are admitted, and each one is asked separately to say what is wanting in the State, and which of the magistrates have discharged their duties rightly and which wrongly.

二十岁以上的公民都要出席；每个人都有权对共和国的缺点和对政府负责人员执行工作的好坏，提出自己的意见。

Then after eight days all the magistrates assemble, to wit, Hoh first, and with him Power, Wisdom, and Love.

接下来，八天之后会举行一次全体负责人员的会议。出席的人首先是最高领导人“太阳”，然后是“威力”、“智慧”和“爱”。

Each one of the three last has three magistrates under him,

making in all thirteen, and they consider the affairs of the arts pertaining to each one of them:

后面这三位领导人手下各有三位下属，总共就十三人，他们分别掌管三个部门：

Power, of war; Wisdom, of the sciences; Love, of food, clothing, education, and breeding.

“威力”掌管军事，“智慧”负责科学，“爱”掌管食品、衣着、教育和生育。

The masters of all the bands, who are captains of tens, of fifties, of hundreds, also assemble, the women first and then the men.

负责十人团、五十人团和百人团的各领导人，按妇女优先、男子其次的顺序开始集会。

They argue about those things which are for the welfare of the State, and they choose the magistrates from among those who have already been named in the great Council.

他们讨论国事和选出大会预先提名的负责人员。

In this manner they assemble daily, Hoh and his three princes, and they correct, confirm, and execute the matters passing to them, as decisions in the elections; other necessary questions they provide of themselves.

“太阳”和他的其他三个主要领导人每天举行会议，来处理日常事务并批准有关选举的决议和检查执行决议的情况，同时也讨论其他的必要措施。

They do not use lots unless when they are altogether doubtful how to decide.

除了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解决的问题外，他们不会用抽签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The eight magistrates under Hoh, Power, Wisdom, and Love are changed according to the wish of the people, but the first four are never changed, unless they, taking counsel with themselves, give up the dignity of one to another, whom among them they know to be wiser, more renowned, and more nearly perfect.

“太阳”、“威力”、“智慧”和“爱”治下八位官员的更换，要根据人民的愿望来决定。但前四位除外，他们只有在经过协商认为可以把自己的职务移交给一位的确是最贤明、最有智慧和毫无缺点的人以后，才能离职。

And then they are obedient and honorable, since they yield willingly to the wiser man and are taught by him.

他们明理而正直，因为他们很乐意让位给最贤明的人并听从其教导。

This, however, rarely happens.

但这样的事很少发生。

The principals of the sciences, except Metaphysic, who is Hoh himself, and is, as it were, the architect of all science, having rule over all, are attached to Wisdom.

主管各个科学的人，除了归那位像建筑师一样主管各种科学的“形而上学者”（他自己就是“太阳”）的领导外，都归统治者“智慧”领导。

Hoh is ashamed to be ignorant of any possible thing.

“太阳”耻于不懂得凡人都懂得的一切。

Under Wisdom therefore are Grammar, Logic, Physics, Medicine, Astrology, Astronomy, Geometry, Cosmography, Music,

Perspective, Arithmetic, Poetry, Rhetoric, Painting, Sculpture.

因此，归“智慧”领导的有语法学家、逻辑学家、物理学家、医生、星相家、天文学家、宇宙学家、音乐家、伦理学家、算术家、诗人、修辞学家、画家和雕刻家。

Under the triumvir Love are Breeding, Agriculture, Education, Medicine, Clothing, Pasturage, Coining.

执政官“爱”主管生育、农业、教育、医药、服装、畜牧和铸造。

G.M. What about their judges?

大头领： 他们的法官又是怎样的呢？

Capt. This is the point I was just thinking of explaining.

船长： 我正要讲到这个问题。

Everyone is judged by the first master of his trade, and thus all the head artificers are judges.

在司法方面，每个公民都直接受他工作岗位上的领导人的管辖。

They punish with exile, with flogging, with blame, with deprivation of the common table, with exclusion from the church and from the company of women.

他们可以对下属作出以下的判决：流放、鞭打、训诫、禁止在公共食堂进餐、开除教籍、禁止与妇女结合。

When there is a case in which great injury has been done, it is punished with death, and they repay an eye with an eye, a nose for a nose, a tooth for a tooth,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retaliation.

如果极其严重的案子，那处以罪犯死刑或者给予同样的报复，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鼻还鼻等等。

If the offence is wilful the Council decides.

如果罪行是蓄意而为，由交由理事会裁决。

When there is strife and it takes place undesignedly, the sentence is mitigated; nevertheless, not by the judge but by the triumvirate, from whom even it may be referred to Hoh, not on account of justice but of mercy, for Hoh is able to pardon.

如果发生争斗，但不是出于预谋，则可以从轻判处．但这种判处不由法官做出，而归三位领导人来决定，而且也不是要求进行审判，而是请求赦免，因为只有“太阳”才有权赦免。

They have no prisons, except one tower for shutting up rebellious enemies, and there is no written statement of a case, which we commonly call a lawsuit.

除了有一个塔来关叛逆的敌人外，他们没有监狱。还有，他们不采用书面的诉讼程序（即一般所称的那种程序）。

But the accusation and witnesses are produc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judge and Power; the accused person makes his defence, and he is immediately acquitted or condemned by the judge; and if he appeals to the triumvirate, on the following day he is acquitted or condemned.

但原告和证人可以向“威力”和法官申诉，被告可以为自己辩护，法官就当场判决有罪或无罪；如果被告还要再向三位领导人申诉，则于第二天重新宣判。

On the third day he is dismissed through the mercy and clemency of Hoh, or receives the inviolable rigor of his sentence.

第三天，由“太阳”对被告宣布赦免或依法执行判决，

An accused person is reconciled to his accuser and to his witnesses, as it were, with the medicine of his complaint, that is, with embracing and kissing.

被告被判决后要和自己的原告以及证人言归于好，就像自己的病被治好以后对医生那样，互相拥抱和接吻，等等。

No one is killed or stoned unless by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the accuser and the witnesses beginning first.

死刑必须通过人民的手去执行。他们把犯人打死，或者用石头砸死。证人或原告首先打第一下。

For they have no executioners and lictors, lest the State should sink into ruin.

太阳城既没有刽子手和刀斧手，以免亵渎自己的国家。

The choice of death is given to the rest of the people, who enclose the lifeless remains in little bags and burn them by the application of fire, while exhorters are present for the purpose of advising concerning a good death.

另一种办法是授权犯人自杀：让他自己把一些装有火药的小袋子挂在身上，自己点燃火药，爆炸而死；而且在场的人都鼓励犯人应当

去死。

Nevertheless, the whole nation laments and beseeches God that his anger may be appeased, being in grief that it should, as it were, have to cut off a rotten member of the State.

同时，全体公民都为他的死而痛哭，祈求上帝息怒，并为国家不得不消灭一个败类而哀痛。

Certain officers talk to and convince the accused man by means of arguments until he himself acquiesces in the sentence of death passed upon him, or else he does not die.

如果犯人不同意或不愿意接受某种死刑的判决，就要派官员去说服和劝导他，否则，是不能处决犯人的。

But if a crime has been committed against the liberty of the republic, or against God, or against the supreme magistrates, there is immediate censure without pity.

但是，如果所犯的是反对国家的自由、反对上帝、反对最高领导人的罪行，那就会毫不留情立即宣判。

These only are punished with death.

这样的犯人就判处死刑。

He who is about to die is compelled to stat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eople and with religious scrupulousness the reasons for which he does not deserve death, and also the sins of the others who ought to die instead of him, and further the mistakes of the magistrates.

犯死罪的人可以在人民面前凭良心陈述自己的意见，说明自己不应该受死刑的理由，检举其他应受死刑的罪犯，也可以检举行政人员的罪行，并提出这些人应受更严重惩处的证明。

If, moreover, it should seem right to the person thus asserting, he must say why the accused ones are deserving of less punishment than he.

此外，犯人必须要说清楚，为什么被检举的人不用受到比其本人更严重的惩罚。

And if by his arguments he gains the victory he is sent into exile, and appeases the State by means of prayers and sacrifices and good life ensuing.

如果其理由有根据，则可以减轻处分改为流放。同时，他必须向上帝作祈祷、供奉祭品，并遵纪守法，以此平息太阳城公民的愤怒。

They do not torture those named by the accused person, but they warn them.

但是，那些被犯人检举的人并不会受折磨，多半只是受到申斥。

Sins of frailty and ignorance are punished only with blaming, and with compulsory continuation as learners under the law and discipline of those sciences or arts against which they have sinned.

由于软弱或无知所犯的罪行，那就对犯罪的人加以申斥，强迫他接受经验教训，或学习他由于不懂而犯罪的那些科学和技艺。

And all these things they have mutually among themselves, since they seem to be in very truth members of the same body, and one of another.

从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来说，他们就像人体的各部分一样，是互相紧密相连的。

This further I would have you know, that if a transgressor, without waiting to be accused, goes of his own accord before a magistrate, accusing himself and seeking to make amends, that one is liberated from the punishment of a secret crime, and since he has not been accused of such a crime, his punishment is changed into another.

这里，请您要注意的是，如果某个公民犯了错误而能在惩罚之前自动地向领导人坦白认错，表示悔罪并进行弥补，鉴于其未被审判定刑，就可以对他应有的罪行不进行惩罚，或改为其他的处分。

They take special care that no one should invent slander, and if this should happen they meet the offence with the punishment of retaliation.

他们特别留意，不会使任何人诽谤别人；一旦发生，对于诽谤者则要依法惩处。

Since they always walk about and work in crowds, five witnesses are required for the conviction of a transgressor.

由于他们总是集体地进行工作，所以要揭发某个人有罪，必须有五个证人。

If the case is otherwise, after having threatened him, he is released after he has sworn an oath as the warrant of good conduct.

否则，就要罪犯自己发誓并保证改正，然后给予警告后才能了事。

Or if he is accused a second or third time, his increased punishment rests on the testimony of three or two witnesses.

如果他再度受到控告，那么，这一次只须有两个或三个证人的证辞就够了，而且还要加倍处分。

They have but few laws, and these short and plain, and written upon a flat table and hanging to the doors of the temple, that is between the columns.

他们只有很少的几条法律，但都是简单而明确的条文，刻在平板上，悬于神殿的大门口，也就是神殿的柱子之间。

And on single columns can be seen the essences of things described in the very terse style of Metaphysic — viz., the essences of God, of the angels, of the world, of the stars, of man, of fate, of virtue, all done with great wisdom.

在个别的柱子上，可以看到用形而上学的观点，以非常扼要的文体对某些事物所下的定义。例如，什么是上帝，什么是天使、世界、星辰、人、命运、美德等等，字里行间充满了智慧。

The definitions of all the virtues are also delineated here, and here is the tribunal, where the judges of all the virtues have their seat.

各种美德的定义也都详细地列出。在这里，也设有法庭，设置有代表各种道德的法官的坐席。

The definition of a certain virtue is written under that column where the judges for the aforesaid virtue sit, and when a judge gives judgment he sits and speaks thus:

在每根书写着相应的定义的柱子旁边，代表该美德的法官就坐在下面。进行审判时，法官坐在那里对被告说：

O son, thou hast sinned against this sacred definition of beneficence, or of magnanimity, or of another virtue, as the case may be.

”我的孩子，您犯了违反这些神圣定义（违反了善行、慷慨等等）的罪，您念念这些定义吧！“

And after discussion the judge legally condemns him to the punishment for the crime of which he is accused — viz., for injury, for despondency, for pride, for ingratitude, for sloth, etc.

在研究完案情后，法官就根据被告所犯的罪行（因粗暴、胆怯、骄傲、疏忽等所犯的罪行）作出判决。

But the sentences are certain and true correctives, savoring more of clemency than of actual punishment.

但这些判决是明确、真实的纠偏措施，被告感受到更多的是仁慈、宽恕，而不是实际的处罚。

G.M. Now you ought to tell me about their priests, their sacrifices, their religion, and their belief.

大头领： 现在您应该向我讲一讲他们的司祭、祭祀、宗教和信仰。

Capt. The chief priest is Hoh, and it is the duty of all the superior magistrates to pardon sins.

船长： 大司祭就是“太阳”本人。所有高级司祭都可以宽恕公民们的罪行。

Therefore the whole State by secret confession, which we also use, tell their sins to the magistrates, who at once purge their souls and teach those that are inimical to the people.

他们的司祭也和我们的司祭一样，接受每个公民的秘密忏悔，纯洁他们的灵魂，同时也能了解在全国最容易犯的罪过。

Then the sacred magistrates themselves confess their own sinfulness to the three supreme chiefs, and together they confess the faults of one another, though no special one is named, and they

confess especially the heavier faults and those harmful to the State.

其次是司祭长也要向三位最高领导者忏悔自己和别人的罪过；然后把这些罪过加以综合，但不指明是谁所犯的罪过，主要的只是指出危害国家的最严重罪过。

At length the triumvirs confess their sinfulness to Hoh himself, who forthwith recognizes the kinds of sins that are harmful to the State, and succors with timely remedies.

最后，三位执政官也要向“太阳”作同样的忏悔，从而使“太阳”立即认识到的各种不利于国家的罪恶，并进行及时的补救。

Then he offers sacrifices and prayers to God.

然后他向上帝祈祷，并奉献祭品。

And before this he confesses the sins of the whole people,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publicly in the temple, above the altar, as often as it had been necessary that the fault should be corrected. Nevertheless, no transgressor is spoken of by his name.

但在这之前，大司祭会在神殿召集众人，在神坛上献祭和祈祷，为全体人民向上帝悔罪。这样做就是为了纯洁他们的灵魂所必须的，但不指出任何犯罪者的姓名。

In this manner he absolves the people by advising them that they should beware of sins of the aforesaid kind.

这样，他勉励人民，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罪过。

Afterward he offers sacrifice to God, that he should pardon the State and absolve it of its sins, and to teach and defend it.

最后，再由他向上帝献祭，祈求上帝对全国人民恕罪并为他们消罪，指点人民并保佑他们。

Once in every year the chief priests of each separate subordinate State confess their sins in the presence of Hoh. Thus he is not ignorant of the wrongdoings of the provinces, and forthwith he removes them with all human and heavenly remedies.

每一年，每个下属城市的大祭司都要代表他的人民来向“太阳”忏悔一次，以便“太阳”了解各属地的缺陷，也由他采用各种世俗的与宗教的办法来加以治理。

Sacrifice is conducted after the following manner: Hoh asks the people which one among them wishes to give himself as a sacrifice to God for the sake of his fellows.

祭祀是这样举行的：由“太阳”问人民，谁愿意为自己的同胞奉献自己以祭祀上帝。

He is then placed upon the fourth table, with ceremonies and the offering up of prayers: the table is hung up in a wonderful manner by means of four ropes passing through four cords attached to firm pulley-blocks in the small dome of the temple.

于是大家经过规定的各种仪式和祈祷之后，就把他放在第四张桌上。桌子的四角系着四根粗绳，绳子连到四个固定的滑轮上，悬在神殿的穹窿之下。

This done they cry to the God of mercy, that he may accept the offering, not of a beast as among the heathen, but of a human being.

然后他们祈求上帝大发慈悲，慨然接受这个自愿的人祭，而不是异教徒的牲畜祭品。

Then Hoh orders the ropes to be drawn and the sacrifice is pulled up above to the centre of the small dome, and there it dedicates itself with the most fervent supplications.

接着，“太阳”下令拉起绳子，把这个人祭上升到小穹窿的中心，并由他在那里作虔诚的祈祷。

Food is given to it through a window by the priests, who live around the dome, but it is allowed a very little to eat, until it has atoned for the sins of the State.

居住在这个穹窿四周小房子里的司祭，就从窗口投给他食物，但是数量非常少，直投到全国的罪过被认为已经完全赎尽为止。

There with prayer and fasting he cries to the God of heaven that he might accept its willing offering.

在那里，他不停地祈祷，并以绝食的方式祈求上帝接受他完全自愿的牺牲。

And after twenty or thirty days, the anger of God being appeased, the sacrifice becomes a priest, or sometimes, though rarely, returns below by means of the outer way for the priests.

经过二十天或三十天的祈祷，在上帝息怒之后，他就可以成为司祭，或者是穿过司祭的小房子重新下来（但这种情形是很少有的）。

Ever after, this man is treated with great benevolence and much honor, for the reason that he offered himself unto death for the sake of his country.

在这之后，这位英勇的人因他甘愿为祖国牺牲而受到人们极大的

尊敬。

But God does not require death.

而且上帝也不愿意他死去。

The priests above twenty-four years of age offer praises from their places in the top of the temple.

在神殿的上面，住着年龄在二十四岁以上的司祭，他们每天向上帝咏唱赞美诗。

This they do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t noon, in the morning and in the evening, to wit, four times a day they sing their chants in the presence of God.

他们每天在子夜、正午、早晨、傍晚时分向上帝咏唱赞美诗，每天四次。

It is also their work to observe the stars and to note with the astrolabe their motions and influences upon human things, and to find out their powers.

他们还负责观察星象、用星盘来记录星辰的运动并研究它们对人

间产生的力量和影响。

Thus they know in what part of the earth any change has been or will be, and at what time it has taken place, and they send to find whether the matter be as they have it.

因而，他们知道在地球的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会发生什么变化；同时，还派人检查这些观察是否正确。

They make a note of predictions, true and false, so that they may be able from experience to predict most correctly.

无论是否准确，他们都会记录下这些预测，从而根据所得的材料更加准确地预测自然界发生的现象。

The priests, moreover, determine the hours for breeding and the days for sowing, reaping, and gathering the vintage, and are, as it were, the ambassadors and intercessors and connection between God and man.

关于授胎、播种、收获、采葡萄的时期也由司祭来规定，他们是神与人之间的传话者和联系人。

And it is from among them mostly that Hoh is elected.

很多时候，“太阳”就从这些人中产生。

They write very learned treatises and search into the sciences.

他们记录重要的事件，并从事各种科学调查。

Below they never descend, unless for their dinner and supper, so that the essence of their heads do not descend to the stomachs and liver.

他们只是吃早饭和午饭的时候才从上面下来，因为他们也同样具有想吃食物的本性。

Only very seldom, and that as a cure for the ills of solitude, do they have converse with women.

除了健康的迫切需要而外，他们不与妇女性交。

On certain days Hoh goes up to them and deliberates with them concerning the matters which he has lately investigat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State and all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太阳”在特定的日子里会上去找他们，和他们谈论有关他在为太阳城和世界各国谋福利方面的新想法。

In the temple beneath, one priest always stands near the altar praying for the people, and at the end of every hour another succeeds him, just as we are accustomed in solemn prayer to change every fourth hour.

在神殿下面，祭坛前面经常有一个祭司在为人民祈祷。这样的祭司每小时轮换一次，和我们在做庄严的祷告时每四小时轮换一次是一样的。

And this method of supplication they call perpetual prayer.

他们称这种祈祷为“永恒的致祭”。

After a meal they return thanks to God.

每次吃完饭以后，他们就唱一支颂扬上帝的歌。

Then they sing the deeds of the Christian, Jewish, and Gentile heroes, and of those of all other nations, and this is very delightful to them.

然后歌唱基督教徒、犹太人、多神教徒和其他各民族所建立的英勇功勋，他们很欣赏这些功勋。

Forsooth, no one is envious of another.

他们不会嫉妒任何人。

They sing a hymn to Love, one to Wisdom, and one each to all the other virtues, and this they do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ruler of each virtue.

他们也在各自“王”的指挥下，歌唱赞美爱情、智慧和各种各样的美德的歌曲。

Each one takes the woman he loves most, and they dance for exercise with propriety and stateliness under the peristyles.

每个男子都会选择一位他很喜欢的女伴，在圆柱下跳起严肃而非常好看的舞。

The women wear their long hair all twisted together and collected into one knot on the crown of the head, but in rolling it they leave one curl.

妇女留长发，把头发编成一根辫子，然后在后脑壳上结成一个髻子。

The men, however, have one curl only and the rest of their hair around the head is shaven off.

男人只留一绺鬈发，其余的都剪去。

Further, they wear a slight covering, and above this a round hat a little larger than the size of their head.

他们头上扎着一块头巾，上面再戴一顶比头部稍宽的圆帽。

In the fields they use caps, but at home each one wears a biretta, white, red, or another color according to his trade or occupation. Moreover, the magistrates use grander and more imposing-looking coverings for the head.

在劳作时他们戴带缘的帽子，在家时则根据他们的职业和职务来决定帽子的颜色，如红色、白色或其他各种颜色；公职人员的帽子比较大些和美观些。

They hold great festivities when the sun enters the four cardinal points of the heavens, that is, when he enters Cancer, Libra, Capricorn, and Aries.

每年，他们都要在太阳进入世界的四个转变点时，也就是太阳进入巨蟹宫、天称宫、摩羯宫和白羊宫时，来四次庆祝盛大的节日。

On these occasions they have very learned, splendid, and, as it were, comic performances.

在这时，他们将上演经过周密考虑的、盛大的类似喜剧的戏剧。

They celebrate also every full and every new moon with a festival, as also they do the anniversarie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ity, and of the days when they have won victories or done any other great achievement.

每当每月朔望之日、建国的日子以及作战胜利的日子等等，都定为纪念日。

The celebrations take place with the music of female voices, with the noise of trumpets and drums, and the firing of salutations.

在这样的节日里，妇女们举行大合唱，号鼓震天，礼炮齐鸣。

The poets sing the praises of the most renowned leaders and the victories.

诗人则颂扬光荣的统帅和他们的胜利。

Nevertheless, if any of them should deceive even by disparaging a foreign hero, he is punished.

但如果某个诗人的颂扬缺乏真实性，甚至捏造某个英雄的事迹，他就会受到惩罚。

No one can exercise the function of a poet who invents that which is not true, and a license like this they think to be a pest of our world, for the reason that it puts a premium upon virtue and often assigns it to unworthy persons, either from fear of flattery, or ambition, or avarice.

凡是造谣的人就不配称为诗人；他们认为造谣是一种危害整个人类的行为，因为造谣可以夺去有德之人应得的赞扬，而且往往由于恐惧、阿谀、奉承或贪欲而把这些赞扬加给不道德的人。

For the praise of no one is a statue erected until after his death;

他们只是在某人死后才建立纪念他的纪念碑。

but while he is alive, who has found out new arts and very useful secrets, or who has rendered great service to the State either at home or on the battle-field, his name is written in the book of heroes.

然而对于发明某种有益的东西的人以及在平时或战时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则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把他们的事迹记录到英雄列传里。

They do not bury dead bodies, but burn them, so that a plague may not arise from them, and so that they may be converted into fire, a very noble and powerful thing, which has its coming from the sun and returns to it.

为避免瘟疫流行，他们不把死者埋葬而把他火葬，因为他们认为火具有一种稀有的和使人复生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太阳，又回到太阳中去。

And for the above reasons no chance is given for idolatry.

这种风俗还可以避免产生偶像崇拜的可能性。

The statues and pictures of the heroes, however, are there, and the splendid women set apart to become mothers often look at them.

但他们还保留着英雄人物的画像和雕像，这是为了使美丽的女子得以经常瞻仰这些形象，因为国家曾把生育子女的任务委托给她们。

Prayers are made from the State to the four horizontal corners of the world — in the morning to the rising sun, then to the setting

sun, then to the south, and lastly to the north; and in the contrary order in the evening, first to the setting sun, to the rising sun, to the north, and at length to the south.

他们在祈祷时是连续朝着四个方向进行的：早晨起初朝东，然后朝西，朝南，朝北；晚上则相反：起初朝西，然后朝东，朝北，朝南。

They repeat but one prayer, which asks for health of body and of mind, and happiness for themselves and all people, and they conclude it with the petition “As it seems best to God.”

他们总是重复同样的一种祈祷，即祈求赐给他们和世界各民族健全的身体、健全的心灵和永远的幸福，祈祷末尾则是对于神明的至高无上的智慧表示衷心的感谢。

The public prayer for all is long, and it is poured forth to heaven.

为全民祈祷的时间很长，而且是向天祈祷。

For this reason the altar is round and is divided crosswise by ways at right angles to one another.

因此，祭坛被设计为圆形，并且有四条形成直角的交叉通路。

By these ways Hoh enters after he has repeated the four prayers, and he prays looking up to heaven.

在四次的重复祈祷中每次进行完毕后，“太阳”都走过一条通路，并仰望着天祷告。

And then a great mystery is seen by them.

然后他们就会目睹一个巨大的秘密。

The priestly vestments are of a beauty and meaning like to those of Aaron. They resemble nature and they surpass Art.

大司祭的法衣是华美的，每一部分都具有像征性，极像亚伦的法衣。他们来源于自然，又超越艺术。

They divide the seasons according to the revolution of the sun, and not of the stars, and they observe yearly by how much time the one precedes the other.

他们根据太阳的公转，而不是星辰的运动，来划分四季。他们还通一年一年的观察，来确定每一年的时间差异。

They hold that the sun approaches nearer and nearer, and therefore by ever-lessening circles reaches the tropics and the equator every year a little sooner.

他们认为，太阳不断地往下降，晕圈也越来越低，因此每一年都比头一年更早到达回归线和赤道。

They measure months by the course of the moon, years by that of the sun.

他们根据月亮的运行来计算月份，根据太阳的运行来计算年份。

They praise Ptolemy, admire Copernicus, but place Aristarchus and Philolaus before him.

他们赞美托勒密，景仰哥白尼，但更推崇阿利斯塔克斯和菲洛劳斯。

They take great pains in endeavoring to underst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and whether or not it will perish, and at what time.

无论世界是否会灭亡或什么时候灭亡，他们都极努力地去了解世界的形成。

They believe that the true oracle of Jesus Christ is by the signs in the sun, in the moon, and in the stars, which signs do not thus appear to many of us foolish ones.

他们从太阳、月亮和星辰的征兆中坚信耶稣的预言是真实的，这些不是我们这些愚蠢的人能看到的。

Therefore they wait for the renewing of the age, and perchance for its end.

因此，他们期待世界的重生，以及或许是终结。

They say that it is very doubtful whether the world was made from nothing, or from the ruins of other worlds, or from chaos, but they certainly think that it was made, and did not exist from eternity.

他们也承认，人们理解世界的起源是很困难的。它不是从虚无中创造的，或从别的世界划分出来的，抑或是从混沌中产生。但他们却坚信世界是被创造的，而不是向来就存在的。

Therefore they disbelieve in Aristotle, whom they consider a logican and not a philosopher.

因此，他们不相信亚里斯多德，他们认为他是一位逻辑学家，并

不是一位哲学家。

From analogies, they can draw many arguments against the eternity of the world.

他们根据一些反常的现象提出了许多证据来反对世界永恒存在的说法。

The sun and the stars they, so to speak, regard as the living representatives and signs of God, as the temples and holy living altars, and they honor but do not worship them.

因而，他们认为太阳和星辰就如同圣殿和神圣的祭坛一样，是上帝的代表和符号，他们尊敬太阳和星辰，但不崇拜它们。

Beyond all other things they venerate the sun, but they consider no created thing worthy the adoration of worship.

虽然太阳是他们最尊敬的对象，但他们绝不崇拜任何被创造出来的东西。

This they give to God alone, and thus they serve Him, that they may not come into the power of a tyrant and fall into misery by undergoing punishment by creatures of revenge.

他们崇信、祭祀上帝，他们害怕若是把某种创造物当作神来崇拜，神就会惩罚他们，使他们受暴政的压迫或遭受灾祸。

They contemplate and know God under the image of the Sun, and they call it the sign of God, His face and living image, by means of which light, heat, life, and the making of all things good and bad proceed.

他们只是进行消极的观察而认为神就在太阳中，太阳就是神的形象、面容和生动的雕像，太阳给了他们光、热、生命、活力和一切财富。

Therefore they have built an altar like to the sun in shape, and the priests praise God in the sun and in the stars, as it were His altars, and in the heavens, His temple as it were; and they pray to good angels, who are, so to speak, the intercessors living in the stars, their strong abodes.

因此，他们的神坛建立得像太阳一样；他们的神职人员把太阳和星辰当作神来崇拜，他们以太阳和星辰为上帝的祭坛，以苍天为上帝的殿堂。他们也敬奉善良的天使，认为这些天使居住在星辰里面，是人世的庇护者。

For God long since set signs of their beauty in heaven, and of His glory in the sun.

因为，上帝在天上显示了他的光芒，在太阳中显示了他的伟大。

They say there is but one heaven, and that the planets move and rise of themselves when they approach the sun or are in conjunction with it.

他们说只有一个天空，星辰在接近太阳或与其平行时才会起升降落。

They assert two principles of the physics of things below, namely, that the sun is the father, and the earth the mother; the air is an impure part of the heavens; all fire is derived from the sun.

他们认为地球上的东西有两种物理元素：一是太阳，一种大地，太阳是父亲，大地是母亲。他们认为空气是天的不纯部分，一切火的来源是太阳。

The sea is the sweat of earth, or the fluid of earth combusted, and fused within its bowels, but is the bond of union between air and earth, as the blood is of the spirit and flesh of animals.

海是地的汗水，或者是地下所包含的物质因燃烧和蒸发而产生的液体，是空气和大地之间的联结的环结，就像生物的肉体和精神之间的联结的环节一样。

The world is a great animal, and we live within it as worms live within us.

世界是一个庞大的有生命的存在物；我们生存在它的腹内，就像蛔虫生存在我们的腹内一样。

Therefore we do not belong to the system of stars, sun, and earth, but to God only; for in respect to them which seek only to amplify themselves, we are born and live by chance; but in respect to God, whose instruments we are, we are formed by prescience and design, and for a high end.

所以，我们并不属于星辰、太阳和地球，而只属于上帝，因为星辰、太阳和地球，除了自己的扩大外，我们的出生和生命只是偶然；对于上帝来说，我们只是他的工具，是上帝根据他的预见和安排为其伟大的目的而创造的。

Therefore we are bound to no father but God, and receive all things from Him.

因此，我们没有父亲，只有上帝，并从他那里得到一切。

They hold as beyond question the immortality of souls, and that these associate with good angels after death, or with bad angels, according as they have likened themselves in this life to either.

他们认为灵魂不灭，在人们死了之后，就根据他们在尘世的行为而分别加入善天使或恶天使之群。

For all things seek their like.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物以群分。

They differ little from us as to places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他们对于进行赏罚的地点问题，和我们的见解几乎完全相同。

They are in doubt whether there are other worlds beyond ours, and account it madness to say there is nothing.

他们怀疑在我们的世界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世界；同时他们认为，否定其他世界的存在，是愚蠢的想法。

Nonentity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finite entity of God.

上帝是永恒的存在，因此没有不存在的存在。

They lay down two principles of metaphysics, entity which is the highest God, and nothingness which is the defect of entity.

他们认为形而上学有两个因素：存在（即最高的上帝）和虚无（即存在的缺陷）。

Evil and sin come of the propensity to nothingness; the sin having its cause not efficient, but in deficiency.

可见，产生罪恶的实际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有了缺点。

Deficiency is, they say, of power, wisdom, or will.

但他们所谓的缺点，是指缺乏力量，智慧或意志。

Sin they place in the last of these three, because he who knows and has the power to do good is bound also to have the will, for will arises out of them.

他们认为罪恶正是由此产生的，懂得行善和能够行善的人，应当有行善的意志，因为意志是由力量和智慧产生的，而不是意志产生力量和智慧。

They worship God in trinity, saying God is the Supreme Power,

whence proceeds the highest Wisdom, which is the same with God, and from these comes Love, which is both power and wisdom; but they do not distinguish persons by name, as in our Christian law, which has not been revealed to them.

他们也崇拜三位一体的上帝，认为上帝是最高的威力，这种威力产生了最高的智慧，这种智慧就是上帝；人们从上帝那里获得了爱，而爱也就是威力和智慧；因为产生某种东西的东西，一定要有产生某种东西的本性。

This religion, when its abuses have been removed, will be the future mistress of the world, as great theologians teach and hope.

正如伟大的神学家所教导和所期望的那样，这种信仰在去除掉其恶行后，将统治全世界。

Therefore Spain found the New World (though its first discoverer, Columbus, greatest of heroes, was a Genoese), that all nations should be gathered under one law.

因此，西班牙人之所以发现新大陆（虽然首先发现它的是我们最英勇的热那亚人哥伦布），其目的是要使一切民族都按统一的法律联合起来。

We know not what we do, but God knows, whose instruments we are.

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上帝知道，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工具。

They sought new regions for lust of gold and riches, but God works to a higher end.

人们去寻找新的国家，为了黄金和财富，而上帝追求的是崇高的目的。

The sun strives to burn up the earth, not to produce plants and men, but God guides the battle to great issues.

太阳虽然照热了地球，但它根本不能创造植物，也不能创造人类，而上帝则能利用其使人类趋于繁荣。

His the praise, to Him the glory!

应该赞美上帝！荣誉属于上帝！

G.M. Oh, if you knew what our astrologers say of the coming age, and of our age, that has in it more history within 100 years than all the world had in 4,000 years before! of the wonderful inventions of printing and guns, and the use of the magnet, and how it all comes of Mercury, Mars, the Moon, and the Scorpion!

船长： 啊！如果您能知道我们的占星家对未来和当下所说一切，又不知作何感想呢！他们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作的重大事件要比全世界四千年所作的还多；这一百年来，印刷术和火枪的发明、磁石的运用，他们都认为是在水星、火星、月亮、火星和天蝎座的影响下才得以实现。

Capt. Ah, well! God gives all in His good time. They astrologize too much.

船长： 好吧！上帝给了我们所有这一切，隐藏在日月星辰之中。

[1_1].A pace was 1-9/25 yard, 1,000 paces making a mile

[2_1].一步大约1-9/25码，1000步就是1英里。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Birth of Tragedy
悲剧的诞生

Friedrich Nietzsche

弗里德里希·尼采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悲剧的诞生

The Birth of Tragedy

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吴艾玲 译

目 录

- An Attempt at Self-Criticism 自我批评的尝试
- Preface to Richard Wagner 致理查德·瓦格纳之序言
- The Birth of Tragedy 悲剧的诞生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An Attempt at Self-Criticism

自我批评的尝试

1 [1_1]

1 [2_1]

Whatever might have been the basis for this dubious book, it must have been a question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and charm, as well as a deeply personal one. Testimony to that effect is the time in which it arose, in spite of which it arose, that disturbing era of the Franco-Prussian war of 1870-71. While the thunderclap of the Battle of Wörth was reverberating across Europe, the meditative lover of enigmas whose lot it was to father this book sat somewhere in a corner of the Alps, extremely reflective and perplexed, thus simultaneously very distressed and carefree, and wrote down his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Greeks, the kernel of that odd and difficult book to which this later preface (or postscript) should be dedicated. A few weeks after that, he found himself under the walls of Metz, still not yet free of the question mark which he had set down beside the alleged “serenity” of the Greeks and of Greek culture, until, in that month of the deepest tension, as peace was being negotiated in Versailles, he finally came to peace with himself and, while slowly recovering from an illness he had brought back home with him from the field, finished composing the Birth of Tragedy out of the Spirit of Music.

无论这本让人心存疑虑的著作因何而写，书中所讨论的问题一定非常重要、非常迷人，当然也非常个性化。这点可以通过该书完成于

1870－1871年普法战争这一动荡不安的年代得以印证（也就是说，战争的炮火并未阻挡该书的诞生）。正当沃斯之战的炮声响彻欧洲，这位热衷思考谜题，注定要写下该书的人却独自坐在阿尔卑斯山一角，凝神沉思，深感困顿迷茫（沮丧和畅快之情相互交织）。他将自己对希腊人的思考付诸笔端，就是这本奇怪且难懂的著作的核心部分。眼下这篇后著的前言（或后记）即为此书而写。之后的数周时间里，他来到了法国的麦茨城，但心中仍然在惦记之前所思考的希腊人和希腊文化中所谓的“沉静”问题。直到局势最紧张的那个月，也就是凡尔赛举行和平谈判之时，他的内心最终才得以平静。他从战场上带回的病在慢慢地治愈，身体也逐渐恢复，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悲剧在音乐精神中诞生》一书。

—From music? Music and tragedy? The Greeks and the Music of Tragedy? The Greeks and the art work of pessimism? The most successful, most beautiful, most envied people, those with the most encouraging style of life—the Greeks? How can this be? Did they really need tragedy? Even more to the point, did they really need art? And Greek art, what is that, and how did it come about?

悲剧来自于音乐？音乐和悲剧？希腊人和悲剧之乐？希腊人和悲观主义的艺术作品？来自于最成功、最美丽、最受人羡慕的人，那些享受着最令人鼓舞的生活方式的——希腊人？这怎么可能呢？希腊人？他们真的需要悲剧吗？更重要的是，他们真的需要艺术吗？希腊艺术，是什么，怎么来的？

One can guess from all this just where the great question mark about the worth of existence was placed. Is pessimism necessarily the sign of collapse, destruction, and disaster, of the exhausted and enfeebled instinct, as it was among the Indians, as it is now, to all

appearances, among us, “modern” peoples and Europeans? Is there a pessimism of the strong? An intellectual inclination for what in existence is hard, dreadful, angry, and problematic, emerging from what is healthy, from overflowing well being, from living existence to the full? Is there perhaps a way of suffering from the very fullness of life, a tempting courage of the keenest sight which demands what is terrible, like an enemy—a worthy enemy—against which it can test its power, from which it will learn what “to fear” means?

从这一切，人们可以猜出关于生存的价值方面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大问题。悲观主义必然标志着崩溃、破坏和灾难吗？必然标志着疲惫和衰弱的本能吗，就像过去的印第安人那样，或如种种迹象表明，像我们这些“现代”人和欧洲人所显现的那样？强者有悲观情绪吗？人们享受着健康、满满的幸福和充实的生活，为何反而在理智上倾向选择困苦、恐怖、愤怒和问题？是否会有这么一种可能——正是由于生活太满足，反而产生了痛苦。因此，目光犀利者便壮着胆子想试着寻找最可怕的东西，比如敌人——值得交手的敌人，只有与敌人交手才能测试出这种勇气的威力；从敌人那里，人们才能品尝到“害怕”的滋味。

What does the tragic myth mean precisely for the Greeks of the best, strongest, and bravest age? What about that tremendous phenomenon of the Dionysian? And what about what was born out of the Dionysian—the tragedy? By contrast, what are we to make of what killed tragedy—Socratic morality, dialectic, the satisfaction and serenity of the theoretical man? Could not this very Socratic way be a sign of collapse, exhaustion, sicknes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anarchic instinct? And could the “Greek serenity” of later Greek periods be only a red sunset? Could the Epicurean will hostile

to pessimism be merely the prudence of a suffering man? And even scientific enquiry itself, our science—indeed, what does all scientific enquiry in general mean considered as a symptom of life? What is the point of all that science and, even more serious, where did it come from? What about that? Is scientific scholarship perhaps only a fear and an excuse in the face of pessimism, a delicate self-defence against—the Truth? And speaking morally, something like cowardice and falsehood? Speaking unmorally, a clever trick? Oh, Socrates, Socrates, was that perhaps your secret? Oh you secretive ironist, was that perhaps your—irony?

对于处在最美好、最强盛、最勇敢时代的希腊人而言，悲剧神话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个宏大的酒神精神现象意味着什么？还有，诞生于酒神精神的——悲剧又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我们又如何去理解苏格拉底哲学里的道德观、辩证法，以及理论者的自满和沉寂——这些扼杀悲剧的原因？难道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思维方式不是崩溃、衰竭、病态，以及混乱本能解体的象征？后期希腊呈现出来的“希腊人的从容”会不会只是夕阳残照？与悲观主义相对立的伊壁鸠鲁意志会不会只是受苦之人的谨慎之道？甚至还有科学探究的本身，我们的科学——是的，所有的被视为生命特征的科学探究总体而言意味着什么？那种科学所做的研究有何意义，如果进一步严肃地探究的话，它来自何处？那又如何呢？科学精神是否有可能是人们在悲观主义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害怕和逃避，或是为了反对真理所做出来的巧妙的自我辩护？从道德层面来说，是否有点像怯懦和虚伪？从非道德层面来讲，是否是一种机灵？哦，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啊，莫非那是你的秘密？哦，你这个诡秘的冷嘲者，那也许是你的——冷嘲吧？

2

2

What I managed to seize upon at that time, something fearful and dangerous, was a problem with horns (not necessarily a bull exactly, but in any event a new problem). Today I would state that it was the problem of scholarship itself, scholarly research for the first time grasped as problematic, as dubious. But that book, in which my youthful courage and suspicion then spoke, what an impossible book had to grow out of a task so contrary to the spirit of youth! Created out of merely premature and really immature personal experiences, which lay close to the threshold of something communicable, and built on the basis of art (for the proble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annot be understood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enquiry)—a book perhaps for artists with analytical tendencies and a capacity for retrospection (that means for exceptions, a type of artist whom it is necessary to seek out and whom one never wants to look for), full of psych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artists' secrets, with an artist's metaphysics in the background, a youthful work full of the spirit of youth and the melancholy of youth, independent, defiantly self-sufficient as well, even where it seemed to bow down with special reverence to an authority—in short, a first work also in the bad sense of the word, afflicted, in spite of the antiquity of the problem, with every fault of youth, above all with its excessive verbiage and its storm and stress.

我当时捕捉到的是某个可怕而危险的东西——一个带有犄角的大难题；虽然并非真的如同捉公牛一般困难，但无论如何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新的问题。如今，我更愿意把它说成是学术本身的问题。学术研究首次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且遭受到了质疑。那本书道出了我一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怀疑。说它是一本如此不可思议的书，是因为它所完成的任务有悖于年轻人的精神，因为该书是基于早熟的并且很不成熟的个人体验所撰写的，这些体验几乎难以用言辞表达。本书的观点表达起来较为困难，并以艺术为基础，因为科学研究的问题是不可能从科

学探究的角度理解的，因此可以说，该书是写给喜欢分析、善于回顾的艺术家们看的（指的是另类的艺术家，把他们找出来很必要，但没有人真的想把他们找出来）。书中以艺术家的形而上学做背景，充满了心理学的创新概念和艺术家们的秘诀。这本年轻之作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和忧伤。虽然它在某些地方似乎带着崇敬的心情向权威示弱，但仍然表现出独立，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一面——总之，用贬义词来形容这本书就是：尽管书中所讨论的是一个古老的问题，犯有年轻人容易犯的种种错误，特别是语言冗长乏味，但它仍然不失为一部首创之作，经历过风风雨雨。

On the other hand, looking back on the success the book had (especially with the great artist to whom it addressed itself, as if in a conversation, that is, with Richard Wagner), the book proved itself—I mean it was the sort of book which at any rate was effective enough among “the best people of its time.” For that reason the book should at this point be handled with some consideration and discretion. However, I will not totally hide how unpleasant the book seems to me now, how strangely after sixteen years it stands there in front of me, an older man, a hundred times more discriminating, but with eyes which have not grown colder in the slightest. The issue which that bold book dared to approach for the first time has itself become no more remote: to look at scientific enqui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rtist, but to look at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另一方面，回顾这本书的成功（特别是向伟大的艺术家理查德·瓦格纳致敬的部分，仿佛与其展开对话，进行交流），可以看出本书已经证实了自己的重要性——我的意思是，该书在当代无论如何也能算得上是一部一流作品。为此，读者必须认真、谨慎地对待它。当然，我现在也不想彻底隐瞒，我觉得这本书多么不顺眼啊！时隔16年，它

突然摆在我的面前，好不怪异！我年纪是大了一些，但眼光却一点也没有变冷，辨别能力也比过去强上百倍。我在这本书中首次斗胆所讨论的问题本身不再遥远了，即从艺术家的视野来进行科学探讨，同时从生活的角度来看待艺术……

3

3

Let me say again: today for me it is an impossible book. I call it something poorly written, ponderous, painful, with fantastic and confused imagery, here and there so saccharine it is effeminate, uneven in tempo, without any impulse for logical clarity, extremely self-confident and thus dispensing with evidence, even distrustful of the relevance of evidence, like a book for the initiated, like “Music” for those baptized in music, those who are bound together from the start in secret and esoteric aesthetic experiences, a secret sign recognized among artistic blood relations, an arrogant and rhapsodic book, which right from the start hermetically sealed itself off from the profane vulgarity of the “intelligentsia” even more than from the “people,” but a book which, as its effect proved and continues to prove, must also understand enough of this issue to search out its fellow rhapsodists and tempt them to new secret paths and dancing grounds.

再说一遍：在我看来，如今的我是不可能写出这本书的。这本书写得很糟糕，写得凝重而痛苦，到处充满梦幻般混乱的意象，嗲声嗲气像个女人，节奏也不均匀。无心追求逻辑的清晰，极端自信以至于缺乏证据，甚至怀疑证据的重要性。最终弄得如同写给入门人看的书，或是如同写给接受过音乐洗礼之人的乐曲，他们从一开始就在一

起接受过神秘而深奥的审美体验，这种神秘性表现在它把所有的具有艺术血缘关系的人聚集了在一起。这是一本狂妄自大、无所顾忌的书。从一开始就不与“大众”沾边，甚至与“知识分子”也没有半点关系。但本书有足够的深度，能找到它的知音，并引导他们步入崭新的神秘之路和舞场，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今后这一点也会继续被印证。

At any rate here a strange voice spoke—curious people understood that, as did those who found it distasteful, the disciple of an as yet “unknown God,” who momentarily hid himself under the hood of a learned man, under the gravity and dialectical solemnity of the German man, even under the bad manners of the followers of Wagner. Here was a spirit with alien, even nameless, needs, a memory crammed with questions, experiences, secret places, beside which the name Dionysus was written like a question mark. Here spoke—so people told themselves suspiciously)—something like a mystic and an almost maenad-like soul, which stammered with difficulty and arbitrarily, as if talk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almost uncertain whether it wanted to communicate something or remain silent. This “new soul” should have sung, not spoken! What a shame that I did not dare to utter as a poet what I had to say at that time. Perhaps I might have been able to do that! Or at least as a philologist—even today in this area almost everything is still there for philologists to discover and dig up, above all the issue that there is a problem right here and that the Greeks will continue to remain, as before, entirely unknown and unknowable as long as we have no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Dionysian?”

不管怎么说，这里有一个怪异的声音在说话（这一点为好奇的人

及对其反感的人所公认），是一位信徒在说话，其信奉的神灵迄今为止鲜为人知。他暂时给自己冠以一个学者的帽子，带着德国人的庄重以及辩证的严肃性，同时也可以说不排斥受到瓦格纳追随者的不良做法的影响。这是一个带有另类的，甚至无名需要的灵魂；也是一种充满疑问、充满不同经历、充满神秘之处的回忆（旁边是狄奥尼索斯的名字，写得如问号一般）。这像是一个神秘的，女祭司般的灵魂说出的话（人们狐疑地对自己说），结结巴巴、随心所欲，好似在用外语说话，连他自己似乎都不知道是想表达思想还是想保持沉默。这个“新的灵魂”本该把他所要说出来的话唱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只可惜，我当时没有像诗人的勇气，把心中想说的话通过歌咏的方式表达出来。也许我本来是可以做到的！或者起码能够像一位语言学家那样（即使到今天，在这个领域里，几乎所有的地方仍然有待于语言学家去发现和挖掘），去发现和挖掘最重要的问题。而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果不能够找出“什么是酒神精神”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希腊人将会继续像以前一样，完全不被人们了解，也不能够被人理解。

4

4

Indeed, what is the Dionysian? This book offers an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a “knowledgeable person” speaks there, the initiate and disciple of his own god. Perhaps I would now speak with more care and less eloquently about such a difficult psychological question as the origin of tragedy among the Greeks. A basic issue i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Greeks to pain, the degree of their sensitivity. Did this relationship remain constant? Or did it turn itself around? That question whether their constantly strong desire for beauty, feasts, festivities, and new cults arose out of some lack, deprivation, melancholy, or pain. If we assume that this desire for

the beautiful and the good might be quite true—and Pericles, or, rather, Thucydides, in the great Funeral Oration gives us to understand that it is—where must that contradictory desire stem from, which appears earlier than the desire for beauty, namely, the desire for the ugly or the good strong willing of the ancient Hellenes for pessimism, for tragic myth, for pictures of everything fearful, angry, enigmatic, destructive, and fateful as the basis of existence? Where must tragedy come from? Perhaps out of desire, out of power, out of overflowing health, out of overwhelming fullness of life?

的确，什么是酒神精神呢？这本书给出了答案：在那说话的人是一个“智者”，他是自己上帝的追随者和信徒。对于像悲剧起源于希腊人这个难以回答的心理学问题，现在的我，也许应该多一份谨慎，少一份侈谈。这个问题的基本点在于希腊人与痛苦之间的关系，也在于他们对痛苦的敏感度。难道这种关系迄今为止未曾改变过吗？还是早已有所变化？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弄清楚这一点，即希腊人一向强烈地追求的美、盛宴、节日以及新的崇拜对象，是否来自于在某些方面的匮乏、贫困、忧郁或痛苦。假如我们能够断定希腊人这种向往确实是真的——实际上伯里克利，或者更确切地说修西得底斯，在大葬礼上所做的演说已经证明了那点——那么，这种相反的渴望又是从何而来？它可是早于对美的渴望啊！这个相反的渴望就是对丑的渴望，或者说古希腊人对悲观主义和悲剧神话有着强烈的意志。他们渴望一切令人恐惧的、愤怒的、神秘的，具有破坏性的画面能作为生存的基础。悲剧来源于何处？也许来源于欲望，来源于权力，来源于超强的身体健康，或是来源于无以复加的幸福生活？

And psychologically speaking, what then is the meaning of that madness out of which tragic as well as comic art grew, the Dionysian madness? What? Is madness perhaps not necessarily the

symptom of degradation, collapse, cultural decadence? Is there perhaps (a question for doctors who treat madness) a neurosis associated with health, with the youth of a people, and with youthfulness? What is revealed in that synthesis of god and goat in the satyr? Out of what personal experience, what impulse, did the Greeks have to imagine the Dionysian enthusiast and original man as a satyr? And what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tragic chorus?

那么，从心理学角度而说，产生悲剧艺术和喜剧艺术的疯狂，即酒神的疯狂有着何等的意义？什么？也许疯狂未必是堕落、崩溃和文明颓废的象征？也许（这个问题是提给专治神经病的医生的）与神经官能症是否健全有关，与一个民族的年轻人有关，与青春期有关？希腊神话中的萨堤尔半神半羊的样子揭示了什么？希腊人出于什么样的个人经历，什么样的冲动非得把热衷于酒神的人和原始人想象成半神半羊的样子？还有，悲剧合唱队起源于什么？

In those centuries when the Greek body flourished and the Greek soul bubbled over with life, perhaps there were endemic raptures, visions, and hallucinations which entire communities, entire cultural bodies, shared. What if it were the case that the Greeks, right in the midst of their rich youth, had the desire for tragedy and were pessimists? What if it was clearly lunacy, to use a saying from Plato, which brought the greatest blessings throughout Hellas?

也许是在那几百年里，希腊人身强力壮、精神抖擞，所以举国上下崇尚狂欢、想象和幻想，并且城邦之间、文化社团之间互相交流。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即希腊人正值年富力强的时期，反倒去追求悲剧，做悲观主义者，那会怎么样呢？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显然就是癫

狂给希腊人带来了最大的福祉。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又能怎么样呢？

And, on the other hand, what if, to turn the issue around, it was clearly during the time of their dissolution and weakness that the Greeks became constantly more optimistic, more superficial, more hypocritical, with a lust for logic and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more cheerful” and “more scientific”? What's this? In spite of all “modern ideas” and the judgments of democratic taste, could the victory of optimism, the developing hegemony of reasonableness,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utilitarianism, as well as democracy itself (which occurs in the same period) perhaps be a symptom of failing power, approaching old age, physiological exhaustion, all these factors rather than pessimism? Was Epicurus an optimist for the very reason that he was suffering? We see that this book was burdened with an entire bundle of difficult questions. Let us add its most difficult question: Wha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living, does morality mean?

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把问题倒过来看，显然可以看出：希腊人在瓦解和衰弱的年代里，除了表现得“更加开心”、“更加细致严谨”外，还经常表现为更加乐观、更加肤浅、更加虚伪，这种虚伪表现在渴望能对这个世界作出符合逻辑的理性理解。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尽管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现代思想”，都是对民主格调的研判，但是乐观主义的胜利，占据优势的理性，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以及民主本身（这发生在同一时期）都有可能标志的是体力的衰退，年老的将至和身心的疲惫，一切的一切，什么因素都有，唯一没有的就是悲观主义？就是因为伊壁鸠鲁正在深受苦难，我们就可以称他为乐观主义者？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所涉及的是一大批难题。但是最大的难题却是：从生活的角度来看，道德

意味着什么？

5

5

The preface to Richard Wagner already proposed that art, and not morality, was the essential metaphysical human activity, and in the book itself there appears many times over the suggestive statement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e world is justified only as an aesthetic phenomenon. In fact, the entire book recognizes only an aesthetic sense and a deeper meaning under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a “God,” if you will, but certainly only a totally unthinking and amoral artist-God, who in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in good things and bad, dispassionately desires to become aware of his own pleasures and power, a God who, as he creates worlds, rids himself of the strain of fullness and superfluity, from the suffering of pressing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The world is at every moment the attained manifestation of God, as the eternally changing, eternally new vision of the person who suffers most, who is the most rent with contradictions, the one with the richest sense of protest, who knows how to save himself only in illusion.

在《致查理斯·瓦格纳之前言》里已经提出过，是艺术而不是道德是人类最基本的形而上学活动。在书的正文里，也多次提到这样一个令人思考的命题——使世界得以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审美现象。实际上，全书只承认一种审美意识，以及事发背后的更深层的意义；假如你愿意，也可以这样说：全书承认的是一种“神”：一种全然无思辨能力和道德感的艺术家；一种冷静地渴望在经历中创造与毁灭，在好事与坏事的过程中能认识到自己的快乐和力量的神：一种在他创造世界

的同时，能摆脱自满情绪的约束和释放内心积压已久的矛盾的神。这个神每时每刻会在这个世界完美显灵，而他常常以一个变幻莫测、常变常新的人的形象出现。他受苦最多、矛盾最多，最富有抵抗精神，即使在幻觉中他也能知道如何拯救自己。

People may call this entire artistic metaphysic arbitrary, pointless, and fantastic, but the essential point about it is that it already betrays a spirit which will at some point establish itself on that dangerous ground and make a stand against the moralistic interpretation and moral meaningfulness of existence. Here is announced, perhaps for the first time, a pessimism “beyond good and evil.” Here comes that “perversity in belief” in word and formula against which Schopenhauer never grew tired of hurling his angriest curses and thunderstones in advance, a philosophy which dared to place morality itself in the world of phenomena and so to subsume it, not under the “visions” (in the sense of some idealistic end point) but under “illusions,” as an appearance, delusion, fallacy, interpretation, something made up, a work of art.

也许大家都认为，这里所有的形而上学艺术过于随性、无目标，也很荒诞。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已经违背了某种精神，使得自己有的时候建立在危险的理论基础之上，并且站在对生存做出道德层面上的解释和道德意义化的对立面。也许在此，悲观主义首次被认为“超越了好坏之分”。语言和套路上也出现了“信仰的颠覆”。为了抵制信仰的颠覆，叔本华总是早早地、不知厌倦地把愤怒的谴责和攻击抛了出去。“信仰的颠覆”是一种哲学，它敢于把道德本身放置在现象世界里，不再把道德归属到“想象”的领域里（按照唯心主义术语的含义），而是把它归属到“幻象”的范畴，例如：一种外观、错觉、谬误、解释、编造之物或一个艺术作品。

Perhaps we can best gauge the depth of this tendency hostile to morality from the careful and hostile silence with which Christianity is treated in the entire book, Christianity as the most excessive and thorough figuring out of a moralistic theme which humanity has ever had available to listen to. To tell the truth, there is nothing which stands more in opposition to the purely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and justification of the world, as it was set out in this book, than Christian teaching, which is and will remain merely moralistic and which, with its absolute moral standards (for example, with its truthfulness of God), relegates art to the realm of lies—in other words, which denies art, condemns it, and passes sentence on it.

也许，我们最好通过整本书在谈论基督教时采取的谨慎与敌意的沉默来测量这种反道德倾向有多深。基督教是人类迄今为止人们所能听到的道德主旋律之渲染最过分但又最彻底的华彩乐章。说实话，对于世界进行单纯性的审美和合理化的解释，没有哪个能堪比基督教的教义，这点书上说得清清楚楚。基督教的教义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唯有道义论。它将以道德作为绝对的准绳（例如上帝真实存在），把艺术纳入谎言范畴——换句话来说，就是否定艺术、谴责艺术，给艺术判以死刑。

Behind such a way of thinking and evaluating, which must be hostile to art, so long as it is in any way consistent, I always perceived also something hostile to life, the wrathful, vengeful aversion to life itself for all life rests on appearance, art, illusion, optics, the need for perspective and for error. Christianity was from the start essentially and thoroughly disgust and weariness with life, which only dressed itself up, only hid itself in, only decorated itself with the belief in an “other” or “better” life. The hatred of the

“world,” the curse against the emotions, the fear of beauty and sensuality, a world beyond created so that the world on this side might be more easily slandered, at bottom a longing for nothingness, for extinction, for rest, until the “Sabbath of all Sabbaths”—all that, as well as the absolute desire of Christianity to value only moral worth, has always seemed to me the most dangerous and most eerie form of all possible manifestations of a “Will to Destruction,” at least a sign of the deepest illness, weariness, bad temper, exhaustion, and impoverishment in living—for in the eyes of morality (and particularly Christian morality, that is, absolute morality) life must be seen as constantly and inevitably wicked, because life is something essentially amoral. Hence, pressed down under this weight of contempt and eternal No's, life must finally be experienced as something not worth desiring, as something worthless. And what about morality itself? Isn't morality a “desire for the denial of life,” a secret instinct for destruction, a principle of decay, diminution, and slander, a beginning of the end, and thus, the greatest of all dangers?

只要这种一定敌视艺术的思维方式和评价方式自始至终保持一致的话，我总能在其背后察觉到那是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愤怒至极、心存报复的憎恶，因为生命全部仰仗于外观、艺术、幻觉、观感、以及需要得到正确的和错误的观点。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对生活极度的厌恶与厌倦，但它只是穿上了相信世上还存在一种“其他”或“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的外衣罢了，把自己藏于其中，包装起来。仇恨“世界”、诅咒感情、害怕美丽与性欲，在某个彼岸创建一个世界，这样就可以更好地鞭挞此岸的世界。归根到底，渴望虚无、灭绝、长眠，直到“安息日的安息”为止。这一切以及基督教所绝对崇尚唯有道德才有价值的理念在我看来，是种种“追求毁灭的意志”中最危险、最可怕的一种表现形式。至少可以说它已经病入膏肓、疲惫不堪、脾气暴躁、精疲力竭、生活窘迫——因为在道德（尤其是基督教的道德，即绝对的道

德）眼中，生活必定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邪恶东西，因为生活是某种极不道德的东西。因此，在蔑视和永恒否定的重压下，生活一定最终被体验为不值得向往的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那么，道德本身又是什么呢？难道道德不是渴望否定生活，不是一个渴望毁灭的隐蔽本能？难道不是一种衰落、萎缩、诽谤的原则，一种末日的开始，因此在所有的危险中成为最大的危险？

And so, my instinct at that time turned itself against morality in this questionable book, as an instinctual affirmation of life, and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doctrine, a totally opposite way of evaluating life, was invented, something purely artistic and anti-Christian. What should it be called? As a philologist and man of words, I baptized it, taking some liberties (for who knew the correct name for the Antichrist?), after the name of a Greek god: I called it the Dionysian.

因此，在这本争论多端的书籍里，随着我对生活做出本能的肯定，持有根本不同的信条以及对生活所持有的全然相反的评价方式，就在那顷刻之间，我的本能开始抨击道德了，这就是所谓的纯艺术和反基督教。不这样叫，还能叫做什么呢？虽然我是一名语言学者和言辞家，但是我还是冒昧地给它取上一个希腊神的名字（因为谁知道反基督的合适称谓是什么呢？）：我称它为酒神精神。

6

6

Do people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task I dared to stir up with this book? How much I now regret the fact that at the time I

didn't have the courage (or the presumptuousness?) to consider allowing myself a personal language appropriate to such an odd point of view and such a daring exploit—that I sought laboriously to express strange and new evaluations with formulas from Schopenhauer and Kant—something which basically went quite against the spirit of Kant and Schopenhauer, as well as against their tastes!

大家是否能够明白我在这本书里挑战了什么核心问题？我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勇气（或者说没有胆量？）考虑使用个人的语言，否则我可以更加贴切地阐述如此奇怪的观点和如此大胆的探索。相反，我却费力地套用叔本华和康德的路子，做出奇特而又新颖的评估——而评估的内容从本质上来说又与康德和叔本华的精神和趣味恰恰相反！

What then did Schopenhauer think about tragedy? He says, “What gives all tragedies their characteristic drive for elevation is the working out of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world and life cannot provide any just satisfactions, and thus our devotion to it is not worthwhile; the tragic spirit lives on in that insight, and it leads from there to resignation” (*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 , II, p. 495). Oh, how differently Dionysus speaks to me! Oh, how far from me then was just this entire doctrine of resignation!—But there is something much worse about my book, something which I regret even more than to have obscured and spoiled my Dionysian premonitions with formulas from Schopenhauer: namely, that I generally ruined for myself the magnificent problem of the Greeks, as it arose in me, by mixing it up with the most modern issues! I regret that I tied myself to hopes where there was nothing to hope for, where everything indicated all too clearly an end point! I regret that, on the basis of the most recent German music, I began to tell

stories of the “German character,” just as if that character might be about to discover itself, to find itself again. And all that at a time when the German spirit (which not so long before had the desire to rule Europe and the power to assume leadership of Europe) was, as it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abdicating and, beneath the ostentatious pretext of founding an empire, making the transition to a negotiated moderation, to democracy and “modern ideas”!

那么，叔本华对悲剧持有什么观点呢？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第495页里说：“要想明白是什么使得所有类型的悲剧富有典型的从上力量，就得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世界和生命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满足，因而不值得我们去依恋；悲剧的精神即在其中，它引导我们听天由命。”嘿，酒神精神告诉我的是多么的不同啊！嘿，这全套的听天由命法则与我当时是多么格格不入啊！——但是，在这本书里有着更为糟糕的地方，这些地方比起我套用叔本华的思想来隐晦和破坏我对酒神精神的研判还令我后悔。这就是：我总是把希腊人最重要的问题与当代问题混为一谈，从而亲手把希腊人最重要的问题给毁掉！我后悔在没有希望的地方寄予了希望，在败局已定的地方仍然寄予希望。我后悔，我基于的是德国最新音乐，却在那里大谈“德国特征”，仿佛这种精神可能不久就会自我发现、再现自己。其实在当时，德国精神已经处于日趋衰败的格局（不久之前还在雄心勃勃地想要统治欧洲，并且也有这个势力继续维持它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尽管它想做出最后的努力和证明，但格局难改，于是它只能在要建立帝国这个漂亮的幌子下，把这种衰亡说成是通过谈判取得平稳局面的表现，说成是民主和“现代思想”的表现！

As a matter of fact, in the intervening years I have learned to think of that “German character” without any hope and without mercy—similarly with German music, which is Romantic through and through and the most un-Greek of all possible art forms, and

besides that, the worst sort of narcotic, doubly dangerous among a people who love drink and honour lack of clarity as a virtue, because that has the dual character of a drug which simultaneously intoxicates and befuddles the mind. Of course, set apart from all the rash hopes and the defectiv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o present times with which I then ruined my first book, the great Dionysian question mark remains still standing, as it is set out there (also in relation to music): How should a music be created which is no longer Romantic in origin (like the German) but Dionysian?

事实上，在此期间的多年，我已经学会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和怜悯之心去看待“德国精神”了。对于看待德国音乐，也是一样。德国音乐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在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里它最非希腊化。不仅如此，它具有很强的麻醉作用。对于一个既爱喝酒，又视迷糊为美德的民族而言，这种音乐是具有双重危险性的。因为它像毒品一样，既能让人陶醉，同时也能使人大脑麻痹。当然，我当时轻率地抱有种种希望，以及不恰当地使用当前时势的做法毁掉了我的处女作。即便这样，伟大的酒神精神始终是本书常设的问题，这点通篇可以看到（音乐问题也是如此）：怎样才能创造出一种音乐，它骨子里不再具有浪漫的情怀（像德国音乐那样），而是具有酒神的精神？

7

7

But, my dear sir, what in the earth is Romantic if your book is not? Can the deep hatred against modernism, reality, and modern ideas go any further than it does in your artists' metaphysics, which would sooner believe in nothingness or the devil than in the here and now? Does not a fundamental bass note of anger and desire for

destruction rumble underneath all your contrapuntal vocal art and seductive sounds, a raging determination in opposition to everything contemporary, a desire which is something not too distant from practical nihilism and which seems to say “I'd rather that nothingness were the truth than that you were right, than that your truth was justified!”

可是，我亲爱的先生，倘若您的书不是浪漫主义，那究竟什么是浪漫主义呢？人们对现代主义、现实状况和现代思想的憎恨怎能比得上对您这位艺术家的形而上学论的憎恨？您这艺术家的形而上学论宁愿相信虚无或魔鬼，也不相信眼前和现在的事实。在你所有的对位声乐艺术和诱人的音响里，演奏的不是愤怒和渴望毁灭的低音音符吗？不是一种誓死都要决心反抗一切现代东西的勃然大怒？不是一种对近乎于现实中虚无缥缈的东西的渴望？这个渴望似乎在说“我宁愿相信无物为真，也不相信你为真，也不相信你的真为真！”

Listen to yourself, my pessimistic gentleman and worshipper of art, listen with open ears to a single selected passage from your book, to that not ineloquent passage about the dragon killer, who may sound like an awkward pied piper to those with young ears and hearts. What? Is your book not a true and justified Romantic declaration of 1830, under the mask of the pessimism of 1850, behind which is already playing the prelude to the usual Romantic finale—break, collapse, return, and prostration before an ancient belief, before the old gods. . . . What? Isn't your book of pessimism itself an anti-Greek and Romantic piece, even something “as intoxicating as it is befuddling,” in any event, a narcotic, even a piece of music, German music?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听听您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吧，我的悲观主义先生、艺术的崇拜者；竖起耳朵听听我从您书中摘录的一段话吧，那个关于屠龙之士颇为雄辩的段落。尽管屠龙之士在年轻人的耳朵和心灵里听上去像个穿着花哨衣服、笨手笨脚的吹笛手。什么？您的书不是1830年正版合法的浪漫主义宣言，戴的是1850年悲观主义的面具，其后却响起的是常规浪漫主义终曲的前奏曲——在古老的信仰和传统的诸神面前分裂、倒塌、回归、崇拜？……什么？您那本关于悲观主义的书不正是带有“既让人陶醉又让人迷惑”成分的反希腊人和浪漫主义之作？难道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麻醉剂，甚至是一首音乐，一首德国音乐？请开始听吧：

> Let's picture for ourselves a generation growing up with this fearlessness in its gaze, with this heroic push into what is monstrous; let's picture for ourselves the bold stride of these dragon slayers, the proud audacity with which they turn their backs on all the doctrines of weakness associated with optimism, so that they live with resolution, fully and completely. Would it not be necessary for the tragic man of this culture, having trained himself for what is serious and frightening, to desire a new art, an art of metaphysical consolation, tragedy as his own personal Helen of Troy, and to have to cry out with Faust: “And should I not, through my power to yearn, Drag into life that most extraordinary form?” “Would it not be necessary?” …No, three times no! You young Romantics: it should not be necessary! But it is very likely that things will end up—that you will end up—being consoled, as is written, in spite of all the self-training for what is serious and frightening,

“metaphysically consoled,” as Romantics tend to finish up, as Christians. No! You should for the time being learn the art of consolation in this life: you should learn to laugh, my young friends, even if you wish to remain thoroughly pessimistic. From that, as laughing people, some day or other perhaps you will ship all that metaphysical consolation to the devil—and then away with metaphysics! Or, to speak the language of that Dionysian fiend called Zarathustra:

让我们设想一下：有那么一代人长大了，他们变得无所畏惧、所向披靡；让我们再设想一下：那些屠龙之士昂首阔步、不可一世地背弃所有的与乐观主义有关脆弱的信条，从而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坚定不移地生活。这种文化里的悲剧人物，早已训练有数，敢于面对严峻与恐怖，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去渴望一种新的艺术，一种能够在精神上得到慰藉的艺术，即渴望悲剧成为特洛伊私人的海伦？是不是也是没有必要与浮士德同声呐喊：“我为何不能凭借痴情一片，摘取人间尤物相伴一生？”“真的没有必要吗？”……是的，真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们这些年轻的浪漫主义艺术家们：他们确实没有这个必要了！但是，无论是事情还是你们自己完全有这个可能，你们的结局会像我写到的那样，是以慰藉而告终，而且是形而上的慰藉，就像浪漫主义艺术家告终的方式一样，像基督教徒告终的方式一样，尽管你们已经做好了自我训练，准备迎接一切严峻和恐怖的挑战。他们是没有必要了！而眼下的你们，却要学会掌握人生中的慰藉艺术。这就是：要学会笑，我的年轻朋友，即使你想永远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你也得学

会微笑啊。所以，作为欢笑者，你们也许会有朝一日把一切形而上的慰藉扔给魔鬼，然后结束形而上学！或者，用酒神精神的劲敌话来说，就是叫做“查拉斯图拉”：

Lift up your hearts, my brothers, high, higher! And for my sake don't forget your legs! Raise up your legs, you fine dancers, and better yet, stand on your heads!

“振奋你们的精神，我的兄弟们，振奋、再振奋！为了我，也别忘了你们的双腿！抬起你们的双腿，你们这些出类拔萃的舞者，如果可以倒立，那将更胜一筹！

This crown of the man who laughs, this crown wreathed with roses—I have placed this crown on myself. I speak out my holy laughter to myself. Today I found no one else strong enough for that.

“这顶笑者的王冠，这顶玫瑰花环的王冠——我首先给自己戴上，我对自己发出神圣的大笑，并宣布：戴上它，看有谁还比我强大。

Zarathustra the dancer, Zarathustra the light hearted, who beckons with his wings, a man ready to fly, hailing all birds, prepared and ready, a

careless and blessed man.

“查拉斯图拉是个舞者，身心轻松、振翅欲飞；他呼唤众鸟各就各位、蓄势待发；他俨然是一个幸运的粗心鬼。

Zarathustra the truth-teller, Zarathustra the true laugher, not an impatient man, not a man of absolutes, someone who loves jumps and leaps to the side—I placed the crown on myself!

“查拉斯图拉是个说真话的人，查拉斯图拉是个真正爱笑的人，一个不急不躁的、不偏不倚的人，一个爱在路边蹦蹦跳跳的人。——这样的话，我还是把王冠戴在自己头上吧！

This crown of the laughing man, this crown of rose wreaths: my brothers I throw this crown to you! Laughter I declare sacred: you higher men, for my sake learn to laugh!

“这是一顶爱笑者的王冠，这是一顶玫瑰花环的王冠：我的兄弟们，我把这顶王冠扔给你们！我向你们声明，笑是神圣的：你们这些比我更加高贵的人，为了我，你们大笑起来吧！”

August 1886

1886年8月

[1_1].Note that this first section of the Birth of Tragedy was added to the book many years after it first appeared, as the text makes clear. Nietzsche wrote this "Attempt at Self-Criticism" in 1886. The original text, written in 1870－71, begins with the Preface to Richard Wagner, the second major section

[2_1].《悲剧的诞生》第一部分是在该书首次出版多年之后添加的，这点可以从文章的内容看出。尼采于1886年写下《自我批评的尝试》。原文写于1870－71，以第二部分《致理查德•瓦格纳之序言》开始。

Preface to Richard Wagner

致理查德·瓦格纳之序言

In order to keep far away from me all possible disturbances, agita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s which the assembly of ideas in this piece of writing will bring about on account of the peculiar character of our aesthetic public, and also to be capable of writing a word of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with the same contemplative joy which marks every page, the crystallization of good inspirational hours, I am imagining the look with which you, my esteemed friend, will receive this work—how you, perhaps after an evening stroll in the winter snow, look at the unbound Prometheus on the title page, read my name, and are immediately convinced that, no matter what this text consists of, the writer has something serious and urgent to say, and that, in addition, in everything which he composed, he was conversing with you as with someone present and could only write down what was appropriate to such a presence.

鉴于我们审美大众的特殊品味，这本书所集聚的思想可能会引发他们的骚乱、激动和误解。为了远离这一切的可能性，以及能够带着同样的沉思快感，写好这本书前言中的每一句话，使得每一页都能够充分地展现出这些沉思的快感，把那才思泉涌的美好时光晶化在那里，我在设想，我尊敬的朋友，当您收到这本书的时候，脸上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比如说，您在寒冬的晚上，从雪地里散步归来，看到这本未装订的书籍标题页上写着《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读到我的名字，您一定会立即相信，不管这部著作论述的是什么内容，其作者必定有严肃且迫切的话要说。您还会相信，他所写的每一点，都是

像与一个面对面的人交谈似的在与您交谈，并且只写下一些适合这个场合的内容。

In this connection, you will remember that I gathered these ideas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that your marvelous commemorative volume on Beethoven appeared, that is, during the shock and grandeur of the war which had just broken out. Nevertheless, people might think that this collection of ideas has an aesthetic voluptuousness opposed to patriotic excitement, a cheerful game different from brave seriousness. Such people would be quite wrong. By actually reading the work, they should rather be astonished to recognize clearly the serious German problem which we have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which we really placed right in the middle of German hopes as its vortex and turning point.

说到此，也许您还能记得，在我整理这些思绪的时候，您也正在写纪念贝多芬的鸿篇巨制，却突然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我们两人都感到震惊。因此，也许会有人认为，我在这个时期去整理思绪，是审美的陶醉而不是爱国的热情；是一场怡情的游戏而不是勇敢严肃的态度。这些人真的是大错特错了。假如他们能够认真地阅读我的著作，他们一定会吃惊而清晰地发现，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是德国的严峻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原先放置在德国希望的中心位置，把它当作漩涡和转折点的。

However, it will perhaps be generally offensive for these same people to see an aesthetic problem taken so seriously, if they are in a position to see art as nothing more than a merry diversion, as an easily dispensable bell-ringing summoning us to the “Seriousness of Existence,” as if no one knew what such as opposing stance as this

has to do with such “Seriousness of Existence.”

然而还是那些人，如果他们看到我把一个审美的问题弄得那么复杂化，一定普遍会感到非常厌恶，特别是那些习惯地把艺术只是当作一种快乐的消遣方式的人。他们认为，艺术只是唤起我们对“生存的严肃性”注意的可有可无的铃声，似乎没有人知道，反而这种对立面的观点才与这“生存的严肃性”有关。

For these serious readers, let this serve as a caution: I am convinced that art is the highest task and the essential metaphysical capability of this life, in the sense of that man to whom I here, as to my inspiring pioneer on this path, have dedicated this book.

对于这些严肃的读者们，我在这里有一个提醒：我相信艺术是人生最高的使命，是人生最重要的形而上的能力。这是在这条道路上曾经给过我启迪的前辈人的思想。为了他，我专门写上这本书，奉献给他。

Basel, December 1871

一八七一年岁末，于巴塞尔。

The Birth of Tragedy

悲剧的诞生

1

1

We will have achieved much for the study of aesthetics when we come, not merely to a logical understanding, but also to the immediately certain apprehension of the fact tha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rt is bound up with the duality of the Apollonian and the Dionysian, just as reproduction depends upon the duality of the sexes, their continuing strife and only periodically occurring reconciliation. We take these names from the Greeks who gave a clear voice to the profound secret teachings of their contemplative art, not in ideas, but in the powerfully clear forms of their divine world.

我们要想在审美研究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就得在逻辑上和直觉上同时认识到这么一个事实，即艺术要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离不开日神阿波罗精神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的二元性。这如同繁衍一样，需要雌雄两性。两者永远持续不断地斗争，间或偶尔和解，我们从希腊人那里取了这两个名字，是因为二者能清晰地阐释出冥想艺术中深奥的秘籍。这点不仅仅表现在观念上，而且还表现在形式上，他们在各自的神圣世界里，表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风格。

With those two gods of art, Apollo and Dionysus, we link our recognition that in the Greek world there exists a huge contrast, in

origins and purposes, between visual (plastic) arts, the Apollonian, and the non-visual art of music, the Dionysian. Both very different drives go hand in hand, for the most part in open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and simultaneously provoking each other all the time to new and more powerful offspring, in order to perpetuate for themselves the contest of opposites which the common word “Art” only seems to bridge, until they finally, through a marvelous metaphysical act, seem to pair up with each other and, as this pair, produce Attic tragedy, just as much a Dionysian as an Apollonian work of art.

有了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这两个艺术之神，我们可以认识到，希腊世界里存在着一对对立体——日神阿波罗精神，代表视觉（造型）艺术，和酒神狄奥尼索斯，代表音乐这个非视觉的艺术。它们无论在起源还是宗旨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两股相悖的驱动力携手共进，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公开对决。与此同时，彼此又一直在互相刺激，直至新的、更强大的下一代诞生。这对矛盾对立体在对抗中生息永存，好像只有它们的共同词汇“艺术”才能在它们之间搭起桥梁。最终，通过某个奇迹般的形而上的行为，两者似乎融合了起来。古希腊雅典派的悲剧就是这样，通过二元的对立关系产生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艺术品无不都是出自这样的道理。

In order to get closer to these two instinctual drives, let us think of them next as the separate artistic worlds of dreams and of intoxication, physiological phenomena between which we can observe an opposi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one between the Apollonian and the Dionysian.

为了更好地明白这两股本能驱动力的内涵，让我们把这两股动力看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境界：梦境与醉境。通知这两种生理现象的差

异，我们可以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之间看到相应的差异关系。

According to the ideas of Lucretius, the marvelous divine shapes first appeared to the mind of man in a dream. It was in a dream that the great artist saw the delightful anatomy of superhuman existence, and the Hellenic poet, questioned about the secrets of poetic creativity, would have recalled his dreams and given an explanation exactly similar to the one Hans Sachs provides in *Die Meistersinger* .

根据卢克莱修的观点，奇妙的神形首先是通过梦境出现在人们的心灵。伟大的雕刻家就是在梦中看到那些让他兴奋不已的超人灵物的身躯解剖构造的。如果你问古希腊的诗人作诗的秘诀是什么，他会回忆他曾经做过的梦，他所给的解释一定与汉斯·萨克斯在他的诗《名歌手》里所给的一模一样：

> My friend, that is precisely the poet's work—
>
> 我的朋友，这正是诗人的工作——
>
> To figure out his dreams, mark them down.
>
> 解读他的梦想，把它写下来。
>
> Believe me, the truest illusion of mankind

相信我，人类最真实的幻觉

Is revealed to him in dreams:

在梦里向他透露；

All poetic art and poeticizing

所有的诗歌艺术与诗意

Is nothing but interpreting true dreams.

都只是解释真正的梦想。

The beautiful appearance of the world of dreams, in whose creation each man is a complete artist, is the condition of all plastic art, indeed, as we shall see, an important half of poetry. We enjoy the form with an immediate understanding, all shapes speak to us, nothing is indifferent and unnecessary.

梦境的美丽外表，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先决条件。谁用它来创作，谁就能够成为完美的艺术家。正如下面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作诗也不例外，漂亮的外观占据诗歌的半壁江山。我们对某个外形一眼能够看

懂，就是因为外形是不言而喻的，它的身上没有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东西。

For all the very intense life of these dream realities, we nevertheless have the thoroughly disagreeable sense of their illusory quality. At least that is my experience. For their frequency, even normality, I can point to many witnesses and the utterances of poets. Even the philosophical man has the presentiment that this reality in which we live and have our being is an illusion, that under it lies hidden a second quite different reality. And Schopenhauer specifically designates as the trademark of philosophical talent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at certain times that human beings and all things are mere phantoms or dream pictures.

尽管梦中的现实生活非常紧张，然而我们仍然能够体会到梦中现实的假象特征，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至少，那是我的体验。由于这些现象频繁出现，甚至已经常态化了，所以我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和诗人的话语来作为证据。甚至哲学家也有同感，那就是：在那样的现实里，我们的生活和存在是一种幻觉，在这个现实下面还藏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叔本华特别指出：如果某个人在某些特定的时候，能够把人和所有的东西都看作为仅仅是幻影和梦景，这就标志此人一定具有哲人的才能。

Now, just as the philosopher behaves in relation to the reality of existence, so the artistically excitable man behaves in relation to the reality of dreams. He looks at them precisely and with pleasure, for from these pictures he fashions his interpretation of life; from these events he rehearses his life. This is not merely a case of agreeable and friendly images which he experiences with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They also include what is serious, cloudy, sad, dark, sudden scruples, teasing accidents, nervous expectations, in short, the entire “divine comedy” of life, including the Inferno—all this moves past him, not just like a shadow play, for he lives and suffers in the midst of these scenes, yet not without that fleeting sensation of illusion. And perhaps several people remember, like me, amid the dangers and terrors of a dream, successfully cheering themselves up by shouting: “It is a dream! I want to dream it some more!” I have also heard accounts of some people who had the ability to set out the causal connection of one and the same dream over three or more consecutive nights. These facts are clear evidence showing that our innermost beings, the secret underground in all of us, experiences its dreams with deep enjoyment, as a delightful necessity.

所以，正如哲学家处理的是与生存现实之间的关系，艺术细胞发达的人处理的则是与梦境现实之间的关系。他对这些梦境的现实观察仔细，怡然自得，因为从这些画面中，他能够产生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从这些事件中预演到自己的人生。他所体验的意象不总是愉悦、友好，也不是他完全能够理解的。这些意象里必定有严峻、混浊、悲哀、黑暗、瞬间的迟疑、愚人的事件以及令人着急的期待。总之，人生的“神曲”整部剧，包含其中的“地狱篇”，——从他身边走过。这可不像皮影戏啊，因为他就身在其中，生活着，苦恼着，完全意识不到幻觉会转瞬即逝。也许有那么一些人跟我一样，依稀记得，曾经我们在梦里掉进了危险和恐怖之中，一旦我们成功地逃脱，我们就会欢呼雀跃：“这是一场梦！我索性继续做下去吧！”我也曾经听有人说过，他可以连续三四个晚上做一个前后有因果关联的梦，或做同样一个梦。这些事实都清晰地证明了我们的内心是存在的，即我们大家都有心灵深处。而心灵深处在体验梦境的时候，总是带有深深的愉悦感，这就是快感的必然性。

The Greeks expressed this joyful necessity of the dream experience in their god Apollo, who, as god of all the plastic arts,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god of prophec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oot meaning of his association with brightness, he is the god of light. He also rules over the beautiful appearance of the inner fantasy world. The higher truth, the perfection of this condition in contrast to the sketchy understanding of our daily reality, as well as the deep consciousness of a healing and helping nature in sleep and dreaming, is the symbolic analogy to the capacity to prophesy the truth, as well as to art in general, through which life is made possible and worth living. But also that delicate line which the dream image may not cross so as to work its effect pathologically (otherwise the illusion would deceive us as crude reality)—that line must not be absent from the image of Apollo, that boundary of moderation, that freedom from more ecstatic excitement, that fully calm wisdom of the god of images. His eye must be sun-like, in keeping with his origin. Even when he is angry and gazes with displeasure, the consecration of the beautiful illusion rests on him.

希腊人在阿波罗神身上找到过梦境体验的快感必然性。阿波罗是所有造型艺术的神，但同时也是预知之神。阿波罗，就其词源而言，是“光明”的意思，因此他被称为“日神”。他还掌管我们内心幻觉世界里的美丽外观。更高级的事实发现（他无所不能，这比我们人类对日常生活只能有着粗略的认识要强的多，尽管我们人类对睡眠和做梦的愈合和帮助功能已有了深刻的认识），是预知能力的象征比喻，即所有艺术有着预知能力的功效。正是这种预言性才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可能，才使我们觉得值得过下去。当然，梦境里有一道敏感的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如果逾越了，后果就不堪设想（否则，我们就会被幻觉世界所蒙骗，误认为是残酷的现实）——阿波罗的形象中少不了这道红线，这个红线就是适中、不狂喜和智慧般的冷静，总之他具有一个神该有的一切形象。他的目光必须像阳光，保持与他名称来源一致。

即使在他勃然大怒或神色沮丧的时候，也要有给人一种美丽的幻觉的感受。

And so one may verify (in an eccentric way) what Schopenhauer says of the man trapped in the veil of Maja: “As on the stormy sea which extends without limit on all sides, howling mountainous waves rise up and sink and a sailor sits in a row boat, trusting the weak craft, so, in the midst of a world of torments, the solitary man sits peacefully, supported by and trusting in the *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 (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 *(World as Will and Idea* , Vol. I, p. 416). Yes, we could say of Apollo that the imperturbable trust in that principle and the calm sitting still of the man conscious of it attained its loftiest expression in him, and we may even designate Apollo himself as the marvelous divine image of the *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 , from whose gestures and gaze all the joy and wisdom of illusion, together with its beauty, speak to us.

所以，有人想知道（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叔本华是如何描述一个坠入“玛雅（幻）”帷帐的人的：“在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咆哮的巨浪此起彼伏。一个水手，孤独地坐在划船上，相信脆弱的小船能抵御惊涛骇浪，于是他平静地坐在那里，相信‘个性原则’可以支撑他。”（《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卷I，第416页）其实我们可以说，信仰那个原则从而达到安心静坐的这一现象，在日神阿波罗身上得到了最崇高的表现。我们甚至可以把阿波罗本人视作为“个性原则”的神圣典范。我们从他的动作和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在幻景中体会到了快乐和智慧，连同它的美丽。

In the same place Schopenhauer also described for us the

monstrous horror which seizes a man when he suddenly doubts his ways of comprehending illusion, when the sense of a foundation, in any one of its forms, appears to suffer a breakdown. If we add to this horror the ecstatic rapture, which rises up out of the same collapse of the *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 from the innermost depths of human beings, yes, from the innermost depths of nature, then we have a glimpse into the essence of the Dionysian, which is presented to us most closely through the analogy to intoxication.

在同一本书里，叔本华还给我们描述了这么一个例子，当一个人突然怀疑自己对幻觉的理解思路出了问题的时候，或当他感觉到某个定理以某种方式似乎在动摇的时候，他会惶恐不安。假如我们在惶恐之外，能添加一份狂喜，而这份狂喜同样是来自于人的心底深处，是的，就是自然的最深处，那么我们就可以洞察到酒神精神的精髓。用醉境来比喻酒神精神的精髓是最为贴切不过了。

Either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narcotic drink, of which all primitive men and peoples speak, or through the powerful coming on of spring, which drives joyfully through all of nature, that Dionysian excitement arises. As its power increases, the subjective fades into complete forgetfulness of self. In the German Middle Ages under the same power of Dionysus constantly growing hordes waltzed from place to place, singing and dancing. In that St. John's and St. Vitus's dancing we recognize the Bacchic chorus of the Greeks once again, and its precursors in Asia Minor, right back to Babylon and the orgiastic *Sacaea* (a riotous Babylonian festival).

所有的原始人和所有部落的人都说：酒神风格的激情不是被醇香的酒精作用所唤醒，就是被从远方一路欢声笑语、呼呼而来的春天所

唤醒。随着激情的越发高涨，主观意识逐渐褪去，直至最后化为全然忘我。在德国中世纪，同样受到酒神精神的影响，不断出现歌舞队。他们像跳华尔兹一样，到处巡演，载歌载舞。在圣约翰和圣维托的舞蹈中，我们再次看到古希腊醉酒式的合唱。这种形式的表演早期的时候是在小亚细亚的，后来回到巴比伦和狂欢的萨刻亚节（一个欢腾喧闹的巴比伦节日）上了。

There are men who, from a lack of experience or out of apathy, turn mockingly away from such phenomena as from a “sickness of the people,” with a sense of their own health and filled with pity. These poor people naturally do not have any sense of how deathly and ghost-like this very “Health” of theirs sounds, when the glowing life of the Dionysian throng roars past them. Under the magic of the Dionysian, not only does the bond between man and man lock itself in place once more, but also nature itself, no matter how alienated, hostile, or subjugated, rejoices again in her festival of reconciliation with her prodigal son, man. The earth freely offers up her gifts, and the beasts of prey from the rocks and the desert approach in peace. The wagon of Dionysus is covered with flowers and wreaths under his yolk stride panthers and tigers.

有些人，不是出于经验的匮乏就是出于情感的淡漠，自以为心灵健康，对这种现象深表遗憾，甚至是嗤之以鼻，讥讽为“民间的病态”。但是这些可怜虫自然意识不到，他们所谓的“心灵健康”，与酒神歌队的朝气蓬勃相比，显得多么得死气沉沉、形同幽灵啊！在酒神精神的魔力作用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再次得以巩固，就连那个被疏远、被敌视、被屈服的大自然也再次庆贺自己能够与她的浪子——人类言归于好。大地慷慨地献出她的礼物，猛兽们跳过岩石、跨过沙漠乖乖地走了过来。酒神的战车装饰着百卉和花环，黑豹和老虎在车轭下大踏步地往前走。

If someone were to transform Beethoven's *Ode to Joy* into a painting and not restrain his imagination when millions of people sink dramatically into the dust, then we could come close to the Dionysian. Now is the slave a free man, now all the stiff, hostile barriers break apart, those things which necessity and arbitrary power or “saucy fashion” have established between men. Now, with the gospel of world harmony, every man feels himself not only united with his neighbour, reconciled and fused together, but also as if the veil of Maja had been ripped apart, with only scraps fluttering around before the mysterious original unity. Singing and dancing, man expresses himself as a member of a higher unity. He has forgotten how to walk and talk and is on the verge of flying up into the air as he dances. The enchantment speaks out in his gestures. Just as the animals speak and the earth gives milk and honey, so now something supernatural echoes out of him. He feels himself a god. He now moves in a lofty ecstasy, as he saw the gods move in his dream. The man is no longer an artist. He has become a work of art. The artistic power of all of nature, the rhapsodic satisfaction of the primordial unity, reveals itself here in the intoxicated performance. The finest clay, the most expensive marble—man—is here worked and chiseled, and the cry of the Eleusinian mysteries rings out to the chisel blows of the Dionysian world artist: “Do you fall down, you millions? World, do you have a sense of your creator?”

如果有谁愿意把贝多芬的《欢乐颂》绘成油画，同时也不吝啬自己的想象力，想象出成千上万的人如何伏地膜拜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做酒神精神了。此时，奴隶变成了自由身；此时，所有的僵化、敌对的壁垒——繁文缛节、强权势力和“不雅的风尚”统统被打破。此时，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人不但感到自

己与邻人团结了、和解了、融洽了，而且还感到“幻”的帷帐似乎已经揭去，只留下几片残叶在神秘的“太一”面前飘零。人在载歌载舞，自豪于自己成为更加高级的社团成员；他陶然忘步、混然忘言；他翩跹起舞，意欲凌空飞去！他的投足之间到处散发着无穷的魅力。现在，正如动物能开口说话，大地能流出牛奶与蜂蜜一样，所以超自然也呼应人。人觉得自己是神灵。见到众神踯躅于自己的梦境中，他觉得自己也徘徊在一个无比高尚的癫狂之殿。他不再是一个艺术家；俨然是一件艺术品。一切自然的艺术才能，即对原始太一狂热的满足感统统在这个如痴如醉的表演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人——这块精细的粘土、最昂贵的大理石在这里被捏制、被雕琢。秘仪上的教徒，应和着这位宇宙酒神艺术大师的凿击声，在那里呐喊：“芸芸众生，你们都倒下了吗？大地啊，你感受到你的造物主了吗？”

2

2

Up to this point, we have considered the Apollonian and its opposite, the Dionysian, as artistic forces which break forth out of nature itself, without the mediation of the human artist and in which the human artistic drive is for the time being satisfied directly—on the one hand as a world of dream images, whose perfection has no connection with an individual's high level of intellect or artistic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intoxicating reality, which once again does not respect the individual, but even seeks to abolish the individual and to restore him through a mystic feeling of collective unity. In comparison to these unmediated artistic states of nature, every artist is an “Imitator,” and, in fact, an artist either of Apollonian dream or Dionysian intoxication or, finally, as in Greek tragedy, for example, simultaneously an artist of intoxication and dreams. As the last,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imagine

how he sinks down in the Dionysian drunkenness and mystical obliteration of the self, alone and apart from the rapturous throng, and how through the Apollonian effects of dream his own state now reveals itself to him, that is, his unity with the innermost basis of the world, in a metaphorical dream picture.

至此，我们已经把来自于无人类艺术家参与的、纯自然的艺术创作动力——日神和他的对立面酒神的风格讨论完毕了。从这些艺术创作的原动力中，人类的艺术创作动力暂且获得直接的满足。这是因为：一方面，日神作为梦境的世界，它的完美与个人的智商或艺术修养无关；另一方面，酒神作为醉境的现实，它也不尊重个体，甚至追求废除个体，追求通过集体概念的神秘感觉来恢复个体。就以上两种没有人为干预的、纯自然的艺术境界而言，每个艺术家都是“摹仿者”。换句话来说，一个艺术家不是属于日神梦境派的就是属于醉境派的，或者像希腊悲剧那样，兼而有之。如果某个艺术家属于最后的一类，我们就能想象出，他沉溺在酒神的醉境和神秘的忘我境界，孑然一身，远离狂歌纵饮的人群是什么样的感觉；同样，我们也能体会到，他受日神梦境的影响，恢复了自我，在隐喻式的梦境画面里，自己与宇宙本源达到了统一是什么样的感觉。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general assumptions and comparisons, let us now approach the Greeks, in order to recognize to what degree and to what heights the natural artistic drives had developed in them and how we are in a position to understand more deeply and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Greek artist to his primordial images or, to use Aristotle's expression, his “imitation of nature.” In spite of all their literature on dreams and numerous dream anecdotes, we can speak of the dreams of the Greeks only hypothetically, although with fair certainty. Given the incredibly clear and accurate plastic capability of their eyes, along with their

intelligent and open love of colour, one cannot go wrong in assuming that (to the shame all those born later) their dreams also had a logical causality of lines and circumferences, colours, and groupings, a sequence of scenes rather like their best bas reliefs, whose perfection would justify us, if such a comparison were possible, to describe the dreaming Greek man as a Homer and Homer as a dreaming Greek man, in a deeper sense than when modern man, with respect to his dreams, has the temerity to compare himself with Shakespeare.

秉承上面普遍现象所做的假设与对比，下面我们进而来研究希腊人，看看他们在自然艺术驱动力方面发展到了何等地步和高度，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评估希腊艺术家与他们原始意象之间的关系，或者用亚里士多德的表达法来说，就是“摹仿自然”。尽管我们可以找到希腊人所有的关于梦的文献，以及无数的关于梦的趣闻轶事，但是当我们论及到希腊人的梦境的时候，我们还是只能依靠推断，当然这些推断是合理、确定无疑的。鉴于希腊人造型眼力异常的敏锐和精准，加之他们聪明，以及对色彩公开的喜爱，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他们梦景中的线形和圆形、色彩、归类都具有逻辑的因果关系。归类指的是一系列场景，很像他们最好的浮雕连环画。浮雕连环画太完美了，可以证实我们的论断，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把爱做梦的希腊人叫做荷马人，把荷马人叫做爱做梦的希腊人。这总比现代人在谈及自己的梦境时，竟敢鲁莽地把自己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更有深远的意义。

On the other hand, we do not need to speak merely hypothetically when we have to expose the immense gap which separates the Dionysian Greeks from the Dionysian barbarians. In all quarters of the old world (setting aside here the newer worlds), from Rome to Babylon, we can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Dionysian

celebrations, of a type, at best, related to the Greeks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the bearded satyr whose name and characteristics are taken from the goat is related to Dionysus himself. Almost everywhere, the central point of these celebrations consisted of an exuberant sexual promiscuity, whose waves flooded over all established family practices and traditional laws. The wildest bestiality of nature was here unleashed, creating an abominable mixture of lust and cruelty, which has always seemed to me the real witches' potion.

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具有酒神精神的希腊人和具有酒神精神的野蛮人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这点我们无需通过假设就可以确定的。在旧世界（撇开这里的新世界）的各个角落里，从罗马到巴比伦，我们可以证实到处都举行过各种类型的酒神庆祝活动。如果说这些庆祝活动中哪种形式与希腊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这种关系就像带胡子的萨堤罗斯（萨堤罗斯的名字和他的性格都是取自于山羊）与狄奥尼索斯本人之间的关系。几乎在所有地方，这些庆祝活动的中心内容就是狂交乱媾，其狂潮吞噬了所有的家庭生活模式和传统法规。自然界最粗野的兽性在此得到了释放，结果酿成了令人作呕的情欲与残暴的混合物。在我看来，那才真的是“巫婆的毒药”。

From the feverish excitement of these festivals, knowledge of which reached the Greeks from all directions, by land and sea, they were apparently for a long time completely secure and protected through the figure of Apollo, drawn up in all his pride. Apollo could counter by holding up the head of Medusa in the face of the unequalled power of this crude and grotesque Dionysian force. Doric art has immortalized this majestic bearing of Apollo as he stands in opposition. This opposition became more dubious and even impossible as similar impulses gradually broke out from the

deepest roots of Hellenic culture itself. Now the effect of the Delphic god, in a timely process of reconciliation, limited itself to taking the destructive weapon out of the hand of his powerful opponent.

这些过度疯狂的庆祝活动通过海上和陆地两个渠道从四面八方传入希腊，显然希腊人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们用化身为威风凛凛的阿波罗形象来保护自己。阿波罗靠着手举美杜莎的头颅便可以慑服这个残酷而诡异的酒神强大力量。阿波罗这种抗拒对手、大义凛然的风范最终体现在多立斯柱式的艺术上，使之永垂不朽。随着酒神类似的冲动渐渐地从古希腊文化根基里爆发出来，这种对抗之后就更加动摇了，甚至不得继续维持。此时在特尔斐的阿波罗，威力减弱，他在与对手及时的和解中，只是从强大对手的手里夺走了那毁灭性的武器。

This reconcili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Greek culture. Wherever we look the revolutionary effects of this experience manifest themselves. It was the reconciliation of two opponents, who from now on observed their differences with a sharp demarcation of the border line between them and with occasional gifts send to honour each other. Basically the gap was not bridged over. However, if we see how,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is peace agreement, the Dionysian power revealed itself, then we now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festivals of world redemption and days of transfiguration in the Dionysian orgies of the Greek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Babylonian *Sacaea* , which turned human beings back into tigers and apes.

日神和酒神之间的和解是希腊文化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无论我们

在哪里观察，都能看到这次和解所带来的变革。和解使得敌对双方开始认识到，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从此以后，他们双方必须恪守自己的特点，偶尔可以互送礼物以表尊重之意。从本质上来看，这条鸿沟是没法跨越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去了解一下酒神的力量是如何在这份和平协议压力之下展现自己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世界范围内这些节日的救赎意义，以及希腊人在酒神狂欢节上变容的意义——这种变容的意义要比巴比伦萨刻亚节上把人变回老虎和猿人的意义重大得多。

In these Greek festivals, for the first time nature achieves its artistic jubilee. In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the tearing apart of the *principii individuationis* (the individualizing principle) becomes an artistic phenomenon. Here that dreadful witches' potion of lust and cruelty was without power. The strange mixture and ambiguity in the emotions of the Dionysian celebrant remind him, as healing potions remind him of deadly poison, of that sense that pain awakens joy, that the jubilation in his chest rips out cries of agony. From the most sublime joy echoes the cry of horror or the longingly plaintive lament over an irreparable loss. In those Greek festivals it was as if a sentimental feature of nature is breaking out, as if nature has to sigh over her dismemberment into separate individuals.

在这些希腊人的节日里，自然破天荒地有了自己的艺术庆典。第一次，脱离“个性原则”变成了一种艺术现象。在这里，可怕的情欲与残暴组合的“巫婆的毒药”失效：唯有酒神派的司仪神父那离奇混合的双重情感才在告诫他：是胸口的喜悦撕裂了内心痛苦的呐喊。这种由痛苦所唤醒的喜悦，就像良药能让人想起毒鸩一样——最崇高的喜悦也不过只是对恐怖的尖叫和对无法弥补损失的凄婉哀号。希腊人在庆典时候的活动，仿佛就是自然情感特征的爆发，仿佛就是自然不得不为自己的肢体被分成多个独立的个体而发出的叹息。

The language of song and poetry of such a doubly defined celebrant was for the Homeric Greek world something new and unheard of. Dionysian music especially awoke in that world fear and terror. If music was apparently already known as an Apollonian art, this music, strictly speaking, was a rhythmic pattern like the sound of waves, whose artistic power had developed for presenting Apollonian states of mind. The music of Apollo was Doric architecture expressed in sound, but only in intimate tones, characteristic of the *cithara* (a traditional stringed instrument). The un-Apollonian character of Dionysian music keeps such an element of gentle caution at a distance, and with that turns music generally into emotionally disturbing tonal power, a unified stream of melody, and the totally incomparable world of harmony.

具有双重性格的酒神派司仪神父所采用的那种既像歌又像诗的语言，是荷马时代的希腊人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酒神风格的音乐特别能唤起他们的恐惧和害怕。如果哪种音乐能被明显地看作为是日神派的艺术，那这个音乐一定是节奏型的，像波浪的声音。它的艺术魅力是为了展现日神阿波罗的心理状态。阿波罗音乐是声音形式的多立克式建筑，只是音调表现得比较亲和罢了，类似于现在的希腊竖琴（一种传统的弦乐器）。无日神音乐特征的酒神派音乐则远离这类带有转折性的轻柔声音，他们的通常做法是让音乐通过音量来引起人们情感上的波动，从而最终变成一首旋律统一而流畅的音乐，创造出一个无以伦比的和谐世界。

In the Dionysian dithyramb man is aroused to the highest intensity of all his symbolic capabilities. Something never felt before forces itself into expression—the destruction of the veil of Maja, the sense of oneness as the presiding genius of form, of nature

itself. Now the essence of nature must express itself symbolically; a new world of symbols is necessary, the entire symbolism of the body, not just the symbolism of mouth, face, and words, but the full gestures of the dance—all the limbs moving to the rhythm. And then the other symbolic powers grow, those of music, rhythm, dynamics, and harmony—all with sudden spontaneity.

在酒神的颂歌里，人的一切象征能力被激发到极致。一些从未体验过的情感都迫不及待地想表达出来——此时，“幻”的帷帐被摧毁。人俨然像一位首席官，在那里指挥形式，乃至于指挥内容本身做到统一。现在，内容的实质只能靠象征性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符号世界，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来表达人身体上的全部内容。不但单指嘴巴、脸庞或语言，而必须找到象征性的符号语言来表达丰富多彩的舞姿，即所有跟着节奏摇摆的肢体动作。之后，其他具有象征性的表达法自然会应运而生，所有的有关音乐、节奏、力度和和谐的象征表达法都会一并爆发。

To grasp this total unleashing of all symbolic powers, man must already have attained that high level of freedom from the self which seeks to express itself symbolically in those forces. Because of this, the dithyrambic servant of Dionysus will understand only someone like himself. With what astonishment must the Apollonian Greek have gazed at him! With an amazement which was all the greater as he sensed with horror that all this may not be really foreign to him, that even his Apollonian consciousness was covering the Dionysian world in front of him, like a veil.

要想全面掌握释放所有象征能力的技巧，人必须要达到某种忘我的境界，并能够通过这些能力把这种忘我境界象征性地表现出来。这

就是为什么酒神颂歌的神职人员只能与他志同道合的信徒心心相印，如果换成日神派的希腊人，看到这种神职人员那一定是目瞪口呆！可是，更让他目瞪口呆、惊愕不已的是，他发现所有的这一切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只是日神的意识像面纱一样在他面前遮挡了酒神世界！

3

3

In order to grasp this point, we must dismantle that artistic structure of Apollonian culture, as it were, stone by stone, until we see the foundations on which it is built. Here we become aware for the first time of the marvelous Olympian divine forms, which stand on the pediments of this building and whose actions decorate its friezes all around in illuminating bas relief. If Apollo also stands among them, as a single god next to the others and without any claim to the pre-eminent position, we should not on that account let ourselves be deceived. The same instinct which made Apollo perceptible to the senses gave birth to the entire Olympian world in general. In this sense, we must value Apollo as the father of them all. What was the immense need out of which such an illuminating group of Olympic beings arose?

为了掌握这一点，我们必须把日神文化的艺术大厦一砖一石地拆除，直到看见它的地基。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意识到，那些巍峨的奥林匹斯山诸神的雕像耸立在这座大厦的山墙上，他们的事迹刻录在光芒四射的浮雕上，装点四周的雕带。如果阿波罗也站在其中的话，只是诸神旁边的一个，位置并不凸显，我们千万不要因此而感到迷惑。总的说来，使阿波罗成为可感之神的相同直觉催生了整个奥林匹斯山神界。从这一意思上来讲，阿波罗堪称为神界之父。是什么巨大的需

求导致了这组如此光彩照人的奥林匹克神人的诞生呢？

Anyone who steps up to these Olympians with another religion in his heart and seeks from them ethical loftiness, even sanctity or spiritual longing for the non-physical, for loving gazes filled with pity, must soon enough despondently turn his back on them in disappointment. For here there is no reminder of asceticism, spirituality, and duty. Here speaks to us only a full, indeed a triumphant, existence, in which everything present is worshipped,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good or evil. And thus the onlooker may well stand in real consternation in front of this fantastic excess of life, to ask himself with what magical drink in their bodies these high-spirited men could have enjoyed life so that wherever they look, Helen laughs back at them, that ideal image of their own existence, “hovering in sweet sensuousness.”

倘若有谁怀揣其他宗教的理念去接近奥林匹斯山诸神，想从他们那里寻找到道德的高尚，甚至尊严或超肉体的灵性，充满爱意和同情的秋波，他势必会怅然若失、扭头就走，因为这里没有什么能让人想到禁欲主义、思想自由、清规戒律之类的东西。这里我们所能听到的只是实实在在，甚至可以说是生机盎然的生存方式。这里存在的一切，不论善恶，都被奉若神明。于是，静观者，面对如此超乎想象的生活景象，也许会惊慌失措，并抚心自问：这些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的人儿到底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能做到如此潇洒地生活，以至于他们无论把目光投向何处，都能看到海伦以微笑回敬他们？这正是他们理想的生存画面啊——“永远甜蜜、回味无穷”的感觉。

However, we must summon back this onlooker who has already turned around to go away. “Don't leave them. First listen to what

Greek folk wisdom expresses about this very life which spreads out before you here with such inexplicable serenity. There is an old saying to the effect that King Midas for a long time hunted the wise Silenus, the companion of Dionysus, in the forests, without catching him. When Silenus finally fell into the king's hands, the king asked what was the best thing of all for men, the very finest. The daemon remained silent, motionless and inflexible, until, compelled by the king, he finally broke out into shrill laughter and said, 'Suffering creature, born for a day, child of accident and toil, why are you forcing me to say what is the most unpleasant thing for you to hear? The very best thing for you is totally unreachable: not to have been born, not to exist, to be nothing. The second best thing for you, however, is this: to die soon.'"

但是，我们必须对那个扭头就走的静观者大声疾呼："别跑开，请先听听古希腊民间智慧是怎样阐述你面前这种妙不可言、安静祥和生活的。有这么一个古老传说，内容大致是这样：迈达斯国王曾经在深山老林里搜寻酒神的伴侣——聪明的西勒诺斯。他找了很久没有逮到他。当西勒诺斯终于落到国王手上的时候，国王就问他：对于人来说，什么是最好、最美妙的东西？这个半神半人的精灵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不屈不挠。在国王多次逼问下，他终于大笑起来，扯着嗓子说道：'受苦受难的人儿、朝生暮死的可怜虫、无法抗拒意外却又不得不劳苦辛作的孩子，你为何要逼我说出你最不爱听的话呢？世间最好的东西你是永远得不到的。这个东西就是：不曾降生、不要存在、化为乌有。但是，你有第二个最好的选择，那就是——早一点去死。'"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ympian world of the gods and this popular wisdom? It is lik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entrancing vision of the tortured martyr to his pain.

奥林匹斯山诸神世界与民间智慧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这种关系就像饱受煎熬的殉道者面对他的痛苦产生一种使人入神的幻景。

Now, as it were, the Olympic magic mountain reveals itself to us and shows us its roots. The Greek knew and felt the terror and horror of existence. In order to live at all, he must have placed in front of him the gleaming Olympians, born in his dreams. That immense distrust of the titanic forces of nature, that *Moira* (Fate) enthroned mercilessly above all knowledge, that vulture that devoured Prometheus, friend of man, that fatal lot drawn by wise Oedipus, that family curse on the House of Atreus, that Orestes compelled to kill his mother, in short, that entire philosophy of the woodland god, together with its mythical illustrations, from which the melancholy Etruscans died off, all that was overcome time after time by the Greeks (or at least hidden and removed from view) through the artistic middle world of the Olympians.

现在可以说，奥林匹克神秘之山已经向我们敞开，让我们看到了它的根基。希腊人知道并感受到生存的恐惧与害怕；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的面前摆放着诞生于梦境中的星光璀璨的奥林匹斯山神。他们生存中有太多的恐惧与害怕：他们对巨大的自然灾害无法抗拒，对无情的厄运不得其解。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兀鹫要把人类的朋友——普罗米修斯给吞噬；为什么聪明的俄狄浦斯要遭受杀父娶母的劫难；为什么阿特柔斯家的家族诅咒阴魂不散；为什么俄瑞斯忒斯被迫提刀弑母。总而言之，那些都是树林之神的全部哲学以及他们神秘的事例（例如忧郁的伊特鲁里亚人的灭亡），但是统统被希腊人采用奥林匹斯山诸神的艺术中间世界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或至少加以掩盖，不再让人看见）。

In order to be able to live, the Greeks must have created these gods out of the deepest necessity. We can readily imagine the sequential development of these gods: through that instinctive Apollonian drive for beauty there developed by slow degrees out of the primordial titanic divine order of terror the Olympian divine order of joy, just as roses break forth out of thorny bushes. How else could a people so emotionally sensitive, so spontaneously desiring, so singularly capable of suffering have endured their existence, unless the same qualities manifested themselves in their gods, around whom flowed a higher glory. The same instinctual drive which summons art into life as the seductive replenishment for further living and the completion of existence also gave rise to the Olympian world, by which the Hellenic “Will” held before itself a transfiguring mirror.

为了能生存下去，希腊人必须创造这些神灵以满足这个迫切的需要。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象出这些神灵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原始泰坦神的恐怖次序，通过日神天性对美的追究，逐步发展为快乐的奥林匹斯神圣的秩序。这就如同美丽的玫瑰绽放在多刺的灌木里。试问：如果不是在他们心目中的诸神身上看到与自己相同的品质，并在他们周围看到散发出来的更加灿烂的荣光，像希腊这个在情感上如此敏感，在欲望上如此强烈，特容易遭罪的民族怎样能够生存下来的？相同的原始冲动召唤艺术融入生活，诱导和补偿人们继续生存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这就促使了奥林匹斯山神界的诞生。古希腊人的“意志”就是坚守这神界的做法，并把它们放在自己的面前作为变容镜。

In this way the gods justify the lives of men because they themselves live it—that is the only satisfactory theodicy! Existence under the bright sunshine of such gods is experienced as worth striving for in itself, and the essential pain of the Homeric men

consists in the separation from that sunlight, above all in the fact that such separation is close at hand, so that we could say of them, with a reversal of the wisdom of Silenus, “the very worst thing for them was to die soon, the second worst was to die at all.” When the laments resound now, they tell of short-lived Achilles, of the changes in the race of men, transformed like leaves,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eroic age. It is not unworthy of the greatest heroes to long to live on, even as a day labourer. In the Apollonian stage, the “Will” so spontaneously demands to live on, the Homeric man fills himself with that feeling so much, that even his lament becomes a song of praise.

所以，神是人生的印证，因为神本身也过着人类的生活——这是唯一令人满意的神义论！能在神的灿烂阳光下生活是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而荷马勇士最大的痛苦就在于生活中没有阳光。更主要的问题是：这样缺乏阳光的日子就在眼前。我们不妨把西勒诺斯的警句倒过来念来理解这点：“他们最糟糕的事是马上要死，第二糟糕的事是终究会死。”这些人一旦哀叹人生，就会说到短命的阿喀琉斯，说到人生像树叶一样变化无常，说到这个英雄时代的毁灭。旷世英雄眷恋人生，他们宁可为奴隶一天也不愿意早死一天。在阿波罗神时代，这种“意志”顺其自然地变成了对活下去的渴望。荷马勇士活下去的意志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的人生哀歌变成为了人生礼赞。

At this point we must point out that this harmony, this union of man with nature (something looked on enviously by more recent ages), for which Schiller coined the artistic slogan “naïve,” is in no way such a simple, inevitable, and, as it were, unavoidable condition (like a human paradise) which we necessarily run into at the door of every culture. Such a belief is possible only in an age which seeks to believe that Rousseau's Emile is an artist and

imagines it has found in Homer an artist like Emile raised in the bosom of nature. Wherever we encounter the “naïve” in art, we have to recognize the highest effect of Apollonian culture, something which always must come into existence to overthrow the kingdom of the Titans, to kill monsters, and through powerfully deluding images and joyful illusions to emerge victorious over the horrific depths of what we observe in the world and the most sensitive capacity for suffering. But how seldom does the naïve, that sense of being completely swallowed up in the beauty of appearance, succeed. For that reason, how inexpressibly noble is Homer, who, as a single person, was related to Apollonian popular culture as the single dream artist to his people's capacity to dream and to nature in general.

至此，我们应该指出，这种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合二为一，是一件现代人妒忌的事情。席勒为此自己创造了一个艺术术语“纯真”来形容这一意境。这种意境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也就是说，不是在进入任何一种文明之前必然能见到的人间天堂。这一点只有在人们完全相信卢梭的爱弥儿是个艺术家，并妄想荷马跟爱弥儿一样，都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培育出来的艺术家这样的年代里才有可能。无论我们在哪里发现了艺术的“纯真”，我们都必须承认，这是日神文化最高级别的效应。那份纯真帮助推翻了泰坦王国，杀掉了恶魔，借助强有力的幻景和令人愉悦的幻觉，战胜了对世间深渊所产生的恐惧和对苦难所表现的脆弱。如今，我们却很少能够达到一种在外观之美的观照下对纯真心醉神迷的境界。就这点而言，荷马是何等的了不起啊，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竟然与日神大众文化的精髓戚戚相关；他，作为一个个体的诗人，竟然与百姓做梦能力和一般自然息息相连。

Homeric “naïveté” is only to be understood as the complete

victory of the Apollonian illusion. It is the sort of illusion which nature uses so frequently in order to attain her objectives. The true goal is concealed by a deluding image. We stretch our hands out toward this image, and nature reaches its goal through the deception. With the Greeks it was a case of the “Will” wishing to gaze upon itself through the transforming power of genius and the world of art. In order to celebrate itself, its creatures had to sense that they were worthy of being glorified—they must see themselves again in a higher sphere, without this complete world of contemplation affecting them as an imperative or as a reproach. This is the sphere of beauty, in which they saw their mirror images, the Olympians. With this mirror of beauty, the Hellenic “Will” fought against the talent for suffering and the wisdom of suffering which is bound up with artistic talent, and as a memorial of its victory Homer, the naïve artist, stands before us.

荷马的“纯真”只能理解为日神幻觉的彻底胜利。它是自然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而经常使用的一种幻觉，但是其根本的目的还是被骗人的影像所遮蔽。对于影像，我们人通过伸手的方式去捕捉它，而自然却通过欺骗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希腊人的所谓的“意志”。他们希望利用天才们的改造能力和艺术世界来观照自己。为了赞美自己，希腊这帮人知道首先应该让自己值得赞扬——他们必须再次能够站在更高的层面来审度自己，而不要受这个完美静观世界的督促或责备。这就是审美层面。在那里，他们看到自己的镜像——奥林匹斯山诸神。有了这个审美镜像，古希腊人的“意志”就战胜了艺术天赋中与生俱来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对付痛苦的智慧，以此来纪念站在我们面前的纯真艺术家荷马的胜利。

Using the analogy of a dream we can learn something about this naïve artist. If we recall how the dreamer, in the middle of his illusory dream world, calls out to himself, without destroying that world, “It is a dream. I want to continue dreaming,” and if we can infer, on the one hand, a deep inner delight at the contemplation of dreams, and, on the other, that he must have completely forgotten the pressing problems of his daily life, in order to be capable of dreaming at all with such an inner contemplative joy, then we may interpret all these phenomena, with the guidance of Apollo, the interpreter of dreams, in something like the manner which follows below.

如果我们能拿做梦打个比喻的话，就可以体会到这类纯真艺术家的心态了。大家都记得，一个做梦的人，处在做梦的高潮，是不愿意打破梦境的。他宁愿对自己说：“既然这是一场梦，我就不妨继续做下去。”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出，一方面，他在梦的静观中深深地体验一种内心的快感；另一方面，他一定已是把日常生活所有的紧迫问题抛之脑后了，否则是不会彻底体验到这份发自内心冥想的快感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依照解梦者阿波罗的指导，用以下介绍的方式来解释所有的现象了。

To be sure, with respect to both halves of life, the waking and the dreaming states, the first one strikes us as disproportionately better, more important, more valuable, more worth living—the only way to live.

毫无疑问，生活具有两个一半：一半是醒着的状态，一半是做梦

的状态。我们总觉得前者比后者更好、更重要、更可贵、更值得体验，因为那是生活的必经之路。

Nevertheless I can assert (something of a paradox to all appearances) on the basis of the secret foundation of our essence, whose manifestation we are, precisely the opposite evaluation of dreams. For the more I become aware of those all-powerful natural artistic impulses and the fervent yearning for illusion contained in them, the desire to be redeemed through appearances, the more I feel myself forced to the metaphysical assumption that the true basis of being, the ever suffering and entirely contradictory primordial oneness, constantly uses the delightful vision, the joyful illusion, to redeem itself. We are compelled to experience this illusion, totally caught up in it and constituted by it, as the truly non-existent, that is, as a continuing development in time, space, and causality, in other words, as an empirical reality. But if we momentarily look away from our own “reality,” if we grasp our empirical existence and the world in general as an idea of the primordial oneness created in each moment, then we must consider our dreams as illusions of illusions, as well as an even higher fulfillment of the primordial hunger for illusion. For the same reasons, the innermost core of nature takes an indescribable joy in the naïve artist and naïve works of art, which is, in the same way, only “an illusion of an illusion.”

然而，鉴于我们是其现象存在之神秘的根源和表现的形式，我可以毫不含糊并坚决地主张（看上去像个悖论），对梦我们应该给予相反的评价。我越熟知那些威力无比的天然艺术冲动和隐藏其中的对幻觉的强烈渴望，渴望通过外象来获得救赎，我就越发感到有必要做出形而上学的假设：万物存在的基础，即永恒受苦和处于矛盾中的（永

恒的受苦者和矛盾体的）太一不断地采用怡情的外象、快乐的幻象来拯救自己。完全置身于幻象之中并受制于它，我们不得不把它当作彻底不存在的东西去体验；也就是说，去体验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的发展次序。换句话来说，作为经验现实去体验它。当然，如果我们暂时不看自己的“现实”，暂时把经验的存在和一般意义上的世界理解为是太一实时产生的表象，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梦看作为幻象中的幻象，甚至可以把它看作为对幻象原始渴望的更高层次的满足。同样的道理，大自然也从内心深处对纯真艺术家和纯真艺术作品感到欢欣鼓舞，原因它是“幻象之幻象”。

Rafael, himself one of those immortal “naïve” artists, in one of his allegorical paintings, has presented that issue of transforming an illusion into an illusion, the fundamental process of the naïve artist and Apollonian culture as well. In his *Transfiguration* the bottom half shows us, in the possessed boy, the despairing porters, and the helplessly frightened disciples, the mirror image of the eternal primordial pain, the sole basis of the world. The “illusion” here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eternal contradiction, the father of things. Now, out of this illusion there rises up, like an ambrosial fragrance, a new world of illusion, like a vision, invisible to those trapped in the first scene, something illuminating and hovering in the purest painless ecstasy, a shining vision to contemplate with eyes wide open.

拉斐尔本人就是那些不朽的纯真艺术家之一。他在一幅象征派的油画里，向我们呈现一个幻象转向另外一个幻象的问题，即纯真艺术家和日神文化的原始转换过程。在他的《耶稣变容》这幅作品里，下半部分通过着魔的男孩、绝望的搬运工以及惊恐且无助的信徒之镜像来表现永恒的原始痛苦——这一世界唯一的基础。这里的“幻象”是万物之父永恒矛盾的写照。从这个幻象往上，犹如一缕清香袅袅升起的是一个新的幻象世界。这个幻象虽然对于第一场景的人来说，是看不

见的；但它如同外象一样，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纯真无比、不病无灾的虚幻里散发着万丈光芒。这是一个闪闪发光的景象，是一个需要睁大眼睛去凝视与思忖的景象。

Here we have before our very eyes in the highest symbolism of art that Apollonian world of beauty and its foundation, the frightening wisdom of Silenus, and we understand, through intuition, the reciprocal necessity for both of them. But Apollo confronts us once again as the divine manifestation of the *principii individuationis* (the individualizing principle), in which the eternally attained goal of the primordial oneness, its redemption through illusion, comes into being. He shows us, with his awe-inspiring gestures, how the entire world of torment is necessary, so that through it the individual is pushed to create the redemptive vision and then, absorbed in contemplation of that vision, sits quietly in his rowboat, tossing around in the middle of the ocean.

这里，就在我们的眼前展现的是一个具有最崇高艺术象征意义的日神审美世界以及它的根基，还有就是森林之神西勒诺斯那可怕的警句。我们凭直觉领悟到了这两者的互相依存的必要性。然而，日神再度以“个性原则”之化身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太一永恒的终极目的达到了，也实现了幻觉救赎。他以他那启迪人生的高贵姿势告诫我们——整个的苦难世界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个人不得不去创造救赎的幻景，然后安心地坐在那里的一叶小舟上，颠簸于大海中，凝思那份幻觉，超度苦难。

This deif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zation, if it is thought of in general as commanding and proscriptive, understands only one law, that of the individual, that is, observing the limits of

individualization, moderation in the Greek sense. Apollo, as the ethical divinity, demands moderation from his followers and self-knowledge, so that they can observe moderation. And so alongside the aesthetic necessity of beauty run the demands “Know thyself” and “Nothing in excess.” Arrogance and excess are considered the essentially hostile daemons of the non-Apollonian sphere, therefo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pre-Apollonian period, the age of the Titans, and of the world beyond the Apollonian, that is, the barbarian world. Because of his Titanic love for mankind Prometheus had to be ripped apart by the vulture. For the sake of his excessive wisdom, which solved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 Oedipus had to be overthrown in a bewildering whirlpool of evil. That is how the Delphic god interpreted the Greek past.

这种个性原则的崇拜，虽然有人会认为强人所难，但它确实可以作为一项标准，即严守个性的范围；用希腊人的话来说，就是适度。作为道德典范的阿波罗，他要求其弟子凡事要适可而止，要有自知之明，只有这样才能洞察到适度二字。所以，他除了审美的要求之外，还提出了“认识自己”和“谨防过分”这些要求。狂妄自大、毫无节制被视为非梦神境界的真正恶魔，是日神以前原始泰坦时代的特征，日神以外的世界；也就是说，是野蛮世界的特征。普罗米修斯就是因为自己把泰坦之爱献给了人类才不得不遭受兀鹰的啄食，俄狄浦斯就是因为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这一过分聪明的举止才陷入纷乱的罪恶旋涡中。狄尔斐之神阿波罗是这样解释希腊过去的。

To the Apollonian Greeks the effect aroused by the Dionysian also seemed “Titanic” and “barbaric.” But they could not, with that response, conceal that they themselves were, nonetheless, internally related and similar to those deposed Titans and heroes. Indeed, they must have felt even more that their entire existence, with all its

beauty and moderation, rested on some hidden underground of suffering and knowledge which was reawakened through that very Dionysian. And look! Apollo could not live without Dionysus! The “Titanic” and the “barbaric” were, in the end, every bit as necessary as the Apollonian.

对于信奉日神的希腊人而言，一切受到酒神影响的东西也都似乎带有“泰坦”和“野蛮”的味道。但是，他们又不能公然地否定自己与被推翻的泰坦之神和英雄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和相似性。确实，他们也许已经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的生存，包括审美和节制方面，都完全建立在对苦难和认知潜在的觉醒上，而这种觉醒只能靠这个酒神。看吧！阿波罗离不开酒神！所谓的“泰坦”与“野蛮”最终成为了日神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And now let us imagine how in this world, constructed on illusion and moderation and restrained by art, the ecstatic sound of the Dionysian celebration rang out all around with a constantly tempting magic, how in such celebrations the entire excess of nature sang out loudly in joy, suffering, and knowledge, even in the most piercing scream. Let's imagine what the psalm-chanting Apollonian artist, with his ghostly harp music could offer in comparison to this daemonic popular singing. The muses of the art of “illusion” withered away in the face of an art which spoke truth in its intoxicated state: the wisdom of Silenus cried out “Woe! Woe!” against the serene Olympian. Individualism, with all its limits and moderation, was destroyed in the self-forgetfulness of the Dionysian condition and forgot its Apollonian principles.

那么现在，让我们试想一下这样一幅场景：酒神庆典上喧嚣的声

音，虽然基于幻觉与节制之上，并受制于艺术的规则，但声音还是在那里响彻云霄，弄得人们神魂颠倒；整个场面，所有的人都无所顾忌地引吭高歌，甚至用刺耳的尖叫声来唱出心中的欢乐、苦难和认知。让我们再试想一下另外一幅场景：日神派的唱诗艺术家，在那里拨动着竖琴，这幽灵般的声音岂能与这个令人陶醉的大众化演唱方式堪比。在这种迷幻吐真言的艺术形式面前，“幻境”这一冥想艺术暗然失色了！听听西勒诺斯是怎样对静穆的奥林匹斯山神高呼的：“悲哀！悲哀！”个性主义，连同它的限制和适度消解在酒神的忘我境界里，日神的清规戒律也早已抛之脑后。

Excess revealed itself as the truth. The contradictory ecstasy born from of pain spoke of itself right out of the heart of nature. And so the Apollonian was canceled and destroyed, above all where the Dionysian penetrated. But it is just as certain that in those places where the first onslaught was halted, the high reputation and the majesty of the Delphic god manifested itself more firmly and threateningly than ever. For I can explain the Doric state and Doric art only as a constant Apollonian war camp. Only through an uninterrupted opposition to the Titanic-barbaric essence of the Dionysian could such a defiantly aloof art, protected on all sides with fortifications, such a harsh upbringing as a preparation for war, and such a cruel and ruthless basis for government endure.

过度变成真理，这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悲中生乐是大自然的肺腑之言。所以，酒神文化所到之处，日神文化必将遭到废除和破坏。反之亦然。酒神的进攻一旦中止，日神的名誉与威严就变得更加坚固与高涨。因此，在我看来，多立克境界和多立克艺术只能算是日神的一个文化常驻战争集中营。唯有不断地反抗酒神文化中的泰坦和原始野性，这个目空一切、壁垒森严的艺术，这个训练有素、时刻备战的艺术，这个为日后取得统治地位做出残酷无情准备的艺术才能维持长

久。

Up to this point I have set out at some length what I observed at the opening of this essay: how the Dionysian and the Apollonian ruled the Hellenic world, in a constant sequence of births, one after the other, mutually intensifying each other, how, out of the “first” ages, with their battles of the Titans and their harsh popular philosophy, the Homeric world developed under the rule of the Apollonian drive for beauty, how this “naïve” magnificence is swallowed up once more by the breaking out of the Dionysian torrent, and how in opposition to this new power the Apollonian erected the rigid majesty of Doric art and the Doric world view.

至此，我已经把文章开头部分做了非常详尽的论述：酒神文化与日神文化是如何统治古希腊世界的——两者相继诞生，之后又相互强化；荷马世界如何接受日神审美驱动力的影响，与泰坦族和他们的粗鲁大众哲学进行战斗从而走出“第一”阶段的；这个“纯真”的意义如何再一次遭到酒神文化山洪爆发淹没的；以及阿波罗神又如何抵抗这股新的力量，并且把多立克艺术和多立克世界观的刚硬威风树立起来的。

If in this way 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Greeks, in the struggle of these two hostile principles, falls into four major artistic periods, we are now impelled to ask more about the final stage of this development and striving, in case we should consider the last attained period, the one of Doric art, as the summit and intention of these artistic impulses. Here, the lofty and highly much praised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Attic tragedy and the dramatic dithyramb presents itself before our eyes, as the common goal of both artistic

drives, whose secret marriage partnership, after a long antecedent struggle, celebrated itself with such a child, simultaneously Antigone and Cassandra.

如果古希腊人的历史确实是通过这两个对立原则相互斗争的方式发展而来的，那其艺术就可以分成四个主要阶段。而现在我们有必要对它们发展和奋斗的最后一个阶段做进一步的探讨，以免将来我们把最后所取得的阶段，即多立克艺术的时代，当作是这些艺术冲动的最高峰和归宿。在这里，像雅典派的阿蒂卡悲剧和戏曲性的酒神赞美歌这样受到无比高度赞赏的艺术作品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作为两个有着共同目标的艺术驱动力和秘密联姻的伴侣，它们庆贺自己经过长期的波折，终于同时拥有了两个孩子：安提戈涅和卡桑德拉。

5

5

We are now approaching the essential goal of our undertaking, which aims at a knowledge of the Dionysian-Apollonian genius and its works of art, or at least an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of its mysterious unity. Here now we raise the question of where that new seed first appears in the Hellenic world, the seed which later develops into tragedy and the dramatic dithyramb. On this question classical antiquity itself gives us illustrative evidence when it places Homer and Archilochus next to each other as the originators and torch-bearers of Greek poetry in paintings, cameos, and so on, in full confidence that only these two should be considered equally the original natures from whom a fire-storm flowed out over the entire later world of the Greeks.

现在，我们接近研究的真正目的了，这个目的就是在于认识酒神兼日神型的天才及其艺术作品，或至少我们直观地去理解这种神秘的结合。这里，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这颗后来发展成为悲剧和戏剧性的酒神赞美歌的种子最初出现在希腊的什么地方。对于这个问题，希腊人用古典文物作为具有解释性的证据给予了回答：无论在油画、浮雕还是其他艺术形式上，荷马和阿奇洛科斯总是被当作诗歌的鼻祖和火炬手肩并肩地放置着。希腊人坚信只有这两位天才值得受到同等的尊重，只有这两位才是后来点燃整个希腊人热情之火的源泉。

Homer, the ancient self-absorbed dreamer, the archetype of the naïve Apollonian artist, now stares astonished at the passionate head of wild Archilochus, the fighting servant of the muses, battered by existence. In its interpretative efforts, our recent aesthetics has known only how to indicate that here the first “subjective” artist stands in contrast to the “objective” artist. This interpretation is of little use, since we recognize the subjective artist as a bad artist and demand in every art and every high artistic achievement, first and foremost, a victory over the subjective, redemption from the “I,” and the silence of every individual will and desire—indeed, we are incapable of accepting the slightest artistic creation as true, unless it has objectivity and a purely 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

荷马——这位古代自我陶醉的做梦人，纯真日神艺术家的原型，此时吃惊地凝视着热情奔放且狂放不羁的阿奇洛科斯的头，他是饱经风霜缪斯女神的侍卫。近来，美学界有了最新的成果，他们解释道，第一个主观型诗人与第一个客观型诗人截然不同。这种解释没有意义，因为我们认为主观型的艺术家是不好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艺术最高成就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战胜主观性，从“我”字中解放出来，制止个人的意志与欲望。真的，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作品，如果没有客

观性，没有超然的静观，我们就不可能把它视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创作。

Hence, our aesthetic must first solve the problem of how it is possible for the “lyricist” to be an artist. For he,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all ages, always says “I” and sings out the entire chromatic sequence of the sounds of his passions and desires. This Archilochus immediately startles us, alongside Homer, through his cry of hate and scorn, through the drunken eruptions of his desire. By doing this, isn't Archilochus (the first artist called subjective) essentially a non-artist? But then where does that veneration come from, which the Delphic oracle, the centre of “objective” art, showed to him, the poet, in very remarkable sayings.

因此，我们美学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抒情诗人成为艺术家。从过往时代的经验来看，抒情诗人总喜欢用“我”字说话，委婉动听地唱出自己心中的情感与欲望。撇开荷马不说，单说阿奇洛科斯而言，这个人真让我们瞠目结舌，他就是靠呐喊表达仇恨与蔑视，通过醉酒方式发泄自己的情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位号称第一位主观型的艺术家，岂不成了一个非艺术家？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对他的崇拜又从何而来？为什么“客观型”的艺术中心阿波罗神谕用非同一般的话语尊称他为诗人？

Schiller has illuminated his own writing process with a psychological observation, inexplicable to him, which nevertheless does not appear questionable. He confesses that when he was in a state of preparation, before he actually started writing, he did not have something like a series of pictures, with a structured causality of ideas, in front of him, but rather a musical mood: “With me,

feeling at first lacks a defined and clear object—that develops for the first time later on. A certain musical emotional state comes first, and from this, with me, the poetic idea then follows.”

席勒曾经通过心理观察来生动地阐述自己的创作过程。那种感受他说不出来，但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他承认，在动手写作之前，他心里一直处于一种预备阶段，但在眼前并没有一连串像画面的东西，也没有一连串结构井然、逻辑严谨的思想，而是一种音乐情怀。他说：“一开始，我的情感缺乏清晰的定义，也没有清晰的目标——只是到后来才开始形成。对我而言，首先有的是某种音乐情感状态，然后才有作诗的思想。”

Now, if we add the most important phenomenon of the entire ancient lyric, the union,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as natural, between the lyricist and the musician, even their common identity (in comparison with which our recent lyrics look like the image of a god without a head) then we can, on the basis of the aesthetic metaphysics we established earlier, account for the lyric poet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He has, first of all, as a Dionysian artist, become entirely one with the primordial oneness of his painful contradictory nature and produces the reflection of this primordial oneness as music, if music can with justice be called a re-working of the world, its second coat. But now this music becomes perceptible to him once again, as in a metaphorical dream ima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pollonian dreaming. That reflection, which lacks imagery and concepts, of the original pain in music, together with its redemption in illusion, gives rise now to a second reflection as the particular metaphor or illustration. The artist has already surrendered his subjectivity in the Dionysian process. The image which now reveals his unity with the heart of the world is a dream

scene, which symbolizes that original contradiction and pain, together with the primordial joy in illusion. The “I” of the lyric poet thus echoes out of the abyss of being. What recent aestheticians mean by his “subjectivity” is mere fantasy.

整个古代抒情诗中最重要的现象是抒情人与音乐家之间的自然融合，这点达到了共识。如果我们现在能把这两者之间的融合与共性（相形之下，我们最近的抒情诗人看上去有点像没头的神像）加以思考进去，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据上述形而上学的审美理论，用下面介绍的方式来解释抒情诗人。首先，他作为酒神的艺术家，与原始太一一样，是痛苦的矛盾体；只是他用音乐的形式再现这种原始太一。如果音乐可以被称为世上的复制品，那音乐就可以被称为第二层外衣。问题是，在日神梦境的影响下，这种音乐在他的眼里变成了可见的实物，犹如象征的梦景。原始的痛苦无表象、无概念地反映在音乐上，又通过幻景获得救赎，便产生第二次的反映，成为一种独特的象征或范本。艺术家在自我酒神化的过程中，放弃了主观性。此时，让他体验到自己与宇宙心灵在融合的是一种梦境。它象征原始的矛盾和痛苦，同时也象征原始的快乐。于是，抒情诗人的“我”从本我的深渊里回荡出来。所以说，近来美学家说抒情诗人具有“主观性”一说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

When Archilochus, the first Greek lyric poet, announces his raging love and, at the same time, his contempt for the daughters of Lycambes, it is not his own passion which dances in front of us in an orgiastic frenzy. We see Dionysus and the maenads; we see the intoxicated reveler Archilochus sunk down in sleep—as Euripides describes in the Bacchae, asleep in a high Alpine meadow in the midday sun—and now Apollo steps up to him and touches him with his laurel. The Dionysian musical enchantment of the sleeper now, as it were, flashes around him fiery images, lyrical poems, which

are called, in their highest form, tragedies and dramatic dithyrambs.

当希腊第一位抒情诗人阿奇洛科斯向吕甘伯斯的女儿表达自己狂热的爱情，同时也表现出对她们的蔑视，于是在我们面前看到的不仅仅是他如醉如狂的热情悸动，而且还有狄奥尼索斯酒神和他的侍女们。我们还看到酩酊大醉的阿奇洛科斯正酣睡在那里——形同欧里庇得斯在《酒神侍者》中所描绘的那样——在烈日当头的中午，酣睡在高山草坪上。此时，阿波罗向阿奇洛科斯走来，用月桂枝触碰了他一下，于是睡诗人的酒神音乐魔力立马在他周围迸发出如画的火花。此时的抒情诗，就是其最高形式，被称为悲剧和戏剧酒神颂。

The plastic artist as well as his relation, the epic poet, is absorbed in the pure contemplation of images. The Dionysian musician lacks any image and is in himself only and entirely the original pain and original reverberation of that image. The lyrical genius feels a world of images and metaphors grow up out of the mysteriously unified state of renunciation of the self. These have a colour, causality, and speed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at world of the plastic artist and the writer of epic. While the last of these (the epic poet) lives in these pictures and only in them with joyful contentment and does not get tired of contemplating them with love, right down to the smallest details. Even the image of the angry Achilles is for him only a picture whose expressions of anger he enjoys with that dream joy in illusions, so that he, by this mirror of appearances, is protected against the development of that sense of unity and being fused together with the forms he has created. By contrast, the images of the lyric poet are nothing but himself and, as it were, only different objectifications of himself. He can say “I” because he is the moving central point of that world. Only this “I” is

not the same as the “I” of the awake, empirically real man, but the single “I” of true and eternal being in general, the “I” rest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things. Through its portrayal the lyrical genius sees right into the very basis of things.

造型艺术家，与同类的史诗诗人一样，喜欢沉湎在单纯的形象观照中。酒神风格的音乐家则无需形象，他自己就是原始痛苦唯一或全部的观照或者是那个形象的原始放射。抒情天才能够感受到一个充满画面和象征意义的世界从神秘的玄同忘我之境中产生出来。这里所有的颜色、因果关系和速度都完全有别于造型艺术家和史诗作家世界的。其中的最后一个，即史诗作家，他们生活在这些画面当中。只有生活在这些画面当中，他们才能感受到那种无比的快乐与满足。他们带着爱意去静观这一切，细微末梢也不放过，乐此不疲。甚至阿喀琉斯愤怒的形象，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一幅画景而已，因为他是带着幻觉中做梦的快感来欣赏这个愤怒表情的。在镜像的作用下，他不会产生融合的感觉，也不会与他所创作的人物同体。相反，抒情诗人所描写的画面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也就是说，是他本人不同形式的客观化。他可以用“我”字，因为他就是那个世界可移动的中心点。只是这个“我”并不等于醒着的“我”，经验中真实的我，而是真实而永恒的“我”。这个“我”建立在万象基础之上。通过对“我”的写照，抒情天才就能洞察到事物的根源。

Now let's imagine how he looks upon himself among these likenesses, as a non-genius, that is, as his own “Subject,” the entire unruly crowd of subjective passions and striving of his will aiming at something particular, which seems real to him. If it now seems as if the lyrical genius and the non-genius bound up with him were one and the same and as if he first spoke that little word “I” about himself, then this illusion could no longer deceive us, not at least in the way it deceived those who have defined the lyricist as a

subjective poet.

让我们想象一下，抒情天才在同类人当中是如何看待自己也是一个非天才这一事实的。也就是说，如何把自己当作自己的“主体”。曾经为了追求意志中某项特别的东西所付出的那些非真实的主观热情和努力，现在变得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如果此时他觉得好像抒情天才与非抒情天才都与他同体或同化，并说出那个小词“我”，那么这个幻景就不再能够蒙蔽我们了，至少不会像蒙蔽认为抒情诗人是主观性诗人的那些人那样。

To tell the truth, Archilochus, the man of passionately burning love and hate, is only a vision of the genius who is no longer Archilochus any more but a world genius and who expresses his primordial pain symbolically in Archilochus as a metaphor for man. That subjectively willing and desiring man Archilochus can never ever be a poet. It is not at all essential that the lyric poet see directly in front of him the phenomenon of the man Archilochus as a reflection of eternal being. Tragedy shows how far the visionary world of the lyric poet can distance itself from that phenomenon clearly standing near at hand.

说实话，阿奇洛科斯由于具有热情似火的爱与恨，所以变成了天才的形象，而不再是阿奇洛科斯本人，他是世界奇才，只是假借阿奇洛科斯其人，象征地说出自己的原始痛苦。那个具有主观意志和欲望的人，阿奇洛科斯，是永远成不了诗人的。抒情诗人一眼能看出他面前的阿奇洛科斯其人反映的是永恒存在这一现象，这点并不重要。悲剧向我们展示，诗人的想象空间可以把近在眼前的现象拒于千里之外。

Schopenhauer, who did not hide from the difficulty which the lyric poet creates for the philosophical observer of art, believed that he had discovered a solution (something which I cannot go along with) when in his profound metaphysics of music he found a way setting the difficulty decisively to one side, as I believe I have done in his spirit and with due honour to him. He describes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song as follows:

叔本华并不回避抒情诗人给艺术哲学家带来的难题，并相信自己已找到了答案（我不认同）。他认为，他那一套关于音乐的深奥的形而上学理论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我照他的精神做了，而且也没有损坏他的名声。下面是他对诗歌本质的描述：

>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inger is filled with the subject of willing, that is, his own willing, often as an unleashed satisfied willing (joy), but also, and more often, as a restricted willing (sorrow). It is always a mobile condition of the heart: emotional and passionate. However, alongside this condition, the singer simultaneously, through a glimpse at the surrounding nature, becomes aware of himself as a subject of the pure, will-less knowledge, whose imperturbable, blessed tranquilly now enters to contrast the pressure of his always dull, always still limited willing. The sensation of this contrast, this game back and forth, is basically what expresses itself in the totality of the song and what, in general, creates the lyrical state. In this state, pure understanding, as it were, comes to us, to save us from willing and the pressures of willing. We

follow along, but only moment by moment. The will, the memory of our personal goals, constantly interrupts this calm contemplation of ours, over and over again, but the next beautiful setting, in which pure will-less knowledge presents itself to us, always, once again, releases us from willing. Hence, in the song and the lyrical mood, willing (our personal interest in our own purposes) and pure contemplation in the setting which presents itself are miraculously mixed up together. We seek and imagin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both. The subjective mood, the emotional state of the will, communicates with the surroundings we contemplate, and the latter, in turn, gives its colour to our mood, in a reflex action. The true song is the expression of this entire emotional condition, mixed and divided in this way. (*World as Will and Idea* , I, p. 295)

一个歌手的知觉充满意志的主体，也就是说，充满自己的意志。这种意志有时表现为被释放、被满足的快乐，多数的时候呈现出一种被限制的悲哀。意志是一颗易动的心：多愁善感、热情奔放。歌手就是带着这颗易动的心表演的。只要他环顾一下四周，就能感到此刻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纯洁、没有多少意志的认知主体——沉着与冷静，俨然不是平时那索然无味，意志被压抑的心情。感知这种对照和二者互换交替是唱歌表演必不可少的，也是构成抒情心境的因素。在这种场合下，纯粹认知出现了，我们不再受意志的控制或被意志压制。我们带着这种心情一直往前走；可是好景不长，那些不忘我们个人目的的意志不断地来

干扰我们的静观，一次又一次；接下来，寡欲的认知境界又回来了，像以往一样，再一次把我们从意志中释放出来。于是，在歌唱和抒情的情绪里，意志（对自己目标所感的兴趣）和当时所处的静观状态奇迹般地融合在一起。我们想弄明白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主观的情绪，意志的情感状态，和我们静观的环境进行交流。接着，环境以反射的方式，给我们的情绪添加色彩。真正的歌曲就是像这样把和和分分的情感贯彻始终。（《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第295页）

Who can fail to recognize in this description that here the lyric has been characterized as an incompletely realized art, a leap, as it were, which seldom attains its goal, indeed, as a semi-art, whose essence must consist of the fact that the will and pure contemplation, that is, the unaesthetic and the aesthetic conditions, must be miraculously mixed up together? In contrast to this, we maintain that the entire opposition, which even Schopenhauer uses as a measurement of value to classify art, that opposition of the subjective and the objective, has generally no place in aesthetics, since the subject, the willing individual demanding his own egotistical purposes, can only be thought of as an enemy of art not as its origin.

通过这场描述，谁不能看出，抒情诗已经被说成是一种没被充分认识的艺术，一种目的不易达到“跳跃”性的半艺术，其本质就是意志与静观，也就是说，非审美与审美必须奇妙地融合在一起？我们的观点与之相反，我们认为主观与客观是对立关系，尽管叔本华也把艺术按主客观分成两类，并把这两种对立作为艺术分类的价值衡量标准，但是我们还是认为，这种分类说法在审美领域里是没有地位的，因为

主体，即只顾达到自我本位目的的意志个体，只能把它看作艺术的敌人，而不能看作艺术的根源。

But insofar as the subject is an artist, he is already released from his individual willing and has become, so to speak, a medium through which a subject of true being celebrates its redemption. For we need to be clear on this point, above everything else (to our humiliation or ennoblement): the entire comedy of art does not present itself for us in order to make us better or to educate us—even less so that we should be the true creators of the art world. We should really look upon ourselves as beautiful pictures and artistic projections of the true creator, and in that significance as works of art we have our highest value, for only as an aesthetic phenomena are existence and the world eternally justified, while, of course, our own consciousness of this significance of ours is no different from the consciousness which soldiers painted on canvas have of the battle portrayed there.

其实，只要主体是个艺术家，他就已经摆脱了他个人意志，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了一种媒介，通过这个媒介，一个真实存在的“主体”就可以获得救赎。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无论这个观点给我们带来荣或辱）；整个喜剧艺术的诞生，不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水平，也不是为了教育我们，甚至没有什么作用，所以我们必须成为这个艺术世界的真正创造者。我们必须好好地把自己看作是美丽的画卷和真实创造者的艺术投射。就这点来看，作为艺术品的我们，具有最高的价值。因为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我们的生存和这个世界才有永恒的合理性。当然，我们对自身在这方面价值的意识，与画在画布上的士兵对画在那里战场的意识一样没有意识。

Hence our entire knowledge of art is basically completely illusory, because, as knowing people, we are not one with or identical to that being who, as the single creator and spectator of that comedy of art, prepares for itself an eternal enjoyment.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 genius in the act of artistic creation is fused with that primordial artist of the world, does he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eternal nature of art, only in that state in which (as in the weird picture of fairy tales) he can miraculously turn his eyes and contemplate himself. Now he is simultaneously subject and object, all at once poet, actor, and spectator.

所以，我们关于艺术的一切知识，完全是错觉的，因为明智的我们，是知道自己并没有与存在同体，也没有与他认同。作为喜剧艺术的唯一创造者和观众，“存在”为自己准备了这个永恒的娱乐方式。唯有当天才在艺术创作活动中同这给世界的原始艺术家融为一体的起时候，他才能完全看到艺术的永恒本质。也只有在那种状态下（就像童话里的奇异画面），他才能够神奇地翻转眼睛来看自己。这样，他同时成为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诗人、演员，也是观众。

6

6

With respect to Archilochus, learned scholarship has revealed that he introduced the folk song into literature and that, because of this achievement, he earned his place next to Homer in the universal estimation of the Greeks. But what is the folk song in comparison to the completely Apollonian epic poem? What else but the *perpetuum vestigum* (the eternal mark) of a union between the Apollonian and the Dionysian? Its tremendous expansion, extending

to all peoples and constantly increasing with new births, testifies to us how strong that artistic duality of nature is: which, to use an analogy, leaves its trace behind in the folk song just as the orgiastic movements of a people leave their traces in its music. Indeed, it must also be historically demonstrable how that period rich in folk songs at the same time was stirred in the strongest manner by Dionysian trends, something which we have to recognize as the foundation and precondition of folk songs.

关于阿奇洛科斯，学者们研究发现，是他把民歌引入文学。由于这个功绩，希腊人普遍认定他有权享受仅次于荷马的地位。但是，与日神风格的叙事诗相比，民歌又有什么不同呢？除了它是日神风格与酒神风格永恒的结合体（永恒的标记）还有什么？民歌广泛流行于各种民族之间，而且随着新的形式不断地出现，也在日益壮大。这就向我们证明了一点——自然界的艺术二元冲动威力多么大啊。打个比喻，这种威力在民歌里所留下的痕迹，就像一个民族狂欢活动，在音乐里留下痕迹一样。的确，历史也可以表明，民歌最丰富的时代往往就是受酒神祭潮冲击最猛烈的时代，我们应该把这股浪潮当作民歌的根源和先决条件。

But to begin with, we must view the folk song as the musical mirror of the world, as the primordial melody, which seeks for a parallel dream image of itself and expresses this in poetry. The melody is thus primary and universal, for which reason it can undergo many objectifications, in several texts. It is also far more important and more essential in the naïve evaluations of the people. Melody gives birth to poetry from itself, over and over again. The forms of the strophes in the folk song indicate that to us. I have always observed this phenomenon with astonishment, until I finally came up with this explanation. Whoever looks at a collection of folk

songs, for example, *Des Knaben Wunderhorn* (*The Boy's Miraculous Horn*) with this theory in mind will find countless examples of how the continually fecund melody emits fiery showers of images all around. These images, with their bright colours, sudden alteration, and their wild momentum, reveal a power completely foreign to the epic illusion and its calm forward progres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pic this uneven and irregular word of images in the lyric is easy to condemn—something no doubt the solemn rhapsodists of the Apollonian celebrations did in the age of Terpander.

然而，我们首先应该把民歌当作反映世界的一面音乐镜子，当作原始的旋律，这种旋律为自己找到了匹配的梦境，并用歌词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旋律是首位，无所不在。这就是为什么旋律可以在不同歌词里接受不同形式的客观化。再者，在人们朴实的认知里，旋律也是非常重要，必不可少的。旋律从自身中产生歌曲，并且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旋律。民歌中有诗节的形式，足以证明这点。过去，每当我发现这一现象的时候，总感到非常惊愕。后来我终于找到了解释。无论是谁，只要按照这个理论去研究一下民歌集，比如说《男孩子的魔笛》，就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这个不断在生育的旋律如何向四周迸发火焰般的形象的。这些形象个个都是色彩斑斓、瞬息万变、动力十足。这种力量是史诗般的幻景和其波澜不惊往前推进的叙事方式所不具备的。从史诗的角度来看，抒情歌词不均匀、无规则，应当受到谴责。果真，在特尔潘德时代的日神节上，遭到了庄严的史诗朗诵者的谴责。

Thus, in the poetry of the folk song we see the language of poetry most strongly pressured to imitate music. Hence, with Archilochus a new world of poetry begins, something which conflicts very profoundly with the Homeric world. Here we have demonstrated the one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music, word and tone: word, image, and idea look for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in music and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music. In this sense we can distinguish two main strea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of the Greek people: language which imitates appearance and images and language which imitates the world of music.

因此，从民歌歌词的创作中我们看见，歌词受到极大的压制，以便仿造音乐。所以，从阿奇洛科斯起，开始了诗歌的新世界，它从根本上不同于荷马史诗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已经指出歌词与音乐、单词与音调之间都有可能存在某种关联：歌词、形象和思想在音乐里找到了隐喻式的表达方式，体验到了音乐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对希腊人语言发展中的两大主流做出区分：一是模仿外象和形象，一个是模仿音乐世界。

Let's think for a moment more deeply about the linguistic difference in colour,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vocabulary between Homer and Pindar in order to grasp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ontrast. It will become crystal clear to some that between Homer and Pindar the orgiastic flute melodies of Olympus must have rung out, music which even in the time of Aristotle, in the midst of an infinitely more sophisticated music, drove people into raptures of drunken enthusiasm and with their natural effects no doubt stimulated all the poetical forms of expression of contemporaries to imitate them.

为了掌握两者对立差异的意义，我们不妨多思考一下荷马和另外一个希腊抒情诗人品达在语言色彩、句法和词汇方面的差异。显然，在荷马时期和品达时期之间，一定响彻过奥林匹斯秘仪时那狂野的笛声。即使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代，音乐已经相对发达了，这种旋律的笛声仍旧能使人们如醉如痴、热情奔放。毫无疑问，它以其原始的效

果激发当时所有的诗歌表达手段去模仿它。

I recall here a well-known phenomenon of our own times, something which strikes our aestheticians as objectionable. Again and again we experience how a Beethoven symphony makes it necessary for the individual listener to talk in images, even if it's true that the collection of different worlds of imagery created by a musical piece really looks fantastically confused, even contradictory. The most proper style of our aestheticians is to exercise their lame wits on such a collection and to overlook the phenomenon which is really worth explaining. Even when the tone poet has spoken in images about his composition, for example, when he describes a symphony as a pastoral, one movement as “A Scene by the Brook,” and another as “A Frolicking Meeting of Peasants,” these expressions are in any event only metaphors, images born out of the music and not some objective condition imitated by the music. These notions cannot teach us anything at all about the Dionysian content of the music and have no exclusive value alongside other pictures.

我不禁想起当今出现的一种人所皆知，但遭到美学家反对的现象。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体验过贝多芬交响曲能使有的听众觉得有必要说出这个全集所表达的各种形象。尽管这首了不起的交响曲全集确实能使人产生不同的想象世界，但是这些想象真的是乱七八糟，荒诞无奇，有的甚至相互矛盾。可是，我们的美学家就是喜欢在这个全集上挑战自己那可怜的智慧，忽视真正值得解释的现象。就连交响音诗作曲家也用过语言来说明他作品的形象，比如说，他把某个交响曲称为田园曲交响曲，或者把其中一个乐章称为“溪边景色”，另外一个乐章称为“农夫同乐”。这些表达法充其量只能算是隐喻，是音乐孕育出来的形象，而不是音乐模仿的客观对象。这些概念在音乐醉境方面没有

给我们任何启示；比起其它的画面，也没有什么独特的价值。

Now, we have only to transfer this process of unloading music into pictures to a large, youthful, linguistically creative population in order to sense how the strophic folk song arose and how the entire linguistic capability was stimulated by a new principle, the imitation of music. If we can thus consider the lyrical poem as the mimetic efflorescence of music in pictures and ideas, then we can now ask the following question: “What does music look like in the mirror of imagery and ideas?” It appears as the will, taking that word in Schopenhauer's sense, that is, as the opposite to the aesthetic, pure, contemplative, will-less state. Here we should differentiate as sharply as possible the idea of being from the idea of appearance. For it is impossible for music, given its nature, *to be* the will, because if that were the case we would have to ban music entirely from the realm of art. For the will consists of what is inherently unaesthetic. But music *appears* as the will.

如果我们能把音乐转化为图像这一过程放在一个人数众多、朝气蓬勃、富有语言创造能力的民族身上来研究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分节式的民歌是如何兴起的，整个语言能力又是如何被模仿音乐——这个新原则所激发的。如果我们能够因此把抒般的歌词看作是形象和思想对音乐模仿的粉化，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音乐在形象和思想镜像中是以什么形象出现的？”用叔本华的话来说，以意志的形象出现；也就是说，是纯粹、静观、寡欲审美状态的对立面。这里，我们必须把内在概念和外在概念分得清清楚楚。鉴于音乐的自身特性，它是不可能成为意志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将不得不把音乐彻底地排除在艺术范畴之外。意志本来是非审美的，但是音乐却作为意志呈现出来。

In order to express that appearance in images, the lyric poet needs all the excitement of passion, from the whispers of affection right to the ravings of lunacy. Under the impulse to speak of music in Apollonian metaphors, he understands all nature and himself in nature only as eternal willing, desiring, yearning. However, insofar as he interprets music in images, he is resting in the still tranquility of the sea of Apollonian observation, no matter how much everything which he contemplates through that medium of music is moving around him, pushing and driving. Indeed, if he looks at himself through that same medium, his own image reveals itself to him in a condition of emotional dissatisfaction. His own willing, yearning, groaning, and cheering are for him a metaphor which he interprets the music for himself. This is the phenomenon of the lyric poet: as an Apollonian genius he interprets the music through the image of the will, while he himself, fully released from the greed of his will, is a pure, untroubled eye of the sun.

为了把呈现出来的音乐意志转换为形象，抒情诗人则需要调动全部的激情，从温情细语到胡言乱语。他一时冲动用了日神比喻来表达音乐，他把整个自然界，连同处于大自然里的自己比喻成永恒的渴望者、欲望者和展望者。然而，只要让他用形象来解释音乐的话，他就会立即让自己休憩在日神观照的静谧大海上，任凭他通过音乐媒介观照到的一切事物在他周围如何纷乱进行，他都在那里静观着。然而，如果他用同样的手段观照自己的话，那他的形象就呈现出不满足的状态。他自己的渴望、展望、呻吟和欢乐此时变成了他借以向自己解释音乐的比喻。这就是抒情诗人的情况：作为日神风格的天才，他是通过意志的形象来解释音乐，尽管他本人已经完全克服了欲望的贪婪，成为了一只纤尘不染的天眼。

This entire discussion firmly maintains that the lyric is just as

dependent on the spirit of music as is music itself. In its complete freedom, music does not use image and idea, but only tolerates them as something additional to itself. The poetry of the lyricist can express nothing which was not already latent in the immense universa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music, which forces him to speak in images. The world symbolism of music for this very reason cannot in any way be overcome by or reduced to language, because music addresses itself symbolically to the primordial contradiction and pain in the heart of the original oneness, and thus presents in symbolic form a sphere which is above all appearances and prior to them. In comparison with music, each appearance is far more a mere metaphor. Hence, language, the organ and symbol of appearances, never ever converts the deepest core of music to something external, but always remains, as long as it involves itself with the imitation of music, only in superficial contact with the music. The full eloquence of lyric poetry cannot bring us one step closer to the deepest meaning of music.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坚定地认为，歌词同音乐一样，是依赖音乐的精神。音乐是完全无拘无束的，它不需要用形象，也不需要有主题思想；即使有的话，也只能作为附属品。歌词创作者的歌词没法表达音乐在普及性和有效性方面所没有的东西，这样他就不得不用形象来说话。正因为这个缘故，音乐世界里的象征无论如何也不会被语言消解或减弱，音乐采用象征的方式来述说太一内心的原始矛盾与痛苦，所以它用象征的方式来展现万物出现之前的，再之前的世界。与音乐对比，任何一件东西出现，都只不过是个隐喻。因此，歌词只能算是其外观的元件与象征，从来没有把音乐最深的内核外化，一直与音乐保持肤浅的接触，直到在需要模仿音乐的时候为止。纵然抒情歌词优美动听，但它丝毫也不能让我们对音乐最深层的意义靠近一步。

7

7

We must now seek assistance from all the artistic principles laid out above in order to find our way correctly through the labyrinth—a descriptive term we have to use to designate the origin of Greek tragedy. I don't think I'm saying anything illogical when I claim that the problem of this origin has not once been seriously formulated up to now, let alone solved, no matter how frequently the scattered scraps of ancient tradition have been put together in combinations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n again ripped apart.

现在，我们必须借助于上述所有的艺术原理，找到正确走出这个“迷宫”的路。我们不得不用迷宫这个描述性的术语来描述希腊悲剧的起源。对于希腊悲剧起源的问题，在古代民间中，多次出现过拼拼凑凑的说法，但是最终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我想，当我声称迄今为止没有人认真地阐释过，更没有人解决过的希腊悲剧起源问题的时候，我并没有在那里胡说八道。

This tradition tells us very emphatically that tragedy developed out of the tragic chorus and originally consisted only of a chorus and nothing else. This fact requires us to look into the heart of this tragic chorus as the essential original drama, without allowing ourselves to be satisfied in any way with the common styles of talking about art—that the chorus is the ideal spectator or had the job of standing in for the people over against the royal area of the scene.

这一民间说法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希腊悲剧是从悲剧合唱队发展而来的。起初的时候，合唱队就只是合唱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这一事实需要我们把这支悲剧合唱队作为最重要的原始戏剧来探究其核心，而不能只是满足使用现有的艺术理论，说：合唱队是理想的观众，有责任代替平民与剧中的皇权势力做斗争。

That last mentioned point, a conceptual explanation which sounds so lofty for many politicians (as though the invariable moral law was presented by the democratic Athenians in the people's chorus, which was always proved right in matters dealing with their kings' passionate acts of violence and excess) may have been suggested by a word from Aristotle. But such an idea has no influence on the original formation of tragedy, since all the opposition between people and ruler and every political-social issue in general is excluded from those purely religious origins. Looking with hindsight back on the classical form of the chorus known to us in Aeschylus and Sophocles we might well consider it blasphemous to talk of a premoni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popular representation” here. Others, however, have not been deterred from this blasphemous assertion. The ancient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had no practical knowledge of a constitutional popular representation and they never once “had a hopeful premonition” of such things in their tragedies.

最后所提到的那点，在许多政客耳朵里，听上去非常的高档（好像这个颠扑不破的道德规范是民主的雅典人利用平民合唱队提出来的，而合唱队在与国王暴行和专横对抗方面也总能证明自己在这方面做的很好）。这种说法也好像曾经得到过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但它不足以解释悲剧的形成，因为所有的横跨在平民与统治者之间，平民与一般政治-社会问题之间的一切对立都没有触及到那些纯粹的宗教起源

问题。如果我们做一次事后聪明的回顾，回顾一下我们熟悉的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合唱队的古典形式，我们完全有可能把在这里谈论的“立宪人民代表制”的预言说成是“亵渎神明”。但是，有的人就是没有被这个亵渎神明的论断所吓倒。古代政治制度并不懂什么叫做立宪人民代表制，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在悲剧里对这些事情做出希望性的预言。

Much more famous than this poli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chorus is A. W. Schlegel's idea. He recommended that we consider the chorus to some extent as a sample embodiment of the crowd of onlookers, as the “ideal spectator.” This view, combined with that historical tradition that originally the tragedy consisted entirely of the chorus, reveals itself for what it is, a crude and unscholarly, although dazzling, claim. But the glitter survives only in the compact form of the expression, from the real German prejudice for everything which is called “ideal,” and from our momentary astonishment.

比合唱队政治根源说更加有名的是奥·威·施莱格尔的观点。他建议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把合唱队视为一群旁观者的典型化身，即所谓的“理想观众”。这个观点，与“悲剧一开始就是一支合唱队”这一历史传统说法一样，暴露了自己的说法只不过是一则粗浅的、无学术性的论断。尽管这个观点耀眼夺目，但是它的闪光之处来源于概况性的表达，来源于德国人对任何可视为“理想的”东西持有的偏见，来源于它当时引起我们感到惊愕的潜能。

For we are astonished, as soon as we compare the theatre public we know well with that chorus and ask ourselves whether it would be at all possible on the basis of this public to derive some

idealization analogous to the tragic chorus. We silently deny this and then are surprised by the audacity of Schlegel's claim as well as by the totally different nature of the Greek general public. For we had always thought that the proper spectator, whoever he might be, must always remain conscious that he has a work of art in front of him, not an empirical reality. By contrast, the tragic chorus of the Greeks is required to recognize the shapes on the stage as living, existing people. The chorus of Oceanids really believes that they see the Titan Prometheus in front of them and consider themselves every bit as real as the god of the scene.

我们是会惊愕的。只要我们把今天熟知的剧场观众与当时的合唱队做个对比，并基于这个大众都知晓的事实，问问自己是否有这个可能，想象出类似的悲剧合唱队，我们就会默默地否定这点。但随即，我们又会被施莱格尔的大胆言论所惊愕，被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希腊大众所惊愕。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说到观众，无论是什么人，一定意识到在他前面出现的只不过是个艺术品，而不是经验的现实。相比之下，希腊人的悲剧合唱队应该认识到，舞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可是，海神仙女合唱队真的相信站在她们面前的泰坦巨神普罗米修斯是真的，并且认为自己就是剧中的真神。

And is that supposed to be the highest and purest type of spectator, a person who, like the Oceanids, considers Prometheus vitally alive and real? Would it be a mark of the ideal spectator to run up onto the stage and free the god from his torment? We had believed in an aesthetic public and considered the individual spectator sufficiently capable, the more he was in a position to take the work of art as art, that is, aesthetically. This saying of Schlegel's indicates to us that the completely ideal spectator lets the scenic world work on him, not aesthetically at all, but vitally and

empirically. “Oh, what about these Greeks!” we sigh, “they are knocking over our aesthetics!” But once we get used to that idea, we repeat Schlegel's saying every time we talk about the chorus.

一个人真的像海神仙女合唱队那样，把普罗米修斯当做真神现身就是最高级、最纯真的观众吗？难道一个人跑上舞台去，把普罗米修斯从酷刑中解放就标志他是一个最高级、最纯粹的观众？我们相信有这样一批审美大众，相信他们有足够的审美能力，把艺术品当做艺术，也就是说，从审美角度来看。施莱格尔的言论告诉我们，最理想的观众不是从审美的角度对待舞台，而是把舞台当做活生生的体验去对待。我们不禁叹息道：“哦，这些希腊人是怎么啦！他们推翻了我们的美学观！”问题是，一旦我们习惯了这种说法，恐怕以后每次谈到合唱队的时候，就会重复施莱格尔的说法。

But that emphatic tradition speaks here against Schlegel. The chorus in itself, without the stage, that is, the primitive form of tragedy, and that chorus of ideal spectators are not compatible. What sort of artistic style would we have if from this the idea of the spectator we derived, as its essential form, the “spectator in himself” (the pure spectator). The spectator without a play is a contradictory idea. We suspect that the birth of tragedy cannot be explained either from the high estimation of the moral intelligence of the masses or from the idea of the spectator without a play. And we consider this problem too profound to be touched by such superficial styles of commentary.

然而，那个十分明确的民间传说却驳倒了施莱格尔的观点：合唱队原来是没有舞台的，也就是说，这是悲剧的原型。这与有着理想观众的合唱队这一说法是相悖的。试问，有哪种艺术形式是从观众这概

念引伸出来的呢？把“自在的观众”（纯粹的观众）当做艺术的基本形式又是什么样的艺术？无戏的观众，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我们认为，悲剧的诞生恐怕既不能以大众对于道德思想的高度评估来解释，又不能以无戏的观众的概念来说明。相反，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太深奥，如此肤浅的评论连它的边都沾不上。

Schiller has already provided an infinitely more valuable insight into the meaning of the chorus in the famous preface to the *Bride from Messina* —the chorus viewed as a living wall which tragedy draws about itself in order to separate itself cleanly from the real world and to protect its ideal space and its poetical freedom for itself. With this as his main weapon Schiller fought against the common idea of naturalism, against the common demand for illusionistic dramatic poetry. While in the theatre daytime might be only artistic and stage architecture only symbolic, and the nature of the metrical language might have an ideal quality, nevertheless, on the whole, a misconception still ruled: it was not enough, Schiller claimed, that people merely tolerated as poetic freedom what was the essence of all poetr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orus, according to Schiller, was the decisive step with which war was declared openly and nobly against naturalism in art.

席勒在其著名的《麦西拿的新娘》的序文里，曾就合唱队的意义给出过极其可贵的见解。他认为，合唱队是一堵活墙，悲剧在那上演，目的就是把自己与现实世界彻底地隔绝开来，以保存它的理想领域和诗意的自由。席勒用这个观点作为主要武器，向自然主义的平庸思想开战，向呼吁写出场面壮观的戏剧歌词大众开火。在剧场，白昼是艺术加工而来的，布景是象征性的，韵律语言也是理想化的，但是还是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广为流行，那就是：席勒说过，对于把诗歌的精髓当做作诗的自由这一做法，只是采取容忍的态度是不够的。根据

席勒的观点，要想公开而庄严地向艺术中的自然主义宣战，采用合唱队是一个决定性的一步。

Such a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is the one, it strikes me, for which our age (which considers itself so superior) uses the dismissive catch phrase “pseudo-idealism.” I suspect, by contrast, that with our present worship of naturalism and realism we are situated at the opposite pole from all idealism, namely, in the region of a wax works collection. In that, too, there is an art, as in certain romance novels of the present time. Only let no one pester us with the claim that with this we have overthrown the artistic “pseudo-idealism” of Schiller and Goethe.

我突然觉得，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用我们当代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自命不凡）使用的一个带有诋毁意思的流行词，就叫做“伪理想主义”。其实现在一切都相反。我觉得以我们现在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如此的崇拜，我们是处在远离所有理想主义的极地，换句话说，处在蜡像陈列室。在那里，照旧存在艺术，如同当今我们有浪漫小说。我只是希望没有人说，我们这个观点已经推翻了席勒和歌德的艺术“伪理想主义”。

Of course, it is an “ideal” stage on which, following Schiller's correct insight, the Greek satyr chorus, the chorus of the primitive tragedy, customarily strolled, a stage lifted high above over the real strolling stage of mortal men. For this chorus the Greeks constructed a suspended hovering framework of an imaginary natural condition and on it placed imaginary natural beings. Tragedy grew up out of this foundation and, for that very reason, has, from its inception, been spared the embarrassing business of

counterfeiting reality.

如果按照席勒这一正确观点来理解的话，这个舞台是“理想中的”舞台，希腊萨提儿合唱队，也就是原始悲剧的合唱队曾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过；这个舞台远远高于凡夫俗子在上面行走的舞台。为了这支合唱队，希腊人给他们搭起了悬浮的构架，上面是虚构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生灵。希腊悲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希腊悲剧从一开始就没有令人尴尬的现实写照。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it is a world arbitrarily fantasized somewher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It is much rather a world possessing the same reality and credibility for the devout Greek as the world of Olympus, together with its inhabitants. The satyr as the Dionysian chorus member lives in a reality permitted by religion, sanctioned by myth and culture. The fact that tragedy begins with him, that out of him the Dionysian wisdom of tragedy speaks, is a phenomenon as foreign to us here as the development of tragedy out of the chorus generally.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不是一个放在天地之间任意编造的世界，但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具有与现实一样，虔诚的希腊人相信这就是奥林匹斯山界，里面住着许多神灵。作为酒神合唱队成员的萨提儿，他居住在这个世界里，宗教自由，神话和文化得到庇护。悲剧从萨提儿那里开始，悲剧的酒神智慧从他口里说出，这个事实让我们瞠目结舌，不亚于一般人相信悲剧产生于合唱队。

Perhaps we can reach a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discussion when I offer the claim that the satyr himself, the imaginary natural being,

is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person in the same way that Dionysian music is related to civilization. On this last point Richard Wagner states that civilization is neutralized by music in the same way lamplight is by daylight. In just such a manner, I believe, the cultured Greek felt himself neutralized by the sight of the chorus of satyrs. This is the most direct effect of Dionysian tragedy: generally,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e gap between man and man give way to an invincible feeling of unity which leads back to the heart of nature.

如果我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命题——即虚构的自然人萨提儿本人与有教养的人之间的关系如同酒神音乐与文明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就此继续探讨下去。对于最后一点，理查德·瓦格纳声称：音乐夺走了文明的光芒，如同日光使蜡烛黯淡无光。同样的道理，我相信，有教养的希腊人，在萨提儿合唱队面前会自惭形秽。在酒神悲剧最直接的影响下，会出现以下的现象：城邦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被不可战胜的统一感所消除，人们再次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The metaphysical consolation, which as I have already indicated, true tragedy leaves us, that at the bottom of everything, in spite of all the transformations in phenomena, life is indestructibly power and delightful, this consolation appears in lively clarity as the chorus of satyrs, the chorus of natural beings, who live, as it were, behind civilization, who cannot disappear, and who, in spite of all the changes in generations and a people's history, always remain the same. With this chorus, the profound Greek, capable of the most delicate and the most severe suffering, consoled himself, the man who looked around with a daring gaze in the middle of the terrifying destructive instincts of so-called world history and equally into the cruelty of nature and who is in danger of longing for the denial of the will of Buddhism. Art saves him, and

through art life saves him.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真正的悲剧会给我们留下形而上的慰藉，让我们相信这么一条真理：从万物的根本上来看，一切现象外表都会变，但无论怎么变，生活永远是坚不可摧、令人欢愉的。这种慰藉是通过作为萨提儿合唱队——自然人的合唱队生动而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尽管萨提儿合唱队隐藏在文明背后，但是它永远不会消失；尽管一代代队员会变，历史会变，但是它却亘古不变。深明大义的希腊人，本来就善于处理最棘手、最残酷的困难，现在有了这样的合唱队，就用这个合唱队来安慰自己。于是，他们变得敢于面对所谓的世界历史上种种可怕、毁灭性的浩劫和残酷的自然灾害。与此同时，他们也陷入祈求佛教否定意志的危险境地。艺术拯救了他们，生活通过艺术也拯救了他们。

The ecstasy of the Dionysian state, with its destruction of the customary manacles and boundaries of existence, contains, of course, for as long as it lasts a lethargic element, in which everything personally experienced in the past is immersed. Through this gulf of oblivion, the world of everyday reality and the Dionysian reality separate from each other. As soon as that daily reality comes back again into consciousness, one feels it as something disgusting. The fruit of this condition is an ascetic condition, in which one denies the power of the will.

酒神的醉境，是一种打破一切清规戒律、无拘无束的境界，空荡之中唯有催眠存在，只要存在，它就存在。催眠能使人对过往经历不再记起。遗忘的鸿沟把日常生活的现实与酒神醉境的现实分离开来。一旦日常生活的现实重新回到人们的意识当中，人们就会感到厌恶，一种遁世绝欲的心情便会油然而生。

In this sense the Dionysian man has similarities to Hamlet. Both have had a real glimpse into the essence of things. They have understood, and it now disgusts them to act, for their actions can change nothing in the eternal nature of things. They perceive as ridiculous or humiliating the fact that it is expected of them that they should set right a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The knowledge kills action, for action requires a state of being in which we are covered with the veil of illusion. That is what Hamlet has to teach us, not that really venal wisdom about John-a-Dreams, who cannot move himself to act because of too much reflection, too many possibilities, so to speak. It's not a case of reflection. No! The true knowledge, the glimpse into the cruel truth overcomes the driving motive to act, both in Hamlet as well as in the Dionysian man.

从这个意义上讲，醉境中的人物与哈姆雷特之间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两者都把人生的真谛看得一清二楚。大彻大悟的他们，懒得行动，因为他们的行动不可能改变事物的永恒性。指望他们把已经被颠覆的世界再颠倒回来是可笑的、耻辱的。知识扼杀行动；因为要想采取行动，就得有一种被幻觉帷帐所蒙蔽的状态。这些智慧都是哈姆雷特传授给我们的，而不是关于“成天空想的人”的那些贪赃的智慧。空想的人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顾虑过多，也就是说，他怕遇到太多的可能性。这不是反思不反思的问题。不是！这是真知灼见，真正洞察到了残酷的事实，才能打消哈姆雷特和醉境之人采取行动。

Now no consolation has any effect. His longing goes out over the world, even beyond the gods themselves, toward death. Existence is denied, together with its blazing reflection in the gods or an immortal afterlife.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once having glimpsed the truth, man now sees everywhere only the horror or

absurdity of being; now he understands the symbolism in the fate of Ophelia; now he recognizes the wisdom of the forest god Silenus. It disgusts him.

至此，一切慰藉都无补于事。所以，醉境中的人物想超度人生，甚至超越神本身，走向死亡。生存，连同神灵身上闪烁的光芒，以及不朽的来世都遭到他们的否定。由于看破红尘，所以他们所能看到的是一片恐惧与存在的荒谬；此时此刻，他们终于顿悟到了奥菲利亚命运的象征意义；也意识到了森林之神西勒诺斯的智慧所在。这一切让他厌恶至极。

Here the will in in the highest danger. Thus, to be saved, it comes close to the healing magician, art. Art alone can turn those thoughts of disgust at the horror or absurdity of existence into imaginary constructs, which permit living to continue. These constructs are the Sublime as the artistic mastering of the horrible and the Comic as the artistic release from disgust at the absurd. The chorus of satyrs in the dithyramb is the saving fact of Greek art. The emotional fits I have just described play themselves out by means of the world of these Dionysian attendants.

此时，意志到了高危境地。要想拯救，就必须求助于救苦救难的魔术师——艺术。唯有艺术才能把人们生存的恐怖和荒谬这些厌世的思想转换为虚拟建构，使得人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这些建构就是崇高和喜剧：崇高是以艺术来克服恐怖，喜剧是以艺术来解脱对荒唐的厌恶。表演酒神赞美颂的萨提儿合唱队是希腊艺术拯救人类的例子。我在上面所列举的各种情绪爆发都是通过酒神侍者的世界得以释放。

8

8

The satyr and the idyllic shepherd of our more recent times are both the epitome of a longing directed toward the primordial and natural, but with what a strong fearless grip the Greek held onto his men from the woods, and how timidly and weakly modern man toys with the flattering image of a delicate and gentle flute-playing shepherd! The Greek who had not been worked on as yet by any knowledge which kept culture imprisoned saw nature in his satyr, and so he did not yet mistake satyrs for apes. Quite the contrary: the satyr was the primordial image of man, the expression of his highest and strongest emotions, as an inspired reveler, enraptured by the approach of the god, as a sympathetic companion, in whom the suffering of the god was repeated, as a messenger bringing wisdom from the deepest heart of nature, as a perceptible image of the sexual omnipotence of nature, which the Greek was accustomed to observing with reverent astonishment.

萨提儿和我们近代牧歌中的牧童，都是人们向往原始和自然的缩影。然而，对于森林之人，希腊人无所畏惧地向他们伸出强有力的手，把他们牢牢地抓住；而我们现代人，却在那儿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地抚弄一个纤弱而文雅吹笛牧童的可爱形象！希腊人虽然还没有走上文明，但他们在萨提儿身上还是看到了自然，没有把萨提儿误认为是猿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萨提儿是人类的原型，是人类最高、最强的情感表现形式，是个靠近神灵就手舞足蹈的人，是个以酒助兴的人，是与神灵共患难的多情伴侣，是把智慧从大自然心窝里掏出来的信使，是大自然中万能性爱之象征。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希腊人愿意带着崇敬心理和惊喜之情看到的品质。

The satyr was something sublime and divine—that's how he must have seemed especially to the painfully broken gaze of the Dionysian man, who would have been insulted by our well groomed fictitious shepherd. His eye lingered with sublime satisfaction on the exposed, vigorous, and magnificent script of nature. Here the illusion of culture was wiped away by the primordial image of man. Here the real man revealed himself, the bearded satyr who cried out with joy to his god. In comparison with him the man of culture was reduced to a misleading caricature. Schiller was also right to see in these matters the start of tragic art: the chorus is a living wall against the pounding reality, because it—the satyr chorus—presents existence more genuinely, truly, and completely than does the civilized person, who generally considers himself the only reality.

萨提儿看上去显得非常崇高、神圣，这就是为什么在内心已经支离破碎、痛苦不堪的醉境人眼光中更是这样。醉境中的人物也许是怕遭到我们虚构出来的、穿着考究的牧羊人所蔑视，所以目光久久停留在泄露机、充满活力和意义深远的天书上，眼里充满崇敬与满足。这里，文明的幻觉被原始人的形象荡涤得一干二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真人，胡子拉碴的萨提儿，对着神灵在那里兴奋地乱喊乱叫，揭示自己的内心。与他相比，文明的人变成了让人看不懂的讽刺画。席勒这次又说对了，他从这些方面看到了悲剧艺术的开始：合唱队是一堵活生生的墙，把纷乱的现实世界堵截在外边，因为它——萨提儿合唱队所提供的生存空间比自认为是唯一现实的文明人所提供的更加真实、更加可靠、更加完善。

The sphere of poetry does not lie beyond this world as the fantastic impossibility of a poet's brain. It wants to be exactly the opposite, the unadorned expression of the truth, and it must therefore cast off the false costume of that truth thought up by the

man of culture. The contrast of this real truth of nature and the cultural lie which behaves as if it is the only reality is similar to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eternal core of things, the thing-in-itself, and the total world of appearances. And just as tragedy, with its metaphysical consolation, draws attention to the eternal life of that existential core in the continuing destruction of appearances, so the symbolism of the satyr chorus already expresses metaphorically that primord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ing-in-itself and appearances. That idyllic shepherd of modern man is only a counterfeit, the totality of cultural illusions which he counts as nature. The Dionysian Greek wants truth and nature in their highest power: he seems himself transformed into a satyr.

诗歌的范围并不像诗人头脑中的空中楼阁那样超出世外。诗歌要想扮演相反的角色，就必须脱掉由文明人带来的所谓真理的假外衣，这样才能不加修饰地去表达真理。这种真实的自然真理与文化谎言的对比，就像它是唯一的现实一样，与事物的永恒核心，本身的东西和整个外表世界之间的对比相似。悲剧就是通过不断地撕毁外观来引起我们观照现存内核的永恒生命，以此向我们提供形而上的慰藉，同样，萨提儿合唱队的象征意义在于它从形而上学的方面表达出根本之根本与外观之间的原始关系。

The enraptured horde of those who served Dionysus rejoic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ch moods and insights, whose power transformed them before their very eyes, so that they imagined themselves as restored natural geniuses, as satyrs. The later constitution of the tragic chorus is the artistic imitation of that natural phenomenon, in which now a division was surely necessary between the Dionysian spectators and those under the Dionysian enchantment. But we must always remind ourselves that the public

in Attic tragedy re-discovered itself in chorus of the orchestra and that basically there was no opposi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chorus. For everything is only a huge sublime chorus of dancing and singing satyrs or of those people who permit themselves to be represented by these satyrs.

这群欣喜若狂的酒神信徒在这样的情绪和认知下感到无比的快乐。这股力量使他们觉得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变化，变得好像是再造的自然精灵，是萨提儿。后来悲剧合唱队的表演就是在艺术上模仿那种自然现象。当然这里，我们有必要把酒神气质的观众和酒神附魔者区分开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时常记住：在阿蒂卡（雅典派）的悲剧里，观众在交响乐的和声中会重新发现自我，所以从更本上来说，观众与合唱队之间不是对立关系。大家一起只不过是一个大型、高尚、载歌载舞的萨提儿合唱团而言，或者说是哪些让萨提儿歌队代表自己人的合唱团而言。

We must now appropriate that saying of Schlegel's in a deeper sense. The chorus is the “ideal spectator,” insofar as it is the only onlooker, the person who sees the visionary world of the scene. A public of spectators, as we know it, was unknown to the Greeks. In their theatre, given the way the spectators' space was built up in terraces, raised up in concentric rings, it was possible for everyone quite literally to look out over the collective cultural world around him and with a complete perspective to imagine himself a member of the chorus. Given this insight, we can call the chorus, in its primitive stages of the prototypical tragedy, the self-reflection of Dionysian men, a phenomenon which we can make out most clearly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actor, who, if he is really gifted, sees perceptibly before his eyes the image of the role he has to play, hovering there for him to grasp.

在此，让我们对施莱格尔的见解做出更深层次的解读：合唱团是“理想的观众”，即他们是唯一的旁观者，是亲眼看到舞台虚构的世界。我们知道，古希腊人是没有观众的，希腊的剧场是一个同心弧形建筑物，观众席位成梯田状。这种设施确实能够使人直观地产生一种俯瞰芸芸众生世界的感觉，一览无际的视野使得观众幻想自己就是歌队中的一员。鉴于这个观点，我们不妨把原始悲剧最早阶段的大合唱称作为酒神人的自我反照。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演员的经历把这种现象弄得清清楚楚：一个演员，如果他真的有才华，就可以看到在他所扮演的角色，栩栩如生地漂浮在他的眼前，唾手可得。

The satyr chorus is, first and foremost, a vision of the Dionysian mass, just as, in turn, the world of the acting area is a vision of this satyr chorus. The power of this vision is strong enough to dull and desensitize the impression of “reality,” the sight of the cultured people ranged in their rows of seats all around. The form of the Greek theatre is a reminder of a solitary mountain valley.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cene appears as an illuminated picture of a cloud, which the Bacchae gaze upon, as they swarm down from the mountain heights, as the majestic setting in the middle of which the image of Dionysus is revealed.

萨提儿的合唱首先呈现出一种酒神大众的集合气场，然后，整个的表演区变成为了这支萨提儿合唱队的世界。这种场面的气势压倒了对“现实”的印象，也淹没四周一排排坐在那里的文明人，让人视若无睹。希腊剧场的造型使人想起一座寂寞的山谷。舞台的布景像一朵光彩夺目的云图，酒神女仆们凝视着那朵祥云，从高高的山顶上飘然而下。此时，酒神的形象往往出现在这美不胜收的场中央。

This primitive artistic illusion, which we are putting into words here to explain the tragic chorus,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ur scholarly views about the basic artistic process, almost offensive, although nothing can be more obvious than that the poet is only a poet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he sees himself surrounded by shapes which live and act in front of him and into whose innermost being he gazes. Through some peculiar weakness in our modern talent, we are inclined to imagine that primitive aesthetic phenomenon in too complicated and abstract a manner.

我们在此，即用文字阐述的悲剧大合唱的原始艺术幻景，如果用基本艺术过程的学术观点来探讨的话，可能是不登大雅之堂。然后，诗人就是诗人，这点已经毫无疑问，因为诗人可以看到他自己被许多各种各样形状物包围。这些形状物在他眼皮底下生活、行动所以他要对这些东西做个探究，弄个明白。也许是我们现代人在某一方面有缺陷，所以我们总是对原始的审美现象做出过于复杂和抽象的解释。

For the true poet, metaphor is not a rhetorical trope, but a representative image which really hovers in front of him in the place of an idea. The character is for him not a totality put together from individual traits collected bit by bit, but a living person, insistently there before his eyes, which differs from the similar vision of the painter only through its continued further living and acting. Why does Homer give us descriptions so much more vivid than all the poets? Because he sees so much more around him. We speak about poetry so abstractly because we all tend to be poor poets. The aesthetic phenomenon is fundamentally simple: if someone just possesses the capacity to see a living game going on and to live all the time surrounded by hordes of ghosts, then that man is a poet. If someone just feels the urge to change himself and

to speak out from other bodies and souls, then that person is a dramatist.

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隐喻不是一种修辞格，而是一个漂浮在他面前的象征图形，替代某个思想。对他而言，一个人物的产生不是东一个特征、西一个特征拼凑而成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直徘徊在他眼前，挥之不去。这种画面与画家相似的画面有所不同，画家只需人物的生活和行为没有画完的部分画完就行了。为什么荷马的诗歌描写的比其他所有的诗人描写的都生动呢？因为他对周围的观察比别人多。我们谈论诗歌的时候，总是非常的抽象，这是因为我们天生就不是一个诗人。归根到底，审美现象是很简单的：如果某个人有本领看到一场生存游戏是任何进行的，并且之后他一直在鬼魂的围绕下生活，这人就是诗人。如果某个人有一种想改变自己、但借他人的身躯和灵魂来说话的冲动，那么，这个人就是剧作家。

Dionysian excitement is capable of communicating this artistic talent to an entire multitude, so that they see themselves surrounded by such a horde of ghosts with which they know they are innerly one. This dynamic of the tragic chorus is the original dramatic phenomenon: to see oneself transformed before one's eyes and now to act as if one really had entered another body, another character. This process stands righ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drama. Here is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rhapsodist, who never fuses with his images, but, like the painter, sees them with an observing eye outside himself. In this drama there is already a surrender of individuality by entering into a strange nature. And this phenomenon breaks out like an epidemic; an entire horde feels itself enchanted in this way.

酒神式的兴奋能够把这种艺术感染力传播给大众，使大众感觉自己被一群与其本质相同的精灵所包围，他们心心相印。这个悲剧合唱的动力就是戏剧现象的雏形：看着自己在自己的面前变化，然后好像真的走进他人的身躯，变为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体验在戏剧发展的初期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里有些东西是与叙事诗朗诵者不同的。叙事诗朗诵者不需要把自己与他的形象融合在一起。但是，他必须要像画家那样，用观察的眼光，置身于事外地审视他的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在这种戏剧中，由于进入的是一种陌生的大自然，所以个性自然退却。这种现象一旦爆发，就像流行病一样，所有的人都会被感染。

For this reason the dithyramb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every other choral song. The virgins who move solemnly to Apollo's temple with laurel branches in their hands singing a processional song as they go, remain who they are and retain their names as citizens. The dithyrambic chorus is a chorus of transformed people, for whom their civic past, their social position, is completely forgotten. They have become their god's timeless servants, living beyond all regions of society. All other choral lyrics of the Greeks are only an immens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Apollonian solo singer; whereas in the dithyramb a congregation of unconscious actors stands before us, who look upon each other as transformed. Enchantment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all dramatic art. In this enchantment the Dionysian reveler sees himself as a satyr, and then, in turn, as a satyr he looks at his god. That is, in his transformed state he sees a new vision outside himself as an Apollonian fulfillment of his condition. With this new vision drama is complete.

由于这个缘故，酒神颂歌本质上就有别于其他任何一种合唱曲。女童合唱队手拿桂树枝，庄严地迈向阿波罗神庙。他们边走边唱着进行曲，始终保持固有的状态和姿势，连同他们市井的名字也不更改。

但是，酒神颂歌合唱演唱者都是一群变态的人，他们的市井身份和社会地位统统忘得干干净净，他们已经变成了超时间，生活在一切社会之外的神的仆人。希腊其余所有的抒情合唱曲只不过是日神气质的独唱极度强化而已，但是在酒神颂歌里，站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群无意识的演员，他们作为变形人彼此看着对方。着魔之感是所有戏剧艺术的前提。在着魔之感中，酒神饮酒狂欢者感觉自己变成了萨提儿。随后，他又以萨提儿的身份去观照他的神。也就是说，他在变形之后，看见身外一个新幻象，这时他的心情达到了梦境的最高峰。有了这个新幻象，可以说这部戏剧便完结了。

With this knowledge in mind, we must understand Greek tragedy as the Dionysian chorus which over and over again constantly discharges itself in an Apollonian world of images. Those choral passages interspersed through tragedy are thus, as it were, the maternal bosom of the entire dialogue so-called, that is, of the totality of the stage word, the drama itself. This primordial basis of tragedy sends its vision pulsing out in several discharges following one after the other, a vision which is entirely a dream image and therefore epic in nature, but, on the other hand, as an objectification of a Dionysian state, it presents not the Apollonian consolation in illusion, but its opposite, the smashing of individuality and becoming one with primordial being. With this, drama is the Apollonian projection of Dionysian knowledge and effects, and thus is separated by an immense gulf from epic.

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能够理解希腊人的悲剧其实就是酒神大合唱，是在日神形象的世界里，演员们不断地释放自己。合唱部分贯穿整个悲剧，它是整个对话，或者说所有在舞台上说话部分的所谓娘胎。悲剧的原始根基一个接一个地放射出幻景，跟真的梦里形象一样，因此在本质上具有史诗特征。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它又

是对酒神状态的客观化。它不是代表幻觉中的日神式慰藉；恰恰相反，它是个性的粉碎以及与太一合体的过程。有了这个特色，我们可以说，悲剧是酒神知识和效应的日神式投射，因此它与史诗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

This conception of ours provides a full explanation for the chorus of Greek tragedy, the symbol for the total frenzied Dionysian multitude. While, given what we are used to with the role of the chorus on the modern stage, especially the chorus in opera, we are totally unable to grasp how this tragic chorus could be older, more original,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eal “action” (as tradition tell us so clearly), while we cannot then figure out why, given that traditionally high importance and original preeminence, that chorus would be put together only out of lowly serving creatures, at first only out of goat-like satyrs, and while for us the orchestra in front of the acting area remains a constant enigma, we have now come to the insight that the acting area together with the action is basically and originally thought of only as a vision, that the single “reality” is the chorus itself, which creates the vision out of itself and speaks of that with the entire symbolism of dance, tone, and word.

我们的观点已经充分地阐述了什么是希腊悲剧的合唱队，以及它对狂野的酒神大众有什么象征意义。尽管我们习惯于现代舞台上的合唱作用，特别是歌剧里的合唱作用，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够完全理解为什么这种悲剧式的合唱比真实的“合唱”历史更加久远、更加原始、更加重要（传统说法已经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合唱队意义很大、地位很高，可是为什么合唱队的成员都是出身卑微的仆人，例如第一个就是山羊形象的萨提儿。虽然在表演区前面的交响乐乐队在我们看来一直是个谜团，但是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表演区连同表演本身，从本质和最初来看，都是一种幻觉，唯一“真实”的

是合唱队队员，因为他们把自己变成了幻觉，并通过跳舞、唱歌和语言的形式把这种幻觉表达出来。

This chorus in its vision gazes at its lord and master Dionysus and is thus always the chorus of servants. The chorus sees how Dionysus, the god, suffers and glorifies himself, and thus it does not itself act. But in this role, as complete servants in relation to the god, the chorus is nevertheless the highest (that is, the Dionysian) expression of nature and, like nature, thus in its frenzy speaks the language of oracular wisdom, as the sympathetic as well as wise person reporting the truth from the heart of the world. So arises that fantastic and apparently offensive figure of the wise and frenzied satyr, who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naïve man” in contrast to the god: an image of nature and its strongest drives, a symbol of tha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announcer of its wisdom and art: musician, poet, dancer, visionary—in a single person.

合唱队在幻景中凝视着自己的君王和主人——酒神狄奥尼索斯，所以他们始终是仆人身份的合唱队。他们看见狄奥尼索斯，这位神灵如何受过苦难，如何自我赞扬，却没有自我行动。身为这个角色，即狄奥尼索斯酒神的忠实仆人，合唱无疑成为自然表达的最高形式（即酒神式的）。同样，像自然一样，合唱队在迷乱之境说出神谕和至理名言。作为富有同情心和智慧的人，他把宇宙内心的真相向人类汇报。由此便产生了这个古里古怪、貌似讨厌，但却聪明、充满激情的萨提儿形象。尽管如此，较之于酒神，萨提儿还算是个“天真的人”：他是大自然以其最强大驱动力的写照，是大自然本身的象征符号，同时也是大自然智慧和艺术的讲解员：集音乐家、诗人、舞蹈家和幻想家为一身的普通人。

According to this insight and to the tradition, Dionysus, the essential stage hero and centre of the vision, was not really present in the very oldest periods of tragedy, but was only imagined as present. That is, originally tragedy was only “chorus” and not “drama.” Later the attempt was made to show the god as real and then to present in a way visible to every eye the form of the vision together with the transfiguring setting. At that point “drama” in the strict sense begins. Now the dithyrambic chorus takes on the task of stimulating the mood of the listeners right up to the Dionysian level, so that when the tragic hero appeared on the stage, they did not see something like an awkward masked person but a visionary shape born, as it were, out of their own enchantment.

基于这种观点和按照传统的说法，狄奥尼索斯是最重要的舞台英雄和幻觉的焦点，但是在悲剧的最初期，它不真正出场，只是靠人们去幻想他的存在。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悲剧只是“合唱”，不是“演戏”。后来人们尝试把这位神灵当作真人来扮演，让观众能够看见幻觉的形状以及可变的布景。直到那个时候，狭义的“戏剧”才开始形成。现在，狂热的合唱队任务就是把观众的心情激发到如醉如痴的地步。这样，等到悲剧英雄人物登台亮相的时候，观众就不会把他看作一个戴着面具、不伦不类的人，而把他看作在自己心神恍惚之际所看到的幻影。

If we imagine Admetus thinking deeply about his recently departed wife Alcestis and pining away in his spiritual contemplation of her, and how suddenly is led up to him an image of a woman of similar form and similar gait, but in disguise, if we imagine his sudden trembling anticipation, his emotional comparisons, his instinctive conviction—then we have an analogy to the sensation with which the aroused Dionysian spectator sees

the god stride onto the stage, with whose suffering he has already become one. Spontaneously he transfers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god, which like magic trembles in his soul, onto that masked form and dissolves the reality of that figure as if in a ghostly unreality. This is the Apollonian dream state, in which the world of day veils itself and a new world, clearer, more comprehensible, more moving than the first, and yet shadow-like generates itself anew in a continuing series of changes before our eyes.

让我们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阿德墨托斯的妻子阿尔塞斯蒂斯刚刚去世，他陷入对她深深的怀念之中，已是骨瘦如柴，突然他看到一位体态和步态都像他亡妻的女性（装扮的）朝他走来；再设想一下，他顿感浑身发抖，打量着这个女人，在情感上把这两个女人做个对比，然后直觉告诉他这个女人就是他的亡妻——当我们看到神灵大步流星地走上舞台的时候，就会与情绪激动的酒神式观众产生同样的感觉，觉得自己与神灵合二为一了。与此，观众就会把在灵魂里像魔法一样颤抖的神其全部形象转移到戴面具的那个演员身上，把演员的现实消解成魔鬼般的非现实。这就是日神梦境的状态，在这个梦境里，日常世界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清晰、更加可感、更加动人的新世界。然而，这个影子般的世界在我们面前通过一系列的变化来不断地更替自己。

With this in mind, we can recognize in tragedy a drastic contrast of styles: speech, colour, movement, dynamics of speech appear in the Dionysian lyric of the chorus and also in the Apollonian dream world of the scene as expressive spheres completely separate from each other. The Apollonian illusions, in which Dionysus objectifies himself, are no longer “an eternal sea, a changing weaving motion, a glowing sense of living” (as is the case with the music of the chorus), no longer those powers which are

only felt and cannot be turned into poetic images, in which the frenzied servant of Dionysus feels the approach of the god. Now, from the acting area the clarity and solemnity of the epic form speaks to him; now Dionysus no longer speaks through forces but as an epic hero, almost with the language of Homer.

这样，我们在悲剧里就可以看到两个完全相反的风格；在语言、色彩、动作，以及在说话活泼和流畅方面都大相径庭。一方面是酒神合唱的抒情性，另一方面是日神剧场的梦境。现在，由于日神在幻景里把自己客观化了，所以日神的幻景不再是“一片永恒的海洋，不断穿梭的走动，以及热情洋溢的生活感受”（如合唱音乐），也不再是狂热的日神信徒们在神即将到来的时候，那种只能意会，无法观赏的那些诗一般形象的魅力。现在观众能够在演员表演中看到的是清晰而庄严史诗格式；而不再能看到狄奥尼索斯通过神的力量来跟人说话。现在，他作为史诗里的英雄，差不多用的是荷马语言来跟人说话。

9

9

Everything which comes to the surface in the Apollonian part of Greek tragedy, in the dialogue, looks simple, translucent, and beautiful. In this sense the dialogue is an image of the Greeks, whose nature reveals itself in dancing, because in dancing the greatest power is only latent, betraying its presence in the lithe and rich movement. The language of the Sophoclean heroes surprises us by its Apollonian clarity and brightness, so that we immediately imagine that we are glimpsing the innermost basis of their being, with some astonishment that the path to this foundation is so short.

凡是属于希腊悲剧中日神式的对话，表面上都会显得简单、明晰、漂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话是希腊人的形象，其本质展现在舞蹈里。舞蹈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却泄露于轻盈而丰富的动作中。索福克勒斯悲剧中的英雄们个个使用日神式的语言——清晰而明朗，真让我们震惊不已；以此同时，我们顿时意识到我们看到了他们存在之最深的基础，只是惊叹那条通向这个基础的道路太短了。

However, once we look away from the character of the hero as it surfaces and becomes perceptible (a character which is basically nothing more than a light picture cast onto a dark wall, that is, an illusion through and through) we penetrate further into the myth which projects itself in this bright reflection. At that point we suddenly experience a phenomenon which is the reverse of a well known optical one. When we make a determined attempt to look directly at the sun and turn away blinded, we have dark coloured specks in front of our eyes, like a remedy. Those illuminated illusory pictures of the Sophoclean heroes are the reverse of that: briefly put, the Apollonian of the mask, necessary creations of a glimpse into the inner terror of nature, are like bright spots to heal us from the horrifying night of the disabled gaze. Only in this sense can we think of correctly grasping the serious and significant idea of “Greek serenity”; whereas nowadays we run into the false idea of this as a condition of safe contentment with all of life's paths and bridges.

但是，一旦我们把目光从浮现在表面，清晰可见的英雄人物那里（这个人物不过是投射在黑暗墙壁上的一幅明亮的画面；也就是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幻影而已）挪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入地看到投射在这个光亮投影里的神话内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突然会体验到一种与大众光学原理恰恰相反的现象——我们死死地盯着太阳看，

之后闭上眼睛，把视线挪开，在我们的眼前就会出现许多帮助恢复视力的黑色斑点。索福克勒斯悲剧中的人物光辉形象与之正好相反。简言地说，面具下面的日神精神，就是人们瞥见到自然内在的恐怖之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就像医治恐怖的黑夜导致眼睛失明的光点。只有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才能正确地掌握“希腊人的从容”这个概念的严肃性和重大意义。可惜的是，当今，我们闯入了一个误区，认为这完全是他们对生活过分满意的情绪所导致的结果。

The most painful figure of the Greek stage, the unlucky Oedipus, is understood by Sophocles as the noble man who is destined for error and misery in spite of his wisdom, but who at the end through his immense suffering exerts a beneficial effect around him which is effective on those different from him. The noble man does not sin—that's what the profound poet wishes to tell us: through Oedipus' actions every law, every natural principle of order, indeed, the entire moral world may collapse, but because of these actions a higher circle of consequences is created, which will found a new world on the ruins of the old world which has been overthrown. Insofar as the poet is also a religious thinker, that is what he says to us. As a poet, he shows us first a wonderfully complicated legal knot, which the judge, link by link, undoes, in the process destroying himself. The real joy for the Greek in this dialectical solution is so great that a sense of powerful serenity invests the entire work, which breaks the sting of the dreadful pre-conditions which started the process.

希腊舞台上最悲催的人物当属不幸的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把他描绘成一个高尚的人物。他虽然聪明过人，但命中注定，不是受苦就是遭挫。可是，他吃尽千辛万苦，却改变了他周围人的命运，包括异己分子。这位高尚的人从不犯法，这点是才高八斗的诗人想告诉我们

的：一切法律，一切自然秩序，甚至这个道德世界，都因他的行为举止规范而崩溃。是的，他的规范行为举止摧毁了道德世界，但是在这个已经被推翻了的旧世界废墟上建立起了一个新世界，一个旋转式上升后的更高级世界。这就是他，一个诗人兼宗教思想家想告诉我们的东西。作为诗人，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一个十分离奇复杂的公诉案，法官抽丝剥茧，终于破案告破，法官却在其中毁掉了自己。希腊人太喜欢这种辩证法式的问题解决方式了，所以只要在整个作品里，注入一种强大的从容感就可以缓解一开始就对公案的结局提心吊胆的心情。

In *Oedipus in Colonus* we run into this same serenity, but elevated by an immeasurable transformation. Unlike the old man afflicted with excessive suffering, a man who merely suffers as the victim of everything which happens to him, now we have the unearthly serenity which descends from the sphere of the gods and indicates to us that the hero in his purely passive conduct achieves his highest action, which reaches out far over his own life (whereas his conscious striving in his earlier life led him to pure passivity). Thus for the mortal eye the inextricably tangled legal knot of the Oedipus story is slowly untangled, and the most profound human joy suffuses us with this divine dialectical companion piece.

我们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这部剧里，同样看到了这份从容感，只是人物拔高了许多。不像过去窠臼的描述——一个老人饱经风霜，吃尽人间苦难，但只能逆来顺受、安于天命；现在，我们有了超自然的从容，这份从容来自于天神。它暗示我们：戏剧中的主人翁在纯粹的被动中获得了至高的主动。这种无为即有为的境界远远高于他原先的生活（然而，如今的纯粹被动又是早期有意识的奋斗导致的）。因此，俄狄浦斯传说的公诉案虽然在凡人的眼里是那么纷繁复杂，可是还是慢慢地得到了解决。这种神圣的辩证法案例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无上的快乐。

If we have here correctly explained the poet, one can still ask whether the content of the myth has been exhausted in that explanation. And here we see that the entire conception of the poet is nothing other than that illuminated image which nature as healer holds up before us after a glimpse into the abyss. Oedipus the murderer of his father, the husband of his mother, Oedipus the solver of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 What does the secret trinity of these fatal events tell us? There is a very ancient folk belief, especially in Persia, that a wise magus could be born only out of incest. With hindsight on Oedipus as the solver of riddles and emancipator of his mother, what we have to interpret right away is the fact that right there where, through prophecy and magical powers, the spell of present and future is broken, that rigid law of individuation and the essential magic of nature in general, then an immense natural horror (for example, incest) must have come first as the original cause. For how could we compel nature to yield up its secrets, if not for the fact that we fight back against her and win, that is, if not for the fact that we commit unnatural actions?

假如我们在此对诗人的思想所做的解释是正确的话，还是会有人问，神话的内容是否已经穷尽。这里，很显然，诗人的全部意义是告诉我们，他所说的只不过是大自然呈现在我们前面的一个闪光形象，用来医治我们瞥到深渊之后所产生的恐惧感。俄狄浦斯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是自己母亲的丈夫，俄狄浦斯是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者！这神秘的三重厄运告诉我们什么？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民间说法，特别是在波斯，人们相信，聪明的男巫只能诞生于乱伦。反思解密和娶母的俄狄浦斯，我们就可以解释通下面的道理：如果预言或神秘的力量能打破笼罩在现在和未来头上的魔咒，打破严厉的个体规律，或打破自然界的基本魔力，那么在此之前一定发生过重大的恐怖事件（比如，乱伦）作为前因。如果我们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并取胜她，或没有

逆天行事，我们怎么需要迫使大自然道出天机呢？

I see this idea stamped out in that dreadful trinity of Oedipus's three fates: the same man who solved the riddle of nature (the ambiguous sphinx) must also break the most sacred natural laws when he murders his father and marries his mother. Indeed, the myth seems to want to whisper to us that wisdom—especially Dionysian wisdom—is something horrific and hostile to nature, that a man who through his knowledge pushes nature into the destructive abyss, has to experience in himself the disintegration of nature. “The lance of knowledge turns itself against the wise man. Wisdom is a crime against nature.” The myth calls out such frightening statements to us. But, like a ray of sunlight, the Greek poet touches the sublime and fearful Memnon's Column of Myth, so that the myth suddenly begins to play out Sophoclean melodies.

我在俄狄浦斯可怕的三重厄运中看出这个道理，他解答了自然之谜，即二重性的斯芬克斯之谜，就必须以杀父娶母的方式来打破最神圣的自然秩序。确实，这个神话好像想悄悄地告诉我们：智慧，尤其是狄奥尼索斯式的智慧，乃是大自然的恶魔和天敌；如果谁凭自己这个智慧把自然推进毁灭的深渊，谁就必然会遭到自然对他的毁灭。“智慧的长矛会反刺智者。智慧是自然的罪行。”这就是神话对我们喊出的振聋发聩的宣言。然而，希腊诗人像一缕阳光，照射在庄严而肃穆的门农神柱上，于是神柱就会发出索福克勒斯的歌曲。

Now I'm going to compare the glory of passivity with the glory of activity which illuminates Aeschylus's Prometheus. What Aeschylus the thinker had to say to us here, but what Aeschylus as a poet could only hint at through a metaphorical picture—that's what

young Goethe knew how to reveal in the bold words of his Prometheus:

下面我来对被动性和主动性的荣誉做个比较，来看看埃斯库罗斯是如何说明他的普罗米修斯的。作为思想家的埃斯库罗斯，在谈到普罗米修斯的时候，他采用的是语言；而作为诗人的他，在谈到普罗米修斯的时候，则使用隐喻式的画面来暗指——而青年歌德用豪言壮语揭示了他心中的普罗米修斯：

Here I sit—I make men in my own image,

“我坐在这里——脑海里想象我的臣民，

a race like me,

一个名族，像我一样，

to suffer, to weep,

去受苦、去哭泣，

to enjoy life and rejoice,

去享受、去开心，

and then to pay no attention,

然后什么也不关心，

like me.

像我这样。”

Man, rising up into something Titanic, is victorious over his own culture and compels the gods to unite with him, because in his self-controlled wisdom he holds their existence and the limits to their authority in his hand. The most marvelous thing in that poem of Prometheus, which is, according to its basic concepts, is a hymn celebrating impiety, is, however, the deep Aeschylean impulse for justice. The immeasurable suffering of the brave “individual”,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the peril faced by the gods, even a presentiment of the twilight of the gods, the compelling power for a metaphysical oneness, for a reconciliation of both these worlds of suffering—all this is a powerful reminder of the central point and major claim of the Aeschylean world view, which sees fate (*Moira*) enthroned over gods and men as eternal justice.

这位上升为泰坦族神的人，靠的是战争所取得的胜利来赢得自己的文明，并迫使诸神与自己联盟，因为在他自我控制的智慧里，他可

以掌管诸神的生存、限制他们的权利。《普罗米修斯》这首赞美诗，从其基本内容上来看，算得上是一首亵渎神灵的赞美诗，但是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它又是一首埃斯库罗斯深深呼唤正义的赞美诗。一方面是“个人”遭受无限的痛苦；另一方面是诸神所面临的灭亡，甚至末日来临的先兆。这两股受苦受难的世界都散发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渴求形而上的统一，渴求和解。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这些就是埃斯库罗斯世界观的中心内容以及主要观点。他认为“命”高于神和人，永远是对的。

With respect to the astonishing daring with which Aeschylus places the Olympian world on his scales of justice, we must remind ourselves that the deep-thinking Greek had an unshakably firm basis for metaphysical thinking in his mystery cults, and that he could unload all his skeptical moods onto the Olympians. The Greek artist, in particular, in looking back on these divinities, felt a dark sense of reciprocal dependency. And this sense is symbolized especially in Aeschylus's *Prometheus* . The Titanic artist (Prometheus) found in himself the defiant belief that he could make men and, at the very least, destroy Olympian gods—all this through his higher wisdom, which he, of course, was compelled to atone for in eternal suffering. The magnificent capability of the great genius, for whom eternal suffering itself is too cheap a price, the harsh pride of the artist—that is the content and soul of Aeschylean poetry; whereas, Sophocles in his Oedipus makes his case by sounding out the victory song of the holy man.

埃斯库罗斯为何如此胆大包天，竟敢把奥林匹斯山神界放在他正义的天秤上来衡量。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弄清楚这一点：在思想深邃的希腊人神秘的崇拜中，他们形而上学的思想有着不可动摇的坚实基础；他们可以把一切怀疑撒向奥林匹斯山诸神。特别是希腊的艺

术家们，当他们回想这些神灵的时候，就会在暗中感受到自己与神灵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埃斯库罗斯在他的《普罗米修斯》作品里通过象征的手法充分地体现出这种感觉。泰坦家族的艺术家普罗米修斯公然相信：他可以造就自己的臣民，至少能够把奥林匹斯山诸神摧毁——当然，这一切靠的是他的智慧，之后还得接受终生受苦来赎罪。这位伟大的天才认为，只要能完成这项大业，终生受苦不足为奇，因为那是艺术家最崇高的自豪感。由此可见，埃斯库罗斯诗歌的宗旨与灵魂就在于此。与此相对照的是，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一剧中则用高唱圣者的胜利之歌来表达同样的意思。

But also this meaning which Aeschylus gave the myth does not fill the astonishing depth of its terror. The artist's joy in being, the serenity of artistic creativity in spite of that impiety, is only a light picture of cloud and sky, which mirrors itself in a dark ocean of sorrow. The Prometheus saga is a primordial possession of the Aryan population collectively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their talent for the profoundly tragic. In fact, it could be the case that for the Aryan being this myth has the same defining meaning as the myth of the Fall has for the Semitic peoples, and that both myths are, to some degree, related, as brother and sister.

然而，埃斯库罗斯这样解释神话，也未能道尽神话深不可测的骇人恐怖。艺术家生存之快乐，不敬神灵的艺术创作之从容，都只不过是反射在黑暗苦海中一幅蓝天白云靓丽的图画。普罗米修斯的传奇故事是全体雅利安人的共同原始财富，同时也是他们擅长悲情艺术创作的史料见证。其实，完全有这么一个可能——《普罗米修斯》神话在雅利安人心里的分量不亚于《人类堕落》神话在闪米特人心里的分量。二者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姊妹亲属关系。

The pre-condition of this Prometheus myth is the extraordinary value which a naïve humanity associates with fire as the true divine protector of that rising culture. But the fact that man freely controls fire and does not receive it merely as a gift from heaven, as a stirring lightning flash or warming rays of the sun, appeared to these contemplative primitive men as an outrage, a crime against divine nature. And so right there the first philosophical problem posed an awkward insolubl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n and god and pushed it right up to the door of that culture, like a boulder. The best and loftiest thing which mankind can share is achieved through a crime, and people must now accept the further consequences, namely, the entire flood of suffering and troubles with which the offended divine presences afflict the nobly ambitious human race. Such things must happen—an austere notion which, through the value which it gives to a crime, stands in a curious contrast to the Semitic myth of the Fall, in which curiosity, lying falsehoods, temptation, lust, in short, a row of predominantly female emotions are look upon as the origin of evil.

《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前提是，天真的人类认为火具有非凡的价值，它是一种新兴文明的真正护守神。但在事实上，人自由地支配火，并没有把火当作天神赏赐的礼物，没有把它当作激动人心的闪电，或太阳给予的温暖光芒。在那些爱沉思的原始人眼里，这种做法是对天神的掠夺和亵渎。于是，人与神之间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哲学问题首次出现了，并像一块巨石堵在文明的门槛。人类最期盼的东西只能通过犯罪才能获得，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还得继续承受恶果的缘故。换句话来说，这些源源不断的苦和难都是神灵因人类野心太大，触犯了自己所给予的折磨。这种以犯罪为荣的朴素思想与闪米特人的神话《人类堕落》形成一种奇怪的对比：在后者中，好奇、说谎、引诱、淫欲，总之一切与女性情感有关的都被视为万恶之源。

What distinguishes the Aryan conception is the lofty view of an active transgression as the essentially Promethean virtue. With this, the ethical basis of pessimistic tragedy is established together with the justification of human evil, that is, human guilt as the penalty for that sin. The impiety in the essence of things—that's what the thinking Aryan is not inclined to quibble away. The contradiction in the heart of the world reveals itself to him as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different worlds, for example, a divine and human world, each one of which is right in its separate way but which must suffer for its individuality as the two worlds come close together.

雅利安人观点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们把积极犯罪看作为普罗米修斯的主要德行。他们认为，悲壮型的悲剧诞生，其道德基础就是要为人类犯罪找出合理的解释。人在忏悔就是人在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受惩。亵渎神灵这类事是理性的雅利安人最不想敷衍了事的。在他们看来。世上核心的矛盾是由于矛盾双方来自不同的世界，比如说，神灵世界和人类世界。如果分开来的话，各自都是对的；但是二者一旦走到一起，就因个性的差异而产生矛盾。

With this heroic push of the individual into the universal, with this attempt to stride out over the limits of individuation and to wish to be oneself a world being, man suffers in himself the contradiction hidden in things, that is, he violates the laws and he suffers. Just as among the Aryans crime is seen as male, and among the Semites sin is seen as female, so the original crime was committed by a man, the original sin by a woman. In this connection, the chorus of witches (in Goethe's *Faust*) says:

人的个性只要大胆地走入共性，并企图跨越个性的界限，成为一

个唯我的世界，他就必须会遭受事物内在的矛盾。也就是说，他破坏了自然规律，所以就得去受苦。正像雅利安人认为一切法律意义上的罪行来自于男人，闪米特人认为一切道德意义上的罪行来自于女人。也就是说，一个认为原罪是由男人犯的，一个认为本罪是女人犯的。就此而论，歌德的《浮士德》中女巫们的合唱也是这样唱的：

We're not so particular in what we say:

我们的话无特长，只想说：

Woman takes a thousand steps to get her way.

女人疾走千百步，

But no matter how quickly she hurries on,
With just one leap the man will get it done.

不及男人一大步。

Anyone who understands this innermost core of the Prometheus saga, namely, the imperative requirement that the individual striving like a Titan has to fall into crime, must also sense at the same time the un-Apollonian quality of this pessimistic concept. For Apollo wants to make these separate individual worlds tranquil precisely because he establishes the border line between

them and, with his demands for self-knowledge and moderation, always reminds us once again of the most sacred laws of the world. However, to prevent this Apollonian tendency from freezing form into Egyptian stiffness and frigidity and to prevent the movement of the entire ocean from dying away, through the attempts of the Apollonian tendency to prescribe to the individual waves their path and extent, from time to time the high flood of the Dionysian destroys those small circles in which the one-sided Apollonian will seeks to confine the Greek spirit. Now suddenly a tidal wave of the Dionysian takes the single small individual crests on its back, just as the brother of Prometheus, the Titan Atlas, shouldered the Earth. This Titanic impulse to become something like the Atlas of all individuals and to bear them on one's wide back, higher and higher, further and further, is the common link between the Promethean and the Dionysian.

任何人只要他明白普罗米修斯传奇的真正内涵，即一个个体，例如泰坦神，要想为自己的目标奋斗，就难免会触犯天规。那么，他同样也能明白这种悲壮型的悲剧具有非日神的特征。阿波罗希望分裂的个体能相安无事，因为他早已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划好了界限。他还总是一再告诫我们：人要有自知之明，凡事适中，这是最圣神的宇宙规律。当然，为了防止这条日神倾向过于形式化，凝固成埃及式的僵硬和死板，也为了防止大海因日神给个体波规定路径和范围而导致大海水域中的水流光，酒神这个大海中的巨浪将会不断地吞噬片面的日神渴望把希腊精神禁锢在那里的小漩涡。此时突然，酒神的一股潮汐波拱起了一个小浪峰，犹如普罗米修斯的兄弟，泰坦族阿特拉斯背起了大地。这种泰坦似的强大冲动，仿佛要做个忍辱负重的阿特拉斯泰坦神，用他那宽宽的背部背起所有的人，爬得更高、爬得更远——这种冲动在普罗米修斯和酒神身上都曾体现过。

In this view, the Aeschylean Prometheus is a Dionysian mask; while, in that previously mentioned deep desire for justice Aeschylus betrays to those who understand his paternal descent from Apollo, the god of individuation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And the double nature of the Aeschylean Prometheus, his simultaneously Dionysian and Apollonian nature, can be expressed in an understandable way with the following words: “Everything present is just and unjust and both aspects are equally justified.”

就这点来说，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可谓是酒神的掩饰。在前面正义感言论部分，埃斯库罗斯已经向我们泄漏了普罗米修斯的家世：他是个性原则之神与正义界限之神阿波罗的后裔。因此，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具有双重性格，他同时拥有酒神和日神的品质，这点可以通过以下的简明扼要的话语表达清楚：“一切存在是合理的，又是不合理的，两者同样都有道理。”

That is your world! That's what one calls a world!

这就是你的世界！这就是大家称呼的世界！

10

10

It is an incontestable tradition that Greek tragedy in its oldest form had as its subject only the suffering of Dionysus and that for a long time later the individually present stage heroes were only Dionysus. But with the same certainty we can assert that right up to

the time of Euripides Dionysus never ceased being the tragic hero, that all the famous figures of the Greek theatre, like Prometheus, Oedipus, and so on, are only masks of that primordial hero Dionysus. The fact that behind all these masks stands a divinity,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frequently admired characteristic “ideality” of those well known figures.

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传统做法，希腊悲剧在最初的时候，都是以酒神受难为主题；而且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舞台上以个人身份出现的都是狄奥尼索斯酒神。还有一个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那就是：直到欧里庇得斯时期，酒神狄奥尼索斯从来没有停止过充当悲剧英雄这一角色。希腊舞台上所有出现过的有名人物，例如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等等，都只不过是原始英雄狄奥尼索斯的化妆而已。实际上，在这些化装人物的背后藏着一位神，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著名的舞台人物往往个个都能让人崇敬，让人觉得是典型“理想化”人物的主要原因。

Someone (I don't know who) asserted that all individuals, as individuals, have to be taken as comic and thus untragic, that the Greeks in general could not tolerate individuals in their tragic theatre. In fact, they seem to have felt this way. That Platonic distinction between and evaluation of the “idea” in contrast to the “idol” in connection with likenesses lies deeply grounded in the nature of the Greeks. But for us to make use of Plato's terminology, we would have to talk of the tragic figures of the Greek stage in something like the following terms: the one truly real Dionysus appears in a multiplicity of shapes, in the mask of a struggling hero and, as it were, bound up in the nets of the individual will. So now the god made manifest talks and acts in such a way that he looks like an erring, striving, and suffering individual. The fact that he

appears in general with this epic definition and clarity is the effect of Apollo, the interpreter of dreams, who indicates to the chorus its Dionysian state by this metaphorical appearance.

我不知道谁曾经说过：任何人作为个体身份出现，都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的，所以个体形象是不能给予人们悲壮感的。这就是为什么希腊人一般不能容忍个人形象出现在悲剧的舞台上。事实上，古希腊人似乎确实有此感觉，柏拉图对“理念”与“理想”之间的相同点做过区分和评价，这深深地扎根于希腊人的本性里。但是，如果我们借用柏拉图的术语来说的话，我们就不妨这样评价希腊悲剧的人物形象：真实的酒神总是以各种姿态出现，比如说装扮成一个戴着面具苦苦挣扎在个人意志罗网里的英雄。在这个场合，酒神是通过语言和行动公开地表明这个人老是犯错误，他在挣扎、在受苦。一般说来，他表现得像史诗人物那样明确而清楚，这点不得不归功于日神阿波罗这个解梦人，是他通过象征性的外表来向合唱队展现他酒神之梦境。

In reality, however, that hero is the suffering Dionysus of the mysteries, that god who experiences the suffering of the individual in himself, the god about whom the amazing myths tell how he, as a child, was dismembered by the Titans and now in this condition is venerated as Zagreus. Through this is revealed the idea that this dismemberment, the essentially Dionysian suffering, is like a transformation into air, water, earth, and fire, that we also have to look upon the condition of individuation as the source and basis for all suffering, as something in itself reprehensible. From the laughing of this Dionysus arose the Olympian gods, from his tears arose mankind. In that existence as dismembered god Dionysus has the dual nature of a cruelly savage daemon and a lenient, gentle master.

实际上，那个受苦受难的酒神身负着许多谜团。他本人亲身经历过因个性表现所带来的痛苦。令人称奇的神话是这样传说他的故事：小的时候，被泰坦族神肢解而死。在这种情况下，他被崇奉为扎格列欧斯神。这个传说给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观念：这种解体作为狄奥尼索斯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灾难，如同必须要转化为空气、水、土和火；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明白，行使个性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和基础，本身就应该受到谴责。酒神的微笑诞生了奥林匹斯山诸神，他的眼泪诞生了人类。在这样生存状态中，作为一个被解体的神，狄奥尼索斯就必须具有双重性格——残酷野蛮的恶魔和温柔良善的君主。

The initiates in the Eleusinian mysteries hoped for a rebirth of Dionysus, which we now can understand as the mysterious end of individuation. The initiate's song of jubilation cried out to this approaching third Dionysus. And only with this hope was there a ray of joy on the face of the fragmented world, torn apart into individuals, just as myth reveals in the picture of the eternal sorrow of sunken Demeter, who rejoices again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someone says to her that she might be able once again to give birth to Dionysus. In these established concepts we already have assembled all the components of a profound and pessimistic world view, together with the mysterious teachings of tragedy: the basic acknowledgement of the unity of all existing things, the idea of individuation a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all evil, art as the joyful hope that the spell of individuation is there for us to break, as a premonition of a re-established unity.

在依洛西斯城举行的祭祀秘密仪式上，众信徒都期盼狄奥尼索斯重生，我们现在能够明白这种重生是个性主义的神秘终结。信徒们以嘹亮的歌声来迎接这即将诞生的第三位酒神。得知这一希望，这个支离破碎，分裂成多个个性的世界，脸上绽放出快乐的笑容，就像神话

描绘的永远沉溺在悲哀里的得墨忒耳。当有人告诉她，她可以再次生育狄奥尼索斯时的候，她第一次露出久违的欢乐。照上述的观点来看，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个具有深刻而悲壮的世界观其全部要素，以及悲剧的神秘教义。这些观点可以总结为：承认“万物一体”为根本，个性化是一切罪恶的诱因，艺术是我们打破个性化魔咒的快乐希望，是重新建立一体化的先决条件。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earlier that the Homeric epic is the poetry of Olympian culture, with which it sang its own song of victory over the terrors of the fight against the Titans. Now, under the overwhelming influence of tragic poetry, the Homeric myths were newly reborn and show in this metamorphosis that by now the Olympian culture is overcome by an even deeper world view. The defiant Titan Prometheus reported to his Olympian torturer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his rule was threatened by the highest danger, unless he quickly joined forces with him. In Aeschylus we acknowledge the union of the frightened Zeus, worried about the end of his power, with the Titan.

上文已经指出：荷马史诗是奥林匹斯文化的诗歌，用它来唱出战胜与泰坦诸神作斗争的恐惧心理。而现在，受到悲剧歌词的强大影响，再次诞生出荷马神话。这场蜕变说明，奥林匹斯文化被一种更加深刻的世界观所战胜。这位大无畏的泰坦普罗米修斯对奥林匹斯暴君宣布，除非他立刻与他结盟，否则他的统治将首次遭到最严重的危险。我们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里看到，惊恐万状的宙斯，担心他的统治地位保不住，最终还是选择与普罗米修斯结盟。

Thus the earlier age of the Titans is belatedly brought back from Tartarus into the light once more. The philosophy of wild and

naked nature looks with the unconcealed countenance of truth at the myths of the Homeric world dancing past it. Before the flashing eyes of this goddess, those myths grow pale and tremble, until they press the mighty fist of the Dionysian artist into the service of the new divinity. The Dionysian truth takes over the entire realm of myth as the symbol of its knowledge and speaks of this knowledge, partly in the public culture of the tragedy and partly in the secret celebrations of the dramatic mystery celebrations, but always in the disguise of the old myths. What power was it which liberated Prometheus from his vultures and transformed myth to a vehicle of Dionysian wisdom? It was the Herculean power of music. Music, which attained its highest manifestation in tragedy, had the power to interpret myth with a new significance in the most profound manner, something we have already described before as the most powerful capacity of music.

早期的泰坦族文化姗姗走出塔耳塔洛斯监狱，重见光明。其野蛮而袒露的自然哲学，带着对真理不未加掩饰的面容，看着荷马世界里所有的神话从身边飞舞而过。面对哲学女神的闪烁目光，这些神话变得苍白无力、瑟瑟发抖，迫使酒神艺术家的强大拳头开始为这个新神提供服务。酒神的真理便占据了整个神话领域，以此作为知识的象征和知识的代言。神话无论是公开上演在悲剧演出里，还是隐蔽地表现在戏剧性的秘仪祭祀上，总之，都伪装在古老神话的外衣里。是什么力量把普罗米修斯从兀鹰魔爪之下拯救出来，把这个神话变成表达酒神智慧的工具？这是赫拉克勒斯音乐的力量。音乐在悲剧中达到了极致的表现，它能够以一种最深刻的方式阐述出神话新的涵义，这就是我前面已经谈论过的音乐最强力量。

For it is the lot of every myth gradually to creep into the crevice of an assumed historical reality and to become analyzed as a

unique fact in answer to the historical demands of some later time or other. The Greek were already fully on their way to labeling cleverly and arbitrarily the completely mythical dreams of their youth as historical, pragmatic, and youthful history. For this is the way religions tend to die out, namely, when the mythical pre-conditions of a religion, under the strong, rational eyes of an orthodox dogmatism become classified as a closed totality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people begin anxiously to defend the credibility of their myths, but to resist the naturally continuing life and growth of those myths, and when the feeling for the myth dies out and in its place the claim to put religion on a historical footing steps onto the scene.

每种神话总有这样的命运：它逐渐会沉淀为一段公认的历史，以便后人把它看作唯一的事实，做到有案可稽。希腊人现在完全做好了准备，把他们青春时候纯粹像神话的梦巧妙而任意地标上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具有实用价值的、青年人的历史。宗教往往就是这样走向灭亡的，也就是说，在一种宗教神话前提遭受到正统教条主义严格而理性的目光审视后，被视为历史事件总和之际，就是宗教灭亡之日。此时，人们就开始焦虑地捍卫起神话的可信性，但与此同时也反对这些神话继续自然生存与发展下去。于是，人们对神话的热情逐步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历史的宗教。

The newly born genius of Dionysian music now seized these dying myths, and in its hands myth blossomed again, with colours which it had never shown before, with a scent which stirred up a longing premonition of a metaphysical world. After this last flourishing, myth collapsed, its leaves grew pale, and soon the mocking Lucians of antiquity grabbed up the flowers, scattered around by all winds, colourless and withered. Through tragedy

myth attains its most profound content, its most expressive form. It lifts itself up again, like a wounded hero, and with the excessive power and wise tranquilly of a dying man, its eyes burn with its last powerful light.

现在，新生的酒神风格音乐才子死死地抓住垂死的神话。在他的手里，神话再次枯木逢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五颜六色，弥散出令人向往的形而上世界的芬芳。然而，神话毕竟是回光返照，之后便轰然倒塌，枝枯叶落；很快，那些玩世不恭的古董级人物，像鲁奇安之流立刻拾起随风飘落在满地的无色而凋零的花朵。通过悲剧，神话获得它最深邃的内容和最强的表现形式。它像个受伤的英雄，使出超常的力量，再次站立起来。纵然他眼睛里闪亮出强末之光，但终究是个将死的人，所以他镇定自若、泰然处之。

What did you want, you rascal Euripides, when you sought to force this dying man once more into your service? He died under your powerful hands. And now you had to use a counterfeit, masked myth, which was able only to dress itself up with the old splendour, like Hercules's monkey. And as myth died with you, so died the genius of music as well. Even though you plundered with greedy hands all the gardens of music, you achieved only a counterfeit masked music. And because you abandoned Dionysus, you were then abandoned by Apollo. Even if you hunted out all the passions from their beds and charmed them into your circle, even though you sharpened and filed a really sophisticated dialectic for the speeches of your heroes, nevertheless your heroes have only counterfeit, masked passions and speak only a counterfeit, masked language.

渎神的欧里庇德斯啊，你为何迫使一个生命垂危的人为你服务呢？它终于死于你的铁掌下，而现在你却竟然启用一个冒牌的神话赝品，可是它只能像赫拉克勒斯的猴子，穿起古装，粉墨登场。神话死在你的手里，音乐天才也死在你的手里。即使你贪得无厌地夺走所有的音乐花园，你也只能获取冒牌的音乐赝品。由于你抛弃了酒神，所以阿波罗就抛弃你。即使你从他们的花坛搜走所有的热情来装点你的花环，也无论你如何把你的英雄们的演说磨砺得多么头头是道，你的英雄人物的热情也只能是虚假名牌的热情，他们的演说也只能算是言不由衷的假话。

11

11

Greek tragedy died in a manner different from all its ancient sister arts: it died by suicide, as a result of an insoluble (hence tragic) conflict; whereas, all the others passed away in advanced old age with the most beautiful and tranquil deaths. If it is an appropriately happy natural condition to depart from life with beautiful descendants and without any painful strains in one's life, the end of those ancient artistic genres manifests to us such a fortunate natural state of things. They disappeared slowly, and their more beautiful children were already standing there before their dying gaze, impatiently lifting their heads in courageous gestures. By contrast, with the death of Greek tragedy there was created an immense emptiness, profoundly felt everywhere. Just as the Greek sailors at the time of Tiberius heard from some isolated island the shattering cry “the great god Pan is dead,” so now, like a painful lament, rang out throughout the Greek world, “Tragedy is dead! Poetry itself is lost with it! Away, away with you, you stunted, emaciated epigones! Off with you to hell, so you can for once eat

your fill of the crumbs from your former masters!”

希腊悲剧死的方式与其它古代姊妹艺术不同：它是自杀，迫于不可解决的冲突；其它古艺术形式则都是寿终正寝，优雅安详地谢世。如果一个生命能够在他与世长辞之际，身上不留痛苦的痉挛痕迹，身后却留下俊男靓女的后代，则可谓是一种幸福的善终，那些古艺术种类的终结让我们看到了世上就有这般幸事，它们慢慢地消失，而他更多的漂亮子孙却在他垂死的目光勇敢而迫不及待地昂起头来。相形之下，希腊悲剧的死亡，则遗留巨大的空洞，到处可见。正像在罗马皇帝台比留时代，希腊水手从某个孤岛上传来撕心裂肺的叫声：“伟大的潘神死了”，现在我们听到整个希腊世界都响起：“希腊悲剧死了！诗歌也随悲剧而去！随你而去的还有那些发育不良瘦弱的追随者！统统将下地狱，去饱餐一顿你们昔日主子的残羹剩饭吧！”这真像一首悲哀的挽歌。

If now a new form of art blossomed which paid tribute to tragedy as its predecessor and mistress, it was looked upon with fright, because while it carr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mother, they were the same ones she had shown in her long death struggle. Tragedy's death struggle was fought by Euripides, and this later art form is known as New Attic Comedy. In it the atrophied form of tragedy lived on, as a monument to tragedy's extremely laborious and violent death.

如果说，现在有那么一种新的艺术正在茁壮成长，并把悲剧敬奉为自己的长辈和母亲，那一定让人惊愕不已。因为尽管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秉承了它先妣的特征，所以这些特征必定是先妣在漫长的死亡抗争中表现出来过的。欧里庇得斯曾经与悲剧死亡做过斗争，但终究没有能够抵制住雅典派新喜剧的诞生。其中悲剧的影子依旧存在。它作

为一座纪念碑，纪念悲剧那条艰辛而暴力的死亡之路。

Looking at things this way makes understandable the passionate fondness the poets of the newer comedies felt for Euripides. Thus, Philemon's wish (to be hanged immediately so that he could seek out Euripides in the underworld, provided only he could be convinced that the dead man was still in possession of his wits) is no longer something strange. However, if we ask ourselves to indicate, briefly and without claiming to say anything in detail, what Euripides might have in common with Menander and Philemon and what was so excitingly exemplary and effective for them in Euripides, it is enough to say that the spectator in Euripides is brought up onto the stage. Anyone who recognizes the material out of which the Promethean tragedians before Euripides created their heroes and how remote from them was any intention of bringing the true mask of reality onto the stage will see clearly the totally deviant tendencies of Euripides.

沿着这条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新喜剧的诗人们为什么这般爱戴欧里庇得斯。腓利门有这个愿望（只要他能够相信，死人仍然具有智慧，他就希望立马去死，这样他就可以到阴曹地府拜见欧里庇得斯）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如果我们让我们自己简明扼要，不提任何细节地指出，欧里庇得斯与米南德和腓利门俩人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米南德和腓利门俩人在欧里庇得斯身上看到了什么光辉典范作用，为什么对他们影响这么大，那就是欧里庇得斯把观众带上了舞台。只要能看出，在欧里庇得斯之前，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剧剧作家用什么素材来塑造英雄人物的，知道要想把现实的真面具搬上舞台有多么遥远的人，一定能清楚地看出欧里庇得斯的倾向与他们的彻底不同。

As a result of Euripides, the man of ordinary life pushed his way out of the spectators' space and up onto the acting area. The mirror in which earlier only great and bold features had been shown now displayed a painful fidelity which conscientiously reflected the unsuccessful features of nature. Odysseus, the typical Greek of the older art, now sank in the hands of the newer poets into the figure of Graeculus, who from now on stands right at the centre of dramatic interest as the good hearted, clever slave. What Euripides in Aristophanes' *Frogs* gives himself credit for as a service, namely, that through his household medicines he freed tragic art of its pompous hustle and bustle, that point we can trace above all in his tragic heroes.

欧里庇得斯给人们带来的效应是，一个过着日常生活的普通人从观众座席走上了舞台。戏剧这面镜子，以前只反映粗犷伟岸的线条，现在却照出令人痛心的真相，意在再现自然中的失败。奥德修斯，这一典型古老的希腊艺术形象，现在落在新的诗人手里变成了小希腊儿。这些小希腊儿从此便成为编剧的中心人物，一个善良又聪明的奴隶形象。欧里庇得斯在阿里斯托芬的《青蛙》这部里作品里称赞自己向大家提供了一项服务，也就是说，通过他家常便药医治了悲剧华而不实的渲染——这些特征我们在他的悲剧人物身上都能找到痕迹。

Essentially the spectator now saw and heard his double on the Euripidean stage and was happy that that character understood how to talk so well. But this was not the only delight. People themselves learned from Euripides how to speak. He praises himself on this very point in the contest with Aeschylus—how through him the people learned to observe in an artistic way, with the keenest sophistication, to judge, and to draw consequences. Because of this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in public language he also made the new

comedy possible. For from that time on there was nothing mysterious about how ordinary life could appear on stage and what language it would use.

现在，观众在欧里庇得斯舞台上能够看到和听到他对此的怀疑态度。他们很高兴，剧中人物知道如何说话了。当然，令人高兴的不只是这点，还有一点就是，观众也知道自己该怎么说话了。他本人也为此感到自豪，他比埃斯库罗斯做的好，因为通过他，人们学会如何带着最敏锐的眼光用艺术的方式观察、判断和总结事物。大众语言的彻底变化，成就了新的喜剧形式，因此从那以后，如何把普通人的生活搬上舞台，以及使用什么语言都没有悬念了。

Middle-class mediocrity, on which Euripides built all his political hopes, now came into prominence. Up to that point, in tragedy the demi-god and in comedy the intoxicated satyr or semi-human had determined the nature of the language. And so the Aristophanic Euripides gave himself high praise for how he presented common, well-known, ordinary living and striving, which any person was capable of judging. If now the entire crowd philosophized, administered their lands and goods with tremendous astuteness, and carried on their own legal matters, well then, he claimed, that was to his credit and the achievement of the wisdom which he had drummed into the people.

寄予了欧里庇得斯政治希望的并且反映中产阶层人们生活的题材，开始引起了大众的重视。在那之前，悲剧里的半神和喜剧中酒醉的萨堤儿或者是半人的人物这两个角色一直决定着戏剧的用语。阿里斯托芬式的欧里庇得斯为自己能向观众呈现出平凡而熟知，人人都有水平判断的普通人生活和奋斗的故事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果现在，大

家能用理性去思考问题，非常慎重地管理好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会打官司，那么他声称，这是他的功劳，同时也是他用智慧启迪民众的成果。

The new comedy could now direct its attention to such a prepared and enlightened crowd, for whom Euripides became, to some extent, the choir master. Only this time the chorus of spectators had to have practice. As soon as the chorus was well trained to sing in the Euripidean musical key, a style of drama like a chess game arose, the new comedy, with its continuing triumph of sly shrewdness. But Euripides, the leader of the chorus, was incessantly praised. Indeed, people would have let themselves be killed in order to learn more from him, if they had not been aware that tragic poets were just as dead as tragedy itself.

现在，新的喜剧所要面临的一群人是有准备、有思想的人。从某种程度来说，欧里庇得斯是这群人的合唱队队长。所不同的是，这次观众合唱队必须要经过训练，一旦这支合唱队接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就唱出欧里庇得斯的调子，那么一种棋逢敌手似的戏剧便会兴起。这种新的喜剧是一种描写勾心斗角，以智取胜的故事。尽管如此，欧里庇得斯，合唱队的队长还是不断地赢得赞誉。如果大家不知道悲剧诗人其实已经像悲剧戏剧一样已经死亡了，他们就会想从他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哪怕丢掉性命也在所不辞。

With tragedy the Greeks had surrendered their faith in immortality, not merely the faith in an ideal past, but also the faith in an ideal future. The saying from the well-known written epitaph, “as an old man negligent and trivial” is applicable also to the old age of Hellenism. The instantaneous, the witty, the foolish, and the

capricious—these are its loftiest divinities, the fifth state, that of the slave (or at least the feelings of a slave) now come to rule. And if it is possible to talk still of a “Greek serenity,” it is the serenity of the slave, who has no idea how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anything difficult, how to strive for anything great, or how to value anything in the past or future higher than the present.

随着悲剧的死亡，希腊人就不再相信永恒的存在。不仅不相信理想的过去，也不相信理想的未来会永恒存在。希腊文化的旧时代可以用那句著名的墓志铭来形容：“像一个懒懒散散、玩世不恭的老人。”那些昔日最高尚、最神圣的品质——雷厉风行、能言善辩、大智若愚和变幻莫测，现在却沦为第五阶层，即奴隶人的专利（至少可说是奴隶的情感）。如果还有什么“希腊人的从容”而言，那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奴隶的从容。这份从容是来自于他们不知道如何担起困难的责任，不知道如何追求伟大的事业，甚至也不知道对过去或未来比现在更为重要的事件做出评价。

It was this appearance of “Greek serenity” which so outraged the profound and fearful natures of the first four centuries of Christianity. To them this feminine flight from seriousness and terror, this cowardly self-satisfaction with comfortable consumption, seemed not only despicable but also the essentially anti-Christian frame of mind. And to the influence of this outrage we can ascribe the fact that the view of Greek antiquity as a time of rose-coloured serenity lasted for centuries with almost invincible tenacity, as if Greek antiquity had never produced a sixth century, with its birth of tragedy, its mystery cults, its Pythagoras and Heraclitus, indeed, as if the artistic works of the great age simply did not exist—although these works,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cannot be explained at all on the grounds of such a senile joy in

existence and serenity, moods appropriate to a slave, or of things which testify to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orld view as the basis of their existence.

“希腊人的从容”的出现严重地冒犯了基督宗教最初四百年间那些深邃而可畏的本质。在他们看来，这种女性似的逃避责任与害怕困难，这种懦夫似的贪图安逸，不但是可鄙的，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反基督教的精神状态。我们可以把这种冒犯的原因归结为人们坚定地认为，古希腊是希腊人从容的玫瑰色时期，这种观点一直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几乎不可动摇，仿佛古希腊从未有悲剧诞生，秘仪的崇拜，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的第六世纪，甚至仿佛那个伟大的时期根本不存在艺术作品——尽管这些作品，每一件都不能根据现有的糊涂快乐和从容，奴隶的情绪，也不能根据把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看作生存的基本去解释。

Finally, when it is asserted that Euripides brought the spectator onto the stage in order to make him really capable for the first time of judging drama, it may appear as if the older tragic art had not resolved its false relationship to the spectator, and people might be tempted to value the radical tendency of Euripides to attain an appropri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t work and the public as a progressive step beyond Sophocles. However, the “public” is only a word and not at all a constant, firm thing of value. Why should an artist be duty-bound to accommodate himself to a power whose strength is only in numbers? And if, with respect to his talent and intentions, he senses that he is superior to every one of these spectators, how could he feel more respect for the common expression of all these capacities inferior to his own than for the most highly talented individual spectator.

最后，我们说欧里庇得斯把观众带上了舞台，从而使他们确实有能力评判戏剧；这种说法，会使人误解，以为以前悲剧艺术与观众的关系是不正确的，也会使人贸然地赞扬欧里庇得斯这一激进的倾向，认为他在艺术作品与观众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比索福克勒斯向前迈进了大一步。然而，“观众”只不过是个名词，并不是一个价值衡量的常数。艺术家有什么义务去迎合这种仅仅以数量取胜的力量呢？如果他觉得自己的才能和志向比每个观众都高明，那么他为何还要尊重那些才能比自己低的大众舆论，而不重视最有才能的个别观众呢？

To tell the truth, no Greek artist handled his public over a long lifetime with greater daring and self-satisfaction than Euripides. As the masses threw themselves at his feet, he nonetheless, with a sublime act of defiance, threw his own individual attitudes in their faces, those same attitudes with which he had conquered the masses. If this genius had had the slightest reverence for the pandemonium of the public, he would have broken apart under the cudgel blows of his failures long before the middle of his lifetime.

说实话，希腊艺术家没有一个像欧里庇得斯那样，一辈子都在以孤傲和自负的态度对待他的观众。正当大众拜倒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他竟然公开地以当初征服他的大众的同样态度抨击自己的倾向。如果这位天才对于大众的一片哗然存有半点敬畏之情的话，他也许早在他事业的中途，被失败击垮了。

Taking this into account, we see that our expression—Euripides brought the spectator onto the stage, in order to make the spectator capable of making judgments—was only provisional and that we have to seek ou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is dramatic tendencies. By contrast, it is well known everywhere how Aeschylus and

Sophocles during their lifetime and, indeed, well beyond that, stood in full possession of popular favour, and thus, given these predecessors of Euripides, there is no point in talking about a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art work and the public. What drove the richly talented artist (Euripides), constantly under the urge to create, away from the path above which shone the sun of the greatest poetic names and the cloudless sky of popular approval? What curious consideration of the spectator led him to go against the spectator? How could he be contemptuous of his public out of a high respect for his public?

鉴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欧里庇得斯把观众带上舞台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观众的判断能力——这种说法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假说而已。反过来看，众所周知，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在生前和生后都极负盛誉，作为欧里庇得斯的前辈，难道说他们没有弄懂艺术作品与大众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一来，是什么强大的力量，驱使这位才华横溢、笔耕不辍的艺术家（欧里庇得斯）丢失星光大道上最闪亮的诗人名誉和民众爱戴呢？出于对观众的什么考虑，使他背离观众呢？他怎么能因高度尊重观众而轻视观众呢？

The solution to the riddle posed immediately above is this: Euripides felt himself as a poet higher than the masses, but not higher than two of his spectators. He brought the masses up onto the stage. Those two spectators he honoured as the only judges capable of rendering a verdict and as the masters of all his art. Following their instructions and reminders, he transposed the entire world of feelings, passions, and experiences, which up to that point had appeared in the rows of spectators as an invisible chorus in every celebratory presentation, into the souls of his stage heroes. Following the demands of these two judges, he sought out for his

heroes new characters, a new language, and a new tone. In the vote of these two spectators alone he heard judgment pronounced on his creation, just as much as he heard encouragement promising victory, when he saw himself once again condemned by the justice of the general public.

上文所提到的谜题答案是，欧里庇得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诗人，比一般观众高明，但在其中两个观众面前，他甘拜下风。他是把观众带上了舞台，但是唯有他所尊敬的这两位观众才有能力对他所有的艺术作品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全盘的理解。遵从他们的指导和劝告，每次演出的时候，他都把观众席上的观众当作隐形的合唱队，观察他们的情感、激情和体验，并把这一切植入到下一次舞台人物的灵魂里去。同样，遵从这两位判官的要求，他为他戏剧中的主人翁创设出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新的语调。当他一再遭受观众舆论的否定时，唯有他们对自己创作的评价，才能使他觉得犹如听到胜利在望的鼓励。

The first of these two spectators is Euripides himself, Euripides the thinker, not the poet. Of him we can say that the extraordinarily richness of his critical talent, like that of Lessing, constantly stimulated, even if it did not create, an additional productive artistic drive. With this talent, with all the clarity and agility of his critical thinking, Euripides sat in the theatre and struggled to recognize the masterpieces of his great predecessors, as with a painting darkened by age, feature by feature, line by line. And here he encountered something familiar to those who know the profound secrets of Aeschylean tragedy: he became aware of something incommensurable in each feature and in each line, a certain deceptive clar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an enigmatic depth, the infinity of the background.

这两个观众之一就是欧里庇得斯本人，作为思想家的欧里庇得斯，而不是作为诗人的欧里庇得斯。我们可以这样说，他像莱辛一样，他具有异常丰富的批评天赋，经常一旦被刺激，就会产生出另一种艺术冲动，即使这个冲动没有付出行动。带着这个天赋，带着情绪而敏锐的批评思维，欧里庇得斯坐在戏院当中，认真地观摩前辈大师的杰作，犹如鉴赏一幅岁月褪去了色彩的油画，一点一滴、逐行逐句地推敲。他体会到一些专家熟知的埃斯库罗斯悲剧之秘奥——他慢慢开始意识到字里行间，特征之后都有些深不可测的东西。表面上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浅显，但在背后是高深莫测的深度和广度。

The clearest figure still always had a comet's tail attached to it, which seemed to hint at the unknown, the inexplicable. The same duality lay ov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rama, as well as over the meaning of the chorus. And how ambiguously the solution of the ethical problems remained for him. How questionable the handling of the myths! How unequal the division of luck and disaster! Even in the language of the old tragedies there was a great deal he found offensive or, at least, enigmatic. He especially found too much pomp and circumstance for simple relationships, too many figures of speech and monstrosities for the straightforward characters. So he sat there in the theatre, full of uneasy thoughts, and, as a spectator, he came to realize that he did not understand his great predecessors. Since his reason counted for him as the root of all enjoyment and creativity, he had to ask himself and look around to see if there was anyone who thought the way he did and could in the same way attest to that incommensurability of the old drama.

即使是最浅显的人物形象，也往往带着彗星的尾巴，仿佛暗示着一些未知、无法解释的东西。还是那个二元性，笼罩在戏剧的结构上空，就像笼罩在合唱队的上空一样。在他看来，道德问题的答案是多

么含糊不清，神话的研究是多么成问题，幸运与倒霉的界限是多么不明！即使古代悲剧里的语言，他也发现很多地方令人不舒服，或至少可以说，不够清晰。他尤其发现一些简单的关系变得过于复杂，性格直率的人使用过多的修辞格和空话、大话。于是，他坐在戏院里，思绪翻腾。作为一个观众，他终于认识到，他并不理解先辈大师。由于他认为，推理是欣赏和创作的根本，所以他不得不问自己，并环顾四周，看看是否有人观点与他的相同，并且用同样的方法对古代戏剧高深莫测的特性加以证明。

But the public, including the best individuals among them, met him only with a suspicious smile. No one could explain to him why his reflections about and objections to the great masters might be correct. And in this agonizing condition he found the other spectator, who did not understand tragedy and therefore did not value it. United with him, Euripides could dare to begin emerging from his isolation to fight the immense battle against the art works of Aeschylus and Sophocles—not with critical writings, but as a dramatic poet, who sets up the presentation of his tragedy in opposition to the tradition.

然而，观众，其中不乏最优秀的人们，对他报以不信任的微笑。没有一个人能够认为，他对大师们的怀疑和异议可能是对的。在他沮丧之际，他遇到了另外一个观众，他不懂悲剧，自然不认为悲剧有什么价值。有了他，欧里庇得斯不再孤军作战了，他勇敢地向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艺术作品展开巨大的战争——不是靠写大量的评论文章，而是以悲剧诗人的身份提出他自己对悲剧的概念，来反抗传统的概念。

Before we designate this other spectator by name, let's linger here a moment to reconsider that characteristic duality and incommensurability at the heart of Aeschylean tragedy (something we described earlier). Let us think about how strange we find the chorus and the hero of those tragedies, which were not able to reconcile with what we are used to or with our traditions, until we recognized that duality itself as the origin and essence of Greek tragedy, as the expression of two artistic drives woven together, the Apollonian and the Dionysian.

在指出另外一个观众的名字之前，我们不妨稍停片刻，重新思考一下埃斯库罗斯悲剧的中心问题：典型的二元性和深不可测性（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过的）。我们发现合唱队和那些悲剧人物多么怪异啊，它们与我们的习惯和传统格格不入，直到我们认识到，二元本身就是希腊悲剧的根源和本质，是两种，即日神型和酒神型，彼此交错在一起的艺术驱动力的表现。

To cut that primordial and all-powerful Dionysian element out of tragedy and to rebuild tragedy as a pure, new, and un-Dionysian art, morality, and world view—that has now revealed itself to us very clearly as the tendency of Euripides. Near the end of his life, Euripides himself propounded as emphatically as possible the question about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this tendency in a myth to his contemporaries. Should the Dionysian exist at all? Should we not eradicate it forcefully from Greek soil? Of course we should, the poet says to us, if only it were possible, but the god Dionysus is too powerful. The most intelligent opponent, like Pentheus in *The Bacchae* , is unexpectedly charmed by Dionysus and runs from him

in this enchanted state to his destruction.

如果我们能把原始和万能的酒神要素从悲剧中剔除掉，从而重新建立起一个纯的、新的、非酒神型的艺术模式，并具有着道德观和世界观的悲剧，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欧里庇得斯的艺术倾向。在他晚年的时候，欧里庇得斯通过一部神话剧毅然决然地向他同代人提出这种倾向的价值和意义。酒神精神有必要存在吗？难道没有必要把它从希腊土壤中连根拔掉？当然诗人对我们说，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必须这样做，但问题是，酒神的力量太大。比如说，他最聪明的对手，《酒神巴克斯之女》中的彭透斯就出人意料地着迷于酒神，在这种迷幻中，他奔向他的毁灭。

The judgment of the two old men, Cadmus and Tiresias, seems also to be the judgment of the aged poet: the mind of the cleverest individual does not throw away that old folk tradition, that eternally propagating reverence for Dionysus; indeed, where such amazing powers are concerned, it is appropriate at least to demonstrate a diplomatically prudent show of joining in. But even with that, the god might still possibly take offense at such a lukewarm participation and transform the diplomat finally into a dragon (as happens here with Cadmus).

两位老先知卡德摩斯和提瑞西阿斯的判断似乎也是对这位老诗人的判断：最聪明人的大脑当中，少不掉那种古老民歌的传统，那种对酒神精神永无止境地传播的崇拜之情。确实，只要谈论到这两个神奇的力量，我们至少可以采用外交手段谨慎地把二者融合在一起。当然，即使我们这样做，神灵也许还是会因这般冷淡参与而勃然大怒，从而把外交使节最终变成龙（就像剧中卡德摩斯所遭遇的那样）。

The poet tells us this, a poet who fought throughout his long life against Dionysus with heroic force, only to conclude his life finally with a glorification of his opponent and a suicide, like a man suffering from vertigo who, in order to escape the dreadful dizziness, which he can no longer endure, throws himself off a tower. That tragedy is a protest against the practicality of his artistic program, and that program had already succeeded! A miracle had taken place: just when the poet recanted, his program was already victorious.

诗人告诉我们，一个诗人即使他倾其毕生的悠长岁月，以英勇的魄力去反抗酒神，到头来他还是会颂扬他的敌手，并且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事业历程，就像一个眩晕症患者，为了摆脱他那可怕的，再也无法忍受的头晕眼花症状而选择从高塔上纵身跳下结束自己的生命一样。这场悲剧就是对他已经证明成功的艺术倾向实施的抗议！奇迹出现了：正当诗人放弃自己的艺术倾向时，他的艺术倾向却早已取得了胜利。

Dionysus had already been chased off the tragic stage, and by a daemonic power speaking out from Euripides. But Euripides was, to some extent, only a mask. The divinity which spoke out of him was not Dionysus, and not Apollo, but an entirely new-born daemon called Socrates.

酒神已经被逐出悲剧的舞台，是被一种借用欧里庇得斯之喉说出来的魔力逐出的。但是，欧里庇得斯，从某种程度上来，只是一个面具。从他口中道出的神，既不是酒神，也不是日神，而是一个完完全全崭新的灵物，名叫苏格拉底。

This is the new opposition: the Dionysian and the Socratic. And from this contrast, Greek tragedy perished as a work of art. No matter now how much Euripides might seek to console us with his retraction, he was unsuccessful. The most magnificent temple lay in ruins. What use to us are the laments of the destroyer and his awareness that it had been the most beautiful of all temples? And even if Euripides himself, as a punishment, has been turned into a dragon by the artistic critics of all ages, who can be satisfied with this paltry compensation?

这是一种新的对立：酒神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对立。作为一种艺术作品的希腊悲剧就在这一对立相撞中消亡。现在，无论欧里庇得斯怎么样用他艺术上的让步来讨好我们，他都无法成功。辉煌的庙宇已成废墟，破坏者的悲叹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即使他承认这座庙宇是最辉煌的庙宇中最辉煌的那一个，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即使世世代代的艺术批评家把欧里庇得斯化为龙，以示惩罚，可是这样微不足道的赔偿又能让谁满意呢？

Let's get closer now to this Socratic project, with which Euripides fought against and conquered Aeschylean tragedy.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考察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倾向。欧里庇得斯就是以它为武器来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斗争，并战胜它的。

What purpose (that's the question we need to ask at this point) could Euripides' intention to ground drama solely on the un-Dionysian have had, if we assume its implementation had the very highest ideals? What form of drama remained, if it was not to be

born from the womb of music, in that mysterious half-light of the Dionysian? All it could be was dramatic epic, an Apollonian art form in which the tragic effect is naturally unattainable.

如果我们假设，欧里庇得斯只想以非酒神风格作为自己戏剧的基础，并把做到这点视为最高理想的话，那么他这一想法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戏剧的形式不是从音乐的娘胎里出来的话，不是在酒神祭的神秘暮色时，戏剧还能有什么形式存在呢？那只能是史诗剧，一种日神风格的艺术形式。在这种艺术形式里，悲剧的效果当然是达不到的。

This is not a matter of the content of the represented events. I might even assert that in Goethe's proposed *Nausikaa* i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to make the suicide of that idyllic being (which was to be carried out in the fifth act) grippingly tragic, for the power of the Apollonian epic is so extraordinary that it magically transforms the most horrific things through that joy in and redemption through appearances right before our very eyes. The poet of the dramatic epic cannot completely fuse with his pictures, any more than the epic rhapsodist can. It is always a matter of still calm, tranquil contemplation with open eyes, a state which sees the images in front of it. The actor in this dramatic epic remains, in the most profound sense, still a rhapsodist; the consecration of the inner dream lies upon all his actions, so that he is never completely an actor.

这不是史诗事件所描述的内容问题。我甚至可以说，歌德在创作《诺西卡》的时候，本不应该把这田园牧歌式的人物自杀（应该安排在第五幕）写得如此富有悲剧效果，因为日神梦境史诗的表现力极

强，以至于可以神奇般地把最恐怖的事情通过内在的快乐和外在的救赎展现在我们眼前。但是史诗剧的诗人，正如史诗朗诵者那样，就不能完全投入到情景去，他必须始终抱着冷静、无动于衷的静观态度，冷眼旁观面前的景象。同样，史诗剧的演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朗诵者，内心梦境靠他的行动再现出来，因此他不能算是完完全全的演员。

How is Euripides' work related with respect to this ideal of Apollonian drama? It is just lik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olemn rhapsodist of the olden times to the younger attitude, whose nature is described in Plato's *Ion* : “When I say something sad, my eyes fill with tears. But if what I say is horrifying and terrible, then the hairs on my head stand on end from fright, and my heart knocks.” Here we do not see any more the epic dissolution of the self in appearances, the disinterested coolness of the real actor, who remain, even in his highest achievements, totally appearance and delight in appearances. Euripides is the actor with the beating heart, with his hair standing on end. He designs his work as a Socratic thinker, and he carries it out as a passionate actor.

那么，就日神型戏剧这个理想方面，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又怎么样呢？旧时代严肃的朗诵者与年轻一代的朗诵者之间的不同反应在态度上。在柏拉图的“伊翁篇”中，一个青年朗诵者这样形容他自己的心情：“当我讲到悲哀的事情，我总是满眼泪水；当我讲到可惊可怖的事情，我就感到毛骨悚然，心脏在砰砰地跳。”在这里，再也见不到史诗般的自我消解在外观里，也看不到一个作为真正演员的那种袖手旁观的冷静。一个真正的演员，即使在他事业的最高峰，他也不会喜形于色。欧里庇得斯说他是个演员，是因为他有心脏砰砰地跳，毛骨悚然之感。在他设计作品的时候，他是以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家来对待的；在表演的时候，他却又作为一个有激情的演员，把戏剧表演出

去。

Euripides is a pure artist neither in planning his work nor in carrying it out. Thus the Euripidean drama is simultaneously a cool and fiery thing, equally capable of freezing or burning. It is impossible for it to attain the Apollonian effect of the epic,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divorced itself as much as possible from the Dionysian elements, and now, in order to work at all, it needs new ways to arouse people, methods which can no longer lie within either of the two individual artistic drives of the Apollonian and the Dionysian. These method of arousing people are detached paradoxical ideas, substituted for Apollonian objects of contemplation, and fiery emotional effects, substituted for Dionysian enchantment. The fiery effects are, to be sure, imitated with a high degree of realism, but the ideas and emotional effects are not in the slightest way imbued with the spirit of art.

欧里庇得斯在作品的设计和出演两个方面都不能称为真正的艺术家。因此，欧里庇得斯的戏剧总是又冷又热，一会儿让人冻得要死，一会儿让人灼热要命。让他的作品获得史诗梦境效果是不可能的，尽管已经尽可能地脱离酒神要素，但是现在，为了能够获得史诗梦境效果，它需要新的方法来唤起人和方法，使之不再躲藏在日神或酒神这两个艺术驱动力任何一个里。这些唤起人们的方法是用不带感情的悖论思想，替代日神静观的目的；用火一样的热情，替代醉境陶醉。火热的情怀高度地模仿现实，思想和情感没有丝毫艺术的精神。

If we have now recognized that Euripides did not succeed in basing his drama solely on Apollonian principles, that his un-Dionysian tendencies much rather led him astray into an inartistic

naturalism, we are now able to move closer to the essential quality of his Socratic aesthetics, whose most important law runs something like this: “Everything must be understandable in order to be beautiful,” a corollary to the Socratic saying, “Only the knowledgeable person is virtuous.” With this canon at hand, Euripides measured all the individual features and justified them according to this principle: the language, characters, dramatic construction, the choral music.

如果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欧里庇得斯想把戏剧只放在日神的梦境原则基础上并没有成功，他的非酒神型的倾向把他引入歧途，走入非艺术的自然主义，那么我们离他的苏格拉底主义基本审美性质更近了一步。他的苏格拉底主义基本审美性质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唯有理解才能美丽”，这可以与苏格拉底的格言“唯有知性才能有德”媲美。有了这个标准在手，欧里庇得斯就用它来衡量戏剧里的一切成份——语言、人物、戏剧结构和合唱音乐——并按照这个原则去订正它们。

What we habitually assess so frequently in Euripides, in comparison with Sophoclean tragedy, as a poetical deficiency and a backward step is for the most part the product of his emphatic critical process, his daring intelligence. Let the Euripi dean prologue serve as an example of what that rationalistic method produces. Nothing can be more offensive to our stage techniques than the prologue in Euripides's plays. That a single person should step forward at the beginning of a work and explain who he is, what has gone on before the action starts, what has happened up to this point, and even what will occur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work, that would strike a modern poetical dramatist as a wanton, inexcusable abandonment of all the effects of suspense. If we know everything

which is going to happen, who will want to sit around waiting to see that it really does happen? For here there is nothing like the stimula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 prophetic dream and a later real event. Euripides thought quite differently about the matter.

与诸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相比，我们通常认为，欧里庇得斯悲剧中少了一份诗意，是一种退步，这多半是他创作过程中使用了批判性的大胆思维所致。就拿欧里庇得斯把座堂主任牧师作为序幕为例，来讨论理性主义方法带来什么结果。没有哪个悲剧序幕比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序幕更违反当今的舞台技巧了。在他的戏里，一开始总有一个人登台报幕，首先他自报家门，然后交代剧情，交代前因后果，统统讲一遍。这种做法使得现代剧作家感到不可原谅，因为这样做丢弃了所有的悬念效果。假设我们已经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谁还愿意坐在那里等着看同样的事情真的发生呢？这里，序幕的梦与后来发生的事实完全吻合，这就导致剧情没有了刺激。但是，欧里庇得斯的思路就是与众不同。

The effect of tragedy never depends on epic suspense, on the tempting uncertainty about what will happen now and later. It depends far more on those great rhetorical-lyrical scenes in which the passion and dialectic of the main hero swelled up into a wide and powerful storm. Everything was preparing for pathos, not for action. What did not prepare the way for paths was considered disposable. But what hinders most seriously the listener's delighted devotion to such scenes is any missing part, any gap in the network of the previous events. As long as the listener still has to figure out what this or that person means, what gives rise to this or that conflict in motives or purposes, then his full immersion in the suffering and action of the main character, his breathless sympathy with and fear for them, are not possible. The Aeschylean-

Sophoclean tragedies made use of the most elegant artistic methods in the opening scenes to provide the spectators, as if by chance, all the necessary clues 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a technique in which their noble artistry proves its worth by allowing the necessary features to appear, but, so to speak, as something masked and accidental.

他认为，悲剧效果绝不是靠史诗剧情的跌宕起伏，也不是靠诱发观众对现在和未来要发生事情的刨根问底，而是靠语言的魅力和抒情的宏大场面。在这种场面中，主角的激情和雄辩高涨成暴风骤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感染力，而不是为了剧情。凡是不能引起观众共鸣的都被视为可以删去的东西。但是，如果有哪里让观众看不懂，即他们不能享受剧情的发展的，那一定是在前面的叙述中少掉了某个环节，留下了沟壑。只要观众在那里揣摩这个或那个人物的意图，这个或那个动机和目的的冲突是什么引起的，他们就不可能彻底地浸入到主人翁的遭遇和行为当中去，就不可能与剧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悲剧在开场的前几幕，就把理解剧情所必需的线索全部交代给观众，其方法如此巧妙，以至于让人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这真是一个高明的艺术技巧，它能让必要的特征显现出来，但同时又把它们遮蔽，偶然才能看见。

But Euripides still believed he noticed that during these first scenes the spectator was oddly disturbed having to figure out the simple arithmetic of the previous events so that the poetical beauties and the pathos of the exposition was lost on him. Therefore Euripides set up the prologue even before the exposition and put it in the mouth of a person whom people could trust—a divinity would necessarily confirm the outcome of the tragedy for the public, more or less, and take away any doubts about the reality of the myth,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way in which Descartes could

establish the reality of the empirical world through an appeal to the truthfulness of God and his inability to lie. At the end of his drama, Euripides once again made use of this same divine truthfulness in order to confirm his hero's future for the public. That is the task of the notorious *deus ex machina* . Between the epic prologue and epilogue lay the lyrical, dramatic present, the essential “drama.”

然而，欧里庇得斯仍然相信，由于注意到观众在头几场戏里，十分焦急地想弄清楚前面的剧情，所以无法去欣赏剧中的场景美和剧情的感染力。因此，欧里庇得斯就在戏剧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设置一个序幕，通过一个大家都信赖的人之口把剧情说出来。这是一个神一级的人物，他似乎觉得有必要把悲剧的结局向观众多多少少地介绍一下，扫除他们对神话现实性的怀疑。正像笛卡儿诉诸神的真实存在和其诚实的性格来证明经验世界之真实性，对于戏剧的收场，欧里庇得斯再次使用这种神灵真实存在的方法，以向观众保证剧中主人翁的未来也是真实的。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天外救星”的任务。由此可见，这种剧情的序幕和收场之间是诗意和剧情，这就是“戏剧”之根本。

So Euripides as a poet is, above all, the echo of his conscious knowledge, and it is precisely this which confers upon him such a memorable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Greek art.

所以，欧里庇得斯，作为诗人，他首先是自己自觉认知的回音，正是这种回音赋予他在希腊艺术历史上享有如此令人难忘的地位。

In view of his critically productive creativity it must have often struck him that he must be bringing alive in drama the opening of Anaxagoras's text, the first lines of which go as follows: “In the

beginning everything was a confused mixture, but then came reason and created order.” And if, among philosophers, Anaxagoras, with his concept of mind, seems to be the first sober man among total drunkards, so Euripides might have conceptualized his relationship to the other poets with a similar image. So long as the single creator of order and ruler of all, the mind, was still excluded from artistic creativity, everything was still mixed up in a chaotic primordial pudding. That's how Euripides must have thought about it; that's how he, the first “sober” poet must have passed sentence on the “drunken” poets.

就他的批判创作能力而论，他一定常常觉得有必要把阿那克萨哥拉著作开头的几句话灵活地运用在戏剧里。这几句话就是：“初始，万物混沌一片，但后来理性出现，创立了秩序”。如果说，正是因为阿那克萨哥拉有着这样的思想，所以他在哲学家群里成为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物，那欧里庇得斯也许认为他与其他悲剧诗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只要秩序的创立者和万物的统治者——即理性，仍然被排斥在艺术创作之物，一切就会继续处于原始浑沌状态之中。欧里庇得斯一定是这样想的，他一定认为，作为第一个清醒的诗人，就应该对“醉酒”诗人判处死刑。

What Sophocles said about Aeschylus—that he does what's right, without being aware of it—was certainly not said in any Euripidean sense. Euripides would have conceded only that Aeschylus created improperly because he created without any conscious awareness. Even the god-like Plato speaks of the creative capability of poets and how this is not a conscious understanding, but for the most part only ironically, and he draws a comparison with the talent of prophets and dream interpreters, for the poet is not able to write until he has lost his conscious mind and reason no

longer resides in him. Euripides undertook the task (which Plato also took on) to show the world the opposite of the “irrational” poet. His basic aesthetic principle, “everything must be conscious in order to be beautiful,” is, as I have said, the corollary to the Socratic saying, “Everything must be conscious in order to be good.”

欧里庇得斯必须当机立断，索福克勒斯曾经说过，埃斯库罗斯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欧里庇得斯当然不同意这个观点。相反，他总结道，埃斯库罗斯的创作不当就是因为他创作的时候，没有自觉意识。甚至神一级人物柏拉图就诗人的创作能力论述的时候，也说过，这是没有自觉理解的问题，当然说这样话的时候多半是带有讽刺意味的。他把诗人的才能与预言家和解梦人的才能做了对比，这就是说，诗人在失去自觉思维和理性之前，是不会有创作能力的。欧里庇得斯这样做（柏拉图也这样做的）的目的就是向世人证明“非理性诗人”对立面的存在。他的基本审美原则“唯有理解才能美丽”正如我所说的，这可以与苏格拉底的格言“唯有知性才能有德”相媲美。

With this in mind, it is permissible for us to assess Euripides as the poet of Socratic aesthetics. Socrates, however, was that second spectator, who did not understand the old tragedy and therefore did not value it. With Socrates as his ally, Euripides dared to be the herald of a new artistic creativity. If old tragedy perished in this development, then Socratic aesthetics is the murdering principle. Insofar as the fight was directed against the Dionysian of the older art, we recognize in Socrates the enemy of Dionysus, the new Orpheus, who roused himself against Dionysus, and who, although destined to be torn apart by the maenads of the Athenian Court of Justice, nevertheless himself made the powerful god fly away.

Dionysus, as before, when he fled from Lycurgus, King of the Edoni, saved himself in the depths of the sea, that is, in the mysterious floods of a secret cult which would gradually overrun the entire world.

因此，我们不妨认为，欧里庇得斯是苏格拉底主义审美学的诗人。然而，苏格拉底就是那个第二个观众。他不了解旧悲剧，因而不看重它。有苏格拉底做他的联盟，欧里庇得斯就敢去做一种新艺术创作的先驱者。如果旧悲剧在这种新艺术发展中灭亡，那么苏格拉底主义审美观学乃是它毁灭性的原理。但是，既然这场斗争的矛头指向旧悲剧中的醉境因素，那么我们不妨把苏格拉底看作酒神的敌手，这个反抗酒神的新俄耳甫斯。俄耳甫斯虽然命中注定要被雅典法庭的酒神侍女们撕死，但是他也不得不亲自把这位强大的神灵赶走。从前，酒神逃离伊多尼国王莱克格斯的时候，就是躲在大海深处的。这就是说，他潜入秘仪崇拜的神秘洪流中，后来这股洪流逐渐全蔓延全世界。

13

13

That Socrates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to Euripides' project did not escape their contemporaries in ancient times, and the clearest expression for this happy intuition is the rumour floating around Athens that Socrates was in the habit of helping Euripides with his poetry. Both names were invoked by the supporters of the “good old days” when it was time to list the present popular leaders whose influence had brought about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old strength of mind and body manifested at the Battle of Marathon was being increasingly sacrificed for a dubious way of explaining things, in a

continuing erosion of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powers.

苏格拉底与欧里庇得斯的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点没有逃脱那个时代人的眼睛。在雅典有个流传，说苏格拉底习惯帮助欧里庇得斯作诗，这足以表明人们直觉很敏锐。每当有机会列举最受欢迎的领袖时，这俩个人的名字总是被“昔日好时光”支持者并列提名。认为过去人们在马拉松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身心健康越来越被现在纷杂的认知弄得体力和智力都在渐趋退化。这就是受到这俩人影响的结果。

This was the tone—half indignation, half contempt—in which Aristophanic comedy habitually talked of these men, to the irritation of the newer generations, who, although happy enough to betray Euripides, were always totally amazed that Socrates appeared in Aristophanes as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sophist, the mirror and essence of all sophistic ambitions. As a result, they took consolation in putting Aristophanes himself in the stocks as an impudent lying Alcibiades of poetry. Without here defending the profound instinct of Aristophanes against such attacks, I will proceed to demonstrate the clos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Socrates and Euripides as the ancients saw it. It'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remember in this connection that Socrates, as an opponent of tragic art, never attended the performance of a tragedy, and only joined the spectators when a new piece by Euripides was being produced. The best known connection, however, is the close juxtaposition of both names in the oracular pronouncements of the Delphic Oracle, which indicated that Socrates was the wisest of men and at the same time delivered the judgment that Euripides captured second prize in the contest for wisdom.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谈及这俩人时，习惯性地带着半愤怒半轻蔑的调子——这会使现代人大为气愤，因为他们看到阿里斯托芬背叛欧里庇得斯没什么感觉，但是看到苏格拉底在阿里斯托芬喜剧中被说成是第一个主要的诡辩者，是一切诡辩倾向的镜子和总结，还是觉得好奇怪。因此，他们给阿里斯托芬套上精神绞刑架，辱骂他是诗坛上放肆无礼、满口谎言的亚西比德，以此自慰。这里，我并不想替阿里斯托芬的深识灼见做出任何辩护，来反驳这种诽谤，我将继续讨论古人是怎么看待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的密切关系。说到这个问题，特别有必要提到一点，苏格拉底是反对悲剧的，从来不看悲剧，唯独欧里庇得斯的新剧一出来，他就去看。然而，他们俩人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的是在德尔斐神谕就把这两个名字并列放置的。这充分体现出，苏格拉底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但同时也断定欧里庇得斯在斗智的比赛中应该得第二名。

Sophocles was the third person named in this hierarchy, the man who could praise himself in comparison with Aeschylus by saying that he (Sophocles) did what was right because he knew what was right. Obviously the degree of clarity in these men's knowledge was the factor that designated them collectively as the three “wise men” of their time.

索福克勒斯的名字排列第三。此人自诩堪比诸埃斯库罗斯，声称说他（索福克勒斯）只做对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显然，就是这几个人有明确的认知，所以才被称为“智者”。

But the most pointed statement about this new and unheard of high opinion of knowledge and reason was uttered by Socrates, when he claimed that he was the only person to assert that he knew nothing; whereas, in his critical wandering about in Athens

conversing with the greatest statesmen, orators, poets, and artists, everywhere he ran into people who imagined they knew things. Astonished, he recognized that all these famous people had no correct and clear insight into their occupations and carried out their work instinctually. “Only from instinct”—with this expression we touch upon the heart and centre of the Socratic project.

但是，关于这个有关认知和理性的从未听说过的新观点，苏格拉底曾说过最精辟的一句话。他说他是唯一说过自己对此无知的人：他怀着批判的心情走遍雅典，拜访过最伟大的政治家、演讲家、诗人、艺术家，所遇到的人都自认为懂得很多。他震惊地发现，这些有名人士对自己的职业没有正确和清晰的认识，只是凭着本能在工作。“全靠本能”，凭借这句话，我们就能够触及到苏格拉底倾向的要点和核心。

With this expression Socratic thought condemns existing art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ethics. Wherever he directs his searching gaze, he sees a lack of insight and the power of delusion, and from this he infers the inner falsity and worthlessness of present conditions. On the basis of this one point, Socrates believed he had to correct existence. He, one solitary individual, stepped forward with an expression of contempt and superiority, as the pioneer of a brand new style of culture, art, and morality, into that world, a scrap of which we would count it an honour to catch.

苏格拉底思想以这句话谴责现有的艺术和当代的道德。苏格拉底以探索的眼光到处观察，所到之处不是真知的缺乏，就是幻想的猖獗。因此，他便推断出当代的情况是人们的内心是虚伪的，无价值感。基于这一点，苏格拉底认为他有责任去改变现状。他作为一种崭

新文化、艺术、道德的先驱，带着清高自傲的态度，孑然一身地走入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所有内容，如果我们还能一知半解的话，将无比荣幸。

That is the immensely disturbing thing which grips us about Socrates whenever we run into him and which over and over again always stimulates us to find out the meaning and intention of this man, the most problematic figure of ancient times. Who is the man who can dare, as an individual, to deny the very essence of Greece, which with Homer, Pindar, Aeschylus, Phidias, Pericles, Pythia, and Dionysus is certainly worthy of our highest veneration? What daemonic force is it that could dare to sprinkle this magic drink into the dust? What demi-god is it to whom the ghostly chorus of the noblest specimens of humanity had to cry out: “Alas, alas! You have destroyed our beautiful world with your mighty fist. It is collapsing, falling to pieces!”

当我们遇上苏格拉底这个人的问题时，上面所叙述的情况是最令我们抓狂的地方。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地刺激我们去探究这个古代最有争议的人的真实意义和目的。是谁这么大胆，单枪匹马地否定希腊最最本质的东西？希腊可是出现过荷马、品达、埃斯库罗斯、斐狄亚斯、伯里克利、皮提亚和狄奥尼索斯等这样的天才，当然值得我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的啊。是什么魔力竟敢把这剂魔药泼洒在尘埃上呢？是什么神人呢，就连人类标本式的人物组成的，幽灵般的合唱队也要对他高呼：“哎呀，哎呀！你用你的拳头把我们美丽的世界给砸烂了。现在这个美丽的世界正在倒塌，变成碎片！”

A key to the heart of Socrates is offered by that amazing phenomenon indicated by the term Socrates's daimonon.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 which his immense reasoning power was stalled in doubt, he resolved his irresolution firmly with a divine voice which expressed itself at such times. When this voice came, it always sounded a cautionary note. In this totally strange character instinctive wisdom reveals itself only in order to confront the conscious knowledge now and then as an impediment. Whereas in all productive men instinct is the truly creative and affirming power, and consciousness acts as a critical and cautioning reaction, in Socrates the instinct becomes the critic, consciousness becomes the creator—truly a monstrous defect.

所谓“苏格拉底的守护神”这个奇怪现象，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把解决苏格拉底真髓的钥匙。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他的推理能力也会出现失灵，此时他就会毅然决然地用神灵般的声音去斩断自己的优柔寡断。这个神灵般的声音每每出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旦它出现，就会变成一种警告。在这极其奇怪的个性下，直觉的智慧出来对抗当时的有意识的认知并起到一种阻碍的作用。尽管对那些创造力很强的人而言，直觉真的是一种激发创作、鼓舞人心的力量，而知觉则起着批判和阻碍的作用。然而在苏格拉底那里，直觉是批判性的，知觉是创造性的——这真是一种缺憾！

Now, we see here a grotesque defect in mythical consciousness, so that Socrates can be considered specifically a non-mystic man in whom the logical character has become too massive through excessive use, just like instinctive wisdom in the mystic.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at logical drive, as it appeared in Socrates, to turn against itself. In its unfettered rush it demonstrates a natural power of the sort we meet, to our shuddering surprise, only in the very greatest instinctive powers. Anyone who has sensed in the Platonic texts the merest scent of the

god-like naïveté and confidence in the direction of Socrates's teaching has also felt how that immense drive wheel of Socratic logic is, at it were, in motion behind Socrates and how we have to see this behind Socrates, as if we were looking through a shadow.

现在，我们在神秘的意识里看到了这一缺憾，以此我们更加可以把苏格拉底视为一个非神秘主义者，其逻辑思维特征因为使用过量而变得过于庞大，就像其直觉智慧过度发达那样。另一方面，苏格拉底的逻辑推理不像他的直觉，不会自相矛盾；相反，令我们吃惊的是，他的逻辑推理冲动仅凭最大的直觉能力就能一泻千里地展现出一种我们期待的自然力。凡是在柏拉图著作中稍为领略过苏格拉底学说之神灵般的纯真，坚信其方向正确的人，都会感觉到飞转在苏格拉底背后的苏格拉底逻辑理论主动轮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不得不从苏格拉底背后去观察它，如同透过影子看东西一样。

That he himself had a premonition of this relationship comes out in the dignified seriousness with which he assessed his divine calling everywhere, even before his judges. To censure him for this is as impossible as it is to approve of his influence on the removal of instinct. When Socrates was hauled before the assembly of the Greek state, there was only one form of sentence for this irreconcilable conflict, namely, banishment. People should have expelled him beyond the borders as something enigmatic, unclassifiable, and inexplicable, so that some future world could not justly charge the Athenians with acting shamefully.

苏格拉底本人早就意识到这种关系，所以即使在法官面前，他也表现得正气凛然，坚守他的神圣使命。要想为此指责他的话是不可能的，犹如赞许他在消除直觉的方面的影响一样。当苏格拉底在希腊国

家法庭出庭受审的时候，只有一种判刑方式能够解决这对不可调和的冲突，那就是放逐。人们本应该把他当作解不开的谜、无法归类和解释的东西驱逐出境的，从而未来世界上不会有人理直气壮地指责希腊人做出了如此可耻之举。

The fact that death and not exile was pronounced over him Socrates himself appears to have brought about, fully clear about what he was doing and without the natural horror of death. He went to his death with the same tranquility Plato describes him showing as he leaves the Symposium, the last drinker in the early light of dawn, beginning a new day, while behind him, on the benches and the ground, his sleeping dinner companions stay behind, to dream of Socrates the truly erotic man. The dying Socrates was the new ideal of the noble Greek youth, never seen before. Right in the vanguard, the typical Greek youth, Plato, prostrated himself before Socrates's picture with all the fervent adoration of his passionately enthusiastic soul.

结果是，苏格拉底被判的是死刑而不是放逐，仿佛是他自愿请求为之的，所以他深知他面临着什么，但没有丝毫自然的恐惧。他从容就义，泰然得像柏拉图所描述的那样——他是最后一个离开酒会的饮者，迎着黎明的曙光，开始新的一天，而在他身后，喝得酩酊大醉、昏昏欲睡的饮者坐在板凳和地板上，梦着苏格拉底这个真正爱情至上论者。临死的苏格拉底成了高尚的希腊青年人的新理想人物，前所未有的偶像。充当排头兵的是典型的希腊青年柏拉图，他五体投地俯伏在苏格拉底画像前，怀揣着对他火热灵魂的无比钦佩之情。

Let's now imagine that one great Cyclops eye of Socrates focused on tragedy, that eye in which the beautiful madness of artistic enthusiasm never glowed—let's imagine how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at eye to peer into the Dionysian abyss with a feeling of pleasure. Then what must that eye have seen in the “lofty and highly praised” tragic art, as Plato calls it? Something really unreasonable, with causes without effects, actions which apparently had no causes, and as a whole so varied and with so many different elements that any reasonable person had to reject it, but dangerous tinder for sensitive and easily excitable minds. We know which single form of poetry Socrates understood: Aesop's fables. And no doubt his reaction involved that smiling complacency with which the noble and good Gellert in his fable of the bee and the hen sings the praises of poetry: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苏格拉底这个伟大的独眼巨人凝视着悲剧，可是这眼神中，并没有对艺术狂热的美丽光芒在闪烁——让我们设想，要让这种眼神带着愉悦的心情去窥视酒神精神之深渊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柏拉图之所谓“崇高而受到高度美誉的”悲剧艺术中，这种眼神一定看到了什么？是一些有因无果、有果无因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总体说来，因素很多、很杂，以至于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断然拒绝它。更可怕的是，对于敏感而容易激动的人而言，却又潜伏危险。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对伊索寓言了如指掌、句句熟悉。这种反应无疑是他对伊索寓言带着微笑的满意，就像在《蜜蜂与母鸡》这则寓言里高尚而善良的格尔伯赞美寓言那样：

You see in me the use of poetry—

你看我用寓言——

To tell the man without much sense

白描的方式道出，

A picture image of the truth of things.

真理的画面。

But for Socrates tragic art did not seem “to speak the truth” at all,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it did address itself to those “without much sense,” and thus not to philosophers, a double excuse to keep one's distance from it. Like Plato, he assigned it to the art of cosmetics, which present only a pleasant surface, not the useful, and he therefore demanded that his disciples abstain and stay away from such unphilosophical temptations, with so much success that the young poet of tragedy, Plato, immediately burned his poetical writing in order to be able to become Socrates's student. But where invincible talents fought against the Socratic instructions, his power, together with the force of his immense personality, was always still strong enough to force poetry itself into new attitudes, unknown up until then.

尽管悲剧艺术是对“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不是对哲学家说话，但是，在苏格拉底看来，悲剧艺术似乎没有“说出真话”。有两个原因导

致他远离悲剧。一方面，像柏拉图那样，他把悲剧归为化妆品艺术,只提供表面上的愉悦，没有实用的内容。因此，他要求他的弟子们切戒，并抵制这些毫无哲理的诱惑。他大获成功。年青的悲剧诗人柏拉图立刻焚掉他的剧本，为的就是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但是，有的时候，他身上与生俱来的才华会起来反抗苏格拉底的教导；幸运的是，他内心的力量和个性仍然强大到足以把他的悲剧推上新的、前所未有的层面。

An example of this is Plato himself. To be sure, in his condemnation of tragedy and art in general he did not remain back behind the naïve cynicism of his master. But completely from artistic necessity he had to create an art form related directly to the existing art forms which he had rejected. The major criticism which Plato made about the old art—that it was the imitation of an illusion and thus belonged to a lower level than the empirical world—must above all not be directed against his new work of art. And so we see Plato exerting himself to go beyond reality and to present the Idea which forms basis of that pseudo-reality.

柏拉图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说实在的，他对悲剧和一般艺术的谴责不亚于他导师的冷嘲热讽。但是，完全出于艺术的必要性，他不得不创造一种与现有的，也是他曾经抛弃过的艺术形式有着直接的关系艺术形式。柏拉图对旧艺术所做的主要批判——即旧艺术幻象的模仿，属于比经验世界还低的领域。这点一定不是首先针对他的新艺术作品的。因此，我们看到柏拉图竭力走出现实，提出自己的“理念”为那个伪现实打下基础。

With that, however, the thinker Plato reached by a detour the very place where, as a poet, he had always been at home and from

where Sophocles and all the old art was protesting against Plato's criticism. If tragedy had assimilated all earlier forms of art, so the same holds true, in an odd way, for Plato's dialogues, which were created from a mixture of all available styles and forms and hover between explanation, lyric, drama, prose and poetry, right in the middle, and in so doing broke through the strict old law about the unity of stylistic form. The Cynic philosophers went even further along the same path. With their excessively garish and motley collection of styles, weav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prose and metrical forms, they produced the literary image of “raving Socrates,” which they were in the habit of presenting in their own lives.

但是正因此，思想家柏拉图却迂回地到达了他作为一个诗人之前一直呆在的那个家。索福克勒斯和所有的老艺术家从那里抗议他的非难。如果说悲剧吸收了以前的各种艺术，柏拉图的“对话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这样，杂糅所有的现存艺术风格和形式。它摇摆于叙事、抒情、戏剧、散文与诗歌之间，就在它们的正中间，因此打破了风格形式的统一性这一严格的老规律。犬儒学派的哲学家们沿着这条道路则走得更远。他们以极其丰富多彩的风格驰骋于散文与韵文之间，创作出“狂人苏格拉底式”的文学形象。这是他们一辈子都想展现的文学形象。

The Platonic dialogue was, so to speak, the boat on which the shipwreck of the old poetry, along with all its children, was saved. Pushed together into a single narrow space and with an anxious Socrates at the helm they humbly set off now into a new world, which never could see enough fantastic images of this event. Plato really gave all later worlds the image of a new form of art, the image of the novel, which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n infinitely

intensified Aesopian fable, in which the relative priorities of poetry and dialectical philosophy were the same as the relative priorities of that very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for many hundreds of years. Poetry, in other words, was subservient. This was poetry's new position, the place into which Plato forced i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aemonic Socrates.

柏拉图的对话，可以说，是一条船，它救起了遇难的古代诗歌和她所有的孩子。此刻，他们挤在一个弹丸之地，由一个着急的苏格拉底式的人掌舵，心惊胆颤地驶入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是不可能目睹到这类事件的稀奇古怪画面。真的，柏拉图给后世留下的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原型，这就是小说的原型。这种形式可以说是《伊索寓言》无限加强版。在这里，诗歌和辩证哲学处于相对优先地位，如同维持数百年那个哲学和神学那样，换句话来说，诗歌处于屈从的地位，这是诗歌新的地位。也就是柏拉图在超凡入圣的苏格拉底的驱使下强迫诗陷入的地位。

Now philosophical ideas grew up around art and forced it to cling to the trunk of dialectic. Apollonian tendencies metamorphosed into logical systematizing, something corresponding to what we noticed with Euripides, as well as a translation of the Dionysian into naturalistic effects. Socrates, the dialectical hero in Platonic drama, reminds us of the changed nature of the Euripidean hero, who has to defend his actions with reasons and counter-reasons and thus frequently runs the risk of losing our tragic sympathy. For who can fail to recognize the optimistic element in the heart of dialectic, which celebrates a jubilee with every conclusion and can breathe only in a cool conscious brightness, that optimistic element, which, once pushed into tragedy, gradually overruns its Dionysian regions and

necessarily drives them to self-destruction, right to their death leap into middle-class drama.

这里，哲学思想长满在艺术之上，强迫它依附在辩证法的主干。日神梦境倾向幻化为逻辑三段论，我们在欧里庇得斯那里也见到过类似的情况。此外，我们也还看到过酒神醉境风格转变为自然效果。苏格拉底，这个柏拉图戏剧中的辩证法英雄，使人觉得他是本性改变过的欧里庇得斯悲剧中英雄人物：他必须采取推理和反驳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行为，因此往往冒有丧失我们对悲剧赋予同情的危险，因为谁会只是吸收冷静的意识，认识不到辩证法核心中的乐观主义成份，以及每做一次结论所带来的快感？其中的乐观成分一旦进入悲剧，很快蔓延酒神醉酒领域，就会自然而然地促使它自我毁灭，直至它跳入中产阶级戏剧的深渊而丧命。

Let people merely recall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Socratic sayings “Virtue is knowledge; sin arises only from ignorance; the virtuous person is the happy person.” In these three basic forms of optimism lies the death of tragedy. For now the virtuous hero must be a dialectician. Now there must be a perceptible link between virtue and knowledge, belief and morality. Now the transcendental vision of justice in Aeschylus is lowered to the flat and impertinent principle of “poetical justice” with its customary *deus ex machina* .

让我们看一看苏格拉底的格言“知识就是美德，罪恶完全来自于无知，有美德的人是快乐的”影响。乐观主义的这三种基本形式导致了悲剧剧种的灭亡。按照这个道理来说，有美德的英雄一定是一位讲辩证法的人；美德与知识之间、信仰与道德之间一定有明显的联系。埃斯库罗斯正义的先验观被夷为平地了。“诗歌的正义性”这个邪理论用它的“天外救星”的鬼蜮伎俩走向灭亡。

What does this new Socratic optimistic stage world look like with respect to the chorus and the whole musical-Dionysian basis for tragedy in general? All that seem to be something accidental, a reminder of the origin of tragedy which we can well do without, because we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 chorus can be understood only as the origin of tragedy and the tragic in general. Already in Sophocles the chorus reveals itself as something of an embarrassment, an important indication that even with him the Dionysian stage of tragedy was beginning to fall apart. He did not dare to trust the Chorus to carry the major share of the action, but limited its role to such an extent that it appears almost as one of the actors, just as if it had been lifted out of the orchestra into the scene. This feature naturally destroys its nature completely, no matter how much Aristotle approved of this arrangement of the chorus.

那么现在，合唱队和以酒神音乐为基础的普通悲剧，在这个新的苏格拉底乐观主义舞台上是什么样子的呢？它们给我们感觉是似乎偶尔才会有的，看到它们，也只是让我们想起对我们已经没有意义的悲剧起源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合唱就是悲剧的起源和一般的悲剧。合唱在索福克勒斯的作品里早已显出不伦不类了，也就是说，即使有合唱，悲剧的酒神型舞台也只能是在崩溃。他不指望通过合唱来挑大梁，只能把合唱当作一个小演员，如同把它从正厅前排座位拉到舞台上来一样。不管这种合唱安排受到亚里士多德何等的赞许，现在合唱的特征自然会彻底终结它的本性。

This demotion in the position of the chorus, which Sophocles certainly recommended in his dramatic practice and, according to tradition, even in a written text,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horus, whose phases in Euripides, Agathon, and the New Comedy followed with breakneck speed one after the other.

合唱地位的下降毫无疑问得到索福克勒斯的支持，这点在他的戏剧创作实践中可以看的出。根据传统，合唱地位的下降，包括在剧本写作，都是合唱形式迈向毁灭的第一步。在之后的欧里庇得斯、阿伽同，直到新喜剧都在以惊人的速度相继而来走向毁灭。

Optimistic dialectic, with its syllogistic whip, drove music out of tragedy, that is, it destroyed the essence of tragedy, which can be interpreted only as a manifestation and imaginary presentation of Dionysian states, as a perceptible symbolizing of music, as the dream world of a Dionysian intoxication.

乐观主义的辩证法，以其三段论的皮鞭，把音乐从悲剧里驱逐出去，也就是说，它破坏了悲剧的本质，因为悲剧只能被解释为醉境心情的表现和图解、音乐的具体象征和醉境陶醉中的梦境世界。

We have noticed an anti-Dionysian tendency already effective before Socrates, which only achieves in him an expression of incredible brilliance. Now we must not shrink back from the question of where such a phenomenon as Socrates points. For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given the Platonic dialogues, to see that phenomenon as a force of totally negative dissolution. And so, while it's true that the immediate effect of the Socratic drive was to bring about the destruction of Dionysian tragedy, the profound living experiences of Socrates himself force us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or not there must necessarily be only an antith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rates's doctrines and art and whether the birth of an “artistic Socrates” is in general something of a contradiction.

我们注意到了，在苏格拉底之前，反酒神倾向已经兴起，只是到了他的身上表现得难以置信的明显。现在，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苏格拉底反酒神的现象表现在哪里。鉴于柏拉图的对话录，我们不能把这现象完全看作是否定瓦解的力量。因此，尽管苏格拉底倾向的直接效果应该是瓦解酒神型的悲剧，但是苏格拉底他本人深刻的生活经验迫使我们要问：苏格拉底的学说和艺术之间就必须是对立关系吗？“艺术家苏格拉底”诞生是否总体说来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

Where culture is concerned, that despotic logician now and then had the feeling of a gap, an emptiness, a partial sense of reproach for a duty he might have neglected. As he explains to his friends in prison, often one and the same dream apparition came to him, always with the words, “Socrates, practise music!” He calmed himself, right up to his last days,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his philosophizing was the highest musical art, and believed that it was incorrect that a divinity would remind him of “common, popular music.” Finally in prison he came to understand how, in order to relieve his conscience completely, to practice that music which he had considered insignificant. And in this mood, he composed a poem to Apollo and rendered a few of Aesop's fables in verse.

说到文化，那个专横的逻辑家时不时地产生隔阂感、空虚感，对他失职有一半自责感。他曾在狱中告诉他的朋友，说他在梦中常常见到一位神灵对他说：“苏格拉底，练习音乐吧！”他一直到他生命最后

的日子里，都是这样安慰自己：认为他的思辨乃是最高的音乐艺术，不相信梦神对他暗示的是“大众通俗音乐”。他在狱中终于明白了，要想彻底减轻内疚之感，就必须练习他曾经认为不重要的音乐。在这种情绪下，他创作了《致阿波罗》这首诗歌，并把几个伊索寓言改写成诗体。

What drove him to this practice was something like the voice of his warning daemon. It was his Apollonian insight that, like a barbarian king, he did not understand a divine image and was in danger of sinning against a divinity through his failure to understand. That statement of Socrates's dream vision is the single indication of his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perhaps beyond the borders of his logical nature. So he had to ask himself: Have I always labeled unintelligible things I could not understand? Perhaps there is a kingdom of wisdom which is forbidden to the logician? Perhaps art is even a necessary correlative and supplement to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那是一种类似于鬼神的告诫之声敦促他去练习音乐的；他有着日神的认知，这使他像一个野蛮君主那样，不得理解神的高贵形象，并且由于这个无知，他差点亵渎到了神明。苏格拉底那个梦幻体的叙述，表明他所思考的问题也许超越了他的逻辑本质。于是，他不得不反躬自问：我是不是总是把我不能理解的东西当作我难理解的东西了？也许还有一个智慧王国，是逻辑学家不得而入的吧？也许艺术就是一项科学理解必不可少的相关物和补充吧？

15

In the sense of this last ominous question we must how discuss how the influence of Socrates has spread out over later worlds, right up to the present and even into all future ages, like a constantly growing shadow in the evening sun, and how that influence always makes necessary the re-creation of art (I mean art in its most profound and widest metaphysical sense) and through its own immortality guarantees the immortality of art. For this fact to be acknowledged, before it was established that all art inherently depended on the Greeks, from Homer right up to Socrates, we had to deal with these Greeks as the Athenians dealt with Socrates. Almost every age and cultural stage has at some time or another sought in an ill-tempered frame of mind to free itself of the Greeks, becaus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Greeks, all their achievements, apparently fully original and admired in all sincerity, suddenly appeared to lose their colour and life and were reduced to unsuccessful copies, even caricatures.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需要讨论一下，苏格拉底的影响是如何像渐深的暮色一样笼罩着世世代代，一直到现在，甚至到未来。我们还需要讨论一下这种影响是怎样促成艺术的推陈出新（我的意思是指最深刻、最广泛的形而上学艺术），并通过它自身的不朽保障了艺术的不朽。要想理解这一道理，我们得明白，在众所周知一切艺术在本质上是依赖从荷马到苏格拉底时期的那些古希腊人之前，我们不得不像雅典人考察苏格拉底那样考察这些希腊人。几乎每个时代和文明阶段都曾有人一度愤愤不平地设法摆脱古希腊人的影响。因为他们所有的成绩，虽然明显是原创，也受到人们真挚的赞许，但只要与希腊人的作品相比，就会立即黯然失色、失去生机，惨淡到成为失败的仿作，甚至成为讽刺漫画。

And so a heartfelt inner anger constantly kept breaking out

against that arrogant little nation which dared throughout time to define everything that was not produced in its own country as “barbaric” Who were these Greeks, people asked themselves, who had achieved only an ephemeral historical glitter, only ridiculously restricted institutions, only an ambiguous competence in morality, who could even be identified with hateful vices, yet who had nevertheless taken a pre-eminent place among nations for their value and special importance, something fitted for a genius among the masses? Unfortunately people were not lucky enough to find the cup of hemlock which can do away with such a being, for all the poisons they created—envy, slander, and inner anger—were insufficient to destroy that self-satisfied magnificence.

这个小小的傲慢国家，竟敢一向把不是本国产生的东西视为“野蛮”，对此人们常常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慨。人们要追问：希腊人是什么人，他们只是在历史上取得过昙花一现的荣耀、制定过一些有限的荒谬制度、有一定的模糊道德判断能力，可以与恶棍相提并论的民族，竟然在其他诸民族中在价值和特殊地位方面享有至高的荣誉？这种待遇只能适合百里挑一的人物啊。可是，不幸的是，人们找不到一杯鸩酒，否则可以把这群人解决掉了，因为他们所酿制的毒酒——嫉妒、诽谤和内心仇恨都不足以消灭他们狂妄自大的性格。

Hence, confronted by the Greeks, people have been ashamed and afraid. It seems that an individual who values the truth above everything else might dare to propose as true the notion that the Greeks drive the chariot of our culture and every other one, but that almost always the wagon and the horses are inferior material and cannot match the glory of their drivers, who then consider it funny to whip such a team into the abyss, over which they themselves jump with a leap worthy of Achilles.

因此，面对希腊人，人们一直感到自愧不如，同时也感到担心害怕。一个把真理视为高于一切的人好像有可能把这个概念说成是真理——即希腊人驾驭我们的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的马车，但是他们的马车和马质量都很低劣，不足以匹配他们享有的荣誉。他们用鞭子把这支队伍带入深渊，而自己却有着阿喀琉斯善跳的本领，一跃跳过这个深渊。

To demonstrate that Socrates also merits such a place among the drivers of the chariot, it is sufficient to recognize him as typifying a form of existence inconceivable before him, the type known as Theoretical Man. Our next task is to reach some insight about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such a man. The theoretical man, like the artist, takes an infinite satisfaction in the present and is, like the artist, protected by that satisfaction from the practical effects of pessimism with its lynx eyes which glow only in the darkness. But while the artist, in his revelation of the truth, always keeps his enchanted gaze hanging on what still remains hidden after his revelation, theoretical man enjoys and remains satisfied with the covers which have been thrown off and takes his greatest delight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ally successful unveiling, a success which his own power has brought about.

要想表明苏格拉底是这群御者中有资格享受这个荣誉的，我们则需要把他视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典型人物——那是理论家那种类型。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深入地洞察对这种人物的意义和目的。像艺术家那样，理论家对于当下感到无限地满足。像艺术家那样，这种满足，避免他受到悲观主义的实际影响，不至于像猞猁眼睛那样只在黑暗中闪烁。但是，艺术家在揭示一个真理的时候，总是在用自己着迷的眼睛盯着被揭示的事物背后的意义。而理论家呢，则陶醉于已经被揭开的

盖子，并洋洋得意。他的最大快乐在于只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地成功揭示真理之过程。

There would be no scientific knowledge if it concerned itself only with that one naked goddess and had nothing else to do. For then its disciples would have to feel like those people who want to dig a hole straight through the earth, and one among them sees that, even with the greatest lifelong effort, he is in a position to dig through only a really small piece of the immense depths, and that piece will be covered over in front of his very eyes by the work of the person next to him, so that a third person would apparently do well to select a new place for the tunneling efforts he undertakes on his own initiative.

如果科学只关注一位裸体女神，而不做其它的事情的话，世间就不会有科学了。因为那样，科学的信徒们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要把地球凿穿的人。谁都知道，即使尽了自己毕生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在深不可测的大地表层挖出一小块洞，而那一小块洞很快被他旁边的人当着他的面给覆盖。第三个人要想挖掘出一个新的隧道，他则必须积极主动地找到一块新的领域挖掘。

Now, if one person convincingly demonstrate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reach the antipodes by this direct route, who will want to continue to work on in the old depths, unless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in the meantime that he would be happy finding some valuable rock or discovering some natural law? For that reason, Lessing, the most noble theoretical man, dared to state that for him the search for the truth counted for more than truth itself. That statement unmasks the fundamental secre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the astonishment, even the anger, of scientists. Now, of course, alongside this single recognition, excessively truthful and brave, stands a profound but delusive image, which first came into the world in the person of Socrates, that unshakeable faith that thinking, guided by the idea of causality, might reach into the deepest abyss of being, and that thinking is capable of, not just understanding being, but even correcting it. This lofty metaphysical delusion is inher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leads it over and over again to its limits, at which point it must turn itself into art, something which is really predictable in this mechanical process.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假如一个人坚定地相信再照这条直路走下去，是永远到达不了对面那一点，谁还愿意在原来的洞穴里继续挖下去呢，除非他觉得有可能欣然地发现一些有用的矿石或发现一些自然规律？正因为这个道理，最诚实的理论家莱辛曾大胆地说过，寻求真理的过程比真理本身重要。此话道出了科学的基本秘密，震惊科学界，甚至激怒科学界。当然，这一独特的见解，非常真实与勇敢；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种深奥但又令人迷惑的形象。这个形象首先反映在苏格拉底身上，他坚信思维受到因果律的指引，可能会直接到达存在（现状）深渊的最深处，思维不仅能理解存在，甚至还可以纠正它。这种崇高的形而上学假想是科学研究固有的，一次又一次地把科学研究推向极限，科学研究到达一定的极限点就会转变成艺术。其实，艺术这个东西在这个机械的过程中是可以预知到的。

With the torch of this idea, let's look at Socrates. To us he appears as the first person who was capable not only of liv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scientific instinct, but also of dying under it (something much more difficult). Therefore the picture of the dying Socrates as a man raised above fear of death by knowledge and reason is the emblazoned shield hanging over the entranceway to

scientific research, reminding every individual of his purpose, namely, to make existence intelligible and thus apparently justified. Of course, when reasoning cannot succeed in this endeavour, myth must finally serve, something which I have just noted as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 indeed, even the purpose of, science.

有这个观点作为火炬，让我们洞察一下苏格拉底。在我们看来，他是一个能为遵循科学本能指导而生，能为遵循科学本能指导而死（其实，这点更难做到）的第一人。因此，将死的苏格拉底的形象就是一个借以知识和理性摆脱死亡恐惧人物的形象。他的这一形象挂在科学研究门前作为一个饰盾，提醒每个人科学研究者记住自己的使命，也就是说，提醒他们做到让人们认识到生存的意义，从而知道生存显然是合乎情理的。当然，如果理性在此不奏效的话，神话则最终可以派上用场。这点我刚才说：这是科学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说是终极目的。

Anyone who clearly sees how, after Socrates, that mystagogue of knowledge, one philosophical school after another, like wave after wave, arose in turn, and how an unimaginable universal greed for knowledge through the full extent of the educated world steered knowledge around on the high seas as the essential task for every person of greater capabilities, a greed which it has been impossible since then completely to expel from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how through this universal greed a common net of thinking was cast over the entire earth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even glimpses of the rule-bound workings of an entire solar system)—whoever reminds himself of all this, together with that astonishingly high pyramid of contemporary knowledge, cannot deny that in Socrates we see a turning point and vortex of so-called world history.

在苏格拉底之后，知识的秘法以哲学流派的形式，像海浪一样，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出现；难以想象的是，在知识领域，人们疯狂地追求知识，仿佛每一位有志之士都有一个基本的义务，就是把知识引向公海。这种追求知识的现象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消失过。这种求识欲的普及，使得人们对哲学的思考变成了一个公网，首次笼罩在这个大地上（甚至还有窥视这个太阳系运作规律的势头）。任何人只要能够清晰地看到，或提醒自己考虑到这些事实，以及那个高得惊人的现代知识金字塔，就不会否定我们在苏格拉底身上看到的是所谓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漩涡。

Imagine for a moment the following scenario: if the incalculable sum of all the energy which has been used in pursuit of this world project is spent not in the service of knowledge but on the practical (i.e., egotistical) aims of individuals and peoples, then in all probability the instinctive delight in living would be so weakened in universal wars of destruction and continuing migrations of people that, with suicide being a common occurrence, the individual, perhaps out of a sense of duty, would have to see death as a final rest and, like the inhabitants of the Fiji Islands, the son would strangle his parents, the friend would strangle his friend. A practical pessimism, which could give rise to a dreadful ethic of mass murder out of sympathy, such a belief is present and was present all over the world, wherever art did not appear in some form or other, especially in religion and science, as a remedy and a defense against that pestilence.

设想一下这样一幅场景：如果人们把追求世界知识那些无法计量的精力不用于服务知识，而是用于服务个人和民族的琐碎（利己）目的，那么人对生存最本能的快乐，在那些满目疮痍的大规模战争和人口不断的迁徙中，完全有可能大大地削弱。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自

杀现象比比皆是，人们往往不得不把死亡看作最终的休息；也许像斐济群岛那里的人一样，把儿子杀死父母、朋友杀死朋友视作一种责任。这是一种地道的悲观主义思想，它可能引发可怕的群杀现象，并还认为这样是做出于怜悯之心。这种错误的认识在全世界范围里，现在有，过去也有。只要艺术没有以任何一种形式，特别是没有以宗教和科学的形式出现过来拯救和预防这场瘟疫的话，这种错误的认识在全世界范围里就一定存在。

With respect to this practical pessimism, Socrates is the original picture of the theoretical optimist, who in the belief (which I have described) that we could discover the nature of things conferred upon knowing and discovering the power of a universal medicine and understood evil-in-itself as error. To push forward with that reasoning and to separate true knowledge from appearance and error seem to the Socratic man to be the noblest, even the single truly human vocation, just as that mechanism of ideas, judgments, and conclusions has been valued, from Socrates on, as the highest activity and the most admirable gift of nature, above all other faculties. Even the noblest moral deeds, the sympathetic emotions, self-sacrifice, heroism and that calmness in the soul (so difficult to attain), which the Apollonian Greeks called sophrosyne—all these were derived by Socrates and his like-minded descendants right up to the present from the dialectic of knowledge and therefore described as teachable.

对于这个地地道道的悲观主义思想而言，苏格拉底可谓是理论上的乐观主义者原型。他相信（这点我已经描述过）只有我们能够知道并找到一种包治百病的药物，明白错误本身就是一种邪恶，那么我们就能够找到事物的本质。对于像苏格拉底式的人物而言，进一步开展理性的思辨，把真正的知识从表面上和错误中脱离出来，是一件最高

尚的事情，甚至是人类唯一真正的天职。所以，从苏格拉底之后，像建立概念、进行判断和做出结论这一逻辑思维机制被视为人类最高尚的活动，最令人羡慕的天赋，高于其它一切才能。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为、怜悯之心、自我牺牲、英雄主义、心若止水（很难达到），那些日神式的希腊人称为“境界”的东西，都统统来源于苏格拉底，以及直到如今还与他同心同德的后辈们对知识所进行的逻辑思考得来的，所以可以传授的。

Whoever has experienced the delight of a Socratic discovery and feels how this, in ever-widening rings, seeks to enclose the entire world of phenomena, will experience no spur capable of pushing him into existence more intense than the desire to complete that conquest and to weave a solid impenetrable net. To a man so minded, the Platonic Socrates appears as the teacher of an entirely new form of “Greek serenity” and of a blissful existence which seeks to discharge itself in actions. And these actions will consist, for the most part, like those of a mid-wife, of things concerned with the education of noble disciples, in order to produce an endless supply of geniuses.

凡是体验过苏格拉底认识论的快乐，并察觉到这种求知的快乐在不断地扩大其范围，势将包万象的人，总会感到促使人们生存最强烈的动力，莫过于想编织一个结实不漏的网，穷尽天下所有知识的欲望。对于有这样一种抱负的人来说，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俨然就是一个崭新的“希腊人从容”和幸福生存的导师。这种幸福生存的法则是追求付诸行动，这些行动大多数情况下，像思想助产师那样，从事高贵门徒们的教育工作，目的是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天才。

But now science, incited by its powerful delusion, speeds on

inexorably right to its limits, at which point the optimism hidden in the essence of logic fails. For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circle of science has an infinity of points, and while it is still impossible to see how that circumference could ever be completely measured, nevertheless the noble, talented man, before the middle of his life, inevitably comes up against some border point on that circumference, where he stares at something which cannot be illuminated. When, at this point, he sees to his horror how logic turns around on itself and finally bites its own tail, then a new form of knowledge breaks through, th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tragic, which in order merely to be endured, requires art as a protector and healer.

现在，科学被其自身的强大幻觉所激发，以不可阻挡之势奔向它的极限。此时，蕴藏在它逻辑精髓中的乐观主义败下阵来。科学圈的周线上有着无数个点，虽然迄今仍然看不出何时能够完全测量出它的周长，但是德才兼备的人，不到中年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周线边际上的某个点，被这点卡壳，不得其解。此时，他吃惊地发现，逻辑突然变得自相矛盾起来，反咬了自己一口。这样，一种新的知识形式破土而出，取而代之。这就是对悲剧的认可。悲剧接下来要想持久，就必须要请艺术作为自己的保护者和治疗师。

If we look at the loftiest realms of the world streaming around us, our eyes strengthened and refreshed by the Greeks, we become aware of that greed of insatiably optimistic knowledge (which Socrates previews for us) turning into tragic resignation and a need for art, even if it's true that this same greed, in its lower levels, must express itself as hostile to art and must especially loathe Dionysian tragic art, as I have already explained in the exampl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Aeschylean tragedy and Socratic doctrine.

希腊人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更加敏锐和有神了。如果我们看到世界最高尚的领域从我们身边绕道而行，我们就可以知道，尽管这种无限度的乐观求知欲在低级阶段的时候一定是与艺术敌对的，尤其是对酒神风格的悲剧深恶痛绝，但现在却正在演变成对悲剧的屈从，和对艺术的渴望。这点我曾经以苏格拉底主义与埃斯库罗斯悲剧的对抗作为例子讲过。

Here we are now knocking, with turbulent feelings, on the door of the present and future: Will that transformation lead to continuously new configurations of genius and straight to the music-playing Socrates? Will that wide net of art, whether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or of science, fly over existence always more tightly and delicately, or is it determined that it will be ripped to shreds by the restless barbaric impulses and hurly-burly which we now call “the present.” We are standing here on the sidelines as lookers on, worried but not without hope, for we are being permitted to witness that immense struggle and transition. Ah, but there is a magic spell in these battles: whoever looks at them must also fight them!

在此，我们怀着汹涌澎湃的心情叩响当下和未来的大门：这种变形是否会导致天才不断产生新的转型或直接导致爱好演奏音乐的苏格拉底式人物的出现？那个硕大的艺术之网，无论是以宗教之名还是以科学之名，是会不断地飞越现存，越来越紧密，还是注定要被现在我们称之为“现代”的骚动不安，野蛮的冲动与喧闹撕成碎片？此刻，我们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站在那里冷眼旁观，心里充满无限的担忧，但并没有失去希望，因为我们需要见证这场宏伟的斗争和转型。但是，这些战役蕴藏着一个咒语：无论是谁，只要目睹了这场战争，必须要投入其中！

16

By setting out this historical example, we have attempted to clarify how tragedy surely dies away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pirit of music, since tragedy can arise only out of this spirit. To mitigate the strangeness of this claim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indicate the origin of this idea of ours, we must now openly face up to analogous phenomena of the present time. We must stride right into the midst of those battles which, as I have just said, are being waged in the loftiest spheres of our present world between the insatiably optimistic desire to know and the artistic need for tragedy.

通过上述的历史事例，我们已经清晰地阐明了这么一个观点：由于悲剧只能从音乐精神中诞生，所以悲剧也一定随着音乐精神的消亡而消亡。为了减少这一说法给人带来的诧异感，同时，也在另一方面指出我们这一观点的渊源，目前我们必须要坦率地面对当今的类似现象。我们必须投入到这些战斗的中心去，正如我刚刚说过，这些战斗发生于当今世界最崇高的领域，是无休止的乐观求知欲与渴望悲剧的艺术之间的战斗。

In this discussion, I shall omit all the other opposing drives which have in every age worked against art (especially against tragedy) and which at present have taken hold to such an extent that, for example, in the art of the theatre, only farces and ballets achieve a fairly rich profit with their fragrant blooms, which are perhaps not for everyone. I shall speak only of the most illustrious

opposition to the tragic world view: by that I mean research scholarship, optimistic to the core of its being, with its father Socrates perched on the pinnacle. Shortly I shall also indicate by name the forces which seem to me to guarantee a new birth of tragedy and who knows what other blessed hopes for the German character!

在这场讨论中，我将暂时不谈其他所有的反对力量，无论哪个时代，它们都反对艺术（尤其反对悲剧）。现在，它们又重拾升势，这个势头凶猛到戏剧艺术当中去了，只有滑稽戏和芭蕾才能凭其馥郁的芬芳获得相对富足的利益。然而，这两种艺术形式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欣赏的。所以，在此我只想谈谈针对悲剧世界观最著名的反对言论：我指的是以苏格拉底为鼻祖，站在其巅峰的以乐观主义为核心的研究学派。紧接着，我将列举一些在我看来似乎能够保证悲剧重生的力量，谁知道呢，也许德国精神也有望重生！

Before we leap into the middle of this battle, let us wrap ourselves in the armour of the knowledge we seized upon earlier. In opposition to all those eager to derive art from a single principle as the necessary living origin of every work of art, I keep my eyes fixed on both those artistic divinities of the Greeks, Apollo and Dionysus, and recognize in them the living and clear representatives of two art worlds, very different in their deepest being and their highest goals. Apollo stands before me as the transfigured genius of the *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 (the individualizing principle), through which release is only to be truly attained in illusion. However, under the mystical joyous cries of Dionysus, the spell of individuation shatters and the way lies open to the maternal source of being, to the innermost core of things.

在进入这场战斗之前，我们用之前所掌握的知识作为甲胄来武装自己。与热衷于所有把单一原则视为一切艺术品赖以生存的源泉这一观点不同，我始终关注着两位希腊艺术之神：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从中认识到来自两个艺术世界的鲜活而清晰的范例，二者最深的本质和最高的目标都大不相同。阿波罗作为“个性化原则”的天才化身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只有通过这一原则才能在幻象中获得真正的释放。然而，在酒神神秘的欢呼中，个性化的符咒破碎了，通往生命母性起源的大路便打开了，直抵万物最深的核心部位。

This tremendous difference, which opens up a yawning gap between plastic art as Apollonian and music as Dionysian art became more or less obvious to only one great thinker, when he, without any prompting from the symbolism of the Greek gods, recognized the different character of music and the origin of all other arts from it, because music is not, like all the others art forms, images of appearances, but an immediate reflection of the will itself, and also because it presents itself as the metaphysical counterpart to all physical things in the world, the thing-in-itself as counterpart to all appearances (Schopenhauer, *World as Will and Idea* , I, p. 310).

这种巨大的对立，像一道鸿沟分隔梦神的造型艺术与酒神的音乐艺术。这个鸿沟只有在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眼里或多或少是清楚的。他不需要这两个希腊神灵象征的指导，也能看出在各种艺术中唯独音乐具有特殊的性质和根源。因为音乐不像其他艺术，它不是外观的展现，而是意志本身的直接写照。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原因是音乐对宇宙间一切自然物而言是超自物的，对一切现象而言是物自体（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第310页）。

On the basis of this most significant way of understanding all aesthetics, which, taken seriously, marks the first beginning of aesthetics, Richard Wagner, to confirm its lasting truth, set his stamp, when he established in his *Beethoven* that music must be assessed on aesthetic principles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for all fine arts and not at all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y of beauty, although an erroneous aesthetics, in the service of a misleading and degenerate art, has become accustomed to the idea of beauty asserting itself in the world of images and to demand from music an effect similar to the effect of plastic arts, namely, the arousal of satisfaction in beautiful forms.

基于所有对美学理解最有效的方法，严格来说，这一方法标志着美学的滥觞。理查德·瓦格纳承认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并为其盖上自己的印章。他在《贝多芬传》中断言：尽管一种错误审美在服务于误导性和堕落性艺术时，已经习惯于用形象世界来审视自身，并要求音乐效果要与造型艺术效果相似，也就是说唤起对美的形式的满足感；但是对音乐的审美必须要用完全不同于造型艺术的评判原则，也绝不能用美的类别来评判音乐。

After my recognition of that tremendous opposition, I sensed in myself a strong urge to approach the essence of Greek tragedy and, in so doing, the deepest insight into the Hellenic genius. Now for the first time I believed I was capable of the magical task of posing the basic problem of tragedy in my own mind, over and above the jargon of our customary aesthetics. Through that, such an strange idiosyncratic glimpse into the Hellenic was granted to me that it had to appear to me as if our classical-Hellenistic scholarship (which is so proud of itself) had up to this point known, for the most part, only how to gloat over games with shadows and

trivialities.

认识到这一巨大的对立后，我感到内心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去接近希腊悲剧的本质。这样，我就可以洞悉到希腊圣贤的真实思想。此刻，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坚信自己有能力完成这项神奇的任务，即在脑海中深思悲剧的基本问题，而不是搬弄那些常规的美学术语。我借此可以用与众不同的视角观察希腊，它让我觉得我们（引以为傲的）古希腊研究至此最多不过是欣喜若狂地浅尝辄止而已。

We may be able perhaps to touch on this original problem with the following question: What aesthetic effect arises when those separate powers of art, the Apollonian and the Dionysian, come to operate alongside each other? Or, put more briefly,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and images and ideas? Richard Wagner applauded Schopenhauer on this very point for the restrained clarity and perceptiveness of his explanation. Schopenhauer spoke his views on this matter in the greatest detail in the following place (which I will quote again here in full, from *World as Will and Idea*, I, p. 309):

我们也许可以通过以下问题来触及这个原始问题：当日神和酒神两股独立的艺术力量并肩作战时，会产生什么样的美学效果？或者简言之，音乐与形象和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理查德·瓦格纳十分赞赏叔本华的这一观点，认为他的论述十分清晰而透彻。叔本华在下面（《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第309页）十分详尽地阐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这里我将再次征引全文）：

As a result of all this, we can look upon the

world of appearance, or nature, and music as two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the same thing, which itself is thus the only analogy mediating between the two of them. Thus, an understanding of this thing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have insight into that analogy. Consequently, music, when considered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world, is universal to the highest degree, something which even has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versality of ideas, rather like the way these are related to particular things. Its universality is, however, in no way the empty universality of abstractions, but something of an entirely different kind, bound up with a thoroughly clear certainty. In this, music is like geometric figures and numbers, which are the universal forms of all possible objects of experience and applicable to them all *a priori* (before experience), although they are not abstract but vivid and always fixed.

由此，我们将表象的世界或者说自然，与音乐视为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这样，它本身就成为了二者类似性的唯一中介。我们需要弄清这个现象，这样才能进一步地洞悉这种类似性的内涵。我们发现，当音乐被视为表达世界的方式时，它能达到最高程度上的共通性，成为一种甚至与思想共通性相关联的东西，这种关联性就像思想的普遍性与特定事物间的关系一样。然而，它的普遍性绝不是抽象概念的那种空洞的普遍性，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普遍性，与清晰明了的确定性紧密相连。在这方面,音乐就像几何图形和数字，尽管它们并不抽象，而是生动且形式固定，但是二者都是再现所有可能的经验对象的普遍形式，并可

以先验地应用于一切事物。

All possible efforts, excitements, and expressions of the will, all those processes inside human beings, which reason subsumes under the broad negative concept of feelings, are there to express through the infinite number of possible melodies, but always in the universality of mere form, without matter, always only according to the thing-in-itself, not according to its appearance, like its innermost soul, without the body.

所有可能的努力、激动、意志的表现，凡是那些被理性划归到消极的情感大概念的人类心理历程，都可以通过无穷多的音乐旋律表达出来。然而，它们总是只表现出形式的普遍性，而非物质的普遍性，总是依据自身而非表象，就像只有灵魂而没有驱壳一样。

From these inner relationships which music has with the true essence of all things, we can also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when an appropriate music is heard in any scene, business, action, or environment, this music appears to open up to us the most secret sense of these things, and seems to come forward as the most correct and clearest commentary on them. In the same way, for the man who surrenders himself entirely to the experience of a symphony it appears as if he saw all the possible events of life and the world drawn over into himself. Nevertheless, he cannot, if he thinks about it, perceive any similarity between that game of sounds and the things which come into his mind.

我们从音乐与所有事物的真实本质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来看，也

能解释出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在某个场景、某项商务、某次活动或某种环境中听到合适的音乐，此时的音乐似乎在向我们揭开这些事物最隐藏的意义，似乎是对它们作出最正确、最清晰的评论。同样，对于一个完全折服于交响乐体验的人来说，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所处的生活和世界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然而，当他仔细想来，却又发现他找不出所播放的音乐与他头脑里的想法有什么相似性。

For music is, as mentioned, different from all other arts, in that it is not a portrayal of appearances, or more correctly, the adequate objectification of the will, but the unmediated portrayal of the will itself, as well as the metaphysical complement of all physical things in the world, presenting the thing-in-itself as complement to all appearances. We could, therefore, call the world the embodiment of music just as much as the embodiment of the will. And that's why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music is capable of bringing out every painting, even every scene of real life and the world, with an immediate and higher significance and, of course, to do that all the more, the closer the analogy of its melody to the inner spirit of the given phenomenon. On this point we base the fact that we can set a poem to music as a song or as a vivid presentation in pantomime or as both in an opera. Such individual pictures of men's lives, given a foundation in the universal speech of music, are not bound to music and do not correspond with music by a compelling necessity, but they stand in relation to music as a random example to a universal idea. They present in the clarity of the real the very thing which music expresses in the universality of mere form.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音乐不同于其他艺术，这是因为它不是对表象的临摹，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是意志充分地客观化，而是对意志本身的直接描述，也是对世上所有实物做出的形而上的补充，将实物本

身呈现为所有表象的补充。因此，我们可以把世界称为音乐的具体化，正如把其称为意志的具体化一样。这就是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音乐可以把真实生活和世间里的每一个画面，甚至每一个场景都能呈现出来，并赋予他们直接和更深远的意义的原因。当然，音乐的这种能力越强，其旋律的类似性就与特定现象的内在精神越接近。基于这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可以把诗置于音乐中，使之成为诗歌，或将其作为舞剧中的生动表现，或将二者结合成为歌剧。人们生活中的这种个人影像只是以音乐的普遍语言作为基础，但并不与音乐紧密相连，也无须与音乐相一致，但是，它们与音乐的关系就像一个随意的举例与普通概念之间的关系。它们以真实生活的清晰性来呈现，而音乐则用单纯形式的普遍性来表达。

For melodies are, to a certain extent, like general ideas, an abstraction from the real. For reality, the world of separate things, supplies clear phenomena, remarkable and individual things, the single case, to both the universality of ideas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melodies. Both of these universals, however, are,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contrary, since ideas consist only of forms abstracted first from perception, rather like the stripped away outer skin of things, and are thus really and entirely abstractions.; whereas, music, by contrast, gives the heart of the thing, the innermost core, which comes before all particular shapes. This relationship is easily expressed properly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cholastics: ideas are the *universalia post rem* (universals after the fact); music, however, gives the *universalia ante rem* (universals before the fact), and reality the *universalia in re* (universals in the fact).

在某种程度上，旋律就像一般概念那样，是对真实的抽象化。现实，即个别现象的世界，给思想的普遍性和旋律的普遍性提供了清晰可见的现象、特殊和个别的东西，以及单个案例。然而，从某个角度

来说，这两种普遍性是相背而驰的，因为思想只由最初从感知中脱剥出来的形式组成，就像事物被剥掉的外壳一样，因此，它们全部都是实实在在的抽象概念。然而，相比之下，音乐给予事物以心灵，这些最深处的核心先于一切具体形式而存在。用哲学术语就能够恰到好处地解释这种关系：思想是后于事物的普遍性；然而，音乐先于事物的普遍性；现实则是事物之中的普遍性。

The fact that in general there can be a connection between a musical composition and a perceptible presentation rests on the point that, as stated, both are only very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same inner essence of the world. Now, when in a particular case such a connection is truly present and the composer has known how to express in the universal language of music the dynamics of the will, which constitutes the core of the event, then the melody of the song, the music of the opera, is full of expression. The composer's discovery of the analogy between both must, however, issue from the immediate realization of the world essence, unknown to his reason, and must not be an imitation, conveyed in ideas with conscious intentionality. Otherwise the music does not express the inner essence, that is, the will itself, but only imitates inadequately its appearance.

一般来说，音乐创作与直观表现之间是有所关联的。如上所述，二者只是对世界相同内在本质的不同表达。现在，在某个特定的场合，如果这种联系确实存在，即作曲家知道如何用音乐的通用语言来表达那些构成事物核心的意志冲动，那么歌曲的旋律和歌剧中的音乐都会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但是，作曲家在二者之间所发现的类似性，必须是他对世界本质的直接认识，而且不为他的理性所感知。也一定不能是一种有意识的模仿来表达这些概念，否则，音乐就不能表现出内在的本质，即意志的本身，而只能是对其表象做出不恰当的临摹。

Following what Schopenhauer has taught, we also understand music as the language of the unmediated will and feel our imaginations stirred to shape that spirit world which speaks to us invisibly and nonetheless in such a vital manner and to embody it in ourselves through a metaphorical illustration. By contrast, image and ide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truly appropriate music, reach an elevated significance. Thus, Dionysian art customarily works in two ways on Apollonian artistic potential: music arouses us to consider an image, in some way similar to the Dionysian universality, and music then permits that image to come forward with the highest significance.

根据叔本华的学说，我们也可以把音乐理解为直接意志的语言。我们感受到我们的想象被激发，要去塑造那个用无形却又充满活力的方式向我们诉说的精神世界，要去用比喻性的例子把它表达出去。相反，如果形象和概念在非常合适的音乐作用下，会获得提升。因此,酒神风格的艺术通常以两种方式作用于日神风格的艺术潜能:首先，音乐让我们想起一种图像，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酒神风格的普遍性；其次，音乐又赋予图像以最深远的意义。

From this intelligible observation and without any deeper considerations of unapproachable things, I conclude that music is capable of generating myth (that is the most meaningful example) and, indeed, of giving birth to the tragic myth, that myth which speaks of the recognition of the Dionysian among the Greeks. I have explained the phenomenon of the lyric poet, and after that how music in the lyric poet strives to make known its essence in Apollonian pictures. Let us now imagine that music at its highest intensity also must seek to reach its highest representation. Thus,

we must consider it possible that music also knows how to find the symbolic expression for its essentially Dionysian wisdom. And where else will we have to look for this expression, if not in tragedy and in the idea of tragedy generally?

通过这一目了然的观察，也无需对那些难以理解的事物做出更深刻的思考，我推断，音乐是可以产生神话的（这是最有意义的例子）；的确，它还可以产生悲剧神话，那种悲剧神话是关于希腊人对酒神的认同。我已经解释过抒情诗人这一现象，紧接着，我也解释了抒情诗人的音乐是如何力求解释日神形象的本质的。现在让我们想想最高强度的音乐也必定力争达到最高程度的形象化。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音乐在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它也必须找到最高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音乐也知道如何形象地表达酒神智慧的本质。除了在悲剧里，在一般意义上悲剧的概念中，我们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这样的表达方式呢？

From the essence of art as it is commonly understood according to the single categories of illusion and beauty it is genuinely impossible to derive the tragic. Only with reference to the spirit of music do we understand a joy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vidual. Now, individual examples of such a destruction makes clear the eternal phenomenon of Dionysian art, which brings into expression the will in its omnipotence out from behind, so to speak, the *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 , the life beyond all appearances and eternal life, in spite of all destruction.

由于艺术的本质通常是以幻象和美的单一类别来理解的，所以绝对不可以派生出悲剧。只有参照音乐的精神，我们才能理解个体毁灭的快感。现在，个体遭到如此的毁灭，这清晰地例证了酒神艺术的永

恒现象，表达了隐藏在“个性原则”背后的全能意志，也可以说，是历经过所有的毁灭而超越所有的表象和永恒生命的生命。

The metaphysical joy in the tragic is a translation of the instinctive unconscious Dionysian wisdom into the language of the image. The hero, the highest manifestation of the will, is destroyed, and we are happy at that, because, after all, he is only an illusion, and the eternal life of the will is not disturbed by his destruction. “We believe in eternal life,” so tragedy calls out, while the music is the unmediated idea of this life. The work of the plastic artist has an entirely purpose: Here Apollo overcomes the suffering of the individual through the bright exaltation in the eternity of the illusion. Here beauty is victorious over the suffering inherent in life. The pain is, in a certain sense, brushed away from the face of nature. In Dionysian art and in its tragic symbolism this same nature speaks to us with its true, undisguised voice: “Be as I am! Under the incessantly changing phenomena the eternal primordial mother, always forcing things into existence, always satisfied with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ppearances!”

悲剧中的形而上乐趣是一种本能的无意识的酒神智慧在视觉语言中的再现。主角，这个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就这样毁灭了，而我们却怡然自得。这是因为他毕竟只是个幻象，意志的永恒生命不因他的毁灭而受半点的影响。所以悲剧强调：“我们相信永恒生命”，而音乐则是这一永恒生命的直接理念。造型艺术家的作品完全有着这样的目的：这里，日神高调地歌颂幻象的永恒，用以克服个人的苦难。这里的美便是战胜生活中固有的苦难。在某种意义上，痛苦已经从自然的面庞上消失。在酒神艺术及其悲剧象征中，同一个自然真诚而坦率地告诉我们：“像我一样吧！在瞬息万变的现象中，永恒的原始母体总是在不断创造出新的东西，总是满足于表象的变化本性！”

17

17

Dionysian art also wants to convince us of the eternal delight in existence. But we must seek this delight, not in appearances, but behind them. We must recognize how everything which comes into being must be ready for a painful destruction. We are forced to gaze directly into the terror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but, in the process, must not become paralyzed. A metaphysical consolation tears us momentarily out of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changing forms. For a short time we really are the primordial essence itself and feel its unbridled lust for and joy in existence. The struggle, torment, and destruction of appearances we now consider necessary, on account of the excess of countless forms of existence forcefully thrusting themselves into life, and of the exuberant fecundity of the world's will. We are transfixed by the raging barbs of this torment in the very moment when we become, as it were, one with the immeasurable primordial delight in existence and when we sense the indestructible and eternal nature of this Dionysian joy. In spite of fear and compassion, we are fortunate vital beings, not as individuals, but as the one force of Life, with whose procreative joy we have been fused.

酒神艺术也极力说服我们相信永恒快乐的存在。不过，我们不能在表象上寻求这种喜悦，而应在其背后去探求。我们必须意识到：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必须准备好经历痛苦的毁灭过程。我们被迫直视个人生存中的恐怖，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决不能麻木不仁。形而上学的慰藉让我们暂时免遭瞬息万变的形式纷扰。在短时间内，我们真正成为了原生的本质，并且体会到它对生存无拘无束的追求，以及乐在其

中的自在。我们现在认为，过量的、无以计数的生命形态竞相生存，加之世人的意志绵延不休地膨胀和再生，表象去斗争、受苦和走向毁灭就在所难免了。当我们刚要体会到生存原始的无限快乐，感受到酒神快乐那坚不可摧的永恒本质时，我们却被这种折磨的锐利锋芒所刺，真让我们惊恐万状。纵然我们有恐惧与怜悯，但是我们还是有幸地成为了重要的生灵，不是以个体生存，而是以所有生命为一体的方式，我们已融入于生命繁衍的乐趣之中。

The story of how Greek tragedy arose tells us now with clear certainty how the Greeks' tragic work of art really was born out of the spirit of music. With this idea we think we have, for the first time, reached a tru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and astonishing meaning of the choru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we must concede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gic myth explained previously, to say nothing of Greek philosophy, was never entirely clear to the Greek poets. Their heroes speak to a certain extent more superficially than they act, and the myth does not really find its adequate objectification in the spoken word.

现在，希腊悲剧的起源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希腊悲剧的艺术作品确实是诞生于音乐精神。有了这一想法，我们认为我们第一次真正地理解了合唱队不可思议的本源意义。然而，同时我们也得承认希腊诗人对之前解释过的悲剧神话不甚了解，希腊哲学家更是全然不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英雄人物言语比行动更肤浅，神话在口语中并没有真正做到充分的客观化。

The structure of the scenes and the vivid images reveal a deeper wisdom than the poet himself can grasp in words and ideas. We can make the same observation about Shakespeare, whose

Hamlet, for example, similarly speaks in a more superficial manner than he acts, so that we derive the above mentioned study of Hamlet, not from the words, but from the deepest view and review of the totality of the work. With respect to Greek tragedy, which, of course, comes to us only as a drama of words, I have even suggested that that incongruity between myth and word can easily seduce us into considering it shallower and more empty of meaning than it is, and thus to assume a more superficial action than it must have had according to the testimony of the ancients. For we easily forget that what the poet as a wordsmith could not achieve, the attainment of the highest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idealization of myth, he could achieve successfully at any time as a creating musician.

剧情的结构和生动的形象所表现的智慧要比诗人用文字和理念所把握的智慧更加深刻。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考量莎士比亚，例如，他的哈姆雷特的语言就比行动更肤浅，所以，要想得出如上的哈姆雷特研究，我们就不能从语言入手，而是应该从对作品的整体性做出最深入的审视与评论。当然，希腊悲剧，也是以语言戏剧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我甚至曾经表示过，神话与文字之间的不协调很容易让我们认为其意义比其原本的要肤浅、空泛，于是我们就臆断它的行为比古人的证言更肤浅。这是由于我们容易忘记，作为作家的诗人无法得到的东西是什么。他们不能得到的是实现神话最高程度的智能化和理想化。如果他作为一个创作型的音乐家，他就可以随时成功地达成这一目标。

Admittedly through scholarship we must recreate the extraordinary power of the musical effects in order to receive something of that incomparable consolation necessarily characteristic of true tragedy. But we would experience this extraordinary musical power for what it is only if we were Greeks,

because considering the entire development of Greek music, which is well known, quite familiar to us, and infinitely richer by comparison, we believe we are hearing only youthful songs, sung with only a timid sense of their power. The Greeks are, as the Egyptian priests say, eternal children, and where tragic art is concerned, only children who do not know what an exalted toy has arisen under their hands, something which will be destroyed.

诚然，我们必须通过学术重建音乐非凡的感染力，以此获得真正悲剧所具有的无法比拟的慰藉作用。但是，除非我们能成为希腊人，否则我们是不会体会到这种超凡音乐魅力的内涵。这是因为，整个希腊音乐的发展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对此也非常熟悉，相比起来当然就显得比较丰富，所以我们就会相信我们只是在听年轻人的歌曲，歌声中带着羞怯腼腆。正如埃及祭司所说，希腊人永远是孩子，而在悲剧艺术方面，他们也是孩子。只有那些不知道在手中的玩具是一种高贵的玩具的孩子，才会去毁掉那些玩具。

Every struggle of the spirit of music for pictorial and mythic revelation, which becomes increasingly intens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lyric right up to Attic tragedy, suddenly breaks apart, right after developing in full luxuriant bloom, and, so to speak, disappears from the surface of Hellenic art, although the Dionysian world view born out of this struggle lives on in the mysteries and in its most amazing transformations and degeneration never stops attracting serious natures to it. Isn't it possible that it will rise from its mystical depths as art once more?

从抒情诗起始直到雅典派的悲剧，音乐精神对形象化和神话化的追求不断加强。就在达到其全盛期后，这一追求却突然中断，也就是

说，从希腊艺术的表层消失。但是，诞生于这一追求的酒神世界观，却在神秘仪式和其最奇妙的变形中生存了下来。这种蜕化从来没有停止过吸纳严肃性。它难道不能作为艺术，再一次从这神秘的深渊升起？

At this point we are concerned with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power whose hostile effects broke tragedy has sufficient power for all time to hinder the artistic re-growth of tragedy and the tragic world view. If the old tragedy was derailed by the dialectical drive for knowledge and by the optimism of scholarly research, we might have to infer from this fact an eternal struggle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and the tragic world views. And only after the spirit of knowledge is taken right to its limits and its claim to universal validity destroy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at limit would it be possible to hope for a re-birth of tragedy. For a symbol of such a cultural form, we would have to set up Socrates the player of music, in the sense talked about earlier. By this opposition I understand with respect to the spirit of scholarly research the belief (which first came to light in the person of Socrates) that our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can be grounded and that knowledge has a universal healing power.

在这点上，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那些拥有破坏悲剧的敌对势力是否一直足以阻碍悲剧和悲剧世界观的艺术再生长。如果旧的悲剧是被知识对辩证法的追求以及学术研究的乐观精神所引出正轨，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一事实中推导出，理论的世界观和悲剧的世界观之间永远存在斗争。只有当科学精神被引到了其边界，它所认定的普遍有效性被这一界限所摧毁，它才有可能期待悲剧的重生。基于之前讨论过的观点，我们可以把作为音乐演奏者的苏格拉底设为这种文化形式的象征。与此相反，我所理解的学术研究精神（这种精神首先反映在苏

格拉底身上）是：我们对自然的理解是有根有据的，这种知识具有普遍的治愈力。

Whoever remembers the most immediate consequences of this restless forward driving spiri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will immediately recall how it destroyed myth and how through this destruction poetry was driven out of its naturally ideal soil as something from now on without a home. If we have correctly ascribed to music the power to bring about out of itself a re-birth of myth, then we will have to seek out the spirit of science on that very path where it has its hostile encounter with the myth-creating power of music. This occur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Attic dithyramb, whose music no longer expressed the inner essence, the will itself, but only gave back an inadequate appearance in an imitation delivered through ideas. From such innerly degenerate music those with a true musical nature turned away with the same aversion which they had displayed before the art-killing tendency of Socrates.

科学知识具有催人奋进的精神，它能给人带来最直接的结果。凡是记得这一道理的人，都会马上回想起它是如何摧毁神话的，以及诗歌是如何由于这一毁灭而被逐出自然的理想土壤，从此变得流离失所的。如果我们判断没有错误的话，音乐具有自身再造神话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得在这条路上寻找科学的精神，一路上我们会遇到能用音乐创造神话的敌人。这发生在新雅典派酒神颂歌的发展过程中，这种音乐不再表达内在本质和意志本身，而只是通过思想对外表进行大概的模仿。那些具有真正音乐本质的音乐已经摒弃了这种内在已退化的音乐，就像他们摒弃具有磨灭艺术倾向的苏格拉底一样。

The instinct of Aristophanes (which grasped issues so surely) was certainly right when he linked together Socrates himself, the tragedies of Euripides, and the music of the new writers of dithyrambs, hating each of them and smelling in all three of the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degenerate culture. Through that new dithyramb, music is criminally turned into a mimetic demonstration of appearances, for example, a battle or storm at sea, and in the process is totally robbed of all its power to create myths. For when music seeks only to arouse our indulgence by compelling us to find external analogies between an event in life or nature and certain rhythmic figures and characteristic musical sounds, when our understanding is supposed to be satisfied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these analogies, then we are dragged down into a mood in which a conception of the mythic is impossible. For myth must be vividly felt as a single instance of universality and truth staring into the infinite.

阿里斯托芬总能准确地抓住问题本质，这点毫无疑问是对的。他把苏格拉底本人、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以及酒神颂歌新作者的音乐联系在一起，憎恨他们每个人，从中闻到了文化堕落的味道。通过那一新的酒神颂歌，音乐错误地变为对表象的模仿与展示，例如，表现一场海上战争或风浪。音乐在这一过程中完全被剥夺了创造神话的力量。如果音乐只是通过强迫我们寻找生命或自然事件与某种节奏特征和特定的音乐声响之间存在外在的相似点来引起我们的陶醉，而我们的理解还必须满足认识这些相似之处的话，那么我们就陷入无法认知神话的心境了。因为神话必须要能被人生动地感受到，像是那些眼望穹苍的普遍性和真理的简单例证。

Truly Dionysian music works on us as a universal mirror reflecting the will of the world. Each vivid event reflected in this

mirror widens out at once for our feelings into the image of an eternal truth. By contrast, the sound painting of the new dithyramb immediately strips such a vivid event of its mythic character. Now the music has become a feeble copy of a phenomenon and, in the process, infinitely poorer than the phenomenon itself. Through this impoverishment the phenomenon itself is even lowered in our feelings, so that now, for example, a battle imitated in this kind of music plays itself feebly out in marches, trumpet calls, and so forth, and our imagination is held back precisely by these superficialities.

真正的酒神音乐作品之于我们，就像宇宙的镜子返照出世界的意志。我们感到，反射在这面镜子里的每个生动的事件，立刻拓展成永恒真理的映像。相比之下，新酒神颂歌的声音画面马上剥离了这一生动的神话特征。此时，音乐成为了这一现象苍白无力的临摹。而在这一过程中，它表现的比这一现象本身还要苍白无力。鉴于这种贫乏，现象本身甚至在我们的感觉中也被贬低了，例如现在，我们用这种音乐来临摹战斗，也只能苍白无力地表现出行军、军号等等，我们的想象力恰恰被这些肤浅的东西所制约着。

Painting with music is thus in every respect the opposite to the myth creating power of true music. Through the former a phenomenon becomes more impoverished than it is, whereas through Dionysian music the individual phenomenon becomes richer and widens into an image of the world. It was a powerful victory of the non-Dionysian spirit whe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dithyramb, it alienated music from itself and pushed it down to be the slave of appearances. Euripides, who, in a higher sense, must have had a thoroughly unmusical nature, is for this very reason an ardent supporter of the new dithyrambic music and uses all its stock effects and styles with the open-handedness of a thief.

因此，音乐图画在各方面都与创造真正音乐力量的神话背道而驰。通过前者，现象就会变得比它本来的更加贫乏；然而，通过酒神音乐，个体现象则会变得更加丰满，拓展成一种世界形象。这是非酒神精神的伟大胜利，因为它在新酒神颂歌的发展中，将音乐从自身中剥离，让它降为表象的奴隶。在更高的意义上来说，欧里庇得斯一定具有完全非音乐的本质，由于这一原因，他成为新酒神赞歌的狂热支持者，以小偷轻手轻脚的方式来使用着它所有的效果和风格。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we see the force of this un-Dionysian spirit in action directing its effects against myth, when we turn our gaze toward the way in which the way in which the presentation of character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mplexities get way out of hand in the tragedies of Sophocles. The character cannot be allowed to broaden out any more into an eternal type, but, by contrast, must appear an individual through the artistic qualifications and shading, through the most delicate clarity of every line, so that the spectator generally no longer experiences the myth but the commanding naturalism of the artist, his power of imitation.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索福克勒斯悲剧中大批的个性描写和心理刻画的话，我们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对抗神话的非酒神精神的力量。个性不能被拓展为永恒的类型；相反，必须通过艺术认定和描影以及每个线条的精细刻画来单独塑造。所以观众不再能体验到神话了，而只能体验到艺术家高度的自然主义和模仿的力量。

Here also we become aware of the victory of appearances over the universal and of the delight in the particular, rather like an anatomical specimen. Already we breathe the air of a theoretical

world, which values the scientific insight higher than the artistic mirror image of a universal principle. The movement along the line of increasing characterization quickly goes further. While Sophocles still paints whole characters and yokes their sophisticated development to myth, Euripides already paints only large individual character traits, which are capable of expressing themselves in violent passions. In the new Attic comedy there are masks with only one expression, reckless old men, deceived pimps, mischievous slaves in an inexhaustible repetition.

这里,我们也意识到表象战胜了普遍性，我们也还察觉到追求特殊性的乐趣，就像对解剖标本怀有浓厚的兴趣那样。我们早已呼吸到了理论世界的空气,它比起普遍原则的艺术镜像更看重科学见解。这场愈演愈烈的个性描述继续迅速地往前发展。尽管索福克勒斯仍然继续描绘人物的完整性格，并将其错综复杂的性格发展按照神话套路去写，但是欧里庇得斯早已只描绘显著的个性特征了，即通过强烈情感的渲染表现出来。在新雅典派的喜剧里，只有一个表情的面具、鲁莽的老人、被骗的皮条客、淘气的奴隶，他们在剧中不停地重复出现。

Where now has the myth-building spirit of music gone? What is left now for music is music of stimulation or memory, that is, either music as a means of stimulating jaded and worn out nerves or sound painting. As far as the first is concerned, the text is largely irrelevant. Already in Euripides, when his heroes or chorus first start to sing, things get really out of hand. What must it have been like with his unapologetic successors?

现在，音乐创建神话的精神哪去了？现在只剩下刺激的音乐或令人回忆的音乐，也就是说，音乐变成了不是对疲倦的神经进行刺激，

就是对声音绘制图像。就第一点而言，歌词与音乐之间没多大的关联。欧里庇得斯的演员们或者说合唱团团员们第一次演唱时，就表现得一塌糊涂。不知道他那些顽固的后继者折腾过什么样子？

However, the new un-Dionysian spirit manifests itself with the utmost clarity in the conclusions of the new plays. In the old tragedy, the metaphysical consolation was there to feel at the conclusion. Without that, the delight in tragedy simply cannot be explained.

然而,新的非酒神精神在新戏剧的结局方面表现得最为清晰。在旧的悲剧中，结局处可以感受到形而上学的安慰。没有这一点，悲剧中的快乐就无从解释。

The sound of reconciliation from another world echoes most purely perhaps in *Oedipus at Colonus* . But as soon as the genius of music flew away from tragedy, tragedy is, in the strong sense of the term, dead. For out of what are people now able to create that metaphysical consolation?

也许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一剧中，你还听到一种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最纯真的调和之音。但是严格说来，一旦音乐功效从悲剧中流失，悲剧也就灭亡了。现在，人们还能从什么当中创建形而上学的慰藉呢?

Consequently, people looked for an earthly solution to tragic dissonance. After the hero was sufficiently tortured by fate, he was

paid a well earned reward in an impressive marriage, in divine testament to his honour. The hero became a gladiator, to whom people gave his freedom, after he had been well beaten and was covered with wounds. The *deus ex machina* moved in to take the place of metaphysical consolation. I will not say that the tragic world view was destroyed entirely and completely by the surging spirit of the un-Dionysian. We only know that it must have fled out of art as if into the underworld, degenerating into a secret cult.

结果，人们在尘世中寻找解决悲剧不和谐的方法。悲剧英雄在饱受命运折磨之后，终于得到很好的回报——不是享有盛大的婚礼典礼，就是神赐荣耀的典礼。悲剧英雄变成角斗士，在他被殴打得遍体鳞伤之后，人们才给他自由。“天降神兵”的戏法被引进，取代形而上学的慰藉。虽然我不能说，悲剧世界观已经被非酒神精神完全而彻底地冲垮了，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它一定逃离了艺术，仿佛逃进了冥界，退化成一种密仪。

But over the widest surface area of Hellenistic existence raged the consuming wind of that spirit which announces itself in the form of “Greek serenity,” to which I referred earlier as an impotent and unproductive delight in life. This serenity is a counterpart to the marvelous “naïveté” of the old Greeks, which we must see—in accordance with its given characteristics—as the flowering of Apollonian culture, blossoming out of a dark abyss, as the victory over suffering, the wisdom of suffering, which the Hellenic will gains through its ability to mirror beauty.

但是，这种精神的狂风，横扫了希腊民族存在的最大领域。它自称是“希腊人的从容”，也就是我之前认为的那种对生活苍白无力且不

能带来任何结果的喜悦。这种从容与古希腊人了不起的“天真”相对应。根据上面所讲的特征，我们可以把这种从容看作日神文化在黑暗深渊里的绽放，看作打败苦难的胜利，以及战胜困难的智慧。这些都是希腊人凭借自身返照美的能力可以获得的。

The noblest form of that other form of “Greek serenity,” the Alexandrian, is the cheerfulness of the theoretical man. It manifests the sam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I already derived out of the idea of the un-Dionysian: it fights against Dionysian wisdom and art; it strives to dissolve myth; it places an earthy consonance in place of a metaphysical consolation, indeed a particular *deus ex machina* , namely, the god of machines and crucibles, that is, the force of nature, recognized and used in the service of a higher egoism; it believes in correcting the world through knowledge, a life led by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us is really in a position to confine the individual man in the narrowest circle of problems which can be solved, inside which he can cheerfully say to life: “I want you. You are worth knowing.”

“希腊人从容”的另一种最崇高的形式是亚历山大式的，即理论家乐观。它与我曾经从非酒神思想中得出的特点有很多相同之处：它与酒神智慧和艺术相对抗；它致力于消解神话；它用尘世的和谐代替形而上学的慰藉，实际上是代替自己的“天降神兵”，即机器和坩锅之神，也就是代替高度利己主义的自然力量。它信奉通过知识改变世界，以及一种由科学知识所引导的人生，因此它时刻准备好，把个人禁锢在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最狭小的范围之内。在这里，他可以饱含激情地对生活说：“我需要你，你值得我去了解。”

It's an eternal phenomenon: the voracious will always finds a way to keep its creatures alive and force them on to further living by an illusion spread over things. One man is fascinated by the Socratic desire for knowledge and the delusion that with it he'll be able to cure the eternal wound of existence. Another is caught up by the seductively beautiful veil of art fluttering before his eyes; yet another by the metaphysical consolation that underneath the hurly-burly of appearances eternal life flows on indestructibly, to say nothing of the more common and almost more powerful illusions which the will holds ready at all times. In general, these three stages of illusion are only for nobly endowed natures, those who feel the weight and difficulty of existence with more profound reluctance and who need to be deceived out of this reluctance by these exquisite stimulants. Everything we call culture emerges from these stimulants: depending on the proportions of the mixture we have a predominantly Socratic or artistic or tragic culture—or if you'll permit historical examples—there is either an Alexandrian or a Hellenic or a Buddhist culture.

这是一种永恒的现象：贪得无厌的意志，总是想方设法，凭借其笼罩万物的幻象，把人间造物强留在人生里，迫使他们生存下去。有的人被苏格拉底的求知欲所桎梏，妄想借此可以医治生存中永久的伤痕；有的人被飘逸在眼前那诱惑人心的艺术美之帷幕所吸引。还有的人陶醉于形而上的慰藉中，以为在纷繁的外观下面，流淌着一条奔腾不息的永恒生命之河流，绝口不提意志一直在坚守的更加普遍、几乎更加强大的幻象。一般来说，这三个幻象阶段只是针对天赋极高的人而言的，这些人往往不再愿意继续承受生命之重和生活之困，他们需要借助这些强烈的兴奋剂来摆脱这份无奈。一切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从这些兴奋剂中被调配了出来。按照混合的比例，占主导地位的

是苏格拉底文化，或艺术家文化，或悲剧文化；如果允许我用历史的例证，那还能有亚历山大文化、古希腊文化和佛教文化。

Our entire modern world is trapped in the net of Alexandrian culture and recognizes as its ideal the theoretical man, equipped with the highest intellectual powers and working in the service of science, a man for whom Socrates is the prototype and progenitor. All our methods of education originally have this ideal in view. Every other existence has struggled on with difficulty alongside this ideal as a way of life we permit, not as one we intend. For a long time now, it's been almost frightening to sense how an educated person here is found only in the form of the scholar. Even our literary arts have had to develop out of scholarly imitations, and in the main effect of rhyme we recognize still the development of our poetical form out of artificial experiments with what is essentially really a scholarly language, not one native to us.

我们整个现代世界陷入亚历山大文化网之中。现代世界把具有最高知识，愿意从事科学工作的理论家视为理想人物。苏格拉底就是这种人物的原型和先驱。我们所有教育方法最初就是以这种理想为目的。其它一路走过来的生存方法则都是按照我们允许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挣扎下来。长期以来，有一个现象让人称奇，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以学者的身份出现，甚至文学艺术也是按照模仿学术道路发展而来的。受此影响最大的是韵律诗，其形式来源于人为实验，语言极富风雅，毫无自然可言。

To a true Greek how incomprehensible must Faust have appeared, that man of modern culture, who is inherently intelligible to us—Faust, who storms dissatisfied through all faculties, his drive

for knowledge making him devoted to magic and the devil. We have only to stand him beside Socrates for comparison in order to recognize that modern man is beginning to have a premonition of the limits of that Socratic desire for knowledge and is yearning for a coastline somewhere in the wide and desolate sea of knowledge. When Goethe once remarked to Eckermann, with reference to Napoleon, “Yes, my good man, there is also a productivity in actions,” in a delightfully naïve way he was reminding us that the non-theoretical human being is something implausible and astonishing to modern man, so that we had to have the wisdom of a Goethe to find out that such a strange form of existence is comprehensible, even forgivable.

浮士德，这个现代文明的人物，对于我们而言非常好理解。可是，在真正的希腊人眼里，他是一个多么令人不可思议人物啊。浮士德贪得无厌地攻究一切学术，这种求知的冲动竟然让其投身于巫术和魔鬼这些领域。我们只要把浮士德放在苏格拉底旁边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现代人开始意识到那种苏格拉底式的求知欲是有局限的，所以呼唤在苍茫而孤寂的知识海洋上设立一道海岸线。有一次，歌德谈到拿破仑的时候，是这样对艾克曼说的：“是啊，我的好人儿，行动是生产力（有行必有果）。”他以一种轻松愉快而又天真烂漫地方式提醒我们：对于现代人而言，那种不讲理论的人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令人诧异啊，所以我们需要拥有歌德的精神，去找出能够解释，甚至原谅这种奇怪的生存方式的途径。

And now we must not conceal from ourselves what lies hidden in the womb of this Socratic culture! An optimism that thinks itself all powerful! Well, people should not be surprised when the fruits of this optimism ripen, when a society that has been thoroughly leavened with this kind of culture, right down to the lowest levels,

gradually starts trembling in an extravagant turmoil of desires, when the belief in earthly happiness for everyone, when faith in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universal knowledge culture gradually changes into the threatening demand for such an Alexandrian earthly happiness, into the invocation of a Euripidean *deus ex machina*!

现在，我们不要回避隐藏在苏格拉底文化坟墓里的东西！一种自认为全能的乐观主义！当这种乐观主义的果实成熟的时候，我们不必感到大惊小怪。此时，这个社会到处弥漫着这种文化的气息，自上而下，逐渐地开始在欲望的强烈膨胀中瑟瑟发抖；此时，每个人都渴望平凡的幸福，相信这样无所不在的学术文化有可能会渐渐转变为对亚历山大式平凡幸福的穷追不舍，转变为对欧里庇得斯式的“天降神兵”乞灵！

People should take note: Alexandrian culture requires a slave clas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exist over time, but with its optimistic view of existence, it denies the necessity for such a class and thus, when the effect of its beautiful words of seduction and reassurance about the “dignity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dignity of work” has worn off, it gradually moves towards a horrific destruction. There is nothing more frightening than a barbarian slave class which has learned to think of its existence as an injustice and is preparing to take revenge, not only for itself, but for all generations.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亚历山大文化需要一个奴隶阶级才能维持长久，但是它却以乐观主义的人生观否定了这一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因而，一旦“做人的尊严”和“劳动的光荣”这些带有诱惑和安慰的漂亮话失效的时候，它便逐渐走向可怕的毁灭。野蛮的奴隶阶级是最可怕不过的了，他们已经觉悟到他们这种生活待遇是不公正的，所以

他们时刻准备好复仇，不仅为自己，也为世世代代的奴隶报复。

In the face of such threatening storms, who dares appeal with sure confidence to our pale and exhausted religions, which themselves in their foundations have degenerated into scholarly religions, so that myth, the essential precondition for all religions, is already everywhere paralyzed—even in this area that optimistic spirit which we have just described as the germ of destruction of our society has gained control.

面临这般令人生畏的暴风骤雨，谁还会有胆量去满怀信心地诉诸我们那苍白虚弱的宗教呢？现代的宗教已经基本上蜕化为学术的信仰。所以神话，本来是一切宗教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现在却在各个方面处于瘫痪的状态——甚至在神话领域，乐观主义精神，这个曾经被我们称之为败坏社会的病菌已经得到控制。

While the disaster slumbering in the bosom of theoretical culture gradually begins to worry modern man and while he, in his uneasiness, reaches into the treasure of his experience for ways to avert the danger, without any inherent faith in these means, and while he also begins to have a premonition of his own particular consequences, some great and widely gifted natures have, with incredibly careful thought, known how to use the tools of science to set out the boundaries and relative nature of knowledge itself and, in the process, decisively to deny the claim of science to universal validity and universal goals. With proofs like this,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delusion which presumes with the help of causality to be able to ground the innermost essence of things has become recognized for what it is.

尽管沉睡在理论文化胸怀里的祸患逐渐使现代人感到不安，尽管人们带着局促不安的心情从经验里搜索可以躲避这一危险的方法——哪怕从内骨子里不相信这些方法，也尽管开始预感自己的结局不一般，有些伟大的、博学多才的学者却经过抽丝剥茧的思考之后，找到了如何使用科学作为工具来指出认知本身是有界线的，它具有相对性的本质。同时，他们否定科学具有广泛的使用性和目的性。有了这些作为证明，以前那种凭借因果规律就可以探究事物最深层的秘奥的断言，第一次被视为一种幻想。

The immense courage and wisdom of Kant and Schopenhauer achieved the most difficult victory, the one over the optimism lying concealed in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logic, which is, in turn, the foundation of our culture. While this logic, based on *aeternae veritates* (eternal truths) which it did not consider open to objection, had believed that all the riddles of the world could be recognized and resolved and had treated space, time, and causality as totally unconditional laws with the most universal validity, Kant showed how these really served only to raise mere appearance, the work of Maja, to the only reality, the highest reality, and to set it in place as the innermost and true essence of things and thus to make true knowledge of this essence impossible, that is, to use an expression of Schopenhauer, to get the dreamer to sleep even more soundly (*World as Will and Idea* , I, p. 498).

康德和叔本华的非凡勇气和智慧终于取得了最艰难的胜利，战胜了隐藏在逻辑本质中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也正是我们的文化根基。尽管这种逻辑是基于不容置喙的“永恒真理”之上的，相信世界上所有的迷都可以被认知和解决，同时也把空间、时间、因果规律完全当作普遍有效的绝对规律；但是康德还是证明，其实这些范畴的作用

只不过是把纯粹的表象，即幻的作品，提高到唯一的最高现实当中而已，以表象代替事物的真正内在本质而已，因此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事物的本质的；也就是说，按叔本华说的，这不过是使做梦的人睡得更香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第498页）。

With this recognition there is introduced a culture which I venture to describe as a tragic culture. Its most important distinguishing feature is that wisdom replaces knowledge as the highest goal, a wisdom which, undeceived by the seductive diversions of science, turns its unswerving gaze towards the all-encompassing picture of the world and, with a sympathetic feeling of love, seeks in that world to grasp eternal suffering as its own suffering. Let's imagine a growing generation with this fearless gaze, this heroic attraction for what is immense; let's imagine the bold step of these dragon slayers, the proud daring with which they turn their backs on all the doctrines of weakness belonging to that optimism, in order to “live resolutely,” fully and completely. Would that not require the tragic man of this culture in his self-education for seriousness and terror to desire a new art, the art of metaphysical consolation, to desire tragedy as the Helen which belongs to him and to have to cry out with Faust:

随着这种认识出现了一种文化，我冒昧地把它称之为悲剧文化。它的最重要特征是：智慧代替科学作为最高的目的，一种不受科学引诱步入歧途的大智大慧，以坚定不移的目光纵观世界，带着博爱的怜悯之心，搜寻天下永恒的痛苦，把它们当作自己的痛苦。让我们设想一下：正在茁壮成长的这代人具有这种大无畏的眼神，胸怀大志的英雄气概。再设想一下：这些屠龙之士，以傲慢和大胆的姿态，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种乐观主义那些无力的学说，目的是能够“坚决地生活”，全身心投入地活着。这样，难道不需要一个具有这种文化特质

的悲剧人物？难道他在自我教育、培养出能够抗御灾难与恐惧的过程中不需要一种新的艺术，一种能够给人提供形而上慰藉的艺术？不需要把悲剧视为属于自己的海伦？不需要与浮士德同声齐喊：

With my desire's power,

我满怀痴情，

Should I not call Into this life the fairest form of all?

岂能佳人难寻？

However, now that Socratic culture has been shaken on two sides—once by the fear of its own consequences, which it is definitely beginning to sense, and, in addition, because it is itself no longer convinced of the eternal validity of its foundations with that earlier naïve trust—it can hang onto the sceptre of its infallibility only with trembling hands. So it's a sorry spectacle—how the dance of its thinking dashes longingly after new forms in order to embrace them and then how, like Mephistopheles with the seductive Lamia, it suddenly, with a shudder, lets them go.

然而现在，苏格拉底式的文化在两方面都开始摇撼了。第一是因为害怕看到自己最终的结果，这个结果无疑已经体会到了；第二是因为它自己对其理论基础的有效性，再没有早期时那份天真的信心了

——现在它只能用颤巍巍的手来执着没有错误的拐杖，坚持下去。这是一幅令人遗憾的景象——活跃的思想，急切地追赶新的艺术形式，想把它们抱住；然后像靡菲斯特那样放走那个诱惑人的蛇妖一样，突然颤抖一下，把它们放走。

That is, in fact, the characteristic mark of that fracture which everyone habitually talks about as the root malady of modern culture, that theoretical man is afraid of his own consequences and, in his dissatisfaction, no longer dares to commit himself to the fearful ice currents of existence. He runs anxiously up and down along the shore. He no longer wants to have anything completely, any totality with all the natural cruelty of things. That's how much the optimistic way of seeing things has mollycoddled him. At the same time he feels how a culture which has been built on 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 must collapse when it begins to become illogical, that is, when it begins to run back, away from its own consequences.

其实，那就是人们习惯性地把它称之为现代文化劣根断裂的明显标志。也就是说，理论家害怕自己的结果。在他的不满情绪中，他不再敢投身于可怕的生存冰川里，他只能焦虑地踯躅在河边。他不再想把事情做得尽美尽善了，自然界的事物残酷之极，没有必要委曲求全。由此可见，乐观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经把他宠坏了。同时，他意识到，建立在科学原理之上的文化一旦变得不符合逻辑的话，就必须会倒塌。也就是说，一旦它倒行逆施，背离自己的结果，就必然毁灭。

Our art reveals this general distress: in vain people use imitation to lean on all the great productive periods and natures; in vain they gather all “world literature” around modern man to bring

him consolation and place him in the middle of artistic styles and artists of all ages, so that he may, like Adam with the animals, give them a name. But he remains an eternally hungry man, the “critic” without joy and power, the Alexandrian man, who is basically a librarian and copy editor and goes miserably blind from the dust of books and printing errors.

我们的艺术暴露了这一普遍的窘迫现象：人们徒劳地仰仗并效仿所有伟大的、富有成效的时代和人物；人们徒劳地把现代人周围的所有“世界文学”收集起来，带给他们安慰，并把他们放置于历代艺术风格和艺术家中间，以便给他们一一命名，就像亚当给动物命名那样。然而，现代人还是那样，永远觉得饥肠辘辘。“批评家”愁眉苦脸、有气无力。亚历山大式的人物，其实从本质上来说，也只不过是一个图书管理员和文字编辑，可怜地让书上的尘埃和印刷错误弄得失明。

19

19

We can designate the innermost form of this Socratic culture most precisely when we call it the culture of opera, for in this area our Socratic culture, with characteristic naiveté, has expressed its wishes and perceptions—something astonishing to us if we bring the genesis of opera and the fa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opera together with the eternal truths of the Apollonian and the Dionysian.

把苏格拉底的文化称为歌剧文化，则可以让我们彻底地看清它的内在形式。因为在歌剧领域里，我们的苏格拉底文化则会带着其天真

的特质，流露出自己的愿望与观念。假设我们将歌剧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同日神及酒神风格的永恒真理做比较的话，我们则会对这些愿望和概念感到震惊。

First, I recall the emergence of the *stilo rappresentativo* (the representational style) and of recitative. Is it credible that this entirely externalized opera music, something incapable of worship, could be accepted and preserved with wildly enthusiastic favour, as if it were the rebirth of all true music, in an age in which Palestrina's inexpressibly awe-inspiring and sacred music had just arisen? On the other hand, who would make the diversion-loving voluptuousness of those Florentine circles or the vanity of its dramatic singers responsible for such a rapidly spreading love of opera? The fact that in the same age, indeed, in the same peoples, alongside the vaulted structure of Palestrina's harmonies, which the entire Christian Middle Ages had developed, there awoke that passion for a half-musical way of speaking—that I can only explain by some tendency beyond art, something also at work in the very nature of recitative.

首先，我要回忆的是抒情调和吟诵调的起源。谁敢相信，在帕莱斯特里纳那无比庄严肃穆的圣乐已经出现的时代里，这种肤浅又不敬神的歌剧竟然还能够受到大众如醉如痴的追捧和保护，仿佛它是所有真正音乐的重生？另一方面，谁会认为歌剧这么快受到大众的喜爱是出自于佛罗伦萨社会名流对感情的不专一以及戏剧歌手的爱慕虚荣？事实是，整个中世纪时代的基督教推崇的是帕莱斯特里纳那拱形结构般的旋律，同样还是这批同时代的人也开始喜欢上这半说半奏的演出形式。对于这种现象，我只能解释为是个人的爱好，而不是艺术；用同样的道理去解释吟诵调最根本的本质也是可以的。

To the listener who wishes to hear clearly the word under the singing, there corresponds the singer who speaks more than he sings and who intensifies the expressions of pathos in half-singing. Through this intensification of pathos he makes the words easier to understand and overpowers what's left of the musical half. The real danger now threatening him is that at an inopportune moment he may give the music the major emphasis, so that the pathos in the speech and the clarity of the words necessarily disappear. On the other hand, he always feels the urge for musical release and a virtuoso presentation of his voice. Here the “poet” comes to his assistance, the man who knows how to provide him sufficient opportunities for lyrical interjections, repetitions of words and sentences, and so on, places where the singer can now rest in a purely musical element,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words. This alternation of only half-sung speech full of urgent emotion and interjections which are all singing, which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stilo rappresentativo* , this rapidly changing effort at one moment to affect the understanding and imagination of the listener and at another to work on his musical senses, is something so completely unnatural and at the same time so innerly contradictory to the Dionysian and Apollonian artistic drives that we must conclude that the origin of recitative lies outside all artistic instincts.

观众想要在歌手唱歌的时候听清楚歌词，歌手就得多说少唱，在半说半唱中增加感染力的表现。通过这种感染力的强化，歌手的歌词就容易让观众听懂，并且还能使音乐部分减弱。现在，他所遭到的真正危险是，偶尔他需要强调音乐部分。这样，说话的感染力和歌词的清晰度都将消失。另一方面，歌者总有想唱的冲动，总也有急于一展歌喉来展现自己在音乐方面的造诣的时候。于是，“诗人”来帮忙，他知道如何通过重复歌词和句子等手段向歌手提供足够的抒情机会。此时，歌手可以在纯音乐的表演中稍作休息，无需考虑歌词。半唱的慷

慨说辞与全唱的抒情叹词相互交替，才是抒情调的核心。这种时而影响听众的理解和想象，时而影响听众乐感的急速转换，极其不自然，同时在本质上是与日神和酒神的艺术动力相冲突的。由此我们不得不推断，吟诵调的起源与一切艺术本质风马牛不相及。

According to this account, we should define recitative as the mixing of epic and lyric performing, but not at all in an innerly consistent blending, which could never have been attained with such entirely disparate things, but the most external conglutination, in the style of a mosaic, something the like of which has no model whatsoever in the realm of nature and experience. But this was not the opinion of those inventors of recitative.

由此观之，我们应当将吟诵调定义为史诗朗诵与抒情诗吟诵的混合，但这绝不是内在一致性的混合。由于两种完全迥异，要想达到这样的混合是不可能的，它们只能是最外层的镶嵌式的粘合，一种在自然和经验领域都无法找到模板的粘合。当然，这绝不是吟诵调创始者的初衷。

Rather they—along with their age—believed that through that *stilo rappresentativo* the secret of ancient music had been resolved and that only through it could one explain the tremendous effect of an Orpheus, Amphion, and, indeed, even of Greek tragedy. The new style was valued as the re-awakening of the most effective music—the music of the ancient Greeks. In fact, under the universal and totally popular conception of the Homeric world as the primitive world, people allowed themselves to surrender to the dream that they had now climbed down back once more into the paradisal beginnings of humankind, when music necessarily must have had

that superb purity, power, and innocence which the poets knew how to talk about so movingly in their pastoral plays.

相反，创始者及他们的时代相信，是抒情调解开了古典音乐之谜，也只有通过抒情调，才能解释为什么俄耳甫斯、安菲翁，甚至是希腊悲剧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种新的风格被视为最动人的音乐——即古希腊音乐的复苏。事实上，依据广泛流传的观点，荷马世界是原始世界，人们可以纵情梦想，以为再度回到人类发源的乐土；在那里，音乐必然是纯洁无比、有力而天真，只有诗人才知道如何在田园式的戏剧中用动人的方式把它们表现出来。

Here we see the innermost development of this truly modern style of art, the opera. A powerful need forces itself out in art, but it is a need of an unaesthetic sort: the yearning for the idyllic, the belief in a primordial existence of the artistic and good man. Recitative served as the rediscovered language of that primordial man, and opera as the rediscovered land of that idyllic or heroically good being, who in all his actions at the same time follows a natural artistic drive, who sings at least something in everything he has to say, so that, given the slightest emotional arousal, he can immediately sing out in full voice.

这里，我们可以洞见歌剧，这种真正的现代艺术的内在成长历程。是一种强烈的需求使得歌剧成为了艺术，但这并非是审美类型的需要：它只是一种对田园生活的渴求，相信远古就存在一种有着艺术细胞的善良之人。吟诵调被看作原始人类重新发现的语言，而歌剧则被视为牧歌式或英雄般的好人失而复得的故土。这些内心善良的人们一举一动都在遵循着自然的艺术冲动。他们想说便唱，只要情绪稍有一点高涨，就会立即引吭高歌起来。

For us now it is unimportant that contemporary humanists used this newly created picture of the paradisal artist to fight against the old church idea of human beings as inherently corrupt and lost, so that opera is to be understood as the opposing dogma of good people, something in which they simultaneously discovered a way of consoling themselves against that pessimism to which the seriously minded people of that time, given the horrifying uncertainties of all social conditions, were attracted most strongly. It's enough for us to recognize how the real magic and thus the origin of this new artistic form lies in the satisfaction of an entirely unaesthetic need, in the optimistic glorification of man as such, in its view of primitive man as naturally good and artistic man. This operatic principle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tself into a threatening and terrible demand, which we, faced with the socialist movement of the present day, can no longer fail to hear. The “good primitive man” wants his rights: what paradisal prospects!

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利用新塑造出来的乐土艺术家形象来抨击教会认为人天生就是腐化堕落这一陈旧的观念。这点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已经不重要了。所以，我们可以把歌剧理解为善良人的相反信条，在这个信条中，人们同时也发现了一种能够抵抗悲观情绪产生的安慰剂。要知道，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环境不安因素很多，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所以思想严肃的人大多数都患有悲剧情绪。如今我们要做的是，认识到这种艺术的真正魅力和它的起源都是来自于对无需审美的满足，来自于人们以乐观主义为荣的精神，来自于把原始人看作生性具有艺术细胞和善良之心的做法。歌剧的这一原则，现在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令人生畏的要求。如今我们面对着社会的变革，对于这个呼声不可再继续置若罔闻。“善良的原始人类”想要得到他们的权利，即享有天堂般的前景！

Alongside this point I set another equally clear confirmation of my opinion that opera is constructed on the same principles as our Alexandrian culture. Opera is the birth of theoretical man, of the critical layman, not of the artist—one of the strangest facts in the history of all the arts. It was the demand of completely unmusical listeners that people had to hear the words above all, so that a rebirth of music was only to be expected when some way of singing was discovered according to which the words of the text rule over the counterpoint the way a lord rules his servants. For the words (they said) are nobler than the accompanying harmonic system just as the soul is nobler than the body. In the beginning of opera, the union of music, image, and word was treated according to the amateurish and unmusical crudity of these views. The first experiments with the sense of this aesthetic were launched in distinguished amateur circles in Florence by the poets and singers patronized there.

除此之外，我还要提出另一同样明晰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观点，即歌剧与我们的亚历山大文化建立在相同的原理上。歌剧产生于理论家和外行批评家之手，而非艺术家之手——这是所有艺术史上最为怪诞的事情之一。毫无音乐素养的听众首先要求歌词易懂，所以只有发明了歌词支配着旋律的唱法，就像主人支配着仆人一样，我们才能期待音乐的重生。（人们说）歌词远比和谐伴奏高贵，如同灵魂远比肉体高贵。在歌剧初兴之时，将音乐，形象和语言融合一体，是依据不懂音乐的外行人粗野的意见进行处理的。依照这种审美意识，自命不凡的诗人和歌手首次在佛罗伦萨上流社会里的外行人群里做了实验。

The man who is artistically impotent produces for himself a form of art precisely because he is the inherently inartistic man. Because he has no sense of the Dionysian depths of music, for his

own sake he transforms musical taste into easy to understand verbal and musical rhetoric of the passions in *stilo rappresentativo* and into the voluptuousness of the art of singing. Because he is incapable of seeing a vision, he presses mechanics and decorative artists into his service. Because he has no idea how to grasp the true essence of the artist, he conjures up right in front of him the “artistic primitive man” to suit his own taste, that is, the man who, when passionate, sings and speaks verse. He dreams himself back in an age in which passion was sufficient to produce songs and poems, as if that feeling has ever been in a position to create something artistic. The precondition of opera is a false belief about the artistic process; it is, in fact, the idyllic faith that in reality every sensitive man is an artist. According to the meaning of this belief, opera is the expression of lay amateurs in art, something which dictates its laws with the cheerful optimism of theoretical man.

如果一个没有艺术潜力的人能为自己创造出一种艺术形式的话，这恰恰说明他天生没有艺术细胞。由于他不能领悟酒神音乐的深邃，所以为了自己能懂，就把音乐的品味转变为抒情调中易懂的绮声艳语，把歌唱艺术变为靡靡之音。由于他缺乏形象思维，所以他就借助舞台道具和剧务场景来为他服务。由于他不知道如何把握艺术家的真正内涵，所以他凭空想象出一个“有艺术才华的原始人”站在他的面前，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品味。这个人，一旦情绪高涨，不是唱歌，就是吟诗。他梦想自己回到了过去那个只要有激情就能唱歌作诗的年代，仿佛那个感觉总是能够创造出艺术作品来。歌剧的产生就是因为人们对艺术过程有着错误的认识——一种田园般的信念，相信在现实中，一个人只要敏感，就是艺术家。据此信念，歌剧就是艺术门外汉的表现，就像理论家饶有兴致带着乐观主义情绪在那里指手画脚，乱点江山。

If we wanted to bring together into a single conception both of these ideas I have just describ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rigin of opera, all we would have left to do is to speak of an idyllic tendency in opera—and the only things we would need to use are Schiller's way of expressing himself and his explanation. He claimed that nature and the ideal are either an object of sorrow, when the former is represented as lost and the latter as unattained or both are an object of joy, when they are represented as real. The first produces the elegy in a narrower sense, and the other produces the idyll in its broadest sense. And right away we must draw attention to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both of these ideas in the genesis of opera—that in them the ideal does not register as unattained and nature does not register as lost.

假如我们想把上述关于歌剧产生的两种观念融合为一种概念的话，我们还需要提及一下歌剧里的田园倾向。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用席勒的自我表述和解释就足矣。他说："自然与理想，都是悲哀的对象。一旦前者失去，而后者未能获得，就会产生悲哀。同样，两者都是快乐的源泉，一旦两者成为现实，快乐至极。前一种情形催生了狭义的悲歌，后一种情形萌发广义的牧歌。至此，我们应当注意这两个概念在歌剧起源中的共同特点，即理想总会达到，自然绝未丧失。

According to this feeling, there was a primordial time for man when he lay on the heart of nature and, with this state of nature, simultaneously attained the ideal of humanity in paradisal goodness and artistry. We all are said to have descended from these perfect primitive men, indeed, we still were their faithful image—we only had to cast some things away from us in order to recognize ourselves once again as these primitive people, thanks to a voluntary renunciation of superfluous scholarship, of lavish culture.

照这样的感受，人类一定存在过某种原始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人类接近自然的心灵，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同时实现了德艺双馨的理想。据此可以说，我们都是这些完美先人的后裔，确实，我们依旧是他们忠实的肖像——我们只需要抛弃我们自身的一些东西，就能意识到我们本来就是那些原始人类的面影，而这一切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放弃多余的学识与累赘的文化。

Through his operatic imitation of Greek tragedy, the educated man of the Renaissance let himself be led back to such a harmony of nature and the ideal, to an idyllic reality. He used this tragedy, as Dante used Virgil, to be brought right up to the gates of paradise, while from this point on he strode even further on his own and passed over from an imitation of the highest Greek art form to a “restoration of all things,” to a copy of man's original art world.

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人用歌剧来模仿希腊的悲剧，以此来使自己回归到那自然与理想和谐共处的现实中去，那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现实生活。他们用这种悲剧，就像但丁用维吉尔一样，将自己引路到天堂之门。而他们又从这里继续独自前行，从模仿希腊最高艺术形式走向“万物复苏”，走向对人类原创艺术世界的拷贝。

What a confident good nature there is in these audacious attempts, right in the bosom of theoretical culture! Something to be explained only by the comforting faith that “man in himself” is the eternally virtuous hero of opera, the eternally piping or singing shepherd, who must always in the end rediscover himself as such, should he find out at some time or other that he has really lost himself for a while—something which is only the fruit of that

optimism which here arises out of the depths of the Socratic world view, like a sweetly seductive fragrant column of air.

在理论文化的怀抱之中，这样大胆的尝试何等善意、何等自信！这只能用以下令人宽慰的信念来解释："人本身"永远是德行高超的歌剧主角，永恒是吹着竖笛、唱着歌的牧羊人。人终将重新发现自己是这样，即使间或迷失了自我片刻，那也是来自于苏格拉底世界观深处的甜美、诱人、芳香的妖雾魅影一般的乐观主义使之然也。

Hence amo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ra there is no sense at all of that elegiac pain of eternal loss—there is rather the cheerfulness of an eternal rediscovery, the comfortable joy in an idyllic reality which man can at least imagine for himself at all times. But in doing this, man may perhaps at some point suspect that this imagined reality is nothing other than a fantastically silly indulgence. Anyone able to measure this against the fearful seriousness of true nature and to compare it with the actual primitive scenes of the beginnings of humanity would have to cry out in disgust—Get rid of that phantom!

所以，歌剧丝毫没有千古之恨的肝肠寸断之音，有的是永恒重获的朱弦三叹。那是人们随时能够遐想到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悠然自得。当然，不可否定，人们也可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怀疑那些遐想的现实只不过是南柯一梦。若将美好的遐想，与自然现实中令人生畏的严峻环境做衡量，与人类诞生之初的本来面目做比较的话，谁都必将对那个幻影怒目喝之——滚开！

Nevertheless, we would be deceiving ourselves if we believed

that such a playful being as opera could be chased away simply by a powerful shout, like a ghost. Whoever wants to destroy opera must undertake the struggle against that Alexandrine cheerfulness which expresses its favourite idea so naively in opera; in fact, opera is its real artistic form. But what can we expect for art itself from the effect of a form of art whose origins in general do not lie in the aesthetic realm but which have rather stolen from a half moralistic sphere over into the realm of art and which can deceive people about its hybrid origin only now and then?

然而，如果我们相信，仅凭一声高吼，就能像呵斥幽灵一般，把这作为娱乐方式的歌剧呵退，那一定是在自欺欺人。无论是谁，只要他想摧毁歌剧，他就势必要与亚历山大的乐天精神作斗争，这种乐天精神在歌剧中总是在不经意中表达自己偏爱的观点。事实上，歌剧就是这种精神的固有艺术形式。但是，如果一种艺术形式的起源完全不在审美领域之内，而是从半道德领域潜入艺术领域的，并时而隐瞒其混血的身份，那么我们怎能指望这种形式对艺术本身有什么作用呢？

On what juices does this parasitic operatic being feed itself, if not from the sap of true art? Are we not to assume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pera's idyllic seductions and its Alexandrine arts of flattering, the highest task of art, the one we should take really seriously—saving the eye from a glimpse into the horror of the night and through the healing balm of illusion rescuing the subject from the spasms brought about by the strivings of the will—would degenerate into a trend to empty and scattered diversion? What happens to the eternal truths of the Dionysian and the Apollonian in such a mixture of styles of the sort I have set down as the essence of the *stilo rappresentativo* , where the music is considered the servant and the libretto the master, where the music is compared to the

body and the libretto to the soul, where the highest goal at best will aim at a descriptive tone painting, as it was earlier with the new Attic dithyramb, where the music is completely alienated from its true office, which is to be a Dionysian world-mirror, so that the only thing left for it is to imitate the essential forms of appearances, like a slave of phenomena, and to arouse superficial entertainment in the play of lines and proportions?

这种寄生的歌剧倘若不从真正的艺术汲取营养，那么它又何以为生呢？难道我们不能推断，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艺术最高使命，即不让眼睛看到黑夜的恐惧，用虚幻的药膏来拯救人们意志冲动的抽搐，会在歌剧的牧歌生活的引诱下，在亚历山大艺术的谄媚下，堕落成为一种空洞而涣散的娱乐？如果是这样的话，日神和酒神风格的永恒真理在这种风格混合中又该何去何从？这种风格的混合，我在前文里已经把它定为抒情调的本质了。在抒情调中，音乐为仆人，而歌词为主人；音乐被比作肉身，而歌词被喻为灵魂；其最高目的，如同以前新雅典派的歌颂那样，不过是以声写画而已；音乐已经彻底背离了它作为酒神世界明镜的真正荣光，它已没有其他用处，只能像一个现象的奴隶，模仿表象的基本形式，或只能靠玩弄线条和比例来激起表面的欢愉。

A rigorous examination shows how this fatal influence of opera on music coincides precisely with the entir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usic. The optimism lurking in the genesis of opera and in the essence of the culture represented through opera succeeded with alarming speed in stripping music of its Dionysian world meaning and stamping on it a formally playful and entertaining character. This transformation can only be compared to something like the metamorphosis of Aeschylean man into the Alexandrian cheerful man.

仔细观察不难看出，歌剧对于音乐的致命影响与现代音乐的整个发展过程精准地一致。潜藏在歌剧起源以及由歌剧体现出来的文化精髓的乐观主义，正以惊人的速度把音乐从酒神世界的意义中剥离开来，并把它定性为只是供人们玩玩，消遣消遣而已。这一转变，只有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英雄转变为亚历山大的乐天人物才能与之比拟。

If in the explanation given above we have been right to link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Dionysian spirit with an extremely striking but so far unexplained transformation and degeneration of Greek man, what hopes must revive in us when the most certain favourable signs bring us the guarantee of the gradual awakening of the Dionysian spirit in our contemporary world! It is not possible that the divine power of Hercules should remain always impotent in voluptuous bondage to Omphale. Out of the Dionysian foundation of the German spirit a power has arisen which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most basic assumptions of Socratic culture, something those assumptions cannot explain or excuse. Rath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is culture it is experienced as something terrible which cannot be explained, as something overpoweringly hostile—and that is German music, above all as it is to be understood in its forceful orbit from Bach to Beethoven, from Beethoven to Wagner.

假设我们在以上的论述中，将酒神精神的消失与极其明显但迄今又未得到足够解释的希腊人的转变以及他们的退化联系起来是正确的，那么，当某个最可靠的征兆向我们承诺在当今这个世界里，酒神精神会逐渐苏醒过来，我们心中将会燃起怎样的希望！赫拉克勒斯的神力绝不可能永远侍奉翁法勒女王，在她的安乐窝里殆尽。从德意志精神的酒神文化根基上，一股力量正在崛起。这股力量与苏格拉底文

化最基本的假说之间没有共同之处，也不被它们解释或辩护，相反被这种文化说成是莫名其妙，甚至极端敌对的东西——这个东西便是德国音乐，主要指从巴赫到贝多芬，从贝多芬到瓦格纳的光辉历程。

Even in the best of circumstances what can the Socratic man of our day, greedy for knowledge, begin to make of this daemon rising from the inexhaustible depths? Neither from the lacework or arabesques of operatic melodies nor with the help of the arithmetic abacus of fugue and contrapuntal dialectic will a formula reveal itself in whose triple-powered light people can render that daemon obsequious and compel it to speak. What a spectacle when our aestheticians nowadays, with the fishing net of “beauty” all their own, strike at and try to catch that musical genius roaming about in front of them with incredible life, with movements which will not be judged according to eternal beauty any more than according to notions of the sublime. We should only inspect these patrons of music in person and at close quarters, when they cry out so tirelessly “Beauty! Beauty!” to see whether they look like educated and discriminating darling children of nature or whether they are not rather seeking a deceptively euphemistic form for their own crudity, an aesthetic pretext for their characteristically unfeeling sobriety. Here, for example, I'm thinking of Otto Jahn.

即使在如今最有利的情况下，那些求知欲极强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将如何对付那来自无底深渊的魔鬼呢？无论在歌剧旋律的华丽乐谱里，还是借助于赋格曲式的算术算盘和对位辩证法，都不可能找到三倍强的灯光，让我们看到一条可行的方法，能使这个魔鬼乖乖就范，并让他开口说话。今日的美学家们，手持自己织的“审美”渔网，扑打和捕捉那些游走在他们面前充满活力的音乐天才们。他们的一举一动，不再以永恒之美作为衡量标准，而是按照崇高之美来衡量——

这是怎样的一个景象！当这些音乐保护者喋喋不休地高呼“美哉！美哉！”之时，我们不妨站在近处，亲眼目睹一下，他们到底是否像是有知识、有辨别力的大自然宠儿，还是说在寻找一件欺人的外衣来掩饰自己的粗鄙，亦或为自己无情的冷静寻找一个审美的借口。此时此刻，我想用奥托·杨便为例。

But the liar and hypocrite should beware of German music, for in the midst of all our culture it is precisely the one unalloyed pure and purifying fire spirit out from which and towards which all things move in a double orbit, as in the doctrine of the great Heraclitus of Ephesus: everything which we now call culture, education, and civilization must at some point appear before the unerring judge Dionysus. Furthermore, let's remember how the spirit of German philosophy in Kant and Schopenhauer, streaming from the same springs, was able to annihilate the contented joy in existence of scholarly Socratism by demonstrating its boundaries, and how with this demonstration an infinitely deeper and more serious consideration of ethical questions and art was introduced, which we can truly describe as Dionysian wisdom conceptually understood.

这个谎言家以及伪君子，最好当心德国的音乐，因为在我们全部的文化里，音乐表现为最不含杂质，有净化火精神的功效。万物起源于火，同时也回归于火。正如以弗所伟大的赫拉克利特学说里谈到的：我们如今称之为文化、教育和文明的一切，总有一天要被带到公正的法官酒神面前。再者，让我们回顾一下，反映在康德和叔本华身上，与德国音乐同源的德国哲学精神，是如何通过证明苏格拉底学派的局限来摧毁其存在的自鸣得意，以及又是如何以这种证明引进无限深邃、无比严肃的道德观和艺术观的。而这样的道德观和艺术观，我们可称之为概念化的酒神智慧。

Where does the mystery of this unity between German music and German philosophy point if not to a new form of existence, about whose meaning we can inform ourselves only by speculating on the basis of analogies with the Greeks? For the Greek model has this immeasurable value for us who stand on the border line between two different forms of existence—that in it are stamped all those transitions and struggles in a classically instructive form, except that we are, as it were, living through the great high points of Greek being in the reverse order. For example, we seem to be moving now out of an Alexandrian period backwards into a period of tragedy.

德国音乐和德国哲学的统一，这一奥秘若不是向我们指出，基于与希腊人之间有着相似性，我们才能推测出我们新的生活方式，又能指什么呢？因为对于站在两种生活方式边界线上的我们而言，希腊人作为楷模，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一切转变和斗争在其中也显现为经典的、富有启示性的形式。不过，我们似乎在按照相反的顺序，经历着类似于希腊人的各大主要时代。例如，我们似乎在从亚历山大时代倒退到悲剧时代。

At the same time, we feel as if the birth of a tragic time period for the German spirit only means a return to itself, a blessed re-discovery of self, after immensely powerful forces from outside had for a long time forced it into servitude under their form, since that spirit, so far as form is concerned, lived in helpless barbarism.

同时我们感到，悲剧时代的诞生对于德国精神而言，是一种自我回归，一种幸运的重新自我发现。因为长期以来，强大的外来势力迫

使德国精神按其规定的形式行事。说到形式，德国的精神可以说一直生存在无助的野蛮状态里。

And now finally after its return home to the original spring of its being, it can dare to stride in here before all peoples, bold and free, without the guiding reins of Roman civilization. If only it can now understand how to learn all the time from a single people, the Greeks—being capable of learning from them is already a high honour and a remarkable distinction. And when have we needed these most eminent of mentors more than now, when we are experiencing the rebirth of tragedy and are in danger of not knowing where it is coming from or of being able to interpret where it is going?

现在，德国精神终于回归到它的生命本源了。只要它能明白如何一如既往地向一个民族，即希腊人学习（其实，善于向希腊人学习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崇高的荣誉和了不起的特质），那么它就敢于在所有的民族人的面前自由自在地昂首阔步向前走，无需罗马文明的引领。当然，正当我们经历着悲剧的重生，忧于不知悲剧从何而来、往哪里去之时，还有什么时候比今日更需要这些最杰出的导师呢？

20

20

At some point under the gaze of an incorruptible judge we may determine in what ages and in which men up to now the German spirit has struggled most powerfully to learn from the Greeks. And if we can assume with some confidence that this extraordinary

praise must be awarded to the noblest cultural struggles of Goethe, Schiller, and Winckelmann, then we would certainly have to add that since that time and the most recent developments of that battle, the attempt to attain a culture and to reach the Greeks by the same route has become incomprehensibly weaker and weaker.

有朝一日，也许我们在铁面无私的法官目光凝视下，来判断德国精神在何年代、是何人一直在努力坚定不移地向希腊人学习。如果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是歌德、席勒、温克尔曼他们最崇高的文化斗争应该受此殊荣，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补充一句：自从他们那个时代，以及那场斗争最新发展之后，试图从同一途径走进希腊文化和希腊人的努力，莫明其妙地变得日渐衰微。

In order to avoid being forced into total despair about the German spirit, shouldn't we conclude from all this that in some important point or other these fighters were not successful in penetrating the Hellenic spirit and creating a lasting bond of love between German and Greek culture? And beyond that, perhaps an unconscious recognition of this failure gives rise in serious people to the enervating doubt whether, after such predecessors, they could go even further than these men had along this cultural path and reach their goal at all. For that reason since that time we've seen judgments about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Greeks degenerate in the most disturbing way. We can hear expressions of sympathetic condescension in the most varied encampments of the spirit and of the lack of spirit. In other places a completely ineffectual sweet talk flirts with “Greek harmony,” “Greek beauty,” and “Greek cheerfulness.”

为了避免对德国精神陷入彻底的失望，难道我们不应该从上所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某些重大问题方面，这些战士并没有渗透到古希腊人的精神里，为德国和希腊文化之间搭起永远之爱的桥梁？还有，无意间发现这一失败，使得某些思考严谨的人开始担心起来，怀疑自己今后，在这条文化之路上是否能比他们的前辈走的更远，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因此，从那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希腊人的教育价值用一种令人极其担忧的方式在减弱。在许多学术和非学术的阵营里，可以听到有人带有优越感来表示怜惜。在其他场合，有人卖弄毫无用处的花言巧语，说那是“希腊的和谐”，“希腊的美”，“希腊的乐观”。

And precisely in the circles which could dignify themselves by drawing tirelessly from the Greek river bed in order to benefit German education—the circles of teachers in the institutes of higher education—people have learned best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Greeks early and in a comfortable manner, often with a sceptical abandoning of the Hellenic ideal and a total reversal of the real purpose of classical studies. In general, anyone in these circles who hasn't completely exhausted himself in the effort to be a dependable corrector of old texts or a microscopic studier of language, like some natural historian may perhaps also seek to acquire Greek antiquity “historically,” as well as other antiquities, but in any case following the methods of our present scholarly writing, along with their supercilious expressions.

有那么一群人，为了滋养德国教育，他们不知疲倦地从希腊的河床里汲取养分。这群人就是高等院校的老师。他们老早就学会如何与希腊人妥协了，而且方法得当，常常抱着怀疑的态度放弃希腊人的理想，这种做法与古学研究的真正目的完全背道而驰。一般说来，在这个领域里，任何人只要他没有耗尽毕生精力去做一个可靠的古籍校勘家，或做一个语言的微观研究者，比如说自然历史学家，那他也许会

努力地从“历史的角度”去获取希腊的古物和其它古代资料。但是，无论怎么说，他们的写作方法也只能算是模仿我们当今学者的，用词却盛气凌人。

If, as a result, the real cultural power of ou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has certainly never been lower and weaker than at present, if the “journalist,” the paper slave of the day, has won his victory over the professors so far as culture is concerned and the only thing still left for the latter is the frequently experienced metamorphosis which has them also moving around these days with the speech styles of a journalist, with the “light elegance” of this sphere, like cheerful well-educated butterflies, then how awkward and confusing it must be for people living in such a present and educated in this manner to stare at that phenomenon of the revival of the Dionysian spirit and the rebirth of tragedy, something which may only be understood by some analogy to the most profound principles of the as yet incomprehensible Hellenic genius.

结果，如果我们高等院校的真正文化力量确实从来没有比现在高等院校的真正文化力量层次低过，更加薄弱过的话；如果当今社会的奴隶，即“记者”在文化这个方面战胜了教授们的话；如果教授们还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不断地体验蜕变，用记者的说话风格，用这个领域中的“淡淡的优雅”来让自己不断地活跃在这个年代，像快乐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蝴蝶那样的话，那么活在当下的人们，受过此教育的人们在看到酒神精神的复兴、悲剧重生的时候，一定感到无比的尴尬和困惑，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只能通过理解希腊天才们的最深奥的原则的类推才能理解的，可是深奥的原则迄今尚未被人理解。

There is no other artistic period in which so-called culture and

true art have stood more alienated from and averse to each other than what we witness with our own eyes nowadays. We understand why such a weak culture despises true art, for it fears such art will destroy it. But surely an entire form of culture, i.e., the Socratic-Alexandrian, must have run its full life after being able to culminate in such a delicate and insignificant point as our present culture.

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艺术时代，像我们今日目睹的那样，所谓的文化与真正的艺术彼此那么疏远、互相那么对立。我们明白为什么如此弱的文化竟然讨厌真正的艺术，这是因为它害怕这样的真正艺术会毁掉自己。当然，一个完整的文化形式，即苏格拉底——亚历山大文化，如果结束于像我们现代文化这样脆弱和无足轻重的时刻，那只能说明它已经走完了一生。

When heroes like Schiller and Goethe couldn't succeed in breaking down that enchanted door which leads to the Hellenic magic mountain, when for all their most courageous struggles they reached no further than that yearning gaze which Goethe's *Iphigeneia* sent from barbaric Tauris over the sea towards her home, what is left for the imitators of such heroes to hope for, unless from some totally different side, untouched by all the efforts of previous culture, the door might suddenly open on its own—to the accompaniment of the mysterious sound of the reawakened music of tragedy.

如果像歌德和席勒这样的英雄们，未能打破通往希腊神山的魔关的话，如果他们以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只能像歌德《伊菲革涅亚》作品里的伊菲革涅亚那样，只能停留在对家乡的望眼欲穿，而不能再进一步；只能身在野蛮的托瑞斯族，隔洋遥望故乡，以解相思之愁。那

些英雄的模仿者呢，他们又有什么希望？除非这道魔关，在复苏的悲剧音乐的神秘之声的伴奏中，突然在以前文化没有涉足过的、完全不同的一侧主动打开。

Let no one try to detract from our belief in a still imminent rebirth of Hellenic antiquity, for that's the only place where we find our hope for a renewal and reformation of the German spirit through the fiery magic of music. What would we otherwise know to name which amid the desolation and wearines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could awaken some comforting expectation for the future? We look in vain for a single powerfully branching root, for a spot of fertile and healthy soil—but everywhere there is dust, sand, ossification, and decay.

谁也不能减弱我们对希腊古风即将重生的信念，因为只有凭着这种信念，我们才能找到德国精神有可能通过火一般的音乐魅力得以复兴与变革。否则，在当今凄凉而疲软的文化中，我们还能指望什么能够唤起我们对未来怀有一丝慰藉的展望呢？我们在寻找一颗茁壮的树根，寻找一块肥沃的健土，可是徒劳无功；到处所能看到的是灰尘、沙石、僵化、萧条！

Here a desperate, isolated man couldn't choose a better symbol than the knight with Death and the Devil, as Dürer has drawn him for us, the knight in armour with the hard bronze gaze, who knows how to make his way along his terrible path, without wavering at his horrific companions—and yet without any hope, alone with his horse and hound. Such a *Dürer* knight was our Schopenhauer: he lacked all hope, but he wanted the truth. There is no one like him.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孤独绝望的人需要为自己选择一个象征的话，他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席勒所描绘的与死神和魔鬼相伴的骑士了——这个骑士，身披铁甲，目光炯炯，面对他那可怕的同伴，不动声色。尽管他的前途毫无希望，但是他还是骑上马，带着猎犬，一个人驰骋在危险重重的道路上。席勒笔下这样的骑士是我们的叔本华：他没有多大希望，但是他依然追求真理。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

But how suddenly that wilderness of such an exhausted culture as the one I have just sketched out so gloomily changes when the Dionysian magic touches it! A tempest seizes everything worn out, rotten, broken apart, and stunted, wraps it in a red whirling cloud of dust, and lifts it like a vulture up into the air. In our bewilderment, our gaze seeks out what has disappeared, for what we see has risen up as if from oblivion into golden light, so full and green, so richly alive, so immeasurable and full of longing. Tragedy sits in the midst of this superfluity of life, suffering, and joy; with awe-inspiring delight it listens to a distant melancholy song, which tells of the mothers of being whose names are Delusion, Will, and Woe.

然而，我刚才忧伤地勾勒出的那种文化是多么死气沉沉啊，但是当它受到酒神魔力的触碰后，那份萎靡不振的样子陡然间变得活跃起来。似一场狂风暴雨，席卷了所有的破旧、腐朽、破碎、僵死的东西，卷成一股旋转的红尘，像一只苍鹰，把它们带上天空。我们感到一片茫然，我们的目光在搜寻是什么消失了，因为我们看到仿佛是在湮没之处升起了金色的亮光——饱满、翠绿、富有活力、无量、充满渴望。悲剧就端坐在生活充裕、苦乐兼并的情景中央，带着令人敬畏和令人鼓舞的神情，倾听来自远方的哀歌。歌中唱到的是“万有之母”，她们的名字是幻想、意志、悲哀。

Yes, my friends, believe with me in the Dionysian life and in the rebirth of tragedy. The age of the Socratic man is over: crown yourselves with ivy, take the thyrsus stalk in your hand, and don't be amazed when tigers and panthers lie down fawning at your feet. Only now you must dare to be tragic men, for you will be redeemed. You are to lead the Dionysian celebratory procession from India to Greece! Arm yourselves for a hard battle, but have faith in the miracles of your god!

是的，朋友，同我一起信仰酒神的生命，信仰悲剧的再生吧。苏格拉底式人物的时代过去了，给您自己戴上一顶常春藤的花冠吧，手里拿着一副酒神的手杖吧，如果虎豹躺在你脚下摇尾乞怜，您也不要惊讶！此时此刻，您一定敢做一个悲剧人物了吧，因为您必将获得救赎！您得引领酒神的庆典队伍，从印度走到希腊！武装起来，准备作艰苦的斗争，但是您要相信您的神灵会创造出奇迹！

21

21

Moving back from this tone of exhortation into a mood suitable for contemplation, I repeat that only from the Greeks can we learn what such a miraculously sudden awakening of tragedy can mean for the innermost fundamental life of a people. It is the people of tragic mystery who fight the Persian wars, and again the people who carried on these wars uses tragedy as an essential potion in their recovery. Who would have supposed that such a people, after being stirred right to their innermost being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by the strongest paroxysms of the Dionysian demon, were still capable of a regular and powerful outpouring of the simplest

political feeling, the most natural instinctive feeling for their homeland, the original manly desire to fight?

让我收回劝告的口吻，改用适合沉思的心情，重申一遍：只有从希腊人身上，我们才能明白悲剧中奇迹般的顿悟对于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是那些具有悲剧神秘感的人打响了波斯之战，也还是这帮把战争进行到底的人，把悲剧作为战后恢复家园的灵丹妙药。谁能想到，这个民族几代人都受到酒神型恶魔强烈的病发刺激，伤及他们的心灵深处，他们依旧对政治时不时勇猛地流露出最朴素的热情，对家乡流露出最自然、最本能的感情，对战斗流露出原始而勇敢的渴望？

Nonetheless, if we always sense in that remarkable extension of oneself into one's surroundings associated with Dionysian arousal how Dionysian release from the shackles of individuality registers at first as a heightened indifference—even apathy and hostility—to the political instincts, on the other hand, Apollo, the nation builder, is also the genius of the *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 (individualizing principle), and a sense of state and homel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an affirmation of the individual personality.

然而，随着酒神精神兴起，个人的自我意识大规模地转向环境意识。我们看到，就是通过这一转变，酒神精神摆脱了个人主义的束缚。之后，它首先表现为对政治事务的漠不关心，甚至可以说冷漠和对视。另一方面，阿波罗，这个民族的建筑师，却又是“个性原则”的维护者。不肯定个人性格，民族、家乡这样的概念就不存在。

From ecstatic experience there is only one way out for a

people, the route to Indian Buddhism, which, with its longing for nothingness, in order to be endurable requires those rare ecstatic states with their ascent above space, time, and individuality. These states, in their turn, demand a philosophy which teaches people to use some idea to overcome the unimaginable dreariness of intermediate states. In cases where the political drives are considered unconditionally valid, it's equally necessary for a people to turn to the path of the most extreme forms of secularization. The most magnificent but also the most terrifying example of this is the Roman Empire.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要想走出迷幻的体验，唯一一条路就是投奔印度的佛教。印度佛教渴望的是四大皆空，这样才能超渡人生。这就需要这些迷幻的感觉，超渡空间、超渡时间、超渡个性。这些感觉，反过来需要哲学来教会人们采用某些理念来克服这种迷幻之间所产生的难以想象的枯燥无味。如果政治冲动在一个国家里被视为正当的话，那么该民族的人民就同样有必要采取把教育从宗教中分离这一极端的形式。这点，罗马帝国作为一个典型，表现得最为明显，但也最为可怕。

Standing between India and Rome and forced to make a tempting choice, the Greeks succeeded in inventing a third form in classical purity. Of course, they did not make use of it for long, but for that very reason they made it immortal. That fact that the darlings of the gods die early holds in all things, but it's equally certain that then they live among the gods for ever. So people should not demand from the noblest thing of all that it should possess the hard-wearing durability of leather—that crude toughness characteristic of the Roman national impulses, for example, probably does not belong to the necessary predicates of

perfection.

希腊人站在印度和罗马人之间，所以不得不做出引人注目的抉择，但是他们在古典的纯情中成功地找到了第三条道路，当然，他们本来并不想长期采取这一方法的，但是就是这个方法，却成为了永恒。这就像圣灵的至亲早早死去，他们反而能够永远地活在神灵当中，这个道理适合于一切事物。所以，人们不能指望所有的高贵之物都能像皮革一样耐磨。如像罗马民族冲动性格中所反映出来的坚韧性也许不是完美性格不可缺少的属性。

But if we ask what remedies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Greek in their great period, with the extraordinary strength of their Dionysian and political drives, not to exhaust themselves either with an ecstatic brooding or in a consuming pursuit of world power and worldly honour, but to reach that marvelous mixture—just as a noble wine makes one feel fiery and meditative at the same time—then we must keep in mind the immense power of tragedy, which stimulated the entire people, purifying them and giving them release. We will first sense its highest value when it confronts us, as with the Greeks, as the essence of all prophylactic healing potions, as the mediator between the strongest and inherently most disastrous characteristics of a people.

但是，如果我们要问：是什么方法让希腊人在酒神精神和政治冲动都十分强烈的伟大时期，不把全部的精力消耗在迷幻的沉思中或消耗在追逐世界霸权和荣耀里，而去达到那美妙的融合境界。就像葡萄酒那样，既能让人感到热血沸腾，同时也能使人感到沉着冷静；那么，我们必须牢记悲剧的巨大力量。悲剧激励了这整个民族，让他们得到净化，得到释放。我们同希腊人感受一样，一旦悲剧的最高价值

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立马意识到这是一切治病防病良药的精华，是一个民族人身上最强大的优点和天生的最糟糕缺点之间的调和剂。

Tragedy draws the highest ecstatic music into itself, so that, with the Greeks, as with us, it immediately brings music to perfection. But then it places the tragic myth and the tragic hero next to the music, who then, like a powerful Titan, takes the whole Dionysian world on his back and thus relieves us of it.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same tragic myth, in the person of the tragic hero, tragedy knows how to redeem us from the avid pressure for this existence and with a warning hand reminds us of another state of being and a higher pleasure for which the struggling hero, full of foreboding, is preparing himself, not through his victory but through his destruction.

悲剧吸纳了最高层面的迷幻，这使得音乐一下子进入了尽美尽善的境地。在希腊人的眼中是这样，在我们的眼里也是这样。不过之后，悲剧是把悲剧的神话和悲剧里的英雄人物放在与音乐同等的位置。悲剧英雄就像强悍的泰坦人一样，将醉境世界整个背起，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另一方面，悲剧懂得如何采用相同的悲剧神话塑造出悲剧英雄人物来，把我们从生存的重压之下拯救出来；同时，它挥手告诫我们，世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存在状态和更高层的乐趣。奋斗中的英雄们充分地意识到，要想获得这些，靠的是自我毁灭，而不是靠胜利。

Tragedy places between the universal validity of its music and the listener sensitive to the Dionysian an awe-inspiring parable—the myth—and with that gives rise to an illusion, as if the music is only

the production's highest device for bringing life to the plastic world of myth. Trusting in this noble deception, tragedy can now move its limbs in the dithyrambic dance and abandon itself unconsciously to an ecstatic feeling of freedom in which it would not dare to revel without that deception.

悲剧在音乐普遍的有效性与敏感于酒神风格的听众之间讲述的是一种崇高而鼓舞人心的寓言——这就是神话。悲剧有了神话，能使听众产生一种幻觉，好像音乐不过是使神话造型世界活灵活现地灵动起来的最高级工具罢了。悲剧有了这个高端的迷幻功能，它现在在酒神典礼的舞蹈中大显身手，忘乎所以地陶醉于自由自在中。没有这份迷幻，悲剧是万万不敢狂欢作乐的。

The myth protects us from the music, while it, by contrast, immediately gives the music its highest freedom. In return, the music gives back to the tragic myth, as a return gift, an urgent and convincing metaphysical significance, of a kind which words and pictures never could attain without its help. And particularly through the music there comes over the spectator of tragedy that certain presentiment of the highest joy, the road to which leads through destruction and negation, so that he thinks what he hears is like the innermost abyss of things speaking to him out loud.

神话保护我们免受音乐的干扰，这就给音乐带来了最大限度的自由。作为回报，音乐赋予神话以令人鼓舞和信服的形而上意义。没有音乐的帮助，语言和画面都不能到达这些意义。音乐尤其能给悲剧观众指明一条走过毁灭与否定道路之后才能体验到的某种最至高的快感，以至于他觉得他所听到的仿佛是万物最深层处的奥秘在向他呼唤的东西。

If in these last sentences I have perhaps tried to provide only a provisional expression of this complex idea, something immediately intelligible to few people, at this very point I cannot refrain from encouraging my friends to a further attempt and from asking them to prepare themselves with a single example of our common experience in order to recognize a general principle.

在上述最后几句话里，算是我对这一复杂的概念发表假定性的看法。对此，可能很少的人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从这个意思上来说，我不得不鼓励我的朋友们做出进一步的努力，用我们共同经验中的任何一则简单的实例，去理解一般性的命题。

With this example, I must not refer to those who use the images of the action in the scenes—the words and emotions of active people—in order with their help to come closer to the feeling of the music. For none of them speaks music as a mother tongue, and, for all that help, they proceed no further than the lobbies of musical perception, without ever being able to touch its innermost shrine. Some of these who take this road, like Gervinus, don't even succeed in reaching the lobby. But I must turn only to those who have an immediate relationship with music and who find in it, as it were, their mother's womb, those who stand bound up with things almost exclusively through an unconscious musical relationship.

对于那些必须靠剧情中演员的形象——剧中人物的台词和情感的表现——才能体验到音乐魅力的人，我不想举这个例子。因为他们谈起音乐来，并不像说母语那样了解，即使有了那些帮助，他们也只能达到音乐感受的前门大厅，无法踏入音乐世界最深处的圣殿。许多选

择音乐道路的人，例如格尔维纳斯，甚至连前门大厅都从来没有到达过。但我必须只对那些与音乐有直接关系的人，也就是说对那些在娘胎就喜欢音乐的人，对在接触事物时总是无意中联想到音乐的人倾诉。

To these true musicians I direct the question: Can they imagine a person capable of perceiving the third act of *Tristan and Isolde* as an immense symphonic movement, getting no help from words and images, without suffocating from a convulsive spreading of all the wings of his soul? A man who, as in this case, has set his ear, so to speak, on the heart chambers of the world's will, who feels in himself the raging desire for existence pouring forth into all the veins of the world as a thundering rainstorm or as the most delicately spraying brook—would such a man not fall apart on the spot? Could he endure hearing in the suffering glass case of human individuality the echo of countless desires—and cries of woe from the “wide space of the world's night,” without, in the midst of this shepherd's medley of metaphysics, inexorably flying off to his original home? But what if nonetheless such a work could be perceived as a totality, without the denial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what if such a creation could be produced without shattering its creator—where do we get the solution to such a contradiction?

我想直截了当地问这些真正的音乐家：您是否能够想出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和人物形象的帮助，就能够理解《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第三幕是一场大型的交响乐演奏，而没有被他灵魂所有张开的痉挛了的翅膀窒息而死？这个人将他的耳朵贴在世界意志的心房，体会到对生命的狂热渴望从心房里流入世界的血管，或如瓢泼大雨，或如涓涓细流，他不会崩溃吗？他能忍受从人的个性玻璃盒里所发出的无数欲望的回响，以及从“世界黑夜的广袤空间”里传来的哀鸣，而不为这田

园牧歌式的形而上的混成曲所动心，陶醉般地飞往他的故乡吗？然而，如果这样的作品，观众能把它作为整体去理解，而不否定个体的存在；如果这样的创作，作家能够苦心写成而不至于毁了自己——那我们将到哪里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呢？

Here between our highest musical excitement and this music the tragic myth and the tragic hero interpose themselves, basically only as a parable of the most universal facts of all, about which only music can speak directly. However, if we felt as purely Dionysian beings, then myth would be entirely ineffectual as a parable and would remain there beside us unnoticed. It would not make us turn our ears away for an instant from listening to the echo of the *universalia ante rem* (the universal before the fact).

这里，在我们音乐最高的兴奋点与这种音乐之间，插入了神话和悲剧英雄。从本质上来说，它们只是作为万物最普遍事实的譬喻，这种譬喻只有音乐才能直接表达出来。然而，如果我们只是单纯作为酒神式的人物去感知，那么神话就会像譬喻一样毫无作用。虽然它存在我们身边，但人们却毫无察觉。它一刻也不会妨碍我们聆听先于事物普遍性的回响。

But here the Apollonian power breaks through, preparing for the reintegration of shattered individuality with the healing balm of blissful illusion. Suddenly we think we see only Tristan, motionless and dazed, as he asks himself, “The old melody—what does it awaken for me?” And what earlier struck us as an empty sigh from the centre of being now only says to us something like “the barren, empty sea.” And where we imagined we were dying in a convulsive inner working out of all our feelings with only a little linking us to

this existence, now we hear and see only the hero mortally wounded and yet not dying, with his cry full of despair, “Longing! Longing! In death still yearning not to die from yearning!” And when earlier, after such an excess and such a huge number of torments consuming us, the jubilation of the horns, almost like an extreme agony, cuts through our hearts, there stands between us and this “jubilation in itself” the celebrating Kurwenal, turned towards the ship carrying Isolde. No matter how powerful the compassion gripping us inside, in a certain sense, nonetheless, this compassion saves us from the primordial suffering of the world, just as the symbolic picture of myth saves us from the immediate look at the highest world idea, just as thoughts and words save us from the unrestrained outpouring of the unconscious will. Because of that marvelous Apollonian deception it seems to us as if the empire of music confronted us as a plastic world, as if only Tristan's and Isolde's destiny had been formed and stamped out in pictures in the most delicate and expressive of all material.

但日神的力量在这里爆发，准备用幸福的幻象这一良药来拯救支离破碎的个人。突然，我们感觉我们只看到一动不动、茫然若失的特里斯坦，他问自己：“这都是陈词滥调，这对于我而言有何用处？”早先发自于生存内心的那声空叹，现在却好像对我们这样说“这大海贫瘠、空荡”。原来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虽然尚存一口气，但我们的内心被各种情感所煎熬得要死；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英雄，虽然伤势很重，但他们不会死去，只是绝望地呼唤着：“期待、期待，至死也要期待，为了期待而不死！”早期的时候，我们遭受过太多太多的磨难。之后，欢呼的号角，几乎像极端痛苦一样，刺穿了我们的心灵。现在，在我们与“欢呼本身”之间站着向载着伊索尔德船只在欢呼的库汶那尔。无论这份同情如何让我们揪心，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将我们从这个世界原生苦难中拯救了出来，就像神话中象征性的画面阻碍了我们立即去观察最高端世界的思想，也像思想和文字阻碍了我们把非

意识的意志一泻千里、毫无保留。由于这神奇的日神假象，音乐王国似乎就像造型世界一样呈现在我们面前，似乎只有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命运在所有最柔软、最可塑的材料上刻下了图案。

Thus the Apollonian rescues us from Dionysian universality and delights us with individuals. It attaches our aroused feelings of sympathy to them, and with them it satisfies our sense of beauty, our longing for great and awe-inspiring forms. It presents images of life to us and provokes us to a thoughtful grasp of the kernel of life contained in them. With the immense power of imagery, ideas, ethical instruction, and sympathetic arousal, the Apollonian lifts man up out of his ecstatic self-destruction and blinds him to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Dionysian process, leading him to the delusion that he is watching just one image of the world (for example, Tristan and Isolde) and that the music only helps him see it better and with greater profundity.

因此，日神将我们从醉境的普遍性中解救出来，并且以个体取悦我们。它将我们的同情心依附于个性之上，用它来满足我们对于美感，以及对伟大的和崇高形式的渴望。它将生活的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唤起我们对生活真谛的彻底理解。通过形象、思想、道德的指导，以及共鸣的巨大力量，日神能够将人们从糜烂的自我毁灭中解救出来，引导他们走出醉境过程的普遍性，走向幻觉之中，让他以为自己看到的仅仅是世界的一幅图景，（比如说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而且音乐能够帮助他更好、更深入地理解。

What can the skilful healing power of Apollo's magic not achieve, if it can even excite in us this delusion, so that it seems as if the Dionysian is really working to serve the Apollonian, capable

of intensifying its effects—in fact, as if the music was essentially an artistic presentation of an Apollonian content?

有什么是梦神的治愈能力所无法做到的呢？如果它能使我们因幻觉而兴奋，那么酒神似乎真的是服务于日神的，并且能够加强梦的效果——事实上，好像音乐根本上就是展现梦境内容的艺术表现。

With that pre-established harmony which reigns between the perfect drama and its music, drama attains an extreme degree of vividness, something which verbal drama cannot approach. In the independently moving melodic lines all the living forms in the scene simplify themselves into the clarity of curved lines, and the juxtaposition of these lines sounds out to us, sympathizing in the most delicate way with the action as it moves forward. As this happens, the relation of things becomes immediately audible to us in a more sensuously perceptible way, which has nothing abstract about it at all, as we also recognize through it that only in these relations does the essence of a character and of a melodic line clearly reveal itself.

由于预期中完美戏剧和音乐之间的和谐，戏剧达到了最高程度的生动性，这是话剧难以企及的。在舞台上所有活灵活现的形象，凭借着各自独立运动的旋律线条，在我们眼前简化成清晰的曲线。从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里，我们听出了它们以巧妙的方式应和着每一个向前的舞步。当这一切发生时，我们能够以一种更能察觉的方式直接听出事物之间的联系，而非抽象的体会。通过它，我们还认识到，就是在这些关系中，一种特性或者一段旋律线的本质才能表现得清楚。

And while the music compels us in this way to see more and more profoundly than ever and the scenic action spreads itself in front of us like a delicate spider's web, our inner view of the world of the stage is infinitely widened and illuminated from within. What could a word poet offer analogous to this—someone who struggles with a very imperfect mechanism in indirect ways to attain with words and ideas that inner expansion of the vivid world of the stage and its inner illumination? Musical tragedy, of course, also uses the word,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set beside it the fundamental basis and origin of that word and reveal to us from inside what that word has become.

尽管音乐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我们看待事物做出越来越深入的观察，剧情也像精细的蛛网一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内心对于舞台世界的视野却在无限地扩张，从内心回照舞台。对于像这样的问题，用文字表达的诗人又能说出什么呢——他用语言和思想这些不完备的机制来间接地获取对舞台世界视野的无限扩张，和内心对舞台的回照？当然，音乐悲剧也是要使用文字的，但同时它可以不顾那些歌词的基础和根源就能够阐释清楚歌词的发展。

But nonetheless we could just as surely claim about this depiction of the action that it is only a marvelous appearance, i.e., that previously mentioned Apollonian delusion, through whose effects we should be relieved of the Dionysian surge and excess. In f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and drama is fundamentally the reverse—the music is the essential idea of the word, and the drama is only a reflection of this idea, its isolated silhouette.

但是，关于上述整个过程，我们还可以明确地指出：那不过是一

场华丽的表象而已，亦即之前所述的梦境式的幻觉。有了这一效果，我们就可以摆脱醉境式的情感冲动和过度兴奋。实际上，音乐与戏剧之间的关系恰恰相反——音乐是歌词的基本思想，而戏剧只是反映这一世界观，是音乐的孤立剪影。

This identity between the melodic line and the living form, between the harmony and the relation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at form, is true in a sense opposite to what it might seem to be for us as we look at musical tragedy. We may well stir up the form in the most visible way, enliven and illuminate it from within, but it always remains only an appearance, from which there is no bridge leading to true reality, to the heart of the world. But music speaks out from this heart, and though countless appearances could clothe themselves in the same music, they would never exhaust its essence—they would always be only its external reflection.

这些旋律线条与人物形象之间的统一，音乐谐调与人物关系之间的统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与我们在观看音乐悲剧时候的感觉正好相反。我们完全可以在内心里塑造出可视的形象，让他活灵活现，光彩照人；但是，它最终不过是一种表象，从表象走向真正的现实，通向世界的心灵，是不存在桥梁的。然而，音乐诉说着世界的心声，即便无数的表象可能通过同样的音乐而出现，但是它们永远不能说尽音乐的奥秘，而往往只是浮于表面而已。

And, of course, with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and drama nothing is explained and everything is confused by the popular and entirely false contrast between the soul and the body. But among our aestheticians it's precisely the unphilosophical crudity of this contrast which seems to have become, for reasons

nobody knows, a well known article of faith, while they have learned nothing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ppearance and the thing-in-itself or, for similarly unknown reasons, don't want to learn anything.

当然，至于音乐与戏剧之间的复杂关系，没有什么可以解释清楚的。如果用灵与肉这种具有对立概念的概念来解释这种关系的话，那只会把问题搞得一塌糊涂，因为这种对立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俗见。可是，对于我们的美学家来说，就是这个非哲学的浅薄二元论似乎成为了一个著名的信条。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至于现象与物体自身之间的差异，他们也一无所知。同样，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连去探索的意愿都没有。

If one result of our analysis might be that the Apollonian in tragedy, thanks to its deception, emerges victorious over the primordial Dionysian elements of music and makes use of these for its own purposes, that is, for the highest dramatic clarity, a very important reservation naturally follows: at the most essential point of all that Apollonian deception is broken up and destroyed. Drama, which, with the help of music, spreads out in front of us with such innerly illuminated clarity in all its movements and forms, as if we were seeing the fabric on the loom while the shuttle moves back and forth, achieves its effect as a totality which lies beyond all the artistic workings of the Apollonian. In the total action of tragedy the Dionysian regains its superiority once more. Tragedy ends with a tone which never could resound from the realm of Apollonian art.

如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话，即悲剧中的日神风格，由于它具有梦幻性，所以战胜了音乐里原始酒神的醉境要素，并利用它到

达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使戏剧得到最高的清晰度，那么自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需要保留：那就是，在最重要的关键处，这种梦幻性会遭到破灭和毁灭。在音乐的帮助下，戏剧自我们面前铺展开来，由内而外散发着光芒，使得全部动作和形态清晰可见，宛若梭子上下闪动，织出帛锦。戏剧达成了其整体性的效果，一种在一切日神艺术效果彼岸的效果。酒神因素在悲剧的总效果中重新找回了优势。悲剧结束时的那种音调，在日神艺术领域里闻所未闻。

And as that happens, the Apollonian deception reveals itself for what it is, as the veil which, so long as the tragedy is going on, has covered the essentially Dionysian effect. But this Dionysian effect is nonetheless so powerful that at the end it drives the Apollonian drama itself into a sphere where it begins to speak with Dionysian wisdom and where it denies itself and its Apollonian visibility. So we could truly symboliz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pollonian and the Dionysian in tragedy with the fraternal bond between both divinities: Dionysus speaks the language of Apollo, but Apollo finally speaks the language of Dionysus, and with that the highest goal of tragedy and art in general is attained.

因此，日神幻景原形毕露，即它在悲剧上演时，将真正的酒神效果掩盖了起来。然而，在悲剧行将落幕时，强大的酒神效果将日神戏剧推进到一种境地，令它开始讲述酒神的智慧，否定自己和自己鲜明的日神特点。所以，我们可以说，酒神和日神这两位神灵的兄弟联盟，象征着悲剧中日神因素和酒神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酒神说着日神的语言，而日神最终说起了酒神的语言。这样一来，就达成了悲剧以及一般艺术的最高目的。

An attentive friend should remind himself,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of the pure and unmixed effect of a truly musical tragedy. I think I have described what this effect is like, attending to both aspects of it, so that he will now know how to clarify his own experience for himself. For he will recall how, confronted with the myth unfolding in front of him, he felt himself raised up to some sort of omniscience, as if now the visual power of his eyes was not merely a force dealing with surfaces but was capable of penetrating within, as if, with the help of the music, he could see in front him the turbulent feelings of the will, the war of motives, the growing storm of passions as something which is, as it were, sensuously present, like an abundance of living lines and figures in motion, and thus as if he could plunge into the most delicate secrets of unknown emotions.

请一直听我叙述的朋友，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回忆一下一个真正的音乐悲剧具有的纯真的效果。我想我已经从两个方面阐述了这一效果的内涵，所以他现在该知道如何向自己说清这是什么样的体验了。看着一部神话在眼前表演，他觉得自己被提到了一种“全能”的境界——仿佛他的眼睛视力不仅具有一种对付表面现象的能力，而且还能够穿透其间；仿佛在音乐的帮助下，他可以看到眼前的意志在奔腾，动机在斗争，激情在澎湃。也就是说，这一切都能呼之欲出，好像所有的台词和人物都灵动了起来，从而仿佛他可以潜入不为人知的情感中最微妙的神秘之处。

As he becomes conscious of this highest intensification of his instincts which aim for clarity and transfiguration, nonetheless he feels with equal certainty that this long series of Apollonian artistic

effects does not produce that delightful indifference of will-less contemplation which the sculptor and the epic poet—that is, the genuine Apollonian artist—bring out in him with their works of art, that is,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world of the individual attained in that contemplation, which is the peak and essence of Apollonian art. He looks at the transfigured world of the stage and yet denies it.

尽管他在本能上追求清晰化和形象化，并在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层次的集约化，但是他同样明白，这一系列梦境艺术的效果，还是不能产生无意识静观所带来的那份怡然自得的心境，像雕刻家和史诗诗人，也就是说，真正的梦境艺术家那样，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来表达出他们内心的这份感受。也就是说，作品必须表达静观中所获得的个性世界，这才是阿波罗艺术的顶峰和精髓。他看着舞台上这个形象化的世界，内心却在否定它。

He sees the tragic hero in front of him in his epic clarity and beauty and, nonetheless, takes pleasure in his destruction. He understands the scenic action to its innermost core, and yet joyfully flies off into the incomprehensible. He feels the actions of the hero as justified and is, nonetheless, still more uplifted when these actions destroy the one who initiated them. He shudders at the suffering which the hero is about to encounter and, nonetheless, because of it has a premonition of a higher, much more overpowering joy. He perceives more things and more profoundly than ever before and yet wishes he were blind.

他觉得眼前的悲剧英雄被叙述得很清晰、很美，然而对于悲剧英雄的毁灭却感到痛快。他能彻底吃透剧中每个情节，然而却喜欢对不好理解的部分钻牛角尖。他觉得英雄人物的行为合情合理，然而当这

些行为摧毁了创造这些行为的人的时候，他却情绪更加高涨。他对英雄将要面临的苦难心惊胆颤，然而正因此，他却期待更高、更强的快感。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看得多、看得深，但是他却但愿自己什么也没有看见。

Where would we be able to derive this miraculous division of the self, this collapse of the Apollonian climax, if not from Dionysian magic, which, while it apparently excites the Apollonian feelings to their highest point, nevertheless can still force this exuberance of Apollonian art into its service? The tragic myth can only be understood as a symbolic picture of Dionysian wisdom by means of Apollonian art. It leads the world of appearances to its limits where it denies itself and once again seeks to fly back into the bosom of the true and single reality, at which point it seems, like Isolde, to sing its metaphysical swan song.

如果不是酒神的魔力，我们到哪里能够推究到这奇妙的自我分裂，这个日神精神至高点的倒塌？尽管酒神精神显而易见地把日神的感情调动到了最高点，却还能强迫热情洋溢的日神艺术为其服务。悲剧的神话只能理解为通过日神的艺术来象征性地表达酒神的智慧。悲剧的神话把表象世界引到它的极限，直到它否定自己，不得不再度寻求飞回真正唯一的现实怀抱。在这个意思上来讲，好像像伊索尔德那样，唱着超凡辞世歌曲。

In the surging torrents of seas of my desires,

在我欲望海洋洪流中，

in resounding tones of fragrant waves,

在咆哮的芬芳巨浪里，

in the blowing All of the world's breath—

在追赶宇宙之呼吸间，

to drown, to sink down to lose consciousness—

淹没、下沉，直至失去知觉——

the highest joy.

这才是至高境界的快乐。

So we remember the experiences of the truly aesthetic listener, the tragic artist himself, as he, like a voluptuous divinity of individualism, creates his forms—in which sense his work can scarcely be understood as an “imitation of nature”—and as his immense Dionysian drive then devours this entire world of appearances in order to allow him, through its destruction, to have a premonition of the original and highest artistic joy in the primordial One.

让我们回顾一下一个真正的审美听众的经验，他本人就是个悲剧艺术家。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他像个性主义妖魔一样，创作出各种人物。从这个意思上来说，他的作品很难说是“对自然的模仿”。第二，由于他身上具有的巨大酒神冲动当时吞噬了整个现象界，使得他能够预感到，通过整个现象界的毁灭，在原始太一里能够找到原始和最高级的艺术快感。

Of course, our aestheticians don't know what to write about this return journey to our original home, about the fraternal bond of the brother gods of art in tragedy, any more than they do about the Apollonian or the Dionysian excitement of the listener, while they never weary of characterizing a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tragic the struggle of the hero with fate, the victory of a moral world order, or the purging of the emotions achieved by tragedy. Such tireless efforts lead me to the thought that in general they may be men incapable of aesthetic excitement, so that when they hear a tragedy perhaps they think of themselves only as moral beings.

当然，对于这场回归故里的旅途，对于梦神与酒神在悲剧艺术中兄弟般的关系，我们的美学家就说不出一二了，只是对具有日神和酒神兴奋心情的听众有所描述。相反，他们不厌其烦地描述英雄与命运抗争、道德世界秩序的胜利，以及悲剧所起的感情净化作用等为悲剧的基本特征。这种不知疲倦的努力导致我在想：一般说来，这些人没有水平解释审美兴奋，所以一旦他们听到悲剧，也许就会把自己视为唯一有道德的人。

Since Aristotle, there has not yet been an explanation of the tragic effect from which one might be able to infer aesthetic

conditions or the aesthetic capability of the listener. Sometimes pity and fear are supposed to be pushed by the serious action to a discharge which brings relief. At other times, we are supposed to feel enthusiastic and elevated because of the victory of good and noble principles, by the sacrifice of the hero, taking that as a service to a moral world order.

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来没有人对悲剧效果做出任何的解释。一个人往往就是通过从悲剧效果来推断出审美条件和听众的审美能力的。有的时候，怜悯与恐惧被认作是严肃剧情导致的一种发泄，这个发泄可以带来解脱。还有的时候，由于英雄做出了牺牲，使得好的、高尚的原则得以胜利，所以我们一定会感到热情洋溢、热血沸腾，并把它看作是维持道德世界次序的。

I have no doubt that for countless men that and only that is precisely the effect of tragedy. But this reveals equally clearly that all these people, together with their aesthetic interpreters, have experienced nothing of tragedy as the highest art. That pathological purgation, the catharsis of Aristotle, which the philologues are uncertain whether to count a medical or a moral phenomenon, brings to mind a remarkable idea of Goethe's. “Without a living pathological interest,” he says, “I have also never succeeded in working on any kind of tragic situation, and therefore I prefer to avoid it rather than seek it out. Could it perhaps be the case that among the merits of the ancients the highest degree of the pathetic was also only aesthetic play for them, while with us the truth of nature must be there as well in order for such a work to be produced?”

我深信，对于无数人来说，悲剧的效果正是这一点，而且仅仅就是这一点。但是，它同时也清晰地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人，连同他们美学的解释家，对于作为最高艺术形式的悲剧，什么也没有体会出来。所谓病理的宣泄，亚里士多德的宣泄（语文学家不知应该把它归入医学的还是道德的现象），使人想起歌德一则有名的观点。他说："我对病理问题没有鲜活的兴趣，我也从来没有成功地写出过任何一种悲剧场面，所以我宁愿回避，也不愿意把这个问题弄清楚。难道这是古代人的一个优点：在他们眼里，最高的感伤不过是一种审美的游戏；在我们眼里，必须要依托自然的真实，这样才能产生出这样的作品？"

After our glorious experiences we can now answer yes to this profound question—after we have experienced with wonder precisely this musical tragedy, how truly the highest degree of the pathetic can be, for all that, only an aesthetic game. For that reason, we're justified in claiming that only now can the primordial phenomenon of the tragic be described with some success. Anyone who nowadays still provides explanations in terms of those surrogate effects from spheres beyond aesthetics and doesn't sense that he has risen above the pathological and moralistic processes may well despair of his aesthetic nature. For that condition we recommend as an innocent substitute the interpretation of Shakespeare the way Gervinus does it with the diligent search for "poetic justice."

经过光荣的体验，我们现在可以对这个深奥的问题给出肯定的答案。也就是说，亲自观看了这场音乐悲剧，我们想确切地知道，最高层面的感伤到底是不是只是一场审美游戏。现在看来这是真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有理由说，到如今，悲剧的原始现象才成功地被描写出来。现在，如果还有谁在审美领域以外来寻找这些替代效果来解

释，并且还意识不到自己的解释是超越了病理和道德的过程，那他一定太缺乏审美能力了。鉴于此，我们建议，按照格尔维纳斯的方法去解读莎士比亚，孜孜不倦地探索出“诗学的正义”。

So with the rebirth of tragedy the aesthetic listener is also born again, in whose place up to this point a strange quid pro quo habitually sat in the theatre space, with half moral and half scholarly demands—the “critic.” In his sphere so far everything has been only synthetic and whitewashe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life. The performing artist in fact didn't really know what he could begin to do with a listener who behaved so critically, and therefore he, together with dramatist or opera composer who inspired him, peered anxiously for the last remnants of life in this discriminating, barren creature incapable of enjoying itself.

所以，随着悲剧的重生，审美观众被复活。以前，代替审美观众坐在剧场的是一个怪人，他既讲道德又讲学术——这就是“批评家”。在他领域里，一切只不过是生活表象的合成与粉饰。演员真的不知道如何对付这样喜欢吹毛求疵的听众，于是他与调动他情感的剧作家或是说和作曲家一道，惶恐不安地在这具有辨别能力的，但自己却没有创造能力，却不会寻找快乐的人身上找到最后一点生活情趣的残余。

But up to this point the general public has consisted of this sort of “critic.” Through education and the press, the student, the school child, indeed even the most harmless female creature has been prepared, without being aware of it, to perceive a work of art in a similar manner. The more noble natures among the artists, faced with such a public, counted on exciting moral and religious forces, and the call for “a moral world view” stepped in vicariously, where,

in fact, a powerful artistic magic should have entranced the real listener.

但是，迄今为止，受众群主要还是由这类“批评家”组成。由于受学校教育的影响，受媒介宣传的影响，中学生、小学生，甚至最无辜的女性观众，也都在不知不觉当中采用类似的方式来看待艺术作品。其中聪明的艺术家，遇到这样的观众，就指望调动道德和宗教的力量。本该在靠强大的艺术魅力征服真正的观众的地方，现在却要靠唤起“道德世界观”间接地介入。

Alternatively, dramatists with a pronounced and at least exciting proclivity for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brought out such clear productions that the listener could forget his critical exhaustion and let himself go with feelings like patriotism or militaristic moments, or in front of the speaker's desk in parliament or with judicial sentences for crimes and vices. And that necessarily led to an alienation from true artistic purposes and directly to a culture of attitudinizing.

还有那么一些剧作家，他们具有明显的，或至少可以说调动起来的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倾向。他们的作品主题明确，不是爱国运动，就是战争；不是国会里的辩论，就是庭审。观众被这些主题所吸引，从而忘记竭力的批评。这就必然导致远离真正艺术的目的，直接走向装腔作势的文化。

But here there stepped in, what in every artificial art up to now has intervened, a ragingly quick deprivation of that very attitudinizing, so that, for example, the view that the theatre should

be used as an institution for the moral education of a people, something taken serious in Schiller's day, is already counted among the incredible antiquities of an education which has been superceded. As the critic came to rule in the theatre and concert and the journalist in the schools and the press in society, art degenerated into an object of entertainment of the basest sort, and the aesthetic critic was used as a way of binding together in a vain, scattered, selfish, and, beyond this, pitifully unoriginal society, of which we can get some sense in Schopenhauer's parable of the porcupines, so there has never been a time when there has been so much chatter about art and when people think so little of it. But can't we still associate with someone who is in a position to entertain himself with Beethoven and Shakespeare? Everyone may answer this question according to his own feelings—with his answer he will at any rate demonstrate what he imagines by the word “culture,” provided he seek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t all and is not already struck dumb with astonishment.

但是，刚刚兴起的这种装腔作势的创作形式，在过去所有的人工艺术形式里都出现过，现在却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衰退。比如说这样一个观点：剧院应该是对大众进行道德教育的机构。这个观点，在席勒时代是被认真对待的；但是现在，却已经变成了不足为训的古风，不复存在。随着批评家开始掌控剧院和音乐厅，记者掌控学校，报社掌控社会，艺术便沦为低俗的娱乐活动了。在一个虚荣、紊乱、自私，加之无创新能力的社会里，审美批评家被视为是一种凝聚人心的手段。如果拜读一下叔本华关于豪猪的寓言故事，就可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现在这样的现象，对艺术只是夸夸其谈，而从不认真思考。这样，我们是不是永远交不上一个懂得谈论贝多芬或莎士比亚的朋友？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回答这个问题，只要他愿意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在那里呆呆地吃惊着，一言不发，他就无论如何都可以表达出，他想象当中的这

个“文化”词的意思。

By contrast, someone with a nobler and more naturally refined ability—even if he also has gradually turned into a critical barbarian in the manner described above—could say something about an unexpected and entirely incomprehensible effect of the sort which something like a happily successful production of Lohengrin had on him, except perhaps he didn't have a hand which could advise him and clearly lead him, so that that incomprehensibly varied and totally incomparable sensation which so shook him at the time remained a single example and, after a short period of illumination, died out, like a mysterious star. That was the moment he had a presentiment of what an aesthetic listener is.

相反，有的人情商高——尽管他也渐渐地喜欢用上面所描述的那种野蛮的批评手段——他可以说出《罗英格林》是一部成功之作，给他留下了快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他始料未及的，而且完全不可思议的。但是，也许当时让他大为震惊的那份不可思议、妙不可言的感觉是因为没有人指点他、指导他，他才这样的。所以，这只能算是一个个案。闪光不了多久，就会像一个神秘的星星消失掉。直到那个时刻，他才揣摩到审美观众的心情。

23

23

Anyone who wants an accurate test for himself to see how closely related he is to the truly aesthetic listener or how much he

belongs with the Socratic-critical community could sincerely ask himself about the feelings with which he receives some miracle presented on stage. In that situation, for example, does he feel offended in his historical sense, which organizes itself on strict psychological causality, or does he, in a spirit of generosity, as it were, make a concession to the miracle as something comprehensible in childhood but foreign to him, or does he suffer anything else at all in that process?

如果有谁想通过精准的考试来测试自己，看看自己离真正的审美听众距离到底有多远，或者还差多少可以算是苏格拉底这类的批评家，他可以真诚地问问自己，在看到舞台上所出现的奇迹时，是什么感觉。他的历史常识是建立在严格的心理因果律之上的，所以说，如果在那种情况下，出现了与他所掌握的历史常识相悖的内容的话，他心里会不会感到不舒服？还是，出于慷慨，对这个奇迹做出让步，权当童年时代听来的故事，只是现在陌生罢了？还是在那一过程中遭受到其他的困惑呢？

For in doing this he will be able to measure how far, in general, he is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myth, the concentrated image of the world, which, as an abbreviation of appearance, cannot work without the miracle. However, it's likely that almost everyone in a strict test would feel himself so thoroughly corrupted by the critical-historical spirit of our culture that he could make the previous existence of the myth credible only with something scholarly, by compromising with some abstractions. However, without myth that culture forfeits its healthy creative natural power: only a horizon reorganized through myth completes the unity of an entire cultural movement.

无论哪一种感受，一般来说，他都能够测量出他对神话到底能够理解多少。神话是世界上人和物的集中体现。作为表象的缩写，它是少不掉奇迹的。但是，很有可能，几乎所有的人在严格的测试中，都会发现自己已被现代文化的历史批判精神腐蚀得太深，以至于他只有通过学术解释和抽象的思维方式，才能相信以前是存在过神话。然而，没有神话，一种文化就会失去健康的、天然的创造力：正是通过神话重新组织的视野，统一了整个文化运动。

Through myth all the powers of illusion and of Apollonian dream are first rescued from their random wandering around. The images of myth must be the unseen, omnipresent demonic sentries under whose care the young soul matures and by whose signs a man interprets his life and struggles for himself. Even the state knows no more powerful unwritten laws than the mythical foundation which guarantees its connection to religion, its growth out of mythic ideas.

正是通过神话，一切想象力，一切梦境的幻想，才获得拯救，免于漫无目的地彷徨。神话的形象，必须是一个肉眼看不见，但无所不在的神灵哨兵。在他们的庇佑下，年轻的心灵成熟起来。在他们的指点下，成年人明白了自己生活和斗争的意义；甚至国家也承认，最有力的不成文法莫过于神话的根基，它保障了国家与宗教之间的联系，保障了国家能按照神话观念发展。

Alongside that let's now place abstract people, those who are not led by myths, as well as abstract education, abstract customs, abstract law, the abstract state. Let's remember the disorderly roaming of artistic phantasy which is not restrained by any secret myth. Let's imagine a culture which has no fixed and sacred

primordial seat but which is condemned to exhaust all possibilities and to live on a meagre diet from all other cultures—and there we have the present, the result of that Socratism whose aim is to destroy myth.

顺着这个思路，让我们设想一下，不靠神话指引的抽象的人、抽象的教育、抽象的风俗、抽象的法律和抽象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设想一下，没有任何神秘的神话，艺术的幻想将会如何五花八门、乱七八糟。让我们设想一下，一种文化没有固定和神圣的神话发祥地，它就必然要穷尽一切可能，并还得依靠其它一切外来文化的微薄食粮生存下去——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是旨在消灭神话的苏格拉底主义招致的结果。

And now the man without a myth stands there, eternally hungry, in the midst of all past ages, rummaging around and digging as he looks for roots, even if he has to shovel for them in the most remote ancient times. What is revealed in the immense historical need of this dissatisfied modern culture, the gathering up of countless other cultures, the consuming desire to know, if not the loss of myth, the loss of the mythic homeland, of the mythic maternal womb?

如今，人们没有了神话，站在那里，总是饥肠辘辘，穿梭在过去所有的时代中，四处挖掘，寻找自己的文化之根，不惜跑到遥远古代去挖掘也在所不辞。为什么这个欲望未遂的现代文化对历史有着强烈的兴趣，收集过无数种其它文化之精华，怀揣如火如荼的求知欲，不都是因为失去了神话，失去了神话的家园，失去了神话的母体吗？

Let's ask ourselves whether the feverish and eerie inner excitements of this culture is something other than a starving man's greedy snatch and grab for food—and who would still want to give such a culture anything, when nothing which it gobbles down satisfies it and when, at its touch, the most powerful and healthiest nourishment usually changes into “history and criticism.”

让我们问问自己，这种文化的狂热而焦躁的内心亢奋，是不是就像一个挨饿的人，已经到了饥饿难耐、饥不择食的地步。假如一个人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东西，不能满足自己的胃口；触碰一下最滋补、最有益的食物，它们又往往化为“历史和批评”，谁还愿意给这个文化添加任何营养呢？

We would also have to experience painful despair over our German being, if it is already inextricably intermixed in a similar way with its culture, or, indeed, if they have become a single unit, as we can observe, to our horror, with civilized France. What for a long time constituted the great merit of France and the cause of its huge superiority—that very unity of being in people and culture—should make us, when we look at it, praise our luck and give thanks that such a questionable culture has had nothing in common up to this point with the noble core of our people's character.

假如我们德国人和德国文化之间像我们见到的触目惊心的文明法国那样，把民族与文化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交织得难分彼此，我们一定会为此而感到痛心和失望。长期以来，是什么造就了法国这么大的一个优点，导致他们具有这么强烈的优越感，就是因为他们的人民与文化相结合。看到此，我们庆幸，我们感激这种低劣的文化迄今为止，与我们那高贵的民族性内核完全格格不入。

Instead of that, all our hopes are reaching out yearningly towards the perception that under his restless cultural life jumping around here and there and these cultural convulsions lies hidden a glorious, innerly healthy, and age-old power, which naturally only begins to stir into powerful motion at tremendous moments and then goes on dreaming once again about a future awakening. Out of this abyss the German Reformation arose. In its choral music there rang out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uture style of German music. Luther's choral works sounded as profound, courageous, spiritual, as exuberantly good and tender as the first Dionysian call rising up out of the thickly growing bushes at the approach of spring. In answer to it came the competing echo of that solemn procession of Dionysian dreamers, whom we have to thank for German music and whom we will thank for the rebirth of the German myth!

然而相反，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渴求到这样的一种认识：在那上蹦下跳、动荡不安的文化生活里，即在这些动荡因素之下，隐藏一股伟大的、内心健康的、古老的力量。这股力量一直在积聚力量，一到那关键的时刻，就会自然而然地爆发。之后，继而再次沉睡，梦想着下次的苏醒。从这个深渊里升起来的是德国宗教改革。在赞美诗音乐里，我们首次听出了德国未来的音乐风格。路德赞美诗的旋律，是那么的意义深刻、华丽、空灵、柔美，宛若在阳春来临之际，从茂密的丛林里，传出酒神第一声迷人的呼唤。回应这一呼唤的是酒神幻想家们庄严的队伍，他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我们要为德国的音乐而感谢他们，我们还将为德国的神话复活感谢他们。

I know that now I have to take the sympathetic friend who is following me to a lofty place for lonely contemplation, where he will have only a few travelling companions. By way of

encouragement I call out to him that we have to keep hold of those leaders who illuminate the way for us, the Greeks. Up to now in order to purify our aesthetic awareness, we have borrowed from them both of those images of the gods, each of whom rules a specific artistic realm, and by considering Greek tragedy, we came to an awareness of their mutual contact and intensification.

我知道，我现在应该把跟随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带到一个更高的境地，在那里只有寥寥几个同行者，这样他们可以独自静观。我要多多给他鼓励，大声对他说，我们要抓住照亮我们前进道路的那些领导者们——希腊人。如今，我们需要做的是净化我们的审美意识。我们从希腊人那里借来了两个神的形象，每个神灵掌管艺术中的某个特殊领域。就拿希腊悲剧而论，我们已经意识到两个神灵彼此作用、相得益彰。

To us the downfall of Greek tragedy must seem to have occurred through a remarkable tearing apart of both of these primordial artistic drives. And this event corresponded to a degen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Greek people—something which demands from us some serious reflection about how necessarily and closely art and people, myth and custom, tragedy and the state are fundamentally intertwined.

对于我们而言，希腊悲剧的崩溃一定是这两位神灵的原始艺术冲动遭到了巨大撕裂导致的。这一撕裂过程中，希腊民族性也随之衰退和改变——这就需要我们对艺术与人民，神话与风俗，悲剧与国家之间为何有必要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做出认真的思考。

That downfall of tragedy was at the same time the downfall of myth. Up to that point the Greeks were instinctively compelled to tie everything they lived through immediately to their myths—in fact, to understand that experience only through this link. By doing that, even the most recent present moment had to appear to them at once *sub species aeterni* (under the eye of eternity) and thus, in a certain sense, to be timeless. In this stream of the timeless, however, the state and art both plunged equally, in order to find in it rest from the weight and the greed of the moment. And a people (as well as a person, by the way) is only worth as much as it can stamp upon its experiences the mark of the eternal, for in that way it is, as it were, relieved of the burden of the world and demonstrates its unconscious inner conviction of the relativity of time and of the True, that is, of the metaphysical meaning of life.

悲剧的崩溃同时也是神话的崩溃。在那之前，希腊人本能地把经历过的一切都会立即与他们的神话联系起来。其实，要想理解这种经历，只要关照一下这种关联，就不难理解了。这样做，即使眼前的时光在他们眼中也会立即变成永恒；因此，从某种意思上来说，是超时间的。然而，在这个超时间的河流里，国家和艺术两者不分高低地投入这条长河里，以便解除当前的压力和贪婪。一个民族（也可是说一个人）究竟有多少价值，也全要看它能在自己的经验上打下多少永恒的印记。因为仿佛只有这样，该民族才能超凡脱俗；这样他们才显出对时间的相对性，对人生的真谛，对人生之哲理无意识的内心信仰。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from this happens when a people begins to understand itself historically and to smash up the mythic bastions standing around it. It is customary for a decisive secularization, a breach with the unconscious metaphysics of its earlier existence, with all the ethical consequences, to be tied in

with this process. Greek art and especially Greek tragedy above all checked the destruction of myth. People had to destroy them in order to be able to live detached from their home soil, unrestrained in the wildness of thought, custom, and action.

如果一个民族开始从历史上认识自己，并且摧毁设在周围的神话堡垒，那就会发生截然相反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该民族一定会毅然决然地还俗，这将有悖于他们早期生活中的无意识哲理，及其一切道德结论。希腊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首先阻止的是神话的毁灭。所以，人们必须毁灭了这两者，才能摆脱对故土的思念，摆脱思想上的胡思乱想，不再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

But now this metaphysical drive still tries to create, even in a toned down form, a transfiguration for itself, in the Socratism of science which pushes toward life. But on the lower steps this very drive led only to a feverish search, which gradually lost itself in a pandemonium of myths and superstitions from all over the place all piled up together. For all that, the Hellene still sat in the middle this pile with an unquenched heart, until he understood to mask that fever, like Graeculus, with Greek cheerfulness and Greek negligence or to plunge completely into some stupefying oriental superstition or other.

但是现在，这种超凡的冲动，还在苏格拉底主义学科里努力地为自己创造出一种变容，甚至这种变容很低调，也在所不辞，因为这种变容推动着生活继续向前进。但是，在其较低阶段，这种冲动只能导致狂热的探索，逐步消失在堆积各地的神话和迷信的大混乱场面中。即使如此，希腊人带着一颗未泯的探索之心，安详地端坐在这一堆神话和迷信中央，直到他们懂得如何像格里库卢斯那样，用希腊人的开

朗和从容来掩饰那份狂热。或者是全身心地投入那种迷醉的东方迷信或别的东西。

In the most obvious way, since the reawakening of Alexandrian-Roman antiquit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after a long and difficult to describe interval, we have come closer to this condition. Up on the heights this same abundant desire for knowledge, the same dissatisfied happiness in discovery, the same immense secularization, alongside a homeless wandering around, a greedy thronging at foreign tables, a reckless idolizing of the present or a lifeless numbed turning away—with everything *sub specie saeculi* (under the eye of the secular age), of the "present age." These same symptoms lead us to suspect the same lack at the heart of this culture—the destruction of myth. It seems hardly possible that transplanting a foreign myth would enjoy any lasting success, without irreparably damaging the tree in the transplant. Perhaps it is at some point strong and healthy enough to slice out this foreign element with a fearful struggle, but usually it must proliferate its diseased condition, sick and faded.

不知道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罗马的古风中断了很久，到了十五世纪才再度兴起。显然，我们现在已经靠近这个时局了。站在这高高的层面上，求知欲还是那么旺盛，探索未知欲还是那么强烈，尽管自己还是在那里无家可归地游荡，窥视异国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盲目地崇拜当下或麻木不仁地对毫无生机的当下背离。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逃脱“现代”世俗的视野。这些征兆，使我们怀疑这种文化的核心同样有缺陷——那就是神话的毁灭。移植一种外国神话，而且要获得永久性的成功，又不致于在移植的过程当中，对这棵大树造成任何无法挽回的伤害似乎是绝不可能的。也许，有的时候，这棵大树很强壮、很健康，足以排除一切异己因素，酣畅淋漓地与它们肉搏一场；但是一般

说来，它必须在其病灶处，把有病的、凋零的地方医治好，使之枝繁叶茂。

We have such a high regard for the pure and powerful core of the German being that it is precisely there we dare to expect from it that elimination of powerfully planted foreign elements and consider it possible that the German spirit will come back into an awareness of itself on its own. Perhaps some people will think that this spirit would have start its struggle with the elimination of the Romantic But at that point he has to remember an external preparation and encouragement in the victorious courage and bloody glory of the recent war but search for the inner necessity in the competitive striving always to be worthy of the noble pioneers on this road, including Luther just as much as our great artists and poets.

我们十分看重德国民族性的纯真而强大的核心，所以我们敢于期待它能排除那些已经强行移入的异己因素，并期待德国精神有可能自发地重新做出自觉的意识。或许，有些人有的时候认为，德国精神的斗争一定是从排除罗马因素开始的；但有的时候，他们却又必须记住此前战争（普法战争）胜利的骁勇精神和浴血奋斗的光荣只是给予重建德国文化提供了外在的准备和鼓励，同时他们还要在这场竞争性的斗争中寻找到内在的必要性，通过彰显走在这条道路上的先驱们，包括路德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和诗人，来驱除德国文化中的法国因素。

But let him never believe that he can fight such a battle without his house gods, without his mythic homeland, without a “bringing back” of all German things! And if the German in his hesitation should look around him for a leader who will take him

back again to his long lost home land, whose roads and pathways he hardly knows any more, let him only listen to the sweet enticing call of the Dionysian bird hovering above him seeking to show him the way.

德国人不要指望，他们没有家族守护神的保护，没有神话的家园，没有所有的德国东西回归，能够赢得这场战斗！如果处在迷茫之中的德国人，决定环顾四周，寻找一位能够带领他们重回久违家乡的人，因为这条回家之路他们已经不再熟悉，那么就让他听从盘旋在他头顶上，指引他们回家的酒神之鸟所发出的甜美动听的召唤，跟着上路吧。

24

24

Among the characteristic artistic effects of musical tragedy we had to stress an Apollonian illusion through which we are supposedly rescued from immediate unity of being with the Dionysian music, while our musical excitement can discharge itself in an Apollonian sphere, in a visible middle world which interposed itself. By doing this we thought we had noticed how, through this discharge, that this middle world of the scenic action, the drama in general, to a certain degree became visible and comprehensible from within, in a way which is unattainable in all other Apollonian art. Hence, it was here, where the Apollonian is energized and raised aloft, as it were, through the spirit of the music, we had to recognize the highest intensification of its power and, therefore, in the fraternal bond of Apollo and Dionysus the highest point of both Apollonian and Dionysian artistic aims.

在音乐悲剧众多的特色艺术效果中，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梦境的幻觉效果。我们有了梦境的幻觉，就不会与醉境音乐直接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对音乐的激情只释放在梦境领域里，它显而易见地处在中观世界。通过这点，我们想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戏剧的艺术，即一般的戏剧，通过这一释放，在某种程度上，由内到外地显现出来，容易理解。那份感觉在其它梦境艺术中得不到的。在这里，梦境借助音乐的精神，表现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这已经是梦境力量最强烈的表现了。日神和酒神兄弟般的联盟就是梦境和醉境艺术所追求的至高点。

Of course, the projected Apollonian image with this inner illumination through music does not achieve the effect characteristic of the weaker degrees of Apollonian art—what epic or animated stone are capable of, compelling the contemplating eye to that calm delight in the world of the individual. In spite of a higher animation and clarity, that effect will not permit itself to be attained

当然，通过音乐的内在诠释所展现出的日神形象，并未起到程度较弱的日神艺术所特有的那种效果，而这种效果正是史诗或石像能够带来的，它迫使我们把静观的目光投向个体世界里无言的喜悦。在这里，尽管艺术表现更具活力，更为清晰，但是这一效果却是自身无法得到呈现的。

We looked at drama and with a penetrating gaze forced our way into the inner moving world of its motives—and nonetheless for us it was as if only an allegorical picture passed before us, whose most profound meaning we thought we could almost guess

and which we wanted to pull aside, like a curtain, in order to look at the primordial image behind it. The brightest clarity of the image did not satisfy us. For this seemed to hide just as much as it revealed. And while, with its allegorical-like revelation, it seemed to promise to rip aside the veil, to disclose the mysterious background, once again that penetrating light illuminating everything held the eye in its spell and held it from penetrating any more deeply.

我们观看戏剧，是用洞察的慧眼直视戏剧动机内部那动人心弦的世界的——然而，对于我们而言，那只是一种寓意式的画面，从我们眼前掠过而已。它最深邃的意义，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得到。于是，我们想像拉帷幕那样，把眼前的帷幕拉到一边，以便看到其背后的原形。此时，无论画面多么清晰，都不能满足我们内心的需求，因为暴露的有多少，隐蔽的就有多少。尽管那个具有相似寓意的启示似乎有希望把帷幕拉开，去暴露神秘的背景，这个刺眼的灯光再一次把我们所能看到的给妖魔化了，让我们看得更深。

Anyone who has not had the experience of having to watch and, at the same time, of yearning to go above and beyond watching will have difficulty imagining how definitely and clearly these two processes exist together and are felt alongside each other as one observes the tragic myth. However, the truly aesthetic spectators will confirm for me that among the peculiar effects of tragedy this co-existence may be the most remarkable.

任何人，只要他没有经历过一边看戏，一边渴望超越看戏的感觉，就很难想象出，在看悲剧的时候，这两个过程的确同时分明地存在着，清晰可感。真正具有审美情趣的观众一定会证实我这一观点

的，即在悲剧所有的特殊效果中，这种并存的现象最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If we now translate this phenomenon going on in the aesthetic spectator into an analogous process in the tragic artist, we will have understood the genesis of the tragic myth. He shares with the Apollonian sphere of art the full joy in appearances and in watching—at the same time he denies this joy and has an even higher satisfaction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visible world of appearances.

如果我们现在把发生在观众身上的这一审美过程转换到悲剧艺术家身上，我们就能明白悲剧神话的起源了。悲剧艺术家同日神艺术一样，乐于表象、乐于观看——同时，他也否定这种快感，甚至从表象可感世界的毁灭中获取更高的满足。

The content of the tragic myth is at first an epic event with the glorification of the struggling hero. But what is the origin of that inherently mysterious feature, the fact that the suffering in the fate of the hero, the most painful victories, the most agonizing opposition of motives, in short, the exemplification of that wisdom of Silenus, or, expressing it aesthetically, of the ugly and dissonant, in so many countless forms, is presented with such fondness, always renewed—and precisely in the richest and youngest age of a people? Do we not perceive in all this a higher pleasure?

悲剧神话的内容，首先是讴歌战斗英雄的史诗事件。但是，英雄人物总是命途多舛，胜利来之不及，内心动机冲突导致极度痛苦。简而言之，是一种西勒诺斯智慧的范例。或者说，用美学术语来讲，丑

陋与不和谐，出现在无数的艺术形式里，总是受到如此的青睐，常绘常新，特别是在一个民族最富有、最年轻的时代，更是这样。这种莫明其妙的特点从何而来的？难道不是人们从中看到了更高层次的快乐吗？

For the fact that in life things are really so tragic would at least accou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 art form—if art is not only an imitation of natural reality but a metaphysical supplement to that reality, set beside it in order to overcome it. And the tragic myth, in so far as it belongs to art at all, also participates fully in this general purpose of art to provide metaphysical transfiguration. But what does it transfigure, when it leads out the world of appearance in the image of the suffering hero? Least of all the “Reality” of this world of appearances, for it says directly to us: “Look here! Look right here! This is your life! This is the hour hand on the clock of your existence!”

如果说艺术不仅仅是自然现实的模仿，而且是对那个现实做出的形而上学补充，那么生活中的事情如此悲惨这一事实，至少是能够解释一种艺术发展的成因。艺术与生活并行是为了最终超越它。正因为悲剧神话无疑属于艺术范畴，它也将会彻底地参与到以一般性为目的实现艺术活动中去，以便提供形而上的变容作用。问题是，当它导致现象世界以受苦的英雄人物形象出现的时候，它使什么产生了变容？再怎么也不会是这个表现世界的所谓“现实”，因为它直接对我们说：“在这里，就看这样，这就是你的生活！这就是你生存时钟上的时针！”

And does the myth show us this life in order to transfigure it for us? If not, in what does the aesthetic joy consist with which we

also allow these images to pass in front of us? I ask about aesthetic delight and know full well that many of these images can in addition now and then still produce a moral pleasure, for example, in the form of pity or a moral triumph. But whoever wants to derive the effect of the tragic merely from these moral origins—as, of course, has been customary in aesthetics for far too long—should not think that he has then done anything for art, which above all must demand purity in its realm. For an explanation of the tragic myth the very first demand is that he seeks that joy characteristic of it in the purely aesthetic sphere, without reaching over into the territory of pity, fear, and the morally sublime. How can the ugly and dissonant, the content of the tragic myth, excite an aesthetic delight?

神话向我们展示这样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改变这样的生活？如果不是，那我们为什么容许这些形象从我们眼前经过，并能从中体验到审美的快感呢？我研究的是审美快感，所以我十分了解，许多这样的形象，不但能给我们带来审美的快感，而且有的时候，还能给我们带来道德上的快感，例如怜悯，或道义胜利之类的。但是，无论是谁，只要他仅从这些道德的根源寻找悲剧效果的话（当然，长期以来，这种现象在美学界已经司空见惯了），都不能因此以为自己已经为艺术做出过什么贡献，因为艺术首先必须要求其范围内的纯粹性。为了能够解释悲剧的神话，首先要求做到的是，他必须在纯审美的范围内找到属于自己特有的快感，而不是涉足到怜悯、恐惧、道德崇高等这些的领域。怎么可能有内容丑陋且不和谐的悲剧神话，还能激发我们的审美情趣呢？

He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vault with a bold leap into a metaphysics of art, in which I repeat an earlier sentence—that existence and the world appear justified only as an aesthetic

phenomenon. It's in this sense that the tragic myth has to convince us that even the ugly and dissonant are an artistic game, which the will, in the eternal abundance of its joy, plays with itself. But there's a direct way to make this ur-phenomenon of Dionysian art, so difficult to comprehend, completely understandable and to enable one to grasp it immediately—through the miraculous meaning of musical dissonance, the way the music, set next to the world, is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give an idea of what it means to understand a justification of the world as an aesthetic phenomenon. The joy which the tragic myth produces has the same homeland as the delightful sensation of dissonance in music. The Dionysian, together with its primordial joy felt even in pain, is the common birth womb of music and the tragic myth.

至此，我们有必要勇往直前，大胆地跳进艺术的形而上学里。我重复一下我在前面解释艺术的形而上学时所说过的那句话——人的生存和万象世界，只有作为审美现象才能显得合情合理。从这一意义来说，悲剧神话应该能够说服我们相信，即使丑陋且不和谐的事情也是一种艺术游戏，也是意志以永远丰富多彩的快乐形式在那里自娱自乐。不过，酒神艺术这个难以把握的艺术，虽然非常难理解，但是还是有一条捷径使它完全被理解，使人们立即能够掌握——这就是通过音乐中的不谐和音。音乐，仅次于世界，其表现方式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世界作为审美现象的合理性。悲剧神话所产生的快感与音乐中不和谐音所带来的快乐之情都来源于共同的故土。甚至醉酒，以及它原始快乐的疼痛感，也都是音乐和悲剧神话在同一母体降生时候产生的。

Thus, shouldn't we have made that difficult problem of the tragic effect really much easier now that we have called on the relation of musical dissonance to help us? For now we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in tragedy to want to keep look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yearn for something beyond what we see. We would have to characterize this condition in relation to the artistic use of dissonance precisely as the fact that we want to keep listen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yearn to get beyond what we hear.

既然我们求助于音乐不和谐的关系来帮助我们理解，那么我们不就已经使得悲剧效果这个难题变得容易些了吗？因为现在我们终于明白，悲剧里面什么叫做一边看戏，一边渴望得到超越我们所看到的戏外东西。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状态等同于不和谐的艺术使用，这是因为我们愿意聆听，但同时我们还渴望得知所听以外的东西。

That striving for the infinite, the wing beat of longing, associated with the highest delight in clearly perceived reality, reminds us that in both states we must recognize a Dionysian phenomenon, which always reveals to us all over again the playful cracking apart and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of the individual as the discharge of primordial delight,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one in which gloomy Heraclitus compares the forc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to a child who playfully sets stones here and there, builds sand piles, and then knocks them down again.

在清晰可感的现实里，已经到达了最高层次的快乐，现在却又向往无限，振翅欲飞。这种现象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两种状态中都存在着梦境现象。它总是不断地向我们显示出有趣的裂变游戏，在释放原始快感的同时，把个性世界毁灭。这种做法类似于忧郁的赫拉克利特把建立世界的力量比作为一个在那里开心玩耍的孩子，这个孩子到处砌石头墙、筑沙子堆，然后再把它们全部推掉。

And thus in order to assess the Dionysian capability of a people correctly, we have to think not just about their music; we must also to think about their tragic myth as the second feature of that capacity. Given this closest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music and myth, now we can in a similar way assume that a degeneration or deprivation of one of them will be linked to a decline in the other, if a weakening of myth in general manifests itself in a weakening of the Dionysian capability.

因此，为了正确评估一个民族的醉酒的能力，我们不能只考虑他们的音乐，而且还需把悲剧神话作为这个能力的第二特征加以考虑。鉴于音乐与神话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断言，二者中的任何一方，无论蜕化还是丧失，都将导致另一方的衰败。一般说来，神话衰微，往往表示出醉境能力的削弱。

But concerning both of these, a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rman being should leave us in no doubt: in the opera as well as in the abstract character of our myth-deprived existence, in an art which has sunk down to mere entertainment as well as in a life guided by concepts, that inartistic and equally life-draining nature of Socratic optimism stands revealed.

但是，至于这二者，只需要看一下德国民族的发展就让我们一目了然：无论在歌剧里还是在其实不存在神话的抽象人物身上，是在已经堕落为纯粹娱乐的艺术里还是在被概念指导的生活中，苏格拉底式的乐观主义依然在展露着它那非艺术性的、使生命干涸的本质。

For our consolation, however, there are indications that in spite

of everything the German spirit rests and dreams in magnificent health, its profundity and Dionysian power undamaged, like a knight sunk down in slumber in an inaccessible abyss. And from this abyss, the Dionysian song rises up to us in order to make us understand that this German knight is also still dreaming his age-old Dionysian myth in solemn blissful visions. Let no one believe that the German spirit has lost for ever its mythic homeland, when it still understands so clearly the voice of the birds which tell of that homeland. One day it will find itself awake in all the morning freshness of an immense sleep. Then it will kill dragons, destroy the crafty dwarf, and awake Brunnhilde—and even Wotan's spear itself will not be able to block its way.

但是，令我们欣慰的是，有迹象表明，无论怎么说，德国精神处在无比健康的状态中休息、沉睡。它厚积薄发的特征以及酒神力量都完好无损，犹如一个沉睡在深不可测的渊壑里的骑士。从这个渊壑里飘出酒神的颂歌，让我们明白，这位德国骑士，在庄严而快乐的梦境中，仍然梦见他古老的酒神神话。我们不要以为德国精神已经永远失去了它的神话故乡，只要它还能清晰地听懂叙说神话故乡的鸟鸣，就没有丢失。总有一天，德国精神在神清气爽的早晨，从酣睡中一觉醒来。之后，它斩杀蛟龙，铲除狡猾的侏儒，唤醒布伦希尔德，甚至沃顿的长矛也别妄想阻止得了德国精神前进的道路！

My friends, you who have faith in Dionysian music, you also know what tragedy means to us. In it we have the tragic myth, reborn from music—and in it you must hope for everything and forget what is most distressing! The most painful thing, however, for all of us is this—the long degradation under which the German genius, alienated from house and home, has lived in service to that crafty dwarf. You understand my words—as you also will

understand my hopes as I conclude.

我的朋友，只要信仰酒神音乐，你也会知道，悲剧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在悲剧中，我们见到悲剧神话从音乐里重生——在悲剧中，你一定期待所有，而忘却最令人揪心的事情！然而，长期堕落之下，德意志的天才远离其家族和家庭，为那个狡猾的侏儒效劳，这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你们能明白我的话，同样你们也会明白我在此所寄予的希望。

25

25

Music and tragic myth are equally an expression of the Dionysian capacity of a people and are inseparable from each other. Both derive from an artistic realm that lies beyond the Apollonian. Both transfigure a region in whose joyful chords dissonance as well as the terrible image of world fade delightfully away. Both play with the sting of joylessness, trusting in the extreme power of their magical arts. Through this play both justify the existence of even the “worst of worlds.” Here the Dionysian shows itself, measured against the Apollonian, as the eternal and primordial artistic force, which summons the entire world of appearances into existence. In its midst a new transfiguring illusion becomes necessary in order to keep alive the living world of the individual. Could we imagine some human development of dissonance—and what is a man other than that?—then this dissonance, in order to capable of life, would need a marvelous illusion, which covered it with a veil of beauty over its essential being. This is the true artistic purpose of Apollo, in whose name we put together all those countless illusions of

beautiful appearances which render existence at every moment in general worth living and push us to experience the next moment.

音乐和悲剧神话铢两悉称、不分彼此，都是一个民族酒神精神能力的表达。二者都是来自于日神精神以外的一个艺术领域，并使之靓丽了起来。在其欢快的大合唱里，世上一切不和谐和可怕的形象都心甘情愿开心地逃之夭夭。二者都在那拨动琴弦，歌颂艺术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二者要借助这场表演，阐释世界上即使是最坏的东西，也有其生存的道理。在此，酒神以与日神相反的形象出现，以永恒的原始艺术动力展示自己，召唤所有的外观变为实体。其间，一种新的变形幻觉必不可少，有了它，活生生的个体世界才能活灵活现地现形。我们能想象出人类一些不和谐的发展吗？没有它，人会变成什么样？这些不和谐的东西，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具有超凡的幻觉能力，用美丽的面纱遮盖着自己的存在。这是阿波罗艺术的真实目的，在阿波罗艺术名下，我们把数不胜数漂亮的假象外表集聚在了一起，使得每时每刻，世间万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价值，促使我们在下一时刻有机会体验它们。

But in this process, from that basis for all existence, the Dionysian bed rock of the world, only as much can come into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human individual as can be overcome once more by that Apollonian power of transfiguration, so that both of these artistic drives are compelled to display their powers in a strictly mutual propor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eternal justice. Where Dionysian power rises up as impetuously as we are seeing it rise, there Apollo must already have come down to us, hidden in a cloud. The next generation may well see the richest his beautiful effects.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酒神世界的基石从万象生存的根底进入人们的意识，却遭到日神变形力量的全部消解，因此现在二者不得不遵循永恒合理的原则严格地以势均力敌的方式自我再现。当我们看到酒神精神高歌猛进的时候，日神阿波罗一定已经日落西山，躲在了云彩后面，等待后来之人饱览这绮丽的晚霞。

However, the fact that this effect is necessary each man will experience most surely through his intuition, if he once, even in a dream, feels himself set back into the life of the ancient Greeks. As he wanders under high Ionic colonnades, glancing upwards to a horizon marked off with pure and noble lines, with reflections of his transfigured form beside him in shining marble, around him people solemnly striding or moving delicately, with harmoniously sounding lutes and a speech of rhythmic gestures—faced with this constant stream of beauty, would he not have to extend his hand to Apollo and cry out: “Blessed Hellenic people! How great Dionysus must be among you, if the Delphic god thinks such magic necessary to heal your dithyrambic madness!” To a person in such a mood as this, however, an old Athenian, looking at him with the noble eye of Aeschylus, might reply: “But, you strange foreigner, how much must these people have suffered in order to be able to become so beautiful! But now follow me to the tragedy and sacrifice with me in the temple of both divinities.”

然而，这种效应必定是每个人在直觉中体验过的，特别是那些曾经在梦中穿越过到古希腊，体验过那里生活的人，哪怕他只有一次，也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当他徜徉在爱奥尼亚柱廊下面的时候，抬头看到水平线上有着优雅高贵的分隔划线，光亮亮的大理石上侧映着他那变形的倩影，在他的周围，有的人迈着庄严的步伐往前冲，有的则轻盈碎步往前走，耳边响起的是悠扬的鲁特琴声，看到的是韵律般的肢

体语言——面对这一串串的美景，你怎能让他不伸出双手对着阿波罗大声喊道：“多么幸运的希腊人啊！如果日神阿波罗觉得这种奇观异景有助于治愈你们疯子般的癫狂，那么酒神狄奥尼索斯在你们当中就一定会感到无比的幸福！“但是此时，很可能出现一位雅典老者，他带着埃斯库罗斯似的神圣眼神看着这位心处此境的人说：“然而，你这样陌生的异乡人，你可知道，这些人都是吃尽人间苦，方为人上人的！你还是跟我去看悲剧吧，与我在双神俱在的圣殿里祭拜吧。”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道德原则研究

David Hume

大卫·休谟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道德原则研究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大卫·休谟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AUTHOR'S ADVERTISEMENT 作者言
- SECTION 1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MORALS 第一章 论道德的一般原则
- SECTION 2 OF BENEVOLENCE 第二章 论仁爱
- SECTION 3 OF JUSTICE 第三章 论正义
- SECTION 4 OF POLITICAL SOCIETY 第四章 论政治社会
- SECTION 5 WHY UTILITY PLEASES 第五章 效用为何使人愉悦
- SECTION 6 OF QUALITIES USEFUL TO OURSELVES 第六章 论对我们自己有用的品质
- SECTION 7 OF QUALITIES IMMEDIATELY AGREEABLE TO OURSELVES 第七章 论直接令我们自己愉快的品质
- SECTION 8 OF QUALITIES IMMEDIATELY AGREEABLE TO OTHERS 第八章 论直接令他人愉快的品质
- SECTION 9 CONCLUSION 第九章 结论
- APPENDIX 1 CONCERNING MORAL SENTIMENT 附录一 关于道德情感
- APPENDIX 2 OF SELF-LOVE 附录二 论自爱
- APPENDIX 3 SOME FARTHER CONSIDERATIONS WITH REGARD TO JUSTICE 附录三 对正义的进一步思考
- APPENDIX 4 OF SOME VERBAL DISPUTES 附录四 论几次口头争论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AUTHOR'S ADVERTISEMENT

作者言

Most of the principles, and reasoning, contained in this volume, [1_1] were published in a work in three volumes, calle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A work which the Author had projected before he left College, and which he wrote and published not long after. But not finding it successful, he was sensible of his error in going to the press too early, and he cast the whole anew in the following pieces, where some negligence in his former reasoning and more in the expression, is, he hopes, corrected. Yet several writers who have honoured the Author's Philosophy with answers, have taken care to direct all their batteries against that juvenile work, which the author never acknowledged, and have affected to triumph in any advantages, which, they imagined, they had obtained over it: A practice very contrary to all rules of candour and fair-dealing, and a strong instance of those polemical artifices which a bigoted zeal thinks itself authorized to employ. Henceforth, the Author desires, that the following pieces may alone be regarded as containing his philosophical sentiments and principles.

本书中的大部分原则和推理 [2_1] ，之前已发表于一部名为《人性论》的三卷本著作中，这部著作构思于作者大学毕业之前，撰写和出版于其后不久。发现这部著作并不成功，作者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于将其过早付梓，因而现将其全部重写为以下的章节，希望能够纠正先前推理中以及更多表达上的失误。然而，有些曾撰文对作者的哲学思想惠赠回应的人，却对这部作者本人从未认可的青涩之作不遗余力大加挞伐，且屡屡以臆想之己长攻他人之短以胜人一筹。这种做法与一

切公平公正法则大相背离，是抱有偏见、头脑发热的人自认为有权使用那些诡辩伎俩的一个有力例证。因此，作者强烈希望读者能够仅将以下的章节视作包含了作者的哲学情感和原则。

[1_1].Volume II. of the posthumous edition of Hume's works published in 1777 and containing, besides the present ENQUIRY, A DISSERTATION ON THE PASSIONS, and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 reprint of this latter treatise has already appeared in The Religion of Science Library (NO. 45)

[2_1].1777年版的休谟全集出版于休谟去世之后，其中的第二卷除这里的《道德原则探究》之外，还包括了《论激情》和《人类知性探究》。“科学宗教图书馆”丛书已经重印了《人类知性探究》（第45册）。

SECTION 1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MORALS

第一章　论道德的一般原则

Disputes with men, pertinaciously obstinate in their principles, are, of all others, the most irksome; except, perhaps, those with persons, entirely disingenuous, who really do not believe the opinions they defend, but engage in the controversy, from affectation, from a spirit of opposition, or from a desire of showing wit and ingenuity, superior to the rest of mankind. The same blind adherence to their own arguments is to be expected in both; the same contempt of their antagonists; and the same passionate vehemence, in inforcing sophistry and falsehood. And as reasoning is not the source, whence either disputant derives his tenets; it is in vain to expect, that any logic, which speaks not to the affections, will ever engage him to embrace sounder principles.

相比一切其他争论，与那些固执于坚持自己原则的人争论，是最令人厌烦的；或许只有与那些毫无辩论诚意的人的争论除外，因为，这些人其实并不真正相信他们为之辩护的那些观点，他们之所以与人辩论，或是为了故弄玄虚，或是由于逆反心理作祟，或是想要炫耀其无人能及的机巧才智。可以想见，这两类人都同样盲目地坚持己见，同样蔑视对手，同样诡辩滔滔、谬论连篇。由于这两类争论者都不是凭借推理引申出其信条的，因此，指望他们能凭借不诉诸感情的逻辑转而接受更为正确的原则亦属徒劳。

Those who have denied the reality of moral distinctions, may be ranked among the disingenuous disputants; nor is it conceivable,

that any human creature could ever seriously believe, that all characters and actions were alike entitled to the affection and regard of everyone. The difference, which nature has placed between one man and another, is so wide, and this difference is still so much farther widened, by education, example, and habit, that, where the opposite extremes come at once under our apprehension, there is no scepticism so scrupulous, and scarce any assurance so determined, as absolutely to deny al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Let a man's insensibility be ever so great, he must often be touched with the images of Right and Wrong; and let his prejudices be ever so obstinate, he must observe, that others are susceptible of like impressions. The only way, therefore, of converting an antagonist of this kind, is to leave him to himself. For, finding that nobody keeps up the controversy with him, it is probable he will, at last, of himself, from mere weariness, come over to the side of common sense and reason.

那些否认存在德恶之别这一现实的人，可划归于毫无辩论诚意的争论者之列；我们也无法想象，有谁会真的相信，所有的性格和行为都有同样的资格赢得每一个人的喜爱和尊重。大自然在人与人之间设置了如此巨大的差异，而教育、榜样和习惯更是远远地拉大了这种差异，以至于当我们面对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时，即便是最审慎的怀疑和最坚定的确信也无法彻底否认二者之间存在的所有区别。一个人就算感觉再麻木，也必定常常会被是非对错打动；一个人就算偏见再深固，也必定会看到，其他人更易被类似印象触动。因此，要想让这类争论对手改变观点，唯一的办法就是由他去。因为，当发现没人愿意再和他辩论时，他很可能仅仅是出于厌倦也最终会自行改变立场，站到常识和理性这边来。

There has been a controversy started of late, much better worth

examination, concerning the general foundation of Morals; whether they be derived from Reason, or from Sentiment; whether we attain the knowledge of them by a chain of argument and induction, or by an immediate feeling and finer internal sense; whether, like all sound judgement of truth and falsehood, they should be the same to every rational intelligent being; or whether, like the perception of beauty and deformity, they be founded entirely on the particular fabric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human species.

最近刚刚展开了一场辩论，这场有关道德的一般根基为何的辩论尤为值得我们考察；道德究竟是源于理性还是情感；我们关于道德的知识究竟是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和归纳还是通过一种直接的感受和细微的内在感觉获取的；道德究竟是应该像对真与假的所有正确判断一样，对于每一个有理性有智力的人而言都是相同的，还是应该像对美与丑的感知一样，完全依赖于人类特定的身体组织与结构。

The ancient philosophers, though they often affirm, that virtue is nothing but conformity to reason, yet, in general, seem to consider morals as deriving their existence from taste and sentiment. On the other hand, our modern enquirers, though they also talk much of the beauty of virtue, and deformity of vice, yet have commonly endeavoured to account for these distinctions by metaphysical reasonings, and by deductions from the most abstract principles of the understanding. Such confusion reigned in these subjects, that an opposition of the greatest consequence could prevail between one system and another, and even in the parts of almost each individual system; and yet nobody, till very lately, was ever sensible of it. The elegant Lord Shaftesbury, who first gave occasion to remark this distinction, and who, in general,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ancients, is not, himself, entirely free from the

same confusion.

古时的先哲们，尽管常常断言德不外乎是遵奉理性，但大体上却似乎都认为道德的形成源于品味和情感。另一方面，我们当代的探究者们，尽管也常常论及德之美与恶之丑，却普遍致力于通过形而上的推理和发端于最为抽象的知性原则的演绎来对德恶之别加以解说。这些论题是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最为严重的对立不仅在不同的体系之间会常常出现，甚至在每个体系的不同分支之间也会出现；而对此，直到最近都尚未有人察觉。高雅的莎夫茨伯里勋爵第一个引起人们对德恶之别的关注，而他大体上信奉的是古人的原则，他自己也未能完全摆脱这种混乱。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at both sides of the question are susceptible of specious arguments. Moral distinctions, it may be said, are discernible by pure reason: else, whence the many disputes that reign in common life, as well as in philosophy, with regard to this subject: the long chain of proofs often produced on both sides; the examples cited, the authorities appealed to, the analogies employed, the fallacies detected, the inferences drawn, and the several conclusions adjusted to their proper principles. Truth is disputable; not taste: what exist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is the standard of our judgement; what each man feels within himself is the standard of sentiment. Propositions in geometry may be proved, systems in physics may be controverted; but the harmony of verse, the tenderness of passion, the brilliancy of wit, must give immediate pleasure. No man reasons concerning another's beauty; but frequently concerning the justice or injustice of his actions. In every criminal trial the first object of the prisoner is to disprove the facts alleged, and deny the actions imputed to him: the second to prove, that, even if these actions were real, they might be justified, as

innocent and lawful. It is confessedly by deductions of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first point is ascertained: how can we suppose that a different faculty of the mind is employed in fixing the other?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ho would resolve all moral determinations into sentiment, may endeavour to show,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reason ever to draw conclusions of this nature. To virtue, say they, it belongs to be amiable, and vice odious. This forms their very nature or essence. But can reason or argumentation distribute these different epithets to any subjects, and pronounce beforehand, that this must produce love, and that hatred? Or what other reason can we ever assign for these affections, but the original fabric and formation of the human mind, which is naturally adapted to receive them?

必须承认，问题的两面确实都能提出貌似合理的论点。一方面，人们会说，凭借纯粹理性，德恶之别清晰可辨——盛行于日常生活和哲学中的与道德论题相关的诸多争论由此产生；争论双方往往会提出一长串的论据：援引例证、诉诸权威、运用类比、查找谬误、给出推论，最后，得出若干适用于其各自固有原则的结论。真理是可争论的，品味却不然：存在于事物本质之中的东西是我们的评判标准；而决定每个人内心感觉的则是我们的情感标准。我们可以证明几何学命题，也可以反驳物理学体系；但是，诗歌的和谐音韵、情爱的如水温柔、才智的璀璨夺目，却必定给人以直接的愉悦。没有人凭借理性评判他人的美丑；但是，我们常常凭借理性评判他人行为的正义与否。在每一起刑事案件的审判中，犯人们的第一步目标都是要否认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否认归之于他的犯罪行为；而第二步目标则是要证明，即便他们的行为属实，他们的行为也是正当的，即无罪、合法的。众所周知，通过知性演绎可以达到第一个目标；可我们如何能够认为运用心灵的另外一种官能才能达到第二个目标？另一方面，那些想要将一切道德断定全部都分解为情感的人则会极力证明，理性是绝不可能给出这类结论的。他们说，德是可亲的，恶是可憎的。这就是

德和恶的本性或本质所在。但是，理性或论证能告诉我们何者可亲、何者可憎吗？它们能预先宣告一者必定产生爱、一者必定产生恨吗？或者，除了人类心灵原始的组织与结构之外——它们接受这些情感乃是人类心灵的天性使然，我们还能将其他何种理性派定给这些情感呢？

The end of all moral speculations is to teach us our duty; and, by proper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eformity of vice and beauty of virtue, beget correspondent habits, and engage us to avoid the one, and embrace the other. But is this ever to be expected from inference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understanding, which of themselves have no hold of the affections or set in motion the active powers of men? They discover truths: but where the truths which they discover are indifferent, and beget no desire or aversion, they can have no influence on conduct and behaviour. What is honourable, what is fair, what is becoming, what is noble, what is generous, takes possession of the heart, and animates us to embrace and maintain it. What is intelligible, what is evident, what is probable, what is true, procures only the cool ass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gratifying a speculative curiosity, puts an end to our researches.

一切道德思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教给我们责任；通过恰当地表现恶之丑与德之美，促使我们养成相应的习惯，避恶从德。而我们如何指望能从知性推论和知性结论中获取这些呢？知性推论和结论本身无法左右人的感情，也激发不起人的能动力。它们确实发现了真理；但它们发现的真理是冷漠的，既引发不起欲望也引发不起反感，因而，它们对人的行为举止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可敬的、公正的、适宜的、高贵的以及慷慨的事物占据了我们的内心，鼓动我们去接受、去坚持它们。而易懂的、明显的、可能的以及真实的事物只能得到我们

冷冰冰的知性认同；思辨的好奇心一旦获得满足，我们的探究即告终止。

Extinguish all the warm feelings and prepossessions in favour of virtue, and all disgust or aversion to vice: render men totally indifferent towards these distinctions; and morality is no longer a practical study, nor has any tendency to regulate our lives and actions.

倘若熄灭所有对德行的炽热情爱，消除所有对恶行的厌憎——令人们对德恶之别彻底无动于衷；那么，道德规范就不再是一种实践修习，也不再趋向于调控我们的生活与行为。

These arguments on each side (and many more might be produced) are so plausible, that I am apt to suspect, they may, the one as well as the other, be solid and satisfactory, and that reason and sentiment concur in almost all moral determinations and conclusions. The final sentence, it is probable, which pronounces characters and actions amiable or odious, praise-worthy or blameable; that which stamps on them the mark of honour or infamy, approbation or censure; that which renders morality an active principle and constitutes virtue our happiness, and vice our misery; it is probable, I say, that this final sentence depends on some internal sense or feeling, which nature has made universal in the whole species. For what else can have an influence of this nature? But in order to pave the way for such a sentiment, and give a proper discernment of its object, it is often necessary, we find, that much reasoning should precede, that nice distinctions be made, just conclusions drawn, distant comparisons formed, complicated

relations examined, and general facts fixed and ascertained. Some species of beauty, especially the natural kinds, on their first appearance, command our affection and approbation; and where they fail of this effect, it is impossible for any reasoning to redress their influence, or adapt them better to our taste and sentiment. But in many orders of beauty, particularly those of the finer arts, it is requisite to employ much reasoning, in order to feel the proper sentiment; and a false relish may frequently be corrected by argument and reflection. There are just grounds to conclude, that moral beauty partakes much of this latter species, and demands the assistance of our intellectual faculties, in order to give it a suitable influence on the human mind.

争辩双方提出的这些论点（可能还会提出更多的论点）都似乎言之有理，令我不由得猜测两面的论点都可能是可信可靠、令人满意的，而且理性与情感在几乎所有的道德断定和道德结论中都是并存的。很可能，最终裁决，即宣告某些性格与行为是可亲和值得赞美的，而某些性格与行为则是可憎和应受谴责的；给某些性格与行为打上荣耀和赞许的标志，而给某些性格与行为则打上耻辱和责难的烙印；使德行成为一种能动的原则，将德行规定为我们的幸福、将恶行规定为我们的痛苦，我是说，这一裁决很可能依赖于某种大自然普遍赋予人类的内在感官或感受。因为，除了内在感官或感受之外，还有什么能拥有这种影响力呢？然而，为了给这样的情感铺平道路，为了正确清晰地辨明情感的目标对象，我们发现，我们常常需要首先进行大量的推理，常常需要做出细微的区别、给出公正的结论，需要比较迥然相异的事物，考察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确定普遍一般的事实。许多种美，特别是种种自然之美，甫一亮相便能赢得我们由衷的喜爱和赞许；如果它们自身无法产生这种效果，任何推理都是无法补救、无法改造它们以迎合我们的品味和情感的。但也有许多的美，尤其是在种种精致的艺术之美中，为了能够感觉到适当的情感，大量地运用推理却是必须的；论证和思索常常可以帮助我们矫正不正确的趣味和喜

好。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这一结论，即道德之美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后面这些类型的美的特质，为了能对人类的心灵产生适当的影响，道德之美要求我们的智力官能给予协助。

But though this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morals, be curious and important, it is needless for us, at present, to employ farther care in our researches concerning it. For if we can be so happy, in the course of this enquiry, as to discover the true origin of morals, it will then easily appear how far either sentiment or reason enters into all determinations of this nature [2_1] . In order to attain this purpose, we shall endeavour to follow a very simple method: we shall analyse that complication of mental qualities, which form what, in common life, we call Personal Merit: we shall consider every attribute of the mind, which renders a man an object either of esteem and affection, or of hatred and contempt; every habit or sentiment or faculty, which, if ascribed to any person, implies either praise or blame, and may enter into any panegyric or satire of his character and manners. The quick sensibility, which, on this head, is so universal among mankind, gives a philosopher sufficient assurance, that he can never be considerably mistaken in framing the catalogue, or incur any danger of misplacing the objects of his contemplation: he needs only enter into his own breast for a moment, and consider whether or not he should desire to have this or that quality ascribed to him, and whether such or such an imputation would proceed from a friend or an enemy. The very nature of language guides us almost infallibly in forming a judgement of this nature; and as every tongue possesses one set of words which are taken in a good sense, and another in the opposite, the least acquaintance with the idiom suffices, without any reasoning, to direct us in collecting and arranging the estimable or blameable qualities of men. The only object of reasoning is to

discover the circumstances on both sides, which are common to these qualities; to observe that particular in which the estimable qualities agree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blameable on the other; and thence to reach the foundation of ethics, and find those universal principles, from which all censure or approbation is ultimately derived. As this is a question of fact, not of abstract science, we can only expect success, by following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and deducing general maxims from a comparison of particular instances. The other scientific method, where a general abstract principle is first established, and is afterwards branched out into a variety of inferences and conclusions, may be more perfect in itself, but suits less the imperfec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is a common source of illusion and mistake in this as well as in other subjects. Men are now cured of their passion for hypotheses and systems in natural philosophy, and will hearken to no arguments but those which are derived from experience. It is full time they should attempt a like reformation in all moral disquisitions; and reject every system of ethics, however subtle or ingenious, which is not founded on fact and observation.

然而，尽管这一关于道德一般原则的问题令人好奇且颇为重要，但我们现在却不必对它再做进一步的探究。因为，如果在本书的探究过程中我们能够幸运地发现道德的真正起源所在，那么，情感或理性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一切道德断定的形成，便将一目了然[3_1]。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将尽力采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将分析错综复杂的心灵品质，正是它们构成了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谓的个人价值；我们将思考心灵的各种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我们觉得有些人令人钦敬、让人喜爱，而有些人令人憎恨、让人蔑视；以及每一种习惯、每一种情感、每一种官能，无论它们是用在谁的身上，意味着赞美或是谴责，对该人性格作风是称颂或是嘲讽。在这一点上，人类普遍拥有敏锐的感受力，使得哲学家充分确信，他在编写目录时绝不会

出现重大失误，也绝不会招致错置他的思考对象这种危险：他只需看一眼自己的内心，想一想自己是否应该渴望拥有归之于他的这种或那种品质，这样或那样的非难是来自朋友还是敌人。语言的本质正在于引导我们几乎始终无误地做出这种判断；由于每一种语言都分别拥有一套用作褒义和贬义的词语，因而，只需稍懂习语，无需推理，我们便能在词语的指引下对人们值得钦敬和应受谴责的品质分别加以收集和整理。推理的唯一目标是发现哪些因素是上述两类品质所共有的；一方面观察值得钦敬的品质所共同具有的特殊因素，另一方面观察应受谴责的品质所共同具有的特殊因素；并由此抵达伦理学的根基之处，找到那些作为一切责难和赞许的最终根源的普遍原则。由于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一个抽象科学的问题，因此，我们如果想成功，就只能采用实验的方法，通过比较特定事例来推演出一般准则。另一种科学方法则是先设立一条一般性的抽象原则，然后再从这条原则中分枝出种种推论和结论。这种方法本身可能更完善，但却不太适用于不太完美的人性，它是道德论题和其他诸多论题中一切幻觉和错误的共同根源。在自然哲学中，人们已经不再狂热地追求假设和体系，而仅仅关注那些源自经验的论点。现在人们应该在一切道德研究中尝试进行同样的变革，抛弃所有不以事实和观察为根基的伦理体系，无论这些体系是多么的精巧和新颖。

We shall begin our enquiry on this head by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social virtues, Benevolence and Justice. The explication of them will probably give us an opening by which the others may be accounted for.

我们将以对仁爱和正义这两种社会德性的思考开始我们对道德原则的探究。通过对于仁爱与正义的阐明，我们或将可以解说其他的社会德性。

[2_1].See Appendix 1.

[3_1].见附录一。

SECTION 2　OF BENEVOLENCE

第二章　论仁爱

PART 1

第一节

It may be esteemed, perhaps, a superfluous task to prove, that the benevolent or softer affections are estimable; and wherever they appear, engage the approbation and good-will of mankind. The epithets SOCIABLE, GOOD-NATURED, HUMANE, MERCIFUL, GRATEFUL, FRIENDLY, GENEROUS, BENEFICENT, or their equivalents, are known in all languages, and universally express the highest merit, which HUMAN NATURE is capable of attaining. Where these amiable qualities are attended with birth and power and eminent abilities, and display themselves in the good government or useful instruction of mankind, they seem even to raise the possessors of them above the rank of HUMAN NATURE, and make them approach in some measure to the divine. Exalted capacity, undaunted courage, prosperous success; these may only expose a hero or politician to the envy and ill-will of the public: but as soon as the praises are added of humane and beneficent; when instances are displayed of lenity, tenderness or friendship; envy itself is silent, or joins the general voice of approbation and applause.

人们可能会认为，仁爱的或温和的感情是值得钦敬的，无论它们在哪里出现均能引起世人的赞许和善意，对此加以求证，纯属多此一

举。友好的、善良的、仁慈的、宽恕的、感恩的、友爱的、慷慨的、慈善的，或与它们意义相同的词语，在一切语言中都是人所共知的，它们普遍表达着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价值。当这些可亲的品质伴之以出身、权势和非凡的能力展现于人类的善政或有益的教导中时，它们似乎甚至将其拥有者提升到了一个超越人性、近乎神性的高度。高蹈的才能、无畏的勇气、巨大的成功，凡此种种，或许只能给英雄和政治家招来公众的妒忌和敌意；而一旦加上诸如仁慈的和慈善之类的赞语，一旦公众看到他们宽容、温柔、友爱的一面，妒忌便即刻消音，或是转而加入到一片喝彩和欢呼声中。

When Pericles, the great Athenian statesman and general, was on his death-bed, his surrounding friends, deeming him now insensible, began to indulge their sorrow for their expiring patron, by enumerating his great qualities and successes, his conquests and victories, the unusual length of his administration, and his nine trophies erected over the enemies of the republic. YOU FORGET, cries the dying hero, who had heard all, YOU FORGET THE MOST EMINENT OF MY PRAISES, WHILE YOU DWELL SO MUCH ON THOSE VULGAR ADVANTAGES, IN WHICH FORTUNE HAD A PRINCIPAL SHARE. YOU HAVE NOT OBSERVED THAT NO CITIZEN HAS EVER YET WORNE MOURNING ON MY ACCOUNT. (Plut. in Pericles)

伯里克利这位雅典伟大的政治家和将军临终前，守护在他身边的朋友以为他已失去知觉，于是开始历数他伟大的品质和功业、他的征服和胜利、他超长的执政期和他在战胜共和国的敌人后树立起的九座胜利纪念碑，以尽情表达他们对这位即将辞世的恩主的哀痛之情。他们的话被弥留之际的英雄悉数听到，“你们忘了，”他喊道，“你们尽在数说我那些大多凭靠运气得来的世俗功绩，却忘了我最非凡的、值得赞美的功德。你们不曾提到，雅典公民从未有一人因我而穿上丧

服。” [4_1]

In men of more ordinary talents and capacity, the social virtues become, if possible, still more essentially requisite; there being nothing eminent, in that case, to compensate for the want of them, or preserve the person from our severest hatred, as well as contempt. A high ambition, an elevated courage, is apt, says Cicero, in less perfect characters, to degenerate into a turbulent ferocity. The more social and softer virtues are there chiefly to be regarded. These are always good and amiable. [3_1]

这些社会德性，如有可能，在那些天赋和才能都较为平庸的人的身上，反而更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因为，在他们身上，没有什么其他非凡之处可用来弥补这些社会德性的缺失，或是用来帮助他们抵挡我们最尖利的憎恨与轻蔑。西塞罗说，高远的志向和卓越的勇气，在有缺陷的性格中，反而容易蜕变成一种狂乱的暴戾。因此，在有缺陷的性格中，较为社会性和较为温和的德性，尤其应当得到重视。这些德性总是善良的和可亲的。 [4_2]

The principal advantage, which Juvenal discovers in the extensive capacity of the human species, is that it renders our benevolence also more extensive, and gives us larger opportunities of spreading our kindly influence than what are indulged to the inferior creation. [3_2] It must, indeed, be confessed, that by doing good only, can a man truly enjoy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eminent. His exalted station, of itself but the more exposes him to danger and tempest. His sole prerogative is to afford shelter to inferiors, who repose themselves under his cover and protection.

尤维纳利斯发现，人类广博的才能其主要益处在于，它使我们的仁爱亦变得广博，并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广布我们和善的影响力，而不致沉湎于低级创造。[4_3] 的确，必须承认，唯有行善，人才能真正享受到非凡卓越所带来的诸多益处。因为，身居高位者，本身就会遭遇到更多的危险与风暴。而他唯一的特权则是庇护下位者，让后者在他的荫蔽与保护下安然休憩。

But I forget, that it is not my present business to recommend generosity and benevolence, or to paint, in their true colours, all the genuine charms of the social virtues. These, indeed, sufficiently engage every heart, on the first apprehension of them; and it is difficult to abstain from some sally of panegyric, as often as they occur in discourse or reasoning. But our object here being more the speculative, than the practical part of morals, it will suffice to remark, (what will readily, I believe, be allowed) that no qualities are more intitled to the general good-will and approbation of mankind than beneficence and humanity, friendship and gratitude, natural affection and public spirit, or whatever proceeds from a tender sympathy with others, and a generous concern for our kind and species. These wherever they appear seem to transfuse themselves, in a manner, into each beholder, and to call forth, in their own behalf, the same favourable and affectionate sentiments, which they exert on all around.

但是我忘了，宣扬慷慨与仁爱，或是如实地描绘社会德性的全部真正魅力，并非我目前的任务。确实，当人们第一次领悟到社会德性时，每一颗心灵都会完完全全地被其吸引；而每当社会德性出现在言谈或推理中时，人们亦都无法不对其大加称颂。然而，在此，我们的研究对象却是道德思辨性的部分，并非其实践性的部分，因此，我们只需注意到以下一点即可（对此，我相信人们将会欣然同意）：唯有

慈善与人道、友爱与感恩、自然感情与公共精神，或是任何一种源于对他人的温柔同情和对人类的慷慨关心的品质，方能赢得人类普遍的善意和赞许。这些品质无论出现在何处都似乎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每一位观者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并在他们自身唤起它们施于其身边所有人的同样令人称道和充满关爱的情感。

PART 2

第二节

We may observe that, in displaying the praises of any humane, beneficent man, there is one circumstance which never fails to be amply insisted on, namely, the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 derived to society from his intercourse and good offices. To his parents, we are apt to say, he endears himself by his pious attachment and duteous care still more than by the connexions of nature. His children never feel his authority, but when employed for their advantage. With him, the ties of love are consolidated by beneficence and friendship. The ties of friendship approach, in a fond observance of each obliging office, to those of love and inclination. His domestics and dependants have in him a sure resource; and no longer dread the power of fortune, but so far as she exercises it over him. From him the hungry receive food, the naked clothing, the ignorant and slothful skill and industry. Like the sun, an inferior minister of providence he cheers, invigorates, and sustains the surrounding world.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当我们赞美人道、慈善之人时，我们总是会十分强调这样一个因素，即，那个人的人际交往和善意相助给社会带来的幸福与满足。我们会说，父母喜爱他，远非因为他与父母有血缘

关系，而是因为他对父母有孝敬之情和恭顺之心。他也从不对儿女们施威，除非是为了儿女们好。与他相处，爱的纽带因仁善和友爱而变得牢固。而友情的纽带则因他亲切奉行所有应尽的职责而近似于爱与喜爱的纽带。他的家仆和随从们仰仗他，从此不再惧怕命运的摆布，除非命运首先将他打翻在地。饥者因他得其食，裸者因他得其衣，愚者因他善其技，懒者因他勤其体。这位如同太阳般的天道下界使者，鼓舞、振奋、支撑着周围的世界。

If confined to private life, the sphere of his activity is narrower; but his influence is all benign and gentle. If exalted into a higher station, mankind and posterity reap the fruit of his labours.

如果局限在私人生活的领域，他的活动范围较为狭小，但他的影响力完全是宽厚、温和的。而如果将他置于高位，他的劳作则将造福世人和子孙后代。

As these topics of praise never fail to be employed, and with success, where we would inspire esteem for any one; may it not thence be concluded, that the UTILITY, resulting from the social virtues, forms, at least, a PART of their merit, and is one source of that approbation and regard so universally paid to them?

每当我们想要激发起人们对某人的钦敬之情时，总是会借用这些值得赞美的话题，且屡试不爽，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社会德性所产生的效用至少构成了其价值的一部分，是它们所享有的普遍赞许和尊重的一个根源？

When we recommend even an animal or a plant as USEFUL and BENEFICIAL, we give it an applause and recommendation suited to its nature. As, on the other hand, reflection on the baneful influence of any of these inferior beings always inspires us with the sentiment of aversion. The eye is pleased with the prospect of corn-fields and loaded vine-yards; horses grazing, and flocks pasturing: But flies the view of briars and brambles, affording shelter to wolves and serpents.

当我们说一只动物或是一株植物有用和有益的时候，我们是在给予它们符合其本性的赞赏和推荐。而另一方面，一想到这些低等生物的有害影响，我们又总是会心生反感之情。丰收的玉米地和果实累累的葡萄园，还有羊马成群的牧场，悦人眼目；但与此同时，我们选择避开丛生的石楠和荆棘以及潜藏其间的豺狼和蟒蛇这些景象。

A machine, a piece of furniture, a vestment, a house well contrived for use and conveniency, is so far beautiful, and is contemplated with pleasure and approbation. An experienced eye is here sensible to many excellencies, which escape persons ignorant and uninstructed.

精心设计出的适用而便利的机器、家具、衣服和房屋，是美的，凝视它们时，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愉悦和赞许。看着它们，一双阅历丰富的眼睛可以敏锐地捕捉到许多可看之处，而未经教导的愚昧之人只会对这些可看之处视而不见。

Can anything stronger be said in praise of a profession, such as merchandize or manufacture, than to observe the advantages which

it procures to society? And is not a monk and inquisitor enraged when we treat his order as useless or pernicious to mankind?

当我们赞美一个行业，比如商业或制造业时，难道有什么能比指出这个行业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更具有说服力？而当我们认为一位僧侣或是一位宗教审判官所属的教派对于世人是无用甚或是有害的时候，他难道不会因此勃然大怒？

The historian exults in displaying the benefit arising from his labours. The writer of romance alleviates or denies the bad consequences ascribed to his manner of composition.

历史学家因看到自己的劳作是有益处的而欣喜不已。小说家对自己的写作风格导致的恶劣后果轻描淡写甚至矢口否认。

In general, what praise is implied in the simple epithet USEFUL! What reproach in the contrary!

总而言之，在有用的这个简简单单的修饰语中包含着多么大的赞美！而在它的反义修饰语中又包含着多么大的指责！

Your Gods, says Cicero, [3_3] in opposition to the Epicureans, cannot justly claim any worship or adoration, with whatever imaginary perfections you may suppose them endowed. They are totally useless and inactive. Even the Egyptians, whom you so much ridicule, never consecrated any animal but on account of its utility.

西塞罗在反对伊壁鸠鲁学派时说 [4_4] ，你们的神祇并不值得人们去崇拜和敬仰，无论你们将他们想象得如何完美。因为，他们是完全无用和无为的。即便是你们大加嘲讽的埃及人也从未尊崇过任何一种动物，除非这种动物是有效用的。

The sceptics assert, [3_4] though absurdly, that the origin of all religious worship was derived from the utility of inanimate objects, as the sun and moon, to the support and well-being of mankind. This is also the common reason assigned by historians, for the deification of eminent heroes and legislators. [3_5]

怀疑论者们断言 [4_5] ——尽管他们的断言十分荒谬——所有的宗教崇拜均起源于无生命体，比如太阳和月亮，养育和造福人类的效用。而这也正是历史学家们认为非凡的英雄和立法者们之所以会被奉若神明的共同原因所在。 [4_6]

To plant a tree, to cultivate a field, to beget children; meritorious acts, according to the religion of Zoroaster.

种树、耕田、养儿育女，按照琐罗亚斯德的宗教，都是有价值的行为。

In all determinations of morality, this circumstance of public utility is ever principally in view; and wherever disputes arise, either in philosophy or common life, concerning the bounds of duty, the question cannot, by any means, be decided with greater

certainty, than by ascertaining, on any side, the true interests of mankind. If any false opinion, embraced from appearances, has been found to prevail; as soon as farther experience and sounder reasoning have given us juster notions of human affairs, we retract our first sentiment, and adjust anew the boundaries of moral good and evil.

在一切道德断定中，公共效用都始终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关于义务界限的争论，无论发生在何处，哲学抑或日常生活中，明确争论各方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到人类的真正利益，是这个问题唯一确定无疑的解决之道。如果我们发现任何根据表象而被欣然采纳的错误观点正在流行，那么，一旦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和做出了更正确的推理，让我们对人类事务有了更合理的认识，我们就会立即收回我们最初的情感，重新调整善与恶的道德界线。

Giving alms to common beggars is naturally praised; because it seems to carry relief to the distressed and indigent: But when we observe the encouragement thence arising to idleness and debauchery, we regard that species of charity rather as a weakness than a virtue.

施舍乞丐理应受到赞美，因为此举是在救困济贫。但如果我们发现因此反而纵容了懒惰和淫逸，那么，我们便不再视这样的慈善之举为一种德性，而是将它看作一种缺点。

Tyrannicide, or the assassination of usurpers and oppressive princes, was highly extolled in ancient times; because it both freed mankind from many of these monsters, and seemed to keep the

others in awe, whom the sword or poniard could not reach. But history and experience having since convinced us, that this practice increases the jealousy and cruelty of princes, a Timoleon and a Brutus, though treated with indulgence on account of the prejudices of their times, are now considered as very improper models for imitation.

诛弑暴君，或是刺杀篡位者和暴虐的君王，古时候曾备受称颂，因为此举既能救民于水火，又能杀一儆百，令那些刀剑尚不能及的暴君心生畏惧。然而，历史和经验却已令我们深信，这样的做法只会加剧君王们的猜忌和残暴。提摩莱昂和布鲁图们，尽管由于其所处时代对他们的偏向而受到纵容，但今天看来却不可效仿。

Liberality in princes is regarded as a mark of beneficence, but when it occurs, that the homely bread of the honest and industrious is often thereby converted into delicious cates for the idle and the prodigal, we soon retract our heedless praises. The regrets of a prince, for having lost a day, were noble and generous, but had he intended to have spent it in acts of generosity to his greedy courtiers, it was better lost than misemployed after that manner.

君王们的慷慨大方被认为是一种仁善的表现，但倘若因此而常常让诚实勤劳者的日常面包变成懒惰浪费者的美味佳肴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我们就会立刻收回我们轻率的赞美。君王因虚度了一天的时光而心生懊悔，是高尚而慷慨的表现。但倘若他原本是要用这一天的时光来向他贪得无厌的朝臣们慷慨行赏的，那么，这一天的时光毋宁浪费掉，也好过错用在这件事上。

Luxury, or a refinement on the pleasur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had not long been supposed the source of every corruption in government, and the immediate cause of faction, sedition, civil wars, and the total loss of liberty. It was, therefore, universally regarded as a vice, and was an object of declamation to all satirists, and severe moralists. Those, who prove, or attempt to prove, that such refinements rather tend to the increase of industry, civility, and arts regulate anew our MORAL as well as POLITICAL sentiments, and represent, as laudable or innocent, what had formerly been regarded as pernicious and blameable.

奢侈，或是对愉悦便利生活的精致追求，不久之前还被看作是一切政府腐败的源泉，和内讧、叛乱、内战以及极端独裁的直接原因。因而，奢侈曾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恶，是所有讽刺作家和严厉的道德家们口诛笔伐的对象。那些证明或试图证明对生活如此这般的精致追求反而促进了工业、文明和艺术发展的人，重新调整了我们的道德情感及政治情感，并将从前被视作是有害和应受谴责的事物重新描述成无害和值得夸赞的。

Upon the whole, then, it seems undeniable, THAT nothing can bestow more merit on any human creature than the sentiment of benevolence in an eminent degree; and THAT a PART, at least, of its merit arises from its tendency to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our species, and bestow happiness on human society. We carry our view into the salutary consequences of such a character and disposition; and whatever has so benign an influence, and forwards so desirable an end, is beheld with complacency and pleasure. The social virtues are never regarded without their beneficial tendencies, nor viewed as barren and unfruitful. The happiness of mankind, the order of society, the harmony of families, the mutual support of friends, are

always considered as the result of their gentle dominion over the breasts of men.

总而言之，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什么能比非凡者的仁爱之情赋予全人类的价值更多；仁爱之情自身的价值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于它提升人类利益、造福人类社会的趋向。我们瞩目于这种性格和气质的有益结果；对于一切具有如此温厚影响力、推进如此美好目标实现的东西，我们都会投以满意而愉悦的目光。我们考虑社会德性时总是会想到它们的有益趋向，社会德性从不会被视作是徒劳无果的。人类的幸福、社会的秩序、家庭的和睦以及朋友的相互扶持，始终被认为是社会德性温和地统驭人们内心的结果。

How considerable a PART of their merit we ought to ascribe to their utility, will better appear from future disquisitions; [3_6] as well as the reason, why this circumstance has such a command over our esteem and approbation. [3_7]

至于我们应当将它们价值的多大一部分归之于它们的效用 [4_7] ，以及为何效用这一因素对我们的钦敬和赞许具有这样一种控制力 [4_8] ，我们将会在后面的探究中进一步讨论。

[3_1].Cic. de Officiis, lib. I.

[3_2].Sat. XV. 139 and seq.

[3_3].De Nat. Deor. lib. i.

[3_4].Sext. Emp. adversus Math. lib. viii.

[3_5].Diod. Sic. passim.

[3_6].Sect. 3 and 4.

[3_7].Sect. 5.

[4_1].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

[4_2].西塞罗：《论义务》，第一卷。

[4_3].《讽刺诗》，XV，第139行及以下。

[4_4].《神性论》，第一卷。

[4_5].塞克斯都·恩披里珂：《反对数学家》，第八卷。

[4_6].西西里人狄奥多罗斯：《历史文库》，散见于书中各处。

[4_7].第三章，第四章。

[4_8].第五章。

SECTION 3　OF JUSTICE

第三章　论正义

PART 1

第一节

THAT Justice is useful to society, and consequently that PART of its merit, at least, must arise from that consideration, it would be a superfluous undertaking to prove. That public utility is the SOLE origin of justice, and that reflections on the beneficial consequences of this virtue are the SOLE foundation of its merit; this proposition, being more curious and important, will better deserve our examination and enquiry.

正义对于社会是有用的，因而至少正义的这一部分价值必定是产生自这一考虑因素的，对此加以求证，纯属多此一举。公共效用是正义的唯一起源，对于正义德性有益结果的反思是其价值的唯一根基，这一奇特而重要的命题，将更值得我们考察和探究。

Let us suppose that nature has bestowed on the human race such profuse ABUNDANCE of all EXTERNAL conveniencies, that, without any uncertainty in the event, without any care or industry on our part, every individual finds himself fully provided with whatever his most voracious appetites can want, or luxurious imagination wish or desire. His natural beauty, we shall suppose, surpasses all acquired ornaments: The perpetual clemency of the

seasons renders useless all clothes or covering; the raw herbage affords him the most delicious fare; the clear fountain, the richest beverage. No laborious occupation required: no tillage; no navigation. Music, poetry, and contemplation form his sole business: Conversation, mirth, and friendship his sole amusement. It seems evident that, in such a happy state, every other social virtue would flourish, and receive tenfold increase; but the cautious, jealous virtue of justice would never once have been dreamed of. For what purpose make a partition of goods, where every one has already more than enough? Why give rise to property, where there cannot possibly be any injury? Why call this object MINE, when upon the seizing of it by another, I need but stretch out my hand to possess myself of what is equally valuable? Justice, in that case, being totally useless, would be an idle ceremonial, and could never possibly have place in the catalogue of virtues.

假定大自然已经赋予了人类如此富足的外在的舒适便利，以至于我们无需疑虑，无需担忧，无需辛劳，每一个人便都能得到完全的满足，无论是口腹之欲，还是奢糜之望。我们假定他天生丽质，素面胜雕饰；四季如春，无需着衣被；以草木为美食；以清泉为佳饮。他不必劳作：不用耕田，也无需航海。音乐、诗歌和沉思是他唯一的工作；交谈、欢笑和友情是他仅有的娱乐。显然，在这样的幸福状态中，人的每一种社会德性都会蓬勃生长，并获得十倍的提升；但这其中不包括正义，在这样的幸福状态中，人们绝不会想到正义这种警戒性和防备性的德性。因为既然人人富足有余，又何需分割财物？既然不可能产生任何危害，又何需订立所有权？既然这件物品被别人拿走之后，另一件有着相同价值的物品我唾手可得，又何需声称这件物品是我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正义是完全无用的，它不过是一种虚设的仪式，而绝不可能在德性的目录中出现。

We see, even in the present necessitous condition of mankind, that, wherever any benefit is bestowed by nature in an unlimited abundance, we leave it always in common among the whole human race, and make no subdivisions of right and property. Water and air, though the most necessary of all objects, are not challenged as the property of individuals; nor can any man commit injustice by the most lavish use and enjoyment of these blessings. In fertile extensive countries, with few inhabitants, land is regarded on the same footing. And no topic is so much insisted on by those, who defend the liberty of the seas, as the unexhausted use of them in navigation. Were the advantages, procured by navigation, as inexhaustible, these reasoners had never had any adversaries to refute; nor had any claims ever been advanced of a separate, exclusive dominion over the ocean.

我们看到，甚至是在人类目前的这种境况中，只要大自然所赐的某些恩惠是无限富足的，我们也总是将它拿出来与所有人共同分享，而不会作权利和所有权的划分。水和空气，尽管是人类最不可或缺的，却既无人要求将其据为己有，也无人可以借大肆享用它们而妄行不义。在那些土地肥沃广袤且人口稀少的国家，土地亦是如此。那些捍卫海洋自由权的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莫过于航海中海洋的用之不竭。如果航海所获得的益处是取之不尽的，那么，这些海洋自由权的辩护者们就从未遇到过任何需要反驳的对手，也从未有人提出过对海洋分而治之、独占专有的主张。

It may happen, in some countries, at some periods, that there be established a property in water, none in land [4_1] ; if the latter be in greater abundance than can be used by the inhabitants, and the former be found, with difficulty, and in very small quantities.

在某些国家某些时期，如果用来给居民的土地资源宽裕得多，而水资源难寻且短缺，那或许会设立水源所有权，而非土地所有权。[5_1]

Again; suppose, that, though the necessities of human race continue the same as at present, yet the mind is so enlarged, and so replete with friendship and generosity, that every man has the utmost tenderness for every man, and feels no more concern for his own interest than for that of his fellows; it seems evident, that the use of justice would, in this case, be suspended by such an extensive benevolence, nor would the divisions and barriers of property and obligation have ever been thought of. Why should I bind another, by a deed or promise, to do me any good office, when I know that he is already prompted, by the strongest inclination, to seek my happiness, and would, of himself, perform the desired service; except the hurt, he thereby receives, be greater than the benefit accruing to me? In that case, he knows, that, from my innate humanity and friendship, I should be the first to oppose myself to his imprudent generosity. Why raise landmarks between my neighbour's field and mine, when my heart has made no division between our interests; but shares all his joys and sorrows with the same force and vivacity as if originally my own? Every man, upon this supposition, being a second self to another, would trust all his interests to the discretion of every man; without jealousy, without partition, without distinction. And the whole human race would form only one family; where all would lie in common, and be used freely, without regard to property; but cautiously too, with as entire regard to the necessities of each individual, as if our own interests were most intimately concerned.

再假定人类的生活必需品仍如现在这般，而人类的心灵却变得如此宏大，充满了友爱和慷慨，以至于每一个人都对他人无限温柔，关心他人的利益如同关心自己的一般，那么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以广博的仁爱取代正义，并绝不会想到要对所有权和责任进行划分与分隔。既然我知道另一个人出于强烈的爱意已然愿意为我谋取幸福，并愿意主动为我做我希望他做的事，那么，我为何还要用契约或承诺来约束他，要求他善意相助于我呢？除非他因此所受到的伤害大于我因此所增加的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知道，如果他因此所受到的伤害大于我因此所增加的收益，我会出于天赋的仁慈与友爱，第一个站出来阻止他轻率的慷慨之举。既然我的内心没有将我和我邻人的利益划分开来，而是以他之快乐为我之快乐，以他之悲伤为我之悲伤，那么，为何还要在我们的田地之间竖立界碑以作划分呢？依照这一假定，由于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第二个自我，因此，每一个人都会毫无猜忌、毫无隔阂、毫无区别地将自己的全部利益信托给他人决断处理。整个人类将组成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一切都是大家共有的，并且可以自由取用的，不需要问是谁所有，而只需小心谨慎地问有谁需要，这种对他人需要的全心关注，就如同是在密切关心我们自身的利益一般。

In the present disposition of the human heart, it would, perhaps, be difficult to find complete instances of such enlarged affections; but still we may observe, that the case of families approaches towards it; and the stronger the mutual benevolence is among the individuals, the nearer it approaches; till all distinction of property be, in a great measure, lost and confounded among them. Between married persons, the cement of friendship is by the laws supposed so strong as to abolish all division of possessions; and has often, in reality, the force ascribed to it. And it is observable, that, during the ardour of new enthusiasms, when every principle is inflamed into extravagance, the community of goods has frequently been attempted; and nothing but experience of its

inconveniencies, from the returning or disguised selfishness of men, could make the imprudent fanatics adopt anew the ideas of justice and of separate property. So true is it, that this virtue derives its existence entirely from its necessary USE to the intercourse and social state of mankind.

就人类心灵目前的性情而言，想要找到与这些宏大的感情完全契合的例证或许并非易事；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家庭的情形与之近似，并且，家庭成员之间给予对方的仁爱越是强烈，就越是与之近似，直至所有权的一切区别几乎在家庭成员之间消失不见或是混淆不清。在婚姻配偶之间，友谊的结合被法律假定为牢固到足以取消一切的财产划分，而事实上它也确实常常具备这样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当热情初起、激情如火时，每一条原则都尽情燃烧之时，人们总是试图实现财物的共用；只有当人们因为复发的或是掩饰的自私而亲身体验到财物共用的诸多不便之处时，轻率的狂热分子们才会重新采纳正义和独立所有权的观念。因此，正义这种德性之所以产生，完全是因为它对于人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状态而言有其必不可少的用途。

To make this truth more evident, let us reverse the foregoing suppositions; and carrying everything to the opposite extreme, consider what would be the effect of these new situations. Suppose a society to fall into such want of all common necessaries, that the utmost frugality and industry cannot preserve the greater number from perishing, and the whole from extreme misery; it will readily, I believe, be admitted, that the strict laws of justice are suspended, in such a pressing emergence, and give place to the stronger motives of necessity and self-preservation. Is it any crime, after a shipwreck, to seize whatever means or instrument of safety one can lay hold of, without regard to former limitations of property? Or if a city besieged were perishing with hunger; can we imagine, that men

will see any means of preservation before them, and lose their lives, from a scrupulous regard to what, in other situations, would be the rules of equity and justice? The use and tendency of that virtue is to procure happiness and security, by preserving order in society: but where the society is ready to perish from extreme necessity, no greater evil can be dreaded from violence and injustice; and every man may now provide for himself by all the means, which prudence can dictate, or humanity permit. The public, even in less urgent necessities, opens granaries, without the consent of proprietors; as justly supposing, that the authority of magistracy may, consistent with equity, extend so far: But were any number of men to assemble, without the tie of laws or civil jurisdiction; would an equal partition of bread in a famine, though effected by power and even violence, be regarded as criminal or injurious?

为了阐明这条真理，让我们反转之前的假定，走到另一个极端，重新考虑如果出现的是下面这些新情况后果又会怎样。假定一个社会陷入日常必需品全线匮乏的局面，以致最大限度的勤俭都无法保证大多数人能够免于死亡，无法保证所有人能够免于遭受极端的苦难，我相信人们会欣然承认，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之下，正义的严苛法则被暂时废止，而迫切需要和自我保全等更为强烈的动机会取而代之。船只失事之后，抓住所能抓到的任何救生手段或工具求生，而不顾之前所有权的限制，难道能说是在犯罪吗？或者假定一座城市因受到围困而面临饥饿带来的死亡威胁，我们能够想象，人们为了恪守公平与正义的法则，眼睁睁地看着摆在他们面前可以活命的食物不吃，而白白送命吗？正义这种德性的用途和趋向是通过维持社会秩序从而获得幸福与平安。然而，当整个社会因必需品的极端匮乏而濒临灭绝之时，却已经没有什么更大的罪恶可以威慑住人们而使其不诉诸暴力，不妄行不义，此时，每一个人都会在合理的要求和仁慈所允许的前提之下不惜一切手段地设法夺食活命。甚至是在必需品不是如此极端匮乏的情况之下，公众也会不经所有人同意就打开粮仓，因为他们正当合理地

认为追求公平的执政当局的职权可延伸到这种程度。但如若一群处于饥荒中的人无视法律和民事管辖权的约束而聚众起事，以推行食物的平均分配，尽管凭靠的是强权甚或暴力，那么，此时他们的做法会被认为是在违法犯罪或是侵害他人利益吗？

Suppose likewise, that it should be a virtuous man's fate to fall into the society of ruffians, remote from the protection of laws and government; what conduct must he embrace in that melancholy situation? He sees such a desperate rapaciousness prevail; such a disregard to equity, such contempt of order, such stupid blindness to future consequences, as must immediately have the most tragical conclusion, and must terminate in destruction to the greater number, and in a total dissolution of society to the rest. He, meanwhile, can have no other expedient than to arm himself, to whomever the sword he seizes, or the buckler, may belong: To make provision of all means of defence and security: And his particular regard to justice being no longer of use to his own safety or that of others, he must consult the dictates of self-preservation alone, without concern for those who no longer merit his care and attention.

同样，假定一位有德之人不幸落入了匪徒之手，无法受到法律和政府的保护，那么，在这种悲惨的境况之中，他必须采取何种行动呢？他明了，匪徒们如此猖獗地强取豪夺，如此肆无忌惮地无视公平，蔑视秩序，愚蠢而盲目地不顾及后果，他们必定很快会落得最可悲的下场，在大部被歼灭、余者被社会完全消解之后彻底终结。而与此同时，他别无他法，唯有不管从谁的手中夺取来剑盾，武装自己以防身护体。此时，他对正义的特别尊重对于保护他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而言一无所用，他必须也只能依照自我保全的指示行事，而无需顾虑不值得他再去关心和关注的人的生死。

When any man, even in political society, renders himself by his crimes, obnoxious to the public, he is punished by the laws in his goods and person; that is, the ordinary rules of justice are, with regard to him, suspended for a moment, and it becomes equitable to inflict on him, for the BENEFIT of society, what otherwise he could not suffer without wrong or injury.

无论是谁，即便是在政治圈中，当他因自己的罪行而成为公众憎恶的对象之时，他的财物和人身便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就是说，正义的一般法则对他暂时废止，而为了社会的利益对他施以应有的惩罚才是公平公正的做法，当然，如果他不曾对他人犯下过错或是造成侵害，他自然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

The rage and violence of public war; what is it but a suspension of justice among the warring parties, who perceive, that this virtue is now no longer of any USE or advantage to them? The laws of war, which then succeed to those of equity and justice, are rules calculated for the ADVANTAGE and UTILITY of that particular state, in which men are now placed. And were a civilized nation engaged with barbarians, who observed no rules even of war, the former must also suspend their observance of them, where they no longer serve to any purpose; and must render every action or rencounter as bloody and pernicious as possible to the first aggressors.

公共战争狂暴而激烈，交战各方均觉察到正义此时对于他们而言既无用途亦无益处，既然如此，除了让正义这种德性暂时废止，还能怎样？于是，战争法则取代了公平和正义的法则，是人们对当前所处

特定状态之中益处以及效用进行的一种考量。如果一个文明国家的交战对手是甚至连战争法则都不遵守的野蛮人，那么，前者也必须暂时废止对于这些法则的遵守，因为它们已不再有用，并且必须在每一次的行动和战役中都要给最先发动战争的侵略者们以铁血杀戮和致命痛击。

Thus, the rules of equity or justice depend entirely on the particular state and condition in which men are placed, and owe their origin and existence to that utility, which results to the public from their strict and regular observance. Reverse, in any considerable circumstance, the condition of men: Produce extreme abundance or extreme necessity: Implant in the human breast perfect moderation and humanity, or perfect rapaciousness and malice: By rendering justice totally USELESS, you thereby totally destroy its essence, and suspend its obligation upon mankind. The common situation of society is a medium amidst all these extremes. We are naturally partial to ourselves, and to our friends; but are capable of learning the advantage resulting from a more equitable conduct. Few enjoyments are given to us from the open and liberal hand of nature; but by art, labour, and industry, we can extract them in great abundance. Hence the ideas of property become necessary in all civil society: Hence justice derives its usefulness to the public: And hence alone arises its merit and moral obligation.

因此，是否采用公平抑或正义的法则完全要视人们所处的特定状态和特定状况而定，它们的起源和存在也完全取决于始终严格地遵守它们对于公众所产生的效用。无论如何，反转对比人类所处的状况——必需品的极大富足和极大匮乏，在人类的胸中植入绝对的温和与仁慈和植入绝对的贪婪与恶毒——将正义变得完全无用，你们就完全摧毁了正义的本质，暂时废止了它赋予人类的义务。而通常的社会境

况是处于这两极之间。我们自然会更偏爱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朋友一些，但也能懂得公正之举所带来的益处。大自然慷慨大方的张手赠予并未带给我们太多的享乐，而技艺、劳作和勤勉却让我们获得了极大的富足。正因为此，所有权的观念才会在所有的公民社会中变得如此必要；也正因为此，正义对公众而言才会是有用的；并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正义才拥有了其价值和道义责任。

These conclusions are so natural and obvious, that they have not escaped even the poets, in their descriptions of the felicity attending the golden age or the reign of Saturn. The seasons, in that first period of nature, were so temperate, if we credit these agreeable fictions, that there was no necessity for men to provide themselves with clothes and houses, as a security against the violence of heat and cold: The rivers flowed with wine and milk: The oaks yielded honey; and nature spontaneously produced her greatest delicacies. Nor were these the chief advantages of that happy age. Tempests were not alone removed from nature; but those more furious tempests were unknown to human breasts, which now cause such uproar, and engender such confusion. Avarice, ambition, cruelty, selfishness, were never heard of: Cordial affection, compassion, sympathy, were the only movements with which the mind was yet acquainted. Even the punctilious distinction of MINE and THINE was banished from among that happy race of mortals, and carried with it the very notion of property and obligation, justice and injustice.

上述结论是如此自然而明显，以至于连诗人们都在描写黄金时代和农神萨图尔努斯统治时期幸福安乐生活的诗句中提到了它们。在大自然最初的那段时期，四季气候是如此温和——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诗人们那些令人愉快的虚构想象的话——以至于人们甚至无需盖房制衣

以抵御严寒酷暑的侵袭。水中流淌的是美酒鲜乳，树上溢出的是甘甜蜜汁，大自然自发地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珍馐美味。但这些却并非人类的那段幸福时期所拥有的主要益处。那个时候，不仅大自然没有风暴，而且人们也还未曾经历那些在今天引发巨大骚动、造成巨大混乱的更为猛烈的风暴。贪欲、野心、残暴和自私，当时的人们闻所未闻；而挚爱、怜悯和同情，是他们唯一了解的心灵活动。甚至在这些享受尘世幸福的人们中间，也没有泾渭分明地区分“我的”和“你的”，因而也不再有所谓所有权与义务、正义与不义的观念。

This POETICAL fiction of the GOLDEN AGE, is in some respects, of a piece with the PHILOSOPHICAL fiction of the STATE OF NATURE; only that the former is represented as the most charming and most peaceable condition, which can possibly be imagined; whereas the latter is painted out as a state of mutual war and violence, attended with the most extreme necessity. On the first origin of mankind, we are told, their ignorance and savage nature were so prevalent, that they could give no mutual trust, but must each depend upon himself and his own force or cunning for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No law was heard of: No rule of justice known: No distinction of property regarded: Power was the only measure of right; and a perpetual war of all against all was the result of men's untamed selfishness and barbarity. [4_2]

诗人们关于黄金时代充满诗意的虚构想象，从某些方面来看，和关于自然状态充满哲学意味的虚构想象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黄金时代在诗人们的笔下是人们可以想象出的美丽迷人、平和宁静；而自然状态则被描绘为伴有必需品的极端匮乏而战乱频仍、暴力不断。我们被告知，在人类诞生之初，愚昧无知和野蛮凶残无所不在，以致人们不敢彼此信任，而只能各自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计谋以获得保护和平安。人们不知道法律为何物，不知正义法则为何意，不

尊重所有权的区别。力量是正当与否的唯一衡量标准。由于人们的自私无度和野蛮不驯 [5_2]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无休无止。

Whether such a condition of human nature could ever exist, or if it did, could continue so long as to merit the appellation of a STATE, may justly be doubted. Men are necessarily born in a family-society, at least; and are trained up by their parents to some rule of conduct and behaviour. But this must be admitted, that, if such a state of mutual war and violence was ever real, the suspension of all laws of justice, from their absolute inutility, is a necessary and infallible consequence.

人性的这一状况能否存在，抑或如果可以，人性的这一状况能否存续足够长的时间从而称得上是一种状态，或许应当受到怀疑。人们必定至少是降生在一个家庭社会中的，其后才在父母的教导下懂得行为举止的规则。但必须承认，如果这种战乱频仍、暴力不断的状态是真实的，那么，正义法则因彻底失去效用而全部废止，便是一个必然而无误的结果。

The more we vary our views of human life, and the newer and more unusual the lights are in which we survey it, the more shall we be convinced, that the origin here assigned for the virtue of justice is real and satisfactory.

我们越是对人类生命有不同的认识，我们就越是能以更新和更奇特的目光来审视它，我们也越是深信，我们所认为的正义这一德性的起源是真实和令人满意的。

Were there a species of creatures intermingled with men, which, though rational, were possessed of such inferior strength, both of body and mind, that they were incapable of all resistance, and could never, upon the highest provocation, make us feel the effects of their resentment;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 I think, is that we should be bound by the laws of humanity to give gentle usage to these creatures, but should not, properly speaking, lie under any restraint of justice with regard to them, nor could they possess any right or property, exclusive of such arbitrary lords. Our intercourse with them could not be called society, which supposes a degree of equality; but absolute command on the one side, and servile obedience on the other. Whatever we covet, they must instantly resign: Our permission is the only tenure, by which they hold their possessions: Our compassion and kindness the only check, by which they curb our lawless will: And as no inconvenience ever results from the exercise of a power, so firmly established in nature, the restraints of justice and property, being totally USELESS, would never have place in so unequal a confederacy.

假定有一种生物与人类交往相处，尽管它们是有理性的，但却缺乏强大的体力和脑力，以至于它们不仅毫无抵抗力，而且即便我们对其肆意挑衅也无法感觉到它们对我们的憎恨，我想这种情况的必然后果只能是，我们应该在仁慈法则的约束之下善待这些生物，或者确切地说，我们对待它们不应受到正义的约束，而它们除了拥有这些独断专行的主人之外，亦不能拥有任何的权利和所有权。我们与它们的交往不能被称作是社会，因为，社会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平等；而在我们与它们的关系中，是一方发号施令，另一方俯首听命。无论我们想要什么，它们都必须立即拱手相让。我们的许可是它们得以保存所有之物的唯一凭据；我们的怜悯与好心是它们得以遏止我们无法无天意志的唯一牵制。由于行使这种本质上根深蒂固的权力不会招致任何的不

便，因此，完全无用的正义和所有权的约束，在一个如此不平等的联盟中将不会出现。

This is plainly the situation of men, with regard to animals; and how far these may be said to possess reason, I leave it to others to determine. The great superiority of civilized Europeans above barbarous Indians, tempted us to imagine ourselves on the same footing with regard to them, and made us throw off all restraints of justice, and even of humanity, in our treatment of them. In many nations, the female sex are reduced to like slavery, and are rendered incapable of all property, in opposition to their lordly masters. But though the males, when united, have in all countries bodily force sufficient to maintain this severe tyranny, yet such are the insinuation, address, and charms of their fair companions, that women are commonly able to break the confederacy, and share with the other sex in all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society.

这显然正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情形。至于动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有理性的，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其他人去断定。文明的欧洲人远远优越于野蛮的印第安人，这一点诱使我们常常将他们想象成动物，并使得我们在对待他们时抛开了正义乃至仁慈的一切约束。在许多国家，女性沦落到了奴隶一般的地位，与她们高高在上的男主人们相反，她们没有资格拥有任何的所有权。然而，尽管男性联合起来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拥有足以维系这一专制暴政的强大体力，但是，他们女伴们的暗送秋波、风度谈吐以及魅力风情却使得她们常常打破双方之间的这一不平等联盟，得以与男人们分享所有的社会所有权与特权。

Were the human species so framed by nature as that each

individual possessed within himself every faculty, requisite both for his own preservation and for the propagation of his kind: Were all society and intercourse cut off between man and man, by the primary intention of the supreme Creator: It seems evident, that so solitary a being would be as much incapable of justice, as of social discourse and conversation. Where mutual regards and forbearance serve to no manner of purpose, they would never direct the conduct of any reasonable man. The headlong course of the passions would be checked by no reflection on future consequences. And as each man is here supposed to love himself alone, and to depend only on himself and his own activity for safety and happiness, he would, on every occasion, to the utmost of his power, challenge the preference above every other being, to none of which he is bound by any ties, either of nature or of interest. But suppose the conjunction of the sexes to be established in nature, a family immediately arises; and particular rules being found requisite for its subsistence, these are immediately embraced; though without comprehending the rest of mankind within their prescriptions. Suppose that several families unite together into one society, which is totally disjoined from all others, the rules, which preserve peace and order, enlarge themselves to the utmost extent of that society; but becoming then entirely useless, lose their force when carried one step farther. But again suppose, that several distinct societies maintain a kind of intercourse for mutual convenience and advantage, the boundaries of justice still grow larger, in proportion to the largeness of men's views, and the force of their mutual connexions. History, experience, reason sufficiently instruct us in this natural progress of human sentiments, and in the gradual enlargement of our regards to justice, in proportion as we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he extensive utility of that virtue.

倘若人类天然的身体构造能够使得每一个人都拥有他保全自我和繁衍种族所需要的全部身体官能，倘若至高的造物主从一开始就割断了人与人之间一切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交往，那么很显然，一个孤单的个人，就像无法进行社会性的话语和交谈一样，也无法施行正义。如果相互尊重和相互容忍毫无用武之地，那么，它们也就对任何有理性之人的行为毫无指导作用。一发不可收的激情也会因毫不思虑后果而受到阻止。由于每一个人此时都假定只爱自己一人，也只有自己一人和自己一人之力可以依靠以获得安全和幸福，因此，他就会无时无刻不竭尽全力地去获取优于其他人的权利，因为其他人和他既无血缘关系亦无利益关系，他不会受到这些限制。现在，假定两性自然结合，家庭随之产生。为了维持家庭的生存，需要订立一些法则，法则一旦订立，大家立即接受。此时，家庭之外的其他人并不在他们法则规定的范围之内。假定若干这样的家庭相互联合组成一个社会，一个与所有人完全分离的社会，上述法则也仍可用以维护这个社会的和平与秩序，并扩展到这个社会的范围极限。但如果这些法则再向前推进一步，那它们就会变得彻底无用、完全失去效力。再假定若干这样各自截然不同的社会为了彼此的便利和利益而保持交往，此时，正义的界限也将随着人们眼界的日渐拓展和他们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不断拓展。由于历史、经验和理性给予我们的充分教导，我们认识到人类情感的这一自然发展进程，认识到随着我们不断加深对正义这种德性的广泛效用的了解，我们对正义的尊重也在不断增加。

PART 2

第二节

If we examine the PARTICULAR laws, by which justice is directed, and property determined; we shall still be presented with the same conclusion. The good of mankind is the only object of all th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Not only is it requisite, for the peace and interest of society, that men's possessions should be separated;

but the rules, which we follow, in making the separation, are such as can best be contrived to serve farther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倘若我们以用来指导正义和断定所有权的特定法律为考察对象，那么，我们仍然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增进人类的利益是所有这些法律法规唯一的目标。为了社会的和平与利益，不仅人们的财产需要划分，而且我们在划分财产的过程中所遵循的法则也是为了进一步实现社会利益而精心制定的。

We shall suppose that a creature, possessed of reason, but unacquainted with human nature, deliberates with himself what rules of justice or property would best promote public interest, and establish peace and security among mankind: His most obvious thought would be, to assign the largest possessions to the most extensive virtue, and give every one the power of doing good, proportioned to his inclination. In a perfect theocracy, where a being, infinitely intelligent, governs by particular volitions, this rule would certainly have place, and might serve to the wisest purposes: But were mankind to execute such a law; so great is the uncertainty of merit, both from its natural obscurity, and from the self-conceit of each individual, that no determinate rule of conduct would ever result from it; and the total dissolution of society must be the immediate consequence. Fanatics may suppose, THAT DOMINION IS FOUNDED ON GRACE, and THAT SAINTS ALONE INHERIT THE EARTH; but the civil magistrate very justly puts these sublime theorists on the same footing with common robbers, and teaches them by the severest discipline, that a rule, which, in speculation, may seem the most advantageous to society, may yet be found, in practice, totally pernicious and destructive.

我们假定有一种生物，他拥有理性，但却不了解人性，他暗自思量何种正义或所有权的法则才能最大地增进公共利益，并给人类带来和平与平安。他最直接的想法是将最大份额的财产分配给最广博的德性，并根据每一个人的自身喜好赋予其行善的权力。在一个完善的神权政治体制中，即由一个拥有无穷智慧的个人按照自己的特定意志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中，这条法则无疑占有一席之地，并很可能服务于最智慧的意图。但倘若人类真的施行了这条法则，那么，因其自身天然的隐晦不明以及每一个人的自负而导致的其价值巨大的不确定性，则将令它无法产生任何明确的行为准则。施行这条法则的直接后果必然是社会彻底的分崩离析。宗教狂热分子们会认为，统治基于神恩，尘世之王唯有圣徒。但民事执政官却极其公正地将这些崇高的理论家与普通的劫匪同等看待，并以最为严厉的训导告诫他们，在思辨中可能是对社会最为有利的法则，在实践中却可能被发现反而是有害和破坏性的。

That there were RELIGIOUS fanatics of this kind in England, during the civil wars, we learn from history; though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obvious TENDENCY of these principles excited such horror in mankind, as soon obliged the dangerous enthusiasts to renounce, or at least conceal their tenets. Perhaps the LEVELLERS, who claimed an equal distribution of property, were a kind of POLITICAL fanatics, which arose from the religious species, and more openly avowed their pretensions; as carrying a more plausible appearance, of being practicable in themselves, as well as useful to human society. It must, indeed, be confessed, that nature is so liberal to mankind, that, were all her presents equally divided among the species, and improved by art and industry, every individual would enjoy all the necessaries, and even most of the comforts of life; nor would ever be liable to any ills but such as might accidentally arise from the sickly frame and constitution of his body. It must also be confessed, that, wherever we depart from

this equality, we rob the poor of more satisfaction than we add to the rich, and that the slight gratification of a frivolous vanity, in one individual, frequently costs more than bread to many families, and even provinces. It may appear withal, that the rule of equality, as it would be highly USEFUL, is not altogether IMPRACTICABLE; but has taken place, at least in an imperfect degree, in some republics; particularly that of Sparta; where it was attended, it is said, with the most beneficial consequences. Not to mention that the Agrarian laws, so frequently claimed in Rome, and carried into execution in many Greek cities, proceeded, all of them, from a general idea of the utility of this principle.

我们从历史中得知，内战时期的英国也曾出现过此类的宗教狂热分子，尽管很可能由于他们所主张原则的明显趋向引起了人们巨大的恐惧，这些危险的狂热者们很快就被迫放弃或者至少是隐藏起了他们的信条。主张平分财产的平权主义者们或许可算作是一种政治狂热分子。他们来源于宗教狂热分子，但却比后者更为公开地宣扬自己的主张，因为，他们的主张表面上看似乎更为合理，似乎本身是切实可行的，且对人类社会十分有用。的确，我们必须承认，大自然对人类极为慷慨大方，因而如果将她的全部馈赠在人类内部加以平均分配，并通过技艺和勤勉使之有所增进，那么，每一个人都不仅能够享有全部的生活必需品，甚至还可以享受大部分的舒适生活，同时能远离一切疾病，而即便是身体抱恙，也完全是因其自身的身体构造与体格羸弱所致。我们还必须承认，一旦我们背离这种平等，穷人被剥夺的满足感会甚于我们附加给富人的满足感；对一个人轻浮的虚荣心一丁点儿的满足，其耗费常常比许多家庭乃至许多省份全部人口的口粮还多。此外，平等法则，因为极其有用，似乎也并非完全不切实际。而且，它已经在有些共和国出现过，至少在某种不完全的程度上，特别是在斯巴达共和国，据说产生了最为有益的结果。更毋庸说，土地法不仅在罗马被反复要求施行，而且在希腊的许多城市也曾付诸实施。土地法全部源自于关于这条原则的效用的一般观念。

But historians, and even common sense, may inform us, that, however specious these ideas of PERFECT equality may seem, they are really, at bottom, IMPRACTICABLE; and were they not so, would be extremely PERNICIOUS to human society. Render possessions ever so equal, men's different degrees of art, care, and industry will immediately break that equality. Or if you check these virtues, you reduce society to the most extreme indigence; and instead of preventing want and beggary in a few, render it unavoidable to the whole community. The most rigorous inquisition too is requisite to watch every inequality on its first appearance; and the most severe jurisdiction, to punish and redress it. But besides, that so much authority must soon degenerate into tyranny, and be exerted with great partialities; who can possibly be possessed of it, in such a situation as is here supposed? Perfect equality of possessions, destroying all subordination, weakens extremely the authority of magistracy, and must reduce all power nearly to a level, as well as property.

但历史学家甚或常识都可能会告诉我们，关于完全平等的诸多观念无论多么地貌似合理，从根本上讲，它们都的的确确不切实际，而倘若它们是切实可行的，它们也是对人类社会极端有害的。即便人们对财产的占有是平等的，人们技艺、关心和勤勉的程度不同也会立即打破这种平等。而如果你们遏止这些德性，你们就会使得社会陷入极端的贫困，不仅没有使一些人免于匮乏和乞讨，反而使得整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同样的境况。还有，为了监视每一种不平等现象的苗头的出现，我们需要进行最为严密的调查；而为了惩罚和纠正每一种不平等现象，我们需要进行最为严厉的管辖。此外，如此的权威必然会迅速蜕变为暴政，行政执法严重不公。不过，在我们所假定的这种情形之下，谁又能拥有这样的权威呢？财产的完全平等，不仅破坏了一切的主从关系，而且极度削弱了执政当局的权威，必然几乎削平

了一切权力以及所有权。

We may conclude, therefore, that, in order to establish laws for the regulation of property, we must be acquainted with the nature and situation of man; must reject appearances, which may be false, though specious; and must search for those rules, which are, on the whole, most USEFUL and BENEFICIAL. Vulgar sense and slight experience are sufficient for this purpose; where men give not way to too selfish avidity, or too extensive enthusiasm.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为了制定法律以规范所有权，我们必须了解人的本性和境况，必须舍弃尽管貌似合理但却可能错误的外在表象，必须寻求那些总体上最为有用的和有益的法则。人们既不屈从于过于自私的热望也不屈从于过于广博的热情，要达到这一目的，粗浅的感觉和些许的经验足可胜任。

Who sees not, for instance, that whatever is produced or improved by a man's art or industry ought, for ever, to be secured to him, in order to give encouragement to such USEFUL habits and accomplishments? That the property ought also to descend to children and relations, for the same USEFUL purpose? That it may be alienated by consent, in order to beget that commerce and intercourse, which is so BENEFICIAL to human society? And that all contracts and promises ought carefully to be fulfilled, in order to secure mutual trust and confidence, by which the general INTEREST of mankind is so much promoted?

例如，谁会不明白，为了鼓励技艺、勤勉等诸如此类的有用习惯

和才艺，凡是一个人靠着他自己的技艺或勤勉所生产和改进的物品，都应该永远归他所有？谁会不明白，为了同样的有用目的，一个人的所有权应该遗传给他的儿女或者是亲属？而与此同时，谁又会不明白，为了促成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商业贸易和人际交往的出现，人们的所有权应该可以协议转让？并且，谁又会不明白，为了赢得彼此之间的信任与信赖，所有的契约和承诺都应该得到认真履行，从而使得人类的普遍利益大为增进？

Examine the writers on the laws of nature; and you will always find, that, whatever principles they set out with, they are sure to terminate here at last, and to assign, as the ultimate reason for every rule which they establish, the convenience and necessities of mankind. A concession thus extorted, in opposition to systems, has more authority than if it had been made in prosecution of them.

对自然法的撰写者们进行考察，你们总会发现，无论他们以何种原则为出发点，到最后他们都一定会在此打住，而将人类的舒适便利与基本必需看作是他们所确立的每一条原则的终极原因。相比于在实施体系的过程中作出的让步，由于与各种体系相对立而被迫作出的让步的权威性更大。

What other reason, indeed, could writers ever give, why this must be MINE and that YOURS; since uninstructed nature surely never made any such distinction? The objects which receive those appellations are, of themselves, foreign to us; they are totally disjoined and separated from us; and nothing but the general interests of society can form the connexion.

诚然，对于为什么这个必须是我的，而那个必须是你的，既然未经教化的本性都的确从未进行这样的区分，自然法的撰写者们又能给出什么其他原因来解释呢？被冠以这些称号的这个或那个物品，其本身并非是我们所固有的，而是与我们完全分离的；唯有社会的普遍利益才能将它们与我们联系在一起。

Sometimes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may require a rule of justice in a particular case; but may not determine any particular rule, among several, which are all equally beneficial. In that case, the slightest analogies are laid hold of, in order to prevent that indifference and ambiguity, which would be the source of perpetual dissension. Thus possession alone, and first possession, is supposed to convey property, where no body else has any preceding claim and pretension. Many of the reasonings of lawyers are of this analogical nature, and depends on very slight connexions of the imagination.

有时，社会利益可能在特定情形下会要求采用某一条正义法则，但却无法在具有同等益处的若干条法则中规定要用哪一条。在这种情形之下，需要抓住最细微的类似之处，以避免混为一谈或模棱两可，并继而引发无穷无尽的纷争。因此，之前没有其他人曾对被占有物提出过任何的主张和要求时，独自占有和首先占有即意味着所有权。律师们的许多推理都具有这样的类比性，它们依赖于一些极其细微的联想。

Does any one scruple, in extraordinary cases, to violate all regard to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individuals, and sacrifice to public interest a distinction 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for the sake of that interest? The safety of the people is the supreme law: All other

particular laws are subordinate to it, and dependent on it: And if, in the COMMON course of things, they be followed and regarded; it is only because the public safety and interest COMMONLY demand so equal and impartial an administration.

在非常情形之下，有人会心存顾虑，不愿侵犯对私人所有权的完全尊重，而为公共利益牺牲掉最初恰恰是为公共利益而确立的所有权区别吗？民众的安全是最高法律，其他所有特定的法律均从属和依赖于它。如果在事物的通常进程中，这些特定的法律得到了遵从和尊重，那也仅仅是因为公共安全和利益通常要求进行这样一种平等和公正的管理。

Sometimes both UTILITY and ANALOGY fail, and leave the laws of justice in total uncertainty. Thus, it is highly requisite, that prescription or long possession should convey property; but what number of days or months or years should be sufficient for that purpose, it is impossible for reason alone to determine. CIVIL LAWS here supply the place of the natural CODE, and assign different terms for prescrip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UTILITIES, proposed by the legislator. Bills of exchange and promissory notes, by the laws of most countries, prescribe sooner than bonds, and mortgages, and contracts of a more formal nature.

有时，效用与类比均告失败，正义法则于是陷入完全的不确定性中。因此，时效或长期占有即意味着所有权，这一点就变得尤为必要；但究竟是几天、几个月或是几年才可算作长期，却不是仅凭理性就可加以断定的。在此，民法填补了自然法典的位置，它依据立法者所提出的不同效用而设定了不同的时效期限。根据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汇票和期票的时效短于债券、抵押贷款和更正式的契约。

In general, we may observe that all questions of property are subordinate to the authority of civil laws, which extend, restrain, modify, and alter the rules of natural justice, according to the particular CONVENIENCE of each community. The laws have, or ought to have, a constant reference to the co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the manners, the climate, the religion, the commerce, the situation of each society. A late author of genius, as well as learning, has prosecuted this subject at large, and has established, from these principles, a system of political knowledge, which abounds in ingenious and brilliant thoughts, and is not wanting in solidity. [4_3]

一般而言，我们会看到，与所有权相关的所有问题都从属于民法的权威，后者有权依照每一个社会特定的便利对自然正义的法则予以延伸、限制、修改和变更。法律与每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气候、宗教、商业和境况之间存在或者说应该存在一种恒定的关系。最近有一位天才而博学的作者对上述论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根据上述原则确立了一个充满新颖睿智的思想且不乏稳固性的政治学体系 [5_3] 。

WHAT IS A MAN'S PROPERTY? Anything which it is lawful for him, and for him alone, to use. BUT WHAT RULE HAVE WE, BY WHICH WE CAN DISTINGUISH THESE OBJECTS? Here we must have recourse to statutes, customs, precedents, analogies, and a hundred other circumstances; some of which are constant and inflexible, some variable and arbitrary. But the ultimate point, in which they all professedly terminate, is the interest and happiness of human society. Where this enters not into consideration, nothing can appear more whimsical, unnatural, and even superstitious, than

all or most of the laws of justice and of property.

“人的所有权是什么？”任何他可以合法使用、且唯独他自己可以合法使用的物品。“但我们可以依据哪些法则来分清这些物品的归属呢？”在此，我们必须诉诸成文法、习俗、先例、类比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因素，其中，有些因素是恒定和不变的，有些则是可变和任意的。但它们却全都公开声明以人类社会的利益和幸福为最终目标。如果不考虑这一点，那就没有什么是比正义和所有权的全部或大部分法则更怪异、更反常、甚至更迷信的了。

Those who ridicule vulgar superstitions, and expose the folly of particular regards to meats, days, places, postures, apparel, have an easy task; while they consider all the qualities and relations of the objects, and discover no adequate cause for that affection or antipathy, veneration or horror, which have so mighty an influence over a considerable part of mankind. A Syrian would have starved rather than taste pigeon; an Egyptian would not have approached bacon: But if these species of food be examined by the senses of sight, smell, or taste, or scrutinized by the sciences of chemistry, medicine, or physics, no difference is ever found between them and any other species, nor can that precise circumstance be pitched on, which may afford a just foundation for the religious passion. A fowl on Thursday is lawful food; on Friday abominable: Eggs in this house and in this diocese, are permitted during Lent; a hundred paces farther, to eat them is a damnable sin. This earth or building, yesterday was profane; to-day, by the muttering of certain words, it has become holy and sacred. Such reflections as these, in the mouth of a philosopher, one may safely say, are too obvious to have any influence; because they must always, to every man, occur at first sight; and where they prevail not, of themselves, they are surely

obstructed by education, prejudice, and passion, not by ignorance or mistake.

那些嘲讽迷信思想是粗俗的，揭露对特定肉类、时日、地方、姿势和服装的尊重是错误的人，他们的工作轻而易举，当他们需要考虑这些事物所有的品质和关系，发现人们对于这些事物的喜恶敬惧虽然对很多人有着非常强的影响力但却毫无道理。叙利亚人宁愿饿死也不吃鸽子肉；埃及人宁愿饿死也不碰咸猪肉。然而，如果从视觉、嗅觉或味觉上来检验这些食物，或是用化学、医学或物理学的知识来分析这些食物，我们便会发现它们与其他食物之间其实毫无不同之处可言，并且，也找不出什么确切的因素可以为人们的宗教激情提供一个正当合理的根基。星期四吃家禽是合法的，而星期五吃就是令人厌恶的；大斋期间在这所房子和这个教区吃鸡蛋是准许的，而在百步开外的地方吃就是可恶和有罪的。昨天这片土地或是这幢建筑物还是亵渎神灵的，今天念了几句咒语就成了圣洁而庄严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哲学家的口中，诸如此类的认识由于太过浅显而没有丝毫的影响力，因为它们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始终是第一时间就能想到的，如果它们没能自发流行起来，那肯定是受到了教育、偏见和激情而非愚昧无知或错误过失的阻碍。

It may appear to a careless view, or rather a too abstracted reflection, that there enters a like superstition into all the sentiments of justice; and that, if a man exposes its object, or what we call property, to the same scrutiny of sense and science, he will not, by the most accurate enquiry, find any foundation for the difference made by moral sentiment. I may lawfully nourish myself from this tree; but the fruit of another of the same species, ten paces off, it is criminal for me to touch. Had I worn this apparel an hour ago, I had merited the severest punishment; but a man, by pronouncing a few magical syllables, has now rendered it fit for my

use and service. Were this house placed in the neighbouring territory, it had been immoral for me to dwell in it; but being built on this side the river, it is subject to a different municipal law, and by its becoming mine I incur no blame or censure. The same species of reasoning it may be thought, which so successfully exposes superstition, is also applicable to justice; nor is it possible, in the one case more than in the other, to point out, in the object, that precise quality or circumstance,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entiment.

在某种草率的观点看来，或确切而言在某种太过抽象的认识看来，似乎所有的正义情感都带有相同的迷信色彩，似乎如果我们对正义的对象抑或我们称之为所有权的东西进行相同的感觉检验和科学分析的话，即便经过最为精确的探究，我们也找不出道德情感造成差异的根基究竟何在。我采摘这棵树上的果实为生是合法的，但如果我碰一下十步开外另一棵同样的树上的果实，我就是在犯罪。假如我一小时前穿着这件衣服，我就会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但是当有人发出几个神奇的音节之后，我再穿这件衣服就是适合的了。假如这所房子位于邻人的土地上，我住进去就是不道德的；但如果这所房子建在河的这一边，由于所遵守的国内法不同，这所房子就成了我的，我住进去也不会受到任何的谴责和责难。人们可能会想，这种成功地将迷信暴露无遗的推理同样也适用于正义，因此，就像我们无法指出迷信这一情感的根基究竟是什么确切的品质或因素一样，我们都不可能从正义的对象之中指出它究竟有什么确切的品质或因素可以作为正义这一情感的根基。

But there is this material difference between SUPERSTITION and JUSTICE, that the former is frivolous, useless, and burdensome; the latter is absolutely requisite to the well-being of mankind and existence of society. When we abstract from this circumstance (for

it is too apparent ever to be overlooked)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all regards to right and property, seem entirely without foundation, as much as the grossest and most vulgar superstition. Were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nowise concerned, it is as unintelligible why another's articulating certain sounds implying consent, should change the nature of my actions with regard to a particular object, as why the reciting of a liturgy by a priest, in a certain habit and posture, should dedicate a heap of brick and timber, and render it, thenceforth and for ever, sacred.[1]

然而，在迷信与正义之间有一个实质性的不同，即前者是肤浅、无用和累赘多余的，而后者对于人类的福祉和社会的存在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将这一因素抽离出来（因为它太过明显而不会被忽视），那我们就必须承认，如同最为荒唐和粗俗的迷信思想一样，对于权利和所有权的一切尊重都似乎毫无根基可言。假如不关涉社会利益，那我们无法理解，为何另一个人发出的表示同意的某些声音便能改变我对特定事物所做出的行为的性质，就像无法理解为何一位牧师以某种特定姿势进行祷告，就可以让一块砖头或木头从此变成圣物[1]。

1: It is evident, that the will or consent alone never transfers property, nor causes the obligation of a promise (for the same reasoning extends to both), but the will must be expressed by words or signs, in order to impose a tie upon any man. The expression being once brought in as subservient to the will, soon becomes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 promise; nor will a man be less bound by his word, though he secretly gives a different direction to his intention,

and withholds the assent of his mind. But though the expression makes, on most occasions, the whole of the promise, yet it does not always so; and one who should make use of any expression, of which he knows not the meaning, and which he uses without any sense of the consequences, would not certainly be bound by it. Nay, though he knows its meaning, yet if he uses it in jest only, and with such signs as evidently show, that he has no serious intention of binding himself, he would not lie under any obligation of performance; but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words be a perfect expression of the will, without any contrary signs. Nay, even this we must not carry so far as to imagine, that one, whom, by our quickness of understanding, we conjecture, from certain signs, to have an intention of deceiving us, is not bound by his expression or verbal promise, if we accept of it; but must limit this conclusion to those cases where the signs are of a different nature from those of deceit. All these contradictions are easily accounted for, if justice arises entirely from its usefulness to society; but will never be explained on any other hypothesis.

1：显而易见，由于意愿必须用言语或符号表达出来，方能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因此，仅凭意愿或是同意，是永远无法实现所有权的转让，也无法形成遵守承诺的义务的（因为同样的推理可延伸至此二者）。言语或符号表达最初从属于意愿，但很快就变

成了承诺的主体部分。就算一个人暗中改变意向，心中不再同意，他也依然要受到自己诺言的约束。然而，尽管言语或符号表达大多数时候构成了承诺的全部，但却并非始终如此，因为，倘如某人并不知某个表达的意义，也不知使用该表达会引发何种后果，那么，他就不一定要受其约束。不但如此，即便他懂得该表达的意义，但如果他只是在用它开玩笑，并用明显的符号表明他并不真的有意给自己任何约束，那么，他也同样没有履行的义务。而如果没有相反的符号，言语就必然是意愿的完美表达。不但如此，我们甚至不必去想象，凭借我们敏锐的知性，我们能够根据某些符号猜测出某人有意欺骗自己，那么，当我们要求他兑现承诺时，他其实并不受他的表达或言语承诺的约束。这一结论仅限于上述情形，因为，上述情形中所使用的符号不同于那些欺骗性的符号。如果我们假设正义完全源自于它对社会的有用性，那么，这所有的矛盾之处便都很容易得到说明；而如果依据的是其他假设，那么，这所有的矛盾之处便将永远无从解释。

It is remarkable that the moral decisions of the JESUITS and other relaxed casuists, were commonly formed in prosecution of some such subtilties of reasoning as are here pointed out, and proceed as much from the habit of scholastic refinement as from any corruption of the heart, if we may follow the authority of Mons. Bayle. See his Dictionary, article Loyola. And why has the indignation of mankind risen so high against these

casuists; but because every one perceived, that human society could not subsist were such practices authorized, and that morals must always be handled with a view to public interest, more than philosophical regularity? If the secret direction of the intention, said every man of sense, could invalidate a contract; where is our security? And yet a metaphysical schoolman might think, that, where an intention was supposed to be requisite, if that intention really had not place, no consequence ought to follow, and no obligation be imposed. The casuistical subtilties may not be greater than the snbtilties of lawyers, hinted at above; but as the former are PERNICIOUS, and the latter INNOCENT and even NECESSARY, this is the reason of the very different reception they meet with from the world.

值得注意的是，耶稣会会士和其他偷奸取巧的决疑者们通常是在处理一些复杂微妙的推理的过程中做出道德决定的，这些复杂微妙的推理与我们在此所指出的那些复杂微妙的推理同属一类，它们之所以会出现既是学究习气使然，亦是内心堕落之过，如果我们能够采信培尔的说法的话。见倍尔的《辞典》，“罗耀拉”这一条目。每一个人都发觉到如若这些做法被认可人类社会便无法存续，觉察到在处理道德问题时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必须始终大于对哲学规律的关注，除此之外，人们还会因为什么对这些决疑者们如此义愤填膺呢？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说，如果暗中的意向

会导致契约的失效，那我们的安全何在？然而，玄学家却可能认为，如果某个意图是必要的，而这个意图又确实没有发生，那就不会引发后果，也不会义务应当被加予。正如上文所暗示的，决疑者的推理可能并不比律师的推理更加复杂微妙，然而，由于前者是有害的，而后者是无害的乃至必要的，因此，世人对待它们的态度也大相径庭。

It is a doctrine of the Church of Rome, that the priest, by a secret direction of his intention, can invalidate any sacrament. This position is derived from a strict and regular prosecution of the obvious truth, that empty words alone, without any meaning or intention in the speaker, can never be attended with any effect. If the same conclusion be not admitted in reasoning concerning civil contracts, where the affair is allowed to be of so much less consequence than the eternal salvation of thousands, it proceeds entirely from men's sense of the danger and inconvenience of the doctrine in the former case: And we may thence observe, that however positive, arrogant, and dogmatical any superstition may appear, it never can convey any thorough persuasion of the reality of its objects, or put them, in any degree, on a balance with the common incidents of life, which we learn from daily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asoning.

罗马教会的有些教义认为，牧师暗中的意向可令一切宣誓失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人们始终严格地尊奉着一条显见的真理，即空洞的言语，若在说话人那里毫无意义或意图，自己是永远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的。人们承认民事契约中的事件远远没有对众生的永恒救赎来得重要，而如果在关于民事契约的推理过程中上述结论得不到承认，那完全是因为人们感觉到该教义的危险和不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何种迷信思想，也无论这些迷信思想看上去是如何地绝对、傲慢和武断，它们都始终无法彻底说服人们相信其对象是真实的，也丝毫不能使其对象与我们从日常观察和实验推理中所获知的日常生活事件在任何程度上等量齐观。

These reflections are far from weakening the obligations of justice, or diminishing anything from the most sacred attention to property. On the contrary, such sentiments must acquire new force from the present reasoning. For what stronger foundation can be desired or conceived for any duty, than to observe, that human society, or even human nature, could not subsist with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it; and will still arrive at greater degrees of happiness and perfection, the more inviolable the regard is, which is paid to that duty?

这些反思远远没有削弱正义的义务，也远远没有消减人们对于所有权最为神圣的关注。相反，这样的一些情感必定从目前的推理中获得新的力量。因为对于任何责任而言，除了观察到如果不确立这项责任，人类社会甚或人性就无法存续，而给予这项责任的尊重越是不可侵犯，人类社会甚或人性就越是能够实现更大程度的幸福和美满之

外，我们还能为这项责任渴求或是构想出更为坚实的根基吗？

The dilemma seems obvious: As justice evidently tends to promote public utility and to support civil society, the sentiment of justice is either derived from our reflecting on that tendency, or like hunger, thirst, and other appetites, resentment, love of life, attachment to offspring, and other passions, arises from a simple original instinct in the human breast, which nature has implanted for like salutary purposes. If the latter be the case, it follows, that property, which is the object of justice, is also distinguished by a simple original instinct, and is not ascertained by any argument or reflection. But who is there that ever heard of such an instinct? Or is this a subject in which new discoveries can be made? We may as well expect to discover, in the body, new senses, which had before escaped the observation of all mankind.

这其中的两难困境显而易见。既然正义显然是趋向于增进公共效用、维持公民社会的，那正义情感就或是起源于我们对这一趋向的思索，或是如同饥饿、干渴等嗜欲、憎恨、对生命的热爱、对后代的关爱等激情一样起源于大自然为了同样有益目的而已然植入人类胸中的一种单纯的原始本能。如果是后一种情形，那么，作为正义对象的所有权就同样是凭靠一种单纯的原始本能被辨识出来的，而不是凭靠任何的论证或思索而得到确定的。但有谁曾听闻过这样一种本能呢？抑或，这个论题能有新发现吗？我们还是期待发现一些之前不曾被任何人观察到的新感官为好。

But farther, though it seems a very simple proposition to say, that nature, by an instinctive sentiment, distinguishes property, yet in reality we shall find, that there are required for that purpose ten

thousand different instincts, and these employed about objects of the greatest intricacy and nicest discernment. For when a definition of PROPERTY is required, that relation is found to resolve itself into any possession acquired by occupation, by industry, by prescription, by inheritance, by contract, etc. Can we think that nature, by an original instinct, instructs us in all these methods of acquisition?

再进一步，尽管大自然凭靠一种本能性的情感来对所有权加以辨识似乎是一道非常简单的命题，然而，我们在现实中还是会发现，要想将所有权辨识出来，我们需要拥有上万种不同的本能，用来对付那些极度错综复杂和极度难以分辨的事物。因为，当需要给所有权下定义时，我们会发现，这种关系消解在了靠占有、勤勉、时效、继承以及契约等获取的任何一种财产中。我们能认为大自然凭靠一种原始本能教导给我们所有这些获取方式吗？

These words too, inheritance and contract, stand for ideas infinitely complicated; and to define them exactly, a hundred volumes of laws, and a thousand volumes of commentators, have not been found sufficient. Does nature, whose instincts in men are all simple, embrace such complicated and artificial objects, and create a rational creature, without trusting anything to the operation of his reason?

而且，像继承和契约这样的字眼本身就代表着一些被无限复杂化了的观念；要想精确地定义它们，上百卷的法律和上千卷的注释，都依然不够。既然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本能极其简单，那它能否接受这些复杂的人造物，能否创造出一种理性的生物而又不将任何东西信托给他的理性运作呢？

But even though all this were admitted, it would not be satisfactory. Positive laws can certainly transfer property. Is it by another original instinct, that we recognize the authority of kings and senates, and mark all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jurisdiction? Judges too, even though their sentence be erroneous and illegal, must be allowed, for the sake of peace and order, to have decisive authority, and ultimately to determine property. Have we original innate ideas of praetors and chancellors and juries? Who sees not, that all these institutions arise merely from the necessities of human society?

而即便上述种种全部得到承认，也依然无法令人满意。实证法当然允许转让所有权。难道是凭靠另一种原始本能，我们才认可了国王和议会的职权，并规定了他们权限的全部范围吗？尽管法官的审判可能会出错、会违法，但为了和平与秩序，我们还是必须允许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威，能够最终断定所有权的归属。难道我们拥有关于执政官、大法官和陪审团的原始的天赋的观念吗？谁会不明白，所有这些机构制度都仅仅是源自于人类社会的必需呢？

All birds of the same species in every age and country, build their nests alike: In this we see the force of instinct. Men, in different times and places, frame their houses differently: Here we perceive the influence of reason and custom. A like inference may be drawn from comparing the instinct of gener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 of property.

同一种类的鸟儿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它们筑就的鸟巢都是相同的。在此，我们看到的是本能的力量。而人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建造的房子却是各不相同的。在此，我们觉察到的是理性和习俗的

影响力。通过对比生殖本能和所有权制度，我们也可以给出相同的推论。

How great soever the variety of municipal laws,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eir chief outlines pretty regularly concur; because the purposes, to which they tend, are everywhere exactly similar. In like manner, all houses have a roof and walls, windows and chimneys; though diversified in their shape, figure, and materials. The purposes of the latter, directed to the conveniencies of human life, discover not more plainly their origin from reason and reflection, than do those of the former, which point all to a like end.

无论国内法如何地种类繁多，我们都必须承认，它们的主要框架都始终是相互一致的，因为它们所趋向的目的无论在哪里都完全相似。同样，所有的房子都有屋顶和墙壁，都有窗户和烟囱，尽管它们的形状、外观和材料彼此相异。后一例证（房子）的目的指向人们生活的舒适便利，它与全部指向同一目标的前一例证（国内法）的目的一样，显然都起源于理性和思索。

I need not mention the variations, which all the rules of property receive from the finer turns and connexions of the imagination, and from the subtilties and abstractions of law-topics and reasonings.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reconciling this observation to the notion of original instincts.

且不说所有权的全部法则因为想象力种种细微的倾向和联结以及种种微妙抽象的法律问题和推理而出现种种变异。我们不可能使这一观察合乎原始本能的观念。

What alone will beget a doubt concerning the theory, on which I insist, is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and acquired habits, by which we are so accustomed to blame injustice, that we are not, in every instance, conscious of any immediate reflection on the pernicious consequences of it. The views the most familiar to us are apt, for that very reason, to escape us; and what we have very frequently performed from certain motives, we are apt likewise to continue mechanically, without recalling, on every occasion, the reflections, which first determined us. The convenience, or rather necessity, which leads to justice is so universal, and everywhere points so much to the same rules, that the habit takes place in all societies; and it is not without some scrutiny, that we are able to ascertain its true origin. The matter, however, is not so obscure, but that even in common life we have every moment recourse to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utility, and ask, WHAT MUST BECOME OF THE WORLD, IF SUCH PRACTICES PREVAIL? HOW COULD SOCIETY SUBSIST UNDER SUCH DISORDERS? Were the distinction or separation of possessions entirely useless, can any one conceive, that it ever should have obtained in society?

唯一能够对我所坚持的这一理论提出质疑的，是教育和后天养成的习惯的影响；这种影响使我们变得如此习惯于谴责不义，以至于我们从来都意识不到要立即去思索它的有害后果。正因为此，对于我们最熟悉的观点，我们常常会熟视无睹；我们出于某些动机已经反复不断做着的事情，我们也常常会机械地加以延续，而从来都不会回想起最初规定过我们的思索。导向正义的舒适便利或者说基本必需，是如此普遍，并且处处都如此有力地指向一些相同的法则，以至于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出现了这种习惯。无需细究，我们便不能确定这一习惯的真正起源。然而，问题并非如此隐晦不明，我们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在运用公共效用这一原则，都在追问：这些做法如若流行，

世界将会怎样？在如此混乱的状况下，社会如何存续？倘若财产的区分或划分完全无用，那有谁能设想它应该通行于社会中吗？

Thus we seem, upon the whole, to have attained a knowledge of the force of that principle here insisted on, and can determine what degree of esteem or moral approbation may result from reflections on public interest and utility. The necessity of justice to the support of society is the sole foundation of that virtue; and since no moral excellence is more highly esteemed, we may conclude that this circumstance of usefulness has, in general, the strongest energy, and most entire command over our sentiments. It must, therefore, be the source of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merit ascribed to humanity, benevolence, friendship, public spirit, and other social virtues of that stamp; as it is the sole source of the moral approbation paid to fidelity, justice, veracity, integrity, and those other estimable and useful qualities and principles. It is entirely agreeable to the rules of philosophy, and even of common reason; where any principle has been found to have a great force and energy in one instance, to ascribe to it a like energy in all similar instances. This indeed is Newton's chief rule of philosophizing. [4_4]

因此，整体而言，我们似乎已经对在此坚持的这条原则的效力有所认识，并且可以断定对于公共利益和效用的反思可以产生出多大程度的钦敬和道德赞许。正义对于维持社会的必要性是正义这种德性的唯一根基。既然没有哪一种美德可以得到更高的钦敬，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般而言，有用性因素有着最为强大的效能，并且对我们的情感有着完全的控制力。因此，有用性因素必然是人道、仁爱、友善、公共精神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社会德性的价值源泉；正如它也是忠实、正义、诚实、正直，以及其他值得钦敬的有用品质和有用原则所得到的道德赞许的唯一源泉一样。如果一条原则在某个

事例中被发现有着巨大的力量和效能，那么，在其他所有相似事例中出现的相似效能都归之于它，是完全合乎哲学法则甚至日常理性法则的。这其实也正是牛顿哲学研究的主要法则 [5_4] 。

[4_1].Genesis, chaps. xiii. and xxi.

[4_2].This fiction of a state of nature, as a state of war, was not first started by Mr. Hobbes, as is commonly imagined. Plato endeavours to refute a hypothesis very like it in 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books de republica. Cicero, on the contrary, supposes it certain and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in the following passage. 'Quis enim vestrum, judices, ignorat, ita naturam rerum tulisse, ut quodam tempore homines, nondum neque naturali neque civili jure descripto, fusi per agros ac dispersi vagarentur tantumque haberent quantum manu ac viribus, per caedem ac vulnera, aut eripere aut retinere potuissent? Qui igitur primi virtute & consilio praestanti extiterunt, ii perspecto genere humanae docilitatis atque ingenii, dissipatos unum in locum congregarunt, eosque ex feritate illa ad justitiam ac mansuetudinem transduxerunt. Tum res ad communem utilitatem, quas publicas appellamus, tum conventicula hominum, quae postea civitates nominatae sunt, tum domicilia conjuncta, quas urbes dicamus, invento & divino & humano jure moenibus sepserunt. Atque inter hanc vitam, perpolitam humanitate, & llam immanem, nihil tam interest quam JUS atque VIS. Horum utro uti nolimus, altero est utendum. Vim volumus extingui. Jus valeat necesse est, idi est, judicia, quibus omne jus continetur. Judicia displicent, ant nulla sunt. Vis dominetur necesse est. Haec vident omnes.' Pro Sext. sec. 42.

[4_3].The author of L'ESPRIT DES LOIX. This illustrious writer, however, sets out with a different theory, and supposes all right to be founded on certain RAPPORTS or relations; which is a system, that, in my opinion, never will be reconciled with true philosophy. Father Malebranche, as far as I can learn, was the first that started this abstract theory of morals, which was afterwards adopted by Cudworth, Clarke, and others; and as it excludes all sentiment, and pretends to found everything on reason, it has not wanted followers in this philosophic age. See Section 1, Appendix 1. With regard to justice, the virtue here treated of, the inference against this theory seems short and conclusive. Property is allowed to be dependent on civil laws; civil laws are allowed to have no other object, but the interest of society: This therefore must be allowed to be the sole foundation of property and justice. Not to mention, that our obligation itself to obey the magistrate and his laws is founded on nothing but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If the ideas of justice, sometimes, do not follow the dispositions of civil law; we shall find, that these cases, instead of objections, are

confirmations of the theory delivered above. Where a civil law is so perverse as to cross all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it loses all its authority, and men judge by the ideas of natural justice, which are conformable to those interests. Sometimes also civil laws, for useful purposes, require a ceremony or form to any deed; and where that is wanting, their decrees run contrary to the usual tenour of justice; but one who takes advantage of such chicanes, is not commonly regarded as an honest man. Thus,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require, that contracts be fulfilled; and there is not a more material article either of natural or civil justice: But the omission of a trifling circumstance will often, by law, invalidate a contract, in foro humano, but not in foro conscientiae, as divines express themselves. In these cases, the magistrate is supposed only to withdraw his power of enforcing the right, not to have altered the right. Where his intention extends to the right, and is conformable to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it never fails to alter the right; a clear proof of the origin of justice and of property, as assigned above.

[4_4].Principia. lib. iii.

[5_1].《创世纪》，第十三、二十一章。

[5_2].对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的这种虚构想象并不是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由霍布斯先生首先给出的。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二、三、四卷中曾经努力反驳过一种与之非常相似的假设。相反，西塞罗却在下面这段话中认为它是确定无疑和普遍认可的。“各位法官，你们谁会不知道，自然的发展进程是，在自然法和民法被完全制定出来之前，人是在乡野间骚动不安、四处游荡的群氓，除非凭借他们自己的个人力量在伤痛和流血中夺取和占有，否则他们便一无所有？贤人和智者思考着人之本质与人之是否可教的问题，他们将散落四方的人们聚集一地，并带领人们走出凶残和野蛮，走进正义和温良。随之，他们建立起我们称之为“共同体”的社会结构以为人类所用，之后，被称作“邦国”的更大的人类群体开始出现。这时，环绕着连片的房屋，人们筑起城墙，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城市”，与此同时，神法和人法也开始逐渐获得认可。这种文明精致的生活方式与原先野蛮的生活方式之间唯一的最大不同是，法律是前者的主导原则，而支配后者的则是暴力。如果我们不想听从法律，我们就必会接受暴力。而如果我们中止暴力，我们就会大兴法律，或曰大建法庭，因为法庭本身即包含了法律和正义。凡此种种，人所共睹。”《为塞克斯都辩》，第四十二节。

[5_3].《论法的精神》的作者。然而，这位著名作家却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理论，认为一切权利均基于某些联系或关系，他的这一理论我认为是一种永远与真正的哲学相龃龉的体系。据我所知，首先提出这一抽象道德理论的是马勒伯朗士神父。该理论后来得到了卡德沃斯、克拉克等人的采纳。由于将一切情感排除在外，并自称完全基于理性，因而，在我们这个哲学的时代，它不乏追随者。见第一章和附录一。就正义这一我们在此探讨的德性而言，反驳该理论的推论似乎精短而确凿。我们承认所有权依

赖于民法，承认民法除社会利益之外别无其他目标，因此，我们也必定会承认社会利益是所有权和正义的唯一根基。更毋庸说，我们遵从执政官以及他的法律义务本身也是完全基于社会利益的。如果正义观念有时违背了民法意向，那么，我们会发现，正是这些事例而非他人的异议证实了上述的理论。倘若某条民法极度悖谬以至于不利于一切社会利益，那么，它就会彻底丧失权威，人们在进行评判时就会转向那些符合社会利益的自然正义的观念。有时，民法也会为了有用的目的，要求人们的任何行为都要遵循礼仪礼节。倘若缺乏礼仪礼节，民法的法令就会违反正义的通常要义。而如若有人利用这些漏洞，那么，一般而言，在人们眼中此人便非诚实之辈。因此，社会利益要求履行契约，这是自然正义或民法正义最实质性的一则条款。而契约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的缺失，依照人类世俗的法律而非神学家们所谓的良知的法律，却常常会导致契约的失效。在这种情形之下，执政官本应只是撤回他执行该权利的权力，而非变更该权利。但倘若他的意图延伸至该权利，且符合社会利益，那么，他变更该权利的意图是会绝不会失败。这是对上文所指出的正义和所有权的起源的一个明证。

[5_4].《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第三卷。

SECTION 4　OF POLITICAL SOCIETY

第四章　论政治社会

Had every man sufficient SAGACITY to perceive, at all times, the strong interest which binds him to the observance of justice and equity, and STRENGTH OF MIND sufficient to persevere in a steady adherence to a general and a distant interest, in opposition to the allurements of present pleasure and advantage; there had never, in that case, been any such thing as government or political society, but each man, following his natural liberty, had lived in entire peace and harmony with all others. What need of positive law where natural justice is, of itself, a sufficient restraint? Why create magistrates, where there never arises any disorder or iniquity? Why abridge our native freedom, when, in every instance, the utmost exertion of it is found innocent and beneficial? It is evident, that, if government were totally useless, it never could have place, and that the sole foundation of the duty of allegiance is the ADVANTAGE, which it procures to society, by preserving peace and order among mankind.

倘若每一个人都拥有足够的睿智能够时刻觉察到那种迫使他遵循正义和公平的强大利益，都拥有足够的意志力能够抵御眼下愉悦和好处的诱惑而坚定不移地坚持一种普遍和长远的利益，那诸如政府和政治社会之类的事物就不会出现，而每一个人也只需顺守其天然的自由，便能与其他所有人和平和谐地相处。假如自然正义本身就是一种充足的约束，还需要实证法做什么？假如一个地方从未出现过无序和不公的情况，为何还要设置执政官？假如我们每一次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天赋自由都发现这样做是无害而有益的，为何还要对它加以限

制？显而易见，如果政府是完全无用的，那么它就不可能出现，而忠诚这项责任的唯一根基是它通过维持人类的和平与秩序而给社会带来的利益。

When a number of political societies are erected, and maintain a great intercourse together, a new set of rules are immediately discovered to be USEFUL in that particular situation; and accordingly take place under the title of Laws of Nations. Of this kind are, the sacredness of the person of ambassadors, abstaining from poisoned arms, quarter in war, with others of that kind, which are plainly calculated for the ADVANTAGE of states and kingdoms in their intercourse with each other.

当一些政治社会建立起来并彼此保持密切交往时，人们立刻便会发现在这种特定情形之下一套新的法则是有用的，于是国际法应运而生。这套法则包括：使节们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使用有毒武器、优待俘虏等，这些法则的制定显然是为了在诸邦国和王国的相互交往中保护彼此的利益。

The rules of justice, such as prevail among individuals, are not entirely suspended among political societies. All princes pretend a regard to the rights of other princes; and some, no doubt, without hypocrisy. Alliances and treaties are every day made between independent states, which would only be so much waste of parchment, if they were not found by experience to have SOME influence and authority. But here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kingdoms and individuals. Human nature cannot by any means subsist, without the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that association never could have place, were no regard paid to the laws of equity

and justice. Disorder, confusion, the war of all against all, are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s of such a licentious conduct. But nations can subsist without intercourse. They may even subsist, in some degree, under a general war. The observance of justice, though useful among them, is not guarded by so strong a necessity as among individuals; and the moral obligation holds proportion with the USEFULNESS. All politicians will allow, and most philosophers, that reasons of state may, in particular emergencies, dispense with the rules of justice, and invalidate any treaty or alliance, where the strict observance of it would be prejudicial, in a considerable degree, to either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But nothing less than the most extreme necessity, it is confessed, can justify individuals in a breach of promise, or an invasion of the properties of others.

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流行的正义法则，在各个政治社会之间并未完全废止。所有的君王都自称尊重其他君王的权利，毫无疑问，其中有些君王并不是出于伪善。独立的邦国之间每天都在缔结联盟、签订协议。如果从经验来看这些联盟和协议并不具备某种影响力和权威性，那它们不过就是在大肆浪费纸张而已。而这也正是王国和个人之间的不同之处。没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联合，人性就无法存续。假如没有对公平和正义法则的尊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联合就不可能出现。无序、混乱以及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正是这样一种无视法则的行为导致的必然结果。然而，即便没有交往，国家也能存续。即便全面开战，它们甚至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存续。尽管遵循正义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有用的，但却不像在个人与个人之间那样必不可少，因为道义责任是和有用性成正比的。所有的政治家和大部分的哲学家都会认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国家理性会废止正义法则、取消协议或联盟，因为此时遵循它们对于缔约双方而言都是有极大损害的。相反，人们承认，除非是出于极端必需，否则个人的违约或是对他人所有权的侵犯都无法被证明是正当合理的。

In a confederated commonwealth, such as the Achaean republic of old, or the Swiss Cantons and United Provinces in modern times; as the league has here a peculiar UTILITY, the conditions of union have a peculiar sacredness and authority, and a violation of them would be regarded as no less, or even as more criminal, than any private injury or injustice.

在如古代的阿开亚共和国和现代的瑞士联省共和国这样的共和国中，由于联盟在此有着特殊的效用，结盟条款就有着特殊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违反它们将被视为犯罪，其严重程度不亚于甚或高于任何对私人施加的侵害和不义。

The long and helpless infancy of man requires the combination of parents for the subsistence of their young; and that combination requires the virtue of chastity or fidelity to the marriage bed. Without such a UTILITY, it will readily be owned, that such a virtue would never have been thought of. [5_1]

人类漫长而无助的婴儿期要求父母双方彼此联合以维持他们子女的生存，这种联合要求他们拥有贞洁或对婚床忠贞的美德。人们会易于承认，没有这样的一种效用，他们就永远不会想到这种德性 [6_1] 。

An infidelity of this nature is much more PERNICIOUS in WOMEN than in MEN. Hence the laws of chastity are much stricter over the one sex than over the other.

在这一方面，女人的不忠比男人的不忠更加有害。因此，有关忠

贞的法律对女人也比对男人更为严苛。

These rules have all a reference to generation; and yet women past child-bearing are no more supposed to be exempted from them than those in the flower of their youth and beauty. GENERAL RULES are often extended beyond the principle whence they first arise; and this in all matters of taste and sentiment. It is a vulgar story at Paris, that, during the rage of the Mississippi, a hump-backed fellow went every day into the Rue de Quincempoix, where the stock-jobbers met in great crowds, and was well paid for allowing them to make use of his hump as a desk, in order to sign their contracts upon it. Would the fortune, which he raised by this expedient, make him a handsome fellow; though it be confessed, that personal beauty arises very much from ideas of utility? The imagination is influenced by associations of ideas; which, though they arise at first from the judgement, are not easily altered by every particular exception that occurs to us. To which we may add, in the present case of chastity, that the example of the old would be pernicious to the young; and that women, continually foreseeing that a certain time would bring them the liberty of indulgence, would naturally advance that period, and think more lightly of this whole duty, so requisite to society.

这些法则全部和生育有关，但却对过了生育年龄的妇人和正值花季美貌的少女一样一律不予豁免。一般法则最初产生于原则，但却常常延伸至原则之外，在一切品味和情感问题上，均是如此。一则流行于巴黎的民间故事，在密西西比股票暴涨时期，一个驼背的人每天都会去证券交易人云集的坎康布瓦街，让他们以自己的驼背作桌案签署契约，从而获得丰厚的报酬。尽管我们承认，身体上的美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效用的观念，但这个人利用自己的驼背之便所赚取的财富能够

使他变得英俊漂亮吗？想象力受观念的联结影响。尽管这些观念的联结最初产生于判断力，但却并不因我们所想到的每一个特殊的例外而轻易改变。再者，在目前所举的忠贞的例证中，老年人的榜样会有害于年轻人，并且，如果女人们总是期望着什么时候她们能有尽情放纵的自由，那么，她们自然会将那个时间提前，而更加轻视忠贞这一社会必需的德性的全部责任。

Those who live in the same family have such frequent opportunities of licence of this kind, that nothing could preserve purity of manners, were marriage allowed, among the nearest relations, or any intercourse of love between them ratified by law and custom. Incest, therefore, being PERNICIOUS in a superior degree, has also a superior turpitude and moral deformity annexed to it.

家庭成员之间有更多这样淫乱放纵的机会，以至于假如法律和习俗允许近亲结婚或是根据法律习俗准许近亲交合的话，那么，人们作风的纯洁性就无法得到保持。因此，由于是高度有害的，乱伦也便被认为有着一种高度的堕落和道德畸形。

What is the reason, why, by the Athenian laws, one might marry a half-sister by the father, but not by the mother? Plainly this: The manners of the Athenians were so reserved, that a man was never permitted to approach the women's apartment, even in the same family, unless where he visited his own mother. His step-mother and her children were as much shut up from him as the woman of any other family, and there was as little danger of any crimin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m. Uncles and nieces, for a like reason, might marry at Athens; but neither these, nor half-

brothers and sisters, could contract that alliance at Rome, where the intercourse was more open between the sexes. Public utility is the cause of all these variations.

根据雅典的法律，一个人可以和他同父异母的姐妹结婚，而不可以和他同母异父的姐妹结婚，原因何在？显然是因为雅典人作风矜持保守，即便是一家人，一个男人除了看望他自己的亲生母亲以外，也决不被允许靠近女人们的房间。他的继母和继母的女儿如同另一个家庭中的女人一般与他是相隔离的，因此，他们之间很少会有通奸的危险。出于同样的原因，在雅典，叔父与侄女可以结婚。在两性交往更为开放的罗马，无论是叔父与侄女之间，还是同父异母和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之间，都是不能缔结婚约的。公共效用就是所有这些变异的根由所在。

To repeat, to a man's prejudice, anything that escaped him in private conversation, or to make any such use of his private letters, is highly blamed. The free and social intercourse of minds must be extremely checked, where no such rules of fidelity are established.

为了损害一个人而将其在私人谈话中无意泄露的任何内容传扬出去，或是以同样的方式利用这个人的私人信件，都会受到人们的强烈谴责。假如忠实法则还未确立，那么，心灵之间自由的社会交往就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遏止。

Even in repeating stories, whence we can foresee no ill consequences to result, the giving of one's author is regarded as a piece of indiscretion, if not of immorality. These stories, in passing from hand to hand, and receiving all the usual variations,

frequently come about to the persons concerned, and produce animosities and quarrels among people, whose intentions are the most innocent and inoffensive.

即便是在我们看来不出产生任何恶劣后果的传闲话，透露出闲话的作者这种做法，就算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也会被认为是不慎重的。这些闲话在口口相传中通常会几经变异，传到当事人的耳中，从而在那些意图最为单纯和最无冒犯性的人们中间引发怨恨和争吵。

To pry into secrets, to open or even read the letters of others, to play the spy upon their words and looks and actions; what habits more inconvenient in society? What habits, of consequence, more blameable?

窥探秘密，私拆甚或偷看他人信件，暗中监视他人言谈、表情和行为，还有什么习惯比这些更能令人在社会中感到不便呢？因而，还有什么习惯比这些更应受到谴责呢？

This principle is also the foundation of most of the laws of good manners; a kind of lesser morality, calculated for the ease of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 Too much or too little ceremony are both blamed, and everything, which promotes ease, without an indecent familiarity, is useful and laudable.

这条原则也是大多数礼貌法则的根基所在，这些法则的道德性较弱，制定它们也只是为了使得交际和谈话能够安适惬意。拘于礼仪或是毫无规矩都会受到责备，凡是能够增进交际和谈话的安适惬意、亲

密而不狎昵的做法，都是有用和值得夸赞的。

Constancy in friendships, attachments, and familiarities, is commendable, and is requisite to support trust and good correspondence in society. But in places of general, though casual concourse, where the pursuit of health and pleasure brings people promiscuously together, public conveniency has dispensed with this maxim; and custom there promotes an unreserved conversation for the time, by indulging the privilege of dropping afterwards every indifferent acquaintance, without breach of civility or good manners.

对友情、关爱和亲昵的坚贞不渝不仅值得称许，而且也是维持社会中人们彼此信任和良好交往所必需的。然而，在一般的却不拘礼数的场所，人们不论男女，为了追求健康和愉悦聚集起来，为众人之便这条准则就被免除了。习俗纵容人们享受特权，不再理睬不感兴趣的熟人，这暂且促使人们无拘无束地交往，而不致失礼。

Even in societies, which are established on principles the most immoral, and the most destructive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general society, there are required certain rules, which a species of false honour, as well as private interest, engages the members to observe. Robbers and pirates, it has often been remarked, could not maintain their pernicious confederacy, did they not establish a new distributive justice among themselves, and recall those laws of equity, which they have violated with the rest of mankind.

有些社会的建立依据的是最不道德、对一般社会的利益最具破坏

性的原则，而即便是在这样的社会中，也仍然需要一些法则，这些法则借助一种虚假的荣誉感以及私人利益要求社会成员们予以遵守。人们经常注意到，假如劫匪和海盗没有在其内部建立起一种新的分配正义，不恢复那些他们在对待其他人时已然违背的公平法则，他们就无法维持其内部邪恶的联盟。

I hate a drinking companion, says the Greek proverb, who never forgets. The follies of the last debauch should be buried in eternal oblivion, in order to give full scope to the follies of the next.

希腊谚语云：我不愿与事事记在心上之人共饮。上一次饮酒作乐时做下的荒唐事应该彻底从脑海中抹去，这样，下一次饮酒时我们才能够继续尽情作乐。

Among nations, where an immoral gallantry, if covered with a thin veil of mystery, is, in some degree, authorized by custom, there immediately arise a set of rules, calculated for the conveniency of that attachment. The famous court or parliament of love in Provence formerly decided all difficult cases of this nature.

在有些国家，一件不道德的风流韵事如果披上一层神秘的薄纱，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习俗的认可，因而，为了这种恋情的便利，这些国家随即便会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法则。普罗旺斯著名的爱情法庭或爱情议院从前就审判过各种各样此类性质的疑难案例。

In societies for play, there are laws required for the conduct of the game; and these laws are different in each game. The

foundation, I own, of such societies is frivolous; and the laws are, in a great measure, though not altogether, capricious and arbitrary. So far is there a mater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the rules of justice, fidelity, and loyalty. The general societies of men are absolutely requisite for the subsistence of the species; and the public conveniency, which regulates morals, is inviolably established in the nature of man, and of the world, in which he lives. The comparison, therefore, in these respects, is very imperfect. We may only learn from it the necessity of rules, wherever men have any intercourse with each other.

在游戏比赛的社会中，需要有规定比赛行为的法则，并且，赛事不同，法则也不尽相同。我承认，这些社会的根基轻浅，其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变化无常、任意随便的，尽管不是全部如此。而这也正是这些法则与正义、忠实和忠诚法则之间的实质性不同。人类的一般社会对于其种族的存续而言是绝对必需的。用以规范道德的公共便利是在人的本性和人所生活的世界的本质中不可动摇地确立起来的。因此，以上这些方面的比较是非常完善的。我们只能从中了解到，人们彼此之间无论在哪里发生交往，法则都是必要的。

They cannot even pass each other on the road without rules. Waggoners, coachmen, and postilions have principles, by which they give the way; and these are chiefly founded on mutual ease and convenience. Sometimes also they are arbitrary, at least dependent on a kind of capricious analogy like many of the reasonings of lawyers. [5_2]

没有法则，人们甚至无法在马路上你来我往。赶大车的、赶载客马车的和赶多驾马车的车夫，都有其相互让路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

是基于彼此的安适与便利。有时候，这些原则也是任意随便的，或者至少是像律师们的许多推理一样依赖于一种反复多变的类比 [6_2] 。

To carry the matter farther, we may observe,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n so much as to murder each other without statutes, and maxims, and an idea of justice and honour. War has its laws as well as peace; and even that sportive kind of war, carried on among wrestlers, boxers, cudgel-players, gladiators, is regulated by fixed principles. Common interest and utility beget infallibly a standard of right and wrong among the parties concerned.

更进一步讲，我们会看到，没有成文法、箴言和正义与荣誉的观念，人们甚至连相互残杀都是不可能的。正如和平一般，战争亦有法则；甚至是在摔跤手、拳击手、斗棍士以及斗剑士之间进行的体育战争也要受固定原则的规范。共同利益和共同效用会可靠无误地在当事各方之间形成一个对错的标准。

[5_1].The only solution, which Plato gives to all the objections that might be raised against the community of women, established in his imaginary commonwealth, is, (Greek quotation here). Scite enim istud et dicitur et dicetur, Id quod utile sit honestum esse, quod autem inutile sit turpe esse. (De Rep. lib. v, p. 457. ex edit. Ser.) And this maxim will admit of no doubt, where public utility is concerned, which is Plato's meaning. And indeed to what other purpose do all the ideas of chastity and modesty serve? "Nisi utile est quod facimus, frustra est gloria," says Phaedrus. (Greek quotation here), says Plutarch, de vitioso pudore. "Nihil eorum quae damnosa sunt, pulchrum est." The same was the opinion of the Stoics (Greek quotation here; from Sext. Emp. lib. iii. cap. 20.)

[5_2].That the lighter machine yield to the heavier, and, in machines of the same kind, that the empty yield to the loaded; this rule is founded on convenience. That those who are going to the capital take place of those who are coming from it; this seems to be founded on some idea of dignity of the great city, and of the preference of the future to the past. From like reasons, among foot-walkers, the right-

hand entitles a man to the wall, and prevents jostling, which peaceable people find very disagreeable and inconvenient.

[6_1].针对在其想象的共和国中所建立的共妻制可能会引发的所有异议，柏拉图给出的唯一解释是：有用则美，无用则丑，古今同理。（希腊文）（*Scite enim istud et dicitur et dicetur, Id quod utile sit honestum esse, quod autem inutile sit turpe esse.*）（《理想国》，第五卷，第457页，摘自Serranus所编版本）。就公共效用而言——正是柏拉图所指之意，这条箴言不容置疑。的确，忠贞和端庄的全部观念除此之外还能发挥什么其他作用呢？斐德罗说，“除非我们所做有用，否则努力便无足称道。”（*Nisi utile est quod facimus, frustra est gloria.*）普鲁塔克在《论伪端庄》中说，“有害的事物无一为美。”（*Nihil eorum quae damnosa sunt, pulchrum est.*）斯多葛派的观点亦是如此。斯多葛派认为，善即有用，或者说唯有德性和美好行为是有用的。引自塞克斯都·恩披里珂：《皮浪主义纲要》，第三卷，第二十章。

[6_2].轻型车辆让路给重型车辆，而如果是同类车辆，那么，就是空载的车辆让路给负载的车辆。这条法则基于便利。驶离首都方向的车辆给驶向首都方向的车辆让路。这条法则似乎是基于某种首都大城市是尊贵的和未来优先于过去的观念。同样，步行者靠右行即靠近有墙的一边，从而避免发生冲撞，而爱好和平的人认为发生冲撞是令人感到不快和不便的。

SECTION 5　WHY UTILITY PLEASES

第五章　效用为何使人愉悦

PART 1

第一节

It seems so natural a thought to ascribe to their utility the praise, which we bestow on the social virtues, that one would expect to meet with this principle every where in moral writers, as the chief foundation of their reasoning and enquiry. In common life, we may observe, that the circumstance of utility is always appealed to; nor is it supposed, that a greater eulogy can be given to any man, than to display his usefulness to the public, and enumerate the services, which he has performed to mankind and society. What praise, even of an inanimate form, if the regularity and elegance of its parts destroy not its fitness for any useful purpose! And how satisfactory an apology for any disproportion or seeming deformity, if we can show the necessity of that particular construction for the use intended! A ship appears more beautiful to an artist, or one moderately skilled in navigation, where its prow is wide and swelling beyond its poop, than if it were framed with a precise geometrical regularity, in contradiction to all the laws of mechanics. A building, whose doors and windows were exact squares, would hurt the eye by that very proportion; as ill adapted to the figure of a human creature, for whose service the fabric was intended.

把我们赋予社会德性的赞美归因于它们的效用似乎是很自然的一个想法，使得人们会期待在有道德感的作家笔下处处都能见到这条原则，并以此作为自己推理和探究的主要根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总是求助于效用因素，我们也认为，对一个人的最高颂扬莫过于展现他对公众的有用性，历数他为人类和社会所做出的种种贡献。即便是一种无生命的形式，如果其各部分的规则性和优雅性并不会影响其适用于任何有用的目的，那它亦会受到极大的称赞！任何的比例失调或是外表畸形，只要我们能够表明该种特殊结构对于某一意图实现预期的用途而言是必要的，那么，为它辩护将是多么地令人满意！对于一位艺术家或是一个具备基本航海技能的人来说，一艘船头比船尾宽阔高大的船只，违背了一切力学法则，却比按照精确的几何学常规建造出来的形态更美。一幢建筑，如其门窗都是精准的正方形，这种比例看起来有些刺目，因为它们与该建筑所意图服务的人类的体型比例并不完全适应。

What wonder then, that a man, whose habits and conduct are hurtful to society, and dangerous or pernicious to every one who has an intercourse with him, should, on that account, be an object of disapprobation, and communicate to every spectator the strongest sentiment of disgust and hatred. [6_1]

于是，一个人，如果其行为习惯于社会有害、于每一个与他交往的人有危险或是有危害的话，那他会因此成为人们非难的对象，并向每一位观者传达最强烈的厌恶和憎恨之情，便不足为奇 [7_1] 。

But perhaps the difficulty of accounting for these effects of usefulness, or its contrary, has kept philosophers from admitting them into their systems of ethics, and has induced them rather to employ any other principle, in explaining the origin of moral good

and evil. But it is no just reason for rejecting any principle, confirmed by experience, that we cannot give a satisfactory account of its origin, nor are able to resolve it into other mor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if we would employ a little thought on the present subject, we need be at no loss to account for the influence of utility, and to deduce it from principles, the most known and avowed in human nature.

但是，或许解释这些有用性或无用性的效果十分困难，因此哲学家们拒绝将其纳入他们的伦理学体系，并促使他们在解释善恶起源时宁愿采用其他原则。对于任何得到经验证实的原则，我们无法对它的起源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也不能将其分解成其他更一般性的原则，但这些都不是我们拒绝它的正当理由。如果我们对目前的论题稍加思考，我们就需要完全解释效用的影响力，并将其从人性中那些最著名、最公开宣称的原则中演绎出来。

From the apparent usefulness of the social virtues, it has readily been inferred by sceptics,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that all moral distinctions arise from education, and were, at first, invented, and afterwards encouraged, by the art of politicians, in order to render men tractable, and subdue their natural ferocity and selfishness, which incapacitated them for society. This principle, indeed, of precept and education, must so far be owned to have a powerful influence, that it may frequently increase or diminish, beyond their natural standard, the sentiments of approbation or dislike; and may even, in particular instances, create, without any natural principle, a new sentiment of this kind; as is evident in all superstitious practices and observances: But that ALL moral affection or dislike arises from this origin, will never surely be allowed by any judicious enquirer. Had nature made no such

distinction, founded on 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of the mind, the words, HONOURABLE and SHAMEFUL, LOVELY and ODIOUS, NOBLE and DESPICABLE, had never had place in any language; nor could politicians, had they invented these terms, ever have been able to render them intelligible, or make them convey any idea to the audience. So that nothing can be more superficial than this paradox of the sceptics; and it were well, if, in the abstruser studies of logic and metaphysics, we could as easily obviate the cavils of that sect, as in the practical and more intelligible sciences of politics and morals.

由社会德性显而易见的有用性，古代和现代的怀疑论者们已轻而易举地推断出，所有的德恶之别均源自于教育，是由政治家们凭借政治艺术先发明出来而后鼓励起来的，以使得人们变得温顺，并使人们身上那些令其不适合社会生活的天生的残暴与自私受到压制。事实上，必须承认这条规诫与教育的原则拥有一种强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它往往超出赞许与嫌恶之情的自然标准而对其加以增减；而在特定事例中，它甚至无需借助任何自然原则便能创造一种新的赞许或嫌恶之情，这在所有的迷信活动和仪式中均显而易见。一切道德上的喜爱与嫌恶均源自于此，然而，这一点却将永远都得不到任何明智的探究者的承认。如果不是大自然基于心灵的原始结构做出了如此区分，那么，可敬的和可耻的、可爱的和可憎的以及高尚的和卑鄙的等诸如此类的词汇就绝对不会出现在任何一种语言之中；而如果是政治家们发明了这些语词，那么，他们就绝对做不到令这些语词变得容易理解，或是使其向听众传达思想。由此可见，再没有什么比怀疑论者们的这一悖论更加肤浅了。但愿在深奥难懂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研究中，我们也能像在实践性和更易理解的政治学和道德学中一样轻松击退该学派的这些无端指责。

The social virtues must, therefore, be allowed to have a natural

beauty and amiableness, which, at first, antecedent to all precept or education, recommends them to the esteem of uninstructed mankind, and engages their affections. And as the public utility of these virtues is the chief circumstance, whence they derive their merit, it follows, that the end, which they have a tendency to promote, must be some way agreeable to us, and take hold of some natural affection. It must please, either from considerations of self-interest, or from more generous motives and regards.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社会德性拥有一种自然的美和亲切感，这种自然的美和亲切感最初先于所有的规诫与教育，使社会德性受到了尚未开化的人类的钦敬与喜爱。由于社会德性的公共效用是社会德性从中获取其价值的主要因素，因此，社会德性趋向于促成的目标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令我们感到愉快，必须抓住某种自然感情。无论是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还是出于更为慷慨的动机和关顾，这个目标必须令人感到愉悦。

It has often been asserted, that, as every man has a strong connexion with society, and perceives the impossibility of his solitary subsistence, he becomes, on that account, favourable to all those habits or principles, which promote order in society, and insure to him the quiet possession of so inestimable a blessing, As much as we value our own happiness and welfare, as much must we applaud the practice of justice and humanity, by which alone the social confederacy can be maintained, and every man reap the fruits of mutual protection and assistance.

人们常常断言，由于每一个人都与社会有着牢固的联系，并觉察到自己不可能独自生存，因此，他们才会赞同所有那些能够维护社会

秩序、确保他们安享如此珍贵之福佑的习惯或原则。正如我们珍视我们自身的幸福和福利，同样，我们也必须赞赏正义和人道的做法，仅凭践行正义和人道，社会联盟才可得到维持，而每一个人才能收获到相互保护和扶助所结出的果实。

This deduction of morals from self-love, or a regard to private interest, is an obvious thought, and has not arisen wholly from the wanton sallies and sportive assaults of the sceptics. To mention no others, Polybius, one of the gravest and most judicious, as well as most moral writers of antiquity, has assigned this selfish origin to all our sentiments of virtue. [6_2] But though the solid practical sense of that author, and his aversion to all vain subtilties, render his authority on the present subject very considerable; yet is not this an affair to be decided by authority, and the voice of nature and experience seems plainly to oppose the selfish theory.

由自爱或对私人利益的关注演绎出道德，这一清楚明白的观点，并非完全是因怀疑论者不怀好意的俏皮话和纯属玩闹的攻击而产生的。且不说别人，就连作为古代最严肃、最明智、最具道德感的作家之一的波里比阿也认为，我们所有的道德情感均源自于这种自私性[7_2]。但是，尽管这位作者坚如磐石的实践感和他对所有徒劳无益的精妙之物的反感使他在本论题上拥有极大的权威，然而，这并不是靠权威就能决定的事情，大自然和经验的声音似乎明显反对这种自私理论。

We frequently bestow praise on virtuous actions, performed in very distant ages and remote countries; where the utmost subtilty of imagination would not discover any appearance of self-interest, or find any connexion of our present happiness and security with

events so widely separated from us.

我们常常赞美那些发生在久远时代和遥远国度的有德的行为，因为，在彼时彼地，即使最敏锐的想象也看不见自我利益的任何迹象，找不到我们当下的幸福和平安与这些距离如此久远的事件之间的任何联系。

A generous, a brave, a noble deed, performed by an adversary, commands our approbation; while in its consequences it may be acknowledged prejudicial to our particular interest.

对手的一次或慷慨、或勇敢、或高尚的行为，会博得我们的赞许，尽管我们也会承认，就后果而言，对手的行为有损于我们的自身利益。

Where private advantage concurs with general affection for virtue, we readily perceive and avow the mixture of these distinct sentiments, which have a very different feeling and influence on the mind. We praise, perhaps, with more alacrity, where the generous humane action contributes to our particular interest: But the topics of praise, which we insist on, are very wide of this circumstance. And we may attempt to bring over others to our sentiments, without endeavouring to convince them, that they reap any advantage from the actions which we recommend to their approbation and applause.

当私人利益与对德性的普遍好感相一致时，我们会当即觉察到并

欣然承认这些在心灵中产生迥然相异感受和影响的截然不同的情感发生了混合。在慷慨仁慈的行动有助于我们的特定利益的情况下，我们或许更乐意于称赞之；但是我们所坚持称赞的主题在这个因素方面有着很大的灵活性。我们尝试使他人具有与我们相同的情感，而无需努力就使其相信，他们能够从我们所推荐给他们的那些赞许和称赞的行动中获得任何好处。

Frame the model of a praiseworthy character, consisting of all the most amiable moral virtues: Give instances, in which these display themselves after an eminent and extraordinary manner: You readily engage the esteem and approbation of all your audience, who never so much as enquire in what age and country the person lived, who possessed these noble qualities: A circumstance, however, of all others, the most material to self-love, or a concern for our own individual happiness. Once on a time, a statesman, in the shock and contest of parties, prevailed so far as to procure, by his eloquence, the banishment of an able adversary; whom he secretly followed, offering him money for his support during his exile, and soothing him with topics of consolation in his misfortunes. ALAS! cries the banished statesman, WITH WHAT REGRET MUST I LEAVE MY FRIENDS IN THIS CITY, WHERE EVEN ENEMIES ARE SO GENEROUS! Virtue, though in an enemy, here pleased him: And we also give it the just tribute of praise and approbation; nor do we retract these sentiments, when we hear, that the action passed at Athens, abou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and that the persons' names were Eschines and Demosthenes.

塑造一个包含所有最可亲的道德德性和值得赞美的性格的典范，给出一些事例，使这些德性以某种杰出而卓越的方式得以显现出来，你们将很容易博得所有听众的敬重和赞许，他们从不打听那个拥有这

些高贵的品质的人生活在什么时代和什么国度。然而，这正是所有因素中，对自爱或对我们自身个人幸福的关怀最具实质性的一个因素。从前有一位政治家，在党派斗争中获得强大优势，竟至于凭其雄辩就使一位具有卓有才能的对手遭到流放；他私下对这位对手给予关怀，在其流放期间为其提供金钱维持生计，在其遭遇不幸时用宽慰的话语进行安慰。“唉！”这位被流放的政治家感叹道，“在这个连敌人都如此慷慨的城邦，我离开这里的朋友们该有多么遗憾啊！”这里，德性，尽管用在敌人身上，也使他感到快乐；而且我们也给予它正当的称赞和赞许的颂辞；当我们听说这个行为发生在大约两千年前的雅典、那两个人的名字叫埃斯西和德摩斯梯尼时，我们也不收回这些情感。

WHAT IS THAT TO ME? There are few occasions, when this question is not pertinent: And had it that universal, infallible influence supposed, it would turn into ridicule every composition, and almost every conversation, which contain any praise or censure of men and manners.

“那与我有什么关系？”多数场合都与这个问题相关；如果它具有所设想的那种普遍而又切实可靠的影响，它将使那些包含对人和作风的任何称赞或责难的所有文章和几乎所有谈话都变成笑柄。

It is but a weak subterfuge, when pressed by these facts and arguments, to say, that we transport ourselves, by the force of imagination, into distant ages and countries, and consider the advantage, which we should have reaped from these characters, had we been contemporaries, and had any commerce with the persons. It is not conceivable, how a REAL sentiment or passion can ever arise from a known IMAGINARY interest; especially when our REAL interest is still kept in view, and is often acknowledged to be

entirely distinct from the imaginary, and even sometimes opposite to it.

当我们迫于这些事实和论证，通过想象的力量把自己送到久远的时代和遥远的国度，考虑如果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人，并和这些人有任何社会交往，我们将从这些性格中获得的好处，这只不过是种软弱的遁辞。一种真实的情感或激情如何产生于一种众所周知的想象的利益，尤其是当我们的真实的利益仍然受到重视，并经常被承认是与想象的截然不同的、有时甚至对立的时候。

A man, brought to the brink of a precipice, cannot look down without trembling; and the sentiment of IMAGINARY danger actuates him, in opposition to the opinion and belief of REAL safety. But the imagination is here assisted by the presence of a striking object; and yet prevails not, except it be also aided by novelty, and the unusual appearance of the object. Custom soon reconciles us to heights and precipices, and wears off these false and delusive terrors. The reverse is observable in the estimates which we form of characters and manners; and the more we habituate ourselves to an accurate scrutiny of morals, the more delicate feeling do we acquire of the most minute distinctions between vice and virtue. Such frequent occasion, indeed, have we, in common life, to pronounce all kinds of moral determinations, that no object of this kind can be new or unusual to us; nor could any FALSE views or prepossessions maintain their ground against an experience, so common and familiar. Experience being chiefly what forms the associations of ideas, it is impossible that any association could establish and support itself, in direct opposition to that principle.

一个人被带到悬崖边，不可能朝下看而不发抖；想象的危险情感驱动着他，与真实安全的意见和信念恰恰相反。但是这里，想象力得到一个令人心惊的对象的出现的援助，却没有占优势，除非它也得到新颖性和那个对象的不同寻常的出现带来的帮助。习惯很快使我们适应高处和悬崖，逐渐减弱这些虚假和幻想的恐怖。我们在对性格和作风所形成的评价中，可以观察到相反的情形；我们愈使自己习惯于精确的道德考察，就能对恶行和德性之间最细微的区别获得愈细腻的感受。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非常频繁的机会宣告所有种类的道德规定，以致不可能有任何一种道德规定的对象对我们而言是新的和不寻常的；面对如此普遍和熟悉的经验，一些虚假的观点或偏见也不可能站住脚。经验形成诸观念之间的联系，任何联结要完全违背经验这条原则而得以确立和维持，都是不可能的。

Usefulness is agreeable, and engages our approbation. This is a matter of fact, confirmed by daily observation. But, USEFUL? For what? For somebody's interest, surely. Whose interest then? Not our own only: For our approbation frequently extends farther. It must, therefore, be the interest of those, who are served by the character or action approved of; and these we may conclude, however remote, are not totally indifferent to us. By opening up this principle, we shall discover one great source of moral distinctions.

有用性是令人愉快的，并且博得我们的赞许，这是一个日常观察确证的事实。但是，有用的？对什么是有用的？当然是对某人的利益是有用的。那么，某人的利益又是谁的利益？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利益，因为我们的赞许经常延伸得更远。因此，它一定是指那些受到称许的性格或行动所服务的人的利益。而我们可以断定，不论多么遥远，这些人都不是与我们完全漠不相关的。通过揭示这条原则，我们将发现德恶之别的一个重大来源。

PART 2

第二节

Self-love is a principle in human nature of such extensive energy, and the interest of each individual is, in general, s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at of the community, that those philosophers were excusable, who fancied that all our concern for the public might be resolved into a concern for our own happiness and preservation. They saw every moment, instances of approbation or blame, satisfaction or displeasure towards characters and actions; they denominated the objects of these sentiments, VIRTUES, or VICES; they observed, that the former had a tendency to increase the happiness, and the latter the misery of mankind; they asked, whether it were possible that we could have any general concern for society, or any disinterested resentment of the welfare or injury of others; they found it simpler to consider all these sentiments as modifications of self-love; and they discovered a pretence, at least, for this unity of principle, in that close union of interest, which is so observable between the public and each individual.

在人类本性中，自爱是一条具有如此广泛效能的原则，通常，每一个体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那些设想对公众的所有关注都可以分解成对我们自身幸福和自我维护的关注的哲学家，都是可以谅解的。他们时时刻刻看到对性格和行动或赞许或谴责、或满意或不悦的事例；他们赋予这些情感的对象或德性或恶行的名称；他们观察到，前者有种增加人类幸福的趋向，后者有种增加人类苦难的趋向；他们提出这一疑问：我们是否可能对社会有任何一般性的关怀，或对无关于己的他人福利或伤害有任何怨恨。他们发现，把所有这些情感全都当作自爱的变体要更为简单一些；至少为了这种原则上的统一，他们揭示了公共与个体利益之间紧密联合的那种显而

易见的伪装。

But notwithstanding this frequent confusion of interests, it is easy to attain what natural philosophers, after Lord Bacon, have affected to call the experimentum crucis, or that experiment which points out the right way in any doubt or ambiguity. We have found instances, in which private interest was separate from public; in which it was even contrary: And yet we observed the moral sentiment to continue, notwithstanding this disjunction of interests. And wherever these distinct interests sensibly concurred, we always found a sensible increase of the sentiment, and a warmer affection to virtue, and detestation of vice, or what we properly call, GRATITUDE and REVENGE. Compelled by these instances, we must renounce the theory, which accounts for every moral sentiment by the principle of self-love. We must adopt a more public affection, and allow, that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are not, even on their own account, entirely indifferent to us. Usefulness is only a tendency to a certain end; and it is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that anything pleases as means to an end, where the end itself no wise affects us. If usefulness, therefore, be a source of moral sentiment, and if this usefulness be not always considered with a reference to self; it follows, that everything,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happiness of society, recommends itself directly to our approbation and good-will. Here is a principle, which accounts, in great part, for the origin of morality: And what need we seek for abstruse and remote systems, when there occurs one so obvious and natural? [6_3]

但是这种利益上的频繁混淆，要达到培根勋爵之后的自然哲学家们所爱称作的那种判决性实验，也就是那种在任何怀疑或模糊中都指明正确道路的实验，却也容易。我们已经找到一些事例，其中个人利

益与公共利益相分离甚至对立；然而我们发现，尽管有这种利益上的分离，道德情感依然在继续。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些截然不同的利益明显在同时发生，而道德情感始终有一种明显的增强，对德性的好感更热烈和对恶行的厌恶更强烈，我们恰当地将其称为感恩或报复。由于这些事例，我们被迫放弃这种用自爱原则来解释一切道德情感的理论。我们必须用一种更公共的情感，并承认社会利益甚至就它们自身而论，也并不是完全与我们无关的。效用只是对于一定目的的趋向；若目的本身丝毫影响不了我们，说任何事物是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使人快乐，这明显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如果有用性是道德情感的一个源泉，如果人们不总是将这种有用性与自我相关联，那么由此可见，凡是有助于实现社会幸福的事物都会成为我们赞许和亲善的对象。这条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道德规范的起源；假如存在一个如此清楚明白和自然的体系，我们又何必去寻求玄奥而渺茫的体系呢[7_3]？

Have we any difficulty to comprehend the force of humanity and benevolence? Or to conceive, that the very aspect of happiness, joy, prosperity, gives pleasure; that of pain, suffering, sorrow, communicates uneasiness? The human countenance, says Horace ('Uti ridentibus arrident, ita flentibus adflent Humani vultus,'—Hor.), borrows smiles or tears from the human countenance. Reduce a person to solitude, and he loses all enjoyment, except either of the sensual or speculative kind; and that because the movements of his heart are not forwarded by correspondent movements in his fellow-creatures. The signs of sorrow and mourning, though arbitrary, affect us with melancholy; but the natural symptoms, tears and cries and groans, never fail to infuse compassion and uneasiness. And if the effects of misery touch us in so lively a manner; can we be supposed altogether insensible or indifferent towards its causes; when a malicious or treacherous character and behaviour are presented to us?

难道我们难以领略人道和仁爱的力量吗？或难以设想是幸福、喜悦和富足使人产生愉悦、苦难、苦痛和悲哀，传达不安吗？贺拉斯说，人们从彼此的面容上借取欢笑和悲泣。若一个人孤居独处，他就会失去官能和思辨享受之外的一切愉悦；因为他的内心活动不是被其人类同胞相应的活动推动的。悲痛和哀伤的迹象，尽管是任意的，却令我们感到忧伤；眼泪、哭喊和呻吟这些自然症状，总是能使我们感到怜悯和不安。如果苦难以如此活跃的一种方式来影响我们，难道能够假定，当我们面对恶毒的或背信弃义的人格和行为时，还能对苦难的原因完全无知无觉或无动于衷吗？

We enter, I shall suppose, into a convenient, warm, well-contrived apartment: We necessarily receive a pleasure from its very survey; because it presents us with the pleasing ideas of ease, satisfaction, and enjoyment. The hospitable, good-humoured, humane landlord appears. This circumstance surely must embellish the whole; nor can we easily forbear reflecting, with pleasure, on the satisfaction which results to every one from his intercourse and good-offices.

我想，假如我们进入一个舒适、温暖、布置精致的房间：我们环顾四周必然获得一种愉悦，因为它呈现给我们的是舒适、满足和享受这些令人快乐的观念。好客、幽默、善良的房东出现了。这个情节一定为整个事件增添魅力，我们也禁不住快乐地回想他的交谈和尽责为每一个人带来的满足。

His whole family, by the freedom, ease, confidence, and calm enjoyment, diffused over their countenances, sufficiently express their happiness. I have a pleasing sympathy in the prospect of so

much joy, and can never consider the source of it, without the most agreeable emotions.

他的所有家人，他们面容上焕发出来的自由、安适、信任以及安静的愉悦，充分地显示出他们的幸福。一看到这些喜悦的景象，我就同样感到快乐，如没有这种最令人愉快的情感，我就从不会考虑它的源泉。

He tells me, that an oppressive and powerful neighbour had attempted to dispossess him of his inheritance, and had long disturbed all his innocent and social pleasures. I feel an immediate indignation arise in me against such violence and injury.

他告诉我，一个暴虐而有权有势的邻居曾试图夺去他的财产继承权，并长期搅扰他所有无害的社交欢愉。对这样的暴行和伤害，我顿生义愤之感。

But it is no wonder, he adds, that a private wrong should proceed from a man, who had enslaved provinces, depopulated cities, and made the field and scaffold stream with human blood. I am struck with horror at the prospect of so much misery, and am actuated by the strongest antipathy against its author.

他补充道，这个人曾经奴役许多行省，夷平许多城市，使田野和绞架淌满人类的鲜血，他犯下这样私人性的罪恶，是毫不奇怪的。我对这些苦难景象带来的恐怖感到震惊，又为对其制造者最强烈的反感所促动。

In general, it is certain, that, wherever we go, whatever we reflect on or converse about, everything still presents us with the view of human happiness or misery, and excites in our breast a sympathetic movement of pleasure or uneasiness. In our serious occupations, in our careless amusements, this principle still exerts its active energy.

一般说来，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反思或谈论什么，一切呈现给我们的总是人类幸福或苦难的景象，并在我们胸腔中激起快乐或不安的同感。在严肃的工作、轻松的娱乐中，这一原则一直发挥着它的能动效能。

A man who enters the theatre, is immediately struck with the view of so great a multitude, participating of one common amusement; and experiences, from their very aspect, a superior sensibility or disposition of being affected with every sentiment, which he shares with his fellow-creatures.

一个人一走进剧场，看到参加同一娱乐活动的人如此众多，就会被这一景象震惊到，根据他们的表情，他体验着由与同胞们所共有的每一种情感影响着的高度感受力和性情倾向性。

He observes the actors to be animated by the appearance of a full audience, and raised to a degree of enthusiasm, which they cannot command in any solitary or calm moment.

他观察到，演员们看到座无虚席的观众，受到了鼓舞，热情高涨到了他们在孤居独处或平静时刻所无法达到的程度。

Every movement of the theatre, by a skilful poet, is communicated, as it were by magic, to the spectators; who weep, tremble, resent, rejoice, and are inflamed with all the variety of passions, which actuate the several personages of the drama.

巧妙的诗人创作的戏剧中出现的每一个跌宕起伏，仿佛魔法一般传达给观众；他们哭泣、颤抖、愤恨、欢喜，为驱动剧中人物的种种激情而情绪激动。

Where any event crosses our wishes, and interrupts the happiness of the favourite characters, we feel a sensible anxiety and concern. But where their sufferings proceed from the treachery, cruelty, or tyranny of an enemy, our breasts are affected with the liveliest resentment against the author of these calamities. It is here esteemed contrary to the rules of art to represent anything cool and indifferent. A distant friend, or a confident, who has no immediate interest in the catastrophe, ought, if possible, to be avoided by the poet; as communicating a like indifference to the audience, and checking the progress of the passions.

当任何事件阻挠我们的意愿，打断我们最喜爱的人物的幸福时，我们就明显地感觉到焦虑和担忧。当敌人的背叛、残忍或暴虐给我们钟爱的人物带来苦痛时，我们胸中就充满对这些不幸的始作俑者的无比愤恨。因此，在这里展现任何冰冷的和冷漠的事物都被认为是违反艺术法则的。诗人应当尽可能避免写到疏远的朋友或在大灾难中没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知己，因为这会向观众传递给一种同样的冷漠，并阻碍其激情的迸发。

Few species of poetry are more entertaining than PASTORAL; and every one is sensible, that the chief source of its pleasure arises from those images of a gentle and tender tranquillity, which it represents in its personages, and of which it communicates a like sentiment to the reader. Sannazarius, who transferred the scene to the sea-shore, though he presented the most magnificent object in nature, is confessed to have erred in his choice. The idea of toil, labour, and danger, suffered by the fishermen, is painful; by an unavoidable sympathy, which attends every conception of human happiness or misery.

没有哪种诗比田园诗更令人愉快；每个人都能察觉到，欣赏田园诗的快乐的主要来源于其柔和、亲切、安宁的意象。诗中人物身上表现出的这种安宁，也会向读者传达一种相同的情感。桑纳扎罗把场景转移到了海滨，尽管他描绘的是大自然中最壮丽的景象，但是被认为在选择上犯了错误。渔夫们遭受艰辛、劳苦和危险的观念，是令人痛苦的。由于人类不可避免的同理心，它伴随着人类幸福或苦难的每一个观念。

When I was twenty, says a French poet, Ovid was my favourite: Now I am forty, I declare for Horace. We enter, to be sure, more readily into sentiments, which resemble those we feel every day: But no passion, when well represented, can be entirely indifferent to us; because there is none, of which every man has not, within him, at least the seeds and first principles. It is the business of poetry to bring every affection near to us by lively imagery and

representation, and make it look like truth and reality: A certain proof, that, wherever that reality is found, our minds are disposed to be strongly affected by it.

一位法国诗人说，我二十岁的时候，奥维德是我钟爱的对象；现在我四十岁了，我宣布我喜爱贺拉斯。的确，我们更容易陷入与我们每天感受的情感相似的那些情感中；但是，当得到很好的表现时，没有任何一种激情是完全与我们无关的；因为没有一种激情不是人内心所拥有的，至少他们拥有这些情绪的根基及最初的根源。诗的任务就是通过生动的意象和表现，使得每一种情感贴近我们，并使它看上去像是真理和现实；确定无疑的是，无论该情绪在何种现实中存在，我们的心灵都容易受到它的强烈影响。

Any recent event or piece of news, by which the fate of states, provinces, or many individuals is affected, is extremely interesting even to those whose welfare is not immediately engaged. Such intelligence is propagated with celerity, heard with avidity, and enquired into with attention and concern. The interest of society appears, on this occasion, to be in some degree the interest of each individual. The imagination is sure to be affected; though the passions excited may not always be so strong and steady as to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onduct and behaviour.

影响国家、地区或众多个体命运的任何最新事件或新闻，甚至对于那些与其福利并不直接相关的人们来说，也是极富趣味的。这样的信息被迅速传播、热切分享并受到专注及殷切的探寻。这样一来，社会利益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每个个体的利益。想象力一定会受到影响；尽管它所激发的激情可能并不总是强烈和稳定到对行为举止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The perusal of a history seems a calm entertainment; but would be no entertainment at all, did not our hearts beat with correspondent movements to those which are described by the historian.

读史似乎是一种安静的享受；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与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些活动相应而动，它就根本无法成为一种享受。

Thucydides and Guicciardin support with difficulty our attention; while the former describes the trivial rencounters of the small cities of Greece, and the latter the harmless wars of Pisa. The few persons interested and the small interest fill not the imagination, and engage not the affections. The deep distress of the numerous Athenian army before Syracuse; the danger which so nearly threatens Venice; these excite compassion; these move terror and anxiety.

我们很难持续将注意力放在修昔底德和圭恰迪尼身上；前者描述希腊诸小城邦之间琐屑的冲突，后者则描述比萨无害的战争。涉及极少数人的利益，且这利益又微小，满足不了想象力的要求，也无法博得人们的感情。雅典大军在叙拉古城下遭遇的严重危难，威尼斯面临的紧迫的危险，这些才能激发读者的怜悯，引发恐慌和焦虑的情绪。

The indifferent, uninteresting style of Suetonius, equally with the masterly pencil of Tacitus, may convince us of the cruel depravity of Nero or Tiberius: But what a difference of sentiment! While the former coldly relates the facts; and the latter sets before

our eyes the venerable figures of a Soranus and a Thrasea, intrepid in their fate, and only moved by the melting sorrows of their friends and kindred. What sympathy then touches every human heart! What indignation against the tyrant, whose causeless fear or unprovoked malice gave rise to such detestable barbarity!

苏埃托尼乌斯漠然平淡的风格，塔西佗巧妙精湛的文笔，两者同样可使我们信服尼禄或提比略的残酷堕落，但其中蕴含的情感却是多么不同！前者冷漠地陈述事实之时，后者却将索拉努斯和特拉塞亚这样的可敬形象展现于我们眼前，他们无畏于自身的命运，只动容于友人和同胞令人心碎的苦难。何等的同情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何等的义愤指向暴君，正是因其无端的恐惧或无故的恨意而引发出那样可憎的暴行！

If we bring these subjects nearer: If we remove all suspicion of fiction and deceit: What powerful concern is excited, and how much superior, in many instances, to the narrow attachments of self-love and private interest! Popular sedition, party zeal, a devoted obedience to factious leaders; these are some of the most visible, though less laudable effects of this social sympathy in human nature.

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主题，消除所有虚构和捏造的嫌疑，那将激起多么有力的关怀，在很多情况下，比起自爱和个人利益的狭隘情感，这将多么优越啊！民众叛乱、党派热情、对宗派领袖的忠诚服从，这些都是人类本性中社会同情所产生的一些最为明显的影响，尽管相较之下有些不可称道。

The frivolousness of the subject too, we may observe, is not able to detach us entirely from what carries an image of human sentiment and affection.

我们可以观察到，该主题的琐屑性也无法彻底地将我们与承载人类情感和感情的意象分离开来。

When a person stutters, and pronounces with difficulty, we even sympathize with this trivial uneasiness, and suffer for him. And it is a rule in criticism, that every combination of syllables or letters, which gives pain to the organs of speech in the recital, appears also from a species of sympathy, harsh and disagreeable to the ear. Nay, when we run over a book with our eye, we are sensible of such unharmonious composition; because we still imagine, that a person recites it to us, and suffers from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se jarring sounds. So delicate is our sympathy!

当一个说话结巴和发音费力时，我们甚至对这种微小的不安也会感到同情，并为他感到痛苦。有一条批评的规则是，每一个音节或字母的组合，如在朗诵中给发音器官带来痛苦，出于同样的同情，对耳朵而言也显得刺耳和不快。不但如此，当我们用眼睛浏览书本时，我们也可察觉出这类不和谐的地方，因为我们依然想象有人在为我们朗诵它，并因为发出这些不和谐的声音而遭受痛苦。我们的同情就是如此微妙！

Easy and unconstrained postures and motions are always beautiful: An air of health and vigour is agreeable: Clothes which warm, without burdening the body; which cover, without

imprisoning the limbs, are well-fashioned. In every judgement of beauty, the feelings of the person affected enter into consideration, and communicate to the spectator similar touches of pain or pleasure. [6_4]

惬意而不受拘束的姿势和动作总是优美的；健康而生气勃勃的神色是令人愉悦的；保暖而不累赘、蔽体而不束缚的衣服总会十分流行。在对美的每一次判断中，被影响者的感受都得到考虑，也向旁观者传达了类似的痛苦或快乐的感触 [7_4] 。

What wonder, then, if we can pronounce no judgement concerning the character and conduct of men,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tendencies of their actions, and the happiness or misery which thence arises to society? What association of ideas would ever operate, were that principle here totally inactive. [6_5]

于是，如果我们不考虑人们行动的趋向和这些行动给社会带来的幸福或苦难，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性格和行为作出任何判断，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假如这条原则在这里完全不起作用，那观念之间是怎样联结在一起起作用的呢 [7_5] ？

If any man from a cold insensibility, or narrow selfishness of temper, is unaffected with the images of human happiness or misery, he must be equally indifferent to the images of vice and virtue: A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ways found, that a warm concern for the interests of our species is attended with a delicate feeling of all moral distinctions; a strong resentment of injury done to men; a lively approbation of their welfare. In this particular,

though great superiority is observable of one man above another; yet none are so entirely indifferent to the interest of their fellow-creatures, as to perceive no distinctions of moral good and evil, in consequence of the different tendencies of actions and principles. How, indeed, can we suppose it possible in any one, who wears a human heart, that if there be subjected to his censure, one character or system of conduct, which is beneficial, and another which is pernicious to his species or community, he will not so much as give a cool preference to the former, or ascribe to it the smallest merit or regard? Let us suppose such a person ever so selfish; let private interest have ingrossed ever so much his attention; yet in instances, where that is not concerned, he must unavoidably feel SOME propensity to the good of mankind, and make it an object of choice, if everything else be equal. Would any man, who is walking along, tread as willingly on another's gouty toes, whom he has no quarrel with, as on the hard flint and pavement? There is here surely a difference in the case. We surely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happiness and misery of others, in weighing the several motives of action, and incline to the former, where no private regards draw us to seek our own promotion or advantage by the injury of our fellow-creatures. And if the principles of humanity are capable, in many instances, of influencing our actions, they must, at all times, have some authority over our sentiments, and give us a general approbation of what is useful to society, and blame of what is dangerous or pernicious. The degrees of these sentiments may be the subject of controversy; but the reality of their existence, one should think, must be admitted in every theory or system.

任何一个由于自身冷酷的麻木或狭隘的自私而无视人类幸福或苦难的意象，那么他一定也会对那些对恶行和德性的意象也同样漠不关心；正如反过来，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人类利益的热情关怀始终带有

对所有德恶之别的细腻感触，一种对给人们造成伤害的强烈愤恨，一种对他们获得福利的热烈赞许。特别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比，明显存在很大的优势，然而没有人对其人类同胞的利益完全漠不关心，以至于觉察不出由于行动和原则的不同倾向而造成道德的善恶之别。实际上，我们如何能够假定，任何一个怀有人心的人，如果他对一个对人类和社会有利的性格或行为体系和另一个对其有害的体系都进行责难，他甚至不愿平静地优先选择前者，或归予它最微少的价值或尊重，这是可能的吗？我们假定，一个如此自私的人，让私人利益强烈地吸引他的注意力；然而，在与他的个人利益无关的那些场合，他必定不可避免地感受到某种对人类利益的偏向，如果其他情况相同，那他会将这种偏向作为选择对象。任何正在散步的人，会像愿意踩踏坚实的石块和道路一样，愿意踩踏一个未与他发生争吵的痛风患者的脚趾吗？在此，情况必有差异。在权衡行动的几种动机时，我们一定会考虑他人的幸福和苦难，在没有个人缘由促使我们通过伤害我们的人类同胞以寻求我们自身的晋升或好处情况下，我们倾向于前者。如果人道的原则在许多情况下能够影响我们的行动，它们必定总是对我们的情感具有某种权威，并会使我们对一切有益于社会的事物加以赞许，同时对一切有害或有损于社会的事物予以谴责。这些情感的程度也许是争论的主题；不过我们应该明白，他们存在的现实在每一种理论或理论体系都必须得到承认。

A creature, absolutely malicious and spiteful, were there any such in nature, must be worse than indifferent to the images of vice and virtue. All his sentiments must be inverted, and directly opposite to those, which prevail in the human species. Whatever contributes to the good of mankind, as it crosses the constant bent of his wishes and desires, must produce uneasiness and disapprobation; and on the contrary, whatever is the source of disorder and misery in society, must, for the same reason, be regarded with pleasure and complacency. Timon, who, probably from his affected spleen, more than any inveterate malice, was

denominated the man-hater, embraced Alcibiades with great fondness. GO ON, MY BOY! cried he, ACQUIRE THE CONFIDENCE OF THE PEOPLE: YOU WILL ONE DAY, I FORESEE, BE THE CAUSE OF GREAT CALAMITIES TO THEM [6_6] . Could we admit the two principles of the Manicheans, it is an infallible consequence, that their sentiments of human actions, as well as of everything else, must be totally opposite, and that every instance of justice and humanity, from its necessary tendency, must please the one deity and displease the other. All mankind so far resemble the good principle, that, where interest or revenge or envy perverts not our disposition, we are always inclined, from our natural philanthropy, to give the preference to the happiness of society, and consequently to virtue above its opposite. Absolute, unprovoked, disinterested malice has never perhaps place in any human breast; or if it had, must there pervert all the sentiments of morals, as well as the feelings of humanity. If the cruelty of Nero be allowed entirely voluntary, and not rather the effect of constant fear and resentment; it is evident that Tigellinus, preferably to Seneca or Burrhus, must have possessed his steady and uniform approbation.

一个完全恶毒和居心不良的生物，如果大自然中有任何这样的生物的话，一定比对恶行和德性的意象漠不关心的生物更加糟糕。他所有的情感必定都是颠倒的，与人类所接受的情感截然相对。无论有助于人类利益的事物是什么，只要阻挠了他的意愿和欲望的恒常癖好，必定导致不安和非难；相反，无论社会混乱和苦难的根源是什么，出于同样的原因，必定受到他快乐和满足的注视。泰门，或许由于他假装的易怒脾气而非由于任何根深蒂固的恶意，而被称为恨世者，他满怀深情地拥抱了阿尔西比亚德。“继续干下去，我的孩子！”他喊道，“获得人民的信任；我预见，有朝一日你将是他们深重灾难的原因。” [7_6] 如果我们承认摩尼教徒的两条原则，那么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可靠的推论，那就是它们对人类行动及其他一切事物的情感必定是

完全对立的。而且每个正义和仁慈的事例，根据其必然趋向，必定会令一位神祇愉悦而令另一位神祇不快。整个人类如此近乎于善的原则，以至于在利益、报复或嫉妒没有侵害我们的性情时，我们总是出于天然的博爱而趋向于优先选择社会的幸福，并由此而得德性而非其反面。或许绝对的、无故的、冷漠的恶意从来无法出现在任何一个人的心中；如果它曾经出现，那必定会使得一切道德情感和人道感受都变得反常。如果认为尼禄的残忍是完全故意的，而不是长期恐惧和怨恨的结果，那么显然，他必定会给予提格利努斯，而非塞内加或步洛，坚定而统一的赞许。

A statesman or patriot, who serves our own country in our own time, has always a more passionate regard paid to him, than one whose beneficial influence operated on distant ages or remote nations; where the good, resulting from his generous humanity, being less connected with us, seems more obscure, and affects us with a less lively sympathy. We may own the merit to be equally great, though our sentiments are not raised to an equal height, in both cases. The judgement here corrects the inequalities of our internal emotions and perceptions; in like manner, as it preserves us from error, in the several variations of images, presented to our external senses. The same object, at a double distance, really throws on the eye a picture of but half the bulk; yet we imagine that it appears of the same size in both situations; because we know that on our approach to it, its image would expand on the eye, and that the difference consists not in the object itself, but in our position with regard to it. And, indeed, without such a correction of appearances, both 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ntiment, men could never think or talk steadily on any subject; while their fluctuating situations produce a continual variation on objects, and throw them into such different and contrary lights and positions. [6_7]

一个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服务于我们自己的国家的政治家或爱国者，跟在久远时代或遥远国度发挥有益影响的政治家或爱国者比起来，会受到人们更热烈的尊重；在那些久远时代和遥远国度中，他的慷慨仁慈所产生的益处与我们少有关联且较为模糊，因而只能以一种较不生动的同情感染我们。我们可能会承认，尽管我们的情感并没有被提升到同等的高度，两种情形中二者的价值也同等伟大。判断在这里矫正我们内在情绪和感知上的不均等。同样地，将几个不同的意象呈现给我们的外在感官时，判断力也使得我们免于犯错。同一个物体，在双倍距离处，映入我们眼中的形象其实只有原来形象的一半，我们却想象它在两种境况下大小相同；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接近它时，它的形象在我们眼中会扩大，这种差异不在于物体本身，而在于我们与它的相对位置。事实上，假如没有这种对内在和外在的情感表象的矫正，人们绝不可能平稳地思考或谈论任何主题；而人们飘忽不定的境况使物体频繁地发生变化，并使得他们以殊异和相反的眼光和立场去看待这些物体 [7_7] 。

The more we converse with mankind, and the greater social intercourse we maintain, the more shall we be familiarized to these general preferences and distinctions, without which our conversation and discourse could scarcely be rendered intelligible to each other. Every man's interest is peculiar to himself, and the aversions and desires, which result from it, cannot be supposed to affect others in a like degree. General language, therefore, being formed for general use, must be moulded on some more general views, and must affix the epithets of praise or blame, in conformity to sentiments, which arise from the general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ty. And if these sentiments, in most men, be not so strong as those, which have a reference to private good; yet still they must make some distinction, even in persons the most depraved and selfish; and must attach the notion of good to a beneficent conduct, and of evil to the contrary. Sympathy, we shall allow, is much

fainter than our concern for ourselves, and sympathy with persons remote from us much fainter than that with persons near and contiguous; but for this very reason it is necessary for us, in our calm judgements and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characters of men, to neglect all these differences, and render our sentiments more public and social. Besides, that we ourselves often change our situation in this particular, we every day meet with persons who are in a situation different from us, and who could never converse with us were we to remain constantly in that position and point of view, which is peculiar to ourselves. The intercourse of sentiments, therefore, in society and conversation, makes us form some general unalterable standard, by which we may approve or disapprove of characters and manners. And though the heart takes not part entirely with those general notions, nor regulates all its love and hatred by the universal abstract differences of vice and virtue, without regard to self, or the persons with whom we are more intimately connected; yet have these moral differences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and being sufficient, at least for discourse, serve all our purposes in company, in the pulpit, on the theatre, and in the schools. [6_8]

我们同人们交谈愈多，同他们保持的社会交往愈广泛，对一般的优先选择和区别就愈熟悉。没有一般的优先选择和区别，我们的交谈和对话就几乎不可能得到相互理解。每个人的利益对自己来讲都是特有的，因而不能假定由这份利益所引起的厌恶和欲望对他人具有相同程度的影响力。因此，基于共同用途而形成的通用语言必须根据某些更普遍的观点来铸造，必须附带与由社会共同利益引发的情感相符的称赞或谴责用语。即使对于大多数人，这些情感并不如与个人利益所关联的那些情感强烈，它们必定仍然造成某种区别，即便是在甚至最堕落最自私的人中，必定会把善的概念附于某个慈善的行为，把恶的概念附于某个相反的行为。我们应当承认，同情远比我们对自己的关

怀微弱，而且我们对于远离我们的人的同情远比对周围和邻近的人的同情微弱。但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对人们的性格进行冷静的评价和讨论时，我们有必要忽略所有这些差异，使我们的情感更公开和更社会化。况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身的境况也经常发生改变，每天我们遇到处于不同境况中的人，倘若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特有的立场和观点，我们就决不可能与他们交谈。因此，在社交和谈话中，情感的交流使我们形成某种共同且固定不变的标准，我们可据此赞成或反对种种性格和作风。尽管内心并不完全赞同那些一般性概念，也并不会根据恶行和德性普遍而抽象的差异来规范全部爱恨，而不尊重自我或与我们关系更为亲密的人。然而，这些道德差异却有一种相当大的影响力，当这些差异足够强大时，至少作为话语，它能够帮助我们在社交场合、布道、剧场和学校中实现所有目的。[7_8]

Thus, in whatever light we take this subject, the merit, ascribed to the social virtues, appears still uniform, and arises chiefly from that regard, which the natural sentiment of benevolence engages us to pay to the interests of mankind and society. If we consider the principles of the human make, such as they appear to daily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we must, A PRIORI, conclude it impossible for such a creature as man to be totally indifferent to the well or ill-being of his fellow-creatures, and not readily, of himself, to pronounce, where nothing gives him any particular bias, that what promotes their happiness is good, what tends to their misery is evil, without any farther regard or consideration. Here then are the faint rudiments, at least, or outlines, of a GENERAL distinction between actions; and in proportion as the humanity of the person is supposed to increase, his connexion with those who are injured or benefited, and his lively conception of their misery or happiness; his consequent censure or approbation acquires proportionable vigour. There is no necessity, that a generous action, barely mentioned in an old history or remote gazette, should communicate any strong

feelings of applause and admiration. Virtue, placed at such a distance, is like a fixed star, which, though to the eye of reason it may appear as luminous as the sun in his meridian, is so infinitely removed as to affect the senses, neither with light nor heat. Bring this virtue nearer, by our acquaintance or connexion with the persons, or even by an eloquent recital of the case; our hearts are immediately caught, our sympathy enlivened, and our cool approbation converted into the warmest sentiments of friendship and regard. These seem necessary and infallible consequences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 as discovered in common life and practice.

因此，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考察这个主题，看来赋予社会德性的价值仍然是一致的，这种价值主要产生于自然的仁爱之情使得我们对人类和社会利益所产生的那种尊重。如果我们考虑诸如日常经验和观察中所显现的人类构造的原则，我们必定进行先验推断，即人类不可能对他同胞的幸福和苦难完全漠不关心，不可能在没有任何事物使他怀有任何特定的偏向时或是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关注或考虑时就立即自行主张：凡是增进他们幸福的就是善，凡是加重他们苦难的就是恶。于是，这里就是诸行为之间一般区别的大致雏形或者轮廓。相应地，人越仁慈，其与那些受害者或受益者的关系就会越亲近，其对人们的苦难或幸福的设想就越生动；随之，他的责难或赞许就会有相应的力度。仅在古老的历史或久远公报中提及的慈善行为并不一定会传达某些强烈的赞许和钦佩之情。德性，如置于这样遥远的距离，就宛若一颗恒星，虽然对理性之眼而言似乎显得如中天之日般光明灿烂，然而它是如此无限遥远，以至于既无法用光也无法用热来影响我们的感官。通过与那些人的熟识或联系、甚至通过对实情绘声绘色的描述，我们就会更加接近这一德性，我们的心将即刻被打动，我们的同情将活跃起来，我们冷淡的赞许将转变为最热烈的友爱和尊重之情。这些似乎是人类本性一般原则必然且可靠的结果，同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实践中的发现是一样的。

Again; reverse these views and reasonings: Consider the matter a posteriori; and weighing the consequences, enquire if the merit of social virtue be not, in a great measure, derived from the feelings of humanity, with which it affects the spectators. It appears to be matter of fact, that the circumstance of UTILITY, in all subjects, is a source of praise and approbation: That it is constantly appealed to in all moral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merit and demerit of actions: That it is the SOLE source of that high regard paid to justice, fidelity, honour, allegiance, and chastity: That it is inseparable from all the other social virtues, humanity, generosity, charity, affability, lenity, mercy, and moderation: And, in a word, that it is a foundation of the chief part of morals, which has a reference to mankind and our fellow-creatures.

再颠倒这些观点和推理，后验地考虑这个问题；权衡这些后果时，探究社会德性的价值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来源于影响观者的人类的人道感受这种。看来事实是，在所有主题中，效用因素是颂扬和赞许的来源：在所有关于行为价值或过失的道德判断中，人们总是诉诸效用考量，因为它是正义、忠实、道义、忠诚和贞洁所受到的尊重的唯一缘由；它与其他社会德性，如人道、慷慨、慈善、亲切、宽容、怜悯和节制，是不可分离的。总而言之，它是关乎人类和其同胞道德的主体基础。

It appears also, that, in our general approbation of characters and manners, the useful tendency of the social virtues moves us not by any regards to self-interest, but has an influence much more universal and extensive. It appears that a tendency to public good, and to the promoting of peace, harmony, and order in society, does always, by affecting the benevolent principles of our frame, engage

us on the side of the social virtues. And it appears, as an additional confirmation, that these principles of humanity and sympathy enter so deeply into all our sentiments, and have so powerful an influence, as may enable them to excite the strongest censure and applause. The present theory is the simple result of all these inferences, each of which seems founded on uniform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这样看来事实还是，在对于性格和作风的一般赞许中，社会德性的有用趋向打动我们靠的并不是对自我利益的某些关注，而是一种更为普遍和广泛的影响力。由此，对公共利益的趋向以及对促进社会和平、和谐与秩序的趋向，总是通过影响我们本性结构中的仁爱原则而促使我们站在社会德性这一边。这好像额外确认了，这些人道和同情的原则如此深刻地植入我们所有的情感中，并拥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以至于能够使它们引发最强烈的责难和赞许之情。目前的理论是所有这些推论的简单结果，其中每个似乎都基于相同的经验和观察。

Were it doubtful, whether there were any such principle in our nature as humanity or a concern for others, yet when we see, in numberless instances, that whatever has a tendency to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is so highly approved of, we ought thence to learn the force of the benevolent principle; since it is impossible for anything to please as means to an end, where the end is totally indifferent. On the other hand, were it doubtful, whether there were, implanted in our nature, any general principle of moral blame and approbation, yet when we see, in numberless instances, the influence of humanity, we ought thence to conclude, that it is impossible, but that everything which promotes the interest of society must communicate pleasure, and what is pernicious give uneasiness. But when these different ref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concur in establishing the same conclusion, must they not bestow an undisputed evidence upon it?

尽管还不能确认，我们的本性中是否存在这种人道原则或关心他人的原则，可我们在无数事例中都可以发现，任何具有促进社会利益趋向的事物都受到如此高度的称赞，我们应当由此认识到仁爱原则的力量。因为若某一目的是完全与我们漠不相关的，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令人感到快乐。另一方面，如果还无法确认我们本性中是否有任何对于道德的谴责和赞许的一般原则，然而当我们在无数事例中意识到仁慈的影响力时，我们就应该由此推断，凡是有益于社会的事物都必定传达快乐，凡是有害于社会的事物必定导致不安，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而若这些不同的思考和观察在确立同一结论时同时出现，难道它们不是正赋予这个结论以一种无可争辩的证据吗？

It is however hoped, that the progress of this argument will bring a farther confirmation of the present theory, by showing the rise of other sentiments of esteem and regard from the same or like principles.

不过我希望，若能阐明其他敬重和尊敬起源于相同或相似的原则，这一论证过程将进一步证实目前这个理论。

A very small variation of the object, even where the same qualities are preserved, will destroy a sentiment. Thus, the same beauty, transferred to a different sex, excites no amorous passion, where nature is not extremely perverted.

为什么说这棵桃树比那棵好，难道不是因为它结出的果实更多更好吗？尽管它的桃子在完全成熟之前已被蜗牛或害虫毁坏，难道就不给予它同样的称赞吗？在道德上，难道不也是由果知树吗？难道我们在道德上不能像桃树上一样，容易地把本性和偶因区分开吗？

[6_1].We ought not to imagine, because an inanimate object may be useful as well as a man, that therefore it ought also, according to this system, to merit he appellation of VIRTUOUS. The sentiments, excited by utility, are, in the two cases, very different; and the one is mixed with affection, esteem, approbation, etc., and not the other. In like manner, an inanimate object may have good colour and proportions as well as a human figure. But can we ever be in love with the former? There are a numerous set of passions and sentiments, of which thinking rational beings are, by 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of nature, the only proper objects: and though the very same qualities be transferred to an insensible, inanimate being, they will not excite the same sentiments. The beneficial qualities of herbs and minerals are, indeed, sometimes called their VIRTUES; but this is an effect of the caprice of language, which out not to be regarded in reasoning. For though there be a species of approbation attending even inanimate objects, when beneficial, yet this sentiment is so weak,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at which is directed to beneficent magistrates or statesman; that they ought not to be ranked under the same class or appellation.

[6_2].Undutifulness to parents is disapproved of by mankind, (Greek quotation inserted here. Ingratitude for a like reason (though he seems there to mix a more generous regard) (Greek quotation inserted here) lib. vi. cap. 4. (Ed. Gronorius.) Perhaps the historian only meant, that our sympathy and humanity was more enlivened, by our considering the similarity of our case with that of the person suffering; which is a just sentiment.)

[6_3].It is needless to push our researches so far as to ask, why we have humanity or a fellow-feeling with others. It is sufficient, that this is experienced to be a principle in human nature. We must stop somewhere in our examination of causes; and there are, in every science,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beyond which we cannot hope to find any principle more general. No man is absolutely indifferent to the happiness and misery of others. The first has a natural tendency to give pleasure; the second, pain. This every one may find in himself. It is not probable, that these principles can be resolved into principles more simple and universal, whatever attempts may have been made to that purpose. But if it were possible, it belongs not to the present subject; and we may here safely consider these principles as original; happy, if we can render all the consequences sufficiently plain and perspicuous!

[6_4].'Decentior equus cujus astricta suntilia; sed idem velocior. Pulcher aspectu sit athleta, cujus lacertos execitatio expressit; idem certamini paratior nunquam enim SPECIES ab UTILITATE dividitur. Sed hoc quidem discernere modici judicii est.'—Quintilian, Inst. lib. viii. cap. 3.

[6_5].In proportion to the station which a man possesses,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 in which he is placed; we always expect from him a greater or less degree of good, and when disappointed, blame his inutility; and much more do we blame him, if any ill or prejudice arise from his conduct and behaviour. When the interests of one country interfere with those of another, we estimate the merits of a statesman by the good or ill, which results to his own country from his measures and councils, without regard to the prejudice which he brings on its enemies and rivals. His fellow-citizens are the objects, which lie nearest the eye, while we determine his character. And as nature has implanted in every one a superior affection to his own country, we never expect any regard to distant nations, where a competition arises. Not to mention, that, while every man consults the good of his own community, we are sensible, that the general interest of mankind is better promoted, than any loose indeterminate views to the good of a species, whence no beneficial action could ever result, for want of a duly limited object, on which they could exert themselves.

[6_6].Plutarch fit vita Ale.

[6_7].For a little reason, the tendencies of actions and characters, not their real accidental consequences, are alone regarded in our more determinations or general judgements; though in our real feeling or sentiment, we cannot help paying greater regard to one whose station, joined to virtue, renders him really useful to society, then to one, who exerts the social virtues only in good intentions and benevolent affections. Separating the character from the furtone, by an easy and necessary effort of thought, we pronounce these persons alike, and give them the appearance: But is not able entirely to prevail our sentiment.
Why is this peach-tree said to be better than that other; but because it produces more or better fruit? And would not the same praise be given it, though snails or vermin had destroyed the peaches, before they came to full maturity? In morals too, is not THE TREE KNOWN BY THE FRUIT? And cannot we easily distinguish between nature and accident, in the one case as well as in the other?

[6_8].It is wisely ordained by nature, that private connexions should commonly prevail over univeral views and considerations; otherwise our affections and actions would be dissopated and lost, for want of a proper limited object. Thus a small benefit done to ourselves, or our near friends, excites more lively sentiments of love

and approbation than a great benefit done to a distant commonwealth: But still we know here, as in all the senses, to correct these inequalities by reflection, and retain a general standard of vice and virtue, founded chiefly on a general usefulness.

[7_1].我们不应当想象，因为一个无生命的对象可以和人一样，是有用的，就因此按照这个体系使它享有“德”这个名称。在这两种情况中，由效用所激起的情感是非常不同的；其中一种混合着好感、敬重以及赞许等，另一者则不然。同样，一个无生命对象可以像人的形体一样，有美丽的颜色以及和谐的比例。但是我们能对前者产生爱情吗？对于许多激情和情感，由于大自然的原始构造，思维的理性存在物成为它们唯一适当的对象；尽管同样的品质和性质能够被转移至无感觉无生命的存在物上，然而它们将无法激起同样的情感。药草和矿泉水的性质固然有时被称为它们的德性，但这是语言变化无常的结果，在推理中，语言的这种变化无常应当不予考虑。因为即使它们甚至是无生命的对象，但当它们有益时，也有一种赞许相伴随，然而这种情感是那样微弱，而且与指向仁慈的执政官或政治家的情感那样不同，以至于它们不应当被划归于同样的种类或名称之下。
甚至当对象的性质保持同一不变的时候，对象的非常微小的变化也会把一种情感毁灭。因此，当本性没有变得极端反常时，同一种美转移至异性身上的时候，激不起任何性爱的激情。

[7_2].对父母不孝顺是人类所不赞成的，（此处插入一段希腊语引文。因为同样的理由，忘恩负义（尽管他在那里似乎混合着一种更慷慨的考虑）（此处插入一段希腊语引文）。波里比阿：《历史》，第六卷，第四章（Gronovius编）。或许这位历史学家只是表明，我们的同情和仁慈，在较大程度上是我们考虑到自己的情形与那个遭受痛苦的人的情形相似，因而激发出来的；这种考虑是一种正当的情感。

[7_3].我们没有必要研究得如此深入，以至于去追问我们为什么会怀有仁慈之心或会与他人感同身受。经验证明，这是人类本性中的一条原则，这就足矣。在考察原因时，我们必须在某个地方止步；每一门科学都有一些通则，在这些通则之外我们不可能希望发现任何更加通用的原则。没有人完全与他人的幸福和苦难漠不相关。他人的幸福有种产生快乐的自然趋向；他人的苦难有种产生痛苦的自然趋向。每个人在其自身中都可发现这一点。无论我们为了这个目的而可能作出什么尝试，这些原则不可能被分解成更简单和更普遍的原则。但是，如果可能，它也不属于目前的这个论题；我们在这里可以有把握地将这些原则当作原始理论；如果我们能够使所有的推论都足够清楚和明晰，那将是幸运的！

[7_4].“一个人的马腰腹结实，不但美观，而且敏捷。锻炼使竞技者肌筋发达，不但显得美，而且适合于竞技。的确，美和效用是从不分离的。不过，这至少需要适当的判断力才能分辨出来。”——昆体良：《演说家准则》，第八卷，第三章。

[7_5].我们总是根据一个人拥有的地位、所处的关系，而期望从他身上获得或大或

小的利益；当他令我们失望时，我们就谴责他的无效用；而如果他的行为举止造成了任何不利或损害，我们就对他进行更为严厉的谴责。当一国的利益妨碍到另一国的利益时，我们根据他的措施和谘议对他自己的国家所带来的利益或不利来评价一个政治家的价值，并不考虑他给敌国和对手所造成的损害。当我们确定他的性格时，我们最先注意的对象是他的同胞公民。由于自然已在每个人心中都植入一种祖国优先的情感，因而当发生竞争时，我们从不期望有人会对遥远的民族产生任何尊重。更不用说，我们能感受到，当人人都考虑自己集体的利益时，人类的共同利益所获得的提升要比人类拥有任何散漫的和不明确的观点时要多，后者是无法产生任何有利行动的利益的，因为缺乏一个它们能够发挥作用的适当限定的对象。

[7_6].普鲁塔克：《阿尔西比亚德传》。

[7_7].因为同样的理由，只有行为和性格的趋向，而不是它们实在的偶然后果，才是我们在道德规定或一般判断中所尊重的；尽管出于我们的真实感受或情感，我们禁不住更加尊重地位与德行都对社会确实有用的人，其次才是只在善良意愿和仁爱感情中发挥社会德性的人。在思想上稍加简单和必要的努力，把性格和命运分离开来，我们就能断定这些人是类似的，而且呈现出这样的迹象，但不能完全支配我们的情感。

[7_8].正是大自然的智慧安排，私人的联系通常战胜普遍的观念和考虑；不然由于缺乏适当的限定对象，我们的感情和行为就会烟消云散。因此，和给予一个遥远国家的巨大恩惠比起来，给予我们自己或我们亲密朋友的微小恩惠，更能激起强烈的爱和赞许的情感；但是我们依然知道，正如在所有感官中一样，要通过反思来矫正这些不平等的判断，且要坚持那种主要基于一般有用性的德性与恶性的一般标准。

SECTION 6　OF QUALITIES USEFUL TO OURSELVES

第六章　论对我们自己有用的品质

PART 1

第一节

It seems evident, that where a quality or habit is subjected to our examination, if it appears, in any respect, prejudicial to the person possessed of it, or such as incapacitates him for business and action, it is instantly blamed, and ranked among his faults and imperfections. Indolence, negligence, want of order and method, obstinacy, fickleness, rashness, credulity; these qualities were never esteemed by any one indifferent to a character; much less, extolled as accomplishments or virtues. The prejudice, resulting from them, immediately strikes our eye, and gives us the sentiment of pain and disapprobation.

看来很明显的是，我们以某种品质或习惯为考察对象时，如果该品质或习惯对其所有者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害无利，甚或使其所有者丧失做事和行动的能力，那它即刻便会受到谴责，并被看作是其所有者的缺点和瑕疵。从来没有人认为，懒惰、疏忽、缺乏条理和方法、固执、浮躁、莽撞、轻信他人，这些品质是与性格毫不相关的，更不会被人们当作才艺或德性加以赞颂。这些品质所带来的弊害，一旦出现即刻便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令我们产生痛苦和不满的情感。

No quality, it is allowed, is absolutely either blameable or

praiseworthy. It is all according to its degree. A due medium, say the Peripatetics,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virtue. But this medium is chiefly determined by utility. A proper celerity, for instance, and dispatch in business, is commendable. When defective, no progress is ever made in the execution of any purpose: When excessive, it engages us in precipitate and ill-concerted measures and enterprises: By such reasonings, we fix the proper and commendable mediocrity in all moral and prudential disquisitions; and never lose view of the advantages, which result from any character or habit. Now as these advantages are enjoyed by the person possessed of the character, it can never be SELF-LOVE which renders the prospect of them agreeable to us, the spectators, and prompts our esteem and approbation. No force of imagination can convert us into another person, and make us fancy, that we, being that person, reap benefit from those valuable qualities, which belong to him. Or if it did, no celerity of imagination could immediately transport us back, into ourselves, and make us love and esteem the person, as different from us. Views and sentiments, so opposite to known truth and to each other, could never have place,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ame person. All suspicion, therefore, of selfish regards, is here totally excluded. It is a quite different principle, which actuates our bosom, and interests us in the felicity of the person whom we contemplate. Where his natural talents and acquired abilities give us the prospect of elevation, advancement, a figure in life, prosperous success, a steady command over fortune, and the execution of great or advantageous undertakings; we are struck with such agreeable images, and feel a complacency and regard immediately arise towards him. The ideas of happiness, joy, triumph, prosperity, are connected with every circumstance of his character, and diffuse over our minds a pleasing sentiment of sympathy and humanity. [7_1]

我们承认，没有哪一种品质是绝对应受谴责的，也没有哪一种品质是绝对值得赞美的，这完全要视其程度大小而定。逍遥学派认为，适度是德性的典型特征。而适度又主要取决于效用。例如，做事时适当的迅速和敏捷值得称许。因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实现目的的进程就总是停滞不前；而如果做得太过，又会使得措施计划变得仓促混乱。据此推理，我们得以在一切关于道德的审慎研究中，确定适当的和值得称许的中庸，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从不会忽视那些性格或习惯所带来的益处。现在，由于这种性格的拥有者享受着其带来的种种益处，因此，该性格就不可能是自爱，因为，自爱会使我们这些旁观者因看到这种种益处的前景而感到愉快，并会激发起我们的钦佩和赞许之情。没有哪一种想象力能够将我们彻底转变成另外一个人，并让我们幻想，假如我们是那个人的话，我们就可以从那些属于他的宝贵品质中获益得利。抑或，即便想象力真的能够做到，也没有哪一种想象力能够如此迅速地将我们即刻转换回我们自己，从而使得我们爱和钦敬那个与我们不同的人。对立于已知真理且彼此相互对立的观点和情感，永远不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因此，一切对于自私性的尊重的怀疑均被彻底排除了。这是一条截然不同的原则，它使我们的内心激动起来，激起我们对自己关注的那个人是否幸福安乐的兴趣。倘若一个人先天的才赋和后天的能力让我们看到拔擢、进步、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大富大贵、丰功伟业的前景，那我们就会注目动心于这些令人愉快的意象，对他满意和尊重的情感也会油然而生。幸福、喜悦、胜利和繁荣的观念与他性格的每一个因素相关联，并使得我们的心灵充溢着令人愉悦的同情和人道的情感 [8_1] 。

Let us suppose a person originally framed so as to have no manner of concern for his fellow-creatures, but to regard the happiness and misery of all sensible beings with greater indifference than even two contiguous shades of the same colour. Let us suppose, if the prosperity of nations were laid on the one hand, and their ruin on the other, and he were desired to choose; that he would stand like the schoolman's ass, irresolute and undetermined,

between equal motives; or rather, like the same ass between two pieces of wood or marble, without any inclination or propensity to either side. The consequence, I believe, must be allowed just, that such a person, being absolutely unconcerned, either for the public good of a community or the private utility of others, would look on every quality, however pernicious, or however beneficial, to society, or to its possessor, with the same indifference as on the most common and uninteresting object.

假设一个人天生对其人类同胞毫不关心，也对一切感性生物的幸福和痛苦极度冷漠，甚至比不上他对同一色系的两种毗邻颜色的细微差别的关注。假设一边是国家的繁荣昌盛，一边是国家的衰亡覆灭，需要他做出选择，此时，他会像那头经院哲学家的驴一样，在两个同等的动机之间犹豫不决、徘徊不定；或确切而言，这头驴就像是被拴在两根木头或两块石头之间一样毫不倾向或是偏好哪一边。因此，我认为必须承认的正当合理的结论是，既然这样一个人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他人的私人效用都完全漠不关心，那么，他也会像看待一个最普通和最乏味无趣的事物一样，漠然地看待每一种品质，无论这种品质对社会多么有害或是有益。

But if, instead of this fancied monster, we suppose a MAN to form a judgement or determination in the case, there is to him a plain foundation of preference, where everything else is equal; and however cool his choice may be, if his heart be selfish, or if the persons interested be remote from him; there must still be a choice or 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is useful, and what is pernicious. Now this distinction is the same in all its parts, with the MORAL DISTINCTION, whose foundation has been so often, and so much in vain, enquired after. The same endowments of the mind, in every circumstance, are agreeable to the sentiment of morals and to that

of humanity; the same temper is susceptible of high degrees of the one sentiment and of the other; and the same alteration in the objects, by their nearer approach or by connexions, enlivens the one and the other. By all the rules of philosophy, therefore, we must conclude, that these sentiments are originally the same; since, in each particular, even the most minute, they are governed by the same laws, and are moved by the same objects.

然而，假如不是这一假想出的怪物，而是假定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能够给出判断或做出决定，那么对于他而言，在同等事物之间有所偏爱，其优先选择的依据显而易见；无论他的选择多么冷静，而如果他的内心是自私的，抑或如果他与利益相关的人十分疏远，那么，他在有用之物和有害之物之间就必然是有所选择、有所区别的。在此，这一区别是与德恶之别完完全全相同的，德恶之别的依据何在，是一个人们不断追问但又总是无功而返的难题。在每一个方面，同样的心灵禀赋，都既适宜于道德情感又适宜于人道情感；同样的脾性既易受到高度的道德情感的感染又易受到高度的人道情感的感染；事物由于彼此之间的相互靠近和相互联系而出现的同样的改变，既能给道德情感也能给仁慈情感带来生机和活力。因此，依循哲学的全部法则，我们必然会得出如下结论：道德情感和人道情感本就毫无二致，因为，在每一个方面，甚至是最细微之处，它们都受控于同样的法则，感动于同样的事物。

Why do philosophers infer, with the greatest certainty, that the moon is kept in its orbit by the same force of gravity, that makes bodies fall near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but because these effects are, upon computation, found similar and equal? And must not this argument bring as strong conviction, in moral as in natural disquisitions?

如果不是通过计算发现二者有着相似的和同等的效果，哲学家们又如何能够肯定无疑地推论出，同样的万有引力既能让物体向地球表面坠落又能让月亮在其轨道上保持运行？该论证在道德研究中难道不是和在自然研究中有着同样强大的说服力吗？

To prove, by any long detail, that all the qualities, useful to the possessor, are approved of, and the contrary censured, would be superfluous. The least reflection on what is every day experienced in life, will be sufficient. We shall only mention a few instances, in order to remove, if possible, all doubt and hesitation.

通过任何琐碎的细节来论证，所有对拥有者有用的品质都是值得赞许的，所有相反的品质都应遭到责难，实属多余。只需对我们每天的生活经历稍作思索，就完全足矣。为了消除可能出现的各种怀疑和犹豫，在此，我们仅略举几个例子。

The quality, the most necessary for the execution of any useful enterprise, is discretion; by which we carry on a safe intercourse with others, give due attention to our own and to their character, weigh each circumstance of the business which we undertake, and employ the surest and safest means for the attainment of any end or purpose. To a Cromwell, perhaps, or a De Retz, discretion may appear an alderman-like virtue, as Dr. Swift calls it; and being incompatible with those vast designs, to which their courage and ambition prompted them, it might really, in them, be a fault or imperfection. But in the conduct of ordinary life, no virtue is more requisite, not only to obtain success, but to avoid the most fatal miscarriages and disappointments. The greatest parts without it, as observed by an elegant writer, may be fatal to their owner; as

Polyphemus, deprived of his eye, was only the more exposed, on account of his enormous strength and stature.

在实行任何有用的计划之时，慎重这种品质都是最必不可少的。凭借慎重，我们得以与他人安全地交往，适当地留意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性格，权衡我们所做之事的每一个细节因素，并采用最为安全可靠的手段达成任何目标或意图。或许，正如斯威夫特博士所言，对于克伦威尔或德雷兹这样的人而言，慎重可能是一种市政议员式的德性，因为，这种德性与他们的勇气和雄心促使他们实现的宏图大略相抵触，因而在他们身上，慎重可能真的是缺点和瑕疵。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慎重这种德性却是最不可或缺的，它不仅能够帮助人们取得成功，而且能够帮助人们避开最致命的失败和失望。正如一位文笔高雅的作家在评论中提到的那样，假如一个人拥有最伟大的品质却缺乏慎重，那这也可能是致命的，就像被刺瞎眼睛的波吕斐摩斯，他越是身高力壮，就越是容易受到攻击。

The best character, indeed, were it not rather too perfect for human nature, is that which is not swayed by temper of any kind; but alternately employs enterprise and caution, as each is useful to the particular purpose intended. Such is the excellence which St. Evremond ascribes to Mareschal Turenne, who displayed every campaign, as he grew older, more temerity in his military enterprises; and being now, from long experience, perfectly acquainted with every incident in war, he advanced with greater firmness and security, in a road so well known to him. Fabius, says Machiavel, was cautious; Scipio enterprising: And both succeeded, because the situation of the Roman affairs, during the command of each, was peculiarly adapted to his genius; but both would have failed, had these situations been reversed. He is happy, whose circumstances suit his temper; but he is more excellent, who can

suit his temper to any circumstances.

不任由脾性摆布，交替运用有助于特定目的的大胆进取或是小心谨慎，确实，这才是最佳的性格，若不是对人性本身而言太过完美的话。这一优点也正是圣埃夫雷蒙称颂蒂雷纳元帅之处。随着年岁的增长，蒂雷纳元帅在其军事生涯的每一场战役中都表现得愈加勇猛，而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对战争中每一次行动的了如指掌，他正在这条稔熟于心的道路上安全无虞地稳步前行。马基雅弗利评说道，费比乌斯小心谨慎，西庇阿大胆进取；由于二人统治下的罗马所处的情势分别适合于他们各自天分的发挥，因此，二人均大获成功。而如若情势反转，则二人均会一败涂地。假如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如能适应于其脾性，那么他就会感到幸福；而如若他的脾性能适应于任何环境，他则更为优秀。

What need is there to display the praises of industry, and to extol its advantages, in the acquisition of power and riches, or in raising what we call a FORTUNE in the world? The tortoise, according to the fable, by his perseverance, gained the race of the hare, though possessed of much superior swiftness. A man's time, when well husbanded, is like a cultivated field, of which a few acres produce more of what is useful to life, than extensive provinces, even of the richest soil, when over-run with weeds and brambles.

在获取权势和财富的过程中，或是在改善我们称之为尘世命运的过程中，为什么需要赞美勤勉、赞颂它所带来的益处呢？寓言故事中的乌龟由于坚持不懈，所以在比赛中跑赢了灵活得多的兔子。我们的时间，如能善加利用，便会如同一块精心耕种的田地，区区几亩，即能收成丰足，远胜杂草荆棘丛生的沃野千里。

But all prospect of success in life, or even of tolerable subsistence, must fail, where a reasonable frugality is wanting. The heap, instead of increasing, diminishes daily, and leaves its possessor so much more unhappy, as, not having been able to confine his expences to a large revenue, he will still less be able to live contentedly on a small one. The souls of men, according to Plato [7_2] , inflamed with impure appetites, and losing the body, which alone afforded means of satisfaction, hover about the earth, and haunt the places, where their bodies are deposited; possessed with a longing desire to recover the lost organs of sensation. So may we see worthless prodigals, having consumed their fortune in wild debauches, thrusting themselves into every plentiful table, and every party of pleasure, hated even by the vicious, and despised even by fools.

而倘若没有合理的节俭，我们便毫无前景可言，不仅无法功成名就，甚至难以勉强度日。积蓄不是日渐增多而是日渐减少，其拥有者的不幸亦是日盛一日，由于无法将自己的花销限制在丰厚收入的范围之内，靠微薄的收入生活只会令他愈加不满。据柏拉图所言 [8_2] ，人类的灵魂在不纯洁的嗜欲的火焰中燃烧，失去了唯一能够满足欲望的肉体，因而只能在大地上徘徊游荡，在肉体的存放之地出没流连，疯狂而热切地渴望找回它们丢失了的感觉器官。于是，我们看到，一无所用的浪子们，在放纵无度的寻欢作乐中挥金如土，对待豪宴佳肴、燕舞笙歌趋之若鹜，对他们，恶人亦会憎恨之，愚人亦会鄙夷之。

The one extreme of frugality is avarice, which, as it both deprives a man of all use of his riches, and checks hospitality and every social enjoyment, is justly censured on a double account. PRODIGALITY, the other extreme, is commonly more hurtful to a man himself; and each of these extremes is blamed above the other,

according to the temper of the person who censures, and according to his greater or less sensibility to pleasure, either social or sensual.

节俭的一个极端是贪婪，由于它不仅剥夺了一个人对其钱财的全部使用，而且遏止了宴会招待和各种社交享乐，因而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们的双重责难。浪费是节俭的另一个极端，它通常对一个人自身的伤害更大。由于责难者各自的脾性不同，且对于社交和感官愉悦的感受有强有弱，因此他对这两个极端的谴责也会有重有轻。

Qualities often derive their merit from complicated sources. Honesty, fidelity, truth, are praised for their immediate tendency to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but after those virtues are once established upon this foundation, they are also considered as advantageous to the person himself, and as the source of that trust and confidence, which can alone give a man any consideration in life. One becomes contemptible, no less than odious, when he forgets the duty, which, in this particular, he owes to himself as well as to society.

品质的价值常常有着复杂的根源。忠诚、忠实和真实之所以受到赞美，就在于它们具有增进社会利益的直接趋向；而一旦将这些德性确立在这一根基之上，它们又会被认为对个人自身有益，并进而被视作信任和信赖的根源，仅凭它们，一个人便能在生活中赢得敬重。倘若一个人忘记了他在这方面应该承担的个人与社会责任，他就是可鄙、乃至可憎的。

Perhaps, this consideration is one CHIEF source of the high blame, which is thrown on any instance of failure among women in

point of CHASTITY. The greatest regard, which can be acquired by that sex, is derived from their fidelity; and a woman becomes cheap and vulgar, loses her rank, and is exposed to every insult, who is deficient in this particular. The smallest failure is here sufficient to blast her character. A female has so many opportunities of secretly indulging these appetites, that nothing can give us security but her absolute modesty and reserve; and where a breach is once made, it can scarcely ever be fully repaired. If a man behaves with cowardice on one occasion, a contrary conduct reinstates him in his character. But by what action can a woman, whose behaviour has once been dissolute, be able to assure us, that she has formed better resolutions, and has self-command enough to carry them into execution?

然而，这一考虑或许又是女人在关于忠贞问题的任何失败的案例中深受谴责的一个主要根源。女性能够赢得的最高层次的尊重来自于她们的忠实；不忠的女人轻贱下流，没有地位，遭人百般侮辱唾骂。哪怕是一点小小的不忠也足以彻底毁掉她的人格。女人暗中纵欲的机会非常之多，以至于除非她绝对端庄、绝对矜持，否则我们便毫无安全感可言，因为一旦她做出不忠之事，此事便难以完全补救。如果一个男人这一次表现懦弱，那么，下一次只要他表现勇敢，便可以重新恢复自己的人格。而一个女人一旦有过淫荡之举，她还能凭靠什么行为来让我们相信，她已下定改过的决心，并有足够大的自控力保证自己从此以后谨守妇道？

All men, it is allowed, are equally desirous of happiness; but few are successful in the pursuit: One considerable cause is the want of strength of mind, which might enable them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of present ease or pleasure, and carry them forward in the search of more distant profit and enjoyment. Our affections, on

a general prospect of their objects, form certain rules of conduct, and certain measures of preference of one above another: and these decisions, though really the result of our calm passions and propensities, (for what else can pronounce any object eligible or the contrary?) are yet said, by a natural abuse of terms, to be the determinations of pure REASON and reflection. But when some of these objects approach nearer to us, or acquire the advantages of favourable lights and positions, which catch the heart or imagination; our general resolutions are frequently confounded, a small enjoyment preferred, and lasting shame and sorrow entailed upon us. And however poets may employ their wit and eloquence, in celebrating present pleasure, and rejecting all distant views to fame, health, or fortune; it is obvious, that this practice is the source of all dissoluteness and disorder, repentance and misery. A man of a strong and determined temper adheres tenaciously to his general resolutions, and is neither seduced by the allurements of pleasure, nor terrified by the menaces of pain; but keeps still in view those distant pursuits, by which he, at once, ensures his happiness and his honour.

人们承认，所有的人对幸福都有着同等的渴望，然而，得偿所愿者却寥寥无几。究其根源，一个重要原因是，绝大多数人都缺乏意志力，一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眼下安适和愉悦的诱惑，并引领他们去追求更长远的收益和享乐的意志力。我们的感情，根据其对象的一般前景，形成了一定的行为法则和厚此薄彼的优先选择标准；这些决定，尽管确实是我们冷静激情和癖好的产物（因为，还有其他什么能够判断对象合适与否的吗？），却依然由于自然的术语滥用而被说成是由纯理性和纯思索做出的决断。然而，当某些物体距离我们更近，或是由于其光线和位置的优势，而俘获了我们的内心或想象力时，它们常常会扰乱我们的一般决定，令我们偏向于选择暂时的微小享乐，结果换来的却是长久的羞愧与悲伤。无论诗人们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与雄

辩，歌颂眼下的愉悦，否定关于名誉、健康和财富的长远观点，这种做法都显然是一切淫荡、无序、悔恨和苦难的渊薮。一个脾性强硬之人，能够执着地坚持自己的一般决定，他既不会沉迷于愉悦的诱惑，也不会恐惧于痛苦的威胁，而是牢牢锁定那些长远目标，从而将幸福和荣誉牢牢掌握在手中。

Self-satisfaction, at least in some degree, is an advantage, which equally attends the fool and the wise man: But it is the only one; nor is there any other circumstance in the conduct of life, where they are upon an equal footing. Business, books, conversation; for all of these, a fool is totally incapacitated, and except condemned by his station to the coarsest drudgery, remains a useless burthen upon the earth. Accordingly, it is found, that men are extremely jealous of their character in this particular; and many instances are seen of profligacy and treachery, the most avowed and unreserved; none of bearing patiently the imputation of ignorance and stupidity. Dicaearchus, the Macedonian general, who, as Polybius tells us [7_3] , openly erected one altar to impiety, another to injustice, in order to bid defiance to mankind; even he, I am well assured, would have started at the epithet of FOOL, and have meditated revenge for so injurious an appellation. Except the affection of parents, the strongest and most indissoluble bond in nature, no connexion has strength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disgust arising from this character. Love itself, which can subsist under treachery, ingratitude, malice, and infidelity, is immediately extinguished by it, when perceived and acknowledged; nor are deformity and old age more fatal to the dominion of that passion. So dreadful are the ideas of an utter incapacity for any purpose or undertaking, and of continued error and misconduct in life!

自我满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愚人和智者可同等享有的益处，但却是唯一的一种。因为，在生活中，愚人再没有什么其他方面可以和智者平起平坐。工作、读书和交谈，愚人无一能够胜任，除了因身份地位的关系被迫从事最粗重的苦力之外，他只是地球的一个无用的负累。于是，我们发现，人们对自己这方面的性格极端忌讳，很多人能够完全坦诚布公地承认自己的放荡淫乱和变节背叛，但却无人能够在听到别人指责自己愚昧无知和呆笨愚蠢时还能耐心忍受。正如波里比阿所言[8_3]，马其顿将军狄凯阿科斯为挑衅人类而当众垒起一座不敬的祭坛和一座不义的祭坛，但我敢肯定，即便是他，也会因愚人这一绰号而暴跳如雷，并因这一侮辱诽谤的称谓而蓄谋报复。除了父母之爱这种血浓于水的最为牢靠的感情，没有哪一种联系的力量能够强大到承受得了这种性格引起的厌恶之情。爱经受得住背叛、忘恩负义、恶意和不忠，然而一旦觉察并确认了这种性格，却能在顷刻间烟消云散，连残障和衰老都不如它这般致命，可以使爱这种激情的统治转瞬崩塌。一无所用、一事无成，在生活中错误连连、失误频频，想到这些是多么可怕啊！

When it is asked, whether a quick or a slow apprehension be most valuable? Whether one, that, at first view, penetrates far into a subject, but can perform nothing upon study; or a contrary character, which must work out everything by dint of application? Whether a clear head or a copious invention? Whether a profound genius or a sure judgement? In short, what character, or peculiar turn of understanding, is more excellent than another? It is evident, that we can answer none of these questions, without considering which of those qualities capacitates a man best for the world, and carries him farthest in any undertaking.

当人们问，灵敏和迟钝的领悟力，哪一个大有价值？一眼即能洞见论题但却在研究中毫无建树，和一种相反的，凡事均需殚思竭虑方

能有所进展的性格，哪一个大有价值？清晰的头脑和丰富的创造力，哪一个大有价值？深邃渊奥的天分和沉着自信的判断力，哪一个大有价值？简而言之，何种性格抑或何种特别的知性，比之另外一种更为优秀？显而易见，不考虑这些品质中哪一种能够赋予一个人最可安身立命的能力，并襄助他成就最大的功业，我们便无法回答上述的任何问题。

If refined sense and exalted sense be not so USEFUL as common sense, their rarity, their novelty, and the nobleness of their objects make some compensation, and render them the admiration of mankind: As gold, though less serviceable than iron, acquires from its scarcity a value which is much superior.

尽管精致感和崇高感不如日常感觉那般有用，但它们却以自身的珍稀罕见、新颖奇异及其对象的高贵弥补了这一不足，并因此成为人类赞赏倾慕的对象，正如金子虽不如铁用途广泛，但却因其稀有反而拥有更高的价值。

The defects of judgement can be supplied by no art or invention; but those of memory frequently may, both in business and in study, by method and industry, and by diligence in committing everything to writing; and we scarcely ever hear a short memory given as a reason for a man's failure in any undertaking. But in ancient times, when no man could make a figure without the talent of speaking, and when the audience were too delicate to bear such crude, undigested harangues as our extemporary orators offer to public assemblies; the faculty of memory was then of the utmost consequence, and was accordingly much more valued than at present. Scarce any great genius is mentioned in antiquity, who is

not celebrated for this talent; and Cicero enumerates it among the other sublime qualities of Caesar himself. [7_4]

技艺和发明无法弥补判断力的缺陷；但在工作和学习中，记忆力的缺陷，却常常可以通过方法和勤勉以及勤做笔记得到弥补，因此，我们很少听说，记忆力差能成为一个人做事不成的理由。然而古时候，一个人没有说话才能便无法出名，听众太过细致，以至于无法忍受演说家在公共集会上即兴演讲时未经推敲、缺少章法的慷慨陈辞。那时候，记忆力这种官能至关重要，因而也比现在更受重视。在古代，凡是被人提及的伟大天才几乎无一不因其惊人的记忆力而闻名于世，在西塞罗看来，这也正是凯撒本人其他的崇高品质之一 [8_4] 。

Particular customs and manners alter the usefulness of qualities: They also alter their merit. Particular situations and accidents have, in some degree, the same influence. He will always be more esteemed, who possesses those talents and accomplishments, which suit his station and profession, than he whom fortune has misplaced in the part which she has assigned him. The private or selfish virtues are, in this respect, more arbitrary than the public and social. In other respects, they are, perhaps, less liable to doubt and controversy.

特定的风俗和作风改变了品质的有用性，也改变了品质的价值。特定的情形与意外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同样的影响力。相比于那些因命运安排而身在错位的人，拥有与其身份和职业相应的才赋和才艺的人，总是会更受钦敬。在这一方面，私人德性或自私德性，和公共德性和社会德性比起来，更为随意和武断。而在其他方面，前者则比后者更不容易引起怀疑和争论。

In this kingdom, such continued ostentation, of late years, has prevailed among men in ACTIVE life with regard to PUBLIC SPIRIT, and among those in SPECULATIVE with regard to BENEVOLENCE; and so many false pretensions to each have been, no doubt, detected, that men of the world are apt, without any bad intention, to discover a sullen incredulity on the head of those moral endowments, and even sometimes absolutely to deny their existence and reality. In like manner, I find, that, of old, the perpetual cant of the STOICS and CYNICS concerning VIRTUE, their magnificent professions and slender performances, bred a disgust in mankind; and Lucian, who, though licentious with regard to pleasure, is yet in other respects a very moral writer, cannot sometimes talk of virtue, so much boasted without betraying symptoms of spleen and irony. But surely this peevish delicacy, whence-ever it arises can never be carried so far as to make us deny the existence of every species of merit, and all distinction of manners and behaviour. Besides DISCRETION, CAUTION, ENTERPRISE, INDUSTRY, ASSIDUITY, FRUGALITY, ECONOMY, GOOD-SENSE, PRUDENCE, DISCERNMENT; besides these endowments, I say, whose very names force an avowal of their merit, there are many others, to which the most determined scepticism cannot for a moment refuse the tribute of praise and approbation. TEMPERANCE, SOBRIETY, PATIENCE, CONSTANCY, PERSEVERANCE, FORETHOUGHT, CONSIDERATENESS, SECRECY, ORDER, INSINUATION, ADDRESS, PRESENCE OF MIND, QUICKNESS OF CONCEPTION, FACILITY OF EXPRESSION, these, and a thousand more of the same kind, no man will ever deny to be excellencies and perfections. As their merit consists in their tendency to serve the person, possessed of them, without any magnificent claim to public and social desert, we are the less jealous of their pretensions, and readily admit them into the catalogue of laudable qualities. We are not sensible that, by this concession, we have paved the way for all the other moral

excellencies, and cannot consistently hesitate any longer, with regard to disinterested benevolence, patriotism, and humanity.

在这个王国，近年来，在现实生活中炫耀公共精神之风一直在民众中盛行不衰，而炫耀仁爱之风则一直在思辨者中盛行不衰。毫无疑问，在这两种情况中都可看到大量的虚妄自夸之处，以至于世人很容易不带任何恶意地就对有道德禀赋的人产生出一种阴郁的怀疑，甚至有时会完全否认这些道德禀赋的存在和真实性。同样，我发现，之前斯多葛派和犬儒学派关于德性无休无止的隐言晦语以及他们的言高手低，很早便已令人们心生厌恶。尽管纵情玩乐，但琉善在其他方面却依然是一位极具道德感的作家，有时，不发发怒气、不嘲讽嘲讽，他便无法谈论那被人们夸赞备至的德性。然而，这样的敏感易怒，不论因何而起，都绝不至于使我们否认每一种价值的存在，否认举止作风的一切区别。除慎重、谨慎、进取、勤勉、勤奋、节俭、节约、明辨、审慎、敏锐之外，我要说的是，除这些仅闻其名便知其价值的禀赋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禀赋，哪怕是那些最坚定的怀疑论者，都不得不给予赞美和赞许。克己节制、沉稳持重、容让忍耐、忠贞不渝、坚毅不拔、深谋远虑、体贴周到、缄口保密、有条不紊、含蓄委婉、谈吐优雅、临事镇定、敏于才思、善于言辩，凡此种种，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万千禀赋，没有人会否认它们是美德和优点。由于这些禀赋的价值在于它们服务其拥有者的趋向，不自我吹嘘为公共和社会功德，因此，我们并不怎么在意它们的自我标榜，而是将它们欣然纳入值得夸赞的品质的目录名单里。我们没有意识到，由于这一让步，我们已经为其他所有的美德铺平了道路，并在面对无私的仁爱、爱国主义、仁慈时再也不能总是犹疑不决。

It seems, indeed, certain, that first appearances are here, as usual, extremely deceitful, and that it is more difficult, in a speculative way, to resolve into self-love the merit which we ascribe to the selfish virtues above mentioned, than that even of the social

virtues, justice and beneficence. For this latter purpose, we need but say, that whatever conduct promotes the good of the community is loved, praised, and esteemed by the community, on account of that utility and interest, of which every one partakes; and though this affection and regard be, in reality, gratitude, not self-love, yet a distinction, even of this obvious nature, may not readily be made by superficial reasoners; and there is room, at least, to support the cavil and dispute for a moment. But as qualities, which tend only to the utility of their possessor,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us, or to the community, are yet esteemed and valued; by what theory or system can we account for this sentiment from self-love, or deduce it from that favourite origin? There seems here a necessity for confessing that the happiness and misery of others are not spectacles entirely indifferent to us; but that the view of the former, whether in its causes or effects, like sunshine or the prospect of well-cultivated plains (to carry our pretensions no higher), communicates a secret joy and satisfacti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latter, like a lowering cloud or barren landscape, throws a melancholy damp over the imagination. And this concession being once made, the difficulty is over; and a natural unforc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enomena of human life will afterwards, we may hope, prevail among all speculative enquirers.

的确，第一印象在这里好像和通常一样极具欺骗性，以一种思辨的方式将归于上述自私德性的价值分解成自爱，和将正义、仁善等社会德性的价值分解成自爱比起来，更为困难。为了后一目的，我们只需说，凡是增进社会利益的行为，由于它具有人人共享的效用和利益，因而会是整个社会所衷爱、赞美和钦敬的行为，尽管这种喜爱和尊重其实是感恩而非自爱。然而，即便是这么明显的一个区别，也不是肤浅的辩论者们能够轻易做出的。至少，目前仍有指摘和争论的余地。然而，这些仅以其拥有者而非我们或整个社会的效用为唯一趋向

的品质，依然获得了钦敬和重视；因此，我们借助何种理论或体系，才能解释这种源于自爱的情感，或是从自爱这一人们最喜爱的起源中演绎出这种情感呢？在此，似乎必须承认，我们并非完全对他人的幸福和痛苦漠不关心；相反，看到他人幸福，无论是这幸福的因还是果，我们都会像看到阳光和眺望精耕细作的田野一般（不做更高的自我标榜），感到一种喜悦和满足；而看到他人痛苦，我们的想象则会像看到低垂的乌云和贫瘠的土地一般，变得忧郁而沮丧。一旦做出这一让步，困难便迎刃而解；我们就可以希望，一种对人生现象自然且毫不牵强的解释能够在所有的思辨探究者中盛行起来。

PART 2

第二节

It may not be improper, in this place,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bodily endowments, and of the goods of fortune, over our sentiments of regard and esteem, and to consider whether these phenomena fortify or weaken the present theory. It will naturally be expected, that the beauty of the body, as is supposed by all ancient moralists, will be similar, in some respects, to that of the mind; and that every kind of esteem, which is paid to a man, will have something similar in its origin, whether it arises from his mental endowments, or from the situation of his exterior circumstances.

此处，探察身体禀赋和财富利益对我们的尊重和钦敬之情的影响力，考虑这些现象是强化还是弱化了我们在此提出的理论，并无不当。我们自然期望看到，就像所有古代道德家所认为的那样，身体之美会在某些方面与心灵之美相似，每一种对人的钦敬，在其起源处也有某种相似之处，无论它们是起源于心灵禀赋还是起源于所处的外部处境。

It is evident, that one considerable source of BEAUTY in all animals is the advantage which they reap from the particular structure of their limbs and members, suitably to the particular manner of life, to which they are by nature destined. The just proportions of a horse, described by Xenophon and Virgil, are the same that are received at this day by our modern jockeys; because the foundation of them is the same, namely, experience of what is detrimental or useful in the animal.

显而易见，所有动物的美的一个重要根源都是它们因自身特定的肢体及器官结构而获得的益处，这些结构适应于它们由大自然命定的特定生活方式。色诺芬与维吉尔所描述的马的匀称比例，和我们现代赛马师所感受到的相同，因为它们的根基，即对动物身上何为有害何为有用的体验，是相同的。

Broad shoulders, a lank belly, firm joints, taper legs; all these are beautiful in our species, because signs of force and vigour. Ideas of utility and its contrary, though they do not entirely determine what is handsome or deformed, are evidently the source of a considerable part of approbation or dislike.

宽阔的肩膀、平坦的小腹、有力的关节和修长的双腿，所有这些在我们人类的身上都是美的，因为它们是力量和活力的标志。效用和无效用的观念，尽管并不能完全决定何为健美何为畸丑，但显而易见，它们是大部分赞许和嫌恶的根源。

In ancient times, bodily strength and dexterity, being of greater

USE and importance in war, was also much more esteemed and valued, than at present. Not to insist on Homer and the poets, we may observe, that historians scruple not to mention FORCE OF BODY among the other accomplishments even of Epaminondas, whom they acknowledge to be the greatest hero, statesman, and general of all the Greeks. [7_5] A like praise is given to Pompey, one of the greatest of the Romans. [7_6] This instance is similar to what we observed above with regard to memory.

古时候，由于身体的力量和灵巧在战争中比今天更有用、更重要，因此也比今天更受钦敬和重视。不必非得援引荷马和诗人们，我们也能看到，历史学家甚至在谈论被他们视为整个希腊最伟大的英雄、政治家和将军的伊巴密浓达的才艺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提及身体的力量 [8_5] 。庞培，罗马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8_6] ，也得到了类似的赞美。此例与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关于记忆力的情形相似。

What derision and contempt, with both sexes, attend IMPOTENCE; while the unhappy object is regarded as one deprived of so capital a pleasure in life, and at the same time, as disabled from communicating it to others. BARRENNESS in women, being also a species of INUTILITY, is a reproach, but not in the same degree: Of which the reason is very obvious,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theory.

无论男性或是女性，性无能都会遭到人们极大的嘲弄和轻蔑，因为，人们认为这个不快乐的人被剥夺了如此首要的一个人生乐事，并丧失将这一愉悦传输给他人的能力。女人不孕，由于也是一种无效用，因而是一种耻辱，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根据我们在此提出的理论，个中原由是显而易见的。

There is no rule in painting or statuary more indispensible than that of balancing the figures, and placing them with the greatest exactness on their proper centre of gravity. A figure, which is not justly balanced, is ugly; because it conveys the disagreeable ideas of fall, harm, and pain. [7_7]

在绘画和雕塑中，最不可或缺的法则莫过于保持形像的平衡，使其保持适当重心并不发生丝毫偏移。而形像如果不能保持平衡，便是丑的，因为它传递出的是跌倒、受伤、痛苦等令人不快的观念 [8_7] 。

A disposition or turn of mind, which qualifies a man to rise in the world and advance his fortune, is entitled to esteem and regard, as has already been explained. It may, therefore, naturally be supposed, that the actual possession of riches and authority will have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ver these sentiments.

如上所言，能够令人飞黄腾达、财源滚滚的性情或气质倾向，理应受到钦敬和尊重，这已经得到解释。因此，我们自然会认为，只有实际拥有钱财和权势的人才会对人们的钦敬和尊重之情拥有可观的影响力。

Let us examine any hypothesis by which we can account for the regard paid to the rich and powerful: We shall find none satisfactory, but that which derives it from the enjoyment communicated to the spectator by the images of prosperity, happiness, ease, plenty, authority, and the gratification of every appetite. Self-love, for instance, which some affect so much to

consider as the source of every sentiment, is plainly insufficient for this purpose. Where no good-will or friendship appears, it is difficult to conceive on what we can found our hope of advantage from the riches of others; though we naturally respect the rich, even before they discover any such favourable disposition towards us.

通过考察可以用来解释有钱有势者之所以受到尊重的任何一个假设，我们发现其中无一令人满意，除非我们假设，这种对于有钱有势者的尊重来自于成功、幸福、安适、富裕、权势和各种嗜欲的全部满足等意象给观者带来的享乐。例如，尽管有些人非常喜欢将自爱视作一切情感的根源，但在这里自爱显然不足以给出解释。倘若没有善意或友爱，我们便很难设想我们何以奢望从他人的钱财中获益，尽管我们甚至已经在富人对我们表现出如此这般的好性情之前，就对他们表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尊敬。

We are affected with the same sentiments, when we lie so much out of the sphere of their activity, that they cannot even be supposed to possess the power of serving us. A prisoner of war, in all civilized nations, is treated with a regard suited to his condition; and riches, it is evident, go far towards fixing the condition of any person. If birth and quality enter for a share, this still affords us an argument to our present purpose. For what is it we call a man of birth, but one who is descended from a long succession of rich and powerful ancestors, and who acquires our esteem by his connexion with persons whom we esteem? His ancestors, therefore, though dead, are respected, in some measure, on account of their riches; and consequently, without any kind of expectation.

当我们远在他们的活动范围之外，甚至于他们的力量无法为我们

服务时，我们也会生发出同样的情感。在所有文明国家，战俘都受到了与其身份地位相称的尊重，显然，人们的富裕程度绝对有助于确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即便加上出身和品质，也只是为我们当前的目的提供了又一个论据。因为，我们所谓的出身显贵，如果指的不是这个人家世绵长显赫，先祖个个有钱有势，对于他我们有一份爱屋及乌的钦敬之情，指的又能是什么呢？因此，尽管他的先祖已逝，但还是因其有钱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并且，人们对他们的尊敬也因其已不在世而不附带任何的期盼。

But not to go so far as prisoners of war or the dead, to find instances of this disinterested regard for riches; we may only observe, with a little attention, those phenomena which occur in common life and conversation. A man, who is himself, we shall suppose, of a competent fortune, and of no profession, being introduced to a company of strangers, naturally treats them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respect, as he is informed of their different fortunes and conditions; though it is impossible that he can so suddenly propose, and perhaps he would not accept of, any pecuniary advantage from them. A traveller is always admitted into company, and meets with civility, in proportion as his train and equipage speak him a man of great or moderate fortune. In short, the different ranks of men are, in a great measure, regulated by riches; and that with regard to superiors as well as inferiors, strangers as well as acquaintance.

不过，我们不必舍近求远地以战俘和逝者为例来说明这种对于钱财无私的尊重，而只需稍加留意便可在日常生活和一般交谈中观察到这样的一些现象。假定一个人没有工作却拥有足够多的财富，当他被引见给一群陌生人时，由于得知这些人有着不同的财富状况和身份地位，他对不同的人自然会给予不同程度的尊敬，尽管他不可能突然之

间就打算从这些人身上获得钱财方面的益处，而且即便可能他或许也不会接受。旅行者的随从和装备状况表明了他是处于上等还是中等财富水平，从而被接纳进入相应的交际圈，并受到相称的礼遇。简而言之，人的钱财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等级的高低；无论是对上位者还是下位者，无论是对生人还是熟人，均是如此。

What remains, therefore, but to conclude, that, as riches are desired for ourselves only as the means of gratifying our appetites, either at present or in some imaginary future period, they beget esteem in others merely from their having that influence. This indeed is their very nature or essence: They have a direct reference to the commodities, conveniencies, and pleasures of life. The bill of a banker, who is broke, or gold in a desert island, would otherwise be full as valuable. When we approach a man , who is, as we say, at his ease, we are presented with the pleasing ideas of plenty, satisfaction, cleanliness, warmth; a cheerful house, elegant furniture, ready service, and whatever is desirable in meat, drink, or apparel. On the contrary, when a poor man appears, the disagreeable images of want, penury, hard labour, dirty furniture, coarse or ragged clothes, nauseous meat and distasteful liquor, immediately strike our fancy. What else do we mean by saying that one is rich, the other poor? And as regard or contempt is the natural consequence of those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life; it is easily seen what additional light and evidence this throws on our preceding theory, with regard to all moral distinctions. [7_8]

因此，我们最后要做的是给出以下的结论，由于就我们自己而言，之所以渴望钱财不过是因为它既可以满足我们现在的又可以满足我们想象中的未来的嗜欲，因此，钱财之所以能够引发他人的钦敬之情也不过是因为它们具有这种影响力。实际上，这就是钱财的本性或

本质，它们与生活中的商品、便利和愉悦直接相关。否则，破产银行家手中的汇票和荒岛上的黄金就会同样值钱。当走近一个我们认为安适惬意的人时，我们会获得富裕、满足、洁净、温暖等这样一些令人愉悦的观念，会想到漂亮的房子、精美的家具、周到的服务以及各种各样的佳肴美酒和鲜衣华服。相反，如果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个穷人，那我们马上想到的就会是匮乏、拮据、辛苦的劳作、肮脏的家具、粗衣烂衫、猪食劣酒等种种令人不快的意象。说这个人富有、那个人贫穷，我们还会有什么别的意思吗？由于尊重和轻蔑是这两种不同生活境况自然引发的后果，因此，显而易见，这一例证为我们阐明和证实之前关于一切德恶之别的理论，增加了什么额外的证据和证明[8_8]。

A man who has cured himself of all ridiculous pre-possessions, and is fully, sincerely, and steadily convinced, from experience as well as philosophy, that the difference of fortune makes less difference in happiness than is vulgarly imagined; such a one does not measure out degrees of esteem according to the rent-rolls of his acquaintance. He may, indeed, externally pay a superior deference to the great lord above the vassal; because riches are the most convenient, being the most fixed and determinate, source of distinction. But his internal sentiments are more regulated by the personal characters of men, than by the accidental and capricious favours of fortune.

倘若一个人摒弃了一切荒谬的先见，依据经验和哲学，充分、真诚且坚定地相信，财富差异带来的幸福差异一般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小，那么，这样一个人就不会依照其熟人的租金账簿来决定他钦敬的不同程度了。在表面上，他或许对贵族确实比对奴仆更加恭敬，因为钱财是最固定和最确定，因而也是最方便的区别之源。然而，调控其内心情感的更多是人们的个人性格而非财富偶然而多变的眷顾。

In most countries of Europe, family, that is, hereditary riches, marked with titles and symbols from the sovereign, is the chief source of distinction. In England, more regard is paid to present opulence and plenty. Each practice ha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here birth is respected, unactive, spiritless minds remain in haughty indolence, and dream of nothing but pedigrees and genealogies: The generous and ambitious seek honour and authority, and reputation and favour. Where riches are the chief idol, corruption, venality, rapine prevail: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agriculture flourish. The former prejudice, being favourable to military virtue, is more suited to monarchies. The latter, being the chief spur to industry, agrees better with a republican government. And we accordingly find that each of these forms of government, by varying the utility of those customs, has commonly a proportionable effect on the sentiments of mankind.

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一个人的家世，即世袭的财富，以君主所赐的头衔和徽章为标志，是他们主要的区别之源。在英国，人们更尊重的是眼下的富裕和富足。每一种做法都有其利弊。在出身受到尊敬的地方，消极萎靡的心灵就会耽于傲慢的懒惰，一心只梦想着血统和门第；而慷慨大方、胸怀大志之人，则会追求荣誉、权势、声望和拥戴。在钱财是人们主要崇拜对象的地方，贪污、受贿、掠夺就会大肆猖獗；而技艺、制造业、商业和农业则会繁荣兴旺。前一种偏见有利于军事德性，更适合于君主政体。后一种偏见则是勤勉的主要动力，与共和政体更为相宜。于是，我们发现，这两种政体形式，通过改变习俗的效用，通常都会对人类的情感产生相应的影响。

The infirmities of old age are mortifying; because a comparison with the young may take place. The king's evil is industriously

concealed, because it affects others, and is often transmitted to posterity. The case is nearly the same with such diseases as convey any nauseous or frightful images; the epilepsy, for instance, ulcers, sores, scabs, &c.

年老者的体弱令人羞愧，可能是因为与年轻人做了比较。国王的罪恶被人百般遮掩，因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并常常会传播给子孙后代。而那些令人产生恶心和惧怕意象的疾病，如癫痫、溃疡、疮疤、疥癣等，情形亦大致如此。

[7_1].One may venture to affirm, that there is no human nature, to whom the appearance of happiness (where envy or revenge has no place) does not give pleasure, that of misery, uneasiness. This seems inseparable from our make and constitution. But they are only more generous minds, that are thence prompted to seek zealously the good of others, and to have a real passion for their welfare. With men of narrow and ungenerous spirits, this sympathy goes not beyond a slight feeling of the imagination, which serves only to excite sentiments of complacency or ensure, and makes them apply to the object either honorable or dishonorable appellations. A griping miser, for instance, praises extremely INDUSTRY and FRUGALITY even in others, and sets them, in his estimation, above all the other virtues. He knows the good that results from them, and feels that species of happiness with a livelier sympathy, than any other you could represent to him; though perhaps he would not part with a shilling to make the fortune of the industrious man, whom he praises so highly.

[7_2].Phaedo.

[7_3].Lib. xvi. Cap. 35.

[7_4].Fruit in Illo Ingenium, ratio, memoria, literae, cura, cogitatio, diligentia &c. Phillip. 2.

[7_5].CUM ALACRIBUS, SALTU; CUMM VELOCIBUS, CURSU; CUM VALIDIS RECTE CERTABATA. Sallust apud Veget.

[7_6].Diodorus Siculus, lib. xv. It may be improper to give the character of

Epaminondas, as drawn by the historian, in order to show the idea of perfect merit, which prevailed in those ages. In other illustrious men, say he, you will observe, that each possessed some one shining quality, which was the foundation of his fame: In Epaminondas all the VIRTUES are found united; force of body. eloquence of expression, vigour of mind, contempt of riches, gentleness of disposition, and what is chiefly to be regarded, courage and conduct of war.)

[7_7].All men are equally liable to pain and disease and sickness; and may again recover health and ease. These circumstances, as they mak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one man and another, are no source of pride or humility, regard or contempt. But comparing our own species to superior ones, it is a very mortifying consideration, that we should all be so liable to diseases and infirmities; and divines accordingly employ this topic, in order to depress self-conceit and vanity. They would have more success, if the common bent of our thoughts were not perpetually turned to compare ourselves with others.

[7_8].There is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and seemingly unaccountable in the operation of our passions, when we consider the fortune and situation of others. Very often another's advancement and prosperity produces envy, which has a strong mixture of hatred, and arises chiefly from the comparison of ourselves with the person. At the very same time, or at least in very short intervals, we may feel the passion of respect, which is a species of affection or good-will, with a mixture of humi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misfortunes of our fellows often cause pity, which has in it a strong mixture of good-will. This sentiment of pity is nearly allied to contempt, which is a species of dislike, with a mixture of pride. I only point out these phenomena, as a subject of speculation to such as are curious with regard to moral enquiries. It is sufficient for the present purpose to observe in general, that power and riches commonly cause respect, poverty and meanness contempt, though particular views and incidents may sometimes raise the passions of envy and of pity.

[8_1].我们可以大胆断言，没有哪一个人，看到幸福（其中没有妒忌也没有报复）会感觉不到愉悦，看到苦难会感觉不到不安。这似乎与我们自身的体格和身体结构密不可分。但是，只有更为慷慨的心灵才能因此受到促动热心地去帮助他人谋求利益，对他人的福利拥有一种真正的激情。至于心胸狭隘、小肚鸡肠之人，他们的同情就仅限于想象力的一种微弱的感觉，这种微弱的感觉只是有助于激起满意或责难的情感，让他们将对象说成可敬的或可耻的而已。例如，一个怨声不断的吝啬鬼甚至会极力赞美他人的勤勉和节俭，相比于其他所有的德性，他对勤勉和节俭有更高的评价。他知道这两种德性带给他的利益，并以一种比你们所能向他描述出的同情更为强烈的同情感受着这种幸福，尽管他或许连一个先令都不会拿出来帮助他如此高度赞美的那个勤俭之人发财致富。

[8_2].《斐多篇》。

[8_3].《历史》，第十七卷，第三十五章。

[8_4].其中包括天赋、理性、记忆力、教养、专注、沉思、勤奋等。《腓力》，2。

[8_5].“与灵敏者比跳，与迅捷者赛跑，与强壮者公平角力。”韦格提乌斯引自萨卢斯特。

[8_6].西西里人狄奥多罗斯，《历史文库》，第十五卷。像这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为了展现这些时代盛行的完美价值观念，给出伊巴密浓达的性格，可能并不恰当。这位历史学家说，在其他杰出人物的身上，你们会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某一种构成其名誉之根基的闪光品质；而在伊巴密浓达的身上，你们会发现所有德性都集于一身，从身体的力量、口才的雄辩、思维的活跃、对钱财的轻蔑和性情的温和，到他尤为令人尊重的德性——英勇善战。

[8_7].所有的人都同等地容易遭受疼痛、疾病和不适，也都可以同等地恢复健康和重享安适。由于这些因素不会区分人的不同，因此，它们并不是骄傲和谦卑、尊重和轻蔑的根源。但如果我们将人类与更高级的物种做比较，想到我们人类全都是如此地体弱多病，便会深感羞愧，而神学家们则借此话题抑制人类的自负和虚荣。如果我们人类思想的一般倾向不是总要把我们自己与其他物种做比较的话，他们或许会更成功。

[8_8].当我们考虑他人的财富和境况时，在我们的激情的运作中会出现某种似乎无法解释的不同寻常的东西。另一个人的进步和成功常常引发妒忌，这种混杂着强烈的憎恨的妒忌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将我们自己与那人做了比较。但与此同时，抑或至少是在极短的间隔内，我们又会萌发尊敬之情，而尊敬则是一种混杂了谦卑的喜爱和善意。另一方面，我们同胞的不幸常常引发的是混杂着强烈善意的悲悯。这种悲悯的情感与轻蔑颇有关联，而后者则是一种混杂着骄傲的嫌恶。我举出这些现象只是为了向那些对道德探究感兴趣的人提出一个思辨的论题。因为，就目前的讨论而言，我们只需在总体上看到权势和钱财通常引发的是尊敬，贫穷和悭吝通常引发的是轻蔑即可，尽管特定的景象和事件有时可能会引起妒忌和悲悯之情。

SECTION 7 OF QUALITIES IMMEDIATELY AGREEABLE TO OURSELVES

第七章　论直接令我们自己愉快的品质

Whoever has passed an evening with serious melancholy people, and has observed how suddenly the conversation was animated, and what sprightliness diffused itself over the countenance, discourse, and behaviour of every one, on the accession of a good-humoured, lively companion; such a one will easily allow that cheerfulness carries great merit with it, and naturally conciliates the good-will of mankind. No quality, indeed, more readily communicates itself to all around; because no one has a greater propensity to display itself, in jovial talk and pleasant entertainment. The flame spreads through the whole circle; and the most sullen and morose are often caught by it. That the melancholy hate the merry, even though Horace says it, I have some difficulty to allow; because I have always observed that, where the jollity is moderate and decent, serious people are so much the more delighted, as it dissipates the gloom with which they are commonly oppressed, and gives them an unusual enjoyment.

无论是谁，与严肃、抑郁的人一起度过一个夜晚之后，看到一个幽默、活泼的伙伴的到来一下子使得谈话活跃起来，每个人都神采熠熠、言语活泼、举止轻快；那这个人无疑会承认，欢喜拥有巨大的价值，自然赢得人们的好感。实际上，没有什么品质会比欢喜更容易将其自身传达给周围所有的人了；因为在愉快的谈话和惬意的消遣中，没有什么品质具有更大的展示其自身的倾向。它的光芒照耀遍整个交际圈，最沉闷和阴郁的人也常常为之感化。尽管贺拉斯说，抑郁的人

讨厌欢乐的人，对此我却难以苟同；因为我总是观察到：严肃的人在乐趣适度和合宜时更感高兴，因为它驱散了通常压抑他们的阴郁，给予他们一种不同平常的愉悦。

From this influence of cheerfulness, both to communicate itself and to engage approbation, we may perceive that there is another set of mental qualities, which, without any utility or any tendency to farther good, either of the community or of the possessor, diffuse a satisfaction on the beholders, and procure friendship and regard. Their immediate sensation, to the person possessed of them, is agreeable. Others enter into the same humour, and catch the sentiment, by a contagion or natural sympathy; and as we cannot forbear loving whatever pleases, a kindly emotion arises towards the person who communicates so much satisfaction. He is a more animating spectacle; his presence diffuses over us more serene complacency and enjoyment; our imagination, entering into his feelings and disposition, is affected in a more agreeable manner than if a melancholy, dejected, sullen, anxious temper were presented to us. Hence the affection and approbation which attend the former; the aversion and disgust with which we regard the latter. [8_1]

从欢喜在传达其自身和赢得赞许两方面的影响力来看，我们可以感知到，还有另外一系列的心理品质，它们毋需对社会或拥有者产生任何效用或任何更大利益的趋向，就给予旁观者以一种满足感，并赢得他们的友爱和关注。对于拥有这些品质的人，他们的直接感受是愉快的。而他人，则通过感染或自然的同情而进入这一心境，领略这种情感；由于我们禁不住热爱使人快乐的一切，因而对于那个传达如此巨大满足感的人就油然而生起好感来。与面对一个性情抑郁、沮丧、沉闷和焦虑的人相比，他更像是一个激发我们活力的奇观，他的在场

使我们获得更多宁静的满足感，并给予我们享受，进入到他的感情和气质中，我们的想象力会受到更愉悦的感染。因此，伴随前者的是好感和赞许；对后者的则是厌恶和反感 [9_1] 。

Few men would envy the character which Caesar gives of Cassius:

很少有人会嫉妒凯撒所描绘的卡西乌斯的性格：

> He loves no play, As thou do'st, Anthony: He hears no music: Seldom he smiles; and smiles in such a sort, As if he mock'd himself, and scorn'd his spirit That could be mov'd to smile at any thing.

> “他从不喜欢娱乐，正如你安东尼；他从不听音乐；他难得露出微笑，笑容却又那般仿佛在嘲笑自己，嘲笑自己那可以驱动来讥笑一切的心灵。”

Not only such men, as Caesar adds, are commonly DANGEROUS, but also, having little enjoyment within themselves, they can never become agreeable to others, or contribute to social entertainment. In all polite nations and ages, a relish for pleasure, if accompanied with temperance and decency, is esteemed a considerable merit, even in the greatest men; and becomes still more requisite in those of inferior rank and character. It is an agreeable representation, which a French writer gives of the situation of his own mind in this particular, VIRTUE I LOVE, says

he, WITHOUT AUSTERITY: PLEASURE WITHOUT EFFEMINACY: AND LIFE, WITHOUT FEARING ITS END. [8_2]

如凯撒补充道的那样：这样的人不但通常是危险的，而且他们内心几乎没有什么欢乐，他们永远不能变得令他人愉快，或有助于社交性的娱乐。在一切礼仪之邦和讲求礼仪的时代，拥有享乐的喜好，但懂得节制和礼仪，那这种喜好在那些最伟大人物身上甚至也会被尊崇为一种相当重要的价值，而在那些等级低下、身份卑微的人身上，就变得更加不可或缺。一位法国作家曾经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作过如下这一令人愉悦的描述："我爱不严厉的德性，我爱不娇纵的娱乐，我爱不惧终结的人生。" [9_2]

Who is not struck with any signal instance of greatness of mind or dignity of character; with elevation of sentiment, disdain of slavery, and with that noble pride and spirit, which arises from conscious virtue? The sublime, says Longinus, is often nothing but the echo or image of magnanimity; and where this quality appears in any one, even though a syllable be not uttered, it excites our applause and admiration; as may be observed of the famous silence of Ajax in the Odyssey, which expresses more noble disdain and resolute indignation than any language can convey. [8_3]

对于有关伟大心灵或高贵性格的任何卓越的事例，对于情感的升华，对于奴役的轻蔑，对于源于德性自觉的那种高贵骄傲和气魄，谁能不受到震撼呢？朗吉努斯说，崇高不外乎是恢宏大度的回声或是影像；即使一言不发，这种品质在任何人身上显现出来，也能激起我们的赞赏和钦敬；这在《奥德赛》中埃阿斯著名的沉默里可以看到，他的沉默表达了任何语言都不能传达的更高贵的轻蔑和更决然的愤慨 [9_3] 。

WERE I Alexander, said Parmenio, I WOULD ACCEPT OF THESE OFFERS MADE BY DARIUS. SO WOULD I TOO, replied Alexander, WERE I PARMENIO. This saying is admirable, says Longinus, from a like principle. [8_4]

帕曼纽说："如我是亚历山大，我将接受大流士的这些提议。"亚历山大回答："如我是帕曼纽，我也如此。"朗吉努斯说，根据一条类似的原则，这样说是值得钦佩的 [9_4] 。

GO! cries the same hero to his soldiers, when they refused to follow him to the Indies, GO TELL YOUR COUNTRYMEN, THAT YOU LEFT Alexander COMPLETING THE CONQUEST OF THE WORLD. 'Alexander,' said the Prince of Conde, who always admired this passage, 'abandoned by his soldiers, among barbarians, not yet fully subdued, felt in himself such a dignity and right of empire, that he could not believe it possible that any one would refuse to obey him. Whether in Europe or in Asia, among Greeks or Persians, all was indifferent to him: Wherever he found men, he fancied he should find subjects.'

当士兵拒绝跟从亚历山大远征西印度群岛时，这位英雄对他们大声说："去吧！去告诉你们的同胞，你们离开了正在完成征服世界任务的亚历山大。"孔代亲王对于这段话钦敬不已，他说："亚历山大被部卒所抛弃，身处尚未完全臣服的蛮邦，自己内心却有着这样一种帝王的尊严感和权力感，以至于不会相信任何人会拒绝服从他。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不论身处在希腊人或在波斯人之中，一切对他都没有什么两样：不论他在哪里找到人，他就认为他找到了臣民。"

The confident of Medea in the tragedy recommends caution and submission; and enumerating all the distresses of that unfortunate heroine, asks her, what she has to support her against her numerous and implacable enemies. MYSELF, replies she; MYSELF I SAY, AND IT IS ENOUGH. Boileau justly recommends this passage as an instance of true sublime [8_5] .

悲剧中美狄亚的知心人建议她保持谨慎和顺从；并在列举了这位不幸的女主人公所有危难后问她，她凭什么来对抗为数众多、无法平息的敌人。“我自己，”她回答说，“我说就是我自己，这就足够了。”布瓦洛就把这段话推崇为一个真正崇高的事例 [9_5] 。

When Phocion, the modest, the gentle Phocion, was led to execution, he turned to one of his fellow-sufferers, who was lamenting his own hard fate, IS IT NOT GLORY ENOUGH FOR YOU, says he, THAT YOU DIE WITH PHOCION? [8_6]

当福基翁，谦逊而和蔼的福基翁，被带往刑场时，他转向一个正哀叹自己命运多舛的难友说：“你和福基翁一同受难，难道不是你莫大的光荣吗？” [9_6]

Place in opposition the picture which Tacitus draws of Vitellius, fallen from empire, prolonging his ignominy from a wretched love of life, delivered over to the merciless rabble; tossed, buffeted, and kicked about; constrained, by their holding a poniard under his chin, to raise his head, and expose himself to every contumely. What abject infamy! What low humiliation! Yet even here, says the historian, he discovered some symptoms of a mind

not wholly degenerate. To a tribune, who insulted him, he replied, I AM STILL YOUR EMPEROR. [8_7]

相反，塔西佗描绘了维特里乌斯失去帝位，因可怜的贪生而使自己受到更大的侮辱，他被交到冷酷无情的暴民手中；被拖拽、殴打、踢踹；被刀尖抵颌的时候，他被迫抬起头来，使自己受尽侮辱！何等凄惨的侮辱！何等卑贱的蒙羞！即便如此，仍有历史学家说他发现了维特里乌斯的心灵尚未完全堕落的某些征兆。面对一个侮辱他的护民官，他回答道："我依然是你的君主。" [9_7]

We never excuse the absolute want of spirit and dignity of character, or a proper sense of what is due to one's self, in society and the common intercourse of life. This vice constitutes what we properly call MEANNESS; when a man can submit to the basest slavery, in order to gain his ends; fawn upon those who abuse him; and degrade himself by intimacies and familiarities with undeserving inferiors. A certain degree of generous pride or self-value is so requisite, that the absence of it in the mind displeases, after the same manner as the want of a nose, eye, or any of the most material features of the face or members of the body. [8_8]

我们从不容许一个人的性格中完全缺乏气魄和尊严，亦即人们在社会和日常的普遍交往中对属于自我的某种东西的一种恰当的意识。当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屈从于最低贱的奴役，巴结那些凌辱他的人，亲近那些不值得交往的低贱之辈而贬低自己，这样的恶行构成了我们通常称谓的卑贱。一定程度的慷慨的骄傲或是自重不可或缺，以至于人的灵魂中没有它就会使其感到不悦，如同脸部没有鼻子、眼睛或任何最关键的部分，或身体没有任何最关键的肢体部分一样 [9_8] 。

The utility of courage, both to the public and to the person possessed of it, is an obvious foundation of merit. But to any one who duly considers of the matter, it will appear that this quality has a peculiar lustre, which it derives wholly from itself, and from that noble elevation inseparable from it. Its figure, drawn by painters and by poets, displays, in each feature, a sublimity and daring confidence; which catches the eye, engages the affections, and diffuses, by sympathy, a like sublimity of sentiment over every spectator.

对于公众和拥有它的个人而言，勇敢的效用显然是其价值的基础。但对于任何恰当考量这项事宜的人，这种品质似乎别有一种特别的光辉，这种光辉完全来自它自身，来自与其自身密不可分的那种高贵的升华。在画家和诗人的笔下，它的形象的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庄严和无畏的自信，从而吸引关注，博得同情，并通过同情而将一种类似的庄严感传播给每一位观者。

Under what shining colours does Demosthenes [8_9] represent Philip; where the orator apologizes for his own administration, and justifies that pertinacious love of liberty, with which he had inspired the Athenians. 'I beheld Philip,' says he, 'he with whom was your contest, resolutely, while in pursuit of empire and dominion, exposing himself to every wound; his eye gored, his neck wrested, his arm, his thigh pierced, whatever part of his body fortune should seize on, that cheerfully relinquishing; provided that, with what remained, he might live in honour and renown. And shall it be said that he, born in Pella, a place heretofore mean and ignoble, should be inspired with so high an ambition and thirst of fame: While you, Athenians, etc.' These praises excite the most lively admiration; but

the views presented by the orator, carry us not, we see, beyond the hero himself, nor ever regard the future advantageous consequences of his valour.

当德摩斯梯尼 [9_9] 这位演讲者为自己的执政辩解，当他为曾经激励雅典人对自由的坚贞的爱而辩护时，他是在用何等绚丽的色彩描绘腓力啊！他说："我注视着腓力，这个你们与之持久斗争过的人，在对帝国和版图的追求中，他承受了一切创伤；他的眼睛被划破了，脖子扭伤了，胳膊、大腿被刺穿了，无论命运想要攫取他身体的哪个部分，他都甘愿舍弃；只要凭借保留下来的身体，他可以拥有荣誉和名望继续活着。也许有人会说：他出生于佩拉这样一个从前卑微低贱的地方，理应被如此高度的野心和对名誉的渴望激励着：而你们雅典人，则如何如何。"这些赞美激起我们最狂热的崇敬，但是我们看到，这位演说家所描绘的景象并没有将我们提升到这位英雄本人之上，也决没有关注他的英勇后来产生的有益后果。

The martial temper of the Romans, inflamed by continual wars, had raised their esteem of courage so high, that, in their language, it was called VIRTUE, by way of excellence and of distinction from all other moral qualities. THE Suevi, in the opinion of Tacitus, tus, [8_10] DRESSED THEIR HAIR WITH A LAUDIBLE INTENT: NOT FOR THE PURPOSE OF LOVING OR BEING LOVES; THEY DORNED THEMSELVES ONLY FOR THEIR ENEMIES, AND IN ORDER TO APPEAR MORE TERRIBLE. A sentiment of the historian, which would sound a little odd in other nations and other ages.

在连续加剧的战争的影响下，罗马人好战的禀性把他们对勇敢的敬重提升到如此高度，以致他们在语言中，由于勇敢相对其他一切道德品质具有的那种优越性和卓越性，而将其称为德性。按照塔西佗的

观点 [9_10] ，“苏维汇人人怀着一种值得称道的意图装扮他们的头发；目的不是为了爱和被爱，只是为了对付敌人，为了看上去更加恐怖。”这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这种情感，对于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来说，可能听起来颇为古怪。

The Scythians, according to Herodotus, [8_11] after scalping their enemies, dressed the skin like leather, and used it as a towel; and whoever had the most of those towels was most esteemed among them. So much had martial bravery, in that nation, as well as in many others, destroyed the sentiments of humanity; a virtue surely much more useful and engaging.

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 [9_11] ，西塞亚人把敌人剥剐之后把他们的皮肤像皮革一样穿戴、像手巾一样使用，谁拥有这种手巾最多，谁就最受敬重。在那个民族，像在许多其他民族一样，对英勇善战的过分崇尚毁灭了人道的情感，这一肯定更有用和更迷人的德性。

It is indeed observable, that, among all uncultivated nations, who have not as yet had full experience of the advantages attending beneficence, justice, and the social virtues, courage is the predominant excellence; what is most celebrated by poets, recommended by parents and instructors, and admired by the public in general. The ethics of Homer are, in this particular,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Fenelon, his elegant imitator; and such as were well suited to an age, when one hero, as remarked by Thucydides (Lib.i.), could ask another, without offence, whether he were a robber or not. Such also very lately was the system of ethics which prevailed in many barbarous parts of Ireland; if we may credit Spencer, in his judicious account of the state of that kingdom.

[8_12]

实际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一切迄今尚未充分体验到仁爱、正义以及各种社会德性所带来的益处的未开化的民族中，勇敢是最卓越的品质，它也是一种最为诗人们所讴歌、最受父母和导师们推崇、通常也是最被公众所钦敬的品质。从这个方面来讲，荷马的道德准则与其卓越的模仿者费奈隆的道德准则大相径庭；它们十分适合于那个时代，正如修昔底德所说，当时即便一个英雄问另一个英雄是否是强盗，都不至于冒犯他。如果我们认可斯宾塞对那个王国的情况所作的审慎说明的话，这也正是近来爱尔兰许多野蛮地区所盛行的那套道德准则 [9_12] 。

Of the same class of virtues with courage is that undisturbed philosophical tranquillity, superior to pain, sorrow, anxiety, and each assault of adverse fortune. Conscious of his own virtue, say the philosophers, the sage elevates himself above every accident of life; and securely placed in the temple of wisdom, looks down on inferior mortals engaged in pursuit of honours, riches, reputation, and every frivolous enjoyment. These pretensions, no doubt, when stretched to the utmost, are by far too magnificent for human nature. They carry, however, a grandeur with them, which seizes the spectator, and strikes him with admiration. And the nearer we can approach in practice to this sublime tranquillity and indifference (for we must distinguish it from a stupid insensibility), the more secure enjoyment shall we attain within ourselves, and the more greatness of mind shall we discover to the world. The philosophical tranquillity may, indeed, be considered only as a branch of magnanimity.

与勇敢同属一类德性的是那种泰然自若的哲学的宁静，它超越了痛苦、悲伤、焦虑以及各种时运不济。哲学家们说，智者觉察到自己的德性，使自己超然于人生的一切偶然之上；稳居于智慧的圣殿之中，俯视下界那些忙忙碌碌地追逐着荣誉、财富、名望以及各种无谓享受的凡夫俗子们。毫无疑问，当这些自负的主张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时，他们对于人类本性而言就过于冠冕堂皇而不适用了。然而，它们带有一种吸引旁观者、并激发其崇敬之情的庄严。我们在实践中愈贴近这种崇高的宁静和淡泊（因为我们必须把它和愚蠢的麻木区别开来），我们内心获得的享受就愈可靠，我们就将发现心灵比世界更伟大。其实，这种哲学的宁静只能看作是恢宏大度的一个分支。

Who admires not Socrates; his perpetual serenity and contentment, amidst the greatest poverty and domestic vexations; his resolute contempt of riches, and his magnanimous care of preserving liberty, while he refused all assistance from his friends and disciples, and avoided even the dependence of an obligation? Epictetus had not so much as a door to his little house or hovel; and therefore, soon lost his iron lamp, the only furniture which he had worth taking. But resolving to disappoint all robbers for the future, he supplied its place with an earthen lamp, of which he very peaceably kept possession ever after.

谁不钦佩苏格拉底，不钦佩他处在赤贫和家庭烦恼之中却保持始终如一的平静和满足，不钦佩他拒绝朋友和门徒的一切帮助、乃至避免依赖任何恩惠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对财富的断然蔑视和对保持自由的慷慨关怀？爱比克泰德的陋室或者说茅屋甚至连一扇门都没有，故而他不久便丢失了铁灯，那唯一值得拿走的家什。而他决意让以后的一切盗贼失望，在住所内装上一盏陶灯，此后他一直太平地保有这盏灯。

Among the ancients, the heroes in philosophy, as well as those in war and patriotism, have a grandeur and force of sentiment, which astonishes our narrow souls, and is rashly rejected as extravagant and supernatural. They, in their turn, I allow, would have had equal reason to consider as romantic and incredible, the degree of humanity, clemency, order, tranquillity, and other social virtues, to which,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government, we have attained in modern times, had any one been then able to have made a fair representation of them. Such is the compensation, which nature, or rather education, has mad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excellencies and virtues, in those different ages.

古代人中的哲学英雄也像战争英雄和爱国英雄一样，情感上庄严而有力，而这使我们狭隘的心灵为之震惊，认为其不切实际且超自然因而将其轻易抛弃。我认为，他们反过来也将有同样的理由把仁慈、宽大、秩序、安定等我们在现代政府管理中所获得的各种社会德性，看作富于浪漫色彩且不可思议的，如果当时有人能对这些社会德性做出清楚描绘的话。这是大自然，或更确切地说是教育，在那些不同的时代，传播各种美德和德性时所作出的补偿。

The merit of benevolence, arising from its utility, and its tendency to promote the good of mankind has been already explained, and is, no doubt, the source of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at esteem, which is so universally paid to it. But it will also be allowed, that the very softness and tenderness of the sentiment, its engaging endearments, its fond expressions, its delicate attentions, and all that flow of mutual confidence and regard, which enters into a warm attachment of love and friendship: It will be allowed, I say, that these feelings, being delightful in themselves, are necessarily communicated to the spectators, and melt them into the

same fondness and delicacy. The tear naturally starts in our eye on the apprehension of a warm sentiment of this nature: Our breast heaves, our heart is agitated, and every humane tender principle of our frame is set in motion, and gives us the purest and most satisfactory enjoyment.

仁爱，来源于其效用和促进人类利益的趋向，其价值已经得到了解释，而且毫无疑问，这份价值是人们对仁爱表示如此普遍的敬重的重要原因。但是人们也要承认，情感的温柔和体贴，它迷人的亲切、柔情的表达、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所有在爱和友谊方面发挥作用的相互信赖和尊重之情的流露，我认为，人们将承认，这些情感在令他们自己愉悦的同时，必然被传达给旁观者，将他们融化在同样的温情和体贴中。当领悟这类热烈的情感时，我们自然会热泪盈眶，胸膛起伏、心潮澎湃，我们本性结构中的每一根仁慈的温柔之弦都被拨动，给我们带来最纯净、最满足的享受。

When poets form descriptions of Elysian fields, where the blessed inhabitants stand in no need of each other's assistance, they yet represent them as maintaining a constant intercourse of love and friendship, and sooth our fancy with the pleasing image of these soft and gentle passions. The idea of tender tranquillity in a pastoral Arcadia is agreeable from a like principle, as has been observed above. [8_13]

诗人们在对天堂乐土进行描述时，虽然认为那些受庇佑的居民无需相互帮助就可以存在，却仍将他们描绘为保持着持久的爱和友谊交往的人，借助这些柔和优雅的激情的令人愉快的意象来抚慰我们的想象力。根据一条相似的原则，关于田园牧歌式的阿卡迪亚的温柔宁静的观念是令人愉快的，这在前面已经有所说明 [9_13] 。

Who would live amidst perpetual wrangling, and scolding, and mutual reproaches? The roughness and harshness of these emotions disturb and displease us: We suffer by contagion and sympathy; nor can we remain indifferent spectators, even though certain that no pernicious consequences would ever follow from such angry passions.

有谁愿意生活在无尽无休的争吵、辱骂和相互指责之中吗？这些情绪的粗暴和尖刻干扰并刺伤了我们；由于情绪传染和同情，我们承受着痛苦；即使可以确信这种愤怒的激情决不会带来任何有害的后果，我们也不能继续作漠然中立的旁观者。

As a certain proof that the whole merit of benevolence is not derived from its usefulness, we may observe, that in a kind way of blame, we say, a person is TOO GOOD; when he exceeds his part in society, and carries his attention for others beyond the proper bounds. In like manner, we say, a man is too HIGH-SPIRITED, TOO INTREPID, TOO INDIFFERENT ABOUT FORTUNE: Reproaches, which really, at bottom, imply more esteem than many panegyrics. Being accustomed to rating the merit and demerit of characters chiefly by their useful or pernicious tendencies, we cannot forbear applying the epithet of blame, when we discover a sentiment, which rises to a degree, that is hurtful; but it may happen,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s noble elevation, or its engaging tenderness so seizes the heart, as rather to increase our friendship and concern for the person. [8_14]

作为仁爱的全部价值并非来源于其有用性的一个确凿证据，我们

可以观察到，一种亲切的谴责方式，即当一个人超出他的社会职责，去关心他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他人时，我们就说他太善良了。同样，我们说一个人太有气概、太无畏、太漠视命运；这些责备实质上比许多颂扬包含更多的敬重。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于按照性格有用和有害的趋向来评判它们的价值和过失，因此，当我们发现一种情感达到有害的程度时，我们就禁不住使用谴责的言辞；但是同时这样的情形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感的高贵升华或迷人温柔是那样的动人心弦，以至于我们反而会对那个人更加友善和关心 [9_14] 。

The amours and attachments of Harry the IVth of France, during the civil wars of the league, frequently hurt his interest and his cause; but all the young, at least, and amorous, who can sympathize with the tender passions, will allow that this very weakness, for they will readily call it such, chiefly endears that hero, and interests them in his fortunes.

联盟内战期间，法兰西亨利四世的恋情经常伤及他的利益和事业；但是至少所有能对这种温柔的激情产生共鸣的年轻人和多情者都将承认，正是这个弱点，他们将如此欣然称之，使他们喜爱上了这位英雄，并对他的命运产生了兴趣。

The excessive bravery and resolute inflexibility of Charles the XIIth ruined his own country, and infested all his neighbours; but have such splendour and greatness in their appearance, as strikes us with admiration; and they might, in some degree, be even approved of, if they betrayed not sometimes too evident symptoms of madness and disorder.

查理十二世的过度英勇和刚毅不屈毁灭了他的社稷，也侵扰了他的众邻；但其表面上却呈现出那样的壮美和伟大，以至于激起我们的崇敬；而且如果不是它们有时表现出过于明显的疯狂和无序的征象，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甚至可能获得我们的赞赏。

The Athenians pretended to the first invention of agriculture and of laws: and always valued themselves extremely on the benefit thereby procured to the whole race of mankind. They also boasted, and with reason, of their warlike enterprises; particularly against those innumerable fleets and armies of Persians, which invaded Greece during the reigns of Darius and Xerxes. But though there be no comparison in point of utility, between these peaceful and military honours; yet we find, that the orators, who have writ such elaborate panegyrics on that famous city, have chiefly triumphed in displaying the warlike achievements. Lysias, Thucydides, Plato, and Isocrates discover, all of them, the same partiality; which, though condemned by calm reason and reflection, appears so natural in the mind of man.

雅典人声称最先发明了农业、创制了法律，而且总是以由此带给整个人类的利益而尊崇自己。他们也会理直气壮地将自己发起的战争自夸为业绩，尤其是自夸他们在大流士和薛西斯统治期间入侵希腊的那些不计其数的波斯战舰和军队战争。尽管就效用而论，和平和战争的荣誉之间无法比较，然而我们发现，为这座名城写下精美讼辞的演说家们主要都是以展示其战争成就而获得成功。吕西阿斯、修昔底德、柏拉图、伊索克拉底，他们全都有着同样的偏好，尽管这种偏好受到平静的推理和反思的谴责，然而在人类心灵看来，它却是那样自然。

It is observable, that the great charm of poetry consists in lively pictures of the sublime passions, magnanimity, courage, disdain of fortune; or those of the tender affections, love and friendship; which warm the heart, and diffuse over it similar sentiments and emotions. And though all kinds of passion, even the most disagreeable, such as grief and anger, are observed, when excited by poetry, to convey a satisfaction, from a mechanism of nature, not easy to be explained: Yet those more elevated or softer affections have a peculiar influence, and please from more than one cause or principle. Not to mention that they alone interest us in the fortune of the persons represented, or communicate any esteem and affection for their character.

可以观察到，诗歌的巨大魅力在于生动描绘了诸如宽宏大度、英勇无畏、藐视命运之类的崇高激情和诸如爱、友谊之类的温柔感情；它们温暖了人心，使之充溢着同样的情感和情绪。可以看到，各种激情，甚至诸如悲伤和愤怒等最令人不快的情感，当被诗歌激发出来时，都传达出一种满足感。尽管这种满足感产生于一种自然的心理机制，不容易得到解释。然而，那些更崇高或温柔的感情却有一种特殊的影响力，并由于一个以上的原因或原则而使人快乐。更不用说，只有它们才能激发出我们对于所描写人物命运的兴趣，或传达对这些人物性格的任何尊敬和喜爱了。

And can it possibly be doubted, that this talent itself of poets, to move the passions, this pathetic and sublime of sentiment, is a very considerable merit; and being enhanced by its extreme rarity, may exalt the person possessed of it, above every character of the age in which he lives? The prudence, address, steadiness, and benign government of Augustus, adorned with all the splendour of his noble birth and imperial crown, render him but an unequal

competitor for fame with Virgil, who lays nothing into the opposite scale but the divine beauties of his poetical genius.

难道可以怀疑，诗人的这种激发激情的才赋，这种哀婉且崇高的情感，本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吗？而且由于这种才赋极端罕有，可以将其拥有者提升至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一切人物之上吗？奥古斯都的谨慎、机智、稳重和仁政，在其高贵出身和至尊皇冠的光环下，使得他与维吉尔在名望上成为不平等的竞争者，后者除了诗歌天赋的神性之美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充当与之相抗衡的砝码。

The very sensibility to these beauties, or a delicacy of taste, is itself a beauty in any character; as conveying the purest, the most durable, and most innocent of all enjoyments.

正是这些神性之美的感受性，或者说是趣味的精致性，其本身在任何性格中都是一种美；因为它传达出一切享受中最纯净、最持久和最无害的部分。

These are some instances of the several species of merit, that are valued for the immediate pleasure, which they communicate to the person possessed of them. No views of utility or of future beneficial consequences enter into this sentiment of approbation; yet is it of a kind similar to that other sentiment, which arises from views of a public or private utility. The same social sympathy, we may observe, or fellow-feeling with human happiness or misery, gives rise to both; and this analogy, in all the parts of the present theory, may justly be regarded as a confirmation of it.

以上事例说明，某些种类的价值之所以被珍视，是因为它们传达给拥有者直接的快乐。效用的观点或未来有益后果的观点并没有进入这种赞许的情感中；然而这种赞许之情却与由公众或私人效用的观点所产生的另一种情感属于相似的类型。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情感都产生于相同的社会同情，即对人类的幸福或苦难的同胞感；这种类比，在目前理论的所有部分中，都可以被恰当地视为对社会同情的一种确认。

[8_1].There is no man, who, on particular occasions, is not affected with all the disagreeable passions, fear, anger, dejection, grief, melancholy, anxiety, &c. But these, so far as they are natural, and universal, make no difference between one man and another, and can never be the object of blame. It is only when the disposition gives a PROPENSITY to any of these disagreeable passions, that they disfigure the character, and by giving uneasiness, convey the sentiment of disapprobation to the spectator.

[8_2].'J'aime la vertu, sans rudesse; J'aime le plaisir, sans molesse; J'aime la vie, et n'en crains point la fin.'-ST. EVREMONT.

[8_3].Cap. 9.

[8_4].Idem.

[8_5].Reflexion 10 sur Longin.

[8_6].Plutarch in Phoc.

[8_7].Tacit. hist. lib. iii. The author entering upon the narration, says, LANIATA VESTE, FOEDUM SPECACULUM DUCEBATUR, MULTIS INCREPANTIBUS, NULLO INLACRIMANTE: deformatitas exitus misericordiam abstulerat. To enter thoroughly into this method of thinking, we must make allowance for the ancient maxims, that no one ought to prolong his life after it became dishonourable; but, as he had always a right to dispose of it, it then became a duty to part with it.

[8_8].The absence of virtue may often be a vice; and that of the highest kind; as in the instance of ingratitude, as well as meanness. Where we expect a beauty, the disappointment gives an uneasy sensation, and produces a real deformity. An abjectness of character, likewise, is disgustful and contemptible in another view.

Where a man has no sense of value in himself, we are not likely to have any higher esteem of him. And if the same person, who crouches to his superiors, is insolent to his inferiors (as often happens), this contrariety of behaviour, instead of correcting the former vice, aggravates it extremely by the addition of a vice still more odious. See Sect.8.

[8_9].De Corona.

[8_10].De moribus Germ.

[8_11].Lib. iv.

[8_12].Footnote from Spencer: It is a common use, says he, amongst their gentlemen's sons, that, as soon as they are able to use their weapons, they strait gather to themselves three or four stragglers or kern, with whom wandering a while up and down idly the country, taking only meat, he at last falleth into some bad occasion, that shall be offered; which being once made known, he is thenceforth counted a man of worth, in whom there is courage.

[8_13].Sect. 5. Part 2.

[8_14].Cheerfulness could scarce admit of blame from its excess, were it not that dissolute mirth, without a proper cause or subject, is a sure symptom and characteristic of folly, and on that account disgustful.

[9_1].没有人在任何特定场合都不受令人不快的激情影响，如恐惧、愤怒、沮丧、悲痛、抑郁、焦虑等。但这些激情，鉴于它们的自然性和普遍性，并没有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任何差异，因而也绝不能成为谴责的对象。只有当人对任何这类令人不快的激情产生癖好的倾向时，它们才有损于性格形象，并因产生不快而传达给观者一种责难的情感。

[9_2].法语原文为：J'aime la vertu, sans rudesse; J'aime le plaisir, sans molesse; J'aime la vie, et n'en crains point la fin.'，作者为圣埃弗雷蒙。

[9_3].《论崇高》，第九章。

[9_4].同上。

[9_5].关于朗吉努斯的反思之十。

[9_6].普鲁塔克：《福基翁传》。

[9_7].塔西佗：《历史》，第三卷。作者着手叙述时说，面对撕破的衣衫，拽拖的惨状，众人的诅骂，没有人感到悲伤落泪；他最后一幕的丑恶表现已使人们无法对他产生怜悯之情。为了完全进入这种思维方法，我们必须考虑古代的准则，即一个人不应当在其生命失去荣誉时还延续它；但由于他总具有处置生命的自主权，于是放弃它就变成一项义务。

[9_8].德性的缺乏经常可能就是一种恶性，而且是那种最严重的恶行，正如在忘恩负义和卑贱的事例中一样。当我们期望一种美时，失望会引起不快的感觉，并产生一种确实的丑。同样，另换一种视角看，性格的卑劣就是可恶和卑劣的。如果一个人感觉不到自身的什么价值，我们也不可能对他有任何更高的敬重。此外，如果一个人，向其上位者卑躬屈膝，对其下位者无礼傲慢（这是常常发生的情况），这种相反的行为，前者的过错非但不能得以纠正，反而因为滋生了更大的恶而被极大地恶化了。见第八章。

[9_9].《论桂冠》。

[9_10].《论日耳曼的风俗》。

[9_11].希罗多德：《历史》，第四卷。

[9_12].他说，在他们那些绅士们的公子当中，一种通常做法是，只要他们能够使用武器，就招募三四个散兵游勇，同他们一起到乡间到处游荡，只带肉食，最终他定会陷入某种困境，经过付出努力才能摆脱出来；这件事一旦被人们得知，他从此就算是一个有价值、有胆量的人。

[9_13].第五章，第二节。

[9_14].如果不是那种无缘无故、漫无节制的愉乐的话，欢喜几乎不可能因为其过度而招致谴责；那种无缘无故、漫无节制的愉乐必定是愚蠢的征象和特征，并因此令人讨厌。

SECTION 8 OF QUALITIES IMMEDIATELY AGREEABLE TO OTHERS

第八章　论直接令他人愉快的品质

As the mutual shocks, in SOCIETY, and the oppositions of interest and self-love have constrained mankind to establish the laws of JUSTICE,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advantages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protection: In like manner, the eternal contrarieties, in COMPANY, of men's pride and self-conceit, have introduced the rules of GOOD MANNERS or POLITENES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intercourse of minds, and an undisturbed commerce and conversation. Among well-bred people, a mutual deference is affected; contempt of others disguised; authority concealed; attention given to each in his turn; and an easy stream of conversation maintained, without vehemence, without interruption, without eagerness for victory, and without any airs of superiority. These attentions and regards are immediately AGREEABLE to others, abstracted from any consideration of utility or beneficial tendencies: They conciliate affection, promote esteem, and extremely enhance the merit of the person who regulates his behaviour by them. [9_1]

在社会中，各种相互冲突以及利益和自爱方面的相互对立迫使人类确立了正义的种种法则，以便保持相互扶助和保护的优势；同样，在社交中，人们的骄傲和自负引起的接连不断的矛盾也导致了礼貌或礼仪规范的产生，以便于促进心灵的交流，同时使得交往和谈话免受影响。素有教养的人们会装作相互尊敬，掩饰对他人的轻视，隐藏起自己的权威，将注意力轮流给予每一个人，保持轻松自如的交谈，没

有激动，没有打断，没有对占据上风的渴望，也没有高人一等的傲气。这些关注和尊重是直接令他人愉快的，与其效用或有益趋向无关；它们博得好感，赢得尊敬，极度地放大了以此规范自己行为之人的价值。[10_1]

Many of the forms of breeding are arbitrary and casual, but the thing expressed by them is still the same. A Spaniard goes out of his own house before his guest, to signify that he leaves him master of all. In other countries, the landlord walks out last, as a common mark of deference and regard.

教养的许多形式是任意的和偶然的，但是不同形式表达的意义却仍然是一致的。西班牙人送客时会先于客人走出自己的房屋，以示一切以客人为主。在其他国家，表示敬意和尊重的通常作法是主人最后出来。

But, in order to render a man perfect GOOD COMPANY, he must have Wit and Ingenuity as well as good manners. What wit is, it may not be easy to define; but it is easy surely to determine that it is a quality immediately AGREEABLE to others, and communicating, on its first appearance, a lively joy and satisfaction to every one who has any comprehension of it. The most profound metaphysics, indeed, might be employed in explaining the various kinds and species of wit; and many classes of it, which are now received on the sole testimony of taste and sentiment, might, perhaps, be resolved into more general principles. But this is sufficient for our present purpose, that it does affect taste and sentiment, and bestowing an immediate enjoyment, is a sure source of approbation and affection.

但是，要使一个人成为尽善尽美的嘉友良伴，他就必须富有机趣和真诚坦率，同时又彬彬有礼。何谓机趣，也许难以界定；但是有一点无疑是不难断定的，即它是一种直接令他人愉快的品质，只要甫一出现就会使每一个对它稍有领略的人获得强烈的喜悦和满足感。诚然，我们或许可以借用最深奥的形而上学来解释各种类别和类型的机趣，而机趣的许多种类，现在仅仅是由品味和情感所感受到的东西来划分的，或许可以被分解为一些更普遍的原则。但是，就我们当前的探讨目的而言，了解到这一点就足够了：机趣确实影响到品味和情感，使人产生直接的喜悦，成为赞许和好感可靠来源。

In countries where men pass most of their time in conversation, and visits, and assemblies, these COMPANIONABLE qualities, so to speak, are of high estimation, and form a chief part of personal merit. In countries where men live a more domestic life, and either are employed in business, or amuse themselves in a narrower circle of acquaintance, the more solid qualities are chiefly regarded. Thus, I have often observed, that, among the French, the first questions with regard to a stranger are, IS HE POLITE? HAS HE WIT? In our own country, the chief praise bestowed is always that of a GOOD-NATURED, SENSIBLE FELLOW.

在有些国家，人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交谈、拜访和聚会上，在那里，这些善于交际的品质可以说颇受敬重，构成个人价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另一些国家，人们更注重家庭生活，其余时间或忙于工作，或只在较为狭窄的熟人圈中消遣娱乐，那么其更为可靠的品质就备受尊重。因此，我常常观察到，法国人对于陌生人的首要问题是：他有礼貌吗？他机智吗？而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主要赞美总是某人是和善、明智之人。

In conversation, the lively spirit of dialogue is AGREEABLE, even to those who desire not to have any share in the discourse: Hence the teller of long stories, or the pompous declaimer, is very little approved of. But most men desire likewise their turn in the conversation, and regard, with a very evil eye, that LOQUACITY which deprives them of a right they are naturally so jealous of.

在交谈中，活泼的对话气氛令人感到愉快，即便是对那些根本没想参与谈话的人也是如此。因此讲话冗长或是夸夸其谈者很少受到赞许。但是大多数人都有一种相同的期望，想在交谈中有轮到自己讲话的机会。出于天性，他们是如此渴望这一权利，以至于一旦有人的饶舌剥夺了他们的这项权利，他们就会以十分恶毒的目光看待他。

There is a sort of harmless LIARS, frequently to be met with in company, who deal much in the marvellous. Their usual intention is to please and entertain; but as men are most delighted with what they conceive to be truth, these people mistake extremely the means of pleasing, and incur universal blame. Some indulgence, however, to lying or fiction is given in HUMOROUS stories; because it is there really agreeable and entertaining, and truth is not of any importance.

有一种无害的撒谎者，人们在社交时常会碰到这类人。他们的情形简直妙不可言。他们撒谎的意图通常是取悦他人或消遣娱乐，但是由于人们最乐于听到的是能令自己信服的真实情况，因而这些人采用此种取悦手段实在是大错特错，而且广受谴责。然而，在幽默故事中，撒谎和杜撰却得到了某种纵容，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它们确实令人感到愉快和饶有趣味，而真实与否则无关紧要。

Eloquence, genius of all kinds, even good sense, and sound reasoning, when it rises to an eminent degree, and is employed upon subjects of any considerable dignity and nice discernment; all these endowments seem immediately agreeable, and have a merit distinct from their usefulness. Rarity, likewise, which so much enhances the price of every thing, must set an additional value on these noble talents of the human mind.

雄辩、各种天赋，甚至理智和正确推理，当达到不凡的程度并被运用于任何庄严、深刻的论题时，所有这些天资似乎都是直接令人愉快的，具有一种与其有用性截然不同的价值。同样，能令一切事物价值极大提升的珍稀性，也必定能让人类这些高贵的天赋增加额外的价值。

Modesty may be understood in different senses, even abstracted from chastity, which has been already treated of. It sometimes means that tenderness and nicety of honour, that apprehension of blame, that dread of intrusion or injury towards others, that Pudor, which is the proper guardian of every kind of virtue, and a sure preservative against vice and corruption. But its most usual meaning is when it is opposed to IMPUDENCE and ARROGANCE, and expresses a diffidence of our own judgement, and a due attention and regard for others. In young men chiefly, this quality is a sure sign of good sense; and is also the certain means of augmenting that endowment, by preserving their ears open to instruction, and making them still grasp after new attainments. But it has a further charm to every spectator; by flattering every man's vanity, and presenting the appearance of a docile pupil, who receives, with proper attention and respect, every word they utter.

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去理解谦逊，甚至可以从前面已经探讨过的贞洁中将其提炼出来。谦逊有时意味着对荣誉的审慎与慎重，对谴责的担心，对侵犯和伤害他人的畏惧，意味着作为所有德性的有力护卫者和恶行与腐化的可靠防卫者的那种端庄。但是它最通常的意义则是与无礼和傲慢相对，表现为对自己的判断缺乏信心以及对他人给予适当的关注和尊重。尤其在年轻人身上，这一品质是理智健全的一个确切标志，同时也是使其增强理智这一天资的可靠手段，让他们始终虚心听取意见，在取得新成就后依然虚怀若谷。然而，谦逊这一品质对于每一位旁观者而言都具有更深层次的魅力，因为它满足了所有人的虚荣心，对于他们说出的每一个字，人们像听话的学童般全神贯注、洗耳恭听。

Men have, in general, a much greater propensity to overvalue than undervalue themselves; notwithstanding the opinion of Aristotle [9_2] . This makes us more jealous of the excess on the former side, and causes us to regard, with a peculiar indulgence, all tendency to modesty and self-diffidence; as esteeming the danger less of falling into any vicious extreme of that nature. It is thus in countries where men's bodies are apt to exceed in corpulency, personal beauty is placed in a much greater degree of slenderness, than in countries where that is the most usual defect. Being so often struck with instances of one species of deformity, men think they can never keep at too great a distance from it, and wish always to have a leaning to the opposite side. In like manner, were the door opened to self-praise, and were Montaigne's maxim observed, that one should say as frankly, I HAVE SENSE, I HAVE LEARNING, I HAVE COURAGE, BEAUTY, OR WIT, as it is sure we often think so; were this the case, I say, every one is sensible that such a flood of impertinence would break in upon us, as would render society wholly intolerable. For this reason custom has established it as a rule, in common societies, that men should not indulge themselves

in self-praise, or even speak much of themselves; and it is only among intimate friends or people of very manly behaviour, that one is allowed to do himself justice. Nobody finds fault with Maurice, Prince of Orange, for his reply to one who asked him, whom he esteemed the first general of the age, THE MARQUIS OF SPINOLA, said he, IS THE SECOND. Though it is observable, that the self-praise implied is here better implied, than if it had been directly expressed, without any cover or disguise.

一般说来，人们大多倾向于高估而不是低估自己，尽管亚里士多德对此持不同意见 [10_2] 。这就使我们倍加警惕出现前者过度的倾向，而对于一切谦逊和缺乏自信的倾向却抱有一种特别的纵容，因为我们认为自己不太可能会有陷入后一种倾向的恶性极端的危险。因此，在人们身材容易发胖的国家，较之于肥胖是最常见的缺点的国家，身体之美与苗条有着更大程度的关系。这是因为在某种缺陷极为普遍的情况下，人们会认为自己也不能确保与其保持足够的距离，因而总是期望有一种相反的倾向。同样，假如人们向自我称赞敞开大门，按照蒙田的准则行事，即我们应当坦率地宣称，“我有理智，我有学识，我有勇气、美貌或才智”，正如我们常常自以为然地那样；假如情况如此，在我看来，每个人都会感到一股傲慢无礼的洪流向我们席卷而来，使得整个社会彻底变得令人不堪忍受。基于这一缘由，人们根据习俗在日常交往中确立了这样一条规则，即人们不应当放任自己进行自我称赞，甚至不应当过多地谈论自己；只有在亲密的好友或有男子气概的大丈夫之间，才能公正地评价自己。当有人向奥兰治亲王莫里斯问及他尊奉谁为当世第一将军时，他答道：“斯皮诺拉侯爵排第二。”没有人对他的这一回答吹毛求疵。尽管可以看出，这其中隐含的自我称赞，与直截了当、不加掩饰和伪装的直接表达比起来，更为明显。

He must be a very superficial thinker, who imagines that all

instances of mutual deference are to be understood in earnest, and that a man would be more esteemable for being ignorant of his own merits and accomplishments. A small bias towards modesty, even in the internal sentiment, is favourably regarded, especially in young people; and a strong bias is required in the outward behaviour; but this excludes not a noble pride and spirit, which may openly display itself in its full extent, when one lies under calumny or oppression of any kind. The generous contumacy of Socrates, as Cicero calls it, has been highly celebrated in all ages; and when joined to the usual modesty of his behaviour, forms a shining character. Iphicrates, the Athenian, being accused of betraying the interests of his country, asked his accuser, WOULD YOU, says he, HAVE, ON A LIKE OCCASION, BEEN GUILTY OF THAT CRIME? BY NO MEANS, replied the other. AND CAN YOU THEN IMAGINE, cried the hero, that Iphicrates WOULD BE GUILTY? [9_3] —In short, a generous spirit and self-value, well founded, decently disguised, and courageously supported under distress and calumny, is a great excellency, and seems to derive its merit from the noble elevation of its sentiment, or its immediate agreeableness to its possessor. In ordinary characters, we approve of a bias towards modesty, which is a quality immediately agreeable to others: The vicious excess of the former virtue, namely, insolence or haughtiness, is immediately disagreeable to others; the excess of the latter is so to the possessor. Thus are the boundaries of these duties adjusted.

如果一个人认为所有相互敬重的事例都会得到人们真诚的理解，或者认为一个对于自己的优点和才艺全然不知的人更值得受尊敬，那么他必定思想肤浅。轻微的谦逊倾向，甚至只是在内心情感的层面上，也会得到赞许，特别是在年轻人身上尤为如此。但在外在行为中却要求表现出强烈的谦逊倾向，而高贵的骄傲和气概并不会因此丧失，不论是遭到中伤还是受到压迫时，这种骄傲和气概都会被光明磊

落地充分展示出来。如西塞罗所说，苏格拉底对于法庭慷慨坦荡的抗命不从，历来备受颂扬，而将此与他一贯的谦逊行为结合起来审视，就形成一种闪光的性格。当雅典人伊菲克拉底被指控背叛国家利益时，他质问控告者："如果你处于类似的情况，你会犯此罪行吗？"那人回答道："绝对不会。"于是，这位英雄厉声喝道："那么，你又怎能想象出伊菲克拉底会犯？"[10_3] 简言之，慷慨的气概和自重，根基牢固、不形于外，在悲痛和中伤的重压之下仍能大无畏地毫不动摇，这是一种伟大而卓越的品质，其价值似乎源于其情感的高贵的升华，亦即它能直接令其拥有者感到愉快。在普通人身上，我们赞许谦逊的倾向，那是一种直接令他人愉快的品质。前一种德性的恶性过度，即傲慢无礼或狂妄自大，会直接令他人感到不快；而后一种德性的过度则会直接令其拥有者感到不快。这些道德义务的界线因此得以划定。

A desire of fame, reputation, or a character with others, is so far from being blameable, that it seems inseparable from virtue, genius, capacity, and a generous or noble disposition. An attention even to trivial matters, in order to please, is also expected and demanded by society; and no one is surprised, if he finds a man in company, to observe a greater elegance of dress and more pleasant flow of conversation, than when he passes his time at home, and with his own family. Wherein, then, consists Vanity, which is so justly regarded as a fault or imperfection. It seems to consist chiefly in such an intemperate display of our advantages, honours, and accomplishments; in such an importunate and open demand of praise and admiration, as is offensive to others, and encroaches too far on their secret vanity and ambition. It is besides a sure symptom of the want of true dignity and elevation of mind, which is so great an ornament in any character. For why that impatient desire of applause; as if you were not justly entitled to it, and might not reasonably expect that it would for ever attend you? Why so anxious to inform us of the great company which you have kept; the

obliging things which were said to you; the honours, the distinctions which you met with; as if these were not things of course, and what we could readily, of ourselves, have imagined, without being told of them?

人们对于名誉、声望、口碑的欲望无可非议，甚至于到了这种欲望似乎与德性、天赋、能力以及慷慨高贵的气质不可分割的地步。为了快乐甚至对细枝末节也倍加关注，这也是社会所期望和要求的；一个人在社交场合比在家中与家人相伴时更注重衣着的优雅得体和谈吐的流畅自如，对于这一情形，没有人会感到诧异。那么，被如此理所当然地视为缺点或瑕疵的虚荣心究竟何在？它似乎主要在于我们对自己的优点、荣誉和才艺的那般不加节制的展示，在于我们对赞美和钦佩的那般急切和公然的要求，以至于冒犯了他人，极大地触犯了他们隐秘的虚荣心和野心。此外，它也是心灵缺乏真正的尊严和崇高的确切表征，而对于任何人来说，真正的尊严和崇高的心灵都是性格的一个重要装饰物。为何如此迫切渴望得到别人的赞赏，仿佛你不配获得它，不能合理地期望它会永远属于你呢？为何如此急切地告知我们你结交的显贵、受到的礼遇以及所获得的荣誉和嘉奖，仿佛这些并非理所当然呢？如果不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就想象不到吗？

Decency, or a proper regard to age, sex, character, and station in the world, may be ranked among the qualities which are immediately agreeable to others, and which, by that means, acquire praise and approbation. An effeminate behaviour in a man, a rough manner in a woman; these are ugly because unsuitable to each character, and different from the qualities which we expect in the sexes. It is as if a tragedy abounded in comic beauties, or a comedy in tragic. The disproportions hurt the eye, and convey a disagreeable sentiment to the spectators, the source of blame and disapprobation. This is that INDECORUM, which is explained so

much at large by Cicero in his *Offices* .

得体，亦即对年龄、性别、性格和社会地位恰如其分的尊重，或可被列为直接令他人愉快的品质之一，也因此而获得赞美和赞许。男人的柔弱举止和女人的粗野作风是丑陋的，因为它们不适宜于双方各自的性格，与别人对我们的性别角色的期待不一致。这就好像是一出悲剧却充满了喜剧之美，或是一部喜剧充满了悲剧之美。比例失调的画面会使人眼睛不适，会让旁观者产生一种不快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正是谴责和非难的源头。这就是西塞罗在其《论义务》中详加解释的那种失当。

Among the other virtues, we may also give Cleanliness a place; since it naturally renders us agreeable to others, and is no inconsiderable source of love and affection. No one will deny, that a negligence in this particular is a fault; and as faults are nothing but smaller vices, and this fault can have no other origin than the uneasy sensation which it excites in others; we may, in this instance, seemingly so trivial, clearly discover the origin of moral distinctions, about which the learned have involved themselves in such mazes of perplexity and error.

在种种德性之中，我们或许可以给予洁净一席之地，因为这种德性自然而然地使我们令他人感到愉快，也是爱和好感不可忽视的一个源泉。没有人会否认在这一方面的疏忽是一个失误，由于失误只不过是小恶，而这一失误的根源也只不过是一种在他人心里引起的不快之感，因此，从这个看似极其琐屑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德恶之别的根源所在，这一让饱学之士们长久以来深陷疑惑和错误之中的论题。

But besides all the AGREEABLE qualities, the origin of whose beauty we can, in some degree, explain and account for, there still remains something mysterious and inexplicable, which conveys an immediate satisfaction to the spectator, but how, or why, or for what reason, he cannot pretend to determine. There is a manner, a grace, an ease, a genteelness, an I-know-not-what, which some men possess above others,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external beauty and comeliness, and which, however, catches our affection almost as suddenly and powerfully. And though this MANNER be chiefly talked of in the passion between the sexes, where the concealed magic is easily explained, yet surely much of it prevails in all our estimation of characters, and forms no inconsiderable part of personal merit. This class of accomplishments, therefore, must be trusted entirely to the blind, but sure testimony of taste and sentiment; and must be considered as a part of ethics, left by nature to baffle all the pride of philosophy, and make her sensible of her narrow boundaries and slender acquisitions.

除了我们或多或少能够对其根源给出一些解释和说明的令人愉快的品质之外，还有某种神秘的、无法解释的东西，它能旁使观者得到直接的满足，而其发生作用的方式、原因或理由，却是旁观者不能妄加判定的。有一种风度、一种优雅、一种自如、一种修养、一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一些人比其他人拥有的更多。它迥异于外在的美和靓丽，但却几乎是一瞬间就强有力地获取了我们的好感。尽管这种风度主要是在男女情爱这一层面上被提及的，在那种情况下其隐藏的魔力很容易得到解释，但非常确定的是，这种风度也普遍存在于我们对性格的所有评价中，构成了个人价值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这类教养必须完全交由品味和情感来见证，虽然这种见证颇为盲目但却是可靠的；它们必须被看作大自然为了使得哲学收敛起全部的骄傲、使其意识到自身范围的狭小和收获的微薄而遗留的伦理学的部分内容。

We approve of another, because of his wit, politeness, modesty, decency, or any agreeable quality which he possesses; although he be not of our acquaintance, nor has ever given us any entertainment, by means of these accomplishments. The idea, which we form of their effect on his acquaintance, has an agreeable influence on our imagination, and gives us the sentiment of approbation. This principle enters into all the judgements which we form concerning manners and characters.

我们因为某人的机趣、礼貌、谦逊、得体或是其拥有的任何令人愉快的品质而赞赏他，尽管我们与他素不相识，尽管他从未以这些教养来取悦我们。我们对这些才赋在他认识的人身上所发挥的效用形成一种观念，从而衍生出令我们自己愉悦的想象，使我们产生赞许的情感。这条原则适用于我们对举止和性格的所有判断。

[9_1].It is the nature and, indeed, the definition of virtue, that it is A QUALITY OF THE MIND AGREEABLE TO OR APPROVED OF BY EVERY ONE WHO CONSIDERS OR CONTEMPLATES IT. But some qualities produce pleasure, because they are useful to society, or useful or agreeable to the person himself; others produce it more immediately, which is the case with the class of virtues here considered.

[9_2].Ethic. ad Nicomachum.

[9_3].Quinctil. lib. v. cap.12.

[10_1].德性的本质，其实就是德性的定义，即它是一种令所有考虑或思索这一问题的人感到心灵愉快或赞赏的品质。但是有些品质产生快乐的原因是它们对社会有用，或是对某人自己有用或是令自己感到愉快；而另一些品质则更直接地产生快乐，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就是德性的这一类别。

[10_2].《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四卷，第三章。

[10_3].昆体良：《演说家准则》，第五卷，第十二章。

SECTION 9　CONCLUSION

第九章　结论

PART 1

第一节

It may justly appear surprising that any man in so late an age, should find it requisite to prove, by elaborate reasoning, that Personal Merit consists altogether in the possession of mental qualities, USEFUL or AGREEABLE to the PERSON HIMSELF or to OTHERS. It might be expected that this principle would have occurred even to the first rude, unpractised enquirers concerning morals, and been received from its own evidence, without any argument or disputation. Whatever is valuable in any kind, so naturally classes itself under the division of USEFUL or AGREEABLE, the UTILE or the DULCE, that it is not easy to imagine why we should ever seek further, or consider the question as a matter of nice research or inquiry. And as everything useful or agreeable must possess these qualities with regard either to the PERSON HIMSELF or to OTHERS, the complete delineation or description of merit seems to be performed as naturally as a shadow is cast by the sun, or an image is reflected upon water. If the ground, on which the shadow is cast, be not broken and uneven; nor the surface from which the image is reflected, disturbed and confused; a just figure is immediately presented, without any art or attention. And it seems a reasonable presumption, that systems and hypotheses have perverted our natural understanding, when a theory, so simple and obvious, could so long have escaped the most

elaborate examination.

直到如此晚近的时代，有人发现需要借助严密的推理来证明个人价值完全在于拥有对自己或对他人有用或令自己或令他人感到愉快的心灵品质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点或许有理由令人感到惊讶。最早的道德探究者们虽然思想简陋、经验匮乏，但我们或许可以猜测，甚至连他们也已想到了这条原则，并依据这条原则的自明性而不加论证、不加论辩就接受了这条原则。无论哪种事物，只要它是有价值的，就会如此自然地被归属到有用的或令人愉快的、有效用的或令人欢愉的这一类别，以至于很难想象我们为何还要做进一步的探寻，为何还会认为这个问题值得予以细致的研究或探究。由于所有有用的或令人愉快的事物都必然拥有这些或是与自己或是与他人有关的品质，因此，完整地描绘或描述价值，就如同阳光投下阴影、水面映出倒影一般，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投下阴影的地面不是坑坑洼洼的，映出倒影的水面不是波澜起伏的，那么，无需艺术加工，也无需刻意辨认，一个精确的影像即刻便能显现出来。如果一个如此简单、如此明显的理论能够如此长久地逃脱我们最为精密的探察的话，那这就意味着体系和假设已然腐蚀了我们的自然知性，这显然是一个合理的推定。

But however the case may have fared with philosophy, in common life these principles are still implicitly maintained; nor is any other topic of praise or blame ever recurred to, when we employ any panegyric or satire, any applause or censure of human action and behaviour. If we observe men, in every intercourse of business or pleasure, in every discourse and conversation, we shall find them nowhere, except in the schools, at any loss upon this subject. What so natural, for instance, as the following dialogue? You are very happy, we shall suppose one to say, addressing himself to another, that you have given your daughter to Cleanthes. He is a

man of honour and humanity. Every one, who has any intercourse with him, is sure of FAIR and KIND treatment. [10_1] I congratulate you too, says another, on the promising expectations of this son-in-law; whose assiduous applica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s, whose quick penetration and early knowledge both of men and business, prognosticate the greatest honours and advancement. [10_2] You surprise me, replies a third, when you talk of Cleanthes as a man of business and application. I met him lately in a circle of the gayest company, and he was the very life and soul of our conversation: So much wit with good manners; so much gallantry without affectation; so much ingenious knowledge so genteelly delivered, I have never before observed in any one. [10_3] You would admire him still more, says a fourth, if you knew him more familiarly. That cheerfulness, which you might remark in him, is not a sudden flash struck out by company: it runs through the whole tenor of his life, and preserves a perpetual serenity on his countenance, and tranquillity in his soul. He has met with severe trials, misfortunes as well as dangers; and by his greatness of mind, was still superior to all of them. [10_4] The image, gentlemen, which you have here delineated of Cleanthes, cried I, is that of accomplished merit. Each of you has given a stroke of the pencil to his figure; and you have unawares exceeded all the pictures drawn by Gratian or Castiglione. A philosopher might select this character as a model of perfect virtue.

然而，无论这一论点在哲学领域中是何种遭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暗中坚持着这些原则；当我们颂扬或讽刺、赞赏或谴责人类的行为举止时，我们也从未提到过任何其他赞美或责备的话题。如果观察一下人们在每一次工作或玩乐交往中、在每一次言谈和交谈中的表现，我们就会发现，除了学校，人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对这个论题感到茫然失措。比如，还有什么能比下面的这段对话更为自然的

呢？假定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真幸福，把女儿嫁给了克列安提斯。此人可敬而仁慈。他会公正、和善地对待每一个和他交往的人。[11_1] 又一个人说，我也向你表示祝贺，你的这位乘龙快婿可谓前程无量。他学习法律的刻苦用功，他对人对事敏锐的洞察力和先见之明，都预示着他至高无尚的荣耀和进步 [11_2] 。然而，第三个人却说，你们说克列安提斯这个人专注事务、刻苦用功，这真让我感到惊讶。最近，我刚在一个极其轻松欢快的交际圈中见过他，他是交谈中最为活跃的中心人物。我从未见过有人如他这般机智风趣而风度优雅、殷勤周到而不矫揉造作、才识敏赡而谈吐温雅 [11_3] 。这时，第四个人说道，你们要是对他更熟悉一些的话，你们就会更加钦佩他。你在他身上看到的那种快乐并非与人交际时擦出的转瞬即逝的火花，而是贯穿他生命的如一常态。由于这种快乐，他的神情始终是平静安详的，灵魂始终是平和安定的。他曾遭遇过各种磨难、不幸和危险，但凭借着心灵的伟大，他最终克服了这一切 [11_4] 。先生们，我大声喊道，你们在这里所描绘出的克列安提斯的形象正是一个具有完满价值的形象。你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的画像上添上一笔。你们不经意间完成的画作甚至胜过了格拉提安和卡斯蒂廖内的全部画作。哲学家可能会将克列安提斯的这种性格选作完美德性的典范。

And as every quality which is useful or agreeable to ourselves or others is, in common life, allowed to be a part of personal merit; so no other will ever be received, where men judge of things by their natural, unprejudiced reason, without the delusive glosses of superstition and false religion. Celibacy, fasting, penance, mortification, self-denial, humility, silence, solitude, and the whole train of monkish virtues; for what reason are they everywhere rejected by men of sense, but because they serve to no manner of purpose; neither advance a man's fortune in the world, nor render him a more valuable member of society; neither qualify him for the entertainment of company, nor increase his power of self-enjoyment? We observe, on the contrary, that they cross all these

desirable ends; stupify the understanding and harden the heart, obscure the fancy and sour the temper. We justly, therefore, transfer them to the opposite column, and place them in the catalogue of vices; nor has any superstition force sufficient among men of the world, to pervert entirely these natural sentiments. A gloomy, hair-brained enthusiast, after his death, may have a place in the calendar; but will scarcely ever be admitted, when alive, into intimacy and society, except by those who are as delirious and dismal as himself.

由于每一种对我们自己或他人有用或令我们自己或他人愉快的品质在日常生活中都被承认作是个人价值的一部分，因此，当人们抛开虚妄的迷信和伪宗教、依据其毫无偏见的自然理性对事物做出判断时，他们是不会接受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品质的。独身、斋戒、苦行、禁欲、克己、谦卑、缄默、孤居以及一整套的僧侣德性，之所以处处遭到理智健全之人的摈斥，难道不正是因为它们毫无目的可言，既不增益人们的世俗财富，也不造就有用的社会成员；既不培养人们与人同乐的能力，也不提高人们自我享乐的能力吗？相反，我们发现僧侣德性背离所有这些人们渴望实现的目标，导致知性昏聩、心肠冷硬、想象晦暗、脾性乖张。因此，我们将它们归入反列、放在恶行的目录中是正确合理的。还没有哪种迷信思想力量强大到能够在世人中彻底腐蚀这些自然情感。一个阴郁、疯癫的狂热者在死后可能会被载入历书，但生前除了那些和他一样心智错乱、性情抑郁的人以外，很少会有人去亲近他、结交他。

It seems a happiness in the present theory, that it enters not into that vulgar dispute concerning the DEGREES of benevolence or self-love, which prevail in human nature; a dispute which is never likely to have any issue, both because men, who have taken part, are not easily convinced, and because the phenomena, which can be

produced on either side, are so dispersed, so uncertain, and subject to so many interpretations, that it is scarcely possible accurately to compare them, or draw from them any determinate inference or conclusion. It is sufficient for our present purpose, if it be allowed, what surely, without the greatest absurdity cannot be disputed, that there is some benevolence, however small, infused into our bosom; some spark of friendship for human kind; some particle of the dove kneaded into our frame, along with the elements of the wolf and serpent. Let these generous sentiments be supposed ever so weak; let them be insufficient to move even a hand or finger of our body, they must still direct the determinations of our mind, and where everything else is equal, produce a cool preference of what is useful and serviceable to mankind, above what is pernicious and dangerous. A MORAL DISTINCTION, therefore, immediately arises; a general sentiment of blame and approbation; a tendency, however faint, to the objects of the one, and a proportionable aversion to those of the other. Nor will those reasoners, who so earnestly maintain the predominant selfishness of human kind, be any wise scandalized at hearing of the weak sentiments of virtue implanted in our nature.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found as ready to maintain the one tenet as the other; and their spirit of satire (for such it appears, rather than of corruption) naturally gives rise to both opinions; which have, indeed, a great and almost indissoluble connexion together.

我们的理论没有卷入那场仁爱和自爱主导人性程度的粗俗争论似乎是一件幸事。这场争论永远不可能争出结果，一方面是因为，参与争论的那些人都很难被彼此说服，另一方面，争论双方摆出的事实均如此散乱、含糊且释义纷繁，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对它们做出准确的比较或是从中得出任何明确的推论或结论。就我们目前的研究目的而言，我们只需承认，我们的内心注入了些许仁爱，无论这仁爱是多么

微少，我们的身上闪烁着些许对人类的友爱，我们的身体中除了豺狼和毒蛇以外还揉入了些许鸽子的成分，这就足够了。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必定是荒谬至极的。即便假定这些慷慨的情感是软弱无力的，即便它们甚至无力抬起我们的一只手乃至一根手指头，它们必定还是会引导着我们的心灵做出决定，并在同等条件之下，在对人类有用和有助益的以及有害和有危险的事物之间，冷静地做出偏向前者的选择。由此，德恶之别，即一种谴责和赞许的一般情感，一种对某类对象的趋向，无论这种趋向是多么微弱，和另一种与之相应的对另一类对象的反感，就呼之而出了。那些热切地坚持人类的自私性占据主导地位的辩论者们，在听闻这些软弱无力的道德情感根植于我们的本性中时不会有丝毫的惊讶。相反，我们发现他们乐于对这两则信条做同样的坚持；他们的嘲讽精神（如其所示，而非堕落精神）自然引发出这两种观点，而事实上，这两种观点之间有着几乎不可分解的密切联系。

Avarice, ambition, vanity, and all passions vulgarly, though improperly, comprised under the denomination of SELF-LOVE, are here excluded from our theory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morals, not because they are too weak, but because they have not a proper direction for that purpose. The notion of morals implies some sentiment common to all mankind, which recommends the same object to general approbation, and makes every man, or most men, agree in the same opinion or decision concerning it. It also implies some sentiment, so universal and comprehensive as to extend to all mankind, and render the actions and conduct, even of the persons the most remote, an object of applause or censure, according as they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at rule of right which is established. These two requisite circumstances belong alone to the sentiment of humanity here insisted on. The other passions produce in every breast, many strong sentiments of desire and aversion, affection and hatred; but these neither are felt so much in common, nor are so

comprehensive, as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any general system and established theory of blame or approbation.

贪婪、野心、虚荣以及尽管被不甚恰当地粗略划归于自爱这一名称之下的各种激情，在此均被排除于我们的道德起源理论之外，这并非因为它们过于软弱无力，而是因为它们无法正确地导向我们的研究目的。道德这一概念意味着某种人类共通的情感，这种情感使得人们对同一个对象给予普遍的赞许，并使得每一个人或大多数人都赞同关于它的同一个观点或决定。这一概念还意味着某种可延伸至全人类的普泛而全面的情感，这种情感使得那些即便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的行为举止，依据其是否符合既定的是非法则，也能成为赞赏或责难的对象。只有这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才属于我们在这里所坚持主张的人道情感。其他的激情虽然也会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激起许多诸如欲望、反感、喜爱和憎恨这样的强烈情感，但这些情感既不那么为人类所共通，也没有全面到可以构成任何关于谴责或赞许的一般体系和既定理论的根基。

When a man denominates another his ENEMY, his RIVAL, his ANTAGONIST, his ADVERSARY, he is understood to speak the language of self-love, and to express sentiments, peculiar to himself, and arising from his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and situation. But when he bestows on any man the epithets of VICIOUS or ODIOUS or DEPRAVED, he then speaks another language, and expresses sentiments, in which he expects all his audience are to concur with him. He must here, therefore, depart from his private and particular situation, and must choose a point of view, common to him with others; he must move some universal principle of the human frame, and touch a string to which all mankind have an accord and symphony. If he means, therefore, to express that this man possesses qualities, whose tendency is pernicious to society, he has

chosen this common point of view, and has touched the principle of humanity, in which every man, in some degree, concurs. While the human heart is compounded of the same elements as at present, it will never be wholly indifferent to public good, nor entirely unaffected with the tendency of characters and manners. And though this affection of humanity may not generally be esteemed so strong as vanity or ambition, yet, being common to all men, it can alone be the foundation of morals, or of any general system of blame or praise. One man's ambition is not another's ambition, nor will the same event or object satisfy both; but the humanity of one man is the humanity of every one, and the same object touches this passion in all human creatures.

当一个人称另一个人为自己的敌人、对手、敌手和仇敌时，他被认为是在讲自爱的语言，是在表达他自己所特有的和源自于其自身特定境遇和境况的情感。但当他用诸如邪恶的、可憎的和堕落的等修饰语来形容任何一个人时，他却是在讲另外一种语言，是在表达他期望所有听他说话的人都赞同的情感。因此，他这时必须抛开自己特定的私人境况而选择一个与他人相共通的观点，必须触动某种人类构造中的普遍原则，拨动能让全人类产生同感与共鸣的琴弦。因此，如果他意图表达的是此人具有一些趋向于对社会有害的品质，他便已选择了一个共通的观点，触动了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人都赞同的人道原则。既然人类的内心是由目前的这样一些要素构成的，那它就绝不会完全漠视公共利益，也绝不会完全不受性格和作风趋向的影响。尽管人道这种情感一般不会被认为如同虚荣和野心那般强烈，然而，作为人人共通的情感，它却是道德或任何关于谴责或赞美的一般体系的唯一根基。人们的野心各不相同，同一个事件或对象满足不了不同的人的野心；但人道却是人人相同，同一个对象能在所有人的心中触动这种激情。

But the sentiments, which arise from humanity, are not only the same in all human creatures, and produce the same approbation or censure; but they also comprehend all human creatures; nor is there any one whose conduct or character is not, by their means, an object to every one of censure or approbation. On the contrary, those other passions, commonly denominated selfish, both produce different sentiments in each individual, according to his particular situation; and also contemplate the greater part of mankind with the utmost indifference and unconcern. Whoever has a high regard and esteem for me flatters my vanity; whoever expresses contempt mortifies and displeases me; but as my name is known but to a small part of mankind, there are few who come within the sphere of this passion, or excite, on its account, either my affection or disgust. But if you represent a tyrannical, insolent, or barbarous behaviour, in any country or in any age of the world, I soon carry my eye to the pernicious tendency of such a conduct, and feel the sentiment of repugnance and displeasure towards it. No character can be so remote as to be, in this light, wholly indifferent to me. What is beneficial to society or to the person himself must still be preferred. And every quality or action, of every human being, must, by this means, be ranked under some class or denomination, expressive of general censure or applause.

但是，源于仁慈的种种情感不仅在所有人的心中都是相同的，并引发出同样的赞许或责难，而且它们还包括所有人，每一个人的行为或性格都是其他所有人责难或赞许的对象。相反，另外那些通常被称作自私的激情，则不仅使得每一个体因特定境况的不同而在心中产生出不同的情感，而且使其在看待大部分人时也极度冷漠和漠然。凡是非常尊重和钦敬我的人都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凡是轻蔑我的人都使我感到了屈辱和不悦，但是，由于只有一小部分人认识我，因此，能够走进这种激情影响范围的人或是能够因这种激情而激发起我

的喜爱或厌恶之情的人，亦寥寥无几。可是倘若你描述的是一种专横跋扈、傲慢无礼、野蛮残忍的行为，无论它发生在世界上的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我都会立即注目于这一行为的有害趋向，并对它生发出一种嫌恶和不悦的情感。同样，也没有任何一种性格能够因其时代或距离的遥远而使我完全漠然无视。对社会或对个人自己有益的东西必然仍会受到偏爱。每一个人的每一种品质或行为都必定会通过这种方式被划归于某个表示一般性的责难或赞赏的类别或名称之下。

What more, therefore, can we ask to distinguish the sentiments, dependent on humanity, from those connected with any other passion, or to satisfy us, why the former are the origin of morals, not the latter? Whatever conduct gains my approbation, by touching my humanity, procures also the applause of all mankind, by affecting the same principle in them; but what serves my avarice or ambition pleases these passions in me alone, and affects not the avarice and ambition of the rest of mankind. There is no circumstance of conduct in any man, provided it has a beneficial tendency, that is not agreeable to my humanity, however remote the person; but every man, so far removed as neither to cross nor serve my avarice and ambition, is regarded as wholly indifferent by those passions. The distinction, therefore, between these species of sentiment being so great and evident, language must soon be moulded upon it, and must invent a peculiar set of terms, in order to express those universal sentiments of censure or approbation, which arise from humanity, or from views of general usefulness and its contrary. VIRTUE and VICE become then known; morals are recognized; certain general ideas are framed of human conduct and behaviour: Such measures are expected from men in such situations. This action is determined to be conformable to our abstract rule; that other, contrary. And by such universal principles are the particular sentiments of self-love frequently controlled and limited.

[10_5]

因此，我们还能要求通过什么其他方式来对这些依赖于人道的情感和那些与其他任何激情相关的情感作出区分，或是使我们明了为何道德起源于前者而非后者？凡是通过触动我的人道之情而赢得我的赞许的行为，也会通过打动全人类的这同一条原则而获得所有人的赞赏；但那些满足我的贪婪或野心的行为却只能迎合我个人的这些激情，而打动不了其他人的贪婪和野心。任何人的行为因素，只要具备有益的趋向，那无论那人有多么遥远，都会令我的仁慈感到愉快；但如若那人与我疏远到既阻挠不了也满足不了我的贪婪和野心，那么无论他是谁，都会被那些激情视作是完全漠不相关的。因此，由于这两类情感之间的区别巨大而显见，人们必定会立即据此创造出相应的语言，并发明出一套独特的术语，以用来表达那些源自于仁慈或一般有用性和无用性的观点的责难或赞许的普遍情感。于是，德恶得到分辨，道德得到认可，关于人们行为举止的某些一般观念得到形成，一定的标准就期望在一定的情形之下得到人们的采取。此行为被断定为符合我们的抽象法则，而彼行为则被断定为不符合我们的抽象法则。正是这些普遍原则常常控制和限制着自爱的那些特定情感 [11_5] 。

From instances of popular tumults, seditions, factions, panics, and of all passions, which are shared with a multitude, we may learn the influence of society in exciting and supporting any emotion; while the most ungovernable disorders are raised, we find, by that means, from the slightest and most frivolous occasions. Solon was no very cruel, though, perhaps, an unjust legislator, who punished neuters in civil wars; and few, I believe, would, in such cases, incur the penalty, were their affection and discourse allowed sufficient to absolve them. No selfishness, and scarce any philosophy, have there force sufficient to support a total coolness and indifference; and he must be more or less than man, who

kindles not in the common blaze. What wonder then, that moral sentiments are found of such influence in life; though springing from principles, which may appear, at first sight, somewhat small and delicate? But these principles, we must remark, are social and universal; they form, in a manner, the PARTY of humankind against vice or disorder, its common enemy. And as the benevolent concern for others is diffused, in a greater or less degree, over all men, and is the same in all, it occurs more frequently in discourse, is cherished by society and conversation, and the blame and approbation, consequent on it, are thereby roused from that lethargy into which they are probably lulled, in solitary and uncultivated nature. Other passions, though perhaps originally stronger, yet being selfish and private, are often overpowered by its force, and yield the dominion of our breast to those social and public principles.

从民众的骚动、叛乱、内讧、恐慌以及所有群体共有的激情的事例中，我们都可以发觉社会在激发和鼓动任何一种情绪方面的影响力，尽管我们也发现，那些最难以控制的混乱状况竟发端于最轻微、最琐屑的偶然事件。在惩处内战中的中立者一事上，尽管梭伦可能不是一位公正的立法者，但却并不十分残忍；我想，如果中立者的情感和言谈被认为足以赦免他们的罪行，那么，在这些情形之下，他们就很少有人会受到惩罚。在内战中，没有哪种自私性，也几乎没有哪种哲学思想，其力量足以支撑一种彻底的冷酷和冷漠。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冷眼旁观而不随波逐流，他就要么太是人，要么太不是人了。既然如此，道德情感尽管发源于那些乍看之下稍显渺小、脆弱的原则，但却被发现对生活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又何足为奇？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些原则是社会性和普遍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形成了一个对抗恶行或混乱这一人类共同敌人的党派。由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对他人有一种仁爱的关切之情，而这种情感在所有人的心中都是相同的，因此，它在言谈中便屡屡出现，在社交和交谈中备受珍视，而

紧随其后的谴责和赞许也会因此被唤醒，不再沉陷于孤独、粗朴的浑噩状态之中。其他的激情，尽管刚出现时可能更强烈一些，但却是自私性和私人性的，因此往往无法与仁爱的关切之情相抗衡，不得不将我们内心的主宰权拱手让与社会原则和公共原则。

Another spring of our constitution, that brings a great addition of force to moral sentiment, is the love of fame; which rules, with such uncontrolled authority, in all generous minds, and is often the grand object of all their designs and undertakings. By our continual and earnest pursuit of a character, a name, a reputation in the world, we bring our own deportment and conduct frequently in review, and consider how they appear in the eyes of those who approach and regard us. This constant habit of surveying ourselves, as it were, in reflection, keeps alive all the sentiments of right and wrong, and begets, in noble natures, a certain reverence for themselves as well as others, which is the surest guardian of every virtue. The animal conveniencies and pleasures sink gradually in their value; while every inward beauty and moral grace is studiously acquired, and the mind is accomplished in every perfection, which can adorn or embellish a rational creature.

对名誉的热爱为道德情感增添了巨大的力量，它是我们性格结构的另外一道源泉，它以无上的权威统驭着一切慷慨的心灵，并常常成为这些心灵一切规划和事业的宏伟目标。对尘世名声、声名和声望不懈而热切的追求，令我们时时审视自己的行为举止，想知道它们在那些亲近和尊重我们的人眼中是否得体。这种可以说是在思索中不断省察我们自身的习惯，使得一切是非情感保持了活力，并使得本性高尚之人对自己和他人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而这种敬畏之情正是一切德性最忠实可靠的护卫者。当一切内在美和道德美经过努力皆备于一身，心灵变得完美无瑕从而成为理性生物的修饰和装帧之时，动物性

的便利和愉悦的价值便会逐步降低。

Here is the most perfect morality with which we are acquainted; here is displayed the force of many sympathies. Our moral sentiment is itself a feeling chiefly of that nature, and our regard to a character with others seems to arise only from a care of preserving a character with ourselves; and in order to attain this end, we find it necessary to prop our tottering judgement on the correspondent approbation of mankind.

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最完美的道德，这就是众多同情心的力量的展现。我们的道德情感本身就是以这种性质为主的一种感受，我们关注自己在他人那里的名声，似乎也只是出于对维护我们在自己心目中的名声的一种关心。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发现自己摇摆不定的判断力需要依靠人类一致的赞许。

But, that we may accommodate matters, and remove if possible every difficulty, let us allow all these reasonings to be false. Let us allow that, when we resolve the pleasure, which arises from views of utility, into the sentiments of humanity and sympathy, we have embraced a wrong hypothesis. Let us confess it necessary to find some other explication of that applause, which is paid to objects, whether inanimate, animate, or rational, if they have a tendency to promote the welfare and advantage of mankind. However difficult it be to conceive that an object is approved of on account of its tendency to a certain end, while the end itself is totally indifferent: let us swallow this absurdity, and consider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The preceding delineation or definition of Personal Merit must still retain its evidence and authority: it must still be

allowed that every quality of the mind, which is USEFUL or AGREEABLE to the PERSON HIMSELF or to OTHERS, communicates a pleasure to the spectator, engages his esteem, and is admitted under the honourable denomination of virtue or merit. Are not justice, fidelity, honour, veracity, allegiance, chastity, esteemed solely on account of their tendency to promote the good of society? Is not that tendency inseparable from humanity, benevolence, lenity, generosity, gratitude, moderation, tenderness, friendship, and all the other social virtues? Can it possibly be doubted that industry, discretion, frugality, secrecy, order, perseverance, forethought, judgement, and this whole class of virtues and accomplishments, of which many pages would not contain the catalogue; can it be doubted, I say, that the tendency of these qualities to promote the interest and happiness of their possessor, is the sole foundation of their merit? Who can dispute that a mind, which supports a perpetual serenity and cheerfulness, a noble dignity and undaunted spirit, a tender affection and good-will to all around; as it has more enjoyment within itself, is also a more animating and rejoicing spectacle, than if dejected with melancholy, tormented with anxiety, irritated with rage, or sunk into the most abject baseness and degeneracy? And as to the qualities, immediately AGREEABLE to OTHERS, they speak sufficiently for themselves; and he must be unhappy, indeed, either in his own temper, or in his situation and company, who has never perceived the charms of a facetious wit or flowing affability, of a delicate modesty or decent genteelness of address and manner.

但是，假如我们考虑到事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消除一切困难，且让我们承认，所有的这些推理都是虚假谬误的。且让我们承认，当我们将源自于效用观点的愉悦分解为仁慈和同情的情感时，我们已经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假设。且让我们承认，如果我们赞赏的对象趋向于

增进人类的福利和利益，那么，无论这些对象是无生命的、有生命的、还是有理性的，我们都有必要为它们获得的赞赏找到另外一种解释。设想某个对象因其趋向于某个和其本身完全漠不相关的目标而受到赞许，无论如此设想有多么困难，都且让我们先暂时接受这一谬论，看看后果如何。我们之前就个人价值所给出的描绘或定义必定仍然保持着其自明性和权威性；人们也必定仍然承认，对自己或对他人有用的或令自己或令他人感到愉快的一切心灵品质都能传递给观者一种愉悦，赢得观者的钦敬，并被冠以德性或价值的美名。难道正义、忠实、荣誉、诚实、忠诚和忠贞不是仅仅因其具有增进社会利益的趋向而获得人们的钦敬吗？难道这种趋向与仁慈、仁爱、宽容、慷慨、感恩、节制、温柔、友爱以及所有其他的社会德性不是不可分割的吗？勤勉、慎重、节俭、守密、条理、坚毅、谋虑、判断力以及这一整类的德性和才艺，其目录名单长达数页，难道可能会遭到怀疑吗？我要说的是，这些品质具有增进其拥有者利益和幸福的趋向，这才是其价值的唯一根基，难道这一点会遭到怀疑吗？如果一颗心灵能够始终保持平静和快乐，始终保持高贵的尊严和无畏的气概，始终保持对周遭人等的温情和善意，那么，较之于忧郁不振、焦虑不安、愤怒不平或是无比卑鄙和极度堕落的另一颗心灵，它可以从自身获得更多的享乐，因此，在旁人眼中，它也更能令人感到欢欣鼓舞，对于这一点，有谁能提出质疑吗？至于那些直接令他人愉快的品质，它们自己本身就足以说明自己。一个人若是从未体会过风趣机智或亲切和蔼的魅力，也从未领略过谈吐举止高雅庄重或彬彬有礼的魅力，那么他必定是不快乐的，要么是其自身脾性如此，要么是其处境和相处之人所致。

I am sensible, that nothing can be more unphilosophical than to be positive or dogmatical on any subject; and that, even if excessive scepticism could be maintained, it would not be more destructive to all just reasoning and inquiry. I am convinced that, where men are the most sure and arrogant, they are commonly the most mistaken, and have there given reins to passion, without that

proper deliberation and suspense, which can alone secure them from the grossest absurdities. Yet, I must confess, that this enumeration puts the matter in so strong a light, that I cannot, at PRESENT, be more assured of any truth, which I learn from reasoning and argument, than that personal merit consists entirely in the usefulness or agreeableness of qualities to the person himself possessed of them, or to others, who have any intercourse with him. But when I reflect that, though the bulk and figure of the earth have been measured and delineated, though the motions of the tides have been accounted for, the order and economy of the heavenly bodies subjected to their proper laws, and Infinite itself reduced to calculation; yet men still dispute concern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moral duties. When I reflect on this, I say, I fall back into diffidence and scepticism, and suspect that a hypothesis, so obvious, had it been a true one, would, long ere now, have been received by the unanimous suffrage and consent of mankind.

我知道，最不哲学的做法莫过于在任何论题上都态度自负或武断，即便是极端的怀疑主义能够得以持续，它也不会对一切合理的推理和探究造成更大的破坏。我相信，人们在最笃定、最傲慢的地方，通常也最容易出错，在那儿，他们放任激情，没有进行恰当的考虑和疑虑，而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其免于极端荒唐的谬误。然而，我必须承认，以上的列举已使问题变得极为明朗，以至于我目前就如同确信自己通过推理和论证获知的任何真理一般，确信个人价值完全在于品质对其拥有者本人或对与他有任何交往的其他人的有用性或令人愉快的性质。但是，当我想到，尽管人们已经测量和描绘出地球的体积和形状，尽管人们已经能够对潮汐运动做出解释，尽管人们已经发现了天体排列顺序和组织体系的固有规律，尽管人们已经能够对无限本身进行计算，然而，在自身道德责任的根基的问题上，人们却依然争论不休。我要说的是，当我思及此处时，我就会重新陷入不自信和怀疑主义之中，因为，倘若一个如此显而易见的假设确实是真实正确的，那

它早就应该被人类全票通过且一致同意而广为接受了。

PART 2

第二节

Having explained the moral APPROBATION attending merit or virtue, there remains nothing but briefly to consider our interested OBLIGATION to it, and to inquire whether every man, who has any regard to his own happiness and welfare, will not best find his account in the practice of every moral duty. If this can be clearly ascertained from the foregoing theory, we shall have the satisfaction to reflect, that we have advanced principles, which not only, it is hoped, will stand the test of reasoning and inquiry, but may contribute to the amendment of men's lives, and their improvement in morality and social virtue. And though the philosophical truth of any proposition by no means depends on its tendency to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yet a man has but a bad grace, who delivers a theory, however true, which, he must confess, leads to a practice dangerous and pernicious. Why rake into those corners of nature which spread a nuisance all around? Why dig up the pestilence from the pit in which it is buried? The ingenuity of your researches may be admired, but your systems will be detested; and mankind will agree, if they cannot refute them, to sink them, at least, in eternal silence and oblivion. Truths which are pernicious to society, if any such there be, will yield to errors which are salutary and ADVANTAGEOUS.

解释完了伴随着价值或德性的道德赞许，最后我们只需简要考虑一下我们对于价值或德性的相关义务，探究一下每一个关心自身幸福

和福利的人能否在每一项道德责任的践行中实现自身的最大收益。如果这一点能够从上述的理论中得到确定，那么，当想到我们已提出一些原则，它们不仅如人们所望的那样将经受住推理和探究的考验，而且还将可能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生活、完善他们的道德和社会德性的原则，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尽管任何命题的哲学真理性都绝不取决于它增进社会利益的趋向；然而，一个人若是提出一种他必须承认会导致危险和有害做法的理论，那么，无论这种理论多么真实正确，他都是完全粗鲁无礼的。为何要去细细翻寻四处传播人性之恶的各个角落？为何要将瘟疫从埋葬它的坑洞中刨挖出来？你们研究的独出心裁可能会受人钦佩，但你们的体系却会遭人憎恶；人类如果不能将你们的体系驳倒，则至少会赞同将其沉入永久的沉默和遗忘之中。那些有害于社会的真理，假如真有这样的真理存在的话，将会屈服于那些对社会有利和有益的谬误。

But what philosophical truths can be more advantageous to society, than those here delivered, which represent virtue in all her genuine and most engaging charms, and make us approach her with ease, familiarity, and affection? The dismal dress falls off, with which many divines, and some philosophers, have covered her; and nothing appears but gentleness, humanity, beneficence, affability; nay, even at proper intervals, play, frolic, and gaiety. She talks not of useless austerities and rigours, suffering and self-denial. She declares that her sole purpose is to make her votaries and all mankind, during every instant of their existence, if possible, cheerful and happy; nor does she ever willingly part with any pleasure but in hopes of ample compensation in some other period of their lives. The sole trouble which she demands, is that of just calculation, and a steady preference of the greater happiness. And if any austere pretenders approach her, enemies to joy and pleasure, she either rejects them as hypocrites and deceivers; or, if she admits them in her train, they are ranked, however, among the least

favoured of her votaries.

但是，既然我们在此提出的哲学真理展现了德性全部最为吸引人的真正魅力，使我们能够轻松自在、亲密无间、满怀爱意地靠近她，那么，与它们相比，还有什么哲学真理能更有益于社会呢？剥落许多神学家和一些哲学家覆盖在德性身上的那件阴郁凄楚的外衣，显露出来的别无其他，惟有温和、仁慈、仁善与亲和，除此之外，甚至还恰当地间或伴随有游乐、嬉乐和欢乐。她不谈无用的艰苦和艰难，受苦和自我否定。她宣称她唯一的目的就是令她的信徒和全人类在其生存的每一个瞬间都能活得快乐和幸福；她绝不愿放弃任何愉悦，除非她希望在人们生命的其他时刻给予丰厚的补偿。而她要求人们付出的唯一辛劳只是合理的计算和对更大幸福坚定不移的优先选择。如有任何假冒的苦行者靠近她，对于这些喜悦和愉悦的敌人，她要么将其视作伪君子和骗子拒之门外，要么虽然允其入门，但却将其归入她最不喜爱的信徒之列。

And, indeed, to drop all figurative expression, what hopes can we ever have of engaging mankind to a practice which we confess full of austerity and rigour? Or what theory of morals can ever serve any useful purpose, unless it can show, by a particular detail, that all the duties, which it recommends, are also the true interest of each individual? The peculiar advantage of the foregoing system seems to be, that it furnishes proper mediums for that purpose.

事实上，如果舍弃一切修辞表达，我们如何还能希望让人们去进行那些我们自己都承认充满了艰苦和艰难的实践呢？抑或，何种道德理论能够达成有用的目的呢？除非这种道德理论能够通过特定的细节显现出它所推许的所有责任也是每一个个人的真正利益所在。上述体系的独特益处似乎就在于，它为达成这一目的提供了适用的工具手

段。

That the virtues which are immediately USEFUL or AGREEABLE to the person possessed of them, are desirable in a view to self-interest, it would surely be superfluous to prove. Moralists, indeed, may spare themselves all the pains which they often take in recommending these duties. To what purpose collect arguments to evince that temperance is advantageous, and the excesses of pleasure hurtful, when it appears that these excesses are only denominated such, because they are hurtful; and that, if the unlimited use of strong liquors, for instance, no more impaired health or the faculties of mind and body than the use of air or water, it would not be a whit more vicious or blameable.

以自我利益的观点来看，那些直接对其拥有者直接有用或是令其拥有者直接感到愉快的德性更令人渴求，对此无需加以求证。事实上，道德家们大可不必如此费尽苦心地去推许这些责任。既然过度之所以谓之过度，原因似乎仅仅在于它们是有害的，例如，倘若无限制地饮用烈酒并不比无限制地使用空气和水更有害身心健康的话，它就丝毫不会更邪恶和更应受谴责，那么，我们搜罗证据以表明节制是有益的而过度的玩乐则是有害的，目的何在？

It seems equally superfluous to prove, that the COMPANIONABLE virtues of good manners and wit, decency and genteelness, are more desirable than the contrary qualities. Vanity alone, without any other consideration, is a sufficient motive to make us wish for the possession of these accomplishments. No man was ever willingly deficient in this particular. All our failures here proceed from bad education, want of capacity, or a perverse and

unpliable disposition. Would you have your company coveted, admired, followed; rather than hated, despised, avoided? Can any one seriously deliberate in the case? As no enjoyment is sincere, without some reference to company and society; so no society can be agreeable, or even tolerable, where a man feels his presence unwelcome, and discovers all around him symptoms of disgust and aversion.

貌似同样无需加以求证的是，礼貌与机智、体面与高雅这样有利于交际的德性较之于那些与之相反的品质更令人渴求。无需其他任何考虑，单是出于虚荣的动机就足以令我们渴望拥有这些才艺了。在这一方面，从未有人自愿有所欠缺。我们在这一方面所有的不足，或是由于未受到良好的教育、不具备应有的才能，或是由于乖戾执拗的性情。难道你不想让自己在与人相处时受人爱慕、钦佩和追随，而不是遭人憎恨、鄙夷和躲避吗？在这种情形之下，有谁还能做到认真考虑、三思而后行呢？由于一切享乐倘若不涉及交际和社交就称不上是真正的享乐，因此，如果某人在社交时感到自己的在场不受欢迎，发现周围到处都是对自己的厌恶和反感，那这种社交就不会是令人愉快甚至是不堪忍受的。

But why, in the greater society or confederacy of mankind, should not the case be the same as in particular clubs and companies? Why is it more doubtful, that the enlarged virtues of humanity, generosity, beneficence, are desirable with a view of happiness and self-interest, than the limited endowments of ingenuity and politeness? Are we apprehensive lest those social affections interfere, in a greater and more immediate degree than any other pursuits, with private utility, and cannot be gratified, without some important sacrifice of honour and advantage? If so, we are but ill-instructed in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passions, and

are more influenced by verbal distinctions than by real differences.

然而，为何在更大的人类社会或联盟中，情形却不同于俱乐部和交际圈中的情形呢？从幸福和自我利益的观点来看，仁慈、慷慨和仁善这类宏大的德性，比机巧和礼貌这类受到限制的禀赋更令人渴求，为什么这一点更遭人怀疑？难道我们担心，较之于其他一切追求，这些社会感情会在更大程度上、更为直接地妨碍到私人效用，并且如若不以荣誉和利益的一些重大牺牲为代价，它们就不会得到满足吗？倘若如此，我们就纯粹是在人类激情的性质方面受到了错误的教导，更多地受到了字眼区别而非真实差异的影响。

Whatever contradiction may vulgarly be supposed between the SELFISH and SOCIAL sentiments or dispositions, they are really no more opposite than selfish and ambitious, selfish and revengeful, selfish and vain. It is requisite that there be an original propensity of some kind, in order to be a basis to self-love, by giving a relish to the objects of its pursuit; and none more fit for this purpose than benevolence or humanity. The goods of fortune are spent in one gratification or another: The miser who accumulates his annual income, and lends it out at interest, has really spent it in the gratification of his avarice. And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how why a man is more a loser by a generous action, than by any other method of expense; since the utmost which he can attain by the most elaborate selfishness, is the indulgence of some affection.

无论在私人还是社会情感或性情之间可能被粗俗地假定存在着何种矛盾，它们之间的对立事实上并不比自私与野心、自私与报复、自私与虚荣之间的对立更大。某种原初的癖好是必须的，以便通过赋予其追求对象某种趣味而成为自爱的一个基础。没有什么比仁爱或人道

更适合这一目的。财富是用来满足各种需求的，守财奴将日积月累的收入用来放贷其实是满足了他的贪婪。既然一个人锱铢必较的自私所能获得的最高回报不过是某种感情的尽情放纵，那么，要证明他在某一慷慨行为上的付出比在其他方面的支出损失更大，将困难重重。

Now if life, without passion, must be altogether insipid and tiresome; let a man suppose that he has full power of modelling his own disposition, and let him deliberate what appetite or desire he would choose for the foundation of his happiness and enjoyment. Every affection, he would observe, when gratified by success, gives a satisfaction proportioned to its force and violence; but besides this advantage, common to all, the immediate feeling of benevolence and friendship, humanity and kindness, is sweet, smooth, tender, and agreeable, independent of all fortune and accidents. These virtues are besides attended with a pleasing consciousness or remembrance, and keep us in humour with ourselves as well as others; while we retain the agreeable reflection of having done our part towards mankind and society. And though all men show a jealousy of our success in the pursuits of avarice and ambition; yet are we almost sure of their good-will and good wishes, so long as we persevere in the paths of virtue, and employ ourselves in the execution of generous plans and purposes. What other passion is there where we shall find so many advantages united; an agreeable sentiment, a pleasing consciousness, a good reputation? But of these truths, we may observe, men are, of themselves, pretty much convinced; nor are they deficient in their duty to society, because they would not wish to be generous, friendly, and humane; but because they do not feel themselves such.

如今，如果生活没有激情，就必定是彻头彻尾地单调乏味和令人

厌倦的，那么，且让那人假定自己完全有力量塑造自己的性情，让他认真思量自己将选择何种嗜欲或欲望作为自己幸福和享乐的根基。他将看到，所有的感情由于成功而获得满足时，都会带来一种与其力度和强度相应的满足感。然而，除去这一所有感情共有的益处之外，仁爱与友爱、仁慈与好心所带来的直接感受是甜蜜、平和、温柔和愉悦的，这种感受与一切财富和偶然事件无关。除此之外，当我们愉快地想着自己已为人类和社会尽了一己之力时，这些德性还能带来一种令人愉悦的意识或回忆，使我们在面对自己和他人时心情大好。尽管所有的人都会妒羡我们在贪婪和野心的追求上所获得的成功，然而，只要我们坚持走德性之道路，并致力于实现慷慨的计划和目标，那我们就一定会赢得他们的善意和祝福。我们还能发现有什么其他的激情能融合令人愉快的情感、令人愉悦的意识以及良好的声望这如此之多的益处吗？不过，我们也看到，人们对于这些真理是自发地信服，而他们之所以未能充分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变得慷慨、友爱和仁慈，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感到这些东西。

Treating vice with the greatest candour, and making it all possible concessions,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re is not, in any instance, the smallest pretext for giving it the preference above virtue, with a view of self-interest; except, perhaps, in the case of justice, where a man, taking things in a certain light, may often seem to be a loser by his integrity. And though it is allowed that, without a regard to property, no society could subsist; yet according to the imperfect way in which human affairs are conducted, a sensible knave, in particular incidents, may think that an act of iniquity or infidelity will make a considerable addition to his fortune, without causing any considerable breach in the social union and confederacy. That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may be a good general rule, but is liable to many exceptions; and he, it may perhaps be thought, conducts himself with most wisdom, who observes the general rule, and takes advantage of all the exceptions.

I must confess that, if a man thinks that this reasoning much requires an answer, it will be a little difficult to find any which will to him appear satisfactory and convincing. If his heart rebels not against such pernicious maxims, if he feels no reluctance to the thoughts of villainy or baseness, he has indeed lost a considerable motive to virtue; and we may expect that his practice will be answerable to his speculation. But in all ingenuous natures, the antipathy to treachery and roguery is too strong to be counter-balanced by any views of profit or pecuniary advantage. Inward peace of mind, consciousness of integrity, a satisfactory review of our own conduct; these are circumstances, very requisite to happiness, and will be cherished and cultivated by every honest man, who feels the importance of them.

如果我们以最大的坦率对待恶，并向它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那我们就必定会承认，以自我利益的观点来看，或许除法庭审案之外，在任何情况下都丝毫没有藉口扬恶抑德。因为在法庭审案中，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则往往可能因为自己的正直而输掉官司。尽管人们承认，不尊重财产权，社会就无以存续；然而，在特定事件中，鉴于人类不够完美的处事方式，一个有理智的无赖可能会认为，一个不公或不忠之举在不给社会结盟和联盟造成巨大破坏的同时，将会给他增添一笔可观的财富。做人诚实为本，或许是一条很好的一般法则，但也很容易出现例外。而人们可能会认为，一个人在遵守一般法则的同时利用其例外获得好处，是一种极富智慧的行为表现。我必须承认，如果那人认为这一推理非常需要一个答案，那么给出一个令其感到满意和信服的答案还是有些困难的。如果他的内心并不抗拒那些有害的准则，如果他并不抵触那些恶毒或卑鄙的想法，他事实上就已经丧失了践行德性的一个重要动机，而我们也可预见他的这一做法将会是其所思所想的一个回答。但在一切纯真的本性中，人们对背信弃义和无耻行径的憎恶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任何认为它们会产生利润或金钱收益的观点都无法将其抵消。心灵的内在平和、正直意识以及对我们自身行为

的满意审视，这些都是获得幸福所必需的因素，将得到所有感受到其重要性的诚实的人们的珍惜和培养。

Such a one has, besides, the frequent satisfaction of seeing knaves, with all their pretended cunning and abilities, betrayed by their own maxims; and while they purpose to cheat with moderation and secrecy, a tempting incident occurs, nature is frail, and they give into the snare; whence they can never extricate themselves, without a total loss of reputation, and the forfeiture of all future trust and confidence with mankind.

此外，当看到无赖们尽管将其狡诈和伎俩伪装起来，但却遭到他们自身准则的出卖时，这些诚实的人常常会获得另外一种满足；当无赖们企图神不知鬼不觉地行骗且见好就收时，诱惑的出现和本性的脆弱使他们落入陷阱，并且他们将永远无法脱身而出，除非彻底丧失声望、完全舍弃人们将来对他们的信任和信赖。

But were they ever so secret and successful, the honest man, if he has any tincture of philosophy, or even common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will discover that they themselves are, in the end, the greatest dupes, and have sacrificed the invaluable enjoyment of a character, with themselves at least, for the acquisition of worthless toys and gewgaws. How little is requisite to supply the necessities of nature? And in a view to pleasure, what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nbought satisfaction of conversation, society, study, even health and the common beauties of nature, but above all the peaceful reflection on one's own conduct; what comparison, I say, between these and the feverish, empty amusements of luxury and expense? These natural pleasures, indeed, are really without price; both

because they are below all price in their attainment, and above it in their enjoyment.

但是，即便他们总是行事隐秘、屡屡得手，诚实的人只要具备些许哲学眼光，甚或通常的观察和思索能力，就会发现，最终无赖们自己才是最大的傻瓜，为了获取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而牺牲了名声所带来的无价的享乐，至少是给他们自己带来的享乐。满足人性的必需品有多么少呢？就愉悦的角度而言，交谈、社交、学习，甚至健康和共有的人性美，尤其是对自身行为的一切静思，这些买不到的满足，我想说的是，这些满足与那些奢侈浪费、狂热空虚之间又有何可比性呢？实际上，这些自然的愉悦才是真正无价的，因为获得它们时分文不取，而享用它们时却是千金不易。

[10_1].Qualities useful to others.

[10_2].Qualities useful to the person himself.

[10_3].Qualities immediately agreeable to others.

[10_4].Qualities immediately agreeable to the person himself.

[10_5].It seems certain, both from reason and experience, that a rude, untaught savage regulates chiefly his love and hatred by the ideas of private utility and injury, and has but faint conceptions of a general rule or system of behaviour. The man who stands opposite to him in battle, he hates heartedly, not only for the present moment, which is almost unavoidable, but for ever after; nor is he satisfied without the most extreme punishment and vengeance. But we, accustomed to society, and to more enlarged reflections, consider, that this man is serving his own country and community; that any man, in the same situation, would do the same; that we ourselves, in like circumstances, observe a like conduct; that; in general, human society is best supported on such maxims: and by these suppositions and views, we correct, in some measure, our ruder and narrower positions. And though much of our friendship and enemity be still regulated by private considerations of benefit and harm, we pay, at least, this homage to general rules, which we are accustomed to respect, that we commonly perver our adversary's conduct, by imputing malice or

injustice to him, in order to give vent to those passions, which arise from self-love and private interest. When the heart is full of rage, it never wants pretences of this nature; though sometimes as frivolous, as those from which Horace, being almost crushed by the fall of a tree, effects to accuse of parricide the first planter of it.

[11_1].对他人有用的品质。

[11_2].对自己有用的品质。

[11_3].直接令他人愉快的品质。

[11_4].直接令自己愉快的品质。

[11_5].从理性和经验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肯定，一个粗野、无知的野蛮人主要根据私人效用和对私人的侵害这样的观念对自己的爱恨加以调控，他对于行为的一般法则或体系的概念十分模糊。对于战斗中的敌人，他不仅几乎不可避免地在当时而且自那以后直到永远都恨之入骨，并且，不对其施以极端的惩罚和报复，他就不会满足。但是，我们这些习惯于社会、习惯于更宏大思索的人却认为，这个人是在为他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效力；任何人在同样的境况之中都会像他一样；我们自己在相似的处境下也会遵行相似的行为；一般而言，人类社会主要是靠这样的准则来维系的；而凭借这些假定和观点，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自己较为粗野和狭隘的立场。尽管我们的友情与敌意大多仍然是由关于利益和损害的私人考量来加以调控的，但至少我们向已经习惯去尊敬的一般法则表达了敬意，即我们常常通过将恶意或不义加诸我们的仇敌，来歪曲他的行为，以此来发泄那些源自于自爱和私人利益的激情。当一个人的内心充满愤怒时，他绝不缺少这种托词，尽管这种托词有时是极为轻率的，就像贺拉斯差点被一颗倒下的树砸到时假装要控告栽树人犯有弑亲罪一般。

APPENDIX 1　CONCERNING MORAL SENTIMENT

附录一　关于道德情感

If the foregoing hypothesis be received, it will now be easy for us to determine the question first started, [11_1] concern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though we postponed the decision of that question, lest it should then involve us in intricate speculations, which are unfit for moral discourses, we may resume it at present, and examine how far either REASON or SENTIMENT enters into all decisions of praise or censure.

如果接受前述假设，那么一开始提出的关于道德的一般原则的问题，现在就很容易弄清了 [12_1] ；尽管我们推迟解决这个问题，免得使我们陷入与道德讨论不适宜的复杂思辨中，现在我们却可以重拾这个问题，研究理性或情感在称赞或责难的决定中发挥多大的作用。

One principal foundation of moral praise being supposed to lie in the usefulness of any quality or action, it is evident that REASON must enter for a considerable share in all decisions of this kind; since nothing but that faculty can instruct us in the tendency of qualities and actions, and point out their beneficial consequences to society and to their possessors. In many cases this is an affair liable to great controversy: Doubts may arise; opposite interests may occur; and a preference must be given to one side, from very nice views, and a small overbalance of utility. This is particularly remarkable in questions with regard to justice; as is, indeed, natural to suppose, from that species of utility which attends this virtue.

[11_2] Were every single instance of justice, like that of benevolence, useful to society; this would be a simpler state of the case, and seldom liable to great controversy. But as single instances of justice are often pernicious in their first and immediate tendency, and as the advantage to society results only from the observance of the general rule, and from the concurrence and combination of several persons in the same equitable conduct; the case here becomes more intricate and involved. The various circumstances of society; the various consequences of any practice; the various interests which may be proposed; these, on many occasions, are doubtful, and subject to great discussion and inquiry. The object of municipal laws is to fix all the questions with regard to justice: The debates of civilians; the reflections of politicians; the precedents of history and public records, are all directed to the same purpose. And a very accurate REASON or JUDGEMENT is often requisite, to give the true determination, amidst such intricate doubts arising from obscure or opposite utilities.

假定道德称赞的首要基础在于任何品质或行动的有用性中，那么显然，理性必定极大地影响着所有这类决定；因为只有这种能力可以在品质和行为的趋向中给我们指导，并指出它们对社会及其拥有者的有利后果。很多情况下，这件事都容易引起重大争议；可能产生各种怀疑，也可能出现各种对立的利益；从十分微妙的视角和略偏重于效用的倾向出发，选择必定优先给予某一方。在关于正义的问题上，这是尤为显著的；实际上，这正是基于正义这一德性所带来的那类效用而自然作出的一个假定 [12_2] 。如果每一次正义之举都像仁爱那样对社会有用，情况将会比较简单，也不易引起重大的争论。但是由于正义的单一例子在其最初的直接趋向上往往是有害的，而其对社会的益处仅仅产生于对一般规则的奉行，产生于在同样正义行为中人们的协力和联合，因而事情在此变得比较复杂和纠结。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情形，任何实践的各种不同的后果，以及可能被提及的种种不同的利

益，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可怀疑的，需要大量探讨和研究。国内法的目标是确定一切有关正义的问题，平民的辩论、政治家的反思、历史和档案记载中的先例，都是为了这一目标。在各种模糊或对立的效用所引起如此复杂的种种怀疑中，为了做出真正的规定，一种非常精确的理性或判断力常常是必不可少的。

But though reason, when fully assisted and improved, be sufficient to instruct us in the pernicious or useful tendency of qualities and actions; it is not alone sufficient to produce any moral blame or approbation. Utility is only a tendency to a certain end; and were the end totally indifferent to us, we should feel the same indifference towards the means. It is requisite a SENTIMENT should here display itself, in order to give a preference to the useful above the pernicious tendencies. This SENTIMENT can be no other than a feeling for the happiness of mankind, and a resentment of their misery; since these are the different ends which virtue and vice have a tendency to promote. Here therefore REASON instructs us in the several tendencies of actions, and HUMANITY makes a distinction in favour of those which are useful and beneficial.

尽管在得到充分的辅助和改进时，理性足以在品质和行为的有害或有用的趋向上给我们指明，然而理性自身却不足以产生任何道德的谴责或赞许之情。效用只是对于某一目的的一种趋向，假如这一目的于我们而言完全漠不相关，那么我们对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同样也会感到漠然。为了优先选择有用的而非有害的趋向，在此，情感需要得到展现。这种情感只能是对人类幸福的关切和对人类苦难的愤恨，因为这些正是德性和恶行各自的趋向促进的不同结果。所以，在这里，理性在行动的诸种趋向中给予我们指导，而人道则从中区分出了有用的和有益的趋向。

This partition between the faculties of understanding and sentiment, in all moral decisions, seems clear from the preceding hypothesis. But I shall suppose that hypothesis false: It will then be requisite to look out for some other theory that may be satisfactory; and I dare venture to affirm that none such will ever be found, so long as we suppose reason to be the sole source of morals. To prove this, it will be proper to weigh the fiv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从上述的假设来看，在所有道德判断中，知性能力和情感能力之间的划分似乎是清楚的。但是我将假定这一假设是虚妄的，那么就必须去寻求某种别的令人满意的理论；而我大胆地断言，只要我们假设理性为道德的唯一来源，就决找不到这样的理论。为了证明这一点，权衡以下五种考虑将会是适当的做法。

I . It is easy for a false hypothesis to maintain some appearance of truth, while it keeps wholly in generals, makes use of undefined terms, and employs comparisons, instead of instances. This is particularly remarkable in that philosophy, which ascribes the discernment of all moral distinctions to reason alone, without the concurrence of sentiment. It is impossible that, in any particular instance, this hypothesis can so much as be rendered intelligible, whatever specious figure it may make in general declamations and discourses. Examine the crime of INGRATITUDE, for instance; which has place, wherever we observe good-will, expressed and known, together with good-offices performed, on the one side, and a return of ill-will or indifference, with ill-offices or neglect on the other: anatomize all these circumstances, and examine, by your reason alone, in what consists the demerit or blame. You never will come to any issue or conclusion.

一、就一个虚假的假设而言，当它完全着眼于一般情况，使用未限定的术语，采用比较而非例证时，很容易保持某种真理的表象。这一点在哲学中尤为明显，即把对所有德恶之别的辨识全归于理性，而排除来自情感方面的助力。不论这一假设在一般的演说和话语中会给人留下多么似乎有理的印象，在任何具体的事例中，人们都不可能理解得了它。譬如，以对忘恩负义的罪恶的考察为例。不论我们在哪里看到一方表现出明确的善意并施以援手，而另一方却报以恶意或漠然并报以恶意或是置之不理时，我们都能看见忘恩负义的罪恶。剖析所有这些因素，仅凭理性考察这一缺点或谴责指的是什么，你们是永远不会得到任何结果或结论的。

Reason judges either of MATTER OF FACT or of RELATIONS. Enquire then, first, where is that matter of fact which we here call crime; point it out; determine the time of its existence; describe its essence or nature; explain the sense or faculty to which it discovers itself. It resides in the mind of the person who is ungrateful. He must, therefore, feel it, and be conscious of it. But nothing is there, except the passion of ill-will or absolute indifference. You cannot say that these, of themselves, always, and in all circumstances, are crimes. No, they are only crimes when directed towards persons who have before expressed and displayed good-will towards us. Consequently, we may infer, that the crime of ingratitude is not any particular individual FACT; but arises from a complication of circumstances, which, being presented to the spectator, excites the SENTIMENT of blame, by the particular structure and fabric of his mind.

理性要么是判断事实问题，要么是判断关系问题。首先，让我们来探究在这里被称为罪恶的那个事实存在于何处，把它指出来，确定其存在时间，描述其实质或本质，解释它自我发现的感官或能力。它

存在于那个忘恩负义之人的心里。因此他必定能感受到它，意识到它。但是除了恶意或绝对漠然的激情之外，他的心里别无其他。你们不能说，它们本身以及在所有条件下都是罪恶。不，只有在指向那些先前对我们表达和显示出善意的人们时，它们才是罪恶。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忘恩负义的罪恶不是任何特定的单个事实，而是起因于一些复杂的因素，当这些因素被呈现给旁观者时，由于他们心灵的特定结构和组织才激起了谴责的情感。

This representation, you say, is false. Crime, indeed, consists not in a particular FACT, of whose reality we are assured by reason; but it consists in certain MORAL RELATIONS, discovered by reason, in the same manner as we discover by reason the truths of geometry or algebra. But what are the relations, I ask, of which you here talk? In the case stated above, I see first good-will and good-offices in one person; then ill-will and ill-offices in the other. Between these, there is a relation of CONTARIETY. Does the crime consist in that relation? But suppose a person bore me ill-will or did me ill-offices; and I, in return, were indifferent towards him, or did him good offices. Here is the same relation of CONTRARIETY; and yet my conduct is often highly laudable. Twist and turn this matter as much as you will, you can never rest the morality on relation; but must have recourse to the decisions of sentiment.

你们说，这些描述是虚假的。其实，罪恶并不存在于一个我们凭理性而确定其实在性的特定事实，而存在于我们凭理性像发现几何学或代数学的真理那样发现的一定的道德关系之中。但是我问，你们这里谈到的是什么关系？在上述情况中，我看到的首先是一个人的善意和善举，然后是另一个人的恶意和恶举。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的关系。难道罪恶就存在于这种对立的关系之中吗？但是假定一个人对我怀有恶意或是施以恶举，而我反过来对他淡漠处之，甚至对他施

以善举。这里也存在着同一种对立的关系，然而我的行为通常受到高度的颂扬。你们只管随心所欲地变换这个问题，但是决不能由此而将道德准则建立在关联上，而必须诉诸情感判断。

When it is affirmed that two and three are equal to the half of ten, this relation of equality I understand perfectly. I conceive, that if te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f which one has as many units as the other; and if any of these parts be compared to two added to three, it will contain as many units as that compound number. But when you draw thence a comparison to moral relations, I own that I am altogether at a loss to understand you. A moral action, a crime, such as ingratitude, is a complicated object. Does the morality consist in the relation of its parts to each other? How? After what manner? Specify the relation: Be more particular and explicit in your propositions, and you will easily see their falsehood.

当断言二加三等于十的一半时，我完全理解这个等式关系。我设想，如果把十分成单位相等的两部分，把其中的任何一部分与二加三相比较，那么它将包含与二加三的和相等的数量单位。但是，当由此而引申出一种与道德关系的比较时，我承认我完全无法理解你们。一种道德的行动，一种罪恶，譬如忘恩负义，是一个复杂的对象。难道道德性在于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吗？是怎样存在的？按照什么方式？详察这种关系，让命题更加详细和明晰，你们将会很容易看出它们的虚妄。

No, say you, the morality consists in the relation of actions to the rule of right; and they are denominated good or ill, according as they agree or disagree with it. What then is this rule of right? In what does it consist? How is it determined? By reason, you say,

which examines the moral relations of actions. So that moral relations are determined by the comparison of actions to a rule. And that rule is determined by considering the moral relations of objects. Is not this fine reasoning?

你们说，不，道德性在于行为对正当规则的关系；行为按照是否符合正当规则而被称为善的或恶的。那么这条正当规则是什么呢？它在于什么？它是如何决定的？你们说，是由考察行为的道德关系的理性所决定的。因此道德关系是由行为和某条规则的比较所决定的。而这条规则又是由对于对象的道德关系的考虑所决定的。这难道不是精致的推理吗？

All this is metaphysics, you cry. That is enough; there needs nothing more to give a strong presumption of falsehood. Yes, reply I, here are metaphysics surely; but they are all on your side, who advance an abstruse hypothesis, which can never be made intelligible, nor quadrate with any particular instance or illustration. The hypothesis which we embrace is plain. It maintains that morality is determined by sentiment. It defines virtue to be WHATEVER MENTAL ACTION OR QUALITY GIVES TO A SPECTATOR THE PLEASING SENTIMENT OF APPROBATION; and vice the contrary. We then proceed to examine a plain matter of fact, to wit, what actions have this influence. We consider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se actions agree, and thence endeavour to extract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se sentiments. If you call this metaphysics, and find anything abstruse here, you need only conclude that your turn of mind is not suited to the moral sciences.

你们叫喊道，这全都是形而上学。那就够了，再也没有任何必要给出一个强有力的虚妄假设。是的，我回答，这些的确是形而上学，不过它们全都在支持你们推进一个深奥的假设。这一假设永远不被人们理解，也难以适合于任何特定的事例或例证。而我们所持的假设却是浅显明白的。它坚持道德性是由情感所决定的。它将德性界定为所有能够给予观者令人愉悦的赞许之情的心理活动或品质，恶行则与之相反。我们接下来开始考察一个浅显明白的事实，即什么行动具有这样的影响力。我们考虑这些行动共同具有的所有因素，之后努力引出关于这些情感的某些一般性见解。如果你们将这称为形而上学，并于此发现任何玄奥之处，那么你们只好断定自己的心智思维不适合精神科学。

II. When a man, at any time, deliberates concerning his own conduct (as, whether he had better, in a particular emergence, assist a brother or a benefactor), he must consider these separate relations, with all the circumstances and situations of the person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superior duty and obligation; and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proportion of lines in any triangle,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nature of that figure, and the relation which its several parts bear to each other. But notwithstanding this appearing similarity in the two cases, there is, at bottom, an extre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 speculative reasoner concerning triangles or circles considers the several known and given relations of the parts of these figures; and thence infers some unknown relation, which is dependent on the former. But in moral deliberations we must be acquainted beforehand with all the objects, and all their relations to each other; and from a comparison of the whole, fix our choice or approbation. No new fact to be ascertained; no new relation to be discovered.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re supposed to be laid before us, ere we can fix any sentence of blame or approbation. If any material circumstance be

yet unknown or doubtful, we must first employ our inquiry or intellectual faculties to assure us of it; and must suspend for a time all moral decision or sentiment. While we are ignorant whether a man were aggressor or not, how can we determine whether the person who killed him be criminal or innocent? But after every circumstance, every relation is known, the understanding has no further room to operate, nor any object on which it could employ itself. The approbation or blame which then ensues, cannot be the work of the judgement, but of the heart; and is not a speculative proposition or affirmation, but an active feeling or sentiment. In the disquisitions of the understanding, from known circumstances and relations, we infer some new and unknown. In moral decisions, all the circumstances and relations must be previously known; and the mind, from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whole, feels some new impression of affection or disgust, esteem or contempt, approbation or blame.

二、任何时候，当一个人慎重考虑自己的行为时，例如在一个特定的紧要关头他最好是帮助兄弟还是帮助恩人，他都必须依照所有人们所处的条件和境况而考虑这些不同的关系以确定优先的义务和责任；而为了确定任何一个三角形的诸边比例，就必须考察这个图形的性质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两种情况看起来相似，实际上却存在极大的差异。对于三角形或圆形，一个善于思考的推理者考虑的是这些图形各部分之间的一些已知和给定的关系；并依赖于这些关系去推论出某种未知的关系。但是在关乎道德的审慎思考中，我们必须预先熟悉所有对象以及这些对象彼此之间的所有关系，通过整体比较，才可以确定我们的选择和赞许。没有新的事实要去确定，也没有新的关系要去发现。在能够确定任何谴责或赞许的判定之前，我们假定相关情况的一切因素都摆在自己面前。如有任何实质性的因素仍是未知的或可疑的，我们就必须首先运用我们的探究或理智能力把它弄清楚，而且必须把一切道德的决定或情感暂时悬置。当我们不清楚一

个人是否为侵犯者时，我们如何能判定杀死他的那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呢？但是当每个因素、每种关系已知之后，知性又失去了进一步发挥的余地，也没有了它能够自己发挥作用的对象。因此，随即发生的赞许或谴责不可能是理智判断的结果，而只能是用心感受的结果，这不是一个思考所得的命题或断言，而是一种积极的感受或情感。在知性的专题研究中，我们从已知的因素和关系中推断出某种新的未知的因素和关系。在道德判断中，所有因素和关系都必须预先得以知晓，心灵则是从整体思量中感受到某种喜爱或厌恶、敬重或轻蔑、赞许或谴责的新印象。

Hence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a mistake of FACT and one of RIGHT; and hence the reason why the one is commonly criminal and not the other. When Oedipus killed Laius, he was ignorant of the relation, and from circumstances, innocent and involuntary, formed erroneous opinions concerning the action which he committed. But when Nero killed Agrippina, all the relations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person, and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fact, were previously known to him; but the motive of revenge, or fear, or interest, prevailed in his savage heart over the sentiments of duty and humanity. And when we express that detestation against him to which he himself, in a little time, became insensible, it is not that we see any relations, of which he was ignorant; but that, from the rectitude of our disposition, we feel sentiments against which he was hardened from flattery and a long perseverance in the most enormous crimes.

因而对事实和对正当的误解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在同一件事中通常一个人有罪而另一个人无罪。当俄狄浦斯杀死拉伊俄斯时，他并不知晓他们二人的关系，并且由于无恶意和非自愿的因素，他对自己采取的行动形成了错误的观点。但是当尼禄杀死阿格里皮娜

时，他事先知晓他自己和她之间的所有关系以及事实的所有因素，然而在他残忍的内心中，复仇或是恐惧或是利益的动机压倒了道德义务和人道的情感。当我们对他表示出那种他本人早已麻木不仁的憎恶时，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他所不知道的关系；而是由于性情正直，我们对此事感到反感，而他则因受到谄媚和一贯作恶多端而并不为之所动。

In these sentiments then, not in a discovery of relations of any kind, do all moral determinations consist. Before we can pretend to form any decision of this kind, everything must be known and ascertained on the side of the object or action. Nothing remains but to feel, on our part, some sentiment of blame or approbation; whence we pronounce the action criminal or virtuous.

因此，一切的道德判断都正在于这些情感，而不在于任何一种关系的发现。在我们可以自诩形成任何道德决定之前，对象和行为的方方面面都必须被了解和查明。而我们自身要做的仅仅是感受某种谴责抑或赞许的情感，据此我们宣布某种行为是罪恶或有德性的。

III. This doctrine will become still more evident, if we compare moral beauty with natural, to which, in many particulars, it bears so near a resemblance. It is on the proportion, relation, and position of parts, that all natural beauty depends; but it would be absurd thence to infer, that the perception of beauty, like that of truth in geometrical problems, consists wholly in the perception of relations, and was performed entirely by the understanding or intellectual faculties. In all the sciences, our mind from the known relations investigates the unknown. But in all decisions of taste or external beauty, all the relations are beforehand obvious to the eye; and we

thence proceed to feel a sentiment of complacency or disgust,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object, and disposition of our organs.

三、如果我们将道德美和与它在许多细节处存在相似之处的自然美做比较，这一学说将变得更加清晰。一切自然之美都依赖于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和位置；但是如果由此推断，对美的感知，是像对几何学问题中的真理认知一样，完全依赖于对关系的知觉，完全由知性或智性能力决定，那将会是荒谬的。在一切科学中，我们的心灵都是依据已知的关系去探求未知的关系。但是在关于鉴赏力或外在美的所有决定中，一切关系都是预先就显而易见的；由此，根据对象的性质和我们的器官特质，我们生发出满足或厌恶的情感。

Euclid has fully explained all the qualities of the circle; but has not in any proposition said a word of its beauty. The reason is evident. The beauty is not a quality of the circle. It lies not in any part of the line, whose parts are equally distant from a common centre. It is only the effect, which that figure produces upon the mind, whose peculiar fabric or structure renders it susceptible of such sentiments. In vain would you look for it in the circle, or seek it, either by your senses or by mathematical reasonings, in all the properties of that figure.

欧几里得充分解释了圆的一切性质，但是在任何命题中对于圆的美都未曾进行过任何描述。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美不是圆的性质。美不在于圆周线条的任何部分，圆周各个部分到圆心的距离是相等的。美仅仅是圆形在人内心中产生的一种效果，它特有的结构或组织使得人们容易感受这样一些情感。你们到圆中去寻找美，或者在其一切属性中，或是通过感官或是通过数学推理去寻求美，这都将是白费力气。

Attend to Palladio and Perrault, while they explain all the parts and proportions of a pillar. They talk of the cornice, and frieze, and base, and entablature, and shaft, and architrave; and give the description and position of each of these members. But should you ask the description and position of its beauty, they would readily reply, that the beauty is not in any of the parts or members of a pillar, but results from the whole, when that complicated figure is presented to an intelligent mind, susceptible to those finer sensations. Till such a spectator appear, there is nothing but a figure of such particular dimensions and proportions: From his sentiments alone arise its elegance and beauty.

我们看看帕拉第奥和佩罗是如何解释圆柱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各种比例的。他们谈到了上楣、中楣、底座、楣构、柱身和下楣，并对每一个组成部分进行了描述和说明。但是如果你们向他们追问关于圆柱之美的描述和说明，他们会欣然回答，美不在于圆柱的任何一个部分或构件，而是当这个复杂的图像呈现于易于产生较精细感受的理智心灵时，从其整体之中产生的。在这样一个观察者出现之前，存在的只是具有这些特定尺寸和比例的图形而已；只有从观察者的情感中才产生了赋予它的雅致和美。

Again; attend to Cicero, while he paints the crimes of a Verres or a Catiline. You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 moral turpitude results, in the same manner, from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whole, when presented to a being whose organs have such a particular structure and formation. The orator may paint rage, insolence, barbarity on the one side; meekness, suffering, sorrow, innocence on the other. But if you feel no indignation or compassion arise in you from this complication of circumstances, you would in vain ask

him, in what consists the crime or villainy, which he so vehemently exclaims against. At what time, or on what subject it first began to exist. And what has a few months afterwards become of it, when every disposition and thought of all the actors is totally altered or annihilated. No satisfactory answer can be given to any of these questions, upon the abstract hypothesis of morals; and we must at last acknowledge, that the crime or immorality is no particular fact or relation, which can be the object of the understanding, but arises entirely from the sentiment of disapprobation, which, by the structure of human nature, we unavoidably feel on the apprehension of barbarity or treachery.

我们再来看看西塞罗是如何描写维勒斯和喀提林之流的罪恶的。你们一定认为，道德的恶劣，同样也是产生于它被呈现在一个其器官具有这样一种特定结构和构造的生物面前时，这个生物对其整体的思考。这位演说家可以将一方描绘为狂暴、傲慢、野蛮成性，而将另一方描绘为温顺、苦楚、悲伤、无辜。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这些因素的复杂性并不能激起自己的义愤或怜悯，那么你们可以去问他如此强烈地控诉的罪恶或邪恶究竟在于什么？它首先存在于什么时间或什么主体之中？当所有行为者的所有气质和思想都彻底改变或湮灭的时候，它在往后的岁月中又将变成什么？虽然你们会徒劳无果。基于抽象的道德假设，对于任何一个问题，他们决不可能给出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最终必须承认，罪恶或不道德，不是任何一个可被理解的对象的特定事实或关系，而是完全源于一种不满的情感，而人类的本性结构使我们在感受野蛮和背信弃义时必然感受到这种不满的情感。

IV. Inanimate objects may bear to each other all the same relations which we observe in moral agents; though the former can never be the object of love or hatred, nor are consequently susceptible of merit or iniquity. A young tree, which over-tops and

destroys its parent, stands in all the same relations with Nero, when he murdered Agrippina; and if morality consisted merely in relations, would no doubt be equally criminal.

四、无生命的对象相互之间可能具有我们在道德行为者中所观察到的那些同样的关系，尽管前者决不可能成为爱或恨的对象，因此也决不能认为其具有价值或罪恶。一棵超越并毁灭了其亲本的子树，和尼禄谋杀阿格丽庇娜处在完全相同的关系中；如果道德性单纯存在于关系之中的话，毫无疑问，它将同样有罪。

V．It appears evident that—the ultimate ends of human actions can never, in any case, be accounted for by reason, but recommend themselves entirely to the sentiments and affections of mankind, without any dependance on the intellectual faculties. Ask a man WHY HE USES EXERCISE; he will answer, BECAUSE HE DESIRES TO KEEP HIS HEALTH. If you then enquire, WHY HE DESIRES HEALTH, he will readily reply, BECAUSE SICKNESS IS PAINFUL. If you push your enquiries farther, and desire a reason WHY HE HATES PAIN, it is impossible he can ever give any. This is an ultimate end, and is never referred to any other object.

五、显然，在任何情况下，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都绝对不能通过理性来解释，而只能完全诉诸人类的情感和感情，毫不依赖于智力。问一个人“他为什么锻炼”，他会回答“因为他希望自己保持健康”。如果你接着问“他为什么希望健康”，他将欣然回答“因为疾病使人痛苦”。如果你们把问题更推进一步，想得到“他为什么憎恶痛苦”的理由，那么他不可能给出任何一个理由。这就是一个最终目的，绝不涉及任何其他的对象。

Perhaps to your second question, WHY HE DESIRES HEALTH, he may also reply,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EXERCISE OF HIS CALLING. If you ask, WHY HE IS ANXIOUS ON THAT HEAD, he will answer, BECAUSE HE DESIRES TO GET MONEY. If you demand WHY? IT IS THE INSTRUMENT OF PLEASURE, says he. And beyond this it is an absurdity to ask for a reason. It is impossible there can be a progress IN INFINITUM; and that one thing can always be a reason why another is desired. Something must be desirable on its own account, and because of its immediate accord or agreement with human sentiment and affection.

或许对于你们的第二个问题“他为什么希望健康”，他可能会回答“这对他执行工作来说是必需的”。如果你们问“他为什么那样在乎那份工作”，他将回答“因为他希望挣到钱”。如果你们问道“为什么？”他就会说“金钱是快乐的工具”。除此之外再去寻求一个理由就是一件荒唐事。不可能有一个无限的过程，一事物也不可能总是能成为另一事物为什么被需求的理由。一定有某些事物是因为它自身之故而令人需求，因为它直接符合或与人类的情感和感情相一致。

Now as virtue is an end, and is desirable on its own account, without fee or reward, merely for the immediate satisfaction which it conveys; it is requisite that there should be some sentiment which it touches, some internal taste or feeling, or whatever you may please to call it, which distinguishes moral good and evil, and which embraces the one and rejects the other.

由于德性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且源于自身之故，不需要任何报酬和奖赏，仅仅因为它所传达的直接满足感就是令人需求的；而必不可少的是，应当有某种被它触动的情感，某种内在的审美趣味或感受，

或者不论你们乐于称呼它什么，它区别了道德的善与恶，接受前者而摒弃后者。

Thus the distinct boundaries and offices of REASON and of TASTE are easily ascertained. The former conveys the knowledge of truth and falsehood: The latter gives the sentiment of beauty and deformity, vice and virtue. The one discovers objects as they really stand in nature, without addition or diminution; the other has a productive faculty, and gilding or staining all natural objects with the colours, borrowed from internal sentiment, raises in a manner a new creation. Reason being cool and disengaged, is no motive to action, and directs only the impulse received from appetite or inclination, by showing us the means of attaining happiness or avoiding misery: Taste, as it gives pleasure or pain, and thereby constitutes happiness or misery, becomes a motive to action, and is the first spring or impulse to desire and volition. From circumstances and relations, known or supposed, the former leads us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concealed and unknown: after all circumstances and relations are laid before us, the latter makes us feel from the whole a new sentiment of blame or approbation. The standard of the one, being founded on the nature of things, is eternal and inflexible, even by the will of the Supreme Being: The standard of the other arising from the internal frame and constitution of animals, is ultimately derived from that Supreme Will, which bestowed on each being its peculiar nature, and arranged the several classes and orders of existence.

这样，理性和趣味的不同范围和职责就很容易确认了。前者传达的是关于真理和谬误的知识；后者则产生关于美和丑、德性和恶行的情感。一方按照对象在自然界中的实际情形揭示它们，不增不减；另

一方具有一种创造力，它借用内在情感的色彩装点或着色一切自然对象时，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创造物。理性，由于其本身的冷漠和超然，因而不是行为的动机，只是通过给我们指明获得幸福或避免苦难的手段，从而引起我们出自欲望或爱好的冲动；趣味，它产生快乐或痛苦，也由此构成幸福和苦难的本质，因而变成行动的动机，是欲望和意愿的首要源泉和动力。前者根据已知的或假定的因素和关系，引导我们发现隐藏的和未知的因素和关系；后者在一切因素和关系摆在我们面前之后，使我们从整体上感受关于谴责和赞许的新的情感。前者的标准基于万物的本性，是恒久不变的，即使是最高存在物的意志也不能改变；后者的标准来自动物的永久构架和组织，终究是起源于那个最高存在物的意志——这一意志赋予每一个存在物特有的本性，并给整个存在排好了各种等级和秩序。

[11_1].Sect. 1.

[11_2].See App. 2.

[12_1].第一章。

[12_2].见附录二。

APPENDIX 2　OF SELF-LOVE

附录二　论自爱

There is a principle, supposed to prevail among many, which is utterly incompatible with all virtue or moral sentiment; and as it can proceed from nothing but the most depraved disposition, so in its turn it tends still further to encourage that depravity. This principle is, that all BENEVOLENCE is mere hypocrisy, friendship a cheat, public spirit a farce, fidelity a snare to procure trust and confidence; and that while all of us, at bottom, pursue only our private interest, we wear these fair disguises, in order to put others off their guard, and expose them the more to our wiles and machinations. What heart one must be possessed of who professes such principles, and who feels no internal sentiment that belies so pernicious a theory, it is easy to imagine, and also what degree of affection and benevolence he can bear to a species whom he represents under such odious colours, and supposes so little susceptible of gratitude or any return of affection. Or if we should not ascribe these principles wholly to a corrupted heart, we must at least account for them from the most careless and precipitate examination. Superficial reasoners, indeed, observing many false pretences among mankind, and feeling, perhaps, no very strong restraint in their own disposition, might draw a general and a hasty conclusion that all is equally corrupted, and that men, different from all other animals, and indeed from all other species of existence, admit of no degrees of good or bad, but are, in every instance, the same creatures under different disguises and appearances.

有一条原则被假定在众多的原则中处于支配的地位，它与一切德性或道德情感完全不相容；由于它只能是出自最堕落的气质，因而它也就随之趋向于更进一步助长那种堕落。这条原则就是，所有仁爱是纯粹的伪善，友爱是一种欺骗，公共精神是一种闹剧，忠实是一种为获取信任和信赖设计的圈套。当我们全都内心只追求个人利益时，我们就披上这些漂亮的伪装，以解除他人的防备，使他们更多地暴露于我们的诡计和阴谋面前。当一个人拥有这样的原则，又感到没有什么内在情感同如此有害的理论相矛盾时，他必定拥有一颗什么样的心，是很容易想象的；而他对一个自己用如此丑陋的色彩加以描绘、并设想其根本没有感激或任何感情回报的物种，能怀有何种程度的感情和仁爱，也是很容易想象的。或者，如果说我们不应当把这些原则完全归于一颗腐败的心，我们就必须至少通过最粗疏和最仓促的考察来对它们进行说明。的确，当肤浅的推理者看到人类中存在许多虚假的欺诈，或许也感到自己的性情中没有任何强有力的约束时，他们可能引出一个普遍又草率的结论，即所有人都是同样堕落腐化的，尽管人类与一切其他动物，实际上与一切其他存在物种都不同，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好或坏的程度差别，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过是披着不同伪装和外衣的相同被造物。

There is another principle, somewhat resembling the former; which has been much insisted on by philosophers, and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many a system; that, whatever affection one may feel, or imagine he feels for others, no passion is, or can be disinterested; that the most generous friendship, however sincere, is a modification of self-love; and that, even unknown to ourselves, we seek only our own gratification, while we appear the most deeply engaged in schemes for the liberty and happiness of mankind. By a turn of imagination, by a refinement of reflection, by an enthusiasm of passion, we seem to take part in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and imagine ourselves divested of all selfish considerations: But, at bottom, the most generous patriot and most niggardly miser, the

bravest hero and most abject coward, have, in every action, an equal regard to their own happiness and welfare.

另有一条原则多少与前一条原则有些类似，它一直为哲学家们所坚持，一直是许多体系的基础。这条原则就是，不论一个人可能感受到或者想象自己感受到什么样的感情，没有一种激情是或能够是无私的；即使是最宽宏的友爱，不论多么真诚，都是自爱的一种变体；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当我们看起来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进行的谋划时，我们只是在寻求自己的满足。通过想象的倾向、反思的提炼、激情的热忱，我们似乎加入了他人的利益，并想象自己摈弃了一切自私的考虑；但从根本上来说，最慷慨的爱国者和最吝啬的守财奴，最勇敢的英雄和最怯弱的懦夫，在每一个行动中都同样地关注自己的幸福和福利。

Whoever concludes from the seeming tendency of this opinion, that those, who make profession of it, cannot possibly feel the true sentiments of benevolence, or have any regard for genuine virtue, will often find himself, in practice, very much mistaken. Probity and honour were no strangers to Epicurus and his sect. Atticus and Horace seem to have enjoyed from nature, and cultivated by reflection, as generous and friendly dispositions as any disciple of the austerer schools. And among the modern, Hobbes and Locke, who maintained the selfish system of morals, lived irreproachable lives; though the former lay not under any restraint of religion which might supply the defects of his philosophy.

无论谁根据这种观点的表面趋向而推断，那些声称信奉它的人决不可能感受真正的仁爱之情，或决不可能对真正的德性有任何尊重，他将经常发现自己在实践中大错特错。正直和道义对伊壁鸠鲁及其学

派来说并不陌生。阿提库斯和贺拉斯似乎从自然中求得了乐趣，并通过反思提高了教养，他们慷慨友爱的性情同那些苦行学派的门徒们如出一辙。在现代人中，坚持自私论道德体系的霍布斯和洛克，却过着无可挑剔的生活，尽管霍布斯不受宗教——它或许可以弥补他的哲学上的不足之处——的任何约束。

An epicurean or a Hobbist readily allows,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a friendship in the world, without hypocrisy or disguise; though he may attempt, by a philosophical chymistry, to resolve the elements of this passion, if I may so speak, into those of another, and explain every affection to be self-love, twisted and moulded, by a particular turn of imagination, into a variety of appearances. But as the same turn of imagination prevails not in every man, nor gives the same direction to the original passion; this is sufficient even according to the selfish system to make the widest difference in human characters, and denominate one man virtuous and humane, another vicious and meanly interested. I esteem the man whose self-love, by whatever means, is so directed as to give him a concern for others, and render him serviceable to society: As I hate or despise him, who has no regard to anything beyond his own gratifications and enjoyments. In vain would you suggest that these characters, though seemingly opposite, are at bottom the same, and that a very inconsiderable turn of thought forms the who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Each character, notwithstanding these in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appears to me, in practice, pretty durable and untransmutable. And I find not in this more than in other subjects, that the natural sentiments arising from the general appearances of things are easily destroyed by subtile reflections concerning the minute origin of these appearances. Does not the lively, cheerful colour of a countenance inspire me with complacency and pleasure; even though I learn from philosophy that all difference of

complexion arises from the most minute differences of thickness, in the most minute parts of the skin; by means of which a superficies is qualified to reflect one of the original colours of light, and absorb the others?

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或一个霍布斯派的人乐于承认，世界上存在像友爱一类没有伪善或伪装的事物；尽管他可能试图通过一种哲学的化学将这种激情的元素分解——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成为另一种激情的元素，并将每一种感情都解释成自爱，解释成由某种想象力倾向变形和铸造出来的现象多样体。但是由于同一种想象力倾向并不对每一个人都能起支配作用，也不会给予这种原始激情同一种指引，因此，即使以自私论的道德体系为准，也足以在人类性格中造成极大的差异，并将一个人称为有德的和人道的，而将另一个人称为邪恶的和卑鄙的。我敬重这样的人，无论通过什么方式，他的自爱都指引他对他人怀有关怀之心，对社会能带来益处；正如我憎恶或轻蔑这样的人，他毫不关注除了他自己的满足和享受之外的任何事物。如果你们试图表明，这两种性格虽然表面是对立的，实际上是一样的，是一种完全微不足道的思想倾向形成它们之间的整个差异，那将会是徒劳的。在我看来，每一种性格，尽管存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差异，其实都是相当持久且不易改变的。我发现，与在其他论题上一样，事物的一般现象在这个论题上所引起的自然情感很容易被关于这些现象的微小根源的敏锐反思所毁灭。难道一个人生动、欢喜的面色就无法激起我的满足和快乐吗？即使我从哲学中懂得，人们面容的全部差异起源于面部皮肤各个最小部分的最小厚薄的差异，有了这些差异，面部表面才能反射某种光原色并吸收其他光原色。

But though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universal or partial selfishness of man be not so material as is usually imagined to morality and practice, it is certainly of consequence in the speculative science of human nature, and is a proper object of

curiosity and enquiry. It may not, therefore, be unsuitable, in this place, to bestow a few reflections upon it. [12_1]

尽管关于人的自私性是普遍性的还是部分性的这个问题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对道德和实践那么重要，然而它在人类本性的思辨科学中肯定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使人好奇和探究的恰当对象。因此，在这里对它稍作反思可能并不会不恰当 [13_1] 。

The most obvious objection to the selfish hypothesis is, that, as it is contrary to common feeling and our most unprejudiced notions, there is required the highest stretch of philosophy to establish so extraordinary a paradox. To the most careless observer there appear to be such dispositions as benevolence and generosity; such affections as love, friendship, compassion, gratitude. These sentiments have their causes, effects, objects, and operations, marked by common language and observation, and plainly distinguished from those of the selfish passions. And as this is the obvious appearance of things, it must be admitted, till some hypothesis be discovered, which by penetrating deeper into human nature, may prove the former affections to be nothing but modifications of the latter. All attempts of this kind have hitherto proved fruitless, and seem to have proceeded entirely from that love of SIMPLICITY which has been the source of much false reasoning in philosophy. I shall not here enter into any detail on the present subject. Many able philosophers have shown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se systems. And I shall take for granted what, I believe, the smallest reflection will make evident to every impartial enquirer.

对自私论的假设最为明显的异议是，由于它与我们的普遍感受和

最公正的思想相反，因此要确立一个如此反常不通的理论，就需要哲学做出最大的伸展。即便对于最粗心的观察者来说，也存在诸如仁爱和慷慨这样的气质，如爱情、友爱、同情、感激这类感情。这些情感有着其各自的原因、结果、对象和作用，它们在日常语言和观察中突显出来，显然与自私性的感情的原因、结果、对象和作用有所不同。由于这是事物显而易见的现象，因而它必须得到承认，直到发现某种假设，通过更深入洞察人类本性，这种假设可以证明这些仁爱性的感情不过是自私性的感情的变体而已。所有这类尝试迄今都被证明是无果的，都似乎完全源于那种极端虚假的哲学推理对于简单性的热爱。在此，我并不想就当前这个论题进行任何细节性的讨论。许多卓有才能的哲学家已经指明这些体系的不足之处。我将理所当然地认为，最少的反思对每个公正的探究者就已经足够清晰明了。

But the nature of the subject furnishes the strongest presumption, that no better system will ever, for the future, be invented, in order to account for the origin of the benevolent from the selfish affections, and reduce all the various emotions of the human mind to a perfect simplicity. The case is not the same in this species of philosophy as in physics. Many a hypothesis in nature, contrary to first appearances, has been found, on more accurate scrutiny, solid and satisfactory. Instances of this kind are so frequent that a judicious, as well as witty philosopher, [12_2] has ventured to affirm, if there be more than one way in which any phenomenon may be produced, that there is a general presumption for its arising from the causes which are the least obvious and familiar. But the presumption always lies on the other side, in all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our passions, and of the internal operations of the human mind. The simplest and most obvious cause, which can there be assigned for any phenomenon, is probably the true one. When a philosopher, in the explication of his system, is obliged to have recourse to some very intricate and

refined reflections, and to suppose them essential to the production of any passion or emotion, we have reason to be extremely on our guard against so fallacious a hypothesis. The affections are not susceptible of any impression from the refinements of reason or imagination; and it is always found that a vigorous exertion of the latter faculties, necessarily, from the narrow capacity of the human mind, destroys all activity in the former. Our predominant motive or intention is, indeed, frequently concealed from ourselves when it is mingled and confounded with other motives which the mind, from vanity or self-conceit, is desirous of supposing more prevalent: but there is no instance that a concealment of this nature has ever arisen from the abstruseness and intricacy of the motive. A man that has lost a friend and patron may flatter himself that all his grief arises from generous sentiments, without any mixture of narrow or interested considerations: but a man that grieves for a valuable friend, who needed his patronage and protection; how can we suppose, that his passionate tenderness arises from some metaphysical regards to a self-interest, which has no foundation or reality? We may as well imagine that minute wheels and springs, like those of a watch, give motion to a loaded wagon, as account for the origin of passion from such abstruse reflections.

但这一论题的性质却提供了一个最强有力的假设，即将来也不可能有任何更好的体系被发明出来，以说明仁爱的情感起源于自私的情感，并将人类心灵的所有不同情绪还原为一种完美的简单性。在这类哲学中与在物理学中的情形并不相同。许多与最初现象相反的假设，通过更精确地考察，实质上是可靠的和令人满意的。这类事例时有发生，以致一位明智而机趣的哲学家 [13_2] 大胆断言，如果任何现象存在一种以上的产生方式，那么就存在这样的一般性假设，即它产生于最不明显和最不熟悉的原因。但是在一切关于我们的激情和人类心灵内在活动的起源的探寻中，假设却总是处于相反的方面。能解释任何

现象的最简单和最明显的原因，或许就是其真正的原因。当一个哲学家在阐明自己的体系时不得不借助于一些相当复杂和精致的反思，并将这些反思设想为任何激情或情绪产生不可或缺的条件时，我们有理由全神戒备并警惕如此谬误的一个假设。感情是不容易受到理性或想象力的提炼所产生的任何印象的影响的；人们总是发现，理性和想象力强有力的发挥必然是由于人类心灵的狭小容量而摧毁感情的全部活力。诚然，当我们的心灵，出于虚荣或自负，希望假定别的动机更具优势时，占主导地位的动机或意图会与其混淆，此时它们往往是对我们隐藏起来的；然而没有任何事例表明这种性质的隐藏是源于动机本身的玄奥和复杂。一个人失去了朋友和恩人，可能自以为他的全部悲伤都发自高尚的情感，没有夹杂任何狭隘或偏私的考虑；但是一个为某个曾经需要其帮助和保护的珍贵朋友而悲伤的人，我们怎么能假定，他的深切悲伤源自某种对那些自身毫无基础或现实性的自我利益的形而上的关注呢？我们可以想象微小的齿轮和链条，正如手表中的部件，驱动着载重的大马车一样，根据如此玄奥的反思来解释激情的起源。

Animals are found susceptible of kindness, both to their own species and to ours; nor is there, in this case, the least suspicion of disguise or artifice. Shall we account for all THEIR sentiments, too, from refined deductions of self-interest? Or if we admit a disinterested benevolence in the inferior species, by what rule of analogy can we refuse it in the superior?

我们发现动物不但对它们自己的同类，而且对我们人类都具有友善的倾向，这种情况丝毫不存在任何伪装或欺骗的嫌疑。难道我们也应当根据自我利益的精致推论来阐释它们的所有情感吗？或者说，如果我们承认这些低等物种具有无私的仁爱，那么通过什么样的类比规则，我们才能否认高等物种拥有无私的仁爱呢？

Love between the sexes begets a complacency and good-will, very distinct from the gratification of an appetite. Tenderness to their offspring, in all sensible beings, is commonly able alone to counter-balance the strongest motives of self-love, and has no manner of dependance on that affection. What interest can a fond mother have in view, who loses her health by assiduous attendance on her sick child, and afterwards languishes and dies of grief, when freed, by its death, from the slavery of that attendance?

两性之间的爱会产生一种与嗜欲的满足截然不同的满足和善意。在所有感性的存在物中，仅仅是对幼嗣的温情往往就足以抗衡最强烈的自爱动机，而且这种温情丝毫不依赖于自爱这种感情。一位慈爱的母亲，因精心照料自己体弱多病的孩子而失去健康，而当孩子夭折而她得以免受照料之苦时，又因悲痛而憔悴以致其死亡，她能指望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

Is gratitude no affection of the human breast, or is that a word merely, without any meaning or reality? Have we no satisfaction in one man's company above another's, and no desire of the welfare of our friend, even though absence or death should prevent us from all participation in it? Or what is it commonly, that gives us any participation in it, even while alive and present, but our affection and regard to him?

难道感激不是人类所拥有的感情，或者说，难道它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或现实性的词语吗？难道我们不是更乐意与这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交往吗？难道我们不希望自己的朋友财运亨通，即使分离或死亡使我们无法得以分享？或者即使当我们活着而且在场，从中得到分享的，除了我们对他的好感和尊重之外，通常还有什么别的吗？

These and a thousand other instances are marks of a general benevolence in human nature, where no REAL interest binds us to the object. And how an IMAGINARY interest known and avowed for such, can be the origin of any passion or emotion, seems difficult to explain. No satisfactory hypothesis of this kind has yet been discovered; nor is there the smallest probability that the future industry of men will ever be attended with more favourable success.

这些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事例都是人类本性中存在一般仁爱的标志，其中并没有任何实在的利益将我们束缚于对象之上。因此，一种已知并已公开确认为想象的利益，如何能成为任何激情或情绪的起源，似乎很难得到解释。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令人满意的这类假设，也不存在人类的勤奋将带来更有利的成功的最微小可能。

But farther, if we consider rightly of the matter, we shall find that the hypothesis which allows of a disinterested benevolence, distinct from self-love, has really more SIMPLICITY in it, and is more conformable to the analogy of nature than that which pretends to resolve all friendship and humanity into this latter principle. There are bodily wants or appetites acknowledged by every one, which necessarily precede all sensual enjoyment, and carry us directly to seek possession of the object. Thus, hunger and thirst have eating and drinking for their end; and from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se primary appetites arises a pleasure, which may become the object of another species of desire or inclination that is secondary and interested. In the same manner there are mental passions by which we are impelled immediately to seek particular objects, such as fame or power, or vengeance without any regard to interest; and when these objects are attained a pleasing enjoyment

ensues, as the consequence of our indulged affections. Nature must, by the internal frame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mind, give an original propensity to fame, ere we can reap any pleasure from that acquisition, or pursue it from motives of self-love, and a desire of happiness. If I have no vanity, I take no delight in praise; if I be void of ambition, power gives me no enjoyment; if I be not angry, the punishment of an adversary is totally indifferent to me. In all these cases, there is a passion which points immediately to the object, and constitutes it our good or happiness; as there are other secondary passions which afterwards arise, and pursue it as a part of our happiness, when once it is constituted such by our original affections. Were there no appetite of any kind antecedent to self-love, that propensity could scarcely ever exert itself; because we should, in that case, have felt few and slender pains or pleasures, and have little misery or happiness to avoid or to pursue.

但进一步讲，如果公正地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这种允许一种与自爱截然不同的无私仁爱存在的假设，和那种自称能把一切友爱和仁慈全都分解成自爱的假设比起来，其实包含了更大的简单性，也更合乎自然的类比。有一些被所有人承认的身体需求或嗜欲，它们必然先行于一切官能享受，驱使我们直接寻求对对象的占有。因而，饥和渴以吃和喝为目的，从这些最初嗜欲的满足中会产生一种快乐，这种快乐可能成为另一类第二性的和有利害关系的欲望或爱好的对象。同样，有一些心理激情会迫使我们直接寻求诸如名望、权力，或与利益毫不相关的复仇之类的特定对象；一旦获得这些对象，随即会出现使人愉悦的享受，这正是我们放纵感情的后果。在我们可能因获得名望而得到快乐或出于自爱动机和幸福欲望而追求名望之前，大自然必定已经通过我们心灵的内在结构和组织赋予我们对于名望的原始倾向。如果我没有虚荣心，我就不会因得到称赞而感到高兴；如果我没有野心，权力就不会给我带来享受；如果我没有愤怒，对对手的惩罚就会彻底与我无关。在所有这些情形中，都有一种激情存在，它直

接指向对象，并将其建构为我们的利益和幸福，正如一旦我们的原始情感将这种激情建构为我们的幸福，就会有另一些第二性的激情随即产生出来，并将原始激情作为我们幸福的一部分加以追求一样。如果不存在先行于自爱的任何一种嗜欲，大自然赋予我们的那种原始倾向就几乎不可能发挥出来；因为在那种情形下，我们所感受的痛苦或快乐数量极微、程度极弱，而我们所规避或追求的苦难或幸福极少。

Now where is the difficulty in conceiving, that this may likewise be the case with benevolence and friendship, and that, from the original frame of our temper, we may feel a desire of another's happiness or good, which, by means of that affection, becomes our own good, and is afterwards pursued, from the combined motives of benevolence and self-enjoyment? Who sees not that vengeance, from the force alone of passion, may be so eagerly pursued, as to make us knowingly neglect every consideration of ease, interest, or safety; and, like some vindictive animals, infuse our very souls into the wounds we give an enemy; [12_3] and what a malignant philosophy must it be, that will not allow to humanity and friendship the same privileges which are undisputably granted to the darker passions of enmity and resentment; such a philosophy is more like a satyr than a true delineation or descrip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may be a good foundation for paradoxical wit and raillery, but is a very bad one for any serious argument or reasoning.

现在，设想仁爱和友爱也可是与这相同的一种情形，设想我们根据性情的原始结构，可以感受自己内心对于他人的幸福或利益的欲望，而这些他人的利益和欲望通过这种情感变成我们自己的利益，而后出于仁爱和自我享受的双重动机，我们对其加以追求，这会是难以想象的吗？谁看不见那种单纯出于激情威力的复仇可以受到如此狂热

的追求，导致我们有意识地抛开一切舒适、利益或安全的考虑；而像某些报复性的动物那样，全神贯注于给敌人造成伤害 [13_3] ；如果一种哲学不允许仁慈和友爱获得敌意和憎恨这些阴暗的激情所不争地享有的同样一些特权，它必定是一门恶毒的哲学；与其说这样一种哲学是对人类本性的一种真正描绘或描述，毋宁说它更像一个泄欲狂；它可以为自相矛盾式的机趣和嘲弄构成一个良好的基础，然而对任何严肃的论证或推理来说，它是一个很坏的基础。

[12_1].Benevolence naturally divides into two kinds, the GENERAL and the PARTICULAR. The first is, where we have no friendship or connexion or esteem for the person, but feel only a general sympathy with him or a compassion for his pains, and a congratulation with his pleasures. The other species of benevolence is founded on an opinion of virtue, on services done us, or on some particular connexions. Both these sentiments must be allowed real in human nature: but whether they will resolve into some nice considerations of self-love, is a question more curious than important. The former sentiment, to wit, that of general benevolence, or humanity, or sympathy, we shall have occasion frequently to treat of in the course of this inquiry; and I assume it as real, from general experience, without any other proof.

[12_2].Mons. Fontenelle.

[12_3].Animasque in vulnere ponunt. VIRG, Dum alteri noceat, sui negligens says Seneca of Anger. De Ira, I. i.

[13_1].仁爱自然地分成两种：一般性的仁爱和特定性的仁爱。前者是我们在对一个人完全没有友爱或联系或敬重时对他单纯感受的一种一般性同情，即对他痛苦的怜悯和对他的快乐的祝贺。后一种仁爱则基于一种关于德性的观点，基于对方施予我们的帮助，或基于某种特定的关联。必须承认，这两种情感都是真实存在于人性之中的；但它们能否分解为自爱的一些细微因素，却是一个与其说是重要的毋宁说是奇妙的问题。前一种情感，即一般性的仁爱、仁慈或同情的情感，我们在本次探究过程中将时常有机会论及。根据一般经验，无需任何其他证据，我假定它是真实的。

[13_2].丰德耐尔先生（Mons. Fomenelle）。

[13_3].他们全神贯注于伤害。（维吉尔，《农事诗》，第四卷）。安格尔的塞涅卡说，当他们伤害别人时，也伤害了自己。（《论愤怒》，第一部，第一卷）。

APPENDIX 3 SOME FARTHER CONSIDERATIONS WITH REGARD TO JUSTICE

附录三 对正义的进一步思考

The intention of this Appendix is to give some more particular explication of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Justice, and to mark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it and the other virtues.

本附录旨在对正义的根源和本质作出更具体的阐释，并标示出它与其他德性之间的差异。

The social virtues of humanity and benevolence exert their influence immediately by a direct tendency or instinct, which chiefly keeps in view the simple object, moving the affections, and comprehends not any scheme or system, nor the consequences resulting from the concurrence, imitation, or example of others. A parent flies to the relief of his child; transported by that natural sympathy which actuates him, and which affords no leisure to reflect on the sentiments or conduct of the rest of mankind in like circumstances. A generous man cheerfully embraces an opportunity of serving his friend; because he then feels himself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beneficent affections, nor is he concerned whether any other person in the universe were ever before actuated by such noble motives, or will ever afterwards prove their influence. In all these cases, the social passions have in view a single individual object, and pursue the safety or happiness alone of the person loved and esteemed. With this they are satisfied: in this they acquiesce.

And as the good, resulting from their benign influence, is in itself complete and entire, it also excites the moral sentiment of approbation, without any reflection on farther consequences, and without any more enlarged views of the concurrence or imitation of the other members of society. On the contrary, were the generous friend or disinterested patriot to stand alone in the practice of beneficence, this would rather enhance his value in our eyes, and join the praise of rarity and novelty to his other more exalted merits.

仁慈和仁爱这些社会德性是通过一种直接的趋向或本能立即发挥作用的。这种趋向或本能主要着眼于打动感情这一简单的对象，而不在意任何体制或体系，也不考虑他人的协同、模仿或榜样所产生的后果。父母会不顾一切地去尽快地减轻孩子的痛苦，因为一种自然的同情使他们对这种痛苦感同身受，使他们无暇顾及他人在类似情形下的情感或行为。慷慨之士愉快地接受为朋友效劳的机会，因为他那时感到自己受到仁善的情感的支配，而不关心这世上其他任何人是否曾经为如此高贵的动机所驱使，亦或今后会为此所激励。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社会激情都只着眼于某一个别对象，仅仅追求那个我们所爱和所尊敬的人的安全或幸福。这些激情于此得到满足，它们默许于此得到释放。这些激情的良好影响产生了善，而这善本身就是完满的、完整的，因而，无需反思更深远的后果，也无需多虑社会其他成员的协同和模仿，它也会激起赞许的道德情感。相反，如果这位慷慨的朋友或无私的爱国者在力行善举时孤军奋战，这反倒会使他在我们眼中身价倍增；使我们在他的其他更高贵的优点之上增添对其品行珍稀和新奇的赞美。

The case is not the same with the social virtues of justice and fidelity. They are highly useful, or indeed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the well-being of mankind: But the benefit resulting from them is

not the consequence of every individual single act; but arises from the whole scheme or system concurred in by the whole, 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ociety. General peace and order are the attendants of justice or a general abstinence from the possessions of others; but a particular regard to the particular right of one individual citizen may frequently, considered in itself, be productive of pernicious consequences. The result of the individual acts is here, in many instances, directly opposite to that of the whole system of actions; and the former may be extremely hurtful, while the latter is, to the highest degree, advantageous. Riches, inherited from a parent, are, in a bad man's hand, the instrument of mischief. The right of succession may, in one instance, be hurtful. Its benefit arises only from the observance of the general rule; and it is sufficient, if compensation be thereby made for all the ills and inconveniencies which flow from particular characters and situations.

正义和忠贞这两种社会德性的情形则不尽相同。它们对人类的福乐至关重要，或者说的确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带来的益处并不是每个单一行为的后果，而源于社会全体或大部分成员协同推行的整个体制或体系。全面的和平和秩序是正义的伴生物，即全面戒绝侵犯他人财产的伴生物。但是对公民个体的这一特定的权利给予特定的尊重，这本身可能往往会产生有害的后果。许多例子可以证实，个别行为的后果与整个行为体系的后果是直接对立的；前者可能极端有害，而后者可能极度有利。从父辈继承的财富在恶人手中就是作恶的工具。在个例中，继承权可能是有害的。它的益处只有在奉行普遍规则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能因此而弥补由特定性格和情形所造成的不利和不便，那就完满了。

Cyrus, young and inexperienced, considered only the individual

case before him, and reflected on a limited fitness and convenience, when he assigned the long coat to the tall boy, and the short coat to the other of smaller size. His governor instructed him better, while he pointed out more enlarged views and consequences, and informed his pupil of the general, inflexible rules, necessary to support general peace and order in society.

年轻而涉世未深的居鲁士，在将长衣分给一个高个男孩而将短衣分给另一个矮个男孩时，只考虑了眼前的个例，只反思了有限的合适和便利。他的师长则指导他处理得更好，为他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指出了更深远的后果，并告知他维系社会的全面和平和秩序所必须的那些普遍而不可变更的规则。

The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of mankind, arising from the social virtue of benevolence and its subdivisions, may be compared to a wall, built by many hands, which still rises by each stone that is heaped upon it, and receives increase proportional to the diligence and care of each workman. The same happiness, raised by the social virtue of justice and its subdivisions, may be compared to the building of a vault, where each individual stone would, of itself, fall to the ground; nor is the whole fabric supported but by the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mbination of its corresponding parts.

可以将仁爱这一社会德性及其分支给人类带来的幸福和富足比作一道墙，它起于众人之手，一砖一石加诸其上使其不断增高，而所增加的高度与每位工匠的勤奋和关怀成正比。由正义这一社会德性及其分支所带来的这种人类的幸福，可以被比作筑造拱顶，每块石材单凭自身会掉落地面；整体的结构必须依赖各部分的相互辅助和联合才能被支撑起来。

All the laws of nature, which regulate property, as well as all civil laws, are general, and regard alone some essenti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withou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haracters, situations, and connexions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or any particular consequences which may result from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se laws in any particular case which offers. They deprive, without scruple, a beneficent man of all his possessions, if acquired by mistake, without a good title; in order to bestow them on a selfish miser, who has already heaped up immense stores of superfluous riches. Public utility requires that property should be regulated by general inflexible rules; and though such rules are adopted as best serve the same end of public utility,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prevent all particular hardships, or make beneficial consequences result from every individual case. It is sufficient, if the whole plan or scheme be necessary to the support of civil society, and if the balance of good, in the main, do thereby preponderate much above that of evil. Even the general laws of the universe, though planned by infinite wisdom, cannot exclude all evil or inconvenience in every particular operation.

一切规范财产权的自然法和民法都是一般性的，它们只关注案例的某些基本因素，而没有考虑到涉案人的性格、情况和关系，也不考虑这些法律规定在特定案例中会产生的特定后果。即便是对仁善之人，倘若他的财产是误得而来，没有任何正当名目的话，这些法律也会毫无顾忌地将其剥夺，转而判予一个剩余财富已累积如山的自私的吝啬鬼。公共效用要求财产权应受一般的、不可变更的规则所规范。尽管公众遵循这些规范是为了尽可能地促进公共效用这一个共同的目的，然而要使这些规范能够规避所有特定的困境，或是令所有个例都能产生有益的后果是不可能的。倘若整个计划或体制是维系公民社会所必需的，并从而在大体上使得善明显大于恶，那就足够了。即便是

宇宙的一般法则，尽管它出自无限智慧的规划，也无法排除在每一次特定的实施过程中所造成的一切灾祸或不便。

It has been asserted by some, that justice arises from Human Conventions, and proceeds from the voluntary choice, consent, or combination of mankind. If by CONVENTION be here meant a PROMISE (which is the most usual sense of the word) nothing can be more absurd than this position. The observance of promises is itself one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s of justice, and we are not surely bound to keep our word because we have given our word to keep it. But if by convention be meant a sense of common interest, which sense each man feels in his own breast, which he remarks in his fellows, and which carries him, in concurrence with others, into a general plan or system of actions, which tends to public utility; it must be owned, that, in this sense, justice arises from human conventions. For if it be allowed (what is, indeed, evident) that the particular consequences of a particular act of justice may be hurtful to the public as well as to individuals; it follows, that every man, in embracing that virtue, must have an eye to the whole plan or system, and must expect the concurrence of his fellows in the same conduct and behaviour. Did all his views terminate in the consequences of each act of his own, his benevolence and humanity, as well as his self-love, might often prescribe to him measures of conduct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which are agreeable to the strict rules of right and justice.

曾有人断言，正义源于人类的约定，形成于人类的自愿选择、同意或结合。如果此处的约定意味着承诺（这是这个词最通常的意义）的话，那么没有什么比这种观点更荒谬的了。履行承诺本身就是正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不是因为我们答应了履行承诺才一定会做

到这一点。但是如果约定是指一种共同利益感，这种感觉每个人都能在自己内心里感受到，也能在同胞身上察觉到，并且在与他人同心协力的合作中将自己带入一个促进公共效用的一般计划和行为体系中的话，那么必须承认，在这个意义上，正义的确源于人类的约定。因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实际显而易见），一个特定的正义行为所产生的特定后果可能不仅对个人有害，而且对公众也有害，那么结果就是，所有人在看待正义这一德性时必定是着眼于整个计划或体系的，必定期待同胞们对相同的行为和举止与自己持有同样的态度。倘若人人都将自己的视野囿于自己各个行为的后果上，那么他们的仁爱和仁慈以及自爱就往往给他们自己设定出一套行为准则，它们与合乎严格的正当和正义规则的行为准则完全不同。

Thus, two men pull the oars of a boat by common convention for common interest, without any promise or contract; thus gold and silver are made the measures of exchange; thus speech and words and language are fixed by human convention and agreement. Whatever is advantageous to two or more persons, if all perform their part; but what loses all advantage if only one perform, can arise from no other principle. There would otherwise be no motive for any one of them to enter into that scheme of conduct. [13_1]

因此，通过基于共同利益的约定，虽然没有任何承诺或合约，同船的两个人就会共同摇起桨橹；因此，金银被作为交换的度量标准；因此，话语、词汇和语言被人类的约定和协议确定了下来。凡是人人各尽其责就对他们二人或是更多的人有益的事情，凡是仅有一人尽力就丧失所有益处的事情，不可能基于任何其他的原则，否则就不会有某种动机能令他们中的任何人尊奉那种行为体制 [14_1] 。

The word NATURAL is commonly taken in so many senses and

is of so loose a signification, that it seems vain to dispute whether justice be natural or not. If self-love, if benevolence be natural to man; if reason and forethought be also natural; then may the same epithet be applied to justice, order, fidelity, property, society. Men's inclination, their necessities, lead them to combine;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e tell them that this combination is impossible where each governs himself by no rule, and pays no regard to the possessions of others: And from these passions and reflections conjoined, as soon as we observe like passions and reflections in others, the sentiment of justice, throughout all ages, has infallibly and certainly had place to some degree or other in every individual of the human species. In so sagacious an animal, what necessarily arises from the exertion of his intellectual faculties may justly be esteemed natural. [13_2]

“自然的”这个词的意义通常是如此众多且松散的，以至于去争论正义是否是自然的实在是徒劳。如果自爱、仁爱对于人来说是自然的；如果理性和先见也是自然的，那么“自然的”这个修饰词也可适用于正义、秩序、忠贞、财产权和社会之上。人们的喜好和必需使得他们结合起来；知性和经验告诉他们，如果所有人都不受规则约束，都不尊重他人的财产，那么这种结合是不可能的。在自身结合了这些激情和反思的基础上，一旦我们在他人身上观察到类似的激情和反思，这种贯穿各个时代的正义的情感就可靠且必然地在人类的每个个体心中升腾起来，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如此聪慧的动物运用其智力官能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可以正当地被认定为是自然的 [14_2] 。

Among all civilized nations, it has been the constant endeavour to remove everything arbitrary and partial from the decision of property, and to fix the sentence of judges by such general views and considerations as may be equal to every member of the society.

For besides, that nothing could be more dangerous than to accustom the bench, even in the smallest instance, to regard private friendship or enmity; it is certain, that men, where they imagine that there was no other reason for the preference of their adversary but personal favour, are apt to entertain the strongest ill-will against the magistrates and judges. When natural reason, therefore, points out no fixed view of public utility by which a controversy of property can be decided, positive laws are often framed to supply its place, and direct the procedure of all courts of judicature. Where these too fail, as often happens, precedents are called for; and a former decision, though given itself without any sufficient reason, justly becomes a sufficient reason for a new decision. If direct laws and precedents be wanting, imperfect and indirect ones are brought in aid; and the controverted case is ranged under them by analogical reasonings and comparisons, and similitudes, and correspondencies, which are often more fanciful than real. In general, it may safely be affirmed that jurisprudence is, in this respect, different from all the sciences; and that in many of its nicer questions, there cannot properly be said to be truth or falsehood on either side. If one pleader brings the case under any former law or precedent, by a refined analogy or comparison; the opposite pleader is not at a loss to find an opposite analogy or comparison: and the preference given by the judge is often founded more on taste and imagination than on any solid argument. Public utility is the general object of all courts of judicature; and this utility too requires a stable rule in all controversies: But where several rules, nearly equal and indifferent, present themselves, it is a very slight turn of thought which fixes the decision in favour of either party.[1]

在所有文明国度里，人们一直在尽力避免财产权决定中的一切任意性和偏私性，并且以那些关照所有社会成员平等的一般观点和考虑

来约束法官的判决。因为，让法庭习惯于即使在最微不足道的案件的审理中都去关注私人的友谊或敌意，这是莫大的危险。此外，毫无疑问的是，倘若人们想象他们的对手得到法庭的偏向不过是裁判官和法官个人的好恶所致，那么他们很容易对裁判官和法官产生最强烈的敌意。因此，当自然理性无法得出关于公共效用的确定观点，使得财产权争论无法得到判定时，人们就常常拟定成文法取代它来指导所有司法法院的程序。在成文法也不适用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人们就会援引先例。而一个先前的判决，尽管其自身并没有任何充分的依据，却正当地成为新判决的充足的理由。如果直接适用的法律和先例都不存在，人们就会借助于不完善的和间接适用的法律和先例。通过类比推理和比较推导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一致性，这些相似性和一致性往往是想象多于真实，这样就把这些有争议的案件归于这些不完善的和间接适用的法律和先例之下。大体上，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断言，在这方面，法理学与所有科学都不同。在法理学的诸多微妙的问题上，我们都难以严格判定真理或谬误究竟在哪一方。如若一方的辩护律师能通过精巧的类比或比较将案件归于任何一种先前的法律或先例之下，对方的辩护律师也不难作出对立的类比或比较。法官的偏向往往是基于品味和想象，而不是基于任何严密的论证。公共效用是所有司法法院的总体目标。这种效用本身也要求有一条适用于所有争论的稳定规则。但在有些情况下，几条规则同时出现，它们几乎同等重要、不分轩轾，那么对某一方有利的判决就取决于一种非常微弱的思想倾向[1]。

1: That there be a separation or distinction of possessions, and that this separation be steady and constant; this is absolutely required by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and hence the origin of justice and property. What possessions are assigned to particular persons; this is, generally speaking, pretty indifferent; and is often determined by very

frivolous views and considerations. We shall mention a few particulars.

1：对于财产，应当存在一种划分或区分的规则，且这种划分规则应当是稳定不变的。这是社会利益的必然要求，因而也是正义和财产权的根源。分配给某个人什么财产，这一般来说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而且往往决定于一些甚为琐屑的观点和考虑。我们将提及几种特定的情形。

Were a society formed among several independent members, the most obvious rule, which could be agreed on, would be to annex property to PRESENT possession, and leave every one a right to what he at present enjoys. The relation of possession, which takes place between the person and the object, naturally draws on the relation of property.

如果社会是由一些独立的成员构成的，那么最显而易见且能获得一致赞同的规则将会是：将财产权加诸当前的财产，令每一个人对他当前的所有具备一种权利。发生于人和物之间的占有关系自然地引出了财产权关系。

For a like reason, occupation or first possession becomes the foundation of property.

基于相似的理由，占领或是最先占有就成为财产权的基础。

Where a man bestows labour and industry upon any object, which before belonged to no body; as in cutting down and shaping a tree, in cultivating a field, &c., the alterations, which he produces, causes a relation between him and the object, and naturally engages us to annex it to him by the new relation of property. This cause here concurs with the public utility, which consists in the encouragement given to industry and labour.

如果一个人对先前不属于任何人的某物付出劳动、辛勤耕耘，例如修剪树木、开垦田地等等，那么他所造成的改变就在他和此物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并自然地使我们根据这种新的财产权关系将此物归属于他。此处的动机是与旨在鼓励勤奋和劳动的公共效用相一致的。

Perhaps too, private humanity towards the possessor concurs, in this instance, with the other motives, and engages us to leave with him what he has acquired by his sweat and labour; and what he has flattered himself in the constant enjoyment of. For though private humanity can, by no means, be the origin of justice; since the latter virtue so often contradicts the former; yet when the rule of

separate and constant possession is once formed by the indispensable necessities of society, private humanity, and an aversion to the doing a hardship to another, may, in a particular instance, give rise to a particular rule of property.

也或许，在此例中，除了其他动机之外，对占有者私人的仁慈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使我们将他的汗水和劳动之所获，将他一直享有并从中获得满足的东西留他保有。因为，尽管私人的人道绝不可能是正义的根源，因为正义这种德性常常与私人的人道相抵触，然而，一旦由不可或缺的社会必需性建立起划分和持续占有的规则，在某一特定事例中，私人的人道和对伤害他人的反感就可以引发一条特定的财产权规则的产生。

I am much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he right succession or inheritance much depends on those connexions of the imagination, and that the relation to a former proprietor begetting a relation to the object, is the cause why the property is transferred to a man after the death of his kinsman. It is true; industry is more encouraged by the transference of possession to children or near relations: but this consideration will only have place in a cultivated society; whereas the right of succession is regarded even among the greatest Barbarians.

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继承或承袭的权利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那些想象的联系；某人与某物之前的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导致他与此物也具有了一种关系，这是某人的财产在其身故后被移交给其亲属的原因。诚然，由于财产可以转移给子女或近亲，勤奋因而受到更大的鼓励。不过，虽然财产继承权在最野蛮的部族中都受到尊重，但这种考虑也只在文明社会中才会出现。

Acquisition of property by accession can be explained no way but by having recourse to the relations and connexions of the imaginations.

通过附属而获得财产权，这不能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只能通过想象的关系和联系才能得到解释。

The property of rivers, by the laws of most nations, and by the natural turn of our thoughts, is attributed to the proprietors of their banks, excepting such vast rivers as the Rhine or the Danube, which seem too large to follow as an accession to the property of the neighbouring fields. Yet even these rivers are considered as the property of that nation, through whose dominions they run; the idea of a nation being of a suitable bulk to correspond with them, and bear them such a relation in the fancy.

根据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以及我们思想的自然倾向，河流的财产权归于河岸的所有者。而诸如莱茵河或多瑙河之类的大河是例外，因为它们似乎太大而不能被当作对毗邻的土地的财产权的一种附属。然而即便这些河流也被认为是它们所流经的国家的财产，这种观念是与之面积相称并在想象中与之具有这样一种关系的国家才有的。

> The accessions, which are made to land, bordering upon rivers, follow the land, say the civilians, provided it be made by what they call alluvion, that is, insensibly and imperceptibly; which are circumstances, that assist the imagination in the conjunction.

> 民法学家认为，河流沿岸的土地上的附属物应与这块土地的归属一致，前提是这些附属物由冲击形成，即不知不觉之间形成的，正是这些因素促生了对它们联结关系的一种想象。

> Where there is any considerable portion torn at once from one bank and added to another, it becomes not his property, whose land it falls on, till it unite with the land, and till the trees and plants have spread their roots into both. Before that, the thought does not sufficiently join them.

如果此岸的一大部分冲积物突然移至彼岸，对于它所附着的土地的所有者来说，它不能立即成为他的财产，必须要到这片冲积物与这块土地结合起来，要到树木和植物的根蔓延深入它们彼此。在那之

前，想象的联结还不足以使它们结合起来。

> In short, we must ever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necessity of a separation and constancy in men's possession, and the rules, which assign particular objects to particular persons. The first necessity is obvious, strong, and invincible: the latter may depend on a public utility more light and frivolous, on the sentiment of private humanity and aversion to private hardship, on positive laws, on precedents, analogies, and very fine connexions and turns of the imagination.

> 简言之，划分和保持人们的财产有着自身的必需性，而将特定的财物分配给特定的个人也有一定的规则。对于这二者我们要区别认识。这种必需性是显而易见的、强烈的、不可或缺的；而这些规则可能依赖于一种更细微琐屑的公共效用，依赖于一种私人的人道和对伤害他人的反感的情感，依赖于成文法、先例、类比以及想象力的非常微妙的联结和倾向。

We may just observe, before we conclude this subject, that after the laws of justice are fixed by views of general utility, the injury, the hardship, the harm, which result to any individual from a violation of them, enter very much into consideration, and are a great source of that universal blame which attends every wrong or iniquity. By the laws of society, this coat, this horse is mine, and OUGHT to remain perpetually in my possession: I reckon on the

secure enjoyment of it: By depriving me of it, you disappoint my expectations, and doubly displease me, and offend every bystander. It is a public wrong, so far as the rules of equity are violated: It is a private harm, so far as an individual is injured. And though the second consideration could have no place, were not the former previously established: For otherwise the distinction of MINE and THINE would be unknown in society: Yet there is no question but the regard to general good is much enforced by the respect to particular. What injures the community, without hurting any individual, is often more lightly thought of. But where the greatest public wrong is also conjoined with a considerable private one, no wonder the highest disapprobation attends so iniquitous a behaviour.

在我们结束这个主题之前，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在正义的法律基于公共效用而被确立之后，对它们的触犯给个人所造成的伤害、苦难和损害就深受关注，并成为一切不义或不公事件广受谴责的重要源头。根据社会的法律，这件衣服、这匹马属于我，并且应当永远为我所有。我指望安心地享用它，若是你将它从我手里夺走，就会使我的期望落空，就会加倍使我不快，同时也触怒了所有的旁观者。如若某行为触犯了公正规则，它就是对公众的不义之举；如若它伤害了某个个体，它就是对私人的损害。如果不先作出前一种考虑，那么后一种考虑就不能成立。要不然，社会就不存在“我的”和“你的”之间的区分。尽管如此，有一点却不容置疑，即对一般利益的尊重很大程度上是由对特定利益的尊重体现出来的。损害了社会共同体而没有伤害到任何个人的事件往往会为人所忽视。但是，如果一件对公众极端严重的不义之举伴随着对私人的不义之举，那就难怪这样的一桩恶行会招致最强烈的不满了。

[13_1].This theory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property, and consequently of justice, is, in the main, the same with that hinted at and adopted by Grotius, 'Hinc

discimus, quae fuerit causa, ob quam a primaeva communione rerum primo mobilium, deinde et immobilinm discessum est: nimirum quod cum non contenti homines vesci sponte natis, antra habitare, corpore aut nudo agere, aut corticibus arborum ferarumve pellibus vestito, vitae genus exquisitius delegissent, industria opus fuit, quam singuli rebus singulls adhiberent. Quo minus autem fructus in commune conferrentur, primum obstitit locorum, in quae hominess discesserunt, distantia, deinde justitiae et amoris defectus, per quem fiebat, ut nee in labore, nee in consumtione fructuum, quae debebat, aequalitas servaretur. Simul discimus, quomodo res in proprietatem iverint; non animi actu solo, neque enim scire alii poterant, quid alil suum esse vellent, ut eo abstinerent, et idem velle plures poterant; sed pacto quodam aut expresso, ut per divisionem, aut tacito, ut per occupationem.' De jure belli et pacis. Lib. ii. cap. 2. sec. 2. art. 4 and 5.

[13_2].Natural may be opposed, either to what is UNUSUAL, MIRACULOUS or ARTIFICIAL. In the two former senses, justice and property are undoubtedly natural. But as they suppose reason, forethought, design, and a social union and confederacy among men, perhaps that epithet cannot strictly, in the last sense, be applied to them. Had men lived without society, property had never been known, and neither justice nor injustice had ever existed. But society among human creatures had been impossible without reason and forethought. Inferior animals, that unite, are guided by instinct, which supplies the place for reason. But all these disputes are merely verbal.

[14_1].这套关于财产权的根源，因而也涉及到正义的根源的理论大体上与格劳秀斯所暗示和采纳的理论相同："由此我们可以获知，存在某种原因，使得动产公有制被瓦解，而后不动产公有制也被瓦解；毫无疑问，由于孱弱的人类自身不满足于穴居生活，不满足于行动时赤身裸体或以树皮为衣，他们对生活方式也要求精益求精，故而努力去对个别对待个别事物就是必需的。其次，为了使产品更少地聚集于公社，首先出现了人们地位划分上的差别，而后正义和爱又逐渐衰退，以致不论在劳动中还是在对产品的合理消费中都出现了不平等。同时我们还知道，他们把财物私有化的方式不仅仅是心中的想法，不是因为一些人能够看出另一些人想把某物据为己有就加以阻止并期望自己占有更多，而是通过制定某种约定来实施。这种约定或明确，例如分配，或只是默许，例如占有。"《战争与和平法》，第二卷，第二章，第二节，第四条和第五条。

[14_2]."自然的"既可以理解是"不寻常的"、"奇迹的"反义，也可以理解是"人为的"反义。如果是前两种意义，那么正义和财产权无疑都是自然的。但正义和财产权的保障需以理性、先见、设计以及人们的社会同盟和联盟为前提，因此，严格说来，在后一种意义上，正义和财产权并不是自然的。假如人们不在社会中生活，财产权就无从由来；正义和非正义都不会存在。没有理性和先见，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低等

动物的结合是遵循本能的引导。在这种情况下，本能代替理性在发挥作用。然而所有这些争论仅仅是语词层面上的。

APPENDIX 4 OF SOME VERBAL DISPUTES

附录四 论几次口头争论

Nothing is more usual than for philosophers to encroach upon the province of grammarians; and to engage in disputes of words, while they imagine that they are handling controversies of the deepest importance and concern. It was in order to avoid altercations, so frivolous and endless, that I endeavoured to state with the utmost caution the object of our present enquiry; and proposed simply to collect, on the one hand, a list of those mental qualities which are the object of love or esteem, and form a part of personal merit; and on the other hand, a catalogue of those qualities which are the object of censure or reproach, and which detract from the character of the person possessed of them; subjoining some reflections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these sentiments of praise or blame. On all occasions, where there might arise the least hesitation, I avoided the terms VIRTUE and VICE; because some of those qualities, which I classed among the objects of praise, receiv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appellation of TALENTS, rather than of virtues; as some of the blameable or censurable qualities are often called defects, rather than vices. It may now, perhaps, be expected that before we conclude this moral enquiry, we should exactly separate the one from the other; should mark the precise boundaries of virtues and talents, vices and defects; and should explain the reason and origin of that distinction. But in order to excuse myself from this undertaking, which would, at last, prove only a grammatical enquiry, I shall subjoin the four following reflections, which shall contain all that I intend to say on the present subject.

当哲学家们认为他们在进行着至关重要、深受关注的争论时，他们实际上正在侵犯文法学家的领地，卷入语词之争中，这种情形早已是司空见惯了。为了避免陷入如此微不足道却又无休无止的争辩中，我尽可能以极其谨慎的态度阐述了我们当前探究的对象，简单地提出了一方面要汇集那些赢得爱或尊敬、构成部分个人价值的心灵品质；另一方面要汇集那些招致责难或谴责、使得其拥有者品格受损的心灵品质；此外还对这些赞美或谴责的情感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在一切可能引起哪怕一丝犹疑不定的情形之下，我都避免使用德性和恶行这两个术语。因为在我将其归于赞美的对象的那类品质中，有一部分在英语中被称为才赋，而不是德性；而一些受到谴责或责难的品质被称为缺点，而不是恶行。至此人们或许期待我们在结束这一道德探究之前，应当精确区分这些品质的类别，应当标示出德性与才赋、恶行与缺点之间的明确界线，并且应当对这种区分的理由和根源给出合理解释。但是，为了使我自己不必费心进行这一终究被证明只不过是文法方面探究的任务，我将补充下列四项反思，它们包含了我对当下这一主题的全部思考。

First, I do not find that in the English, or any other modern tongue, the boundaries are exactly fixed between virtues and talents, vices and defects, or that a precise definition can be given of the one as contradistinguished from the other. Were we to say, for instance, that the esteemable qualities alone, which are voluntary, are entitled to the appellation of virtues; we should soon recollect the qualities of courage, equanimity, patience, self-command; with many others, which almost every language classes under this appellation, though they depend little or not at all on our choice. Should we affirm that the qualities alone, which prompt us to act our part in society, are entitled to that honourable distinction; it must immediately occur that these are indeed the most valuable qualities, and are commonly denominated the

SOCIAL virtues; but that this very epithet supposes that there are also virtues of another species. Should we lay hold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 and MORAL endowments, and affirm the last alone to be the real and genuine virtues, because they alone lead to action; we should find that many of those qualities, usually called intellectual virtues, such as prudence, penetration, discernment, discretion, had also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conduc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heart and the head may also be adopted: the qualities of the first may be defined such as in their immediate exertion are accompanied with a feeling of sentiment; and these alone may be called the genuine virtues: But industry, frugality, temperance, secrecy, perseverance, and many other laudable powers or habits, generally stilled virtues are exerted without any immediate sentiment in the person possessed of them, and are only known to him by their effects. It is fortunate, amidst all this seeming perplexity, that the question, being merely verbal, cannot possibly be of any importance. A moral,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needs not enter into all these caprices of language, which are so variable in different dialects, and in different ages of the same dialect. But on the whole, it seems to me, that though it is always allowed, that there are virtues of many different kinds, yet, when a man is called virtuous, or is denominated a man of virtue, we chiefly regard his social qualities, which are, indeed, the most valuable. It is, at the same time, certain, that any remarkable defect in courage, temperance, economy, industry, understanding, dignity of mind, would bereave even a good-natured, honest man of this honourable appellation. Who did ever say, except by way of irony, that such a one was a man of great virtue, but an egregious blockhead?

首先，我发现在英语或其他任何一门现代语言中，并不存在德性

与才能、恶行与缺点之间的明确界线，或者说并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使它们得以区分彼此。举例来说，假如我们认定只有那些出于自愿的可敬品质才可以被称为德性，那么我们立刻就会想到勇敢、沉着、耐心、自制这些品质以及其他许多几乎在任何一门语言中都被归于德性的品质，尽管这些品质的类属很少或者几乎根本不取决于我们的裁夺。假如我们断定只有那些促使我们为社会恪尽职守的品质才有资格获得德性这一光荣的称号，那么我们就会立即意识到，这些确实极其可贵的品质通常被称为社会德性，但正是“社会”这一修饰词标示着还有另外一类德性的存在。假如我们把握了智力禀赋和道德禀赋之间的区别，并因为只有后者才会引发行动而断定唯独后一种才能才是真实的、真正的德性，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许多通常被称为智力才能的品质，例如明智、明察、明辨、审慎等，对行为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或许也可以采用心和脑的区分方法：心的品质也许可以界定为那些在直接作用时伴随着情感的品质，唯独这些品质才可以被称为真正的德性；而勤奋、节俭、自制、保密、坚毅以及其他许多通常被划归为德性的令人称道的能力或习惯，在其作用时却并没有激起其所有者任何直接的情感，也只有通过其效用才为他所知晓。幸而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表象之下，这个仅仅属于语词范畴的问题不可能具有任何重要性。关于道德或哲学方面的讨论无需涉入所有这些语言的无常变化。这些变化在不同的方言中，或者在同一方言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是相当地不可捉摸。但是，依我之见，尽管我们一向承认存在许多不同类别的德性，然而，总的来说，当我们称一个人品德高尚或者称其为有德之士的时候，我们关注的主要是他的社会品质，那些品质的确是最可贵的。同时，可以确定，即便他天性纯良、诚实可信，他在勇敢、自制、节约、勤奋、知性、心灵尊严等方面的任何显著的缺点都将剥夺他这一光荣的称号。除了讽刺之外，有谁曾经说过，某人德性卓越，但却愚不可及呢？

But, secondly, it is no wonder that languages should not be very precise in mark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virtues and talents, vices and defects; since there is so little distinction made in our

internal estimation of them. It seems indeed certain, that the SENTIMENT of conscious worth, the self-satisfaction proceeding from a review of a man's own conduct and character; it seems certain, I say, that this sentiment, which, though the most common of all others, has no proper name in our language, [14_1] arises from the endowments of courage and capacity, industry and ingenuity, as well as from any other mental excellencies. Who, on the other hand, is not deeply mortified with reflecting on his own folly and dissoluteness, and feels not a secret sting or compunction whenever his memory presents any past occurrence, where he behaved with stupidity or ill-manners? No time can efface the cruel ideas of a man's own foolish conduct, or of affronts, which cowardice or imprudence has brought upon him. They still haunt his solitary hours, damp his most aspiring thoughts, and show him, even to himself, in the most contemptible and most odious colours imaginable.

但是，其次，在划定德性与才赋、恶行与缺点之间的界线时，语言将不会十分精确，这一点不足为怪，因为在我们的内心里，对它们的评价区别甚微。实际上，那种认知自我价值的情感，或由人们对自身的行为和性格所作的检视产生的一种自我满足感，我认为，似乎可以肯定，这种情感尽管在所有其他语言中最为寻常，但在我们的语言中却没有专门的名称 [15_1] ，它发端于勇气和才能、勤奋和机巧等禀赋以及任何其他的心灵美德。另一方面，有谁不会因为自己的愚蠢和放荡不羁而深感羞愧？有谁不会在回忆起自己过去愚蠢的粗野举动时感到锥心刺骨、懊悔不已？一个人对自己的蠢行或是因懦弱或不明智之举而招致的侮辱后悔不已，这些是无法随时间流逝的。在他独处时这些观念仍然挥之不去，遏制他至高至远的理想，展现出一幅甚至在他自己的眼中都是以所能想象的最可鄙、最可憎的色彩所描绘的自我形象。

What is there too we are more anxious to conceal from others than such blunders, infirmities, and meannesses, or more dread to have exposed by raillery and satire? And is not the chief object of vanity, our bravery or learning, our wit or breeding, our eloquence or address, our taste or abilities? These we display with care, if not with ostentation; and we commonly show more ambition of excelling in them, than even in the social virtues themselves, which are, in reality, of such superior excellence. Good-nature and honesty, especially the latter, are so indispensably required, that, though the greatest censure attends any violation of these duties, no eminent praise follows such common instances of them, as seem essential to the support of human society. And hence the reason, in my opinion, why, though men often extol so liberally the qualities of their heart, they are shy in commending the endowments of their head: because the latter virtues, being supposed more rare and extraordinary, are observed to be the more usual objects of pride and self-conceit; and when boasted of, beget a strong suspicion of these sentiments.

较之于这样的过错、软弱和卑劣，还有什么是我们更急于向他人隐瞒或是更惧怕暴露于他人的讽刺和嘲弄之下的吗？我们虚荣心的主要对象不就是我们的勇敢或学识、我们的才智或教养、我们的雄辩或机智、我们的品味或能力吗？对于这些品质，我们即便不会夸耀地，也会着意地加以展示。在这些方面，我们通常总是期望在这些方面出类拔萃，显现出更大的雄心，甚至超越了在本身具有更高优越性的社会德性方面出类拔萃的愿望。天性纯良和诚实可靠，尤其是后者，对于我们是如此不可或缺的要求，以至于任何违背这两种义务的言行都会受到最严厉的责难，然而，比比皆是的对这些义务的践行事例却不会赢得特别的赞美，因为它们似乎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础。因此，在我看来，尽管人们常常慷慨称颂他们的心灵品质，却羞于夸赞他们的头脑才能。因为这后一类德性——尽管更珍稀、更卓越

——是骄傲自负更为常见的对象，当人们炫耀它们时，就会招致他人对这些情感的强烈怀疑。

It is hard to tell, whether you hurt a man's character most by calling him a knave or a coward, and whether a beastly glutton or drunkard be not as odious and contemptible, as a selfish, ungenerous miser. Give me my choice, and I would rather, for my own happiness and self-enjoyment, have a friendly, humane heart, than possess all the other virtues of Demosthenes and Philip united: But I would rather pass with the world for one endowed with extensive genius and intrepid courage, and should thence expect stronger instances of general applause and admiration. The figure which a man makes in life, the reception which he meets with in company, the esteem paid him by his acquaintance; all these advantages depend as much upon his good sense and judgement, as upon any other part of his character. Had a man the best intentions in the world, and were the farthest removed from all injustice and violence, he would never be able to make himself be much regarded, without a moderate share, at least, of parts and understanding.

很难判断，称一个人为无赖或懦夫是否会大损他的名声；一个行尸走肉般的饭桶或酒鬼是否像一个自私、吝啬的守财奴那样可鄙可憎？如果让我自行选择，为了我自己的幸福和欢乐，我宁愿有颗友爱和仁慈的心，而不愿拥有德摩斯梯尼和腓力拥有的所有其他德性之和。不过我更情愿作为一个拥有广博的天赋和大无畏的勇气的人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因之而期望获得人们更加肯定、更加普遍的赞赏和钦佩。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树立的光辉形象、在社交中所受到的热情接待，以及在熟人中所获得的尊敬，所有这些益处都依赖于他的理智和良好的判断力，正如依赖于他的性格的其他方面一样。即使一个人

存有世界上最良好的意图，也与一切不义和暴行毫不相关，但倘若他性格的各个方面和知性甚至达不到中等水平，他也不会获得多少尊重。

What is it then we can here dispute about? If sense and courage, temperance and industry, wisdom and knowledge confessedly form a considerable part of PERSONAL MERIT: if a man, possessed of these qualities, is both better satisfied with himself, and better entitled to the good-will, esteem, and services of others, than one entirely destitute of them; if, in short, the SENTIMENTS are similar which arise from these endowments and from the social virtues; is there any reason for being so extremely scrupulous about a WORD, or disputing whether they be entitled to the denomination of virtues? It may, indeed, be pretended, that the sentiment of approbation, which those accomplishments produce, besides its being INFERIOR, is also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at which attends the virtues of justice and humanity. But this seems not a sufficient reason for ranking them entirely under different classes and appellations. The character of Caesar and that of Cato, as drawn by Sallust, are both of them virtuous, in the strictest and most limited sense of the word; but in a different way: nor are the sentiments entirely the same which arise from them. The one produces love, the other esteem: the one is amiable, the other awful: we should wish to meet the one character in a friend; the other we should be ambitious of in ourselves. In like manner , the approbation, which attends temperance or industry or frugality, may be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at which is paid to the social virtues, without making them entirely of a different species. And, indeed, we may observe, that these endowments, more than the other virtues, produce not, all of them, the same kind of approbation. Good sense and genius beget esteem and regard: wit

and humour excite love and affection. [14_2]

那么，我们能在这里争论的是什么问题呢？倘若理智和勇敢、自制和勤奋、智慧和知识被公认为在个人价值的构成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倘若一个具备这些品质的人与一个根本不具备这些品质的人相比，一方面对自己感到更为满意，另一方面更有资格接受他人的善意、尊敬和帮助；简言之，倘若这些才能所激发的情感与社会德性所激发的情感相似，那还有何理由在字眼上这般吹毛求疵，或就它们是否有资格获称德性而争执不下呢？诚然，或许有人声称这些才艺所激发的情感不仅是次级的，而且与正义和仁慈这类德性所激发的情感多少有些不同。但这似乎不足以把它们完全归于不同的类别之下，并且冠之以不同的名称。正如萨鲁斯特所描绘的那样，凯撒和加图的性格即使在最严格、最狭义的意义上来说都是有德的，但是二者形式有别，由它们所激发的情感也不尽相同。一者引发爱，另一者引发尊敬；一者是可亲的，另一者是可畏的；一者我们希望朋友能够具备，另一者我们渴望自身拥有。同样，自制、勤奋或节俭所引起的赞许可能与对社会德性的赞许有所不同，但不至令它们完全归于不同的种类。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与其他的德性相比，这些才能更不可能全部产生同一种赞许的情感。理智和天赋获得尊敬和尊重；机趣和幽默激发爱和好感 [15_2] 。

Most people, I believe, will naturally, without premeditation, assent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elegant and judicious poet:

我相信，大多数人无需预先思考就会自然地赞同这位优雅而明辨的诗人的定义：

Virtue (for mere good-nature is a fool) is sense and spirit with

humanity. [14_3]

德性（仅仅天性纯良乃是愚笨）即理智与仁慈之心 [15_3] 。

What pretensions has a man to our generous assistance or good offices, who has dissipated his wealth in profuse expenses, idle vanities, chimerical projects, dissolute pleasures or extravagant gaming? These vices (for we scruple not to call them such) bring misery unpitied, and contempt on every one addicted to them.

若是一个人将其财富挥霍于奢靡的消费、无用的虚荣、空妄的计划、放荡的享乐或无节制的赌博上，他还有什么借口索求我们慷慨的援助或帮忙呢？这些恶行（我们并不忌讳这样称呼它们）给每一个沉溺其中的人带来不值得怜悯的苦难和蔑视。

Achaeus, a wise and prudent prince, fell into a fatal snare, which cost him his crown and life, after having used every reasonable precaution to guard himself against it. On that account, says the historian, he is a just object of regard and compassion: His betrayers alone of hatred and contempt. [14_4]

阿凯夫斯这位睿智而又谨慎的国王，在采取了一切合理的防范措施来保护自己之后，还是落入了一个致命的陷阱，以致失去了自己的王冠和生命。故而，有位历史学家说，他是尊重和怜悯的恰当对象；唯有他的背叛者们才是憎恨和蔑视的对象 [15_4] 。

The precipitate flight and improvident negligence of Pompe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ivil wars, appeared such notorious blunders to Cicero, as quite palled his friendship towards that great man. In the same manner, says he, as want of cleanliness, decency, or discretion in a mistress are found to alienate our affections. For so he expresses himself, where he talks, not in the character of a philosopher, but in that of a statesman and man of the world, to his friend Atticus. (Lib. ix. epist. 10). But the same Cicero, in imitation of all the ancient moralists, when he reasons as a philosopher, enlarges very much his ideas of virtue, and comprehends every laudable quality or endowment of the mind, under that honourable appellation. This leads to the THIRD reflection, which we proposed to make, to wit, that the ancient moralists, the best models, made no material distinction among the different species of mental endowments and defects, but treated all alike under the appellation of virtues and vices, and made them indiscriminately the object of their moral reasonings. The prudence explained in Cicero's Offices [14_5] is that sagacity, which leads to the discovery of truth, and preserves us from error and mistake. MAGNANIMITY, TEMPERANCE, DECENCY, are there also at large discoursed of. And as that eloquent moralist followed the common received division of the four cardinal virtues, our social duties form but one head, in the general distribution of his subject.[1]

内战爆发时，庞培仓皇的逃跑和短视的过失在西塞罗看来是如此臭名昭著的弥天大错，以至于使他与这位伟大人物的友情彻底破裂。他说："这就好比一个女人不纯洁、不正派、不审慎，故而令我们无法对其产生好感。"他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因为他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饱经世故的人在和他的朋友阿提库斯交谈 [15_5] 。但就是这同一个西塞罗，在作为哲学家进行推理时，却仿效所有古代的道德家的方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关于道

德的观念，将一切值得赞赏的心灵品质或才能都囊括于这一光荣的名称之下。这就引出了我们提议的第三项反思，即古代的道德家，这些最杰出的楷模并没有就心理才能和心理缺点的不同种类作出实质性的区分，而是将它们笼统地置于德性和恶行的名称之下，无差别地作为他们道德推理的对象。西塞罗在其著作《论义务》 [15_6] 中所阐释的明智就是那种引导我们发现真理、规避谬见和错误的智慧。宽宏大度、节欲自制和得体正派在该著作中也得到了详尽的阐述。由于这位雄辩的道德家遵循的是对于这四种重要德性的通常划分，因而在他对主题的总体分配中，我们的社会德性仅仅占据了其中一项[1] 。

1: The following passage of Cicero is worth quoting, as being the most clear and express to our purpose, that any thing can be imagined, and, in a dispute, which is chiefly verbal, must, on account of the author, carry an authority, from which there can be no appeal.

1：西塞罗下面这段话值得引述，因为它极其清楚且明确地适用于我们的目的，即任何事物都可以是想象出来的，并且，在主要是语词范畴的争论中，它因为代表作者而带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Virtus autem, quae est per se ipsa laudabilis, et sine qua nihil laudari potest, tamen habet plures partes, quarum alia est alia ad laudationem aptior. Sunt enim aliae virtutes, quae videntur in moribus hominum, et quadam comitate ac beneficentia positae: aliae quae in ingenii aliqua facultate, aut

animi magnitudine ac robore. Nam clementia, justitia, benignitas, fides, fortitudo in periculis communibus, jucunda est auditu in laudationibus. Omnes enim hae virtutes non tam ipsis, qui eas in se habent, quam generi hominum fructuosae putantur. Sapientia et magnitude animi, qua omnes res humanae tenues et pro nihilo putantur, et in cogitando vis quaedam ingenii, et ipsa eloquentia admirationis habet non minus, jucunditatis minus. Ipsos enim magis videntur, quos laudamus, quam illos, apud quos laudamus ornare ac tueri: sed tamen in laudenda jungenda sunt eliam haec genera virtutum. Ferunt enim aures bominum, cum ilia quae jucunda et grata, tum etiam ilia, quae mirabilia sunt in virtute, laudari.' De orat. lib. ii. cap. 84.

“可是，那自身就值得赞扬，缺之则无可赞扬的德性由很多部分组成，若各个部分相得益彰就更易赢得赞扬。那些在人类的习俗中发现的德性属于温柔和仁慈的范畴；那些在人类的天资中发现的德性属于能力或心灵的宽宏和坚强的范畴。因为众所周知，人们乐于赞扬温和、公正、仁慈、忠实，以及在公共危急时挺身而出的勇敢。事实上，所有这些德行与其说是对其拥有者有益，不如说是对整个人类有益。人类的一切事务被看作微不足道，基于此看法，心灵的智慧和宽宏、思维的天赋才能，以及雄辩的口才并非带来愉悦，更多是引起钦佩。事实上，我们所赞扬的德性似乎比我们赞扬时所依据的德性更应受到赞扬和遵守，

> 但是受到赞扬和遵守的确是后者。事实上，人们所听到的是，一方面令人愉快和满足的德性受到赞扬，另一方面令人钦佩的德性也受到赞扬。”《论演说家》，第二卷，第八十四章。

> I suppose, if Cicero were now alive, it would be found difficult to fetter his moral sentiments by narrow systems; or persuade him, that no qualities were to be admitted as virtues, or acknowledged to be a part of PERSONAL MERIT, but what were recommended by The Whole Duty of Man.

> 我想，如果西塞罗还在世，我们很难用狭隘的体系去束缚他的道德情感，或者劝说他信服，只有“人的整体义务”（译者按：西塞罗《论义务》之一章）中所推荐的品质才可被承认为德性或是个人价值的一部分。

We need only peruse the titles of chapters in Aristotle's Ethics to be convinced that he ranks courage, temperance, magnificence, magnanimity, modesty, prudence, and a manly openness, among the virtues, as well as justice and friendship.

我们只需浏览一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章节题目就能确信，除却正义和友情之外，他还将勇敢、自制、庄严、高尚、谦逊、明智以及一种伟岸的坦荡也纳入德性之列。

To SUSTAIN and to ABSTAIN, that is, to be patient and continent, appeared to some of the ancients a summary comprehension of all morals.

持守和戒绝，即忍耐和克制，在有些古人看来是对全部道德规范的总结概括。

Epictetus has scarcely ever mentioned the sentiment of humanity and compassion, but in order to put his disciples on their guard against it. The virtue of the Stoics seems to consist chiefly in a firm temper and a sound understanding. With them, as with Solomon and the eastern moralists, folly and wisdom are equivalent to vice and virtue.

爱比克泰德几乎从不提及人道和怜悯的情感，除非是为了让他的信徒对之加以提防。斯多葛派推崇的德性似乎主要在于坚定的脾性和健全的知性。对于他们，正如对于所罗门和东方道德家一样，愚蠢和智慧之对立与德恶之对立是并重的。

Men will praise thee, says David, [14_6] when thou dost well unto thyself. I hate a wise man, says the Greek poet, who is not wise to himself [14_7] Plutarch is no more cramped by systems in his philosophy than in his history. Where he compares the great men of Greece and Rome, he fairly sets in opposition all their blemishes and accomplishments of whatever kind, and omits nothing considerable, which can either depress or exalt their characters. His moral discourses contain the same free and natural censure of men and manners.

大卫 [15_7] 说："当你善待自己时，人们将赞美你。"有位希腊诗人说："我憎恶那些对自己不聪明的聪明人。" [15_8] 普鲁塔克在其哲学中与在其历史学中同样不受体系所束缚。他在比较希腊和罗马的伟人时，公平地将他们的各种缺点和才艺都加以对照，未曾忽略任何能够贬损或提升他们性格的重要方面。他的道德论说同样包含了对人和作风所作出的自由和自然的责难。

The character of Hannibal, as drawn by Livy, [14_8] is esteemed partial, but allows him many eminent virtues. Never was there a genius, says the historian, more equally fitted for those opposite offices of commanding and obeying; and it were, therefore,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ther he rendered himself DEARER to the general or to the army. To none would Hasdrubal entrust more willingly the conduct of any dangerous enterprize; under none did the soldiers discover more courage and confidence. Great boldness in facing danger; great prudence in the midst of it. No labour could fatigue his body or subdue his mind. Cold and heat were indifferent to him: Meat and drink he sought as supplies to the necessities of nature, not as gratifications of his voluptuous appetites. Waking or rest he used indiscriminately, by night or by day.—These great Virtues were balanced by great Vices; inhuman cruelty; perfidy more than punic; no truth, no faith, no regard to oaths, promises, or religion.

正如李维 [15_9] 所描述的，汉尼拔的性格被认为是缺乏公正的，但是却具备许多卓越的德性。这位历史学家说，从来没有哪位天才能像他这般同等地胜任命令和服从这两种对立的职责，因而很难断定究竟是将军还是士兵更喜爱他。哈斯德鲁拔最愿意委派他去执行所有危险的行动；士兵们在他的领导下最勇敢、也最有信心。面对危险，他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而在险境中他又极为谨慎。任何劳苦都无法摧

垮他的身体、使他的心灵屈服。他对寒暑无动于衷；酒肉于他只是用来充饥解渴，而非满足口腹之欲。作息上他不分昼夜。但他这些伟大的德性却都被他重大的恶行抵消了：野蛮残忍、比迦太基人更严重的背信弃义、湮灭真理、丧失信仰、不重誓约、不守承诺、不信宗教。

The character of Alexander the Sixth, to be found in Guicciardin, [14_9] is pretty similar, but juster; and is a proof that even the moderns, where they speak naturally, hold the same language with the ancients. In this pope, says he, there was a singular capacity and judgement: Admirable prudence; a wonderful talent of persuasion; and in all momentous enterprizes a diligence and dexterity incredible. But these VIRTUES were infinitely overbalanced by his VICES; no faith, no religion, insatiable avarice, exorbitant ambition, and a more than barbarous cruelty.

根据圭恰迪尼 [15_10] 的描述，亚历山大六世的性格与汉尼拔颇为相似，只不过更公正一些罢了。这也证明，即便是现代人，他们自然地讲话时，与古人所说的语言也别无二致。他说，这位教皇具有非凡的能力和判断力、令人钦佩的明智、令人惊叹的游说天赋以及在一切重大的事物中所表现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勤奋和机敏。但是他的恶行彻底湮没了这些德性：丧失信仰、不信宗教、贪得无厌、野心勃勃、比野蛮人更甚的野蛮凶残。

Polybius, [14_10] reprehending Timaeus for his partiality against Agathocles, whom he himself allows to be the most cruel and impious of all tyrants, says: if he took refuge in Syracuse, as asserted by that historian, flying the dirt and smoke and toil of his former profession of a potter; and if proceeding from such slender beginnings, he became master, in a little time, of all Sicily; brought

the Carthaginian state into the utmost danger; and at last died in old age, and in possession of sovereign dignity: must he not be allowed something prodigious and extraordinary, and to have possessed great talents and capacity for business and action? His historian, therefore, ought not to have alone related what tended to his reproach and infamy; but also what might redound to his Praise and Honour.

波里比阿 [15_11] 指责提麦奥斯对阿迦托克勒斯有失公允，尽管他自己也承认阿迦托克勒斯是所有暴君中最残忍、最邪恶的。他说，如果像提麦奥斯这位历史学家所断言的，他在叙拉古避难时重操旧业，不避泥土烟尘，辛苦制陶，以如此低微的开端，在短期内一跃而成为整个西西里岛的主宰，令迦太基城邦岌岌可危，并最终以君主之尊寿终正寝，那么岂不是必须承认，他身上具有奇异过人之处，承认他具备成就事业和行动的杰出天赋和能力吗？因此，记述他的历史学家提麦奥斯不应当只记述那些使他声名受损的事迹，而也应当记述那些使他赢得赞美和荣誉的事迹。

In general, we may observe, that the distinction of voluntary or involuntary was little regarded by the ancients in their moral reasonings; where they frequently treated the question as very doubtful, WHETHER VIRTUE COULD BE TAUGHT OR NOT? [14_11] They justly considered that cowardice, meanness, levity, anxiety, impatience, folly, and many other qualities of the mind, might appear ridiculous and deformed, contemptible and odious, though independent of the will. Nor could it be supposed, at all times, in every man's power to attain every kind of mental more than of exterior beauty.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在道德推理中很少关注自愿与非自愿的区别；他们会时常质疑“德性是否可传授”这个问题[15_12]。他们正当地认为，懦弱、卑劣、轻浮、焦虑、急躁、愚蠢和心灵的许多其他品质都可能显得荒唐、丑陋、可鄙、可憎，尽管它们不受意志所控。我们也无法设想，在各个时代，每个人都具有比获得外在美更大的力量去获得各种内心美。

And here there occurs the FOURTH reflection which I purposed to make, in suggesting the reason why modern philosophers have often followed a course in their moral enquiries s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ancients. In later times, philosophy of all kinds, especially ethics, have been more closely united with theology than ever they were observed to be among the heathens; and as this latter science admits of no terms of composition, but bends every branch of knowledge to its own purpose, without much regard to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or to the unbiassed sentiments of the mind, hence reasoning, and even language, have been warped from their natural course, and distinctions have been endeavoured to be established where the difference of the objects was, in a manner, imperceptible. Philosophers, or rather divines under that disguise, treating all morals as on a like footing with civil laws, guarded by the sanctions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were necessarily led to render this circumstance, of VOLUNTARY or INVOLUNTARY,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whole theory. Every one may employ TERMS in what sense he pleases: but this, in the mean time, must be allowed, that SENTIMENTS are every day experienced of blame and praise, which have objects beyond the dominion of the will or choice, and of which it behoves us, if not as moralists, as speculative philosophers at least, to give some satisfactory theory and explication.

这里，在阐释为什么现代哲学家的道德探究路线与古人差异如此之大时，就出现了我提议做出的第四项反思。在晚近时期，各种哲学，尤其是伦理学，与神学之间的关系，在异教徒中比以往都密切得多。由于神学不接纳任何形式的调和，而只是强令各门学科都服从于它自己的意图，不尊重自然现象以及心灵不偏不倚的情感，因而那些哲学推理，甚至语言都偏离了它们自然的轨道，还力图在差异微乎其微的对象之间作出区分。哲学家，或者毋宁说是伪装成哲学家的神学家们，当他们站在类似民法的立场上，即以奖惩为制裁手段来探究一切道德规范时，就必然导致他们将自愿还是非自愿这一因素作为他们全部理论的根基。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喜好出发来使用术语，但是同时也必须承认，谴责和赞美的情感是我们每天都会体验到的，这些情感的对象不受意志掌控，也无从选择。对于这些情感，即使不作为道德家，至少作为思辨哲学家，我们也应提出令人满意的理论和解释。

A blemish, a fault, a vice, a crime; these expressions seem to denote different degrees of censure and disapprobation; which are, however, all of them, at the bottom, pretty nearly of the same kind or species. The explication of one will easily lead us into a just conception of the others; and it is of greater consequence to attend to things than to verbal appellations. That we owe a duty to ourselves is confessed even in the most vulgar system of morals; and it must be of consequence to examine that duty, in order to see whether it bears any affinity to that which we owe to society.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approbation attending the observance of both is of a similar nature, and arises from similar principles, whatever appellation we may give to either of these excellencies.

污点、过错、恶行、罪恶，这些表达似乎表明不同程度的责难和不满；然而它们在本质上十分接近，几乎属于同一种类。对其中一项

的解释会让我们很容易正确地把握其他几项的概念；况且关注事物本身比关注语词名称重要得多。我们对自身负有义务，这在即便是最通俗的道德体系中也得到了承认；探察我们对自身的义务与我们对社会的义务是否有亲缘性，必然具有重要意义。或许，无论我们给予这两项美德中的任何一项什么样的名称，对它们的遵奉都会以相似的原则激发出相似性质的赞许。

[14_1].The term, pride, is commonly taken in a bad sense; but this sentiment seems indifferent, and may be either good or bad, according as it is well or ill founded, and according to the other circumstances which accompany it. The French express this sentiment by the term, AMOUR PROPRE, but as they also express self-love as well as vanity by the same term, there arises thence a great confusion in Rochefoucault, and many of their moral writers.

[14_2].Love and esteem are nearly the same passion, and arise from similar causes. The qualities, which produce both, are such as communicate pleasures. But where this pleasure is severe and serious; or where its object is great, and makes a strong impression, or where it produces any degree of humility and awe; in all these cases, the passion, which arises from the pleasure, is more properly denominated esteem than love. Benevolence attends both; but is connected with love in a more eminent degree. There seems to be still a stronger mixture of pride in contempt than of humility in esteem; and the reason would not be difficulty to one, who studied accurately the passions. All these various mixtures and compositions and appearances of sentiment from a very curious subject of speculation, but are wide for our present purpose. Throughout this enquiry, we always consider in general, what qualities are a subject of praise or of censure, without entering into all the minute differences of sentiment, which they excite. It is evident, that whatever is contemned, is also disliked, as well as what is hated; and we here endeavour to take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ir most simple views and appearances. These sciences are but too apt to appear abstract to common readers, even with all the precautions which we can take to clear them from superfluous speculations, and bring them down to every capacity.

[14_3].The Art of preserving Health. Book 4.

[14_4].Polybius, lib. iii. cap. 2

[14_5].Lib. i. cap. 6.

[14_6].Psalm 49th.

[14_7].Here, Hume quotes Euripedes in Greek.

[14_8].Lib. xxi. cap. 4

[14_9].Lib. i.

[14_10].Lib. xii.

[14_11].Vid. Plato in Menone, Seneca de otio sap. cap. 31. See also Horace, Virtutem doctrina paret, naturane donet, Epist. lib. I. ep. 18. Aeschines Socraticus, Dial. I.

[15_1].骄傲这个术语通常被从负面的意义上加以理解，但是这种情感似乎是中性的，好坏都有可能，完全取决于其基础的好坏以及其他的附加因素。法国人用AMOUR PROPRE（自尊）一词来表达这种情感，但由于该词同时也可表达自爱和虚荣之意，因而在拉罗什福科和其他许多道德作家的著作中引起了巨大的混乱。

[15_2].爱和尊敬几乎是同一种激情，而且源于相似的原因。产生这两种情感的品质都同样传达了快乐。但是，如果传达的快乐是严肃的和庄重的，或者如果这种快乐的对象是伟大的，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又或者这种快乐引起一定程度的谦卑和敬畏，那么在所有这些情形之下，这种快乐带来的激情就更适合称之为尊敬，而不是爱。尊敬与爱中都伴有仁爱，但仁爱与爱的关系更为紧密。蔑视中带有骄傲；尊敬里含有谦卑。似乎前二者的混合更为明显，其理由对于精密研究过这些激情的人来说是不难发现的。情感的所有这些混合、组成和现象构成一个非常令人好奇的思辨主题，但是对于我们当前的探讨目的来说却过于宽泛。在整个探究过程中，我们总是一般地考虑什么品质是赞美的对象，什么品质是责难的对象，而没有涉及这些品质所激起的情感的所有细微的差异。显而易见，凡是受到蔑视的对象，也是不受喜爱的，同时也是受到憎恶的。在这里，我们尽力按照这些对象的最简单的表象和现象来对待它们。这些科学研究，即使我们尽可能地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来防止它们陷入过于繁琐的思辨，将其难度降低以适应所有读者的理解能力，但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它们还是很容易显得抽象晦涩。

[15_3].《保健的艺术》，第四卷。

[15_4].波里比阿，《历史》，第三卷，第二章。

[15_5].《致阿提库斯书简》，第九卷，第十简。

[15_6].《论义务》，第一卷，第六章。

[15_7].《诗篇》，第四十九篇。

[15_8].此处，休谟引用了欧里庇得斯的希腊语原文。

[15_9].《罗马史》，第二十一卷，第四章。

[15_10].《意大利史》，第一卷。

[15_11].《历史》，第十二卷

[15_12].参见柏拉图《美诺篇》；塞涅卡《论悠闲》第三十一章；贺拉斯亦如是说，“德性是教育的产物，还是自然的馈赠？”《书简》第一卷，第十八简；苏格拉底派的埃斯西勒斯，《对话一》。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第一哲学沉思录

Rene Descarte

勒内·笛卡尔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第一哲学沉思录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勒内·笛卡尔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Letter of Dedication 感谢信
- Preface to the Reader 前言
- Synopsis of the Six Following Meditations 六个沉思之提要
- Meditation I OF THE THINGS OF WHICH WE MAY DOUBT. 沉思一 论可疑之物
- Meditation II OF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MIND; AND THAT IT IS MORE EASILY KNOWN THAN THE BODY. 沉思二 论人类灵魂之本性，兼论其比肉体更容易认识
- Meditation III OF GOD: THAT HE EXISTS. 沉思三 论上帝之存在
- Meditation IV OF TRUTH AND ERROR. 沉思四 论真理与谬误
- Meditation V OF THE ESSENCE OF MATERIAL THINGS; AND, AGAIN, OF GOD; THAT HE EXISTS. 沉思五 论物质性事物的本质；再论上帝之存在
- Meditation VI OF THE EXISTENCE OF MATERIAL THINGS, AND OF THE RE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IND AND BODY OF MAN. 沉思六 论物质性东西的存在；兼论人的灵魂和肉体之间的真正区别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Letter of Dedication

感谢信

TO THE VERY SAGE AND ILLUSTRIOUS THE DEAN AND DOCTORS OF THE SACRED FACULTY OF THEOLOGY OF PARIS.

致神圣的巴黎神学院院长和圣师们

Gentlemen,

先生们：

1．The motive which impels me to present this Treatise to you is so reasonable, and when you shall learn its design, I am confident that you also will consider that there is ground so valid for your taking it under your protection, that I can in no way better recommend it to you than by briefly stating the end which I proposed to myself in it.

1．我献给你们本书的动机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我深信，在你们了解到本书的用意以后，也会想到用足够的理由把它置于你们的保护之下，因此，为了更好地向你们推荐本书，我向你们简单地说明一下本书的写作目的。

2 . I have always been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two questions respecting God and the Soul were the chief of those that ought to be determined by help of Philosophy rather than of Theology; for although to us, the faithful, it be sufficient to hold as matters of faith, that the human soul does not perish with the body, and that God exists, it yet assuredly seems impossible ever to persuade infidels of the reality of any religion, or almost even any moral virtue, unless, first of all, those two things be proved to them by natural reason. And since in this life there are frequently greater rewards held out to vice than to virtue, few would prefer the right to the useful, if they were restrained neither by the fear of God nor the expectation of another life; and although it is quite true that the existence of God is to be believed since it is taught in *the sacred Scriptures* , and that, on the other hand, *the sacred Scriptures* are to be believed because they come from God (for since faith is a gift of God, the same Being who bestows grace to enable us to believe other things, can likewise impart of it to enable us to believe his own existence), nevertheless, this cannot be submitted to infidels, who would consider that the reasoning proceeded in a circle. And, indeed, I have observed that you, with all the other theologians, not only affirmed the sufficiency of natural reason for the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but also, that it may be inferred from *sacred Scripture* , that the knowledge of God is much clearer than of many created things, and that it is really so easy of acquisition as to leave those who do not possess it blameworthy. This is manifest from these words of the *Book of Wisdom* , chap. xiii.,where it is said, Howbeit they are not to be excused; for if their understanding was so great that they could discern the world and the creatures, why did they not rather find out the Lord thereof? And in *Romans* , chap. i., it is said that they are without excuse; and again, in the same place, by these words, That which may be known of God is manifest in them—we seem to be admonished that all which can be known

of God may be made manifest by reasons obtained from no other source than the inspection of our own minds. I have, therefore, thought that it would not be unbecoming in me to inquire how and by what way, without going out of ourselves, God may be more easily and certainly known than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2．我一直这样认为，在回答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借助的是哲学而不是神学。因为，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信教的人来说，光凭信仰就足以使我们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灵魂不会随着肉身的死亡而消亡，可是对于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甚至不懂伦理道德的人来说，如果不首先用浅显易懂的道理来证明这两个事物，我们肯定说服不了他们。与此同时，因为罪恶的行为经常比道德的行为在生活上给人们带来的好处要多得多，这样一来，如果不是因为害怕上帝的惩罚和向往来世的报偿而在行为上有所克制的话，多数人都会选择有利可图的而不是正确的行为。不错，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的存在，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同时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经》，因为它是来自上帝的恩赐（这是因为："信仰"是上帝的一种恩赐，上帝既然可以使我们相信世间万物，那么他同样也能使我们相信他自己的存在），然而这个理由不能说服不信教的人，因为他们会以为我们在这上面犯了逻辑学家们称为循环论的错误。确实，我已经看出来了，你们，以及所有其他神学家们，不仅确信上帝的存在是能够用浅显易懂来证明的，而且你们也明白从《圣经》中得出的关于上帝的论述要比其他造物更清楚明白，同时这种认知也更加容易获得；没有这种认知的人应当受到谴责。就像《智慧书》第十三章里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无知是不可饶恕的，他们既然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达到如此程度，为什么无法从中找到至高无上的主呢?"在《达罗马人书》第一章里，说他们是"不可原谅的"，并且在同一章里用这样的话说："人们对上帝的认识，显明于他们的内心"。我们似乎被告诫所有关于上帝的认知只能从我们内心而不是别的途径获得。因此，我才在这里提出如何在不走出我们内心的情况下，做到对上帝的认知，因为认知上帝比认知其他世间万物更加容易，在我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3 . And as regards the Soul, although many have judged that its nature could not be easily discovered, and some have even ventured to say that human reason l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 perished with the body, and that the contrary opinion could be held through faith alone; nevertheless, since the Lateran Council, held under Leo X. (in session viii.), condemns these, and expressly enjoins Christian philosophers to refute their arguments, and establish the truth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I have ventured to attempt it in this work.

3．至于灵魂，许多人认为灵魂的本质很难被发现，甚至有人冒险认为由于人的原因，灵魂会随肉体的死亡而消失。与其相左的认识只有通过信仰才能得到印证。虽然如此，利奥十世主持的拉特兰宗教会议（第八次会议）对他们进行了谴责，并且特别命令基督教哲学家们要对那些人的论点加以驳斥，要全力以赴地去阐明真理，我也冒险尝试在本书中进行这项工作。

4 . Moreover, I am aware that most of the irreligious deny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the distinctness of the human soul from the body, for no other reason than because these points, as they allege, have never as yet been demonstrated. Now, although I am by no means of their opinion, but, on the contrary, hold that almost all the proofs which have been adduced on these questions by great men, possess, when rightly understood, the force of demonstrations, and that it is next to impossible to discover new, yet there is, I apprehend, no more useful service to be performed in Philosophy, than if someone were, once for all, carefully to seek out the best of these reasons, and expound them so accurately and clearly that, for the future, it might be manifest to all that they are real

demonstrations. And finally, since many persons were greatly desirous of this, who knew that I had cultivated a certain Method of resolving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in the sciences, which is not indeed new (there being nothing older than truth), but of which they were aware I had made successful use in other instances, I judged it to be my duty to make trial of it also on the present matter.

4．此外，我注意到许多不信教的人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们无法看到灵魂和肉体的区别。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至今无人能够就这两个问题作出最好的证明。我显然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与此相反，我认为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那些伟大的人物就这个问题提出的那些理论，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我们亦无法找到更好的理由了；但是确实有许多其他理由存在，在我看来，我们应当站在哲学的角度上认真的找出一些最好的、最有说服力的道理，继而将其完善、整理，而将来的人将会笃信这些都是经过认真仔细审阅的证明，这将会是哲学界的一大幸事。最后，众所周知我曾用某种方法解决过些许科学难题，继而身负众望让我来解决这个难题，老实说，我的方法并不新颖，因为再没有什么事物能比真理更加古老了。不过，他们知道我曾成功的使用过这种方法，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有责任和义务去挑起这根大梁。

5．Now the sum of what I have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on the subject is contained in this Treatise. Not that I here essayed to collect all the diverse reasons which might be adduced as proofs on this subject, for this does not seem to be necessary, unless on matters where no one proof of adequate certainty is to be had; but I treated the first and chief alone in such a manner that I should venture now to propose them as demonstrations of the highest certainty and evidence. And I will also add that they are such as to lead me to think that there is no way open to the mind of man by

which proofs superior to them can ever be discovered for the importance of the subject, and the glory of God, to which all this relates, constrain me to speak here somewhat more freely of myself than I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do. Nevertheless, whatever certitude and evidence I may find in these demonstrations, I cannot therefore persuade myself that they are level to the comprehension of all. But just as in geometry there are many of the demonstrations of Archimedes, Apollonius, Pappus, and others, which, though received by all as evident even and certain (because indeed they manifestly contain nothing which, considered by itself, it is not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and no consequents that are inaccurately related to their antecedents), are nevertheless understood by a very limited number, because they are somewhat long, and demand the whole attention of the reader: so in the same way, although I consider the demonstrations of which I here make use, to be equal or even superior to the geometrical in certitude and evidence, I am afraid, nevertheless, that they will not be adequately understood by many, as well because they also are somewhat long and involved, as chiefly because they require the mind to be entirely free from prejudice, and able with ease to detach itself from the commerce of the senses. And, to speak the truth, the ability for metaphysical studies is less general than for those of geometry. And, besides, there is still this difference that, as in geometry, all are persuaded that nothing is usually advanced of which there is not a certain demonstration, those but partially versed in it err more frequently in assenting to what is false, from a desire of seeming to understand it, than in denying what is true. In philosophy, on the other hand, where it is believed that all is doubtful, few sincerely give themselves to the search after truth, and by far the greater number seek the reputation of bold thinkers by audaciously impugning such truths as are of the greatest moment.

5．就这个问题来说，我能做的一切都在这个册子里了。我并没有将所有问题以及他们衍生出来的各类问题搜集进来，因为这没有必要同时有些问题也找不到站得住脚的理由。在此我只是阐述了那些在我看来最重要，最明显，最可靠的理由。同时我还得这样说，这是在人力情况下能够做到的最好的论证了。由于此事关乎上帝的荣耀，我不得不把话说得绝对一点。尽管我收集整理了许多可靠的理由，但我并不认为他们能够为大众所理解。在几何学里，很多论证是阿基米德、阿波罗尼奥斯、帕普斯以及许多其他前辈留下的，大家非常认可这些论证，因为如果把它们分开来看，它们所包含的道理都是通俗易懂的，前因后果的衔接也非常的到位。不过这些论证都有点冗长，而且都需要用心思考，因此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同样的，我在本书中使用的论证方式和在几何学的论证方式同样可靠，甚至更加可靠，但是我还是担心许多人无法真正理解这些理论。一方面因为这些论证太长，并且它们又是相互关联的；更主要的是，它们寻求精神上的纯净摆脱一切外物干扰。说实话，世界上善于做形而上学思考的人没有善于研究几何学的人多。此外，不同的还有：在几何学里，人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确切可靠地论证就不能继续研究下去，于是一些在这方面研究不深的人，为了表明他们懂得什么，他们经常错在肯定了一些错误的论证，而不是错在否定了一些正确的论证。在哲学里就不是这样。另一方面，在哲学里，大家都认为凡是哲学上的命题都是不可靠的，因而只有很少的人才乐于追求真理；更有甚者，为了博得才子的名声，竟然无知无畏的对真理进行狂妄的攻击。

6．Hence it is that, whatever force my reasonings may possess, yet because they belong to philosophy, I do not expect they will have much effect on the minds of men, unless you extend to them your patronage and approval. But since your Faculty is held in so great esteem by all, and since the name of SORBONNE is of such authority, that not only in matters of faith, but even also in what regards human philosophy, has the judgment of no other society, after the Sacred Councils, received so great deference, it being the

universal conviction that it is impossible elsewhere to find greater perspicacity and solidity, or greater wisdom and integrity in giving judgment, I doubt not, if you but condescend to pay so much regard to this Treatise as to be willing, in the first place, to correct it (for mindful not only of my humanity, but chiefly also of my ignorance, I do not affirm that it is free from errors); in the second place, to supply what is wanting in it, to perfect what is incomplete, and to give more ample illustration where it is demanded, or at least to indicate these defects to myself that I may endeavour to remedy them; and, finally, when the reasonings contained in it, by which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the distinction of the human soul from the body are established, shall have been brought to such degree of perspicuity as to be esteemed exact demonstrations, of which I am assured they admit, if you condescend to accord them the authority of your approbation, and render a public testimony of their truth and certainty, I doubt not, I say, but that henceforward all the errors which have ever been entertained on these questions will very soon be effaced from the minds of men. For truth itself will readily lead the remainder of the ingenious and the learned to subscribe to your judgment; and your authority will cause the atheists, who are in general sciolists rather than ingenious or learned, to lay aside the spirit of contradiction, and lead them, perhaps, to do battle in their own persons for reasoningswhich they find considered demonstrations by all men of genius, lest they should seem not to understand them; and, finally, the rest of mankind will readily trust to so many testimonies, and there will no longer be any one who will venture to doubt either the existence of God or the real distinction of mind and body. It is for you, in your singular wisdom, to judg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beliefs, [who are cognisant of the disorders which doubt of these truths produces]. [1_1] But it would not here become me to commend at greater length the cause of God and of religion to you,

who have always proved the strongest suppor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6．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管我的理由具有多大说服力，只要它们是属于哲学范畴的，假定不对这些理由加以保护，就不会对知识界产生较大影响。因为大家对贵学院的评价如此之高，而巴黎大学的威望又如此之大，以致不仅在有关信仰上，自从神圣的宗教会议以后大家从来没有这样尊崇过任何其他教团的判断，而且在人类哲学上，大家都认为在别的地方不可能再有什么更坚毅有力、知识丰富、小心持重、完整无缺的判断了。因此我毫不怀疑，如果你们肯于关怀这本著作，首先，愿意对它加以修订（对于我的缺点和无知，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我不敢肯定书中没有什么错误）；其次，裨补缺漏，把不够好的地方加以改善，并且费心在有必要的地方加上一些比较充实的解释，或者至少告诉我以便我再进一步完善它；最后，敢于不辞辛苦地作一声明，在我推理上帝确实存在、灵魂确实可以独立于肉体存在之时，其中的论证准确得当，内容真实可靠，那么在有关这两个问题上曾经发生的错误见解无疑就会很快地从大家心中清除。因为真理将使一切博学的人士赞成你们的判断，并且承认你们的权威，而目空一切，既不博学也不正确的一般无神论者，将会不再保持对抗的态度，或者也许会在看到诸位学者都把这些理由接受过来当作论证之后，害怕显得他们对这些理由一无所知，所以他们自己也会接受这些理由；最后，其余众人也会向这些确凿的事实认输，不至于再有人对上帝存在和灵魂与肉体之间的真正的区别加以怀疑了。你们已经看到了，［对信仰怀疑，这造成了多么大的混乱，］[2_1] 现在就是你们学会要作出判断的时刻了。不过，如果我在这里对你们喋喋不休地说着上帝和宗教事业，那未免显得班门弄斧，太不知趣了，因为你们一向是天主教最忠诚的支持者。

[1_1].The square brackets, here and throughout the volume, are used to mark additions to the original of the revised French translation.

[2_1].此处及本书所使用的方括号是用来标注在原法语修订版基础上的增补内容。

Preface to the Reader

前言

1．I have already slightly touched upon the questions respecting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soul, in the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of rightly conducting the Reason, and seeking Truth in the Sciences,“* published in French in the year 1637; not however, with the design of there treating of them fully, but only, as it were, in passing, that I might learn from the judgment of my readers in what way I should afterward handle them; for these questions appeared to me to be of such moment as to be worthy of being considered more than once, and the path which I follow in discussing them is so little trodden, and so remote from the ordinary route that I thought it would not be expedient to illustrate it at greater length in French, and in a discourse that might be read by all, lest even the more feeble minds should believe that this path might be entered upon by them.

1．关于上帝的存在和人类灵魂的本性这两个问题，我在《谈谈正确引导理性在各门科学上引导理性的方法》（以下简称《谈谈方法》）一书中稍有涉及。该书于1637年以法文出版。然而，那时我只是顺便一谈，并无意深入讨论，只为看看大家对这两个问题如何判断，好从中学习，以便以后应付之用。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非常重要，只谈一次总嫌不够；而我谈论这两个问题的方式有些生僻，和人们通常用的方法大不相同，因此我认为用长篇大论的法文来谈论这两个问题，并非权宜之计，而且这本书人人可读，我担心知识浅薄的人会以为我许可他们也来试探一下往这条路上走。

2．But, as in the *“Discourse on Method,“* I had requested all who might find aught meriting censure in my writings, to do me the favor of pointing it out to me, I may state that no objections worthy of remark have been alleged against what I then said on these questions except two, to which I will here briefly reply, before undertaking their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2．在《谈谈方法》里，我曾说过无论何人，若发现我的书有任何问题都请费心告知我；可是在我谈到的这两个问题上，除了提出来两点反驳以外，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别的重要意见。对于这两点反驳，我想先做一简短的回答，然后再详尽解答。

3．The first objection is that though, while the human mind reflects on itself, it does not perceive that it is any other than a thinking thing,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its nature or essence consists only in its being a thing which thinks; so that the word ONLY shall exclude all other things which might also perhaps be said to pertain to the nature of the mind. To this objection I reply, that it was not my intention in that place to exclude these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ruth in the matter (of which I did not then treat), but only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hought (perception); so that my meaning was, that I clearly apprehended nothing, so far as I was conscious, as belonging to my essence, except that I was a thinking thing, or a thing possessing in itself the faculty of thinking. But I will show hereafter how, from the consciousness that nothing besides thinking belongs to the essence of the mind, it follows that nothing else does in truth belong to it.

3．第一个反驳是：单从人类灵魂自我反照上，看不出其是一个

思想物，也看不出其本性或本质仅仅存在于会思想的事物；因为那样一来，“仅仅”这一词就把其他凡是有可能说得上也属于灵魂的东西都排除掉了。对这个反驳我的答辩是：那时我并不是有意按照事物的实在情况的次序（因为那时我还没有谈到事物的实在情况），而仅仅是按照思想的次序，把它们排除了。我的意思是：我那时还不清楚地知道我是属于我的本质的，我只知道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事物，或有思想能力的事物。不过之后我将指出，我是如何在认定除了思想没有什么是属于灵魂本质的基础上，引申出事实上没有事物是属于它的。

4．The second objection is that it does not follow, from my possessing the idea of a thing more perfect than I am, that the idea itself is more perfect than myself, and much less that what is represented by the idea exists. But I reply that in the term idea there is here something equivocal; for it may be taken either materially for an act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 this sense it cannot be said to be more perfect than I, or objectively, for the thing represented by that act, which, although it be not supposed to exist out of my understanding, may, nevertheless, be more perfect than myself, by reason of its essence. But, in the sequel of this treatise I will show more amply how, from my possessing the idea of a thing more perfect than myself, it follows that this thing really exists.

4．第二个反驳是：从我心里有一个比我完美的事物这一观念，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观念比我完美，更不能说这个观念所代表的东西存在。我的答辩是：观念这个词在这里是有不同含义的。它或其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解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观念比我完美；它或者可以客观地被当作这种活动所代表的东西，这个东西，虽然不能假定它存在于我的理智之外，可是由于它的本质的缘故，它却可以比我完美。但是，在本书的后续章节里我会更充分地说明，我是

如何仅仅从我心里有比我完美的事物这一观念引申出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5．Besides these two objections, I have seen, indeed, two treatises of sufficient length relating to the present matter. In these, however, my conclusions, much more than my premises, were impugned, and that by arguments borrowed from the common places of the atheists. But, as arguments of this sort can make no impression on the minds of those who shall rightly understand my reasonings, and as the judgments of many are so irrational and weak that they are persuaded rather by the opinions on a subject that are first presented to them, however false and opposed to reason they may be, than by a true and solid, but subsequently received, refutation of them, I am unwilling here to reply to these strictures from a dread of being, in the first instance, obliged to state them. I will only say, in general, that all which the atheists commonly allege in favor of the non-existence of God, arises continually from one or other of these two things, namely, either the ascription of human affections to Deity, or the undue attribution to our minds of so much vigor and wisdom that we may essay to determine and comprehend both what God can and ought to do; hence all that is alleged by them will occasion us no difficulty, provided only we keep in remembrance that our minds must be considered finite, while Deity is incomprehensible and infinite.

5．除这两个反驳以外，我其实还看到两篇有关于此的相当长的文章。然而，超乎预料，我的结论遭到指责，而且指责我的论据是从无神论者那里借来的。不过，这样的论据对于能正确理解我的理由的人来说，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而且这些判断非常不理性，还很无力，首先呈现给他们的意见，就能说服他们，不论这些意见是否错误

或有悖于理性。而一些真实有力，渐渐呈现的却被他们拒绝。因此对这两篇文章我不愿意在这里进行答辩，我怕要去答辩，就不得不把这两篇文章的内容首先介绍一番。我只想说，通常情况下，无神论者通常所宣称的上帝的虚无存在，都是陆续来自于这两个事物之一，也就是说，或是归因于对神圣的喜爱，或是不合理地归因于充满活力和智慧的灵魂，我们可以借此确定和理解上帝能做和应该做的。然而他们宣称的一切，对我们不会造成什么困难，只要我们铭记我们的灵魂必须视为有限的，而上帝是不可理解的和无限的。

6．Now that I have once, in some measure, made proof of the opinions of men regarding my work, I again undertake to treat of God and the human soul,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discuss the principles of the entire First Philosophy, without, however, expecting any commendation from the crowd for my endeavors, or a wide circle of readers. On the contrary, I would advise none to read this work, unless such as are able and willing to meditate with me in earnest, to detach their minds from commerce with the senses, and likewise to deliver themselves from all prejudice; and individuals of this character are, I well know, remarkably rare. But with regard to those who, without caring to comprehend the order and connection of the reasonings, shall study only detached clauses for the purpose of small but noisy criticism, as is the custom with many, I may say that such persons will not profit greatly by the reading of this treatise; and although perhaps they may find opportunity for cavilling in several places, they will yet hardly start any pressing objections, or such as shall be deserving of reply.

6．现在，在一定程度上我已充分理解了大家的意见，再重新开始讨论关于上帝和灵魂的问题，同时也讨论一下完整的第一哲学的一些原则。不过，我既不想得到一般人的什么好评，也不期待很多人读

我的书。相反，我不会强求任何人去读这本书，除了那些有能力并愿意和我一起进行严肃认真的沉思，并且能够脱离感官的干扰、完全从各种成见中摆脱出来的人，当然这样的人不多。至于毫不考虑我所讲的理由的次序和联系而断章取义、专门以吹毛求疵为乐的那些人（这样的人很多），我可以说纵使他们读了我的书，也是徒劳无功。虽然他们也许会在有些地方找到横加指责的机会，然而他们也找不出来什么切实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回答的问题。

7．But since, indeed, I do not promise to satisfy others on all these subjects at first sight, nor arrogate so much to myself as to believe that I have been able to foresee all that may be the source of difficulty to each ones I shall expound, first of all, in the *Meditations*, those considerations by which I feel persuaded that I have arrived at a certain and evident knowledge of truth, in order that I may ascertain whether the reasonings which have prevailed with myself will also be effectual in convincing others. I will then reply to the objections of some men, illustrious for their genius and learning, to whom these *Meditations* were sent for criticism before they were committed to the press; for these objections are so numerous and varied that I venture to anticipate that nothing, at least nothing of any moment, will readily occur to any mind which has not been touched upon in them. Hence it is that I earnestly entreat my readers not to come to any judgment on the questions raised in the *Meditations* until they have taken care to read the whole of the Objections, with the relative Replies.

7．的确，我不敢保证大家一眼就能满意我的看法，也不高估自己有那么大本领足以预见到可能给每个人带来的困难，因而我将在本书里开宗明义，阐明我的想法，按照这种想法我是怎么相信我终于认识了确切、明显的真理，以便试试看能否用同样的理由也获得别人的

信任和认同。然后对那些博学多才之人的反驳进行答辩。我已经把我的这些沉思给他们寄去了，让他们在该书付印之前审查一下。他们的反驳众多，且各种各样都有，因此我敢说别的人很难再提出什么更重要、没有涉及的反驳了。因此我对想看本书的读者有个请求，请他们费心在看过所有那些反驳和我对那些反驳所做的答辩之前，先不要下相应的什么结论。

Synopsis of the Six Following Meditations

六个沉思之提要

1．In the First Meditation I expound the grounds on which we may doubt in general of all things, and especially of material objects, so long at least, as we have no other foundations for the sciences than those we have hitherto possessed. Now, although the utility of a doubt so general may not be manifest at first sight, it is nevertheless of the greatest, since it delivers us from all prejudice, and affords the easiest pathway by which the mind may withdraw itself from the senses; and finally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us to doubt wherever we afterward discover truth.

1．在第一个沉思里，我探讨了我们普遍地怀疑一切事物的基石，尤其是那些有关物质的事物，因为除了当下我们所拥有的科学基础之外，我们并没有其他基础。尽管普遍怀疑的效用，起初并不显著，但实际效果却非常之大，它不仅可以使我们摒弃各种成见，而且能提供一条非常容易遵循的道路，让我们的灵魂逐渐习惯脱离感官，并且最终在我们发现真理时，令我们深信不疑。

2．In the Second, the mind which, in the exercise of the freedom peculiar to itself, supposes that no object is, of the existence of which it has even the slightest doubt, finds that, meanwhile, it must itself exist. And this point is likewise of the highest moment, for the mind is thus enabled easily to distinguish what pertains to itself, that is, to the intellectual nature, from what is to be referred to the body. But since some, perhaps, will expect,

at this stage of our progress, a statement of the reasons which establish the doctrine of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I think it proper here to make such aware, that it was my aim to write nothing of which I could not give exact demonstration, and that I therefore felt myself obliged to adopt an order similar to that in use among the geometers, viz., to premise all upon which the proposition in question depends, before coming to any conclusion respecting it. Now, the first and chief prerequisite for the knowledge of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is our being able to form the clearest possible conception (conceptus—concept) of the soul itself, and such as shall be absolutely distinct from all our notions of body; and how this is to be accomplished is there shown. There is required, besides this, the assurance that all objects which we clearly and distinctly think are true (really exist) in that very mode in which we think them; and this could not be established previously to the Fourth Meditation. Farther,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ame purpose, that we possess a distinct conception of corporeal nature, which is given partly in the Second and partly in the Fifth and Sixth Meditations. And, finally, on these grounds, we are necessitated to conclude, that all those objects which are clearly and distinctly conceived to be diverse substances, as mind and body, are substances really reciprocally distinct; and this inference is made in the Sixth Meditation. The absolute distinction of mind and body is, besides, confirmed in this Second Meditation, by showing that we cannot conceive body unless as divisible;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mind cannot be conceived unless as indivisible. For we are not able to conceive the half of a mind, as we can of any body, however small, so that the natures of these two substances are to be held, not only as diverse, but even in some measure as contraries. I have not, however, pursued this discussion further in the present treatise, as well for the reason that these considerations are sufficient to show tha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ind does not

follow from the corruption of the body, and thus to afford to men the hope of a future life, as also because the premises from which it is competent for us to infer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involve an explication of the whole principles of Physics: in order to establish,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generally all substances, that is, all things which can exist only in consequence of having been created by God, are in their own nature incorruptible, and can never cease to be, unless God himself, by refusing his concurrence to them, reduce them to nothing;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that body, taken generally, is a substance, and therefore can never perish, but that the human body, in as far as it differs from other bodies, is constituted only by a certain configuration of members, and by other accidents of this sort, while the human mind is not made up of accidents, but is a pure substance. For although all the accidents of the mind be changed—although, for example, it think certain things, will others, and perceive others, the mind itself does not vary with these changes; while, on the contrary, the human body is no longer the same if a change take place in the form of any of its parts: from which it follows that the body may, indeed, without difficulty perish, but that the mind is in its own nature immortal.

2．在第二个沉思里，灵魂用其自身的自由方式，对一切事物的存在只要有一丝怀疑，就假设它们都不存在，同时决不能认为它自己不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灵魂可以用这个办法很容易地分辨出属于它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智慧的本性，也可由此区别出什么是属于物体性的。但是，有些人或许会期待我在此拿出一些理由来证明灵魂的不朽，因此我认为现在不妨告诉他们，我著书的宗旨就是，凡是我没有非常准确地论证过的东西，都不会写进书里，那么我采用的方法就得和几何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一样：先提出求证的命题所依据的全部理由，然后再给出结论。现在，要对灵魂不灭有透彻的了解，首先是给灵魂一个清楚、明白的定义，并且使这个定义要完全有别于一切

物体的定义，在后文里会揭示如何完成这一过程。除此以外，还要求知道我们所明白而清晰地领会到的一切事物，本来就是按照我们所领会的那样是真实存在的。这在第四个沉思以前还没有能够确立下来。其次，出于同样的目的，对物质的本性还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这个概念一部分见于第二个沉思，一部分见于第五和第六个沉思。最后，我们需要从这一切中得出一个结论：凡是能清晰明了地理解为不同实体性的东西，就像灵魂和物体那样，实际上都是分属于不同实体的，它们之间是实在有别的：这是在第六个沉思里得出的结论。在第二个沉思里，还证实了灵魂和物体的绝对差异，并指出：我们能把一切物体都领会为是可分的，而灵魂是不可分的。因为，任何物体，无论多微小，我们都能区分其中的一半，但却没法领会灵魂的一半。因此物体和灵魂在性质上不仅不同，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会相反。不过，我在此书中没有更进一步谈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我所提出的，已经足以清楚地说明，肉体的腐烂并不会使灵魂毁灭，因而给人以来世的希望；同时也因为，我们可以由之而推论出灵魂不灭的那些前提取决于整个物理学的解释。这首先是为了知道：一切实体（即经上帝创造才存在的事物）的本性是不会朽坏的，除非上帝加以否定，它们才会归于“无”。其次，在一般的意义下，物体是实体，因此它也是不会毁灭的；但是就人的肉体有别于其他物体这一点来说，它不过是由一些肢体和其他类似的一些偶然性组合成的；而人的灵魂不是这样，它只是一种单纯的实体，绝不是由什么偶然属性组合起来的。因为，即使灵魂的一切偶然属性都改变了，例如它会思想、会用意志力驱使、会感知，不过它本身是不会改变的。而人的身体，仅仅由于它的某些部分的形状改变，它就不再是同一的了。由此可见人的身体很容易毁灭，但是灵魂从其本性来说是不朽的。

3．In the Third Meditation, I have unfolded at sufficient length, as appears to me, my chief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But yet, since I was there desirous to avoid the use of comparisons taken from material objects, that I might withdraw, as far as possible, the minds of my readers from the senses, numerous

obscurities perhaps remain, which, however, will, I trust, be afterward entirely removed in the Replies to the Objections: thus among other things, it may b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how the idea of a being absolutely perfect, which is found in our minds, possesses so much objective reality [i. e., participates by representation in so many degrees of being and perfection] that it must be held to arise from a cause absolutely perfect. This is illustrated in the Replies by the comparison of a highly perfect machine, the idea of which exists in the mind of some workman; for as the objective (i. e., representative) perfection of this idea must have some cause, viz, either the science of the workman, or of some other person from whom he has received the idea, in the same way the idea of God, which is found in us, demands God himself for its cause.

3．在第三个沉思里，在我看来，我已经把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主要论据都足够详尽地解释了。不过在这里，我尽量避免在物体性的东西里边进行比较，尽量让读者的精神从感官摆脱出来，因而也许还剩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这些模糊不清的地方，我希望在我对给我提出来的反驳将做的答辩中完全得到澄清。比如，我们心里的至上完美的存在体的观念，何以包含那么多的客观实在性，［也就是说，从表象里分享了那么大程度的存在性和完美性］以致它必然应当来自一个至上完满的原因，这是相当难于理解的。不过，在答辩里，我用了一个十分精巧的机器作为比较来阐明，这个机器的观念存在于某一个工匠的心里。这个观念在客观技巧上一定有一个原因，比如说，工匠的学识，或者这个概念是他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因此同样的道理，在我们心里的上帝的观念也不可能没有它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上帝自己。

4．In the Fourth, it is shown that all which we clearly and distinctly perceive (apprehend) is true; and, at the same time, is

explained wherein consists the nature of error, points that require to be known as well for confirming the preceding truths, as for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ose that are to follow. But, meanwhile, it must be observed, that I do not at all there treat of Sin, that is, of error committed in the pursuit of good and evil, but of that sort alone which arise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true and the false. Nor do I refer to matters of faith, or to the conduct of life, but only to what regards speculative truths, and such as are known by means of the natural light alone.

4．第四个沉思展示了凡是我们领会得清晰明了的事物都是真的；同时这部分也解释了错误和虚假由何而生；还指出这是必须了解的，一方面是为了证实以前的那些真理，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接下来的那些真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这里绝不论述罪恶，也不探究在追求善与恶时所犯的错误，而仅仅论述在分辨真假时所产生的错误；我不打算在这里谈属于信仰或指导人生的事情，而只谈那些要透过自然之光才能了解的思辨真理。

5．In the Fifth, besides the illustration of corporeal nature, taken generically, a new demonstration is given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not free, perhaps, any more than the former, from certain difficulties, but of these the solution will be found in the Replies to the Objections. I further show, in what sense it is true that the certitude of geometrical demonstrations themselves is dependent on the knowledge of God.

5．第五个沉思除解释一般物质的本性以外，还用新的论证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虽然这个新论证会遇到某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我将在答辩中一一解决。还有，我还指出，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说几何

论证的确定性，必须要由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而定。

6．Finally, in the Sixth, the act of the understanding (intellection)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at of the imagination (imagination); the marks of this distinction are described; the human mind is shown to be really distinct from the body, and, nevertheless, to be so closely conjoined therewith, as together to form, as it were, a unity. The whole of the errors which arise from the senses are brought under review, while the means of avoiding them are pointed out; and, finally, all the grounds are adduced from which the existence of material objects may be inferred; not, however, because I deemed them of great utility in establishing what they prove, viz., that there is in reality a world, that men are possessed of bodies, and the like, the truth of which no one of sound mind ever seriously doubted; but because, from a close consideration of them, it is perceived that they are neither so strong nor clear as the reasonings which conduct us to the knowledge of our mind and of God; so that the latter are, of all which come under human knowledge, the most certain and manifest—a conclusion which it was my single aim in these Meditations to establish; on which account I here omit mention of the various other questions which, in the course of the discussion, I had occasion likewise to consider.

6．最后，在第六个沉思里，我把理解和想象区别开来，并描述了这种区别的种种标志；指出人的灵魂虽有别于肉体，然而又和肉体紧密结合，就像一个整体似的。接着，这部分又阐明了由感官产生的一些错误以及避免错误的办法。最后，这部分指出了各种理由来说明有形事物的存在，这并不是因为我断定这些理由对于它们所证明的东西是有帮助的，例如世界确实存在、人类的确具有身体以及诸如此类

的事情，这些都是任何一个正常人从来没有怀疑过的，而是通过仔细观察之后发现，那些理由并不如指引我们得知灵魂和上帝的推论那么有力而明显。因此，在人类所能认知的范围之内，能指引我们得知灵魂和上帝的知识，才是最确定、最明显的知识。这就是我计划要在这六个沉思里证明的全部东西。我在这里省略了其他很多问题，关于那些问题，我在这本书里也在适当的机会讲到了。

Meditation I　OF THE THINGS OF WHICH WE MAY DOUBT.

沉思一　论可疑之物

1．Several years have now elapsed since I first became aware that I had accepted, even from my youth, many false opinions for true, and that consequently what I afterward based on such principles was highly doubtful; and from that time I was convinced of the necessity of undertaking once in my life to rid myself of all the opinions I had adopted, and of commencing anew the work of building from the foundation, if I desired to establish a firm and abiding superstructure in the sciences. But as this enterprise appeared to me to be one of great magnitude, I waited until I had attained an age so mature as to leave me no hope that at any stage of life more advanced I should be better able to execute my design. On this account, I have delayed so long that I should henceforth consider I was doing wrong were I still to consume in deliberation any of the time that now remains for action. To-day, then, since I have opportunely freed my mind from all cares (and am happily disturbed by no passions), and since I am in the secure possession of leisure in a peaceable retirement, I will at length apply myself earnestly and freely to the general overthrow of all my former opinions.

1．几年前，我第一次明白，我从幼时起就将一些错误观点，当作正确的接受了，并认为此后以此为基础所得的结论，都是非常不可信的。从那时起，我坚信，必须将我有生以来所接受的观点全部抛弃，重新打基础，才能建立一个坚定可靠、经久不衰的上层科学体系。然而，对我而言，这项工程乃是浩大工程之一，因此我一直等到

能足以熟谙事理，且以后不会再有任何最佳时机的年纪，才着手实行我的计划。基于这个缘由，我已等了很久，若再犹豫不决，思前虑后，不予行动，终将铸成大错。如今，我已适时放开思想，毫无顾虑，也不受任何杂念干扰，高兴不已。况且闲居于此，环境优雅，我将郑重其事、毫无保留地试将平生所学逐一推翻。

2．But, to this end, it will not be necessary for me to show that the whole of these are false—a point, perhaps, which I shall never reach; but as even now my reason convinces me that I ought not the less carefully to withhold belief from what is not entirely certain and indubitable, than from what is manifestly false, it will be sufficient to justify the rejection of the whole if I shall find in each some ground for doubt. Nor for this purpose will it be necessary even to deal with each belief individually, which would be truly an endless labor; but, as the removal from below of the foundation necessarily involves the downfall of the whole edifice, I will at once approach the criticism of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all my former beliefs rested.

2．但为达目的，而去证明自己所学皆不正确，似乎没有必要，因为如果这样做，这个目的或许永远达不到。不过，理智使我坚信，显而易见的错误不可放过，而对于并非确切无疑的更不可轻易就相信。因此，哪怕一丝可疑之处，就足以令我将其整个否定。这样一来，就无需逐个对付了，因为那将永无尽头。但大厦根基若被移走，其势将崩塌，因此，我将首先从批判旧见解所基于的原则着手。

3．All that I have, up to this moment, accepted as possessed of the highest truth and certainty, I received either from or through the senses. I observed, however, that these sometimes misled us;

and it is the part of prudence not to place absolute confidence in that by which we have even once been deceived.

3．直到现在，所学之物中最真最可靠的，皆来自感觉或由感觉得来。然而，感觉有时也会误导我们。我们一定要非常谨慎，对于曾经欺骗过我们的东西，绝对不能信任。

4．But it may be said, perhaps, that, although the senses occasionally mislead us respecting minute objects, and such as are so far removed from us as to be beyond the reach of close observation, there are yet many other of their informations (presentations), of the truth of which it is manifestly impossible to doubt; as for example, that I am in this place, seated by the fire, clothed in a winter dressing gown, that I hold in my hands this piece of paper, with other intimations of the same nature. But how could I deny that I possess these hands and this body, and withal escape being classed with persons in a state of insanity, whose brains are so disordered and clouded by dark bilious vapors as to cause them pertinaciously to assert that they are monarchs when they are in the greatest poverty; or clothed (in gold) and purple when destitute of any covering; or that their head is made of clay, their body of glass, or that they are gourds? I should certainly be not less insane than they, were I to regulate my procedure according to examples so extravagant.

4．虽然，在一些细微之物以及远离我们而又不能仔细观察的东西上，感觉会误导我们，但是，也有其他许多东西，虽由感觉而认识，却毫无怀疑之理由。正如，在这里，我身穿长袍，依炉而坐，手持此纸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可我又怎能否认这双手和身体属于我

呢？我又怎么避免其他人将我与那些疯癫之人列为一等呢？那些疯癫之人大脑被黑暗的胆汁蒸气笼罩，思维混乱。他们一贫如洗，却执拗地断言他们是君王，或者一丝不挂，却坚称他们穿金戴银，又或者信誓旦旦地说他们的头是泥做的，身体是玻璃做的，或者自诩他们是葫芦。倘若我以这些极度疯狂之人为榜样行事，恐怕我的荒诞将不亚于他们。

5．Though this be true, I must nevertheless here consider that I am a man, and that, consequently, I am in the habit of sleeping, and representing to myself in dreams those same things, or even sometimes others less probable, which the insane think are presented to them in their waking moments. How often have I dreamt that I was in these familiar circumstances, that I was dressed, and occupied this place by the fire, when I was lying undressed in bed? At the present moment, however, I certainly look upon this paper with eyes wide awake; the head which I now move is not asleep; I extend this hand consciously and with express purpose, and I perceive it; the occurrences in sleep are not so distinct as all this. But I cannot forget that, at other times I have been deceived in sleep by similar illusions; and, attentively considering those cases, I perceive so clearly that there exist no certain marks by which the state of waking can ever be distinguished from sleep, that I feel greatly astonished; and in amazement I almost persuade myself that I am now dreaming.

5．虽然这是真的，但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我终究是个人，而人是要睡觉的，我在梦中往往会做出上述事情来，有时甚至做出更为荒唐之事，而这些事对那些疯子来说，是醒时就能做到的。多少次，我梦到过相似之情景，自己虽宽衣解带，卧眠在床，却梦到自己着衣在身，依炉而坐。此时此刻，我确实睁大眼睛注视着这张纸，头脑清

醒。此时此刻，我的头在动，我并没有睡着。我有意识地伸出手，我察觉到手能够灵活伸缩。然而在睡觉的时候，所有情况却模糊不清。但回头想想，梦中的这些幻影也曾欺骗过自己，再仔细想想，便豁然开朗，清醒与梦境之间本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我不禁大吃一惊，几乎要说服自己现在就在梦中。

6 . Let us suppose, then, that we are dreaming, and that all these particulars—namely, the opening of the eyes, the motion of the head, the forth-putting of the hands—are merely illusions; and even that we really possess neither an entire body nor hands such as we see. Nevertheless it must be admitted at least that the objects which appear to us in sleep are, as it were, painted representations which could not have been formed unless in the likeness of realities; and, therefore, that those general objects, at all events, namely, eyes, a head, hands, and an entire body, are not simply imaginary, but really existent. For, in truth, painters themselves, even when they study to represent sirens and satyrs by forms the most fantastic and extraordinary, cannot bestow upon them natures absolutely new, but can only make a certain medley of the members of different animals; or if they chance to imagine something so novel that nothing at all similar has ever been seen before, and such as is, therefore, purely fictitious and absolutely false, it is at least certain that the colors of which this is composed are real. And on the same principle, although these general objects, viz. (a body), eyes, a head, hands, and the like, be imaginary, we are nevertheless absolutely necessitated to admit the reality at least of some other objects still more simple and universal than these, of which, just as of certain real colors, all those images of things, whether true and real, or false and fantastic, that are found in our consciousness (cogitation), are formed.

6．那么现在，让我们假设正在睡梦之中，而我们睁开眼睛，晃动脑袋，伸展双手等等这一切都只是幻觉；和我们所看到的不同，双手和整个身体也不为我们所有。尽管如此，我们至少必须承认，梦中所出现的东西，可以说是图画表现，是临摹现实才得以成型的。因此，诸如眼睛、脑袋、双手和整个身体这些东西，并非想象虚构之物，而是真真正正存在的实体。其实，就算画家用最古怪、最特别的手法去画塞壬女妖和萨梯神时，要想给他们加上些新的东西，也是不太可能的。恐怕画出来的只是集合不同动物的混合体罢了。即使他们能想象出一些人类前所未见的新奇之物，比如一些纯粹虚构，完全不真实的东西，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所用的种种颜色是真实存在的。同样，即使身体、眼睛、脑袋、双手等等是想象出来的，总得承认还有更为简单、更为普遍的东西真实地存在着。正像是真实的颜色所构成的，所有这些不管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构古怪的，都是在我们的意识(思考)里形成的。

7．To this class of objects seem to belong corporeal nature in general and its extension; the figure of extended things, their quantity or magnitude, and their number, as also the place in, and the time during, which they exist, and other things of the same sort.

7．这类物质的本质似乎与一般物质及其衍生物的本质同属一类。这些衍生物的形状、数量、大小、数目，还有这些物体所处地点、所占时间，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如此。

8．We will not, therefore, perhaps reason illegitimately if we conclude from this that Physics, Astronomy, Medicine, and all the other sciences that have for their end the consideration of composite objects, are indeed of a doubtful character; but that Arithmetic, Geometry, and the other sciences of the same class,

which regard merely the simplest and most general objects, and scarcely inquire whether or not these are really existent, contain somewhat that is certain and indubitable: for whether I am awake or dreaming, it remains true that two and three make five, and that a square has but four sides; nor does it seem possible that truths so apparent can ever fall under a suspicion of falsity (or incertitude).

8．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合理地得出以下结论：物理学、天文学、医药学，以及其他研究各种复杂事物的学科，都有可疑之处；而算术、几何以及同属的其他学科，多是明确无误、不容置疑的，因为他们所研究的不过是些最简单、最普遍的东西，几乎不需要考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无论我是醒着还是在梦中，二加三等于五总是真的，正方形只有四条边也总是真的；这样浅显的道理，怕不太可能会遭人怀疑（或者让人觉得模糊）吧。

9．Nevertheless, the belief that there is a God who is all powerful, and who created me, such as I am, has, for a long time, obtained steady possession of my mind. How, then, do I know that he has not arranged that there should be neither earth, nor sky, nor any extended thing, nor figure, nor magnitude, nor place, providing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for (the rise in me of the perceptions of all these objects, and) the persuasion that these do not exist otherwise than as I perceive them? And further, as I sometimes think that others are in error respecting matters of which they believe themselves to possess a perfect knowledge, how do I know that I am not also deceived each time I add together two and three, or number the sides of a square, or form some judgment still more simple, if more simple indeed can be imagined? But perhaps Deity has not been willing that I should be thus deceived, for he is said to be supremely good. If, however, it were repugnant to the goodness

of Deity to have created me subject to constant deception, it would seem likewise to be contrary to his goodness to allow me to be occasionally deceived; and yet it is clear that this is permitted.

9．虽然如此，长久以来我始终相信，万能的上帝是存在的，并创造了我。可是，我怎么知道，上帝一定没有做出过如下安排：即没有土地、没有天空、也没有任何衍生物，也没有形状、大小、地点？但与此同时，（我对这些东西的察觉不断增多），怎样我就能确信这些东西正如我察觉它们的那样存在着呢？还有，别人觉得最了解的事情，我有时会觉得他们错了。我又怎么知道，每当我把二和三加在一起时，或者数一个正方形有几条边时，或者做出一些更简单的判断时（如果人们确实能想象出更简单的事情），我都没有受骗？既然众人都说上帝至善，但是或许上帝从未打算让我这样上当受骗。然而假定，上帝造我却让我犯错，与他的善相矛盾的话，那么让我偶尔上当受骗则似乎是与他的善相违背的了。因此，这样假设显然是可行的。

10．Some, indeed, might perhaps be found who would be disposed rather to deny the existence of a Being so powerful than to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thing certain. But let us for the present refrain from opposing this opinion, and grant that all which is here said of a Deity is fabulous: nevertheless, in whatever way it be supposed that I reach the state in which I exist, whether by fate, or chance, or by an endless series of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ts, or by any other means, it is clear (since to be deceived and to err is a certain defect)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my being so imperfect as to be the constant victim of deception, will be increased exactly in proportion as the power possessed by the cause, to which they assign my origin, is lessened. To these reasonings I have assuredly nothing to reply, but am constrained at last to avow that there is nothing of all that I formerly believed to be true of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doubt, and that not through thoughtlessness or levity, but from cogent and maturely considered reasons; so that henceforward, if I desire to discover anything certain, I ought not the less carefully to refrain from assenting to those same opinions than to what might be shown to be manifestly false.

10．也许，确实有人宁愿否认万能上帝的存在，也不愿相信世间一切都是不可靠的。不过，让我们暂时先不反对这一观点，相信有关上帝的一切皆是传说。无论如何假设我的存在，是命运也好，偶然事件也罢，是无止境的一系列经历或结果，又或者是其他什么，既然上当和犯错都是一种缺陷，显然，如果指导我源泉之动因在不断减少，我变得不完美，越来越容易上当受骗。这种种理由，我无言以对，但我不得不承认，我以前所信的一切，现在没有一个是可靠的。这绝非是考虑不周或轻率所致，而是由于一些具有说服力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理由。因此，我若想找到任何确切的东西，今后就像对待显而易见的错误一样，不可轻易做出评判。

11．But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have made these observations; care must be taken likewise to keep them in remembrance. For those old and customary opinions perpetually recur—long and familiar usage giving them the right of occupying my mind, even almost against my will, and subduing my belief; nor will I lose the habit of deferring to them and confiding in them so long as I shall consider them to be what in truth they are, viz., opinions to some extent doubtful, as I have already shown, but still highly probable, and such as it is much more reasonable to believe than deny. It is for this reason I am persuaded that I shall not be doing wrong, if, taking an opposite judgment of deliberate design, I become my own deceiver, by supposing, for a time, that all those opinions are entirely false and imaginary, until at length, having thus balanced

my old by my new prejudices, my judgment shall no longer be turned aside by perverted usage from the path that may conduct to the perception of truth. For I am assured that, meanwhile, there will arise neither peril nor error from this course, and that I cannot for the present yield too much to distrust, since the end I now seek is not action but knowledge.

11．但仅做这些观察远远不够，还应当将之牢记于心。因为那些旧的、已成习惯的观点不断地在我的脑海浮现——我长久而熟练地使用它们，让它们有权利占据我的思想，甚至抵制我的意愿，抑制我的信念。唯有实事求是，认真考虑才能克服这一切，就像我指出的那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可疑的，而有时是十分可能的，因而往往信任多于怀疑。基于这个原因，我想我做的是正确的，如果我故意反驳自己，自我欺骗，装作这些见解都是错的虚幻的，等到我的新旧偏见得以平衡，我就不至于受坏习惯影响，舍真理之路而误入歧途了。同时，我相信，在这条路上既没有危险也不会产生错误。我现在也不能有太多怀疑，我现在的目的不在于行动而在于认识。

12．I will suppose, then, not that Deity, who is sovereignly good and the fountain of truth, but that some malignant demon, who is at once exceedingly potent and deceitful, has employed all his artifice to deceive me; I will suppose that the sky, the air, the earth, colors, figures, sounds, and all external things, are nothing better than the illusions of dreams, by means of which this being has laid snares for my credulity; I will consider myself as without hands, eyes, flesh, blood, or any of the senses, and as falsely believing that I am possessed of these; I will continue resolutely fixed in this belief, and if indeed by this means it be not in my power to arrive at the knowledge of truth, I shall at least do what is in my power, viz., (suspend my judgment), and guard with settled

purpose against giving my assent to what is false, and being imposed upon by this deceiver, whatever be his power and artifice. But this undertaking is arduous, and a certain indolence insensibly leads me back to my ordinary course of life; and just as the captive, who, perchance, was enjoying in his dreams an imaginary liberty, when he begins to suspect that it is but a vision, dreads awakening, and conspires with the agreeable illusions that the deception may be prolonged; so I, of my own accord, fall back into the train of my former beliefs, and fear to arouse myself from my slumber, lest the time of laborious wakefulness that would succeed this quiet rest, in place of bringing any light of day, should prove inadequate to dispel the darkness that will arise from the difficulties that have now been raised.

12．因此，我假设，不是上帝这个真善的源泉，而是一个恶毒的魔鬼，用其狡诈欺骗的本领，尽其所能地欺骗我。我假设，天空、空气、土壤、颜色、身体、声音等天地万物，世间一切，不过是这个恶魔用来欺骗我的一些梦幻假象。我将认为自己本无手眼血肉，什么感官都没有，认为自己错误地相信自己拥有这些东西。我将继续坚守这样的信念，如果这样还不能够认识真理，至少将尽力为之，比如我先不作评判，做好准备不去相信欺骗者强加给我的错误的信息不管这恶魔多么强大，多么狡诈。但这项任务非常艰苦，而且一些特定的惰性还会潜移默化地引导我回到普通生活中。如同奴隶一般，或许在梦中享受片刻虚幻的自由，当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幻觉时，又害怕醒来，情愿与惬意的幻觉妥协，以求多享受一会。所以我又自愿地重拾以前的见解，害怕从中清醒过来，以防费尽心力得到的清醒打破这片刻的安静。这样的话，别说带来光明了，就连刚刚由这些难题产生的乌烟瘴气也难以驱除。

Meditation II OF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MIND; AND THAT IT IS MORE EASILY KNOWN THAN THE BODY.

沉思二　论人类灵魂之本性，兼论其比肉体更容易认识

1．The Meditation of yesterday has filled my mind with so many doubts, that it is no longer in my power to forget them. Nor do I see, meanwhile, any principle on which they can be resolved; and, just as if I had fallen all of a sudden into very deep water, I am so greatly disconcerted as to be unable either to plant my feet firmly on the bottom or sustain myself by swimming on the surface. I will, nevertheless, make an effort, and try anew the same path on which I had entered yesterday, that is, proceed by casting aside all that admits of the slightest doubt, not less than if I had discovered it to be absolutely false; and I will continue always in this track until I shall find something that is certain, or at least, if I can do nothing more, until I shall know with certainty that there is nothing certain. Archimedes, that he might transport the entire globe from the place it occupied to another, demanded only a point that was firm and immovable; so, also, I shall be entitled to entertain the highest expectations, if I am fortunate enough to discover only one thing that is certain and indubitable.

1．昨天的沉思，令我心中充满疑问，使我已无力将其忘却。同时，我尚未看出有何方法可以将其解决；正如同突然坠入深潭之中，惊慌失措之余，无法在水底站稳，也不能游出水面。虽然如此，我仍将尽最大努力，重回我昨日之道路，将稍有可疑之物置之不理，就如同我已知道他们是绝对错误的一样；此外，我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到找到可靠之物为止，或者，即使一无所获，我至少要明确知道世

上没有可靠的东西。阿基米德只要求一个固定不移的点，就可以把整个地球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同样，如果我有幸能发现哪怕一个确切无疑之物，我就有权抱有无穷的期望了。

2．I suppose, accordingly, that all the things which I see are false (fictitious); I believe that none of those objects which my fallacious memory represents ever existed; I suppose that I possess no senses; I believe that body, figure, extension, motion, and place are merely fictions of my mind. What is there, then, that can be esteemed true? Perhaps this only, that there is absolutely nothing certain.

2．于是我假设，凡是我看见的都是假的；我相信，我那虚假的记忆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存在的；我进一步假设自己没有感官，并相信物体、形状、扩延、运动和地点，都只不过是在我脑中虚构出来的。那么还有什么可以认为是真实的呢？或许只有一件，那就是世上绝对没有可靠之物。

3．But how do I know that there is not something different altogether from the objects I have now enumerated, of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entertain the slightest doubt? Is there not a God, or some being, by whatever name I may designate him, who causes these thoughts to arise in my mind? But why suppose such a being, for it may be I myself am capable of producing them? Am I, then, at least not something? But I before denied that I possessed senses or a body; I hesitate, however, for what follows from that? Am I so dependent on the body and the senses that without these I cannot exist? But I had the persuasion that there was absolutely nothing in the world, that there was no sky and no earth, neither minds nor

bodies; was I not, therefore, at the same time, persuaded that I did not exist? Far from it; I assuredly existed, since I was persuaded. But there is I know not what being, who is possessed at once of the highest power and the deepest cunning, who is constantly employing all his ingenuity in deceiving me. Doubtless, then, I exist, since I am deceived; and, let him deceive me as he may, he can never bring it about that I am nothing, so long as I shall be conscious that I am something. So that it must, in fine, be maintained, all things being maturely and carefully considered, that this proposition (pronunciatum) I am, I exist, is necessarily true each time it is expressed by me, or conceived in my mind.

3．但是，除了刚才所提到的事物，我又怎么知道再没有别的东西，是我们丝毫不能怀疑的呢？难道就没有上帝，或者冠以他名的神明，将这些想法注入我的灵魂吗？然而为什么如此想呢，或许我自己又何尝不能产生这些思想呢？那么至少，我不就是一种事物吗？可是我先前已经否认了我有感官或者身体，但我还是犹豫了，这到底会带来什么结论呢？难道我就真的非常依赖身体和感官，离开这两者就不能存在吗？可是，我曾说服自己相信，这世上什么都没有，既没有苍穹和大地，也没有灵魂和肉体；如此一来，我不是相信了自己也不存在吗？事实并非如此，既然我曾被说服，那么我就确实存在了。但是总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骗子，不仅法力无边，而且狡诈异常，时常欺骗我，无所不用其极。毫无疑问的是，既然他欺骗我，那就说明我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不管他怎么欺骗于我，只要我想到我是某种事物，他就绝无法令我化为子虚乌有。所以在对这一切深思熟虑之后，就必然会得出这一结论："我思，故我在。"不管我说出来，还是在心里默想，这一命题都是真实可靠的。

4．But I do not yet know with sufficient clearness what I am, though assured that I am; and hence, in the next place, I must take

care, lest perchance I inconsiderately substitute some other object in room of what is properly myself, and thus wander from truth, even in that knowledge (cognition) which I hold to be of all others the most certain and evident. For this reason, I will now consider anew what I formerly believed myself to be, before I entered on the present train of thought; and of my previous opinion I will retrench all that can in the least be invalidated by the grounds of doubt I have adduced, in order that there may at length remain nothing but what is certain and indubitable.

4．虽然我已确知自己是存在的，但是我还是不大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因此，我必须小心从事，避免随便找一些别的事物来代替本来的自己，这样也免得以前认为最确定、最明显的知识（认知）远离真理。为了这个缘故，在我做进一步探究之前，先要对过去所相信的自己重新思索一番；至于以前的意见，凡是稍有可疑而经不起考验的，一律将其剔除，以保留那些十分确信和毋庸置疑的意见。

5．What then did I formerly think I was? Undoubtedly I judged that I was a man. But what is a man? Shall I say a rational animal? Assuredly not; for it would be necessary forthwith to inquire into what is meant by animal, and what by rational, and thus, from a single question, I should insensibly glide into others, and these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first; nor do I now possess enough of leisure to warrant me in wasting my time amid subtleties of this sort. I prefer here to attend to the thoughts that sprung up of themselves in my mind, and were inspired by my own nature alone, when I applied myself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what I was. In the first place, then, I thought that I possessed a countenance, hands, arms, and all the fabric of members that appears in a corpse, and which I called by the name of body. It further occurred to me that I was

nourished, that I walked, perceived, and thought, and all those actions I referred to the soul; but what the soul itself was I either did not stay to consider, or, if I did, I imagined that it was something extremely rare and subtle, like wind, or flame, or ether, spread through my grosser parts. As regarded the body, I did not even doubt of its nature, but thought I distinctly knew it, and if I had wished to describe it according to the notions I then entertained, I should have explained myself in this manner: By body I understand all that can be terminated by a certain figure; that can be comprised in a certain place, and so fill a certain space as therefrom to exclude every other body; that can be perceived either by touch, sight, hearing, taste, or smell; that can be moved in different ways, not indeed of itself, but by something foreign to it by which it is touched [and from which it receives the impression]; for the power of self-motion, as likewise that of perceiving and thinking, I held as by no means pertaining to the nature of body; on the contrary, I was somewhat astonished to find such faculties existing in some bodies.

5．那么，我过去认为自己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人。但何谓人呢？我可以称之为有理性的动物吗？绝对不可以，因为如此一来，就要追问何为动物，何为理性，于是乎会由一个问题，不知不觉地陷入无数个更为棘手的问题中去，且人生苦短，我也没有足够空闲的时间浪费在这类细节问题上。在此我宁可思考那些从前在我心里自动浮现的思想，那些思想不过是在我进行思考我的存在时从我自己的本性中衍生出来的。我起初认为自己是拥有一张面孔、两只手、两条胳膊和所有在尸体中能够呈现的躯体结构，以及被我称之为“身体”的东西。除此之外，后来我想到我是受到了培养的人，我将吃饭、走路、感觉、思想等等这一切归功于灵魂；但灵魂到底是什么，我并没有探究，如果说我探究过，我也只是想象他是一种极其稀薄、极其精细的东西，如同风或火焰，又如同稀薄的气，遍布身体较

粗浊的各部分。至于物体，我不仅从未怀疑过它的本性，而且自认为对它有深刻的了解，并且如果要按照我那时所持有的看法来解释它的话，我就会这样地描述它：所谓物体，是指一切能为某种形状所限定的东西；能局限在某个地方，能占有一定空间，能把其他任何物体都排斥于外；可以透过触觉、视觉、听觉、味觉或者嗅觉被感知到；它可以在若干方式下移动，不过不是自动的，而是受外物的触动［受到一些压力］而动的；因为像自动、感觉和思维等能力，我以前决不认为是属于物体的本性，相反看到像这样一些功能出现在某些物体之中，我倒是非常惊奇的。

6 . But [as to myself, what can I now say that I am], since I suppose there exists an extremely powerful, and, if I may so speak, malignant being, whose whole endeavors are directed toward deceiving me? Can I affirm that I possess any one of all those attributes of which I have lately spoken as belonging to the nature of body? After attentively considering them in my own mind, I find none of them that can properly be said to belong to myself. To recount them were idle and tedious. Let us pass, then, to the attributes of the soul. The first mentioned were the powers of nutrition and walking; but, if it be true that I have no body, it is true likewise that I am capable neither of walking nor of being nourished. Perception is another attribute of the soul; but perception too is impossible without the body; besides, I have frequently, during sleep, believed that I perceived objects which I afterward observed I did not in reality perceive. Thinking is another attribute of the soul; and here I discover what properly belongs to myself. This alone is inseparable from me. I am—I exist: this is certain; but how often? As often as I think; for perhaps it would even happen, if I should wholly cease to think, that I should at the same time altogether cease to be. I now admit nothing that is not necessarily true. I am therefore, precisely speaking, only a thinking

thing, that is, a mind (menssive animus), understanding, or reason, terms whose signification was before unknown to me. I am, however, a real thing, and really existent; but what thing? The answer was,a thinking thing.

6．可是，我既然假设有一个极具势力的恶魔，［如果可以这样假设的话，］施展浑身解数来欺骗于我，那么我还能说自己是什么呢？我还能肯定地说，我具有一点点方才所说的那些属于物体本性的属性吗？经过在脑中再三推敲后，我并没有发现任何一种能够称得上真正属于自己的属性。要一一列举出来，实在是费时又沉闷的事。所以让我们直接探究灵魂的属性吧。首先提到的是营养和行走的力量；可是，如果我真的没有身体，那也就是说我就真的既不能走路也无法摄取营养了。接下来是灵魂的另一属性——感觉，可是感觉也离不开身体；另外，我经常在梦中自以为感觉到许多事物，实则在醒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感觉到它们。最后谈谈思想，在这里我发现只有它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只有思想与我是密不可分的。有我，我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能持续多久呢？我思考多久，就存在多久；因为如果我完全停止了思考，那么我同时也就不存在了。现在，对不是必然真实的东西，我一概不承认。因此准确说来，我只是一个能思考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灵魂，一种理解或是一类理性，这些名称的意义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无论如何，我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答案就是：我是一个能思考的东西。

7．The question now arises, am I aught besides? I will stimulate my imagination with a view to discover whether I am not still something more than a thinking being. Now it is plain I am not the assemblage of members called the human body; I am not a thin and penetrating air diffused through all these members, or wind, or flame, or vapor, or breath, or any of all the things I can imagine; for

I supposed that all these were not, and, without changing the supposition, I find that I still feel assured of my existence. But it is true, perhaps, that those very things which I suppose to be non-existent, because they are unknown to me, are not in truth different from myself whom I know. This is a point I cannot determine, and do not now enter into any dispute regarding it. I can only judge of things that are known to me: I am conscious that I exist, and I who know that I exist inquire into what I am. It is, however, perfectly certain that the knowledge of my existence, thus precisely taken, is not dependent on things, the existence of which is as yet unknown to me: and consequently it is not dependent on any of the things I can feign in imagination. Moreover, the phrase itself, I frame an image (effingo), reminds me of my error; for I should in truth frame one if I were to imagine myself to be anything, since to imagine is nothing more than to contemplate the figure or image of a corporeal thing; but I already know that I exist, and that it is possible at the same time that all those images, and in general all that relates to the nature of body, are merely dreams [or chimeras].From this I discover that it is not more reasonable to say, I will excite my imagination that I may know more distinctly what I am, than to express myself as follows: I am now awake, and perceive something real; but because my perception is not sufficiently clear, I will of express purpose go to sleep that my dreams may represent to me the object of my perception with more truth and clearness. And, therefore, I know that nothing of all that I can embrace in imagination belongs to the knowledge which I have of myself, and that there is need to recall with the utmost care the mind from this mode of thinking, that it may be able to know its own nature with perfect distinctness.

7．于是问题又来了，除此之外，我还是别的什么吗？我要发挥

想象力，看看除了是思考的东西之外，自己还是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现在很清楚了，我并非所谓人类五官肢体的聚集，也不是一种稀薄、无孔不入、渗透到所有这些肢体里的空气；更不是风、火、水蒸气、气息或其他我能想象到的东西，因为我已经假设这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而且我觉得即使不改变这个假定，也并不妨碍我确实知道我是存在的。或许也可能是这样的：由于我不认识而假定不存在的那些东西，同我所认识的“自我”并没有什么不同。关于这一点我现在无法确定，也不想为此问题争论。我只能判断我所知道的事物，我已经认识到我存在，现在我追问已经认识到存在的这个“我”究竟是什么。可是，我对自己存在的认识，严格说来，并不取决于我还不知道其存在的那些东西，因而也不取决于任何一个我想象虚构出来的东西，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其实虚构和想象这类说法，就足以证明我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我想象自己是一种东西，那我非得勾勒一个影像不可，所谓想象，只是勾画有形物体的形状或影像罢了。不过我已确实知道我是存在的，而且一般说来，这些影像就是与物体本性有关的事物，也许只是一些梦境［或幻想］而已。由此我发现：如果我说我要发挥我的想象力，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我是什么，这就好比我说我现在是醒着，看到某种实在和真实的东西，但是由于我看得还不够明白，我要故意睡着，好让我的梦给我把它更真实、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一样，都是不合理的。这样一来，我确切地认识到，凡是能在想象中理解或接受的东西，都不属于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所以有必要唤醒灵魂，以谨慎有加的态度摆脱这种思维方式，以便能完全清晰地了解自己的本性。

8．But what, then, am I? A thinking thing, it has been said. But what is a thinking thing? It is a thing that doubts, understands, [conceives], affirms, denies, wills, refuses; that imagines also, and perceives.

8．可是，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思想的东西，已经说过了。

但何谓思想的东西呢？它就是一个能怀疑，能领会，［能设想，］能肯定，能否定，能愿意，能拒绝，也能想象，能感觉的东西。

9．Assuredly it is not little, if all these properties belong to my nature. But why should they not belong to it? Am I not that very being who now doubts of almost everything; who, for all that, understands and conceives certain things; who affirms one alone as true, and denies the others; who desires to know more of them, and does not wish to be deceived; who imagines many things, sometimes even despite his will; and is likewise percipient of many, as if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senses. Is there nothing of all this as true as that I am, even although I should be always dreaming, and although he who gave me being employed all his ingenuity to deceive me? Is there also any one of these attributes that can be properly distinguished from my thought, or that can be said to be separate from myself? For it is of itself so evident that it is I who doubt, I who understand, and I who desire, that it is here unnecessary to add anything by way of rendering it more clear. And I am as certainly the same being who imagines; for although it may be (as I before supposed) that nothing I imagine is true, still the power of imagination does not cease really to exist in me and to form part of my thought. In fine, I am the same being who perceives, that is, who apprehends certain objects as by the organs of sense, since, in truth, I see light, hear a noise, and feel heat. But it will be said that these presentations are false, and that I am dreaming. Let it be so. At all events it is certain that I seem to see light, hear a noise, and feel heat; this cannot be false, and this is what in me is properly called perceiving (sentire), which is nothing else than thinking.

9．当然，若这些东西都属于我的本性，那确实也不算少了。可是，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该属于我的本性呢？难道我现在不就是一个怀疑一切的物体吗？这个物体在千方百计地了解、领会某些物体；这个物体只肯定一件事物的真实性，而否定其他的一切；这个物体既想了解更多的事物，却又不愿意受骗；这个物体有时甚至不顾自己的意志，想象出许多事物；这个物体同样也能感觉许多事物，就如同通过身体各器官感觉出来的一样。纵然我每天都做梦，并且那个创造我的神明费尽心思想欺骗于我，可上述这一切，难道就没有一种如同我真实存在一样真实的吗？在这些属性中，难道就没有一种能与我的思想分得开吗？或者可以说与我分得开吗？因为事情本来是如此明了，是我在怀疑、在了解、在希望，根本不必在此补充任何东西来加以说明以使之更加明了。而且我当然也有能力去想象；因为即使我所想象的事物有可能（就像我以前曾经假定的那样）完全都是虚假的，可是这种想象的能力仍然会存在于我心里，并构成我思维的一部分。总之，我就是那个相同的处于感知状态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就好像是借着感觉器官认识特定事物一样，因为我确实看见了光，听到了声音，感到了热。可是有人会说，那些现象都是假的，而我只是在做梦。随他们怎么说好了。但可以确定的是，我确实看见了光，听见了声音，感觉到了热。这是千真万确的。真正来说，这就是在我心里叫做在感觉的东西，而在正确的意义上，这就是在思维。

10．From this I begin to know what I am with somewhat greater clearness and distinctness than heretofore. But, nevertheless, it still seems to me, and I cannot help believing, that corporeal things, whose images are formed by thought [which fall under the senses], and are examined by the same, are known with much greater distinctness than that I know not what part of myself which is not imaginable; although, in truth, it may seem strange to say that I know and comprehend with greater distinctness things whose existence appears to me doubtful, that are unknown, and do not belong to me, than others of whose reality I am persuaded, that are

known to me, and appertain to my proper nature; in a word, than myself. But I see clearly what is the state of the case. My mind is apt to wander, and will not yet submit to be restrained within the limits of truth. Let us therefore leave the mind to itself once more, and, according to it every kind of liberty [permit it to consider the objects that appear to it from without], in order that, having afterward withdrawn it from these gently and opportunely [and fixed it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its being and the properties it finds in itself], it may then be the more easily controlled.

10．从此，我开始比以往更明白更清晰地了解自己是什么了。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不得不相信：那些有形物体（其影像由思想构成［归根结底是感官中的东西］，并且被思想所检验），比起那些我自己不能想象的部分，我会认识得更清晰。对我而言，尽管那些可疑的、未知的、不属于我的东西，我认识和理解它们的存在性要比那些我确信的、已知的、属于我真实本性的东西要清晰很多，也就是说，比认识和理解我自己还清晰，但是，实际上，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奇怪。但是我还是清楚地看出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的本性放荡不羁，不愿束缚在真理的范围之内。现在且让我再次放飞灵魂，任其自由驰骋［任其思考由外界呈现给我心中的事物］，然后在适当时机慢慢收缰回顾［专注于思考自己的存在和属性］，如此我的思想更易受到控制。

11．Let us now accordingly consider the objects that are commonly thought to be [the most easily, and likewise] the most distinctly known, viz, the bodies we touch and see; not, indeed, bodies in general, for these general notions are usually somewhat more confused, but one body in particular. Take, for example, this piece of wax; it is quite fresh, having been but recently taken from the beehive; it has not yet lost the sweetness of the honey it

contained; it still retains somewhat of the odor of the flowers from which it was gathered; its color, figure, size, are apparent (to the sight); it is hard, cold, easily handled; and sounds when struck upon with the finger. In fine, all that contributes to make a body as distinctly known as possible, is found in the one before us. But, while I am speaking, let it be placed near the fire—what remained of the taste exhales, the smell evaporates, the color changes, its figure is destroyed, its size increases, it becomes liquid, it grows hot, it can hardly be handled, and, although struck upon, it emits no sound. Does the same wax still remain after this change?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it does remain; no one doubts it, or judges otherwise. What, then, was it I knew with so much distinctness in the piece of wax? Assuredly, it could be nothing of all that I observed by means of the senses, since all the things that fell under taste, smell, sight, touch, and hearing are changed, and yet the same wax remains.

11．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普遍认为［最容易认识，或同样］，被认识得最清楚的事物，也就是我们摸得着看得见的物体，但并不是指一般物体，而是从特殊的物体出发，因为一般的概念往往较为杂乱模糊。那么就以一块蜂蜡为例，刚从蜂巢取出来，非常新鲜，尚没有失掉蜜固有的甜味，仍然保留着所采集的花的香气；它的颜色、形状、大小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质硬性冷，易于拿取，以手敲之，还能发声。总而言之，凡是能令人清楚辨认一个物体的必备条件，都包含在这块蜂蜡中了。但是，说话之余，将其置于火旁，剩下的味道发散了，香气也随之消失了，颜色也变了，形状和原来不一样了，体积增大了，固体变成了液体，进而发热，很难再用手拿起来，而且即使敲它，也发不出声音了。经过这一番变化之后，原来的蜡还存在吗？必须承认它还存在，没人会怀疑这一点，也没人会提出反驳。那么，我之前对这块蜂蜡清晰的认识又是什么呢？当然不是我凭感官而觉察到的东西，因为原来从味觉、嗅觉、视觉、触觉、听觉得到的东西都改

变了，不过蜡还是原来的那一块。

12 . It was perhaps what I now think, viz, that this wax was neither the sweetness of honey, the pleasant odor of flowers, the whiteness, the figure, nor the sound, but only a body that a little before appeared to me conspicuous under these forms, and which is now perceived under others. But, to speak precisely, what is it that I imagine when I think of it in this way? Let it be attentively considered, and, retrenching all that does not belong to the wax, let us see what remains. There certainly remains nothing, except something extended, flexible, and movable. But what is meant by flexible and movable? Is it not that I imagine that the piece of wax, being round, is capable of becoming square, or of passing from a square into a triangular figure? Assuredly such is not the case, because I conceive that it admits of an infinity of similar changes; and I am, moreover, unable to compass this infinity by imagination, and consequently this conception which I have of the wax is not the product of the faculty of imagination. But what now is this extension? Is it not also unknown? for it becomes greater when the wax is melted, greater when it is boiled, and greater still when the heat increases; and I should not conceive [clearly and] according to truth, the wax as it is, if I did not suppose that the piece we are considering admitted even of a wider variety of extension than I ever imagined, I must, therefore, admit that I cannot even comprehend by imagination what the piece of wax is, and that it is the mind alone (mens, Lat., entendement, F.) which perceives it. I speak of one piece in particular; for as to wax in general, this is still more evident. But what is the piece of wax that can be perceived only by the [understanding or] mind? It is certainly the same which I see, touch, imagine; and, in fine, it is the same which, from the beginning, I believed it to be. But (and this it is of moment to

observe) the perception of it is neither an act of sight, of touch, nor of imagination, and never was either of these, though it might formerly seem so, but is simply an intuition (inspectio) of the mind, which may be imperfect and confused, as it formerly was, or very clear and distinct, as it is at present, according as the attention is more or less directed to the elements which it contains, and of which it is composed.

12．也许这块蜂蜡正和我现在所想的一样，就是说，它原来并没有那种蜂蜜的甜味、怡人的花香、洁白的颜色，也没有原来的形状和声音，而只是一个形体，刚才以那些形式呈现给我引起我的注意，而现在又以别的形式呈现给我。但是确切地说，当我如此这般设想这块蜂蜡时，我想象的是什么呢？让我们仔细掂量一下，如果把所有不属于蜂蜡的东西全部去掉，看看还剩下些什么。当然剩下的只是一个有广延、能变形、可移动的东西。但是能变形、可移动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想象这块圆的蜂蜡可以变成方的，又可以从方的变成三角形的呢？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尽管我可以想象这蜂蜡能有无穷无尽类似的变化，但是，我却不能以自己的想象来完全认识这些变化。因此我对蜂蜡的所有概念是不能借想象力来做到的。那么这个广延又是什么呢？不也是未知的吗？因为当蜂蜡融化时就会变大，沸腾时则变得更大，而持续加热，就越发大了。我不能根据真理［清晰地］确认蜂蜡到底是什么。如果我没有假设这块蜂蜡在广延方面能有甚至超乎我们想象的更多的变化样式，那么我必须承认，我甚至无法借助想象力来了解这块蜂蜡是什么，我只有靠理智才能了解了。我说的只是这块特殊的蜂蜡，至于一般的蜡，那就更明显了。那么这块只能为灵魂所了解［或理解］的蜂蜡到底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我所看见的、所触摸到的、所想象的那块蜡，而且是一开始我所认识的那块蜂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蜂蜡的感知，并非来源于视觉、触觉或想象，而且从来都不是它们中的任何一种。虽然以前似乎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它只是灵魂的一种直觉。这种直觉可能并不完美或模糊不清，像以前一样，也可能会是清楚而分明的，就像现在一样，这一切都取

决于我们对该蜂蜡所含有的成分能投入多少注意力。

13 . But, meanwhile, I feel greatly astonished when I observe [the weakness of my mind, and] its proneness to error. For although, without at all giving expression to what I think, I consider all this in my own mind, words yet occasionally impede my progress, and I am almost led into error by the terms of ordinary language. We say, for example, that we see the same wax when it is before us, and not that we judge it to be the same from its retaining the same color and figure: whence I should forthwith be disposed to conclude that the wax is known by the act of sight, and not by the intuition of the mind alone, were it not for the analogous instance of human beings passing on in the street below, as observed from a window. In this case I do not fail to say that I see the men themselves, just as I say that I see the wax; and yet what do I see from the window beyond hats and cloaks that might cover artificial machines, whose motions might be determined by springs? But I judge that there are human beings from these appearances, and thus I comprehend, by the faculty of judgment alone which is in the mind, what I believed I saw with my eyes.

13 . 不过，同时我又发现 [我的灵魂极为脆弱，] 我的灵魂往往不自觉地犯错，这令我颇为惊讶。因为尽管我没有表达出来我在想什么，只是在心中思索这一切，但言语也会偶尔阻碍我进步，而且我几乎被一些日常语言所骗。例如，当一块蜂蜡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只会说看见的是同一块，却不会说，我们是根据同一的颜色、形状，判断出来它是同一块蜂蜡。因此，就像当我从窗口观看路上的行人，倘若不是有类似的情景，我便轻率地下结论说，我认识这块蜂蜡，靠的是视觉，而不仅仅是灵魂的直觉。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会说，我看见这些人，就像我看见蜂蜡一样。可是我从窗口看见了什么呢？会

不会是一些穿戴衣帽、靠弹簧行动的人造机器呢？不过我从所看到的现象中判断，这里有人，因此，我虽然是通过双眼去看这些人，但实际上这些人是由我心里的判断力构成的。

14．The man who makes it his aim to rise to knowledge superior to the common, ought to be ashamed to seek occasions of doubting from the vulgar forms of speech: instead, therefore, of doing this, I shall proceed with the matter in hand, and inquire whether I had a clearer and more perfect perception of the piece of wax when I first saw it, and when I thought I knew it by means of the external sense itself, or, at all events, by the common sense (sensuscommunis), as it is called, that is, by the imaginative faculty; or whether I rather apprehend it more clearly at present, after having examined with greater care, both what it is, and in what way it can be known. It would certainly be ridiculous to entertain any doubt on this point. For what, in that first perception, was there distinct? What did I perceive which any animal might not have perceived? But when I distinguish the wax from its exterior forms, and when, as if I had stripped it of its vestments, I consider it quite naked, it is certain, although some error may still be found in my judgment, that I cannot, nevertheless, thus apprehend it without possessing a human mind.

14．一个人如果以在知识上超越普通人为目标，那他应该觉得从通俗的说话形式中找寻怀疑的根据是可耻的。因此，在这样做之前，我应该从手头的事情开始做起，思考我在最初看到蜂蜡时，是否对它有较清晰和较全面的了解？还是现在对它有更清晰的认识？当初我认为我认识它，是通过蜂蜡本身给人的外观感觉，或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常识（也即一般所谓的想象力）。现在我不但非常仔细地考察过它是什么，而且对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认识它，也经过了深思熟虑。如果

连这一点也加以怀疑，那可真是可笑了。因为在最初的认识里，会有什么是明了的呢？我所能认识的，不也正是任何动物都能认识的吗？但是，当我把蜂蜡和其外表区别开来，就像脱掉它的外衣，赤裸裸地研究它，尽管我的判断里还可能存在某些错误，不过，如果没有人的灵魂，我就无法感知它，这是确定无疑的。

15 . But finally, what shall I say of the mind itself, that is, of myself? for as yet I do not admit that I am anything but mind. What, then! I who seem to possess so distinct an apprehension of the piece of wax, do I not know myself, both with greater truth and certitude, and also much more distinctly and clearly? For if I judge that the wax exists because I see it, it assuredly follows, much more evidently, that I myself am or exist, for the same reason: for it is possible that what I see may not in truth be wax, and that I do not even possess eyes with which to see anything; but it cannot be that when I see, or, which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when I think I see, I myself who think am nothing. So likewise, if I judge that the wax exists because I touch it, it will still also follow that I am; and if I determine that my imagination, or any other cause, whatever it be, persuades m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wax, I will still draw the same conclusion. And what is here remarked of the piece of wax, is applicable to all the other things that are external to me. And further, if the [notion or] perception of wax appeared to me more precise and distinct, after that not only sight and touch, but many other causes besides, rendered it manifest to my apprehension, with how much greater distinctness must I now know myself, since all the reason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nature of wax, or of any body whatever, manifest still better the nature of my mind? And there are besides so many other things in the mind itself that contribute to the illustration of its nature, that those dependent on the body, to which I have here referred, scarcely merit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15．可是到最后，我能对这个灵魂本身，也就是我自己，说点什么呢？因为直到现在我仍然承认，除灵魂之外，我什么都不是。那么，我到底该说些什么呢？我既然如此清晰地认识到这块蜂蜡，难道就不能更真实而可靠地，而且更明确而清晰地认识我自己吗？因为，如果我由于看见了蜂蜡，就断定它的存在，那么我就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更明显地推断出自己是存在的。也许我所看见的东西，它实际上并不是蜂蜡，或许我甚至根本就没有用来看东西的眼睛。可是，当我在看或者当我认为在看（这两者情况是一样的）的时候，这个在思考的我就绝不能不存在，这一点是肯定的。同样，如果由于我摸到了蜡而断定它存在，其结果也一样，即我存在；如果是因为我的想象或者其他任何原因使我相信而断定它存在，我也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而且我在这里提及有关蜂蜡的话，也可以适用于我以外的其他一切事物上。再者，不仅通过视觉、触觉，而且还有别的很多原因，促使我认识了蜂蜡的本质，如果我对它的［概念或］知觉似乎变得更加清楚、更加分明，那么，我不是应该越发明显地认识我自己了吗？因为一切用以认识蜂蜡或不管什么别的物体的本性的理由，不正是更能使我了解灵魂的本性吗？而且还有很多别的事物可以说明灵魂的本性，因此我刚刚提到的有关事物几乎就不值得去提了。

16．But, in conclusion, I find I have insensibly reverted to the point I desired; for, since it is now manifest to me that bodies themselves are not properly perceived by the senses nor by the faculty of imagination, but by the intellect alone; and since they are not perceived because they are seen and touched, but only because they are understood [or rightly comprehended by thought], I readily discover that there is nothing more easily or clearly apprehended than my own mind. But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rid one's self so promptly of an opinion to which one has been long

accustomed, it will be desirable to tarry for some time at this stage, that, by long continued meditation, I may more deeply impress upon my memory this new knowledge.

16．可是，总而言之，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我原来想要的论调；因为，既然事情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明白了，即物体本身并不是由于被感官正好感知，也不是通过想象，而是被智力操控；不是被看见或者被摸到，而不过是被理解了［或者正确地被思想所掌握］，那么我看得很清楚，没有什么比我的灵魂对我来说更容易清晰地认识了。但是，由于很难这么快就破除一个习以为常的见解，我不妨在这个阶段多停留一些时日，以便靠着长期不断的沉思，把这一个新的认识深深地印到我的记忆里去。

Meditation III　OF GOD: THAT HE EXISTS.

沉思三　论上帝之存在

1．I will now close my eyes, I will stop my ears, I will turn away my senses from their objects, I will even efface from my consciousness all the images of corporeal things; or at least, because this can hardly be accomplished, I will consider them as empty and false; and thus, holding converse only with myself, and closely examining my nature, I will endeavor to obtain by degrees a more intimate and familiar knowledge of myself. I am a thinking (conscious) thing, that is, a being who doubts, affirms, denies, knows a few objects, and is ignorant of many, —[who loves, hates], wills, refuses, who imagines likewise, and perceives; for, as I before remarked, although the things which I perceive or imagine are perhaps nothing at all apart from me [and in themselves], I am nevertheless assured that those modes of consciousness which I call percep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 as far only as they are modes of consciousness, exist in me.

1．现在我要闭上双眼、堵住双耳、停止一切感官活动，甚至要从我的思维中，将一切有形物体的影像加以抛弃，或者至少（因为那几乎是无法完成的）我要把它们看作空洞而虚假的；如此一来，我可以只和自己交流，并且可以更近地检查自己的本性，以求渐渐地认识自己，与自己更为亲近。我是个能思想（有意识）的物体，也就是说，是一个能怀疑、能肯定、能否定、能了解一些事物，但同时也是对很多事物一无所知的物体。此外，也是［有爱、有恨、］能愿意、能拒绝、能想象也能感知的东西。因为，如上所说，虽然我所想象和感知的东西，在离开我之后［和就其自身而言］，或许根本就是虚无

的，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确信，我称之为感知和想象的意识模态，就其本身仅仅是思维模式来说，是存在我之内的。

2．And in the little I have said I think I have summed up all that I really know, or at least all that up to this time I was aware I knew. Now, as I am endeavoring to extend my knowledge more widely, I will use circumspection, and consider with care whether I can still discover in myself anything further which I have not yet hitherto observed. I am certain that I am a thinking thing; but do I not therefore likewise know what is required to render me certain of a truth? In this first knowledge, doubtless, there is nothing that gives me assurance of its truth except the clear and distinct perception of what I affirm, which would not indeed be sufficient to give me the assurance that what I say is true, if it could ever happen that anything I thus clearly and distinctly perceived should prove false; and accordingly it seems to me that I may now take as a general rule, that all that is very clearly and distinctly apprehended (conceived) is true.

2．并且我认为，上述寥寥数语，已经把我真正知道的，或者至少到如今我自认为知道的，都已经说尽了。现在，为了进一步扩展知识，我必须小心谨慎，仔细考虑，看看自己是否还能再发现一些至今仍没有认识到的事物。我已然确信自己是个思想之物，然而，我不是因此也就知道了必须具备什么，才能使我确信某个真理吗？毫无疑问，在初步的认识里，若是没有明白而清晰的知觉，没什么能使我确信其真实性。老实说，倘若我认识得如此清楚、明了的东西竟是假的，那么这个知觉就不足以使我确信我所说的是真的。从而我觉得我可以总结出一条总则，那就是："凡是我们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明了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3．Nevertheless I before received and admitted many things as wholly certain and manifest, which yet I afterward found to be doubtful. What, then, were those? They were the earth, the sky, the stars, and all the other objects which I was in the habit of perceiving by the senses. But what was it that I clearly [and distinctly] perceived in them? Nothing more than that the ideas and the thoughts of those objects were presented to my mind. And even now I do not deny that these ideas are found in my mind. But there was yet another thing which I affirmed, and which, from having been accustomed to believe it, I thought I clearly perceived, although, in truth, I did not perceive it at all; I mean the existence of objects external to me, from which those ideas proceeded, and to which they had a perfect resemblance; and it was here I was mistaken, or if I judged correctly, this assuredly was not to be traced to any knowledge I possessed (the force of my perception, Lat.).

3．尽管如此，我以前认为完全可靠、非常明显而接受和承认的许多东西，后来我又发现是有些可疑的。那么那些东西又是什么呢？它们是大地、苍穹、星辰，以及一切我习惯于通过感官所感知到的其他东西。可是，从这些东西里，我能清楚［而明白］地感知的又是什么呢？没有别的，只有那些东西在我灵魂中呈现的观念或思想。即使现在我依然不否认这些观念是在我灵魂中。可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虽曾经肯定过，并且由于习惯使然，我一直相信它，我自以为看得非常清楚，实际上我并没有认清它，我是说那些外在于我的事物的存在，那些观念就是始于它们，并且两者一模一样。我就是在这件事情上犯了错；或者，即使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也绝不是由我的观念所产生的知识造成的。

4．But when I considered any matter in arithmetic and

geometry, that was very simple and easy, as, for example, that two and three added together make five, and things of this sort, did I not view them with at least sufficient clearness to warrant me in affirming their truth? Indeed, if I afterward judged that we ought to doubt of these things, it was for no other reason than because it occurred to me that a God might perhaps have given me such a nature as that I should be deceived, even respecting the matters that appeared to me the most evidently true. But as often as this preconceived opinion of the sovereign power of a God presents itself to my mind, I am constrained to admit that it is easy for him, if he wishes it, to cause me to err, even in matters where I think I possess the highest evidence; and, on the other hand, as often as I direct my attention to things which I think I apprehend with great clearness, I am so persuaded of their truth that I naturally break out into expressions such as these: Deceive me who may, no one will yet ever be able to bring it about that I am not, so long as I shall be conscious that I am, or at any future time cause it to be true that I have never been, it being now true that I am, or make two and three more or less than five, in supposing which, and other like absurdities, I discover a manifest contradiction. And in truth, as I have no ground for believing that Deity is deceitful, and as, indeed, I have not even considered the reasons by which the existence of a Deity of any kind is established, the ground of doubt that rests only on this supposition is very slight, and, so to speak, metaphysical. But, that I may be able wholly to remove it, I must inquire whether there is a God, as soon as an opportunity of doing so shall present itself; and if I find that there is a God, I must examine likewise whether he can be a deceiver; for,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se two truths, I do not see that I can ever be certain of anything. And that I may be enabled to examine this without interrupting the order of meditation I have proposed to myself [which is, to pass by degrees from the notions that I shall find first in my mind to those I

shall afterward discover in it], it is necessary at this stage to divide all my thoughts into certain classes, and to consider in which of these classes truth and error are, strictly speaking, to be found.

4．可是，当我思考算术和几何中十分简单、十分容易的事情时，比如三加二等于五，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不是至少把它们领会得清清楚楚，确实知道它们是真的吗？当然，从那以后，如果我认为这些东西也可以怀疑的话，那一定不会是别的理由，而只是因为我心里产生这样一种想法，也许是上帝赋予我这样的本性，即我本来就应该受骗，甚至对最明显的道理也不例外。但是，若我经常对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怀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不得不承认，只要他愿意，就能很容易使我弄错，甚至在我相信认识得非常清楚的东西上也是如此。而在另一方面，每当我注意我以为领会得十分清楚的东西时，又会对他们的真实深信不疑，不由得脱口而出：随他怎么骗我，只要我意识到自己是存在的，他就绝不能使我不存在；既然现在我存在这件事是真的，他就绝不能在将来说我不曾存在过；而且，它也绝不能使三加二之和多于五或少于五，也不能声称任何我一眼就能看出其中含有明显矛盾的事物是谬论。其实，既然我并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上帝是骗人的，既然我对上帝是否存在的理由也没有充分地考虑过，因此仅仅建筑在这个见解之上的怀疑根据当然是非常不可靠的，并且是（姑且这么说）形而上学的。可是，为了完全排除这个怀疑的基础，在机会一旦来到，我应该自问上帝是否存在；而一旦证明上帝存在，也应探究他是否是骗子。因为如果我对这两个事实真相不了解，我就看不出我还能确信什么。而为了我能够有条不紊地研究这些，而不致中断我自己提出来的沉思次序［就是从我心里最先发现的概念一步步地推论到后来可能在心里找到的概念］，有必要在这里把我的全部思想分为特定类别，考虑在哪些类别里，严格来说，能发现真理或错误。

5．Of my thoughts some are, as it were, images of things, and

to these alone properly belongs the name IDEA; as when I think [represent to my mind] a man, a chimera, the sky, an angel or God. Others, again, have certain other forms; as when I will, fear, affirm, or deny, I always, indeed, apprehend something as the object of my thought, but I also embrace in thought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and of this class of thoughts some are called volitions or affections, and others judgments.

5．在我的众多思想之中，有些可以说是事物的影像。而观念正是属于这一类的，比如我可以想象［呈现于我灵魂中］一个人、一个怪物、天空、一个天使或者上帝本身。除此而外，一些思想有别的形式，比如我在憧憬、恐惧、赞成、否定时，虽然总能领会到某种东西，以作为我思想的对象，但是除了事物的表象之外，我的思想还接受了一些别的事物；属于这一类思想的，有些称为意愿或情感，另外的一些叫作判断。

6．Now, with respect to ideas, if these are considered only in themselves, and are not referred to any object beyond them, they cannot, properly speaking, be false; for, whether I imagine a goat or chimera, it is not less true that I imagine the one than the other. Nor need we fear that falsity may exist in the will or affections; for, although I may desire objects that are wrong, and even that never existed, it is still true that I desire them. There thus only remain our judgments, in which we must take diligent heed that we be not deceived. But the chief and most ordinary error that arises in them consists in judging that the ideas which are in us are like or conformed to the things that are external to us; for assuredly, if we but considered the ideas themselves as certain modes of our thought (consciousness), without referring them to anything beyond, they would hardly afford any occasion of error.

6．至于观念，如果只就其本身、不牵涉到别的东西来说的话，严格来说它们不可能是虚假的；因为不论我想象一只山羊或一个怪物，在想象之中它们都是真实的。也不要害怕在意志或情感里边会有虚妄存在；即使我可以追求一些错的东西，甚至不存在的东西，但是我追求这些东西仍不失为真事。因此，就只剩下判断了。在做判断时应该小心谨慎以免受骗。而在做出判断时，最主要和最平常的错误，就是我们往往认为自己心中的观念，与外界的事物相似或相同；很显然，如果把观念仅仅看成思想（意识）的某些模态，不想把它们牵涉到外界的东西上去，那么它们就很难使我犯错了。

7．But among these ideas, some appear to me to be innate, others adventitious, and others to be made by myself (factitious); for, as I have the power of conceiving what is called a thing, or a truth, or a thought, it seems to me that I hold this power from no other source than my own nature; but if I now hear a noise, if I see the sun, or if I feel heat, I have all along judged that these sensations proceeded from certain objects existing out of myself; and, in fine, it appears to me that sirens, hippogryphs, and the like, are inventions of my own mind. But I may even perhaps come to be of opinion that all my ideas are of the class which I call adventitious, or that they are all innate, or that they are all factitious; for I have not yet clearly discovered their true origin.

7．不过，在这些观念里边，我认为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是外来的，另有一些是我自己捏造的（虚构的）。因为，既然我有领会所谓物体、真理或思想的能力，我觉得这种能力不是外来的，而是天生的；但是，如果我现在听见了某种声音，看见了太阳，感觉到了热，那么我判断这些感觉都是从在我之外的东西发出的；最后，我觉得塞壬女妖，鹫马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一切怪物，都是由我心中凭空

捏造虚构出来的。不过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一切观念都是外来的，或者都是与生俱来的，或都是捏造的；因为我还没有清楚地发现它们的真正来源。

8．What I have here principally to do is to consider, with reference to those that appear to come from certain objects without me, what grounds there are for thinking them like these objects. The first of these grounds is that it seems to me I am so taught by nature; and the second that I am conscious that those ideas are not dependent on my will, and therefore not on myself, for they are frequently presented to me against my will, as at present, whether I will or not, I feel heat; and I am thus persuaded that this sensation or idea (sensumvelideam) of heat is produced in me by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myself, viz., by the heat of the fire by which I sit. And it is very reasonable to suppose that this object impresses me with its own likeness rather than any other thing.

8．我现在要做的主要事情是，在有关我觉得来自我以外的对象的那些观念中，看看有哪些理由使我不得不相信它们是和这些对象一样的。第一个理由是：我觉得这是本性告诉我的；第二个理由是：我自己体会到这些观念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呈现在我心中的观念，往往违反我的意志。正如现在，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感觉到了热，因此我便相信，我心中有关热的感觉或观念是由于一种不同于我的事物所产生的，即我旁边火炉的热使我心中产生热的感觉或观念。所以，可以合理推断，这个对象是以其固有的形象，而不是别的东西，使我产生了印象。

9．But I must consider whether these reasons are sufficiently strong and convincing. When I speak of being taught by nature in

this matter, I understand by the word nature only a certain spontaneous impetus that impels me to believe in a resemblance between ideas and their objects, and not a natural light that affords a knowledge of its truth. But these two things are widely different; for what the natural light shows to be true can be in no degree doubtful, as, for example, that I am because I doubt, and other truths of the like kind; inasmuch as I possess no other faculty whereby to distinguish truth from error, which can teach me the falsity of what the natural light declares to be true, and which is equally trustworthy; but with respect to [seemingly] natural impulses, I have observed, when the question related to the choice of right or wrong in action, that they frequently led me to take the worse part; nor do I see that I have any better ground for following them in what relates to truth and error.

9．现在我必须考虑这些理由是否足够有力，能令人心悦诚服。当我说我觉得这是本性告诉我的，我说的本性，这个词所指的仅仅是某一种自然而然的倾向，这种倾向使我相信观念和其对象有一种类似的关系，而不是指一种自然之光，使我知道这是真的。这两种说法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自然之光使我看到的都是真的，我一点都不能怀疑，比如“我怀疑，故我在”等等诸如此类的真理一样。此外，在辨别真和假上，我没有任何别的能力能够教给我，说这个自然之光指给我的并不是真的，让我能够对于那种能力和对于自然之光同样地加以信赖。可是，至于［似乎］自然而然的倾向，我注意到，当我要在善恶的行为之间进行选择时，时不时地就会选择较坏的一方；在有关真假对错的问题上，我并没有看到更好的理由使我依靠这些自然而然的倾向。

10．Then, with respect to the other reason, which is that because these ideas do not depend on my will, they must arise from

objects existing without me, I do not find it more convincing than the former, for just as those natural impulses, of which I have lately spoken, are found in me,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y are not always in harmony with my will, so likewise it may be that I possess some power not sufficiently known to myself capable of producing ideas without the aid of external objects, and, indeed, it has always hitherto appeared to me that they are formed during sleep, by some power of this nature, without the aid of aught external.

10．至于另外的理由，即这些观念既然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那么它们必然是从别处来的，我并不认为这比前面的理由更有说服力。因为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自然而然的倾向，是存在于我心里的，尽管它们并不总是和我的意志一致。同样，也许是我心里有某种能力，能够产生这些观念而并不借助于外在的事物，虽然我对这些能力还一无所知；事实上，我总觉得在我睡觉的时候，这些观念在我心里形成，依靠着本性的力量，而不借助于任何外在对象。

11．And, in fine, although I should grant that they proceeded from those objects, it is not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that they must be like them. On the contrary, I have observed, in a number of instances, that there wa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bject and its idea. Thus, for example, I find in my mind two wholly diverse ideas of the sun; the one, by which it appears to me extremely small draws its origin from the senses, and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class of adventitious ideas; the other, by which it seems to be many times larger than the whole earth, is taken up on astronomical grounds, that is, elicited from certain notions born with me, or is framed by myself in some other manner. These two ideas cannot certainly both resemble the same sun; and reason teaches me that the one which seems to have immediately emanated from it is the most unlike.

11．最后，即使我同意它们是由这些对象引起的，也并不能因此而推论出它们一定与那些对象相似。相反，从很多事例上我看到，对象和其观念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举例来说，在我灵魂中，关于太阳我觉得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太阳非常小，这种观念是来源于感官的，应该归入外来观念的范畴中；另一种观念认为太阳比整个地球大很多倍，这种观念是从天文学的角度看，也就是说，从我与生俱来的某些概念里得出来的，或者是由我自己用别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当然这两种观念，不可能都符合同样的太阳；而且理性使我相信，直接来自它外表的那个观念是和它最不相像的。

12．And these things sufficiently prove that hitherto it has not been from a certain and deliberate judgment, but only from a sort of blind impulse, that I believed existence of certain things different from myself, which, by the organs of sense, or by whatever other means it might be, conveyed their ideas or images into my mind [and impressed it with their likenesses].

12．所有这些足够使我认识到，至今为止，我之所以相信外界有异乎于我的事物存在，相信它们可以透过感官或其他可能的途径，把它们的观念和影像传到我的心中［依他们的原样印在我的心中］，并非出自确信的、深思熟虑的判断，而是出自盲目的冲动。

13．But there is still another way of inquiring whether, of the objects whose ideas are in my mind, there are any that exist out of me. If ideas are taken in so far only as they are certain modes of consciousness, I do not remark any difference or inequality among them, and all seem, in the same manner, to proceed from myself; but, considering them as images, of which one represents one thing

and another a different, it is evident that a great diversity obtains among them. For, without doubt, those that represent substances are something more, and contain in themselves, so to speak, more objective reality [that is, participate by representation in higher degrees of being or perfection], than those that represent only modes or accidents; and again, the idea by which I conceive a God [sovereign], eternal, infinite, [immutable], all-knowing, all-powerful, and the creator of all things that are out of himself, this, I say, has certainly in it more objective reality than those ideas by which finite substances are represented.

13．可是还有另外一种途径，可以用来探究在我心里有其观念的那些对象，是否有些是存在于我自身以外的。如果把这些观念只看作思维的某些方式，那么我就看不出在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或不等，都好像是以同样方式由我而来的。可是，如果把它们看作影像，其中一个影像表示一种东西，另一个表示另一种东西，那么很显然，它们彼此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事实上，因为给我表象实体的那些观念，不仅仅是观念，可以肯定地说，其中一定有较多的客观实在性［也就是说，借着表象作用而分享更多的存在和完美］，至于那些指向我表象模态或偶然属性的观念，它们的客观实在性自然较少。再说，我由之而体会到的［至高无上的、］永恒的、无限的、［不变的、］全知的、全能的上帝，或能创造它自身以外一切事物的造物主，这种观念，比之表象各种有限实体的那些观念，含有较多的客观实在性。

14．Now, it is manifest by the natural light that there must at least be as much reality in the efficient and total cause as in its effect; for whence can the effect draw its reality if not from its cause? And how could the cause communicate to it this reality unless it possessed it in itself? And hence it follows, not only that what is cannot be produced by what is not, but likewise that the

more perfect, in other words, that which contains in itself more reality, cannot be the effect of the less perfect; and this is not only evidently true of those effects, whose reality is actual or formal, but likewise of ideas, whose reality is only considered as objective. Thus, for example, the stone that is not yet in existence, not only cannot now commence to be, unless it be produced by that which possesses in itself, formally or eminently, all that enters into its composition, [in other words, by that which contains in itself the same properties that are in the stone, or others superior to them]; and heat can only be produced in a subject that was before devoid of it, by a cause that is of an order, [degree or kind], at least as perfect as heat; and so of the others. But further, even the idea of the heat, or of the stone, cannot exist in me unless it be put there by a cause that contains, at least, as much reality as I conceive existent in the heat or in the stone for although that cause may not transmit into my idea anything of its actual or formal reality, we ought not on this account to imagine that it is less real; but we ought to consider that, [as every idea is a work of the mind], its nature is such as of itself to demand no other formal reality than that which it borrows from our consciousness, of which it is but a mode [that is, a manner or way of thinking]. But in order that an idea may contain this objective reality rather than that, it must doubtless derive it from some cause in which is found at least as much formal reality as the idea contains of objective; for, if we suppose that there is found in an idea anything which was not in its cause, it must of course derive this from nothing. But, however imperfect may be the mode of existence by which a thing is objectively [or by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derstanding by its idea, we certainly cannot, for all that, allege that this mode of existence is nothing, nor, consequently, that the idea owes its origin to nothing.

14．现在，凭借自然之光，可以明显看出，在整个动因中一定有比它的结果有更多的实在性：因为结果的实在性，如果不是来自于其原因，那么能从哪里取得呢？而且原因如果本身没有实在性，怎么能够把它传给结果呢？由此可见，不仅无中不能生有，而且比较完美的事物，换言之，本身包含较多实在性的事物，也不能是较不完美之物的结果。这个结论，无论是在具有现实的或形式的那种实在性的结果里，或者是在只有客观实在性的那些观念里，都是清楚易见的。例如：一块没有存在过的石头，如果本身没有一种形式的或超越的，自身所特有的因素，那么这块石头是不会存在的［换言之，它本身需要有和石头同样的性质或者更高级的一些别的性质，那么石头才会存在］；又如，热之所以能产生在原来本没有热的东西中，是由于有一种［在程度上或种类上］至少跟热同样完美的起因存在，其他的事物也莫不如是。再者，热或石头的观念之所以会存在我心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至少包含我想象中的热或石头所具有的那么多的实在性。因为即使那个原因并不能把它们现实的或形式的实在性传到我的观念里，也不应该因此就想象那个原因不那么真实；而应该要考虑，［既然每个观念都是灵魂的作品，］那么观念的本性就不需要其他形式的实在性，只要由意识得来的那种实在性就够了，因为它不仅是意识的模态［也是思想的方法或方式］。不过一个观念包含这样一个而不包含别的客观实在性，这无疑是来自一些原因，而这个原因里的形式实在性，至少同这个观念所包含的客观实在性一样多。因为如果我们在一个观念里，发现有原因里所没有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就一定是从无中生来的。不过，不管事物的存在模态有多不完美，这种存在模态源自我们的理解中产生的客观表象，［或观念，］但我们绝不能说，这种存在的模态是虚无的，也不能说这种观念的来源也是虚无的。

15．Nor must it be imagined that, since the reality which considered in these ideas is only objective, the same reality need not be formally (actually) in the causes of these ideas, but only objectively: for, just as the mode of existing objectively belongs to ideas by their peculiar nature, so likewise the mode of existing

formally appertains to the causes of these ideas (at least to the first and principal), by their peculiar nature. And although an idea may give rise to another idea, this regress cannot, nevertheless, be infinite; we must in the end reach a first idea, the cause of which is, as it were, the archetype in which all the reality [or perfection] that is found objectively [or by representation] in these ideas is contained formally [and in act]. I am thus clearly taught by the natural light that ideas exist in me as pictures or images, which may, in truth, readily fall short of the perfection of the objects from which they are taken, but can never contain anything greater or more perfect.

15．虽然这些观念里的实在性仅仅是客观的，我也不应该就此怀疑这些实在性不必形式地（真实地）存在于观念的原因中就，只要这种实在性客观地存在于观念的原因里就够了：因为，各种观念既然依其特殊的本性而具有客观的存在模态，因此，这些观念的原因（至少那些主要的原因），也要依其特殊的本性而具有形式的存在模态。而且即使一个观念有可能产生另一个观念，这种现象也不可能是无穷无尽的，它最终必须达到一个“元观念”，这个“元观念”的原因就像一种原型一样，它里面形式地［实际地］包含着仅仅是客观地或由于表象而存在于这些观念之中的全部现实性［或完美性］。这样，自然之光使我明显地看出，观念在我心里就像一些绘画或者一些图像一样，它们可能乐于达不到原物的完美性，但绝不可能包含什么更伟大或者更完满的东西。

16．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time and care with which I examine all those matters, the conviction of their truth brightens and becomes distinct. But, to sum up, what conclusion shall I draw from it all? It is this: if the objective reality [or perfection] of any one of my ideas be such as clearly to convince me, that this same

reality exists in me neither formally nor eminently, and if, as follows from this, I myself cannot be the cause of it, it is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that I am not alone in the world, but that there is beside myself some other being who exists as the cause of that idea; while, on the contrary, if no such idea be found in my mind, I shall have no sufficient ground of assurance of the existence of any other being besides myself, for, after a most careful search, I have, up to this moment, been unable to discover any other ground.

16．对这些问题考察得越久越仔细，也就对他们的真实性了解得越加明白而清晰。不过最后我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来呢？结论是：如果任何观念的客观实在性［或完美性］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它既不是形式地，也不是卓越地存在于自我之中，从而我自己不可能是它的原因，那么结果必然是，在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而是还有别的东西存在，这就是这个观念的原因；反之，如果这样的观念不存在于我，我就没有任何论据能够使我确实相信除了我自己以外，还有任何别的东西存在；因为，在仔细地寻找过后，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任何别的理由。

17．But, among these my ideas, besides that which represents myself, respecting which there can be here no difficulty, there is one that represents a God; others that represent corporeal and inanimate things; others angels; others animals; and, finally, there are some that represent men like myself.

17．可是，在我的这些观念之中，除了代表我自己的那个观念之外，相对来说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有一个观念向我表征了上帝，另外一些观念给我表征了有形体而无生命的东西，一些观念表征天使，一些观念给我表征动物，最后，还有一些观念给我表征跟我相似

的人。

18 . But with respect to the ideas that represent other men, or animals, or angels, I can easily suppose that they were formed by the mingling and composition of the other ideas which I have of myself, of corporeal things, and of God, although they were, apart from myself, neither men, animals, nor angels.

18．不过，至于那些表征其他的人、动物或天使的观念，我不难推断它们是由我关于有形物体和上帝所具有的其他一些观念混合而成的，尽管除了我以外，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人、动物和天使。

19 . And with regard to the ideas of corporeal objects, I never discovered in them anything so great or excellent which I myself did not appear capable of originating; for, by considering these ideas closely and scrutinizing them individually, in the same way that I yesterday examined the idea of wax, I find that there is but little in them that is clearly and distinctly perceived. As belonging to the class of things that are clearly apprehended, I recognize the following, viz, magnitude or extension in length, breadth, and depth; figure, which results from the termination of extension; situation, which bodies of diverse figures preserve with reference to each other; and motion or the change of situation; to which may be added substance, duration, and number. But with regard to light, colors, sounds, odors, tastes, heat, cold, and the other tactile qualities, they are thought with so much obscurity and confusion, that I cannot determine even whether they are true or false; in other words, whether or not the ideas I have of these qualities are in truth the ideas of real objects. For although I before remarked

that it is only in judgments that formal falsity, or falsity properly so called, can be met with, there may nevertheless be found in ideas a certain material falsity, which arises when they represent what is nothing as if it were something. Thus, for example, the ideas I have of cold and heat are so far from being clear and distinct, that I am unable from them to discover whether cold is only the privation of heat, or heat the privation of cold; or whether they are or are not real qualities: and since, ideas being as it were images there can be none that does not seem to us to represent some object, the idea which represents cold as something real and positive will not improperly be called false, if it be correct to say that cold is nothing but a privation of heat; and so in other cases.

19．至于有形物体的观念，在他们身上，我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伟大和优越的性质，是我自己所不能创造的；因为，我曾抱着像昨天考察蜂蜡那样的态度，将这些观念仔细思量过，逐个推敲了一遍，结果我发现从他们那里所能明白而清晰地感知的东西并不多。至于那些能让我清晰知晓的事物范畴，我发现只有以下内容：长、宽、深的多寡或者广延；用这些广延所形成的形状；由不同形状的物体互相保持的位置，以及运动或位置的变化；还有实体、持续时间和数目。至于其他东西，像光、颜色、声音、气味、味道、热、冷，以及属于触觉的其他性质，在我的思想里是模糊不清的，使我不能确定它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换言之，不知道我对于性质所有的观念，到底是不是真实事物的观念。因为，虽然我以前提过，只有在判断里才有形式的虚假（或确切地说是真正的虚假），然而在观念里则可能有某种实质的虚假，若观念把子虚乌有的事物表象成某些实有的东西。比如，我对于冷和热的观念，就很不清楚、不明白，以致我不能根据它们来分辨，到底冷仅仅是缺失热呢，还是缺失冷呢，或者二者都是实在的性质，或者都不是；并且，既然观念就像影像一样，没有观念不给我们表象什么东西，如果说冷真的不过是缺失热，那么把冷表现为实在的、肯定的观念就不能不恰当地被说成是虚假的，其他类似的观念也

是一样。

20 . To ideas of this kind, indeed,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I should assign any author besides myself: for if they are false, that is, represent objects that are unreal, the natural light teaches me that they proceed from nothing; in other words, that they are in me only because something is wanting to the perfection of my nature; but if these ideas are true, yet because they exhibit to me so little reality that I cannot even distinguish the object represented from nonbeing, I do not see why I should not be the author of them.

20．对于这一类的观念，我就是它们的创造者，不必再找寻别的创造者，因为如果它们是虚假的，也就是说，如果它们表示事物是不实在的或不存在的，自然之光就会告诉我，它们是子虚乌有的，换言之，它们只存在于我的心中，是因为我的本性有不完美的地方。不过如果这些观念是真实的，那么即使它们向我呈现的真实性太少以至于我无法把所表象的事物和不存在的事物明白地区别开来，我也实在没有理由说我不是它们的创造者。

21 . With reference to those ideas of corporeal things that are clear and distinct, there are some which, as appears to me, might have been taken from the idea I have of myself, as those of substance, duration, number, and the like. For when I think that a stone is a substance, or a thing capable of existing of itself, and that I am likewise a substance, although I conceive that I am a thinking and non-extended thing, and that the stone, on the contrary, is extended and unconscious, there being thus the greatest diversity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yet these two ideas seem to have this in common that they both represent substances. In the same way,

when I think of myself as now existing, and recollect besides that I existed some time ago, and when I am conscious of various thoughts whose number I know, I then acquire the ideas of duration and number, which I can afterward transfer to as many objects as I please. With respect to the other qualities that go to make up the ideas of corporeal objects, viz, extension, figure, situation, and motion, it is true that they are not formally in me, since I am merely a thinking being; but because they are only certain modes of substance, and because I myself am a substance, it seems possible that they may be contained in me eminently.

21．至于那些明白而清晰的有形物体的观念，有些似乎是能够从我自己的观念中得出来的，就像我对实体、持续时间、数目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事物的观念那样。因为，当我想到石头是一个实体，或者一个本身有能力存在的事物，而我自己也是一个实体，虽然我清楚自己是一个能思想而没有广延的事物，相反石头是一个有广延而无思想的事物，这样，这两个概念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可是，无论如何它们在表象实体这一点上似乎是一致的。同样，我想到自己现在存在，并且记得自己以前也存在过，此外我还意识到许多不同的思想，认识到这些思想的数目，这时我就得到持续时间和数目的观念，从此我就可以把这两种观念随心所欲地应用在其他很多东西上。至于构成有形物体观念的其他性质，即广延、形状、位置和运动等，它们固然不是形式化地存在于我心里，因为我不过是一个有思想的东西；然而由于这仅仅是实体的某些模态，而且我自己也是一个实体，因此它们似乎能够突出地包含在我心里。

22．There only remains, therefore, the idea of God, in which I must consider whether there is anything that cannot be supposed to originate with myself. By the name God, I understand a substance infinite, [eternal, immutable], independent, all-knowing, all-

powerful, and by which I myself, and every other thing that exists, if any such there be, were created. But these properties are so great and excellent, that the more attentively I consider them the less I feel persuaded that the idea I have of them owes its origin to myself alone. And thus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conclude, from all that I have before said,that God exists.

22．因而现在只剩下上帝的观念了，对这个观念，必须考虑一下是否有什么东西不能来源于我自己。关于上帝这个名称，我指的是一个无限、［永恒、不变、］独立、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实体，而我自己和其他一切存在的事物（假如真有这些事物存在的话）都是这个实体创造出来的。可是这些优点是如此伟大，如此卓越，以至于我越认真考虑它们，就越不相信我对它们所具有的观念，都仅仅来源于我。因此，从上述一切必然可推出结论：上帝必然存在。

23．For though the idea of substance be in my mind owing to this, that I myself am a substance, I should not, however, have the idea of an infinite substance, seeing I am a finite being, unless it were given me by some substance in reality infinite.

23．虽然我是实体这个想法存在于我的心里，但我不过是一个有限的实体，不能有一个无限的实体的观念，除非是一个真正无限的实体将这个观念赋予我。

24．And I must not imagine that I do not apprehend the infinite by a true idea, but only by the negation of the finite, in the same way that I comprehend repose and darkness by the negation of motion and light: since, on the contrary, I clearly perceive that

there is more reality in the infinite substance than in the finite, and therefore that in some way I possess the perception (notion) of the infinite before that of the finite, that is, the perception of God before that of myself, for how could I know that I doubt, desire, or that something is wanting to me, and that I am not wholly perfect, if I possessed no idea of a being more perfect than myself, by comparison of which I knew the deficiencies of my nature?

24．而且我不能想象我不是通过一个真正的观念，而仅仅是通过否定有限的事物来了解无限的，就像我通过否定运动和光明来理解静止和黑暗；相反，因为我明显地看到，无限实体的实在性比有限实体的实在性更多，因此我是先有无限的知觉（概念），然后才有有限的知觉，也就是说，先有的是上帝的概念，而不是我自己的概念。因为，假如我不是有一个比自己更完满的存在观念，使我借此比较，我才看出自己本性的缺陷，我又怎么可能认识到我怀疑和我希望，也就是说，我认识到我缺少什么东西，我不是完满无缺的呢？

25．And it cannot be said that this idea of God is perhaps materially false, and consequently that it may have arisen from nothing [in other words, that it may exist in me from my imperfections] as I before said of the ideas of heat and cold, and the like: for, on the contrary, as this idea is very clear and distinct, and contains in itself more objective reality than any other, there can be no one of itself more true, or less open to the suspicion of falsity. The idea, I say, of a being supremely perfect, and infinite, is in the highest degree true; for although, perhaps, we may imagine that such a being does not exist, we cannot, nevertheless, suppose that his idea represents nothing real, as I have already said of the idea of cold. It is likewise clear and distinct in the highest degree, since whatever the mind clearly and distinctly conceives as real or true,

and as implying any perfection, is contained entire in this idea. And this is true, nevertheless, although I do not comprehend the infinite, and although there may be in God an infinity of things that I cannot comprehend, nor perhaps even compass by thought in any way; for it is of the nature of the infinite that it should not be comprehended by the finite; and it is enough that I rightly understand this, and judge that all which I clearly perceive, and in which I know there is some perfection, and perhaps also an infinity of properties of which I am ignorant, are formally or eminently in God, in order that the idea I have of him may become the most true, clear, and distinct of all the ideas in my mind.

25．不能说上帝的观念或许在实质上是虚假的，因此，这个观念可以从子虚乌有中产生出来［换言之，因为我有缺陷，所以它可能存在我心里］，就像我以前所说的关于热和冷等等的观念那样；因为，恰恰相反，这个观念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它本身比任何别的观念都含有更多的客观实在性，所以自然没有任何观念比它更真实，比它更少地令人怀疑为虚假的。我说的这个无上完美的、无限的存在观念是完全真实的；因为，虽然也许可以设想这个存在体是不存在的，可是却不能设想它的观念给我表象的东西不是真的，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冷的观念那样。这个观念也是最清楚、最明白的，因为凡是灵魂清楚明白地领会为实在和真实的，并且本身含有完美性的东西，都完全包含在这个观念里了。虽然我不能理解无限或者虽然上帝可能所有的一些无限的事物，既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也不是我透过任何思考的途径就能把握的，但这都无碍于上面所说的这个事实是真的；因为我的本性是有限的，不能理解无限，这是由于无限的本性的缘故；只要我很好地理解这个道理，而且相信，我明白地知觉的一切事物所蕴含的完美性和无限性（这是我所不知道的），都形式地或者卓越地存在于上帝心中，则在我的心中，我对它所有的观念，即可成为最真实、最明白和最清晰的了。

26．But perhaps I am something more than I suppose myself to be, and it may be that all those perfections which I attribute to God, in some way exist potentially in me, although they do not yet show themselves, and are not reduced to act. Indeed, I am already conscious that my knowledge is being increased [and perfected] by degrees; and I see nothing to prevent it from thus gradually increasing to infinity, nor any reason why, after such increase and perfection, I should not be able thereby to acquire all the other perfections of the Divine nature; nor, in fine, why the power I possess of acquiring those perfections, if it really now exist in me, should not be sufficient to produce the ideas of them.

26．不过，或许我比我以为的要多一点我归于上帝的那些完美性，这些完美性正以某种方式潜存于我心中，虽然还没有表现出来，也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其实，我已然体会出，知识是逐渐增长［并逐渐完美起来］的，我看不出有什么能够阻止它逐渐地臻于无限。一直这样增长和完美，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能阻止我获得上帝本性的其他一切完美性。最后，我也看不出，既然我拥有获得那些完美性的能力（如果这个能力确实存在于我心中），为何不能产生这些完美的观念。

27．Yet, on looking more closely into the matter, I discover that this cannot be; for, in the first place, although it were true that my knowledge daily acquired new degrees of perfection, and although there were potentially in my nature much that was not as yet actually in it, still all these excellences make not the slightest approach to the idea I have of the Deity, in whom there is no perfection merely potentially [but all actually] existent; for it is even an unmistakable token of imperfection in my knowledge, that it is augmented by degrees. Further, although my knowledge

increase more and more, nevertheless I am not, therefore, induced to think that it will ever be actually infinite, since it can never reach that point beyond which it shall be incapable of further increase. But I conceive God as actually infinite, so that nothing can be added to his perfection. And, in fine, I readily perceive that the objective being of an idea cannot be produced by a being that is merely potentially existent, which, properly speaking, is nothing, but only by a being existing formally or actually.

27．虽然如此，在进一步仔细一点观察之后，我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即使我的知识真是每天都趋向于进一步的完美，并且我的本性中确实有很多潜在的东西还没有成为真实的存在，可是所有这些优点并不能稍稍接近我所具有的上帝的观念，因为上帝的完美并非仅是潜在的东西，而是现实存在的［实在的］东西。由于我的知识是逐渐累积的，正表示它是有缺点的。再说，虽然我的知识逐渐增长，可是我仍然不认为它能臻于无限，因为无论它达到什么高度，总是可以再增加的。可是我心中的上帝是真正无限的，它的完美是不能再增加的。总之，我认为，观念的客观存在体不能仅仅取决于潜在的存在体（这样的存在体严格来说是不存在的），它只能产生于形式的或现实的存在体。

28．And, truly, I see nothing in all that I have now said which it is not easy for any one, who shall carefully consider it, to discern by the natural light; but when I allow my attention in some degree to relax, the vision of my mind being obscured, and, as it were, blinded by the images of sensible objects, I do not readily remember the reason why the idea of a being more perfect than myself, must of necessity have proceeded from a being in reality more perfect. On this account I am here desirous to inquire further, whether I, who possess this idea of God, could exist supposing there was no

God.

28．当然，凡是能审慎思考的人，很容易根据自然之光，来分辨我所说的一切；可是，当我的注意力稍一放松，我的精神就被可感觉的东西的影像弄得模糊起来，好像瞎了一样，不容易记得，为什么一个比我完美的存在观念，必然是由一个确实完美的存在得来的。由于这个缘故，我在这里继续探究，若宇宙间没有上帝，具有上帝观念的我，是否还会存在。

29．And I ask,from whom could I, in that case, derive my existence? Perhaps from myself, or from my parents, or from some other causes less perfect than God; for anything more perfect, or even equal to God, cannot be thought or imagined.

29．试问：在上述情形下，我是从哪里得到我的存在的呢？也许来自于我自己，或者来自于我的父母，抑或是来自于不如上帝完美的其他原因；因为我们不能想象有比上帝更完美，或者和上帝一样完美的东西。

30．But if I [were independent of every other existence, and] were myself the author of my being, I should doubt of nothing, I should desire nothing, and, in fine, no perfection would be awanting to me; for I should have bestowed upon myself every perfection of which I possess the idea, and I should thus be God. And it must not be imagined that what is now wanting to me is perhaps of more difficult acquisition than that of which I am already possessed; for, on the contrary, it is quite manifest that it was a matter of much higher difficulty that I, a thinking being,

should arise from nothing, than it would be for me to acquire the knowledge of many things of which I am ignorant, and which are merely the accidents of a thinking substance; and certainly, if I possessed of myself the greater perfection of which I have now spoken [in other words, if I were the author of my own existence], I would not at least have denied to myself things that may be more easily obtained [as that infinite variety of knowledge of which I am at present destitute]. I could not, indeed, have denied to myself any property which I perceive is contained in the idea of God, because there is none of these that seems to me to be more difficult to make or acquire; and if there were any that should happen to be more difficult to acquire, they would certainly appear so to me (supposing that I myself were the source of the other things I possess), because I should discover in them a limit to my power.

30．但是，［如果我独立于其他存在之外，］如果我是自己的创造者，那么我不应当怀疑任何东西，不再有欲求，最后就不缺少任何完美性；因为，凡是在我心里有什么观念的东西，我都能自己给予，这样一来我就是上帝了。而且，我不能想象说，我所缺少的东西，也许比我已经有的东西更难取得；因为相反，很明显的，要我这个思想物能无中生有，是十分困难的，可是，若要我获得不为我所知的很多事物的知识，或者仅仅获得一些思想物质的偶然属性，那就容易得多了。不过显然，如果我拥有刚才所说的完美［换言之，如果说我是自己存在的创造者）］，则我至少不会拒绝给予自己那些较容易获得的事物［正如我现在所缺乏的无穷无尽各种各样的知识］。事实上，我不能否认，我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包含在上帝的观念中，因为那些东西里没有一件是我觉得更难做的或更难取得的；假如其中有一件是较难获得的，这也无可避免（虽然我已假设自己是我所具有的其他事物的来源），因为我应该发现，对这些事物，我的能力相当有限。

31 . And though I were to suppose that I always was as I now am, I should not, on this ground, escape the force of these reasonings, since it would not follow, even on this supposition, that no author of my existence needed to be sought after. For the whole time of my life may be divided into an infinity of parts, each of which is in no way dependent on any other; and, accordingly, because I was in existence a short time ago,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I must now exist, unless in this moment some cause create me anew as it were, that is, conserve me. In truth, it is perfectly clear and evident to all who will attentively consider the nature of duration, that the conservation of a substance, in each moment of its duration, requires the same power and act that would be necessary to create it, supposing it were not yet in existence; so that it is manifestly a dictate of the natural light that conservation and creation differ merely in respect of our mode of thinking [and not in reality].

31 . 虽然我可以假定，我以往的存在和现在一样，可是我不能据此而置这些强而有力的推论于不顾，更不能借此假设，为自己的存在寻求别的创造者。因为我的一生，可以分为无数部分，而每一部分都绝对不取决于其余部分，因此，从不久以前我存在过这件事上并不能得出我现在一定存在这一结论来，除非当下有一个原因重新创造我，保存我。事实上，任何人只要专心一意地探究时间的本性，就会很明白地看到，实体如果要在每一刻保存其持续性，就需要同一种能力和动作，正如它在被创造时所需的能力一样（假设那实体还未曾存在）。因此，自然之光使我看得很清楚，保存和创造只是从我们的思维方式来看才是不同的［而从事实上来看并没有什么不同］。

32 . All that is here required, therefore, is that I interrogate myself to discover whether I possess any power by means of which I

can bring it about that I, who now am, shall exist a moment afterward: for, since I am merely a thinking thing (or since, at least, the precise question, in the meantime, is only of that part of myself), if such a power resided in me, I should, without doubt, be conscious of it; but I am conscious of no such power, and thereby I manifestly know that I am dependent upon some being different from myself.

32．所以，现在我必须问我自己，我是否具有什么能力，使现在存在的我将来依然存在。因为，既然我无非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或者至少既然一直到现在严格说来问题还只在于我自己的这一部分），那么如果这样的一种力量存在我心里，我一定会时刻想到它并且对它有所认识。可是，在我心里一点都没有这样的东西，因此我明显地认识到我依存于一个和我不同的某个存在体。

33．But perhaps the being upon whom I am dependent is not God, and I have been produced either by my parents, or by some causes less perfect than Deity. This cannot be: for, as I before said, it is perfectly evident that there must at least be as much reality in the cause as in its effect; and accordingly, since I am a thinking thing and possess in myself an idea of God, whatever in the end be the cause of my existence, it must of necessity be admitted that it is likewise a thinking being, and that it possesses in itself the idea and all the perfections I attribute to Deity. Then it may again be inquired whether this cause owes its origin and existence to itself, or to some other cause. For if it be self-existent, it follows, from what I have before laid down, that this cause is God; for, since it possesses the perfection of self-existence, it must likewise, without doubt, have the power of actually possessing every perfection of which it has the idea—in other words, all the perfections I conceive

to belong to God. But if it owe its existence to another cause than itself, we demand again, for a similar reason, whether this second cause exists of itself or through some other, until, from stage to stage, we at length arrive at an ultimate cause, which will be God.

33．不过，也许我所依存的这个存在体并不是上帝，而我是由我的父母，或者不如上帝完美的其他什么原因创造的。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以前已经说过，很明显在原因里至少要有与结果里一样多的实在性。因此，既然我是一个在思想上、心里有上帝的观念的东西，所以不论到底什么是我存在的原因，必须承认它一定同样的是一个在思想的事物，而且本身具有上帝的观念，和我归之于上帝的一切完美性。然后可以重新追问这个原因的来源和存在是由于它本身呢，还是另有原因。因为如果是由于它本身，那么根据我以前说过的道理，这个原因一定是上帝，因为它有独立自存的完美性，那么无疑，它必然有能力拥有一切完美的观念（也就是说，我认为属于上帝的一切完美的观念）。如果它的存在是由于它本身以外的什么原因，那么可以根据同样的道理重新再问：这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它本身而存在的呢，还是透过其他的原因来的，由此一步步地，最终达到一个最后原因，即上帝。

34．And it is quite manifest that in this matter there can be no infinite regress of causes, seeing that the question raised respects not so much the cause which once produced me, as that by which I am at this present moment conserved.

34．很明显，在这上面再无穷无尽地追问下去是没有用的，因为这里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从前产生我的原因上，而在于现在保存我的原因上。

35 . Nor can it be supposed that several causes concurred in my production, and that from one I received the idea of one of the perfections I attribute to Deity, and from another the idea of some other, and thus that all those perfections are indeed found somewhere in the universe, but do not all exist together in a single being who is God; for, on the contrary, the unity, the simplicity, or inseparability of all the properties of Deity, is one of the chief perfections I conceive him to possess; and the idea of this unity of all the perfections of Deity could certainly not be put into my mind by any cause from which I did not likewise receive the ideas of all the other perfections; for no power could enable me to embrace them in an inseparable unity,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giving me the knowledge of what they were [and of their existence in a particular mode].

35．也不能假定也许我的产生是由很多原因共同造成的，我从这一个原因接受了我归之于上帝的那些完美观念，从另外一个原因中，接受了其他完美的观念，这样一来，宇宙里虽然有许多完美的观念，可是不能都结合在一起存在于一个唯一的地方，即上帝之中。因为恰恰相反，上帝所有的统一性、单纯性，和不可分性，是我在上帝那里所领会的主要的完满性之一；而上帝的一切完满性的各种统一的观念一定不可能是由任何一个原因（由于这个原因，我同时也接受了其他一切完满性的观念）放在我心里的。因为，如果这个原因不让我同时知道它们是什么，不让我［以某种方式］认识它们的存在，它就不能让我把它们理解为不可分的统一体。

36 . Finally, with regard to my parents [from whom it appears I sprung], although all that I believed respecting them be true, it does not, nevertheless, follow that I am conserved by them, or even that I was produced by them, in so far as I am a thinking being. All

that, at the most, they contributed to my origin was the giving of certain dispositions (modifications) to the matter in which I have hitherto judged that I or my mind, which is what alone I now consider to be myself, is inclosed; and thus there can here be no difficulty with respect to them, and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conclude from this alone that I am, and possess the idea of a being absolutely perfect, that is, of God, that his existence is most clearly demonstrated.

36．最后说到我的父母，［好像我是源自于他们，］虽然我认为有关他们的事物都是真实的，可这并不等于是他们保存了我，也不等于说是他们造就了我这个有思想的东西。关于我的起源，他们也只能在我或灵魂（我现在只认为灵魂是属于我的）里根植了一些特性；所以关于他们，在这里是毫无问题的；可是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单从我存在和我心里有一个至上完美的存在体（也就是说上帝）的观念这个事实，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37．There remains only the inquiry as to the way in which I received this idea from God; for I have not drawn it from the senses, nor is it even presented to me unexpectedly, as is usual with the ideas of sensible objects, when these are presented or appear to be presented to the external organs of the senses; it is not even a pure production or fiction of my mind, for it is not in my power to take from or add to it; and consequently there but remains the alternative that it is innate, in the same way as is the idea of myself.

37．现在所剩下的，只是要探究：我是用什么方法取得了这个观念的。因为我不是通过感官获得此观念的，而且它也不是意外地呈现出来的，就像可感知的事物呈现于外在的感觉器官时，我们所获得的

观念那样。它也不是纯粹由我的灵魂产生或虚构出来的，因为我没有能力在上面加减任何东西。因此只剩下一种说法，它是天生的，正如我的观念一样是与生俱来的。

38 . And, in truth, it is not to be wondered at that God, at my creation, implanted this idea in me, that it might serve, as it were, for the mark of the workman impressed on his work; and it is not also necessary that the mark should be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work itself; but considering only that God is my creator, it is highly probable that he in some way fashioned me after his own image and likeness, and that I perceive this likeness, in which is contained the idea of God, by the same faculty by which I apprehend myself, in other words, when I make myself the object of reflection, I not only find that I am an incomplete, [imperfect] and dependent being, and one who unceasingly aspires after something better and greater than he is; but, at the same time, I am assured likewise that he upon whom I am dependent possesses in himself all the goods after which I aspire [and the ideas of which I find in my mind], and that not merely indefinitely and potentially, but infinitely and actually, and that he is thus God. And the whole force of the argument of which I have here availed myself to establish the existence of God, consists in this, that I perceive I could not possibly be of such a nature as I am, and yet have in my mind the idea of a God, if God did not in reality exist—this same God, I say, whose idea is in my mind—that is, a being who possesses all those lofty perfections, of which the mind may have some slight conception, without, however, being able fully to comprehend them, and who is wholly superior to all defect [and has nothing that marks imperfection]: whence it is sufficiently manifest that he cannot be a deceiver, since it is a dictate of the natural light that all fraud and deception spring from some defect.

38．实际上，我们不必惊奇，上帝在创造我的时候，为何把这个观念置于我灵魂中，如同工匠在他的作品上印下标记一样；这个标记也不必一定和这个作品有所不同。因为单就上帝创造我这一事实来说，非常可信的是，上帝创造我有几分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的，我能借着了解我自己的能力来理解这个形象（它包含有上帝的观念），也就是说，当我进行反省的时候，我不仅认识到我是一个不完美的［有缺点的］事物，而且要依存于别人，时刻追求一个更完美、更伟大的事物，而且我同时也认识到，我所依存的那个别人，他本身具有我所希求的［和我所知道的］一切美善和伟大的事物，而且他不是不确定地、潜在地，而是实际地、现实地、无限地具有这些东西，因此，他就是上帝。总之，我在这里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论据，它的全部效果就在于我认识到，假如上帝真不存在，我的本性就不可能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我不可能有一个上帝的观念；我再说一遍，恰恰是这个上帝，我在我的心里有其观念，也就是说，他具有所有这些高尚的完满性，对于这些完满性我们心里尽管有什么轻微的观念，却不能全部理解。［他不可能有任何缺点；］凡是标志着什么不完满性的东西，他都没有。这就足以明显地说明他不可能是骗子，因为自然的光明告诉我们，欺骗必然是由于什么缺点而来的。

39．But before I examine this with more attention, and pass on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other truths that may be evolved out of it, I think it proper to remain here for some time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God himself—that I may ponder at leisure his marvelous attributes—and behold, admire, and adore the beauty of this light so unspeakably great, as far, at least, as the strength of my mind, which is to some degree dazzled by the sight, will permit. For just as we learn by faith that the supreme felicity of another life consists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Divine majesty alone, so even now we learn from experience that a like meditation, though incomparably less perfect, is the source of the highest satisfaction of which we are

susceptible in this life.

39．不过，在我更仔细地检查这件事情，并对人们从其中得出的其他真理进行考虑之前，我认为最好是稍微停顿一下，以便深思这个完满无缺的上帝——可以从容不迫地衡量一下他的美妙的属性——并且至少尽我最大的力量，去深思、赞美、崇爱这个光辉的无与伦比的美，这种美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眩晕的，也是可以让人接受的。因为，信仰告诉我们，来世的至高无上的全福，就在于对上帝的这种深思之中，这样，我们从经验知道，同样的沉思，虽然比起来不太完美，却使我们感受到我们在此世所能感受的最大满足。

Meditation IV　OF TRUTH AND ERROR.

沉思四　论真理与谬误

1 . I have been habituated these bygone days to detach my mind from the senses, and I have accurately observed that there is exceedingly little which is known with certainty respecting corporeal objects, that we know much more of the human mind, and still more of God himself. I am thus able now without difficulty to abstract my mind from the contemplation of [sensible or] imaginable objects, and apply it to those which, as disengaged from all matter, are purely intelligible. And certainly the idea I have of the human mind in so far as it is a thinking thing, and not extended in length, breadth, and depth, and participating in none of the properties of body, is incomparably more distinct than the idea of any corporeal object; and when I consider that I doubt, in other words, that I am an incomplete and dependent being, the idea of a complete and independent being, that is to say of God, occurs to my mind with so much clearness and distinctness, and from the fact alone that this idea is found in me, or that I who possess it exist, the conclusions that God exists, and that my own existence, each moment of its continuance, is absolutely dependent upon him, are so manifest, as to lead me to believe it impossible that the human mind can know anything with more clearness and certitude. And now I seem to discover a path that will conduct us from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true God, in whom are contained all the treasures of science and wisdom,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other things in the universe.

1．过去的几天，我已经习惯于从感官里将我的灵魂解脱出来，我精确地察觉到，对于有形事物，我们确切知晓的太少了，但在人的灵魂方面，认识的就比较多，而关于上帝，我们所知的远远要超过前面两者。因此，我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的心思，从考虑［可感觉或］可想象的事物上，转到完全脱离物质、纯粹精神的事物上去。当然，我目前将灵魂看作是一个思想物，没有长、宽、高的广延，也没有物体的任何性质，那么我的这个观念，相对而言比任何有形事物的观念更清晰。当我考虑到我是会怀疑的，也就是说，我是个不完美、有依赖性的事物时，我心里就十分清楚明白地出现一个完美且不依存于别人的存在体的观念，也就是上帝的观念；既然这个观念存在于我心里，具有这个观念的我又是存在的，我就得出结论，上帝是存在的，而我的存在，在我的生命的每一时刻都完全依存于他。这个结论是如此地明显，以至于我不认为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明确、更可靠地为人的灵魂所认识的了。因此，我似乎觉得已经发现了一条坦途，引领我们从深思真实的上帝（它包含着科学和智慧的全部宝藏），进而认识宇宙间的其他事物。

2．For, in the first place, I discover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him ever to deceive me, for in all fraud and deceit there is a certain imperfection: and although it may seem that the ability to deceive is a mark of subtlety or power, yet the will testifies without doubt of malice and weakness; and such, accordingly, cannot be found in God.

2．因为，我发现首先他不可能骗我，这是由于凡是欺骗，都含有某种不完美性；即使能够骗人好像也是一种机智和能力的标志，不过，想要骗人却无疑地证明是一种缺陷或恶意。因此，上帝是不可能骗人的。

3 . In the next place, I am conscious that I possess a certain faculty of judging [or discerning truth from error], which I doubtless received from God, along with whatever else is mine; and since it is impossible that he should will to deceive me, it is likewise certain that he has not given me a faculty that will ever lead me into error, provided I use it aright.

3 . 其次，我意识到自己具有一种判断能力［或分辨真伪的能力］，并深信这种能力和我所具有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无疑是从上帝那里接受过来的；而且，因为他没有骗我的意愿，所以，毫无疑问，他所赋予我的能力，若运用得宜，是决不会使我犯错的。

4 . And there would remain no doubt on this head, did it not seem to follow from this, that I can never therefore be deceived; for if all I possess be from God, and if he planted in me no faculty that is deceitful, it seems to follow that I can never fall into error. Accordingly, it is true that when I think only of God (when I look upon myself as coming from God, Fr.), and turn wholly to him, I discover [in myself] no cause of error or falsity: but immediately thereafter, recurring to myself, experience assures me that I am nevertheless subject to innumerable errors. When I come to inquire into the cause of these, I observe that there is not only present to my consciousness a real and positive idea of God, or of a being supremely perfect, but also, so to speak, a certain negative idea of nothing, in other words, of that which is at an infinite distance from every sort of perfection, and that I am, as it were, a mean between God and nothing, or placed in such a way between absolute existence and non-existence, that there is in truth nothing in me to lead me into error, in so far as an absolute being is my creator; but that, on the other hand, as I thus likewise participate in some

degree of nothing or of nonbeing, in other words, as I am not myself the supreme Being, and as I am wanting in many perfections, it is not surprising I should fall into error. And I hence discern that error, so far as error is not something real, which depends for its existence on God, but is simply defect; and therefore that, in order to fall into it, it is not necessary God should have given me a faculty expressly for this end, but that my being deceived arises from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 power which God has given me of discerning truth from error is not infinite.

4．关于此事，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可以据此推断，我是从不会被欺骗的；因为，如果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如果他没有赋予我上当受骗的功能，那么就应该说，我决不会陷入错误旋涡。事实上，当我只想着上帝（以为我是从上帝那儿来的），且完全转向他时，我［在心里］并没发现任何产生错误或虚假的原因；可是，紧接着，当我反省自身时，经验告诉我，我仍然会陷入种种错误之中。在仔细追寻这些错误的原因时，我注意到在我心中，不仅有一个真实而积极的上帝观念，或者一个至上完美的存在体的观念，同时，姑且这样说，也出现一个虚无的消极观念，也就是说，与其他各种完美性完全相反的观念；而我好像就是介乎上帝与虚无之间，也就是说，我处于“绝对存在”和“虚无存在”之间。因此，就一个“绝对存在”创造我而言，在我心里确实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导致我犯错；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我把我看成某种程度上的虚无或不存在，换言之，由于我自己并不是至上存在体，处于一种事事都渴望完美的状态中，因此我会犯错，自然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我认识到，错误——就其依赖上帝而存在来说，并非什么实在的东西，而仅仅是一种缺陷。从而对于犯错误来说，不需要上帝专门为这个目的而给我什么能力，而我所以有时犯错，是因为上帝赋予我分辨真伪的能力并不是无穷无尽的。

5．Nevertheless this is not yet quite satisfactory; for error is

not a pure negation, [in other words, it is not the simple deficiency or want of some knowledge which is not due], but the privation or want of some knowledge which it would seem I ought to possess. But, on considering the nature of God, it seems impossible that he should have planted in his creature any faculty not perfect in its kind, that is, wanting in some perfection due to it: for if it be true, that in proportion to the skill of the maker the perfection of his work is greater, what thing can have been produced by the suprem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that is not absolutely perfect in all its parts? And assuredly there is no doubt that God could have created me such as that I should never be deceived; it is certain, likewise, that he always wills what is best: is it better, then, that I should be capable of being deceived than that I should not?

5．虽然如此，这种说法不能令我十分满意；因为，错误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否定［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缺失或者缺少一些不必要的知识］，而是缺失一些似乎我应该具有的某种认识。然而，在探究上帝的本性时，我认为，倘若上帝给了我某种不完满的，也就是说，缺少什么必不可少的完满性的功能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作品的完美，既然与工匠作品的完满度和技巧成正比，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由一切事物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所产生的东西，有哪一种不是各个部分都绝对完美精巧的呢？很明显地，毫无疑问，上帝本可以创造一个永不受骗的我；同样可以确信的是，他也总是力求尽善尽美。那么，我能受骗岂不是比我不受骗要好多了？

6．Considering this more attentively the first thing that occurs to me is the reflection that I must not be surprised if I am not always capable of comprehending the reasons why God acts as he does; nor must I doubt of his existence because I find, perhaps, that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things besides the present respecting which I

understand neither why nor how they were created by him; for, knowing already that my nature is extremely weak and limited, and that the nature of God, on the other hand, is immense, incomprehensible, and infinite, I have no longer any difficulty in discerning that there is an infinity of things in his power whose causes transcend the grasp of my mind: and this consideration alone is sufficient to convince me, that the whole class of final causes is of no avail in physical [or natural] things; for it appears to me that I cannot, without exposing myself to the charge of temerity, seek to discover the [impenetrable] ends of Deity.

6．在深思熟虑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纵然我不能常常了解上帝的作为，我倒也不必为此感到奇怪，也不必怀疑上帝的存在，因为我发现，也许存在着许多其他事物，我还不了解上帝为何要创造他们以及如何创造他们。因为，我早已经知道了我的本性是极其软弱，极其有限的，相反，上帝的本性是深不可测、无穷无尽的，我很容易就看出他的潜能里有无穷无尽的东西，这些东西的起因超出了我的认知能力。单是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我相信：一切的最终成因都无助于解释物理界的［或自然界的］事物。因为，妄想去探求和打算发现上帝的［那些深不可测的］目的，我觉得那简直是狂妄和愚不可及的。

7．It further occurs to me that we must not consider only one creature apart from the others, if we wish to determine the perfection of the works of Deity, but generally all his creatures together; for the same object that might perhaps, with some show of reason, be deemed highly imperfect if it were alone in the world, may for all that be the most perfect possible, considered as forming part of the whole universe: and although, as it was my purpose to doubt of everything, I only as yet know with certainty my own existence and that of God, nevertheless, after having remarked the

infinite power of Deity, I cannot deny that we may have produced many other objects, or at least that he is able to produce them, so that I may occupy a place in the relation of a part to the great whole of his creatures.

7．其次，我还发现，当我们想探求上帝的作品是否完美时，不应该排除其他事物来单独考虑某一事物，而应该把所有的造物总体合起来看。因为，只单独观察某一件事物，可能会把它当作是不完美的，可是，如果把它看成是这个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它的本性上就是非常完满的。而且，虽然我的目的在于怀疑一切事物，但我仅仅肯定地认识了我的存在和上帝的存在；另外自从我认出了上帝的无限潜能以来，就不能否认我们本来可以产生其他很多事物，或者至少它有创造他们的能力，因而我所处的地位，也许正如全宇宙中的某个部分一样。

8．Whereupon, regarding myself more closely, and considering what my errors are (which alone testify to the existence of imperfection in me), I observe that these depend on the concurrence of two causes, viz, the faculty of cognition, which I possess, and that of election or the power of free choice, —in other words,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will. For by the understanding alone, I [neither affirm nor deny anything but] merely apprehend (percipio) the ideas regarding which I may form a judgment; nor is any error, properly so called, found in it thus accurately taken. And although there are perhaps innumerable objects in the world of which I have no idea in my understanding, it cannot, on that account be said that I am deprived of those ideas [as of something that is due to my nature], but simply that I do not possess them, because, in truth, there is no ground to prove that Deity ought to have endowed me with a larger faculty of cognition than he has

actually bestowed upon me; and however skillful a workman I suppose him to be, I have no reason, on that account, to think that it was obligatory on him to give to each of his works all the perfections he is able to bestow upon some. Nor, moreover, can I complain that God has not given me freedom of choice, or a will sufficiently ample and perfect, since, in truth, I am conscious of will so ample and extended as to be superior to all limits. And what appears to me here to be highly remarkable is that, of all the other properties I possess, there is none so great and perfect as that I do not clearly discern it could be still greater and more perfect. For, to take an example, if I consider the faculty of understanding which I possess, I find that it is of very small extent, and greatly limited, and at the same time I form the idea of another faculty of the same nature, much more ample and even infinite, and seeing that I can frame the idea of it, I discover, from this circumstance alone, that it pertains to the nature of God. In the same way, if I examine the faculty of memory or imagination, or any other faculty I possess, I find none that is not small and circumscribed, and in God immense [and infinite]. It is the faculty of will only, or freedom of choice, which I experience to be so great that I am unable to conceive the idea of another that shall be more ample and extended; so that it is chiefly my will which leads me to discern that I bear a certain image and similitude of Deity. For although the faculty of will is incomparably greater in God than in myself, as well in respect of the knowledge and power that are conjoined with it, and that render it stronger and more efficacious, as in respect of the object, since in him it extends to a greater number of things, it does not, nevertheless, appear to me greater, considered in itself formally and precisely: for the power of will consists only in this, that we are able to do or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that is, to affirm or deny, to pursue or shun it), or rather in this alone, that in affirming or denying, pursuing or shunning, what is proposed to us by the

understanding, we so act that we are not conscious of being determined to a particular action by any external force. For, to the possession of freedom,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I be alike indifferent toward each of two contraries; but, on the contrary, the more I am inclined toward the one, whether because I clearly know that in it there is the reason of truth and goodness, or because God thus internally disposes my thought, the more freely do I choose and embrace it; and assuredly divine grace and natural knowledge, very far from diminishing liberty, rather augment and fortify it. But the indifference of which I am conscious when I am not impelled to one side rather than to another for want of a reason, is the lowest grade of liberty, and manifests defect or negation of knowledge rather than perfection of will; for if I always clearly knew what was true and good, I should never have any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what judgment I ought to come to, and what choice I ought to make, and I should thus be entirely free without ever being indifferent.

8．此后，我更进一步探究自身，并且考虑一下哪些是我的错误（只有这些错误才证明我不完满），我发现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我拥有的认知功能，二是选择能力或自由意识，也就是说，我的理解和意志。因为单凭理解，我［并没有肯定或否定任何事物］仅仅是领会我所能领会的东西的观念，这些观念是我能够加以判断的。严格来说，理解中也无所谓错误。而且，虽然在世界上也许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是我无法理解的，却不能因此就说我缺少这些观念［好像它们是我的本性所该有的一样］，而仅仅是我没有掌握那些观念；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证明，上帝赋予我的认识能力，应该比实际所赋予的还要大；并且不管我把它想象成是多么精巧熟练的工匠，也不应该因此就认为，他应该把所赋予某些造物的完美性，完全赋予一个造物。我也不能埋怨上帝没有给我自由选择权，或充足而完美的意志，因为事实上，我意识到这个选择的自由或意志是非常大、非常广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而且我觉得在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心里

的其他一切东西里，没有一个能再比它更大、更完满的了。举例来说，在探究自己所具有的理解功能时，我认为它的范围很狭小，很有限。而同时，我提供另外一个功能的观念，这个观念要广阔得多，甚至是无限的；仅仅从这一事实，我就可以认识到这个观念是属于上帝本性的。如果我用同样方式检查记忆或者想象，或者检查其他任何我具有的功能，我发现它们都是渺小而受限制的，只有在上帝身上才是广大［而无限］的。我体验到，在我身上只有意志功能或自由选择权，是最广大、最不受限制的，以至于不能设想另一个更广大而无限的意志观念。因此，只有我的意志，能令我领悟到自己与上帝有某种相似的地方。因为，虽然上帝的意志比我自身的要大得多得多，不论是在认识和能力方面（因为认识和能力在意志里结合到一起使意志更有力量，更有实效），或者是在事物方面（因为意志无限地扩展到更多的东西上），如果我形式化地、恰如其分地对意志本身加以考虑的话，那么我就觉得它就不会更大。因为它仅仅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做同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肯定它或否定它，追逐它或逃避它），或者不如说，它仅仅在于为了确认或否认、追逐或逃避理智向我们提供的东西，我们只是自由行动，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外在的力量驱使我们似的。因为，为了拥有自由，我没有必要在相反的两个东西之间选择其一时，抱无所谓的态度；而是，我越是倾向于其中一个（无论是由于我明显地认识在那里有善和真，或者由于上帝内在地支配了我的思想），我选择时就越自由，并且接受这一个；而且，上帝的恩宠和自然的知识远没有减少我的自由，而是扩大和加强了我的自由。因此，当我由于没有任何理由迫使我倾向于这一边而不倾向于那一边时，我所感觉到的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不过是最低程度的自由。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与其说是在意志里表现出一种完满性，不如说是一种知识的欠缺或是对知识的否定。因为，如果我总是清清楚楚地认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善，就决不会费事去掂算我到底应该得出什么样的判断和选择了。这样我就会完全自由，决不会抱无所谓的态度。

9．From all this I discover, however, that neither the power of willing, which I have received from God, is of itself the source of

my errors, for it is exceedingly ample and perfect in its kind; nor even the power of understanding, for as I conceive no object unless by means of the faculty that God bestowed upon me, all that I conceive is doubtless rightly conceived by me, 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be deceived in it. Whence, then, spring my errors? They arise from this cause alone, that I do not restrain the will, which is of much wider range than the understanding, within the same limits, but extend it even to things I do not understand, and as the will is of itself indifferent to such, it readily falls into error and sin by choosing the false in room of the true, and evil instead of good.

9．不过，从所有这一切，我发现我的错误并非来源于意愿的力量（它是我从上帝那里得来的），因为其本身是非常广泛而完美的；至于理解力，亦非我错误的来源，因为我所理解其他的任何事物，都只能凭借上帝赋予我的能力，因此，毫无疑问，凡是我所领会的，都是实事求是地去领会，绝不可能在这个上面受骗。那么我的错误从何而来呢？究其原因都由此出：虽然意志比理解力的范围更广，但我没有把意志限制在理解力的范围之内，反而把它扩展到我所不理解的东西上去了。既然意志本身对这些东西是无所谓的，于是就很容易把恶当成善，把假当作真，结果陷入错误和犯罪的漩涡。

10．For example, when I lately considered whether aught really existed in the world, and found that because I considered this question, it very manifestly followed that I myself existed, I could not but judge that what I so clearly conceived was true, not that I was forced to this judgment by any external cause, but simply because great clearn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was succeeded by strong inclination in the will; and I believed this the more freely and spontaneously in proportion as I was less indifferent with respect to it. But now I not only know that I exist, in so far as I am a

thinking being, but there is likewise presented to my mind a certain idea of corporeal nature; hence I am in doubt as to whether the thinking nature which is in me, or rather which I myself am, is different from that corporeal nature, or whether both are merely one and the same thing, and I here suppose that I am as yet ignorant of any reason that would determine me to adopt the one belief in preference to the other; whence it happens that it is a matter of perfect indifference to me which of the two suppositions I affirm or deny, or whether I form any judgment at all in the matter.

10．举例来说，最近我探究了世上是否确有事物存在，并且发现由于我探究了这一问题，我自己是存在的也就不言自明了。于是我就不得不作这样的判断，即我所能清楚领会的都是真实的，并非由于外在任何原因强迫我，而是因为在我意志中强烈的倾向性造成了清晰明白的理解；并且我越是示以好感，就越能自由和自发地去相信。不过，我认识到自己存在，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思想物，而且因为我心中还有一个物质本性的观念。因此，我怀疑我的能思考的本性（即“我”）与这个物质的本性，究竟是相同还是相异，或者二者是否为同一个东西。我在此假设，至今还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使我倾向于其中的某一猜测。因此，肯定或否认它们，或者甚至不作任何判断，对我而言都没有什么大碍。

11．This indifference, moreover, extends not only to things of which the understanding has no knowledge at all, but in general also to all those which it does not discover with perfect clearness at the moment the will is deliberating upon them; for, however probable the conjectures may be that dispose me to form a judgment in a particular matter, the simple knowledge that these are merely conjectures, and not certain and indubitable reasons, is sufficient to lead me to form one that is directly the opposite. Of

this I lately had abundant experience, when I laid aside as false all that I had before held for true, on the single ground that I could in some degree doubt of it.

11．这种不在乎，不仅扩展到理解力绝对认识不到的事物上去，而且一般而言，意志在审议或选择各种事物时，理解力若无法完全明白地通晓他们，这种不在乎也会发生作用。因为，当我判断什么事情时，不管我所采取的猜测的可能性有多大，只要我知道这纯然是猜测，不是确定不移的理由，就足以给我机会去作出相反的判断。有关这一点，我最近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正如我只要认为各种事物稍有可疑之处，就会把以前当作非常真实的事物都加以否定。

12．But if I abstain from judging of a thing when I do not conceive it with sufficient clearness and distinctness, it is plain that I act rightly, and am not deceived; but if I resolve to deny or affirm, I then do not make a right use of my free will; and if I affirm what is false, it is evident that I am deceived; moreover, even although I judge according to truth, I stumble upon it by chance, and do not therefore escape the imputation of a wrong use of my freedom; for it is a dictate of the natural light, that the knowledge of the understanding ought always to preced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will. And it is this wrong use of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in which is found the privation that constitutes the form of error. Privation, I say, is found in the act, in so far as it proceeds from myself, but it does not exist in the faculty which I received from God, nor even in the act, in so far as it depends on him.

12．可是，如果对于我没有领会得足够清楚、明白的事情，我就不去妄下判断，那么显然我是正确的，而且我不会受骗。可是如果我

决定去否定或肯定它，那么我就没有正确地运用自由意志；如果我肯定了假的东西，那么显然我是受骗了。即使我根据真理判断，这也不过是碰巧罢了，我仍然难逃错误使用我的自由意志的指责。因为，自然之光告诉我们，理解的认识必须永远先于意志的决定。因此，正是这种对自由意志的误用，才构成了错误的形式。在我看来，缺失存在于行为中，因为行为是我发出的，而不存在于上帝赋予我的官能中，甚至也不存在于来自上帝的行为中。

13 . For I have assuredly no reason to complain that God has not given me a greater power of intelligence or more perfect natural light than he has actually bestowed, since it is of the nature of a finite understanding not to comprehend many things, and of the nature of a created understanding to be finite; on the contrary, I have every reason to render thanks to God, who owed me nothing, for having given me all the perfections I possess, and I should be far from thinking that he has unjustly deprived me of, or kept back, the other perfections which he has not bestowed upon me.

13 . 因为，我确实没有任何理由埋怨，上帝赋予我的智慧为什么没有更多一些，所赋予的自然之光为什么不更完美一些。因为有限理解力的本性，本来就不能了解许多事物，而一个被创造的理解力又必然是有限的。但是我有一切理由感谢他，因为他从来没有欠过我什么，却给了我所拥有的一切完美。所以我不该妄自认为他不公正地剥夺或抑制了不曾给予我的其他的完美性。

14 . I have no reason, moreover, to complain because he has given me a will more ample than my understanding, since, as the will consists only of a single element, and that indivisible, it would appear that this faculty is of such a nature that nothing could be

taken from it [without destroying it]; and certainly, the more extensive it is, the more cause I have to thank the goodness of him who bestowed it upon me.

14．而且，我也没有理由埋怨他给了我一个比理智更广大的意志。因为意志只包含一个单一元素，并且是不可分割的，它的本性看来是这样的，不管从它身上拿掉了什么都会把它毁灭。而且，当然，它扩展得越广，我就越要感谢上帝赋予我的善意。

15．And, finally, I ought not also to complain that God concurs with me in forming the acts of this will, or the judgments in which I am deceived, because those acts are wholly true and good, in so far as they depend on God; and the ability to form them is a higher degree of perfection in my nature than the want of it would be. With regard to privation, in which alone consists the formal reason of error and sin, this does not require the concurrence of Deity, because it is not a thing [or existence], and if it be referred to God as to its cause, it ought not to be called privation, but negation [according to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se words in the schools]. For in truth it is no imperfection in Deity that he has accorded to me the power of giving or withholding my assent from certain things of which he has not put a clear and distinct knowledge in my understanding; but it is doubtless an imperfection in me that I do not use my freedom aright, and readily give my judgment on matters which I only obscurely and confusedly conceive. I perceive, nevertheless, that it was easy for Deity so to have constituted me as that I should never be deceived, although I still remained free and possessed of a limited knowledge, viz., by implanting in my understanding a clear and distinct knowledge of all the objects respecting which I should ever have to deliberate; or simply by so

deeply engraving on my memory the resolution to judge of nothing without previously possessing a clear and distinct conception of it, that I should never forget it. And I easily understand that, in so far as I consider myself as a single whole, without reference to any other being in the universe, I should have been much more perfect than I now am, had Deity created me superior to error; but I cannot therefore deny that it is not somehow a greater perfection in the universe, that certain of its parts are not exempt from defect, as others are, than if they were all perfectly alike. And I have no right to complain because God, who placed me in the world, was not willing that I should sustain that character which of all others is the chief and most perfect.

15．最后，我也不应该埋怨上帝为帮助我的这个意志所采取的行为，也就是说我弄错了的那些判断，因为这些行为既然是取决于上帝的，那么就是完全真实的、绝对善良的；在某种意义上，我能够做成这些行为比我不能做成这些行为，在我的本性上有着更多的完满性。至于缺失，虽然它只是构成错误和罪恶的形式依据，但是这并不要求上帝参与其间，因为缺失并不是一种事物［或存在］。而且假如把缺失的原因归诸于上帝，那么它就不应该叫做缺失，而应该［按照经院学派所给的字义］叫否定。因为事实上，上帝会给出一些我的理解力所无法明白和无法清晰知道的事物，对于这些事物他又会赋予我一些能力去否定或肯定它们，可是这绝非上帝的不完美；相反，如果我不能正确地运用自己的自由，又对模糊不清的事物轻易作判断，那才毫无疑问是一种不完美。不过，我看得出，虽然我仍然是自由的，并且具有有限的认识，但是上帝也很容易把我构造得免于犯错和受骗，因为他可以使我明白而清晰地理解我所思考的各种对象，或干脆使我牢牢记着永不忘记：在对一个事物没有明白而清晰的概念之前，不要妄作判断。而且我容易看出来，如果我把我自己看成是独一无二的，与世界上其他事物毫不相干，并且上帝把我造得永不犯错，那么我就会比我现在完满得多。可是我不能因此就否认在某种意义上，宇宙万物

参差不齐，有些能免于错误，有些则不能，那正是宇宙之所以完美的原因，而且还总比万物完全千篇一律更为完美。此外，我也无权抱怨说，上帝既然把我安置在世界里，为什么又不愿使我具有在其他一切事物中都是最重要、最完美的特质。

16．I have even good reason to remain satisfied on the ground that, if he has not given me the perfection of being superior to error by the first means I have pointed out above, which depends on a clear and evident knowledge of all the matters regarding which I can deliberate, he has at least left in my power the other means, which is, firmly to retain the resolution never to judge where the truth is not clearly known to me: for, although I am conscious of the weakness of not being able to keep my mind continually fixed on the same thought, I can nevertheless, by attentive and oft-repeated meditation, impress it so strongly on my memory that I shall never fail to recollect it as often as I require it, and I can acquire in this way the habitude of not erring.

16．甚至我有理由满意：即使他不曾赋予我前面提到的免于犯错的完美特质，使我对于自己所思维的事物，得到明白而清晰的知识，可是他至少还使我有其他能力牢牢记得，在未确实知道真相时，绝不要作出判断。因为，虽然我看到在我的本性中的这种缺陷，即我不能连续地将注意力集中到同一个思想上，可是我能够通过一种专注的并且反复的沉思，把它强烈地印到我的记忆中，使我每次在需要的时候都能想起它，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够养成不犯错误的习惯。

17．And since it is in being superior to error that the highest and chief perfection of man consists, I deem that I have not gained little by this day's meditation, in having discovered the source of

error and falsity. And certainly this can be no other than what I have now explained: for as often as I so restrain my will within the limits of my knowledge, that it forms no judgment except regarding objects which are clearly and distinctly represented to it by the understanding, I can never be deceived; because every clear and distinct conception is doubtless something, and as such cannot owe its origin to nothing, but must of necessity have God for its author—God, I say, who, as supremely perfect, cannot, without a contradiction, be the cause of any error; and consequently it is necessary to conclude that every such conception [or judgment] is true. Nor have I merely learned to-day what I must avoid to escape error, but also what I must do to arrive at the knowledge of truth; for I will assuredly reach truth if I only fix my attention sufficiently on all the things I conceive perfectly, and separate these from others which I conceive more confusedly and obscurely; to which for the future I shall give diligent heed.

17．而且，由于人的最大的、主要的完美性就在于此，我认为，从这些天的沉思里受益匪浅，因为我发现了虚假和错误的源泉。而且，当然除了我所解释的那个原因以外，再不能有其他原因了。因为只要我把我的意志限制在我的认识范围之内，除了理智给它清楚、明白地提供出来的那些事物之外，不对其他事物作出判断，我就不至于弄错；因为凡是我领会得清楚、明白的，都毫无疑问的是实在的、肯定的东西，因而它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必然有上帝作为它的创造者。在我看来上帝既然是至上完满的，就决不能是错误的原因；因此一定要断言：像这样一种领会［或者像这样一个判断］是真实的。此外，今天我不但知道了必须避免什么才能不犯错误，而且也知道了我必须做什么才能认识真理。因为，只要我把注意力充分集中于我领会得完满的事物上，并且把这些事物从其余的、我所理解得糊里糊涂的事物中分离出来，我当然就会认识真理。这就是我今后将要认真加以注意的。

Meditation V　OF THE ESSENCE OF MATERIAL THINGS; AND, AGAIN, OF GOD; THAT HE EXISTS.

沉思五　论物质性事物的本质；再论上帝之存在

1．Several other questions remain for consideration respecting the attributes of God and my own nature or mind. I will, however, on some other occasion perhaps resum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se. Meanwhile, as I have discovered what must be done and what avoided to arrive at the knowledge of truth, what I have chiefly to do is to essay to emerge from the state of doubt in which I have for some time been, and to discover whether anything can be known with certainty regarding material objects.

1．关于上帝的属性，以及我自己的本性或者说我自己的灵魂，我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探究。不过，也许我可以另寻机会来研究这些问题。同时，因为我已发现了必须去做什么或者必须避免做什么才能认识真理，所以目前我的首要任务是试图从我这段时间所陷入的怀疑状态中解脱出来，看看关于物质性的对象我们能否得到某些确切的认识。

2．But before considering whether such objects as I conceive exist without me, I must examine their ideas in so far as these are to be found in my consciousness, and discover which of them are distinct and which confused.

2．可是，在我思考我以外是否存在这样的对象之前，我必须先

考虑这些对象的观念，因为这些观念在我的意识中可以找到。我还必须要看看这些观念中哪些是清晰的，哪些是模糊的。

3．In the first place, I distinctly imagine that quantity which the philosophers commonly call continuous, or the extension in length, breadth, and depth that is in this quantity, or rather in the object to which it is attributed. Further, I can enumerate in it many diverse parts, and attribute to each of these all sorts of sizes, figures, situations, and local motions; and, in fine, I can assign to each of these motions all degrees of duration.

3．首先，我清晰地想到哲学家通常称为“连续性”的那种量，或者有长、宽、深的广延。此广延就是在这种量里，甚至可以说就在人们认为具有量的对象里。其次，我可以在这种量里举出许许多多不同的部分，并且在每一部分上加上各种体积、形状、位置和运动。最后我可以给每个运动分配各种不同的延续时间。

4．And I not only distinctly know these things when I thus consider them in general; but besides, by a little attention, I discover innumerable particulars respecting figures, numbers, motion, and the like, which are so evidently true, and so accordant with my nature, that when I now discover them I do not so much appear to learn anything new, as to call to remembrance what I before knew, or for the first time to remark what was before in my mind, but to which I had not hitherto directed my attention.

4．当我这样总体性地考虑这些东西时，我不仅清晰地认识了这些东西，而且，只要我稍加注意，还可以发现形状、数目、运动以及

诸如此类的无数特点，这些特点的真实性非常明显，而且与我的本性非常契合，以至于我现在发现我似乎并没有从它们那里学到什么新东西，而只是想起了我从前已经知道的东西，或者说好像第一次注意到早已在我心里，但是我以前没有重视的东西。

5．And what I here find of most importance is, that I discover in my mind innumerable ideas of certain objects, which cannot be esteemed pure negations, although perhaps they possess no reality beyond my thought, and which are not framed by me though it may be in my power to think, or not to think them, but possess true and immutable natures of their own. As, for example, when I imagine a triangle, although there is not perhaps and never was in any place in the universe apart from my thought one such figure, it remains true nevertheless that this figure possesses a certain determinate nature, form, or essence, which is immutable and eternal, and not framed by me, nor in any degree dependent on my thought; as appears from the circumstance, that diverse properties of the triangle may be demonstrated, viz, that its three angles are equal to two right, that its greatest side is subtended by its greatest angle, and the like, which, whether I will or not, I now clearly discern to belong to it, although before I did not at all think of them, when, for the first time, I imagined a triangle, and which accordingly cannot be said to have been invented by me.

5．此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在我心里有某些确切对象的无数观念，虽然这些对象也许在我的思想之外并非真实地存在，可是不能将它们视为纯粹的虚无；而且，虽然我可以以我的能力去思考它们或者不去思考它们，但它们并非我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有它们本身真实、不变的本性的。举例来说吧，当我想象一个三角形时，虽然远离我的思维之外也许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并且永远也不会有

什么地方存在这样一个形状，可是这个形状还是具有某种明确的性质、形式或本质。它是不变的、永恒的，不是我凭空捏造的，也决不取决于我的思想，就像我们能够证明这个三角形的各种特性这件事所表现的那样，即它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最大的边对着最大的角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尽管在我从前第一次想象一个三角形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过，可是现在，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非常清晰地看出这些特性属于三角形，因而不能说是我凭空捏造了这些特性。

6．Nor is it a valid objection to allege, that perhaps this idea of a triangle came into my mind by the medium of the senses, through my having. seen bodies of a triangular figure; for I am able to form in thought an innumerable variety of figures with regard to which it cannot be supposed that they were ever objects of sense, and I can nevertheless demonstrate diverse properties of their nature no less than of the triangle, all of which are assuredly true since I clearly conceive them: and they are therefore something, and not mere negations; for it is highly evident that all that is true is something, [truth being identical with existence]; and I have already fully shown the truth of the principle, that whatever is clearly and distinctly known is true. And although this had not been demonstrated, yet the nature of my mind is such as to compel me to assert to what I clearly conceive while I so conceive it; and I recollect that even when I still strongly adhered to the objects of sense, I reckoned among the number of the most certain truths those I clearly conceived relating to figures, numbers, and other matters that pertain to arithmetic and geometry, and in general to the pure mathematics.

6．也许有人会说，三角形的这个观念是通过感官进入我心里

的，因为我见过三角形的物体，不过这种说法不是有效的异议，因为我可以在我心里构建无数个不同图形，但我不能假设它们曾经是我的感官对象，不过这并不妨碍我能够证明它们的本性的各种特点，就像我也可以证明三角形的本性的各种特点一样。这些东西当然一定都是真的，因为我可以非常清楚地领悟它们，因而它们都是某种事物而并非纯粹的虚无；因为，显而易见，凡是真的都是某种真实［而且存在］的东西。我已经充分地证明过这个原则的真实性，即凡是我清晰、明确地认识的东西都是真的。即使我不曾证明这一点，灵魂的本性仍会迫使我承认我清楚地领悟到了。而且我记得，纵然我还在强烈地、执著地相信感官的对象时，我仍然把我清晰领悟到的有关形状、数目和其他属于算术、几何学及一般纯粹数学的东西列入最确定的真理之中。

7．But now if because I can draw from my thought the idea of an object, it follows that all I clearly and distinctly apprehend to pertain to this object, does in truth belong to it, may I not from this derive an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It is certain that I no less find the idea of a God in my consciousness, that is the idea of a being supremely perfect, than that of any figure or number whatever: and I know with not less clearness and distinctness that an [actual and] eternal existence pertains to his nature than that all which is demonstrable of any figure or number really belongs to the nature of that figure or number; and, therefore, although all the conclusions of the preceding Meditations were false, the existence of God would pass with me for a truth at least as certain as I ever judged any truth of mathematics to be.

7．但是，如果现在由于我能从我的思想中得出一个东西的观念，就推断说，凡是我清晰、明确地认识到属于这个对象的实际上都属于这个东西，那么难道我不可以由此得出上帝存在的证明吗？当

然，我在意识中觉察到了上帝的观念，也就是说，我的确找到了一个至上完美的存在体的观念，它并不比不论什么形状或什么数目的观念差。而且非常清晰而明确地知道，上帝的本质具有一种［现实的而且］永恒的存在性，其清楚、分明的程度并不比我可以证明的什么形状或任何数目真正属于那个形状或数目的本质的程度差。这样，即使所有在前几个沉思里所得的一切结论都是错的，上帝的存在也会在我心里至少会和我曾经判断的任何数学真理同样可靠。

8．Indeed such a doctrine may at first sight appear to contain more sophistry than truth. For, as I have been accustomed in every other matter to distinguish between existence and essence, I easily believe that the existence can be separated from the essence of God, and that thus God may be conceived as not actually existing. But, nevertheless, when I think of it more attentively, it appears that the existence can no more be separated from the essence of God, than the idea of a mountain from that of a valley, or the equality of its three angles to two right angles, from the essence of a [rectilinear] triangle; so that it is not less impossible to conceive a God, that is, a being supremely perfect, to whom existence is awanting, or who is devoid of a certain perfection, than to conceive a mountain without a valley.

8．的确，这样的理论乍看起来，似乎诡辩多于真理。因为，既然我已习惯于在其他一切事物中把存在和本质分开，我就很容易相信上帝的存在是可以同上帝的本质分开的，这样上帝就可以被领会为不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当我更仔细地思考上帝时，却发现上帝的存在决不能同上帝的本质分开，正如大山的观念不能同峡谷的观念分开一样，或者一个［直线］三角形的本质不能同它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分开一样。因此，领悟一个缺失存在性，或缺少某种完美性的上帝、或者说一个至上完美的存在体是不可能的，就好比我们无法领

悟一座没有山谷的大山。

9．But though, in truth, I cannot conceive a God unless as existing, any more than I can a mountain without a valley, yet, just as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re is any mountain in the world merely because I conceive a mountain with a valley, so likewise, though I conceive God as existing, it does not seem to follow on that account that God exists; for my thought imposes no necessity on things; and as I may imagine a winged horse, though there be none such, so I could perhaps attribute existence to God, though no God existed.

9．不过，虽然事实上我不能领悟一个不存在着的上帝，更不能领悟一个没有山谷的大山，然而，世界上不能仅仅因为我想象一个带有峡谷的大山，就有确实存在这座大山。同样，虽然我领悟存在着的上帝，但似乎并不能因此就说上帝存在。因为我的思想并不给事物强加任何必然性；而且，尽管并没有什么带翅膀的马，可是我却可以想象出来一个带翅膀的马。因此，尽管没有什么上帝存在，可是我也许能够给上帝加上存在性。

10．But the cases are not analogous, and a fallacy lurks under the semblance of this objection: for because I cannot conceive a mountain without a valley,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re is any mountain or valley in existence, but simply that the mountain or valley, whether they do or do not exist, are inseparable from each other; whereas,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I cannot conceive God unless as existing, it follows that existence is inseparable from him, and therefore that he really exists: not that this is brought about by my thought, or that it imposes any necessity on things, but, on the contrary, the necessity which lies in the thing itself, that is, the

necessity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determines me to think in this way: for it is not in my power to conceive a God without existence, that is, a being supremely perfect, and yet devoid of an absolute perfection, as I am free to imagine a horse with or without wings.

10．但是这两种情况并不相同，而且这个反驳的外表下潜藏着一个谬论。因为，我不能领悟一个不带山谷的山，并不能推理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山或山谷存在，而只能推断说，不管山和谷是确实存在，或是确实不存在，彼此都是不可分的；另一方面，由于我只有通过一个存在着的上帝才能想象它，因此我就推断说存在性和上帝是不可分的，继而推出上帝真的就存在。不过这并不是由我思想产生的，或者我的思想给事物强加任何必然性。恰恰相反，是因为事物本身的必然性，即上帝的存在的必然性，决定我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因为虽然我可以自由地想象一匹带翅膀或不带翅膀的马，但是我却不能领悟一个没有存在性的上帝，也就是说，我不能领悟一个至上完美、然而却缺少绝对完美的存在体。

11．Nor must it be alleged here as an objection, that it is in truth necessary to admit that God exists, after having supposed him to possess all perfections, since existence is one of them, but that my original supposition was not necessary; just as it is not necessary to think that all quadrilateral figures can be inscribed in the circle, since, if I supposed this, I should be constrained to admit that the rhombus, being a figure of four sides, can be therein inscribed, which, however, is manifestly false. This objection is, I say, incompetent; for although it may not be necessary that I shall at any time entertain the notion of Deity, yet each time I happen to think of a first and sovereign being, and to draw, so to speak, the idea of him from the storehouse of the mind, I am necessitated to attribute to him all kinds of perfections, though I may not then

enumerate them all, nor think of each of them in particular. And this necessity is sufficient, as soon as I discover that existence is a perfection, to cause me to infer the existence of this first and sovereign being; just as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I should ever imagine any triangle, but whenever I am desirous of considering a rectilinear figure composed of only three angles,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attribute those properties to it from which it is correctly inferred that its three angles are not greater than two right angles, although perhaps I may not then advert to this relation in particular. But when I consider what figures are capable of being inscribed in the circle, it is by no means necessary to hold that all quadrilateral figures are of this number; on the contrary, I cannot even imagine such to be the case, so long as I shall be unwilling to accept in thought aught that I do not clearly and distinctly conceive; and consequently there is a vast difference between false suppositions, as is the one in question, and the true ideas that were born with me, the first and chief of which is the idea of God. For indeed I discern on many grounds that this idea is not factitious depending simply on my thought, but that it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true and immutable nature: in the first place because I can conceive no other being, except God, to whose essence existence [necessarily] pertains; in the second,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to conceive two or more gods of this kind; and it being supposed that one such God exists, I clearly see that he must have existed from all eternity, and will exist to all eternity; and finally, because I apprehend many other properties in God, none of which I can either diminish or change.

11．也不应该在这里反驳说，我假设上帝具有一切的完美性之后，我就真得有必要承认上帝存在着，因为存在就是其完美性之一。但是，最初的假设并不是必要的。同样，正如我不必去思考所有四边

形都能内切于圆一样，如果我这样假设的话，我就不得不承认，菱形既然是四边形，那么菱形也能内切于圆。然而，这样的说法明显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个反驳无效，因为虽然我不必在任何时候都抱有上帝的观念，但是，每当我想到一个第一的、至高无上的存在体，并且从我灵魂的深处描绘（姑且这样说）他的观念时，虽然我不能把他所有的完美性都一一列举出来，而且也不会特别想到这些完美性之中的每一个方面，但是我必然要把所有种类的完美性都归之于他。这种必然性足以使我推断，只要我发现存在性是一种完美性，这个第一的、至高无上的存在体就是存在的。这正如我不必非得想象任何一个三角形不可；不过，每当我要考虑一个仅仅由三个角组成的直线形时，我就必须要认可三角形的那些特点，即可以正确地推断出三角形的三个角之和不大于两个直角之和，即使也许我当时没有特别考虑到这个关系。但是当我考虑什么形状能够内切于圆时，我无论如何也不必坚持所有四个边的形状都属于这个范围内；相反，只要我不愿意把我没有清晰而且明确领悟的任何东西接纳到我的思想中，我甚至无法想象这样的情况。因此，类似这种虚妄的假设和真实的观念存在云泥之别，在天生的真实观念中，第一个主要的观念就是上帝的观念。因为事实上我依据充分的理由看出来这个观念并非凭空捏造，只依赖我的思想，但它是一个真实、不变的本性的表象。首先，因为除了上帝以外我不能领悟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其存在［必然］属于其本质；其次，因为我不可能领悟两个或多个同他一样的上帝；而且既然假设有一个这样的上帝存在，我就清楚地明白，他以前必然是完全永恒地存在过，而且将来也会永恒地存在着；最后，因为我在上帝身上领悟了许多其他特性，而我不能减少，也不能改变其中任何一种特性。

12 . But, indeed, whatever mode of probation I in the end adopt, it always returns to this, that it is only the things I clearly and distinctly conceive which have the power of completely persuading me. And although, of the objects I conceive in this manner, some, indeed, are obvious to every one, while others are only discovered after close and careful investigation; nevertheless

after they are once discovered, the latter are not esteemed less certain than the former. Thus, for example, to take the case of a right-angled triangle, although it is not so manifest at first that the square of the base is equal to the squares of the other two sides, as that the base is opposite to the greatest angle; nevertheless, after it is once apprehended, we are as firmly persuaded of the truth of the former as of the latter. And, with respect to God if I were not pre-occupied by prejudices, and my thought beset on all sides by the continual presence of the images of sensible objects, I should know nothing sooner or more easily then the fact of his being. For is there any truth more clear than the existence of a Supreme Being, or of God, seeing it is to his essence alone that [necessary and eternal] existence pertains?

12．可是实际上，不论最终采纳什么证明方法，也总是回到这一点上来：只有我清晰、明确地领悟的东西才有力量使我完全信服。而且虽然我通过这种方式才领悟到这些，但事实上其中的某些部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而另外一些只有经过专心而仔细的探究之后才能被发现；不过，这些东西一经发现，人们便会认为它们比前者更靠得住。就以一个直角三角形为例吧，虽然起初不能明显看出底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个边的平方之和，因为只看到这个底边正对着最大的角。不过一旦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坚信二者同样都是真实的。说到上帝，如果我事先没有一点成见，而且我的思维没有让不断出现的可感知的对象的影像干扰，那么比起其他事物我应该最快也最容易地知道上帝存在的真相。因为，如果明白［必然而永恒的］存在只属于上帝的本质，难道还有什么真理比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体的存在，或者说上帝的存在更清晰吗？

13．And although the right conception of this truth has cost me much close thinking, nevertheless at present I feel not only as

assured of it as of what I deem most certain, but I remark further that the certitude of all other truths is so absolutely dependent on it that without this knowledge it is impossible ever to know anything perfectly.

13．虽然我花费了很多专注的思考，才恰当地领悟这个真理，可是现在我不但像相信最可靠的真理一样确实相信它，而且，我也注意到其他一切真理的可靠性都是绝对依存于它；如果没有这种认识就永远不可能完满地知道任何事物。

14．For although I am of such a nature as to be unable, while I possess a very clear and distinct apprehension of a matter, to resist the conviction of its truth, yet because my constitution is also such as to incapacitate me from keeping my mind continually fixed on the same object, and as I frequently recollect a past judgment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being able to recall the grounds of it, it may happen meanwhile that other reasons are presented to me which would readily cause me to change my opinion, if I did not know that God existed; and thus I should possess no true and certain knowledge, but merely vague and vacillating opinions. Thus, for example, when I consider the nature of the [rectilinear] triangle, it most clearly appears to me, who have been instructed in the principles of geometry, that its three angles are equal to two right angles, and I find it impossible to believe otherwise, while I apply my mind to the demonstration; but as soon as I cease from attending to the process of proof, although I still remember that I had a clear comprehension of it, yet I may readily come to doubt of the truth demonstrated, if I do not know that there is a God: for I may persuade myself that I have been so constituted by nature as to be sometimes deceived, even in matters which I think I apprehend

with the greatest evidence and certitude, especially when I recollect that I frequently considered many things to be true and certain which other reasons afterward constrained me to reckon as wholly false.

14．因为，一旦我对一个事物有非常清晰、明确的理解，我就无法拒绝它的真实性：这是我的本性使然。但是因为我灵魂不能总是持续地固定在一个相同的事物上，而且因为我经常想起过去的一个判断却同时又想不起这个判断的依据，因此，假如我不知道上帝的存在性，也许就会出现别的理由使我很容易改变看法。如此一来，我就不可能拥有真实、可靠的知识，而只能拥有模糊的、游移不定的见解。举例来说吧，当我考虑［直线］三角形的性质时，我这个熟知几何学的人显然非常清晰地知道，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直角之和，而且当我用心去证明的时候，我不可能不相信这一点；可是，只要我停止证明的过程，那么，虽然我仍然记得我清清楚楚地理解它，假如我不知道有一个上帝存在，我还是很可能会怀疑所证明的那个真理。因为我可以说服我自己：即使在我以为理解得最明显、最确定的事情上，我也不断地时常被本性所欺骗，尤其是因为我记得经常把很多事物认为是真实、确定的，可是后来却有别的理由使我不得不把这些事物判断成是完全虚假的。

15．But after I have discovered that God exists, seeing I also at the same time observed that all things depend on him, and that he is no deceiver, and thence inferred that all which I clearly and distinctly perceive is of necessity true: although I no longer attend to the grounds of a judgment, no opposite reason can be alleged sufficient to lead me to doubt of its truth, provided only I remember that I once possessed a clear and distinct comprehension of it. My knowledge of it thus becomes true and certain. And this same knowledge extends likewise to whatever I remember to have

formerly demonstrated, as the truths of geometry and the like: for what can be alleged against them to lead me to doubt of them? Will it be that my nature is such that I may be frequently deceived? But I already know that I cannot be deceived in judgments of the grounds of which I possess a clear knowledge. Will it be that I formerly deemed things to be true and certain which I afterward discovered to be false? But I had no clear and distinct knowledge of any of those things, and, being as yet ignorant of the rule by which I am assured of the truth of a judgment, I was led to give my assent to them on grounds which I afterward discovered were less strong than at the time I imagined them to be. What further objection, then, is there? Will it be said that perhaps I am dreaming (an objection I lately myself raised), or that all the thoughts of which I am now conscious have no more truth than the reveries of my dreams? But although, in truth, I should be dreaming, the rule still holds that all which is clearly presented to my intellect is indisputably true.

15．但是，在我发现上帝是存在的之后，同时我也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取决于他，而他并不是骗子，我就断定，我清晰、明确地领悟的一切事物必定都是真的。虽然我不再去想每个判断的根据是什么，但是，只要我记得我曾经清晰、明确地理解过它，就不能提出任何相反的理由引导我去怀疑它的真实性。这样，我对这个事物就有了真实、可靠的知识。这种知识也就扩展到我记得以前曾经证明过的一切事物中去，比如扩展到几何学的真理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因为，难道有什么说法可以反驳它们，使我去怀疑它们呢？我经常上当受骗难道是因为我的本性如此吗？但是我已经知道，我依据我清楚知道的那些理由下判断时，我是不会犯错受骗的。难道因为我从前认定是真实、可靠的东西，后来发现又是虚假的吗？对那些东西中的任何一个我都没有认识得清楚、明白，而且，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可以确定判断的真实性，因此我只好根据一些理由同意它们，可是后来我发

现，那些理由还不如我在想象它们时的那些理由更有说服力。那么，还有什么可反驳的理由吗？是因为也许我睡着了（就像我以前反驳过我自己的那样），或者是因为我现在意识到的所有思想和我睡梦中的幻觉一样不真实吗？可是实际上，即使我在做梦，规则仍然在发挥作用。这个规则就是，凡是明明白白出现在我心里的都是绝对真实的。

16．And thus I very clearly see that the certitude and truth of all science depends on the knowledge alone of the true God, insomuch that, before I knew him, I could have no perfect knowledge of any other thing. And now that I know him, I possess the means of acquiring a perfect knowledge respecting innumerable matters, as well relative to God himself and other intellectual objects as to corporeal nature, in so far as it is the object of pure mathematics [which do not consider whether it exists or not].

16．这样，我就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切学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都取决于对于真实的上帝这个唯一的认识，因而在我知道上帝之前，我是不能完满地知道其他任何事物的。但是现在我既然认识了上帝，我就有办法获得关于无穷无尽的事物的完满知识，不仅包括与取得上帝本身有关的知识，同时还包括拥有物质性本质的其他智力型对象的知识，因为物质性本质是纯粹数学的对象［其存在与否是不予考虑的］。

Meditation VI　OF THE EXISTENCE OF MATERIAL THINGS, AND OF THE RE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IND AND BODY OF MAN.

沉思六　论物质性东西的存在；兼论人的灵魂和肉体之间的真正区别

1．There now only remains the inquiry as to whether material things exist. With regard to this question, I at least know with certainty that such things may exist, in as far as they constitute the object of the pure mathematics, since, regarding them in this aspect, I can conceive them clearly and distinctly. For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God possesses the power of producing all the objects I am able distinctly to conceive, and I never considered anything impossible to him, unless when I experienced a contradiction in the attempt to conceive it aright. Further, the faculty of imagination which I possess, and of which I am conscious that I make use when I apply myself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material things, is sufficient to persuade me of their existence: for, when I attentively consider what imagination is, I find that it is simply a certain application of the cognitive faculty (facultascognoscitiva) to a body which is immediately present to it, and which therefore exists.

1．现在留下来要讨论的只是物质性的东西是否存在的问题了。关于这个问题，至少我确切地知道，只要把物质性的东西看成是纯粹数学的对象，这样的东西是可以存在的。因为从这个方面看它们时，我能清晰、明确地感悟到它们。因为毫无疑问，凡是我能够明确领悟到的所有东西，上帝都有能力创造出来，而且我从来不认为上帝有办不到的事情，除非我试图正确领悟它们时，我发现其中存在着矛盾。而且，我拥有想象能力，我能意识到这种能力，当我考虑物质性的东

西时，我就自己使用这个能力。这种功能足以使我相信物质性的东西是存在的。因为当我仔细考虑什么是想象时，我发现它只不过是认知功能对一个物体的某种应用，而该物体是对认知功能的直接呈现，因而这个物体是存在的。

2 . And to render this quite clear, I remark, in the first place, the difference that subsists between imagination and pure intellection [or conception]. For example, when I imagine a triangle I not only conceive (intelligo) that it is a figure comprehended by three lines, but at the same time also I look upon (intueor) these three lines as present by the power and internal application of my mind (acie mentis), and this is what I call imagining. But if I desire to think of a chiliogon, I indeed rightly conceive that it is a figure composed of a thousand sides, as easily as I conceive that a triangle is a figure composed of only three sides; but I cannot imagine the thousand sides of a chiliogon as I do the three sides of a triangle, nor, so to speak, view them as present [with the eyes of my mind]. And althoug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abit I have of always imagining something when I think of corporeal things, it may happen that, in conceiving a chiliogon, I confusedly represent some figure to myself, yet it is quite evident that this is not a chiliogon, since it in no wise differs from that which I would represent to myself, if I were to think of a myriogon, or any other figure of many sides; nor would this representation be of any use in discovering and unfolding the properties that constitu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chiliogon and other polygons. But if the question turns on a pentagon, it is quite true that I can conceive its figure, as well as that of a chiliogon, without the aid of imagination; but I can likewise imagine it by applying the attention of my mind to its five sid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the area which they contain. Thus I observe that a special effort of mind is necessary to the act of

imagination, which is not required to conceiving or understanding (ad intelligendum); and this special exertion of mind clearly show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magination and pure intellection (imaginatioetintellectiopura).

2．为了把这一点弄得非常明白，我首先要指出想象和纯粹理智［或概念］之间存在的区别。举例来说吧，当我想象一个三角形时，我不但领悟到这是一个由三条线组成的图形，而且同时，我也把这三条线看成是由于灵魂的力量和内在应用才呈现在我面前的，而这正是我所说的想象。但是，如果我要想出一个千边形，我当然可以正确地领悟到这是一个由一千个边组成的图形，就像我领悟到一个三角形只是由三个边组成的图形那样容易。然而，我却不能像想象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边那样想象一个千边形的一千个边，也就是说，我也不能［用我灵魂的眼睛］把一千个边看成是呈现在我面前的一千个边。而且，虽然当我想到有形物体时，我总是习惯于想象某种东西，这样，在我设想一个千边形时，我会模模糊糊地向自己呈现出某种图形。不过很明显，这个图形并不是一个千边形，因为这个图形和我想到一个万边形，或别的任何多边形的形状时，向自己呈现出来的图形没有什么差别，而且这个呈现出来的图形决不能用来发现和揭示一个千边形和别的多边形之间的差别。但是，如果问题转向考虑一个五边形，我就可以跟领悟一个千边形的形状一样领悟它的形状，无需借助想象；但是，我同样可以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到五边形的五个边上，同时也可以集中到它们所包含的面积上，用这样的办法来想象这个五边形。这样我就认识到，想象活动需要一种集中精神，而领悟或理解则不需要。这种精神的集中清晰地显示出想象与纯粹理智之间的差别。

3．I remark, besides, that this power of imagination which I possess, in as far as it differs from the power of conceiving, is in no way necessary to my [nature or] essence, that is, to the essence of my mind; for although I did not possess it, I should still remain the

same that I now am, from which it seems we may conclude that it depends on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mind. And I easily understand that, if some body exists, with which my mind is so conjoined and united as to be able, as it were, to consider it when it chooses, it may thus imagine corporeal objects; so that this mode of thinking differs from pure intellection only in this respect, that the mind in conceiving turns in some way upon itself, and considers some one of the ideas it possesses within itself; but in imagining it turns toward the body, and contemplates in it some object conformed to the idea which it either of itself conceived or apprehended by sense. I easily understand, I say, that imagination may be thus formed, if it is true that there are bodies; and because I find no other obvious mode of explaining it, I thence, with probability, conjecture that they exist, but only with probability; and although I carefully examine all things, nevertheless I do not find that, from the distinct idea of corporeal nature I have in my imagination, I can necessarily infer the existence of any body.

3．此外，我还要指出，我所具有的这种想象能力，就其有别于领悟的能力而言，绝不是我的本性［或本质］，或者说我的灵魂本性所需要的；因为，即使我不拥有这种想象的能力，我仍然会和现在的我一模一样。从这一点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想象的能力取决于不同于灵魂的某些东西。而且，我很容易领悟到，如果有某物存在，而我的灵魂能和它联结得非常紧密，以至于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可以考虑它，那么灵魂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想象物体性的对象了。因此，这种思维方式与纯粹理智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灵魂在领悟时，是以某种方式转向其自身，并且考虑其自身所拥有的某种观念；而在想象时，灵魂则转向物体，并且在物体上考虑与观念契合的一些对象，而此观念或者是由灵魂自身得来，或者通过感官得来。我说，我很容易领悟到，如果真的有物体存在，想象是可以这样形成的，而且，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别的方式来解释想象是怎么形成的，所以我就猜测物体

是“可能”存在的，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虽然我仔细检查所有的东西，但我并不认为我能从自身所想象的关于物质本性的确切观念中推断出任何物体的存在。

4．But I am accustomed to imagine many other objects besides that corporeal nature which is the object of the pure mathematics, as, for example, colors, sounds, tastes, pain, and the like, although with less distinctness; and, inasmuch as I perceive these objects much better by the senses, through the medium of which and of memory, they seem to have reached the imagination, I believe that, in order the more advantageously to examine them, it is proper I should at the same time examine what sense-perception is, and inquire whether from those ideas that are apprehended by this mode of thinking (consciousness), I cannot obtain a certain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corporeal objects.

4．可是，除了作为纯粹数学的对象的那种物质性本性以外，我习惯于想象很多别的对象，例如颜色、声音、滋味、疼痛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虽然它们并不那么清楚。而且，因为通过感官我就能更好地觉察这些对象，通过感官和记忆的媒介，这些对象似乎已达到我的想象，所以我相信，为了更便捷地检查它们，我应该同时检查一下什么是感官知觉，看看依据这种思维方式（意识）所理解的那些观念里，我能否得出某种可靠的证据来证明物质性对象的存在。

5．And, in the first place, I will recall to my mind the things I have hitherto held as true, because perceived by the senses, and the foundations upon which my belief in their truth rested; I will, in the second place, examine the reasons that afterward constrained me to doubt of them; and, finally, I will consider what of them I ought

now to believe.

5．首先，我要在我的记忆里回想一下我以前认为通过感官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以及回想我是根据哪些理由才相信的；其次，我要检查一下从那以后强迫我怀疑这些东西的理由；最后我要考虑我现在应该相信什么东西。

6．Firstly, then, I perceived that I had a head, hands, feet and other members composing that body which I considered as part, or perhaps even as the whole, of myself. I perceived further, that that body was placed among many others, by which it was capable of being affected in diverse ways, both beneficial and hurtful; and what was beneficial I remarked by a certain sensation of pleasure, and what was hurtful by a sensation of pain. And besides this pleasure and pain, I was likewise conscious of hunger, thirst, and other appetites, as well as certain corporeal inclinations toward joy, sadness, anger, and similar passions. And, out of myself, besides the extension, figure, and motions of bodies, I likewise perceived in them hardness, heat, and the other tactile qualities, and, in addition, light, colors, odors, tastes, and sounds, the variety of which gave me the means of distinguishing the sky, the earth, the sea, and generally all the other bodies, from one another. And certainly, considering the ideas of all these qualities, which were presented to my mind, and which alone I properly and immediately perceived, it was not without reason that I thought I perceived certain objects wholly different from my thought, namely, bodies from which those ideas proceeded; for I was conscious that the ideas were presented to me without my consent being required, so that I could not perceive any object, however desirous I might be, unless it were present to the organ of sense; and it was wholly out

of my power not to perceive it when it was thus present. And because the ideas I perceived by the senses were much more lively and clear, and even, in their own way, more distinct than any of those I could of myself frame by meditation, or which I found impressed on my memory, it seemed that they could not have proceeded from myself, and must therefore have been caused in me by some other objects; and as of those objects I had no knowledge beyond what the ideas themselves gave me, nothing was so likely to occur to my mind as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objects were similar to the ideas which they caused. And because I recollected also that I had formerly trusted to the senses, rather than to reason, and that the ideas which I myself formed were not so clear as those I perceived by sense, and that they were even for the most part composed of parts of the latter, I was readily persuaded that I had no idea in my intellect which had not formerly passed through the senses. Nor was I altogether wrong in likewise believing that that body which, by a special right, I called my own, pertained to me more properly and strictly than any of the others; for in truth, I could never be separated from it as from other bodies; I felt in it and on account of it all my appetites and affections, and in fine I was affected in its parts by pain and the titillation of pleasure, and not in the parts of the other bodies that were separated from it. But when I inquired into the reason why, from this I know not what sensation of pain, sadness of mind should follow, and why from the sensation of pleasure, joy should arise, or why this indescribable twitching of the stomach, which I call hunger, should put me in mind of taking food, and the parchedness of the throat of drink, and so in other cases, I was unable to give any explanation, unless that I was so taught by nature; for there is assuredly no affinity, at least none that I am able to comprehend, between this irritation of the stomach and the desire of food, any more than between the perception of an object that causes pai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sadness which springs from the perception. And in the same way it seemed to me that all the other judgments I had formed regarding the objects of sense, were dictates of nature; because I remarked that those judgments were formed in me, before I had leisure to weigh and consider the reasons that might constrain me to form them.

6．因此，首先我察觉到我有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以及组成我这个身体的其他部分，我把我的身体看作我自己的一部分，甚至也许是全部。而且，我察觉到，这个身体处于其他很多物体之间，能够以各种有益或有害的方式，被这些物体影响。我察觉到，由一些愉悦的感觉引发的是有益的，而由痛苦的感觉引发的则是有害的。除了这些愉快和痛苦以外，我还意识到饥饿、干渴以及其他的饮食欲望，还有某些对于喜悦、悲伤、愤怒，以及类似情绪的物质性的倾向。而且，在我之外，除了各种物体的广延、形状及其运动之外，我还在物体里察觉出硬度、热度以及其他触觉方面的特性。此外，我在物体中察觉到光、颜色、气味、味道和声音，这些多种多样的特性提供方法，使我能分辨天、地、海，并且大体上与其他一切物体都区分开来。当然，考虑到所有这些特性的观念呈现在我的心里，而且只有这些观念是我真正、直接察觉到的，于是我当然认为我察觉到了某些和我的思维完全不同的对象，也就是说，产生这些观念的物体，并非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已意识到这些观念呈现给我并不需要我的同意。所以，不论我多么希望察觉什么东西，如果它没有呈现给我的感觉器官，我就不能感觉到它；而当它呈现在我的感觉器官之时，我完全不可能察觉不到它。而且，因为我通过感官获得的那些观念，比之我通过沉思凭空杜撰出来的任何观念，或者比之我发现铭记在记忆里的任何观念，都要生动得多，清晰得多，甚至在其方式上也表现得非常明确。它们似乎不能从我心里产生，而必然是由一些别的对象在我心里引发。既然除了那些观念以外，我对那些对象什么认识都没有，那么除非假设那些对象是与它们所引发的观念相似，否则就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进入我的心里了。因为我还记得我以前相信的是感官而不是理

性，并且我认识到我自己形成的观念比不上我通过感官得来的观念那么明确，况且我自己形成的观念甚至大多是我通过感官得来的观念中的一部分所构成，所以我很容易就相信在我心里决没有什么观念不是从前通过感官而得来。同样，我也不会错误地相信，这个物体（由于某种特权我称之为我自己的身体）比其他任何物体都更适合、更紧密地属于我。因为事实上，我永远不能像跟别的物体分开那样，跟我的身体分开。我身体在感觉，并且借着我的身体来感觉我的一切饮食之欲和一切情感。最后，我在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上感受到愉快和痛苦，而在跟身体分得开的别的物体的任何部分上则感觉不到。但是，当我进一步探究，为什么莫名的痛苦会引起心里的悲伤，愉快会引起快乐，或者为什么这种难以描述的胃的痉挛（我称之为饥饿）让我产生想要吃东西的念头，为什么喉咙干渴让我想要喝水，以及其他情况时，除了说这是本性使我这样做以外，我不能给出任何解释。因为在胃的刺激和想要吃食物的欲望之间，在感觉到引起疼痛的东西与由这个感觉引起悲伤的意识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少我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同样，我通过感官对象形成的所有其他判断好像也是本性的指示，因为我注意到，在我有工夫掂量和考虑能够使我作出这样的判断的理由之前，那些判断已在我心中形成了。

7 . But, afterward, a wide experience by degrees sapped the faith I had reposed in my senses; for I frequently observed that towers, which at a distance seemed round, appeared square, when more closely viewed, and that colossal figures, raised on the summits of these towers, looked like small statues, when viewed from the bottom of them; and, in other instances without number, I also discovered error in judgments founded on the external senses; and not only in those founded on the external, but even in those that rested on the internal senses; for is there aught more internal than pain? And yet I have sometimes been informed by parties whose arm or leg had been amputated, that they still occasionally seemed to feel pain in that part of the body which they had lost, —a

circumstance that led me to think that I could not be quite certain even that any one of my members was affected when I felt pain in it. And to these grounds of doubt I shortly afterward also added two others of very wide generality: the first of them was that I believed I never perceived anything when awake which I could not occasionally think I also perceived when asleep, and as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ideas I seem to perceive in my sleep proceed from objects external to me, I did not any more observe any ground for believing this of such as I seem to perceive when awake; the second was that since I was as yet ignorant of the author of my being or at least supposed myself to be so, I saw nothing to prevent my having been so constituted by nature as that I should be deceived even in matters that appeared to me to possess the greatest truth.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grounds on which I had before been persuaded of the existence of sensible objects, I had no great difficulty in finding suitable answers to them; for as nature seemed to incline me to many things from which reason made me averse, I thought that I ought not to confide much in its teachings. And although the perceptions of the senses were not dependent on my will, I did not think that I ought on that ground to conclude that they proceeded from things different from myself, since perhaps there might be found in me some faculty, though hitherto unknown to me, which produced them.

7．可是后来，我的经验逐渐增长，就削弱了对感官的信任。因为我经常注意到，我远看塔楼好像是圆的，而近看却是方的；而且，耸立在塔顶上的巨大雕像从塔底下看却是小小的塑像而已。这样，在其他无数例证中，我也发现根据外部感官所下的判断是有错误的。而且不仅外部感官如此，就连依据内部感官所下的判断也一样。因为，还有什么东西比痛苦更内在吗？可是被截去胳臂或腿的人多次告诉我，他们有时还会感觉到已经截去了的那部分肢体还在疼，这种情形

使我想到，虽然我感觉到我的某一个肢体有疼痛感，我也不能确定它是否疼痛。除了这些怀疑的理由以外，最近我又加上其他两个非常普遍的理由。其一，我相信凡是在我睡着时经常能感觉到的东西在我醒着的时候却无法觉察；而且，因为我不相信我在睡着时好像感觉的东西是从我以外的对象得来的，所以我没什么理由相信这些在我醒着时感觉到的东西。其二，因为我还不知道或者至少说假装自己不知道我的存在的创造者，因此，我看不出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如此这般地被本性造就，甚至使我在呈现给我的最真实的事情中上当受骗。而且，至于以前使我相信感觉对象存在的那些理由，我用不着费很多事就可以找到恰当的答案。因为本性似乎使我倾向于许多事情，而理智又使我远离这些事情，所以我认为我不应该过于相信本性教给我的事情。而且，虽然我由感官得来的那些观念并不取决于我的意志，可是我不认为我就应该据此理由推论说那些观念是从不同于我的东西得出的，因为也许在我身体之中有些什么功能产生了这些观念，虽然迄今为止我还不认识它们。

8．But now that I begin to know myself better, and to discover more clearly the author of my being, I do not, indeed, think that I ought rashly to admit all which the senses seem to teach, nor, on the other hand, is it my conviction that I ought to doubt in general of their teachings.

8．可是，现在既然我开始更好地认识我自己，开始更清楚地发现我的存在的创造者，那么我认为我不应该轻率地接受感官看似教给我的一切事物；另一方面，我深信我也不应该普遍地怀疑感官教给我的东西。

9．And, firstly, because I know that all which I clearly and distinctly conceive can be produced by God exactly as I conceive it,

it is sufficient that I am able clearly and distinctly to conceive one thing apart from another, in order to be certain that the one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seeing they may at least be made to exist separately, by the omnipotence of God; and it matters not by what power this separation is made, in order to be compelled to judge them different; and, therefore, merely because I know with certitude that I exist, and because, in the meantime, I do not observe that aught necessarily belongs to my nature or essence beyond my being a thinking thing, I rightly conclude that my essence consists only in my being a thinking thing [or a substance whose whole essence or nature is merely thinking]. And although I may, or rather, as I will shortly say, although I certainly do possess a body with which I am very closely conjoined; nevertheless,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I have a clear and distinct idea of myself, in as far as I am only a thinking and unextended thing, and as, on the other hand, I possess a distinct idea of body, in as far as it is only an extended and unthinking thing, it is certain that I, [that is, my mind, by which I am what I am], is entirely and truly distinct from my body, and may exist without it.

9．首先，因为我知道，凡是我清晰、明确地领悟到的东西都能由上帝创造出来，就像我领悟的那样，所以只要我能清晰、明确地领悟一物而不涉及别的东西，就足以确定一物与另一物之间的区别，因为它们至少凭借上帝的能力分开来存在。至于是什么力量把它们分开，使我断定它们之间有差异，则无关紧要。这样，只是因为我确实知道我存在着，同时因为我注意到，除了我是一个在思维之物以外，根本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必然属于我的本性或属于我的本质，因此可以正确地得出结论，我的本质只在于我是一个在思维之物［或者只在于我是一个实体，其全部本质或本性就只是思维］。而且，虽然我可以说，或者正像我马上要说的那样，我确实有一个肉体，我和它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因为一方面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清晰、明确的

观念，并且我只是一个有在思维而无广延之物，另一方面，我对肉体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即它只是一个有广延而无思维之物，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我［也就是我之所以为我所依据的灵魂］，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跟我的肉体分开的，我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

10．Moreover, I find in myself diverse faculties of thinking that have each their special mode: for example, I find I possess the faculties of imagining and perceiving, without which I can indeed clearly and distinctly conceive myself as entire, but I cannot reciprocally conceive them without conceiving myself, that is to say, without an intelligent substance in which they reside, for [in the notion we have of them, or to use the terms of the schools] in their formal concept, they comprise some sort of intellection; whence I perceive that they are distinct from myself as modes are from things. I remark likewise certain other faculties, as the power of changing place, of assuming diverse figures, and the like, that cannot be conceived and cannot therefore exist, any more than the preceding, apart from a substance in which they inhere. It is very evident, however, that these faculties, if they really exist, must belong to some corporeal or extended substance, since in their clear and distinct concept there is contained some sort of extension, but no intellection at all. Further, I cannot doubt but that there is in me a certain passive faculty of perception, that is, of receiving and taking knowledge of the ideas of sensible things; but this would be useless to me, if there did not also exist in me, or in some other thing, another active faculty capable of forming and producing those ideas. But this active faculty cannot be in me [in as far as I am but a thinking thing], seeing that it does not presuppose thought, and also that those ideas are frequently produced in my mind without my contributing to it in any way, and even frequently contrary to my will. This faculty must therefore exist in some

substance different from me, in which all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the ideas that are produced by this faculty is contained formally or eminently, as I before remarked; and this substance is either a body, that is to say, a corporeal nature in which is contained formally [and in effect] all that is objectively [and by representation] in those ideas; or it is God himself, or some other creature, of a rank superior to body, in which the same is contained eminently. But as God is no deceiver, it is manifest that he does not of himself and immediately communicate those ideas to me, nor even by the intervention of any creature in which their objective reality is not formally, but only eminently, contained. For as he has given me no faculty whereby I can discover this to be the case, but, on the contrary, a very strong inclination to believe that those ideas arise from corporeal objects, I do not see how he could be vindicated from the charge of deceit, if in truth they proceeded from any other source, or were produced by other causes than corporeal things: and accordingly it must be concluded, that corporeal objects exist. Nevertheless, they are not perhaps exactly such as we perceive by the senses, for their comprehension by the senses is, in many instances, very obscure and confused; but it is at least necessary to admit that all which I clearly and distinctly conceive as in them, that is, generally speaking all that is comprehended in the object of speculative geometry, really exists external to me.

10．其次，我发现自身还有多种思维功能，每种都有其特殊的模态。举例来说吧，我发现我拥有想象功能和感觉功能，没有这两种功能我虽然能够清晰、明确地领悟我自己是完整的，但是我不能在没有领悟自己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它们可以归属的理智性实体的情况下领悟它们。。因为［或者用经院学派的术语来说］在我们对这些功能所具有的理念中，在其形式概念里，它们包含着某种智力活动。因此，我领悟到它们之所以与我不同，就像事物的模态与事物本

身不同一样。我也注意到某些其他功能，诸如改换位置的功能、设想多种形态的功能等等，这些功能也都同前述的一些功能一样，如果脱离它们依附的实体，就不能被人们领悟，因而也不能存在。然而，非常明显，这些功能如果真的存在，则必定附属于什么物质性的或有广延的实体，因为在它们清晰、明确的概念里，包含有某种广延，却决不包含有智力活动。再次，我自身决不怀疑有某种被动的感觉功能，也就是说，接受和认识可感知事物的观念的功能；可是，如果我自身或者在其他事物中也不存在另一种能够形成和产生这些观念的主动功能，那么这种被动的功能对我而言就毫无作用。可是，既然我只不过是一个思维之物，那么这种主动功能就不能存在于自我之中，因为它并不预设思想，而且那些观念经常在我灵魂中产生但决不需要我协助，甚至经常与我的意志相反。因此，这种主动功能必定存在于和我不同的某些实体中，在那些实体中，以表面的或显著的方式包含着由这个功能所产生的所有客观实在性，这正如同我以前指出的那样。这个实体要么是一个物体，也就是说一个以表面的方式［和实际的方式］包含了所有客观地［并且通过表象］存在在那些观念里的物质性的本性；要么是上帝本身，或者别的什么比物体更高级的造物，这个造物显著地包含着同样的东西。可是，既然上帝不是骗子，那么显然他不会自己直接地，也不会通过什么造物的媒介（在这个造物里并不是以表面的方式，而仅仅是以显著的方式包含观念的客观实在性）把那些观念传送给我。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任何功能可使我发现情况是这样的，反而使我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念头，使我相信那些观念是由物质性的对象引起的。因此，如果这些观念确实来自其他源泉或由其他原因产生出来，而不是由物质性的东西产生，那么，我就无法看出他如何能澄清欺骗的罪名。这样，我们必定可以推断说，物质性的对象是存在的。虽然如此，它们也许并不完全像我们通过感官察觉到的那样，因为由感官得来的理解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非常模糊、非常混乱的；不过至少必须承认所有我清晰、明确领悟的东西，即一般来说，所有人们在思辨几何学的对象里理解的东西都是在我以外真实地存在着。

11 . But with respect to other things which are either only particular, as, for example, that the sun is of such a size and figure, etc., or are conceived with less clearness and distinctness, as light, sound, pain, and the like, although they are highly dubious and uncertain, nevertheless on the ground alone that God is no deceiver, and that consequently he has permitted no falsity in my opinions which he has not likewise given me a faculty of correcting, I think I may with safety conclude that I possess in myself the means of arriving at the truth. And, in the first place, it cannot be doubted that in each of the dictates of nature there is some truth: for by nature, considered in general, I now understand nothing more than God himself, or the order and disposition established by God in created things; and by my nature in particular I understand the assemblage of all that God has given me.

11 . 不过，说到其他东西，有些要么是个例，比如太阳是不是这么大、是不是这样的形状等等；要么是被人们领悟得不那么清晰、不那么明确的问题，就像光、声音、痛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虽然它们是非常可疑、非常靠不住，可是上帝不是骗子，因而他不允许在我的见解里能有任何错误，而且同时他没有给我什么纠正错误的功能，仅仅根据这一点，我就认为，我可以可靠地推断自己拥有获得真理的方法。首先，毫无疑问，凡是本性的指示都含有某种真实性。因为本性，就一般意义而言，我现在的理解本性指的不是别的，而是上帝本身，或者上帝在各造物里所建立的秩序和安排；就特殊意义而言，我理解我的本性指的是上帝给我的一切事物的聚集。

12 . But there is nothing which that nature teaches me more expressly [or more sensibly] than that I have a body which is ill affected when I feel pain, and stands in need of food and drink when I experience the sensations of hunger and thirst, etc. And

therefore I ought not to doubt but that there is some truth in these informations.

12．可是，这个本性最明显［或最合理性地］教给我的，莫过于我有一个肉体，当我感觉痛苦的时候，它就不舒服；当我感觉饥饿、口渴的时候，它就需要食物和饮料，等等。因此，在这些信息里必定有某些真理，对此我决不怀疑。

13．Nature likewise teaches me by these sensations of pain, hunger, thirst, etc., that I am not only lodged in my body as a pilot in a vessel, but that I am besides so intimately conjoined, and as it were intermixed with it, that my mind and body compose a certain unity. For if this were not the case, I should not feel pain when my body is hurt, seeing I am merely a thinking thing, but should perceive the wound by the understanding alone, just as a pilot perceives by sight when any part of his vessel is damaged; and when my body has need of food or drink, I should have a clear knowledge of this, and not be made aware of it by the confused sensations of hunger and thirst: for, in truth, all these sensations of hunger, thirst, pain, etc., are nothing more than certain confused modes of thinking, arising from the union and apparent fusion of mind and body.

13．本性同样通过疼痛、饥饿、口渴等等感觉教给我，我不仅寄住在我的肉体里，就像一个舵手住在他的船上一样，而且除此之外，我和它非常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相互融合在一起，使灵魂和肉体组合成一个特定的整体。因为，倘若不是这样，那么当我的肉体受伤时，我就不应该感到疼痛，因为我仅仅是一个思维之物，只会凭借理解力去感知这个伤处，就像一个舵手凭借视觉去察看他的船上是否有哪能

部分损坏了一样；当我的肉体需要喝水或吃东西时，我就会直截了当地察觉这种事，并非要凭借饥饿、口渴的模糊感觉我才知道。因为事实上，所有这些饥饿、口渴、疼痛等等感觉只不过是思维的某些混乱模态，它们是来自于精神和肉体的联合，看起来就像混合在一起一样。

14．Besides this, nature teaches me that my own body is surrounded by many other bodies, some of which I have to seek after, and others to shun. And indeed, as I perceive different sorts of colors, sounds, odors, tastes, heat, hardness, etc., I safely conclude that there are in the bodies from which the diverse perceptions of the senses proceed, certain varieties corresponding to them, although, perhaps, not in reality like them; and since, among these diverse perceptions of the senses, some are agreeable, and others disagreeable,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my body, or rather my entire self, in as far as I am composed of body and mind, may be variously affected, both beneficially and hurtfully, by surrounding bodies.

14．此外，本性还教给我，我自己的身体周围还有许多别的物体，其中有一些是我不得不追求的，有一些则是我不得不躲避的。而且实际上，由于我感觉到不同种类的颜色、气味、滋味、声音、热度、硬度等，所以我有把握地断定，在这些产生不同感官知觉的物体中，肯定有多种多样的东西与这些物体相应，虽然也许它们实际上和这些物体不一样。而且，在这些千差万别的感官知觉中，有些是我喜欢而同意的，有些则是我讨厌而反对的，所以毫无疑问，我的身体，或者不如说我的整个自我，也就是由肉体和灵魂组合成的我，是可以从周围的其他物体那里受到各种不同的有益或有害的影响。

15 . But there are many other beliefs which though seemingly the teaching of nature, are not in reality so, but which obtained a place in my mind through a habit of judging inconsiderately of things. It may thus easily happen that such judgments shall contain error: thus, for example, the opinion I have that all space in which there is nothing to affect [or make an impression on] my senses is void: that in a hot body there is something in every respect similar to the idea of heat in my mind; that in a white or green body there is the same whiteness or greenness which I perceive; that in a bitter or sweet body there is the same taste, and so in other instances; that the stars, towers, and all distant bodies, are of the same size and figure as they appear to our eyes, etc. But that I may avoid everything like indistinctness of conception, I must accurately define what I properly understand by being taught by nature. For nature is here taken in a narrower sense than when it signifies the sum of all the things which God has given me; seeing that in that meaning the notion comprehends much that belongs only to the mind [to which I am not here to be understood as referring when I use the term nature]; as, for example, the notion I have of the truth, that what is done cannot be undone, and all the other truths I discern by the natural light [without the aid of the body]; and seeing that it comprehends likewise much besides that belongs only to body, and is not here any more contained under the name nature, as the quality of heaviness, and the like, of which I do not speak, the term being reserved exclusively to designate the things which God has given to me as a being composed of mind and body. But nature, taking the term in the sense explained, teaches me to shun what causes in me the sensation of pain, and to pursue what affords me the sensation of pleasure, and other things of this sort; but I do not discover that it teaches me, in addition to this, from these diverse perceptions of the senses, to draw any conclusions respecting external objects without a previous [careful and mature]

consideration of them by the mind: for it is, as appears to me, the office of the mind alone, and not of the composite whole of mind and body, to discern the truth in those matters. Thus, although the impression a star makes on my eye is not larger than that from the flame of a candle, I do not, nevertheless, experience any real or positive impulse determining me to believe that the star is not greater than the flame; the true account of the matter being merely that I have so judged from my youth without any rational ground. And, though on approaching the fire I feel heat, and even pain on approaching it too closely, I have, however, from this no ground for holding that something resembling the heat I feel is in the fire, any more than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similar to the pain; all that I have ground for believing i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in it, whatever it may be, which excites in me those sensations of heat or pain. So also, although there are spaces in which I find nothing to excite and affect my senses, I must not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those spaces contain in them no body; for I see that in this, as in many other similar matters, I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pervert the order of nature, because these perceptions of the senses, although given me by nature merely to signify to my mind what things are beneficial and hurtful to the composite whole of which it is a part, and being sufficiently clear and distinct for that purpose, are nevertheless used by me as infallible rules by which to determine immediately the essence of the bodies that exist out of me, of which they can of course afford me only the most obscure and confused knowledge.

15．可是还有许多其他的信仰，虽然似乎是本性向我指示的，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它们之所以在我灵魂中占有一席之地，乃是因为我有一种对事物轻率下判断的习惯。这样就能够很容易使这些判断包含错误。举例来说吧，就像我以为在所有空间里，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影响［或留下印象］我的感官，这个空间就是空的；又比如我以为在

一个热的物体里有跟我灵魂中的热的观念在每一个方面都相似的东西；在一个白的或绿的物体里，有我所察觉到的同样的白色或绿色；在一个苦的或甜的物体里有我所感觉到的同样的滋味，其他的东西也是如此。星体、塔楼以及一切距离远的物体都是像它们在我们的眼睛等感官中呈现的那样，具有相同的形状和大小。但是，为了避免模糊不清的要领所以我必须精确地定义一下“本性教育给我什么”这句话的真正所指意义。因为此处所说的本性只是就其狭义而言，而不代表上帝赋予我的一切东西的总合。鉴于在那种意义中，此概念包含的大多只属于灵魂的东西［我在这里说的本性这个术语，不是指那些东西］。举例来说吧：关于真理，我有这样的理念：成则无毁；并且凭借自然的光明［无需身体的帮助］，我就能识别所有其他的真理。同样，这个术语也能涵盖很多只属于物体的东西，那些东西也不包括在本性的名称之下，比如物体具有重量的性质，诸如此类等等，我也不是指这些东西，该术语并不涵盖这些东西的所指意义，而仅仅是指上帝所赋予我的、作为灵魂和肉体的总和的那些事情。不过，照这个术语的字面意义来看，本性只是教给我躲避引起痛苦感觉的东西，以及追求给我带来愉悦感觉的东西，以及其他此类的东西。除上述东西之外，我发现本性并没有教给我，根据这些不同的感官知觉可以对我们之外的东西必须得出什么结论，除非灵魂对它们进行［仔细、成熟的］考查。因为，在我看来，从这些事物中获得的真理，只是灵魂的职责，而不是身心合一整体的职责。因此，虽然一颗星星给我眼睛的印象并不比一簇烛光留下的深刻，可是我不能体验到任何一种实在的或积极的刺激，使我相信星星并不比烛光大。我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我从幼年起就一直认为是这样的，并没有任何合理的根据。在我挨近火的时候虽然我感觉到热，甚至在我挨得太近的时候，我感觉到疼，可是我没有任何理由坚持说火中有什么东西跟我所感觉到的热相似，更不能坚持说火中有什么东西跟我感觉到的疼相似。我有理由相信的只是火中有什么东西，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它都刺激我，使我有热或疼的感觉。同样，在有些空间里，虽然我找不出任何能刺激和触动我的感官的东西，可是我不应该因此就得出结论说那些空间里绝对没有物体。因为我发现，在这种情形和其他许多类似的情形下，我习惯于把本性的秩序弄乱，因为尽管本性赋予我的感官这些知觉仅仅

是为了向我的灵魂表明什么东西对身心的综合体（灵魂是这个综合体的一部分）是有益还是有害的，而且这些知觉清晰、明确地了解这一目的，不过，我只把它们当成非常可靠的规则，可以用它们直接决定外在于我的事物的本质，而对于这些事物的本质知觉只能给我最模糊、最令人费解的知识。

16．But I have already sufficiently considered how it happens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supreme goodness of God, there is falsity in my judgments. A difficulty, however, here presents itself, respecting the things which I am taught by nature must be pursued or avoided, and also respecting the internal sensations in which I seem to have occasionally detected error, [and thus to be directly deceived by nature]: thus, for example, I may be so deceived by the agreeable taste of some viand with which poison has been mixed, as to be induced to take the poison. In this case, however, nature may be excused, for it simply leads me to desire the viand for its agreeable taste, and not the poison, which is unknown to it; and thus we can infer nothing from this circumstance beyond that our nature is not omniscient; at which there is assuredly no ground for surprise, since, man being of a finite nature, his knowledge must likewise be of a limited perfection.

16．不过我已经充分地考虑到了，尽管上帝是至善的，可是我的判断里仍会有错。然而，说到有关本性教给我必须追求或躲避的事情，以及我的自身感觉方面，都会有困难；因为我偶尔会发现错误，而且这样我就直接被我的本性所欺骗。举例来说吧，一种混有毒药的珍馐美味滋味很香，可以引诱我去吃毒药，这样一来我就上当受骗。然而，在这种情形下本性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它仅仅引导我去渴求美食，并没有引导我去渴求我所不知道的毒药。因而我们只能由这种情形推论，我们的本性并非无所不知；而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人本身

具有有限性，他的知识也具有类似的性质，即有限的完美性。

17 . But we also not unfrequently err in that to which we are directly impelled by nature, as is the case with invalids who desire drink or food that would be hurtful to them. It will here, perhaps, be alleged that the reason why such persons are deceived is that their nature is corrupted; but this leaves the difficulty untouched, for a sick man is not less really the creature of God than a man who is in full health; and therefore it is as repugnant to the goodness of God that the nature of the former should be deceitful as it is for that of the latter to be so. And as a clock, composed of wheels and counter weights, observes not the less accurately all the laws of nature when it is ill made, and points out the hours incorrectly, than when it satisfies the desire of the maker in every respect; so likewise if the body of man be considered as a kind of machine, so made up and composed of bones, nerves, muscles, veins, blood, and skin, that although there were in it no mind, it would still exhibit the same motions which it at present manifests involuntarily, and therefore without the aid of the mind, [and simply by the dispositions of its organs], I easily discern that it would also be as natural for such a body, supposing it dropsical, for example, to experience the parchedness of the throat that is usually accompanied in the mind by the sensation of thirst, and to be disposed by this parchedness to move its nerves and its other parts in the way required for drinking, and thus increase its malady and do itself harm, as it is natural for it, when it is not indisposed to be stimulated to drink for its good by a similar cause; and although looking to the use for which a clock was destined by its maker, I may say that it is deflected from its proper nature when it incorrectly indicates the hours, and on the same principle, considering the machine of the human body as having been formed

by God for the sake of the motions which it usually manifests, although I may likewise have ground for thinking that it does not follow the order of its nature when the throat is parched and drink does not tend to its preservation, nevertheless I yet plainly discern that this latter acceptation of the term natur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for this is nothing more than a certain denomination, depending entirely on my thought, and hence called extrinsic, by which I compare a sick man and an imperfectly constructed clock with the idea I have of a man in good health and a well made clock; while by the other acceptation of nature is understood something which is truly found in things, and therefore possessed of some truth.

17．不过我们也经常在我们直接由本性驱使去做的那些事情上犯错，就像病人有时希望会贪求对他们有害的饮食一样。也许有人会申辩说，这些人之所以上当受骗是因为他们的本性败坏。可是这种解释并未触及事情的难点，因为一个病人也和完全健康的人一样，都是上帝真真正正的造物。因此，如果说前者的本性骗人，那么后者的本性也应该会骗人，那就与上帝的善意相矛盾了。正如一个由齿轮和钟摆组成的钟表一样，虽然做得颇为拙劣，指示时间也不准确，但它同样能够准确地遵守自然的一切规律，就像它在各方面都能满足制造者需求的时候一样；同样，如果我把人的肉体看成是由骨骼、神经、肌肉、血管、血液和皮肤组成的一台机器，即使这台机器里边没有灵魂，它也仍然可以被动地与当下一样展现动作，因而无需灵魂协助，而仅仅是由它的各个部件的安排来动作。因此我很容易认识到，一个没有灵魂的身体，比如说，假定是一个水肿病患者，他自然就由于喉咙发干而感到难受，喉咙发干通常给灵魂“渴”的感觉，因而使得这种干渴的感觉引起他的神经和其他部分要求喝水，这样一来就增加他的病痛，害了他自己，这和他没有患病时由于受到类似原因的刺激而喝水以应身体之需是同样自然的。虽然我注意到一个钟表被其制造者指定了用途，但是我可以说，如果这个钟表不能准确地指示时间，因为

它违反了它的恰当的本性，根据同样的原理，如果我把人体这台机器看成是上帝做成的，用以表现它经常显示的运动，虽然我同样有理由认为，如果喉咙发干，喝水又会对身体健康不利，那么身体就没有遵循其本性的秩序。但是，我仍然认识到，用后一种方式去解释这个术语的意义，是和用前一种方式解释的意义大相径庭的。因为用后一种方式解释的意义不过是特定的名称，它完全取决于我的思想，因此可以称为外在的，因为我通过这个名称可以把一个病人和一个健康良好的人作比较，以及把构造不良的钟表和制作精良的钟表作比较。说到用另一种方式对本性的解释，我是指真正在那些东西里发现的某些东西，因此，它具有某些真实性。

18．But certainly, although in respect of a dropsical body, it is only by way of exterior denomination that we say its nature is corrupted, when, without requiring drink, the throat is parched; yet, in respect of the composite whole, that is, of the mind in its union with the body, it is not a pure denomination, but really an error of nature, for it to feel thirst when drink would be hurtful to it: and, accordingly, it still remains to be considered why it is that the goodness of God does not prevent the nature of man thus taken from being fallacious.

18．当然，虽然从一个水肿病患者的身体来看，它不需饮水，却觉得喉咙发干，我们之所以说它的本性已毁坏，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称号。可是从完整的总和来看，即从心和肉体的结合来看，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称号问题，而实际是本性的错误，喝水对它有害，但它却感觉口渴。这样一来，仍然有待于探究的就是，上帝的善意为什么不去阻止人类的本性去犯这样的错误。

19．To commence this examination accordingly, I here remark,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there is a vast difference between mind and body, in respect that body, from its nature, is always divisible, and that mind is entirely indivisible. For in truth, when I consider the mind, that is, when I consider myself in so far only as I am a thinking thing, I can distinguish in myself no parts, but I very clearly discern that I am somewhat absolutely one and entire; and although the whole mind seems to be united to the whole body, yet, when a foot, an arm, or any other part is cut off, I am conscious that nothing has been taken from my mind; nor can the faculties of willing, perceiving, conceiving, etc., properly be called its parts, for it is the same mind that is exercised [all entire] in willing, in perceiving, and in conceiving, etc. But quite the opposite holds in corporeal or extended things; for I cannot imagine any one of them [how small soever it may be], which I cannot easily sunder in thought, and which, therefore, I do not know to be divisible. This would be sufficient to teach me that the mind or soul of man is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e body, if I had not already been apprised of it on other grounds.

19．探究这个问题之前，在这里我首先要指出，精神和肉体有巨大差别。有关身体方面，就其本性来说，肉体永远是可分的，而精神是完全不可分的。因为事实上，当我考虑灵魂时，也就是说，当我自己仅仅是一个思维之物来探究时，我并不能把自己分成几部分，但是我能清楚地明白我是某种绝对单一、完整之物，而且尽管整个灵魂似乎和整个肉体结合在一起，可是当一只脚或者一只胳臂或别的什么部分从我的肉体截去的时候，我会意识到从我的灵魂上并没有截去什么东西。意愿、感觉、领会等功能真正来说也不能被称作灵魂的一些部分，因为意愿、感觉、领悟等都只不过是同一个灵魂在意志力里发挥［全部的］作用而已。可是物质性的或者有广延的东西就完全相反了；因为我可以想象任何凡是物质性的、有广延的东西［无论多么细微］，没有一个是我很难想象出来的，因而没有一个是我认为是不可

分的。如果我不曾根据别的原因理解这一点，那么这一点就足以告诉我，人的灵魂或精神和肉体是迥然不同的。

20．I remark, in the next place, that the mind does not immediately receive the impression from all the parts of the body, but only from the brain, or perhaps even from one small part of it, viz, that in which the common sense (senses communis) is said to be, which as often as it is affected in the same way gives rise to the same perception in the mind, although meanwhile the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may be diversely disposed, as is proved by innumerable experiments, which it is unnecessary here to enumerate.

20．其次，我还要指出，灵魂并不直接接收由肉体各个部分得来的感觉，而仅仅接收由大脑或者甚至大脑的一个较小的部分得来的感觉，亦即从人们称之为“共同感官”的那一部分得来的感觉。每当那一部分以同样方式感受时，就使灵魂产生同样的感觉，虽然这时候肉体的其他部分可以得到不同的感受，就像无数经验所证明的那样，不过在这里就不用一一列举了。

21．I remark, besides, that the nature of body is such that none of its parts can be moved by another part a little removed from the other, which cannot likewise be moved in the same way by any one of the parts that lie between those two, although the most remote part does not act at all. As, for example, in the cord A, B, C, D, [which is in tension], if its last part D, be pulled, the first part A, will not be moved in a different way than it would be were one of the intermediate parts B or C to be pulled, and the last part D meanwhile to remain fixed. And in the same way, when I feel pain in the foot, the science of physics teaches me that this sensation is

experienced by means of the nerves dispersed over the foot, which, extending like cords from it to the brain, when they are contracted in the foot, contrac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most parts of the brain in which they have their origin, and excite in these parts a certain motion appointed by nature to cause in the mind a sensation of pain, as if existing in the foot; but as these nerves must pass through the tibia, the leg, the loins, the back, and neck, in order to reach the brain, it may happen that although their extremities in the foot are not affected, but only certain of their parts that pass through the loins or neck, the same movements, nevertheless, are excited in the brain by this motion as would have been caused there by a hurt received in the foot, and hence the mind will necessarily feel pain in the foot, just as if it had been hurt; and the same is true of all the other perceptions of our senses.

21．此外，我还要指出，身体的性质是这样的，即它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被另一个与其稍微隔开的部分推动，同样它也不能被那两个部分之间的任何一个部分以同样的方式推动，即使那个离得最远的部分根本不动。举例来说吧，在一条［紧绷的］绳子上有A、B、C、D四个线段。如果拉动最末一部分D线段，那么第一部分A线段就动起来，它动的方式和拉动中间的B线段或者C线段一样，期间最末一部分D线段则保持不动。和这个情况相同的是，当我感觉得脚部疼时，物理学就告诉我，这个感觉是通过分布在脚部的神经传来的，这些神经就像绳子一样从脚部一直延伸到大脑里，当它们在脚部收缩时，同时也令大脑内部最深处，也就是神经发源的部位收缩，并且在这些部位激发一种特定的运动，本性会使这种运动在灵魂里产生一种疼痛的感觉，就好像疼痛是在脚部似的。可是因为这些神经要从脚部通到大脑里，就一定要经过胫骨、腿部、腰部、背部和颈部，所以也有可能这样：尽管脚部的末端并没有受到刺激，而仅仅腰部或颈部的某些部位受到刺激，则大脑也会同样受到这种运动的刺激，这种运动和脚上受伤所接收到的运动一模一样，然后灵魂必然会觉得脚部疼痛，就好像

脚部受了伤似的。我们感官的其他各种知觉，也应是同样的情况。

22 . I remark, finally, that as each of the movements that are made in the part of the brain by which the mind is immediately affected, impresses it with but a single sensation, the most likely supposition in the circumstances is, that this movement causes the mind to experience, among all the sensations which it is capable of impressing upon it; that one which is the best fitted, and generally the most useful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human body when it is in full health. But experience shows us that all the perceptions which nature has given us are of such a kind as I have mentioned; and accordingly, there is nothing found in them that does not manifest the power and goodness of God. Thus, for example, when the nerves of the foot are violently or more than usually shaken, the motion passing through the medulla of the spine to the innermost parts of the brain affords a sign to the mind on which it experiences a sensation, viz, of pain, as if it were in the foot, by which the mind is admonished and excited to do its utmost to remove the cause of it as dangerous and hurtful to the foot. It is true that God could have so constituted the nature of man as that the same motion in the brain would have informed the mind of something altogether different: the motion might, for example, have been the occasion on which the mind became conscious of itself, in so far as it is in the brain, or in so far as it is in some place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foot and the brain, or, finally, the occasion on which it perceived some other object quite different, whatever that might be; but nothing of all this would have so well contribut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body as that which the mind actually feels. In the same way, when we stand in need of drink, there arises from this want a certain parchedness in the throat that moves its nerves, and by means of them the internal parts of the brain; and this

movement affects the mind with the sensation of thirst,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on that occasion which is more useful for us than to be made aware that we have need of drink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our health; and so in other instances.

22．最后，我要指出，既然大脑的每一种运动直接刺激灵魂时，只能引起某一种单一的感觉，那么，最有可能的假设情况就是，这种运动导致灵魂去体验在灵魂中能留下印象的所有感觉，而在所有感觉中，只有这种运动能够在灵魂保持健康时最适合、最有效地维持人体的健康。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本性给我们的一切知觉都像我已说过的那样，因此，在这知觉里表现出来的无一不是上帝的力量和善意。这样，举例来说吧，当脚部的神经受到猛烈或异于平时的摇动时，经过脊椎骨髓直达大脑内部最深处的那种运动就会给灵魂一种讯号，使灵魂体验到一种感觉，即疼痛感，就如同在脚上的这种疼痛感一样。这样灵魂就会得到启发并且受到刺激，从而竭尽全力去驱除痛因，把这一痛因当成是对于脚部危险、有害的东西。实际上，上帝本来可以这样构造人的本性，即大脑的同一种运动可以给灵魂传递迥然不同的东西。举例来说吧，这个运动使灵魂意识到自己可能在大脑里，也可能在脚部，也可能在脚部和大脑之间某些部位，或者说还可能察觉别的完全不同的东西，不论这个东西是什么。不过，所有这些意识都比不上灵魂实际感觉到的能很好地有助于保存肉体的意识。同样，当我们需要喝水时，喉咙就产生一种干渴的感觉，这种感觉就使神经运动，并且借此直达大脑内部最深处。这种运动使灵魂产生口渴的感觉，因为在那种情形下，最有用的事情，莫过于让我们知道，为了维持我们的健康，我们需要喝水。其他例证，也是一样。

23．Whence it is quite manifest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sovereign goodness of God, the nature of man, in so far as it is composed of mind and body, cannot but be sometimes fallacious. For, if there is any cause which excites, not in the foot, but in some

one of the parts of the nerves that stretch from the foot to the brain, or even in the brain itself, the same movement that is ordinarily created when the foot is ill affected, pain will be felt, as it were, in the foot, and the sense will thus be naturally deceived; for as the same movement in the brain can but impress the mind with the same sensation, and as this sensation is much more frequently excited by a cause which hurts the foot than by one acting in a different quarter, it is reasonable that it should lead the mind to feel pain in the foot rather than in any other part of the body. And if it sometimes happens that the parchedness of the throat does not arise, as is usual, from drink being necessary for the health of the body, but from quite the opposite cause, as is the case with the dropsical, yet it is much better that it should be deceitful in that instance, than if, on the contrary, it were continually fallacious when the body is well-disposed; and the same holds true in other cases.

23．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虽然上帝是至善至美的，但是本性既然是由灵魂和肉体组合而成的，那么它有时就只能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有什么原因不是在脚部，而是在脚部一直延伸到大脑神经的某一个部分上，或者甚至在大脑本身里面，这种刺激与脚部受损时所产生的运动一样，我所感觉到的疼痛就好像在脚部一样，如此感官自然就上当受骗了；因为既然大脑中的相同运动只能把同样的感觉印刻在灵魂中，而这个感觉更多的是由脚部受伤的原因引起的，而不是由其他部位所受的刺激引起。理所当然，这个运动引发灵魂感到疼痛是在脚部而不是在身体的其他部位。而且，有时喉咙干渴不像平常那样，是由于喝水对身体健康是必要的，而是由完全相反的原因引起的，就如同患水肿病人所遭遇的那种情况。不过，我们宁可在这种情况下上当受骗，而不是相反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接二连三地上当受骗。其他情况也是一样。

24 . And certainly this consideration is of great service, not only in enabling me to recognize the errors to which my nature is liable, but likewise in rendering it more easy to avoid or correct them: for, knowing that all my senses more usually indicate to me what is true than what is false, in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body, and being able almost always to make use of more than a single sense in examining the same object, and besides this, being able to use my memory in connecting present with past knowledge, and my understanding which has already discovered all the causes of my errors, I ought no longer to fear that falsity may be met with in what is daily presented to me by the senses. And I ought to reject all the doubts of those bygone days, as hyperbolical and ridiculous, especially the general uncertainty respecting sleep, which I could not distinguish from the waking state: for I now find a very marke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tates, in respect that our memory can never connect our dreams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course of life, in the way it is in the habit of doing with events that occur when we are awake. And, in truth, if some one, when I am awake, appeared to me all of a sudden and as suddenly disappeared, as do the images I see in sleep, so that I could not observe either whence he came or whither he went, I should not without reason esteem it either a specter or phantom formed in my brain, rather than a real man. But when I perceive objects with regard to which I can distinctly determine both the place whence they come, and that in which they are, and the time at which they appear to me, and when, without interruption, I can connect the perception I have of them with the whole of the other parts of my life, I am perfectly sure that what I thus perceive occurs while I am awake and not during sleep. And I ought not in the least degree to doubt of the truth of these presentations, if, after having called together all my senses, my memory, and my understanding for the purpose of examining them, no deliverance is given by any one of these

faculties which is repugnant to that of any other: for since God is no deceiver, it necessarily follows that I am not herein deceived. But because the necessities of action frequently oblige us to come to a determination before we have had leisure for so careful an examination,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e life of man is frequently obnoxious to error with respect to individual objects; and we must, in conclusion, ac. knowledge the weakness of our nature.

24．当然，这个考虑对我有很大作用，不仅使我认识到我的本性可能犯的错误，同时也使我更容易地避免或者改正错误。因为我知道，在对身体有益的事物方面，我的所有感官指示给我的通常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又因为我差不多总是能够运用一种以上的感官来考察相同的对象，而且，除此之外，我还能利用我的记忆把现在的和过去的认识连接起来，并且我还能利用我的理解力，因为我的理解力已经发现了我的各种错误的一切原因，所以我就不必再害怕我的感官每日呈现给我的那些东西是虚假的了。而且我应该把我这过去的一切怀疑都抛弃掉，认为它们全都言过其实、荒谬绝伦，特别是把有关我不能区分清醒状态和睡梦状态的那种普遍的、不确定的事情抛弃掉，因为我现在发现这两种状态之间有一种非常显著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我们的记忆不能在我们清醒时所习惯的那样，把我们的各种梦境互相连接起来，也不能将梦境和日常生活连接起来。而且事实上，假如有人在我醒着时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又突然消失，就像我在睡着时所见到的影像那样，使我看不出他来自何方，去向何处，那么我就只能理智地把他看成是在我脑海里形成的一个怪影或者一个幽灵，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但是，当我察觉到一些对象时，我能清清楚楚地确定它们来自何方，所居何处，以及它们出现在我面前的时间，并且我能毫无间断地把我对它们产生的感觉同我整个生活的其他部分串接起来，那么我就完全可以肯定，我所察觉的东西是在醒着时出现的，而不是在梦中出现的。而且，如果在唤起我所有的感官、记忆和理解力去检查这些东西之后，只要所有这些官能给出的所有证据都互不相违，那么我就决不应该对这些呈现物的真实性有丝毫怀疑。因为，上帝不是骗

子，这必然说明我在这上面没有上当受骗。然而，由于行动经常迫使我们在没有工夫仔细探究之前就做出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人生经常会令人不快地在个别事情上犯错误；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本性存在着缺陷和弱点。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Gorgias
高尔吉亚篇

Plato
柏拉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高尔吉亚篇

Gorgias

柏拉图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GORGIAS 高尔吉亚篇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GORGIAS

高尔吉亚篇

PERSONS OF THE DIALOGUE: Callicles, Socrates,Chaerephon, Gorgias, Polus.

对话人物：卡利克勒，苏格拉底，凯勒丰，高尔吉亚，波卢斯

SCENE: The house of Callicles.

场景：卡利克勒家

CALLICLES: The wise man, as the proverb says, is late for a fray, but not for a feast.

卡利克勒：俗话说，聪明人避免争执，却不会错过盛宴。

SOCRATES: And are we late for a feast?

苏格拉底：我们刚错过了一场盛宴？

CALLICLES: Yes, and a delightful feast; for Gorgias has just been exhibiting to us many fine things.

卡利克勒：对，一场令人愉快的盛宴；因为高尔吉亚才向我们展示了许多绝妙的事物。

SOCRATES: It is not my fault, Callicles; our friend Chaerephon is to blame; for he would keep us loitering in the Agora.

苏格拉底：这不是我的过错，卡利克勒；要怪就怪我们的朋友凯勒丰，是他让我们在市民广场上逗留太久。

CHAEREPHON: Never mind, Socrates; the misfortune of which I have been the cause I will also repair; for Gorgias is a friend of mine, and I will make him give the exhibition again either now, or, if you prefer, at some other time.

凯勒丰：没关系，苏格拉底；这场错失因我而起，我会给予补偿；因为高尔吉亚是我的朋友，我会让他重新展示一次，要么现在，要么另找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

CALLICLES: What is the matter, Chaerephon—does Socrates want to hear Gorgias?

卡利克勒：怎么回事，凯勒丰——苏格拉底要听高尔吉亚的演

讲？

CHAEREPHON: Yes, that was our intention in coming.

凯勒丰：对，这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CALLICLES: Come into my house, then; for Gorgias is staying with me, and he shall exhibit to you.

卡利克勒：那么到我家来；高尔吉亚就在舍下，他会为你们展示一番。

SOCRATES: Very good, Callicles; but will he answer our questions? For I want to hear from him what is the nature of his art, and what it is which he professes and teaches; he may, as you (Chaerephon) suggest, defer the exhibition to some other time.

苏格拉底：很好，卡利克勒；但他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吗？因为我想请教他，他技艺的本质为何，以及他所教授的是什么。至于展示，如你（凯勒丰）所言，可以推迟到以后。

CALLICLES: There is nothing like asking him, Socrates; and indeed to answer questions is a part of his exhibition, for he was saying only just now, that any one in my house might put any question to him, and that he would answer.

卡利克勒：不用问他愿不愿意，苏格拉底；事实上，回答提问也是他展示的一部分。因为他刚才还说，在我家若有任何人提出任何问题，他都会回答。

SOCRATES: How fortunate! Will you ask him, Chaerephon?

苏格拉底：真是太幸运了！凯勒丰，要不由你来提问？

CHAEREPHON: What shall I ask him?

凯勒丰：我问什么呢？

SOCRATES: Ask him who he is.

苏格拉底：问他是谁。

CHAEREPHON: What do you mean?

凯勒丰：你的意思是？

SOCRATES: I mean such a question as would elicit from him, if he had been a maker of shoes, the answer that he is a cobbler. Do

you understand?

苏格拉底：我是说问一个能引导他这样作答的问题，如果他是做鞋的，他就会回答自己是鞋匠。明白了吗？

CHAEREPHON: I understand, and will ask him: Tell me, Gorgias, is our friend Callicles right in saying that you undertake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which you are asked?

凯勒丰：明白了，我这就问他；请告诉我，高尔吉亚，我们的朋友卡利克勒说你承诺过对别人有问必答，是这样吗？

GORGIAS: Quite right, Chaerephon: I was saying as much only just now; and I may add, that many years have elapsed since any one has asked me a new one.

高尔吉亚：确有此事，凯勒丰，我刚才也强调过这一点。再有，这么多年过去了，都没人向我提出过有新意的问题。

CHAEREPHON: Then you must be very ready, Gorgias.

凯勒丰：那你可要做好准备了，高尔吉亚。

GORGIAS: Of that, Chaerephon, you can make trial.

高尔吉亚：这个嘛，凯勒丰，你不妨一试。

POLUS: Yes, indeed, and if you like, Chaerephon, you may make trial of me too, for I think that Gorgias, who has been talking a long time, is tired.

波卢斯：的确如此，凯勒丰，如果你愿意，不妨也提问我试试。因为高尔吉亚已经讲了很久，想必已经疲倦了。

CHAEREPHON: And do you, Polus, think that you can answer better than Gorgias?

凯勒丰：波卢斯，你认为自己能比高尔吉亚回答得更好吗？

POLUS: What does that matter if I answer well enough for you?

波卢斯：要是我的回答足以令你满意，又会怎样呢？

CHAEREPHON: Not at all—and you shall answer if you like.

凯勒丰：不会怎样——你愿意的话你就来回答。

POLUS: Ask—

波卢斯：请问吧。

CHAEREPHON: My question is this: If Gorgias had the skill of his brother Herodicus, what ought we to call him? Ought he not to have the name which is given to his brother?

凯勒丰：我的问题是：假设高尔吉亚具有他的兄弟希罗狄库的技艺，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他呢？难道不应该用称呼他兄弟的名称来称呼他吗？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当然应该。

CHAEREPHON: Then we should be right in calling him a physician?

凯勒丰：那我们称他为医生不会错吧？

POLUS: Yes.

波卢斯：没错。

CHAEREPHON: And if he had the skill of Aristophon the son of Aglaophon, or of his brother Polygnotus, what ought we to call him?

凯勒丰：再假设他有着阿格拉俄封之子阿里斯托芬或者阿里斯托芬的兄弟波利格诺托斯那样的技能，我们该怎么称呼他呢？

POLUS: Clearly, a painter.

波卢斯：显而易见，画家。

CHAEREPHON: But now what shall we call him—what is the art in which he is skilled.

凯勒丰：可是现在我们该称他什么呢？——他擅长什么技艺呢？

POLUS: Oh Chaerephon, there are many arts among mankind which are experimental, and have their origin in experience, for experience makes the days of men to proceed according to art, and inexperience according to chance, and different persons in different ways are proficient in different arts, and the best persons in the best arts. And our friend Gorgias is one of the best, and the art in which he is a proficient is the noblest.

波卢斯：凯勒丰啊，人类有许多技艺是基于经验的，这些技艺源于经验的积累，因为经验形成技艺，使人类文明不断演进，而缺乏经验使之依赖于偶然。不同的人，术业专攻各不相同，层次水平各有高低，最优秀的人精通那些最优秀的技艺。我们的朋友高尔吉亚就是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他所擅长的技艺是最高尚的。

SOCRATES: Polus has been taught how to make a capital speech, Gorgias; but he is not fulfilling the promise which he made to Chaerephon.

苏格拉底：波卢斯已经学会了怎样作一场一流的演讲，高尔吉亚；但是，他并没有践行他给凯勒丰作出的承诺。

GORGIAS: What do you mean, Socrates?

高尔吉亚：苏格拉底，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SOCRATES: I mean that he has not exactly answered the question which he was asked.

苏格拉底：我是说波卢斯答非所问。

GORGIAS: Then why not ask him yourself?

高尔吉亚：那你为何不亲自问他呢？

SOCRATES: But I would much rather ask you, if you are disposed to answer: for I see, from the few words which Polus has uttered, that he has attended more to the art which is called rhetoric than to dialectic.

苏格拉底：如果你愿意回答的话，我更愿意请教你。因为我从波卢斯所说不多的字句中看出，他使用更多的技艺是修辞术而不是辩证法。

POLUS: What makes you say so, Socrates?

波卢斯：苏格拉底，你这么说的依据何在？

SOCRATES: Because, Polus, when Chaerephon asked you what was the art which Gorgias knows, you praised it as if you were answering some one who found fault with it, but you never said what the art was.

苏格拉底：波卢斯，这是因为在凯勒丰问你高尔吉亚所精通的技艺是什么时，你极力赞扬这种技艺，仿佛在回应某人对它的诋毁，对这种技艺到底是什么，你却只字未提。

POLUS: Why, did I not say that it was the noblest of arts?

波卢斯：怎么会呢，难道我没有说它是最高尚的技艺吗？

SOCRATES: Yes, indeed, but that was no answer to the question. Nobody asked what was the quality, but what was the nature, of the art, and by what name we were to describe Gorgias. And I would still beg you briefly and clearly, as you answered Chaerephon when he asked you at first, to say what this art is, and what we ought to call Gorgias: Or rather, Gorgias, let me turn to you, and ask the same question,—what are we to call you, and what is the art which you profess?

苏格拉底：是的，你确实谈到了这点，但这回答不了凯勒丰的问题。没有人问这门技艺的性质优劣，而是本质为何，还有应该怎么称呼高尔吉亚。我还是想恳请你像最初回答凯勒丰那样，给我一个简洁、明确的答案，说出这种技艺是什么，还有我们该如何称呼高尔吉亚。或者，高尔吉亚，我还是来问你吧，而且问你相同的问题——我们该怎么称呼你，还有你所精通的技艺叫什么？

GORGIAS: Rhetoric, Socrates, is my art.

高尔吉亚：修辞就是我的技艺，苏格拉底。

SOCRATES: Then I am to call you a rhetorician?

苏格拉底：那么我应该称你为修辞学家了？

GORGIAS: Yes, Socrates, and a good one too, if you would call me that which, in Homeric language, 'I boast myself to be.'

高尔吉亚：对，苏格拉底，我还是个优秀的修辞学家。如果你愿意用荷马的语言那样称呼我的话，那么“很荣幸我就是一名修辞学家。”

SOCRATES: I should wish to do so.

苏格拉底：我应该愿意这样称呼你。

GORGIAS: Then pray do.

高尔吉亚：那就请这样称呼吧。

SOCRATES: And are we to say that you are able to make other men rhetoricians?

苏格拉底：而且我们可以说你能训练别人成为修辞学家吗？

GORGIAS: Yes, that is exactly what I profess to make them, not only at Athens, but in all places.

高尔吉亚：可以。我确实宣称要把他们变成修辞学家，不仅是在雅典，而且是在世界各地。

SOCRATES: And will you continue to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Gorgias, as we are at present doing and reserve for another occasion the longer mode of speech which Polus was attempting? Will you keep your promise, and answer shortly the questions which are asked of you?

苏格拉底：高尔吉亚，你愿意像现在这样继续和我进行问答，而把波卢斯试图进行的长篇大论留待以后吗？能否请你遵守承诺，尽量简洁地回答我的提问？

GORGIAS: Some answers, Socrates, are of necessity longer; but I will do my best to make them as short as possible; for a part of my profession is that I can be as short as any one.

高尔吉亚：有些相对冗长的回答是必要的，苏格拉底，不过我会尽我所能地做到简洁；因为我职业的一部分就是可以和任何人一样简洁。

SOCRATES: That is what is wanted, Gorgias; exhibit the shorter method now, and the longer one at some other time.

苏格拉底：这才是我们所期待的，高尔吉亚；现在展示更加简洁的风格吧，长篇大论另找时间吧。

GORGIAS: Well, I will; and you will certainly say, that you never heard a man use fewer words.

高尔吉亚：好吧，我会的，你会发现从没有人比我更言简意赅。

SOCRATES: Very good then; as you profess to be a rhetorician, and a maker of rhetoricians, let me ask you, with what is rhetoric concerned: I might ask with what is weaving concerned, and you would reply (would you not?), with the making of garments?

苏格拉底：很好；你自称修辞学家，又是修辞学家的缔造者，我来问你，修辞关乎何事：我可能会问织布关乎何事，你会回答关乎制衣，你不会这么回答吗？

GORGIAS: Yes.

高尔吉亚：我会这么回答。

SOCRATES: And music is concerned with the composition of melodies?

苏格拉底：音乐关乎旋律的编排？

GORGIAS: It is.

高尔吉亚：正是。

SOCRATES: By Here, Gorgias, I admire the surpassing brevity of your answers.

苏格拉底：到目前为止，高尔吉亚，我很赞赏你简洁非凡的回答。

GORGIAS: Yes, Socrates, I do think myself good at that.

高尔吉亚：对，苏格拉底，我确实认为自己长于此道。

SOCRATES: I am glad to hear it; answer me in like manner about rhetoric: with what is rhetoric concerned?

苏格拉底：你这样说我很高兴；请以同样简洁的方式回答：修辞关乎何事？

GORGIAS: With discourse.

高尔吉亚：关乎话语。

SOCRATES: What sort of discourse, Gorgias?—such discourse as would teach the sick under what treatment they might get well?

苏格拉底：何种话语，高尔吉亚？——像教会病人接受何种治疗可康复的话语？

GORGIAS: No.

高尔吉亚：不是。

SOCRATES: Then rhetoric does not treat of all kinds of discourse?

苏格拉底：如此说来，修辞不是研究所有的话语？

GORGIAS: Certainly not.

高尔吉亚：当然不是。

SOCRATES: And yet rhetoric makes men able to speak?

苏格拉底：修辞使人能说会道？

GORGIAS: Yes.

高尔吉亚：是的。

SOCRATES: And to understand that about which they speak?

苏格拉底：修辞使人对所言之物心中有数？

GORGIAS: Of course.

高尔吉亚：当然。

SOCRATES: But does not the art of medicine, which we were just now mentioning, also make men able to understand and speak about the sick?

苏格拉底：但是我们刚刚谈到医学，医学的技艺不也使人能够了解并谈论病情吗？

GORGIAS: Certainly.

高尔吉亚：没错。

SOCRATES: Then medicine also treats of discourse?

苏格拉底：所以医学也研究话语了？

GORGIAS: Yes.

高尔吉亚：对。

SOCRATES: Of discourse concerning diseases?

苏格拉底：研究关乎疾病的话语？

GORGIAS: Just so.

高尔吉亚：正是如此。

SOCRATES: And does not gymnastic also treat of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good or evil condition of the body?

苏格拉底：如此说来，体育不也涉及身体状况好坏的话语吗？

GORGIAS: Very true.

高尔吉亚：很对。

SOCRATES: And the same, Gorgias, is true of the other arts—all of them treat of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subjects with which they severally have to do.

苏格拉底：其他门类的技艺，高尔吉亚，也同样如此——所有的技艺都涉及相关学科的话语。

GORGIAS: Clearly.

高尔吉亚：显而易见。

SOCRATES: Then why, if you call rhetoric the art which treats of discourse, and all the other arts treat of discourse, do you not call them arts of rhetoric?

苏格拉底：既然你把研究话语的技艺称为修辞学，并且承认所有其他的技艺也都与话语有关，为什么你不把它们统称为修辞学呢？

GORGIAS: Because, Socrates, the knowledge of the other arts has only to do with some sort of external action, as of the hand; but

there is no such action of the hand in rhetoric which works and takes effect only through the medium of discourse. And therefore I am justified in saying that rhetoric treats of discourse.

高尔吉亚：因为，苏格拉底，其他技艺仅仅涉及到某种外在行为，比如动手；而修辞学并不涉及此类动手的行为，它发挥作用的途径只能是借助话语。因此，我说修辞学关乎话语是有道理的。

SOCRATES: I am not sure whether I entirely understand you, but I dare say I shall soon know better; please to answer me a question—you would allow that there are arts?

苏格拉底：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理解了你的意思，但我敢说，一会儿我会理解得更透彻；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承认有技艺这回事吗？

GORGIAS: Yes.

高尔吉亚：承认。

SOCRATES: As to the arts generally, they are for the most part concerned with doing, and require little or no speaking; in painting, and statuary, and many other arts, the work may proceed in silence; and of such arts I suppose you would say that they do not come within the province of rhetoric.

苏格拉底：通常来说，技艺大都与行动相关，不太需要或者不需要话语；对于绘画、雕塑还有许多其他的技艺来说，创作可以在无声的状态下进行；我估计你会说这样的技艺不应划归在修辞学的范围之内。

GORGIAS: You perfectly conceive my meaning, Socrates.

高尔吉亚：你完全领会了我的意思，苏格拉底。

SOCRATES: But there are other arts which work wholly through the medium of language, and require either no action or very little, as, for example, the arts of arithmetic, of calculation, of geometry, and of playing draughts; in some of these speech is pretty nearly co-extensive with action, but in most of them the verbal element is greater—they depend wholly on words for their efficacy and power: and I take your meaning to be that rhetoric is an art of this latter sort?

苏格拉底：但另有一些技艺，完全以语言为媒介发挥作用，不需要或不太需要行动的参与，譬如，算术、计算、几何、还有下棋；诸如此类的技艺当中，一些需要言行通力合作，但对于其中多数的技艺来说，语言的作用更为重要——这类技艺完全依靠语言才能发挥效力、彰显力量：我想你所说的修辞学就是后者这类的技艺吧？

GORGIAS: Exactly.

高尔吉亚：完全正确。

SOCRATES: And yet I do not believe that you really mean to call any of these arts rhetoric; although the precise expression which you used was, that rhetoric is an art which works and takes effect only through the medium of discourse; and an adversary who wished to be captious might say, “And so, Gorgias, you call arithmetic rhetoric.' But I do not think that you really call arithmetic rhetoric any more than geometry would be so called by you.

苏格拉底：但我认为你不会真的将这些技艺称为修辞；虽然你把修辞精确地阐述为一种完全依赖话语发挥作用的技艺；喜欢吹毛求疵的对手也许会说：“按照你的定义，高尔吉亚，算术也称得上是修辞。”但我认为算术和几何一样，在你看来都称不上是真正的修辞。

GORGIAS: You are quite right, Socrates, in your apprehension of my meaning.

高尔吉亚：你说得很对，苏格拉底，我的意思你领会得很到位。

SOCRATES: Well, then, let me now have the rest of my answer—seeing that rhetoric is one of those arts which works mainly by the use of words, and there are other arts which also use words, tell me what is that quality in words with which rhetoric is concerned—Suppose that a person asks me about some of the arts which I was mentioning just now; he might say, 'Socrates, what is arithmetic?'

and I should reply to him, as you replied to me, that arithmetic is one of those arts which take effect through words. And then he would proceed to ask: 'Words about what?' and I should reply, words about odd and even numbers, and how many there are of each. And if he asked again: 'What is the art of calculation?' I should say, that also is one of the arts which is concerned wholly with words. And if he further said, 'Concerned with what?' I should say, like the clerks in the assembly, 'as aforesaid' of arithmetic, but with a 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 being that the art of calculation considers not only the quantities of odd and even numbers, but also their numerical relations to themselves and to one another. And suppose, again, I were to say that astronomy is only word—he would ask, 'Words about what, Socrates?' and I should answer, that astronomy tells us about the motions of the stars and sun and moon, and their relative swiftness.

苏格拉底：好，那现在让我讲完我的理解——鉴于修辞学是通过语言发挥作用的技艺之一，而其他一些技艺也使用语言，请告诉我与修辞相关的语言有什么特性——假设有人就我刚才提到的技艺向我发问；他可能会说："苏格拉底，算术是什么？"我会像你刚才回答我的那样回答他，算术是通过语言发挥作用的技艺之一。然后他可能会追问："关于什么的语言？"我会回答说关于奇偶数本身及其各自数目的语言。如果他又问："什么是计算？"我会回答，那也是完全与语言有关的技艺之一。假如他又问："关于什么的语言？"我会像集会上的书记员那样回答，"如上所述"，它和算术技艺一样，但还有一个区别，计算不仅涉及奇数和偶数的数目，而且涉及它们本身和彼此之间的数字关系。还可以再假设，如果我说，天文学不过是语言，他会问，"关于什么的语言，苏格拉底？"我会回答说，天文学为我们讲述日月星辰的运动及其相对速度。

GORGIAS: You would be quite right, Socrates.

高尔吉亚：很有道理，苏格拉底。

SOCRATES: And now let us have from you, Gorgias, the truth about rhetoric: which you would admit (would you not?) to be one of those arts which act always and fulfil all their ends through the medium of words?

苏格拉底：高尔吉亚，现在让我们听听你对修辞的真知灼见。你承不承认修辞是通过语言为媒介来实行并达其所有目的的技艺之一？

GORGIAS: True.

高尔吉亚：承认。

SOCRATES:Words which do what? I should ask. To what class of things do the words which rhetoric uses relate?

苏格拉底：是用来做什么的语言？我会这样问。修辞学使用的语言与哪类事物相关？

GORGIAS: To the greatest, Socrates, and the best of human things.

高尔吉亚：与人世间最了不起、最美好的事物有关，苏格拉底。

SOCRATES: That again, Gorgias is ambiguous; I am still in the dark: for which are the greatest and best of human things? I dare say that you have heard men singing at feasts the old drinking song, in which the singers enumerate the goods of life, first health, beauty next, thirdly, as the writer of the song says, wealth honesty obtained.

苏格拉底：又来了，高尔吉亚又在含糊其辞了。我还是不明白：人世间最了不起、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呢？我敢说你肯定听过人们在宴会上唱的那首古老的饮酒歌，那些歌者一一列举生命中美好的事物，一是健康，二是美貌，三是如词作者所言，合法财富。

GORGIAS: Yes, I know the song; but what is your drift?

高尔吉亚：没错，我知道那首歌；但你想说明什么呢？

SOCRATES: I mean to say, that the producers of those things which the author of the song praises, that is to say, the physician, the trainer, the money-maker, will at once come to you, and first the physician will say: 'Oh Socrates, Gorgias is deceiving you, for my art is concerned with the greatest good of men and not his.' And when I ask, Who are you? He will reply, 'I am a physician.' What do you mean? I shall say. Do you mean that your art produces the greatest good? 'Certainly,' he will answer, 'for is not health the

greatest good? What greater good can men have, Socrates?' And after him the trainer will come and say, 'I too, Socrates, shall be greatly surprised if Gorgias can show more good of his art than I can show of mine.' To him again I shall say, who are you, honest friend, and what is your business? 'I am a trainer,' he will reply, 'and my business is to make men beautiful and strong in body.' When I have done with the trainer, there arrives the money-maker, and he, as I expect, utterly despise them all. 'Consider Socrates,' he will say, 'whether Gorgias or any one else can produce any greater good than wealth.' Well, you and I say to him, and are you a creator of wealth? 'Yes,' he replies. And who are you? 'A money-maker.' And do you consider wealth to be the greatest good of man? 'Of course,' will be his reply. And we shall rejoin: Yes; but our friend Gorgias contends that his art produces a greater good than yours. And then he will be sure to go on and ask, 'What good? Let Gorgias answer.' Now I want you, Gorgias, to imagine that this question is asked of you by them and by me; what is that which, as you say, is the greatest good of man, and of which you are the creator? Answer us.

苏格拉底：我的意思是说，歌曲作者所赞扬的那些美好事物的创造者，我是指，医生、教练、商人，会立刻找到你，然后医生会第一个发话："苏格拉底啊，高尔吉亚在欺骗你，因为我的技艺才是关乎人类最根本利益的技艺，而不是他的。"当我问他"你是谁"时，他会回答说："我是个医生。""你是什么意思呢？"我会问。"你是说你的医术创造了最大利益吗？""没错"，他会回答说，"因为，健康不是最大的利益吗？人类还有什么比这大的利益吗，苏格拉底？"紧随其后的是教练。他会过来说："我也一样，苏格拉底，如果高尔吉亚能证明他的技艺比我的技艺更有优势，我会大为惊讶。"我同样会对他说："你是谁，诚实的朋友，你的职业是什么？""我是教练，"他会回答说，"我的职责是让人们体格更加健美、强壮。"当我答复完教练，商

人就过来了。正如我预料的一样，他十分鄙视其他所有人。“想想吧，苏格拉底，”他会说，“高尔吉亚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人是否能创造比财富更大的利益。”那么，你和我对他说：“你是财富的创造者吗？”“正是。”他答道。“你是做什么的？”“商人。”“你认为财富是人类最大的利益吗？”他会回答：“当然，”我们会反驳说：“没错；但是我们的朋友高尔吉亚声称他的技艺能创造更大的利益。”然后，他肯定会继续问：“什么利益？让高尔吉亚来回答。”现在，高尔吉亚，我想让你想象一下，假设你被我和他们问到这个问题；如你所说，由你所创造的那个人类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回答我们。

GORGIAS: That good, Socrates, which is truly the greatest, being that which gives to men freedom in their own persons, and to individuals the power of ruling over others in their several states.

高尔吉亚：这一利益，苏格拉底，的确是最伟大的，它给人们内在的自由，给每个人一种以不同身份统治他人的力量。

SOCRATES: And what would you consider this to be?

苏格拉底：你想把它看成什么呢？

GORGIAS: What is there greater than the word which persuades the judges in the courts, or the senators in the council, or the citizens in the assembly, or at any other political meeting?—if you have the power of uttering this word, you will have the physician your slave, and the trainer your slave, and the money-maker of whom you talk will be found to gather treasures, not for

himself, but for you who are able to speak and to persuade the multitude.

高尔吉亚：有什么比能在法庭上说服法官、在会议上说服议员，或是在集会或者任何其他的政治会议上说服民众的语言更伟大呢？——如果你有说出这种语言的力量，你将让那位医生成为你的奴隶，你将让那位教练成为你的奴隶，还有你谈到的那位商人将会囤积财宝，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你这个会说话并且会劝说民众的人。

SOCRATES: Now I think, Gorgias, that you have very accurately explained what you conceive to be the art of rhetoric; and you mean to say, if I am not mistaken, that rhetoric is the artificer of persuasion, having this and no other business, and that this is her crown and end. Do you know any other effect of rhetoric over and above that of producing persuasion?

苏格拉底：现在，高尔吉亚，我认为你已经准确地解释出了你心目中的修辞学艺术是什么样子；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是说修辞学专司劝说，此外没有其他职责，而且这就是修辞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的。你还知道修辞学有其他比劝说更高级的作用吗？

GORGIAS: No. The definition seems to me very fair, Socrates; for persuasion is the chief end of rhetoric.

高尔吉亚：不知道，在我看来，这个定义非常恰当，苏格拉底；因为劝说是修辞学的主要目的。

SOCRATES: Then hear me, Gorgias, for I am quite sure that if there ever was a man who entered on the discussion of a matter from a pure love of knowing the truth, I am such a one, and I should say the same of you.

苏格拉底：那么听我说，高尔吉亚，因为我很确定如果有人——纯粹地从热爱真理的角度出发，进入一个议题的讨论，我就是其中一位，我应该说你也是其中之一。

GORGIAS: What is coming, Socrates?

高尔吉亚：接下来呢，苏格拉底？

SOCRATES: I will tell you: I am very well aware that I do not know what, according to you, is the exact nature, or what are the topics of that persuasion of which you speak, and which is given by rhetoric; although I have a suspicion about both the one and the other. And I am going to ask—what is this power of persuasion which is given by rhetoric, and about what? But why, if I have a suspicion, do I ask instead of telling you? Not for your sake, but in order that the argument may proceed in such a manner as is most likely to set forth the truth. And I would have you observe, that I am right in asking this further question: If I asked, 'What sort of a painter is Zeuxis?' and you said, 'The painter of figures,' should I not be right in asking, 'what kind of figures, and where do you find them?'

苏格拉底：我会告诉你的：我十分清楚自己并不知道你所说的那种劝说的切实本质是什么，或者说，你所说的修辞学中的那种劝说涉及什么话题；尽管我对这两个问题都感到怀疑。而且我要问——修辞学赋予劝说的是怎样一种力量，是关于什么的力量。但是，如果我有疑问，为什么我不告诉你我的疑问而是向你发问呢？我并不是为你考虑，而是为了使辩论能以最可能呈现真理的方式来进行。并且，我想让你看到，我进一步问下面这个问题是正确的。如果我问："宙克西斯算哪类画家？"然后你说："人物画家。"我问："哪种人物，你在哪里找到这些人物的？"这样问会有错吗？

GORGIAS: Certainly.

高尔吉亚：当然没错。

SOCRATES: And the reason for asking this second question would be, that there are other painters besides, who paint many other figures?

苏格拉底：问第二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还有其他的画家，画了许多其他的人物？

GORGIAS: True.

高尔吉亚：对。

SOCRATES: But if there had been no one but Zeuxis who painted them, then you would have answered very well.

苏格拉底：但如果除了宙克西斯再没有别人画这些人物，那么你就会回答的很好了。

GORGIAS: Quite so.

高尔吉亚：确实如此。

SOCRATES: Now I want to know about rhetoric in the same way;—is rhetoric the only art which brings persuasion, or do other arts have the same effect? I mean to say—does he who teaches anything persuade men of that which he teaches or not?

苏格拉底：现在，我想用同样的方法来了解修辞学；——修辞学是唯一一门能进行劝说的技艺吗？还是有其他的技艺也具有同样的作用？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一个人无论教的是什么，他都在劝说人们接受他所教授的东西吗？

GORGIAS: He persuades, Socrates,—here can be no mistake about that.

高尔吉亚：他是在劝说，苏格拉底，——这么说没错。

SOCRATES: Again, if we take the arts of which we were just now speaking—do not arithmetic and the arithmeticians teach us the properties of number?

苏格拉底：再回到刚才的问题，如果我们以刚才谈到的种种技艺而论——算术和算术家不教我们数字的特性吗？

GORGIAS: Certainly.

高尔吉亚：当然教。

SOCRATES: And therefore persuade us of them?

苏格拉底：因此是在劝说我们接受这些特性？

GORGIAS: Yes.

高尔吉亚：是的。

SOCRATES: Then arithmetic as well as rhetoric is an artificer of persuasion?

苏格拉底：那么算术和修辞学都是劝说的技艺。

GORGIAS: Clearly.

高尔吉亚：显然如此。

SOCRATES: And if any one asks us what sort of persuasion, and about what,—we shall answer, persuasion which teaches the quantity of odd and even; and we shall be able to show that all the other arts of which we were just now speaking are artificers of persuasion, and of what sort, and about what.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有任何人问我们哪种劝说，关于什么，——我们将回答，是教授奇偶数数量的劝说；我们将能够说明我们刚才谈到的所有其他种类的技艺都能产生劝说，并证明它们是哪种劝说、有关什么。

GORGIAS: Very true.

高尔吉亚：很对。

SOCRATES: Then rhetoric is not the only artificer of persuasion?

苏格拉底：那么修辞学不是劝说的唯一创造者？

GORGIAS: True.

高尔吉亚：对。

SOCRATES: Seeing, then, that not only rhetoric works by persuasion, but that other arts do the same, as in the case of the painter, a question has arisen which is a very fair one: Of what persuasion is rhetoric the artificer, and about what?—is not that a fair way of putting the question?

苏格拉底：既然不光是修辞学靠劝说起作用，还有其他的技艺也是这样，正如刚才提到的画家的例子一样，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修辞学产生的是什么样的劝说，是关于什么的？——以这种方式讨论这个问题不好吗？

GORGIAS: I think so.

高尔吉亚：我认为不错。

SOCRATES: Then, if you approve the question, Gorgias, what is the answer?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你赞成我这么问，高尔吉亚，答案是什么？

GORGIAS: I answer, Socrates, that rhetoric is the art of persuasion in courts of law and other assemblies, as I was just now saying, and about the just and unjust.

高尔吉亚：苏格拉底，我的答案是，修辞学是用于法庭和其他集会的劝说艺术，正如我之前所说，而且是关于公正与不公。

SOCRATES: And that, Gorgias, was what I was suspecting to be your notion; yet I would not have you wonder if by-and-by I am found repeating a seemingly plain question; for I ask not in order to confute you, but as I was saying that the argument may proceed consecutively, and that we may not get the habit of anticipating and suspecting the meaning of one another's words; I would have you develop your own views in your own way, whatever may be your hypothesis.

苏格拉底：高尔吉亚，这就是为什么我怀疑你所持有的观念；然而如果你发现我在重复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感到疑惑；因为我提问不是为了将你驳倒，而是正如我所说的，使辩论可以一直连续进行下去，我们不可以养成预测和怀疑彼此说话含义的习惯；我会允许你以自己的方式展开自己的观点，无论你的假说如何。

GORGIAS: I think that you are quite right, Socrates.

高尔吉亚：我认为你说得很对，苏格拉底。

SOCRATES: Then let me raise another question;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having learned'?

苏格拉底：下面让我再问一个问题；有“已经学会”这样一回事吗？

GORGIAS: Yes.

高尔吉亚：有。

SOCRATES: And there is also 'having believed'?

苏格拉底：也有“已经相信”了？

GORGIAS: Yes.

高尔吉亚：有。

SOCRATES: And is the 'having learned' the same as 'having believed,' and are learning and belief the same things?

苏格拉底：那么“已经学会”和“已经相信”是一样的吗？学习和相信是一回事吗？

GORGIAS: In my judgment, Socrates, they are not the same.

高尔吉亚：依我判断，苏格拉底，不一样。

SOCRATES: And your judgment is right, as you may ascertain in this way—if a person were to say to you, 'Is there, Gorgias, a false belief as well as a true?' —you would reply, if I am not mistaken, that there is.

苏格拉底：你的判断是对的，这一点你可以这样来弄清——假设一个人对你说："高尔吉亚，是不是既有错误的相信又有正确的相信？"——你会回答，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这样的。

GORGIAS: Yes.

高尔吉亚：是的。

SOCRATES: Well, but is there a false knowledge as well as a true?

苏格拉底：好，可是，既有错误的知识，又有正确的知识吗？

GORGIAS: No.

高尔吉亚：不是。

SOCRATES: No, indeed; and this again proves that knowledge and belief differ.

苏格拉底：确实不是，这再次证明了知识和相信是不一样的。

GORGIAS: Very true.

高尔吉亚：非常正确。

SOCRATES: And yet those who have learned as well as those who have believed are persuaded?

苏格拉底：但那些学会了的人和相信了的人都是受到了劝说？

GORGIAS: Just so.

高尔吉亚：正是如此。

SOCRATES: Shall we then assume two sorts of persuasion,—one which is the source of belief without knowledge, as the other is

of knowledge?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假定有两类劝说如何，——一类是没有基于知识的相信，另一类是基于知识的相信？

GORGIAS: By all means.

高尔吉亚：当然可以。

SOCRATES: And which sort of persuasion does rhetoric create in courts of law and other assemblies about the just and unjust, the sort of persuasion which gives belief without knowledge, or that which gives knowledge?

苏格拉底：修辞学在法庭和其他集会上产生出来的关于公正与不公的劝说是哪一类呢，是没有基于知识使人相信的劝说，还是基于知识的劝说？

GORGIAS: Clearly, Socrates, that which only gives belief.

高尔吉亚：很明显，苏格拉底，是只使人相信的那类劝说。

SOCRATES: Then rhetoric, as would appear, is the artificer of a persuasion which creates belief about the just and unjust, but gives

no instruction about them?

苏格拉底：那么修辞学是一种能够劝说别人相信公正与不公的技艺，但它不提供对公正与不公的指导，是吗？

GORGIAS: True.

高尔吉亚：对。

SOCRATES: And the rhetorician does not instruct the courts of law or other assemblies about things just and unjust, but he creates belief about them; for no one can be supposed to instruct such a vast multitude about such high matters in a short time?

苏格拉底：修辞学家并不对法庭和其他集会的人就公正与不公进行指导，但是他使人相信；因为不可能有人能在短时间内就这样高深的话题对如此广大的民众群体进行指导？

GORGIAS: Certainly not.

高尔吉亚：当然不能。

SOCRATES: Come, then, and let us see what we really mean about rhetoric; for I do not know what my own meaning is as yet.

When the assembly meets to elect a physician or a shipwright or any other craftsman, will the rhetorician be taken into counsel? Surely not. For at every election he ought to be chosen who is most skilled; and, again, when walls have to be built or harbours or docks to be constructed, not the rhetorician but the master workman will advise; or when generals have to be chosen and an order of battle arranged, or a proposition taken, then the military will advise and not the rhetoricians: what do you say, Gorgias? Since you profess to be a rhetorician and a maker of rhetoricians, I cannot do better than learn the nature of your art from you. And here let me assure you that I have your interest in view as well as my own. For likely enough some one or other of the young men present might desire to become your pupil, and in fact I see some, and a good many too, who have this wish, but they would be too modest to question you. And therefore when you are interrogated by me, I would have you imagine that you are interrogated by them. 'What is the use of coming to you, Gorgias?' They will say—'about what will you teach us to advise the state?—about the just and unjust only, or about those other things also which Socrates has just mentioned?' How will you answer them?

苏格拉底：那么，好吧，让我们看看我们关于修辞学到底想说什么；因为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意思。当与会者开会选举一名医生或一个船木工或是任何其他行业的一个手艺人，他们会征求修辞学家的建议吗？当然不会。因为每次选举都应该是最训练有素的人当选；而且，当需要砌墙、建港口或是码头时，进行指导的是娴熟的工匠而不是修辞学家；或者，当我们需要选出将军、下战令，或是有个职位需要担当时，指导我们的是军人而不是修辞学家：你的看法是什么呢，高尔吉亚？既然你自称是修辞学家和修辞学家的创造者，我从你那里了解你技艺的性质再好不过了。现在我向你保证，我既考虑到了你的利益，也考虑到了我自己的利益。因为很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中有人渴望

成为你的学生，而且事实上我看到了一些这样的青年人有这个愿望，并且为数不少，但是他们由于太谦逊了而不好质疑你。因此当我向你发问时，我希望你想象成是他们在向你发问。“向你学习有什么用处呢，高尔吉亚？”他们会说——“你将教我们什么来为城邦出谋划策呢？——只是关于公正和不公，还是也包括苏格拉底刚才提及的那些其他的事情？”你将如何回答他们呢？

GORGIAS: I like your way of leading us on, Socrates, and I will endeavour to reveal to you the whole nature of rhetoric. You must have heard, I think, that the docks and the walls of the Athenians and the plan of the harbour were devi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unsels, partly of Themistocles, and partly of Pericles, and not at the suggestion of the builders.

高尔吉亚：我喜欢你引领我们谈话的方式，苏格拉底，我将努力向你展示修辞学的全部性质。我想，你一定听说过，雅典人已经建的码头和城墙，以及计划建的港口，都是根据建议设计出来的，这些建议一部分来自塞米斯托克利斯，一部分来自伯里克利，而非来自建筑工匠。

SOCRATES: Such is the tradition, Gorgias, about Themistocles; and I myself heard the speech of Pericles when he advised us about the middle wall.

苏格拉底：关于塞米斯托克利斯，高尔吉亚，这属于传统；而且我亲耳听到过伯里克利对中部城墙的建造提出建议时的演讲。

GORGIAS: And you will observe, Socrates, that when a decision has to be given in such matters the rhetoricians are the advisers; they are the men who win their point.

高尔吉亚：而且你会注意到，苏格拉底，当必须针对这样的事情作决定时，出谋划策的是修辞学家；是他们的观点得到采纳。

SOCRATES: I had that in my admiring mind, Gorgias, when I asked what is the nature of rhetoric, which always appears to me, when I look at the matter in this way, to be a marvel of greatness.

苏格拉底：高尔吉亚，当我问你修辞学的本质是什么时，我心里一直谨记这一点；若以这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修辞学的本质于我而言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GORGIAS: A marvel, indeed, Socrates, if you only knew how rhetoric comprehends and holds under her sway all the inferior arts. Let me offer you a striking example of this. On several occasions I have been with my brother Herodicus or some other physician to see one of his patients, who would not allow the physician to give him medicine, or apply a knife or hot iron to him; and I have persuaded him to do for me what he would not do for the physician just by the use of rhetoric. And I say that if a rhetorician and a physician were to go to any city, and had there to argue in the Ecclesia or any other assembly as to which of them should be elected state-physician, the physician would have no chance; but he who could speak would be chosen if he wished; and in a contest with a man of any other profession the rhetorician more than any

one would have the power of getting himself chosen, for he can speak more persuasively to the multitude than any of them, and on any subject. Such is the nature and power of the art of rhetoric! And yet, Socrates, rhetoric should be used like any other competitive art, not against everybody,—the rhetorician ought not to abuse his strength any more than a pugilist or pancratiast or other master of fence;—because he has powers which are more than a match either for friend or enemy, he ought not therefore to strike, stab, or slay his friends. Suppose a man to have been trained in the palestra and to be a skilful boxer,—he in the fulness of his strength goes and strikes his father or mother or one of his familiars or friends; but that is no reason why the trainers or fencing-masters should be held in detestation or banished from the city;—surely not. For they taught their art for a good purpose, to be used against enemies and evil-doers, in self-defence not in aggression, and others have perverted their instructions, and turned to a bad use their own strength and skill. But not on this account are the teachers bad, neither is the art in fault, or bad in itself; I should rather say that those who make a bad use of the art are to blame. And the same argument holds good of rhetoric; for the rhetorician can speak against all men and upon any subject,—in short, he can persuade the multitude better than any other man of anything which he pleases, but he should not therefore seek to defraud the physician or any other artist of his reputation merely because he has the power; he ought to use rhetoric fairly, as he would also use his athletic powers. And if after having become a rhetorician he makes a bad use of his strength and skill, his instructor surely ought not on that account to be held in detestation or banished. For he was intended by his teacher to make a good use of his instructions, but he abuses them. And therefore he is the person who ought to be held in detestation, banished, and put to death, and not his instructor.

高尔吉亚：一个奇迹，的确如此，苏格拉底，如果你仅仅知道修辞学如何理解和支配其他次一级的技艺的话。让我给你举个在这方面突出的例子吧。有几次我和我的兄弟希罗狄库或是其他的某个医生去看他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不愿意让医生给自己开药，不愿意开刀或使用烧灼术；医生说服不了他，而我正是运用了修辞学，使他对我言听计从。而且，据我估计，如果一名修辞学家和一名医生要去任何一座城市，而且不得不在那里的市民议会或是任何其他集会上辩论谁应该当选为城邦医生，那位医生不会当选；但是，那个能言善辩的人如果希望自己当选的话，就能被选上；在与其他任何职业的人竞争的时候，修辞学家比其他任何人更有能力使自己当选，因为他在面对公众讲话时，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具有说服力，无论谈论的是什么话题。这就是修辞学这种技艺的本质和力量！然而，苏格拉底，修辞学的运用应该和其他任何一门竞技技艺一样，不是用来打击他人，——修辞学家理应和拳击手、摔跤运动员、击剑手一样，不滥用自己的力量；——因为修辞学家的力量远比他朋友和敌人的力量强大，因此他不该袭击、伤害或杀死他的朋友。假设一个人在角斗士学校经过训练，成为了一个技艺精湛的拳击手，——他力量强盛，去袭击自己的父母、熟人，或是朋友，但人们不应该以此为理由去憎恨他的教练或击剑老师，或是把他们从城市驱逐出去；——绝对不应该。因为他们传授技艺用意良好，旨在抗击敌人和坏人，为了自卫而不是进攻，是别人曲解了他们的教诲，滥用了他们自己的力量和技艺。但不能据此判断老师不够好，也不该把错误归咎于技艺，或者认为技艺本身不好；我宁可说应该怪那些滥用自己技艺的人。这一论证同样适用于修辞学；因为修辞学家有能力就任何话题攻击任何人，——概括来说，他有能力劝说民众接受他中意的任何事情，他的劝说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效，但他不应该仅仅因为自己有这种能力就伺机去骗取医生或其他艺术家的名誉；他应当将修辞学用于正途，就像他会正确运用体育才能一样。成为修辞学家之后，如果他滥用力量和技艺，他的老师当然不应该为此受到憎恶和驱逐。因为老师本打算让他把所学用于正途，但他却滥用学问。因此他才是应该受到憎恶、驱逐、处死的人，而不是他的老师。

SOCRATES: You, Gorgias, like myself, have had great experience of disputations, and you must have observed, I think, that they do not always terminate in mutual edification, or in the definition by either party of the subjects which they are discussing; but disagreements are apt to arise—somebody says that another has not spoken truly or clearly; and then they get into a passion and begin to quarrel, both parties conceiving that their opponents are arguing from personal feeling only and jealousy of themselves, not from any interest in the question at issue. And sometimes they will go on abusing one another until the company at last are quite vexed at themselves for ever listening to such fellows. Why do I say this? Why, because I cannot help feeling that you are now saying what is not quite consistent or accordant with what you were saying at first about rhetoric. And I am afraid to point this out to you, lest you should think that I have some animosity against you, and that I speak, not for the sake of discovering the truth, but from jealousy of you. Now if you are one of my sort, I should like to cross-examine you, but if not I will let you alone. And what is my sort? You will ask. I am one of those who are very willing to be refuted if I say anything which is not true, and very willing to refute any one else who says what is not true, and quite as ready to be refuted as to refute; for I hold that this is the greater gain of the two, just as the gain is greater of being cured of a very great evil than of curing another. For I imagine that there is no evil which a man can endure so great as an erroneous opinion about the matters of which we are speaking; and if you claim to be one of my sort, let us have the discussion out, but if you would rather have done, no matter;—let us make an end of it.

苏格拉底：你，高尔吉亚，和我自己一样，有着丰富的辩论经验。我想你一定也注意到了，辩论并非常常以双方互相启迪，或是其

中任何一方给所讨论的话题下定义而终止；相反，更可能出现的是各执一词——一个人说另一个人所说的不真实、不清楚；然后双方情绪变得激动，开始争吵起来，双方都认为对手仅仅是从个人情感和对他们的妒意出发在争论，而不是出于对辩题的任何兴趣。有时他们会继续互相辱骂，直到最后同伴们自己开始恼火于真不该来听这些家伙辩论。我为什么说这些呢？为什么，因为我禁不住感到你现在所说的和你最初说的修辞学不太一致。我恐怕要向你指出这点，以免你认为我对你有什么敌意，认为我的言谈并不是为了发现真理，而是出于对你的嫉妒。现在，如果你我是同类人，我想盘问你一下，但如果不是，我不再缠着你。那么我这类人是什么人呢？你会问。我们这类人一旦说了任何有悖真理的言论，就很愿意听取反驳，而且当其他任何人的言谈有悖真理时，我们也很愿意进行反驳。正如反驳别人一样，我也同样准备好了被他们反驳；——因为我认为两者中被反驳者的收获更大，就像身陷极为重大的灾祸，得到救治比救治别人收获更多。因为我料想，在我们谈到的事情上产生的错误观点这种大恶，是没人能够忍受的；而且，如果你宣称自己属于我们这类人，让我们讨论个彻底吧，但是如果你认为已经讨论过了，没关系；——让我们就此结束。

GORGIAS: I should say, Socrates, that I am quite the man whom you indicate; but, perhaps, we ought to consider the audience, for, before you came, I had already given a long exhibition, and if we proceed the argument may run on to a great length. And therefore I think that we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we, may not be detaining some part of the company when they are wanting to do something else.

高尔吉亚：我应该说，苏格拉底，我正是你所指的这种人；但是，或许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观众，因为在你来之前，我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演讲，如果我们继续下去，辩论会持续非常长的时间。因此，我想我们应该考虑到，当一些同伴想干别的事情时，我们不要耽误他

们的时间。

CHAEREPHON: You hear the audience cheering, Gorgias and Socrates, which shows their desire to listen to you; and for myself, heaven forbid that I should have any business on hand which would take me away from a discussion so interesting and so ably maintained.

凯勒丰：你们听见了观众在欢呼吧，高尔吉亚、苏格拉底，这表明他们渴望听你们辩论；就我自己而言，我手头要是有任何的事务要处理，使我离开这么有趣并且进行得如此巧妙的辩论，那可是天理不容啊。

CALLICLES: By the gods, Chaerephon, although I have been present at many discussions, I doubt whether I was ever so much delighted before, and therefore if you go on discoursing all day I shall be the better pleased.

卡利克勒：诸神在上，凯勒丰，尽管我出席过很多辩论场合，但是我怀疑自己是否曾经这么愉快过，因此如果你们继续演讲一整天，我将会更高兴。

Socrates: I may truly say, Callicles, that I am willing, if Gorgias is.

苏格拉底：我可以据实以告，卡利克勒，我愿意，如果高尔吉亚

愿意的话。

GORGIAS: After all this, Socrates, I should be disgraced if I refused, especially as I have promised to answer all com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shes of the company, then, do you begin, and ask of me any question which you like.

高尔吉亚：经过这一切之后，苏格拉底，如果我拒绝就是有失风度，尤其因为我已经承诺过要回答所有来访者的问题；那么，按照同伴们的意愿，就请你开始就任何你想问的问题向我发问吧。

SOCRATES: Let me tell you then, Gorgias, what surprises me in your words; though I dare say that you may be right, and I may have understood your meaning. You say that you can make any man, who will learn of you, a rhetorician?

苏格拉底：那么让我告诉你，高尔吉亚，你的话中是什么使我感到意外；尽管我敢说你可能是对的，而且我可能误解了你的意思。你是说你能够使任何一个愿意向你学习的人成为修辞学家吗？

GORGIAS: Yes.

高尔吉亚：是的。

SOCRATES: Do you mean that you will teach him to gain the

ears of the multitude on any subject, and this not by instruction but by persuasion?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说你将教他使民众在任何话题上都听取他的意见，并且是通过劝说而不是通过教导吗？

GORGIAS: Quite so.

高尔吉亚：很对。

SOCRATES: You were saying, in fact, that the rhetorician will have greater powers of persuasion than the physician even in a matter of health?

苏格拉底：事实上，你是在说修辞学家劝说的本领会比医生的更大，甚至在健康问题上也是如此？

GORGIAS: Yes, with the multitude,—that is.

高尔吉亚：是的，对于民众而言，——就是这样。

SOCRATES: You mean to say, with the ignorant; for with those who know he cannot be supposed to have greater powers of persuasion.

苏格拉底：你是想说，对于无知的人来说是这样；因为在有知识的人看来，他的劝说本领并非更大。

GORGIAS: Very true.

高尔吉亚：非常正确。

SOCRATES: But if he is to have more power of persuasion than the physician, he will have greater power than he who knows?

苏格拉底：但如果他劝说的本领比医生的更大，他将比有知识的人有更大的劝说本领是吗？

GORGIAS: Certainly.

高尔吉亚：当然。

SOCRATES: Although he is not a physician—is he?

苏格拉底：尽管他不是医生——是吗？

GORGIAS: No.

高尔吉亚：是的，他不是医生。

SOCRATES: And he who is not a physician must, obviously, be ignorant of what the physician knows.

苏格拉底：显然，一个人如果不是医生，一定对医生所知道的东西一无所知。

GORGIAS: Clearly.

高尔吉亚：明显是这样。

SOCRATES: Then, when the rhetorician is more persuasive than the physician, the ignorant is more persuasive with the ignorant than he who has knowledge?—is not that the inference?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修辞学家比医生更具有说服力，那么对于无知者来说，无知的人比具备知识的人更具有说服力？——不就是这个推断结果吗？

GORGIAS: In the case supposed—yes.

高尔吉亚：在这种假定的情况下——是的。

SOCRATES: And the same holds of the relation of rhetoric to all the other arts; the rhetorician need not know the truth about things; he has only to discover some way of persuading the ignorant that he has more knowledge than those who know?

苏格拉底：修辞学和所有其他技艺的关系也是如此；修辞学家用不着懂得事物的真相；他只需要去发现某种方法来劝说无知者他比那些有知识的人知道的更多？

GORGIAS: Yes, Socrates, and is not this a great comfort?—not to have learned the other arts, but the art of rhetoric only, and yet to be in no way inferior to the professors of them?

高尔吉亚：是的，苏格拉底，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吗？——并未习得其他技艺，而仅仅掌握了修辞学，就丝毫不比这些技艺的专家差？

SOCRATES: Whether the rhetorician is or not inferior on this account is a question which we will hereafter examine if the enquiry is likely to be of any service to us; but I would rather begin by asking, whether he is as ignorant of the just and unjust, base and honourable, good and evil, as he is of medicine and the other arts; I mean to say, does he really know anything of what is good and evil, base or honourable, just or unjust in them; or has he only a way with the ignorant of persuading them that he not knowing is to be esteemed to know more about these things than someone else who knows? Or must the pupil know these things and come to you

knowing them before he can acquire the art of rhetoric? If he is ignorant, you who are the teacher of rhetoric will not teach him—it is not your business; but you will make him seem to the multitude to know them, when he does not know them; and seem to be a good man, when he is not. Or will you be unable to teach him rhetoric at all, unless he knows the truth of these things first? What is to be said about all this? By heavens, Gorgias, I wish that you would reveal to me the power of rhetoric, as you were saying that you would.

苏格拉底：以这种理由来判断修辞学家是否不如那些技艺专家，这还是一个疑问，如果探讨这个问题可能对我们有所贡献的话，我们之后将要探讨一下；但我更想通过问这样一个问题来开始，他对公正与不公、卑贱与体面、善与恶的无知，是否和他对医学和其他技艺的无知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不是真的对其他技艺中何为善恶、何为卑贱、何为体面、何为公正、何为不公有所了解；还是说他并不了解，而只是掌握了就这些事情来劝说无知的人们的一种方法，就被视为比专家知道的还多而得到敬重？或者说学生是否必须知道这些事情并且在习得修辞学之前，来拜师时就懂得这些事情？如果他不知道这些，你作为老师也不会教他——这不是你的职责；但是当他不知道这些，你将让他在公众面前看起来知道这些；而且不是好人看起来却像是好人。或者说你会不会根本没有能力教他修辞学，除非他自己首先了解这些事情的真相？对于这一切，你要说些什么呢？天啊，高尔吉亚，我希望你愿意向我展示修辞学的力量，正如你之前说你会的。

GORGIAS: Well, Socrates, I suppose that if the pupil does chance not to know them, he will have to learn of me these things as well.

高尔吉亚：好吧，苏格拉底，我料想如果学生碰巧不知道这些事情，他将不得不跟我学习这些。

SOCRATES: Say no more, for there you are right; and so he whom you make a rhetorician must either know the nature of the just and unjust already, or he must be taught by you.

苏格拉底：就说到这里吧，因为在这一点上你是对的。所以，被你教导成为修辞学家的那个人必须要么早就知道公正和不公的本质，要么必须是你来教他。

GORGIAS: Certainly.

高尔吉亚：当然。

SOCRATES: Well, and is not he who has learned carpentering a carpenter?

苏格拉底：那么，学过木工活的人不就是木匠吗？

GORGIAS: Yes.

高尔吉亚：是。

SOCRATES: And he who has learned music a musician?

苏格拉底：学过音乐的人就是音乐家？

GORGIAS: Yes.

高尔吉亚：是的。

SOCRATES: And he who has learned medicine is a physician, in like manner? He who has learned anything whatever is that which his knowledge makes him.

苏格拉底：同样，学过医学的人就是医生？一个人不论学过任何知识，都被所学知识塑造成为某种人。

GORGIAS: Certainly.

高尔吉亚：没错。

SOCRATES: And in the same way, he who has learned what is just is just?

苏格拉底：同理，学过何为公正的人就是公正的？

GORGIAS: To be sure.

高尔吉亚：肯定是这样。

SOCRATES: And he who is just may be supposed to do what is just?

苏格拉底：公正的人理应做事公正？

GORGIAS: Yes.

高尔吉亚：对。

SOCRATES: And must not the just man always desire to do what is just?

苏格拉底：公正的人不一定总是渴望做公正的事吧？

GORGIAS: That is clearly the inference.

高尔吉亚：推论显然如此。

SOCRATES: Surely, then, the just man will never consent to do injustice?

苏格拉底：当然，那么公正的人决不会同意做不公正的事？

GORGIAS: Certainly not.

高尔吉亚：当然不会。

SOCRATES: And according to the argument the rhetorician must be a just man?

苏格拉底：那么根据论断，修辞学家一定是一个公正的人？

GORGIAS: Yes.

高尔吉亚：是的。

SOCRATES: And will therefore never be willing to do injustice?

苏格拉底：因此他决不愿意做不公正的事？

GORGIAS: Clearly not.

高尔吉亚：当然不愿意。

SOCRATES: But do you remember saying just now that the trainer is not to be accused or banished if the pugilist makes a wrong use of his pugilistic art; and in like manner, if the rhetorician makes a bad and unjust use of rhetoric, that is not to be laid to the charge of his teacher, who is not to be banished, but the wrong-doer himself who made a bad use of his rhetoric—he is to be banished—was not that said?

苏格拉底：但是你还记得自己刚才说过如果拳击手滥用拳击术，老师不应该受到指责和驱逐吧；同样地，如果修辞学家对修辞术的运用是不恰当的、非正义的，他的老师不该被指责，不该被驱逐，而是作恶的人自己滥用了修辞术，他才该受到指责——他才该受到驱逐——你没这样说过吗？

GORGIAS: Yes, it was.

高尔吉亚：是的，说过。

SOCRATES: But now we are affirming that the aforesaid rhetorician will never have done injustice at all?

苏格拉底：但现在，我们是在承认之前谈及的修辞学家永远不会做出任何不公正之事？

GORGIAS: True.

高尔吉亚：是的。

SOCRATES: And at the very outset, Gorgias, it was said that rhetoric treated of discourse, not (like arithmetic) about odd and even, but about just and unjust? Was not this said?

苏格拉底：在最开始的时候，高尔吉亚，我们说过修辞学论述的是话语，不是关于（像算术一样）奇偶数的话语，而是关于公正和不公正的话语？难道没说过这些吗？

GORGIAS: Yes.

高尔吉亚：说过。

SOCRATES: I was thinking at the time, when I heard you saying so, that rhetoric, which is always discoursing about justice, could not possibly be an unjust thing. But when you added, shortly afterwards, that the rhetorician might make a bad use of rhetoric I noted with surprise the inconsistency into which you had fallen; and I said, that if you thought, as I did, that there was a gain in

being refuted, there would be an advantage in going on with the question, but if not, I would leave off. And in the course of our investigations, as you will see yourself, the rhetorician has been acknowledged to be incapable of making an unjust use of rhetoric, or of willingness to do injustice. By the dog, Gorgias, there will be a great deal of discussion, before we get at the truth of all this.

苏格拉底：当我听你这样说的时候，我在想修辞学总是在谈论正义，其本身不可能是非正义的事情。但是紧接着，当你补充说修辞学家可以滥用修辞术时，我惊讶地注意到你陷入了前后不一致之中；我说到，如果你同我一样，认为被驳斥能有所收获，那么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才有意义，但如果你不这么认为，我将停止讨论。我们在探讨的过程中，正如你自己会看到的，已经承认修辞学家不可能不正当地运用修辞术，也不愿做非正义的事情。奉神犬之名，高尔吉亚，我们在获得关于这一切的真相之前，将会进行大量的讨论。

POLUS: And do even you, Socrates, seriously believe what you are now saying about rhetoric? What! because Gorgias was ashamed to deny that the rhetorician knew the just and the honourable and the good, and admitted that to any one who came to him ignorant of them he could teach them, and then out of this admission there arose a contradiction—the thing which you dearly love, and to which not he, but you, brought the argument by your captious questions—(do you seriously believe that there is any truth in all this?) For will any one ever acknowledge that he does not know, or cannot teach, the nature of justice? The truth is, that there is great want of manners in bringing the argument to such a pass.

波卢斯：苏格拉底，你自己当真相信你此刻关于修辞学的言论

吗？什么！因为高尔吉亚羞于否认修辞学家懂得何为公正、何为廉耻、何为德行，而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对任何一个来拜师但不懂公正、廉耻、德行的人，他都会教授他们，于是由此承认产生了一个矛盾命题——这正是你最喜欢的事情，而且是你，而不是他，用你的那些吹毛求疵的提问把这场辩论引向了一个矛盾命题——（你当真相信这一切中存在真理吗？）因为会有谁愿意承认自己不懂或者没能力讲授公正的本质吗？事实是，把争论引到这个困境是极不礼貌的。

SOCRATES: Illustrious Polus, the reason why we provide ourselves with friends and children is, that when we get old and stumble, a younger generation may be at hand to set us on our legs again in our words and in our actions: and now, if I and Gorgias are stumbling, here are you who should raise us up; and I for my part engage to retract any error into which you may think that I have fallen—upon one condition:

苏格拉底：伟大的波卢斯啊，我们之所以结交朋友，生养子嗣，就是为了在我们年老吐字不清、步履蹒跚的时候，有年轻一代能在旁边扶我们一把，帮我们表意达行：那么现在，倘若我和高尔吉亚都开始犯糊涂了，就该你来帮助我们；就我而言，我答应收回之前所有你可能认为我说错的话——倘若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

POLUS: What condition?

波卢斯：什么条件？

SOCRATES: That you contract, Polus, the prolixity of speech in

which you indulged at first.

苏格拉底：波卢斯，你得精简起初你乐此不疲的冗长演讲。

POLUS: What! Do you mean that I may not use as many words as I please?

波卢斯：什么！你是说我都不可以畅所欲言吗？

SOCRATES: Only to think, my friend, that having come on a visit to Athens, which is the most free—spoken state in Hellas, you when you got there, and you alone, should be deprived of the power of speech—that would be hard indeed. But then consider my case—shall not I be very hardly used, if, when you are making a long oration, and refusing to answer what you are asked, I am compelled to stay and listen to you, and may not go away? I say rather, if you have a real interest in the argument, or, to repeat my former expression, have any desire to set it on its legs, take back any statement which you please; and in your turn ask and answer, like myself and Gorgias—refute and be refuted: for I suppose that you would claim to know what Gorgias knows—would you not?

苏格拉底：只需想象，我的朋友，你来海拉斯——言论最自由的城邦雅典参观，当到这里时，你却发现只有自己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这的确会让人难以忍受。可是，考虑一下我的境况——如果你一直长篇大论并拒绝回答提问，我被迫呆在原地聆听，不能退场，我岂不是没有多大作用了？我是想说，如果你确实对此辩论感兴趣，或重

复我之前所说的，有意愿让这场辩论继续进行的话，请收回你随意发表的言论；轮到你来问答，就像我和高尔吉亚之前那样——反驳对方或者接受反驳：因为我想你会声称知道高尔吉亚所知道的——不会吗？

POLUS: Yes.

波卢斯：我会的。

SOCRATES: And you, like him, invite any one to ask you about anything which he pleases, and you will know how to answer him?

苏格拉底：那么像他一样，你也会请任何人就任何事情对你提问，并知道怎样回答吧？

POLUS: To be sure.

波卢斯：当然了。

SOCRATES: And now, which will you do, ask or answer?

苏格拉底：那么现在，你是愿意提问还是回答？

POLUS: I will ask; and do you answer me, Socrates, the same question which Gorgias, as you suppose, is unable to answer: What is rhetoric?

波卢斯：我来提问；并且请你务必回答我，苏格拉底，还是之前你认为高尔吉亚没能解答的那个相同的问题：修辞学是什么？

SOCRATES: Do you mean what sort of an art?

苏格拉底：你是说修辞学是何种技艺吗？

POLUS: Yes.

波卢斯：是。

SOCRATES: To say the truth, Polus, it is not an art at all, in my opinion.

苏格拉底：实话实说，波卢斯，在我看来，修辞学根本就不是技艺。

POLUS: Then what, in your opinion, is rhetoric?

波卢斯：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是修辞学？

SOCRATES: A thing which, as I was lately reading in a book of yours, you say that you have made an art.

苏格拉底：一种事物，最近我在你写的一本书中读到，你说你已经使之成为一种技艺。

POLUS: What thing?

波卢斯：什么事物？

SOCRATES: I should say a sort of experience.

苏格拉底：我想说这是一种经验。

POLUS: Does rhetoric seem to you to be an experience?

波卢斯：修辞学在你看来是一种经验吗？

SOCRATES: That is my view, but you may be of another mind.

苏格拉底：这是我的看法，但你可以存有异议。

POLUS:An experience in what?

波卢斯：什么方面的经验？

SOCRATES: An experience in producing a sort of delight and gratification.

苏格拉底：一种可以创造欣喜和满足之情的经验。

POLUS: And if able to gratify others, must not rhetoric be a fine thing?

波卢斯：如果能满足别人的需要，修辞学肯定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不是吗？

SOCRATES: What are you saying, Polus? Why do you ask me whether rhetoric is a fine thing or not, when I have not as yet told you what rhetoric is?

苏格拉底：你在说什么啊，波卢斯？当我还没有告诉你修辞学是什么，你为什么问我修辞学好坏与否？

POLUS: Did I not hear you say that rhetoric was a sort of experience?

波卢斯：你不是跟我说修辞学是一种经验吗？

SOCRATES: Will you, who are so desirous to gratify others, afford a slight gratification to me?

苏格拉底：既然你如此渴望满足他人需要，是否也能稍稍满足我一下呢？

POLUS: I will.

波卢斯：行。

SOCRATES: Will you ask me, what sort of an art is cookery?

苏格拉底：你能不能这样问我，烹饪是什么样的技艺？

POLUS: What sort of an art is cookery?

波卢斯：烹饪是一种什么样的技艺？

SOCRATES: Not an art at all, Polus.

苏格拉底：根本就不算技艺，波卢斯。

POLUS: What then?

波卢斯：那算什么？

SOCRATES: I should say an experience.

苏格拉底：我说是种经验。

POLUS: In what? I wish that you would explain to me.

波卢斯：什么方面的？我希望你能向我解释。

SOCRATES: An experience in producing a sort of delight and gratification, Polus.

苏格拉底：一种可以创造欣喜和满足之情的经验，波卢斯。

POLUS: Then are cookery and rhetoric the same?

波卢斯：那么修辞学和烹饪是一样的了？

SOCRATES: No, they are only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ame profession.

苏格拉底：不，它们是同一领域的不同分工。

POLUS: Of what profession?

波卢斯：什么领域？

SOCRATES: I am afraid that the truth may seem discourteous; and I hesitate to answer, lest Gorgias should imagine that I am making fun of his own profession. For whether or no this is that art of rhetoric which Gorgias practises I really cannot tell—from what he was just now saying, nothing appeared of what he thought of his art, but the rhetoric which I mean is a part of a not very creditable whole.

苏格拉底：我担心真相听起来会很无礼；而且我在犹豫怎样回答，以免高尔吉亚会认为我在取笑他的职业。因为这究竟是不是高尔吉亚所从事的修辞艺术，我看不出——从他刚刚所说的话来看，看不出任何他对自己技艺的看法，但我认为的修辞学就是不怎么值得称道的总体的一部分。

GORGIAS: A part of what, Socrates? Say what you mean, and never mind me.

高尔吉亚：什么的一部分，苏格拉底？请直抒胸臆，我不介意。

SOCRATES: In my opinion then, Gorgias, the whole of which rhetoric is a part is not an art at all, but the habit of a bold and ready wit, which knows how to manage mankind: this habit I sum up under the word 'flattery'; and it appears to me to have many other parts, one of which is cookery, which may seem to be an art, but, as I maintain, is only an experience or routine and not an art—another part is rhetoric, and the art of attiring and sophistry are two others; thus there are four branches, and four different things answering to them. And Polus may ask, if he likes, for he has not as yet been informed, what part of flattery is rhetoric: he did not see that I had not yet answered him when he proceeded to ask a further question: Whether I do not think rhetoric a fine thing? But I shall not tell him whether rhetoric is a fine thing or not, until I have first answered, 'What is rhetoric?' For that would not be right, Polus; but I shall be happy to answer, if you will ask me, what part of flattery is rhetoric?

苏格拉底：在我看来，高尔吉亚，修辞学作为其部分的整体，根本就算不上技艺，而只是一种胆大而善辩的习性罢了，这种习性深谙操纵人性之道：我将其归到“谄媚”这一词下；而且我认为这种习性还包含其他几个分支，其中之一就是烹饪，烹饪貌似技艺，但我坚持认为它只是一种经验或者一套程序，而不算技艺——修辞学是另外一个部分，还有两个部分是打扮和诡辩，这样就有了四个分支，也有四种不同的事物与其一一对应。那么波卢斯可能会发问，如果他愿意的

话，因为他还不知道修辞学是谄媚的哪个分支：他都没意识到我还没回答他呢，就接着问我另外一个问题：问我认为修辞学是好是坏。但是我将把修辞学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放到后面回答，在我先回答了“什么是修辞学？”的问题之后。因为那样是不合适的，波卢斯，但是我很乐意回答，如果你愿意问我修辞学是谄媚的哪个部分？

POLUS: I will ask and do you answer? What part of flattery is rhetoric?

波卢斯：我愿意这样问，你会回答吗？修辞学是谄媚的哪个部分？

SOCRATES: Will you understand my answer? Rhetoric, according to my view, is the ghost or counterfeit of a part of politics.

苏格拉底：你能理解我的答案吗？修辞学，在我看来，就是模仿和伪造了政治学的一部分。

POLUS: And noble or ignoble?

波卢斯：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

SOCRATES: Ignoble, I should say, if I am compelled to answer, for I call what is bad ignoble: though I doubt whether you

understand what I was saying before.

苏格拉底：卑鄙的，我这样认为，如果我不得不回答的话。因为我认为不好的事物就是卑鄙的：尽管我怀疑你是否理解我刚才说的。

GORGIAS: Indeed, Socrates, I cannot say that I understand myself.

高尔吉亚：事实上，苏格拉底，我自己也不敢说已经理解。

SOCRATES: I do not wonder, Gorgias; for I have not as yet explained myself, and our friend Polus, colt by name and colt by nature, is apt to run away.

苏格拉底：对此，我并不吃惊，高尔吉亚，因为我还没有给出解释。而我们的朋友波卢斯，人如其名，天性就像一只精力旺盛的小马驹，老想着往前跑。

GORGIAS: Never mind him, but explain to me what you mean by saying that rhetoric is the counterfeit of a part of politics.

高尔吉亚：不用理会他，请向我解释，你说修辞学就是对政治学一部分的伪造，是什么意思？

SOCRATES: I will try, then, to explain my notion of rhetoric, and if I am mistaken, my friend Polus shall refute me. We may assume the existence of bodies and of souls?

苏格拉底：那么我来尽力解释一下我对修辞学的看法，而且如果我有弄错的地方，我的朋友波卢斯会反驳我的。我们可以假定肉体和灵魂是存在的吗？

GORGIAS: Of course.

高尔吉亚：当然可以。

SOCRATES: You would further admit that there is a good condition of either of them?

苏格拉底：此外，你们也承认这两者都有状态良好的时候吧？

GORGIAS: Yes.

高尔吉亚：是的。

SOCRATES: Which condition may not be really good, but good only in appearance? I mean to say, that there are many persons who appear to be in good health, and whom only a physician or trainer

will discern at first sight not to be in good health.

苏格拉底：这两种种状态也可能并非真的良好，而只是表象良好？我是想说，很多人看上去身体健康，而只有医生或者教练能一眼看出他们并不健康。

GORGIAS: True.

高尔吉亚：确实。

SOCRATES: And this applies not only to the body, but also to the soul: in either there may be that which gives the appearance of health and not the reality?

苏格拉底：这种现象不只见于身体，也见于灵魂：两者都会有貌似健康实则不然的情况？

GORGIAS: Yes, certainly.

高尔吉亚：是，当然。

SOCRATES: And now I will endeavour to explain to you more clearly what I mean: The soul and body being two, have two arts corresponding to them: there is the art of politics attending on the

soul; and another art attending on the body, of which I know no single name, but which may be described as having two divisions, one of them gymnastic, and the other medicine. And in politics there is a legislative part, which answers to gymnastic, as justice does to medicine; and the two parts run into one another, justice having to do with the same subject as legislation, and medicine with the same subject as gymnastic, but with a difference. Now, seeing that there are these four arts, two attending on the body and two on the soul for their highest good; flattery knowing, or rather guessing their natures, has distributed herself into four shams or simulations of them; she puts on the likeness of some one or other of them, and pretends to be that which she simulates, and having no regard for men's highest interests, is ever making pleasure the bait of the unwary, and deceiving them into the belief that she is of the highest value to them. Cookery simulates the disguise of medicine, and pretends to know what food is the best for the body; and if the physician and the cook had to enter into a competition in which children were the judges, or men who had no more sense than children, as to which of them best understands the goodness or badness of food, the physician would be starved to death. A flattery I deem this to be and of an ignoble sort, Polus, for to you I am now addressing myself, because it aims at pleasure without any thought of the best. An art I do not call it, but only an experience, because it is unable to explain or to give a reason of the nature of its own applications. And I do not call any irrational thing an art; but if you dispute my words, I am prepared to argue in defence of them.

苏格拉底：现在，我将努力把自己的想法解释得更清楚一些：灵魂和身体作为两个部分，各有一种技艺与之相对：叫做政治学的技艺照管灵魂；另外一种看护身体的技艺，我还没有合适的名字来称呼它，不过它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体操，另一部分是医术。在政治

学里，立法部分与体操对应，司法与医术对应。它们各自包括的两个部分有相互交叠的地方，司法与立法涉及同一事物，医术与体操涉及同一事物，但仍有区别。现在看到有这样四种技艺，两两分开，分别看护着身体和灵魂，以实现它们的最大益处；谄媚在了解或猜测到了这四种技艺各自的品性后就将自己分成了四个部分，对它们进行伪造和仿制；她努力模仿它们各自的样子，假装自己就是她所仿造的那门技艺，对人们的最高利益丝毫不予理会，只利用感官上的享乐为诱饵诱骗那些粗心大意者上钩，使他们相信她对于他们具有至高价值。烹饪冒充成医术的样子，并假装知道哪些食物对身体最有益；如果医生和厨师必须一起参加由孩子或头脑并不比孩子更聪明的人做评委的竞赛，比比谁更清楚食物的好出和坏处，那么医生肯定会被饿死。我认为这就是谄媚，并且性质卑劣，波卢斯，我是在对你说话，因为烹饪旨在提供感官上的愉悦而不考虑最大益处。我不会用技艺来描述烹饪，我仅仅叫它经验，因为它不能对自己实际应用的性质进行解释或给以缘由。我不会称任何一种非理性的事物为技艺；但是你若要对我的言论进行反驳，我已做好准备为它们进行辩护。

Cookery, then, I maintain to be a flattery which takes the form of medicine; and tiring, in like manner, is a flattery which takes the form of gymnastic, and is knavish, false, ignoble, illiberal, working deceitfully by the help of lines, and colours, and enamels, and garments, and making men affect a spurious beauty to the neglect of the true beauty which is given by gymnastic.

因此，烹饪，我认为只是一种伪装成医术的谄媚；同样，打扮只是一种伪装成体操的谄媚，它狡诈、虚伪、卑鄙、狭隘，借助各种线条、色彩、化妆品和服饰起作用，把人们伪装得比实际更美丽，以至于忽略了体操可以赋予人体的真正的美。

I would rather not be tedious, and therefore I will only say,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geometricians (for I think that by this time you will be able to follow).

为了长话短说，我将仅仅借用几何学家的方法进行说明（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你们应该能够理解我的意思了）。

astiring: gymnastic:: cookery: medicine;

打扮：体操：：烹饪：医术；

or rather,

或者

as tiring: gymnastic:: sophistry: legislation;

打扮：体操：：诡辩：立法；

and

以及

as cookery: medicine:: rhetoric: justice.

烹饪：医术：：修辞学：司法。

And this, I say, is the na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hetorician and the sophist, but by reason of their near connection, they are apt to be jumbled up together; neither do they know what to make of themselves, nor do other men know what to make of them. For if the body presided over itself, and were no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oul, and the soul did not discern and discriminate between cookery and medicine, but the body was made the judge of them, and the rule of judgment was the bodily delight which was given by them, then the word of Anaxagoras, that word with which you, friend Polus, are so well acquainted, would prevail far and wide: 'Chaos' would come again, and cookery, health,and medicine would mingle in an indiscriminate mass. And now I have told you my notion of rhetoric, which is, in relation to the soul, what cookery is to the body. I may have been inconsistent in making a long speech, when I would not allow you to discourse at length. But I think that I may be excused, because you did not understand me, and could make no use of my answer when I spoke shortly, and therefore I had to enter into an explanation. And if I show an equal inability to make use of yours, I hope that you will speak at equal length; but if I am able to understand you, let me have the benefit of your brevity, as is only fair: And now you may do what you please with my answer.

我认为这就是修辞学家和诡辩学家的本质区别，但由于关系紧密，他们很容易被混淆；他们自己不知道如何理解自身，其他人也无

从晓得。因为如果人由身体主宰，身体不听从灵魂的指导，灵魂就不能将烹饪和医术辨认和区别开来，而是由身体来评判两者，评判时就看两者是否产生了身体上的愉悦感，那么我的朋友波卢斯非常熟悉的阿那克萨哥拉的那个词语，就要大行其道了，“混乱”将再次盛行，烹饪、健康、医术将混为难以区分的一团。现在，我已将我对修辞学的理解告诉你们了，修辞学之于灵魂正如烹饪之于身体。我做了如此冗长的演讲，却不允许你们长篇大论，这样可能前后矛盾。但是我想这不是我的错，因为你们不能领会我的意思，倘若我言简意赅的话，我的答案对你们便毫无启发，所以我才进行解释。如果我觉得我同样不能理解你们的话，我希望你们也能够用同样的篇幅进行解释；但是如果我能够领会你们所言的话，请尽量让我能够得益于你们简洁的言谈，这样才算公平：现在你们可以随意理解我的答案了。

POLUS: What do you mean? Do you think that rhetoric is flattery?

波卢斯：你是什么意思？你认为修辞学就是谄媚吗？

SOCRATES: Nay, I said a part of flattery; if at your age, Polus, you cannot remember, what will you do by-and-by, when you get older?

苏格拉底：不，我说是谄媚的一部分；——波卢斯，如果你在这个年纪就这么健忘的话，变老后可怎么办呢？

POLUS: And are the good rhetoricians meanly regarded in states, under the idea that they are flatterers?

波卢斯：那么要在城邦里把这些优秀的修辞学家当作可耻的谄媚者吗？

SOCRATES: Is that a question or the beginning of a speech?

苏格拉底：这是个提问，还是演讲的开始？

POLUS: I am asking a question.

波卢斯：我在提问。

SOCRATES: Then my answeris, that they are not regarded at all.

苏格拉底：那我的答案是，他们根本就不值一提。

POLUS: How not regarded? Have they not very great power in states?

波卢斯：怎么能不值一提？他们在城邦中不是拥有很大的权力吗？

SOCRATES: Not if you mean to say that power is a good to the possessor.

苏格拉底：不是，如果你想说权力之于掌权者是好事的话。

POLUS: And that is what I do mean to say.

波卢斯：那正是我想说的。

SOCRATES: Then, if so, I think that they have the least power of all the citizens.

苏格拉底：那么，这样的话，我认为他们是公民中拥有最小权力的人。

POLUS: What! Are they not like tyrants? They kill and despoil and exile any one whom they please.

波卢斯：什么！他们难道不像僭主吗？可以随意杀戮、掠夺或者驱逐任何人。

SOCRATES: By the dog, Polus, I cannot make out at each deliverance of yours, whether you are giving an opinion of your own, or asking a question of me.

苏格拉底：奉神犬之名，波卢斯，我不明白你每次说话，到底是在阐述己见，还是在向我提问？

POLUS: I am asking a question of you.

波卢斯：我在向你提问。

SOCRATES: Yes, my friend, but you ask two questions at once.

苏格拉底：行，我的朋友，可是你同时问了两个问题。

POLUS: How two questions?

波卢斯：为什么成了两个问题？

SOCRATES: Why, did you not say just now that the rhetoricians are like tyrants, and that they kill and despoil or exile any one whom they please?

苏格拉底：为什么，你刚才难道没有说修辞学家像僭主一样，可以随意杀戮、掠夺或者驱逐任何人吗？

POLUS: I did.

波卢斯：我说过。

SOCRATES: Well then, I say to you that here are two questions in one, and I will answer both of them. And I tell you, Polus, that rhetoricians and tyrants have the least possible power in states, as I was just now saying; for they do literally nothing which they will, but only what they think best.

苏格拉底：对啊，我是说这句话包含了两个问题，我将对二者都进行解答。我告诉你，波卢斯，修辞学家和僭主在城邦中拥有可能的最小权力，正如我刚才说过的那样；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按照意愿行事，只是做了自己认为最好的事情。

POLUS: And is not that a great power?

波卢斯：难道这不是很大的权力吗？

SOCRATES: Polus has already said the reverse.

苏格拉底：波卢斯之前还持相反意见呢！

POLUS: Said the reverse! Nay,that is what I assert.

波卢斯：相反意见！不，这正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

SOCRATES: No, by the great—what do you call him?—not you, for you say that power is a good to him who has the power.

苏格拉底：不，对有权势的人是这样——你怎么称呼这类人？——而对你来说不是这样，因为你说权力对于其拥有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POLUS: I do.

波卢斯：对。

SOCRATES: And would you maintain that if a fool does what he think best, this is a good, and would you call this great power?

苏格拉底：那么你认为，如果一个蠢才做了自以为最好的事情，这也是好事吗？你会称之为极大的权力吗？

POLUS: I should not.

波卢斯：我不会。

SOCRATES: Then you must prove that the rhetorician is not a fool, and that rhetoric is an art and not a flattery—and so you will have refuted me; but if you leave me unrefuted, why, the rhetoricians who do what they think best in states, and the tyrants, will have nothing upon which to congratulate themselves, if as you say, power be indeed a good, admitting at the same time that what is done without sense is an evil.

苏格拉底：那么你就得证明修辞学家不是蠢才，并且修辞学是门技艺而不是恭维之术了——那样你就能完全驳倒我了；但假若你不能驳倒我，那么，城邦里这些大行自以为最有利之事的修辞学家和僭主就没有什么值得自我庆贺了，如果，诚如你所说的那样，权力确实是件好事，你同时也该承认不加理智随意行事是坏事。

POLUS: Yes; I admit that.

波卢斯：是的，我承认。

SOCRATES: How then can the rhetoricians or the tyrants have great power in states, unless Polus can refute Socrates, and prove to him that they do as they will?

苏格拉底：那么要证明修辞学家和僭主的确在城邦中拥有极大的权力，波卢斯，你是不是就得反驳苏格拉底并向他证明，他们确实是依照个人意愿行事的呢？

POLUS: This fellow—

波卢斯：这家伙——

SOCRATES: I say that they do not do as they will;—now refute me.

苏格拉底：我说他们并没有按个人意愿行事；——现在反驳我吧。

POLUS: Why, have you not already said that they do as they think best?

波卢斯：什么，你难道没说过他们做了自己认为最好的事情吗？

SOCRATES: And I say so still.

苏格拉底：我现在也这样说。

POLUS: Then surely they do as they will?

波卢斯：那他们肯定是按意愿行事的啊？

SOCRATES: I deny it.

苏格拉底：我否认。

POLUS: But they do what they think best?

波卢斯：但他们做了他们认为最好的事情？

SOCRATES: Aye.

苏格拉底：对。

POLUS: That, Socrates, is monstrous and absurd.

波卢斯：苏格拉底，这简直令人震惊而且荒唐。

SOCRATES: Good words, good Polus, as I may say in your own peculiar style; bu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to ask of me, either prove that I am in error or give the answer yourself.

苏格拉底：说得好啊，好一个波卢斯，借用你独特的风格来说；但是你要还有任何疑问，要么证明我错了，要么就自己做出回答。

POLUS: Very well, I am willing to answer that I may know what you mean.

波卢斯：很好，我想告诉你我可能明白你的意思了。

SOCRATES: Do men appear to you to will that which they do, or to will that further end for the sake of which they do a thing? When they take medicine, for example, at the bidding of a physician, do they will the drinking of the medicine which is painful, or the health for the sake of which they drink?

苏格拉底：你认为人们做某件事情，是出于对做事本身的意愿还是对事情可能产生的结果的意愿？比如说，人们按照医生的嘱咐吃药，是因为他们喜欢这种令人痛苦的药物呢，还是为了健康才这样做？

POLUS: Clearly, the health.

波卢斯：显而易见，为了健康。

SOCRATES: And when men go on a voyage or engage in business, they do not will that which they are doing at the time; for who would desire to take the risk of a voyage or the trouble of business?—But they will, to have the wealth for the sake of which they go on a voyage.

苏格拉底：还有，那些长途航行和从事贸易的人们，当时并不是出于意愿而去从事这类活动的；因为有谁愿意冒险航行或者不怕困难而从事贸易呢？——但是，他们都想获得财富，才会踏上长途航行。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And is not this universally true? If a man does something for the sake of something else, he wills not that which he does, but that for the sake of which he does it.

苏格拉底：这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吗？如果一个人做某事是为了另外一件事，那他意愿之事并不是所行之事，而是所得之事。

POLUS: Yes.

波卢斯：是。

SOCRATES: And are not all things either good or evil, or intermediate and indifferent?

苏格拉底：而且任何事情都可以是好事、坏事、或处于中间状态的不好不坏之事和无关紧要之事？

POLUS: To be sure, Socrates.

波卢斯：毫无疑问，苏格拉底。

SOCRATES: Wisdom and health and wealth and the like you would call goods, and their opposites evils?

苏格拉底：智慧、健康、财富及诸如此类的事物，你会称之为好事，而与其相反的事物你会称之为坏事吧？

POLUS: I should.

波卢斯：我会。

SOCRATES: And the things which are neither good nor evil, and which partake sometimes of the nature of good and at other times of evil, or of neither, are such as sitting, walking, running, sailing; or, again, wood, stones, and the like—these are the things which you call neither good nor evil?

苏格拉底：而那些不好不坏的事情，以及会在某些时候表现出好事品质、在另外一些时候却表现出坏事品质，或者表现不好不坏的事情，它们是诸如坐、行走、跑步、航海；再或者木、石之类的事物——你会把这类事物归到不好不坏一类吧？

POLUS: Exactly so.

波卢斯：正是如此。

SOCRATES: Are these indifferent things done for the sake of the good, or the good for the sake of the indifferent?

苏格拉底：人们是为了好事而去做不好不坏的事情呢，还是为了不好不坏的事情去做好事呢？

POLUS: Clearly, the indifferent for the sake of the good.

波卢斯：显然，是为了好事而去做不好不坏的事情。

SOCRATES: When we walk we walk for the sake of the good, and under the idea that it is better to walk, and when we stand we stand equally for the sake of the good?

苏格拉底：我们行走，是为了能得到行走的好处，认为这行走更有益；我们站立，同样是为了这样做的好处？

POLUS: Yes.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And when we kill a man we kill him or exile him or despoil him of his goods, because, as we think, it will conduce to our good?

苏格拉底：当我们杀人的时候，我们要么将他杀死、驱逐，要么将他的财产据为己有，因为我们认为，这使我们得利？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Men who do any of these things do them for the sake of the good?

苏格拉底：人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好事所驱？

POLUS: Yes.

波卢斯：是的。

SOCRATES: And did we not admit that in doing something for

the sake of something else, we do not will those things which we do, but that other thing for the sake of which we do them?

苏格拉底：我们之前不是已经都认可了，我们做一件事是为了其他事，我们意愿之事并非所行之事，而是从中获益之事？

POLUS: Most true.

波卢斯：很对。

SOCRATES: Then we do not will simply to kill a man or to exile him or to despoil him of his goods, but we will to do that which conduces to our good, and if the act is not conducive to our good we do not will it; for we will, as you say, that which is our good, but that which is neither good nor evil, or simply evil, we do not will. Why are you silent, Polus? Am I not right?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并不是单凭意愿就处死、驱逐某一个人或者掠夺他的财产，而是愿意做有助于我们得到好处的事情，如果这种行为不能给我们带来利益，我们就不会愿意这样做了。因为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们都愿意做于我们有益的好事，而不愿做不好不坏或者纯粹的坏事。波卢斯，你为什么缄口不言呢？难道我说错了吗？

POLUS: You are right.

波卢斯：你说得对。

SOCRATES: Hence we may infer, that if any one, whether he be a tyrant or a rhetorician, kills another or exiles another or deprives him of his property, under the idea that the act is for his own interests when really not for his own interests, he may be said to do what seems best to him?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如果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僭主还是修辞学家，将他人杀戮、驱逐或者掠夺其财产，以为这样会给自己带来利益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他可以说是做了看似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

POLUS: Yes.

波卢斯：是的。

SOCRATES: But does he do what he wills if he does what is evil? Why do you not answer?

苏格拉底：但如果他所做的是坏事，他是在依照意愿行事吗？你为什么不回答？

POLUS: Well, I suppose not.

波卢斯：嗯，我想不是。

SOCRATES: Then if great power is a good as you allow, will such a one have great power in a state?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权势如你所见是好事的话，这样的人会在城邦里握有重权吗？

POLUS: He will not.

波卢斯：他不会。

SOCRATES: Then I was right in saying that a man may do what seems good to him in a state, and not have great power, and not do what he wills?

苏格拉底：那么，我说一个人可以在城邦中做看似于己有利之事，却没有权势也不能按意愿行事是没错的了？

POLUS: As though you, Socrates, would not like to have the power of doing what seemed good to you in the state, rather than not; you would not be jealous when you saw any one killing or despoiling or imprisoning whom he pleased. Oh, no!

波卢斯：苏格拉底，你仿佛不想拥有这种可做看似于己有利之事的权力，而不是情况相反；当你看到别人随意杀戮、掠夺或囚禁他人，你不会羡慕吗？啊，不会吧！

SOCRATES: Justly or unjustly, do you mean?

苏格拉底：你是问这种行为正义还是非正义？

POLUS: In either case is he not equally to be envied?

波卢斯：无论哪种情况，他不是都惹人羡慕吗？

SOCRATES: Forbear, Polus!

苏格拉底：克制，波卢斯！

POLUS: Why 'forbear'?

波卢斯：为什么要“克制”？

SOCRATES: Because you ought not to envy wretches who are not to be envied, but only to pity them.

苏格拉底：因为你不仅不应该羡慕这些不值得羡慕的可怜虫，而且还应该怜悯他们。

POLUS: And are those of whom spoke wretches?

波卢斯：这种人是可怜虫吗？

SOCRATES: Yes, certainly they are.

苏格拉底：是的，毋庸置疑。

POLUS: And so you think that he who slays any one whom he pleases, and justly slays him, is pitiable and wretched?

波卢斯：那么你认为一个人能够随意杀任何人并且是出于正义，他也是可悲可怜的吗？

SOCRATES: No, I do not say that of him: but neither do I think that he is to be envied.

苏格拉底：不，我没有这样说：但我也不认为他值得羡慕。

POLUS: Were you not saying just now that he is wretched?

波卢斯：你刚才没说过这种人可怜吗？

SOCRATES: Yes, my friend, if he killed another unjustly, in which case he is also to be pitied; and he is not to be envied if he killed him justly.

苏格拉底：我说过，我的朋友，如果他杀人并非出于正义，这种情况下他也值得怜悯；如果他杀人出于正义，他不应该被羡慕。

POLUS: At any rate you will allow that he who is unjustly put to death is wretched, and to be pitied?

波卢斯：无论怎样，你承认被不公正地处死的人都是不幸的并且值得怜悯？

SOCRATES: Not so much, Polus, as he who kills him, and not so much as he who is justly killed.

苏格拉底：波卢斯，他们不幸且值得怜悯的程度不及杀害他的人，也不及那些被公正地处死的人。

POLUS: How can that be, Socrates?

波卢斯：怎么可能是这样呢？苏格拉底。

SOCRATES: That may very well be, inasmuch as doing injustice is the greatest of evils.

苏格拉底：很有可能，鉴于行不公正之事是最大的恶行。

POLUS: But is it the greatest?Is not suffering injustice a greater evil?

波卢斯：可是这是最大的恶行吗？遭受不公正不是更为恶劣吗？

SOCRATES: Certainly not.

苏格拉底：当然不是。

POLUS: Then would you rather suffer than do injustice?

波卢斯：那么你宁愿受不公正待遇而不愿做不公正之事了？

SOCRATES: I should not like either, but if I must choose between them, I would rather suffer than do.

苏格拉底：两者我都不喜欢，但是必须二者择一的话，我宁愿受其害而不愿行其害。

POLUS: Then you would not wish to be a tyrant?

波卢斯：那你不想成为一个僭主吧？

SOCRATES: Not if you mean by tyranny what I mean.

苏格拉底：不愿意，如果你对僭主统治的理解和我一样的话。

POLUS: I mean, as I said before, the power of doing whatever seems good to you in a state, killing, banishing, doing in all things as you like.

波卢斯：我的理解是，像我之前所说，在城邦里行一切似乎于己有利之事的权力，例如杀戮、流放他人，做自己喜欢的一切事情。

SOCRATES: Well then, illustrious friend, when I have said my say, do you reply to me. Suppose that I go into a crowded Agora, and take a dagger under my arm. Polus, I say to you, I have just acquired rare power, and become a tyrant; for if I think that any of these men whom you see ought to be put to death, the man whom I have a mind to kill is as good as dead; and if I am disposed to break his head or tear his garment, he will have his head broken or his

garment torn in an instant. Such is my great power in this city. And if you do not believe me, and I show you the dagger, you would probably reply: Socrates, in that sort of way any one may have great power—he may burn any house which he pleases, and the docks and triremes of the Athenians, and all their other vessels, whether public or private—but can you believe that this mere doing as you think best is great power?

苏格拉底：好，那么，伟大的朋友，当我发表己见后，请务必回答我。假设我来到拥挤的集会场，腋下藏着一把匕首。波卢斯，我对你说，我获得了罕见的权力，成了僭主；因此，如果我认为凡是你看来应当被处死、而我又有意杀害的人，他们几乎都必死无疑；如果我乐意砍掉某个人的头或者撕掉他的衣服，那么顷刻间他就会人头落地或者衣服被撕掉。这就是我在城邦里握有的重权。如果你不相信我，我会以匕首相胁，你很可能回答：苏格拉底，如果这就是巨大权力的话，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放火烧掉雅典境内的任何房子、码头和战船，以及他们所有的战舰，不论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但是你认为仅仅做自己认为最好之事就是巨大的权力吗？

POLUS: Certainly not such doing as this.

波卢斯：你所说的这些行为肯定不是。

SOCRATES: But can you tell me why you disapprove of such a power?

苏格拉底：但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不认同这种权力吗？

POLUS: I can.

波卢斯：能。

SOCRATES: Why then?

苏格拉底：那么为什么？

POLUS: Why, because he who did as you say would be certain to be punished.

波卢斯：为什么，因为一个人若做了你所说的事情，必然难逃惩罚。

SOCRATES: And punishment is an evil?

苏格拉底：惩罚是坏事？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And you would admit once more, my good sir, that great power is a benefit to a man if his actions turn out to his advantage, and that this is the meaning of great power; and if not, then his power is an evil and is no power. But let us look at the matter in another way—do we not acknowledge that the things of which we were speaking, the infliction of death, and exile, and the deprivation of property are sometimes a good and sometimes not a good?

苏格拉底：那么你是再次承认，我的好先生啊，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结果于己有利，这种巨大的权力于他就是好事，且其意义正是在此；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结果于己无利，那么他的权力就是恶事，也称不上真正的权力。但是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们都承认，之前我们谈及的行为，死刑和流放以及财产的没收在某些时候是好事而在某些时候又不是好事，对吧？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About that you and I may be supposed to agree?

苏格拉底：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没有异议吧？

POLUS: Yes.

波卢斯：是。

SOCRATES: Tell me, then, when do you say that they are good and when that they are evil—what principle do you lay down?

苏格拉底：那么，请告诉我它们在何时是好事何时又是坏事呢——你规定的准则是什么？

POLUS: I would rather, Socrates, that you should answer as well as ask that question.

波卢斯：我宁愿，苏格拉底，你来回答自己的提问。

SOCRATES: Well, Polus, since you would rather have the answer from me, I say that they are good when they are just, and evil when they are unjust.

苏格拉底：好吧，波卢斯，既然你想从我这里得到答案，我会说，它们在正义之时就是好事，在非正义之时就是坏事。

POLUS: You are hard of refutation, Socrates, but might not a child refute that statement?

波卢斯：你的确很难被驳倒，苏格拉底，但是这个说法连小孩都

能驳倒吧？

SOCRATES: Then I shall be very grateful to the child, and equally grateful to you if you will refute me and deliver me from my foolishness. And I hope that refute me you will, and not weary of doing good to a friend.

苏格拉底：那么我将十分感谢这个小孩，并且同样感谢你，如果你能够驳倒我并救我脱离愚蠢的话。而且我希望你愿意驳斥我，并能不厌其烦为朋友做件好事。

POLUS: Yes, Socrates, and I need not go far or appeal to antiquity; events which happened only a few days ago are enough to refute you, and to prove that many men who do wrong are happy.

波卢斯：行，苏格拉底，我无需追溯到很久以前寻求证据，几天前发生的事情就足够将你驳倒，同时证明很多行恶事之人是幸福的。

SOCRATES: What events?

苏格拉底：什么事？

POLUS: You see, I presume, that Archelaus the son of Perdiccas is now the ruler of Macedonia?

波卢斯：你应该知道，我猜，珀迪克斯的儿子阿基劳斯现在成了马其顿的统治者？

SOCRATES: At any rate I hear that he is.

苏格拉底：不管怎么说，我听说有这回事。

POLUS: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 is happy or miserable?

波卢斯：那么你认为他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福的？

SOCRATES: I cannot say, Polus, for I have never had any acquaintance with him.

苏格拉底：我不知道，波卢斯，因为我对他一无所知。

POLUS: And cannot you tell at once, and without having an acquaintance with him, whether a man is happy?

波卢斯：那么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你就不能一下子判断出他是否幸福吗？

SOCRATES: Most certainly not.

苏格拉底：当然不能。

POLUS: Then clearly, Socrates, you would say that you did not even know whether the great king was a happy man?

波卢斯：那么显然，苏格拉底，你会说你甚至不知这位伟大的国王是否是一个幸福的人？

SOCRATES: And I should speak the truth; for I do not know how he stands in the matter of education and justice.

苏格拉底：我应当说真话；因为我不知他在教育和公正问题上持何种立场。

POLUS: What! And does all happiness consist in this?

波卢斯：什么？所有的幸福都在于这上面吗？

SOCRATES:Yes, indeed, Polus, that is my doctrine; the men and women who are gentle and good are also happy, as I maintain, and the unjust and evil are miserable.

苏格拉底：是的，确实如此，波卢斯，这是我的主张；我认为，慈祥、善良的男女都是幸福的，而不公正、邪恶的人是痛苦的。

POLUS: Then, according to your doctrine, the said Archelaus is miserable?

波卢斯：那么，按照你的主张，阿基劳斯是痛苦的？

SOCRATES: Yes, my friend, if he is wicked.

苏格拉底：是的，我的朋友，如果他很恶劣的话。

POLUS: That he is wicked I cannot deny; for he had no title at all to the throne which he now occupies, he being only the son of a woman who was the slave of Alcetas the brother of Perdiccas; he himself therefore in strict right was the slave of Alcetas; and if he had meant to do rightly he would have remained his slave, and then, according to your doctrine, he would have been happy. But now he is unspeakably miserable, for he has been guilty of the greatest crimes: in the first place he invited his uncle and master, Alcetas, to come to him, under the pretence that he would restore to him the throne which Perdiccas has usurped, and after entertaining him and his son Alexander, who was his own cousin, and nearly of an age with him, and making them drunk, he threw them into a waggon and carried them off by night, and slew them, and got both of them out of the way; and when he had done all this wickedness he never discovered that he was the most miserable of

all men, was very far from repenting: shall I tell you how he showed his remorse? He had a younger brother, a child of seven years old, who was the legitimate son of Perdiccas, and to him of right the kingdom belonged; Archelaus, however, had no mind to bring him up as he ought and restore the kingdom to him; that was not his notion of happiness; but not long afterwards he threw him into a well and drowned him, and declared to his mother Cleopatra that he had fallen in while running after a goose, and had been killed. And now as he is the greatest criminal of all the Macedonians, he may be supposed to be the most miserable and not the happiest of them, and I dare say that there are many Athenians, and you would be at the head of them, who would rather be any other Macedonian than Archelaus!

波卢斯：他道德恶劣我不能否认；因为他完全没有名分占有他现在所拥有的王位，他本是佩狄卡斯之兄弟阿凯塔斯的一个女奴所生；因此他本人也是阿凯塔斯的奴隶；如果他打算正当行事，他应继续做奴隶，那么，按照你的主张，他该会幸福。但是现在他却说不出地痛苦，因为他在为犯下的滔天大罪而内疚：首先他邀请他的叔父也是他的主人阿凯塔斯，谎称要恢复他被佩狄卡斯篡夺去的王位，款待了他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也就是阿基劳斯年纪相仿的堂兄，灌醉他们，之后阿基劳斯将他们扔进马车，趁夜晚运走，杀害了他们，从而清除他们这两个绊脚石；在做所有这些恶事之时，他从未发现自己是最痛苦的人，而且一点儿也没忏悔：要我告诉你他是如何表示自己的懊悔之情吗？他有一个弟弟，还是年仅七岁的孩子，是佩狄卡斯的嫡子，王国的所有权应当归他所有；但是阿基劳斯完全没有意思要按照他该做的，把他弟弟养大成人，并把王国移交给他；那不是他对幸福的观点；不久之后他把弟弟扔进井里淹死，并向他的母亲克克娄巴特拉报告说他在追逐一只鹅的时候掉到井里，淹死了。现在，阿基劳斯是所有马其顿人中最大的罪犯，他理应是最痛苦而非最幸福的人，而且我敢说有许多以你为首的雅典人，宁愿成为任何一个马其顿人，也不愿

成为阿基劳斯！

SOCRATES: I praised you at first, Polus, for being a rhetorician rather than a reasoner. And this, as I suppose, is the sort of argument with which you fancy that a child might refute me, and by which I stand refuted when I say that the unjust man is not happy. But, my good friend, where is the refutation? I cannot admit a word which you have been saying.

苏格拉底：一开始我表扬你，波卢斯，因为你是位修辞学家而不是辩论家。而在我看来，这种论辩正是那种你以为连一个孩童都能将我驳倒的论辩，当我说不公正的人不幸福时，你也是靠这点反驳我的。但是，我的好朋友，反驳在哪里呢？你所说的我连一个字都不承认。

POLUS: That is because you will not; for you surely must think as I do.

波卢斯：那是因为你不愿承认罢了；因为你一定跟我想的一样。

SOCRATES: Not so, my simple friend, but because you will refute me after the manner which rhetoricians practise in courts of law. For there the one party think that they refute the other when they bring forward a number of witnesses of good repute in proof of their allegations, and their adversary has only a single one or none at all. But this kind of proof is of no value where truth is the aim; a man may often be sworn down by a multitude of false witnesses

who have a great air of respectability. And in this argument nearly every one, Athenian and stranger alike, would be on your side, if you should bring witnesses in disproof of my statement;—you may, if you will, summon Nicias the son of Niceratus, and let his brothers, who gave the row of tripods which stand in the precincts of Dionysus, come with him; or you may summon Aristocrates, the son of Scellius, who is the giver of that famous offering which is at Delphi; summon, if you will, the whole house of Pericles, or any other great Athenian family whom you choose;—they will all agree with you: I only am left alone and cannot agree, for you do not convince me; although you produce many false witnesses against me, in the hope of depriving me of my inheritance, which is the truth. But I consider that nothing worth speaking of will have been effected by me unless I make you the one witness of my words; nor by you, unless you make me the one witness of yours; no matter ab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For there are two ways of refutation, one which is yours and that of the world in general; but mine is of another sort—let us compare them, and see in what they differ. For, indeed, we are at issue about matters which to know is honourable and not to know disgraceful; to know or not to know happiness and misery—that is the chief of them. And what knowledge can be nobler? Or what ignorance more disgraceful than this? And therefore I will begin by asking you whether you do not think that a man who is unjust and doing injustice can be happy, seeing that you think Archelaus unjust, and yet happy? May I assume this to be your opinion?

苏格拉底：不是这样的，我单纯的朋友，因为你以修辞学家在法庭上辩论的方式来反驳我。在那里，当一方带来若干好名声的证人来证明他们的指控，而对方只有一个或没有证人时，这一方便认为驳倒了对方。但当辩论以追求真理为目的时，这种证明便毫无价值；一个

人可能经常被一群看似体面的伪证人驳倒。在我们这个辩论中，几乎每个人，不论是雅典人还是外邦人，都会站在你一方，如果你要请证人来反驳我的论点的话；——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请来尼刻拉图之子尼西亚斯，让他的兄弟们陪同前来，他们的祭鼎成排地放在狄俄尼索斯的领地；或者你可以请来斯凯利亚之子阿里司托克拉底，他是特尔斐祭祀的施主；如果你愿意，请来伯利克里家族的人或任何其他雅典家族的人；——他们都会同意你：只有我独自不敢苟同，因为你未说服我；虽然你找来许多伪证人来反对我，希望剥夺我的财产，那就是真理。但是我认为我的辩论会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除非我能让你做我言语的证人；你的辩论也是如此，除非你能让我做你言语的证人；不用管世界上的其他人。有两种辩论的方式，一种是你和世上常人的；而我的是另一种——让我们比较一下，看看有何区别。诚然，关于知识即可敬而无知即可耻的这些问题，我们存有争议；对幸福和痛苦的知识和无知——这是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何种认识更高贵呢？何种无知比这更可耻呢？因此，鉴于你认为阿基劳斯不公正但仍幸福，我先这么问你，你是否不认为一个不公正且行不公正之事的人是幸福的？我可以认定这是你的观点吧？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But I say that this is an impossibility—here is one point about which we are at issue—very good. And do you mean to say also that if he meets with retribution and punishment he will still be happy?

苏格拉底：但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我们争论的一点——

很好。你意思是说，如果受到报应和惩罚，他仍然幸福？

POLUS: Certainly not; in that case he will be most miserable.

波卢斯：当然不是；那样的话他就最痛苦了。

SOCRATES: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unjust be not punished, then, according to you, he will be happy?

苏格拉底：另一方面，如果不公正的人未受惩罚，那么，按你所说，他就会幸福吗？

POLUS: Yes.

波卢斯：是的。

SOCRATES: But in my opinion, Polus, the unjust or doer of unjust actions is miserable in any case,—more miserable, however, if he be not punished and does not meet with retribution, and less miserable if he be punished and meets with retribution at the hands of gods and men.

苏格拉底：但依我所见，波卢斯，不公正的人或行不公正之事的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是痛苦的，——但如果未受惩罚和报应，他会

更痛苦，而如果受到神和人的惩罚和报应，他的痛苦会较轻。

POLUS:You are maintaining a strange doctrine, Socrates.

波卢斯：你在坚持一个古怪的主张，苏格拉底。

SOCRATES: I shall try to make you agree with me, Oh my friend, for as a friend I regard you. Then these are the points at issue between us—are they not? I was saying that to do is worse than to suffer injustice?

苏格拉底：我将试着让你同意我，我的朋友，因为我把你当作朋友。那么这些是我们之间争论的地方——难道不是吗？我说行不公正之事比遭受不公正之事更痛苦？

POLUS: Exactly so.

波卢斯：正是如此。

SOCRATES: And you said the opposite?

苏格拉底：你认为恰恰相反？

POLUS: Yes.

波卢斯：对。

SOCRATES: I said also that the wicked are miserable, and you refuted me?

苏格拉底：我还说邪恶之人是痛苦的，而你反驳我？

POLUS: By Zeus, I did.

波卢斯：以宙斯之名，我反驳过。

SOCRATES: In your own opinion, Polus.

苏格拉底：这是你个人的观点，波卢斯。

POLUS: Yes, and I rather suspect that I was in the right.

波卢斯：是的，我更认为我是正确的。

SOCRATES: You further said that the wrong-doer is happy if he

be unpunished?

苏格拉底：你进一步说做坏事的人如未受惩罚会幸福？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And I affirm that he is most miserable, and that those who are punished are less miserable—are you going to refute this proposition also?

苏格拉底：而我坚信他是最痛苦的，而那些受到惩罚的却没那么痛苦——你也要反驳这一论点吗？

POLUS: A proposition which is harder of refutation than the other, Socrates.

波卢斯：这个论点比前一个更难反驳，苏格拉底。

SOCRATES: Say rather, Polus, impossible;—for who can refute the truth?

苏格拉底：波卢斯，不如说是不可能；——因为谁能驳倒真理呢？

POLUS: What do you mean? If a man is detected in an unjust attempt to make himself a tyrant, and when detected is racked, mutilated, has his eyes burned out, and after having had all sorts of great injuries inflicted on him, and having seen his wife and children suffer the like, is at last impaled or tarred and burned alive, will he be happier than if he escape and become a tyrant, and continue all through life doing what he likes and holding the reins of government, the envy and admiration both of citizens and strangers? Is that the paradox which, as you say, cannot be refuted?

波卢斯：你是什么意思？如果有人试图非正义地使自己成为僭主时被发觉，备受折磨和迫害，他的双眼被烧坏，等到各种极刑都施加到他身上，而且眼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也受这样的折磨后，最终被钉死或被泼油活活烧死，难道这比他逃出来成为僭主，继而一生随心所欲，掌权执政，受到公民和异邦人的羡慕和敬仰还要幸福吗？你所说的那个悖论难道不能被驳倒吗？

SOCRATES: There again, noble Polus, you are raising hobgoblins instead of refuting me; just now you were calling witnesses against me. But please to refresh my memory a little; did you say—'in an unjust attempt to make himself a tyrant'?

苏格拉底：又来了，高贵的波卢斯，你是在列举令人厌恶的东西，而不是反驳我；刚才你这不是在召集证人反对我嘛。但请你提醒我一下；你说过——“有人试图非正义地使自己成为僭主”吗？

POLUS: Yes, I did.

波卢斯：是的，我说过。

SOCRATES: Then I say that neither of them will be happier than the other,—neither he who unjustly acquires a tyranny, nor he who suffers in the attempt, for of two miserables one cannot be the happier, but that he who escapes and becomes a tyrant is the more miserable of the two. Do you laugh, Polus? Well, this is a new kind of refutation,—when any one says anything, instead of refuting him to laugh at him.

苏格拉底：那么我要说这两种可怜人谁都不会更幸福，——非法成为僭主之人不幸福，试图成为僭主未成而受到惩罚的也不幸福，这两种痛苦之人都不会更幸福，但逃过惩罚而成为僭主的在二者中更加不幸。你在笑吗，波卢斯？那么，这是一种新的反驳方式了，——不论谁说了什么，不反驳他反而是去嘲笑他。

POLUS: But do you not think, Socrates, that you have been sufficiently refuted, when you say that which no human being will allow? Ask the company.

波卢斯：但是，苏格拉底，你难道不认为如果没有人认同你，你已经被有力地反驳了？问问我们的同伴们。

SOCRATES: Oh Polus, I am not a public man, and only last year, when my tribe were serving as Prytanes, and it became my duty as their president to take the votes, there was a laugh at me, because I was unable to take them. And as I failed then, you must not ask me to count the suffrages of the company now; but if, as I was saying, you have no better argument than numbers, let me have a turn, and do you make trial of the sort of proof which, as I think, is required; for I shall produce one witness only of the truth of my words, and he is the person with whom I am arguing; his suffrage I know how to take; but with the many I have nothing to do, and do not even address myself to them. May I ask then whether you will answer in turn and have your words put to the proof? For I certainly think that I and you and every man do really believe, that to do is a greater evil than to suffer injustice and not to be punished than to be punished.

苏格拉底：哦，波卢斯，我不是一个政治家，就在去年，我的部族供职议事会，而我出于责任担任他们的长官来负责投票，那时有人笑我，因为我不懂如何负责。鉴于那次我失败了，你现在一定不要让我去计算同伴的票数；但正如我刚才所说，如果你除了数目之外没有更好的论据，那么该轮到我了，你务必尝试我认为必需的证明方式；因为我只需找一位证人来证明我言语的真实性，他就是正与我争论的人；我知道如何掌管他的投票；但对众多人我无计可施，甚至不搭理他们。我问你，你能否依次回答，以你的话来作证明？因为我认为你、我和其他每个人都真正相信，行不公正比遭受不公正更为罪恶，而且未受处罚比受到处罚更为罪恶。

POLUS: And I should say neither I, nor any man: would you yourself, for example, suffer rather than do injustice?

波卢斯：而我要说，我不会这样认为，任何人都不会这样认为：譬如说，你自己会宁愿遭受不公正而不去行不公正吗？

SOCRATES: Yes, and you, too; I or any man would.

苏格拉底：是的，而且你也会；我或任何人都会的。

POLUS: Quite the reverse; neither you, nor I, nor any man.

波卢斯：恰恰相反；你不会，我也不会，任何人都不会。

SOCRATES: But will you answer?

苏格拉底：但你愿意回答问题吗？

POLUS: To be sure, I will; for I am curious to hear what you can have to say.

波卢斯：当然，我愿意——因为我很好奇，想听听你会说些什么。

SOCRATES: Tell me, then, and you will know, and let us suppose that I am beginning at the beginning: which of the two,

Polus, in your opinion, is the worst?—to do injustice or to suffer?

苏格拉底：我们假设从头开始，波卢斯，告诉我，依你之见，行不公正或遭受不公正哪种更痛苦？回答之后，你就会知道的。

POLUS: I should say that suffering was worst.

波卢斯：我会说遭受不公正更痛苦。

SOCRATES:And which is the greater disgrace?—Answer.

苏格拉底：那哪种更可耻呢？请回答。

POLUS: To do.

波卢斯：行不公正。

SOCRATES: And the greater disgrace is the greater evil?

苏格拉底：更可耻也就更罪恶？

POLUS: Certainly not.

波卢斯：当然不是。

SOCRATES: I understand you to say, if I am not mistaken, that the honourable is not the same as the good, or the disgraceful as the evil?

苏格拉底：如果我没搞错，我明白你要说的，即可敬的不等同于善的，可耻的不等同于恶的？

POLUS: Certainly not.

波卢斯：当然不同。

SOCRATES: Let me ask a question of you: When you speak of beautiful things, such as bodies, colours, figures, sounds, institutions, do you not call them beautiful in reference to some standard: bodies, for example, are beautiful in proportion as they are useful, or as the sight of them gives pleasure to the spectators; can you give any other account of personal beauty?

苏格拉底：我问你一个问题：当你提起美丽的事物，诸如身体、颜色、图形、声音、制度，你说它们美丽时是否参照某一标准：例如，身体比例美丽是因为他们有用，或看见它们给予观者快乐；你能给出个人美的其他原因吗？

POLUS: I cannot.

波卢斯：我不能。

SOCRATES: And you would say of figures or colours generally that they were beautiful, either by reason of the pleasure which they give, or of their use, or both?

苏格拉底：你会笼统地说图形和颜色是美的，或因为它们给予快乐，或因为它们有用，或两者兼有？

POLUS: Yes, I should.

波卢斯：是，我会的。

SOCRATES: And you would call sounds and music beautiful for the same reason?

苏格拉底：你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说声音和音乐美丽吗？

POLUS: I should.

波卢斯：我会。

SOCRATES: Laws and institutions also have no beauty in them except in so far as they are useful or pleasant or both?

苏格拉底：法律和制度本身也没有美丽可言，若不是因为有用或宜人或兼而有之？

POLUS:I think not.

波卢斯：是这样的。

SOCRATES: And may not the same be said of the beauty of knowledge?

苏格拉底：同样也可以这么说知识之美？

POLUS:To be sure, Socrates; and I very much approve of your measuring beauty by the standard of pleasure and utility.

波卢斯：当然，苏格拉底；我十分赞同你以愉悦和用途的标准来衡量美。

SOCRATES: And deformity or disgrace may be equally measured by the opposite standard of pain and evil?

苏格拉底：而丑陋和可耻也可以同样以相反的标准，即痛苦和罪恶来衡量了？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Then when of two beautiful things one exceeds in beauty, the measure of the excess is to be taken in one or both of these; that is to say, in pleasure or utility or both?

苏格拉底：那么两种美丽的事物中的一种胜出，胜出的衡量依据也是这两种标准之一或兼而有之；即愉悦或用途或兼而有之，对吗？

POLUS: Very true.

波卢斯：非常正确。

SOCRATES: And of two deformed things, that which exceeds in deformity or disgrace, exceeds either in pain or evil—must it not be so?

苏格拉底：而两种丑陋的东西，在丑陋或可耻上胜出，也是在痛

苦或罪恶上胜出——难道不是这样吗？

POLUS: Yes.

波卢斯：是。

SOCRATES: But then again, what was the observation which you just now made, about doing and suffering wrong? Did you not say, that suffering wrong was more evil, and doing wrong more disgraceful?

苏格拉底：但是话说回来，你刚才所说的关于行不公正和遭受不公正的论点是什么来着？你是说遭受不公正更加痛苦，而行不公正更加可耻吗？

POLUS: I did.

波卢斯：我是这么说的。

SOCRATES: Then, if doing wrong is more disgraceful than suffering, the more disgraceful must be more painful and must exceed in pain or in evil or both: does not that also follow?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行不公正比遭受不公正更加可耻，更加可

耻的一定更加痛苦，而且在痛苦或罪恶或两方面上胜出：能得出这个结论吧？

POLUS: Of course.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First, then, let us consider whether the doing of injustice exceeds the suffering in the consequent pain: Do the injurers suffer more than the injured?

苏格拉底：那么首先，让我们考虑行不公正是否在之后的痛苦上超过了遭受不公正：伤害者比受害者受苦更多吗？

POLUS: No, Socrates; certainly not.

波卢斯：不，苏格拉底；当然不是。

SOCRATES: Then they do not exceed in pain?

苏格拉底：那么他们并非在痛苦上胜出了？

POLUS: No.

波卢斯：不。

SOCRATES: But if not in pain, then not in both?

苏格拉底：但如果不是在痛苦方面胜出，在兼有两个方面也没有？

POLUS: Certainly not.

波卢斯：当然没有。

SOCRATES: Then they can only exceed in the other?

苏格拉底：那么他们只能在另一个方面胜出了？

POLUS: Yes.

波卢斯：是的。

SOCRATES: That is to say, in evil?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在罪恶方面？

POLUS:True.

波卢斯：正确。

SOCRATES: Then doing injustice will have an excess of evil, and will therefore be a greater evil than suffering injustice?

苏格拉底：那么行不公正有更大的罪恶，因而比遭受不公正更为罪恶吗？

POLUS: Clear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But have not you and the world already agreed that to do injustice is more disgraceful than to suffer?

苏格拉底：但你和世上其他人不是都已经同意行不公正比遭受不公正更加可耻吗？

POLUS: Yes.

波卢斯：同意。

SOCRATES: And that is now discovered to be more evil?

苏格拉底：现在又发觉行不公正更加罪恶？

POLUS: True.

波卢斯：对。

SOCRATES: And would you prefer a greater evil or a greater dishonour to a less one? Answer, Polus, and fear not; for you will come to no harm if you nobly resign yourself into the healing hand of the argument as to a physician without shrinking, and either say 'Yes' or 'No' to me.

苏格拉底：你是不是倾向于更为罪恶或更加可耻的，而不是程度稍轻的？回答我，波卢斯，不要害怕；因为如果你顺从我的论证，正如毫不畏缩地顺从医生那样，这对你并无坏处，回答我“是”或“不是”。

POLUS: I should say 'No.'

波卢斯：我要说“不是”。

SOCRATES: Would any other man prefer a greater to a less evil?

苏格拉底：其他任何人会不会倾向于更为罪恶或更加可耻的，而非较轻的？

POLUS: No, not according to this way of putting the case, Socrates.

波卢斯：不会，按照这种假定的方式是不会的，苏格拉底。

SOCRATES: Then I said truly, Polus that neither you, nor I, nor any man, would rather, do than suffer injustice; for to do injustice is the greater evil of the two.

苏格拉底：那么我这么说是对的，波卢斯，与遭受不公正相比，你、我或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去行不公正；因为两者中行不公正更罪恶。

POLUS: That is the conclusion.

波卢斯：结论是这样的。

SOCRATES:You see, Polus, when you compare the two kinds of refutations, how unlike they are. All men, with the exception of myself, are of your way of thinking; but your single assent and witness are enough for me,—I have no need of any other, I take your suffrage, and am regardless of the rest. Enough of this, and now let us proceed to the next question; which is, whether the greatest of evils to a guilty man is to suffer punishment, as you supposed, or whether to escape punishment is not a greater evil, as I supposed. Consider.—You would say that to suffer punishment is another name for being justly corrected when you do wrong?

苏格拉底：你看，波卢斯，当你比较这两种辩论方式，它们是多么地不同。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跟你想的一样；但你自己的认同和证明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不需要其他人，我管你的投票，不管其他人的。对此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让我们接着讨论下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如你认为的那样，有罪之人最大的罪恶是遭受惩罚，还是如我所认为的，逃避惩罚是更大的罪恶。考虑一下。——你会说遭受惩罚就是做了坏事之后的正当改正？

POLUS: I should.

波卢斯：我会。

SOCRATES: And would you not allow that all just things are honourable in so far as they are just? Please to reflect, and, tell me your opinion.

苏格拉底：难道你不承认，所有公正的事情，既然公正，都是荣耀的的吗？请考虑，然后告诉我你的观点。

POLUS: Yes, Socrates, I think that they are.

波卢斯：是的，苏格拉底，我认为是。

SOCRATES: Consider again—where there is an agent, must there not also be a patient?

苏格拉底：再考虑——只要有施事者，就一定有受事者吗？

POLUS: I should say so.

波卢斯：我这么认为。

SOCRATES: And will not the patient suffer that which the agent does, and will not the suffering have the quality of the action? I mean, for example, that if a man strikes,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hich is stricken?

苏格拉底：难道受事者不承受施事者的所为，而承受不具备行为的性质吗？我的意思是，比如有人打击，就一定有被打的事物吗？

POLUS: Yes.

波卢斯：是的。

SOCRATES: And if the striker strikes violently or quickly, that which is struck will he struck violently or quickly?

苏格拉底：如果打击者打得猛烈或迅速，被打的不也被打得猛烈或迅速吗？

POLUS: True.

波卢斯：对。

SOCRATES: And the suffering to him who is stricken is of the same nature as the act of him who strikes?

苏格拉底：承受至于被打者和行动至于打击者不是有同样的性质吗？

POLUS: Yes.

波卢斯：是的。

SOCRATES: And if a man burns, there is something which is burned?

苏格拉底：如果有人烧，肯定有被烧之物？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And if he burns in excess or so as to cause pain, the thing burned will be burned in the same way?

苏格拉底：而如果他烧得厉害，或为了引起疼痛而烧，被烧之物也这样被烧对吗？

POLUS: Truly.

波卢斯：对。

SOCRATES: And if he cuts, the same argument holds—there will be something cut?

苏格拉底：如果他切割，按照同样的推理——有东西被切？

POLUS: Yes.

波卢斯：是。

SOCRATES: And if the cutting be great or deep or such as will cause pain, the cut will be of the same nature?

苏格拉底：如果切得厉害，或很深或引起疼痛，被切的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切？

POLUS: That is evident.

波卢斯：明显如此。

SOCRATES: Then you would agree generally to the universal proposition which I was just now asserting: that the affection of the patient answers to the affection of the agent?

苏格拉底：那你大体上同意我刚才主张的普遍观点：受事者的承受回应施事者的行为？

POLUS: I agree.

波卢斯：我同意。

SOCRATES: Then, as this is admitted, let me ask whether being punished is suffering or acting?

苏格拉底：既然承认了这一点，那么我问你遭受惩罚是承受还是行为？

POLUS: Suffering, Socrates; there can be no doubt of that.

波卢斯：承受，苏格拉底；这点毫无疑问。

SOCRATES: And suffering implies an agent?

苏格拉底：承受就必然有一个施事者？

POLUS: Certainly, Socrates; and he is the punisher.

波卢斯：当然，苏格拉底；那就是惩罚者。

SOCRATES: And he who punishes rightly, punishes justly?

苏格拉底：那正当实施惩罚的人，也是公正实施惩罚的人吧？

POLUS: Yes.

波卢斯：是。

SOCRATES: And therefore he acts justly?

苏格拉底：那么他行为正当了？

POLUS: Justly.

波卢斯：正当。

SOCRATES: Then he who is punished and suffers retribution, suffers justly?

苏格拉底：那被惩罚者受到报应，他理应承受？

POLUS: That is evident.

波卢斯：这很显然。

SOCRATES: And that which is just has been admitted to be honourable?

苏格拉底：这是刚才证明可敬的？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正是。

SOCRATES: Then the punisher does what is honourable, and the punished suffers what is honourable?

苏格拉底：那么惩罚者做了可敬的事，而被惩罚者承受了可敬之事？

POLUS: True.

波卢斯：正确。

SOCRATES: And if what is honourable, then what is good, for

the honourable is either pleasant or useful?

苏格拉底：可敬之事必是好的，因为可敬之事要么是愉悦的要么是有用的对吗？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Then he who is punished suffers what is good?

苏格拉底：那么受惩罚者承受的是好事了？

POLUS: That is true.

波卢斯：正是如此。

SOCRATES: Then he is benefited?

苏格拉底：那么他受益了？

POLUS: Yes.

波卢斯：对。

SOCRATES: Do I understand you to mean what I mean by the term 'benefited'? I mean, that if he be justly punished his soul is improved.

苏格拉底：我不知你理解的“受益”是否和我理解的一致？我意思是说，如果他受到公正的惩罚，他的灵魂便得到改进。

POLUS: Sure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Then he who is punished is delivered from the evil of his soul?

苏格拉底：那么受到惩罚的人，他的灵魂被从罪恶处救回了？

POLUS: Yes.

波卢斯：是的。

SOCRATES: And is he not then delivered from the greatest evil? Look at the matter in this way—In respect of a man's estate, do you see any greater evil than poverty?

苏格拉底：那他难道不是从极恶中被救出来了吗？这样来看这个问题——就一个人的财产来说，你认为有比贫穷更加大的罪恶吗？

POLUS: There is no greater evil.

波卢斯：没有更大的罪恶了。

SOCRATES: Again, in a man's bodily frame, you would say that the evil is weakness and disease and deformity?

苏格拉底：再者，关于人的体形，你会说罪恶在于虚弱、疾病和畸形吗？

POLUS: I should.

波卢斯：我会。

SOCRATES: And do you not imagine that the soul likewise has some evil of her own?

苏格拉底：难道你不认为灵魂也有她自己类似于此的罪恶吗？

POLUS: Of course.

波卢斯：当然有。

SOCRATES: And this you would call injustice and ignorance and cowardice, and the like?

苏格拉底：你会称之为不公、无知和懦弱，诸如此类吗？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So then, in mind, body, and estate, which are three, you have pointed out three corresponding evils—injustice, disease, poverty?

苏格拉底：那么，关于思想、身体和财产三类，你已经指出了相应的三类罪恶——不公、疾病、贫穷对吗？

POLUS: True.

波卢斯：对。

SOCRATES: And which of the evils is the most disgraceful?—is not the most disgraceful of them injustice, and in general the evil of the soul?

苏格拉底：哪种罪恶最为可耻呢？——难道不公，即灵魂的罪恶不是最可耻的吗？

POLUS: By far the most.

波卢斯：目前看来是最可耻的。

SOCRATES: And if the most disgraceful, then also the worst?

苏格拉底：若是最可耻的，不也是最坏的吗？

POLUS: What do you mean, Socrates?

波卢斯：你什么意思，苏格拉底？

SOCRATES: I mean to say, that is most disgraceful has been

already admitted to be most painful or hurtful, or both.

苏格拉底：我想说，我们已经承认最为可耻的就是最痛苦、最有害的或兼而有之？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And now injustice and all evil in the soul has been admitted by to be most disgraceful?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已经承认不公正及灵魂的罪恶是最可耻的了？

POLUS: It has been admitted.

波卢斯：已经承认。

SOCRATES: And most disgraceful either because most painful and causing excessive pain, or most hurtful, or both?

苏格拉底：最可耻的是因为他们是最痛苦的，引起剧烈的痛苦，

或最有害的，或二者兼之？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And therefore to be unjust and intemperate, and cowardly and ignorant, is more painful than to be poor and sick?

苏格拉底：因此不公正、放纵、懦弱和无知比贫穷和疾病更加痛苦吗？

POLUS: Nay, Socrates; the painfulness does not appear to me to follow from your premises.

波卢斯：不，苏格拉底；痛苦对我来说并不符合你的假定。

SOCRATES: Then, if, as you would argue, not more painful, the evil of the soul is of all evils the most disgraceful; and the excess of disgrace must be caused by some preternatural greatness, or extraordinary hurtfulness of the evil.

苏格拉底：那么，照你要说的，如果不更加痛苦，灵魂的罪恶是所有罪恶中最可耻的；而极度可耻必然由罪恶的程度极大或害处极大

所导致的。

POLUS: Clear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And that which exceeds most in hurtfulness will be the greatest of evils?

苏格拉底：害处最大的即是最大的罪恶吗？

POLUS: Yes.

波卢斯：是。

SOCRATES: Then injustice and intemperance, and in general the depravity of the soul, are the greatest of evils?

苏格拉底：那么不公正、放纵以及灵魂的堕落都是最大的罪恶了？

POLUS: That is evident.

波卢斯：显然如此。

SOCRATES: Now, what art is there which delivers us from poverty? Does not the art of making money?

苏格拉底：那么，什么技艺使我们摆脱贫穷？难道不是赚钱的技艺吗？

POLUS: Yes.

波卢斯：是的。

SOCRATES: And what art frees us from disease? Does not the art of medicine?

苏格拉底：什么技艺使我们摆脱疾病？不是医术吗？

POLUS: Very true.

波卢斯：非常正确。

SOCRATES: And what from vice and injustice? If you are not able to answer at once, ask yourself whither we go with the sick,

and to whom we take them.

苏格拉底：又是什么技艺使我们摆脱罪恶和不公呢？如果你不能立即回答，问问你自己，当你病了，你去何处，去求助何人。

POLUS: To the physicians, Socrates.

波卢斯：去见医生，苏格拉底。

SOCRATES: And to whom do we go with the unjust and intemperate?

苏格拉底：而要摆脱不公正和不节制我们要找谁呢？

POLUS: To the judges, you mean.

波卢斯：你是说找法官。

SOCRATES: Who are to punish them?

苏格拉底：那些惩罚他人的人？

POLUS: Yes.

波卢斯：正是。

SOCRATES: And do not those who rightly punish others, punish them in accordance with a certain rule of justice?

苏格拉底：难道这些公正地惩罚他人的人不是按照一定的审判规则惩罚他人的？

POLUS: Clearly.

波卢斯：当然是。

SOCRATES: Then the art of money-making frees a man from poverty; medicine from disease; and justice from intemperance and injustice?

苏格拉底：赚钱的技艺使人摆脱贫穷；医术使人摆脱疾病；而审判使人摆脱不节制和不公正吗？

POLUS: That is evident.

波卢斯：这显而易见。

SOCRATES: Which, then, is the best of these three?

苏格拉底：三者中最好的是什么？

POLUS: Will you enumerate them?

波卢斯：你能列举一下吗？

SOCRATES: Money-making, medicine, and justice.

苏格拉底：赚钱、医术、审判。

POLUS: Justice, Socrates, far excels the two others.

波卢斯：审判，苏格拉底，远远胜过其余两者。

SOCRATES: And justice, if the best, gives the greatest pleasure or advantage or both?

苏格拉底：如果是最好的，审判给予最大的快乐或好处或二者兼

之吗？

POLUS: Yes.

波卢斯：是的。

SOCRATES: But is the being healed a pleasant thing, and are those who are being healed pleased?

苏格拉底：但被治疗是件好事，且那些被治疗的人是快乐的吗？

POLUS: I think not.

波卢斯：我想不是。

SOCRATES: A useful thing, then?

苏格拉底：那么是有用的？

POLUS: Yes.

波卢斯：是。

SOCRATES: Yes, because the patient is delivered from a great evil; and this is the advantage of enduring the pain—that you get well?

苏格拉底：是的，因为受事者从大恶中摆脱出来；这是受苦的好处——你可明白了？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And would he be the happier man in his bodily condition, who is healed, or who never was out of health?

苏格拉底：在身体状况方面，是一个被治好的人，还是一个从未生病的人更加幸福呢？

POLUS: Clearly he who was never out of health.

波卢斯：当然是那个从未生病的。

SOCRATES: Yes; for happiness surely does not consist in being delivered from evils, but in never having had them.

苏格拉底：是的；因为幸福绝非存在于摆脱邪恶，而在于从未有过邪恶。

POLUS: True.

波卢斯：正确。

SOCRATES: And suppose the case of two persons who have some evil in their bodies, and that one of them is healed and delivered from evil, and another is not healed, but retains the evil—which of them is the most miserable?

苏格拉底：假定有两人身体内含有邪恶，其中一人被治愈并摆脱邪恶，而另一人未被治愈，仍保留着邪恶——哪个人更痛苦呢？

POLUS: Clearly he who is not healed.

波卢斯：当然是未被治愈的那个。

SOCRATES: And was not punishment said by us to be a deliverance from the greatest of evils, which is vice?

苏格拉底：我们所说的惩罚难道不是用来摆脱最大的恶，即罪行

的吗？

POLUS: True.

波卢斯：正确。

SOCRATES: And justice punishes us, and makes us more just, and is the medicine of our vice?

苏格拉底：审判惩罚我们，使我们更加公正，并且是治疗我们罪行的良药，对吗？

POLUS: True.

波卢斯：正确。

SOCRATES: He, then, has the first place in the scale of happiness who has never had vice in his soul; for this has been shown to be the greatest of evils.

苏格拉底：那么，灵魂内从未有过罪恶的人在幸福的尺度上是占据第一位的；因为灵魂上的罪恶是最大的罪恶。

POLUS: Clearly.

波卢斯：显然如此。

SOCRATES: And he has the second place, who is delivered from vice?

苏格拉底：而罪恶被治愈的人是占据第二位的。

POLUS: True.

波卢斯：正确。

SOCRATES: That is to say, he who receives admonition and rebuke and punishment?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那接受劝告、谴责和惩罚的人？

POLUS: Yes.

波卢斯：是的。

SOCRATES: Then he lives worst, who, having been unjust, has no deliverance from injustice?

苏格拉底：那么最糟糕的，是已经不公正却从未摆脱不公的人？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当然是。

SOCRATES: That is, he lives worst who commits the greatest crimes, and who, being the most unjust of men, succeeds in escaping rebuke or correction or punishment; and this, as you say, has been accomplished by Archelaus and other tyrants and rhetoricians and potentates?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那活得最惨的人是犯了大罪，成了最不公正，且逃避了谴责、改正或惩罚的人；如你所言，这不正是阿基劳斯和其他僭主、修辞学家和当权者所做的吗？

POLUS: True.

波卢斯：正是如此。

SOCRATES: May not their way of proceeding, my friend, be

compared to the conduct of a person who is afflicted with the worst of diseases and yet contrives not to pay the penalty to the physician for his sins against his constitution, and will not be cured, because, like a child, he is afraid of the pain of being burned or cut—Is not that a parallel case?

苏格拉底：我的朋友，他们的行径难道不可以比作一个身染恶疾，又不愿为妨碍着身体健康的罪恶向医生支付罚金之人的行为吗？他的病不会治愈，因为他像孩子般害怕灼烧和手术的疼痛——这难道不是很相似的事情吗？

POLUS: Yes, truly.

波卢斯：是的，确实如此。

SOCRATES: He would seem as if he did not know the nature of health and bodily vigour; and if we are right, Polus, in our previous conclusions, they are in a like case who strive to evade justice, which they see to be painful, but are blind to the advantage which ensues from it, not knowing how far more miserable a companion a diseased soul is than a diseased body; a soul, I say, which is corrupt and unrighteous and unholy. And hence they do all that they can to avoid punishment and to avoid being released from the greatest of evils; they provide themselves with money and friends, and cultivate to the utmost their powers of persuasion. But if we, Polus, are right, do you see what follows, or shall we draw out the consequences in form?

苏格拉底：他仿佛不知健康和身体活力的本质；如果在此前的辩论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波卢斯，在类似的情况下他们力求逃避审判，他们认为那是痛苦的，但对随之而来的好处视而不见，不知道拥有一个病态的灵魂比有病的身体要痛苦得多；我说的是一个堕落的、邪恶的、肮脏的灵魂。因而他们竭尽所能逃避惩罚，也是在逃避从极大的罪恶中解脱出来；他们为自己聚集财物和朋友，并将自己劝说的能力训练到极致。但如果我们是正确的，波卢斯，你会知道接下来会如何，或者我们还要得出形式上的结果来吗？

POLUS: If you please.

波卢斯：如果你愿意。

SOCRATES: Is it not a fact that injustice, and the doing of injustice, is the greatest of evils?

苏格拉底：难道不公正本身和行不公正之事不是罪大恶极吗？

POLUS: That is quite clear.

波卢斯：这显然如此。

SOCRATES: And further, that to suffer punishment is the way to be released from this evil?

苏格拉底：进一步说，遭受惩罚不是摆脱这种罪恶的途径吗？

POLUS:True.

波卢斯：是的。

SOCRATES: And not to suffer, is to perpetuate the evil?

苏格拉底：而不受惩罚会使罪恶继续下去吧？

POLUS: Yes.

波卢斯：是。

SOCRATES: To do wrong, then, is second only in the scale of evils; but to do wrong and not to be punished, is first and greatest of all?

苏格拉底：那么，做坏事在罪恶的尺度上仅是第二位的；做了坏事未受惩罚才是首要的、最大的罪恶吧？

POLUS: That is true.

波卢斯：这很正确。

SOCRATES: Well, and was not this the point in dispute, my friend? You deemed Archelaus happy, because he was a very great criminal and unpunished: I, on the other hand, maintained that he or any other who like him has done wrong and has not been punished, is, and ought to be, the most miserable of all men; and that the doer of injustice is more miserable than the sufferer; and he who escapes punishment, more miserable than he who suffers.—was not that what I said?

苏格拉底：那么，我的朋友，这不正是我们存有争议的一点吗？你认为阿基劳斯是幸福的，因为他罪大恶极却未受到惩罚：我呢，与此相反，认为他和像他一样做了坏事未受惩罚的人是，也理应是，最痛苦的人；行不公正的人比遭受不公正的人更痛苦；而那逃避了惩罚的人比受到惩罚的人更痛苦。——这不正是我说过的吗？

POLUS: Yes.

波卢斯：是的。

SOCRATES: And it has been proved to be true?

苏格拉底：这不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了？

POLUS: Certainly.

波卢斯：当然。

SOCRATES: Well, Polus, but if this is true, where is the great use of rhetoric? If we admit what has been just now said, every man ought in every way to guard himself against doing wrong, for he will thereby suffer great evil?

苏格拉底：那么，波卢斯，如果这是正确的，修辞学的巨大用处在哪里？如果我们承认刚才所说的，每个人都应以各种方式防止自己做坏事，因为否则他将遭受大恶对吗？

POLUS: True.

波卢斯：对。

SOCRATES: And if he, or any one about whom he cares, does wrong, he ought of his own accord to go where he will be immediately punished; he will run to the judge, as he would to the physician, in order that the disease of injustice may not be rendered chronic and become the incurable cancer of the soul; must we not allow this consequence, Polus, if our former admissions are to stand—is any other inference consistent with them?

苏格拉底：如果他或任何他关心的人做了坏事，他应该主动地去他能够立即接受惩罚的地方；正如去看医生那样，他该去找法官，因此不公正之疾病不会成为长期的、成为灵魂不可医治的癌症；如果我们此前的看法站得住脚，波卢斯，我们绝不应该允许这一结果——还有与这些看法一致的其他推论吗？

POLUS: To that, Socrates, there can be but one answer.

波卢斯：对此，苏格拉底，只有一个答案。

SOCRATES: Then rhetoric is of no use to us, Polus, in helping a man to excuse his own injustice, that of his parents or friends, or children or country; but may be of use to any one who holds that instead of excusing he ought to accuse—himself above all, and in the next degree his family or any of his friends who may be doing wrong; he should bring to light the iniquity and not conceal it, that so the wrong-doer may suffer and be made whole; and he should even force himself and others not to shrink, but with closed eyes like brave men to let the physician operate with knife or searing iron, not regarding the pain, in the hope of attaining the good and the honourable; let him who has done things worthy of stripes, allow himself to be scourged, if of bonds, to be bound, if of a fine, to be fined, if of exile, to be exiled, if of death, to die, himself being the first to accuse himself and his relations, and using rhetoric to this end, that his and their unjust actions may be made manifest, and that they themselves may be delivered from injustice, which is the greatest evil. Then, Polus, rhetoric would indeed be useful. Do you say 'Yes' or 'No' to that?

苏格拉底：那么，要想帮助一个人为自己，或其父母、朋友、子女或国家的不公正进行开脱，波卢斯，修辞学对我们是没用的；但有人主张应谴责——首先是谴责自己，其次是谴责他可能做坏事的家人或任何朋友，而非为之辩解，对任何这么主张的人来说，修辞学是有用的；他应该将罪行公开而非隐藏，因此做坏事的人会受到惩罚、得以治愈；他甚至应该强迫自己和他人不要畏缩，而是像勇敢的人那样闭上眼，让医生用刀或烙铁动手术，不计疼痛，希望获得好的和可敬的事物；让那做了应当受鞭打的错事之人，允许自己受到惩罚，如果该捆绑，就要绑起来，如果该罚款，就要罚款，如果该流放，就要流放，如果该处死，就处死，他自己成为谴责自己和亲友的第一人，并把修辞学用于这一目的，以便他和亲友的不公正行为能展现出来，进而摆脱不公正这一最大的恶。那么，波卢斯，修辞学便确实有用。对此你说“是”还是“不是”？

POLUS: To me, Socrates, what you are saying appears very strange, though probably in agreement with your premises.

波卢斯：苏格拉底，对我来说，你说的话显得十分奇怪，虽然我可能同意你的论述。

SOCRATES: Is not this the conclusion, if the premises are not disproven?

苏格拉底：如果对这些论述没有异议的话，这不就是结论吗？

POLUS: Yes; it certainly is.

波卢斯：是的，当然是。

SOCRATES: And from the opposite point of view, if indeed it be our duty to harm another, whether an enemy or not—I except the case of self-defence—then I have to be upon my guard—but if my enemy injures a third person, then in every sort of way, by word as well as deed, I should try to prevent his being punished, or appearing before the judge; and if he appears, I should contrive that he should escape, and not suffer punishment: if he has stolen a sum of money, let him keep what he has stolen and spend it on him and his, regardless of religion and justice; and if he has done things worthy of death, let him not die, but rather be immortal in his wickedness; or, if this is not possible, let him at any rate be allowed to live as long as he can. For such purposes, Polus, rhetoric may be useful, but is of small if of any use to him who is not intending to commit injustice; at least, there was no such use discovered by us in the previous discussion.

苏格拉底：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如果伤害他人，不论是不是敌人，确实是我们的义务的话——我排除了自卫的情形——那时我不得不自我防卫——但如果我的敌人伤害了第三个人，那么以各种方式，无论语言还是行为，我会试图阻止他受到惩罚或法官的审判；如果他来到法官面前，我会力图使他逃避惩罚而非受到惩罚；如果他偷了一笔钱，就让他留着为他自己和他的亲人花，不管宗教和公正；如果他做了应当处死的事，不让他死，而是长活在罪恶中；又或，如果这不可能，无论如何也让他活得尽可能地久。为了这些目的，波卢斯，修辞学可能是有用的，但对于那没有意图行不公正之事的人，如果有用也是很小的；至少，在我们此前的讨论中没有发现这样的用途。

CALLICLES: Tell me, Chaerephon, is Socrates in earnest, or is he joking?

卡利克勒：告诉我，凯勒丰，苏格拉底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

CHAEREPHON: I should say, Callicles, that he is in most profound earnest; but you may well ask him.

凯勒丰：卡利克勒，我会说他是再认真不过了，但你可以问问他。

CALLICLES: By the gods, and I will. Tell me, Socrates, are you in earnest, or only in jest? For if you are in earnest, and what you say is true, is not the whole of human life turned upside down; and are we not doing, as would appear, in everything the opposite of what we ought to be doing?

卡利克勒：奉诸神之名，我会问的。告诉我，苏格拉底，你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因为如果你是认真的，而且你所说的是正确的，那么整个人类生活不是被颠倒了吗？而且，我们所做的任何事看上去不都与我们应该做的事背道而驰了？

SOCRATES: Oh Callicles, if there were not some community of feelings among mankind, however varying in different persons—I mean to say, if every man's feelings were peculiar to himself and

were not shared by the rest of his species—I do not see how we could ever communicate our impressions to one another. I make this remark because I perceive that you and I have a common feeling. For we are lovers both, and both of us have two loves apiece—I am the lover of Alcibiades, the son of Cleinias, and of philosophy; and you of the Athenian Demus, and of Demus the son of Pyrilampes. Now, I observe that you, with all your cleverness, do not venture to contradict your favourite in any word or opinion of his; but as he changes you change, backwards and forwards. When the Athenian Demus denies anything that you are saying in the assembly, you go over to his opinion; and you do the same with Demus, the fair young son of Pyrilampes. For you have not the power to resist the words and ideas of your loves; and if a person were to express surprise at the strangeness of what you say from time to time when under their influence, you would probably reply to him, if you were honest, that you cannot help saying what your loves say unless they are prevented; and that you can only be silent when they are. Now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my words are an echo too, and therefore you need not wonder at me; but if you want to silence me, silence philosophy, who is my love, for she is always telling me what I am now telling you, my friend; neither is she capricious like my other love, for the son of Cleinias says one thing to-day and another thing to-morrow, but philosophy is always true. She is the teacher at whose words you are now wondering, and you have heard her yourself. Her you must refute, and either show, as I was saying, that to do injustice and to escape punishment is not the worst of all evils; or, if you leave her word unrefuted, by the dog the god of Egypt, I declare, O Callicles, that Callicles will never be at one with himself, but that his whole life, will be a discord. And yet, my friend, I would rather that my lyre should be inharmonious, and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music in the chorus which I provided; aye, or that the whole world should be at odds with me, and oppose

me, rather than that I myself should be at odds with myself, and contradict myself.

苏格拉底：啊！卡利克勒，如果人类没有某些共同的感情，不论其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得多么不同——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每个人的感情都是自己特有的，不为他同类中的其他人所共享——我不知道我们如何与他人交流我们的观点。我之所以说这一点，是因为我发觉你我有一种共同的感情。我们都喜爱别人，各自都有两个所爱——我的所爱是克莱尼阿斯之子阿尔西比亚德斯，还有哲学；而你的所爱是雅典的德摩斯以及皮里兰佩斯之子德摩斯。现在我发觉，你这么聪明的人，不敢反驳你最喜爱之人的任何字词或观点上的不一致；而是他变你也随着变，完全地亦步亦趋。当雅典的德摩斯否定了你在集会上说的任何话，你就转向他的观点；对皮里兰佩斯英俊的幼子德摩斯，你也这么做。因为你没有勇气拒绝你喜爱之人的言语和观点；并且如果有人对你受他们影响在不同时间段说出不同的话这种奇怪现象表示诧异，如果你诚实的话，你可能会回答他说，你禁不住说了你所喜爱之人的话，除非你所喜爱之人受到阻止；而只有他们沉默时，你才能保持沉默。现在你一定知道，我的话也是一种回声，因而你不必对我感到惊讶；但如果你要使我沉默，就要使哲学沉默，哲学是我的所爱，因为她经常告诉我我现在告诉你的，我的朋友；她也不像我的另一个所爱一样变化无常，因为克利尼亚之子今天说了件事情，明天又说另一件事情，但哲学是永远不变的。她是个老师，你现在正对她的话感到惊讶，而且是你亲自听她说的。你一定要反驳她，要么你表明，如我所言，行不公正并逃避惩罚不是最大的恶；要么你不反驳她的话，那么以埃及神的神犬起誓，我要说，啊！卡利克勒，卡利克勒将永远不会与自己一致，他的一生都是不和谐的。然而，我的朋友，我宁愿我的我的里拉琴演奏不协调，我提供的合唱不成音乐；是的，或者整个世界都不同意我，反对我，也不愿我自己与自己意见不一、互相矛盾。

CALLICLES: Oh Socrates, you are a regular declaimer, and seem to be running riot in the argument. And now you are declaiming in this way because Polus has fallen into the same error himself of which he accused Gorgias—for he said that when Gorgias was asked by you, whether, if some one came to him who wanted to learn rhetoric, and did not know justice, he would teach him justice, Gorgias in his modesty replied that he would, because he thought that mankind in general would be displeased if he answered 'No'; and then in consequence of this admission, Gorgias was compelled to contradict himself, that being just the sort of thing in which you delight. Whereupon Polus laughed at you deservedly, as I think; but now he has himself fallen into the same trap. I cannot say very much for his wit when he conceded to you that to do is more dishonourable than to suffer injustice, for this was the admission which led to his being entangled by you; and because he was too modest to say what he thought, he had his mouth stopped. For the truth is, Socrates, that you, who pretend to be engaged in the pursuit of truth, are appealing now to the popular and vulgar notions of right, which are not natural, but only conventional. Convention and nature are generally at variance with one another: and hence, if a person is too modest to say what he thinks, he is compelled to contradict himself; and you, in your ingenuity perceiving the advantage to be thereby gained, slyly ask of him who is arguing conventionally a question which is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rule of nature; and if he is talking of the rule of nature, you slip away to custom: as, for instance, you did in this very discussion about doing and suffering injustice. When Polus was speaking of the conventionally dishonourable, you assailed hi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nature; for by the rule of nature, to suffer injustice is the greater disgrace because the greater evil; but conventionally, to do evil is the more disgraceful. For the suffering of injustice is not the part of a man, but of a slave, who indeed had better die than live;

since when he is wronged and trampled upon, he is unable to help himself, or any other about whom he cares. The reason, as I conceive, is that the makers of laws are the majority who are weak; and they make laws and distribute praises and censures with a view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they terrify the stronger sort of men, and those who are able to get the better of them, in order that they may not get the better of them; and they say, that dishonesty is shameful and unjust; meaning, by the word injustice, the desire of a man to have more than his neighbours; for knowing their own inferiority, I suspect that they are too glad of equality. And therefore the endeavour to have more than the many, is conventionally said to be shameful and unjust, and is called injustice, whereas nature herself intimates that it is just for the better to have more than the worse, the more powerful than the weaker; and in many ways she shows, among men as well as among animals, and indeed among whole cities and races, that justice consists in the superior ruling over and having more than the inferior. For on what principle of justice did Xerxes invade Hellas, or his father the Scythians? (Not to speak of numberless other examples.) Nay, but these are the men who act according to nature; yes, by Heaven, and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nature: not, perhaps, according to that artificial law, which we invent and impose upon our fellows, of whom we take the best and strongest from their youth upwards, and tame them like young lions,—charming them with the sound of the voice, and saying to them, that with equality they must be content, and that the equal is the honourable and the just. But if there were a man who had sufficient force, he would shake off and break through, and escape from all this; he would trample under foot all our formulas and spells and charms, and all our laws which are against nature: the slave would rise in rebellion and be lord over us, and the light of natural justice would shine forth. And this I take to be the sentiment of Pindar, when he says in

his poem, that

卡利克勒：啊！苏格拉底，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演说家，似乎在辩论中发动了一场暴动。现在你以这种方式抨击波卢斯，因为他本人也犯了他指责高尔吉亚所犯的那个错误——波卢斯说当你问高尔吉亚，如果有人来找他希望向他学习修辞学而又不知何为公正，他是否会教他公正，高尔吉亚谦逊地回答说他会，因为他认为如果回答“不”，众人都会不高兴；正是由于他承认这一点，高尔吉亚被迫陷入自相矛盾，而这正是你所引以为乐的那种事情。因此在我看来，波卢斯取笑你是理所应当的；但这会儿他也陷入了同一个陷阱。当他向你让步承认行不公正比遭受不公正更加可耻时，我不敢太恭维他的机智，因为他承认了这一点，你致使他陷入陷阱；因为他太谦虚，不愿说出自己的想法，所以只好闭嘴。事实是，苏格拉底，你假装致力于追求真理，现在却迎合流行的和庸俗的正义观，这些观念不是出于本性的，而仅是约定俗成的。习俗和本性通常彼此有分歧：因此，如果一个人太谦虚了，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便不得不自相矛盾；你凭借你的机智，发现了由此可获得的优势，狡猾地向一个以习俗的方式辩论的人提问，而答案取决于本性的规则；而如果他谈论本性的规则，你则溜到习俗上：例如，你在这次关于行不公正和遭受不公正的讨论上就这么做的。当波卢斯谈论按照习俗来说可耻的事物，你从本性的规则这个角度抨击他；因为按照本性的规则，遭受不公正是更大的耻辱因为它是更大的恶；但从习俗来看，做恶事更为可耻。因为遭受不公正不是人的一部分，而是奴隶的一部分，他的确是生不如死；因为当他被虐待和蹂践，他帮不了自己，也帮不了任何他所关心的人。在我看来，原因在于法律的制定者是处于弱势的大多数；并且他们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利益来制定法律和实施赏罚；他们威吓更强的那类人，和那些能胜过他们的人，以便他们不会胜过自己；他们说不诚实是可耻的和不公正的；不公正这一词意思是说，一个人想比他的邻人拥有更多这一欲望；因为了解他们自己的低下，我猜他们对公平十分乐意。因此，试图拥有更多，习俗上说是可耻的和不公的，被称为不公正，然而自然本身告诉我们，更优秀者比低劣者拥有更多，强大

者比弱者拥有更多，这是公正的；而且在人和动物中，也在所有城市和种族间，她以多种方式显示了公正在于上等对低等的统治和比低等拥有更多。薛西斯，或他锡西厄人的父亲按照什么公正的原则入侵赫拉斯？（更不用提无数的其他例子了。）确切地说，他们正是按照自然行动的人；是的，按照天意，且按照自然法则，但或许不是按照人为的法律，那是我们创造出、强加在我们同伴身上的；从他们幼年开始我们从中选取最优秀的和最强大的，像驯服幼师一样驯服他们，——以声音迷惑他们，并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满足于平等，平等是可敬的、公正的。但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力量，他会动摇、突破和摆脱这一切；他会把我们的公例、迷惑和哄骗，以及所有我们有违自然的法律都踩到脚下；奴隶会起来反抗，成为我们的主人，自然公正之光会闪耀。这点我借用了品达的观点，他在诗中说：

'Law is the king of all, of mortals as well as of immortals;'

“法则是万物之王，不论凡人还是神仙；”

This, as he says,

他这么说：

'Makes might to be right, doing violence with highest hand; as I infer from the deeds of Heracles, for without buying them—'(Fragm. Incert. 151(bockh).) —I do not remember the exact words, but the meaning is, that without buying them, and without their being given to him, he carried off the oxen of Geryon,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natural right, and that the oxen and other possessions of the

weaker and inferior properly belong to the stronger and superior. And this is true, as you may ascertain, if you will leave philosophy and go on to higher things: for philosophy, Socrates, if pursued in moderation and at the proper age, is an elegant accomplishment, but too much philosophy is the ruin of human life. Even if a man has good parts, still, if he carries philosophy into later life, he is necessarily ignorant of all those things which a gentleman and a person of honour ought to know; he is inexperienced in the laws of the State, and in the language which ought to be used in the dealings of man with man, whether private or public, and utterly ignorant of the pleasures and desires of mankind and of human character in general. And people of this sort, when they betake themselves to politics or business, are as ridiculous as I imagine the politicians to be, when they make their appearance in the arena of philosophy. For, as Euripides says,

“使强权成为正当，手握最大的权力，行暴力之事；我从赫拉克勒斯的所为推测出的，因为他没付钱——”（Fragm. Incert. 151 (bockh).）——我记不住准确的字词，但意思是，没有买下，也没有人送给他，他就按照自然权力的法则牵走了吉里昂的群牛，弱者及低等人的牛群和其他财产都属于强者和高等人。如果你抛开哲学，追求更高的东西，你会明白这是正确的：至于哲学，苏格拉底，如果在适当的年龄适度追求，是很高雅的成就，但过度的哲学会毁掉人的生活。即使一个人有好的地方，如果他仍旧把哲学带到他晚年的生活，那么他对一个绅士、一个可敬之人所应当知道的必然一无所知；对城邦的法律、对跟人不论是私交还是社交应该用的语言都毫无经验，对人类和人性的愉悦和欲望，他完全不了解。这种人，当他们致力于政治或商业，他们会像我想象的政客在哲学的竞技场出现一样荒谬可笑。正如欧里庇得斯所说：

'Every man shines in that and pursues that, and devotes the greatest portion of the day to that in which he most excels,' (Antiope, fragm. 20 (Dindorf).)but anything in which he is inferior, he avoids and depreciates, and praises the opposite from partiality to himself, and because he thinks that he will thus praise himself. The true principle is to unite them. Philosophy, as a part of education, is an excellent thing, and there is no disgrace to a man while he is young in pursuing such a study; but when he is more advanced in years, the thing becomes ridiculous, and I feel towards philosophers as I do towards those who lisp and imitate children. For I love to see a little child, who is not of an age to speak plainly, lisping at his play; there is an appearance of grace and freedom in his utterance, which is natural to his childish years. But when I hear some small creature carefully articulating its words, I am offended; the sound is disagreeable, and has to my ears the twang of slavery. So when I hear a man lisping, or see him playing like a child, his behaviour appears to me ridiculous and unmanly and worthy of stripes. And I have the same feeling about students of philosophy; when I see a youth thus engaged,—the study appears to me to be in character, and becoming a man of liberal education, and him who neglects philosophy I regard as an inferior man, who will never aspire to anything great or noble. But if I see him continuing the study in later life, and not leaving off, I should like to beat him, Socrates; for, as I was saying, such a one, even though he have good natural parts, becomes effeminate. He flies from the busy centre and the market-place, in which, as the poet says, men become distinguished; he creeps into a corner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and talks in a whisper with three or four admiring youths, but never speaks out like a freeman in a satisfactory manner. Now I, Socrates, am very well inclined towards you, and my feeling may be compared with that of Zethus towards Amphion, in the play of Euripides, whom I was mentioning just now: for I am disposed to

say to you much what Zethus said to his brother, that you, Socrates, are careless about the things of which you ought to be careful; and that you

“每个人都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做他最擅长的事情，他的追求在那里，也在那里发出光芒。”（Antiope, fragm. 20 (Dindorf).）但对任何他不擅长的事情，他会避免和贬低，并出于他自己的偏见称赞与之相对的事情，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称赞自己。正确的原则是将它们结合。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哲学是极好的事物，一个人年轻时追求这一研究没有什么丢脸的；但随着他年龄的增大，哲学变得荒谬起来，我看待哲学家就像看待那些模仿孩童咬舌说话的人一样。因为我喜欢看到这样的小孩子，他还不到流利说话的年龄，玩耍时咬着舌头吐字；他的发音有一种优雅和自由的感觉，这在他孩提时是很自然的。但当我听到有些小家伙仔细地、清晰地发音吐字，我感到不舒服；那声音令人不快，对我的耳朵来说就是奴隶发出的鼻音。因此，当我听见一个成人咬舌说话，或看见他像孩子一样玩耍，他的行为对我来说荒谬、丢人，他该受鞭打。对学习哲学的学生们我也抱有同样的感情；当我看到年轻人学习哲学，——我认为那种学习在我看来与其年龄十分相称，那是一个接受通识教育的人。那些不学哲学的人我视为低等人，他们永远不会做出什么伟大或高贵之事。但如果我看到他晚年继续学习哲学，仍未放弃，我直接想揍他，苏格拉底；因为如我所说，这样的人即使天性有些好的地方，也变得软弱。他远离了商业中心和市场，如诗人所言，在这些地方，人们才变得高贵起来；他蜷缩在一个角落度过余生，他只低声地同三四个崇拜他的年轻人谈话，但永远不会像一个自由民那样令人满意地大声说话。苏格拉底，现在我非常赞赏你，我对你的感情正如我刚才想你提到的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里西苏斯对安菲翁的感情：我愿意对你说西苏斯对他兄弟所说的话，苏格拉底，你对你该关心的事情不关心，而且你

'Who have a soul so noble, are remarkable for a puerile

exterior; neither in a court of justice could you state a case, or give any reason or proof, or offer valiant counsel on another's behalf.'

“拥有那么高贵的灵魂，却表现得如此幼稚；”在法庭上你不能陈述案例，不能给出任何推理或证据，也不能勇敢地为他人提供辩护。

And you must not be offended, my dear Socrates, for I am speaking out of good-will towards you, if I ask whether you are not ashamed of being thus defenceless; which I affirm to be the condition not of you only but of all those who will carry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too far. For suppose that some one were to take you, or any one of your sort, off to prison, declaring that you had done wrong when you had done no wrong, you must allow that you would not know what to do—there you would stand giddy and gaping, and not having a word to say; and when you went up before the Court, even if the accuser were a poor creature and not good for much, you would die if he were disposed to claim the penalty of death. And yet, Socrates, what is the value of

你一定不要生气，我亲爱的苏格拉底，因为如果我问你是否因无言以对而感到羞愧，我是出于好意；我肯定这不仅是你自己的状况，所有过度学习哲学的人都是如此。假如有人把你或任何像你这样的人带到监狱，声称你做了坏事而其实你没有，你必须承认你不知该如何做——你张着嘴，晕晕乎乎站在那里，一个字都说不出；当你来到法庭前，即便控告人只是个一无是处的可怜虫，如果他想要执行死刑，你也会死去。那么，苏格拉底，这种技艺的价值是什么？

'An art which converts a man of sense into a fool,'

“这种技艺使一个有理性的人变成傻子，”

who is helpless, and has no power to save either himself or others, when he is in the greatest danger and is going to be despoiled by his enemies of all his goods, and has to live, simply deprived of his rights of citizenship?—he being a man who, if I may use the expression, may be boxed on the ears with impunity. Then, my good friend, take my advice, and refute no more:

当他身处最大的危险并被敌人剥夺所有的财产时，这人完全无助，没有拯救自己或他人的能力，他不得不丧失了公民的权利而活着是吗？——我可以这么表述，人人可以打这个人的耳光而免于惩罚。那么，我的好朋友，接受我的建议，不要再反驳了：

'Learn the philosophy of business, and acquire the reputation of wisdom. But leave to others these niceties,'

“学习经商之道，赢得智慧美名。把这些吹毛求疵的研究留给别人，”

whether they are to be described as follies or absurdities:

不论这可以被称作愚蠢之事还是荒谬之事：

'For they will only Give you poverty for the inmate of your dwelling.'

“因为他们只能给你带来贫穷，与你同驻。”

Cease, then, emulating these paltry splitters of words, and emulate only the man of substance and honour, who is well to do.

那么，停止效仿这些毫无价值的琐碎文字，而应去仿效那些富有的和可敬的人。

SOCRATES: If my soul, Callicles, were made of gold, should I not rejoice to discover one of those stones with which they test gold, and the very best possible one to which I might bring my soul; and if the stone and I agreed in approving of her training, then I should know that I was in a satisfactory state, and that no other test was needed by me.

苏格拉底：卡利克勒，如果我的灵魂是金子做的，我会很高兴发现一块试金石，并找到最有可能的那块把我的灵魂凑上去；如果我和试金石的检验结果在此达成一致，那么我知道我状态良好，不需要其他的检验了。

CALLICLES: What is your meaning, Socrates?

卡利克勒：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什么？

SOCRATES: I will tell you; I think that I have found in you the desired touchstone.

苏格拉底：我会告诉你的；我想我已经在你身上发现了想要的试金石。

CALLICLES: Why?

卡利克勒：为什么？

SOCRATES: Because I am sure that if you agree with me in any of the opinions which my soul forms, I have at last found the truth indeed. For I consider that if a man is to make a complete trial of the good or evil of the soul, he ought to have three qualities—knowledge, good-will, outspokenness, which are all possessed by you. Many whom I meet are unable to make trial of me, because they are not wise as you are; others are wise, but they will not tell me the truth, because they have not the same interest in me which you have; and these two strangers, Gorgias and Polus, are undoubtedly wise men and my very good friends, but they are not outspoken enough, and they are too modest. Why, their modesty is so great that they are driven to contradict themselves, first one and then the other of them, in the face of a large company, on matters of the highest moment. But you have all the qualities in which these others are deficient, having received an excellent education; to this

many Athenians can testify. And you are my friend. Shall I tell you why I think so? I know that you, Callicles, and Tisander of Aphidnae, and Andron the son of Androtion, and Nausicydes of the deme of Cholarges, studied together: there were four of you, and I once heard you advising with one another as t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ursuit of philosophy should be carried, and, as I know, you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tudy should not be pushed too much into detail. You were cautioning one another not to be overwise; you were afraid that too much wisdom might unconsciously to yourselves be the ruin of you. And now when I hear you giving the same advice to me which you then gave to your most intimate friends, I have a sufficient evidence of your real good-will to me. And of the frankness of your nature and freedom from modesty I am assured by yourself, and the assurance is confirmed by your last speech. Well then, the inference in the present case clearly is, that if you agree with me in an argument about any point, that point will have been sufficiently tested by us, and will not require to be submitted to any further test. For you could not have agreed with me, either from lack of knowledge or from superfluity of modesty, nor yet from a desire to deceive me, for you are my friend, as you tell me yourself. And therefore when you and I are agreed, the result will be the attainment of perfect truth. Now there is no nobler enquiry, Callicles, than that which you censure me for making,—what ought the character of a man to be, and what his pursuits, and how far is he to go, both in maturer years and in youth? For be assured that if I err in my own conduct I do not err intentionally, but from ignorance. Do not then desist from advising me, now that you have begun, until I have learned clearly what this is which I am to practise, and how I may acquire it. And if you find me assenting to your words, and hereafter not doing that to which I assented, call me 'dolt,' and deem me unworthy of receiving further instruction. Once more, then, tell me

what you and Pindar mean by natural justice: Do you not mean that the superior should take the property of the inferior by force; that the better should rule the worse, the noble have more than the mean? Am I not right in my recollection?

苏格拉底：因为我确信对于我的灵魂所孕育的任何一个观点，如果你和我的看法一致，那么我最终真的找到了真理。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想彻底考验灵魂的善恶，他应该具备三种品质——知识、善意和坦率，这三种品质你都具备。我见过的许多人都没有考验我的能力，因为他们不像你这样睿智；剩下的一些虽然睿智，但不愿意以实相告，因为他们不具有你对我的那种兴趣；这两个陌生人，高尔吉亚和波卢斯，无疑是智者，也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但他们不够坦率，他们太谦虚。为什么呢？他们谦虚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当面对一大群同伴的时候，论及最为紧要关头的大事时，他们不得不反驳自己，先是高尔吉亚，然后是波卢斯。但是，经过了良好的教育，其他的那些人所缺少的品质你都具备了；这一点许多雅典人可以证明。而且你是我的朋友。要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这样想吗？我知道你、卡利克勒、阿菲德那人提珊德尔、安德罗提翁之子安德隆、科拉吉斯镇的瑙昔居德过去在一起学习：你们是四个人，我曾经听到你们互相切磋，哲学的追求应该进行到什么程度。而且，据我所知，你得出结论说学习不应该过多地追求细节。你们当时在互相告诫不要太过聪明；你们害怕过多的智慧会在不知不觉中毁了自己。现在当我听到你把曾经给你最亲密的朋友的忠告说给我时，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对我的善意。你天性坦率，不故作谦恭，这点我很确定，而且你最后的演讲再次确认了这点，使我深信不疑。那么好，从目前情况来推断，很显然，如果你在辩论中同意我的任何一个观点，那个观点将是经过我们充分验证的，不需要经过任何进一步的验证。因为你不可能已经同意了我的观点，或是由于知识不足，或是由于谦虚过度，但不是出于想欺骗我的一种欲望，因为正如你自己告诉我的，你是我的朋友。因此，当你我达成一致意见时，结果会实现绝对真理。现在，卡利克勒，没有比你指责我时提问的问题更好的了，——一个人无论年少时还是成年后，性格

应该如何，追求应该如何，应该走多远？因为请相信，如果我自己的行为有错，并非故意为之，而是无知使然。既然你已经开始，那么请不要中断对我的指导，直到我已经清楚地了解了自己将要从事的技艺为何，以及怎样才能学会。如果你发现我同意你的教导，而后却没有照此行事，你就叫我“笨蛋”吧，认为我不配接受进一步的指导吧。那么，再来一次吧，告诉我你和品达所说的自然公正是什么意思：你们难道不是想说高贵者应该用暴力占有低下者的财产；优秀者应该统治低劣者、高尚者应该比卑鄙者拥有得更多吗？我回忆得不对吗？

CALLICLES: Yes; that is what I was saying, and so I still aver.

卡利克勒：对；我当时说的就是这些，而且我还是坚持这种观点。

SOCRATES: And do you mean by the better the same as the superior?for I could not make out what you were saying at the time—whether you meant by the superior the stronger, and that the weaker must obey the stronger, as you seemed to imply when you said that great cities attack small ones in accordance withnatural right, because they are superior and stronger, as though the superior and stronger and better were the same; or whether the better may be also the inferior and weaker, and the superior the worse, or whether better is to be defined in the same way as superior—this is the point which I want to have cleared up. Are the superior and better and stronger the same or different?

苏格拉底：你所说的优秀者和高贵者所指相同吗？因为我不明白你当时在说什么——是不是你说的高贵者指相对强大者，弱小者必须

顺从强大者，正如当你说到大城邦进攻小城邦时似乎在暗示的那样——所谓顺乎天赋权利，因为他们高贵且更强大，仿佛高贵者、强大者、优秀者没有区别；或者说，是否优秀者也可能是低下者、可能是弱小的，高贵者也可能是低劣的；或者说，是否要以同样的方式定义优秀者和高贵者——这是我想弄清的关键点。高贵者、优秀者还有强大者，相同还是不同？

CALLICLES: I say unequivocally that they are the same.

卡利克勒：我毫不含糊地说他们是相同的。

SOCRATES: Then the many are superior by nature to the one, against whom, as you were saying, they make the laws?

苏格拉底：那么群体生来就比个体强，正如你说过的，群体制定了统治个体的法律？

CALLICLES: Certainly.

卡利克勒：没错。

SOCRATES: Then the laws of the many are the laws of the superior?

苏格拉底：那么多数人的法律是高贵者的法律？

CALLICLES: Very true.

卡利克勒：非常正确。

SOCRATES: Then they are the laws of the better; for the superior class are far better, as you were saying?

苏格拉底：那么就是优秀者的法律，因为高贵者阶层要优秀得多，如你之前所说？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对。

SOCRATES: And since they are superior, the laws which are made by them are by nature good?

苏格拉底：既然他们是高贵者，由他们制定的法律先天就是好的了？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对。

SOCRATES: And are not the many of opinion, as you were lately saying, that justice is equality, and that to do is more disgraceful than to suffer injustice?—is that so or not? Answer, Callicles, and let no modesty be found to come in the way; do the many think, or do they not think thus?—I must beg of you to answer, in order that if you agree with me I may fortify myself by the assent of so competent an authority.

苏格拉底：如你刚才所述，公正就是平等，做事不公正比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更不光彩，这难道不是多数人的看法吗？——对还是不对？请回答，卡利克勒，不要让我看到谦虚在碍手碍脚。多数人这样想，还是不这样想？——我一定要恳求你回答，目的是一旦你同意我的说法，我就可以用这样一位实力雄厚的权威的赞同来鼓励自己。

CALLICLES: Yes; the opinion of the many is what you say.

卡利克勒：是这样想；多数人的看法就是你说的那样。

SOCRATES: Then not only custom but nature also affirms that to do is more disgraceful than to suffer injustice, and that justice is equality; so that you seem to have been wrong in your former assertion, when accusing me you said that nature and custom are opposed, and that I, knowing this, was dishonestly playing between them, appealing to custom when the argument is about nature, and

to nature when the argument is about custom?

苏格拉底：那么，不仅习俗，而且天性都坚持认为，做事不公正比遭受不公正更不光彩，公正就是平等；如此说来，你之前的主张有错，你指责我时说到天性和习俗是对立的，你说我已经知道这一点，却在关于天性的辩论中诉诸习俗，在关于习俗的辩论中诉诸天性，说我是狡猾地在二者之间玩花样？

CALLICLES: This man will never cease talking nonsense. At your age, Socrates, are you not ashamed to be catching at words and chuckling over some verbal slip? Do you not see—have I not told you already, that by superior I mean better: do you imagine me to say, that if a rabble of slaves and nondescripts, who are of no use except perhaps for their physical strength, get together their ipsissimaverba are laws?

卡利克勒：这个人永远停止不了说废话。苏格拉底，你这样的年纪了还咬文嚼字，还会因为一些言辞上的疏漏暗自发笑，难道不觉得难为情吗？难道你不知道——难道我没告诉过你，我说的高贵是指优秀；你是不是猜想我要这么说，有一群由奴隶和不入流的人们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除了体力以外毫无用处的，一旦集合到一起，他们的话就成了法律？

SOCRATES: Ho! My philosopher, is that your line?

苏格拉底：啊！我的哲学家啊，那是你的思路吗？

CALLICLES: Certainly.

卡利克勒：没错。

SOCRATES: I was thinking, Callicles, that something of the kind must have been in your mind, and that is why I repeated the question,—what is the superior? I wanted to know clearly what you meant; for you surely do not think that two men are better than one, or that your slaves are better than you because they are stronger? Then please to begin again, and tell me who the better are, if they are not the stronger; and I will ask you, great Sir, to be a little milder in your instructions, or I shall have to run away from you.

苏格拉底：我之前在想，卡利克勒，你脑海里一定已经有类似的想法，这就是我重复这个问题的原因，——何为高贵者？我想了解清楚你是什么意思；因为你肯定不会认为两个人比一个人优秀，或是你的奴隶比你强壮所以就比你要优秀，不是吗？那么请重新开始，告诉我，如果相对强壮的人并非更优秀的人，谁才是呢。尊贵的大人，我想恳请您教诲别人时稍稍温和一些，不然我将不得不从你面前逃开。

CALLICLES: You are ironical.

卡利克勒：你爱挖苦人。

SOCRATES: No, by the hero Zethus, Callicles, by whose aid you

were just now saying many ironical things against me, I am not—tell me, then, whom you mean, by the better?

苏格拉底：非也。奉英雄西苏斯，卡利克勒之名，奉西苏斯之帮助，你刚才说了很多挖苦我的话，而我并不爱挖苦人——那么，告诉我，你所说的优秀者指的是谁？

CALLICLES: I mean the more excellent.

卡利克勒：我指的是更杰出的人。

SOCRATES: Do you not see that you are yourself using words which have no meaning and that you are explaining nothing?—will you tell me whether you mean by the better and superior the wiser, or if not, whom?

苏格拉底：你难道没发觉自己所用的词没意义，并且你什么都没解释出来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所说的优秀者和高贵者是不是智者，如果不是，那又是谁呢？

CALLICLES: Most assuredly, I do mean the wiser.

卡利克勒：十分肯定，我指的确实是智者。

SOCRATES: Then according to you, one wise man may often be superior to ten thousand fools, and he ought to rule them, and they ought to be his subjects, and he ought to have more than they should. This is what I believe that you mean (and you must not suppose that I am word-catching), if you allow that the one is superior to the ten thousand?

苏格拉底：所以，根据你的说法，一个智者往往可能比一万个蠢人要高贵，而且他应当统治他们，他们应当对他俯首称臣，并且他应该比他们拥有的更多。我认为这就是你的意思（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咬文嚼字），如果你同意那一个人比那一万人要高贵的话？

CALLICLES: Yes; that is what I mean, and that is what I conceive to be natural justice—that the better and wiser should rule have more than the inferior.

卡利克勒：同意；那就是我的意思，而且那就是我所认为的所谓自然公正——优秀睿智的人应该统治低下的人并比他们拥有更多。

SOCRATES: Stop there, and let me ask you what you would say in this case: Let us suppose that we are all together as we are now; there are several of us, and we have a large common store of meats and drinks, and there are all sorts of persons in our company having various degrees of strength and weakness, and one of us, being physician, is wiser in the matter of food than all the rest, and he is probably stronger than some and not so strong as others of us—will he not, being wiser, be also better than we are, and our superior in this matter of food?

苏格拉底：到此为止，让我问问你对于这种情况你怎么说：假设我们像现在这样所有人在一起；其中包括我们中的几个，我们共有大量的肉和酒，有各色人等，他们力气大小不同，体格强弱不同。我们中有一个人是医生，对于食物，他比其余所有的人都睿智，他很可能还比其中一些人强壮，但不如剩下的人——既然比我们睿智，在食物方面他难道会不比我们优秀，不是比我们高贵的人吗？

CALLICLES: Certainly.

卡利克勒：当然会。

SOCRATES: Either, then, he will have a larger share of the meats and drinks, because he is better, or he will have the distribution of all of them by reason of his authority, but he will not expend or make use of a larger share of them on his own person, or if he does, he will be punished;—his share will exceed that of some, and be less than that of others, and if he be the weakest of all, he being the best of all will have the smallest share of all, Callicles—am I not right, my friend?

苏格拉底：所以，他或者会分得更多的肉和酒，因为他优秀，或者会因其权威而分得所有的肉和酒；但是，他不会把大部分的肉和酒用于自己食用或使用，或者如果他用了，他会受到惩罚；——他分到的量比一些人的多，比另一些人的少，而且如果他最弱小，，虽然最为优秀，但是分到的酒肉会最少。卡利克勒，我说的不对吗，我的朋友？

CALLICLES: You talk about meats and drinks and physicians and other nonsense; I am not speaking of them.

卡利克勒：你谈论的是肉、酒、医生和其他没意义的东西；我说的不是这些。

SOCRATES: Well, but do you admit that the wiser is the better? Answer 'Yes' or 'No.'

苏格拉底：好啊，但你承认更睿智的人就是更优秀吗？请回答“是”或“不是”。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

SOCRATES: And ought not the better to have a larger share?

苏格拉底：更优秀的人难道不应该分到更大的一份吗？

CALLICLES: Not of meats and drinks.

卡利克勒：不是分肉和酒。

SOCRATES: I understand: then, perhaps, of coats—the most skilful weaver ought to have the largest coat, and the greatest number of them, and go about clothed in the best and finest of them?

苏格拉底：我明白：那么，分的有可能是上衣——最灵巧的织工应该拥有最大的上衣，而且数量最多，穿着最好最精致的大衣四处走？

CALLICLES: Fudge about coats!

卡利克勒：上衣不在讨论之列！

SOCRATES: Then the skillfullest and best in making shoes ought to have the advantage in shoes; the shoemaker, clearly, should walk about in the largest shoes, and have the greatest number of them?

苏格拉底：那么最灵巧、做鞋子做得最好的鞋匠应该在分鞋子时占有优势；显然，这样的鞋匠得到的可以穿着到处走的鞋子应该最大、数量最多？

CALLICLES: Fudge about shoes! What nonsense are you talking?

卡利克勒：鞋子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你在胡说些什么啊？

SOCRATES: Or, if this is not your meaning, perhaps you would say that the wise and good and true husbandman should actually have a larger share of seeds, and have as much seed as possible for his own land?

苏格拉底：或者，如果这不是你的所指，也许你是想说睿智、善良、纯粹的农夫实际上应该分得更多的种子，并且越多越好，直到够种他的整块地？

CALLICLES: How you go on, always talking in the same way, Socrates!

卡利克勒：你怎么一直这样？你总在用同样的方式说话，苏格拉底！

SOCRATES: Yes, Callicles, and also about the same things.

苏格拉底：是的，卡利克勒，而且说的还是同样的事。

CALLICLES: Yes, by the Gods, you are literally always talking of cobblers and fullers and cooks and doctors, as if this had to do with our argument.

卡利克勒：是的，诸神在上，你其实一直在谈论鞋匠、漂洗工、厨师，还有医生，仿佛这和你的论断有关似的。

SOCRATES: But why will you not tell me in what a man must be superior and wiser in order to claim a larger share; will you neither accept a suggestion, nor offer one?

苏格拉底：可是，你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一个人必须要在哪方面高贵和睿智，才能要求分得更多呢；你是不是既不想接受建议，也不想给出建议呢？

CALLICLES: I have already told you. In the first place, I mean by superiors not cobblers or cooks, but wise politicians who underst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state, and who are not only wise, but also valiant and able to carry out their designs, and not the men to faint from want of soul.

卡利克勒：我已经告诉你了。首先，我所说的高贵的人并非指鞋匠或厨师，而是睿智的政治家，他们通晓如何治理城邦，他们不仅睿智，而且勇武，有能力执行计划，他们不是那些因灵魂不健全而失去勇气的人。

SOCRATES: See now, most excellent Callicles, how different my charge against you is from that which you bring against me, for you reproach me with always saying the same; but I reproach you with never saying the same about the same things, for at one time you were defining the better and the superior to be the stronger, then

again as the wiser, and now you bring forward a new notion; the superior and the better are now declared by you to be the more courageous: I wish, my good friend, that you would tell me, once for all, whom you affirm to be the better and superior, and in what they are better?

苏格拉底：看看现在，卓越无比的卡利克勒，我对你的批评和你对我的是多么不同啊。你谴责我总是说同样的事；我却指责你对同样的事情的说法总是不一致，因为你一会儿把强大者定义为优秀者和高贵者，一会儿又定义为睿智者，现在你又带来了个新的概念：你声称高贵者和优秀者就是更英勇的人：我希望你，我的好朋友，能一次性地告知我，你坚持宣称的优秀的人和高贵的人是谁，他们在什么方面优秀？

CALLICLES: I have already told you that I mean those who are wise and courageou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state—they ought to be the rulers of their states, and justice consists in their having more than their subjects.

卡利克勒：我已经告诉你了，我说的是那些在城邦的治理方面睿智英勇的人——他们应该成为各自城邦的统治者，他们比其子民拥有得更多是公正的。

SOCRATES: But whether rulers or subjects will they or will they not have more than themselves, my friend?

苏格拉底：可是统治者或者臣民愿不愿意这些人比自己拥有得更

多呢，我的朋友？

CALLICLES: What do you mean?

卡利克勒：你是什么意思？

SOCRATES: I mean that every man is his own ruler; but perhaps you think that there is no necessity for him to rule himself; he is only required to rule others?

苏格拉底：我是指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统治者；但或许你认为他没有必要统治自己；只要求他统治别人？

CALLICLES:What do you mean by his 'ruling over himself'?

卡利克勒：你说他“统治自己”是什么意思？

SOCRATES: A simple thing enough; just what is commonly said, that a man should be temperate and master of himself, and ruler of his own pleasures and passions.

苏格拉底：太简单不过的事情；就是常说的所谓一个人应该节制，做自己的主人，控制自己的愉悦和激情。

CALLICLES: What innocence! You mean those fools,—the temperate?

卡利克勒：太天真了！你是说那些傻瓜——有节制的人？

SOCRATES: Certainly—any one may know that to be my meaning.

苏格拉底：没错——任何人可能都知道这就是我的意思。

CALLICLES: Quite so, Socrates; and they are really fools, for how can a man be happy who is the servant of anything? On the contrary, I plainly assert, that he who would truly live ought to allow his desires to wax to the uttermost, and not to chastise them; but when they have grown to their greatest he should have courage and intelligence to minister to them and to satisfy all his longings. And this I affirm to be natural justice and nobility. To this however the many cannot attain; and they blame the strong man because they are ashamed of their own weakness, which they desire to conceal, and hence they say that intemperance is base. As I have remarked already, they enslave the nobler natures, and being unable to satisfy their pleasures, they praise temperance and justice out of their own cowardice. For if a man had been originally the son of a king, or had a nature capable of acquiring an empire or a tyranny or sovereignty, what could be more truly base or evil than temperance—to a man like him, I say, who might freely be enjoying every good, and has no one to stand in his way, and yet has admitted custom and reason and the opinion of other men to be

lords over him?—must not he be in a miserable plight whom the reputation of justice and temperance hinders from giving more to his friends than to his enemies, even though he be a ruler in his city? Nay, Socrates, for you profess to be a votary of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is this—that luxury and intemperance and licence, if they be provided with means, are virtue and happiness—all the rest is a mere bauble, agreements contrary to nature, foolish talk of men, nothing worth.

卡利克勒：确实如此，苏格拉底；他们真的是傻瓜，因为在任何事都受管治的人怎么会快乐呢？相反，我坦诚地断言，那些想活得纯粹的人容许自己的欲望膨胀到最大，而不应加以遏制；但是，当欲望已经膨胀到最大的时候，他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照管并满足自己所有的这些欲望。这就是我所说的天然的公平和高尚。然而，有很多人难以达到这一点；他们就责怪强大的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弱小感到羞愧，想掩盖自己的弱小，因此他们说没有节制的人是卑下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奴役着那些更为高尚的天性，由于无法使这些天性得以满足，他们就从自己的弱小出发来赞扬节制和公正。因为，如果一个人起初是国王的儿子，或者具有能建立王国，当上僭主，君临天下的天性，又有什么真正比节制更加卑劣、害处更大呢——我是说，对于一个他这样的人，这样一个可能随心所欲享受一切美好事物，无人阻拦，却承认习俗、理智和他人的观点高高在上的人？——下面这个人难道就一定不会处于痛苦的境地吗：公正和节制的声名使得他无法对朋友付出得比对敌人更多，即使他是自己城邦的统治者？不一定，苏格拉底，因为你声称自己是献身真理的人，这就是真理——假若使用得当，奢侈、无度和放荡便是美德和幸福——剩下的一切都一文不值，违背天性的协议、人们愚蠢的谈话，一切都毫无价值。

SOCRATES: There is a noble freedom, Callicles, in your way of

approaching the argument; for what you say is w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nk, but do not like to say. And I must beg of you to persevere, that the true rule of human life may become manifest. Tell me, then—you say, do you not, that in the rightly-developed man the passions ought not to be controlled, but that we should let them grow to the utmost and somehow or other satisfy them, and that this is virtue?

苏格拉底：卡利克勒，你展开论证的方式，显示出一种高贵的自由精神；因为你所说的就是世界上其他人所想到但却不想说的。我一定要恳请你继续这样下去，人类生活的真理可能就要浮出水面。那么，告诉我——你是不是提到对于自身激情得到合理发展的人来说，激情不应该被遏制，相反，我们应该容许其发展到极致，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以满足，而且这是一种美德？

CALLICLES: Yes; I do.

卡利克勒：是的，我说过。

SOCRATES: Then those who want nothing are not truly said to be happy?

苏格拉底：所以你说那些无欲无求的人并非真正幸福？

CALLICLES: No indeed, for then stones and dead men would be the happiest of all.

卡利克勒：确实如此，因为那样的话石头和死人就会成为最幸福的了。

SOCRATES: But surely life according to your view is an awful thing; and indeed I think that Euripides may have been right in saying,

苏格拉底：但依据你的观点，生活肯定是可怕的东西；我确实认为欧里庇得斯所言可能是对的：

'Who knows if life be not death and death life;'

“谁知道是否生非死，死非生；”

and that we are very likely dead; I have heard a philosopher say that at this moment we are actually dead, and that the body (soma) is our tomb, and that the part of the soul which is the seat of the desires is liable to be tossed about by words and blown up and down; and some ingenious person, probably a Sicilian or an Italian, playing with the word, invented a tale in which he called the soul—because of its believing and make believe nature—a vessel (An untranslatable pun,—dia to pithanon te kai pistikon onomase pithon.), and the ignorant he called the uninitiated or leaky, and the place in the souls of the uninitiated in which the desires are seated, being the intemperate and incontinent part, he compared to a vessel full of holes, because it can never be satisfied. He is not of

your way of thinking, Callicles, for he declares, that of all the souls in Hades, meaning the invisible world (aeides), these uninitiated or leaky persons are the most miserable, and that they pour water into a vessel which is full of holes out of a colander which is similarly perforated. The colander, as my informer assures me, is the soul, and the soul which he compares to a colander is the soul of the ignorant, which is likewise full of holes, and therefore incontinent, owing to a bad memory and want of faith. These notions are strange enough, but they show the principle which, if I can, I would fain prove to you; that you should change your mind, and, instead of the intemperate and insatiate life, choose that which is orderly and sufficient and has a due provision for daily needs. Do I make any impression on you, and are you coming over to the opinion that the orderly are happier than the intemperate? Or do I fail to persuade you, and, however many tales I rehearse to you, do you continue of the same opinion still?

而且，我们很可能已死。我听一位哲学家说过，此刻我们实际已经死去，躯体（soma）是我们的坟墓（sema），作为欲望的所在地的灵魂部分，容易受到言语的扰乱而飘忽不定；某个足智多谋的人，很可能是西西里人或意大利人，摆弄字词，编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灵魂被叫做——源自它相信被人和使别人相信的天性——一个容器（An untranslatable pun,—dia to pithanon te kai pistikon onomase pithon.），无知的人被称为不谙此道或有孔洞的人，不谙此道的人灵魂中欲望的居所是荒淫无度的地方，他将其比作一个满是孔洞的容器，因为他们欲望永远也无法得到满足。他的思考方式与你不同，卡利克勒，因为他宣称在冥府的所有灵魂中，也就是那个看不见的世界（aeides），这些不谙此道或有漏洞的人们是最痛苦的一群，他们把水从一个同样穿了孔的滤器中倒入一个满是孔洞的容器。这个滤器，正如别人使我确信的那样，就是灵魂，被他比作滤器的这个灵魂是无知者的灵魂，同样充满了孔洞，因此是填不满的，加之记忆力

差，缺乏信仰。这些想法奇怪至极，但显示出了那个我想向你证明的原则，如果我能够的话；你应该转变观念，并且，放弃那种没有节制、欲壑难填的生活，选择那种有序、有度、能合理供给日常所需的生活。我是否给你留下了任何的印象，你是否正在改变立场，认为生活有条理的人比无节制的人更幸福？或者是说，我是否没能说服你，而且，无论我对你讲述多少故事，你仍然还持同样的观点？

CALLICLES: The latter, Socrates, is more like the truth.

卡利克勒：后者，苏格拉底，更接近事实。

SOCRATES: Well, I will tell you another image, which comes out of the same school—Let me request you to consider how far you would accept this as an account of the two lives of the temperate and intemperate in a figure—There are two men, both of whom have a number of casks; the one man has his casks sound and full, one of wine, another of honey, and a third of milk, besides others filled with other liquids, and the streams which fill them are few and scanty, and he can only obtain them with a great deal of toil and difficulty; but when his casks are once filled he has need to feed them anymore, and has no further trouble with them or care about them. The other, in like manner, can procure streams, though not without difficulty; but his vessels are leaky and unsound, and night and day he is compelled to be filling them, and if he pauses for a moment, he is in an agony of pain. Such are their respective lives—and now would you say that the life of the intemperate is happier than that of the temperate? Do I not convince you that the opposite is the truth?

苏格拉底：那么，我将告诉你另外一个比喻，与之前那个出自同一学派——让我请你考虑一下，你想在多大程度上把这个比喻当成对有节制和无节制的人的生活图景的描述——有两个人，每人各有许多只桶；其中一个人的桶很结实，而且装得满满的，第一只装酒，第二只装蜜，第三只装奶，余下的装其他液体，用来装满这些桶的液体流量少而且小，他只有付出大量的劳动，克服很多困难才能得到这些液体；但一旦他的几只桶都满了，他就再也不用装了，不会再遇到与之相关的麻烦，也不用再操心了。另一个人类似。他能够弄到液体，尽管也不无困难；但他的容器是漏的而且不结实，他不得不日日夜夜往桶里装液体，而且只要他停下片刻，就会被疼痛所折磨。这就是他们各自的生活——现在你会说无节制者的生活比有节制者的要幸福吗？我还没能说服你相信相反的情况才是事实吗？

CALLICLES: You do not convince me, Socrates, for the one who has filled himself has no longer any pleasure left; and this, as I was just now saying, is the life of a stone: he has neither joy nor sorrow after he is once filled; but the pleasure depends on the superabundance of the influx.

卡利克勒：你没有说服我，苏格拉底，因为，欲望得到了满足的人不再拥有任何的乐趣；这，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石头的生活：他的欲望一旦被满足了，就无喜无悲了；但是，生活的乐趣靠的是极为充足的液体。

SOCRATES: But the more you pour in, the greater the waste; and the holes must be large for the liquid to escape.

苏格拉底：但你倒入的越多，浪费的也越多；而且孔洞必须够

大，以便液体逸出。

CALLICLES: Certainly.

卡利克勒：当然。

SOCRATES: The life which you are now depicting is not that of a dead man, or of a stone, but of a cormorant; you mean that he is to be hungering and eating?

苏格拉底：你现在描述的不是死人的生活，或石头的生活，而是贪得无厌者的生活；你的意思是说他将会持续饥饿并吃东西？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对。

SOCRATES: And he is to be thirsting and drinking?

苏格拉底：他将会持续口渴并会喝东西？

CALLICLES: Yes, that is what I mean; he is to have all his desires about him, and to be able to live happily in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m.

卡利克勒：对，这是我的意思；他所有的欲望都将围绕着他，他将能够满足欲望，幸福地生活。

SOCRATES: Capital, excellent; go on as you have begun, and have no shame; I, too, must disencumber myself of shame: and first, will you tell me whether you include itching and scratching, provided you have enough of them and pass your life in scratching, in your notion of happiness?

苏格拉底：好极了，真棒，如何开始就如何继续吧，别难为情；我也必须使自己把羞愧扔到一边：首先，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否把痒和抓痒也包括进到你对幸福的看法中去了，假如你痒得难耐，一生都在抓痒的话？

CALLICLES: What a strange being you are, Socrates! a regular mob-orator.

卡利克勒：你这个人好奇怪啊，苏格拉底！典型强词夺理的演说家。

SOCRATES: That was the reason, Callicles, why I scared Polus and Gorgias, until they were too modest to say what they thought; but you will not be too modest and will not be scared, for you are a brave man. And now, answer my question.

苏格拉底：卡利克勒，这就是为什么波卢斯和高尔吉亚会被我吓到，直弄得他们过于谦虚而无法说出自己的想法；但你不会太谦虚也不会被吓到，因为你是勇敢的人。现在，回答我的问题。

CALLICLES: I answer, that even the scratcher would live pleasantly.

卡利克勒：我的答案是，即便是抓痒者，也能活得快活。

SOCRATES: And if pleasantly, then also happily?

苏格拉底：如果快活，也就幸福了？

CALLICLES: To be sure.

卡利克勒：当然。

SOCRATES: But what if the itching is not confined to the head? Shall I pursue the question? And here, Callicles, I would have you consider how you would reply if consequences are pressed upon you, especially if in the last resort you are asked, whether the life of a catamite is not terrible, foul, miserable? Or would you venture to say, that they too are happy, if they only get enough of what they want?

苏格拉底：但如果不只头部痒呢？我继续提问，好吗？这次，卡利克勒，我想让你考虑一下，如果强迫你回答，尤其是你别无选择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娈童的生活是否不是可怕的、痛苦的、让人恶心的？或者你会不会冒险说他们也是幸福的，只要他们得到足够多他们想要的东西？

CALLICLES: Are you not ashamed, Socrates, of introducing such topics into the argument?

卡利克勒：苏格拉底，你把这样的话题引入讨论，不害羞吗？

SOCRATES: Well, my fine friend, but am I the introducer of these topics, or he who says without any qualification that all who feel pleasure in whatever manner are happy, and who admits of no distinction between good and bad pleasures? And I would still ask, whether you say that pleasure and good are the same, or whether there is some pleasure which is not a good?

苏格拉底：可是，我的好朋友啊，引出这些话题的是我，还是那个没有任何证据，就说以任何方式感受愉悦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快乐的，认为有益和有害的愉悦没有区别的那位老兄呢？我还是想问，你是不是说愉悦等同于好，或者说，你是不是说有些愉悦不是好的？

CALLICLES:Well, then, for the sake of consistency, I will say that they are the same.

卡利克勒：那么，好，为了做到观点一致，我会说他们是一样的。

SOCRATES:You are breaking the original agreement, Callicles, and will no longer be a satisfactory companion in the search after truth, if you say what is contrary to your real opinion.

苏格拉底：你在破坏最初的协议，卡利克勒，如果你所说与你的真实意见相左的话，你就不再是一个在对真理的探索上令人满意的伙伴。

CALLICLES: Why, that is what you are doing too, Socrates.

卡利克勒：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也在这么做啊，苏格拉底。

SOCRATES: Then we are both doing wrong. Still, my dear friend, I would ask you to consider whether pleasure, from whatever source derived, is the good; for, if this be true, then the disagreeable consequences which have been darkly intimated must follow, and many others.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都做错了。然而，我亲爱的朋友，我想请你想一想，无论其来源为何，快乐是否都是好事；因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令人厌烦的后果定会随之而来，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预兆，还有许多其他的后果。

CALLICLES:That, Socrates, is only your opinion.

卡利克勒：苏格拉底，那只是你一家之言。

SOCRATES: And do you, Callicles, seriously maintain what you are saying?

苏格拉底：卡利克勒，你当真坚持你的话吗？

CALLICLES: Indeed I do.

卡利克勒：当然坚持。

SOCRATES: Then, as you are in earnest, shall we proceed with the argument?

苏格拉底：那么，既然你较真，我们继续辩论如何？

CALLICLES:By all means.

卡利克勒：当然可以。

SOCRATES:Well, if you are willing to proceed, determine this question for me—there is something, I presume, which you would call knowledge?

苏格拉底：好，如果你愿意继续，请回答我这个问题——我料想，是否存在一种你会称其为知识的东西？

CALLICLES:There is.

卡利克勒：存在。

SOCRATES:And were you not saying just now, that some courage implied knowledge?

苏格拉底：你之前没有说某种勇气暗含着知识吗？

CALLICLES:I was.

卡利克勒：我说了。

SOCRATES: And you were speaking of courage and knowledge as two things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苏格拉底：而且你提到勇气和知识时，说它们是两种互不相同的事物？

CALLICLES: Certainly I was.

卡利克勒：我确实是这样说的。

SOCRATES: And would you say that pleasure and knowledge are the same, or not the same?

苏格拉底：你会说乐趣和知识相同还是不同呢？

CALLICLES: Not the same, O man of wisdom.

卡利克勒：不相同，哦，睿智的人啊！

SOCRATES: And would you say that courage differed from pleasure?

苏格拉底：那你会说勇气与乐趣不同吗？

CALLICLES: Certainly.

卡利克勒：当然会。

SOCRATES: Well, then, let us remember that Callicles, the Acharnian, says that pleasure and good are the same; but that knowledge and courage are not the same, either with one another, or with the good.

苏格拉底：那么，好，让我们记住吧，阿卡奈人卡利克勒说乐趣和好事是相同的；但是知识和勇气是不同的，它们彼此不同，或都与好事不同。

CALLICLES: And what does our friend Socrates, of Foxton, say—does he assent to this, or not?

卡利克勒：我们的朋友，福克斯顿的苏格拉底怎么说呢——他赞同这个观点吗，还是反对？

SOCRATES: He does not assent; neither will Callicles, when he sees himself truly. You will admit, I suppose, that good and evil fortune are opposed to each other?

苏格拉底：他不赞同；卡利克勒当看清自己时也不会赞同。我料想，你会认可好运和厄运是彼此相反的？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And if they are opposed to each other, then, like health and disease, they exclude one another; a man cannot have them both, or be without them both, at the same time?

苏格拉底：如果它们彼此相反，那么，就像健康和疾病，它们彼此排斥；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或者缺少二者？

CALLICLES: What do you mean?

卡利克勒：你是什么意思？

SOCRATES: Take the case of any bodily affection—a man may have the complaint in his eyes which is called ophthalmia?

苏格拉底：以任何一种身体疾病为例——一个人眼部可能患有一种叫眼炎的疾病？

CALLICLES: To be sure.

卡利克勒：当然。

SOCRATES: But he surely cannot have the same eyes well and sound at the same time?

苏格拉底：但他的同一双眼睛肯定不可能同时是健康完好的？

CALLICLES: Certainly not.

卡利克勒：当然不能。

SOCRATES: And when he has got rid of his ophthalmia, has he got rid of the health of his eyes too? Is the final result, that he gets rid of them both together?

苏格拉底：当她的眼炎消失了，她眼睛的健康也消失了吗？最终结果还是他一并脱离了两者吗？

CALLICLES: Certainly not.

卡利克勒：当然不是。

SOCRATES: That would surely be marvellous and absurd?

苏格拉底：那一定会是不可思议的和荒唐的吧？

CALLICLES: Very.

卡利克勒：甚是如此。

SOCRATES: I suppose that he is affected by them, and gets rid of them in turns?

苏格拉底：我料想二者轮番作用于他，然后交替着被他摆脱？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And he may have strength and weakness in the same way, by fits?

苏格拉底：同样，他的体魄可能要么强大，要么虚弱？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Or swiftness and slowness?

苏格拉底：或者是迅速和缓慢？

CALLICLES: Certainly.

卡利克勒：没错。

SOCRATES:And does he have and not have good and happiness, and their opposites, evil and misery, in a similar alternation?

苏格拉底：他是不是也以类似的更迭方式拥有善和快乐，以及它们的对立面，恶和痛苦呢？

CALLICLES: Certainly he has.

卡利克勒：他当然是。

SOCRATES: If then there be anything which a man has and has not at the same time, clearly that cannot be good and evil—do we agree? Please not to answer without consideration.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有存在任何东西是人拥有又同时没有的，那显然不可能是善和恶——我们看法一致吧？请不要未经思索就回答。

CALLICLES: I entirely agree.

卡利克勒：我完全同意。

SOCRATES: Go back now to our former admissions.—did you say that to hunger, I mean the mere state of hunger, was pleasant or painful?

苏格拉底：现在回到我们之前认可的事实。——你有没有说过饥饿，我仅仅指饥饿的状态，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

CALLICLES: I said painful, but that to eat when you are hungry is pleasant.

卡利克勒：我说过是痛苦的，但是你如果在饥饿时进食，那是快乐的。

SOCRATES: I know; but still the actual hunger is painful: am I not right?

苏格拉底：我知道；但是饥饿实际上还是痛苦的：我没说错吧？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没错。

SOCRATES: And thirst, too, is painful?

苏格拉底：口渴，也是痛苦的？

CALLICLES: Yes, very.

卡利克勒：是的，很痛苦。

SOCRATES: Need I adduce any more instances, or would you agree that all wants or desires are painful?

苏格拉底：需要我再举出更多的例子吗，还是你会赞同所有的需求或欲望都是痛苦的？

CALLICLES: I agree, and therefore you need not adduce any more instances.

卡利克勒：我赞同，因此你不必再举例子。

SOCRATES: Very good. And you would admit that to drink, when you are thirsty, is pleasant?

苏格拉底：很好。你会认为，渴了时喝东西是愉快的吗？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承认。

SOCRATES: And in the sentence which you have just uttered, the word 'thirsty' implies pain?

苏格拉底：在你刚说的那句话中，“渴”这个词暗示着痛苦吗？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And the word 'drinking' is expressive of pleasure, and of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want?

苏格拉底：“喝”这个词表达的是快乐和对需要的满足吗？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There is pleasure in drinking?

苏格拉底：喝的过程中存在快乐吗？

CALLICLES: Certainly.

卡利克勒：当然。

SOCRATES: When you are thirsty?

苏格拉底：当你渴了的时候？

SOCRATES: And in pain?

苏格拉底：而且痛苦的时候？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Do you see the inference—that pleasure and pain are simultaneous, when you say that being thirsty, you drink? For are they not simultaneous, and do they not affect at the same time the same part, whether of the soul or the body?—which of them is affected cannot be supposed to be of any consequence: Is not this true?

苏格拉底：你明白这个推断吗——那种愉快和痛苦是同时存在的，当你说你是渴了要喝东西的时候？因为它们难道不是在同一时间影响着灵魂或身体的同一个部分吗？——是哪一部分受到影响并不重要：不是这样吗？

CALLICLES: It is.

卡利克勒：是这样。

SOCRATES:You said also, that no man could have good and evil fortune at the same time?

苏格拉底：你也提到，没有人会同时拥有好运和厄运是吗？

CALLICLES: Yes, I did.

卡利克勒：是的，我说过。

SOCRATES: But you admitted, that when in pain a man might also have pleasure?

苏格拉底：但是，你承不承认一个人处于痛苦中时同样可能快乐？

CALLICLES: Clearly.

卡利克勒：当然。

SOCRATES: Then pleasure is not the same as good fortune, or pain the same as evil fortune, and therefore the good is not the same as the pleasant?

苏格拉底：所以快乐和好运不同，或者说痛苦和厄运不同，因此好和快乐是不同的？

CALLICLES: I wish I knew, Socrates, what your quibbling means.

卡利克勒：我希望我知道，苏格拉底，你吹毛求疵的问题是什么

意思。

SOCRATES: You know, Callicles, but you affect not to know.

苏格拉底：你是知道的，卡利克勒，但装作不知道。

CALLICLES: Well, get on, and don't keep fooling: then you will know what a wiseacre you are in your admonition of me.

卡利克勒：好啊，继续，别再玩笑了：待会儿你就知道自己在劝诫我的时候是多么自命不凡了。

SOCRATES: Does not a man cease from his thirst and from his pleasure in drinking at the same time?

苏格拉底：一个人喝东西的时候，缓解了口渴的同时也结束了快乐，不是这样吗？

CALLICLES: I do not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saying.

卡利克勒：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GORGIAS: Nay, Callicles, answer, if only for our sakes;—we

should like to hear the argument out.

高尔吉亚：不要吧，卡利克勒，作答吧，哪怕只是为我们——我们希望从头到尾听完辩论。

CALLICLES: Yes, Gorgias, but I must complain of the habitual trifling of Socrates; he is always arguing about little and unworthy questions.

卡利克勒：好的，高尔吉亚，但对于苏格拉底习惯性的无聊谈话，我必须发发牢骚；他总是在纠缠那些细枝末节、没有价值的问题。

GORGIAS: What matter? Your reputation, Callicles, is not at stake. Let Socrates argue in his own fashion.

高尔吉亚：这有什么？你的名声，卡利克勒，并未受到威胁。让苏格拉底以自己的方式辩论吧。

CALLICLES: Well, then, Socrates, you shall ask these little peddling questions, since Gorgias wishes to have them.

卡利克勒：好，那么，苏格拉底，你可以问这些琐屑的问题，既然高尔吉亚希望你问。

SOCRATES: I envy you, Callicles, for having been initiated into the great mysteries before you were initiated into the lesser. I thought that this was not allowable. But to return to our argument—does not a man cease from thirsting and from pleasure of drinking at the same moment?

苏格拉底：我羡慕你啊，卡利克勒，你还没弄懂小问题呢，就先了解了大谜团。我认为这是不允许的。不过还是回到我们的辩题——一个人喝东西的时候，缓解了口渴的同时也结束了快乐，不是这样吗？

CALLICLES: True.

卡利克勒：是这样。

SOCRATES: And if he is hungry, or has any other desire, does he not cease from the desire and the pleasure at the same moment?

苏格拉底：如果他饿了，或是有任何其他的欲望，他在满足欲望的同时不是也结束了快乐吗？

CALLICLES: Very true.

卡利克勒：非常正确。

SOCRATES: Then he ceases from pain and pleasure at the same moment?

苏格拉底：所以他同时结束了痛苦和快乐？

CALLICLES:Yes.

卡利克勒：对。

SOCRATES: But he does not cease from good and evil at the same moment, as you have admitted: do you still adhere to what you said?

苏格拉底：但是，他不会同时结束掉好运和厄运，根据你所认可的说法，你仍然坚持自己所言吗？

CALLICLES: Yes, I do; but what is the inference?

卡利克勒：是的，我坚持；但推论是什么呢？

SOCRATES: Why, my friend, the inference is that the good is not the same as the pleasant, or the evil the same as the painful; there is a cessation of pleasure and pain at the same moment; but not of good and evil, for they are different. How then can pleasure

be the same as good, or pain as evil? And I would have you look at the matter in another light, which could hardly, I think, have been considered by you when you identified them: Are not the good because they have good present with them, as the beautiful are those who have beauty present with them?

苏格拉底：啊，我的朋友，推论就是好和快乐不一样，或者说恶和痛苦不一样；快乐和痛苦能在同一刻结束；但好和恶不能，因为它们不同。那么，快乐怎么会和好一样呢，或者痛苦怎么会和恶一样呢？我希望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我想，你把它们作类比时，几乎不可能想到这个角度：好的东西之所以好是因为它们目前是好的，美的东西所以美是因为它们目前有美感，不是这样吗？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

SOCRATES: And do you call the fools and cowards good men? For you were saying just now that the courageous and the wise are the good—would you not say so?

苏格拉底：你会不会称愚人和懦夫为好人？因为你刚才说好人是勇敢和睿智的人，你不会这样说吗？

CALLICLES: Certainly.

卡利克勒：当然会。

SOCRATES: And did you never see a foolish child rejoicing?

苏格拉底：你从来没见过愚笨的孩子很快乐吗？

CALLICLES: Yes, I have.

卡利克勒：不，我见过。

SOCRATES: And a foolish man too?

苏格拉底：也见过愚笨的成年人这样过？

CALLICLES: Yes, certainly; but what is your drift?

卡利克勒：是的，当然；但你的意思是？

SOCRATES: Nothing particular, if you will only answer.

苏格拉底：没什么特别的，只要你愿意回答就好。

CALLICLES: Yes, I have.

卡利克勒：是的，我见过。

SOCRATES: And did you ever see a sensible man rejoicing or sorrowing?

苏格拉底：那你见没见过明智的人快乐或悲伤吗？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见过。

SOCRATES: Which rejoice and sorrow most—the wise or the foolish?

苏格拉底：谁的快乐和悲伤的程度更深——聪明人还是笨人？

CALLICLES: They are much upon a par, I think, in that respect.

卡利克勒：我认为，在这方面他们确实是半斤八两。

SOCRATES: Enough: And did you ever see a coward in battle?

苏格拉底：足矣：你见过懦夫参加战斗吗？

CALLICLES: To be sure.

卡利克勒：当然见过。

SOCRATES: And which rejoiced most at the departure of the enemy, the coward or the brave?

苏格拉底：敌军撤退时，谁笑得更欢，懦夫还是勇士？

CALLICLES: I should say 'most' of both; or at any rate, they rejoiced about equally.

卡利克勒：我应该说两类人中的“大多数”；或者不管怎么说，他们高兴的程度大致相当。

SOCRATES: No matter; then the cowards, and not only the brave, rejoice?

苏格拉底：不要紧；那么不只是勇士高兴，懦夫也高兴了？

CALLICLES: Greatly.

卡利克勒：很高兴。

SOCRATES: And the foolish; so it would seem?

苏格拉底：这样看来，愚人也是啦？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And are only the cowards pained at the approach of their enemies, or are the brave also pained?

苏格拉底：敌军进攻时，只有懦夫感到痛苦，还是勇士也感到痛苦呢？

CALLICLES:Both are pained.

卡利克勒：两个人都痛苦。

SOCRATES: And are they equally pained?

苏格拉底：他们痛苦的程度一样吗？

CALLICLES: I should imagine that the cowards are more pained.

卡利克勒：我会认为懦夫更痛苦。

SOCRATES: And are they better pleased at the enemy's departure?

苏格拉底：敌军撤退时，懦夫比勇士更高兴吗？

CALLICLES:I dare say.

卡利克勒：我想是这样。

SOCRATES: Then are the foolish and the wise and the cowards and the brave all pleased and pained, as you were saying, in nearly equal degree; but are the cowards more pleased and pained than the brave?

苏格拉底：那么，如你所说，愚人、智者、懦夫、勇士都高兴也都痛苦，并且程度几乎相同是吗；但是懦夫比勇士更高兴、更痛苦吗？

CALLICLES: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But surely the wise and brave are the good, and the foolish and the cowardly are the bad?

苏格拉底：但智者和勇士一定是好人，愚人和懦夫一定是坏人吗？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对。

SOCRATES: Then the good and the bad are pleased and pained in a nearly equal degree?

苏格拉底：那么好人与坏人痛苦和快乐的程度几乎相同吗？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Then are the good and bad good and bad in a nearly equal degree, or have the bad the advantage both in good and evil? (i. e. in having more pleasure and more pain.)

苏格拉底：那么好人好的程度与坏人坏的程度也几乎相同了，还是坏人在好与恶上都程度更深？（也就是，更高兴和更痛苦。）

CALLICLES: I really do not know what you mean.

卡利克勒：我真的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SOCRATES: Why, do you not remember saying that the good were good because good was present with them, and the evil because evil; and that pleasures were goods and pains evils?

苏格拉底：哎呀，你不记得说过，好的事物之所以好是因为好的存在，不好的是因为恶的存在；快乐是好事，痛苦是坏事吗？

CALLICLES: Yes, I remember.

卡利克勒：是的，我记得。

SOCRATES: And are not these pleasures or goods present to those who rejoice—if they do rejoice?

苏格拉底：这些快乐或好事不也是和快乐的人同在吗——如果他们真的快乐的话？

CALLICLES: Certainly.

卡利克勒：当然。

SOCRATES: Then those who rejoice are good when goods are present with them?

苏格拉底：所以那些快乐的人与好事同在时是快乐的？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And those who are in pain have evil or sorrow present with them?

苏格拉底：那些痛苦中的人与坏事或痛苦同在吗？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And would you still say that the evil are evil by reason of the presence of evil?

苏格拉底：那你会不会仍旧说，坏事是坏的是因为恶的存在？

CALLICLES: I should.

卡利克勒：我会的。

SOCRATES:Then those who rejoice are good, and those who are in pain evil?

苏格拉底：那么快乐的人是好人，痛苦的人是坏人？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The degrees of good and evil vary with the degrees of pleasure and of pain?

苏格拉底：好坏的程度随着快乐和痛苦的程度不同而不同？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对。

SOCRATES: Have the wise man and the fool, the brave and the coward, joy and pain in nearly equal degrees? Or would you say that the coward has more?

苏格拉底：智者和愚人，还有勇士和懦夫，拥有的快乐和痛苦的程度是否几乎相同，或者你会不会说懦夫拥有的快乐和痛苦更多？

CALLICLES: I should say that he has.

卡利克勒：我应该说懦夫拥有的更多。

SOCRATES: Help me then to draw out the conclusion which

follows from our admissions; for it is good to repeat and review what is good twice and thrice over, as they say. Both the wise man and the brave man we allow to be good?

苏格拉底：那么帮我根据我们共识做个结论吧，因为如他们所言，把好的东西重复、温习两三次是有益的。我们认可智者和勇士都是好的吗？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认可。

SOCRATES: And the foolish man and the coward to be evil?

苏格拉底：愚人和懦夫是坏的？

CALLICLES: Certainly.

卡利克勒：没错。

SOCRATES: And he who has joy is good?

苏格拉底：快乐的人是好的？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对。

SOCRATES: And he who is in pain is evil?

苏格拉底：痛苦的人是坏的？

CALLICLES: Certainly.

卡利克勒：没错。

SOCRATES: The good and evil both have joy and pain, but, perhaps, the evil has more of them?

苏格拉底：好人与坏人都是既有快乐也有痛苦，但是，或许，坏人有的快乐和痛苦更多？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Then must we not infer, that the bad man is as good and bad as the good, or, perhaps, even better?—is not this a further inference which follows equally with the preceding from the assertion that the good and the pleasant are the same—can this be denied, Callicles?

苏格拉底：那么难道不可以这样推断吗，坏人同样是好的，或者，也许比好人还好；好人同样是坏的，或者，也许比坏人还坏？——难道这不是在之前的好人和快乐的人是一样的这个主张基础上得出的进一步推论吗——能否认这点吗？卡利克勒。

CALLICLES: I have been listening and making admissions to you, Socrates; and I remark that if a person grants you anything in play, you, like a child, want to keep hold and will not give it back. But do you really suppose that I or any other human being denies that some pleasures are good and others bad?

卡利克勒：我一直在听你讲，而且在对你的观点表示认同，苏格拉底；我注意到如果有谁准许你拿任何东西玩，你就像个孩子似的，想一直拿着这样东西再不愿归还。可是你真的认为我，或是任何其他的人会否认有些快乐的事是好的，另一些是坏的吗？

SOCRATES: Alas, Callicles, how unfair you are! You certainly treat me as if I were a child, sometimes saying one thing, and then another, as if you were meaning to deceive me. And yet I thought at first that you were my friend, and would not have deceived me if you could have helped. But I see that I was mistaken; and now I suppose that I must make the best of a bad business, as they said of

old, and take what I can get out of you.—Well, then, as I understand you to say, I may assume that some pleasures are good and others evil?

苏格拉底：唉，卡利克勒，你是多么不公正啊！你确实是在把我当孩子在对待，一会说一件事，一会又说另一件，似乎是想欺骗我。而我却从开始就把你当成自己的朋友，认为如果你能忍住的话是不会欺骗我的。但是现在我发现我搞错了；现在，我想自己一定得像以前他们说过的那样，好好利用这件不成功的事，拿走我能够从你这里得到的东西。——好了，那么，正如我所理解的你的意思，我可以假设一些乐事是好的，而另一些是坏的吗？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可以。

SOCRATES: The beneficial are good, and the hurtful are evil?

苏格拉底：有利于人们的那些是好的，有害的那些是坏的？

CALLICLES:To be sure.

卡利克勒：当然。

SOCRATES: And the beneficial are those which do some good, and the hurtful are those which do some evil?

苏格拉底：有利于人们的就是那些能带来益处的，有害的就是那些带来坏处的？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Take, for example, the bodily pleasures of eating and drinking, which we were just now mentioning—you mean to say that those which promote health, or any other bodily excellence, are good, and their opposites evil?

苏格拉底：例如，刚才提到的给身体带来愉悦的吃和喝——你的意思是说这些增进健康，或者任何其他使身体优越的事是好的，它们的对立面是坏的吗？

CALLICLES: Certainly.

卡利克勒：没错。

SOCRATES: And in the same way there are good pains and

there are evil pains?

苏格拉底：同样，痛苦也分为好的和不好的？

CALLICLES: To be sure.

卡利克勒：当然。

SOCRATES: And ought we not to choose and use the good pleasures and pains?

苏格拉底：我们不应该选择和利用那些有益的快乐和痛苦吗？

CALLICLES: Certainly.

卡利克勒：当然应该。

SOCRATES: But not the evil?

苏格拉底：而不是那些坏的？

CALLICLES: Clearly.

卡利克勒：显然。

SOCRATES: Because, if you remember, Polus and I have agreed that all our actions are to be done for the sake of the good;—and will you agree with us in saying, that the good is the end of all our actions, and that all our actions are to be done for the sake of the good, and not the good, for the sake of them?—will you add a third vote to our two?

苏格拉底：因为，如果你记得，波卢斯和我都认为我们做一切事都是为了得到那些好的东西；——你会不会和我们看法一致，认为好的东西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谋取好的东西而进行，而不是相反？——你愿不愿意给我们俩投赞成票达成三人共识？

CALLICLES: I will.

卡利克勒：我愿意。

SOCRATES: Then pleasure, like everything else, is to be sought for the sake of that which is good, and not that which is good for the sake of pleasure?

苏格拉底：那么，和所有其他的事物一样，寻找快乐也是为了得到好的东西，而不是寻找好的东西为了得到快乐？

CALLICLES: To be sure.

卡利克勒：没错。

SOCRATES: But can every man choose what pleasures are good and what are evil, or must he have art or knowledge of them in detail?

苏格拉底：但是人人都能够选择哪些快乐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吗，还是他必须具备关于快乐的详细的技艺和知识？

CALLICLES: He must have art.

卡利克勒：他必须具备技艺。

SOCRATES: Let me now remind you of what I was saying to Gorgias and Polus; I was saying, as you will not have forgotten, that there were some processes which aim only at pleasure, and know nothing of a better and worse, and there are other processes which know good and evil. And I considered that cookery, which I do not call an art, but only an experience, was of the former class,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pleasure, and that the art of medicine was of the class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good. And now, by the god of friendship, I must beg you, Callicles, not to jest, or to imagine that I am jesting with you; do not answer at random and contrary to your

real opinion—for you will observe that we are arguing about the way of human life; and to a man who has any sense at all, what question can be more serious than this?—whether he should follow after that way of life to which you exhort me, and act what you call the manly part of speaking in the assembly, and cultivating rhetoric, and engaging in public affair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now in vogue; or whether he should pursue the life of philosophy;—and in what the latter way differs from the former. But perhaps we had better first try to distinguish them, as I did before, and when we have come to an agreement that they are distinct, we may proceed to consider in what they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and which of them we should choose. Perhaps, however, you do not even now understand what I mean?

苏格拉底：现在，我请你回忆一下我之前跟高尔吉亚和波卢斯说过的话；你应该还没忘记，我当时说，存在这样一些过程，其唯一目的就是快乐，对好与坏一无所知，而在另外一些过程中，好与坏会被区分开。我认为烹饪属于前者，我只称之为经验，而不是技艺，这类过程注重愉悦；医学这门技艺属于后者，这类过程关注的是益处。现在，友谊之神在上，我必须恳求你，卡利克勒，不要开玩笑，也不要觉得我是在和你开玩笑；不要随意回答，违背你的真正想法——因为你会发现我们是在就人类生活的方式进行辩论；对于还算明智的人来说，有什么问题能比这个更严肃吗？——不管他是否应该遵循你劝诫我去遵循的那种生活方式，在集会时采用你所说的那种有男子汉气概的言谈方式，锻炼演讲能力，根据时下流行的原则，忙于公共事务；还是应该用毕生去探索哲学——也不管后一种生活方式与前一种的区别是什么。不过我们或许最好是先把它们加以区分，就像我之前做过的那样，等我们一致认为它们不同时，可以继续思考它们彼此到底什么地方不同，我们应该选择其中的哪一种。可是，或许你甚至现在也没明白我的意思？

CALLICLES: No, I do not.

卡利克勒：是的，我不明白。

SOCRATES: Then I will explain myself more clearly: seeing that you and I have agreed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good, and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pleasure, and that pleasure is not the same as good, and that the pursuit and process of acquisition of the one, that is pleasure, is different from the pursuit and process of acquisition of the other, which is good—I wish that you would tell me whether you agree with me thus far or not—do you agree?

苏格拉底：那么我要把观点解释得更清楚些：既然你我已经都认可了存在有益之事，也存在快乐之事，快乐之事与有益之事不一样，追求和获得其中的快乐之事，不同于追求和获得有益之事——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到目前为止你是否同意我的说法——你同意吗？

CALLICLES: I do.

卡利克勒：同意。

SOCRATES: Then I will proceed, and ask whether you also agree with me, and whether you think that I spoke the truth when I further said to Gorgias and Polus that cookery in my opinion is only an experience, and not an art at all; and that whereas medicine is an art, and attends to the nature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patient, and

has principles of action and reason in each case, cookery in attending upon pleasure never regards either the nature or reason of that pleasure to which she devotes herself, but goes straight to her end, nor ever considers or calculates anything, but works by experience and routine, and just preserves the recollection of what she has usually done when producing pleasure. And first, I would have you consider whether I have proved what I was saying, and then whether there are not other similar processes which have to do with the soul—some of them processes of art, making a provision for the soul's highest interest—others despising the interest, and, as in the previous case, considering only the pleasure of the soul, and how this may be acquired, but not considering what pleasures are good or bad, and having no other aim but to afford gratification, whether good or bad. In my opinion, Callicles, there are such processes, and this is the sort of thing which I term flattery, whether concerned with the body or the soul, or whenever employed with a view to pleasure and without any consideration of good and evil. And now I wish that you would tell me whether you agree with us in this notion, or whether you differ.

苏格拉底：那么，我将继续问，当我进一步对高尔吉亚和波卢斯说这些话时，你是否也同意我的观点，是否认为我说的是事实，在我看来，烹饪只是一种经验，根本不算一门技艺；而医学是一门技艺，她照管着病人的身体机能和体质，并且对每一病例有着诊断和治疗的原则，烹饪照管的是愉悦，但从不关注自己创造的愉悦的性质和理由，也从不思考或盘算任何事，而是直接达到目的，只不过是靠着经验和惯例行事，仅仅将她创造愉悦时常做的那些事保存到记忆中。首先，我想请你思考一下，是否我已经证明了自己之前说的话；再有，是否不存在其他类似的与灵魂相关的过程——一些过程是技艺，技艺为灵魂提供最大的利益——另外一些过程瞧不起利益，就像在先前的例子中那样，这些过程只考虑心灵的愉悦，以及怎么获得这种愉悦，

而不关注哪些愉悦是好的，哪些不好，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满足人对愉悦的享受，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在我看来，卡利克勒，存在这种过程，就是我称之为谄媚的那种事物，无论涉及的是身体还是灵魂，或者无论何时被采用，它的目标都是纯粹的快乐，一点儿都不会考虑快乐的好坏。现在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是否同意我们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否你反对。

CALLICLES: I do not differ; on the contrary, I agree; for in that way I shall soonest bring the argument to an end, and shall oblige my friend Gorgias.

卡利克勒：我不反对；相反，我同意；因为这样我将很快使辩论结束，这样就帮了我朋友高尔吉亚的忙。

SOCRATES: And is this notion true of one soul, or of two or more?

苏格拉底：此看法适用于一个人的灵魂还是两个或者更多的人？

CALLICLES: Equally true of two or more.

卡利克勒：对两个或者更多的人同样适用。

SOCRATES: Then a man may delight a whole assembly, and yet have no regard for their true interests?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人可以取悦集会上所有的人却不考虑他们真正的利益？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Can you tell me the pursuits which delight mankind—or rather, if you would prefer, let me ask, and do you answer, which of them belong to the pleasurable class, and which of them not? In the first place, what say you of flute-playing? Does not that appear to be an art which seeks only pleasure, Callicles, and thinks of nothing else?

苏格拉底：你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追求使人类快乐——或者最好，如果你更喜欢这样的话，我来问，请你回答，什么样的追求属于愉悦的那类，什么样的不属于？首先，你怎么看待吹长笛呢？那难道不是一种只追求愉悦，对其他一切都不考虑的技艺吗，卡利克勒？

CALLICLES: I assent.

卡利克勒：我同意。

SOCRATES: And is not the same true of all similar arts, as, for

example, the art of playing the lyre at festivals?

苏格拉底：比如说，所有像在宴会上弹里拉琴这样的技艺不都是如此吗？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And what do you say of the choral art and of dithyrambic poetry?—are not they of the same nature? Do you imagine that Cinesias the son of Meles cares about what will tend to the moral improvement of his hearers, or about what will give pleasure to the multitude?

苏格拉底：那你怎么看待唱诗班的技艺和赞美酒神的颂歌呢？——它们的性质不也是如此吗？你以为梅莱斯之子卡涅西亚是在乎什么会提升他听众的道德水准吗，还是在乎什么能给民众带来愉悦？

CALLICLES: There can be no mistake about Cinesias, Socrates.

卡利克勒：卡涅西亚不会有错的，苏格拉底。

SOCRATES: And what do you say of his father, Meles the harp-

player? Did he perform with any view to the good of his hearers? Could he be said to regard even their pleasure? For his singing was an infliction to his audience. And of harp-playing and dithyrambic poetry in general, what would you say? Have they not been invented wholly for the sake of pleasure?

苏格拉底：那你怎么看待他的父亲，弹竖琴的梅莱斯呢？他表演时对听众的利益有任何的考虑吗？甚至是带给他们快乐这一点，他算得上是考虑到了吗？因为他唱歌是在让观众受苦。你对弹竖琴和赞美酒神的颂歌总体上怎么看呢？发明这些总的目的不是为了快乐吗？

CALLICLES: That is my notion of them.

卡利克勒：这是我对它们的观点。

SOCRATES: And as for the Muse of Tragedy, that solemn and august personage—what are her aspirations? Is all her aim and desire only to give pleasure to the spectators, or does she fight against them and refuse to speak of their pleasant vices, and willingly proclaim in word and song truths welcome and unwelcome?—which in your judgment is her character?

苏格拉底：对于悲剧缪斯这个庄重威严的人物——她的渴望是什么？她的全部目标和愿望仅仅是给观众以愉悦吗，还是说她违背他们，拒绝带给他们愉悦这种罪恶，而是自愿用言辞和颂歌称赞真理，无论这样做是否受欢迎？——你判断她的性格是哪一种？

CALLICLES: There can be no doubt, Socrates, that Tragedy has her face turned towards pleasure and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 audience.

卡利克勒：毫无疑问，苏格拉底，悲剧缪斯迎合观众的愉悦观和满足。

SOCRATES: And is not that the sort of thing, Callicles, which we were just now describing as flattery?

苏格拉底：卡利克勒，这不是我们刚刚所称为谄媚的那类东西吗？

CALLICLES: Quite true.

卡利克勒：十分正确。

SOCRATES: Well now, suppose that we strip all poetry of song and rhythm and metre, there will remain speech?

苏格拉底：那么，假如我们剥去所有诗歌的音乐性、节奏和韵律，剩下的只有言语了？

CALLICLES: To be sure.

卡利克勒：显然。

SOCRATES: And this speech is addressed to a crowd of people?

苏格拉底：这言语是讲给一群人听的？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Then, poetry is a sort of rhetoric?

苏格拉底：那么诗歌是一种修辞？

CALLICLES: True.

卡利克勒：对。

SOCRATES: And do not the poets in the theatres seem to you to be rhetoricians?

苏格拉底：那在你看来，剧场里的诗人也是修辞学家了？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Then now we have discovered a sort of rhetoric which is addressed to a crowd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freemen and slaves. And this is not much to our taste, for we have described it as having the nature of flattery.

苏格拉底：那么现在我们发现了一种面向一群男女、孩子、自由人和奴隶的修辞。而这不尽合我们的品味，因为我们已经称之有谄媚的本质。

CALLICLES: Quite true.

卡利克勒：非常正确。

SOCRATES: Very good. And what do you say of that other rhetoric which addresses the Athenian assembly and the assemblies of freemen in other states? Do the rhetoricians appear to you always to aim at what is best, and do they seek to improve the citizens by their speeches, or are they too, like the rest of mankind, bent upon giving them pleasure, forgetting the public good in the thought of

their own interest, playing with the people as with children, and trying to amuse them, but never considering whether they are better or worse for this?

苏格拉底：很好。那你怎么看待另一种面向雅典公民聚会或其他城邦自由人聚会的修辞？在你看来，这些修辞学家总是致力于最好的事情，他们企图通过演讲来提高公民素质，还是也像其他人那样，致力于给那些人快乐，只考虑自身利益而忘记了公共利益，像哄小孩一般跟人们嬉戏，试图取悦他们，但从未考虑他们是否因此而获益或受损？

CALLICLES: I must distinguish. There are some who have a real care of the public in what they say, while others are such as you describe.

卡利克勒：我必须作出区分。有些人在他们的演讲中真正关心公众，而另一些正如你所说的那样。

SOCRATES: I am contented with the admission that rhetoric is of two sorts; one, which is mere flattery and disgraceful declamation; the other, which is noble and aims at the training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ouls of the citizens, and strives to say what is best, whether welcome or unwelcome, to the audience; but have you ever known such a rhetoric; or if you have, and can point out any rhetorician who is of this stamp, who is he?

苏格拉底：我对修辞分为两类这一认识很满意；其中一类只是谄

媚和可耻的夸夸其谈；另一类是高尚的，致力于训练和改进公民的灵魂，力求使所说的对听众最有益，不论是否受欢迎；但你知道有这样的修辞吗；如果你知道的话，能指出任何一位这样的修辞学家吗？他是谁呢？

CALLICLES: But, indeed, I am afraid that I cannot tell you of any such among the orators who are at present living.

卡利克勒：确实有，但恐怕在当世的演讲家中，我无法向你指出谁是这样的人。

SOCRATES: Well, then, can you mention any one of a former generation, who may be said to have improved the Athenians, who found them worse and made them better, from the day that he began to make speeches?For, indeed, I do not know of such a man.

苏格拉底：那么，你能否指出前一辈中的任何一位，从他演讲之日，他便堪称改进了雅典人，指出了他们的缺点，使他们变好？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任何这样的人。

CALLICLES: What! Did you never hear that Themistocles was a good man, and Cimon and Miltiades and Pericles, who is just lately dead, and whom you heard yourself?

卡利克勒：什么！你从未听说塞米斯托克利斯是个好人吗，还有西门和米尔蒂亚季斯，以及刚刚去世的伯里克利吗？你不是亲耳听过

他演说吗？

SOCRATES: Yes, Callicles, they were good men, if, as you said at first, true virtue consists only in the satisfaction of our own desires and those of others; but if not, and if, as we were afterwards compelled to acknowledge, the satisfaction of some desires makes us better, and of others, worse, and we ought to gratify the one and not the other, andthere is an art in distinguishing them,—can you tell me of any of these statesmen who did distinguish them?

苏格拉底：是的，卡利克勒，他们是好人，如果如您起初所言，真正的美德仅在于满足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欲望；但若非如此，如果像我们后来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有些欲望的满足使我们变好，但另一些使我们变坏，我们应满足第一类而非另一类，还有一种技艺能够区分它们，——你能告诉我这里面任何一位能够区分它们的政治家吗？

CALLICLES: No, indeed, I cannot.

卡利克勒：不，我确实不能。

SOCRATES: Yet, surely, Callicles, if you look you will find such a one. Suppose that we just calmly consider whether any of these was such as I have described. Will not the good man, who says whatever he says with a view to the best, speak with a reference to some standard and not at random; just as all other artists, whether the painter, the builder, the shipwright, or any other look all of them to their own work, and do not select and apply at random

what they apply, but strive to give a definite form to it? The artist disposes all things in order, and compels the one part to harmonize and accord with the other part, until he has constructed a regular and systematic whole; and this is true of all artists, and in the same way the trainers and physicians, of whom we spoke before, give order and regularity to the body: do you deny this?

苏格拉底：但当然，卡利克勒，如果你留心的话，你会找到一位。假设我们静心考虑一下，这些人是否有任何一位如我所述的那样。好人不论说什么都为了最好的事物，他们说话时难道不是参照某一标准而非随意乱说吗；正如从事所有其他技艺的人，不论他们是画家、建筑工、造船工还是从事任何其他技艺的人，都专注于自己工作，也不随意选择和应用他们所应用的东西，而是给其一个固定的形式？他们井然有序地处理所有事物，使一部分同另一部分和谐一致，直到构建起一个有序、系统的整体；从事所有技艺的人都是如此，我们此前提到的教练和医生也以同样的方式使身体有序、规律地运转：你否认这点吗？

CALLICLES: No; I am ready to admit it.

卡利克勒：不；我乐于承认这点。

SOCRATES: Then the house in which order and regularity prevail is good; that in which there is disorder, evil?

苏格拉底：那么建造有序、规整的房子是好的；无秩序的是坏的？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对。

SOCRATES: And the same is true of a ship?

苏格拉底：船也是如此？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And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the human body?

苏格拉底：人体也可称之为如此？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

SOCRATES: And what would you say of the soul? Will the good

soul be that in which disorder is prevalent, or that in which there is harmony and order?

苏格拉底：关于灵魂你怎么说？好的灵魂充斥着无序，还是富有和谐和秩序的？

CALLICLES: The latter follows from our previous admissions.

卡利克勒：后者符合我们之前的看法。

SOCRATES: What is the name which is given to the effect of harmony and order in the body?

苏格拉底：身体上和谐有序的效果如何命名呢？

CALLICLES: I suppose that you mean health and strength?

卡利克勒：我想你的意思是说健康和力量？

SOCRATES: Yes, I do; and what is the name which you would give to the effect of harmony and order in the soul? Try and discover a name for this as well as for the other.

苏格拉底：是的，我这么想的；灵魂上和谐有序的效果你会如何命名呢？尽量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就像给身体上的效果一样。

CALLICLES: Why not give the name yourself, Socrates?

卡利克勒：你为什么不自己给出个名称呢，苏格拉底？

SOCRATES: Well, if you had rather that I should, I will; and you shall say whether you agree with me, and if not, you shall refute and answer me. 'Healthy,' as I conceive, is the name which is given to the regular order of the body, whence comes health and every other bodily excellence: is that true or not?

苏格拉底：好，如果你更愿意让我命名，我会的；你告诉我你是否同意，如果不同意，就反驳我。我认为，“健康的”是赋予身体有序的名称，从中才生发出健康和其他身体上的优点：这是否正确？

CALLICLES: True.

卡利克勒：正确。

SOCRATES: And 'lawful' and 'law' are the names which are given to the regular order and action of the soul, and these make men lawful and orderly—and so we have temperance and justice: have we not?

苏格拉底：而“合法”和“法则”是赋予灵魂行动有序的名称，这使人们合法有序——因此我们有了节制和公正，不是吗？

CALLICLES: Granted.

卡利克勒：同意。

SOCRATES: And will not the true rhetorician who is honest and understands his art have his eye fixed upon these, in all the words which he addresses to the souls of men, and in all his actions, both in what he gives and in what he takes away? Will not his aim be to implant justice in the souls of his citizens mind take away injustice, to implant temperance and take away intemperance, to implant every virtue and take away every vice? Do you not agree?

苏格拉底：诚实正直、了解自己这门技艺的修辞学家在所有关照人类灵魂的言语和行为中，不论是给予还是索取，不正着眼于这些吗？其目的难道不在于植入公民灵魂中的公正，消除其中的不公正，植入节制，消除纵欲，植入各种美德，消除各种邪恶？你不同意吗？

CALLICLES: I agree.

卡利克勒：我同意。

SOCRATES: For what use is there, Callicles, in giving to the body of a sick man who is in a bad state of health a quantity of the most delightful food or drink or any other pleasant thing, which may be really as bad for him as if you gave him nothing, or even worse if rightly estimated. Is not that true?

苏格拉底：卡利克勒，一个健康状态很差的病人，给其身体以最精美的食物或饮品或其他任何愉悦之物，这有什么用呢？这可能跟什么都不给他一样坏，恰当地说甚至更坏。这不对吗？

CALLICLES: I will not say No to it.

卡利克勒：我不会对此说不。

SOCRATES: For in my opinion there is no profit in a man's life if his body is in an evil plight—in that case his life also is evil: am I not right?

苏格拉底：我认为，如果身体状态极为糟糕，人的生活便没有益处——那这情况下人的生活也很糟糕：我说的不对吗？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对。

SOCRATES: When a man is in health the physicians will generally allow him to eat when he is hungry and drink when he is thirsty, and to satisfy his desires as he likes, but when he is sick they hardly suffer him to satisfy his desires at all: even you will admit that?

苏格拉底：当一个人健康时，医生通常允许他饿了便吃，渴了便喝，按照喜好满足自己的欲望，但当他生病时，他们几乎完全不允许他满足自己的欲望。你也承认这点吧？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And does not the same argument hold of the soul, my good sir? While she is in a bad state and is senseless and intemperate and unjust and unholy, her desires ought to be controlled, and she ought to be prevented from doing anything which does not tend to her own improvement.

苏格拉底：关于灵魂，同样的论证不也站得住脚吗，我的好先生？当她状态不好、不理智、不节制、不公正、不虔诚时，应该管制她的欲望，阻止她做任何不利于自身改进的事。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对。

SOCRATES: Such treatment will be better for the soul herself?

苏格拉底：如此处置对灵魂本身有好处吧？

CALLICLES: To be sure.

卡利克勒：当然。

SOCRATES: And to restrain her from her appetites is to chastise her?

苏格拉底：抑制她的嗜好是责罚她？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

SOCRATES: Then restraint or chastisement is better for the soul than intemperance or the absence of control, which you were just now preferring?

苏格拉底：那么抑制或责罚比放纵或毫无管制对灵魂来说更好，这也是你刚才更倾向的？

CALLICLES: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ocrates, and I wish that you would ask some one who does.

卡利克勒：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苏格拉底，我希望你问其他明白你意思的人。

SOCRATES: Here is a gentleman who cannot endure to be improved or: to subject himself to that very chastisement of which the argument speaks!

苏格拉底：这里有位绅士不能忍受改进，或者说：无法使自己接受争论提及的责罚！

CALLICLES: I do not heed a word of what you are saying, and have only answered hitherto out of civility to Gorgias.

卡利克勒：你说的我一个字都没留意，迄今为止仅是出于对高尔吉亚的礼貌才作出回答的。

SOCRATES: What are we to do, then? Shall we break off in the middle?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要中断吗？

CALLICLES: You shall judge for yourself.

卡利克勒：你自己判断吧。

SOCRATES: Well, but people say that 'a tale should have a head and not break off in the middle,' and I should not like to have the argument going about without a head; please then to go on a little longer, and put the head on.

苏格拉底：好吧，但人们常说“故事要有头有尾，不应半途中断，”我不希望辩论没有结尾；请再继续一会儿，使辩论有个结尾。

CALLICLES: How tyrannical you are, Socrates! I wish that you and your argument would rest, or that you would get someone else to argue with you.

卡利克勒：你太专断了，苏格拉底！我希望你休息一下，辩论也停停吧，否则你找别人辩论吧。

SOCRATES: But who else is willing?—I want to finish the argument.

苏格拉底：但还有谁愿意呢？——我希望完成辩论。

CALLICLES: Cannot you finish without my help, either talking straighton, or questioning and answering yourself?

卡利克勒：不借助我的帮忙，你就不能完成吗？你要么直接说下去，要么就自问自答。

SOCRATES: Must I then say with Epicharmus, 'Two men spoke before, but now one shall be enough'? I suppose that there is absolutely no help. And if I am to carry on the enquiry by myself, I will first of all remark that not only I but all of us should have an ambition to know what is true and what is false in this matter, for the discovery of the truth is common good. And now I will proceed to argue according to my own notion. But if any of you think that I arrive at conclusions which are untrue you must interpose and refute me, for I do not speak from any knowledge of what I am saying; I am an enquirer like yourselves, and therefore, if my opponent says anything which is of force, I shall be the first to agree with him. I am speaking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argument ought to be completed; but if you think otherwise let us leave off and go our ways.

苏格拉底：那么我必须引用厄皮卡玛斯说的话，“以前两人说话，而今一人足矣”？那看来真的没有帮助了。如果我自己继续问答下去，我首先要说在这点上不仅我，而且我们大家都希望知道何为真何为假，因为发现真理是公共利益所在。现在我将继续按照我的观点论证。但如果你们任何一人认为我得出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就必须打

断并反驳我，因为我并非根据已知的一切进行辩论；我跟你们一样是个探索者，因此，如果我的对手说了任何使人信服的话，我将最先同意他。我说这些话的前提是应该完成辩论；但如果你意见相反的话，我们就此中断，各走各的路。

GORGIAS: I think, Socrates, that we should not go our ways until you have completed the argument; and this appears to me to be the wish of the rest of the company; I myself should very much like to hear what more you have to say.

高尔吉亚：我认为，苏格拉底，在你完成论证之后，我们才能各走各的路；我看这好像也是我们其他同伴的心愿；我本人十分希望听听你还要说什么。

SOCRATES: I too, Gorgias, should have liked to continue the argument with Callicles, and then I might have given him an 'Amphion' in return for his 'Zethus'; but since you, Callicles, are unwilling to continue, I hope that you will listen, and interrupt me if I seem to you to be in error. And if you refute me, I shall not be angry with you as you are with me, but I shall inscribe you as the greatest of benefactors on the tablets of my soul.

苏格拉底：高尔吉亚，我也希望继续跟卡利克勒辩论，继而我可能还他一个“安菲翁”，作为他“西苏斯”的回报；但因为你，克里克勒，不愿意继续，我希望你能够聆听，而且如果你认为我犯了错，就打断我。如果你反驳我，我将不会像你对我一样对你生气，我将把你作为我灵魂之碑上最大的恩人。

CALLICLES: My good fellow, never mind me, but get on.

卡利克勒：我的好朋友，不要顾忌我，请继续。

SOCRATES: Listen to me, then, while I recapitulate the argument—is the pleasant the same as the good? Not the same. Callicles and I are agreed about that. And is the pleasant to be pursued for the sake of the good? Or the good for the sake of the pleasant? The pleasant is to be pursued for the sake of the good. And that is pleasant at the presence of which we are pleased, and that is good at the presence of which we are good? To be sure. And we aregood, and all good things whatever are good when some virtue is present in us or them? That, Callicles, is my conviction. But the virtue of each thing, whether body or soul, instrument or creature, when given to them in the best way comes to them not by chance but as the result of the order and truth and art which are imparted to them: Am I not right? I maintain that I am. And is not the virtue of each thing dependent on order or arrangement? Yes, I say. And that which makes a thing good is the proper order inhering in each thing? Such is my view. And is not the soul which has an order of her own better than that which has no order? Certainly. And the soul which has order is orderly? Of course. And that which is orderly is temperate? Assuredly. And the temperate soul is good? No other answer can I give, Callicles dear; have you any?

苏格拉底：那么，听我说，我扼要重述一下辩论——愉悦的事物和好的事物一样吗？不一样。我和卡利克勒同意此点。那应该是为了好的事物去追求愉悦的事物？或是为了愉悦的事物追求好的事物？是

为了好的事物追求愉悦的事物。面对愉悦的事物，我们感到愉悦，那面对好的事物，我们是好的？当然。我们是好的，所有好的事物都是好的，当我们或它们呈现某一美德时？这点，卡利克勒和我深信不疑。但不论是身体或灵魂，工具或生物，所有事物，当它们以最佳方式获得美德时，美德不是偶然所得，而是给予它们的秩序、真理和艺术产生的结果：我说的不对吗？我认定我是对的。每一事物的美德难道不都依赖于秩序或安排吗？我说是的。不正是每一事物固有的恰当秩序才使其成为好的吗？这是我的观点。拥有自己秩序的灵魂不是比没有秩序的好吗？当然是。拥有秩序的灵魂是有序的？当然。有序的即是有节制的？确实如此。有节制的灵魂是好的？我给不出其他的答案了，亲爱的卡利克勒；你有其他的吗？

CALLICLES: Go on, my good fellow.

卡利克勒：继续，我的好朋友。

SOCRATES: Then I shall proceed to add, that if the, temperate soul is the good soul, the soul which is in the opposite condition, that is, the foolish and intemperate, is the bad soul. Very true.

苏格拉底：那我将继续补充，如果节制的灵魂是好的灵魂，那么处于相反状态的灵魂，即愚蠢、不节制的灵魂就是坏的。非常正确。

And will not the temperate man do what is proper, both in relation to the gods and to men;—for he would not be temperate if he did not? Certainly he will do what is proper. In his relation to other men he will do what is just; and in his relation to the gods he

will do what is holy; and he who does what is just and holy must be just and holy? Very true. And must he not be courageous? For the duty of a temperate man is not to follow or to avoid what he ought not, but what he ought, whether things or men or pleasures or pains, and patiently to endure when he ought; and therefore, Callicles, the temperate man, being, as we have described, also just and courageous and holy, cannot be other than a perfectly good man, nor can the good man do otherwise than well and perfectly whatever he does; and he who does well must of necessity be happy and blessed, and the evil man who does evil, miserable: now this latter is he whom you were applauding—the intemperate who is the opposite of the temperate. Such is my position, and these things I affirm to be true. And if they are true, then I further affirm that he who desires to be happy must pursue and practise temperance and run away from intemperance as fast as his legs will carry him: he had better order his life so as not to need punishment; but if either he or any of his friends, whether private individual or city, are in need of punishment, then justice must be done and he must suffer punishment, if he would be happy. This appears to me to be the aim which a man ought to have, and towards which he ought to direct all the energies both of himself and of the state, acting so that he may have temperance and justice present with him and be happy, not suffering his lusts to be unrestrained, and in the never-ending desire satisfy them leading a robber's life. Such a one is the friend neither of God nor man, for he is incapable of communion, and he who is incapable of communion is also incapable of friendship. And philosophers tell us, Callicles, that communion and friendship and orderliness and temperance and justice bind together heaven and earth and gods and men, and that this universe is therefore called Cosmos or order, not disorder or misrule, my friend. But although you are a philosopher you seem to me never to have observed that geometrical equality is mighty, both among gods and men; you

think that you ought to cultivate inequality or excess, and do not care about geometry.—Well, then, either the principle that the happy are made happy by the possession of justice and temperance, and the miserable the possession of vice, must be refuted, or, if it is granted, what will be the consequences? All the consequences which I drew before, Callicles, and about which you asked me whether I was in earnest when I said that a man ought to accuse himself and his son and his friend if he did anything wrong, and that to this end he should use his rhetoric—all those consequences are true. And that which you thought that Polus was led to admit out of modesty is true, viz., that, to do injustice, if more disgraceful than to suffer, is in that degree worse; and the other position, which, according to Polus, Gorgias admitted out of modesty, that he who would truly be a rhetorician ought to be just and have a knowledge of justice, has also turned out to be true.

节制的人无论对神还是对人难道都不做恰当的事吗；——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便算不上节制？当然他会做恰当的事。对待他人，他做公正的事；对待诸神，他做虔诚的事；而做公正和虔诚之事的人一定是公正的和虔诚的？十分正确。他必定是勇敢的，不是吗？因为一个节制之人的责任不是遵循或避免他不当做之事，而是他当做之事，不论是事或人，还是快乐或痛苦，并且当他应该忍受时他会耐心忍受；因此，卡利克勒，如我们所说，节制的人是公正、勇敢和虔诚的，肯定是完美的好人，而好人不论做什么也必然做得尽善尽美；做事好的人必然是快乐和幸福的，做坏事的坏人必然是悲惨的：你赞成的是后一类人——无节制的人，而不是有节制之人。这就是我的观点，而且我坚信这是正确的。如果这些是正确的，那么我还坚信希望幸福的人必须追求和践行节制，并尽其所能远离不节制，他最好生活有序，从而不受惩罚；但如果他或他的任何朋友，不论是私人朋友还是城市，需要接受惩罚，那么那人想要幸福的话，正义必须得以彰显，他必须要受到惩罚。这对我来说是人应当追求的目标，为此他应该动用自己

和城邦的全部精力，行动起来以便拥有节制和公正以及幸福，而不应使欲望放纵，在永无尽头的满足欲望中过上强盗的生活。这种人既不是神的朋友也不是人的朋友，因为他不会交流，不会交流也就不懂友谊。卡利克勒，哲学家告诉我们，交流、友谊以及有序、节制和公正共同使天地神人合为一体，因此这个世界被称为宇宙或秩序，而非混乱或无序，我的朋友。虽然你是哲学家，但在我看来你从没注意到，不论在神还是人之中，几何等式有强大的力量；你认为你应该培养不平等或过度，却不关心几何学。——好吧，那么，拥有公正和节制使幸福成为幸福，拥有邪恶使悲惨成为悲惨，要么反驳这个原则，要么同意，结论会是什么呢？当我说一个人应该谴责自己、他的儿子和朋友，如果那人做了任何错事的话，并且为此目的他应当使用修辞，卡利克勒，你问我是不是认真的，所有我之前得出的结论——所有这些结论都是正确的。你认为波卢斯出于谦虚以致认错，这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行不公正，如果比遭受不公正更可耻，在这层意义上讲是更坏的；而另一点，根据波卢斯的观点，高尔吉亚出于谦虚，承认想真正成为修辞学家的人应当公正并具有关于公正的知识，结果这也是正确的。

And now, these things being as we have said, let us proceed in the next place to consider whether you are right in throwing in my teeth that I am unable to help myself or any of my friends or kinsmen, or to save them in the extremity of danger, and that I am in the power of another like an outlaw to whom anyone may do what he likes,—he may box my ears, which was a brave saying of yours; or take away my goods or banish me, or even do his worst and kill me; a condition which, as you say, is the height of disgrace. My answer to you is one which has been already often repeated, but may as well be repeated once more. I tell you, Callicles, that to be boxed on the ears wrongfully is not the worst evil which can befall a man, nor to have my purse or my body cut open, but that to smite and slay me and mine wrongfully is far more disgraceful and more

evil; aye, and to despoil and enslave and pillage, or in any way at all to wrong me and mine, is far more disgraceful and evil to the doer of the wrong than to me who am the sufferer. These truths, which have been already set forth as I state them in the previous discussion, would seem now to have been fixed and riveted by us, if I may use an expression which is certainly bold, in words which are like bonds of iron and adamant; and unless you or some other still more enterprising hero shall break them,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denying what I say. For my position has always been, that I myself am ignorant how these things are, but that I have never met any one who could say otherwise, any more than you can, and not appear ridiculous. This is my position still, and if what I am saying is true, and injustice is the greatest of evils to the doer of injustice, and yet there is if possible a greater than this greatest of evils, in an unjust man not suffering retribution, what is that defence of which the want will make a man truly ridiculous? Must not the defence be one which will avert the greatest of human evils? And will not worst of all defences be that with which a man is unable to defend himself or his family or his friends?—and next will come that which is unable to avert the next greatest evil; thirdly that which is unable to avert the third greatest evil; and so of other evils. As is the greatness of evil so is the honour of being able to avert them in their several degrees, and the disgrace of not being able to avert them. Am I not right Callicles?

我们已经说了这些，现在让我们接下来考虑，你这样责备我对不对，你说我不能帮助自己、朋友或亲人，或将他们从极度危险中解救出来，而且我被其他的力量左右，像被剥夺法律保护的人一样，任何人可以对我做他喜欢做的，——他可以扇我耳光，你毫不畏惧地对我说；又或拿走我的财产或流放我，甚至做最绝的，杀了我；如你所言，这种状态是最大的耻辱。我给你的答案是人们常说的，但不妨再

说一次。我告诉你，卡利克勒，一个人能遭受的最大的恶不是被不公正地扇耳光，也不是我的钱包或身体被剖开，不公正地击败并杀死我和我的亲友是更大的耻辱和罪恶；是的，抢劫、奴役和掠夺或以任何方式不公正地对待我和我的亲友，这些不公正行为的实施者比我这遭受者更加可耻和罪恶。这些真理我在之前的讨论中已经阐述过，如果允许我用一个大胆的表述，这些真理现在看来已经被我们用如铁和金刚拧成的语言固定和确信了；除非你或其他更为野心勃勃的英雄打破它们，否则没有可能否认我所说的。因为我的立场一直是如此，我本人不知这些事情如何，但除了你，我从未遇到任何人持相反的观点且不显得荒谬。这仍是我的立场，如果我说的是对的，不公正对它的实行者是最大的恶，而如果可能，一个不公正之人未受惩罚比这最大的恶还要严重，还有什么要辩护吗？这种辩护会使人显得非常荒谬。难道那辩护能防止人类最大的恶吗？不能使人为自己或其家人、朋友声辩的辩护是最糟糕的吗？不能避免第二大恶的辩护次之，不能避免第三大恶的辩护再次之；其他的恶以此类推。恶有多大，能够在不同程度上避免它们的荣耀也就有多大，没能避免它们的可耻也是如此。我说得不对吗，卡利克勒？

CALLICLES: Yes, quite right.

卡利克勒：是的，十分正确。

SOCRATES:Seeing then that there are these two evils, the doing injustice and the suffering injustice—and we affirm that to do injustice is a greater, and to suffer injustice a lesser evil—by what devices can a man succeed in obtaining the two advantages, the one of not doing and the other of not suffering injustice? Must he have the power, or only the will to obtain them? I mean to ask whether a man will escape injustice if he has only the will to escape, or must

he have provided himself with the power?

苏格拉底：鉴于有两种恶，行不公正和遭受不公正——而且我们确定行不公正是更大的罪恶，遭受不公正较轻——以何种方式一个人才能兼得这两种好处，其一是不行不公正，另一是不遭受不公正？要获得这些好处，他必须要有权力，还是仅需有意愿即可？我是想问一个人欲躲避不公正，他只需有躲避的意愿即可，还是必须使自己具备权力？

CALLICLES: He must have provided himself with the power; that is clear.

卡利克勒：他必须为自己提供权力；这很显然。

SOCRATES: And what do you say of doing injustice? Is the will only sufficient, and will that prevent him from doing injustice, or must he have provided himself with power and art; and if he has not studied and practised, will he be unjust still? Surely you might say, Callicles, whether you think that Polus and I were right in admitting the conclusion that no one does wrong voluntarily, but that all do wrong against their will?

苏格拉底：你怎么看待行不公正呢？仅有意愿就足够了吗，那能阻止他行不公正吗？还是他必须使自己具有权力和技艺；如果他未经过学习和锻炼，他会依然不公正吗？卡利克勒，当然你可以说说看，你认为我和波卢斯得出这一结论是否正确，即没人愿意主动做错事，人们只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做错事？

CALLICLES: Granted, Socrates, if you will only have done.

卡利克勒：我同意，苏格拉底，如果你愿意这么说。

SOCRATES: Then, as would appear, power and art have to be provided in order that we may do no injustice?

苏格拉底：那么，如此看来，得到权力和技艺的目的是我们可以不行不公正之事？

CALLICLES: Certainly.

卡利克勒：当然。

SOCRATES: And what art will protect us from suffering injustice, if not wholly, yet as far as possible? I want to know whether you agree with me; for I think that such an art is the art of one who is either a ruler or even tyrant himself, or the equal and companion of the ruling power.

苏格拉底：什么技艺能使我们即使不完全免除、也尽可能少地遭受不公正呢？我想知道你是否同意我；因为我认为这种技艺是统治者或甚至僭主本人，又或与统治者有同等权势之人或同伴所拥有的。

CALLICLES: Well said, Socrates; and please to observe how ready I am to praise you when you talk sense.

卡利克勒：说得好，苏格拉底；请注意，当你说得有理时，我是多么乐意称赞你。

SOCRATES: Think and tell me whether you would approve of another view of mine: To me every man appears to be most the friend of him who is most like to him—like to like, as ancient sages say: Would you not agree to this?

苏格拉底：想一下告诉我，你是否同意我的另一个观点：在我看来，一个人很可能跟最他相似的人成为的朋友——古时的圣人说，物以类聚：你不同意这点吗？

CALLICLES: I should.

卡利克勒：我同意。

SOCRATES: But when the tyrant is rude and uneducated, he may be expected to fear any one who is his superior in virtue, and will never be able to be perfectly friendly with him.

苏格拉底：但当僭主粗鲁、缺乏教养，他理应会害怕任何品德比他高尚的人，且永远不能将其当朋友看待。

CALLICLES: That is true.

卡利克勒：这是正确的。

SOCRATES: Neither will he be the friend of any one who greatly his inferior, for the tyrant will despise him, and will never seriously regard him as a friend.

苏格拉底：他也不会与比他远远低下的人成为朋友，因为僭主会看不起他，也永远不会真把他当朋友看待。

CALLICLES: That again is true.

卡利克勒：这也是正确的。

SOCRATES: Then the only friend worth mentioning, whom the tyrant can have, will be one who is of the same character, and has the same likes and dislikes, and is at the same time willing to be subject and subservient to him; he is the man who will have power in the state, and no one will injure him with impunity—is not that so?

苏格拉底：那么僭主能够拥有的、唯一值得一提的朋友是跟他性格相同之人，有着同样的好恶，同时也愿意臣服、屈从于他；他是城

邦里掌权之人，没人能够伤害他后免于惩罚——不是如此吗？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正是。

SOCRATES: And if a young man begins to ask how he may become great and formidable, this would seem to be the way—he will accustom himself, from his youth upward, to feel sorrow and joy on the same occasions as his master, and will contrive to be as like him as possible?

苏格拉底：如果有年轻人问如何变得了不起、强大，这似乎是可行之道——自年轻时，他便使自己习惯与他的主人同悲同喜，而且尽可能地试图学他吗？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And in this way he will have accomplished, as you and your friends would say, the end of becoming a great man and not suffering injury?

苏格拉底：以这种方式，如你和你的朋友会说，他会达到成为伟人且不受伤害这一目的吗？

CALLICLES: Very true.

卡利克勒：非常正确。

SOCRATES: But will he also escape from doing injury? Must not the very opposite be true,—if he is to be like the tyrant in his injustice, and to have influence with him? Will he not rather contrive to do as much wrong as possible, and not be punished?

苏格拉底：但他也会免于行不公正吗？如果他像僭主一样不公正，且受其影响的话，与此难道不会有截然相反的结论吗？他难道不会力求做坏事且不受惩罚吗？

CALLICLES: True.

卡利克勒：正确。

SOCRATES: And by the imitation of his master and by the power which he thus acquires will not his soul become bad and corrupted, and will not this be the greatest evil to him?

苏格拉底：通过模仿他的主人，通过这样所获得的权力，他的灵魂不会变坏、堕落吗，这对他来说不是最大的恶吗？

CALLICLES: You always contrive somehow or other, Socrates, to invert everything: do you not know that he who imitates the tyrant will, if he has a mind, kill him who does not imitate him and take away his goods?

卡利克勒：苏格拉底，你总是这样或那样地试图颠倒一切，你不知道模仿僭主之人如果有意愿，会杀掉不效仿他的人，并夺走其财产？

SOCRATES: Excellent Callicles, I am not deaf, and I have heard that a great many times from you and from Polus and from nearly every man in the city, but I wish that you would hear me too. I dare say that he will kill him if he has a mind—the bad man will kill the good and true.

苏格拉底：非常好，卡利克勒，我不是聋子，已经多次从你和波卢斯以及几乎城中所有人的口中听说过这一点，但我希望你也能听我所说。我敢说如果有意，他会杀掉那人——坏人会杀掉好人和诚实的人。

CALLICLES: And is not that just the provoking thing?

卡利克勒：这难道不正是令人愤怒的事情吗？

SOCRATES:Nay, not to a man of sense, as the argument shows: do you think that all our car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prolonging life to the uttermost, and to the study of those arts which secure us from danger always; like that art of rhetoric which saves men in courts of law, and which you advise me to cultivate?

苏格拉底：不是，对一个理智的人来说不是如此，论据如下：你认为我们应该倾注所有精力来最大程度地延长生命，并研究能使我们永远摆脱危险的技艺上吗；诸如可使人在法庭上免受法律制裁、你也建议我学习的那种修辞学？

CALLICLES: Yes, truly, and very good advice too.

卡利克勒：是的，确实如此，这也是极好的建议。

SOCRATES: Well, my friend, but what do you think of swimming; is that an art of any great pretensions?

苏格拉底：那么，我的朋友，但你如何看待游泳？那种技艺也带有丝毫的伪饰吗？

CALLICLES: No, indeed.

卡利克勒：不，确实不是。

SOCRATES: And yet surely swimming saves a man from death, there are occasions on which he must know how to swim. And if you despise the swimmers, I will tell you of another and greater art, the art of the pilot, who not only saves the souls of men, but also their bodies and properties from the extremity of danger, just like rhetoric. Yet his art is modest and unpresuming: it has no airs or pretences of doing anything extraordinary, and, in return for the same salvation which is given by the pleader, demands only two obols, if he brings us from Aegina to Athens, or for the longer voyage from Pontus or Egypt, at the utmost two drachmae, when he has saved, as I was just now saying, the passenger and his wife and children and goods, and safely disembarked them at the Piraeus,—this is the payment which he asks in return for so great a boon; and he who is the master of the art, and has done all this, gets out and walks about on the sea-shore by his ship in an unassuming way. For he is able to reflect and is aware that he cannot tell which of his fellow-passengers he has benefited, and which of them he has injured in not allowing them to be drowned. He knows that they are just the same when he has disembarked them as when they embarked, and not a whit better either in their bodies or in their souls; and he considers that if a man who is afflicted by great and incurable bodily diseases is only to be pitied for having escaped, and is in no way benefited by him in having been saved from drowning, much less he who has great and incurable diseases, not of the body, but of the soul, which is the more valuable part of him; neither is life worth having nor of any profit to the bad man, whether he be delivered from the sea, or the law-courts, or any other devourer;—and so he reflects that such a one had better not live, for he cannot live well.

苏格拉底：可是游泳的确可救人脱离死亡，有些场合也要求人们必须会游泳。如果你鄙视游泳者，我来告诉你另外一种更伟大的技艺，即领航员的技艺，领航员不仅拯救人们的灵魂、也拯救他们的身体和财产于极危险的境地，正如修辞术一样。然而，他的技艺谦逊平和：不会装腔作势或假装自己所做的事情很了不起，并且，当求助者请求回报时，仅索取两个欧宝，假设他将我们从埃伊那岛、或者从更远的本都和埃及带到雅典，他最多就要两个德拉克马，考虑一下他救了，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乘客及其妻儿以及他们的财产，并使他们在比雷埃夫斯安全登岸——他为如此之大的恩惠得到的回报就是两个德拉克马；而精通这项技艺的领航员，在做完这一切之后，走出船来在附近的海滩上散步，一点儿都不张扬。因为他能够反思并意识到，在他没有让同船乘客溺死的行为中，他并不能断定哪个因此受惠，哪个因此受到伤害。他知道，在他让他们下船的时候，他们与上船时候相比毫无变化，无论灵魂或身体，都没有些微改善；并且他想到，假设一个人身体患上无法治愈的重病，并深受其苦，他只能够因这一逃脱值得怜悯，他丝毫没有因被救免于溺死而受益，对于同样遭受无法治愈之重疾——不是身体上，而是灵魂上——所引起痛苦的人，受益更无从谈起，因为灵魂是他更为宝贵的部分；而对于坏人来说，无论是免于溺死大海，还是免于法庭裁判，或者免于任何其他灾祸，生命既不值得拥有也没有任何益处。所以领航员认识到这样的人最好不要活着，因为他不能活得很好。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pilot, although he is our saviour, is not usually conceited, any more than the engineer, who is not at all behind either the general, or the pilot, or any one else, in his saving power, for he sometimes saves whole cities. Is there any comparison between him and the pleader? And if he were to talk, Callicles, in your grandiose style, he would bury you under a mountain of words, declaring and insisting that we ought all of us to be engine-makers, and that no other profession is worth thinking about; he would have plenty to say. Nevertheless you despise him

and his art, and sneeringly call him an engine-maker, and you will not allow your daughters to marry his son, or marry your son to his daughters. And yet, on your principle, what justice or reason is there in your refusal? What right have you to despise the engine-maker, and the others whom I was just now mentioning? I know that you will say, 'I am better, better born.' But if the better is not what I say, and virtue consists only in a man saving himself and his, whatever may be his character, then your censure of the engine-maker, and of the physician, and of the other arts of salvation, is ridiculous. Oh my friend! I want you to see that the noble and the good may possibly be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saving and being saved—May not he who is truly a man cease to care about living a certain time?—he knows, as women say, that no man can escape fate, and therefore he is not fond of life; he leaves all that with God, and considers in what way he can best spend his appointed term;—whether by assimilating himself to the constitution under which he lives, as you at this moment have to consider how you may become as like as possible to the Athenian people, if you mean to be in their good graces, and to have power in the state; whereas I want you to think and see whether this is for the interest of either of us;—I would not have us risk that which is dearest on the acquisition of this power, like the Thessalian enchantresses, who, as they say, bring down the moon from heaven at the risk of their own perdition. But if you suppose that any man will show you the art of becoming great in the city, and yet not conforming yourself to the ways of the city, whether for better or worse, then I can only say that you are mistaken, Callides; for he who would deserve to be the true natural friend of the Athenian Demus, aye, or of Pyrilampes' darling who is called after them, must be by nature like them, and not an imitator only. He, then, who will make you most like them, will make you as you desire, a statesman and orator: for every man is pleased when he is spoken to in his own language and spirit, and

dislikes any other. But perhaps you, sweet Callicles, may be of another mind. What do you say?

这就是领航员尽管是我们的救助者，却通常不会自高自大的原因，工程师也是如此，就救人的能力而言，工程师一点都不落后于将军，或者领航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因为有时候他拯救的是整座城市。他和求救者之间有任何可比性吗？卡利克勒，假设他以你那浮夸的风格来谈话，他那滔滔不绝的话语会将你淹没，一再宣称和坚持我们都应该成为工具制造者，除此之外任何其他职业都不值得考虑；对此他会有很多话要说。然而你鄙视他和他的技艺，并且轻蔑地称他为工具制造者，你也不会允许你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或者让你的儿子娶他的女儿。可是，就你的原则来说，你的拒绝到底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呢？你有什么权利来轻视工具制造者以及我刚才提及的那些人呢？我知道你会说："我更优秀，出身更好。"但是，倘若这更好不是我所说的那样，美德仅仅在于一个人能够保全自己和亲友，无论他品性如何，那么你对工具制造者、医生以及其他救人之术的责难就是荒谬的了。哦，我的朋友！我想让你明白，高尚和美德很可能并不同于救人和被救——难道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会在乎能活多久吗？——他知道，正如女人们说的，没有人可以逃脱命运，所以他对寿命并不关心；他将这一切交托给神，只考虑怎样才能充分利用这神给定的有限的生命；——他要么使自己适应生活的法规，正如此时，如果你想博得他们的欢心并在城邦里拥有权力，你就得考虑如何让自己更与雅典人相似；然而，我想让你想想看，这样做是否对我们中的任何一人有益——我不会为了获取这种权力而用我们最珍视的东西来冒险，就像塞萨利人的女巫，据说，她们为了将月亮从天上击落下来，会甘冒下地狱的危险。但是假设有人教你在这个城市中如何成为伟人、却无需遵照这个城市的言行方式的技艺，无论其是好是坏，那么我只能说你弄错了，卡利克勒；因为对雅典德缪斯、或者以皮里兰佩斯命名的该家族的后裔来说，称得上他们真正的挚爱的朋友的人，必须生性与他们相似，而不是效仿。那么，那个使你与其最相似的人会如你所愿，使你成为一个政治家或者演说家：因为每个人听到别人用自己的语言和

方式对自己说话，都会感到愉快，而对其他的感到厌恶。但是，或许，亲爱的卡利克勒，你可能会有其他想法。你的意思如何？

CALLICLES: Somehow or other your words, Socrates, always appear to me to be good words; and yet, like the rest of the world, I am not quite convinced by them.

卡利克勒：不知怎么回事，苏格拉底，你的话在我听来似乎总是好听的话；但是，和其他人一样，我却不能完全信服。

SOCRATES: The reason is, Callicles, that the love of Demus which abides in your soul is an adversary to me; but I dare say that if we recur to these same matters, and consider them more thoroughly, you may be convinced for all that. Please, then, to remember that there are two processes of training all things, including body and soul; in the one, as we said, we treat them with a view to pleasure, and in the other with a view to the highest good, and then we do not indulge but resist them: was not that the distinction which we drew?

苏格拉底：原因是，卡利克勒，你灵魂深处深爱着的德穆斯却是我的敌人；但是我敢说，如果我们重新来谈论并更彻底地考虑这些事情，你会对这些都心悦诚服的。那么请记着这点，所有事物的训练都包括两个过程，无论身体还是灵魂；我们说过一个过程是以愉悦为目的对待他们，而另外一个过程则以最高利益为目的对待他们，并且不会纵容而会克制他们：这不是我们先前得出的区别吗？

CALLICLES:Very true.

卡利克勒：正是。

SOCRATES: And the one which had pleasure in view was just a vulgar flattery—was not that another of our conclusions?

苏格拉底：而且以愉悦为目的的只是卑劣的谄媚——这不是我们得出的另外一个结论吗？

CALLICLES: Be it so, if you will have it.

卡利克勒：就这样吧，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

SOCRATES: And the other had in view the greatest improvement of that which was ministered to, whether body or soul?

苏格拉底：而另外一个是以被服侍对象的最大改善为目的，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

CALLICLES: Quite true.

卡利克勒：相当正确。

SOCRATES: And must we not have the same end in view in the treatment of our city and citizens? Must we not try and makethem as good as possible? For we have already discovered that there is no use in imparting to them any other good, unless the mind of those who are to have the good, whether money, or office, or any other sort of power, be gentle and good. Shall we say that?

苏格拉底：在治理城市和对待市民时我们不是必须得本着相同的目的吗？我们不是也得努力——让他们变得尽可能更好吗？因为我们已经发现给他们任何其他好处都已毫无用处，只有当他们的心灵温和良善时，他们所获得的诸如金钱、职务或其他任何一种权利等好处才对他们有益。我们可以这样说吧？

CALLICLES: Yes, certainly, if you like.

卡利克勒：是的，当然，如果你乐意。

SOCRATES: Well, then, if you and I, Callicles, were intending to set about some public business, and were advising one another to undertake buildings, such as walls, docks or temples of the largest size, ought we not to examine ourselves, first, as to whether we know or do not know the art of building, and who taught us?—would not that be necessary, Callicles?

苏格拉底：那么，卡利克勒，假使你和我打算从事一些公共事业，并建议彼此承接比如特大墙体、码头或神庙等建筑，我们不应该自我审视一番，首先看我们是否懂得建筑的技艺，还有谁曾就此教过我们？——这不是必须的吗，卡利克勒？

CALLICLES: True.

卡利克勒：这是必须的。

SOCRATES: In the second place, we should have to consider whether we had ever constructed any private house, either of our own or for our friends, and whether this building of ours was a success or not; and if upon consideration we found that we had had good and eminent masters, and had been successful in constructing many fine buildings, not only with their assistance, but without them, by our own unaided skill—in that case prudence would not dissuade us from procee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works. But if we had no master to show, and only a number of worthless buildings or none at all, then, surely, it would be ridiculous in us to attempt public works, or to advise one another to undertake them. Is not this true?

苏格拉底：其次，我们必得考虑一下我们以前是否建造过任何私人住宅，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朋友，以及我们的建造物是否成功；如果经过考虑，我们发现，我们曾师从优秀杰出的大师，并曾有过多次建造精美建筑物的成功经验，其中不仅有借助大师们的帮助而建成的，也有不借助他们帮助独立完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审慎也不会使我们对承建这些公共工程望而却步。但是，倘若我们说不出

师从过的大师，并且仅建造过几个毫无价值的建筑物，或者什么都没有建造过，我们如果尝试或彼此建议承接公共工程，那必然是荒谬至极的。这难道不对吗？

CALLICLES: Certainly.

卡利克勒：当然对。

SOCRATES: And does not the same hold in all other cases? If you and I were physicians, and were advising one another that we were competent to practise as state-physicians, should I not ask about you, and would you not ask about me, well, but how about Socrates himself, has he good health? And was any one else ever known to be cured by him, whether slave or freeman? And I should make the same enquiries about you. And if we arrived at the conclusion that no one, whether citizen or stranger, man or woman, had ever been any the better for the medical skill of either of us, then, by Heaven, Callicles, what an absurdity to think that we or any human being should be so silly as to set up as state-physicians and advise others like ourselves to do the same, without having first practised in private, whether successfully or not, and acquired experience of the art! Is not this, as they say, to begin with the big jar when you are learning the potter's art; which is a foolish thing?

苏格拉底：这不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情况吗？倘使我们都是医生，并告知彼此，说我们有能力胜任城邦医师一职，我们不是应该彼此询问一下，苏格拉底的他本人身体健康吗？并且是否有人曾经被他治愈，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民？而且，我应该向你询问同样的问题。如

果我们得出结论，没有任何人，无论市民还是外乡人、男人还是女人曾借助我们两个人中任何一个的医术得到好转，那么，天啊，卡利克勒，我们或者其他任何人竟然愚蠢到认为，在没有私下里提前练习，无论成败，并获得该项技艺的经验时，我们就可以成为城邦医师施行医术并建议他人和我们做同样的事情，这简直太荒谬了！这难道不正是他们所说的还没学会走路就想跑步吗？这难道不是愚蠢的事情吗？

CALLICLES: True.

卡利克勒：是。

SOCRATES: And now, my friend, as you are already beginning to be a public character, and are admonishing and reproaching me for not being one, suppose that we ask a few questions of one another. Tell me, then, Callicles, how about making any of the citizens better? Was there ever a man who was once vicious, or unjust, or intemperate, or foolish, and became by the help of Callicles good and noble? Was there ever such a man, whether citizen or stranger, slave or freeman? Tell me, Callicles, if a person were to ask these questions of you, what would you answer? Whom would you say thatyou had improved by your conversation? There may have been good deeds of this sort which were done by you as a private person, before you came forward in public. Why will you not answer?

苏格拉底：那么现在，我的朋友，既然你已经快要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了，并且因为我不是一个公众人物而训诫和责备我，让我们互相询问几个问题吧。那么告诉我，卡利克勒，如何让公民变得更好？有

没有一度邪恶或不诚实或放纵或愚蠢的人经卡利克勒的帮助而变得良善和高尚？有过这样的人吗，不管他是公民或者外乡人，奴隶还是自由民？告诉我，卡利克勒，如果有人问你这些问题，你会怎么回答？——你会说谁曾经在和你交谈后得到改进？你可能在参与公众事务之前，以个人身份干过这样的好事。你为什么不愿回答？

CALLICLES: You are contentious, Socrates.

卡利克勒：你太喜好争论了，苏格拉底。

SOCRATES: Nay, I ask you, not from a love of contention, but because I really want to know in what way you think that affairs should be administered among us—whether, when you come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m, you have any other aim bu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itizens? Have we not already admitted many times over that such is the duty of a public man? Nay, we have surely said so; for if you will not answer for yourself I must answer for you. But if this is what the good man ought to effect for the benefit of his own state, allow me to recall to you the names of those whom you were just now mentioning, Pericles, and Cimon, and Miltiades, and Themistocles, and ask whether you still think that they were good citizens.

苏格拉底：不，我不是因为喜好争论而问你，而是因为我的确想知道，你认为应以何种方式在我们之间执行事务——在你执行的时候，除了带着使公民变得更好这个目的之外，你是否还有其他目的？我们难道没有多次达成共识这正是一个公众人物的职责吗？不，我们确实这样说过；因为如果你不愿意自己来回答的话，我就要替你回答

了。但是倘若这就是一个想为自己城邦谋利益的好人应当实现的目的，允许我再次跟你提及刚才说过的那些人名，伯里克利、西门、米尔蒂亚季斯、塞米斯托克利斯，并问你是否依然认为他们是好公民。

CALLICLES: I do.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But if they were good, then clearly each of them must have made the citizens better instead of worse?

苏格拉底：但是如果他们是好公民的话，那么很显然，他们每个人都一定使公民们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了？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

SOCRATES:And, therefore, when Pericles first began to speak in the assembly, the Athenians were not so good as when he spoke last?

苏格拉底：那么，因此，当伯里克利首次在集会发言的时候，公民们没有在他最后一次发言时那么好？

CALLICLES: Very likely.

卡利克勒：很有可能。

SOCRATES:Nay, my friend, 'likely' is not the word; for if he was a good citizen, the inference is certain.

苏格拉底：不，我的朋友，“可能”这个词用得不对。因为如果他是个好公民的话，这个推断就是确定的。

CALLICLES: And what difference does that make?

卡利克勒：这有什么区别吗？

SOCRATES: None; only I should like further to know whether the Athenians are supposed to have been made better by Pericles, or, on the contrary, to have been corrupted by him; for I hear that he was the first who gave the people pay, and made them idle and cowardly, and encouraged them in the love of talk and money.

苏格拉底：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是，我想进一步知道伯里克利理应使雅典人民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因为我听说他是第一个给人民薪酬、使他们变得懒惰懦弱、并鼓励他们热衷演讲和金钱的人。

CALLICLES: You heard that, Socrates, from the laconising set who bruise their ears.

卡利克勒：苏格拉底，这一定是你从耳朵有毛病、善于以偏概全之徒那里听来的。

SOCRATES: But what I am going to tell you now is not mere hearsay, but well known both to you and me: that at first, Pericles was glorious and his character unimpeached by any verdict of the Athenians—this was during the time when they were not so good—yet afterwards, when they had been made good and gentle by him, at the very end of his life they convicted him of theft, and almost put him to death, clearly under the notion that he was a malefactor.

苏格拉底：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并不只是谣言，而是你我都熟知的：首先，依照雅典人的任何裁决标准，伯里克利都是伟大的，他的品性都是无可指责的——这一切都是在公民们不够好的时期——然而后来，伯里克利将他们变得良善和温和，他们却认定他就是个坏人，在他生命将终之时判定他有盗窃罪，并且几乎将他处死。

CALLICLES: Well, but how does that prove Pericles' badness?

卡利克勒：那么，这又怎么证明伯利克里是坏人呢？

SOCRATES: Why, surely you would say that he was a bad manager of asses or horses or oxen, who had received them

originally neither kicking nor butting nor biting him, and implanted in them all these savage tricks? Would he not be a bad manager of any animals who received them gentle, and made them fiercer than they were when he received them? What do you say?

苏格拉底：好吧，你肯定会说他不擅长管理驴、马或牛，当初接管这些牲畜的时候，它们并不踢人也不撞人咬人，只是在后来他才向它们灌输了这些粗鲁的花招？把在接管时还很温顺的动物变得比刚接管时凶狠，这样的动物管理员难道不是很糟糕吗？你的意思如何？

CALLICLES: I will do you the favour of saying 'yes.'

卡利克勒：我愿意帮你这个忙：“是的。”

SOCRATES: And will you also do me the favour of saying whether man is an animal?

苏格拉底：那么你愿意再帮我一个忙，告诉我人是否也是动物吗？

CALLICLES: Certainly he is.

卡利克勒：当然是。

SOCRATES: And was not Pericles a shepherd of men?

苏格拉底：那么伯利克里不正是民众的牧羊人吗？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And if he was a good political shepherd, ought not the animals who were his subjects, as we were just now acknowledging, to have become more just, and not more unjust?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他是一个好的政治领头人，那些作为他的臣民的动物们——正如我们刚才承认的那样——不是应该变得更加正义而不是非正义吗？

CALLICLES: Quite true.

卡利克勒：完全正确。

SOCRATES: And are not just men gentle, as Homer says?—or are you of another mind?

苏格拉底：那么，正如荷马所说，正义的人不也是温和的吗？——或者你有其他看法？

CALLICLES: I agree.

卡利克勒：我同意。

SOCRATES:And yet he really did make them more savage than he received them, and their savageness was shown towards himself; which he must have been very far from desiring.

苏格拉底：但是他的确使他们比刚接管时更为残暴，而且他们也以这种残暴的方式对待他本人，这肯定与他所想要的大相径庭。

CALLICLES: Do you want me to agree with you?

卡利克勒：你想要我同意你的说法吗？

SOCRATES: Yes, if I seem to you to speak the truth.

苏格拉底：是的，如果你觉得我所言是事实的话。

CALLICLES: Granted then.

卡利克勒：算是同意吧。

SOCRATES: And if they were more savage, must they not have been more unjust and inferior?

苏格拉底：如果他们更为残暴，他们不也必定是更加不公正和低劣吗？

CALLICLES: Granted again.

卡利克勒：也同意。

SOCRATES: Then upon this view, Pericles was not a good statesman?

苏格拉底：那么按照这个观点，伯利克里并不是个好的政治家？

CALLICLES: That is, upon your view.

卡利克勒：对，要照你的观点来说。

SOCRATES: Nay, the view is yours, after what you have

admitted. Take the case of Cimon again. Did not the very persons whom he was serving ostracize him,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not hear his voice for ten years? And they did just the same to Themistocles, adding the penalty of exile; and they voted that Miltiades, the hero of Marathon, should be thrown into the pit of death, and he was only saved by the Prytanis. And yet, if they had been really good men, as you say, these things w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to them. For the good charioteers are not those who at first keep their place, and then, when they have broken-in their horses, and themselves become better charioteers, are thrown out—that is not the way either in charioteering or in any profession.—What do you think?

苏格拉底：不，在你承认之后，这个观点就是你的。再来看看西门的例子。不正是那些他一直为之效劳的人将他驱逐出境，从而得以十年不必听到他的声音吗？他们也对塞米斯托克利斯做了同样的事情，并对其处以流放的刑罚；并公议决定马拉松的英雄米尔蒂亚季斯应当被处死，只是普律塔尼斯救了他。可是，如果他们确实如你所言最初就是好人的话，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因为那些刚开始坐稳位子、后来在驯服马匹后变成更加娴熟的御车夫却被甩下马——这并不是好的御车夫，无论驾车还是其他职业都不应该是这样的。——你怎么认为？

CALLICLES: I should think not.

卡利克勒：我认为不该这样。

SOCRATES: Well, but if so, the truth is as I have said already,

that in the Athenian State no one has ever shown himself to be a good statesman—you admitted that this was true of our present statesmen, but not true of former ones, and you preferred them to the others; yet they have turned out to be no better than our present ones; and therefore, if they were rhetoricians, they did not use the true art of rhetoric or of flattery, or they would not have fallen out of favour.

苏格拉底：那么，既然如此，真理就是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在雅典城邦，还没有人能够证明自己就是个好的政治家——你承认就我们同时代的政治家来说是这样没错，却不认为以前的政治家也是这样，比起其他的政治家你更偏爱他们可是结果证明他们并不比现在的这些人好得了多少；因此，倘若他们是修辞学家的话，他们并没有真正使用修辞或谄媚的技艺，否则他们不可能会失去众人爱戴的。

CALLICLES: But surely, Socrates, no living man ever came near any one of them in his performances.

卡利克勒：可是无疑，苏格拉底，没有哪个在世的人，其行为可与他们几个相比。

SOCRATES: Oh, my dear friend, I say nothing against them regarded as the serving-men of the State; and I do think that they were certainly more serviceable than those who are living now, and better able to gratify the wishes of the State; but as to transforming those desires and not allowing them to have their way, and using the powers which they had, whether of persuasion or of force,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fellow citizens, which is the prime object

of the truly good citizen, I do not see that in these respects they were a whit superior to our present statesmen, although I do admit that they were more clever at providing ships and walls and docks, and all that. You and I have a ridiculous way, for during the whole time that we are arguing, we are always going round and round to the same point, and constantly misunderstanding one another. If I am not mistaken, you have admitted and acknowledged more than once,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operations which have to do with the body, and two which have to do with the soul: one of the two is ministerial, and if our bodies are hungry provides food for them, and if they are thirsty gives them drink, or if they are cold supplies them with garments, blankets, shoes, and all that they crave. I use the same images as before intentionally, in order that you may understand me the better. The purveyor of the articles may provide them either wholesale or retail, or he may be the maker of any of them,—the baker, or the cook, or the weaver, or the shoemaker, or the currier; and in so doing, being such as he is, he is naturally supposed by himself and every one to minister to the body. For none of them know that there is another art—an art of gymnastic and medicine which is the true minister of the body, and ought to be the mistress of all the rest, and to use their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knowledge which she has and they have not, of the real good or bad effects of meats and drinks on the body. All other arts which have to do with the body are servile and menial and illiberal; and gymnastic and medicine are, as they ought to be, their mistresses. Now, when I say that all this is equally true of the soul, you seem at first to know and understand and assent to my words, and then a little while afterwards you come repeating, Has not the State had good and noble citizens? and when I ask you who they are, you reply, seemingly quite in earnest, as if I had asked, Who are or have been good trainers?—and you had replied, Thearion, the baker, Mithoecus, who wrote the Sicilian cookery-book, Sarambus, the

vintner: these are ministers of the body, first-rate in their art; for the first makes admirable loaves, the second excellent dishes, and the third capital wine;—to me these appear to be the exact parallel of the statesmen whom you mention. Now you would not be altogether pleased if I said to you, My friend, you know nothing of gymnastics; those of whom you are speaking to me are only the ministers and purveyors of luxury, who have no good or noble notions of their art, and may very likely be filling and fattening men's bodies and gaining their approval, although the result is that they lose their original flesh in the long run, and become thinner than they were before; and yet they, in their simplicity, will not attribute their diseases and loss of flesh to their entertainers; but when in after years the unhealthy surfeit brings the attendant penalty of disease, he who happens to be near them at the time, and offers them advice, is accused and blamed by them, and if they could they would do him some harm; while they proceed to eulogize the men who have been the real authors of the mischief. And that, Callicles, is just what you are now doing. You praise the men who feasted the citizens and satisfied their desires, and people say that they have made the city great, not seeing that the swollen and ulcerated condition of the State is to be attributed to these elder statesmen; for they have filled the city full of harbours and docks and walls and revenues and all that, and have left no room for justice and temperance. And when the crisis of the disorder comes, the people will blame the advisers of the hour, and applaud Themistocles and Cimon and Pericles, who are the real authors of their calamities; and if you are not careful they may assail you and my friend Alcibiades, when they are losing not only their new acquisitions, but also their original possessions; not that you are the authors of these misfortunes of theirs, although you may perhaps be accessories to them. A great piece of work is always being made, as I see and am told, now as of old; about our statesmen. When the

State treats any of them as malefactors, I observe that there is a great uproar and indignation at the supposed wrong which is done to them; 'after all their many services to the State, that they should unjustly perish,' —so the tale runs. But the cry is all a lie; for no statesman ever could be unjustly put to death by the city of which he is the head. The case of the professed statesman is, I believe, very much like that of the professed sophist; for the sophists, although they are wise men, are nevertheless guilty of a strange piece of folly; professing to be teachers of virtue, they will often accuse their disciples of wronging them, and defrauding them of their pay, and showing no gratitude for their services. Yet what can be more absurd than that men who have become just and good, and whose injustice has been taken away from them, and who have had justice implanted in them by their teachers, should act unjustly by reason of the injustice which is not in them? Can anything be more irrational, my friends, than this? You, Callicles, compel me to be a mob-orator, because you will not answer.

苏格拉底：哦，我亲爱的朋友，我可没说任何反对他们作为城邦公务人员的话；并且我确实认为比起在世的这些人来说他们更好地服务于民，并且能更好地满足城邦的需求；但在转变那些欲望以防止它们各行其是、运用拥有的权力，不论劝导还是强制的权力来改善公民方面，我没有发现他们比我们现在的政治家有哪怕一点儿的进步，尽管我的确认为他们更擅长提供船只、墙体、码头一类的东西。而改善公民才是真正良善公民应追求的最主要目标。我们两个讨论的方式很滑稽，因为讨论期间，我们一直在围绕着同一个观点兜圈子，并且不断地误解彼此的意思。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也不止一次承认，身体和灵魂各有两种与其相关的对待方式：一种是服侍性的，如果我们的身体饥饿就供以食物，如果口渴就供以饮料，如果寒冷即供以衣服、毛毯、鞋子以及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我特意使用以前使用过的这些意象，以便你能更好地理解我的意思。商品的供应商可以给他们提供批

发或零售，或者他本人就可以成为任何产品的制造者，——比如说面包师、厨师、纺织工、鞋匠，或者制革工人；如此，在自己和他人看来，他这样的人地很自然被看做是在服侍身体。因为他们都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类技艺——体操和医术，这类技艺是身体的真正看护者，而且应该成为其他一切技艺的女主人，并参照只有自己拥有的就饮食对身体的真实好处和坏处的知识，对其他技艺产生的结果加以利用。所有其他与身体相关的技艺都是卑微、下贱和狭隘的；而体操和医学诚如它们理应的那样，是所有其他技艺的女主人。现在，当我说这一切同样符合于灵魂，你起先似乎知道、懂得并同意我的话，然而过了一会儿之后，你又重说道，难道这个城邦就没有良善和高尚的公民吗？当我问你他们是谁时，你貌似非常诚挚地回答我，就好像我问你的问题是：谁现在是或者曾经是我们优秀的教练员？——接着你可能会回答到，面包师赛亚里翁，著有西西里岛烹饪全书的米塞库斯，酿造葡萄酒的萨拉姆布斯：这些人都是身体的服侍者，都拥有其专司领域的一流技艺；因为赛亚里翁能够烤制极好的面包，米塞库斯能够做出可口的美食，萨拉姆布斯能造出上乘的佳酿——而在我看来这些人与你提及的政治家不分上下。现在你可能会非常不高兴，假设我对你说，我的朋友，你对体操一无所知；你对我提及的那些人仅仅是享受品的施与者与供应商，他们对自己的技艺也没有良善和高尚的看法，很可能不断地装满和催肥人们的身体使人们变得肥胖，尽管长期如此会使人们失掉最初的体重，变得比之前瘦弱；然而，单纯的他们并不会将他们的疾病和消瘦归罪于他们的款待者；但是在若干年后，这种不健康的暴饮暴食会使侍者遭受照料病人的惩罚，而恰巧在病者身边常给病者出谋划策的人会受到指责和控告，倘若病者还有能力的话会给这些人造成伤害；而与此同时，他们继续称颂着这不幸的真正的始作俑者。而这，卡利克勒，正是你正在做的。你赞美那些款待公民并满足他们欲望的人，人们说是他们使城邦变得更伟大，却没有看到这个城邦肿胀溃烂的现状得归咎于那些政界元老；因为是他们把整个城市用海港、码头、墙体、税收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给正义与节制没有留下任何空间。当混乱无序的危机降临时，人们会怪罪于时下的指导者，却来赞美塞米斯托克利斯、西门和伯利克里——这些灾难的真正制造者；如果你不够小心的话，一旦他们在不

断失去新的所获之物、同时还不断丢失他们原本的财产时，他们可能会攻击你以及我的朋友阿尔西比亚德斯；不是说你就是他们不幸的制造者，而是说你可能是这些人的帮手。而正如我耳闻目睹的那样，有关我们政治家的伟大作品总是层出不穷，如今同过去一样；当城邦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当做作恶者处理时，我观察到，民众对那些被认为行使他们身上的错事非常愤慨，喧嚣不已；“虽然他们对城邦有很多的贡献，即使这样做有失公正，也应该将他们处死。”——故事就是这样流传的。但是这样的呼声完全是个谎言；因为还没有政治家能够被他所领导的城市不公正地处死。我认为，这种自称是政治家的例子和自称是诡辩家的例子非常相似；因为诡辩家，尽管也是智者，从某种特殊的意义上来说也有愚笨之过；他们会经常指责他们的门徒诽谤他们、欺诈他们应得的工资、对他们给予的教导没有表示出感激之情。但是那些已成为正直良善的人，在他们中非正义已被移除，正义已由他们的老师植入其内，这种人竟然能够通过非正义之由而行非正义之事，还有比这更荒诞的事情吗？能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更荒谬吗，我的朋友？卡利克勒，是你强迫我成为一个强词夺理的演讲家，因为你不愿意回答。

CALLICLES: And you are the man who cannot speak unless there is someone to answer?

卡利克勒：你是那种没人回答就不能讲话的人吗？

SOCRATES: I suppose that I can; just now, at any rate, the speeches which I am making are long enough because you refuse to answer me. But I adjure you by the god of friendship, my good sir, do tell me whether there does not appear to you to be a great inconsistency in saying that you have made a man good, and then blaming him for being bad?

苏格拉底：我想我能；无论如何，我刚才做的演讲已相当长了，因为你拒绝回答我。但是，我指着友谊之神请求你，我的好先生，请务必告诉我，你声称你已使一个人变好，而又指责他作恶，这两者是否有极大的不一致？

CALLICLES: Yes, it appears so to me.

卡利克勒：是的，我这样认为。

SOCRATES: Do you never hear our professors of education speaking in this inconsistentmanner?

苏格拉底：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从事教育的教师用这种前后矛盾的方式说话吧？

CALLICLES: Yes, but why talk of men who are good for nothing?

卡利克勒：是的，但是为什么要谈论这些一无是处的人呢？

SOCRATES: I would rather say, why talk of men who profess to be rulers, and declare that they are devo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ity, and nevertheless upon occasion declaim against the utter vileness of the city—do you think that there is any difference

between one and the other? My good friend, the sophist and the rhetorician, as I was saying to Polus, are the same, or nearly the same; but you ignorantly fancy that rhetoric is a perfect thing, sophistry a thing to be despised; whereas the truth is, that sophistry is as much superior to rhetoric as legislation is to the practice of law, or gymnastic to medicine. The orators and sophists, as I am inclined to think, are the only class who cannot complain of the mischief ensuing to themselves from that which they teach others, without in the same breath accusing themselves of having done no good to those whom they profess to benefit. Is not this a fact?

苏格拉底：我更想问，为什么要谈论这些自诩为统治者、宣称他们致力于城市改进、却时不时激烈斥责城市堕落到极致的人呢——你认为这两种人有什么任何区别吗？我的好朋友啊，诡辩家和修辞学家，如我同波卢斯所说的那样，是一样的，或近乎一样；但是你却无知地以为修辞学是完美的，而诡辩术却是应当被蔑视的；然而，真相是，诡辩术之于修辞学正如立法之于执法、体操之于医学，它们具有同等地位。我倾向于这样认为，演说家和诡辩家同属于仅有的这样一类人，他们不能抱怨由自己教授他人带给自身的不幸，一旦抱怨，他们就同时在谴责自己没能给人带来利益，但他们声称使其获益。这不是事实吗？

CALLICLES: Certainly it is.

卡利克勒：当然是。

SOCRATES: If they were right in saying that they make men better, then they are the only class who can afford to leave their

remuneration to those who have been benefited by them. Whereas if a man has been benefited in any other way, if, for example, he has been taught to run by a trainer, he might possibly defraud him of his pay, if the trainer left the matter to him, and made no agreement with him that he should receive money as soon as he had given him the utmost speed; for not because of any deficiency of speed do men act unjustly, but by reason of injustice.

苏格拉底：如果他们说能使人们变得更好，那么他们那类人有能力将酬劳留给那些受惠于他们的人。然而，如果有人以其他任何方式获益，比如说，一个人从教练那里学会了跑步，他可能会欺赖教练的薪酬，如果教练把这件事完全交给他处理，并且之前也没有和他协议说一旦他能使受训者达到最快速就得收到报偿的话；因为人们不是由于没有达到最高速而行事不义，而是由于不讲道义。

CALLICLES: Very true.

卡利克勒：非常正确。

SOCRATES: And he who removes injustice can be in no danger of being treated unjustly: he alone can safely leave the honorarium to his pupils, if he be really able to make them good—am I not right?

苏格拉底：那么那个移除不义之人就没有受到非公正对待的危险了：他独自就能够将这份谢礼安全地留给他的学生们，如果他确实能使他们变好的话——我不对吗？

CALLICLES: Yes.

卡利克勒：对。

SOCRATES: Then we have found the reason why there is no dishonour in a man receiving pay who is called in to advise about building or any other art?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就找到原因了，为什么一个被邀请就建筑或其他技艺给予指导的人接受薪酬这种行为并没有什么丢人之处。

CALLICLES: Yes, we have found the reason.

卡利克勒：是的，我们找到了原因。

SOCRATES: But when the point is, how a man may become best himself, and best govern his family and state, then to say that you will give no advice gratis is held to be dishonourable?

苏格拉底：但是这样的话，问题就是：一个人怎样使自己变得最好，怎样最好地治理自己的家庭和国家，那么，有偿给人提供意见这种说法并不是可耻的？

CALLICLES: True.

卡利克勒：对。

SOCRATES: And why? Because only such benefits call forth a desire to requite them, and there is evidence that a benefit has been conferred when the benefactor receives a return; otherwise not. Is this true?

苏格拉底：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的好处才能唤起他们回报的欲望，并且很显然，当给予者得到报酬时，他才会给予好处，否则就不会。这是事实吧？

CALLICLES: It is.

卡利克勒：是的。

SOCRATES: Then to which service of the State do you invite me? determine for me. Am I to be the physician of the State who will strive and struggle to make the Athenians as good as possible; or am I to be the servant and flatterer of the State? Speak out, my good friend, freely and fairly as you did at first and ought to do again, and tell me your entire mind.

苏格拉底：那么你邀请我给城邦提供什么服务呢？请替我决定。

是要我成为城邦里的医生来努力使雅典人尽可能地保持良善呢；还是要成为城邦谄媚的行政者？请畅所欲言，我的好朋友，请像你起先那样自由公正地说话，这也是你应该继续做的，告诉我你的全部想法。

CALLICLES: I say then that you should be the servant of the State.

卡利克勒：那么我说你应该做城邦的行政者。

SOCRATES: The flatterer? Well, sir, that is a noble invitation.

苏格拉底：谄媚的行政者？哦，先生，这是极好的邀请。

CALLICLES: The Mysian, Socrates, or what you please. For if you refuse, the consequences will be—

卡利克勒：苏格拉底，选择贡物总管或者其他你乐意的职务。因为如果你拒绝的话，后果将会是——

SOCRATES: Do not repeat the old story—that he who likes will kill me and get my money; for then I shall have to repeat the old answer, that he will be a bad man and will kill the good, and that the money will be of no use to him, but that he will wrongly use that which he wrongly took, and if wrongly, basely, and if basely, hurtfully.

苏格拉底：请不要再重复老一套了——有人会杀了我并拿走我的钱财；因为那样一来，我又得重复我已经说过的答案，他将成为一个杀了好人的坏人，得到的钱财将对他毫无用处，但是他会滥用他非法获得的东西，既然是非法的，就是卑鄙的，既然是卑鄙的，就是有害的。

CALLICLES: How confident you are, Socrates, that you will never come to harm! You seem to think that you are living in another country, and can never be brought into a court of justice, as you very likely may be brought by some miserable and mean person.

卡利克勒：苏格拉底，你这么自信自己就不会遭受不幸！你似乎以为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家，永远不会出庭受讯似的，事实是你很有可能就被卑鄙邪恶的人起诉。

SOCRATES: Then I must indeed be a fool, Callicles, if I do not know that in the Athenian State any man may suffer anything. And if I am brought to trial and incur the dangers of which you speak, he will be a villain who brings me to trial—of that I am very sure, for no good man would accuse the innocent. Nor shall I be surprised if I am put to death. Shall I tell you why I anticipate this?

苏格拉底：那我确确实实就是个蠢人了，卡利克勒，如果我不懂得在雅典城邦，任何人都可能遭受任何不幸的话。如果我被审判并招致你所说的那些危险，将我指控的那个人一定是个恶棍——对此我非常确信，因为没有好人会起诉无辜的人。如果我被处死我也不会觉得

奇怪。要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这么预料吗？

CALLICLES: By all means.

卡利克勒：一定要。

SOCRATES: I think that I am the only or almost the only Athenian living who practises the true art of politics; I am the only politician of my time. Now, seeing that when I speak my words are not uttered with any view of gaining favour, and that I look to what is best and not to what is most pleasant, having no mind to use those arts and graces which you recommend, I shall have nothing to say in the justice court. And you might argue with me, as I was arguing with Polus—I shall be tried just as a physician would be tried in a court of little boys at the indictment of the cook. What Would he repl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if some one were to accuse him, saying, 'O my boys, many evil things has this man done to you: he is the death of you, especially of the younger ones among you, cutting and burning and starving and suffocating you, until you know not what to do; he gives you the bitterest potions, and compels you to hunger and thirst. How unlike the variety of meats and sweets on which I feasted you!' What do you suppose that the physician would be able to reply when he found himself in such a predicament? If he told the truth he could only say, 'All these evil things, my boys, I did for your health,' and then would there not just be a clamour among a jury like that? How they would cry out!

苏格拉底：我想我是在世的雅典人中，唯一或几乎唯一一个真正

行使政治艺术的人；我是这个时代唯一的政治家。现在，鉴于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为了获得好感，并且我追求最有利而不是最愉悦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利用你推荐的那些技艺和好处，在法庭上我将没有什么可说的。你或许会和我争论，就像我和波卢斯争论那样——我会像一个被厨师控告的医生那样，被由孩子们组成的评审团评判。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会怎么回答呢，如果有人指控他说："哦，我的孩子们，这个人对你们做了多少邪恶的事情啊：他将你们，尤其是你们中较小的孩子置于死地，他切割、灼痛你们，使你们挨饿、窒息，直到你们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他给你们最苦的药物，并迫使你们感到饥渴难耐。就更不要奢望会像我以前那样会用各式各样的肉类和甜食来款待你们了！"你认为医生在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困境时会做出什么回答呢？如果他说实话他只能说："所有这些邪恶的事情，我的孩子们，我都是为了你们的健康才做的，"接着那样的评审团里不就会喧闹一片吗？他们会吵得多厉害啊！

CALLICLES: I dare say.

卡利克勒：我敢这么说。

SOCRATES: Would he not be utterly at a loss for a reply?

苏格拉底：他会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回答吗？

CALLICLES: He certainly would.

卡利克勒：他肯定会。

SOCRATES: And I too shall be treated in the same way, as I well know, if I am brought before the court. For I shall not be able to rehearse to the people the pleasures which I have procured for them, and which, although I am not disposed to envy either the procurers or enjoyers of them, are deemed by them to be benefits and advantages. And if any one says that I corrupt young men, and perplex their minds, or that I speak evil of old men, and use bitter words towards them, whether in private or public, it is useless for me to reply, as I truly might—'All this I do for the sake of justice, and with a view to your interest, my judges, and to nothing else.' And therefore there is no saying what may happen to me.

苏格拉底：我对此非常清楚，假如我被带到法庭上的话，我也会被以同样的方式审判。因为我不能对他们说我为他们带来了哪些愉悦，尽管我既不嫉妒这种愉悦的提供者也不嫉妒这种愉悦的享受者，但这种愉悦却被他们看作是利益和好处。如果有任何人说我败坏年轻人、迷惑他们的心灵，或者说我诽谤年长者、对他们言辞尖刻，不管是私下里还是公开，我的回答将毫无用处，我确实可能会回答——“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正义，都是为了实现你们的利益啊，我的法官们，不是为了其他任何目的。”因此很难预料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

CALLICLES: And do you think, Socrates, that a man who is thus defenceless is in a good position?

卡利克勒：苏格拉底，你认为如此没有辩护能力的人算是处于有利形势吗？

SOCRATES: Yes, Callicles, if he have that defence, which as you have often acknowledged he should have—if he be his own defence, and have never said or done anything wrong, either in respect of gods or men; and this has been repeatedly acknowledged by us to be the best sort of defence. And if anyone could convict me of inability to defend myself or others after this sort, I should blush for shame, whether I was convicted before many, or before a few, or by myself alone; and if I died from want of ability to do so, that would indeed grieve me. But if I died because I have no powers of flattery or rhetoric, I am very sure that you would not find me repining at death. For no man who is not an utter fool and coward is afraid of death itself, but he is afraid of doing wrong. For to go to the world below having one's soul full of injustice is the last and worst of all evils. And in proof of what I say, if you have no objection, I should like to tell you a story.

苏格拉底：是的，卡利克勒，假设他拥有那个你通常认为他理应拥有的辩护人——假设他本人为自己做辩护人，而且他的言行（无论涉及神还是人类）都从来没有出过差错；这已经被我们反复确认为最好的辩护。假设有任何人宣称我不能以这种方式为自己或他人辩护，无论是当着很多人还是几个人或者仅我一人的面，我都会羞愧得面红耳赤；并且如果我由于缺乏这种能力而死去，这的确会让我痛苦。但是假设我因为没有谄媚或修辞的能力而死去，我十分确定你们不会看到我在临死前有任何悔恨。因为没有人，会惧怕死亡本身，只要他不是个十足的蠢人和懦夫，他惧怕的是作恶。因为带着一个充满非正义的灵魂去往下面那个世界是世上最邪恶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异议的话，我愿意给你讲个故事来证明我所说的。

CALLICLES: Very well, proceed; and then we shall have done.

卡利克勒：很好，继续；那么我们就能够结束了。

SOCRATES: Listen, then, as story-tellers say, to a very pretty tale, which I dare say that you may be disposed to regard as a fable only, but which, as I believe, is a true tale, for I mean to speak the truth. Homer tells us, how Zeus and Poseidon and Pluto divided the empire which they inherited from their father. Now in the days of Cronos there existed a law respecting the destiny of man, which has always been, and still continues to be in Heaven,—that he who has lived all his life in justice and holiness shall go, when he is dead, to the Islands of the Blessed, and dwell there in perfect happiness out of the reach of evil; but that he who has lived unjustly and impiously shall go to the house of vengeance and punishment, which is called Tartarus. And in the time of Cronos, and even quite lately in the reign of Zeus, the judgment was given on the very day on which the men were to die; the judges were alive, and the men were alive; and the consequence was that the judgments were not well given. Then Pluto and the authorities from the Islands of the Blessed came to Zeus, and said that the souls found their way to the wrong places. Zeus said: 'I shall put a stop to this; the judgments are not well given, because the persons who are judged have their clothes on, for they are alive; and there are many who, having evil souls, are apparelled in fair bodies, or encased in wealth or rank, and, when the day of judgment arrives, numerous witnesses come forward and testify on their behalf that they have lived righteously. The judges are awed by them, and they themselves too have their clothes on when judging; their eyes and ears and their whole bodies are interposed as a well before their own souls. All this is a hindrance to them; there are the clothes of the judges and the clothes of the judged,—what is to be done? I will tell you—In the first place, I will deprive men of the foreknowledge of death, which

they possess at present: this power which they have Prometheus has already received my orders to take from them: in the second place, they shall be entirely stripped before they are judged, for they shall be judged when they are dead; and the judge too shall be naked, that is to say, dead—he with his naked soul shall pierce into the other naked souls; and they shall die suddenly and be deprived of all their kindred, and leave their brave attire strewn upon the earth—conducted in this manner, the judgment will be just. I knew all about the matter before any of you, and therefore I have made my sons judges; two from Asia, Minos and Rhadamanthus, and one from Europe, Aeacus. And these, when they are dead, shall give judgment in the meadow at the parting of the ways, whence the two roads lead, one to the Islands of the Blessed, and the other to Tartarus. Rhadamanthus shall judge those who come from Asia, and Aeacus those who come from Europe. And to Minos I shall give the primacy, and he shall hold a court of appeal, in case either of the two others are in any doubt—then the judgment respecting the last journey of men will be as just as possible.'

苏格拉底：那么，像讲故事的人常说的那样，且来听一个美丽的故事，我敢说你很可能会仅仅将此看做一个寓言，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我想说明真相。荷马告诉我们，宙斯、波塞冬和普路托怎样将继承自他们父亲的帝国瓜分。接着在克洛诺斯的时代，产生了一项与人类命运相关的法律，这项法律一直存在而且如今仍然存在于天堂，——那就是在正义和圣洁中度过一生的人将在死后前往极乐岛，并居住在那个远离邪恶、充满幸福的地方；而在不义与邪恶中生活的人将去往充满复仇与惩罚、被称之为塔耳塔洛斯的地方。在克洛诺斯统治甚至更晚到宙斯统治天庭的时期，审判都是在人们即将死去的当日决定的；审判官和被审判者都仍然活着；所以导致审判结果的偏颇。布鲁托和极乐岛的统治者来到宙斯那里说，灵魂们找错了地方。宙斯说：“我要结束这一切；审判执行的不好，因为接

受审判者还穿着衣服，他们还活着；有很多人，他们灵魂邪恶，却被装饰以美丽的身体、包裹以财富和头衔，当审判之日到来时，无数的见证人走上前来为自己证明说他们曾经正直地生活。他们使这些审判时同样身着服饰的审判官感觉敬畏；他们的眼睛、耳朵和他们的整个身体都成为他们显现自身灵魂的源泉。这整个对他们来说是个阻碍；审判者和接受审判者还都穿着衣服呢，——怎么办？我来告诉你——首先，我会剥夺人们对死期的知情权，目前人们还拥有这项权利：但是普罗米修斯已经接到我的命令，将从他们那里剥夺这项权利：其次，在审判时他们将一丝不挂，因为审判时他们已经死去；并且审判者也必须赤身裸体，也就是说，也必须是死者——他用自己赤裸的灵魂来洞察其他赤裸的灵魂；他们将突然死去并被剥夺所有亲属关系，他们华丽的服饰将散落在地——用这种方式来执行审判，结果将会是公正的。我先于你们任何一位知道此事，所以我已经安排我的儿子们来担当审判官，两个来自亚洲，弥诺斯和拉达曼提斯；一个来自欧洲，埃阿科斯。死后，他们几个将在生死相隔的岔路口的草地上进行审判，那里一条路通向极乐岛，另一条通向塔耳塔洛斯。拉达曼提斯将审判那些来自亚洲的人，埃阿科斯审判那些来自欧洲的人。我将特权授予弥诺斯，他将主持法院，受理上诉，以免另外两个中的任何一个有任何不确定的地方——这样一来，与人类最后一段行程相关的审判将会最大程度地主持公正。”

From this tale, Callicles, which I have heard and believe, I draw the following inferences—Death, if I am right, i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eparation from one another of two things, soul and body; nothing else. And after they are separated they retain their several natures, as in life; the body keeps the same habit, and the results of treatment or accident are distinctly visible in it: for example, he who by nature or training or both, was a tall man while he was alive, will remain as he was, after he is dead; and the fat man will remain fat; and so on; and the dead man, who in life had a fancy to have flowing hair, will have flowing hair. And if he was marked

with the whip and had the prints of the scourge, or of wounds in him when he was alive, you might see the same in the dead body; and if his limbs were broken or misshapen when he was alive, the same appearance would be visible in the dead. And in a word, whatever was the habit of the body during life would be distinguishable after death, either perfectly, or in a great measure and for a certain time. And I should imagine that this is equally true of the soul, Callicles; when a man is stripped of the body, all the natural or acquired affections of the soul are laid open to view.—And when they come to the judge, as those from Asia come to Rhadamanthus, he places them near him and inspects them quite impartially, not knowing whose the soul is: perhaps he may lay hands on the soul of the great king, or of some other king or potentate, who has no soundness in him, but his soul is marked with the whip, and is full of the prints and scars of perjuries and crimes with which each action has stained him, and he is all crooked with falsehood and imposture, and has no straightness, because he has lived without truth. Him Rhadamanthus beholds, full of all deformity and disproportion, which is caused by licence and luxury and insolence and incontinence, and despatches him ignominiously to his prison, and there he undergoes the punishment which he deserves.

卡利克勒，从我听说并相信的这个故事里，我做出以下推断——死亡，如果我说得没错的话，首先是灵魂与肉体彼此的分离；此外无他。在它们分开以后，他们各自保持一些特征，就跟活着时一样；身体保持同样的习惯，生前治疗或事故的后遗症依然清晰可见：比如说，一个高个子，无论生来如此，还是通过训练成为这样，或者两种原因兼而有之，在死后依然会保持这个特征，胖人死后依然会是个胖子；诸如此类；生前喜欢留长发的人死后也会拥有长发。如果他生前身上有抽打、鞭笞或伤口的痕迹，你在他的尸体上也会看见同样的印

记；如果他的四肢在生前被折断或畸形，他死去后也会是这个样子。总而言之，无论身体在生前有什么习性，死后都可以辨认，有的可以完全辨认、有的在一段时间内很大程度上可以辨认。我猜想这同样适用于灵魂，卡利克勒；当一个人身体被从灵魂上分离，灵魂所有先天的或者后天获得的特征都一览无余了。——当他们来到审判者面前时，就像那些来到拉达曼提斯面前的亚洲人一样，审判者就将他们置于近旁进行公正无私的审查，但他并不知道灵魂是谁的：被审查的灵魂有可能属于那伟大的国王、其他某位国王或当权者，他本身无一完好，但他的灵魂有鞭痕，布满了虚伪与罪行的印记和伤口，他的每一行为都会留下这样的痕迹；谎言和欺诈将他完全扭曲，他没有正直可言，因为他生活得不诚实。拉达曼提斯看着这个由放纵、奢侈、粗野和无节制导致极度扭曲变形的灵魂，很不齿地将他发配到牢狱中去，在那儿他会受到他应得的惩罚。

Now the proper office of punishment is twofold: he who is rightly punished ought either to become better and profit by it, or he ought to be made an example to his fellows, that they may see what he suffers, and fear and become better. Those who are improved when they are punished by gods and men, are those whose sins are curable; and they are improved, as in this world so also in another, by pain and suffering; for there is no other way in which they can be delivered from their evil. But they who have been guilty of the worst crimes, and are incurable by reason of their crimes, are made examples; for, as they are incurable, the time has passed at which they can receive any benefit. They get no good themselves, but others get good when they behold them enduring for ever the most terrible and painful and fearful sufferings as the penalty of their sins—there they are, hanging up as examples, in the prison-house of the world below, a spectacle and a warning to all unrighteous men who come thither. And among them, as I confidently affirm, will be found Archelaus, if Polus truly reports of

him, and any other tyrant who is like him. Of these fearful examples, most, as I believe, are taken from the class of tyrants and kings and potentates and public men, for they are the authors of the greatest and most impious crimes, because they have the power. And Homer witnesses to the truth of this; for they are always kings and potentates whom he has described as suffering everlasting punishment in the world below: such were Tantalus and Sisyphus and Tityus. But no one ever described Thersites, or any private person who was a villain, as suffering everlasting punishment, or as incurable. For to commit the worst crimes, as I am inclined to think, was not in his power, and he was happier than those who had the power. No, Callicles, the very bad men come from the class of those who have power. And yet in that very class there may arise good men, and worthy of all admiration they are, for where there is great power to do wrong, to live and to die justly is a hard thing, and greatly to be praised, and few there are who attain to this. Such good and true men,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and will be again, at Athens and in other states, who have fulfilled their trust righteously; and there is one who is quite famous all over Hellas, Aristeides, the son of Lysimachus. But, in general, great men are also bad, my friend.

这样一来，实施恰当的惩罚作用有二：得到公正惩罚的人应该或变好、得益于此，或被作为同胞的警戒，他们会看到他遭受的这一切苦难，感到害怕因而变得更好。那些经诸神和人类惩罚而得到改进的人，他们的罪恶是可以矫正的；他们通过痛苦和受难得到改进，这在两个世界里都是一样的；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他们脱离罪恶。但是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由于罪行过大无法矫正，就会被作为典型以儆效尤；因为，既然他们已经不能被矫正，他们可以得到任何益处的时机就已经错过。他们自己得不到益处，但是其他人在观看他们无休止地承受这最可怕最痛苦最恐怖的苦难（他们罪恶的惩

罚）时，会得到益处——他们被吊在地下世界的牢房里当作典型示范，这种景象对所有来此地的邪恶之人正是一个警告。我极其确定，如果波卢斯关于阿基劳斯的事情所说无误的话，他肯定就在这些人之中，还有那些和他相似的任何暴君都会在其中。在这些可怕的典型中，我认为，大多数都属于暴君、国王、统治者和公共人物一类，因为他们拥有权力，是犯有最大、最不敬罪行的人。荷马证实过这种说法的真实性；那些在地下世界中永无止休承受苦难的人，通常都是国王和当权者：比如说坦塔罗斯、西绪福斯和提堤俄斯。但是却从没有人描写过瑟赛蒂兹或其他任何邪恶的个人承受永无止境的苦难，也没有人说他们无可救药。因为正如我认为的那样，他权力还不够犯下滔天大罪，因此他比那些拥有此等权力的人要幸福。不，卡利克勒，极恶的人都来自有权势的阶层。然而正是在这同一阶层，也可以出现好人，他们值得人们毫无保留的钦佩和赞扬，因为拥有极大可以作恶的权势，要正义地度过一生是件难事，也应大力赞扬，但确实做到如此的人没有几个。尽管如此，雅典和其他城邦曾有过将来也会有这样优秀和正直的人，他们公正地履行他们的职责。闻名赫拉斯的阿里斯提德，雷西马克的儿子正是这样的人。但是，总体来说，握有重权的人通常都是坏人，我的朋友。

As I was saying, Rhadamanthus, when he gets a soul of the bad kind, knows nothing about him, neither who he is, nor who his parents are; he knows only that he has got hold of a villain; and seeing this, he stamps him as curable or incurable, and sends him away to Tartarus, whither he goes and receives his proper recompense. Or, again, he looks with admiration on the soul of some just one who has lived in holiness and truth; he may have been a private man or not; and I should say, Callicles, that he is most likely to have been a philosopher who has done his own work, and not troubled himself with the doings of other in his lifetime; him Rhadamanthus sends to the Islands of the Blessed. Aeacus does the same; and they both have sceptres, and judge; but Minos alone

has a golden sceptre and is seated looking on, as Odysseus in Homer declares that he saw him: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当拉达曼提斯得到一个坏人的灵魂，他对他一无所知，既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他只知道手中这个人是个恶棍；鉴于此，他就给他标上可以矫正或无法矫正的戳记，并把他送到塔耳塔洛斯那里去接受相应的惩罚。或者，再一次，他满怀敬佩之情看着那些一生正直虔诚之人的灵魂，他可能不是公众人物也可能是；我说，卡利克勒，他一生很可能是个专司其职、心无旁骛的哲学家；拉达曼提斯会把他送到极乐岛。埃阿科斯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他们都有权杖，行使审判；但是只有弥诺斯拥有金色权杖，坐在一旁观看，正如荷马作品中奥季塞乌斯声称他看到的那样：

'Holding a sceptre of gold, and giving laws to the dead.'

“手执金色权杖，对死者实行裁决。”

Now I, Callicles, am persuaded of the truth of these things, and I consider how I shall present my soul whole and undefiled before the judge in that day. Renouncing the honours at which the world aims, I desire only to know the truth, and to live as well as I can, and, when I die, to die as well as I can. And, to the utmost of my power, I exhort all other men to do the same. And, in return for your exhortation of me, I exhort you also to take part in the great combat, which is the combat of life, and greater than every other earthly conflict. And I retort your reproach of me, and say, that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help yourself when the day of trial and judgment, of which I was speaking, comes upon you; you will go

before the judge, the son of Aegina, and, when he has got you in his grip and is carrying you off, you will gape and your head will swim round, just as mine would in the courts of this world, and very likely some one will shamefully box you on the ears, and put upon you any sort of insult.

卡利克勒，如今我已相信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并思考着怎样才能在我的审判之日为审判者呈上一个完整洁净的灵魂。摒弃世人们所孜孜追求的荣耀，我只渴望知道真理，尽我最大的努力正直地生活，当我死的时候，也能尽我最大努力问心无愧地死去。并且，我将尽我所能，来规劝所有其他人也这样做。作为你对我劝勉的回报，我劝勉你也来参与这场伟大的战役，这场比世上任何一场斗争都要伟大的生命之战。我要这样反驳你对我的斥责，当我所说的审讯和裁决之日降临在你身上时，你将无法自救；伊齐那之子啊，你会走到审判者面前，当他牢牢地抓着你，将你带走的时候，你会目瞪口呆，而且正如我在这个世上的法庭上那样，你会六神无主，并且很可能会有人无耻地打你耳光，用各种可能的方式侮辱你。

Perhaps this may appear to you to be only an old wife's tale, which you will contemn. And there might be reason in your contemning such tales, if by searching we could find out anything better or truer: but now you see that you and Polus and Gorgias, who are the three wisest of the Greeks of our day, are not able to show that we ought to live any life which does not profit in another world as well as in this. And of all that has been said, nothing remains unshaken but the saying, that to do injustice is more to be avoided than to suffer injustice, and that the reality and not the appearance of virtue is to be followed above all things, as well in public as in private life; and that when any one has been wrong in anything, he is to be chastised, and that the next best thing to a

man being just is that he should become just, and be chastised and punished; also that he should avoid all flattery of himself as well as of others, of the few or of the many: and rhetoric and any other art should be used by him, and all his actions should be done always, with a view to justice.

或许，在你看来这可能就是一个老妇的故事而已，对此你会不以为然。或许你蔑视类似的传说也是有道理的，如果查找一番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任何比这更可信更好的故事：但是现在你看到了吧，你、波卢斯、高尔吉亚，当今希腊最有智慧的三个人，却不能证明我们应该过那种既不能在今生获益也不能在另一个世界获益的生活。所有以上所言中，其他说法都不是无懈可击的，除了以下这些说法，比起遭受不公正之事，行不公正之事更当回避，无论是在公众生活中还是私人生活中，人们应追求的首要东西都是美德的实质而不是表面；当任何人有任何事做错的时候，他都当受到惩戒，逊于一个正直之人的次好者就是一个可以通过惩戒和处罚变得正直的人；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谄媚，他都应当规避：他可以运用修辞或其他技艺，他行所有事情都应当着眼于正义。

Follow me then, and I will lead you where you will be happy in life and after death, as the argument shows. And never mind if some one despises you as a fool, and insults you, if he has a mind; let him strike you, by Zeus, and do you be of good cheer, and do not mind the insulting blow, for you will never come to any harm in the practise of virtue, if you are a really good and true man. When we have practised virtue together, we will apply ourselves to politics, if that seems desirable, or we will advise about whatever else may seem good to us, for we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judge then. In our present condition we ought not to give ourselves airs, for even on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s we are always changing our

minds; so utterly stupid are we! Let us, then, take the argument as our guide, which has revealed to us that the best way of life is to practise justice and every virtue in life and death. This way let us go; and in this exhort all men to follow, not in the way to which you trust and in which you exhort me to follow you; for that way, Callicles, is nothing worth.

追随我吧，我将带领你们去一个生前和死后都会幸福的地方，正如辩论所示的那样。如果有人视你为蠢人，蔑视你，并有意侮辱你，不要放在心上；让他打你，对着宙斯起誓，请一定要喜悦，不要介意这侮辱性的殴打，因为若你真正良善和正直，你在修身养性方面并不会因此受到任何伤害。当我们修身养性都做得很好了，如果可取的话，我们可以去从政，或者我们将商议出其他任何于我们有益的事物，因为那时我们会更好地作出判断。就我们目前的状态而言，我们不应该不可一世，因为即使在最重要的话题上，我们也时常改变观念；我们是多么愚蠢啊！那么，让我们将此辩论作为我们的指南。它告诉我们生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实践正义、践行所有美德，生前和死后均要如此。让我们顺着这条道路前行；也让我们规劝世人走上这条道路，而非你们信赖并规劝我去走的道路；因为，卡利克勒，你们所说的道路毫无价值。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Symposium
会饮篇

Plato
柏拉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会饮篇

Symposium

柏拉图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Symposium 会饮篇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Symposium

会饮篇

Persons of the Dialogue: Apollodorus, who repeats to his companion the dialogue which he had heard from Aristodemus, and had already once narrated to Glaucon. Phaedrus, Pausanias, Eryximachus, Aristophanes, Agathon, Socrates, Alcibiades, A Troop of Revellers.

对话人：阿波罗多洛（对他的同伴重复他之前从阿里斯托得摩斯那里听来的对话，并且他已经同格劳孔讲述过这则对话了）、裴德罗、鲍塞尼阿斯、厄律克西马库、阿里斯托芬、阿伽通、苏格拉底、亚西比德、一群赴宴畅饮者。

Scene: The House of Agathon.

场景：阿伽通的住所

Concerning the things about which you ask to be informed I believe that I am not ill-prepared with an answer. For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I was coming from my own home at Phalerum to the city, and one of my acquaintance, who had caught a sight of me from behind, calling out playfully in the distance, said: “Apollodorus, O thou Phalerian (Probably a play of words on (Greek), 'bald-headed.') man, halt!”

就你想要了解的事情，我认为我已经准备好如何回答了。前天我正要离开我在法勒伦的住处前往城里，我的一个熟人，从后面看到我，便开玩笑地从远处大声地喊道：“阿波罗多洛，你这个秃头（英文中“O thou Phalerian”可能是希腊语关于“秃头”的文字游戏），快停下！”

So I did as I was bid; and then he said, “I was looking for you, Apollodorus, only just now, that I might ask you about the speeches in praise of love, which were delivered by Socrates, Alcibiades, and others, at Agathon's supper.”

于是我依他停了下来，他说道：“阿波罗多洛，我刚才正找你呢，想请教你关于苏格拉底、亚西比德和其他一些人在阿伽通家举行晚宴时所做的赞扬爱的讲话的内容。

“Phoenix, the son of Philip, told another person who told me of them; his narrative was very indistinct, but he said that you knew, and I wish that you would give me an account of them. Who, if not you, should be the reporter of the words of your friend? And first tell me,” he said, “were you present at this meeting?”

“菲利普的儿子菲尼克斯，将这些对话告诉了别人，这个人又转述给了我。他的叙述含混不清，但是他说你也知道，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给我描述一下。还有谁比你更适合来转述你朋友的话呢，所以首先请你告诉我，这次聚会你在场吗？”

“Your informant, Glaucon,” I said, “must have been very indistinct indeed, if you imagine that the occasion was recent; or that I could have been of the party.”

我答道：“那位向你转述的人大概说得不是很清楚，否则你就不会以为那次聚会是最近的事，并且问我是不是参加了。”

“Why, yes,” he replied, “I thought so.”

他回答说：“我原来以为那次聚会是不久前发生的。”

“Impossible:” I said. “Are you ignorant that for many years Agathon has not resided at Athens; and not three have elapsed since I became acquainted with Socrates, and have made it my daily business to know all that he says and does. There was a time when I was running about the world, fancying myself to be well employed, but I was really a most wretched being, no better than you are now. I thought that I ought to do anything rather than be a philosopher.”

“怎么可能，”我说道，“你不知道阿伽通已经好几年没住在雅典了吗，而且距离我和苏格拉底相识，每天获悉他的一言一行，都过去不止三年了。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世界各地奔波，幻想我会找到好的工作，但是和现在的你一样，我当时真的是一个很可怜的家伙。而且我当时认为，做什么都比做哲学家强。”

“Well,” he said, “jesting apart, tell me when the meeting

occurred.

“好吧，”他说，“言归正传，告诉我那次宴会是在什么时候吧。”

“In our boyhood,” I replied, “when Agathon won the prize with his first tragedy, on the day after that on which he and his chorus offered the sacrifice of victory.”

我回答说：“那时候我们都还是毛头小子，阿伽通的第一部悲剧获了奖。第二天，他和他的合唱队为庆祝获奖举办了一个祭祀的庆典。”

“Then it must have been a long while ago,” he said, “and who told you—did Socrates?”

“那么这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道，“是谁告诉你的——苏格拉底吗？”

“No indeed,” I replied, “but the same person who told Phoenix; he was a little fellow, who never wore any shoes, Aristodemus, of the deme of Cydathenaeum. He had been at Agathon's feast; and I think that in those days there was no one who was a more devoted admirer of Socrates. Moreover, I have asked Socrates about the truth of some parts of his narrative, and he confirmed them.”

“不，实际上不是苏格拉底，”我回答道，“而是告诉菲尼克斯的那个人——他是一个小家伙，从不穿鞋，名字叫阿里斯托得摩斯，是西达塞纳乌姆人。他曾经去过阿伽通的宴会。我想在那时除了他，没有人能如此热烈地崇拜苏格拉底。此外，我曾经问过苏格拉底他叙述的某些内容是否属实，苏格拉底确认属实。”

“Then,” said Glaucon, “let us have the tale over again; is not the road to Athens just made for conversation?”

“那么，”格劳孔说，“那你能不能给我说一遍？进城的路上我们正好可以谈谈？”

And so we walked, and talked of the discourses on love; and therefore, as I said at first, I am not ill-prepared to comply with your request, and will have another rehearsal of them if you like. For to speak or to hear others speak of philosophy always gives me the greatest pleasure, to say nothing of the profit. But when I hear another strain, especially that of you rich men and traders, such conversation displeases me; and I pity you who are my companions, because you think that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when in reality you are doing nothing. And I dare say that you pity me in return, whom you regard as an unhappy creature, and very probably you are right. But I certainly know of you what you only think of me—there is the difference.

于是我们一路谈着那些关于爱的讲话。因此，就像我最开始说的，我预料到了你的请求。如果你愿意听，我会把对话的内容复述一遍。因为无论是自己谈论哲学，还是听别人谈论哲学，除了能有收获

以外，我总是能感觉到莫大的欣喜。至于其他谈话，尤其是你们富人和商人之间的谈话，都会让我感到不快。我可怜你们，因为你们自以为做了点事，但其实毫无价值。我敢说你们也觉得我很可怜，认为我整天郁郁寡欢，而且关于这点，你有可能是正确的。我在你们心里的样子仅仅是你们主观臆断出来的，而你们的样子我却是切实了解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同的。

COMPANION: I see, Apollodorus, that you are just the same—always speaking evil of yourself, and of others; and I do believe that you pity all mankind, with the exception of Socrates, yourself first of all, true in this to your old name, which, however deserved, I know not how you acquired, of Apollodorus the madman; for you are always raging against yourself and everybody but Socrates.

同伴：我明白了，阿波罗多洛，你还是老样子——总是责备自己，也不放过别人。我看你是认为所有人包括你自己都十分可怜，并且只有苏格拉底不可怜。在这一点上对得起你的绰号“疯子阿波罗多洛”。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绰号的，但你当之无愧。因为你总是痛斥除了苏格拉底之外的所有人，包括你自己。

APOLLODORUS: Yes, friend, and the reason why I am said to be mad, and out of my wits, is just because I have these notions of myself and you; no other evidence is required.

阿波罗多洛：是的，朋友。难道仅仅是因为我对我和你有那样的想法，就表明我发了疯，神经错乱吗？

COMPANION: No more of that, Apollodorus; but let me renew my request that you would repeat the conversation.

同伴：阿波罗多洛，我们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争吵，你还是给我说说那次谈话是怎样进行的吧。

APOLLODORUS: Well, the tale of love was on this wise:—But perhaps I had better begin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eavour to give you the exact words of Aristodemus:

阿波罗多洛 ：好的，关于爱的谈话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是尽量用阿里斯托得摩斯的原话从头开始讲述为好。

He said that he met Socrates fresh from the bath and sandalled; and as the sight of the sandals was unusual, he asked him whither he was going that he had been converted into such a beau:—

他说他在路上遇见了苏格拉底，他刚刚沐浴完毕，还穿上了凉鞋。他平时不常看到苏格拉底穿鞋，便问苏格拉底打扮得这么漂亮是要去哪里。

“To a banquet at Agathon's,” he replied, “whose invitation to his sacrifice of victory I refused yesterday, fearing a crowd, but promising that I would come to-day instead; and so I have put on my finery, because he is such a fine man. What say you to going with me unasked?”

“去阿伽通家参加宴会，”他答道，“昨天，他邀请我参加为庆祝获奖而举行的祭祀典礼，可是我怕人太多，就没去，但我答应今天去。所以今天我穿上了我华丽的衣裳，去拜访一个那么出色的人。虽然你未被邀请，但与我一同赴宴怎么样？”

“I will do as you bid me,” I replied.

“我会按照你吩咐的那样办。”阿里斯托得摩斯答道。

“Follow then,” he said, “and let us demolish the proverb:—'To the feasts of inferior men the good unbidden go;' instead of which our proverb will run:—'To the feasts of the good the good unbidden go;' and this alteration may be supported by the authority of Homer himself, who not only demolishes but literally outrages the proverb. For, after picturing Agamemnon as the most valiant of men, he makes Menelaus, who is but a fainthearted warrior, come unbidden (*Iliad*) to the banquet of Agamemnon, who is feasting and offering sacrifices, not the better to the worse, but the worse to the better.”

“那就跟我走吧，”他说，“让我们来改改这条谚语吧。原来的说法是：‘不大好的人开宴，好人不请自来。’我们应该改成这样：‘好人开宴，好人不请自来。’这种改动可能会得到荷马这位伟人的认可，因为他不但推翻了这则谚语，而且简直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把阿伽门农写成最勇敢的人，而将墨涅拉俄斯写成一位胆小的战士。在他笔下，有一次阿伽门农设宴并举办祭祀活动，并未邀请墨涅拉俄斯，他却不请自来（出自《伊利亚特》）。这么看来，并不是好人出席了不大好的人的宴会，而是不大好的人出席了好人的宴会。”

“I rather fear, Socrates,” said Aristodemus, “lest this may still be my case; and that, like Menelaus in Homer, I shall be the inferior person, who 'To the feasts of the wise unbidden goes.' But I shall say that I was bidden of you, and then you will have to make an excuse.”

阿里斯托得摩斯说：“苏格拉底，恐怕今天也是这种情况，我做了‘智者的不速之客’，就像是荷马史诗里的墨涅拉俄斯，成了不大好的人。但是我是被你邀请来的，就轮到你找个理由解释了。”

“Two going together,” he replied, in Homeric fashion, “one or other of them may invent an excuse by the way (*Iliad*).”

苏格拉底引用《荷马史诗》答道：“两个人一道走，总有一个能在路上想出一个理由（出自《伊利亚特》）。”他们就是这样边走边谈。

This was the style of their conversation as they went along. Socrates dropped behind in a fit of abstraction, and desired Aristodemus, who was waiting, to go on before him. When he reached the house of Agathon he found the doors wide open, and a comical thing happened. A servant coming out met him, and led him at once into the banqueting-hall in which the guests were reclining, for the banquet was about to begin.

他们就这样边走边谈着。不知想起了什么，苏格拉底突然想得入

神，落在了后面，并让正在前面等待他的阿里斯托得摩斯继续往前走。当阿里斯托得摩斯到达阿伽通的寓所时，发现门大开着，而此时一件可笑的事发生了。一位仆人出来迎接他，并领他到宴会厅，此时客人们都斜靠在椅子上，因为宴会就要开始了。

“Welcome, Aristodemus,” said Agathon, as soon as he appeared—“you are just in time to sup with us; if you come on any other matter put it off, and make one of us, as I was looking for you yesterday and meant to have asked you, if I could have found you. But what have you done with Socrates?”

阿伽通一看到阿里斯托得摩斯进来，便说道：“欢迎你，阿里斯托得摩斯——你来的正是时候，加入我们的晚宴吧。如果你是由于其他原因才来，那就先和我们一起吃饭，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昨天我还在找你呢，打算如果找到你的话就邀请你呢。但你怎么没和苏格拉底一起来？”

I turned round, but Socrates was nowhere to be seen; and I had to explain that he had been with me a moment before, and that I came by his invitation to the supper.

阿里斯托得摩斯转过身，发现苏格拉底不知去向。他不得不解释说刚才还和苏格拉底在一起，并应他的邀请来参加晚宴。

“You were quite right in coming,” said Agathon; “but where is he himself? He was behind me just now, as I entered, he said, and I cannot think what has become of him.”

“你们能一起来太好了，”阿伽通说，“但是他本人在哪里？”阿里斯托得摩斯说，“刚刚我进来时，他还在我后面，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Go and look for him, boy,” said Agathon, “and bring him in; and do you, Aristodemus, meanwhile take the place by Eryximachus.”

阿伽通对着仆人说：“去找找苏格拉底，然后把他带进来。”然后转向阿里斯托得摩斯说，“而你呢，阿里斯托得摩斯，在厄律克西马库旁边坐下吧！”

The servant then assisted him to wash, and he lay down, and presently another servant came in and reported that our friend Socrates had retired into the portico of the neighbouring house.

然后仆人帮阿里斯托得摩斯洗漱，他便躺下了。一会儿另一个仆人进来了，报告说我们的朋友苏格拉底就待在隔壁的门廊处。

“There he is fixed,” said he, “and when I call to him he will not stir.”

阿里斯托得摩斯说：“就让他待在那里吧，我去叫他他也不离开。”

“How strange,” said Agathon; “then you must call him again, and keep calling him.”

“多奇怪呀！”阿伽通说，“那么你再试试，一直叫他。”

“Let him alone,” said my informant; “he has a way of stopping anywhere and losing himself without any reason. I believe that he will soon appear; do not therefore disturb him.”

“别打扰他了，”给我传信的人说，“他随时随地都能停下来陷入沉思，不需要任何理由，这是他的习惯。他应该马上就来了，因此别打扰他了。”

“Well, if you think so, I will leave him,” said Agathon. And then, turning to the servants, he added, “Let us have supper without waiting for him. Serve up whatever you please, for there is no one to give you orders; hitherto I have never left you to yourselves. But on this occasion imagine that you are our hosts, and that I and the company are your guests; treat us well, and then we shall commend you.”

“好吧，照你说的办吧，那我就不管他了。”阿伽通说。然后他又对仆人们说，“不要等他了，我们开始晚宴吧。就随你们的心意上菜吧，因为在这儿不会有人对你们发号施令，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放任你们不管过。今天这种场合，你们就设想我和我的这些客人们都是你们邀请来的。你们要好好招待我们，争取我们的赞扬。”

After this, supper was served, but still no Socrates; and during the meal Agathon several times expressed a wish to send for him, but Aristodemus objected; and at last when the feast was about half over—for the fit, as usual, was not of long duration—Socrates entered.

之后，晚宴开始了，但是依然不见苏格拉底的影子。在宴会期间阿伽通多次想要派人去找他，但是遭到了阿里斯托得摩斯的反对。最后，当晚宴已经快进行到一半时，苏格拉底进来了，因为他的这种冥想，跟往常一样，持续时间不长。

Agathon, who was reclining alone at the end of the table, begged that he would take the place next to him; that “I may touch you,” he said, “and have the benefit of that wise thought which came into your mind in the portico, and is now in your possession; for I am certain that you would not have come away until you had found what you sought.”

在末席独自斜靠着的阿伽通请求苏格拉底坐在他旁边。“这样我可以触碰到你了，”他说，“就可以沾到你在门廊处驻足时得到的智慧。显然你是找到了，并且得到了智慧，否则你是不会离开的。”

“How I wish,” said Socrates, taking his place as he was desired, “that wisdom could be infused by touch, out of the fuller into the emptier man, as water runs through wool out of a fuller cup into an emptier one; if that were so, how greatly should I value the privilege of reclining at your side! For you would have filled me full with a stream of wisdom plenteous and fair; whereas my own is of a

very mean and questionable sort, no better than a dream. But yours is bright and full of promise, and was manifested forth in all the splendour of youth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in the presence of more than thirty thousand Hellenes.”

苏格拉底如阿伽通所愿坐在他旁边，说道：“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智慧能够通过触摸从知识较为丰富的人传递给知识较为匮乏的人，就好像水能够通过毛线从较满的杯子流向较空的一样，那就好了。我多希望能够如此！如若真是这样，我又该多么珍惜能在你旁边靠着坐的这种待遇啊！如果真是如此，你肯定已经向我灌注了一大股智慧的清泉，而我自己的智慧极其匮乏，犹如一场空梦，是真是假还难说。而你的智慧明亮而充满希望，前天它以青春般的绚烂呈现出来，有超过三万的希腊人可以证明。”

“You are mocking, Socrates,” said Agathon, “and ere long you and I will have to determine who bears off the palm of wisdom—of this Dionysus shall be the judge; but at present you are better occupied with supper.”

“你在嘲笑我吧！苏格拉底，”阿伽通说，“一会儿，你我就得决定谁会赢得智慧的棕榈树——此次酒神狄俄尼索斯是裁判，但你现在最好赶快吃饭吧。”

Socrates took his place on the couch, and supped with the rest; and then libations were offered, and after a hymn had been sung to the god, and there had been the usual ceremonies, they were about to commence drinking, when Pausanias said, “And now, my friends, how can we drink with least injury to ourselves?”

苏格拉底坐在他的椅子上，和其他人共进晚餐。之后是奠酒祭神仪式，他们唱了一首赞颂神明的圣歌，之后做了一些常规仪式，接着就要开始畅饮了。这时，鲍塞尼阿斯说：“现在，我的朋友们，我们怎么才能在畅饮的时候把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

“I can assure you that I feel severely the effect of yesterday's potations, and must have time to recover; and I suspect that most of you are in the same predicament, for you were of the party yesterday. Consider then: How can the drinking be made easiest?”

“我昨天喝了酒，今天我能强烈地感受到酒精对我的影响，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真的。而且我需要缓一缓。我猜测你们大多数人应该都有同样的体会，因为你们也参加了昨天的聚会。那么让我们想一想，怎么才能使喝酒成为一件从容的事情呢？”

“I entirely agree,” said Aristophanes, “that we should, by all means, avoid hard drinking, for I was myself one of those who were yesterday drowned in drink.”

“我完全同意，”阿里斯托芬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办法避免饮酒过度，因为我昨天就喝得烂醉如泥。”

“I think that you are right,” said Eryximachus, the son of Acumenus; “but I should still like to hear one other person speak: Is Agathon able to drink hard?”

“你说得对，”阿库美努的儿子厄律克西马库说道，“但是我还想听听你们之中另外一位的想法，阿伽通，怎么样，你还能喝吗？”

“I am not equal to it,” said Agathon.

“我可不胜酒力了。”阿伽通说。

“Then,” said Eryximachus, “the weak heads like myself, Aristodemus, Phaedrus, and others who never can drink, are fortunate in finding that the stronger ones are not in a drinking mood.” (I do not include Socrates, who is able either to drink or to abstain, and will not mind, whichever we do.) “Well, as of none of the company seem disposed to drink much, I may be forgiven for saying, as a physician, that drinking deep is a bad practice, which I never follow, if I can help, and certainly do not recommend to another, least of all to any one who still feels the effects of yesterday's carouse.”

厄律克西马库说：“像我、阿里斯托得摩斯、裴德罗和其他酒量小的人平时都不喝酒，今天恰逢能喝的人失了喝酒的兴致，真是幸运。”（我没提到苏格拉底，因为他喝不喝酒都可以，也不介意我们是否喝酒。）“那么，既然没有人愿意多喝，作为一位医生，请原谅我这样说，大量喝酒是恶习，如果能自制，我决不多喝，当然也不会劝别人喝，尤其是那些现在还能感受到昨日过饮之痛的人。”

“I always do what you advise, and especially what you prescribe as a physician,” rejoined Phaedrus the Myrrhinusian, “and

the rest of the company, if they are wise, will do the same.”

“我听从你的建议，尤其是你作为医生所提的建议，”裴德罗附和道，“如果其他同伴是明智的，也会照你说的做。”

It was agreed that drinking was not to be the order of the day, but that they were all to drink only so much as they pleased.

大家都同意不以喝酒作为今天的宴会形式了，如果谁愿意喝的话则以适量为宜。

“Then,” said Eryximachus, “as you are all agreed that drinking is to be voluntary, and that there is to be no compulsion, I move, in the next place, that the flute-girl, who has just made her appearance, be told to go away and play to herself, or, if she likes, to the women who are within(compare *Prot.*). To-day let us have conversation instead; and, if you will allow me, I will tell you what sort of conversation.” This proposal having been accepted, Eryximachus proceeded as follows:—

厄律克西马库说道：“既然你们都同意饮酒要全凭自愿，那就不勉强了。接下来，我要打发刚才进来的那个吹笛子的女孩出去，让她演奏给自己听，或者，如果她愿意的话，也可以演奏给里面的女人们听（参考《普罗塔哥拉篇》）。今天让我们用谈话来代替饮酒，并且，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来说说谈些什么。”这个提议被采纳后，厄律克西马库继续说道：

“I will begin,” he said, “after the manner of Melanippe in Euripides,”

“我将效仿欧里庇得斯创作的《墨拉尼珀》中的话作为开场白。

“Not mine the word which I am about to speak, but that of Phaedrus. For often he says to me in an indignant tone:—'What a strange thing it is, Eryximachus, that, whereas other gods have poems and hymns made in their honour, the great and glorious god, Love, has no encomiast among all the poets who are so many. There are the worthy sophists too—the excellent Prodicus for example, who have descanted in prose on the virtues of Heracles and other heroes; and, what is still more extraordinary, I have met with a philosophical work in which the utility of salt has been made the theme of an eloquent discourse; and many other like things have had a like honour bestowed upon them. And only to think that there should have been an eager interest created about them, and yet that to this day no one has ever dared worthily to hymn Love's praises! So entirely has this great deity been neglected.' Now in this Phaedrus seems to me to be quite right, and therefore I want to offer him a contribution; also I think that at the present moment we who are here assembled cannot do better than honour the god Love. If you agree with me, there will be no lack of conversation; for I mean to propose that each of us in turn, going from left to right, shall make a speech in honour of Love. Let him give us the best which he can; and Phaedrus, because he is sitting first on the left hand, and because he is the father of the thought, shall begin.”

“我要说的话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引用裴德罗的。因为他时常用

愤愤不平的口吻对我说：‘这真是怪事，厄律克西马库！众神均受到诗与圣歌的赞颂，而唯有伟大、荣耀的爱神是个例外，诸多诗人中没有一个写诗歌颂扬他的。也有一些可敬的哲学家们——比如，杰出的普罗狄克斯，用散文称颂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及其他英雄人物。更特别的是，我曾偶然读到一本哲学著作，里面把盐的效用作为雄辩论述的主题，还有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事物也受到过类似的称赞。想一想，这些事物都受到过如此热切的关注，而至今却仍然没有一个人敢写诗赞颂爱神！这位伟大的神竟被忽视到这个地步。’此刻，在这一点上裴德罗的话在我看来是相当正确的，因此我想要同他一起向爱神致敬，并且我认为此时此刻聚集在一起的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礼赞爱神。如果你们赞同我的观点，那我们将进行一场尽兴的畅谈。我建议我们从左向右每人轮流做一次赞美爱神的演说。每个人都要尽其所能，应该从裴德罗开始，因为他坐在左手边的第一个位置，并且他是这次讨论的发起人。”

“No one will vote against you, Eryximachus,” said Socrates. “How can I oppose your motion, who profess to understand nothing but matters of love; nor, I presume, will Agathon and Pausanias; and there can be no doubt of Aristophanes, whose whole concern is with Dionysus and Aphrodite; nor will any one disagree of those whom I, see around me. The proposal, as I am aware, may seem rather hard upon us whose place is last; but we shall be contented if we hear some good speeches first.”

“厄律克西马库，没有人会反对你的提议。”苏格拉底说道，“我怎能反对你的提议，除了爱我对其他一无所知。我想阿伽通和鲍塞尼阿斯也不会反对。毫无疑问，阿里斯托芬亦是如此，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酒神狄俄尼索斯和爱神阿弗洛狄忒身上。我看在座的人也不会反对。我发现你的提议对于我们坐在后排的人不是很公平，但是如果我们能先听到一些精彩的演说，那也算心满意足了。”

“Let Phaedrus begin the praise of Love, and good luck to him.” All the company expressed their assent, and desired him to do as Socrates bade him.

“那就让裴德罗开始他对爱神的颂扬吧，并祝他好运。”其他在座的人都表示赞同，并希望裴德罗按照苏格拉底的建议首先开始。

Aristodemus did not recollect all that was said, nor do I recollect all that he related to me; but I will tell you what I thought most worthy of remembrance, and what the chief speakers said.

阿里斯托得摩斯无法回忆起聚会中的所有谈话，我也记不起他向我转述的所有内容，但我会告诉你们我认为最值得回忆的部分，以及主要的演说者都说了什么。

Phaedrus began by affirming that Love is a mighty god, and wonderful among gods and men, but especially wonderful in his birth. For he is the eldest of the gods, which is an honour to him; and a proof of his claim to this honour is, that of his parents there is no memorial; neither poet nor prose-writer has ever affirmed that he had any. As Hesiod says:—“First Chaos came, and then broad-bosomed Earth, The everlasting seat of all that is, And Love.” In other words, after Chaos, the Earth and Love, these two, came into being. Also Parmenides sings of Generation: “First in the train of gods, he fashioned Love.” And Acusilaus agrees with Hesiod. Thus numerous are the witnesses who acknowledge Love to be the eldest of the gods.

裴德罗在开始便谈到，爱神是伟大的神灵，并且在诸神与人类之中是不可思议的存在，但是最为神奇的还是他的出生。因为他是诸神中最古老的神，而古老就是一种荣誉。他获得这份荣耀的凭证之一就是没有关于他父母的任何记载，从来没有诗人或散文家提到他有父母。如赫西俄德说："最初产生的是混沌，随后是胸怀广阔的大地——这是承载一切的永恒的基础，然后是爱神。"换言之，混沌之后，大地和爱神，这两者相继产生。巴门尼德描写创世时说："一切神灵中爱神最先产生。"并且阿库西劳也同意赫西俄德的观点。因此，很多人都可以证明爱神是诸神之中最古老的神祇。

And not only is he the eldest, he is also the source of the greatest benefits to us. For I know not any greater blessing to a young man who is beginning life than a virtuous lover, or to the lover than a beloved youth. For the principle which ought to be the guide of men who would nobly live—that principle, I say, neither kindred, nor honour, nor wealth, nor any other motive is able to implant so well as love. Of what am I speaking? Of the sense of honour and dishonour, without which neither states nor individuals ever do any good or great work. And I say that a lover who is detected in doing any dishonourable act, or submitting through cowardice when any dishonour is done to him by another, will be more pained at being detected by his beloved than at being seen by his father, or by his companions, or by any one else. The beloved too, when he is found in any disgraceful situation, has the same feeling about his lover. And if there were only some way of contriving that a state or an army should be made up of lovers and their loves (compare *Rep.*), they would be the very best governors of their own city, abstaining from all dishonour, and emulating one another in honour; and when fighting at each other's side, although a mere handful, they would overcome the world. For what lover

would not choose rather to be seen by all mankind than by his beloved, either when abandoning his post or throwing away his arms? He would be ready to die a thousand deaths rather than endure this. Or who would desert his beloved or fail him in the hour of danger? The veriest coward would become an inspired hero, equal to the bravest, at such a time; Love would inspire him. That courage which, as Homer says, the god breathes into the souls of some heroes, Love of his own nature infuses into the lover.

此外，他不仅是最年长的，还是最能让我们受益的。因为我知道，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没有什么能比有一个忠贞的爱人更幸福的了，或者说，对于爱人而言，没有什么能比有一位心爱的少年更幸福的了。因为爱情最能够透彻地用一个原则指导人们，这个原则可以指引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血统、荣誉、财富或其他的任何动机都比不上它。这是什么原则呢？是荣辱感。没有了荣辱感，国家和个人都不会做出善事或伟业。并且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被发现正在做不光彩的事情，或者被别人羞辱时由于怯懦而屈服，那么这些事被他的爱人发现远比被他的父亲、同伴或者是其他人发现更令其痛苦。被爱的人也一样，在任何一种不光彩的境遇之中被爱人看到，都会无地自容。因此如果能想出一个方法，使一个城邦或是一个军队全由爱他们的人和他们所爱的人组成，他们将会成为自己城市的最忠诚的管理者，戒除所有耻辱，彼此竞争来赢得荣誉，并且如果他们并肩作战，即使只有少数人，也可以征服全世界。因为一个人如果擅离职守或者弃甲曳兵，不但怕全军看见，更怕被他心爱的人看见。他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被爱人看见。换句话说，谁会在危难时刻背弃或辜负自己心爱的人呢？在这样的时刻纵然是最怯懦的人也会受到爱神的鼓舞，变成一个可以与最勇敢的人相媲美的英雄。正如荷马所说，神将这种英勇之气注入这些英雄们的心灵。因为爱神将自身具有的这种勇气注入到了爱人身上。

Love will make men dare to die for their beloved—love alone; and women as well as men. Of this, Alcestis, the daughter of Pelias, is a monument to all Hellas; for she was willing to lay down her life on behalf of her husband, when no one else would, although he had a father and mother; but the tenderness of her love so far exceeded theirs, that she made them seem to be strangers in blood to their own son, and in name only related to him; and so noble did this action of hers appear to the gods, as well as to men, that among the many who have done virtuously she is one of the very few to whom, in admiration of her noble action, they have granted the privilege of returning alive to earth; such exceeding honour is paid by the gods to the devotion and virtue of love. But Orpheus, the son of Oeagrus, the harper, they sent empty away, and presented to him an apparition only of her whom he sought, but herself they would not give up, because he showed no spirit; he was only a harp-player, and did not dare like Alcestis to die for love, but was contriving how he might enter Hades alive; moreover, they afterwards caused him to suffer death at the hands of women, as the punishment of his cowardliness. Very different was the reward of the true love of Achilles towards his lover Patroclus—his lover and not his love (the notion that Patroclus was the beloved one is a foolish error into which Aeschylus has fallen, for Achilles was surely the fairer of the two, fairer also than all the other heroes; and, as Homer informs us, he was still beardless, and younger far). And greatly as the gods honour the virtue of love, still the return of love on the part of the beloved to the lover is more admired and valued and rewarded by them, for the lover is more divine; because he is inspired by God. Now Achilles was quite aware, for he had been told by his mother, that he might avoid death and return home, and live to a good old age, if he abstained from slaying Hector. Nevertheless he gave his life to revenge his friend, and dared to die, not only in his defence, but after he was dead. Wherefore the gods

honoured him even above Alcestis, and sent him to the Islands of the Blest.

爱情会使男人们敢于为他们心爱的人献出生命——这一点只有爱情可以做到，女人们亦是如此。就这一点而言，珀利阿斯的女儿阿尔刻提斯是全希腊的典范。因为她愿意为她的丈夫献出自己的生命，而其他人却做不到，虽然她的丈夫也有父母，但是目前，她对她丈夫的爱已经超过了他们，使他父母与儿子形同陌路，只剩下姓氏上的关系。她的行为在诸神和人之中都是如此的高尚，在众多高尚的人之中，她是少有的几个受到神钦佩，并被赐予起死回生特权的人之一。这一非凡的荣誉是诸神对爱的奉献与美德的回报。而俄阿格罗斯的儿子俄耳甫斯（竖琴琴师），因为他缺乏勇气，诸神让他空手而归，只让他看到他所寻找的爱人的幽灵，并没有放他的爱人离开。他是一个竖琴琴师——不敢像阿尔刻提斯那样为爱而死，只是设法活着进入冥府。最终，他死在了女人的手里，作为诸神对他怯懦的惩罚。不同的是，阿喀琉斯对于他的爱人帕特洛克罗斯的真爱却得到了不同的回报——他的爱人而不是他的情人（把帕特洛克罗斯写成是被爱的人，这是埃斯库罗斯犯的一个愚蠢的错误，因为很明显阿喀琉斯才是两个人中更好看的，他也比其他英雄们更英俊，并且，如荷马所说，他还没有长胡子，且年轻许多）。此外，由于诸神十分尊敬爱所展现的美德，所以就被爱人而言，报答给爱人的爱是更加受到诸神的敬佩、重视和回报。因为爱人更为神圣，他受到了神的启示。由于母亲的劝告，现在阿喀琉斯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他不杀赫克托耳，他将免于一死，并且可以回到家乡，安享晚年。然而他还是献出自己的生命为朋友报仇，并且他不仅敢于为保护他的朋友而死，还敢于跟随他赴死。因此，诸神对他的待遇甚至高于阿尔刻提斯，把他送到了“幸福岛”。

“These are my reasons for affirming that Love is the eldest and noblest and mightiest of the gods; and the chiefest author and giver

of virtue in life, and of happiness after death.”

“综上所述，爱神不仅是最年长，最高尚，也是最伟大的神祇，也是生前美德以及死后幸福的最主要创造者和给予者。”

This, or something like this, was the speech of Phaedrus; and some other speeches followed which Aristodemus did not remember; the next which he repeated was that of Pausanias.

裴德罗的发言大致如此。至于接下来的一些讲话，阿里斯托得摩斯就记不清楚了，他接下来复述的是鲍塞尼阿斯的话。

“Phaedrus,” he said, “the argument has not been set before us, I think, quite in the right form;—we should not be called upon to praise Love in such an indiscriminate manner. If there were only one Love, then what you said would be well enough; but since there are more Loves than one—should have begun by determining which of them was to be the theme of our praises. I will amend this defect; and first of all I will tell you which Love is deserving of praise, and then try to hymn the praiseworthy one in a manner worthy of him.

“裴德罗，”鲍塞尼阿斯说道，“我认为我们的话题不是很准确，我们不应该如此不加区分地颂扬爱神。如果爱神只有一位，那你所说的倒还不错，但是爱神不止一位，我们就应该先确定他们中哪些是我们要歌颂的对象。我将改正这一缺点。首先我将要告诉大家哪位爱神是值得颂扬的，而后我将用适合他的方式来颂扬他。

“For we all know that Love is inseparable from Aphrodite, and if there were only one Aphrodite there would be only one Love; but as there are two goddesses there must be two Loves. And am I not right in asserting that there are two goddesses? The elder one, having no mother, who is called the heavenly Aphrodite—she is the daughter of Uranus; the younger, who is the daughter of Zeus and Dione—her we call common; and the Love who is her fellow-worker is rightly named common, as the other love is called heavenly. All the gods ought to have praise given to them, but not without distinction of their natures; and therefore I must try to distinguish the characters of the two Loves. Now actions vary according to the manner of their performance. Take, for example, that which we are now doing, drinking, singing and talking—these actions are not in themselves either good or evil, but they turn out in this or that way according to the mode of performing them; and when well done they are good, and when wrongly done they are evil; and in like manner not every love, but only that which has a noble purpose, is noble and worthy of praise.

“众所周知，爱神离不开阿弗洛狄忒，如果只有一个阿弗洛狄忒，那就仅有一位爱神，但是由于有两位女神，那就有两位爱神。我认为存在两个女神，难道不对吗？其中一位年长的女神叫天国爱神——她是天神的女儿，但是没有母亲。另一位年幼的女神叫尘世爱神——她是宙斯和狄俄涅的女儿。既然年长的爱神叫天国爱神，那么作为她的伙伴，这位年幼的爱神叫尘世爱神也合情合理。凡是神都应该得到颂扬，但是首先要分清他们的本质，因此我必须试着区分两位爱神的特质。由于行事的方式不同，采取的行动也就各不相同。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饮酒，歌唱，谈话，这些行为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但是由于它们不同的行为方式，它们所呈现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行为的方式美，这个行为就美；行为的方式丑，这个行为就丑。因此，同理可知，不是所有的爱都是高尚的，值得称颂的；只有

那些具有高尚目的的爱才是高尚的，值得称颂的。

“The Love who is the offspring of the common Aphrodite is essentially common, and has no discrimination, being such as the meaner sort of men feel, and is apt to be of women as well as of youths, and is of the body rather than of the soul—the most foolish beings are the objects of this love which desires only to gain an end, but never thinks of accomplishing the end nobly, and therefore does good and evil quite indiscriminately. The goddess who is his mother is far younger than the other, and she was born of the union of the male and female, and partakes of both. But the offspring of the heavenly Aphrodite is derived from a mother in whose birth the female has no part—she is from the male only; this is that love which is of youths, and the goddess being older, there is nothing of wantonness in her. Those who are inspired by this love turn to the male, and delight in him who is the more valiant and intelligent nature; any one may recognise the pure enthusiasts in the very character of their attachments. For they love not boys, but intelligent beings whose reason is beginning to be developed, much about the time at which their beards begin to grow. And in choosing young men to be their companions, they mean to be faithful to them, and pass their whole life in company with them, not to take them in their inexperience, and deceive them, and play the fool with them, or run away from one to another of them. But the love of young boys should be forbidden by law, because their future is uncertain; they may turn out good or bad, either in body or soul, and much noble enthusiasm may be thrown away upon them; in this matter the good are a law to themselves, and the coarser sort of lovers ought to be restrained by force; as we restrain or attempt to restrain them from fixing their affections on women of free birth. These are the persons who bring a reproach on love; and

some have been led to deny the lawfulness of such attachments because they see the impropriety and evil of them; for surely nothing that is decorously and lawfully done can justly be censured.

“尘世女神所引起的爱本质上是世俗的，并且对人是无差别的。这种爱只能存在于下等人，它的对象可以是女人，也可以是青年；它所眷恋的是肉体而非心灵——最后它会选择一个愚蠢的对象，因为它只贪求达到目的，却从不考虑是否这个目的是否高尚，因此怀着这种爱的人做事不分善恶。这位女神的母亲远比另外一位年轻，并且她是由男女结合而生，所以兼有两种特性。而天国女神的出生却与女性无关，她只是由男子所生的。所以其爱情对象只有青年男子。此外，因为这位女神比较年长，她没有任何放荡淫乱的念头。她鼓励人们把爱情专注于男性对象，追求生来比较坚强，比较聪明的对象。所有人都可以看出他们情感中的纯粹和热情。他们爱的不仅仅是青年男子，更是他们的智慧，因为他们的逻辑能力差不多在他们刚长胡子的时候就开始发展提高了。在选择青年作为伴侣时，他们想要对对方忠诚，并使其成为终生伴侣，而不是利用他们的年幼无知来欺骗他们，愚弄他们，或是碰到另外心仪的对象就将前者抛弃。但是爱慕年幼的男孩应该由法律禁止，这样人们才不会在动摇不定的对象身上浪费许多精力，因为年幼的男孩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在心灵方面都会举棋不定。就此而言，具有美德的人本身就有约束自己的能力，同时也强迫那些凡俗的人受到约束。这就如同我们制止他们爱上良家妇女一样。这些凡俗的人使得爱情受人指责，并且有些人已经开始否定这类感情的合法性，因为他们在这些俗人身上看到了寡廉鲜耻的行为，毫无疑问任何高雅并合法的行为是不会受到指责的。

“Now here and in Lacedaemon the rules about love are perplexing, but in most cities they are simple and easily intelligible; in Elis and Boeotia, and in countries having no gifts of eloquence, they are very straightforward; the law is simply in favour of these

connexions, and no one, whether young or old, has anything to say to their discredit; the reason being, as I suppose, that they are men of few words in those parts, and therefore the lovers do not like the trouble of pleading their suit. In Ionia and other places, and generally in countries which are subject to the barbarians, the custom is held to be dishonourable; loves of youths share the evil repute in which philosophy and gymnastics are held, because they are inimical to tyranny; for the interests of rulers require that their subjects should be poor in spirit (compare Arist. *Politics*), and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strong bond of friendship or society among them, which love, above all other motives, is likely to inspire, as our Athenian tyrants learned by experience; for the love of Aristogeiton and the constancy of Harmodius had a strength which undid their power. And, therefore, the ill-repute into which these attachments have fallen is to be ascribed to the evil condition of those who make them to be ill-reputed; that is to say, to the self-seeking of the governors and the cowardice of the govern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discriminate honour which is given to them in some countries is attributable to the laziness of those who hold this opinion of them.

“现在在雅典和斯巴达，有关爱情的规定很复杂，但是在大多数城邦里，它们比较简单明了。在伊利斯和波埃提亚，以及在那些不善辞令的人们所居住的城市里，爱情的规定非常直截了当。法律支持这些结合，无论老少，没有人说它是丑事。我认为这是由于他们不愿意花言巧语来争取青年男子，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本来就不擅长。爱奥尼亚和其他一些地方，大多在蛮夷的统治之下。在这些地方，人们认为爱情是可耻的。人们把对青少年的爱恋，就像对哲学和体育的钟情一样，看成一件丑事，因为它们不利于专制统治。出于统治者的利益要求，被统治者必须在精神上贫乏，并且人民之间不应有牢固的友谊或亲密的社交，这一切都是由可以超越所有动机的爱情所激发的。正像

我们雅典的暴君，从他们的经验中得知：阿里司托吉顿和哈谟狄乌坚定不移的爱使专制的君主政权土崩瓦解。由此可知，这些爱恋之所以被看成污秽，正是由于怀有爱情的邪恶之人使其污秽不堪。换句话说，这是由于统治者的追逐私利和被统治者的胆小怯懦；另一方面，在某些国家，怀有这些情感的人之所以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被赋予荣誉，是因为持有这一观点的人懒惰倦怠。

“In our own country a far better principle prevails, but, as I was saying, the explanation of it is rather perplexing. For, observe that open loves are held to be more honourable than secret ones, and that the love of the noblest and highest, even if their persons are less beautiful than others, is especially honourable. Consider, too, how great is the encouragement which all the world gives to the lover; neither is he supposed to be doing anything dishonourable; but if he succeeds he is praised, and if he fails he is blamed.

“在我们国家盛行着一个更合理的原则，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原则的解释也更复杂，不易理解。因为我们观察到，光明正大的爱比匿影藏形的爱更高尚。光明正大的爱是最高尚光荣的，即使相爱的人没有他人貌美，也尤其值得尊重。此外，细想一下，世人对爱人都会给予极大的鼓励，不认为他是在做不体面的事情。但是如果追求爱情成功了，他就会得到赞扬，如果失败了，他就会受到指责。

“And in the pursuit of his love the custom of mankind allows him to do many strange things, which philosophy would bitterly censure if they were done from any motive of interest, or wish for office or power. He may pray, and entreat, and supplicate, and swear, and lie on a mat at the door, and endure a slavery worse

than that of any slave—in any other case friends and enemies would be equally ready to prevent him, but now there is no friend who will be ashamed of him and admonish him, and no enemy will charge him with meanness or flattery; the actions of a lover have a grace which ennobles them; and custom has decided that they are highly commendable and that there no loss of character in them; and, what is strangest of all, he only may swear and forswear himself (so men say), and the gods will forgive his transgression, fo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lover's oath. Such is the entire liberty which gods and men have allowed the lover, according to the custom which prevails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而且，在追求爱的过程中，人类的习俗允许他做很多离奇的事，如果做这些事情是出于任何获利动机，或者是为了谋求官职或权利，而非爱情，他将会受到哲学家严厉的谴责。他可能会对爱人恳求，乞求，哀求，发誓，躺在门口的垫子上，忍受比任何奴隶所经受的都更为艰苦的奴役——如若在其他的情况下，他的朋友和他的仇敌都同样会来阻止他，但是现在没有一个朋会为他感到羞耻，会来劝解他，他的仇敌没有一个会来控诉他的卑鄙或是谄媚。他对爱人的所作所为有一种魅力，能够使其行为变得高尚。习俗认为这种行为应该被大力赞美，并且这种行为也无损他的品格。此外，最奇怪的是，一般人认为只有爱人发了誓却未遵守，也可以得到诸神的宽恕，因为世上根本没有爱人的誓言这种东西。由此可知诸神和人类都给予爱人完全的自由，正如我们这里的规矩所默许的那样。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a man fairly argues that in Athens to love and to be loved is held to be a very honourable thing. But when parents forbid their sons to talk with their lovers, and place them under a tutor's care, who is appointed to see to these things, and their companions and equals cast in their teeth anything of the

sort which they may observe, and their elders refuse to silence the reprovers and do not rebuke them—any one who reflects on all this will, on the contrary, think that we hold these practices to be most disgraceful.

“就此而言，在雅典，人们认为爱与被爱都是光荣的。但是父母却禁止他们的儿子和他们的爱人们谈话，并且请家庭教师来看管他们；当他们的同伴和同龄人发现他们的这种来往也会加以指责，而他们的长辈不仅不制止这些指责者，也不会谴责他们——任何一个仔细思考这一切的人，都会反过来认为我们这样做非常不光彩。

“But, as I was saying at first, the truth as I imagine is, that whether such practices are honourable or whether they are dishonourable is not a simple question; they are honourable to him who follows them honourably, dishonourable to him who follows them dishonourably. There is dishonour in yielding to the evil, or in an evil manner; but there is honour in yielding to the good, or in an honourable manner. Evil is the vulgar lover who loves the body rather than the soul, inasmuch as he is not even stable, because he loves a thing which is in itself unstable, and therefore when the bloom of youth which he was desiring is over, he takes wing and flies away, in spite of all his words and promises; whereas the love of the noble disposition is life-long, for it becomes one with the everlasting.

“但正如我一开始说的那样，我认为事实是，要判断这些做法是光荣还是耻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行为的方式高尚它们就高尚，行为的方式可耻它们就可耻。无力抵抗邪恶或者做邪恶的事就是可耻，相反如果接受美德或崇高的行为就是高尚。凡俗人爱肉体多于爱

灵魂，这就如同善变一样令人厌恶，因为他所爱的事物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所以当他渴望的青春年华不复存在的时候，他就会不顾任何誓言，远走高飞。但品质高尚的爱却是永恒的，因为这爱与永恒结为一体。

“The custom of our country would have both of them proven well and truly, and would have us yield to the one sort of lover and avoid the other, and therefore encourages some to pursue, and others to fly; testing both the lover and beloved in contests and trials, until they show to which of the two classes they respectively belong.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n the first place, a hasty attachment is held to be dishonourable, because time is the true test of this as of most other things; and secondly there is a dishonour in being overcome by the love of money, or of wealth, or of political power, whether a man is frightened into surrender by the loss of them, or, having experienced the benefits of money and political corruption, is unable to rise above the seductions of them. For none of these things are of a permanent or lasting nature; not to mention that no generous friendship ever sprang from them.

“我们国家的习俗是要人们对这两种人加以彻底的考验，知道哪一种人值得去爱，哪一种人必须避开，因此鼓励一些人去追求所爱的人，而鼓励另一些人逃避不值得爱的人。爱人与被爱的人都要经历种种质疑、考验，才能判断出他们在两种爱情中究竟属于哪一种。正因如此，首先，草率地接受一份感情是可耻的，因为正如其他事情一样，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其次，不能克服对金钱、财富或政治权力的贪恋而委身于人是可耻的，无论这个人是怕失去这些东西，还是尝过金钱、政治腐败的甜头而不能拒绝它们的诱惑。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持久不变的，而慷慨的友谊也从不会从他们之中产生。

“There remains, then, only one way of honourable attachment which custom allows in the beloved, and this is the way of virtue; for as we admitted that any service which the lover does to him is not to be accounted flattery or a dishonour to himself, so the beloved has one way only of voluntary service which is not dishonourable, and this is virtuous service. For we have a custom, and according to our custom any one who does service to another under the idea that he will be improved by him either in wisdom, or in some other particular of virtue—such a voluntary service, I say, is not to be regarded as a dishonour, and is not open to the charge of flattery. And these two customs, one the love of youth, and the other the practice of philosophy and virtue in general, ought to meet in one, and then the beloved may honourably indulge the lover. For when the lover and beloved come together, having each of them a law, and the lover thinks that he is right in doing any service which he can to his gracious loving one; and the other that he is right in showing any kindness which he can to him who is making him wise and good; the one capable of communicating wisdom and virtue, the other seeking to acquire them with a view to education and wisdom, when the two laws of love are fulfilled and meet in one—then, and then only, may the beloved yield with honour to the lover. Nor when love is of this disinterested sort is there any disgrace in being deceived, but in every other case there is equal disgrace in being or not being deceived. For he who is gracious to his lover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he is rich, and is disappointed of his gains because he turns out to be poor, is disgraced all the same: for he has done his best to show that he would give himself up to any one's 'uses base' for the sake of money; but this is not honourable. And on the same principle he who gives himself to a lover because he is a good man, and in the hope that he will be improved by his company, shows himself to be virtuous, even though the object of his affection turn out to be a villain, and

to have no virtue; and if he is deceived he has committed a noble error. For he has proved that for his part he will do anything for anybody with a view to virtue and improvement, than which there can be nothing nobler. Thus noble in every case is the acceptance of another for the sake of virtue. This is that love which is the love of the heavenly goddess, and is heavenly, and of great price to individuals and cities, making the lover and the beloved alike eager in the work of their own improvement. But all other loves are the offspring of the other, who is the common goddess.

“因此习俗仅允许我们使用尊贵的情感这一种方式去爱，就是用美德去爱。因为正如我们说过的，爱人为心上人做的任何事情对他来说都不算是谄媚，或是耻辱，因此被爱的人仅有一种自愿服务的方式，而且这方式是受人尊敬的，就是美德的奉献。因为我们有一项习俗，依据这项习俗，为了增进智慧或提高美德，一个人要对另一个人提供自愿性的服务。我认为这种行为不会被看作是羞耻的或者谄媚的。这两种习俗，一种是关于青少年的爱情，另一种是关于被普遍接受的哲学和美德的实践，应该合二为一，那么被爱的人就可以体面地与他的爱人沉浸在爱情之中。那么，当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法则。爱的人认为，对他所眷顾而心爱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是正当的。而被爱的人则认为，对能使自己变得聪慧而善良的人表达任何善意之举是正当的。一个有传递智慧和美德的本领，另一个会考虑到教育和智慧从而力图获得它们，当这两项爱的法则都得以实现并且合二为一时——然后，也只有这样，被爱的人才能体面地接受爱人的爱。在爱情是如此公正无私的时候，爱的背叛也并不羞耻，但是在其他任何情况下，背不背叛都同样可耻。如果一个人以为他的爱人很富有而与他亲近，但结果发现他很贫穷进而对他的无利可图而感到失望，那么他仍然很可耻。因为他的行为恰恰表明了他愿意为了金钱委身于任何有利可图的人，这是不光彩的。同理，如果他和一个人相爱是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好人，并且希望因为有这个人的陪伴而进步，那么他就是道德高尚的。那么即使他最终发现他所爱的人是个恶

棍，他也是道德高尚的；即使他最终遭到背叛，他犯下的也是高尚的错误。因为他已经证明，对他而言，他愿意为了美德和进步为任何人做任何事，再也没有比这更高尚的事情了。因此，但凡为了美德而接受一个人都是高尚的。这种起于天国女神的爱情是神圣的，对于个人和城邦来说，它也是非常宝贵的。它使得爱人和被爱的人都渴望为自身的进步而努力。但除此以外，其他的爱情都起于另一位爱神——尘世爱神。

“To you, Phaedrus, I offer this my contribution in praise of love, which is as good as I could make extempore.”

“裴德罗啊，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即兴表达了我对爱神的赞美。”

Pausanias came to a pause—this is the balanced way in which I have been taught by the wise to speak; and Aristodemus said that the turn of Aristophanes was next, but either he had eaten too much, or from some other cause he had the hiccough, and was obliged to change turns with Eryximachus the physician, who was reclining on the couch below him. “Eryximachus,” he said, “you ought either to stop my hiccough, or to speak in my turn until I have left off.”

鲍塞尼阿斯停了下来——这就是我从智者们那里学会的稳重的说话方式。阿里斯托得摩斯接着说道：“该轮到阿里斯托芬了，可是他正在打嗝——不知是因为吃得太饱了，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因此就不得不轮到正靠在下方卧榻上的医生厄律克西马库。”“厄律克西马库，”阿里斯托芬说道，“你要么设法止住我的打嗝，要么替我讲话，等我恢复过来再说。”

“I will do both,” said Eryximachus: “I will speak in your turn, and do you speak in mine; and while I am speaking let me recommend you to hold your breath, and if after you have done so for some time the hiccough is no better, then gargle with a little water; and if it still continues, tickle your nose with something and sneeze; and if you sneeze once or twice, even the most violent hiccough is sure to go.” “I will do as you prescribe,” said Aristophanes, “and now get on.”

“这两件事我都可以帮你做，”厄律克西马库说，“我先替你讲话，等轮到我的时候你再讲。然而，在我发言的时候我建议你屏住呼吸，这么做一段时间还没好的话，就用一点水漱漱口。如果还是继续打嗝，用什么东西让你的鼻子发痒，然后打个喷嚏，这样来回一两次，不管你打嗝多厉害，都会停止的。”阿里斯托芬说：“我会照你说的做的，你开始讲吧。”

Eryximachus spoke as follows: “Seeing that Pausanias made a fair beginning, and but a lame ending, I must endeavour to supply his deficiency. I think that he has rightly distinguished two kinds of love.

厄律克西马库所说如下：“看到鲍塞尼阿斯开了一个好头，但结尾却缺乏说服力，我必须尽力对他的话做一些补充。我认为他正确地区分了两类爱情。

“But my art further informs me that the double love is not merely an affection of the soul of man towards the fair, or towards

anything, but is to be found in the bodies of all animals and in productions of the earth, and I may say in all that is; such is the conclusion which I seem to have gathered from my own art of medicine, whence I learn how great and wonderful and universal is the deity of love, whose empire extends over all things, divine as well as human. And from medicine I will begin that I may do honour to my art.

“但我的医术进一步告诉我，这两种爱情不是人类灵魂对于美少年的爱或是对于任何事物的爱，而是对动物的身体和大地孕育的所有产物的爱，可以说这种爱在万事万物身上都适用。这是我从自己的医疗中得出的结论：爱神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神奇和广泛，爱神的威力遍布于包括神和人的一切事物之中。为了表示对我所从事的行业的尊敬，我将从医学讲起。

“There are in the human body these two kinds of love, which are confessedly different and unlike, and being unlike, they have loves and desires which are unlike; and the desire of the healthy is one, and the desire of the diseased is another; and as Pausanias was just now saying that to indulge good men is honourable, and bad men dishonourable:—so too in the body the good and healthy elements are to be indulged, and the bad elements and the elements of disease are not to be indulged, but discouraged. And this is what the physician has to do, and in this the art of medicine consists: for medicine may be regarded generally as the knowledge of the loves and desires of the body, and how to satisfy them or not; and the best physician is he who is able to separate fair love from foul, or to convert one into the other; and he who knows how to eradicate and how to implant love, whichever is required, and can reconcile the most hostile elements in the constitution and make them loving

friends, is a skilful practitioner. Now the most hostile are the most opposite, such as hot and cold, bitter and sweet, moist and dry, and the like. And my ancestor, Asclepius, knowing how to implant friendship and accord in these elements, was the creator of our art, as our friends the poets here tell us, and I believe them; and not only medicine in every branch but the arts of gymnastic and husbandry are under his dominion. Any one who pays the least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 will also perceive that in music there is the same reconciliation of opposites; and I suppose that this must have been the meaning, of Heracleitus, although, his words are not accurate; for he says that The One is united by disunion, like the harmony of the bow and the lyre.

“人类的身体就蕴含着这两类被公认为截然不同的爱，他们拥有不同的爱与渴望。健康者的渴望是一种，患病者的渴望则是另一种。正如刚才鲍塞尼阿斯所说，与好人相爱是荣，与恶人相爱是耻——在身体方面也是如此，好的、健康的部分要继续保持，不好的、生病的部分则不能放任下去，而要加以避免。这就是医生的职责，也是医学的所在。总之，医学被看作是关于身体的爱与渴望的学问，研究如何去满足、如何去发泄。医术高明的医生能够区分美好的爱与恶劣的爱，将一种转变成另一种，并且知道在何时根除爱，栽培爱，还可以调解构造中最敌对的部分，使他们成为好友。现在最敌对的部分就是那些互相对立的东西，如冷和热，苦与甜，干燥与潮湿之类的。我的前辈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所以成为医学始祖，就是因为他知道如何让相互敌对的部分协调一致，他不仅能支配医学的方方面面，还能支配体育和畜牧技术。正如我们这里的诗人朋友们所说，我相信的那样。任何一个对此话题稍加注意的人都会发现，音乐之中也有类似的相对事物的和谐。赫拉克利特说过一句话，虽然字面含糊费解，但也许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就像弓弦与竖琴的协调，是由不和谐而产生的。

“Now there is an absurdity saying that harmony is discord or is composed of elements which are still in a state of discord. But what he probably meant was, that harmony is composed of differing notes of higher or lower pitch which disagreed once, but are now reconciled by the art of music; for if the higher and lower notes still disagreed, there could be no harmony—clearly not. For harmony is a symphony, and symphony is an agreement; but an agreement of disagreements while they disagree there cannot be; you cannot harmonize that which disagrees. In like manner rhythm is compounded of elements short and long, once differing and now in accord; which accordance, as in the former instance, medicine, so in all these other cases, music implants, making love and unison to grow up among them; and thus music, too, is concerned with the principles of love in their application to harmony and rhythm. Again, in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harmony and rhythm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discerning love which has not yet become double. But when you want to use them in actual life, either in the composition of songs or in the correct performance of airs or metres composed already, which latter is called education, then the difficulty begins, and the good artist is needed. Then the old tale has to be repeated of fair and heavenly love—the love of Urania the fair and heavenly muse, and of the duty of accepting the temperate, and those who are as yet intemperate only that they may become temperate, and of preserving their love; and again, of the vulgar Polyhymnia, who must be used with circumspection that the pleasure be enjoyed, but may not generate licentiousness; just as in my own art it is a great matter so to regulate the desires of the epicure that he may gratify his tastes without the attendant evil of disease. Whence I infer that in music, in medicine, in all other things human as well as divine, both loves ought to be noted as far as may be, for they are both present.

“现在有一种荒谬的言论：和谐就是冲突，或者和谐由冲突的因素组合而成。他的意思或许是说，和声是由曾经不协调的高音和低音组成，但现在被音乐的艺术调和了。因为如果高音和低音仍不协调，就不可能有和弦，这一点很明显。因为和声就是声音的和谐，声音的和谐就是协调一致。但如果音符仍在冲突就不可能将冲突变成协调，你也不可能使冲突变得和谐。同样地，节奏也是由或长或短的节拍组成，曾经它们互不相同，但是现在它们协调一致。正如前面提到的例子，医术带来了身体的协调，在所有其他例子中也一样。而音乐带来的这种协调一致，使得爱与和谐在其中生长。因此当把它们应用到和弦与节奏领域里时，音乐也与爱情的一些原则有了关系。此外，从和弦与节奏的本质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爱具有双重性了。但当你将他们应用于现实生活之中，无论是作曲还是正确地演奏谱好的曲调，即我们所谓的音乐教育，都不是易事，都需要技艺高超的艺术家。接下来我们就要重复美丽的天国之爱那古老的故事了——也就是乌拉尼亚之爱。主掌美丽与天国之爱的缪斯女神，她负责接收有节制的人，还有那些仍不节制但有可能变得节制的人，并且保存他们的爱。我们还要重复世俗的波吕许漠尼亚之爱，这种爱必须要被慎用才可以享受快感，才不至于产生淫乱。正如在我所从事的医学领域，控制对美食的欲望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可能享受美味而又不引发疾病。由此，我推断在音乐、医学以及其他所有人与神的事物之中，我们都应尽可能地注意这两种爱神，因为她们都在当前存在的。

“The course of the seasons is also full of both these principles; and when, as I was saying, the elements of hot and cold, moist and dry, attain the harmonious love of one another and blend in temperance and harmony, they bring to men, animals, and plants health and plenty, and do them no harm; whereas the wanton love, getting the upper hand and affecting the seasons of the year, is very destructive and injurious, being the source of pestilence, and bringing many other kinds of diseases on animals and plants; for hoar-frost and hail and blight spring from the excesses and

disorders of these elements of love, which to know in relation to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bodies and the seasons of the year is termed astronomy.

“四季的推移也充满了这些原则。正如我刚才所说，当热与冷、湿与干的因素达到一种相互和谐的爱的状态，并且以温和而和谐的形式混合在一起，它们就给人类、动物和植物带来健康与富足，并且毫无危害。然而放荡的爱要是占了上风并且影响一年四季的运行，那就非常有害了，这是瘟疫的祸根，也会给动物和植物带来许多其他种类的疾病。因为白霜、冰雹与荒芜的春天都是这些过量和失调的爱所导致的，这些天体的运动与四季推移的知识即被称为天文学。

“Furthermore all sacrifices and the whole province of divination, which is the art of communion between gods and men—these, I say, are concerned only with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good and the cure of the evil love. For all manner of impiety is likely to ensue if, instead of accepting and honouring and reverencing the harmonious love in all his actions, a man honours the other love, whether in his feelings towards gods or parents, towards the living or the dead. Wherefore the business of divination is to see to these loves and to heal them, and divination is the peacemaker of gods and men, working by a knowledge of the religious or irreligious tendencies which exist in human loves.

“此外，我认为占卜术是神与人交流的艺术，它的所有祭祀和占卜的仪式都与保留美德和治愈邪恶有关。因为如果一个人不以他所有的言行举止来接受、尊敬和崇敬和谐之爱，而是转为尊敬另外的爱，那么所有形式的不虔诚都有可能发生，无论他的感情是针对神灵或是父母，是针对生者还是逝者。因此，占卜术就是要关注这样的爱并治

愈它们，并且它是众神和人类的调解者，通过了解存在于人类爱情之中的虔诚与不虔诚来发挥作用。

“Such is the great and mighty, or rather omnipotent force of love in general. And the love, more especially,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good, and which is perfected in company with temperance and justice, whether among gods or men, has the greatest power, and is the source of all our happiness and harmony, and makes us friends with the gods who are above us, and with one another.

“总之，这就是伟大的、强有力的、甚至是无所不能的爱的力量。并且更特别的是，不管是在神还是在人之中，爱的威力都是最大的。它涉及到美德，因为有了节制和公正而变得完美。它是所有幸福与和谐的源泉，并且使得我们彼此成为朋友，甚至和高高在上的神成为朋友。

“I dare say that I too have omitted several things which might be said in praise of Love, but this was not intentional, and you, Aristophanes, may now supply the omission or take some other line of commendation; for I perceive that you are rid of the hiccough.”

“我或许也遗漏了几处赞颂爱神的话语，但这并不是有意的。阿里斯托芬，如果我有遗漏，就请你把它补充上，或者用某种其他方式来颂扬爱神，我察觉到你已经不打嗝了。”

“Yes,” said Aristophanes, who followed, “the hiccough is gone; not, however, until I applied the sneezing; and I wonder whether

the harmony of the body has a love of such noises and ticklings, for I no sooner applied the sneezing than I was cured.”

阿里斯托芬接着说道：“是的，但我只有打了喷嚏，才能停止打嗝。我怀疑是不是非要经过一阵大声的、很痒的喷嚏，身体才能恢复正常状态。因为我一打喷嚏，嗝就止住了。”

Eryximachus said: “Beware, friend Aristophanes, although you are going to speak, you are making fun of me; and I shall have to watch and see whether I cannot have a laugh at your expense, when you might speak in peace.”

厄律克西马库说道：“当心，阿里斯托芬，我的朋友，你一张口就开玩笑。你本可以平静地说，却非要开玩笑，这样一来我不得不提防着你，看看你的话有什么惹人发笑的。”

“You are right,” said Aristophanes, laughing. “I will unsay my words; but do you please not to watch me, as I fear that in the speech which I am about to make, instead of others laughing with me, which is to the manner born of our muse and would be all the better, I shall only be laughed at by them.”

“你是对的。”阿里斯托芬笑着说道，“我会收回我的话。但请你不要提防我，因为我怕在之后的演讲中，我只会被他们嘲笑，我倒是不怕自己的话惹人发笑，那倒更好，因为惹人发笑是诗神的天性。”

“Do you expect to shoot your bolt and escape, Aristophanes? Well, perhaps if you are very careful and bear in mind that you will be called to account, I may be induced to let you off.”

厄律克西马库说：“你指望说完你的话就溜走吗，阿里斯托芬？小心点，你要为它辩护。如果你的话合我意，我或许会放过你。”

Aristophanes professed to open another vein of discourse; he had a mind to praise Love in another way, unlike that either of Pausanias or Eryximachus. “Mankind,” he said, “judging by their neglect of him, have never, as I think, at all understood the power of Love. For if they had understood him they would surely have built noble temples and altars, and offered solemn sacrifices in his honour; but this is not done, and most certainly ought to be done: since of all the gods he is the best friend of men, the helper and the healer of the ills which are the great impediment to the happiness of the race. I will try to describe his power to you, and you shall teach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at I am teaching you.

阿里斯托芬声称要用另一种风格来演讲，他有意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赞美爱神，既不同于鲍塞尼阿斯也不同于厄律克西马库。他说道：“在我看来，从人类对爱神的忽视就可断定，人类根本没有理解过爱神的力量。因为如果他们理解爱神，他们肯定会建造宏伟的庙宇和祭坛，为他做庄严的祭祀。但人类没有这样做，尽管这是他们最应该做的。因为在众神中，爱神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是帮手和疾病的医治者，而疾病是人类幸福的巨大障碍。我会尽量向你描绘他的力量，而你要把我将教授给你的东西再教授给世界上的其他人。

“In the first place, let me treat of the nature of man and what has happened to it; for the original human nature was not like the present, but different. The sexes were not two as they are now, but originally three in number; there was man, woman, and the union of the two, having a name corresponding to this double nature, which had once a real existence, but is now lost, and the word 'Androgynous' is only preserved as a term of reproach.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primeval man was round, his back and sides forming a circle; and he had four hands and four feet, one head with two faces, looking opposite ways, set on a round neck and precisely alike; also four ears, two privy members, and the remainder to correspond. He could walk upright as men now do, backwards or forwards as he pleased, and he could also roll over and over at a great pace, turning on his four hands and four feet, eight in all, like tumblers going over and over with their legs in the air; this was when he wanted to run fast. Now the sexes were three, and such as I have described them; because the sun, moon, and earth are three; and the man was originally the child of the sun, the woman of the earth, and the man-woman of the moon, which is made up of sun and earth, and they were all round and moved round and round like their parents. Terrible was their might and strength, and the thoughts of their hearts were great, and they made an attack upon the gods; of them is told the tale of Otys and Ephialtes who, as Homer says, dared to scale heaven, and would have laid hands upon the gods. Doubt reigned in the celestial councils.

“首先，我来谈谈人类的本性和他所经历过的变迁。因为最初人类的本性并不像现在这样，而是与之不同的。人类不像现在这样有两种性别，而原本是三种：男人、女人和他们的结合体，并且这种雌雄同体还有与之相符的名字。这曾经的确存在，但现在没有了，现在“雌雄同体”这个词仅被作为侮辱之词保留着。其次，原始的人类是

圆的，他的后背和侧面形成一个圆形。他有四只手和四只脚，一个头上有两张模样一致的脸面对面，长在圆圆的脖颈上。还有四只耳朵，两个生殖器，其余器官的数量依比例加倍。他能像现在的人类一样直立行走，但是可以随意地向前走或向后走，而且还能快速地滚来滚去。他们要快跑的时候，四只手和四只脚并用，样子就像翻筋斗的演员一样，用腿使身体在空中翻滚。就像我描述过的，当时人有三种性别，因为太阳、月亮和地球是三个。男人原来是太阳的孩子，女人是地球的，雌雄同体的人是月亮所生的，而月亮由太阳和地球组成。他们的形体是圆的，运动起来也是圆的，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的力量大得可怕，他们心中的想法非常强烈，他们向神发起了进攻。就像荷马所说的俄图斯和厄菲亚尔特的故事，他们企图打开一条通天路，去和诸神交战。于是天庭上阴云密布。

“Should they kill them and annihilate the race with thunderbolts, as they had done the giants, then there would be an end of the sacrifices and worship which men offered to them;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ds could not suffer their insolence to be unrestrained. At last, after a good deal of reflection, Zeus discovered a way. He said: 'Methinks I have a plan which will humble their pride and improve their manners; men shall continue to exist, but I will cut them in two and then they will be diminished in strength and increased in numbers; this will have the advantage of making them more profitable to us. They shall walk upright on two legs, and if they continue insolent and will not be quiet, I will split them again and they shall hop about on a single leg.' He spoke and cut men in two, like a sorb-apple which is halved for pickling, or as you might divide an egg with a hair; and as he cut them one after another, he bade Apollo give the face and the half of the neck a turn in order that the man might contemplate the section of himself: he would thus learn a lesson of humility. Apollo was also bidden to heal their wounds and compose their forms. So he gave a

turn to the face and pulled the skin from the sides all over that which in our language is called the belly, like the purses which draw in, and he made one mouth at the centre, which he fastened in a knot (the same which is called the navel); he also moulded the breast and took out most of the wrinkles, much as a shoemaker might smooth leather upon a last; he left a few, however, in the region of the belly and navel, as a memorial of the primeval state.

“诸神如果杀死他们，并用雷电消灭这个种族，就像他们对巨人所做的那样，那么人对神的祭祀和崇拜就将结束。但是另一方面，诸神又不能任由他们傲慢无礼，无法无天。最后，经过许久的沉思，宙斯找到一种方法。他说：‘我想我有办法了，我的办法不仅能挫伤他们的锐气，还能改善他们的举止。人类将继续存在，但是我会把他们剖成两半，这样他们的力气就会减少而数量却会增加，这将使他们对我们更加有益。’他们将用两条腿直立行走，而且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傲慢无礼，不安分的话，我将把他们再劈成两半，他们就得单腿跳着走。他此言一出就把人类剖成两半，就像一个被切成两半进行酸渍的花楸果，或者像是用发丝截开鸡蛋一样。就在他把人类一个接着一个地剖开时，他命令阿波罗把人脸和脖子扭到切开的那一边，这样人类可以对被剖开的部分进行思考：如此他才会学会谦卑。阿波罗还被命令治好他们的伤口，组合好他们的形体。所以他把脸扭过来，把切开的皮从两边拉到中间，也就是现在肚皮的地方，就像钱包合在一起一样。他在肚皮中间系了一个缝口，也就是现在的肚脐。他又塑造出胸部，除去大部分皱纹，与鞋匠在鞋楦上弄平皮革非常相似。然而他在肚子和肚脐这块留下一些皮褶，使人永远不忘初期受到的惩罚。

“After the division the two parts of man, each desiring his other half, came together, and throwing their arms about one another, entwined in mutual embraces, longing to grow into one, they were on the point of dying from hunger and self-neglect, because they

did not like to do anything apart; and when one of the halves died and the other survived, the survivor sought another mate, man or woman as we call them—being the sections of entire men or women—and clung to that. They were being destroyed, when Zeus in pity of them invented a new plan: he turned the parts of generation round to the front, for this had not been always their position, and they sowed the seed no longer as hitherto like grasshoppers in the ground, but in one another; and after the transposition the male generated in the female in order that by the mutual embraces of man and woman they might breed, and the race might continue; or if man came to man they might be satisfied, and rest, and go their ways to the business of life: so ancient is the desire of one another which is implanted in us, reuniting our original nature, making one of two, and healing the state of man.

“人被分成两个部分以后，每一半都渴望找到另一半，他们走到一起，伸出手来紧紧拥抱彼此，并渴望融为一体。他们做任何事都不想分开，所以他们几乎死于饥饿和自我忽视。而且当一半死去时，另一半还活着，活着的那一半就会寻找另一个伴侣，要么是整个男人剖开的一半，就是我们所称的男人，要么是整个女人剖开的一半，就是我们所称的女人——找到后就紧紧拥抱在一起。人类正在走向毁灭。宙斯怜悯他们，想出了一个新办法：他把生殖器移到前面，从前生殖器并不总是在这个位置，他们不再像今天的草蜢那样把卵产在地里，而是种在彼此的身体里。一番床笫之欢之后，男人就会让女人生育，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相互拥抱繁衍下一代，这样人类或许会延续。人与人相互拥抱，可以获得满足，感到放松，进而从事人生的正常工作。人类对彼此的渴望如此久远，想要再次结合成我们原始的状态，合二为一，以治愈人类的不安，这一点已经深植于人心。

“Each of us when separated, having one side only, like a flat

fish, is but the indenture of a man, and he is always looking for his other half. Men who are a section of that double nature which was once called Androgynous are lovers of women; adulterers are generally of this breed, and also adulterous women who lust after men: the women who are a section of the woman do not care for men, but have female attachments; the female companions are of this sort. But they who are a section of the male follow the male, and while they are young, being slices of the original man, they hang about men and embrace them, and they are themselves the best of boys and youths, because they have the most manly nature. Some indeed assert that they are shameless, but this is not true; for they do not act thus from any want of shame, but because they are valiant and manly, and have a manly countenance, and they embrace that which is like them. And these when they grow up become our statesmen, and these only, which is a great proof of the truth of what I am saving. When they reach manhood they are lovers of youth, and are not naturally inclined to marry or beget children—if at all, they do so only in obedience to the law; but they are satisfied if they may be allowed to live with one another unwedded; and such a nature is prone to love and ready to return love, always embracing that which is akin to him.

“被剖开时，我们每个人只有一半，就像比目鱼一样，只是每个人都有缺口，所以总是在寻找另一半。具有双重本性的雌雄同体被剖开后，成为男人的那一半眷恋女人，奸夫通常是来自这种人；成为女人的那一半眷恋男人，淫妇也是来自于这种人。由女人剖成的女人，并不喜欢男人而眷恋女人，女同性恋就出于这一类。由男人剖出的男人会追求男人。他们从少年时期就是男人的一部分，喜欢和男人作伴，并且和他睡在一起，他们是男孩和青年中最优秀的，因为他们最具有男子气概。有些人甚至断言他们是伤风败俗的，其实这种说法不对。因为他们不是想要给自己蒙羞才这样做的，而是因为他们英勇而

强壮，具有男人的沉着冷静，他们拥抱的是与他们相像的人。“这些人成年后成为了政治家，只有这些人，才能极好地证明我在保护的事实。壮年时，他们会眷恋青年男子，对娶妻生子没有天生的欲望——如果真的结了婚，他们也只是依法行事。但如果允许他们不结婚而住在一起，他们也会心满意足。他们这样的天性易于产生爱，并愿意回报爱，他们总是意气相投。

“And when one of them meets with his other half, the actual half of himself, whether he be a lover of youth or a lover of another sort, the pair are lost in an amazement of love and friendship and intimacy, and one will not be out of the other's sight, as I may say, even for a moment: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 pass their whole lives together; yet they could not explain what they desire of one another. For the intense yearning which each of them has towards the other does not appear to be the desire of lover's intercourse, but of something else which the soul of either evidently desires and cannot tell, and of which she has only a dark and doubtful presentiment. Suppose Hephaestus, with his instruments, to come to the pair who are lying side by side and to say to them, 'What do you people want of one another?' they would be unable to explain. And suppose further, that when he saw their perplexity he said: 'Do you desire to be wholly one; always day and night to be in one another's company? For if this is what you desire, I am ready to melt you into one and let you grow together, so that being two you shall become one, and while you live, live a common life as if you were a single man, and after your death in the world below still be one departed soul instead of two—I ask whether this is what you lovingly desire, and whether you are satisfied to attain this?'—there is not a man of them who when he heard the proposal would deny or would not acknowledge that this meeting and melting into one another, this becoming one instead of two, was the very expression of his ancient

need (compare Arist. *Pol.*). And the reason is that human nature was originally one and we were a whole, and the desire and pursuit of the whole is called love.

“当其中一个遇到他的另一半——他真正的另一半，这一对人就会沉浸在爱、友谊和亲密的奇妙关系之中，无论爱人年轻抑或如何。一方怎么都不会走出另一方的视线，甚至可以说是片刻不离。他们共度一生，却解释不出对彼此的渴望是什么。一半对另一半的这种强烈的渴望似乎不是与爱人的床笫之欢，而是明显渴望彼此灵魂中某种无以言表的东西，对此她仅有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预感。假使火神赫菲斯托斯，带着他的工具，来到并肩躺在一起的伴侣身旁，对他们说：‘你们需要彼此的什么呢？’他们不能做出解释。进一步推测，火神看到他们的疑惑时说：‘你们想要成为日夜相伴的一个人吗？如果这是你们想要的，我可以把你们融为一体，让你们一同成长，这样你们会变成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你们就好像一个人在正常生活；死后，在阴间仍然是一个灵魂而非两个——这是不是你们所钟爱的愿望，变成一个人能否使你们满意？’——当听到这个建议时，他们不会拒绝，或者否认他们盼望这样的相逢与融合，合二为一的想法正表达了他自古就有的需求（参考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原因是人类的本性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对于完整的渴望和追求即被称为爱。

“There was a time, I say, when we were one, but now because of the wickedness of mankind God has dispersed us, as the Arcadians were dispersed into villages by the Lacedaemonians (compare Arist. *Pol.*). And if we are not obedient to the gods, there is a danger that we shall be split up again and go about in basso-relievo, like the profile figures having only half a nose which are sculptured on monuments, and that we shall be like tallies. Wherefore let us exhort all men to piety, that we may avoid evil, and obtain the good, of which Love is to us the lord and minister;

and let no one oppose him—he is the enemy of the gods who opposes him. For if we are friends of the God and at peace with him we shall find our own true loves, which rarely happens in this world at present.

“从前，我们是一个人，现在由于人类的邪恶，上帝把我们分开了，就像阿卡迪亚人被斯巴达人分散到各个村庄一样（参考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如果不听从上帝的命令，我们就会有再被分割成两半的危险，如同浮雕一般。就好比人面图，仅剩下纪念碑上雕刻的半个鼻子，好像符契一样。因此我们劝诫所有人要虔诚，这样我们才可以摆脱邪恶，获得善意。爱神之于我们，就好比主人之于侍从。所有的人都要服从他——反对他的人就是众神的敌人。因为如果我们是爱神的朋友，并能与他和平相处，我们会找到当今世上罕见的真爱。

“I am serious, and therefore I must beg Eryximachus not to make fun or to find any allusion in what I am saying to Pausanias and Agathon, who, as I suspect, are both of the manly nature, and belong to the class which I have been describing. But my words have a wider application—they include men and women everywhere; and I believe that if our loves were perfectly accomplished, and each one returning to his primeval nature had his original true love, then our race would be happy. And if this would be best of all, the best in the next degree and under present circumstances must be the nearest approach to such a union; and that will be the attainment of a congenial love. Wherefore, if we would praise him who has given to us the benefit, we must praise the god Love, who is our greatest benefactor, both leading us in this life back to our own nature, and giving us high hopes for the future, for he promises that if we are pious, he will restore us to our original state, and heal us and make us happy and blessed.

“我是认真的，所以请厄律克西马库不要取笑我，也不要想着我这番话是暗指鲍塞尼阿斯和阿伽通。而他俩，据我推测，都具有男人的本性，属于我所描述的那一类人。但我的话有更广泛的应用——它包括任何地方的男人和女人。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们的爱有完美的结局，每个回归最初本性的人都得到了他的真爱，那么我们这个种族将会幸福。既然回归本性是最好的结果，那么达到这个目标的捷径并且是最好的途径就是得到一个合乎理想的爱人。因此，如果要赞颂给我们这种恩惠的人，就必须赞颂爱神，他是我们最大的恩人。他既指引我们在今生找到适合自己的人，又使我们对来生满怀希望。他许诺，如果我们是虔诚的，他就把我们回归到最初的状态，治愈我们，使我们幸福快乐。

“This, Eryximachus, is my discourse of love, which, although different to yours, I must beg you to leave unassailed by the shafts of your ridicule, in order that each may have his turn; each, or rather either, for Agathon and Socrates are the only ones left.”

“厄律克西马库，这就是我关于爱的演讲，虽然与你的不同，但是请你不要拿它来开玩笑，我们还得听听其他人的观点，至少还有阿伽通和苏格拉底两位没有发言。”

“Indeed, I am not going to attack you,” said Eryximachus, “for I thought your speech charming, and did I not know that Agathon and Socrates are masters in the art of love, I should be really afraid that they would have nothing to say, after the world of things which have been said already. But, for all that, I am not without hopes.”

“实际上我没打算攻击你，”厄律克西马库说道，“因为我认为你的演讲很有魅力。而且如果我不知道阿伽通和苏格拉底是精通爱情这门艺术的大师，在谈论了这么多之后，我真担心他们会无话可说。但是虽然如此，我依旧充满期待。”

Socrates said: “You played your part well, Eryximachus; but if you were as I am now, or rather as I shall be when Agathon has spoken, you would, indeed, be in a great strait.”

苏格拉底说：“你说得很好，厄律克西马库。但是如果你现在处在我的位置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你处在阿伽通说完后我将要面对的状态，那么你真的会有大麻烦。”

“You want to cast a spell over me, Socrates,” said Agathon, “in the hope that I may be disconcerted at the expectation raised among the audience that I shall speak well.”

阿伽通说：“苏格拉底，你是想迷惑我吧，希望我一想到听众指望我说出一番漂亮话，而变得惶恐不安。”

“I should be strangely forgetful,” Agathon replied Socrates, “of the courage and magnanimity which you showed when your own compositions were about to be exhibited, and you came upon the stage with the actors and faced the vast theatre altogether undismayed, if I thought that your nerves could be fluttered at a small party of friends.”

阿伽通回答苏格拉底说："我记得你将要演讲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雅量，以及你和演员们一起登台面对巨大的剧院所表现的镇定自若，如果我以为你面对一小群人就会紧张起来的话，那我得多健忘啊。"

"Do you think, Socrates," said Agathon, "that my head is so full of the theatre as not to know how much more formidable to a man of sense a few good judges are than many fools?"

阿伽通说："苏格拉底，你以为我满脑子都是戏剧，都不知道几个有头脑的人要比一群愚者要可怕得多吗？"

"Nay," replied Socrates, "I should be very wrong in attributing to you, Agathon, that or any other want of refinement. And I am quite aware that if you happened to meet with any whom you thought wise, you would care for their opinion much more than for that of the many. But then we, having been a part of the foolish many in the theatre, cannot be regarded as the select wise; though I know that if you chanced to be in the presence, not of one of ourselves, but of some really wise man, you would be ashamed of disgracing yourself before him—would you not?"

苏格拉底回答道："不，阿伽通，我把刚才那个或其他需要改进的地方都归咎于你，是我的错。而且我非常明白，如果你碰巧遇到你认为明智的人，你将会更加注意他们的观点而不是大多数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剧场中众多愚者的一部分，不能被视为遴选出来的智者。虽然我知道，如果你碰巧遇到的不是我们其中的一员，而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在他面前，你也会因让自己丢脸而感到羞耻——难

道不是吗？”

“Yes,” said Agathon.

“是的。”阿伽通说。

“But before the many you would not be ashamed, if you thought that you were doing something disgraceful in their presence?”

“如果你在众人面前做了丢脸的事，你不会觉得羞愧吗？”

Here Phaedrus interrupted them, saying: “not answer him, my dear Agathon; for if he can only get a partner with whom he can talk, especially a good-looking one, he will no longer care about the completion of our plan. Now I love to hear him talk; but just at present I must not forget the encomium on Love which I ought to receive from him and from every one. When you and he have paid your tribute to the god, then you may talk.”

此时裴德罗打断了他们，说：“别回答他，我亲爱的阿伽通；因为如果他能找到一个谈话的伙伴，尤其是一个英俊的伙伴，他就不会关心我们的计划是否能完成了。尽管我爱听他辩论，但是此时我不能忘记对爱神的赞美，这是我应该从他和每一位演讲者那里听到的。你和他向爱神做完礼赞后再辩论吧。”

“Very good, Phaedrus,” said Agathon; “I see no reason why I should not proceed with my speech, as I shall have many other opportunities of conversing with Socrates. Let me say first how I ought to speak, and then speak:—

阿伽通说：“非常好，裴德罗，看来没有理由不开始我的演讲了，因为我会有很多与苏格拉底交流的机会。我先说说我应该怎样讲，然后再讲。

“The previous speakers, instead of praising the god Love, or unfolding his nature, appear to have congratulated mankind on the benefits which he confers upon them. But I would rather praise the god first, and then speak of his gifts; this is always the right way of praising everything. May I say without impiety or offence, that of all the blessed gods he is the most blessed because he is the fairest and best? And he is the fairest: for, in the first place, he is the youngest, and of his youth he is himself the witness, fleeing out of the way of age, who is swift enough, swifter truly than most of us like:—Love hates him and will not come near him; but youth and love live and move together—like to like, as the proverb says. Many things were said by Phaedrus about Love in which I agree with him; but I cannot agree that he is older than Iapetus and Kronos:—not so; I maintain him to be the youngest of the gods, and youthful ever.

“前面的演讲者们，似乎并没有赞扬爱神，或者是阐明他的本性，就已经开始庆祝人类从他那里得到的恩惠了。但是我更愿意先赞扬爱神，然后再谈他的赠予，这才是赞扬万物的正确方式。并非出于不敬或冒犯，我认为在所有被尊崇的神中，爱神是最受人们尊敬的，

因为他是最美丽、最好的。他是最美丽的，因为首先他是最年轻的，关于他的青春，他本人就是见证人，他逃离了岁月的侵蚀，动作十分敏捷，实在是比我们大多数人敏捷得多——爱神憎恨衰老，不愿靠近它。所以爱神喜欢和年轻人一起生活一起行动——正如谚语所说：物以类聚。裴德罗说的很多关于爱神的事情，我都赞同，但是他说爱神比伊阿珀托斯和克罗诺斯还要年长，我不敢苟同。我坚持认为他在众神中是最年轻的一位，而且永远年轻。

“The ancient doings among the gods of which Hesiod and Parmenides spoke, if the tradition of them be true, were done of Necessity and not of Love; had Love been in those days,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chaining or mutilation of the gods, or other violence, but peace and sweetness, as there is now in heaven, since the rule of Love began. Love is young and also tender; he ought to have a poet like Homer to describe his tenderness, as Homer says of Ate, that she is a goddess and tender:—'Her feet are tender, for she sets her steps, Not on the ground but on the heads of men:' herein is an excellent proof of her tenderness—that she walks not upon the hard but upon the soft. Let us adduce a similar proof of the tenderness of Love; for he walks not upon the earth, nor yet upon the skulls of men, which are not so very soft, but in the hearts and souls of both gods and men, which are of all things the softest: in them he walks and dwells and makes his home. Not in every soul without exception, for where there is hardness he departs, where there is softness there he dwells; and nestling always with his feet and in all manner of ways in the softest of soft places, how can he be other than the softest of all things?

“如果关于诸神的传说真实的话，那么赫西俄德和巴门尼德提到的众神在古时候所做的事情，则是定命神所为，而不是爱神。如果爱

神生长在那个时期，众神中就不会有囚禁或残害，或其他暴力的存在，只会和平而甜美，就像现在的天国。自从由爱神统治诸神开始便是如此。爱神既年轻又温柔，应该有一位像荷马一样的诗人去描写他的温柔，荷马描述埃特时说她是一位性格温和的女神：‘她的双脚娇嫩，因为从不接触地面，而是踩在人的头上。’这极好地证明了她的温柔——她不走在硬物上而是走在柔软的东西上。我们举一个能证明爱神温柔的相似例子：他不是走在陆地上，也不是走在不怎么柔软的人的头骨上，而是行走在神和人的心和灵魂里。心和灵魂可是万物中最柔软的——他走在其中，住在其中并在心和灵魂中筑巢。当然，他并不是存在于每一个灵魂之中，因为当灵魂变得冷酷时他就会离开，变得温柔时他就会停留在那里。他用双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安居在柔软地方的最柔软之处，他怎能不是万物中最温柔的呢？

“Of a truth he is the tenderest as well as the youngest, and also he is of flexile form; for if he were hard and without flexure he could not enfold all things, or wind his way into and out of every soul of man undiscovered. And a proof of his flexibility and symmetry of form is his grace, which is universally admitted to be in an especial manner the attribute of Love; ungrace and love are always at war with one another. The fairness of his complexion is revealed by his habitation among the flowers; for he dwells not amid bloomless or fading beauties, whether of body or soul or aught else, but in the place of flowers and scents, there he sits and abides. Concerning the beauty of the god I have said enough; and yet there remains much more which I might say.

“事实上他是最温柔、最年轻的，而且他有柔软而灵活的身体；因为如果他坚硬不能弯曲，他就不能拥抱万物，或蜿蜒地出入每个人的灵魂而不被察觉。他身体的灵活性和对称性证实了他的魅力，从某种特殊意义上来说，这是世间公认的爱神的特质，丑恶和爱总是水火

不容的。他白皙的面容在他栖身的花朵中显现。无论身体、灵魂或其他任何事物中，若其花朵凋落或美丽衰退，他就不会在其中停留。他栖身的地方一定繁花芬芳。关于这位神的美丽我说的已经够多了，但是可说的话还有很多。

“Of his virtue I have now to speak: his greatest glory is that he can neither do nor suffer wrong to or from any god or any man; for he suffers not by force if he suffers; force comes not near him, neither when he acts does he act by force. For all men in all things serve him of their own free will, and where there is voluntary agreement, there, as the laws which are the lords of the city say, is justice. And not only is he just but exceedingly temperate, for Temperance is the acknowledged ruler of the pleasures and desires, and no pleasure ever masters Love; he is their master and they are his servants; and if he conquers them he must be temperate indeed.

“现在我要说说他的美德：他最大的荣誉就是他既不加害于神或人也不受神或人的欺压。因为即使他要忍受，也不是忍受暴力，因为暴力根本不能靠近他，他也从来不使用暴力行事。因为所有人的爱情都是出于自愿的，就像城邦的君主们所制定的法律一样，有自愿的协议，就有公正。他不仅公正而且极其有节制，因为“节制”公认是肉体的享受和欲望的主宰者，爱神从不受到这些享受的控制。爱神是它们的主人，而它们是爱神的仆人。实际上如果爱神要征服它们，他就必须得有节制。

“As to courage, even the God of War is no match for him; he is the captive and Love is the lord, for love, the love of Aphrodite, masters him, as the tale runs; and the master is stronger than the servant.

“至于勇敢，即使是战神也不能与他相比。爱神是统治者，战神被爱神制服，被阿弗洛狄忒所制服。就像故事里传诵的那样：主人就是比仆人强大。如若爱神要征服世间最勇敢的，他本人必须是最勇敢的。

“And if he conquers the bravest of all others, he must be himself the bravest. Of his courage and justice and temperance I have spoken, but I have yet to speak of his wisdom; and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my ability I must try to do my best. In the first place he is a poet (and here, like Eryximachus, I magnify my art), and he is also the source of poesy in others, which he could not be if he were not himself a poet. And at the touch of him every one becomes a poet, even though he had no music in him before (A fragment of the Sthenoaoea of Euripides.); this also is a proof that Love is a good poet and accomplished in all the fine arts; for no one can give to another that which he has not himself, or teach that of which he has no knowledge. Who will deny that the creation of the animals is his doing? Are they not all the works of his wisdom, born and begotten of him? And as to the artists, do we not know that he only of them whom love inspires has the light of fame?—he whom Love touches not walks in darkness. The arts of medicine and archery and divination were discovered by Apollo, under the guidance of love and desire; so that he too is a disciple of Love. Also the melody of the Muses, the metallurgy of Hephaestus, the weaving of Athene, the empire of Zeus over gods and men, are all due to Love, who was the inventor of them. And so Love set in order the empire of the gods—the love of beauty, as is evident, for with deformity Love has no concern. In the days of old, as I began by saying, dreadful deeds were done among the gods, for they were ruled by Necessity; but now since the birth of Love, and from the

Love of the beautiful, has sprung every good in heaven and earth.

“对于爱神的勇气、正义和节制我已经谈了很多，但是我还是要说说他的智慧。这一方面我必须要竭尽全力地说好。首先爱神是一位诗人（就像厄律克西马库一样，我也要赞美我的行业），他也是其他人诗歌创作的源泉，如果爱神本人不是诗人，那么他不可能成为诗歌的源泉。‘每个碰到爱神的人都会变成诗人，即使之前他不懂音乐’（来自欧里庇得斯的残篇）。这也证明爱神是一位优秀的诗人，精通各种和美有关的艺术。因为如果一个人自身不具有某种东西，他是不能把它给予他人的，或者说他不可能教授连他自己都不懂的事情。所有出现的动物，有谁敢说不是爱神的功劳？难道它们不是爱神智慧的结晶吗？难道不是由他而生吗？至于艺术家，难道我们不知道只有受到爱神启发的人才会有获得名望的机会？——未曾受教于爱神的人都会黯淡无光。在爱情和欲望的指引下，阿波罗发明了医药、箭术和占卜术，所以他是爱神的信徒。同样，缪斯所演奏的音乐，火神赫菲斯托斯的冶金术，雅典娜的编织术，宙斯对神和人的绝对统治，都可以归功于爱神，因为是爱神启发了他们。所以爱神使诸神的工作有了秩序，这显然是由于对美的热爱，因为爱神不关心畸形的所在。就像我开始说的，古时候，定命神主事，众神之间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但自从爱神诞生以来，人们就开始喜好美的东西，因此产生了天上和人间的一切幸福。

“Therefore, Phaedrus, I say of Love that he is the fairest and best in himself, and the cause of what is fairest and best in all other things. And there comes into my mind a line of poetry in which he is said to be the god who 'Gives peace on earth and calms the stormy deep, who stills the winds and bids the sufferer sleep.' This is he who empties men of disaffection and fills them with affection, who makes them meet together at banquets such as these: in sacrifices, feasts, dances, he is our lord—who sends courtesy and

sends away discourtesy, who gives kindness ever and never gives unkindness; the friend of the good, the wonder of the wise, the amazement of the gods; desired by those who have no part in him, and precious to those who have the better part in him; parent of delicacy, luxury, desire, fondness, softness, grace; regardful of the good, regardless of the evil: in every word, work, wish, fear—saviour, pilot, comrade, helper; glory of gods and men, leader best and brightest: in whose footsteps let every man follow, sweetly singing in his honour and joining in that sweet strain with which love charms the souls of gods and men.

“因此，裴德罗，我说爱神他本人是最美丽、最优秀的，他也创立了各种公正、优秀的事物。有一行诗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诗文里说爱神造就了‘和平的人间，平静的海洋，消散了暴风，平息了苦难’。他消除了人类的不满，产生了友善，是他让人们在祭典，宴席，舞会等等这样的场合上相遇，他是我们的主——他迎来和睦，除去凶暴，给予仁慈，消除恶意，他永远善良、仁慈，从不刻薄。所以，他带来美好的友谊，引起哲人的羡慕、神明的赞叹。缺乏爱的人渴望得到它，拥有爱的人又万般珍惜它。他是微妙、奢侈、愿望、爱好、温柔、优雅的父亲，他关注美德，无视邪恶。在工作中他领导我们，在困苦中他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在逐梦的过程中他是我们的伴侣。他是神和人的荣耀，是最优秀、最聪明的领导者，每个人都追寻他的脚步，唱着甜蜜的歌赞美他，并且加入到使人和神皆大欢喜的旋律中。

“Such is the speech, Phaedrus, half-playful, yet having a certain measure of seriousness, which, according to my ability, I dedicate to the god.”

“这就是我的颂辞，裴德罗，尽我所能使这篇颂辞时而庄重，时

而诙谐幽默，我把它奉献给爱神。”

When Agathon had done speaking, Aristodemus said that there was a general cheer; the young man was thought to have spoken in a manner worthy of himself, and of the god. And Socrates, looking at Eryximachus, said: “Tell me, son of Acumenus, was there not reason in my fears? And was I not a true prophet when I said that Agathon would make a wonderful oration, and that I should be in a strait?”

当阿伽通做完演讲，阿里斯托得摩斯说大家发出了一片欢呼声。大家认为这位年轻人在某种程度上对得起他自己，也对得起爱神。苏格拉底看着厄律克西马库说：“告诉我，阿库美努之子，我的担心难道没有道理吗？我早就说过，阿伽通会做出一番精彩的演讲，使我很难接着讲下去，这难道不是我的先见之明吗？”

“The part of the prophecy which concerns Agathon,” replied Eryximachus, “appears to me to be true; but not the other part—that you will be in a strait.”

厄律克西马库答道：“你确实说阿伽通会说得很好，但是你说你很难接着讲下去，这一点我却不同意。”

“Why, my dear friend,” said Socrates, “must not I or any one be in a strait who has to speak after he has heard such a rich and varied discourse? I am especially struck with the beauty of the concluding words—who could listen to them without amazement?

When I reflected on the immeasurable inferiority of my own powers, I was ready to run away for shame, if there had been a possibility of escape. For I was reminded of Gorgias, and at the end of his speech I fancied that Agathon was shaking at me the Gorginian or Gorgonian head of the great master of rhetoric, which was simply to turn me and my speech into stone, as Homer says (*Odyssey*), and strike me dumb.

苏格拉底说："我亲爱的朋友，不光是我，就是任何一个人，在听到那样一番华丽而别具一格的颂辞之后再发言，不都会感觉陷入困境之中吗？结束语的美妙尤为打动我——有谁听了会不觉得惊奇？无论如何我说的也没那么好，如果可以逃避的话，我随时会因羞愧而逃走。因为我想起高尔吉亚，我的心情就像荷马在《奥德赛》里所描述的，想象着阿伽通收尾时向我摇晃着修辞大师的可怕的头，只此一下就会使我和我的演讲陷入僵局，让我哑口无言。

"And then I perceived how foolish I had been in consenting to take my turn with you in praising love, and saying that I too was a master of the art, when I really had no conception how anything ought to be praised. For in my simplicity I imagined that the topics of praise should be true, and that this being presupposed, out of the true the speaker was to choose the best and set them forth in the best manner. And I felt quite proud, thinking that I knew the nature of true praise, and should speak well. Whereas I now see that the intention was to attribute to Love every species of greatness and glory, whether really belonging to him or not, without regard to truth or falsehood—that was no matter; for the original proposal seems to have been not that each of you should really praise Love, but only that you should appear to praise him. And so you attribute to Love every imaginable form of praise which can be gathered

anywhere; and you say that 'he is all this,' and 'the cause of all that,' making him appear the fairest and best of all to those who know him not, for you cannot impose upon those who know him. And a noble and solemn hymn of praise have you rehearsed. But as I misunderstood the nature of the praise when I said that I would take my turn, I must beg to be absolved from the promise which I made in ignorance, and which (as Euripides would say (Eurip. *Hyppolytus*) was a promise of the lips and not of the mind. Farewell then to such a strain: for I do not praise in that way; no, indeed, I cannot. But if you like to hear the truth about love, I am ready to speak in my own manner, though I will not make myself ridiculous by entering into any rivalry with you. Say then, Phaedrus, whether you would like to have the truth about love, spoken in any words and in any order which may happen to come into my mind at the time. Will that be agreeable to you?”

“于是我感觉到，当初答应和你们轮流颂扬爱神，并且说自己也是位艺术大师，是多么愚蠢可笑，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颂扬一个对象。因为以我的愚见，我想赞美的主题应该是真实而准确的，以此为基础，然后要从真实的事中去选择最好的，并以最佳的方式把它们陈述出来。我觉得非常骄傲，有自信会说得很好，因为我自以为知道怎样做颂辞。然而现在看来，颂扬就是要把所有的伟大和光荣归功于爱神，不管是否真的属于他，也无论是真是假，就算是假的也没关系。因为最初的提议似乎并不是说你们每个人要真实地赞美爱神，而是说每个人要装出颂扬的模样来。因此你们把从任何地方得到的，各种可以想象的赞美的语句都用在爱神身上。你们说：‘这些都是赞美他的，’“一切都由他而生，’来显示出爱神是最美的、最好的，但这只是无知之徒的看法，有识之士绝非这样认为。你们已经排练出高贵而庄严的颂辞。但是当时我同意和你们轮流赞美爱神，是因为我曲解了赞美的本质，我必须请求免除我在无知中许下的诺言，那只是口头答应，而非内心真正同意（就像欧里庇得斯在《希波吕托斯》中所说

的）。对这样格调的赞美说再见吧，因为我不能以那样的方式赞美。的确，我也根本不会。但是如果你们喜欢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说，而不是和你们比口才，最后使自己成为笑柄，那我愿意来试一试。那么，裴德罗，说说吧，是想听一番颂扬爱神的话，还是让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同意吗？”

Aristodemus said that Phaedrus and the company bid him speak in any manner which he thought best. “Then,” he added, “let me have your permission first to ask Agathon a few more questions, in order that I may take his admissions as the premisses of my discourse.”

阿里斯托得摩斯说裴德罗和他的同伴都请求苏格拉底说下去，随他用什么方式。然后，苏格拉底又补充道：“请你允许我先问阿伽通另外一些问题，先得到他的同意，再说我的话。”

“I grant the permission,” said Phaedrus; “put your questions.”

裴德罗说：“我同意，提问吧。”

Socrates then proceeded as follows:—“In the magnificent oration which you have just uttered, I think that you were right, my dear Agathon, in proposing to speak of the nature of Love first and afterwards of his works—that is a way of beginning which I very much approve. And as you have spoken so eloquently of his nature, may I ask you further, whether love is the love of something or of nothing? And here I must explain myself: I do not want you to say

that love is the love of a father or the love of a mother—that would be ridiculous; but to answer as you would, if I asked is a father a father of something? To which you would find no difficulty in replying, of a son or daughter: and the answer would be right.”

苏格拉底接着就开始发言，他说：“在你刚刚说出的华丽的颂辞里，我认为你是对的，我亲爱的阿伽通，你提出先讲爱神的本性，然后讲他的善行——我非常赞同这样的开头。既然你如此富有表现力地讲出了爱神的本性，我还想请问一下：爱神之为爱神，是爱人呢，还是不爱任何人？此处我必须要亲自解释一下，我的意思并不是问：爱神是爱母亲，还是爱父亲？——那样问很可笑。我是问，在说父亲的时候，我要问父亲是某个人的父亲，还是并非什么人的父亲。你会发现很容易妥当的回答，你当然会说，是儿子的父亲或是女儿的父亲，对不对？”

“Very true,” said Agathon.

阿伽通说：“当然。”

“And you would say the same of a mother?”

“母亲也是这样吗？”

He assented.

阿伽通表示赞同。

“Yet let me ask you one more question in order to illustrate my meaning: Is not a brother to be regarded essentially as a brother of something?”

“然而让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以便阐明我的意思：一个哥哥之所以被称为哥哥，是不是因为他是某个人的哥哥？”

“Certainly,” he replied.

阿伽通答道：“当然。”

“That is, of a brother or sister?”

“也就是弟弟或妹妹的哥哥？”

“Yes,” he said.

“是。”阿伽通说。

“And now,” said Socrates, “I will ask about Love:—Is Love of something or of nothing?”

“现在，”苏格拉底说，“我要问你关于爱神的事了——爱神的爱是不是对某个人的爱？”

“Of something, surely,” he replied.

“当然，是对某个人的爱。”他答道。

“Keep in mind what this is, and tell me what I want to know—whether Love desires that of which love is.”

“记住这话，并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爱神是否渴望那样的爱。”

“Yes, surely.”

“是的，当然。”

“And does he possess, or does he not possess, that which he loves and desires?”

“他是否拥有他所热爱和渴望的事物？”

“Probably not, I should say.”

“我得说，可能没有。”

“Nay,” replied Socrates, “I would have you consider whether 'necessarily' is not rather the word. The inference that he who desires something is in want of something, and that he who desires nothing is in want of nothing, is in my judgment, Agathon, absolutely and necessarily true. What do you think?”

苏格拉底回答道：“不行，请你确定地说是还是不是，不要含糊其辞，要坚定地说‘必定’。你想，一个人盼望某样东西，他必定需要那样东西，有了这个东西他肯定就不盼望了。在我看来，这一点毋庸置疑。阿伽通，你怎么看？”

“I agree with you,” said Agathon.

阿伽通说：“我同意你的观点。”

“Very good. Would he who is great, desire to be great, or he who is strong, desire to be strong?”

“非常好，一个伟大的人就渴望伟大吗？一个强壮的人就渴望强壮吗？”

“That would be inconsistent with our previous admissions.”

“如果那样的话，就与我们之前的提出的观点相矛盾了。”

“True. For he who is anything cannot want to be that which he is?”

“的确是。因为他有了某种品质，他就不再想要它了？”

“Very true.”

“非常正确。”

“And yet,” added Socrates, “if a man being strong desired to be strong, or being swift desired to be swift, or being healthy desired to be healthy, in that case he might be thought to desire something which he already has or is. I give the example in order that we may avoid misconception. For the possessors of these qualities, Agathon, must be supposed to have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at the time, whether they choose or not; and who can desire that which he has? Therefore, when a person says, I am well and wish to be well, or I am rich and wish to be rich, and I desire simply to have what I have—to him we shall reply: 'You, my friend, having wealth and health and strength, want to have the continuance of them; for at this moment, whether you choose or no, you have them. And when you say, I desire that which I have and nothing else, is not your

meaning that you want to have what you now have in the future?' He must agree with us—must he not?”

苏格拉底又说到：“如果一个强大的人渴望强大，敏捷的人想要敏捷，健康的想要健康，那样的话，别人会认为他还想要他已经拥有或具有的某种品质。我给出的这个例子是为了让我们避免误解。因为具有这些品质的人，无论他们作何选择，在那时就应该有了各自的优势，阿伽通。谁还想要他已经拥有了的品质？因此，当有人说，我本来健康，现在还渴望健康，或者我本来富有，现在还渴望富有，我仅仅渴望拥有我已经拥有的——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应回答：‘我的朋友，你拥有财富、健康和力量，是盼望着在将来继续拥有它们，因为在那一刻，无论你作何选择，你已经拥有了它们。当你说，你盼望得到已经拥有的，别无它求，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所拥有的，将来也想拥有，对不对？’他一定会承认的，对吗？”

“He must,” replied Agathon.

阿伽通回答道：“他一定会。”

“Then,” said Socrates, “he desires that what he has at present may be preserved to him in the future, which is equivalent to saying that he desires something which is non-existent to him, and which as yet he has not got:”

苏格拉底说：“那么，他现在渴望拥有的东西，将来可能会有，这就等同说他渴望某些不存在、现在还未得到的东西。”

“Very true,” he said.

“的确是。”阿伽通说。

“Then he and every one who desires, desires that which he has not already, and which is future and not present, and which he has not, and is not, and of which he is in want;—these are the sort of things which love and desire seek?”

“那么他和每个人都渴望，渴望现在还没有的，渴望现在得不到而将来有的，渴望现在还没有的、不存在的，这样的东西他才盼望，他才会爱。”

“Very true,” he said.

“的确是的。”阿伽通说。

“Then now,” said Socrates, “let us recapitulate the argument. First, is not love of something, and of something too which is wanting to a man?”

苏格拉底说，“那么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所说的话。这就是：爱神首先是爱某样东西，其次是爱他所欠缺的东西，对吗？”

“Yes,” he replied.

“是的。”他回答。

“Remember further what you said in your speech, or if you do not remember I will remind you: you said that the love of the beautiful set in order the empire of the gods, for that of deformed things there is no love—did you not say something of that kind?”

“进一步回忆你在演讲时所说的内容，如果你忘记了我会提醒你的，你说热爱美好的事物使得众神的帝国井然有序，因为爱神不爱丑陋的事——你刚才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Yes,” said Agathon.

“是的。”阿伽通说。

“Yes, my friend, and the remark was a just one. And if this is true, Love is the love of beauty and not of deformity?”

“是的，我的朋友，你说的话很对。如果真是如此，爱神就是爱美丽的事物而不爱丑陋的事物了？”

He assented.

阿伽通表示赞同。

“And the admission has been already made that Love is of something which a man wants and has not?”

“可是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一个人爱他想要的、没有的东西？”

“True,” he said.

“的确是。”阿伽通说。

“Then Love wants and has not beauty?”

“那么爱神就缺少、没有美的东西咯？”

“Certainly,” he replied.

“当然。”阿伽通答道。

“And would you call that beautiful which wants and does not possess beauty?”

“那缺少美、没有美的东西，你说它美吗？”

“Certainly not.”

“当然不会。”

“Then would you still say that love is beautiful?”

“既然如此，你还能说爱神是美的吗？”

Agathon replied: “I fear that I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I was saying.”

阿伽通回答道：“我恐怕不能理解我刚才说的话了。”

“You made a very good speech, Agathon, replied Socrates; but there is yet one small question which I would fain ask:—Is not the good also the beautiful?”

苏格拉底回答道：“阿伽通，你的演讲很精彩，但是我仍然有一个小问题：你是不是认为好的东西也是美的？”

“Yes.”

“是的。”

“Then in wanting the beautiful, love wants also the good?”

“好的东西也是美的，既然爱神缺乏美的东西，那他是不是也缺乏好的东西？”

“I cannot refute you, Socrates,” said Agathon—“Let us assume that what you say is true.”

阿伽通说：“我不能驳倒你，苏格拉底，就依你说的吧。”

“Say rather, beloved Agathon, that you cannot refute the truth; for Socrates is easily refuted.

“亲爱的阿伽通，更确切地说，你不能驳倒的是真理，苏格拉底是很容易被驳倒的。

“And now, taking my leave of you, I would rehearse a tale of love which I heard from Diotima of Mantineia (compare *1 Alcibiades*), a woman wise in this and in many other kinds of knowledge, who in the days of old, when the Athenians offered sacrifice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plague, delayed the disease ten years. She was my instructress in the art of love, and I shall repeat to you what she

said to me, beginning with the admissions made by Agathon, which are nearly if not quite the same which I made to the wise woman when she questioned me: I think that this will be the easiest way, and I shall take both parts myself as well as I can (compare *Gorgias*). As you, Agathon, suggested (supra), I must speak first of the being and nature of Love, and then of his works. First I said to her in nearly the same words which he used to me, that Love was a mighty god, and likewise fair; and she proved to me as I proved to him that, by my own showing, Love was neither fair nor good.

“我现在放开你，我要讲述一个关于爱神的传说，这是从曼蒂尼亚女人第俄提玛那里听来的（参考《亚西比德篇》）。她是一个智慧的女人，了解祭祀和许多其他的知识，她以前劝说过雅典人，让他们在瘟疫到来之前祭神攘疫，并且她的劝说使那场瘟疫推迟了十年。在爱的这门艺术中她是我的导师，我要把她对我所说的转述给你，按照阿伽通许可的方式开始，虽然做不到完全一样，但也争取做到和那位博学的女人问我时所说的一样。我想这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会尽可能的把这两部分讲述好（参考《高尔吉亚篇》）。按照阿伽通在前面所建议的，我必须首先讲一下爱神的品格和本质，然后再谈他的善行。我对她说的话和阿伽通对我说的话一模一样，我说过爱神是一位伟大的神，同样也是美的。她驳斥我的话也和我驳斥阿伽通的话一模一样，她认为按照我的话来讲，爱神既不美丽也不善良。

“'What do you mean, Diotima,' I said, 'is love then evil and foul?'

“‘第俄提玛，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你怎么说爱神是丑的恶的呢？’

“'Hush,' she cried; 'must that be foul which is not fair?'

“‘嘘，’她喊道，‘不美就一定是丑的吗？’

“'Certainly,' I said.

“‘当然。’我说。

“'And is that which is not wise, ignorant? Do you not see that there is a mean between wisdom and ignorance?'

“‘不智慧就是无知吗？你没有想到智慧和无知之间有一个中间状态吗？’

“'And what may that be?' I said.

“‘那是什么呢？’我说。

“'Right opinion,' she replied; 'which, as you know, being incapable of giving a reason, is not knowledge (for how can knowledge be devoid of reason? nor again, ignorance, for neither can ignorance attain the truth), but is clearly something which is a mean between ignorance and wisdom.'

“她答道：‘如你所知，一个人有正确的意见却说不出原因，说明他没有知识（因为知识需要根据），但他也不是无知（因为无知没有正确内容）。所以很清楚，正确的观点是介于无知和智慧之间的某种东西。’

“'Quite true,' I replied.

“‘非常正确。’我回答道。

“'Do not then insist,' she said, 'that what is not fair is of necessity foul, or what is not good evil; or infer that because love is not fair and good he is therefore foul and evil; for he is in a mean between them.'

“她说：‘那么你坚持认为不美的就必是丑的，不好的就一定是坏的，这些观点都是错的。或者推断出：爱神既不美也不好，因此他就必定丑、必定坏。他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Well,' I said, 'Love is surely admitted by all to be a great god.'

“我说：‘可是所有人都承认爱神是位伟大的神。’

“'By those who know or by those who do not know?'

“‘你说的所有人是指无知之徒还是有识之士呢？’

“'By all.'

“‘各式各样的人。’

“'And how, Socrates,' she said with a smile, 'can Love be acknowledged to be a great god by those who say that he is not a god at all?'

“于是她笑着说：‘苏格拉底啊，他们既然不承认他是神，怎么能承认他很伟大呢？’

“'And who are they?' I said.

“‘他们是谁？’我说。

“'You and I are two of them,' she replied.

“‘你和我就是他们中的两个。’她回答道。

“'How can that be?' I said.

“‘你为什么这样认为？’我说。

“'It is quite intelligible,' she replied; 'for you yourself would acknowledge that the gods are happy and fair—of course you would—would you dare to say that any god was not?'

“‘这是相当明了的，’她答道，‘因为你本人就承认过神是美的幸福的——当然你会承认——你有胆量说哪个神不美不幸福吗？’

“'Certainly not,' I replied.

“‘当然不会。’我回答。

“'And you mean by the happy, those who are the possessors of things good or fair?'

“‘你的意思是幸福的人，就是那些拥有美的东西或好的东西的人？’

“'Yes.'

“‘是的。’

“'And you admitted that Love, because he was in want, desires those good and fair things of which he is in want?'

“‘你承认过爱神正是缺乏美的东西和好的东西，所以才盼望这种东西？’

“'Yes, I did.'

“‘是的，我承认。’

“'But how can he be a god who has no portion in what is either good or fair?'

“‘但是如果他既不善良也不美丽，他又怎么可能成为神呢？’

“'Impossible.'

“‘不可能。’

“'Then you see that you also deny the divinity of Love.'

“‘那么你看，你又否认了爱神的神性。’

“'What then is Love?' I asked; 'Is he mortal?'

“‘那么爱神是什么呢？’我问道，‘他是永生的吗？’

“'No.'

“‘不是。’

“'What then?'

“‘那么他是什么？’

“'As in the former instance, he is neither mortal nor immortal, but in a mean between the two.'

“‘就和前面的例子里介绍的一样，他既不会像凡人一样注定有一死，也不会像神一样长生不老，但是他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What is he, Diotima?'

“‘第俄提玛，那他到底是什么呢？’

“'He is a great spirit (daimon), and like all spirits he is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divine and the mortal.'

“‘他是一位伟大的精灵，就像所有精灵一样，他介乎于神和人之间。’

“'And what,' I said, 'is his power?'

“‘那么，’我说，‘他具有怎样的能力？’

“'He interprets,' she replied, 'between gods and men, conveying and taking across to the gods the prayers and sacrifices of men, and to men the commands and replies of the gods; he is the mediator who spans the chasm which divides them, and therefore in him all is bound together, and through him the arts of the prophet and the priest, their sacrifices and mysteries and charms, and all prophecy and incantation, find their way. For God mingles not with man; but through Love all the intercourse and converse of God with man, whether awake or asleep, is carried on. The wisdom which understands this is spiritual; all other wisdom, such as that of arts and handicrafts, is mean and vulgar. Now these spirits or intermediate powers are many and diverse, and one of them is Love.'

“‘他是一位神与人之间的信使，’她答道，‘在神与人之间，他把人类的祈祷和祭品传递给众神，再把神的命令和回复传达给人类。他是一位中间人，跨越了分开神与人之间的鸿沟，因此一切都能通过他来

连接汇聚。通过他，先知和祭司念出咒语、做出预言，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他们的牺牲、神秘和魅力也得以体现。虽然神不与人交往，但是通过爱神，神与人的所有来往和谈话，无论在清醒时还是在睡梦中，都被传递给彼此。懂得这种交流的智慧才是神圣而崇高的。艺术和手工艺方面的才智，则微不足道且普普通通。这些精灵——或称之为中间媒介——数量众多、种类各异，其中之一就有爱神。’

“'And who,' I said, 'was his father, and who his mother?'

“我说：‘他的父亲和母亲是谁？’

“'The tale,' she said, 'will take time; nevertheless I will tell you. On the birthday of Aphrodite there was a feast of the gods, at which the god Poros or Plenty, who is the son of Metis or Discretion, was one of the guests. When the feast was over, Penia or Poverty, as the manner is on such occasions, came about the doors to beg. Now Plenty who was the worse for nectar (there was no wine in those days), went into the garden of Zeus and fell into a heavy sleep, and Poverty considering her own straitened circumstances, plotted to have a child by him, and accordingly she lay down at his side and conceived Love, who partly because he is naturally a lover of the beautiful, and because Aphrodite is herself beautiful, and also because he was born on her birthday, is her follower and attendant.

“她说：‘这个故事要花些时间来讲，不过我会告诉你的。在阿弗洛狄忒生日那天，众神举行了一次宴会，波洛斯——被称作富裕之神——他是机智之神墨提斯的儿子，是客人之一。宴会结束后，贫乏之神伯尼阿来到门前乞讨，如同她在这种场合里一贯的习惯那样。当时

富裕之神深受琼浆（那时还没有酒）的影响，走进宙斯的花园，沉沉睡去。贫乏之神考虑到自己贫困的处境，想设法怀上他的孩子，因此躺在他的身旁，怀上了爱神。因为爱神天生热爱美丽的事物，而阿弗洛狄忒本人就很美丽，也是因为爱神是在她生日那天投胎的，所以爱神自然就是她的追随者和仆人。

“'And as his parentage is, so also are his fortunes. In the first place he is always poor, and anything but tender and fair, as the many imagine him; and he is rough and squalid, and has no shoes, nor a house to dwell in; on the bare earth exposed he lies under the open heaven, in the streets, or at the doors of houses, taking his rest; and like his mother he is always in distress. Like his father too, whom he also partly resembles, he is always plotting against the fair and good; he is bold, enterprising, strong, a mighty hunter, always weaving some intrigue or other, keen in the pursuit of wisdom, fertile in resources; a philosopher at all times, terrible as an enchanter, sorcerer, sophist. He is by nature neither mortal nor immortal, but alive and flourishing at one moment when he is in plenty, and dead at another moment, and again alive by reason of his father's nature. But that which is always flowing in is always flowing out, and so he is never in want and never in wealth; and, further, he is in a mean between ignorance and knowledge.

“‘就像爱神的出身一样，他的生活也是跌宕起伏。如许多人所想，首先爱神总是处于贫穷之中，而且绝对和温柔和美丽扯不上关系。他粗暴并且肮脏，不穿鞋，居无定所；他总是露天睡在地上，毫无遮掩，在大街上、房门前栖身。就像他的母亲一样，爱神总是处于困境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爱神也像他父亲，爱神总是暗中追寻美丽和美好的事情。他勇敢，有魄力，强壮，是一位非常好的猎人，总是设计这样或那样的阴谋诡计，渴望追寻才智，足智多谋。他永远都是一

位哲学家，又像巫师、魔术师、诡辩家那样令人害怕。从本质上讲，他既不会终有一死也不会永生，但当他富裕时他就活跃起来，健康成长，贫穷时便毫无生气，而凭借与父亲相似的性格，他就会再次变得生机勃勃。但是源源不断而来的财富又会不断地流走，因此他不至于贫乏至极但也不会永远处于富裕之中。进一步讲，他介乎于愚昧无知和知识渊博之间。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is: No god is a philosopher or seeker after wisdom, for he is wise already; nor does any man who is wise seek after wisdom. Neither do the ignorant seek after wisdom. For herein is the evil of ignorance, that he who is neither good nor wise is nevertheless satisfied with himself: he has no desire for that of which he feels no want.'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没有哪个神会研究或追寻智慧，因为神本身就已经十分博学了；同样，智者也不会去追寻智慧。而无知者也不会寻求智慧。因为愚昧的坏处正是在于，尽管他既不崇高也不聪明，却对自己心满意足：他从不渴求他自认为不需要的东西。’

“'But who then, Diotima,' I said, 'are the lovers of wisdom, if they are neither the wise nor the foolish?'

“‘但是第俄提玛，’我说，‘如果智者和愚者都不热爱智慧，那么究竟谁是智慧的追求者呢？’

“'A child may answer that question,' she replied; 'they are those who are in a mean between the two; Love is one of them. For

wisdom is a most beautiful thing, and Love is of the beautiful; and therefore Love is also a philosopher or lover of wisdom, and being a lover of wisdom is in a mean between the wise and the ignorant. And of this too his birth is the cause; for his father is wealthy and wise, and his mother poor and foolish. Such, my dear Socrates, is the nature of the spirit Love. The error in your conception of him was very natural, and as I imagine from what you say, has arisen out of a confusion of love and the beloved, which made you think that love was all beautiful. For the beloved is the truly beautiful, and delicate, and perfect, and blessed; but the principle of love is of another nature, and is such as I have described.'

“‘孩童就能回答这个问题，’她回答道，‘当然就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的那些人，爱神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智慧是一样非常美丽的东西，而爱神又具有爱美的天性，因此爱神也是一位热爱研究智慧的人，这样的人就处于智慧与无知之间。他的这种特性也是起因于他的出身，因为他的父亲富有且智慧，而他的母亲贫穷而愚昧。我亲爱的苏格拉底，这就是爱神这个精灵的本质。你对他有错误的想法是很自然的，就从你说的话里我可以推测出，你的话源于爱与被爱的混乱之中，这使得你认为爱不分黑白，全都是美丽的。被爱确实令人愉快，它柔和而完美，是受到祝福的。但是就像我说的那样，爱的原则又有着其他的性质。’

“I said, 'O thou stranger woman, thou sayest well; but, assuming Love to be such as you say, what is the use of him to men?'

“我说：‘噢，你这个奇怪的女人，你说得很好。但是假使爱神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他对人类而言又有什么用处呢？’

“'That, Socrates,' she replied, 'I will attempt to unfold: of his nature and birth I have already spoken; and you acknowledge that love is of the beautiful. But some one will say: Of the beautiful in what, Socrates and Diotima?—or rather let me put the question more clearly, and ask: When a man loves the beautiful, what does he desire?'

“‘苏格拉底，’她回答道，‘我会试着为你详细说明。我已经讲了他的本质和出身，你也承认爱神具有美的性质。但是有人会说，苏格拉底和第俄提玛，美在何处？更确切地说，让我来问你，如果一个人爱上美丽的事物，他想要的是什么呢？’

“I answered her, 'That the beautiful may be his.'

“我回答她说：‘那么美丽可能就是他想要的。’

“'Still,' she said, 'the answer suggests a further question: What is given by the possession of beauty?'

“‘还有，’她说，‘这答案暗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拥有美丽又能让人得到什么呢？’

“'To what you have asked,' I replied, 'I have no answer ready.'

“‘对你的问题，’我答道，‘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Then,' she said, 'let me put the word “good” in the place of the beautiful, and repeat the question once more: If he who loves loves the good, what is it then that he loves?'

“‘那么，’她说，‘让我用“美好”这个词代替美丽，然后再重复一次这个问题：如果拥有爱的人热爱美好的事物，那么他爱的是什么？’

“'The possession of the good,' I said.

“‘可以去拥有美好的事物。’我说。

“'And what does he gain who possesses the good?'

“‘那么拥有着美好事物的人又得到什么呢？’

“'Happiness,' I replied; 'there is less difficulty in answering that question.'

“‘幸福，’我答道，‘这个问题不是很难。’

“'Yes,' she said, 'the happy are made happy by the acquisition

of good things. Nor is there any need to ask why a man desires happiness; the answer is already final.'

“‘是的，’她说，“幸福的人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美好的事物。那也就无需问为什么人渴望幸福了。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You are right.' I said.

“‘你说得对。’我说。

“'And is this wish and this desire common to all? and do all men always desire their own good, or only some men?—what say you?'

“‘那么，这种愿望和渴望是人人都有的吗？是所有的人永远都渴望美好的东西为自己所有，或仅仅是某些人这样？——你怎么说？’

“'All men,' I replied; 'the desire is common to all.'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回答，‘这种渴望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

“'Why, then,' she rejoined, 'are not all men, Socrates, said to love, but only some of them? Whereas you say that all men are

always loving the same things.'

“‘那么，’她反驳道，‘苏格拉底，为何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爱着，而仅仅是部分人呢？然而你说，所有的人总是爱相同的事物。’

“'I myself wonder,' I said, 'why this is.'

“‘我自己也很纳闷，’我说，‘为什么是这样。’

“'There is nothing to wonder at,' she replied; 'the reason is that one part of love is separated off and receives the name of the whole, but the other parts have other names.'

“‘没有什么可纳闷的，’她答道，‘原因是以爱之名的只是爱被分离出来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又有着其他的名称。’

“'Give an illustration,' I said.

“‘请举例解释一下。’我说。

“She answered me as follows: 'There is poetry, which, as you know, is complex and manifold. All creation or passage of non-being into being is poetry or making, and the processes of all art are creative; and the masters of arts are all poets or makers.'

“她回答我说：‘你知道，诗歌是复杂多样的。把所有不存在的事物创造或转变成为存在的事物即是诗歌或创作，所有艺术所经历的这一过程都是具有创造性的，所以艺术大师都是诗人或创作者。’

“'Very true.'

“‘的确如此。’

“'Still,' she said, 'you know that they are not called poets, but have other names; only that portion of the art which is separated off from the rest, and is concerned with music and metre, is termed poetry, and they who possess poetry in this sense of the word are called poets.'

“‘还有，’她说，‘你知道他们并不被称为诗人，而拥有其他的称呼。只有涉及到音乐和韵律的那部分艺术才被称为诗歌，在词语的意义上讲，掌握诗歌的人才被称作诗人。”

“'Very true,' I said.

“‘非常正确，’我说。

“'And the same holds of love. For you may say generally that all desire of good and happiness is only the great and subtle power

of love; but they who are drawn towards him by any other path, whether the path of money-making or gymnastics or philosophy, are not called lovers—the name of the whole is appropriated to those whose affection takes one form only—they alone are said to love, or to be lovers.'

“‘要拥有爱也是一样的。你通常会说所有对美好和幸福的渴望都是爱所产生的伟大而微妙的力量。但是经由其他渠道靠近它的人，无论是为了挣钱，或是热衷于体育运动或哲学，都不会被称作有爱之人——而只有那些仅仅采取一种形式去爱的，才被称作是去爱，或有爱之人。’

“'I dare say,' I replied, 'that you are right.'

“‘我敢说，’我回答道，‘你是对的。’

“'Yes,' she added, 'and you hear people say that lovers are seeking for their other half; but I say that they are seeking neither for the half of themselves, nor for the whole, unless the half or the whole be also a good. And they will cut off their own hands and feet and cast them away, if they are evil; for they love not what is their own, unless perchance there be some one who calls what belongs to him the good, and what belongs to another the evil. For there is nothing which men love but the good. Is there anything?'

“‘是的，’她补充说，‘你听人们说有爱之人都在寻求着他们的另一半，但是我认为他们正在寻求的不是他们自身的另一半，也不是成为

一个整体，除非那另一半或整体也很美好。如果他们的手脚是有害的，他们甚至会把它们砍下并扔掉。因为他们爱属于别人的东西，除非偶然有某个人称属于他的是好的，属于别人的是坏的。因为人们只爱美好的事物。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吗？’

“'Certainly, I should say, that there is nothing.'

“‘当然，我应该说没有。’

“'Then,' she said, 'the simple truth is, that men love the good.'

“‘那么，’她说，‘这一简单的真理就是人们热爱美好的事物。’

“'Yes,' I said.

“‘是的，’我说。

“'To which must be added that they love the possession of the good?'

“‘另外我必须要问他们是否爱着就能拥有这些美好的东西？’

“'Yes, that must be added.'

“‘是的，这个必须要补充说一下。’

“'And not only the possession, but the everlasting possession of the good?'

“‘还有，不仅要拥有，而且要永远拥有美好的东西吗？’

“'That must be added too.'

“‘是的，这也没错。’

“'Then love,' she said, 'may be described generally as the love of the everlasting possession of the good?'

“‘那么，’她说，‘爱一般会被描述为要永远拥有美好的事物吗？’

“'That is most true.'

“‘绝对正确。’

“'Then if this be the nature of love, can you tell me further,' she said, 'what is the manner of the pursuit? What are they doing who

show all this eagerness and heat which is called love? And what is the object which they have in view? Answer me.'

“‘那么如果这就是爱的本质，你能否进一步告诉我，’她说，‘人们追求爱的方式是怎样的呢？那些表现出所有这种被称作爱的渴望和炙热的人们在做什么？在他们的视野里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回答我。’”

“'Nay, Diotima,' I replied, 'if I had known, I should not have wondered at your wisdom, neither should I have come to learn from you about this very matter.'

“我回答道：‘不，第俄提玛，如果我知道，我就不会对你的智慧感到惊讶了，也不会来到这里想从你这儿学习关于爱的事情。’

“'Well,' she said, 'I will teach you:—The object which they have in view is birth in beauty, whether of body or soul.'

“‘好吧，’她说，‘我会教给你的——他们视野里所看到的事物正是美丽的诞生，它要么源于身体，要么源于灵魂。’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I said; 'the oracle requires an explanation.'

“‘我不明白，’我说，‘您这睿智的回答需要解释一下。’

“'I will make my meaning clearer,' she replied. 'I mean to say, that all men are bringing to the birth in their bodies and in their souls. There is a certain age at which human nature is desirous of procreation—procreation which must be in beauty and not in deformity; and this procreation is the union of man and woman, and is a divine thing; for conception and generation are an immortal principle in the mortal creature, and in the inharmonious they can never be. But the deformed is always inharmonious with the divine, and the beautiful harmonious. Beauty, then, is the destiny or goddess of parturition who presides at birth, and therefore, when approaching beauty, the conceiving power is propitious, and diffusive, and benign, and begets and bears fruit: at the sight of ugliness she frowns and contracts and has a sense of pain, and turns away, and shrivels up, and not without a pang refrains from conception.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hen the hour of conception arrives, and the teeming nature is full, there is such a flutter and ecstasy about beauty whose approach is the alleviation of the pain of travail.

“‘我会把我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一些，’她回答道，‘我的意思是，所有的人都会凭借身体或灵魂生育。在某个年龄段，人的本性会促使他们渴望生殖——生殖必须是在美丽之中而不是在丑恶之中的。这种生殖是把男人和女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神圣的。因为怀孕和生殖是人世间生物得到永生的原理，不可能在不和谐中实现，但是丑陋总是和神圣相悖的，而美丽却能与之和谐相处。然而，美神是命运之神或主管出生的生产女神，因此，当接近美丽的事物时，这种孕育的力量会使怀孕变得顺利并温和，具有散播性，很容易孕育小生命。一见到丑陋她就愁眉苦脸，痛苦地萎缩不前，并转身逃避，而且抑制怀孕也不是毫无痛苦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怀孕的时刻到来时，热闹的自然界十分充实，美的降临所带来的激动和狂喜减轻了分娩之痛。

“'For love, Socrates, is not, as you imagine, the love of the beautiful only.'

“‘苏格拉底，因为爱不是像你想像的那样，仅仅是对美丽的事物的爱。’

“'What then?'

“‘那是什么样的呢？’

“'The love of generation and of birth in beauty.'

“‘是对美丽的产生和孕育的爱。’

“'Yes,' I said.

“‘是的。’我说。

“'Yes, indeed,' she replied.

“‘是的，就是这样。’她回答道。

“'But why of generation?'

“‘但为什么是对其孕育的爱？’

“'Because to the mortal creature, generation is a sort of eternity and immortality,' she replied; 'and if, as has been already admitted, love is of the everlasting possession of the good, all men will necessarily desire immortality together with good: Wherefore love is of immortality.'

“‘因为对于不能永生的生物而言，繁殖是一种获得永存和永生的方式，’她答道，‘就像我们已经承认的那样，如果爱就是永远拥有美好的事物，所有的人就必然渴望既长生不老又拥有美好的事物：因此爱就是永生。’

“All this she taught me at various times when she spoke of love.

“这就是在几次谈及爱时，她所教给我的。

“And I remember her once saying to me, 'What is the cause, Socrates, of love, and the attendant desire? See you not how all animals, birds, as well as beasts, in their desire of procreation, are in agony when they take the infection of love, which begins with the desire of union; whereto is added the care of offspring, on whose behalf the weakest are ready to battle against the strongest

even to the uttermost, and to die for them, and will let themselves be tormented with hunger or suffer anything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young. Man may be supposed to act thus from reason; but why should animals have these passionate feelings? Can you tell me why?'

“我记得她曾经对我说：‘苏格拉底，是什么使爱以及随之而来的渴望产生的？你难道没有看到，所有的动物，飞鸟和走兽，在生殖欲望的驱使之下受到爱情的感染时，是多么的痛苦——这源于渴望彼此的结合。接下来是照顾好下一代，为了保护它们的孩子，最弱小的动物会随时准备与最强大的做最顽强的搏斗，甚至为它们的孩子而死；为了维护年轻的一代它们会忍饥挨饿，会忍受任何苦难。人类这样做可能是源于理智，但是为什么动物竟然也有这些激情呢？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Again I replied that I did not know.

“我再一次回答说不知道。

“She said to me: 'And do you expect ever to become a master in the art of love, if you do not know this?'

“她对我说：‘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还能期待成为精通爱的这门艺术的大师吗？’

“'But I have told you already, Diotima, that my ignorance is the

reason why I come to you; for I am conscious that I want a teacher; tell me then the cause of this and of the other mysteries of love.'

“‘但是我已经告诉你了，第俄提玛，我的无知正是我来找你的原因。因为我意识到我需要一名老师，请告诉我这件事的起因还有关于爱的其他神秘的事情。’

“'Marvel not,' she said, 'if you believe that love is of the immortal, as we have several times acknowledged; for here again, and on the same principle too, the mortal nature is seeking as far as is possible to be everlasting and immortal: and this is only to be attained by generation, because generation always leaves behind a new existence in the place of the old. Nay even in the life of the same individual there is succession and not absolute unity. A man is called the same, and yet in the short interval which elapses between youth and age, and in which every animal is said to have life and identity, he is undergoing a perpetual process of loss and reparation—hair, flesh, bones, blood, and the whole body are always changing. Which is true not only of the body, but also of the soul, whose habits, tempers, opinions, desires, pleasures, pains, fears, never remain the same in any one of us, but are always coming and going; and equally true of knowledge, and what is still more surprising to us mortals, not only do the sciences in general spring up and decay, so that in respect of them we are never the same; but each of them individually experiences a like change. For what is implied in the word “recollection,” but the departure of knowledge, which is ever being forgotten, and is renewed and preserved by recollection, and appears to be the same although in reality new, according to that law of succession by which all mortal things are preserved, not absolutely the same, but by substitution, the old

worn-out mortality leaving another new and similar existence behind—unlike the divine, which is always the same and not another? And in this way, Socrates, the mortal body, or mortal anything, partakes of immortality; but the immortal in another way. Marvel not then at the love which all men have of their offspring; for that universal love and interest is for the sake of immortality.'

“‘不惊奇吗，’她说，‘如果你认为爱是永生的，就像我们这几次认为的那样，因此也基于同样的原理，这种不能永生的本质在尽可能地寻求永存和永生——而这只能靠繁衍生息来获得，因为繁衍后代总是在老的旧的地方留下新的。甚至是在同样的生命个体中就有这样的演替，而并不是要在绝对的结合之中，人类就被称作上述这样的个体。然而在这短暂的青春流逝走向年老的瞬间，每一个动物都被认为是有生命和身份的，他正在经历着失去和补偿的这一反复交替的过程——头发、肉体、骨头和整个身体总是在不停地变化。这不仅对身体而言是真理，也适用于灵魂，我们中没有哪个人会保持自己的习惯、性情、观点、愿望、快乐、痛苦，恐惧一成不变，它们总是变来变去的。知识也是同样的，对于不能永生的我们而言，更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不仅知识会更新换代，以至于我们对知识的认知也从未相同；而且每一种知识都经历着相似的变化。“回忆”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当知识离我们而去，也就是当我们一度忘记知识，而由于回忆，知识被更新后保存了下来，它和之前看似相同而实际上却变了。根据演替的法则，所有不能永生的事物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被保存下来的，不一定和以前绝对一样，但经过替换，一个旧的、已耗尽的、注定一死的生物留下了另一个新的类似的存在物——不像神那样，总是一成不变，不会转换成其他事物。这样的话，苏格拉底，凡人之体，或任何不能永生之物，都带有几分不朽的性质，但是这是以另一种方式不朽。那么就不必对人人都有的对于后代的爱而感到惊异了，因为那种博爱和兴趣是为了永生。’

“I was astonished at her words, and said: 'Is this really true, O thou wise Diotima?'

“我对她的话感到非常惊讶，然后说：‘这真的是事实吗，噢，聪明的第俄提玛？’

“And she answered with all the authority of an accomplished sophist: 'Of that, Socrates, you may be assured;—think only of the ambition of men, and you will wonder at the senselessness of their ways, unless you consider how they are stirred by the love of an immortality of fame. They are ready to run all risks greater far than they would have run for their children, and to spend money and undergo any sort of toil, and even to die, for the sake of leaving behind them a name which shall be eternal. Do you imagine that Alcestis would have died to save Admetus, or Achilles to avenge Patroclus, or your own Codrus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kingdom for his sons, if they had not imagined that the memory of their virtues, which still survives among us, would be immortal? Nay,' she said, 'I am persuaded that all men do all things, and the better they are the more they do them, in hope of the glorious fame of immortal virtue; for they desire the immortal. Those who are pregnant in the body only, betake themselves to women and beget children—this is the character of their love; their offspring, as they hope, will preserve their memory and giving them the blessedness and immortality which they desire in the future. But souls which are pregnant—for there certainly are men who are more creative in their souls than in their bodies—conceive that which is proper for the soul to conceive or contain.'

“她以一位技艺娴熟的诡辩家所具有的最大权威回答我说：‘对于那个，苏格拉底，你可以放心——仅去想一想人类的野心，你就会对于他们行为方式的愚蠢而感到吃惊，除非你考虑到他们是如何受到贪恋永垂不朽的名望的鼓动。他们随时准备冒着各种危险，这远比为孩子所冒的风险多得多；他们花费金钱、遭受各种苦难，甚至赴死，只是为了身后能流芳百世。阿尔刻提斯愿意为阿德墨托斯而死，阿喀琉斯替帕特洛克罗斯报仇，而你们自己的国王科德洛斯为他的儿子们维持王权地位而做的牺牲，如果他们不是想到这样做的话自己给世人留下的美德就会流芳百世、成为不朽，你能想象他们会做出这些牺牲吗？不仅如此，’她说，‘我相信人会做任何事情，他们越有能力就会做得越多，希望获得不朽美德的显赫名望，因为他们渴望不朽。那些仅在身体方面有孕育能力的人，就会极力接近女人并期望有孩子——这就是他们爱的本质。他们的后代，就像他们期望的那样，会保留对他们的记忆，给予他们渴望将来会有的祝福和永存不朽。但是在心灵方面具有孕育能力的人——必然会有人，他们的心灵比身体更富有创造性——会想什么是适合灵魂去怀有或容纳的。

“'And what are these conceptions?—wisdom and virtue in general. And such creators are poets and all artists who are deserving of the name inventor. But the greatest and fairest sort of wisdom by far is that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ordering of states and families, and which is called temperance and justice. And he who in youth has the seed of these implanted in him and is himself inspired, when he comes to maturity desires to beget and generate. He wanders about seeking beauty that he may beget offspring—for in deformity he will beget nothing—and naturally embraces the beautiful rather than the deformed body; above all when he finds a fair and noble and well-nurtured soul, he embraces the two in one person, and to such an one he is full of speech about virtue and the nature and pursuits of a good man; and he tries to educate him; and at the touch of the beautiful which is ever present to his memory,

even when absent, he brings forth that which he had conceived long before, and in company with him tends that which he brings forth; and they are married by a far nearer tie and have a closer friendship than those who beget mortal children, for the children who are their common offspring are fairer and more immortal. Who, when he thinks of Homer and Hesiod and other great poets, would not rather have their children than ordinary human ones? Who would not emulate them in the creation of children such as theirs, which have preserved their memory and given them everlasting glory? Or who would not have such children as Lycurgus left behind him to be the saviours, not only of Lacedaemon, but of Hellas, as one may say? There is Solon, too, who is the revered father of Athenian laws; and many others there are in many other places, both among Hellenes and barbarians, who have given to the world many noble works, and have been the parents of virtue of every kind; and many temples have been raised in their honour for the sake of children such as theirs; which were never raised in honour of any one, for the sake of his mortal children.

“‘这些想法是什么呢？——一般而言，就是智慧和美德。诸如此类的创造者有诗人和所有值得享有发明家称号的艺术家。但是目前为止，最伟大、最公正的那种智慧所涉及的就是统治城邦和管理家庭，这被称作节制和公正。当一个人年轻时，在他的身上就播下了这样的种子，他自身受到激发，当他到了成年，就渴望生儿育女。他徘徊着去寻求美丽以便他有后人——因为他不愿在丑陋中留下后代——自然要拥抱美丽的而不是丑陋的身体。尤其是当他发现了美丽、尊贵而又有修养的人时，他就会使他们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对这样一个人，他就会有无尽的言语去表达好人所具有的美德、本性和追求。他尽力去教育他的爱人。无论能否触碰到他记忆里存有的美丽，他都会把长久以来所怀有的孕育出来，和爱人一起照顾他所生育的孩子。他

们以比夫妻关系更近的关系结合，并且比生育凡胎的人有更亲密的友谊，因为他们共同的后代是更美丽，更不朽于人世的。当想到荷马和赫西俄德还有其他伟大的诗人时，谁不想要超凡脱俗的孩子？谁不想生一个像他们的孩子那样，会保留着对他们的记忆，并让他们的美名流芳百世的孩子呢？或者谁又不想有像莱科勾那样的孩子，成为人们口中所说的不仅是古斯巴达的而且是希腊的救世主呢？还有梭伦，令人尊敬的雅典法律的制定者。还有在诸多其他地方的很多其他的人，在希腊人和野蛮人之中，他们为世界创造出很多宏伟之作，是每一种美德的根源。为了有像他们的孩子那样的孩子，人们为他们建造了许多的庙宇。这不是为了纪念任何人而建的，而是为了他的不能永生的孩子。

“'These are the lesser mysteries of love, into which even you, Socrates, may enter; to the greater and more hidden ones which are the crown of these, and to which, if you pursue them in a right spirit, they will lead, I know not whether you will be able to attain. But I will do my utmost to inform you, and do you follow if you can. For he who would proceed aright in this matter should begin in youth to visit beautiful forms; and first, if he be guided by his instructor aright, to love one such form only—out of that he should create fair thoughts; and soon he will of himself perceive that the beauty of one form is akin to the beauty of another; and then if beauty of form in general is his pursuit, how foolish would he be not to recognize that the beauty in every form is and the same! And when he perceives this he will abate his violent love of the one, which he will despise and deem a small thing, and will become a lover of all beautiful forms; in the next stage he will consider that the beauty of the mind is more honourable than the beauty of the outward form. So that if a virtuous soul have but a little comeliness, he will be content to love and tend him, and will search out and bring to the birth thoughts which may improve the young, until he

is compelled to contemplate and see the beauty of institutions and laws, an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eauty of them all is of one family, and that personal beauty is a trifle; and after laws and institutions he will go on to the sciences, that he may see their beauty, being not like a servant in love with the beauty of one youth or man or institution, himself a slave mean and narrow-minded, but drawing towards and contemplating the vast sea of beauty, he will create many fair and noble thoughts and notions in boundless love of wisdom; until on that shore he grows and waxes strong, and at last the vision is revealed to him of a single science, which is the science of beauty everywhere.

“‘爱的不太神秘之处，即使是你，苏格拉底，也可以领悟。对于更大更隐秘的，即是这神秘的顶峰了，对于此，如果你以正确的态度去追寻，它们会指引你到那里，而我不知道你能否到达。但是我会尽我最大努力告知你，如果你注意听，就可能会领悟。因为能在这件事上以正确的路线行进的人，应该在年轻时就开始去与具有美丽形体的人交往了。首先，如果他的老师正确地引导他，仅爱这样一种样子——他就应该通过它来创造出美丽的想法，不久他就会自发地认识到美丽的形体都大致相同。一般而言，如果形体的美丽就是他所追寻的，那他该多么愚蠢才能无法察觉到每一种形体的美丽都是如此相同！当他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会把他对某一事物猛烈的爱减少一些，会蔑视它，认为它是不起眼的，并成为热爱所有美丽事物的人。在下一阶段，他会考虑心灵的美丽要比外在形体的美丽更值得人的尊敬。因此哪怕一颗善良的心灵只有一点美丽之处，他都会愿意去爱并照顾他，还会找寻到并想出促使年轻人变得更好的思想，直到他不得不去思忖和领悟制度与法律的美丽，去理解他们所有的美丽都是源于同一类东西，而个人的美丽只占其中一点。法律和制度之后，他会走向科学，他会看到它们的美丽，他不再是一个沉湎于对人或制度之爱的仆人，不再是一个自私的、心胸狭窄的爱的奴隶，而是逐渐注视并走向这片广阔的美丽海域。在对智慧之爱这无边的领域里，他将会创造出

许多美好和高贵的思想与观念，直到在那块海滨长大，并逐渐变得强壮，最后在他眼前显示出的是某一门学科，这就是无处不在的美丽之科学。

“'To this I will proceed; please to give me your very best attention: He who has been instructed thus far in the things of love, and who has learned to see the beautiful in due order and succession, when he comes toward the end will suddenly perceive a nature of wondrous beauty (and this, Socrates, is the final cause of all our former toils)—a nature which in the first place is everlasting, not growing and decaying, or waxing and waning; secondly, not fair in one point of view and foul in another, or at one time or in one relation or at one place fair, at another time or in another relation or at another place foul, as if fair to some and foul to others, or in the likeness of a face or hands or any other part of the bodily frame, or in any form of speech or knowledge, or existing in any other being, as for example, in an animal, or in heaven, or in earth, or in any other place; but beauty absolute, separate, simple, and everlasting, which without diminution and without increase, or any change, is imparted to the ever-growing and perishing beauties of all other things. He who from these ascend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ue love, begins to perceive that beauty, is not far from the end. And the true order of going, or being led by another, to the things of love, is to begin from the beauties of earth and mount upwards for the sake of that other beauty, using these as steps only, and from one going on to two, and from two to all fair forms, and from fair forms to fair practices, and from fair practices to fair notions, until from fair notions he arrives at the notion of absolute beauty, and at last knows what the essence of beauty is.'

“‘对于此我会继续讲下去，请尽最大努力集中注意力听我讲：此时，通过所有关于爱的事物中他所受的教育，他已经学会了应以遵守的顺序依次去看美丽的事物，当走到尽头时他会突然觉察到令人惊奇的美丽之本质（这个，苏格拉底，就是所有我们之前辛苦讨论的终极原因）——这种本质起初是永恒的，不生长也不衰退，也不会逐渐增多或逐渐减少。其次，真正的美不会从一个立场上看是美丽的，而从另一个立场上看是邪恶的，也不会因时而异、因关系而异、因场所而异，或是因人而异；美不存在于脸、双手或身体构造的其他部分的相似之处，不存在于任何一种形式的演讲或任意一门学科，也不存在于任何一种事物之中，例如，动物，抑或天上、地上，或任何其他地方。但爱却是绝对的、独立的、简单和永恒的，不会减少亦不会增大，没有任何变化，它被赋予给所有其他事物中日益增大和渐趋毁灭的美丽之中。在真爱的影响之下，当一个人可以从这些高度开始觉察出美，就离尽头不是很远了。爱的事物之中真正的顺序，或由别人引导的顺序是从尘世的美丽开始，为了寻求其他的美丽而攀升，把这些过程作为台阶，从一级走向二级，从二级走向所有美丽的形式，再从美丽的形式走向美丽的实践，而后从美丽的实践到美丽的观念，直到从美丽的观念处他得出绝对美丽的概念，最后他懂得了爱的本质。’

“'This, my dear Socrates,' said the stranger of Mantineia, 'is that life above all others which man should live,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beauty absolute; a beauty which if you once beheld, you would see not to be after the measure of gold, and garments, and fair boys and youths, whose presence now entrances you; and you and many a one would be content to live seeing them only and conversing with them without meat or drink, if that were possible—you only want to look at them and to be with them. But what if man had eyes to see the true beauty—the divine beauty, I mean, pure and clear and unalloyed, not clogged with the pollutions of mortality and all the colours and vanities of human life—thither looking, and holding converse with the true beauty simple and divine? Remember how in

that communion only, beholding beauty with the eye of the mind, he will be enabled to bring forth, not images of beauty, but realities (for he has hold not of an image but of a reality), and bringing forth and nourishing true virtue to become the friend of God and be immortal, if mortal man may. Would that be an ignoble life?'

“‘亲爱的苏格拉底，’曼蒂尼亚来的这位贵客说，‘这就是人类首先应该有的生活，沉思于绝对的美；一旦你见到这种美，你就不会再追寻富足的钱财、华丽的衣服、美丽的男孩或青年，和其他现在在诱惑你的事物。如果可能的话，包括你在内的许多人都愿意这样生活——仅是看着他们，与他们交谈而废寝忘食——你想做的只是看看他们，和他们在一起。但如果一个人有眼力能辨别出真正的美丽——这神圣的美丽，我的意思是，纯洁、清澈、没有杂质的，不会受到必死之念的搅扰和人类生活的所有外在虚荣的污染的美丽——如果一个人能与真正简单而神圣的美丽交流，又会怎么样呢？记住，一个人只有在那样的交流中，通过心灵去看美好的东西时，产生的才不是美的意象，而是真实（因为他抓住的不是一个意象而是真实），而后他通过产生并养育真正的美德以成为神灵的朋友并获得永生，如果凡人可以做到的话。那样活着难道不光彩吗？’

“Such, Phaedrus—and I speak not only to you, but to all of you—were the words of Diotima; and I am persuaded of their truth. And being persuaded of them, I try to persuade others, that in the attainment of this end human nature will not easily find a helper better than love: And therefore, also, I say that every man ought to honour him as I myself honour him, and walk in his ways, and exhort others to do the same, and praise the power and spirit of love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my ability now and ever. The words which I have spoken, you, Phaedrus, may call an encomium of love, or anything else which you please.”

“这些话，裴德罗——我不仅是对你说的，而且是对你们所有的人说的——都是第俄提玛的原话，我已经被这些话说服了。由于相信这些话，我尽力去说服你们，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对人性来说很难找到比爱更好的帮手了：因此，我认为每个人应该像我一样尊敬爱神，走他走的路，并鼓励他人也这样做，从现在开始，力所能及地去赞扬爱的力量和精神。我的这番话，你，裴德罗，可能会唤醒人们去赞美爱，或任何其他你喜欢的东西。”

When Socrates had done speaking, the company applauded, and Aristophanes was beginning to say something in answer to the allusion which Socrates had made to his own speech, when suddenly there was a great knocking at the door of the house, as of revellers, and the sound of a flute-girl was heard. Agathon told the attendants to go and see who were the intruders. “If they are friends of ours,” he said, “invite them in, but if not, say that the drinking is over.”

苏格拉底说完后，聚会的人们就鼓掌喝彩，当阿里斯托芬正要开始说些话回应苏格拉底演讲里涉及的暗示时，突然听到一些狂饮者的猛烈敲门声，随即传来了长笛女的笛声。阿伽通告诉侍者去看看这些闯入者是谁。“如果是我们的朋友，”他说，“就邀请他们进来，但若不是，就说会饮结束了。”

A little while afterwards they heard the voice of Alcibiades resounding in the court; he was in a great state of intoxication, and kept roaring and shouting “Where is Agathon? Lead me to Agathon,” and at length, supported by the flute-girl and some of his attendants, he found his way to them. “Hail, friends,” he said,

appearing at the door crowned with a massive garland of ivy and violets, his head flowing with ribands. “Will you have a very drunken man as a companion of your revels? Or shall I crown Agathon, which was my intention in coming, and go away? For I was unable to come yesterday, and therefore I am here to-day, carrying on my head these ribands, that taking them from my own head, I may crown the head of this fairest and wisest of men, as I may be allowed to call him. Will you laugh at me because I am drunk? Yet I know very well that I am speaking the truth, although you may laugh. But first tell me; if I come in shall we have the understanding of which I spoke (supra Will you have a very drunken man? etc.)? Will you drink with me or not?”

后来不一会儿，他们就听到从庭院里传来亚西比德宏亮的嗓音。他现在正处于极度的醉酒状态，不停地大吼大叫：“阿伽通在哪儿？带我去见阿伽通，”最后，他被一个长笛女和一些侍从扶着，找到了他们。“嘿，朋友们，”他说，亚西比德出现在门旁，他戴着常春藤和紫罗兰编织的花环，头旁飘垂着缎带。“你们会接受一位烂醉如泥的人作为你们狂饮的一员吗？还是我应该完成我来的目的——给阿伽通戴上花冠，然后就走？因为昨天不能来，所以今天我到这儿来了，我的头上戴着这些缎带，或许我会将缎带从头上拿下来，戴到最美丽最聪明的人的头上，就像我被允许拜访他一样。你们会因为我喝醉了而嘲笑我吗？虽然你们会笑，我却十分清楚我正在说实话，但是首先告诉我，如果我加入到其中，你们能理解我说的话吗（比如我之前说的，你们会给一位十足的醉汉机会吗？等等）？你们是否会愿意一起喝酒呢？”

The company were vociferous in begging that he would take his place among them, and Agathon specially invited him. Thereupon he was led in by the people who were with him; and as

he was being led, intending to crown Agathon, he took the ribands from his own head and held them in front of his eyes; he was thus prevented from seeing Socrates, who made way for him, and Alcibiades took the vacant place between Agathon and Socrates, and in taking the place he embraced Agathon and crowned him. “Take off his sandals,” said Agathon, “and let him make a third on the same couch.”

会饮者们大声地请求他加入进来，阿伽通还特别邀请了他。于是他被和他一起来的人们引了进来。在他进来的时候，他打算给阿伽通戴上花冠，就从头上拿下缎带捧在面前，这样却妨碍他看到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正在给他挪地方，亚西比德就在阿伽通和苏格拉底之间的空位置坐了下来，他拥抱了阿伽通，并给他戴了花冠。阿伽通说：“给他脱下便鞋。在这边的卧榻下让他作为第三个发言人。”

“By all means; but who makes the third partner in our revels?” said Alcibiades, turning round and starting up as he caught sight of Socrates. “By Heracles,” he said, “what is this? Here is Socrates always lying in wait for me, and always, as his way is, coming out at all sorts of unsuspected places. And now, what have you to say for yourself, and why are you lying here, where I perceive that you have contrived to find a place, not by a joker or lover of jokes, like Aristophanes, but by the fairest of the company?”

亚西比德说：“一定，但在我们的会饮中谁会是第三个人的搭档呢？”当转过身来开始讲时，他看到了苏格拉底。“以赫拉克勒斯的名义，”他说，“这是谁？苏格拉底总是躺在这儿等着我，就是他那个样子，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现在你要为自己说些什么？为什么你躺在这儿，我发现你在此处已经找到了一块地方，不坐在像

阿里斯托芬那样爱开玩笑或是爱听笑话的人旁边，而是坐在会饮者中最美的人身边呢？”

Socrates turned to Agathon and said: “I must ask you to protect me, Agathon; for the passion of this man has grown quite a serious matter to me. Since I became his admirer I have never been allowed to speak to any other fair one, or so much as to look at them. If I do, he goes wild with envy and jealousy, and not only abuses me but can hardly keep his hands off me, and at this moment he may do me some harm. Please to see to this, and either reconcile me to him, or, if he attempts violence, protect me, as I am in bodily fear of his mad and passionate attempts.”

苏格拉底转向阿伽通说：“我必须请求你保护我，阿伽通，因为这个人的热情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自从我成了他的仰慕者，我就从未被允许和其他任何长得漂亮的人说话，甚至都不能看他们一眼。如果我这样做了，他就会因艳羡和嫉妒而发狂，不仅要辱骂我，而且手还抓着我不放，此刻他可能要对我动粗了。请看着他，一定要让他和我和解，如果他企图使用武力，请保护我，因为我打身体上就畏惧他这些疯狂和热烈的企图。”

“There can never b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you and me,” said Alcibiades; “but for the present I will defer your chastisement. And I must beg you, Agathon, to give me back some of the ribands that I may crown the marvellous head of this universal despot—I would not have him complain of me for crowning you, and neglecting him, who in conversation is the conqueror of all mankind; and this not only once, as you were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but always.” Whereupon, taking some of the ribands, he crowned Socrates, and

again reclined.

亚西比德说："你我之间从不可能有和解，但是目前我要推迟对你的惩罚。我必须请求你，阿伽通，请还给我一些缎带，我要把它们戴到这位宇宙专制者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头上——我不会让他因为我给你戴上了缎带却忽略了他而抱怨我，在谈话中他总能胜过其他任何人。这可不止一次，就像前天你们在场时那样，他总是这个样子。"因此，阿伽通拿了一些缎带，戴到了苏格拉底的头上，又屈身坐了回来。

Then he said: "You seem, my friends, to be sober, which is a thing not to be endured; you must drink—for that was the agreement under which I was admitted—and I elect myself master of the feast until you are well drunk. Let us have a large goblet, Agathon, or rather," he said, addressing the attendant, "bring me that wine-cooler." The wine-cooler which had caught his eye was a vessel holding more than two quarts—this he filled and emptied, and bade the attendant fill it again for Socrates. "Observe, my friends," said Alcibiades, "that this ingenious trick of mine will have no effect on Socrates, for he can drink any quantity of wine and not be at all nearer being drunk."

然后他说，"我的朋友们，你们似乎还清醒着，这可让人无法忍受。你们必须喝酒——因为这是我被认可的约定——我选我自己为宴会的主人，你们要喝得令我满意为止。让我们用大的高脚杯，阿伽通，更确切地说，"他又转向侍从说，"把那个冷酒器递给我。"他看到的那个冷酒器是一个能容纳超过两夸脱酒的容器——他斟满酒并一饮而尽，又吩咐侍从再为苏格拉底斟满。亚西比德说："注意看，我的朋友们，我这精心设计的骗局对苏格拉底是不起作用的，因为他非常

能喝酒而且从未喝醉过。”

Socrates drank the cup which the attendant filled for him. Eryximachus said: “What is this, Alcibiades? Are we to have neither conversation nor singing over our cups; but simply to drink as if we were thirsty?”

苏格拉底喝了侍从为他斟满的酒。厄律克西马库说：“亚西比德，这算什么？难道我们不交流也不畅饮歌唱，就像因饥渴而喝酒吗？”

Alcibiades replied: “Hail, worthy son of a most wise and worthy sire!”

亚西比德回答说：“好哇，你这位最博学的、最值得人钦佩的大人物的让人尊敬的儿子！”

“The same to you,” said Eryximachus; “but what shall we do?”

厄律克西马库说：“你也一样，但我们将做什么呢？”

“That I leave to you,” said Alcibiades. “'The wise physician skilled our wounds to heal' (from Pope's *Homer* , Il.) shall prescribe and we will obey. What do you want?”

亚西比德说：“那个就由你定。‘聪明的医生有办法使我们的伤口愈合’（来自蒲柏的《荷马》II）应该给我们下个处方，我们会听从。你想做什么？”

“Well,” said Eryximachus, “before you appeared we had passed a resolution that each one of us in turn should make a speech in praise of love, and as good a one as he could: the turn was passed round from left to right; and as all of us have spoken, and you have not spoken but have well drunken, you ought to speak, and then impose upon Socrates any task which you please, and he on his right hand neighbour, and so on.”

厄律克西马库说：“好的，在你来之前，我们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中的每个人轮流为赞美爱而做一次演讲，尽可能向好的方面说，次序是从左到右。鉴于我们都已经说过，你还没发言而且喝得很多，现在该你该说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便强加给苏格拉底什么苦活，他也可以这样对待他右手边的人，以此类推。”

“That is good, Eryximachus,” said Alcibiades; “and yet the comparison of a drunken man's speech with those of sober men is hardly fair; and I should like to know, sweet friend, whether you really believe what Socrates was just now saying; for I can assure you that the very reverse is the fact, and that if I praise any one but himself in his presence, whether God or man, he will hardly keep his hands off me.”

亚西比德说：“那样很好，厄律克西马库，而醉汉的演讲与清醒者的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有利之处。我就想要知道，亲爱的朋友，你们

是否真的相信苏格拉底刚刚说的话。因为我能向你保证与之相反的才是事实，如果我在他面前赞扬除他以外的任何人，无论是神或是人，他都要对我动手。”

“For shame,” said Socrates.

“真不害臊。”苏格拉底说。

“Hold your tongue,” said Alcibiades, “for by Poseidon, there is no one else whom I will praise when you are of the company.”

亚西比德说：“保持沉默吧，因为以波塞冬的名义发誓，有你在场的时候我是不会赞扬任何人的。”

“Well then,” said Eryximachus, “if you like praise Socrates.”

厄律克西马库说：“那么，你是否愿意赞扬苏格拉底？”

“What do you think, Eryximachus?” said Alcibiades: “shall I attack him and inflict the punishment before you all?”

亚西比德说：“你认为呢，厄律克西马库？我应该在你们所有人面前攻击他和惩罚他吗？”

“What are you about?” said Socrates; “are you going to raise a laugh at my expense? Is that the meaning of your praise? I am going to speak the truth, if you will permit me. I not only permit, but exhort you to speak the truth.”

苏格拉底说：“你在说什么？你打算以我为代价引起一场笑话吗？那是你赞扬的目的吗？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打算讲出事实。我不仅允许你，而且恳请你说出真相。”

“Then I will begin at once,” said Alcibiades, “and if I say anything which is not true, you may interrupt me if you will, and say 'that is a lie,' though my intention is to speak the truth. But you must not wonder if I speak any how as things come into my mind; for the fluent and orderly enumeration of all your singularities is not a task which is easy to a man in my condition.

亚西比德说：“那么我要马上开始了，如果我说的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只要你愿意，你便可以打断我，并说‘那是假话。’虽然我的意图是要讲出事实。但是如果我想到哪儿就说哪儿，你不要怀疑我在胡乱地讲。流畅有序地列举事物是你的超凡之处，而这些超凡之处在我这种情况下可不容易做到。

“And now, my boys, I shall praise Socrates in a figure which will appear to him to be a caricature, and yet I speak, not to make fun of him, but only for the truth's sake. I say, that he is exactly like the busts of Silenus, which are set up in the statuaries' shops, holding pipes and flutes in their mouths; and they are made to open in the middle, and have images of gods inside them. I say also that

he is like Marsyas the satyr. You yourself will not deny, Socrates, that your face is like that of a satyr. Aye, and there is a resemblance in other points too. For example, you are a bully, as I can prove by witnesses, if you will not confess. And are you not a flute-player? That you are, and a performer far more wonderful than Marsyas. He indeed with instruments used to charm the souls of men by the power of his breath, and the players of his music do so still: for the melodies of Olympus (compare Arist. *Pol.*) are derived from Marsyas who taught them, and these, whether they are played by a great master or by a miserable flute-girl, have a power which no others have; they alone possess the soul and reveal the wants of those who have need of gods and mysteries, because they are divine. But you produce the same effect with your words only, and do not require the flute: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ou and him. When we hear any other speaker, even a very good one, he produces absolutely no effect upon us, or not much, whereas the mere fragments of you and your words, even at second-hand, and however imperfectly repeated, amaze and possess the souls of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who comes within hearing of them.

“现在，我的孩子们，我要以一种貌似讽刺的方式赞扬苏格拉底了，然而我不是要与他开玩笑，而仅是为了说出事实。我说，他可真像矗立在雕塑店里的森林之神西勒诺斯的半身像，它们被塑造成嘴里衔着管乐器亦或长笛的样子，身子的中间敞开，里面是神的肖像。我还要说他像玛息阿，那个萨梯。苏格拉底，你是不会否认你的脸长得像萨梯的。啊，在其他方面也有相像之处。例如，你是个恃强凌弱者，如果你不承认的话，我有证人能证明。你不是一个吹笛手吗？你是，而且远比玛息阿吹得好得多。的确，通过呼吸的力量，玛息阿过去曾用他的乐器迷惑过人类的心灵，而现在演奏他音乐的人依然如此：比如说奥林匹斯的美妙音乐（参考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就来自于教授它们的玛息阿，这些乐曲无论是由伟大的乐师或是可怜的吹

笛女来演奏，都具有其他乐曲所没有的魅力。单单它们自身就具有情感，并能表现出那些对众神和神秘之物有需求的人的欲望，因为它们是神圣的。但你不需要长笛，只用你的话语就能产生出同样的效果：那就是你与他的不同之处。我们听其他人演讲时，哪怕是一位非常棒的演说家，也不会对我们有丝毫或是太大的影响，然而你那些只言片语，哪怕是听人复述，不管被复述到什么糟糕的地步，都能迷惑住听到它们的每个人的灵魂，无论男人、女人或小孩。

“And if I were not afraid that you would think me hopelessly drunk, I would have sworn as well as spoken to the influence which they have always had and still have over me. For my heart leaps within me more than that of any Corybantian reveller, and my eyes rain tears when I hear them. And I observe that many others are affected in the same manner. I have heard Pericles and other great orators, and I thought that they spoke well, but I never had any similar feeling; my soul was not stirred by them, nor was I angry at the thought of my own slavish state. But this Marsyas has often brought me to such a pass, that I have felt as if I could hardly endure the life which I am leading (this, Socrates, you will admit); and I am conscious that if I did not shut my ears against him, and fly as from the voice of the siren, my fate would be like that of others—he would transfix me, and I should grow old sitting at his feet. For he makes me confess that I ought not to live as I do, neglecting the wants of my own soul, and busying myself with the concerns of the Athenians; therefore I hold my ears and tear myself away from him. And he is the only person who ever made me ashamed, which you might think not to be in my nature, and there is no one else who does the same. For I know that I cannot answer him or say that I ought not to do as he bids, but when I leave his presence the love of popularity gets the better of me. And therefore I run away and fly from him, and when I see him I am ashamed of

what I have confessed to him. Many a time have I wished that he were dead, and yet I know that I should be much more sorry than glad, if he were to die: so that I am at my wit's end.

“要不是担心你们会认为我喝得酩酊大醉了，我本想发誓证明那些话总是且依旧对我产生着影响。与女神西布莉的随从的狂欢乱舞相比，我的心要跳得更剧烈，听到它们时，我会泪流满面。我注意到其他许多人也受到同样的影响。我听过伯里克利（古雅典政治家）和其他伟大的演说家的演讲，我认为他们说得很好，但是我却从未有过同样的感觉。他们的演讲既不会令我的灵魂振作，也不会使我对那个处于臣服状态的自己感到愤怒。但是这位玛息阿经常把我带到那样一条路上，就像我感觉自己几乎不能忍受正在度过的生活（这个，苏格拉底，你会承认的）。我意识到，如果我没有像听到塞壬的歌声时那样掩住耳朵迅速走开，那我的命运就要和其他人一样了——他会麻木我，我会在他的旁边坐到老去。因为他的话使我承认我不应该像现在这样生活，忽略了我自己的心灵所需要的东西，只顾着忙碌于雅典人的事情，所以我抑制自己不去听，让自己远离他。他是惟一一位曾经让我觉得羞愧的人，你或许认为这不是我的本性，可没有其他人让我有同样的感受。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回答他的问题或者说我不应该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但是一旦离开他，对名望的渴望就会击败我。因此我逃开并跑得远远的，当再次我看到他时，我就会为自己对他所做的忏悔感到羞愧。我曾多次希望他离开人世，然而我知道如若他死去我会更加伤心而不是开心，因此我变得不知所措了。

“And this is what I and many others have suffered from the flute-playing of this satyr. Yet hear me once more while I show you how exact the image is, and how marvellous his power. For let me tell you; none of you know him; but I will reveal him to you; having begun, I must go on. See you how fond he is of the fair? He is always with them and is always being smitten by them, and then

again he knows nothing and is ignorant of all things—such is the appearance which he puts on. Is he not like a Silenus in this? To be sure he is: his outer mask is the carved head of the Silenus; but, O my companions in drink, when he is opened, what temperance there is residing within! Know you that beauty and wealth and honour, at which the many wonder, are of no account with him, and are utterly despised by him: he regards not at all the persons who are gifted with them; mankind are nothing to him; all his life is spent in mocking and flouting at them. But when I opened him, and looked within at his serious purpose, I saw in him divine and golden images of such fascinating beauty that I was ready to do in a moment whatever Socrates commanded: they may have escaped the observation of others, but I saw them.

“这就是吹长笛的萨梯让我和许多其他人所遭受的痛苦。然而当我向你们展现这比喻是多么准确时，请听我再说一次，他的力量是多么非凡。让我告诉你们，你们中没有人了解他。但是我会让他为你们所知，既然话题已经开始，我就必须得继续讲下去。你想看看他有多么喜欢漂亮的人吗？他总是和他们在一起，总是受到他们的折磨，并且表现出什么都不知道，对一切事物都一无所知的样子。在这方面他不像西勒诺斯吗？当然，他很像。他外表的面具就是被雕刻好的西勒诺斯的头部。但是，噢，我这些正在饮酒的同伴们，当他真实的一面被揭开时，里面藏着怎样的自我呀！你们要知道，许多人为之惊叹的美丽、财富和荣誉对他来说都毫无价值，受到他绝对的鄙视：他一点也不尊敬那些拥有它们的人。他蔑视世人，用整个一生的精力去嘲笑和愚弄他们。但是当我揭开他的表象，向里看时，看到他严肃认真的一面，那是神圣和珍贵的化身，那令人着迷的品质使我甘愿立刻去做苏格拉底命令我做的任何事情。他的这种内在可能会被其他人忽视，但我能注意到它们。

“Now I fancied that he was seriously enamoured of my beauty, and I thought that I should therefore have a grand opportunity of hearing him tell what he knew, for I had a wonderful opinion of the attractions of my youth.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is design, when I next went to him, I sent away the attendant who usually accompanied me (I will confess the whole truth, and beg you to listen; and if I speak falsely, do you, Socrates, expose the falsehood). Well, he and I were alone together, and I thought that when there was nobody with us, I should hear him speak the language which lovers use to their loves when they are by themselves, and I was delighted. Nothing of the sort; he conversed as usual, and spent the day with me and then went away. Afterwards I challenged him to the palaestra; and he wrestled and closed with me several times when there was no one present; I fancied that I might succeed in this manner. Not a bit; I made no way with him. Lastly, as I had failed hitherto, I thought that I must take stronger measures and attack him boldly, and, as I had begun, not give him up, but see how matters stood between him and me. So I invited him to sup with me, just as if he were a fair youth, and I a designing lover. He was not easily persuaded to come; he did, however, after a while accept the invitation, and when he came the first time, he wanted to go away at once as soon as supper was over, and I had not the face to detain him. The second time, still in pursuance of my design, after we had supped, I went on conversing far into the night, and when he wanted to go away, I pretended that the hour was late and that he had much better remain.

“我曾以为他极其倾心于我的美丽，我也应该有极大的机会听他告诉我他所知道的一切，因为我对我的青春魅力极富自信。在实施计划时，我首先走到他旁边，然后把通常陪伴我的仆人打发走了（我要坦白整个事件的真相，请你们听着。如果我说错了，苏格拉底，请你

揭露错误之处）。喔，他和我单独在一起了，我本以为当没有其他人和我们在一起时，我会听到他说出热恋中的爱人们私下相处时说的话，我心中充满了快乐。可这种事并没发生，他还像平时一样同我交谈，跟我呆了一天便走了。然后我邀请他去健身房较量一下，当没有旁人在的时候，他和我摔跤，扭打了几次。我想，在这种方式下我或许会成功。可我没成功，我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最后，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成功，我认为我必须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大胆地对他进攻，我按此方式开始了，我不会放弃他，只是要看看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因此我邀请他与我共进晚餐，他就像是一位美丽的青年，而我则是一个狡猾的情人。劝说他过来不是很容易，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就接受了我的邀请。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晚餐一结束，他就立刻要走，我真是没有脸面去挽留他。第二次，仍旧依照我的计划，在晚餐后，我继续和他谈至深夜，当他要离去时，我假借天色已晚劝他最好留下来。

“So he lay down on the couch next to me, the same on which he had supped, and there was no one but ourselves sleeping in the apartment. All this may be told without shame to any one. But what follows I could hardly tell you if I were sober. Yet as the proverb says, 'In vino veritas,' whether with boys, or without them (In allusion to two proverbs.); and therefore I must speak. Nor, again, should I be justified in concealing the lofty actions of Socrates when I come to praise him. Moreover I have felt the serpent's sting; and he who has suffered, as they say, is willing to tell his fellow-sufferers only, as they alone will be likely to understand him, and will not be extreme in judging of the sayings or doings which have been wrung from his agony. For I have been bitten by a more than viper's tooth; I have known in my soul, or in my heart, or in some other part, that worst of pangs, more violent in ingenuous youth than any serpent's tooth, the pang of philosophy, which will make a man say or do anything. And you whom I see around me, Phaedrus

and Agathon and Eryximachus and Pausanias and Aristodemus and Aristophanes, all of you, and I need not say Socrates himself, have had experience of the same madness and passion in your longing after wisdom. Therefore listen and excuse my doings then and my sayings now. But let the attendants and other profane and unmannered persons close up the doors of their ears.

“因此他躺在我旁边的睡椅上，跟吃饭时一样，寓所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睡觉。我讲这一切时，无愧于人。但如果我是清醒的，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很难讲述了。然而就像谚语里说的，‘酒后吐真言，’无论身旁有没有这些小伙子们（来自于两个寓言引喻），我必须说。此外，当我赞扬苏格拉底时，若是隐瞒了他高尚的行为，我理应受到责备。而我就这样深深感到被蛇咬伤的痛苦；就像他们说的那样，遭受苦难的人，只愿意向同样遭受苦难的同伴们诉说，因为只有他们可能理解他，在判断他出于痛苦而说或做的事情时不会偏激。因为我曾被比毒蛇还毒的牙齿咬过，所以在我的灵魂中，心里，或其他部位，我知道那种最剧烈的疼痛发生在一个直率的年轻人身上会比毒蛇的牙齿咬得还猛烈。哲学带给人的剧痛，会使人无所不说，无所不做。在我周围的你们，裴德罗、阿伽通、厄律克西马库、鲍塞尼阿斯、阿里斯托得摩斯和阿里斯托芬，你们所有人，我就不必说苏格拉底本人了，在你们渴求智慧的道路上，也有着同样疯狂、激昂的经历。因此听着，原谅我那时做的事和现在说的话。但是让侍从和其他鄙俗的、粗鲁的人捂住耳朵不要听。

“When the lamp was put out and the servants had gone away, I thought that I must be plain with him and have no more ambiguity. So I gave him a shake, and I said: 'Socrates, are you asleep?' 'No,' he said. 'Do you know what I am meditating?' 'What are you meditating?' he said. 'I think,' I replied, 'that of all the lovers whom I have ever had you are the only one who is worthy of me, and you

appear to be too modest to speak. Now I feel that I should be a fool to refuse you this or any other favour, and therefore I come to lay at your feet all that I have and all that my friends have, in the hope that you will assist me in the way of virtue, which I desire above all things, and in which I believe that you can help me better than any one else. And I should certainly have more reason to be ashamed of what wise men would say if I were to refuse a favour to such as you, than of what the world, who are mostly fools, would say of me if I granted it.' To these words he replied in the ironical manner which is so characteristic of him:—'Alcibiades, my friend, you have indeed an elevated aim if what you say is true, and if there really is in me any power by which you may become better; truly you must see in me some rare beauty of a kind infinitely higher than any which I see in you. And therefore, if you mean to share with me and to exchange beauty for beauty, you will have greatly the advantage of me; you will gain true beauty in return for appearance—like Diomede, gold in exchange for brass. But look again, sweet friend, and see whether you are not deceived in me. The mind begins to grow critical when the bodily eye fails, and it will be a long time before you get old.' Hearing this, I said: 'I have told you my purpose, which is quite serious, and do you consider what you think best for you and me.' 'That is good,' he said; 'at some other time then we will consider and act as seems best about this and about other matters.' Whereupon, I fancied that he was smitten, and that the words which I had uttered like arrows had wounded him, and so without waiting to hear more I got up, and throwing my coat about him crept under his threadbare cloak, as the time of year was winter, and there I lay during the whole night having this wonderful monster in my arms. This again, Socrates, will not be denied by you. And yet, notwithstanding all, he was so superior to my solicitations, so contemptuous and derisive and disdainful of my beauty—which really, as I fancied, had some attractions—hear, O

judges; for judges you shall be of the haughty virtue of Socrates—nothing more happened, but in the morning when I awoke (let all the gods and goddesses be my witnesses) I arose as from the couch of a father or an elder brother.

“当灯熄了，仆人走了以后，我认为我必须对他坦白，不再弄得含糊不清。因此我晃了晃他，说：‘苏格拉底，你睡了吗？”“没有。’他说。‘你知道我正在考虑什么吗？”“你在考虑什么？’他说。‘我认为，’我回答道，‘在我曾有过的所有爱人中，你是惟一值得我爱慕的，但你看起来太谨慎了，似乎不愿意说出来。现在，我感觉拒绝你这样或那样的好意，那我就是个傻瓜，因此我把我和我朋友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你，听你吩咐，希望你会帮助我获得美德，这是我尤为想要的；而且在这方面比起其他人来，你对我的帮助能更大些。如果我拒绝给你这样的人恩惠，博学的人就会指责我，那我就有更多的理由感到羞愧。世俗的人，大多数都是愚蠢的，而如果我允许他们说我的话，我就不应该感到那么羞愧。’他用反语的方式回答了这些话，这是他特有的风格——‘亚西比德，我的朋友，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要是我自身真的有种力量可以使你变好，你的确有高尚的志向。的确，你一定在我身上看到某种罕有的美丽，远比我在你身上看到的高尚得多。因此，如果你打算和我一起分享，用美丽交换美丽，你将大大超过我。作为对外表的回报，你会获得真正的美丽——就像狄俄墨得斯，用黄金兑换黄铜。但再看看，亲爱的朋友，看看你是否没有看错我。当肉眼不再敏锐时，心灵才开始变得有判断力，而你离变老还早着呢。’听到此，我说：‘我已经告诉了你我的目的，这是相当严肃的，请你考虑怎样对你和我是最好的。’“那听起来不错，’他说，‘那么改天我们会以看起来最恰当的方式来考虑这事还有其他事，并付诸行动。’于是，我想他受了打击，我说出的话就像箭一样刺伤了他，因此，等不及再去多听，我起了身，把我的外套随手扔到他旁边，爬到他破旧的大外衣下面，由于时值冬日，整个晚上我就躺在那儿抱着他，想着我臂弯里这个令人惊奇的怪物。此外，苏格拉底，这个你也无法否认。然而，尽管我做了所有这些，他对我所有的诱惑都是如此

的不为所动，如此鄙视、嘲笑和轻视我的美丽——真的，就像我想的那样，我是有些迷人之处的——噢，裁判员们，你们听着，因为你们应是苏格拉底高傲德行的裁判员——什么都没发生，早晨我醒来时（让众神为我作证）我只是从一位父亲或一位长兄的长椅上起来。

“What do you suppose must have been my feelings, after this rejection, at the thought of my own dishonour? And yet I could not help wondering at his natural temperance and self-restraint and manliness. I never imagined that I could have met with a man such as he is in wisdom and endurance. And therefore I could not be angry with him or renounce his company, any more than I could hope to win him. For I well knew that if Ajax could not be wounded by steel, much less he by money; and my only chance of captivating him by my personal attractions had failed. So I was at my wit's end; no one was ever more hopelessly enslaved by another.

“这次被拒之后，一想到我自己的丢人之处，你猜我肯定会有怎样的感觉呢？然而，我禁不住对他天生的节制、自制和刚毅惊叹不已。我从未想像过我会遇到一位在智慧和耐力方面像他这样的人。因此，我无法对他生气或与他断绝关系，这比我希望赢得他的程度还要大。因为我很明白如果埃阿斯不能被钢铁所伤，他更不会为金钱所动。我没有抓住惟一通过个人魅力去迷惑他的机会。因此我那时不知所措，没有人曾像我这样不可救药地被另一个人束缚着。

“All this happened before he and I went on the expedition to Potidaea; there we messed together, and I had the opportunity of observing his extraordinary power of sustaining fatigue. His endurance was simply marvellous when, being cut off from our supplies, we were compelled to go without food—on such

occasions, which often happen in time of war, he was superior not only to me but to everybody; there was no one to be compared to him. Yet at a festival he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had any real powers of enjoyment; though not willing to drink, he could if compelled beat us all at that—wonderful to relate! No human being had ever seen Socrates drunk; and his powers, if I am not mistaken, will be tested before long. His fortitude in enduring cold was also surprising. There was a severe frost, for the winter in that region is really tremendous, and everybody else either remained indoors, or if they went out had on an amazing quantity of clothes, and were well shod, and had their feet swathed in felt and fleeces in the midst of this, Socrates with his bare feet on the ice and in his ordinary dress marched better than the other soldiers who had shoes, and they looked daggers at him because he seemed to despise them.

“我和他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就这样一直继续到波提狄亚，我们在那儿集体用餐，我则有机会观察他抵抗疲劳的超凡能力。他的耐力简直太了不起了，当我们的供给切断时，我们要被迫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行进——那种情况，在战时是经常发生的，而他不仅比我，而且比其他任何人都优秀，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然而，节日里他是惟一一位真正有实力去享受的人。虽然不愿意喝酒，但如果强迫他，他能把我们全都喝倒！没有人曾看到苏格拉底喝醉过，他的酒量，如果我没弄错，不久以后就会得到验证。他忍耐寒冷的毅力也是令人吃惊的。那时出现了严霜，因为那个地区的冬天真的很可怕，其他人要么呆在屋里，要么穿上出奇多的衣服，并穿好鞋子，把脚裹在毡子和羊毛织物里才会出门。这时候，苏格拉底赤裸着脚站在冰上，他穿着平时的衣服，却比其他穿鞋的士兵行进得还好，他们愤怒地看着他，因为他似乎是在鄙视他们。

“I have told you one tale, and now I must tell you another, which is worth hearing, 'Of the doings and sufferings of the enduring man' while he was on the expedition. One morning he was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which he could not resolve; he would not give it up, but continued thinking from early dawn until noon—there he stood fixed in thought; and at noon attention was drawn to him, and the rumour ran through the wondering crowd that Socrates had been standing and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ever since the break of day. At last, in the evening after supper, some Ionians out of curiosity (I should explain that this was not in winter but in summer), brought out their mats and slept in the open air that they might watch him and see whether he would stand all night. There he stood until the following morning; and with the return of light he offered up a prayer to the sun, and went his way (compare supra).

“我已经告诉了你们一个故事，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另一个值得一听的故事，是‘关于一位有耐力的人所做的和所遭受的事’，这发生在他出门远足的时候。一天早上，苏格拉底正在想某件他无法解决的事。他不愿放弃，从一大早一直想到中午——他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思索着。中午时，他引来了别人的注意，流言传到了好奇的人群里，说苏格拉底从天一破晓就一直站着，思索着某件事。最后，晚上晚餐后，出于好奇，一些爱奥尼亚人（我应该解释一下，当时是在冬季而是在夏季），他们拿出席子睡在空旷处，这样他们可以注视着他，看他是否会整晚都站着。他就在那儿一直站到第二天一大早。随着日光的降临，他向太阳做了祈祷，然后就上路了。

“I will also tell, if you please—and indeed I am bound to tell—of his courage in battle; for who but he saved my life? Now this was the engagement in which I received the prize of valour: for I was

wounded and he would not leave me, but he rescued me and my arms; and he ought to have received the prize of valour which the generals wanted to confer on me partly on account of my rank, and I told them so, (this, again, Socrates will not impeach or deny), but he was more eager than the generals that I and not he should have the prize. There was another occasion on which his behaviour was very remarkable—in the flight of the army after the battle of Delium, where he served among the heavy-armed—I had a better opportunity of seeing him than at Potidaea, for I was myself on horseback, and therefore comparatively out of danger. He and Laches were retreating, for the troops were in flight, and I met them and told them not to be discouraged, and promised to remain with them; and there you might see him, Aristophanes, as you describe (Aristoph. *Clouds*), just as he is in the streets of Athens, stalking like a pelican, and rolling his eyes, calmly contemplating enemies as well as friends, and making very intelligible to anybody, even from a distance, that whoever attacked him would be likely to meet with a stout resistance; and in this way he and his companion escaped—for this is the sort of man who is never touched in war; those only are pursued who are running away headlong. I particularly observed how superior he was to Laches in presence of mind.

“我还要讲一下，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实际上我必须讲——关于他作战时的勇猛。因为正是他，救了我的命。当时，就是在我因为勇敢受到奖励的那次战役中，因为我受伤了，他不愿离开我，还挽救了我和我的部队。由于勇敢，他应该受到奖励而将军却想要把奖励授予给我，部分原因在于我系出名门，我告诉了他们这件事（再者，这个，苏格拉底是不会怀疑或否认的），但是他比将军还积极，让我而不是他受到奖励。另外还有一次他的行为也是非常出众的——代立昂战役后，在军队撤退时，他在重武器部队中——此时要比在波提狄亚更有机会好好看看他，因为我本人骑在马上，所以相对安全。他和

拉刻正在撤退，因为部队在撤退，我遇到他们后，告诉他们不要丧失勇气，并许诺和他们在一起。在那儿，你们或许会看到他，阿里斯托芬，如同你所描述的（阿里斯托芬《云》），他就好像走在雅典的大街上，像鹈鹕一样昂首阔步地走，转动着眼睛，沉着地注视着敌人还有朋友，这使得任何人，甚至离得很远的人都能明白，任何进攻他的人都会得到激烈地抵抗。就这样，他和他的同伴们跑掉了——因为这样的人才永远不会卷入战争中。那些轻率逃跑的人，才是惟一被追击的对象。我尤为注意到，他比拉刻更加沉着、镇定。

“Many are the marvels which I might narrate in praise of Socrates; most of his ways might perhaps be paralleled in another man, but his absolute unlikeness to any human being that is or ever has been is perfectly astonishing. You may imagine Brasidas and others to have been like Achilles; or you may imagine Nestor and Antenor to have been like Pericles; and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other famous men, but of this strange being you will never be able to find any likeness, however remote, either among men who now are or who ever have been—other than that which I have already suggested of Silenus and the satyrs; and they represent in a figure not only himself, but his words. For, although I forgot to mention this to you before, his words are like the images of Silenus which open; they are ridiculous when you first hear them; he clothes himself in language that is like the skin of the wanton satyr—for his talk is of pack-asses and smiths and cobblers and curriers, and he is always repeating the same things in the same words (compare *Gorg.*), so that any ignorant or inexperienced person might feel disposed to laugh at him; but he who opens the bust and sees what is within will find that they are the only words which have a meaning in them, and also the most divine, abounding in fair images of virtue, and of the widest comprehension, or rather extending to the whole duty of a good and honourable man.

“在赞扬苏格拉底方面，我或许要叙述许多令人惊奇的事。他大多数的行为方式在其他人身上都能找到相似之处，但是，他有绝对不像任何人的地方，那是或曾是很令人吃惊的。你可以设想，伯拉西达和其他曾像阿喀琉斯的人，或你可以想像曾像伯里克利的内斯特和安特诺尔，其他著名的人物也有同样的说法。但是对于这个奇怪的人，你永远不能找到任何与其相似的人，无论离得多远，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的人——除了我在谈森林之神和萨梯时所暗示的那两个人。他们不仅能在外貌上代替他本人，而且在言语方面也可以。虽然我忘记之前对你提到过此事，但是他的话就像森林之神的塑像敞开时的样子。当你起初听到时，他们显得荒谬、可笑。他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就像好色之徒萨梯的皮肤——因为他的话里尽是拖物的驴子、铁匠、补鞋匠、制革匠，他总是用同样的话重复同样的事（参考《高尔吉亚篇》），以至于任何一个无知的或没有经验的人都有意要嘲笑他。但是打开半身像看到里面的人将会发现，这是对他们惟一有意义的话，也是最神圣的，富有美德的，具有最广泛的含义，或更确切地说，可以扩展到一位善良而正直的人的全部职责。

“This, friends, is my praise of Socrates. I have added my blame of him for his ill-treatment of me; and he has ill-treated not only me, but Charmides the son of Glaucon, and Euthydemus the son of Diocles, and many others in the same way—beginning as their lover he has ended by making them pay their addresses to him. Wherefore I say to you, Agathon, 'Be not deceived by him; learn from me and take warning, and do not be a fool and learn by experience, as the proverb says.'”

“朋友们，这就是我对苏格拉底的赞美之词。由于他对我的不友善，我又说了些对他责备的言辞。他不仅不友善待我，而且也不友善对待格劳孔的儿子卡密德，狄奥克勒斯的儿子攸惕顿，也不友善对待

许多其他人——开始时，作为他们的爱人，最后却使他们向他献殷勤。因此我对你说，阿伽通，‘不要被他骗了，要从我这儿学到些教训，并有所警惕，不要成为一个傻瓜，要从经验中学习，就像谚语里说的。’”

When Alcibiades had finished, there was a laugh at his outspokenness; for he seemed to be still in love with Socrates. “You are sober, Alcibiades,” said Socrates, “or you would never have gone so far about to hide the purpose of your satyr's praises, for all this long story is only an ingenious circumlocution, of which the point comes in by the way at the end; you want to get up a quarrel between me and Agathon, and your notion is that I ought to love you and nobody else, and that you and you only ought to love Agathon. But the plot of this Satyric or Silenic drama has been detected, and you must not allow him, Agathon, to set us at variance.”

亚西比德一说完，大家就因他的直言不讳而笑了出来，因为他似乎仍旧爱着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你是清醒的，亚西比德，否则你是不会讲这么多去隐藏你对你的萨梯的赞美之意，因为整个这番长篇大论只不过是精心策划的、婉转曲折的陈述，顺便说一下，其主旨在最后便显露出来。你想在我和阿伽通之间引起一场争吵，你希望我应该爱你而不是其他人，而且你们其他人应该只爱阿伽通一人。但是，这个由萨梯或者森林之神所演绎的戏剧阴谋已被发现，阿伽通，你不能允许他离间我们。”

“I believe you are right,” said Agathon, “and I am disposed to think that his intention in placing himself between you and me was only to divide us; but he shall gain nothing by that move; for I will

go and lie on the couch next to you.”

阿伽通说：“我相信你是对的，我也认为他把他自己置于你我之间的目的就是为了离间我们。但是，那个举动毫无意义，因为我要走过来躺在你身旁的椅子上。”

“Yes, yes,” replied Socrates, “by all means come here and lie on the couch below me.”

“是的，是的，”苏格拉底回答说，“你一定要过来躺在我下面的椅子上。”

“Alas,” said Alcibiades, “how I am fooled by this man; he is determined to get the better of me at every turn. I do beseech you, allow Agathon to lie between us.”

“哎，”亚西比德说，“我是怎样被这个人给愚弄的呀。他决意每一轮都要打败我。我恳求你，允许阿伽通躺在我们中间吧。”

“Certainly not,” said Socrates, “as you praised me, and I in turn ought to praise my neighbour on the right, he will be out of order in praising me again when he ought rather to be praised by me, and I must entreat you to consent to this, and not be jealous, for I have a great desire to praise the youth.”

苏格拉底说："当然不可能了，既然你赞扬了我，反过来该我赞扬我右边的人了，他若再赞扬我就是乱了次序，我必须请求你同意这一点，不要嫉妒，因为我极其渴望赞美这位青年。"

"Hurrah!" cried Agathon, "I will rise instantly, that I may be praised by Socrates."

阿伽通喊道："好哇！我要马上站起来，以便苏格拉底可以赞扬我。"

"The usual way," said Alcibiades; "where Socrates is, no one else has any chance with the fair; and now how readily has he invented a specious reason for attracting Agathon to himself."

亚西比德说："还是和平常一样，有苏格拉底的地方，美丽的人不会给其他任何人机会。现在，他多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把阿伽通吸引到他自己身旁。"

Agathon arose in order that he might take his place on the couch by Socrates, when suddenly a band of revellers entered, and spoiled the order of the banquet. Some one who was going out having left the door open, they had found their way in, and made themselves at home; great confusion ensued, and every one was compelled to drink large quantities of wine.

阿伽通站起身来以便坐到苏格拉底旁边的椅子上，这时突然进来

一帮狂欢者，破坏了宴会的讲话次序。某个要出去的人没有关门，他们见到门就进来了，无拘无束。接下来就极其混乱了，每个人都被迫又喝了不少酒。

Aristodemus said that Eryximachus, Phaedrus, and others went away—he himself fell asleep, and as the nights were long took a good rest: he was awakened towards daybreak by a crowing of cocks, and when he awoke, the others were either asleep, or had gone away; there remained only Socrates, Aristophanes, and Agathon, who were drinking out of a large goblet which they passed round, and Socrates was discoursing to them. Aristodemus was only half awake, and he did not hear the beginning of the discourse; the chief thing which he remembered was Socrates compelling the other two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genius of comedy was the same with that of tragedy, and that the true artist in tragedy was an artist in comedy also. To this they were constrained to assent, being drowsy, and not quite following the argument. And first of all Aristophanes dropped off, then, when the day was already dawning, Agathon.

阿里斯托得摩斯说厄律克西马库、裴德罗还有其他人都走了——他睡着了，由于夜晚很长，所以休息得很好。黎明时，他被公鸡报晓的声音惊醒了，发现其他人要么睡着了要么离开了，只剩下了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和阿伽通还醒着，他们正在从一个循环传递的大酒杯里取酒喝，苏格拉底正对他们讲话呢。阿里斯托得摩斯仅是半醒着，他没有听到讲话的开始，他记住的主要的事情就是苏格拉底迫使其他两位承认，对喜剧有天赋的人对悲剧也有天赋，真正的悲剧诗人也是真正的喜剧诗人。至于这一点，他们勉强同意，由于昏昏欲睡，并不能完全领悟辩论的主题。首先是阿里斯托芬睡着了，然后，待天破晓后阿伽通也睡着了。

Socrates, having laid them to sleep, rose to depart; Aristodemus, as his manner was, following him. At the Lyceum he took a bath, and passed the day as usual. In the evening he retired to rest at his own home.

再把他们都说睡着了后，苏格拉底就起身离开了。就像他往常那样，阿里斯托得摩斯跟着他。在吕克昂，他洗了个澡，像往常一样度过了这一天。晚上他在自己家里休息。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On the Soul

论灵魂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论灵魂

On the Soul

亚里士多德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Book I 第一卷
- Book II 第二卷
- Book III 第三卷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Book I

第一卷

Chapter 1

第一章

Holding as we do that, while knowledge of any kind is a thing to be honoured and prized, one kind of it may, either by reason of its greater exactness or of a higher dignity and greater wonderfulness in its objects, be more honourable and precious than another, on both accounts we should naturally be led to place in the front rank the study of the soul. The knowledge of the soul admittedly contributes greatly to the advance of truth in general, and, above all,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for the soul is in some sense the principle of animal life. Our aim is to grasp and understand, first its essential nature, and secondly its properties; of these some are taught to be affections proper to the soul itself, while others are considered to attach to the animal owing to the presence within it of soul.

我们认为，尽管任何一种知识都应受到尊重与珍视，但是，其中一种知识由于其精确程度较高，抑或由于其客体更显尊贵和奇妙，就可能比另外一种知识更加令人尊崇，也更显弥足珍贵；由于上述两种原因，我们自然不得不将对灵魂的研究置于首位。无可否认，关于灵魂的知识对真理的发展具有普遍的促进意义，尤其是对我们理解自然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灵魂是动物生命的本原。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握并理解以下两点：一是灵魂的本质，二是灵魂的属性；在这些属性中，一些被认为是灵魂自身所独有的属性，而

另一些则因灵魂寓于动物体内而被视为附属于动物的属性。

To attain any assured knowledge about the soul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s in the world. As the form of question which here presents itself, viz. the question 'What is it?', recurs in other fields, it might be supposed that there was some single method of inquiry applicable to all objects whose essential nature (as we are endeavouring to ascertain there is for derived properties the single method of demonstration); in that case what we should have to seek for would be this unique method. But if there is no such single and general method for solving the question of essence, our task becomes still more difficult; in the case of each different subject we shall have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process of investigation. If to this there be a clear answer, e.g. that the process is demonstration or division, or some known method, difficulties and hesitations still beset us—with what facts shall we begin the inquiry? For the facts which form the starting-points in different subjects must be different, as e.g. in the case of numbers and surfaces.

获得关于灵魂的任何确切可靠的知识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由于问题自身呈现的形式，即“它是什么？”这一问题，也反复出现在其他研究领域，人们可假设存在某种唯一的研究方法，它适用于研究所有我们试图确定其实质的所有客体（正如单一的论证法便适用于研究衍生属性）；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必须寻找的一定是这种独一无二的方法。但是如果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唯一的、通用的研究本质问题的方法，我们的任务就更加艰难；我们将不得不针对每一个不同的主体确定适当的研究方法。即使对此有明确的答案，譬如研究方法是论证法或划分法，抑或其他某种已知的方法，仍然有诸多困难和疑虑困扰我们——我们以什么事实开始研究？因为在不同的研究领域

中，例如算术和平面几何，构成出发点的事实肯定不同。

First, no doubt, it is necessary to determine in which of the summa genera soul lies, what it is; is it 'a this-somewhat', a substance, or is it a quale or a quantum, or some other of the remaining kinds of predicates which we have distinguished? Further, does soul belong to the class of potential existents, or is it not rather an actuality? Our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首先，勿庸置疑，确定灵魂的终极类属是必要的，它是什么？它是“某一个体”、某种实体，或者它是某一可感受的特质，抑或数量，还是我们业已区分的其他的某种范畴？进而言之，灵魂是属于潜在的存在，抑或只是某种现实的存在？我们对此问题的回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We must consider also whether soul is divisible or is without parts, and whether it is everywhere homogeneous or not; and if not homogeneous, whether its various forms are different specifically or generically: up to the present time those who have discussed and investigated soul seem to have confined themselves to the human soul. We must be careful not to ignore the question whether soul can be defined in a single unambiguous formula, as is the case with animal, or whether we must not give a separate formula for each of it, as we do for horse, dog, man, god (in the latter case the 'universal' animal—and so too every other 'common predicate'—being treated either as nothing at all or as a later product). Further, if what exists is not a plurality of souls, but a plurality of parts of one soul, which ought we to investigate first, the whole soul or its

parts? (It is also a difficult problem to decide which of these parts are in nature distinct from one another.) Again, which ought we to investigate first, these parts or their functions, mind or thinking, the faculty or the act of sensation, and so on? I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functions precedes that of the parts, the further question suggests itself: ought we not before either to consider the correlative objects, e.g. of sense or thought? It seems not only useful for the discovery of the causes of the derived properties of substances to be acquainted with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those substances (as in mathematics it is useful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perty of the equality of the interior angles of a triangle to two right angles to know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the straight and the curved or of the line and the plane) but also conversely, for the knowledge of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a substance is largely promoted by an acquaintance with its properties: for, when we are able to give an account conformable to experience of all or most of the properties of a substance, we shall be in the most favourable position to say something worth saying about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that subject; in all demonstration a definition of the essence is required as a starting-point, so that definitions which do not enable us to discover the derived properties, or which fail to facilitate even a conjecture about them, must obviously, one and all, be dialectical and futile.

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灵魂是可分的还是不可分的，它是完全同质的还是不同质的；如若不同质，其多种形式上的差异是属差还是种差：迄今为止，讨论和研究灵魂的研究者们似乎只将其研究局限于人类的灵魂。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忽略下面这一问题：就像动物的定义一样，灵魂是否也可以用一个单一明确的方式来定义，或者我们是否绝不可以给每一种动物分别下一个不同的定义，譬如我们对马、狗、人、神的定义（后一种情况中的“普遍存在的”动物——其他所有的“共同范畴”也是一样——要么被视为不存在，要么被看作是晚期的

产物）。而且，如果存在的不是多种灵魂，而是一个灵魂的多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应该首先研究哪一个，是整体的灵魂还是其组成部分？（确定哪些组成部分在本质上是相互区别的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另外，我们应该首先研究什么，是灵魂的组成部分还是其功能，是心智还是思维，是感觉的官能还是感觉的行为，抑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如果对灵魂的功能研究先于对其组成部分的研究，那么问题本身就会进一步提出：我们不应该在考虑上述两者之前考虑相关的客体，譬如感觉或思想的相关客体吗？看来认识本体的实质不仅对发现本体衍生属性的成因大有裨益（正如在数学中，了解直与曲或线与面的实质有助于理解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其两个直角度数之和一样），而且，反之亦然，因为对某一本体衍生属性的认识也会极大地促进人们对本体实质的认识：这是因为，当我们能够给出的描述与我们对某一本体的全部或大部分属性的体验相一致时，我们才最有可能说出关于该主体实质的有价值的内容；一切论证均要求以本质的定义为出发点，因此，那些不能使我们发现衍生属性的定义，或者那些甚至是无助于我们对其进行推断的定义，显然都只是空口辩论，没有实际意义的。

A further problem presented by the affections of soul is this: are they all affections of the complex of body and soul, or is there any one among them peculiar to the soul by itself? To determine this is indispensable but difficult. If we consider the majority of them, there seems to be no case in which the soul can act or be acted upon without involving the body; e.g. anger, courage, appetite, and sensation generally. Thinking seems the most probable exception; but if this too proves to be a form of imagination or to be impossible without imagination, it too requires a body as a condition of its existence. If there is any way of acting or being acted upon proper to soul, soul will be capable of separate existence; if there is none, its separate existence is impossible. In the latter case, it will be like what is straight, which has many

properties arising from the straightness in it, e.g. that of touching a bronze sphere at a point, though straightness divorced from the other constituents of the straight thing cannot touch it in this way; it cannot be so divorced at all, since it is always found in a body. It therefore seems that all the affections of soul involve a body-passion, gentleness, fear, pity, courage, joy, loving, and hating; in all these there is a concurrent affection of the body. In support of this we may point to the fact that, while sometimes on the occasion of violent and striking occurrences there is no excitement or fear felt, on others faint and feeble stimulations produce these emotions, viz. when the body is already in a state of tension resembling its condition when we are angry. Here is a still clearer case: in the absence of any external cause of terror we find ourselves experiencing the feelings of a man in terror. From all this it is obvious that the affections of soul are enmattered formulable essences.

灵魂的诸属性所显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它们是躯体和灵魂综合体的全部属性，抑或在它们之中存在某种只属于灵魂自身的属性？明确这一点是必需的，但也是困难的。仔细考察其大多数属性，我们就会发现，脱离了躯体，灵魂似乎根本无法主动作用或被动反应；例如愤怒、勇气、欲望和感觉等通常大多如此。思维看似是最有可能的例外，但如果思维也被证明是想象的一种形式或者不可能离开想象，那么它也需要以躯体作为其存在的条件。如果有某种主动作用或被动反应方式专属于灵魂，灵魂则能够独立存在；如果没有，灵魂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在后一种情形中，灵魂与直的物体相类似，直的物体具有许多属性，这些属性均源于其自身直的性质，例如一条直线与一个青铜球在某一点相切，尽管直的性质是从直的物体的其他组成部分中分离出来的，但是直的性质却不能以这种方式与青铜球相切；因为直的性质总是寓于某一物体之中，所以它根本不能被分离出来。因此，灵魂的所有属性似乎都与某种躯体相联结：狂热、温柔、恐惧、

怜悯、勇气、喜悦、友爱和憎恨；在所有这些情感中均有躯体的某一属性与之同时存在。我们似可举下面这一事实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有时当暴力和令人惊骇的事件发生时，人们却没有感觉到激动或恐惧，而在另一些时候，微弱和轻微的刺激便会令人产生这些情绪，那就是当躯体已经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的时候，这种紧张状态与我们愤怒时的状态相似。这里还有一更明显的例子：在没有任何引起恐怖的外在因素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自己体验着身陷恐惧之中的人所承受的那种感觉。根据上述事实，显而易见，灵魂的诸多属性依附于质料的、可形式化的本质。

Consequently their definitions ought to correspond, e.g. anger should be defined as a certain mode of movement of such and such a body (or part or faculty of a body) by this or that cause and for this or that end. That is precisely why the study of the soul must fall within the science of Nature, at least so far as in its affections it manifests this double character. Hence a physicist would define an affection of soul differently from a dialectician; the latter would define e.g. anger as the appetite for returning pain for pai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while the former would define it as a boiling of the blood or warm substance surround the heart. The latter assigns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the former the form or formulable essence; for what he states is the formulable essence of the fact, though for its actual existence there must be embodiment of it in a material such as is described by the other. Thus the essence of a house is assigned in such a formula as 'a shelter against destruction by wind, rain, and heat'; the physicist would describe it as 'stones, bricks, and timbers'; but there is a third possible description which would say that it was that form in that material with that purpose or end. Which, then, among these is entitled to be regarded as the genuine physicist? The one who confines himself to the material, or the one who restricts himself to the formulable essence alone? Is it not

rather the one who combines both in a single formula? If this is so, how are we to characterize the other two? Must we not say that there is no type of thinker who concerns himself with those qualities or attributes of the material which are in fact inseparable from the material, and without attempting even in thought to separate them? The physicist is he who concerns himself with all the properties active and passive of bodies or materials thus or thus defined; attributes not considered as being of this character he leaves to others, in certain cases it may be to a specialist, e.g. a carpenter or a physician, in others (a) where they are inseparable in fact, but are separable from any particular kind of body by an effort of abstraction, to the mathematician, (b)where they are separate both in fact and in thought from body altogether, to the first philosopher or metaphysician. But we must return from this digression, and repeat that the affections of soul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material substratum of animal life, to which we have seen that such affections, e.g. passion and fear, attach, and have not the same mode of being as a line or a plane.

因此，它们的定义应该与之相符，譬如愤怒应被定义为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目的，某一躯体（或者躯体的一部分，或躯体的能力）的某种运动方式。正因为如此，灵魂研究必定属于自然科学领域，至少就其诸属性而言，灵魂呈现这一双重特点。因此，自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对灵魂属性的定义完全不同；例如后者会将愤怒定义为以牙还牙的欲望，抑或与此类似的事物，而前者则会把愤怒定义为血液的沸腾或心脏周围的热物质。后者阐释的是物质条件，前者界说的是形式或形式化的本质；因为他所论述的是事实的形式化本质，尽管其现实存在必须寓于逻辑学家所述的某一相应物质之中。因此，房子的本质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界定为“抵御风、雨和炎热破坏的掩蔽所”；自然哲学家则会将房子描述为“石头、砖和木料”；但是也可有第三种表述，该表述可将其假定为为了那种用途或目的使

用那种物质的那个形式。那么，这其中哪一位堪称真正的自然哲学家？是那位将自己限定于质料的学者，还是那位把自己限定于形式化本质的学者？难道就不能是那位将两种定义合二为一的学者吗？果真是这位学者的话，我们又该如何概括另外两位学者的特点呢？有一类思想家专注于物质的性质或属性，事实上这些性质和属性与物质是不可分离的，这类思想家甚至根本无意将其分开。我们一定不能说不存在这类思想家吗？自然哲学家就是这样的研究专家，他致力于研究这样或那样界定的躯体或质料的所有积极或消极属性；其他不具有此类性质的特征均留给他人研究，在一些情况下，可将其留给专业人员，譬如木匠或医师；在另一些情况下，当实际上它们不可分离，但通过抽象的努力却可以从某种特殊躯体中分离出来时，可将其留给数学家；当它们在现实中和在想象中均可以从躯体中分离出来时，将其留给第一哲学家或形而上学家。现在我们必须回归正题，并重申灵魂的属性与动物生命的物质基质是不可分离的，我们业已看到的狂热和恐惧等诸属性都依附于动物生命的物质基质，而且灵魂的属性与线或面不属于同一存在类型。

Chapter 2

第二章

For our study of soul it is necessary, while formulating the problems of which in our further advance we are to find the solutions, to call into council the views of those of our predecessors who have declared any opinion on this subject, in order that we may profit by whatever is sound in their suggestions and avoid their errors.

在关于灵魂的研究中，我们应明确必须研究的诸问题，通过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找出问题的答案。与此同时，我们有必要甄别所有对此

问题发表过见解的先哲们的一切观点，以便我们能够从中借鉴其任何有益的成果，摈弃其谬误。

The starting-point of our inquiry is an exposition of tho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ve chiefly been held to belong to soul in its very nature. Two characteristic marks have above all others been recognized as distinguishing that which has soul in it from that which has not—movement and sensation. It may be said that these two are what our predecessors have fixed upon as characteristic of soul.

探索灵魂问题，我们阐述的切入点是那些在本性上通常被视为属于灵魂的特征。其中两个最显著的标志性特征被公认为可用以区分有灵魂的和无灵魂的事物——运动和感觉。可以说这两个特征是我们的先哲们在灵魂特征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

Some say that what originates movement is both pre-eminently and primarily soul; believing that what is not itself moved cannot originate movement in another, they arrived at the view that soul belongs to the class of things in movement. This is what led Democritus to say that soul is a sort of fire or hot substance; his 'forms' or atoms are infinite in number; those which are spherical he calls fire and soul, and compares them to the motes in the air which we see in shafts of light coming through windows; the mixture of seeds of all sorts he calls the elements of the whole of Nature (Leucippus gives a similar account); the spherical atoms are identified with soul because atoms of that shape are most adapted to permeate everywhere, and to set all the others moving by being themselves in movement. This implies the view that soul is identical

with what produces movement in animals. That is why, further, they regard respiration as the characteristic mark of life; as the environment compresses the bodies of animals, and tends to extrude those atoms which impart movement to them, because they themselves are never at rest, there must be a reinforcement of these by similar atoms coming in from without in the act of respiration; for they prevent the extrusion of those which are already within by counteracting the compressing and consolidating forc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animals continue to live only so long as they are able to maintain this resistance.

有些先哲认为，灵魂是显著的、首要的运动肇始者；因为他们确信凡其自身不能运动的事物均不能引起其他事物运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灵魂属于处于运动中的那类事物。据此，德谟克利特认为，灵魂是某种火或热的物质；他所说的“形式”或原子在数量上是无限的；他将那些球状的原子称为火和灵魂，并将其比作悬浮在空气中的微粒，我们可以在透过窗户照射进来的光束中看见这些微粒；他将一切种子的混合体称为整个自然的元素（留基伯也有类似的阐述）；球形原子与灵魂是同一的，因为这种形状的原子最适于渗入所有物体，并且因其自身处于运动状态而引起所有其他事物的运动。这其中隐含着这样一个观点：灵魂等同于动物体内肇始运动者。而且，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认为呼吸是生命的标志性特征；由于外界环境挤压动物躯体，并倾向于将动物体内引起运动的原子挤压出来，因为它们本身从不处于静止状态，所以必须通过呼吸活动吸进但却未参与呼吸运动的类似的原子对其进行加固；因为通过抵消外界环境的压力及其凝结力，它们可阻止动物体内已有的原子被挤压到体外；只要动物能够保持这种抵抗力，它们便可继续生存。

The doctrine of the Pythagoreans seems to rest upon the same ideas; some of them declared the motes in air, others what moved

them, to be soul. These motes were referred to because they are seen always in movement, even in a complete calm.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灵魂学说似乎也是基于同样的观点；该学派中有些人断言灵魂是空气中的微粒，另一些人则认为引起这些微粒运动的是灵魂。他们论及这些微粒是因为他们看到，即使是在绝对平静的空气中，这些微粒也总是处于运动之中。

The same tendency is shown by those who define soul as that which moves itself; all seem to hold the view that movement is what is closest to the nature of soul, and that while all else is moved by soul, it alone moves itself. This belief arises from their never seeing anything originating movement which is not first itself moved.

这与那些将灵魂定义为自我运动事物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是相同的；他们似乎都认为，运动是最接近灵魂本质的显著特征，并且既然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因灵魂而运动，灵魂便可独自地自我运动。这种看法源于他们从未见到过任何自身首先不运动但却肇始运动的事物。

Similarly also Anaxagoras (and whoever agrees with him in saying that mind set the whole in movement) declares the moving cause of things to be soul. His position must, however,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at of Democritus. Democritus roundly identifies soul and mind, for he identifies what appears with what is true—that is why he commends Homer for the phrase 'Hector lay with thought distraught'; he does not employ mind as a special faculty dealing with truth, but identifies soul and mind. What

Anaxagoras says about them is more obscure; in many places he tells us that the cause of beauty and order is mind, elsewhere that it is soul; it is found, he says, in all animals, great and small, high and low, but mind (in the sense of intelligence) appears not to belong alike to all animals, and indeed not even to all human beings.

与此相仿，阿那克萨哥拉（以及所有与其一样认为心智肇始万物运动的人）也断言肇始万物运动的动因是灵魂。然而，他的观点有别于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德谟克利特直接把灵魂等同于心智，因为他将看似真实的事物等同于真实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他赞赏荷马的诗句“赫克托耳躺着作别样的思维”；他不用心智一词指某种辨别真理的专门能力，而是将灵魂等同于心智。阿那克萨哥拉关于灵魂与心智的论述更是模糊不清；他在论述中多处向我们指出，美与秩序源于心智，而在别处他又认为这是源于灵魂；他指出，灵魂见诸于所有动物，不论其是大还是小，也不论其是高级还是低级，但是心智（智力意义上的心灵）似乎并非在同等程度上属于一切动物，而且甚至也并非属于所有人。

All those, then, who had special regard to the fact that what has soul in it is moved, adopted the view that soul is to be identified with what is eminently originative of movement. All, on the other hand, who looked to the fact that what has soul in it knows or perceives what is, identify soul with the principle or principles of Nature, according as they admit several such principles or one only. Thus Empedocles declares that it is formed out of all his elements, each of them also being soul; his words are:

而且，有些先哲特别注重考察有灵魂的生物可以运动这一事实，所有这些人都认为，灵魂与具有非常强的肇始运动能力的事物是同一

的。另一方面，另一些先哲所关注的是有灵魂的生物认识或感知其认识或感知的是什么，这些人无不认为灵魂等同于自然的唯一或诸多本原，这取决于他们是承认诸多这样的本原还是只接受唯一本原。譬如恩培多克勒就断言灵魂是由他所谓的全部元素构成的；每一种元素亦均为某一灵魂；他的表述是：

> For 'tis by Earth we see Earth, by Water Water,
>
> 唯有凭土我们才了解土，凭水才了解水，
>
> By Ether Ether divine, by Fire destructive Fire,
>
> 唯有借气才认识具有神性的气，借火才认识毁灭性的火，
>
> By Love Love, and Hate by cruel Hate.
>
> 唯有靠友爱才感受友爱，并靠仇恨感受仇恨。

In the same way Plato in the *Timaeus* fashions soul out of his elements; for like, he holds, is known by like, and things are formed out of the principles or elements, so that soul must be so too. Similarly also in his lectures 'On Philosophy' it was set forth that the animal—itself is compounded of the idea itself of the One together with the primary length, breadth, and depth, everything else, the

objects of its perception, being similarly constituted. Again he puts his view in yet other terms: mind is the monad, science or knowledge the dyad (because it goes undeviatingly from one point to another), opinion the number of the plane, sensation the number of the solid; the numbers are by him expressly identified with the forms themselves or principles, and are formed out of the elements; now things are apprehended either by mind or science or opinion or sensation, and these same numbers are the forms of things.

柏拉图在其所著的《蒂迈欧篇》中也用他自己的诸元素构建了灵魂；他认为，物以类识，而且事物是由这些本原或元素构成的，所以灵魂也必定如此。与此相似，柏拉图在其‘论哲学’讲稿中还提出动物本身是由“一”这一理念本身与由此演化而来的基本的长、宽和深复合构成的，其他所有事物，灵魂感知的所有客体，也都是以类似的方式构成的。此外，他还用另一种方式对其观点进行了阐释：心智是“一”，科学或知识是“二”（因为两点间只能有一条直线），意见是平面的数，感觉是立体的数；他认为，这些数与诸形式本身或本原显然是同一的，并且是由诸元素构成的；如此说来，认识事物要么是凭借心智，要么是凭借科学，要么是凭借意见，要么是凭借感觉，而且这些数恰恰就是事物的形式。

Some thinkers, accepting both premises, viz. that the soul is both originative of movement and cognitive, have compounded it of both and declared the soul to be a self-moving number.

有些思想家接受上述两种假说，即灵魂既肇始运动，又具有认识能力，因此他们兼收并蓄，合二为一，提出了灵魂是一个能够自身运动的数这一主张。

As to the nature and number of the first principles opinions differ. The difference is greatest between those who regard them as corporeal and those who regard them as incorporeal, and from both dissent those who make a blend and draw their principles from both sources. The number of principles is also in dispute; some admit one only, others assert several. There is a consequent diversity in their several accounts of soul; they assume, naturally enough, that what is in its own nature originative of movement must be among what is primordial. That has led some to regard it as fire, for fire is the subtlest of the elements and nearest to incorporeality; further, in the most primary sense, fire both is moved and originates movement in all the others.

在有关灵魂的第一本原的性质及数的问题上，人们各持己见。最主要的分歧是视灵魂第一本原的性质与数为物质的思想家与视其为非物质的思想家之间的纷争，以及综合两种观点分歧，认为其既是物质的，又是非物质的，并且从上述两个源头出发推断其本原的思想家之间的争论。关于本原的数也存在争议；一些人确认只有唯一本原，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有数个本原。诸家的观点分歧必然导致他们对灵魂的诸多论述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非常自然地，主观认为凡自身在本性上就能够肇始运动的事物必然存在于原生的事物之中。这就使得有些人认为灵魂是火，因为火是最微妙的，也最接近非物质性的元素；而且，从最主要的意义上说，火既可以被运动，又可以肇始所有其他事物运动。

Democritus has expressed himself more ingeniously than the rest on the grounds for ascribing each of these two characters to soul; soul and mind are, he says, one and the same thing, and this thing must be one of the primary and indivisible bodies, and its power of originating movement must be due to its fineness of grain

and the shape of its atoms; he says that of all the shapes the spherical is the most mobile, and that this is the shape of the particles of fire and mind.

关于为何将运动和肇始运动二者均视为灵魂所具有的特征，德谟克利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较之其他先哲，他的阐述更加精确明了；他明确地指出，灵魂与心智是同一的，而且这同一事物必须是一种原始的、不可分割的物体；另外，其肇始运动的能力一定是源于其微粒的精细度及其原子的形状；他断言在所有的形状中球形是最易于运动的，而且这正是火和心智的粒子的形状。

Anaxagoras, as we said above, seem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oul and mind, but in practice he treats them as a single substance, except that it is mind that he specially posits as the principle of all things; at any rate what he says is that mind alone of all that is simple, unmixed, and pure. He assigns both characteristics, knowing and origination of movement, to the same principle, when he says that it was mind that set the whole in movement.

正如我们业已提及的那样，阿那克萨哥拉似乎欲区分灵魂与心智，但是实际上他却是将两者视为一种实体，只是他尤其断定心智为一切事物的本原；不管怎样，他所阐述的不外乎在所有事物中，心智是唯一简单的、纯粹的和纯净的。当论及使所有事物处于运动状态的是心智时，他就把认识和肇始运动这两种特征都归于同一本原。

Thales, too, to judge from what is recorded about him, seems to have held soul to be a motive force, since he said that the magnet has a soul in it because it moves the iron.

据相关记载，塔莱斯似乎也认为灵魂是一种引起运动的原动力，因为他曾说过由于磁石可以使铁运动，所以磁石有灵魂。

Diogenes (and others) held the soul to be air because he believed air to be finest in grain and a first principle; therein lay the grounds of the soul's powers of knowing and originating movement. As the primordial principle from which all other things are derived, it is cognitive; as finest in grain, it has the power to originate movement.

第欧根尼（以及其他一些人）将灵魂视为气，因为他认为气是微粒中最细微的，而且是第一本原；故此灵魂具有认知和肇始运动的能力。作为衍生万物的最初本原，灵魂具有认识能力；作为极其精细的微粒，它具有肇始运动的能力。

Heraclitus too says that the first principle—the 'warm exhalation' of which, according to him, everything else is composed—is soul; further, that this exhalation is most incorporeal and in ceaseless flux; that what is in movement requires that what knows it should be in movement; and that all that is has its being essentially in movement (herein agreeing with the majority).

赫拉克利特也认为，第一本原——“发散的热气”，他认为，其他一切事物均由此构成——就是灵魂；而且，这种散发的热气不具有任何物质性并且处于流动状态；处于运动状态的事物要求能够认识它的事物也必须处于运动状态；并且所有存在的事物均必须处于运动状态（在这一点上其观点与大多数人的观点是一致的）。

Alcmaeon also seems to have held a similar view about soul; he says that it is immortal because it resembles 'the immortals', and that this immortality belongs to it in virtue of its ceaseless movement; for all the 'things divine', moon, sun, the planets, and the whole heavens, are in perpetual movement.

阿尔克迈翁对于灵魂似乎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灵魂是永恒的，因为它与“永恒的事物”相类似，而且这种永恒性归因于其不断的运动；因为一切“神圣的事物”，月、日、星辰以及整个天体都处在永恒的运动之中。

Of more superficial writers, some, e.g. Hippo, have pronounced it to be water; they seem to have argued from the fact that the seed of all animals is fluid, for Hippo tries to refute those who say that the soul is blood, on the ground that the seed, which is the primordial soul, is not blood.

在较为浅薄的作者当中，有些人，譬如希波，称灵魂为水；所有动物的精液都是流体的，他们提出这一主张似乎就是以这一事实为依据，因为精液不是血液，而是初始灵魂，据此希波试图反驳那些主张灵魂是血液的人。

Another group (Critias, for example) did hold it to be blood; they take perception to be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attribute of soul, and hold that perceptiveness is due to the nature of blood.

另一些人（比如克里底亚）的确认为灵魂是血液；他们将感知当作灵魂最具特色的属性，并且坚持认为这种感知性源于血液的本性。

Each of the elements has thus found its partisan, except earth—earth has found no supporter unless we count as such those who have declared soul to be, or to be compounded of, all the elements. All, then, it may be said, characterize the soul by three marks, movement, sensation, incorporeality, and each of these is traced back to the first principles. That is why (with one exception) all those who define the soul by its power of knowing make it either an element or constructed out of the elements. The language they all use is similar; like, they say, is known by like; as the soul knows everything, they construct it out of all the principles. Hence all those who admit but one cause or element, make the soul also one (e.g. fire or air), while those who admit a multiplicity of principles make the soul also multiple. The exception is Anaxagoras; he alone says that mind is impassible and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anything else. But, if this is so, how or in virtue of what cause can it know? That Anaxagoras has not explained, nor can any answer be inferred from his words. All who acknowledge pairs of opposites among their principles, construct the soul also out of these contraries, while those who admit as principles only one contrary of each pair, e.g. either hot or cold, likewise make the soul some one of these. That is why, also, they allow themselves to be guided by the names; those who identify soul with the hot argue that sen (to live) is derived from sein (to boil), while those who identify it with the cold say that soul (psuche) is so called from the process of respiration and refrigeration(katapsuxis). Such are the traditional opinions concerning soul, together with the grounds on which they are maintained.

至此，四种元素中的每一元素均有其支持者，只有土是个例外——没有人持土是灵魂的观点，除非我们将认为灵魂就是所有元素或是由所有元素混合构成的人视为持这一主张的人。既然如此，我们大概可以说，所有先哲都认同灵魂具有三个显著特征：运动、感觉和非物质性，而且每一特征都可追溯到第一本原。这就是所有用灵魂的认识能力来界定灵魂的先哲们（只有一个例外）要么将其视作某一元素，要么将其看成是由诸元素组合而成的原因。他们所使用的论述方式是相似的；同类事物，他们说，只能通过同类事物来认识；既然灵魂可以认识所有的事物，他们便用所有的本原来构建灵魂。因此所有那些只承认一种原因或一个元素的先哲们就构建一个灵魂（例如火或气），而那些承认多个本原的先哲们则用多个元素构建多个灵魂。阿那克萨哥拉是个例外；唯独他认为心智是不为外物所动的并且与其他任何事物均无共同之处。但是，果真如此的话，心智怎么认识[事物]或凭借什么缘由认识事物？对此阿那克萨哥拉没有作出解释，我们从其论述中也无法推断出任何答案。凡承认在它们的本原之中存在相互对立双方的先哲们，均用这些相互对立的双方构建灵魂，而另一些先哲则承认作为本原的是对立对中的某一个，例如热或冷，他们同样也是从中择一构建灵魂。也是源于此故，他们任由名称误导；那些把灵魂等同于热的人认为，sen（生活）源自sein（沸腾），而那些视灵魂为冷的人说灵魂（psuche）之所以被称为灵魂是源于呼吸和冷却（katapsuxis）过程。这些便是关于灵魂的传统的诸家之说及其主张的根据。

Chapter 3

第三章

We must begin our examination with movement; for doubtless, not only is it false that the essence of soul is correctly described by those who say that it is what moves (or is capable of moving) itself, but it is an impossibility that movement should be even an attribute

of it.

我们必须从运动入手开始我们的研究；因为毫无疑问，有些人称灵魂是自身运动（或自身能运动）的事物，不仅他们对灵魂本质的所谓正确论述是错误的，而且甚至就连运动应该是灵魂的属性也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

We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that there is no necessity that what originates movement should itself be moved. There are two senses in which anything may be moved—either (a) indirectly, owing to something other than itself, or (b) directly, owing to itself. Things are 'indirectly moved' which are moved as being contained in something which is moved, e.g. sailors in a ship, for they are moved in a different sense from that in which the ship is moved; the ship is 'directly moved', they are 'indirectly moved', because they are in a moving vessel. This is clear if we consider their limbs; the movement proper to the legs (and so to man) is walking, and in this case the sailors are not walking. Recognizing the double sense of 'being moved', what we have to consider now is whether the soul is 'directly moved' and participates in such direct movement.

我们早已指出，凡肇始运动的事物其自身不必被运动。任何事物均可被运动包含两种意义——或间接地，由于他物而非自身的原因[所进行的运动]；抑或直接地，由于自身的原因而进行的运动。当被置于某一被运动物体之中被运动时，事物就是“被间接地运动”，譬如轮船上的水手，因为水手们被运动较之轮船被运动其意义是不同的；该轮船属“被直接地运动”，水手们则是“被间接地运动”，因为他们处于一艘运动的船中。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他们的四肢，情况就会十分明了；双下肢（对于人类也是如此）所作的专门运动是行走，而且在该

例中水手们并没有在行走。认识了“被运动”的双重意义，现在我们必须探讨的是，灵魂是否是“被直接地运动”及其是否参与这类的直接运动。

There are four species of movement—locomotion, alteration, diminution, growth; consequently if the soul is moved, it must be moved with one or several or all of these species of movement. Now if its movement is not incidental, there must be a movement natural to it, and, if so, as all the species enumerated involve place, place must be natural to it. But if the essence of soul be to move itself, its being moved cannot be incidental to—as it is to what is white or three cubits long; they too can be moved, but only incidentally—what is moved is that of which 'white' and 'three cubits long' are the attributes, the body in which they inhere; hence they have no place: but if the soul naturally partakes in movement, it follows that it must have a place.

运动分四种——位置移动、形态变化、衰亡和生长；因此，假如灵魂被运动，那么其运动必定是上述诸运动中的一种或几种抑或全部。如此说来，假若灵魂的运动不是偶然的，那么必定存在某种其自然本性所致的运动，果真如此的话，因为上述列举的四种运动中均包含空间位置，所以空间位置就一定是其自然本性。但是，假如灵魂的本质是自我运动，那么其被运动则不能是偶然的，如同白色或三肘长一样；它们也都可以被运动，但却只能是偶然地被运动——真正被运动的是具有“白色”和“三肘长”属性的事物，是它们寓于其中赖以存在的躯体；因此它们不占有空间位置：但是，如果灵魂出于其自然本性参与运动，那么它就必然占有空间位置。

Further, if there be a movement natural to the soul, there must

be a counter-movement unnatural to it, and conversely. The same applies to rest as well as to movement; for the terminus ad quem of a thing's natural movement is the place of its natural rest, and similarly the terminus ad quem of its enforced movement is the place of its enforced rest. But what meaning can be attached to enforced movements or rests of the soul, it is difficult even to imagine.

其次，假如存在由某种灵魂的自然本质所致的运动，则必然存在某种由外力所肇始的反向运动，反之亦然。这一同样的解释既适用于静止，也适用于运动；因为出于自然本性而运动的事物所运行的终点就是其因自然本性而静止的空间位置，而且与此相似，其被迫运动的终点恰恰就是其被迫静止的空间位置。但是灵魂的被迫运动或被迫静止究竟其义为何，却是令人费解，甚至难以想象。

Further, if the natural movement of the soul be upward, the soul must be fire; if downward, it must be earth; for upward and downward movements are the definito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bodies. The same reasoning applies to the intermediate movements, termini, and bodies. Further, since the soul is observed to originate movement in the body, it is reasonable to suppose that it transmits to the body the movements by which it itself is moved, and so, reversing the order, we may infer from the movements of the body back to similar movements of the soul. Now the body is moved from place to place with movements of locomotion. Hence it would follow that the soul too mu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ody change either its place as a whole or the relative places of its parts. This carries with i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soul might even quit its body and re-enter it, and with this would be involved the possibility of a resurrection of animals from the dead. But, it may be contended,

the soul can be moved indirectly by something else; for an animal can be pushed out of its course. Yes, but that to whose essence belongs the power of being moved by itself, cannot be moved by something else except incidentally, just as what is good by or in itself cannot owe its goodness to something external to it or to some end to which it is a means.

进一步说，假如灵魂因其自然本性所作的运动是向上的，那么灵魂一定是火；如若是向下的，那么它必定是土；因为向上和向下两种运动是这两种相关物体的明显特征。同样的推论也适用于“上”“下”之间的运动、终端运动以及躯体运动。此外，据观察，灵魂在躯体内部肇始运动；既然如此，我们有理由假定是灵魂将运动传递给躯体并以此使其自身被运动，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反向推之，我们似乎可从躯体的运动倒推出灵魂的相似的运动。由于躯体被运动而作从一处向另一处的位置移动，所以灵魂也必然要与躯体的位置变化保持一致，或是作为整体变换其位置，或是其部分变换其相对的位置。这其中包含着一种可能：灵魂有可能离开其躯体并再进入其躯体，而且该可能又将包含动物死而复生的可能。但是，我们可以认为，灵魂可以被其他事物间接地运动；因为动物可以受外力推动而运动。是的，但凡其本质属于有自我运动能力的事物均不能被其他事物运动，除非它是偶然地被运动，正如由己为善或于已为善的事物一样，它们既不能由于外在事物，也不能因为它们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具有善性。

If the soul is moved, the most probable view is that what moves it is sensible things.

如果灵魂是可被运动的，那么最有可能成立的观点是，肇始其运动的是可感觉事物。

We must note also that, if the soul moves itself, it must be the mover itself that is moved, so that it follows that if movement is in every case a displacement of that which is in movement, in that respect in which it is said to be moved, the movement of the soul must be a departure from its essential nature, at least if its self-movement is essential to it, not incidental.

我们还必须指出的是，如果灵魂自我运动，那么它本身必须是被运动的运动肇始者，这样，如果在任何情况下运动都是处于运动中的事物的位移，那么就此而言我们称该事物被运动，如果灵魂的运动是源于其自身本性的，而不是偶然的，那么灵魂的运动必定是对其本性的背离。

Some go so far as to hold that the movements which the soul imparts to the body in which it is are the same in kind as those with which it itself is moved. An example of this is Democritus, who uses language like that of the comic dramatist Philippus, who accounts for the movements that Daedalus imparted to his wooden Aphrodite by saying that he poured quicksilver into it; similarly Democritus says that the spherical atoms which according to him constitute soul, owing to their own ceaseless movements draw the whole body after them and so produce its movements. We must urge the question whether it is these very same atoms which produce rest also—how they could do so, it is difficult and even impossible to say. And, in general, we may object that it is not in this way that the soul appears to originate movement in animals—it is through intention or process of thinking.

有人甚至认为，灵魂寓寄于躯体之中，它使躯体进行的运动与其自身的被运动是同一种类的运动。例如德谟克利特就持这种观点，他所采用的论述方式与喜剧作家菲利普斯的很相似，菲利普斯说道，代达罗斯使其木雕阿佛洛狄特活动起来，原因是他向木雕中加注了水银；以类似的方式德谟克利特阐释道，在他看来球形的原子构成灵魂，由于原子本身不停地运动，所以它们拖动整个躯体并因此使其运动。我们必须强调的问题是，这些相同的原子是否也能引起静止——它们怎样才能引起静止，很难这样说，甚至是根本不可能这样说。概而言之，我们似可提出反对的观点，灵魂在动物体内肇始运动所凭借的不是这种方式——而是通过意愿或思维过程。

It is in the same fashion that the *Timaeus* also tries to give a physical account of how the soul moves its body; the soul, it is there said, is in movement, and so owing to their mutual implication moves the body also. After compounding the soul-substance out of the elements and dividing 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armonic numbers, in order that it may possess a connate sensibility for 'harmony' and that the whole may move in movements well attuned, the Demiurge bent the straight line into a circle; this single circle he divided into two circles united at two common points; one of these he subdivided into seven circles. All this implies that the movements of the soul are identified with the local movements of the heavens.

《蒂迈欧篇》也同样试图对灵魂如何使其躯体运动给出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解释；该篇论述道，灵魂是处于运动之中的，而且又因其双方的相互关系，它也能使躯体运动。在利用所有元素合成灵魂并且依据和谐数将其划分之后，为了使其具有对和谐的内在感觉并使宇宙万物均能在非常和谐的运动中运动，造物主便将一直线弯作了一个圆圈；他又将这一圆圈分成两个在两个共同点上相交的圆圈；他将其中

的一个圆圈再分成七个圆圈。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灵魂的运动与宇宙天体的空间位置变动是同一的。

Now,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a mistake to say that the soul is a spatial magnitude. It is evident that Plato means the soul of the whole to be like the sort of soul which is called mind—not like the sensitive or the desiderative soul, for the movements of neither of these are circular. Now mind is one and continuous in the sense in which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is so, and thinking is identical with the thoughts which are its parts; these have a serial unity like that of number, not a unity like that of a spatial magnitude. Hence mind cannot have that kind of unity either; mind is either without parts or is continuous in some other way than that which characterizes a spatial magnitude. How, indeed, if it were a spatial magnitude, could mind possibly think? Will it think with any one indifferently of its parts? In this case, the 'part' must be understood either in the sense of a spatial magnitude or in the sense of a point (if a point can be called a part of a spatial magnitude). If we accept the latter alternative, the points being infinite in number, obviously the mind can never exhaustively traverse them; if the former, the mind must think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indeed an infinite number of times (whereas it is manifestly possible to think a thing once only). If contact of any part whatsoever of itself with the object is all that is required, why need mind move in a circle, or indeed possess magnitude at all? On the other hand, if contact with the whole circle is necessary, what meaning can be given to the contact of the parts? Further, how could what has no parts think what has parts, or what has parts think what has none? We must identify the circle referred to with mind; for it is mind whose movement is thinking, and it is the circle whose movement is revolution, so that if thinking is a movement of revolution, the

circle which has this characteristic movement must be mind.

那么，首先，称灵魂为一空间量度是一个误解。显然，柏拉图的意思是指宇宙灵魂与被称之为心智的这类灵魂相类似，但却不与感觉或欲望灵魂相类似，因为这两者的运动都不是圆形的。但是，心智是单一的和连续的，在此意义上的思维过程就是如此，而且思维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思想是同一的；它们具有和数而非空间量度一样的连续整体。因此，心智也不可能具有那种连续整体；心智要么是没有组成部分的，要么是连续的，但其方式却是有别于空间量度特征的其他某种方式。假如它确实是一空间量度，那么心智怎么可能思考呢？它会用其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个不偏不倚地去思考吗？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必定有如下两种理解：要么是空间量度意义上的“部分”，要么是点意义上的“部分”（如果点可以被称为空间量度的一个部分的话）。如果我们接受后一种理解，因为点在数量上是无限的，那么显而易见心智将永远都无法到达其终点；如果是前者，心智则必须周而复始地思考同一事物，而且其次数也是无穷的（然而显然一次只可能思考一个事物）。倘若只要其自身的任意一部分与其思维客体相接触就满足要求的话，那么为什么心智还需要作圆周运动，抑或必须具有量度？另一方面，如果与整个圆周的接触是必需的，那么部分的接触还有什么意义？其次，没有组成部分的事物怎么能思考有组成部分的事物，或者有组成部分的事物怎么能思考没有组成部分的事物？我们必须把这里所提及的圆等同于心智；因为心智的运动是思维，圆的运动是循环，所以如果思维是一种循环运动，具有此种运动特征的圆则必然就是心智。

If the circular movement is eternal,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hich mind is always thinking—what can this be? For all practical processes of thinking have limits—they all go on for the sake of something outside the process, and all theoretical processes come to a close in the same way as the phrases in speech which express

processes and results of thinking. Every such linguistic phrase is either definitory or demonstrative. Demonstration has both a starting-point and may be said to end in a conclusion or inferred result; even if the process never reaches final completion, at any rate it never returns upon itself again to its starting-point, it goes on assuming a fresh middle term or a fresh extreme, and moves straight forward, but circular movement returns to its starting-point. Definitions, too, are closed groups of terms.

如果该循环运动是永恒的，那么一定存在某种心智总在思维的事物——这种事物会是什么？因为所有的实用思维过程均有极限——它们均有外在于思维过程的事物作为其思维目标，而且所有的理论思维过程也都要走向终结，其终结的方式就如同用以表述过程和思维结果的词语。每一个这样的词语或为定义性，抑或是论证性的。论证既要有起点，也要有结果，可以是结论或是推论的结果；即便论证的过程永远也无法完成，不管怎样，它也绝不会再返回到其起点，而是继续采用一新的中间项或一新的极端物，并一直向前推进，但是循环运动却是返回到其起点。定义同样也是有限的几组术语。

Further, if the same revolution is repeated, mind must repeatedly think the same object.

再次，如果同一循环不断重复，那么心智必须不断地重复思维同一客体。

Further, thinking has more resemblance to a coming to rest or arrest than to a movement;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inferring.

再其次，与其说思维与运动相似，倒不如说它更像静止或暂时停顿的状态；可以说，推理也是如此。

It might also be urged that what is difficult and enforced is incompatible with blessedness; if the movement of the soul is not of its essence, movement of the soul must be contrary to its nature. It must also be painful for the soul to be inextricably bound up with the body; nay more, if, as is frequently said and widely accepted, it is better for mind not to be embodied, the union must be for it undesirable.

还应该强调的是，凡自身难以运动但却被迫运动的事物是没有幸福可言的；如果灵魂的运动不是出于其本质，那么其运动就必然是有悖与其自然本性的。灵魂与躯体关系密切，无法摆脱，对于灵魂而言这是痛苦的；不仅如此，如果，诚如人们经常所说并普遍接受的那样，心智最好是独立于躯体之外，那么对心智而言，这种结合一定是不理想的。

Further, the cause of the revolution of the heavens is left obscure. It is not the essence of soul which is the cause of this circular movement—that movement is only incidental to soul—nor is, a fortiori, the body its cause. Again, it is not even asserted that it is better that soul should be so moved; and yet the reason for which God caused the soul to move in a circle can only have been that movement was better for it than rest, and movement of this kind better than any other. But since this sort of consideration is more appropriate to another field of speculation, let us dismiss it for the present.

最后，遗留下的关于诸天体循环运动的原因问题让人费解。这种循环运动的原因决非灵魂的本质——对于灵魂这种运动只是偶然的——更不容置疑的是，其原因也不是躯体。而且，应该使灵魂作这种圆周运动，因为这种运动更好，这种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并且神之所以使灵魂作圆周运动就是因为这样的圆周运动比静止更好，这种运动也比其他任何一种运动都更好，这种观点也是不足为凭的。但是因为这类的考虑更适于另一研究领域，我们暂且不予讨论。

The view we have just been examining, in company with most theories about the soul, involves the following absurdity: they all join the soul to a body, or place it in a body, without adding any specification of the reason of their union, or of the bodily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it. Yet such explanation can scarcely be omitted; for some community of nature is presupposed by the fact that the one acts and the other is acted upon, the one moves and the other is moved; interaction always implies a special nature in the two interagents. All, however, that these thinkers do is to describe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l; they do not try to determine anything about the body which is to contain it, as if it were possible, as in the Pythagorean myths, that any soul could be clothed upon with any body—an absurd view, for each body seems to have a form and shape of its own. It is as absurd as to say that the art of carpentry could embody itself in flutes; each art must use its tools, each soul its body.

我们刚刚仔细研究的观点，还有大多数有关灵魂的理论，存在一些荒谬之处：它们无不将灵魂与躯体结合在一起或将灵魂置于躯体中，但却既不追加有关两者结合原因的具体阐述，也不详细说明该结合要求的躯体条件。可是这样的解释却是不可省略的；因为某种自然结合是以事实为先决条件的，这一事实是一方作用而另一方被作用，

一方运动而另一方被运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总是暗示着其组成部分的特殊性质。可是，这些思想家们所做的一切只是描述灵魂的具体特征；关于灵魂所寓寄的躯体，他们却未作任何明确的论证，仿佛真的有可能，就像毕达哥拉斯学派虚构的故事那样，任一灵魂均可进入任一躯体之中——多么荒唐的观点，因为每一躯体似都有其独特的形式和形状。这样的说法与称木工的技术可以寓于长笛之中同样荒唐；每一门技艺都必有其专门的工具，每一个灵魂必有其躯体。

Chapter 4

第四章

There is yet another theory about soul, which has commended itself to many as no less probable than any of those we have hitherto mentioned, and has rendered public account of itself in the court of popular discussion. Its supporters say that the soul is a kind of harmony, for (a) harmony is a blend or composition of contraries, and the (b) body is compounded out of contraries. Harmony, however, is a certain proportion or composition of the constituents blended, and soul can be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of these. Further, the power of originating movement cannot belong to a harmony, while almost all concur in regarding this as a principal attribute of soul.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call health (or generally one of the good states of the body) a harmony than to predicate it of the soul. The absurdity becomes most apparent when we try to attribute the active and passive affections of the soul to a harmony; the necessary readjustment of their conceptions is difficult. Further, in using the word 'harmony' we have one or other of two cases in our mind; the most proper sense is in relation to spatial magnitudes which have motion and position, where harmony means the disposition and cohesion of their parts in such a

manner as to prevent the introduction into the whole of anything homogeneous with it, and the secondary sense, derived from the former, is that in which it means the ratio between the constituents so blended; in neither of these senses is it plausible to predicate it of soul. That soul is a harmony in the sense of the mode of composition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 is a view easily refutable; for there are many composite parts and those variously compounded; of what bodily part is mind or the sensitive or the appetitive faculty the mode of composition? And what is the mode of composition which constitutes each of them? It is equally absurd to identify the soul with the ratio of the mixture; for the mixture which makes flesh has a different ratio between the elements from that which makes bone.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view will therefore be that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whole body there will be many souls, since every one of the bodily parts is a different mixture of the elements, and the ratio of mixture is in each case a harmony, i.e. a soul.

关于灵魂还有另一种理论，其可信度丝毫不逊于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提及的任何理论，而且在舆论上，它已经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其支持者们认为，灵魂是某种和谐，因为和谐是相反事物的混合物或合成物，而且躯体是由相反事物合成的。可是，和谐是一种确定的比例或混杂成分的混合，而灵魂却既不可能是有比例的混合物，也不可能是合成物。其次，和谐不可能具有肇始运动的能力，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灵魂的基本属性。与其把灵魂谓为和谐，不如将健康（或一般意义上的一种好的躯体状况）称作和谐更为合适。如果我们尝试把灵魂的主动和被动属性归到某种和谐上，那么这种荒唐就会更加显而易见；要对其概念进行必要的重新调整十分困难。再次，使用“和谐”一词时，我们的头脑中显现的是该词两种意义中的此义或彼义；该词最基本的意义所关涉的是具有运动及位置的空间量度，这里和谐意指各组成部分以这样的方式配置并结合，以防止任何

与其同种类的事物进入其整体，而该词由上述本义引申而来的第二义则指如此混合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在上述两种意义中，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称灵魂为和谐都是没有道理的。躯体的诸部分是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的，从该组合方式的意义上说，灵魂是某种和谐，这种观点很容易被驳倒；因为躯体的组成部分有许多，而且这些组成部分又是以多种不同方式组合在一起；躯体哪一部分的组合方式是心智或感觉能力抑或欲望能力？而且其中的每一种的构成方式又是什么？将灵魂等同于混合物的比例的观点同样是荒谬的；因为组成肌肉的混合物的比例有别于组成骨骼各元素之间的比例。因此，依此观点，我们必然能得出结论：整个躯体内将会分布着许多灵魂，其原因在于躯体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由相关元素组成的一个不同的混合物，并且混合物的比例在每一种情况下均是一种和谐，即灵魂。

From Empedocles at any rate we might demand an answer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for he says that each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 is what it is in virtue of a ratio between the elements: is the soul identical with this ratio, or is it not rather something over and above this which is formed in the parts? Is love the cause of any and every mixture, or only of those that are in the right ratio? Is love this ratio itself, or is love something over and above this? Such are the problems raised by this account. But,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soul is different from the mixture, why does it disappear at one and the same moment with that relation between the elements which constitutes flesh or the other parts of the animal body? Further, if the soul is not identical with the ratio of mixture, and it is consequently not the case that each of the parts has a soul, what is that which perishes when the soul quits the body?

恩培多克勒认为，躯体的每一部分之所以是其所是，原因在于其诸元素间的比例。既然如此，我们无论如何要请他对下面这一问题作

出回答：灵魂与该比例是同一的，或者它不可能是除此之外的、诸躯体的部分中所形成的其他别的东西吗？友爱是任意一种混合物的成因，或者只是那些比例适当的混合物的成因？友爱就是这一比例本身，或者是其他有别于这一比例的什么东西？这些就是该观点招致的疑难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灵魂有别于这种混合物，为什么当组成肌肉的元素或动物躯体的其他部分消亡时，它也同时消亡？此外，如果灵魂与混合物的比例不同一，则躯体的每一部分均有一灵魂这一观点必然不复成立，那么一旦灵魂脱离了躯体，随之消亡的又是躯体的哪一部分？

That the soul cannot either be a harmony, or be moved in a circle, is clear from what we have said. Yet that it can be moved incidentally is, as we said above, possible, and even that in a sense it can move itself, i.e. in the sense that the vehicle in which it is can be moved, and moved by it; in no other sense can the soul be moved in space.

根据我们的上述分析，很明显，灵魂既不可能是一种和谐，也不可能作圆周运动。然而，如上所述，灵魂偶然地被运动是可能的，并且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自我运动，即当其所寄寓的媒介可被运动，并且是被其所运动；在其他任何情况下灵魂都不可能在空间位置上被运动。

More legitimate doubts might remain as to its movement in view of the following facts. We speak of the soul as being pained or pleased, being bold or fearful, being angry, perceiving, thinking. All these are regarded as modes of movement, and hence it might be inferred that the soul is moved. This, however, does not necessarily follow. We may admit to the full that being pained or pleased, or

thinking, are movements (each of them a 'being moved'), and that the movement is originated by the soul. For example, we may regard anger or fear as such and such movements of the heart, and thinking as such and such another movement of that organ, or of some other; these modifications may arise either from changes of place in certain parts or from qualitative alterations (the special nature of the parts and the special modes of their changes being for our present purpose irrelevant). Yet to say that it is the soul which is angry is as inexact as it would be to say that it is the soul that weaves webs or builds houses. It is doubtless better to avoid saying that the soul pities or learns or thinks and rather to say that it is the man who does this with his soul. What we mean is not that the movement is in the soul, but that sometimes it terminates in the soul and sometimes starts from it, sensation e.g. coming from without inwards, and reminiscence starting from the soul and terminating with the movements, actual or residual, in the sense organs.

鉴于以下事实，关于灵魂的运动的质疑便可显得愈加合理。我们说灵魂会悲伤、愉悦、勇敢、畏惧、愤怒，也能感知、思考。所有这些均可被视为运动的方式，因此似可推断灵魂是被运动的；但是，情况未必如此。我们似乎完全可以承认，悲伤、愉悦，或思考都是运动（且每一个为一种“被运动”），并且该运动是由灵魂肇始的。例如，我们可视愤怒或恐惧为心脏的如此这般的运动，并把思考视为那个器官，抑或其他某一器官的这样那样的运动；这些改变有的是源于某些躯体部分的位置改变，有些则是由于品质的变化（躯体部分的特殊性质及其变化的特殊方式与我们目前的讨论目的无关）。然而，说灵魂在发怒就如同说灵魂在织网或建造房屋一样有失精当。毫无疑问，最好避免说灵魂怜悯，或学习，抑或思维，而说是人凭借灵魂作此行为。我们所要阐明的是，运动并非发生在灵魂中，而是它有时止于灵魂，有时始于灵魂，譬如感觉始于外在的可感觉事物并抵达灵魂，而

回忆却是始于灵魂并通过或现实的或残留的运动止于感官。

The case of mind is different; it seems to be an independent substance implanted within the soul and to be incapable of being destroyed. If it could be destroyed at all, it would be under the blunting influence of old age. What really happens in respect of mind in old age is, however, exactly parallel to what happens in the case of the sense organs; if the old man could recover the proper kind of eye, he would see just as well as the young man. The incapacity of old age is due to an affection not of the soul but of its vehicle, as occurs in drunkenness or disease. Thus it is that in old age the activity of mind or intellectual apprehension declines only through the decay of some other inward part; mind itself is impassible. Thinking, loving, and hating are affections not of mind, but of that which has mind, so far as it has it. That is why, when this vehicle decays, memory and love cease; they were activities not of mind, but of the composite which has perished; mind is, no doubt, something more divine and impassible. That the soul cannot be moved is therefore clear from what we have said, and if it cannot be moved at all, manifestly it cannot be moved by itself.

心智的情况却不同；它似乎是植于灵魂之中的某一独立的实体而且是不能被毁灭的。如果它是可以完全被毁灭的，那一定是由年老体衰所致。然而，就心智而言，在老年阶段实际出现的情况与感官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相提并论的；如果一位老人能够恢复其正常视力，那么他就能像年轻人一样看得清清楚楚。老年阶段的无能不在于灵魂的影响，而在于灵魂所寄寓的躯体，当人们处于醉酒或生病状态时所出现的情况正是如此。因此在老年阶段，心智活动或思辨能力的衰退只是由于心智所寄寓的躯体内某一部分的衰退所致，心智本身是不受影响的。思维、友爱以及憎恨均为属性，但不是心智的属性，而是拥有心

智的躯体的属性，只要躯体拥有心智。这正是为什么一旦其所寄寓的躯体自然衰亡，记忆和友爱便不复存在的原因；记忆与友爱本不属于心智的活动，而是属于那个业已消亡的合成物；毫无疑问，心智是更具神性的东西，并且不受外物影响。因此，根据我们以上所述，灵魂不能被运动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如果它根本不能被运动，那么显然它也不能被其自身所运动。

Of all the opinions we have enumerated, by far the most unreasonable is that which declares the soul to be a self-moving number; it involves in the first place all the impossibilities which follow from regarding the soul as moved, and in the second special absurdities which follow from calling it a number. How we to imagine a unit being moved? By what agency? What sort of movement can be attributed to what is without parts or internal differences? If the unit is both originative of movement and itself capable of being moved, it must contain difference.

在所有我们业已枚举的观点中，目前最荒谬的当数称灵魂为一自我运动的数；首先，该观点认为灵魂是可以被运动的，这就必然导致其包含所有的不可能性；第二，它将灵魂称为某一数，这就必然使其具有诸多特殊的荒唐性。我们如何想象一个计数单位被运动？这一行为依托什么媒介？哪种运动可以归属于没有任何组成部分或没有内在区别的事物？如果该计数单位既能肇始运动，自身又可被运动，那么它必须具有内部差异性。

Further, since they say a moving line generates a surface and a moving point a line, the movements of the psychic units must be lines (for a point is a unit having position, and the number of the soul is, of course, somewhere and has position).

其次，既然他们认为一条运动着的直线可形成一个平面，一个运动着的点可形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些精神单位的运动就一定是线（因为点是一占据空间位置的单位，当然灵魂的数就会在某处并具有其空间位置）。

Again, if from a number a number or a unit is subtracted, the remainder is another number; but plants and many animals when divided continue to live, and each segment is thought to retain the same kind of soul.

再次，如果从某一个数中减去一个数或一个单位，其剩余部分则为另一个数；但是植物和许多动物被分割后可继续存活，而且，每一分割后的部分被认为均保留有与原来相同的灵魂。

It must be all the same whether we speak of units or corpuscles; for if the spherical atoms of Democritus became points, nothing being retained but their being a quantum, there must remain in each a moving and a moved part, just as there is in what is continuous; what happen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ize of the atoms, it depends solely upon their being a quantum. That is why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o originate movement in the units. If in the animal what originates movement is the soul, so also must it be in the case of the number, so that not the mover and the moved together, but the mover only, will be the soul. But how is it possible for one of the units to fulfil this function of originating movement? There must be some difference between such a unit and all the other units, and what difference can there be between one placed unit and another except a difference of position? If then,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psychic units within the body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ints of the body, there will be two sets of units both occupying the same place; for each unit will occupy a point. And yet, if there can be two, why cannot there be an infinite number? For if things can occupy an indivisible place, they must themselves be indivisible.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ints of the body are identical with the units whose number is the soul, or if the number of the points in the body is the soul, why have not all bodies souls? For all bodies contain points or an infinity of points.

无论我们说计数单位或是微粒都必定是完全一样的；如果德谟克利特的球形原子变成了点，除其作为某一量而被保留下来以外其他任何东西均无保留，那么每一量中必定存在一个主动和一个被动部分，正如在一个连续的事物中的情况一样；事情与原子的大小毫无关系，它只取决于它们是某一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单位中必定蕴涵某一能够肇始运动的事物。如果动物体内肇始运动的是灵魂，就数而言情况也必然如此，那么灵魂便不可能既是运动的肇始者又是被运动者，而只可能是运动的肇始者。可是，对于一个单位，它怎么可能具有肇始运动这一功能呢？在这一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差别，然而在一个占据了空间位置的单位与另一单位之间，除了位置上的不同之外，还可能存在什么差别呢？另一方面，如果这些躯体内的精神单位有别于躯体的诸点，那将会有两组单位，共同占据同一位置；因为每一个单位都会占据一个点。可是，如果同一位置可以存在两个，那么为什么不能存在无数个？因为如果事物可占据一个不可分割的空间位置，那么它们自身必定是不可分割的；另一方面，如果躯体的点与其数就是灵魂的单位是同一的，或者如果这些躯体内的点的数是灵魂，那么为什么不是所有的躯体都有灵魂？因为一切躯体内均含有点或无数的点。

Further, how is it possible for these points to be isolated or

separated from their bodies, seeing that lines cannot be resolved into points?

另外，如果线不能被分割成点，那么怎么可能使这些点从其躯体中独立或分离出来呢？

Chapter 5

第五章

The result is, as we have said, that this view, while on the one side identical with that of those who maintain that soul is a subtle kind of body, is on the other entangled in the absurdity peculiar to Democritus' way of describing the manner in which movement is originated by soul. For if the soul is present throughout the whole percipient body, there must, if the soul be a kind of body, be two bodies in the same place; and for those who call it a number, there must be many points at one point, or every body must have a soul, unless the soul be a different sort of number—other, that is, than the sum of the points existing in a body. Another consequence that follows is that the animal must be moved by its number precisely in the way that Democritus explained its being moved by his spherical psychic atoms.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whether we speak of small spheres or of large units, or, quite simply, of units in movement? One way or another, the movements of the animal must be due to their movements. Hence those who combine movement and number in the same subject lay themselves open to these and many other similar absurdities. It is impossible not only that these characters should give the definition of soul—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y should even be attributes of it. The point is clear if the attempt

be made to start from this as the account of soul and explain from it the affections and actions of the soul, e.g. reasoning, sensation, pleasure, pain. For, to repeat what we have said earlier, movement and number do not facilitate even conjecture about the derivative properties of soul.

其结果是，正如我们所述，该观点一方面与那些认为灵魂是某种微妙物体的人所持的主张如出一辙，而另一方面却又陷入德谟克利特式论述方式所特有的荒谬，荒诞不经地认为运动是由灵魂引起的。因为如果灵魂普遍存在于所有具有感知能力的躯体之中，如果灵魂也是某种类型的躯体的话，那么必定在同一空间位置存在两种躯体；而对于那些将其称为数的人而言，则必然是在同一空间点上存在许多的点，或每一躯体中都必定有一灵魂，除非灵魂是另外某种不同的数——即某种与存在于躯体中所有的点的总数不同的数。另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动物一定是被其数所运动，其被运动的方式与德谟克利特所阐释的方式毫无二致：他认为动物被运动所凭借的是其所谓的球形灵魂原子。我们称其为小球或大单位，抑或将其简单地称作运动单位，这有什么区别呢？不论称其为什么，动物都必定是因其运动而运动。因此，那些在同一主体中将运动与数结合在一起的人很容易陷入这些甚至其他更多类似的荒谬之中。这些特征不仅不可能用于定义灵魂——甚至也不可能是灵魂的属性。如果试图以此为出发点论述灵魂并依此解释灵魂的属性和活动，譬如推理、感觉、喜悦和痛苦等，这一点便会十分明了。因为，重复我们业已论述的观点，运动和数甚至不会对推测灵魂的衍生性质有所帮助。

Such are the three ways in which soul has traditionally been defined; one group of thinkers declared it to be that which is most originative of movement because it moves itself, another group to be the subtlest and most nearly incorporeal of all kinds of body. We have now sufficiently set forth the difficulties and inconsistencies to

which these theories are exposed. It remains now to examine the doctrine that soul is composed of the elements.

这就是传统上界定灵魂的三种方法。一些思想家称其为极具肇始运动能力的事物，因为它可自我运动；另一些则视其为最微妙的和几乎不具任何物质性的躯体。至此我们已经充分地阐述了这两种理论所暴露出来的疑难和矛盾。现在还有灵魂是由诸元素构成的这一学说尚待仔细考证。

The reason assigned for this doctrine is that thus the soul may perceive or come to know everything that is, but the theory necessarily involves itself in many impossibilities. Its upholders assume that like is known only by like, and imagine that by declaring the soul to be composed of the elements they succeed in identifying the soul with all the things it is capable of apprehending. But the elements are not the only things it knows; there are many others, or, more exactly, an infinite number of others, formed out of the elements. Let us admit that the soul knows or perceives the elements out of which each of these composites is made up; but by what means will it know or perceive the composite whole, e.g. what God, man, flesh, bone (or any other compound) is? For each is, not merely the elements of which it is composed, but those elements combined in a determinate mode or ratio, as Empedocles himself says of bone,

该学说旨在阐明，这样灵魂便可感知或认识所存在的一切事物，可是这一理论本身却必然包含着许多不可能性。其支持者主张物以类识，并且试图通过宣称灵魂是由诸元素所构成的，他们便可成功地将灵魂与其能够感知的一切事物等同起来。但是灵魂所认识的事物并非

只有这些元素，还有许多其他事物，抑或，更确切地说，是还有其他无数由这些元素构成的事物。我们姑且承认灵魂可以认识或感知构成每一个综合体的元素；可是它是通过什么方法来认识或感知这个综合整体，譬如神、人、肌肉、骨骼（或任何其他合成物）是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综合整体都不仅仅是由这些元素所组成的，而是由这些元素按确定的方式或比例所组成的，正如恩培多克勒在谈及骨骼时所说的那样：

> The kindly Earth in its broad-bosomed moulds
>
> 仁慈的大地，在你胸膛般宽阔而柔软的泥土里
>
> Won of clear Water two parts out of eight,
>
> 八分之二清澈的水融入其中，
>
> And four of Fire; and so white bones were formed.
>
> 加之四分的火；才有白色的骨骼生成。

Nothing, therefore, will be gain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elements in the soul, unless there be also present there the various formulae of proportion and the various composi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m. Each element will indeed know its fellow outside, but

there will be no knowledge of bone or man, unless they too are present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oul. The impossibility of this needs no pointing out; for who would suggest that stone or man could enter in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oul? The same applies to 'the good' and 'the not-good', and so on.

因此，认为诸元素存在于灵魂中也是无用的，除非与诸元素一致的各种比例标准和合成物也存在于灵魂之中。灵魂内的每一元素确实均可认识其外部的同类事物，但是其中却没有任何能够认识骨骼或人的元素，除非骨骼和人也存在于灵魂的组成部分之中。其不可能性一目了然，确无必要赘述；毕竟，谁会提议把石块或人纳入灵魂的组成部分之中呢？这一道理同样也适用“善”与“非善”以及其他类似的事物。

Further, the word 'is' has many meanings: it may be used of a 'this' or substance, or of a quantum, or of a quale, or of any other of the kinds of predicates we have distinguished. Does the soul consist of all of these or not?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all have common elements. Is the soul formed out of those elements alone which enter into substances? So how will it be able to know each of the other kinds of thing? Will it be said that each kind of thing has elements or principles of its own, and that the soul is formed out of the whole of these? In that case, the soul must be a quantum and a quale and a substance. But all that can be made out of the elements of a quantum is a quantum, not a substance. These (and others like them)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view that the soul is composed of all the elements.

其次，“存在”一词有多种意义：它可用以指“这个”或实体，或指

量，或指质，抑或指任何其他一种我们业已区分的范畴。灵魂是不是由所有这些范畴构成的呢？这些范畴似乎并不具有共同的元素。灵魂是仅仅由组成实体的那些元素构成的吗？如果是，那么它怎么能够认识其他每一种事物呢？可以说每一种事物均有其特有的元素或本原，并且灵魂是由所有这些构成的吗？在此情况下，灵魂则必定既是量，又是质，又是实体。但是由量元素所构成的一切事物必定只能是量，而不能是实体。这些（以及与此类似的其他）难题就是灵魂是由所有诸元素构成的这一观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It is absurd, also, to say both (a) that like is not capable of being affected by like, and (b) that like is perceived or known by like, for perceiving, and also both thinking and knowing, are, on their own assumption, ways of being affected or moved.

同类事物不可能被其同类所影响以及同类事物能被其同类所感知或被其同类所认识，这两种说法也是荒唐的。因为根据他们的假设，感知以及思维和认识，也都是被影响或被运动的方式。

There are many puzzles and difficulties raised by saying, as Empedocles does, that each set of things is known by means of its corporeal elements and by reference to something in soul which is like them, and additional testimony is furnished by this new consideration; for all the parts of the animal body which consist wholly of earth such as bones, sinews, and hair seem to be wholly insensitive and consequently not perceptive even of objects earthy like themselves, as they ought to have been.

如恩培多克勒所述，每一种事物都只能通过其物质元素并凭借其

与灵魂中相似物的关系才能被认识，而且这一新的认识提供了额外的证据，此说存在许多令人困惑之处和疑难；因为所有完全由土构成的动物躯体的各组成部分，如骨骼、筋腱以及毛发，似乎完全不具有任何感觉，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感知能力，甚至是感知与其类似的土质物体的能力，但据此观点，这些动物躯体的组成部分应该具有感觉和感知能力。

Further, each of the principles will have far more ignorance than knowledge, for though each of them will know one thing, there will be many of which it will be ignorant. Empedocles at any rate must conclude that his God is the least intelligent of all beings, for of him alone is it true that there is one thing, strife, which he does not know, while there is nothing which mortal beings do not know, for there is nothing which does not enter into their composition.

此外，对每一本原而言，其所不知都将远远多于其所知，因为尽管每一个本原都认识一个事物，但其所不知的事物将会有许多。无论如何，恩培多克勒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所有的存在中，他的神是最无知的，因为确实有一种只有他不知道的元素——斗争，而凡世间的人却是无所不知，因为其灵魂是无所不包的。

In general, we may ask, why has not everything a soul, since everything either is an element, or is formed out of one or several or all of the elements? Each must certainly know one or several or all.

总的来说，我们似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每一事物要么是某

一元素，要么是由某一元素或几种元素抑或全部元素构成的，为什么不是每一事物都有灵魂呢？每一元素必定认识一种或几种或全部的事物。

The problem might also be raised, what is that which unifies the elements into a soul? The elements correspond, it would appear, to the matter; what unites them, whatever it is, is the supremely important factor. But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re should be something superior to, and dominant over, the soul (and a fortiori over the mind); it is reasonable to hold that mind is by nature most primordial and dominant, while their statement that it is the elements which are first of all that is.

似乎还有一个问题，使诸元素与灵魂成为一体的是什么？诸元素，看起来，似与相应的质料相符；将其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什么，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但是不可能存在某种高于灵魂并支配灵魂（更不必说是心智）的事物；根据其自然本质，认为心智很可能先于并支配灵魂的主张是有道理的，可他们的说法却是诸元素是先于一切的存在。

All, both those who assert that the soul, because of its knowledge or perception of what is compounded out of the elements, and those who assert that it is of all things the most originative of movement, fail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all kinds of soul. In fact (1) not all beings that perceive can originate movement; there appear to be certain animals which stationary, and yet local movement is the only one, so it seems, which the soul originates in animals. And (2) the same object-on holds against all those who construct mind and the perceptive faculty out of the

elements; for it appears that plants live, and yet are not endowed with locomotion or perception, while a large number of animals are without discourse of reason. Even if these points were waived and mind admitted to be a part of the soul (and so too the perceptive faculty), still, even so, there would be kinds and parts of soul of which they had failed to give any account.

有些人主张灵魂是由诸元素组成的，因为灵魂能够认识或感知由诸元素所构成的事物，有些人则主张灵魂是由最具肇始运动能力的所有事物组成的，持这两种观点的所有的人均未考虑到全部种类的灵魂。实际上，并非一切具有感知能力的事物都能肇始运动；有些动物看起来在空间位置上是静止的，然而空间位置运动又似乎是灵魂在动物体内所肇始的唯一运动。而且这一同样的异议也可用来质疑所有那些认为心智和感知能力是由诸元素构成的人；因为似乎植物能够生存，但却不具有空间位置移动或感知能力，而为数众多的动物也不具有推理能力。这些关键问题姑置勿论，姑且承认心智为灵魂的一部分（感知能力也是如此），即便如此，仍然还有灵魂的其他种类和部分他们未给予任何论述。

The same objection lies against the view expressed in the 'Orphic' poems: there it is said that the soul comes in from the whole when breathing takes place, being borne in upon the winds. Now this cannot take place in the case of plants, nor indeed in the case of certain classes of animal, for not all classes of animal breathe. This fact has escaped the notice of the holders of this view.

这一同样的异议与“奥菲士”诗歌所表述的观点是相悖的：诗歌中写道，[灵魂]由风而生，当[动物]呼吸时，灵魂便从宇宙进入[它们的体内]。可是对于植物来说这种情况是不能发生的，甚至是对某些种

类的动物，也不能发生，因为并非所有种类的动物都呼吸。持该观点的人疏忽了这一事实。

If we must construct the soul out of the elements, there is no necessity to suppose that all the elements enter into its construction; one element in each pair of contraries will suffice to enable it to know both that element itself and its contrary. By means of the straight line we know both itself and the curved—the carpenter's rule enables us to test both—but what is curved does not enable us to distinguish either itself or the straight. Certain thinkers say that soul is intermingled in the whole universe, and it is perhaps for that reason that Thales came to the opinion that all things are full of gods. This presents some difficulties: Why does the soul when it resides in air or fire not form an animal, while it does so when it resides in mixtures of the elements, and that although it is held to be of higher quality when contained in the former? (One might add the question, why the soul in air is maintained to be higher and more immortal than that in animals.) Both possible ways of replying to the former question lead to absurdity or paradox; for it is beyond paradox to say that fire or air is an animal, and it is absurd to refuse the name of animal to what has soul in it. The opinion that the elements have soul in them seems to have arisen from the doctrine that a whole must be homogeneous with its parts. If it is true that animals become animate by drawing into themselves a portion of what surrounds them, the partisans of this view are bound to say that the soul of the whole too is homogeneous with all its parts. If the air sucked in is homogeneous, but soul heterogeneous, clearly while some part of soul will exist in the inbreathed air, some other part will not. The soul must either be homogeneous, or such that there are some parts of the whole in which it is not to be found.

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这些元素构造灵魂，那也不必认为所有的元素都要成为其组成部分；每一对相互对立的元素中的一种元素便足以使其既能认识其自身，又能认识与其对立的元素。依直线我们便既可认识直线自身，也可认识曲线——木工的直尺使我们可以对两者进行检验——但是曲线却既不能使我们分辨它自身，也不能分辨直线。一些思想家认为灵魂弥漫整个宇宙，或许正是缘于此故，塔莱斯才认为万物皆充满了神。这一观点引发了一些疑问：为什么当灵魂处于气或火中时不变成动物，而当其处于诸元素混合物中时才变成动物，尽管当灵魂处于前一种情况下被认为品质更高级？（似乎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处于气中的灵魂要比处于动物中的灵魂更高级而且更能长生不老？）回答前一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法，采用这两种方法都只能得出荒谬或自相矛盾的答案；如果说火或气是动物，这是极其自相矛盾的，而拒不把有灵魂的事物叫做动物又是荒谬的。灵魂寓于诸元素之中这一观点似乎源于整体必须与其组成部分是同类的这一观点。动物是因为把围绕在周围的气的一部分吸入其体内而变得有生命，如果此说是合理的，那么持该观点的人必定说宇宙的灵魂也是与其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属于同类的。如果被吸入体内的气是同类的，而灵魂是异类的，那么显然灵魂的某一部分将会存在于被吸入的气之中，而其它某一部分则不然。灵魂必定要么各部分是同类的，要么这样的灵魂在宇宙的某些部分中是无法找到的。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it is now clear that knowing as an attribute of soul cannot be explained by soul's being composed of the elements, and that it is neither sound nor true to speak of soul as moved. But since (a) knowing, perceiving, opining, and further (b) desiring, wishing, and generally all other modes of appetition, belong to soul, and (c) the local movements of animals, and (d) growth, maturity, and decay are produced by the soul, we must ask whether each of these is an attribute of the soul as a whole, i.e. whether it is with the whole soul we think, perceive, move ourselves, act or are acted upon, or whether each of them requires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soul? So too with regard to life. Does it depend on one of the parts of soul? Or is it dependent on more than one? Or on all? Or has it some quite other cause?

综上所述，显然，认识作为灵魂的属性是不能用灵魂由元素组成来加以解释，而且说灵魂被运动既不妥当，也不正确。但是既然认识、感知、意见，而且还有渴望、愿望以及所有其他种类的欲望均属于灵魂，并且动物的空间位置运动，加之生长、成熟和衰亡也都是由灵魂产生的，我们必须追问清楚，是否这些中的每一个都是作为整体灵魂的某一属性，即我们思维、感知、自我运动、作用与被作用所凭借的是否是整体灵魂，抑或它们中每一个都依赖于灵魂的不同部分？对于生命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它所依赖的是灵魂的一个部分吗？或者它所依赖的不止一个部分？抑或所有部分？或者它还有某种其他不同的原因？

Some hold that the soul is divisible, and that one part thinks, another desires. If, then, its nature admits of its being divided, what can it be that holds the parts together? Surely not the body; on the contrary it seems rather to be the soul that holds the body together; at any rate when the soul departs the body disintegrates and decays. If, then, there is something else which makes the soul one, this unifying agency would have the best right to the name of soul, and we shall have to repeat for it the question: Is it one or multipartite? If it is one, why not at once admit that 'the soul' is one? If it has parts, once more the question must be put: What holds its parts together, and so ad infinitum?

有些人认为灵魂是可分割的，而且一部分用以思维，另一部分产生欲望。既然如此，如果其自然本性容许其被分割，那么将其组成部

分聚在一起的是什么？当然不会是躯体；相反似乎应是灵魂把躯体结合在了一起；无论如何一旦灵魂脱离了躯体，躯体便会解体并腐败。而且，如果另有某物使灵魂成为一个整体，那么该结合物则将最有资格堪称灵魂，为此我们还必须重复这一问题：它是单一的还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如果它是单一的，那么为什么不马上承认“灵魂”是单一的？如果它有组成部分，这一问题必须再次被提出来：使其部分结合在一起的是什么？这样一来我们的讨论必将循环往复，永无休止。

The question might also be raised about the parts of the soul: What is the separate role of each in relation to the body? For, if the whole soul holds together the whole body, we should expect each part of the soul to hold together a part of the body. But this seems an impossibility; it is difficult even to imagine what sort of bodily part mind will hold together, or how it will do this.

关于灵魂的组成部分也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其与躯体的关系而言灵魂的每一组成部分各自的功能是什么？因为，如果整个灵魂把整个躯体结合在一起，我们应该认为灵魂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会把躯体的某一部分结合在一起。然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心智将结合的会是躯体的哪个部分，或其结合方式是怎样的，这甚至难以想象。

It is a fact of observation that plants and certain insects go on living when divided into segments; this means that each of the segments has a soul in it identical in species, though not numerically identical in the different segments, for both of the segments for a time possess the power of sensation and local movement. That this does not last is not surprising, for they no longer possess the organs necessary for self-maintenance. But, all the same, in each of the bodily parts there are present all the parts

of soul, and the souls so present are homogeneous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the whole; this means that the several parts of the soul are indisseverable from one another, although the whole soul is divisible. It seems also that the principle found in plants is also a kind of soul; for this is the only principle which is common to both animals and plants; and this exists in isolation from the principle of sensation, though there nothing which has the latter without the former.

植物和某些昆虫被分割成数段仍可继续存活，这是人们观察到的一个事实；这意味着每一段中均有一类属相同的灵魂，尽管在不同段上数量不同，因为[当其被分为两段时]两段均在一定时间内具有感觉和空间位置运动的能力。这种情况不能持续很久，这不足为奇，因为它们已不再拥有维持其自身存活所必需的感官。但是，灵魂的所有部分仍然存在于每一躯体部分之中，存在的这些灵魂相互之间以及和整体之间都是同类的；这意味着，虽然整体的灵魂是可分割的，但其几个组成部分却是彼此不可分割的。见诸植物之中的本原似乎也是某种灵魂，因为这是动物和植物两者所具有的唯一的共同本原；这种灵魂可脱离感觉本原而独立存在，尽管不存在任何具有感觉却不具有灵魂的事物。

Book II

第二卷

Chapter 1

第一章

Let the foregoing suffice as our account of the views concerning the soul which have been handed on by our predecessors; let us now dismiss them and make as it were a completely fresh start, endeavouring to give a precis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soul? i.e. to formulate the most general possible definition of it.

作为我们对从先贤那里传承下来的有关灵魂诸说的综述分析，上文所述足矣；现在我们只能摈弃这些观点并且可以说完全从头开始，力求对“什么是灵魂？”这一问题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即为其拟定一个最具普遍意义的定义。

We are in the habit of recognizing, as one determinate kind of what is, substance, and that in several senses, (a) in the sense of matter or that which in itself is not 'a this', and (b) in the sense of form or essence, which is that precisely in virtue of which a thing is called 'a this', and thirdly (c) in the sense of that which is compounded of both (a) and (b). Now matter is potentiality, form actuality; of the latter there are two grades related to one another as e.g. knowledge to the exercise of knowledge.

我们习惯于把实体看作现实存在物中的某一确定的种类，并且从以下几种意义上来分辨实体：第一，在质料的意义上或其自身并非“这个”；第二，在形式或本质意义上，正是凭借此意义某物才被称为“这个”；第三则是前两种意义的结合。质料是潜能，形式是现实；现实包含两层相互联系的意义，譬如知识与知识应用的联系。

Among substances are by general consent reckoned bodies and especially natural bodies; for they are the principles of all other bodies. Of natural bodies some have life in them, others not; by life we mean self-nutrition and growth (with its correlative decay). It follows that every natural body which has life in it is a substance in the sense of a composite.

人们普遍认为物身，尤其是自然物身，属实体；因为它们是其他一切物身的本原。在自然物身中，有些有生命，有些无生命；所谓生命，我们是指自己摄取营养与生长（及其与之相伴的衰亡）。如此看来，从复合物这一意义上说，每一个寓生命于其中的自然物身都是一个实体。

But since it is also a body of such and such a kind, viz. having life, the body cannot be soul; the body is the subject or matter, not what is attributed to it. Hence the soul must be a substance in the sense of the form of a natural body having life potentially within it. But substance is actuality, and thus soul is the actuality of a body as above characterized. Now the word actuality has two senses corresponding respectively to the possess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actual exercise of knowledg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soul is actuality in the first sense, viz. that of knowledge as possessed, for both sleeping and waking presuppose the existence of soul, and of these

waking corresponds to actual knowing, sleeping to knowledge possessed but not employed, and,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ividual, knowledge comes before its employment or exercise.

但是，由于它又是这种或那种物身，即[它是]有生命的，所以物身不可能是灵魂；物身是主体或质料，而不是其附属物。因此，灵魂，作为潜在地寓生命于其中的自然物身的形式，在此意义上，必定是实体。可是实体是现实存在，所以灵魂是具有上述特征的物身的现实存在。这样一来，现实存在一词有两种意义，分别对应知识的拥有与知识的实际应用。显然，灵魂是第一种意义上的现实存在，即作为被拥有的知识，因为眠与醒两者均以灵魂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而且在这两者中，醒相当于应用知识的现实认知，而眠则相当于被拥有的却未被利用的知识，而且，在个体的历史上，知识是先于其利用或应用而出现。

That is why the soul is the first grade of actuality of a natural body having life potentially in it. The body so described is a body which is organized. The parts of plants in spite of their extreme simplicity are 'organs'; e.g. the leaf serves to shelter the pericarp, the pericarp to shelter the fruit, while the roots of plants are analogous to the mouth of animals, both serving for the absorption of food. If, then, we have to give a general formula applicable to all kinds of soul, we must describe it as the first grade of actuality of a natural organized body. That is why we can wholly dismiss as unnecessary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soul and the body are one: it is as meaningless as to ask whether the wax and the shape given to it by the stamp are one, or generally the matter of a thing and that of which it is the matter. Unity has many senses (as many as 'is' has), but the most proper and fundamental sense of both is the relation of an actuality to that of which it is the actuality. We have

now given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soul?—an answer which applies to it in its full extent. It is substance in the sense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definitive formula of a thing's essence. That means that it is 'the essential whatness' of a body of the character just assigned. Suppose that what is literally an 'organ', like an axe, were a natural body, its 'essential whatness', would have been its essence, and so its soul; if this disappeared from it, it would have ceased to be an axe, except in name. As it is, it is just an axe; it wants the character which is required to make its whatness or formulable essence a soul; for that, it would have had to be a natural body of a particular kind, viz. one having in itself the power of setting itself in movement and arresting itself. Next, apply this doctrine in the case of the 'parts' of the living body. Suppose that the eye were an animal—sight would have been its soul, for sight is the substance or essence of the eye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formula, the eye being merely the matter of seeing; when seeing is removed the eye is no longer an eye, except in name—it is no more a real eye than the eye of a statue or of a painted figure. We must now extend our consideration from the 'parts' to the whole living body; for what the departmental sense is to the bodily part which is its organ, that the whole faculty of sense is to the whole sensitive body as such.

这就是灵魂是潜在地寓生命于其中的自然物身的第一现实存在的原因。以上所述的物身是一个由相关部分组成的有机体。植物的诸组成部分虽然极其简单，但却是“器官”。例如，叶子的作用是保护果皮，果皮的作用是保护果实，而植物的根则类似于动物的嘴，两者的功能都是摄取食物。因此，假如我们必须给出一个适用于各种灵魂的普遍定义，我们只能将其表述为由相关部分有机组成的自然物身的第一现实存在。灵魂与物身是否是一体这一问题根本无需讨论，我们可以完全不予探讨的原因是：这就如同是问熔蜡与图章在其上所留下的

图形是否是一体，或从普遍意义说某一事物的质料与以其为质料的某一事物是否是一体一样毫无意义。统一体有多种含义（其含义与“存在”的含义一样多），但两者的最准确和最基本的意义是某一现实存在与该现实存在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什么是灵魂？至此我们已经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一个适用于灵魂的最具普遍意义的回答。从灵魂相当于事物本质的终极形式的意义上说，灵魂是实体。这意味着，灵魂是具有我们刚谈及的品格的物身的“本质上的其所是”。假如按照字面意义被称为“器官”的事物，譬如一把斧头，如果其是一自然物身，那么其“本质上的其所是”便一定是其本质，并且其灵魂也是如此；一旦这从其中消失，它也便不再是斧头，而只是徒有其名罢了。实际上，它只是斧头；它缺乏那种能够使其为其所是的品格或使其拥有灵魂的形式化本质的品格；想要具有上述品格，它应该是某一特殊种类的自然物身，即那种自身有能力使其自身处于运动和静止状态的自然物身。下面，将此原则应用于活的物身的躯体“部分”。假如眼睛是一个动物——那么视觉则应是其灵魂，因为视觉是眼睛的实体或本质，其相当于[眼睛的]形式，眼睛只是视觉的质料；倘若失去了视觉，眼睛便不再是眼睛，而只能空有其名了——它充其量不过是雕像或画像上的眼睛。现在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思考从活的物身的“部分”扩展到整个活的物身；因为[物身的]部分感觉与作为其器官的物身的部分之间的关系，同[物身的]整体感觉官能与有感觉的整个物身之间的关系一样。

We must not understand by that which is 'potentially capable of living' what has lost the soul it had, but only what still retains it; but seeds and fruits are bodies which possess the qualification. Consequently, while waking is actuality in a sense corresponding to the cutting and the seeing, the soul is actuality in the sense corresponding to the power of sight and the power in the tool; the body corresponds to what exists in potentiality; as the pupil plus the power of sight constitutes the eye, so the soul plus the body constitutes the animal.

我们必须明白，具有潜在生命力的一定不能是已丧失灵魂的物身，而只能是依然具有灵魂的物身；不过种子和果实却是符合这一条件的物身。因此，清醒作为现实存在，从某种意义说与斧头的砍削和眼睛的观看相类似，而灵魂作为现实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与视觉能力和工具的能力相类似；物身相当于潜在的存在；犹如瞳孔与视觉能力一起构成眼睛一样，灵魂与躯体一道构成有生命的动物。

From this it indubitably follows that the soul is inseparable from its body, or at any rate that certain parts of it are (if it has parts) for the actuality of some of them is nothing but the actualities of their bodily parts. Yet some may be separable because they are not the actualities of any body at all. Further, we have no light on the problem whether the soul may not be the actuality of its body in the sense in which the sailor is the actuality of the ship.

由此可见，勿庸置疑，灵魂与躯体是不可分离的，或者至少与其某些部分（如果它有组成部分的话）是不可分离的，因为其中有些组成部分的现实存在不过是其躯体组成部分的现实存在。然而，有些部分却似乎可以分离，因为它们根本不是任何躯体的现实存在。此外，我们尚不清楚，灵魂是否是物身的现实存在，是否和水手作为船只的现实存在是同一种意义上的现实存在。

This must suffice as our sketch or outline deter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soul.

作为我们对界定灵魂的本质所作的勾勒或概述，以上所述足矣。

Chapter 2

第二章

Since what is clear or logically more evident emerges from what in itself is confused but more observable by us, we must reconsider our result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For it is not enough for a definitive formula to express as most now do the mere fact; it must include and exhibit the ground also. At present definitions are given in a form analogous to the conclusion of a syllogism; e.g. what is squa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quilateral rectangle equal to a given oblong rectangle. Such a definition is in form equivalent to a conclusion. One that tells us that squaring is the discovery of a line which is a mean proportional between the two unequal sides of the given rectangle discloses the ground of what is defined.

清楚明了的或逻辑上较为清晰的观点通常出自本身混乱不清但却比较易于观察的现象，既然如此，必须从这一角度重新思考我们关于灵魂的研究结论。因为现在多数的定义所表述的只是事实，对终极形式而言，仅有事实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包括并且阐明其依据。目前人们所给出的定义在形式上类似演绎推理的结论，譬如什么是正方形？正方形是四条边相等的矩形。这样的定义在形式上等同于一个结论。但如若有人向我们解释说，正方形是已知矩形的两不等边之间的均等比例的线的发现，那么他便揭示了被定义物的依据。

We resume our inquiry from a fresh starting-point by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what has soul in it differs from what has not, in that the former displays life. Now this word has more than one sense, and provided any one alone of these is found in a thing we say that thing is living. Living, that is, may mean thinking or

perception or local movement and rest, or movement in the sense of nutrition, decay and growth. Hence we think of plants also as living, for they are observed to possess in themselves an originative power through which they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all spatial directions; they grow up and down, and everything that grows increases its bulk alike in both directions or indeed in all, and continues to live so long as it can absorb nutriment.

事实上，通过专注有灵魂之物和无灵魂之物的区别在于有灵魂之物能够彰显生命，以此作为新的出发点，重新开始我们的研究。现在生命一词有不止一种意义，如果这些意义中的任何一种见诸某一事物，我们便说该事物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换言之，意指思维或感知，抑或空间位置上的运动和静止，或者指营养、衰亡和生长意义上的运动。因此我们认为植物也是有生命的，因为，据观察，它们体内具有一种本能，凭借这一本能它们可以向所有空间方向生长或衰亡；它们既向上，又向下生长，而且随着每一植物的生长，其躯干也向上下两个方向或所有方向均等地生长，并且只要其能够摄取营养，它便可继续存活下去。

This power of self-nutrition can be isolated from the other powers mentioned, but not they from it—in mortal beings at least. The fact is obvious in plants; for it is the only psychic power they possess.

这种自我摄取营养能力可独立于业已提及的其他能力而存在，但其他能力却不能脱离该能力而存在——至少对于有生有死的事物而言是这样的。对于植物而言，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是它们所具有的唯一灵魂的能力。

This is the originative power the possession of which leads us to speak of things as living at all, but it is the possession of sensation that leads us for the first time to speak of living things as animals; for even those beings which possess no power of local movement but do possess the power of sensation we call animals and not merely living things.

这种自我摄取营养能力是生物的本能，正是由于事物具有了这种本能才使我们将其称为生物，但是正是由于生物拥有感觉才使我们首次将其称为动物；因为即使有些生物并不具备空间位置运动的能力，但却具有感觉能力，我们仍然称其为动物而不仅仅称其为生物。

The primary form of sense is touch, which belongs to all animals. Just as the power of self-nutrition can be isolated from touch and sensation generally, so touch can be isolated from all other forms of sense. (By the power of self-nutrition we mean that departmental power of the soul which is common to plants and animals: all animals whatsoever are observed to have the sense of touch.) What the explanation of these two facts is, we must discuss later. At present we must confine ourselves to saying that soul is the source of these phenomena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them, viz. by the powers of self-nutrition, sensation, thinking, and motivity.

感觉的首要形式是触觉，它属于所有动物。正如自我摄取营养能力通常可独立于触觉和感觉一样，触觉也可以独立于所有其他形式的感觉。（我们所说的自我摄取营养能力指的是灵魂的部分能力，此能力为植物与动物共同拥有：据观察，所有的动物都有触觉。）对于这两个事实的解释，我们应留待以后讨论。目前，我们只能说灵魂既是上述各种现象的根源，又以它们作为其基本特征，上述各种现象是指

自我摄取营养能力、感觉能力、思维能力以及运动能力。

Is each of these a soul or a part of a soul? And if a part, a part in what sense? A part merely distinguishable by definition or a part distinct in local situation as well? In the case of certain of these powers,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are easy, in the case of others we are puzzled what to say. Just as in the case of plants which when divided are observed to continue to live though removed to a distance from one another (thus showing that in their case the soul of each individual plant before division was actually one, potentially many), so we notice a similar result in other varieties of soul, i.e. in insects which have been cut in two; each of the segments possesses both sensation and local movement; and if sensation, necessarily also imagination and appetition; for, where there is sensation, there is also pleasure and pain, and, where these, necessarily also desire.

这其中每一种能力均是一个独立的灵魂抑或是灵魂的一部分？如果是一部分的话，那么它又是何种意义上的一部分呢？这一部分仅在定义上是可分离的还是在空间位置上也同样是可分离的呢？就这些能力中的某些而言，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容易的；就另一些而言，我们却难以作答。正如就植物而言，据观察，当它们被分割开之后，尽管其被分割的部分彼此相距很远，但其被分割的部分也能够[各自]继续生存（这表明，在其被分割之前每株植物的灵魂从现实意义上说是一个，而从潜在的意义上看却是许多个），我们还在其他各种灵魂中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即在被分割成两段的昆虫中；每一段都具有感觉和空间位置运动两种能力；而且如果有感觉，也就必然会有想象和欲望；因为只要有感觉存在，必然也就会有愉悦和痛苦存在，而只要有愉悦和痛苦，必然也就会有欲求。

We have no evidence as yet about mind or the power to think; it seems to be a widely different kind of soul, differing as what is eternal from what is perishable; it alone is capable of existence in isolation from all other psychic powers. All the other parts of soul, it is evident from what we have said, are, in spite of certain statements to the contrary, incapable of separate existence though, of course, distinguishable by definition. If opining is distinct from perceiving, to be capable of opining and to be capable of perceiving must be distinct, and so with all the other forms of living above enumerated. Further, some animals possess all these parts of soul, some certain of them only, others one only (this is what enables us to classify animals); the cause must be considered later. A similar arrangement is found also within the field of the senses; some classes of animals have all the senses, some only certain of them, others only one, the most indispensable, touch.

迄今为止，关于心智或思维能力我们尚未论证；它似乎是一种极其不同的灵魂，其差异就好像永生的事物迥然不同于易死的事物一样；只有它能够脱离所有其他灵魂能力而独立存在。通过我们的以上论述，不难看出，虽然存在某些相反的观点，灵魂所有的其他部分是不能分离存在的，尽管在定义上[它们]确实是可分离的。如果发表意见不同于感知，那么发表意见的能力也必然有别于感知能力，而且对于以上枚举的所有其他形式的生物，情况也是如此。另外，有些动物具有灵魂所有的能力，有些只具有部分能力，有些则仅具有某一种能力（正是这一点才使我们得以对动物进行分类）；其原因须待后文讨论。类似的情况也见诸感觉的领域；有些种类的动物拥有全部的感觉，有些只拥有某些感觉，其他的则仅拥有一种感觉，一种必不可少的感觉——触觉。

Since the expression 'that whereby we live and perceive' has

two meanings, just like the expression 'that whereby we know'—that may mean either (a) knowledge or (b) the soul, for we can speak of knowing by or with either, and similarly that whereby we are in health may be either (a) health or (b) the body or some part of the body; and since of the two terms thus contrasted knowledge or health is the name of a form, essence, or ratio, or if we so express it an actuality of a recipient matter—knowledge of what is capable of knowing, health of what is capable of being made healthy (for the operation of that which is capable of originating change terminates and has its seat in what is changed or altered); further, since it is the soul by or with which primarily we live, perceive, and think:—it follows that the soul must be a ratio or formulable essence, not a matter or subject. For, as we said, word substance has three meanings— form, matter, and the complex of both— and of these three what is called matter is potentiality, what is called form actuality. Since then the complex here is the living thing, the body cannot be the actuality of the soul; it is the soul which is the actuality of a certain kind of body. Hence the rightness of the view that the soul cannot be without a body, while it cannot be a body; it is not a body but something relative to a body. That is why it is in a body, and a body of a definite kind. It was a mistake, therefore, to do as former thinkers did, merely to fit it into a body without adding a definite specification of the kind or character of that body. Reflection confirms the observed fact; the actuality of any given thing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what is already potentially that thing, i.e. in a matter of its own appropriate to it. From all this it follows that soul is an actuality or formulable essence of something that possesses a potentiality of being besouled.

正如“我们认识的凭借物”这一表述一样，“我们生活和感觉的凭借物”这一表述包含两种意义，其含义可能是知识或灵魂，因为我们可

以说，我们凭借或运用两者中的任意一个来认识，同样地，我们保持健康，可以指健康，或指[整个]身体或身体的某一部分；而且在如此对照的这两个术语中——知识或健康是形式、本质或比例的名称，或者如果我们称它是某一接受质料的现实存在——有认识能力者的知识、有保持健康能力者的健康（因为引起变化者停止作用于被完全改变或部分变动者并且置身于其中）；此外，既然主要是凭借或运用灵魂我们才得以生存、感知和思维——那么灵魂就必定是某种比例或形式化本质，而不是某种质料或主体。因为，如前所述，实体一词有三种意义——形式、质料以及这两者的结合——而且在这三者中被称为质料的是潜在存在，被称为形式的是现实存在。那么，这里所说的结合物便是有生命的事物，既然如此，躯体便不可能是灵魂的现实存在；相反，某一种物身的现实存在恰恰就是灵魂。因此，认为灵魂无法脱离物身而存在，而它又不可能是物身；它不是物身但却是与物身相关联的某物的那种观点是正确的。这就是灵魂寄寓于物身之中，并且是寄寓于某种确定的物身之中的原因。因此，像过去的思想家们那样，仅将灵魂归入物身，而对该物身的种类或特征却不加任何明确的说明，是错误的。深入的思考进一步证实了观察所得到的事实；任何特定事物的现实存在都只有在早已潜在该事物的体内才能得以实现，即在与之相适合的其本身的固有质料之中。从以上全部所述，可得出结论：灵魂是某一事物的现实存在或形式化本质，该事物具有使灵魂得以体现的潜能。

Chapter 3

第三章

Of the psychic powers above enumerated some kinds of living things, as we have said, possess all, some less than all, others one only. Those we have mentioned are the nutritive, the appetitive, the sensory, the locomotive, and the power of thinking. Plants have none but the first, the nutritive, while another order of living things

has this plus the sensory. If any order of living things has the sensory, it must also have the appetitive; for appetite is the genus of which desire, passion, and wish are the species; now all animals have one sense at least, viz. touch, and whatever has a sense has the capacity for pleasure and pain and therefore has pleasant and painful objects present to it, and wherever these are present, there is desire, for desire is just appetition of what is pleasant. Further, all animals have the sense for food (for touch is the sense for food); the food of all living things consists of what is dry, moist, hot, cold, and these are the qualities apprehended by touch; all other sensible qualities are apprehended by touch only indirectly. Sounds, colours, and odours contribute nothing to nutriment; flavours fall within the field of tangible qualities. Hunger and thirst are forms of desire, hunger a desire for what is dry and hot, thirst a desire for what is cold and moist; flavour is a sort of seasoning added to both. We must later clear up these points, but at present it may be enough to say that all animals that possess the sense of touch have also appetition. The case of imagination is obscure; we must examine it later. Certain kinds of animals possess in addition the power of locomotion, and still another order of animate beings, i.e. man and possibly another order like man or superior to him, the power of thinking, i.e. mind. It is now evident that a single definition can be given of soul only in the same sense as one can be given of figure. For, as in that case there is no figure distinguishable and apart from triangle, so here there is no soul apart from the forms of soul just enumerated. It is true that a highly general definition can be given for figure which will fit all figures without expressing the peculiar nature of any figure. So here in the case of soul and its specific forms. Hence it is absurd in this and similar cases to demand an absolutely general definition which will fail to express the peculiar nature of anything that is, or again, omitting this, to look for separate definitions corresponding to each infima species. The cases

of figure and soul are exactly parallel; for the particulars subsumed under the common name in both cases—figures and living beings—constitute a series, each successive term of which potentially contains its predecessor, e.g. the square the triangle, the sensory power the self-nutritive. Hence we must ask in the case of each order of living things, what is its soul, i.e. what is the soul of plant, animal, man? Why the terms are related in this serial way must form the subject of later examination. But the facts are that the power of perception is never found apart from the power of self-nutrition, while—in plants—the latter is found isolated from the former. Again, no sense is found apart from that of touch, while touch is found by itself; many animals have neither sight, hearing, nor smell. Again, among living things that possess sense some have the power of locomotion, some not. Lastly, certain living beings—a small minority—possess calculation and thought, for (among mortal beings) those which possess calculation have all the other powers above mentioned, while the converse does not hold—indeed some live by imagination alone, while others have not even imagination. The mind that knows with immediate intuition presents a different problem.

在以上所列的灵魂的诸多能力中，正如我们业已提及的那样，有些种类的生物具有所有的灵魂的能力，有些只具有某几种，而有些则只具有一种。我们业已提及的这些灵魂的能力是营养能力、欲望能力、感觉能力、空间位置运动能力和思维能力。植物只具有第一种能力——营养能力，而另一目生物除具有这种能力之外还具有感觉能力。无论哪一目生物，如果具有感觉能力，那么它也必然具有欲望能力；因为欲望是属，包括欲求、激情和意愿诸种；由于一切动物均至少具有一种感觉，即触觉，并且凡一切具有感觉的事物均有能力感知愉悦和痛苦并因此存在令其感到愉快和痛苦的客体，哪里存在这些客体，哪里就存在欲求，因为欲求就是对令人愉悦的事物的欲望。另

外，所有动物都具有对食物的感觉（因为触觉就是对食物的感觉）；所有生物的食物均由干的、湿的、热的、冷的物品构成，而且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触觉去认知的性质；其他所有可感觉的性质都只能间接地通过触觉被认知。声音、颜色和气味均对营养毫无裨益；滋味属于可触知的性质。饥与渴是欲求的形式，饥是对干和热的食物的欲求，渴是对冷和湿的食物的欲求；滋味是添加在两者中的某种调味品。这些要点，我们须待以后澄清，现在只说具有触觉的一切动物也都有欲望可能就足够了。想象这一灵魂的能力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尚须留待以后仔细讨论。除此之外，某些种类的动物还具有位置移动能力，还有另一目类的动物，即人以及可能与人类相似或比人更高级的另一目类的动物，它们还具有思维能力，即心智。于是，显而易见，正如图形只能有一个定义一样，灵魂也只能有一个定义。因为，就图形而言，除了三角形等图形之外，根本不存在任何其他不同的图形，对于灵魂来说，情况也是一样，除了上述所列的灵魂形式之外，根本不存在任何其他别的灵魂。的确，我们可以给图形一极具普遍意义的定义，该定义适用于所有的图形，但不体现任何个别图形的特殊本质。这里对于灵魂及其具体的形式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在这种或类似的情况下，以下两种作法都是荒唐的：要求给出一个具有绝对普遍意义的定义，而该定义却无法体现任何事物其所是的特殊本质；或者索性放弃这一定义，转而寻求适用于每一个最低种的个别事物的单独的定义。图形与灵魂两者的情况完全相同；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中——图形和生物——都是一个通用名称下所包含的由诸个别事物组成的一个系列，每一后继项中均潜在地蕴涵着其前项，例如正方形中蕴涵着三角形，感觉能力中蕴涵着自我营养能力。因此我们必须要问，对生物的每一个目类而言，其灵魂是什么，即植物的灵魂是什么？动物的灵魂是什么？人的灵魂[又]是什么？这些项以这种成系列的方式相互关联的原因将是我们留待后文予以讨论的问题。不过，事实是，离开了自我营养能力，感知能力便不复存在，但是——在植物中——自我营养能力与感知能力却是分离的。其次，离开了触觉，其他的所有感觉便都不能存在，但是离开了其他感觉，触觉却能够存在；许多动物既没有视觉和听觉，也没有嗅觉。再次，在那些具有感觉的生物中，有的具有位置移动能力，有的却没有。最后，有一些生物——极少数生物

——具有演算和思维能力，因为（在芸芸众生中）那些具有演算能力的生物也具有以上提及的所有其他的能力，然而相反的情况却不存在——实际上有些是仅凭想象能力生存，而另有一些甚至就连想象能力也不具备。凭借直觉认识事物的心智属另一种不同的问题。

It is evident that the way to give the most adequate definition of soul is to seek in the case of each of its forms for the most appropriate definition.

显然，定义灵魂的最好方法就是为每一种灵魂的形式都寻找到一个最适切的定义。

Chapter 4

第四章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tudent of these forms of soul first to find a definition of each, expressive of what it is, and then to investigate its derivative properties, &c. But if we are to express what each is, viz. what the thinking power is, or the perceptive, or the nutritive, we must go farther back and first give an account of thinking or perceiving, for in the order of investigation the question of what an agent does precedes the question, what enables it to do what it does. If this is correct, we must on the same ground go yet another step farther back and have some clear view of the objects of each; thus we must start with these objects, e.g. with food, with what is perceptible, or with what is intelligible.

对于探索灵魂诸多形式的研究者来说，他有必要首先给出每一种灵魂形式的定义，阐明其是什么，并继而探究其衍生属性等。但是如果要阐明每一种灵魂的形式是什么；换言之，何为思维能力，何为感知能力，抑或何为营养能力，那么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回溯，首先阐述思维或感知，因为在研究的顺序中主体之所为这一问题一般是先于何以使其为其所为这一问题的。如果这是正确的，我们则必须以同样的理由再进一步回溯以清楚认识每一灵魂客体；因此我们必须从以下这些客体开始，譬如从食物开始、从可感知的事物开始，或者是从可凭智力认知的事物开始。

It follows that first of all we must treat of nutrition and reproduction, for the nutritive soul is found along with all the others and is the most primitive and widely distributed power of soul, being indeed that one in virtue of which all are said to have life. The acts in which it manifests itself are reproduction and the use of food—reproduction, I say, because for any living thing that has reached its normal development and which is unmutilated, and whose mode of generation is not spontaneous, the most natural act is the production of another like itself, an animal producing an animal, a plant a plant, in order that, as far as its nature allows, it may partake in the eternal and divine. That is the goal towards which all things strive, that for the sake of which they do whatsoever their nature renders possible. The phrase 'for the sake of which' is ambiguous; it may mean either (a) the end to achieve which, or (b) the being in whose interest, the act is done. Since then no living thing is able to partake in what is eternal and divine by uninterrupted continuance (for nothing perishable can for ever remain one and the same), it tries to achieve that end in the only way possible to it, and success is possible in varying degrees; so it remains not indeed as the self-same individual but continues its existence in something like itself—not numerically but specifically

one.

因此，首先我们必须讨论营养和繁殖，因为营养灵魂见诸于所有其他灵魂能力之中并且是最原始、最为广泛拥有的灵魂能力，实际上正是由于具有这一能力，所有的生物才具有生命。营养灵魂借以显示其自身存在的行为是繁殖与摄取食物——繁殖，请注意，因为任何生物只要其已经正常发育成熟并且是无残缺的，而且其繁殖方式不是自发的，那么最自然的行为就是生产出另一个与其自身类似的生物，动物生育动物，植物繁殖植物，以便能够，只要其本质允许，分享永恒和神圣。这是一切生物所追求的目标，为此所有生物无一不做其本质所允许的一切可为之事。“为此目的”这一短语具有双层意义，它既可指欲达到之目的，也可指为某一存在的利益，所施之为。既然任何生物都不能凭[自身存在的]不断持续来分享永恒和神圣（因为凡有生有死的事物均不能使其自身永远作为同一个体而存在），它以其唯一可能的方式努力实现这一目的，并且有可能成功，只是其程度不同而已；所以实际上它所保持的不是与其自身相同的那一个体，而是通过与其类似的东西继续其存在——但却不是数量上的一个，而是种类上的一类。

The soul is the cause or source of the living body. The terms cause and source have many senses. But the soul is the cause of its body alike in all three senses which we explicitly recognize. It is (a) the source or origin of movement, it is (b) the end, it is (c) the essence of the whole living body.

灵魂是生物躯体的因与源。因与源这两个术语有多种含义。但是灵魂是其物身的因却是在我们明确区分的三种意义上而言的：它是运动的源或起源，是目的，是一切生物躯体的本质。

That it is the last, is clear; for in everything the essence is identical with the ground of its being, and here, in the case of living things, their being is to live, and of their being and their living the soul in them is the cause or source. Further, the actuality of whatever is potential is identical with its formulable essence.

上述的最后一义，灵魂是一切生物躯体的本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万物之中本质等同于其存在的根据，而且在这一点上，对生物而言，其存在就是生存，而对其存在和生存而言，寄寓于其中的灵魂就是因或原。此外，任何潜在生物的现实存在也等同于其形式化本质。

It is manifest that the soul is also the final cause of its body. For Nature, like mind, always does whatever it does for the sake of something, which something is its end. To that something corresponds in the case of animals the soul and in this it follows the order of nature; all natural bodies are organs of the soul. This is true of those that enter into the constitution of plants as well as of those which enter into that of animals. This shows that the sake of which they are is soul. We must here recall the two senses of 'that for the sake of which', viz. (a) the end to achieve which, and (b) the being in whose interest, anything is or is done.

显然，灵魂也是其物身的目的因。因为与心智相类似，自然也总是为了某物而为其一切之所为，某物就是其目的。对于动物而言，其灵魂也同样是为了某一目的而为其一切之所为，这是合乎自然法则的；所有的自然物身都是灵魂的器官。对于构成植物和动物物身的器官，情况确实如此。这表明，这一目的就是灵魂。在此我们必须重温“为此目的”的两种意义，即欲到达之目的，以及为了某一存在的利

益，其所是或所施之为。

We must maintain, further, that the soul is also the cause of the living body as the original source of local movement. The power of locomotion is not found, however, in all living things. But change of quality and change of quantity are also due to the soul. Sensation is held to be a qualitative alteration, and nothing except what has soul in it is capable of sensation. The same holds of the quantitative changes which constitute growth and decay; nothing grows or decays naturally except what feeds itself, and nothing feeds itself except what has a share of soul in it.

此外，我们必须坚持作为空间位置运动的本原的灵魂也是生物躯体的因这一观点。然而，并非所有的生物都具有空间位置移动能力。但是质量变化和数量变化也都归因于灵魂。感觉被认为是性质变化，而且只有拥有灵魂之物才有感觉的能力。造成生长和衰亡的数量变化也与此相同；任何生物，只有其能够自己摄取食物，才能自然地生长或衰亡；除非其具有灵魂，否则任何生物都不能自己摄取食物。

Empedocles is wrong in adding that growth in plants is to be explained, the downward rooting by the natural tendency of earth to travel downwards, and the upward branching by the similar natural tendency of fire to travel upwards. For he misinterprets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are not for all things what they are for the whole Cosmos: if we are to distinguish and identify organs according to their functions, the roots of plants are analogous to the head in animals. Further, we must ask what is the force that holds together the earth and the fire which tend to travel in contrary directions; if there is no counteracting force, they will be torn

asunder; if there is, this must be the soul and the cause of nutrition and growth. By some the element of fire is held to be the cause of nutrition and growth, for it alone of the primary bodies or elements is observed to feed and increase itself. Hence the suggestion that in both plants and animals it is it which is the operative force. A concurrent cause in a sense it certainly is, but not the principal cause, that is rather the soul; for while the growth of fire goes on without limit so long as there is a supply of fuel, in the case of all complex wholes formed in the course of nature there is a limit or ratio which determines their size and increase, and limit and ratio are marks of soul but not of fire, and belong to the side of formulable essence rather than that of matter.

恩培多克勒关于植物生长的补充说明是错误的。他论述道，植物的生长应该这样解释，根的向下生长源于土的下行的自然趋向，而其枝的向上生长则是源于火的上行的与此类似的自然趋向。因为他对向上和向下的解释是错误的；对于所有的植物而言的向上和向下并非是对于整个宇宙而言的向上和向下：如果我们根据其功能来区分和确定器官，那么植物的根便与动物的头相类似。此外，鉴于土和火趋于向相反方向运行，我们不得不问，将其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是什么；如果没有中和的力量，那么它们便将会分离开来；如果有的话，这种力必定是灵魂和营养及生长的因。有些人认为，火元素是营养与生长的因，因为据观察，在诸原始物身或诸元素中，火是唯一能够自我摄取食物并自我增长的元素。于是，他们认为不论是在植物体内，还是在动物体内，真正起作用的力量就是火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确是并存原因，但却不是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应该是灵魂；因为尽管只要有火所需的燃料，它便能无限燃烧，但对于在自然过程中形成的所有的复合整体而言，存在着某种决定其大小及增长的限制或比例，而该限制和比例是灵魂的标志，而不是火的标志，并且其属于灵魂的形式化存在，而不属于质料。

Nutrition and reproduction are due to one and the same psychic power. It is necessary first to give precision to our account of food, for it is by this function of absorbing food that this psychic power is distinguished from all the others. The current view is that what serves as food to a living thing is what is contrary to it—not that in every pair of contraries each is food to the other: to be food a contrary must not only be transformable into the other and vice versa, it must also in so doing increase the bulk of the other. Many a contrary is transformed into its other and vice versa, where neither is even a quantum and so cannot increase in bulk, e.g. an invalid into a healthy subject. It is clear that not even those contraries which satisfy both the conditions mentioned above are food to one another in precisely the same sense; water may be said to feed fire, but not fire water. Where the members of the pair are elementary bodies only one of the contraries, it would appear, can be said to feed the other. But there is a difficulty here. One set of thinkers assert that like fed, as well as increased in amount, by like. Another set, as we have said, maintain the very reverse, viz. that what feeds and what is fed are contrary to one another; like, they argue, is incapable of being affected by like; but food is changed in the process of digestion, and change is always to what is opposite or to what is intermediate. Further, food is acted upon by what is nourished by it, not the other way round, as timber is worked by a carpenter and not conversely; there is a change in the carpenter but it is merely a change from not-working to working. In answering this problem 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whether we mean by 'the food' the 'finished' or the 'raw' product. If we use the word food of both, viz. of the completely undigested and the completely digested matter, we can justify both the rival accounts of it; taking food in the sense of undigested matter, it is the contrary of what is fed by it, taking it as digested it is like what is fed by it. Consequently it is clear that in a certain sense we may say that both parties are right,

both wrong.

营养与繁殖均归因于同一灵魂能力。首先有必要厘清我们对食物的界定，因为正是凭借吸收食物这一功能，该灵魂能力才得以与其他所有的能力相区别。时下流行的观点是，可成为生物食物之物是该物之相反物——这不是指在每一个对立对中任意一物都是其相反物的食物：相反物不仅必须能够互相转化，而且还必须在此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使其相反物得以增长，这样的相反物方可成为食物。许多相反物均可相互转化，但是这种相互的转化甚至都算不上是量的转化，因而也就无助于其相反物的增长，例如一个染病体转化成为与之相反的健康体。显然，即使这些相互对立的事物满足上述的两个条件，它们也不是绝对相同意义上的彼此的食物；水据说可以饲火，但是火却不能饲水。在对立对中的两者是[非复合的]基本物的情况下，据说只有一方可以饲另一方。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难题。有一派思想家们主张，与量以类增一样，物以类饲。而另一派，正如我们业已论述的那样，所持的却是完全对立的观点，即饲者与被饲者是彼此对立的；他们认为，同类的事物不能被其同类所影响；但是食物在其消化过程中被改变，而且变化总是使之成为其对立物或中间物。另外，食物受其供养者作用，而不是与此相反，正如木料是被木匠加工而非与之相反一样；木匠也有变化，但却只是从非工作状态到工作状态的变化而已。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所用的“食物”一词是指“已被消化了的”食料还是指“尚未被消化的”食料，会使答案完全不同。如果我们使用的是食物一词的这两种意义，即完全未被消化的食料和业已完全被消化的食料，那么我们便可以评判这两个相反的观点：如果用食物指尚未被消化的食料，那么它便是被饲者的相反物；如果用食物指已被消化的食料，那么它便与消化它的被饲者相似。因此，显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两派既都是正确的，又都是错误的。

Since nothing except what is alive can be fed, what is fed is the besouled body and just because it has soul in it. Hence food is

essentially related to what has soul in it. Food has a power which is other than the power to increase the bulk of what is fed by it; so far forth as what has soul in it is a quantum, food may increase its quantity, but it is only so far as what has soul in it is a 'this-somewhat' or substance that food acts as food; in that case it maintains the being of what is fed,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what it is so long as the process of nutrition continues. Further, it is the agent in generation, i.e. not the generation of the individual fed but the reproduction of another like it; the substance of the individual fed is already in existence; the existence of no substance is a self-generation but only a self-maintenance.

除了有生命的物体之外，其他任何事物均不能被饲，既然如此，被饲的物体便是被赋予了灵魂的物体，其体内也因此才拥有灵魂。因此食物在本质上是与其中寄寓灵魂的事物相关联的。除了使被饲者的躯干增长这一功能之外，食物还具有[其他]某种功能；凡体内具有灵魂的事物便是一个量元，食物可增加其量，但是，只有体内具有灵魂的事物为“这—某物”或一实体时，食物才能发挥其本身的营养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食物使被饲者得以维持其生存，并且只要营养过程持续，被饲者便可继续维持其所是。此外，食物也是繁殖的原动力，即繁殖出与个体相类似的另一个体，而不是被饲个体自身的生成；被饲个体的实体早已存在；任何实体的存在均不是自我生成而只是汲取营养以便自我持续生存。

Hence the psychic power which we are now studying may be described as that which tends to maintain whatever has this power in it of continuing such as it was, and food helps it to do its work. That is why, if deprived of food, it must cease to be.

因此我们现在所研究的灵魂能力似乎可这样表述，该灵魂能力趋于为一切寓该灵魂能力于其中的事物提供营养，使之一如既往地继续存在，并且食物可助其完成它的这一使命。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失去了食物，它便不复存在。

The process of nutrition involves three factors, (a) what is fed, (b) that wherewith it is fed, (c) what does the feeding; of these (c) is the first soul, (a) the body which has that soul in it, (b) the food. But since it is right to call things after the ends they realize, and the end of this soul is to generate another being like that in which it is, the first soul ought to be named the reproductive soul. The expression (b) 'wherewith it is fed' is ambiguous just as is the expression 'wherewith the ship is steered'; that may mean either (i) the hand or (ii) the rudder, i.e. either (i) what is moved and sets in movement, or (ii) what is merely moved. We can apply this analogy here if we recall that all food must be capable of being digested, and that what produces digestion is warmth; that is why everything that has soul in it possesses warmth.

营养过程包括三个因素，被饲者何也，其被饲所凭者何也和饲者何也；此三者之中，饲者是第一灵魂，被饲者是寓灵魂于其中的物身，其被饲所凭者则是食物。可是，既然依据事物所实现的终极目的来命名是正确的，而灵魂的终极目的又是生成另一个与其相类似的后嗣，那么这个第一灵魂应该被命名为繁殖灵魂。词语“其被饲者所凭者何也”具有双重意义，和“船之被驾驶所凭者何也”这一词语一样；它可以既指手，又指船舵，即要么是指被运动者和运动者，要么是指仅仅是被运动者。如果我们想想一切食物都必须是可被消化的，而且引起消化的是热，那么我们在此就可以使用这一类比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切寓灵魂于其中的事物均具有热。

We have now given an outline account of the nature of food; further details must be given in the appropriate place.

既然我们已经对食物的本质作了简要的论述，更加详尽的论述尚须另文专门讨论。

Chapter 5

第五章

Having made these distinctions let us now speak of sensation in the widest sense. Sensation depends, as we have said, on a process of movement or affection from without, for it is held to be some sort of change of quality. Now some thinkers assert that like is affected only by like; in what sense this is possible and in what sense impossible, we have explained in our general discussion of acting and being acted upon.

完成了上述的区分与界定，我们现在就讨论最广泛意义上的感觉。诚如上述，感觉取决于运动的过程或外部的影响，因为它一般被视为某种性质的改变。现在有些思想家认为，同类的事物只能被其同类所影响；在何种意义上这是可能的，在何种意义上这是不可能的，对此已经在关于作用与被作用的一般性讨论中解释过了。

Here arises a problem: why do we not perceive the senses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e external objects of sense, or why without the stimulation of external objects do they not produce sensation, seeing that they contain in themselves fire, earth, and all the other

elements, which are the direct or indirect objects is so of sense? It is clear that what is sensitive is only potentially, not actually. The power of sense is parallel to what is combustible, for that never ignites itself spontaneously, but requires an agent which has the power of starting ignition; otherwise it could have set itself on fire, and would not have needed actual fire to set it ablaze.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感知感觉的外部客体一样感知感觉本身？或者，既然它们自身含有火、土以及所有其他元素，而这些元素又都是感觉的直接或间接的客体，那么为什么离开了外部客体的刺激，它们就无法产生感觉呢？显然，具有感觉能力者只能潜在地存在，而不能现实地存在。感觉能力与可燃物类似，因为可燃物绝不可能自燃，而需要有一具有引燃能力的动因；否则可燃物必然会自燃，并且也无需现实的火种将其点燃了。

In reply we must recall that we use the word 'perceive' in two ways, for we say (a) that what has the power to hear or see, 'sees' or 'hears', even though it is at the moment asleep, and also (b) that what is actually seeing or hearing, 'sees' or 'hears'. Hence 'sense' too must have two meanings, sense potential, and sense actual. Similarly 'to be a sentient' means either (a) to have a certain power or (b) to manifest a certain activity. To begin with, for a time, let us speak as if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between (i) being moved or affected, and (ii) being active, for movement is a kind of activity—an imperfect kind, as has elsewhere been explained. Everything that is acted upon or moved is acted upon by an agent which is actually at work. Hence it is that in one sense, as has already been stated, what acts and what is acted upon are like, in another unlike, i.e. prior to and during the change the two factors are unlike, after it like.

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重温我们所使用的“感知”一词的两种含义，因为我们可以说凡具有听或看的能力者，即使其此刻正在睡眠之中，仍然“看得见”或“听得到”，此外也可说凡实际上正在看或正在听着的，“看见”或“听到”。因此“感觉”也必然有两种含义：潜在感觉和现实感觉。与此相似，“成为有感觉能力者”也有两种含义：有某一感觉能力，或证实某一感觉行为。讨论伊始，我们暂时先对以下两者不作区分：被运动或被影响和起主动作用，因为运动是活动的一种——一种不完善的活动，对此另文已经有过阐释。实际上，正在发挥作用的作用者施其作用于一切被作用或被运动的事物。因此，如上所述，从某种意义上说，作用者与被作用者是相类似的，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即在变化之前和变化过程之中这两个因素是不相类似的，而在变化之后，则又归于相类似。

But we must now distinguish not only between what is potential and what is actual but also different senses in which things can be said to be potential or actual; up to now we have been speaking as if each of these phrases had only one sense. We can speak of something as 'a knower' either (a) as when we say that man is a knower, meaning that man falls within the class of beings that know or have knowledge, or (b) as when we are speaking of a man who possesses a knowledge of grammar; each of these is so called as having in him a certain potentiality, bu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potentialities, the one (a) being a potential knower, because his kind or matter is such and such, the other (b), because he can in the absence of any external counteracting cause realize his knowledge in actual knowing at will. This implies a third meaning of 'a knower' (c), one who is already realizing his knowledge—he is a knower in actuality and in the most proper sense is knowing, e.g. this A. Both the former are potential knowers, who realize their respective potentialities, the

one (a) by change of quality, i.e. repeated transitions from one state to its opposite under instruction, the other (b) by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inactive possession of sense or grammar to their active exercise. The two kinds of transition are distinct.

但是我们必须现在就加以区分，什么是潜在的和什么是现实的，还有不同的感觉，在这些不同的感觉中，事物是潜在的或是现实的方可得以确认；至此，我们在论述中一直使用的上述几个词语仿佛只有一种意义。我们可以称某物为“知者”，其所指要么是我们说那个人是一知者，我们指的是该人属于通晓或拥有知识这一种类的人；要么是我们说某人掌握语法知识，[我们的所指也是一样的]。这两人均可如此称谓是由于在其体内每人都有某种潜在的能力，但是其各自的潜在能力却是有差别的，前者是一潜在的知者，因为其种类或质料是属于某一类的；后者[也是一潜在的知者，但却是]因为在没有任何外在阻碍的情况下，他可以随意地将其潜在的知识转变为现实的知识。这里隐含着“知者”一词的第三个意思，已在实践其知识者——他是现实中的知者，而且该义是最严格意义上的认知，譬如[认知]这个A。前两者都是潜在的知者，他们实现各自潜在能力的方式不同，前者是通过质的变化，即通过学习，多次使其从一种状态转变为与其相反的另一种状态，后者则是通过从对感觉或语法的消极拥有向对其积极使用的转变。这两种转变是不同的。

Also the expression 'to be acted upon' has more than one meaning; it may mean either (a) the extinction of one of two contraries by the other, or (b) the maintenance of what is potential by the agency of what is actual and already like what is acted upon, with such likeness as is compatible with one's being actual and the other potential. For what possesses knowledge becomes an actual knower by a transition which is either not an alteration of it at all (being in reality a development into its true self or actuality) or at

least an alteration in a quite different sense from the usual meaning.

“被作用”这一词语也有多种意义；它或指相互对立的双方中的一方因另一方而消亡，或指潜在的存在被现实存在的和已被作用的同类物所保存，凭借这一相似性，某一现实存在与另一潜在存在相辅相成。因为通过转变，拥有知识者变成了实际的知者，这种转变既不是其自身的改变（因为这实际上是其发展成为了真自我或变成了现实存在），也不是完全有别于被作用一词一般意义的改变。

Hence it is wrong to speak of a wise man as being 'altered' when he uses his wisdom, just as it would be absurd to speak of a builder as being altered when he is using his skill in building a house.

因此，当一个智者用其智慧，说他正在被“改变”是错误的，就像当一个建筑师运用其技艺建造房屋时，说他正在被改变是荒谬的。

What in the case of knowing or understanding leads from potentiality to actuality ought not to be called teaching but something else. That which starting with the power to know learns or acquires knowledge through the agency of one who actually knows and has the power of teaching either (a) ought not to be said 'to be acted upon' at all or (b) we must recognize two senses of alteration, viz. (i) the substitution of one quality for another, the first being the contrary of the second, or (ii) the development of an existent quality from potentiality in the direction of fixity or nature.

对于认识或理解而言，使潜在存在变为现实存在的过程不应被视为教授过程，而应是其他事物。凡通过一个实际上具有认识能力和教授能力者的作用，凭潜在的认识能力开始学会或获取知识的过程要么根本不应被说成是“被作用”，要么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改变，即一种品质取代另一种品质，第一种品质是第二种品质的对立物，或现存的品质从其潜在的存在向稳定性或本质方向发展。

In the case of what is to possess sense, the first transition is due to the action of the male parent and takes place before birth so that at birth the living thing is, in respect of sensation, at the stage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possession of knowledge. Actual sensation corresponds to the stage of the exercise of knowledge. But between the two cases compared there is a difference; the objects that excite the sensory powers to activity, the seen, the heard, &c., are outside. The ground of this difference is that what actual sensation apprehends is individuals, while what knowledge apprehends is universals, and these are in a sense within the soul. That is why a man can exercise his knowledge when he wishes, but his sensation does not depend upon himself—a sensible object must be there. A similar statement must be made about our knowledge of what is sensible—on the same ground, viz. that the sensible objects are individual and external.

至于何为拥有感觉，第一个转变归因于父本的影响，而且该转变发生在子体出生之前，因此在出生时，此生物在感觉方面便处于和拥有知识相一致的阶段。实际感觉相当于知识应用阶段。但是在这里用以相互对比的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差异；激发感觉能力进行感觉活动的客体，例如视觉客体、听觉客体等，都是外在的。这一差异的根源是现实感觉所感知的是个别事物，而知识所把握的却是普遍的事物，并且这些均在某种意义上寓于灵魂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人可以随其意愿

地在任何时候运用其知识，但是他的感觉却不取决于其自身——必须存在某一感觉客体的原因。对我们关于可感知事物的知识也必须作同样的阐述——基于相同的根据，即可感知客体都是个别的、外在的。

A later more appropriate occasion may be found thoroughly to clear up all this. At present it must be enough to recognize the distinctions already drawn; a thing may be said to be potential in either of two senses, (a) in the sense in which we might say of a boy that he may become a general or (b) in the sense in which we might say the same of an adult, and there are two corresponding senses of the term 'a potential sentient'. There are no separate names for the two stages of potentiality; we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and how they are different. We cannot help using the incorrect terms 'being acted upon or altered' of the two transitions involved. As we have said, has the power of sensation is potentially like what the perceived object is actually; that is, whi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cess of its being acted upon the two interacting factors are dissimilar, at the end the one acted upon is assimilated to the other and is identical in quality with it.

以后可找到更合适的时机来阐明所有这一切。目前，识别这些已指出的差别完全足矣；某一事物是潜在的可包含两种意义：其中一义我们可以说一个男孩可能成为将军，；另一义，似乎可以同样说他可能成为成年人。“潜在的感觉力”这一术语也包含两种相关的意义。潜在存在的两个阶段没有各自不同的名称，尽管我们已经指出它们是不同的以及它们如何不同，但我们不得不沿用“被作用或被改变”这两个不恰当的术语来指其中的两种转变。诚如我们已经阐述的那样，具有感觉能力的事物潜在地与实际上可以被感知的事物相类似，即在其被作用过程的开始阶段，相互作用的两个因素是不同的，而在被作用过程结束时，一方则被另一方所同化，并在性质上与之相同。

Chapter 6

第六章

In dealing with each of the senses we shall have first to speak of the objects which are perceptible by each. The term 'object of sense' covers three kinds of objects, two kinds of which are, in our language, directly perceptible, while the remaining one is only incidentally perceptible. Of the first two kinds one (a) consists of what is perceptible by a single sense, the other (b) of what is perceptible by any and all of the senses. I call by the name of special object of this or that sense that which cannot be perceived by any other sense than that one and in respect of which no error is possible; in this sense colour is the special object of sight, sound of hearing, flavour of taste. Touch, indeed, discriminates more than one set of different qualities. Each sense has one kind of object which it discerns, and never errs in reporting that what is before it is colour or sound (though it may err as to what it is that is coloured or where that is, or what it is that is sounding or where that is.) Such objects are what we propose to call the special objects of this or that sense.

为了研究每一种感觉，我们将首先讨论可为每一感官所感知的客体。“感觉客体”这一术语涵盖三种事物，其中的两种是直接可感知的，而剩下的一种只是偶然可感知的。在前两种之中，一种包括只能被一种感觉所感知的事物，另一种则包括可被任何和全部感觉所感知的事物。对那种不能为任何其他感觉所感知而只能为一种相应的感觉所感知的事物而言，便没有出现任何感觉错误的可能，我称这种可感觉事物为这种或那种感觉的特殊客体；从这种意义上说，颜色是视觉的特殊客体，声音是听觉的特殊客体，滋味是味觉的特殊客体。触

觉，实际上，可以区分多种不同性质的事物。每一种感觉都有一种它能够分辨的客体，而且在分辨出现在其面前的是颜色还是声音时从不失误（尽管在分辨有颜色的事物为何物或该物在何处，或者发声的事物为何物或该物在何处时，它可能会失误）。这样的感觉客体，我们提议称之为这种或那种感觉的特殊客体。

'Common sensibles' are movement, rest, number, figure, magnitude; these are not peculiar to any one sense, but are common to all. There are at any rate certain kinds of movement which are perceptible both by touch and by sight.

“共同感觉客体”是运动、静止、数量、形状和度量；这些客体并非专属于任何一种感觉，而属于所有的感觉。至少，有几种运动就是既可以凭触觉感知，也可以凭视觉感知。

We speak of an incidental object of sense where e.g. the white object which we see is the son of Diares; here because 'being the son of Diares' is incidental to the directly visible white patch we speak of the son of Diares as being (incidentally) perceived or seen by us. Because this is only incidentally an object of sense, it in no way as such affects the senses. Of the two former kinds, both of which are in their own nature perceptible by sense, the first kind—that of special objects of the several senses—constitute the objects of sense in the strictest sense of the term and it is to them that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the structure of each several sense is adapted.

我们谈及感觉的偶然客体，在此以我们所看到的白色物体是狄亚雷之子为例；在此例中，由于“狄亚雷之子”碰巧是直接可见的白色物

体，所以说狄亚雷之子是（偶然地）为我们所感知或看见。由于这仅仅是偶然感觉到的客体，所以它这类感觉客体绝不会影响诸感觉。在前两种感觉客体中，两者均为其自身内在本质上就是可以被感觉所感知的，第一种感觉客体——几种感觉的特殊感觉客体——构成了此术语的最严格意义上的感觉客体，并且这几种感觉中的每一种感觉的结构恰恰都与相应的感觉客体在事物的本质上相适应。

Chapter 7

第七章

The object of sight is the visible, and what is visible is (a) colour and (b) a certain kind of object which can be described in words but which has no single name; what we mean by (b) will be abundantly clear as we proceed. Whatever is visible is colour and colour is what lies upon what is in its own nature visible; 'in its own nature' here means not that visibility is involved in the definition of what thus underlies colour, but that that substratum contains in itself the cause of visibility. Every colour has in it the power to set in movement what is actually transparent; that power constitutes its very nature. That is why it is not visible except with the help of light; it is only in light that the colour of a thing is seen. Hence our first task is to explain what light is.

视觉客体是可见物，可见物是[指]颜色以及某种可以用语言描述但却没有名称的事物，随着讨论的继续，我们所指的后者的意义将会十分清楚。任何可见的事物都是颜色，而颜色之所以是可见的取决于其自身内在本质的可见性；在此，“其自身内在的本质”指的不是用以解释颜色的定义所涉及的那种可见性，而是指其自身所含有的能够引起可见性的那一基质。每一种颜色都具有使实际上透明的物体处于运

动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构成其真正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光的帮助，它便是不可见的；只有在光照中，物体的颜色才是可见的。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阐明光是什么。

Now there clearly is something which is transparent, and by 'transparent' I mean what is visible, and yet not visible in itself, but rather owing its visibility to the colour of something else; of this character are air, water, and many solid bodies. Neither air nor water is transparent because it is air or water; they are transparent because each of them has contained in it a certain substance which is the same in both and is also found in the eternal body which constitutes the uppermost shell of the physical Cosmos. Of this substance light is the activity—the activity of what is transparent so far forth as it has in it the determinate power of becoming transparent; where this power is present, there is also the potentiality of the contrary, viz. darkness. Light is as it were the proper colour of what is transparent, and exists whenever the potentially transparent is excited to actuality by the influence of fire or something resembling 'the uppermost body'; for fire too contains something which is one and the same with the substance in question.

透明物显然是存在的，我所说的“透明物”指的是可见物，但并非指其自身是可见的，而是由于他物的颜色，它才具有其可见性；气、水以及许多固体都具有这一特征。气和水是透明的原因不在于它是气或水，而在于它们两者中均含有某种物质，该物质在两者中是相同的，并且也存在于构成物质宇宙外壳的永恒物体之中。该物质的活动就是光——透明物不断活动直至其中具有变成透明的决定性能力；哪里有这种能力存在，哪里也就有其相反者的潜在存在，即黑暗。光就是透明物固有的颜色，并且受火或者与“天穹物体”类似的某物的影

响，每当潜在的透明物被激活而变为现实存在时，光便存在；因为火中也包含某种物质，这种物质与现在所讨论的物质是同一的。

We have now explained what the transparent is and what light is; light is neither fire nor any kind whatsoever of body nor an efflux from any kind of body (if it were, it would again itself be a kind of body)—it is the presence of fire or something resembling fire in what is transparent. It is certainly not a body, for two bodies cannot be present in the same place. The opposite of light is darkness; darkness is the absence from what is transparent of the corresponding positive state above characterized; clearly therefore, light is just the presence of that.

我们现在已经阐述了什么是透明物以及什么是光；光既不是火，不是任何哪一种物体，也不是任何一种物体的外流物（如果是，其自身将再次成为某一物体）——它是火或与火类似的透明体中的某种存在。它肯定不是某一物体，因为两个物体不能同时在同一空间存在。光的相反者是黑暗，具有上述相应特征的积极状态的透明物的缺失就是黑暗；因此，显而易见，光就是具有这一状态的透明体的存在。

Empedocles (and with him all others who used the same forms of expression) was wrong in speaking of light as 'travelling' or being at a given moment between the earth and its envelope, its movement being unobservable by us; that view is contrary both to the clear evidence of argument and to the observed facts; if the distance traversed were short, the movement might have been unobservable, but where the distance is from extreme east to extreme west, the draught upon our powers of belief is too great.

恩培多克勒（以及采用与其相同论述方式的他的支持者们）是错误的，他曾论述道，光在地球与其周围的大气层之间“旅行”或者在某一特定的时刻抵达此处，其运动是我们无法察觉得到的；这种观点既与确凿的论据相悖，又与观察所见的事实相反；假如（光所）穿越的距离很短，其运动可能是我们无法观察得到的，但是这一距离（实际上）是从最东端到最西端，这就令我们无法相信了。

What is capable of taking on colour is what in itself is colourless, as what can take on sound is what is soundless; what is colourless includes (a) what is transparent and (b) what is invisible or scarcely visible, i.e. what is 'dark'. The latter (b) is the same as what is transparent, when it is potentially, not of course when it is actually transparent; it is the same substance which is now darkness, now light.

凡能够显现颜色的物体均是其自身无颜色的物体，正如一切能够接收声音的物体都是其自身无声的物体一样；无颜色的物体包括透明物以及不可见物或几乎不可见物，即“暗色”物体。当透明物潜在地透明，当然不是实际透明时，后者与透明物是一样的；它是时暗、时明的同一物质。

Not everything that is visible depends upon light for its visibility. This is only true of the 'proper' colour of things. Some objects of sight which in light are invisible, in darkness stimulate the sense; that is, things that appear fiery or shining. This class of objects has no simple common name, but instances of it are fungi, flesh, heads, scales, and eyes of fish. In none of these is what is seen their own 'proper' colour. Why we see these at all is another question. At present what is obvious is that what is seen in light is

always colour. That is why without the help of light colour remains invisible. Its being colour at all means precisely its having in it the power to set in movement what is already actually transparent, and, as we have seen, the actuality of what is transparent is just light.

并非所有可见物的可见性都取决于光。这只适用于事物“特有的”颜色。某些在光中不可见的视觉客体，即那些看上去炽热的或发光的物体，在黑暗中却能够[刺激视觉感官]产生感觉。这类的事物没有统称，不过真菌、肌肉、头、介壳虫以及鱼的眼睛却都是这类事物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视觉所见的均非其“特有的”颜色。究竟为什么我们能看见这些是另一个问题。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在光中所能看见的总是颜色。这就是为什么一旦离开了光的帮助，颜色便是不可见的。颜色之所以是颜色正是因为其本身有能力使已经是处于运动状态的现实透明物，并且，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透明物的现实存在恰恰就是光。

The following experiment makes the necessity of a medium clear. If what has colour is placed in immediate contact with the eye, it cannot be seen. Colour sets in movement not the sense organ but what is transparent, e.g. the air, and that, extending continuously from the object to the organ, sets the latter in movement. Democritus misrepresents the facts when he expresses the opinion that if the interspace were empty one could distinctly see an ant on the vault of the sky; that is an impossibility. Seeing is due to an affection or change of what has the perceptive faculty, and it cannot be affected by the seen colour itself; it remains that it must be affected by what comes between. Hence it is indispensable that there be something in between—if there were nothing, so far from seeing with greater distinctness, we should see nothing at all.

下面这个实验意图阐明视觉介质的必要性。如果使有颜色的物体与眼睛直接接触，该物体则不能被看到。颜色不是使视觉感官而是使透明物处于运动状态，譬如气，而且该透明体在视觉客体和视觉感官之间持续地延展，使后者处于运动状态。德谟克利特在阐述其相关的观点时歪曲了事实，他认为，假如视觉客体与视觉感官之间的空间是空的，那么人们就能够清楚地看见天穹上的蚂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视觉归因于有感觉能力的事物的影响与变化，而且它不能受所见颜色自身的影响；那么它就必然被两者间的事物影响。因此其间必然有某物存在——假若其间没有任何事物，非但不能看得更清晰，我们反而必将什么也看不到。

We have now explained the cause why colour cannot be seen otherwise than in light. Fire on the other hand is seen both in darkness and in light; this double possibility follows necessarily from our theory, for it is just fire that makes what is potentially transparent actually transparent.

至此，我们已经阐释了为什么除非在光中否则颜色是不能被看到的。另一方面，火既可以在黑暗中被看到，也可以在光中被看到；按照我们的理论，这一双重的可能性是必然的，因为正是火使潜在的透明物变成了现实的透明物。

The same account holds also of sound and smell; if the object of either of these senses is in immediate contact with the organ no sensation is produced. In both cases the object sets in movement only what lies between, and this in turn sets the organ in movement: if what sounds or smells is brought into immediate contact with the organ, no sensation will be produced. The same, in spite of all appearances, applies also to touch and taste; why there

is this apparent difference will be clear later. What comes between in the case of sounds is air; the corresponding medium in the case of smell has no name. But, corresponding to what is transparent in the case of colour, there is a quality found both in air and water, which serves as a medium for what has smell—I say 'in water' because animals that live in water as well as those that live on land seem to possess the sense of smell, and 'in air' because man and all other land animals that breathe, perceive smells only when they breathe air in. The explanation of this too will be given later.

同样的阐释也适用于声音和气味；如果这两种感觉客体与其[相应的]感官直接接触，那么将不会产生任何感觉。在这两种情况中，感觉客体只能使存在于[它与感官]之间的事物处于运动状态，继而该中间事物又使[相应的]感官处于运动状态：如果将发出声音或气味的事物与[相应的]感官直接接触，那么将不会产生任何感觉。同样的阐释还适用于触觉和味觉，尽管它们看起来完全不同；为什么存在这一明显的不同，将待下文阐明。对声音而言，其介质是空气；对气味而言，其相应的介质尚无名称。但是，对颜色而言，其相应的透明物介质具有某种在空气和水中兼备的性质，该性质可作为散发气味之物的介质——我之所以说“在水中”是因为生活在水中的动物以及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似均具有嗅觉，而“在空气中”是因为人与其他所有陆地上能呼吸的动物，只有当其吸入空气时才能感知气味。对此的阐释也将留待下文给出。

Chapter 8

第八章

Now let us, to begin with, make certain distinctions about sound and hearing.

现在，我们首先理清声音与听觉的差别。

Sound may mean either of two things—(a) actual, and (b) potential, sound.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which, as we say, 'have no sound', e.g. sponges or wool, others which have, e.g. bronze and in general all things which are smooth and solid—the latter are said to have a sound because they can make a sound, i.e. can generate actual sound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organ of hearing.

声音有两种：现实声音和潜在声音。我们说，有些事物“没有声音”，例如海绵或羊毛；有些事物则有声音，例如青铜以及一般来说所有[表面]光滑的和坚固的事物。后者被认为是有声音的，其原因在于它们能够发出声音，即能够在它们自身与听觉感官之间产生现实声音。

Actual sound requires for its occurrence (i, ii) two such bodies and (iii) a space between them; for it is generated by an impact. Hence it is impossible for one body only to generate a sound—there must be a body impinging and a body impinged upon; what sounds does so by striking against something else, and this is impossible without a movement from place to place.

现实声音的产生需具备以下两个必要条件：两个物体以及两物体之间的空间；因为声音是通过碰撞产生的，所以仅有一个物体是不可能产生声音的——必须有某一撞击物体和某一被撞击物体；发声物体通过撞击另一其他物体发出声音，而没有从一处到另一处的空间运动是不可能的。

As we have said, not all bodies can by impact on one another produce sound; impact on wool makes no sound, while the impact on bronze or any body which is smooth and hollow does. Bronze gives out a sound when struck because it is smooth; bodies which are hollow owing to reflection repeat the original impact over and over again, the body originally set in movement being unable to escape from the concavity.

正如我们已阐明的那样，并非所有的物体相互撞击都能发出声音，撞击羊毛便不会发出声音，而撞击青铜或任何表面光滑并且内部中空的物体却会发出声音。青铜受到撞击时便发出声音是由于它是光滑的；而中空的物体发出声音则是因为最初的撞击所引起的回声多次反复，因为最初处于运动状态的物体无法从中空部分脱离出来。

Further, we must remark that sound is heard both in air and in water, though less distinctly in the latter. Yet neither air nor water is the principal cause of sound. What is requir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sound is an impact of two solids against one another and against the air. The latter condition is satisfied when the air impinged upon does not retreat before the blow, i.e. is not dissipated by it.

此外，我们还必须提及的是，无论在空气中还是在水中，声音均是可以被听到的，尽管在后者中，声音听起来不是那么清晰。然而不论是空气还是水都不是产生声音的主要原因。产生声音所必须的条件是两个固体的相互撞击及其与空气的撞击。如果被撞击的空气在这一撞击前没有退避，即没有因该撞击而消散，则满足了后一必备的条件。

That is why it must be struck with a sudden sharp blow, if it is to sound—the movement of the whip must outrun the dispersion of the air, just as one might get in a stroke at a heap or whirl of sand as it was traveling rapidly past.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它将发出声音，那么对其的撞击必须迅疾而猛烈——撞击者的运动必须快于空气的消散，这就好比人们用鞭子抽击一个沙堆或者抽击一个正在快速经过的旋转沙团便可发出声音一样。

An echo occurs, when, a mass of air having been unified, bounded, and prevented from dissipation by the containing walls of a vessel, the air originally struck by the impinging body and set in movement by it rebounds from this mass of air like a ball from a wall. It is probable that in all generation of sound echo takes place, though it is frequently only indistinctly heard. What happens here must be analogous to what happens in the case of light; light is always reflected—otherwise it would not be diffused and outside what was directly illuminated by the sun there would be blank darkness; but this reflected light is not always strong enough, as it is when it is reflected from water, bronze, and other smooth bodies, to cast a shadow, which is the distinguishing mark by which we recognize light.

当最初受到撞击物的撞击并处于运动状态的空气，从另一团结为一体被限制在容器内的空气上反弹回来，如同一个皮球从墙上反弹回来，且无法消散，这时便出现回声。简而言之，回声很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尽管它通常只能是隐约地被听到。这里所出现的情况肯定与光的情况相类似；光总是被反射——否则，它便无法被到处传播，那么除了被太阳直接照射的区域之外，其他的地方必将是茫茫的黑暗；

但是，当其被水、青铜以及其他表面光滑的物体反射时，被反射的光并不总是强到足以投下阴影，这正是我们借以识别光的独特标志。

It is rightly said that an empty space plays the chief part in the production of hearing, for what people mean by 'the vacuum' is the air, which is what causes hearing, when that air is set in movement as one continuous mass; but owing to its friability it emits no sound, being dissipated by impinging upon any surface which is not smooth. When the surface on which it impinges is quite smooth, what is produced by the original impact is a united mass, a result due to the smoothness of the surface with which the air is in contact at the other end.

虚空的空间在声音的产生过程中起主要作用，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因为人们所说的“虚空”指的是空气，当空气作为一个连续的气团而处于运动状态，它便产生听觉；但是由于其自身的易散性，在受到撞击而与不光滑的物体表面相撞时，它便会受撞消散，而发不出任何声音。当其所撞击的物体表面非常光滑时，最初撞击所产生的便是一个结为一体的气团，这一结果归因于空气在另一端所接触的[物体]表面的光滑性。

What has the power of producing sound is what has the power of setting in movement a single mass of air which is continuous from the impinging body up to the organ of hearing. The organ of hearing is physically united with air, and because it is in air, the air inside is moved concurrently with the air outside. Hence animals do not hear with all parts of their bodies, nor do all parts admit of the entrance of air; for even the part which can be moved and can sound has not air everywhere in it. Air in itself is, owing to its

friability, quite soundless; only when its dissipation is prevented is its movement sound. The air in the ear is built into a chamber just to prevent this dissipating movement, in order that the animal may accurately apprehend all varieties of the movements of the air outside. That is why we hear also in water, viz. because the water cannot get into the air chamber or even, owing to the spirals, into the outer ear. If this does happen, hearing ceases, as it also does if the tympanic membrane is damaged, just as sight ceases if the membrane covering the pupil is damaged. It is also a test of deafness whether the ear does or does not reverberate like a horn; the air inside the ear has always a movement of its own, but the sound we hear is always the sounding of something else, not of the organ itself. That is why we say that we hear with what is empty and echoes, viz. because what we hear with is a chamber which contains a bounded mass of air.

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事物是有能力肇始结为一体的气团处于运动状态的事物，该气团将这一运动从最初的撞击物继续传递到听觉器官。听觉器官与空气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且由于听觉器官存在于空气之中，听觉器官内部的空气与其外部的空气是同时被运动的。因此，动物不是用其躯体所有的部分来听，也并非其所有躯体部分都允许空气进入；因为即使是可以被运动并且能够发声的部位也不是其中处处都有空气。由于其自身的易散性，空气本身是无声的；只有当其消散受阻，其运动才能发出声音。耳内的空气被聚集在一个耳室之中恰好阻止这一消散运动，以便动物得以准确地听辨出外部空气的各种运动。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在水中也能听得到声音，换言之，因为水不能进入耳室，而且由于耳内部的螺旋结构，水甚至无法进入外耳。如果有水进入，听觉便会终止，如果耳鼓膜受损，情况也是如此，正如如果瞳孔上的膜受损，视觉就会终止一样。耳是否能像号角一样发出回响也是一种耳聋测验方法；耳内的空气总有其自身的运动，但是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总是其他物体发出的声音，而不是听觉器官本身发出

的声音。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借以听闻的是虚空的事物和回声，即因为我们借以听闻的是一个其中包含着被结为一体的气团的耳室。

Which is it that 'sounds', the striking body or the struck? Is not the answer 'it is both, but each in a different way'? Sound is a movement of what can rebound from a smooth surface when struck against it. As we have explained, not everything sounds when it strikes or is struck, e.g. if one needle is struck against another, neither emits any sound. In order, therefore, that sound may be generated, what is struck must be smooth, to enable the air to rebound and be shaken off from it in one piece.

孰为“发出声音者”：撞击者还是被撞击者？难道答案不能是“两者都是，但各自方式不同”吗？声音是在受撞击时撞击一个物体的光滑表面并反弹回来的物体运动。正如我们业已阐释的那样，在撞击或受到撞击时，并非所有的物体都发出声音，例如，如果一根针被另一根针撞击，两者均不发出任何声音。因此，为了发出声音，被撞击物体必须表面光滑，以使空气能够反弹并且以一完整的气团经振动脱离这一表面。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ounding bodies show themselves only in actual sound; as without the help of light colours remain invisible, so without the help of actual sound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acute and grave sounds remain inaudible. Acute and grave are here metaphors, transferred from their proper sphere, viz. that of touch, where they mean respectively (a) what moves the sense much in a short time, (b) what moves the sense little in a long time. Not that what is sharp really moves fast, and what is grave, slowly, but that the difference in the qualities of the

one and the other movement is due to their respective speeds. There seems to be a sort of parallelism between what is acute or grave to hearing and what is sharp or blunt to touch; what is sharp as it were stabs, while what is blunt pushes, the one producing its effect in a short, the other in a long time, so that the one is quick, the other slow.

只有在现实声音中，不同发声物体的差异才能自己显露出来；如果没有光，颜色依然是不可见的，与此相同，如果没有现实声音的帮助，尖厉的声音与低沉的声音之间的差别也是无从听辨的。此处的尖厉和低沉是隐喻，是从其原本的感觉，即触觉转借而来的，在触觉中它们分别指在短时间内强烈触动此感觉的事物，和在长时间内微弱触动此感觉的事物。并非尖利之物运动得快，沉钝之物运动得慢，而是这种运动与另一种运动之间在性质上的差异归因于它们各自的速度。看来听觉上的尖厉或低沉之物与触觉上的尖利或沉钝之物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尖利之物实际上是动则以刺，而沉钝之物则是动则以推，一个在短时间内便产生效果，另一个则在长时间内才能产生效果，因此一个迅速，一个缓慢。

Let the foregoing suffice as an analysis of sound. Voice is a kind of sound characteristic of what has soul in it; nothing that is without soul utters voice, it being only by a metaphor that we speak of the voice of the flute or the lyre or generally of what (being without soul) possesses the power of producing a succession of notes which differ in length and pitch and timbre. The metaphor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all these differences are found also in voice. Many animals are voiceless, e.g. all non-sanguineous animals and among sanguineous animals fish. This is just what we should expect, since voice is a certain movement of air. The fish, like those in the Achelous, which are said to have voice, really make the

sounds with their gills or some similar organ. Voice is the sound made by an animal, and that with a special organ. As we saw, everything that makes a sound does so by the impact of something (a) against something else, (b) across a space, (c) filled with air; hence it is only to be expected that no animals utter voice except those which take in air. Once air is inbreathed, Nature uses it for two different purposes, as the tongue is used both for tasting and for articulating; in that case of the two functions tasting is necessary for the animal's existence (hence it is found more widely distributed), while articulate speech is a luxury subserving its possessor's well-being; similarly in the former case Nature employs the breath both as an indispensable means to the regulation of the inner temperature of the living body and also as the matter of articulate voice, in the interests of its possessor's well-being. Why its former use is indispensable must be discussed elsewhere.

上述对于声音的分析已足矣，无需赘述。语音是声音的一种，是寓寄灵魂者所具有的特征；没有灵魂的事物是发不出语音的，我们说长笛或竖琴的语音抑或通常所说的那些有能力发出一系列音域、音高及音质不同的音符的事物（无灵魂之物）的语音，那只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罢了。该比喻基于所有这些差异也都见诸语音之中这一事实。许多动物都发不出语音，例如所有无血动物以及有血动物中的鱼类。这正是我们所预期的，因为语音是空气的某种运动。像阿克罗俄斯河中的鱼一样，这类鱼据说是能够发出语音的，实际上它们是用鳃或某种类似的器官发出声音。语音是动物发出的声音，而且是用专门的器官发出的声音。诚如我们所述，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事物在其发声时无不通过某物撞击另一物，通过某一空间，充满空气；因此，唯一可以预料的是只有那些能够吸入空气的动物才能发出语音。一旦空气被吸入，自然便将其用于两个不同的目的，正如舌既被用于品尝味道，又被用于发出语音一样；在这两种功用中，品尝味道是动物生存所必需的（所以该功用更广泛地见诸于各种动物），而发出语音则属

一种奢侈，有助于其拥有者能够更好地生存；与此相似，在前一种情况中，自然既将呼吸作为生物调节体内温度必不可少的手段，又将其作为发出语音的介质，为的是其拥有者更好地生存。关于为什么调节生物体内温度这一功用是不可或缺的，须待另文讨论。

The organ of respiration is the windpipe, and the organ to which this is related as means to end is the lungs. The latter is the part of the body by which the temperature of land animals is raised above that of all others. But what primarily requires the air drawn in by respiration is not only this but the region surrounding the heart. That is why when animals breathe the air must penetrate inwards.

呼吸的器官是气管，与气管相连并实现呼吸这一目的的器官是肺。肺是躯体的一部分，凭借此部分陆地动物的体温才得以高于其他所有动物的体温。但是迫切需要通过呼吸以吸入空气的不止这一部分，还有心脏周围的部分。这就为什么动物呼吸时空气必须进入体内。

Voice then is the impact of the inbreathed air against the 'windpipe', and the agent that produces the impact is the soul resident in these parts of the body. Not every sound, as we said, made by an animal is voice (even with the tongue we may merely make a sound which is not voice, or without the tongue as in coughing); what produces the impact must have soul in it and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n act of imagination, for voice is a sound with a meaning, and is not merely the result of any impact of the breath as in coughing; in voice the breath in the windpipe is used as an instrument to knock with against the walls of the windpipe. This is

confirmed by our inability to speak when we are breathing either out or in—we can only do so by holding our breath; we make the movements with the breath so checked. It is clear also why fish are voiceless; they have no windpipe. And they have no windpipe because they do not breathe or take in air. Why they do not is a question belonging to another inquiry.

因此语音是被吸入的空气撞击“气管”所发出的声音，而产生这一撞击的动因是寓寄于躯体这些部分之中的灵魂。正如我们所论述的那样，并非动物所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语音（即使是用舌我们可能也只不过是发出一个并非语音的声音，抑或不用舌，就能发出像咳嗽声那样[也不是语音]）；发出撞击声者必定有灵魂寓寄其中，并且一定有想象活动与之相伴，因为语音是一种有意义的声音，而且并不仅仅像咳嗽那样，是任何吸入空气撞击的结果；在发出语音的过程中，气管中所吸入的空气被用作撞击气管壁的工具。这一点可用以下事实证明，当我们正在呼气或吸气时，我们都是不能说话的——只有屏住呼吸我们才能说话；因为只有在屏住呼吸时，我们才能进行这样的运动。鱼类为什么不能发声，其原因也就十分清楚了，它们根本没有气管。而且它们没有气管是由于它们既不呼气，也不吸气。为什么它们不呼吸则属于另一有待探讨的问题。

Chapter 9

第九章

Smell and its object are much less easy to determine than what we have hitherto discussed;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object of smell is less obvious than those of sound or colour. The ground of this is that our power of smell is less discriminating and in general inferior to that of many species of animals; men have a

poor sense of smell and our apprehension of its proper objects is inseparably bound up with and so confused by pleasure and pain, which shows that in us the organ is inaccurate. It is probable that there is a parallel failure in the perception of colour by animals that have hard eyes: probably they discriminate differences of colour only by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what excites fear, and that it is thus that human beings distinguish smells. It seems that there is an analogy between smell and taste, and that the species of tastes run parallel to those of smells—the only difference being that our sense of taste is more discriminating than our sense of smell, because the former is a modification of touch, which reaches in man the maximum of discriminative accuracy. While in respect of all the other senses we fall below many species of animals, in respect of touch we far excel all other species in exactness of discrimination. That is why man is the most intelligent of all animals. This is confirmed by the fact that it is to differences in the organ of touch and to nothing else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n and man in respect of natural endowment are due; men whose flesh is hard are ill-endowed by nature, men whose flesh is soft, well-endowed.

较之迄今我们已讨论的诸多感觉，嗅觉及其客体更为难以确定；嗅觉客体的区别性特征不如声音或颜色的区别性特征那么明显。其原因在于我们嗅觉能力的辨别力较差，并且一般说来逊于许多其他种类动物的嗅觉辨别力；人的嗅觉很差，而且我们对特定嗅觉客体的分辨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我们的愉悦和痛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其迷惑，这表明，我们体内的嗅觉器官是不精确的。硬眼动物在感知颜色过程中很可能也有类似的失误：它们可能仅凭是否出现引起恐惧的事物来分辨颜色的不同，而且人类正是以与此类似的方式分辨气味。嗅觉与味觉之间似乎可作某种类比，而且不同种类的味道与不同种类的气味相类似——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味觉远比我们的嗅觉更加具有辨别力，因为前者属触觉的一种变异，人类的触觉达到了最

高的分辨精度。在所有其他感觉方面，我们都逊于许多其他种类的动物，但在触觉方面我们的辨别精度却是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动物。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动物中，人是最具智慧的。以下事实可为这一点提供佐证：人与人之间在天赋上的差异取决于触觉器官上的不同，而与其他器官无关；凡肌肤粗糙者，其自然禀赋均不高，凡肌肤柔软者，其自然禀赋皆很高。

As flavours may be divided into (a) sweet, (b) bitter, so with smells. In some things the flavor and the smell have the same quality, i.e. both are sweet or both bitter, in others they diverge. Similarly a smell, like a flavour, may be pungent, astringent, acid, or succulent. But, as we said, because smells are much less easy to discriminate than flavours, the names of these varieties are applied to smells only metaphorically; for example, 'sweet' is extended from the taste to the smell of saffron or honey, 'pungent' to that of thyme, and so on.

味道可分为甜和苦，气味也是如此。在有些事物中，味道和气味具有同样的性质，即两者均为甜或两者均为苦；而在另一些事物中，它们却是不同的。与味道相类似，气味也可以是刺鼻的、涩的、酸的，或油腻的。不过，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由于气味远比味道难于辨别，这些不同的名称只是以比喻的方式用于气味；譬如“甜的”是从藏红花或蜂蜜的味道延伸至其气味的，“刺鼻的”则是从百里香的味道延伸至其气味的，等等。

In the same sense in which hearing has for its object both the audible and the inaudible, sight both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smell has for its object both the odorous and the inodorous. 'Inodorous' may be either (a) what has no smell at all, or (b) what

has a small or feeble smell. The same ambiguity lurks in the word 'tasteless'.

从相同的意义上说，听觉的客体既包括可听见物，也包括不可听见物；视觉的客体既包括可见物，也包括不可见物；嗅觉的客体既包括有气味的物体，也包括无气味的物体。“无气味的”可指无任何气味的物体，或指淡薄或微弱的气味之物。同样的双重意义也隐存于“无味道”一词之中。

Smelling, like the operation of the senses previously examined, takes place through a medium, i.e. through air or water—I add water, because water-animals too (both sanguineous and non-sanguineous) seem to smell just as much as land-animals; at any rate some of them make directly for their food from a distance if it has any scent. That is why the following facts constitute a problem for us. All animals smell in the same way, but man smells only when he inhales; if he exhales or holds his breath, he ceases to smell, no difference being made whether the odorous object is distant or near, or even placed inside the nose and actually on the wall of the nostril; it is a disability common to all the senses not to perceive what is in immediate contact with the organ of sense, but our failure to apprehend what is odorous without the help of inhalation is peculiar (the fact is obvious on making the experiment). Now since bloodless animals do not breathe, they must, it might be argued, have some novel sense not reckoned among the usual five. Our reply must be that this is impossible, since it is scent that is perceived; a sense that apprehends what is odorous and what has a good or bad odour cannot be anything but smell. Further, they are observed to be deleteriously effected by the same strong odours as man is, e.g. bitumen, sulphur, and the like.

These animals must be able to smell without being able to breathe. The probable explanation is that in man the organ of smell has a certain superiority over that in all other animals just as his eyes have over those of hard-eyed animals. Man's eyes have in the eyelids a kind of shelter or envelope, which must be shifted or drawn back in order that we may see, while hard-eyed animals have nothing of the kind, but at once see whatever presents itself in the transparent medium. Similarly in certain species of animals the organ of smell is like the eye of hard-eyed animals, uncurtained, while in others which take in air it probably has a curtain over it, which is drawn back in inhalation, owing to the dilating of the veins or pores. That explains also why such animals cannot smell under water; to smell they must first inhale, and that they cannot do under water.

与此前仔细讨论过的诸多感觉活动相似，嗅觉活动也要通过某种介质方能实现，即通过空气或水——我之所以加上水，是因为水生动物（既包括有血的，也包括无血的）似乎也与陆地动物一样能够嗅闻；如果食物有气味，至少一些水生动物能够直接找到远处的食物。下列事实之所以对我们构成一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此。所有动物均以同样的方式嗅闻，但是人只有在其吸气时才能嗅闻；如果呼气或屏住呼吸，他便无法继续嗅闻，不论有气味之物是在远处还是在近前，即使是将其置于鼻中或者干脆置于鼻孔底下均无济于事；所有感觉均无法感知与其器官直接接触的事物，这是普遍的感觉缺陷，可是失去了吸气的帮助，我们便不能感知有气味的事物，这却是特殊的（在实验中，这一事实显而易见）。既然无血动物不呼吸，人们似可认为，它们一定具有通常所说的五种感觉之外的某种新感觉。我们对此的回答必然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被感知的是气味；感知有气味之物并且辨别其气味好或坏的感觉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只能是嗅觉。此外，据观察，与人类一样，它们会因沥青、硫磺以及诸如此类的、同样强烈气味的刺激而受到伤害。这些无血动物肯定无需呼吸便能够嗅闻。

其可能的解释是，与其他所有动物体内的嗅觉器官相比较，人体中的嗅觉器官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这就好像较之硬眼动物的眼睛，人的眼睛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一样。人的眼睛在眼睑中有一种庇护物或保护膜，它们必须是可移动或可拉开的，以便我们能够看到物体，硬眼动物却不具备任何这类的器官，而只能立刻看到呈现于透明介质中的任何事物。与此相似，在某些种类的动物体内，其嗅觉器官与硬眼动物的眼睛类似，属无遮蔽保护的，而在那些吸入空气的动物体内，其嗅觉器官则可能有遮蔽保护，吸气时，由于血管或毛孔的扩张，该遮蔽保护被拉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动物不能在水中嗅闻；为了嗅闻，它们首先必须吸气，然而它们在水中不能吸气。

Smells come from what is dry as flavours from what is moist. Consequently the organ of smell is potentially dry.

正如味道源自湿润之物一样，气味源于干燥之物。因此，嗅觉器官潜在地属干性。

Chapter 10

第十章

What can be tasted is always something that can be touched, and just for that reason it cannot be perceived through an interposed foreign body, for touch means the absence of any intervening body. Further, the flavoured and tasteable body is suspended in a liquid matter, and this is tangible. Hence, if we lived in water, we should perceive a sweet object introduced into the water, but the water would not be the medium through which we perceived; our perception would be due to the solution of the sweet

substance in what we imbibed, just as if it were mixed with some drink. There is no parallel here to the perception of colour, which is due neither to any blending of anything with anything, nor to any efflux of anything from anything. In the case of taste, there is nothing corresponding to the medium in the case of the senses previously discussed; but as the object of sight is colour, so the object of taste is flavour. But nothing excites a perception of flavour without the help of liquid; what acts upon the sense of taste must be either actually or potentially liquid like what is saline; it must be both (a) itself easily dissolved, and (b) capable of dissolving along with itself the tongue. Taste apprehends both (a) what has taste and (b) what has no taste, if we mean by (b) what has only a slight or feeble flavour or what tends to destroy the sense of taste. In this it is exactly parallel to sight, which apprehends both what is visible and what is invisible (for darkness is invisible and yet is discriminated by sight; so is, in a different way, what is over brilliant), and to hearing, which apprehends both sound and silence, of which the one is audible and the other inaudible, and also over-loud sound. This corresponds in the case of hearing to over-bright light in the case of sight. As a faint sound is 'inaudible', so in a sense is a loud or violent sound. The word 'invisible' and similar privative terms cover not only (a) what is simply without some power, but also (b) what is adapted by nature to have it but has not it or has it only in a very low degree, as when we say that a species of swallow is 'footless' or that a variety of fruit is 'stoneless'. So too taste has as its object both what can be tasted and the tasteless—the latter in the sense of what has little flavour or a bad flavour or one destructive of tas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is tasteless and what is not seems to rest ultimately on that between what is drinkable and what is undrinkable—both are tasteable, but the latter is bad and tends to destroy taste, while the former is the normal stimulus of taste. What is drinkable is the common object of

both touch and taste.

凡可被品尝之物都是可被触摸之物，因此可被品尝的事物是不能通过外来的媒介而被感知的，因为触觉意味着无需任何媒介。此外，有味的、可品尝的物体是处于液体质料中的，并且是可触摸的。因此，假如我们生活在水中，我们应该能够感知到加注到水中的甜物质，但是水并不是我们借以感知的介质；我们的感知应归因于我们饮用水中的甜味物质的溶解，就好像将甜味物质混合在某些饮品中一样。此处的感知与颜色的感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颜色的感知既不是由于某物与某物的混合，也不是因为某物从某物中流出。与此前所讨论的诸感觉的介质的情形不同，对味觉而言，不存在任何与其介质相对应的事物；但是正如视觉的客体是颜色一样，味觉的客体是味道。但是，如果没有液体的帮助，任何事物都不能激起味感；作用于味觉的事物必须是现实的液体或者是潜在的液体，如含盐物；含盐物必须既本身易于溶解，又能够因舌头而溶解。味觉所感知的既有有味物，又有无味物，我们用无味物指的是只有淡淡或微弱味道的事物，或者是能够破坏味觉的事物。在这一点上，味觉酷似视觉，视觉所感知的既有可见物，也有不可见物（虽然黑暗是不可见的，但却可以被视觉所分辨；[对于]过于明亮的事物，情况也是如此，但却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而且味觉也酷似听觉，听觉所听辨的既有声音，又有寂静，在这两者中，一种为可听到的，而另一种则是不可听到的，而且还有过于高亢的声音。在听觉中，这种情况与视觉中的过于明亮的光相类似。就像一种微弱的声音是“听不到的”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响亮或剧烈的声音也是如此。“不可见的”一词以及类似的表示否定意义的词语所包含的意义不仅有某物完全不具有某种能力，而且还有某物为适应自然应具备某种能力，但却并不具有该能力或者只是在非常低级的水平上具有该能力，正如我们说某一种类的燕是“无足的”或者某一种水果是“无核的”一样。味觉也是如此，其客体既可以是可品尝之物，又可以是不可品尝之物——后者意指淡味之物或不良气味之物抑或破坏味觉之物。无味物与有味物的区分似乎完全基于可饮物与不可饮物的区分，可饮物与不可饮物——两者都是可品尝的，但后者是

不好的并倾向于破坏味觉，而前者却是味觉的正常刺激物。可饮物是触觉与味觉的共同客体。

Since what can be tasted is liquid, the organ for its perception cannot be either (a) actually liquid or (b) incapable of becoming liquid. Tasting means a being affected by what can be tasted as such; hence the organ of taste must be liquefied, and so to start with must be non-liquid but capable of liquefaction without loss of its distinctive nature. This is confirmed by the fact that the tongue cannot taste either when it is too dry or when it is too moist; in the latter case what occurs is due to a contact with the pre-existent moisture in the tongue itself, when after a foretaste of some strong flavour we try to taste another flavour; it is in this way that sick persons find everything they taste bitter, viz. because, when they taste, their tongues are overflowing with bitter moisture.

凡可被品尝的事物均是液体的，故而其感觉它的器官既不可能是现实意义上的液体，也不可能是不能转化成液体之物。味觉的意思是可被品尝物以如此的方式作用于某一存在；因此味觉器官必须被液化，而且是始于非液体但却能够液化而又不失其独特本质。以下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当舌头过干燥或者过湿润时，它都无法品尝；后一种情况中出现的原因在于舌头本身所接触到的是舌头已有的水分，这就如同在先品尝了某一强烈味道之后，我们又试图品尝另一味道；同样，病人感觉他们所品之物都是苦的，换言之，这是因为，在他们品尝时，充溢其舌的是苦味的水分。

The species of flavour are, as in the case of colour, (a) simple, i.e. the two contraries, the sweet and the bitter, (b) secondary, viz. (i) on the side of the sweet, the succulent, (ii) on the side of the

bitter, the saline, (iii) between these come the pungent, the harsh, the astringent, and the acid; these pretty well exhaust the varieties of flavour. It follows that what has the power of tasting is what is potentially of that kind, and that what is tasteable is what has the power of making it actually what it itself already is.

与颜色的分类相似，味道的种类有单纯味道，即相反的两种味道；有兼性味道，即在甜的这类味道中，还有油性的味道；在苦的这类味道中，还有咸的味道；在这些之间，尚有刺激的、粗涩的、清苦的以及酸的味道，这些几乎就是各种不同的味道了。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凡具有味觉能力者就是潜在地具有这些性质的东西，而且凡可品尝的均为有能力使这种潜能变成现实的东西。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Whatever can be said of what is tangible, can be said of touch, and vice versa; if touch is not a single sense but a group of senses, there must be several kinds of what is tangible. It is a problem whether touch is a single sense or a group of senses. It is also a problem, what is the organ of touch; is it or is it not the flesh (including what in certain animals is homologous with flesh)? On the second view, flesh is 'the medium' of touch, the real organ being situated farther inward. The problem arises because the field of each sense is according to the accepted view determined as the range between a single pair of contraries, white and black for sight, acute and grave for hearing, bitter and sweet for taste; but in the field of what is tangible we find several such pairs, hot cold, dry moist, hard soft, &c. This problem finds a partial solution, when it is

recalled that in the case of the other senses more than one pair of contraries are to be met with, e.g. in sound not only acute and grave but loud and soft, smooth and rough &c.; there are similar contrasts in the field of colour. Nevertheless we are unable clearly to detect in the case of touch what the single subject is which underlies the contrasted qualities and corresponds to sound in the case of hearing.

任何适用于可触摸物的论述，都适用于触觉，反之亦然；如果触觉不是一种单一的感觉，而是多种感觉的组合，那么就一定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可触摸物。触觉是一种单一的感觉还是多种感觉的组合，这是一个问题。触觉器官是什么，这也是一个问题；触觉器官是不是肌肉（包括在某些动物体内，与肌肉功能相同的是什么）？据第二种观点，肌肉是触觉的“介质”，真正的触觉器官位于躯体内部的更深处。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是因为，据普遍接受的观点，每一感觉领域均由单一的一对相互对立的感觉客体所决定，对视觉而言的白与黑，对听觉而言的尖厉与低沉，对味觉而言的苦与甜；但是在可触摸物的领域内我们却发现数个这样的对立对，热与冷、干与湿、硬与软等。回顾一下其他感觉，便可找到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其他的感觉领域中，也可找到不止一个对立对，譬如声音中不仅有尖厉与低沉，还有宏亮与轻柔、圆润与刺耳等；在颜色中也有一些类似的对立对。但是，在触觉中，这些相互对立的性质所依赖的、类似听觉中声音的那种唯一的主体是什么，我们尚不能确定。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organ of touch lies inward or not (i.e. whether we need look any farther than the flesh), no indication in favour of the second answer can be drawn from the fact that if the object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the flesh it is at once perceived. For even under present conditions if the experiment is made of making a web and stretching it tight over the flesh, as soon as this

web is touched the sensation is report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before, yet it is clear that the organ is not in this membrane. If the membrane could be grown on to the flesh, the report would travel still quicker. The flesh plays in touch very much the same part as would be played in the other senses by an air-envelope growing round our body; had we such an envelope attached to us we should have supposed that it was by a single organ that we perceived sounds, colours, and smells, and we should have taken sight, hearing, and smell to be a single sense. But as it is, because that through which the different movements are transmitted is not naturally attached to our bodies, the difference of the various sense-organs is too plain to miss. But in the case of touch the obscurity remains.

触觉器官是位于躯体的内部还是外部（即我们是否需要越过肌肉在躯体内部寻找），对于这一问题，如果触觉客体与肌肉接触，该客体马上就被感知，从这一事实中看不出任何支持第二个答案的迹象。因为即使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如果所做的实验是织一张网，再用其紧紧地包裹住肌肉，只要该网被触摸，感觉就会像以前一样以同样的方式被记录下来，然而触觉器官却不在这个网膜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假如网膜能够长到肌肉上去，那么感觉记录将会传送得更快。肌肉在触觉中所起的作用与围绕在我们周围的大气层在其他感觉中所起的作用将会是完全一样的；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大气层包围着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凭借某一单一的器官，我们就可以感知声音、颜色以及气味，而且我们也可把视觉、听觉和嗅觉视为同一单一的感觉。但是实际上，不同的感觉运动所赖以传递的介质并非自然地依附于我们的躯体，因此，各种不同感觉器官的差别是非常明显，不容忽视的。但是对触觉而言，情况尚不清楚。

There must be such a naturally attached 'medium' as flesh, for

no living body could be constructed of air or water; it must be something solid. Consequently it must be composed of earth along with these, which is just what flesh and its analogue in animals which have no true flesh tend to be. Hence of necessity the medium through which are transmitted the manifoldly contrasted tactual qualities must be a body naturally attached to the organism. That they are manifold is clear when we consider touching with the tongue; we apprehend at the tongue all tangible qualities as well as flavour. Suppose all the rest of our flesh was, like the tongue, sensitive to flavour, we should have identified the sense of taste and the sense of touch; what saves us from this identification is the fact that touch and taste are not always found together in the same part of the body. The following problem might be raised. Let us assume that every body has depth, i.e. has three dimensions, and that if two bodies have a third body between them they cannot be in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let us remember that what is liquid is a body and must be or contain water, and that if two bodies touch one another under water, their touching surfaces cannot be dry, but must have water between, viz. the water which wets their bounding surfaces; from all this it follows that in water two bodies cannot be in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The same holds of two bodies in air—air being to bodies in air precisely what water is to bodies in water—but the facts are not so evident to our observation, because we live in air, just as animals that live in water would not notice that the things which touch one another in water have wet surfaces. The problem, then, is: does the perception of all objects of sense take place in the same way, or does it not, e.g. taste and touch requiring contact (as they are commonly thought to do), while all other senses perceive over a distance? The distinction is unsound; we perceive what is hard or soft, as well as the objects of hearing, sight, and smell, through a 'medium', only that the latter are perceived over a greater distance than the former; that is why the facts escape our notice.

For we do perceive everything through a medium; but in these cases the fact escapes us. Yet, to repeat what we said before, if the medium for touch were a membrane separating us from the object without our observing its existence, we should be relatively to it in the same condition as we are now to air or water in which we are immersed; in their case we fancy we can touch objects, nothing coming in between us and them. But there remains this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can be touched and what can be seen or can sound; in the latter two cases we perceive because the medium produces a certain effect upon us, whereas in the perception of objects of touch we are affected not by but along with the medium; it is as if a man were struck through his shield, where the shock is not first given to the shield and passed on to the man, but the concussion of both is simultaneous.

因为任何生物的躯体都不可能由空气或水组成，所以必然存在某种自然所赋予的像肌肉一样的“介质”；它一定是某种固体物质。因此它一定是由土与空气和水混合而组成的，该介质很有可能就是肌肉以及没有真正肌肉的动物体内类似肌肉的部分。因此这些多种相互对立的触觉客体借以传递的介质必然一定是自然所赋予该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舌的触觉，那么触觉客体的多样性就会十分清楚了；在舌上我们既可感知所有的可触摸物，也可感知味道。假设我们其他所有的肌肉，都像舌一样，对味道很敏感，那么我们就该把味觉和触觉视为同一种感觉了；触觉和味觉却不总是见于躯体的同一部位，这一事实使我们不能把这两者视为同一种感觉。人们可能会提出下面这一问题，我们假定每一物体都是有深度的，即具有三个维度，而且如果两个物体之间有第三个物体，使其不能彼此相互接触；我们要记住，液态物是一种物体，而且必然是水或必然含有水，如果两个物体在水下相互接触，它们的接触表面不可能是干的，它们之间必然有水，即润湿其接触界面的水；从所有这一切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水中的两物体是不能彼此相互接触的。在空气中的两物体也是

如此——空气对在空气中的物体的作用与水对在水中的物体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可是就我们的观察而言，事实却并不明显，因为我们生活在空气中，正如生活在水中的动物，通常不会注意到水中相互接触的物体的表面是湿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对所有感觉客体的感知方式是否相同？例如味觉与触觉要求接触（一般认为味觉与触觉是如此），是否所有其他感觉都是远距离感知呢？这种区分不妥；我们既感知硬的或软的物体，也凭借某一“介质”感知听觉客体、视觉客体以及嗅觉客体，只是被感知的后者所处的距离比前者远些；这正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注意这些事实。因为我们确实是通过某一介质来感知一切事物的；但是在这些情况中我们疏忽了其中的事实。然而，重复一下我们此前的论述，假如触觉的介质是一网膜，它将我们与感觉客体分离开来，而我们也未曾留意其存在，那么我们与该网膜的相对关系将会如同我们与我们现在正置身于其中的空气和水的关系；在空气和水中，我们认为我们能够触摸到客体，在我们与客体之间没有任何东西介入。但是在可被触摸物与可被看见物或能发声物之间还是存在着这样一个差别的；在后两者情形中我们感知是因为介质对我们产生了某种影响，而在对触觉客体的感知中，我们不是被介质所影响，而是和介质一起受到影响；这就好像一个人隔着他的盾被刺伤一样，在这种情况中，不是盾牌受到震动后将震动传至人，而是同时对两者产生冲击。

In general, flesh and the tongue are related to the real organs of touch and taste, as air and water are to those of sight, hearing, and smell. Hence in neither the one case nor the other can there be any perception of an object if it is placed immediately upon the organ, e.g. if a white object is plac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eye. This again shows that what has the power of perceiving the tangible is seated inside. Only so would there be a complete analogy with all the other senses. In their case if you place the object on the organ it is not perceived, here if you place it on the flesh it is perceived; therefore flesh is not the organ but the medium of touch.

概而言之，肌肉和舌与触觉和味觉的真正器官相关，正如空气和水与视觉、听觉和嗅觉相关一样。因此，无论在哪一种感觉中，如果将感觉客体直接置于器官之上，都无法产生对该客体的任何感觉，譬如将一白色客体放在眼睛的表面。这再次证明，有能力感知可触摸物的器官一定位于肌肉内部。唯有如此，触觉才能与其他感觉形成完全的类比。对于其他感觉而言，如果你将感觉客体直接放在器官上，那么该客体则不能被感知，但对触觉来说，如果你将其放在肌肉上，那么它就会被感知；因此肌肉不是触觉的器官而是其介质。

What can be touched are distinctive qualities of body as body; by such differences I mean those which characterize the elements, viz, hot cold, dry moist, of which we have spoken earlier in our treatise on the elements. The organ for the perception of these is that of touch—that part of the body in which primarily the sense of touch resides. This is that part which is potentially such as its object is actually: for all sense-perception is a process of being so affected; so that that which makes something such as it itself actually is makes the other such because the other is already potentially such. That is why when an object of touch is equally hot and cold or hard and soft we cannot perceive; what we perceive must have a degree of the sensible quality lying beyond the neutral point. This implies that the sense itself is a 'mean' between any two opposite qualities which determine the field of that sense. It is to this that it owes its power of discerning the objects in that field. What is 'in the middle' is fitted to discern; relatively to either extreme it can put itself in the place of the other. As what is to perceive both white and black must, to begin with, be actually neither but potentially either (and so with all the other sense-organs), so the organ of touch must be neither hot nor cold.

凡可触摸物均具有物体之所以为物体的独特性质，我的意思是，正是那些体现诸元素特征的不同性质才是物体之为物体的独特性质，即热与冷、干与湿，我们早已在此前关于诸元素的专篇中对这些性质做过论述。感知这些的器官是触觉器官——躯体中触觉器官主要寓居的那个部分。该部分是潜在存在的那一部分，这就好似其客体是现实存在一样：因为一切的感觉—感知都是被如此影响的过程；所以，凡能够使某物成为现实之所是者均可使另一物如是，因为另一物早已潜在地如是。这就是为什么当触觉客体和我们一样地热和冷或一样地硬和软时，我们便不能感知；我们所感知的事物必须具有或高于或低于中性点的可感觉度。这表明，感觉本身是介于任何两种决定该感觉领域的相互对立性质之间的一个“平均值”。正因如此，感觉才具有了分辨其感觉领域中的感觉客体的能力。位于“中心”者适合辨别；相对于任何一个极端而言，它可以把自己置于另一端。这就像感知到白与黑的对象，首先，必须现实上既不是白，也不是黑，但潜在地则必须既是白，又是黑（并且所有其他一切感觉器官都是如此），所以触觉器官必然既非热，亦非冷。

Further, as in a sense sight had for its object both what was visible and what was invisible (and there was a parallel truth about all the other senses discussed), so touch has for its object both what is tangible and what is intangible. Here by 'intangible' is meant (a) what like air possesses some quality of tangible things in a very slight degree and (b) what possesses it in an excessive degree, as destructive things do.

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两者均属视觉客体（对于业已讨论过的所有其他感觉，其真实情况也都与此类似），与此相同，触觉的客体既包括可触摸物，也包括不可触摸物。这里“不可触摸物”指的是像空气一样只具有微弱可触摸性的事物以及具有超强可触摸性的事物，如具有破坏性事物那样。

We have now given an outline account of each of the several senses.

至此，我们已经对以上诸感觉中的每一种都分别给予以了简要论述。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The following results applying to any and every sense may now be formulated.

现在似乎可以系统地阐述以下适用于任何感觉的结论了。

(A) By a 'sense' is meant what has the power of receiving into itself the sensible forms of things without the matter. This must be conceived of as taking place in the way in which a piece of wax takes on the impress of a signet-ring without the iron or gold; we say that what produces the impression is a signet of bronze or gold, but its particular metallic constitution makes no difference: in a similar way the sense is affected by what is coloured or flavoured or sounding, but it is indifferent what in each case the substance is; what alone matters is what quality it has, i.e. in what ratio its constituents are combined.

（A）“感觉”是指无需事物的质料便有接受事物的可感知形式的能力。对此的理解必须是，感觉发生的方式如同一块蜡呈现图章戒指的印纹，这与其铁的或金的质料无关；我们说产生印纹的是一铜质或金质的图章，其特有的金属构造不起任何影响：以类似的方式，感觉可以被有色物或有味物抑或发声物所影响，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其实体是什么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性质是什么，即其组成部分相结合的比率是什么。

(B) By 'an organ of sense' is meant that in which ultimately such a power is seated.

（B）“感官”是指该能力最终所寄寓的躯体的部位。

The sense and its organ are the same in fact, but their essence is not the same. What perceives is, of course, a spatial magnitude, but we must not admit that either the having the power to perceive or the sense itself is a magnitude; what they are is a certain ratio or power in a magnitude. This enables us to explain why objects of sense which possess one of two opposite sensible qualities in a degree largely in excess of the other opposite destroy the organs of sense; if the movement set up by an object is too strong for the organ, the equipoise of contrary qualities in the organ, which just is its sensory power, is disturbed; it is precisely as concord and tone are destroyed by too violently twanging the strings of a lyre. This explains also why plants cannot perceive, in spite of their having a portion of soul in them and obviously being affected by tangible objects themselves; for undoubtedly their temperature can be lowered or raised. The explanation is that they have no mean of contrary qualities, and so no principle in them capable of taking on

the forms of sensible objects without their matter; in the case of plants the affection is an affection by form-and-matter together. The problem might be raised: Can what cannot smell be said to be affected by smells or what cannot see by colours, and so on? It might be said that a smell is just what can be smelt, and if it produces any effect it can only be so as to make something smell it, and it might be argued that what cannot smell cannot be affected by smells and further that what can smell can be affected by it only in so far as it has in it the power to smell (similarly with the proper objects of all the other senses). Indeed that this is so is made quite evident as follows. Light or darkness, sounds and smells leave bodies quite unaffected; what does affect bodies is not these but the bodies which are their vehicles, e.g. what splits the trunk of a tree is not the sound of the thunder but the air which accompanies thunder. Yes, but, it may be objected, bodies are affected by what is tangible and by flavours. If not, by what are things that are without soul affected, i.e. altered in quality? Must we not, then, admit that the objects of the other senses also may affect them? Is not the true account this, that all bodies are capable of being affected by smells and sounds, but that some on being acted upon, having no boundaries of their own, disintegrate, as in the instance of air, which does become odorous, showing that some effect is produced on it by what is odorous? But smelling is more than such an affection by what is odorous—what more? Is not the answer that, while the air owing to the momentary duration of the action upon it of what is odorous does itself become perceptible to the sense of smell, smelling is an observing of the result produced?

感觉及其器官实际上是相同的，但是其本质却是不同的。当然，感知事物者是一空间量，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认同具有感知能力或感觉本身是一个量；它们是量中的某一比率或潜能。这使我们能够解释，

为什么感觉客体拥有的两个相互对立的可感知性质，如果一方在某种程度上比另一方过于强烈时，感觉客体便会对感觉的器官造成破坏；如果某一客体所引起的运动对器官而言太过强烈的话，器官中对立性质的平衡便被打破了，该平衡恰恰就是其感觉能力；正如过于猛烈地弹拨七弦竖琴，其和谐与音质就会被破坏了一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植物不能感知，尽管在其体内寄寓着部分灵魂并且其自身明显地受可触摸客体影响；因为毫无疑问，它们的温度可以被降低或者被升高。对此的解释是，植物根本没有相互对立性质的平均点，因此其体内也没有能够无须借助可感知对象的质料，便接受感知对象形式的本原。就植物而言，它们所受到的影响是一种形式与质料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影响。人们可能质疑：可以说不能嗅闻者能够受气味所影响吗？或者可以说不具有视觉机能者能够被颜色所影响吗？而且其他诸如此类的感觉者都是这样吗？我们似乎可以说，气味就是可被嗅闻之物，如果它产生任何影响，它也只能是使某物嗅闻到它而已，而且似乎可以认为，凡不能嗅闻者均不能受气味影响，即使是可嗅闻者也只有当气味在其嗅觉能力之内时才能为气味所影响（对于所有其他感觉的相应客体而言，情况也都与此相似）。的确，下列事实完全可以证明情况就是如此。光亮与黑暗、声音与气味未对物体施加任何影响；真正对物体施加影响的不是这些，而是作为它们工具的物体，譬如劈开树干的不是雷声，而是与雷相伴随的空气。这是事实，可是，这也可能遭到反对，物体受可触摸物和味道影响。如若不然，影响没有灵魂之物的，即令其发生性质改变的，是什么？那么，我们一定不能认为其他感觉的客体也可能会影响它们吗？所有物体都能被气味和声音所影响，但是有一些物体，由于其自身没有界限，当被作用时容易消散，空气就是一例，由于受到了有气味物体的某些影响，它也变成有气味的了，这一说法是正确吗？但是有气味的物体所产生的影响除了引起嗅闻之外还有什么影响吗？由于受到有气味之物的短暂影响，空气本身确实变得可由嗅觉所感知，嗅是对已经产生的结果的感知，这不就是该问题的答案吗？

Book III

第三卷

Chapter 1

第一章

That there is no sixth sense in addition to the five enumerated—sight, hearing, smell, taste, touch—may be established by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除已列举的五种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之外再无第六感觉。这一观点或许可以通过以下论述得以证明：

If we have actually sensation of everything of which touch can give us sensation (for all the qualities of the tangible qua tangible are perceived by us through touch); and if absence of a sense necessarily involves absence of a sense-organ; and if (1) all objects that we perceive by immediate contact with them are perceptible by touch, which sense we actually possess, and (2) all objects that we perceive through media, i.e. without immediate contact, are perceptible by or through the simple elements, e.g. air and water (and this is so arranged that (a) if more than one kind of sensible object is perceivable through a single medium, the possessor of a sense-organ homogeneous with that medium has the power of perceiving both kinds of objects; for example, if the sense-organ is made of air, and air is a medium both for sound and for colour; and that (b) if more than one medium can transmit the same kind of

sensible objects, as e.g. water as well as air can transmit colour, both being transparent, then the possessor of either alone will be able to perceive the kind of objects transmissible through both); and if of the simple elements two only, air and water, go to form sense-organs (for the pupil is made of water, the organ of hearing is made of air, and the organ of smell of one or other of these two, while fire is found either in none or in all—warmth being an essential condition of all sensibility—and earth either in none or, if anywhere, specially mingled with the components of the organ of touch; wherefore it would remain that there can be no sense-organ formed of anything except water and air); and if these sense-organs are actually found in certain animals;—then all the possible senses are possessed by those animals that are not imperfect or mutilated (for even the mole is observed to have eyes beneath its skin); so that, if there is no fifth element and no property other than those which belong to the four elements of our world, no sense can be wanting to such animals.

如果我们确实具有凭借触觉感觉一切事物的感觉（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触觉感知可触知物的一切可触知的性质）；其次，如果某一感觉的缺失必然包括某一感官缺失；再次，如果我们通过直接接触感知的所有对象均可凭我们实际拥有的触觉所感知，而且我们通过介质感知的所有对象，即无须直接接触[而感知的客体]，均可以凭借或通过如空气和水一类的简单元素而感知到（并且这又分为如下两类：如果不止一种可感对象可通过一种单一介质而被感知，与介质类似的感官的拥有者有能力感知多种对象；例如，如果该感官是由空气构成，而空气既是声音的介质，又是颜色的介质；但是，如果有不止一种介质可传输同一种可感觉对象，例如，水和空气均能传输颜色，而且两者都是透明的，那么这两者的拥有者都将能感知这类可通过这两种介质传输的客体）；并且如果感官只是由空气和水这两种简单元素构成（因为瞳孔是由水构成的，听觉感官是由空气构成的，嗅觉感官是由这两

者之一构成的，然而火要么在全部之中，要么不在任何一种之中——热是一切感觉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且土要么不在任何一种之中，要么，如果存在的话，便专门与触觉感官的组成部分相联结；因此，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感官只能是由水和空气构成，除此以外，别无他物）；而且如果某些动物拥有这些感官；——则一切发育完全或无残缺的动物均有一切可能有的感觉（因为观察发现，甚至鼹鼠在其皮毛下也长有眼睛）；因此，如果不存在第五种元素，除了属于我们世界中的四种元素的那些属性外，别无其他属性，那么对这些动物而言也就无需任何其他感觉。

Further, there cannot be a special sense-organ for the common sensibles either, i.e. the objects which we perceive incidentally through this or that special sense, e.g. movement, rest, figure, magnitude, number, unity; for all these we perceive by movement, e.g. magnitude by movement, and therefore also figure (for figure is a species of magnitude), what is at rest by the absence of movement: number is perceived by the negation of continuity, and by the special sensibles; for each sense perceives one class of sensible objects. So that it is clearly impossible that there should be a special sense for any one of the common sensibles, e.g. movement; for, if that were so, our perception of it would be exactly parallel to our present perception of what is sweet by vision. That is so because we have a sense for each of the two qualities, in virtue of which when they happen to meet in one sensible object we are aware of both contemporaneously. If it were not like this our perception of the common qualities would always be incidental, i.e. as is the perception of Cleon's son, where we perceive him not as Cleon's son but as white, and the white thing which we really perceive happens to be Cleon's son.

此外，也不可能存在某种特殊的感官能感知诸多共同感觉对象，即我们通过这种或那种特殊的感觉偶然感知到的诸客体，譬如运动、静止、形状、广延、数和统一体；因为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凭借运动来感知的，例如凭借运动感知广延，并且也凭此感知形状（因为形状是一种广延），我们凭借运动的缺失感知静止之物：数则是通过否定连续性，通过特殊感觉对象被感知的；因为每一种感觉感知一类可感对象。所以，显然不可能存在某种特殊感觉能感知任意一种共同感觉对象，比如运动；因为，如果存在，那么我们对共同感觉对象的感知将完全类似于我们现在用视觉感知甜物。其原因还在于我们具有某一感觉，可以感知两种性质中的每一种性质，由于这一缘故，当两种性质恰巧共存于同一可感对象中时，我们便可同时感觉到两者。如若不然，我们对共同性质的感知必将总是偶然的，这就好比我们对克里昂之子的感知，这里我们并非感知到他是克里昂的儿子，而是感知到白色，只是我们实际感觉到的白色物体恰巧就是克里昂的儿子。

But in the case of the common sensibles there is already in us a general sensibility which enables us to perceive them directly; there is therefore no special sense required for their perception: if there were, our perception of them would have been exactly like what has been above described.

但是，就共同感觉对象而言，我们已具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能力，这种能力使我们能够直接感知这些共同感觉对象；因此根本不存在为了感知它们而必须有特殊感觉：假如有，那么我们对它们的感知也将与上述的感知完全相仿。

The senses perceive each other's special objects incidentally; not because the percipient sense is this or that special sense, but because all form a unity: this incidental perception takes place

whenever sense is directed at one and the same moment to two disparate qualities in one and the same object, e.g. to the bitterness and the yellowness of bile, the assertion of the identity of both cannot be the act of either of the senses; hence the illusion of sense, e.g. the belief that if a thing is yellow it is bile.

诸感觉能够偶然地相互感知其特殊客体；其原因不在于这感觉是这种或那种特殊感觉，而在于所有的特殊客体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只要在同一时刻感觉被指向同一客体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便会产生这种偶然的感觉，例如关于胆汁的苦味与黄色，无论是嗅觉还是视觉均不能肯定两者的同一性；所以会感觉错误，譬如人们会认为如果某物是黄色的，那么它就是胆汁。

It might be asked why we have more senses than one. Is it to prevent a failure to apprehend the common sensibles, e.g. movement, magnitude, and number, which go along with the special sensibles? Had we no sense but sight, and that sense no object but white, they would have tended to escape our notice and everything would have merged for us into an indistinguishable identity because of the concomitance of colour and magnitude. As it is, the fact that the common sensibles are given in the objects of more than one sense reveals their distinction from each and all of the special sensibles.

人们或许会提出质疑，为什么我们要有多种感觉，而不是只有一种？这是为了防止感知共同感觉对象，例如与特殊感觉对象如影随形的运动、广延和数时出现疏漏吗？假如我们只有视觉而没有任何其他感觉，并且该感觉只能感知白色对象，那么这些共同感觉对象将会逃脱我们的注意，而且所有的事物都将合为同一而使我们无法辨别，因

为颜色和广延是相伴共存的。实际上，共同感觉对象存在于被多种感觉感知的对象中，这一事实表明，共同感觉对象与每一种特殊感觉对象都不同。

Chapter 2

第二章

Since it is through sense that we are aware that we are seeing or hearing, it must be either by sight that we are aware of seeing, or by some sense other than sight. But the sense that gives us this new sensation must perceive both sight and its object, viz. colour: so that either (1) there will be two senses both percipient of the same sensible object, or the sense (2) must be percipient of itself. Further, even if the sense which perceives sight were different from sight, we must either fall into an infinite regress, or we must somewhere assume a sense which is aware of itself. If so, we ought to do this in the first case.

既然我们是凭借感觉才意识到我们正在看或正在听，那我们必然是凭借视觉或是视觉以外的某种感觉才意识到我们在看。但是带给我们这种新感觉的感觉一定既能感知视觉，又可感知视觉对象，即颜色：所以，或将有两种感觉均可感知同一可感对象，或该感觉一定能感知其自身。此外，假若感知视觉的感觉与视觉不同，那么我们必定或陷入一种无穷无尽的回归，或必须假设存在某种能够感知其自身的感觉。若是如此，在第一种情形下，我们应该这样做。

This presents a difficulty: if to perceive by sight is just to see, and what is seen is colour (or the coloured), then if we are to see

that which sees, that which sees originally must be coloured. It is clear therefore that 'to perceive by sight' has more than one meaning; for even when we are not seeing, it is by sight that we discriminate darkness from light, though not in the same way as we distinguish one colour from another. Further, in a sense even that which sees is coloured; for in each case the sense-organ is capable of receiving the sensible object without its matter. That is why even when the sensible objects are gone the sensings and imaginings continue to exist in the sense-organs.

这自然带来一个难题：如果凭视觉感知就是看见，且所见是颜色（抑或是着色物），那么如果我们意欲见到看者所见，则最初的所见一定是着了色的。因此，显而易见，“凭视觉感知”有不止一种含义；因为即使当我们不在看的时候，凭借视觉我们也能辨别黑暗和光明，尽管其方式与我们辨别不同颜色的方式不同。此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所见也是着了色的；因为在所有情况下感官都能接受可感对象，但却不包括其质料。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可感对象消失时，感觉和想象仍继续留存于感官中。

The activity of the sensible object and that of the percipient sense is one and the same activity, and ye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ir being remains. Take as illustration actual sound and actual hearing: a man may have hearing and yet not be hearing, and that which has a sound is not always sounding. But when that which can hear is actively hearing and which can sound is sounding, then the actual hearing and the actual sound are merged in one (these one might call respectively hearkening and sounding).

可感对象的活动与感觉的活动是同一的，但它们的存在依然并不

相同。试以现实的声音和现实的听为例来加以说明：一个人可能有听觉，但却没在听，而且能够发声的事物也不总是在发声。但是如果能够听的人正在倾听而且能够发声的事物正在发声，那么这一现实的听和现实的声音便被融合为一（我们可将其分别称为倾听和发声）。

If it is true that the movement, both the acting and the being acted upon, is to be found in that which is acted upon, both the sound and the hearing so far as it is actual must be found in that which has the faculty of hearing; for it is in the passive factor that the actuality of the active or motive factor is realized; that is why that which causes movement may be at rest. Now the actuality of that which can sound is just sound or sounding, and the actuality of that which can hear is hearing or hearkening; 'sound' and 'hearing' are both ambiguous. The same account applies to the other senses and their objects. For as the-acting-and-being-acted-upon is to be found in the passive, not in the active factor, so also the actuality of the sensible object and that of the sensitive subject are both realized in the latter. But while in some cases each aspect of the total actuality has a distinct name, e.g. sounding and hearkening, in some one or other is nameless, e.g. the actuality of sight is called seeing, but the actuality of colour has no name; the actuality of the faculty of taste is called tasting, but the actuality of flavour has no name. Since the actualities of the sensible object and of the sensitive faculty are one actuality in spit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modes of being, actual hearing and actual sounding appear and disappear from existence at one and the same moment, and so actual savour and actual tasting, &c., while as potentialities one of them may exist without the other. The earlier students of nature were mistaken in their view that without sight there was no white or black, without taste no savour. This statement of theirs is partly true, partly false: 'sense' and 'the sensible object' are ambiguous

terms, i.e. may denote either potentialities or actualities: the statement is true of the latter, false of the former. This ambiguity they wholly failed to notice.

运动，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均见诸被作用的事物。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声音和听觉，只要两者是现实的，就一定见诸具有听觉机能的事物；因为正是在被动因素中主动或原动因素的现实存在才得以实现；这就是为什么肇始运动的事物可处于静止状态。如此，能够发出声音的现实存在就是声音或发声，而能够听的现实存在就是听觉或倾听；“声音”和“听觉”都具有双重意义。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其他诸感觉及其客体。由于主动与被动均见诸被动因素，而非主动因素，所以感觉客体和感觉主体的现实存在均在后者中得以实现。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一总的现实存在的每个方面均有各自的名称，例如发声和倾听，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或此或彼却没有名称，例如视觉的现实存在被称为看，但颜色的现实存在却没有名称；味觉官能的现实存在被称为品尝，但味道的现实存在却没有名称。虽然其存在形式有别，感觉客体的现实存在和感觉能力的现实存在却同是一种现实存在。因此，现实的听和现实的发声便同时出现，同时消失，而且现实的滋味和现实的品尝等也是如此，但是，对于潜在存在而言，其一方却可在另一方不在的情况下依然存在。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们错误地认为，若无视觉，则不存在白或黑，若无味觉，则无滋味。他们的这一表述部分正确，部分错误：“感觉”和“感觉客体”是两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术语，即它们既可指潜在存在，也可指现实存在：他们的表述对于后者而言是正确的，但对于前者而言却是错误的。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双重性。

If voice always implies a concord, and if the voice and the hearing of it are in one sense one and the same, and if concord always implies a ratio, hearing as well as what is heard must be a ratio. That is why the excess of either the sharp or the flat destroys

the hearing. (So also in the case of savours excess destroys the sense of taste, and in the case of colours excessive brightness or darkness destroys the sight, and in the case of smell excess of strength whether in the direction of sweetness or bitterness is destructive.) This shows that the sense is a ratio.

如果嗓音总是蕴涵某种和谐，而且如果该嗓音与听到的该嗓音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的，而且如果和谐总是蕴涵某一比例，那么听和所听到的必定是某比例。这便是为什么声音过高或过低都有损听觉。（同样，对滋味而言，滋味过度也会损坏味觉，对于颜色而言，过亮或过暗也会损坏视觉，而对于气味而言，不论其是甜还是苦，过度刺激均对嗅觉有破坏作用。）这表明，感觉是一种比例。

That is also why the objects of sense are (1) pleasant when the sensible extremes such as acid or sweet or salt being pure and unmixed are brought into the proper ratio; then they are pleasant: and in general what is blended is more pleasant than the sharp or the flat alone; or, to touch, that which is capable of being either warmed or chilled: the sense and the ratio are identical: while (2) in excess the sensible extremes are painful or destructive.

因此当可感觉的极端物比如纯净的、无掺杂的酸、甜或咸被调至适度的比例时，感觉客体就会变得使人惬意，那么它们就是令人惬意的：一般来说，与单纯的高音或单纯的低音相比，高音和低音的混合音更和谐；或者，对于触觉来说，既可加热又可冷却的事物更令人愉悦：感觉和比例是同一的：但是超出限度的可感觉极端物却是令人痛苦的或是具有破坏性的。

Each sense then is relative to its particular group of sensible qualities: it is found in a sense-organ as such and discriminates the differences which exist within that group; e.g. sight discriminates white and black, taste sweet and bitter, and so in all cases. Since we also discriminate white from sweet, and indeed each sensible quality from every other, with what do we perceive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It must be by sense; for what is before us is sensible objects. (Hence it is also obvious that the flesh cannot be the ultimate sense-organ: if it were, the discriminating power could not do its work without immediate contact with the object.)

因此，每一种感觉都与其特定的一组可感性质相关联：它存在于相应感官之中并对存在于此组中各性质的差异进行分辨；譬如视觉辨别白色与黑色，味觉辨别甜与苦，而且所有感觉均如此。既然我们还能够分辨白色与甜，而且更确切地说，我们能够分辨每一种可感性质，那么我们凭借什么感知他们彼此相异？一定是凭借感觉，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可感觉客体。（因此还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肌肉不可能是终极感官：假如它是终极感官，若无与客体的直接接触，辨别力则不能从事其工作。）

Therefor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white and sweet cannot be effected by two agencies which remain separate; both the qualities discriminated must be present to something that is one and single. On any other supposition even if I perceived sweet and you perceived whi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would be apparent. What says that two things are different must be one; for sweet is different from white. Therefore what asserts this difference must be self-identical, and as what asserts, so also what thinks or perceives.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by means of two agencies which remain separate to discriminate two objects which are separate, is therefore

obvious; and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to do this in separate movements of time may be seen if we look at it as follows. For as what asser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ood and the bad is one and the same, so also the time at which it asserts the one to be different and the other to be different is not accidental to the assertion (as it is for instance when I now assert a difference but do not assert that there is now a difference); it asserts thus—both now and that the objects are different now; the objects therefore must be present at one and the same moment. Both the discriminating power and the time of its exercise must be one and undivided.

所以白色与甜的辨别不可能由两个相互分离的感觉来完成；被辨别的两种性质均必须蕴于同一单体事物中。在其他任何假设的情况下，即使我感知的是甜，你感知的是白色，两者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断言两事物不同者必须是一（一种感觉能力）；因为甜不同于白色。因此，断言该差异必定是具有同一性的，正如它断言一样，它思考或感觉也是这样。有鉴于此，通过两个分离的感觉辨别两个分离的客体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如果我们按如下的方式就可看出，在不同的时刻做这样的辨别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断言的善与恶之间的差异是同一的那样，其断言此不同和断言彼不同的时间对该断言来说也不是偶然的（例如就像我现在断言某一差异，但却不断言现在存在某一差异）；因此，它断言——不仅现在作出断言，而且客体也是现在不同；因此客体必须在同一时刻在场。辨别能力与辨别的时间均必须是同一和未分离的。

But, it may be objected, it is impossible that what is self-identical should be moved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with contrary movements in so far as it is undivided, and in an undivided moment of time. For if what is sweet be the quality perceived, it moves the sense or thought in this determinate way, while what is bitter

moves it in a contrary way, and what is white in a different way. Is it the case then that what discriminates, though both numerically one and indivisible, is at the same time divided in its being? In one sense, it is what is divided that perceives two separate objects at once, but in another sense it does so qua undivided; for it is divisible in its being but spatially and numerically undivided. Is not this impossible? For while it is true that what is self-identical and undivided may be both contraries at once potentially, it cannot be self-identical in its being—it must lose its unity by being put into activity. It is not possible to be at once white and black, and therefore it must also be impossible for a thing to be affected at one and the same moment by the forms of both, assuming it to be the case that sensation and thinking are properly so described.

但是，对此可提出异议，在一个不可分割的时刻，使具有同一性的单体事物同时向相反的方向运动，而又保持其单体不被分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假如甜的东西是被感知的味觉属性，那么它会触动相应的感觉或思想向这一限定的方向运动，但苦的东西则使其向一个相反的方向运动，而白色的东西则使其向一个不同方向运动。尽管辨别物在数目上为一且不可分离，而同时其在自身存在中却是可被分开的，情况真的如此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分开的能力同时在感知两个分离的客体，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是以完整的身份进行这种感知的；因为其在其存在中是可分的，但在空间和数目上是不可分的。难道这不是不可能的吗？自我同一和未被分割的单体可以同时潜在地兼含两个相反的性质。虽然这一点勿庸置疑，但就其存在而言，它却不能是自我同一的——一旦被置于活动中，它就必定丧失其统一性。同一事物不可能同时既为白色，又为黑色，所以，对某一事物而言，假设该事物是上述严格意义上的感觉和思维，它也绝不可能在同一时刻受白色和黑色两种形式的影响。

The answer is that just as what is called a 'point' is, as being at once one and two, properly said to be divisible, so here, that which discriminates is qua undivided one, and active in a single moment of time, while so far forth as it is divisible it twice over uses the same dot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So far forth then as it takes the limit as two, it discriminates two separate objects with what in a sense is divided: while so far as it takes it as one, it does so with what is one and occupies in its activity a single moment of time.

被称之为“点”的事物，因为其同时既可为一，又可为二，所以它被确认为是可分割的。这就是本章所讨论的难题的答案。在这里，正如被称作“点”事物一样，辨别能力作为不可分的单体，并且在某一瞬间处于活动状态，而当其作为可分物时，其在同一时间两次使用同一个点。所以，至于说它最多可分离成二，则是说它是凭借某一感觉中被分割的两个部分分辨两个分离的客体：而至于说它自成为一，则是指它进行如此分辨所借助的是某单一的分辨能力并且在其活动中只占用某一瞬间。

About the principle in virtue of which we say that animals are percipient, let this discussion suffice.

关于此原理，即我们阐释的动物借此而具有感觉的原理，以上讨论足矣，不再赘述。

Chapter 3

第三章

There are two distinctive peculiarities by reference to which we characterize the soul (1) local movement and (2) thinking, discriminating, and perceiving. Thinking both speculative and practical is regarded as akin to a form of perceiving; for in the one as well as the other the soul discriminates and is cognizant of something which is. Indeed the ancients go so far as to identify thinking and perceiving; e.g. Empedocles says 'For tis in respect of what is present that man's wit is increased', and again 'Whence it befalls them from time to time to think diverse thoughts', and Homer's phrase 'For suchlike is man's mind' means the same. They all look upon thinking as a bodily process like perceiving, and hold that like is known as well as perceived by like, as I explained at the beginning of our discussion. Yet they ought at the same time to have accounted for error also; for it is more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animal existence and the soul continues longer in the state of error than in that of truth. They cannot escape the dilemma: either (1) whatever seems is true (and there are some who accept this) or (2) error is contact with the unlike; for that is the opposite of the knowing of like by like.

有两种显著的特殊性质，我们可借以概括灵魂的特征——空间位移以及思维、辨别和感知。思辨性思维和实践性思维两者均被认为与某种感知方式相似；因为通过两者中的任意一个，灵魂辨别并认知某物是什么。实际上先哲们甚至认为思维与感知是同一的；例如恩培多克勒认为，“正是得益于现存的事物，人类的理智才不断增强”，而且他还认为，“人们会时不时地思考不同的想法，其根源就在于此”，此外，荷马的“人心皆如此，所识不相同”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正如在我们的讨论开始时我曾阐述的那样，他们都把思维看作是一个像感知一样的生理过程，并且认为物以类而被认识，物以类而被感知。但与此同时，他们还应该对失误也作出解释；因为失误与动物生存的联系更密切，而且灵魂处于失误状态的时间长于其处于真实状态的时

间。他们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这样一种两难推理：要么一切看似真的均为真（而且有些人接受这一点），要么失误与不同类的事物相关；因为这与物以类认[原则]相悖。

But it is a received principle that error as well as knowledge in respect to contraries is one and the same.

但是，对相反的事物而言，失误和知识是同一的，这是一条公认的原则。

That perceiving and practical thinking are not identical is therefore obvious; for the former is universal in the animal world, the latter is found in only a small division of it. Further, speculative thinking is also distinct from perceiving—I mean that in which we find rightness and wrongness—rightness in prudence, knowledge, true opinion, wrongness in their opposites; for perception of the special objects of sense is always free from error, and is found in all animals, while it is possible to think falsely as well as truly, and thought is found only where there is discourse of reason as well as sensibility. For imagination is different from either perceiving or discursive thinking, though it is not found without sensation, or judgement without it. That this activity is not the same kind of thinking as judgement is obvious. For imagining lies within our own power whenever we wish (e.g. we can call up a picture, as in the practice of mnemonics by the use of mental images), but in forming opinions we are not free: we cannot escape the alternative of falsehood or truth. Further, when we think something to be fearful or threatening, emotion is immediately produced, and so too with what is encouraging; but when we merely imagine we remain as

unaffected as persons who are looking at a painting of some dreadful or encouraging scene. Again within the field of judgement itself we find varieties—knowledge, opinion, prudence, and their opposite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I must speak elsewhere.

因此，感知与实践性思维不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前者在动物界中是普遍存在的，后者则只属于动物中的一小部分。此外，思辨性思维也与感知相异——我是指我们可从中找出正确与错误——正确存在于审慎、知识和真实意见中，错误存在于它们的对立面中；因为对于个别感觉客体的感知总是正确无误的，并且这种情况见于所有动物，然而正确地思维和错误地思维都可能存在，而且思想仅存在于那些具有推理能力和感觉能力的动物之中。因为想象既不同于感知，又不同于论证思维，尽管没有感觉就不存在想象，或者没有想象就不存在判断。这种活动与作为判断的思维活动是不同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有意愿，想象总是在我们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譬如，就像使用备忘录一样，凭借心理影像我们就能够回想起某一画面），但是，在形成意见的过程中我们却不能随心所欲：我们的意见注定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正确的。而且，当我们认为某一事物是可怕的或有威胁性时，马上便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当我们认为某一事物鼓舞人心时，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当我们仅仅只是想象时，我们就会像那些正在观看表现某一恐怖的或鼓舞人心的场景的绘画作品的观众一样，并不为之所动。此外，我们发现在判断领域自身中也有不同的种类——知识、意见、审慎，以及它们的对立面；关于这些种类之间的差异，我须在其他地方予以论述。

Thinking is different from perceiving and is held to be in part imagination, in part judgement: we must therefore first mark off the sphere of imagination and then speak of judgement. If then imagination is that in virtue of which an image arises for us, excluding metaphorical uses of the term, is it a single faculty or

disposition relative to images, in virtue of which we discriminate and are either in error or not? The faculties in virtue of which we do this are sense, opinion, science, intelligence.

思维有别于感知并被认为是由想象和判断两部分构成的：既然如此，我们必须首先划定想象的范围，然后再论述判断。而且，如果想象是凭借某种影像呈现在我们心中，[这里]不包括影像一词的比喻用法，那么想象是一种单一的能力还是与诸影像有关的某种性质？凭借它我们进行判断，结论或者正确或者错误。我们借以判断的诸能力是感觉、意见、知识和理智。

That imagination is not sense is clear from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Sense is either a faculty or an activity, e.g. sight or seeing: imagination takes place in the absence of both, as e.g. in dreams. Again, sense is always present, imagination not. If actual imagination and actual sensation were the same, imagination would be found in all the brutes: this is held not to be the case; e.g. it is not found in ants or bees or grubs. Again, sensations are always true, imaginations are for the most part false. Once more, even in ordinary speech, we do not, when sense functions precisely with regard to its object, say that we imagine it to be a man, but rather when there is some failure of accuracy in its exercise. And, as we were saying before, visions appear to us even when our eyes are shut. Neither is imagination any of the things that are never in error: e.g. knowledge or intelligence; for imagination may be false.

通过以下分析可以明确，想象不是感觉：首先感觉是一种能力，抑或是一种活动，譬如视觉或看：即使是在这两者都缺失的情况下，想象仍可发生，譬如在梦中。其次，感觉总是存在的，想象却不然。

假如现实的想象与现实的感觉是相同的，那么所有野生动物就都具有想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蚂蚁或蜜蜂抑或蛴螬都没有想象。再次，感觉总是真的，想象却大多数都是假的。再次，即使是在平常的说话中，当感觉确切地感觉到了其客体时，我们也不说我们想象它是一个人，而只有当感觉不够确切时，我们才会这样说。而且正如我们曾经所说的那样，即使是在我们闭上双眼时，想象也会出现。幻象也并非是那样永远正确无误的事物：例如知识或理智；因为想象可能为假。

It remains therefore to see if it is opinion, for opinion may be either true or false.

因此，现在有待讨论的是它是否为意见，因为意见既可为真，亦可为假。

But opinion involves belief (for without belief in what we opine we cannot have an opinion), and in the brutes though we often find imagination we never find belief. Further, every opinion is accompanied by belief, belief by conviction, and conviction by discourse of reason: while there are some of the brutes in which we find imagination, without discourse of reason. It is clear then that imagination cannot, again, be (1) opinion plus sensation, or (2) opinion mediated by sensation, or (3) a blend of opinion and sensation; this is impossible both for these reasons and because the content of the supposed opinion cannot b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sensation (I mean that imagination must be the blending of the perception of white with the opinion that it is white: it could scarcely be a blend of the opinion that it is good with the perception that it is white): to imagine is therefore (on this view)

identical with the thinking of exactly the same as what one in the strictest sense perceives. But what we imagine is sometimes false though our contemporaneous judgement about it is true; e.g. we imagine the sun to be a foot in diameter though we are convinced that it is larger than the inhabited part of the earth, and the following dilemma presents itself. Either (a) while the fact has not changed and the observer has neither forgotten nor lost belief in the true opinion which he had, that opinion has disappeared, or (b) if he retains it then his opinion is at once true and false. A true opinion, however, becomes false only when the fact alters without being noticed.

但是意见包含信念（因为如果我们的想法中没有信念，我们就不可能有意见），而且在野生动物中，虽然我们经常发现想象，但却从未发现有信念。此外，所有的意见都与信念相伴，信念与确信相伴，确信与推理相伴：尽管在一些野生动物中我们发现有想象，但未见有推理。因此，显而易见，想象不可能是意见加感觉，或是通过感觉起中介作用促成的意见，抑或是意见和感觉的混合物；这之所以是不可能的，究其根源，除了上述这些理由之外，还因为假定意见的内容不可能和与之相关的感觉的内容相异（我是指想象必须是对白色的感知与它是白色这一意见的混合：它不可能是这是善的这一意见与对白色的感知的混合）：因此，所谓进行想象（按此观点），亦即进行思维，但这完全等同于最严格意义上的其所感知的事物的思维。但是我们所想象的有时是虚假的，尽管我们同时对其作出的判断是真实的；譬如，我们想象太阳的直径是一英尺，尽管我们相信它比我们居住的地球更大；这样，自然就出现下面的两难抉择：或虽然事实没有改变并且观察者既没有忘记也没有放弃其所持真实意见中的信念，但该意见不复存在；或如果他坚持其信念，那么其意见则同时既为真又为假。然而，只有当事实发生改变，但却未引起注意时，真实的意见才会变为虚假的。

Imagination is therefore neither any one of the states enumerated, nor compounded out of them.

因此想象既非上述列举的任何一种状态，亦非它们的混合物。

But since when one thing has been set in motion another thing may be moved by it, and imagination is held to be a movement and to be impossible without sensation, i.e. to occur in beings that are percipient and to have for its content what can be perceived, and since movement may be produced by actual sensation and that movement is necessarily similar in character to the sensation itself, this movement must be (1) necessarily (a) incapable of existing apart from sensation, (b) incapable of existing except when we perceive, such that in virtue of its possession that in which it is found may present various phenomena both active and passive, and such that it may be either true or false.

但是，当一物被处于运动状态时，它可能使另一物运动。既然如此，想象也被视为一种运动而且不可能离开感觉，即想象存在于具有感知能力的生物中，并有可被感知物作为其内容；既然实际感觉可引起运动，且该运动必然在特征上与感觉本身相似，那么该运动定然不能脱离感觉而存在，也不能存在于我们进行感觉以外的时候；由于想象存在于感觉之中并受其控制，这种情况可能引发出各种各样的、既可是主动又可是被动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想象既可为真亦可为假。

The reason of the last characteristic is as follows. Perception (1) of the special objects of sense is never in error or admits the

least possible amount of falsehood. (2) That of the concomitance of the objects concomitant with the sensible qualities comes next: in this case certainly we may be deceived; for while the perception that there is white before us cannot be false, the perception that what is white is this or that may be false. (3) Third comes the perception of the universal attributes which accompany the concomitant objects to which the special sensibles attach (I mean e.g. of movement and magnitude); it is in respect of these that the greatest amount of sense-illusion is possible.

上述最后一个特征之所以成立的理由如下：首先是对特殊感觉客体的感知总是真实的，或仅有最小的偏差。其次是对感觉客体的伴随状态的感知，这些客体伴有可感觉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我们有可能被欺骗；因为虽然我们对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白色的感知不可能是错误的，但对该白色物体是此物或彼物的感知却可能是错误的。再次是对普遍属性的感知，普遍属性和与之相伴的客体同时存在，特殊的可感觉物附属于这些普遍属性（我意指，譬如运动和广延）；有可能正是在这些普遍属性方面错觉出现的次数最多。

The motion which is due to the activity of sense in these three modes of its exercise will differ from the activity of sense; (1) the first kind of derived motion is free from error while the sensation is present; (2) and (3) the others may be erroneous whether it is present or absent, especially when the object of perception is far off. If then imagination presents no other features than those enumerated and is what we have described, then imagination must be a movement resulting from an actual exercise of a power of sense.

由感觉活动的上述三种方式所肇始的想象运动与感觉活动相异；当感觉在场时，第一种衍生的运动总是正确无误的；但无论感觉是否在场，其他两种运动均可能是错误的，尤其是当感知客体在远处时。因此，除上述列举的那些特点之外，如果想象再无其他特点，并且它就是我们业已描述的那样，那么想象必定是一种由感觉能力的现实活动而肇始的运动。

As sight is the most highly developed sense, the name Phantasia (imagination) has been formed from Phaos (light) because it is not possible to see without light.

既然视觉是最为高度发达的感觉，Phantasia（想象）这一名词是由Phaos（光）演化形成的，因为没有光，视觉便看不到任何事物。

And because imaginations remain in the organs of sense and resemble sensations, animals in their actions are largely guided by them, some (i.e. the brutes) because of the non-existence in them of mind, others (i.e. men) because of the temporary eclipse in them of mind by feeling or disease or sleep.

而且因为想象寓于感官之中并且与感觉相似，所以动物多数都是凭借想象行动，有些动物（譬如野生动物）由于其没有心智，只能依靠想象，另有一些动物（譬如人）受感情或疾病抑或睡眠的影响，其心智会暂时消失，这时它们也要凭借想象行动。

About imaginati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exists, let so much suffice.

关于想象，它是什么以及它为何存在，我们就讨论到此。

Chapter 4

第四章

Turning now to the part of the soul with which the soul knows and thinks (whether this is separable from the others in definition only, or spatially as well) we have to inquire (1) what differentiates this part, and (2) how thinking can take place.

现在讨论灵魂中用以认识和思维的这一部分，（无论这一部分是仅在定义上与其他部分相分离，抑或在空间上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探讨是什么使该部分与其他部分相异，以及思维是如何发生的。

If thinking is like perceiving, it must be either a process in which the soul is acted upon by what is capable of being thought, or a process different from but analogous to that. The thinking part of the soul must therefore be, while impassible, capable of receiving the form of an object; that is, must be potentially identical in character with its object without being the object. Mind must be related to what is thinkable, as sense is to what is sensible.

如若思维与感知相仿，它一定或者是某种承受思想对象作用于灵魂的过程，或者是一与此相异但又类似的过程。因此，灵魂中的思维部分一定能够接受客体的形式，同时又是不为所动的；即它一定潜在地在特性上与其客体同一，但却不必是该客体。心智必定也与可思维

物相关，正如感觉与可感觉物相关一样。

Therefore, since everything is a possible object of thought, mind in order, as Anaxagoras says, to dominate, that is, to know, must be pure from all admixture; for the co-presence of what is alien to its nature is a hindrance and a block: it follows that it too, like the sensitive part, can have no nature of its own, other than that of having a certain capacity. Thus that in the soul which is called mind (by mind I mean that whereby the soul thinks and judges) is, before it thinks, not actually any real thing. For this reason it cannot reasonably be regarded as blended with the body: if so, it would acquire some quality, e.g. warmth or cold, or even have an organ like the sensitive faculty: as it is, it has none. It was a good idea to call the soul 'the place of forms', though (1) this description holds only of the intellective soul, and (2) even this is the forms only potentially, not actually.

因此，既然任何事物都是思维的潜在的对象，诚如阿那克萨哥拉所说，为了支配控制，即为了认识（一切事物），心智必须纯净，远离一切混杂物；因为外来异质杂物的共存对其是一种妨碍和障碍：其结果是，像感觉部分一样，心智也就只有某种接受能力，而不能具有自己的本性。因此灵魂中被称为心智的部分（我所说的心智是指灵魂借以思维和判断的部分），在其进行思维之前，不是实际存在的真实事物。正因为如此，将其视为与躯体混合的观点是有悖于理的：倘若如此，它必将具有某种性质，譬如热或冷，甚至抑或像感觉机能一样，具有某种感官：但实际上，它没有感官。称灵魂为“形式的居所”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只适用于智力灵魂，而且即便如此，也仅限于潜在形式，而非现实形式。

Observation of the sense-organs and their employment reveal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impassibility of the sensitive and that of the intellective faculty. After strong stimulation of a sense we are less able to exercise it than before, as e.g. in the case of a loud sound we cannot hear easily immediately after, or in the case of a bright colour or a powerful odour we cannot see or smell, but in the case of mind thought about an object that is highly intelligible renders it more and not less able afterwards to think objects that are less intelligible: the reason is that while the faculty of sensation is dependent upon the body, mind is separable from it.

观察感官及其运用，我们发现，感觉能力的麻痹与思维能力的麻痹之间存在着差异。在某一感官受到强烈刺激之后，我们就不能像此前一样使用该感官，譬如，在遇有巨大声响的情况时，我们就不能轻而易举地马上在此后听到声音，或在看到强烈颜色或闻到强烈刺激性气味的情况时，我们就不能在此后马上看到东西或嗅到气味，但是当心智思维某一高度概念化的客体之后，它思维概念化程度较低的客体的能力会更强，而不是减弱：其原因在于感觉能力依赖于躯体，而心智却是与躯体分离的。

Once the mind has become each set of its possible objects, as a man of science has, when this phrase is used of one who is actually a man of science (this happens when he is now able to exercise the power on his own initiative), its condition is still one of potentiality, but in a different sense from the potentiality which preceded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by learning or discovery: the mind too is then able to think itself.

一旦心智已经成为其潜在的客体，犹如一位饱学之士，当该词语

被用以指称一位现实存在的饱学之士时（当他此时能够自主地操控其思维能力时，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其状态仍然是一种潜在状态，但与通过学习或研究获得知识前的那种潜能相比较，它是一种不同意义上的潜能：这样，心智也就能思考其自身。

Since we can distinguish between a spatial magnitude and what it is to be such, and between water and what it is to be water, and so in many other cases (though not in all; for in certain cases the thing and its form are identical), flesh and what it is to be flesh are discriminated either by different faculties, or by the same faculty in two different states: for flesh necessarily involves matter and is like what is snub-nosed, a this in a this. Now it is by means of the sensitive faculty that we discriminate the hot and the cold, i.e. the factors which combined in a certain ratio constitute flesh: the essential character of flesh is apprehended by something different either wholly separate from the sensitive faculty or related to it as a bent line to the same line when it has been straightened out.

既然我们可以区分广延和广延的本质，区分水和水的本质，而且许多其他情况均可作此区分（尽管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事物与其形式是同一的），肌肉与肌肉的本质就可以或者根据不同的机能，或者根据同一机能的不同状态加以辨别：因为肌肉必然包含质料，而且诚如塌鼻，系特殊质料中的特殊形式。既然我们正是凭借感觉机能来区分热与冷，即按一定的比率组成肌肉的诸元素：肌肉的本质特性可通过一种不同的机能来理解，这种不同的机能要么是与感觉机能完全分离的，要么是与之相关联的，就好像一条曲线与被拉直了的同一条线的关系一样。

Again in the case of abstract objects what is straight is

analogous to what is snub-nosed; for it necessarily implies a continuum as its matter: its constitutive essence is different, if we may distinguish between straightness and what is straight: let us take it to be two-ness. It must be apprehended, therefore, by a different power or by the same power in a different state. To sum up, in so far as the realities it knows are capable of being separated from their matter, so it is also with the powers of mind.

另外，对抽象的客体而言，何为直与何为塌鼻类似；因为它必然隐含着一个作为其质料的连续体：其构成的本质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可以区分直的性质与何为直：我们权且将直的性质视为二元性。因此，必须通过一种不同的能力，或通过同一种能力的不同状态才能理解它。概而言之，既然它所认识的实体能与其质料相分离，那么心智的诸能力亦可如此。

The problem might be suggested: if thinking is a passive affection, then if mind is simple and impassible and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anything else, as Anaxagoras says, how can it come to think at all? For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factors is held to require a precedent community of nature between the factors. Again it might be asked, is mind a possible object of thought to itself? For if mind is thinkable per se and what is thinkable is in kind one and the same, then either (a) mind will belong to everything, or (b) mind will contain some element common to it with all other realities which makes them all thinkable.

如阿那克萨哥拉所言，思维是一种消极影响，而心智是简单的、不为外物所动的，并且与其他任何事物均无共同之处，果真如此的话，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心智究竟是怎样思维的？因为两个

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依赖于两者间预先存在的本质共同体。此外，人们也许还要问，心智自身是不是思维的对象呢？因为如果心智自身是思维对象，思维对象则属于一个完全相同的种类，那么，心智要么归属于一切事物，要么则包含有某些和其他所有实体相同的元素，正是共同的元素使它们成为可思维物。

Have not we already disposed of the difficulty about interaction involving a common element, when we said that mind is in a sense potentially whatever is thinkable, though actually it is nothing until it has thought? What it thinks must be in it just as characters may be said to be on a writing tablet on which as yet nothing actually stands written: this is exactly what happens with mind.

当我们说心智在某种意义上是潜在的可思维物，然而在其思维前却实际什么都不是，我们还是没有破解关于心智与思维客体包含某一共同因素的互动这一难题吗？心智所思考的必定蕴涵于心智之中，这好比我们可以说字将出现在写字板上，尽管目前写字板上实际空无一字：心智也恰恰是这样。

Mind is itself thinkable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as its objects are. For (a) in the case of objects which involve no matter, what thinks and what is thought are identical; for speculative knowledge and its object are identical. (Why mind is not always thinking we must consider later.) (b) In the case of those which contain matter each of the objects of thought is only potentially present. It follows that while they will not have mind in them (for mind is a potentiality of them only in so far as they are capable of being disengaged from matter) mind may yet be thinkable.

思考心智自身的方式正如思考心智客体的方式一样。因为在心智客体不包含质料的情况下，思维主体和思维客体是同一的；理性知识与其客体是同一的。（为什么心智不是一直不停地在思维？这一问题我们须留待以后讨论。）在包含质料的情况下，每一个思维客体只是潜在地存在。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它们没有心智（因为心智是一种潜在性，而且只存在于当它们有能力摆脱质料的情况下），心智仍可成为可思维对象。

Chapter 5

第五章

Since in every class of things, as in nature as a whole, we find two factors involved, (1) a matter which is potentially all the particulars included in the class, (2) a cause which is productive in the sense that it makes them all (the latter standing to the former, as e.g. an art to its material), these distinct elements must likewise be found within the soul.

既然在每一类事物中，如同在作为整体的自然中一样，我们发现两个相关因素：质料，它潜在地就是包括在该种类中的所有的个别事物；成因，它造就了一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因是具有生产性的（后者与前者的关系，就如同艺术品与其材料之间的关系）。有鉴于此，这两种不同的因素也必然同样地存在于灵魂之中。

And in fact mind as we have described it is what it is by virtue of becoming all things, while there is another which is what it is by virtue of making all things: this is a sort of positive state like light;

for in a sense light makes potential colours into actual colours.

实际上，心智就像我们已经描述的那样，一方面其之所以是其所是，是凭借其可以成为万物，而另一方面其所是为哪一是，则凭借其可以创造万物：这是一种类似于光的积极状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光可使潜在的颜色变成现实的颜色。

Mind in this sense of it is separable, impassible, unmixed, since it is in its essential nature activity (for always the active is superior to the passive factor, the originating force to the matter which it forms).

此种意义上的心智是可分离的、不为所动的和非混合的，因为它处于其本质活动中（因为主动因素总是优于被动因素，动因总是优于其形成的质料）。

Actual knowledge is identical with its object: in the individual, potential knowledge is in time prior to actual knowledge, but in the universe as a whole it is not prior even in time. Mind is not at one time knowing and at another not. When mind is set free from its present conditions it appears as just what it is and nothing more: this alone is immortal and eternal (we do not, however, remember its former activity because, while mind in this sense is impassible, mind as passive is destructible), and without it nothing thinks.

现实知识与其客体同一：就个别事物而言，潜在知识在时间上先于现实知识，但对于作为整体的宇宙而言，即便是在时间上，它也并

不在先。心智不是有时认知，有时不认知。当心智被从其目前的状况中分离出来时，它才现出其真正的所是，而别无其他：只有这样的心智才是永不消亡的和永恒的（可是，我们没有记住其前期活动，因为，尽管这种意义上的心智是不为所动的，但作为被动的心智是可消亡的），没有这种心智，万物都不能思考。

Chapter 6

第六章

The thinking then of the simple objects of thought is found in those cases where falsehood is impossible: where the alternative of true or false applies, there we always find a putting together of objects of thought in a quasi-unity. As Empedocles said that 'where heads of many a creature sprouted without necks' they afterwards by Love's power were combined, so here too objects of thought which were given separate are combined, e.g. 'incommensurate' and 'diagonal': if the combination be of objects past or future the combination of thought includes in its content the date. For falsehood always involves a synthesis; for even if you assert that what is white is not white you have included not white in a synthesis. It is possible also to call all these cases division as well as combination. However that may be, there is not only the true or false assertion that Cleon is white but also the true or false assertion that he was or will be white. In each and every case that which unifies is mind.

因此，对思维的简单对象的思考发生在这样的事物中，对于这样的事物不可能存在着虚假，我们总是在将多个思想混合为准统一体的事物中，才存在着真实和虚假。诚如恩培多克勒所言，“许多生物于

无脖颈处生出头来”，而后，又由“爱”的力量将其连接在一起，这里，原本分离的思维的诸客体也是这样被联合到一起，例如“无法度量的”和“对角线”：假如该联合是过去或未来客体的联合，那么该思维的联合应在其内容中包括时间。因为虚假性总是涉及合成；倘若你把白的事物说成是不白的事物，你就已经把非白包括在合成中了。除可将其称为联合之外，我们亦可以把所有这些都称之为切分。无论将其称作什么，都不仅存在克里昂现在是白的这一或真或假的断言，而且还存在他过去或将来是白的这一或真或假的断言。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组成联合体的都是心智。

Since the word 'simple' has two senses, i.e. may mean either (a) 'not capable of being divided' or (b) 'not actually divided', there is nothing to prevent mind from knowing what is undivided, e.g. when it apprehends a length (which is actually undivided) and that in an undivided time; for the time is divided or undivid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line. It is not possible, then, to tell what part of the line it was apprehending in each half of the time: the object has no actual parts until it has been divided: if in thought you think each half separately, then by the same act you divide the time also, the half-lines becoming as it were new wholes of length. But if you think it as a whole consisting of these two possible parts, then also you think it in a time which corresponds to both parts together. (But what is not quantitatively but qualitatively simple is thought in a simple time and by a simple act of the soul.)

由于“单一”一词具有双重含义，即（它）可指“（潜在地）不能被分开的”，也可指“实际上未分开的”。例如，当心智领会一个（实际上未被切分的）长度，而该长度又处于一段未被分割的时间中时，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心智认知不可分割的事物；因为和线一样，时间也是可切分的或不可切分的。因此，不可能分辨出心智在时间的一半中正在

感知哪部分线：客体在被切分之前，没有现实存在的部分：如果在思维中你分别思考每一半，那么你也就同样切分了时间，被两分的半线也可以说就变成了两个新的完整的长度单体。但是如果你将其当作一个由这两个潜在部分组成的整体来思考，那么你也就是在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由两部分时间组成的时间之中来思考。（但是，如果客体性质单一而数量不单一，心智则凭借灵魂的单一行为在单一的时间中思考它。）

But that which mind thinks and the time in which it thinks are in this case divisible only incidentally and not as such. For in them too there is something indivisible (though, it may be, not isolable) which gives unity to the time and the whole of length; and this is found equally in every continuum whether temporal or spatial.

然而，心智思考的客体和思考所处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偶然地可分，但就其本身而论却并非如此。因为这些可切分的事物中也蕴涵着某些不可分的因素（尽管其可能并非孤立的），正是此赋予时间以整体，赋予长度以完整；这在任意时间连续体或空间连续体中都可同样被发现。

Points and similar instances of things that divide, themselves being indivisible, are realized in consciousness in the same manner as privations.

点和相似的可切分但本身处于未切分状态之物，在意识中都是以和缺失同样的方式被认知的。

A similar account may be given of all other cases, e.g. how evil or black is cognized; they are cognized, in a sense, by means of their contraries. That which cognizes must have an element of potentiality in its being, and one of the contraries must be in it. But if there is anything that has no contrary, then it knows itself and is actually and possesses independent existence.

对于其他所有情况均可作类似的解释，譬如，怎样认知恶或黑；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通过它们的对立物而被认知的。认知机能自身中必定存在着一个潜在的要素和其相反要素之一。然而，如果存在没有对立物的事物，那么它就自我认识，而且现实地存在，并拥有独立的存在。

Assertion is the saying of something concerning something, e.g. affirmation, and is in every case either true or false: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with mind: the thinking of the definition in the sense of the constitutive essence is never in error nor is it the assertion of something concerning something, but, just as while the seeing of the special object of sight can never be in error, the belief that the white object seen is a man may be mistaken, so too in the case of objects which are without matter.

断言是明确与某物相关的某物，例如肯定，而且是在任一情况下要么为真，要么为假；对于心智而言情况却不尽然：心智所思维的关于是其所是的定义永远是正确无误的，它所思维的也不是某物与某物相关的断言。诚如，尽管所看到的视觉的特殊客体决不会出错，而认为所见到的白色客体是人则可能是错误的，当客体系无质料客体时，情况也是如此。

Chapter 7

第七章

Actual knowledge is identical with its object: potential knowledge in the individual is in time prior to actual knowledge but in the universe it has no priority even in time; for all things that come into being arise from what actually is. In the case of sense clearly the sensitive faculty already was potentially what the object makes it to be actually; the faculty is not affected or altered. This must therefore be a different kind from movement; for movement is, as we saw, an activity of what is imperfect, activity in the unqualified sense, i.e. that of what has been perfected, is different from movement.

现实知识与其客体是同一的：就个别事物而言，潜在知识在时间上先于现实知识，但总体而论，它在时间上并不在先；因为一切成为存在的事物均源自现实的存在。就感觉而言，显然，感觉对象使已经潜在的感觉能力变成现实的感觉能力；这种机能没有被影响或被改变。因此，这必定是另一种不同于一般的运动；因为运动，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不完善的事物的活动，绝对意义上的活动，换言之，完善物的活动不同于运动。

To perceive then is like bare asserting or knowing; but when the object is pleasant or painful, the soul makes a quasi-affirmation or negation, and pursues or avoids the object. To feel pleasure or pain is to act with the sensitive mean towards what is good or bad as such. Both avoidance and appetite when actual are identical with this: the faculty of appetite and avoidance are not different, either from one another or from the faculty of sense-perception; but their

being is different.

既然如此，感觉就像单纯的肯定或认知一样；但是当感觉客体令人愉悦或令人痛苦时，灵魂便会作出相应的似肯定或否定的反应，并追求或回避该客体。感到愉悦或痛苦本身就是凭借感觉介质为了追求善或恶而采取的行动。当它们现实存在时，回避与欲望两者均与此同一：欲望能力与回避能力并无差异，它们彼此之间无差异，它们与感观知觉机能也无差异，但它们的本质却是不同的。

To the thinking soul images serve as if they were contents of perception (and when it asserts or denies them to be good or bad it avoids or pursues them). That is why the soul never thinks without an image. The process is like that in which the air modifies the pupil in this or that way and the pupil transmits the modification to some third thing (and similarly in hearing), while the ultimate point of arrival is one, a single mean, with different manners of being.

对思维灵魂而言，影像所起的作用就好比它们是感知的内容（而且一旦思维灵魂肯定或否定它们为善或恶时，它就回避或追求之）。这便是离开了影像，灵魂就根本无法思考的原因。这一过程就像是空气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改变瞳孔，而瞳孔又将这种改变传送给别的事物（听觉过程也大抵如此），但是感觉最终的汇聚点是单一的介质，具有多种不同的存在方式。

With what part of itself the soul discriminates sweet from hot I have explained before and must now describe again as follows: That with which it does so is a sort of unity, but in the way just mentioned, i.e. as a connecting term. And the two faculties it

connects, being one by analogy and numerically, are each to each as the qualities discerned are to one another (for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whether we raise the problem of discrimination between disparates or between contraries, e.g. white and black?). Let then C be to D as A is to B: it follows alternando that C: A:: D: B. If then C and D belong to one subject, the case will be the same with them as with A and B; A and B form a single identity with different modes of being; so too will the former pair. The same reasoning holds if A be sweet and B white.

灵魂凭借其自身的哪一部分分辨甜与热，此前已阐释，现在必须重新表述如下：灵魂作此分辨所凭借的部分是某种单体，但这是在刚刚提及的意义上的，即作为联结项的单体。它所联结的两种能力，当其在类比和数上均为一时，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像其已被识别的诸多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样（我们提出的分辨不同类事物这一问题与我们提出的分辨对立事物这一问题，譬如白与黑，会有什么差别呢？）。那么，假设C比D等于A比B：则可得交换比例式C：A::D：B。如果C与D属于同一个主体，那么C与D的关系与A与B的关系相同；A与B形成具有不同存在方式的同一体，C与D亦然。如果设A为甜而B为白，同样的推论也成立。

The faculty of thinking then thinks the forms in the images, and as in the former case what is to be pursued or avoided is marked out for it, so where there is no sensation and it is engaged upon the images it is moved to pursuit or avoidance. E.g. perceiving by sense that the beacon is fire, it recognizes in virtue of the general faculty of sense that it signifies an enemy, because it sees it moving; but sometimes by means of the images or thoughts which are within the soul, just as if it were seeing, it calculates and deliberates what is to come by reference to what is present; and when it makes a

pronouncement, as in the case of sensation it pronounces the object to be pleasant or painful, in this case it avoids or pursues and so generally in cases of action.

所以，思维能力所思维的是影像中的形式，就像上述情况一样，什么是应被追求或回避的都为其选定，这样，在没有感觉而它又专注于处理影像的情况下，它则被动地进行追求或回避的活动。例如，感觉到了烽火是火，由于见其在移动，凭借一般的感觉能力它确认这意味着有敌人；但是，有些时候凭借灵魂内部的影像或思想，仿佛灵魂正在观看一样，实际却是它依据当前的情况，谋算筹划未来将发生的事情；而且一旦作出决定，如同感觉一样，它断定该客体是令人愉悦的或是令人痛苦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回避或追求，思维能力采取行动的情况，一般来说就是这样。

That too which involves no action, i.e. that which is true or false, is in the same province with what is good or bad: yet they differ in this, that the one set imply and the other do not a reference to a particular person.

无行动的事物，譬如真或假，与善或恶属于同一范畴：然而它们却在以下这点上相异，一组涉及某一特殊的人而另一组却不涉及。

The so-called abstract objects the mind thinks just as, if one had thought of the snubnosed not as snub-nosed but as hollow, one would have thought of an actuality without the flesh in which it is embodied: it is thus that the mind when it is thinking the objects of Mathematics thinks as separate elements which do not exist separate. In every case the mind which is actively thinking is the

objects which it thinks. Whether it is possible for it while not existing separate from spatial conditions to think anything that is separate, or not, we must consider later.

假如某人认为“塌鼻者”不是“鼻子塌陷的”，而是“空的”，那么所谓心智思维的抽象对象就好似某人思考去除了使其具体化的肌肉的现实存在：正是用这种方式当其思考数学对象时，心智将它们视为分离的元素，它们其实并不能分离存在。一般说来，正在积极思维的心智就是其所思维的客体。它是否可能在不脱离空间条件下思考独立于空间条件之物，这一点我们必须留待以后讨论。

Chapter 8

第八章

Let us now summarize our results about soul, and repeat that the soul is in a way all existing things; for existing things are either sensible or thinkable, and knowledge is in a way what is knowable, and sensation is: in a way what is sensible: in what way we must inquire.

现在我们来概括一下我们有关灵魂讨论的结果，并再次申明，从某种意义上说灵魂是一切存在物；因为存在物要么是可感知的，要么是可被思考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是可认知的事物，感觉也是可感觉的事物：而从何种意义说则是我们必须探究的。

Knowledge and sensation are divided to correspond with the realities, potential knowledge and sensation answering to

potentialities, actual knowledge and sensation to actualities. Within the soul the faculties of knowledge and sensation are potentially these objects, the one what is knowable, the other what is sensible. They must be either the things themselves or their forms. The former alternative is of course impossible: it is not the stone which is present in the soul but its form.

我们对知识和感觉进行划分以使其符合现实，潜在知识和感觉对应潜在物，现实知识和感觉对应现实物。在灵魂中，知识能力和感觉能力就是这些潜在的对象，一种是可认知物，另一种是可感知物。它们必定要么是事物本身，要么是事物的形式。前者当然是不可能的：出现在灵魂中的不会是石块，只能是其形式。

It follows that the soul is analogous to the hand; for as the hand is a tool of tools, so the mind is the form of forms and sense the form of sensible things.

据此可以推断，灵魂与手相似；因为诚如手是一种使用工具的工具一样，所以灵魂是一种运用形式的形式，感觉是可感知物的形式。

Since according to common agreement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and separate in existence from sensible spatial magnitudes, the objects of thought are in the sensible forms, viz. both the abstract objects and all the states and affections of sensible things. Hence (1) no one can learn or understand anything in the absence of sense, and when the mind is actively aware of anything it is necessarily aware of it along with an image; for images are like sensuous contents except in that they contain no matter.

根据人们的共识，没有什么能脱离可感知的空间广延而分离存在。既然如此，思想的诸客体就存在于可感知的形式之中，即抽象客体以及可感知物的所有状态和属性。因此，人若无感觉就不可能学习或理解任何事物，而且当心智积极地认识任一事物时，也必然伴有影像；因为影像与感觉的内容均相似，除了其不含质料以外。

Imagination is different from assertion and denial; for what is true or false involves a synthesis of concepts. In what will the primary concepts differ from images? Must we not say that neither these nor even our other concepts are images, though they necessarily involve them?

想象与肯定和否定相异；因为何为真何为假包含概念的综合。基本概念与影像有何不同？即使基本概念必然包括影像，我们一定不能说这些概念，甚至我们的其他概念均不是影像吗？

Chapter 9

第九章

The soul of animals is characterized by two faculties, (a) the faculty of discrimination which is the work of thought and sense, and (b) the faculty of originating local movement. Sense and mind we have now sufficiently examined. Let us next consider what it is in the soul which originates movement. Is it a single part of the soul separate either spatially or in definition? Or is it the soul as a whole? If it is a part, is that part different from those usually distinguished or already mentioned by us, or is it one of them? The

problem at once presents itself, in what sense we are to speak of parts of the soul, or how many we should distinguish. For in a sense there is an infinity of parts: it is not enough to distinguish, with some thinkers, the calculative, the passionate, and the desiderative, or with others the rational and the irrational; for if we take the dividing lines followed by these thinkers we shall find parts far more distinctly separated from one another than these, namely those we have just mentioned: (1) the nutritive, which belongs both to plants and to all animals, and (2) the sensitive, which cannot easily be classed as either irrational or rational; further (3) the imaginative, which is, in its being, different from all, while it is very hard to say with which of the others it is the same or not the same, supposing we determine to posit separate parts in the soul; and lastly (4) the appetitive, which would seem to be distinct both in definition and in power from all hitherto enumerated.

动物的灵魂以下列两种能力为特征：判断能力，负责思想和感觉以及引起空间运动的能力。我们已经对感觉和心智作了充分的说明。下面我们讨论在灵魂中引起运动的是什么。它是在空间或定义上与灵魂分离的一部分吗？抑或它就是整个灵魂？如果它是一个部分，那么该部分是与我们通常区分的或已经论及的部分不同，或者它就是这些部分的其中之一呢？这里马上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在何种意义上谈论灵魂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我们应该区分出多少部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灵魂的组成部分是无限的，像一些思想家们将灵魂的组成部分划分为推测、情感和渴望，或者像另一些将其划分为理性和非理性部分；都是不够的；如果我们采用这些思想家们的分类标准，我们就会发现另一些组成部分，较之我们刚刚提及到的那些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明显相互背离：比如，营养能力，该部分既属于植物又属于所有动物；再者，感觉能力，我们很难将其划归为非理性或理性的部分；此外，想象能力在本质上与其他所有部分均不相同，如果我们一定要假设灵魂中有相互分离的不同部分，那么我们就很难说它

与哪些其他部分是相同的，与哪些部分是不同的；最后欲望能力，不论是在定义上还是在能力上该部分与以上列举的部分似乎均明显不同。

It is absurd to break up the last-mentioned faculty: as these thinkers do, for wish is found in the calculative part and desire and passion in the irrational; and if the soul is tripartite appetite will be found in all three parts. Turning our attention to the present object of discussion, let us ask what that is which originates local movement of the animal.

像这些思想家们那样，把上述最后一种能力分离出来是荒谬的，因为意愿存在于推测部分之中，欲望和情感存在于非理性部分之中；如果灵魂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那么在这三个部分中都可找到欲望。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现在的论题，探讨是什么引起动物进行空间运动。

The movement of growth and decay, being found in all living things, must be attributed to the faculty of reproduction and nutrition, which is common to all: inspiration and expiration, sleep and waking, we must consider later: these too present much difficulty; at present we must consider local movement, asking what it is that originates forward movement in the animal.

见于一切生物的生长与衰亡运动必定归因于生殖和营养能力，这种运动是所有生物所共有的：吸气与呼气、睡眠与清醒，我们留待后面讨论，这些也都是令人困惑的难点；现在我们必须探讨空间运动，追问引起动物作前行运动的是什么。

That it is not the nutritive faculty is obvious; for this kind of movement is always for an end and is accompanied either by imagination or by appetite; for no animal moves except by compulsion unless it has an impulse towards or away from an object. Further, if it were the nutritive faculty, even plants would have been capable of originating such movement and would have possessed the organs necessary to carry it out. Similarly it cannot be the sensitive faculty either; for there are many animals which have sensibility but remain fast and immovable throughout their lives.

显而易见，它不是营养能力；因为这种运动总是为着某种目的，并且或与想象或与欲望相伴；因为动物除非被强迫，如果不受冲动驱使而接近或回避某物，它们就不运动。另外，假如它是营养能力，那么甚至连植物都能够引起这样的运动，而且具有实现运动必需的器官。同样，它也不可能是感觉能力；因为很多有感觉的动物却是静止的，终生不运动。

If then nature never makes anything without a purpose and never leaves out what is necessary (except in the case of mutilated or imperfect growths; and that here we have neither mutilation nor imperfection may be argued from the facts that such animals (a) can reproduce their species and (b) rise to completeness of nature and decay to an end), it follows that, had they been capable of originating forward movement, they would have possessed the organs necessary for that purpose. Further, neither can the calculative faculty or what is called 'mind' be the cause of such movement; for mind as speculative never thinks what is practicable, it never says anything about an object to be avoided or pursued, while this movement is always in something which is avoiding or pursuing an object. No, not even when it is aware of such an object

does it at once enjoin pursuit or avoidance of it; e.g. the mind often thinks of something terrifying or pleasant without enjoining the emotion of fear. It is the heart that is moved (or in the case of a pleasant object some other part). Further, even when the mind does command and thought bids us pursue or avoid something, sometimes no movement is produced; we act in accordance with desire, as in the case of moral weakness. And, generally, we observe that the possessor of medical knowledge is not necessarily healing, which shows that something else is required to produce a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knowledge; the knowledge alone is not the cause. Lastly, appetite too is incompetent to account fully for movement; for those who successfully resist temptation have appetite and desire and yet follow mind and refuse to enact that for which they have appetite.

既然如此，如果自然绝不会无目的地创造任何事物，也绝不会遗漏必备之物（那些残缺的或发育不全的动物除外；这里我们讨论的是既无残缺不全，也无发育不全[的动物]，这一点可用以下事实论证：这样的动物能繁衍同种后代，能达到生命的鼎盛并走向衰亡），那么由此可见，假如它们能够引起前行运动，它们就一定拥有实现此目的所必需的器官。另外，这种运动的原因也不可能是推测能力，或者说是被称为“心智”的东西；因为，作为思辨能力，心智从不思维任何实际的事情，它从不确定说什么应该回避，什么应该追求，而这种运动却总是存在于回避或追求某物的东西之中。的确，即使心智意识到这样的东西，它也不直接下命令去追求或回避；譬如心智经常考虑令人害怕或令人喜悦的事物，但却并不强求要有恐惧感。令人害怕的事物触动的是心脏（或者说在遇到令人愉悦的事物的情况下，被触动的是某一其他部分）。而且有些时候，即便是在心智确实命令并且思想也的确吩咐我们追求或回避某物时，也没有运动产生；我们的行为受欲望驱使，在道德观念薄弱的情况下便是如此。此外，通常我们观察发现，有医疗知识的人并不一定总是在进行治疗，这表明需要有另外某

种东西方可根据知识产生行动；仅有知识并不构成动因。最后，欲望也不能完全解释运动的成因；因为对于那些能够抵制诱惑的人，虽然他们也有欲望和渴求，但是他们却能服从心智，拒不为其欲望而行动。

Chapter 10

第十章

These two at all events appear to be sources of movement: appetite and mind (if one may venture to regard imagination as a kind of thinking; for many men follow their imaginations contrary to knowledge, and in all animals other than man there is no thinking or calculation but only imagination).

在所有行为中，欲望和心智这两者似乎是引起运动的原因（如果可以大胆地把想象当作某种思维；因为许多人通常听凭与知识相反的想象行事，在除人类以外的所有其他动物中，既不存在思维，也不存在推测，只有想象）。

Both of these then are capable of originating local movement, mind and appetite: (1) mind, that is, which calculates means to an end, i.e. mind practical (it differs from mind speculative in the character of its end); while (2) appetite is in every form of it relative to an end: for that which is the object of appetite is the stimulant of mind practical; and that which is last in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action. It follows that there is a justification for regarding these two as the sources of movement, i.e. appetite and practical thought; for the object of appetite starts a

movement and as a result of that thought gives rise to movement, the object of appetite being it a source of stimulation. So too when imagination originates movement, it necessarily involves appetite.

心智和欲望，这两者均能引起位置运动：心智，即实践心智，它能推测实现目的的方式（实践心智的目的特性与思辨心智相异）；相比之下，每一种形式的欲望都与目的相关：因为欲望的客体恰恰是实践心智的刺激物；而且思维过程的终端又正是行为的起点。据此有理由认为，欲望和实用心智，这两者是运动的源泉；因为欲望的客体引起运动而且致使思想产生运动，所以欲望客体是引起刺激的根源。当想象也这样引起运动时，它也必然包含欲望。

That which moves therefore is a single faculty and the faculty of appetite; for if there had been two sources of movement—mind and appetite—they would have produced movement in virtue of some common character. As it is, mind is never found producing movement without appetite (for wish is a form of appetite; and when movement is produced according to calculation it is also according to wish), but appetite can originate movement contrary to calculation, for desire is a form of appetite. Now mind is always right, but appetite and imagination may be either right or wrong. That is why, though in any case it is the object of appetite which originates movement, this object may be either the real or the apparent good. To produce movement the object must be more than this: it must be good that can be brought into being by action; and only what can be otherwise than as it is can thus be brought into being. That then such a power in the soul as has been described, i.e. that called appetite, originates movement is clear. Those who distinguish parts in the soul, if they distinguish and divide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ces of power, find themselves with a very

large number of parts, a nutritive, a sensitive, an intellective, a deliberative, and now an appetitive part; for these are more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than the faculties of desire and passion.

因而，始动者是某种单一的能力和欲望的能力；因为如果有两种动因——心智和欲望——那么它们就会凭借某一共同特性引起运动。实际上，人们从未见过心智能离开欲望而单独引起运动（因为意愿是欲望的一种形式；当产生的运动与推测相符时，它也与意愿相符），然而欲望却能够引起与推测相反的运动，因为渴求是欲望的一种形式。心智永远是正确的，然而欲望与想象却可对可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欲望客体既可能真的是善，也可能只是看似善，虽然无论如何是欲望客体引起运动。为了引起运动，欲望客体必定不仅限于此：只有[真正]好的客体才可能通过行为被变成现实；而且只有那种能够变得不再是其本身的[客体]才能被变成现实。于是，显然易见，运动是由灵魂中被称为欲望的能力引起的。那些区分灵魂中各部分的人，如果他们依据能力的不同进行区别和划分，那么他们就会区分出许多部分，营养能力、感觉能力、思维能力、审议能力，还有欲望能力；因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比渴求机能与情感能力之间的差异更大。

Since appetites run counter to one another, which happens when a principle of reason and a desire are contrary and is possible only in beings with a sense of time (for while mind bids us hold back because of what is future, desire is influenced by what is just at hand: a pleasant object which is just at hand presents itself as both pleasant and good, without condition in either case, because of want of foresight into what is farther away in time), it follows that while that which originates movement must be specifically one, viz. the faculty of appetite as such (or rather farthest back of all the object of that faculty; for it is it that itself remaining unmoved originates the movement by being apprehended in thought or

imagination), the things that originate movement are numerically many.

当理性原则与渴求完全相反时，各种欲望之间便相互对立，这可能仅发生在有时间感的存在物中（心智为了未来而要求我们抑制渴求，渴求仅被当前事物影响：由于缺乏对客体在久远后的情形的预见，当前某个愉快的对象便呈现为快乐和善），因此，虽然引起运动必然是特定的一种欲望，即作为欲望机能的欲望（或者进一步追溯到该机能的所有对象；因为它自身保持不动，却通过在思想或想象中被感知而引起运动），但是引起运动的东西在数量上却是多个。

All movement involves three factors, (1) that which originates the movement, (2) that by means of which it originates it, and (3) that which is moved. The expression 'that which originates the movement' is ambiguous: it may mean either (a) something which itself is unmoved or (b) that which at once moves and is moved. Here that which moves without itself being moved is the realizable good, that which at once moves and is moved is the faculty of appetite (for that which is influenced by appetite so far as it is actually so influenced is set in movement, and appetite in the sense of actual appetite is a kind of movement), while that which is in motion is the animal. The instrument which appetite employs to produce movement is no longer psychical but bodily: hence the examination of it falls within the province of the functions common to body and soul. To state the matter summarily at present, that which is the instrument in the production of movement is to be found where a beginning and an end coincide as e.g. in a ball and socket joint; for there the convex and the concave sides are respectively an end and a beginning (that is why while the one remains at rest, the other is moved): they are separate in definition

but not separable spatially. For everything is moved by pushing and pulling. Hence just as in the case of a wheel, so here there must be a point which remains at rest, and from that point the movement must originate.

所有的运动均包含三个因素：引起运动的事物、引起运动所凭借的方式，以及被运动的事物。“引起运动的事物”这一表述具有双重意义：它既可指自身不动的某物，也可指既可立刻运动又能被运动的某物。在这一点上，无需被运动而自发运动者是可实现的善，既可立刻运动，又被运动者是欲望的机能（受欲望影响者，只要其实际被影响便处于运动之中，当欲望是指现实欲望时，欲望本身就是一种运动），而处在运动之中的是动物。欲望引起运动所凭借的工具已不是精神的范围而是躯体的范围：因此对其研究属于躯体和灵魂的共同功能的范围。现在概而言之，产生运动所凭借的工具可在起点和终点的重合处找到，就好像在球窝关节里的情形一样；因为在那里凸面和凹面分别是运动的终点和起点（那就是为什么当一方处于静止时，后者就运动）：它们的定义截然不同，但在空间位置上却不可分离。因为一切事物都是经由推和拉而被运动。所以，就像车轮一样，其中必定有一点处于静态，而且正是从该点产生运动。

To sum up, then, and repeat what I have said, inasmuch as an animal is capable of appetite it is capable of self-movement; it is not capable of appetite without possessing imagination; and all imagination is either (1) calculative or (2) sensitive. In the latter all animals, and not only man, partake.

总之，因为动物有欲望能力，它就能够自我运动；如果它没有想象，也就没有欲望能力；而且所有想象均或为推测，或为感觉。人和所有动物都拥有感觉。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We must consider also in the case of imperfect animals, sc. those which have no sense but touch, what it is that in them originates movement. Can they have imagination or not? Or desire? Clearly they have feelings of pleasure and pain, and if they have these they must have desire. But how can they have imagination? Must not we say that, as their movements are indefinite, they have imagination and desire, but indefinitely?

现在，我们还必须考虑，对于那些发育不完善的动物，即那些只有触觉而没有其他感觉的动物，引起它们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它们是否具有想象力？抑或有渴求？显然它们有喜悦和痛苦的感觉，如果它们有这些感觉，它们就一定有欲望。可是它们怎么会有想象呢？由于其运动是不确定的，即便它们不一定会有想象和欲望，我们也一定不能说吗？

Sensitive imagination, as we have said, is found in all animals, deliberative imagination only in those that are calculative: for whether this or that shall be enacted is already a task requiring calculation; and there must be a single standard to measure by, for that is pursued which is greater. It follows that what acts in this way must be able to make a unity out of several images.

如前所述，感觉想象是所有动物共有的，审议想象只属于能推测的动物：因为决定应该做这或是做那已经是一项需要推测的任务；而

且还必须有单一的标准用以衡量，因为追求的是更好的那个。由此可见，以这样的方式行事的动物都必须具有能将多个影像合而为一的能力。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magination is held not to involve opinion, in that it does not involve opinion based on inference, though opinion involves imagination. Hence appetite contains no deliberative element. Sometimes it overpowers wish and sets it in movement: at times wish acts thus upon appetite, like one sphere imparting its movement to another, or appetite acts thus upon appetite, i.e. in the condition of moral weakness (though by nature the higher faculty is always more authoritative and gives rise to movement). Thus three modes of movement are possible.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认为想象不包含意见，因为它不包含基于推理的意见，尽管意见包含想象。因此，欲望不含任何审议成分。有时它战胜意愿并使其运动，有时意愿也同样作用于欲望，就好像一个球推动另一个球，或者一种欲望也同样地作用于另一种欲望，即在道德观念不强的情况下（尽管依据自然法则，较高级的能力总是更具支配力并引起运动）。所以有三种运动方式是可能的。

The faculty of knowing is never moved but remains at rest. Since the one premiss or judgement is universal and the other deals with the particular (for the first tells us that such and such a kind of man should do such and such a kind of act, and the second that this is an act of the kind meant, and I a person of the type intended), it is the latter opinion that really originates movement, not the universal; or rather it is both, but the one does so while it remains in a state more like rest, while the other partakes in movement.

认识能力根本无法被运动而是处于静止状态。由于一个前提或判断是普遍性的，而另一个则是讨论特殊个体（前者向我们阐明的是如此这般的一种人应该如此这般地行事，而后者则是这就是那种有意采取的行为，我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真正引起运动的是后一种意见，而非普遍性意见；更确切地说是两者共同引起运动，只不过前者引起运动但却保持一种更接近静止的状态，而后者更多地参与运动。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The nutritive soul then must be possessed by everything that is alive, and every such thing is endowed with soul from its birth to its death. For what has been born must grow, reach maturity, and decay—all of which are impossible without nutrition. Therefore the nutritive faculty must be found in everything that grows and decays.

另外，每一个有生命的生物都必然具有营养灵魂，每一个这样的生物从生到死都赋有灵魂。因为业已诞生的生物必然要生长，发育成熟，继而衰亡——没有营养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个经历生长与衰亡的生物都必然具有营养机能。

But sensation need not be found in all things that live. For it is impossible for touch to belong either (1) to those whose body is uncompounded or (2) to those which are incapable of taking in the forms without their matter.

然而，不是所有的生物需要有感觉。因为触觉不可能属于躯体结构简单的生物，或离开其质料就无法接受形式的生物。

But animals must be endowed with sensation, since Nature does nothing in vain. For all things that exist by Nature are means to an end, or will be concomitants of means to an end. Every body capable of forward movement would, if unendowed with sensation, perish and fail to reach its end, which is the aim of Nature; for how could it obtain nutriment? Stationary living things, it is true, have as their nutriment that from which they have arisen; but it is not possible that a body which is not stationary but produced by generation should have a soul and a discerning mind without also having sensation. (Nor yet even if it were not produced by generation. Why should it not have sensation? Because it were better so either for the body or for the soul? But clearly it would not be better for either: the absence of sensation will not enable the one to think better or the other to exist better). Therefore no body which is not stationary has soul without sensation.

既然自然不做徒劳无益的事，那么动物就一定都具有天赋的感觉。因为自然化育的万物都有达到其生存目的的方法，或者是为此目的而伴生的附属性状。每一个能够作前进运动的躯体，若无天赋的感觉，都会夭亡，而无法抵达自然赋予它的目的；因为若无感觉，它怎么摄取营养呢？诚然，静止不动的生物从其生长处摄取食物；但是，非静止的通过生殖而诞生的躯体应有一个灵魂和一个有识别力的心智，但却没有感觉，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它不是通过生殖而诞生的，这也不可能。它怎么会没有感觉呢？是因为这样要么对躯体有益，要么对灵魂有益吗？但是显然这对两者都是无益的：感觉缺失，灵魂就不能更好地思维，躯体也不能更好地存在）。所以，没有感觉、非静止的躯体不可能有灵魂。

But if a body has sensation, it must be either simple or compound. And simple it cannot be; for then it could not have touch, which is indispensable. This is clear from what follows. An animal is a body with soul in it: every body is tangible, i.e. perceptible by touch; hence necessarily, if an animal is to survive, its body must have tactual sensation. All the other senses, e.g. smell, sight, hearing, apprehend through media; but where there is immediate contact the animal, if it has no sensation, will be unable to avoid some things and take others, and so will find it impossible to survive. That is why taste also is a sort of touch; it is relative to nutriment, which is just tangible body; whereas sound, colour, and odour are innutritious, and further neither grow nor decay. Hence it is that taste also must be a sort of touch, because it is the sense for what is tangible and nutritious.

另外，如果躯体有感觉，那么它必定是简单或复合的。但它不可能是简单的；否则就不可能有触觉，而触觉又是不可或缺的。通过以下论述这一观点可显清晰明了。动物是有灵魂的躯体：每一躯体都是可触知的，即可通过触觉感知；如果动物要存活下去，其躯体就必然要具有触觉机能。所有其他感觉，如嗅觉、视觉和听觉，都是通过介质来感知；如果动物没有感觉，当发生直接接触时，它就将无法避开某些东西或无法抓到另一些东西，因此它也就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味觉也是一种触觉；味觉与营养物相关，营养物正是可触摸的物体；而声音、颜色和气味都与营养无关，进而也与动物的生长和衰亡无关。既然味觉是对那些可触知的有营养的事物的感觉，那么它必定也是某种触觉。

Both these senses, then, are indispensable to the animal, and it is clear that without touch it is impossible for an animal to be. All

the other senses subserve well-being and for that very reason belong not to any and every kind of animal, but only to some, e.g. those capable of forward movement must have them; for, if they are to survive, they must perceive not only by immediate contact but also at a distance from the object. This will be possible if they can perceive through a medium, the medium being affected and moved by the perceptible object, and the animal by the medium. Just as that which produces local movement causes a change extending to a certain point, and that which gave an impulse causes another to produce a new impulse so that the movement traverses a medium—the first mover impelling without being impelled, the last moved being impelled without impelling, while the medium (or media, for there are many) is both—so is it also in the case of alteration, except that the agent produces it without the patient's changing its place. Thus if an object is dipped into wax, the movement goes on until submersion has taken place, and in stone it goes no distance at all, while in water the disturbance goes far beyond the object dipped: in air the disturbance is propagated farthest of all, the air acting and being acted upon, so long as it maintains an unbroken unity. That is why in the case of reflection it is better, instead of saying that the sight issues from the eye and is reflected, to say that the air, so long as it remains one, is affected by the shape and colour. On a smooth surface the air possesses unity; hence it is that it in turn sets the sight in motion, just as if the impression on the wax were transmitted as far as the wax extends.

因此，这两种感觉对于动物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显然，没有触觉，动物便不存在。所有其他感觉都是有助于动物生存得好，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些感觉并非为任何种类的动物所共有，而只为某些动物所有，例如，那些能够前行的动物必须具有这些感觉；原因在于，如果这些动物要生存，它们就必须不仅能通过直接接触去感知，

而且必须在隔着一定距离时也能感知。如果动物能通过某一介质感知，这是有可能的，介质受到可感知对象的作用与推动，继而动物又受到介质的作用与推动。这就好像产生位置移动的事物引起延伸至某一点上的变化，产生推力的事物又引起另一事物产生新的推力，因此通过介质便产生了运动——原动者推动他物而无需被推动，最后一个被推动者不再推动他物，而介质（抑或许多介质，因为存在多个介质）则可推动他物又可被他物推动——形态的变换也是如此，只不过原动力引起运动，而无需受动者改变位置。因此，如果将一物体浸入蜡液中，运动就会一直持续到完全浸没为止；如果将其置于石头中，则根本没有运动，而一旦将其置于水中，它所引起的扰动就会波及很远；如果将其抛于空气之中，只要空气保持其为连续的统一体，随着空气连续地作用与被作用，它所引起的扰动就会传播开来，直至最远。这正是为什么关于光的反射，与其说视线从眼睛中发出并被反射，不如说只要空气保持为统一体，便会受可见物的形状和颜色的影响。在一个光滑表面上空气保持其统一体；因此，就像蜡上的印记随着蜡的延伸而被延伸一样，空气就会依次使视觉运动。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It is clear that the body of an animal cannot be simple, i.e. consist of one element such as fire or air. For without touch it is impossible to have any other sense; for every body that has soul in it must, as we have said, be capable of touch. All the other elements with the exception of earth can constitute organs of sense, but all of them bring about perception only through something else, viz. through the media. Touch takes place by direct contact with its objects, whence also its name. All the other organs of sense, no doubt, perceive by contact, only the contact is mediate: touch alone perceives by immediate contact. Consequently no animal body can

consist of these other elements.

显然，动物的躯体不可能简单，即只由诸如火或气一种元素组成。因为没有触觉就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感觉；如前所述，因为每一个有灵魂的躯体都一定具有触觉能力。除土元素以外的其他所有元素均可构成感觉器官，但是它们都只有通过其他事物，即通过一定的介质，方能引起感觉。与其对象直接接触便产生触觉，触觉这一名称也源于此。毫无疑问，所有其他感觉器官也是通过接触来感知，但只是通过间接的接触：惟有触觉通过直接接触来感知。由此可见，动物的躯体不能只由这些其他元素中的单一元素构成。

Nor can it consist solely of earth. For touch is as it were a mean between all tangible qualities, and its organ is capable of receiving not only all the specific qualities which characterize earth, but also the hot and the cold and all other tangible qualities whatsoever. That is why we have no sensation by means of bones, hair, &c., because they consist of earth. So too plants, because they consist of earth, have no sensation. Without touch there can be no other sense, and the organ of touch cannot consist of earth or of any other single element.

它也不能只由土构成。因为在所有可触知的性质中，触觉可谓是处于中间状态，其器官不仅能够接受那些代表土的所有的特殊性质，而且还能够接受热和冷以及所有其他可触知的性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骨骼、毛发等去感知，因为它们是由土构成的。植物也是如此，因为它们是由土构成的，所以没有感觉能力。没有触觉便没有其他感觉，而且触觉器官不可能由土构成，也不可能由任何其他一种单独元素构成。

It is evident, therefore, that the loss of this one sense alone must bring about the death of an animal. For as on the one hand nothing which is not an animal can have this sense, so on the other it is the only one which is indispensably necessary to what is an animal. This explains, further, the followin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ther senses and touch. In the case of all the others excess of intensity in the qualities which they apprehend, i.e. excess of intensity in colour, sound, and smell, destroys not the but only the organs of the sense (except incidentally, as when the sound is accompanied by an impact or shock, or where through the objects of sight or of smell certain other things are set in motion, which destroy by contact); flavour also destroys only in so far as it is at the same time tangible. But excess of intensity in tangible qualities, e.g. heat, cold, or hardness, destroys the animal itself. As in the case of every sensible quality excess destroys the organ, so here what is tangible destroys touch, which is the essential mark of life; for it has been shown that without touch it is impossible for an animal to be. That is why excess in intensity of tangible qualities destroys not merely the organ, but the animal itself, because this is the only sense which it must have.

因此，这种感觉一旦丧失必然导致动物的死亡，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从一方面来说除动物之外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能有这种感觉，所以，反之，它是使动物成其为动物的唯一的、不可或缺的感觉。此外，这还可解释其他感觉与触觉之间的以下差别。对所有其他感觉而言，如果其感知的性质的强度过度，例如颜色、声音和气味的强度过度，只能毁坏相应的感觉器官却不会导致动物死亡（但偶有例外，如当过高的声音与撞击或剧烈震动伴随发生时，或者是视觉客体或嗅觉客体导致某些其他物体处于运动状态时，动物则会因接触毁灭）；当滋味同时是可触摸的时候也会由于触摸而毁灭。但是，诸如热、冷或硬等可触知的性质的强度过度就会致使动物本身死亡。正如

每一种感觉性质过度都会毁坏相应的器官一样，可触摸物同样毁坏触觉器官，触觉器官是生命的基本标志；因为前已阐明，如果没有触觉，动物就不复存在。这就是可触摸强度过度不仅毁坏相应器官，而且毁灭动物本身的原因，因为触觉是动物唯一不可或缺的感觉。

All the other senses are necessary to animals, as we have said, not for their being, but for their well-being. Such, e.g. is sight, which, since it lives in air or water, or generally in what is pellucid, it must have in order to see, and taste because of what is pleasant or painful to it, in order that it may perceive these qualities in its nutriment and so may desire to be set in motion, and hearing that it may have communication made to it, and a tongue that it may communicate with its fellows.

如前所述，对于动物而言，所有其他的感觉都是必要的，但却不是为其生存，而是为其生存得好。譬如，动物必须有视觉以便观看，因为动物生活在空气或水中，或通常生活在透明状态里；动物必须有味觉，为了感觉其食物中甜和苦的这些性质，并且引起运动的欲望；动物必须有听觉，以便能够听到发给它的信息，而且动物还必须有舌，以便用于与同伴交流。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人类理解研究

David Hume

大卫·休谟［英］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人类理解研究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大卫·休谟（英） 著

金学勤 译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Section I　Of the Different Species of Philosophy 第一章　论哲学的不同类别
- Section II　Of the Origin of Ideas 第二章　论观念的起源
- Section III　Of the Association of Ideas 第三章　论观念的联系
- Section IV　Sceptical doubts concerning the operations of the understanding 第四章　对理解活动的怀疑
- Section V　Sceptical Solution of the Doubts 第五章　针对这些疑虑的怀疑主义解决方案
- Section VI　Of Probability 第六章　论可然性
- Section VII　Of the Idea of Necessary Connexion 第七章　论必然联系的观念
- Section VIII　Of Liberty and Necessity 第八章　论自由与必然
- Section IX　Of the Reason of Animals 第九章　论动物的理性
- Section X　Of Miracles 第十章　论奇迹
- Section XI　Of a Particular Providence and of a Future State 第十一章　论天意和来世
- Section XII　Of the Academical or Sceptical Philosophy 第十二章　论怀疑哲学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Section I　Of the Different Species of Philosophy

第一章　论哲学的不同类别

Moral philosophy, or the science of human nature, may be treated after two different manners; each of which has its peculiar merit, and may contribute to the entertainment, instruction, and reformation of mankind. The one considers man chiefly as born for action; and as influenced in his measures by taste and sentiment; pursuing one object, and avoiding another, according to the value which these objects seem to possess, and according to the light in which they present themselves. As virtue, of all objects, is allowed to be the most valuable, this species of philosophers paint her in the most amiable colours; borrowing all helps from poetry and eloquence, and treating their subject in an easy and obvious manner, and such as is best fitted to please the imagination, and engage the affections. They select the most striking observations and instances from common life; place opposite characters in a proper contrast; and alluring us into the paths of virtue by the views of glory and happiness, direct our steps in these paths by the soundest precepts and most illustrious examples. They make us fee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vice and virtue; they excite and regulate our sentiments; and so they can but bend our hearts to the love of probity and true honour, they think, that they have fully attained the end of all their labours.

道德哲学，或曰人性科学，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二者各有所长，均有助于人类的娱乐、教育和改革。一种方法认为，人主要为行动而生，在品位和情趣的影响之下，根据事物表现出的不同价值，以

及事物的展现方式，有选择地追求和规避。既然一切事物中，唯德最为宝贵，此类哲学家便将德描绘得美妙无比，充分利用诗歌和雄辩，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解释德，以便充分发挥人们的想象，激发其情感共鸣。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挑选给人最深刻印象的现象和事例，将相反的品格加以适当的对照，用壮丽和幸福的景象诱导我们步入德行之途，再以最无懈可击的箴言和最好的例证指引我们前行的步履。他们让我们感知善恶之别，激发并管制我们的情感。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把人心引向对诚信和至善的热爱，他们就完全达到了自己千辛万苦所追求的目标。

The other species of philosophers consider man in the light of a reasonable rather than an active being, and endeavour to form his understanding more than cultivate his manners. They regard human nature as a subject of speculation; and with a narrow scrutiny examine it, in order to find those principles, which regulate our understanding, excite our sentiments, and make us approve or blame any particular object, action, or behaviour. They think it a reproach to all literature, that philosophy should not yet have fixed, beyond controversy, the foundation of morals, reasoning, and criticism; and should for ever talk of truth and falsehood, vice and virtue, beauty and deformity, without being able to determine the source of these distinctions. While they attempt this arduous task, they are deterred by no difficulties; but proceeding from particular instances to general principles, they still push on their enquiries to principles more general, and rest not satisfied till they arrive at those original principles, by which, in every science, all human curiosity must be bounded. Though their speculations seem abstract, and even unintelligible to common readers, they aim at the approbation of the learned and the wise; and think themselves sufficiently compensated for the labour of their whole lives, if they can discover some hidden truths,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instruction of posterity.

另一类哲学家把人视作理性而非行动的生灵，他们致力于培养人的悟性，而非规范其举止。他们把人性作为思辨的对象，对其进行仔细考察，以期发现有什么原则在塑造我们的理解，激发我们的情感，让我们对某一事物、行动、行为或褒或贬。他们认为，令古今一切文献蒙羞的是，哲学竟然迄今尚未无可争议地确立道德、理性和批评的根基；竟然还在无休止地讨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却无法确定这些不同之处的本源是什么。他们力图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不惧怕任何困难；他们从具体事例出发，设法推导出普遍原理，再进一步探求，以找出更普遍的原理，孜孜以求，直到得出那些初始原则。在每一门学科里，这些原则限定了人类本着好奇心探求的边界。这些哲学家的思辨似乎很抽象，普通人甚至理解不了，其目标是得到博学和智慧之士的赞同。他们认为，倘若能发现什么隐秘的真理，有助于教育子孙后代，那么他们毕生的努力就如愿以偿了。

It is certain that the easy and obvious philosophy will always, with the generality of mankind, have the preference above the accurate and abstruse; and by many will be recommended, not only as more agreeable, but more useful than the other. It enters more into common life; moulds the heart and affections; and, by touching those principles which actuate men, reforms their conduct, and brings them nearer to that model of perfection which it describes. On the contrary, the abstruse philosophy, being founded on a turn of mind, which cannot enter into business and action, vanishes when the philosopher leaves the shade, and comes into open day; nor can its principles easily retain any influence over our conduct and behaviour. The feelings of our heart, the agitation of our passions, the vehemence of our affections, dissipate all its conclusions, and reduce the profound philosopher to a mere

plebeian.

显然，对于大众而言，明白易懂的哲理总是比精确深奥的哲理更受欢迎；而且在许多人看来，前者不仅更招人喜欢，而且比后者更实用可行。它更贴近日常生活，更能够塑造人的心灵与情感。它通过触及促使人行动的原则，改进人的行为举止，将人引领到它所描绘的完美境界。反之，那些玄奥的哲理，由于它们视作基础的思维方式不适用于日常事务与行动，因此一旦哲学家们走出阴影，进入光天化日之下，它们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原则也很难对我们的言行举止产生任何影响。在世人的真切感受、澎湃欲念、激烈情感面前，这种哲学的一切结论都会烟消云散，思想深奥的哲人也就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庸人。

This also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e most durable, as well as justest fame, has been acquired by the easy philosophy, and that abstract reasoners seem hitherto to have enjoyed only a momentary reputation, from the caprice or ignorance of their own age, but have not been able to support their renown with more equitable posterity. It is easy for a profound philosopher to commit a mistake in his subtilereasonings; and one mistake is the necessary parent of another, while he pushes on his consequences, and is not deterred from embracing any conclusion, by its unusual appearance, or its contradiction to popular opinion. But a philosopher, who purposes only to represent the common sense of mankind in more beautiful and more engaging colours, if by accident he falls into error, goes no farther; but renewing his appeal to common sense, and the natural sentiments of the mind, returns into the right path, and secures himself from any dangerous illusions. The fame of Cicero flourishes at present; but that of Aristotle is utterly decayed. La Bruyere passes the seas, and still maintains his reputation; but the

glory of Malebranche is confined to his own nation, and to his own age. And Addison, perhaps, will be read with pleasure, when Locke shall be entirely forgotten.

必须承认，简易的哲学赢得了最恒久、最公道的声誉。而那些抽象的推理者似乎仅因其所处时代的一时潮流或愚昧无知获得了短暂的虚名，一旦到了更加公正的后人那里，这种名声便无法维持。对于深奥的哲学家而言，在玄妙的推理中犯错误是很容易的，而且在其一环扣一环的推理过程中，一个错误必然导致另一个错误；同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任何结论，哪怕这结论显得怪诞离奇、有悖于常理。相反，一个只想把人类的常识描绘得更加美好、更加绚丽的哲学家，即便一不小心犯了错误，也不至失之太远。只要他能重新借助常识和心灵的自然情感，便能回归正途，确保自己不陷入虚妄的险境。当今世界，西塞罗的名声如日中天，而亚里士多德则几近销声匿迹。拉布吕耶尔驰名海外，如今仍然举世皆知，而马勒伯朗士的荣耀却仅限于他的国家和他的时代。艾迪生的作品或许会被后人拜读，而洛克必定会被彻底遗忘。

The mere philosopher is a character, which is commonly but little acceptable in the world, as being supposed to contribute nothing either to the advantage or pleasure of society; while he lives remote from communication with mankind, and is wrapped up in principles and notions equally remote from their comprehens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re ignorant is still more despised; nor is any thing deemed a surer sign of an illiberal genius in an age and nation where the sciences flourish, than to be entirely destitute of all relish for those noble entertainments. The most perfect character is supposed to lie between those extremes; retaining an equal ability and taste for books, company, and business; preserving in conversation that discernment and delicacy which arise from polite

letters; and in business, that probity and accuracy which are the natural result of a just philosophy. In order to diffuse and cultivate so accomplished a character, nothing can be more useful than compositions of the easy style and manner, which draw not too much from life, require no deep application or retreat to be comprehended, and send back the student among mankind full of noble sentiments and wise precepts, applicable to every exigence of human life. By means of such compositions, virtue becomes amiable, science agreeable, company instructive, and retirement entertaining.

纯粹的哲学家常常不为世人接受，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既无助于社会的发展，也不能让大众娱乐。他们不与人交流；他们的思想也不为大众所理解。另一方面，纯粹的无知之辈仍然更让人厌恶。在科学高度发达的国家和时代，能体现出一个人不开明最明显的标志，莫过于完全对这些高尚的志趣没兴趣。最完美的人应该介于两者之间；在读书、交友和职业诸方面，有着同等的能力和志趣；谈吐之中，既有敏锐的判断，又有儒雅的风范；在职业活动中，则能时时展现出正确的哲学所养成的正直和精确。要培养这样的完美人格，使更多的人拥有这种品性，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人阅读风格简易、文笔晓畅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既非过多地取材于生活，也无需人们孜孜不倦，甚或隐居精修以求得理解。一个人读了这样的书，回到社会时便具备了高尚的志趣和明智的观念，足以在情急时派上用场。在这类作品的陶冶之下，美德变得与人亲近，科学让人舒心惬意，交友使人受益，独居充满乐趣。

Man is a reasonable being; and as such, receives from science his proper food and nourishment; but so narrow are the bound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that little satisfaction can be hoped for in this particular, either from the extent of security or his acquisitions.

Man is a sociable, no less than a reasonable being; but neither can he always enjoy company agreeable and amusing, or preserve the proper relish for them. Man is also an active being; and from that disposition, as well as from the various necessities of human life, must submit to business and occupation; but the mind requires some relaxation, and cannot always support its bent to care and industry. It seems, then, that nature has pointed out a mixed kind of life as most suitable to the human race, and secretly admonished them to allow none of these biases to draw too much, so as to incapacitate them for other occupations and entertainments. Indulge your passion for science, says she, but let your science be human, and such as may have a direct reference to action and society. Abstruse thought and profound researches I prohibit, and will severely punish, by the pensive melancholy which they introduce, by the endless uncertainty in which they involve you, and by the cold reception which your pretended discoveries shall meet with, when communicated. Be a philosopher; but, amidst all your philosophy, be still a man.

人是理性的生灵，因此能从科学中获得合适的精神食粮和养分。可是，人的理解能力非常有限，对于他对科学的了解，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确切程度上，都不能期望过高。人不仅仅是理性的生灵，他同时也是社会动物。然而，人既不能和惬意开心的朋友长久相处，也无法保持结交这类朋友的志趣。人还是活跃的动物，由于这样的性情，加之生活的种种需要，人必须从事某种职业和工作。但是人的心灵需要放松，无法承受长期的操心和劳作之苦。所以，大自然似乎为人类指明了最适合他们的混合式的生活，暗中告诫他们，不可让任何偏好过多侵占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不能追求其他的职业和娱乐。大自然说，带着激情去拥抱科学吧，但是，要让你追求的科学成为人的科学，成为与行动和社会息息相关的科学。深奥的思想和玄妙的研究，我要禁止，违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让它们带给你忧思冥想之苦，让

你永远感到飘忽不定，让你把自己所谓的发现公诸于众时，受到世人的冷遇。你若要做哲学家，尽管做吧，但是，在你醉心于哲学的同时，务必要做一个人。

Were the generality of mankind contented to prefer the easy philosophy to the abstract and profound, without throwing any blame or contempt on the latter, it might not be improper, perhaps, to comply with this general opinion, and allow every man to enjoy, without opposition, his own taste and sentiment. But as the matter is often carried farther, even to the absolute rejecting of all profound reasonings, or what is commonly called metaphysics, we shall now proceed to consider what can reasonably be pleaded in their behalf.

如果大众更偏爱明白易懂的哲学，但并不责难或藐视玄妙深刻的思想，我们不妨追随大众的看法，不非此即彼，让人人都有享受各自品位和情趣的自由。然而，实际的情形远非如此，人们往往对一切玄奥推理，即所谓的形而上学，持全盘否决的态度。有鉴于此，我们将在下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看看我们能为这一派哲学做出什么合理的辩护。

We may begin with observing, that one considerable advantage, which results from the accurate and abstract philosophy, is, itssubserviency to the easy and humane; which, without the former, can never attain a sufficient degree of exactness in its sentiments, precepts, or reasonings. All polite letters are nothing but pictures of human life in various attitudes and situations; and inspire us with different sentiments, of praise or blame, admiration or ridicule, according to the qualities of the object, which they set

before us. An artist must be better qualified to succeed in this undertaking, who, besides a delicate taste and a quick apprehension, possesses an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internal fabric, the operations of the understanding, the workings of the passions, and the various species of sentiment which discriminate vice and virtue. How painful soever this inward search or enquiry may appear, it becomes, in some measure, requisite to those, who would describe with success the obvious and outward appearances of life and manners. The anatomist presents to the eye the most hideous and disagreeable objects; but his science is useful to the painter in delineating even a Venus or a Helen. While the latter employs all the richest colours of his art, and gives his figures the most graceful and engaging airs; he must still carry his attention to the inward structure of the human body, the position of the muscles, the fabric of the bones, and the use and figure of every part or organ. Accuracy is, in every case, advantageous to beauty, and just reasoning to delicate sentiment. In vain would we exalt the one by depreciating the other.

首先我们要指出，精确玄妙哲学的一大好处是，它补益于浅易近人的哲学。离开了前者，浅易近人的哲学无论在其情感和观念的表述上，还是在其推理过程中，都永远达不到高度精确。一切儒雅的文章都不过是描绘人类生活的各种态度和不同情景，并根据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的特质，用不同的情感启迪我们，或颂扬或谴责、或崇敬或嘲讽。一个艺术家必须能更好地担当这一任务。除了要具备高雅的品位和敏捷的头脑，他还得精确了解思维的内在机理、人类理解的方式、激情的作用过程以及区分善恶的各类情感。这是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搜寻和探索，无论多么痛苦，对于任何期望成功描述人类生活和行为的明显外部特征的人而言，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必备的素质。解剖学家把人体最丑陋、最不堪入目的一面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他所从事的科学有助于画家勾勒维纳斯或海伦的画像。画家在运用丰富的色

彩，刻画出人物最优雅动人的形象时，他还必须关注人体的内部结构、肌肉的位置、骨骼的构造，以及身体各部分或各器官的作用和形状。任何情况下，精确有助于美的呈现，严密的推理有益于表达细腻的情感。我们通过贬低一种品质来抬高另一种品质，这是徒劳之举。

Besides, we may observe, in every art or profession, even those which most concern life or action, that a spirit of accuracy, however acquired, carries all of them nearer their perfection, and renders them more subservient to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And though a philosopher may live remote from business, the genius of philosophy, if carefully cultivated by several, must gradually diffuse itself throughout the whole society, and bestow a similar correctness on every art and calling. The politician will acquire greater foresight and subtility, in the subdividing and balancing of power; the lawyer more method and finer principles in his reasonings; and the general more regularity in his discipline, and more caution in his plans and operations. The stability of modern governments above the ancient, and the accuracy of modern philosophy, have improved, and probably will still improve, by similar gradations.

此外，我们还可以说，在每一种艺术或职业中，甚至在那些与生活或行动最密切相关的艺术或职业中，只要获得精确的精神，都能使这一艺术或职业更近于完美，更有益于社会。一个哲学家或许远离职业活动，但哲学的天赋之才一旦在几个人身上得到精心培养，必然会逐渐在全社会扩散开来，并为每一门艺术和职业带来类似的对准确的追求。在权力分配与制衡方面，政治家会变得更富远见，也更加敏锐；律师在其推理中会更有条理，原则更加细致；将军能掌握更适合军事训练的规律，筹划和实施军事行动时更为谨慎。现代政府相比于古代政府更稳定，现代哲学相比于古代哲学更精确，并且以此类推，

它们将来很可能会继续进步。

Were there no advantage to be reaped from these studies, beyond the gratification of an innocent curiosity, yet ought not even this to be despised; as being one accession to those few safe and harmless pleasures, which are bestowed on the human race. The sweetest and most inoffensive path of life leads through the avenues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and whoever can either remove any obstructions in this way, or open up any new prospect, ought so far to be esteemed a benefactor to mankind. And though these researches may appear painful and fatiguing, it is with some minds as with some bodies, which being endowed with vigorous and florid health, require severe exercise, and reap a pleasure from what, to the generality of mankind, may seem burdensome and laborious. Obscurity, indeed, is painful to the mind as well as to the eye; but to bring light from obscurity, by whatever labour, must needs be delightful and rejoicing.

即使这些研究除了满足人类天真的好奇心外，没有任何益处，它们也不应该因此而受到鄙视，毕竟这是自然赋予人类为数不多、却又安全无害的消遣之一。最幸福、最平和无害的人生之路会穿过科学和学问的大道，任何人只要能排除这一道路上的障碍，或是开拓出新的前景，都应当被视为人类的恩人。尽管从事研究可能会劳神费力，让人筋疲力尽，但是有些人的思想就像有些人的身体一样，天生地充满活力、健康茁壮，需要通过高强度的锻炼才能得到快乐，而这对普通人而言，可能是让人疲惫不堪的负荷。事实上，晦涩深奥的东西让思想和视觉都感到痛苦。但是，用尽一切方法，把晦涩深奥的东西解释清楚，便能令人欢欣鼓舞。

But this obscurity in the profound and abstract philosophy, is objected to, not only as painful and fatiguing, but as the inevitable source of uncertainty and error. Here indeed lies the justest and most plausible objection against a considerable part of metaphysics, that they are not properly a science; but arise either from the fruitless efforts of human vanity, which would penetrate into subjects utterly inaccessible to the understanding, or from the craft of popular superstitions, which, being un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on fair ground, raise these intangling brambles to cover and protect their weakness. Chased from the open country, these robbers fly into the forest, and lie in wait to break in upon every unguarded avenue of the mind, and overwhelm it with religious fears and prejudices. The stoutest antagonist, if he remits his watch a moment, is oppressed. And many, through cowardice and folly, open the gates to the enemies, and willingly receive them with reverence and submission, as their legal sovereigns.

然而，人们对深奥抽象哲学中晦涩难懂的东西持排斥态度，不仅因为它劳神费力、让人精疲力竭，还因为人们认为它必然是一切不安和错误的根源。事实上，人们反对相当一部分形而上哲学，最正当、最合理的缘由在于，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要么发端于人类虚荣徒劳之举，渗透到人类理解力无法企及的话题，要么来源于广为流传的迷信之术，由于不能光明磊落地捍卫自己的立场，只好生发出这些纵横杂乱的荆棘，来掩盖自身的弱点以保护自身。这些盗贼之徒在开阔之地上受到驱逐，只得躲进树林之中，伺机对疏于防守的思想之路发起突然袭击，并用宗教恐惧和偏见使其溃败。最强健的对手，稍有疏忽松懈，就会被打败。许多懦弱愚蠢之辈，更是为敌人打开大门，心悦诚服、卑躬屈膝地将这些盗贼之徒奉为合法之主。

But is this a sufficient reason, why philosophers should desist

from such researches, and leave superstition still in possession of her retreat? Is it not proper to draw an opposite conclusion, and perceive the necessity of carrying the war into the most secret recesses of the enemy? In vain do we hope, that men, from frequent disappointment, will at last abandon such airy sciences, and discover the proper province of human reason. For, besides, that many persons find too sensible an interest in perpetually recalling such topics; besides this, I say, the motive of blind despair can never reasonably have place in the sciences; since, however unsuccessful former attempts may have proved, there is still room to hope, that the industry, good fortune, or improved sagacity of succeeding generations may reach discoveries unknown to former ages. Each adventurous genius will still leap at the arduous prize, and find himself stimulated, rather than discouraged, by the failures of his predecessors; while he hopes that the glory of achieving so hard an adventure is reserved for him alone. The only method of freeing learning, at once, from these abstruse questions, is to enquire seriously into the nature of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show, from an exact analysis of its powers and capacity, that it is by no means fitted for such remote and abstruse subjects. We must submit to this fatigue in order to live at ease ever after; and must cultivate true metaphysics with some care, in order to destroy the false and adulterate. Indolence, which, to some persons, affords a safeguard against this deceitful philosophy, is, with others, overbalanced by curiosity; and despair, which, at some moments, prevails, may give place afterwards to sanguine hopes and expectations. Accurate and just reasoning is the only catholic remedy, fitted for all persons and all dispositions; and is alone able to subvert that abstruse philosophy and metaphysical jargon, which, being mixed up with popular superstition, renders it in a manner impenetrable to careless reasoners, and gives it the air of science and wisdom.

但是，难道这一理由就足以让哲学家们放弃玄奥哲学的研究，让迷信继续占据其逍遥自在之所？难道我们不该做相反的决定，认识到我们有必要将战火烧到敌人最隐秘的藏身之地？我们枉然期盼，人们在频繁失望之后，最终会放弃这些虚幻的科学，发现人类理性的正途。因为许多人有着强烈的动机想要长久地研究这些话题，除此以外，我认为盲目的绝望绝不可能合理地存在于科学研究中。不管前人的努力多么不成功，我们仍然有理由期待，后人的勤勉、好运，以及在智慧上更胜一筹，或许会有前人闻所未闻的发现。每一个不畏艰险的天才都会奋不顾身地要夺取这份巨奖，前人的失败不仅不会使他感到泄气，反而会成为激励他前行的动力。他希望这份克服此等艰难险阻的荣誉是专门为自己预备的。让学问立即摆脱这些晦涩难题的唯一方法，在于对人类理解力的本质进行严肃探讨，精确分析其才智和能力，证明它根本不适合涉猎如此遥远而玄妙的话题。我们必先经受这一磨难，以求以后能安然地生活；必须精心地培育真正的形而上学，以摧毁假冒伪劣的形而上学。对有些人而言，懒惰是抵御这一欺世哲学的良方，但在另一些人身上，懒惰则被好奇心取代。同样，绝望有时候会占上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说不定会让位于乐观的希望和期盼。准确恰当的推理乃是唯一的普世良方，适合所有人、所有性格，而且仅凭自身就足以颠覆玄妙的哲学和形而上的胡言乱语。后两者常和世间流传的迷信混杂在一起，伪装成科学和智慧，让粗心大意的推理者无法看透。

Besides this advantage of rejecting, after deliberate enquiry, the most uncertain and disagreeable part of learning, there are many positive advantages, which result from an accurate scrutiny into the powers and faculties of human nature. It is remarkable concerning the operations of the mind, that, though most intimately present to us, yet, whenever they become the object of reflexion, they seem involved in obscurity; nor can the eye readily find those lines and boundaries, which discriminate and distinguish them. The objects

are too fine to remain long in the same aspect or situation; and must be apprehended in an instant, by a superior penetration, derived from nature, and improved by habit and reflexion. It becomes, therefore, no inconsiderable part of science barely to know the different operations of the mind, to separate them from each other, to class them under their proper heads, and to correct all that seeming disorder, in which they lie involved, when made the object of reflexion and enquiry. This talk of ordering and distinguishing, which has no merit, when performed with regard to external bodies, the objects of our senses, rises in its value, when directed towards the operations of the mind, in proportion to the difficulty and labour, which we meet with in performing it. And if we can go no farther than this mental geography, or delineation of the distinct parts and powers of the mind, it is at least a satisfaction to go so far; and the more obvious this science may appear (and it is by no means obvious) the more contemptible still must the ignorance of it be esteemed, in all pretenders to learning and philosophy.

经过慎重研究，把最不确定、最让人厌恶的学问排拒于外，这是一件好事。除此之外，对人性的能力和机能进行准确的分析和探索，也有许多益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心智活动和我们息息相关，可是一旦把它们作为思考的对象，似乎就显得很难理解。同样，我们无法用眼睛观察到各种心智活动的边界。作为我们思考的对象它们太过精细，不能长时间以同样的形态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只有借助超常的洞察力瞬间把握住它们。这样的洞察力是天生的，并在反复运用和思考中得到提高。因此，稍微了解思想发挥作用的各种方式，并加以区分，将其各自归入适当的类别，并改正它们作为思考和探索对象时造成的混乱，本身就是一份不小的科学任务。我们的感官对象对外在物体进行分类和区分本身没有什么益处，但若是针对我们的思维活动，其价值就会升高，而且与我们从事这一工作的难度和强度成正比。如

果我们在完成思维的测绘之后，或者说在勾画和区分出思想的各种成分和各种能力之后，再也无法继续向前，那么至少我们应该为走到了这一步而感到满足。这一门科学越明了（现在当然丝毫也不明了），一切对其一无所知的伪学问家和伪哲学家就越应该受到鄙视。

Nor can there remain any suspicion, that this science is uncertain and chimerical; unless we should entertain such a scepticism as is entirely subversive of all speculation, and even action. It cannot be doubted, that the mind is endowed with several powers and faculties, that these powers are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that what is really distinct to the immediate perception may be distinguished by reflexion; and consequently, that there is a truth and falsehood in all propositions on this subject, and a truth and falsehood, which lie not beyond the compas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There are many obvious distinctions of this kind, such as those between the will and understanding, the imagination and passions, which fall within the comprehension of every human creature; and the finer and more philosophical distinctions are no less real and certain, though more difficult to be comprehended. Some instances, especially late ones, of success in these enquiries, may give us a juster notion of the certainty and solidity of this branch of learning. And shall we esteem it worthy the labour of a philosopher to give us a true system of the planets, and adjust the position and order of those remote bodies; while we affect to overlook those, who, with so much success, delineate the parts of the mind, in which we are so intimately concerned?

到时候，也不再有任何人会怀疑这是一门飘渺不定、异想天开的科学，除非我们抱着一种颠覆一切思辨甚至行动的怀疑主义。毫无疑问，我们的大脑拥有多种能力和机能，这些能力各不相同，且真正可

以直接观察的东西或许也能通过思考来分辨。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所有的观点都有正误之别，这种正误之别并未超出人类理解的范畴。类似的明显区别有许多，比如意愿和理解力的区别、想象和激情的区别，都是每个人可以理解的。更细致、更具有哲学性的区别，虽然更难理解，但却同样是真实和确定的。在这类研究中取得的一些成功的例子，特别是最近的例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门学问的确定性和实在性。如果一位哲学家努力为我们提供正确的行星系统，调整那些遥远天体的位置和顺序，而我们认同他的工作，那么对于那些成功地绘制了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心理地图的人，我们能够视而不见吗？

But may we not hope, that philosophy, cultivated with care, and encouraged by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may carry its researches still farther, and discover, at least in some degree, the secret springs and principles, by which the human mind is actuated in its operations? Astronomers had long contented themselves with proving, from the phaenomena, the true motions, order, and magnitude of the heavenly bodies; till a philosopher, at last, arose, who seems, from the happiest reasoning, to have also determined the laws and forces, by which the revolutions of the planets are governed and directed. The like has been performed with regard to other parts of nature.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o despair of equal success in our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mental powers and economy, if prosecuted with equal capacity and caution. It is probable, that one operation and principle of the mind depends on another; which, again, may be resolved into one more general and universal; and how far these researches may possibly be carried,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us, before, or even after, a careful trial, exactly to determine. This is certain, that attempts of this kind are every day made even by those who philosophize the most negligently; and nothing can be more requisite than to enter upon the enterprize with thorough care and attention; that, if it lie within the compas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it may at last be happily achieved; if not, it may, however, be rejected with some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This last conclusion, surely, is not desirable; nor ought it to be embraced too rashly. For how much must we diminish from the beauty and value of this species of philosophy, upon such a supposition? Moralists have hitherto been accustomed, when they considered the vast multitude and diversity of those actions that excite our approbation or dislike, to search for some common principle, on which this variety of sentiments might depend. And though they have sometimes carried the matter too far, by their passion for some one general principle; it must, however, be confessed, that they are excusable in expecting to find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into which all the vices and virtues were justly to be resolved. The like has been the endeavour of critics, logicians, and even politicians; nor have their attempts been wholly unsuccessful; though perhaps longer time, greater accuracy, and more ardent application may bring these sciences still nearer their perfection. To throw up at once all pretensions of this kind may justly be deemed more rash, precipitate, and dogmatical, than even the boldest and most affirmative philosophy, that has ever attempted to impose its crude dictates and principles on mankind.

但是，难道我们不能希望，通过精心培育，并在公众关注的激励之下，哲学的各项研究能够更深入地推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发现隐秘的驱使人类头脑运转的动因和原则吗？长期以来，天文学家满足于从各种现象中证明了天体的运动、秩序和星等（天体的亮度），直到终于出现了一个哲学家，从最恰当巧妙的推理中确定了支配和驱使行星旋转的法则和力量。类似的成就也出现在自然界的其他领域。如果我们在人类心理和结构上投入同等的研究力度和同样的细心谨慎，我们没有理由感到绝望，认为不能获得同样的成功。一种心理活动和法则有可能依赖另一种心理活动和法则，而这另一种活动和法则有可能

又引向一种更一般、更普遍的法则。这样的研究能走出多远，我们在进行细心的尝试之前，甚至之后，都很难确切阐明。不过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即乐于对最琐碎的事物进行哲学思考的人们每天都在进行类似的尝试。在这一方面，尤为必要的是要全神贯注地投入。如果这一目标在人类的理解范围之内，可能最终会实现；反之，我们也可以颇有信心地、安全地将其拒之于外。最后这个结论当然并非我们所愿，我们也不应该草率接受。因为一旦得出这样的假定，我们不就大大减损了这类哲学的美和价值吗？道德学家们在思考那些为我们认可或厌恶的各不相同的大量行动时，习惯于去寻求这些情感共同依赖的某种原则。尽管他们对某种普遍原理的热情有时候使他们走得太远，但也必须承认，他们期待找到能解释一切善恶的普遍原则的行为是情有可原的。批评家、逻辑学家，甚至政治家们也做出过类似的尝试。他们的努力也并非全然不成功，尽管要使这些科学更加完美，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更高的准确度、更多的热情和勤勉。倘若全然抛弃这样的主张，则完全可以被视为鲁莽、草率、独断之举。这和试图把粗陋的教条和原理强加给人类的最冒失、最武断的哲学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What though these reasonings concerning human nature seem abstract, and of difficult comprehension? This affords no presumption of their falsehood. On the contrary, it seems impossible, that what has hitherto escaped so many wise and profound philosophers can be very obvious and easy. And whatever pains these researches may cost us, we may think ourselves sufficiently rewarded, not only in point of profit but of pleasure, if, by that means, we can make any addition to our stock of knowledge, in subjects of such unspeakable importance.

如果这些关于人性的推理显得抽象，难以理解，那又怎样呢？这并不能作为断定它们是错误哲学的理由。相反，迄今为止，许多聪明

博学的哲学家们尚且没能理解的东西，似乎不可能是非常简单明了的。无论这样的研究会让我们感到多么烦恼，倘若我们通过研究，能够在这些无比重要的领域增加我们的知识，我们会感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不仅增进了利益，也得到了乐趣。

But as, after all, the abstractedness of these speculations is no recommendation, but rather a disadvantage to them, and as this difficulty may perhaps be surmounted by care and art, and the avoiding of all unnecessary detail, we have, in the following enquiry, attempted to throw some light upon subjects, from which uncertainty has hitherto deterred the wise, and obscurity the ignorant. Happy, if we can unite the boundaries of the different species of philosophy, by reconciling profound enquiry with clearness, and truth with novelty! And still more happy, if, reasoning in this easy manner, we can undermine the foundations of an abstruse philosophy, which seems to have hitherto served only as a shelter to superstition, and a cover to absurdity and error!

但是，这些哲学思辨的抽象性质毕竟不是什么优点，而是其缺点。我们可以通过细心和技巧，以及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细节等方法，来克服这一困难，我们在下面的探索研究中，尝试揭示出某些话题的真相。迄今为止，这些领域以其不确定性令智者望而却步，以其深奥晦涩令无知者畏缩不前。倘若我们能让深奥的研究变得清晰，让真相和新奇完美结合起来，将不同类别的哲学连接起来，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如果能通过这样简单明了的推理，我们可以削弱深奥哲学的根基，那就更令人高兴了。因为这样一种深奥的哲学迄今为止所起的作用，似乎仅仅是在庇护迷信、遮掩荒唐与谬误。

Section II　Of the Origin of Ideas

第二章　论观念的起源

Every one will readily allow, that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rceptions of the mind, when a man feels the pain of excessive heat, or the pleasure of moderate warmth, and when he afterwards recalls to his memory this sensation, or anticipates it by his imagination. These faculties may mimic or copy the perceptions of the senses; but they never can entirely reach the force and vivacity of the original sentiment. The utmost we say of them, even when they operate with greatest vigour, is, that they represent their object in so lively a manner, that we could almost say we feel or see it; but, except the mind be disordered by disease or madness, they never can arrive at such a pitch of vivacity, as to render these perceptions altogether undistinguishable. All the colours of poetry, however splendid, can never paint natural objects in such a manner as to make the description be taken for a real landskip. The most lively thought is still inferior to the dullest sensation.

人人都会欣然承认，人在切身感受过被烫的痛苦或温暖的快乐时的心理感觉，和他在事后回忆时的感受，或通过想象获得的感觉是有很大区别的。回忆和想象的官能可以模仿或复制感官的感觉，但它们却永远无法完全达到切身感受所具有的强度和活力。即便是最强烈的回忆和想象，我们最多只能说，它们生动再现了原来的场景，使我们仿佛身临其境。但是，除非由于疾病或疯狂导致心理失常，回忆和想象绝不能达到让我们无法将其与亲身感受相区分的鲜活程度。诗歌描绘的色彩缤纷的世界，无论多么壮美，都不可能以假乱真，让我们把

它描绘的景物当作真实的自然风光。最生动的想法都不如最迟钝的亲身感受。

We may observe a like distinction to run through all the other perceptions of the mind. A man in a fit of anger, is actuated in a very different manner from one who only thinks of that emotion. If you tell me, that any person is in love, I easily understand your meaning, and form a just conception of his situation; but never can mistake that conception for the real disorders and agitations of the passion. When we reflect on our past sentiments and affections, our thought is a faithful mirror, and copies its objects truly; but the colours which it employs are faint and dull, in comparison of those in which our original perceptions were clothed. It requires no nice discernment or metaphysical head to mark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我们可以从心理的其他所有感觉中发现同样的区别。一个怒火中烧的人和一个仅仅想象自己愤怒的人，处于完全不同的状态。如果你对我说某某人在恋爱，我很容易明白你的意思，并对该人的状态有了正确的认识，但是决不会把这一认识等同于恋爱的激情所引起的实实在在的错乱和狂热。我们回忆过去的情感体验时，我们的思想是一面忠实的镜子，把思考的对象映射出来。但是，它所运用的色彩，与我们切身感受相比，就显得暗淡模糊。把两者区别开来，并不需要多么卓越的明辨能力或哲学头脑。

Here therefore we may divide all the perceptions of the mind into two classes or species, which are distinguished by their different degrees of force and vivacity. The less forcible and lively are commonly denominated Thoughts or Ideas. The other species

want a name in our language, and in most others; I suppose, because it was not requisite for any, but philosophical purposes, to rank them under a general term or appellation. Let us, therefore, use a little freedom, and call them Impressions; employing that word in a sense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usual. By the term impression, then, I mean all our more lively perceptions, when we hear, or see, or feel, or love, or hate, or desire, or will. And impression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ideas, which are the less lively perceptions, of which we are conscious, when we reflect on any of those sensations or movements above mentioned.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心理感知的强度和活力把它们分为两类。强度和活力低的一类普遍称为“思想”或“观念”。另一类在我们的语言和大多数语言中缺乏一个名称，我想可能是因为除了哲学的考虑之外，没有必要将其纳入一个一般性的术语或名称之下。因此，咱们暂且随意一点，把这一类心理感知称为“印象”，这和该词通常的意义有点区别。我所谓印象，指的是一切更生动的感知，即我们的所听、所见、所感、所爱、所恨、所欲、所愿。印象有别于观念。观念是生动程度更低的感知，是我们回想上述各种情感活动时所意识到的感知。

Nothing, at first view, may seem more unbounded than the thought of man, which not only escapes all human power and authority, but is not even restrained within the limits of nature and reality. To form monsters, and join incongruous shapes and appearances, costs the imagination no more trouble than to conceive the most natural and familiar objects. And while the body is confined to one planet, along which it creeps with pain and difficulty; the thought can in an instant transport us into the most distant regions of the universe; or even beyond the universe, into the unbounded chaos, where nature is supposed to lie in total

confusion. What never was seen, or heard of, may yet be conceived; nor is any thing beyond the power of thought, except what implies an absolute contradiction.

乍一看，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的思想更无拘无束。思想不仅超越了人的一切能力和权力的范畴，甚至不受自然和现实的任何束缚。在头脑中想象怪物，把错乱的形状和外表结合在一起，对于思想而言，就像想象最自然、最熟悉的事物一样，毫不费力。虽然我们置身一个星球，只能在上面艰难痛苦地行走，思想却能在一瞬间把我们带到宇宙中最遥远的空间，甚至把我们带到宇宙之外无垠的混沌中去，在那里，自然处于彻底混乱状态。任何前所未见、前所未闻之物，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除非其自身是绝对矛盾之物，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越思想的边界。

But though our thought seems to possess this unbounded liberty, we shall find, upon a nearer examination, that it is really confined within very narrow limits, and that all this creative power of the mind amounts to no more than the faculty of compounding, transposing, augmenting, or diminishing the materials afforded us by the senses and experience. When we think of a golden mountain, we only join two consistent ideas, gold, and mountain, with which we were formerly acquainted. A virtuous horse we can conceive; because, from our own feeling, we can conceive virtue; and this we may unite to the figure and shape of a horse, which is an animal familiar to us. In short, all the materials of thinking are derived either from our outward or inward sentiment; the mixture and composition of these belongs alone to the mind and will. Or, to express myself in philosophical language, all our ideas or more feeble perceptions are copies of our impressions or more lively ones.

但是，尽管我们的思想似乎拥有无拘无束的自由，认真思考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思想活动的范围非常狭窄，我们思想的全部创造力不外乎是对感官和经验提供的材料进行组合、变换、扩大或减少。我们想到一座金山，不过是把我们先前熟悉的“金”和“山”这两个观念组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一匹品德高尚的马，因为我们从自己的情感中想到美德，然后再将其和马的外形结合起来，而马是我们熟悉的动物。简单地说，思想进行活动的一切材料都来自于我们外在的或内在的情感，对这些材料进行混合组装则仅仅是心理和意愿的功能。或者用哲学语言来说，我们所有的观念或更加微弱的感知都是我们的印象或更加生动的感知摹本。

To prove this, the two following arguments will, I hope, be sufficient. First, when we analyze our thoughts or ideas, however compounded or sublime, we always find that they resolve themselves into such simple ideas as were copied from a precedent feeling or sentiment. Even those ideas, which, at first view, seem the most wide of this origin, are found, upon a nearer scrutiny, to be derived from it. The idea of God, as meaning an infinitely intelligent, wise, and good Being, arises from reflecting on the operations of our own mind, and augmenting, without limit, those qualities of goodness and wisdom. We may prosecute this enquiry to what length we please; where we shall always find, that every idea which we examine is copied from a similar impression. Those who would assert that this position is not universally true nor without exception, have only one, and that an easy method of refuting it; by producing that idea, which, in their opinion, is not derived from this source. It will then be incumbent on us, if we would maintain our doctrine, to produce the impression, or lively perception, which corresponds to it.

我希望下面两条论据足以证明这一点。首先，我们的思想和观念无论多么复杂、多么崇高，一经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是我们先前的某种感觉或情感所引起的简单的观念。即使那些初看起来有着完全不同来源的观念，只要进行更仔细分析，也会发现它们是因此而来的。上帝的观念，指的是一种无限聪明、智慧、善良的存在，来源于我们对各种心理活动的思考，和对善良与智慧这些品质的无限扩大。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不受时间限制，但是我们始终会发现，每一种观念均来源于一种相似的印象。那些宣称这一立场并非永远正确或者不无例外的人，只能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反驳这一立场，那就是找出一种在他们看来不源于此的观念。而我们如果要坚持自己的信条，就有义务来证明，任何观念都有一种与之对应的印象或生动的感知。

Secondly, if it happens, from a defect of the organ, that a man is not susceptible of any species of sensation, we always find that he is as little susceptible of the correspondent ideas. A blind man can form no notion of colours; a deaf man of sounds. Restore either of them that sense in which he is deficient; by opening this new inlet for his sensations, you also open an inlet for the ideas; and he finds no difficulty in conceiving these objects. The case is the same, if the object, proper for exciting any sensation, has never been applied to the organ. A Laplander or Negro has no notion of the relish of wine. And though there are few or no instances of a like deficiency in the mind, where a person has never felt or is wholly incapable of a sentiment or passion that belongs to his species; yet we find the same observation to take place in a less degree. A man of mild manners can form no idea of inveterate revenge or cruelty; nor can a selfish heart easily conceive the heights of friendship and generosity. It is readily allowed, that other beings may possess many senses of which we can have no conception; because the ideas of them have never been introduced to us in the only manner by

which an idea can have access to the mind, to wit, by the actual feeling and sensation.

其二，如果一个人由于身体器官的缺陷无法获得任何一类感知，我们就会发现，他同样不会具有相应的观念。盲人没有色彩的观念，聋子没有声音的观念。为他们打通新的感官通道，让他们获得先前不具有的感官能力，同时也是为他们打通了认识观念的通道。他们就会发现，理解色彩和声音并不难。如果某种事物可以激发某种情感，但是这种事物却从未呈现在相应的感官面前，情况也一样。北欧的拉普兰人或非洲人就不知道葡萄酒的滋味。一个人从未感知或完全不能感知人类共有的某种情感或激情，尽管这样的心理缺陷很少，几乎没有，但我们还是发现确有这样的情形存在，只是程度较低而已。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无法想象什么是深仇大恨，什么是残忍。同样，一个自私自利的人难以理解友谊和大方的高尚何在。我们愿意相信，其他生物或许具有多种我们无法想象的感官能力，因为它们有着什么样的观念，我们不得而知。它们所具有的观念从来不曾以心理认识观念的唯一方式，即通过切身体验或感知的方式，为我们所知晓。

There is, however, one contradictory phenomenon, which may prove that it is not absolutely impossible for ideas to arise, independent of their correspondent impressions. I believe it will readily be allowed, that the several distinct ideas of colour, which enter by the eye, or those of sound, which are conveyed by the ear, are real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ough, at the same time, resembling. Now if this be true of different colours, it must be no less so of the different shades of the same colour; and each shade produces a distinct idea, independent of the rest. For if this should be denied, it is possible, by the continual gradation of shades, to run a colour insensibly into what is most remote from it; and if you will not allow any of the means to be different, you cannot, without

absurdity, deny the extremes to be the same. Suppose, therefore, a person to have enjoyed his sight for thirty years, and to have become perfectly acquainted with colours of all kinds except one particular shade of blue, for instance, which it never has been his fortune to meet with. Let all the different shades of that colour, except that single one, be placed before him, descending gradually from the deepest to the lightest; it is plain that he will perceive a blank, where that shade is wanting, and will be sensible that there is a greater distance in that place between the contiguous colours than in any other. Now I ask, whether it be possible for him, from his own imagination, to supply this deficiency, and raise up to himself the idea of that particular shade, though it had never been conveyed to him by his senses? I believe there are few but will be of opinion that he can; and this may serve as a proof that the simple ideas are not always, in every instance, derived from the correspondent impressions; though this instance is so singular, that it is scarcely worth our observing, and does not merit that for it alone we should alter our general maxim.

然而，有一种矛盾的现象可以证明，观念的来源和与之相应的印象相互独立，这并非绝对不可能的事。我相信人们会欣然承认，多种由眼睛观看形成的关于色彩的观念，或由耳朵获得的关于声音的观念，虽然很相似，其实是有区别的。如果对于不同色彩的认识的确如此，那么对同一色彩的不同色差的认识也应该一样，每一种色度产生一种独特的观念，不同于其他色度给人的感觉。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就有可能在不断的色差变化后，使一种颜色彻底变了样。如果你不承认色度之间的差异，你就必须荒唐地承认色差极大的两种色度属于同一种颜色。假设一个人30年来都有很好的视力，对各种各样的色彩相当熟悉，而只有某种特定色度的蓝色，他未曾有幸见过。现在，把除此之外所有不同色度的蓝色放在他面前，依据色彩的深浅度由高到低排列。很明显，他会发觉有个空缺，缺了那一种特定色度的蓝

色，而且觉察到，空缺两边相邻的两种蓝色间的色差，比其他任意两种相邻蓝色间的色差要大。现在我要问的是，这个人能否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填补这个空缺，在大脑中形成那种特定色度的蓝色的观念，尽管此前他的感官从未接触过这种色彩？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他办得到。这可以证明，简单的观念并非总是从某种与之相对应的印象衍生而来。不过这样的情形很少见，不值得我们去观察，更不值得我们仅仅为了这个例外就改变我们的普遍原则。

Here, therefore, is a proposition, which not only seems, in itself, simple and intelligible; but, if a proper use were made of it, might render every dispute equally intelligible, and banish all that jargon, which has so long taken possession of metaphysical reasonings, and drawn disgrace upon them. All ideas, especially abstract ones, are naturally faint and obscure: The mind has but a slender hold of them; they are apt to be confounded with other resembling ideas; and when we have often employed any term, though without a distinct meaning, we are apt to imagine it has a determinate idea annexed to it.On the contrary, all impressions, that is, all sensations, either outward or inward, are strong and vivid: thelimits between them are more exactly determined; nor is it easy to fall into any error or mistake with regard to them. When we entertain, therefore, any suspicion that a philosophical term is employed without any meaning or idea (as is but too frequent), we need but enquire, from what impression is that supposed idea derived? And if it be impossible to assign any, this will serve to confirm our suspicion. By bringing ideas into so clear a light we may reasonably hope to remove all dispute, which may arise, concerning their nature and reality. [2_1]

这里我们就有一个命题，它不仅本身简单明了，而且只要运用得

当，也能把每一种争论变得清晰易懂，能够让我们抛弃长期控制着哲学推理，并使之蒙羞的胡言乱语。一切观念，尤其是抽象的观念，自然都是飘渺模糊的。我们的头脑只能微弱地把握住它们，并且容易和其他相似的观念混淆。我们往往在使用一个并无明确意义的术语时，想象它有着一种确定不变的意义。相反，所有的印象，即所有的切身感觉，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都是强烈生动的。各种切身感觉之间的界限更加分明，我们不会轻易误判。因此，如果我们怀疑人们使用的一个哲学术语没有明确的意思或观念（这种情形时常出现），我们只需要探究一下，这个观念来源于什么印象？如果我们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印象，这就证实我们的怀疑是对的。通过对观念的明确分析，我们或许有望能消除围绕观念的本质和真实状况可能出现的一切争论。[3_1]

[2_1].It is probable that no more was meant by these, who denied innate ideas, than that all ideas were copies of our impressions; though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e terms, which they employed, were not chosen with such caution, nor so exactly defined, as to prevent all mistakes about their doctrine. For what is meant by innate? If innate be equivalent to natural, then all the perceptions and ideas of the mind must be allowed to be innate or natural, in whatever sense we take the latter word, whether in opposition to what is uncommon, artificial, or miraculous. If by innate be meant, contemporary to our birth, the dispute seems to be frivolous; nor is it worthwhile to enquire at what time thinking begins, whether before, at, or after our birth. Again, the word idea, seems to be commonly taken in a very loose sense, by LOCKE and others; as standing for any of our perceptions, our sensations and passions, as well as thoughts. Now in this sense, I should desire to know, what can be meant by asserting, that selflove, or resentment of injuries, or the passion between the sexes is not innate?

But admitting these terms, impressions and ideas, in the sense above explained, and understanding by innate, what is original or copied from no precedent perception, then may we assert that all our impressions are innate, and our ideas not innate.

To be ingenuous, I must own it to be my opinion, that LOCKE was betrayed into this question by the schoolmen, who, making use of undefined terms, draw out their disputes to a tedious length, without ever touching the point in question. A like ambiguity and circumlocution seem to run through that philosopher's reasonings on this as well as most other subjects.

[3_1].那些否认固有的观念的人，所指的也可能不过是，一切观念都是我们印象的

摹本而已。但是必须承认，他们在选择术语上不够严谨，没有明确地定义，以避免人们对他们的学说产生误解。因为，“固有的”指的是什么呢？如果“固有的”在这里等同于“自然的”，那就必须承认，我们心理的一切知觉和观念都是固有的、自然的，不管我们如何理解后面这个词，把它当作“少见的”、“人为的”，或是“奇迹般的”的对立面，都是如此。而如果“固有的”指的是“与生俱来的”，这个争议更是微不足道，也不值得我们去探究思维的起点在哪里，是在一个人出生之前，出生之时，还是出生以后。再者，“观念”这个词在洛克和其他人那里意义都很宽泛。它可以指代我们的任何知觉、感觉、情感，以及我们的思想。那么，在这种意义上，我很想知道，如果我们断言自恋、怨恨受伤、两性之间的激情不是固有的情感，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但是，按照上述解释来对待这些术语、印象和观念，并从“固有性”的角度来理解有创造性的、不模仿先有的知觉的事物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我们的一切印象都是固有的，而观念则不是。

坦率地说，我个人认为，洛克在这个问题上被经院哲学家引入了歧途。这些人使用未经定义的术语，展开无休止的争论，然而丝毫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在这个问题和在其他大多数问题上，这位哲学家（洛克）的推论都似乎同样含糊不清、冗长累赘。

Section III　Of the Association of Ideas

第三章　论观念的联系

It is evident that there is a principle of connex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thoughts or ideas of the mind, and that in their appearance to the memory or imagination, they introduce each other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method and regularity. In our more serious thinking or discourse this is so observable that any particular thought, which breaks in upon the regular tract or chain of ideas, is immediately remarked and rejected. And even in our wildest and most wandering reveries, nay in our very dreams, we shall find, if we reflect, that the imagination ran not altogether at adventures, but that there was still a connexion upheld among the different ideas, which succeeded each other. Were the loosest and freest conversation to be transcribed, there would immediately be observed something which connected it in all its transitions. Or where this is wanting, the person who broke the thread of discourse might still inform you, that there had secretly revolved in his mind a succession of thought, which had gradually led him from the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Among different languages, even where we cannot suspect the least connexion or communi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words, expressive of ideas, the most compounded, do yet nearly correspond to each other: a certain proof that the simple ideas, comprehended in the compound ones, were bound together by some universal principle, which had an equal influence on all mankind.

显然，我们心中的不同思想或观念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些思想

或观念出现在记忆或想象中时，会以一定的方法和规律互相引入。在我们更加严肃的思维活动或对话中，很容易观察到这一过程，因此，如果某个想法突然闯入我们一连串连贯的观念中，便会立刻引起我们的注意，并遭到排斥。我们仔细思索就会发现，即使在我们最异想天开的遐想中，甚至在我们的梦中，想象也不是全然漫无目的的冒险之举，各种先后出现的观念间仍然存在着联系。如果把我们随意自由的谈话誊录下来，立刻就会发现有某种线索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就算某个地方没有这种线索，打断它的人仍然能告诉你，他的心里产生了一连串的想法，让他渐渐偏离了谈话的主题。在不同的语言里，即使在那些我们相信根本不存在丝毫联系或交流的地方，我们也发现，哪怕是用来表达最复杂观念的词语之间的确存在前后关联性。这一点明确证明，有某种普遍原则把简单的观念联系起来，形成复合观念，这样的原则对全人类有着同等的影响。

Though it be too obvious to escape observation, that different ideas are connected together; I do not find that any philosopher has attempted to enumerate or class all the principles of association; a subject, however, that seems worthy of curiosity. To me, there appear to be only three principles of connexion among ideas, namely, Resemblance, Contiguity in time or place, and Cause or Effect.

尽管不同观念间的相互联系一目了然，我还没有发现哪位哲学家尝试过将所有联系法列举出来并分类。然而，这似乎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课题。在我看来，观念间的联系法则似乎只有三种，即“相似性”、“时空连续性”，和“因果关系”。

That these principles serve to connect ideas will not, I believe, be much doubted. A picture naturally leads our thoughts to the

original [3_1] ; the mention of one apartment in a building naturally introduces an enquiry or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others [3_2] ; and if we think of a wound, we can scarcely forbear reflecting on the pain which follows it [3_3] . But that this enumeration is complete, and that there are no other principles of association except these, may be difficult to prove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reader, or even to a man's own satisfaction. All we can do, in such cases, is to run over several instances, and examine carefully the principle which binds the different thoughts to each other, never stopping till we render the principle as general as possible [3_4] . The more instances we examine, and the more care we employ, the more assurance shall we acquire, that the enumeration, which we form from the whole, is complete and entire.

我相信，说这些是联系观念的法则，不会受到多少怀疑。一幅画自然把我们的思想引向画家描摹的原型； [4_1] 谈到某栋楼中的一套公寓，我们自然会提到大厅或谈论该楼中其余的公寓； [4_2] 想到伤口时，我们很少不会想到伤口引起的疼痛。 [4_3] 但是，要说这就是全部的法则，除此三项之外再没有别的联系观念的法则，此证明就很难使读者满意，甚至很难让自己满意。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一些例子，仔细研究将不同观念联系起来的法则，直到我们尽可能找出最普遍的法则。 [4_4] 我们探讨的例子越多，越认真细致，就越能保证我们列举的三项法则是完整无缺的。

[3_1].Resemblance.

[3_2].Contiguity.

[3_3].Cause and effect.

[3_4].For instance, Contrast or Contrariety is also a connexion among Ideas; but it may perhaps, be considered as a mixture of Causation and Resemblance. Where two objects are contrary, the one destroys the other; that is, the cause of its

annihilation, and the idea of the annihilation of an object, implies the idea of its former existence.

[4_1].相似性

[4_2].连续性

[4_3].因果关系

[4_4].比如，“相对”或“相反”也是观念之间的一种联系，但是可以被视作“因果关”系和“相似性”的混合形式。两种事物呈相对状态，一事物就会毁灭另一事物，或者说成为另一事物毁灭的原因；而一事物毁灭的观念就暗示了其先前存在的观念。

Section IV Sceptical doubts concerning the operations of the understanding

第四章　对理解活动的怀疑

Part I

第一节

All the objects of human reason or enquiry may naturally be divided into two kinds, to wit, Relations of Ideas, and Matters of Fact. Of the first kind are the sciences of Geometry, Algebra, and Arithmetic; and in short, every affirmation which is either intuitively or demonstratively certain. That the square of the hypothenuse is equal to the square of the two sides, is a proposition which expresses a relation between these figures. That three times five is equal to the half of thirty, expresses a relation between these numbers. Propositions of this kind are discoverable by the mere operation of thought, without dependence on what is anywhere existent in the universe. Though there never were a circle or triangle in nature, the truths demonstrated by Euclid would for ever retain their certainty and evidence.

人类推理或研究的一切对象可以自然地分为两类，即观念的联系和实际的事实。第一类指几何、代数和算术，简单说，指每一种凭直觉或通过演示证明是确定的论断。“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另外两边平方之和”是表达三角形各边之间关系的观点。“3乘5等于30的一半”表达了这几个数字间的关系。这类观点仅仅需要大脑进行思考就可以证明，不依赖宇宙中任何别的存在。即使自然界从来没有过圆形或三角形，欧几里得证明了的真理仍然永远是确信的、有据可依的。

Matters of fact, which are the second objects of human reason, are not ascertained in the same manner; nor is our evidence of their truth, however great, of a like nature with the foregoing. The contrary of every matter of fact is still possible; because it can never imply a contradiction, and is conceived by the mind with the same facility and distinctness, as if ever so conformable to reality. That the sun will not rise tomorrow is no less intelligible a proposition, and implies no more contradiction than the affirmation, that it will rise. We should in vain, therefore, attempt to demonstrate its falsehood. Were it demonstratively false, it would imply a contradiction, and could never be distinctly conceived by the mind.

实际的事实作为人类理性思考的第二类对象，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得到确证。我们用来证明它们的证据无论多么坚实，也不具有上述第一类对象的性质。每一种实际的事实仍然可能有其对立面，因为这并不隐含着什么矛盾，大脑可以轻易地、清晰地想象出来，仿佛它们与现实非常相符。“明天太阳不会升起”和“明天太阳会升起”的观点一样可以理解，并未隐含什么矛盾。我们如果要证明它是错误的，只能白费力气。要是我们能证明这个观点是错的，那就意味着它本身是矛盾的，是我们的大脑绝对不能清楚地想象出来的。

It may, therefore, be a subject worthy of curiosity, to enquire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at evidence which assures us of any real existence and matter of fact, beyond the present testimony of our senses, or the records of our memory. This part of philosophy, it is observable, has been little cultivated, either by the ancients or moderns; and therefore our doubts and errors, in the prosecution of so important an enquiry, may be the more excusable; while we march through such difficult paths without any guide or direction.

They may even prove useful, by exciting curiosity, and destroying that implicit faith and security, which is the bane of all reasoning and free enquiry. The discovery of defects in the common philosophy, if any such there be, will not, I presume, be a discouragement, but rather an incitement, as is usual, to attempt something more full and satisfactory than has yet been proposed to the public.

因此，研究这类证据的性质可能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话题。这类证据让我们确信，在我们的感官之外，在我们的记忆之外，确实有实际的事实存在。很显然，这一种哲学无论在古人还是今人身上都几乎没得到培养。所以，我们在这样一项重要的研究中，有疑虑和失误是情有可原的，毕竟我们是在一条艰难的道路上前行，没有前人引导，不知道正确的方向。说不定这些疑虑和失误最终证明是有用的，能够激励我们的好奇心，并摧毁我们心中固有的信念和安全感，这些东西是一切推理和自由探索的毒药。如果普通哲学中存在缺陷，那么我认为，发现这些缺陷不仅不会让人失望，通常情况下反而会激励我们去进行比已提出的理论更充实、更令人满意的探索。

All reasonings concerning matter of fact seem to be founded on the 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By means of that relation alone we can go beyond the evidence of our memory and senses. If you were to ask a man, why he believes any matter of fact, which is absent; for instance, that his friend is in the country, or in France; he would give you a reason; and this reason would be some other fact; as a letter received from him, or the knowledge of his former resolutions and promises. A man finding a watch or any other machine in a desert island, would conclude that there had once been men in that island. All our reasonings concerning fact are of the same nature. And here it is constantly supposed that there is a connexion

between the present fact and that which is inferred from it. Were there nothing to bind them together, the inference would be entirely precarious. The hearing of an articulate voice and rational discourse in the dark assures us of the presence of some person. Why? because these are the effects of the human make and fabric, and closely connected with it. If we anatomize all the other reasonings of this nature, we shall find that they are founded on the 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and that this relation is either near or remote, direct or collateral. Heat and light are collateral effects of fire, and the one effect may justly be inferred from the other.

针对实际事实的所有推理似乎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仅仅凭借因果关系，我们就能超越记忆和各种感官提供的证据。你问一个人，他为什么相信不在他眼前的事物，比如，他的朋友目前在国内或在法国，他会给你提供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本身又是某个事实，如刚收到来自该朋友的信，或者朋友此前的决定和承诺，等等。一个人在荒岛上发现一块表或别的任何机器，他会得出结论，曾经有人来过这座岛。我们关于事实的所有推理都具有同样性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事实和从事实得出的推论之间存在联系。要是二者间没有什么联系，那么得出的推论就是完全靠不住的。听到暗处传来清晰的声音和理性的谈话，我们就能确信那里有人。为什么？因为这些是人体构造的结果，二者间有密切联系。如果我们对同样性质的其他推理进行剖析，就会发现它们都是基于因果关系的。这种关系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附带产生。热和光就是火附带产生的两种结果，我们从其中一种结果可以合理地推断出另一种结果。

If we would satisfy ourselves, therefore,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that evidence, which assures us of matters of fact, we must enquire how we arrive at the knowledge of cause and effect.

因此，我们若要满足自己的好奇，了解让我们确信而又事实存在的那种证据有什么样的性质，就得研究我们是如何得出因果关系的。

I shall venture to affirm, as a general proposition, which admits of no exception, that the knowledge of this relation is not, in any instance, attained by reasonings *a priori* ; but arises entirely from experience, when we find that any particular objects are constantly conjoined with each other. Let an object be presented to a man of ever so strong natural reason and abilities; if that object be entirely new to him, he will not be able, by the most accurate examination of its sensible qualities, to discover any of its causes or effects. Adam, though his rational faculties be supposed, at the very first, entirely perfect, could not have inferred from the fluidity and transparency of water that it would suffocate him, or from the light and warmth of fire that it would consume him. No object ever discovers, by the qualities which appear to the senses, either the causes which produced it, or the effects which will arise from it; nor can our reason, unassisted by experience, ever draw any inference concerning real existence and matter of fact.

我将大胆提出一个没有任何例外的、普遍性的命题，即因果关系的知识任何时候都不是通过由因及果的推理得出的，而是完全来自我们的经验，即我们发现某些具体的事物之间有着恒常的联系。如果把一个事物放在一个有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各种才能的人面前，这个事物是他从未见过，即便他对该事物进行精确的观察和研究，也不能发现与之相关的因果关系。即使我们假定亚当一开始就具有完美的理性推理能力，但他照样不能从水的流动性和透明度等属性上推断出水能把他淹死，也不能从火的发光发热中看出火能把他吞噬。没有任何东西感官上呈现的各种品质揭示出它由什么原因引起，会产生什么结果。同样，我们的理性没有经验的辅助，也不能得出关于真实存在和

实际事实的任何推论。

This proposition, that causes and effects are discoverable, not by reason but by experience, will readily be admitted with regard to such objects, as we remember to have once been altogether unknown to us; since we must be conscious of the utter inability, which we then lay under, of foretelling what would arise from them. Present two smooth pieces of marble to a man who has no tincture of natural philosophy; he will never discover that they will adhere together in such a manner as to require great force to separate them in a direct line, while they make so small a resistance to a lateral pressure. Such events, as bear little analogy to the common course of nature, are also readily confessed to be known only by experience; nor does any man imagine that the explosion of gunpowder, or the attraction of a loadstone, could ever be discovered by arguments *a priori* . In like manner, when an effect is supposed to depend upon an intricate machinery or secret structure of parts, we make no difficulty in attributing all our knowledge of it to experience. Who will assert that he can give the ultimate reason, why milk or bread is proper nourishment for a man, not for a lion or a tiger?

对于我们曾经一无所知的事物，我们很容易接受因果关系不是通过理性所揭示，而是通过经验所揭示的观点，因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丝毫没有能力来预测会出现什么结果。把两块光滑的大理石交给一个完全不懂自然哲学的人，他永远也不会发现，两块石头会粘在一起，而且粘合得很紧密，如果从纵向施力，需要很大的力才能把石头分开；但是，如果从侧面往相反方向施力，就能很轻松地分开它们。这种事情在自然中很少有类似的情形，也只有通过经验才能知晓。我们也无法想象，怎么可以通过先觉推理发现火药的爆炸威力或磁铁的

吸引力。同理，如果某种结果有赖于复杂的机械构造或各部分间的隐秘结构，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所有知识来源于经验。谁能断言说自己能够解释为什么牛奶面包能够为人提供营养，但不能为狮子老虎提供营养呢？

But the same truth may not appear, at first sight, to have the same evidence with regard to events, which have become familiar to us from our first appearance in the world, which bear a close analogy to the whole course of nature, and which are supposed to depend on the simple qualities of objects, without any secret structure of parts. We are apt to imagine that we could discover these effects by the mere operation of our reason, without experience. We fancy, that were we brought on a sudden into this world, we could at first have inferred that one billiard-ball would communicate motion to another upon impulse; and that we needed not to have waited for the event, in order to pronounce with certainty concerning it. Such is the influence of custom, that, where it is strongest, it not only covers our natural ignorance, but even conceals itself, and seems not to take place, merely because it is found in the highest degree.

但是，在涉及我们从小就熟悉的事物时，这个道理似乎就没有同样的证据来支持了。这些事情与自然中的事物存在密切的相似性，仅仅依赖事物简单的品质特点，不涉及复杂的部件构造。我们倾向于认为，只需要运用理性推理就能揭示出这些结果从何而来。我们想象，即便我们是突然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也能立刻推断出，一个弹子球在碰击另一个弹子球时会把动能传递给第二个弹子球，我们无须等着亲眼所见，就能断定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便是习惯的影响。当这种影响非常强时，它不仅能掩盖我们的无知，还会掩盖它自身，因为当其强大到无所不在的时候，我们仿佛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But to convince us that all the laws of nature, and all the operations of bodies without exception, are known only by experience, the following reflections may, perhaps, suffice. Were any object presented to us, and were we required to pronounce concerning the effect, which will result from it, without consulting past observation; after what manner, I beseech you, must the mind proceed in this operation? It must invent or imagine some event, which it ascribes to the object as its effect; and it is plain that this invention must be entirely arbitrary. The mind can never possibly find the effect in the supposed cause, by the most accurate scrutiny and examination. For the effect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ause, and consequently can never be discovered in it. Motion in the second billiard-ball is a quite distinct event from motion in the first; nor is there anything in the one to suggest the smallest hint of the other. A stone or piece of metal raised into the air, and left without any support, immediately falls; but to consider the matter *a priori* , is there anything we discover in this situation which can beget the idea of a downward, rather than an upward, or any other motion, in the stone or metal?

但是，要证明一切自然法则、一切物体的运动规律，都毫无例外地只能通过经验来知悉，如下的思考和论证或许足以说明问题。如果把任一物体呈现在我们面前，要求我们在不借助过去经验的前提下判断它能导致什么结果，那么，我诚恳地求教于你，我们的大脑将以何种方式展开这项任务？大脑必须发明或想象出什么东西，作为该物体引起的结果。很显然，这样想象出来的东西完全带有随意性。大脑凭借最精细的观察和研究，绝对不能从眼前的原因中推断出可能的结果，因为结果完全不同于原因，也绝不可能从原因中找到。第二个弹子球的运动和第一个弹子球的运动不同，第一个弹子球的运动中没有任何东西向我们暗示第二个球会怎样运动。把一颗石头或一块金属举

起来，去掉托举的力后，石头或金属会立刻掉下来。但是，如果在落下之前去考虑这个问题，我们难道会发现任何能够告诉我们石头或金属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往下落，而不是往上或往其他任何方向的事物吗？

And as the first imagination or invention of a particular effect, in all natural operations, is arbitrary, where we consult not experience; so must we also esteem the supposed tie or connexion between the cause and effect, which binds them together, and renders it impossible that any other effect could result from the operation of that cause. When I see, for instance, a billiard-ball moving in a straight line towards another; even suppose motion in the second ball should by accident be suggested to me, as the result of their contact or impulse; may I not conceive, that a hundred different events might as well follow from that cause? May not both these balls remain at absolute rest? May not the first ball return in a straight line, or leap off from the second in any line or direction? All these suppositions are consistent and conceivable. Why then should we give the preference to one, which is no more consistent or conceivable than the rest? All our reasonings *a priori* will never be able to show us any foundation for this preference.

正因为我们在不借助经验的情况下，想象或发明自然界中的任何结果都是随意的行为，所以我们必须尊重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一关系将二者联系起来，使某一种具体的原因不可能得出别的任何结果。比如，我看见一个弹子球沿直线向另一个弹子球移动，甚至认为两个球相撞的方式已经向我暗示了第二个球的运动方向。这个时候，难道我不可以想象，同一个原因会产生一百个不同的结果？两个球难道不会在碰撞后立刻保持绝对的静止不动？第一个球不会沿相反方向被弹回来，或者越过第二个球，沿任何路线或方向运动？所有这

些推断都是合理的，都是可以想象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优先选择其中一种推测呢？而这一种推测并不比其他的推测更加合理，更容易想象。所有的先觉推理永远不能揭示我们这一优先选择背后的理由。

In a word, then, every effect is a distinct event from its cause. It could not, therefore, be discovered in the cause, and the first invention or conception of it, *a priori* , must be entirely arbitrary. And even after it is suggested, the conjunction of it with the cause must appear equally arbitrary; since there are always many other effects, which, to reason, must seem fully as consistent and natural. In vain, therefore, should we pretend to determine any single event, or infer any cause or effect,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一言以蔽之，每一个结果都是其背后原因的独特产物。我们不能从原因中直接发现该结果，任何先觉的发明和想象都完全是随意的行为。即使在有暗示的情况下，结果和原因的联系也会显得同样的随意，因为总是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结果，它们在我们的理性面前都显得完全合理和自然。因此，在不借助观察和经验的情况下，我们试图确定任何事件，或推断任何原因和结果，都是徒劳之举。

Hence we may discover the reason why no philosopher, who is rational and modest, has ever pretended to assign the ultimate cause of any natural operation, or to show distinctly the action of that power, which produces any single effect in the universe. It is confessed, that the utmost effort of human reason is to reduce the principles, productive of natural phenomena, to a greater simplicity, and to resolve the many particular effects into a few general causes, by means of reasonings from analogy,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But as to the causes of these general causes, we should in vain attempt their discovery; nor shall we ever be able to satisfy ourselves, by any particular explication of them. These ultimate springs and principles are totally shut up from human curiosity and enquiry. Elasticity, gravity, cohesion of parts, communication of motion by impulse; these are probably the ultimate causes and principles which we shall ever discover in nature; and we may esteem ourselves sufficiently happy, if, by accurate enquiry and reasoning, we can trace up the particular phenomena to, or near to, these general principles. The most perfect philosophy of the natural kind only staves off our ignorance a little longer; as perhaps the most perfect philosophy of the moral or metaphysical kind serves only to discover larger portions of it. Thus the observation of human blindness and weakness is the result of all philosophy, and meets us at every turn, in spite of our endeavours to elude or avoid it.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没有一个理智谦逊的哲学家试图为任何自然现象确定终极原因，或者向我们清楚地展示这种原因的力量能引起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结果。我们承认，人类理性的终极目的在于提炼出自然现象背后的法则，使之变得更加简单，并通过类比、经验和观察，找出众多具体的结果背后一些普遍的原因。至于要找出这些普遍原因背后的原因，我们恐怕只能白费力气，不仅如此，我们也不能对它们提出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事物背后的这些终极机理和原则完全是人类的好奇和探究无法了解的。弹性、引力、物体各部分间的黏合性、通过接触传递动能，这些或许就是我们能从自然中发现的最终原因和法则。如果我们通过精确的研究和推理，能够把具体的现象中和这些普遍的原则联系或大致吻合起来，我们就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最完美的自然类哲学只是帮助我们暂时地避开无知，而最完美的精神哲学和形而上学类哲学或许仅仅在帮助我们发现更多我们的无知。这样说来，人类的盲目和脆弱就成了一切哲学的观察结果。尽管

我们努力躲闪或逃避，却总会在每一个拐角路口和这个现实不期而遇。

Nor is geometry, when taken into the assistance of natural philosophy, ever able to remedy this defect, or lead us into the knowledge of ultimate causes, by all that accuracy of reasoning for which it is so justly celebrated. Every part of mixed mathematics proceeds upon the supposition that certain laws are established by nature in her operations; and abstract reasonings are employed, either to assist experience in the discovery of these laws, or to determine their influence in particular instances, where it depends upon any precise degree of distance and quantity. Thus, it is a law of motion, discovered by experience, that the moment or force of any body in motion is in the compound ratio or proportion of its solid contents and its velocity; and consequently, that a small force may remove the greatest obstacle or raise the greatest weight, if, by any contrivance or machinery, we can increase the velocity of that force, so as to make it an overmatch for its antagonist. Geometry assists u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law, by giving us the just dimensions of all the parts and figures which can enter into any species of machine; but still the discovery of the law itself is owing merely to experience, and all the abstract reasonings in the world could never lead us one step towards the knowledge of it. When we reason *a priori* , and consider merely any object or cause, as it appears to the mind, independent of all observation, it never could suggest to us the notion of any distinct object, such as its effect; much less, show us the inseparable and inviolable connexion between them. A man must be very sagacious who could discover by reasoning that crystal is the effect of heat, and ice of cold, without being previously acquainted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se qualities.

几何学即使可以用来辅助自然哲学，也不能纠正这一缺陷。几何学因精确的推理而得到公认，即便如此，它也没法运用精确推理来引领我们获得终极原因的知识。应用数学的每一领域都建立在同样的假设之上，即自然在其活动中建立了某些法则，我们需要运用抽象推理，作为经验的辅助来发现这些法则，或者用以确定这些法则在具体情形中的影响——特别是对距离和数量有精确要求的情况下。因此，通过经验发现的一个运动法则就是，运动物体的动能与其本身的质量和速度成正比，其结果是一种小的力可以移动巨大的障碍，或举起重量极大的物体，前提就是我们通过某种机巧或设备提高这种力运动的速度，使之产生能战胜对手的动能。几何学使得我们能精确丈量这种设备中所需部件的尺寸和形状，为动能法则的应用提供了辅助作用。但是，发现该法则完全要归功于经验，所有的抽象推理都不能引领我们推导出这个法则，哪怕是靠近一步也不可能。如果我们靠先觉推理来思考任何事物或其背后的原因，不借助任何观察，我们绝不可能获得关于该事物的任何认知，比如其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更不可能认识到前因后果之间紧密相连、不可违背的关系。一个人如果没有亲眼见过热能使水蒸发成晶莹的水珠，冷会导致水结成冰，而能仅凭推理即可发现这些自然现象，那得具备何等敏锐的洞察力！

Part II

第二节

But we have not yet attained any tolerable satisfaction with regard to the question first proposed. Each solution still gives rise to a new question as difficult as the foregoing, and leads us on to farther enquiries. When it is asked, *What is the nature of all our reasonings concerning matter of fact?* the proper answer seems to be, that they are founded on the 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When again it is asked, *W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our reasonings and*

conclusions concerning that relation? it may be replied in one word, Experience. But if we still carry on our sifting humour, and ask, *W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conclusions from experience?* This implies a new question, which may be of more difficult solution and explication. Philosophers, that give themselves airs of superior wisdom and sufficiency, have a hard task when they encounter persons of inquisitive dispositions, who push them from every corner to which they retreat, and who are sure at last to bring them to some dangerous dilemma. The best expedient to prevent this confusion, is to be modest in our pretensions; and even to discover the difficulty ourselves before it is objected to us. By this means, we may make a kind of merit of our very ignorance.

但是，就最初提出的问题而言，我们尚未找到稍微让人满意的答案。每一种回答都会引出一个和前述问题同样困难的新问题，把我们引向更深入的研究。如果要问：我们针对实际的事实进行的一切推理本质何在？ 正确的回答似乎是，这些推理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如果再问：所有因果关系及由此得到的结论的基础又是什么？ 我或许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经验。但是，如果再接着一问到底：从经验中得出所有结论的根基何在？ 这就意味着一个更难回答和解释的新问题出现了。哲学家们貌似智慧超群，信心百倍，但是一旦遇上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就显得束手无策。这些人不停地追问，把他们逼到墙角，最终置他们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要避免出现这样糟糕的局面，最实用的办法就是要保持谦逊的立场，甚至在遭到别人反对之前先发现自己的麻烦。这样，我们反倒可以弄拙成巧，把我们的无知化为优势。

I shall content myself, in this section, with an easy task, and shall pretend only to give a negativ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here proposed. I say then, that, even after we have experience of the operations of cause and effect, our conclusions from that experience

are not founded on reasoning, or any proc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This answer we must endeavour both to explain and to defend.

在本节中，我情愿为自己设定一项简单的任务，尝试为这里提出的问题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我想说的是，即使我们有因果关系的亲身经验，我们从这一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也不是来自推理，或者任何理解的过程。这个答案，我们必须尽力解释清楚，努力为之辩护。

It must certainly be allowed, that nature has kept us at a great distance from all her secrets, and has afforded us only the knowledge of a few superficial qualities of objects; while she conceals from us those powers and principles on which the influence of those objects entirely depends. Our senses inform us of the colour, weight, and consistence of bread; but neither sense nor reason can ever inform us of those qualities which fit it for the nourishment and support of a human body. Sight or feeling conveys an idea of the actual motion of bodies; but as to that wonderful force or power, which would carry on a moving body for ever in a continued change of place, and which bodies never lose but by communicating it to others; of this we cannot form the most distant conception. But notwithstanding this ignorance of natural powers [4_1] and principles, we always presume, when we see like sensible qualities, that they have like secret powers, and expect that effects, similar to those which we have experienced, will follow from them. If a body of like colour and consistence with that bread, which we have formerly eat, be presented to us, we make no scruple of repeating the experiment, and foresee, with certainty, like nourishment and support. Now this is a process of the mind or thought, of which I would willingly know the foundation. It is allowed on all hands that there is no known connexion between the

sensible qualities and the secret powers; and consequently, that the mind is not led to form such a conclusion concerning their constant and regular conjunction, by anything which it knows of their nature. As to past Experience, it can be allowed to give direct and certain information of those precise objects only, and that precise period of time, which fell under its cognizance; but why this experience should be extended to future times, and to other objects, which for aught we know, may be only in appearance similar; this is the main question on which I would insist. The bread, which I formerly eat, nourished me; that is, a body of such sensible qualities was, at that time, endued with such secret powers; but does it follow, that other bread must also nourish me at another time, and that like sensible qualities must always be attended with like secret powers? The consequence seems nowise necessary. At least,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is here a consequence drawn by the mind;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step taken; a process of thought, and an inference, which wants to be explained. These two propositions are far from being the same. *I have found that such an object has always been attended with such an effect* , and *I foresee, that other objects, which are, in appearance, similar, will be attended with similar effects* . I shall allow, if you please, that the one proposition may justly be inferred from the other; I know, in fact, that it always is inferred. But if you insist that the inference is made by a chain of reasoning, I desire you to produce that reasoning. The connexion between these propositions is not intuitive. There is required a medium, which may enable the mind to draw such an inference, if indeed it be drawn by reasoning and argument. What that medium is, I must confess, passes my comprehension; and it is incumbent on those to produce it, who assert that it really exists, and is the origin of all our conclusions concerning matter of fact.

必须承认，自然把我们拒之于外，使我们无法获知它的奥秘。自然仅仅让我们了解事物的一些表面属性，却把这些事物的活动所依赖的力量和原则藏了起来。我们的感官让我们知道面包的颜色、重量和软硬度，但是，无论是感官还是理性都无法让我们知道，面包的这些特性如何为人体提供营养和支持。我们的视觉和触觉让我们有了物体实际运动的概念，对于是什么神奇的力量让运动的物体不断变换位置后继续运动，为什么物体永远不会失去这种力量，而是把它传递给其他物体，我们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概念。然而，尽管我们对于这些自然力量[5.1]和原理一无所知，我们在见到相似的自然现象时，总是假定它们也具有同样隐秘的力量，并期待它们会产生我们有过亲身经验的相似结果。如果把一个物体摆在我们面前，和我们吃过的面包同样的颜色，同样的硬度，我们无须重复任何实验，便能十分肯定地预测它像面包一样能给我们提供营养和支持。这是一个心理或思考的过程，我非常想知道其背后的依据是什么。我们承认，在事物可感知的属性和隐秘的力量之间没有明确显现的联系，我们的大脑也不能以它对事物本质的了解就二者之间恒常的、有规律的关系做出任何结论。至于过去的经验，它仅仅为我们提供某种特定的事物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这一直接的、特定的信息。但是，为什么这种经验可以延伸到未来，或者延伸到我们知道可能只是外表相似的其他事物上，这就是我要追问的主要问题。我先前吃过的面包给了我营养，也就是说，一种具有如此品质属性的东西在彼时彼刻具有如此神秘的力量。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其他面包会在其他时间为我提供营养，具有如此感官属性的东西就一定具有如此神秘的力量？这样的结果似乎不完全是必然的。至少我们必须承认，这里存在一种心理推断的结果，有一个必要的步骤，一个思考和推理的过程，需要我们解释。“我发现这样的事物总会有这样的结果 ”，和“我预测，外形和这个相似的其他东西也会有相似的结果 ”，这两个观点有很大区别。我承认，如果你愿意，可以从一个观点推出另一个观点。事实上，人们总是能得出这样的推断。但是，如果你坚持说，这个结论是经过一连串的推理得来的，那就请你把这个推理过程展示出来。两个观点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建立在直觉之上的，需要有一种媒介的辅助，大脑才能得出这样的推断，如果真要用推理和论证得出结论的话。至于这个媒介是什么，我承认自己没法理

解。如果谁觉得确实有这个媒介存在，并且是我们针对实际的事实得出的所有结论的根源，那他就有义务把这个媒介展示出来。

This negative argument must certainly, in process of time, become altogether convincing, if many penetrating and able philosophers shall turn their enquiries this way and no one be ever able to discover any connecting proposition or intermediate step, which supports the understanding in this conclusion. But as the question is yet new, every reader may not trust so far to his own penetration, as to conclude, because an argument escapes his enquiry, that therefore it does not really exist. For this reason it may be requisite to venture upon a more difficult task; and enumerating all the branches of human knowledge, endeavour to show that none of them can afford such an argument.

如果有更多敏锐和能干的哲学家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研究，而谁也不能发现在任何观点或中间步骤中可以支持这个关于理解过程的结论，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提出的否定的论点会越来越有说服力。但是，目前这还是一个新问题，每个读者暂且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判断，从而得出结论说，他通过研究没有找到这个论点，说明这个论点不存在。为此，我们有必要开始一项更困难的任务，一一梳理人类知识的各个分支领域，努力证明没有任何领域有这样的论点存在。

All reasonings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kinds, namely, demonstrative reasoning, or that concerning relations of ideas, and moral reasoning, or that concerning matter of fact and existence. That there are no demonstrative arguments in the case seems evident; since it implies no contradiction that the course of nature may change, and that an object, seemingly like those which we

have experienced, may be attended with different or contrary effects. May I not clearly and distinctly conceive that a body, falling from the clouds, and which, in all other respects, resembles snow, has yet the taste of salt or feeling of fire? Is there any more intelligible proposition than to affirm, that all the trees will flourish in December and January, and decay in May and June? Now whatever is intelligible, and can be distinctly conceived, implies no contradiction, and can never be proved false by any demonstrative argument or abstract reasoning *a priori* .

所有推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演示性推理，涉及概念间的联系；另一类是事实推理，关乎实际的事实和存在。这一过程中不存在演示性推论，原因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说自然的进程会发生改变的观点，和某个物体虽然与我们经历过的其他物体相似，却可能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的观点，并不存在什么矛盾。难道我不能清晰地想象，从云端落下的某种东西，看起来很像雪片，但是尝起来带咸味，摸起来像火一样烫手？难道所有树木将在12月和1月繁花盛开葱葱郁郁，而在5月和6月却会落叶凋零比别的想法更难理解吗？由此可见，无论什么情况都是可以理解、可以想象的，并未隐含什么矛盾，也不能通过演示性推理或抽象的先觉 推理证明它是错误的。

If we be, therefore, engaged by arguments to put trust in past experience, and make it the standard of our future judgement, these arguments must be probable only, or such as regard matter of fact and real existence according to the division above mentioned. But that there is no argument of this kind, must appear, if our explication of that species of reasoning be admitted as solid and satisfactory. We have said that all arguments concerning existence are founded on the 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that our knowledge of that relation is derived entirely from experience; and that all our

experimental conclusions proceed upon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future will be conformable to the past. To endeavour, therefore, the proof of this last supposition by probable arguments, or arguments regarding existence, must be evidently going in a circle, and taking that for granted, which is the very point in question.

如果我们要通过论证来确定过去的经验值得信任，并将其作为评判未来事件的标准，这种论证只能是事实推理，或者说，根据上文的分类，是关乎实际的事实与存在的推理。但是，如果我们对事实推理的解释是站得住脚的，令人满意的，那么就不会出现这种论证。我们说过，一切关于现实存在的推论都是基于因果关系的，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完全来自经验，我们所有来自经验的结论都建立在未来的情形应该和过去一致的假设之上。因此，试图通过事实推理，或关于现实存在的推理来证明上述最后一个假设，显然就进入了循环推理，把问题本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In reality, all arguments from experience are founded on the similarity which we discover among natural objects, and by which we are induced to expect effects similar to those which we have found to follow from such objects. And though none but a fool or madman will ever pretend to dispute the authority of experience, or to reject that great guide of human life, it may surely be allowed a philosopher to have so much curiosity at least as to examine the principle of human nature, which gives this mighty authority to experience, and makes us draw advantage from that similarity which nature has placed among different objects. From causes which appear similar we expect similar effects. This is the sum of all our experimental conclusions. Now it seems evident that, if this conclusion were formed by reason, it would be as perfect at first, and upon one instance, as after ever so long a course of experience.

But the case is far otherwise. Nothing so like as eggs; yet no one, on account of this appearing similarity, expects the same taste and relish in all of them. It is only after a long course of uniform experiments in any kind, that we attain a firm reliance and security with regard to a particular event. Now where is that process of reasoning which, from one instance, draws a conclusion, so different from that which it infers from a hundred instances that are nowise different from that single one? This question I propose as much for the sake of information, as with an intention of raising difficulties. I cannot find, I cannot imagine any such reasoning. But I keep my mind still open to instruction, if any one will vouchsafe to bestow it on me.

实际上，从经验出发的所有推论都建立在我们在自然界事物中发现的相似性之上。正是由于相似性，我们期待事物产生的结果和我们所见过的相似的事物所引起的结果也相似。尽管除了傻瓜和疯子之外，没有人会尝试去质疑经验的权威性，或者排斥这位人类生活的伟大向导，但是，显然应该允许一个哲学家至少具备强烈的好奇心，去考查赋予经验巨大权威的人性法则——使我们从自然赋予事物的相似性中受益的人性法则。我们从相似的原因中期待相似的结果。这是我们从经验中获得的全部结论。显而易见，如果这一结论是通过理性推理得出来的，那么，无论是对于最初的一次体验，还是对于长期的无数次体验而言，这个结论都是同样完美的。但实际情况截然相反。蛋与蛋之间的相似性没有别的事物可比，但是没有人会因为这一点，认为所有的蛋都有相同的滋味。我们只有通过长期一致的实验，才能获得对具体事物的信赖感和安全感。从一种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和从一百种并无不同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大不相同，这样的推理过程在哪里去找呢？我提出这个问题既是为了获得信息，也是有意想出难题。我找不到这样的推理，也无法想象有这样的推理。但是我愿意保持开放的心态，如果有人愿意赐教，我随时洗耳恭听。

Should it be said that, from a number of uniform experiments, we infer a connexion between the sensible qualities and the secret powers; this, I must confess, seems the same difficulty, couched in different terms. The question still recurs, on what process of argument this inference is founded? Where is the medium, the interposing ideas, which join propositions so very wide of each other? It is confessed that the colour, consistence, and other sensible qualities of bread appear not, of themselves, to have any connexion with the secret powers of nourishment and support. For otherwise we could infer these secret powers from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these sensible qualities, without the aid of experience; contrary to the sentiment of all philosophers, and contrary to plain matter of fact. Here, then, is our natural state of ignorance with regard to the powers and influence of all objects. How is this remedied by experience? It only shows us a number of uniform effects, resulting from certain objects, and teaches us that those particular objects, at that particular time, were endowed with such powers and forces. When a new object, endowed with similar sensible qualities, is produced, we expect similar powers and forces, and look for a like effect. From a body of like colour and consistence with bread we expect like nourishment and support. But this surely is a step or progress of the mind, which wants to be explained. When a man says, *I have found, in all past instances, such sensible qualities conjoined with such secret powers* ; and when he says, *Similar sensible qualities will always be conjoined with similar secret powers* , he is not guilty of a tautology, nor are these propositions in any respect the same. You say that the one proposition is an inference from the other. But you must confess that the inference is not intuitive; neither is it demonstrative. Of what nature is it, then? To say it is experimental, is begging the question. For all inferences from experience suppose, as their foundation, that the future will resemble the past, and that similar powers will be conjoined with

similar sensible qualities. If there be any suspicion that the course of nature may change, and that the past may be no rule for the future, all experience becomes useless, and can give rise to no inference or conclusion. It is impossible, therefore, that any arguments from experience can prove this resemblance of the past to the future; since all these arguments are founded on the supposition of that resemblance. Let the course of things be allowed hitherto ever so regular; that alone, without some new argument or inference, proves not that, for the future, it will continue so. In vain do you pretend to have learned the nature of bodies from your past experience. Their secret nature, and consequently all their effects and influence, may change, without any change in their sensible qualities. This happens sometimes, and with regard to some objects. Why may it not happen always, and with regard to all objects? What logic, what process ofargument secures you against this supposition? My practice, you say, refutes my doubts. But you mistake the purport of my question. As an agent, I am quite satisfied in the point; but as a philosopher, who has some share of curiosity, I will not say scepticism, I want to learn the foundation of this inference. No reading, no enquiry has yet been able to remove my difficulty, or give me satisfaction in a matter of such importance. Can I do better than propose the difficulty to the public, even though, perhaps, I have small hopes of obtaining a solution? We shall at least, by this means, be sensible of our ignorance, if we do not augment our knowledge.

是否应当说，我们从一系列相同的实验中推断出事物的可感知属性和隐秘力量之间存在联系。我得承认，这不过是用不同的话表述同样的疑难问题。这个推断背后的推理过程是什么？这个问题同样存在。把两个如此无关的观点连接起来的媒介或中间思想在哪里？我们承认，面包的颜色、软硬度及其他的外在特征本身和它能为人体提供

营养和支持的隐秘力量之间并无联系。否则，我们一眼就可以从这些外在特征中推断出这些隐秘力量，无需借助经验。这与所有哲学家的情感相左，也违背客观事实。这便是我们在事物的隐秘力量和影响方面的自然无知状态。这种无知状态怎样通过经验来弥补？经验只是向我们展示，一定的事物会引起一系列相同的结果，告诉我们特定的事物在特定的时间具有这样的力量和影响。一旦一个新的、具有相似外在属性的事物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会期待它有相似的力量和影响，能产生相似的结果。看见和面包一样颜色和软硬度的东西，我们就期待它能为人体提供同样的营养和支持。但是这肯定是心理推理的一个步骤或过程，有待解释。如果一个人说："在所有情况下，我发现这样的外在特征总是和这样的隐秘力量相联系的 "，和他说"相似的外在特征永远会和相似的隐秘力量相联系 "，他并没有犯同义反复的错误，这两个观点完全不相同。你会说，一个观点是从另一个观点中推断出来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种推理既不是靠直觉，也不是演示性推理。那么，这是什么性质的推理？说这是来自经验的推理，就是想当然了。因为一切来自经验的推断的前提和基础是，未来和过去具有相似性，相似的隐秘力量总是和相似的外在特征相联系。如果我们怀疑，自然的进程会发生变化，过去不能作为评判未来的标准，所有经验都没有用了，不能帮助我们进行推断和得出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来自经验的任何推论都不可能证明过去和未来具有相似性，因为所有这些推论都是建立在这一相似性基础之上的。我们假设，迄今为止，自然界中的事物都是有规律的，但是，如果不借助新的论证和推断，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未来的一切会保持不变。如果你声称自己从过去的经验中知悉了事物的特性，必然是徒劳的。事物隐秘的属性，及其相应的结果和影响可能会发生变化，而其外在特征可能丝毫没变。这种情况的确在某些时候出现在某些事物身上。凭什么说它不可能在所有事物中永远出现呢？你有什么样的逻辑，什么样的推理过程来驳斥这个观点呢？你可能说，我个人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不要有这种疑虑。但是你误解了我的问题的要旨。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完全满意这个说法。可是，作为一个有好奇心的哲学家，我不会接受这种怀疑态度，我需要了解这个推论的基础何在。我的所有阅读和研究没能帮我排除疑难，也没能给我任何值得满意的回答。我还有更好的办

法吗？或者不如把问题交给公众，说不定我还有一线希望找到答案。通过这种办法，即便我们不能增长自己的知识，至少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所在。

I must confess that a man is guilty of unpardonable arrogance who concludes, because an argument has escaped his own investigation, that therefore it does not really exist. I must also confess that, though all the learned, for several ages, should have employed themselves in fruitless search upon any subject, it may still, perhaps, be rash to conclude positively that the subject must, therefore, pass all human comprehension. Even though we examine all the sources of our knowledge, and conclude them unfit for such a subject, there may still remain a suspicion, that the enumeration is not complete, or the examination not accurate. But with regard to the present subject, there are some considerations which seem to remove all this accusation of arrogance or suspicion of mistake.

我必须承认，如果一个人在其调查研究中没有得出某种推论，就认为这个推论不存在，那么他的无知是不可原谅的。我还得承认，如果几百年来所有哲学家都在某一问题上探索但却没有获得任何成果，便因此断言这个领域超越了人类的理解力，这仍然可能是草率的。即使我们检查了人类知识的各个分支，认为它们都不适合用来研究该问题，仍然可以怀疑我们的梳理是不完整的，我们的检查不够准确。但是就目前的问题而言，有一些认识似乎让我们免受无知的指责或者犯错的怀疑。

It is certain that the most ignorant and stupid peasants—nay infants, nay even brute beasts—improve by experience, and learn the qualities of natural objects, by observing the effects which result

from them. When a child has felt the sensation of pain from touching the flame of a candle, he will be careful not to put his hand near any candle; but will expect a similar effect from a cause which is similar in its sensible qualities and appearance. If you assert, therefore,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ld is led into this conclusion by any process of argument or ratiocination, I may justly require you to produce that argument; nor have you any pretence to refuse so equitable a demand. You cannot say that the argument is abstruse, and may possibly escape your enquiry; since you confess that it is obvious to the capacity of a mere infant. If you hesitate, therefore, a moment, or if, after reflection, you produce any intricate or profound argument, you, in a manner, give up the question, and confess that it is not reasoning which engages us to suppose the past resembling the future, and to expect similar effects from causes which are, to appearance, similar. This is the proposition which I intended to enforce in the present section. If I be right, I pretend not to have made any mighty discovery. And if I be wrong, I must acknowledge myself to be indeed a very backward scholar; since I cannot now discover an argument which, it seems, was perfectly familiar to me long before I was out of my cradle.

显然，哪怕是最无知愚钝的农夫，甚至连孩童，不，甚至是野兽，都能在经验中学习，并能通过观察自然界事物的结果了解它们的品质属性。孩子因碰到蜡烛的火焰而感到疼痛，他会小心不再用手接近燃烧的蜡烛，而且会明白，具有和蜡烛相似形状和特征的东西，会产生相似的结果。如果你认为，从孩子的理解中得出这个结论是推理的结果，我就请你演示出这个推理的过程，你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个合理的要求。你不能说，这个推理的过程很深奥，你没法从研究中得出来，因为你承认这是连婴儿都能明白的道理。如果你犹豫不决，或者经过思考之后提出了复杂深奥的推理过程，那你则是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这个问题，并不得不承认，我们不是通过推理得出过去和未来

相似以及相似的原因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这样的结论的。这就是我在本章中要强调的观点。如果我这个观点正确，我不会因此宣称自己有了惊天动地的发现；如果是错的，我只得承认自己的确是个愚钝的学者，毕竟我没法证明一个我还是摇篮中的婴儿的时候就非常熟悉的推论。

[4_1].The word, Power, is here used in a loose and popular sense. The more accurate explication of it would give additional evidence to this argument. See Sect. 7.

[5_1].这里的力量（Power）一词是用其随意且常见的意义。更加准确的解释能够为进一步证明这个观点提供证据。参见第七章。

Section V　Sceptical Solution of the Doubts

第五章　针对这些疑虑的怀疑主义解决方案

Part I

第一节

The passion for philosophy, like that for religion, seems liable to this inconvenience, that, though it aims at the correction of our manners, and extirpation of our vices, it may only serve, by imprudent management, to foster a predominant inclination, and push the mind, with more determined resolution, towards that side which already draws too much, by the bias and propensity of the natural temper. It is certain that, while we aspire to the magnanimous firmness of the philosophic sage, and endeavour to confine our pleasures altogether within our own minds, we may, at last, render our philosophy like that of Epictetus, and other Stoics, only a more refined system of selfishness, and reason ourselves out of all virtue as well as social enjoyment. While we study with attention the vanity of human life, and turn all our thoughts towards the empty and transitory nature of riches and honours, we are, perhaps, all the while flattering our natural indolence, which, hating the bustle of the world, and drudgery of business, seeks a pretence of reason to give itself a full and uncontrolled indulgence. There is, however, one species of philosophy which seems little liable to this inconvenience, and that because it strikes in with no disorderly passion of the human mind, nor can mingle itself with any natural affection or propensity; and that is the Academic or Sceptical philosophy. The academics always talk of doubt and suspense of judgement, of danger in hasty determinations, of

confining to very narrow bounds the enquiries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of renouncing all speculations which lie not within the limits of common life and practice. Nothing, therefore, can be more contrary than such a philosophy to the supine indolence of the mind, its rash arrogance, its lofty pretensions, and its superstitious credulity. Every passion is mortified by it, except the love of truth; and that passion never is, nor can be, carried to too high a degree. It is surprising, therefore, that this philosophy, which, in almost every instance, must be harmless and innocent, should be the subject of so much groundless reproach and obloquy. But, perhaps, the very circumstance which renders it so innocent is what chiefly exposes it to the public hatred and resentment. By flattering no irregular passion, it gains few partizans; by opposing so many vices and follies, it raises to itself abundance of enemies, who stigmatize it as libertine, profane, and irreligious.

追求哲学的激情，就像宗教狂热一样，容易导致这样一种麻烦。尽管哲学期望改进我们的行为，根除罪恶，但是由于管理不当，哲学恰恰容易滋生出一种强势的倾向，驱使我们的心灵更加固执地向着本已被天性中的偏见和癖好所扭曲的方向发展。可以确信的是，尽管我们企望达到圣哲的宽宏大量，并努力把我们的快乐完全控制在自己的心里，但是最终我们或许把自己的哲学变成了爱比克泰德和其他斯多葛派哲学家那样的思想，只不过比起他们来是一套更加精致的自私自利的学说，从而使我们完全脱离了一切美德，以及社会的快乐。我们一面认真研究人类生活的虚荣、关注荣华富贵的人生背后空虚和飘渺的本质；另一面我们可能一直在助长我们懒惰的天性。这一种惰性由于讨厌世间的喧闹、生计的艰辛，在理性的掩饰之下，完全地、毫无节制地迁就自己。然而，有一类哲学似乎极少遭遇这样的麻烦，因为信奉这一类哲学无需我们的心里产生狂热的激情，也不会和我们的自然情感和倾向混在一起。这就是学院派哲学或怀疑论哲学。学院派哲学家总是谈论怀疑，谈论不要随意做出判断，谈论草率下结论的危

险，要把针对理解的研究关在狭窄的范围之内，要抛弃不在日常生活和实践范围内的一切思辨。可以说，再没有什么学说比这派哲学更反对心灵的消极怠倦、盲目自大、自命不凡，及其对迷信的轻信。这派哲学要求克制除了追求真理之外的所有情感，而对真理的热爱永远高无止境，也不可能有止境。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种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天真无邪的哲学，偏偏成了无端指责和诽谤的目标。或许正是赋予这派哲学纯真特性的东西，使之遭到公众的怨恨。因为它不煽无端之情，它没有多少虔诚的追随者；因为它反对各种邪恶和愚蠢，它树敌很多，敌人反过来指责它放荡不羁、亵渎神灵、无宗教信仰。

Nor need we fear that this philosophy, while it endeavours to limit our enquiries to common life, should ever undermine the reasonings of common life, and carry its doubts so far as to destroy all action, as well as speculation. Nature will always maintain her rights, and prevail in the end over any abstract reasoning whatsoever. Though we should conclude, for instance, as in the foregoing section, that, in all reasonings from experience, there is a step taken by the mind which is not supported by any argument or proc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there is no danger that these reasonings, on which almost all knowledge depends, will ever be affected by such a discovery. If the mind be not engaged by argument to make this step, it must be induced by some other principle of equal weight and authority; and that principle will preserve its influence as long as human nature remains the same. What that principle is may well be worth the pains of enquiry.

我们不必担心，这种哲学在努力将我们的研究限制在日常生活范围内的同时，会削弱关于日常生活的推理，让怀疑论得到蔓延，从而摧毁我们的一切行动和思辨。自然总会坚持自己的权利，最终会战胜

一切形式的抽象推理。就像在上一章，尽管我们指出，在所有来自经验的推理中，有一个思维步骤是不能用推论或者理解的过程来证明的，但是，发现这一点也不会影响人类一切知识所赖以产生的推理。如果我们的心灵（思想）不是依靠推论来完成这一步的，它一定受到某种同样重要的原则所驱使，只要人性不变，这种原则就会永远发生作用。至于这是什么样的原则，值得我们艰辛探索一番。

Suppose a person, though endowed with the strongest faculties of reason and reflection, to be brought on a sudden into this world; he would, indeed, immediately observe a continual succession of objects, and one event following another; but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discover anything farther. He would not, at first, by any reasoning, be able to reach the idea of cause and effect; since the particular powers, by which all natural operations are performed, never appear to the senses; nor is it reasonable to conclude, merely because one event, in one instance, precedes another, that therefore the one is the cause, the other the effect. Their conjunction may be arbitrary and casual. There may be no reason to infer the existence of one from the appearance of the other. And in a word, such a person, without more experience, could never employ his conjecture or reasoning concerning any matter of fact, or be assured of anything beyond what was immediately present to his memory and senses.

假设一个理性思考能力极强的人突然间被带到这个世界，他会立刻观察到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世间万物，但他不可能有任何更深入的发现。首先，由于驱使万物运转的具体力量无法感知，他不可能通过推理获得因果关系的概念；其次，也不可能仅仅因为在一种情况下某个事件在另一个事件之前出现，就推断出一个是原因，另一个是结果。两个事件之间的联系可能是随意无常的，没有理由从一个事

件的出现推断出另一事件会发生。一句话，这样一个毫无经验的人绝不可能运用其针对事实的推理能力，也不能理解任何处于其记忆和感官之外的事物。

Suppose, again, that he has acquired more experience, and has lived so long in the world as to have observed familiar objects or events to be constantly conjoined together; what is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experience? He immediately infers the existence of one object from the appearance of the other. Yet he has not, by all his experience, acquired any idea or knowledge of the secret power by which the one object produces the other; nor is it by any process of reasoning, he is engaged to draw this inference. But still he finds himself determined to draw it; and though he should be convinced that his understanding has no part in the operation, he would nevertheless continue in the same course of thinking. There is some other principle which determines him to form such a conclusion.

再假设，这个人有了更多的经验，已经在世界上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注意到了相似的事物和相似的结果之间的联系。那么，这种经验会产生什么影响呢？结果就是：他能从一个事件的出现立刻推断出另一事件会发生。但是，他的所有经验并没有让他获得关于使一事物得以产生另一事物的隐秘力量的任何观念或知识，他也不能通过任何推理得出这一推断。但是他发现自己决心推出这个结论。尽管他相信自己的理解并未参与其中，他仍然要继续进行同样的思考，因为有某种别的原则迫使他做出这样的结论。

This principle is Custom or Habit. For wherever the repetition of any particular act or operation produces a propensity to renew the same act or operation, without being impelled by any reasoning

or proc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we always say, that this propensity is the effect of *Custom* . By employing that word, we pretend not to have given the ultimate reason of such a propensity. We only point out a principle of human nature, which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and which is well known by its effects. Perhaps we can push our enquiries no farther, or pretend to give the cause of this cause; but must rest contented with it as the ultimate principle, which we can assign, of all our conclusions from experience. It is sufficient satisfaction, that we can go so far, without repining at the narrowness of our faculties because they will carry us no farther. And it is certain we here advance a very intelligible proposition at least, if not a true one, when we assert that, after the constant conjunction of two objects—heat and flame, for instance, weight and solidity—we are determined by custom alone to expect the one from the appearance of the other. This hypothesis seems even the only one which explains the difficulty, why we draw, from a thousand instances, an inference which we are not able to draw from one instance, that is, in no respect, different from them. Reason is incapable of any such variation. The conclusions which it draws from considering one circle are the same which it would form upon surveying all the circles in the universe. But no man, having seen only one body move after being impelled by another, could infer that every other body will move after a like impulse. All inferences from experience, therefore, are effects of custom, not of reasoning.[1]

这个原则就是“习惯”或“习性”。因为每当一种动作或行为的重复会产生一种使得这一动作或行为再次出现的倾向，我们不必受到任何推理或理解过程的驱使就会说，这一倾向就是“习惯 ”的结果。我们使用“习惯”这个词，并不是说我们对这一倾向做了最终解释。我们仅仅是指出了人性的一条法则，这是一条公认的、其结果为人熟知的法

则。可能我们再也不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不能给出原因背后的原因，只得满足于把它视为我们从经验中得出的所有结论的最高法则。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大满足，我们无须埋怨自己的能力有限，不能再引领我们走得更远。如果在我们亲眼见证了诸如炙热与火焰、沉重与结实这样的两种事物间的紧密联系之后，宣称仅仅凭习惯我们可以从一事物的出现推断出另一事物会发生，显然我们提出了一个即便不正确，但至少非常容易理解的命题。这似乎是唯一能够解释如下疑难的假说：为什么我们能够从一千个事例中得出推断，而不能从一个单独的但却并无什么不同的事例中得出同样的推断。理性就不能进行这样的变通。理性从研究一个圆得出的结论和其研究了宇宙中所有的圆后形成的结论是相同的。但是，没有任何人仅仅见到一个物体被另一个物体碰击之后动了起来，就能推断出所有的物体在遇到相似的碰击之后都会运动起来。由此看来，一切来自经验的结论都是习惯的结果，而不是推理的结果。[1]

1: Nothing is more useful than for writers, even, on moral, political, or physical subject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and to suppose, that these species of argumentation are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e former are taken for the mere result of our intellectual faculties, which, by considering *a priori*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examining the effects, that must follow from their operation, establish particular principles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The latter are supposed to be derived entirely from sense and observation, by which we learn what has actually resulted from the operation of particular objects, and are thence able to infer, what will, for the future, result from them. Thus, for instance, the limitations and restraints of

civil government, and a legal constitution, may be defended, either from reason, which reflecting on the great frailty and corruption of human nature, teaches, that no man can safely be trusted with unlimited authority; or from experience and history, which inform us of the enormous abuses, that ambition, in every age and country, has been found to make so imprudent a confidence.

1: 对于那些在人性、政治或自然领域从事写作的作者们而言，最有用的莫过于区分理性和经验，并指出围绕各自的论证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围绕理性的论证通常被认为是我们的心智能力的结果，通过先觉地思考事物的性质，探索事物活动引起的结果，来确定科学和哲学的具体原则。围绕经验的论证则完全来源于我们的感官和观察，我们借此了解特定事物活动产生的结果，并由此出发，推断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从理性和经验两个方面来论证政府和宪法的缺陷和不足。从理性角度看，由于人性的脆弱和败坏，不能把绝对的权力安全地托付给任何人；而从人类的经验和历史来看，随处可见滥用权力的情形，事实证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人类的野心正是充分利用了这样一种草率的信任。

The same distinction 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is maintained in all our deliberations concerning the conduct of life; while the experienced statesman, general, physician, or

merchant is trusted and followed; and the unpractised novice, with whatever natural talents endowed, neglected and despised. Though it be allowed, that reason may form very plausible conjectures with regard to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a particular conduct in such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it is still supposed imperfect,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experience, which is alone able to give stability and certainty to the maxims, derived from study and reflection.

理性和经验的这一区别同样存在于我们关于生活的审度之中。有经验的政治家、将军、医生或商人让人信赖，引人追随，而没有经验的生手，不管天资如何聪颖，总会被忽略，受人轻视。纵然我们承认，理性能够就特定情况下某种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推测，但是，我们依然认为，没有经验的辅助，理性是不完美的。我们从研究和思考中得出各种原则，但只有经验本身才能使它们稳固和确定下来。

But notwithstanding that this distinction be thus universally received, both in the active and speculative scenes of life, I shall not scruple to pronounce, that it is, at bottom, erroneous, at least, superficial.

尽管在实际生活和思辨领域人们都普遍接受了理性和经验的这种区别，我仍然会毫无顾虑地指出，这个观

点本质上是错误的，或者至少说是肤浅的。

If we examine those arguments, which, in any of the sciences above mentioned, are supposed to be mere effects of reasoning and reflection, they will be found to terminate, at last, in some general principle or, conclusion, for which we can assign no reason but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those maxims, which are vulgarly esteemed the result of pure experience, is, that the former cannot be established without some process of thought, and some reflection on what we have observed,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its circumstances, and trace its consequences: Whereas in the latter, the experienced event is exactly and fully familiar to that which we infer as the result of any particular situation. The history of a TIBERIUS or a NERO makes us dread a like tyranny, were our monarchs freed from the restraints of laws and senates: But the observation of any fraud or cruelty in private life is sufficient, with the aid of a little thought, to give us the same apprehension; while it serves as an instance of the general corrup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shows us the danger which we must incur by reposing an entire confidence in mankind. In both cases, it is experience which is ultimately the foundation of our inference and conclusion.

有些论证在上述任何科学中被认为仅仅是推理和思考的产物，但是，仔细检查就会发现，它们最终得出的普遍原则和结论，是我们只能用观察和经验，而不是用任何理性来解释的。和那些纯粹来自经验的原则相比，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这些论证的确离不开思考的过程，需要对我们的观察所得进行反思，以区分其具体的情景，追踪其结果。而在后者而言，我们所经验的事情本身就是我们从具体境况中推断出的结果，或者极为相似。罗马皇帝提比略（43BC—37AD）和尼禄（37AD—68AD）的统治让我们恐惧的是，倘若我们的君主不受法律和议会的约束，我们可能也会遭遇同样的暴政。不过，只要我们稍许思考就会发现，我们从私人生活中见到的欺骗和残忍也足以让我们产生同样的顾虑，因为我们的观察所得向我们揭示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败坏，告诉我们如果把完全信赖托付给人类，必将导致什么样的危害。两种情况下，我们最终都是从经验中得出的推断和结论。

There is no man so young and inexperienced, as not to have formed, from observation, many general and just maxims concerning human affairs and the conduct of life; but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when a man comes to put these in practice, he will be extremely liable to error, till time and farther experience both enlarge these maxims, and teach him their proper use and application. In every situation or incident, there are many particular and seemingly minute circumstances, which the man of greatest talent is, at first, apt to overlook, though

on them the justness of his conclusions, and consequently the prudence of his conduct, entirely depend. Not to mention, that, to a young beginner, the general observations and maxims occur not always on the proper occasions, nor can be immediately applied with due calmness and distinction. The truth is, an unexperienced reasoner could be no reasoner at all, were he absolutely unexperienced; and when we assign that character to any one, we mean it only in a comparative sense, and suppose him possessed of experience, in a smaller and more imperfect degree.

任何人，无论多么年轻、多么没有经验，都能从自己的观察中形成关于人类生活的普遍的、正确的诸多原则。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人若要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践，那是非常容易犯错误的，他还需要时间和更多的经验帮助他拓展这些准则，并学会如何正确地运用它们。在各种情况下，一个人哪怕天赋极高，一开始总会忽视一些具体的、看似细微的情节，而他的判断是否正确，行为是否谨慎，却往往完全取决于这些细节。更不用说，对于年轻的涉世未深的人而言，并非总是能从适当的情况下提炼出普遍的观察和原则，也不能立即冷静地、谨慎地把这些原则排上用场。事实上，一个没有经验的人，若是真的毫无经验，根本就不能做任何推理。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没有经验，只是相对而言，是说他的经验较少或经验不足。

Custom, then, is the great guide of human life. It is that principle alone which renders our experience useful to us, and makes us expect, for the future, a similar train of events with those which have appeared in the past. Without the influence of custom, we should be entirely ignorant of every matter of fact beyond what is immediately present to the memory and senses. We should never know how to adjust means to ends, or to employ our natural powers in the production of any effect. There would be an end at once of all action, as well as of the chief part of speculation.

所以，习惯是人类生活的伟大向导。正是由于习惯这个原则，我们过去的经验才有用处，我们才会期待，未来我们见到过去曾经见过的事物时，其也会产生相似的结果。没有习惯的影响，我们将完全无法了解一切不在我们记忆和感官范围内的事物。我们就不知道怎样调整手段以达成目的，不知道利用我们天生的能力去获得我们想要的结果。这样的话，一切行动一旦结束便会立刻终止，我们大部分思辨活动也是如此。

But here it may be proper to remark, that though our conclusions from experience carry us beyond our memory and senses, and assure us of matters of fact which happened in the most distant places and most remote ages, yet some fact must always be present to the senses or memory, from which we may first proceed in drawing these conclusions. A man, who should find in a desert country the remains of pompous buildings, would conclude that the country had, in ancient times, been cultivated by civilized inhabitants; but did nothing of this nature occur to him, he could never form such an inference. We learn the events of former ages from history; but then we must peruse the volumes in which this instruction is contained, and thence carry up our inferences from

one testimony to another, till we arrive at the eyewitnesses and spectators of these distant events. In a word, if we proceed not upon some fact, present to the memory or senses, our reasonings would be merely hypothetical; and however the particular links might be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the whole chain of inferences would have nothing to support it, nor could we ever, by its means, arrive at the knowledge of any real existence. If I ask why you believe any particular matter of fact, which you relate, you must tell me some reason; and this reason will be some other fact, connected with it. But as you cannot proceed after this manner, in infinitum, you must at last terminate in some fact, which is present to your memory or senses; or must allow that your belief is entirely without foundation.

但是这里我们恰好可以指出，尽管来自经验的结论让我们超越了记忆和感官，能够确知发生在遥远时空的事情，但是，必须首先有什么事实呈现给我们的记忆和感官，我们才能推断出结论。一个人在荒郊野岭发现了宏伟建筑的废墟，他会推断，这个地方在古代曾是文明人生活的场所。但是如果他从没见过建筑物的废墟，也就不会得出这个结论。我们从历史中了解古代的事件，但是我们必须先翻阅记载有这些事件的史册，才能从一个证据推出另一个证据，直到我们找出远古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旁观者。一句话，如果我们不从记忆和感官中的事实出发，我们的推论就仅仅是猜想，无论其中有什么样的具体联系，我们整个的推理链条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更不能以这样的方式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任何知识。假如我问你，你为什么相信你提及的某个事实，你会给我举出某个理由，这个理由本身又是与之有关的别的事实。但是，你不能永无止境地用这种方式继续说下去，最终必须结束于某个记忆或感官中的事实，否则你必须承认，你的信念是毫无基础的。

What, then, is the conclusion of the whole matter? A simple one; though, it must be confessed, pretty remote from the common theories of philosophy. All belief of matter of fact or real existence is derived merely from some object, present to the memory or senses, and a customary conjunction between that and some other object. Or in other words; having found, in many instances, that any two kinds of objects—flame and heat, snow and cold—have always been conjoined together; if flame or snow be presented anew to the senses, the mind is carried by custom to expect heat or cold, and to believe that such a quality does exist, and will discover itself upon a nearer approach. This belief is the necessary result of placing the mind in such circumstances. It is an operation of the soul, when we are so situated, as unavoidable as to feel the passion of love, when we receive benefits; or hatred, when we meet with injuries. All these operations are a species of natural instincts, which no reasoning or process of the thought and understanding is able either to produce or to prevent.

那么我们的整体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结论很简单，但是必须承认，它和常见的哲学理论相去甚远。一切关于客观事实和真实存在的信念均来自记忆和感官中的某个事物，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习惯性联系。或者换一种说法，由于我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两种事物，比如火和热、雪和冷，总是联系在一起，如果火或者雪再次出现在感官里，心灵由于习惯的引导就会想到热或者冷，并且由于相信这些特征确实存在，大脑会选择更加捷径的方法来揭示出这一点。这种信念是把心灵放入具体情境的必然结果。这是心灵在特定情况下的反应，就像我们在得到恩惠时不可避免地感受到爱心，而受到伤害时则会感到仇恨一样。所有这些心灵的反应都是一种自然的本能，不是任何推理或思维和理解过程能够引起的，或能够阻碍其发生的。

At this point, it would be very allowable for us to stop our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In most questions we can never make a single step farther; and in all questions we must terminate here at last, after our most restless and curious enquiries. But still our curiosity will be pardonable, perhaps commendable, if it carry us on to still farther researches, and make us examine more accurately the nature of this belief, and of the customary conjunction, whence it is derived. By this means we may meet with some explications and analogies that will give satisfaction; at least to such as love the abstract sciences, and can be entertained with speculations, which, however accurate, may still retain a degree of doubt and uncertainty. As to readers of a different taste; the remaining part of this section is not calculated for them, and the following enquiries may well be understood, though it be neglected.

到了这一步，如果我们停止我们的哲学研究，应该是完全可以的。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们无法再向前推进一步；在所有的问题上，我们在无休止的、充满好奇的探索之后，最终也得停下脚步。但是，如果我们的好奇心引领我们继续向前，去探索这种信念的本质，并对产生这一信念的习惯性联系做更加精确的研究，不仅情有可原，或许还值得赞赏。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或许能找到一些解释和类比，至少可以让我们对抽象科学的热爱得到满足，并且能够接纳无论多么准确也依然带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不确定的哲学思辨。对于品位不同的读者而言，本章余下的部分不是为他们写的。就算忽略下面这一节，后面的研究也完全可以理解。

Part II

第二节

Nothing is more free than the imagination of man; and though it cannot exceed that original stock of ideas furnished b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nses, it has unlimited power of mixing, compounding, separating, and dividing these ideas, in all the varieties of fiction and vision. It can feign a train of events, with all the appearance of reality, ascribe to them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conceive them as existent, and paint them out to itself with every circumstance, that belongs to any historical fact, which it believes with the greatest certainty. Wherein, therefore, consis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h a fiction and belief? It lies not merely in any peculiar idea, which is annexed to such a conception as commands our assent, and which is wanting to every known fiction. For as the mind has authority over all its ideas, it could voluntarily annex this particular idea to any fiction, and consequently be able to believe whatever it pleases; contrary to what we find by daily experience. We can, in our conception, join the head of a man to the body of a horse; but it is not in our power to believe that such an animal has ever really existed.

没有什么比人的想象更自由。尽管想象不能超出我们内部和外部感官提供的思想库藏，但是，它可以不受限制地对这些想法进行混合、组装、拆分和切割，而且可以按其尽情虚构和幻想的各种方式进行。想象可以虚构一连串逼真的事件，就像真实的一样，为它们确定具体的时间地点，把它们构想成真实的存在，绘声绘色地为其描绘各种情节，各种我们坚信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所具备的情节。那么，这样的虚构和信念的差异何在？二者之别并不在于某个特定的观念，它只和得到我们认同的某种概念相关，而在任何虚构的思想中都没有踪影。因为既然我们的心灵对其所有的想法有着控制权，它可以自发地把这个想法和任何虚构结合起来，并相信它愿意相信的任何东西，完全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情形相反。我们可以在想象中把人的头加在马的身上，虽然我们不相信真有过这样的动物存在。

It follows, therefore,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ction and belief lies in some sentiment or feeling, which is annexed to the latter, not to the former, and which depends not on the will, nor can be commanded at pleasure. It must be excited by nature, like all other sentiments; and must arise from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in which the mind is placed at any particular juncture. Whenever any object is presented to the memory or senses, it immediately, by the force of custom, carries the imagination to conceive that object, which is usually conjoined to it; and this conception is attended with a feeling or sentiment, different from the loose reveries of the fancy. In this consists the whole nature of belief. For as there is no matter of fact which we believe so firmly that we cannot conceive the contrary, there would b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ception assented to and that which is rejected, were it not for some sentiment which distinguishes the one from the other. If I see a billiard-ball moving towardsanother, on a smooth table, I can easily conceive it to stop upon contact. This conception implies no contradiction; but still it feels very differently from that conception by which I represent to myself the impulse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motion from one ball to another.

由此看来，虚构与信念间的区别在于某种情感或感觉，这种情感与信念结合在一起，而与虚构无关，它依赖我们的意愿，不是我们随心所欲能掌控的。像其他一切情感一样，它必须由自然中的事物所激发，必须从我们的心灵所处的具体情景中产生出来。一旦某种事物出现在我们的记忆和感官里，由于习惯的作用，它会立刻引领我们想到与之相关的事物，而这个构想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某种特定的感觉或情感，和漫无目的的遐想是不同的。这里包含了信念的全部本质。既然不存在我们确信无疑，以至不能想象其反面的事物，那么，要不是因为我们心灵中对不同事物带有不同的情感，我们就无法区分我们赞成

的概念和我们反对的概念。我看见一颗弹子球在平滑的桌面上向另一颗移动，能轻易地想象它在触碰到第二颗球时会立刻停止下来。这个想法并无矛盾，但是，这与我的另一种想法却有很大区别，即它在触碰第二颗球后会把动能传递给第二颗球。

Were we to attempt a definition of this sentiment, we should, perhaps, find it a very difficult, if not an impossible task; in the same manner as if we should endeavour to define the feeling of cold or passion of anger, to a creature who never had any experience of these sentiments. Belief is the true and proper name of this feeling; and no one is ever at a loss to know the meaning of that term; because every man is every moment conscious of the sentiment represented by it. It may not, however, be improper to attempt a description of this sentiment; in hopes we may, by that means, arrive at some analogies, which may afford a more perfect explication of it. I say, then, that belief is nothing but a more vivid, lively, forcible, firm, steady conception of an object, than what the imagination alone is ever able to attain. This variety of terms, which may seem so unphilosophical, is intended only to express that act of the mind, which renders realities, or what is taken for such, more present to us than fictions, causes them to weigh more in the thought, and gives them a superior influence on the passions and imagination. Provided we agree about the thing, it is needless to dispute about the terms. The imagination has the command over all its ideas, and can join and mix and vary them, in all the ways possible. It may conceive fictitious objects with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place and time. It may set them, in a manner, before our eyes, in their true colours, just as they might have existed. But as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is faculty of imagination can ever, of itself, reach belief, it is evident that belief consists not in the peculiar nature or order of ideas, but in the manner of their

conception, and in their feeling to the mind. I confess, that it is impossible perfectly to explain this feeling or manner of conception. We may make use of words which express something near it. But its true and proper name, as we observed before, is *belief* ; which is a term that every one sufficiently understands in common life. And in philosophy, we can go no farther than assert, that belief is something felt by the mind, which distinguishes the ideas of the judgement from the fictions of the imagination. It gives them more weight and influence; makes them appear of greater importance; enforces them in the mind; and renders them the governing principle of our actions. I hear at present, for instance, a person's voice, with whom I am acquainted; and the sound comes as from the next room. This impression of my senses immediately conveys my thought to the person, together with all the surrounding objects. I paint them out to myself as existing at present, with the same qualities and relations, of which I formerly knew them possessed. These ideas take faster hold of my mind than ideas of an enchanted castle.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to the feeling, and have a much greater influence of every kind, either to give pleasure or pain, joy or sorrow.

如果我们尝试给这种情感下定义，就会发现这即便不是不可能，却也非常困难，这就像我们要向一个从未经历过寒冷和愤怒的人解释寒冷和愤怒是什么感觉一样。信念是这一情感恰如其分的名称，谁都能明白这个术语表示的意思，因为每个人随时都在体验它所传达的情感。当然，我们对这一情感做一番描述并无不妥之处，或许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参照，帮助我们对其作更精确的解释。所以我说，信念，与仅凭想象所能得到的结果相比，只不过是我们关于某一事物的更为生动、活泼、有力、坚定、稳固的概念。用这么多的词来解释似乎显得有失哲学性，但目的不外乎想表示那种能够把客观事实，或我们认为的客观事实，更直接呈现给我们的心理活动，使之与

幻想相比，在我们的思想中占更大的分量，并对我们的情感和想象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果我们认可某一事物，就没有必要争论用什么术语的问题。想象对其所有的想法有着控制权，可以用任意可能的方式拼接、混合和变换各种想法。它可以想象具体时空条件下虚构的事物，可以让事物以适当的色彩呈现在我们眼前，仿佛它们真正存在过。但是，由于想象力不可能靠自身产生信念，显然信念不在于思想和观念的特有品质或类型，而在于我们的心灵构想这些观念的方式，以及这些观念在心灵中留下的感觉。我承认，我们不可能对这种感觉或构想观念的方式作出理想的解释。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可以词语表达与之接近的概念，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它的恰如其分的名称就是“信念 ”，这是日常生活中人人都能充分理解的术语。在哲学上，我们除了说，信念就是区分明确判断的观念和想象的虚构之物的一种心灵感受，此外别无他法。信念让这些观念在我们心中占有更大的分量，显得更加重要，把它们内化于我们心中，使之成为引领我们生活的准则。比如现在我听见一个熟人的声音从隔壁房间传过来，我感官中获得的具体印象立刻让我想到这个人，连同他周围具体的事物。我想象中这些事物就在我眼前，各自的特点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就像我从前见过的一样。这些观念在我心中比一座被施以魔法的城堡留下的印象还要深刻。它们会引起非常不同的感觉，并对心灵产生更大的影响，无论是高兴与痛苦，或是欢乐和忧伤。

Let us, then, take in the whole compass of this doctrine, and allow, that the sentiment of belief is nothing but a conception more intense and steady than what attends the mere fictions of the imagination, and that this manner of conception arises from a customary conjunction of the object with something present to the memory or senses. I believe that it will not be difficult, upon these suppositions, to find other operations of the mind analogous to it, and to trace up these phenomena to principles still more general.

现在，我们暂且接受这个学说的全部内容，承认信念这一情感只不过是比想象的虚构更加强烈、更加稳固的一种构想，形成这一构想的方式来自于外界某一事物与我们记忆或感官中的另一事物间习惯性的联系。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我相信我们不难发现与信念类似的其他心理活动，并从所有这些现象中推断出更具有普遍性的原则。

We have already observed that nature has established connexions among particular ideas, and that no sooner one idea occurs to our thoughts than it introduces its correlative, and carries our attention towards it, by a gentle and insensible movement. These principles of connexion or association we have reduced to three, namely, Resemblance, Contiguity and Causation; which are the only bonds that unite our thoughts together, and beget that regular train of reflection or discourse, which, in a greater or less degree, takes place among all mankind. Now here arises a question, on which the solution of the present difficulty will depend. Does it happen, in all these relations, that, when one of the objects is presented to the senses or memory, the mind is not only carried to the conception of the correlative, but reaches a steadier and stronger conception of it than what otherwise it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attain? This seems to be the case with that belief which arises from the 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And if the case be the same with the other relations or principles of associations, this may be established as a general law, which takes place in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mind.

上文中我们谈到，自然在各种具体观念间建立了联系，一旦一个观念进入我们的思想，就会立刻令我们想到与之相关的事物，以微妙的方式让我们不知不觉地注意到它们。我们已经把观念间的联系精简到三种，即相似性、连续性和因果关系。唯有这些纽带能把我们的想

法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思考或对话显得前后连贯，这一点或多或少是全人类共有的。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解决目前的疑难就取决于这一问题。在所有这些关系中，会不会出现如下的情形呢？当某物出现在感官或记忆中，不仅吸引我们的心灵注意到与之相关的事物，而且在我们心中形成一个更加稳固、更加深刻的构想，是该事物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感官或记忆的情形无法相比的。这似乎就是从因果关系中衍生出来的信念。如果其他的关系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形，就可以把它作为一条普遍的法则，适用于一切心理活动。

We may, therefore, observe, as the first experiment to our present purpose, that, up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picture of an absent friend, our idea of him is evidently enlivened by the resemblance, and that every passion, which that idea occasions, whether of joy or sorrow, acquires new force and vigour. In producing this effect, there concur both a relation and a present impression. Where the picture bears him no resemblance, at least was not intended for him, it never so much as conveys our thought to him; and where it is absent, as well as the person, though the mind may pass from the thought of the one to that of the other, it feels its idea to be rather weakened than enlivened by that transition. We take a pleasure in viewing the picture of a friend, when it is set before us; but when it is removed, rather choose to consider him directly than by reflection in an image, which is equally distant and obscure.

因此，作为当前研究目标的第一个实验，我们可以注意到，一旦我们看见一位不在身边的朋友的画像，我们心中有关他的观念就被相似性所激活，由此引起的每一种情感，无论是欢乐还有忧伤，都变得强烈而鲜活。一种联系和眼前的印象同时出现，产生了这一结果。如果这幅画像不像我的朋友，或者至少不是为他而画的，就绝不会让我

们想到他。如果没有画像，人也不在身边，尽管我们心中的思绪会从一个想法过渡到另一个想法，但是这样形成的想法和由具体事物激活的想法相比，就暗淡多了。如果朋友的画像在眼前，我们看着会高兴；但如果把画像拿走，我们会直接想到朋友，而不是想到他的像，因为这时那画像和人一样遥远模糊。

The ceremonies of the Roman Catholic religion may be considered as instances of the same nature. The devotees of that superstition usually plead in excuse for the mummeries, with which they are upbraided, that they feel the good effect of those external motions, and postures, and actions, in enlivening their devotion and quickening their fervour, which otherwise would decay, if directed entirely to distant and immaterial objects. We shadow out the objects of our faith, say they, in sensible types and images, and render them more present to us by the immediate presence of these types, than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do merely by an intellectual view and contemplation. Sensible objects have always a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fancy than any other; and this influence they readily convey to those ideas to which they are related, and which they resemble. I shall only infer from these practices, and this reasoning, that the effect of resemblance in enlivening the ideas is very common; and as in every case a resemblance and a present impression must concur, we are abundantly supplied with experiments to prove the reality of the foregoing principle.

照此看来，罗马天主教的各种仪式具有相同的性质。这一宗教的信徒们因其愚蠢虚伪的仪式遭到世人谴责，而他们则寻求各种托词辩护说，他们感到那些外在的动作、姿势和行为能够激活他们的宗教虔诚、增强他们的宗教激情。相反，如果借助遥远的、非物质的事物，这样的宗教情感就会衰减。他们说，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化成可以感知

的类型和形象，让它们更直接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是仅仅靠想象和思考不能实现的。与其他任何事物相比，可以感知的事物能对头脑和心灵产生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很快和与事物相关、与之具有相似性的观念联系起来。我从这类行为以及这一推理过程中得出的结论仅仅是，相似性激活观念的情形非常普遍。而且，由于每一种情况下都必然是相似性和事物的直接印象同时出现，我们就有大量的实验可以证明上述原则的真实性。

We may add force to these experiments by others of a different kind, in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contiguity as well as of resemblance. It is certain that distance diminishes the force of every idea, and that, upon our approach to any object; though it does not discover itself to our senses; it operates upon the mind with an influence, which imitates an immediate impression. The thinking on any object readily transports the mind to what is contiguous; but it is only the actual presence of an object, that transports it with a superior vivacity. When I am a few miles from home, whatever relates to it touches me more nearly than when I am two hundred leagues distant; though even at that distance the reflecting on any thing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my friends or family naturally produces an idea of them. But as in this latter case, both the objects of the mind are ideas; notwithstanding there is an easy transition between them; that transition alone is not able to give a superior vivacity to any of the ideas, for want of some immediate impression. [5_1]

我们可以用不同类型的实验来增强这些实验的说服力，来考察连续性以及相似性的效果。显然，距离会削弱任何观念的强度，我们在应对事物的时候，尽管该事物没有直接出现在我们的感官里，但它会在我们心中产生影响，这一影响和直接接触形成的印象相似。我们想

到某一事物时，心里很快就会想到与之相关的一切，但是只有事物真实地出现，才能留下鲜明的印象。当我在离家几英里远的地方时候，周围的环境显然比我在200里格（约合600英里）外时更能给我留下亲近的感觉，尽管当我们置身如此遥远的距离之外时，想到朋友或自家附近的任何东西仍然会让我们想到朋友或家人。但是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心里出现的不过是两种观念。虽然二者可以轻易转换，但是由于缺乏直接的印象，仅凭转换不能让这些想法变得鲜明起来。[6_1]

No one can doubt but causation has the same influence as the other two relations of resemblance and contiguity. Superstitious people are fond of the reliques of saints and holy men,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they seek after types or images, in order to enliven their devotion, and give them a more intimate and strong conception of those exemplary lives, which they desire to imitate. Now it is evident, that one of the best reliques, which a devotee could procure, would be the handywork of a saint; and if his cloaths and furniture are ever to be considered in this light, it is because they were once at his disposal, and were moved and affected by him; in which respect they are to be considered as imperfect effects, and as connected with him by a shorter chain of consequences than any of those, by which we learn the reality of his existence.

没有人会怀疑因果关系也像相似性和连续性性一样具有同样的影响。迷信的人喜爱圣人们的遗物，同样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实物和形象激活他们的宗教热情，让他们对于自己渴望效仿的那些圣人的生活有更加密切、更加深刻的概念。显然，一个追随者所能获得的最好的遗物之一就是圣人亲手制作的东西。如果说圣人留下的衣物和家具也可以当作他的遗物的话，那是因为这些东西曾经为其所用，带有他活动和情感的气息。从这个角度看，这些物品只能被当作不完美的遗物，和那些我们可以由之了解圣人真实生活的物品相比，它们与圣

人生活的联系就要更浅一些。

Suppose, that the son of a friend, who had been long dead or absent, were presented to us; it is evident, that this object would instantly revive its correlative idea, and recall to our thoughts all past intimacies and familiarities, in more lively colours than they would otherwise have appeared to us. This is another phaenomenon, which seems to prove the principle above mentioned.

假如一位友人早已逝去，或早已不在身边，可突然有一天他的儿子出现在我们面前，那很显然，朋友儿子的出现会立刻激起与之相联系的观念，让我们想起过去和朋友亲密相处的时光和彼此间的熟悉感，一切都显得格外真实，历历在目。这似乎是可以证明上述原则的另一种现象。

We may observe, that, in these phaenomena, the belief of the correlative object is always presupposed; without which the relation could have no effect. The influence of the picture supposes, that we believe our friend to have once existed. Contiguity to home can never excite our ideas of home, unless we believe that it really exists. Now I assert, that this belief, where it reaches beyond the memory or senses, is of a similar nature, and arises from similar causes, with the transition of thought and vivacity of conception here explained. When I throw a piece of dry wood into a fire, my mind is immediately carried to conceive, that it augments, not extinguishes the flame. This transition of thought from the cause to the effect proceeds not from reason. It derives its origin altogether from custom and experience. And as it first begins from an object,

present to the senses, it renders the idea or conception of flame more strong and lively than any loose, floating reverie of the imagination. That idea arises immediately. The thought moves instantly towards it, and conveys to it all that force of conception,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impression present to the senses. When a sword is levelled at my breast, does not the idea of wound and pain strike me more strongly, than when a glass of wine is presented to me, even though by accident this idea should occur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the latter object? But what is there in this whole matter to cause such a strong conception, except only a present object and a customary transition of the idea of another object, which we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conjoin with the former? This is the whole operation of the mind, in all our conclusions concerning matter of fact and existence; and it is a satisfaction to find some analogies, by which it may be explained. The transition from a present object does in all cases give strength and solidity to the related idea.

我们可以说，在这些现象中，相信相关事物的存在总是一个先决条件，离开了它就没有二者间关系产生的影响。朋友的画像之所以能产生影响，是因为我们相信的确有过这样一位朋友。离家很近的地方绝不会引起我们想到家，除非我们相信家确实存在。我肯定地说，这种超越记忆和感官的信念，正如上文解释过的思想的转换以及概念的鲜明程度一样，二者具有相似的性质和相似的来源。我把一块干柴扔进火里，心里立刻就会想到，干柴会助长火势，而不是让火熄灭。这个从原因到结果的思想转换并不是从推理中得来的，而是整个来源于习惯和经验。因为这一转换过程始于呈现在我们感官面前的具体事物，就使得我们对于火势的观念或概念比其他随意的、漂浮不定的遐想显得更加强烈生动。这个观念是瞬间出现的，我们的思想立刻趋向它，并把感官里的印象鲜活地传递到它上面。尽管葡萄酒的出现或许碰巧会引起伤痛的感觉，但是，一把剑放在胸前难道不比一杯酒摆在

面前更能激起我强烈的伤害和疼痛的感觉？在整个过程中，除了某种在场的事物和由其向另一相关事物的观念的习惯性转移之外，还有什么能让我们产生如此强烈鲜明的观念？这是我们针对事实和存在的全部结论中整个的心理活动过程。令人满意的是，我们找到了一些可以对其进行解释的参照。在一切情况下，从在场的事物转换到相关的观念总是能让该观念变得鲜明有力。

Here, then, is a kind of pre-established harmony between the course of nature and the succession of our ideas; and though the powers and forces, by which the former is governed, be wholly unknown to us; yet our thoughts and conceptions have still, we find, gone on in the same train with the other works of nature. Custom is that principle, by which this correspondence has been effected; so necessary to the subsistence of our species, and the regulation of our conduct, in every circumstance and occurrence of human life. Had not the presence of an object, instantly excited the idea of those objects, commonly conjoined with it, all our knowledge must have been limited to the narrow sphere of our memory and senses; and we should never have been able to adjust means to ends, or employ our natural powers, either to the producing of good, or avoiding of evil. Those, who delight in the discovery and contemplation of final causes, have here ample subject to employ their wonder and admiration.

在自然进程和我们的思想观念的发展之间有一种预先建立的和谐关系。尽管我们不知道支配自然的力量为何物，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自然的其他作品是同向而行的。习惯就是这一联系得以实现的原则，它对于人类的生存非常必要，能在人类生活的各种情况下调整我们的行为。如果不是由于一事物的出现立刻促使我们产生了与之相关的其他事物的观念，我们所有的知识将被限制在记忆和感官的

狭窄范围内，我们绝不可能采用适当的手段实现我们的目的，也不可能发挥我们的智力来造福于人，或消灾避邪。那些乐于揭示和思考事物的终极原因的人，在这个话题上有充分的空间尽情发挥他们的奇思妙想。

I shall add, for a further confirmation of the foregoing theory, that, as this operation of the mind, by which we infer like effects from like causes, and vice versa, is so essential to the subsistence of all human creatures, it is not probable, that it could be trusted to the fallacious deductions of our reason, which is slow in its operations; appears not, in any degree,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infancy; and at best is, in every age and period of human life, extremely liable to error and mistake. It is more conformable to the ordinary wisdom of nature to secure so necessary an act of the mind, by some instinct or mechanical tendency, which may be infallible in its operations, may discover itself at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life and thought, and may be independent of all the laboured deductions of the understanding. As nature has taught us the use of our limbs, without giving us the knowledge of the muscles and nerves, by which they are actuated; so has she implanted in us an instinct, which carries forward the thought in a correspondent course to that which she has established among external objects; though we are ignorant of those powers and forces, on which this regular course and succession of objects totally depends.

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理论，我要补充的是，我们可以依据心理活动从相似的原因推断出相似的结果，或者相反，由于这一心理活动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不可能把它交付给不可靠的演绎推理来完成。这种推理是一个缓慢的心理过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在婴幼儿早

期可以进行演绎推理；而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即便得到最好的发挥，这推理也是极易犯错误的。更符合自然智慧的是，应该由某种本能或心理机制来进行这一必要的心理活动，因为本能或心理机制不会出现错误，这可能是生命和思想一开始就有的，而且或许和繁琐的演绎推理无关。正如自然教会我们如何使用四肢，却没有赋予我们有关肌肉和神经的任何知识一样，它也在我们身上植入了某种本能，引领我们的思想按照相应的进程抵达她在外部事物中建立的规律，尽管我们对于这一进程以及相关事物所依赖的的各种力量一无所知。

[5_1]."Naturane nobis, inquit, datum dicam, an errore quodam, ut, cum ea loca videamus, in quibus memoria dignos viros acceperimus multum esse versatos, magis moveamur, quam siquandoeorum ipsorum aut facta audiamus aut scriptum aliquodlegamus?Velut ego nunc moveor. Venit enim mihi Plato in mentem, quera accepimus primum hic disputare solitum: cuius etiam illi hortuli propinqui non memoriam solum mihi afferunt, sed ipsum videntur in conspectumeo hic ponere. Hic Speusippus, hic Xenocrates, hic eius auditor Polemo; cuius ipsa illa sessio fuit, quam videmus. Equidem etiam curiam nostram, Hostiliam dico, non hanc novam, quae mihi minor esse videtur postquam est maior, solebam intuens, Scipionem, Catonem, Laelium, nostrum vero in primis avum cogitare. Tanta visadmonitionisest in locis; ut non sine causa ex his memoriae deducta sit disciplina."

[6_1].“一个人在来到了传说中的古代名人常去之处后，听别人讲述他们的行为，比只读他们的书籍所引起的情感更强烈。我不确定这是人类的自然本能还是幻觉。此刻我的感情正是如此。我听说第一个哲学家柏拉图常在此处和人讨论问题。确实，我旁边的这个花园不仅使我想到他，而且仿佛把他带到了我面前。这是斯珀西波斯、色诺克拉底以及色诺克拉底的弟子波莱谟常来的地方，这些人常坐在我们所见的那个座位上。在我看来，就是我们本国的元老院（我指的是赫斯提亚元老院，而不是新的那个，因为现在这个元老院扩建后似乎比以前还小），一见之后也常使我想起西庇阿、加图、拉埃柳斯，尤其是我们的祖父。一个地方竟有如此强的暗示能力，怪不得科学的记忆训练方法是建立在方位关系上的。”——摘自西塞罗《论至善和至恶》第五卷。

Section VI　Of Probability

第六章　论可然性

Though there be no such thing as Chance in the world; our ignorance of the real cause of any event has the same influence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begets a like species of belief or opinion. [6_1]

虽然世界上没有“概率”这样的东西存在，但是我们对于事件背后真实原因的无知也会对理解过程产生同样的影响，并得出一种与“概率”类似的信念或意见。 [7_1]

There is certainly a probability, which arises from a superiority of chances on any side; and according as this superiority increases, and surpasses the opposite chances, the probability receives a proportionable increase, and begets still a higher degree of belief or assent to that side, in which we discover the superiority. If a die were marked with one figure or number of spots on four sides, and with another figure or number of spots on the two remaining sides, it would be more probable, that the former would turn up than the latter; though, if it had a thousand sides marked in the same manner, and only one side different, the probability would be much higher, and our belief or expectation of the event more steady and secure. This process of the thought or reasoning may seem trivial and obvious; but to those who consider it more narrowly, it may, perhaps, afford matter for curious speculation.

任何一方如果有更多的概率，肯定会产生一种可然性，而且随着这一优势增加，超过对方的概率，可然性也会按比例相应提高，使得具有优势的一方得到更大程度的信念或认同。如果一个骰子的四面都标着相同的数字或同样数量的点子，其余两面标着另一数字或另一数量的点子，那么，我们在掷骰子时，前一个数字或相同数量的点子朝上面的可然性就更大。但是，如果骰子有一千个面标有同一数字或相同数量的点子，只有一个面不同，前者出现面朝上的可然性就高得多，而我们相信和期待其出现的程度也更稳固、更安全。这个思考和推理过程也许显得微不足道，不言自明，然而对于那些想要做更细致研究的人们而言，这或许是一个值得他们深入探索的话题。

It seems evident, that, when the mind looks forward to discover the event, which may result from the throw of such a die, it considers the turning up of each particular side as alike probable; and this is the very nature of chance, to render all the particular events, comprehended in it, entirely equal. But finding a greater number of sides concur in the one event than in the other, the mind is carried more frequently to that event, and meets it oftener, in revolving the various possibilities or chances, on which the ultimate result depends. This concurrence of several views in one particular event begets immediately, by an inexplicable contrivance of nature, the sentiment of belief, and gives that event the advantage over its antagonist, which is supported by a smaller number of views, and recurs less frequently to the mind. If we allow, that belief is nothing but a firmer and stronger conception of an object than what attends the mere fictions of the imagination, this operation may, perhaps, in some measure, be accounted for. The concurrence of these several views or glimpses imprints the idea more strongly on the imagination; gives it superior force and vigour; renders its influence on the passions and affections more sensible; and in a word, begets that reliance or security, which constitutes the nature of belief and

opinion.

显而易见，我们的心灵在企图揭示像掷骰子这样的事件之谜时，会认为骰子的每一面朝上的概率是一样的，这便是概率的本质，就是让一事件中所包含的各个具体情形具有完全平等的机会。但是，当我们发现骰子大量的面同时出现在一种情形的概率大于同时出现在另一种情形的概率时，我们的思想就会更频繁地关注这一情形，和它相遇也更频繁，以求了解最终结果所依赖的各种可然性和概率。多次出现的同样情形，在自然不可解释的机缘作用下，立刻在我们心中生出信念的情感，并给予这一情形较其对立的一方更大的优势，因为与其对立的一方出现次数要少，在人心灵中呈现的频率也更低。如果我们承认，信念与想象的虚构相比，只不过是关于某事物的更坚定、更深刻的观念，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一活动。多次见到或瞥见同一情形，这情形便在我们的想象中印下更深刻的观念，变得生动有力，对我们的情感产生更强烈的影响；一句话，使我们产生一种信赖感和安全感，这便是信念或意见的本质。

The case is the same with the probability of causes, as with that of chance. There are some causes, which are entirely uniform and constant in producing a particular effect; and no instance has ever yet been found of any failure or irregularity in their operation. Fire has always burned, and water suffocated every human creature; the production of motion by impulse and gravity is a universal law, which has hitherto admitted of no exception. But there are other causes, which have been found more irregular and uncertain; nor has rhubarb always proved a purge, or opium a soporific to every one, who has taken these medicines. It is true, when any cause fails of producing its usual effect, philosophers ascribe not this to any irregularity in nature; but suppose, that some secret causes, in the particular structure of parts, have prevented the operation. Our

reasonings, however, and conclusions concerning the event are the same as if this principle had no place. Being determined by custom to transfer the past to the future, in all our inferences; where the past has been entirely regular and uniform, we expect the event with the greatest assurance, and leave no room for any contrary supposition. But where different effects have been found to follow from causes, which are to appearance exactly similar, all these various effects must occur to the mind in transferring the past to the future, and enter into our consideration, when we determine the probability of the event. Though we give the preference to that which has been found most usual, and believe that this effect will exist, we must not overlook the other effects, but must assign to each of them a particular weight and authority, in proportion as we have found it to be more or less frequent. It is more probable, in almost every country of Europe, that there will be frost sometime in January, than that the weather will continue open throughout that whole month; though this probability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limates, and approaches to a certainty in the more northern kingdoms. Here then it seems evident, that, when we transfer the past to the future,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which will result from any cause, we transfer all the different events,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they have appeared in the past, and conceive one to have existed a hundred times, for instance, another ten times, and another once. As a great number of views do here concur in one event, they fortify and confirm it to the imagination, beget that sentiment which we call belief, and give its object the preference above the contrary event, which is not supported by an equal number of experiments, and recurs not so frequently to the thought in transferring the past to the future. Let any one try to account for this operation of the mind upon any of the received systems of philosophy, and he will be sensible of the difficulty. For my part, I shall think it sufficient, if the present hints

excite the curiosity of philosophers, and make them sensible how defective all common theories are in treating of such curious and such sublime subjects.

原因的可然性和概率的可然性是同样的情形。某些原因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导致某一特定的结果，从未有过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或出现其他异常的时候。火总会燃烧，水总是淹死人。物体受到撞击或受引力作用而动起来，这是一项普遍法则，从未有过例外。但是另一些原因出现异常或不确定结果的情形就更多。大黄不是对每个人都能起到催泻通便的作用，鸦片也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安眠的功效。的确，当某种原因没能产生其通常的结果时，哲学家们并不将其归咎于自然界中的任何异常情形，而是认为在事物具体结构中有某种神秘因素阻碍了结果的出现。然而，我们关于事件的推论和结论却并不受这个例外的影响，就仿佛不存在这样的例外似的。在我们所有推理中，由于习惯决定了我们把过去的经历转移到未来的情形，当过去的情况完全一致地合符规律时，我们就会满怀信心地期待结果也会一样，不会留下任何余地去做出相反的假设。但是，一旦发现非常相似的原因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所有这些不同的结果在我们把过去的经验转移到未来时就会进入我们心中，成为我们判断某一结果的可然性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尽管我们会优先考虑最通常的情形，相信这样的结果会继续出现，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其他可能的结果，而且必须根据我们观察到这些结果出现的实际情形按比例确定每一种结果的可然性比重。几乎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每年一月份下霜的可然性就比这个月里天气持续晴朗的可然性更大。当然，各国气候条件有差异，这种可然性也有程度变化，但是，越靠近北边，可然性就越加变得确信无疑。似乎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把过去的经验转移到未来以确定某一原因导致某一结果的可然性时，我们是把各种不同的情况按其过去出现的实际频度同时转移，比如会考虑到某一结果已经出现过100次，另一结果出现过10次，另一结果只出现过1次，等等。同一结果出现的次数很多，就会在我们的想象中得到强化和加深，形成我们所谓信念的情感，使之与其对立的情形相比更占优势，因为与之相反的情况没有得到同等数

量的出现次数的支持，当我们把过去转移到未来时，它在我们的思想中出现的频度更低。请任何人用现有的各种哲学理论来解释这一心理活动，他都会立刻感到棘手。对我而言，如果目前提出的一些看法能够激起哲学家们的好奇心，让他们感觉到，现有的哲学理论在应对这些值得探索的崇高话题时存在多大的缺陷，我想就足够了。

[6_1].Mr. Locke divides all arguments into demonstrative and probable. In this view, we must say, that it is only probable that all men must die, or that the sun will rise tomorrow. But to conform our language more to common use, we ought to divide arguments into demonstrations, proofs, and probabilities. By proofs meaning such arguments from experience as leave no room for doubt or opposition.

[7_1].洛克先生把所有论证分为演示性（可证明性）和可能性两类。照此观点，我们必须说，所有人可能会有一死，或者明天太阳可能会升起来。但是，我们的语言若要更加符合日常运用，则应该将论证分为可演示性，确证性和可能性。所谓确证性指的是经过经验证明，不容质疑和反对的论证。

Section VII　Of the Idea of Necessary Connexion

第七章　论必然联系的观念

Part I

第一节

The great advantage of the mathematical sciences above the moral consists in this, that the ideas of the former, being sensible, are always clear and determinate, the smallest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is immediately perceptible, and the same terms are still expressive of the same ideas, without ambiguity or variation. An oval is never mistaken for a circle, nor a hyperbola for an ellipsis. The isosceles and scalenum are distinguished by boundaries more exact than vice and virtue, right and wrong. If any term be defined in geometry, the mind readily, of itself, substitutes, on all occasions, the definition for the term defined; or even when no definition is employed, the object itself may be presented to the senses, and by that means be steadily and clearly apprehended. But the finer sentiments of the mind, the operations of the understanding, the various agitations of the passions, though really in themselves distinct, easily escape us, when surveyed by reflection; nor is it in our power to recall the original object, as often as we have occasion to contemplate it. Ambiguity, by this means, is gradually introduced into our reasonings; similar objects are readily taken to be the same, and the conclusion becomes at last very wide of the premises.

数学相对于人性科学的巨大优势在于，前者涉及的观点可以感知，都是清晰明确的，观念之间的细微区别可以立刻分辨出来，而且

同样的术语总是表达同样的观念，没有模糊不清，不会发生变化。椭圆就是椭圆，绝不会被当作圆来看；双曲线不会被当作省略号。等腰三角形和不规则三角形的区别比是非善恶间的区别明确得多。如果几何学中的术语得到定义，我们的大脑在各种情况下都会轻松地用定义取代被定义的术语；即使在没有定义可用的时候，只要具体的事物出现在感官面前，我们也能获得清楚的理解。但是，就心灵中更细腻的情感、理解的具体活动、各种躁动的激情而言，尽管各自都是清晰明白的，但当我们去反省这些事物时，却很不容易理解。我们也不能轻易回想起原先的事物，尽管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它。这样，我们的推理就会逐渐产生模糊不清的东西，往往把仅仅相似的事物当作相同的事物，结果导致我们得出的结论和推理所依据的前提相去甚远。

One may safely, however, affirm, that, if we consider these sciences in a proper light,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nearly compensate each other, and reduce both of them to a state of equality. If the mind, with greater facility, retains the ideas of geometry clear and determinate, it must carry on a much longer and more intricate chain of reasoning, and compare ideas much wider of each other, in order to reach the abstruser truths of that science. And if moral ideas are apt, without extreme care, to fall into obscurity and confusion, the inferences are always much shorter in these disquisitions, and the intermediate steps, which lead to the conclusion, much fewer than in the sciences which treat of quantity and number. In reality, there is scarcely a proposition in Euclid so simple, as not to consist of more parts, than are to be found in any moral reasoning which runs not into chimera and conceit. Where we trace the principles of the human mind through a few steps, we may be very well satisfied with our progress; considering how soon nature throws a bar to all our enquiries concerning causes, and reduces us to an acknowledgment of our ignorance. The chief obstacle, therefore, to our improvement in the

moral or metaphysical sciences is the obscurity of the ideas, and ambiguity of the terms. The principal difficulty in the mathematics is the length of inferences and compass of thought, requisite to the forming of any conclusion. And, perhaps, our progress in natural philosophy is chiefly retarded by the want of proper experiments and phaenomena, which are often discovered by chance, and cannot always be found, when requisite, even by the most diligent and prudent enquiry. As moral philosophy seems hitherto to have received less improvement than either geometry or physics, we may conclude, that, if there be any difference in this respect among these sciences, the difficulties, which obstruct the progress of the former, require superior care and capacity to be surmounted.

然而，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如果我们正确地看待这两种科学，各自的优劣几乎可以互补，最终使得两者具有平等的地位。如果我们的大脑能更加娴熟地掌握几何学中那些清楚明确的观念，它也一定能够进行更持久、更精密的推理，把差异很大的观念作对比，以得出几何学中更加深奥的真理。至于人性科学的观念，人们如果稍有粗心，就会觉得晦涩而模糊，但是，相对于和数量数字打交道的科学，人性科学研究的推论过程要短得多，帮助我们得出结论的中间步骤要少得多。事实上，欧几里得的数学里，极少有非常简单的命题，它们哪一个都比那些陷入妄想自大的人性推理所包含的结构要复杂。考虑到我们探索事物原因的过程很快就会受到自然的阻挡，让我们承认自己的无知，那么，如果我们在寻求人心的普遍原理时需要的步骤更少，我们就大可为取得的进步感到满意。由此看来，我们在发展人性科学或形而上学时，面对首要的障碍就是那些晦涩难懂的观念和模糊不清的术语。而在数学领域中，主要的困难是我们推理的长度和思想的广度不够，而这两者的充分发展对于我们形成结论是必不可少的。或许可以说，自然哲学的进步主要受制于缺乏适当的实验和现象，这些东西常常是偶然发现的，无论研究者多么勤勉谨慎，在需要这些实验和现象时，也并非总能得到。而对于人性科学而言，迄今取得的进步既不

如几何学，也比不上物理学，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些科学中存在什么差异的话，就是那些阻碍前者（人性科学）取得进展的困难需要我们付诸更大的耐心和能力加以克服。

There are no ideas, which occur in metaphysics, more obscure and uncertain, than those of power, force, energy or necessary connexion, of which it is every moment necessary for us to treat in all our disquisitions. We shall, therefore, endeavour, in this section, to fix, if possible,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ese terms, and thereby remove some part of that obscurity, which is so much complained of in this species of philosophy.

形而上学中出现的观念，最晦涩不清者莫过于动力、力量、能量或必要联系之类，而在我们的研究中时刻都得与之打交道。因此，我们将在本章中尽可能明确这些术语的意思，消除我们在形而上学研究中经常抱怨的晦涩难懂之处。

It seems a proposition, which will not admit of much dispute, that all our ideas are nothing but copies of our impressions, or, in other words,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think of anything, which we have not antecedently felt, either by our external or internal senses. I have endeavoured [7_1] to explain and prove this proposition, and have expressed my hopes, that, by a proper application of it, men may reach a greater clearness and precision in philosophical reasonings, than what they have hitherto been able to attain. Complex ideas, may, perhaps, be well known by definition, which is nothing but an enumeration of those parts or simple ideas, that compose them. But when we have pushed up definitions to the most simple ideas, and find still some ambiguity

and obscurity; what resource are we then possessed of? By what invention can we throw light upon these ideas, and render them altogether precise and determinate to our intellectual view? Produce the impressions or original sentiments, from which the ideas are copied. These impressions are all strong and sensible. They admit not of ambiguity. They are not only placed in a full light themselves, but may throw light on their correspondent ideas, which lie in obscurity. And by this means, we may, perhaps, attain a new microscope or species of optics, by which, in the moral sciences, the most minute, and most simple ideas may be so enlarged as to fall readily under our apprehension, and be equally known with the grossest and most sensible ideas, that can be the object of our enquiry.

有一个观点似乎很少有争议，即我们所有的观念不过是我们的印象的摹本，换言之，我们不可能对没有事先被我们的内外感官所感知的任何事物进行思考。上文中 [8_1] 我已经尝试解释和证明这一立场，并希望通过恰当的应用，人们能在哲学推理中达到比先前努力达到的更清晰、更准确的程度。复杂的观念或许可以通过定义让人们了解，定义不过是把构成复杂观念的各个成分或简单观念一一列举清楚。但是，如果我们通过定义推进到最简单的观念，仍然发现还有模棱两可晦涩难懂的东西存在，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采用？还有什么奇思妙想可以帮助我们阐明这些观念，使之在我们的知觉中变得精准明确呢？答案就是再现这些观念得以衍生的印象或最初的情感。这些印象是强烈的、可以觉察到的，毫不模糊。这些印象不仅自身清楚明确，也有助于理解那些由之而来的晦涩难懂的观念。这样，我们或许能获得一种新的显微镜或类似的光学仪器，用来把人性科学中最细微、最简单的观念放大，便于我们理解，并使之像那些最醒目、最明显的观念一样明白易懂，从而可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To be fully acquainted, therefore, with the idea of power or necessary connexion, let us examine its impression; and in order to find the impression with greater certainty, let us search for it in all the sources, from which it may possibly be derived.

因此，要完全熟悉动力或必然联系的观念，就得检查它们的印象，而要确切地找到印象，我们就得从印象可能产生的各种来源去寻找。

When we look about us towards external objects, and consider the operation of causes, we are never able, in a single instance, to discover any power or necessary connexion; any quality, which binds the effect to the cause, and renders the one an infallible consequence of the other. We only find, that the one does actually, in fact, follow the other. The impulse of one billiard-ball is attended with motion in the second. This is the whole that appears to the outward senses. The mind feels no sentiment or inward impression from this succession of objects; consequently, there is not, in any single, particular instance of cause and effect, any thing which can suggest the idea of power or necessary connexion.

我们从外界事物中寻求原因的时候，绝不可能从单一的事件中发现任何动力或必然联系，或是任何特性，能将结果和原因联系起来，使得一个成为另一个的必然结果。我们见到的不过是一件事在另一件事之后出现。第一个弹子球撞击了第二个弹子球，然后第二个弹子球动了起来。这就是呈现在我们外部感官中的一切，我们的心灵并未从这一连串事件中获得任何情感或形成任何内在印象。因此，任何单一的因果事件并不能暗示动力或必然联系的观念。

From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an object, we never can conjecture what effect will result from it. But were the power or energy of any cause discoverable by the mind, we could foresee the effect, even without experience; and might, at first, pronounce with certainty concerning it, by mere dint of thought and reasoning.

我们绝不能从某一事物的第一次出现推测其可能产生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原因中包含的动力或能量，我们甚至无需任何经验也能预测到会有什么结果出现，或许只需事先动脑筋想一想就能准确地判断出结果来。

In reality, there is no part of matter, that does ever, by its sensible qualities, discover any power or energy, or give us ground to imagine, that it could produce any thing, or be followed by any other object, which we could denominate its effect. Solidity, extension, motion; these qualities are all complete in themselves, and never point out any other event which may result from them. The scenes of the universe are continually shifting, and one object follows another in an uninterrupted succession; but the power of force, which actuates the whole machine, is entirely concealed from us, and never discovers itself in any of the sensible qualities of body. We know, that, in fact, heat is a constant attendant of flame; but what is the connexion between them, we have no room so much as to conjecture or imagine. It is impossible, therefore, that the idea of power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contemplation of bodies, in single instances of their operation; because no bodies ever discover any power, which can be the original of this idea. [7_2]

事实上，没有任何事物会明显地向我们揭示其动力或能量，或给

我们任何依据去想象它能产生什么事物，或产生任何我们可以称之为它的结果的事物。固态、广延、运动，这些都是自身完整的属性，但是从不会揭示它们能引起的结果。宇宙中的事物时刻都在变化，一事物之后接着另一事物，永不停息，但是，驱动万物运转的动力或能量却彻底隐藏起来了，从不以事物明显的属性向我们揭示自身。我们知道，有火就会产生热，但是二者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我们却无从猜测和想象。因此，动力的观念不可能来源于对事物单一活动的思考，因为没有任何事物会向我们揭示其背后的动力，从而向我们揭示动力这一观念的本源。 [8_2]

Since, therefore, external objects as they appear to the senses, give us no idea of power or necessary connexion, by their operation in particular instances, let us see, whether this idea be derived from reflection on the operations of our own minds, and be copied from any internal impression. It may be said, that we are every moment conscious of internal power; while we feel, that, by the simple command of our will, we can move the organs of our body, or direct the faculties of our mind. An act of volition produces motion in our limbs, or raises a new idea in our imagination. This influence of the will we know by consciousness. Hence we acquire the idea of power or energy; and are certain, that we ourselves and all other intelligent beings are possessed of power. This idea, then, is an idea of reflection, since it arises from reflecting on the operations of our own mind, and on the command which is exercised by will, both over the organs of the body and faculties of the soul.

既然外界事物呈现到我们感官时，不会以其具体的活动方式向我们揭示其背后的动力或必然联系，那就让我们来检查一下，动力的观念是否来自我们对自身心理活动的思考，是我们内心印象的摹本。我们感觉到，单纯靠意志的指令，就能让身体的器官动起来，就能行使

我们的心智功能，这可以说我们时时刻刻都意识到了有某种内在动力存在。仅凭意志力我们能让我们的四肢动起来，或者在头脑中产生一个新的想法。我们靠意识了解到意志的这种影响。因此，我们获得了动力或能量的观念，而且确信我们和所有其他高等生物都具有这种动力。这个观念就是思考得来的观念，因为它来自于我们对自身心理活动以及我们的意志对身体器官和心智能力的控制的思考。

We shall proceed to examine this pretension; and first with regard to the influence of volition over the organs of the body. This influence, we may observe, is a fact, which, like all other natural events, can be known only by experience, and can never be foreseen from any apparent energy or power in the cause, which connects it with the effect, and renders the one an infallible consequence of the other. The motion of our body follows upon the command of our will. Of this we are every moment conscious. But the means, by which this is effected; the energy, by which the will performs so extraordinary an operation; of this we are so far from being immediately conscious, that it must for ever escape our most diligent enquiry.

我们将继续探讨这一主张，先从意志对身体器官的影响开始。我们注意到，这种影响力是客观事实，像自然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我们只能靠经验来认识，绝不能指望从原因所蕴含的能量或动力中预测出来，这能量或动力将原因和结果联结在一起，并使得一事物成为另一事物必然结果。我们的身体会随我们意志的指令而动，这是我们时刻都能意识到的。但是，引起身体活动的途径，意志得以行使这一非凡活动的能量，我们根本意识不到，或许无论我们进行多么勤勉的研究也永远发现不了。

For first: Is there any principle in all nature more mysterious than the union of soul with body; by which a supposed spiritual substance acquires such an influence over a material one, that the most refined thought is able to actuate the grossest matter? Were we empowered, by a secret wish, to remove mountains, or control the planets in their orbit; this extensive authority would not be more extraordinary, nor more beyond our comprehension. But if by consciousness we perceived any power or energy in the will, we must know this power; we must know its connexion with the effect; we must know the secret union of soul and body, and the nature of both these substances; by which the one is able to operate, in so many instances, upon the other.

首先我们要问，整个自然界中还有任何比心灵和身体的结合更神秘的原理吗？心灵和身体的结合使得精神的东西能对物质的东西产生极大的影响，哪怕是最细微的思想也足以驱动最庞大的物体。倘若我们受一神秘的意愿指使，要移动大山，或把行星控制在其轨道上，这一宏大的意愿并不会显得非凡异常，也不会让我们无法理解。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意识感觉到意志中的任何动力或能量，我们就能知道这种动力，就会知道它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会了解心灵和身体的神秘结合，以及这两种事物的本质何在。正是这一本质决定了一事物在很多情况下能否对另一事物产生作用和影响。

Secondly, we are not able to move all the organs of the body with a like authority; though we cannot assign any reason besides experience, for so remarkable a difference between one and the other. Why has the will an influence over the tongue and fingers, not over the heart or liver? This question would never embarrass us, were we conscious of a power in the former case, not in the latter. We should then perceive, independent of experience, why the

authority of will over the organs of the body is circumscribed within such particular limits. Being in that case fully acquainted with the power or force, by which it operates, we should also know, why its influence reaches precisely to such boundaries, and no farther.

其次，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意志力来指挥身体的各个器官动起来，尽管除了经验之外，我们找不到其他解释，毕竟身体各部分差异很大。为什么我们的意志能控制舌头和手指，却无法控制我们的心和肝？倘若我们能意识到在前一种而不是后一种情况下有什么动力在起作用，这个问题就绝不会让我们感到难堪了。那样我们无须借助任何经验就能感知到，为什么意志对于身体器官的影响会受到这样的限制。完全熟悉了驱使意志的动力或力量之后，我们也就会明白，为什么意志的影响力只能达到这个边界，不能再有超越。

A man, suddenly struck with palsy in the leg or arm, or who had newly lost those members, frequently endeavours, at first to move them, and employ them, in their usual offices. Here he is as much conscious of power to command such limbs, as a man in perfect health is conscious of power to actuate any member which remains in its natural state and condition. But consciousness never deceives. Consequently, neither in the one case nor in the other, are we ever conscious of any power. We learn the influence of our will from experience alone. And experience only teaches us, how one event constantly follows another; without instructing us in the secret connexion, which binds them together, and renders them inseparable.

一个人突然间手脚麻痹，或刚刚失去了这些肢体，一开始他会频

繁地尝试活动他的手和脚，行使其日常的功能。此时的他对控制肢体的动力有清醒的意识，就像一个健康的人能清醒地意识到某种能够驱使健在完好的肢体进行活动的动力一样。但是意识从不会欺骗我们，所以无论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我们都不会意识到任何动力的存在。我们只能从经验中了解我们意志的影响。而经验仅仅向我们显示，一事物总是频繁出现在另一事物之后，没有为我们揭示出将两者联系起来、使之密不可分的神秘联系。

Thirdly, we learn from anatomy, that the immediate object of power in voluntary motion, is not the member itself which is moved, but certain muscles, and nerves, and animal spirits, and, perhaps, something still more minute and more unknown, through which the motion is successively propagated, ere it reach the member itself whose motion is the immediate object of volition. Can there be a more certain proof, that the power, by which this whole operation is performed, so far from being directly and fully known by an inward sentiment or consciousness is, to the last degree, mysterious and unintelligible? Here the mind wills a certain event. Immediately another event, unknown to ourselves, and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intended, is produced. This event produces another, equally unknown; till at last, through a long succession, the desired event is produced. But if the original power were felt, it must be known; were it known, its effect also must be known; since all power is relative to its effect. And vice versa, if the effect be not known, the power cannot be known nor felt. How indeed can we be conscious of a power to move our limbs, when we have no such power; but only that to move certain animal spirits, which, though they produce at last the motion of our limbs, yet operate in such a manner as is wholly beyond our comprehension?

第三，我们从解剖学中得知，在肢体的自发运动中，动力作用的直接对象并非被启动的肢体本身，而是一些肌肉、神经和精气，或者说是一些更细微、更不为人知的东西。通过这些东西运动得到不断传递，最后才到达肢体本身，因为肢体的运动才是意志的直接目标。隐藏在这一系列活动背后的是我们的内部情感和意识完全无法感知的动力，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确切的证据，证明事物背后的动力是完全神秘、不可知晓的吗？我们的心中一旦生出实现某一事件的愿望，立刻就有某个我们全然不知的、与我们的意图完全不一样的动作发生，接着一个动作导致另一个我们同样全然不知的动作，直到最后，经过一连串的动作之后，我们意愿中的动作发生了。但是假如我们能感觉到最初的动力，我们就能知晓它；如果我们知晓这一动力，我们就会知道它的结果，因为一切动力都与其结果相关。反之亦然，如果我们不知道结果，也就不可能知晓或感知其背后的动力。我们没有让肢体动起来的动力，怎么能意识到这种动力的存在呢？我们只不过动用了一点精气，尽管这最终引起了我们的肢体动作，但是其作用的方式却是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

We may, therefore, conclude from the whole, I hope, without any temerity, though with assurance; that our idea of power is not copied from any sentiment or consciousness of power within ourselves, when we give rise to animal motion, or apply our limbs to their proper use and office. That their motion follows the command of the will is a matter of common experience, like other natural events. But the power or energy by which this is effected, like that in other natural events, is unknown and inconceivable. [7_3]

因此，我们可以从整个分析中得出结论，我希望这不是冒失的结论，而是有把握的结论，即我们的动力观念并不是在我们产生动作或发挥肢体作用时，由我们心中关于动力的情感或意识衍生而来的。肢体的动作是意志指令的结果，和自然界其他事物一样，是个日常经验

问题。但是让这一活动得以发生的动力或能量，也像其他情形中的一样，是我们不可理解、不可感知的。[8_3]

Shall we then assert, that we are conscious of a power or energy in our own minds, when, by an act or command of our will, we raise up a new idea, fix the mind to the contemplation of it, turn it on all sides, and at last dismiss it for some other idea, when we think that we have surveyed it with sufficient accuracy? I believe the same arguments will prove, that even this command of the will gives us no real idea of force or energy.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我们通过意志的指令产生一个新的想法，让我们集中心思来思考，从各方面加以权衡，在我们认为已经对其进行充分的探索之后，把它抛弃，再换上另一个想法，而在此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了心中的某种动力或能量呢？我认为，我们的论证同样会证明，即使这样一种意志的指令也没有为我们提供真实的动力或能量的观念。

First, it must be allowed, that, when we know a power, we know that very circumstance in the cause, by which it is enabled to produce the effect; for these are supposed to be synonymous. We must, therefore, know both the cause and effect,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But do we pretend to be acquainted with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soul and the nature of an idea, or the aptitude of the one to produce the other? This is a real creation; a production of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which implies a power so great, that it may seem, at first sight, beyond the reach of any being, less than infinite. At least it must be owned, that such a power is not felt, nor known, nor even conceivable by the mind. We only feel the event,

namely, the existence of an idea, consequent to a command of the will; but the manner, in which this operation is performed, the power by which it is produced, is entirely beyond our comprehension.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如果我们知晓一种动力，我们就知晓原因中导致其产生结果的具体情境，因为二者实际上具有相同性质。这样我们就不仅知道原因和结果，而且知道两者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能否声称我们知晓人心的本性和某个观念的本质，或者其中一个有能力产生另一个呢？这就真正属于创造，是从无中生出有的创造；这其中隐含着有一种巨大的动力，乍一看似乎超越了一切非永恒生命的掌控范围。至少必须承认，这样的动力不能被我们的心灵所察觉、所知晓、所想象。我们仅仅能感觉到这一事物（即观念的存在）出现于我们的意志的指令之后，但是，它以何种方式呈现，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

Secondly, the command of the mind over itself is limited, as well as its command over the body; and these limits are not known by reason, or any acquaintance with the nature of cause and effect, but only by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as in all other natural events and in the operation of external objects. Our authority over our sentiments and passions is much weaker than that over our ideas; and even the latter authority is circumscribed within very narrow boundaries. Will any one pretend to assign the ultimate reason of these boundaries, or show why the power is deficient in one case, not in another.

第二，意志对自身的控制有限，对身体的控制也有限。这些限制我们既不能通过理性获得认知，也不能因为我们熟悉因果关系的本质

而能有所了解，就像对于自然界中其他事物和外界物体的活动一样，我们只能通过观察和经验来认识它们。我们对自身情感和感情的主宰远远比我们对自己思想的主宰要脆弱；而且即使是我们对自身思想的掌控，也是严格限制在狭窄边界内的。难道有人能尝试对这些边界做出最终的解释，或者阐明为什么动力在一种情况下不起作用，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能发挥作用吗？

Thirdly, this self-command is very different at different times. A man in health possesses more of it than one languishing with sickness. We are more master of our thoughts in the morning than in the evening; fasting, than after a full meal. Can we give any reason for these variations, except experience? Where then is the power, of which we pretend to be conscious? Is there not here, either in a spiritual or material substance, or both, some secret mechanism or structure of parts, upon which the effect depends, and which, being entirely unknown to us, renders the power or energy of the will equally unknown and incomprehensible?

第三，意志的自我控制因时而异。身体健康的人比疾病缠身的人有更大的意志控制力，早晨我们对自己思想的控制比傍晚更强，斋戒之时比饱食之后更强。除了经验，我们还能用什么理由来解释这些变化？我们声称知晓的动力在何处呢？在精神或物质的实体，或同时在两者中，难道不是有某种神秘机制或复杂结构，成为了结果的依托吗？这样的机制决定了结果是什么，并在我们全然不觉中把动力和能量变得同样不可知晓、不可理解。

Volition is surely an act of the mind, with which we are sufficiently acquainted. Reflect upon it. Consider it on all sides. Do you find anything in it like this creative power, by which it raises

from nothing a new idea, and with a kind of Fiat, imitates the omnipotence of its Maker, if I may be allowed so to speak, who called forth into existence all the various scenes of nature? So far from being conscious of this energy in the will, it requires as certain experience as that of which we are possessed, to convince us that such extraordinary effects do ever result from a simple act of volition.

意志力显然是一种心理活动，对此我们都非常熟悉。认真思考，并从各个方面仔细检查一下。你能从中发现任何类似创造性动力的东西，使意志能从虚无中生出新的想法，从而借着一道命令，模仿从虚无中创造世间万物的全能的主吗（假如我可以这样比方的话）？由于我们远远不能意识到意志中有这种能量，这就需要用一定的经验，就像我们有的经验一样，来证明如此非凡的结果的确来自一个简单的意志行为。

The generality of mankind never find any difficulty in accounting for the more common and familiar operations of nature—such as the descent of heavy bodies, the growth of plants,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 or the nourishment of bodies by food; but suppose that, in all these cases, they perceive the very force or energy of the cause, by which it is connected with its effect, and is for ever infallible in its operation. They acquire, by long habit, such a turn of mind, that, up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cause, they immediately expect with assurance its usual attendant, and hardly conceive it possible that any other event could result from it. It is only on the discovery of extraordinary phaenomena, such as earthquakes, pestilence, and prodigies of any kind, that they find themselves at a loss to assign a proper cause, and to explain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effect is produced by it. It is usual for men, in

such difficulties, to have recourse to some invisible intelligent principle [7_4] as the immediate cause of that event which surprises them, and which, they think, cannot be accounted for from the common powers of nature. But philosophers, who carry their scrutiny a little farther, immediately perceive that, even in the most familiar events, the energy of the cause is as unintelligible as in the most unusual, and that we only learn by experience the frequent Conjunction of objects, without being ever able to comprehend anything like Connexion between them.

一般人并不觉得很难解释自然界中常见的、熟悉的现象，比如重物下落、植物生长、动物繁殖，或者身体需要食物提供养分，等等。但是，假设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他们感知到了原因中的动力或能量，即与其结果相关、永远不会出错的动力或能量。他们因为长期的习惯获得了这样一种心智习性，即一见到原因出现，立刻就确信通常与之伴随的结果，却极少会想到有可能出现意外的情况。只有在他们见到一些异常的现象，诸如地震、瘟疫，以及各种奇迹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找不到原因，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在遭遇这些难题的时候，人们通常会认为是某种看不见的智慧的干预 [8_4] 直接导致了让他们感到诧异的事件，而这是不能从常见的自然活动中寻求解释的。但是，进行深入追究的哲学家就不同了，他们立刻就会认识到，即使在最熟悉的事件里，原因背后的能量和在最异常事件的情形中一样难以理解，我们只能通过经验获悉某些事物经常伴随出现，并不能理解它们之间所谓的联系。

Here, then, many philosophers think themselves obliged by reason to have recourse, on all occasions, to the same principle, which the vulgar never appeal to but in cases that appear miraculous and supernatural. They acknowledge mind and intelligence to be, not only the ultimate and original cause of all

things, but the immediate and sole cause of every event which appears in nature. They pretend that those objects which are commonly denominated causes, are in reality nothing but *occasions* ; and that the true and direct principle of every effect is not any power or force in nature, but a volition of the Supreme Being, who wills that such particular objects should for ever be conjoined with each other. Instead of saying that one billiard-ball moves another by a force which it has derived from the author of nature, it is the Deity himself, they say, who, by a particular volition, moves the second ball, being determined to this operation by the impulse of the first ball, in consequence of those general laws which he has laid down to himself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verse. But philosophers advancing still in their inquiries, discover that, as we are totally ignorant of the power on which depends the mutual operation of bodies, we are no less ignorant of that power on which depends the operation of mind on body, or of body on mind, nor are we able, either from our senses or consciousness, to assign the ultimate principle in one case more than in the other. The same ignorance, therefore, reduces them to the same conclusion. They assert that the Deity is the immediate cause of the union between soul and body; and that they are not the organs of sense, which, being agitated by external objects, produce sensations in the mind; but that it is a particular volition of our omnipotent Maker, which excites such a sensation, in consequence of such a motion in the organ. In like manner, it is not any energy in the will that produces local motion in our members; it is God himself, who is pleased to second our will, in itself impotent, and to command that motion which we erroneously attribute to our own power and efficacy. Nor do philosophers stop at this conclusion. They sometimes extend the same inference to the mind itself, in its internal operations. Our mental vision or conception of ideas is nothing but a revelation made to us by our Maker. When we voluntarily turn our thoughts to

any object, and raise up its image in the fancy, it is not the will which creates that idea; it is the universal Creator, who discovers it to the mind, and renders it present to us.

然而，一般人只用来解释奇迹和超自然现象的原理，许多哲学家却认为它们有必要用来解释所有现象。他们承认，心灵和智力不仅是一切事物的终极根源，也是自然界中一切现象的直接和唯一的诱因。他们声称通常被称之为原因的事物实际上不过是一些“起因 ”，产生每一结果的真实的直接的原理不是自然界中的任何动力或力量，而是上帝的意志，上帝愿意把某些具体事物永远安排在一起出现。他们说，不是一个弹子球借助自然力推动另一个弹子球运动起来，而是上帝自己以具体的意愿推动第二个弹子球在动，第二个弹子球受到第一个球的撞击动起来，符合上帝为自己制定的统领宇宙的普遍法则。哲学家们更进一步发现，正如我们对事物相互活动所依赖的动力一无所知，我们同样不了解心灵之于身体，或身体之于心灵的影响活动背后的动力，更不可能从我们的感官或意识中找到能更好地解释一种情形而不是另一种情形的终极原理。同样的无知让他们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断言，上帝才是心灵与身体得以结合的直接原因；心灵和身体不是感觉器官，它们的感知不是在外界事物的刺激之下在思想中产生的，而是由我们万能的造物主的一个意愿，通过器官的活动促成的。同样，不是我们意志中的能量引发了肢体的动作，而是上帝本身乐于支持我们那本来无能的意志，引起了肢体的动作，而我们却错误地认为是我们自己身上的动力和能量引起的。哲学家们并未就此止步，他们有时候把同样的推理加以扩展，用来解释心灵本身的内在活动。我们头脑中关于种种观念的认识或概念只不过是造物主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自发地想到一个事物，在心中产生一种形象，这都不是意志产生的观念，而是万能的造物主为我们揭示，为我们呈现的。

Thus, according to these philosophers, every thing is full of God. Not content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nothing exists but by his

will, that nothing possesses any power but by his concession; they rob nature, and all created beings, of every power, in order to render their dependence on the Deity still more sensible and immediate. They consider not that, by this theory, they diminish, instead of magnifying, the grandeur of those attributes, which they affect so much to celebrate. It argues surely more power in the Deity to delegate a certain degree of power to inferior creatures than to produce every thing by his own immediate volition. It argues more wisdom to contrive at first the fabric of the world with such perfect foresight that, of itself, and by its proper operation, it may serve all the purposes of providence, than if the great Creator were obliged every moment to adjust its parts, and animate by his breath all the wheels of that stupendous machine.

因此，在这些哲学家看来，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万物皆因上帝的意志而存在，万物皆因上帝的许可而具有能力，他们不仅没有因此感到满足，还更进一步剥夺了自然和一切造物的一切能力，把它们对上帝的依存变得更明显，更直接。他们并未考虑到，通过这样的理论，他们实际上削减而不是增加了他们努力称颂的事物的光辉品质。因为这个观点强调的是上帝可以向低等生灵分发一定程度的能力，而不是上帝按照自身的意志创造了万物。同样，它认为，上帝极具远见地设计世界的结构，使其靠自身的活动实现神的旨意，而不是说，伟大的造物主需要时刻为其调整结构，需要用自己的气息激活这架庞大机器并使其运转起来。

But if we would have a more philosophical confutation of this theory, perhaps the two following reflections may suffice:

但是，如果我们要对这个理论提出更具哲理的批判，或许下面两

点理由就够了。

First, it seems to me that this theory of the universal energy and operation of the Supreme Being is too bold ever to carry conviction with it to a man, sufficiently apprized of the weakness of human reason, and the narrow limits to which it is confined in all its operations. Though the chain of arguments which conduct to it were ever so logical, there must arise a strong suspicion, if not an absolute assurance, that it has carried us quite beyond the reach of our faculties, when it leads to conclusions so extraordinary, and so remote from common life and experience. We are got into fairy land, long ere we have reached the last steps of our theory; and there we have no reason to trust our common methods of argument, or to think that our usual analogies and probabilities have any authority. Our line is too short to fathom such immense abysses. And however we may flatter ourselves that we are guided, in every step which we take, by a kind of verisimilitude and experience, we may be assured that this fancied experience has no authority when we thus apply it to subjects that lie entirely out of the sphere of experience. But on this we shall have occasion to touch afterwards. [7_5]

第一，在我看来，上帝掌握一切能量和活动的理论，对于任何充分了解人类理性的缺陷以及思维活动的狭窄限制的人，都显得过于冒失，没有说服力。尽管这个理论中一连串的推理似乎合符逻辑，然而，即使我们不敢确信，也会产生强烈的怀疑，因为它让我们远远超越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得出了非凡异常、远离日常生活和经验的结论。我们还没有得出最后的理论，就早早地被引入了一片神奇的仙境，在这块仙境中我们没有理由信任我们常用的论证方法，更不会认为我们常见的类比和可然性会发挥作用。我们的思想之线太短，无法

丈量这个无边无际的深渊。无论我们多么庆幸自己每走一步都受到某种异常真实的事物和经验的指引，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假想的经验对于完全处在我们经验之外的事物没有任何指导作用。这个问题下文中我们还会再讨论。 [8_5]

Secondly, I cannot perceive any force in the arguments on which this theory is founded. We are ignorant, it is true, of the manner in which bodies operate on each other; their force or energy is entirely incomprehensible. But are we not equally ignorant of the manner or force by which a mind, even the supreme mind, operates either on itself or on body? Whence, I beseech you, do we acquire any idea of it? We have no sentiment or consciousness of this power in ourselves. We have no idea of the Supreme Being but what we learn from reflection on our own faculties. Were our ignorance, therefore, a good reason for rejecting any thing, we should be led into that principle of denying all energy in the Supreme Being as much as in the grossest matter. We surely comprehend as little the operations of one as of the other. Is it more difficult to conceive that motion may arise from impulse than that it may arise from volition? All we know is our profound ignorance in both cases. [7_6]

第二，我无法从得出这个理论的论证中发现任何动力。诚然，我们不知道事物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其中的动力和能量我们完全不能理解。但是，难道我们不是同样不知道心灵，甚至上帝之灵，以何种方式或动力对自身或对身体发挥作用？我问你，我们又是从哪里获得关于动力的观念的呢？我们对自己身上的这种动力没有任何感觉和意识；，我们也没有上帝的观念，只有我们对自己能力的反思所得。如果我们的无知可以作为拒绝一切的理由，我们就会得出，就像一切明显的事物一样，上帝不具有任何能量的观点。显然我们对两种情形同样知之甚少。想象运动源于推力难道比想象运动源于意志力更难吗？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对于两种情形我们都一无所知。 [8_6]

Part II

第二节

But to hasten to a conclusion of this argument, which is already drawn out to too great a length, we have sought in vain for an idea of power or necessary connexion in all the sources from which we could suppose it to be derived. It appears that, in single instances of the operation of bodies, we never can, by our utmost scrutiny, discover any thing but one event following another, without being able to comprehend any force or power by which the cause operates, or any connexion between it and its supposed effect. The same difficulty occurs in contemplating the operations of mind on body—where we observe the motion of the latter to follow upon the volition of the former, but are not able to observe or conceive the tie which binds together the motion and volition, or the energy by which the mind produces this effect. The authority of the will over its own faculties and ideas is not a whit more comprehensible; so that, upon the whole, there appears not, throughout all nature, any one instance of connexion which is conceivable by us. All events seem entirely loose and separate. One event follows another; but we never can observe any tie between them. They seem conjoined, but never connected. And as we can have no idea of any thing which never appeared to our outward sense or inward sentiment, the necessary conclusion seems to be that we have no idea of connexion or power at all, and that these words are absolutely, without any meaning, when employed either in philosophical reasonings or common life.

但是，为了从这个已经拉得太长的议论中匆忙得出结论，我们已经从各个可能的源头徒劳地寻求动力或必然联系的观念。显然，就算再仔细审视，我们也不能从事物活动的单一例证中发现除了事物先后出现这一现象之外的任何东西，无法理解原因背后的任何动力或力量，或者原因与其结果之间的任何联系。我们在思索心灵对身体的作用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我们看得见身体的动作随意志而出现，但是既不能看见也不能想象连接身体动作和意志的纽带，或者心灵藉以产生这个结果的能量。而意志对自身能力和对观念的影响，对我们而言，丝毫也不显得更容易理解。所以，总的来说，整个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种我们可以知晓的联系存在。各种事物之间关系疏散，各不相干。虽然一事物之后出现另一事物，但我们绝不可能发现二者间有任何关联。它们在时空上有连接，但绝没有内在联系。既然我们对于从未在我们外部感官和内部情感中出现过的事物没有任何观念，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我们完全没有关于联系或动力的任何观念，这些词语无论用于哲学推理，还是用于日常生活，都是毫无意义的。

But there still remains one method of avoiding this conclusion, and one source which we have not yet examined. When any natural object or event is presented,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by any sagacity or penetration, to discover, or even conjecture, without experience, what event will result from it, or to carry our foresight beyond that object which is immediately present to the memory and senses. Even after one instance or experiment where we have observed a particular event to follow upon another, we are not entitled to form a general rule, or foretell what will happen in like cases; it being justly esteemed an unpardonable temerity to judge of the whole course of nature from one single experiment, however accurate or certain. But when one particular species of event has always, in all instances, been conjoined with another, we make no longer any scruple of foretelling one up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other, and of

employing that reasoning, which can alone assure us of any matter of fact or existence. We then call the one object, Cause; the other, Effect. We suppose that there is some connexion between them; some power in the one, by which it infallibly produces the other, and operates with the greatest certainty and strongest necessity.

但是，还有一种方法可以避免得出这个结论，还有一个源头我们尚未认真检查过。当自然界的事物或事件出现时，我们不可能靠聪明或悟性，而不靠经验，来发现甚至来想象其结果，或者让我们的见识超越直接呈现在感官和记忆中的事物。即使我们注意到一事物随另一事物出现的单个例子，我们也不能就此得出普遍法则，或者预言在相似情况下会发生什么结果。单个事例无论多么精确，多么确定，也不能因此就得出整个自然进程的规律，这样做是不可原谅的冒失之举。但是，若一连串的事物在各种情况下总是伴随在一起出现，我们可以毫无顾虑地预测一事物的出现会引起另一事物的出现，并将这种自身足以让我们对实际的事实和存在感到确信的推理方法加以运用。我们因此把一事物称为原因，把另一种事物称为结果，并认定二者间有某种联系，其中一种事物包含某种动力，肯定会产生另一种事物，而且这个过程确信无疑，必然发生。

It appears, then, that this idea of a necessary connexion among events arises from a number of similar instances which occur of the constant conjunction of these events; nor can that idea ever be suggested by any one of these instances, surveyed in all possible lights and positions. But there is nothing in a number of instances, different from every single instance,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exactly similar; except only, that after a repetition of similar instances, the mind is carried by habit, upon the appearance of one event, to expect its usual attendant, and to believe that it will exist. This connexion, therefore, which we feel in the mind, this customary

transition of the imagination from one object to its usual attendant, is the sentiment or impression from which we form the idea of power or necessary connexion. Nothing farther is in the case. Contemplate the subject on all sides; you will never find any other origin of that idea. This is the sole difference between one instance, from which we can never receive the idea of connexion, and a number of similar instances, by which it is suggested. The first time a man saw the communication of motion by impulse, as by the shock of two billiard balls, he could not pronounce that the one event was connected; but only that it was conjoined with the other. After he has observed several instances of this nature, he then pronounces them to be connected. What alteration has happened to give rise to this new idea of connexion? Nothing but that he now feels these events to be connected in his imagination, and can readily foretell the existence of one from the appearance of the other. When we say, therefore, that one object is connected with another, we mean only that they have acquired a connexion in our thought, and give rise to this inference, by which they become proofs of each other's existence: a conclusion which is somewhat extraordinary, but which seems founded on sufficient evidence. Nor will its evidence be weakened by any general diffidence of the understanding, or sceptical suspicion concerning every conclusion which is new and extraordinary. No conclusions can be more agreeable to scepticism than such as make discoveries concerning the weakness and narrow limits of human reason and capacity.

由此看来，必然联系的这个观念来自于事物恒常相伴发生的多种类似情形，而不能从任何单一的情形中获得暗示，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对其精心研究。但是，一系列反复发生的情形，和与之其实完全相似的单一的情形相比，并无什么不同。唯有在相似的事物不断重复发生之后，心灵才会受习惯的影响，能够从一事物的出现期待其常见的

结果，并相信这一结果会出现。因此，我们心中感觉到的这种联系，即思想从一事物到其通常结果的习惯性过渡，正是我们形成动力或必然联系观念所依据的情感或印象。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从各方面思考这个问题，你永远不会找到这个观念还有其他来源。这便是一个事例和多个相似事例之间的唯一区别，从前者中我们得不出联系的观念，从后者中却能得出来。一个人第一次见到因推力引起的运动，比如两个弹子球相撞，他不能宣称两者间有联系，他只是见到一种现象出现在另一种之后。只有在他见到多种类似的现象之后，才能断言二者间存在联系。是什么发生了改变，使之产生了联系的新观念？唯一的变化是，现在他感觉事物在他的想象中存在联系，他根据一现象的出现轻松地预测另一现象会发生。因此，我们说一事物与另一事物有联系，实际上是说它们在我们的思想中建立了联系，使我们产生了这个推断，把二者变为各自相互依存的证据。这个结论显得有些异常，但似乎有充分的证据可以支持。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不会因为对理解过程的一般性怀疑而被削弱，也不会经不起人们对所有新奇异常结论所持的怀疑态度的考验。

And what stronger instance can be produced of the surprising ignorance and weakn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than the present?For surely, if there be any relation among objects which it imports to us to know perfectly, it is that of cause and effect. On this are founded all our reasonings concerning matter of fact or existence. By means of it alone we attain any assurance concerning objects which are removed from the present testimony of our memory and senses. The only immediate utility of all sciences, is to teach us, how to control and regulate future events by their causes. Our thoughts and enquiries are, therefore, every moment, employed about this relation; yet so imperfect are the ideas which we form concerning it,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give any just definition of cause, except what is drawn from something extraneous and foreign to it. Similar objects are always conjoined with similar. Of this we have

experience. Suitably to this experience, therefore, we may define a cause to be an object, followed by another, and where all the objects similar to the first are followed by objects similar to the second. Or in other words where, if the first object had not been, the second never had existed. The appearance of a cause always conveys the mind, by a customary transition, to the idea of the effect. Of this also we have experience. We may, therefore, suitably to this experience, form another definition of cause, and call it, an object followed by another, and whose appearance always conveys the thought to that other. But though both these definitions be drawn from circumstances foreign to the cause, we cannot remedy this inconvenience, or attain any more perfect definition, which may point out that circumstance in the cause, which gives it a connexion with its effect. We have no idea of this connexion, nor even any distant notion what it is we desire to know, when we endeavour at a conception of it. We say, for instance, that the vibration of this string is the cause of this particular sound. But what do we mean by that affirmation? We either mean that this vibration is followed by this sound, and that all similar vibrations have been followed by similar sounds; or, that this vibration is followed by this sound, and that upon the appearance of one the mind anticipates the senses, and forms immediately an idea of the other. We may consider the 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in either of these two lights; but beyond these, we have no idea of it. [7_7]

除了目前的观点，对于理解过程的惊人的无知和缺陷，我们还能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吗？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事物之间有什么需要我们彻底理解的关系，那必定是因果关系。我们关于实际的事实和存在的一切推理都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仅凭因果关系的存在，我们就能对不在我们感官和记忆中的事物获得确切的认识。一切科学唯一直接的用途，在于教会我们如何利用事物的原因对未来的事物进行控制

和管理。所以我们所有的思想和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用在这一关系之上。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的观念还十分浅陋，除了从一些无关的外在事物中得出一些推论之外，不可能对原因作出恰当的定义。相似的事物总是伴随出现，对此我们有经验。按照这个经验，我们或许把原因定义为引起另一事物之事物，与第一种事物相似的所有事物必然引起和第二种事物相似的事物。或者换句话说，没有第一种事物，第二种就根本不会出现。原因的出现总是通过习惯性过渡把思想引向结果的观念。对此我们也有经验。根据这个经验，我们或许就会为原因下另一个定义，将其称之为引起另一事物之事物，它的出现总是把思想引向另一事物的观念。虽然这两种定义都是从与原因无关的事物中得出来的，但是我们也无法弥补这个不足，或者给出更完美的定义，以真正呈现与原因相关的情形，揭示出它与结果之间的联系。然而，当我们尝试解释这一联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联系是什么，甚至对我们想知道什么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观念。比如，我们说，这根琴弦的颤动产生了某个具体声音。但是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么指的是，琴弦颤动之后出现了这个声音，所有类似的颤动都出现了类似的声音，要么是说，琴弦颤动之后出现了这个声音，看见类似的琴弦颤动，我们的思想就会调动我们的感官，使之立刻产生类似声音的观念。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中任意一个角度考虑原因与结果的关系，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8_7]

To recapitulate, therefore, the reasonings of this section: Every idea is copied from some preceding impression or sentiment; and where we cannot find any impression, we may be certain that there is no idea. In all single instances of the operation of bodies or minds, there is nothing that produces any impression, nor consequently can suggest any idea of power or necessary connexion. But when many uniform instances appear, and the same object is always followed by the same event; we then begin to entertain the notion of cause and connexion. We then feel a new sentiment or impression, to wit, a customary connexion in the thought or

imagination between one object and its usual attendant; and this sentiment is the original of that idea which we seek for. For as this idea arises from a number of similar instances, and not from any single instance, it must arise from that circumstance, in which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differ from every individual instance. But this customary connexion or transition of the imagination is the only circumstance in which they differ. In every other particular they are alike. The first instance which we saw of motion communicated by the shock of two billiard balls (to return to this obvious illustration) is exactly similar to any instance that may, at present, occur to us; except only, that we could not, at first, infer one event from the other; which we are enabled to do at present, after so long a course of uniform experience. I know not whether the reader will readily apprehend this reasoning. I am afraid that, should I multiply words about it, or throw it into a greater variety of lights, it would only become more obscure and intricate. In all abstract reasonings there is one point of view which, if we can happily hit, we shall go farther towards illustrating the subject than by all the eloquence and copious expression in the world. This point of view we should endeavour to reach, and reserve the flowers of rhetoric for subjects which are more adapted to them.

现将本章的推理概括如下：每一个观念都是现有的印象或情感的摹本；只要我们无法找到任何印象，就敢确证不会有相应的观念。身体或心理活动的任何单独的事例都不会留下印象，因而也不会产生动力或必然联系的观念。但是，假如许多相同的事例出现，而且相同的事物之后总会出现相同的事件，我们就开始有了原因和联系的观念。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新的情感或印象，即在我们的思想和想象中存在着一事物和与其通常伴随的事物之间的习惯性联系，这一情感正是我们追寻的观念的原型。因为既然这一观念来源于众多相似的事例，而不是任何单一的事例，说明它必然来源于众多事例与单独事例有所差异

的情形中。但是这一习惯性联系或想象中发生的转移正是这两种情形的不同之处。从每个单个具体的事例来看，它们都相似。我们见到的两个弹子球相撞引起运动的第一个事例（再次借用这个典型例子）和现在我们可能见到的任何事例完全相似；唯一区别在于，我们当时不能从一事件推断出另一事件，而在我们有了长期的相同经验之后，如今就可以了。我不知道读者是否可以轻松理解这个推理过程。我担心的是，假如我再多费口舌，或者再做更详细的探讨，恐怕只能把这个问题弄得更加晦涩，更加玄妙。所有抽象推理中都有一个视角，一旦我们能荣幸地找到，它将引领我们在阐明主题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胜于滔滔不绝的文采和一切华丽丰富的辞藻。我们期望努力找到这一视角，把修辞之花留给更适合用它们来装饰的话题。

[7_1].Section II.

[7_2].Mr. Locke, in his chapter of power, says that, finding from experience, that there are several new productions in matter, and concluding that there must somewhere be a power capable of producing them, we arrive at last by this reasoning at the idea of power. But no reasoning can ever give us a new, original, simple idea; as this philosopher himself confesses. This, therefore, can never be the origin of that idea.

[7_3].It may be pretended, that the resistance which we meet with in bodies, obliging us frequently to exert our force, and call up all our power, this gives us the idea of force and power. It is this nisus, or strong endeavour, of which we are conscious, that is the original impression from which this idea is copied. But, first, we attribute power to a vast number of objects, where we never can suppose this resistance or exertion of force to take place; to the Supreme Being, who never meets with any resistance; to the mind in its command over its ideas and limbs, in common thinking and motion, where the effect follows immediately upon the will, without any exertion or summoning up of force; to inanimate matter, which is not capable of this sentiment. Secondly, this sentiment of an endeavour to overcome resistance has no known connexion with any event: what follows it, we know by experience; but could not know it *a priori*. It must, however, be confessed, that the animal nisus, which we experience, though it can afford no accurate precise idea of power, enters very much into that vulgar, inaccurate idea, which is formed by it.

[7_4].Greek: Theos apo mechanes (deus ex machina).

[7_5].Section XII.

[7_6].I need not examine at length the visinertiae which is so much talked of in the new philosophy, and which is ascribed to matter. We find by experience, that a body at rest or in motion continues for ever in its present state, till put from it by some new cause; and that a body impelled takes as much motion from the impelling body as it acquires itself. These are facts. When we call this a visinertiae, we only mark these facts, without pretending to have any idea of the inert power; in the same manner as, when we talk of gravity, we mean certain effects, without comprehending that active power. It was never the meaning of Sir Isaac Newton to rob second causes of all force or energy; though some of his followers have endeavoured to establish that theory upon his authority. On the contrary, that great philosopher had recourse to an etherial active fluid to explain his universal attraction; though he was so cautious and modest as to allow, that it was a mere hypothesis, not to be insisted on, without more experiments. I must confes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fate of opinions a little extraordinary. Des Cartes insinuated that doctrine of the universal and sole efficacy of the Deity, without insisting on it. Malebranche and other Cartesians made it the foundation of all their philosophy. It had, however, no authority in England. Locke, Clarke, and Cudworth, never so much as notice of it, but suppose all along, that matter has a real, though subordinate and derived power. By what means has it become so prevalent among our modern metaphysicians?

[7_7].According to these explications and definitions, the idea of power is relative as much as that of cause; and both have a reference to an effect, or some other event constantly conjoined with the former. When we consider the unknown circumstance of an object, by which the degree or quantity of its effect is fixed and determined, we call that its power; and accordingly, it is allowed by all philosophers, that the effect is the measure of the power. But if they had any idea of power, as it is in itself, why could not they measure it in itself? The dispute whether the force of a body in motion be as its velocity, or the square of its velocity; this dispute, I say, need not be decided by comparing its effects in equal or unequal times; but by a direct mensuration and comparison.
As to the frequent use of the words, Force, Power, Energy, &c., which every where occur in common conversation, as well as in philosophy; that is no proof, that we are acquainted, in any instance, with the connecting principle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or can account ultimately for the production of one thing to another. These words, as commonly used, have very loose meanings annexed to them; and their ideas are very uncertain and confused. No animal can put external bodies in motion without the sentiment of a nisus or endeavour; and every animal has a sentiment or feeling from the stroke or blow of an external object, that is in motion. These sensations, which

are merely animal, and from which we can *a priori* draw no inference, we are apt to transfer to inanimate objects, and to suppose, that they have some such feelings, whenever they transfer or receive motion. With regard to energies, which are exerted, without our annexing to them any idea of communicated motion, we consider only the constant experienced conjunction of the events; and as we feel a customary connexion between the ideas, we transfer that feeling to the objects; as nothing is more usual than to apply to external bodies every internal sensation, which they occasion.

[8_1].见第二章。

[8_2].洛克先生在其书中论及动力的章节中说，从经验中发现，事物能产生多种新的结果，这说明一定有什么动力导致了这些结果，我们由此推断出动力的观念。但是，正如这位哲学家自己承认，没有任何推理可以帮助我们得出一个全新的、真实的、简单的观念。因此，这绝不可能是动力这一观念的来源。

[8_3].或许有人会宣称，正是我们在物体中遇到的阻力，即常常迫使我们用尽全力与之抗衡的阻力，给了我们动力的观念。我们能意识到的这种冲劲，这种坚强的努力，正是导致动力观念得以产生的原始印象。但是，首先我们认为动力存在于大量的事物中，其中有许多情形我们根本不会设想有任何阻力存在。我们认为上帝身上有动力，上帝从不会遭遇任何阻力；我们认为心灵中的动力可以掌控其思想和肢体，可以进行日常思考和执行动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无需我们施展和动用力气，期待的结果就会紧随意愿发生；我们认为没有生命的物质也存在动力，这些东西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情感。其次，我们不知道努力克服阻力的情感与任何事物之间有什么联系。它会引起什么结果，我们可以凭经验，而不是凭先觉推理得知。但是，必须承认，尽管我们感受到的这股本能的冲劲不能为我们提供精确的动力观念，但是它却在一种庸俗和粗糙的动力观念中占有很大成分。

[8_4].拥有强大力量的神灵。

[8_5].见第十二章。

[8_6].我无需详细探讨新哲学中谈论很多的“惯性”，被视为物质属性的“惯性”。我们从经验中知道，一个处于静止或运动状态的物体会保持原有的状态，除非受到新的外因所作用，而一个物体受到另一个的推力时，它从推动它的物体中获得的动能正好是它本身得到的动能。这是事实。我们把它称之为惯性，仅仅是指出这一事实，并不表示我们有任何关于惯性的概念。同样，我们谈到引力时只是表示某种效应，而不是说我们理解了这种活跃的动力（力量）。牛顿的本意，绝不是说从属的原因都不具备一切力量或能量，但是他的一些追随者们却试图以他的名义建立这样的理论。相反，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借助一种（叫做以太的）精微的活动液体来解释他的万有引力论，

但是，他非常谦虚谨慎地承认，这个学说仅仅是个假说，还需要更多实验来证明，否则就不能坚持。我必须承认，各种哲学观点的命运真是有点奇怪。笛卡尔只是有意无意地提及上帝具有万能和唯一的能力，并没有坚持这一观点。但是，马尔布兰奇和其他的笛卡尔主义者却将其视为他们所有哲学的根基。但是，这个观点在英国未曾有过影响。洛克、克拉克和卡德沃斯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学说，他们一直主张，物质有一种真实的能力，哪怕这种能力是从属的，是从上帝那里得来的。那么，这种观点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在当今的哲学家中流行开来的呢？

[8_7].根据这些解释和定义，动力的观念和原因的观点一样是相对的，二者都涉及一个结果，或者说某种总是伴随前者出现的事物。我们在思考某一事物的未知的、藉此可以确定其结果的程度和大小的情形时，会将它称之为事物的动力。因此，所有哲学家都承认，结果是衡量动力的尺度（标准）。但是，倘若他们有任何关于动力的概念，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衡量动力自身呢？运动中的物体的力量是与其速度成正比，还是与其速度之平方成正比，对于这个争论，我想指出的是，我们无须通过比较事物结果是否成比例来决定，我们只需要直接对事物进行衡量和对比即可。
至于力量、动力、能量这些词，虽然在日常会话和哲学中都在频繁使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对维系因果关系的原则很熟悉，也不能证明我们能对一事物导致另一事物的现象做出最终解释。这些常用的词各自的意思很松散，各自所指很不确定，非常混乱。任何动物要让外在的物体动起来，都得有一种卖力或努力的感觉，任何动物受到运动中的物体的触动或撞击，同样会产生一种感觉。这些感觉虽然是动物才有的，而且我们也不能从中得出任何先觉性的推论，但是我们容易把它们转移到没有生命的事物上，认为这些事物在促成其他物体运动或因受外力而运动时，也有类似的感觉。至于能量，在其释放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任何运动的观念附加在上面，我们只是考虑我们经验中事物恒常出现在一起。由于我们感觉到观念之间的习惯性联系，我们把这种感觉转移到事物身上。毕竟，把内心的感觉施加到外在事物上乃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

Section VIII　Of Liberty and Necessity

第八章　论自由与必然

Part I

第一节

It might reasonably be expected in questions which have been canvassed and disputed with great eagerness, since the first origin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that the meaning of all the terms, at least, should have been agreed upon among the disputants; and our enquiries, in the course of two thousand years, been able to pass from words to the true and real subject of the controversy. For how easy may it seem to give exact definitions of the terms employed in reasoning, and make these definitions, not the mere sound of words, the object of future scrutiny and examination? But if we consider the matter more narrowly, we shall be apt to draw a quite opposite conclusion. From this circumstance alone, that a controversy has been long kept on foot, and remains still undecided, we may presume that there is some ambiguity in the expression, and that the disputants affix different ideas to the terms employed in the controversy. For as the faculties of the mind are supposed to be naturally alike in every individual; otherwise nothing could be more fruitless than to reason or dispute together; it were impossible, if men affix the same ideas to their terms, that they could so long form different opinions of the same subject; especially when they communicate their views, and each party turn themselves on all sides, in search of arguments which may give them the victory over their antagonists. It is true, if men attempt the discussion of questions which lie entirely beyond the reach of human capacity,

such as those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worlds, or the economy of the intellectual system or region of spirits, they may long beat the air in their fruitless contests, and never arrive at any determinate conclusion. But if the question regard any subject of common life and experience, nothing, one would think, could preserve the dispute so long undecided but some ambiguous expressions, which keep the antagonists still at a distance, and hinder them from grappling with each other.

自从科学和哲学诞生以来，有些问题一直是人们热切探究和争论的对象。或许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在这些问题中，争论各方至少本该在所有术语的意义上达成一致；而我们的研究，历经两千年之后，也本应能够从文字落到所争论的真实话题之上。对推理中采用的术语进行准确定义，使这些定义，而不是文字的声音，成为将来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对象，这岂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更仔细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个话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但却一直悬而未决，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认定其中一定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各方对争论涉及的术语各说不一。每个人的心智能力应该大体相当，否则大家在一起研讨和争论问题必定是最徒劳无功的事情。如果人们在术语上达成共识，就不可能在许久的争论之后还在同样的问题上众说纷纭，因为他们可以交流各自的观点，每一方可以对这些观点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和权衡，以寻求能够战胜对手的论证。说真的，如果人们想要讨论人类才能远不能及的一些问题，例如世界的起源，智力体系或精神领域的组织方式等，那么他们在那些毫无意义的争辩中只能徒费力气，永远无法达成确切结论。但是如果所讨论的问题只是涉及日常生活和经验的任一方面，那我们可以想见，只有含糊不清的表述才会使人们的争论悬置多年而未决。这些含糊的词句直至现在仍使论辩对手们保持距离，并且阻止他们相互了解。

This has been the case in the long disputed question concerning liberty and necessity; and to so remarkable a degree that, if I be not much mistaken, we shall find, that all mankind, both learned and ignorant, have always been of the same opinion with regard to this subject, and that a few intelligible definitions would immediately have put an end to the whole controversy. I own that this dispute has been so much canvassed on all hands, and has led philosophers into such a labyrinth of obscure sophistry, that it is no wonder, if a sensible reader indulge his ease so far as to turn a deaf ear to the proposal of such a question, from which he can expect neither instruction or entertainment. But the state of the argument here proposed may, perhaps, serve to renew his attention; as it has more novelty, promises at least some decision of the controversy, and will not much disturb his ease by any intricate or obscure reasoning.

长期围绕“自由和必然”的争议正是这样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们会发现，所有人，无论博学之才还是无知之辈，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都坚守着同样的意见，而实际上只要对一些术语作出清楚明白的定义就会立刻平息整个争论。我承认这个争论已经在各方面讨论得太多，而且已经把哲学家们引入了一个模糊诡辩的迷宫。一个明智的读者若是只管自享安宁，在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时不闻不问，一点也不足为怪，因为从中他既不可能获得教益，也不可能得到乐趣。但是，我们这里提出的论证或许能重新引起他的注意，因为我们的论证有足够的新意，至少可以保证解决部分争议，也不会用玄妙晦涩的推理打扰他的安宁。

I hope, therefore, to make it appear that all men have ever agreed in the doctrine both of necessity and of liberty, according to any reasonable sense, which can be put on these terms; and that the whole controversy, has hitherto turned merely upon words. We

shall begin with examining 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因此，我希望证明，根据这些术语所具有的合理意义，所有人都认同必然原则和自由原则，并证明迄今为止的整个争论仅仅是文字上的争论。下面我们首先讨论必然原则。

It is universally allowed that matter, in all its operations, is actuated by a necessary force, and that every natural effect is so precisely determined by the energy of its cause that no other effect, in such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could possibly have resulted from it. The degree and direction of every motion is, by the laws of nature, prescribed with such exactness that a living creature may as soon arise from the shock of two bodies as motion in any other degree or direction than what is actually produced by it. Would we, therefore, form a just and precise idea of necessity, we must consider whence that idea arises when we apply it to the operation of bodies.

人们普遍认为，事物的所有活动皆由一种必然的动力所引起，每一种自然的结果都是由其原因中的能量精确地决定，而在每一种具体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出别的任何结果。每一运动的程度和方向都是由自然法则准确规定的，两个运动的物体相撞产生的运动就如实际的那样，不可能产生别的程度和方向的运动，就像不可能导致一种生物由此产生一样。因此，我们若要形成恰当准确的必然的观念，必须考虑我们用这一观念描述事物的活动时它究竟从何而来。

It seems evident that, if all the scenes of nature were continually shifted in such a manner that no two events bore any

resemblance to each other, but every object was entirely new, without any similitude to whatever had been seen before, we should never, in that case, have attained the least idea of necessity, or of a connexion among these objects. We might say, upon such a supposition, that one object or event has followed another; not that one was produced by the other. The 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must be utterly unknown to mankind. Inference and reasoning concerning the operations of nature would, from that moment, be at an end; and the memory and senses remain the only canals, by which the knowledge of any real existence could possibly have access to the mind. Our idea, therefore, of necessity and causation arises entirely from the uniformity observable in the operations of nature, where similar objects are constantly conjoined together, and the mind is determined by custom to infer the one from the appearance of the other. These two circumstances form the whole of that necessity, which we ascribe to matter. Beyond the constant conjunction of similar objects, and the consequent inference from one to the other, we have no notion of any necessity or connexion.

显然，假如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一直沿着下述方式发展，没有任何两种事物间存在相似之处，每一种事物都是崭新的，与此前的一切都不一样，这样的话，我们绝对不会产生一丁点儿必然的观念，或事物之间存在联系的观念。在这样一种假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一种事物在另一种之后出现，而不是一种事物引起了另一种事物。人类完全不会知道有因果关系存在。关于自然的推论和推理从此彻底终结，而我们的记忆和感官仅仅是一种把现实世界的知识引向我们思想的渠道。因此，我们的必然和因果关系的观念完全来源于从自然中观察到的统一性，相似的事物恒常地伴随出现，心灵由于习惯的影响从一事物的出现推断出另一事物。这两种情形构成了我们所谓的事物的必然观念的全部。事物恒常伴随出现，从一种事物推断出另一种事物，除此而外，我们没有必然和联系的任何观念。

If it appear, therefore, that all mankind have ever allowed, without any doubt or hesitation, that these two circumstances take place in the voluntary actions of men, and in the operations of mind; it must follow, that all mankind have ever agreed in 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and that they have hitherto disputed, merely for not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如果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承认，上述两种情形的确出现在人们的自发活动和心理活动中，这就说明，所有人都认同必然原则，而迄今为止的一切争论，都是因为各自间互不理解。

As to the first circumstance, the constant and regular conjunction of similar events, we may possibly satisfy ourselves by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It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is a great uniformity among the actions of men, in all nations and ages, and that human nature remains still the same, in its principles and operations. The same motives always produce the same actions; the same events follow from the same causes. Ambition, avarice, self-love, vanity, friendship, generosity, public spirit; these passions, mixed in various degrees, and distributed through society, have bee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and still are, the source of all the actions and enterprises, which have ever been observed among mankind. Would you know the sentiments, inclinations, and course of life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Study well the temper and actions of the French and English. You cannot be much mistaken in transferring to the former most of the observations which you have made with regard to the latter. Mankind are so much the same, in all times and places, that history informs us of nothing new or strange in this particular. Its

chief use is only to discover the constant and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 by showing men in all varieties of circumstances and situations, and furnishing us with materials from which we may form our observations and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he regular springs of human action and behaviour. These records of wars, intrigues, factions, and revolutions, are so many collections of experiments, by which the politician or moral philosopher fixes the principles of his science,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physician or natural philosopher becomes acquainted with the nature of plants, minerals, and other external objects, by the experiments which he forms concerning them. Nor are the earth, water, and other elements, examined by Aristotle, and Hippocrates, more like to those which at present lie under our observation than the men described by Polybius and Tacitus are to those who now govern the world.

针对第一种情形，即相似事物恒常而有规律地伴随出现，我们或许可以从下面的论述中找到满意的解释。人们普遍承认，生活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人们，其活动都有巨大的统一性，人性的基本原则和行为方式并未发生改变。同样的动机总会产生同样的行动，同样的结果总会出现在同样的原因之后。野心、贪婪、自恋、虚荣、友谊、大方、公益心，这些或多或少相互混合、全社会普遍存在的感情，从人类文明之初直到今天，一直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和事业的源泉。你期望了解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情感生活、性情嗜好和人生轨迹吗？如果是的话，那就分别认真地考察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情和活动吧，再把从后者那里获得的大部分观察发现转移到前者身上，这样做不会有多少差错。不同时空的人类有很大共性，历史在这方面并未向我们揭示任何新奇的东西。历史的首要功用是揭示普遍恒定的人性原则，通过展示各种境遇中人的活动，为我们提供可以进行观察研究的材料，我们藉此熟悉人类行为活动的源泉。关于战争、阴谋、分裂和革命的记载把大量的实验材料集合起来，政治家和人性哲学家从中提出各自

科学领域的原理，就像自然哲学家通过相关实验熟悉植物、矿物和其他事物一样。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研究过的土、水和其他自然要素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自然要素之间的相似性，并不比波利比奥斯和塔西佗笔下的人和今天统治世界的人们之间的相似性更大。

Should a traveller, returning from a far country, bring us an account of men, wholly different from any with whom we were ever acquainted; men, who were entirely divested of avarice, ambition, or revenge; who knew no pleasure but friendship, generosity, and public spirit; we should immediately, from these circumstances, detect the falsehood, and prove him a liar, with the same certainty as if he had stuffed his narration with stories of centaurs and dragons, miracles and prodigies. And if we would explode any forgery in history, we cannot make use of a more convincing argument, than to prove, that the actions ascribed to any person are directly contrary to the course of nature, and that no human motives, in such circumstances, could ever induce him to such a conduct. The veracity of Quintus Curtius is as much to be suspected, when he describes the supernatural courage of Alexander, by which he was hurried on singly to attack multitudes, as when he describes his supernatural force and activity, by which he was able to resist them. So readily and universally do we acknowledge a uniformity in human motives and actions as well as in the operations of body.

倘若一个从遥远的国度归来的旅人，向我们讲述的人的故事完全和我们所熟悉的不同，比如说，那里的人们根本不懂什么叫贪婪、野心、复仇，除了友谊、大度、公益精神之外再没有别的乐子可寻。我们立刻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他不过是个大骗子，就像我们听他吹嘘说见到过什么半人半马的怪物，什么龙啊，什么奇迹和怪事等等，就敢确信他在胡编乱造一样。如果我们要揭露历史上无中生有的

杜撰，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证明其中记载的某人的事迹完全违背自然规律，在其具体的处境下，没有任何合理的动机会促使他做出那样的事情。库尔提乌斯在描写亚历山大时，说他有超人的勇气，敢于冲锋陷阵，单枪匹马向庞大的敌军发起攻击，又说他法力无边，抵挡得了千军万马的进攻，两项描写涉及的可信性都值得怀疑。对于人类动机和行为的统一性，就像身体活动中存在的统一性一样，我们是欣然和普遍接受的。

Hence likewise the benefit of that experience, acquired by long life and a variety of business and company, in order to instruct us in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 and regulate our future conduct, as well as speculation. By means of this guide, we mount up to the knowledge of men's inclinations and motives, from their actions, expressions, and even gestures; and again descend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actions from our knowledge of their motives and inclinations. The general observations treasured up by a course of experience, give us the clue of human nature, and teach us to unravel all its intricacies. Pretexts and appearances no longer deceive us. Public declarations pass for the specious colouring of a cause. And though virtue and honour be allowed their proper weight and authority, that perfect disinterestedness, so often pretended to, is never expected in multitudes and parties; seldom in their leaders; and scarcely even in individuals of any rank or station. But were there no uniformity in human actions, and were every experiment which we could form of this kind irregular and anomalous, it were impossible to collect any general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mankind; and no experience, however accurately digested by reflection, would ever serve to any purpose. Why is the aged husbandman more skilful in his calling than the young beginner but because there is a certain uniformity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sun, rain, and earth towards the production of vegetables;

and experience teaches the old practitioner the rules by which this operation is governed and directed.

从长期的生活、大量的事务处理和社交活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对我们的益处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使我们了解人性的原则，帮助我们调整未来的行为和思想活动。在经验的指引下，我们从人们的行为、表情，甚至姿态中识得他们的习性和动机，再从他们的习性和动机中进一步分析和解释他们的活动。从长期的经验中得来的观察和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人性的线索，帮助我们解开其中的难解之谜。我们不再被借口和表象所欺骗，明白人们的公开宣言不过是对某件事情做虚假的粉饰。尽管美德和荣誉被予以相当的分量和权威，但是人们常常自命拥有的公正无私，在公众和各种党派中绝对找不到，在他们的领袖人物身上很少见到，在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个人身上则更罕见。但是，如果人类活动中没有统一性存在，如果我们进行的每一项实验都是不规则的、反常的，那我们就不可能得出任何关于人类的普遍认知。我们在实践中悟出的经验无论多么精确，都无法派上任何用场。老农之所以比年轻的农夫更懂得农事，就是因为阳光、雨水和土壤在农业生产中存在统一性，而且老农从经验中获得了支配和指导农业生产的原则。

We must not, however, expect that this uniformity of human actions should be carried to such a length as that all men, in the same circumstances, will always act precisely in the same manner, without making any allowance for the diversity of characters, prejudices, and opinions. Such a uniformity in every particular, is found in no part of nature. On the contrary, from observing the variety of conduct in different men, we are enabled to form a greater variety of maxims, which still suppose a degree of uniformity and regularity.

但是，我们不能期望人类活动的统一性会达到所有人在相同情况下都会按照完全一样的方式行动的程度，不容许他们在性格、偏见和意见方面有任何差异和变化存在。无论在自然界的哪一个领域，这样的统一性都不存在。相反，通过观察各种人身上不同的行为，我们可以归纳出大量的人性原则，不过它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以统一性和规律性为前提。

Are the manners of men different in different ages and countries? We learn thence the great force of custom and education, which mould the human mind from its infancy and form it into a fixed and established character. Is the behaviour and conduct of the one sex very unlike that of the other? Is it thence we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he different characters which nature has impressed upon the sexes, and which she preserves with constancy and regularity? Are the actions of the same person much diversified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 life, from infancy to old age? This affords room for many general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gradual change of our sentiments and inclinations, and the different maxims which prevail in the different ages of human creatures. Even the characters, which are peculiar to each individual, have a uniformity in their influence; otherwise our acquaintance with the persons and our observation of their conduct could never teach us their dispositions, or serve to direct our behaviour with regard to them.

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行为方式有区别吗？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习惯和教育的巨大力量，从一个人的孩童时代起就对其心灵产生影响，逐渐将其塑造成某一特定的品格。男人和女人的行为举止有很大差别吗？可我们不正是从中了解到自然赋予性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性格，并将其稳定性和一致性传承下来吗？同一个人从婴儿期到老年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行为方式有很大差异吗？这为我们提

供了空间，让我们可以对人类情感习性的逐渐变化进行观察总结，并归纳和提炼出不同时代通行的人性原则。即使在个体身上因人而异的性格特征，其影响也具有统一性，否则，即使我们熟悉他人，观察他人言行，也无法借此了解他们的性情，也无法指导我们更好地和这些人打交道。

I grant it possible to find some actions, which seem to have no regular connexion with any known motives, and are exceptions to all the measures of conduct which have ever been established for the government of men. But if we would willingly know what judgement should be formed of such irregular and extraordinary actions, we may consider the sentiments commonly entertained with regard to those irregular events which appear in the course of nature, and the operations of external objects. All causes are not conjoined to their usual effects with like uniformity. An artificer, who handles only dead matter, may be disappointed of his aim, as well as the politician, who directs the conduct of sensible and intelligent agents.

我认为我们有可能发现一些行为，似乎与任何已知的动机之间都没有规则的联系，也不合乎那些早已被确认为支配人类活动的行为准则。但是，如果我们想知道如何判断这些不合规律的异常行为，我们或许可以参考人们在自然界或外部事物出现怪异现象时通常怀有怎样的情绪。不是所有的原因都会以同样的统一性引发通常的结果。一个技工，虽然只跟无生命的物体打交道，也可能实现不了自己的目标，正如一个政治家指导具有理性和智慧的人们的行为时一样。

The vulgar, who take things according to their first appearance, attribute the uncertainty of events to such an uncertainty in the

causes as makes the latter often fail of their usual influence; though they meet with no impediment in their operation. But philosophers, observing that, almost in every part of nature, there is contained a vast variety of springs and principles, which are hid, by reason of their minuteness or remoteness, find, that it is at least possible the contrariety of events may not proceed from any contingency in the cause, but from the secret operation of contrary causes. This possibility is converted into certainty by farther observation, when they remark that, upon an exact scrutiny, a contrariety of effects always betrays a contrariety of causes, and proceeds from their mutual opposition. A peasant can give no better reason for the stopping of any clock or watch than to say that it does not commonly go right. But an artist easily perceives that the same force in the spring or pendulum has always the same influence on the wheels; but fails of its usual effects, perhaps by reason of a grain of dust, which puts a stop to the whole movement.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several parallel instances, philosophers form a maxim that the connexion between all causes and effects is equally necessary, and that its seeming uncertainty in some instances proceeds from the secret opposition of contrary causes.

普通人按照第一次见到事物的情况来判断事物，他们把事物的变化不定性归咎于原因的不确定性，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原因未能产生其常见的后果，尽管原因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并未遇到什么障碍。然而哲学家们注意到，在自然的各个领域都存在大量的机理和原则，由于太细微、太隐秘不为我们所见。因而他们发现，异常或相反的结果至少有可能不是由于原因中偶然出现的意外引起的，而是由相反的原因的隐秘活动产生的。进一步的观察使得这一可能性变成了确定性，他们指出，仔细检查后发现，相反的结果总是暗示其背后有相反的原因，总是从相互对立的原因中产生的。钟表停下不走了，一个农民能给出的最好的解释莫过于说钟表常常要出问题。但是，一个机械

师很容易看到，弹簧和摆锤同样的力总是会对齿轮产生同样的影响；如果它没有产生同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一粒尘埃让使其停止了运动。在观察多个相似的事例后，哲学家们会得出因果关系必然存在的结论，而某些情况下的不确定性是由相反原因的隐秘作用造成的。

Thus, for instance, in the human body, when the usual symptoms of health or sickness disappoint our expectation; when medicines operate not with their wonted powers; when irregular events follow from any particular cause; the philosopher and physician are not surprised at the matter, nor are ever tempted to deny, in general, the necessity and uniformity of those principles by which the animal economy is conducted. They know that a human body is a mighty complicated machine; that many secret powers lurk in it, which are altogether beyond our comprehension; that to us it must often appear very uncertain in its operations; and that therefore the irregular events, which outwardly discover themselves, can be no proof that the laws of nature are not observed with the greatest regularity in its internal operations and government.

比如，拿我们的身体来说，如果健康或疾病的征兆与预期不符，或是药物没有起到其惯常的功效，或者某个原因产生了异常的结果等等，哲学家和医学家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从而一概否定那些支配身体活动的原则具有必然性和统一性。他们知道人的身体是一架庞大而复杂的机器，隐藏着多种神秘的力量，这完全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在我们看来，身体活动常常显得很不确定，因此，一些表面的异常现象并不能证明，自然法则在身体内部活动和组织中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遵守。

The philosopher, if he be consistent, must apply the same reasoning to the actions and volitions of intelligent agents. The most irregular and unexpected resolutions of men may frequently be accounted for by those who know every particular circumstance of their character and situation. A person of an obliging disposition gives a peevish answer; but he has the toothache, or has not dined. A stupid fellow discovers an uncommon alacrity in his carriage; but he has met with a sudden piece of good fortune. Or even when an action, as sometimes happens, cannot be particularly accounted for, either by the person himself or by others; we know, in general, that the characters of men are, to a certain degree, inconstant and irregular. This is, in a manner, the constant character of human nature; though it be applicable, in a more particular manner, to some persons who have no fixed rule for their conduct, but proceed in a continued course of caprice and inconstancy. The internal principles and motives may operate in a uniform manner, notwithstanding these seeming irregularities;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winds, rain, cloud, and other variations of the weather are supposed to be governed by steady principles; though not easily discoverable by human sagacity and enquiry.

一位哲学家如果注重观点的一致性，那么他一定会把同样的推理用到具有智慧的人的活动和意志之上。如果对他人的性格和处境的特有之处非常熟悉，常常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做出最反常、最出人意料的决定。一个通常对他人很体贴的人突然给你一个乖戾的回答，是因为他牙疼得厉害，或是饿了还没吃饭。一个愚笨的人显得出奇的敏捷，那是因为他突然撞上了好运气。即便有些时候，个人的某种行为自己和他人都无法解释清楚，我们知道人们的性格通常会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和反常情况。从某种形式上说，这正是人性恒常的特点，但是在那些没有一贯的行事原则、言行变化无常的人身上会显出一些更为特别的情形。尽管有这些表面的反常，人性的内在原则和动机依

然具有统一性，正如风、雨、云和其他天气变化也受到恒常的规律所支配，只是靠人类的才智和探究不易发现罢了。

Thus it appears, not only that the conjunction between motives and voluntary actions is as regular and uniform as that between the cause and effect in any part of nature; but also that this regular conjunction has been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among mankind, and has never been the subject of dispute, either in philosophy or common life. Now, as it is from past experience that we draw all inferences concerning the future, and as we conclude that objects will always be conjoined together which we find to have always been conjoined; it may seem superfluous to prove that this experienced uniformity in human actions is a source whence we draw inferences concerning them. But in order to throw the argument into a greater variety of lights we shall also insist, though briefly, on this latter topic.

可见，不仅动机和自发行为之间的结合和自然界中的因果关系的结合一样具有规律性和统一性，而且这一惯常的结合是得到人们普遍认同的，无论在哲学还是日常生活中，从来都不是争论的话题。我们正是从过去的经验中对未来做出推断，当我们指出发现过去总是一起出现的事物将来也会一起发生时，似乎没有必要再去证明我们从经验中得来的人类行为的统一性是我们对人类行为进行推断的根据。但是，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一观点，我们将简要地论证后一个问题。

The mutual dependence of men is so great in all societies that scarce any human action is entirely complete in itself, or is performed without some reference to the actions of others, which are requisite to make it answer fully the intention of the agent. The

poorest artificer, who labours alone, expects at least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gistrate, to ensure him the enjoyment of the fruits of his labour. He also expects that, when he carries his goods to market, and offers them at a reasonable price, he shall find purchasers, and shall be able, by the money he acquires, to engage others to supply him with those commodities which are requisite for his subsistence. In proportion as men extend their dealings, and render their intercourse with others more complicated, they always comprehend, in their schemes of life, a greater variety of voluntary actions, which they expect, from the proper motives, to cooperate with their own. In all these conclusions they take their measures from past experience,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their reasonings concerning external objects; and firmly believe that men, as well as all the elements, are to continue, in their operations, the same that they have ever found them. A manufacturer reckons upon the labour of his servants for the execution of any work as much as upon the tools which he employs, and would be equally surprised were his expectations disappointed. In short, this experimental inference and reasoning concerning the actions of others enters so much into human life that no man, while awake, is ever a moment without employing it. Have we not reason, therefore, to affirm that all mankind have always agreed in 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according to the foregoing definition and explication of it?

在一切社会中，人们之间都非常需要相互依赖，极少有人类行为是完全独立的，或无需考虑他人的行为，必须有别人的行动才能使个体的意图得以充分实现。一个独自劳作的最为贫穷的工匠至少也希望受到地方长官的保护，确保自己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他当然还希望，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市场上，以合理的价格卖给别人，再用换来的钱从他人手里买回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产品。随着人们的经济活动日渐广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复杂，他们就会从生活中认识和了解

别人各种有意识的活动，出于适当的动机，他们期待这些有意识的活动和自己的活动是一致的。在得出所有这些结论时他们都以过去的经验为尺度，正如他们对外界事物做出推断时一样。他们坚信，人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一样，会继续按照他们已经发现的方式存在和活动。工厂老板从员工的劳动以及他采用的工具来判断某项任务的完成情况，如果他所依据的两方面的情况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会感到同样惊讶。总之，人类生活中处处都是这种对别人的行为进行实验性的推测和推断的情形，任何清醒的人无时无刻不在这样做。由此看来，根据上述定义和解释，难道我们不能断言所有人从来都是认同必然学说的吗？

Nor have philosophers even entertained a different opinion from the people in this particular. For, not to mention that almost every action of their life supposes that opinion, there are even few of the speculative parts of learning to which it is not essential. What would become of history, had we not a dependence on the veracity of the historian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which we have had of mankind? How could politics be a science, if laws and forms of government had not a uniform influence upon society? Where would be the foundation of morals, if particular characters had no certain or determinate power to produce particular sentiments, and if these sentiments had no constant operation on actions? And with what pretence could we employ our criticism upon any poet or polite author, if we could not pronounce the conduct and sentiments of his actors either natural or unnatural to such characters, and in such circumstances? It seems almost impossible, therefore, to engage either in science or action of any kind without acknowledging 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and this inference from motive to voluntary actions, from characters to conduct.

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哲学家们所抱的立场和普通人并无不同。不必说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揭示了这一观点，就是在他们的思辨活动中，也极少有这一观点不显得至关重要的地方。倘若我们不能依赖史学家建立在过往人类经验之上的诚信，历史会成为什么样的呢？如果法律和政府形式不能对社会产生一致的影响，政治何以成为一门科学？如果特定的人格不能产生特定的情感，或者这些情感对于人们的活动没有恒常的影响，道德学的根基何在？对于诗人和作家，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笔下人物的行为和情感在角色扮演和具体情境中显得自然还是不自然，我们又有何理由对他们进行批判？因此，如果我们不承认必然法则，不承认从动机到意志活动、从个人品格到行为的推论，似乎将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科学研究和活动。

And indeed, when we consider how aptly natural and moral evidence link together, and form only one chain of argument, we shall make no scruple to allow that they are of the same nature, and derived from the same principles. A prisoner who has neither money nor interest, discovers the impossibility of his escape, as well when he considers the obstinacy of the gaoler, as the walls and bars with which he is surrounded; and, in all attempts for his freedom, chooses rather to work upon the stone and iron of the one, than upon the inflexible nature of the other. The same prisoner, when conducted to the scaffold, foresees his death as certainly from the constancy and fidelity of his guards, as from the operation of the axe or wheel. His mind runs along a certain train of ideas: the refusal of the soldiers to consent to his escape; the action of the executioner; the separation of the head and body; bleeding, convulsive motions, and death. Here is a connected chain of natural causes and voluntary actions; but the mind feel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n passing from one link to another. Nor is it less certain of the future event than if it were connected with the objects present to the memory or senses, by a train of causes, cemented

together by what we are pleased to call a physical necessity. The same experienced union has the same effect on the mind, whether the united objects be motives, volition, and actions; or figure and motion. We may change the name of things; but their nature and their operation on the understanding never change.

事实上，我们看到自然和人性领域的证据是多么易于互相联系，共同组成一条连贯的论证思路，我们就可以坦然承认，它们本质上是相同的，来源于同样的原理。一个无钱无势的囚犯，想到监狱看守不近人情，再看看四面的高墙和铁栏，发现逃跑无门。为了获得自由，他宁愿在钢铁牢房上做文章，而不是去化解狱吏的铁石心肠。同一个囚犯在被押赴刑场之时，看见肃立的卫兵满脸的坚定忠诚，看见刀斧或绞架，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他的心头浮现出一连串的想法：狱吏不容他逃跑，刽子手手起刀落，他的身首分离，流血、抽搐以及死亡。这里呈现的是一连串的自然原因和意志行为，不过我们的心灵在从一个观念过度到另一个观念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区别，也不会对将要发生的事件感到不够确信，就像这一事件是由一连串原因和我们感官或记忆中的事物相联系，由我们乐意称为物理必然性的东西紧密结合在一起似的。我们体验到的相同的结合会对心灵产生相同的影响，不管结合在一起的事物是动机、意志或行动，甚或是某种形象、某种运动。我们可以改变事物的名称，但是事物本身的性质和其在理解过程中的作用绝不会改变。

Were a man, whom I know to be honest and opulent, and with whom I live in intimate friendship, to come into my house, where I am surrounded with my servants, I rest assured that he is not to stab me before he leaves it in order to rob me of my silver standish; and I no more suspect this event than the falling of the house itself, which is new, and solidly built and founded.—But he may have been seized with a sudden and unknown frenzy.—So may a sudden

earthquake arise, and shake and tumble my house about my ears. I shall therefore change the suppositions. I shall say that I know with certainty that he is not to put his hand into the fire and hold it there till it be consumed. And this event, I think I can foretell with the same assurance, as that, if he throw himself out at the window, and meet with no obstruction, he will not remain a moment suspended in the air. No suspicion of an unknown frenzy can give the least possibility to the former event, which is so contrary to all the known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 A man who at noon leaves his purse full of gold on the pavement at Charing-Cross, may as well expect that it will fly away like a feather, as that he will find it untouched an hour after. Above one half of human reasonings contain inferences of a similar nature, attended with more or less degrees of certainty proportioned to our experience of the usual conduct of mankind in such particular situations.

一个我知道很诚实富裕的人，和我有深厚的友谊，如果他来到我家，周围都是我的仆人，我敢肯定的是他在出门之前不会拿刀捅我，抢走我的银质墨水台。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就像我相信我的新房子地基稳固、墙体坚实，不会垮塌。但是他或许会突然间莫名地发起狂来，就像会突然发生地震，把我的房子给摇垮一样。所以我改变一下假设，我会说我敢肯定这人不会把手伸进火里，放着不动，直到被火烧焦。我对这个预测信心十足，就像我同样敢肯定，如果他从窗口跳出去，在没有遇到任何东西阻挡的情况下，他不会停留在空中，哪怕是短暂的一刻。我们能猜想到的任何莫名的狂躁，都不能证明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因为这彻底违背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人性原则。一个人中午把装满黄金的钱袋遗失在伦敦市中心查宁十字街的步行道上，如果他设想一个时辰后钱袋还在那里，没有人动它，还不如设想钱袋会像一片羽毛一样飞走。半数以上的人类推理中有类似的推论，只是确信的程度或多或少，和我们对人们在此等情况下的通常行为的经验感受相对应。

I have frequently considered, what could possibly be the reason why all mankind, though they have ever, without hesitation, acknowledged 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in their whole practice and reasoning, have yet discovered such a reluctance to acknowledge it in words, and have rather shown a propensity, in all ages, to profess the contrary opinion. The matter, I think, may be accounted for after the following manner. If we examine the operations of body, and the production of effects from their causes, we shall find that all our faculties can never carry us farther in our knowledge of this relation than barely to observe that particular objects are constantly conjoined together, and that the mind is carried, by a customary transition, from the appearance of one to the belief of the other. But though this conclusion concerning human ignorance be the result of the strictest scrutiny of this subject, men still entertain a strong propensity to believe that they penetrate farther into the powers of nature, and perceive something like a necessary connexion between the cause and the effect. When again they turn their reflections towards the operations of their own minds, and feel no such connexion of the motive and the action; they are thence apt to suppose,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ffects which result from material force, and those which arise from thought and intelligence. But being once convinced that we know nothing farther of causation of any kind than merely the constant conjunction of objects, and the consequent inference of the mind from one to another, and finding that these two circumstances are universally allowed to have place in voluntary actions; we may be more easily led to own the same necessity common to all causes. And though this reasoning may contradict the systems of many philosophers, in ascribing necessity to the determinations of the will, we shall find, upon reflection, that they dissent from it in words only, not in their real sentiment. Necessity, according to the

sense in which it is here taken, has never yet been rejected, nor can ever, I think, be rejected by any philosopher. It may only, perhaps, be pretended that the mind can perceive, in the operations of matter, some farther connexion between the cause and effect; and connexion that has not place in voluntary actions of intelligent beings. Now whether it be so or not, can only appear upon examination; and it is incumbent on these philosophers to make good their assertion, by defining or describing that necessity, and pointing it out to us in the operations of material causes.

我常常想，既然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承认必然原则在他们整个实践和推理中的作用，为什么他们不仅不情愿把这个观点诉诸于文，反而在不同时代都更倾向于表达恰恰相反的立场呢。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可以按照以下的方式进行解释。如果我们考察物体的活动，以及从原因产生结果的过程，我们发现自己的智力对这一关系的最深远的知识，不过就是注意到某些特定的事物恒常地伴随在一起，而由于习惯的影响，我们的心灵会从一事物的出现过渡到对另一事物的信念。尽管关于人类无知的这个结论是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最严肃地探索的基础上得来的，人们仍然强烈相信他们能够探索到自然界中更深刻的认识，发现因果之间存在的类似必然联系的东西。而他们再次反思自己的内心活动时，却又找不到动机和行为之间的类似联系，他们便容易假设，源自物质力量的结果和源自思想智慧的结果是有差别的。但是，一旦我们相信我们对因果关系的了解仅限于事物恒常会伴随出现以及心灵从一事物推断出另一事物，并且发现人们承认这两种情形普遍存在于意志活动中，我们或许更容易接受一切原因都有同样的必然性。虽然这个将必然归于意志决定的推理和许多哲学家所持的学说想矛盾，仔细思考后我们就会发现，分歧不过停留在言语之上，并不是真情实感。在我们眼下讨论的意义上，必然性从未遭到任何哲学家的否定，我相信，它也永远不能被否定。人们或许可以声称，心灵从物质世界的事物活动中可以洞察更深刻的因果关系，一种不存在于有智慧的生物的意志活动中的因果关系。至于这个观点正不正确，只有经

过检验才能确定，而提出这个观点的哲学家要让人信服，就有义务定义和描述这种必然性，为我们指明它在事物原因运动中的作用。

It would seem, indeed, that men begin at the wrong end of this question concerning liberty and necessity, when they enter upon it by examining the faculties of the soul, the influence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operations of the will. Let them first discuss a more simple question, namely, the operations of body and of brute unintelligent matter; and try whether they can there form any idea of causation and necessity, except that of a constant conjunction of objects, and subsequent inference of the mind from one to another. If these circumstances form, in reality, the whole of that necessity, which we conceive in matter, and if these circumstances be also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o take place in the operations of the mind, the dispute is at an end; at least, must be owned to be thenceforth merely verbal. But as long as we will rashly suppose, that we have some farther idea of necessity and causation in the operations of external objects; at the same time, that we can find nothing farther in the voluntary actions of the mind;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bringing the question to any determinate issue, while we proceed upon so erroneous a supposition. The only method of undeceiving us is to mount up higher, to examine the narrow extent of science when applied to material causes, and to convince ourselves that all we know of them is the constant conjunction and inference above mentioned. We may, perhaps, find that it is with difficulty we are induced to fix such narrow limits to human understanding; but we can afterwards find no difficulty when we come to apply this doctrine to the actions of the will. For as it is evident that these have a regular conjunction with motives and circumstances and characters, and as we always draw inferences from one to the other, we must be

obliged to acknowledge in words that necessity, which we have already avowed, in every deliberation of our lives, and in every step of our conduct and behaviour. [8_1]

事实上，人们从探索心灵的官能、理解的影响和意志的作用着手研究自由与必然这个问题，似乎本末倒置了。让他们先讨论一个更简单的问题，即物体的活动和无智慧物质的活动，看看除了事物恒常伴随出现以及心灵从一事物推断出另一事物这个发现之外，他们是否还能找到关于因果关系和必然性的任何观念。如果这些情形事实上构成了我们在事物中获得的必然性的全部内容，而且是人们普遍认为存在于心灵活动之中的，那争论就可以结束了，或者至少要承认这个争论此后只是口头上的。但是，只要我们仍然冒失地以为，我们对于外界事物活动中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有更深刻的观念，而与此同时我们在心灵的意志活动中没有更深入的发现，这个争论就不可能有个了结，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本身就建立在如此错误的认识上。摆脱自欺欺人的唯一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考察涉及物质原因时科学的狭窄范围，让我们确信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上文提到的事物恒常伴随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推断。我们或许会发现，我们为人类的理解设定如此狭窄的限制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把这个原则用到意志活动上时却没有任何困难。很明显，这些活动和动机、情景以及性格之间存在有规律的关联，并且我们总是从一者中推断出另一者，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已经认同的那种必然性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我们行为举止的每一个步骤中。 [9_1]

But to proceed in this reconciling project with regard to the question of liberty and necessity; the most contentious question of metaphysics, the most contentious science; it will not require many words to prove, that all mankind have ever agreed in the doctrine of liberty as well as in that of necessity, and that the whole dispute, in this respect also, has been hitherto merely verbal. For what is

meant by liberty, when applied to voluntary actions? We cannot surely mean that actions have so little connexion with motives, inclinations, and circumstances, that one does not follow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uniformity from the other, and that one affords no inference by which we can conclude the existence of the other. For these are plain and acknowledged matters of fact. By liberty, then, we can only mean a power of acting or not acting, according to the determinations of the will; this is, if we choose to remain at rest, we may; if we choose to move, we also may. Now this hypothetical liberty is universally allowed to belong to every one who is not a prisoner and in chains. Here, then, is no subject of dispute.

自由与必然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这一最具争议的科学中最具争议的问题，要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我们无须多费口舌就能证明，全人类都认同自由原则，就像认同必然原则一样，而且迄今为止围绕这一争论都只是口头上的。在用于意志活动时，自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显然不是指行为和个人的动机、意愿和境遇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不是指一者与另一者之间没有一定程度的统一性，不是指我们不能从一者中推断出另一者的存在。这些都是明确且广为接受的事实。我们所谓自由，只能是意志的决断之下作为或不作为的能力，换言之，我们想静就可以静，想动就可以动的能力。我们普遍认为，一个人只要没有身陷囹圄，没有被戴上枷锁，都拥有这一理论上的自由，这是没有争议的。

Whatever definition we may give of liberty, we should be careful to observe two requisite circumstances: First, that it be consistent with plain matter of fact; secondly, that it be consistent with itself. If we observe these circumstances, and render our definition intelligible, I am persuaded that all mankind will be found of one opinion with regard to it.

不管我们怎样定义自由，我们都要小心谨慎地考虑两个必要的因素。一是我们的定义要合乎实际的事实，二是要和自身相符合。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因素，把自由定义得清楚易懂，我相信所有人都不会有任何意见。

It is universally allowed that nothing exists without a cause of its existence, and that chance, when strictly examined, is a mere negative word, and means not any real power which has anywhere a being in nature. But it is pretended that some causes are necessary, some not necessary. Here then is the advantage of definitions. Let any one define a cause, without comprehending, as a part of the definition, a necessary connexion with its effect; and let him show distinctly the origin of the idea, expressed by the definition; and I shall readily give up the whole controversy. But if the foregoing explication of the matter be received, this must be absolutely impracticable. Had not objects a regular conjunction with each other, we should never have entertained any no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and this regular conjunction produces that inference of the understanding, which is the only connexion, that we can have any comprehension of. Whoever attempts a definition of cause, exclusive of these circumstances, will be obliged either to employ unintelligible terms or such as are synonymous to the term which he endeavours to define. [8_2] And if the definition above mentioned be admitted; liberty, when opposed to necessity, not to constraint, is the same thing with chance; which is universally allowed to have no existence.

我们都承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原因，而所谓机会，一经详细检查就会发现，只是个消极意义的词，它不指自然界中存在的任何真

实的能量。然而人们却声称有些原因是必然的，有些不是必然的。这便是定义的优势所在。让一个人来给原因下定义，而定义中不包含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个成分，他若能在定义中把原因这个观念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我会立即抛弃整个争论。但是只要接受了上文的阐述，他们就完全不可能这样做。假如事物之间没有有规则地伴随出现，我们绝不会有因果关系的任何观念，正是由于事物的这种恒常伴随出现，才产生了理解中的推断，形成了我们能够理解的唯一联系。任何人在给原因下定义时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只能采用含混不清的术语或者套用与被定义的术语语义相近的词汇。[9_2] 而如果接受我们上文中的定义，自由，在与必然相对而不是限制必然的意义上，就等同于机会这一公认的子虚乌有之物。

Part II

第二节

There is no method of reasoning more common, and yet none more blameable, than, in philosophical disputes, to endeavour the refutation of any hypothesis, by a pretence of its dangerous consequences to religion and morality. When any opinion leads to absurdities, it is certainly false; but it is not certain that an opinion is false, because it is of dangerous consequence. Such topics, therefore, ought entirely to be forborne; as serving nothing to the discovery of truth, but only to make the person of an antagonist odious. This I observe in general, without pretending to draw any advantage from it. I frankly submit to an examination of this kind, and shall venture to affirm that the doctrines, both of necessity and of liberty, as above explained, are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 morality, but are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its support.

哲学争论中，最常见但也最受诟病的方法就是尝试用“一个假说对宗教或道德有危害”这种说法来批判这个学说。如果一个观点造成荒唐的后果，这个观念一定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一个观点会导致危险的后果，我们却不能因此肯定这个观点必然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完全避免这样的话题，因为它们不仅无助于发现真理，反而只能使争论的对手变得令人厌恶。针对这一点，我只是泛泛而谈，并不是宣称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坦率地接受这方面的检查，并大胆断言，如上所述的必然原则和自由原则不仅合乎道德，而且绝对是维系道德的必要成分。

Necessity may be defined two ways, conformably to the two definitions of cause, of which it makes an essential part. It consists either in the constant conjunction of like objects, or in the inference of the understanding from one object to another. Now necessity, in both these senses, (which, indeed, are at bottom the same) has universally, though tacitly, in the schools, in the pulpit, and in common life, been allowed to belong to the will of man; and no one has ever pretended to deny that we can draw inferences concerning human actions, and that those inferences are founded on the experienced union of like actions, with like motives, inclinations, and circumstances. The only particular in which any one can differ, is, that either, perhaps, he will refuse to give the name of necessity to this property of human actions; but as long as the meaning is understood, I hope the word can do no harm; or that he will maintain it possible to discover something farther in the operations of matter. But this,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can be of no consequence to morality or religion, whatever it may be to natural philosophy or metaphysics. We may here be mistaken in asserting that there is no idea of any other necessity or connexion in the actions of body. But surely we ascribe nothing to the actions of the mind, but what everyone does, and must readily allow of. We

change no circumstance in the received orthodox system with regard to the will, but only in that with regard to material objects and causes. Nothing, therefore, can be more innocent, at least, than this doctrine.

必然性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定义，分别对应原因的两种定义，因为必然性是原因的关键部分。必然性要么指相似事物恒常伴随出现，要么指从一事物到另一事物的理解推断。现在，在学校、教堂和日常生活中，人们虽然没有明言，但普遍接受必然性在这两层意义上（本质上是同一种意义）属于人的意志的范畴，没有人会否认我们能对人类行为进行推断，或否认这些推断建立在我们对相似行为总是伴随相似动机、意愿和境遇的经验感受之上。可能出现分歧的地方只在于：一是可能有人拒绝把人类行为的这一特征称为必然性。但是只要意思得到正确理解，我认为用词的问题不会带来什么危害；二是有人或许会坚持我们可能在事物作用中获得更深刻的认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无论这一点对自然哲学或形而上学会产生什么后果，都不会影响到道德或宗教。我们若是断言在物体的活动中再没有任何别的必然和联系的观念，或许有错。但是我们归于心灵活动的只有人人都接受且欣然认可的东西。我们没有对正统理论体系中关于意志的看法做任何改变，只是对外界事物和原因的观点有所改变。因此，恐怕再也没有比这个学说更纯真无害的东西了。

All laws being founded on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it is supposed a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these motives have a regular and uniform influence on the mind, and both produce the good and prevent the evil actions. We may give to this influence what name we please; but, as it is usually conjoined with the action, it must be esteemed a cause, and be looked upon as an instance of that necessity, which we would here establish.

一切法则都建立在奖惩之上，这被假设为一个基本的原则，即这些动机会对心灵产生一致的、统一的影响，起到扬善抑恶的作用。对于这样的影响，我们想怎么称谓都可以；但是，由于它常常会导致相应的行为，它必定是一种原因，应该被视作我们这里论证的必然性的具体事例。

The only proper object of hatred or vengeance is a person or creature, endowed with thought and consciousness; and when any criminal or injurious actions excite that passion, it is only by their relation to the person, or connexion with him. Actions are, by their very nature, temporary and perishing; and where they proceed not from some cause in the character and disposition of the person who performed them, they can neither redound to his honour, if good; nor infamy, if evil. The actions themselves may be blameable; they may be contrary to all the rul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 but the person is not answerable for them; and as they proceeded from nothing in him that is durable and constant, and leave nothing of that nature behind them, it is impossible he can, upon their account, become the object of punishment or vengeanc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therefore, which denies necessity, and consequently causes, a man is as pure and untainted, after having committed the most horrid crime, as at the first moment of his birth, nor is his character anywise concerned in his actions, since they are not derived from it, and the wickedness of the one can never be used as a proof of the depravity of the other.

憎恶和报复的对象只能是一个具有思想和意识的人或生物。如果有什么罪恶或是有害的行为激起了这种情感，必定是因为这类行为和这个人相关，使他脱不了干系。人的行为本身是转瞬即逝的，如果行为不是出于行事人品行和性情的某种原因，那么即使好的行为也不会

让他感到光荣，坏的行为也不会让他背上恶名。行为本身可能受到谴责，因为它违背了一切道德和宗教的原则，但是行事人无需对此负责。既然这些行为既不是源自这个人内心某种一贯的、恒常的品质，过后也不会存留类似的东西，人们就不可能把他当作惩罚和报复的对象。因此，按照这种否认必然性和事物原因的逻辑，一个犯下滔天大罪的人和新生儿一样纯洁无暇，其品行全然不会因其行为而受影响，因为行为和品行无关，无论他的行为多么恶劣，都不能用来证明他品行败坏。

Men are not blamed for such actions as they perform ignorantly and casually, whatever may be the consequences. Why? but because the principles of these actions are only momentary, and terminate in them alone. Men are less blamed for such actions as they perform hastily and unpremeditatedly than for such as proceed from deliberation. For what reason? but because a hasty temper, though a constant cause or principle in the mind, operates only by intervals, and infects not the whole character. Again, repentance wipes off every crime, if attended with a reformation of life and manners. How is this to be accounted for? but by asserting that actions render a person criminal merely as they are proofs of criminal principles in the mind; and when, by an alteration of these principles, they cease to be just proofs, they likewise cease to be criminal. But, except upon 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they never were just proofs, and consequently never were criminal.

无论人们的行为造成什么后果，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漫无目的，他们就不该为这些行为受到谴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是暂时的、只限于自身的。此类行为如果是人们在急躁中未经预想就实施的，他们受到的责备应该比那些出于故意的人轻一些。理由何在？因为脾气急躁虽然常常是人民心中一

种恒常的原因或是原理，但是这种情况是间断性的，不至祸及整个品格。再如，人们悔过之后若能把生活和举止都改善一番，他的一切罪孽都可以洗尽。这又作何解释？我们只能说，行为之所以把人变为罪人，就在于它证明了心灵中罪恶的理念，而一旦理念改变了，行为也就不再构成合理的证据，同样也就不能被视为有罪的了。但是，除非我们用必然原则来衡量，否则那些行为不可能构成合理的证据，因而也绝不可能构成罪恶。

It will be equally easy to prove, and from the same arguments, that liberty, according to that definition above mentioned, in which all men agree, is also essential to morality, and that no human actions, where it is wanting, are susceptible of any moral qualities, or can be the objects either of approbation or dislike. For as actions are objects of our moral sentiment, so far only as they are indications of the internal character, passions, and affections;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y can give rise either to praise or blame, where they proceed not from these principles, but are derived altogether from external violence.

按照同样的论证我们也可以轻易证明，依据上述我们都认同的定义，自由是道德中不可或缺的成分，离开了自由，任何人类活动都不再有道德的品质，也不能成为我们赞同或厌恶的对象。因为行动只有作为我们内心的品格、激情和感情的外在流露，才是我们的道德情感的对象。如果我们的行为不是源于这些动因，而是由外在力量引起的，就不可能对其进行赞扬或批评。

I pretend not to have obviated or removed all objections to this theory, with regard to necessity and liberty. I can foresee other objections, derived from topics which have not here been treated of.

It may be said, for instance, that, if voluntary actions be subjected to the same laws of necessity with the operations of matter, there is a continued chain of necessary causes, preordained and predetermined, reaching from the original cause of all to every single volition of every human creature. No contingency anywhere in the universe; no indifference; no liberty. While we act, we are, at the same time, acted upon. The ultimate Author of all our volitions is the Creator of the world, who first bestowed motion on this immense machine, and placed all beings in that particular position, whence every subsequent event, by an inevitable necessity, must result. Human actions, therefore, either can have no moral turpitude at all, as proceeding from so good a cause; or if they have any turpitude, they must involve our Creator in the same guilt, while he is acknowledged to be their ultimate cause and author. For as a man, who fired a mine, is answerable for all the consequences whether the train he employed be long or short; so wherever a continued chain of necessary causes is fixed, that Being, either finite or infinite, who produces the first, is likewise the author of all the rest, and must both bear the blame and acquire the praise which belong to them. Our clear and unalterable ideas of morality establish this rule, upon unquestionable reasons, when we examine the consequences of any human action; and these reasons must still have greater force when applied to the volitions and intentions of a Being infinitely wise and powerful. Ignorance or impotence may be pleaded for so limited a creature as man; but those imperfections have no place in our Creator. He foresaw, he ordained, he intended all those actions of men, which we so rashly pronounce criminal. And we must therefore conclude, either that they are not criminal, or that the Deity, not man, is accountable for them. But as either of these positions is absurd and impious, it follows, that the doctrine from which they are deduced cannot possibly be true, as being liable to all the same objections. An absurd consequence, if

necessary, proves the original doctrine to be absurd; in the same manner as criminal actions render criminal the original cause, if the connexion between them be necessary and inevitable.

我并不敢说我已经把关于必然和自由理论的所有反对观点都清除干净了。我能预见到，可能有人会从这里没有涉及的话题上生出其他的反对意见。比如，如果意志行为同样受客观事物活动中必然原则的支配，就可以说存在着一连串的必然原因，预先注定和决定了万物的原始动因直到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意志决定。宇宙中哪里都不存在偶然，没有无缘无故的事物，没有自由。在行动的同时，我们也是行动的对象。我们所有意志的终极动力便是创世者，是他首先让这台巨大的机器运转起来，把一切存在安排在各自特定的位置，随后的每一事件都按照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而发生。照此看来，人类行为就没有任何道德沦丧的情形，因为都源于如此美好的动因；而如果存在道德沦丧的情形，那么我们的造物主就脱不了干系，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一切人类行为的终极动因和发动者。引爆地雷的人，无论他用的导火线是长是短，都应该对一切后果负责；同理，如果能够确定一连串必然原因，那么作为原始动因，无论是人还是神，自然也是其他所有原因的作者，也应该为其后果担责，有过要遭到谴责，有功要得到赞赏。这一原则建立在我们明确的、不可更改的道德观念之上，背后有着我们观察人类行为的后果后得出的无可质疑的理由。这些理由同样应该对全知全能的神明的意志和企图产生更大的影响。人类可以推说受制于无知无能，但是造物主身上没有这些瑕疵。他预知、预定而且谋划了我们暂且称之为罪孽的一切人类行为。因此，我们要么宣布这些行为并非罪孽，要么把罪责归于上帝，而非人类。两种立场都同样荒唐，同样亵渎神灵，说明其背后的原则不可能是正确的，都会遭到同样的反驳。荒唐的结果若是必然产生的，证明其背后的原则同样荒唐，就如邪恶的行为证明其动机本身是罪恶的的一样，如果它们之间存在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联系。

This objection consists of two parts, which we shall examine separately. First, that, if human actions can be traced up, by a necessary chain, to the Deity, they can never be criminal; on account of the infinite perfection of that Being from whom they are derived, and who can intend nothing but what is altogether good and laudable. Or, Secondly, if they be criminal, we must retract the attribute of perfection, which we ascribe to the Deity, and must acknowledge him to be the ultimate author of guilt and moral turpitude in all his creatures.

这个反对意见包含两个方面，我们分开讨论。第一，如果可以经由一串必然的线索把人类行为的动机追溯到上帝，那么其中就绝不会有罪恶存在，因为作为行为之源的上帝尽善尽美，上帝意旨中的一切都是好的、值得称颂的。第二，如果人类行为存在罪恶，我们就必须收回上帝尽善尽美的观点，并且承认上帝是其创造的一切生命的罪恶和道德沦丧的根源。

The answer to the first objection seems obvious and convincing. There are many philosophers who, after an exact scrutiny of all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conclude, that the WHOLE, considered as one system, is, in every period of its existence, ordered with perfect benevolence; and that the utmost possible happiness will, in the end, result to all created beings, without any mixture of positive or absolute ill or misery. Every physical ill, say they, make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is benevolent system, and could not possibly be removed, even by the Deity himself, considered as a wise agent, without giving entrance to greater ill, or excluding greater good, which will result from it. From this theory, some philosophers, and the ancient Stoics among the rest, derived a topic of consolation under all afflictions, while they taught their pupils

that those ills under which they laboured were, in reality, goods to the universe; and that to an enlarged view, which could comprehend the whole system of nature, every event became an object of joy and exultation. But though this topic be specious and sublime, it was soon found in practice weak and ineffectual. You would surely more irritate than appease a man lying under the racking pains of the gout by preaching up to him the rectitude of those general laws, which produced the malignant humours in his body, and led them through the proper canals, to the sinews and nerves, where they now excite such acute torments. These enlarged views may, for a moment, please the imagination of a speculative man, who is placed in ease and security; but neither can they dwell with constancy on his mind, even though undisturbed by the emotions of pain or passion; much less can they maintain their ground when attacked by such powerful antagonists. The affections take a narrower and more natural survey of their object; and by an economy, more suitable to the infirmity of human minds, regard alone the beings around us, and are actuated by such events as appear good or ill to the private system.

对第一种反对意见的回答似乎很明确而且有说服力。许多哲学家在仔细研究各种自然现象后认为，宇宙整体，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在其各个存在阶段都具备完美的仁德；一切造物最终会享有最大限度的幸福，其中不会掺杂任何积极的或绝对的罪孽和苦难。他们说，每一种罪孽都是这个仁慈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即使被视为具有无上智慧的上帝本身也不可能清除这些罪孽，不然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罪孽，或把由此产生的更大的良善排除出去。正是从这种理论中，一些哲学家和其他斯多葛派学者提出了从一切苦难中得到慰藉的观点。他们教导弟子说，他们忍受的各种罪孽其实都是宇宙中的善，从一种囊括整个自然体系的广阔角度来看，每一种事物都成为我们欢欣和愉悦的对象。尽管这个论调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很快就被证实是脆弱且不中用

的。如果你向一位受痛风折磨的病人宣称说，他体内的毒素通过适当的渠道排出来，到达肌腱和神经，引起了剧烈疼痛，但这都是合理的法则在起作用，恐怕不仅不能让他感到平静，反而会让他恼怒不已。这些夸张的观点可以在短时间内取悦一个安定自在的思辨者的想象。但是，就算他不受痛苦和激情的干扰，这些东西也不会在他心中长久存留，更不用说，在受到这些强敌攻击的时候就更不能守得住阵脚了。我们的情感通常是以更自然的方式看到事物更狭窄的一面。再者，由于人类心灵的脆弱，我们的情感也只能关注自身周围的事物，受到那些对于我们自身而言或好或坏的事情的影响。

The case is the same with moral as with physical ill. It cannot reasonably be supposed, that those remote considerations, which are found of so little efficacy with regard to one, will have a more powerful influence with regard to the other. The mind of man is so formed by nature that, upon the appearance of certain characters, dispositions, and actions, it immediately feels the sentiment of approbation or blame; nor are there any emotions more essential to its frame and constitution. The characters which engage our approbation are chiefly such as contribute to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human society; as the characters which excite blame are chiefly such as tend to public detriment and disturbance; whence it may reasonably be presumed, that the moral sentiments arise, either mediately or immediately, from a reflection of these opposite interests. What though philosophical meditations establish a different opinion or conjecture; that everything is right with regard to the WHOLE, and that the qualities, which disturb society, are, in the main, as beneficial, and are as suitable to the primary intention of nature as those which more directly promote its happiness and welfare? Are such remote and uncertain speculations able to counterbalance the sentiments which arise from the natural and immediate view of the objects? A man who is robbed of a

considerable sum; does he find his vexation for the loss anywise diminished by these sublime reflections? Why then should his moral resentment against the crime be supposed incompatible with them? Or why should not the acknowledgment of a real distinction between vice and virtue be reconcileable to all speculative systems of philosophy, as well as that of a real distinction between personal beauty and deformity? Both these distinctions are founded in the natural sentiments of the human mind, and these sentiments are not to be controuled or altered by any philosophical theory or speculation whatsoever.

道德方面的问题和身体疾病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认为，那些远离主题的考究对一个方面影响很小，却能在另一方面产生大得多的影响。人类心灵的天性是，只要遇见特定的品格、性情和行为，立刻就会流露出认同感或责备感。对于心灵的结构和成分来说，再没有比这些情感更重要的了。引起我们认同感的品格通常是有利于社会的和睦安宁的，而激起我们反感的则是扰乱和危害公共利益的。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道德情操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对上述两种相反利益的反思。但是，如果哲学思考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推测，认为世间一切对于整体而言都是合理的存在，扰乱社会的事物基本都是有益的，和直接促进社会福祉安宁的事物同样合符自然的意愿，那又怎么办呢？这些遥远而不确定的思想能够与我们自然、直接观察事物获得的情感相抗衡吗？一个被抢走了大笔金钱的人会因为这些崇高的反思而减少这一损失给他带来的痛苦吗？为什么说他对犯罪的反感和这些反思不相容？或者，为什么说承认善恶之间真正存在区别，就和一切思辨哲学的理念不相容，我们不是也承认身体有美丑之分吗？这两种区别都建立在人的心灵的自然情感之上，不受任何哲学理论和思辨的控制，也不因其而改变。

The second objection admits not of so easy and satisfactory an

answer; nor is it possible to explain distinctly, how the Deity can be the mediate cause of all the actions of men, without being the author of sin and moral turpitude. These are mysteries, which mere natural and unassisted reason is very unfit to handle; and whatever system she embraces, she must find herself involved in inextricable difficulties, and even contradictions, at every step which she takes with regard to such subjects. To reconcile the indifference and contingency of human actions with prescience; or to defend absolute decrees, and yet free the Deity from being the author of sin, has been found hitherto to exceed all the power of philosophy. Happy, if she be thence sensible of her temerity, when she pries into these sublime mysteries; and leaving a scene so full of obscurities and perplexities, return, with suitable modesty, to her true and proper province, the examination of common life; where she will find difficulties enough to employ her enquiries, without launching into so boundless an ocean of doubt, uncertainty, and contradiction!

对于第二个反对意见，不容易提出满意的回答，也不可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上帝既然是人的一切行为的间接原因，却又不是人类罪孽和道德沦丧的根源。这些神秘的话题不适合用自然的、无助的理性来探讨。无论理性选择什么系统，都会发现在这些话题上每前行一步，自身就会陷入难言的困境甚至是矛盾中。要调和人类行为的随意性、偶然性和先知先觉性，或者既要捍卫上帝的绝对旨意，又要免去上帝的一切罪责，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都不能办到。因此，如果理性意识到在探索这些崇高的神秘话题中自身的冒失，离开这个充满了晦涩而迷惑的领地，谦逊地回到真正属于自身的领地，回到对日常生活的探索之中，也不失为值得庆幸的事。在这块领地上，理性能够找到足以让她探究的难题，而不至于陷入一片充满疑虑、不安和矛盾的汪洋大海。

[8_1].The prevalence of the doctrine of liberty may be accounted for, from another cause, viz. a false sensation or seeming experience which we have, or may have, of liberty or indifference, in many of our actions. The necessity of any action, whether of matter or of mind, is not, properly speaking, a quality in the agent, but in any thinking or intelligent being, who may consider the action; and it consists chiefly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his thoughts to infer the existence of that action from some preceding objects; as liberty, when opposed to necessity, is nothing but the want of that determination, and a certain looseness or indifference, which we feel, in passing, or not passing, from the idea of one object to that of any succeeding one. Now we may observe, that, though, in reflecting on human actions, we seldom feel such a looseness, or indifference, but are commonly able to infer them with considerable certainty from their motives, and from the dispositions of the agent; yet it frequently happens, that, in performing the actions themselves, we are sensible of something like it. And as all resembling objects are readily taken for each other, this has been employed as a demonstrative and even intuitive proof of human liberty. We feel, that our actions are subject to our will, on most occasions; and imagine we feel, that the will itself is subject to nothing, because, when by a denial of it we are provoked to try, we feel, that it moves easily every way, and produces an image of itself (or a Velleïty, as it is called in the schools) even on that side, on which it did not settle. This image, or faint motion, we persuade ourselves, could, at that time, have been compleated into the thing itself; because, should that be denied, we find, upon a second trial, that, at present, it can. We consider not, that the fantastical desire of shewing liberty, is here the motive of our actions. And it seems certain, that, however we may imagine we feel a liberty within ourselves, a spectator can commonly infer our actions from our motives and character; and even where he cannot, he concludes in general, that he might, were he perfectly acquainted with every circumstance of our situation and temper, and the most secret springs of our complexion and disposition. Now this is the very essence of necessity, according to the foregoing doctrine.

[8_2].Thus, if a cause be defined, that which produces any thing, it is easy to observe, that producing is synonymous to causing. In like manner, if a cause be defined, that by which any thing exists, this is liable to the same objection. For what is meant by these words, by which? Had it been said, that a cause is that after which any thing constantly exists; we should have understood the terms. For this is, indeed, all we know of the matter. And this constantly forms the very essence of necessity, nor have we any other idea of it.

[9_1].自由学说之所以得到广泛接受，可以从另一个原因中得到解释，即我们从自己的多种行为中对自由或中立得到错误的经验。恰当地说，任何行动的必然性，无论

是物质的或心理的，都不是行动者的一种品质，而是能思考该行动的有思想或有智慧的生命的一种品质；这种必然性主要体现在其思想的决断能力上，即他能够从先前的事物推断出当前存在的行动来；同样，自由作为必然的对立物，不过就是缺乏这一决断以及我们由一个事物的观念过渡到另一事物的观念或不过渡到另一事物的观念时所感觉到的不受拘束或保持中立。现在我们可以说，尽管我们在反思人类行为时，很少有这样的不受拘束和保持中立，而是常常能比较确信地从行为者的动机和性情中推断出这些行为，但是常见的情形是，我们在实施这些行为时，就会感觉到某种类似随意性的东西。由于相似的事物很容易被相互混淆，我们一直把这样的情况当作直观的甚或直觉的证据，来证明人类的自由。我们感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行为受我们的意志支配，并且想象我们感觉意志本身不受制于任何事物，因为一旦我们尝试抵制意志的自由，我们感到它会随意自在地活动，并且在它未曾安定下来的那一面生成一种自身形象，经院里称之为“寡欲”）。我们相信，这一影象或微弱的运动，当时原本可以化为事物本身；因为如果我们否认这一点，再做一次尝试，我们发现它现在依然能够如此。我们不曾思考，我们试图证明自由存在的这种奇怪的欲望正是我们行为的动机。似乎明确的是，虽然我们想像自己感觉到有一种自由，旁人却往往可以从我们的动机和品格来推断我们的行为。即便他推断不出来，他也能断言说，倘若他完全熟悉我们的生活境遇和性情特征，了解我们的面容和心向背后秘密的机缘，他也可以推断出我们的行为。按照上述学说，这便是“必然”的本质所在。

[9_2].因此，如果把原因定义为：引起任何事物之事物，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引起”不过是“导致（原因本义）”的同义词。同理，如果把原因定义为：一事物因之而得以存在的事物，也会遭到同样的反对。“因之”是什么意思呢？假如换一个说法，原因就是在其自身之后，另一事物总是不断出现，我们也能理解这个术语。因为这就是我们对事物的全部了解。这一恒定性构成了必然的实质，此外我们别无其他的观念。

Section IX　Of the Reason of Animals

第九章　论动物的理性

All our reasonings concerning matter of fact are founded on a species of Analogy, which leads us to expect from any cause the same events, which we have observed to result from similar causes. Where the causes are entirely similar, the analogy is perfect, and the inference, drawn from it, is regarded as certain and conclusive. Nor does any man ever entertain a doubt, where he sees a piece of iron, that it will have weight and cohesion of parts; as in all other instances, which have ever fallen under his observation. But where the objects have not so exact a similarity, the analogy is less perfect, and the inference is less conclusive; though still it has some force, in proportion to the degree of similarity and resemblance. The anatomical observations, formed upon one animal, are, by this species of reasoning, extended to all animals; and it is certain, that whe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for instance, is clearly proved to have place in one creature, as a frog, or fish, it forms a strong presumption, that the same principle has place in all. These analogical observations may be carried farther, even to this science, of which we are now treating; and any theory, by which we explain the operations of the understanding, or the origin and connexion of the passions in man, will acquire additional authority, if we find, that the same theory is requisite to explain the same phenomena in all other animals. We shall make trial of this, with regard to the hypothesis, by which we have, in the foregoing discourse, endeavoured to account for all experimental reasonings; and it is hoped, that this new point of view will serve to confirm all our former observations.

我们关于实际的事实的所有推理都建立在一种类比推理之上。正是因为类比，我们才期待某一原因产生的结果和我们先前从相似原因中见到的结果一样。如果原因完全相似，类比性就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就确定无疑。任何人见到一块铁，都不会怀疑铁块是有重量的，也不会怀疑其各个成分是紧固粘合的，因为他曾经见过的所有铁块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不是如此精确，二者之间的类比性就不高，得出的结论也就不确定，尽管这样的结论也会因二者的相似性程度而具有相当的有效性。按照这种推论，我们从一种动物身上观察到的解剖学知识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动物。如果在蛙类或鱼类动物体内发现血液循环，显然我们可以据此做出有力的假设，即所有动物体内都在进行血液循环。我们可以把从解剖学中的发现推延开来，甚至应用到我们正在研究的领域中来。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用来解释理解活动或者人的情感来源和联系的任何理论，在解释其他所有动物中同样的现象时照样适用，而且必不可少，那么这个理论就会更具有权威性。我们不妨拿上文中用于解释经验推理的假设来做个尝试，希望这个新的观点能够证明我们先前所有的论述。

First, it seems evident, that animals as well as men learn many things from experience, and infer, that the same events will always follow from the same causes. By this principle they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he more obvious properties of external objects, and gradually, from their birth, treasure up a knowledge of the nature of fire, water, earth, stones, heights, depths, &c., and of the effects which result from their operation. The ignorance and inexperience of the young are here plainly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cunning and sagacity of the old, who have learned, by long observation, to avoid what hurt them, and to pursue what gave ease or pleasure. A horse, that has been accustomed to the field, becomes acquainted with the proper height which he can leap, and will never attempt what exceeds his force and ability. An old

greyhound will trust the more fatiguing part of the chace to the younger, and will place himself so as to meet the hare in her doubles; nor are the conjectures, which he forms on this occasion, founded in any thing but his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首先，动物和人一样显然都从经验中学会很多东西，并推断出同样的结果源于同样的原因。用这样的方式，他们逐渐熟悉外界事物更为明显的特点，从生命之初开始，慢慢积累关于火、水、土、石头、高度以及深度的知识，以及它们的作用所能引起的结果。任何没有知识、缺乏经验的幼者和老练世故、经验丰富的长者显然不一样。通过长期的观察，长者已经懂得了如何趋利避害，并且追求让他们轻松愉快的东西。对田野熟悉之后，一匹马明白自己能跃过的高度，绝不会贸然尝试超出其体能的高度。一只老猎犬会把让它疲乏的任务交给年轻的猎犬去做，自己就呆在适当的位置，等兔子调头转弯的时候伺机扑上去。老猎犬在这种场合下的判断并不能依靠别的，只能来自它的观察和经验。

This is still more evident from the effects of discipline and education on animals, who, by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may be taught any course of action, and most contrary to their natural instincts and propensities. Is it not experience, which renders a dog apprehensive of pain, when you menace him, or lift up the whip to beat him? Is it not even experience, which makes him answer to his name, and infer, from such an arbitrary sound, that you mean him rather than any of his fellows, and intend to call him, when you pronounce it in a certain manner, and with a certain tone and accent?

从动物的驯养中得到的证据更明显。用适当的奖惩办法可以教会

动物做各种事情，包括完全违背动物本能和性情的行为。你威吓一只狗，或者朝它举起皮鞭，难道它不是由于经验知道挨打会痛吗？狗对自己的名字有反应，一听到这个随意的声音，就知道你用这个名称指的是它而不是别的同伴，当你用某种方式、某种声调说出这个名字时，就知道你是在叫它。这难道不也是由于经验的缘故？

In all these cases, we may observe, that the animal infers some fact beyond what immediately strikes his senses; and that this inference is altogether founded on past experience, while the creature expects from the present object the same consequences, which it has always found in its observation to result from similar objects.

从所有这些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说，动物能够推断出直接刺激它的感官之外的一些事实。动物从眼前的事物推断出和先前的观察相符的结果，这一过程完全依赖于过去的经验。

Secondly,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is inference of the animal can be founded on any process of argument or reasoning, by which he concludes, that like events must follow like objects, and that the course of nature will always be regular in its operations. For if there be in reality any arguments of this nature, they surely lie too abstruse for the observation of such imperfect understandings; since it may well employ the utmost care and attention of a philosophic genius to discover and observe them. Animals, therefore are not guided in these inferences by reasoning; neither are children; neither are the generality of mankind, in their ordinary actions and conclusions; neither are philosophers themselves, who, in all the active parts of life, are, in the main, the same with the vulgar, and

are governed by the same maxims. Nature must have provided some other principle, of more ready, and more general use and application; nor can an operation of such immense consequence in life, as that of inferring effects from causes, be trusted to the uncertain process of reasoning and argumentation. Were this doubtful with regard to men, it seems to admit of no question with regard to the brute creation; and the conclusion being once firmly established in the one, we have a strong presumption, from all the rules of analogy, that it ought to be universally admitted, without any exception or reserve. It is custom alone, which engages animals, from every object, that strikes their senses, to infer its usual attendant, and carries their imagination, from the appearance of the one, to conceive the other, in that particular manner, which we denominate belief. No other explication can be given of this operation, in all the higher, as well as lower classes of sensitive beings, which fall under our notice and observation. [9_1]

其次，动物从相似事物中推测相似结果，知道自然界活动永远是有规律的，这个推断过程不可能来自论证或是推理过程。如果真有一个这样的推理过程存在，那一定很深奥，超出了动物有限的认知理解能力，只有极具哲学思辨能力的人通过认真细致的研究才能发现这样的推理。因此，动物的结论不是靠推理指导而来的，孩子们也一样，普通人的日常活动和结论也一样。即便是哲学家们，他们的大部分行为活动也和常人无异，也受同样的行为原则的支配。大自然一定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更便捷、更广泛实用的原则，毕竟从原因得出结果这样极为重要的活动，不可能交付给不确定的推理和论证过程来完成。如果对于人而言，这一点还值得怀疑，那么对于低等动物来说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这一结论一旦在动物方面得以确立，我们根据类比法则可以非常有力地断言，同样的结论应该得到更普遍的认可，没有任何例外，没有任何保留。唯有习惯才让动物从刺激其感官的事物中推出其通常的结果，习惯在我们所谓信念的引领下，让想象得以发挥，

从一事物的出现推断出另一事物。我们注意和观察到的一切高等和低等动物都有这种活动，而我们对此找不到任何别的解释。 [10_1]

But though animals learn many parts of their knowledge from observation, there are also many parts of it, which they derive from the original hand of nature; which much exceed the share of capacity they possess on ordinary occasions; and in which they improve, little or nothing, by the longest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These we denominate Instincts, and are so apt to admire as something very extraordinary, and inexplicable by all the disquisition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But our wonder will, perhaps, cease or diminish, when we consider, that the experimental reasoning itself, which we possess in common with beasts, and on which the whole conduct of life depends, is nothing but a species of instinct or mechanical power, that acts in us unknown to ourselves; and in its chief operations, is not directed by any such relations or comparisons of ideas, as are the proper objects of our intellectual faculties. Though the instinct be different, yet still it is an instinct, which teaches a man to avoid the fire; as much as that, which teaches a bird, with such exactness, the art of incubation, and the whole economy and order of its nursery.

但是，尽管动物从观察中学到许多知识，却也有很多知识是自然赋予它们的。这些知识大大超过了动物在平常情况下具备的能力，而且它们在这一方面靠长期的实践和经验几乎得不到任何提高。我们把这些称为本能，羡慕其非凡的本领，是一切人类现已理解的探讨都无法解释的。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和动物都具备的、所有行为所依赖的经验推理不过是一种本能或机械的能力，它在我们内在作用而我们意识不到，其主要活动不借助于观念之间的任何关系和对比，不像我们思考的对象一样。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或许我们就不再对

本能感到惊异，至少这种惊异感会减弱。尽管本能有不同形式，但都是本能，让人懂得躲避火的本能和让鸟儿准确地掌握孵卵、养育雏鸟的本能是一样的。

[9_1].Since all reasoning concerning facts or causes is derived merely from custom, it may be asked how it happens, that men so much surpass animals in reasoning, and one man so much surpasses another? Has not the same custom the same influence on all?We shall here endeavour briefly to explain the great difference in human understandings, after which the reas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animals will easily be comprehended.

1. When we have lived any time, and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the uniformity of nature, we acquire a general habit, by which we always transfer the known to the unknown, and conceive the latter to resemble the former. By means of this general habitual principle, we regard even one experiment as the foundation of reasoning, and expect a similar event with some degree of certainty, where the experiment has been made accurately, and free from all foreign circumstances. It is therefore considered as a matter of great importance to observe the consequences of things; and as one man may very much surpass another in attention and memory and observation, this will make a very great difference in their reasoning.

2. Where there is a complication of causes to produce any effect, one mind may be much larger than another, and better able to comprehend the whole system of objects, and to infer justly their consequences.

3. One man is able to carry on a chain of consequences to a greater length than another.

4. Few men can think long without running into a confusion of ideas, and mistaking one for another; and there are various degrees of this infirmity.

5. The circumstance, on which the effect depends, is frequently involved in other circumstances, which are foreign and extrinsic. The separation of it often requires great attention, accuracy, and subtility.

6. The forming of general maxims from particular observation is a very nice operation; and nothing is more usual, from haste or a narrowness of mind, which sees not on all sides, than to commit mistakes in this particular.

7. When we reason from analogies, the man, who has the greater experience or the greater promptitude of suggesting analogies, will be the better reasoner.

8. Biases from prejudice, education, passion, party, &c. hang more upon one mind than another.

9. After we have acquired a confidence in human testimony, books and conversation enlarge much more the sphere of one man's experience and thought than those of another.

It would be easy to discover many other circumstances that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understandings of men.

[10_1].既然关于事实或原因的一切推理都来源于习惯，我们似乎可以问：为什么人比动物的推理能力强很多，为什么有的人的推理能力远远超过另一个人？同样的习惯不会对一切生命产生同样的影响吗？在此我们将简要解释人类理解中的巨大差异。在解释了这个以后，人和动物间差异的原因就很容易了解。

一、我们在世上生活了一段时间，熟悉了自然界的一律性之后，就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习惯，由此我们总会从已知事物推断未知事物，构想后者和前者具有相似性。借助这一普遍的习惯原则，我们把从一个经验中作为推理的基础，在这一实验做得很精确且不受不相干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按照一定的确定性期待相似的结果会出现。能够观察到事物的结果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事，由于一个人的专注能力、记忆能力和观察能力可能远远超出另一个人，就会导致了人类在推理能力上的巨大差异。

二、如果引起某个结果的原因很复杂，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可能比另一个人强很多，因而他就更能把握事物的全局，也更能合理推断出可能出现的结果。

三、有的人可能比别人更擅长一长串的推理论证过程。

四、很少有人能进行长时间思考而又不至于混淆各种观念，把一个观念错误地当作另一个观念。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项缺陷。

五、结果所依赖的情景常常和其他无关的、外在的情况交织在一起，需要极大的耐心、细致和敏锐才能分辨清楚。

六、从具体观察中得出普遍原则是一种细致的心理活动。在这方面由于草率和眼界狭窄而犯错误，导致无法把握全局，是最常见的问题。

七、在进行类比推理时，经验更丰富或者能更快联想到各种类比关系的人就更擅长推理。

八、由成见、教育、激情和党争等引起的偏见也是因人而异，在某些人身上体现得更明显。

九、我们如果相信人类的证言，那读书和对话能扩展某些人的阅历和思想，这也是因人而异的。

我们还可以很容易找到导致人们理解差异的其他许多情况。

Section X　Of Miracles

第十章　论奇迹

Part I

第一节

There is, in Dr. Tillotson's writings, an argument against the *real presence* , which is as concise, and elegant, and strong as any argument can possibly be supposed against a doctrine, so little worthy of a serious refutation. It is acknowledged on all hands, says that learned prelate, that the authority, either of the scripture or of tradition, is founded merely in the testimony of the Apostles, who were eye-witnesses to those miracles of our Saviour, by which he proved his divine mission. Our evidence, then, for, the truth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s less than the evidence for the truth of our senses; because, even in the first authors of our religion, it was no greater; and it is evident it must diminish in passing from them to their disciples; nor can any one rest such confidence in their testimony, as in the immediate object of his senses. But a weaker evidence can never destroy a stronger; and therefore, were the doctrine of the real presence ever so clearly revealed in scripture, it were directly contrary to the rules of just reasoning to give our assent to it. It contradicts sense, though both the scripture and tradition, on which it is supposed to be built, carry not such evidence with them as sense; when they are considered merely as external evidences, and are not brought home to every one's breast, by the immediate oper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提罗特森博士的著作里有一段反对“圣体实在说 ”的论述，对这样一个不值得严肃批驳的学说，算得上是简洁优美而又有说服力的论述。这位博学的主教说，人们普遍承认，经文和传说的权威仅仅建立在使徒们的证言之上，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我们的救世主用来证明其神圣使命的各种奇迹。这样看来，我们对于基督教真理的证据就不如我们用来证明感官的真实性的证据，因为即使在我们宗教的最初建立者那里，支持基督教真实性的证据也不会比支持感官真实性的证据更充分，而在他们向信徒们传递的过程中，证据的真实性还会削弱。任何人都不至于相信信徒们的证言胜过相信自己直接感知的事物。但是，弱小的证据绝不能战胜强有力的证据。假如“圣体实在说”的确在圣经里有清晰的揭示，那就直接违背了合理推理的所有原则，我们无法认同。这也和我们的感官相矛盾。“圣体实在说”赖以传承的经文和传说所提供的证据并不像感官那样具备有力的证据，它们提供的仅仅被视作外在的证据，并不由圣灵的直接活动抵达每个人的心中。

Nothing is so convenient as a decisive argument of this kind, which must at least silence the most arrogant bigotry and superstition, and free us from their impertinent solicitations. I flatter myself, that I have discovered an argument of a like nature, which, if just, will, with the wise and learned, be an everlasting check to all kinds of superstitious delusion, and consequently, will be useful as long as the world endures. For so long, I presume, will the accounts of miracles and prodigies be found in all history, sacred and profane.

这种果断的论证是最方便的，至少足以平息最傲慢的偏执和迷信，把我们从其荒谬的蛊惑中解救出来。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一种性质类似的论证。这个论证如果正确，将成为智慧和博学之士手里遏制各种迷信的永久利器，而且，只要世界存在，就会有用。因为我认为，只要世界存在，关于神迹和怪事的描述就会出现在各种宗教性和世俗

的史书里。

Though experience be our only guide in reasoning concerning matters of fact;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at this guide is not altogether infallible, but in some cases is apt to lead us into errors. One, who in our climate, should expect better weather in any week of June than in one of December, would reason justly, and conformably to experience; but it is certain, that he may happen, in the event, to find himself mistaken. However, we may observe, that, in such a case, he would have no cause to complain of experience; because it commonly informs us beforehand of the uncertainty, by that contrariety of events, which we may learn from a diligent observation. All effects follow not with like certainty from their supposed causes. Some events are found, in all countries and all ages, to have been constantly conjoined together. Others are found to have been more variable, and sometimes to disappoint our expectations; so that, in our reasonings concerning matter of fact, there are all imaginable degrees of assurance, from the highest certainty to the lowest species of moral evidence.

虽然经验是我们针对实际的事实进行推理的唯一向导，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向导并非永远完美无缺，有时候会把我们引入歧途。在我国的气候条件下生活的人会期待六月任何一周的天气比十二月任何一周的天气好，这样的推理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经验的，不过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弄错了。然而，我们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理由抱怨经验，因为经验常常事先用相反的情况向我们显示了天气的不确定性，只要我们悉心观察就会注意到。一切结果并非同样确定地由我们假设的原因所引起。有些事物不分地域和时代，总是伴随出现。而有些则会发生变化，有时甚至会出乎我们预料之外。因此，我们关于实际事实的推理过程存在各种程度的确定性，从最高程度的完全确定

到最低程度的经验证据，都是有可能的。

A wise man, therefore, proportions his belief to the evidence. In such conclusions as are founded on an infallible experience, he expects the event with the last degree of assurance, and regards his past experience as a full proof of the future existence of that event. In other cases, he proceeds with more caution. He weighs the opposite experiments; he considers which side is supported by the greater number of experiments; to that side he inclines, with doubt and hesitation; and when at last he fixes his judgement, the evidence exceeds not what we properly call probability. All probability, then, supposes an opposition of experiments and observations, where the one side is found to overbalance the other, and to produce a degree of evidence, proportioned to the superiority. A hundred instances or experiments on one side, and fifty on another, afford a doubtful expectation of any event; though a hundred uniform experiments, with only one that is contradictory, reasonably beget a pretty strong degree of assurance. In all cases, we must balance the opposite experiments, where they are opposite, and deduct the smaller number from the greater, in order to know the exact force of the superior evidence.

聪明的人总是根据证据来确定自己对事物的信念程度。在依据无误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中，他对事件的发生抱有高度确信，把过去的经验作为推断未来事物出现的绝对证据。其他情况下，他会更加谨慎。他会认真权衡各种相反的实验，看看哪一方由更多的实验证实，再迟疑地选择这一方。即使到最后他确定了自己的判断，他所拥有的证据不过是我们所谓的可能性罢了。一切可能性都意味着背后存在矛盾的情形和见解，其中一方会压倒另一方，并根据其所占优势的大小提供相应程度的证据。一方有一百次例证或实验支持，另一方有五十次，

就会让我们很难预判事物的结果，但是，一方有一百次的统一的实验支持，另一方只有一次，就让我们可以合理地做出判断。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权衡对立的双方，矛盾之处在哪里，从大数排除小数，以确定占优势的证据究竟有多大的精确度。

To apply these principles to a particular instance; we may observe, that there is no species of reasoning more common, more useful, and even necessary to human life, than that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testimony of men, and the reports of eye-witnesses and spectators. This species of reasoning, perhaps, one may deny to be founded on the 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I shall not dispute about a word. It will be sufficient to observe that our assurance in any argument of this kind is derived from no other principle than our observation of the veracity of human testimony, and of the usual conformity of facts to the reports of witnesses. It being a general maxim, that no objects have any discoverable connexion together, and that all the inferences, which we can draw from one to another, are founded merely on our experience of their constant and regular conjunction; it is evident, that we ought not to make an exception to this maxim in favour of human testimony, whose connexion with any event seems, in itself, as little necessary as any other. Were not the memory tenacious to a certain degree; had not men commonly an inclination to truth and a principle of probity; were they not sensible to shame, when detected in a falsehood; were not these, I say, discovered by experience to be qualities, inherent in human nature, we should never repose the least confidence in human testimony. A man delirious, or noted for falsehood and villainy, has no manner of authority with us.

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具体的事例中，我们可以说，最常见、最有

用，甚而对于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推理莫过于从人们的证言、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的报告中得来的推理了。有人可能会否认这类推理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对此我不提出任何争议，只需要这样表述就够了：我们对于这类论证的确信程度不是来源于别的什么原则，而是来源于我们对人类证言真实性的观察，来源于我们对事实和证人言辞通常是相符的观察。一个基本的原理是，没有任何事物之间存在可以被发现的联系，我们从一事物到另一事物的所有推断完全建立在我们对它们之间恒常的、规律的伴随出现的体验之上。显然，我们不能把人们的证言当作例外，认为它不受这个原理之约束，毕竟人们的证言与某一事物之间，就像和任何另一事物之间一样，都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不是因为记忆有某种韧性，如果不是因为人们普遍具有倾向真理和诚信的天性，如果不是因为人们在谎言被揭穿后会有羞耻感，如果不是因为经验为我们揭示所有这些品质是深植于人性中的，我们就绝不会对人类的证言寄予丝毫信任。一个胡言乱语的人，或者一个以虚伪和凶恶而臭名昭著的人，丝毫不值得我们的信任。

And as the evidence, derived from witnesses and human testimony, is founded on past experience, so it varies with the experience, and is regarded either as a proof or a probability, according as the conjunction between any particular kind of report and any kind of object has been found to be constant or variable. There are a number of circumstances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all judgements of this kind; and the ultimate standard, by which we determine all disputes, that may arise concerning them, is always derived from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Where this experience is not entirely uniform on any side, it is attended with an unavoidable contrariety in our judgements, and with the same opposition and mutual destruction of argument as in every other kind of evidence. We frequently hesitate concerning the reports of others. We balance the opposite circumstances, which cause any doubt or uncertainty; and when we discover a superiority on any

side, we incline to it; but still with a diminution of assurance, in proportion to the force of its antagonist.

来自证人和人类证言的证据，由于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之上，其确定性也随经验而变化。依据某一报告和其报告的事物是恒常的伴随出现还是存在一定的变化，证人证言可能被当作一种确证或者一种可能性。在这类论证中，有许多情形需要考虑，而我们用来裁决一切由此引起的争议的最终标准永远来自经验和观察。任何一方只要出现经验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显然会导致我们判断中出现不可避免的矛盾，并且像任何其他矛盾的证据一样，正反双方相互对立、相互抵消。我们常常在听到别人的报告时犹豫不决，我们会权衡造成疑虑和不确定的对立双方的情形。如果发现某一方占有优势，我们会选择这一方，当然，我们的确定性程度会根据另一方的力量大小相应降低。

This contrariety of evidence, in the present case, may be derived from several different causes; from the opposition of contrary testimony; from the character or number of the witnesses; from the manner of their delivering their testimony; or from the union of all these circumstances. We entertain a suspicion concerning any matter of fact, when the witnesses contradict each other; when they are but few, or of a doubtful character; when they have an interest in what they affirm; when they deliver their testimony with hesitation, or on the contrary, with too violent asseverations. There are many other particulars of the same kind, which may diminish or destroy the force of any argument, derived from human testimony.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矛盾的证据有几方面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相互矛盾的证言，因为证人的品格或人数，因为他们陈述证据的方式，

或者由上述各种因素共同引起等等。如果对于任何事实，当证人的言辞相互矛盾，或者只有为数极少的证人，或者证人的品格值得怀疑，或者证人通过作证有私利可图，或者作证时显得犹豫不决，或刚好相反，他们表现得异常肯定等等，那么我们应该对他们提供的证据持有怀疑的态度。还有许多类似的具体问题，都能削弱或摧毁证人证言的说服力。

Suppose, for instance, that the fact, which the testimony endeavours to establish, partakes of the extraordinary and the marvellous; in that case, the evidence, resulting from the testimony, admits of a diminution, greater or less, in proportion as the fact is more or less unusual. The reason why we place any credit in witnesses and historians, is not derived from any connexion, which we perceive *a priori* , between testimony and reality, but because we are accustomed to find a conformity between them. But when the fact attested is such a one as has seldom fallen under our observation, here is a contest of two opposite experiences; of which the one destroys the other, as far as its force goes, and the superior can only operate on the mind by the force, which remains. The very same principle of experience, which gives us a certain degree of assurance in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gives us also, in this case, another degree of assurance against the fact, which they endeavour to establish; from which contradiction there necessarily arises a counterpoize, and mutual destruction of belief and authority.

举例说，假设证人证言试图证明的事实带有非凡的奇迹般的色彩，那么，从证人证言得来的证据就要打折扣，其可信度或多或少与其试图证明的事实的异常程度成反比。我们之所以信任证人和史学家们，不是因为我们先觉地意识到在其证言和事实之间存在联系，而是因为我们通常发现二者是相符的。但是，如果要证明的事实是我们极

少观察到的，就会出现两种矛盾的经验，二者相互竞争，强者战胜弱者，最后占优势的一方以其所剩的效力影响我们的心灵。这种经验原则，让我们对证人的言辞产生一定程度的信任，同样让我们对其试图证明的事实产生一定程度的怀疑。在这样的矛盾中，对立的双方必然相互抵消，各自的信念和威信相互毁损。

I should not believe such a story were it told me by Cato, was a proverbial saying in Rome, even during the lifetime of that philosophical patriot. [10_1] The incredibility of a fact, it was allowed, might invalidate so great an authority.

“这件事哪怕是加图讲的，我也不信”，这句话在加图这位爱国哲学家 [11_1] 还在世的时候就成了罗马的一句谚语。可见，难以置信的事实甚至能使伟大的权威失效。

The Indian prince, who refused to believe the first relations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frost, reasoned justly; and it naturally required very strong testimony to engage his assent to facts, that arose from a state of nature, with which he was unacquainted, and which bore so little analogy to those events, of which he had had constant and uniform experience. Though they were not contrary to his experience, they were not conformable to it. [10_2]

印度王子第一次听人说起霜的作用时，他并不相信，他的推理是合理的。这就需要有坚实的证据才能让他相信霜是自然现象。因为这是他不熟悉的，和他恒常体验到的事物之间存在很小的类比性。尽管那些现象和他的经验并不矛盾，但却是和他的经验不相符的。 [11_2]

But in order to encrease the probability against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let us suppose, that the fact, which they affirm, instead of being only marvellous, is really miraculous; and suppose also, that the testimony considered apart and in itself, amounts to an entire proof; in that case, there is proof against proof, of which the strongest must prevail, but still with a diminution of its force,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its antagonist.

为了增加相反一面的可能性，以驳倒证人的证据，咱们假设证人断言的事实不仅令人惊奇，简直就是神迹，再假设这些证人证言自身就是完全令人信服的，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证据之间相互对立的局面，其中最有力的一方会胜出，当然，其有力程度也会因对方证据的效力大小而相应减弱。

A miracle is a violation of the laws of nature; and as a firm and unalterable experience has established these laws, the proof against a miracle, from the very nature of the fact, is as entire as any argument from experience can possibly be imagined. Why is it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all men must die; that lead cannot, of itself, remain suspended in the air; that fire consumes wood, and is extinguished by water; unless it be, that these events are found agreeable to the laws of nature, and there is required a violation of these laws, or in other words, a miracle to prevent them? Nothing is esteemed a miracle, if it ever happen in the common course of nature. It is no miracle that a man, seemingly in good health, should die on a sudden: because such a kind of death, though more unusual than any other, has yet been frequently observed to happen. But it is a miracle, that a dead man should come to life; because that has never been observed in any age or country. There must, therefore, be a uniform experience against every miraculous

event, otherwise the event would not merit that appellation. And as a uniform experience amounts to a proof, there is here a direct and full proof, from the nature of the fact, against the existence of any miracle; nor can such a proof be destroyed, or the miracle rendered credible, but by an opposite proof, which is superior. [10_3]

奇迹即是对自然法则的违背。由于这些自然法则建立在坚定而始终不变的经验之上，所以，反对奇迹的证据本质上和由经验得到的论证同样充分。人人都会死；铅不能靠自身悬浮在空中；火会燃烧木材，会被水熄灭，为什么这些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因为这些现象符合自然法则，要阻止这些现象，就得有打破这些法则的事物出现，换言之，就得有奇迹发生。任何自然而然发生的事物都称不上奇迹。一个身体健康的人突然死去，算不上奇迹，因为这种死亡的现象虽然比起其他死亡现象不太寻常，但也是常常会发生的。但是，如果死人复活了那就是奇迹，因为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所以，每一项奇迹必然是和我们恒常的经验背道而驰的，不然它就不值得被称为奇迹。因此，根据事实的本质来说，随着恒常的经验构成确凿的证据，就会对奇迹构成直接而完全的反驳。若是要摧毁这样的证据，从而把奇迹变得真实可信，就必须要有更具优势的反面证据。 [11_3]

The plain consequence is (and it is a general maxim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that no testimony is sufficient to establish a miracle, unless the testimony be of such a kind, that its falsehood would be more miraculous, than the fact, which it endeavors to establish; and even in that case there is a mutual destruction of arguments, and the superior only gives us an assurance suitable to that degree of force, which remains, after deducting the inferior.” When anyone tells me, that he saw a dead man restored to life, I immediately consider with myself, whether it be more probable, that this person should either deceive or be deceived, or that the

fact, which he relates, should really have happened. I weigh the one miracle against the other; and according to the superiority, which I discover, I pronounce my decision, and always reject the greater miracle. If the falsehood of his testimony would be more miraculous, than the event which he relates; then, and not till then, can he pretend to command my belief or opinion.

因此，明确的结论（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普遍原理）就是："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某个奇迹确实存在，除非这一证据足够强大，使得其错误比其试图证明的事实更加神奇；即便如此，正反论证会相互抵消，占优势的一方也只能在抵消弱势一方的效力之后带给我们相应程度的信任感。"要是有人告诉我，他见到死人复活了，我立刻会想，究竟是他在骗人或者被人骗了，还是他说的事真的发生了，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我权衡这两种怪事，根据我对各自优势的观察来确定哪一件事更有可能，然后总是把更为荒诞离奇的一方排除掉。如果他的证据的错误性比他要证明的事实更加荒诞神奇，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能说得到了我的信任或支持。

Part II

第二节

In the foregoing reasoning we have supposed, that the testimony, upon which a miracle is founded, may possibly amount to an entire proof, and that the falsehood of that testimony would be a real prodigy. But it is easy to shew, that we have been a great deal too liberal in our concession, and that there never was a miraculous event established on so full an evidence.

在之前的论证中我们曾假设，某一奇迹所依赖的证据可能会构成确凿的证明，但证据的虚妄才真是更离奇荒诞的事。但我们很容易证明这样的让步太大，事实上任何奇迹都绝不可能建立在如此充分的证据之上。

For first, there is not to be found, in all history, any miracle attested by a sufficient number of men, of such unquestioned good-sense, education, and learning, as to secure us against all delusion in themselves; of such undoubted integrity, as to place them beyond all suspicion of any design to deceive others; of such credit and reputation in the eyes of mankind, as to have a great deal to lose in case of their being detected in any falsehood; and at the same time, attesting facts performed in such a public manner and in so celebrated a part of the world, as to render the detection unavoidable; all which circumstances are requisite to give us a full assurance in the testimony of men.

首先，所有史书中都找不到有任何具有以下特征的奇迹：既得到足够的人支持，这些人又都具备无庸置疑的理性、教育和学识，足以让我们相信他们的观点不可能出错；他们的正直也不必怀疑，足以让我们相信他们绝不会有任何骗人的企图；他们在人们的眼里都深受信任、德高望重，一旦被揭穿有任何虚妄，将会身败名裂；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在世界知名的地方公开地发表证言，任何弄虚作假都将会暴露无遗。要想让我们完全信赖人们的证言，以上这些都是必备条件。

Secondly, we may observe in human nature a principle which, if strictly examined, will be found to diminish extremely the assurance, which we might, from human testimony, have in any kind of prodigy. The maxim, by which we commonly conduct

ourselves in our reasoning, is, that the objects, of which we have no experience, resembles those, of which we have; that what we have found to be most usual is always most probable; and that where there is an opposition of arguments, we ought to give the preference to such as are founded on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ast observations. But though, in proceeding by this rule, we readily reject any fact which is unusual and incredible in an ordinary degree; yet in advancing farther, the mind observes not always the same rule; but when anything is affirmed utterly absurd and miraculous, it rather the more readily admits of such a fact, upon account of that very circumstance, which ought to destroy all its authority. The passion of surprise and wonder, arising from miracles, being an agreeable emotion, gives a sensible tendency towards the belief of those events, from which it is derived. And this goes so far, that even those who cannot enjoy this pleasure immediately, nor can believe those miraculous events, of which they are informed, yet love to partake of the satisfaction at second-hand or by rebound, and place a pride and delight in exciting the admiration of others.

第二，我们可能注意到人性中的一种原则，如果认真检查这原则，就会发现它能极大削弱我们对那些建立在人们证言之上的奇迹的信赖程度。这就是我们平常的推理过程所遵循的原则，包括如下几点：我们没有体验过的事物和我们体验过的事物具有相似性；我们发现的最平常的事物往往具有最大的可然性；如果两种论证相矛盾，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有更多的经验支持的一方。虽然从这个原则出发，我们能轻易拒绝任何在常理看来是荒诞不经、难以置信的事物，但进一步讲，我们的思想并不总是遵循这个原则。如果遇到被人们断言为荒诞离奇的事物，我们的心灵反倒非常愿意接受这是个事实，理由恰恰是那些本该让我们完全不相信这个奇迹的情节。由奇迹引起的惊讶和神奇是令人愉快的感情，它让我们从情感上更倾向于相信我们感到神奇的事物的确存在。更有甚者，即使那些没能直接体验到神奇之感，

或者原本就不相信真有这些神奇的事物的人们，也都乐于间接地分享他人的快乐，并为自己能激起别人的羡慕之情而得意高兴。

With what greediness are the miraculous accounts of travellers received, their descriptions of sea and land monsters, their relations of wonderful adventures, strange men, and uncouth manners? But if the spirit of religion join itself to the love of wonder, there is an end of common sense; and human testimony, in these circumstances, loses all pretensions to authority. A religionist may be an enthusiast, and imagine he sees what has no reality. He may know his narrative to be false, and yet persevere in it, with the best intentions in the world, for the sake of promoting so holy a cause; or even where this delusion has not place, vanity, excited by so strong a temptation, operates on him more powerfully than on the rest of mankind in any other circumstances; and self-interest with equal force. His auditors may not have, and commonly have not, sufficient judgement to canvass his evidence. What judgement they have, they renounce by principle, in these sublime and mysterious subjects; or if they were ever so willing to employ it, passion and a heated imagination disturb the regularity of its operations. Their credulity increases his impudence, and his impudence overpowers their credulity.

人们是何等如饥似渴地聆听旅行家们讲述的那些离奇的故事啊！他们描述的那些海上、陆上的怪物，他们所吹嘘的那些精彩的冒险、怪异的人们、原始粗野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宗教情感和对神奇的热爱掺杂在一起，常识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证言丧失了所有效力。一个信奉宗教的人可能是个狂热的人，他会想象自己见到了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他或许知道自己讲的都是假的，但为了促进如此神圣的事业，他会带着善意的主观意图坚持自

己的观点。即便他的虚妄没有被人接受，在强烈的诱惑之下，虚荣心对他的影响也远胜于在任何情景下对其他人的影响，而自我利益的作用和虚荣心一样强大。他的听众可能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通常事实上也的确没什么明辨是非的能力，因而不能对他的证据进行检查。无论他们还剩下多少判别是非的能力，在遇到这些崇高而神秘的话题时，他们都恪守原则，弃之不用。或者说，即便他们愿意发挥自己的判断力，受心中狂热的激情和想象力的影响，他们的判断力也不能正常发挥。听众的盲目轻信助长了他的厚颜无耻，而他的厚颜无耻又反过来征服了听众，使他们更加轻信。

Eloquence, when at its highest pitch, leaves little room for reason or reflection; but addressing itself entirely to the fancy or the affections, captivates the willing hearers, and subdues their understanding. Happily, this pitch it seldom attains. But what a Tully or a Demosthenes could scarcely effect over a Roman or Athenian audience, every Capuchin, every itinerant or stationary teacher can perform over the generality of mankind, and in a higher degree, by touching such gross and vulgar passions.

雄辩发挥到了极致，就不会给理性和思考留下多少余地，而是全靠调动人们的想象和感情来迷惑热情的听众，让他们丧失理智。幸运的是，雄辩很少达到这个程度。但是，一个西塞罗或一个狄摩西尼很少能让一群罗马或雅典听众接受的事情，一名嘉布遣会修士，每一名巡行的或站立不动的教士却可以调动普通人低劣粗俗的情感，让他们更加信以为真。

The many instances of forged miracles, and prophecies, and supernatural events, which, in all ages, have either been detected by contrary evidence, or which detect themselves by their

absurdity, prove sufficiently the strong propensity of mankind to the extraordinary and the marvellous, and ought reasonably to beget a suspicion against all relations of this kind. This is our natural way of thinking, even with regard to the most common and most credible events. For instance: There is no kind of report which rises so easily, and spreads so quickly, especially in country places and provincial towns, as those concerning marriages; insomuch that two young persons of equal condition never see each other twice, but the whole neighborhood immediately join them together. The pleasure of telling a piece of news so interesting, of propagating it, and of being the first reporters of it, spreads the intelligence. And this is so well known, that no man of sense gives attention to these reports, till he finds them confirmed by some greater evidence. Do not the same passions, and others still stronger, incline the generality of mankind to believe and report, with the greatest vehemence and assurance, all religious miracles?

人们捏造的奇迹、预言和超自然事物不在少数，这些东西要么已经在各个时代被相反的证据所揭穿，要么由于自身的荒谬而不攻自破。这足以证明，人类是多么愿意相信神奇超凡的事物，同时这也应当促使让我们在面对所有类似描述时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比如在乡里和小镇最容易出现且传播最快的故事莫过于那些和婚姻有关的事情，你常常会听说一对门当户对的青年男女，甚至连第二次面都没见过，就被当地的乡亲们火速撮合在一起。正是因为讲一件趣事、传播这件趣事，成为最先讲述这件趣事的人之一，能给人带来快乐，才使得一件事很快传开来。众所周知，任何理智清醒的人都不会在意这些传说，除非他发现有更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它们。难道不是这些同样的感情，以及其他更强烈的感情，促使普罗大众热情饱满、信心十足地相信和传播一切宗教奇迹吗？

Thirdly, it forms a strong presumption against all supernatural and miraculous relations, that they are observed chiefly to abound among ignorant and barbarous nations; or if a civilized people has ever given admission to any of them, that people will be found to have received them from ignorant and barbarous ancestors, who transmitted them with that inviolable sanction and authority, which always attend received opinions. When we peruse the first histories of all nations, we are apt to imagine ourselves transported into some new world; where the whole frame of nature is disjointed, and every element performs its operations in a different manner, from what it does at present. Battles, revolutions, pestilence, famine and death, are never the effect of those natural causes, which we experience. Prodigies, omens, oracles, judgements, quite obscure the few natural events, that are intermingled with them. But as the former grow thinner every page, in proportion as we advance nearer the enlightened ages, we soon learn, that there is nothing mysterious or supernatural in the case, but that all proceeds from the usual propensity of mankind towards the marvellous, and that, though this inclination may at intervals receive a check from sense and learning, it can never be thoroughly extirpated from human nature.

第三，反对一切超自然的神奇故事的充分理由是，这些故事主要产生于无知蒙昧的民族，或者说，如果一个开化的民族里也有这种传说，那么他们一定是从其无知蒙昧的先民那里得来，是先民们带着不可冒犯的威信传承下来的，毕竟来自祖先的传说总带有这样的威信。翻开各民族早期的历史，我们很容易想象自己进入了一片新的天地，大自然处于混乱的状态，各种自然因素发挥着迥然不同的作用，那时的大自然和我们今天所见大不一样。战争、革命、瘟疫、饥荒、死亡，都不是我们体验过的自然原因造成的。在少数自然事件中掺杂着各种奇迹、征兆、神谕和审判的描述，使我们难辨这些事件的真相。

但是，随着人类迈入开化的时代，这类描述逐渐减少，我们很快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神秘超凡的东西，一切描述都出于人们喜好奇迹的倾向。尽管这种倾向不时会受到理智和知识的遏制，但我们从来就没有把它从人性里根除。

It is strange, a judicious reader is apt to say, upon the perusal of these wonderful historians, that such prodigious events never happen in our days. But it is nothing strange, I hope, that men should lie in all ages. You must surely have seen instances enough of that frailty. You have yourself heard many such marvellous relations started, which, being treated with scorn by all the wise and judicious, have at last been abandoned even by the vulgar. Be assured, that those renowned lies, which have spread and flourished to such a monstrous height, arose from like beginnings; but being sown in a more proper soil, shot up at last into prodigies almost equal to those which they relate.

明智的读者在翻阅那些神奇的史学家的书时不禁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描述的种种奇迹在今天都没有发生过。所有时代的人们都会撒谎，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你一定见过许多撒谎的例子，你一定听到过许多这类怪事，因为被所有聪明而审慎的人们所唾弃，最终连普通人也不再相信它。可以肯定那些弥天大谎，虽然传得远，信众多，开始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生存于更加适合的土壤，所以最后得以成为离奇的传说，这传播过程的荒诞程度堪比它们本身所描绘的奇迹。

It was a wise policy in that false prophet, Alexander, who though now forgotten, was once so famous, to lay the first scene of his impostures in Paphlagonia, where, as Lucian tells us, the people

were extremely ignorant and stupid, and ready to swallow even the grossest delusion. People at a distance, who are weak enough to think the matter at all worth enquiry, have no opportunity of receiving better information. The stories come magnified to them by a hundred circumstances. Fools are industrious in propagating the imposture; while the wise and learned are contented, in general, to deride its absurdity, without informing themselves of the particular facts, by which it may be distinctly refuted. And thus the impostor above mentioned was enabled to proceed, from his ignorant Paphlagonians, to the enlisting of votaries, even among the Grecian philosophers, and men of the most eminent rank and distinction in Rome; nay, could engage the attention of that sage emperor Marcus Aurelius; so far as to make him trust the success of a military expedition to his delusive prophecies.

尽管现在人们遗忘了亚历山大这个虚伪的预言家，但当时他却赫赫有名。他将帕夫拉戈尼亚作为其招摇撞骗的起点可谓机关算尽，因为正如卢奇安所说，帕夫拉戈尼亚的人愚昧无知到了极点，哪怕最卑劣的谎言他们也会不假思索地全盘照收。外地的人们信念不够坚定，虽然觉得这个事情值得认真研究，却无从获取更准确的信息。那些谎言通过上百种方式夸大其词地传到他们耳里。傻瓜们不遗余力地向他人传播这些骗人的鬼话；聪明博学之士则常常只对其荒诞不经嗤之以鼻，却没有设法找到具体的事实来批判和驳斥这些谬论。就这样，这个骗子得以从愚昧的帕夫拉戈尼亚人开始，壮大了他的追随者队伍，其中不乏希腊哲学家以及罗马社会中身份显赫的人士，他甚至还引起了圣明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利乌斯的注意，竟然使得这位皇帝把一次战争的胜利完全寄托在虚妄的预言之上。

The advantages are so great, of starting an imposture among an ignorant people, that, even though the delusion should be too gross

to impose on the generality of them (which, though seldom, is sometimes the case) it has a much better chance for succeeding in remote countries, than if the first scene had been laid in a city renowned for arts and knowledge. The most ignorant and barbarous of these barbarians carry the report abroad. None of their countrymen have a large correspondence, or sufficient credit and authority to contradict and beat down the delusion. Men's inclination to the marvellous has full opportunity to display itself. And thus a story, which is universally exploded in the place where it was first started, shall pass for certain at a thousand miles' distance. But had Alexander fixed his residence at Athens, the philosophers of that renowned mart of learning had immediately spread, throughout the whole Roman empire, their sense of the matter; which, being supported by so great authority, and displayed by all the force of reason and eloquence, had entirely opened the eyes of mankind. It is true; Lucian, passing by chance through Paphlagonia, had an opportunity of performing this good office. But, though much to be wished, it does not always happen, that every Alexander meets with a Lucian, ready to expose and detect his impostures.

从无知的人群中开始招摇撞骗有极大的便利。即便欺骗的行为太过昭彰，不能让普通大众全盘接受（这种情况虽然少见，却也时有发生），但是谎言在偏远的乡下更容易让人相信和传播，在崇尚艺术和知识的城市则不然。那些未开化的、最愚昧无知的乡民会把谎言传向四面八方，乡邻中缺少见多识广的人，也没有具有十足的信誉和威望的人来批驳和揭穿这些谎言。在这里，人们喜好奇迹的倾向得到了充分展示。因此，一件荒谬的事，哪怕在其发源之地就已经被普通人识破，也必定会传到千里之外。倘若亚历山大住在雅典，这个以学术闻名的城市的哲学家们立刻会把他们对于事态的认识传遍整个罗马帝国。他们的观点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并展现出理性和雄辩的巨大影

响，一定会开阔人类的眼界。的确，正是卢奇安碰巧路过帕夫拉戈尼亚，才有机会行使这一职责。尽管我们期望这种巧合经常出现，但事实上不是每个亚历山大都会遇到一个时刻准备揭穿其谎言的卢奇安。

I may add as a fourth reason, which diminishes the authority of prodigies, that there is no testimony for any, even those which have not been expressly detected, that is not opposed by an infinite number of witnesses; so that not only the miracle destroys the credit of testimony, but the testimony destroys itself. To make this the better understood, let us consider, that, in matters of religion, whatever is different is contrary; and that it is impossible the religions of ancient Rome, of Turkey, of Siam, and of China should, all of them, be established on any solid foundation. Every miracle, therefore, pretended to have been wrought in any of these religions (and all of them abound in miracles), as its direct scope is to establish the particular system to which it is attributed; so has it the same force, though more indirectly, to overthrow every other system. In destroying a rival system, it likewise destroys the credit of those miracles, on which that system was established; so that all the prodigies of different religions are to be regarded as contrary facts, and the evidences of these prodigies, whether weak or strong, as opposite to each other. According to this method of reasoning, when we believe any miracle of Mahomet or his successors, we have for our warrant the testimony of a few barbarous Arabians;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are to regard the authority of Titus Livius, Plutarch, Tacitus, and, in short, of all the authors and witnesses, Grecian, Chinese, and Roman Catholic, who have related any miracle in their particular religion; I say, we are to regard their testimony in the same light as if they had mentioned that Mahometan miracle, and had in express terms contradicted it, with the same certainty as they have for the miracle they relate. This

argument may appear over subtile and refined; but is not in reality different from the reasoning of a judge, who supposes, that the credit of two witnesses, maintaining a crime against any one, is destroyed by the testimony of two others, who affirm him to have been two hundred leagues distant, at the same instant when the crime is sai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此外，我还可以提出第四个理由来削弱奇迹的可信度。即便针对那些尚未被揭穿的奇迹而言，没有任何证据不是同时遭到无数证人的反对的，所以不只是奇迹本身摧毁了这证据的可信度，证据自己也毁灭了自身。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来思考一下，在宗教问题上，既然不同的主张就是对立的主张，那么古罗马的、土耳其的、暹罗的、中国的宗教不可能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任何一门宗教所描述的每一种奇迹（这些神迹在各种宗教里比比皆是），其直接目的都是要证明这一宗教体系的合法性，显然它应该同时具有推翻其他宗教的作用，哪怕是间接的作用。在推翻对立的宗教的同时，它同样推翻了这门宗教的合法性赖以存在的各种奇迹；这样看来，不同宗教里的奇迹应该是相互矛盾的事实，而用来支持它们的证据，无论强弱，都是相互对立的。按照这一思路，如果我们相信默罕默德和他的信徒们施展的任何奇迹，我们肯定可以找到一些野蛮蒙昧的阿拉伯人的证言来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蒂托·李维、普鲁塔克、塔西佗的话，总之，我们应该同样看待希腊宗教、中国宗教和罗马天主教里各自为自己的宗教讲述奇迹的作者和证人。我是说，我们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的言论，仿佛他们提到了那个默罕默德奇迹，然后明白无误地提出了与之矛盾的观点，其确定程度不亚于他们对自己讲述的奇迹所抱有的信念。这种论证似乎显得过于微妙精密，但是，这难道和现实中法官判案的推理方式有什么两样吗？如果有两个证人控告某人犯了某罪，但是另外两人却向法官保证，案发之时此人身处六百英里之外。法官自然认为前两人的证言不足以信。

One of the best attested miracles in all profane history, is that which Tacitus reports of Vespasian, who cured a blind man in Alexandria, by means of his spittle, and a lame man by the mere touch of his foot; in obedience to a vision of the god Serapis, who had enjoined them to have recourse to the Emperor, for these miraculous cures. The story maybe seen in that fine historian [10_4] ; where every circumstance seems to add weight to the testimony, and might be displayed at large with all the force of argument and eloquence, if any one were now concerned to enforce the evidence of that exploded and idolatrous superstition. The gravity, solidity, age, and probity of so great an emperor, who, through the whole course of his life, conversed in a familiar manner with his friends and courtiers, and never affected those extraordinary airs of divinity assumed by Alexander and Demetrius. The historian, a contemporary writer, noted for candour and veracity, and withal, the greatest and most penetrating genius, perhaps, of all antiquity; and so free from any tendency to credulity, that he even lies under the contrary imputation, of atheism and profaneness: The persons, from whose authority he related the miracle, of established character for judgement and veracity, as we may well presume; eye-witnesses of the fact, and confirming their testimony, after the Flavian family was despoiled of the empire, and could no longer give any reward, as the price of a lie. *Utrumque, qui interfuere, nunc quoque memorant, postquam nullum mendacio pretium* . To which if we add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 facts, as related, it will appear, that no evidence can well be supposed stronger for so gross and so palpable a falsehood.

世俗史上得到多方证实的奇迹之一，是塔西佗讲述的关于罗马皇帝维斯帕先的奇迹。据塔西佗描述，维斯帕先在亚历山大里亚用唾液让一个盲人重新获得光明，他用脚轻轻触了一下瘸子，便治好了他的

瘸腿。这一切都是按照希腊神塞拉皮斯的预示发生的，塞拉皮斯嘱咐那些病人求助于这位罗马皇帝，请求他用这些神奇的方法治愈了他们。读者可以在这位有名的史学家的书里读到这个故事，[11_4] 根据书中的记载，当时的各种情节都起到了强化证据可信度的作用。如果现在谁还希望来为那个早已被揭穿的、极度宣扬个人崇拜的迷信的增添证据，或许还可以把当初的情节令人信服地再现出来。维斯帕先这样英明的皇帝，既严肃诚恳，又德高望重，一生与朋友和臣下亲密无间，从未像亚历山大和德米特里那样，装腔作势，以神自居。记述这个事件的史学家与他们处于同一个时代，以诚实可信著称，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古代时期最杰出、最睿智的思想家，不会对任何事物抱轻信的态度。他甚至还因此受到恰恰相反的指责，说他信仰无神论，亵渎神灵。我们完全可以信赖向他转述这个奇迹的人们，都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和诚实的品格，亲眼目睹了奇迹的发生。而且他们在证明这些奇迹的时候，夫拉维家族已经被赶下罗马帝国的皇位，不可能再对任何谣言给予任何奖励。况且，谁都知道，后人更不会给撒谎者任何奖赏。如果再考虑到这些事实都是公开讲述的，那么对于这一虚妄昭彰的谎言来说，似乎再也不可能找到比这些更有力的证据了。

There is also a memorable story related by Cardinal de Retz, which may well deserve our consideration. When that intriguing politician fled into Spain, to avoid the persecution of his enemies, he passed through Saragossa, the capital of Aragon, where he was shewn, in the cathedral, a man, who had served seven years as a doorkeeper, and was well known to every body in town, that had ever paid his devotions at that church. He had been seen, for so long a time, wanting a leg; but recovered that limb by the rubbing of holy oil upon the stump; and the cardinal assures us that he saw him with two legs. This miracle was vouched by all the canons of the church; and the whole company in town were appealed to for a confirmation of the fact; whom the cardinal found, by their zealous devotion, to be thorough believers of the miracle. Here the relater

was also contemporary to the supposed prodigy, of an incredulous and libertine character, as well as of great genius; the miracle of so singular a nature as could scarcely admit of a counterfeit, and the witnesses very numerous, and all of them, in a manner, spectators of the fact, to which they gave their testimony. And what adds mightily to the force of the evidence, and may double our surprise on this occasion, is, that the cardinal himself, who relates the story, seems not to give any credit to it, and consequently cannot be suspected of any concurrence in the holy fraud. He considered justly, that it was not requisite, in order to reject a fact of this nature, to be able accurately to disprove the testimony, and to trace its falsehood, through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knavery and credulity which produced it. He knew, that, as this was commonly altogether impossible at any small distance of time and place; so was it extremely difficult, even where one was immediately present, by reason of the bigotry, ignorance, cunning, and roguery of a great part of mankind. He therefore concluded, like a just reasoner, that such an evidence carried falsehood upon the very face of it, and that a miracle, supported by any human testimony, was more properly a subject of derision than of argument.

莱兹主教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值得我们注意。莱兹主教是善于权谋的政客，为躲避仇敌的迫害逃到西班牙。他在路过阿拉贡的京城萨拉戈萨时，在当地教堂里见到一个人。这人已经在教堂里当了七年的看门人，当地凡是到过该教堂做礼拜的人都认知他。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看见他只有一条腿。但是，他把圣油涂抹到残肢上，缺了的腿又长出来了。主教向我们保证说他见到这人有两条腿。教堂的全体教士都证明确有这一神奇的事情。主教大人又向萨拉戈萨全体市民求证，结果发现他们都是虔诚的教徒，完全相信这一奇迹的真实性。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故事讲述者诉说的就是发生在与他本人同时代的所谓的奇迹，他本人思想开明，不会对事物抱随意轻信的态度，

而且具有极高的才能。这件事本身很特别，很难有捏造的可能性，证人很多，而且可以说都是对他们亲眼见过的事提供证明。然而，极大增强证据说服力，并让我们倍感惊奇的是，讲述者主教似乎连自己都不相信真有其事，我们自然不会怀疑他参与了这一骗局。他合理地指出，要驳斥这类性质的事情，精确地揭穿各种证据的漏洞，无需从事件产生的欺骗性的、令人轻信的具体情境中追寻证据的错误。他知道，因为发生的事情在时空上离我们都不近，通常完全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即使一个人就在现场，要澄清事实真相也是极为困难的，毕竟大部分人都有偏执、无知、狡诈和欺骗的特性。因此，他像公平的推理者一样得出结论说，这类证据是明目张胆的招摇撞骗，任何建立在人类证言基础上的奇迹不过是一种笑料，不值得我们讨论。

There surely never was a greater number of miracles ascribed to one person, than those, which were lately said to have been wrought in France upon the tomb of Abbe Paris, the famous Jansenist, with whose sanctity the people were so long deluded. The curing of the sick, giving hearing to the deaf, and sight to the blind, wereevery where talked of as the usual effects of that holy sepulchre. But what is more extraordinary; many of the miracles were immediately proved upon the spot, before judges of unquestioned integrity, attested by witnesses of credit and distinction, in a learned age, and on the most eminent theatre that is now in the world. Nor is this all: a relation of them was published and dispersed everywhere; nor were the Jesuits, though a learned body supported by the civil magistrate, and determined enemies to those opinions, in whose favour the miracles were said to have been wrought, ever able distinctly to refute or detect them. [10_5] Where shall we find such a number of circumstances, agreeing to the corroboration of one fact? And what have we to oppose to such a cloud of witnesses, but the absolute impossibility or miraculous nature of the events, which they relate? And this surely, in the eyes

of all reasonable people, will alone be regarded as a sufficient refutation.

围绕个人的奇迹，数量最多的莫过于近来在法国盛传的和巴黎神父的坟墓有关的了。巴黎神父是有名的詹森派信徒，他的圣洁长期以来蒙骗了很多人。民间到处流传着这座神圣的坟墓常常可以治病救人，可以让聋子恢复听觉、让盲人重见光明，等等。但是，更神奇的是，种种此等神迹都在现场得到应验，有着绝对诚信的人作为裁判，还有众多有信誉有身份的人作证。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一个文明的时代，发生在当今世界享有盛誉的文明之都。事情还不止于此。其中一个故事还被印制成册，到处传播。耶稣会可谓是一个崇尚学术且受到政府支持的团体，虽然彻底反对制造和拥护这些神迹的种种言论，也无法对其进行有力的驳斥和揭露。 [11_5] 我们还能去哪里寻找众多这样的情节来确凿证明一件事情的真实性？除了这些子虚乌有的神迹绝不可能发生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反驳如此众多的证人？在所有理性的人们看来，这本身就是对谣言的充分反驳。

Is the consequence just, because some human testimony has the utmost force and authority in some cases, when it relates the battle of Philippi or Pharsalia for instance; that therefore all kinds of testimony must, in all cases, have equal force and authority? Suppose that the Caesarean and Pompeian factions had, each of them, claimed the victory in these battles, and that the historians of each party had uniformly ascribed the advantage to their own side; how could mankind, at this distance, have been able to determine between them? The contrariety is equally strong between the miracles related by Herodotus or Plutarch, and those delivered by Mariana, Bede, or any monkish historian.

人类的证言有些时候具备极大的效力和权威，比如前人讲述的腓利比或法萨利亚之战。因此，人类在所有场合的所有证言都该具有同样的效力和权威吗？假设当年凯撒的阵营和庞培的阵营都各自宣称在这些战役中获胜，维护各自一方的史学家们全部都把功劳记在自己一方的名下，那么，经过了遥远的时代之后，今天的人类如何在二者间确定真伪？希罗多德或普鲁塔克笔下的奇迹和马里亚纳、圣徒比得或任何其他僧侣历史学家们讲述的神迹之间，有着同样尖锐的矛盾。

The wise lend a very academic faith to every report which favours the passion of the reporter; whether it magnifies his country, his family, or himself, or in any other way strikes in with his natural inclinations and propensities. But what greater temptation than to appear a missionary, a prophet, an ambassador from heaven? Who would not encounter many dangers and difficulties, in order to attain so sublime a character? Or if, by the help of vanity and a heated imagination, a man has first made a convert of himself, and entered seriously into the delusion; who ever scruples to make use of pious frauds, in support of so holy and meritorious a cause?

聪明的人对讲述者为满足激情而报告的故事抱以谨慎怀疑的态度，无论这种故事是为了颂扬他的国家、他的家庭或他本人，还是以任何别的方式凸显讲述者自己的性情和习性。但是，把自己装扮成天国的信使、先知和代表，还有什么别的行当比这更具诱惑呢？谁能不遭遇重重危险和困难就可以把自己变成如此神圣的人物呢？或者说，如果一个人凭借虚荣心和狂热的想象，首先把自己感化，一本正经地相信起谎言来，难道他还有什么顾虑，不会虔诚地利用各种骗术来支持这等神圣崇高的事业？

The smallest spark may here kindle into the greatest flame, because the materials are always prepared for it. The *avidum genus auricularum* , [10_6] the gazing populace, receive greedily, without examination, whatever sooths superstition, and promotes wonder.

“星星之火可以燃烧成熊熊烈焰，因为永远不缺柴草。” [11_6] 普通大众时刻张着探听消息的耳朵，带着渴求的目光，不加任何思索，贪婪地接受一切迎合迷信、助长神奇的事物。

How many stories of this nature have, in all ages, been detected and exploded in their infancy? How many more have been celebrated for a time, and have afterwards sunk into neglect and oblivion? Where such reports, therefore, fly about, the solution of the phenomenon is obvious; and we judge in conformity to regular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when we account for it by the known and natural principles of credulity and delusion. And shall we, rather than have a recourse to so natural a solution, allow of a miraculous violation of the most established laws of nature?

古往今来，有多少这样的故事一开始就被人们发现和揭穿？又有多少这样的故事虽然一开始被人传颂，但不久之后便沉入了历史的硝烟？因此，在这类故事盛传的地方，解决问题的办法非常明确：我们应该将其作为轻信和欺骗行为加以对付，这样的判断是合乎日常经验和观察的。难道我们不该借助这一自然的解决方式来对付各种神迹，而是任由其公然违背我们早已接受的自然法则？

I need not mention the difficulty of detecting a falsehood in any private or even public history, at the place, where it is said to

happen; much more when the scene is removed to ever so small a distance. Even a court of judicature, with all the authority, accuracy, and judgement, which they can employ, find themselves often at a los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ruth and falsehood in the most recent actions. But the matter never comes to any issue, if trusted to the common method of altercations and debate and flying rumours; especially when men's passions have taken part on either side.

我无需指出，无论在公开的历史还是私下的记载里，要揭穿一种骗术是很困难的，即便在其发生的现场也是如此，而稍微离开事发地一点点就困难得多了。就算是法庭，虽然拥有权威，法官准确掌握着各种事实，具有正确的判断能力，也常常很难从刚刚发生的事件中判别真伪。如果采用惯常的方法争论不休，听凭流言蜚语到处传播，人们从情感出发各自维护自己的立场，那就永远不会有任何结果。

In the infancy of new religions, the wise and learned commonly esteem the matter too inconsiderable to deserve their attention or regard. And when afterwards they would willingly detect the cheat in order to undeceive the deluded multitude, the season is now past, and the records and witnesses, which might clear up the matter, have perished beyond recovery.

在新的宗教出现之初，聪明博学之士常常认为这种事情微不足道，不值得关注。等到他们觉得有必要揭穿谎言，还真相于受蒙骗的大众的时候，却早已错过了时机，能够用来澄清事实的相关记载和证人已经消失，无处寻觅了。

No means of detection remain, but those which must be drawn from the very testimony itself of the reporters; and these, though always sufficient with the judicious and knowing, are commonly too fine to fall under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vulgar.

到了这个时候，除了从讲述故事的人的证言中寻找证据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用来揭穿谎言。虽然在明达之士看来，这样的方法也足够了，但是，对普通人而言，常常就显得十分微妙，难以理解。

Upon the whole, then, it appears, that no testimony for any kind of miracle has ever amounted to a probability, much less to a proof; and that, even supposing it amounted to a proof, it would be opposed by another proof; derived from the very nature of the fact, which it would endeavour to establish. It is experience only, which gives authority to human testimony; and it is the same experience, which assures us of the laws of nature. When, therefore, these two kinds of experience are contrary, we have nothing to do but subtract the one from the other, and embrace an opinion, either on one side or the other, with that assurance which arises from the remainder. Bu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here explained, this subtraction, with regard to all popular religions, amounts to an entire annihilation; and therefore we may establish it as a maxim, that no human testimony can have such force as to prove a miracle, and make it a just foundation for any such system of religion.

总而言之，没有任何用于证明奇迹的证据可以达到可然性的程度，更不用说能作为确凿的证据了。退一步而言，即使这样的证据能够达到确凿的地步，还会遭遇到源于同样事实的反面证据的抗衡。人类证据的效力的唯一来源就是经验，也正是同样的经验向我们明确地

呈现自然运行的法则。当两种经验互相矛盾时，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多的经验减去少的经验，然后按剩余的多少抱着相应的态度支持胜出的一方的观点。然而，按照这一原则来解决所有通俗的宗教问题，两相抵消就什么都不剩了。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一项普遍的原理，即没有任何人类证据具有证明奇迹的作用，更不能使其成为任何宗教迷信赖以存在的合理基础。

I beg the limitations here made may be remarked, when I say, that a miracle can never be proved, so as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a system of religion. For I own, that otherwise, there may possibly be miracles, or violations of the usual course of nature, of such a kind as to admit of proof from human testimony; though, perhaps, it will be impossible to find any such in all the records of history. Thus, suppose, all authors, in all languages, agree, that, from the first of January, 1600, there was a total darkness over the whole earth for eight days; suppose that the tradition of this extraordinary event is still strong and lively among the people; that all travellers, who return from foreign countries, bring us accounts of the same tradition, without the least variation or contradiction. It is evident, that our present philosophers, instead of doubting the fact, ought to receive it as certain, and ought to search for the causes whence it might be derived. The decay, corruption, and dissolution of nature, is an event rendered probable by so many analogies, that any phenomenon, which seems to have a tendency towards that catastrophe, comes within the reach of human testimony, if that testimony be very extensive and uniform.

虽然我说我们永远不能证明一种神迹的存在，并以之作为宗教迷信的基础，但是我的说法是有一定局限的。因为我承认，说不定会有别的什么奇迹，或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也得到人类证言的支持，

尽管在一切历史记载中不可能找得到这样的事。假设各种语言中的作者们都记载说，从公元1600年1月1日这天起，整个世界接连8天都处于完全黑暗之中，假设今天的人们依然完全相信这一神奇的事件确实发生过，从国外归来的旅行者们也有同样的描述，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矛盾之处。如果是这样，显然今天的哲学家们就不会对此表示怀疑，而是把它当作确定的事实加以接受，并且去追寻这一神奇事件背后的起因。许多类似的事件表明，自然中出现各种衰败、损毁、分化的现象是可能的，任何可能引起这一灾难的现象，都是可以用人类的证据来证明的，尤其是这样的证据得到普遍一致的认同的时候。

But suppose, that all the historians who treat of England, should agree, that, on the first of January, 1600, Queen Elizabeth died; that both before and after her death she was seen by her physicians and the whole court, as is usual with persons of her rank; that her successor was acknowledged and proclaimed by the parliament; and that, after being interred a month, she again appeared, resumed the throne, and governed England for three years. I must confess that I should be surprised at the concurrence of so many odd circumstances, but should not have the least inclination to believe so miraculous an event. I should not doubt of her pretended death, and of those other public circumstances that followed it. I should only assert it to have been pretended, and that it neither was, nor possibly could be real. You would in vain object to me the difficulty, and almost impossibility of deceiving the world in an affair of such consequence; the wisdom and solid judgement of that renowned queen; with the little or no advantage which she could reap from so poor an artifice; all this might astonish me; but I would still reply, that the knavery and folly of men are such common phenomena, that I should rather believe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vents to arise from their concurrence, than admit of so signal a violation of the laws of nature.

但是，假设所有撰写英国历史的史学家都记载说，公元1600年1月1日，伊莉莎白女王驾崩了。在她死前和死后都有她的医生和宫廷全体成员守候在身边，因为像她这样地位的人都会如此。王位的继承者得到议会承认并已正式宣布。可是，在被埋葬了一个月之后，伊莉莎白又出现了，重新坐上了王位，又统治了英国三年时间。如果是这样，我必须承认，虽然我对这么多奇怪的巧合感到惊讶，但丝毫也不会相信真有这等神奇的事情发生。我不会怀疑人们宣称她的死亡，以及她死后举行的各种公开活动，我只想断言说，这不过是人们的宣称而已，她的死亡不是真的，也不可能是真的。你可能会枉然反对说，在这样重要的事情上欺骗世人很难办到，几乎是不可能的，伊莉萨白女王具有何等智慧和英明，这样笨拙的把戏对她而言没有任何好处。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惊讶，但是，我依然会说，人们的狡诈和愚蠢实在太常见，我宁愿相信正是狡诈和愚蠢的结合制造了最奇异的事物，也不会承认世间真有这样违背自然法则的事情。

But should this miracle be ascribed to any new system of religion; men, in all ages, have been so much imposed on by ridiculous stories of that kind, that this very circumstance would be a full proof of a cheat, and sufficient, with all men of sense, not only to make them reject the fact, but even reject it without farther examination. Though the Being to whom the miracle is ascribed, be, in this case, Almighty, it does not, upon that account, become a whit more probable; since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know the attributes or actions of such a Being, otherwise than from the experience which we have of his productions, in the usual course of nature. This still reduces us to past observation, and obliges us to compare the instances of the violation of truth in the testimony of men, with those of the violation of the laws of nature by miracles, in order to judge which of them is most likely and probable. As the violations of truth are more common in the testimony concerning

religious miracles, than in that concerning any other matter of fact; this must diminish very much the authority of the former testimony, and make us form a general resolution, never to lend any attention to it, with whatever specious pretence it may be covered.

但是，如果这一奇迹是由一种新的宗教散播出来，习惯了这类荒谬故事的人们立刻就知道，故事发生的情景本身就是一场骗局的确凿证据，足以让所有具备理性思考能力的人拒绝接受这一事实，而且可以不加任何检查地加以拒绝。即使让奇迹得以发生的神灵就是万能的主，这件事的可然性却不会因此有丝毫增加，因为对我们而言，除了从经验中了解这一神灵在自然中的作品之外，无从知道他所具备的特性和所能施展的行为。这仍然把我们带回过去的观察中，促使我们把人类证据违背真相的情形和以神迹的形式违背自然法则的情形做比较，以判断哪一种情形更有可能出现，可然性更高。由于在宗教奇迹的问题上，人类的证据违背真相的情形比在其他客观事物上显得更为常见，这就大大削弱了用来证明宗教神迹的证据的效力，从而让我们形成一种普遍性的结论，无论这种证据披着多么华美的外衣，都决不能信以为真地加以重视。

Lord Bacon seems to have embraced the same principles of reasoning. “We ought,” says he, “to make a collection or particular history of all monsters and prodigious births or productions, and in a word of every thing new, rare, and extraordinary in nature. But this must be done with the most severe scrutiny, lest we depart from truth.” Above all, every relation must be considered as suspicious, which depends in any degree upon religion, as the prodigies of Livy; and no less so, everything that is to be found in the writers of natural magic or alchemy, or such authors, who seem, all of them, to have an unconquerable appetite for falsehood and fable. [10_7]

培根勋爵似乎也信奉同样的推理原则。他说："我们应该把各种魔怪、各种仙人投胎转世或者其他神奇的事件汇集起来，换句话说，把自然中一切新奇、罕见和超凡的现象收集起来。但是，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偏离真相。"最重要的是，必须把一切与宗教有关的叙述都视为是值得怀疑的，就像李维笔下的那些奇迹一样。自然巫术或炼丹术的作者们，还有所有那些有着强烈的欺骗和捏造欲望的作者们，他们所描绘的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11_7]

I am the better pleased with the method of reasoning here delivered, as I think it may serve to confound those dangerous friends or disguised enemies to the Christian Religion, who have undertaken to defend it by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reason. Our most holy religion is founded on Faith, not on reason; and it is a sure method of exposing it to put it to such a trial as it is, by no means, fitted to endure. To make this more evident, let us examine those miracles, related in scripture; and not to lose ourselves in too wide a field, let us confine ourselves to such as we find in the Pentateuch, which we shall examin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se pretended Christians, not as the word or testimony of God himself, but as the production of a mere human writer and historian. Here then we are first to consider a book, presented to us by a barbarous and ignorant people, written in an age when they were still more barbarous, and in all probability long after the facts which it relates, corroborated by no concurring testimony, and resembling those fabulous accounts, which every nation gives of its origin. Upon reading this book, we find it full of prodigies and miracles. It gives an account of a state of the world and of human nature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e present: of our fall from that state; of the age of man, extended to near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by a deluge; of the arbitrary choice of one

people, as the favourites of heaven; and that people the countrymen of the author; of their deliverance from bondage by prodigies the most astonishing imaginable. I desire any one to lay his hand upon his heart, and after a serious consideration declare, whether he thinks that the falsehood of such a book, supported by such a testimony, would be more extraordinary and miraculous than all the miracles it relates; which is, however, necessary to make it be received,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s of probability above established.

我很赞赏这样的推理方法，因为我想它可以挫败基督教那些危险的朋友和伪装的敌人，他们借用人类理性的原则来捍卫基督教。我们最神圣的宗教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如果要把它交给一种它完全不能承受的方式来检验，正好可以暴露出它的缺陷来。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来看看基督教经文里的那些奇迹。再把范围缩小一点，我们来看看摩西五经里的记载。按照这些所谓基督徒的原则，我们将不把经文视为上帝本身的言语或证据，而仅仅是人类作者和史学家的产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是一个蒙昧无知的民族为我们提供的一部书。在写这部书的时候，他们还处在更加野蛮的状态，叙述的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没有任何当时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事情，完全就像任何民族对自身起源所做的神话式描述。翻阅这部书，随处可见各种怪事和神迹。它对世界的状态和人性的描述完全和今天的不同，涉及人类的堕落；人活在世上的年龄近千岁；上帝用大洪水毁灭世界；上帝把一个民族挑选出来作为天国的选民；而这个民族正是作者的同胞；这个民族历尽磨难，最终借助神迹获得解放。我恳请每个人把手按在胸前，认真思考一下再发表意见：你是不是认为，这部建立在如此证据之上的虚妄之书本身比书中讲述的各种神迹还要荒诞离奇。然而，按照上文确定的可然性原则，正是因为该书的虚妄胜于其中的神迹，才使得它被人们接受。

What we have said of miracles may be applied, without any variation, to prophecies; and indeed, all prophecies are real miracles, and as such only, can be admitted as proofs of any revelation. If it did not exceed the capacity of human nature to foretell future events, it would be absurd to employ any prophecy as an argument for a divine mission or authority from heaven. So that, upon the whole,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Christian Religion not only was at first attended with miracles, but even at this day cannot be believed by any reasonable person without one. Mere reason is insufficient to convince us of its veracity; and whoever is moved by Faith to assent to it, is conscious of a continued miracle in his own person, which subverts all the principles of his understanding, and gives him a determination to believe what is most contrary to custom and experience.

我们对于奇迹的看法可以丝毫不变地用于各种预言。事实上，所有的预言都是真正的奇迹，而且只有如此，才能作为任何启示的证据。如果无需超越人性的能力就可以预知未来的事件，那么借助预言为神圣使命辩护或者将其作为天国的权威就显得无比荒唐。因此，总体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基督教不仅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神迹，而且直到今天，任何理智的人离开了这些神迹都无法相信基督教。仅凭理性不足以让我们相信基督教的真实性。无论是谁，由于信仰而相信基督教，都会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一种奇迹，颠覆了自己所有的理解原则，让他坚定不移地相信与人类习惯和经验背道而驰的事物。

[10_1].Plutarch, in vita Catonis.

[10_2].No Indian, it is evident, could have experience that water did not freeze in cold climates. This is placing nature in a situation quite unknown to him; 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him to tell *a priori* what will result from it. It is making a new experiment, the consequence of which is always uncertain. One may sometimes conjecture from analogy what will follow; but still this is but conjecture. And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in the present case of freezing, the event follows contrary to the rules of analogy, and is such as a rational Indian would not look for. The operations of cold upon water are not gradual, according to the degrees of cold; but whenever it comes to the freezing point, the water passes in a moment, from the utmost liquidity to perfect hardness. Such an event, therefore, may be denominated extraordinary, and requires a pretty strong testimony, to render it credible to people in a warm climate. But still it is not miraculous, nor contrary to uniform experience of the course of nature in cases where all the circumstances are the same. The inhabitants of Sumatra have always seen water fluid in their own climate, and the freezing of their rivers ought to be deemed a prodigy. But they never saw water in Muscovy during the winter; and therefore they cannot reasonably be positive what would there be the consequence.

[10_3].Sometimes an event may not, in itself, seem to be contrary to the laws of nature, and yet, if it were real, it might, by reason of some circumstances, be denominated a miracle; because, in fact, it is contrary to these laws. Thus if a person, claiming a divine authority, should command a sick person to be well, a healthful man to fall down dead, the clouds to pour rain, the winds to blow, in short, should order many natural events, which immediately follow upon his command; these might justly be esteemed miracles, because they are really, in this case, contrary to the laws of nature. For if any suspicion remain, that the event and command concurred by accident there is no miracle and no transgression of the laws of nature. If this suspicion be removed, there is evidently a miracle, and a transgression of these laws; because nothing can be more contrary to nature than that the voice or command of a man should have such an influence. A miracle may be accurately defined, a transgression of a law of nature by a particular volition of the Deity, or by the interposition of some invisible agent. A miracle may either be discoverable by men or not. This alters not its nature and essence. The raising of a house or ship into the air is a visible miracle. The raising of a feather, when the wind wants ever so little of a force requisite for that purpose, is as real a miracle, though not so sensible with regard to us.

[10_4].Hist. lib. iv. cap. 81. Suetonius gives nearly the same account in vita Vesp.

[10_5].By Mons. Montgeron, counsellor or judge of the Parliament of Paris.

[10_6].Lucret.

[10_7].Nov. Org. lib. ii. aph. 29.

[11_1].见普鲁塔克《加图传》。

[11_2].很明显，任何印度人都没见过水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不结冰的情况。这是把自然置于他完全不知晓的境况之下，他不可能凭先觉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是做一个新的实验，其结果永远是不确定的。有时候人们或许通过类比推测可能出现的结果，但毕竟只是推测而已。必须承认，在这个结冰的例子上，事物的结果违背了类比法则，是任何理性的印度人都猜测不到的。寒冷对于水的作用并不是按寒冷的程度逐渐产生变化的，无论什么时候，一旦到了结冰点，水就立即从完全的液态变成坚实的固态。因此，这种变化可以说是异常的，需要有力的证据才能让生活在温暖气候中的人们相信。但是，这算不上奇迹，也不违背人们在相同条件的自然环境中的一致体验。苏门答腊岛上的居民一辈子见到水在他们的气候里都是流动的，如果那里的河流结冰了，似乎可以称之为奇迹。但是他们从未见过莫斯科冬天的水，当然也就不能肯定在那样的气候条件下水会是什么样子。

[11_3].有时候，一事物本身似乎并不违背自然法则。但它如果是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由于其具体情境，也可被称为奇迹，因为它事实上违背了自然法则。因此，如果一个人声称具有神力，可以令病人立刻康复，让健康的人马上倒地而死，还可以呼风唤雨，简单地说，他可以让许多自然事物听他的使唤，那么这些情况就算是奇迹，因为它们在这些情形下违背了自然法则。如果我们怀疑这些事件和这人的命令碰巧同时发生，那就没有奇迹，也没有违背任何自然法则。除去这种怀疑，那这些显然就是奇迹，就违背了自然法则，因为人的声音和命令能有这样强大的力量，再没有比这更违背自然法则的事情了。奇迹可以精确地定义为：由神的所意志或某种无形主体的参与引起的违背自然法则的现象。奇迹可以是能为人所发现的，也可以是不能为人发现的，这都改变不了它的属性和本质。把一栋房子或一座大船举到空中是我们看得见的奇迹。但是，在风的力量不足以扬起一片羽毛时，羽毛自然飘到空中，这也是奇迹，虽然我们不容易觉察到。

[11_4].《历史》第8卷，81页。苏埃托尼乌斯在《诸凯撒生平》中有关于“维斯帕先”的几乎相同的描述。

[11_5].该书由蒙日龙写就，此人当时是巴黎议会的顾问。

[11_6].此句来自卢克莱修。

[11_7].见《新工具论》卷二，第29条。

Section XI　Of a Particular Providence and of a Future State

第十一章　论天意和来世

I was lately engaged in a conversation with a friend who loves sceptical paradoxes; where, though he advanced many principles, of which I can by no means approve, yet as they seem to be curious, and to bear some relation to the chain of reasoning carried on throughout this enquiry, I shall here copy them from my memory as accurately as I can, in order to submit them to the judgement of the reader.

我最近和一位喜欢怀疑主义论辩的朋友有过一次对话。尽管他在谈话中提出的许多原则我绝不敢苟同，但是这些原则很有意思，而且与我在本书中的系列推理不无关联，我在此将我们的对话尽可能准确地抄录下来，让读者自己来做判断。

Our conversation began with my admiring the singular good fortune of philosophy, which, as it requires entire liberty above all other privileges, and chiefly flourishes from the free opposition of sentiments and argumentation, received its first birth in an age and country of freedom and toleration, and was never cramped, even in its most extravagant principles, by any creeds, concessions, or penal statutes. For, except the banishment of Protagoras, and the death of Socrates, which last event proceeded partly from other motives, there are scarcely any instances to be met with, in ancient history, of this bigoted jealousy, with which the present age is so much infested. Epicurus lived at Athens to an advanced age, in peace and

tranquillity; Epicureans [11_1] were even admitted to receive the sacerdotal character, and to officiate at the altar, in the most sacred rites of the established religion; and the public encouragement [11_2] of pensions and salaries was afforded equally, by the wisest of all the Roman emperors [11_3] , to the professors of every sect of philosophy. How requisite such kind of treatment was to philosophy, in her early youth, will easily be conceived, if we reflect, that, even at present, when she may be supposed more hardy and robust, she bears with much difficulty the inclemency of the seasons, and those harsh winds of calumny and persecution, which blow upon her.

对话一开始，我首先对哲学独享的好运表示羡慕。哲学对自由的要求高于它所要求的其他特权，哲学的繁荣主要有赖于各种意见和观点可以自由地对立和争论，而哲学恰好诞生于一个自由宽容的时代和国度，即便是它提出的最大胆的原则也不曾受到任何信条、任何特许权和任何刑事法规的限制。除了普罗塔哥拉遭到了放逐，苏格拉底被迫害至死（后面这一事件还牵涉到其他动机），在整个古代史上，几乎再也没有过类似的极端的忌恨事件，而在今天的时代却随处可见。伊壁鸠鲁在雅典活到很高的年龄，得以安享其晚年。而伊壁鸠鲁的信徒们 [12_1] 甚至得到祭司的身份，在雅典已确立的宗教中最神圣的仪式上走上祭坛主持典礼。罗马帝国最聪明的皇帝们 [12_2] 公开向各派哲学家提供均等的津贴和薪俸以兹鼓励。 [12_3] 可以想象，在哲学发展的初期，这样的待遇很有必要。再想一想，即便在今天，这个人们都以为哲学变得更加顽强健壮的时候，她其实仍然在恶劣的天气中艰难承受着不时向她吹来的诽谤和迫害的狂风。

You admire, says my friend, as the singular good fortune of philosophy, what seems to result from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and to be unavoidable in every age and nation. This pertinacious

bigotry, of which you complain, as so fatal to philosophy, is really her offspring, who, after allying with superstition, separates himself entirely from the interest of his parent, and becomes her most inveterate enemy and persecutor. Speculative dogmas of religion, the present occasions of such furious dispute, could not possibly be conceived or admitted in the early ages of the world; when mankind, being wholly illiterate, formed an idea of religion more suitable to their weak apprehension, and composed their sacred tenets of such tales chiefly as were the objects of traditional belief, more than of argument or disputation. After the first alarm, therefore, was over, which arose from the new paradox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philosophers; these teachers seem ever after, during the ages of antiquity, to have lived in great harmony with the established superstition, and to have made a fair partition of mankind between them; the former claiming all the learned and wise, the latter possessing all the vulgar and illiterate.

我的朋友说，你所羡慕的哲学的好运气，似乎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都是各时各地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你所抱怨的那种对哲学顽固不化的偏执态度，对哲学十分有害。这种态度其实就是哲学的子嗣，他和迷信勾结在一起，全然不顾其生母哲学的利益，反而成了她最冥顽不化的敌人和迫害者。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想象不到像今天这样引起激烈争辩的宗教教义。那时候，所有人都目不识丁，理解能力低，只能形成简单的宗教观念。他们的宗教信条常常是一些以传统信仰为目的的传说，而不是什么论述和争辩。因而哲学家们提出的各种新的悖论和原则，一开始让世人感到惊恐。可是惊恐过后，古代的这些哲学家们似乎和当时盛行的宗教迷信相处得非常和谐，并且把人类一分为二，哲学拥有所有聪明博学的人，而迷信则把庸俗无知的另一半据为己有。

It seems then, say I, that you leave politics entirely out of the question, and never suppose, that a wise magistrate can justly be jealous of certain tenets of philosophy, such as those of Epicurus, which, denying a divine existence, and consequently a providence and a future state, seem to loosen, in a great measure the ties of morality, and may be supposed, for that reason, pernicious to the peace of civil society.

我说，你似乎完全忽略了政治，而且你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明智的官吏可能会自然而然地防备某些哲学信条，比如伊壁鸠鲁的观点。伊壁鸠鲁的学说否认任何神圣的存在，因而也否认有天意和来世，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道德的束缚力，因而可能被认作对社会安宁有害。

I know, replied he, that in fact these persecutions never, in any age, proceeded from calm reason, or from experience of the pernicious consequences of philosophy; but arose entirely from passion and prejudice. But what if I should advance farther, and assert, that if Epicurus had been accused before the people, by any of the sycophants or informers of those days, he could easily have defended his cause, and proved his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to be as salutary as those of his adversaries, who endeavoured, with such zeal, to expose him to the public hatred and jealousy?

朋友回答说，我知道，事实上任何时代的迫害现象都不是理性平静思考的结果，也不是因为人们体验到哲学的危害，完全是由人们的情感和偏见所引起的。但是如果再进一步，我可以说，就算伊壁鸠鲁遭到当时那些谗言者们的控告，他完全可以在公众面前轻松地捍卫自己的观点，证明他的哲学原则和其反对者们的原则一样，都是有益于

公众的，尽管他的对手们以极大的热忱一心要置他于公众的仇恨和嫉妒之下。如果我这样说，会有什么结果呢？

I wish, said I, you would try your eloquence upon so extraordinary a topic, and make a speech for Epicurus, which might satisfy, not the mob of Athens, if you will allow that ancient and polite city to have contained any mob, but the more philosophical part of his audience, such as might be supposed capable of comprehending his arguments.

我说，既然是这样，但愿你能在这个非凡的话题上施展你的口才，发表一篇拥护伊壁鸠鲁的演说。当然，目的不是要你说服雅典的暴民（如果你认为在雅典这个古老的文明城市里确有暴民存在），而是要你说服那些更有哲学头脑，估计更能够了解伊壁鸠鲁思想的听众。

The matter would not be difficult, upon such conditions, replied he, and if you please, I shall suppose myself Epicurus for a moment, and make you stand for the Athenian people, and shall deliver you such a harangue as will fill all the urn with white beans, and leave not a black one to gratify the malice of my adversaries.

他回答说，照你这样说，这事并不难。如果你愿意，我暂且把自己当作伊壁鸠鲁，让你来代表雅典公民。现在我就在你面前发表演说，让全体雅典公民都来投我的票，不让我的敌人得到一张支持的票，让他们的恶意得不到一点满足的机会。

Very well, pray proceed upon these suppositions.

很好，但愿一切如你所愿。

I come hither, O ye Athenians, to justify in your assembly what I maintain in my school, and I find myself impeached by furious antagonists, instead of reasoning with calm and dispassionate enquirers. Your deliberations, which of right should be directed to questions of public good,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commonwealth, are diverted to the disquisitions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and these magnificent, but perhaps fruitless enquiries, take place of your more familiar but more useful occupations. But so far as in me lies, I will prevent this abuse. We shall not here dispute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government of worlds. We shall only enquire how far such questions concer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if I can persuade you, that they are entirely indifferent to the peace of society and security of government, I hope that you will presently send us back to our schools, there to examine, at leisure, the question the most sublim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most speculative of all philosophy.

雅典的公民们，我到这里来，是要利用大家集会的机会向诸位说明我的哲学信念，因为我发现我不是在和一些冷静客观的研究者讨论问题，而是遭到一些怒不可遏的反对者的非难和诋毁。诸位本该思考有益于公共利益和大众福利的问题，现在却把心思分散到思辨哲学的研究上了。这些研究的话题固然宏大，但可能没有任何用处，它们占据了诸位更加熟悉、更加实用的工作。但是，我将尽自己所能来防止大家把精力用到错误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世界的起源和管理的问题，只探询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与公共利益相关。如果我能使诸位相信，这类问题完全不会影响社会的和平安宁和政府的安全稳

定，我希望大家能够让我们立刻回到自己的学院，让我们可以自由探索那些最崇高、最具思辨性的哲学问题。

The religious philosophers, not satisfied with the tradition of your forefathers, and doctrine of your priests (in which I willingly acquiesce), indulge a rash curiosity, in trying how far they can establish religion upon the principles of reason; and they thereby excite, instead of satisfying, the doubts, which naturally arise from a diligent and scrutinous enquiry. They paint, in the most magnificent colours, the order, beauty, and wise arrangement of the universe; and then ask, if such a glorious display of intelligence could proceed from the fortuitous concourse of atoms, or if chance could produce what the greatest genius can never sufficiently admire. I shall not examine the justness of this argument. I shall allow it to be as solid as my antagonists and accusers can desire. It is sufficient, if I can prove, from this very reasoning, that the question is entirely speculative, and that, when, in my philosophical disquisitions, I deny a providence and a future state, I undermine not the foundations of society, but advance principles, which they themselves, upon their own topics, if they argue consistently, must allow to be solid and satisfactory.

宗教哲学家们对你们祖先的传统和祭司们的教义并不满意，而这些我都欣然接受。他们鲁莽地纵容自己的好奇心，极力要把宗教建立在理性的原则之上。其结果是，他们不但没有平息人们在勤恳细致地研究哲学问题时产生的种种疑虑，反而激起了人们的疑虑。他们把宇宙的秩序、美丽和精巧描绘得无比壮丽多彩，并进而问道，难道这种壮观的智慧呈现是由原子的偶然结合而产生的？或者说让最富天才的人们都叹为观止的宇宙难道是偶然的产物？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我暂且不在这里讨论。我愿意承认它像我的反对者和诋毁者们所期望的那

样坚实可靠。我只想按照他们这种推理来证明，这完全是个哲学思辨问题，而我在哲学的研究中否认天意和来世的存在，不仅不会削弱社会的基础，反而提出了一些原则。如果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连贯一致的论证，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原则是坚实可靠的，是令人满意的。如果我能达到这一目标，那就够了。

You then, who are my accusers, have acknowledged, that the chief or sole argument for a divine existence (which I never questioned) is derived from the order of nature; where there appear such marks of intelligence and design, that you think it extravagant to assign for its cause, either chance, or the blind and unguided force of matter. You allow, that this is an argument drawn from effects to causes. From the order of the work, you infer, that there must have been project and forethought in the workman. If you cannot make out this point, you allow, that your conclusion fails; and you pretend not to establish the conclusion in a greater latitude than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will justify. These are your concessions. I desire you to mark the consequences.

你们当中指控我的人已经承认，神圣存在（我对此从未怀疑过）的首要的、唯一的证据来自于自然秩序。自然中呈现的这些智慧和设计，你们认为将其归因于偶然的机会，或者事物盲目、散乱的力量，便太不切实际了。你们承认，这是从结果到原因的论证方法。你们从作品的结构推断出工匠心中一定事先就有设计和筹划。如果你们没法阐明这一点，你们就会承认，你们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你们并不企图得出任何超过自然现象所许可的结论。这些都是你们所认可的。我请大家看看会有什么后果。

When we infer any particular cause from an effect, we must

proportion the one to the other, and can never be allowed to ascribe to the cause any qualities, but what are exactly sufficient to produce the effect. A body of ten ounces raised in any scale may serve as a proof, that the counterbalancing weight exceeds ten ounces; but can never afford a reason that it exceeds a hundred. If the cause, assigned for any effect, be not sufficient to produce it, we must either reject that cause, or add to it such qualities as will give it a just proportion to the effect. But if we ascribe to it farther qualities, or affirm it capable of producing other effects, we can only indulge the licence of conjecture, and arbitrarily suppose the existence of qualities and energies, without reason or authority.

我们从结果推断出原因的时候，必须注意二者间恰当的比例关系，除了足以产生某种结果的那些属性，我们始终不能把其他的属性归于原因。一个十盎司重的物体在天平的一边被举了起来，足以说明天平另一边能将它举起来的法码是不只十盎司重的，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个法码的重量超过了一百盎司。如果我们为结果找出的某个原因不足以产生这个结果，我们要么拒绝接受这个原因，要么为这个原因补充适当的属性，使之和结果的比例恰到好处。但是如果我们说还有其他属性，或者断言它还能引起其他结果，那就是胡乱猜测，在没有任何理由和根据的情况下，武断地认定有别的属性和能量存在。

The same rule holds, whether the cause assigned be brute unconscious matter, or a rational intelligent being. If the cause be known only by the effect, we never ought to ascribe to it any qualities, beyond what are precisely requisite to produce the effect; nor can we, by any rules of just reasoning, return back from the cause, and infer other effects from it, beyond those by which alone it is known to us. No one, merely from the sight of one of Zeuxis's

pictures, could know, that he was also a statuary or architect, and was an artist no less skilful in stone and marble than in colours. The talents and taste, displayed in the particular work before us; these we may safely conclude the workman to be possessed of. The cause must be proportioned to the effect; and if we exactly and precisely proportion it, we shall never find in it any qualities, that point farther, or afford an inference concerning any other design or performance. Such qualities must be somewhat beyond what is merely requisite for producing the effect, which we examine.

我们确定的原因，无论是无意识的物体还是有智慧的生命，都适用这个同样的原则。如果我们只能从结果中认识某个原因，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原因恰恰具有产生该结果的属性，而不能随意认为它还具备其他属性。同样，按照合理的推断方式，我们不能再由原因往回推，断定该原因除了产生我们熟悉的结果之外，还会引起其他结果。没有任何人只看了宙克西斯的绘画之后，就知道他还是雕塑家和建筑师，就知道他在石工方面的技艺并不逊色于他的绘画艺术。眼前这幅作品中展示的才艺和趣味，我们可以可靠地断定是作者具有的品质。原因要和结果相称，如果我们能准确把握好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我们就不会认定还有其他品质，进一步随意推断别的设计或表现。这些品质已经超出了产生目前我们探讨的结果所要求的范畴。

Allowing, therefore, the gods to be the authors of the existence or order of the universe; it follows, that they possess that precise degree of power, intelligence, and benevolence, which appears in their workmanship; but nothing farther can ever be proved, except we call in the assistance of exaggeration and flattery to supply the defects of argument and reasoning. So far as the traces of any attributes, at present, appear, so far may we conclude these attributes to exist. The supposition of farther attributes is mere

hypothesis; much more the supposition, that, in distant regions of space or periods of time, there has been, or will be, a more magnificent display of these attributes, and a scheme of administration more suitable to such imaginary virtues. We can never be allowed to mount up from the universe, the effect, to Jupiter, the cause; and then descend downwards, to infer any new effect from that cause; as if the present effects alone were not entirely worthy of the glorious attributes, which we ascribe to that deity. The knowledge of the cause being derived solely from the effect, they must be exactly adjusted to each other; and the one can never refer to anything farther, or be the foundation of any new inference and conclusion.

因此，就算我们承认各种神灵是宇宙存在和秩序的缔造者，也只能说，这些神灵恰好只具备他们的作品所显示的力量、智慧和仁爱，此外再不能证明有别的品质，除非我们采取夸大其词、巴结奉承的办法来弥补论证和推理的不足。现在，只有有迹象显示这些品质存在，我们才能如此断定。除此之外，认为还有任何别的品质存在都不过是揣测。而如果认为，在某个遥远的地域，或某个久远的时代，这些品质曾经或者将会壮丽地展现出来，也曾经有过或将会有一种更适合这些想象的德行的宇宙秩序，那就更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了。我们绝不能把宇宙的存在这一结果往回推到朱庇特这个原因上，然后再折回来，从这个原因推出新的结果，仿佛现在的结果还配不上我们归于朱庇特神的辉煌品质。既然原因只能从结果中得出来，二者必须是紧密联系的，各自都不能指向任何别的事物，也不能以自身为基础，推出新的事物或得出新的结论。

You find certain phenomena in nature. You seek a cause or author. You imagine that you have found him. You afterwards become so enamoured of this offspring of your brain, that you

imagine it impossible, but he must produce something greater and more perfect than the present scene of things, which is so full of ill and disorder. You forget, that this superlative intelligence and benevolence are entirely imaginary, or, at least, without any foundation in reason; and that you have no ground to ascribe to him any qualities, but what you see he has actually exerted and displayed in his productions. Let your gods, therefore, O philosophers, be suited to the present appearances of nature; and presume not to alter these appearances by arbitrary suppositions, in order to suit them to the attributes, which you so fondly ascribe to your deities.

你发现自然界中的某种现象，然后去寻求这一现象的原因或缔造者。你想象自己找到了这一原因或缔造者，此后你对自己大脑的这一产物如此倾心，觉得他的能耐不可能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一定还引起了比眼前的现象更加宏伟、更加完美的事物，因为眼前的这些现象处处都是问题，混乱不堪。你忘了这个具有无上智慧和仁爱的生灵完全是想象的产物，至少没有任何合理的存在基础，除了你亲眼见到的他在其造物中显示的品质之外，你没有理由认为他还具备其他的任何品质。因此，哲学家们啊，让你们的神灵合乎自然的现状，不要用武断的假设来改变自然的现状，反过来迎合你们欣然以为你们的神灵所具有的那些品质。

When priests and poets, supported by your authority, O Athenians, talk of a golden or silver age, which preceded the present state of vice and misery, I hear them with attention and with reverence. But when philosophers, who pretend to neglect authority, and to cultivate reason, hold the same discourse, I pay them not, I own, the same obsequious submission and pious deference. I ask; who carried them into the celestial regions, who

admitted them into the councils of the gods, who opened to them the book of fate, that they thus rashly affirm, that their deities have executed, or will execute, any purpose beyond what has actually appeared? If they tell me, that they have mounted on the steps or by the gradual ascent of reason, and by drawing inferences from effects to causes, I still insist, that they have aided the ascent of reason by the wings of imagination; otherwise they could not thus change their manner of inference, and argue from causes to effects; presuming, that a more perfect production than the present world would be more suitable to such perfect beings as the gods, and forgetting that they have no reason to ascribe to these celestial beings any perfection or any attribute, but what can be found in the present world.

雅典人啊，你们的祭司和诗人们在你们的威望支持下，谈论在我们这个充满邪恶和苦难的时代之前出现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我总是洗耳恭听。但是，当那些宣称不顾你们的威信，而要培养理性的哲学家们谈起同样的话题时，我承认自己对他们就没有那么顺从和恭敬了。我要问，谁把他们引入了天界，谁允许他们进入神灵的会堂，谁为他们翻开了命运之书，让他们可以草率地断言，他们的神灵曾经实现了事实上不存在的任何目的，或将要实现这一目的？如果他们说，他们或是借助逐步推理，或是从结果推导出原因，从而攀上了这个理性的台阶，我仍然要说，他们是凭借想象的翅膀让理性飞升起来。不然他们也就不会改变了推理的方式，从原因中推出结果，荒谬地以为只有一个比眼前的世界更完美的景象才更符合完美的神灵的作为，忘了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把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任何完美品质归于这些天国的神灵。

Hence all the fruitless industry to account for the ill appearances of nature, and save the honour of the gods; while we

must acknowledge the reality of that evil and disorder, with which the world so much abounds. The obstinate and intractable qualities of matter, we are told, or the observance of general laws, or some such reason, is the sole cause, which controlled the power and benevolence of Jupiter, and obliged him to create mankind and every sensible creature so imperfect and so unhappy. These attributes then, are, it seems, beforehand, taken for granted, in their greatest latitude. And upon that supposition, I own that such conjectures may, perhaps, be admitted as plausible solutions of the ill phenomena. But still I ask, why take these attributes for granted, or why ascribe to the cause any qualities but what actually appear in the effect? Why torture your brain to justify the course of nature upon suppositions, which, for aught you know, may be entirely imaginary, and of which there are to be found no traces in the course of nature?

因此，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世界的确充满了邪恶和混乱，但是，一切用这样的方式解释自然的乱象和拯救神灵荣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人们告诉我们，之所以朱庇特的能力和仁慈受到限制，使他把人类和每一种有灵性的动物创造得如此不完美、如此不幸福，唯一的原因是物质固有的不可改变的属性，或者必须遵守的自然法则，或某种类似的缘由。我们似乎事先就想当然地认为朱庇特具有这些最完美的品质。从这个假设出发，我认为这些猜想或许可以为自然中的各种恶劣现象提供言之有理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依然要问，为什么我们事先就设定这些品质的存在，或者为什么我们要把结果中没有呈现的品质归到原因的名下呢？为什么要绞尽脑汁，用你们清楚知道完全出于想象、在自然中没有一丝存在痕迹的假设来解释自然的进程呢？

The religious hypothesis, therefore, must be considered only as a particular method of accounting for the visible phenomena of the

universe; but no just reasoner will ever presume to infer from it any single fact, and alter or add to the phenomena, in any single particular. If you think, that the appearances of things prove such causes, it is allowable for you to draw an inference concerning the existence of these causes. In such complicated and sublime subjects, every one should be indulged in the liberty of conjecture and argument. But here you ought to rest. If you come backward, and arguing from your inferred causes, conclude, that any other fact has existed, or will exist, in the course of nature, which may serve as a fuller display of particular attributes; I must admonish you, that you have departed from the method of reasoning, attached to the present subject, and have certainly added something to the attributes of the cause, beyond what appears in the effect; otherwise you could never, with tolerable sense or propriety, add anything to the effect, in order to render it more worthy of the cause.

因此，我们只能把宗教假设视为解释宇宙中明显的现象的一种特殊方法，正确运用推理的人都不会在具体情况下用这种方法推出某个具体事实，来改变实际存在的现象，或随意增加内容。如果你们认为，事物的现状证明有这些原因存在，你们可以就这些原因的存在作出自己的推断。对于这些复杂而崇高的话题，人人都有进行推测和论述的自由。但是你们得就此而止。倘若你们又从自己推断出的原因出发，回过来得出结论说，自然界中有过某个事物，或将会出现某个事物，并以之证明这是某些品质的更充分的呈现，那我得警告你们说，你们已经背离目前的话题所需要的正确的推理方法，随意增加了原因的属性，增加了结果中并未显示的属性，否则只要你们能明事理、知分寸，就绝不会把结果夸大，以便它更能展示原因的完美。

Where, then, is the odiousness of that doctrine, which I teach in my school, or rather, which I examine in my gardens? Or what

do you find in this whole question, wherein the security of good morals, or the peace and order of society, is in the least concerned?

那么，我在自己学院中所传授的学说，或者说我在自己花园中研究的学说，究竟有什么令人憎恶的呢？或者说，在这个丝毫无损于良好的道德和社会的安宁和秩序的问题上，你们究竟发现了什么危害呢？

I deny a providence, you say, and supreme governor of the world, who guides the course of events, and punishes the vicious with infamy and disappointment, and rewards the virtuous with honour and success, in all their undertakings. But surely, I deny not the course itself of events, which lies open to every one's inquiry and examination. I acknowledge, that, in the present order of things, virtue is attended with more peace of mind than vice, and meets with a more favourable reception from the world. I am sensible, that, according to the past experience of mankind, friendship is the chief joy of human life, and moderation the only source of tranquillity and happiness. I never balance between the virtuous and the vicious course of life; but am sensible, that, to a well-disposed mind, every advantage is on the side of the former. And what can you say more, allowing all your suppositions and reasonings? You tell me, indeed, that this disposition of things proceeds from intelligence and design. But whatever it proceeds from, the disposition itself, on which depends our happiness or misery, and consequently our conduct and deportment in life is still the same. It is still open for me, as well as you, to regulate my behaviour, by my experience of past events. And if you affirm, that, while a divine providence is allowed and a supreme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the universe, I ought to expect some more particular

reward of the good, and punishment of the bad, beyond the ordinary course of events; I here find the same fallacy, which I have before endeavoured to detect. You persist in imagining, that, if we grant that divine existence, for which you so earnestly contend, you may safely infer consequences from it, and add something to the experienced order of nature, by arguing from the attributes which you ascribe to your gods. You seem not to remember, that all your reasonings on this subject can only be drawn from effects to causes; and that every argument, deducted from causes to effects, must of necessity be a gross sophism; since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know anything of the cause, but what you have antecedently, not inferred, but discovered to the full, in the effect.

你们说，我否认神灵的存在，否认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世界的管理者在背后引领着万事万物，在自然的进程中惩恶杨善，让邪恶的人臭名昭著、永远失意，让具有美德的人功成名就、载誉而归。但是，我显然并不否定事物本身的进程，这是人人都可以自由探索和考察的。我承认，就事物的现状来看，美德比罪恶更能让人心得到安宁，更受世人欢迎。我能感受到，就人类过去的经验说来看，友谊是人生最大的快乐，而节制乃是宁静和幸福人生的唯一源泉。我从没有把善良的人生和罪恶的人生看作是平等的，而是清楚地知道，从心态安宁的角度来看，善良的人生具有各种优势。如果你们的所有假设和推论都得到认可，你们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你们告诉我说，实际上，事物的这种安排源自智慧和设计。但是无论源自什么地方，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所依赖的这种安排是没有改变的，我们人生的行为举止所依赖的这种安排是相同的。我和你们一样，仍然可以用我过去的经验来规范我的行为。如果你们肯定地说，我们承认有神圣的上帝，承认宇宙中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正义分配给万事万物，我就能期待在事物寻常的秩序之外，好人能得到相应的奖赏，恶人也会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这里又出现了我先前努力所揭露的那种谬误。你们坚持自己的想象：我们如果承认你们热切主张的神灵确实存在，你们就可以安全地以之为

起点进行推断，凭借你们赋予神灵的各种品质，把新的事物添加到我们所体验到的自然秩序之上。你们似乎不记得，你们在此话题上的所有推理都只能从结果推断出原因，而从原因到结果的任何论证都必然是彻底的诡辩。因为对于原因的了解，除了事先从结果中发现的，其他内容根本不可能仅凭臆断就能知道。

But what must a philosopher think of those vain reasoners, who instead of regarding the present scene of things as the sole object of their contemplation, so far reverse the whole course of nature, as to render this life merely a passage to something farther; a porch, which leads to a greater, and vastly different building; a prologue, which serves only to introduce the piece, and give it more grace and propriety? Whence, do you think, can such philosophers derive their idea of the gods? From their own conceit and imagination surely. For if they derived it from the present phenomena, it would never point to anything farther, but must be exactly adjusted to them. That the divinity may possibly be endowed with attributes, which we have never seen exerted; may be governed by principles of action, which we cannot discover to be satisfied; all this will freely be allowed. But still this is mere possibility and hypothesis. We never can have reason to infer any attributes, or any principles of action in him, but so far as we know them to have been exerted and satisfied.

但是，一个哲学家会怎么看那些枉费心机的推理者呢？他们不把事物的现状作为思索的唯一目标，相反，他们完全背离自然的进程，认为此生不过是通往更遥远世界的通道，是引领我们通向更雄伟的、截然不同的建筑物的一道走廊，是一篇序言，目的是向我们介绍真正的鸿篇巨制，为之增色、为之捧场。你们觉得这些哲学家们从哪里得来了他们关于神灵的观念？显然这是来源于他们的自负和想象。因为

如果他们的观念来源于眼前的现象，断然就不会把人们引向任何更遥远的事物，而是必须和现实相符的。那位神灵或许拥有我们从未见过的品质，或许受到我们无从发现的行为原则的限制，这一切我们都可以承认。但是，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猜测。我们绝没有任何理由推断出他具有我们未曾见过他们施展、实现的任何品质和行为原则。

Are there any marks of a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the world? If you answer in the affirmative, I conclude, that, since justice here exerts itself, it is satisfied. If you reply in the negative, I conclude, that you have then no reason to ascribe justice, in our sense of it, to the gods. If you hold a medium between affirmation and negation, by saying, that the justice of the gods, at present, exerts itself in part, but not in its full extent; I answer, that you have no reason to give it any particular extent, but only so far as you see it, at present, exert itself.

有任何迹象表明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可以公平分配的正义么？如果你们说有，那我会说，既然正义在这里显现出来，它就得以实现。如果你们说没有，我会说你们没有理由把我们所理解的正义归于神灵。如果你们既不肯定又不否定，说神灵的正义目前只得到部分施行，没有完全地发挥出来，我要说，除了亲眼所见，你们没有理由为正义设定一个具体的程度。

Thus I bring the dispute, O Athenians, to a short issue with my antagonists. The course of nature lies open to my contemplation as well as to theirs. The experienced train of events is the great standard, by which we all regulate our conduct. Nothing else can be appealed to in the field, or in the senate. Nothing else ought ever to

be heard of in the school, or in the closet. In vain would our limited understanding break through those boundaries, which are too narrow for our fond imagination. While we argue from the course of nature, and infer a particular intelligent cause, which first bestowed, and still preserves order in the universe, we embrace a principle, which is both uncertain and useless. It is uncertain; because the subject lies entirely beyond the reach of human experience. It is useless; because our knowledge of this cause being derived entirely from the course of nature, we can never,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just reasoning, return back from the cause with any new inference, or making additions to the common and experienced course of nature, establish any new principles of conduct and behaviour.

雅典人啊，让我把我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议简短地了结了吧。自然的进程是我可以自由思考的，也是他们可以自由探索的。我们过去所经历过的事是我们规范自己行为的大标准，除此之外，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议会大厅，都不能诉诸别的东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私人的秘密房间里，都不该听到别的内容。这样的界限对于我们喜欢的想象力而言实在是狭窄，但是，如果我们有限的理解要试图打破这些边界，则是徒劳之举。如果我们从自然的进程出发，推测出某种智慧的原因从一开始就赋予并一直在维护着宇宙的秩序，我们就选择了一种既不确定也无用处的法则。之所以不确定，是因为它完全处于人类的经验之外；而之所以说它毫无用处，则是因为我们关于原因的知识完全源于自然进程之中，根据正确的推理方法，我们绝不可能又从原因出发，推导出新的结论，或者对我们共同的、有经验的自然作任意增加，确定任何新的行为举止的原则。

I observe (said I, finding he had finished his harangue) that you neglect not the artifice of the demagogues of old; and as you were

pleased to make me stand for the people, you insinuate yourself into my favour by embracing those principles, to which, you know, I have always expressed a particular attachment. But allowing you to make experience (as indeed I think you ought) the only standard of our judgement concerning this, and all other questions of fact; I doubt not but, from the very same experience, to which you appeal, it may be possible to refute this reasoning, which you have put into the mouth of Epicurus. If you saw, for instance, a half-finished building, surrounded with heaps of brick and stone and mortar, and all the instruments of masonry; could you not infer from the effect, that it was a work of design and contrivance? And could you not return again, from this inferred cause, to infer new additions to the effect, and conclude, that the building would soon be finished, and receive all the further improvements, which art could bestow upon it? If you saw upon the seashore the print of one human foot, you would conclude, that a man had passed that way, and that he had also left the traces of the other foot, though effaced by the rolling of the sands or inundation of the waters. Why then do you refuse to admit the same method of reasoning with regard to the order of nature? Consider the world and the present life only as an imperfect building, from which you can infer a superior intelligence; and arguing from that superior intelligence, which can leave nothing imperfect; why may you not infer a more finished scheme or plan, which will receive its completion in some distant point of space or time? Are not these methods of reasoning exactly similar? And under what pretence can you embrace the one, while you reject the other?

在发现我的朋友完成了他的长篇大论之后，我说，我注意到你善于运用古代演说家们的把戏。你先让我来代表雅典人民，然后你又表达了你知道我素来所捍卫的原则，因而逐渐赢得了我的欢心。但是，

纵然我承认你把经验作为我们在这一问题以及其他一切关于客观事实的问题上进行判断的唯一标准（事实上我也认为你应该这样做），我仍然相信，我们可以用你所求助的经验来反驳你借伊壁鸠鲁的口说出的这种推理。例如，你看见一栋建了一半的建筑，周围堆着砖块、石头、灰浆和泥水匠所用的各种工具，难道你不能由眼前的结果推测说，这是一项有设计、有计划的工程么？难道你不能从这个推测的原因再返回来，推测出眼前的结果会有所增加，即建筑很快会完成，并将得到建筑艺术所能给予的一切完善吗？如果你在海滨见到了人留下的一只脚印，你会推断出有人从那里走过，而且他一定也留下了另一只脚的脚印，尽管那个脚印已经被流沙和海水抹去了痕迹。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又拒绝在自然秩序中运用相似的推理方法呢？如果把世界和现在的人生当着一栋没有完成的建筑，我们就可以由此推断出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智慧。既然至高无上的智慧不可能留下任何不完美的事物，那么，你为什么不能从这一至高无上的智慧出发，推测出一种更加完整的设计和计划，可能将在更为遥远的时空得以完善呢？这两种推论方法不是很相似吗？你有什么理由要采用一种方法，却又排斥另一种方法呢？

The infinite difference of the subjects, replied he, is a sufficient foundation for this difference in my conclusions. In works of human art and contrivance, it is allowable to advance from the effect to the cause, and returning back from the cause, to form new inferences concerning the effect, and examine the alterations, which it has probably undergone, or may still undergo. But w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this method of reasoning? Plainly this, that man is a being, whom we know by experience, whose motives and designs we are acquainted with, and whose projects and inclinations have a certain connexion and coherence, according to the laws which nature has established for the government of such a creature. When, therefore, we find, that any work has proceeded from the skill and industry of man; as we are otherwise acquainted with the nature of

the animal, we can draw a hundred inferences concerning what may be expected from him; and these inferences will all be founded in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But did we know man only from the single work or production which we examine, it were impossible for us to argue in this manner; because our knowledge of all the qualities, which we ascribe to him, being in that case derived from the production, it is impossible they could point to anything farther, or be the foundation of any new inference. The print of a foot in the sand can only prove, when considered alone, that there was some figure adapted to it, by which it was produced; but the print of a human foot proves likewise, from our other experience, that there was probably another foot, which also left its impression, though effaced by time or other accidents. Here we mount from the effect to the cause; and descending again from the cause, infer alterations in the effect; but this is not a continuation of the same simple chain of reasoning. We comprehend in this case a hundred other experiences and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usual figure and members of that species of animal, without which this method of argument must be considered as fallacious and sophistical.

他回答说，由这里涉及的话题有无穷的差异，足以让我得出不同的结论。在人类艺术和设计作品中，可以从结果推测出原因，再从原因出发，推出关于结果的新的结论，并检查从中出现的变化，或者有可能还会出现的变化。这种推理方法的基础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是这样的：人是我们通过经验知晓的生物，我们熟悉其动机和目的，根据自然为管理这一生灵确立的法则，人的行为和性情倾向之间有一定联系，是前后连贯的。因此，当我们见到由人的技艺和勤劳得来的作品时，由于了解人这一生物的本性，我们可以对其可能的结果作上百种推测，而这些推测都是建立在过去的经验和观察之上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从我们所见的单个作品或产物中了解人，我们就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做进一步的推论，因为既然我们关于人的所有品质的知识都

来源于他的产物，这些品质就不可能再指向任何其他的事物，或者成为我们做出新的推测的基础。沙地上留下的一只脚印，孤立地看，只能证明它是由某个与之相符的形体产生的；但是如果是人留下的一只脚印，从我们的经验看，就同样证明或许还有另一只脚也留下了脚印，尽管时光或其他偶然的因素已经抹去了它的痕迹。这里我们由结果上升到原因，又从原因往下推，得出结果中可能出现的变化。但是这可不是一连串简单推理的继续。在这种情形下，它涉及我们对于人这一动物平常的形象和肢体的上百种经验和观察，没有这些经验和观察，这种推理方法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诡辩。

The case is not the same with our reasonings from the works of nature. The Deity is known to us only by his productions, and is a single being in the universe, not comprehended under any species or genus, from whose experienced attributes or qualities, we can, by analogy, infer any attribute or quality in him. As the universe shews wisdom and goodness, we infer wisdom and goodness. As it shews a particular degree of these perfections, we infer a particular degree of them, precisely adapted to the effect which we examine. But farther attributes or farther degrees of the same attributes, we can never be authorised to infer or suppose, by any rules of just reasoning. Now, without some such licence of supposition,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argue from the cause, or infer any alteration in the effect, beyond what has immediately fallen under our observation. Greater good produced by this Being must still prove a greater degree of goodness; a more impartial distribution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must proceed from a greater regard to justice and equity. Every supposed addition to the works of nature makes an addition to the attributes of the Author of nature; and consequently, being entirely unsupported by any reason or argument, can never be admitted but as mere conjecture and hypothesis [11_4] .

这个情形和我们针对自然中的事物的推理不一样。我们只能通过上帝的造物来认识他的特性，由于他是宇宙间唯一的存在，不能被纳入任何物种和类别中去理解，不然我们可以通过类比，从这些物种和类别的特性或品质中推测他所具有的属性或品质。宇宙呈现了智慧和善良，我们则推测上帝具有智慧和善良的属性。宇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这些完美属性，我们也就推测出与我们考察的结果完全相符的完美属性。至于其他的属性或更大程度的同一属性，我们没有任何权利运用正确的推理方法作出推断和假设。既然没有任意假设的权利，我们就不可能从原因出发进行论证，或者对结果作超越我们直接感知的改变。这一神圣的生灵产生的善行越大，那就证明他具备越大程度的善心，他的奖惩愈加公正合理，也就证明他愈加看重正义和公道。我们任意增加自然界作品的属性，就意味着我们同样增加了自然的创造者之属性。因此，如果没有得到理性和论证的支持，我们所增加的属性只能是凭空假设和凭空推测的结果 [12_4] 。

The great source of our mistake in this subject, and of the unbounded licence of conjecture, which we indulge, is, that we tacitly consider ourselves, as in the place of the Supreme Being, and conclude, that he will, on every occasion, observe the same conduct, which we ourselves, in his situation, would have embraced as reasonable and eligible. But, besides that the ordinary course of nature may convince us, that almost everything is regulated by principles and maxims very different from ours; besides this, I say, it must evidently appear contrary to all rules of analogy to reason, from the intentions and projects of men, to those of a Being so different, and so much superior. In human nature, there is a certain experienced coherence of designs and inclinations; so that when, from any fact, we have discovered one intention of any man, it may often be reasonable, from experience, to infer another, and draw a long chain of conclusions concerning his past or future conduct. But this method of reasoning can never have place with regard to a

Being, so remote and incomprehensible, who bears much less analogy to any other being in the universe than the sun to a waxen taper, and who discovers himself only by some faint traces or outlines, beyond which we have no authority to ascribe to him any attribute or perfection. What we imagine to be a superior perfection, may really be a defect. Or were it ever so much a perfection, the ascribing of it to the Supreme Being, where it appears not to have been really exerted, to the full, in his works, savours more of flattery and panegyric, than of just reasoning and sound philosophy. All the philosophy, therefore, in the world, and all the religion, which is nothing but a species of philosophy, will never be able to carry us beyond the usual course of experience, or give us measures of conduct and behaviour different from those which are furnished by reflections on common life. No new fact can ever be inferred from the religious hypothesis; no event foreseen or foretold; no reward or punishment expected or dreaded, beyond what is already known by practice and observation. So that my apology for Epicurus will still appear solid and satisfactory; nor have the political interests of society any connexion with the philosophical disputes concerning metaphysics and religion.

我们在这个话题上之所以会犯错误，会不受约束地恣意猜想，其根源在于我们默许自己具有至高无上的神灵的地位，并且断言，这一神灵在各种情况下都会遵照同样的行为原则，正如我们处在他的位置，也会认为这一原则乃是合理的、正确的选择。但是，日常的自然现象让我们相信，几乎各种事物所遵循的法则和原理都和我们所遵循的大不一样，除此之外，我要说的是，以人类的意向和计划为基础，推及与人类截然不同，并高于人类万分的神灵也有同样的意向和计划，这显然违背了一切类比推理的原则。从我们的经验看来，人性中存在设计规划和心向性情之间的连贯性，所以我们一旦从某个事情中发现某人的一种意图，依据经验我们往往可以合理地推测出他的另一

种意图，并且能对他过去和未来的行为得出一长串结论。但是，对于如此遥远、如此不可理解的神灵，这种推理方法就完全不适用。这样的神灵和宇宙中其他事物间的差异之大，胜于太阳和蜡烛之间的差异；他只留下了些许痕迹和踪影，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依据认为他还具备其他的属性或美德。我们想象的无上的美德说不定真的是一项缺陷。如果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德，但是如果我们在崇高的神灵尚未在其作品里充分显示这一美德的时候，就认定这是他所具有的美德，这与其说是正确的推理和健全的哲学判断，毋宁说是巴结谄媚和阿谀奉承之举。因此，世界上一切哲学和一切宗教（其实也只是一种哲学），都不能使我们超越寻常的经验，也不能为我们提供有别于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反思中得来的行为规范。除了我们从实践和观察所得之外，我们不能依据宗教假设来推测任何新的事实，也不能预见或预言任何别的事件，更不能期待获得某种额外的奖赏，或畏惧遭受某种额外的惩罚。我替伊壁鸠鲁所作的辩护似乎仍然是有理由的，是让人满意的；社会的政治利益和涉及形上学和宗教的哲学论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There is still one circumstance, replied I, which you seem to have overlooked. Though I should allow your premises, I must deny your conclusion. You conclude, that religious doctrines and reasonings can have no influence on life, because they ought to have no influence; never considering, that men reason not in the same manner you do, but draw many consequences from the belief of a divine Existence, and suppose that the Deity will inflict punishments on vice, and bestow rewards on virtue, beyond what appear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nature. Whether this reasoning of theirs be just or not, is no matter. Its influence on their life and conduct must still be the same. And those, who attempt to disabuse them of such prejudices, may, for aught I know, be good reasoners, but I cannot allow them to be good citizens and politicians; since they free men from one restraint upon their passions, and make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laws of society, in one respect, more easy and secure.

我对他说，你似乎还忽略了另一种情况。虽然我承认你的前提是合理的，但是我必须拒绝你得出的结论。你的结论是，宗教学说和推理方式对生活没有影响，因为它们本来就不该产生影响。可是你从来没有考虑到，人们不是用你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他们是从神圣存在的信念中推测出许多结果，认为至上的神灵会在日常的自然表象之外，对邪恶实施惩罚，对美德给予奖赏。他们的这种思考方式正确与否，其实并不重要。但是这对他们的生活和行为的影响必然还是一样的。有些人尽量让自己免于这类偏见，我认为他们是用正确的方式来思考的，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就是好的公民，或者好的政治家。因为他们让人们摆脱掉了激情的羁绊，在某一方面让他们更容易、更安全地干违法乱纪的事情。

After all, I may, perhaps, agree to your general conclusion in favour of liberty, though upon different premises from those, on which you endeavour to found it. I think, that the state ought to tolerate every principle of philosophy; nor is there an instance, that any government has suffered in its political interests by such indulgence. There is no enthusiasm among philosophers; their doctrines are not very alluring to the people; and no restraint can be put upon their reasonings, but what must be of dangerous consequence to the sciences, and even to the state, by paving the way for persecution and oppression in points, where the generality of mankind are more deeply interested and concerned.

我可能很赞同你拥护自由的总的结论，但是我赞同的依据和你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并不一样。我认为国家应该对每一种哲学原则持宽

容的态度，没有哪一个政府因为持这样的宽容态度而损害了它的政治利益。哲学家们不是热情高涨的人，他们的学说对于普通人并无太大的吸引力，我们不能限制他们的推理方式，除非他们的推理方式慢慢地在一般人十分关心的领域铺上残害和压迫的道路，从而对科学，甚或对国家造成危害。

But there occurs to me (continued I) with regard to your main topic, a difficulty, which I shall just propose to you without insisting on it; lest it lead into reasonings of too nice and delicate a nature. In a word, I much doubt whether it be possible for a cause to be known only by its effect (as you have all along supposed) or to be of so singular and particular a nature as to have no parallel and no similarity with any other cause or object, that has ever fallen under our observation. It is only when two species of objects are found to be constantly conjoined, that we can infer the one from the other; and were an effect presented, which was entirely singular, and could not be comprehended under any known species, I do not see, that we could form any conjecture or inference at all concerning its cause. If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and analogy be, indeed, the only guides which we can reasonably follow in inferences of this nature; both the effect and cause must bear a similarity and resemblance to other effects and causes, which we know, and which we have found, in many instances, to be conjoined with each other. I leave it to your own reflection to pursue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principle. I shall just observe, that, as the antagonists of Epicurus always suppose the universe, an effect quite singular and unparalleled, to be the proof of a Deity, a cause no less singular and unparalleled; your reasonings, upon that supposition, seem, at least, to merit our attention. There is, I own, some difficulty, how we can ever return from the cause to the effect, and, reasoning from our ideas of the former, infer any

alteration on the latter, or any, addition to it.

我接着说，你谈论的主题让我想到了一种困难。我现在只把这种困难向你提出来，不作深入探究，以免陷入过于细致精深的推理过程。一句话，我非常怀疑我们是否能只通过结果来认识一个原因，像你一直假设的，或者是否存在非常独特、十分特殊的原因，和我们见过的其他任何原因任何事物都不一样，没有相似之处。只有我们见到两种事物恒常地同时出现，我们才能从一事物推测出另一事物。假如某种结果是完全特殊的，不能在我们已知的事物中得到理解，我认为我们就无法对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做出任何猜想或推测。如果在进行这类推测时，我们所能合理遵循的惟一向导只有经验、观察和类比，那么结果和原因就一定得同我们已知的结果和原因之间存在相似性，因为我们从许多例证中发现这样的结果总是和这样的原因伴随在一块的。请你自己通过思考来追寻这个原则的结果。我只想指出，既然伊壁鸠鲁的反对者们总是假设宇宙这个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结果正好证明了神圣神灵这个同样独特、同样前所未有的原因的存在，从这个假设来看，你的推论至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承认，我们如何从原因回过来推出结果，如何能从原因的观念出发，推测出结果中的变化，或者增加结果的内容，这是有一定难度的。

[11_1].Luciani, [Greek: symp. ae Lapithai].

[11_2].Luciani, [Greek: eunouchos].

[11_3].Luciani and Dio.

[11_4].In general, it may, I think, be established as a maxim, that where any cause is known only by its particular effects, it must be impossible to infer any new effects from that cause; since the qualities, which are requisite to produce these new effects along with the former, must either be different, or superior, or of more extensive operation, than those which simply produced the effect, whence alone the cause is supposed to be known to us. We can never, therefore, have any reason to suppose the existence of these qualities. To say, that the new effects proceed only from a continuation of the same energy, which is already known from the first

effects, will not remove the difficulty. For even granting this to be the case (which can seldom be supposed), the very continuation and exertion of a like energy (for it is impossible it can be absolutely the same), I say, this exertion of a like energy, in a different period of space and time, is a very arbitrary supposition, and what there cannot possibly be any traces of it in the effects, from which all our knowledge of the cause is originally derived. Let the inferred cause be exactly proportioned (as it should be) to the known effect; and it is impossible that it can possess any qualities, from which new or different effects can be inferred.

[12_1].卢西恩：《对话集》和《拉比泰人》。

[12_2].卢西恩：《太监论》。

[12_3].卢西恩和戴奥。

[12_4].一般来说，我认为可以确立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任何原因，如果我们只能通过它所引起的具体结果来了解它，我们就不可能从该原因推断出任何新的结果，因为能够引起新旧结果同时出现的那些属性，相对于仅仅引起旧结果的原因的属性，即那些让我们得以认识该原因的属性，一定有所不同，或者更高一层，或者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因此，我们绝没有任何理由来设定有这些属性的存在。说新的结果来源于同样的能量的延续，是我们从先前的结果中已经认识的，并不能化解这个难题。即便承认情况的确如此（极少能这样认为），是相似的能量（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的延续和作用，我还是要说，相似的能量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发挥作用的情形实在是武断的推测，况且竟然在我们熟悉的结果中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而我们关于原因的知识最先正是从这些痕迹中得来的。所以，让我们推断出的原因完全和已知的结果相符，也应该相符，它不可能具有任何别的属性，可以让人推测出新的或者不同的结果。

Section XII　Of the Academical or Sceptical Philosophy

第十二章　论怀疑哲学

Part I

第一节

There is not a greater number of philosophical reasonings, displayed upon any subject, than those, which prove the existence of a Deity, and refute the fallacies of Atheists; and yet the most religious philosophers still dispute whether any man can be so blinded as to be a speculative atheist. How shall we reconcile these contradictions? The knights errant, who wandered about to clear the world of dragons and giants, never entertained the least doubt with regard to the existence of these monsters.

证明无上的神灵的存在，批驳无神论的谬误，围绕这些话题产生的哲学论争数量之多，胜于任何其他的题目。然而，即便是最富于宗教性的哲学家也还在争论，世上是否有人盲目至极，竟成为一个善于思辨的无神论者。我们如何能调和这其中的矛盾呢？四处巡游的骑士们一心要把世上的蛟龙和巨人消灭干净，他们对于这些妖魔的存在，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

The Sceptic is another enemy of religion, who naturally provokes the indignation of all divines and graver philosophers; though it is certain, that no man ever met with any such absurd creature, or conversed with a man, who had no opinion or principle concerning any subject, either of action or speculation. This begets

a very natural question; What is meant by a sceptic? And how far it is possible to push these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of doubt and uncertainty?

怀疑论者是宗教的另一个敌人，他自然而然地激起一切神学家和更严肃的哲学家的愤怒。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有关行动或思辨的话题上都没有自己的见解和原则，一定荒唐至极。不过可以确定地说，这样的人谁也没有见过，不曾与之交流过。这就让我们不禁要问：怀疑论者指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把怀疑论哲学原则向前推进到什么地步？

There is a species of scepticism, antecedent to all study and philosophy, which is much inculcated by Des Cartes and others, as a sovereign preservative against error and precipitate judgement. It recommends an universal doubt, not only of all our former opinions and principles, but also of our very faculties; of whose veracity, say they, we must assure ourselves, by a chain of reasoning, deduced from some original principle, which cannot possibly be fallacious or deceitful. But neither is there any such original principle, which has a prerogative above others, that are self-evident and convincing; or if there were, could we advance a step beyond it, but by the use of those very faculties, of which we are supposed to be already diffident. The Cartesian doubt, therefore, were it ever possible to be attained by any human creature (as it plainly is not) would be entirely incurable; and no reasoning could ever bring us to a state of assurance and conviction upon any subject.

有一种先于一切研究和哲学的怀疑主义，是笛卡尔和他人反复倡导的，认为它是防止人们犯错误和作出轻率判断的灵丹妙药。该怀疑

论提倡对事物采取普遍的怀疑态度，我们不仅要怀疑我们先前的一切意见和原则，还要怀疑我们自己的各种官能。他们说，我们必须根据一种没有任何错误、不带任何欺骗性的初始原则进行环环相扣的推论，才能保证我们的意见和原则是正确的，我们的官能是良好的。但是，世间根本没有这样一种高于其他原则的初始原则，既不言自明，又具说服力。即使真有这样的原则，我们要往前超越一步，也只能借助我们本该持怀疑态度的那些官能。因此，笛卡尔式的怀疑论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就算真的有人能达到，那也完全是不可救药的，因为没有任何推论可以让我们在任何话题上达到确信的状态。

It must, however, be confessed, that this species of scepticism, when more moderate, may be understood in a very reasonable sense, and is a necessary preparative to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by preserving a proper impartiality in our judgements, and weaning our mind from all those prejudices, which we may have imbibed from education or rash opinion. To begin with clear and self-evident principles, to advance by timorous and sure steps, to review frequently our conclusions, and examine accurately all their consequences; though by these means we shall make both a slow and a short progress in our systems; are the only methods, by which we can ever hope to reach truth, and attain a proper stability and certainty in our determinations.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适当地持有这一种怀疑论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哲学研究必要的准备，因为它让我们能够更加公正地判断是非，帮助我们摆脱我们从教育和草率的见解中得来的各种偏见。从清楚明白的原则出发，踏着谨慎而稳健的步履前行，不时检查我们的结论，仔细考察它们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虽然只能凭借这些方法推动我们的哲学研究缓慢前行，但是这却是我们希望达到真理，在我们的研究中寻求稳定和确定的结果的唯一方法。

There is another species of scepticism, consequent to science and enquiry, when men are supposed to have discovered, either the absolute fallaciousness of their mental faculties, or their unfitness to reach any fixed determination in all those curious subjects of speculation, about which they are commonly employed. Even our very senses are brought into dispute, by a certain species of philosophers; and the maxims of common life are subjected to the same doubt as the most profound principles or conclusions of metaphysics and theology. As these paradoxical tenets (if they may be called tenets) are to be met with in some philosophers, and the refutation of them in several, they naturally excite our curiosity, and make us enquire into the arguments, on which they may be founded.

还有一种怀疑主义是伴随科学和研究而来的，人们从科学和研究中要么发现他们的大脑官能是绝对错误的，要么发现他们的大脑官能在其寻常的思辩研究中不能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有一类哲学家甚至对我们的感官本身提出了怀疑，日常生活中的原则和形而上学及神学中最玄奥的原理或结论一样，都受到了同样的怀疑。因为有些哲学家宣扬这些似是而非的教条（如果称得上教条的话），而另一些哲学家却批驳这些教条，这就自然引起了我们的好奇，要去探究它们赖以建立的观点。

I need not insist upon the more trite topics, employed by the sceptics in all ages, against the evidence of sense; such as those which are derived from the imperfection and fallaciousness of our organs, on numberless occasions; the crooked appearance of an oar in water; the various aspects of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distances; the double images which arise from the pressing one eye;

with many other appearances of a like nature. These sceptical topics, indeed, are only sufficient to prove, that the senses alone are not implicitly to be depended on; but that we must correct their evidence by reason, and by considerations, derived from the nature of the medium, the distance of the object, and the disposition of the organ, in order to render them, within their sphere, the proper criteria of truth and falsehood. There are other more profound arguments against the senses, which admit not of so easy a solution.

各个时代的怀疑论者们使用过许多陈腐老套的话题来反驳感官的证据，诸如由我们的器官缺失和谬误在许多场合所引起的问题；例如桨在水中显得弯曲的样子；例如离我们远近不等的物体呈现的不同形状；又如挤压一只眼睛所产生的重影，以及许多类似的现象，等等。在此我无需对这些话题作深入探究。事实上，这些怀疑论话题仅仅能够证明，我们不能全靠感官来认识事物，而应当通过理性和思考来修正感官的证据，要考虑媒介的性质、物体的远近、器官的特性，使它们在各自的范围内成为辨别真伪的适当标准。当然，还有别的反对感官证据的论述，要深入得多，是不能这样简单对待的。

It seems evident, that men are carried, by a natural instinct or prepossession, to repose faith in their senses; and that, without any reasoning, or even almost before the use of reason, we always suppose an external universe, which depends not on our perception, but would exist, though we and every sensible creature were absent or annihilated. Even the animal creation are governed by a like opinion, and preserve this belief of external objects, in all their thoughts, designs, and actions.

似乎很明确的是，人类出于本能或先入之见，信任他们的感官；

我们往往无需任何推理，甚至无需动用理性，就能设定有一个外在的宇宙，其存在不依赖我们的知觉，纵然没有人类及一切有理智情感的生灵，或是我们和一切有理智情感的生灵都被消灭殆尽了，它依然会存在。就是动物界也受这种观点支配，在其思想、计划和行动中，都保持着这种对外界事物的信念。

It seems also evident, that, when men follow this blind and powerful instinct of nature, they always suppose the very images, presented by the senses, to be the external objects, and never entertain any suspicion, that the one are nothing but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ther. This very table, which we see white, and which we feel hard, is believed to exist, independent of our perception, and to be something external to our mind, which perceives it. Our presence bestows not being on it; our absence does not annihilate it. It preserves its existence uniform and entire, independent of the situation of intelligent beings, who perceive or contemplate it.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人类在追随这种盲目却强大的本能之时，总是认定感官显现的形象就是外界事物本身，从未怀疑一者只是另一者影像的再现而已。我们眼中的这张白色的桌子，摸上去很结实，我们认为它独立于我们的感官而存在，乃是我们心理之外的物体，我们不过是感知到它而已。桌子不因我们在场而存在，不因我们不在场而消失。其自身一致且完整地存在着，不因任何感知和思索其存在的智慧生灵的境况而改变。

But this universal and primary opinion of all men is soon destroyed by the slightest philosophy, which teaches us, that nothing can ever be present to the mind but an image or

perception, and that the senses are only the inlets, through which these images are conveyed, without being able to produce any immediate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mind and the object. The table, which we see, seems to diminish, as we remove farther from it; but the real table, which exists independent of us, suffers no alteration; it was, therefore, nothing but its image, which was present to the mind. These are the obvious dictates of reason; and no man, who reflects, ever doubted, that the existences, which we consider, when we say, this house and that tree, are nothing but perceptions in the mind, and fleeting copies or representations of other existences, which remain uniform and independent.

但是，人类这一普遍的基本信念很快就被最浅显的哲学摧毁了。哲学告诉我们，呈现到我们心中的不过是事物的印象或我们对于事物的知觉，我们的各种感官只是一些通道，事物的印象藉此传入，感官本身并不使我们的心灵和外界事物进行直接的交流。我们眼前的这张桌子，在我们往后退时，似乎就变小了。而真实的桌子不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可见呈现于我们心中的只是桌子的影像而已。这显然是理性在指引我们。任何人只要用心思考都不会怀疑，我们说“这间房子”、“那棵树”，所指的存在不过是心中的知觉，不过是别的独立存在的事物在我们心中留下的飘忽不定的摹本或影像。

So far, then, are we necessitated by reasoning to contradict or depart from the primary instincts of nature, and to embrace a new system with regard to the evidence of our senses. But here philosophy finds herself extremely embarrassed, when she would justify this new system, and obviate the cavils and objections of the sceptics. She can no longer plead the infallible and irresistible instinct of nature, for that led us to a quite different system, which

is acknowledged fallible and even erroneous. And to justify this pretended philosophical system, by a chain of clear and convincing argument, or even any appearance of argument, exceeds the power of all human capacity.

由此看来，我们有必要通过理性来反驳或抛弃自然的原始本能，来接纳一种关于感官证据的新的体系。但是，哲学如果要为这个新的体系正名，并排除怀疑论者的指责和反对，就会发现自己陷于十分窘迫的境地。哲学不能再为那种准确无误的、不可抗拒的自然本能申辩，因为那将把我们引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一个被认为是有缺陷的，甚而是错误的体系。然而，要借助一连串清楚有力的论证，或者貌似的论证，为这个所谓的哲学体系正名，又超出了人类的能力所限。

By what argument can it be proved, that the perceptions of the mind must be caused by external objects,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em, though resembling them (if that be possible) and could not arise either from the energy of the mind itself, or from the suggestion of some invisible and unknown spirit, or from some other causes still more unknown to us?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in fact, many of these perceptions arise not from anything external, as in dreams, madness, and other diseases. And nothing can be more inexplicable than the manner, in which body should so operate upon mind as ever to convey an image of itself to a substance, supposed of so different, and even contrary a nature.

我们凭借什么论证可以证明，心中的知觉一定是由外界事物引起，尽管它们和外界事物相似（如果可能的话），实际上却是和外界事物全然不同的呢？凭什么可以证明这些知觉既不能由心灵的力量自

发引起，也不能由某种无形的、不可知的精神暗示所产生，更不是由我们全然不知的缘由所导致的呢？我们承认，事实上这类知觉许多并不是由外界事物引起的，比如人们在做梦，处于疯狂状态或有其他疾病时。令人最难解释的是物体作用于心灵的方式，二者本是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事物，物体何以能将自身的影像传达给心灵呢？

It is a question of fact, whether the perceptions of the senses be produced by external objects, resembling them. How shall this question be determined? By experience surely; as all other questions of a like nature. But here experience is, and must be entirely silent. The mind has never anything present to it but the perceptions, and cannot possibly reach any experience of their connexion with objects. The supposition of such a connexion is, therefore, without any foundation in reasoning.

一个实际问题是，感官中的知觉是否是由与之相似的外界事物所引起的。这个问题该如何来解决呢？当然是借助经验，和其他性质类似的问题一样。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经验完全是沉默不语的，也必须是沉默不语的。呈现在我们心中的除了知觉，别无他物，我们的心灵不可能自己获得知觉与事物之间有联系的经验。因此，我们只是假设有这种联系，而这种推论实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To have recourse to the veracity of the supreme Being, in order to prove the veracity of our senses, is surely making a very unexpected circuit. If his veracity were at all concerned in this matter, our senses would be entirely infallible; because it is not possible that he can ever deceive. Not to mention, that, if the external world be once called in question, we shall be at a loss to find arguments, by which we may prove the existence of that Being

or any of his attributes.

借助无上神灵的真实确凿，来证明我们感官的真实确凿，显然是出乎意料地绕了一个圈。如果他的真实的确与此事有关，我们的感官就不会出现任何错误，因为他是不可能欺骗人的。更不用说，如果连外在的世界也受到怀疑，我们将不知道从哪里去寻找证据，来证明那个至高无上的神灵确实存在，或者证明他确实具有某些属性。

This is a topic, therefore, in which the profounder and more philosophical sceptics will always triumph, when they endeavour to introduce an universal doubt into all subjects of human knowledge and enquiry. Do you follow the instincts and propensities of nature, may they say, in assenting to the veracity of sense? But these lead you to believe that the very perception or sensible image is the external object. Do you disclaim this principle, in order to embrace a more rational opinion, that the perceptions are only representations of something external? You here depart from your natural propensities and more obvious sentiments; and yet are not able to satisfy your reason, which can never find any convincing argument from experience to prove, that the perceptions are connected with any external objects.

因此，在这个论题上，那些比较深刻的、更富哲学意识的怀疑论者总是会占上风，他们努力把普遍怀疑观引入人类知识和研究的各个领域。他们会问，你是按照自然的本能和天性来相信感官的真实吗？如果是这样，你会相信你的知觉或你所感知的影像就是外界事物本身。你会抛弃这个原则，接受另一个更合理的观点，认为各种知觉只不过外界事物在心中的一种表现吗？这样的话，你既背离了自己的自然天性和明显的情感，又无法满足你的理性，因为理性不能从经验中

找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知觉和外界事物之间是有联系的。

There is another sceptical topic of a like nature, derived from the most profound philosophy; which might merit our attention, were it requisite to dive so deep, in order to discover arguments and reasonings, which can so little serve to any serious purpose. It is universally allowed by modern enquirers, that all the sensible qualities of objects, such as hard, soft, hot, cold, white, black, &c. are merely secondary, and exist not in the objects themselves, but are perceptions of the mind, without any external archetype or model, which they represent. If this be allowed, with regard to secondary qualities, it must also follow, with regard to the supposed primary qualities of extension and solidity; nor can the latter be any more entitled to that denomination than the former. The idea of extension is entirely acquired from the senses of sight and feeling; and if all the qualities, perceived by the senses, be in the mind, not in the object, the same conclusion must reach the idea of extension, which is wholly dependent on the sensible ideas or the ideas of secondary qualities. Nothing can save us from this conclusion, but the asserting, that the ideas of those primary qualities are attained by Abstraction, an opinion, which, if we examine it accurately, we shall find to be unintelligible, and even absurd. An extension, that is neither tangible nor visible, cannot possibly be conceived; and a tangible or visible extension, which is neither hard nor soft, black nor white, is equally beyond the reach of human conception. Let any man try to conceive a triangle in general, which is neither Isosceles nor Scalenum, nor has any particular length or proportion of sides; and he will soon perceive the absurdity of all the scholastic notions with regard to abstraction and general ideas. [12_1]

还有一个类似的怀疑论话题，是从最玄奥的哲学衍生而来的。如果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以发现那些其实并无任何严肃用途的论证和推理，那么这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现代的研究者们普遍承认，事物可感知的一切属性，诸如物体的软硬、冷热、黑白等等，都是事物次要的属性，本身并不存在于事物之中，而是我们心里的知觉，不代表任何外在的原型或模式。如果我们承认事物的次要属性确实如此，那么，关于事物广延性和实在性的基本属性也不例外，况且后者并不比前者更有权利获得“基本属性”这个称谓。事物广延性的观念完全来自视觉和触觉，如果感官感知的一切属性都只在心中，而不在事物本身，那么这个结论必须同样适用于广延性的观念，因为它完全建立在我们感知的观念或事物次要属性的观念之上。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断言事物的基本属性是通过抽象推理得来的。只要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是荒谬的。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的广延性无法想象，看得见或摸得着的广延性，既不硬又不软，既非黑也非白，同样超出了人类想象的范围。让任何人来构想一个三角形，既不等腰又不等边，各边无确定的长度和比例，他立刻就会明白，就抽象思维和概括的思想而言，经院哲学的一切观念有多么荒谬。[13_1]

Thus the first philosophical objection to the evidence of sense or to the opinion of external existence consists in this, that such an opinion, if rested on natural instinct, is contrary to reason, and if referred to reason, is contrary to natural instinct, and at the same time carries no rational evidence with it, to convince an impartial enquirer. The second objection goes farther, and represents this opinion as contrary to reason; at least, if it be a principle of reason, that all sensible qualities are in the mind, not in the object. Bereave matter of all its intelligible qualities,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you in a manner annihilate it, and leave only a certain unknown, inexplicable something, as the cause of our perceptions; a notion so imperfect, that no sceptic will think it worth while to contend

against it.

因此，对于感官的证据，或对于外界事物存在的观点，从哲学的角度看，第一种反对意见就是：如果这个观点建立在自然本能上，它就违反了理性，如果涉及到理性，则又违背了人类的自然本能，并且没有任何合理的证据来说服公正的探究者。第二层反驳就更进一步，认为这个观点违背理性，至少可以说，如果它是理性的原则，那么我们感知的一切属性都只在心中，而不在事物本身。如果把事物的一切可认知的属性，包括基本属性和次要属性，都给剥夺了，你无异于把事物给消灭了，只留下一种无从认知、难以理喻的东西作为引起我们知觉的原因。这个观念漏洞百出，没有哪个怀疑论者会认为值得一驳。

Part II

第二节

It may seem a very extravagant attempt of the sceptics to destroy reason by argument and ratiocination; yet is this the grand scope of all their enquiries and disputes. They endeavour to find objections, both to our abstract reasonings, and to those which regard matter of fact and existence.

怀疑论者借助论证和推理来消灭理性，似乎显得很狂妄，然而这的确是他们研究和争论的宏大目标。他们试图寻找一些证据来反驳我们的抽象推理，以及我们关于客观事实和存在的推论。

The chief objection against all abstract reasonings is derived

from the ideas of space and time; ideas, which, in common life and to a careless view, are very clear and intelligible, but when they pass through the scrutiny of the profound sciences (and they are the chief object of these sciences) afford principles, which seem full of absurdity and contradiction. No priestly dogmas, invented on purpose to tame and subdue the rebellious reason of mankind, ever shocked common sense more than the doctrine of the infinite divisibility of extension, with its consequences; as they are pompously displayed by all geometricians and metaphysicians, with a kind of triumph and exultation. A real quantity, infinitely less than any finite quantity, containing quantities infinitely less than itself, and so on in infinitum; this is an edifice so bold and prodigious, that it is too weighty for any pretended demonstration to support, because it shocks the clearest and most natural principles of human reason [12_2] . But what renders the matter more extraordinary, is, that these seemingly absurd opinions are supported by a chain of reasoning, the clearest and most natural; nor is it possible for us to allow the premises without admitting the consequences. Nothing can be more convincing and satisfactory than all the conclusions concerning the properties of circles and triangles; and yet, when these are once received, how can we deny, that the angle of contact between a circle and its tangent is infinitely less than any rectilineal angle, that as you may increase the diameter of the circle in infinitum, this angle of contact becomes still less, even in infinitum, and that the angle of contact between other curves and their tangents may be infinitely less than those between any circle and its tangent, and so on, in infinitum?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se principles seems as unexceptionable as that which proves the three angles of a triangle to be equal to two right ones, though the latter opinion be natural and easy, and the former big with contradiction and absurdity. Reason here seems to be thrown into a kind of amazement and suspence, which, without

the suggestions of any sceptic, gives her a diffidence of herself, and of the ground on which she treads. She sees a full light, which illuminates certain places; but that light borders upon the most profound darkness. And between these she is so dazzled and confounded, that she scarcely can pronounce with certainty and assurance concerning any one object.

反对一切抽象推理的主要理由来自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中，乍一看，这些观念是非常明白清楚的，但是在深奥科学（它们正是这些科学的主要对象）的研究之下，它们为我们提供的却是一些充满了荒谬和矛盾的原则。人们为驯服和压制人类的反叛理性提出过许多震撼常识的宗教信条，然而最震撼常识的，莫过于事物广延性的无限分割说，及其各种结果。所有几何学家和玄学家都堂而皇之、得意忘形地展示过这个学说。一个真实的数量，永远小于任何特定的量，同时又包含比自身小的无限数量，可以无限往下推。这栋庞大的建筑实在太张扬，太怪异，没有哪种演示方法可以承受它的重量，因为它震撼了人类理性最明白最自然的原则。 [13_2] 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似乎荒谬的观点却是建立在一连串最清楚、最自然的推论之上的。而且，我们只要承认了前提，就不可能不承认其结论。最具说服力、最令人满意的莫过于涉及圆形和三角形属性的结论。但是我们一旦接受了这些结论，我们就无法否认，圆和切线间的接触角无限小于任何直线角；随着圆的直径无限增大，这个接触角就无限缩小；其他曲线和其切线间的接触角无限小于圆形和其切线间的接触角，如此等等，可以无限往下推。这些原则可以演示得无懈可击，就像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一样。不同的是，后面这个观点很自然，很容易证明，而前者则矛盾重重、荒谬至极。在这里理性似乎被抛入一种惊诧和犹疑中，如果没有怀疑论者的指引，理性就会怀疑自己，怀疑她所行走的土地。它看见一片绚丽的光芒照亮了某些地方，但是亮光却和最幽深的黑暗交接在一起。理性身处光明和黑暗之间，既感到晕眩，又感到迷惑，对任何事物都没有确定和实在的把握。

The absurdity of these bold determinations of the abstract sciences seems to become, if possible, still more palpable with regard to time than extension. An infinite number of real parts of time, passing in succession, and exhausted one after another, appears so evident a contradiction, that no man, one should think, whose judgement is not corrupted, instead of being improved, by the sciences, would ever be able to admit of it.

抽象科学中这些狂妄结论的荒谬之处，在时间上比在广延性方面可能显得更为突出。时间被分为无数真实的组成部分，前后相连，逐一消逝耗尽，分明矛盾至极。我们认为，任何人只要其判断没有被这些科学所毁损（更不用说得到改善），都不会接受这样的观点。

Yet still reason must remain restless, and unquiet, even with regard to that scepticism, to which she is driven by these seeming absurd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How any clear, distinct idea can contain circumstances, contradictory to itself, or to any other clear, distinct idea, is absolutely incomprehensible; and is, perhaps, as absurd as any proposition, which can be formed. So that nothing can be more sceptical, or more full of doubt and hesitation, than this scepticism itself, which arises from some of the paradoxical conclusions of geometry or the science of quantity. [12_3]

然而，理性仍然躁动不安，即便被这些看似荒谬和矛盾的事物驱赶到怀疑主义的边缘，也是如此。一个清楚明白的观念包含同其自身相矛盾，或与另一个清楚明白的观念相矛盾的东西，这简直无法理解，其荒谬程度已经达到了我们想象的极限。可见，最具怀疑色彩、最令人犹疑不定的莫过于从几何学或数量科学似是而非的结论中衍生

而来的怀疑主义本身。[13_3]

The sceptical objections to moral evidence, or to the reasonings concerning matter of fact, are either popular or philosophical. The popular objections are derived from the natural weaknes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the contradictory opinions, which have been entertained in different ages and nations; the variations of our judgement in sickness and health, youth and old age, prosperity and adversity; the perpetual contradiction of each particular man's opinions and sentiments; with many other topics of that kind. It is needless to insist farther on this head. These objections are but weak. For as, in common life, we reason every moment concerning fact and existence, and cannot possibly subsist, without continually employing this species of argument, any popular objections, derived from thence, must be insufficient to destroy that evidence. The great subverter of Pyrrhonism or the excessive principles of scepticismis action, and employment, and the occupations of common life. These principles may flourish and triumph in the schools; where it is, indeed,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refute them. But as soon as they leave the shade, an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real objects, which actuate our passions and sentiments, are put in opposition to the more powerful principles of our nature, they vanish like smoke, and leave the most determined sceptic in the same condition as other mortals.

针对道德证据，或针对事实本身的推论，有两种怀疑主义的反对意见：一为通俗层面的，一为哲学层面的。通俗层面的反对意见来自如下各种因素：人类理解中固有的弱点；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所持有的相互矛盾的观点；人在健康状态和生病状态、青年时期和老年时期、顺境和逆境中等不同情形下所具备判断能力的变化；每个个体

观念和情感中永远存在的矛盾，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里无需一一列举。这些反驳都没有说服力。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刻都在进行与事实和存在相关的推理，而实际上离开了这类持续存在的推理，我们就无法生存下去。但是，从中衍生出来的通俗的反对意见却不足以消灭关于事实的证据。皮浪主义学说或过分的怀疑主义原则的伟大颠覆者，乃是行动，是事务，是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消遣。这些原则可以在经院中得以兴盛，因为要在经院中要批驳这些原则虽说不是不可能，但也是很困难的。可是一旦离开了庇护它们的树荫，在触动我们激情和感觉的真实事物面前，它们就会和我们天性中更强有力的原则对立起来，并会立刻烟消云散，使得最坚定的怀疑论者也会陷入同其他凡夫俗子一样的境地。

The sceptic, therefore, had better keep within his proper sphere, and display those philosophical objections, which arise from more profound researches. Here he seems to have ample matter of triumph; while he justly insists, that all our evidence for any matter of fact, which lies beyond the testimony of sense or memory, is derived entirely from the 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that we have no other idea of this relation than that of two objects, which have been frequently conjoined together; that we have no argument to convince us, that objects, which have, in our experience, been frequently conjoined, will likewise, in other instances, be conjoined in the same manner; and that nothing leads us to this inference but custom or a certain instinct of our nature; which it is indeed difficult to resist, but which, like other instincts, may be fallacious and deceitful. While the sceptic insists upon these topics, he shows his force, or rather, indeed, his own and our weakness; and seems, for the time at least, to destroy all assurance and conviction. These arguments might be displayed at greater length, if any durable good or benefit to society could ever be expected to result from them.

由此看来，怀疑论者最好把自己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并从更加深入的研究中提出富有哲学性的反对意见。这样他似乎会有充分的胜算，因为他合理地坚持如下观点：我们关于任何客观事实的证据——存在于感官和记忆之外——完全来自因果关系；但是我们除了对两种经常结伴出现的事物有所了解之外，对于因果关系并更多的了解；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服自己这样一种事实：在我们过去的经验中恒常结伴出现的事物，在其他场合也会以同样的方式结伴出现；致使我们得出这个推论的不过是习惯和某种自然的本能，我们很难拒绝这种本能，但是它像其他本能一样，可能是错误和带有欺骗性的。假如怀疑论者紧紧围绕这些话题展开论证，就能展示他的说服力，或者确切地说，是他的不足之处，也是我们的弱点所在。这一论证，恍惚一看，至少暂时消灭了一切的确证和信念。这些论证若是真的可以为社会带来经久的好处和利益，我们不妨可以充分地展开。

For here is the chief and most confounding objection to excessive scepticism, that no durable good can ever result from it; while it remains in its full force and vigour. We need only ask such a sceptic: What his meaning is? And what he proposes by all these curious researches? He is immediately at a loss, and knows not what to answer. A Copernican or Ptolemaic, who supports each his different system of astronomy, may hope to produce a conviction, which will remain constant and durable, with his audience. A Stoic or Epicurean displays principles, which may not be durable, but which have an effect on conduct and behaviour. But a Pyrrhonian cannot expect, that his philosophy will have any constant influence on the mind; or if it had, that its influence would be beneficial to society. On the contrary, he must acknowledge, if he will acknowledge anything, that all human life must perish, were his principles universally and steadily to prevail. All discourse, all action would immediately cease; and men remain in a total lethargy, till the necessities of nature, unsatisfied, put an end to

their miserable existence. It is true; so fatal an event is very little to be dreaded. Nature is always too strong for principle. And though a Pyrrhonian may throw himself or others into a momentary amazement and confusion by his profound reasonings; the first and most trivial event in life will put to flight all his doubts and scruples, and leave him the same, in every point of action and speculation, with the philosophers of every other sect, or with those who never concerned themselves in any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When he awakes from his dream, he will be the first to join in the laugh against himself, and to confess, that all his objections are mere amusement, and can have no other tendency than to show the whimsical condition of mankind, who must act and reason and believe; though they are not able, by their most diligent enquiry, to satisfy themselves concern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se operations, or to remove the objections, which may be raised against them.

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对过分的怀疑主义最重要、最猛烈的反驳，那就是，尽管这种怀疑主义显得强大而且充满活力，但是它不能为社会带来经久的利益。我们只需要问一问这样的怀疑论者：他所传达的意义何在？他想通过这些好奇的研究提出什么观点？他立刻就会不知所措，无言以对。哥白尼的追随者或信奉托勒密学说的人，都各自捍卫自己所支持的天文学原理，可能希望提出某种能让自己的读者和听众始终如一确信的东西。一个斯多葛学派学者或伊壁鸠鲁学派的信徒提出的原则或许并不持久，但却能影响人们的行为举止。但是，一个皮浪主义怀疑论者却不能指望他的哲学能对人心产生任何持续性的影响，或者即便有影响，他也不能指望这一影响会有益于社会。相反，如果他有什么要承认的，他就必须承认，他的原则若是得以恒久、普遍地盛行，一切人类生活都会消失殆尽。所有的话语、所有的行动都会立刻终止，人们会完全处于昏聩的状态，直至自然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从而彻底结束他们痛苦的生存。诚然，我们无须恐惧会出现这样可怕的事情。自然总是很强大，不是什么原则可以左右的。尽

管皮浪主义怀疑论者可以通过玄奥的推论把自己或他人置于短暂的诧异和纷乱之中，但是生活中最基本、最琐碎的现实会驱散他的一切疑虑和顾忌，让他和其他派别的哲学家们一样行动和思考，甚至和那些从未进行哲学研究的人们没有任何区别。怀疑论者一旦从自己的睡梦中醒来，一定会是第一个嘲笑自己的人，并且会承认他所有的反驳不过是搞笑而已，除了展示人类怪诞的生存状态，别无其他目的。人类虽然不能靠自己最勤勉的探索找到令自己满意的行动、思考和信仰的基础，也不能消除别人针对他们提出的各种反对的观点，但是他们依然要行动、要思考、要有自己的信念。

Part III

第三节

There is, indeed, a more mitigated scepticism or academical philosophy, which may be both durable and useful, and which may, in part, be the result of this Pyrrhonism, or excessive scepticism, when its undistinguished doubts are, in some measure, corrected by common sense and reflection. The greater part of mankind are naturally apt to be affirmative and dogmatical in their opinions; and while they see objects only on one side, and have no idea of any counterpoising argument, they throw themselves precipitately into the principles, to which they are inclined; nor have they any indulgence for those who entertain opposite sentiments. To hesitate or balance perplexes their understanding, checks their passion, and suspends their action. They are, therefore, impatient till they escape from a state, which to them is so uneasy; and they think, that they could never remove themselves far enough from it, by the violence of their affirmations and obstinacy of their belief. But could such dogmaticalreasoners become sensible of the strange infirmitie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even in its most perfect state, and when most

accurate and cautious in its determinations; such a reflection would naturally inspire them with more modesty and reserve, and diminish their fond opinion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prejudice against antagonists. The illiterate may reflect on the disposition of the learned, who, amidst all the advantages of study and reflection, are commonly still diffident in their determinations; and if any of the learned be inclined, from their natural temper, to haughtiness and obstinacy, a small tincture of Pyrrhonism might abate their pride, by showing them, that the few advantages, which they may have attained over their fellows, are but inconsiderable, if compared with the universal perplexity and confusion, which is inherent in human nature. In general, there is a degree of doubt, and caution, and modesty, which, in all kinds of scrutiny and decision, ought for ever to accompany a just reasoner.

事实上，有一种更为温和的怀疑主义或学院派哲学，既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有实际用处。这可以说是皮浪主义或“过度”的怀疑主义的产物，不过其普遍怀疑观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常识和反思的矫正。大部分人都会武断和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往往看到了事物的一面，并不了解相反的看法，就会匆忙地投身于自己所偏爱的原则，而且对持相反意见的人没有一点宽容。他们是不能犹豫不决、迟疑不断的，这样会让他们感到茫然不解，会束缚他们的情感，阻止他们的行动。因此，他们急不可耐地要逃脱这种让他们感到不自在的状态，而且他们认为，他们要借助强烈的肯定和执着的信念，离这种状态越远越好。但是，倘若这些教条的推理者能够意识到，即使在最完美的状态下，即使在其得出最精确、最谨慎的结论的时候，人类的理解也是非常脆弱的，那么这种反省自然会让他们更谦逊、更矜持，让他们少一些孤芳自赏，少一些对其对手的偏见。目不识丁的人要思考博学之士的性情，博学之士们虽然从研究和思索中受益颇多，在作结论时却也常常犹豫不定，疑虑重重。另一方面，如有博学的人天性高傲固执，那么适当了解一些皮浪主义则能减少他们的傲慢，因为皮浪

主义怀疑精神可以让他们明白，他们与别人相比所占的那点点优势，和人性中固有的、广泛的迷惑和纷乱之感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总之，一个合理的推理者在进行一切考察和决断之时，都应该具备一定程度的怀疑、谨慎和谦恭的态度。

Another species of mitigated scepticism which may be of advantage to mankind, and which may be the natural result of the Pyrrhonian doubts and scruples, is the limitation of our enquiries to such subjects as are best adapted to the narrow capacity of human understanding. The imagination of man is naturally sublime, delighted with whatever is remote and extraordinary, and running, without control, into the most distant parts of space and time in order to avoid the objects, which custom has rendered too familiar to it. A correct Judgement observes a contrary method, and avoiding all distant and high enquiries, confines itself to common life, and to such subjects as fall under daily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leaving the more sublime topics to the embellishment of poets and orators, or to the arts of priests and politicians. To bring us to so salutary a determination, nothing can be more serviceable, than to be once thoroughly convinced of the force of the Pyrrhonian doubt, and of the impossibility, that anything, but the strong power of natural instinct, could free us from it. Those who have a propensity to philosophy, will still continue their researches; because they reflect, that, besides the immediate pleasure, attending such an occupation, philosophical decisions are nothing but the reflections of common life, methodized and corrected. But they will never be tempted to go beyond common life, so long as they consider the imperfection of those faculties which they employ, their narrow reach, and their inaccurate operations. While we cannot give a satisfactory reason, why we believe, after a thousand experiments, that a stone will fall, or fire burn; can we ever satisfy ourselves

concerning any determination, which we may form, with regard to the origin of worlds, and the situation of nature, from, and to eternity?

另外一种温和的怀疑主义或许有益于人类，同样可能是皮浪主义的犹疑和顾虑的自然产物。这种怀疑主义认为，我们应该限制研究的话题，只选择最适合人类理解相对有限的能力的那些领域。人的想象自然是高远的，人们乐于想象一切悠远奇特的事物，他们的想象会无拘无束地遨游到遥远的时空，以逃避因为习惯而天天接触，因而显得平淡无奇的事物。正确的判断恰恰需要遵循相反的方法，要避免一切好高骛远的探索，把研究的范围限于日常生活中，选择属于我们日常实践和经验范围内的话题。至于更为高远的论题，就让诗人和演说家去装点，或留给祭司和政治家们去施展才艺。要得出这样有益的结论，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完全相信皮浪主义怀疑论的力量，并且相信，除了自然固来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让我们摆脱这种怀疑的影响。喜欢进行哲学思考的人们仍然会继续从事他们的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除了那些直接从哲学研究中得来的快乐，哲学的结论不过是对日常生活所作的系统化的、正确的反省。但是，只要他们意识到自己所运用的官能并不完善，其范围的有限性，其实际作用的不精确性，他们就不会受到诱导，要选择超越日常生活之外的话题来研究。既然我们拿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由，来解释我们为什么在经过上千次实验以后，就相信石头总要往下落，火总会燃烧，那么在关于世界的起源和自然在永恒中的状态这些高深的论题上，我们还能得出让自己满意的结论吗？

This narrow limitation, indeed, of our enquiries, is, in every respect, so reasonable, that it suffices to make the slightest examination into the natural powers of the human mind and to compare them with their objects, in order to recommend it to us. We shall then find what are the proper subjects of science and

enquiry.

从各方面来看，我们对研究话题的限制都如此合理，以至于只要我们对人的心智的自然能力稍加考察，并把这些能力和与之相应的事物进行对比，就会明白这一点。因此，我们接下来将会探索哪些是适合科学和研究的话题。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only objects of the abstract science or of demonstration are quantity and number, and that all attempts to extend this more perfect species of knowledge beyond these bounds are mere sophistry and illusion. As the component parts of quantity and number are entirely similar, their relations become intricate and involved; and nothing can be more curious, as well as useful, than to trace, by a variety of mediums, their equality or inequality, through their different appearances. But as all other ideas are clearly distinct and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we can never advance farther, by our utmost scrutiny, than to observe this diversity, and, by an obvious reflection, pronounce one thing not to be another. Or if there be any difficulty in these decisions, it proceeds entirely from the undeterminate meaning of words, which is corrected by juster definitions. That the square of the hypothenuse is equal to the squares of the other two sides, cannot be known, let the terms be ever so exactly defined, without a train of reasoning and enquiry. But to convince us of this proposition, that where there is no property, there can be no injustice, it is only necessary to define the terms, and explain injustice to be a violation of property. This proposition is, indeed, nothing but a more imperfect definition. It is the same case with all those pretended syllogisticalreasonings, which may be found in every other branch of learning, except the sciences of quantity and number; and these may safely, I think, be

pronounced the only proper objects of knowledge and demonstration.

我认为，抽象科学或演算科学的惟一对象是量和数，一切要把这类更完备的知识扩充到量和数的界限之外的企图都不过是诡辩和幻想。由于量和数的组成部分完全相似，各组成部分间的关系显得错综复杂。因而，最有意思也最有用的莫过于借用各种手段，通过它们呈现出来的不同外表，来确定它们到底是相同还是相异。但是，其他的观念都是清晰可辨且各不相同的，即使我们凭借多么深入细致的研究，也只能观察到各自的差异，并通过明白的反省来指出此物非彼物，仅此而已。如果我们在做出这些判断时面临困难，那都是由于词义的不确定性引起的，可以通过更准确的定义来对此进行纠正。拿“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余两边平方之和”这一定理来说，即使其中涉及的术语都有精确的定义，如果不通过一连串推理和演算，我们也不能理解该定理。但是，要让我们接受“没有财产，就没有不义之行为”这个命题，我们只须明确定义这些名词，并解释不义之行为就是对他人财产的侵犯。其实这个命题也不过是一种较不完全的定义。除了数量科学以外，各种科学中那些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我可以断言，只有关于数和量的科学才配称得上是知识和演算的适当对象。

All other enquiries of men regard only matter of fact and existence; and these are evidently incapable of demonstration. Whatever *is* may *not be* . No negation of a fact can involve a contradiction. The non-existence of any being, without exception, is as clear and distinct an idea as its existence. The proposition, which affirms it not to be, however false, is no less conceivable and intelligible, than that which affirms it to be. The case is different with the sciences, properly so called. Every proposition, which is not true, is there confused and unintelligible. That the cube root of

64 is equal to the half of 10, is a false proposition, and can never be distinctly conceived. But that Caesar, or the angel Gabriel, or any being never existed, may be a false proposition, but still is perfectly conceivable, and implies no contradiction.

人类所进行的其他一切研究只涉及事实问题和存在，这些显然是无法验证的。任何“存在 ”也可以“不存在 ”。否定一个事实不会引发矛盾。任何事物之“不存在”都毫无例外地和其“存在”一样，都是清楚明白的观念。断言其“不存在”的命题，无论多么荒谬，肯定也和其“存在”的命题一样，是我们可以想象和理解的。而若涉及真正的科学，情况就不一样了。在真正的科学里，任何不真实的命题都会令人困惑并莫名其妙。比如“64的立方根等于10的一半”就是错误的命题，这一点我们永远无法清晰地理解。但是，如果我们说凯撒或天使加百列，或其他任何人物，不曾存在过，这也许是错误的命题，但这却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并不暗含什么矛盾之处。

The existence, therefore, of any being can only be proved by arguments from its cause or its effect; and these arguments are founded entirely on experience. If we reason *a priori* , anything may appear able to produce anything. The falling of a pebble may, for aught we know, extinguish the sun; or the wish of a man control the planets in their orbits. It is only experience, which teaches us the nature and bounds of cause and effect, and enables us to infer the existence of one object from that of another [12_4] . Such is the foundation of moral reasoning, which forms the greater part of human knowledge, and is the source of all human action and behaviour.

因此，任何事物的存在，只能由其原因或其结果来加以证明，而

这些论证是完全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如果进行先觉的推理，任何事物似乎都能产生任何别的事物。比如，一个石子落下可能会消灭太阳；人的意愿可以控制住在轨道上运转的行星。只有经验才能教会我们认识因果关系的本质和适用范围，使我们具备从一种事物的存在推断出另一事物的存在的能力。 [13_4] 这便是进行道德推理的基础，它构成了人类的大部分知识，是一切人类行为的源泉。

Moral reasonings are either concerning particular or general facts. All deliberations in life regard the former; as also all disquisitions in history, chronology, geography, and astronomy.

道德推理所依据的，要么是具体的事实，要么是普遍的事实。关于人生的思考都涉及具体事实；历史学、年代学、地理学和天文学的一切研究也是一样的。

The sciences, which treat of general facts, are politics, natural philosophy, physic, chemistry, &c. where the qualities, causes and effects of a whole species of objects are enquired into.

以普遍的事实为对象的科学包括政治学、自然哲学、物理学、化学等等，在这些领域中，人们研究的是一切事物的性质和因果关系。

Divinity or Theology, as it proves the existence of a Deity, and the immortality of souls, is composed partly of reasonings concerning particular, partly concerning general facts. It has a foundation in reason, so far as it is supported by experience. But its best and most solid foundation is faith and divine revelation.

神学或神性，都旨在证明神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其推理论证既涉及具体事实，也关乎普遍的事实。在其可以用经验证明的范围内，神学有一定的理性基础。但是，神学最佳和最坚实的基础是建立在信仰和神圣启示之上的。

Morals and criticism are not so properly objects of the understanding as of taste and sentiment. Beauty, whether moral or natural, is felt, more properly than perceived. Or if we reason concerning it, and endeavour to fix its standard, we regard a new fact, to wit, the general tastes of mankind, or some such fact, which may be the object of reasoning and enquiry.

与其说道德和批评是人类理解的适当对象，毋宁说是它们人类趣味和情感的表达。美，无论是道德的美还是自然的美，更多地是被人所感觉，而不是为人所认知。我们若要针对美作相关推论，并努力确定美的标准，那么我们所考虑的就是一种新的事实，即人类一般的趣味，或者说是一种可供我们推论和研究的这类事实。

When we run over libraries, persuaded of these principles, what havoc must we make? If we take in our hand any volume; of divinity or school metaphysics, for instance; let us ask: Does it contain any abstract reasoning concerning quantity or number? No. Does it contain any experimental reasoning concerning matter of fact and existence? No. Commit it then to the flames, for it can contain nothing but sophistry and illusion.

假如我们相信了这些原则，那么在翻查各个图书馆的藏书时，我

们该销毁什么样的图书呢？如果随手拿起一本书，比如与神学或经院哲学相关的图书，我们可以这样发问：这本书涉及数和量方面的抽象推论吗？没有。它涉及任何针对事实和存在的推论吗？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付之一炬，因为它所讲的不过都是些诡辩和幻想。

[12_1].This argument is drawn from Dr. Berkeley; and indeed most of the writings of that very ingenious author form the best lessons of scepticism, which are to be found either among the ancient or modern philosophers, Bayle not excepted. He professes, however, in his title-page (and undoubtedly with great truth) to have composed his book against the sceptics as well as against the atheists and free-thinkers. But that all his arguments, though otherwise intended, are, in reality, merely sceptical, appears from this, that they admit of no answer and produce no conviction. Their only effect is to cause that momentary amazement and irresolution and confusion, which is the result of scepticism.

[12_2].Whatever disputes there may be about the mathematical points, we must allow that there are physical points; that is, parts of extension, which cannot be divided or lessened, either by the eye or imagination. These images, then, which are present to the fancy or senses, are absolutely indivisible, and consequently must be allowed by mathematicians to be infinitely less than any real part of extension; and yet nothing appears more certain to reason, than that an infinite number of them composes an infinite extension. How much more an infinite number of those infinitely small parts of extension, which are still supposed infinitely divisible.

[12_3].It seems to be not impossible to avoid these absurd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if it be admitted,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bstract or general ideas, properly speaking; but that all general ideas are, in reality, particular ones, attached to a general term, which recalls, upon occasion, other particular ones, that resemble,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 idea, present to the mind. Thus when the term Horse is pronounced, we immediately figure to ourselves the idea of a black or a white animal, of a particular size or figure. But as that term is also usually applied to animals of other colours, figures and sizes, these ideas, though not actually present to the imagination, are easily recalled; and our reasoning and conclusion proceed in the same way, as if they were actually present. If this be admitted (as seems reasonable) it follows that all the ideas of quantity, upon which mathematicians reason, are nothing but particular, and such as are suggested by the senses and imagination, and consequently, cannot be infinitely divisible. It is sufficient to have dropped this hint at present, without prosecuting it any farther. It certainly concerns all lovers of science not to expose themselves to the ridicule and

contempt of the ignorant by their conclusions; and this seems the readiest solution of these difficulties.

[12_4].That impious maxim of the ancient philosophy, *Ex nihilo*, *nihil fit*, by which the creation of matter was excluded, ceases to be a maxim, according to this philosophy. Not only the will of the supreme Being may create matter; but, for aught, we know *a priori*, the will of any other being might create it, or any other cause, that the most whimsical imagination can assign.

[13_1].这个论证来自柏克莱博士。事实上，这位杰出的作家大部分作品算得上是古今哲学家阐述怀疑论的最佳教材，甚至连培尔的作品也赶不上他的。然而，他在其书的扉页上诚恳地说，他写此书是为了反驳怀疑主义者，以及无神主义者和自由思想者。尽管用意别有所在，他的全部论证实际上是怀疑主义的，既不容有任何答案，也不把人引向任何定论，其唯一作用是引起读者短暂的诧异、犹疑和纷乱的感觉，这正是怀疑主义的效果。

[13_2].就数学点而言，不论有什么争议，我们必须承认有物理点的存在，即广延性中无法被视觉或想象再分割、再减少的部分。这些呈现在我们想象或感官中的影像是绝对不能再分割的，数学家必须承认，它们无限小于任何真实的广延性部分。然而，在理性看来，最确定的不过是无限数量的物理点构成事物无限的广延性。那些无限小的广延性部分，仍然被认为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其无限的数量该有多大啊！

[13_3].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承认，不存在类似于抽象和概括性的观念这类的事物，这似乎不免看起来有些荒唐和矛盾。不过所有概括性的观念实际上都是具体的观念，只是用了概括性的名称来表达而已。这个名称在具体场合能唤起和心中的观念相似的其他具体观念。所以，我们一听到“马”这个名称，立刻就会想到一只黑色或者白色，有一定大小和形状的动物。但是由于该名称指的也是其他颜色、大小和形状不等的马匹，尽管这些观念没有实际呈现在我们的想象里，却是很容易被唤起的。我们会按照它们实际在场的方式进行推理和下结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似乎也是合理的），那么数学家们用以推理的所有关于数量的观念也只能是具体的观念，就像呈现在感官和想象中的那样，因而也不可能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关于这一点，说到这里就可以了，无须进一步深究。对所有爱好科学的人而言，不要因为自己的结论而招致无知者的嘲弄和鄙视，这似乎是化解这些困难最便捷的办法。

[13_4].古代哲学中有一条亵渎的箴言说到：无中不能生有。这一哲学箴言将物质创造说排除在外，那么它就不再是准则了。不只至高无上的神灵可以凭借意志创造出事物，按照我们先觉的推论，任何其他“存在”都可以照意志创造事物，甚至可以说，我们最离奇的想象所能幻想出的任何原因都能创造出事物来。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论

Jean-Jacques Rousseau
让－雅克·卢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社会契约论

The Social Contract

让-雅克·卢梭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BOOK I 第一卷
- BOOK II 第二卷
- BOOK III 第三卷
- BOOK IV 第四卷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BOOK I

第一卷

I mean to inquire if, in the civil order, there can be any sure and legitimate rule of administration, men being taken as they are and laws as they might be. In this inquiry I shall endeavour always to unite what right sanctions with what is prescribed by interest, in order that justice and utility may in no case be divided.

我写作本文意在探讨：从人类本身的实际情况着眼，结合法律的可能性，在公民社会秩序中是否存在某种合法又确切的政权准则。在探讨中，我会尽力将权利所许可的和利益所要求的结合起来，以使公正和利益两者并存。

I enter upon my task without prov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subject. I shall be asked if I am a princeor a legislator, to write on politics. I answer that I am neither, and that is why I do so. If I were a prince or a legislator, I should not waste time in saying what wants doing; I should do it, or hold my peace.

在尚未证明我论题的重要性之前，我已经开始了我的研究。有人也许会问我："你如此热衷于对政治问题的论述，你是一位君主或立法者吗？"我会回答："我不是。"但这正是我做这件事的原因。如果我是君主或立法者，我将不会把这么多时间浪费在讨论上，我所做的，会是采取行动或保持沉默。

As I was born a citizen of a free State, and a member of the Sovereign, I feel that, however feeble the influence my voice can have on public affairs, the right of voting on them makes it my duty to study them: and I am happy, when I reflect upon governments, to find my inquiries always furnish me with new reasons for loving that of my own country.

生为一个自由国度中的公民和这个政权下的一员，我明白我的声音对公共事务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但我既然拥有投票权，我就应该承担起这一项微小权利赋予我的责任。我感到欣慰的是，每当我对政府进行思索，我总会从其中找到新的理由，使我更加热爱我们的国家。

Chapter 1 Subject of the First Book

第一章　本卷要旨

Man is born free, and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 One thinks himself the master of others, and still remains a greater slave than they. How did this change come about? I do not know. What can make it legitimate? That question I think I can answer.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又无时不处在枷锁之中。人类向来认为自己是万物的主宰，但事实上，他们比其他任何事物所受的奴役都要多。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我无法解释。我所能解释的是，这种情况是如何被合法化的。

If I took into account only force, and the effects derived from it,

I should say: “As long as a peopleis compelled to obey, and obeys, it does well; as soon as it can shake off the yoke, and shakes it off, it does still better; for, regaining its liberty by the same right as took it away, either it is justified in resuming it, or there was no justification for those who took it away”. But the social order is a sacred right which is the basis of all other rights. Nevertheless, this right does not come from nature, and must therefore be founded on conventions. Before coming to that, I have to prove what I have just asserted.

如果只是考虑强力和由强力施加的影响，我会说：“如果人民被强迫去服从，并且服从了，这样做很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这种桎梏，并且摆脱了这种桎梏，这样做更对。因为，人民如果依据当初夺走自己自由的方式来重新夺回自己的自由，那么他们就有权利重新获得这种自由。如果说这种方式不正当，那只能说当初夺走人民自由的方式也不正当。”社会秩序就拥有这样一种神圣的权利，这种权利为其他权利提供了存在的依据。然而，这项神圣权利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建立在约定的基础之上，弄清这些约定是什么就是问题所在，但在探讨该问题之前，我必须首先论证我上述提到的观点。

Chapter 2 The First Societies

第二章　论原始社会

The most ancient of all societies, and the only one that is natural, is the family: and even so the children remain attached to the father only so long as they need him for their preservation. As soon as this need ceases, the natural bond is dissolved. The children, released from the obedience they owed to the father, and the father, released from the care he owed his children, return

equally to independence. If they remain united, they continue so no longer naturally, but voluntarily; and the family itself is then maintained only by convention.

在一切社会形态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形态便是家庭。然而在这种关系中，只有在孩子需要父亲养育时，才会依附于父亲，一旦这种需要停止，其中的天然依附关系便结束了。孩子从缘于依附关系而产生的顺从关系中解脱出来，而父亲也从对孩子的养育负担中解脱出来，这时，两者都平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之后，如果他们还想继续保持原来的关系，那也只是出于双方的自愿，而不是自然形成的。这时的家庭就只靠约定来维持了。

This common liberty results from the nature of man. His first law is to provide for his own preservation, his first cares are those which he owes to himself; and, as soon as he reaches years of discretion, he is the sole judge of the proper means of preserving himself, and consequently becomes his own master.

可见，这种人类所共有的自由，乃是人类自然天性发展的结果。人性的首要法则就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就是要关注与其自身生存有关的事物。一旦一个人成长到具有理性的年龄，且能够独自判断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他就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The family then may be called the first model of political societies: the ruler corresponds to the father, and the people to the children; and all, being born free and equal, alienate their liberty only for their own advantage. The whole difference is that, in the family, the love of the father for his children repays him for the

care he takes of them, while, in the State, the pleasure of commanding takes the place of the love which the chief cannot have for the peoples under him.

如此，我们可以把家庭比作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社会的首领相当于父亲，社会中的人民相当于孩子；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只有当寻求自己利益时才会牺牲自己的自由。家庭和政治社会唯一的不同是：家庭中的父亲是为了爱才竭力去抚养自己的儿女；而在政治社会中，位高权重的首领当然不会对臣民有这种爱，取而代之的是执政的乐趣。

Grotius denies that all human power is established in favour of the governed, and quotes slavery as an example. His usual method of reasoning is constantly to establish right by fact. [1_1]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employ a more logical method, but none could be more favourable to tyrants.

格劳秀斯否认所有的人类政权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才建立的。为此，他举了奴隶制作为例子，他一贯的推理方式是把已有的现实作为判定权利的根据。 [2_1] 我们完全可以采用一种更合乎逻辑，而非更有利于专制君主的方式。

It is then, according to Grotius, doubtful whether the human race belongs to a hundred men, or that hundred men to the human race: and, throughout his book, he seems to incline to the former alternative, which is also the view of Hobbes. On this showing, the human species is divided into so many herds of cattle, each with its ruler who keeps guard over them for the purpose of devouring

them.

根据格劳秀斯的说法，究竟是全人类属于某一百个人，还是这某一百个人属于全人类，这点尚属疑问；而在他的著作中，似乎是更倾向于第一种观点，这也正是霍布斯的看法。依据他们的这种观点，人类似乎可被分成一群群的牛羊，每一群都有自己的主人，而这些主人保护它们的目的正是为了吃掉它们。

As a shepherd is of a nature superior to that of his flock, the shepherds of men, i.e., their rulers, are of a nature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peoples under them. Thus, Philo tells us, the Emperor Caligula reasoned, concluding equally well either that kings were gods, or that men were beasts.

正如牧羊人相比自己的羊群拥有更优越的地位，人群的放牧者，也就是人类的统领，相比自己的人民也自然拥有更优越的地位。根据菲洛的记载，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就是据此推理的，他得出如下结论：要么君主都是神灵，要么人民都是牧畜。

The reasoning of Caligula agrees with that of Hobbes and Grotius. Aristotle, before any of them, had said that men are by no means equal naturally, but that some are born for slavery, and others for dominion.

这位罗马皇帝的推论恰恰同霍布斯和格劳秀斯的推论不谋而合，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早在他们之前说过，人并不是生来平等的，一些人生而为奴隶，而另一些人却天生是统治者。

Aristotle was right; but he took the effect for the cause. Nothing can be more certain than that every man born in slavery is born for slavery. Slaves lose everything in their chains, even the desire of escaping from them: they love their servitude, as the comrades of Ulysses loved their brutish condition. [1_2] If, then, there are slaves by nature, it is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slaves against nature. Force made the first slaves, and their cowardice perpetuated the condition.

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说法是对的，但他却错将结果当成原因。出生于奴隶制下的人们，自然是生来做奴隶的，这毫无疑问。束缚在枷锁中的奴隶们失去了一切，甚至失去了摆脱枷锁获取自由的愿望；他们甚至变得喜爱自己的奴隶状态，正如尤利西斯的同伴们喜爱自己所处的卑劣环境一样 [2_2] 。然而，如果真的存在什么天然奴隶，那只能说是因为先出现了违背自然状态的奴隶制度。是强力创造了最初的奴隶，而懦弱使他们永远地成为了奴隶。

I have said nothing of King Adam, or Emperor Noah, father of the three great monarchs who shared out the universe, like the children of Saturn, whom some scholars have recognised in them. I trust to getting due thanks for my moderation; for, being a direct descendant of one of these princes, perhaps of the eldest branch, how do I know that a verification of titles might not leave me the legitimate king of the human race? In any case,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Adam was sovereign of the world, as Robinson Crusoe was of his island, as long as he was its only inhabitant; and this empire had the advantage that the monarch, safe on his throne, had no rebellions, wars, or conspirators to fear.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提到亚当王或挪亚皇帝，也就是那划分世界的三大君王的父亲，许多人甚至认为他们堪与萨杜恩的儿子做比较。作为这几位君主之一的直系后裔，很有可能还是其中最正宗的支派，那么，我希望我亲爱的读者们应该对我的谦逊心存感激。因为考究起族谱来，何以知道我就不会是全人类合法的国王呢？亚当是全世界最正当的国王，这点毫无疑问，这就如同鲁滨逊是他飘流到的那个荒岛上的唯一公民，他便是岛上的国王一样。这样的帝国有个极大的优势，就是君主完全可以安享王位，而不必担心叛乱、战争或篡位。

Chapter 3 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

第三章　论最强者的权利

The strongest is never strong enough to be always the master, unless he transforms strength into right, and obedience into duty. Hence 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 which, though to all seeming meant ironically, is really laid down a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But are we never to have an explanation of this phrase? Force is a physical power, and I fail to see what moral effect it can have. To yield to force is an act of necessity, not of will—at the most, an act of prudence. In what sense can it be a duty?

即使是最强大的人也不可能强大到永远奴役他人，除非他将强力转化为自己的权利，而将服从转化为别人的义务。由此“最强者的权利”便产生了，尽管这听起来颇具讽刺意味，实际上却已被确立为一项原则了。那么，我们是否还应该再重新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呢？强力是一种物理性的力量，我看不出在它身上能产生什么道德。向强力低头，有时只是一种必要的做法，并非出于自愿，这顶多算是一种明智的行为而已。那么，在何种意义上，它能变成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呢？

Suppose for a moment that this so-called “right” exists. I maintain that the sole result is a mass of inexplicable nonsense. For, if force creates right, the effect changes with the cause: every force that is greater than the first succeeds to its right. As soon as it is possible to disobey with impunity, disobedience is legitimate; and, the strongest being always in the right,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to act so as to become the strongest. But what kind of right is that which perishes when force fails? If we must obey perforce, there is no need to obey because we ought; and if we are not forced to obey, we are under no obligation to do so. Clearly, the word “right” adds nothing to force: in this connection, it means absolutely nothing.

好吧，我们姑且假设这种所谓“最强者的权利”存在吧，但我认为这种假设的结果只能产生一系列无法自圆其说的胡言乱语。因为一旦强力转化成权利，结果就会随原因改变，于是，当另一种强力战胜原来的强力时，这种新的强力就可以接替原来旧的强力所拥有的权利。如果人们的反叛行为得不到惩罚，那他的这种行为就成为合法的了。既然最强者永远正确，那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成为最强者了。然而上述那种随着更强力的出现而消失的权利，又算什么权利呢？如果人们是因为强力才服从的，那就不存在根据义务而服从的说法了；如果施加在人们身上的强力停止了，那人们将没有其他服从的理由。可见，“权利”一词同强力并无关联，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纯属浪费时间。

Obey the powers that be. If this means yield to force, it is a good precept, but superfluous: I can answer for its never being violated. All power comes from God, I admit, but so does all sickness: does that mean that we are forbidden to call in the doctor? A brigand surprises me at the edge of a wood: must I not merely surrender my purse on compulsion; but, even if I could withhold it,

am I in conscience bound to give it up? For certainly the pistol he holds is also a power.

“你应该服从权力。”如果将这句话解释为“你应该屈服于强力”，毫无疑问这条命令是合理的，但它很多余；因为“向强力屈服”这条规则不会被人违背。比如：一切权力都来自于上帝，这点我承认；可世间一切疾病也来自于上帝，难道说就应该禁止人们去求医问药了吗？如果我在森林里遭遇强盗，他用强力威胁我把钱包交出，假如我能采用一种方式把钱包藏起来，难道我的良心还会迫使我把钱包交出来吗？因为按上面的说法，强盗手中的枪也是一种“权力”啊。

Let us then admit that force does not create right, and that we are obliged to obey only legitimate powers. In that case, my original question recurs.

话说到此，我们已经很明确地看到，强力根本不能形成权利，只有合法的权力才能使人们履行服从的义务。这样一来，我们又被带回了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上。

Chapter 4 Slavery

第四章　论奴隶制度

Since no man has a natural authority over his fellow, and force creates no right, we must conclude that conventions form the basis of all legitimate authority among men.

既然任何人都不拥有凌驾于他人的天然权力，而且强力也不会产生任何权利，那么人类的合法权威就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了。

If an individual, says Grotius, can alienate his liberty and make himself the slave of a master, why could not a whole people do the same and make itself subject to a king? There are, in this passage, plenty of ambiguous words which would need explaining; but let us confine ourselves to the word *alienate*. To alienate is to give or to sell. Now, a man who becomes the slave of another does not give himself; he sells himself, at the least for his subsistence: but for what does a people sell itself? A king is so far from furnishing his subjects with their subsistence that he gets his own only from them; and, according to Rabelais, kings do not live on nothing. Do subjects then give their persons on condition that the king takes their goods also? I fail to see what they have left to preserve.

格劳秀斯说："如果一个人可以转让自己的自由，成为另一个人的奴隶，那全体人民为什么不能转让自己的自由，成为国王的臣民？"在这段话中，尚存在一些不明确的字眼需要解释；我们就先拿"转让"一词来进行一下细致分析。通常，转让包括赠送或出售两个含义。如果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奴隶，这绝不会是赠送，而是为了生存权而出售了自己。但如果全体人民都把自己出售给国王，又能换回什么作为报偿呢？这个国王不但不会供养他的臣民，还会从臣民那里取得供养。何况，按拉伯雷的说法，国王所需的供养可不是那么一点点就能满足的。难道说臣民在将自身财产双手奉上的条件下，又献出自己的自由吗？那么我可看不出人民自己剩下什么可以保留。

It will be said that the despot assures his subjects civil tranquillity. Granted; but what do they gain, if the wars his

ambition brings down upon them, his insatiable avidity, and the vexations conduct of his ministers press harder on them than their own dissensions would have done? What do they gain, if the very tranquillity they enjoy is one of their miseries? Tranquillity is found also in dungeons; but is that enough to make them desirable places to live in? The Greeks imprisoned in the cave of the Cyclops lived there very tranquilly, while they were awaiting their turn to be devoured.

或许有人说，专制君王会保证他治下臣民的安全。就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吧，但如果这个专制君王同时是个野心家，与国外战争不断，或者贪欲使他无休止地盘剥百姓，导致民不聊生，那这种后果岂不是比人民之间的争斗严重数倍？那国内的安宁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人们要想获得国内和平必须以经历上述磨难为代价，人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住在牢狱里倒是很安全，就能说牢狱是一种很美好的选择吗？被囚禁在西克洛浦巨人族洞穴里的希腊人生活也很安稳，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一个个轮流被吞噬的命运。

To say that a man gives himself gratuitously, is to say what is absurd and inconceivable; such an act is null and illegitimate from the mere fact that he who does it is out of his mind. To say the same of a whole people is to suppose a people of madmen; and madness creates no right.

如果说一个人愿意把自己奉送给别人而不求任何回报，这听起来很荒谬而且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种行为既不合常理，也没有任何意义，任何心智健全的正常人都不会这样做。倘若将这个道理推及一个国家，如果整个国家的人都这样做，那岂不成了疯子的国度？疯狂显然不能带来合理的权利。

Even if each man could alienate himself, he could not alienate his children: they are born men and free; their liberty belongs to them, and no one but they has the right to dispose of it. Before they come to years of discretion, the father can, in their name, lay down conditions for their preservation and well-being, but he cannot give them irrevocably and without conditions: such a gift is contrary to the ends of nature, and exceeds the rights of paternity. It would therefore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legitimise an arbitrary government, that in every generation the people should be in a position to accept or reject it; but, were this so,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no longer arbitrary.

就算一个人可以无偿奉送自己，但他却不能无偿奉送他的孩子。孩子生来就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属于自己，除了自己，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这种自由。当然，在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前，他们的父亲是可以为他们确立一些原则的，但这只是为了孩子能够更好地生存和成长，并且要站在孩子的立场上；父亲绝不能无条件地剥夺孩子的自由，因为这是违反自然的，也是在滥用父亲的职权。因此，一个独裁的政府想要取得合法的统治权，就必须使每一代国民自由地选择承认它还是反对它，这样才能合法。当然了，如果是这样，它就不能被称为独裁政府了。

To renounce liberty is to renounce being a man, to surrender the rights of humanity and even its duties. For him who renounces everything no indemnity is possible. Such a renunci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man's nature; to remove all liberty from his will is to remove all morality from his acts. Finally, it is an empty and contradictory convention that sets up, on the one side, absolute authority, and on the other, unlimited obedience. Is it not clear that

we can be under no obligation to a person from whom we have the right to exact everything? Does not this condition alone, in the absence of equivalence or exchange, in itself involve the nullity of the act? For what right can my slave have against me when all that he has belongs to me, and, his right being mine, this right of mine against myself is a phrase devoid of meaning?

放弃自由就等于放弃人性、放弃了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同时也放弃了自己的义务。一个放弃一切的人，是无法得到任何补偿的。而事实上，这种放弃与人的本性相违背，因为倘若剥夺了一个人的意志自由，就相当于剥夺了这个人行为的道德性。总之，任何一个条约，如果将缔约的双方规定为一方绝对统治另一方而另一方绝对服从，那这个条约是不合逻辑的，也是无效的。这个条约不就相当于说一个人拥有不必对任何事情承担责任的权利吗？这种没有互惠条款、而只有单方面履行责任的约定，不就很明白地显示了它的无效性吗？比如说，我的奴隶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那他的权利就是我的权利，既然如此，他又凭借什么来反对我呢？如果说这是我拥有的一种反对我自己的权利，那听上去岂不是很滑稽？

Grotius and the rest find in war another origin for the so-called right of slavery. The victor having, as they hold, the right of killing the vanquished, the latter can buy back his life at the price of his liberty; and this convention is more legitimate, because it is to the advantage of both parties.

格劳秀斯和另外一些人声称从战争中找到了这种奴役权利的另一个源头。他们认为，既然战胜的一方拥有杀死俘虏的权利，那战败的一方便以放弃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生命。看起来，这种约定似乎要合理得多，因为它对双方都有利。

But it is clear that this supposed right to kill the conquered is by no means deducible from the state of war. Men, from the mere fact that, while they are living in their primitive independence, they have no mutual relations stable enough to constitute either the state of peace or the state of war, cannot be naturally enemies. War is constituted by a relation between things, and not between persons; as the state of war cannot arise out of simple personal relations, but only out of real relations, private war, or war of man with man, can exist neither in the state of nature where there is no constant property, nor in the social state where everything is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laws.

但是，战胜者可以杀死战败者的所谓权利并非战争状态带来的结果。当人类生存在原始的独立时期，他们之间的交往并不确定，不足以形成一种稳定的和平状态或战争状态。因此，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天生的仇敌关系。引发战争的，是物质拥有权的争夺，而不是单纯人与人之间的争吵。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引起战争的，战争只能源于物的拥有关系。那种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战争，不可能存在于没有固定财产权的自然状态中，也不可能存在于法律监督之下的社会状态中。

Individual combats, duels and encounters, are acts which cannot constitute a state, while the private wars, authorised by the Establishments of Louis IX, King of France, and suspended by the Peace of God, are abuses of feudalism, in itself an absurd system if ever there was one, and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right and to all good polity.

单个人之间的争斗、搏斗或冲突并不能构成任何一种战争状态。至于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所颁布的允许个人之间可以存在战争的敕令，后来也被“上帝的和平”运动禁止了。那条敕令只不过是对封建政府对职权的滥用。如果曾经存在这样一种制度，也是非理性的，是与自然权利以及一切合理政体相违背的。

War then is a relation, not between man and man, but between State and State, and individuals are enemies only accidentally, not as men, nor even as citizens,[1] but as soldiers; not as members of their country, but as its defenders. Finally, each State can have for enemies only other States, but not men; for between things disparate in nature, there can be no real relation.

那么，战争就不是人与人的对抗关系，而是国家之间的对抗。在战争中，人与人之间仅仅是因为偶然才成为敌人，因为他们并不是以个人的身份，甚至也不是以公民身份[1]，而是以士兵的身份加入。他们不是作为国家的成员，而是作为国家的捍卫者参与战争。总而言之，一个国家的敌人只能是另一个国家，而不是某些人，因为内在本质不相同的事物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关系。

1: The Romans, who understood and respected the right of war more than any other nation on earth, carried their scruples on this head so far that a citizen was not allowed to serve as a volunteer without engaging himself expressly against the enemy, and against such and such an enemy by name. A legion in which the younger Cato was seeing his first service under Popilius having been

reconstructed, the elder Cato wrote to Popilius that, if he wished his son to continue serving under him, he must administer to him a new military oath, because, the first having been annulled, he was no longer able to bear arms against the enemy. The same Cato wrote to his son telling him to take great care not to go into battle before taking this new oath. I know that the siege of Clusium and other isolated events can be quoted against me; but I am citing laws and customs. The Romans are the people that least often transgressed its laws; and no other people has had such good ones.

1: 罗马人在对战争权利的理解和尊重上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强，他们对这个问题非常慎重，以至于如果一个公民没有明确表示他要反抗敌人或指名道姓反抗哪个敌人之前，他是不被允许自发参与战斗的。小卡图曾在波比里乌斯的军队里参加战斗，当波比里乌斯的军队改编后，老卡图给他写信说如果仍希望自己的儿子留在军中效力，就必须要重新进行一次战争宣誓，理由是第一次所做出的誓言已经无效，儿子不能再扛枪杀敌了。老卡图还写信给小卡图，警告他没有再次宣誓就不能参战。我知道有人会以克鲁修姆之围或罗马历史上的其他例子来反驳我，但是我所引用的是法律和惯例。罗马人比其他任何民族更遵纪守法，也没有哪个民族曾有过罗马人如此完善的法律。

Furthermore, this principle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established rules of all times and the constant practice of all civilised peoples. Declarations of war are intimations less to powers than to their subjects. The foreigner, whether king, individual, or people, who robs, kills or detains the subjects, without declaring war on the prince, is not an enemy, but a brigand. Even in real war, a just prince, while laying hands, in the enemy's country, on all that belongs to the public, respects the lives and goods of individuals: he respects rights on which his own are founded. The object of the war bein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ostile State, the other side has a right to kill its defenders, while they are bearing arms; but as soon as they lay them down and surrender, they cease to be enemies or instruments of the enemy, and become once more merely men, whose life no one has any right to take. Sometimes, it is possible to kill the State without killing a single one of its members; and war gives no right which is not necessary to the gaining of its object. These principles are not those of Grotius: they are not based on the authority of poets, but derived from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based on reason.

上述原则符合自古以来所有时代的准则，也符合每个文明国家的惯常做法。宣战当然可以说是对臣民发出的警告，但更主要是对那个国家政权的警告。假如外来势力——不管是国王，个人，抑或整个民族——对另一国家的臣民进行抢劫、杀害或拘禁，而没有首先向该国宣战，那他就不能被称作敌人，而只能算是强盗。即使在战争发生的过程中，一个正义的君主掠夺敌国领土上的所有财产，他却能尊重该国臣民的人身权与财产权，也尊重自己的权利所依据的那种权利。既然战争目的是征服敌对国，士兵们绝对有权利杀死这个国家拿着武器的守卫者，但一旦这些守卫者放下武器投降，他们就不再是敌人或敌方的工具，而又恢复普通人的身份，任何人都不再有权利杀死他们。有时会发生不伤害对方一兵一卒而能摧毁一个国家的情况。战争绝对

不容许存在取得胜利所必需权利之外的任何权利。这些原则不是格劳秀斯独创的，也不是以诗人的权威为基础的，而是来源于事物的本质，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The right of conquest has no foundation other than 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 If war does not give the conqueror the right to massacre the conquered peoples, the right to enslave them cannot be based upon a right which does not exist. No one has a right to kill an enemy except when he cannot make him a slave, and the right to enslave him cannot, therefore, be derived from the right to kill him. It is accordingly an unfair exchange to make him buy at the price of his liberty his life, over which the victor holds no right. Is it not clear that there is a vicious circle in founding the right of life and death on the right of slavery, and the right of slavery on the right of life and death?

至于征服者的权利，唯一的依据就是最强者的法则。假如战争并没有赋予征服者屠杀被征服者的权力，那么征服者奴役被征服者的权利也并不成立。只有在无法将敌人变成奴隶的情况下，人们才可以把他的敌人杀死，所以奴役他人的权利并不能从杀死他人的权利中产生。由此，前面所说的被征服者用他们的自由来赎买自己的生存权原本就是一场不公平的交易，因为征服者并不拥有对被征服者生命的合法支配权。根据奴役权来确立生死权，根据生死权来确立奴役权，这岂不是很明显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Even if we assume this terrible right to kill everybody, I maintain that a slave made in war, or a conquered people, is under no obligation to a master, except to obey him as far as he is compelled to do so. By taking an equivalent for his life, the victor

has not done him a favour; instead of killing him without profit, he has killed him usefully. So far then is he from acquiring over him any authority in addition to that of force, that the state of war continues to subsist between them: their mutual relation is the effect of it, and the usage of the right of war does not imply a treaty of peace. A convention has indeed been made; but this convention, so far from destroying the state of war, presupposes its continuance.

即使我们假设真的存在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利，那我还是认为，战争中形成的奴隶或被征服的人民对他们的征服者除了被迫服从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义务。征服者已经拿走了与被征服者生命等价的东西，所以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已无任何恩惠可言；与其杀死被征服者落个一无所得的结果，还不如剥削他们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利益。因此，除了最强者的权力之外，征服者对被征服者来说不再具有其他更多的权威。这样一来，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战争将持续进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战争的结果。而战争权的行使则是假设根本不存在任何和平条约。即使真的签署这样一个协定，也不能终止战争状态，而只能是预示着战争的继续。

So, from whatever aspect we regard the question, the right of slavery is null and void, not only as being illegitimate, but also because it is absurd and meaningless. The words *slave* and *right* contradict each other, and are mutually exclusive. It will always be equally foolish for a man to say to a man or to a people: “I make with you a convention wholly at your expense and wholly to my advantage; I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 like, and you will keep it as long as I like.”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奴隶的权利都是无效的，

这不仅因为它没有任何合理的根据，也因为它本身就是荒谬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奴隶制”与“权利”两个词是相互矛盾的，它们相互排斥。无论是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一个人相对于一群人，下列的说法都毫无意义：我和你在此立约，此条约要牺牲你的权利并且只对我个人有利，我是否遵守此约都完全听凭我个人意愿，但无论你愿意与否，你都必须遵守此约。

Chapter 5 That We Must Always Go back to a First Convention

第五章　论必须追溯最初的契约

Even if I granted all that I have been refuting, the friends of despotism would be no better off. There will always be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subduing a multitude and ruling a society. Even if scattered individuals were successively enslaved by one man, however numerous they might be, I still see no more than a master and his slaves, and certainly not a people and its ruler; I see what may be termed an aggregation, but not an association; there is as yet neither public good nor body politic. The man in question, even if he has enslaved half the world, is still only an individual; his interest, apart from that of others, is still a purely private interest. If this same man comes to die, his empire, after him, remains scattered and without unity, as an oak falls and dissolves into a heap of ashes when the fire has consumed it.

即使我对我上述反驳的所有观点都予以妥协，专制主义的拥护者们也不会取得进步。毕竟，征服一大批人和统治一个社会，两者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如果某个人不断地奴役分散的他人，那么不管受他奴役的人数量变得多么庞大，这个人与被奴役者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我丝毫看不出其中存在领袖与人民的关系。这些众

人只是一群积聚在一起的人，并非一个彼此相关的联合体，因为它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价值观念，它也不是一个政治团体。这个人即使把半个世界的人都奴役了，他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利益永远都是私利，同被奴役者的利益完全相反。当这个人死后，他所奴役的这个帝国会因为缺乏内在的联系而土崩瓦解，就像一棵遭遇大火的橡树，最后只剩下一堆灰烬。

A people, says Grotius, can give itself to a king. Then, according to Grotius, a people is a people before it gives itself. The gift is itself a civil act, and implies public deliberation. It would be better, before examining the act, by which a people gives itself to a king, to examine that by which it has become a people; for this act, being necessarily prior to the other, is the true foundation of society.

格劳秀斯说过：人民可以将自己奉送给一位君主。根据格劳秀斯的观点，人民在将自己奉送出去之前首先是“人民”，“人民”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约定，它的出现意味着公共意志的存在。所以，我们在探讨上述国王产生的过程之前，非常有必要先研究一下人民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后者必定是早于前者产生，这才是社会的真正基础所在。

Indeed, if there were no prior convention, where, unless the election were unanimous, would be the obligation on the minority to submit to the choice of the majority? How have a hundred men who wish for a master the right to vote on behalf of ten who do not? The law of majority voting is itself something established by convention, and presupposes unanimity, on one occasion at least.

确实，如果没有事先的契约，除非各位选举者的意愿都一致，否则，是否还会存在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决策的义务？可以设想，如果有一百个人拥戴某位主人，而有十个人表示不同意，那为何这一百个人就可以代表这十个人投票呢？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制本身就是一种契约，这表明在选举进行之前就已经存在过至少一次全体一致同意的意见。

Chapter 6 The Social Compact

第六章　论社会契约

Isuppose men to have reached the point at which the obstacles in the way of their preservatio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show their power of resistance to be greater than the resources at the disposal of each individual for his maintenance in that state. That primitive condition can then subsist no longer; and the human race would perish unless it changed its manner of existence.

我假设人类曾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状况：在自然状态下，威胁人类生存的障碍阻力过于强大，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维持生存的自我保护能力。在这种原始情况下，如果人类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改变当前的生活方式，否则人类将要遭遇灭顶之灾。

But, as men cannot engender new forces, but only unite and direct existing ones, they have no othermeans of preserving themselves than the formation, by aggregation, of a sum of forces great enough to overcome the resistance. These they have to bring into play by means of a single motive power, and cause to act in concert.

然而，人类是不能创造新的力量的，只能组合和利用现有的力量。那么人类为了保存自己别无他法，只能把他们分散在个体的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强大到足以抵抗任何阻力的力量，并且利用一个唯一的动机调动它，从而使它能够协调一致地行动。

This sum of forces can arise only where several persons come together: but, as the force and liberty of each man are the chief instruments of his self-preservation, how can he pledge them without harming his own interests, and neglecting the care he owes to himself? This difficulty, in its bearing on my present subject, may be stated in the following terms:

这种合力只有通过联合分散的个体才能产生，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人的力量和自由是他维持自己生存的首要条件，那么，他的力量和自由在与别人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中，如何才使自己不处于危险中，同时又不至于忽视自己应得的关照呢？这一难题引出了本章的主题，可用下述话来表述：

> *“The problem is to find a form of association which will defend and protect with the whole common force the person and goods of each associate, and in which each, while uniting himself with all, may still obey himself alone, and remain as free as before.“*

> “怎样才能找到这样一种形式的联合：它在能够用全体成员所结成的集体力量保护其联合者的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同时，又可使每个成员在联合过程中仅仅

服从于自己的意愿，并且可以像以前一样拥有自己的自由。”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which the *Social Contract* provides the solution.

这便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The clauses of this contract are so determined by the nature of the act that the slightest modification would make them vain and ineffective; so that, although they have perhaps never been formally set forth, they are everywhere the same and everywhere tacitly admitted and recognised, until, on the violation of the social compact, each regains his original rights and resumes his natural liberty, while losing the conventional liberty in favour of which he renounced it.

这项契约的条款都是由订约的行为本质决定的，以至于哪怕最微小的更改都会使它无效；尽管它们可能从未被正式宣布过，但它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相同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倘若人们违反了这一社会契约，他们会重新获得其原有的权利，同时失去用天然自由换取的契约自由，并且重新获取他们的天然自由。

These clauses, properly understood, may be reduced to one—the total alienation of each associate, together with all his rights, to the whole community; for, in the first place, as each gives himself absolutely, the conditions are the same for all; and, this being so, no

one has any interest in making them burdensome to others.

这些条约为人所正确理解，可简要地表述为一句话：每个联合者都将自己的全部权利转让给整个共同体。因为，首先，每个人都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所以所有人的条件都是同等的；既然条件对于所有人都是同等的，便没有人想要把它变成别人的负担了。

Moreover, the alienation being without reserve, the union is as perfect as it can be, and no associate has anything more to demand: for, if the individuals retained certain rights, as there would be no common superior to decide between them and the public, each, being on one point his own judge, would ask to be so on all; the state of nature would thus continue, and the association would necessarily become inoperative or tyrannical.

其次，只要这种权利的转交是完全的，整个集体将处于最佳状态，任何个体的成员将不再拥有私人权利。只要有一个人还保留着某一项权利，在没有更高的共同权威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进行裁决的情况下，这个人在某些事情上就开始成为自己的裁决者。久而久之，这种权利就会逐渐扩大。如此下去，人们又会恢复到自然状态中去，人们的这种联合体便会成为暴政或者干脆荡然无存。

Finally, each man, in giving himself to all, gives himself to nobody; and as there is no associate over whom he does not acquire the same right as he yields others over himself, he gains an equivalent for everything he loses, and an increase of forc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what he has.

最后，每个个体都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奉献给联合体，这就相当于没把自己交给任何人，每个成员都不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权利。这样，每个人不但获得了与他所付出的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还获得了更多力量的保护。

If then we discard, from the social compact, what is not of its essence, we shall find that it reduces itself to the following terms:

如果把社会契约中的非本质因素剔除，我们就可将社会契约归结为如下公式：

> *“Each of us puts his person and all his power in common under the supreme direction of the general will, and, in our corporate capacity, we receive each member as an indivisible part of the whole.“*

> “在公共意志的最高指导下，我们每个人都将自身以及自己的一切权利转交出来，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At once, in place of the individual personality of each contracting party, this act of association creates a moral and collective body, composed of as many members as the assembly contains votes, and receiving, from this act its unity, its common identity, its life and its will. This public person, so formed by the union of all other persons formerly took the name of *city* ,[2] and now takes that of *Republic* or *body politic* ; it is called by its members

State when passive. *Sovereign* when active, and *Power*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s like itself. Those who are associated in it take collectively the name of *people* , and severally are called *citizens* , as sharing in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subjects* , as being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But these terms are often confused and taken one for another: it is enough to know how to distinguish them when they are being used with precision.

随后，这种联合行为就创造出了一个人为的集合体，使各位缔约者都不再成为单独的人。这一团体由众多成员组成，通过共同行为，这个团体成为一个统一体，形成了统一的自我意识，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意志。这个由所有人联合而成的实体过去曾被叫做城市[2]，现在则被称为共和国或政体。当处于被动状态时，它被称为国家；当处于主动状态时，它被称为主权国家；而与其同类政体相比，它则被称为政权。这种集合体的成员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人民”。当他们处于共同的主权下，可被称为公民；当他们处于国家法律制度的管辖下，可被称为臣民。不过，这几个词在具体使用时常被混淆，导致不加区别地混用。这并不是多严重的问题，我们只要能够区分出它们在使用时所要表达的具体含义就行了。

2: The real meaning of this word has been almost wholly lost in modern times; most people mistake a town for a city, and a townsman for a citizen. They do not know that houses make a town, but citizens a city. The same mistake long ago cost the Carthaginians dear. I have never read of the title of citizens being given to the subjects of any prince, not even the ancient Macedonians or the English of today, though they are nearer liberty than anyone

else. The French alone everywhere familiarly adopt the name of citizens, because, as can be seen from their dictionaries, they have no idea of its meaning; otherwise they would be guilty in usurping it, of the crime of lèse-majesté: among them, the name expresses a virtue, and not a right. When Bodin spoke of our citizens and townsmen, he fell into a bad blunder in taking the one class for the other. M. d'Alembert has avoided the error, and, in his article on Geneva, has clearly distinguished the four orders of men (or even five, counting mere foreigners) who dwell in our town, of which two only compose the Republic. No other French writer, to my knowledge, has understood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word citizen.

2: 该词的真正含义在现代人中几乎完全消失了，大多数人误把城邦当做城市，把公民等同于市民。人们忘了，城邦是由房屋构成的，而只有市民才能构成城市。迦太基人曾为这一错误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从听说过“cives”（公民）这个称号被用于任何君主统治下的臣民，即使是古代的马其顿人和现在的英国人也如此，尽管他们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接近自由。只有法国人会随意使用这个词，因为他们并不清楚这个词的具体含义，这从他们的词典中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他们明白该词的确切含义又加以滥用，那他们就犯了谋篡罪了，他们只是把该词用作表示一种社会地位而不是法律上的权利。当博丹在说起我们的公民和市民时，他就犯了一个拙劣的错误将两者混为一谈。达

朗贝先生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在他的“日内瓦”条目中，明确地区分了我们城镇所拥有的四个等级的人（如果算上外国人，就是五个等级），而只有其中两个等级能组成共和国。据我所知，再没有其他法国作家了解“公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注：达朗贝曾主持《百科全书》的编写，“日内瓦”是该书中的一个条目。）

Chapter 7 The Sovereign

第七章　论主权体

This formula shows us that the act of association comprises a mutual undertaking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individuals, and that each individual, in making a contract, as we may say, with himself, is bound in a double capacity; as a member of the Sovereign he is bound to the individuals, and as a member of the State to the Sovereign. But the maxim of civil right, that no one is bound by undertakings made to himself, does not apply in this case; for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incurring an obligation to yourself and incurring one to a whole of which you form a part.

从以上公式中可以发现，这一联合行为包含了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双向约定，每个人在缔结约定的时候（其实是在和自己缔约），会发现自己有着双重义务：作为主权体中的一员对其他成员的义务，以及作为国家的一员对国家的义务。民法中的那条原则不适用于上述情况，即每个人并不受自己所订契约的约束，因为自己构成集体的一部分，自己对自己负责和对集体负责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Attention must further be called to the fact that public deliberation, while competent to bind all the subjects to the Sovereign, because of the two different capacities in which each of them may be regarded, cannot, for the opposite reason, bind the Sovereign to itself; and that it is consequently against the nature of the body politic for the Sovereign to impose on itself a law which it cannot infringe. Being able to regard itself in only one capacity, it is in the position of an individual who makes a contract with himself; and this makes it clear that there neither is nor can be any kind of fundamental law binding on the body of the people—not even the social contract itself.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body politic cannot enter into undertakings with others, provided the contract is not infringed by them; for in relation to what is external to it, it becomes a simple being, an individual.

由于每个人都会被置于两种关系中加以考虑，因此还需要指出的是，公共的决议可以使所有臣民服从主权体，但不能以相反的理由为主权体强加任何义务。如果主权体给自己设定了一条自己都不能违背的条约，那便违背政治体的本性了。如果只能就一种单一的关系来考虑，这种情况就类似于单个的人不能和自己达成限制自己的约定。这就表明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基本法来约束人民的共同体，即使是社会契约也不例外。这并不是说，在不破坏这一契约的情况下，这个政治共同体不能与其他政体订约。因为对于其他类似的共同体来说，这个共同体只是一个单一的存在体、一个个体而已。

But the body politic or the Sovereign, drawing its being wholly from the sanctity of the contract, can never bind itself, even to an outsider, to do anything derogatory to the original act, for instance, to alienate any part of itself, or to submit to another Sovereign. Violation of the act by which it exists would be self-annihilation;

and that which is itself nothing can create nothing.

既然这一政治共同体或主权体存在的基础是借助于不可侵犯的社会契约，那么它就绝不能做出违背这一原始约定的行为，即使是与其他政体签署条约时也不例外。例如它不能转让自己的一部分，或者把自己置于其他政权的统治之下。破坏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契约，就意味着消灭这个共同体本身。而这个被消灭了的主权体当然就做不了任何事情了。

As soon as this multitude is so united in one body, it is impossible to offend against one of the members without attacking the body, and still more to offend against the body without the members resenting it. Duty and interest therefore equally oblige the two contracting parties to give each other help; and the same men should seek to combine, in their double capacity, all the advantages dependent upon that capacity.

一旦人们结成了这样一个共同体，其中任何一个成员受到侵犯必然意味着整个共同体受到侵犯。而对整个共同体的侵犯也就是对其所有成员的侵犯了。义务和自身的利益使得缔约者彼此间相互帮助，而同时一个人也尽量从这种双重关系中获取他应得的种种利益。

Again, the Sovereign, being formed wholly of the individuals who compose it, neither has nor can have any interest contrary to theirs; and consequently the sovereign power need give no guarantee to its subjects,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body to wish to hurt all its members. We shall also see later on that it cannot hurt any in particular. The Sovereign, merely by virtue of

what it is, is always what it should be.

既然主权体完全是由单独的个体构成，那么主权体的利益同它的成员利益一致，它就不可能去伤害成员的利益。因此主权体无须向臣民们做出任何保证，因为没有一个政治体会伤害自己的全体成员。之后我们也会看到，它也不可能伤害某个个别成员。主权体只要基于它是主权体这一简单的事实，它就永远是它应有的样子。

This, however,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relation of the subjects to the Sovereign, which, despite the common interest, would have no security that they would fulfil their undertakings, unless it found means to assure itself of their fidelity.

但是，臣民对于主权体的关系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共同利益，但这些不足以使臣民自觉履行义务，除非找到一些恰当的办法来保证他们的忠诚。

In fact, each individual, as a man, may have a particular will contrary or dissimilar to the general will which he has as a citizen. His particular interest may speak to him quite differently from the common interest: his absolute and naturally independent existence may make him look upon what he owes to the common cause as a gratuitous contribution, the loss of which will do less harm to others than the payment of it is burdensome to himself; and, regarding the moral person which constitutes the State as a *persona ficta* , because not a man, he may wish to enjoy the rights of citizenship without being ready to fulfil the duties of a subject. The continuance of such an injustice could not but prove the undoing of

the body politic.

事实上，但凡个体，必定有自己的个人意志，而这种个人意志与他作为公民所应有的一般意志有时会不同，甚至会相抵触。他的个人利益可能会完全不同于公共利益。个人绝对的、天然的独立性可能会使他认为自己对公共事业所做的奉献只是一种慈善行为，不去奉献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奉献却给自己带来负担；而且他会把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看成是虚幻的存在，而非真正的个人。这样，他就只希望享受公民的权利，而不去履行公民应有的义务。这种非正义的想法一旦在公民之间滋生蔓延，必然会导致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毁灭。

In order then that the social compact may not be an empty formula, it tacitly includes the undertaking, which alone can give force to the rest, that whoever refuses to obey the general will shall be compelled to do so by the whole body. This means nothing less than that he will be forced to be free; for this is the condition which, by giving each citizen to his country, secures him against all personal dependence. In this lies the key to the working of the political machine; this alone legitimises civil undertakings, which, without it, would be absurd, tyrannical, and liable to the most frightful abuses.

因此，为了使社会契约不至于沦为空谈，契约本身总是暗含着一项约定，可以给契约以力量，该约定就是：任何人如果不遵从集体的意志，集体就应该强迫他遵从，这并无他意，只是在强制让他保持自由。因为这是每个公民在献身于国家时，保证摆脱一切人身依附的必要条件。也正是这一条件，使得政治机器得以运行，并赋予社会契约合法化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一约定，社会契约必然是荒唐的、残暴的，并且极易遭到滥用。

Chapter 8 The Civil State

第八章　论公民社会

The passage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to the civil state produces a very remarkable change in man, by substituting justice for instinct in his conduct, and giving his actions the morality they had formerly lacked. Then only, when the voice of duty takes the place of physical impulses and right of appetite, does man, who so far had considered only himself, find that he is forced to act on different principles, and to consult his reason before listening to his inclinations. Although, in this state, he deprives himself of some advantages which he got from nature, he gains in return others so great, his faculties are so stimulated and developed, his ideas so extended, his feelings so ennobled, and his whole soul so uplifted, that, did not the abuses of this new condition often degrade him below that which he left, he would be bound to bless continually the happy moment which took him from it forever, and, instead of a stupid and unimaginative animal, made him an intelligent being and a man.

从自然人的国度过渡到了公民社会，人类本身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人的行为中，正义取代了本能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并且人类开始具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道德品性。从这时起，责任感取代了生理的冲动，权利代替了贪欲，人们此前仅仅考虑自己的私利，而这时必须要依照另外一些原则来行动，并且必须要使理性先于欲望。在公民社会中，尽管人类失去了自然状态下拥有的一些权利，但他得到的回报却远远大于付出：他的潜能得以开发，他的思想变得开阔，他的情操变得高尚，他的灵魂也得到了升华。如果这些新的能力不被滥用，不致使他堕落到比以前情况更糟的情况，人类必然会对这种状态庆幸

不已。因为从自然状态中走出，人类便从此摆脱了原始狭隘、愚蠢的状态，变为充满智慧的人。

Let us draw up the whole account in terms easily commensurable. What man loses by the socialcontract is his natural liberty and an unlimited right to everything he tries to get and succeeds in getting; what he gains is civil liberty and the proprietorship of all he possesses. If we are to avoid mistake in weighing one against the other, we must clearly distinguish natural liberty, which is bounded only by the strength of the individual, from civil liberty, which is limited by the general will; and possession, which is merely the effect of force or the right of the first occupier, from property, which can be founded only on a positive title.

为了把这一过程说得更明白些，我们可以从更简单的角度出发，这样就可以轻易对所得和所失进行比较了。由于社会契约，人类所失去的是天赋的自由和对任何东西都可占有的无限权利，而获得的是社会的自由和他所占有财产的合法权利。为了避免在比较过程中出现错误，我们必须要明确区分天赋自由和社会自由，前者受限于个人体力，而后者受限于社会公共意志；还要区分占有权和所有权的区别，前者是建立在暴力或“最先占有权”基础上，后者是建立在公众法律认可基础上。

We might, over and above all this, add, to what man acquires in the civil state, moral liberty, which alone makes him truly master of himself; for the mere impulse of appetite is slavery, while obedience to a law which we prescribe to ourselves is liberty. But I have already said too much on this head, and the philosophical

meaning of the word liberty does not now concern us.

我们不妨补充一点，即人类从公民社会中还获得了道德的自由。这种自由使人类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如果人类只服从于自己的欲望便会成为欲望的奴隶，只有遵从为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才是真正的自由。对这一主题我已经讨论过多，“自由”一词更多是哲学上的含义，并非我主题的组成部分。

Chapter 9 Real Property

第九章　论财产权

Each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gives himself to it, at the moment of its foundation, just as he is, with all the resources at his command, including the goods he possesses. This act does not make possession, in changing hands, change its nature, and become property in the hands of the Sovereign; but, as the forces of the city are incomparably greater than those of an individual, public possession is also, in fact, stronger and more irrevocable, without being any more legitimate, at any rat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foreigners. For the State, in relation to its members, is master of all their goods by the social contract, which, within the State, is the basis of all rights; but, in relation to other powers, it is so only by the right of the first occupier, which it holds from its members.

在公民社会形成的那一刻，每个成员将自己的一切——包括他的人身、他全部的力量和所有的财物——完完全全交付给共同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财物在转交给共同体时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了受主权体支配的财物。而是说，由于国家具有个人所无法企及的巨大力量，

所以公共占有要比个人占有具有更大的安全性，尽管公共占有并不具有更多的合法性——至少在外国人看来是如此。因为对于成员而言一个国家，通过社会契约拥有对个人财产的绝对控制权，从而成为其成员所有财物的主人。然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该国家之所以成为这些财物的主人只是基于对财物的“最先占有权”原则。

The right of the first occupier, though more real than 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 becomes a real right only when the right of property has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 Every man has naturally a right to everything he needs; but the positive act which makes him proprietor of one thing excludes him from everything else. Having his share, he ought to keep to it, and can have no further right against the community. This is why the right of the first occupier, which in the state of nature is so weak, claims the respect of every man in civil society. In this right we are respecting not so much what belongs to another as what does not belong to ourselves.

“最先占有者”的权利虽然比“最强者的权利”更为切实，但只有在财产权这一社会事实形成后，最先占有权才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每个人生来都拥有对他所需物品的使用权。但这一积极行为在使一个人成为某种财产所有者的同时也将他同其它财产分离开来。他自己的那份财产一旦确定，他的财产就仅限于此，就不能再对社会上的其他财产有所企及。这就是为什么最先占有权在自然的国度中非常脆弱，却受到社会成员尊重的原因。这项权利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与其说“哪些是属于别人的”，不如说“哪些是不属于自己的”。

In general, to establish the right of the first occupier over a plot of ground,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necessary: first, the land must not yet be inhabited; secondly, a man must occupy only the

amount he needs for his subsistence; and, in the third place, possession must be taken, not by an empty ceremony, but by labour and cultivation, the only sign of proprietorship that should be respected by others, in default of a legal title.

按一般的原则，要确定一块土地的最初占有权利，必须要具备如下条件：首先，此片土地不曾有人居住；第二，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占有数量不能超出他生存所需；第三，对土地的占用不能只是空洞的形式，而必须要凭借在这块土地上的劳动和开垦，因为这是在合法名义尚缺情况下，得到他人对所有权尊重的唯一标志。

In granting the right of first occupancy to necessity and labour, are we not really stretching it as far as it can go? Is it possible to leave such a right unlimited? Is it to be enough to set foot on a plot of common ground, in order to be able to call yourself at once the master of it? Is it to be enough that a man has the strength to expel others for a moment, in order to establish his right to prevent them from ever returning? How can a man or a people seize an immense territory and keep it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except by a punishable usurpation, since all others are being robbed, by such an act, of the place of habitation and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which nature gave them in common? When Nunez Balboa, standing on the sea-shore, took possession of the South Seas and the whole of South America in the name of the crown of Castile, was that enough to dispossess all their actual inhabitants, and to shut out from them all the princes of the world? On such a showing, these ceremonies are idly multiplied, and the Catholic King need only take possession all at once, from his apartment, of the whole universe, merely making a subsequent reservation about what was already in the possession of other princes.

事实上，将“最先占有权”同生存和需要联系在一起，就已经把这种权利扩大到极限了。难道人们不应该为这种权利设置一个界限吗？是不是某个人一旦涉足一块土地，他就可以宣告这块土地为他所有？就算他暂时有能力将他人驱逐出这块土地，难道他就有权让他人永不再回来吗？当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强取豪夺大片领地，却不让他人涉足，这其实是一种应当受到惩罚的罪恶行为。因为大自然赋予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他们却剥夺了其他人享有住所和食物的基本权利。当努涅斯·巴尔波站在海岸上以卡斯提王室的名义宣布拥有南太平洋和整个南美洲时，难道他就真的剥夺了当地居民的所有权并且让其他君王止步了吗？如果真可以这样，这种仪式必然会接二连三地不断重复。而那位天主教国王甚至不必离开他的高贵寓所，弹指间就可以占有全世界，只要随后将那些其他国王已占土地从他的帝国版图上减去就可以了。

We can imagine how the lands of individuals, where they were contiguous and came to be united, became the public territory, and how the right of Sovereignty, extending from the subjects over the lands they held, became at once real and personal. The possessors were thus made more dependent, and the forces at their command used to guarantee their fidelity. The advantage of this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felt by ancient monarchs, who called themselves Kings of the Persians, Scythians, or Macedonians, and seemed to regard themselves more as rulers of men than as masters of a country. Those of the present day more cleverly call themselves Kings of France, Spain, England, etc., thus holding the land, they are quite confident of holding the inhabitants.

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个人相连的土地如何被联合起来成为公共的领土，主权权利的范围也从臣民本身扩展到臣民们所占有的土地，也

就是说，主权权利不光包括人身权，也包括财产权。这就使得土地所有者更加依赖国家，他们把自身的力量转变成对国家忠诚的保证。但古代的君主们似乎并没认识到这等好处，他们仅仅自称为波斯人的王、塞西亚人的王或者马其顿人的王，好像他们只是把自己看做这些人的统治者，而非整片国土的主人。现在的君主则聪明多了，他们号称自己为法兰西国王、西班牙国王或者英格兰国王等等。这样，通过控制土地，他们也成功地掌控了这些土地上的居民。

The peculiar fact about this alienation is that, in taking over the goods of individuals, the community, so far from despoiling them, only assures them legitimate possession, and changes usurpation into a true right and enjoyment into proprietorship. Thus the possessors, being regarded as depositaries of the public good, and having their rights respected by all the members of the State and maintained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 by all its forces, have, by a cession which benefits both the public and still more themselves, acquired, so to speak, all that they gave up. This paradox may easily be explained b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ights which the Sovereign and the proprietor have over the same estate, as we shall see later on.

社会契约中关于转让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共同体在接受个人财产时，并不是要剥夺其财产权，恰恰相反，是为了确保个人对财产的合法所有权，把占有权变成了真正的权利，使占有成为所有权。既然每个所有者都被看作是公共财产的监护人，他的权利便得到了国家其他成员的尊重，面对外国力量的侵害，他也能够受到集体力量的一致保护。因此，这种转让行为不仅有利于公众，更有利于个人。也就是说，个人在转让中又拿回了他所奉献的一切。以后我们阐述主权体和所有者对同一财产所具有的权利有什么不同时，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能得到更好的解释。

It may also happen that men begin to unite one with another before they possess anything, and that, subsequently occupying a tract of country which is enough for all, they enjoy it in common, or share it out among themselves, either equally or according to a scale fixed by the Sovereign. However the acquisition be made, the right which each individual has to his own estate is always subordinate to the right which the community has over all: without this, there would be neither stability in the social tie, nor real force in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可能也存在这种情况：人们在结为共同体时可能并没有占有任何东西，之后他们才去占据一块土地以维持生存。他们对这块土地共同使用，或者将其分割，在各成员间进行分配，分配的形式可以是平等的，也可以根据主权者规定的比例。不论这种分配是以何种方式进行，个人对土地的拥有权要永远从属于共同体对土地的权利。倘若没有这一点，社会的联系就不能巩固，主权的实施也不会有有效的权威和力量。

I shall end this chapter and this book by remarking on a fact on which the whole social system should rest, i.e., that, instead of destroying natural inequality, the fundamental compact substitutes, for such physical inequality as nature may have set up between men, an equality that is moral and legitimate, and that men, who may be unequal in strength or intelligence, become every one equal by convention and legal right. [1_3]

最后，我将用一小段话来结束对本章和本卷的论述，其可作为整个社会系统赖以生存的基础：社会契约远没有破坏自然的平等，相

反，这一基本公约把人类天生身体上的不平等用道德的和法律的平等取而代之；从此，不管人与人之间在体力与智力上是如何不平等，人类都可通过社会契约和法律权利拥有完全的平等 [2_3] 。

[1_1]."Learned inquiries into public right are often only the history of past abuses; and troubling to study them too deeply is a profitless infatuation" (*Essay on the Interests of France in Relation to its Neighbours* , by the Marquis d'Argenson). This is exactly what Grotius has done.

[1_2].See a short treatise of Plutarch's entitled *That Animals Reason* .

[1_3].Under bad governments, this equality is only apparent and illusory: it serves only tokeep the pauper in his poverty and the rich man in the position he has usurped. In fact, laws are always of use to those who possess and harmful to those who have nothing: from which it follows that the social state is advantageous to men only when all have something and none too much.

[2_1].“对公法的学术研究往往只是古人滥用权力的历史，对这些滥权的实例进行过详细的研究，会使人遭到误导，平添烦恼。”见阿冉松侯爵的《论法国及其邻国关系的利益》。格劳秀斯的做法即如此。

[2_2].参见普鲁塔克的一篇短论，题为《如果动物也使用理性》。

[2_3].在不好的政府的统治下，平等只是表面的和虚幻的，它只是使穷人安于贫困，使富人保持富有。事实上，法律总是有利于那些有产者，而不利于无产者。因此，只有当社会所有人都拥有一些财产而谁又不多占有时，社会状态对人类才是有利的。

BOOK II

第二卷

Chapter 1 That Sovereignty Is Inalienable

第一章　论主权是不可转让的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deduction from the principles we have so far laid down is that the general will alone can direct the State according to the object for which it was instituted, i.e., the common good, for if the clashing of particular interests made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eties necessary, the agreement of these very interests made it possible. The common element in these different interests is what forms the social tie; and, were there no point of agreement between them all, no society could exist. It is solely on the basis of this common interest that every society should be governed.

前面所确立的原则所产生的最直接也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公众意志只有按照创建国家的目的——公共利益——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因为，如果个人利益的冲突使公民社会成为必需，那么，正是这些个人利益之间的协调统一使得公民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正是因为这些个人利益的相同点形成了社会联系的纽带，没有这些共同利益的交集，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因此，对社会的管理也必须要建立在这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

I hold then that Sovereignty, being nothing less than the exercise of the general will, can never be alienated, and that the

Sovereign, who is no less than a collective being, cannot be represented except by himself: the power indeed may be transmitted, but not the will.

由此，我想说的是：主权是公众意志的行使，它永远不能被转让；而且主权体只是一个集体的存在形式，除了它自己，没有人可以代表它。权力可以被转移，意志却不可以。

In reality, if it is not impossible for a particular will to agree on some point with the general will, itis at least impossible for the agreement to be lasting and constant; for the particular will tends, by its very nature, to partiality, while the general will tends to equality. It is even more impossible to have any guarantee of this agreement; for even if it should always exist, it would be the effect not of art, but of chance. The Sovereign may indeed say: “I now will actually what this man wills, or at least what he says he wills”; but it cannot say: “What he wills tomorrow, I too shall will”, because it is absurd for the will to bind itself for the future, nor is it incumbent on any will to consent to anything that is not for the good of the being who wills. If then the people promises simply to obey, by that very act, it dissolves itself and loses what makes it a people; the moment a master exists, there is no longer a Sovereign, and from that moment the body politic has ceased to exist.

事实上个体意志与公众意志在某些点上达成一致不是不可能，但这些一致性却不具有规律性和持久性。个体意志由于它的天然本性总会具有不公正性，而公众意志则更偏向平等。所以我们不能保证个体意志与公众意志会和谐一致，即使这种一致应该永远存在，那也不过是巧合而非人为结果。主权者的确可以说：“现在我想要的恰恰就是

这个人想要的，至少是他说他想要的。”但他不能说：“这个人明天想要的也是我想要的。”因为如果一个人说希望自己的未来受束缚，这是荒唐可笑的。同时还因为任何人都不会赞同与自己利益相冲突的事情。如果一个民族的人民只是一味地做出服从承诺，这个民族最终会被这种承诺毁灭，人民也就不可称之为人民了；一旦有了一个主人，主权体便不复存在，政治体也因此而分崩离析。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commands of the rulers cannot pass for general wills, so long as the Sovereign, being free to oppose them, offers no opposition. In such a case, universal silence is taken to imply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This will be explained later on.

这并不是说在主权体有权行使否决权利却没有行使的情况下，首领的政令不被公共意志认可。此时，我们应该把整体的沉默视作人民的认同。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详述。

Chapter 2 That Sovereignty Is Indivisible

第二章　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Sovereignty, for the same reason as makes it inalienable, is indivisible; for will either is, or is not, general; [2_1] it is the will either of the body of the people, or only of a part of it. In the first case, the will, when declared, is an act of Sovereignty and constitutes law; in the second, it is merely a particular will or act of magistracy—at the most a decree.

正如主权不可转让，基于同一原因，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意志

要么是公共意志[3_1]，要么不是；它要么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要么只是其中一部分人的意志。在前一种情况下，这种公共意志的宣示是主权行为，并构成法律；而后一种情况下，它只是一种个别意志或行政行为，顶多算一道政令而已。

But our political theorists, unable to divide Sovereignty in principle, divide it, according to its object, into force and will; into legislative power and executive power; into rights of taxation, justice and war; into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and power of foreign treaty. Sometimes they confuse all these sections, and sometimes they distinguish them; they turn the Sovereign into a fantastic being composed of several connected pieces: it is as if they were making man of several bodies, one with eyes, one with arms, another with feet, and each with nothing besides. We are told that the jugglers of Japan dismember a child before the eyes of the spectators; then they throw all the members into the air one after another, and the child falls down alive and whole. The conjuring tricks of our political theorists are very like that; they first dismember the Body politic by an illusion worthy of a fair, and then join it together again we know not how.

然而，那些无法按主权原则来区分主权的政治理论家们，便将主权按对象来区分。他们将主权分为权力和意志，即将其分为行政权和立法权，分为纳税权、司法权和战争权，分为内政权和外交权。理论家们时而将这些混为一谈，时而又把它们分裂开来。他们把主权体搞成一个东拼西凑出来的怪物，就好比是他们用这个人的眼睛、那个人的胳膊、另一个人的腿、再一个人的脚——用几个人的身体拼凑出一个新的人。据说，日本的一些江湖术士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一个小孩子肢解，然后将身体的各个部位抛向空中，在孩子落地时，依旧活生生、完好无损。这或多或少类似于政治理论家们玩的把戏，他们用

那种完全可以当众表演的手法肢解了社会实体，又不知通过什么手法将它们重新组合起来。

This error is due to a lack of exact notions concerning the Sovereign authority, and to taking for parts of it what are only emanations from it. Thus, for example, the acts of declaring war and making peace have been regarded as acts of Sovereignty;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as these acts do not constitute law, but merely the application of a law, a particular act which decides how the law applies, as we shall see clearly when the idea attached to the word *law* has been defined.

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在于没有对主权形成正确的概念，把主权权威的表现误认为是主权权威的组成部分。例如，人们把宣布战争或者维护和平视为主权行为。其实不然，类似这样的行为不是法律，它们只是法律的实施，是一种确定该如何解读法律的特殊行为。这一点在确定“法律”一词的含义后，就会非常明了。

If we examined the other divisions in the same manner, we should find that, whenever Sovereignty seems to be divided, there is an illusion: the rights which are taken as being part of Sovereignty are really all subordinate, and always imply supreme wills of which they only sanction the execution.

如果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其他的主权划分，我们会发现，无论怎样对主权进行划分，我们都是错误的。因为那些被认为是主权组成部分的权利，最终被证明只是从属于主权，而且他们要以最高意志的存在为前提条件，这些权利只是最高意志的实施而已。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estimate the obscurity this lack of exactness has thrown over the decisions of writers who have dealt with political right, when they have used the principles laid down by them to pass judgment on the respective rights of kings and peoples. Everyone can see, in Chapters III and IV of the First Book of Grotius, how the learned man and his translator, Barbeyrac, entangle and tie themselves up in their own sophistries, for fear of saying too little or too much of what they think, and so offending the interests they have to conciliate. Grotius, a refugee in France, ill-content with his own country, and desirous of paying his court to Louis XIII, to whom his book is dedicated, spares no pains to rob the peoples of all their rights and invest kings with them by every conceivable artifice. This would also have been much to the taste of Barbeyrac, who dedicated his translation to George I of England. But unfortunately, the expulsion of James II, which he called his "abdication", compelled him to use all reserve, to shuffle and to tergiversate, in order to avoid making William out a usurper. If these two writers had adopted the true principles, all difficulties would have been removed, and they would have been always consistent; but it would have been a sad truth for them to tell, and would have paid court for them to no one save the people. Moreover, truth is no road to fortune, and the people dispenses neither ambassadorships, nor professorships, nor pensions.

由于缺乏精确性，这些政治理论家们在根据前述的那些理论来判断君王和人民的相应权利时，得出的结论总是极为模糊。在格劳秀斯第一本著作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读者们会很清楚地看到这位知识渊博的大师和他的翻译者巴贝拉克是如何陷入自己的诡辩中而无法自圆其说。他们担心在书中说得太多或太少，从而不小心触犯到他们想竭力协调的各种利益。格劳秀斯因不满意于自己的祖国而流亡法国。为

了讨好国王路易十三，他把自己的书献给了这位国王。书中他费尽心机将人民的权利剥夺殆尽，再想方设法将它们全都赋予国王。而这本书又恰好迎合了巴贝拉克的口味，他将此书翻译之后献给了英格兰的国王乔治一世。但不幸的是，詹姆士二世被放逐（巴贝拉克称此为“让位”），这位译者不得不在书中采取了保留的态度，以致含糊其辞、吞吞吐吐以避免把威廉三世暗指为一个篡位者。如果这两位作者能按照正确的原则处理，他们就不会那样为难了，所有的难题将会迎刃而解；但是，如果真要那样的话，他们必定带着莫大的悲哀，因为能接受他们的只有人民。真理从来不是使人谋取高官厚禄的康庄大道，人民是无法给予他们大使的头衔、教授的身份和丰厚的俸禄的。

Chapter 3 Whether the General Will Is Fallible

第三章　论公共意志是否会犯错

It follows from what has gone before that the general will is always right and tends to the public advantage; but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people are always equally correct. Our will is always for our own good, but we do not always see what that is; the people is never corrupted, but it is often deceived, and on such occasions only does it seem to will what is bad.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推知：公众意志总是正确的，总是以大众共同的利益为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所有的决议都是正确的。人们总是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事物，但很多时候人无法辨别哪些对他们有利。人民固然不会腐败，但他们有可能受到蒙蔽，此时的人民就会接受一些不好的事物。

There is often a great deal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ill of all and the general will; the latter considers only the common interest, while the former takes private interest into account, and is no more than a sum of particular wills, but take away from these same wills the pluses and minuses that cancel one another, [2_2] and the general will remains as the sum of the differences.

所有人的意志（众意）和公共意志之间经常存在很大区别，公共意志只考虑公共利益，而众意则考虑个人私利，众意其实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如果我们扣除所有人意志中意见不统一的部分，就形成了公共意志，它实际是个别利益的交集 [3_2] 。

If, when the people, being furnished with adequate information, held its deliberations, the citizens had no communication one with another, the grand total of the small differences would always give the general will, and the decision would always be good. But when factions arise, and partial associations are form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great association, the will of each of these associations becomes general in relation to its members, while it remains particular in relation to the State: it may then be said that there are no longer as many votes as there are men, but only as many as there are associations. The differences become less numerous and give a less general result. Lastly, when one of these associations is so great as to prevail over all the rest, the result is no longer a sum of small differences, but a single difference; in this case there is no longer a general will, and the opinion which prevails is purely particular.

当人民对情况能充分了解并具有思考能力，人民之间没有进行相

互串通，那么即使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小差异，公共意志也可以从中产生，而且这种决定总是有益的。但如果人们在交往中开始形成小团体或派别，那么每个派别的意志对于其内部成员来说是公共意志，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则成为了个别意志。这样一来，就形成这样一种情况：不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投票者，而只与投票的团体数目相当。此时利益的冲突相对减弱，但投票表决的结果却缺乏普遍性。到最后，当这些团体或派别中某个规模大到可以压倒其他派别而占据主导地位时，投票的结果就不再是诸多分歧的总和，而只存在一个差别。这时就不存在什么公共意志了，这种主导观点只不过是一种个别意见罢了。

It is therefore essential, if the general will is to be able to express itself,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partial society within the State, and that each citizen should think only his own thoughts: [2_3] which was indeed the sublime and unique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great Lycurgus. But if there are partial societies, it is best to have as many as possible and to prevent them from being unequal, as was done by Solon, Numa and Servius. These precautions are the only ones that can guarantee that the general will shall be always enlightened, and that the people shall in no way deceive itself.

因此，为了更好地表达公共意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让国家中存在小集团，这样才能使每个公民得以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3_3] 。这是绝对必要的，这是伟大的莱克格斯发明的独特又高尚的体系。如果国家内已经存在小集团，那就应该像梭伦、努马、塞尔维乌斯所做的那样，大量增加这些组织的数量，以此来防止它们之间的不均衡。要使公共意志永远正确并确保人民不犯错误，这些都是很有效的预防手段。

Chapter 4 The Limits of the Sovereign Power

第四章　论主权权力的限度

If the State is a moral person whose life is in the union of its members, and if the most important of its cares is the care for its own preservation, it must have a universal and compelling force, in order to move and dispose each part as may be most advantageous to the whole. As nature gives each man absolute power over all his members, the social compact gives the body politic absolute power over all its members also; and it is this power which,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general will, bears, as I have said, the name of Sovereignty.

如果把国家或城市看成是一个道德人格，它的生命力便来自于其成员的团结。如果它的生存是首要法则，则它必须具有一种普遍的强制力量，以便为整体的更高利益去引导或支配它的每个部分。这就如同大自然赋予了每个人控制自身各部分的绝对权力，社会契约也赋予政治体支配每个成员的绝对权力。如我前面所说，这种权力正是在公共意志指导之下，才拥有了主权这个名称。

But, besides the public person, we have to consider the private persons composing it, whose lifeand liberty are naturally independent of it. We are bound then to distinguish clearly between the respective rights of the citizens and the Sovereign, [2_4] and between the duties the former have to fulfil as subjects, and the natural rights they should enjoy as men.

但是，除了这种公共人格，我们也必须考虑构成公共人格的个人。这些个人的生命和自由都是天然独立的。因此，我们必须区别开公民和主权体各自的利益 [3_4] ，同时也要区别开公民作为臣民的责任

和作为人的天然权利。

Each man alienates, I admit, by the social compact, only such part of his powers, goods and liberty as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community to control; but it must also be granted that the Sovereign is sole judge of what is important.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社会契约，每个个体所转让的只是他对于集体有重要作用的那部分权利、财产和自由。还必须要说明的是，唯有主权体才能判定究竟哪一部分才具有这种重要性。

Every service a citizen can render the State he ought to render as soon as the Sovereign demands it; but the Sovereign, for its part, cannot impose upon its subjects any fetters that are useless to the community, nor can it even wish to do so; for no more by the law of reason than by the law of nature can anything occur without a cause.

一旦主权体有所需要，公民就应当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国出力。但是主权体不能对臣民提出任何对主权体利益无用的要求。它甚至也不会有这样的意图，因为在理性法律和自然法则下，任何东西都不会无缘无故产生。

The undertakings which bind us to the social body are obligatory only because they are mutual; and their nature is such that in fulfilling them, we cannot work for others without working for ourselves. Why is it that the general will is always in the right,

and that all continually will the happiness of each one, unless it is because there is not a man who does not think of “each” as meaning him, and consider himself in voting for all? This proves that equality of rights and the idea of justice which such equality creates originate in the preference each man gives to himself, and accordingly in the very nature of man. It proves that the general will, to be really such, must be general in its object as well as its essence; that it must both come from all and apply to all; and that it loses its natural rectitude when it is directed to some particular and determinate object, because in such a case we are judging of something foreign to us, and have no true principle of equity to guide us.

之所以把我们和社会共同体联结起来的那些责任称之为义务，只因它是互惠的。它们具有这样的本质，即在履行这些责任时，每个人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服务。如果不是因为个人将“每个人”都作为自己，从而在为所有人投票时想着自己，公共意志又如何总是正确的？人又如何以此希求每个人都能得到幸福？这就证明了权利的平等和由它产生的正义感都源自每个人对自身的优先考虑，这也是人的本性。这就证明了公共意志要想实现真正的普遍性，不仅要在内容上，还要在对象上是公共意志。它应当来自所有个体以适用于所有个体。当它倾向于某些特定的个体时，它就失去了自然公正性。因为这时我们判断的是一些未知的东西，已经没有任何真正的平等原则来指导我们。

Indeed, as soon as a question of particular fact or right arises on a point not previously regulated by a general convention, the matter becomes contentious. It is a case, in which the individuals concerned are one party, and the public the other, but in which I can see neither the law that ought to be followed nor the judge who

ought to give the decision. In such a case, it would be absurd to propose to refer the question to an express decision of the general will, which can be only the conclusion reached by one of the parties and in consequence will be, for the other party, merely an external and particular will, inclined on this occasion to injustice and subject to error. Thus, just as a particular will cannot stand for the general will, the general will, in turn, changes its nature, when its object is particular, and, as general, cannot pronounce on a man or a fact. When, for instance, the people of Athens nominated or displaced its rulers, decreed honours to one, and imposed penalties on another, and, by a multitude of particular decrees, exercised all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indiscriminately, it had, in such cases, no longer a general will in the strict sense; it was acting no longer as Sovereign, but as magistrate. This will seem contrary to current views; but I must be given time to expound my own.

一旦涉及某个特殊的事实或权利，而它又不在已有的共同契约范围之内，争议就来了。这其实是一场一方为当事个人而另一方为公众的诉讼，但我既看不出有什么可使用的法律条文，也看不到应作出裁决的法官。这时，如果只是任由公共意志来作出决断显然是荒谬的，因为这样的裁决只是一方的结论，对于另一方来说它只是一种个别的意志。这种决断只会偏于不公且容易犯错。因此，正如个别意志不能代表公共意志，公共意志一旦有了个别意志，自身性质也会发生改变。它将不再是公共意志，就不能再以其普遍性来对人和事作出公平的裁决。举个例子，当雅典人民任命或废除他们的领袖，对一些人施加惩罚而对另一些人授予荣耀，通过许多个别的政令行使政府全部职能时，他们就不再是主权体了，他们已经与行政官员无异。这好像与通常的观点相反，但我需要时间来详细阐明我的观点。

It should be seen from the foregoing that what makes the will

general is less the number of voters than the common interest uniting them; for, under this system, each necessarily submits to the conditions he imposes on others: and this admirable agreement between interest and justice gives to the common deliberations an equitable character which at once vanishes when any particular question is discussed, in the absence of a common interest to unite and identify the ruling of the judge with that of the party.

从上述可见，公共意志的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参与投票者的数目，而取决于能够联系起这些投票者的共同利益。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必须要服从他加给其他人的同一个条件，这就是利益与正义的共存共荣。它使得集体的协商具有平等性。这时，一旦讨论到私事，这种公平性便不复存在。因为此时不再有将法官的裁决和当事方的规则完美结合的共同利益。

From whatever side we approach our principle, we reach the same conclusion, that the social compact sets up among the citizens an equality of such a kind, that they all bind themselves to observe the same conditions and should therefore all enjoy the same rights. Thus, from the very nature of the compact, every act of Sovereignty, i.e., every authentic act of the general will, binds or favours all the citizens equally; so that the Sovereign recognises only the body of the nation, and draws no distinctions between those of whom it is made up. What, then, strictly speaking, is an act of Sovereignty? It is not a convention between a superior and an inferior, but a convention between the body and each of its members. It is legitimate, because based on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equitable, because common to all; useful, because it can have no other object than the general good, and stable, because guaranteed by the public force and the supreme power. So long as the subjects

have to submit only to conventions of this sort, they obey no-one but their own will; and to ask how far the respective rights of the Sovereign and the citizens extend, is to ask up to what point the latter can enter into undertakings with themselves, each with all, and all with each.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探究这个原则，我们都会回归到同一点，即社会契约在公民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公民受同一条件制约，也享有同样的权利。也就是说，根据社会契约的本质，任何主权约定，即真正属于公共意志的每个约定，都平等地约束或关怀每个公民。这样一来，主权体只认得国家这一个实体，而不再区分其作为成员的单独个人。那么，确切地说，什么是主权约定呢？它不是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协约，而是共同体和它每个成员之间的约定。它是一种合法的约定，因为它所依据的是社会契约；它是一种公平的约定，因为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它是一种实用的约定，因为它只以为人民谋福利为己任；它是一种持久的约定，因为它以公众力量和最高权力为支持。在这样一种约定下，只要公民遵从，他们就是在遵从自己的意志，并不受制于任何人。至于主权体和公民各自的权利可以延伸到什么程度，就要看每个公民对自身的约束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了。每个人要对全体负责，全体也要对每个人负责。

We can see from this that the sovereign power, absolute, sacred and inviolable as it is, does not and cannot exceed the limits of general conventions, and that every man may dispose at will of such goods and liberty as these conventions leave him; so that the Sovereign never has a right to lay more charges on one subject than on another, because, in that case, the question becomes particular, and ceases to be within its competency.

由此可见，主权权力尽管是完全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却不能超越、也不会超越普遍约定的范畴。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充分支配这些约定所规定给他的财产和自由。结果，主权体永远无权对某个臣民施加比其他臣民多的负担，因为那样一来，就变成个别情况了，也就超越了主权体的权限。

When these distinctions have once been admitted, it is seen to be so untrue that there is, in the social contract, any real renunci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individuals, that the position in which they find themselves as a result of the contract is really preferable to that in which they were before. Instead of a renunciation, they have made an advantageous exchange: instead of an uncertain and precarious way of living they have got one that is better and more secure; instead of natural independence they have got liberty; instead of the power to harm others security for themselves, and instead of their strength, which others might overcome, a right which social union makes invincible. Their very life, which they have devoted to the State, is by it constantly protected; and when they risk it in the State's defence, what more are they doing than giving back what they have received from it? What are they doing that they would not do more often and with greater danger in the state of nature, in which they would inevitably have to fight battles at the peril of their lives in defence of that which is the means of their preservation? All have indeed to fight when their country needs them; but then no one has ever to fight for himself. Do we not gain something by running, on behalf of what gives us our security, only some of the risks we should have to run for ourselves, as soon as we lost it?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区别，那么，那种断言个人由于社会契约而

失去权利的说法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当个人处于社会契约中时，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比过去更优越的环境中。他们不但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反而进行了一次有利的交易，也就是以一种更美好、更稳定的生活方式代替了一种不可靠、不安定的生活方式；用对自然的依赖换取了独立自由；不必再对别人进行暴力侵犯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用他们可能被战胜的力量换取了社会联合体所带来的不可征服的权利。他们奉献给国家生活，也获得了国家的保护。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捍卫国家时，不就是在回报从国家那里得到的保护吗？而且，他们冒如此风险所做的事情，不正是在自然国度里为保障自己生存而必须更频繁地去做的更危险的事情吗？确实，当国家需要时，所有的人都须为国家而战，但同时人们就不必再为自己而战了。联合之前我们需要冒很大的危险去保全自己，联合之后我们只需冒部分危险来保卫国家。两相比较，难道不是有很大的改善吗？

Chapter 5 The Right of Life and Death

第五章　论生死权

The question is often asked how individuals, having no right to dispose of their own lives, can transfer to the Sovereign a right which they do not possess. The difficulty of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seems to me to lie in its being wrongly stated. Every man has a right to risk his own life in order to preserve it. Has it ever been said that a man who throws himself out of the window to escape from a fire is guilty of suicide? Has such a crime ever been laid to the charge of him who perishes in a storm because, when he went on board, he knew of the danger?

有人也许会问：既然个人都没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那他又怎么可能有权把这样的权利转让给主权体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回

答，是因为它问的方式不对。每个人都有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而冒生命危险的权利。一个人为从火灾中逃生而从窗口跳出，难道就说他是自杀吗？一个人在出海时被暴风雨吞噬，难道就能以明知出海有危险却非要这样做为理由强加给他自杀的罪名吗？

The social treaty has for its en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He who wills the endwills the means also, and the means must involve some risks, and even some losses. He who wishes to preserve his life at others' expense should also, when it is necessary, be ready to give it up for their sake. Furthermore, the citizen is no longer the judge of the dangers to which the law-desires him to expose himself; when the prince says to him: “it is expedient for the State that you should die,” he ought to die, because it is only on that condition that he has been living in security up to the present, and because his life is no longer a mere bounty of nature, but a gift made conditionally by the State.

社会契约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各个缔约者。一个想要达到某种目的的人，必须会有相应的手段以及运用这种手段所必然承担的危险，甚至是牺牲。任何人如果想通过牺牲别人来保障自己，他就必须在必要时候为他人牺牲自己。作为一个公民，这时他就不再是自己的主宰，他所承担的危险必须由法律来决定。当执政者对一个人说：为了国家你必须献身。这个人就必须义无反顾地去死。因为这是他能够一直享有安全环境的条件，也因为他的生命已不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国家的一种有条件的许可。

The death-penalty inflicted upon criminals may be looked on in much the same light: it is in order that we may not fall victims to an assassin that we consent to die if we ourselves turn assassins. In

this treaty, so far from disposing of our own lives, we think only of securing them, and it is not to be assumed that any of the parties then expects to get hanged.

对罪犯施以死刑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避免成为某桩杀人案中的被杀者，每个人就必须得同意，一旦自己成了杀人犯就会被处死。这远不是放弃生命的做法，而是人们认为这样可以使生命安全更有保障，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保证社会契约的效力。当然我们无法想象有哪个缔约者会在缔结条约时希望自己被绞死。

Again, every malefactor, by attacking social rights, becomes on forfeit a rebel and a traitor to his country, and by violating its laws be ceased to be a member of it; he even makes war upon it. In such a case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tate is inconsistent with his own, and one or the other must perish; in putting the guilty to death, we slay not so much the citizen as an enemy. The trial and the judgment are the proofs that he has broken the social treaty, and is in consequence no longer a member of the State. Since, then, he has recognised himself to be such by living there, he must be removed by exile as a violator of the compact, or by death as a public enemy; for such an enemy is not a moral person, but merely a man; and in such a case, the right of war is to kill the vanquished.

另外，每个挑战社会权利的恶人，都会因为他的行为成为国家的叛徒或叛乱者。由于他破坏了国家法律，他就不再是国家的成员，这甚至等于在向自己的国家开战。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生存和他的生存就是不相容的，两者必去其一。如果这个罪犯被处以死刑，那么他不是以公民的身份，而是以公敌的身份。审判与判决就是为了证明并宣告他破坏了社会契约，他不再是国家的一员。既然他曾是这个国家的

一员，或者至少曾居住于该国国土上，他就必须遭到放逐或者作为国家公敌被处死。这样的敌人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只是一个个体。根据战争权，他被处死也是理所应当。

But, it will be said, the condemnation of a criminal is a particular act. I admit it: but such condemnation is not a function of the Sovereign; it is a right the Sovereign can confer without being able itself to exert it. All my ideas are consistent, but I cannot expound them all at once.

但是，可能有人会说，对犯罪的惩罚是一种个别行为。没错，但是这样一种职责并不属于主权体，主权体可以给罪犯定罪但是自己却不能亲自执行。我所有的观点都环环相扣，需要慢慢道来。

We may add that frequent punishments are always a sign of weakness or remissness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here is not a single ill-doer who could not be turned to some good. The State has no right to put to death, even for the sake of making an example, any one whom it can leave alive without danger.

过于频繁的惩罚是政府无用或懒惰的表现。无论怎样坏的一个人，总可以使他成为某方面有用的人。如果一个人留存于世并不会对社会造成危险，他就不应该被处死，出于杀一儆百的目的也不行。

The right of pardoning or exempting the guilty from a penalty imposed by the law and pronounced by the judge belongs only to the authority which is superior to both judge and law, i.e., the

Sovereign; each its right in this matter is far from clear, and the cases for exercising it are extremely rare. In a well-governed State, there are few punishments, not because there are many pardons, but because criminals are rare; it is when a State is in decay that the multitude of crimes is a guarantee of impunity. Under the Roman Republic, neither the Senate nor the Consuls ever attempted to pardon; even the people never did so, though it sometimes revoked its own decision. Frequent pardons mean that crime will soon need them no longer, and no one can help seeing whither that leads. But I feel my heart protesting and restraining my pen; let us leave these questions to the just man who has never offended, and would himself stand in no need of pardon.

赦免权，就是对那些受到法律惩罚并由法官强制执行的罪犯施以宽恕或赦免的权利。这种权利仅仅属于超越法律和法官的那个主权体。由于对这种权利的规定并不十分明确，因此它很少被使用。在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之所以不会有太多刑罚，并不是因为国家常行使赦免权，而是罪犯数量很少。只有在国家趋于衰亡时，才会出现罪犯多而惩罚少的情况。在罗马共和国统治时期，元老院和执政官不曾行使过赦免权，古罗马人也没有这样做过，虽然人民有时会撤回裁决。频繁的赦免预示着不久以后犯罪行为将不再需要赦免，每个人都能看出它能产生的后果。此时，我感到思路阻塞，无法下笔。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那些正直人士去讨论吧，他们从不犯错，自己永远不需要任何赦免。

Chapter 6 Law

第六章　论法律

By the social compact we have given the body politic existence

and life; we have now by legislation to give it movement and will. For the original act by which the body is formed and united still in no respect determines what it ought to do for its preservation.

社会契约给政治体以存在和生命，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通过立法为政治体带来意志和行为的力量，因为使政治体得以联合和形成的那种原始行为并没有决定政治体该如何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

What is well and in conformity with order is so by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independently of human conventions. All justice comes from God, who is its sole source; but if we knew how to receive so high an inspiration, we should need neither government nor laws. Doubtless, there is a universal justice emanating from reason alone; but this justice, to be admitted among us, must be mutual. Humanly speaking, in default of natural sanctions, the laws of justice are ineffective among men: they merely make for the good of the wicked and the undoing of the just, when the just man observes them towards everybody and nobody observes them towards him. Conventions and laws are therefore needed to join rights to duties and refer justice to its object. In the state of nature, where everything is common, I owe nothing to him whom I have promised nothing; I recognise as belonging to others only what is of no use to me. In the state of society all rights are fixed by law, and the case becomes different.

事物的美好与合乎秩序是事物的性质使然，与人类的契约无关。一切的公义均来自上帝；只有上帝才是公义的本源。但这一本源如此高不可及，如果我们由此接受公义，就不需要政府或法律了。毫无疑问，从理性本身就可以找到普世的公义，如果要使所有人都承认，它

就必须是互惠的。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任何天然约束，天然的公义法则就是虚幻无效的。如果正义之士遵守正义法则而其余的人却不照此遵守，那么这些正义的法则就只能令善者痛恶者快。因此，必须要用协议和法律将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使正义有所伸张。在自然社会中，一切东西都是公共的。对于那些我未曾作出承诺的人，我对他们也没有任何义务，我只承认那些对我无用的东西才属于他人。但是，在公民社会中，情况完全变了，因为一切权利都是由法律规定的。

But what, after all, is a law? As long as we remain satisfied with attaching purely metaphysical ideas to the word, we shall go on arguing without arriving at an understanding; and when we have defined a law of nature, we shall be no nearer the definition of a law of the State.

那么，法律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仅局限于形而上学的角度为法律下定义，无论怎么讨论，我们都无法真正地认识它。即使人们能说出什么是自然法，他们也不能更好地了解什么是国家法。

I have already said that there can be no general will directed to a particular object. Such an object must be either within or outside the State. If outside, a will which is alien to it cannot be, in relation to it, general; if within, it is part of the State, and in that case there arises a relation between whole and part which makes them two separate beings, of which the part is one, and the whole minus the part the other. But the whole minus a part cannot be the whole; and while this relation persists, there can be no whole, but only two unequal parts; and it follows that the will of one is no longer in any respect general in relation to the other.

我已经说过，公共意志不针对某个个别对象。实际上，这样的个别对象不是处于国家之外就是处于国家之内。如果在国家外部，它的意志对于国家来说就属于外来意志而不是普遍意志；如果它在国家内部，它就是国家的一部分，那么整体与部分之间便形成了两个单独个体相对的关系，部分是其中一方，排除了这一部分的整体是另一方。但排除了某个部分的整体便不再是整体。而且只要这种关系存在，就不再有整体，而是产生两个不对等的部分。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其中一个部分的意愿对于另一部分来说都不能算是公共意志。

But when the whole people decrees for the whole people, it is considering only itself; and if a relation is then formed, it is between two aspects of the entire object, without there being any division of the whole. In that case the matter about which the decree is made is, like the decreeing will, general. This act is what I call a law.

但是，当作为整体的人民为他们自己制订条约的时候，他们考虑的便只有自己；这里如果形成了任何一种关系，那也是一个角度下整体人民同另一个角度下整体人民之间的关系，对整体并没有什么破坏。这时人们对某个问题作出的约定就具有了普遍性，正如作出这种约定的意志具有普遍性一样。这样的约定我称之为法律。

When I say that the object of laws is always general, I mean that law considers subjects *en masse* and actions in the abstract, and never a particular person or action. Thus the law may indeed decree that there shall be privileges, but cannot confer them on anybody by name. It may set up several classes of citizens, and even lay down the qualifications for membership of these classes, but it

cannot nominate such and such persons as belonging to them; it may establish a monarchical government and hereditary succession, but it cannot choose a king, or nominate a royal family. In a word, no function which has a particular object belongs to the legislative power.

当我说到法律的对象总是具有普遍性时，我的意思是法律从整体的角度考虑臣民，并考虑他们的抽象行为，它不涉及某个具体的人或某个具体的行为。因此法律可以规定特权，但不能指定哪个具体的人能享有此特权；法律可以把臣民划分为几个等级，甚至规定每个等级的划分标准，却不能指名道姓地确定哪个人为哪个阶级；法律可以规定君主政府的世袭制度，却不能指定哪个是君王、哪家是王室。简言之，就是立法权力范围中不包括针对个别对象的职能。

On this view, we at once see that it can no longer be asked whose business it is to make laws, since they are acts of the general will; nor whether the prince is above the law, since he is a member of the State; nor whether the law can be unjust, since no one is unjust to himself; nor how we can be both free and subject to the laws, since they are but registers of our wills.

此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可以不必问立法权力的归属问题了，因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约定；我们可以不必问君主是不是高于法律，因为君王不过是国家的一员；我们可以不必问法律是否会不公正，因为没有人会对自己不公正；我们更可以不必问人为何自由却又要遵从法律，因为法律正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表达。

We see further that, as the law unites universality of will with

universality of object, what a man, whoever he be, commands of his own motion cannot be a law; and even what the Sovereign commands with regard to a particular matter is no nearer being a law, but is a decree, an act, not of sovereignty, but of magistracy.

我们还可以明白，既然法律将意志的普遍性和对象的普遍性结合起来，那么，无论是谁，凭个人的意志擅自下的命令都不称其为法律。就算是主权体针对个别对象发出的命令也不是法律，而只是一道行政命令，这并不是主权行为，只是政府的行政行为。

I therefore give the name “Republic” to every State that is governed by laws, no matter what the form of its administration may be: for only in such a case does the public interest govern, and the *res publica* rank as a *reality* . Every legitimate government is republican; [2_5] what government is I will explain later on.

因此，对于一切依法而治的国家，不论其行政机构的形式如何，我都把他们统称为“共和国”。因为只有在那里，公共利益才能成为主导力量，才能真正符合“共和”一词的原意。每一个合法的政府都是共和体 [3_5] ，我在后面篇章中将会解释何为政府。

Laws are, properly speaking, only the conditions of civil association. The people, being subject to the laws, ought to be their author: the conditions of the society ought to be regulated solely by those who come together to form it. But how are they to regulate them? Is it to be by common agreement, by a sudden inspiration? Has the body politic an organ to declare its will? Who can give it the foresight to formulate and announce its acts in advance? Or

how is it to announce them in the hour of need? How can a blind multitude, which often does not know what it wills, because it rarely knows what is good for it, carry out for itself so great and difficult an enterprise as a system of legislation? Of itself the people wills are always the good, but of itself it by no means always sees it. The general will is always in the right, but the judgment which guides it is not always enlightened. It must be got to see objects as they are, and sometimes as they ought to appear to it; it must be shown the good road it is in search of, secured from the seductive influences of individual wills, taught to see times and spaces as a series, and made to weigh the attractions of present and sensible advantages against the danger of distant and hidden evils. The individuals see the good they reject; the public wills the good it does not see. All stand equally in need of guidance. The former must be compelled to bring their wills into conformity with their reason; the latter must be taught to know what it wills. If that is done, public enlightenment leads to the union of understanding and will in the social body: the parts are made to work exactly together, and the whole is raised to its highest power. This makes a legislator necessary.

确切地说，法律是公民社会得以结合的条件，臣服于法律的人民也是法律的制订者。只有那些构成社会的人才有权决定他们结成社会的条件，但他们如何来决定这些条件呢？是根据自发的协议还是突发的灵感？政治体是否有一个机构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谁会具备这种远见，事先就能明确地知道这些法令并将它们公之于众？或者在需要时，它如何宣布这些决定呢？盲目的民众通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他们往往不能正确判定哪些是对他们有益的，那么他们靠什么来完成制订法律这样一项伟大而艰巨的重任呢？就民众本身而言，他们总是希求得到对他们有益的东西，可是他们却很难看清这种利益。公共意志永远是正确的，可指引公共意志的判断并非总是明智的，所以

必须对它示以事实的本来面目，有时甚至是事物的本质。必须为它指明前进的正确道路，防止它被个别意志领偏了方向；必须给予它时空观念，使它在权衡眼前利益的同时能看到长远的隐患；个人看到好东西却拒绝它，公众期望好东西却不认识它，两者都需要引导。个人应该用理性指引自己的欲望，公众应该学会如何发现自己期待的东西。这种公众的启发将会为社会共同体带来理性和意志的结合，使共同体的各部分密切协作，最后形成整体的最大力量。这就需要一个立法者了。

Chapter 7 The Legislator

第七章　论立法者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rules of society best suited to nations, a superior intelligence beholding all the passions of men without experiencing any of them would be needed. This intelligence would have to be wholly unrelated to our nature, while knowing it through and through; its happiness would have to be independent of us, and yet ready to occupy itself with ours; and lastly, it would have, in the march of time, to look forward to a distant glory, and, working in one century, to be able to enjoy in the next. [2_6] It would take gods to give men laws.

要找到一个适合于所有国家的社会法则的确需要一种超人的智慧。这种智慧需能理解人类的所有情感但又不卷入其中；它与人类的本性没有任何关系却又对其了如指掌；它的幸福与我们的幸福无关却甘愿为我们着想；最后，它会为了一种遥远的荣耀而一直等待，它在这个时代辛苦劳作，却在下一个时代收获果实 [3_6] 。真要如此，人类只有等神明来为他们立法了。

What Caligula argued from the facts, Plato, in the dialogue called the *Politicus* , argued in defining the civil or kingly man, on the basis of right. But if great princes are rare, how much more so are great legislators? The former have only to follow the pattern which the latter have to lay down. The legislator is the engineer who invents the machine, the prince merely the mechanic who sets it up and makes it go. “At the birth of societies,” says Montesquieu, “the rulers of Republics establish institutions, and afterwards the institutions mould the rulers.“ [2_7]

关于政治家和君主的界定，柏拉图在他的著作——《政治家篇》中从哲学角度进行了推理论述，卡里古拉也从经验角度进行了同样的阐述。如果说伟大的国君很少出现是一个事实，那伟大的立法者的出现又该罕见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国君不过是遵照立法者所提供的政治规划而已。如果说立法者是发明机器的工程师，国君只不过是组装机器的技术工人而已。孟德斯鸠说，当一个政治体诞生时，是共和国的领导者创建了制度，然后制度又反过来塑造领导者。

He who dares to undertake the making of a people's institutions ought to feel himself capable, so to speak, of changing human nature, of transforming each individual, who is by himself a complete and solitary whole, into part of a greater whole from which he in a manner receives his life and being; of altering man's constitution for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it; and of substituting a partial and moral existence for the physical and independent existence nature has conferred on us all. He must, in a word, take away from man his own resources and give him instead new ones alien to him, and incapable of being made use of without the help of other men. The more completely these natural resources are annihilated, the greater and the more lasting are those which he

acquires, and the more stable and perfect the new institutions; so that if each citizen is nothing and can do nothing without the rest, and the resources acquired by the whole are equal or superior to the aggregate of the resources of all the individuals, it may be said that legislation is at the highest possible point of perfection.

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敢于承担起创建民族制度重任的人，必须自信有改造人性的能力，他要把每个完整而独立的个人转变成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个体从整体中重新获得了他的生命和存在方式；他要能够弱化人类原来的组织结构以强化新的政治组织，并用道德的、集体的存在方式取代人们获于自然那种生理的、独立的存在方式。总而言之，就是先剥夺一个人的原有力量，再赋予他一种外在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必须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运用。这种自然力量剥夺得越是彻底，他所重新获得的力量越是强大、越是持久，而新的社会制度就越是稳固、越是完美。公民没有集体的力量便一事无成，如果集体的力量大于或等于所有人自然力量的总和，那我们就可以说，立法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

The legislator occupies in every respect an extraordinary position in the State. If he should do so by reason of his genius, he does so no less by reason of his office, which is neither magistracy, nor Sovereignty. This office, which sets up the Republic, nowhere enters into its constitution; it is an individual and superior function, which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human empire; for if he who holds command over men ought not to have command over the laws, he who has command over the laws ought not any more to have it over men; or else his laws would be the ministers of his passions and would often merely serve to perpetuate his injustices: his private aims would inevitably mar the sanctity of his work.

立法者在所有方面都是国家的非凡人物。他的非凡不仅表现在他的才华上，还因为他的职位。这种职位既不是行政的也不是主权的，它创建了整个国家制度，却不在该国家机构中居于任何位置。这是一种超脱人类权力，独立的高级职能。因为，治人者不能立法，同样，立法者也不能治人。否则，法律就会被立法者的私人感情左右，从而被用于实施自己的不公正行为。立法这项神圣的事业就无法避免地被立法者的个人目的玷污。

When Lycurgus gave laws to his country, he began by resigning the throne. It was the custom of most Greek towns to entrus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ir laws to foreigners. The Republics of modern Italy in many cases followed this example; Geneva did the same and profited by it. [2_8] Rome, when it was most prosperous, suffered a revival of all the crimes of tyranny, and was brought to the verge of destruction, because it put the legislative authority and the sovereign power into the same hands.

当莱克格斯为他的国家制订法律时，他先放弃了王位。绝大部分的希腊城邦习惯于请外邦人来为他们制立法律。近代意大利的共和国也经常效仿这种做法；日内瓦共和国也是如此 [3_7] ，并发现此法相当有效。而在罗马鼎盛期，就是因为它的立法权力和主权权力集于一人之手，暴政统治的种种罪恶便不断显现，罗马便处于亡国的边缘。

Nevertheless, the decemvirs themselves never claimed the right to pass any law merely on their own authority. “Nothing we propose to you,” they said to the people, “can pass into law without your consent. Romans, be yourselves, the authors of the laws which are to make you happy.”

但是，即使是罗马的十人委员会也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拥有绝对的立法权威，他们对人民说："如果没有你们的允许，我们的提议就不能成为法律。罗马人，请自己制订法律去守护自己的幸福吧。"

He, therefore, who draws up the laws has, or should have, no right of legislation, and the people cannot, even if it wishes, deprive itself of this incommunicable right, because, according to the fundamental compact, only the general will can bind the individuals, and there can be no assurance that a particular will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general will, until it has been put to the free vote of the people. This I have said already, but it is worthwhile to repeat it.

可见，负责起草法律的人并不拥有立法权，而人民自己，就算有这种意愿，也不能放弃这种不可转移的权利。因为根据社会契约，只有公共意志才能约束个人行为。决定个人意志是否顺应公共意志，必须要通过全民自由投票表决。这一点我以前说过，再重复一次并非多余。

Thus, in the task of legislation we find together two things which appear to be incompatible: an enterprise too difficult for human powers, and, for its execution, an authority that is no authority.

由此，我们在立法者的工作中发现两种看似不相容的东西：一项超出人能力之外的任务和缺乏付诸执行的权威。

There is a further difficulty that deserves attention. Wise men, if they try to speak their language to the common herd instead of its own, cannot possibly make themselves understood. There are a thousand kinds of ideas which is impossible to translate into popular language. Conceptions that are too general and objects that are too remote are equally out of its range: each individual, having no taste for any other plan of government than that which suits his particular interest, finds it difficult to realise the advantages he might hope to draw from the continual privations good laws impose. For a young people to be able to relish sound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theory and follow the fundamental rules of statecraft, the effect would have to become the cause; the social spirit, which should be created by these institutions, would have to preside over their very foundation; and men would have to be, before law, what they should become by means of law. The legislator therefore, being unable to appeal to either force or reason, must have recourse to an authority of a different order, capable of constraining without violence and persuading without convincing.

另外，还有一个难题值得关注。智者往往会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通俗的语言对普通百姓说话，这类语言是不容易理解的，因为许多思想无法用大众语言来进行表达。正如太遥远的目标无法企及一样，太宽泛的概念人们也无法理解。作为个人来说，他只是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对于政府的建构他毫不关心。良好的法律在使他放弃某些私利的同时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这一点他也很难看到。要使一个新生的民族理解健康的政治原则并遵守国家的基本规则，就必须将原来的因果关系倒置：本应是社会制度新产物的社会精神反过来支配社会制度的创立，而人民不得不在法律诞生之前就成为法律将他们塑造成的那个样子。同时，由于立法者既无法使用强权，也不能通过辩论的方式达到他的目的，所以他必须求助于另一种权威，这种权威必须具有不武自威、不说必服的力量。

This is what has, in all ages, compelled the fathers of nations to have recourse to divine intervention and credit the gods with their own wisdom, in order that the peoples, submitting to the laws of the State as to those of nature, and recognising the same power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ity as in that of man, might obey freely, and bear with docility the yoke of the public happiness.

这就是为什么历代的开国者都不得不求助于上天的介入，把自己的智慧说成是神的意旨，这样人民才能像服从自然法则般遵从国家的法律，并且认识到正是创造人类的力量创造了国家，从而使人民自由地服从并温顺地承担起为公共事业谋福祉的责任。

This sublime reason, far above the range of the common herd, is that whose decisions the legislator puts into the mouth of the immortals, in order to constrain by divine authority those whom human prudence could not move. [2_9] But it is not anybody who can make the gods speak, or get himself believed when he proclaims himself their interpreter. The great soul of the legislator is the only miracle that can prove his mission. Any man may grave tablets of stone, or buy an oracle, or feign secret intercourse with some divinity, or train a bird to whisper in his ear, or find other vulgar ways of imposing on the people. He whose knowledge goes no further may perhaps gather round him a band of fools; but he will never found an empire, and his extravagances will quickly perish with him. Idle tricks form a passing tie; only wisdom can make it lasting. The Judaic law, which still subsists, and that of the child of Ishmael, which, for ten centuries, has ruled half the world, still proclaim the great men who laid them down; and, while the pride of philosophy or the blind spirit of faction sees in them no more

than lucky impostures, the true political theorist admires, in the institutions they set up, the great and powerful genius which presides over things made to endure.

立法者们将这种超越普通人理解力的崇高道理假托神明之口说出，目的是用神的威严来引领那些由于人类自身的谨慎而不为所动的人民 [3_8] 。但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通过神明立言，也并不是什么人只要假装是神明的代言人就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任。立法者的伟大灵魂才是使他能够彰显使命的真正奇迹。任何人一个人都可以去刻一个石碑，或买一道神谕，或谎称可以和某些神灵秘密沟通，或训练一只小鸟假装在耳边秘传神言，或用其他卑劣手段欺骗别人。诸如此类的把戏或许真的能纠集一群愚昧的群众，但不能建立起一个帝国，这种可笑的伎俩将会随着发明人的死去而消失。虚假的权威可以产生一种暂时的聚集，唯有智慧才能使一种结合体长久不衰。犹太法律至今仍然存在，而统治半个世界达十个世纪之久的伊斯梅尔人后嗣的法律至今仍然在彰显其起草者的丰功伟绩。那些自高自大的哲学和盲目的宗派思想可能会把这些伟人看做侥幸取胜的骗子，但真正的政治家将会从这些制度中认识并崇拜这些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伟大天才。

We should not, with Warburton, conclude from this that politics and religion have among us a common object, but that, in the first periods of nations, the one is used as an instrument for the other.

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得出跟沃伯顿一样的结论，认为政治和宗教对于人的作用是相同的。而应该说，只有在一个民族诞生之初，两者才会成为彼此利用的工具。

Chapter 8 The People

第八章　论人民

As, before putting up a large building, the architect surveys and sounds the site to see if it will bear the weight, the wise legislator does not begin by laying down laws good in themselves, but by investigating the fitness of the people, for which they are destined, to receive them. Plato refused to legislate for the Arcadians and the Cyrenæans, because he knew that both peoples were rich and could not put up with equality; and good laws and bad men were found together in Crete, because Minos had inflicted discipline on a people already burdened with vice.

建筑师在建造一座大厦之前要先勘测和检查地基，看它是否能承受大厦的重量。同样，一个有智慧的立法者也不会从制订一部良好的法律入手，而是首先弄清楚这部法律的统治对象能不能接受并支持它。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柏拉图拒绝为阿卡迪亚人和昔兰尼人制订法律，因为他深知这两个民族都同样富有，不会接受平等的法律。克里特就是一个拥有好法律和坏人民的例子，弥诺斯王曾经试图训导的是一些被邪恶支配的臣民。

A thousand nations have achieved earthly greatness, that could never have endured good laws; even such as could have endured them could have done so only for a very brief period of their long history. Most peoples, like most men, are docile only in youth; as they grow old they become incorrigible. When once customs have become established and prejudices inveterate, it is dangerous and useless to attempt their reformation; the people, like the foolish and cowardly patients who rave at sight of the doctor, can no longer

bear that any one should lay hands on its faults to remedy them.

世界上曾经存在过上千个未曾接受良好法律的显赫民族，即使是那些能够接受好法律的民族也只是在其历史上的某段短暂时期具有这种接受能力。多数的民族就如同人一样，在幼年时期适合教育，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便越来越顽固越来越僵化。这个民族的某种习俗一旦形成，或者某种偏见一旦生根，任何改革都成为冒险且徒劳的事情。一个民族是不会容忍别人触碰它的缺点的，哪怕是别人出于好心想消除这个缺点。这就如同那些愚蠢懦弱的病人讳疾忌医，见到医生就发抖。

There are indeed times in the history of States when, just as some kinds of illness turn men's heads and make them forget the past, periods of violence and revolutions do to peoples what these crises do to individuals: horror of the past takes the place of forgetfulness, and the State, set on fire by civil wars, is born again, so to speak, from its ashes, and takes on anew, fresh from the jaws of death, the vigour of youth. Such were Sparta at the time of Lycurgus, Rome after the Tarquins, and, in modern times, Holland and Switzerland after the expulsion of the tyrants.

如同某些疾病可以扰乱病人的大脑，从而使他失去对过去的记忆那样，有时国家的历史中也会出现某些动乱时期对整个民族产生深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如同重病对病人的影响。这时，对过去的恐惧便取代了遗忘。一个国家只有不忘记过去，才能够在饱经战火洗礼后重获新生，也就是说，才能够跳出死亡的怀抱重获青春。莱克格斯时期的斯巴达，塔尔干王朝之后的罗马就有着类似经历，现代社会的荷兰和瑞士在驱逐暴君后也同样重获新生。

But such events are rare; they are exceptions, the cause of which is always to be found in the particular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concerned. They cannot even happen twice to the same people, for it can make itself free as long as it remains barbarous, but not when the civic impulse has lost its vigour. Then disturbances may destroy it, but revolutions cannot mend it: it needs a master, and not a liberator. Free peoples, be mindful of this maxim: “liberty may be gained, but can never be recovered.”

但这种事例并不常见，它们只是些特殊例子，这需要从例外国家的特殊制度或历史环境来解释。这些事例甚至不可能在同一个民族中发生两次。一个民族的人民追求自由，只能在其未开化之时。当社会的元气耗费殆尽，人民只会在动乱中流离失所，革命也无力挽回这种局面。因为人民身上的锁链一旦被打破，他们就被分解成单独的个体，人民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善于统治的主人而不是解放者。自由的人啊，请你们记住这一句格言：自由可以获得，但绝不可失而复得。

Youth is not infancy. There is for nations, as for men, a period of youth, or, shall we say, maturity, before which they should not be made subject to laws; but the maturity of a people is not always easily recognisable, and, if it is anticipated, the work is spoilt. One people is amenable to discipline from the beginning; another, not after ten centuries. Russia will never be really civilised, because it was civilised too soon. Peter had a genius for imitation; but he lacked true genius, which is creative and makes all from nothing. He did some good things, but most of what he did was out of place. He saw that his people was barbarous, but did not see that it was not ripe for civilisation: he wanted to civilise it when it needed only hardening. His first wish was to make Germans or Englishmen,

when he ought to have been making Russians; and he prevented his subjects from ever becoming what they might have been by persuading them that they were what they are not. In this fashion too a French teacher turns out his pupil to be an infant prodigy, and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to be nothing whatsoever. The empire of Russia will aspire to conquer Europe, and will itself be conquered. The Tartars, its subjects or neighbours, will become its masters and ours, by a revolution which I regard as inevitable. Indeed, all the kings of Europe are working in concert to hasten its coming.

青春异于幼年。和人的成长一样，一个民族也要经历一个成熟期，这时它才有可能接受法律的制约。但这种成熟期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要想识别它并非易事，过早地实施法制往往只会导致失败。民族与民族也不相同，有的民族从诞生时就能接受法律，而有的民族就是等上十个世纪也未必可以。俄罗斯人从未实现过有效的治理，因为他们过早地进行了这种尝试。彼得大帝可以被称为一个极具模仿能力的人，却不能被称为天才。真正的天才具有创造性，能凭空创造一些新的事物。他所做的某些改革是合理的，但更多的举措不合时宜。他仅看到他治下的人民尚未开化，却未看到他们还没准备好接受政府的治理。此时他需要做的只是训练他的臣民以使他们成熟，而他却要试图使他们成为文明人；他试图将他的臣民改造成德国人或英国人而非俄罗斯人；他强迫他的臣民成为他们本不应该是的样子，却无法成为他们本应该是的样子。这就如同一位法国教师所采取的教育方法，把童年时期的孩童教得显姓扬名，而孩子长大后却一事无成。沙皇俄国企图征服欧洲，最终却发现自己被欧洲征服了。鞑靼人作为它的附庸和邻居将成为它的主人，也是我们的主人：这种革命在我看来已无可避免，欧洲所有的君主都在同心协力地加速这种革命的到来。

Chapter 9 The People (*continued*)

As nature has set bounds to the stature of a well-made man, and, outside those limits, makes nothing but giants or dwarfs, similarly, for the constitution of a State to be at its best, it is possible to fix limits that will make it neither too large for good government, nor too small for self-maintenance. In every body politic, there is a *maximum* strength which it cannot exceed and which it only loses by increasing in size. Every extension of the social tie means its relaxation; and, generally speaking, a small State is stronger in proportion than a great one.

大自然对正常人的身高给出了一定界限，超过这个范围的就是巨人或侏儒。一个体制极好的国家可拥有的疆域也同样有限，疆域过大往往很难实现好的治理，过小就很难自保。每个政治体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国力极限，过度的扩张往往使国力达不到这个极限。社会纽带延伸得越长，国力就会变得越弱。一般说来，在比例上，小国往往比大国更强大。

A thousand arguments could be advanced in favour of this principle. First, long distances makeadministration more difficult, just as a weight becomes heavier at the end of a longer lever. Administration, therefore, becomes more and more burdensome as the distance grows greater; for, in the first place, each city has its own, which is paid for by the people: each district its own, still paid for by the people; then, comes each province, and then the great governments, satrapies, and vice-royalties, always costing more the higher you go, and always at the expense of the unfortunate people. Last of all comes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on, which eclipses all the rest. All these over charges are a continual drain upon the subjects;

so far from being better governed by all these different orders, they are worse governed than if there were only a single authority over them. In the meantime, there scarce remain resources enough to meet emergencies; and, when recourse must be had to these, the State is always on the eve of destruction.

有上千个理由能证明上述说法的准确性。首先，距离越远，行政管理就越难进行，这就如同杠杆越长越难举重的道理。随着国家面积的扩展，行政级别增加，政府加在人民头上的负担便会加重。具体来说，在镇这一级的人民要支付镇级行政费用，再往上是地区一级，再往上是省，这样层层累积直到更高的行政机构，如总督府和王侯府。而且行政级别越高，花费越大，这层层级别的行政费用最后都落在了倒霉的百姓头上。最后能压垮一切的最高级别的中央政府。如此巨大的行政费用层层叠加，使臣民们几近被榨干。在这些超负荷下，臣民们远远不是被治理得更好。实际上，如果只有一级行政权力来管理他们的话，人民远比现在生活得更好。同时，国家没有任何可以动用的公共财力来应对紧急事件，一旦有不测发生，国家将会处于崩溃的边缘。

This is not all; not only has the government less vigour and promptitude for securing the observance of the laws, preventing nuisances, correcting abuses, and guarding against seditious undertakings begun in distant places; the people has less affection for its rulers, whom it never sees, for its country, which, to its eyes, seems like the world, and for its fellow-citizens, most of whom are unknown to it. The same laws cannot suit so many diverse provinces with different customs, situated in the most various climates, and incapable of enduring a uniform government. Different laws lead only to trouble and confusion among peoples which, living under the same rulers and in constant communication

one with another, intermingle and intermarry, and, coming under the sway of new customs, never know if they can call their very patrimony their own. Talent is buried, virtue unknown and vice unpunished, among such a multitude of men who do not know one another, gathered together in one place at the seat of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The leaders, overwhelmed with business, see nothing for themselves; the State is governed by clerks. Finally, the measures which have to be taken to maintain the general authority, which all these distant officials wish to escape or to impose upon, absorb all the energy of the public, so that there is none left for 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There is hardly enough to defend it when need arises, and thus a body which is too big for its constitution gives way and falls crushed under its own weight.

这还不是全部。太过辽阔的地域不仅使政府没有足够精力和更高效率来使人遵守法律、制止不满、防止权力滥用和阻止边远地区发生叛乱，也使臣民们对他们永远不得谋面的领袖、广阔无边的国家和大多数形同陌路的同胞们缺乏感情。各个省份因为风尚不同、气候迥异，而不能容忍同一种政府形式。同样的法律并不能同时适合所有的省份，而使用不同的法律则会使人民产生误解和混乱，因为这些人民处于同一个管理者的管辖中，并且处于不断地交流中，他们相互杂居、彼此通婚，不同的规则就会大行其道，人们永远都无法知道他们继承的传统究竟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当这样一大群彼此陌生的人被聚集到同一片领土上，置于同一至高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才能会被埋没，品德会被漠视，恶行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执政者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以至于他无法做到事必躬亲，他的大权被分化到其下级官吏手中。而众多边远地区的官吏们则时刻想着要逃避权力控制或窃取权力，执政者不得不忙于维护这种公共权威，这耗去了他所有的政治精力，以至于再也没有精力去关心百姓的福祉，甚至在必要时无力保卫人民。这样，一个体制过于庞大的共同体会在自身的重压之下衰落甚至破灭。

Again, the State must assure itself a safe foundation, if it is to have stability, and to be able to resist the shocks it cannot help experiencing, as well as the efforts it will be forced to make for its maintenance; for all peoples have a kind of centrifugal force that makes them continually act one against another, and tend to aggrandise themselves at their neighbours' expense, like the vortices of Descartes. Thus the weak run the risk of being soon swallowed up; and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for anyone to preserve itself except by putting itself in a state of equilibrium with all, so that the pressure is on all sides practically equal.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想拥有坚实的力量，它就必须为自己打下坚固的根基，这样才能够经受住它必须要经历的种种动荡，并能维护其为了自保而做的种种努力。因为所有的民族都有一种离心力，这种离心力使他们之间不断产生摩擦，并试图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这就如同笛卡儿所说的旋涡。因此，弱者总是处于被吞没的危险中。除非所有民族都能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使任何地方的人们或多或少一起承受压力，否则任何民族都不能保全自己。

It may therefore be seen that there are reasons for expansion and reasons for contraction; and it is no small part of the statesman's skill to hit between them the mean that is most favourable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tate.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reason for expansion, being merely external and relative, ought to be subordinate to the reasons for contraction, which are internal and absolute. A strong and healthy constitution is the first thing to look for; and it is better to count on the vigour which comes of good government than on the resources a great territory furnishes.

这就向我们表明，国家扩张有道理，收缩同样有道理。事实上，能在扩张与收缩之间找到一种最佳比例使国家最适合生存，是政治才华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一般情况下，领土扩张是外在的、相对的，而领土收缩则是内在的、绝对的，前者服从后者。一个强健的组织体制才应是国家施政的第一目标，因为这种仁政所产生的力量比起大片领土所产生的物产资源更为可靠。

It may be added that there have been known States so constituted that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conquests entered into their very constitution, and tha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mselves, they were forced to expand ceaselessly. It may be that they congratulated themselves greatly on this fortunate necessity, which none the less indicated to them, along with the limits of their greatness, the inevitable moment of their fall.

有人可能会补充说，曾经存在这种政治结构的国家，征服的必要性已经成为它们体制的一部分，它们为了维护自身而被迫不停地扩张自己的领土。也许这些国家曾经为自己的这种必要性沾沾自喜，殊不知这种必要性会在以后的事实中告诉它们，在它们鼎盛之极的时候，已经暗藏着无可避免的陨落时刻。

Chapter 10 The People (*continued*)

第十章　论人民（再续）

Abody politic may be measured in two ways—either by the extent of its territory, or by the number of its people; and there is, between these two measurements, a right relation which makes the State really great. The men make the State, and the territory

sustains the men; the right relation therefore is that the land should suffice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inhabitants, and that there should be as many inhabitants as the land can maintain. In this proportion lies the *maximum* strength of a given number of people; for, if there is too much land, it is troublesome to guard and inadequately cultivated, produces more than is needed, and soon gives rise to wars of defence; if there is not enough, the State depends on its neighbours for what it needs over and above, and this soon gives rise to wars of offence. Every people, to which its situation gives no choice save that between commerce and war, is weak in itself: it depends on its neighbours and on circumstances; its existence can never be more than short and uncertain. It either conquers others, and changes its situation, or it is conquered and becomes nothing. Only insignificance or greatness can keep it free.

可用两种方式来衡量一个政治体：疆域面积或人口数目。人口与领土面积之间存在一个恰当的比例，可以使国家变得真正强大。人构成了国家，而土地又养活了人，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合理比例要求有足够多的土地来养活其居民，同时也要求居民数量同样不超过土地容纳范围。只有在这种合适的比例上，一定数量的人民才能实现他们的最大力量。如果疆域过大，势必造成土地耕种不充分而且产出过剩，而过多的物产又会被邻国觊觎，容易引发防御性战争；如果情况相反，疆域过少，那这个国家就得依赖从邻国进口资源，受邻国牵制，不久就要引发侵略战争。如果只能在战争与贸易之间抉择，那么这个民族本质上就很脆弱。因为它要依赖事态发展，或者依赖邻国，它的存在必定是不稳固的、短暂的。它或者通过征服他国来改变自己的困境，或者被他国征服而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它只能因弱小或强大而保全自由。

No fixed relation can be stated between the extent of territory

and the population that are adequate one to the other, both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quality of land, in its fertility, in the nature of its products, and in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and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tempers of those who inhabit it; for some in a fertile country consume little, and others on an ungrateful soil much. The greater or less fecundity of women, the conditions that are more or less favourable in each country to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the influence the legislator can hope to exercise by his institutions must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legislator, therefore, should not go by what he sees, but by what he foresees; he should stop not so much at the state in which he actually finds the population, as at that to which it ought naturally to attain. Lastly, there are countless cases in which the particular local circumstances demand or allow the acquisition of a greater territory than seems necessary. Thus, expansion will be great in a mountainous country, where the natural products, i.e., woods and pastures, need less labour, where we know from experience that women are more fertile than in the plains, and where a great expanse of slope affords only a small level tract that can be counted on for vege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ontraction is possible on the coast, even in lands of rocks and nearly barren sands, because there fishing makes up to a great extent for the lack of land-produce, because the inhabitants have to congregate together more in order to repel pirates, and further because it is easier to unburden the country of its superfluous inhabitants by means of colonies.

在一片给定面积的土地上究竟安置多少人口合适并没有数学上的固定比例。这不仅因为不同土地有不同特点，比如土壤的肥沃程度不同、物产的种类不同以及气候条件差异，还因为不同国度的居民体格各不相同，比如一些生活在富饶土地上的居民对土地消耗甚少，而生活在贫瘠土地上的居民则消耗甚多。还需要考虑妇女的生育能力、对

人口增长或多或少有利的国情，以及立法者在制定制度时所预期的移民的数量。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立法者不应该根据现状而应根据对未来的预见作出判断。他不应该只考虑当时人口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的数量会是多少。最后，还会有无数种情况，比如在一些特殊条件下，人们需要或获准的土地大于所需，在多山的国家，耕地类型主要是森林和牧场，有丰富的自然产出，因此不需要太多的劳作。而且经验证明那里的妇女比平原的妇女具有更强的生育能力。这些地区山坡陡峭，只有很小部分的平地可供耕种，所以人们居住得非常分散；而海边的情况正好相反，人们聚集在一片很小的区域内，甚至可以在贫瘠不毛的礁石区或沙滩上生存，这是因为渔猎可以大量弥补农业产出的不足，人们也需要聚居在一起更好地抵御海盗入侵，还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海外殖民的方式来摆脱人口过剩的负担。

To these conditions of law-giving must be added one other which, though it cannot take the place of the rest, renders them all useless when it is absent. This is the enjoyment of peace and plenty; for the moment at which a State sets its house in order is, like the moment when a battalion is forming up, that when its body is least capable of offering resistance and easiest to destroy. A better resistance could be made at a time of absolute disorganisation than at a moment of fermentation, when each is occupied with his own position and not with the danger. If war, famine, or sedition arises at this time of crisis, the State will inevitably be overthrown.

为建立国家，除了上述人类制度的诸多条件，这个条件虽无法替代其他任何条件，但没有它，其他任何条件都不再起作用，这个条件就是：人民必须享有充分的和平。因为国家就如同军营，在初创时期是非常脆弱的，没有抵抗力、最易被消灭。一个国家在混乱时期也比在酝酿时期更有抵抗能力，因为在国家酝酿期，人们只考虑自己在国家中所处地位，而无视公共的危险。如果在这种关键时期遇到战争、

饥荒或叛乱，那这个国家将不可避免被颠覆。

Not that many governments have not been set up during such storms; but in such cases these governments are themselves the State's destroyers. Usurpers always bring about or select troublous times to get passed, under cover of the public terror, destructive laws, which the people would never adopt in cold blood. The moment chosen is one of the surest means of distinguishing the work of the legislator from that of the tyrant.

当然，也确曾有过很多在这种动乱中建立起来的政府，但真实的情况是也正是这些政府毁灭了自己的国家。那些篡权者往往选择动乱时期，利用公众的恐慌来颁布法律，而这些法律在正常情况是不可能被公众接受的。可以说，要分辨立法者或暴君，他们所选择的立法时间就是很明确的特征之一。

What people, then, is a fit subject for legislation? One which, already bound by some unity of origin, interest, or convention, has never yet felt the real yoke of law; one that has neither customs nor superstitions deeply ingrained, one which stands in no fear of being overwhelmed by sudden invasion; one which, without entering into its neighbours' quarrels, can resist each of them single-handed, or get the help of one to repel another; one in which every member may be known by every other, and there is no need to lay on any man burdens too heavy for a man to bear; one which can do without other peoples, and without which all others can do; [2_10] one which is neither rich nor poor, but self-sufficient; and, lastly, one which unites the consistency of an ancient people with the docility of a new one. Legislation is made difficult less by wha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up than by what has to be destroyed; and what makes success so rare is the impossibility of finding natural simplicity together with social requirements. All these conditions are indeed rarely found united, and therefore few States have good constitutions.

那么，什么样的民族适合接受法律呢？我的答案是：一个发现自己已经被某种利益关系、起源或或协议联结在一起，但还未曾受到法律真正约束的民族；一个习俗与迷信尚未根深蒂固的民族；一个不畏惧邻国突然侵袭、并且不参与到邻国矛盾中的民族，这个民族能抵挡得住任何一个邻国干预的影响或能够借助一国的帮助来对付另一国；一个每个成员都被其他成员所知、任何人都不需承担他所承担不起的负担的民族；一个可以不依靠其他民族就可以生存，并且其他民族也不依靠它生存的民族 [3_9] ；一个既不太富也不太穷能自力更生的民族。最后，它还是一个能结合新生民族可塑性和古老民族稳定性的民族。立法工作之所以艰难，更多地在于不是要建树什么，而在于要破坏什么；而立法成功的例子之所以稀少，则在于很难将自然的朴素性与社会的需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确，将上述条件整合在一起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世上也就没有几个体制良好的国家存在。

There is still in Europe one country capable of being given laws—Corsica. The valour and persistency with which that brave people has regained and defended its liberty well deserves that some wise man should teach it how to preserve what it has w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someday that little island will astonish Europe.

尽管如此，在欧洲还是有一个能够可以这样立法的地方，那就是科西嘉岛。这个勇敢的民族在恢复和维护它的自由时所表现出的坚定和英勇，使它有资格让一位智者来教导他们如何保障自由。我有一种

预感，这个小岛终有一天会使整个欧洲为之震惊。

Chapter 11 The Various Systems of Legislation

第十一章　论种种不同的法律体系

If we ask in what precisely consists the greatest good of all, which should be the end of every system of legislation, we shall find it reduce itself to two main objects, liberty and equality—liberty, because all particular dependence means so much force taken from the body of the State and equality, because liberty cannot exist without it.

如果探究全体人员的最大利益所在——这原本也应是每个法律体系的宗旨，我们会发现它可被归结为两个主要目标：自由和平等。自由，是因为国家的力量是个体依赖的源泉；平等，是因为如果没有平等，自由亦不复存在。

I have already defined civil liberty; by equality, we should understand, not that the degrees ofpower and riches are to be absolutely identical for everybody; but that power shall never be great enough for violence, and shall always be exercised by virtue of rank and law; and that, in respect of riches, no citizen shall ever be wealthy enough to buy another, and none poor enough to be forced to sell himself: [2_11] which implies, on the part of the great, moderation in goods and position, and, on the side of the common sort, moderation in avarice and covetousness.

我已经论述过什么是公民的自由。至于平等，这个词绝不能理解为所有人在权力和财产上都绝对平均分配，而是指权力不能发展为暴力，它只能根据威望和法律行使。就财产而言，平等就是没有公民可以富足到购买另一个公民，也没有一个公民可以贫穷到出卖自己[3_10]。这便意味着人们需要节制，位高权重的人应该节制自己的财富与势力；而地位相对卑下的人要克服困难，克制自己的贪欲和妄羡。

Such equality, we are told, is an unpractical ideal that cannot actually exist. But if its abuse is inevitable, does it follow that we should not at least mak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it?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the force of circumstances tends continually to destroy equality that the force of legislation should always tend to its maintenance.

有人会说：这种平等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但是，如果明知道滥权不可避免，难道就不应该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吗？正由于现实环境总存在不平等现象，我们所制定的法律才必须要倾向于保障平等。

But these general objects of every good legislative system need modifying in every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cal situation and the temper of the inhabitants; and these circumstances should determine, in each case, the particular system of institutions which is best, not perhaps in itself, but for the State for which it is destined. If, for instance, the soil is barren and unproductive, or the land too crowded for its inhabitants, the people should turn to industry and the crafts, and exchange what they produce for the commodities they lack. If, on the other hand, a people dwells in rich plains and fertile slopes, or, in a good land, lacks inhabitants, it

should give all its attention to agriculture, which causes men to multiply, and should drive out the crafts, which would only result in depopulation, by grouping in a few localities the few inhabitants there are. [2_12] If a nation dwells on an extensive and convenient coast-line, let it cover the sea with ships and foster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It will have a life that will be short and glorious. If, on its coasts, the sea washes nothing but almost inaccessible rocks, let it remain barbarous and ichthyophagous: it will have a quieter, perhaps a better, and certainly a happier life. In a word, besides the principles that are common to all, every nation has in itself something that gives them a particular application, and makes its legislation peculiarly its own. Thus, among the Jews long ago and more recently among the Arabs, the chief object was religion, among the Athenians letters, at Carthage and Tyre commerce, at Rhodes shipping, at Sparta war, at Rome virtue. The author of *The Spirit of the Laws* has shown with many examples by what art the legislator directs the constitution towards each of these objects.

这些只是一切完美制度的一般目标，在具体到某个国家时必须针对该国家的地区情况和居民特性所产生的关系来加以更改，正是在这些关系的基础上，每个民族都应该有针对自己的最好制度体系。这种制度本身或许不是最好的，但是对于其针对的国家来说却是最合适的。比如说，如果你们的土地太过贫瘠或你们的领土相对居民人口过于狭小吗，那你们就转向发展工艺和工业吧，这样就可以用工业产品来换取你们所缺乏的自然资源了。或者相反，如果你们占据了富饶的平原和辽阔的山川，你们拥有沃土无边却人口稀少，那就全心全力发展农业以增殖人口，并放弃导致人口减少的工业吧。因为工业总会减少农业人口，并把为数不多的人集中于一定的城市中 [3_11] 。如果你们占据绵长且便利的海岸，那就把海面布满船舶，大力发展商贸，你们将会收获一个短暂却辉煌的文明。如果你们的海岸边沿，只是海水在拍打无法靠近的岩石，那就做个野蛮的渔夫吧，你将拥有无比安宁

或许更快乐的生活，你也一定更加幸福。总之，除了那些对所有民族都通用的原则外，每个民族都有理由按自己特定的方式生活，实行那些只适合自己的法律。因此，古代的希伯来人和近代的阿拉伯人选择宗教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雅典人选择了文学；迦太基人和提尔人选择了贸易；罗得岛人选择了航海；斯巴达人选择了战争；罗马人选择了美德。《论法的精神》一书的作者采用无数事例证明了立法者是如何艺术地将体制引向这些目标的。

What makes the constitution of a State really solid and lasting is the due observance of what is proper, so that the natural relations are always in agreement with the laws on every point, and law only serves, so to speak, to assure, accompany and rectify them. But if the legislator mistakes his object and adopts a principle other than circumstances naturally direct; if his principle makes for servitude while they make for liberty, or if it makes for riches, while they make for populousness, or if it makes for peace, while they make for conquest—the laws will insensibly lose their influence, the constitution will alter, and the State will have no rest from trouble till it is either destroyed or changed, and nature has resumed her invincible sway.

要使一个国家的体制真正实现稳固与持久，必须遵循这样的规则：自然规律与法律在每一点上都能协调一致，而法律也正是用来保障、支持并调整这种规律的。但如果立法者弄错了他的目标，采取了与事物本质完全不符合的另一套原则，以至于一方倾向于奴役而另一方倾向于自由，或者一方追求财富而另一方追求人口增长，或者一方追求和平而另一方追求征服，那么法律的效力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弱，制度将遭到瓦解，国家就会处于动荡不安中直至毁灭或更迭。而战无不胜的自然将重新掌握自己的统治。

Chapter 12 The Division of the Laws

第十二章　法律的分类

If the whole is to be set in order, and the commonwealth put into the best possible shape, there are various relations to be considered. First, there is the action of the complete body upon itself, the relation of the whole to the whole, of the Sovereign to the State; and this relation, as we shall see, is made up of the relations of the intermediate terms.

为了使所有事务都井然有序，或者说为了尽可能赋予公众好的法律形式，我们需要考虑到各种关系。首先是整个政治体对于自身的作用力，即全体与全体的关系，或者说是主权体与国家的关系。以后我们会看到，这种关系由中间项的联系构成。

The laws which regulate this relation bear the name of political laws, and are also called fundamental laws, not without reason if they are wise. For, if there is, in each State, only one good system, the people that is in possession of it should hold fast to this; but if the established order is bad, why should laws that prevent men from being good be regarded as fundamental? Besides, in any case, a people is always in a position to change its laws, however good; for, if it choose to do itself harm, who can have a right to stop it?

规定着这种关系的法律被称为政治法。如果它制定得当，也可称之为基本法。如此称呼不无道理，因为既然只有一种最好的制度来治理这个国家，那么已经发现这个制度的民族就应该遵循它。但如果现有的制度不好，那为什么还要把妨碍人民生活秩序的法律当成基本法

呢？另外，一个民族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做主改变自己的法律，哪怕是最好的法律。如果一个民族的人们乐于伤害自己，那谁还有权不让他们这样做呢？

The second relation is that of the members one to another, or to the body as a whole; and this relation should be in the first respect as unimportant, and in the second as important, as possible. Each citizen would then be perfectly independent of all the rest, and at the same time very dependent on the city; which is brought about always by the same means, as the strength of the State can alone secure the liberty of its members. From this second relation arise civil laws.

第二种关系是国家成员间的关系，以及成员同整个政治体之间的关系。成员间的关系应尽可能地受制约，成员同政治体间的关系却是越广泛越好，这样能使每个公民在彼此完全独立的同时又极端依赖国家。这种结果总是通过同一手段实现，因为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为每个成员带来自由。这第二种关系产生了民法。

We may consider also a third kind of rela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law, a relation of disobedience to its penalty. This gives rise to the setting up of criminal laws, which, at bottom, are less a particular class of law than the sanction behind all the rest.

我们还可以考虑个体和法律之间的第三种关系，也就是违法和惩罚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刑法得以形成。从根本上说，与其说刑法是一种特定的法律形态，还不如把它看作对其他一切法律的裁定。

Along with these three kinds of law goes a fourth, most important of all, which is not graven on tablets of marble or brass, but on the hearts of the citizens. This forms the real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takes on every day new powers, when other laws decay or die out, restores them or takes their place, keeps a people in the ways in which it was meant to go, and insensibly replaces authority by the force of habit. I am speaking of morality, of custom, above all of public opinion; a power unknown to political thinkers, on which none the less success in everything else depends. With this the great legislator concerns himself in secret, though he seems to confine himself to particular regulations; for these are only the arc of the arch, while manners and morals, slower to arise, form, in the end, its immovable keystone.

在上述三种法律之外，还应加上第四种法律，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它没有刻在石碑上，也没有刻在铜器上，而是刻在了公民心中。是它开创了国家的真正体制。它每天都在积聚力量，当其他法律过时或消亡的时候，它复苏或取代这些法律。它可以使一个民族保持创造精神，使习惯的力量逐渐取代权威的力量。这里，我说的是风尚、习俗，是一个凌驾于所有舆论之上的法律范围，虽然它不为政治家所熟知，但其他法律的成败都取决于它。伟大的立法者们都懂得秘密关注它，尽管他们表面上只是在制定具体的规章条文，但他们明白这些个别的章节只是制度穹顶上的拱架，而缓慢发展的道德与风尚才是形成制度不可动摇的基石。

Among the different classes of laws, the political, which determine the forms of the government, are alone relevant to my subject.

在这些不同种类的法律形态中，只有决定政府形式的政治法才是我的题旨所在。

[2_1].To be general, a will need not always be unanimous; but every vote must be counted: any exclusion is a breach of generality.

[2_2]."Every interest," says the Marquis d'Argenson, "has different principles. The agreement of two particular interests is formed by opposition to a third." He might have added that the agreement of all interests is formed by opposition to that of each. If there were no different interests, the common interest would be barely felt, as it would encounter no obstacle; all would go on of its own accord, and politics would cease to be an art.

[2_3]."In fact," says Machiavelli, "there are some divisions that are harmful to a Republic and some that are advantageous. Those which stir up sects and parties are harmful; those attended by neither are advantageous. Since, then, the founder of a Republic cannot help enmities arising, he ought at least to prevent them from growing into sects" (*History of Florence* , Book vii).

[2_4].Attentive readers, do not, I pray, be in a hurry to charge me with contradicting myself. The terminology made it unavoidable, considering the poverty of the language; but wait and see.

[2_5].I understand by this word, not merely an aristocracy or a democracy, but generally any government directed by the general will, which is the law. To be legitimate, the government must be, not one with the Sovereign, but its minister. In such a case even a monarchy is a Republic. This will be made clearer in the following book.

[2_6].A people becomes famous only when its legislation begins to decline. We do not know for how many centuries the system of Lycurgus made the Spartans happy before the rest of Greece took any notice of it.

[2_7].Montesquieu, *The Greatness and Decadence of the Romans* , ch. i.

[2_8].Those who know Calvin only as a theologian much under-estimate the extent of his genius. The codification of our wise edicts, in which he played a large part, does him no less honour than his *Institute* . Whatever revolution time may bring in our religion, so long as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and liberty still lives among us, the

memory of this great man will be for ever blessed.

[2_9]."In truth," says Machiavelli, "there has never been, in any country, an extraordinary legislator who has not had recourse to God; for otherwise his laws would not have been accepted: there are, in fact, many useful truths of which a wise man may have knowledge without their having in themselves such clear reasons for their being so as to be able to convince others" (*Discourses on Livy,* Bk. v, ch. xi).

[2_10].If there were two neighbouring peoples, one of which could not do without the other, it would be very hard on the former, and very dangerous for the latter. Every wise nation, in such a case, would make haste to free the other from dependence. The Republic of Thiascala, enclosed by the Mexican Empire, preferred doing without salt to buying from the Mexicans, or even getting it from them as a gift. The Thiascalans were wise enough to see the snare hidden under such liberality. They kept their freedom, and that little State, shut up in that great Empire, was finally the instrument of its ruin.

[2_11].If the object is to give the State consistency, bring the two extremes as near to each other as possible; allow neither rich men nor beggars. These two estates, which are naturally inseparable, are equally fatal to the common good; from the one come the friends of tyranny, and from the other tyrants. It is always between them that public liberty is put up to auction; the one buys, and the other sells.

[2_12]."Any branch of foreign commerce," says M. d'Argenson, "creates on the whole only apparent advantage for the kingdom in general; it may enrich some individuals, or even some towns; but the nation as a whole gains nothing by it, and the people is no better off."

[3_1].意志要成为公共意志，没必要总是全体一致，但是必须把全部票数都计算在内。任何形式的例外都会破坏它的普遍性。

[3_2].阿冉松侯爵说：“每种利益都有它不同的原则，两种利益之间的协调是由于和第三种利益相对立而产生的。”他还可以再补充上：所有利益的协调是由于它和每种利益相对立形成的。如果没有不同利益的话，对于这种遇不上任何障碍的共同利益，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一切都将运转自如，政治也就不再是一种艺术了。

[3_3].马基亚维利说：“分裂有时候对共和国是有害的，而有些时候则对国家是有利的；害处是由派系派别造成的，而没有派系派别时则对国家是有利的。因此，既然一个国家的创立者不可能杜绝敌对者的存在，他就应该建立完善的制度来预防派系的出现。”（见《佛罗伦萨史》，第七卷）

[3_4].各位细心的读者，请不要过早地指责我的前后矛盾，我由于语言能力有限，无法避免用词上的矛盾，但还是请诸位等我把话说完吧。

[3_5].我认为，这个词并不是特指贵族制或民主制，而是在普遍意义上的由公共意志——也就是法律——指导下的任何政府。一个合法的政府必须不得与主权联合在一起，而只能是一个为主权服务的机构。所以，甚至是君主专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这一点将在本书第三卷中详细论述。

[3_6].一个民族只有在自己的体制开始衰落时，才会有名气。在希腊其他地方开始谈论之前，我们不知道莱克古斯的制度已经为斯巴达人造福好几个世纪了。

[3_7].那些只是把加尔文看做一个神学家的人并没有认识到其天才的高度。他在我们充满智慧的法令编纂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给他带来的荣誉绝不亚于他的《体制》（《论基督教的体制》）一书。不管我们的教会中会发生怎样的革命，只要对于国家和自由的热爱还没在我们心中泯灭，人们就将永远以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伟大的人物。

[3_8].马基亚维利在文中写道："事实的真相是，在任何国家中都不存在一个杰出的不借助于神明的立法者，如果不借助于神明，他的法律将不被接受。一个智者知道很多有用的真理，便是却无法通过一种可以说服人的方式表达出来。"（《李维论》，第五卷，第十一章）【原文为意大利文——译注】

[3_9].如果两个比邻而居的民族彼此依存，这种情况对一方是不利的，对于另一方则是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明智的民族都会尽快摆脱这种依赖的局面。斯拉斯加拉共和国处于被墨西哥帝国包围中，那里的人民宁可不用盐也不从墨西哥人那里购买，甚至也不接受他们馈赠的食盐。聪明的斯拉斯加拉人看到了墨西哥人慷慨背后隐藏的阴谋。他们维护了自己的自由，这个处于庞大帝国版图之内的一个小国家最终成为导致那个大帝国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3_10].你想让国家内部和谐统一吗？那么就要尽可能使两个极端靠拢，既没有十分富裕的人，也不能有乞丐。因为这两个天然不可分离的阶级对于公共幸福是同等致命的。一方面会产生出暴政的支持者，一方面会产生暴君。经常是这两个阶层之间进行着公共自由的交易：一个买进，一个卖出。

[3_11].阿冉松侯爵说："一般说来，任何对外贸易的部门都只能给王国带来虚幻的利益；它可能会使一部分人，甚至是一些大的城市变得富裕，但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能从中得到什么，而且人民也不会因此而生活得更好。"

BOOK III

第三卷

Before speaking of the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let us try to fix the exact sense of the word, which has not yet been very clearly explained.

在讨论不同的政府形式之前，我们先来确定一下“政府”一词的准确含义，因为迄今为止该词还没被很清楚地解释过。

Chapter 1 Government in General

第一章　政府总论

Iwarn the reader that this chapter requires careful reading, and that I am unable to make myself clear to those who refuse to be attentive.

我必须提醒我的读者，你们一定要仔细阅读本章，因为对于那些不打算集中精力阅读的人，我是没办法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

Every free action is produced by the concurrence of two causes; one moral, i.e., the will which determines the act; the other physical, i.e., the power which executes it. When I walk towards an object, it is necessary first that I should will to go there,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that my feet should carry me. If a paralytic wills to

run and an active man wills not to, they will both stay where they are. The body politic has the same motive powers; here both force and will are distinguished, will under the name of legislative power and force under that of executive power. Without their concurrence, nothing is, or should be, done.

任何自由行动的发生都由两个因素共同促成：一个是抽象意义上的因素，即决定这一行动的意愿；一个是物理意义上的因素，即执行这种行动的力量。如果我想实现一个目标，首先必须有实现这个目标的意愿，其次是要有实现的能力。一个想走的瘫痪病人和一个不想走的健康人，都只能原地不动。政治体的行为也同样具有两个因素，我们同样也可将它们划分为意愿和力量，前者被称为立法权力，后者被称为行政权力。如果没有这两种力的同时作用，政治体的任何行动都不能进行。

We have seen that the legislative power belongs to the people, and can belong to it alone. It may, on the other hand, readily be seen, from the principles laid down above, that the executive power cannot belong to the generality as legislature or Sovereign, because it consists wholly of particular acts which fall outside the competency of the law, and consequently of the Sovereign, whose acts must always be laws.

我们已经知道立法权力属于并只能属于人民。而另一方面，从本书前面章节所确定的原则中可以看出，与立法权和主权体不同，行政权力并不属于全体人命，它只在特定行为中实施，这种个别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范畴，因此它不属于制定法律的主权范畴，进而也不属于主权（其实施始终是法律）。

The public force therefore needs an agent of its own to bind it together and set it to work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general will, to serve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vereign, and to do for the collective person more or less what the union of soul and body does for man. Here we have what is, in the State, the basis of government, often wrongly confused with the Sovereign, whose minister it is.

因此，公众的力量需要有一个合适的代理人将公共的力量凝聚起来，让其在公共意志的指导下行动。作为在国家和主权体之间进行沟通的手段，这个代理人将国家和主权体结合起来，这就如同将灵魂与肉体结合为一个人。这就是国家需要有政府的原因，有时政府被错误地认为是主权体，其实它只是主权体的执行者而已。

What then is government? An intermediate body set up between the subjects and the Sovereign, to secure their mutual correspondence, charged with the execution of the law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liberty, both civil and political.

那么，究竟什么是政府呢？政府就是为了臣民和主权体的相互沟通而建立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体，它负责实施法律、维护政治和社会自由。

The members of this body are called magistrates or *kings* , that is to say *governors* , and the whole body bears the name *prince* . [3_1] Thus those who hold that the act, by which a people puts itself under a prince, is not a contract, are certainly right. It is simply and solely a commission, an employment, in which the rulers, mere

officials of the Sovereign, exercise in their own name the power of which it makes them depositaries. This power it can limit, modify or recover at pleasure; for the alienation of such a righ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body, and contrary to the end of association.

该中介体的成员称为行政官员或国王，即管理者，他们被统称为统治者 [4_1] 。这样看来，那种认为人民接受统治者领导的行为不是一种契约的看法非常正确，因为这种约定不过是一种任命或委托而已。在这一过程中，统治者不过是主权体的代理人，他们以主权体的名义行使主权体赋予的权力，主权体可以在任何时候限制、更改或收回这种权力。转让这一权利与社会共同体的本质不相容，也违背了社会契约的目的。

I call then *government* , or supreme administration, the legitimate exercise of the executive power, and prince or magistrate the man or the body entrusted with that administration.

因此，我把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者称为政府或最高行政，把执掌这一行政权力的人或机构称为君主或行政官员。

In government reside the intermediate forces whose relations make up that of the whole to the whole, or of the Sovereign to the State. This last relation may be represented as that between the extreme terms of a continuous proportion, which has government as its mean proportional. The government gets from the Sovereign the orders it gives the people, and, for the State to be properly balanced, there must, when everything is reckoned in, be equality

between the product or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taken in itself, and the product or power of the citizens, who are on the one hand sovereign and on the other subject.

在政府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中间力量，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全体与全体的关系以及主权体与国家的关系。后一种关系可以用不断变化比率的首尾两极来表示，而政府就是它们的比例中项。政府从主权体那里接受命令，然后发布给人民。如果想使一个国家处于正常的平衡状态，就必须权衡所有因素，使政府自身的乘积或幂，等于作为臣民的公民和作为主权体公民的乘积或幂。

Furthermore, none of these three terms can be altered without the equality being instantly destroyed. If the Sovereign desires to govern, or the magistrate to give laws, or if the subjects refuse to obey, disorder takes the place of regularity, force and will no longer act together, and the State is dissolved and falls into despotism or anarchy. Lastly, as there is only one mean proportional between each relation, there is also only one good government possible for a State. But, as countless events may change the relations of a people, not only may different governments be good for different peoples, but also for the same people at different times.

另外，如果上述三方关系中任意一方发生改变，就必然破坏了原来的等比关系。如果主权体要进行直接治理，或者行政官员想制定法律，又或者臣民不服从领导，那么秩序将被混乱取代，力量与意志不再协调行动，国家也会解体，从而陷入专制政府或者无政府状态。最后，正如两个数字之间只能有一个等比中项，一个国家也只可能有一个好政府。但是由于国家政事纷纭，民族的内部关系不断改变，所以不同的民族就应该有不同的政府形态，即使同一个民族在不同时期也

应该有不同的政府。

In attempting to give some idea of the various relations that may hold 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 terms, I shall take as an example the number of a people, which is the most easily expressible.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比率首尾两极存在的不同关系，我举人口数目作为例子，因为这是一种更容易清楚表达的关系。

Suppose the State is composed of ten thousand citizens. The Sovereign can only be considered collectively and as a body; but each member, as being a subject, is regarded as an individual: thus the Sovereign is to the subject as ten thousand to one, i.e., each member of the State has as his share only a ten-thousandth part of the sovereign authority, although he is wholly under its control. If the people numbers a hundred thous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subject undergoes no change, and each equally is under the whole authority of the laws, while his vote, being reduced to a hundred-thousandth part, has ten times less influence in drawing them up. The subject therefore remaining always a unit, the relation between him and the Sovereign increases with the number of the citizens. From this it follows that, the larger the State, the less the liberty.

假设一个国家有一万名公民，主权体只能被看做一个整体，但作为臣民的每个个人，则被考虑为一个个体，因此主权体相对于一个臣民的比例就是一万比一。就是说，国家的每个成员尽管完全从属于主权体，但它只享有一万分之一的主权权力。如果人口数目增加到十

万，因为每个臣民同其他臣民一样还要完全遵守法律的约定，所以臣民的地位没有变化，但作为主权者，他所分享到的只是十万分之一的表决权，比起以前对制定法律的影响力小了十倍。由于臣民总是作为单一的个体，所以他和主权体的比率根据公民人口数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得出结论：国家越大，自由越少。

When I say the relation increases, I mean that it grows more unequal. Thus the greater it is in the geometrical sense, the less relation there is in the ordinary sense of the word. In the former sense, the relation, considered according to quantity, is expressed by the quotient; in the latter, considered according to identity, it is reckoned by similarity.

当我说到比率增大时，我的意思是它离平等越来越远。因此，这个比率在几何意义上越大，在普通意义上就越小。前者考虑的是数量关系，是以数大小来衡量的；而后者考虑的是同一性，是以相似性来衡量的。

Now, the less relation the particular wills have to the general will, that is, morals and manners to laws, the more should the repressive force be increased. The government, then, to be good, should be proportionately stronger as the people is more numerous.

个别意志与公共意志之间的比率越小，即个人原则与法律之间的相似性越少，强制力量就必须越大。因此，如果政府要做到行动有序，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它必须相应加强其强制力。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growth of the State gives the depositaries of the public authority more temptations and chances of abusing their power, the greater the force with which the government ought to be endowed for keeping the people in hand, the greater too should be the force at the disposal of the Sovereign for keeping the government in hand. I am speaking, not of absolute force, but of the relative force of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tate.

另一方面，国家的扩大意味着给公共权力的掌握者更大的滥权机会和诱惑。随着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力加强，主权体对政府的控制力也必须要加强。这里我所说的并不是绝对权力，而是国家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相对力量。

It follows from this double relation that the continuous proportion between the Sovereign, the prince and the people, is by no means an arbitrary idea, but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the nature of the body politic. It follows further that, one of the extreme terms, viz., the people, as subject, being fixed and represented by unity, whenever the duplicate ratio increases or diminishes, the simple ratio does the same, and is changed accordingly. From this we see that there is not a single unique and absolute form of government, but as many governments differing in nature as there are States differing in size.

从以上双重比率中可以看出，主权体、君主与臣民三者之间的比例绝不是臆造出来的，而是政治体性质的必然产物。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出，既然连续比率的一端是作为臣民的人民，是作为一个固定的整体，总表现为“一”，那么随着双重比率的增大或缩小，单项比率也会同样增大或缩小，因此比例中间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表明，不存

在绝对且单一的政府形式，有多少大小不等的国家，就会有多少性质不同的政府形式。

If, ridiculing this system, any one were to say that, in order to find the mean proportional and give form to the body of the government, it is only necessary, according to me, to find the square root of the number of the people, I should answer that I am here taking this number only as an instance; that the relations of which I am speaking are not measured by the number of men alone, but generally by the amount of action,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a multitude of causes; and that, further, if, to save words, I borrow for a moment the terms of geometry, I am none the less well aware that moral quantities do not allow of geometrical accuracy.

或许有人会嘲笑这一公式，声称如果按照我的观点，要找到首尾项的比例中项并建立一个政府，只需计算出人口数字的平方根就可以了。那么我的回答是：我仅仅是举人口数量作为一个例子。而且我所说的各比率不仅取自人口数量，而是要根据更多行为数量来衡量，这些行为的发生又有数不清的原因。何况，我借用几何学术语只是为了让我的表达更简练，我当然深知道德数量并不像几何学那样精确。

The government is on a small scale what the body politic which includes it is on a great one. It is a moral person endowed with certain faculties, active like the Sovereign and passive like the State, and capable of being resolved into other similar relations. This accordingly gives rise to a new proportion, within which there is yet another, according to the arrangement of the magistracies, till an indivisible middle term is reached, i.e., a single ruler or supreme magistrate, who may be represented, in the midst of this

progression, as the unity between the fractional and the ordinal series.

政府就是大政治体的一个小型化，这个政治体中也包含了政府本身。它是一个被赋予了某些能力的虚拟人，它像主权体一样主动，像国家一样被动；它可被分解为一些类似的比例关系，从而产生新的比率。在这些新的比率上，我们可以按照行政官员的官阶继续进行分解，直到分解为一个单一的、不可再分的比率中项，即唯一的首领或最高行政官，我们可把他看成这一系列比例的中心，是逐级演进中一系列分数和一系列整数的那个“一”。

Without encumbering ourselves with this multiplication of terms, let us rest content with regarding government as a new body within the State, distinct from the people and the Sovereign, and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m.

为避免继续在这些复杂比例中纠缠不清，我们就简单地把政府看成国家中的一个新实体，它有别于人民和主权体，是位于二者之间的中介体。

There is between these two bodies this essential difference, that the State exists by itself, and the government only through the Sovereign. Thus the dominant will of the prince is, or should be, nothing but the general will or the law; his force is only the public force concentrated in his hands, and, as soon as he tries to base any absolute and independent act on his own authority, the tie that binds the whole together begins to be loosened. If finally the prince should come to have a particular will more active than the will of

the Sovereign, and should employ the public force in his hands in obedience to this particular will, there would be, so to speak, two Sovereigns, one rightful and the other actual, the social union would evaporate instantly, and the body politic would be dissolved.

国家与政府这两个实体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可以独立存在，而政府只能通过主权而存在。因此政府的主导意志应该是、而且必须是公共意志或者法律，它的力量不过是公众力量的集合。一旦它试图进行绝对的独立行动，联结共同体的纽带就开始松懈。如果政府的个别意志比主权体的公共意志活跃，并且为了使人民服从他的个别意志而动用他手中的公共力量，就会生成两个主权体，一个是法律上的，一个是事实上的。那么社会共同体将顷刻消亡，政治体也就随之解体。

However, in order that the government may have a true existence and a real life distinguishing it from the body of the State, and in order that all its members may be able to act in concert and fulfil the end for which it was set up, it must have a particular personality, a sensibility common to its members, and a force and will of its own making for its preservation. This particular existence implies assemblies, councils, power and deliberation and decision, rights, titles, and privileges belonging exclusively to the prince and making the office of magistrate more honourable in proportion as it is more troublesome. The difficulties lie in the manner of so ordering this subordinate whole within the whole, that it, in no way, alters the general constitution by affirmation of its own, and always distinguishes the particular force it possesses, which is destined to aid in its preservation, from the public force, which is destin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tate; in a word, it is always ready to sacrifice the government to the people, and never to sacrifice the people to the government.

然而，为了使政府这个实体能真正存在，能具有一个区别于国家实体的真正生命，为了使政府所有成员行动一致，从而符合建立它的目的，政府就必须成为一个特定的自我，拥有其成员的共同意识，拥有保障自身的意志和能力。这种特定的存在意味着政府要有议会、委员会、磋商和决定的权力、各种权利、君主专属的种种特权以及那种使行政官员职责越繁重越能得到相关回报的地位、头衔和权利。政府这样存在的困难在于；如何找到一种方法，在国家这个大的整体中安置政府这一小的整体，以使政府在强化自身体制的同时又不削弱国家公共体制的力量，使其能够把保存自身生存的自有力量区别于维持国家生存的公共力量。总之一句话，政府总要做好准备去为人民牺牲自己，而不是为了政府去牺牲人民。

Furthermore, although the artificial body of the government is the work of another artificial body, and has, we may say, only a borrowed and subordinate life, this does not prevent it from being able to act with more or less vigour or promptitude, or from being, so to speak, in more or less robust health. Finally, without departing directly from the end for which it was instituted, it may deviate more or less from it according to the manner of its constitution.

此外，尽管政府这一人为实体是另一人为实体的产物，只拥有一种外借的、附属的生命，但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凭借或多或少的力量和敏捷性采取行动，也不影响它享有或多或少的健康权。最后，即使它不会完全违背人们建立政府时的目标，但也有可能依照自己的结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偏离这个目标。

From all these differences arise the various relations which the

government ought to bear to the body of the State, according to the accidental and particular relations by which the State itself is modified, for often the government that is best in itself will become the most pernicious, if the relations in which it stands have altered according to the defects of the body politic to which it belongs.

偶然且特殊的关系会使国家发生改变，政府应根据这些关系和国家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所以，政府应随所属政治体出现的缺陷而加以改变。否则，原本最好的政府也往往会成为最糟的政府。

Chapter 2 The Constituent Principle in the Various Forms of Government

第二章　论不同政府形式的构成原则

To set forth the general cause of the above differences, we must here distinguish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ts principle, as we did before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vereign.

在阐述形成这些不同政府形式的一般原因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对政府与君主进行区分，就像我曾经对国家与主权体进行区分一样。

The body of the magistrate may be composed of a greater or a less number of members. We said that the relation of the Sovereign to the subjects was greater in proportion as the people was more numerous, and by a clear analogy, we may say the same of the relation of the government to the magistrates.

执政者团体成员的数量或多或少。我们已经说过主权与臣民的比率会随着臣民数目的增加而增长，同理可推，政府与执政者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同样的比率。

But the total force of the government, being always that of the State, is invariable; so, the more of this force it expends on its own members, the less it has left to employ on the whole people.

政府的全部权力在任何时候都等同于国家的权力，这点永远不会改变。因此，政府在自己成员身上耗费的力量越多，用在人民身上的力量就越少。

The more numerous the magistrates, therefore, the weaker the government. This principle being fundamental, we must do our best to make it clear.

因此，行政官员数量越多，政府就越弱。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们不妨将它解释得更清楚些。

In the person of the magistrate, we can distinguish three essentially different wills: first, the private will of the individual, tending only to his personal advantage; secondly, the common will of the magistrates, which is relative solely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prince, and may be called corporate will, being general in relation to the government, and particular in relation to the State, of which the government forms part; and, in the third place, the will of the people or the sovereign will, which is general both in relation to the

State regarded as the whole, and to the government regarded as a part of the whole.

我们可以在每个行政官员身上区分出三种本质不同的意志。第一种是他的个人意志，它只追求个人私利。第二种是行政官员们的共同意志，它只关心君主的利益，也可称之为团体意志。对政府来说它是一种公共意志，但对于政府从属的国家来说它是个别意志。第三种是人民的意志或主权体的意志，不论是对于整体的国家，还是对于构成整体的政府，它都是一种公共意志。

In a perfect act of legislation, the individual or particular will should be at zero; the corporate will belonging to the government should occupy a very subordinate position; consequently, the general or sovereign will should always predominate and should be the sole guide of all the rest.

在完善的法律体系中，个别或特殊的意志应该是不起作用的，政府的团体意志也是极其次要的，只有普遍的或主权体的意志才永远居于首位，是所有其他意志的唯一规范者。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order,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different wills become more active in proportion as they are concentrated. Thus, the general will is always the weakest, the corporate will second, and the individual will strongest of all: so that, in the government, each member is first of all himself, then a magistrate, and then a citizen—in an order exactly the reverse of what the social system requires.

然而，在自然规律中，这些不同的意志集中到一起时会变得更加活跃。因此，公共意志永远最弱，团体意志略强些，而个别意志总是居于首位。结果在政府中，每个成员首先是其自身，然后是行政官，最后才是公民。这一排列与社会秩序所要求的次序完全相反。

This granted that, if the whole government is in the hands of one man, the particular and the corporate will are wholly united, and consequently the latter is at its highest possible degree of intensity. But, as the use to which the force is put depends on the degree reached by the will, and as the absolute force of the government is invariable, it follows that the most active government is that of one man.

弄清这一点后，我们假定政府掌握在唯一一个人手里，此时个人意志和团体意志完全统一在一起，团体意志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现在，由于权力的实施强度取决于意志的强度，而政府的绝对权力是一个恒量，得出的结论是：最强有力的政府是一个人的政府。

Suppose, on the other hand, we unite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legislative authority, and make the Sovereign prince also, and all the citizens so many magistrates: then the corporate will, being confounded with the general will, can possess no greater activity than that will, and must leave the particular will as strong as it can possibly be. Thus, the government, having always the same absolute force, will be at the lowest point of its relative force or activity.

我们再来考虑另一种情况，如果把政府和立法权合并在一起，使主权体就是统治者，每个公民都是行政官员，那么团体意志就会和公

共意志统一起来，团体意志就不会比公共意志更具能动性，而个人意志依然保持原来的力度。此时的政府虽然依然拥有绝对权力，但在相对力量或能动性上却处于最低点。

These relations are incontestable, and there are other considerations which still further confirm them. We can see, for instance, that each magistrate is more active in the body to which he belongs than each citizen in that to which he belongs, and that consequently the particular will has much more influence on the acts of the government than on those of the Sovereign, for each magistrate is almost always charged with some governmental function, while each citizen, taken singly, exercises no function of Sovereignty. Furthermore, the bigger the State grows, the more its real force increases, though not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its growth; but, the State remaining the same, the number of magistrates may increase to any extent, without the government gaining any greater real force; for its force is that of the State, the dimension of which remains equal. Thus the relative force or activity of the government decreases, while its absolute or real force cannot increase.

这些关联是无可辩驳的，对其他方面的考察会使它们得到进一步证实。例如，处于政府中的行政官员比处于国家中的公民的行动更有能动性，政府中的个别意志比主权体约定中的个别意志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每个政府官员总有一些政府职能，而单个的公民却不具有任何主权职能。而且，国家越是扩展，政府的力量就会越大，尽管实际力量的增长与地域的扩张并不成正比。如果国家规模一定，行政官员数量增加再多，政府的力量也不会有丝毫增加，因为政府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而国家的力量并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绝对力或实际力量没有增加，它的相对力量或能动性却会减少。

Moreover, it is a certainty that promptitude in execution diminishes as more people are put in charge of it: where prudence is made too much of, not enough is made of fortune; opportunity is let slip, and deliberation results in the loss of its object.

还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参与管事的人越多，公共事务的处理便会越慢。大机构过于强调谨慎行事，从而坐失良机；遇事往往耽于无休止的讨论，很难作出有效的决定。

I have just proved that the government grows remiss in proportion as the number of the magistrates increases; and I previously proved that, the more numerous the people, the greater should be the repressive force. From this, it follows that the relation of the magistrates to the government should vary inversely to the relation of the subjects to the Sovereign; that is to say, the larger the State, the more should the government be tightened, so that the number of the rulers diminish in proportion to the increase of that of the people.

我刚才说明的是政府随成员增加效率会变低，前面我还证明过人民数量越多强制力量就应越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行政官员与政府之间的比率同臣民与主权体之间的比率恰好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国家越大，政府就应越精简。所以，行政官员的数量要随着臣民人口的增加而减少。

It should be added that I am here speaking of the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 government, and not of its rectitude: for,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re numerous the magistracy, the nearer the

corporate will comes to the general will; while, under a single magistrate, the corporate will is, as I said, merely a particular will. Thus, what may be gained on one side is lost on the other, and the art of the legislator is to know how to fix the point at which the force and the will of the government, which are always in inverse proportion, meet in the relation that is most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State.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我这里论述的是政府的相对权力而不是它的本性。因为，行政官员越多，团体意志越接近公共意志。相反，在只有一个统治者的情况下，如我前面所述，团体意志就只是一种个别意志。在一方面有所失，在另一方面就必有所得，立法者的艺术就在于寻求一个合适的度，使永远成反比的政府力量和政府意志得到最恰到好处的结合，使其最有利于国家。

Chapter 3 The Division of Governments

第三章　论政府的分类

We saw in the last chapter what causes the various kinds or forms of government to be distinguish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the members composing them: it remains in this to discover how the division is made.

在前面一章中，我们已经清楚了为什么要按组成政府的成员人数来划分各种政府形式，本章我们将要探讨的是这种分类是如何进行的。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overeign may commit the charge of the government to the whole people or to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so that more citizens are magistrates than are mere private individuals. This form of government is called *democracy*.

首先，主权体可将政府置于全体人民或绝大多数人民手中。这样，作为政府官员的公民数量就会比作为普通个人的公民数量多。我们把这种政府形式称为民主制。

Or it may restrict the government to a small number, so that there are more private citizens than magistrates; and this is named *aristocracy*.

若主权体将政府交付到少数人手中，使普通公民的数量多于行政官员，这种政府形式就称为贵族制。

Lastly, it may concentrate the whole government in the hands of a single magistrate from whom all others hold their power. This third form is the most usual, and is called *monarchy* , or royal government.

最后，主权体可以把整个政府都集中于一人之手，其他官员则从这个当权者手里获得权力。这种形式是最为常见的，称为君主制或皇室政府制。

It should be remarked that all these forms, or at least the first

two, admit of degree, and even of very wide differences; for democracy may include the whole people, or may be restricted to half. Aristocracy, in its turn, may be restricted indefinitely from half the people down to the smallest possible number. Even royalty is susceptible of a measure of distribution. Sparta always had two kings, as its constitution provided; and the Roman Empire saw as many as eight emperors at once without it being possible to say that the Empire was split up. Thus there is a point at which each form of government passes into the next, and it becomes clear that, under three comprehensive denominations, government is really susceptible of as many diverse forms as the State has citizens.

应该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形式，至少是前两种，行政官员的数量可以上下浮动，甚至可以有相当显著的变动。民主制官员数量可以从全体人民到半数人民；贵族制可以从半数人民到极少数人。即使是君主制政府也存在分权的可能。根据斯巴达的宪法，国家可以并存两个国王。罗马帝国甚至曾经同时拥有八个皇帝，而其统一性却没有遭到破坏。因此每种政府形式都可能在某一点上与另一种形式重合。政府形式只有三种名称。但实际上，一个国家拥有多少公民数目，就有可能存在多少种政府形式。

There are even more: for, as the government may also, in certain aspects, be subdivided into other parts, one administered in one fashion and one in anothe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forms may result in a multitude of mixed forms, each of which admits of multiplication by all the simple forms.

再者，同一政府可能在某些方面再分为各种不同的机构，每个机构都可以采取不同的行政方式，三种政府形式便可结合起来产生多种

混合形式。每种混合形式都可从这三种单一形式中演变出来。

There has been at all times much dispute concerning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the fact that each is in some cases the best, and in others the worst.

人们历朝历代都在争论这个问题：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殊不知，任何一种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可能是最好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可能是最坏的。

If, in the different States, the number of supreme magistrates should be in inverse ratio to the number of citizens, it follows that, generally, democratic government suits small States, aristocratic government those of middle size, and monarchy great ones. This rule is immediately deducible from the principle laid down.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count the innumerable circumstances which may furnish exceptions.

如果一个国家中最高行政官员的数量与公民人数成反比，那么一般说来，民主政府适合小国，贵族制政府适合中等国家，而君主制则适合大的国家。这一法则从我们已建立的原则中直接得出，但是我们该如何考量那些大量的例外情况呢？

Chapter 4 Democracy

第四章　论民主制

He who makes the law knows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how it should be executed and interpreted. It seems then impossible to have a better constitution than that in which the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powers are united; but this very fact renders the government in certain respects inadequate, because things which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are confounded, and the prince and the Sovereign, being the same person, form, so to speak, no more than a government without government.

立法者比任何人都清楚该如何解释法律和执行法律。于是最好的国家组织形式似乎应该是将执法权力与立法权力相结合。但是事实上，正是这种结合使这种政府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因为它将本该分离的权力结合起来。如果君主与主权体成为同一个人，那么可以说，建构起来的只会是一个没有政府的政府。

It is not good for him who makes the laws to execute them, or for the body of the people to turn itsattention away from a general standpoint and devote it to particular objects. Nothing is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influence of private interests in public affairs, and the abuse of the laws by the government is a less evil than the corruption of the legislator,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sequel to a particular standpoint. In such a case, the State being altered in substance, all reformation becomes impossible, A people that would never misuse governmental powers would never misuse independence; a people that would always govern well would not need to be governed.

由制定法律的人执行法律，或者这一结合体的人民将注意力从全面的角度转向个别的对象，这都并非好事。公众事务中最危险的莫过

于私人利益的影响，相比政府对法律权力的滥用，立法者追求个人利益的危害更为严重。一旦这种腐败行为发生了，国家肌体将遭到破坏，任何改革都无法挽回这个国家。一个从不滥用政府权力的民族也不会滥用独立，一个自我治理始终良好的民族也不需要由别人管理。

If we take the term in the strict sense, there never has been a real democracy, and there never will be. It is against the natural order for the many to govern and the few to be governed. It is unimaginable that the people should remain continually assembled to devote their time to public affairs, and it is clear that they cannot set up commissions for that purpose without the form of administration being changed.

从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民主制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由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是违反自然原则的。我们无法想象人民需要不断地集合起来处理公共事务的场景。而一旦人民为此设立一些专门机构，行政形式便很明显随之改变。

In fact, I can confidently lay down as a principle that, when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are shared by several tribunals, the less numerous sooner or later acquire the greatest authority, if only because they are in a position to expedite affairs, and power thus naturally comes into their hands.

我确信这样一个公理：如果政府的职能被许多机构分别掌握，那么，那些人数少的机构会慢慢获得最大的权威，仅仅因为他们处理事务方便自然而然就能大权在握。

Besides, how many conditions that are difficult to unite does such a government presuppose! First, a very small State, where the people can readily be got together and where each citizen can with ease know all the rest; secondly, great simplicity of manners, to prevent business from multiplying and raising thorny problems; next, a large measure of equality in rank and fortune, without which equality of rights and authority cannot long subsist; lastly, little or no luxury—for luxury either comes of riches or makes them necessary; it corrupts at once rich and poor, the rich by possession and the poor by covetousness; it sells the country to softness and vanity, and takes away from the State all its citizens, to make them slaves one to another, and one and all to public opinion.

何况，要建立一个民主制政府需要多少难以凑齐的先决条件啊！首先，国家要十分小，以便人民易于集合，认识彼此。其次，习俗和道德要极其简洁，以避免繁多的事务和棘手的讨论。第三，社会等级和财富要实现高度平等，否则权利和权威上的平等难以持久。最后，尽量杜绝奢侈现象。奢侈是财富过多造成的，或者可使财富成为一种必需。它既腐蚀富人，也腐蚀穷人，使国家陷入萎靡和虚荣之中，使一些人沦为其他一些人的奴隶。当它让所有人都成为公共舆论的奴隶时，国家便失去了所有的公民。

This is why a famous writer has made virtu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Republics; [3_2] for all these conditions could not exist without virtue. But, for want of the necessary distinctions, that great thinker was often inexact, and sometimes obscure, and did not see that, the sovereign authority being everywhere the same, the same principle should be found in every well-constituted State, in a greater or less degree, it is true, according to the form of the government.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著名作家把美德作为共和国基本原则的原因。因为没有美德，其他所有条件都无法维持。但是这位伟大的天才没有对事务进行必要的区分，所以他的论述常常不够精确，有时甚至不清晰。他没有看到，既然主权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同样的原则应适用于所有体制良好的国家。当然由于政府形式不同，它们的影响力也会有或大或小的差异。

It may be added that there is no government so subject to civil wars and intestine agitations as democratic or popular government, because there is none which has so strong and continual a tendency to change to another form, or which demands more vigilance and courage for its maintenance as it is. Under such a constitution above all, the citizen should arm himself with strength and constancy, and say, every day of his life, what a virtuous Count Palatine [3_3] said in the Diet of Poland: *Malo periculosam libertatem quam quietum servitium.* [3_4]

还要补充的是，民主制政府或人民制政府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更容易出现内战或动乱。因为没有任何政府会如此经常、如此强烈地想改变自己的形式，也没有任何政府需要如此的警觉与勇气来维持现有的形式。总之，在民主制度下，公民必须要时刻充满力量，坚定决心，并且在自己的一生中，每天都在心底重复德高望重的侯爵 [4_2] 在波兰议会上所说的话："我宁要动荡中的自由，也不要平静中的奴役。"

Were there a people of gods, their government would be democratic? So perfect a government is not for men.

如果有一个神的国度，他们可能会采用民主制来治理，但这种完美政府并不适合人类。

Chapter 5 Aristocracy

第五章　论贵族制

We have here two quite distinct moral person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vereign, and in consequence two general wills, one general in relation to all the citizens, the other only for the members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us,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may regulate its internal policy as it pleases, it can never speak to the people saved in the name of the Sovereign, that is, of the people itself, a fact which must not be forgotten.

这里我们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法人，即政府和主权体，因此就有了两个公共意志，一个是相对于全体公民而言，另一个是相对于行政当局的成员而言。因此，尽管政府可以任意对自己的内部事务作出规定，但它只能以主权体的名义，也就是以人民自身的名义，否则它无权对人民发号施令，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

The first societies governed themselves aristocratically. The heads of families took counsel together on public affairs. The young bowed without question to the authority of experience. Hence, such names as priests, elders, senate, and gerontes. The savages of North America govern themselves in this way even now, and their government is admirable.

最初的社会形态都是按照贵族制进行治理的，家族的家长们聚在一起商讨公共事务，年轻人心甘情愿服从于经验的权威，于是有了长老、元老、尊长、长官这些称呼。北美的土著人直到今天仍然采用这种治理方式，而且治理得相当不错。

But, in proportion as artificial inequality produced by institutions became predominant over natural inequality, riches or power [3_5] were put before age, and aristocracy became elective. Finally,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father's power along with his goods to his children, by creating patrician families, made government hereditary, and there came to be senators of twenty.

但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为的不平等逐渐战胜自然的平等，财富或权力 [4_3] 取代年龄开始为人看重，贵族制就变为选举的。最后，权力与财产的父子相传造就了贵族世家。政府也变成了世袭制，有时甚至会出现二十岁的元老。

There are then three sorts of aristocracy—natural, elective and hereditary. The first is only for simple peoples; the third is the worst of all governments; the second is the best, and is aristocracy properly so called.

所以有三种贵族制，即自然的、选举的和世袭的。第一种只适用于原始部族，第三种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糟糕的。而第二种是最好的，它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制。

Besides the advantage that lies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powers, it presents that of its members being chosen; for, in popular government, all the citizens are born magistrates; but here magistracy is confined to a few, who become such only by election. [3_6] By this means uprightness, understanding, experience and all other claims to pre-eminence and public esteem become so many further guarantees of wise government.

实行选举的贵族制除了有将主权体与政府两权分离的好处外，还有可以选择政府官员的好处。在民主制中，所有公民生而为行政官员，但贵族制把官员局限为少数人，他们只能由选举产生 [4_4] 。这种方式使得诚实、贤明、有经验以及其他受公民看重和尊重的品质成为一个明智政府的保障。

Moreover, assemblies are more easily held, affairs better discussed and carried out with more order and diligence, and the credit of the State is better sustained abroad by venerable senators than by a multitude that is unknown or despised.

再一点就是集会更易举行，事务也能得到更好的讨论，进而可以有序地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在外国人眼中，德高望重的元老们比那些不知名的或被人鄙视的群众更能很好地维护国家的名望。

In a word, it is the best and most natural arrangement that the wisest should govern the many, when it is assured that they will govern for its profit, and not for their own. There is no need to multiply instruments, or get twenty thousand men to do what a hundred picked men can do even better. But it must not be forgotten that corporate interest here begins to direct the public

power less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the general will, and that a further inevitable propensity takes away from the laws part of the executive power.

总而言之，如果能够确定他们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去治理民众，那么让贤明之士来治理民众这种方式自然是最好最符合自然法则的安排了。这样就无需增加管辖范围，选举出一百个人就能干好的事，就无需使用两万个人了。但必须要注意团体意志就此产生，它并不会严格地按照公共意志来指导国家力量，而且一部分行政权力将会不可避免地逃避法律的约束。

If we are to speak of what is individually desirable, neither should the State be so small, nor a people so simple and upright, that the execution of the laws follows immediately from the public will, as it does in a good democracy. Nor should the nation be so great that the rulers have to scatter in order to govern it and are able to play the Sovereign each in his own department, and, beginning by making themselves independent, end by becoming masters.

至于建构这种政府形式的特殊要求，一个国家不能太小，人民也不能太简单，太率直以便像好的民主制那样使法律的执行能直接来自公众意志。但它要求国家也不能太大，因为国家很大会导致分散的官员们可能在自己的辖地内取得主权者的权利，继而谋求自身独立，最终成为那块土地的主人。

But if aristocracy does not demand all the virtues needed by popular government, it demands others which are peculiar to itself;

for instance, moderation on the side of the rich and contentment on that of the poor; for it seems that thorough-going equality would be out of place, as it was not found even at Sparta.

尽管贵族制并不像民主制那样要求人民具有一定水准的美德，但它有着其他方面的德行要求，比如富人的节制和穷人的满足。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平等是不会存在的，即使在斯巴达也不例外。

Furthermore, if this form of government carries with it a certain inequality of fortune, this is justifiable in order that as a rule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affairs may be entrusted to those who are most able to give them their whole time, but not, as Aristotle maintains, in order that the rich may always be put first. On the contrary, it is of importance that an opposite choice should occasionally teach the people that the deserts of men offer claims to pre-eminence more important than those of riches.

然而，虽说这种政府形式允许一定的财富不公存在，那也只是为了在一般情况下将公共事务的管理托付给那些能够为其付出他所有时间的人，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富人理应受到重视。相反，有时对立的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可以教育人民，优秀的品质比富有更为重要。

Chapter 6 Monarchy

第六章　论君主制

So far, we have considered the prince as a moral and collective

person, unified by the force of the laws, and the depositary in the State of the executive power. We have now to consider this power when it is gathered together into the hands of a natural person, a real man, who alone has the right to dispose of 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Such a person is called a monarch or king.

之前，我们一直把统治者视作一个由法律力量结合起来的法人，他被赋予了国家和集体的行政权力。现在，我们所要考虑的是，当这些权力集中于一个真正的自然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手里，并且只有他才能行使由法律授权的权力时，这个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君主，或国王。

In contrast with other forms of administration, in which a collective being stands for an individual,in this form an individual stands for a collective being; so that the moral unity that constitutes the prince is at the same time a physical unity, and all the qualities, which in the other case are only with difficulty brought together by the law, are found naturally united.

其他政府形式是由一个集体的法人代表来代表一个人执政，而在君主制中，一个个人代表了一个集体的存在。构成统治者的统一体是抽象的，但同时也是一个具体的人。在其他政府形式中，法律要花费很大精力将这些权力结合在一起；而在君主制中，这些很自然地就实现了。

Thus the will of the people, the will of the prince, the public force of the State, and the particular force of the government, all answer to a single motive power; all the springs of the machine are

in the same hands, the whole moves towards the same end; there are no conflicting movements to cancel one another, and no kind of constitution can be imagined in which a less amount of effort produces a more considerable amount of action. Archimedes, seated quietly on the bank and easily drawing a great vessel afloat, stands to my mind for a skilful monarch, governing vast states from his study, and moving everything while he seems himself unmoved.

这样，人民的意志、统治者的意志、国家的公共力量、政府的个别力量，统统服务于一个驱动者；机器的所有机关都控制在一个人手里，一切都朝着同一目标迈进，而且不存在相互的矛盾来破坏这种前进状态。我们很难想象还有其他政府形式能用更小的力量产生比这更大的能量。在我看来，静静坐在河边，毫不费力地拖动一艘大船的阿基米德就如同一位精明的国君。这样的国君貌似不动声色，却能运筹于千里之外，坐在暖阁中就能将自己的辽阔王国治理得井然有序。

But if no government is more vigorous than this, there is also none in which the particular will holds more sway and rules the rest more easily. Everything moves towards the same end indeed, but this end is by no means that of the public happiness, and even the force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nstantly shows itself prejudicial to the State.

然而，如果没有任何政府形式比君主制更有活力，也就没有任何政府形式中的个人意志能像君主制这样更具支配力。尽管在君主制下，一切都朝着同一目标迈进，但这个目标并非为了人民福祉，而恰恰是这种行政力量在不断削弱国家的力量。

Kings desire to be absolute, and men are always crying out to them from afar that the best means of being so is to get themselves loved by their people. This precept is all very well, and even in some respects very true. Unfortunately, it will always be derided at court. The power which comes of a people's love is no doubt the greatest; but it is precarious and conditional, and princes will never rest content with it. The best kings desire to be in a position to be wicked, if they please, without forfeiting their mastery: political sermonisers may tell them to their hearts' content that, the people's strength being their own, their first interest is that the people should be prosperous, numerous and formidable; they are well aware that this is untrue. Their first personal interest is that the people should be weak, wretched, and unable to resist them. I admit that, provided the subjects remained always in submission, the prince's interest would indeed be that it should be powerful, in order that its power, being his own, might make him formidable to his neighbours; but, this interest being merely secondary and subordinate, and strength being incompatible with submission, princes naturally give the preference always to the principle that is more to their immediate advantage. This is what Samuel put strongly before the Hebrews, and what Machiavelli has clearly shown. He professed to teach kings, but it was the people he really taught. His *Prince* is the book of Republicans. [3_7]

国王们总想拥有绝对的权威，但是来自遥远地区百姓的呼声却告诉他们：要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好的方法就是受到人民的爱戴。这是一条很好的法则，并且从某些方面来看非常正确。不幸的是，这条法则只是朝堂上的一个笑柄。这种建立在人民爱戴基础上的权力当然是最强大的，但这种力量也是不确定的和短暂的，国王们当然不会满足于此。就是最好的国王也想在自己乐意的时候能做点坏事却不妨碍他继续做主子。政治说教者可能会游说国王，说既然人民的

力量就是国王的力量，那国王的最大利益莫过于使百姓繁荣富强、人丁兴旺、英勇坚强。但国王们深知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个人利益首先是要使人民虚弱贫困，从而永远无法反抗他们。我承认，如果国王的臣民们总是完全服从，那么人民的强大就是国王的强大，并且能使邻国都畏惧他的力量。但这只是第二位的从属利益，并且力量与彻底的服从总是不兼容的。所以国王们自然总是偏好那些对他们来说更直接有用的原则。这是撒姆尔对希伯来人强调过的，也是马基雅弗利所清楚证明过的——他以指导国王为借口向人民宣讲，他的《君主论》可以成为共和主义者的手册 [4_5] 。

We found, on general grounds, that monarchy is suitable only for great States, and this is confirmed when we examine it in itself. The more numerous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smaller becom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rince and the subjects, and the nearer it comes to equality, so that in democracy the ratio is unity, or absolute equality. Again, as the government is restricted in numbers, the ratio increases and reaches its *maximum* when the government is in the hands of a single person. There is then too great a distance between prince and people, and the State lacks a bond of union. To form such a bond, there must be intermediate orders, and princes, personages and nobility to compose them. But no such things suit a small State, to which all class differences mean ruin.

在对前面的一般性比率进行讨论时我们发现，君主制只适用于大的国家。而通过对君主制本身的研究，也会得到同一结果。公共行政人员越多，统治者与臣民间的比例就越少从而使两者趋于相等，成为一比一或实现民主制中的平等。这个比率又会随着政府人员的收缩而变大，并在政府集权于一个人时达到最大。但是这样，统治者与人民间的距离会过大，国家缺乏凝聚力，这就要求必须有中间阶层出现来

弥补这种缺陷。这些中间阶层包括亲王、总督、大臣等。但所有这些并不适用于小国，小的国家会被这层层社会规则毁灭。

If, however, it is hard for a great State to be well governed, it is much harder for it to be so by a single man; and everyone knows what happens when kings substitute others for themselves.

但是，如果治理好一个大国很困难，那由一个人来治理好就更困难了。一旦由国王指定代理人，每个人都明白会发生什么事情。

An essential and inevitable defect, which will always rank monarchical below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is that in a republic the public voice hardly ever raises to the highest positions men who are not enlightened and capable, and such as to fill them with honour; while in monarchies those who rise to the top are most often merely petty blunderers, petty swindlers, and petty intriguers, whose petty talents cause them to get into the highest positions at Court, but, as soon as they have got there, serve only to make their ineptitude clear to the public. The people is far less often mistaken in its choice than the prince; and a man of real worth among the king's ministers is almost as rare as a fool at the head of a republican government. Thus, when, by some fortunate chance, one of these born governors takes the helm of State in some monarchy that has been nearly overwhelmed by swarms of “gentlemanly” administrators, there is nothing but amazement at the resources he discovers, and his coming marks an era in his country's history.

君主制政府有一个本质上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使它劣于共和制政

府：在共和制中，人民总是把有才能的人推到高位，而这些人也总能以此为荣并很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而在君主制下，得势的却往往是无赖、骗子和阴谋家，这些人凭着小聪明爬到高位，而他们一旦位于高位就会向公众暴露出自己的无能和不称职。显然，人民在择人方面比君主犯的错误少。君主制内阁中真正优秀的人和共和制政府首脑中愚蠢的笨蛋同样少见。因此，如果有这样一种幸运的机会：一个天生有统治才能的君主开始执掌一个被投机钻营者们败坏了的国家，发挥的才能一定让每个人大吃一惊，而这位君主的出现便成为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For a monarchical State to have a chance of being well governed, its population and extent must be proportionate to the abilities of its governor. It is easier to conquer than to rule. With a long enough lever, the world could be moved with a single finger; to sustain it needs the shoulders of Hercules. However small a State may be, the prince is hardly ever big enough for it. When, on the other hand, it happens that the State is too small for its ruler, in these rare cases too it is ill governed, because the ruler, constantly pursuing his great designs, forgets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makes it no less wretched by misusing the talents he has, than a ruler of less capacity would make it for want of those he had not. A kingdom should, so to speak, expand or contract with each reign, according to the prince's capabilities; but, the abilities of a senate being more constant in quantity, the State can then have permanent frontiers without the administration suffering.

要把一个君主制国家治理好，它的人口和幅员大小就必须依治理者的才能而定。显然，夺天下易，治天下难。如果有足够长的杠杆，一根指头就可以反转世界；但要想支撑这个世界，就非要有大力士海格力斯的肩膀了。国家稍微大一点，君主治理起来就会力不从心。如

果情况相反，即国家的疆域相对于君主的能力太小时——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国家依然治理不好。因为君主为了自己的宏伟理想，往往会忘记人民的利益，结果他会滥用自己超凡的才能进行扩张。如此，带给人民的苦难并不亚于一个能力不足的庸主。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扩张或收缩都是依照君主的能力而定。相反，民主制国家中，元老院的治理能力更容易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国家会拥有固定不变的疆域，国家的治理也不会太坏。

The disadvantage that is most felt in monarchical government is the want of the continuous succession which, in both the other forms, provides an unbroken bond of union. When one king dies, another is needed; elections leave dangerous intervals and are full of storms; and unless the citizens are disinterested and upright to a degree which very seldom goes with this kind of government, intrigue and corruption abound. He, to whom the State has sold itself, can hardly help selling it in his turn and repaying himself, at the expense of the weak, the money the powerful have wrung from him. Under such an administration, venality sooner or later spreads through every part, and peace so enjoyed under a king is worse than the disorders of an interregnum.

一人专政的政府有一个可怕的缺陷，就是缺乏继承的连续性。在其他两种政府体系中，这种连续性为统一提供了永不间断的纽带。当一位君王去世后，便需要选出另一位新主，选举期便成为一个暴风骤雨般的动荡期。这时，除非这种政府中的公民比一般情况下更无私、更忠诚——而这根本不可能——否则贿赂与阴谋就会乘虚而入。靠收买而执掌国政的人上台后，很难保证他不会出卖国家以从弱者身上捞回以前被强者搜刮走的钱财。在这样的政府中，鬻爵盛行，一切都成为金钱交易。人们在有国王统治时享受到的这种和平比王位空缺时的混乱更糟糕啊。

What has been done to prevent these evils? Crowns have been made hereditary in certain families, and an order of succession has been set up, to prevent disputes from arising on the death of kings. That is to say, the disadvantages of regency have been put in place of those of election, apparent tranquillity has been preferred to wise administration, and men have chosen rather to risk having children, monstrosities, or imbeciles as rulers to having disputes over the choice of good kings. It has not been taken into account that, in so exposing ourselves to the risks this possibility entails, we are setting almost all the chances against us. There was sound sense in what the younger Dionysius said to his father, who reproached him for doing some shameful deed by asking: “Did I set you the example?” “No,” answered his son, “but your father was not king.”

人们为了防止这样的弊病出现曾做了些什么呢？人们曾使王位在某些家族中代代相传，并确定继承的秩序以防止在国王驾崩时发生争端。也就是说，用摄政的缺陷取代了选举的缺陷，这表明人们爱表面的安定胜过贤明的行政。人们宁愿让未成年的孩子、怪物、智障来当政，也不愿冒着发生冲突的危险去选择贤主。人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冒着危险做出这种二选一的选择时，他们已使一切机会都对自己不利了。小狄奥尼西奥斯曾因为一桩不光彩的事遭到父亲的指责：“我给你做过这种榜样吗？”小狄奥尼西奥斯狡猾地回答：“啊，可是您的父亲不是国王啊！”

Everything conspires to take away from a man who is set in authority over others the sense of justice and reason. Much trouble, we are told, is taken to teach young princes the art of reigning, but their education seems to do them no good. It would be better to begin by teaching them the art of obeying. The greatest kings whose

praises history tells were not brought up to reign: reigning is a science we are never so far from possessing as when we have learnt too much of it, and one we acquire better by obeying than by commanding. *“Nam utilissimus idem ac brevissimus bonarum malarumque rerum delectus cogitare quid aut nolueris sub alio principe, aut volueris.“* [3_8]

如果一个人从小就被培养如何去命令别人，那他的正义感和理性便极易被剥夺。据说，人们常会煞费苦心地将统治艺术传授给年轻的君主们，但结果显示，这种教育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益处。相反，教给他如何服从会更有效些。历史上那些名垂千古的君主并不是从小就接受统治教育。因为统治是这样一门学问，学得越多，掌握得越少，相比于统治，懂得服从可以让你更好地掌握这门学问。“辨别好与坏最有效和最便捷的方法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而不是站在国王的角度思考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 [4_6]

One result of this lack of coherence is the inconstancy of royal government, which, regulated now on one scheme and now on another,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 of the reigning prince or those who reign for him, cannot for long have a fixed object or a consistent policy—and this variability, not found in the other forms of government where the prince is always the same, causes the State to be always shifting from principle to principle and from project to project. Thus we may say that generally, if a court is more subtle in intrigue, there is more wisdom in a senate, and Republics advance towards their ends by more consistent and better considered policies; while every revolution in a royal ministry creates a revolution in the State; for the principle common to all ministers and nearly all kings is to do in every respect the reverse of what was done by their predecessors.

政府缺乏连续性的一个后果就是王室政权的不稳定性。政府有时执行这个计划，有时又有了另一个计划，这完全取决于执政国王或者代他执政的人的秉性。如此，政府便无法在较长时间内形成一个固定目标或连贯的政策。这种不确定性让国家朝令夕改，摇摆不定。而这种情况在其他政府形式下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那些政府的统治者是同一个人。由此可见，一般情况下，皇室宫廷多阴谋，而共和体的元老院多智慧；共和制国家沿着稳定而有效的指导向着固定的目标前进，而君主制政府每一次变更都带来国家的巨大变化，因为所有的大臣和国王都会颠覆他们前任统治者制定的政策，这几乎成为一条普遍的准则。

This incoherence further clears up a sophism that is very familiar to royalist political writers; not only is civil government likened to domestic government, and the prince to the father of a family—this error has already been refuted—but the prince is also freely credited with all the virtues he ought to possess, and is supposed to be always what he should be. This supposition once made, royal government is clearly preferable to all others, because it is incontestably the strongest, and, to be the best also, wants only a corporate will mor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general will.

这种不连贯性同时可以驳斥保皇派政治家们常用的诡辩，这种诡辩不仅包括前面我已经反驳过的谬论，即把公民政府喻为家庭管理，把国王比作一家之主，它还包括假定所有君主都拥有一个君主所应具备的德行，并把君主设想成他们所应有的样子。在这种假定下，君主政府显然优于其他政府形式，因为它毫无疑问是最强的政府。如果它的团体意志更符合公共意志，那它也是最好的政府了。

But if, according to Plato, [3_9] the “king by nature” is such a rarity, how often will nature and fortune conspire to give him a crown? And, if royal education necessarily corrupts those who receive it, what is to be hoped from a series of men brought up to reign? It is, then, wanton self-deception to confuse royal government with government by a good king. To see such government as it is in itself, we must consider it as it is under princes who are incompetent or wicked: for either they will come to the throne wicked or incompetent, or the throne will make them so.

但是，正如柏拉图所言，一个有天赋的国王是十分罕见的。自然和命运要多久才能交汇在一起造就出如此的明君呢？如果皇室的教育只会腐蚀那些接受这种教育的人，那么对于那些世袭的君主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因此，把君主政府等同于明君政府简直就是自欺欺人。要看清君主政府的本质，就必须观察它在最无能最邪恶的君主统治下的状况。因为如果君主不是在登基之前就昏庸无能，那就一定是在登上王位之后变得昏庸无能。

These difficulties have not escaped our writers, who, all the same, are not troubled by them. The remedy, they say, is to obey without a murmur: God sends bad kings in His wrath, and they must be borne as the scourges of Heaven. Such talk is doubtless edifying, but it would be more in place in a pulpit than in a political book. What are we to think of a doctor who promises miracles, and whose whole art is to exhort the sufferer to patience?

我们的理论家们不是没看到这些困难，但他们并不为此感到为难。他们告诉我们，解决的办法就是默默地服从。上帝在盛怒之中降下了昏君，人民就必须把那当做神的惩罚而忍受。的确，这种观点相

当有启发性，但我认为，把它放在教堂里进行布道应该比放在一本政治理论书里更合适。如果一个医生承诺会创造奇迹，而他的全部医术却只是鼓励病人一味地忍受病痛，对这样的医生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We know for ourselves that we must put up with a bad government when it is there; the question is how to find a good one.

每个人都知道，当我们有一个坏政府时我们必须去忍受它。但我认为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去寻找一个好的政府。

Chapter 7 Mixed Governments

第七章　论混合形式的政府

Strictly speaking,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simple government. An isolated ruler must have subordinate magistrates; a popular government must have a head. There is, therefor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xecutive power, always a graduation from the greater to the lesser number, with the difference that sometimes the greater number is dependent on the smaller, and sometimes the smaller on the greater.

严格来说，单一形式的政府是不存在的。一个唯一的统治者手下必须有一群从属的官员；一个民主政府也要有一个首领。因此，在行政权力的分配中，必定有从大到小的级别之分，而区别就是有时少数依赖多数，有时多数依赖少数。

Sometimes the distribution is equal, when either the constituent parts are in mutual dependence, as in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 or the authority of each section is independent, but imperfect as in Poland. This last form is bad, for it secures no unity i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 is left without a bond of union.

有时也有权力均等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或者是因为政府各组成部分相互依赖，如英国政府；或者是因为各部门虽拥有独立的权威但并不完善，如波兰政府。后一种形式不可取，因为这种政府并非统一的整体，国家也缺乏联系的纽带。

Is a simple or a mixed government the better? Political writers are always debating the question, which must be answered as we have already answered a question about all forms of government.

那么哪种政府形式更好呢？混合还是单一？政治理论家们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而我的回答与早些时候关于政府形式的回答是一样的。

Simple government is better in itself, just because it is simple. But when the executive power is not sufficiently dependent upon the legislative power, i.e., when the prince i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vereign than the people to the prince, this lack of proportion must be cured by the division of the government; for all the parts have then no less authority over the subjects, while their division makes them all together less strong against the Sovereign.

就本身而言，单一形式的政府最好，只是因为它简单。但是当行政权不完全依附于立法权时，也就是说，当统治者与主权体的比例大于人民与君主的比例时，就应当重新分割政府予以弥补这一比例上的失调。这样一来，政府各部门对臣民的权威并没有减少，但政府的分割使他们总体上不如主权体力量强大。

The same disadvantage is also prevented by the appointment of intermediate magistrates, who leave the government entire, and have the effect only of balancing the two powers and maintaining their respective rights. Government is then not mixed, but moderated.

这种失衡还可以通过设置中间官员来弥补。这种官员可以平衡并维持两边各自的权力并保证政府的完整性。这时，政府并没有变成混合型的，而是采用了中庸策略。

The opposite disadvantages may be similarly cured, and, when the government is too lax, tribunals may be set up to concentrate it. This is done in all democracies. In the first case, the government is divided to make it weak; in the second, to make it strong: for the *maxima* of both strength and weakness are found in simple governments, while the mixed forms result in a mean strength.

相反的缺陷也可用同样的方法来弥补：当政府结构松散时，可以建立一些机构来使它变得集中。在前一种情况下，政府被分割以削弱它的力量；而第二种情况则是为了加强它的力量。这是所有民主制国家都在实践的。单一形式的政府中同时存在着最强的力量和最弱的力量，而混合形式的政府却具有适中的力量。

Chapter 8 That All Forms of Government Do not Suit All Countries

第八章　论任何一种政府形式都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

Liberty, not being a fruit of all climates, is not within the reach of all peoples. The more this principle, laid down by Montesquieu, [3_10] is considered, the more its truth is felt; the more it is combated, the more chance is given to confirm it by new proofs.

自由不是任何气候都能长出的果实，因此并非任何民族都能获得它。孟德斯鸠提出了这一学说，人们对它越是深究，就越能体味它的真理性；对它越是反驳，就越有机会得到新的证据来证明它的正确性。

In all the governments that there are, the public person consumes without producing. Whence thendoes it get what it consumes? From the labour of its members. The necessities of the public are supplied out of the superfluities of individuals. It follows that the civil State can subsist only so long as men's labour brings them a return greater than their needs.

世界上任何政府中的公务人员都是只消耗不生产。他们所消费的那些东西来源于何方呢？都是各国成员的劳动所得，正是个人产出的过剩支持了这一公共需求。从这一点看，只有当人们的劳动生产出比自己需求更多的产品时，政府机构才会存在。

The amount of this excess is not the same in all countries. In

some it is considerable, in others middling, in yet others nil, in some even negative. The relation of product to subsistence depends on the fertility of the climate, on the sort of labour the land demands, on the nature of its products, on the strength of its inhabitants, on the greater or less consumption they find necessary, and on several further considerations of which the whole relation is made up.

但这种生产过剩在不同的国家是不相同的。有些国家剩余多些，有些国家剩余少些，而另外一些国家剩余为零，还有一些国家的产出甚至不敷消耗。这一比率取决于各国气候的好坏、土地所需要的劳动种类、物产的种类、当地居民的体力、居民需要的消费品的数量，以及促成这种关系形成的其他一些因素。

On the other side, all governments are not of the same nature: some are less voracious than other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re based on this second principle, that the further from their source the public contributions are removed, the more burdensome they become. The charge should be measured not by the amount of the impositions, but by the path they have to travel in order to get back to those from whom they came. When the circulation is prompt and well-established,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much or little is paid; the people is always rich and, financially speaking, all is well. On the contrary, however little the people gives, if that little does not return to it, it is soon exhausted by giving continually: the State is then never rich, and the people is always a people of beggars.

另一方面，不同的政府特性不同。有些政府消耗多些，有些消耗

少些。这种不同是基于另一种原则：税收离其源头愈远，它的负担就越大。在这里，衡量税收负担的依据不应是捐税的数量，而是税收从源头再回到纳税人手里所经过的距离。当这一循环迅速而顺畅时，赋税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人民总是富足而国家财政状况总是良好。相反，如果人民的持续纳税得不到回馈，那无论税赋有多轻，其源泉终归会在不断的榨取中变得干涸。这样，国家永远不会富裕，而人民永远贫困。

It follows that, the more the distance between people and government increases, the more burdensome tribute becomes: thus, in a democracy, the people bears the least charge; in an aristocracy, a greater charge; and, in monarchy, the weight becomes heaviest. Monarchy therefore suits only wealthy nations; aristocracy, States of middling size and wealth; and democracy, States that are small and poor.

由此可见，人民与政府的距离越远，他们的赋税就越沉重。所以，在民主制国家中，人民的税收负担最轻；贵族制国家中，负担要重一些；而在君主制国家中，负担最重。因此君主制只适用富裕的国家，贵族制适合财富和疆域都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而民主制则适合小而穷的国家。

In fact, the more we reflect, the more we fi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ree and monarchical States to be this: in the former, everything is used for the public advantage; in the latter, the public forces and those of individuals are affected by each other, and either increases as the other grows weak; finally, instead of governing subjects to make them happy, despotism makes them wretched in order to govern them.

的确，我们越是多加思索，就越能发现自由国家和君主国家之间存在诸多不同：前者，一切都是为了公众利益；后者的公众力量和私人力量成反比，一个增长会导致另一个减少。最终，君主专制政府不仅不会为了臣民的幸福而进行统治，反而会把人民拖入悲惨的境地以便治理。

We find then, in every climate, natural causes according to which the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it requires can be assigned, and we can even say what sort of inhabitants it should have.

以下要讲的每种气候条件下都有一些自然因素，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自然因素来决定最适合该气候的政府形式，甚至可以说出这种气候下的居民类型。

Unfriendly and barren lands, where the product does not repay the labour, should remain desert and uncultivated, or peopled only by savages; lands where men's labour brings in no more than the exact *minimum* necessary to subsistence should be inhabited by barbarous peoples: in such places all polity is impossible. Lands where the surplus of product over labour is only middling are suitable for free peoples; those in which the soil is abundant and fertile and gives a great product for a little labour call for monarchical government, in order that the surplus of superfluities among the subjects may be consumed by the luxury of the prince: for it is better for this excess to be absorbed by the government than dissipated among the individuals. I am aware that there are exceptions; but these exceptions themselves confirm the rule, in that sooner or later they produce revolutions which restore things

to the natural order.

那些贫瘠的不毛之地根本不值得开垦，那就任由它们荒芜、闲置，或者由原始人去住；那些劳动所得仅够民生所用的地区应由野蛮人居住，这些地方也不可能有政治社会；那些劳动产出比生活所需略有超出但超出不多的地区，适合自由的民族居住；那些拥有富饶肥沃的土地、劳动不多而所得丰盛的地区，适宜建立君主制，以使君主的奢侈生活能够消耗掉臣民的大量劳动剩余，因为这种剩余由政府吸收掉要比个人浪费掉好得多。我知道会有例外的情况存在，但这些例外也会证实以上的规律，因为这些例外的国家迟早都将爆发革命，从而又恢复到自然的安排。

General laws should always be distinguished from individual causes that may modify their effects. If all the South were covered with Republics and all the North with despotic States, it would be none the less true that, in point of climate, despotism is suitable to hot countries, barbarism to cold countries, and good polity to temperate regions. I see also that, the principle being granted, there may be disputes on its application; it may be said that there are cold countries that are very fertile, and tropical countries that are very unproductive. But this difficulty exists only for those who do not consider the question in all its aspects. We must, as I have already said, take labour, strength, consumption, etc., into account.

我们必须要将一般规律同影响一般规律的特殊规律区别开来。即便所有的南部地区都是共和制国家，而所有的北部地区都是君主专制国家，上述规律依然正确，即在只考虑气候的因素下，专制制度适合气候炎热的国家，野蛮的制度适合气候寒冷的国家，而优秀的政治体制只适合在气候温和的地区存在。我知道这一观点虽得到了人们的认

可，但在具体应用上仍会为人诟病。有人可能会说：寒冷地带也有肥沃的土地，而热带国家也可能十分贫瘠。这一问题对于那些从不全面考虑问题的人来说才称为难题。正如我所提到的那样，我们要考虑到劳动、力量、消费等各种因素。

Take two tracts of equal extent, one of which brings in five and the other ten. I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first consume four and those of the second nine, the surplus of the first product will be a fifth and that of the second a tenth. The ratio of these two surpluses will then be inverse to that of the products, and the tract which produces only five will give a surplus double that of the tract which produces ten.

假定有两块同等大小的土地，一块的产量为五，另一块的产量为十。如果第一块土地上居民的消耗为四，第二块土地上居民的消耗为九，那前者的剩余为五分之一，而后者的剩余为十分之一。这两者剩余的比率和它们产出的比率成反比，产量为五的土地剩余的是产量为十的土地剩余的两倍。

But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a double product, and I think no one would put the fertility of cold countries, as a general rule, on an equality with that of hot ones. Let us, however, suppose this equality to exist: let us, if you will, regard England as on the same level as Sicily, and Poland as Egypt—further south, we shall have Africa and the Indies; further north, nothing at all. To get this equality of product, what a difference there must be in tillage: in Sicily, there is only need to scratch the ground; in England, how men must toil! But, where more hands are needed to get the same product, the superfluity must necessarily be less.

但这里并不存在双倍产量的问题。我认为，一般不会有人将寒冷国度的肥沃程度等同于热带国家的肥沃程度。不过，我们姑且假定两者相等吧，比方说，英国的物产量等于西西里岛，波兰的物产量等于埃及，再往南一点就是非洲与印度，再往北一点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么怎样的农业技术会使它们的物产量相等呢？在西西里岛，只需刮刮地皮就能大量收获，而在英国就得花大力气耕作。如果某国需要增加大量的人力来生产与其他国家同样的物产，那这个国家的劳动剩余量必定少于他国。

Consider, besides, that the same number of men consume much less in hot countries. The climate requires sobriety for the sake of health; and Europeans who try to live there as they would at home all perish of dysentery and indigestion. “We are,” says Chardin, “carnivorous animals, wolv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Asiatics. Some attribute the sobriety of the Persians to the fact that their country is less cultivated; but it is my belief that their country abounds less in commodities because the inhabitants need less. If their frugality,” he goes on, “were the effect of the nakedness of the land, only the poor would eat little; but everybody does so. Again, less or more would be eaten in various provinces, according to the land's fertility; but the same sobriety is found throughout the kingdom. They are very proud of their manner of life, saying that you have only to look at their hue to recognise how far it excels that of the Christians. In fact, the Persians are of an even hue; their skins are fair, fine and smooth; while the hue of their subjects, the Armenians, who live after the European fashion, is rough and blotchy, and their bodies are gross and unwieldy.”

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同样多的人在热带国家消耗量相对少得多的

事实。在这样的气候中，人必须节制食欲才能保证健康。欧洲人到了热带国家，如果还像以前一样饮食，就会死于消化不良和痢疾。夏尔丹说："与亚洲人相比，我们就是如狼似虎的食肉动物。有人将波斯人的节俭归因于他们国家的不宜耕作。但我认为，他们之所以土地出产不丰是因为其居民所需不多。"他接着写道："如果他们的节约是土地贫瘠的结果，那就应该只有穷人才吃得少，但事实是每个人都是如此。而且人们发现，这里的人并没有根据省份的不同，或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吃得有多有少，这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都同样的节俭。他们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称只要看一看他们的肤色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其他国家要好得多。确实如此，波斯人皮肤光滑、美丽、细腻又干净，而附属于他们的亚美尼亚人，由于按照欧洲人的方式生活，皮肤粗糙而暗沉，身躯肥胖又笨重。"

The nearer you get to the equator, the less people live on. Meat they hardly touch; rice, maize, curcur, millet and cassava are their ordinary food. There are in the Indies millions of men whose subsistence does not cost a halfpenny a day. Even in Europe we find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of appetite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eoples. A Spaniard will live for a week on a German's dinner. In the countries in which men are more voracious, luxury therefore turns in the direction of consumption. In England, luxury appears in a well-filled table; in Italy, you feast on sugar and flowers.

越是靠近赤道，人们吃得越少，他们几乎不食用任何肉类。大米、玉米、粗麦粉、小米、木薯是他们的日常食物。在印度，数百万的人每天消耗食物的价值不到一便士。即使同在欧洲，北部人同南部人的胃口也迥然不同。一个德国人的一顿晚餐足够一个西班牙人吃上一礼拜。在那些胃口较大的国家，人们的奢侈也充分体现在吃的方面。如在英国，奢侈就是满桌的大鱼大肉；而到了意大利，奢侈则意味着你会受到糖与鲜花的款待。

Luxury in clothes shows similar differences. In climates in which the changes of season are prompt and violent, men have better and simpler clothes; where they clothe themselves only for adornment, what is striking is more thought of than what is useful; clothes themselves are then a luxury. At Naples, you may see daily walking in the Pausilippeum men in gold-embroidered upper garments and nothing else. It is the same with buildings; magnificence is the sole consideration where there is nothing to fear from the air. In Paris and London, you desire to be lodged warmly and comfortably; in Madrid, you have superb salons, but not a window that closes, and you go to bed in a mere hole.

服饰上的奢侈也体现出了类似的差异。在那些季节变化急遽且迅猛的地区，人们的衣着质地优良且简单；在那些将衣服视为一种装饰的地区，人们追求的是衣服的华丽而不是实用性，而衣着本身就是奢侈的事情。在那不勒斯，你每天都可以看到有人沿着博西利普山散步，他们穿着镶了金边的上衣，却赤着足。建筑方面也是如此，当完全不必担心风吹日晒时，人们便开始追求建筑物的富丽堂皇。在巴黎和伦敦，人们想的是如何能住得温暖而舒适。在马德里，人们虽拥有极为讲究的客厅，但是窗户大开，而他们所睡的卧室却像老鼠洞。

In hot countries foods are much more substantial and succulent; and the third difference cannot but have an influence on the second. Why are so many vegetables eaten in Italy? Because there they are good, nutritious and excellent in taste. In France, where they are nourished only on water, they are far from nutritious and are thought nothing of at table. They take up all the same no less ground, and cost at least as much pains to cultivate. It is a proved fact that the wheat of Barbary, in other respects inferior

to that of France, yields much more flour, and that the wheat of France in turn yields more than that of northern countries; from which it may be inferred that a like gradation in the same direction, from equator to pole, is found generally. But is it not an obvious disadvantage for an equal product to contain less nourishment?

热带国家的食物更有营养、更美味，这是第三种因素，它必然影响上述的第二种因素。意大利人为什么吃那么多蔬菜？因为那里的蔬菜质量好，营养高且味道佳。法国的蔬菜只是靠浇水长成，并无多少营养，在餐桌上也没什么价值。但即使这样，它们也没少占用土地，栽种时花费的力气也和意大利的蔬菜同样多。实验证明，西西里岛的小麦虽然质量不如法国小麦，但磨出来的面粉要比法国多得多，而法国小麦磨出的面粉又比北方小麦又多得多。由此我们可以推出：一般而言，从赤道到北极存在着一个类似的渐变过程。这样，同样数量的产品中却获得较少的出产，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不利条件吗？

To all these points may be added another, which at once depends on and strengthens them. Hot countries need inhabitants less than cold countries, and can support more of them. There is thus a double surplus, which is all to the advantage of despotism. The greater the territory occupied by a fixed number of inhabitants, the more difficult revolt becomes, because rapid or secret concerted action is impossible, and the government can easily unmask projects and cut communications; but the more a numerous people is gathered together, the less can the government usurp the Sovereign's place: the people's leaders can deliberate as safely in their houses as the prince in council, and the crowd gathers as rapidly in the squares as the prince's troops in their quarters. The advantage of tyrannical government therefore lies in acting at great distances. With the help of the rallying-points it establishes, its

strength, like that of the lever, [3_11] grows with distance. The strength of the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acts only when concentrated: when spread abroad, it evaporates and is lost, like powder scattered on the ground, which catches fire only grain by grain. The least populous countries are thus the fittest for tyranny: fierce animals reign only in deserts.

除了上述各种各样的差别，我还要补充一点，它从前面各因素中推出，又可以强化前面各因素。这个因素是：热带国家比寒冷国家所需的居民要少，但能供养的人口却多，这便为专制政府提供了双倍的剩余。相同数量的人民占据的地方越大，反抗就越发困难，因为他们不能迅速且秘密地聚集在一起进行筹划，政府就总可以轻易发现他们的密谋并及时切断通信。相反，人口越是集中，政府就越不容易侵犯主权者。首领们可以如君主身处内阁中议事一样安全地在家中策划；民众也可以如士兵在军营中集合一样迅速地在广场集合。因此，人们距离越远，对于暴君的统治越有好处。只要政府能为自己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点，根据杠杆原理 [4_7] ，政府的统治力量会随着距离的增长而增强。相反，人民的力量却是越集中才越有效。一旦这种力量分散开来，便会烟消云散，就如同火药散在地上后只能星星点点地燃烧。人口最稀少的国家最适合暴君的专制，凶猛的野兽只有在荒野里才能称王称霸。

Chapter 9 The Marks of a Good Government

第九章　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

The question “What absolutely is the best government?” is unanswerable as well as indeterminate; or rather, there are as many good answers as there are possible combinations in the absolute and relative situations of all nations.

如果人们一定要问什么是绝对意义上的最好政府，那么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它无法确定。或者可以说，各民族的绝对处境和相对处境有多少种可能的组合，就有多少种正确答案。

But if it is asked by what sign we may know that a given people is well or ill governed, that is another matter, and the question, being one of fact, admits of an answer.

但是如果有人问：判断某个特定民族是否得到良好治理的标志是什么？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对于这个实际问题则是可以给出回答的。

It is not, however, answered, because everyone wants to answer it in his own way. Subjects extol public tranquillity, citizens individual liberty; the one class prefers security of possessions, the other that of person; the one regards as the best government that which is most severe, the other maintains that the mildest is the best; the one wants crimes punished, the other wants them prevented; the one wants the State to be feared by its neighbours, the other prefers that it should be ignored; the one is content if money circulates, the other demands that the people shall have bread. Even if an agreement were come to on these and similar points, should we have got any further? As moral qualities do not admit of exact measurement, agreement about the mark does not mean agreement about the valuation.

然而，这个问题也不能得到切实的回答，因为每个人都会以自己

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臣民们要求的是公共安全，公民们颂扬的是个人自由；前者希望财产有保障，后者希望人身有保障；臣民们认为政府要尽量严厉，公民们认为政府要尽量宽容；前者提倡惩治犯罪，后者是提倡预防犯罪；前者觉得邻国惧怕自己的国家是好事，后者觉得自己的国家被邻国遗忘是好事；前者乐于金钱流通，后者则要求人民丰衣足食。但是，即使我们能在上述问题和类似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的认识就真的深入了吗？道德是没有精确衡量标准的，即使我们能对一些衡量标志达成一致，我们又如何能在评估方式上达成一致呢？

For my part, I am continually astonished that a mark so simple is not recognised, or that men are of so bad faith as not to admit it. What is the end of political association? The preservation and prosperity of its members. And what is the surest mark of their preservation and prosperity? Their numbers and population. Seek then nowhere else this mark that is in dispute. The rest being equal, the government under which, without external aids, without naturalisation or colonies, the citizens increase and multiply most, is beyond question the best. The government under which a people wanes and diminishes is the worst. Calculators, it is left for you to count, to measure, to compare.[1]

对我而言，我总是诧异于人们不能够认识到如此简单的一个标志，或者别有用心地否认这一标志。政治结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护其成员并使之繁荣兴旺。而它的成员得到保护和走向兴旺的最确切可靠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它们的人口数量。我们不必再去寻找这个标志之外的那些颇有争议的尺度了。假定其他所有条件都是一样的，在某个政府的治理下，不借助归化、移民和殖民等外来手段，其公民数量增长最快最多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在其治理下人民数量减少、逐渐衰弱的政府无疑是最坏的政府。统计学家们，接下来就是你们的

任务了：就请计算、衡量、比较吧。[1]

1: On the same principle it should be judged what centuries deserve the preference for human prosperity. Those in which letters and arts have flourished have been too much admired, because the hidden object of their culture has not been fathomed, and their fatal effects not taken into account. " *ldque apud imperitos humanitas vocabatur, cum pars servitutis esset.* " (Fools called "humanity" what was a part of slavery, Tacitus, *Agricola* , 31.) Shall we never see in the maxims books lay down the vulgar interest that makes their writers speak? No, whatever they may say, when, despite its renown, a country is depopulated, it is not true that all is well, and it is not enough that a poet should have an income of 100,000 francs to make his age the best of all. Les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apparent repose and tranquillity of the rulers than to the well-being of their nations as wholes, and above all of the most numerous States. A hail-storm lays several cantons waste, but it rarely makes a famine. Outbreaks and civil wars give rulers rude shocks, but they are not the real ills of peoples, who may even get a respite, while there is a dispute as to who shall tyrannise over them. Their true prosperity and calamities come from their permanent condition: it is when the whole remains crushed beneath the yoke, that decay sets in, and

that the rulers destroy them at will, and " *ubi solitudinem faciunt, pacem appellant.* " (Where they create solitude, they call it peace, Tacitus, *Agricola* , 31.) When the bickerings of the great disturbed the kingdom of France, and the Coadjutor of Paris took a dagger in his pocket to the Parliament, these things did not prevent the people of France from prospering and multiplying in dignity, ease and freedom. Long ago Greece flourished in the midst of the most savage wars; blood ran in torrents, and yet the whole country was covered with inhabitants. It appeared, says Machiavelli, that in the midst of murder, proscription and civil war, our republic only throve: the virtue, moral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citizens did more to strengthen it than all their dissensions had done to enfeeble it. A little disturbance gives the soul elasticity; what makes the race truly prosperous is not so much peace as liberty.

1: 人们应该根据同一个原则来判断哪个世纪更有利于人类的繁荣。人们曾经过分地尊崇艺术和文学繁荣的世纪，却不能洞察到这些文化背后的秘密企图。“无知者称之为‘人道’的，其实那是奴役的开始。”（引自塔西图的《阿格瑞科拉传》，塔西图：罗马历史学家）难道我们在读到这些箴言时，不能看出其背后所包括的促使作者如此写作的那些个人利益吗？不，不管他们说了些什么，也不管文化有多么灿烂，如果国家的人口减少了，就不能说这个国家治理

良好。一个诗人在他的时代即使能收入十万里弗，也不足以说明他所处的时代就是所有时代中最好的。一场冰雹可能会使几个地区受灾，但它很少会造成饥荒。叛乱和内战可能会使统治者极其惊慌，但对人民来说并不是真正的灾难，因为当统治阶层都忙于争权夺利时，人民甚至可以得到几个月的喘息机会，他们的灾难和兴旺都来自于那种永久不变的生存状态。当所有人都在枷锁下变得懈怠时，一切都开始毁灭了，这时，统治者就可以肆意地摧残他们了，“当他们的国土沦为废墟的时候，他们便说和平来临了。”（选自塔西图《阿格瑞科拉传》）当高官们的纠葛搅扰得法兰西王国不得安宁，当巴黎的副主教怀揣一把匕首参加议会时，法国人民依然生活幸福、人口繁盛、自由而富庶。以前，古希腊在最残酷的战争中繁荣起来，即使在暴乱中血流成河，但整个国家反而人丁兴旺。马基亚维利说：“看上去，在暗杀、流放和内战中，我们的共和国似乎变得更为强大。公民的品德、精神和独立性对共和国的巩固作用比所有的纷争对共和国的消弱作用更为有效。”些许的动荡可以赋予灵魂以活力，真正使人类繁茂的更多的不是和平，而是自由。

Chapter 10 The Abuse of Government and Its Tendency to Degenerate

第十章　论政府的滥用权力和它的衰退倾向

As the particular will acts constantly in opposition to the general will, the government continually exerts itself against the Sovereignty. The greater this exertion becomes, the more the

constitution changes; and, as there is in this case no other corporate will to create an equilibrium by resisting the will of the prince, sooner or later the prince must inevitably suppress the Sovereign and break the social treaty. This is the unavoidable and inherent defect which, from the very birth of the body politic, tends ceaselessly to destroy it, as age and death end by destroying the human body.

正如特殊意志总是不断反抗公共意志，政府也总是不断地与主权体作对。这种对抗的力量越大，政府机构就越腐败。而且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团体意志来制衡它，君主意志迟早会不可避免地压制主权体，从而破坏社会契约。从政治体诞生之日起，这一内在的必然缺陷就不断地使它走向衰落，就如衰老和死亡在不断破坏人的机体一样。

There are two general courses by which government degenerates, i.e., when it undergoes contraction, or when the State is dissolved.

政府的退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府自身的收缩，另一种是国家的解体。

Government undergoes contraction when it passes from the many to the few, that is, from democracy to aristocracy, and from aristocracy to royalty. To do so is its natural propensity.[2] If it took the backward course from the few to the many, it could be said that it was relaxed; but this inverse sequence is impossible.

当政府成员数目由多变少时，也就是从民主制走向贵族制，从贵族制走向君主制时，政府就发生了收缩。这是它的自然趋势[2]。当政府的成员人数朝另一个方面发展，即由少到多时，政府结构便松弛了，但这种逆向的发展是不可能发生的。

2: The slow form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in its lagoons are a notable instance of this sequence; and it is most astonishing that, after more than twelve hundred years' existence, the Venetians seem to be still at the second stage, which they reached with the *Serrar di Consiglio* in 1198. As for the ancient Dukes who are brought up against them, it is proved, whatever the *Squittinio della libertà veneta* may say of them, that they were in no sense sovereigns.

2: 威尼斯共和国在一片礁湖中缓慢形成和发展，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显著的例证；令人惊讶的是，经过一千二百年之后，威尼斯人似乎依然处在1198年由西拉尔·康塞里奥开始的第二阶段。至于人们所谴责的那些古代的大公们，不论《威尼斯自由论》这本书怎么说，都可以证明大公们原来不是他们的主权者。

A case certain to be cited against my view is that of the Roman Republic, which, it will be said, followed exactly the opposite course, and passed from monarchy to aristocracy and from aristocracy to democracy. I by no means take this view of it.

肯定有人会提出罗马共和国的例子来反驳我，说他们遵循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过程，从君主制过渡到贵族制，又从贵族制过渡到民主制。但我绝不同意这种看法。

What Romulus first set up was a mixed government, which soon deteriorated into despotism. From special causes, the State died an untimely death, as new-born children sometimes perish without reaching manhood. The expulsion of the Tarquins was the real period of the birth of the Republic. But at first it took on no constant form, because, by not abolishing the patriciate, it left half its work undone. For, by this means, hereditary aristocracy, the worst of all legitimate forms of administration, remained in conflict with democracy, and the form of the government, as Machiavelli has proved, was only fix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ibunate: only then was there a true government and a veritable democracy. In fact, the people was then not only Sovereign, but also magistrate and judge; the senate was only a subordinate tribunal, to temper and concentrat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nsuls themselves, though they were patricians, first magistrates, and absolute generals in war, were in Rome itself no more than presidents of the people.

罗穆鲁斯建立的第一个政府是混合政府，它随即堕落成为专制政府。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国家过早灭亡了，就像人们所看到的一个婴儿在未成年前就夭折一样。塔尔干王朝的被驱逐才标志着罗马共和国的真正诞生。但一开始它没有采用一种固定的形式，因为罗马人没能够废除贵族等级使得这一事业半途而废了。世袭贵族制作为合法行政机构中最糟糕的那一种，不断地与民主制发生冲突，正如马基亚维利所证明的，政府形式一直处于变化与不确定中直到有了保民官后才确定下来，从这时起才有了真正的政府和真正的民主制。这时，人民不仅是主权者，还是行政官和法官。元老院只是一个附属机构，来制约和集中政府的力量。执政官本人尽管是贵族、首席执政官、战争中的绝对统帅，但在罗马，他只是人民的管家而已。

From that point, the government followed its natural tendency, and inclined strongly to aristocracy. The patriciate, we may say, abolished itself, and the aristocracy was found no longer in the body of patricians as at Venice and Genoa, but in the body of the senate, which was composed of patricians and plebeians, and even in the body of tribunes when they began to usurp an active function: for names do not affect facts, and, when the people has rulers who govern for it, whatever name they bear, the government is an aristocracy.

正是从这时起，罗马政府开始依照它的自然走向，强

烈地趋向了贵族制。当贵族们好像是废除了自己的等级，贵族制不再像日内瓦和威尼斯那样存在于贵族等级的实体中，而是存在于贵族和平民们共同构成的元老院实体中，甚至是存在于篡夺了实际权力时的保民官实体里；因为名称并不能改变事物性质，当人民有了代表自己进行治理的首领时，不论这些首领有着怎样的名称，他们实际上就是贵族制。

The abuse of aristocracy led to the civil wars and the triumvirate. Sulla, Julius Caesar and Augustus became in fact real monarchs; and finally, under the despotism of Tiberius, the State was dissolved. Roman history then confirms, instead of invalidating, the principle I have laid down.

贵族制权力的滥用导致了内战和三方执政。苏拉、尤利西斯·恺撒和奥古斯都成为了事实上的君主，最后，国家在提贝留乌斯的专制下终于解体。如此看来，罗马历史并没有否定我的原则，而是恰恰证明了它。

Indeed, governments never change their form except when their energy is exhausted and leaves them too weak to keep what they have. If a government at once extended its sphere and relaxed its stringency, its force would become absolutely nil, and it would persist still less.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wind up the spring and tighten the hold as it gives way: or else the State it sustains will come to grief.

事实上，除非一个政府的能量被耗尽、衰弱到不能维持现状，否则它永远也不可能改变它的形式。一个政府如果在扩张过程中变得更加松弛，那么它的一切力量就会化为乌有，其自身也就难以生存下去。所以，当一个政府变得松弛时，必须上紧发条使其机构紧凑起来，否则它支撑的国家就会走向消亡。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tate may come about in either of two ways.

国家解体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发生。

First, when the prince ceases to administer the St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and usurps the Sovereign power. A remarkable change then occurs: not the government, but the State, undergoes contraction; I mean that the great State is dissolved, and another is formed within it, composed solely of th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which becomes for the rest of the people merely master and tyrant. So that the moment the government usurps the Sovereignty, the social compact is broken, and all private citizens recover by right their natural liberty, and are forced, but not bound, to obey.

第一种发生在统治者不再依法治国，而是篡夺了主权体的权力时。这时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不是其政府在收缩，而是国家在收缩。我的意思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解体了，而另一个国家又在它的体内形成。新的国家成员只包括原来的政府成员，对于其余人民来说，这个新的国家只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的暴君。因此，一旦政府颠

覆了主权体，社会契约立刻破灭，所有的公民理所当然又重新收回了他们天然自由，但他们的服从仅仅是出于强力的胁迫，并非出于道德的义务。

The same thing happens when th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severally usurp the power they should exercise only as a body; this is as great an infraction of the laws, and results in even greater disorders. There are then, so to speak, as many princes as there are magistrates, and the State, no less divided than the government, either perishes or changes its form.

相同的情况还发生在政府成员分别篡夺了他们本应作为一个整体来行使的权力的时候。这不仅是一种违法行为，还会引发更大的动乱。可以这样说，有多少个行政官员就可能有多少个君主，而国家也像政府一样四分五裂，最后它不是走向消亡，就是改变其形式。

When the State is dissolved, the abuse of government, whatever it is, bears the common name of *anarchy* . To distinguish, democracy degenerates into *ochlocracy* , and aristocracy into *oligarchy;* and I would add that royalty degenerates into *tyranny;* but this last word is ambiguous and needs explanation.

当国家解体时，不论政府的滥权为何种形式，都可被统称为无政府状态。更精确地说，就是民主制退化成暴民统治，而贵族制成为寡头政治。再补充一点，就是君主制会变成暴君制，但是最后这个词含义不清，所以需要另行解释清楚。

In vulgar usage, a tyrant is a king who governs violently and without regard for justice and law. In the exact sense, a tyrant is an individual who arrogates to himself the royal authority without having a right to it. This is how the Greeks understood the word “tyrant”: they applied it indifferently to good and bad princes whose authority was not legitimate. [3_12] *Tyrant* and *usurper* are thus perfectly synonymous terms.

人们通常理解的暴君是统治残暴、无视正义与法律的国王。而在确切意义上，暴君是指那些没有权利享有王权，却窃取王权的人。希腊人就是这样理解“暴君”一词含义的。他们不加区别地把这个称谓用于非法登基的国王，而不论其是好君主还是坏君主 [4_8] 。因此，暴君和篡权者是同义词。

In order that I may give different things different names, I call him who usurps the royal authority a *tyrant* , and him who usurps the sovereign power a *despot* . The tyrant is he who thrusts himself in contrary to the laws to gover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the despot is he who sets himself above the laws themselves. Thus the tyrant cannot be a despot, but the despot is always a tyrant.

为了使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名称，我把王权权威的篡夺者称为“暴君”，把主权权力的篡夺者称为“专制君主”。暴君虽然违背法律掌握政权，但却依照法律进行统治；专制君主却是将自己的权力置于法律之上。因此，暴君不一定是专制君主，专制君主却一定是暴君。

Chapter 11 The Death of the Body Politic

第十一章　论政治体的灭亡

Such is the natural and inevitable tendency of the best constituted governments. If Sparta and Rome perished, what State can hope to endure forever? If we would set up a long-lived form of government, let us not even dream of making it eternal. If we are to succeed, we must not attempt the impossible, or flatter ourselves that we are endowing the work of man with a stability of which human conditions do not permit.

这就是政府形式自然的、无法避免的趋势，哪怕它是最好的政府。斯巴达和罗马都灭亡了，我们还能期待什么样的国家能够永世长存呢？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种持久的制度，就不要梦想什么永恒了。如果想要成功，就不要去尝试那些不可能的事，也不要愚昧地自夸人类所创造的哪样东西是牢不可破的，因为人世间是不存在永恒的。

The body politic, as well as the human body, begins to die as soon as it is born, and carries in itselfthe causes of its destruction. But both may have a constitution that is more or less robust and suited to preserve them a longer or a shorter time.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is the work of nature; that of the State the work of art. It is not in men's power to prolong their own lives; but it is for them to prolong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life of the State, by giving it the best possible constitution. The best constituted State will have an end; but it will end later than any other, unless some unforeseen accident brings about its untimely destruction.

政治体如同人的身体，从出生那刻起就注定要死亡，而且它自身就存在着使自己灭亡的原因。但这两者身上都有或强或弱的机制，使

它们能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维持自己的生存。人体结构是大自然的产物，而国家结构是人为的作品。人类无法延长自己的寿命，但他们可以赋予国家一个好的体制，从而使国家尽可能长久地存在下去。尽管结构最佳的国家最后也要消亡，但如果没有意外事件使它早亡，它的存在必然要长于其他国家。

The life-principle of the body politic lies in the sovereign authority. The legislative power is the heart of the State; the executive power is its brain, which causes the movement of all the parts. The brain may become paralysed and the individual still live. A man may remain an imbecile and live; but as soon as the heart ceases to perform its functions, the animal is dead.

政治生命的关键在于主权权威，立法权力是国家的心脏，行政权力是指挥各部门运行的大脑。如果大脑瘫痪了，人还可以继续存活，尽管成了痴呆，却依然活着。然而，一旦心脏停止了跳动，它所属的身体就死去了。

The State subsists by means not of the laws, but of the legislative power. Yesterday's law is not binding to-day; but silence is taken for tacit consent, and the Sovereign is held to confirm incessantly the laws it does not abrogate as it might. All that it has once declared itself to will it wills always, unless it revokes its declaration.

国家的生存靠的不是法律，而是立法权力。虽然过去的法律不能约束现在，但基于沉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默许，如果主权体在它能废除法律时没有采取行动，那么它就不断地被认为认可了那些法律。那

么，主权体过去所声明的意愿就依然是它现在的意愿，除非它否决了过去的声明。

Why then is so much respect paid to old laws? For this very reason. We must believe that nothing but the excellence of old acts of will can have preserved them so long: if the Sovereign had not recognised them as throughout salutary, it would have revoked them a thousand times. This is why, so far from growing weak, the laws continually gain new strength in any well constituted State; the precedent of antiquity makes them daily more venerable: while wherever the laws grow weak as they become old, this proves that there is no longer a legislative power, and that the State is dead.

那么为什么古老的法律能获得人们的尊重呢？正是因为它们的古老。人们或许认为是古代法律的完美卓越使它们长久地保存下来。但事实上，如果不是主权体不断地承认它们有益，它们可能已经被废除过一千遍了。所以，在一个体制良好的国家里，法律不但不会变弱，反而会不断获取新的力量。对古老东西的偏爱使这些法律日益受到人们的尊重。当法律随着年代的久远而不断被削弱时，立法权力就不存在了，而国家也离死亡不远了。

Chapter 12 How the Sovereign Authority Maintains Itself

第十二章　论如何维持主权权威

The Sovereign, having no force other than the legislative power, acts only by means of the laws; and the laws being solely the authentic acts of the general will, the Sovereign cannot act save when the people is assembled. The people in assembly, I shall be

told, is a mere chimera. It is so to-day, bu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it was not so. Has man's nature changed?

除了立法权力之外，主权体再无其他任何力量，它只能通过法律来发挥作用。既然法律是公共意志的真实表达，所以只有当人们聚在一起时，主权体才能有所行动。“将人民聚集在一起？”人们会说，“那不是天方夜谭嘛！”这在今天看来确实是一种天方夜谭，但在两千年前却是现实。难道是人类的本性改变了吗？

The bounds of possibility, in moral matters, are less narrow than we imagine: it is our weaknesses, our vices and our prejudices that confine them. Base souls have no belief in great men; vile slaves smile in mockery at the name of liberty.

道德范畴可能存在的局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狭隘。正是我们的软弱、邪恶和偏见导致了这种狭隘。正如卑劣的灵魂不会信任伟大的人物，而低贱的奴隶会嘲笑“自由”这个字眼。

Let us judge of what can be done by what has been done. I shall say nothing of the Republics of ancient Greece; but the Roman Republic was, to my mind, a great State, and the town of Rome a great town. The last censu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in Rome four hundred thousand citizens capable of bearing arms, and the last computa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Empire showed over four million citizens, excluding subjects, foreigners, women, children and slaves.

让我们借已经发生的事情来考察一下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姑且不说古希腊共和国，在我看来，罗马共和国就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罗马城是个很大的城市，该城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显示，这里有四十万武装公民。而整个罗马帝国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是四百多万公民，这还不算那些臣民、异邦人、妇女、儿童和奴隶。

What difficulties might not be supposed to stand in the way of the frequent assemblage of the vast population of this capital and its neighbourhood. Yet few weeks passed without the Roman people being in assembly, and even being so several times. It exercised not only the rights of Sovereignty, but also a part of those of government. It dealt with certain matters, and judged certain cases, and this whole people was found in the public meeting-place hardly less often as magistrates than as citizens.

我们不难想象将首都及其周围市郊如此众多的人民聚集在一起开会是多么困难。而事实上，罗马市民很少有连续几周不集会的，有时甚至集会数次。人民不仅行使主权权利，还执行政府的一部分功能，他们处理某些事物，审判某些案件。在这种公众集会中，罗马人民不仅是公民，还是执政官员。

If we went back to the earliest history of nations, we should find that most ancient governments, even those of monarchical form, such as the Macedonian and the Frankish, had similar councils. In any case, the one incontestable fact I have given is an answer to all difficulties; it is good logic to reason from the actual to the possible.

上溯至各国的发轫时期，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古代政府，甚至像马其顿人和法兰克人那样的君主制政府，都有着类似的集会。无论如何，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本身就解决了所有的难题。在我看来，从事实中得出的推论是符合逻辑的。

Chapter 13 The Same (*continued*)

第十三章　论如何维持主权权威（续）

It is not enough for the assembled people to have once fixe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by giving its sanction to a body of law; it is not enough for it to have set up a perpetual government, or provided once for all for the election of magistrates. Besides the extraordinary assemblies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may demand, there must be fixed periodical assemblies which cannot be abrogated or prorogued, so that on the proper day the people is legitimately called together by law without need of any formal summoning.

集会在一起的人民通过制定国家法律建立了国家的体制，这是不够的；人民建立一个永久的政府或一劳永逸地提出行政官员的选举办法，这也是不够的。除了那些因意外事件的发生所必须举行的特殊集会外，还要有固定的、定期的集会，而且不能任意取消或推迟。这样，到了规定集会的日子，人民便会依据法律规定召开会议，而不需要其他正式通知。

But, apart from these assemblies authorised by their date alone, every assembly of the people not summoned by the magistrates appointed for that purpos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scribed

forms, should be regarded as unlawful, and all its acts as null and void, because the command to assemble should itself proceed from the law.

但是，除了这些依法定日期举行的合法会议，人民的其他任何集会，即没有经过专门负责此事的官员通过预定形式召集的人民集会，都应该被视为非法集会，会上所有的决议也被视为无效决议。因为集会的命令本身就应该由法律发出。

The greater or less frequency with which lawful assemblies should occur depends on so many considerations that no exact rules about them can be given. It can only be said generally that the stronger the government, the more often should the Sovereign show itself.

至于合法集会的频率，则受太多因素的制约，因而不能给出明确的规定。一般而言，政府力量越大，主权体就应越频繁地出面表达自己观点。

This, I shall be told, may do for a single town; but what is to be done when the State includes several? Is the sovereign authority to be divided? Or is it to be concentrated in a single town to which all the rest are made subject?

或许有人会说，于单一的城镇来说这或许可行，但如果一个国家包括若干个城市，又当如何处理？是把主权权威平分呢？还是把主权集中于某个特定的城镇并使其他的城镇从属于它？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I reply. First, the sovereign authority is one and simple, and cannot be divided without being destroyed. In the second place, one town cannot, any more than one nation, legitimately be made subject to another, because the essence of the body politic lies in the reconciliation of obedience and liberty, and the words subject and Sovereign are identical correlatives the idea of which meets in the single word “citizen”.

我的回答是两者都不可行。首先，主权权威作为一个单一整体，一旦把它分割开就等于毁灭了它。第二，正如一个国家不能合法地从属于另一个国家，一个城镇也不能合法地从属于另一个城镇，因为政治体的本质就是服从和自由的统一，“臣民”和“主权者”两个词的含义完全对等，两者的意义结合为“公民”一词。

I answer further that the union of several towns in a single city is always bad, and that, if we wish to make such a union, we should not expect to avoid its natural disadvantages. It is useless to bring up abuses that belong to great States against one who desires to see only small ones; but how can small States be given the strength to resist great ones, as formerly the Greek towns resisted the Great King, and more recently Holland and Switzerland have resisted the House of Austria?

我还要进一步回答说，把若干城邦联合成一个国家总归是错误的，任何一个希望如此的人就不要再埋怨无法避免自然的种种不便。不能因大国的滥用权力就去反对那些只喜欢小国的人们。但是，怎样才能使小国拥有足够的力量去抗拒大国呢？那就得像古代的希腊城邦反抗强大的国王那样，或者像更近些时候的荷兰和瑞士抵御奥地利王

室那样。

Nevertheless, if the State cannot be reduced to the right limits, there remains still one resource; this is, to allow no capital, to make the seat of government move from town to town, and to assemble by turn in each the Provincial Estates of the country.

当然，如果无法把国家的领土限定在适当的范围内，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设立固定的首都，将政府驻地轮流设置在各个城市，并且使国家财产在各地轮流循环。

People the territory evenly, extend everywhere the same rights, bear to every place in its abundance and life: by these means will the State become, at once, as strong and as well governed as possible. Remember that the walls of towns are built of the ruins of the houses of the countryside. For every palace I see raised in the capital, my mind's eye sees a whole country made desolate.

让人口均衡地分布于国土之上，使相同的权利扩展到国家的每个角落，让财富和生机充盈整个国家。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力量，才能得到最好的治理。请记住，城市的高墙只是由乡村房屋的断壁残垣构成的，每当我看到又一座辉煌的宫殿在首都拔地而起时，我就好像看到整个乡村地区沦为一片废墟。

Chapter 14 The Same (*continued*)

第十四章　论如何维持主权权威（再续）

The moment the people is legitimately assembled as a sovereign body,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government wholly lapses, the executive power is suspended, and the person of the meanest citizen is as sacred and inviolable as that of the first magistrate; for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erson represented, representatives no longer exist. Most of the tumults that arose in the comitia at Rome were due to ignorance or neglect of this rule. The consuls were in them merely the presidents of the people; the tribunes were mere speakers; [3_13] the senate was nothing at all.

一旦人民作为主权体成员进行合法集会，政府的一切权限便告终止，行政权力也就中断。即便是最卑贱的公民也和最高等的行政官员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因为既然被代表者已经亲自前来，也就不需要什么代表了。发生在罗马公民集会上的大部分骚乱都是由于忽视或不知这一准则所致。这时的执政官仅仅是人民会议的主持者，保民官只是发言人 [4_9] ，而元老院则什么都不是。

These intervals of suspension, during which the prince recognises or ought to recognise an actualsuperior, have always been viewed by him with alarm; and these assemblies of the people, which are the aegis of the body politic and the curb on the government, have at all times been the horror of rulers: who therefore never spare pains, objections, difficulties, and promises, to stop the citizens from having them. When the citizens are greedy, cowardly, and pusillanimous, and love ease more than liberty, they do not long hold out against the redoubled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us, as the resisting force incessantly grows, the sovereign authority ends by disappearing, and most cities fall and perish before their time.

对于政府的成员们来说，这种权力中断的间隙期是很可怕的，因为此时他们只得承认或被迫承认自己存在一个上级。这种人民集会作为政治体的保护者和政府权力的约束者，时时成为官员们的噩梦。于是，这些官员总是不遗余力地设置障碍、制造麻烦以及滥许诺言，以使公民与集会作对。如果公民贪婪、胆怯、倦怠，或者热爱安逸胜过自由，他们就不能长久地抵制政府的一再攻势了。随着政府的对抗力量不断增加，主权权威将最终消失，于是大多数的共和政体也就会过早地衰弱、灭亡。

But between the sovereign authority and arbitrary government, there sometimes intervenes a mean power of which something must be said.

但是，在主权权威与独裁政府之间，有时会出现一种中间力量，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种力量。

Chapter 15 Deputies or Representatives

第十五章　论议员或代表

As soon as public service ceases to be the chief business of the citizens, and they would rather serve with their money than with their persons, the State is not far from its fall. When it is necessary to march out to war, they pay troops and stay at home; when it is necessary to meet in council, they name deputies and stay at home. By reason of idleness and money, they end by having soldiers to enslave their country and representatives to sell it.

一旦公众服务不再是公民关心的重点、公民开始使用他们的钱包而不是自身来为国家提供服务，国家也就离毁灭不远了。需要出兵作战吗？公民会出钱雇佣军队而自己待在家里；到了日期需要参加集会吗？公民会指派代表而自己呆在家里。花钱和懒惰的结果是他们最后将祖国交由军队来奴役、交由代表来出卖。

It is through the hustle of commerce and the arts, through the greedy self-interest of profit, andthrough softness and love of amenities that personal services are replaced by money payments. Men surrender a part of their profits in order to have time to increase them at leisure. Make gifts of money, and you will not be long without chains. The word *finance* is a slavish word, unknown in the city-state. In a country that is truly free, the citizens do everything with their own arms and nothing by means of money; so far from paying to be exempted from their duties, they would even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fulfilling them themselves. I am far from taking the common view: I hold enforced labour to be less opposed to liberty than taxes.

正是由于人们忙于商业和手工业，忙于对利润的追逐，也由于人们的软弱和贪图安逸，金钱代替了个人服务。公民放弃了他们的一部分利益以便随心所欲地追逐其他利益。赶快利用金钱吧！你们很快就被金钱所奴役。“金钱”一词就是奴隶的词语，在共和国中，人们是不知这个词为何物的。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公民用自己的双手而非金钱来完成所有事情。他们绝不会为了逃避责任而花费金钱，反而会花钱让自己履行义务。在这里，我的想法和世俗观点截然不同：我认为税收比义务性服务更不利于人们的自由。

The better the constitution of a State is, the more do public

affairs encroach on private in the minds of the citizens. Private affairs are even of much less importance, because the aggregate of the common happiness furnishes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at of each individual, so that there is less for him to seek in particular cares. In a well-ordered city every man flies to the assemblies: under a bad government no one cares to stir a step to get to them, because no one is interested in what happens there, because it is foreseen that the general will will not prevail, and lastly because domestic cares are all-absorbing. Good laws lead to the making of better ones; bad ones bring about worse. As soon as any man says of the affairs of the State *What does it matter to me?* The State may be given up for lost.

国家的结构越好，在公民头脑中公共事务就越是优先于私人事务。事实上，并不存在那么多的私人利益，因为公共福利就是每个人的绝大部分幸福所在，所以个人也就不必使用个人手段来谋此福利了。在治理良好的国家里，一有公共集会，人们都会飞奔而去；而在坏政府的治理下，谁都懒得挪动一步，因为没人对集会上讨论的事情感兴趣，因为人们都料到主导集会的不是公共意志。最后，公民便把精力完全投入到自家的私事上。好的法律能使人们制定出更好的法律，而坏的法律将会带来更坏的法律。一旦有人在谈论国事时说“这与我何干？”我们就可以预料：这个国家快完了。

The lukewarmness of patriotism, the activity of private interest, the vastness of States, conquest and the abuse of government suggested the method of having deputies o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 in the national assemblies. These are what, in some countries, men have presumed to call the Third Estate. Thus the individual interest of two orders is put first and second; the public interest occupies only the third place.

爱国热情的消退、私人活动的勃兴、国土的辽阔、君王的四处征讨和政府的滥权——所有这一切都暗示国家集会需要议员或人民代表的出现。有些国家甚至公然把这些代表列为第三等级，这就意味着私人利益被列为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而公众利益已经退居第三等级了。

Sovereignty, for the same reason as makes it inalienable, cannot be represented; it lies essentially in the general will, and will does not admit of representation: it is either the same, or other; there is no intermediate possibility. The deputies of the people, therefore, are not and cannot be its representatives: they are merely its stewards, and can carry through no definitive acts. Every law the people has not ratified in person is null and void—is, in fact, not a law. The people of England regards itself as free; but it is grossly mistaken; it is free only during the election of members of parliament. As soon as they are elected, slavery overtakes it, and it is nothing. The use it makes of the short moments of liberty it enjoys shows indeed that it deserves to lose them.

正如主权不能被转让，它也不能被人代表。主权的本质是公共意志，而公共意志是不能被代表的：它要么是公共意志，要么是别的意志，不可能存在任何中间意志。所以，人民代表不是也不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是人民的代理人，他们最后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任何法律不经人民的亲自认可都是无效的，也根本不会成为法律。英国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们只有在推选议会成员时才是自由的，一旦议会成员被选举出来，他们就开始遭受奴役，什么也不是了。在获得自由的短暂时间里，英国人利用自由的这种方式使他们注定失去自由。

The idea of representation is modern; it comes to us from feudal government, from that iniquitous and absurd system which degrades humanity and dishonours the name of man. In ancient republics and even in monarchies, the people never had representatives; the word itself was unknown. It is very singular that in Rome, where the tribunes were so sacrosanct, it was never even imagined that they could usurp the functions of the people, and that in the midst of so great a multitude they never attempted to pass on their own authority a single plebiscitum. We can, however, form an idea of the difficulties caused sometimes by the people being so numerous, from what happened in the time of the Gracchi, when some of the citizens had to cast their votes from the roofs of buildings.Where right and liberty are everything, disadvantages count for nothing. Among this wise people everything was given its just value, its lictors were allowed to do what its tribunes would never have dared to attempt; for it had no fear that its lictors would try to represent it.

代表的概念是近代才有的，它来自于使人类蒙羞的封建政府，来自于那种使人丧失尊严，荒谬而又罪恶的封建政府。在共和制度下，甚至在古代的君主制国家中，人民从来就没有代表，代表这个词根本不存在。罗马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民官是如此神圣，以至于没有人能想到他们可能会篡夺人民的权力。而在盛大的群众集会中，也没有人试图将自己的权力转让。这一点可参照在格拉基时期发生过的一件麻烦事：由于集会人数太多，许多群众不得已只能从屋顶上扔下他们的投票。在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体现的地方，那些不方便也就算不得什么了。这些聪明的古罗马人民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恰到好处，他们让执法吏去做他们的保民官不敢做的事，而人民并不担心这些执法吏有代表人民的企图。

To explain, however, in what way the tribunes did sometimes represent it, it is enough to conceive how the government represents the Sovereign. Law being purely the declaration of the general will, it is clear that, in the exercise of the legislative power, the people cannot be represented; but in that of the executive power, which is only the force that is applied to give the law effect, it both can and should be represented. We thus see that if we looked closely into the matter, we should find that very few nations have any laws. However that may be, it is certain that the tribunes, possessing no executive power, could never represent the Roman people by right of the powers entrusted to them, but only by usurping those of the senate.

要了解保民官是如何代表人民的，只要理解政府是如何代表主权体的就可以了。既然法律只是公共意志的表达，那么人民在行使立法权力时显然是不能被代表的。但是当行使行政权力时，人民可以也应该有代表，因为行政权力不过是履行法律的手段。这样说来，通过仔细考察，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法律。不管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不具有任何行政权力的保民官是不能通过自己的职务权利来代表罗马人民的，他们只能在僭越了元老院的权利之后才能代表人民。

In Greece, all that the people had to do, it did for itself; it was constantly assembled in the public square. The Greeks lived in a mild climate; they had no natural greed; slaves did their work for them; their great concern was with liberty. Lacking the same advantages, how can you preserve the same rights? Your severer climates add to your needs; [3_14] for half the year your public squares are uninhabitable; the flatness of your languages unfits them for being heard in the open air; you sacrifice more for profit than for liberty, and fear slavery less than poverty.

在希腊，只要是人民必须做的事人民都会自己来完成。他们不断地在户外集会。希腊人生活在温和的气候中，他们不贪婪。奴隶们把工作都做完，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他们的自由。如果没有了这些有利条件，又怎能保持同等的权利呢？恶劣气候增加了你们的需求 [4_10]；一年之中有六个月公共场地不能使用，在露天场地中你们微弱的声音根本无法让别人听到。这时，你们关心利益超过关心自由，而且你们害怕贫困超过害怕受奴役。

What then? Is liberty maintained only by the help of slavery? It may be so. Extremes meet. Everything that is not in the course of nature has its disadvantages, civil society most of all. There are some unhappy circumstances in which we can only keep our liberty at others' expense, and where the citizen can be perfectly free only when the slave is most a slave. Such was the case with Sparta. As for you, modern peoples, you have no slaves, but you are slaves yourselves; you pay for their liberty with your own. It is in vain that you boast of this preference; I find in it more cowardice than humanity.

什么！难道自由只能借助于奴隶制的支持才能存在吗？也许是吧。这是两个极端的融合。一切不符合自然的事物都是有缺陷的，而政治社会比其他一切事物的缺陷更多。有这样一些不幸的情况：一个人要想保持住自己的自由就必须以牺牲另一个人的自由为代价；只有当奴隶是绝对的奴隶时，公民才是完全自由的公民。斯巴达的情况就是如此。至于你们这些现代人，你们没有奴隶，但你们自己就是奴隶，你们用自己的自由偿付了他们的自由。你们夸耀自己的这种偏好，这实属徒劳；我从中看到的怯懦多于人道。

I do not mean by all thi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slaves, or that the right of slavery is legitimate: I am merely giving the reasons why modern peoples, believing themselves to be free, have representatives, while ancient peoples had none. In any case, the moment a people allows itself to be represented, it is no long free: it no longer exists.

我并不是想通过这些论述来说明奴隶制是必须的，或者蓄奴制是合法的，因为我已经证明这是不正确的。我只是想说明为何自以为自由的现代人需要代表，而古代人民却没有代表的原因。无论如何，一个民族的人民一旦为自己选出代表，那他们就不再自由，也就不再被称为人民了。

All things considered, I do not see that it is possible henceforth for the Sovereign to preserve among us the exercise of its rights, unless the city is very small. But if it is very small, it will be conquered? No. I will show later on how the external strength of a great people [3_15] may be combined with the convenient polity and good order of a small State.

通过仔细地通盘考虑，我在像我们一样的人民身上，看不到任何主权者可以行使其权利的可能性，除非这是一个很小的共和国。但如果一个共和国很小，那它会不会被其他国家颠覆呢？不会的。我会在以后 [4_11] 讲述如何把小国的易于管理和良好秩序与强大民族的对外力量结合起来。

Chapter 16 That the I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Is not a Contact

第十六章　论政府的建立不是一项契约

The legislative power once well established, the next thing is to establish similarly the executive power; for this latter, which operates only by particular acts, not being of the essence of the former, is naturally separate from it. Were it possible for the Sovereign, as such, to possess the executive power, right and fact would be so confounded that no one could tell what was law and what was not; and the body politic, thus disfigured, would soon fall a prey to the violence it was instituted to prevent.

立法权力一经确立，接下来就是确立行政权力，因为后者通过一些个别行为来运作，所以与立法权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两者自然是分开的。如果主权体按照主权的本意，也能够拥有行政权力的话，法律和实际就会相互混淆，人们就无法区别什么是法律、什么不是法律。陷入歧途的政治体不久将成为暴力的牺牲品，而政治体的建立本来是为了防止这种暴力的。

As the citizens, by the social contract, are all equal, and all can prescribe what all should do, but no one has a right to demand that another shall do what he does not do himself. It is strictly this right, which is indispensable for giving the body politic life and movement, that the Sovereign, in instituting the government, confers upon the prince.

按照社会契约，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所有人应该做什么，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做他自己都不去做的事。但这项权利对于维系政治体的生存和运转是必不可少的，主权体在创立政府时授予统治者的正是这项权利。

It has been held that this act of establishment was a contract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rulers it sets over itself—a contract in which conditions were laid dow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binding the one to command and the other to obey. It will be admitted, I am sure, that this is an odd kind of contract to enter into. But let us see if this view can be upheld.

有些政治理论家曾经声称，建立政府的行为是人民和他们所选择的统治者之间形成的契约，这个契约规定了双方的责任，即一方负责发布命令而另一方负责服从。我确信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契约，就让我们来看看这种理论是否站得住脚。

First, the supreme authority can no more be modified than it can be alienated; to limit it is to destroy it. It is absurd and contradictory for the Sovereign to set a superior over itself; to bind itself to obey a master would be to return to absolute liberty.

首先，最高权威是不能改变的，正如它不能转让；对它的限制也就是对它的毁灭。主权者把一个更高的权威放在自己之上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自己让自己服从一个主人就意味着自己又恢复了彻底的自由。

Moreover, it is clear that this contract between the people and such and such persons would be a particular act; and from this follows that it can be neither a law nor an act of Sovereignty, and that consequently it would be illegitimate.

其次，人民和某些人之间的这种契约很显然是一种特殊行为。由此可知，这种契约不可能是法律，也不可能是主权行为。因此，它只可能是非法的。

It is plain too that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in relation to each other would be under the law of nature alone and wholly without guarantees of their mutual undertakings, a position wholly at variance with the civil state. He who has force at his command being always in a position to control execution, it would come to the same thing if the name “contract” were given to the act of one man who said to another: “I give you all my goods, on condition that you give me back as much of them as you please.”

还可以进一步看到，订立契约的双方只是处于自然法则下，他们之间的相互约定得不到任何保证，这种情况与社会状态相违背。如果拥有权力的人可以一直执行权力，那么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你，条件是你想还我多少就还多少。”这种行为也可以被冠以“契约”的名称了。

There is only one contract in the State, and that is the act of association, which in itself excludes the existence of a second. It is impossible to conceive of any public contract that would not be a violation of the first.

国家中只有一个契约，即结成共同体的契约，它排斥所有其他的契约。其他公共契约的存在必然会破坏最初的契约。

Chapter 17 The I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第十七章　论政府的建立

Under what general idea then should the act by which government is instituted be conceived as falling? I will begin by stating that the act is complex, as being composed of two other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aw and its execution.

我们该如何考虑政府建制这一行为呢？我首先得指出这一行为是复杂的，或者说它由另外两种行为构成，即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执行。

By the former, the Sovereign decrees that there shall be a governing body established in this or that form; this act is clearly a law.

在第一种行为中，主权者决议，应该按一定的规则或形式来建立政府；很显然，这种行为就是在确立一项法律。

By the latter, the people nominates the rulers who are to be entrusted with the government that has been established. This nomination, being a particular act, is clearly not a second law, but merely a consequence of the first and a function of government.

在第二种行为中，人民让官员在建立起来的政府中任职。这种任命是特殊行为，所以它不是另外一项法律，只是第一种行为的结果和

政府的职能。

The difficulty is to understand how there can be a governmental act before government exists, and how the people, which is only Sovereign or subject, can,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become a prince or magistrate.

困难在于，在政府产生以前，政府的行为如才能出现，以及人民既然只能是主权者或臣民，又怎么能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成为君主或执行官。

It is at this point that there is revealed one of the astonishing properties of the body politic, by means of which it reconciles apparently contradictory operations; for this is accomplished by a sudden conversion of Sovereignty into democracy, so that, without sensible change, and merely by virtue of a new relation of all to all, the citizens become magistrates and pass from general to particular acts, from legislation to the execution of the law.

在这里，政治体显示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特性，这一特性使政治体中两个相互矛盾的行为协调运作起来了。因为这一特性是当主权突然转变成民主制时形成的，因而没有任何明显可见的变化，而仅仅由于一种新的全体对全体的关系，公民就变成了行政官员，普遍行为就变成了特殊行为，法律便转变成法律的执行了。

This changed relation is no speculative subtlety without instances in practice: it happens every day in the English

Parliament, where, on certain occasions, the Lower House resolves itself into Grand Committee, for the better discussion of affairs, and thus, from being at one moment a sovereign court, becomes at the next a mere commission; so that subsequently it reports to itself, as House of Commons, the result of its proceedings in Grand Committee, and debates over again under one name what it has already settled under another.

这种关系的转变并不是没有现实例子的玄虚变化，英国议院每天都在上演这种转变。在那里，为了更好地磋商国事，下议院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把自己转变成一个议会委员会。因此，刚才它还是主权者的会场，现在就变成了单纯的委员会机构。之后，它要以议会委员会的身份就刚才已经做出的决定向作为下议院的它本身作出汇报，并且又要以一方的名义对以另一方名义作出决议的问题再次进行讨论。

It is, indeed, the peculiar advantage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that it can be established in actuality by a simple act of the general will. Subsequently, this provisional government remains in power, if this form is adopted, or else establishes in the name of the Sovereign the government that is prescribed by law; and thus the whole proceeding is regular. It is impossible to set up government in any other manner legitimately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so far laid down.

民主制政府的特有好处就在于它只通过公共意志的一次简单行为就可以确立起来。随后，如果这种形式被采纳，那么这一临时政府仍旧可以继续存在下去，或者会以主权者的名义建立一个由法律统治的政府。到那时，一切就走上了正轨。除此之外，不可能存在其他的合法方式可以组建政府，除非抛弃我前面章节中所说的原则。

Chapter 18 How to Check the Usurpations of Government

第十八章　论防止政府篡权的方法

What we have just said confirms Chapter 16, and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i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is not a contract, but a law; that the depositaries of the executive power are not the people's masters, but its officers; that it can set them up and pull them down when it likes; that for them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contract, but of obedience and that in taking charge of the functions the State imposes on them they are doing no more than fulfilling their duty as citizens without having the remotest right to argue about the conditions.

从第十六章确立的观点来看，组建政府的行为不是一种契约行为，而是法律行为；行政权力的掌握者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雇员。人民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随意任命或罢免他们，而这里并不存在一个与他们缔约的问题。在完成国家交给他们的职责时，他们只是在以公民的身份履行义务，并没有任何权利对条件讨价还价。

When, therefore, the people sets up an hereditary government, whether it be monarchical andconfined to one family, or aristocratic and confined to a class, what it enters into is not an undertaking; the administration is given a provisional form, until the people chooses to order it otherwise.

因此，当人民建立起一个世袭政府时，不管它是家族世袭的君主制，还是一个由一定阶层的公民世袭的贵族制，人民并不需要做出任

何承诺。世袭政府只是人民组织的行政机构的临时形式，人民可以随时决定采用其他行政方式。

It is true that such changes are always dangerous, and that the established government should never be touched except when it comes to be incompatible with the public good; but the circumspection this involves is a maxim of policy and not a rule of right, and the State is no more bound to leave civil authority in the hands of its rulers than 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hands of its generals.

当然，这种变化总是相当危险的。除非现有政府与公众利益之间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否则就不要改变已经建立起来的政府。但这种慎重只是政治策略而非法律规定，国家不一定要把公共权威交到行政官手中，就如不一定要把军事权威交到将军手里一样。

It is also true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be too careful to observe, in such cases, all the formalitie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a regular and legitimate act from a seditious tumult, and the will of a whole people from the clamour of a faction. Here above all no further concession should be made to the untoward possibility than cannot, in the strictest logic, be refused it. From this obligation the prince derives a great advantage in preserving his power despite the people, without it being possible to say he has usurped it; for, seeming to avail himself only of his rights, he finds it very easy to extend them, and to prevent, under the pretext of keeping the peace, assemblies that are destined to the re-establishment of order; with the result that he takes advantage of a silence he does not allow to be broken, or of irregularities he causes to be committed,

to assume that he has the support of those whom fear prevents from speaking, and to punish those who dare to speak. Thus it was that the decemvirs, first elected for one year and then kept on in office for a second, tried to perpetuate their power by forbidding the comitia to assemble; and by this easy method every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once clothed with the public power, sooner or later usurps the sovereign authority.

当然，在一些情况下，尽管人们已经很循规蹈矩了，但仍然不能使用合理的程序将一个正当合法的行为与煽动性的鼓吹，整个人民的意志与部分人的喧嚷区分开来。但是，非常重要的是，那些不能拒绝且对社会有害的妥协屈服，一定不能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正是由于这种妥协，统治者获得了一个可以不顾人民意愿维护自己的权力的绝佳机会，而这种行为又不会被说成是篡权。因为从表面上看，统治者只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他又很容易扩展这种权利，会在维护公共安全的借口下，阻止为修正政府滥权而举行的公众集会。他阻止人们打破现状，这样，人们的沉默便被统治者当作默许自己统治的证明，而由此引起的骚乱则成为压制那些敢于抗议者的原因。罗马十人委员会就是这样做的，某一年委员被选举出来之后，便不断地连任，他们试图用阻止罗马公民集会的方式来保持永远的权威。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在获得公共权力之后，迟早都会利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篡夺主权权威。

The periodical assemblies of which I have already spoken are designed to prevent or postpone this calamity, above all when they need no formal summoning; for in that case, the prince cannot stop them without openly declaring himself a law-breaker and an enemy of the State.

我前面所说的召开周期性集会是阻止或妨碍这种不法行为的最好方式，特别是那类不需要正式召集的集会。这样，政府也就无法阻止集会召开，否则它就等于公开宣布自己是违法者和国家公敌。

The opening of these assemblies, whose sole object i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ocial treaty, should always take the form of putting two propositions that may not be suppressed, which should be voted on separately.

这些以维护社会契约为唯一目的集会都应该由两个议题的表决开始，这两个议题永远不能被废除，而且每个议题都要独立进行表决。

The first is: “Does it please the Sovereign to preserve the present form of government?”

第一个是：“主权者是否希望保留现有的政府形式？”

The second is: “Does it please the people to leave its administration in the hands of those who are actually in charge of it?”

第二个是：“人民是否愿意让现任的行政官员继续管理国家行政事务？”

I am here assuming what I think I have shown; that there is in

the State no fundamental law that cannot be revoked, not excluding the social compact itself; for if all the citizens assembled of one accord to break the compact, it is impossible to doubt that it would be very legitimately broken. Grotius even thinks that each man can renounce his membership of his own State, and recover his natural liberty and his goods on leaving the country. [3_16] It would be indeed absurd if all the citizens in assembly could not do what each can do by himself.

至此，我认为我已经清楚地证明了我的观点，那就是，国家中的任何法律，甚至包括社会契约论都可以被撤销。因为如果全体公民举行集会一致同意结束社会契约，毫无疑问，这个契约就被合法地取消了。格劳秀斯就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放弃自己是某国成员的身份，并且在离开这个国家后 [4_12] 重新获得了天然的自由和财产。如果聚集在一起的全体公民做不了他们每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事，那就太荒谬了。

[3_1].Thus at Venice the College, even in the absence of the Doge, is called "Most Serene Prince."

[3_2].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 III:3

[3_3].The Palatine of Posen, father of the King of Poland, Duke of Lorraine.

[3_4].I prefer liberty with danger to peace with slavery.

[3_5].It is clear that the word *optimales* meant, among the ancients, not the best, but the most powerful.

[3_6].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hat the form of the election of magistrates should be regulated by law; for if it is left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prince, it is impossible to avoid falling into hereditary aristocracy, as the Republics of Venice and Berne actually did. The first of these has therefore long been a State dissolved; the second, however, is maintained by the extreme wisdom of the senate, and forms an

honourable and highly dangerous exception.

[3_7].Machiavelli was a proper man and a good citizen; but, being attached to the court of the Medici, he could not help veiling his love of liberty in the midst of his country's oppression. The choice of his detestable hero, Caesar Borgia, clearly enough shows his hidden aim;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eaching of the *Prince* and that of the *Discourses on Livy* and the *History of Florence* shows that this profound political thinker has so far been studied only by superficial or corrupt readers. The Court of Rome sternly prohibited his book. I can well believe it; for it is that Court it most clearly portrays.

[3_8].Tacitus, *Histories* , i. 16. "For the best, and also the shortest way of finding out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bad is to consider what you would have wished to happen or not to happen, had another than you been Emperor."

[3_9].In the *Statesman.*

[3_10].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 XIV

[3_11].This does not contradict what I said before (Book II, ch. 9) about the disadvantages of great States; for we were then dealing with the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over the members, while here we are dealing with its force against the subjects. Its scattered members serve it as rallying-points for action against the people at a distance, but it has no rallying-point for direct action on its members themselves. Thus the length of the lever is its weakness in the one case, and its strength in the other.

[3_12]."*Omnes enim et habentur et dicuntur tyranni, qui potestate utuntur perpetua in ea civitate quæ libertate usa est* " (Cornelius Nepos, *Life of Miltiades)*. (For all those are called and considered tyrants, who hold perpetual power in a State that has known liberty.) It is true that Aristotle (*Ethics* , Book viii, chapter x) distinguishes the tyrant from the king by the fact that the former governs in his own interest, and the latter only for the good of his subjects; but not only did all Greek authors in general use the word *tyrant* in a different sense, as appears most clearly in Xenophon's *Hiero* , but also it would follow from Aristotle's distinction tha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world, there has not yet been a single king.

[3_13].In nearly the same sense as this word has in the English Parliament. The similarity of these functions would have brought the consuls and the tribunes into conflict, even had all jurisdiction been suspended.

[3_14].To adopt in cold countries the luxury and effeminacy of the East is to desire to submit to its chains; it is indeed to bow to them far more inevitably in our case than in theirs.

[3_15].I had intended to do this in the sequel to this work, when in dealing with external relations I came to the subject of confederations. The subject is quite new, and its principles have still to be laid down.

[3_16].Provided, of course, he does not leave to escape his obligations and avoid having to serve his country in the hour of need. Flight in such a case would be criminal and punishable, and would be, not withdrawal, but desertion.

[4_1].因此，在威尼斯，即使当大总督不出席的时候，大议会仍被人们称为“最尊敬的君主”。

[4_2].波兹南侯爵，1704～1735年曾为波兰国王。

[4_3].很明显，古代人使用“贵族”一词并不是表示最好，而是最强有力的意思。

[4_4].把执政者的选举用法律规定下来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如果把这项权力留给统治者的意志来决定，难免会落入世袭的贵族制，就如威尼斯共和国和波尼尔共和国所发生的那样。前一个国家早已分裂，后个国家是靠元老院的超人智慧才得以维持，这是一个值得尊敬但对于国家治理来说非常危险的例外。

[4_5].马基亚维利是一位绅士和好公民；但因其从属于美第奇（Medici）家族，他被迫在祖国深受压迫时掩饰他对自由的热爱。他在书中选择了一个令人憎恨的主人公便清楚地显示了他秘密的意图，他在《君主论》中的原则和《李维论》、《佛罗伦萨史》中的原则相互矛盾，显示这个深刻的政治思想家至今都只拥有一些肤浅堕落的读者。罗马宫廷严禁了他的作品，我对此非常理解，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清晰地描绘了这个宫廷。

[4_6].此文原文为拉丁语，为罗马皇帝戈尔巴的演说词，见塔西图，《历史》第一卷。

[4_7].这与我在前面所说的（第二卷第九章）大国的不利条件并不矛盾。因为我在那里论述的是政府对其成员的权威，而在此我考察的是政府对臣民的权威。政府分散的成员就像许多杠杆的支点，通过它们作用于边远的百姓，但政府并没有一个对其成员自身的杠杆支点。因此，杠杆的长度在一种情况下是弱点，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优点。

[4_8].“在一个习惯了自由的城邦中，那些保有永久权力的人都会被认为和称为暴君。”（见科尔纳留斯·尼波斯的《米提阿底斯传》。的确，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第十章中曾区分过暴君和国王，把两者差别的关键定为前者统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后者是为了其臣民的利益；然而，所有的希腊作家通常都使用另一层意思来使用暴君这个词，就如色诺芬的《希罗》所清楚显示的那样。当然，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那一区分准则进行推论，从世界产生以来还从未出现过一个真正的国王。

[4_9].这个词语在这里的意思有点类似于它在英国议会中的含义。即使所有的权力都被暂时中止，这些职能上的相似也会使执政官和保民官发生对立。

[4_10].如果寒冷国家的人也像东方人一样过着奢侈和怠惰的生活，那么就等于给自己戴上了枷锁，并且比东方人更不可避免地顺从于这种枷锁。

[4_11].这是我在本书的后续著作中想要讨论的，在探讨对外关系的处理时我想到了联邦制。这是一个相当新的课题，其中的原则还有待确立。

[4_12].当然，任何人都不能为了逃避义务而离开自己的国家，也不能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拒绝挽救他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逃避就是有罪的，应该受到惩罚。因为这种情况下的离开不是撤销身份，而是背叛。

BOOK IV

第四卷

Chapter 1 That the General Will Is Indestructible

第一章　论公共意志是不可摧毁的

As long as several men in assembly regard themselves as a single body, they have only a single will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eir common preservation and general well-being. In this case, all the springs of the State are vigorous and simple and its rules clear and luminous; there are no embroilments or conflicts of interests; the common good is everywhere clearly apparent, and only good sense is needed to perceive it. Peace, unity and equality are the enemies of political subtleties. Men who are upright and simple are difficult to deceive because of their simplicity; lures and ingenious pretexts fail to impose upon them, and they are not even subtle enough to be dupes. When, among the happiest people in the world, bands of peasants are seen regulating affairs of State under an oak, and always acting wisely, can we help scorning the ingenious methods of other nations, which make themselves illustrious and wretched with so much art and mystery?

只要一些人联合在一起，并认为他们是一个整体，那么他们就有了唯一的意志，这个意志关系到他们的共同生存和公共福利。这时，国家运转的力量就会单纯而富有生机，它的原则也一目了然，也没有任何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共同利益会明明白白地显露出来，任何人只需利用理智就能发现它。和平、团结、平等与政治阴谋是天敌。正直和纯朴的人是单纯的，所以很难被欺骗。诱惑和花言巧语是骗不了

他们的，因为他们不够工于心计，所以不会因诱惑而上当。在世界上那些最幸福的民族那里，我们看到成群的农民在橡树下处理国家事务，并且总是处理得十分恰当。看到此情此景，我们能不蔑视那些在政治上玩弄权术的民族吗？他们巧施各种伎俩和玄虚，却使得自己的国家陷入绝境而为世人所不齿。

A State so governed needs very few laws; and, as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issue new ones, the necessity is universally seen. The first man to propose them merely says what all have already felt, and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factions or intrigues or eloquence in order to secure the passage into law of what everyone has already decided to do, as soon as he is sure that the rest will act with him.

用如此方法治理的国家只需要很少的法律，而人们早就看到了颁布新法的必要性。所以新法的第一个提议者不过是表达出了所有人的感觉而已。一旦确定其他人都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把人人都决定要做的事情变成法律便不再需要阴谋，也不再需要雄辩。

Theorists are led into error because, seeing only States that have been from the beginning wrongly constituted, they are struck by the impossibility of applying such a policy to them. They make great game of all the absurdities a clever rascal or an insinuating speaker might get the people of Paris or London to believe. They do not know that Cromwell would have been put to “the bells” by the people of Berne, and the Duc de Beaufort on the treadmill by the Genevese.

理论家们往往被误导，因为他们只看到那些从一开始体制就很差

的国家，所以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在那些国家维持上述那种治理方式是不可能的事。一想到一个聪明的骗子或一个善辩的演说家能愚弄摆布巴黎或伦敦人民，他们就发笑。他们不知道克伦威尔曾经被伯尔尼人民处罚过，也不知博福尔公爵曾被日内瓦人民囚禁起来过。

But when the social bond begins to be relaxed and the State to grow weak, when particular interests begin to make themselves felt and the smaller societies to exercise an influence over the larger, the common interest changes and finds opponents: opinion is no longer unanimous; the general will ceases to be the will of all; contradictory views and debates arise; and the best advice is not taken without question.

可是，当社会纽带开始松弛，国家开始衰弱时，当私利能够为人民感知，小集体开始影响大社会时，共同利益便开始发生变化，反对者也开始出现。投票时再也没有一致通过的情况了，公共意志从此不再是所有公民的总意志，冲突和争论随即出现，即使是最明智的观点也要经过一番争论方能通过。

Finally, when the State, on the eve of ruin, maintains only a vain, illusory and formal existence, when in every heart the social bond is broken, and the meanest interest brazenly lays hold of the sacred name of “public good”, the general will becomes mute: all men, guided by secret motives, no more give their views as citizens than if the State had never been; and iniquitous decrees directed solely to private interest get passed under the name of laws.

最后，当国家濒于灭亡，其存在只是空洞和虚幻的形式时，当连

接社会的所有纽带在人民心中断裂时，当最卑鄙的私利能厚颜无耻地打着公益的幌子招摇过市时，公共意志沉默了。每个人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不再作为公民发表意见，仿佛国家从未存在过一样；人民开始弄虚作假，为追逐个人利益而借法律之名去制定一些不公正法令。

Does it follow from this that the general will is exterminated or corrupted? Not at all: it is always constant, unalterable and pure, but it is subordinated to other wills which encroach upon its sphere. Each man, in detaching his interest from the common interest, sees clearly that he cannot entirely separate them, but his share in the public mishaps seems to him negligible beside the exclusive good he aims at making his own. Apart from this particular good, he wills the general good in his own interest, as strongly as anyone else. Even in selling his vote for money, he does not extinguish in himself the general will, but only eludes it. The fault he commits is that of changing the state of the question, and answering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what he is asked. Instead of saying, by his vote, “It is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State,” he says, “it is of advantage to this or that man or party that this or that view should prevail.” Thus the law of public order in assemblies is not so much to maintain in them the general will as to secure that the question be always put to it, and the answer always given by it.

根据上面所述的一切是否就能说公共意志消亡或堕落了？不能，公共意志永远是稳固的，不变的，纯粹的。但它却能被其他流行意志压倒而处于屈从地位。每个人在将自己的个人利益从公共利益中分离出来时，就清楚地知道他无法完全脱离公共利益，但是与他想捞取的，要据为己有的好处相比，他所分担的那一份公共坏处就好像微不足道了。如果排除这些私人利益，就算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强烈地要求公共福利。就算他为了金钱而出卖了自己的选

票，他内心的公共意志也没有泯灭，他只是在躲避公共意志而已。他所犯的错误是改变了问题的状态，而且对问题答非所问。也就是说，通过他的选票，他没有回答“这一方案是否对国家有利”，而是说“这一方案对某个人或某个团体是有利的”。由于这个原因，调整公民集会的法律目的不仅是要维护公民内心的公共意志，还要确保公共意志总会被询问到，而且问题也总能得到答复。

I could here set down many reflections on the simple right of voting in every act of Sovereignty—a right which no one can take from the citizens—and also on the right of stating views, making proposals, dividing and discussing, which the government is always most careful to leave solely to its members, but this important subject would need a treatise to itself,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everything in a single work.

关于在所有主权行为中的简单投票权，我打算做进一步的详谈，因为这是每个公民都不可剥夺的权利。我还想再深入探讨一下政府总是极力局限在政府内部的发言权、建议权、分析权和讨论权。但这个重要课题需要再单独写一篇论文，我在本书中无法尽述。

Chapter 2 Voting

第二章　论投票权

It may be seen, from the last chapter, that the way in which general business is managed may give a clear enough indication of the actual state of morals and the health of the body politic. The more concert reigns in the assemblies, that is, the nearer opinion approaches unanimity, the greater is the dominance of the general

will. On the other hand, long debates, dissensions and tumult proclaim the ascendancy of particular interest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tate.

从前面章节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是公众道德和政治体健康与否的一个相当准确的标志。集会中达成协议的步调越是一致，人们的观点就越是统一，公共意志也就越占主导地位；而长久的争论、分歧和吵嚷则意味着个人私利的盛行和国家的衰落。

This seems less clear when two or more orders enter into the constitution, as patricians andplebeians did at Rome; for quarrels between these two orders often disturbed the comitia, even in the best days of the Republic. But the exception is rather apparent than real; for then, through the defect that is inherent in the body politic, there were, so to speak, two States in one, and what is not true of the two together is true of either separately. Indeed, even in the most stormy times, the plebiscita of the people, when the Senate did not interfere with them, always went through quietly and by large majorities. The citizens having but one interest, the people had but a single will.

当国家结构中包括两个或更多等级时，上述规则就不甚明显了。以罗马为例，就是在共和国鼎盛时期，罗马的贵族和平民间的争吵也常常扰乱公民集会。但这种例外更多是表面现象而非真实情况。因为这种情况下，由于政治体的内在缺陷，可以说罗马这个国家存在着两个国家，上述规则对于这两部分合起来说虽然是不正确的，但对于每个单独的部分来说却是正确的。而且事实上，即使在最动荡年代，只要元老院不干涉，罗马公民的投票也会和平地进行，并且政令的颁布

多是根据多数选票进行的。由于公民只有一种利益，所以人民也就只有一个意志。

At the other extremity of the circle, unanimity recurs; this is the case when the citizens, having fallen into servitude, have lost both liberty and will. Fear and flattery then change votes into acclamation; deliberation ceases, and only worship or malediction is left. Such was the vile manner in which the senate expressed its views under the Emperors. It did so sometimes with absurd precautions. Tacitus observes that, under Otho, the senators, while they heaped curses on Vitellius, contrived at the same time to make a deafening noise, in order that, should he ever become their master, he might not know what each of them had said.

全民一致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另一极端，那就是当公民完全陷入奴役状态，不再具有自由和意志的时候。这时，恐惧和谄媚把投票行为变成了附和，人们不再有什么讨论，有的只是崇拜或者咒骂。这便是罗马皇帝统治下元老院卑鄙的表达方式。有时，元老们做这些事情时小心得可笑。据塔西陀记载，在奥索的治下，那些元老们在争相批判维提留斯的同时制造一场喧闹，这样做的原因是，即使维提留斯将来有机会控制政权，他也无法分辨出元老们都说过什么。

On these various considerations depend the rules by which the methods of counting votes and comparing opinions should be regulated, according as the general will is more or less easy to discover, and the State more or less in its decline.

这些不同的考虑生成了一些原则，人们应该根据这些原则，根据

公共意志被认知的难易程度和国家衰落的程度，对计算选票和比较民意的方式作出规定。

There is but one law which, from its nature, needs unanimous consent. This is the social compact; for civil association is the most voluntary of all acts. Every man being born free and his own master, no one, under any pretext whatsoever, can make any man subject without his consent. To decide that the son of a slave is born a slave is to decide that he is not born a man.

本质上只有一种法律是需要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这就是社会契约。因为公民的联合是世界上最自愿的行为，每个人都是天生自由的，都天生是自己的主人，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不经某人的同意强制他做任何事情。断言奴隶的儿子天生是奴隶，就相当于断言他生来就不是人类。

If, then, there are opponents when the social compact is made, their opposition does not invalidate the contract, but merely prevents them from being included in it. They are foreigners among citizens. When the State is instituted, residence constitutes consent; to dwell within its territory is to submit to the Sovereign. [4_1]

因此，如果在缔结社会契约时有反对的声音，那么这种反对并不能使社会契约无效；反对的人只不过是将自己排除在了社会契约之外而已。这些反对者就是公民中的异族人。国家一旦形成，居住就意味着认可；居住在一块领土之内就等于承认了它的主权权威 [5_1] 。

Apart from this primitive contract, the vote of the majority always binds all the rest. This follows from the contract itself. But it is asked how a man can be both free and forced to conform to wills that are not his own. How are the opponents at once free and subject to laws they have not agreed to?

除这个原始契约之外，多数人的决定总能制约少数人的决定，这也是契约本身的一种结果。可能有人要问：一个人被迫遵从那些并非他自己的意志，他怎么能是自由的呢？而那些反对的少数人要服从于那些他们不曾同意的法律，他们又怎么能是自由的呢？

I retort that the question is wrongly put. The citizen gives his consent to all the laws, including those which are passed in spite of his opposition, and even those which punish him when he dares to break any of them. The constant will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State is the general will; by virtue of it, they are citizens and free. [4_2] When in the popular assembly a law is proposed, what the people is asked is not exactly whether it approves or rejects the proposal, but whether it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general will, which is their will. Each man, in giving his vote, states his opinion on that point; and the general will is found by counting votes. When, therefore, the opinion that is contrary to my own prevails, this proves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that I was mistaken, and that what I thought to be the general will was not so. If my particular opinion had carried the day I should have achieved the opposite of what was my will; and it is in that case that I should not have been free.

我的回答是，这一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公民是同意所有法律的，即使是那些违背他的意志而通过的法律，甚至还有那些如果公民胆敢

违反就要对他施加惩罚的法律。国家中所有成员的固定意志就是公共意志，通过这个公共意志，他们成为了公民，获得了自由 [5_2] 。当人民在集会上提议一个法律时，人们被问的问题并不是他们赞成还是反对这个提议，而是这个提议是否与他们的公共意志相符合。每个人通过投票表达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然后对票数进行计算，这样公共意志就得到宣告了。当与我相反的观点胜出时，只能表明我犯错误了，我所认为的公共意志并不是真的公共意志。如果我的个别意见胜过公共意志成为主导，那么这时我所做的就非我所愿了，我也就不再自由了。

This presupposes, indeed, that all the qualities of the general will still reside in the majority: when they cease to do so, whatever side a man may take, liberty is no longer possible.

这表明公共意志的全部特性仍然体现在多数人中。如果它不体现在多数人中，人们不论作出何种选择，都不再有自由可言。

In my earlier demonstration of how particular wills are substituted for the general will in public deliberation, I have adequately pointed out the practicable methods of avoiding this abuse; and I shall have more to say of them later on. I have also given the principles for determining the proportional number of votes for declaring that will. A difference of one vote destroys equality; a single opponent destroys unanimity; but between equality and unanimity, there are several grades of unequal division, at each of which this proportion may be fix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 and the needs of the body politic.

之前我在阐述个别意志是如何在公众的讨论中取代公共意志时，曾详细地论述了防止这种滥权的具体方法，以后我还会对此进一步讨论。至于公共意志的宣告所应达到的投票比例，我也曾给出了一些原则，根据这些原则，人们就可确定这一比例。一票之差就可以打破双方对等的局面，一票反对就可以破坏全体一致。在全体一致通过和双方均等之间，还存在着多种不均等的分配情况，这种情况可以根据政治实体的状况和需要进行分配。

There are two general rules that may serve to regulate this relation. First, the more grave and important the questions discussed, the nearer should the opinion that is to prevail approach unanimity. Secondly, the more the matter in hand calls for speed, the smaller the prescribed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s of votes may be allowed to become: where an instant decision has to be reached, a majority of one vote should be enough. The first of these two rules seems more in harmony with the laws, and the second with practical affairs. In any case, it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m that gives the best proportions for determining the majority necessary.

有两个普遍性的准则可以用来规定这些比例，第一个是：要决定的事情越是严肃，越是重要，占上风的观点就越应接近全体一致；第二个是：涉及的事情越是需要快速解决，所规定的票额之差越应该缩小；而对于当时就要做决定的问题，一票的优势就足够了。第一个准则似乎更适合制定法律，后一个准则则适合行政事务的迅速处理。无论如何，都应将两者结合来确定我们可以宣布其为多数的最好比率。

Chapter 3 Elections

第三章　论选举

In the elections of the prince and the magistrates, which are, as I have said, complex acts, there are two possible methods of procedure, choice and lot. Both have been employed in various republics, and a highly complicated mixture of the two still survives in the election of the Doge at Venice.

我曾经说过，统治者和行政官员的选举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行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即投票推选或抽签。这两种方式在不同的共和国中都被使用过。在威尼斯的总督选举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两种方式的复杂结合。

“Election by lot,” says Montesquieu, “is democratic in nature.“ [4_3] I agree that it is so; but inwhatsense? “The lot,” he goes on, “is a way of making choice that is unfair to nobody; it leaves each citizen a reasonable hope of serving his country.” These are not reasons.

孟德斯鸠说：“通过抽签进行选举，是民主制的特征。”我同意这一点，但为什么是这样呢？他继续说：“抽签是一种任何人都不感到苦恼的选举方式，并且它给予了每个公民为国家服务的合理希望。”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理由。

If we bear in mind that the election of rulers is a function of government, and not of Sovereignty, we shall see why the lot is the method more natural to democracy, in which the administration is better in proportion as the number of its acts is small.

如果我们还记得首领的选举是一项政府职能而非主权职能，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抽签的方式更符合民主制的本质，因为民主制中行政机构的行为愈少，行政机构也就愈好。

In every real democracy, magistracy is not an advantage, but a burdensome charge which cannot justly be imposed on one individual rather than another. The law alone can lay the charge on him on whom the lot falls. For, the conditions being then the same for all, and the choice not depending on any human will, there is no particular application to alter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law.

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中，行政官的职位并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沉重的责任。这样，人们如果把它加于一个人身上，而不加于另一个人身上，就有失公正。唯有法律才能把这份负担加之于某个抽到签的人身上，因为抽签时，条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相等的，而且选举的结果并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意志，法律的普遍性也没有因为任何特殊的应用而遭到破坏。

In an aristocracy, the prince chooses the prince, the government is preserved by itself, and voting is rightly ordered.

在贵族制中，是君主选择君主，政府自己维护自己。这种情况下，投票选举才是最合适的方式。

The instance of the election of the Doge of Venice confirms, instead of destroying, this distinction; the mixed form suits a mixed government. For it is an error to take the government of Venice for

a real aristocracy. If the people has no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the nobility is itself the people. A host of poor Barnabotes never gets near any magistracy, and its nobility consists merely in the empty title of Excellency, and in the right to sit in the Great Council. As this Great Council is as numerous as our General Council at Geneva, its illustrious members have no more privileges than our plain citizens. It is indisputable that, apart from the extreme disparity between the two republics, the *bourgeoisie* of Geneva is exactly equivalent to the *patriciate* of Venice; our *natives* and *inhabitants* correspond to the *townsmen* and the *people* of Venice; our *peasants* correspond to the *subjects* on the mainland; and, however that republic be regarded, if its size be left out of account, its government is no more aristocratic than our own. The whole difference is that, having no life-ruler, we do not, like Venice, need to use the lot.

威尼斯总督选举的例子非但没有否定这两种方式的区别，恰恰证实了这种区别。这种混合的形式正适合混合政府。因为将威尼斯政府视作真正的贵族制政府本来就是错误的。虽说人民无权分享政府的行政权力，但威尼斯贵族本身就是人民。一群贫困的“马拿波特”无缘于任何行政官员的职位，他们的贵族身份只体现在“阁下”这个虚名上，体现在旁听大议会的权利上。既然这种大议会像我们日内瓦全民会议一样人数众多，那么显赫的贵族成员也不会比我们普通的公民拥有更多的特权。毫无疑问，撇开两个共和国的极端差别，日内瓦的市民完全等同威尼斯的贵族，而我们的土著和居民等同威尼斯的市民和人民，我们的农民等同威尼斯大陆上的臣民。总而言之，如果不考虑面积大小，不管以什么样的观点考察威尼斯共和国，它的政府都不比我们的政府更贵族化。所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不需采用抽签的选举方式，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终身执掌政权的国家首领。

Election by lot would have few disadvantages in a real democracy, in which, as equality would everywhere exist in morals and talents as well as in principles and fortunes, it would become almost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who was chosen. But I have already said that a real democracy is only an ideal.

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抽签选举并没什么不好。因为在那里，所有人不论在品质和能力上，还是在准则与财产上，都是平等的。因此无论谁当选，都没什么不同。但正如我曾经说过的，世上并没有真正的民主制。

When choice and lot are combined, positions that require special talents, such as military posts, should be filled by the former; the latter does for cases, such as judicial offices, in which good sense, justice, and integrity are enough, because in a State that is well constituted, these qualities are common to all the citizens.

当投票和抽签两种选举方式同时进行时，投票选举应该用于填充那些需要特殊才能的官职，如军事指挥；而抽签则应该用来产生那些只需理性、公正和诚实就能担任的官职，比如行政职位，因为在一个建制良好的国家，这些优点是所有公民都具有的。

Neither lot nor vote has any place in monarchical government. The monarch being by right sole prince and only magistrate, the choice of his lieutenants belongs to none but him. When the Abbé de Saint-Pierre proposed that the Councils of the King of France should be multiplied, and their members elected by ballot, he did not see that he was proposing to change the form of government.

在君主制政府中，抽签与投票都不存在。因为君主是法定的、唯一的统治者和行政官员，所以对附属于君主官员的选举权仅仅属于君主自己。当圣彼埃尔的神甫提议增加法兰西国王议会成员的数量，并且通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议会成员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提议改变政府的结构。

I should now speak of the methods of giving and counting opinions in the assembly of the people, but perhaps an account of this aspect of the Roman constitution will more forcibly illustrate all the rules I could lay down. It is worth the while of a judicious reader to follow in some detail the working of public and private affairs in a Council consisting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men.

我还应该再谈一下人民集会中投票和计票的方式，但是罗马体制的发展史可以更生动、更强有力地论证我所要确立的所有原则。花上一些时间来详细考察一个由二十万人组成的集会如何处理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对于善于思考的读者来说是绝对值得的。

Chapter 4 The Roman Comitia

第四章　论罗马的人民大会

We are without well-certified records of the first period of Rome's existence; it even appears very probable that most of the stories told about it are fables; indeed, generally speaking, the most instructive part of the history of peoples, that which deals with their foundation, is what we have least of. Experience teaches us every day what causes lead to the revolutions of empires; but, as no

new peoples are now formed, we have almost nothing beyond conjecture to go upon in explaining how they were created.

有关罗马的早期历史，我们并没有非常确切的文献资料，而且我们听到的大部分关于罗马的说法极有可能只是神话 [5_3]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编年史中最有指导意义的部分就是他们的政治制度史，而这部分也正是我们最缺乏的。经验每天都在告诉我们各帝国兴衰的原因，但由于各个民族的形成期已经过去，我们只能靠推测来解释他们曾经是怎样形成的。

The customs we find established show at least that these customs had an origin. The traditions that go back to those origins, that have the greatest authorities behind them, and that are confirmed by the strongest proofs, should pass for the most certain. These are the rules I have tried to follow in inquiring how the freest and most powerful people on earth exercised its supreme power.

从人们已经发现的各种习俗中，至少可以得出结论：这些习俗必定有其形成的根源。传统就是由这些根源发展而来。那些能得到最高权威支持和最有力的推理证实的传统应被看成是最可靠的。这便是我在考察世界上最自由最强大的民族如何行使他们的最高权力时所力图遵循的原则。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Rome, the new-born republic, that is, the army of its founder, composed of Albans, Sabines and foreigners, was divided into three classes, which, from this division, took the name of *tribes*. Each of these tribes was subdivided into ten *curiæ* , and each *curia* into *decuriæ* , headed by leaders called

curiones and *decuriones.*

罗马建国之后，新生的共和国，也就是由阿尔巴津人、萨比人和外邦人组成的建国军队，被分为三个种人。正是由于这种划分，他们被称为部族。每个部族被分为十个库里亚，每个库里亚又被分成十个德库里亚，其首领被称为库里昂或德库里昂。

Besides this, out of each tribe was taken a body of one hundred *Equites* or Knights, called a *century* , which shows that these divisions, being unnecessary in a town, were at first merely military. But an instinct for greatness seems to have led the little township of Rome to provide itself in advance with a political system suitable for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除此之外，又从每个部族中抽出一百名骑兵或骑士组成一个团队，称为百人团。城市中没有这种划分的必要，因此我们可以推定这种划分的最初目的是纯军事性的。但是，罗马这个小城似乎有一种追求伟大的天分，这种天分引导它在一开始就为自己制定了一套适用于作世界首都的组织系统。

Out of this original division an awkward situation soon arose. The tribes of the Albans (Ramnenses) and the Sabines (Tatienses) remained always in the same condition, while that of the foreigners (Luceres) continually grew as more and more foreigners came to live at Rome, so that it soon surpassed the others in strength. Servius remedied this dangerous fault by changing the principle of cleavage, and substituting for the racial division, which he abolished, a new one based on the quarter of the town inhabited by

each tribe. Instead of three tribes he created four, each occupying and named after one of the hills of Rome. Thus, while redressing the inequality of the moment, he also provided for the future; and in order that the division might be one of persons as well as localities, he forbade the inhabitants of one quarter to migrate to another, and so prevented the mingling of the races.

然而，这种最初的划分很快便显出一种缺陷，即阿尔巴津人的部族和萨比人的部族总是维持不变，而外邦人的部族随着外族人的不断迁入人数不断增多，因此其力量很快就超过了另外两族。塞尔维乌斯应对这一危险弊端的解决办法是改革划分方式。他废除了原来按种族划分的制度，代之以基于部族在城中所占地区的划分制度。他划分出了四个部族，取消了原来的三个。每个部族占有罗马的一座小山，并以山的名字命名。这样，塞尔维乌斯不仅修正了现有的不平等弊端，还防止了未来的不平等。并且为了使这种划分不仅是地区的划分而且也是人身的划分，他就禁止一个区域中的居民迁移到另一个区域，从而防止种族间相互混合。

He also doubled the three old centuries of Knights and added twelve more, still keeping the old names, and by this simple and prudent method, succeeded in making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body of Knights, and the people, without a murmur from the latter.

他还把原先的三个百人团增加一倍，另外新设了十二个百人团，但他保留了原有的名称。这是一个简单又明智的方法，他用这种方法把武士群体和人民群体区分开来，并且没有引起后者的抱怨。

To the four urban tribes Servius added fifteen others called

rural tribes, because they consisted of those who lived in the country, divided into fifteen cantons. Subsequently, fifteen more were created, and the Roman people finally found itself divided into thirty-five tribes, as it remained down to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在这四个城镇部族的基础上，塞尔维乌斯另增加了十五个部族，称为乡村部族，因为它们由分布在十五个州府的乡村居民组成。之后，又不断设立其他的新部族。直到最后，罗马人民被分为三十五个部族，这个数字在共和国结束之前一直是固定的。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tribes had one effect which is worth mention, both because it is without parallel elsewhere, and because to it Rome owed the preservation of her morality and the enlargement of her empire. We should have expected that the urban tribes would soon monopolise power and honours, and lose no time in bringing the rural tribes into disrepute, but what happened was exactly the reverse. The taste of the early Romans for country life is well known. This taste they owed to their wise founder, who made rural and military labours go along with liberty, and, so to speak, relegated to the town arts, crafts, intrigue, fortune and slavery.

由城市部族和乡村部族的区分而产生的结果十分值得人们关注，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过这种先例，还因为罗马人风尚的维持和罗马帝国的成长都要归因于此。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划分之后，城市部族很快就会独揽大权和所有的荣耀，极大地降低了乡村部族的声望。但事实恰恰相反，古代罗马人对乡村生活的品味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品味来自他们明智的创建者，这些创建者把自由与乡村劳动、军事服役结合起来，而把艺术、工艺、阴谋、财富和奴役留给了城市。

Since, therefore, all Rome's most illustrious citizens lived in the fields and tilled the earth, men grew used to seeking there alone the mainstays of the republic. This condition, being that of the best patricians, was honoured by all men; the simple and laborious life of the villager was preferred to the slothful and idle life of the *bourgeoisie* of Rome; and he who, in the town, would have been but a wretched proletarian, became, as a labourer in the fields, a respected citizen. Not without reason, says Varro, did our great-souled ancestors establish in the village the nursery of the sturdy and valiant men who defended them in time of war and provided for their sustenance in time of peace. Pliny states positively that the country tribes were honoured because of the men of whom they were composed; while cowards men wished to dishonour were transferred, as a public disgrace, to the town tribes. The Sabine Appius Claudius, when he had come to settle in Rome, was loaded with honours and enrolled in a rural tribe, which subsequently took his family name. Lastly, freedmen always entered the urban, arid never the rural, tribes: nor is there a single example, throughout the Republic, of a freedman, though he had become a citizen, reaching any magistracy.

既然杰出的罗马公民都居住在乡下勤于垦种，那去乡间寻找共和国的中流砥柱就成为一种惯例。由于这是最高贵的贵族生活方式，因而得到了所有人的尊崇。人们喜爱乡村居民简单而勤劳的生活胜过罗马市民闲散而懒惰的生活。而且，一个人在城市只是个穷困的无产者，但只要他去乡间耕地，就会成为受人尊敬的公民。瓦罗说：“我们高贵的祖先选择在乡村建立那些培养健壮勇敢男儿的基地，让他们在战争时保卫自己，在平时供养自己，这些不是没有道理的。”普林尼也肯定地说，乡村部族受人尊敬是因为他们部族的人，如果要贬低一个懦夫，就把这个人转移到城市部族去羞辱他。萨宾人阿皮乌斯·克

劳狄乌斯载誉而归，来到罗马住的时候，就被编入了一个乡村部族，这个部族随后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最后，那些被解放的奴隶全部被编入了城市部族，没有一个被编入乡村部族。整个罗马共和国也没有任何一个由被释放的奴隶担任执政官的例子，即使他们已经成为合法的公民。

This was an excellent rule; but it was carried so far that in the end it led to a change and certainly to an abuse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尽管这是一个极好的原则，但它被过分地实行，以至最后发生了变化，也就导致了政治权力的滥用。

First the censors, after having for a long time claimed the right of transferring citizens arbitrarily from one tribe to another, allowed most persons to enrol themselves in whatever tribe they pleased. This permission certainly did no good, and further robbed the censorship of one of its greatest resources. Moreover, as the great and powerful all got themselves enrolled in the country tribes, while the freedmen who had become citizens remained with the populace in the town tribes, both soon ceased to have any local or territorial meaning, and all were so confused that the members of one could not be told from those of another except by the registers; so that the idea of the word *tribe* became personal instead of real, or rather came to be little more than a chimera.

首先，督察官长期把持着把公民从一个部族任意转移到另一个部族的权利，后来甚至允许大多数人根据自己的选择编入某个部族，这

种让步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它使督察行为失去了一个主要职能。此外，所有那些高贵的和有权势的人都跑去了乡下，而获得自由的奴隶和普通人则留在了城里，这样一来，部族不再具有任何地区或者领土的基础。所有部族如此混合在一起，人们只能通过户口簿才能识别出某个部族的成员。“部族”一词逐渐具有了人格上的意义，而不再具有领地的意义，或者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It happened in addition that the town tribes, being more on the spot, were often the stronger in the comitia and sold the State to those who stooped to buy the votes of the rabble composing them.

还有一个结果就是，由于集会的地点往往靠近乌合之众居多的城市部族，借近水楼台之便，城市部族常常是人民集会中最强大的群体，他们会把国家出卖给那些胆敢从构成集会的无耻之徒手中购买选票的人。

As the founder had set up ten *curiæ* in each tribe, the whole Roman people, which was then contained within the walls, consisted of thirty *curiæ* , each with its temples, its gods, its officers, its priests and its festivals, which were called *compitalia* and corresponded to the *paganalia* , held in later times by the rural tribes.

至于库里亚，既然建国者在每一部族中设立了十个库里亚，那么那时被围入罗马城墙之内的罗马人民就有三十个库里亚，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庙宇、神明、官员、祭司，还有自己的节日，被称为“大路节”，有点类似于后来乡村部族举办的乡村节。

When Servius made his new division, as the thirty *curiæ* could not be shared equally between his four tribes, and as he was unwilling to interfere with them, they became a further divis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Rome, quite independent of the tribes: but in the case of the rural tribes and their members there was no question of *curiæ* , as the tribes had then become a purely civil institution, and, a new system of levying troops having been introduced, the military divisions of Romulus were superfluous. Thus, although every citizen was enrolled in a tribe, there were very many who were not members of a *curia.*

在塞尔维乌斯做出这样的划分时，三十个区并不能被平均分配到四个部族里，而他又不想改变这一数字，于是就有了独立于部族的库里亚，这成为划分罗马居民的另一种方法。但乡村部族或是组成乡村部族的人民中间没有库里亚。因为在部族成为纯粹的民间机构之后，罗马便设置了另一种制度征募军队，罗穆卢斯时代的军事划分方法已经成为多余。这样，尽管每个公民都是某部族的成员，很多人却不属于任何库里亚。

Servius made yet a third division, quite distinct from the two we have mentioned, which became, in its effect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He distributed the whole Roman people into six classes, distinguished neither by place nor by person, but by wealth; the first classes included the rich, the last the poor, and those between persons of moderate means. These six classes were subdivided into one hundred and ninety-three other bodies, called centuries, which were so divided that the first class alone comprised more than half of them, while the last comprised only one. Thus the class that had the smallest number of members had the largest number of centuries, and the whole of the last class only counted as

a single subdivision, although it alone included more than half the inhabitants of Rome.

塞尔维乌斯还实行了第三种划分方法，这种划分与前两种没有任何关系，但从它实施的效果来看，它却成为所有划分法中最重要的一种。他把整个罗马人民分成六个等级，这种分法既不根据人的身份，也不按居住区域，而是按财产来划分。所以第一等级中全是富人，而最后一个等级中全是穷人，中间等级则由中等富裕的人构成。这六个等级又被细分为一百九十三个团体，命名为百人团。这些群体的分配非常不均，第一等级占据了半数的百人团，而最后一个等级单独构成了一个团。这样就导致人数最少的等级拥有数量最多的百人团，而最末的等级却只当做一个团来计算，尽管这一个等级包括了罗马半数以上的居民。

In order that the people might have the less insight into the results of this arrangement, Servius tried to give it a military tone: in the second class he inserted two centuries of armourers, and in the fourth two of makers of instruments of war; in each class, except the last, he distinguished young and old, that is, those who were under an obligation to bear arms and those whose age gave them legal exemption. It was this distinction, rather than that of wealth, which required frequent repetition of the census or counting. Lastly, he ordered that the assembly should be held in the Campus Martius, and that all who were of age to serve should come there armed.

为了使这种划分形式的含义不那么露骨，塞尔维乌斯设法赋予它一种军事形式：他在第二个等级中安插了两个军械士百人团，在第四个等级中安插了两个兵器制造的百人团。除了最末一个等级，他还在

每个等级中做了老幼的划分，就是说，把那些有义务服兵役的人和那些因年龄大而依法免兵役的人区别开来。这种区分方法与按财产进行划分的方法相比，需要更经常的人口普查。最后，他又规定集会在玛尔提乌斯运动场举行，所有达到服兵役年龄的人都必须携带武器参加。

The reason for his not making in the last class also the division of young and old was that the populace, of whom it was composed, was not given the right to bear arms for its country: a man had to possess a hearth to acquire the right to defend it, and of all the troops of beggars who to-day lend lustre to the armies of kings, there is perhaps not one who would not have been driven with scorn out of a Roman cohort, at a time when soldiers were the defenders of liberty.

塞尔维乌斯没有在最后一个等级中对年轻人和老年人做出区分，原因在于这些最普通的国民没有拿起武器为其国家服务的荣誉。一个人必须先有一个家，然后才有权利保卫这个家园。今天的国王军队里充斥着数不清的乞丐，若是在那个士兵是自由捍卫者的时代，这些人恐怕没有一个不被罗马人轻蔑地从罗马步兵队伍里驱逐出去。

In this last class, however, *proletarians* were distinguished from *capite censi.* The former, not quite reduced to nothing, at least gave the State citizens, and sometimes, when the need was pressing, even soldiers. Those who had nothing at all, and could be numbered only by counting heads, were regarded as of absolutely no account, and Marius was the first who stooped to enrol them.

然而，就是在最低等级中，也存在无产者和所谓按人头计数的人的区分。前者还不是完全的一无所有，至少他们还能为国家提供公民，在紧急的时候甚至能提供兵源。但是后者，那些一无所有而且只能通过数人头来计数的人，则完全被视为毫无地位的人。马里乌斯是第一个肯屈尊招募他们的人。

Without deciding now whether this third arrangement was good or bad in itself, I think I may assert that it could have been made practicable only by the simple morals, the disinterestedness, the liking for agriculture and the scorn for commerce and for love of gain which characterised the early Romans. Where is the modern people among whom consuming greed, unrest, intrigue, continual removals, and perpetual changes of fortune, could let such a system last for twenty years without turning the State upside down? We must indeed observe that morality and the censorship, being stronger than this institution, corrected its defects at Rome, and that the rich man found himself degraded to the class of the poor for making too much display of his riches.

在这里我姑且不谈这三种划分方式本身是好是坏，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只有在早期，罗马人的简单淳朴、他们对农业的热爱以及他们对商业和牟取暴利行为的轻蔑，才使这种划分行得通。而现代民族人民无厌的贪欲、浮躁的内心、无休止的奔波以及反复无常的祸福变换怎么能使这样的制度维持二十年而不颠覆整个国家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罗马人民的道德和监察制度比这个制度更强大并且足以纠正这个制度的弊病。如果一个富人过分地炫耀他的财富，那么他将被贬斥到穷人的队伍中去。

From all this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why only five classes are

almost always mentioned, though there were really six. The sixth, as it furnished neither soldiers to the army nor votes in the Campus Martius, [4_4] and was almost without function in the State, was seldom regarded as of any account.

从上述的一切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尽管罗马有六个等级，但人们常常提起的只有五个。因为第六等级既不能加入军队，也不能去玛尔提乌斯运动场参加公民投票 [5_4] ，他们在共和国几乎一无用处，所以也就很少得到人们的关注。

These were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 Roman people was divided. Let us now see the effect on the assemblies. When lawfully summoned, these were called *comitia:* they were usually held in the public square at Rome or in the Campus Martius, and were distinguished as *comitia curiata, comitia centuriata* , and *comitia tributa* , according to the form under which they were convoked. The *comitia curiata* were founded by Romulus; the *centuriata* by Servius; and the *tributa* by the tribunes of the people. No law received its sanction and no magistrate was elected, save in the comitia; and as every citizen was enrolled in a *curia* , a century, or a tribe, it follows that no citizen was excluded from the right of voting, and that the Roman people was truly sovereign both *de jure* and *de facto.*

以上就是罗马人民的各种分类方式，接下来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些划分对公民集会的影响。合法召集的公民集会被称为人民大会，通常在罗马广场或玛尔提乌斯运动场上举行。根据集会召开所依据的三种形式分为库里亚大会、百人团大会和部族大会。库里亚大会是由罗穆卢斯创立的，百人团大会则由塞尔维乌斯首创，而部族公民会议则起

源于保民官。只有在这些人民大会上，才可以通过法律，才可以选举行政官员，而且由于每个公民都是被编入库里亚、百人团或部族的，所以每个公民都没有被排除在投票权之外，罗马人民在法律和事实上都是真正主权者。

For the comitia to be lawfully assembled, and for their acts to have the force of law, three conditions were necessary. First, the body or magistrate convoking them had to possess the necessary authority; secondly, the assembly had to be held on a day allowed by law; and thirdly, the auguries had to be favourable.

要使人民大会的召开具有合法性，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具有法律的力量，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第一，召集会议的团体或官员必须具有相应的权威；第二，大会必须在法定的日子举行；第三，天象占卜必须为吉兆。

The reason for the first regulation needs no explanation; the second is a matter of policy. Thus, the comitia might not be held on festivals or market-days, when the country-folk, coming to Rome on business, had not time to spend the day in the public square. By means of the third, the senate held in check the proud and restive people, and meetly restrained the ardour of seditious tribunes, who, however, found more than one way of escaping this hindrance.

第一条规则的原因不需要解释了，第二条是一项管理方面的规定，集会不应当在节假日或有集市的日子举行，因为进城办事的乡民们没有时间在广场待上一天。第三条规则可以使元老院能够制约那些骄傲而且躁动的人，并且可以消减保民官们煽动性的热情，尽管保民

官会找出种种办法来摆脱这种约束。

Laws and the election of rulers were not the only questions submitted to the judgment of the comitia: as the Roman people had taken on itself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lot of Europe was regulated in its assemblies. The variety of their objects gave rise to the various forms these took, according to the matters on which they had to pronounce.

法律和官员选举并非是提交集会决定的唯一内容，既然罗马人民已经篡取了政府最重要的职能，那么可以说整个欧洲的命运就是在那些集会上决定的。要处理的公共事务各种各样，这些决定了集会要采取不同的形式召开。

In order to judge of these various forms, it is enough to compare them. Romulus, when he set up *curia* , had in view the checking of the senate by the people, and of the people by the senate, while maintaining his ascendancy over both alike. He, therefore, gave the people, by means of this assembly, all the authority of numbers to balance that of power and riches, which he left to the patricians. But, after the spirit of monarchy, he left all the same a greater advantage to the patricians in the influence of their clients on the majority of votes. This excellent institution of patron and client was a masterpiece of statesmanship and humanity without which the patriciate, being flagrantly in contradiction to the republican spirit, could not have survived. Rome alone has the honour of having given to the world this great example, which never led to any abuse, and yet has never been followed.

要想评判这些不同的大会形式，只需对它们进行一下比较就可以了。罗穆卢斯建立库里亚的目的是要让元老院制衡人民的力量，人民又反过来制约元老院，而他自己则可以驾驭这两方了。他的这种安排给予了人民人数上的权威，以平衡他留给贵族的权力和财富上的权威。然而，按照君主制的精神，他还是留给贵族们更多有利条件，贵族可以通过贿买他们的被保护者在投票上保持优势。这种令人赞叹的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制度实在是一项政治和人道的杰作。没有它，和共和制精神相背离的贵族统治就不可能维系下去。只有罗马才会有此殊荣为世界做出良好榜样，尽管这一制度从未产生过任何弊病，但在其他地方它从未被效仿过。

As the assemblies by *curiæ* persisted under the kings till the time of Servius, and the reign of the later Tarquin was not regarded as legitimate, royal laws were called generally *leges curiatæ*.

库里亚这种形式在所有王权时期都一直存在着一直到塞尔维乌斯时代，由于塔尔干王朝末期的统治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因此王权时期的法律整体上被称作库里亚法。

Under the Republic, the *curiæ* , still confined to the four urban tribes, and including only the populace of Rome, suited neither the senate, which led the patricians, nor the tribunes, who, though plebeians, were at the head of the well-to-do citizens. They therefore fell into disrepute, and their degradation was such, that thirty lictors used to assemble and do what the *comitia curiata* should have done.

在共和制时期，由于库里亚一直局限于四个城市部族，并且仅仅

包括罗马城的居民，所以这种形式既不能适用于领导贵族阶层的元老院，也不能适用于虽然自己身为平民但却领导着一群有钱公民的保民官。这样，库里亚就失去了威信，每况愈下，以至于只要他们的三十个执法吏集合起来，就可以处理那些本应在库里亚大会上处理的事情。

The division by centuries was so favourable to the aristocracy that it is hard to see at first how the senate ever failed to carry the day in the comitia bearing their name, by which the consuls, the censors and the other curule magistrates were elected. Indeed, of the hundred and ninety-three centuries into which the six classes of the whole Roman people were divided, the first class contained ninety-eight; and, as voting went solely by centuries, this class alone had a majority over all the rest. When all these centuries were in agreement, the rest of the votes were not even taken; the decision of the smallest number passed for that of the multitude, and it may be said that, in the *comitia centuriata* , decisions were regulated far more by depth of purses than by the number of votes.

百人团的划分对元老院如此有利，以至于我们一开始很难看明白为什么元老院在那个被称为百人团集会的大会中不能占主导地位，从而去选举执政官、监察官和其他高级行政官员。因为事实上，在那个由全体罗马人民的六个等级所形成的一百九十三个百人团中，第一等级就占了九十八个，而选票是以百人团的数目来计算的，那么第一等级就拥有了超出其他所有等级数的优势。如果第一等级的所有百人团意见达成一致的话，其他等级的投票数就不用再统计了。这样，少数人作出的决定就被看做是大多数人的决定。因此可以这么说，百人团集会中的事务是以财富的多数而不是以投票的多数来决定。

But this extreme authority was modified in two ways. First, the tribunes as a rule, and always a great number of plebeians, belonged to the class of the rich, and so counterbalanced the influence of the patricians in the first class.The second way was this. Instead of causing the centuries to vote throughout in order, which would have meant beginning always with the first, the Romans always chose one by lot which proceeded alone to the election; after this all the centuries were summoned another day according to their rank, and the same election was repeated, and as a rule confirmed. Thus the authority of example was taken away from rank, and given to the lot on a democratic principle.

但是，这种极端的权威遭到两方面的制约。首先，保民官往往来自富人等级，而许多平民也属于富人等级，他们的存在制约了第一等级贵族的影响力。其次，按规定，百人团并不按等级次序进行投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第一个等级的百人团总是首先投票。相反，人们先通过抽签的办法选出一个百人团 [5_5] ，由该团单独进行选举。之后在另一天，所有其他百人团被召集起来再重复这一选举，其结果通常接近前一结果。于是，对应民主制的原则，示范的权威便由地位转移到了抽签上。

From this custom resulted a further advantage. The citizens from the country had time, between the two elections, to inform themselves of the merits of the candidate who had been provisionally nominated, and did not have to vote without knowledge of the case. But, under the pretext of hastening matters, the abolition of this custom was achieved, and both elections were held on the same day.

这一做法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乡下的公民可以利用两次选举的间隔来了解临时被任命的候选人的品行，这样就不会再盲目投票了。但这个办法最终在加快选举进程的借口下被废除了，两个选举被放在同一天举行。

The *comitia tributa* were properly the council of the Roman people. They were convoked by the tribunes alone; at them the tribunes were elected and passed their plebiscita. The senate not only had no standing in them, but even no right to be present; and the senators, being forced to obey laws on which they could not vote, were in this respect less free than the meanest citizens. This injustice was altogether ill-conceived, and was alone enough to invalidate the decrees of a body to which all its members were not admitted. Had all the patricians attended the comitia by virtue of the right they had as citizens, they would not, as mere private individuals, have had any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a vote reckoned by counting heads, where the meanest proletarian was as good as the *princeps senatus.*

严格来说，部族集会才是罗马人民真正的议会，它只能由保民官来召集。而正是这种集会选出了保民官，并通过了全民制定的法律。元老院在此不仅毫无地位，甚至无权参加部族集会，因此不得不服从他们未能参加表决的法律。从这方面来说，元老们的自由还比不上那些最末等的公民。但这一不公正的规定完全是一种拙劣的做法，这个未曾得到全体成员认可的体系足以使它产生的政令无效。如果所有的贵族都凭着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参加了这些集会，那么此时他们已经是单纯的个人，所以就很难影响到这种按人计票的表决形式，因为在这里，最卑微的无产者同最高贵的元老是同等重要的。

It may be seen, therefore, that besides the order which was achieved by these various ways of distributing so great a people and taking its votes, the various methods were not reducible to forms indifferent in themselves, but the results of each were relative to the objects which caused it to be preferred.

可以看到，除了如此众多的人民由于投票时各种不同的分配方式而产生的秩序之外这些投票的分配方式本身也并非无关紧要的。每种分配方式都有与其意图相联系的效果，而这种意图恰是导致这一方式被选中的原因。

Without going here into further details, we may gather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above that the *comitia tributa* were the most favourable to popular government, and the *comitia centuriata* to aristocracy. The *comitia curiata* , in which the populace of Rome formed the majority, being fitted only to further tyranny and evil designs, naturally fell into disrepute, and even seditious persons abstained from using a method which too clearly revealed their projects. It is indisputable that the whole majesty of the Roman people lay solely in the *comitia centuriata* , which alone included all; for the *comitia curiata* excluded the rural tribes, and the *comitia tributa* the senate and the patricians.

不必再进一步阐述更多细节，我们可以从前面的解释中得出结论：部族大会是对民主政治更有利的一种集会，百人团集会则对贵族制更为有利。至于罗马市民占大多数的库里亚大会，由于它们只适宜于推行暴政和设计阴谋，因而名誉扫地，就是那些叛乱分子也会避免利用这种集会，以防止把自己的计划暴露出去。毫无疑问，罗马人民的尊严只有在百人团集会中才能找到。这种大会是唯一完整的公民集

会，因为乡村部族不参加库里亚大会，而部族集会又把元老院和贵族排斥在外。

As for the method of taking the vote, it was among the ancient Romans as simple as their morals, although not so simple as at Sparta. Each man declared his vote aloud, and a clerk duly wrote it down; the majority in each tribe determined the vote of the tribe, the majority of the tribes that of the people, and so with *curiæ* and centuries. This custom was good as long as honesty was triumphant among the citizens, and each man was ashamed to vote publicly in favour of an unjust proposal or an unworthy subject; but, when the people grew corrupt and votes were bought, it was fitting that voting should be secret in order that purchasers might be restrained by mistrust, and rogues be given the means of not being traitors.

早期罗马人的计票方式就像他们的风尚一样简单，尽管还不像斯巴达那么简单。每个人大声报出自己的选票，由职员负责记录。每个部族内部的大多数选票决定了该部族的决定，大多数部族的投票结果便代表了所有人民的决定，库里亚和百人团的表决方式与此相同。如果公民们都是诚实的，且每个人都耻于在公开场合下投票支持那些提出不公措施的不合格候选人，那么这种投票方法是可行的。但是，当民风败坏，选票可以买卖时，就应该使用秘密投票的方式，以使收买选票的人因不信任出卖选票的人而受到限制，而且也使恶棍们不至于成为叛国者。

I know that Cicero attacks this change, and attributes partly to it the ruin of the Republic. But though I feel the weight Cicero's authority must carry on such a point, I cannot agree with him; I hold, on the contrary, that, for want of enough such change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tate must be hastened. Just as the regimen of health does not suit the sick, we should not wish to govern a people that has been corrupted by the laws that a good people requires. There is no better proof of this rule than the long lif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of which the shadow still exists, solely because its laws are suitable only for men who are wicked.

我知道西塞罗谴责这种投票方式的改变，他将共和国灭亡的部分原因归结于此。但是，尽管我知道西塞罗的权威在这里所应有的份量，但对他的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相反，我认为正是类似的改革太少，才加速了罗马共和国的灭亡。正如健康人的食谱不适宜于病人，适宜于正直民族的法律也不能用于治理一个开始堕落的民族。对这一原则最好的例证莫过于威尼斯共和国那长久的历史。迄今为至，它余波仍在，唯一的原因就是它的法律是专为不道德的人制定的。

The citizens were provided, therefore, with tablets by means of which each man could vote without anyone knowing how he voted: new methods were also introduced for collecting the tablets, for counting voices, for comparing numbers, etc.; but all these precautions did not prevent the good faith of the officers charged with these functions [4_5] from being often suspect. Finally, to prevent intrigues and trafficking in votes, edicts were issued, but their very number proves how useless they were.

现在，每个罗马公民在投票时都会分得一块方板，这样他们写下的选择别人就无从得知了。人们也制定出了收集方板、统计选票、比较票数等事务的新程序。尽管如此，也没能使那些负责这些职能 [5_6] 的官员免除作弊的嫌疑。最后，人们还制定了一些用来防止投票舞弊和收买选票的法令，但这些法令的名目繁多恰好显示了它们的无效。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Republic, it was often necessary to have recourse to extraordinary expedients in order to supplement the inadequacy of the laws. Sometimes miracles were supposed; but this method, while it might impose on the people, could not impose on those who governed. Sometimes an assembly was hastily called together, before the candidates had time to form their factions: sometimes a whole sitting was occupied with talk, when it was seen that the people had been won over and was on the point of taking up a wrong position. But in the end, ambition eluded all attempts to check it; and the most incredible fact of all is that, in the midst of all these abuses, the vast people, thanks to its ancient regulations, never ceased to elect magistrates, to pass laws, to judge cases, and to carry through busines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almost as easily as the senate itself could have done.

到了罗马共和国的后期，人们经常不得不诉诸各种非常性的权宜之计来弥补法律的不足。有时他们会假托神迹，但这种办法骗得了人民，却骗不了统治人民的人；有时他们会在候选人还来不及收买选票时就突然召集会议；有时当人民已经被说服并且即将做出错误决定时，就将整个会议耗费在聊天中。但是最后，野心还是战胜了试图制约它的一切。所有这些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有如此种种弊端，这个庞大的民族还是会借助古老的规则继续选举他们的官员，继续制定法律、审理案件、处理公私事务，而其表现出来的智慧同元老院无异。

Chapter 5 The Tribunate

第五章　论保民官制

When an exact proportion cannot b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constituent parts of the State, or when causes that cannot be removed continually alter the relation of one part to another, recourse is had to the institution of a peculiar magistracy that enters into no corporate unity with the rest. This restores to each term its right relation to the others, and provides a link or middle term between either prince and people, or prince and Sovereign, or, if necessary, both at once.

当人们不能在国家各组成部门之间确立一个精确的比例时，或者当一些无法控制的原因不断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时，就需要建立一个独立于其他部门的特殊机构，它能使国家的各组成部分处于一种良好的平衡状态，并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或者在君主和主权体之间成为一种中介或纽带。如果有必要，它甚至可以同时调节以上两种关系。

This body, which I shall call the *tribunate* , is the preserver of the laws and of the legislative power.It serves sometimes to protect the Sovereign against the government, as the tribunes of the people did at Rome; sometimes to uphold the government against the people, as the Council of Ten now does at Venice; and sometimes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as the Ephors did at Sparta.

我将这种制度称之为保民官制度，它是法律和立法权的维护者。有时它会为了保护主权体而与政府作斗争，就像以前罗马的保民官一样；有时，它也会为了支持政府而反对人民，就如同现在的威尼斯十人委员会；而有时它又用以维持双方的平衡，就像从前斯巴达的监察官。

The tribunate is not a constituent part of the city, and should have no share in either legislative or executive power; but this very fact makes its own power the greater: for, while it can do nothing, it can prevent anything from being done. It is more sacred and more revered, as the defender of the laws, than the prince who executes them, or than the Sovereign which ordains them. This was seen very clearly at Rome, when the proud patricians, for all their scorn of the people, were forced to bow before one of its officers who had neither auspices nor jurisdiction.

保民官制度不属于共和制的组成部分，保民官也不应享有任何立法权和行政权。但正是因为这一点，它的权力才最大，虽然它自身什么也不能做，但它可以阻止其他机构所做的任何事情。作为法律的护卫者，它比执行法律的统治者和制定法律的主权者更为神圣，更受人尊崇。这一点在罗马显而易见。那些总是鄙视全体人民的自命不凡的贵族，却不得不屈从于一个既不神圣、又无审判权的普通保民官。

The tribunate, wisely tempered, is the strongest support a good constitution can have; but if its strength is ever so little excessive, it upsets the whole State. Weakness, on the other hand, is not natural to it: provided it is something, it is never less than it should be.

一个调节得当的保民官制度是国家良好体制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一旦它的权力多于它所必需的范围，哪怕是多出一丁点，它就会扰乱整个国家。保民官制在本质上并不易于屈服。一旦它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它所发挥的力量永远不会弱于它所应有的力量。

It degenerates into tyranny when it usurps the executive power,

which it should confine itself to restraining, and when it tries to dispense with the laws, which it should confine itself to protecting. The immense power of the Ephors, harmless as long as Sparta preserved its morality, hastened corruption when once it had begun. The blood of Agis, slaughtered by these tyrants, was avenged by his successor; the crime and the punishment of the Ephors alike hasten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epublic, and after Cleomenes Sparta ceased to be of any account. Rome perished in the same way: the excessive power of the tribunes, which they had usurped by degrees, finally served, with the help of laws made to secure liberty, as a safeguard for the emperors who destroyed it. As for the Venetian Council of Ten, it is a tribunal of blood, an object of horror to patricians and people alike; and, so far from giving a lofty protection to the laws, it does nothing, now they have become degraded, but strike in the darkness blows of which no one dare take note.

当只能作为调节者的保民官篡夺行政权力时，或是当只能保护法律的保民官试图制定法律时，保民官制就堕落成暴政了。在斯巴达还能维持风尚的时候，监察院的巨大权力不足为患，但腐败一旦出现就会愈演愈烈。篡位暴君谋杀亚基斯的血债，由他的继承者讨了回来。但这些监察官们所犯的罪行和所受的惩罚也加速了共和国的灭亡。到克里奥门尼斯之后，斯巴达就不值一提了。罗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走向灭亡：保民官们逐步篡夺了过多的权力，借助于为自由而制定的法律，他们甚至成为破坏自由的皇帝的保护者。至于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根本就是一个血腥的审判所，对于贵族和平民同样的可怕它远不是崇高地保护法律，而是把法律贬得很低。在堕落之后，它只是在暗中施放一些见不得人的冷枪暗箭。

The tribunate, like the government, grows weak as the number

of its members increases. When the tribunes of the Roman people, who first numbered only two, and then five, wished to double that number, the senate let them do so, in the confidence that it could use one to check another, as indeed it afterwards freely did.

就如政府一样，保民官制度的力量也随着人数的增加而削弱。罗马人民的保民官最初是两人，后来成了五个。当他们试图把这个数目增加一倍时，得到了元老院的支持，因为元老院确信他们可以利用其中一些人去控制另外一些，而最后这些都如其所愿地发生了。

The best method of preventing usurpations by so formidable a body, though no government has yet made use of it, would be not to make it permanent, but to regulate the periods during which it should remain in abeyance. These intervals, which should not be long enough to give abuses time to grow strong, may be so fixed by law that they can easily be shortened at need by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s.

要防止这样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机构篡权——尽管还没有任何政府试图这样做——最佳方法就是不要让保民官成为常设机构。可以让它周期性存在，设定一些间歇，但这些间隔时间不能太长，以免权力滥用有足够的时间生根发芽。具体的间隔期可以通过法律作出一些规定，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根据规定来缩短间隔期。

This method seems to me to have no disadvantages, because, as I have said, the tribunate, which forms no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 can be removed without the constitution being affected. It seems to be also efficacious, because a newly restored magistrate starts not

with the power his predecessor exercised, but with that which the law allows him.

在我看来，这样的安排没什么不好，因为我已经说过，保民官制度不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将它暂停也不至于产生什么损害。而且我还认为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安排，因为机构重新运作后的新任官员不是以他前任所拥有的权力为依据处理事情，而只是依据法律赋予他的权力。

Chapter 6 The Dictatorship

第六章　论独裁制

The inflexibility of the laws, which prevents them from adapting themselves to circumstances, may, in certain cases, render them disastrous, and make them bring about, at a time of crisis, the ruin of the State. The order and slowness of the forms they enjoin require a space of time which circumstances sometimes withhold. A thousand cases against which the legislator has made no provision may present themselves, and it is a highly necessary part of foresight to be conscious that everything cannot be foreseen.

法律缺乏弹性使它不能根据具体事件而有所变通，这在特定情况下是有害的，在危机出现的时候甚至能导致国家灭亡。种种法定程式以及拖沓的程序往往会耗费一定的时间，而现实情况往往等不了这么长时间。可能出现的无数种情况都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当然，如果懂得他们不可能预见所有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预见了。

It is wrong therefore to wish to mak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o strong as to render it impossible tosuspend their operation. Even Sparta allowed its laws to lapse.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不应该把政治制度建立得如此僵硬，以至于剥夺了人们中止法律执行的权力。即使是斯巴达有时也会停止法律的运行。

However, none but the greatest dangers can counterbalance that of changing the public order, and the sacred power of the laws should never be arrested save when the existence of the country is at stake. In these rare and obvious cases, provision is made for the public security by a particular act entrusting it to him who is most worthy. This commitment may be carried out in either of two ways,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danger.

但是，只有最大的危险才值得去冒变更公共秩序的风险，只有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时，才可以暂停法律的神圣权力。在这些罕见而又显见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约定来维护国家的公共安全，把这一责任放在一个最值得信赖的人手中。根据危险的性质，这种委托可以以两种方式进行。

If increasing the activity of the government is a sufficient remedy, power is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one or two of its members: in this case the change is not in the authority of the laws, but only in the form of administering them.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ril is of such a kind that the paraphernalia of the laws are an obstacle to their preservation, the method is to nominate a supreme

ruler, who shall silence all the laws and suspend for a moment the sovereign authority. In such a case,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the general will, and it is clear that the people's first intention is that the State shall not perish. Thus the suspension of the legislative authority is in no sense its abolition; the magistrate who silences it cannot make it speak; he dominates it, but cannot represent it. He can do anything, except make laws.

如果只需调动政府的能动性就足以应付危险，那么就可以把它的权力集中在政府的一两个成员手中。在此，并不是法律的权威发生了改变，只是执行法律的形式变了。如果危险太大，法律规定本身已经成为有效行动的障碍，那就必须任命一个至高无上的首领，使他有权力让法律沉默，并且有权力暂时搁置立法者的权威。在此情形下，公共意志应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很显然，此时人民最关心的就是不使国家灭亡。暂时搁置立法权威并不是要废除它。使法律暂时沉默的官员并不能使它开口；他可以控制立法权威，但没有权力代表它；他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制定法律。

The first method was used by the Roman senate when, in a consecrated formula, it charged the consuls to provide for the safety of the Republic. The second was employed when one of the two consuls nominated a dictator: [4_6] a custom Rome borrowed from Alba.

罗马的元老院曾依据一种神圣的仪式把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赋予它的执政官，他们采用的便是这两种方法中的第一种；而当两个罗马执政官中的一个被指定为独裁官时 [5_7] ，便是采用了第二种方法。这种方法最初始自阿尔巴。

During the first period of the Republic, recourse was very often had to the dictatorship, because the State had not yet a firm enough basis to be able to maintain itself by the strength of its constitution alone. As the state of morality then made superfluous many of the precautions which would have been necessary at other times, there was no fear that a dictator would abuse his authority, or try to keep it beyond his term of office. On the contrary, so much power appeared to be burdensome to him who was clothed with it, and he made all speed to lay it down, as if taking the place of the laws had been too troublesome and too perilous a position to retain.

在共和国建立初期，罗马人经常诉诸独裁官制，因为国家的根基尚不稳定，还不具备维护自身的力量。而且在这一时期，人民的道德特征使许多预防措施在其他情况下成为多余，人们不必担心独裁者会滥权或试图延长他的任期。相反，这一巨大的权力对于执掌它的人来说似乎是一种负担。因此他们总是试图尽快摆脱它，就好像取代法律的地位是一件非常痛苦，非常危险的事情。

It is therefore the danger not of its abuse, but of its cheapening, that makes me attack the indiscreet use of this supreme magistracy in the earliest times. For as long as it was freely employed at elections, dedications and purely formal functions, there was danger of its becoming less formidable in time of need, and of men growing accustomed to regarding as empty a title that was used only on occasions of empty ceremonial.

在罗马早期就实行的这种不明智的独裁制度颇受人诟病，并不是因为它存在滥权的危险，而是因为这种职位的权力会有被贬低的风险。当这种独裁官被滥用于选举、祝圣和纯粹的礼仪事务时，人们就

有必要担心这种制度会在真正需要时变得不那么强大，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认为它只是一个用于空洞仪式的空洞头衔。

Towards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the Romans, having grown more circumspect, were as unreasonably sparing in the use of the dictatorship as they had formerly been lavish. It is easy to see that their fears were without foundation, that the weakness of the capital secured it against the magistrates who were in its midst; that a dictator might, in certain cases, defend the public liberty, but could never endanger it; and that the chains of Rome would be forged, not in Rome itself, but in her armies. The weak resistance offered by Marius to Sulla, and by Pompey to Cæsar, clearly showed what was to be expected from authority at home against force from abroad.

接近共和国的末期，罗马人变得小心起来。此时他们在运用这种独裁制上的保守，同他们曾经对这种制度的滥用一样毫无道理。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他们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当时罗马的虚弱反倒成了一种自我保护，可以对抗夹在中间的行政官，而一个独裁者在特定情况下是要在保卫公共自由的同时又不侵犯这一自由。罗马的束缚不是来自它本身，而是在罗马军队里形成的。马里乌斯对苏拉、庞培对凯撒几乎都没有什么抵抗，这清楚地显示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内部权威可以有所作为。

This misconception led the Romans to make great mistakes; such, for example, as the failure to nominate a dictator in the Catilinarian conspiracy. For, as only the city itself, with at most some province in Italy, was concerned, the unlimited authority the laws gave to the dictator would have enabled him to make short

work of the conspiracy, which was, in fact, stifled only by a combination of lucky chances human prudence had no right to expect.

这一过失使罗马人犯了很大的错误，比如，他们在喀提林那事件中没有任命一个独裁官。因为这一事件只是涉及罗马城内部，至多是关联到意大利的几个省份，所以凭借法律所赋予独裁官的无限权威本可以使这次阴谋很容易就被挫败。但事实是种种偶然幸运事件凑在一起才使这次阴谋没有得逞，可人类是不应指望偶然幸运的。

Instead, the senate contented itself with entrusting its whole power to the consuls, so that Cicero, in order to take effective action, was compelled on a capital point to exceed his powers; and if, in the first transports of joy, his conduct was approved, he was justly called, later on, to account for the blood of citizens spilt in violation of the laws. Such a reproach could never have been levelled at a dictator. But the consul's eloquence carried the day; and he himself, Roman though he was, loved his own glory better than his country, and sought, not so much the most lawful and secure means of saving the State, as to get for himself the whole honour of having done so. [4_7] He was therefore justly honoured as the liberator of Rome, and also justly punished as a law-breaker. However brilliant his recall may have been, it was undoubtedly an act of pardon.

元老院没有任命一个独裁官，只是把自己的所有权力交给了执政官们。正因为这样，西塞罗为了更有效地行动，不得不在关键时刻逾越了这一权力。尽管一开始，罗马人在喜悦的激动情绪中支持了他的行动，但是后来人们便要求他为民众在破坏这一法律时所流的血负

责。而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一个独裁官身上，人们就无法指责他。不过这位执政官的能言善辩压过了一切。尽管他是罗马人，但他爱自己的荣誉胜过爱自己的祖国，他不是去积极寻找拯救自己国家的最合适的确切方法，而是想办法从这件事中获得荣耀 [5_8] 。因此作为罗马的解放者他受到人们的尊敬是很公正的，但作为罗马法律的破坏者，他受到的惩罚也是公正的。对他的判决的撤销无论多么光彩，那也只是一种赦免。

However this important trust be conferred, it is important that its duration should be fixed at a very brief period, incapable of being ever prolonged. In the crises which lead to its adoption, the State is either soon lost, or soon saved; and, the present need passed, the dictatorship becomes either tyrannical or idle. At Rome, where dictators held office for six months only, most of them abdicated before their time was up. If their term had been longer, they might well have tried to prolong it still further, as the decemvirs did when chosen for a year. The dictator had only time to provide against the need that had caused him to be chosen; he had none to think of further projects.

此外，这项重要的任命不论以何种方式授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其任期规定在一段非常短的时期内，并且这一任期不能延长。在需要独裁者出现的紧急关头，国家要么很快灭亡要么得到拯救。一旦这种危机过去，独裁要么变成暴政，要么有名无实。罗马的独裁官任期为六个月，大部分人在自己任期结束前就退任了。如果这一期限比这更长，他们可能还想继续延长，就像十人委员会一样，任期变成一年。发生危机才需要推举独裁官，那么独裁官的任期只要足够应付这个危机就够了，这样他才没有时间作任何其他的打算。

Chapter 7 The Censorship

第七章　论监察官制

As the law is the declaration of the general will, the censorship is the declaration of the public judgment: public opinion is the form of law which the censor administers, and, like the prince, only applies to particular cases.

正像公共意志由法律来申明一样，公众判断是由监察机构来阐明的；公共的意见即舆论是另一种法律形式，监察官就是这种法律的执行者。而且依照君主的方式，他只是把这一法律应用于个别事件。

The censorial tribunal, so far from being the arbiter of the people's opinion, only declares it, and, assoon as the two part company, its decisions are null and void.

监察官只是人民舆论的宣告者，而绝不是人民舆论的仲裁者，一旦它偏离了这一点，它的决定就失去了效用。

It is useless to distinguish the morality of a nation from the objects of its esteem; both depend on the same principle and are necessarily indistinguishable. There is no people on earth the choice of whose pleasures is not decided by opinion rather than nature. Right men's opinions, and their morality will purge itself. Men always love what is good or what they find good; it is in judging what is good that they go wrong. This judgment, therefore, is what must be regulated. He who judges of morality judges of honour; and

he who judges of honour finds his law in opinion.

将一个民族的道德和尊崇对象区分开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两者基于相同的原则存在，而且必然会融合到一起。在世界所有的民族中，决定他们喜好选择的并不是天性，而是舆论。端正了人们的舆论，人类的风尚也自然变得纯正。人们总是热爱美好的东西，或者说热爱他们认为美好的东西，但人们正是在这个判断中会发生错误，那就必须对这种判断作出规范。对道德的评判就是对他们所尊崇的东西作出评判，而要对他们所尊崇的东西做出评判，则需从公共意见中得出他们的法则。

The opinions of a people are derived from its constitution; although the law does not regulate morality, it is legislation that gives it birth. When legislation grows weak, morality degenerates; but in such cases, the judgment of the censors will not do what the force of the laws has failed to effect.

一个民族的观念源自它的政体。尽管法律并不对道德作出规定，但道德却从立法中得来。当法律退化的时候，道德就开始退化，但是此时，法律做不到的事情，监察官也同样做不到。

From this it follows that the censorship may be useful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morality, but can never be so for its restoration. Set up censors while the laws are vigorous; as soon as they have lost their vigour, all hope is gone; no legitimate power can retain force when the laws have lost it.

从这一点可以知道，监察官制对维护道德是有作用的，但却不能重建道德。所以要在法律还有活力的时候设置监察官，因为一旦这种活力消失，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希望。当法律失去了自身的力量，一切合法的权力也都不再有力量了。

The censorship upholds morality by preventing opinion from growing corrupt, by preserving its rectitude by means of wise applications, and sometimes even by fixing it when it is still uncertain. The employment of seconds in duels, which had been carried to wild extremes in the kingdom of France, was done away with merely by these words in a royal edict: “As for those who are cowards enough to call upon seconds.” This judgment, in anticipating that of the public, suddenly decided it. But when edicts from the same source tried to pronounce duelling itself an act of cowardice, as indeed it is, then, since common opinion does not regard it as such, the public took no notice of a decision on a point on which its mind was already made up.

监察官制度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维护道德：阻止人们观念的腐败；通过贤明的裁决保持舆论的正确性，有时甚至在舆论还不确定的时候把它确定下来。比如，在决斗中使用助手曾在法兰西王国盛行一时，但这一习惯由于国王的诏书里的几个字“至于那些使用助手的懦夫们……”就被废止了。由于这一判断预见了公共判断，因此一下就把公共判断确定下来了。但是如果以同样的诏书宣布决斗也是一种懦弱的行为，尽管决斗确实是懦弱的表现，但这与舆论的观点不符，那么公众就会嘲笑这个决定，因为公众对决斗的评判早已形成。

I have stated elsewhere [4_8] that as public opinion is not subject to any constraint, there need be no trace of it in the tribunal set up

to represent it. It is impossible to admire too much the art with which this resource, which we moderns have wholly lost, was employed by the Romans, and still more by the Lacedæmonians.

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说过 [5_9] ，公共舆论是不能受到限制的。在为代表公共意志而设置的法庭上不应该存在任何舆论受限制的痕迹。因此，对于罗马人使用这种现代人已完全丧失的能力的方法，我们怎么推崇都不过分，而拉西第蒙人比罗马人更要高明。

A man of bad morals having made a good proposal in the Spartan Council, the Ephors neglected it, and caused the same proposal to be made by a virtuous citizen. What an honour for the one, and what a disgrace for the other, without praise or blame of either! Certain drunkards from Samos [4_9] polluted the tribunal of the Ephors: the next day, a public edict gave Samians permission to be filthy. An actual punishment would not have been so severe as such an impunity. When Sparta has pronounced on what is or is not right, Greece makes no appeal from her judgments.

以前一个品行不端的人在斯巴达议会上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监察院未予理睬，却让另一个德高望重的公民重新提出了同一建议。尽管没有对任意一方做出赞美或指责，但这种做法对前者是多大的荣誉，而对后者又是多大的羞辱啊！有些来自萨莫斯 [5_10] 的醉汉曾弄脏了监察院的法庭，第二天就有公共法令宣布萨莫斯人可以做下流的事情。而这种惩罚比任何实际的惩罚来得更严重。当斯巴达宣布哪些是正当行为，哪些是不正当行为时，希腊人未加任何争辩。

Chapter 8 Civil Religion

第八章　论公民宗教

At first men had no kings save the gods, and no government save theocracy. They reasoned like Caligula, and, at that period, reasoned aright. It takes a long time for feeling so to change that men can make up their minds to take their equals as masters, in the hope that they will profit by doing so.

人类最初并没有国王，有的只是神祇，也没有政府，而只有神权政治。他们像卡利古拉那样进行思考，而在当时的环境中，那种方式也是对的。在经历了感情和观念上的漫长改造之后，人类才最终决定接受他们同类中的某一个作为自己的主人，并幻想从其中获得好处。

From the mere fact that God was set over every political society, it followed that there were asmany gods as peoples. Two peoples that were strangers the one to the other, and almost always enemies, could not long recognise the same master: two armies giving battle could not obey the same leader. National divisions thus led to polytheism, and this in turn gave rise to theological and civil intolerance, which, as we shall see hereafter, are by nature the same.

由这一事实来看，每个政治社会都会膜拜一个神，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个神。两个相异的、甚至是敌对的民族是不可能长期事奉同一个主人的，正如两支敌对的军队不可能受同一个指挥官统领。因此，民族的区分形成了多神制，多神制进而产生了宗教和政治上的不相容，而这两种不相容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阐述。

The fancy the Greeks had for rediscovering their gods among the barbarians arose from the way they had of regarding themselves as the natural Sovereigns of such peoples. But there is nothing so absurd as the erudition which in our days identifies and confuses gods of different nations. As if Moloch, Saturn, and Chronos could be the same god! As if the Phoenician Baal, the Greek Zeus, and the Latin Jupiter could be the same! As if there could still be anything common to imaginary beings with different names!

希腊人曾经幻想他们能在野蛮民族所崇拜的神中发现自己的神，这种想法源自他们荒唐地把自己视为了那些民族的天然主宰者。但在我们的时代，竟然还把各个民族不同的神混为一谈，这就太荒谬，太可笑了，就好像莫洛克、萨士林、克罗诺斯可能是同一个神，腓尼基人的巴尔、希腊人的宙斯和拉丁人的朱庇特可能是同一个神，这就仿佛这些名字的不同虚构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点似的。

If it is asked how in pagan times, where each State had its cult and its gods, there were no wars of religion, I answer that it was precisely because each State, having its own cult as well as its own government, mad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its gods and its laws. Political war was also theological; the provinces of the gods were, so to speak, fixed by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s. The god of one people had no right over another. The gods of the pagans were not jealous gods; they shared among themselves the empire of the world: even Moses and the Hebrews sometimes lent themselves to this view by speaking of the God of Israel. It is true, they regarded as powerless the gods of the Canaanites, a proscribed people condemned to destruction, whose place they were to take; but remember how they spoke of the divisions of the neighbouring peoples they were forbidden to attack! “Is not the possession of

what belongs to your god Chamos lawfully your due?" said Jephthah to the Ammonites. "We have the same title to the lands our conquering God has made his own." [4_10] Here, I think, there is a recognition that the rights of Chamos and those of the God of Israel are of the same nature.

但是，如果有人问既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宗教仪式和不同的神明，那为什么在异教时代却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呢？我的回答是：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信仰和政府，所以国家对神灵和法律并不加以区分。政治的战争也就是宗教上的战争，可以这样说，神的疆域是由国家疆域所决定的。一个民族的神没有任何控制另一个民族的神的权利。异教徒的神灵绝不是嫉妒的神灵。这些神把整个世界的统治范围进行了划分，甚至连摩西和希伯来人也默认这一主张，并在谈话时会提到以色列的神。当然，他们并不承认迦南人的神，认为迦南是个被流放的、命中注定要毁灭的民族，认为其国土应该被其他民族所占领。但是，看一下他们是如何评说相邻民族是如何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吧，耶弗塔对亚扪人说："你们的神基抹所拥有的难道不是你们的合法所有物吗？因此我们同样有资格拥有我们的神占领的土地。" [5_11] 在我看来，这就相当于承认基抹的权利和以色列的神是相当的。

But when the Jews, being subject to the Kings of Babylon, and, subsequently, to those of Syria, still obstinately refused to recognise any god save their own, their refusal was regarded as rebellion against their conqueror, and drew down on them the persecutions we read of in their history, which are without parallel till the coming of Christianity. [4_11]

犹太人曾先后臣服于巴比伦王国和叙利亚王国的统治，但是他们

坚决拒绝承认除了自己上帝之外的任何其他神灵，这种拒绝被认为是对征服者的一种反抗，这为他们招致了种种迫害。这一点我们可从他们的历史中频频读到，在基督教之前这是史无前例的 [5_12] 。

Every religion, therefore, being attached solely to the laws of the State which prescribed it, there was no way of converting a people except by enslaving it, and there could be no missionaries save conquerors. The obligation to change cults being the law to which the vanquished yielded, it was necessary to be victorious before suggesting such a change. So far from men fighting for the gods, the gods, as in Homer, fought for men; each asked his god for victory, and repayed him with new altars. The Romans, before taking a city, summoned its gods to quit it; and, in leaving the Tarentines their outraged gods, they regarded them as subject to their own and compelled to do them homage. They left the vanquished their gods as they left them their laws. A wreath to the Jupiter of the Capitol was often the only tribute they imposed.

既然每种宗教都唯一地附属于相关国家的法律并受其规范，除了征服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使一个民族改变自己的信仰，那么征服者便成了唯一的传教士；既然改信宗教的义务是由征服强加的，那么任何宗教在进行传播之前就必须先完成征服。正如《荷马史诗》中所描写的：绝不是人类为神而战，而是神为人而战。每个民族都在向自己的神祈求胜利，并且开设新的圣坛来感谢神的庇护。罗马人在攻取一个新的城镇之前，都要先召请该处的神放弃这个地方。他们之所以允许塔伦坦人保留其愤怒的神灵，是因为他们认为塔伦坦人的神已经服从了罗马人的神，并且要向罗马的神效忠。他们把自己的神留给被征服者就相当于把自己的法律留给了被征服者。向罗马的万神殿中的朱庇特进献一顶皇冠经常是罗马人索要的唯一供品。

Finally, when, along with their empire, the Romans had spread their cult and their gods, and had themselves often adopted those of the vanquished, by granting to both alike the rights of the city, the peoples of that vast empire insensibly found themselves with multitudes of gods and cults, everywhere almost the same; and thus paganism throughout the known world finally came to be one and the same religion.

最终，当罗马人随着帝国的扩张不断把他们的宗教和神到处传播的时候，当他们通过让被征服民族接受他们的公民身份而吸收了这些民族的信仰和神灵的时候，这个巨大帝国的人民逐渐发现他们拥有众多的神灵和宗教，而这在其他地方也是完全一样的。就这样，异教信仰最终成为整个已知世界的统一信仰。

It was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at Jesus came to set up on earth a spiritual kingdom, which, by separating the theological from the political system, made the State no longer one, and brought about the internal divisions which have never ceased to trouble Christian peoples. As the new idea of a kingdom of the other world could never have occurred to pagans, they always looked on the Christians as really rebels, who, while feigning to submit,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e chance to make themselves independent and their masters, and to usurp by guile the authority they pretended in their weakness to respect. This was the cause of the persecutions.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耶稣来到世上建立了一个精神王国。这个王国将神学体系和政治体系分离开来，这就意味着国家不再是一个统一体，它造成的内部分裂使基督教世界的人民动荡不安。这个另一世界王国的新思想始终不能被异教徒所理解。基督徒于是成了异教徒眼中

一伙表面逆来顺受的虚伪臣服者。异教徒认为他们会伺机阴谋独立并夺取权力，并在自己虚弱时狡猾地篡夺他们假装尊重过的权威。这便是基督徒遭到迫害的原因。

What the pagans had feared took place. Then everything changed its aspect: the humble Christians changed their language, and soon this so-called kingdom of the other world turned, under a visible leader, into the most violent of earthly despotisms.

异教徒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切事情都换了面貌，曾经谦卑的基督徒也一改往日谦卑的腔调。这个所谓在另一个世界有着看不见的统治的精神王国，很快在一个看得见的首领的领导下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狂暴的专制主义。

However, as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 prince and civil laws, this double power and conflict of jurisdiction have made all good polity impossible in Christian States; and men have never succeeded in finding out whether they were bound to obey the master or the priest.

但是，由于统治者和公民法律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这两种权力就会不断地在基督教国家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使得一切基督教国家不可能有好的政体，因为人们不知道到底应该服从统治者还是服从教士。

Several peoples, however, even in Europe and its neighbourhood, have desired without success to preserve or restore the old system: but the spirit of Christianity has everywhere

prevailed. The sacred cult has always remained or again become independent of the Sovereign, and there has been no necessary link between it and the body of the State. Mahomet held very sane views, and linked his political system well together; and, as long as the form of his government continued under the caliphs who succeeded him, that government was indeed one, and so far good. But the Arabs, having grown prosperous, lettered, civilised, slack and cowardly, were conquered by barbarians: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two powers began again; and, although it is less apparent among the Mahometans than among the Christians, it none the less exists, especially in the sect of Ali, and there are States, such as Persia, where it is continually making itself felt.

有很多民族，甚至包括欧洲和附近地区的民族，都曾试图保留或重建原有的体制，但都没能成功，基督教精神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对神的崇拜总是会保持或重新得到主权之外的独立权，并且不必同国家有任何关联。穆罕默德对此很有见地，他将政教很好地实现了统一，只要他的继承人哈里发继续将这种政府形式保存下去，这个政府就会得以保存完整，这种政府形式就不会分裂。但是，后来阿拉伯人变得繁荣了、开化了、优雅了、娇气了、柔弱了，最后便被野蛮人征服了。结果两种权力又重新开始分裂。尽管这种分裂在穆斯林中不如在基督教中那么明显，但它确实存在，特别是在阿里乌教派下。在某些国家如波斯，我们能一直感受到这种分裂的存在。

Among us, the Kings of England have made themselves heads of the Church, and the Czars have done the same, but this title has made them less its masters than its ministers; they have gained not so much the right to change it, as the power to maintain it: they are not its legislators, but only its princes. Wherever the clergy is a corporate body, [4_12] it is master and legislator in its own country.

There are thus two powers, two Sovereigns, in England and in Russia, as well as elsewhere.

在我们当中，英格兰国王已经把自己变为教会的首领，沙皇也如法炮制。但他们这一头衔与其说是使他们成为了教会的主人，不如说是使他们变成了大臣。因为他们除了取得维持教会的权力外，并没有取得改变教会的权利。因此他们不是立法者，只是管理者。在任何由神职人员构成一个集团 [5_13] 的地方，都会产生自己的主人和立法者。所以英国、俄国和其他地方一样，都存在着两种权力，两个主权体。

Of all Christian writers, the philosopher Hobbes alone has seen the evil and how to remedy it, and has dared to propose the reunion of the two heads of the eagle, and the restoration throughout of political unity, without which no State or government will ever be rightly constituted. But he should have seen that the masterful spirit of Christianity is incompatible with his system, and that the priestly interest would always be stronger than that of the State. It is not so much what is false and terrible in his political theory, as what is just and true, that has drawn down hatred on it. [4_13]

在所有的基督教作家中，哲学家霍布斯是唯一一个清楚地看到其中弊病并能开出药方的人。他大胆地提出将鹰的两个头重新结合在一起，把一切彻底归于政治统一中，因为如果失去了这种政治统一，政府和国家永远都不会有良好的结构。但他大概也看到了，基督教的专制与他的学说体系并不相容。教士的利益总是强于国家的利益。霍布斯的政治体系之所以被人憎恶，并不是因为其中虚假和可怕的部分，而是因为其中正确和真实的部分 [5_14] 。

I believe that if the study of history were developed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t would be easy to refute the contrary opinions of Bayle and Warburton, one of whom holds that religion can be of no use to the body politic, while the other, on the contrary, maintains that Christianity is its strongest support. We should demonstrate to the former that no State has ever been founded without a religious basis, and to the latter, that the law of Christianity at bottom does more harm by weakening than good b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To make myself understood, I have only to make a little more exact the too vague ideas of religion as relating to this subject.

我相信，如果从这一点来阐述历史，我们就可以轻易地驳斥贝尔和瓦伯顿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他们一个声称任何宗教对政治实体都一无用处；另一个则说，不对，基督教是政治实体最坚实的支持者。我们可以向第一个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立都是以宗教为基础的。对于第二个人，我们则可以告诉他：事实上，基督教的法律对于一个国家的建构害处远大于利处。为了使我的观点更加清晰，还需稍微明确几个与我主题相关的宗教概念。

Religion,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society, which is either general or particular, may also be divided into two kinds: the religion of man, and that of the citizen. The first, which has neither temples, nor altars, nor rites, and is confined to the purely internal cult of the supreme God and the eternal obligations of morality, is the religion of the Gospel pure and simple, the true theism, what may be called natural divine right or law. The other, which is codified in a single country, gives it its gods, its own tutelary patrons; it has its dogmas, its rites, and its external cult prescribed by law; outside the single nation that follows it, all the world is in

its sight infidel, foreign and barbarous; the duties and rights of man extend for it only as far as its own altars. Of this kind were all the religions of early peoples, which we may define as civil or positive divine right or law.

就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即根据这一关系是普遍的还是个别的，我们可以把宗教分成两类，即人的宗教和公民的宗教。第一种宗教，没有庙宇、祭坛和祭祀，纯粹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至高无上的神灵的虔诚，以及对于道德的永恒责任感。这种宗教是简朴的，纯粹的，能带来福音的宗教，是真正的有神论，可以称之为神圣的自然法律。第二种公民的宗教是建立于特定的国家，为该国提供自己的神灵，规定这个国家的保护神。它有它的教条、祭祀仪式，也有由法律规定的外在崇拜形式。除了这个唯一遵奉这种宗教的国家外，其余所有国家在它看来都是不敬神的，外化的，野蛮的。它将人的权利和责任都局限于它的祭坛所在之地。所有原始民族的宗教都属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这种宗教称为公民的宗教或正式的神圣宗教。

There is a third sort of religion of a more singular kind, which gives men two codes of legislation, two rulers, and two countries, renders them subject to contradictory duties, and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them to be faithful both to religion and to citizenship. Such are the religions of the Lamas and of the Japanese, and such is Roman Christianity, which may be called the religion of the priest. It leads to a sort of mixed and anti-social code which has no name.

还有第三种更加奇特的宗教形式，它在给人提供两套法律、两个统治者和两个祖国的同时，让人们履行两种相互矛盾的义务，使人们无法同时既是信徒又是公民。喇嘛教是这样的，日本人的宗教是这样

的，罗马的天主教也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这种宗教称为牧师的宗教，它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混合的、反社会的法律体系。

In their political aspect, all these three kinds of religion have their defects. The third is so clearly bad that it is waste of time to stop to prove it such. All that destroys social unity is worthless; all institutions that set man in contradiction to himself are worthless.

如果从政治角度来考察这三种宗教，它们每一种都有其弊病。第三种宗教的坏处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去证明其缺陷根本就是浪费时间。任何破坏社会统一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任何使人民处于自我矛盾之中的体制也是毫无价值的。

The second is good in that it unites the divine cult with love of the laws, and, making country the object of the citizens' adoration, teaches them that service done to the State is service done to its tutelary god. It is a form of theocracy, in which there can be no pontiff save the prince, and no priests save the magistrates. To die for one's country then becomes martyrdom; violation of its laws, impiety; and to subject one who is guilty to public execration is to condemn him to the anger of the gods: *Sacer estod* .

第二种宗教的好处在于它把对神的崇拜和对法律的热爱结合到了一起，在于它通过把祖国变成公民崇拜的对象，教导公民为国家服务就是为保护他们的神灵服务。这是一种神权政治，除了统治者之外没有其他教主，除了行政官员之外没有其他牧师。所以为国捐躯就是殉教；违反法律就是亵渎神灵；让一个犯罪的人接受公众的憎恨就是让神威惩罚他：让他受到谴责吧。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bad in that, being founded on lies and error, it deceives men, makes them credulous and superstitious, and drowns the true cult of the Divinity in empty ceremonial. It is bad, again, when it becomes tyrannous and exclusive, and makes a people bloodthirsty and intolerant, so that it breathes fire and slaughter, and regards as a sacred act the killing of every one who does not believe in its gods. The result is to place such a people in a natural state of war with all others, so that its security is deeply endangered.

但是，第二种宗教的坏处就在于这种宗教建立在错误和谎言的基础上，它欺骗人民，使人民轻信和迷信，它把对神灵的真正崇拜埋没在无聊空洞的仪式中。它的坏处还在于，当它变得唯我独尊、专横暴虐时，整个民族也变得嗜杀且不宽容。这样，人们便沉浸于虐杀和屠戮之中，他们相信杀死那些不接受他们神的人是一种神圣的行为。这便会把这个民族和其他民族置于一种天然的战争状态中，这对其他民族和这个民族都是极具破坏力。

There remains therefore the religion of man or Christianity—not the Christianity of to-day, but that of the Gospel, which is entirely different. By means of this holy, sublime, and real religion all men, being children of one God, recognise one another as brothers, and the society that unites them is not dissolved even at death.

剩下要说的便是人的宗教或基督教了。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今天的基督教，而是福音书里的基督教，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通过这一神圣的、崇高的、真正的宗教，人类成为同属于上帝的子民，彼此之间

成为兄弟。人们由此而聚合成的社会即使灭亡也不会解体。

But this religion, having no particular relation to the body politic, leaves the laws in possession of the force they have in themselves without making any addition to it; and thus one of the great bonds that unite society considered in severally fails to operate. Nay, more, so far from binding the hearts of the citizens to the State, it has the effect of taking them away from all earthly things. I know of nothing more contrary to the social spirit.

然而，这种宗教和政治体之间不存在特定的联系，所以法律只能从自身寻求力量。由于这种宗教不会为法律提供新的力量，所以维持社会的一个重要纽带就很难起到什么作用了。更糟的是，它远不能使公民全心全意依附于国家，反而使公民脱离国家，就像他们脱离尘世间的事物一样。由我看来，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背离社会精神的了。

We are told that a people of true Christians would form the most perfect society imaginable. I see in this supposition only one great difficulty: a society of true Christians would not be a society of men.

有人说，由真正的基督徒构成的社会可能是人类能想象出的最完美的社会。我在这种假说中看到的只是一个巨大的困难，那就是一个由真正基督徒构成的社会将不再是人的社会。

I say further that such a society, with all its perfection, would be neither the strongest nor the most lasting: the very fact that it

was perfect would rob it of its bond of union; the flaw that would destroy it would lie in its very perfection.

我甚至还要说，正因为它的完美，所以这一假想中的社会既不是最强大的，也不是最长久的；正因为它的完美，所以它缺乏凝聚力；正是它的完美产生了导致它毁灭的缺陷。

Everyone would do his duty; the people would be law-abiding, the rulers just and temperate; the magistrates upright and incorruptible; the soldiers would scorn death; there would be neither vanity nor luxury. So far, so good; but let us hear more.

在这种所谓的完美社会里，每个人都会履行自己的义务，人民遵纪守法，统治者公正而节制，官员们诚实而廉洁，士兵们会英勇地蔑视死亡，虚荣和奢侈也不会存在。所有这一切都令人崇敬，但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Christianity as a religion is entirely spiritual, occupied solely with heavenly things; the country of the Christian is not of this world. He does his duty, indeed, but does it with profound indifference to the good or ill success of his cares. Provided he has nothing to reproach himself with, it matters little to him whether things go well or ill here on earth. If the State is prosperous, he hardly dares to share in the public happiness, for fear he may grow proud of his country's glory; if the State is languishing, he blesses the hand of God that is hard upon His people.

基督教是一种精神至上的宗教，关心的只是天国的事情，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基督教的祖国。他们的确在履行自己的义务，但他们在履行义务时对自己所作努力的成败漠不关心。如果他们不懂自责，那么世界变得是好是坏都与他们无关。如果国家兴旺，他们几乎不敢享受公共的喜悦，害怕自己因国家的光荣而变得过分骄傲；如果国家没落了，他们还会祈祷上帝惩罚他的子民。

For the State to be peaceable and for harmony to be maintained, all the citizens without exception would have to be good Christians; if by ill hap there should be a single self-seeker or hypocrite, a Catiline or a Cromwell, for instance, he would certainly get the better of his pious compatriots. Christian charity does not readily allow a man to think hardly of his neighbours. As soon as, by some trick, he has discovered the art of imposing on them and getting hold of a share in the public authority, you have a man established in dignity; it is the will of God that he be respected: very soon you have a power; it is God's will that it be obeyed; and if the power is abused by him who wields it, it is the scourge wherewith God punishes His children. There would be scruples about driving out the usurper: public tranquillity would have to be disturbed, violence would have to be employed, and blood spilt; all this accords ill with Christian meekness; and after all, in this vale of sorrows, what does it matter whether we are free men or serfs? The essential thing is to get to heaven, and resignation is only an additional means of doing so.

这个假想社会要想获得和平并保持永久的和谐，所有公民都必须无一例外地成为同等善良的基督徒。但如果公民中不幸出现了一个野心家，一个伪善的人，例如，喀提林或克伦威尔，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很容易利用他虔诚的同胞们，因为基督徒的仁爱思想不允许把别人想

得太坏。当一个狡猾的人发现了某种欺骗同胞的办法，并且因此而取得了一部分公共权力，他就会成为权力的化身，上帝就会让人们去尊敬他；当他独揽大权后，上帝又会让人们服从他。如果他滥用这一权力呢？那他就成为上帝惩罚自己子民的鞭子。基督徒在要不要驱逐这个篡权者的问题上也会犹豫不决，因为那需要扰乱公共的和平，需要使用暴力，需要流血，所有这些都与基督温和的教义相违背。毕竟，既然人世间是充满苦难的，一个人是自由人或者是奴隶又有什么区别呢？最重要的是升入天堂，而逆来顺受是升入天堂的一条重要途径。

If war breaks out with another State, the citizens march readily out to battle; not one of them thinks of flight; they do their duty, but they have no passion for victory; they know better how to die than how to conquer. What does it matter whether they win or lose? Does not Providence know better than they what is meet for them? Only think to what account a proud, impetuous and passionate enemy could turn their stoicism! Set over against them those generous peoples who were devoured by ardent love of glory and of their country, imagine your Christian republic face to face with Sparta or Rome: the pious Christians will be beaten, crushed and destroyed, before they know where they are, or will owe their safety only to the contempt their enemy will conceive for them.

如果爆发了对外战争，公民们会心甘情愿地奔向战场，谁也不会想到逃跑。每个人都将履行自己的义务，但他们在履行这一义务时没有任何夺取胜利的热情；他们对死亡的认识远远多于对战胜敌人的认识。对他们来说，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上帝不是比他们更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吗？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骄横、充满激情且士气高昂的敌人会从这种斯多葛学派中获得怎样的好处。想象他们与心中充满了荣誉以及对祖国充满了热情的勇敢民族作战，或想象基督徒共和国面对的敌人是斯巴达人或罗马人，虔诚的基督徒们在还

没反应过来时就已经被击溃、被粉碎、被毁灭了。当然，他们或许会因敌人对他们的蔑视而保全性命。

It was to my mind a fine oath that was taken by the soldiers of Fabius, who swore, not to conquer or die, but to come back victorious—and kept their oath. Christians would never have taken such an oath; they would have looked on it as tempting God.

我认为法比乌斯的士兵发下的誓言是极好的。他们并不发誓要战胜或战死，而是发誓要以征服者的身份凯旋而归，而他们也的确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基督徒们从来就不敢这样做，因为他们感觉这是在试探上帝。

But I am mistaken in speaking of a Christian republic; the term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Christianity preaches only servitude and dependence. Its spirit is so favourable to tyranny that it always profits by such a *régime* . True Christians are made to be slaves, and they know it and do not much mind: this short life counts for too little in their eyes.

但是当说到“基督徒共和国”时我犯了一个错误：这两个词是互不相容的。基督教宣扬的是服从或奴役，其精神对暴政来说太有利了，这让暴政无法不对其加以利用。真正的基督徒就是用来做奴隶的。基督教徒知道这一点，对此也毫不在乎，因为对他们来说，人短暂的生命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I shall be told that Christian troops are excellent. I deny it.

Show me an instance. For my part, I know of no Christian troops. I shall be told of the Crusades. Without disputing the valour of the Crusaders, I answer that, so far from being Christians, they were the priests' soldiery, citizens of the Church. They fought for their spiritual country, which the Church had, somehow or other, made temporal. Well understood, this goes back to paganism: as the Gospel sets up no national religion, a holy war is impossible among Christians.

有人说，基督徒的军队是极好的军队。我否认这一点。请说这话的人举出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军队给我看看。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军队。有人可能会以十字军为例来反驳我，但在这里我不为十字军的战斗力争辩，我只想指出他们并不是基督徒，而只是牧师的士兵和教会的公民。他们是为了精神上的家园而战，但这一家园却不知被教会采用什么方式变成了现世的家园。严格地讲，十字军之战可被归入异教的主题之下。既然福音书不曾建立过什么民族的宗教，因此基督徒中不可能存在任何圣战。

Under the pagan emperors, the Christian soldiers were brave; every Christian writer affirms it, and I believe it: it was a case of honourable emulation of the pagan troops. As soon as the emperors were Christian, this emulation no longer existed, and, when the Cross had driven out the eagle, Roman valour wholly disappeared.

在异教徒国王的统治下，基督徒士兵是英勇的。所有的基督徒作家都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也相信他们。但是这些士兵只是为了与异教徒军队争夺荣誉，一旦国王也变成了基督徒，这种争夺就停止了。当十字架驱走了鹰饰，罗马人的所有英勇都消失了。

But, setting aside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let us come back to what is right, and settle our principles on this important point. The right which the social compact gives the Sovereign over the subjects does not, we have seen, exceed the limits of public expediency. [4_14] The subjects then owe the Sovereign an account of their opinions only to such an extent as they matter to the community. Now, it matters very much to the community that each citizen should have a religion. That will make him love his duty; but the dogmas of that religion concern the State and its members only so far as they have reference to morality and to the duties which he who professes them is bound to do to others. Each man may have, over and above, what opinions he pleases, without it being the Sovereign's business to take cognisance of them; for, as the Sovereign has no authority in the other world, whatever the lot of its subjects may be in the life to come, that is not its business, provided they are good citizens in this life.

但是，让我们先撇开政治的考虑，回到权力的问题上来，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确立起我们的原则。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社会契约赋予主权置于臣民之上的权利，但绝不能超出公共利益的范围 [5_15] 。于是臣民们的意见所应该遵从于主权者的，也以那些与集体有重要关系的意见为限。对国家来说，只有当每个公民所信奉的宗教能使自己更热爱自己的责任时，这个宗教才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除非这种宗教的教义涉及道德风尚及自己对于他人的责任，否则它与国家及成员都不相关。此外，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他选择的任何观点，这并不在主权者的管理范围之内，因为主权者是管不着另外一个世界的。只要臣民在今生是个好公民，那他在来世的命运如何就与主权者没有任何关系了。

There is therefore a purely civil profession of faith of which the

Sovereign should fix the articles, not exactly as religious dogmas, but as social sentiments without which a man cannot be a good citizen or a faithful subject. [4_15] While it can compel no one to believe them, it can banish from the State whoever does not believe them—it can banish him, not for impiety, but as an anti-social being, incapable of truly loving the laws and justice, and of sacrificing, at need, his life to his duty. If anyone, after publicly recognising these dogmas, behaves as if he does not believe them, let him be punished by death: he has committed the worst of all crimes, that of lying before the law.

因此，可以有一个纯粹的针对社会信仰的公民宣言，宣言的条文可由主权者拟定。这不是严格的宗教教义，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情感，如果没有这些，一个人就不能成为一个好公民，也就无法做一个忠实的臣民 [5_16] 。尽管主权者不会强制任何人去相信这些条款，但可以驱逐任何不相信此条款的人。驱逐他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不虔诚，而是因为他反社会，因为他不能真诚地热爱法律和正义，不能在需要的时候为了责任而奉献生命。如果有人在公开场合承认那些条款，但在行动上却表现得好像并不相信它们，那就应该将他处死，因为他犯了最大的罪行：他在法律面前撒了谎。

The dogmas of civil religion ought to be few, simple, and exactly worded, without explanation or commentary. The existence of a mighty, intelligent and beneficent Divinity, possessed of foresight and providence, the life to come, the happiness of the just, the punishment of the wicked, the sanctity of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the laws: these are its positive dogmas. Its negative dogmas I confine to one, intolerance, which is a part of the cults we have rejected.

公民宗教的教义应该简单、条款少，表达准确而不必解说或注释。一个强大的、睿智的、仁慈的和具有远见的万能上帝的存在；来世的生命；正直者的幸福；对邪恶之人的惩罚；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神圣性——这些都是正面的教义。至于负面的教义，我把它归结为一点：不宽容。我们应该把不宽容从所有宗教教义中排除出去。

Those who distinguish civil from theological intolerance are, to my mind, mistaken. The two forms are inseparable. It is impossible to live at peace with those we regard as damned; to love them would be to hate God who punishes them: we positively must either reclaim or torment them. Wherever theological intolerance is admitted, it must inevitably have some civil effect;[1] and as soon as it has such an effect, the Sovereign is no longer Sovereign even in the temporal sphere: thenceforce priests are the real masters, and kings only their ministers.

在我看来，那些把公民的不宽容和宗教的不宽容区别开来的做法是相当错误的。这两种不宽容是不可分割的。人们不可能与一个他们认为应该受到诅咒的人和平相处；爱这些人就是憎恨惩罚他们的上帝。让他们迷途知返或是让他们深受折磨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论在哪里，当宗教的不宽容为人所接受，它就一定会产生某种政治效果[1]，而这种效果一旦产生，主权体就不再是主权体了，即使在世俗领域内也不是了。从那时起，教士就成为了真正的主人，而国王只是他们的官员而已。

1: Marriage, for instance, being a civil contract, has civil effects without which society cannot even subsist. Suppose a body of clergy should claim the sole right of permitting this act, a right which every

intolerant religion must of necessity claim, is it not clear that in establish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in this respect, it will be destroying that of the prince, who will have thenceforth only as many subjects as the clergy choose to allow him? Being in a position to marry or not to marry people according to their acceptance of such and such a doctrine, their admission or rejection of such and such a formula, their greater or less piety, the Church alone, by the exercise of prudence and firmness, will dispose of all inheritances, offices and citizens, and even of the State itself, which could not subsist if it were composed entirely of bastards? But, I shall be told, there will be appeals on the ground of abuse, summonses and decrees; the temporalities will be seized. How sad! The clergy, however little, I will not say courage, but sense it has, will take no notice and go its way: it will quietly allow appeals, summonses, decrees and seizures, and, in the end, will remain the master. It is not, I think, a great sacrifice to give up a part, when one is sure of securing all.

1: 举例来说，婚姻就是一种公民的契约，会产生社会影响，没有这项契约，社会根本无以为继。让我们设想一下，某教士把订立婚姻的约定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一切不宽容的宗教中，神职人员必定会争取这一权力。他就此在提高教会权威中也使君主的权威有名无实，一旦这一切成真，那么君主除了教士愿意

留给他的臣民，便不再拥有其他臣民了。如果教士可以根据人们是否接受这样那样的教义、是否接受这样那样的规矩、对他是否虔诚来主宰着是否允许别人婚礼的进行，接下来的事就很明显了，因为如果教士谨慎行事并坚持到底，他最后会获得对以下事情的完全控制：继承、公职、公民等事务，甚至包括治理国家。因为这时国家只是由私生子组成了，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一切难道不是很清楚了吗？有人会说，对这种滥权可以申诉，可以对教士进行传唤、命令，甚至占领教会的财产。多么可怜的见解！教士只要稍有一点点常识——我就不说有一点点勇气了，他会任凭一切自然发展。他会平静地接受人民的控告，由他们去传唤、去命令和接管财产，他最终仍然会恢复他所有的一切的。在我看来，当一个人有把握获得一切时，放弃一部分并不是什么巨大的牺牲。

Now that there is and can be no longer an exclusive national religion, tolerance should be given to all religions that tolerate others, so long as their dogmas contain nothing contrary to the duties of citizenship. But whoever dares to say: *Outside the Church is no salvation* , ought to be driven from the State, unless the State is the Church, and the prince the pontiff. Such a dogma is good only in a theocratic government; in any other, it is fatal. The reason for which Henry IV is said to have embraced the Roman religion ought to make every honest man leave it, and still more any prince who knows how to reason.

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可能存在一个排他性的民族宗教，所以教义中不包括任何违背公民责任的内容，而所有容忍其他宗教存在的宗

教也应该被其他宗教所容忍。但是如果任何人敢说“在教会之外不存在救赎”，那就应该将他从国家中驱逐出去，除非国家是教会而国王是主教。只有在神权政府下这种教条才是好的，而在任何其他政府中它们都是致命的。传说亨利四世在接受罗马宗教时所依据的理由，本应使所有诚实的人都背离罗马宗教，尤其是每一个善于思考的君主。

Chapter 9 Conclusion

第九章　结语

Now that I have laid down the tru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 and tried to give the State a basis of its own to rest on, I ought next to strengthen it by its external relations, which would include the law of nations, commerce, the right of war and conquest, public right, leagues, negotiations, treaties, etc. But all this forms a new subject that is far too vast for my narrow scope. I ought throughout to have kept to a more limited sphere.

一旦确定了政治权利的真正原则，并尝试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剩下要做的就是考虑对外关系来巩固这一国家，包括国际公法、商业法、战争权和征服权、公共法律、联盟、谈判、条约，等等。但是这一切对于我狭窄的视野来说确实是一个过于庞大的课题，我还是把视线放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吧。

[4_1].This should of course be understood as applying to a free State; for elsewhere family, goods, lack of a refuge, necessity, or violence may detain a man in a country against his will; and then his dwelling there no longer by itself implies his consent to the contract or to its violation.

[4_2].At Genoa, the word *Liberty* may be read over the front of the prisons and on the chains of the galley-slaves. This application of the device is good and just. It is indeed only malefactors of all estates who prevent the citizen from being free. In the

country in which all such men were in the galleys, the most perfect liberty would be enjoyed.

[4_3].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 II:2

[4_4].I say "in the Campus Martius" because it was there that the *comitia* assembled by centuries; in its two other forms the people assembled in the *forum* or elsewhere; and then the *capite censi* had as much influence and authority as the foremost citizens.

[4_5].*Custodes, diribitores, rogatores suffragiorum.*

[4_6].The nomination was made secretly by night, as if there were something shameful in setting a man above the laws.

[4_7].That is what he could not be sure of, if he proposed a dictator; for he dared not nominate himself, and could not be certain that his colleague would nominate him.

[4_8].I merely call attention in this chapter to a subject with which I have dealt at greater length in my *Letter to M. d'Alembert* .

[4_9].They were from another island, which the delicacy of our language forbids me to name on this occasion.

[4_10].*Nonne ea quœ possidet Chamos deus tuus, tibi jure debentur?* (Judges, 11:24.) Such is the text in the Vulgate. Father de Carrières translates: "Do you not regard yourselves as having a right to what your god possesses?" I do not know the force of the Hebrew text: but I perceive that, in the Vulgate, Jephthah positively recognises the right of the god Chamos, and that the French translator weakened this admission by inserting an "according to you", which is not in the Latin.

[4_11].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 Phocian War, which was called "the Sacred War," was not a war of religion. Its object was the punishment of acts of sacrilege, and not the conquest of unbelievers.

[4_12].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clergy find their bond of union not so much in formal assemblies, as in the communion of Churches. Communion and excommunication are the social compact of the clergy, a compact which will always make them masters of peoples and kings. All priests who communicate together are

fellow-citizens, even if they come from opposite ends of the earth. This invention is a masterpiece of statesmanship: there is nothing like it among pagan priests; who have therefore never formed a clerical corporate body.

[4_13].See, for instance, in a letter from Grotius to his brother (April 11, 1643), what that learned man found to praise and to blame in the *De Cive* . It is true that, with a bent for indulgence, he seems to pardon the writer the good for the sake of the bad; but all men are not so forgiving.

[4_14]."In the republic," says the Marquis d'Argenson, "each man is perfectly free in what does not harm others." This is the invariable limitation,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define more exactly.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deny myself the pleasure of occasionally quoting from this manuscript, though it is unknown to the public, in order to do honour to the memory of a good and illustrious man, who had kept even in the Ministry the heart of a good citizen, and views on the government of his country that were sane and right.

[4_15].Cæsar, pleading for Catiline, tried to establish the dogma that the soul is mortal: Cato and Cicero, in refutation, did not waste time in philosophising. They were content to show that Cæsar spoke like a bad citizen, and brought forward a doctrine that would have a bad effect on the State. This, in fact, and not a problem of theology, was what the Roman senate had to judge.

[5_1].这一点当然总应该理解为一个自由国家的情况；因为在其他地方，家庭、财产、无容身之所、贫穷或暴力都可能违背人的意愿使其滞留在一个国家，如此一来，他这种单纯的居住就不再说明他对社会契约是认可还是违反了。

[5_2].在热那亚，人们可以在监狱门前和犯人的脚镣上看到“自由”一词。此处题铭的用法是极正确且公正的。因为在所有的国家，正是犯罪者妨碍公民获得自由。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所有这样的人都被关进监狱，人们将会享受到最完美的自由。

[5_3].“罗马”一词据说源自罗穆鲁斯，其实它是希腊文，意思为“力量”。“弩玛”一词也为希腊文，意思是“法律”。难道说这个城市最初的两个国王在他们统治之前就提前使用了与他们后来的所为相关的名字？

[5_4].我说去“玛尔提乌斯教场”是因为这是百人团集会的地点；在其他两种集会时，人民在市场或其他地方召开会议，这时，按人头计算者和最显贵的公民平起平坐，有着一样的影响力和权威。

[5_5].如此通过抽签选出的百人团被称为特权团（proerogativa），因为它是第一

个被要求表决的，特权（prerogative）一词由此而来。

[5_6].这里指的是选票的保管、分发和回收。

[5_7].这种任命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好像把一个人置于法律之上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似的。

[5_8].如果他提议任命一个独裁官的话，他就不能确定能否得到这种荣耀了，因为他不敢毛遂自荐做独裁官，也不确定他的同僚是否会提名他。

[5_9].我在本章中只是提出了我的观点，而在我的《至达朗贝先生书》中对此有详细阐述。

[5_10].他们其实是来自另外一个岛的，但我们语言的微妙不允许我在这里写出它的名字。

[5_11].“Nonneea quae possidetChamosdeustuus, tibi jure debentur？”这是拉丁文圣经的原文。贾立埃神父将他译为：“难道你们不相信你们有权拥有你们的神基抹所拥有的土地吗？”我不知道希伯来文原文的含义，但我在拉丁文圣经里发现耶弗塔正面承认了神基抹的权利，而法文译文加上了原拉丁文中没有的“据你的说法”，这就弱化了原文的含义。

[5_12].非常明显，被称为“圣战”的弗凯亚人的战争并不是宗教战争，其目的是为了惩罚渎圣者，而不是征服非基督徒。

[5_13].应该注意到，把教士联合为一个群体，并不是像法国的集会那样形式很正式的集会，而只是通过教会的圣餐仪式。圣餐仪式和开除教籍仪式是教士们的社会契约，凭借这一契约，他们就总是人民和国王的主人。所有一起交流的教士都是同胞公民，哪怕他们来自地球的两极。这种发明是一大政治杰作。在异教的教士中不曾有过这样的事，因此也就从未组织过教士的群体。

[5_14].此外，请参看格劳秀斯于1643年4月11日写给他兄弟的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博学之士对霍布斯的《公民论》赞成什么和谴责什么。事实上，他因为偏爱作者的优点而轻易原谅了书中坏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宽容。

[5_15].阿冉松侯爵说：“在共和国里，每个人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是可以拥有做任何事情的自由的。”这是永恒不变的做人底限，无法更确切地表达这句话了。尽管他的这部手稿不为人所尽知，但我不能否认我在援引手稿中内容时的愉快心情，以向这位杰出而又伟大的人表达我的敬意。他直至入阁后也一直保持着一颗真正公民的心灵，并且对于他国家的政府持有一种公正且有益的观点。

[5_16].恺撒在为卡提里那辩护时，曾试图确定灵魂不能长存的教条。卡图和西塞罗在反驳恺撒的时候没有将时间浪费在纠缠哲学问题上；他们只是指出恺撒在辩护时像是一个不良公民，正试图推行一个对国家有害的教义。事实上，元老院应该对此作出裁判，而不是一个神学问题。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Poetics
诗 学

作者 亚里士多德
译者 连小裕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诗学

Poetics

亚里士多德 著

连小裕 译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Chapter 1 第一章
- Chapter 2 第二章
- Chapter 3 第三章
- Chapter 4 第四章
- Chapter 5 第五章
- Chapter 6 第六章
- Chapter 7 第七章
- Chapter 8 第八章
- Chapter 9 第九章
- Chapter 10 第十章
-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 Chapter 14 第十四章
- Chapter 15 第十五章
- Chapter 16 第十六章
- Chapter 17 第十七章
- Chapter 18 第十八章
- Chapter 19 第十九章
- Chapter 20 第二十章
- Chapter 21 第二十一章
- Chapter 22 第二十二章
- Chapter 23 第二十三章
- Chapter 24 第二十四章
- Chapter 25 第二十五章

- Chapter 26 第二十六章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Chapter 1

第一章

I PROPOSE to treat of Poetry in itself and of its various kinds, noting the essential quality of each, to inquire into the structure of the plot as requisite to a good poem; into the number and nature of the parts of which a poem is composed; and similarly into whatever else falls within the same inquiry. Following, then, the order of nature, let us begin with the principles which come first.

我想讨论关于诗的艺术，包括诗的不同种类，记录各种类的特征；探讨一首好诗的情节安排；探讨一首诗的组成部分和成分的特性，以及相关的研究。下面我们就来按自然顺序来首先讨论一下诗的原理。

Epic poetry and Tragedy, Comedy also and Dithyrambic poetry, and the music of the flute and of the lyre in most of their forms, are all in their general conception modes of imitation. They differ, however, from one another in three respects—the medium, the objects, the manner or mode of imitation, being in each case distinct.

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长笛音乐和竖琴音乐，在形式上都是模仿。但在三个方面彼此不同，即媒介、对象和模仿的形式。

For as there are persons who, by conscious art or mere habit, imitate and represent various objects through the medium of color and form, or again by the voice; so in the arts above mentioned, taken as a whole, the imitation is produced by rhythm, language, or “harmony”, either singly or combined. Thus in the music of the flute and of the lyre, “harmony” and rhythm alone are employed; also in other arts, such as that of the shepherd's pipe, which are essentially similar to these. In dancing, rhythm alone is used without “harmony”; for even dancing imitates character, emotion, and action, by rhythmical movement.

由于有些人凭对艺术的感觉或只凭习惯，用色彩和形态，或仍然用声音，来模拟和呈现各种事物。所以以上提到的艺术，作为一个整体，用一种或多种艺术形式结合，通过节奏、语言或“音调”来模仿。长笛音乐和竖琴音乐，只运用了“音调”和节奏。其他艺术形式也基本类似，比如风笛。在舞蹈中，只用节奏而没有“音调”；舞蹈也是在通过有节奏的运动来模仿性格、情绪和动作。

There is another art which imitates by means of language alone, and that either in prose or verse—which verse, again, may either combine different meters or consist of but one kind—but this has hitherto been without a name. For there is no common term we could apply to the mimes of Sophron and Xenarchus and the Socratic dialogue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to poetic imitations in iambic, elegiac, or any similar meter. People do, indeed, add the word “maker” or “poet” to the name of the meter, and speak of elegiac poets, or epic (that is, hexameter) poets, as if it were not the imitation that makes the poet, but the verse that entitles them all to the name. Even when a treatise on medicine or natural science is brought out in verse, the name of poet is by

custom given to the author; and yet Homer and Empedocles have nothing in common but the meter, so that it would be right to call the one poet, the other physicist rather than poet. On the same principle, even if a writer in his poetic imitation were to combine all meters, as Chaeremon did in his *Centaur* , which is a medley composed of meters of all kinds, we should bring him too under the general term poet. So much then for these distinctions.

而另外一种艺术只通过语言——散文或诗歌来模仿。诗歌也是由几个节拍或由单个的节拍组成——迄今这种单节拍的诗歌还没有名称。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共同的名称让我们可用来称呼索福戎和塞那耳科斯的哑剧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另一方面是诗词用抑扬格和挽歌格或类似节拍来模仿。人们确实会在节拍后加上“创造者”或“诗人”一词，并且称为挽歌诗人或史诗诗人（即六部格诗人），好像不是模仿成就了诗人，反而是诗歌给了诗人们各种名称。即便是医学和自然科学的论著，如果是用诗的方式写出来，作者也会习惯地被称为诗人。但是荷马与恩培多克勒除所用格律之外并无共同之处，称荷马为诗人是对的，但称恩培多克勒为物理学家要比诗人更合适些；同样，如果有作者在诗歌模仿中兼用各种格律，就像开瑞蒙那样兼用各种格律来写《马人》（混合体史诗），我们也应该把他归为诗人。这些艺术的差别就谈到这了。

There are, again, some arts which employ all the means above mentioned—namely, rhythm, tune, and meter. Such are Dithyrambic and Nomic poetry, and also Tragedy and Comedy; but between them originally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n the first two cases these means are all employed in combination, in the latter, now one means is employed, now another.

有些艺术用了以上提到的所有方法——节奏、音调和韵律。比如酒神颂和日神颂、悲剧和喜剧，但差别在于前两种是把所有方法组合使用，而后者是分别使用。

Such, then, 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arts with respect to the medium of imitation.

这些就是各种艺术在运用不同媒介来模仿时的差别。

Chapter 2

第二章

Since the objects of imitation are men in action, and these men must be either of a higher or a lower type (for moral character mainly answers to these divisions, goodness and badness being the distinguishing marks of moral differences), it follows that we must represent men either as better than in real life, or as worse, or as they are. It is the same in painting. Polygnotus depicted men as nobler than they are, Pauson as less noble, Dionysius drew them true to life.

由于模仿的是行动中的人，而人又有高下之分（区别就在于道德品质，道德差异就是善和恶）。因此我们所呈现的人物要比真实生活中的人更好、更坏或一样，绘画也是这样。波吕格诺托斯描绘的人物比实际更加高尚，泡宋描绘的人物比实际差，而狄奥尼修斯的人物则如实描绘。

Now it is evident that each of the modes of imitation above mentioned will exhibit these differences, and become a distinct kind in imitating objects that are thus distinct. Such diversities may be found even in dancing, flute-playing, and lyre-playing. So again in language, whether prose or verse unaccompanied by music. Homer, for example, makes men better than they are; Cleophon as they are; Hegemon the Thasian, the inventor of parodies, and Nicochares, the author of the *Deiliad* , worse than they are. The same thing holds good of Dithyrambs and Nomes; here too one may portray different

types, as Timotheus and Philoxenus differed in representing their Cyclopes. The same distinction marks off Tragedy from Comedy; for Comedy aims at representing men as worse, Tragedy as better than in actual life.

显然上述的每种模仿方法都显示了这些差异，由于模仿了不同的事物就有了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在舞蹈、长笛演奏和竖琴演奏时都有。同样在语言中也有差异，无论是没有音乐伴奏的散文还是诗。例如，荷马描写的人物比实际上好，克勒俄丰笔下的人物则如实描写，滑稽诗的首创者萨索斯人赫革蒙和《得利阿斯》的作者尼科卡瑞斯写的人物却比实际上坏。同样的差异也存在于狄苏朗勃斯和诺摩斯里，因为正如提摩瑟俄斯和菲洛克塞诺斯都塑造过圆目巨人的形象一样，诗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现人物。此外，悲剧和喜剧的不同也体现在这一点上：喜剧倾向于表现比实际上坏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实际上好的人。

Chapter 3

第三章

There is still a third difference—the manner in which each of these objects may be imitated. For the medium being the same, and the objects the same, the poet may imitate by narration—in which case he can either take another personality as Homer does, or speak in his own person, unchanged—or he may present all his characters as living and moving before us.

还有第三种差别——模仿这些对象时所用的方法不同。如果模仿的媒介一样，模仿的对象也一样，那么诗人可用叙述的方式来模仿——既可以像荷马那样另外塑造一个人物，或不改变人称，自己亲口叙述，也可以把笔下所有的人物用动作表演来呈现在我们面前。

These, then, as we said at the beginning, are the three differences which distinguish artistic imitation—the medium, the objects, and the manner. So that from one point of view, Sophocles is an imitator of the same kind as Homer—for both imitate higher types of character;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of the same kind as Aristophanes—for both imitate persons acting and doing. Hence, some say, the name of “drama” is given to such poems, as representing action. For the same reason the Dorians claim the invention both of Tragedy and Comedy. The claim to Comedy is put forward by the Megarians—not only by those of Greece proper, who allege that it originated under their democracy, but also by the Megarians of Sicily, for the poet Epicharmus, who is much earlier

than Chionides and Magnes, belonged to that country. Tragedy too is claimed by certain Dorians of the Peloponnese. In each case they appeal to the evidence of language. The outlying villages, they say, are by them called κῶμαι (*komai*), by the Athenians δῆμοι (*demoi*) ; and they assume that comedians were so named not from κωμάζειν (*komazein*), “to revel”, but because they wandered from village to village (κατὰ κώμας, *kata komas*), being excluded contemptuously from the city. They add also that the Dorian word for “doing” is δρᾶν *dran* , and the Athenian, πράττειν (*prattein*).

这正如我们开头所说的用来区分三种艺术模仿的三个差异——媒介、对象和方法。在某个角度看，索福克勒斯和荷马是同类的模仿者，因为都模仿比较好的人。从另一个角度看，索福克勒斯和阿里斯托芬是同类的模仿者，因为都借人物的行为动作来模仿。因此，有人认为应该称那些模仿行动的诗为“戏剧”。由于同样的原因，多里斯人自称首创悲剧和喜剧。墨加拉人声称他们首创了喜剧，不仅是希腊的墨加拉人声称喜剧起源于他们的民主建立时代，西西里的墨加拉人也自称首创喜剧，因为厄庇卡耳摩斯是他们故乡的诗人，他的时代比喀俄尼得斯和马格涅斯早得多。悲剧也有一些伯罗奔尼撤的多里安人自称是他们首创的，并从语言中找到了依据。他们把边远乡村称为“komai”，而雅典人称为“demoi”：他们认为喜剧演员并非得名于“komazein”,“狂欢”，而是因为他们被傲慢地驱逐在城市之外而流浪在一个个村子（“kata komas”)。多里安人还补充说他们称“活动”为“dran”，而雅典人则称为“prattein”。

This may suffice as to the number and nature of the various modes of imitation.

这些就是关于各种模仿方式的种类和性质了。

Chapter 4

第四章

Poetry in general seems to have sprung from two causes, each of them lying deep in our nature. First, the instinct of imitation is implanted in man from childhood, one difference between him and other animals being that he is the most imitative of living creatures, and through imitation learns his earliest lessons; and no less universal is the pleasure felt in things imitated. We have evidence of this in the facts of experience. Objects which in themselves we view with pain, we delight to contemplate when reproduced with minute fidelity: such as the forms of the most ignoble animals and of dead bodies. The cause of this again is, that to learn gives the liveliest pleasure, not only to philosophers but to men in general; whose capacity, however, of learning is more limited. Thus the reason why men enjoy seeing a likeness is, that in contemplating it they find themselves learning or inferring, and saying perhaps, “Ah, that is he.” For if you happen not to have seen the original, the pleasure will be due not to the imitation as such, but to the execution, the coloring, or some such other cause.

诗一般缘起于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都源于我们人性的深处。首先，模仿的本能是孩提时代就有的，也是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之一，人最早就是通过模仿学习的；而且模仿常常给人带来乐趣。我们有经验为证。那些本身让人看了难过的事物，如果惟妙惟肖地模仿出来却让我们看了愉悦，比如可鄙的动物和尸体的形象。原因还是学习所带来的灵动的快乐，不仅是对哲学家，对普通人也一样，只是普通人的学习能力比较有限。人们之所以看到相似的事物会感到高兴，是因为

看到这些事物时他们就在学习和推断，然后也许会自言自语说："啊，这就是他了。"但如果人们并未见过模仿的原型，快乐就不是来自模仿，而是由于模仿的手法，上色，或是类似的其他原因。

Imitation, then, is one instinct of our nature. Next, there is the instinct for "harmony" and rhythm, meters being manifestly sections of rhythm. Persons, therefore, starting with this natural gift developed by degrees their special aptitudes, till their rude improvisations gave birth to Poetry.

模仿，是我们天性中的本能。而且我们还有"谐调"和韵律的本能，节拍当然是韵律的组成部分。因此，那些有着自然天赋的人们逐渐形成了特殊的能力，直到能够即兴作诗。

Poetry now diverged in two directions, 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 of the writers. The graver spirits imitated noble actions, and the actions of good men. The more trivial sort imitated the actions of meaner persons, at first composing satires, as the former did hymns to the gods and the praises of famous men. A poem of the satirical kind cannot indeed be put down to any author earlier than Homer; though many such writers probably there were. But from Homer onward, instances can be cited — his own *Margites* , for example, and other similar compositions. The appropriate meter was also here introduced; hence the measure is still called the iambic or lampooning measure, being that in which people lampooned one another. Thus the older poets were distinguished as writers of heroic or of lampooning verse.

诗现在又根据作者的不同个性分为两个方向。比较严肃的人模仿高尚的行为和好人的行为。比较琐细的作家则模仿比较低劣的人的行为，他们最先写了嘲讽诗，而严肃诗人则是给神和著名的人物写了赞美诗。在荷马之前，虽然很可能有不少人写嘲讽诗了，却无法把某首嘲讽诗归在某个诗人名下。但在荷马之后，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比如荷马自己写的《马耳癸忒斯》和其他类似的作品。这个时期同时也出现了与诗相适应的韵律，称为抑扬格或嘲讽的手法，因为人们用它来互相嘲讽。因此早些的诗人们分为写英雄事迹的诗人和写嘲讽诗的诗人。

As, in the serious style, Homer is pre-eminent among poets, for he alone combined dramatic form with excellence of imitation so he too first laid down the main lines of comedy, by dramatizing the ludicrous instead of writing personal satire. His *Margites* bears the same relation to comedy that the *Iliad* and *Odyssey* do to tragedy. But when Tragedy and Comedy came to light, the two classes of poets still followed their natural bent: the lampooners became writers of Comedy, and the Epic poets were succeeded by Tragedians, since the drama was a larger and higher form of art.

从严肃的风格看，荷马是个优秀的诗人，因为他自己把戏剧的形式与杰出的模仿结合起来，因此他还为喜剧勾画出主要的轮廓，即把荒唐可笑的事物戏剧化而不是写对个人讽刺的作品。他写的《马耳癸忒斯》同喜剧的关系正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同悲剧的关系一样。但是自从悲剧和喜剧出现以后，两类诗人仍然还保持着他们的自然天性：嘲讽诗人成了喜剧作者，而写英雄史诗的诗人成了悲剧作者，因为戏剧是种更大更高的艺术形式。

Whether Tragedy has as yet perfected its proper types or not;

and whether it is to be judged in itself, or in relation also to the audience—this raises another question. Be that as it may, Tragedy—as also Comedy—was at first mere improvisation. The one originated with the authors of the Dithyramb, the other with those of the phallic songs, which are still in use in many of our cities. Tragedy advanced by slow degrees; each new element that showed itself was in turn developed. Having passed through many changes, it found its natural form, and there it stopped.

悲剧的各个类型目前是否已经完善，是否就其自身或与观众的关系来评判——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尽管这样，悲剧和喜剧一样，起初都是即兴创作而成的。一个起源于酒神赞的作者，另一个则是生殖崇拜歌的作者，这些歌至今还在一些城市里流传。后来逐渐发展，每出现一个新的成分，诗人们就加以促进；经过许多演变，悲剧才具有了它自身的性质，此后就不再发展了。

Aeschylus first introduced a second actor; he diminish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Chorus, and assigned the leading part to the dialogue. Sophocles raised the number of actors to three, and added scene-painting. Moreover, it was not till late that the short plot was discarded for one of greater compass, and the grotesque diction of the earlier satyric form for the stately manner of Tragedy. The iambic measure then replaced the trochaic tetrameter, which was originally employed when the poetry was of the Satyric order, and had greater with dancing. Once dialogue had come in, Nature herself discovered the appropriate measure. For the iambic is, of all measures, the most colloquial we see it in the fact that conversational speech runs into iambic lines more frequently than into any other kind of verse; rarely into hexameters, and only when we drop the colloquial intonation. The additions to the number of

“episodes” or acts, and the other accessories of which tradition tells, must be taken as already described; for to discuss them in detail would, doubtless, be a large undertaking.

埃斯库罗斯把演员数量增加到两个，减弱了合唱的重要性，并让对话成为主导部分。索福克勒斯把演员增加到三个，并增加了布景绘画。直到比较晚的时候悲剧才抛弃了简短的情节而采用了较长的情节，抛弃了早期的萨堤洛斯的奇怪措辞而采用了庄重的形式。抑扬格替代了四步格，四步格原先是用在萨堤洛斯诗的，并更适合舞蹈。一旦引入了对话，悲剧就自然用了合适的韵律，因为抑扬格是所有韵律中最口语化的。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相比其他类型的诗而言，会话性的语言更经常变成抑扬格，而很少变成六步格，除非我们不用对话的声调。关于表演场次的增加，和传说中表演里的道具，就当是已经谈论过了；因为如果仔细谈的话，无疑会太费笔墨。

Chapter 5

第五章

Comedy is, as we have said, an imitation of characters of a lower type—not, however,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d bad, the ludicrous being merely a subdivision of the ugly. It consists in some defect or ugliness which is not painful or destructive. To take an obvious example, the comic mask is ugly and distorted, but does not imply pain.

如前面所说，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模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滑稽的事物存在于某种错误或丑陋中，但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现成的例子如滑稽面具，它又丑又怪，但不使人感到痛苦。

The successive changes through which Tragedy passed, and the authors of these changes, are well known, whereas Comedy has had no history, because it was not at first treated seriously. It was late before the Archon granted a comic chorus to a poet; the performers were till then voluntary. Comedy had already taken definite shape when comic poets, distinctively so called, are heard of. Who furnished it with masks, or prologues, or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actors—these and other similar details remain unknown. As for the plot, it came originally from Sicily; but of Athenian writers Crates was the first who abandoning the “iambic” or lampooning form, generalized his themes and plots.

悲剧所历经的变革以及做出变革的作者们都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喜剧却还没有历史，因为起初并没人重视。直到比较晚的时候执政官才指派喜剧合唱队给诗人，之前的表演者都是自愿参加的。当喜剧诗人的称呼为人所知时，喜剧已经初具雏形了。是谁给喜剧增加了面具，引进了开场白，或是增加了演员人数，以及诸如此类的细节已经无从知晓。喜剧的情节最早起源于西西里，但却是雅典诗人克剌忒斯首先放弃抑扬格或讽刺形式，才使主题和情节具有了普遍性。

Epic poetry agrees with Tragedy in so far as it is an imitation in verse of characters of a higher type. They differ in that Epic poetry admits but one kind of meter and is narrative in form. They differ, again, in their length: for Tragedy endeavors, as far as possible, to confine itself to a single revolution of the sun, or but slightly to exceed this limit, whereas the Epic action has no limits of time. This, then, is a second point of difference; though at first the same freedom was admitted in Tragedy as in Epic poetry.

史诗和悲剧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用诗的形式模仿比较高尚的人物。区别在于史诗只用一种节拍和用叙述的形式。在长度上也有不同：悲剧尽量把长度限制在太阳旋转一周（一天）的时间内，或稍长些，而史诗的情节并没有时间限制。这是两者的又一个差别，虽然原来悲剧和史诗一样都在时间上不受限制。

Of their constituent parts some are common to both, some peculiar to Tragedy: whoever, therefore knows what is good or bad Tragedy, knows also about Epic poetry. All the elements of an Epic poem are found in Tragedy, but the elements of a Tragedy are not all found in the Epic poem.

至于组成部分，有的是两者都一样的，有的是悲剧所特有的。所以凡是知道悲剧是好是坏的人，也都知道史诗的好坏。因为史诗所有的元素悲剧里都有，但悲剧里的元素史诗却不都有。

Chapter 6

第六章

Of the poetry which imitates in hexameter verse, and of Comedy, we will speak hereafter. Let us now discuss Tragedy, resuming its formal definition, as resulting from what has been already said.

喜剧和模仿六音步格的诗，我们以后再谈。现在先讨论悲剧，先根据前面所述，给它的性质下个定义。

Tragedy, then, is an imitation of an action that is serious, complete, and of a certain magnitude; in language embellished with each kind of artistic ornament, the several kinds being found in separate parts of the play; in the form of action, not of narrative; through pity and fear effecting the proper purgation of these emotions. By “language embellished”, I mean language into which rhythm, “harmony” and song enter. By “the several kinds in separate parts”, I mean, that some parts are rendered through the medium of verse alone, others again with the aid of song.

悲剧是对严肃、完整以及有一定重要性的行为所进行的模仿。悲剧采用的语言被各种艺术装饰美化过，它们分布在戏剧的不同部分。用行为的方式，而不是用叙述方式，通过引起同情和恐惧来净化这些情绪。“美化过的语言”是说语言中用了韵律、“和声”和歌曲。“分布在戏剧的不同部分”是说有些部分只通过诗歌这个媒介来描写，有的还

是借助歌曲。

Now as tragic imitation implies persons acting, it necessarily follows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Spectacular equipment will be a part of Tragedy. Next, Song and Diction, for these are the media of imitation. By “Diction” I mean the mere metrical arrangement of the words: as for “Song”, it is a term whose sense every one understands. Again, Tragedy is the imitation of an action; and an action implies personal agents, who necessarily possess certain distinctive qualities both of character and thought; for it is by these that we qualify actions themselves, and these—thought and character—are the two natural causes from which actions spring, and on actions again all success or failure depends. Hence, the Plot is the imitation of the action—for by plot I here mea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incidents. By Character I mean that in virtue of which we ascribe certain qualities to the agents. Thought is required wherever a statement is proved, or, it may be, a general truth enunciated. Every Tragedy, therefore, must have six parts, which parts determine its quality—namely, Plot, Character, Diction, Thought, Spectacle, Song. Two of the parts constitute the medium of imitation, one the manner, and three the objects of imitation. And these complete the fist. These elements have been employed, we may say, by the poets to a man; in fact, every play contains Spectacular elements as well as Character, Plot, Diction, Song, and Thought.

悲剧中的人物既借动作来模仿，那么“场景”的装饰必然是悲剧艺术的成分之一，此外，歌曲和言词也必然是它的成分，此二者是模仿的媒介。言词指“韵文”的组合，至于歌曲的意思则是很明显的。悲剧是对行为的模仿，而行为要通过人物来表现。这些人物必然在性格和

思想上具有独特性。性格和思想是我们选取行为的依据，也是行为产生的两个原因，而悲剧的成败都取决于人物的行为。因此，情节是模仿了行为。这里的情节是说对事件的安排，性格是说我们赋予人物某些品质，而思想是在证明论点或阐述真相时需要的。悲剧因此必须具备六个部分，这六个部分决定了悲剧的性质，就是情节、性格、言辞、思想、场景和歌曲。这六部分中有两个是模仿的媒介，一个是模仿的方式，还有三个是模仿的对象。这些就构成了完整的悲剧。我们可以说诗人把这些要素运用到人的身上；其实每个悲剧都包含了场景的要素，以及人物、情节、言辞、歌曲和思想。

But most important of all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incidents. For Tragedy is an imitation, not of men, but of an action and of life, and life consists in action, and its end is a mode of action, not a quality. Now character determines men's qualities, but it is by their actions that they are happy or the reverse. Dramatic action, therefore, is not with a view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aracter: character comes in as subsidiary to the actions. Hence the incidents and the plot are the end of a tragedy; and the end is the chief thing of all. Again, without action there cannot be a tragedy; there may be without character. The tragedies of most of our modern poets fail in the rendering of character; and of poets in general this is often true. It is the same in painting; and here li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Zeuxis and Polygnotus. Polygnotus delineates character well; the style of Zeuxis is devoid of ethical quality. Again, if you string together a set of speeches expressive of character, and well finished in point of diction and thought, you will not produce the essential tragic effect nearly so well as with a play which, however deficient in these respects, yet has a plot and artistically constructed incidents. Besides which, the most powerful elements of emotional interest in Tragedy—Peripeteia or 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 and Recognition scenes—are parts of the plot. A further proof is, that novices in the

art attain to finish of diction and precision of portraiture before they can construct the plot. It is the same with almost all the early poets.

最重要的是对事件的组织。悲剧是模仿，但不是模仿人，而是模仿行为和生活。生活包含着行为，最终是一种行为模式，而不是一种品质。虽然性格决定了人的品质，但人是通过行为表达出高兴或不高兴的。所以戏剧表演并不着眼于表现人物性格，性格的呈现在表演中只是次要的。事件和情节才是悲剧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一切的重中之重。再强调一下，没有行动就没有悲剧，没有性格也许还能是悲剧。我们现代诗人写的悲剧大多缺少描写性格，其他诗人也是常常这样。绘画也是这样。这就是宙克西斯和波吕格诺图斯的区别。波吕格诺图斯善于描绘人物性格，而宙克西斯很少表现人物道德品质。同样，如果把一系列的表现性格的演讲串起来，并用很好的言辞和思想加以完善，所取得的悲剧的效果却远远不如一部言辞和思想都有不足，却富有情节和艺术构建的事件的戏剧。此外，悲剧中最强大的影响情绪的因素是剧情突变或大逆转，以及发现的场景，它们都是情节的一部分。再举个例子，初学写诗的人总是先会措辞和对人物形象的准确刻画，才会组织情节。早期的诗人大多也这样。

The plot, then, is the first principle, and, as it were, the soul of a tragedy; Character holds the second place. A similar fact is seen in painting. The most beautiful colors, laid on confusedly, will not give as much pleasure as the chalk outline of a portrait. Thus Tragedy is the imitation of an action, and of the agents mainly with a view to the action.

情节是第一原则，也一如既往的是悲剧的灵魂。人物性格为其次。绘画也类似这样。即使最美的颜色，如果混乱地涂抹，给人带来

的愉悦还不如一副用粉笔勾勒出的画像。所以说悲剧是模仿行为，模仿人也是主要是为了表现人的行为。

Third in order is Thought—that is, the faculty of saying what is possible and pertinent in given circumstances. In the case of oratory, this is the function of the political art and of the art of rhetoric: and so indeed the older poets make their characters speak the language of civic life; the poets of our time, the language of the rhetoricians. Character is that which reveals moral purpose, showing what kind of things a man chooses or avoids. Speeches, therefore, which do not make this manifest, or in which the speaker does not choose or avoid anything whatever, are not expressive of character. Thought, on the other hand, is found where something is proved to be or not to be, or a general maxim is enunciated.

排在第三位的是思想，就是在既定情形中能说话、说合适的话的能力。在演讲中，思想起了政治艺术和修辞艺术的作用。的确，早时的诗人让笔下的人物讲市民生活的语言；而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则使用演说家的语言。性格描写是为了体现道德，表明一个人选择或逃避哪类事情。因此，如果说话没有把道德表达清楚，或者说话人说话时没有选择或避开什么，就没有表达清楚人物的性格。另一方面，思想是为了证明对或不对，或阐述一个普遍原则。

Fourth among the elements enumerated comes Diction; by which I mean, as has been already said, the expression of the meaning in words; and its essence is the same both in verse and prose.

要举的第四个例子是言辞。正如前面所说，意思要用语言来表达，所以诗和散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Of the remaining elements Song holds the chief place among the embellishments

在其余要素中，歌曲是悲剧中主要的点缀。

The Spectacle has, indeed, an emotional attraction of its own, but, of all the parts, it is the least artistic, and connected least with the art of poetry. For the power of Tragedy, we may be sure, is felt even apart from representation and actors. Besides, the production of spectacular effects depends more on the art of the stage machinist than on that of the poet.

场景确实本身具有情绪感染力，但却是悲剧六个要素中最不具艺术性的，也和诗的艺术关联最少。因为悲剧的力量即使没有表演和演员我们也能感受到。而且，场景的效果更多的依赖舞台技师的艺术，而不是靠诗人的艺术。

Chapter 7

第七章

These principles being established, let us now discuss the proper structure of the Plot, since this is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ragedy.

这些原则确定下来了，我们现在来讨论情节的合理建构，因为这是悲剧中最首要的事。

Now, according to our definition Tragedy is an imitation of an action that is complete, and whole, and of a certain magnitude; for there may be a whole that is wanting in magnitude. A whole is that which has a beginning, a middle, and an end. A beginning is that which does not itself follow anything by causal necessity, but after which something naturally is or comes to be. An end, on the contrary, is that which itself naturally follows some other thing, either by necessity, or as a rule, but has nothing following it. A middle is that which follows something as some other thing follows it. A well-constructed plot, therefore, must neither begin nor end at haphazard, but conform to these principles.

那么，按照定义，悲剧是对严肃、完整以及有一定重要性的行为所进行的模仿。因为有的行为可能完整却不重要。一个完整的行为包含开头、中间和结尾。开头不是因为之前的事而产生的结果，而是之后诸事形成或产生的原因。结尾正好相反，是继其他事情之后必然或

通常发生的事情，但结尾之后再没有事情了。中间部分是接了前面的事情，后面又有事情接着。因此，构建得当的情节既不能随意开头，也不能随意结尾，而是要遵循这些原则。

Again, a beautiful object, whether it be a living organism or any whole composed of parts, must not only have an orderly arrangement of parts, but must also be of a certain magnitude; for beauty depends on magnitude and order. Hence a very small animal organism cannot be beautiful; for the view of it is confused, the object being seen in an almost imperceptible moment of time. Nor, again, can one of vast size be beautiful; for as the eye cannot take it all in at once, the unity and sense of the whole is lost for the spectator; as for instance if there were one a thousand miles long. As, therefore, in the case of animate bodies and organisms a certain magnitude is necessary, and a magnitude which may be easily embraced in one view; so in the plot, a certain length is necessary, and a length which can be easily embraced by the memory. The limit of length in relation to dramatic competition and sensuous presentment is no part of artistic theory. For had it been the rule for a hundred tragedies to compete together, the performance would have been regulated by the water-clock,—as indeed we are told was formerly done. But the limit as fixed by the nature of the drama itself is this: the greater the length, the more beautiful will the piece be by reason of its size, provided that the whole be perspicuous. And to define the matter roughly, we may say that the proper magnitude is comprised within such limits, that the sequence of event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probability or necessity, will admit of a change from bad fortune to good, or from good fortune to bad.

而且，一个美丽的事物，无论是个生物体还是由部分拼凑而成的

整体，都不仅要有序地安排这些部分，还要有一定的大小。因为美取决于大小和排序。所以一个特别小的生物体不会美，因为我们在看到它的那个小小的瞬间它的形象是模糊的。如果体积太大也不美。因为太大了一眼看不到整体，因此就没了整体感，比如一个长达一千英里的物体。所以如果是有生命的身体或生物体，就要具有一定大小，以一眼能看清为合适。因此情节要有一定的长度，以能让人容易记住为合适。情节的长度与戏剧的竞赛和观看的美感有关，而不属于艺术理论。如果有一百部悲剧一起竞赛，表演将由滴漏来限定时间，听说从前就是这样做的。由戏剧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长度限制是：长度越长，作品就越美，只要整体是清晰可见的。大致而言，悲剧能包含相继发生的事件，根据概率或必然性，可以让事情由坏变好，或由好变坏，就是合适的长度了。

Chapter 8

第八章

Unity of plot does not, as some persons think, consist in the unity of the hero. For infinitely various are the incidents in one man's life which cannot be reduced to unity; and so, too, there are many actions of one man out of which we cannot make one action. Hence the error, as it appears, of all poets who have composed a *Heracleid* , a *Theseid* , or other poems of the kind. They imagine that as Heracles was one man, the story of Heracles must also be a unity. But Homer, as in all else he is of surpassing merit, here too—whether from art or natural genius—seems to have happily discerned the truth. In composing the *Odyssey* he did not include all the adventures of Odysseus—such as his wound on Parnassus, or his feigned madness at the mustering of the host—incidents between which there was no necessary or probable connection: but he made the *Odyssey* , and likewise the *Iliad* , to center round an action that in our sense of the word is one. As therefore, in the other imitative arts, the imitation is one when the object imitated is one, so the plot, being an imitation of an action, must imitate one action and that a whole, the structural union of the parts being such that, if any one of them is displaced or removed, the whole will be disjointed and disturbed. For a thing whose presence or absence makes no visible difference, is not an organic part of the whole.

情节的一致并非像有人所想的那样，主人公是一个人情节就一致了。人一生中的事情有无限的多样性而无从统一。同样，一个人有许许多多的行为，我们也无从统一。因此那些写《赫剌克勒斯》《忒修

斯》以及这类诗的诗人好像都犯了错误。他们以为赫剌克勒斯是一个人，所以赫剌克勒斯的故事是一致的。而荷马，和他的别的优点一样，无论是艺术还是天赋，都欣然领悟了真理。他写一首《奥德赛》时，并没有包括奥底修斯的每一个经历，比如他在帕纳塞斯山受伤，或写他在主人征兵的时候装疯，因为这些事件没有必然或可能的联系。但荷马写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主要都是描写行为，所以让我们感觉到一致性。因此，正如在其他模仿的艺术中，当被模仿的是唯一的，模仿也是唯一的。所以作为模仿行为的情节，在模仿行为时要把各个部分统一成为一个整体。任何一部分的置换或删除都会让整体脱节和混乱。而那些存在与否都不会有明显差别的部分，都不是整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Chapter 9

第九章

It is, moreover, evident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that it is not the function of the poet to relate what has happened, but what may happen—what is possible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probability or necessity. The poet and the historian differ not by writing in verse or in prose. The work of Herodotus might be put into verse, and it would still be a species of history, with meter no less than without it. The true difference is that one relates what has happened, the other what may happen. Poetry, therefore, is a more philosophical and a higher thing than history: for poetry tends to express the universal, history the particular. By the universal I mean how a person of a certain type on occasion speak or act,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probability or necessity; and it is this universality at which poetry aims in the names she attaches to the personages. The particular is—for example—what Alcibiades did or suffered. In Comedy this is already apparent: for here the poet first constructs the plot on the lines of probability, and then inserts characteristic names — unlike the lampooners who write about particular individuals. But tragedians still keep to real names, the reason being that what is possible is credible: what has not happened we do not at once feel sure to be possible; but what has happened is manifestly possible: otherwise it would not have happened. Still there are even some tragedies in which there are only one or two well-known names, the rest being fictitious. In others, none are well known—as in Agathon's *Antheus* , where incidents and names alike are fictitious, and yet they give none the less pleasure. We must not, therefore, at all costs keep to the received legends, which are the

usual subjects of Tragedy. Indeed, it would be absurd to attempt it; for even subjects that are known are known only to a few, and yet give pleasure to all. It clearly follows that the poet or “maker” should be the maker of plots rather than of verses; since he is a poet because he imitates, and what he imitates are actions. And even if he chances to take a historical subject, he is none the less a poet; for there is no reason why some events that have actually happened should not conform to the law of the probable and possible, and in virtue of that quality in them he is their poet or maker.

显而易见，正如前面所说，诗人的任务并不是叙述发生了什么，而是根据或然或必然率来叙述可能发生什么。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区别不在于写的是诗还是散文。希罗多德的作品如果换成诗的形式，也还属于历史，无论有没有韵律。二者真正的区别在于一个写过去发生的事，一个写将要发生的事。因此诗要比历史更有哲理并高于历史，因为诗常常表现普遍事件，而历史表现特殊事件。普遍性是说根据或然或必然规律，某类人会如何说话和做事。诗在给人物起名字的时候追求的目标就是普遍性。特殊性的例子是亚西比德做了什么和遭受了什么。这在喜剧中已是显而易见，诗人先根据可能性构建了情节，再插入特有的名字，这和讽刺作家特意描写某些人不一样。但悲剧作家仍然坚持用真名，因为这样让会发生的事情比较可信。对于还没发生的事情我们不会马上感到发生的可能性。而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显然是可能的，否则就不会发生了。还有些悲剧中只有一两个熟知的人名，其余都是虚构的。其他悲剧中没有一个熟知的人名，比如阿伽同的《安透斯》的人名和地名都是虚构的，也一样受到喜爱。所以我们不必固守普遍接受的传说，这些传说往往是悲剧的主题。这样的固守是可笑的，因为即使是熟知的主题也只是少数人熟知，却受到大众的喜爱。显然，诗人或创造者创造的应该是情节而不是诗。因为他之所以成为诗人是因为他模仿，而模仿的是行为。即使诗人碰巧选了个历史主题，他仍然是诗人。因为有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不合乎事物的可能性。根据这些事件的性质，他就是这些事件的诗人或创作者。

Of all plots and actions the episodic are the worst. I call a plot “episodic” in which the episodes or acts succeed one another without probable or necessary sequence. Bad poets compose such pieces by their own fault, good poets, to please the players; for, as they write show pieces for competition, they stretch the plot beyond its capacity, and are often forced to break the natural continuity.

在所有的情节和行为中，片段是最差的。我把一个情节称为“片段式”是说在情节中不按可信的或必然的顺序接连出现的片段或表演。差的诗人写出这样的作品是因为他们出错了，而好的诗人写这样的作品是为了演员。由于他们在为竞赛写表演片段时，把情节延展过大而无法控制，只好放弃情节的自然连贯性。

But again, Tragedy is an imitation not only of a complete action, but of events inspiring fear or pity. Such an effect is best produced when the events come on us by surprise; and the effect is heightened when, at the same time, they follows as cause and effect. The tragic wonder will then be greater than if they happened of themselves or by accident; for even coincidences are most striking when they have an air of design. We may instance the statue of Mitys at Argos, which fell upon his murderer while he was a spectator at a festival, and killed him. Such events seem not to be due to mere chance. Plots, therefore, constructed on these principles are necessarily the best.

但悲剧不仅仅模仿了完整的行为，还模仿了引起害怕和怜悯的事件。当这些事件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产生的效果最好。而当事件彼此有因果关系时，效果更显著。因此而产生的悲剧奇

效要比事件自然发生或偶然发生要好得多。因为即使是巧合，也是有了设计感之后悲剧效果最显著。我们以阿哥斯的弥堤斯雕像为例，雕像倒在那个在看节庆表演的凶手身上并砸死了他。这种事情似乎又不纯属偶然。因此基于这些原则构建的情节一定是最好的。

Chapter 10

第十章

Plots are either Simple or Complex, for the actions in real life, of which the plots are an imitation, obviously show a similar distinction. An action which is one and continuous in the sense above defined, I call Simple, when the change of fortune takes place without 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 and without Recognition

情节有时简单有时复杂，因为情节模仿的是实际的生活，实际生活中的行动就有简单与复杂之分。简单是按之前说的，单一的或连续的行动，并不因剧情发生逆转或发现而命运发生转变。

A Complex action is one in which the change is accompanied by such Reversal, or by Recognition, or by both. These last should arise from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plot, so that what follows should be the necessary or probable result of the preceding action. 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whether any given event is a case of propter hoc or post hoc.

与此相反，复杂情节中发生了剧情逆转或发现，或二者兼有，导致了命运的转变。逆转或发现是由情节的构建而来的，所以也是前面行为的必然或可能的结果。一个事件是前因还是后果区别重大。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 is a change by which the action veers round to its opposite, subject always to our rule of probability or necessity. Thus in the *Oedipus* , the messenger comes to cheer Oedipus and free him from his alarms about his mother, but by revealing who he is, he produces the opposite effect. Again in the *Lynceus* , Lynceus is being led away to his death, and Danaus goes with him, meaning to slay him; but the outcome of the preceding incidents is that Danaus is killed and Lynceus saved.

情境逆转是一个行为，根据我们所说的可能性或必然性规则掉头朝相反方向发展的转变。例如在《俄狄浦斯王》剧中，信使本来要取悦俄狄浦斯，并让他打消对娶母亲为妻的恐惧，却因此透露了他的身世，从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又如在《林叩斯》剧中，林叩斯被人带去处死，达那俄斯跟着他后面去执行死刑。但事情的结果却是达那俄斯被杀，而林叩斯获救。

Recognition, as the name indicates, is a change from ignorance to knowledge, producing love or hate between the persons destined by the poet for good or bad fortune. The best form of recognition is coincident with a 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 as in the *Oedipus* . There are indeed other forms. Even inanimate things of the most trivial kind may in a sense be objects of recognition. Again, we may recognize or discover whether a person has done a thing or not. But the recognition which is most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plot

and action is, as we have said, the recognition of persons. This recognition, combined with Reversal, will produce either pity or fear; and actions producing these effects are those which, by our definition, Tragedy represents. Moreover, it is upon such situations that the issues of good or bad fortune will depend. Recognition, then, being between persons, it may happen that one person only is recognized by the other—when the latter is already known—or it may be necessary that the recognition should be on both sides. Thus Iphigenia is revealed to Orestes by the sending of the letter; but another act of recognition is required to make Orestes known to Iphigenia.

发现，正如其字义，是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在诗人所设定的命运好或不好的人之间产生爱恨情仇。发现最好能同剧情反转一起发生，如同《俄狄浦斯王》剧中那样。还有其他形式的发现，甚至无生命的最琐碎的物件也可以是发现的目标。我们也可以发现某人是否做过某事。而我们说与剧情和行为最密切的发现是对人的发现。这样的发现与剧情反转结合，会引起怜悯或恐惧的效果。而引发这个效果的表演，就是我们所说的悲剧所要表现的。而且，正是基于这些情景而产生了好运或倒霉的事。如果发现是人与人之间的，就可能是一个人被另外一些人发现了，而这些人都是已知的。又有可能是双方互相发现。例如送信一事使俄瑞斯忒斯“发现”伊菲革涅亚是他姐姐，而俄瑞斯忒斯被伊菲革涅亚认识，则须靠另一个“发现。

Two parts, then, of the Plot—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 and Recognition—turn upon surprises. A third part is the Scene of Suffering. The Scene of Suffering is a destructive or painful action, such as death on the stage, bodily agony, wounds, and the like.

逆转和发现，作为情节的两个部分，常常出人意料。情节的第三个部分是苦难场景，这是破坏性或令人痛苦的表演，比如舞台上的死，肉体的痛苦，受伤这类场景。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The parts of Tragedy which must be treated as elements of the whole have been already mentioned. We now come to the quantitative parts—the separate parts into which Tragedy is divided—namely, Prologue, Episode, Exode, Choric song; this last being divided into Parode and Stasimon. These are common to all plays: peculiar to some are the songs of actors from the stage and the Commoi.

正如前面提到的，悲剧的每个部分都应被视为整体中的成分。我们现在谈谈悲剧分为几个部分——序言、片段、笑剧和合唱歌。合唱歌又分为进场歌与合唱颂歌。这些都是悲剧共有的，有些悲剧有演员在舞台上唱的抒情歌和哀歌。

The Prologue is that entire part of a tragedy which precedes the Parode of the Chorus. The Episode is that entire part of a tragedy which is between complete choric songs. The Exode is that entire part of a tragedy which has no choric song after it. Of the Choric part the Parode is the first undivided utterance of the Chorus: the Stasimon is a Choric ode without anapaests or trochaic tetrameters: the Commos is a joint lamentation of Chorus and actors. The parts of Tragedy which must be treated as elements of the whole have been already mentioned. The quantitative parts—the separate parts into which it is divided—are here enumerated.

开场白是悲剧中紧随在合唱的进场歌后面的整个部分。片段是悲剧中在完整的合唱歌曲之间的那整个部分。笑剧是悲剧中的最后的合唱歌曲之后的整个部分。合唱部分中的进场歌是合唱中第一次唱的没有分开的一段话。合唱颂歌是没有抑扬格或抑扬八音步诗的合唱歌。哀歌是合唱队和演员一起唱的悲歌。悲剧中的各部分都应当作整体中的成分，我们已经谈了，也举例说明了悲剧所分成的各个部分。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As the sequel to what has already been said, we must proceed to consider what the poet should aim at, and what he should avoid, in constructing his plots; and by what means the specific effect of Tragedy will be produced.

继续前面所说，我们接下来考虑诗人在建构情节时，目标应该什么，应该避免什么，以及用什么方法可以产生悲剧的特定效果。

A perfect tragedy should, as we have seen, be arranged not on the simple but on the complex plan. It should, moreover, imitate actions which excite pity and fear, this being the distinctive mark of tragic imitation. It follows plainly,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the change of fortune presented must not be the spectacle of a virtuous man brought from prosperity to adversity: for this moves neither pity nor fear; it merely shocks us. Nor, again, that of a bad man passing from adversity to prosperity: for nothing can be more alien to the spirit of Tragedy; it possesses no single tragic quality; it neither satisfies the moral sense nor calls forth pity or fear. Nor, again, should the downfall of the utter villain be exhibited. A plot of this kind would, doubtless, satisfy the moral sense, but it would inspire neither pity nor fear; for pity is aroused by unmerited misfortune, fear by the misfortune of a man like ourselves. Such an event, therefore, will be neither pitiful nor terrible. There remains, then, the character 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s—that of a man who is not eminently

good and just, yet whose misfortune is brought about not by vice or depravity, but by some error or frailty. He must be one who is highly renowned and prosperous—a personage like Oedipus, Thyestes, or other illustrious men of such families.

完美的悲剧应该有复杂的情节安排，而不是简单的计划。而且所模仿的行为要能够激起怜悯和恐惧，这也是悲剧模仿的一个独特标志。首先，悲剧所描写的命运的转变不能写一个善良的人由繁华落入不幸，因为这样写只能令人震惊，而不会引起怜悯或恐惧。也不能写一个坏人从不幸走向繁华，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悖于悲剧的精神了。这样写不具备悲剧的任何特性，既不符合道德意识，也不能引发怜悯或恐惧。同样，悲剧也不应展示一个极其坏的人的衰败。虽然这样的情节可以满足我们的道德感，但并不能让人产生怜悯或恐惧。因为怜悯的产生是由于不应该的不幸，而恐惧的产生是因为和我们一样的人遭遇的不幸。所以说这样的事情既不引起怜悯，也不引起恐惧。还有一种人介于两个极端之间，这样的人既不非常的好或非常正义，所遭遇的不幸又不是由于自身的恶习或堕落，而是由于某种错误或弱点带来的。这种人名声显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忒斯以及出身于他们这样的家族的著名人物。

A well-constructed plot should, therefore, be single in its issue, rather than double as some maintain. The change of fortune should be not from bad to good, but, reversely, from good to bad. It should come about as the result not of vice, but of some great error or frailty, in a character either such as we have described, or better rather than worse. The practice of the stage bears out our view. At first the poets recounted any legend that came in their way. Now, the best tragedies are founded on the story of a few houses—on the fortunes of Alcmaeon, Oedipus, Orestes, Meleager, Thyestes, Telephus, and those others who have done or suffered something

terrible. A tragedy, then, to be perfect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art should be of this construction. Hence they are in error who censure Euripides just because he follows this principle in his plays, many of which end unhappily. It is, as we have said, the right ending. The best proof is that on the stage and in dramatic competition, such plays, if well worked out, are the most tragic in effect; and Euripides, faulty though he may be in the general management of his subject, yet is felt to be the most tragic of the poets.

一个建构得好的悲剧情节，应该只有一个问题，而不是像有的人主张的有两个。命运的改变不应该是从不好变好的，正好相反，应该是从好变不好的。命运的改变不是因为人的恶，而是由于人物的大错和缺点。这人物要么同我们之前说的那些一样，要么更好。舞台的实践证明了我们的观点。起初，诗人们遇到什么故事就信手拈来，而现在最好的悲剧都是基于几个家族的故事：如阿尔克迈翁、俄狄浦斯、俄瑞斯忒斯、墨勒阿格洛斯、堤厄斯式斯、忒勒福斯，以及那些做了或遭遇到了可怕事情的人的故事。根据艺术的特点，一个完美的悲剧的情节建构就应如此。只因为欧里庇得斯遵循了这一原则而让他的戏剧常常以不幸结局，就有人就指责他，这样是不对的。这才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完美的结局。最好的证明是在舞台上和在戏剧比赛中，这样的戏剧，如果处理得当，产生的悲剧效果是最好的。虽然欧里庇得斯对主题的掌握不算完美，他的作品却被公认为是诗人中最有悲剧色彩的。

In the second rank comes the kind of tragedy which some place first. Like the *Odyssey* , it has a double thread of plot, and also an opposite catastrophe for the good and for the bad. It is accounted the best because of the weakness of the spectators; for the poet is guided in what he writes by the wishes of his audience. The pleasure, however, thence derived is not the true tragic pleasure. It

is proper rather to Comedy, where those who, in the piece, are the deadliest enemies—like Orestes and Aegisthus—quit the stage as friends at the close, and no one slays or is slain.

其次是悲剧的类型，也有人把这排第一位。就像在《奥德赛》中，情节有双重线索，善恶也得到相反的结局。由于观众的嗜好，这被认为是最好的；诗人在写作时也会受观众意愿的引导。但观众因此得到的乐趣并非真正的悲剧的乐趣。这样的剧情比较适合喜剧，因为在喜剧的某个片段中，互为死敌的人物，比如俄瑞斯忒斯和埃癸斯托斯，剧终的时候却成为朋友而一起退场，并没有人杀人或被杀。

Chapter 14

第十四章

Fear and pity may be aroused by spectacular means; but they may also result from the inner structure of the piece, which is the better way, and indicates a superior poet. For the plot ought to be so constructed that, even without the aid of the eye, he who hears the tale told will thrill with horror and melt to pity at what takes Place. This is the impression we should receive from hearing the story of the Oedipus. But to produce this effect by the mere spectacle is a less artistic method, and dependent on extraneous aids. Those who employ spectacular means to create a sense not of the terrible but only of the monstrous, are strangers to the purpose of Tragedy; for we must not demand of Tragedy any and every kind of pleasure, but only that which is proper to it. And since the pleasure which the poet should afford is that which comes from pity and fear through imitation, it is evident that this quality must be impressed upon the incidents.

恐惧和怜悯之情是通过表演场景引起的。也可以起因于情节的内部结构，这是更好的方法，也表明诗人更高明。因为好的情节建构应该是当不借助眼睛看而只用耳朵听到故事也能让人因害怕而发抖，因怜悯而融化。这应该就是我们听《俄狄浦斯王》时的印象。而仅仅用场景来取得这样的效果是缺乏艺术的方法，还要借助很多外部的因素。那些用表演场景来让人产生引起怪异而不是害怕的感觉的，都背离了悲剧的意图。因为我们不应该要求悲剧能带来所有的乐趣，只带来适合悲剧的乐趣就好。既然诗人所提供的乐趣来自通过模仿而来的怜悯和恐惧，这种效果显然应该在事件上有所体现。

Let us then determine what are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strike us as terrible or pitiful.

我们来确定一下什么情况能引起我们的害怕或怜悯之情。

Actions capable of this effect must happen between persons who are either friends or enemies or indifferent to one another. If an enemy kills an enemy, there is nothing to excite pity either in the act or the intention—except so far as the suffering in itself is pitiful. So again with indifferent persons. But when the tragic incident occurs between those who are near or dear to one another—if, for example, a brother kills, or intends to kill, a brother, a son his father, a mother her son, a son his mother, or any other deed of the kind is done—these are the situations to be looked for by the poet. He may not indeed destroy the framework of the received legends—the fact, for instance, that Clytemnestra was slain by Orestes and Eriphyle by Alcmaeon—but he ought to show of his own, and skilfully handle the traditional material. Let us explain more clearly what is meant by skilful handling.

能取得这种效果的行为应该是发生在朋友间，仇敌间，或是互相不在乎的人之间的。如果仇敌互相残杀，其意图或行为都不会引起怜悯，除非残杀的痛苦让人怜悯。如果发生在互相不在乎的人之间，结果也一样。但如果悲剧性的事件发生在亲密的人或珍惜的人之间，比如说兄弟杀死或预谋杀死兄弟，儿子对父亲，母亲对儿子，儿子对母亲，或者其他类似的行为，这才是诗人所要寻找的素材。诗人不会破坏流传的故事，比如克吕泰墨斯特拉死在俄瑞斯忒斯手中，厄里费勒死在阿尔克迈翁手中，但诗人应该加入自己的创作，同时还要能熟练

地处理传统素材。我们来更清楚地解释一下熟练处理的意思。

The action may be done consciously and with knowledge of the persons, in the manner of the older poets. It is thus too that Euripides makes Medea slay her children. Or, again, the deed of horror may be done, but done in ignorance, and the tie of kinship or friendship be discovered afterwards. The Oedipus of Sophocles is an example. Here, indeed, the incident is outside the drama proper; but cases occur where it falls within the action of the play: one may cite the Alcmaeon of Astydamas, or Telegonus in the *Wounded Odysseus* . Again, there is a third case—to be about to act with knowledge of the persons and then not to act. The fourth case is when some one is about to do an irreparable deed through ignorance, and makes the discovery before it is done. These are the only possible ways. For the deed must either be done or not done—and that wittingly or unwittingly. But of all these ways, to be about to act knowing the persons, and then not to act, is the worst. It is shocking without being tragic, for no disaster follows. It is, therefore, never, or very rarely, found in poetry. One instance, however, is in the *Antigone* , where Haemon threatens to kill Creon. The next and better way is that the deed should be perpetrated. Still better, that it should be perpetrated in ignorance, and the discovery made afterwards. There is then nothing to shock us, while the discovery produces a startling effect. The last case is the best, as when in the *Cresphontes* Merope is about to slay her son, but, recognizing who he is, spares his life. So in the *Iphigenia* , the sister recognizes the brother just in time. Again in the *Helle* , the son recognizes the mother when on the point of giving her up. This, then, is why a few families only, as has been already observed, furnish the subjects of tragedy. It was not art, but happy chance, that led the poets in search of subjects to impress the tragic quality

upon their plots. They are compelled, therefore, to have recourse to those houses whose history contains moving incidents like these.

按早期的诗人的风格，人物的行为可能是有意为之的，而且也认识对方。欧里庇得斯让美狄亚杀死她两个儿子就是这样。或者，人物做了可怕的事情后才发现和受害的人是亲属或朋友关系。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就是个例子。确实这件事不在剧中，但有时候这样的事也属于剧情的一部分，例如阿斯堤达马斯的悲剧中阿尔克迈翁杀母一事和《俄底修斯受伤》剧中的忒勒戈诺斯杀父一事。还有第三种情况是正要动手的时候了解了对方是谁而放弃行动。第四种情况是在由于不知情而要做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之前，及时发现而没做。这些就是仅有的可能的方式了，因为事情只能是做了或没做，有意或无意地做。在所有这些方式中，最差的方式是知道对方是谁而打算动手，但又放弃了。因为这样只能让人失望而不是悲痛，因为后面并没有灾难发生。因此诗歌里面没有或很少见到这种情况。例如《安提戈涅》剧中海蒙之企图杀克瑞翁。稍好的方式是事情做了。再好点的方式是做事情的时候并不知情，事后才发现真相。这样就不会让人失望，而真相的发现制造了惊人的效果。最后一种情况是最好的，例如在《克瑞斯丰忒斯》剧中，墨洛珀企图杀她的儿子，及时认出他是自己儿子而饶了他；又如在《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剧中，姐姐在最后关头认出了弟弟；在《赫勒》剧中，正当儿子要把母亲交给仇人的那刻认出了母亲。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只有那几个家族的故事可作为悲剧的素材。所以不是艺术，而是好运气在指引着诗人寻找主题，使得剧情能传达悲剧的特征。所以诗人们才不得不依赖那几个家族的故事，因为他们的家族史中包含了像这样的感人事件。

Enough has now been said concern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incidents, and the right kind of plot.

关于事件的建构和该用什么类型的情节已经讲得够多了。

Chapter 15

第十五章

In respect of Character there are four things to be aimed at.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it must be good. Now any speech or action that manifests moral purpose of any kind will be expressive of character: the character will be good if the purpose is good. This rule is relative to each class. Even a woman may be good, and also a slave; though the woman may be said to be an inferior being, and the slave quite worthless. The second thing to aim at is propriety. There is a type of manly valor; but valor in a woman, or unscrupulous cleverness is inappropriate. Thirdly, character must be true to life: for this is a distinct thing from goodness and propriety, as here described. The fourth point is consistency: for though the subject of the imitation, who suggested the type, be inconsistent, still he must be consistently inconsistent. As an example of motiveless degradation of character, we have Menelaus in the *Orestes* ; of character indecorous and inappropriate, the lament of Odysseus in the *Scylla* , and the speech of Melanippe; of inconsistency, the *Iphigenia at Aulis* —for Iphigenia the suppliant in no way resembles her later self.

关于人物要达到四个目标。首先最重要的是，人要善良。由于任何言行都体现着人的道德目标，也就表明了人物特点：如果目标是好的，人物也是好人。这个规则适用于任何阶层的人。即使是女子也是好的，奴隶也是。虽然据说女子是比较弱势的，奴隶是卑微的。第二个目标是要适合。有种男子汉的英勇，但如果写一个女子的英勇或过度聪明，都不合适。第三是人物要忠实于生活。这是区别于刚才所描

述的善良和适合。第四点是人物的一致性。即使是所模仿的人物性格不一致，也应该是一直不一致。人物无故变坏的例子有《俄瑞斯忒斯》剧中的墨涅拉俄斯；人物不得体或不适合的例子有《斯库拉》剧中俄底修斯的挽歌，和墨拉尼珀的讲话；人物不一致的例子，可以看《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剧中的伊菲革涅亚，请求免死的伊菲革涅亚与后来的她一点也像。

A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plot, so too in the portraiture of character, the poet should always aim either at the necessary or the probable. Thus a person of a given character should speak or act in a given way, by the rule either of necessity or of probability; just as this event should follow that by necessary or probable sequence. It is therefore evident that the unraveling of the plot, no less than the complication, must arise out of the plot itself, it must not be brought about by the “Deus ex Machina”—as in the *Medea* , or in the return of the Greeks in the *Iliad* . The “Deus ex Machina” should be employed only for events external to the drama—for antecedent or subsequent events, which lie beyond the range of human knowledge, and which require to be reported or foretold; for to the gods we ascribe the power of seeing all things. Within the action there must be nothing irrational. If the irrational cannot be excluded, it should be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tragedy. Such is the irrational element the *Oedipus* of Sophocles.

就像情节的建构一样，在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诗人也要致力于合乎可能性或者必然性。一定性格的人就要以一定的方式说话做事，根据一定的必然性或可能性，就像一件事的后面必然或可能发生的另一件事一样。因此很显然，情节的揭开是复杂的，一定是由情节自身发展出来的，而不应该是由天外救星来解围——就像在《美狄亚》里，或者像《伊利亚特》中希腊人的回归，都有牵强入剧来解围之

嫌。这种天外救星的事应该只用于剧外的事件，因为事件之前和之后的情况不在人类的知识范围内，需要展示或预告出来，也因为只有神才能看清楚一切事情的力量。而剧情内部则必须杜绝这些不合理的事。如果不能排除不合理的事，那就要置之于悲剧范围外。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的不合理部分就是这样处理的。

Again, since Tragedy is an imitation of persons who are above the common level, the example of good portrait painters should be followed. They, while reproducing the distinctive form of the original, make a likeness which is true to life and yet more beautiful. So too the poet, in representing men who are irascible or indolent, or have other defects of character, should preserve the type and yet ennoble it. In this way Achilles is portrayed by Agathon and Homer.

同样，既然悲剧是模仿那些高于一般水平的人，诗人们就应该效仿好的画家。他们在复制原型的独特形式的时候，模仿既忠于生活又比原型更美丽。同样，诗人在表现易怒或懒惰，或有其他性格缺陷的人的时候，也应该既保持原型又提升原来的形象。阿加顿和荷马就是这样描绘阿喀琉斯的。

These then are rules the poet should observe. Nor should he neglect those appeals to the senses, which, though not among the essentials, are the concomitants of poetry; for here too there is much room for error. But of this enough has been said in our published treatises.

这些就是诗人应该遵守的规则。同时，也要记得那些吸引人的

事，虽然这些事不是诗的要点，但也是诗的附属部分。这也是诗人们容易犯错的地方，在我们已发表的论著中已经有了足够的说明了。

Chapter 16

第十六章

What Recognition is has been already explained. We will now enumerate its kinds.

发现是什么已经解释过了，我们现在来举例说明发现的类型。

First, the least artistic form, which, from poverty of wit, is most commonly employed—recognition by signs. Of these some are congenital—such as “the spear which the earth-born race bear on their bodies,” or the stars introduced by Carcinus in his *Thyestes* . Others are acquired after birth; and of these some are bodily marks, as scars; some external tokens, as necklaces, or the little ark in the *Tyro* by which the discovery is effected. Even these admit of more or less skilful treatment. Thus in the recognition of Odysseus by his scar, the discovery is made in one way by the nurse, in another by the swineherds. The use of tokens for the express purpose of proof—and, indeed, any formal proof with or without tokens—is a less artistic mode of recognition. A better kind is that which comes about by a turn of incident, as in the Bath Scene in the *Odyssey* .

首先，最没有艺术感的，最是笔底才华少时的一种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标志来发现。有些标志是天生的，比如“从地里生的一族身上的矛”，或卡耳喀诺斯在《堤厄斯忒斯》剧中的星星。还有些是后天获得的，其中有的是身体上的标志，比如伤疤。有些是身体外部的

物件，比如项链，又如《堤洛》剧中的小船，通过它才有了发现。标志的处理技巧有高有低，例如俄底修斯的伤疤，被乳母和养猪人发现的方式就不一样。用物件做证据，或任何正式证据，无论是否有物件为证，都是比较缺乏艺术性的发现方式。较好的方式是通过事件的转折来发现，比如《奥德赛》中沐浴的场景。

Next come the recognitions invented at will by the poet, and on that account wanting in art. For example, Orestes in the *Iphigenia* reveals the fact that he is Orestes. She, indeed, makes herself known by the letter; but he, by speaking himself, and saying what the poet, not what the plot requires. This, therefore, is nearly allied to the fault above mentioned—for Orestes might as well have brought tokens with him. Another similar instance is the “voice of the shuttle” in the *Tereus* of Sophocles.

其次是诗人随意创作出的发现，因此也比较缺乏艺术性。例如，在《伊菲革涅亚》剧中，俄瑞斯忒斯说了自己是谁。伊菲革涅亚是由一封信而暴露自己的；而俄瑞斯忒斯则由他自己讲出来的。他所讲的话是诗人要他讲的，不是情节需要的。所以这和之前提到的错误相似，因为俄瑞斯忒斯可能身上也带着符号。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索福克勒斯的《忒柔斯》剧中的“梭子的声音”。

The third kind depends on memory when the sight of some object awakens a feeling: as in the *Cyprians* of Dicaeogenes, where the hero breaks into tears on seeing the picture; or again in the Lay of Alcinous, where Odysseus, hearing the minstrel play the lyre, recalls the past and weeps; and hence the recognition.

第三种发现是由记忆引起的触景生情，由于看到某物而唤醒某种情感。例如狄开俄革涅斯的《塞浦路斯人》中，男主角看到一幅画而流泪。在阿尔喀诺俄斯的短诗中，奥德修斯听到吟游诗人在弹七弦竖琴，回想起往事而潸然泪下。这就是触景生情而产生的发现。

The fourth kind is by process of reasoning. Thus in the *Choephori* : “Some one resembling me has come: no one resembles me but Orestes: therefore Orestes has come.” Such too is the discovery made by Iphigenia in the play of Polyidus the Sophist. It was a natural reflection for Orestes to make, “So I too must die at the altar like my sister.” So, again, in the *Tydeus* of Theodectes, the father says, “I came to find my son, and I lose my own life.” So too in the *Phineidae* : the women, on seeing the place, inferred their fate —“Here we are doomed to die, for here we were cast forth.” Again, there is a composite kind of recognition involving false inference on the part of one of the characters, as in the Odysseus Disguised as a Messenger. A said that no one else was able to bend the bow; … hence B (the disguised Odysseus) imagined that A would recognize the bow which, in fact, he had not seen; and to bring about a recognition by this means—the expectation that A would recognize the bow—is false inference.

第四种发现是通过推理而来的。例如《奠酒人》剧中的推理：“一个像我的人要来了，除俄瑞斯忒斯而外，没有人像我，所以是他来了。”又如诡辩家波吕伊多斯的戏剧中伊菲革涅亚也是推理而发现的。俄瑞斯忒斯会自然想到，“我会和我姐姐一样死在祭坛上的”。同样，在忒俄得克忒斯的《堤丢斯》剧中的父亲说，“我来找儿子，却把自己的命丢了”。又如在《菲纽斯的儿女们》剧中，那些女人们一看到那个地方就推断出自己的命运，“我们注定要死在这里，因为我们就是被抛弃在这里的”。还有一种综合推断的发现，是因为

对一个角色所做的错误推断而产生的。在俄底修斯装成报信人的剧中，A说，“没有其他人能拉弯这张弓”，因此B（俄底修斯伪装的报信人）猜测A会认出那张弓，而实际上A并没见过的那弓。以为A能认出那张弓是个错误的推断，通过这种方式而引起发现。

But, of all recognitions, the best is that which arises from the incidents themselves, where the startling discovery is made by natural means. Such is that in the *Oedipus* of Sophocles, and in the *Iphigenia* ; for it was natural that Iphigenia should wish to dispatch a letter. These recognitions alone dispense with the artificial aid of tokens or amulets. Next come the recognitions by process of reasoning.

但是，在所有的发现中，最好的是从事件当中产生的发现，这样的发现是用自然的方式做出了惊人的发现。例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在《伊菲革涅亚》里的发现，伊菲革涅亚想送封信回去，是一个很自然的行为。这些发现都不需借助虚拟的符号或项链。其次是通过推理的过程的发现。

Chapter 17

第十七章

In constructing the plot and working it out with the proper diction, the poet should place the scene, as far as possible, before his eyes. In this way, seeing everything with the utmost vividness, as if he were a spectator of the action, he will discover what is in keeping with it, and be most unlikely to overlook inconsistencies. The need of such a rule is shown by the fault found in Carcinus. Amphiaraus was on his way from the temple. This fact escaped the observation of one who did not see the situation. On the stage, however, the piece failed, the audience being offended at the oversight.

在建构情节和选择合适的词写出来的时候，诗人应该尽可能想象剧中的情景就在眼前。这样才能身临其境，才能最真实地审视一切，仿佛自己就像个现场的观众，看清楚什么是符合剧情的，且不容易忽略不符合剧情的地方。这样的做法是必需的，我们可以通过卡耳喀诺斯的错误来说明。安菲阿剌俄斯从神殿中出来，因为没有观察好而忽略了当时的情形。而在舞台上这场剧失败了，观众也因为这个疏忽而不满意。

Again, the poet should work out his play, to the best of his power, with appropriate gestures; for those who feel emotion are most convincing through natural sympathy with the characters they represent; and one who is agitated storms, one who is angry rages, with the most lifelike reality. Hence poetry implies either a happy

gift of nature or a strain of madness. In the one case a man can take the mould of any character; in the other, he is lifted out of his proper self.

被情感支配的诗人应该竭尽全力来写剧本，并用合适的方式来展现。最有说服力的情绪是那些他们所描绘的角色所引起的自然的怜悯之情。写激动的人的暴发，写生气的人的狂怒，都用最栩栩如生的描绘。因此诗中才有快乐的天赋才情或疯狂的劲头。有时人可以像剧中角色的性格，有时，人可以不是正常的自己。

As for the story, whether the poet takes it ready made or constructs it for himself, he should first sketch its general outline, and then fill in the episodes and amplify in detail. The general plan may be illustrated by the *Iphigenia* . A young girl is sacrificed; she disappears mysteriously from the eyes of those who sacrificed her; she is transported to another country, where the custom is to offer up all strangers to the goddess. To this ministry she is appointed. Some time later her own brother chances to arrive. The fact that the oracle for some reason ordered him to go there, is outside the general plan of the play. The purpose, again, of his coming is outside the action proper. However, he comes, he is seized, and, when on the point of being sacrificed, reveals who he is. The mode of recognition may be either that of Euripides or of Polyidus, in whose play he exclaims very naturally: “So it was not my sister only, but I too, who was doomed to be sacrificed”; and by that remark he is saved.

关于故事情节，诗人可用已有的，也可自己编造，但都应当先勾画出故事梗概，加入各个剧段，然后再详述细节。总体规划可以以

《伊菲革涅亚》为例。一个年轻的女孩要被当作祭品祭神，但她神秘地从献出她的人眼前消失了。这个女孩被带到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的习俗是把外来人献祭给一个女神。她被任命来执掌这些祭祀。不久，她的弟弟偶然来到这里。由于某种原因，神让他来到这里这件事并不在故事的总体规划内，也就是说他的到来并不属于情节之内。但是他来了，被抓并马上要成为祭品的时候，他说出了他是谁。这样的发现的模式可以是欧里庇得斯那样或是波吕伊多斯那样的，在剧中他很自然地大声说，“不只是我姐姐，我也是注定要被献祭的”，这样说了他就得救了。

After this, the names being once given, it remains to fill in the episodes. We must see that they are relevant to the action. In the case of Orestes, for example, there is the madness which led to his capture, and his deliverance by means of the purificatory rite. In the drama, the episodes are short, but it is these that give extension to Epic poetry. Thus the story of the *Odyssey* can be stated briefly. A certain man is absent from home for many years; he is jealously watched by Poseidon, and left desolate. Meanwhile his home is in a wretched plight—suitors are wasting his substance and plotting against his son. At length, tempest-tost, he himself arrives; he makes certain persons acquainted with him; he attacks the suitors with his own hand, and is himself preserved while he destroys them.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he plot; the rest is episode.

总体规划有了，就给人物取名，然后开始填入插曲。要确保这些都和情节有关。比如在俄瑞斯忒斯的情况是由于他发疯被捕了，而通过净化礼他被释放了。在戏剧中，剧段是短的，但正是这些插曲扩展了史诗，《奥德赛》的故事才得以简单地讲述。有个人已经多年不在家，波塞冬嫉妒地盯着他，令他变得孤苦伶仃。同时，他的家也陷入困境，求婚者们浪费了他的财产，还暗算他的儿子。终于，经过颠簸

飘摇他回到了家里，认识了一些人，亲自攻打了那些求婚者，杀掉他们也保全了自己。这是主要的情节，其余都是插曲。

Chapter 18

第十八章

Every tragedy falls into two parts—Complication and Unraveling or Denouement. Incidents extraneous to the action are frequently combined with a portion of the action proper, to form the Complication; the rest is the Unraveling. By the Complication I mean all that extend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action to the part which marks the turning-point to good or bad fortune. The Unraveling is that which extend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hange to the end. Thus, in the *Lynceus* of Theodectes, the Complication consists of the incidents presupposed in the drama, the seizure of the child, and then again, the Unraveling extends from the accusation of murder to the end.

每个悲剧都分为两部分——复杂化和解决（或结局）。与情节无关的事件常常会和部分情节结合在一起来使情节复杂化，然后就是解决问题。复杂化的部分是指从故事开始，到故事变好或坏的拐点；而解决部分是从故事的拐点开始，到故事的结局为止。例如式俄得克式斯的《林叩斯》剧中，复杂化部分包括戏剧所预设的事件，孩子被抓住，以及其他；解决部分从起诉谋杀开始直到结尾。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Tragedy: the Complex, depending entirely on 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 and Recognition; the Pathetic (where the motive is passion),—such as the tragedies on *Ajax* and *Ixion* ; the Ethical (where the motives are ethical),—such as the *Phthiotides* and the *Peleus* . The fourth kind is the Simple. (We here

exclude the purely spectacular element), exemplified by the *Phorcides* , the *Prometheus* , and scenes laid in Hades. The poet should endeavor, if possible, to combine all poetic elements; or failing that, the greatest number and those the most important; the more so, in face of the caviling criticism of the day. For whereas there have hitherto been good poets, each in his own branch, the critics now expect one man to surpass all others in their several lines of excellence.

悲剧分四类。复杂剧全靠情景逆转和发现；伤感剧（主题是激情），比如《埃阿斯》与《伊克西翁》之类的悲剧；伦理剧（主题是伦理），比如《佛提亚妇女》与《珀琉斯》；第四种是简单剧（我们这里不包括纯粹展示的因素）。例如《福耳喀得斯》《普罗米修斯》以及所有场景设在冥土上的悲剧。如果有可能，诗人应该努力将所有诗的元素组合起来。如果做不到，也要用尽量多的元素和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诗人们面临着严苛挑剔的当下。因为虽然一直都有优秀的诗人，各自有擅长的部分，批评家们还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在多个方面都超越其他人。

In speaking of a tragedy as the same or different, the best test to take is the plot. Identity exists where the Complication and Unraveling are the same. Many poets tie the knot well, but unravel it ill. Both arts, however, should always be mastered.

其实要说一出悲剧和另一出相同或不相同，最公平的办法莫过于看布局，即看“结”与“解”。许多人善于“结”，不善于“解”；但其实两者都应擅长。

Again, the poet should remember what has been often said, and not make an Epic structure into a tragedy—by an Epic structure I mean one with a multiplicity of plots—as if, for instance, you were to make a tragedy out of the entire story of the *Iliad* . In the Epic poem, owing to its length, each part assumes its proper magnitude. In the drama the result is far from answering to the poet's expectation. The proof is that the poets who have dramatized the whole story of the *Fall of Troy* , instead of selecting portions, like Euripides; or who have taken the whole tale of Niobe, and not a part of her story, like Aeschylus, either fail utterly or meet with poor success on the stage. Even Agathon has been known to fail from this one defect. In his Reversals of the Situation, however, he shows a marvelous skill in the effort to hit the popular taste—to produce a tragic effect that satisfies the moral sense. This effect is produced when the clever rogue, like Sisyphus, is outwitted, or the brave villain defeated. Such an event is probable in Agathon's sense of the word “is probable,” he says, “that many things should happen contrary to probability.”

诗人应该记住前面屡次说的，不要把史诗写成悲剧。一部史诗里有许多情节，就像说你要把《伊利亚特》的整个故事写成悲剧。在史诗中，由于篇幅较大，每个部分都有合适的长度。在戏剧中，结局远不能满足诗人的期望。证据是，有些诗人把《特洛伊陷落》的整个故事写成戏剧，而不是像欧里庇得斯那样只选取部分的故事。或者有些诗人把尼俄伯的整个传说写成戏剧，而不是像埃斯库罗斯那样只选取部分故事。这些诗人在舞台上不是彻底失败就是效果不佳。即使是阿伽同也曾经因为这样的错误失败过。但在写剧情逆转时，他用了非凡的技巧来迎合大众的喜好，即创造出悲剧的效果来符合道德观。这种效果产生于像西绪福斯那种聪明的无赖被智取，或者勇敢的罪犯被打败的时候。这样的事件按阿伽同对写作的感觉是可能的，“很可能,”他说，“许多事情的发生和可能性正好相反”。

The Chorus too should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actors; it should b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whole, and share in the action, in the manner not of Euripides but of Sophocles. As for the later poets, their choral songs pertain as little to the subject of the piece as to that of any other tragedy. They are, therefore, sung as mere interludes—a practice first begun by Agathon. Yet what difference is there between introducing such choral interludes, and transferring a speech, or even a whole act, from one play to another.

合唱队也应被视为演员之一，应该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分担着演出任务，不是像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那样，而应像索福克勒斯的那样。对于后来的诗人，他们的合唱歌与剧情没什么关系，与其他悲剧也没什么关系。因此，他们只是一种幕间节目——由阿伽同首创的做法。但是引进这样的幕间合唱，和把一段讲话，甚至是整个表演从一出剧移到另外一出剧有什么区别呢？

Chapter 19

第十九章

It remains to speak of Diction and Thought, the other parts of Tragedy having been already discussed. Concerning Thought, we may assume what is said in the Rhetoric, to which inquiry the subject more strictly belongs. Under Thought is included every effect which has to be produced by speech, the subdivisions being: proof and refutation; the excitation of the feelings, such as pity, fear, anger, and the like; the suggestion of importance or its opposite. Now, it is evident that the dramatic incidents must be treated from the same points of view as the dramatic speeches, when the object is to evoke the sense of pity, fear, importance, or probability.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the incidents should speak for themselves without verbal exposition; while effects aimed at in should be produced by the speaker, and as a result of the speech. For what were the business of a speaker, if the Thought were revealed quite apart from what he says?

只剩下言辞和思想要谈，其他悲剧的部分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关于思想，我们认可修辞学中所说的，因为对这个题目的探讨更应该属于修辞学。思想包含的各种效果要通过说话来产生。说话可以细分为：证明与反驳；情感的激发，例如怜悯，恐惧，愤怒等；表明重要与否。那么很明显，如果目的是为了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或表明事情重要或可能的感觉，那么对待戏剧的事件要和对待戏剧的言语的视角一样。对待戏剧事件和语言的唯一区别是事件是不借助语言表达来传达意思，然而想到达的效果应该是由说话者产生的，或者是由于说出来的话而产生的效果。因为如果所传达的思想并没有借助所说的

话，那何必要说话者呢？

Next, as regards Diction. One branch of the inquiry treats of the Modes of Utterance. But this province of knowledge belongs to the art of Delivery and to the masters of that science. It includes, for instance—what is a command, a prayer, a statement, a threat, a question, an answer, and so forth. To know or not to know these things involves no serious censure upon the poet's art. For who can admit the fault imputed to Homer by Protagoras—that in the words, “Sing”, goddess, of the wrath, he gives a command under the idea that he utters a prayer? For to tell some one to do a thing or not to do it is, he says, a command. We may, therefore, pass this over as an inquiry that belongs to another art, not to poetry.

接下来是关于言词。言词要探讨的内容之一是表达方式。但这个领域的知识属于讲演的艺术和这门科学的专家的研究范围。言词包括命令、祈求、陈述、威胁、问题、回答等等表达方式。是否了解这些内容并不会引起对诗人的艺术的苛责。普洛塔哥拉指责荷马，说他在“歌唱愤怒吧，女神”一句中，本想要祈求，却变成了下命令。因为普洛塔哥拉说让人去做或不做某事就是在下命令。但是谁能承认这是个错误呢？因此我们可以把这归于诗以外的另外一门艺术的讨论范畴，就先不谈了。

Chapter 20

第二十章

Language in general includes the following parts: Letter, Syllable, Connecting Word, Noun, Verb, Inflection or Case, Sentence or Phrase.

语言通常包含以下几部分：字母，音节，连接词，名词，动词，词形变化或词格，句子或短语。

A Letter is an indivisible sound, yet not every such sound, but only one which can form part of a group of sounds. For even brutes utter indivisible sounds, none of which I call a letter. The sound I mean may be either a vowel, a semi-vowel, or a mute. A vowel is that which without impact of tongue or lip has an audible sound. A semi-vowel that which with such impact has an audible sound, as ς (S) and ρ ®. A mute, that which with such impact has by itself no sound, but joined to a vowel sound becomes audible, as γ (G) and δ (D). These are distinguished according to the form assumed by the mouth and the place where they are produced; according as they are aspirated or smooth, long or short; as they are acute, grave, or of an intermediate tone; which inquiry belongs in detail to the writers on meter.

一个字母是个不可分的音，但不是所有不可分的音，而只是那种可以组成一组语音的不可分的音。因为即使是野兽也能发出不可分的

音，但都不是我们说的字母。我们说的声音是指元音、半元音或静音。元音是那种不触碰舌头或嘴唇而产生的可听见的声音。半元音是有触碰而发出的可听见的声音，例如S和R。静音是触碰舌头而本身没有声音，通过与元音结合才有可听见的声音，例如G和D。它们的区别在于嘴型和发音部位，是否送气音或不送气音，是长音还是短音，是高、低或中音。这些方面具体应属于研究韵律的作家们。

A Syllable is a non-significant sound, composed of a mute and a vowel: for γρ (GR) without *α* (A) is a syllable, as also with *α* (A),—γρ*α* (GRA). Bu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se differences belongs also to metrical science.

一个音节是个无含义的声音，由一个静音和一个元音组成。例如GR没有A就是个音节，带个A——GRA也是个音节。但这个方面的探讨也属于韵律学范畴。

A Connecting Word is a non-significant sound, which neither causes nor hinders the union of many sounds into one significant sound; it may be placed at either end or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Or, a non-significant sound, which out of several sounds, each of them significant, is capable of forming one significant sound,—as *αμθι* (*amphi*), περι (*peri*), and the like. Or, a non-significant sound, which marks the beginning, end, or division of a sentence; such, however, that it cannot correctly stand by itself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as *μεν* (*men*), ητοι (*etoi*), *δε* (*de*).

连接词是没有意义的音，既不引起也不阻碍多个声音结合为一个有含义的声音，一般位于句子的末尾或中间。或者说，它是一个没有

含义的音，能把几个有含义的音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意义的音，例如“amphi”,“peri”之类的。又或者是一个没有含义的音，位于句子的开头，结尾，或句子的分开部分。但这样的音却无法独自位于句首，例如“men”,“etoi”，“de”等。

A Noun is a composite significant sound, not marking time, of which no part is in itself significant: for in double or compound words we do not employ the separate parts as if each were in itself significant. Thus in Theodorus, “god-given”, the *δωρον* (*doron*) or “gift” is not in itself significant.

名词是一个合成的有含义的音，不表明时间，其各部分本身并无含义。例如在复合词或合成词中，我们通常不把各部分当作有含义来看待。因此在“Theodorus”（神赐的）这个词中的“doron”（赠品）就没有自己的含义。

A Verb is a composite significant sound, marking time, in which, as in the noun, no part is in itself significant. For “man” or “white” does not express the idea of “when”; but “he walks” or “he has walked” does connote time, present or past.

动词是合成的有含义的音，表明时间。和名词一样，合成的各部分没有自己的含义。因为“人”或者“白色”并不表明时间；而“他走路”和“他已经走了”却表明了动作的时间，分别是现在和过去。

Inflection belongs both to the noun and verb, and expresses either the relation “of”, “to”, or the like; or that of number, whether

one or many, as “man” or “men”; or the modes or tones in actual delivery, e.g., a question or a command. “Did he go?” and “go” are verbal inflections of this kind.

词形变化名词和动词都有，并且词性变化表明了关系是“属于”、“对于”之类；词形变化还表明数量是一个还是多个，例如“人”或“人们”；词形变化还能表明真正说话时的方式和语气，例如是提问还是命令。“Did he go (他去了吗)？”和“go(去)”就是这类的动词词形变化。

A Sentence or Phrase is a composite significant sound, some at least of whose parts are in themselves significant; for not every such group of words consists of verbs and nouns—“the definition of man,” for example—but it may dispense even with the verb. Still it will always have some significant part, as “in walking”, or “Cleon son of Cleon”. A sentence or phrase may form a unity in two ways, —either as signifying one thing, or as consisting of several parts linked together. Thus the *Iliad* is one by the linking together of parts, the definition of man by the unity of the thing signified.

句子或短语是合成的、有含义的，至少有的部分本身有含义。因为不是每个这样的语句都包含了动词和名词。例如“the definition of man（人的定义）”句中甚至可以不用动词。但语句中总会有些有含义的部分，比如在“克勒翁在行走”中的“克勒翁”。一个句子或短语可以有两种方式来组成一个整体，要么用于表示一件事，要么用于将几段话连在一起。《伊利亚特》就是这样通过连词把部分连接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整体的，而“人的定义”则是一致地表示所指的事件。

Chapter 21

第二十一章

Words are of two kinds, simple and double. By simple I mean those composed of non-significant elements, such as γῆ (*ge*), “earth”. By double or compound, those composed either of a significant and non-significant element (though within the whole word no element is significant), or of elements that are both significant. A word may likewise be triple, quadruple, or multiple in form, like so many Massilian expressions, e.g., “Hermo-caico-xanthus (who prayed to Father Zeus).”

词有两种，简单词和复合词。简单词是指由一些没有含义的部分组成的，例如“ge”“地”。复合词或合成词是指由有含义的部分和无含义部分组成的词（虽然在作为整体的一个词里面的各部分都没有含义），或者是由两部分各自都有含义的词组成。词也可能是三字合成，四字合成，或多字合成的，就像很多加长的词句一样，例如“Hermo-caico-xanthus”（向主神宙斯祈祷的人)。

Every word is either current, or strange, or metaphorical, or ornamental, or newly-coined, or lengthened, or contracted, or altered.

词可以是通用词、外来词、隐喻词、修饰词、新创词、加长词、缩小词或变异词。

By a current or proper word I mean one which is in general use among a people; by a strange word, one which is in use in another country. Plainly, therefore, the same word may be at once strange and current, but not in relation to the same people. The word σίγυνον *(sigynon*), “lance”, is to the Cyprians a current term but to us a strange one.

通用词或专用词是人们普遍使用的词。外来词是其他国家使用的词。所以很明显，一个词可以是外来词，又是通用词，只是使用的人群不一样了。“sigynon”（矛）这个词原来在塞浦路斯是个通用词，但对我们是个外来词。

Metaphor is the application of an alien name by transference either from genus to species, or from species to genus, or from species to species, or by analogy, that is, proportion. Thus from genus to species, as: “There lies my ship”; for lying at anchor is a species of lying. From species to genus, as: “Verily ten thousand noble deeds hath Odysseus wrought”; for ten thousand is a species of large number, and is here used for a large number generally. From species to species, as: “With blade of bronze drew away the life”, and “Cleft the water with the vessel of unyielding bronze.” Here ἀρύσαι (*arusai*), “to draw away” is used for ταμεῖν *(tamein*), “to cleave”, and ταμεῖν (*tamein*), again for ἀρύσαι (*arusai*)—each being a species of taking away. Analogy or proportion is when the second term is to the first as the fourth to the third. We may then use the fourth for the second, or the second for the fourth. Sometimes too we qualify the metaphor by adding the term to which the proper word is relative. Thus the cup is to Dionysus as the shield to Ares. The cup may, therefore, be called “the shield of Dionysus”, and the shield “the cup of Ares”. Or, again, as old age is

to life, so is evening to day. Evening may therefore be called, “the old age of the day”, and old age, “the evening of life”, or, in the phrase of Empedocles, “life's setting sun.” For some of the terms of the proportion there is at times no word in existence; still the metaphor may be used. For instance, to scatter seed is called sowing: but the action of the sun in scattering his rays is nameless. Still this process bears to the sun the same relation as sowing to the seed. Hence the expression of the poet “sowing the god-created light”. There is another way in which this kind of metaphor may be employed. We may apply an alien term, and then deny of that term one of its proper attributes; as if we were to call the shield, not “the cup of Ares”, but “the wineless cup”.

隐喻词是把一个不同的名称进行转换，从属转为类，或从类转为属，或从类到类，或用类推，即类比。从属到类的例子：“我的船停在那里”，船抛锚也是停泊的一种。从类到属的例子是，“上万件高尚的事都由奥德修斯做成”，这里“万”是一类大的数量，所以常常用来比喻数量大。从类到类的转换的句子：“用铜剑夺去性命”和“用坚固的铜器皿打水”这里的夺去和打水都是拿走的意思。类比或类推的意思是当第二个词之对于第一个词，就像第四个词之对于第三个词。这样就可以用第四个词来代替第二个词，或反之，用第二个词来代替第四个词。有时也可以加入与被隐喻的词相关的词来进行隐喻。杯子之对于狄俄倪索斯，正如盾对于阿瑞斯。所以也可以把杯子说成“狄俄倪索斯之盾”或把盾说成“阿瑞斯之杯”。又如老年之于一生，就如黄昏之于一天。所以黄昏也可以说是“一天的老年”，而年老可以是“人生的黄昏”。或用恩培多克勒的话，叫“人生的落日”。有时找不到现成的词用来做类比，仍然可以用隐喻。例如，撒播种子称为播种，但太阳撒播阳光却没有词来形容。阳光被播散正如种子被撒播，所以诗人说“撒播神创造的光”。隐喻还可以用另一个方法，就是另找一个词，但不用这个词的某个属性，比如，我们不把盾叫做“阿瑞斯之杯”，而叫做“无酒之杯”。

A newly-coined word is one which has never been even in local use, but is adopted by the poet himself. Some such words there appear to be: as ἐρνύγες (*ernyges*), “sprouters”, for κέρατα (*kerata*), “horns”; and ἀρητήρ (*areter*), “supplicator”, for ἱερεύς (*hiereus*), “priest”.

新创词指从未在当地使用过的词，它是由诗人自己采用的。这样出现的词有：“ernyges”为“sprouters(芽)”；称“kerata”为“horns(角）”；称“hiereus”为“priest(牧师）”。

A word is lengthened when its own vowel is exchanged for a longer one, or when a syllable is inserted. A word is contracted when some part of it is removed. Instances of lengthening are: πόληος (poleos) for πόλεως (poleos), Πηληιάδεω (Peleiadeo) for Πηλείδου (*Peleidou*): of contraction,—κρῖ (*kri*), δῶ (*do*), and ὄψ (*ops*), as in *μία γίνεται ἀμφοτέρων ὄψ* (*mia ginetai amphoteron ops*), “the appearance of both is one”.

当词的元音变成长元音，或当加入一个音节的时候一个词就加长了。而词的缩小是由于部分词被去掉了。加长词的例子有：“poleos”变成“poleos”（原文均为希腊语），“Peleidou”变成“Peleiadeo”。缩小词有：“kri”，“do”,和“ops”，例如在“mia ginetai amphoteron ops”一句中，两个词出现表示一个词的意思。

An altered word is one in which part of the ordinary form is left unchanged, and part is recast: as in *dexiteron kata mazon* , “on the right breast”, *dexiteron* is for *dexion* .

变异词是当一个词的部分保存不变，部分新创了，例如在dexiteron kata mazon（在右胸上）中，“dexiteron”取代了“dexion”。

Nouns in themselves are either masculine, feminine, or neuter. Masculine are such as end in ν (N), ρ ®, ς (S), or in some letter compounded with ς (S)—these being two, ψ (PS) and ξ (X). Feminine, such as end in vowels that are always long, namely η (E) and ω (O), and — of vowels that admit of lengthening — those in *α* (A). Thus the number of letters in which nouns masculine and feminine end is the same; for ψ (PS) and ξ (X) are equivalent to endings in ς (S). No noun ends in a mute or a vowel short by nature. Three only end in ι (I)—*μέλι* (*meli*), “honey”; κόμμι *(kommi*), “gum”; πέπερι (*peperi*), “pepper”; five end in υ (U). Neuter nouns end in these two latter vowels; also in ν (N) and ς (S).

名词本身是阴性，阳性或中性。阳性的名词有以N,R,S结尾，或以带S的字母组合，比如这两个，PS和X。阴性的名词常常以元音结尾，尤其是长元音，如E和O，以及可以加长的元音，比如那些以A结尾的名词。所以阳性名词和阴性名词的收尾字母数量是一样的，因为PS和X等同于以S的收尾。没有名词是一静音或短元音结尾的。只有三个以I结尾——“meli”（蜂蜜），“kommi”（口香糖），“peperi”（胡椒）。五个以U结尾。中性名词除了以U和I结尾外，还以N和S结尾。

Chapter 22

第二十二章

The perfection of style is to be clear without being mean. The clearest style is that which uses only current or proper word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mean—witness the poetry of Cleophon and of Sthenelus. That diction, on the other hand, is lofty and raised above the commonplace which employs unusual words. By unusual, I mean strange (or rare) words, metaphorical, lengthened,—anything, in short, that differs from the normal idiom. Yet a style wholly composed of such words is either a riddle or a jargon; a riddle, if it consists of metaphors; a jargon, if it consists of strange (or rare) words. For the essence of a riddle is to express true facts under impossible combinations. Now this cannot be done by any arrangement of ordinary words, but by the use of metaphor it can. Such is the riddle: “A man I saw who on another man had glued the bronze by aid of fire”, and others of the same kind. A diction that is made up of strange (or rare) terms is a jargon. A certain infusion, therefore, of these elements is necessary to style; for the strange (or rare) word, the metaphorical, the ornamental, and the other kinds above mentioned, will raise it above the commonplace and mean, while the use of proper words will make it perspicuous. But nothing contributes more to produce a cleanness of diction that is remote from commonness than the lengthening, contraction, and alteration of words. For by deviating in exceptional cases from the normal idiom, the language will gain distinc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partial conformity with usage will give perspicuity. The critics, therefore, are in error who censure these licenses of speech, and hold the author up to ridicule. Thus Eucleides, the elder, declared

that it would be an easy matter to be a poet if you might lengthen syllables at will. He caricatured the practice in the very form of his diction, as in the verse:

语言风格的完美在于清晰而不流于平淡。最清晰的风格是只用通用词或固有词，但同时也比较平淡。克勒俄丰和斯忒涅罗斯的诗的风格就是证明。另一方面，如果措辞能够用标新立异的词就能高雅而不落俗套。所谓标新立异的词是指奇怪的或罕见的词、隐喻词、加长词等任何不同于常规用语的词。但是如果全都是标新立异的词，就会写成谜语或术语了。如果用的是隐喻，就成为谜语；如果用了奇怪或罕见的词，就写成术语了。因为谜语的本质就是通过难解的密码组合来表示真相，用普通的词来组合无法做到，使用隐喻却可以。例如，“我看到一个人用火把铜粘在另一个人身上（拔火罐）”和诸如此类的，便成了谜语。由奇怪或罕见的词组成的措辞是术语。适当使用这些因素对语言风格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用奇怪的词（或罕见词）、隐喻词、修饰词以及以上谈到的其他类型的词，都有助于提升语言风格，使之超凡脱俗，尽管使用固有词清晰易懂。要使措辞清晰又不落俗套，最有效的莫过于使用加长词、缩小词和变异词。有的特殊情况下使用非常规词就会让语言卓尔不凡，但同时也要部分合乎语言惯例才能清晰易懂。因此指责这些语言用法还嘲讽作家的批评家们是错的，就像老欧克勒得斯所说，如果可以随意把字加长，那作诗也未免太容易了。他曾用这种风格写诗来讽刺诗人，例如：

Ἐπιχάρην εἶδον Μαραθῶνάδε βαδίζοντα
(Epicharen eidon Marathonade badizonta,)

Epicharen eidon Marathonade badizonta,

“I saw Epichares walking to Marathon,”

我看到厄毕卡瑞斯走去马拉松，

or,

又如：

οὐκ ἂν γεράμενος τὸν ἐκείνου ἐλλέβορον
(ouk an g'eramenos ton ekeinou elleboron.)

ouk an g’eramenos ton ekeinouelleboron.

“Not if you desire his hellebore.”

除非你想要他的菟葵。

To employ such license at all obtrusively is, no doubt, grotesque; but in any mode of poetic diction there must be moderation. Even metaphors, strange (or rare) words, or any similar forms of speech, would produce the like effect if used without propriety and with the express purpose of being ludicrous. How great a difference is made by the appropriate use of lengthening, may be seen in Epic poetry by the insertion of ordinary forms in the

verse. So, again, if we take a strange (or rare) word, a metaphor, or any similar mode of expression, and replace it by the current or proper term, the truth of our observation will be manifest. For example, Aeschylus and Euripides each composed the same iambic line. But the alteration of a single word by Euripides, who employed the rarer term instead of the ordinary one, makes one verse appear beautiful and the other trivial. Aeschylus in his *Philoctetes* says:

但是如果过度地突出使用这些方式无疑会很怪异。任何风格的诗在措辞上都以适度为宜。如果不得体地使用了隐喻词、奇怪的词（或罕见词）或任何类似的说话方式，以求引人发笑的时候，都会产生同样的怪异的效果。但如果恰当地使用加长词可以产生巨大的效果，例如在史诗中插入普通形式。同样的，如果我们去掉奇怪的（或罕见的）词、隐喻词或类似的表达方式，并用普通词或固有的词来代替，我们所关注的事实就会显示出来。例如: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都写过抑扬格的诗，但是欧里庇得斯改动了一个词，用一个较罕见的词替代了一个平常的词，使得这节诗变出彩，而其余则微不足道。埃斯库罗斯在他的悲剧《菲罗克忒忒斯》中是这样写的：

φαγέδαιναν <δ'> ἥ *μου σάρκας ἐσθίει ποδός*
(phagedaina d'he mou sarkas esthiei podos.)

φαγέδαιναν <δ'> ἥ *μου σάρκας ἐσθίει ποδός*
(phagedaina d'he mou sarkas esthiei podos.)

“The tumor which is eating the flesh of my foot.”

这肿块在吃着我脚上的肉

Euripides substitutes “*θοινᾶται* ” *(thoinatai*), “feasts on”, for “*ἐσθίει* ” *(esthiei*), “feeds on”. Again, in the line,

欧里庇得斯用“盛宴”代替了“吃”。又如：

> νῦν *δέ μ᾽ ἐὼν* ὀλίγος τε καὶ οὐτι*δανὸ*ς καὶ ἀεικής *(nun de m'eon oligos te kai outidanos kai aeikes),*

> νῦν *δέ μ᾽ ἐὼν* ὀλίγος τε καὶ οὐτι*δανὸ*ς καὶ ἀεικής *(nun de m'eon oligos te kai outidanos kai aeikes),*

> “Yet a small man, worthless and unseemly,”

> 仍然是个小人物，卑微而不合时宜

the difference will be felt if we substitute the common words,

我们用普通词替换来感受一下区别：

νῦν *δέ μ᾽ ἐὼν μικρός τε καὶ ἀσθενικὸς καὶ* ἀειδής *(nun de m'eon mikros te kai asthenikos kai aeides.)*

νῦν *δέ μ᾽ ἐὼν μικρός τε καὶ ἀσθενικὸς καὶ* ἀειδής *(nun de m'eon mikros te kai asthenikos kai aeides.)*

“Yet a little fellow, weak and ugly.”

仍然是个小家伙，又弱又丑

Or, if for the line,

或者，如果把这句诗

δίφρον ἀεικέλιον *καταθεὶς* ὀλίγην τε τράπεζαν *(diphron aeikelion katatheis oligen te trapezan),*

δίφρον ἀεικέλιον *καταθεὶς* ὀλίγην τε τράπεζαν *(diphron aeikelion katatheis oligen te trapezan),*

> “Setting an unseemly couch and a meager table,”
>
> 摆一张不体面的沙发和局促的桌子

we read,

改为：

> *δίφρον μοχθηρὸν καταθεὶς μικράν τε τράπεζαν (diphron mochtheron katatheis mikran te trapezan).*

> *δίφρον μοχθηρὸν καταθεὶς μικράν τε τράπεζαν (diphron mochtheron katatheis mikran te trapezan).*

> “Setting a wretched couch and a puny table.”
>
> 摆一张不像样的沙发和短小的桌子

Or, for “ἠιόνες *βοόωσιν* ” (*eiones booosin*), “*the sea shores roar* “, “ἠιόνες κράζουσιν” (*eiones krazousin*), “the sea shores screech”.

或者把“海岸在咆哮”改为“海岸在尖叫”。

Again, Ariphrades ridiculed the tragedians for using phrases which no one would employ in ordinary speech: for example, “*δωμάτων ἄπο* ” (*domaton apo*), “from the house away”, instead of “*ἀπὸ δωμάτων* “,(*apo domaton*), “away from the house”; “*σέθεν* ” (*sethen*), “*ἐγὼ δέ νιν* “, (*ego de nin*), “to thee, and I to him”; “*Ἀχιλλέως πέρι* ” (*Achilleos peri*), “Achilles about”, instead of “*περὶ Ἀχιλλέως* ” *(peri Achilleos*), “about Achilles”; and the like.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such phrases are not part of the current idiom that they give distinction to the style. This, however, he failed to see.

另外，欧里庇得斯还常讽刺悲剧演员使用口语中无人用的短语，因为他们在日常演讲中运用其他人不会用到的词。例如，用“离房屋远”而非“远离房屋”，用“汝之”“我娶伊”“阿喀琉斯周围”而非“围绕阿喀琉斯”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短语。正是由于这类短语不属于普通短语的范围，悲剧演员才赋予了它们独特的风格。然而，欧里庇得斯却未谙此道。

It is a great matter to observe propriety in these several modes of expression, as also in compound words, strange (or rare) words, and so forth. But the greatest thing by far is to have a command of metaphor. This alone cannot be imparted by another; it is the mark of genius, for to make good metaphors implies an eye for resemblances.

以上几种词，以及合成词，奇怪或罕见词等表达方式的恰当运用

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要能善用隐喻词。唯有这点是难以由别人传授学会的。善用隐喻表明了人的天赋，因为写出好的隐喻词说明有双发现事物相似处的眼睛。

Of the various kinds of words, the compound are best adapted to dithyrambs, rare words to heroic poetry, metaphors to iambic. In heroic poetry, indeed, all these varieties are serviceable. But in iambic verse, which reproduces, as far as may be, familiar speech, the most appropriate words are those which are found even in prose. These are the current or proper, the metaphorical, the ornamental.

在各种词中，合成词最适合酒神颂，罕见词最适合英雄诗，隐喻词最适合抑扬格诗。在英雄诗中，所有这些词都有用。但由于抑扬格诗大多表现的是耳熟能详的语句，最合适的词是那些常见于散文的词，即通用词或固有词，隐喻词和修饰词。

Concerning Tragedy and imitation by means of action this may suffice.

关于悲剧和用情节的模仿，我们谈得已经足够了。

Chapter 23

第二十三章

As to that poetic imitation which is narrative in form and employs a single meter, the plot manifestly ought, as in a tragedy, to be constructed on dramatic principles. It should have for its subject a single action, whole and complete, with a beginning, a middle, and an end. It will thus resemble a living organism in all its unity, and produce the pleasure proper to it. It will differ in structure from historical compositions, which of necessity present not a single action, but a single period, and all that happened within that period to one person or to many, little connected together as the events may be. For as the sea-fight at Salamis and the battle with the Carthaginians in Sicily took place at the same time, but did not tend to any one result, so in the sequence of events, one thing sometimes follows another, and yet no single result is thereby produced. Such is the practice, we may say, of most poets. Here again, then, as has been already observed, the transcendent excellence of Homer is manifest. He never attempts to make the whole war of Troy the subject of his poem, though that war had a beginning and an end. It would have been too vast a theme, and not easily embraced in a single view. If, again, he had kept it within moderate limits, it must have been over-complicated by the variety of the incidents. As it is, he detaches a single portion, and admits as episodes many events from the general story of the war—such as the Catalogue of the ships and others—thus diversifying the poem. All other poets take a single hero, a single period, or an action single indeed, but with a multiplicity of parts. Thus did the author of the *Cypria* and of the *Little Iliad* . For this

reason the *Iliad* and the *Odyssey* each furnish the subject of one tragedy, or, at most, of two; while the *Cypria* supplies materials for many, and the *Little Iliad* for eight—the *Award of the Arms* , the *Philoctetes* , the *Neoptolemus* , the *Eurypylus* , the *Mendicant Odysseus* , the *Laconian Women* , the *Fall of Ilium* , the *Departure of the Fleet* .

现在讨论采用叙述形式和单一韵律的诗的模仿。和悲剧一样，这样的诗的情节也应该按戏剧的原则建构，即情节的主题只有一个活动，一个完整和完成的，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活动。这样的情节就像一个活的、完整的生物，给人带来愉悦的感觉。诗的情节和历史作品的结构不一样，因为历史作品必定不是表现单一的活动，而是一个时期，以及这个时期内发生在一个人或许多人身上的所有事件，这些事件又少有关联。正如萨拉弥斯海战和西西里的卡耳刻冬战争几乎同时发生，但结果却互不影响。所以从事件发生的顺序看，一件事有时候接在另一件事后面发生，但并不因此有因果关系。大多诗人都这样写情节。如同前面所说，荷马的出类拔萃再次显现了出来。他从未想把整个特洛伊战争作为诗的主题，即便这个战争有开头也有结尾。因为这个主题太大而不能一览而尽，即使限制在适当的篇幅中，也会因各种事件而过于复杂难懂。事实上，荷马只是选取了战争的一个部分，而把战争故事中的许多事件作为插曲，例如他写的船的目录等，因此他的诗具有多样化。其他诗人也都是只写一个英雄，一个时期，或一个有许多部分的活动。例如《库普里亚》的作者和《小伊利亚特》的作者。因此《伊利亚特》或《奥德赛》只供一出，至多两出悲剧的主题。而《库普里亚》给多部悲剧提供题材，《小伊利亚特》则给八出悲剧提供了题材：《甲仗的评判》、《菲罗克忒忒斯》、《涅俄普托勒摩斯》、《欧律皮罗斯》、《伪装乞丐》、《拉开奈》、《伊利翁的陷落》和《归航》的题材，还可供一出《西农》和一出《特洛亚妇女》的题材。

Chapter 24

第二十四章

Again, Epic poetry must have as many kinds as Tragedy: it must be simple, or complex, or “ethical,” or “pathetic”. The parts also, with the exception of song and spectacle, are the same; for it requires Reversals of the Situation, Recognitions, and Scenes of Suffering. Moreover, the thoughts and the diction must be artistic. In all these respects Homer is our earliest and sufficient model. Indeed each of his poems has a twofold character. The *Iliad* is at once simple and “pathetic”, and the *Odyssey* complex (for Recognition scenes run through it), and at the same time “ethical”. Moreover, in diction and thought they are supreme.

再则，史诗的种类也应和悲剧的一样多，也应该有简单剧、复杂剧、道德剧和感伤剧。史诗的组成不包含歌曲和场景，除此之外与悲剧大致相同，因为史诗也要有情景反转、发现和苦难。而且，史诗的思想和措辞还要有艺术性。在所有这些方面，荷马是我们最早最好的典范。事实上，他的每首诗都有双重特征。例如，《伊利亚特》就是简单剧和感伤剧，《奥德赛》是复杂剧，因为有发现贯彻全剧，同时还是伦理剧。这两部作品中的措辞和思想也都是登峰造极的。

Epic poetry differs from Tragedy in the scale on which it is constructed, and in its meter. As regards scale or length, we have already laid down an adequate limi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must be capable of being brought within a single view. This condition will be satisfied by poems on a smaller scale than the old

epics, and answering in length to the group of tragedies presented at a single sitting.

史诗与悲剧在篇幅和韵律上都有区别。关于篇幅或长短，我们已经做了适当的限定：开头和结尾要能让人一览而尽。较小篇幅的诗比古老的史诗更容易满足这个条件，而且还相当于一次演出了一组悲剧。

Epic poetry has, however, a great—a special—capacity for enlarging its dimensions, and we can see the reason. In Tragedy we cannot imitate several lines of actions carried on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we must confine ourselves to the action on the stage and the part taken by the players. But in Epic poetry, owing to the narrative form, many events simultaneously transacted can be presented; and these, if relevant to the subject, add mass and dignity to the poem. The Epic has here an advantage, and one that conduces to grandeur of effect, to diverting the mind of the hearer, and relieving the story with varying episodes. For sameness of incident soon produces satiety, and makes tragedies fail on the stage.

史诗有很大的限度可以增加篇幅，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悲剧中我们无法一次同时模仿几个线索的活动，而只能把活动局限于舞台表演和演员的角色。但在史诗中，由于采用的是叙事的形式，可以同时描述许多同时发生的事件，如果这些事件都与主题相关，就会使史诗因篇幅增加而气势恢宏。史诗的这个优点能增加气势，使听众转移注意力，还能把史诗分解为各种各样的事件。因为千篇一律的事件会立即使人腻烦，舞台上上演的悲剧常常因此而失败。

As for the meter, the heroic measure has proved its fitness by hexameter test of experience. If a narrative poem in any other meter or in many meters were now composed, it would be found incongruous. For of all measures the heroic is the stateliest and the most massive; and hence it most readily admits rare words and metaphors, which is another point in which the narrative form of imitation stands alone. On the other hand, the iambic and the trochaic tetrameter are stirring measures, the latter being akin to dancing, the former expressive of action. Still more absurd would it be to mix together different meters, as was done by Chaeremon. Hence no one has ever composed a poem on a great scale in any other than heroic verse. Nature herself, as we have said, teaches the choice of the proper measure.

关于韵律，通过六步格的经验证明史诗格律（英雄格）是最适合的。如果使用其他格律或使用我们现作的几种格律来写叙事诗的话，就会很不协调。因为在所有的格律中，史诗格(英雄格）是最庄严最厚重的，也是最适合使用罕见词或隐喻词的，这点让叙事形式的模仿独一无二。另一方面，抑扬格和抑扬格四音步是令人激情澎湃的格律，后者类似跳舞，前者让行动富有表现力。更荒唐的是把不同的韵律混合使用，就像开瑞蒙所做的那样。因此，目前还没人大量使用英雄诗体（史诗体）以外的格律来写长诗。正如我们说过的，叙事诗的本质教我们选择合适的格律。

Homer, admirable in all respects, has the special merit of being the only poet who rightly appreciates the part he should take himself. The poet should speak as little as possible in his own person, for it is not this that makes him an imitator. Other poets appear themselves upon the scene throughout, and imitate but little and rarely. Homer, after a few prefatory words, at once brings in a

man, or woman, or other personage; none of them wanting in characteristic qualities, but each with a character of his own.

荷马，在各方面都令人钦佩，是唯一真正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诗人。诗人应该尽可能不用自己的身份说话，因为这不会让他成为模仿者。而其他诗人则自始至终亲自出场，很少或偶尔模仿。荷马只简单几句前言后，就马上引入一个男人，或女人，或其他人物。这些人物都不乏典型的品质，但每个又都有自己的个性。

The element of the wonderful is required in Tragedy. The irrational, on which the wonderful depends for its chief effects, has wider scope in Epic poetry, because there the person acting is not seen. Thus, the pursuit of Hector would be ludicrous if placed upon the stage—the Greeks standing still and not joining in the pursuit, and Achilles waving them back. But in the Epic poem the absurdity passes unnoticed. Now the wonderful is pleasing, as may be inferred from the fact that every one tells a story with some addition of his knowing that his hearers like it. It is Homer who has chiefly taught other poets the art of telling lies skilfully. The secret of it lies in a fallacy. For, assuming that if one thing is or becomes, a second is or becomes, men imagine that, if the second is, the first likewise is or becomes. But this is a false inference. Hence, where the first thing is untrue, it is quite unnecessary, provided the second be true, to add that the first is or has become. For the mind, knowing the second to be true, falsely infers the truth of the first. There is an example of this in the Bath Scene of the *Odyssey* .

悲剧中需要有出人意料的因素。而非理性正是取得出人意料效果所依赖的因素，很适合用在史诗中，因为人物动作是看不到的。所

以，追逐赫克托耳的情景如果放在舞台上会很滑稽——希腊人站着不加入追逐，而阿喀琉斯还挥手示意他们回来。在史诗中，荒谬的事并不会引起注意。出人意料的事是大家喜欢的，这点可以从这样的事推断出来：每个人在讲述一件事的时候总喜欢加入自认为听者喜欢听的事。荷马就是这样一个主要教其他诗人说谎技巧的人，其秘诀就在于一个谬误。这个谬误就是人们会以为，如果一件事是或成为事实，第二件事也是或成为事实，人们就会猜想，如果第二件事是事实，那么第一件事也是或成为事实。但是这是个错误的推断。因此，第一件事不是事实，而第二件事是，就没必要补充说第一件事是或成为事实。因为如果知道第二件事是真的，人们就会错误地推断第一件事是真的。例如《奥德赛》中的沐浴的场景就是这样的推断。

Accordingly, the poet should prefer probable impossibilities to improbable possibilities. The tragic plot must not be composed of irrational parts. Everything irrational should, if possible, be excluded; or, at all events, it should lie outside the action of the play (as, in the *Oedipus* , the hero's ignorance as to the manner of Laius' death); not within the drama—as in the *Electra* , the messenger's account of the Pythian games; or, as in the *Mysians* , the man who has come from Tegea to Mysia and is still speechless. The plea that otherwise the plot would have been ruined, is ridiculous; such a plot should not in the first instance be constructed. But once the irrational has been introduced and an air of likelihood imparted to it, we must accept it in spite of the absurdity. Take even the irrational incidents in the *Odyssey* , where Odysseus is left upon the shore of Ithaca. How intolerable even these might have been would be apparent if an inferior poet were to treat the subject. As it is, the absurdity is veiled by the poetic charm with which the poet invests it.

因此，诗人应该更青睐可信的不可能，而不是不可信的可能。悲剧的情节不应该由不合理的部分组成。任何不合理的部分都应该尽量被排除，或无论如何也要置于戏剧表演以外（例如在《俄狄浦斯王》剧中，俄狄浦斯不知道拉伊俄斯是怎样死的）；而不该是在戏里，《厄勒克特拉》剧中信使传达皮托运动会的消息，或者像《密西亚人》剧中有人从忒革亚到密西亚，一路上没有说过一句话。那些说不这样就会破坏剧情的辩称是荒唐的，一开始就不该构建这种情节。但是一旦引入了不合理的事，还让这些事看似可能，虽然荒唐我们也必须接受。例如在《奥德赛》中不合理的事件里，俄底修斯被放在伊萨卡岛的岸上。显然，如果由一个拙劣的诗人来写，这个主题就会变得不能忍受。其实是由于荷马的修饰而使诗的魅力掩盖了这些荒谬。

The diction should be elaborated in the pauses of the action, where there is no expression of character or thought. For, conversely, character and thought are merely obscured by a diction that is over-brilliant

繁丽的措辞只适合在行动停顿时使用，因为这里不表现性格或思想。否则性格和思想会因过度华丽的言辞而模糊不清。

Chapter 25

第二十五章

With respect to critical difficulties and their solutions, the number and nature of the sources from which they may be drawn may be thus exhibited.

关于主要的困难和解决方法，其原因种类和本质，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点。

The poet being an imitator, like a painter or any other artist, must of necessity imitate one of three objects—things as they were or are, things as they are said or thought to be, or things as they ought to be. The vehicle of expression is language—either current terms or, it may be, rare words or metaphors. There are also many modifications of language, which we concede to the poets. Add to this, that the standard of correctness is not the same in poetry and politics, any more than in poetry and any other art. Within the art of poetry itself there are two kinds of faults—those which touch its essence, and those which are accidental. If a poet has chosen to imitate something, (but has imitated it incorrectly) through want of capacity, the error is inherent in the poetry. But if the failure is due to a wrong choice—if he has represented a horse as throwing out both his off legs at once, or introduced technical inaccuracies in medicine, for example, or in any other art—the error is not essential to the poetry. These are the points of view from which we should consider and answer the objections raised by the critics.

诗人作为模仿者，就像画家或其他艺术家一样，必然要模仿以下三个对象其中之一——过去或现在的事，传说中或人们相信的事情，或是应该有的事。这些模仿通过语言这个载体来表达，要么用通用语，要么用罕见词或隐喻词。还有很多语言的修改，供诗人使用。而且，诗和政治是否正确的衡量标准不一样，诗歌艺术和其他艺术的衡量标准也不一样。诗歌艺术的本身有两种错误，触及本质的错误和次要方面的错误。如果诗人决定要模仿，（但却模仿不对），由于能力欠缺而导致的错误属于诗内在的错误。但如果模仿失败是由于错误的选择，例如描写马同时迈出两条右腿，或介绍医药时出现技术错误，或者其他艺术方面出错，这些错误都不是诗歌本质的错误。这些观点我们要考虑在内并以此应对批评家提出的反对意见。

First as to matters which concern the poet's own art. If he describes the impossible, he is guilty of an error; but the error may be justified, if the end of the art be thereby attained (the end being that already mentioned), if, that is, the effect of this or any other part of the poem is thus rendered more striking. A case in point is the pursuit of Hector. If, however, the end might have been as well, or better, attained without violating the special rules of the poetic art, the error is not justified: for every kind of error should, if possible, be avoided.

首先是关于诗人自身的艺术。如果诗人描写了不可能发生的事，就会因为这样的错误而感到愧疚。但如果这个错误可证明是正当的，最终也取得了艺术效果（艺术效果前文已谈过）——那么这部分或整首诗的其他部分的描写会变得更令人震惊。一个恰当的例子是追逐赫克托耳。但是如果可以不违背诗歌艺术的情况下获得一样好，或更好的效果，那这个错误就是不正当的，因为要尽可能地避免犯任何错误。

Again, does the error touch the essentials of the poetic art, or some accident of it? For example, not to know that a hind has no horns is a less serious matter than to paint it inartistically.

再则，这个错误是触及诗歌艺术的本质，还是一些次要的错误？比方说，画出长着角的雌鹿，错误还不及画出没有艺术美感的鹿严重。

Further, if it be objected that the description is not true to fact, the poet may perhaps reply, “But the objects are as they ought to be”; just as Sophocles said that he drew men as they ought to be; Euripides, as they are. In this way the objection may be met. If, however, the representation be of neither kind, the poet may answer, “This is how men say the thing is.” This applies to tales about the gods. It may well be that these stories are not higher than fact nor yet true to fact: they are, very possibly, what Xenophanes says of them. But anyhow, “this is what is said”. Again, a description may be no better than the fact: “Still, it was the fact”; as in the passage about the arms: “Upright upon their butt-ends stood the spears.” This was the custom then, as it now is among the Illyrians.

其次，如果有人质疑诗人的描写不符实际，诗人可用回答，“这些事物本该就是这样的。”正像索福克勒斯所说，他按照人应有的样子来描写，欧里庇得斯则按照人原样来描写。这样就可以回答质疑了。如果上面两个说法都不行，诗人还可以回答说：“人们说事情就是这样的。”可以提关于神的传说。也许像塞诺法涅斯所说，这些故事既不高于事实，也不符合事实。但无论如何，“传说就是这样”。而

且，描写的也许还不如事实好，但“仍然是事实”；例如在写武器的段落中，“他们的矛，尾端向下，直竖立在地上”，那是当时的习惯，就像现在的伊吕里斯人的习惯一样。

Again, in examining whether what has been said or done by some one is poetically right or not, we must not look merely to the particular act or saying, and ask whether it is poetically good or bad. We must also consider by whom it is said or done, to whom, when, by what means, or for what end; whether, for instance, it be to secure a greater good, or avert a greater evil.

检验所说所做是否符合诗歌的标准，不能只依据某个特定的行为或言语来判断。还要考虑是谁说的或做的，对谁，通过什么方式，或为了什么目的，例如是否为了更好地趋利避害。

Other difficulties may be resolved by due regard to the usage of language. We may note a rare word, as in οὐρῆας μὲν πρῶτον (*oureas men proton*), “the mules first (he killed)“, where the poet perhaps employs οὐρῆας (*oureas*) not in the sense of mules, but of sentinels. So, again, of Dolon: “ill-favored indeed he was to look upon”. It is not meant that his body was ill-shaped but that his face was ugly; for the Cretans use the word εὐειδὲς (*eueides*), “well-flavored” to denote a fair face. Again, “ζωρότερον δὲ κέραιε (*zoroteron de keraie*)“, “mix the drink livelier” does not mean “mix it stronger” as for hard drinkers, but “mix it quicker”.

其他需要解决的困难是诗歌中使用的语言。我们可能会注意这样的罕见词，“oureas men proton,” “the mules first (he killed),”诗人

用“oureas”一词意思不是“mules”，而是“sentinels”(哨兵)。又如，描写多伦的句子“他看起来真难看”。这里并不是说他的身体形态不好，而是他的脸不好看，因为克里特人用“eueides”，“美貌”一词来表示好看的脸。又如“zoroteron de keraie”，“把酒混合起来更好些”的意思不是“兑得更猛些”，对于饮酒海量的人，是说“兑得快些”。

Sometimes an expression is metaphorical, as “Now all gods and men were sleeping through the nigh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poet says: “Often indeed as he turned his gaze to the Trojan plain, he marveled at the sound of flutes and pipes.” “All” is here used metaphorically for “many,” all being a species of many. So in the verse, “alone she hath no part…” οἴη (*oie*), “alone” is metaphorical; for the best known may be called the only one.

有时语句是隐喻的。例如“现在所有的神和人都整晚睡觉”，但诗人同时还说，“每当他眺望着特洛伊平原，就对长笛和管乐的声音而感到惊奇。这里的“全部”也是隐喻词，代替了“许多”，因为“全部”是许多的一种。所以在诗中，“只有她还没有”中的“唯一”是个隐喻词，因为最著名的可以被称为唯一的。

Again, the solution may depend upon accent or breathing. Thus Hippias of Thasos solved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lines, *δίδομεν δέ* οἱ εὖχος ἀρέσθαι' καὶ 'τὸ *μὲν* οὖ καταπύθεται ὄμβρῳ (*didomen (didomen) de hoi, and to men hou (ou) kataputhetai ombro*).

解决的方法还可以依靠语音或气息。像塔索斯人希庇阿斯那样解答关于诗的疑难：“didomen (didomen) de hoi,”和“to men hou (ou) kataputhetai ombro”。

Or again, the question may be solved by punctuation, as in Empedocles: “Of a sudden things became mortal that before had learnt to be immortal, and things unmixed before mixed.”

或者是用标点符号来解答问题，就像恩培多克勒的诗中所写：“突然间，原来不朽神仙变成了凡人，混杂的变成了纯粹的。”

Or again, by ambiguity of meaning, as παρῴχηκεν δὲ πλέω νύξ (*parocheken de pleo nux*), where the word πλέω (*pleo*) is ambiguous.

或通过含糊的字义来回答质疑。例如“parocheken de pleonux”中的“pleo”的意思就是模棱两可的。

Or by the usage of language. Thus any mixed drink is called οἶνος (*oinos*), “wine”. Hence Ganymede is said “to pour the wine to Zeus”, though the gods do not drink wine. So too workers in iron are called χαλκεῖας (*chalkeias*), or “workers in bronze”. This, however, may also be taken as a metaphor.

或通过语言的使用。例如，任何混合的饮料都叫“oinos”，即“酒”。所以伽倪墨得斯被说是“给宙斯倒酒”，虽然神仙并不喝酒。从事铁艺工作的工人们被称为“chalkes”，或“铜匠”。然而这也可看作是隐喻。

Again, when a word seems to involve some inconsistency of meaning, we should consider how many senses it may bear in the particular passage. For example: “there was stayed the spear of bronze”— we should ask in how many ways we may take “being checked there”. The true mode of interpretation is the precise opposite of what Glaucon mentions. Critics, he says, jump at certain groundless conclusions; they pass adverse judgement and then proceed to reason on it; and, assuming that the poet has said whatever they happen to think, find fault if a thing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ir own fancy. The question about Icarius has been treated in this fashion. The critics imagine he was a Lacedaemonian. They think it strange, therefore, that Telemachus should not have met him when he went to Lacedaemon. But the Cephallenian story may perhaps be the true one. They allege that Odysseus took a wife from among themselves, and that her father was Icadius, not Icarius. It is merely a mistake, then, that gives plausibility to the objection.

当一个词的意思和上下文的意思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这个词在文章中有那些意思。例如“那里竖立着一支铜矛”。我们应该考虑“being checked there(正在被查）”可以有多少种意思。理解的方法和格劳孔所说的恰恰相反，他说，有的批评家的结论是没有依据的，他们先是设定了对诗人不利的判断，然后又从这样的判断出发进行推理。而且，批评家们还认为，诗人应该说出任何批评家所恰好想到的，而那些和批评家幻想中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就各种挑毛病。关于伊卡里俄斯的问题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了。批评家把这个人想象成是古代斯巴达人，所以他们觉得忒勒马科斯到古斯巴达居然没和他见面很奇怪。但是刻法勒尼亚人的故事也许是真实的。他们说俄底修斯娶他们的族人为妻，这女人的父亲叫伊卡狄俄斯，不叫伊卡里俄斯。其实这只是一个错误，让质疑看似合理。

In general, the impossible must be justified by reference to artistic requirements, or to the higher reality, or to received opinion. With respec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rt, a probable impossibility is to be preferred to a thing improbable and yet possible. Again, it may be impossible that there should be men such as Zeuxis painted. “Yes,” we say, “but the impossible is the higher thing; for the ideal type must surpass the reality.” To justify the irrational, we appeal to what is commonly said to be. In addition to which, we urge that the irrational sometimes does not violate reason; just as “it is probable that a thing may happen contrary to probability.”

通常，不可能的事要参照艺术的需要，或为了高于实际，或由于已接受的看法，来证明其合理。关于艺术需要，可信的不可能要比不可信的可能要更受欢迎。也许像宙克西斯所画人物的人，不可能存在。“没错，”我们说，“但不可能的事是更高级的事，因为理想的类型要超过现实。”为了证明这种不合理的事是合理的，我们用了人们通常说是对的事。而且我们也极力主张不可能的事有时不见得违背道理，正如“一件事可能有悖于可能性发生”。

Things that sound contradictory should be examined by the same rules as in dialectical refutation—whether the same thing is meant, in the same relation, and in the same sense. We should therefore solve the question by reference to what the poet says himself, or to what is tacitly assumed by a person of intelligence.

看似矛盾的事情应该用辩证中的辩驳来分析，分析是否指同一件事，或同一种关系，还是同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参照诗人自己所说的，或者参照智慧的人所理解的那样来解决问题。

The element of the irrational, and, similarly, depravity of character, are justly censured when there is no inner necessity for introducing them. Such is the irrational element in the introduction of *Aegeus* by Euripides and the badness of Menelaus in the *Orestes* .

不合理的因素以及人物的堕落，假如是没必要的，就应当受到指责。例如欧里庇得斯的《埃勾斯》的开头和在《俄瑞斯忒斯》中写的墨涅拉俄斯的坏都是不合理因素。

Thus, there are five sources from which critical objections are drawn. Things are censured either as impossible, or irrational, or morally hurtful, or contradictory, or contrary to artistic correctness. The answers should be sought under the twelve heads above mentioned.

因此，批评一般源于五个方面，即那些被批评的事有不可能的事，不合理的事，伤害道德的事，矛盾的事，或与艺术审美相反的事。而应对这些指责的方法就在以上谈到的十二点。

Chapter 26

第二十六章

The question may be raised whether the Epic or Tragic mode of imitation is the higher. If the more refined art is the higher, and the more refined in every case is that which appeals to the better sort of audience, the art which imitates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is manifestly most unrefined. The audience is supposed to be too dull to comprehend unless something of their own is thrown by the performers, who therefore indulge in restless movements. Bad flute-players twist and twirl, if they have to represent “the quoit-throw”, or hustle the coryphaeus when they perform the Scylla. Tragedy, it is said, has this same defect. We may compare the opinion that the older actors entertained of their successors. Mynniscus used to call Callippides “ape” on account of the extravagance of his action, and the same view was held of Pindarus. Tragic art, then, as a whole, stands to Epic in the same relation as the younger to the elder actors. So we are told that Epic poetry is addressed to a cultivated audience, who do not need gesture; Tragedy, to an inferior public. Being then unrefined, it is evidently the lower of the two.

也许会有人问说史诗和悲剧的模仿形式中，哪个更高。如果说艺术越高雅就越高，而越高雅的艺术所吸引的观众越好，那么模仿对象无所不包的艺术显然是最庸俗的。表演者认为观众看不明白表演的意思，除非他们自己补充一些，这就是为什么表演者要加上各种动作。例如一个拙劣的长笛表演者，表演时扭来转去的，像在表演抛掷铁环，或是在表演斯库拉的时候推拉着主唱。据说悲剧也有这样的问题，就像前辈演员眼中的后辈演员。明尼斯科斯时常称呼卡利庇得斯

作“类人猿”，因为他的表演动作过多了。品达也同样遭到类似的批评。总体而言，悲剧和史诗的关系就像年轻演员和老演员的关系一样。所以有人说，史诗适合有教养的观众欣赏，因为他们不需要太多动作。而悲剧是给比较差的观众看的。作为比较庸俗的一方，悲剧显然是二者中更低的那个。

Now,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censure attaches not to the poetic but to the histrionic art; for gesticulation may be equally overdone in epic recitation, as by Sosistratus, or in lyrical competition, as by Mnasitheus the Opuntian. Next, all action is not to be condemned—any more than all dancing—but only that of bad performers. Such was the fault found in Callippides, as also in others of our own day, who are censured for representing degraded women. Again, Tragedy like Epic poetry produces its effect even without action; it reveals its power by mere reading. If, then, in all other respects it is superior, this fault, we say, is not inherent in it.

那么首先，这种指责与诗人无关，而与表演艺术有关。因为史诗朗诵者也可能会有过多的动作，索西斯特剌托斯就是这样；在抒情诗比赛中，俄普斯人谟那西忒俄斯也是这样。但是也不能责备所有的动作，和舞蹈一样，只能责备拙劣的舞蹈表演。这就是批评家们对卡利庇得斯，以及对其他我们时代表现堕落女人的诗人的指责。再则，悲剧和史诗一样，可以不靠动作，仅仅通过阅读来产生艺术效果。如果从其他各方面看，悲剧都有优势，那么这个并不是悲剧内在的错误。

And superior it is, because it has the epic elements—it may even use the epic meter—with the music and spectacular effects as important accessories; and these produce the most vivid of pleasures. Further, it has vividness of impression in reading as well

as in representation. Moreover, the art attains its end within narrower limits for the concentrated effect is more pleasurable than one which is spread over a long time and so diluted. What, for example, would be the effect of the *Oedipus* of Sophocles, if it were cast into a form as long as the *Iliad* ? Once more, the Epic imitation has less unity; as is shown by this, that any Epic poem will furnish subjects for several tragedies. Thus if the story adopted by the poet has a strict unity, it must either be concisely told and appear truncated; or, if it conforms to the Epic canon of length, it must seem weak and watery. (Such length implies some loss of unity,) if, I mean, the poem is constructed out of several actions, like the *Iliad* and the *Odyssey* , which have many such parts, each with a certain magnitude of its own. Yet these poems are as perfect as possible in structure; each is, in the highest degree attainable, an imitation of a single action.

悲剧具有史诗的各种成分，包括韵律——以音乐和场景作为重要的附属装饰，给我们带来最生动的愉悦。而且，从阅读中也能和从表演中一样体验到悲剧的生动效果。而且，在短时间内就有结局的悲剧所获得的集中效应，比剧情散落于长时间的悲剧所带来的愉悦感要强。例如，如果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拉到《伊利亚特》那样长，会是什么效果呢？再则，史诗的模仿不那么有统一性，由一部史诗可以给几部悲剧提供素材就可证明。所以如果诗人要改写的故事是有统一性的，那就必须把故事讲述得简单而且要有所删减；如果要写成符合史诗的长度，故事必然显得松散拖沓，因为这样的长度削弱了统一性。如果一首诗是有几个活动组成，例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就有很多这种活动，每个活动都占有一定的长度。但这些诗的结构却几乎完美，每首诗都是对所模仿的一个行动最高水平。

If, then, tragedy is superior to Epic poetry in all these respects,

and, moreover, fulfills its specific function better as an art—for each art ought to produce, not any chance pleasure, but the pleasure proper to it, as already stated—it plainly follows that tragedy is the higher art, as attaining its end more perfectly.

如同常说的那样，每种艺术都应该产生出恰当的愉悦，而不是碰巧的愉悦。那么，如果悲剧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优于史诗，而且作为一种艺术悲剧获得了更好的效果。悲剧显然是比较高的艺术，因为获得的效果更完美。

Thus much may suffice concerning Tragic and Epic poetry in general; their several kinds and parts, with the number of each and their differences; the causes that make a poem good or bad; the objections of the critics and the answers to these objections.

因此，关于悲剧和史诗的问题就大体谈够了，包括悲剧和史诗的几个类型和组成部分，每部分的数量和差异，决定诗优劣的原因，批评家们的指责以及对他们的回答等。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Philosophy of Style

式样哲学

Herbert Spencer

赫伯特·斯宾塞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式样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Style

赫伯特·斯宾塞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art I Causes of Force in Language Which Depend Upon Economy of the Mental Energies 第一章　语言有力的原因在于脑力的节省
- Part II Causes of Force in Language Which Depend Upon Economy of the Mental Sensibilities 第二章　语言有力的原因在于节省大脑感知力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art I Causes of Force in Language Which Depend Upon Economy of the Mental Energies

第一章　语言有力的原因在于脑力的节省

i. The Principle of Economy

第一节　经济原则

Sec. 1. Commenting on the seeming incongruity between his father's argumentative powers and his ignorance of formal logic, Tristram Shandy says:—“It was a matter of just wonder with my worthy tutor, and two or three fellows of that learned society, that a man who knew not so much as the names of his tools, should be able to work after that fashion with them.” Sterne's intended implication that a knowledge of the principles of reasoning neither makes, nor is essential to, a good reasoner, is doubtless true. Thus, too, is it with grammar. As Dr. Latham, condemning the usual school-drill in Lindley Murray, rightly remarks: “Gross vulgarity is a fault to be prevented; but the proper prevention is to be got from habit—not rules.” Similarly, there can be little question that good composition is far less dependent upon acquaintance with its laws, than upon practice and natural aptitude. A clear head, a quick imagination, and a sensitive ear, will go far towards making all rhetorical precepts needless. He who daily hears and reads well-framed sentences, will naturally more or less tend to use similar ones. And where there exists any mental idiosyncrasy—where there is a deficient verbal memory, or an inadequate sense of logical dependence, or but little perception of order, or a lack of constructive ingenuity; no amount of instruction will remedy the defect. Nevertheless, some practical result may be expected from a

familiarity with the principles of style. The endeavour to conform to laws may tell, though slowly. And if in no other way, yet, as facilitating revision, a knowledge of the thing to be achieved—a clear idea of what constitutes a beauty, and what a blemish—cannot fail to be of service.

（1）特里斯特拉姆·项狄的父亲能言善辩却不懂形式逻辑。在评论这个似乎矛盾的现象时，项狄说："我这位可敬的家庭教师，还有他学术团体里的其他两三位同仁，连自己使用的工具是什么都不知道，竟然还能效仿着使用它——这真是个奇迹。"斯特恩的言下之意是，了解辩论规则未必造就优秀辩者，优秀辩者亦未必需要通晓辩论原则。这一观点毋庸置疑。在语法上同样如此。诚如莱瑟姆博士在批评林德利·默里的学校日常练习时，恰如其分地评论道："粗言鄙语是个应该预防的错误；但防治之法，在于培养习惯而非制定规则。"同样，美文佳作更多倚赖的是实践与天资，而非通晓写作法则。清晰的头脑、敏捷的思维、灵敏的耳朵，几乎让所有修辞手法显得多余。每天耳濡目染优美语句，自然会或多或少学着运用类似语句。倘若智力上有某种独癖，比如语言记忆有欠缺，又或逻辑思维不清晰，又或条理顺序性差，又或建设性才智缺乏；那么，再多教导也无法弥补这些缺陷。然而，熟悉文体原则却有望产生一些实际效果。这一过程尽管漫长，但是努力遵从法则一定会显现成效。如果润饰文章别无他法，那么，获取明辨美丑的知识则大有裨益。

Sec. 2. No general theory of expression seems yet to have been enunciated. The maxims contained in works on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 are presented in an unorganized form. Standing as isolated dogmas—as empirical generalizations, they are neither so clearly apprehended, nor so much respected, as they would be were they deduced from some simple first principle. We are told that "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 We hear styles condemned as verbose or

involved. Blair says that every needless part of a sentence “interrupts the description and clogs the image;” and again, that “long sentences fatigue the reader's attention.” It is remarked by Lord Kaimes, that “to give the utmost force to a period, it ought, if possible, to be closed with that word which makes the greatest figure.” That parentheses should be avoided and that Saxon words should be used in preference to those of Latin origin, are established precepts. But, however influential the truths thus dogmatically embodied, they would be much more influential if reduced to something like scientific ordination. In this, as in other cases, conviction will be greatly strengthened when we understand the why. And we may be sure that a comprehension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 from which the rules of composition result, will not only bring them home to us with greater force, but will discover to us other rules of like origin.

（2）关于表达，目前似乎尚无清晰的通论。那些关于文章与修辞的著述虽蕴含箴言却不够系统。诸多散乱的论述，或为孤立的教义，或为经验主义的概括，不像是从简单、基本的原则中演绎而来的，既不为人们所清楚地理解，亦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常言道：“言以简为贵。”常有文体被指累赘繁冗或晦涩难懂。布莱尔说，句子的每项赘余部分都会“干扰描写、破坏意象”，而且，“冗长句子会涣散读者的注意力”。凯姆斯勋爵有言：“要使句号最为有力，倘若可能，就得用能产生最生动意象的词语结束全句。”不用括号，优先使用撒克逊词汇而非拉丁源词汇，实乃定规。然而，无论这些定规在教义上蕴含多么富有影响力的真理，倘若将它们精简为类似于科学排序法的形式，它们的影响力则会更强。这和我们在其他情形中一样，当我们知其所以然，信心便会倍增。我们或许可以确信，对衍生出写作规则的普遍原则加以了解，不仅会让我们更为熟稔这些规则，还将有助我们发现与之同源的其他规则。

Sec. 3. On seeking for some clue to the law underlying these current maxims, we may see shadowed forth in many of them,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zing the reader's or hearer's attention, to so present ideas that they may be apprehended with the least possible mental effort, is the desideratum towards which most of the rules above quoted point. When we condemn writing that is wordy, or confused, or intricate—when we praise this style as easy, and blame that as fatiguing, w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assume this desideratum as our standard of judgment. Regarding language as an apparatus of symbols for the conveyance of thought, we may say that, as in a mechanical apparatus, the more simple and the better arranged its parts, the greater will be the effect produced. In either case, whatever force is absorbed by the machine is deducted from the result. A reader or listener has at each moment but a limited amount of mental power available. To recognize and interpret the symbols presented to him, requires part of this power; to arrange and combine the images suggested requires a further part; and only that part which remains can be used for realizing the thought conveyed. Hence, the more time and attention it takes to receive and understand each sentence, the less time and attention can be given to the contained idea; and the less vividly will that idea be conceived.

（3）在探索目前这些箴言所蕴含的法则时，我们或许已经洞察到，许多准则中所暗示的节省读者或听众注意力的重要性。这样表达有助于读者动用最少的脑力去理解所表达的意蕴。这便是上文所引的大多规则所渴求达到的目标。当我们批评一篇文章或冗长、或歧义、或难解时，当我们称赞这一文体流畅、批评那一文体晦涩时，已经有意无意在把这一目标视作评判标准了。倘若把语言视为思想表达的工具，我们可以说，就像机械装置中的部件一样，其组合得越简单、越协调，就会越高效。在以上两种情况中，机器无论损耗什么样的力，

均会影响最后的结果。读者和听众在视听过程中可动用的脑力是很有限的。识别和解读眼前呈现文字需要耗费部分脑力，排列和组合这些文字所暗示的意象亦需耗费部分脑力，只有剩下的那部分脑力才能被用来理解文字所传达的思想。因此，接收和理解每个句子所耗费的时间和注意力越多，能用来理解该句子所含思想的时间和注意力就越少，而且该思想理解传递起来也越不真实。

Sec. 4. How truly language must be regarded as a hindrance to thought, though the necessary instrument of it, we shall clearly perceive on remembering the comparative force with which simple ideas are communicated by signs. To say, “Leave the room,” is less expressive than to point to the door. Placing a finger on the lips is more forcible than whispering, “Do not speak.” A beck of the hand is better than, “Come here.” No phrase can convey the idea of surprise so vividly as opening the eyes and raising the eyebrows. A shrug of the shoulders would lose much by translation into words. Again, it may be remarked that when oral language is employed, the strongest effects are produced by interjections, which condense entire sentences into syllables. And in other cases, where custom allows us to express thoughts by single words, as in *Beware, Heigho, Fudge,* much force would be lost by expanding them into specific propositions. Hence, carrying out the metaphor that language is the vehicle of thought, there seems reason to think that in all cases the friction and inertia of the vehicle deduct from its efficiency; and that in composition, the chief, if not the sole thing to be done, is, to reduce this friction and inertia to the smallest possible amount. Let us then inquire whether economy of the recipient's attention is not the secret of effect, alike in the right choice and collocation of words, in the best arrangement of clauses in a sentence, in the proper order of its principal and subordinate propositions, in the judicious use of simile, metaphor, and other figures of speech, and

even in the rhythmical sequence of syllables.

（4）尽管语言是思维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它亦是思维的阻碍。回想一下手势在传达简单思想方面的力量，对比之下，就不难领会这一点。说“出去”远不及指着房门那样达意；用手指触唇，比悄声说“别说话”更有效；招手示意比说“过来”效果更佳；没有哪个词组比瞪大双眼、高扬双眉更能生动地表现出惊讶之情；一个耸肩，若转换成言语，定会丧失许多表现力。或许又有人会说，口语中最强烈的情感是由叹词表现出来的，它们把全句浓缩成几个音节。而且在表达习惯允许的情况下，人们用单个词语表达思想，比如“当心”、“嗨”、“胡说”，若把这些词语扩展成详细的描述，那么他们的表现力也就丧失殆尽了。因此，在“兑现”“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这一暗喻时，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该载体在任何情况下产生的传递损耗和惯性，都会降低其表达效果。同时，写作时的首要任务，尽管不是唯一任务，便是将这传递损耗和惯性降到最低限度。接下来我们就来探究一下有效规划受众注意力有助于取得效果的奥秘，类似地，我们也会讨论其在词语的恰当搭配，句中从句与从句、主句与从句的最佳顺序安排，明喻、隐喻及其他修辞的巧妙使用，甚至是多音节的韵律序列中的运用。

ii. Economy in the Use of Words

第二节　用词简练

Sec. 5. The greater forcibleness of Saxon English, or rather non-Latin English, first claims our attention. The several special reasons assignable for this may all be reduced to the general reason—economy.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m is early association. A child's vocabulary is almost wholly Saxon. He says, I *have* , not I *possess* —I *wish* , not I *desire* ; he does not *reflect* , he *thinks* ; he does not beg for *amusement* , but for *play* ; he calls things *nice* or *nasty* , not

pleasant or *disagreeable* . The synonyms which he learns in after years, never become so closely, so organically connected with the ideas signified, as do these original words used in childhood; and hence the association remains less strong. But in what does a strong association between a word and an idea differ from a weak one? Simply in the greater ease and rapidity of the suggestive action. It can be in nothing else. Both of two words, if they be strictly synonymous, eventually call up the same image. The expression—It is *acid* , must in the end give rise to the same thought as—It is *sour* ; but because the term *acid* was learnt later in life, and has not been so often followed by the thought symbolized, it does not so readily arouse that thought as the term *sour* . If we remember how slowly and with what labour the appropriate ideas follow unfamiliar words in another language, and how increasing familiarity with such words brings greater rapidity and ease of comprehension; and if we consider that the same process must have gone on with the words of our mother tongue from childhood upwards, we shall clearly see that the earliest learnt and oftenest used words, will, other things equal, call up images with less loss of time and energy than their later learnt synonyms.

（5）撒克逊英语，更确切说是非拉丁系英语，拥有较强的表现力。这率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造成该现象的原因颇多，归根结底，便是“简练”。最重要的原因是早期联想。孩童所掌握的词汇几乎全为撒克逊英语。孩子会说“我有”，而非“我拥有”；他会说“我希望”而非“我渴望”；他会用“想”而不会用“思考”；他会说“玩”而不会说“娱乐”；他会说东西“好”或“坏”而不是用“令人愉快”或“令人不悦”。他后来所学的那些同义词远没他孩童时所用的那些原始词汇更能贴切而自然地表意，因此，联想效果减弱。词语与思想二者之间，怎样才算关联强，怎样又才算关联弱？简而言之，就是其含义能否被简单、快速地领悟。这是唯一的区别。两个词语如果绝对同义，它们最终唤起的

意象是相同的。“It is acid”一语，最终令人产生的联想或许与“It is sour”（它是酸的）相同，但由于“acid”这个词学得晚，而且它所代表的想法常常并不紧随其后，因此，“acid”一词不像“sour”那样能迅速引发与酸有关的联想。倘若我们还记得自己领会那些陌生的外语词所表达的概念有、多艰难，还能记起在熟悉了这些词后理解变得多快速、多容易，倘若我们考虑到自幼学习母语也是同样的过程，就会发现，与后来学到的同义词相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学得越早、使用越频繁的词，越能直接唤起我们脑中的意象。

Sec. 6. The further superiority possessed by Saxon English in its comparative brevity, obviously comes under the same generalization. If it be an advantage to express an idea in the smallest number of words, then will it be an advantage to express it in the smallest number of syllables. If circuitous phrases and needless expletives distract the attention and diminish the strength of the impression produced, then do surplus articulations do so. A certain effort, though commonly an inappreciable one, must be required to recognize every vowel and consonant. If, as all know, it is tiresome to listen to an indistinct speaker, or read a badly-written manuscript; and if, as we cannot doubt, the fatigue is a cumulative result of the attention needed to catch successive syllables; it follows that attention is in such cases absorbed by each syllable. And if this be true when the syllables are difficult of recognition, it will also be true, though in a less degree, when the recognition of them is easy. Hence, the shortness of Saxon words becomes a reason for their greater force. One qualification, however, must not be overlooked. A word which in itself embodie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idea to be conveyed, especially when that idea is an emotional one, may often with advantage be a polysyllabic word. Thus it seems more forcible to say, “It is *magnificent* ,” than “It is *grand* .” The word *vast* is not so powerful a one as *stupendous* .

Calling a thing *nasty* is not so effective as calling it *disgusting* .

（6）撒克逊英语所具备的相对简洁的先天优势，显然与我们归纳的结论异曲同工。假如用最少的词语表达思想是一种优势，那么，用最少的音节表达思想应该也是一种优势。倘若冗长词组和多余虚词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削弱意象的表现力，那么，多余的音节亦会如此。虽然不甚明显，但辨别每个元音和辅音均需耗费些许精力。众所周知，听口齿不清的人说话和翻阅书写潦草的手稿，都需要更多的注意力。注意力全用在捕捉连续的音节上，岂有不累之理？注意力此时被每个音节消耗殆尽。难辨的音节如此，易辨的音节亦如此，只是程度低些罢了。因此撒克逊英语的词语简短，就是其词语有表现力的原因之一。不过，有一项限定条件不容忽视。一个单词，若它本身包含着所要表达的思想的最重要部分，尤其是这思想涉及情感时，那它最好是个多音节词。因此，说“it is magnificent”（它很宏伟）比说“it is grand”更有力，“vast”一词就不若“stupendous”（巨大）更有威力，形容某物“nasty”不如用“disgusting”（令人生厌）更有效。

Sec. 7. There seem to be several causes for this exceptional superiority of certain long words. We may ascribe it partly to the fact that a voluminous, mouth-filling epithet is, by its very size, suggestive of largeness or strength; witness the immense pomposity of sesquipedalian verbiage: and when great power or intensity has to be suggested, this association of ideas aids the effect. A further cause may be that a word of several syllables admits of more emphatic articulation; and as emphatic articulation is a sign of emotion, the unusual impressiveness of the thing named is implied by it. Yet another cause is that a long word (of which the latter syllables are generally inferred as soon as the first are spoken) allows the hearer's consciousness a longer time to dwell upon the quality predicated; and where, as in the above cases, it is to this

predicated quality that the entire attention is called, an advantage results from keeping it before the mind for an appreciable time. The reasons which we have given for preferring short words evidently do not hold here. So that to make our generalization quite correct we must say, that while in certain sentences expressing strong feeling, the word which more especially implies that feeling may often with advantage be a many-syllabled or Latin one; in the immense majority of cases, each word serving but as a step to the idea embodied by the whole sentence, should, if possible, be a one-syllabled or Saxon one.

（7）某些长词有这一特别优势，也是有一些原因的。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结为，冗长的词汇从长度上能显示出其规模之大和力量之强；在需要暗示巨大力量或紧张氛围时使用如此繁杂的多音节的冗长词汇，其引发的意义联想有助于加强表达效果。另一深层原因，或许是一个多音节词会有更多的强调发音，正因强调发音突显了情感，其所述之物留给人的非同寻常的印象也就包含其中了。还有一原因是，长词（听到其前部音节往往可推断出其后部音节）能够给听众较长的时间去揣摩自己所要表达的含义；诚如上述某些情况，正因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理解所述含义上，其好处在于，能将所述意象在脑中留有更长时间。我们前面所列的倾向于选用简短词汇的理由，显然有违此例。因此，为使概括准确无误，我们应该这样说，在表达强烈情感的句子中，那些尤为体现情感的词语，最好选用多音节词或拉丁词；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些体现整句观点的词语，则尽可能选用单音节词或撒克逊英语词。

Sec. 8. Once more, that frequent cause of strength in Saxon and other primitive words-their imitative character may be similarly resolved into the more general cause. Both those directly imitative, as *splash, bang, whiz, roar* , &c., and those analogically imitative, as

rough, smooth, keen, blunt, thin, hard, crag , &c., have a greater or less likeness to the things symbolized; and by making on the senses impressions allied to the ideas to be called up, they save part of the effort needed to call up such ideas, and leave more attention for the ideas themselves.

（8）只不过，撒克逊英语和其他原始词语之所以有力，往往是由于它们的模仿性特征，这一常见原因也可以归结为前文所述的共同原因。直接的模仿性词语，如“splash”（溅湿）、“bang”（砰然巨响）、“whiz”（沙沙作声）、“roar”（轰鸣），和类似的模仿性词语如“rough”（粗糙）、“smooth”（平滑）、“keen”（敏锐）、“blunt”（迟钝）、“thin”（薄）、“hard”（硬）、“crag”（陡）等，与它们所代表的现象多少有些类似；它们为感官建立了与所唤起的意象有关联的想象，节省了唤起这些意象需做的部分努力，让人能有更多的精力关注意象本身。

Sec. 9. The economy of the recipient's mental energy, into which are thus resolvable the several causes of the strength of Saxon English, may equally be traced in the superiority of specific over generic words. That concrete terms produce more vivid impressions than abstract ones, and should, when possible, be used instead, is a thorough maxim of composition. As Dr. Campbell says, “The more general the terms are, the picture is the fainter; the more special they are, 'tis the brighter.” We should avoid such a sentence as:—“In proportion as the manners, customs, and amusements of a nation are cruel and barbarous, the regulations of their penal code will be severe.” And in place of it we should write:—“In proportion as men delight in battles, bull-fights, and combats of gladiators, will they punish by hanging, burning, and the rack.”

（9）撒克逊英语之所以有力，还在于它节省受众的脑力，这同样可以从具体词较之笼统词的优势中追溯出来。具体词语给人的印象比抽象词语更为形象，倘若可以，应尽量用具体词语代替抽象词语，此乃写作之箴言。诚如坎贝尔博士所言："词语越笼统，唤起的想象越模糊；词语越具体，唤起的想象越清晰。"我们应在作文中避免使用这样的句子："一个礼仪、风俗和娱乐方式野蛮而原始的民族，其刑法制度必然严厉。"相反，我们应当这样描写："好战、喜欢斗牛和角斗的族群，会用绞刑、火刑和肢解的方式作为刑罚。"

Sec. 10. This superiority of specific expressions is clearly due to a saving of the effort required to translate words into thoughts. As we do not think in generals but in particulars—as, whenever any class of things is referred to, we represent it to ourselves by calling to mind individual members of it; it follows that when an abstract word is used, the bearer or reader has to choose from his stock of images, one or more, by which he may figure to himself the genus mentioned. In doing this, some delay must arise some force be expended; and if, by employing a specific term, an appropriate image can be at once suggested, an economy is achieved, and a more vivid impression produced.

（10）显然，这番具体表述的优势，在于它节省了读者的脑力，读者不必费心斟字酌句。正因我们并非是笼统思考而是具体思考，无论何时提及一类事物，我们大脑中唤起的是此类事物中具体的个体形象。因此，使用抽象词语时，使用者或读者需从自己大脑中储存的形象中选取一个或多个，以此来领会所提及的彼类事物。这一过程中的延迟会耗费些精力，而运用具体词语则能立即唤起确切意象，此番节省，会在受众脑海中留下更为生动的印象。

iii. The Principle of Economy Applied to Sentences

第三节　句子中的经济原则

Sec. 11. Turning now from the choice of words to their sequence, we shall find the same general principle hold good. We have a priori reasons for believing that in every sentence there is some one order of words more effective than any other; and that this order is the one which presents the elements of the proposition in the succession in which they may be most readily put together. As in a narrative, the events should be stated in such sequence that the mind may not have to go backwards and forwards in order to rightly connect them; as in a group of sentences, the arrangement should be such, that each of them may be understood as it comes, without waiting for subsequent ones; so in every sentence, the sequence of words should be that which suggests the constituents of the thought in the order most convenient for the building up that thought. Duly to enforce this truth, and to prepare the way for applications of it, we must briefly inquire into the mental act by which the meaning of a series of words is apprehended.

（11）现在我们从词的选择转向句中词的顺序，会发现该原则同样适用。我们有理由相信，每个句子都含有一种较其他方式更为有效的词序，它以连续形式表现议题要素，其组合或许最为迅速。在记叙文中，我们陈述事件时不能让大脑为了正确联接事件而瞻前顾后；一组句子的排列应该是，人们一看到一句话就能够理解主要含义，无需等待其后面的句子；因此，每个句子中的词应以最方便构建思想的顺序来表现思想的组成部分。为恰当实施这一原则并为其实施排除障碍，我们有必要简略探究一下人的思维活动，人们正是通过思维活动才得以理解词语的意义的。

Sec. 12. We cannot more simply do this than by considering the proper collocation of the substantive and adjective. Is it better to place the adjective before the substantive, or the substantive before the adjective? Ought we to say with the French—un *cheval noir* ; or to say as we do—a black horse? Probably, most persons of culture would decide that one order is as good as the other. Alive to the bias produced by habit, they would ascribe to that the preference they feel for our own form of expression. They would expect those educated in the use of the opposite form to have an equal preference for that. And thus they would conclude that neither of these instinctive judgments is of any worth. There is, however, a philosophical ground for deciding in favour of the English custom. If "a horse black" be the arrangement, immediately on the utterance of the word "horse," there arises, or tends to arise, in the mind, a picture answering to that word; and as there has, been nothing to indicate what kind of horse, any image of a horse suggests itself. Very likely, however, the image will be that of a brown horse, brown horses being the most familiar. The result is that when the word "black" is added, a check is given to the process of thought. Either the picture of a brown horse already presented to the imagination has to be suppressed, and the picture of a black one summoned in its place; or else, if the picture of a brown horse be yet unformed, the tendency to form it has to be stopped. Whichever is the case, a certain amount of hindrance results. But if, on the other hand, "a black horse" be the expression used, no such mistake can be made. The word "black," indicating an abstract quality, arouses no definite idea. It simply prepares the mind for conceiving some object of that colour; and the attention is kept suspended until that object is known. If, then, by the precedence of the adjective, the idea is conveyed without liability to error, whereas the precedence of the substantive is apt to produce a misconception, it follows that the one gives the mind less trouble than the other, and

is therefore more forcible.

（12）做此探究，最简单莫过于斟酌一下名词和形容词的恰当搭配。是形容词置于名词前好，还是名词置于形容词前好？我们应该按照法语的表达方式说“un cheval noir”（一匹马黑）呢，还是按照我们的英语表达方式说“a black horse”（一匹黑马）呢？大多有文化的人或许会觉得两种次序不分高下。他们对习惯导致的偏见很敏感，把自己的偏好归因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他们会希望那些受过教育、采用相反表达方式的人也同样喜欢他们的表达方式。因此，他们认为，这两种直觉判断毫无价值。但偏好英式习惯有其哲学依据。如果按“一匹马黑”的顺序排列，听到“马”字，人脑中会马上唤起或将要唤起并回应“马”的形象；由于未暗示是什么马，任何与马有关的意象都会显现。然而，最可能显现的意象是一匹棕色马，因为棕色马最为常见。结果，当又听到“黑”字时，人们需要检索一下自己的思维过程。要么人们脑海中浮现的棕色马形象扼止，由此时唤起的黑色马形象取而代之；要么是在棕色马形象还未形成之时，人们就要终止构建棕色马形象的倾向了。无论以上何种情况，一定程度的阻碍都已产生。相反，若用“一匹黑马”表达，则不会产生这样的错误。“黑”字暗示了一种抽象特征，不唤起任何特定联想。它只会使人做好准备去构建那种颜色的东西；在还不知道这东西之前，人的注意力始终悬着。因此，形容词前置所表达的构想不易出错而名词性实词前置则容易造成误解，这就表明，一种表达方式比另一种表达方式更难给人脑制造麻烦，因而也就更为有力。

Sec. 13. Possibly it will be objected that the adjective and substantive come so close together, that practically they may be considered as uttered at the same moment; and that on hearing the phrase, “a horse black,” there is not time to imagine a wrongly-coloured horse before the word “black” follows to prevent it. It must be owned that it is not easy to decide by introspection

whether this is so or not. But there are facts collaterally implying that it is not. Our ability to anticipate the words yet unspoken is one of them. If the ideas of the hearer kept considerably behind the, expressions of the speaker, as the objection assumes, he could hardly foresee the end of a sentence by the time it was half delivered: yet this constantly happens. Were the supposition true, the mind, instead of anticipating, would be continually falling more and more in arrear. If the meanings of words are not realized as fast as the words are uttered, then the loss of time over each word must entail such an accumulation of delays as to leave a hearer entirely behind. But whether the force of these replies be or be not admitted, it will scarcely be denied that the right formation of a picture will be facilitated by presenting its elements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are wanted; even though the mind should do nothing until it has received them all.

（13）或许有人反对说，该形容词与名词紧密相连，人们其实会在听到的同时对它们作出反应。在听到“一匹马黑”时，听众在尚未听到“黑”字之前，还未来得及想象出其他颜色的马呢。我们必须承认，仅凭自我想象，很难断定情况是否如此。但有些事实间接暗示了情况并非如此。事实就是我们有预料尚未出口的词语的能力。按反对者的假定，听众的意象构建略滞后于说者的表述，听众不太可能在句子说到一半时就预料到句子的结尾，然而这样的情况却时有发生。如果反对者的假设正确，我们的大脑就不是在预测，而是陷入无休止的延误。词意若未在表达的第一时间被理解，那么，消耗在每个词语上的时间会使延误不断累积，导致听众的思想完全滞后。无论人们是否承认这些回应的力量，不可否认的是，按照人们所期望的顺序呈现图像所需的各个要素，有助于在脑海中形成确切的形象；即便大脑在接收到所有要素之前还无法处理和领会这些要素。

Sec. 14. What is here said respecting the succession of the adjective and substantive is obviously applicable, by change of terms, to the adverb and verb. And without further explanation, it will be manifest, that in the use of prepositions and other particles, most languages spontaneously conform with more or less completeness to this law.

（14）这里所讨论的形容词和名词的接续，若换成副词和动词，显然同样适用。而且不言自明的是，在介词和其他虚词的用法上，大多语言也或多或少遵从这一法则。

Sec. 15. On applying a like analysis to the larger divisions of a sentence, we find not only that the same principle holds good, but that the advantage of respecting it becomes marked. In the arrangement of predicate and subject, for example, we are at once shown that as the predicate determines the aspect under which the subject is to be conceived, it should be placed first; and the striking effect produced by so placing it becomes comprehensible. Take the often-quoted contrast between “Great is Diana of the Ephesians,” and “Diana of the Ephesians is great.” When the first arrangement is used, the utterance of the word “great” arouses those vague associations of an impressive nature with which it has been habitually connected; the imagination is prepared to clothe with high attributes whatever follows; and when the words, “Diana of the Ephesians,” are heard, all the appropriate imagery which can, on the instant, be summoned, is used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picture: the mind being thus led directly, and without error, to the intended impression. When, on the contrary, the reverse order is followed, the idea, “Diana of the Ephesians” is conceived with no special reference to greatness; and when the words “is great” are

added, the conception has to be remodelled: whence arises a loss of mental energy and a corresponding diminution of effect. The following verse from Coleridge's “Ancient Mariner,” though somewhat irregular in structure, well illustrates the same truth:

（15）将类似分析推而广之，用于更大层面的句子划分，我们发现，该原则不仅通用，而且其优势越发显著。比如，我们在排列谓语和主语时会察觉出，谓语决定了主语构建的基础，因此，将谓语前置，这样排列产生的强烈效果不言而喻。试对比以下两个常被引用的例子：“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阿”和“以弗所人的亚底米阿大哉”。在第一个例子中，以“大哉”一词开篇的排列顺序所激起的模糊联想，与它通常蕴含的显著特性相关。听众已在自己的想象中准备好赋予其后的事物以高级的属性；待听到“以弗所人的亚底米阿”时，那一刻能被唤起的一切恰当联想，都在进行意象构建：大脑因此被分毫不差地直接引向所期望的印象。反之，若用与之相反的排列语序，“以弗所人的亚底米阿”来表达时，该排列语序与“伟大”这一概念无特别关联；在添加“大哉”一词后，人们需要在脑中重新构建概念。脑力因此消耗，效果也相应减弱。下面节选的是柯勒律治《古舟子咏》中的诗节，尽管它的结构不太有规律，却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真理：

Alone, alone, all, all alone,

“我孤孤单单，

Alone on a wide, wide sea

独自一人困守着茫茫大海，

And never a saint took pity on

却没有一位天神可怜我，

My soul in agony.

痛苦塞满了心怀。”

Sec. 16. Of course the principle equally applies when the predicate is a verb or a participle. And as effect is gained by placing first all words indicating the quality, conduct or condition of the subject, it follows that the copula also should have precedence. It is true that the general habit of our language resists this arrangement of predicate, copula and subject; but we may readily find instances of the additional force gained by conforming to it. Thus, in the line from “Julius Caesar”

（16）当然，无论谓语是动词还是分词，该原则均适用。如果将所有提示主语的特征、行为和状况的词前置能取得效果，说明系动词同样应该前置。的确，一般情况下，按照我们的语言习惯，我们几乎不使用这种“谓语、系动词、主语”的排列语序，但我们很容易发现诸多因遵循该原则而表现力增强的例子。请看《尤利乌斯·凯撒》中的诗行：

Then burst his mighty heart,

“澎湃着他强大的心”，

priority is given to a word embodying both predicate and copula. In a passage contained in “The Battle of Flodden Field,” the like order is systematically employed with great effect:

这里着重强调的是既具有谓语功能又具有系动词功能的词。在《弗洛登战役》中，有一个片段系统运用了这一语序，效果显著：

The Border slogan rent the sky!

“边疆的口号响彻天空！

A Home! a Gordon! was the cry;

家园！英雄！这样疾呼；

Loud were the clanging blows:

咚咚锵锵的重击声震耳欲聋：

Advanced—forced back—now low, now high,

前进——后退一时低，一时高，

The pennon sunk and rose;

旗子落下又升起；

As bends the bark's mast in the gale

当轻舟的桅杆在狂风中弯曲，

When rent are rigging, shrouds and sail,

当索具、支索和风帆被撕破，

It wavered 'mid the foes.

它在敌人中间晃动。”

Sec. 17. Pursuing the principle yet further, it is obvious that for producing the greatest effect, not only should the main divisions of a sentence observe this sequence, but the subdivisions of these should be similarly arranged. In nearly all cases, the predicate is

accompanied by some limit or qualification, called its complement. Commonly, als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subject, which form its complement, have to be specified. And as these qualifications and circumstances must determine the mode in which the acts and things they belong to are conceived, precedence should be given to them. Lord Kaimes notices the fact that this order is preferable; though without giving the reason. He says:—“When a circumstance is plac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iod, or near the beginning, the transition from it to the principal subject is agreeable: it is like ascending or going upward.” A sentence arranged in illustration of this will be desirable. Here is one:—“Whatever it may be in theory, it is clear that in practice the French idea of liberty is—the right of every man to be master of the rest.”

（17）进一步探究该原则，显而易见，为产生最显著的效果，不仅句子的主要部分须遵循这一序列，次要部分亦须按照类似的顺序排列。几乎所有例子中的谓语都伴有限制或限定条件，我们将其称为补语。通常，主语所处的情景，即其补语，也需详细说明。因为这些限定条件和情形确定了它们所属行为和事物产出的模式，因此，应将其前置。凯姆斯勋爵发现这一顺序更为可取，但他未给出理由。他说：“当背景环境位于句首或靠近句首时，由它转向主语很合适：恰如不断上升或递进的情绪。”这里有一个句子的排列能说明该事实：“无论理论上如何，实际情形显然是，法国人对于自由的理解是人人皆为他者之主。”

Sec. 18. In this case, were the first two clauses, up to the word “I practice” inclusive, which qualify the subject, to be placed at the end instead of the beginning, much of the force would be lost; as thus:—“The French idea of liberty is—the right of every man to be master of the rest; in practice at least, if not in theory.”

（18）此例中，倘若前两个限定主语的分句——从开始到“实际情形显然是”——被置于句末而非句首，其表现力将会大大削弱。例如：“法国人对于自由的理解是，人人皆为他者之主，至少事实如此，即便它在理论上不成立。”

Sec. 19. Similarly with respect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ny fact is predicated. Observe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 the effect of putting them last:—“How immense would be the stimulus to progress, were the honour now given to wealth and title given exclusively to high achievements and intrinsic worth!”

（19）预测事实时的一些情形亦如此。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看看将它们后置的效果：“前进的刺激将会多么巨大，倘若把荣誉让与财富、把头衔毫无保留地让与卓越成就与内在价值！”

Sec. 20. And then observe the superior effect of putting them first:—“Were the honour now given to wealth and title given exclusively to high achievements and intrinsic worth, how immense would be the stimulus to progress!”

（20）再来看一下将它们前置效果会更好：“假如现在将荣誉让与财富、将头衔毫无保留地让与卓越成就与内在价值，前进的刺激将会多么巨大！”

Sec. 21. The effect of giving priority to the complement of the predicate, as well as the predicate itself, is finely displayed in the

opening of “Hyperion”:

（21）《海伯利安》的开篇完美体现了前置谓语补语及谓语本身所产生的效果：

Deep in the shady sadness of a vale

“在山谷背阴的悲伤深处，

Far sunken from the healthy breath of morn,

从黎明健康的呼吸中沉没，

Far from the fiery noon and eve's one star

远离火热的正午，夜晚的一颗星悬着，

Sat gray-haired Saturn, quiet as a stone.

灰发的土星，静默得像块石头。”

Here it will be observed, not only that the predicate “sat”

precedes the subject “Saturn,” and that the three lines in italics, constituting the complement of the predicate, come before it; but that in the structure of that complement also, the same order is followed: each line being so arranged that the qualifying words are placed before the words suggesting concrete images.

我们看到，不仅做谓语的“悬”字出现在主语“土星”之前，修饰谓语的三句斜体诗行出现在谓语之前，做补语的结构亦遵循这一句序：每句诗行依此排列，限定词置于提示具体意象的词之前。

Sec. 22. The right succession of the principal and subordinate propositions in a sentence manifestly depends on the same law. Regard for economy of the recipient's attention, which, as we find, determines the best order for the subject, copula, predicate and their complements, dictates that the subordinate proposition shall precede the principal one when the sentence includes two. Containing, as the subordinate proposition does, some qualifying or explanatory idea, its priority prevents misconception of the principal one; and therefore saves the mental effort needed to correct such misconception. This will be seen in the annexed example:

（22）句子主要论点与从属论点排列的正确顺序，显然也遵从这同一法则。诚如我们所发现的，受众注意力的节省，决定了主语、系动词、谓语及补语的最佳顺序；也决定了当句子包含两个论点时，应将从属论点置于主要论点之前。当从属论点包含限定性或解释性概念时，将它前置能避免受众误解主要论点，因而节省了受众为纠正这一误解所要付出的脑力。再看一个例子：

> The secrecy once maintained in respect to 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 is still thought needful in diplomacy; and in virtue of this secret diplomacy, England may any day be unawares betrayed by its ministers into a war costing a, hundred thousand lives, an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treasure: yet the English pique themselves on being a self-governed people.

> “议会制辩论中的保密问题，仍被认为在外交活动中不可或缺；依靠这种秘密外交，随时可能让英国一不留神便被它的大臣们卷入会夺去成千上万生命、耗损数亿巨额财富的战争之中：可英国人却夸耀自己是自治民族。”

The two subordinate propositions, ending with the semicolon and colon respectively, almost wholly determine the meaning of the principal proposition with which it concludes; and the effect would be lost were they placed last instead of first.

这两个分别以分号和冒号结尾的从属论点，基本确定了它所概括的主要论点的意思；倘若将其后置而非前置，这样的效果将会遗失殆尽。

Sec. 23.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right arrangement in sentences, which we have traced in its application to the leading divisions of them, equally determines the proper order of their minor divisions. In every sentence of any complexity the

complement to the subject contains several clauses, and that to the predicate several others; and these may be arranged in greater or less conformity to the law of easy apprehension. Of course with these, as with the larger members, the succession should be from the less specific to the more specific—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23）我们探寻得出的句子划分中正确排列句子的普遍原则，同样可以用来决定更小划分单位的适当顺序。在任何复杂句子中，当主语的补语包含若干分句、修饰谓语的部分也包含若干分句时，排列这些分句一般应遵循易懂法则。当然，在这样以及更大的语言单位中，语序应遵循从不太具体到比较具体的顺序，即先抽象后具体。

Sec. 24. Now, however, we must notice a further condition to be fulfilled in the proper construction of a sentence; but still a condition dictated by the same general principle with the other: the condition, namely, that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most nearly related in thought shall be brought the closest together. Evidently the single words, the minor clauses, and the leading divisions of every proposition, severally qualify each other. The longer the time that elapses between the mention of any qualifying member and the member qualified, the longer must the mind be exerted in carrying forward the qualifying member ready for use. And the more numerous the qualifications to be simultaneously remembered and rightly applied, the greater will be the mental power expended, and the smaller the effect produced. Hence, other things equal, force will be gained by so arranging the members of a sentence that these suspensions shall at any moment be the fewest in number; and shall also be of the shortest duration. The following is an instance of defective combination:—“A modern newspaper-statement, though

probably true, would be laughed at if quoted in a book as testimony; but the letter of a court gossip is thought good historical evidence, if written some centuries ago." A rearrangement of th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indicated above, will be found to increase the effect. Thus:—"Though probably true, a modern newspaper-statement quoted in a book as testimony, would be laughed at; but the letter of a court gossip, if written some centuries ago, is thought good historical evidence."

（24）不过现在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要恰当组织句子还应满足一个条件；该条件和其他条件一样，受同一条普遍原则所制约，即思想上最为相关的字词应当最紧密地排列在一起。每个论点中的单个词语、小分句和各主要排列部分显然应彼此相互限定。限定与被限定成分之间间隔越长，思维用来承接待用的限定成分的时间就越长。而且，同一时间要记住并正确理解的限定条件越多，耗费的脑力就越多，它们产生的效果就越弱。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延迟次数、缩短延迟时间，这样排列出的句子，会更有力。下面这个例子是个组合不够完美的句子："一则现代新闻陈述，尽管可能真实，也将会遭受讥讽，若它在书中被当作证言引用；然而，法庭上的流言记录却被视为很好的历史证据，倘若它成文于数世纪前。"我们发现这个句子若按前述原则重新排列效果就会增强。如是："尽管可能是真实的，在书中被当作证言引用的现代新闻陈述也将会遭受讥讽；然而，文字记录的法庭上的流言，若成文于数世纪前，却被视为很好的历史证据。"

Sec. 25. By making this change, some of the suspensions are avoided and others shortened; while there is less liability to produce premature conceptions. The passage quoted below from "Paradise Lost" affords a fine instance of a sentence well arranged; alike in the priority of the subordinate members, in the avoidance

of long and numerous suspensions, and i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order of the clauses and the sequence of the phenomena described, which, by the way, is a further prerequisite to easy comprehension, and therefore to effect.

（25）经过以上的修改，延迟次数减少、延迟时间缩短；同时也会减少产生预先构想所带来的麻烦。以下引自《失乐园》的篇章，无论是在从属成分的前置上，在避免延迟次数与延迟时间上，还是在各分句句序与所描述现象的序列之间的对应上，都是句子最佳排列的极好例证。顺便提一下，二者之间的对应，是便于受众理解的另一先决条件，因而产生效果。

As when a prowling wolf,

“好比一只徘徊的狼，

Whom hunger drives to seek new haunt for prey,

在饥饿驱使下去寻求新的猎场，

Watching where shepherds pen their flocks at eye,

看见牧羊人傍晚把羊群赶进田间槛护的羊圈中关得严严实实，

In hurdled cotes amid the field secure,

便轻易地跳过栅栏进入圈内；

Leaps o'er the fence with ease into the fold;

又好比一个贼人，

Or as a thief, bent to unhoard the cash

为窃取富民的钱财，

Of some rich burgher, whose substantial doors,

不管坚牢的门户，

Cross-barr'd, and bolted fast, fear no assault,

不管门闩严紧，也不怕侵袭，

In at the window climbs, or o'er the tiles;

却从窗口或者屋顶椽瓦之间爬进去。

So clomb this first grand thief into God's fold;

这个最早的大盗闯进了神的羊圈：

So since into his church lewd hirelings climb.

近来亵渎之神的雇佣者照例爬进神的教会。”

Sec. 26. The habitual use of sentences in which all or most of the descriptive and limiting elements precede those described and limited, gives rise to what is called the inverted style: a title which is, however, by no means confined to this structure, but is often used where the order of the words is simply unusual. A more appropriate title would be the direct style, as contrasted with the other, or indirect style: the peculiarity of the one being, that it conveys each thought into the mind step by step with little liability to error; and of the other, that it gets the right thought conceived by a series of approximations.

（26）将所有或多数描述及限定成分置于被描述与被限定的成分之前，习惯性地这样建构句子，就形成了所谓的倒装风格：此用法绝非只限于这一结构，它还常用在一些不常用的词序中。相较于另一种间接法，称其为直接法或许更为贴切：其特征之一就在于它近乎完美、准确无误地将思想逐一传输到大脑中。其次，它借助一系列相似

意象向大脑正确传递它所表达的思想。

Sec. 27. The superiority of the direct over the indirect form of sentence, implied by the several conclusions that have been drawn, must not, however, be affirmed without reservation. Though, up to a certain point, it is well for the qualifying clauses of a period to precede those qualified; yet, as carrying forward each qualifying clause costs some mental effort, it follows that when the number of them and the time they are carried become great, we reach a limit beyond which more is lost than is gained. Other things equal, the arrangement should be such that no concrete image shall be suggested until the materials out of which it is to be made have been presented. And yet, as lately pointed out, other things equal, the fewer the materials to be held at once, and the shorter the distance they have to be borne, the better. Hence in some cases it becomes a question whether most mental effort will be entailed by the many and long suspensions, or by the correction of successive misconceptions.

（27）然而，前文所暗示的直接法之于间接法的优势，并不是绝对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把句子的限定性分句放在它所限定的成分前很恰当；但每前置一个限定分句便会耗费读者些许脑力，因此，当前置的数量增多、领会这些前置的时间加长，我们就会濒临一个得不偿失的界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之下，句子应当在还未呈现产生具体意象的材料之前，不要暗示任何具体意象。然而，诚如方才所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次性呈现的材料越少，读者领会材料所需的时间越短，效果也就越好。因此，在一些情境中，关键在于读者的大部分脑力是耗在又多又长的延迟上，还是耗在连续的纠错上。

Sec. 28. This question may sometimes be decided by considering the capacity of the persons addressed. A greater grasp of mind is required for the ready comprehension of thoughts expressed in the direct manner, where the sentences are anywise intricate. To recollect a number of preliminaries stated in elucidation of a coming idea, and to apply them all to the formation of it when suggested, demands a good memory and considerable power of concentration. To one possessing these, the direct method will mostly seem the best; while to one deficient in them it will seem the worst. Just as it may cost a strong man less effort to carry a hundred-weight from place to place at once, than by a stone at a time; so, to an active mind it may be easier to bear along all the qualifications of an idea and at once rightly form it when named, than to first imperfectly conceive such idea and then carry back to it, one by one, the details and limitations afterwards mentioned. While conversely, as for a boy, the only possible mode of transferring a hundred-weight, is that of taking it in portions; so, for a weak mind, the only possible mode of forming a compound conception may be that of building it up by carrying separately its several parts.

（28）判断这个问题有时需要考虑读者的理解能力。要领会用直接法表达句子又错综复杂的思想，需要有较强的理解力。对于一个将至未至的概念，要记住前面与它有关的一系列阐述并在最后能运用这些阐述来形成一个概念，需要有良好的记忆力和相当集中的注意力。对于具备这些条件的人，直接法再好不过；而对于在这些方面有所欠缺的人，直接法似乎糟糕透顶。就好比一个壮汉运石头，他一次性将一英担（约合50kg，100斤）石头从一地运往另一地，比每次只运一块石头更省力。因此，对于思维敏捷者来讲，记住修饰某个概念的所有限定条件并在最后对它加以正确且迅速的建构，比先笼统地构建概念、然后再借助后述的细节和修饰来逐步完善似乎更轻而易举。相

反，一个小男孩搬运一堆百斤重物唯一可能的方式，便是分批搬运。因此，对于思维迟缓者来讲，理解复杂概念的唯一方式，或许是通过分别理解构成该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来构建出整体概念。

Sec. 29. That the indirect method—the method of conveying the meaning by a series of approximations—is best fitted for the uncultivated, may indeed be inferred from their habitual use of it. The form of expression adopted by the savage, as in “Water, give me,” is the simplest type of the approximate arrangement. In pleonasms, which are comparatively prevalent among the uneducated, the same essential structure is seen; as, for instance, in —“The men, they were there.” Again, the old possessive case—“The king, his crown,” conforms to the like order of thought. Moreover, the fact that the indirect mode is called the natural one, implies that it is the one spontaneously employed by the common people: that is —the one easiest for undisciplined minds.

（29）间接法，即借助一系列类似说法来传达意义的方法，对未受教育者最为合适，这或许可以从他们对该方法的习惯性日常运用中推断出来。未受教育者的表达方式，如“水，给我”，乃是类似于排列的最简单类型。冗词也是未受教育者更易犯的毛病，在其中可以发现类似的基本结构，如“那些男人，他们在那儿”。再者，那个关于所有格的老例子——“国王，他的王冠”——都遵循这类思维方式。此外，间接法也被称为自然法，这表明它是普通大众自然而然使用的方法，即这是对未受过教育的人而言最简单的方法。

Sec. 30. There are many cases, however, in which neither the direct nor the indirect structure is the best; but where an intermediate structure is preferable to both. When the number of

circumstances and qualifications to be included in the sentence is great, the most judicious course is neither to enumerate them all before introducing the idea to which they belong, nor to put this idea first and let it be remodelled to agree with the particulars afterwards mentioned; but to do a little of each. Take a case. It is desirable to avoid so extremely indirect an arrangement as the following:—“We came to our journey's end, at last, with no small difficulty after much fatigue, through deep roads, and bad weather.” Yet to transform this into an entirely direct sentence would not produce a satisfactory effect; as witness:—“At last, with no small difficulty, after much fatigue, through deep roads, and bad weather, we came to our journey's end.”

（30）但在很多情况下，直接结构、间接结构均非最佳，中间结构才最为可取。当句子包含的情形和限定条件很多时，最明智的做法，既非在引入概念前先罗列所有隶属于该概念的情形和条件；亦非先呈现概念再不断修正，以使它吻合后续的种种情形和限定条件，而是两种方式兼而用之。举个例子，像以下这样极端的间接排序确实需要避免：“我们到达旅途终点，最终，饱受艰难，极度疲惫，历经坎坷道路、恶劣天气。”但若变成直接排序的句子，效果亦不令人满意；如下：“最终，饱受艰难，极度疲惫，历经坎坷道路、恶劣天气，我们到达旅途终点。”

Sec. 31. Dr. Whately, from whom we quote the first of these two arrangements, proposes this construction:—“At last, after much fatigue, through deep roads and bad weather, we came, with no small difficulty, to our journey's end.” Here it will be observed that by introducing the words “we came” a little earlier in the sentence, the labour of carrying forward so many particulars is diminished, and the subsequent qualification “with no small difficulty” entails

an addition to the thought that is very easily made. But a further improvement may be produced by introducing the words “we came” still earlier; especially if at the same time the qualifications be rearrange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inciple already explained, that the more abstract elements of the thought should come before the more concrete. Observe the better effect obtained by making these two changes:—“At last, with no small difficulty, and after much fatigue, we came, through deep roads and bad weather, to our journey's end.” This reads with comparative smoothness; that is, with less hindrance from suspens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of thought—with less mental effort.

（31）我们引用惠特利博士的两种排列中的第一种，呈现如下：“最终，极度疲惫，历经坎坷道路、恶劣天气，我们到达旅途终点，饱受艰难。”我们看到，句中“我们到达”一语出现得早一些，读者便不必花精力识记过多细枝末节，然后将“饱受艰难”这一后续限定用以补充前面比较容易理解的思想。但若再早一些引入“我们到达”一语，或许更能提升语言效果。尤其是，如果同时遵循着上述原则安排限定条件，即阐述的思想抽象成分在前、具体成分在后。体会一下在进行以上两处修正之后获得的更佳效果：“最终，饱受艰难，极度疲惫，我们终于在历经坎坷道路、恶劣天气之后，到达旅途终点。”这样读起来比较流畅，延迟和重组导致的思路阻滞较少，所耗的脑力也就较少。

Sec. 32. Before dismissing this branch of our subject, it should be further remarked, that even when addressing the most vigorous intellects, the direct style is unfit for communicating ideas of a complex or abstract character. So long as the mind has not much to do, it may be well able to grasp all the preparatory clauses of a sentence, and to use them effectively; but if some subtlety in the

argument absorb the attention—if every faculty be strained in endeavouring to catch the speaker's or writer's drift, it may happen that the mind, unable to carry on both processes at once, will break down, and allow the elements of the thought to lapse into confusion.

（32）在结束这个话题的这一部分之前，还须特别指出，即便是面对精力最充沛的有才之士，在交流复杂、抽象的思想时，使用直接风格也不太合适。只要大脑没有过多事情要做，它就能完美领会句子的所有先行分句并有效利用它们。可是当论述中的微妙之处吸引了注意力时，所有精力都用在努力领会说话者或作者此时的含义了，人很难一心二用，大脑这时就可能会出现问题，造成思维混乱。

iv. The Principle of Economy Applied to Figures

第四节　修辞中的经济原则

Sec. 33. Turning now to consider figures of speech, we may equally discern the same general law of effect. Underlying all the rules given for the choice and right use of them, we shall find the sam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economy of attention. It is indeed chiefly because they so well subserve this requirement, that figures of speech are employed. To bring the mind more easily to the desired conception, is in many cases solely, and in all cases mainly, their object.

（33）现在我们来看种种修辞，也许同样会发现这一普遍的效果法则。在选择并正确运用修辞手法的原则的背后，我们会发现同一基本要求——合理规划注意力。实际上，这主要是因为修辞手法有助于

达到规划注意力这一要求，因而它们得以被采用。让大脑比较轻松地领会所表达的概念，是修辞手法在任何情况下的主要目标，也是在多数情况下的唯一目标。

Sec. 34. Let us begin with the figure called Synecdoche. The advantage sometimes gained by putting a part for the whole, is due to the more convenient, or more accurate,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f, instead of saying “a fleet of ten ships,” we say “a fleet of ten *sail* ,” the picture of a group of vessels at sea is more readily suggested; and is so because the sails constitute the most conspicuous parts of vessels so circumstanced: whereas the word *ships* would very likely remind us of vessels in dock. Again, to say, “All *hands* to the pumps,” is better than to say, “All *men* to the pumps,” as it suggests the men in the special attitude intended, and so saves effort. Bringing “gray *hairs* with sorrow to the grave,” is another expression, the effect of which has the same cause.

（34）让我们先从“提喻法”这种修辞手法开始。有时候，部分代替整体的优势在于它们能够比较省力或确切地表达思想。比如，我们不说“一支十船的舰队”，而说“一支十帆的舰队”，这更容易使人联想到海上一队航船的景象。这是因为在此情形之下，帆是航船最明显的标志，而“船”字极有可能让我们联想到的是停泊在码头的船只。再如，说“全船人手都去抽水”比说“全体船员都去抽水”更好，因为前者表现出了人们在该情境中的特殊态度，因而节省了读者的脑力。另一表达——“伤透白发人的心”——之所以形象，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

Sec. 35. The occasional increase of force produced by Metonymy may be similarly accounted for. “The low morality of the bar,” is a phrase both more brief and significant than the literal one

it stands for. A belief in the ultimate supremacy of intelligence over brute force, is conveyed in a more concrete, and therefore more realizable form, if we substitute the pen and the sword for the two abstract terms. To say, “Beware of drinking!” is less effective than to say, “Beware of the bottle!” and is so, clearly because it calls up a less specific image.

（35）转喻有时能增强效果也是因为类似原因。“混迹酒吧的低劣德行”一语比该措辞的字面意思更简明、更意味深长。在“相信智慧终将战胜暴力”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用更为具体、更易感知的形式来体现，比如用“笔”和“剑”来代替“智慧”和“暴力”这两个抽象词语。“别喝多了”不如“别贪杯”形象，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效果，显然是因为前者唤起的意象不够具体。

Sec. 36. The Simile is in many cases used chiefly with a view to ornament, but whenever it increases the force of a passage, it does so by being an economy. Here in an instance: “The illusion that great men and great events came oftener in early times than now, is partly due to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s in a range of equidistant columns, the furthest off look the closest; so, the conspicuous objects of the past seem more thickly clustered the more remote they are.”

（36）很多情况下明喻主要用作修饰，但是当它使得篇章力量增强时，均因其能够节省读者的注意力。就好比“人们感觉古时的伟人和大事件比现如今的伟人和大事件多，这一错觉，部分归因于历史视角。与观察由远而近等距排列的一列圆柱时的感觉一样，离得越远，显得越密，过往那些引人注目的事物，也是年代越久、集结越密。”

Sec. 37. To construct by a process of literal explanation, the thought thus conveyed would take many sentences, and the first elements of the picture would become faint while the imagination was busy in adding the others. But by the help of a comparison all effort is saved; the picture is instantly realized, and its full effect produced.

（37）若用字面意思进行诠释，表达思想将会颇费笔墨，而且，当人动用想象力忙着添加其他要素时，此前描绘该意象的那些元素会变得模糊不清。借助对比修辞便不必如此费劲；意象马上就能浮现脑海，完整效果也相应产生。

Sec. 38. Of the position of the Simile, it needs only to remark, that what has been said respecting the order of the adjective and substantive, predicate and subject, principal and subordinate propositions, &c., is applicable here. As whatever qualifies should precede whatever is qualified, force will generally be gained by placing the simile before the object to which it is applied. That this arrangement is the best, may be seen in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the “Lady of the Lake”;

（38）至于明喻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前面论述的形容词及名词、谓语和主语以及主从论点的顺序规律，在此同样适用。任何修饰成分都应置于被修饰成分前，因此，把明喻置于所喻事物之前，一般都能取得效果。这种最佳排列，在下面选自《湖上夫人》的小节中可见一斑：

As wreath of snow, on mountain breast,

“就像白雪的花环，在大山的胸膛上，

Slides from the rock that gave it rest,

从它休憩的岩石上滑落，

Poor Ellen glided from her stay,

可怜的艾伦从她呆的地方滑下

And at the monarch's feet she lay.

落到了君主的脚旁。”

Inverting these couplets will be found to diminish the effect considerably. There are cases, however, even where the simile is a simple one, in which it may with advantage be placed last, as in these lines from Alexander Smith's “Life Drama”:

假如倒置这两个对句，效果则会大大削弱。但在某些情况下，当明喻非常简单时，将它后置或许效果更为突出，比如亚历山大·史密斯的《生活戏剧》中的诗行：

I see the future stretch

“我看到未来延展

All dark and barren as a rainy sea.

黑暗、荒凉一片，就像落雨的海面。”

The reason for this seems to be, that so abstract an idea as that attaching to the word “future,” does not present itself to the mind in any definite form, and hence the subsequent arrival at the simile entails no reconstruction of the thought.

究其原因，可能是“未来”一词连带的概念过于抽象，未向大脑呈现任何确定意象，因此，后续的明喻让读者不必重构联想。

Sec. 39. Such, however, are not the only cases in which this order is the most forcible. As the advantage of putting the simile before the object depends on its being carried forward in the mind to assist in forming an image of the object, it must happen that if, from length or complexity, it cannot be so carried forward, the advantage is not gained. The annexed sonnet, by Coleridge, is defective from this cause:

（39）然而，该顺序不仅只在这些情况中最为有力。把明喻置于

所喻事物之前的优势在于，它提前协助大脑对所喻事物形成意象，倘若因为句子冗长或复杂，不将其前置，那其优势也就无从谈起。以下所附的这首柯勒律治的十四行诗，正是因此而失之完美：

As when a child, on some long winter's night,

“就像小孩子，在漫长的冬夜，

Affrighted, clinging to its grandam's knees,

惊恐不安，紧搂着祖母的双膝，

With eager wond'ring and perturb'd delight.

带着急切的渴盼、欣喜与不安，

Listens strange tales of fearful dark decrees,

聆听那些可怕的黑色教令的奇异故事，

Mutter'd to wretch by necromantic spell;

对恶人念着妖术的咒语，

Or of those hags who at the witching time

或是念巫女们的咒语，

Of murky midnight, ride the air sublime,

这些巫女，在昏暗午夜的巫术时刻，腾云驾雾，

And mingle foul embrace with fiends of hell;

把邪恶的拥抱和地狱的恶魔混在一起；

Cold horror drinks its blood! Anon the tear

冰冷的恐惧吸着这孩子的血！旋即眼泪缓慢流下，

More gentle starts, to hear the beldame tell

听到祖母讲述

Of pretty babes, that lov'd each other dear,

可爱的彼此深爱的婴儿，

Murder'd by cruel uncle's mandate fell:

因残忍的叔父大权旁落而被谋杀：

Ev'n such the shiv'ring joys thy tones impart,

尽管你的言语讲述的是些令人战栗的欢喜，

Ev'n so, thou, Siddons, meltest my sad heart.

尽管如此，西登斯夫人，你柔化了我悲伤的心。”

Sec. 40. Here, from the lapse of time and accumulation of circumstances, the first part of the comparison is forgotten before its application is reached, and requires re-reading. Had the main idea been first mentioned, less effort would have been required to retain it, and to modify the conception of it into harmony with the comparison, than to remember the comparison, and refer back to its

successive features for help in forming the final image.

（40）此处，当还没来得及应用，比喻的第一部分就随时间和各种情形的积累被遗忘了，读者就得再读一遍。而如果先提主要思想，然后记住并修饰这一思想，并将其与相喻之物融为一体，就比先记住喻体，再回头援引一系列特征来帮助形成最终意象，要轻松很多。

Sec. 41. The superiority of the Metaphor to the Simile is ascribed by Dr. Whately to the fact that “all men are more gratified at catching the resemblance for themselves, than in having it pointed out to them.” But after what has been said, the great economy it achieves will seem the more probable cause. Lear's exclamation—“Ingratitude! Thou marble-hearted fiend,” would lose part of its effect were it changed into—“Ingratitude! Thou fiend with heart like marble;” and the loss would result partly from the position of the simile and partly from the extra number of words required. When the comparison is an involved one, the greater force of the metaphor, consequent on its greater brevity, becomes much more conspicuous. If, drawing an analogy between mental and physical phenomena, we say, “As, in passing through the crystal, beams of white light are decomposed into the colours of the rainbow; so, in traversing the soul of the poet, the colourless rays of truth are transformed into brightly tinted poetry”; it is clear that in receiving the double set of words expressing the two halves of the comparison, and in carrying the one half to the other, considerable attention is absorbed. Most of this is saved, however, by putting the comparison in a metaphorical form, thus: “The white light of truth, in traversing the many sided transparent soul of the poet, is refracted into iris-hued poetry.”

（41）惠特利博士把隐喻之于明喻的优势归因于这一事实，即“人们更满足于自己去发现相似之处，而非由别人代为指出。”按照他的说法，隐喻能大大节省精力之说，就更有说服力了。我们来看看李尔的怒吼：“忘恩负义！你这铁石心肠的恶魔，”若我们将其改成“忘恩负义！你这恶魔，心肠像铁石一样”，一定会失掉部分效果。这损失一因明喻的位置，二因这样须多费笔墨。当比喻较为复杂时，隐喻的简洁所蕴含的力量就更为明显了。如果我们将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进行类比时，比如我们说“诚如白光穿越水晶时折射出彩虹之色，无色的真理之光穿越诗人心灵，转化成绚烂的诗歌”；显然，要接收表达这一比喻的两个部分的两组词语，且进一步将此意象带入彼意象，要耗费大量注意力。但若用隐喻形式表达这个比喻，精力就节省多了：“真理的白光穿越诗人多棱透明的心灵，折射出多彩的诗歌。”

Sec. 42. How much is conveyed in a few words by the help of the Metaphor, and how vivid the effect consequently produced, may be abundantly exemplified. From “A Life Drama” may be quoted the phrase—“I spear'd him with a jest,” as a fine instance among the many which that poem contains. A passage in the “Prometheus Unbound,” of Shelley, displays the power of the metaphor to great advantage:

（42）借助隐喻，寥寥数语，表达的内容多么丰富，由此产生的效果多么生动！这样的例子也许不胜枚举。我们可从《生活戏剧》中引用这句话——“我用玩笑刺伤他”——作为该诗众多丰富隐喻中极好的例证。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有一诗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隐喻的力量：

Methought among the lawns together

“仿佛一同在那草地上，

We wandered, underneath the young gray dawn,

我们徜徉，在淡灰色的曙光下，

And multitudes of dense white fleecy clouds

密层层羊群般的白云，正慢慢悠过，

Were wandering, in thick flocks along the mountains

大队大队顺着群山，

Shepherded by thev slow unwilling wind.

正由慢悠悠不情愿的风儿保驾护航。”

This last expression is remarkable for the distinctness with which it realizes the features of the scene: bringing the mind, as it were, by a bound to the desired conception.

最后一句表达形象，再现了该场景的特征，因而非同寻常：引领读者思维沿着预期想法前行。

Sec. 43. But a limit is put to the advantageous use of the Metaphor, by the condition that it must be sufficiently simple to be understood from a hint. Evidently, if there be any obscurity in the meaning or application of it, no economy of attention will be gained; but rather the reverse. Hence, when the comparison is complex, it is usual to have recourse to the Simile. There is, however, a species of figure, sometimes classed under Allegory, but which might, perhaps, be better called Compound Metaphor, that enables us to retain the brevity of the metaphorical form even where the analogy is intricate. This is done by indicat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igure at the outset, and then leaving the mind to continue the parallel. Emerson has employed it with great effect in the first of his “I Lectures on the Times”:—

（43）使用隐喻有利但有局限，因为隐喻必须足够简洁，以作为暗示方便理解。显然，倘若隐喻的意义或应用晦涩难懂，注意力便无法节省，反而适得其反。因此，当比喻比较复杂时常转而采用明喻。有一类修辞有时会被归类为寓言，但称之为复合隐喻或许更为贴切，它能够使我们在比喻错综复杂的事物时，依旧仍保持隐喻形式的简洁。这就需要在一开始就点明将要运用这一修辞，然后让思维一直顺着这个思路继续下去。爱默生在其《关于时间的入门演讲》的前部用此修辞方法，效果显著：

> The main interest which any aspects of the Times can have for us is the great spirit which gazes through them, the light which they can shed

on the wonderful questions, What are we, and Whither we tend? We do not wish to be deceived. Here we drift, like white sail across the wild ocean, now bright on the wave, now darkling in the trough of the sea; but from what port did we sail? Who knows? Or to what port are we bound? Who knows? There is no one to tell us but such poor weather-tossed mariners as ourselves, whom we speak as we pass, or who have hoisted some signal, or floated to us some letter in a bottle from far. But what know they more than we? They also found themselves on this wondrous sea. No; from the older sailors nothing. Over all their speaking trumpets the gray sea and the loud winds answer, Not in us; not in Time.

“时间让我们感兴趣的主要之处，在于它穿越时间的伟大灵魂；在于它启示这样的奇妙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我们不愿受骗。我们漂浮着，就像浩瀚海洋上的白帆，忽而被推至浪尖，忽而又逐向海底；但我们驶自哪个港湾？有谁知道？我们又驶向什么口岸？有谁知道？能告诉我们的，唯有那些和我们一样卑微且饱经风霜的水手，或是当我们经过时与之攀谈，或是他们升起信号，借漂流瓶从远方给我们传来讯息。但他们又比我们多了解多少？他们亦觉自己身处玄妙的大海。不；从老水手那里一无所获。咆哮的灰色海洋，呼号的狂烈大风，掩盖了他们的话语：答案不在我们这里，亦不在时间里。”

Sec. 44. The division of the Simile from the Metaphor is by no

means a definite one. Between the one extreme in which the two elements of the comparison are detailed at full length and the analogy pointed out, and the other extreme in which the comparison is implied instead of stated, come intermediate forms, in which the comparison is partly stated and partly implied. For instance:—“Astonished at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English plow, the Hindoos paint it, set it up, and worship it; thus turning a tool into an idol: linguists do the same with language.” There is an evident advantage in leaving the reader or hearer to complete the figure. And generally these intermediate forms are good in proportion as they do this; provided the mode of completing it be obvious.

（44）明喻与隐喻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一个极端是详细叙述比喻的两个要素并指明，另一个极端是暗示而非明示两者之间的比喻，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就是中间形式，即是对比喻做部分明示、部分暗示。比如，“英国耕犁的效能令印度人震惊不已，他们描绘、敬慕并朝拜耕犁；结果把工具变成了偶像：语言学家对待语言也是如此。”修辞留有空间，待读者或听众去联想补全，这样做有明显的好处。一般说来，用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形式进行比喻，会使得比例匀称；当然前提是读者显然知道如何去补全这个修辞。

Sec. 45. Passing over much that may be said of like purport upon Hyperbole, Personification, Apostrophe, &c., let us close our remarks upon construction by a typical example. The general principle which has been enunciated is, that other things equal, the force of all verbal forms and arrangements is great, in proportion as the time and mental effort they demand from the recipient is small. The corollaries from this general principle have been severally illustrated; and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relative goodness of any two modes of expressing an idea, may be determined by observing

which requires the shortest process of thought for its comprehension. But though conformity in particular points has been exemplified, no cases of complete conformity have yet been quoted. It is indeed difficult to find them; for the English idiom does not commonly permit the order which theory dictates. A few, however, occur in Ossian. Here is one:—

（45）还有夸张、拟人、呼语等等，要说的还很多，此处暂且不论，我们用一个经典例子来结束关于建构的论述。我们已经阐明这个普遍原则，即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之下，词语及语序耗费读者的精力越少，就越有表达力。源自这个普遍原则的种种推论已被数度阐述。我们也已阐明这一观点：表达一种思想的任何两种模式，也许可以通过观察哪一模式让人在领会其意义所用时间最短来决定其相对优势。这个观点尽管有很多例子可以佐证，但目前尚未引用过完全遵循此论的实例。寻找这样的实例确实很难；因为英语俚语往往不遵循理论所要求的顺序。不过，在奥西恩的作品中有一些这样的例子。请看：

> As autumn's dark storms pour from two echoing hills, so towards each other approached the heroes. As two dark streams from high rocks meet and mix, and roar on the plain: loud, rough, and dark in battle meet Lochlin and Inisfail…As the troubled noise of the ocean when roll the waves on high; as the last peal of the thunder of heaven; such is noise of the battle.

> “仿佛秋日暗处的风暴涌出两座回响的山谷，英雄们就是这般狂烈地奔向彼此。宛如两条咆哮着冲过平原的深色河流的汇集，洛克林和伊尼斯菲尔在战争

中这样交锋……像大海掀起波涛时的狂啸；如天空最后一阵的雷鸣；战争就是这般喧嚣。”

Sec. 46. Except in the position of the verb in the first two similes, the theoretically best arrangement is fully carried out in each of these sentences. The simile comes before the qualified image, the adjectives before the substantives, the predicate and copula before the subject, and their respective complements before them. That the passage is open to the charge of being bombastic proves nothing; or rather, proves our case. For what is bombast but a force of expression too great for the magnitude of the ideas embodied? All that may rightly be inferred is, that only in very rare cases, and then only to produce a climax, should all the conditions of effective expression be fulfilled.

（46）除了前两个明喻中动词的位置，两个句子从理论角度而言语序非常完美。明喻出现在被修饰的意象之前，形容词出现在名词之前，谓语和系词出现在主语之前，补语出现在它们各自补充的成分之前。该片段很容易被指为夸夸其谈，言辞空洞；亦或更确切地说，这正好证明了我们的例证。因为，言辞对要表达的思想夸大且强烈，这有何不可？我们可以推断的是，在极少数情况下，只有在要推动高潮时，才能够满足运用这种表达效果的条件。

v. Suggestion as a Means of Economy

第五节　暗示是一种节省手段

Sec. 47. Passing on to a more complex application of the doctrine with which we set out, it must now be remarked, that not

only in the structure of sentences, and the use of figures of speech, may economy of the recipient's mental energy be assigned as the cause of force; but that in the choice and arrangement of the minor images, out of which some large thought is to be built up, we may trace the same condition to effect. To select from the sentiment, scene, or event described those typical elements which carry many others along with them; and so, by saying a few things but suggesting many, to abridge the description; is the secret of producing a vivid impression. An extract from Tennyson's “Mariana” will well illustrate this:

（47）接下来我们读下面这个更复杂的例证，看看我们建立的规则是如何运用的。值得一提的是，运用节省读者精力的句子、结构及修辞是增强语言力量的根本；我们还以同样的方式选择和排列次要意象来增强效果，以构建重大思想。在描述情绪、场景或事件时，可选取带有很多其他因素的典型因素；这样，只言明一些因素，却暗示了很多因素，因而节省了描述笔墨；这是创造生动印象的奥秘。丁尼生《玛丽安娜》中的一个选段，就充分揭示了这一奥秘。

All day within the dreamy house,

“整日在空幻的屋中，

The door upon the hinges creaked,

门在合叶上嘎吱作响，

The blue fly sung i' the pane; the mouse

绿头苍蝇在窗玻璃中嗡嗡；

Behind the mouldering wainscot shrieked,

老鼠在发霉的壁板后尖叫，

Or from the crevice peered about.

抑或透过裂缝四处窥望。”

Sec. 48. The several circumstances here specified bring with them many appropriate associations. Our attention is rarely drawn by the buzzing of a fly in the window, save when everything is still. While the inmates are moving about the house, mice usually keep silence; and it is only when extreme quietness reigns that they peep from their retreats. Hence each of the facts mentioned, presupposing numerous others, calls up these with more or less distinctness; and revives the feeling of dull solitude with which they are connected in our experience. Were all these facts detailed instead of suggested, the attention would be so frittered away that little impression of dreariness would be produced. Similarly in other cases. Whatever the nature of the thought to be conveyed, this skilful selection of a few particulars which imply the rest, is the key to success. In the choice of component ideas, as in the choice of

expressions, the aim must be to convey the greatest quantity of thoughts with the smallest quantity of words.

（48）此处被具体描述的若干情形给人以无数的联想。如果周围不是万籁俱寂，我们的注意力不会被窗上嗡闹的苍蝇所吸引。屋内有动静时老鼠通常不会出声，它们只有在屋里寂静无声时才会从深隐处窥探。这里提及的每一情境，都预示了其他无数的情境，并唤起一些相对特别的情境；同时勾起我们在生活经验中类似的孤寂感。若这些情境不是用这样的暗示提及而是被详细地描述，读者的注意力就会被大大消耗，更不用说孤寂感了。其他例证也大抵如此。无论要表达的思想的本质是什么，成功的关键在于精选出能暗示其他情形的几个特例。在思想成分的选择上，其方式与选择表达的方法一样，即尽可能以最简洁的笔墨来表达最丰富的思想。

Sec. 49. The same principle may in some cases be advantageously carried yet further, by indirectly suggesting some entirely distinct thought in addition to the one expressed. Thus, if we say, “The head of a good classic is as full of ancient myths, as that of a servant-girl of ghost stories”; it is manifest that besides the fact asserted, there is an implied opinion respecting the small value of classical knowledge: and as this implied opinion is recognized much sooner than it can be put into words, there is gain in omitting it. In other cases, again, great effect is produced by an overt omission; provided the nature of the idea left out is obvious. A good instance of this occurs in “Heroes and Heroworship.” After describing the way in which Burns was sacrificed to the idle curiosity of Lion-hunters—people who came not out of sympathy, but merely to see him—people who sought a little amusement, and who got their amusement while “the Hero's life went for it!” Carlyle suggests a parallel thus: “Richter says, in the Island of Sumatra

there is a kind of 'Light-chafers,' large Fire-flies, which people stick upon spits, and illuminate the ways with at night. Persons of condition can thus travel with a pleasant radiance, which they much admire. Great honour to the Fire-flies! But—!—”

（49）这一原则有时还会被更深入地利用，即表现除句子已表达的思想之外，还可间接暗示一些完全独特的思想。比如这句话，“经典佳作的篇首常常满是古代神话，就如婢女们的脑中，满是鬼故事”；除了描述事实之外，该断言的隐含之意显然是小觑经典：也正是因为这一暗示，读者一读便知，所以无需言明。其他一些例证也表明，有意省略能产生强烈效果；前提是省略的思想本质要易于理解。《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有个极好的例子——攀结名流者来了，不是出于同情，只是为了见他，为了找乐——“用英雄的生命”换取自己的乐子。在描写完伯恩斯如何牺牲在攀结者无聊的好奇心下之后，卡莱尔打了这么一个比方：“里克特说，苏门答腊岛上有一种‘萤火虫’，人们用唾沫把大个儿头萤火虫粘连起来，夜间用来照路。这样做的人，可以借着这适意的光行走，他们对此很是赞赏。这是萤火虫莫大的荣耀！但是——！”

vi. The Effect of Poetry Explained

第六节　诠释诗歌的效果

Sec. 50. Before inquiring whether the law of effect, thus far traced, explains the superiority of poetry to prose, it will be needful to notice some supplementary causes of force in expression, that have not yet been mentioned. These are not, properly speaking, additional causes; but rather secondary ones, originating from those already specified reflex results of them. In the first place, then, we may remark that mental excitement spontaneously prompts the use

of those forms of speech which have been pointed out as the most effective. “Out with him!” “Away with him!” are the natural utterances of angry citizens at a disturbed meeting. A voyager, describing a terrible storm he had witnessed, would rise to some such climax as—“Crack went the ropes and down came the mast.” Astonishment may be heard expressed in the phrase—“Never was there such a sight!” All of which sentences are, it will be observed, constructed after the direct type. Again, every one knows that excited persons are given to figures of speech. The vituperation of the vulgar abounds with them: often, indeed, consists of little else. “Beast,” “brute,” “gallows rogue,” “cut-throat villain,” these, and other like metaphors and metaphorical epithets, at once call to mind a street quarrel. Further, it may be noticed that extreme brevity is another characteristic of passionate language. The sentences are generally incomplete; the particles are omitted; and frequently important words are left to be gathered from the context. Great admiration does not vent itself in a precise proposition, as—“It is beautiful”; but in the simple exclamation—“Beautiful!” He who, when reading a lawyer's letter, should say, “Vile rascal!” would be thought angry; while, “He is a vile rascal!” would imply comparative coolness. Thus we see that alike in the order of the words, in the frequent use of figures, and in extreme conciseness, the natural utterances of excitement conform to the theoretical conditions of forcible expression.

（50）讨论至此，这条效果法则是否可以说明诗歌之于散文的优势？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留意另外几个尚未被提及的产生表达力量的原因。确切来说，他们并不是附加原因；而是源于已经具化的的本能反射的次要原因。首先，我们或许已经注意到，人在情绪激动时脱口而出的话，往往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最有效的语言形式。“把他赶出出去！”“叫他滚！”愤怒的人们在混乱的会场上脱口狂吼。一位

船员在描述自己亲眼目睹的可怕风暴时，会情绪激动，提高嗓门讲诸如这样的高潮——“啪的一声，绳索断了，桅杆应声倒下。”听到这一描述，或许会有人惊叹道：“从未有过这场面！”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都是用直接法构建的。而且，众所周知，人在激动时会情不自禁地使用修辞。粗口谩骂也会多起来：通常情况下，也只剩下这些言语。“畜生”、“禽兽”、“活该绞死的流氓”、“该千刀万剐的家伙”，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的隐喻和隐喻性词语，会立刻使人想起一场街头争吵。另外，我们或许还注意到，人在激动时用语非常简洁。句子通常不完整，虚词被省略，关键词常常得从语境中收集。在表达强烈赞美时，不是精确地说：“这很漂亮”；而是简单赞叹：“漂亮！”假如一个正在读律师信的人脱口大骂：“混蛋！”他这时会被认为怒气冲冲；“他是个混蛋！”传达的信息则相对平和得多。因此，诚如与我们在词序、修辞的频繁使用以及词汇的极度简洁上所观察到的一样，人在激动时自然流露的语言，表达强烈，符合了有效表达的理论条件。

Sec. 51. Hence, then, the higher forms of speech acquire a secondary strength from association. Having, in actual life, habitually heard them in connection with vivid mental impressions, and having been accustomed to meet with them in the most powerful writing, they come to have in themselves a species of force. The emotions that have from time to time been produced by the strong thoughts wrapped up in these forms, are partially aroused by the forms themselves. They create a certain degree of animation; they induce a preparatory sympathy, and when the striking ideas looked for are reached, they are the more vividly realized.

（51）较高的语言形式因而能从联想中获取附属力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听到或在最具感染力的作品中读到这些自然流露的语言时，已经习以为常地在脑中产生生动联想，它们自身因此已经衍生出一种

力量。用这些形式表现的强烈思想会不时触动情感，这种触动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表达形式本身所激发的。这些形式创造出一定程度的活力，提前诱发了人们的同情，等到读者读到那些令人震撼的思想时，这些思想就更加生动形象了。

Sec. 52. The continuous use of these modes of expression that are alike forcible in themselves and forcible from their associations, produces the peculiarly impressive species of composition which we call poetry. Poetry, we shall find, habitually adopts those symbols of thought, and those methods of using them, which instinct and analysis agree in choosing as most effective, and becomes poetry by virtue of doing this. On turning back to the various specimens that have been quoted,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direct or inverted form of sentence predominates in them; and that to a degree quite inadmissible in prose. And not only in the frequency, but in what is termed the violence of the inversions, will this distinction be remarked. In the abundant use of figures, again, we may recognize the same truth. Metaphors, similes, hyperboles, and personifications, are the poet's colours, which he has liberty to employ almost without limit. We characterize as “poetical” the prose which uses these appliances of language with any frequency, and condemn it as “over florid” or “affected” long before they occur with the profusion allowed in verse. Further, let it be remarked that in brevity—the other requisite of forcible expression which theory points out, and emotion spontaneously fulfils—poetical phraseology similarly differs from ordinary phraseology. Imperfect periods are frequent; elisions are perpetual; and many of the minor words, which would be deemed essential in prose, are dispensed with.

（52）这样的表达方式本身以及它们所产生的联想，同样生动有

力，连续运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所形成的极具感染力的文体，我们称之为诗歌。我们会发现，诗歌通常采用思想符号以及使用思想符号的方法。在选择最有感染力的表达方式上，人的直觉与分析极其一致，它也正因为此而成为诗歌。回头再看我们之前所引的各个例证，会发现诗歌中满是直接形式或者倒装的句子；而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接受这样的句子的。散文与诗歌的差别不仅在于倒装句用得少，还在于诗歌的倒装得太厉害。或许我们可以从大量的修辞运用中领会到这一本质。隐喻、明喻、夸张和拟人是诗人自由、恣意挥洒的颜料。散文中若频繁使用这种我们称为“诗性”的语言，肆意到只有诗歌才如此运用的程度，就要被批为“过于华丽”或“矫揉造作”了。还有，我们再评述一下简洁——简洁也是表达生动有力的前提，这一点在理论上有明确阐述，人们情感的自发流露也表明了这一点——诗歌的简洁与普通文章的简洁，在措词上也是不一样的。不完整句子很常见；省略也常见。很多在散文中被看得很重要的小词，在诗歌中都被省略。

Sec. 53. Thus poetry, regarded as a vehicle of thought, is especially impressive partly because it obeys all the laws of effective speech, and partly because in so doing it imitates the natural utterances of excitement. While the matter embodied is idealized emotion, the vehicle is the idealized language of emotion. As the musical composer catches the cadences in which our feelings of joy and sympathy, grief and despair, vent themselves, and out of these germs evolves melodies suggesting higher phases of these feelings; I so, the poet develops from the typical expressions in which men utter passion and sentiment, those choice forms of verbal combination in which concentrated passion and sentiment may be fitly presented.

（53）因此，以思想的载体而著称的诗歌之所以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它遵从所有的语言效果法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因为它

自然流露激情时所达到的境界。当内容体现理想化的情感时，表现的载体就是理想化的情感语言。譬如曲作者捕捉表现喜悦、悲悯、忧伤和绝望的节律时，就是以这些情绪为基础，从而衍生出表达更高层次情感的旋律的。我如此，诗人，亦如此，依据人们传达激情与情绪时的典型表达，选择言语组合形式，从而恰当地传达强烈的激情与情绪。

Sec. 54. There is one peculiarity of poetry conducing much to its effect—the peculiarity which is indeed usually thought its characteristic one—still remaining to be considered: we mean its rhythmical structure. This, improbable though it seems, will be found to come under the same generalization with the others. Like each of them, it is an idealization of the natural language of strong emotion, which is known to be more or less metrical if the emotion be not too violent; and like each of them it is an economy of the reader's or hearer's attention. In the peculiar tone and manner we adopt in uttering versified language, may be discerne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feelings; and the pleasure which its measured movement gives us, is ascribable to the comparative ease with which words metrically arranged can be recognized.

（54）诗歌有一个特点使它达到了它的效果——这一点的确常被认为是诗歌的独有特征——虽然对此仍有待探讨：那就是它的韵律结构。诗歌的韵律结构和我们上述各条一样，也符合先前概括的结论，尽管这看起来似乎不大可能。与上述各条一样，诗歌的韵律结构同样是强烈情感与自然表达的理想化，即便情感不十分强烈，也或多活少富有韵律。而且，与上述各条一样，它节省读者或听众的注意力。诗化语言所采用的特别语气与方式，可从它与情感的联系上加以识别；而且，它那字斟句酌精心呈现的乐章带给我们的愉悦，正是由于其韵律化的词语让读者比较容易领会。

Sec. 55. This last position will scarcely be at once admitted; but a little explanation will show its reasonableness. For if, as we have seen, there is an expenditure of mental energy in the mere act of listening to verbal articulations, or in that silent repetition of them which goes on in reading—if the perceptive faculties must be in active exercise to identify every syllable—then, any mode of so combining words as to present a regular recurrence of certain traits which the mind can anticipate, will diminish that strain upon the attention required by the total irregularity of prose. Just as the body, in receiving a series of varying concussions, must keep the muscles ready to meet the most violent of them, as not knowing when such may come; so, the mind in receiving unarranged articulations, must keep its perceptives active enough to recognize the least easily caught sounds. And as, if the concussions recur in a definite order, the body may husband its forces by adjusting the resistance needful for each concussion; so, if the syllables be rhythmically arranged, the mind may economize its energies by anticipating the attention required for each syllable.

（55）这点可能不会被立刻认同，但稍作解释，即显合理。因为，诚如我们所见，听读或默读都会耗费脑力——当理解的官能积极辨识每个音节时，而对于常规再现特征的组词方式，大脑常常会有预期，正是这预期，减轻了为理解完全不规则的散文而产生的注意力上的压力。就好比人体在遭受一系列冲击时必须要让肌肉作好迎接最猛烈冲击的准备，因为不知冲击何时降临。因此，大脑在接受无序的发音时，也得保持足够活跃的理解力以辨识那些最不容易辨识的声音。诚如冲击若以特定顺序发生，身体就可以通过调整抵抗力度来节省力气；同样，音节若按韵律排列，大脑便可预测每个音节所需的注意力，从而节省脑力。

Sec. 56. Far-fetched though this idea will perhaps be thought, a little introspection will countenance it. That we do take advantage of metrical language to adjust our perceptive faculties to the force of the expected articulations, is clear from the fact that we are balked by halting versification. Much as at the bottom of a flight of stairs, a step more or less than we counted upon gives us a shock; so, too, does a misplaced accent or a supernumerary syllable. In the one case, we know that there is an erroneous preadjustment; and we can scarcely doubt that there is one in the other. But if we habitually preadjust our perceptions to the measured movement of verse, the physical analogy above given renders it probable that by so doing we economize attention; and hence that metrical language is more effective than prose, because it enables us to do this.

（56）尽管这观点会被认为是牵强附会，但稍作内省就能看到它的合理之处。我们的确在利用韵律语言调整我们的理解官能来适应我们预期的言语力量。不完善的诗律妨碍理解，该事实无疑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就像我们站在一段楼梯底部数台阶一样，多数了一级或少数了一级会让我们吃惊。同样，错位的重音或多余的音节亦会如此。在知道一种情形中的错误并作预先调整，待它出现在另一情形时就不再疑惑了。但是，假如我们惯于预先调整自己对韵律诗节的理解，上文那个有关身体的类比足以表明，这样做是一定能节省注意力的；因此，有韵律的语言之所以比散文更形象，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预作调整。

Sec. 57. Were there space, it might be worthwhile to inquire whether the pleasure we take in rhyme, and also that which we take in euphony, axe not partly ascribable to the same general cause.

（57）若有篇幅，真该深究一下，从节奏及谐音中所获取的快感，是不是也部分归于这一普遍原因。

Part II Causes of Force in Language Which Depend Upon Economy of the Mental Sensibilities

第二章　语言有力的原因在于节省大脑感知力

i. The Law of Mental Exhaustion and Repair

第一节　精神疲惫与修复法则

Sec. 58. A few paragraphs only, can be devoted to a second division of our subject that here presents itself. To pursue in detail the laws of effect, as applying to the larger features of composition, would carry us beyond our limits. But we may briefly indicate a further aspect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 hitherto traced out, and hint a few of its wider applications.

（58）我们讨论的话题还有一个分支，在此用若干段落阐述即可。我们若像阐释作文的详细特征那样，去详细阐释作文的效果法则，将会力不能及。但我们可以简要指出已经探得的这一普遍原则更深入的一个层面，以及它的一些更为广泛的用途。

Sec. 59. Thus far, then, we have considered only those causes of force in language which depend upon economy of the mental energies; we have now to glance at those which depend upon economy of the mental sensibilities. Questionable though this division may be as a psychological one, it will yet serve roughly to indicate the remaining field of investigation. It will suggest that besides considering the extent to which any faculty or group of faculties is tasked in receiving a form of words and realizing its

contained idea, we have to consider the state in which this faculty or group of faculties is left; and how the reception of subsequent sentences and images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at state. Without going at length into so wide a topic as the exercise of faculties and its reactive effects, it will be sufficient here to call to mind that every faculty (when in a state of normal activity) is most capable at the outset; and that the change in its condition, which ends in what we term exhaustion, begins simultaneously with its exercise. This generalization, with which we are all familiar in our bodily experiences, and which our daily language recognizes as true of the mind as a whole, is equally true of each mental power, from the simplest of the senses to the most complex of the sentiments. If we hold a flower to the nose for long, we become insensible to its scent. We say of a very brilliant flash of lightning that it blinds us; which means that our eyes have for a time lost their ability to appreciate light. After eating a quantity of honey, we are apt to think our tea is without sugar. The phrase “a deafening roar,” implies that men find a very loud sound temporarily incapacitates them for hearing faint ones. To a hand which has for some time carried a heavy body, small bodies afterwards lifted seem to have lost their weight. Now, the truth at once recognized in these, its extreme manifestations, may be traced throughout. It may be shown that alike in the reflective faculties, in the imagination, in the perceptions of the beautiful, the ludicrous, the sublime, in the sentiments, the instincts, in all the mental powers, however we may classify them-action exhausts; and that in proportion as the action is violent, the subsequent prostration is great.

（59）至此，我们一直在探讨节省读者的精力让语言有力的原因；现在我们就来谈谈那些节省读者感知力而让语言有力的原因。该问题是否是一心理分支虽尚存疑，但仍可大致指证我们所探讨的问题

的其余方面。它暗示我们除了要考虑某一个或某一组官能在接受词形、领会词意时所被消耗的程度，还要考虑它们被消耗后的状态，以及这状态对领会后面的句子和意象会有什么影响。官能的启用以及启用产生的相应效果，是个很宽泛的话题，对此我们即便不作深入讨论，也满可以认为，任何官能（当它处于正常活动状态下）总是在初始状态最为活跃，不断动用后状况开始变化，直至最终我们称为的“耗竭”。这一概括，源于我们所熟悉的身体体验，同时日常语言亦适用于整体思维，它同样适用于每项心智力量，无论是最简单的感觉，还是最复杂的情感。将鲜花长时间置于鼻下，我们会久闻不知其香。太耀眼的电光会炫目，即让我们的眼睛一时失去感光能力。吃了太多蜂蜜后我们会感觉不出自己茶里放了糖。“震耳欲聋”一词表明巨响会让人一时失聪。手里长时间拎重物，再换拎轻物时，会有轻若无重的感觉。一种种极端显现形式让人立刻体味出的真理，比比皆是。以反思官能为例，注入想象，对于美好、荒谬和庄严的认知，感伤，直觉和一切心智力量的认知，无论如何分类，均是只要使用，便会耗竭；而且，使用越多，耗竭得就越厉害。

Sec. 60. Equally, throughout the whole nature, may be traced the law that exercised faculties are ever tending to resume their original state. Not only after continued rest, do they regain their full power not only do brief cessations partially reinvigorate them; but even while they are in action, the resulting exhaustion is ever being neutralized. The two processes of waste and repair go on together. Hence with faculties habitually exercised—as the senses of all persons, or the muscles of any one who is strong—it happens that, during moderate activity, the repair is so nearly equal to the waste, that the diminution of power is scarcely appreciable; and it is only when the activity has been long continued, or has been very violent, that the repair becomes so far in arrear of the waste as to produce a perceptible prostration. In all cases, however, when, by the action of a faculty, waste has been incurred, some lapse of time

must take place before full efficiency can be reacquired; and this time must be long in proportion as the waste has been great.

（60）启用的官能总是倾向于恢复原态，在大自然中我们同样能发现到这样的法则。官能不但能够在持续休整后重获全力或短暂中断后重获部分活力；即便正在使用，由此造成的疲惫也会同时被中和。损耗和修复过程同时进行。因此，当官能被惯常使用时——正如所有人的感觉，或身体强健者的筋肉——其情况是这样的：适度使用时修复与损耗大致相等，减弱的能量因此常觉察不到；只有在使用持续过长或过于剧烈时，修复才会滞后于折损，直至产生可以觉察出的精疲力竭。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使用官能，就会引起损耗，重获全力需要一定的时间；且损耗越大，恢复所需的时间就越长。

ii. Explanation of Climax, Antithesis, and Anticlimax

第二节　解读渐强、对语与突降

Sec. 61. Keeping in mind these general truths, we shall be in a condition to understand certain causes of effect in composition now to be considered. Every perception received, and every conception realized, entailing some amount of waste—or, as Liebig would say, some change of matter in the brain;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faculties subject to this waste being thereby temporarily, though often but momentarily, diminished; the resulting partial inability must affect the acts of perception and conception that immediately succeed. And hence we may expect that the vividness with which images are realized will, in many cases, depend on the order of their presentation: even when one order is as convenient to the understanding as the other.

（61）记住这些普遍真理，我们便能理解下面要探讨的作品产生感染力的某些原因了。我们每每获取感觉，理解概念时，都会造成一些损耗——按照李比希的说法，会造成大脑中物质的某种变化；官能的效率会因这一损耗而暂时削弱，这现象尽管常有发生但为时不久；它导致能力的部分缺失，必定会影响到后续的感知与理解行为。因此，我们会认为，意象是否生动，很多情况下取决于它们被呈现的顺序：即便此顺序与彼顺序同样便于理解。

Sec. 62. There are sundry facts which alike illustrate this, and are explained by it. Climax is one of them. The marked effect obtained by placing last the most striking of any series of images, and the weakness—often the ludicrous weakness—produced by reversing this arrangement, depends on the general law indicated. As immediately after looking at the sun we cannot perceive the light of a fire, while by looking at the fire first and the sun afterwards we can perceive both; so, after receiving a brilliant, or weighty, or terrible thought, we cannot appreciate a less brilliant, less weighty, or less terrible one, while, by reversing the order, we can appreciate each. In Antithesis, again, we may recognize the same general truth. The opposition of two thoughts that are the reverse of each other in some prominent trait, insures an impressive effect; and does this by giving a momentary relaxation to the faculties addressed. If, after a series of images of an ordinary character, appealing in a moderate degree to the sentiment of reverence, or approbation, or beauty, the mind has presented to it a very insignificant, a very unworthy, or a very ugly image; the faculty of reverence, or approbation, or beauty, as the case may be, having for the time nothing to do, tends to resume its full power; and will immediately afterwards appreciate a vast, admirable, or beautiful image better than it would otherwise do. Conversely, where the idea of absurdity due to extreme insignificance is to be

produced, it maybe greatly intensified by placing it after something highly impressive: especially if the form of phrase implies that something still more impressive is coming. A good illustration of the effect gained by thus presenting a petty idea to a consciousness that has not yet recovered from the shock of an exciting one, occurs in a sketch by Balzac. His hero writes to a mistress who has cooled towards him the following letter:

（62）能够印证和阐释此说法的类似例证多种多样。渐强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显著效果是通过将把一系列意象最突出的一个放在最后来实现的，颠倒这次序就会产生缺陷，且常常是荒唐的缺陷。这是由之前提及的普遍法则所决定的。正如刚看完日光不会马上感知到火光，但先看火光再看日光，二者往往均被感知。所以，我们在接受了绝妙、有力、或者糟糕的思想之后，就容易忽略不那么绝妙、不那么有力、或不那么糟糕的思想了。但若颠倒一下次序，二者的妙处则均能被领会。我们还可从对语这一修辞中觉察出同样的普遍真理。两个对立思想按某一显著特性互为对峙地排在一起，定然效果显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给所涉及的官能以短暂放松。对于一系列具有普通特征的意象，大脑若是感受中等程度的尊重、认可或美好，那回应的也是无关紧要、无价值或十分丑陋的意象；或许，感受尊重、认可和审美美好的官能此时会因无事可做而恢复全力，进而迅速投入领会接下来的宏大、绝妙或者优美意象，其效甚优。反之，要创造由于极度无关紧要而产生的荒谬印象，如果把它置于极其显著的事物之后，这一荒谬印象也许会格外强烈：特别是当词组的形式暗示了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事物将接踵而至。在人的意识尚未从扣人心弦的震撼中恢复过来之前，由向他呈现一个微不足道的概念而产生的效果的例子，出现在巴尔扎克的一篇概述中：他的主人公给已冷淡自己的情人写了如下一封信：

Madame, Your conduct causes me much

surprise and no less distress. Not content with rending my heart with your disdain, you have been so little thoughtful as to retain a toothbrush, which my means will not permit me to replace, my estates being mortgaged beyond their value.

“夫人，你的举止令我惊讶不已，亦同样使我深感忧伤。不愿再因你的轻蔑而心碎，你从不曾想过留下一把牙刷，我的收入容不得我再换一把，我的不动产已被超值抵押。

Adieu, too fair and too ungrateful friend! May we meet again in a better world.

“再见，多么可爱、多么忘恩负义的朋友！愿我们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重逢。

Charles Edward

“查尔斯·爱德华”

Sec. 63. Thus we see that the phenomena of Climax, Antithesis, and Anticlimax, alike result from this general principle. Improbable as these momentary variations in susceptibility may seem, we cannot doubt their occurrence when we contemplate the analogous variations in the susceptibility of the senses. Referring once more to

phenomena of vision, every one knows that a patch of black on a white ground looks blacker, and a patch of white on a black ground looks whiter, than elsewhere. As the blackness and the whiteness must really be the same, the only assignable cause for this is a difference in their actions upon us, dependent upon the different states of our faculties. It is simply a visual antithesis.

（63）由此我们看到，渐强、对语及突降等诸多现象均源自这一普遍原则。尽管这些敏感性的瞬时变化看似不太可能，但当我们仔细体察诸多细微可感的敏感性变化时，我们定然不会怀疑其存在。再引视觉现象为例。众人皆知白色背景映衬下的黑点会显得更黑，黑色背景映衬之下的白点会显得更白。这里的黑与白原本无异，造成上述现象唯一可归结的原因，就是它们因我们官能的不同状态而对我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只是视觉对照。

iii. Need of Variety

第三节　多样性需求

Sec. 64. But this extension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economy—this further condition to effective composition, that the sensitiveness of the faculties must be continuously husbanded—includes much more than has been yet hinted. It implies not only that certain arrangements and certain juxtapositions of connected ideas are best; but that some modes of dividing and presenting a subject will be more striking than others; and that, too, irrespective of its logical cohesion. It shows why we must progress from the less interesting to the more interesting; and why not only the composition as a whole, but each of its successive portions, should tend towards a climax. At the same time, it forbids long continuity

of the same kind of thought, or repeated production of like effects. It warns us against the error committed both by Pope in his poems and by Bacon in his essays—the error, namely, of constantly employing forcible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it points out that as the easiest posture by and by becomes fatiguing, and is with pleasure exchanged for one less easy, so, the most perfectly-constructed sentences will soon weary, and relief will be given by using those of an inferior kind.

（64）但是，节省这条普遍原则——有效写作的深层条件，即一定要不断节省官能的感知力——其涵盖内容还远不止以上所示。它不仅暗示了某些排列和并置关联概念的方式为最佳，还暗示一些划分和呈现主题的方式是优于另一些方式的；且不考虑它逻辑上的连贯性。它表明文章发展为什么要先平淡后生动；为什么文章整体和文章每个连续部分都需趋向高潮。与此同时，它杜绝同类思想的长时延续，或类似效果的重复制造。它告诫我们别犯蒲柏在其诗歌中和培根在其随笔中所犯的错误——连续不断采用强有力的表达形式：它还指出，就如同再舒适的姿势时间长了也会令人疲惫，换个不那么舒适的姿势反倒令人感觉轻松，如果使用过多句法构造太完美的句子，人看了很快就会生厌，用些次等句式反倒令人觉得轻松。

Sec. 65. Further, we may infer from it not only that we should avoid generally combining our words in one manner, however good, or working out our figures and illustrations in one way, however telling; but that we should avoid anything like uniform adherence, even to the wider conditions of effect. We should not make every section of our subject progress in interest; we should not always rise to a climax. As we saw that, in single sentences, it is but rarely allowable to fulfil all the conditions to strength; so, in the larger sections of a composition we must not often conform entirely

to the law indicated. We must subordinate the component effect to the total effect.

（65）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不仅要避免只用一种方式遣词，无论这方式多么巧妙；或者是要避免只用一种方法修辞和举例，无论这方法多么具有说服力；而且还要避免任何雷同的行文方式，即便这方式是为了更为广泛地获取效果。切勿把主题的每一部分都叙写得越来越有序；切勿让文章总朝着高潮发展。诚如我们所见，单个句子鲜少能满足所有条件以达到最强效果。同样，在文章这个更大的单元块里也不应处处遵循写作法则。局部效果必须服从整体效果。

Sec. 66. In deciding how practically to carry out the principles of artistic composition, we may derive help by bearing in mind a fact already pointed out—the fitness of certain verbal arrangements for certain kinds of thought. That constant variety in the mode of presenting ideas which the theory demands, will in a great degree result from a skilful adaptation of the form to the matter. We saw how the direct or inverted sentence is spontaneously used by excited people; and how their language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figures of speech and by extreme brevity. Hence these may with advantage predominate in emotional passages; and may increase as the emotion rises. On the other hand, for complex ideas, the indirect sentence seems the best vehicle. In conversation, the excitement produced by the near approach to a desired conclusion, will often show itself in a series of short, sharp sentences; while, in impressing a view already enunciated, we generally make our periods voluminous by piling thought upon thought. These natural modes of procedure may serve as guides in writing. Keen observation and skilful analysis would, in like manner, detect further peculiarities of expression produced by other attitudes of

mind; and by paying due attention to all such traits, a writer possessed of sufficient versatility might make some approach to a completely-organized work.

（66）在决定如何实际运用艺术创作的这些原则时，牢记上文提到的一个事实，将会大有裨益，即特定思想须以特定的语序排列。变化理论要求不断变化思想表达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娴熟运用形式以服务内容。我们已发现人激动时会不由自主使用直接句或倒装句，还发现他们的语言具有修辞丰富、极为简洁的特征。因此，在表达强烈情感的篇章中，这样的句子可能居多；且随情感升华而增加。但对于复杂思想而言，间接句似乎是最佳载体。在对话中，因即将实现所期待的结论而产生的激动情绪，常通过一系列短小、强烈的语句表现出来；而阐述已发表的观点时，我们常会通过堆积思想而使语句冗长。这些自然流露的模式，可以充当写作指南。同样，敏锐的观察和娴熟的分析能探测出其他思想态度产生的更为特别的表达。对所有这些特征适当加以留意，足够有才华的作家便能写出行文结构十分完美的作品。

iv. The Ideal Writer

第四节　理想的作家

Sec. 67. This species of composition which the law of effect points out as the perfect one, is the one which high genius tends naturally to produce. As we found that the kinds of sentences which are theoretically best, are those generally employed by superior minds, and by inferior minds when excitement has raised them; so, we shall find that the ideal form for a poem, essay, or fiction, is that which the ideal writer would evolve spontaneously. One in whom the powers of expression fully responded to the state of feeling,

would unconsciously use that variety in the mode of presenting his thoughts, which Art demands. This constant employment of one species of phraseology, which all have now to strive against, implies an undeveloped faculty of language. To have a specific style is to be poor in speech. If we remember that, in the far past, men had only nouns and verbs to convey their ideas with, and that from then to now the growth has been towards a greater number of implements of thought, and consequently towards a greater complexity and variety in their combinations; we may infer that we are now, in our use of sentences, much what the primitive man was in his use of words; and that a continuance of the process that has hitherto gone on, must produce increasing heterogeneity in our modes of expression. As now, in a fine nature, the play of the features, the tones of the voice and its cadences, vary in harmony with every thought uttered; so, in one possessed of a fully developed power of speech, the mould in which each combination of words is cast will similarly vary with, and be appropriate to the sentiment.

（67）此效果法则认定的佳作往往是杰出天才挥墨创作出的佳品。诚如我们所发现的，理论上的佳句，往往是智慧超群者的创作和普通人激动时的自然流露。我们由此会发现，理想的诗篇、随笔或小说，是理想作家自发创作出来的作品。作家的表达力量若能完全顺应其在传达思想时的情感状态，那作家就会不自觉地运用艺术所要求的多变模式。这种连续运用一类措词的方式，表现的是语言官能的欠缺，现在大家都须抵制。只拥有某种特定风格，即为语言贫乏。大家应该还记得，在远古时代，人们只用名词和动词表达思想，从那时至今，表达思想的手段越来越多，因而组合形式越来越复杂、越多样；我们或许可据此推断，现在运用句子的方式类似古人运用词汇的方式；从那时至今，这一直持续的过程使得我们的表达方式愈加丰富多彩。现在看来，在一部佳作中，特征的演绎、基调的抑扬和韵律，均与表达的每一思想相得益彰。因此，具有足够语言力量的佳作的每一

个词语组合，同样会随情感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又能顺应情感。

Sec. 68. That a perfectly endowed man must unconsciously write in all styles, we may infer from considering how styles originate. Why is Johnson pompous, Goldsmith simple? Why is one author abrupt, another rhythmical, another concise? Evidently in each case the habitual mode of utterance must depend upon the habitual balance of the nature. The predominant feelings have by use trained the intellect to represent them. But while long, though unconscious, discipline has made it do this efficiently, it remains from lack of practice, incapable of doing the same for the less active feelings; and when these are excited, the usual verbal forms undergo but slight modifications. Let the powers of speech be fully developed, however—let the ability of the intellect to utter the emotions be complete; and this fixity of style will disappear. The perfect writer will express himself as Junius, when in the Junius frame of mind; when he feels as Lamb felt, will use a like familiar speech; and will fall into the ruggedness of Carlyle when in a Carlylean mood. Now he will be rhythmical and now irregular; here his language will be plain and there ornate; sometimes his sentences will be balanced and at other times unsymmetrical; for a while there will be considerable sameness, and then again great variety. His mode of expression naturally responding to his state of feeling, there will flow from his pen a composition changing to the same degree that the aspects of his subject change. He will thus without effort conform to what we have seen to be the laws of effect. And while his work presents to the reader that variety needful to prevent continuous exertion of the same faculties, it will also answer to the description of all highly organized products, both of man and of nature: it will be not a series of like parts simply placed in juxtaposition, but one whole made up of unlike parts that are

mutually dependent.

（68）颇具天赋的人定然会不自觉地用各种风格写作，这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讨论风格的兴起而推断出来。为什么约翰逊风格浮华而哥尔德斯密斯风格简约？为什么此作家的作品突兀，彼作家的作品富有节律，而另一作家的作品简洁呢？显然，无论何种情况，语言表述的习惯模式，一定是依赖惯常的天性上的协调。作家主要的感觉经过实践的熏陶得以再现。但是，尽管长时间无意识的熏陶虽然让作家有效地进行了这种再现，但若缺乏实践，那些不甚活跃的感觉便难以以同样的方式再现；感觉被激发出来后，常见的语言形式也只是发生了细微的改变。无论如何，让言语的力量充分发挥吧！——让作家抒发情感的能力不断完善吧！这样以来，风格一成不变的现象就会烟消云散。一位完美的作家如果体会到了朱尼厄斯的心绪，他可以像朱尼厄斯那样表达自己；若是有兰姆一样的感觉，他同样会用类似兰姆的亲近语言；若有卡莱尔般的情绪时，他也会和卡莱尔一样粗犷。完美作家的作品，会时而有节律时而无节律，语言时而平实时而华丽，句式时而对称时而多样；有时相差无几有时又迥然不同。天才作家的表达方式能够极其自然地反映自己的情感状态，笔端流泻的文章随自己表达主题的不同而变化。因此他可以毫不费力地遵从我们所探讨的效果法则。他的作品向读者呈现必要的变化以避免他们不断动用同样的官能，与此同时，这作品一定具有结构严谨的特点，无论这作品描述的是人物还是自然：它不是一系列类似片段的简单堆砌，而是不同片段的有机组合和相互依存。

End

完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Novum Organum

新工具

Francis Bacon

弗朗西斯·培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新工具

Novum Organum

弗朗西斯·培根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Author's Preface 作者序
- Book One 卷一
- Book Two 卷二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Author's Preface

作者序

Those who have taken upon them to lay down the law of nature as a thing already searched out and understood, whether they have spoken in simple assurance or professional affectation, have therein done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s great injury. For as they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inducing belief, so they have been effective in quenching and stopping inquiry; and have done more harm by spoiling and putting an end to other men's efforts than good by their own. Those on the other hand who have taken a contrary course, and asserted that absolutely nothing can be known—whether it were from hatred of the ancient sophists, or from uncertainty and fluctuation of mind, or even from a kind of fullness of learning, that they fell upon this opinion—have certainly advanced reasons for it that are not to be despised; but yet they have neither started from true principles nor rested in the just conclusion, zeal and affectation having carried them much too far. The more ancient of the Greeks (whose writings are lost) took up with better judgment a position 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s—between the presumption of pronouncing on everything, and the despair of comprehending anything; and though frequently and bitterly complaining of the difficulty of inquiry and the obscurity of things, and like impatient horses champing at the bit, they did not the less follow up their object and engage with nature, thinking (it seems) that this very question—viz., whether or not anything can be known—was to be settled not by arguing, but by trying. And yet they too, trusting entirely to the force of their understanding, applied no rule, but made everything turn upon hard thinking and

perpetual working and exercise of the mind.

有些人自作主张，将自然之法则界定为已为人知、已为人解的东西；他们是轻率地作此论断也好，故作专业地说教也罢，这样的行径都给哲学及各门科学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他们凭此成功地取得了人们的信任，也因此极大地压抑和遏止了人们的探寻；他们自己的努力虽说给人们带来了益处，但也破坏和终止了他人的努力成果，由此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益处。而有些人反其道而行之，断言万事不可尽知——这种论断可能源于他们对古代诡辩家的憎恨，也可能源于其本身心态的游移不定，甚至可能是他们饱学之后得出的结论；他们必定也解释过何以会得出这种论断，其中的种种原因也未必尽遭人们鄙夷；但他们既没有从真理性法则出发，也没有归结出正确的结论——由于满怀热忱又矫揉造作，他们最终离题万里。越是早期的希腊人（其作品现已轶失），越能作出更好的判断。他们在两个极端之间采取了折中立场：这两个极端分别是认为万物皆可知的擅断论和断定万物不可知的绝望论。他们尽管经常痛陈探寻之艰辛，事物之难解，但依然像不安的马儿不屈服于嚼子的束缚一样，绝不因此放弃自己追逐的目标，也绝不会减少对自然的探寻；他们认为（或似乎认为）万物可知与否这个问题并非靠辩论就能解决，而要靠实验。然而，他们也完全依赖自己的理解力，没有遵循任何规律，将一切都诉诸苦思冥想以及心灵的永恒运作。

Now my method, though hard to practice, is easy to explain; and it is this. I propose to establish progressive stages of certainty. The evidence of the sense, helped and guarded by a certain process of correction, I retain. But the mental operation which follows the act of sense I for the most part reject; and instead of it I open and lay out a new and certain path for the mind to proceed in, starting directly from the simple sensuous perception. The necessity of this was felt, no doubt, by those who attributed so much importance to

logic, showing thereby that they were in search of helps for the understanding, and had no confidence in the native and spontaneous process of the mind. But this remedy comes too late to do any good, when the mind is already, through the daily intercourse and conversation of life, occupied with unsound doctrines and beset on all sides by vain imaginations. And therefore that art of logic, coming (as I said) too late to the rescue, and no way able to set matters right again, has had the effect of fixing errors rather than disclosing truth. There remains but one course for the recovery of a sound and healthy condition—namely, that the entire work of the understanding be commenced afresh, and the mind itself be from the very outset not left to take its own course, but guided at every step; and the business be done as if by machinery. Certainly if in things mechanical men had set to work with their naked hands, without help or force of instruments, just as in things intellectual they have set to work with little else than the naked forces of the understanding, very small would the matters have been which, even with their best efforts applied in conjunction, they could have attempted or accomplished. Now (to pause a while upon this example and look in it as in a glass) let us suppose that some vast obelisk were (for the decoration of a triumph or some such magnificence) to be removed from its place, and that men should set to work upon it with their naked hands, would not any sober spectator think them mad? And if they should then send for more people, thinking that in that way they might manage it, would he not think them all the madder? And if they then proceeded to make a selection, putting away the weaker hands, and using only the strong and vigorous, would he not think them madder than ever? And if lastly, not content with this, they resolved to call in aid the art of athletics, and required all their men to come with hands, arms, and sinews well anointed and medicat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art, would he not cry out that they

were only taking pains to show a kind of method and discretion in their madness? Yet just so it is that men proceed in matters intellectual—with just the same kind of mad effort and useless combination of forces—when they hope great things either from the number and cooperation or from the excellency and acuteness of individual wits; yea, and when they endeavor by logic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as a kind of athletic art) to strengthen the sinews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yet with all this study and endeavor it is apparent to any true judgment that they are but applying the naked intellect all the time; whereas in every great work to be done by the hand of man it is manifestly impossible, without instruments and machinery, either for the strength of each to be exerted or the strength of all to be united.

而我的方法，尽管实施起来有困难，解释起来却很容易；解释如下：我提议建立不同层级的确定性。对于感官的运用，在经过一系列的修正后，我是予以保留的。但是那些由感官引起的心理活动，我大都加以排斥；取而代之的是一条为心灵开辟的确定的新道路，这条道路直接以简单的感官知觉为起点。这样做的必要性，那些注重逻辑的人无疑早已体会到了，这也表明他们在为人的理解力寻求帮助，同时也表明他们对心灵自然自发的理解过程缺乏信心。然而这种补救措施来得太迟了，丝毫没有效果。因为这个时候，心灵早已被日常的交往和谈话所浸染，不仅耽于谬误的学说，而且充满了虚妄的想象。逻辑艺术由于来得太晚（如我所言），已然于事无补，无法使事情重归正路。也因此，逻辑非但没有发现真理之效，反而有固化谬误之果。如今要恢复到一个健全健康的状态，唯有一辙可行——赋予理解过程一个全新的开始，从一开始就对心灵加以步步引导，不任其自然发展；而且行事也应如同机械一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人们在做体力劳动时，赤手空拳而不借助于任何工具之力；在做脑力劳动时，也仅凭理解力而几乎不假借任何外力，那么即使联合起来倾其所能，他们所能尝试或成就的事情也极为有限。（让我们略作暂停，探究一例。）现

在假设有一座巨大的方尖碑（因表彰胜利或其它诸如此类的要事）须被挪至他处，而人们竟然赤手空拳做这项工作，那么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是不是会认为他们疯了呢？假设他们派去更多的人，以为这样就可把事情办妥，那么这个旁观者是否会认为他们更加疯狂了呢？假设他们进而再有所筛选，剔除老弱，只用精壮，那么这个旁观者是否会认为他们较之以前疯得更厉害了呢？最后，假设他们对此仍不满意，决定求助于竞技之术，责成所有人遵守竞技的规则，在手臂肌肉上抹油搽药，那么这位旁观者岂不是要大喊，说这些人不过是费尽苦心使自己的疯狂显得更有章法、更有套路呢？而在智力问题上，人们同样也是按这种方式行事的——发疯似地努力，徒劳无益地凝聚各种力量——以求凭借人数的增加、多方的合作或个人卓越与敏锐的智慧，来取得丰功伟绩；是的，他们还企图用逻辑来提高理解力，正如运用竞技之术来增强筋骨力量一样。然而，尽管他们这样费心尽力，在任何有正确判断力的人看来，他们只不过是一直在单纯地使用智力罢了。每一项巨大工作，若仅仅依靠人力而不借助工具和机械，无论是单凭个人力量还是靠大家共同施力，都是绝然不可能完成的。

Upon these premises two things occur to me of which, that they may not be overlooked, I would have men reminded. First, it falls out fortunately as I think for the allaying of contradictions and heartburnings, that the honor and reverence due to the ancients remains untouched and undiminished, while I may carry out my designs and at the same time reap the fruit of my modesty. For if I should profess that I, going the same road as the ancients, have something better to produce, there must needs have been some comparison or rivalry between us (not to be avoided by any art of words) in respect of excellency or ability of wit; and though in this there would be nothing unlawful or new (for if there be anything misapprehended by them, or falsely laid down, why may not I, using a liberty common to all, take exception to it?) yet the contest, however just and allowable, would have been an unequal one

perhaps, in respect of the measure of my own powers. As it is, however (my object being to open a new way for the understanding, a way by them untried and unknown), the case is altered: party zeal and emulation are at an end, and I appear merely as a guide to point out the road—an office of small authority, and depending more upon a kind of luck than upon any ability or excellency. And thus much relates to the persons only. The other point of which I would have men reminded relates to the matter itself.

在这些前提下，我还想起要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两件事。第一，在思考如何消除人们的矛盾与妒忌时，我幸运地发现：古人应得的荣誉与崇敬既未受到撼动，也未受到减损，而我既可实施自己的构想，同时又可保持谦逊。因为如果我宣称说，我和古人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而且我的发现更具价值，那么在我与古人之间必定会产生对比或较量（无论用何种措辞都无法避免），看谁的智慧更卓越、更有用。这种较量无可厚非，也并不鲜见（因为如果古人理解有误，或做出的规定有误，我为什么不能提出异议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自由）。然而尽管如此，若仅仅凭借我自己的力量，无论这种较量多么正当，或许都是不公平的。不过事实上（由于我的目的是为理解力开辟一条新路，一条古人未曾尝试、未曾知晓的道路），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里没有党派的狂热和斗争，而我也只不过是做个指路的向导——这个角色职权很小，并且更多的是靠运气，而不是靠能力或才智。以上这点仅仅是关于人自身的。我要提醒人们的另外一点则是有关事情本身的。

Be it remembered then that I am far from wishing to interfere with the philosophy which now flourishes, or with any other philosophy more correct and complete than this which has been or may hereafter be propounded. For I do not object to the use of this received philosophy, or others like it, for supplying matter for

disputations or ornaments for discourse—for the professor's lecture and for the business of life. Nay, more, I declare openly that for these uses the philosophy which I bring forward will not be much available. It does not lie in the way. It cannot be caught up in passage. It does not flatter the understanding by conformity with preconceived notions. Nor will it come down to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vulgar except by its utility and effects.

希望大家记住，无论是对当今盛行的哲学，还是对已经或今后可能提出的更为正确、更为完善的哲学，我都绝无干涉之意。因为我不反对利用这已为人接受的哲学或其它类似的哲学来为辩论提供话题，或为言语添彩——无论是在教授的课堂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非但如此，我还要坦诚地声明一点，本人提出的哲学几乎不适用于以上用途，也绝非近在眼前、唾手可得；既不会去迎合业已存在的观念来恭维人们的理解力，也不会自降身价以求得平民的共鸣，尽管我的哲学会对他们有实用价值。

Let there be therefore (and may it be for the benefit of both) two streams and two dispensations of knowledge, and in like manner two tribes or kindreds of students in philosophy—tribes not hostile or alien to each other, but bound together by mutual services; let there in short be one method for the cultivation, another for the invention, of knowledge.

那么，就让知识存在两个支流或两个流派（但愿这对二者均有益处）；同样地，哲学的门徒也分为两个门户或两个宗派——不过二者并非相异或彼此敌对，而是由于对哲学的共同信奉而彼此联结；至于对待知识的方法，简单来说有两种，一是培育知识，二是创造知识。

And for those who prefer the former, either from hurry or from considerations of business or for want of mental power to take in and embrace the other (which must needs be most men's case), I wish that they may succeed to their desire in what they are about, and obtain what they are pursuing. But if there be any man who, not content to rest in and use the knowledge which has already been discovered, aspires to penetrate further; to overcome, not an adversary in argument, but nature in action; to seek, not pretty and probable conjectures, but certain and demonstrable knowledge—I invite all such to join themselves, as true sons of knowledge, with me, that passing by the outer courts of nature, which numbers have trodden, we may find a way at length into her inner chambers. And to make my meaning clearer and to familiarize the thing by giving it a name, I have chosen to call one of these methods or ways *Anticipation of the Mind* , the other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

有些人偏向前一种方法，或许是因为心急，或许是出于对现实事务的考虑，又或许是由于智力平平，不足以理解并采纳后一种方法（想必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对于这些人，我祝他们能得偿所愿。但假如有那么一些人，不满足于坐享其成，接受已然被他人发掘出来的知识，而是渴望进一步探索，不求于争辩之中战胜对手，只求在行动中征服自然；不止步于看似合理的推论，而是追求准确可证之知识。对于这些人，我请他们和我一道，做真正的知识之子，去穿过那无数前人走过的自然之外院，而最终我们或许可以到达自然之内庭。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我的意思，也为了使这两种方法或路径更容易为人们所熟悉，我决定为它们命名，一个叫做“臆测人心”，另一个叫做“阐释自然”。

Moreover, I have one request to make. I have on my own part made it my care and study that the things which I shall propound

should not only be true, but should also be presented to men's minds, how strangely so ever preoccupied and obstructed, in a manner not harsh or unpleasant. It is but reasonable, however (especially in so great a restoration of learning and knowledge), that I should claim of men one favor in return, which is this: if anyone would form an opinion or judgment either out of his own observation, or out of the crowd of authorities, or out of the forms of demonstration (which have now acquired a sanction like that of judicial laws), concerning these speculations of mine, let him not hope that he can do it in passage or by the by; but let him examine the thing thoroughly; let him make some little trial for himself of the way which I describe and lay out; let him familiarize his thoughts with that subtlety of nature to which experience bears witness; let him correct by seasonable patience and due delay the depraved and deep-rooted habits of his mind; and when all this is done and he has begun to be his own master, let him (if he will) use his own judgment.

此外，我还有一个请求。就我自己而言，必定会认真勤勉，力求使提出的东西不仅真实可靠，而且不会让人感到不悦，好让那些心智被扭曲或被蒙蔽的人接受起来也不太费劲。然而，倘若有任何人对我的推测有所评价和判断，无论这评价和判断是源于自己的观察，还是来自某些权威人士，亦或是得到了亲自论证（如今这些形式已经如法律一般得到人们认可），我就要请求人们帮我一个忙作为报答，而且我觉得这毫无不妥之处（尤其在这样一个学术与知识复兴的年代）。我的请求便是：他不可以心不在焉，以为可以走马观花；他要深入思考；要亲身体验我所描绘和规划之路径；他要能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与自然之微妙（已由经验所验证）相契合；他要有适当的耐心，在适当延搁之后，能改正心中根深蒂固的腐化的思维定式；当他能做到这一切，并且开始成为自己的主人时，他（如果愿意的话）就应该作出自己的决断了。

Book One

卷一

I

一

Man, being the servant and interpreter of Nature, can do and understand so much and so much only as he has observed in fact or in thought of the course of nature. Beyond this he neither knows anything nor can do anything.

人只能顺从自然和阐释自然，他所能做的、所能理解的，仅仅局限于他对自然规律的实际观察或者思考所得。除此之外，他一无所知，也无能为力。

II

二

Neither the naked hand nor the understanding left to itself can effect much. It is by instruments and helps that the work is done, which are as much wanted for the understanding as for the hand.

And as the instruments of the hand either give motion or guide it, so the instruments of the mind supply either suggestion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r cautions.

徒手施行难以奏效，仅凭理解亦难有效果。动手做事需要工具和他助；动脑理解亦然，工具和他助同样不可或缺。手所需的工具，要么促人行动，要么指导行动；心所需的工具，要么给理解提供建议，要么对理解予以警告。

III

三

Human knowledge and human power meet in one; for where the cause is not known the effect cannot be produced. Nature to be commanded must be obeyed; and that which in contemplation is as the cause is in operation as the rule.

人类的知识和力量实属同一；因为不知其因，所以难有其果。支配自然，必须顺从自然；但凡思辨之中为原因者，行为之中则必为法则。

IV

四

Toward the effecting of works, all that man can do is to put together or put asunder natural bodies. The rest is done by nature working within.

要想事有成效，人只能整合或分解自然物体。其他则通过自然内部运作来完成。

V

五

The study of nature with a view to works is engaged in by the mechanic, the mathematician, the physician, the alchemist, and the magician; but by all (as things now are) with slight endeavor and scanty success.

若论成事，从事自然研究的人有技师、数学家、医师、炼丹术士和魔术师；然而（按照目前情况看）他们都还努力不够，而且成功甚少。

VI

六

It would be an unsound fancy and self-contradictory to expect that things which have never yet been done can be done except by means which have never yet been tried.

期待以未曾尝试之手段，成就未曾成就之事情，实属空想，亦是自相矛盾。

VII

七

The productions of the mind and hand seem very numerous in books and manufactures. But all this variety lies in an exquisite subtlety and derivations from a few things already known, not in the number of axioms.

心有所思而著书，手有所施而成物，二者所成似乎数不胜数。然而凡此种种皆源于少数已知事物的精细衍化，而不在于公理格言数量上的多寡。

VIII

八

Moreover, the works already known are due to chance and experiment rather than to sciences; for the sciences we now possess are merely systems for the nice ordering and setting forth of things already invented, not methods of invention or directions for new works.

况且，即使是已知的成就，也是机遇及实验所致，而非科学的功劳；因为我们现有的科学只不过是将已有的东西进行精细组合与设置，并加以体系化而已，所以其既非发明创造之法，也非新成果之指导。

IX

九

The cause and root of nearly all evils in the sciences is this—that while we falsely admire and extol the powers of the human mind we neglect to seek for its true helps.

科学中的一切弊端，根源几乎都在于此——对人类心灵的力量，我们在虚伪地恭维之余，未能寻求其实际的帮助。

X

十

The subtlety of nature is greater many times over than the subtlety of the senses and understanding; so that all those specious meditations, speculations, and glosses in which men indulge are quite from the purpose, only there is no one by to observe it.

若论微妙，自然远胜人的感官和理解力许多倍；因此，人们所迷恋的一切沉思、揣测和解释都似是而非、离题万里，只是无旁人注意到而已。

XI

十一

As the sciences which we now have do not help us in finding out new works, so neither does the logic which we now have help us in finding out new sciences.

现有的科学无助于我们发现新成果；同样，现有的逻辑也无助于我们发现新科学。

XII

十二

The logic now in use serves rather to fix and give stability to the errors which have their foundation in commonly received notions than to help the search after truth. So it does more harm than good.

现行的逻辑，与其说有助于探寻真理，不如说有助于固化谬误，而此般谬误又建立在广为接受的概念的基础上。因此，这种逻辑害多益少。

XIII

十三

The syllogism is not applied to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sciences, and is applied in vain to intermediate axioms, being no match for the subtlety of nature. It commands assent therefore to the proposition, but does not take hold of the thing.

将三段论用到科学的第一性原理上并不合适，即使是用到中间性公理上也属枉然；因为三段论难以匹敌自然的微妙。因此，三段论虽使人赞同命题，却不能把握事物本身。

XIV

十四

The syllogism consists of propositions, propositions consist of words, words are symbols of notions. Therefore if the notions themselves (which is the root of the matter) are confused and overhastily abstracted from the facts, there can be no firmness in the superstructure. Our only hope therefore lies in a true induction.

三段论由各个命题构成，命题由字词构成，字词代表概念。所以，如果概念本身（此乃事之根本）混淆不清，而且是从事实中草率抽象出来的，那么其上层建筑也就不牢靠。因此，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于采用一种真正的归纳法。

XV

十五

There is no soundness in our notions, whether logical or physical. Substance, Quality, Action, Passion, Essence itself, are not sound notions; much less are Heavy, Light, Dense, Rare, Moist, Dry, Generation, Corruption, Attraction, Repulsion, Element, Matter, Form, and the like; but all are fantastical and ill defined.

我们的许多概念，无论是逻辑概念，还是物理概念，都不够严谨。物质、属性、行为、情感以及本质本身都不是严谨的概念。轻、重、浓、淡、湿、燥、生成、腐败、吸引、排斥、元素、物质和形式等诸般概念更不严谨。这些概念纯属空想，而且界定有误。

XVI

十六

Our notions of less general species, as Man, Dog, Dove, and of the immediate perceptions of the sense, as Hot, Cold, Black, White, do not materially mislead us; yet even these are sometimes confused by the flux and alteration of matter and the mixing of one thing with another. All the others which men have hitherto adopted are but wanderings, not being abstracted and formed from things by proper methods.

我们有些种属概念，意义较窄，比如人、狗、鸽等；还有些概念来自感官的直观感受，比如冷、热、黑、白等，这些概念虽不至于让我们产生太大的错觉，但有时也因物质的流变以及事物的彼此掺合而变得混淆不清。迄今为止，人们使用的其他一切概念，都不过是些随意散漫的概念，这是因为人们在从事物中抽象出概念时使用的方法不当。

XVII

十七

Nor is there less of willfulness and wander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xioms than in the formation of notions, not excepting even those very principles which are obtained by

common induction; but much more in the axioms and lower propositions educed by the syllogism.

公理建构中的随意性和散漫性不亚于概念形成中的随意性和散漫性，即使是那些通过普遍归纳法得来的原理也不例外；但是由三段论推导出来的公理和低级命题中的随意性和散漫性更为常见。

XVIII

十八

The discoveries which have hitherto been made in the sciences are such as lie close to vulgar notions, scarcely beneath the surface. In order to penetrate into the inner and further recesses of nature, it is necessary that both notions and axioms be derived from things by a more sure and guarded way, and that a method of intellectual operation be introduced altogether better and more certain.

迄今为止，科学中的发现都跟一些通俗概念比较接近，仅仅停留于表面。要洞察自然的内部和隐微之处，概念和公理必须通过一种更有把握、更为慎重的方法，从事物中推导出来，而且必须引进更好、更确切的思维方式。

XIX

十九

There are and can be only two ways of searching into and discovering truth. The one flies from the senses and particulars to the most general axioms, and from these principles, the truth of which it takes for settled and immovable, proceeds to judgment and to the discovery of middle axioms. And this way is now in fashion. The other derives axioms from the senses and particulars, rising by a gradual and unbroken ascent, so that it arrives at the most general axioms last of all. This is the true way, but as yet untried.

追求真理和发现真理有且仅有两种方法。一是从感官和特殊情况跳跃到最普遍的公理，再从这些包含了恒定不变真理的公理当中，形成判断，进而发现一些中间性公理。这是目前流行的方法。二是从感官和特殊情况中推导出公理，通过渐进而不间断的方式上升，最后才得到最普遍的公理。这才是正确的方法，但迄今未曾有人尝试过。

XX

二十

The understanding left to itself takes the same course (namely, the former) which it takes in accordance with logical order. For the mind longs to spring up to positions of higher generality, that it may find rest there, and so after a little while wearies of experiment. But this evil is increased by logic, because of the order and solemnity of its disputations.

理解力如果任其自然，就会采取与逻辑顺序相符合的方法（即第一种方法）。因为心灵总是渴望跃升，不到更高的普遍性决不甘心；到达之后立刻又对实验感到厌倦。但是这种弊病又因逻辑而加剧，因为逻辑论辩有自身的秩序性和严肃性。

XXI

二十一

The understanding left to itself, in a sober, patient, and grave mind, especially if it be not hindered by received doctrines, tries a little that other way, which is the right one, but with little progress, since the understanding, unless directed and assisted, is a thing unequal, and quite unfit to contend with the obscurity of things.

理解力如果任其自然，对于清醒、坚韧和严肃的心灵来说，也会尝试第二种方法，尤其是在理解力不受公认学说的阻碍时；这种方法虽然正确，但几乎无甚成效，因为理解力如果不加指导和帮助，就难以与事物的奥妙相匹敌，亦不适合与事物的奥妙相抗衡。

XXII

二十二

Both ways set out from the senses and particulars, and rest in the highest generalities; b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infinite. For the one just glances at experiment and particulars in passing, the other dwells duly and orderly among them.

两种方法都始于感官和特殊情况，止于最高的普遍性；但二者绝然不同。对待经验与特殊情况，第一种方法只是一瞥而过，第二种方法却是充分有序地全神贯注。

The one, again, begins at once by establishing certain abstract and useless generalities, the other rises by gradual steps to that which is prior and better known in the order of nature.

另外，前一种方法一开始时就建立各种抽象无用的普遍性，而后一种方法却循序渐进，上升到自然秩序中众所周知的普遍性。

XXIII

二十三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dols of the human mind and the Ideas of the divine. That is to say, between certain empty dogmas, and the true signatures and marks set upon the works of creation as they are found in nature.

人心生幻象，圣心生理念，二者之间，差异巨大。也就是说，那些空洞无物的教条与那些在自然中见到的、留在造物上的真实印迹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XXIV

二十四

It cannot be that axioms established by argumentation should avail for the discovery of new works, since the subtlety of nature is greater many times over than the subtlety of argument. But axioms duly and orderly formed from particulars easily discover the way to new particulars, and thus render sciences active.

指望由论辩得出的公理有助于发现新成果，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自然的微妙强于论辩的许多倍。但是公理如果是充分而且有序地从特殊中抽象出来的，那么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方法通向新的特殊性，从而给各门科学带来活力。

XXV

二十五

The axioms now in use, having been suggested by a scanty and manipular experience and a few particulars of most general

occurrence, are made for the most part just large enough to fit and take these in; and therefore it is no wonder if they do not lead to new particulars. And if some opposite instance, not observed or not known before, chance to come in the way, the axiom is rescued and preserved by some frivolous distinction; whereas the truer course would be to correct the axiom itself.

现行的公理，都是源自匮乏的、手工的经验和少数最常见的特殊情况，因此，这些公理大多数情况下都极为宽泛，与这些特殊性非常吻合，并可以将这些特殊性概括进来；所以，这些公理若是无法解释新的特殊性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碰巧出现某种相反的事例，无论是前所未见的，还是前所未闻的，那么这条公理就会借助无关痛痒的区分得以保存下来；然而正确的方法应是纠正公理本身。

XXVI

二十六

The conclusions of human reason as ordinarily applied in matters of nature, I call for the sake of distinction *Anticipations of Nature* (as a thing rash or premature). That reason which is elicited from facts by a just and methodical process, I call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

人类通常用推理来解决自然问题，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为了便于区分，我把它称为“臆测自然”（指事情欠斟酌或不够成熟）。而那种通过正确且井然有序的方法从事实中引导出来的推论，我把它称

为“阐释自然”。

XXVII

二十七

Anticipations are a ground sufficiently firm for consent, for even if men went mad all after the same fashion, they might agree one with another well enough.

博得他人认可必须有一个足够坚实的根基。臆测就是这个根基，因为即使人们都失去了理智，而且失去理智的方式都相同，他们彼此之间也可能达成足够的一致。

XXVIII

二十八

For the winning of assent, indeed, anticipations are far more powerful than interpretations, because being collected from a few instances, and those for the most part of familiar occurrence, they straightway touch the understanding and fill the imagination; whereas interpret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being gathered here and there from very various and widely dispersed facts, cannot suddenly strike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refore they must needs, in respect

of the opinions of the time, seem harsh and out of tune, much as the mysteries of faith do.

就博得他人认可而言，臆测确实远远比阐释更加有力，因为臆测是从为数不多的事例中归纳而成的，而且大多数都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例，因此，臆测直接触动人的理解力，充实人的想象力；而阐释是从散见各处的各种事实中推测出来的，无法出其不意地触动人的理解力，因此，在当时的舆论面前，阐释不可避免地显得刺耳、不协调，这与宗教信仰中那些神秘仪式颇为相似。

XXIX

二十九

In sciences founded on opinions and dogmas, the use of anticipations and logic is good; for in them the object is to command assent to the proposition, not to master the thing.

有些科学建立在主观臆断之上，其中臆测和逻辑运用得很有效，因为这些科学旨在令人同意命题，而非精通事物。

XXX

三十

Though all the wits of all the ages should meet together and combine and transmit their labors, yet will no great progress ever be made in science by means of anticipations; because radical errors in the first concoction of the mind are not to be cured by the excellence of functions and subsequent remedies.

即使聚集古今的所有智者，将他们所有的成果一并传承下来，仅凭臆测，科学也不会取得巨大的进步；因为人们内心与生俱来的根本性的错误难以通过努力和后天的补救加以纠正，无论这种努力和补救是多么优秀。

XXXI

三十一

It is idle to expect any great advancement in science from the superinducing and engrafting of new things upon old. We must begin anew from the very foundations, unless we would revolve forever in a circle with mean and contemptible progress.

指望在科学上通过添加、移植的方式来承旧创新，实属痴心妄想。我们如果不想永远在原地兜圈子，不想只满足于卑薄的进步，那么就必须从根基处重新开始。

XXXII

三十二

The honor of the ancient authors, and indeed of all, remains untouched, since the comparison I challenge is not of wits or faculties, but of ways and methods, and the part I take upon myself is not that of a judge, but of a guide.

古代作家，事实上是所有古代作家，他们的声誉并未受到损毁，因为我挑战的并不是才智或才干，而是方式和方法；我的角色不是法官，而是向导。

XXXIII

三十三

This must be plainly avowed: no judgment can be rightly formed either of my method or of the discoveries to which it leads, by means of anticipations (that is to say, of the reasoning which is now in use); since I cannot be called on to abide by the sentence of a tribunal which is itself on trial.

有一点必须公开说清楚：用臆测（即现行的推理）来对我的方法或者由此得出的发现加以评判，那是不恰当的；因为一个自身正在接受审判的法庭，岂能强迫我去服从它所做出的判决。

XXXIV

三十四

Even to deliver and explain what I bring forward is no easy matter, for things in themselves new will yet be apprehended with reference to what is old.

即使要传授和解释我自己的主张，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任何新生事物本身都要参照旧有事物才能为人理解。

XXXV

三十五

It was said by Borgia of the expedition of the French into Italy, that they came with chalk in their hands to mark out their lodgings, not with arms to force their way in. I in like manner would have my doctrine enter quietly into the minds that are fit and capable of receiving it; for confutations cannot be employed when the difference is upon first principles and very notions, and even upon forms of demonstration.

谈起法军远征意大利，博尔吉亚曾说，他们手持粉笔来标注宿营，而不是肩扛武器来开辟通道。同样，我也愿意让我的学说能悄然

进入那些宜于而又能够接受它的人心中；因为如果在第一性原理和概念本身上，甚至在论证形式上出现分歧，那么任何反驳都无济于事。

XXXVI

三十六

One method of delivery alone remains to us which is simply this: we must lead men to the particulars themselves, and their series and order; while men on their side must force themselves for a while to lay their notions by and begin to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facts.

对我们而言，只有一种传授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必须把人们引向特殊本身及其序列与秩序上；而人们自身必须迫使自己将个人观念暂且搁置一边，开始让自己熟悉具体事实。

XXXVII

三十七

The doctrine of those who have denied that certainty could be attained at all has some agreement with my way of proceeding at the first setting out; but they end in being infinitely separated and opposed. For the holders of that doctrine assert simply that nothing

can be known. I also assert that not much can be known in nature by the way which is now in use. But then they go on to destroy the authority of the senses and understanding; whereas I proceed to devise and supply helps for the same.

有些人否认可以获知确定性，这种学说最初与我行事的方法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最终二者全然不同，绝然对立。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全然断言，凡事皆不可知。那我也断言，用现行的方法也不可能更多地了解自然。不过，他们进一步诋毁感官和理解力的权威；而我却开始谋划着帮助感官和理解力树立权威。

XXXVIII

三十八

The idols and false notions which are now in possession of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have taken deep root therein, not only so beset men's minds that truth can hardly find entrance, but even after entrance is obtained, they will again in the very instauration of the sciences meet and trouble us, unless men being forewarned of the danger fortify themselves as far as may be against their assaults.

幻象和谬念如今控制了人的理解力，而且还根深蒂固，不仅困扰了人的心灵从而致使真理难以寻径而入，而且即使真理有径而入，这些幻象和谬念也会在科学建立之初来扰乱我们，除非人们得到危险预警，尽力增强自身能力以抵御其攻击。

XXXIX

三十九

There are four classes of Idols which beset men's minds. To these for distinction's sake I have assigned names, calling the first class *Idols of the Tribe* ; the second, *Idols of the Cave* ; the third, *Idols of the Market Place* ; the fourth, *Idols of the Theater* .

有四类幻象搅乱了人们的心灵。为了便于区分，我对它们进行了分类命名：第一类叫“部族幻象”，第二类叫“洞穴幻象”，第三类叫“市场幻象”，第四类叫“剧场幻象”。

XL

四十

The formation of ideas and axioms by true induction is no doubt the proper remedy to be applied for the keeping off and clearing away of idols. To point them out, however, is of great use; for the doctrine of Idols i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what the doctrine of the refutation of sophisms is to common logic.

用真正的归纳法形成的概念和公理无疑是对症良方，可以用来消除和肃清各类幻象。不过，将这些幻象辨别出来也是非常有用的；因

为用幻象说来解释自然，无异于用驳斥诡辩论的学说来代替普通逻辑。

XLI

四十一

The Idols of the Tribe have their foundation in human nature itself, and in the tribe or race of men. For it is a false assertion that the sense of man is the measure of things. On the contrary, all perceptions as well of the sense as of the mind are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the individual and not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is like a false mirror, which, receiving rays irregularly, distorts and discolors the nature of things by mingling its own nature with it.

部族幻象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植根于人类部族或种族之中。如果断言人的感官是衡量万物的量尺，那就错了。相反，一切知觉，无论是感官的，还是心灵的，都是根据个人的量尺而不是宇宙的量尺测定而来的。人类理解力犹如一块凹凸镜面，由于融入了自己的特性，无法正常接收光线，从而扭曲了事物的本质，改变了事物的本色。

XLII

四十二

The Idols of the Cave are the idols of the individual man. For everyone (besides the errors common to human nature in general) has a cave or den of his own, which refracts and discolors the light of nature, owing either to his own proper and peculiar nature; or to his education and conversation with others; or to the reading of books, and the authority of those whom he esteems and admires; or to the differences of impressions, accordingly as they take place in a mind preoccupied and predisposed or in a mind indifferent and settled; or the like. So that the spirit of man (according as it is meted out to different individuals) is in fact a thing variable and full of perturbation, and governed as it were by chance. Whence it was well observed by Heraclitus that men look for sciences in their own lesser worlds, and not in the greater or common world.

洞穴幻象是指个人幻象。每一个人（人性共有的错误除外）都有自己的洞穴，从而扭曲并改变自然本色。这要么归咎于他固有的特性；要么归咎于他所受的教育和社会交往；或者是归咎于他所阅读的书籍以及尊敬钦佩的权威；或者是归咎于每个人对所接收概念的不同反应——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心有成见、胸中有数，而有的人冷漠麻木、冥顽不化，诸如此类。这样，人的精气（人不同，秉承的精气也就不同）这种东西，实际是变化不定、易受干扰的，而且似乎还取决于机遇。因此，赫拉克利特所言极是：人们都是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追求科学，而不是公共的大天地。

XLIII

四十三

There are also Idols formed by the intercourse and association of men with each other, which I call Idols of the Market Place, on account of the commerce and consort of men there. For it is by discourse that men associate, and words are imposed according to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vulgar. And therefore the ill and unfit choice of words wonderfully obstructs the understanding. Nor do the definitions or explanations wherewith in some things learned men are wont to guard and defend themselves, by any means set the matter right.

还有一类幻象是人们通过彼此交往和彼此联系形成的，我将其称为市场幻象，取市场上人们买卖交往之意。因为人们是通过言语来交往的，而字词是按照平民的理解来使用的。字词选择错误或选择不当会极大地妨碍理解。在某些事情上，有学问的人习惯于使用各种定义或解释来自圆其说，但无论是定义还是解释，也终究不能解决问题。

But words plainly force and overrule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row all into confusion, and lead men away into numberless empty controversies and idle fancies.

但是字词明显地影响并操控着理解力，混淆了一切，将人们引入歧途，引入无数空洞的争论和无聊的空想之中。

XLIV

四十四

Lastly, there are Idols which have immigrated into men's minds from the various dogmas of philosophies, and also from wrong laws of demonstration. These I call Idols of the Theater, because in my judgment all the received systems are but so many stage plays, representing worlds of their own creation after an unreal and scenic fashion. Nor is it only of the systems now in vogue, or only of the ancient sects and philosophies, that I speak; for many more plays of the same kind may yet be composed and in like artificial manner set forth; seeing that errors the most widely different have nevertheless causes for the most part alike. Neither again do I mean this only of entire systems, but also of many principles and axioms in science, which by tradition, credulity, and negligence have come to be received.

最后，还有一类幻象，原本来自哲学的各种教条以及某些错误的论证方法，如今却移植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我把这类幻象称之为剧场幻象，因为我认为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都不过是众多的舞台剧而已，是按照虚幻的舞台布景样式创造出来的世界。我所说的既不仅限于现在时兴的各种体系，也不仅限于古代各种哲学及其宗派，因为可能还有更多类似的戏剧被编撰出来，并以同样的人为方式排演出来；错误不同，但原因相似。同样，我所指的还不仅限于那些完整的体系，也指科学中的许多原理和公理，这些都因为传统、轻信和疏忽而最终得到人们的接受。

But of these several kinds of Idols I must speak more largely and exactly, that the understanding may be duly cautioned.

但是至于上述各种幻象，我必须大谈细谈，唯此理解力方可得到及时的警示。

XLV

四十五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is of its own nature prone to suppose the existence of more order and regularity in the world than it finds. And though there be many things in nature which are singular and unmatched, yet it devises for them parallels and conjugates and relatives which do not exist. Hence the fiction that all celestial bodies move in perfect circles, spirals and dragons being (except in name) utterly rejected. Hence too the element of fire with its orb is brought in, to make up the square with the other three which the sense perceives. Hence also the ratio of density of the so-called elements is arbitrarily fixed at ten to one. And so on of other dreams. And these fancies affect not dogmas only, but simple notions also.

就本质而言，人类理解力易于猜想，猜想出来的世界秩序和规律比实际发现的秩序和规律还要丰富。自然界有许多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人们理解时，却设想出并不存在的事物与其平行、与其对应、与其相联。正因如此，人们才虚构出这么一种学说，即“天体沿正圆轨道运行说”，而完全拒绝“天体螺旋龙形运动说”（除学说名之外）。也正因如此，元素“火”连同太阳，与其它三种可以感知的元素一并构成了四元素。也正因为如此，人们还把这些所谓的元素密度强行规定为十比一。诸如此类的幻想还有许多。这些幻想不仅影响了各种定论，还影响了各种简单的概念。

XLVI

四十六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when it has once adopted an opinion (either as being the received opinion or as being agreeable to itself) draws all things else to support and agree with it. And though there be a greater number and weight of instances to be found on the other side, yet these it either neglects and despises, or else by some distinction sets aside and rejects, in order that by this great and pernicious predetermination the authority of its former conclusions may remain inviolate. And therefore it was a good answer that was made by one who, when they showed him hanging in a temple a picture of those who had paid their vows as having escaped shipwreck, and would have him say whether he did not now acknowledge the power of the gods—“Aye,” asked he again, “but where are they painted that were drowned after their vows?” And such is the way of all superstition, whether in astrology, dreams, omens, divine judgments, or the like; wherein men, having a delight in such vanities, mark the events where they are fulfilled, but where they fail, though this happen much oftener, neglect and pass them by. But with far more subtlety does this mischief insinuate itself into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s; in which the first conclusion colors and brings into conformity with itself all that come after, though far sounder and better. Besides, independently of that delight and vanity which I have described, it is the peculiar and perpetual error of the human intellect to be more moved and excited by affirmatives than by negatives; whereas it ought properly to hold itself indifferently disposed toward both alike. Inde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y true axiom, the negative instance is the

more forcible of the two.

人类理解力，一旦接纳某种观点（无论是公认的意见，还是仅合己意的意见），便会生拉硬扯地寻找其他一切东西来支撑这种观点。即便找到了更多相反的、更有分量的例证，人们都会忽而略之、鄙而视之，要不然就找借口扔而弃之；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这种极为有害的先入为主来保持原有结论的权威性，使之免遭亵渎。其实，有一个人回答得非常妙：他在上庙时，人们给他看了挂在庙里的一幅画，画中描绘的是一些因祈愿船避祸而得以生还的人；人们问他是否承认天上诸神的威力。“是啊，”不过他接着反问道，“但那些许愿之后，仍被淹死的人又画在哪儿呢？”一切迷信，无论是占星解梦，还是征兆抽签，或诸如此类的形式，都如出一辙、别无二致；人们都喜欢这般虚妄之事，与己相吻合者，则记之；与己不合者，即使常见常遇，也视而不见、遇而不理。但是此般错误在哲学和科学中更为隐蔽，为了维护先前的结论，总是要对后来的事例加以矫饰以求前后一致，即使后者更为健全、更为优秀。此外，与以上描写的爱好与虚荣不同的是，较之于反面事例，人类的智力更易受到正面事例的感动和刺激，这是人类特有的，而且难以更改的错误；而人类的智力理应不偏不倚，不应厚此薄彼。的确，任何真正的公理在其建立过程中都有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其中反面事例往往更具说服力。

XLVII

四十七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is moved by those things most which strike and enter the mind simultaneously and suddenly, and so fill the imagination; and then it feigns and supposes all other

things to be somehow, though it cannot see how, similar to those few things by which it is surrounded. But for that going to and fro to remote and heterogeneous instances by which axioms are tried as in the fire, the intellect is altogether slow and unfit, unless it be forced thereto by severe laws and overruling authority.

最易触动人类理解力的是那些瞬间震撼人心而且同时深入人心，并引发想象力的东西；随后便虚想其它一切事物与其周围少数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尽管根本看不出它们有任何相似之处。人类智力，往往还存在于遥不可及、迥然不同的事例之中，把公理置之火中加以锤炼；如果没有这种锤炼，人类智力就会变得迟钝不堪、格格不入，除非有严格的法则和强制性的权威迫使其就范。

XLVIII

四十八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is unquiet; it cannot stop or rest, and still presses onward, but in vain. Therefore it is that we cannot conceive of any end or limit to the world, but always as of necessity it occurs to u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beyond. Neither, again, can it be conceived how eternity has flowed down to the present day, for that distinction which is commonly received of infinity in time past and in time to come can by no means hold; for it would thence follow that one infinity is greater than another, and that infinity is wasting away and tending to become finite. The like subtlety arises touching the infinite divisibility of lines, from the same inability of thought to stop. But this inability interferes more mischievously in

the discovery of causes; for although the most general principles in nature ought to be held merely positive, as they are discovered, and cannot with truth be referred to a cause, nevertheless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being unable to rest still seeks something prior in the order of nature. And then it is that in struggling toward that which is further off it falls back upon that which is nearer at hand, namely, on final causes, which have relation clearly to the nature of man rather than to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and from this source have strangely defiled philosophy. But he is no less an unskilled and shallow philosopher who seeks causes of that which is most general, than he who in things subordinate and subaltern omits to do so.

人类理解力是不会停歇不动的；既不会停止，也不会歇息，反而会勇往无前，但最终都是徒劳无益的。正因如此，我们虽然无法设想世界的结局或极限，但总是要去遐想那些毫无边际的东西。悠悠远古究竟如何流转至今，这很难想象；因为把时间划分为无限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这种惯常的二分法是绝对站不住脚的，这样一来，无限势必有大小之分，势必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即无限日渐消减而最终变成有限。线条具有无限分割性，同样，思想具有永不停歇性，二者微妙之处极为相似。但这种“永不停歇性”危害更大，对人们追寻原因毫无裨益；因为自然中最普遍的原则，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理应不容置疑，而且也不可能将之归结于某个原因；尽管如此，人类理解力由于具有永不停歇的特点，仍然会在自然秩序中寻找更为重要的东西。原本欲求高远，最终却只能寻得原本就近在咫尺的东西，即目的因；然而，目的因显然与人的本性有关，而与宇宙本质无关，从这个根源来说，目的因辱没了哲学，实在不可思议。有的哲学家，即使是最具普遍性的东西，也要为之寻找原因；而有的哲学家，即使是附属衍生性事物，也不想为之寻找理由；两者相比较，前者的拙劣与肤浅丝毫不亚于后者。

XLIX

四十九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is no dry light, but receives an infusion from the will and affections; whence proceed sciences which may be called “sciences as one would.” For what a man had rather were true he more readily believes. Therefore he rejects difficult things from impatience of research; sober things, because they narrow hope; the deeper things of nature, from superstition; the light of experience, from arrogance and pride, lest his mind should seem to be occupied with things mean and transitory; things not commonly believed, out of deference to the opinion of the vulgar. Numberless, in short, are the ways, and sometimes imperceptible, in which the affections color and infect the understanding.

人类理解力并不是干燥之光，反而受到意志和各种情绪的浸染，从而产生了一些可称为“遂人心愿”的科学。对希望之事，人们多信以为真。因此，人们因缺乏研究的耐心而排斥困难的事物；因不敢奢望而排斥清明的事物；因相信迷信而排斥自然深奥的事物；因自傲自大，唯恐琐事扰心而排斥经验之光；因须从俗而排斥尚未为人信的事物。总之，情绪总是想方设法，不知不觉地浸染着理解力。

L

五十

But by far the greatest hindrance and aberration of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proceeds from the dullness, incompetency, and deceptions of the senses; in that things which strike the sense outweigh things which do not immediately strike it, though they be more important. Hence it is that speculation commonly ceases where sight ceases; insomuch that of things invisible there is little or no observation. Hence all the working of the spirits enclosed in tangible bodies lies hid and unobserved of men. So also all the subtler changes of form in the parts of coarser substances (which they commonly call alteration, though it is in truth local motion through exceedingly small spaces) are in like manner unobserved. And yet unless these two things just mentioned be searched out and brought to light, nothing great can be achieved in nature, as far as the production of works is concerned. So again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our common air, and of all bodies less dense than air (which are very many), is almost unknown. For the sense by itself is a thing infirm and erring; neither can instruments for enlarging or sharpening the senses do much; but all the truer kind of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is effected by instances and experiments fit and apposite; wherein the sense decides touching the experiment only, and the experiment touching the point in nature and the thing itself.

人类理解力的最大障碍与迷乱源自感官的迟钝性、局限性和欺骗性；这表现在打动感官的事物强过不直接打动感官的事物，尽管后者更为重要。因此，思考通常随视觉的停止而停止；以至于对看不见的事物总是视而不见。正因如此，物体虽可触摸，但其内部精气的一切活动都极为隐蔽、不为人知。也正因如此，物质越粗糙，其分子的形式变化就越精细，但所有这些变化（通常称为改变，实则指狭小空间范围内的位移），同样也难以观察。然而以上两种事物，如果不加以

探寻，不加以揭示，那么就成事而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也正因如此，普通空气以及比空气还稀疏的物体（太多太多了），其本质几乎也无人知晓。感官这种东西，本身虚弱不牢靠而且易犯错误；即使有工具可以增强感官的敏锐度，也难有作为；要更加真实地阐释自然，只有通过恰当、贴切的事例和实验来实现，其中感官的决断只触及实验，而实验只触及自然要点和事物本身。

LI

五十一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is of its own nature prone to abstractions and gives a substance and reality to things which are fleeting. But to resolve nature into abstractions is less to our purpose than to dissect her into parts; as did the school of Democritus, which went further into nature than the rest. Matter rather than forms should be the object of our attention, its configurations and changes of configuration, and simple action, and law of action or motion; for forms are figments of the human mind, unless you will call those laws of action forms.

人类理解力，就本质而言，趋于抽象化，并赋予变化中的事物以内容和实体。但是自然既可化为抽象，也可分解为不同部分；若论何者更适合我们的意图，前者不如后者，如德谟克利特学派，他们研究自然就比研究其他学派更加深入。我们应该关注的对象，与其说是形式，不如说是物质及其结构与结构变化，不如说是单纯的活动以及活动或运动的法则；因为形式只是人心虚构出来的东西，除非你把那些活动法则称为形式。

LII

五十二

Such then are the idols which I call *Idols of the Tribe* , and which take their rise either from the homogeneity of the substance of the human spirit, or from its preoccupation, or from its narrowness, or from its restless motion, or from an infusion of the affections, or from the incompetency of the senses, or from the mode of impression.

以上所述的幻象，就是我所谓的“部族幻象”；这些幻象或源自人类精神本质上的同质性，或源自人类精神的成见性、偏狭性或永不停息性，或源自情感的注入，或源自感官的无力，或源自感知的模式。

LIII

五十三

The *Idols of the Cave* take their rise in the peculiar constitution, mental or bodily, of each individual; and also in education, habit, and accident. Of this kind there is a great number and variety. But I will instance those the pointing out of which contains the most important caution, and which have most effect in disturbing the clearn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洞穴幻象”源于个人独特的身心结构；也源于教育、习惯和偶然事件。这类幻象数目庞大，种类各异。但是，此处仅举几个突出的事例以示警惕，因为它们对理解力的干扰最为严重。

LIV

五十四

Men become attached to certain particular sciences and speculations, either because they fancy themselves the authors and inventors thereof, or because they have bestowed the greatest pains upon them and become most habituated to them. But men of this kind, if they betake themselves to philosophy and contemplation of a general character, distort and color them in obedience to their former fancies; a thing especially to be noticed in Aristotle, who made his natural philosophy a mere bond servant to his logic, thereby rendering it contentious and well-nigh useless. The race of chemists, again out of a few experiments of the furnace, have built up a fantastic philosophy, framed with reference to a few things; and Gilbert also, after he had employed himself most laboriously in the study and observation of the loadstone, proceeded at once to construct an entire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his favorite subject.

有些人爱慕某种特定的科学和思索，要么是因为他们幻想自己能在相关领域开辟一方天地，要么是因为他们在这些领域倾注了最大的心血，最终习而惯之。这类人如果从事哲学研究或事物普遍性的探索，必定会囿于原有的幻想，扭曲渲染所探究的东西。这种情形在亚

里士多德那里尤为突出，他把自然哲学仅仅当作自己的逻辑学的奴隶；从而导致其争论不断，几乎一无是处。还有些化学家，他们用火炉做几个实验，仅凭少数参考事物就建立起一个异想天开的哲学体系；又如吉尔伯特，他就是根据自己喜欢的课题，通过对磁石辛勤地研究，最后建立起了自己的整个学说体系。

LV

五十五

There is one principal and as it were rad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different minds, in respect of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s, which is this: that some minds are stronger and apter to mark the differences of things, others to mark their resemblances. The steady and acute mind can fix its contemplations and dwell and fasten on the subtlest distinctions; the lofty and discursive mind recognizes and puts together the finest and most general resemblances. Both kinds, however, easily err in excess, by catching the one at gradations, the other at shadows.

就哲学和科学而言，不同心灵之间存在一个主要的，也可以说是，本质的区别，那就是：有的心灵更善于而且更适于观察事物的差异性，有的心灵则更善于而且更适于观察事物的相似性。沉稳敏锐的心灵能全神贯注地思索、发现和抓住事物之间的细微差异；而高昂悠远的心灵能发现最精妙和最普遍的相似之处，并加以整合。但这两种心灵，使用过度则易犯错：一则求异时可能等差判断有误，一则求似时难免捕风捉影。

LVI

五十六

There are found some minds given to an extreme admiration of antiquity, others to an extreme love and appetite for novelty; but few so duly tempered that they can hold the mean, neither carping at what has been well laid down by the ancients, nor despising what is well introduced by the moderns. This, however, turns to the great injury of the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since these affectations of antiquity and novelty are the humors of partisans rather than judgments; and truth is to be sought for not in the felicity of any age, which is an unstable thing, but in the light of nature and experience, which is eternal. These factions therefore must be abjured, and care must be taken that the intellect be not hurried by them into assent.

还可以发现，有的人极端崇古，有的人极端嗜好创新；但很少有人秉性中立，能不偏不倚，既不吹毛求疵、苛责古人，也不视今人如敝屣。然而，这反而给科学与哲学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因为这种对古与新的矫情只不过是朋党人士随性而为，而非理智判断；而且真理不可祈福于某一年代，因为年代易变；而只能求助于自然和经验，因其永恒不朽。因此，必须誓绝朋党之争，必须小心谨慎，杜绝因朋党而失去理智、冒然认同。

LVII

五十七

Contemplations of nature and of bodies in their simple form break up and distract the understanding, while contemplations of nature and bodies in their composition and configuration overpower and dissolve the understanding, a distinction well seen in the school of Leucippus and Democritus a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philosophies. For that school is so busied with the particles that it hardly attends to the structure, while the others are so lost in admiration of the structure that they do not penetrate to the simplicity of nature. These kinds of contemplation should therefore be alternated and taken by turns, so that the understanding may be rendered at once penetrating and comprehensive, and the inconveniences above mentioned, with the idols which proceed from them, may be avoided.

在理解自然和物体时，如果只认识其简单的形式，那么理解必然是支零破碎、凌乱不堪的；如果只认识其组合与结构，那么理解必然难堪重负而迷惘失措；将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学派与其它学派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二者的区别。该学派过分注重微观研究，从而忽略了结构；其它学派则迷恋结构，从而未能洞察出自然的单纯性。因此，这两种思维方法应当交替使用，这样，理解力既能深入洞察又能全面概括，还能避免以上提及的不便以及由此产生的幻象。

LVIII

五十八

Let such then be our provision and contemplative prudence for keeping off and dislodging the *Idols of the Cave* , which grow for the most part either out of the predominance of a favorite subject, or out of an excessive tendency to compare or to distinguish, or out of partiality for particular ages, or out of the largeness or minuteness of the objects contemplated. And generally let every student of nature take this as a rule: that whatever his mind seizes and dwells upon with peculiar satisfaction is to be held in suspicion, and that so much the more care is to be taken in dealing with such questions to keep the understanding even and clear.

以上就是我们的看法，也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想出的消除各类“洞穴幻象”的审慎之法；“洞穴幻象”的产生大致有几种情况：有的是在某一特别喜好的论题上占有优势，有的是过度追求事物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有的是偏爱某些特定年代，有的是对事物的思索偏广或偏细。总的来说，凡是从事自然研究的人都应谨记下面一句话，并视之为规则：但凡心所倾注和偏爱之事，理当质疑；处置相关问题须倍加谨慎，理解时须保持公平和清醒。

LIX

五十九

But the *Idols of the Market Place* are the most troublesome of all—idols which have crept into the understanding through the alliances of words and names. For men believe that their reason governs words; but it is also true that words react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is it is that has rendered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s sophistical and inactive. Now words, being commonly framed and applied according to the capacity of the vulgar, follow those lines of division which are most obvious to the vulgar understanding. And whenever an understanding of greater acuteness or a more diligent observation would alter those lines to suit the true divisions of nature, words stand in the way and resist the change. Whence it comes to pass that the high and formal discussions of learned men end oftentimes in disputes about words and names; with which (according to the use and wisdom of the mathematicians) it would be more prudent to begin, and so by means of definitions reduce them to order. Yet even definitions cannot cure this evil in dealing with natural and material things, since the definitions themselves consist of words, and those words beget others. So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cur to individual instances, and those in due series and order, as I shall say presently when I come to the method and scheme for the formation of notions and axioms.

不过，在所有的幻象中，“市场幻象”最难把握——这些幻象通过文字和名称一并进入人类理解力。人们都认为自己的理性制约着文字，其实，文字反过来又作用于理解力；正因如此，哲学与科学变成了诡辩，毫无生气。字词是根据民众的能力而约定俗成的，因此，字词所遵循的事物区分标准，民众理解起来就最为浅显。然而对理解力敏锐者或观察更加辛勤的人来说，他们很想改变这些民众的字词区分以使其符合自然界中的真实区分，而一旦有这种企图时，字词就会跑出来阻碍任何改变。难怪会出现这种情况：学者们的高谈阔论往往以对字词名称的争辩而告终。按照数学家的习惯和智慧，一开始就应当审慎讨论，即通过定义的方法把所讨论的东西纳入秩序。然而在面对自然事物和物质事物时，即使有定义也难以解决这种弊端，因为定义本身也是由字词组成，这些字词又会衍生出别的字词。因此，有必要回到个体事例上来，回到那些排列有序的事例上来；关于这一点，我

将在下文谈到概念和公理的形成方法时加以讨论。

LX

六十

The idols imposed by words on the understanding are of two kinds. They are either names of things which do not exist (for as there are things left unnamed through lack of observation, so likewise are there names which result from fantastic suppositions and to which nothing in reality corresponds), or they are names of things which exist, but yet confused and ill-defined, and hastily and irregularly derived from realities. Of the former kind are Fortune, the Prime Mover, Planetary Orbits, Element of Fire, and like fictions which owe their origin to false and idle theories. And this class of idols is more easily expelled, because to get rid of them it is only necessary that all theories should be steadily rejected and dismissed as obsolete.

字词强加在理解力上的幻象有两类。一类是有名无实（正如有些事物因观察不到而未被命名，同样有些名称源自幻想，有其名却无其实）；一类是有实名乱，事物名称意义含糊不清，定义界定不明，草率匆忙地从现实中抽象出来，极不规范。前者如“幸运”、“原动机”、“行星轨道”、“火元素”以及那些源自虚假学说的虚构，此类幻象较易驱除，因为要驱除，只需逐步排弃那些学说即可。

But the other class, which springs out of a faulty and unskillful

abstraction, is intricate and deeply rooted. Let us take for example such a word as *humid* and see how far the several things which the word is used to signify agree with each other, and we shall find the word *humid* to be nothing else than a mark loosely and confusedly applied to denote a variety of actions which will not bear to be reduced to any constant meaning. For it both signifies that which easily spreads itself round any other body; and that which in itself is indeterminate and cannot solidize; and that which readily yields in every direction; and that which easily divides and scatters itself; and that which easily unites and collects itself; and that which readily flows and is put in motion; and that which readily clings to another body and wets it; and that which is easily reduced to a liquid, or being solid easily melts. Accordingly, when you come to apply the word, if you take it in one sense, flame is humid; if in another, air is not humid; if in another, fine dust is humid; if in another, glass is humid. So that it is easy to see that the notion is taken by abstraction only from water and common and ordinary liquids, without any due verification.

而另一类幻象是从现实中错误而笨拙地抽象出来的，错综复杂，而且根深蒂固。我们以“潮湿”为例，看看这个词的几个所指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一致性，就会发现“潮湿”这个词只不过就是这样一个符号，即随意混淆用来指称各种无法归结到一个固定意义的活动上。因为该词既可泛指一个事物及其周围的一切，也可指称本身含混不清，难以固定的东西；既可以用来表示在各个方向容易萎缩的东西，也可以指容易自行分散的事物；既可指容易自行聚合，也可指容易流动运行的事物；既可指容易贴附他物必湿之的东西，也可指容易化为液态，或本系固体却易于融化的东西。因此，在使用这个词时，如要用其中一个意义，那么火焰也可以说是潮湿了；如果要用另一个意义，那么空气可以说不潮湿了；如果再换一个意义，那么微尘也可以说是潮湿了；如果再换一个意义，那么玻璃也可说潮湿了。可见，“潮湿”只是

从水中、从普通常见液体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而未得到任何充分验证。

There are, however, in words certain degrees of distortion and error. One of the least faulty kinds is that of names of substances, especially of lowest species and well-deduced (for the notion of *chalk* and of *mud* is good, of *earth* bad); a more faulty kind is that of actions, as *to generate, to corrupt, to alter* ; the most faulty is of qualities (except such as are the immediate objects of the sense) as *heavy* , *light* , *rare* , *dense* , and the like. Yet in all these cases some notions are of necessity a little better than others, in proportion to the greater variety of subjects that fall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human sense.

然而，对字词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曲解和错误。误差最小的一类是物质的名称，尤其是最低而且演绎充分的那种名称（如“垩”和“泥”这两个概念就得当，而“地”这个概念就不得当）；误差较多的一类是表动作的名称，如“产生”、“腐烂”、“改变”；误差最大的一类是关于属性（表示感官直接对象的属性除外）的名称，
如“重”、“轻”、“稀”、“浓”等。不过，以上所有事例中，有些概念必然要比其他一些概念稍好一点——与人类感官接触较丰富的事物与其概念还是比较相称的。

LXI

六十一

But the *Idols of the Theater* are not innate, nor do they steal into the understanding secretly, but are plainly impressed and received into the mind from the playbooks of philosophical systems and the perverted rules of demonstration. To attempt refutations in this case would be merely inconsistent with what I have already said, for since we agree neither upon principles nor upon demonstrations there is no place for argument. And this is so far well, inasmuch as it leaves the honor of the ancients untouched. For they are no wise disparaged—the question between them and me being only as to the way. For as the saying is, the lame man who keeps the right road outstrips the runner who takes a wrong one. Nay, it is obvious that when a man runs the wrong way, the more active and swift he is, the further he will go astray.

不过，“剧场幻象”既非天生具有，也非悄然进入人类理解力，而是公然强行印入人心，为人接受，而且这些幻象来自各种哲学体系的“剧本”和被人滥用的论证规律。如果要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辩驳，那我就自食前言、自相矛盾了——因为我曾经说过：既然我们在原则和论证上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就没有辩论的余地。这样也好，因为这不至于损毁古人的声誉。古人并未受到丝毫毁谤——我和他们的问题只是方法问题。常言说得好，行于正路的跛子胜过走上歧途的快腿。非但如此，人一旦走上歧途，步伐越快捷，显然迷失得就越遥远。

But the course I propose for the discovery of sciences is such as leaves but little to the acuteness and strength of wits, but places all wits and understandings nearly on a level. For as in the drawing of a straight line or a perfect circle, much depends on the steadiness and practice of the hand, if it be done by aim of hand only, but if with the aid of rule or compass, little or nothing; so is it exactly with my plan. But though particular confutations would be of no

avail, yet touching the sects and general divisions of such systems I must say something; something also touching the external signs which show that they are unsound; and finally something touching the causes of such great infelicity and of such lasting and general agreement in error; that so the access to truth may be made less difficult, and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may the more willingly submit to its purgation and dismiss its idols.

关于科学发现的过程，我的提议是，科学发现不可仅凭智慧的敏锐与卓越，而须将所有智慧与理解力置于同等地位。就好比要画一条直线或一个正圆，如果仅凭手画，那么手须稳固与熟练；如果借助直尺或圆规，则与手无关；准确地说，我的计划也是如此。但是，虽说具体辩驳毫无益处，但我还是必须讨论一下哲学流派和体系，还要讨论那些看起来显然并不健全的表面现象，最后还要讨论是什么导致如此重大的失误及其为何得到如此长久普遍的赞成；这样接近真理就更加容易，人类理解力也更心甘情愿地去剔除幻象，纯洁自身。

LXII

六十二

Idols of the Theater, or of Systems, are many, and there can be and perhaps will be yet many more. For were it not that now for many ages men's minds have been busied with religion and theology; and were it not that civil governments, especially monarchies, have been averse to such novelties, even in matters speculative; so that men labor therein to the peril and harming of their fortunes—not only unrewarded, but exposed also to contempt

and envy—doubtless there would have arisen many other philosophical sects like those which in great variety flourished once among the Greeks. For as on the phenomena of the heavens many hypotheses may be constructed, so likewise (and more also) many various dogmas may be set up and established on the phenomena of philosophy. And in the plays of this philosophical theater you may observe the same thing which is found in the theater of the poets, that stories invented for the stage are more compact and elegant, and more as one would wish them to be, than true stories out of history.

“剧场幻象”，或称“学说体系幻象”，有很多，而且还可能或将会产生更多。长期以来，如果不是人们醉心于宗教和神学，如果不是政府，尤其是君主政府，一直反对这种创新，甚至连思考的对象也遭到反对，以至于那些从事或信奉宗教和神学的人，他们的命运也都有危险和伤害——非但没有报酬，而且还会倍受鄙视与嫉恨。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无疑会产生出许多其他哲学宗派，犹如古希腊百家争鸣时期所产生的各种哲学流派。在天体现象上，人们可以构想出许多假设；在哲学现象上，人们也同样（并且更是如此）可以确立出林林总总、花样繁多的教条教义。在这个哲学剧场里产生的剧本中，你所观察到的情况在诗人剧场中也同样可以找得到，即为了登台演出而撰写故事，而且撰写的故事比历史真实故事更为精致典雅，更符合人们的期待。

In general, however, there is taken for the material of philosophy either a great deal out of a few things, or a very little out of many things; so that on both sides philosophy is based on too narrow a foundation of experiment and natural history, and decides on the authority of too few cases. For the Rational School of philosophers snatches from experience a variety of common

instances, neither duly ascertained nor diligently examined and weighed, and leaves all the rest to meditation and agitation of wit.

一般而言，哲学素材的采集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要么从少数事物中获取众多素材，要么从多数事物中获取极少素材；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这样的哲学，其建立的根基太狭窄，来自实验和自然的素材太稀少，几乎没有权威的事例就做出决断。唯理派哲学家从经验中抓取许多普通的事例，但对这些事例既没有充分核实，也没有认真斟酌，仅凭智慧通过沉思和激辩来处理一切事情。

There is also another class of philosophers who, having bestowed much diligent and careful labor on a few experiments, have thence made bold to educe and construct systems, wresting all other facts in a strange fashion to conformity therewith.

还有一类哲学家，他们费心尽力地进行了几个实验之后，就冒然演绎和建构出各种体系来，通过奇怪的方式扭曲其他事实来迎合这些体系。

And there is yet a third class, consisting of those who out of faith and veneration mix their philosophy with theology and traditions; among whom the vanity of some has gone so far aside as to seek the origin of sciences among spirits and genii. So that this parent stock of errors—this false philosophy—is of three kinds: the Sophistical, the Empirical, and the Superstitious.

还有第三类哲学家，他们出于信仰和崇拜，将自己的哲学与神学

和传说杂糅起来，而其中有些哲学家自负过头，竟然要在神怪精灵中去寻求科学的起源。因此，错误的根源——这种错误的哲学——可以分类为三类：诡辩论、经验论和迷信论。

LXIII

六十三

The most conspicuous example of the first class was Aristotle, who corrupted natural philosophy by his logic: fashioning the world out of categories; assigning to the human soul, the noblest of substances, a genus from words of the second intention; doing the business of density and rarity (which is to make bodies of greater or less dimensions, that is, occupy greater or less spaces), by the frigid distinction of act and power; asserting that single bodies have each a single and proper motion, and that if they participate in any other, then this results from an external cause; and imposing countless other arbitrary restrictions on the nature of things; being always more solicitous to provide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and affirm something positive in words, than about the inner truth of things; a failing best shown when his philosophy is compared with other systems of note among the Greeks. For the *homoeomera* of Anaxagoras; the Atoms of Leucippus and Democritus; the Heaven and Earth of Parmenides; the Strife and Friendship of Empedocles; Heraclitus' doctrine how bodies are resolved into the indifferent nature of fire, and remolded into solids, have all of them some taste of the natural philosopher—some savor of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experience, and bodies; whereas in the physics of Aristotle you hear hardly anything but the words of logic, which in his metaphysics

also, under a more imposing name, and more forsooth as a realist than a nominalist, he has handled over again. Nor let any weight be given to the fact that in his books on animals and his problems, and other of his treatises, there is frequent dealing with experiments. For he had come to his conclusion before; he did not consult experience, as he should have done, for the purpose of framing his decisions and axioms, but having first determined the question according to his will, he then resorts to experience, and bending her into conformity with his placets, leads her about like a captive in a procession. So that even on this count he is guiltier than his modern followers, the schoolmen, who have abandoned experience altogether.

第一类哲学家中，亚里士多德最为明显突出，他的逻辑败坏了自然哲学：他用范畴来浇铸世界；用代表二级概念的字词给作为最高贵存在的人类心灵赋予一个属类；用有严格区分的现实和潜能代替浓密和稀疏来行事（疏密程度与所造物体大小的关系，也就是所造物体与其占据空间大小的关系）；他断言单个物体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固有的运动，如果参与其他运动，必是外在原因所致；他还给事物性质强加无数其他武断的限制；他总是急于在纸上写出自己的答案并加以肯定，而不是对事物的内在本质给予答案并加以肯定；如果与其他著名的古希腊哲学体系相比较，这种缺陷在他的哲学中暴露得最为明显。比如阿那克萨哥拉的“同质分子”说、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巴门尼德的天地说、恩培多克勒的爱憎说、赫拉克利特的火为万物本原说，即物体皆可熔解为不同的火质，并重新熔铸为各种固体的学说，所有这些人都有点自然哲学家的味道——都有点探询事物、经验和物体的性质的味道；但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几乎只能听到与逻辑相关的字词。同样，他在形而上学中体现出来的姿态，与其说是像唯名论者，不如说更像实在论者；他又在书中玩了一把逻辑学。虽然他的动物学、问题集以及其他论说经常涉及到实验，但这并不值得给予任何高度评价。因为他总是先下结论；他本应先求诸经验——但

他并未这样做；为了建构自己的论断和原理，他先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设定问题，然后求助于经验，再歪曲经验以适合自己的论断，把经验当作俘虏游行一般东拉西扯。所以，在这条罪状上，较之于他的近代追随者，即那些完全抛弃经验的经院学者们，亚里士多德所犯的罪行比他们所犯的还要大。

LXIV

六十四

But the Empirical school of philosophy gives birth to dogmas more deformed and monstrous than the Sophistical or Rational school. For it has its foundations not in the light of common notions (which though it be a faint and superficial light, is yet in a manner universal, and has reference to many things), but in the narrowness and darkness of a few experiments. To those therefore who are daily busied with these experiments and have infected their imagination with them, such a philosophy seems probable and all but certain; to all men else incredible and vain. Of this there is a notable instance in the alchemists and their dogmas, though it is hardly to be found elsewhere in these times, except perhaps in the philosophy of Gilbert. Nevertheless, with regard to philosophies of this kind there is one caution not to be omitted; for I foresee that if ever men are roused by my admonitions to betake themselves seriously to experiment and bid farewell to sophistical doctrines, then indeed through the premature hurry of the understanding to leap or fly to universals and principles of things, great danger may be apprehended from philosophies of this kind, against which evil we ought even now to prepare.

但是，较之于诡辩学派或唯理学派，哲学中的经验派提出的教条更加离奇、更加古怪。因为经验派哲学的根基并不是借了普通概念的光（这种光虽然微弱和肤浅，但还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且与许多事物有关），而是借了少数实验的光——狭窄而晦暗的光。因此，对于那些终日忙于实验，而想象力深受其感染的人来说，这样的哲学看起来有根有据，而且几乎是肯定无疑的；但对于其他所有的人来说，这种哲学简直荒谬虚妄，难以置信。关于这一点，炼丹术士及其教条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不过，这种例子除了在吉尔伯特的哲学中能找到外，很难再在当时别的地方找得到了。关于此类哲学，有一点不能不保持警惕：我预料，如果有人因受了我告诫的影响而投身于实验，从而告别诡辩说，随之因理解不够成熟而仓促跳跃或飞跃到事物的普遍性和原理上，那么必须考虑到此类哲学中存在的巨大危险；对这种缺陷，我们现在就应该做好准备加以预防。

LXV

六十五

But the corruption of philosophy by superstition and an admixture of theology is far more widely spread, and does the greatest harm, whether to entire systems or to their parts. For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is obnoxious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imagination no less than to the influence of common notions. For the contentious and sophistical kind of philosophy ensnares the understanding; but this kind, being fanciful and tumid and half poetical, misleads it more by flattery. For there is in man an ambi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no less than of the will, especially in high and lofty spirits.

哲学因掺揉了迷信和神学而堕落，而且这种堕落更加广泛地蔓延开来，给整个学术体系和各个分支流派都带来了最大的伤害。因为人类理解力受想象力影响的侵扰不亚于受普通概念影响的侵扰。这类哲学因好争论、爱诡辩而让人类理解力坠入陷阱；但这类哲学因多幻想、多浮夸，还带点诗意，所以多以奉承的方式将人类理解力引入了歧途。人在理解力上的野心不亚于在意志上的野心，对那些意气风发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Of this kind we have among the Greeks a striking example in Pythagoras, though he united with it a coarser and more cumbrous superstition; another in Plato and his school, more dangerous and subtle. It shows itself likewise in parts of other philosophie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abstract forms and final causes and first causes, with the omission in most cases of causes intermediate, and the like. Upon this point the greatest caution should be used. For nothing is so mischievous as the apotheosis of error; and it is a very plague of the understanding for vanity to become the object of veneration. Yet in this vanity some of the moderns have with extreme levity indulged so far as to attempt to found a system of natural philosophy on the first chapter of Genesis, on the book of Job, and other parts of the sacred writings, seeking for the dead among the living; which also makes the inhibition and repression of it the more important, because from this unwholesome mixture of things human and divine there arises not only a fantastic philosophy but also a heretical religion. Very meet it is therefore that we be sober-minded, and give to faith that only which is faith's.

至于此类哲学，我们在古希腊人中找到两个例子：一是毕达哥拉斯；一是柏拉图及其学派；前者是最为突出，把哲学与迷信纠缠在一

起，而且这种迷信比较粗俗，令人讨厌；后者更加危险，更难琢磨。其他哲学中的一些部分同样也存在类似情形，即引入了抽象形式，引入了目的因和初始因，却大都略去了中间因等等。这一点，我们应该给予最大的警告。因为没有什么比把错误奉为神明更加有害了；人类理解力错就错在把虚妄奉为崇敬的对象。而有些现代人极度轻浮地沉迷于这种虚妄之中，竟然想从《创世纪》第一章、《约伯记》、以及圣经其他部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然哲学体系，这简直就是“活人有用偏不用，死人无用偏要用”；正因如此，哲学受到的禁锢与抑制就更加严重，因为这种不健康的人神杂糅，非但会产生荒诞哲学，而且还会产生异端邪教。因此，我们要心平气和，属于信仰的则归还于信仰，唯有如此，方才妥当。

LXVI

六十六

So much, then, for the mischievous authorities of systems, which are founded either on common notions, or on a few experiments, or on superstition. It remains to speak of the faulty subject matter of contemplations, especially in natural philosophy. Now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is infected by the sight of what takes place in the mechanical arts, in which the alteration of bodies proceeds chiefly by composition or separation, and so imagines that something similar goes on in the universal nature of things. From this source has flowed the fiction of elements, and of their concourse for the formation of natural bodies. Again, when man contemplates nature working freely, he meets with different species of things, of animals, of plants, of minerals; whence he readily passes into the opinion that there are in nature certain primary

forms which nature intends to educe, and that the remaining variety proceeds from hindrances and aberrations of nature in the fulfillment of her work, or from the collision of different species and the transplanting of one into another. To the first of these speculations we owe our primary qualities of the elements; to the other our occult properties and specific virtues; and both of them belong to those empty compendia of thought wherein the mind rests, and whereby it is diverted from more solid pursuits. It is to better purpose that the physicians bestow their labor on the secondary qualities of matter, and the operations of attraction, repulsion, attenuation, conspissation, [2_1] dilatation, astriction, dissipation, maturation, and the like; and were it not that by those two compendia which I have mentioned (elementary qualities, to wit, and specific virtues) they corrupted their correct observations in these other matters—either reducing them to first qualities and their subtle and incommensurable mixtures, or not following them out with greater and more diligent observations to third and fourth qualities, but breaking off the scrutiny prematurely—they would have made much greater progress. Nor are powers of this kind (I do not say the same, but similar) to be sought for only in the medicines of the human body, but also in the changes of all other bodies.

以上哲学体系权威的弊端就谈到这里为止；这些哲学体系，或是建立在普通概念之上，或是建立在少数实验之上，或是建立在迷信之上。下面要谈谈思辨中的错误论题，尤其是哲学中的错误论题。看到机械运行原理时，即主要通过聚合或离散来改变物体，人类理解力就会受到感染，并进一步设想事物的普遍性本质也如同此理。元素及其聚合成自然物体的构想就是从这个根源产生出来的。而且人在思索自然的自由运行时，遇见的事物会有各类种属，如动物有不同种类，植物有不同种类，矿物有不同种类；由此很容易就形成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自然之中存在某些初级形态，而这些初级形态正是自然意欲演变

的形态，认为其他变种是自然在运行过程中因受阻碍和变型导致的，或者是因不同种属之间彼此冲突、彼此嫁接导致的。归源于第一个想法的是元素的初级属性，而归源于第二个想法的是隐秘本性和种属品质；二者实属空洞无物的思想概论，在这种空想中，心灵才得以休息，而且也正因如此，心灵偏离了更加坚实的追求。医生们在致力于物质二级属性的研究，在致力于对吸引、排斥、稀释、浓缩[3_1]、膨胀、收敛、消散、成熟等动作的研究时，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以上提及的两种空想（即元素性质和种属品性）在其他事情上毁坏了医生的正确观察，他们要么把二级属性归结到初级属性及其精致难以匹及的混合物上，要么就是没有做深入辛勤的观察，从而无从推演到三级、四级等属性上；否则医生们早就取得更大更多的进步了。这类例子（我说的不是完全相同，而是基本类似的例子）的说服力不仅仅体现在研究人体的医学上，也可以在其他一切物体变化中寻找到。

But it is a far greater evil that they make the quiescent principles, *wherefrom* , and not the moving principles, *whereby* , things are produced, the object of their contemplation and inquiry. For the former tend to discourse, the latter to works. Nor is there any value in those vulgar distinctions of motion which are observed in the received system of natural philosophy, as generation, corruption, augmentation, diminution, alteration, and local motion. What they mean no doubt is this: if a body in other respects not changed be moved from its place, *this is local motion* ; if without change of place or essence, it be changed in quality, this is *alteration* ; if by reason of the change the mass and quantity of the body do not remain the same, this is *augmentation* or *diminution* ; if they be changed to such a degree that they change their very essence and substance and turn to something else, this is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 . But all this is merely popular, and does not at all go deep into nature; for these are only measures and limits, not kinds of motion. What they intimate is *how far* , not *by what means* , or

from what source . For they do not suggest anything with regard either to the desires of bodies or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parts. It is only when that motion presents the thing grossly and palpably to the sense as different from what it was that they begin to mark the division. Even when they wish to suggest something with regard to the causes of motion, and to establish a divis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m, they introduce with the greatest negligence a distinction between motion natural and violent, a distinction which is itself drawn entirely from a vulgar notion, since all violent motion is also in fact natural; the external efficient simply setting nature working otherwise than it was before. But if, leaving all this, anyone shall observe (for instance) that there is in bodies a desire of mutual contact, so as not to suffer the unity of nature to be quite separated or broken and a vacuum thus made; or if anyone say that there is in bodies a desire of resuming their natural dimensions or tension, so that if compressed within or extended beyond them, they immediately strive to recover themselves, and fall back to their old volume and extent; or if anyone say that there is in bodies a desire of congregating toward masses of kindred nature—of dense bodies, for instance, toward the globe of the earth, of thin and rare bodies toward the compass of the sky; all these and the like are truly physical kinds of motion—but those others are entirely logical and scholastic, as is abundantly manifest from this comparison.

但是更为严重的缺陷是：他们思考和研究的对象是静止的原理，而不是运动的原理；前者指自事物“何处”产生的原理，后者指事物“何以”产生的原理；前者趋于讨论，后者趋于行事。在公认的自然哲学体系中，对运动的通俗区分而形成的概念有生成、毁灭、增大、减小、变易和位移等，此般概念毫无价值可言。这些概念无疑是指：一个物体如果其他方面没有变化，而只是位置产生了移动，就叫“位移”；如果地位或本质没有变化，而只是属性产生了变化，就叫“变

易”；一个物体如果体积和数量有别于从前，就叫“增大”或“减小”；如果变化的程度达到连本质和实体也发生了改变而且变成了其他东西，就叫“生成”和“腐败”。但是所有这些概念都只不过是通俗说法，根本没有抓住自然的内在本质；因为这些概念都只是运动的度量界限，而不是运动本身。这些概念暗示的只是“何种程度”，而不是“何种方法”或“何种出处”。因为他们并没有暗示物体的倾向性或物体分子的发展。只有当事物在运动中被感官觉察出完全不同时，他们才开始加以标志以示区分。即使他们希望暗指事物运动的原因，并建立原因之间的区分时，他们也只是极其粗略地区分为自然运动与强力运动；而这种区分本身又来自低俗不堪的概念，因为所有强力运动事实上又是自然运动；外在的动因只是促使自然运动得与以往不同而已。但是，以上一切，姑且不论，有人发现（比如）物体内存在一种相互靠近的倾向力，使自然凝聚一体免遭分裂或碎裂而形成一个真空；有人说物体内有一种自我恢复的倾向力，可以重新恢复其自然的体积或张力，因此一旦内敛或外张，必然会迅即奋力自我恢复，重新回到原有容量和广度；还有人说物体内有一种物以类聚的倾向力，相同性质的物体总有一种趋同，如物体稠密趋于坠地，物体稀薄易浮天穹；如果是这样，那么，诸如此类的运动才真正属于物理运动；除此之外，则纯属逻辑和哲学上的运动，两相比较，区别自现。

Nor again is it a lesser evil that in their philosophies and contemplations their labor is spent in investigating and handling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things and the highest generalities of nature; whereas utility and the means of working result entirely from things intermediate. Hence it is that men cease not from abstracting nature till they come to potential and uninformed matter, nor on the other hand from dissecting nature till they reach the atom; things which, even if true, can do but little for the welfare of mankind.

另外，还有一个不算小的毛病，那就是，在他们的哲学和思辨

中，他们都把精力花到调查和处理事物的第一性原理和自然的最高普遍性上；而他们调查的手段和方法却完全来自中间性事物。正因如此，一方面人们对自然的抽象从不间断，直到无法抽象为止；另一方面对自然的分解永不停息，直到分解出一个又一个原子。但即使真是这样，对人类又有多大的益处呢？

LXVII

六十七

A caution must also be given to the understanding against the intemperance which systems of philosophy manifest in giving or withholding assent, because intemperance of this kind seems to establish idols and in some sort to perpetuate them, leaving no way open to reach and dislodge them.

对人类理解力还应当提出一个警告，即那些哲学体系在表达认可或否决时流露出一种不加节制的态度；这种不加节制，不但断绝了消除幻象的途径，而且似乎多少给幻象的确立和长存助了一臂之力。

This excess is of two kinds: the first being manifest in those who are ready in deciding, and render sciences dogmatic and magisterial; the other in those who deny that we can know anything, and so introduce a wandering kind of inquiry that leads to nothing; of which kinds the former subdues, the latter weakens the understanding. For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after having by hostile confutations destroyed all the rest (as the Ottomans serve

their brothers), has laid down the law on all points; which done, he proceeds himself to raise new questions of his own suggestion, and dispose of them likewise, so that nothing may remain that is not certain and decided; a practice which holds and is in use among his successors.

这种不加节制的态度分为两种：第一种体现在易下决断的人身上，他们认为科学都是武断专横的；第二种体现在持万物不可知论的人身上，他们倡导漫无目的的调查，最终一无所获；二者之中，前者抑制理解力，后者消解理解力。例如亚里士多德，他的哲学势不两立地驳斥、摧垮了其他哲学之后（像奥斯曼诸王对待其兄弟那样），又在各方面立下了法则，随后又对自己的建议提出了新的问题，接着又用既定的法则给予解决，这样任何事情都不会悬而未决；这种方法，他的继任者至今仍在沿用。

The school of Plato, on the other hand, introduced *Acatalepsia* , at first in jest and irony, and in disdain of the older sophists, Protagoras, Hippias, and the rest, who were of nothing else so much ashamed as of seeming to doubt about anything. But the New Academy made a dogma of it, and held it as a tenet. And though theirs is a fairer seeming way than arbitrary decisions, since they say that they by no means destroy all investigation, like Pyrrho and his Refrainers, but allow of some things to be followed as probable, though of none to be maintained as true; yet still when the human mind has once despaired of finding truth, its interest in all things grows fainter, and the result is that men turn aside to pleasant disputations and discourses and roam as it were from object to object, rather than keep on a course of severe inquisition. But, as I said at the beginning and am ever urging, the human senses and understanding, weak as they are, are not to be deprived of their

authority, but to be supplied with helps.

而柏拉图学派却提倡“不可理解论”，对待老一辈诡辩家，如普罗塔哥拉，希庇亚斯等等，先讥嘲，后鄙视，认为这些人最可耻不过的地方似乎是持万物可疑论。但是新学院派却将其教条化，并将其奉为主义。新学院派的方法比起武断论表面上要公正得多，因为新学院派声称，他们绝不像皮罗及其追随者那样摧毁一切调查，而是容许把某些东西视为可能性来追随，虽然这些东西无一可作为真理来坚持；然而，尽管如此，在寻求真理时，人心一但绝望，对一切事情便兴致索然，结果就是人们转为乐争好辩，在对象之间仿佛飘来飘去，不能固守一条慎重的调查之路。但是，正如我开始所说而且一贯主张的那样，人类的感官与理解力，即使先天贫乏，但也不应该剥夺其权威，反而应该予以帮助。

LXVIII

六十八

So much concerning the several classes of Idols and their equipage; all of which must be renounced and put away with a fixed and solemn determin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thoroughly freed and cleansed; the entrance into the kingdom of man, founded on the sciences, being not much other than the entrance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whereinto none may enter except as a little child.

以上几类幻象及其分支，就谈到这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郑重

其事地彻底摒弃这些幻象，要彻底解放理解力、净化理解力；人类之国是建立在科学之上的，踏进人类之国的大门与踏进天国的大门，并没有多大的差异，二者都要求：若非赤子概莫能入焉。

LXIX

六十九

But vicious demonstrations are as the strongholds and defenses of idols; and those we have in logic do little else than make the world the bondslave of human thought, and human thought the bondslave of words. Demonstrations truly are in effect the philosophies themselves and the sciences. For such as they are, well or ill established, such are the systems of philosophy and the contemplations which follow. Now in the whole of the process which leads from the sense and objects to axioms and conclusions, the demonstrations which we use are deceptive and incompetent. This process consists of four parts, and has as many fault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impressions of the sense itself are faulty; for the sense both fails us and deceives us. But its shortcomings are to be supplied, and its deceptions to be corrected. Secondly, notions are ill-drawn from the impressions of the senses, and are indefinite and confused, whereas they should be definite and distinctly bounded. Thirdly, the induction is amiss which infers 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s by simple enumeration, and does not, as it ought, employ exclusions and solutions (or separations) of nature. Lastly, that method of discovery and proof according to which the most general principles are first established, and then intermediate axioms are tried and proved by them, is the parent of error and the curse of all

science. Of these things, however, which now I do but touch upon, I will speak more largely when, having performed these expiations and purgings of the mind, I come to set forth the true way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邪恶的论证方式变成了幻象赖以生存的堡垒和防线；我们现有的逻辑论证只不过是将世界视为人类思想的奴隶，又将人类的思想当作文字的奴隶。实际上，论证的确本身就是哲学，就是科学。因为论证的好与坏要视其建立得好与坏，同样，哲学体系以及追随其后的思辨也是如此。现在，在从感官和对象到公理和结论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使用的论证都具有欺骗性，而且论证不力。这个过程包含四个部分，而且还有许多错误。第一，感官印象本身有误，因为对我们来说，感官不仅无用，而且还有欺骗性。不过，感官的缺陷须要弥补，而且感官的欺骗性须要纠正。第二，概念抽取方法有误，从感官印象中抽取出来的概念模糊不清，混乱不堪；而这些概念本应清晰明确，界限分明。第三，归纳不当，即科学原理的推导本应采取性质排除法或性质分解法，却采用了简单枚举法。第四，发现与证明的方法有误，而且是一切错误的根源，一切科学的祸端；这种方法是先建立起最普遍的原则，然后以此为据考证中间性公理。以上所及的事情，我现在只是浅尝辄止；等到人的心灵得以补过和净化、并最终找到阐释自然的正确方法时，我再予以详论。

LXX

七十

But the best demonstration by far is experience, if it go not beyond the actual experiment. For if it be transferred to other cases

which are deemed similar, unless such transfer be made by a just and orderly process, it is a fallacious thing. But the manner of making experiments which men now use is blind and stupid. And therefore, wandering and straying as they do with no settled course, and taking counsel only from things as they fall out, they fetch a wide circuit and meet with many matters, but make little progress; and sometimes are full of hope, sometimes are distracted; and always find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beyond to be sought. For it generally happens that men make their trials carelessly, and as it were in play; slightly varying experiments already known, and, if the thing does not answer, growing weary and abandoning the attempt. And even if they apply themselves to experiments more seriously and earnestly and laboriously, still they spend their labor in working out some one experiment, as Gilbert with the magnet, and the chemists with gold; a course of proceeding not less unskillful in the design than small in the attempt. For no one successfully investigates the nature of a thing in the thing itself; the inquiry must be enlarged so as to become more general.

最好的论证就是经验，只要这论证符合实际的实验。因为类似情形如果要照搬经验，除非照搬过程合理有序，否则难免有误。然而人们现在实验时所用方法盲目而笨拙。因此，他们做实验缺乏既定的规程，总是搞歪门邪道，仅仅从一些事情中获取教训，因此，他们虽然见多识广，所遇甚多，但进步不大；他们有时信心十足，有时心烦意乱，但总觉得有事情等待自己去寻求。一般而言，人们做实验时总是粗心大意，仿佛是在玩游戏，只需稍加改变已知实验而已，如果事情没有反应，便顿生厌倦，甚至放弃尝试。即使有人实验时认认真真，辛辛苦苦，尽心尽力，他所做的实验也只不过是在活动一下筋骨而已，如吉尔伯特的磁石实验，化学家的黄金实验，都属于此类；这种实验过程，设计笨拙，目标太小。因为仅仅就事论事地去调查事物的本质，谁都无法取得成功，必须扩大探查范围，才能获得更多的普遍

性。

And even when they seek to educe some science or theory from their experiments, they nevertheless almost always turn aside with overhasty and unseasonable eagerness to practice; not only for the sake of the uses and fruits of the practice, but from impatience to obtain in the shape of some new work an assurance for themselves that it is worth their while to go on; and also to show themselves off to the world, and so raise the credit of the business in which they are engaged. Thus, like Atalanta, they go aside to pick up the golden apple, but meanwhile they interrupt their course, and let the victory escape them. But in the true course of experience, and in carrying it on to the effecting of new works, the divine wisdom and order must be our pattern. Now God on the first day of creation created light only, giving to that work an entire day, in which no material substance was created. So must we likewise from experience of every kind first endeavor to discover true causes and axioms; and seek for experiments of Light, not for experiments of Fruit. For axioms rightly discovered and established supply practice with its instruments, not one by one, but in clusters, and draw after them trains and troops of works. Of the paths, however, of experience, which no less than the paths of judgment are impeded and beset, I will speak hereafter; here I have only mentioned ordinary experimental research as a bad kind of demonstration. But now the order of the matter in hand leads me to add something both as to those *signs* which I lately mentioned (signs that the systems of philosophy and contemplation in use are in a bad condition), and also as to the *causes* of what seems at first so strange and incredible. For a knowledge of the signs prepares assent; an explanation of the causes removes the marvel—which two things will do much to render the extirpation of idols from the

understanding more easy and gentle.

人们有时企图从实验中创立某种科学或理论，但即使这样，他们也往往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地偏重于实践；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在追求实际的用途和结果，而且迫不及待地想从新成果中获得一种自信，证明值得花时间去继续做实验，同时也向世界炫耀自己，以便提高自己在业界的声望。这样，他们就会像阿塔兰忒一样，虽然捷足善走，但因在岔道捡拾金苹果而耽误路程，最终导致与胜利失之交臂。但是在真正的经验过程中，在将经验推向产生新成果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神之智慧和秩序为楷模。上帝在创世的第一天仅仅创造了光，而且是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而这一天中，什么物质实体都没有创造出来。同样，我们必须首先从各种经验中努力发现真正的原因和公理，必须追求这种发现“光”的实验，而不是只求那种发现“果”的实验。因为发现和建立公理的过程，如果正确无误，那么公理便会给实践提供工具，并且不是单件单件地提供，而是成堆成堆地提供，随之而来的便是累累硕果。不过，获取经验的途径和作出判断的途径都会受到阻碍和困扰；关于这一点，我在下文还将谈到；关于普通实验研究，我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糟糕的论证来提及一下罢了。现在，根据手中的问题，我还须逐一阐述另外两点：一是前文刚刚提到的“迹象”（即表明当前通行的思辨和哲学体系所处环境极其恶劣）；一是乍看奇怪且令人难以置信的“原因”。了解迹象可以博得人们的认可，说明原因则可消除人们的惊诧；这两点非常有助于根除理解力中的种种幻象，而且根除时也更加容易，更加温和。

LXXI

七十一

The sciences which we possess come for the most part from the Greeks. For what has been added by Roman, Arabic, or later writers is not much nor of much importance; and whatever it is, it is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Greek discoveries. Now the wisdom of the Greeks was professorial and much given to disputations, a kind of wisdom most adverse to the inquisition of truth. Thus that name of Sophists, which by those who would be thought philosophers was in contempt cast back upon and so transferred to the ancient rhetoricians, Gorgias, Protagoras, Hippias, Polus, does indeed suit the entire class: Plato, Aristotle, Zeno, Epicurus, Theophrastus, and their successors Chrysippus, Carneades, and the rest. There was this difference only, that the former class was wandering and mercenary, going about from town to town, putting up their wisdom to sale, and taking a price for it, while the latter was more pompous and dignified, as composed of men who had fixed abodes, and who opened schools and taught their philosophy without reward. Still both sorts, though in other respects unequal, were professorial; both turned the matter into disputations, and set up and battled for philosophical sects and heresies; so that their doctrines were for the most part (as Dionysius not unaptly rallied Plato) "the talk of idle old men to ignorant youths." But the elder of the Greek philosophers, Empedocles, Anaxagoras, Leucippus, Democritus, Parmenides, Heraclitus, Xenophanes, Philolaus, and the rest (I omit Pythagoras as a mystic), did not, so far as we know, open schools; but more silently and severely and simply—that is, with less affectation and parade—betook themselves to the inquisition of truth. And therefore they were in my judgment more successful; only that their works were in the course of time obscured by those slighter persons who had more which suits and pleases the capacity and tastes of the vulgar; time, like a river, bringing down to us things which are light and puffed up, but letting weighty matters sink. Still even they were not altogether free

from the failing of their nation, but leaned too much to the ambition and vanity of founding a sect and catching popular applause. But the inquisition of truth must be despaired of when it turns aside to trifles of this kind. Nor should we omit that judgment, or rather divination, which was given concerning the Greeks by the Egyptian priest—that “they were always boys, without antiquity of knowledge or knowledge of antiquity.” Assuredly they have that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boys: they are prompt to prattle, but cannot generate; for their wisdom abounds in words but is barren of works. And therefore the signs which are taken from the origin and birthplace of the received philosophy are not good.

我们现在的科学大多数来自古希腊。因为罗马、阿拉伯或后来的作家们增加的东西并不多见，而且也不那么重要；即使有所增加，也都是建立在古希腊人的发现之上的。现在看来，希腊人的智慧在于坐而论道，好争善辩，此种智慧与探索真理大相径庭。说到“诡辩家”，那些号称哲学家的人很蔑视这种称呼，他们把这一称呼回敬给那些古代修辞学家，如：高尔吉亚、普罗塔哥拉、希庇亚斯、波卢斯等；“诡辩家”这一称呼，事实上也都适合于他们自己：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伊壁鸠鲁、狄奥佛拉斯塔，及其继承者赫里西普斯，卡尼底斯等等。这两类人唯一区别在于：前者周游各地，唯利是图，往返于城市之间，兜售智慧，并以此谋生；而后者自命不凡，孤芳自赏，固居一处，设校授学，不求回报。二者虽有以上不同之处，但也有相似之处：坐而论道；二者都是把事情变为争论，都是建立哲学流派和异端学说，并彼此唇枪舌剑；因此，他们的学说大多是（就像狄奥尼修斯恰如其分地嘲笑柏拉图）“无聊老者对无知青年的谈话”。较早的希腊哲学家如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哥拉、留基伯、德谟克利特、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色诺芬尼、菲洛劳斯等等，据我们所知，他们都未曾设校授学（毕达哥拉斯乃神秘主义者，姑且不论），而是悄然投身于真理的探寻，而且态度严肃而单纯——既不装腔作势，也不招摇撞骗。因此，我认为他们是比较成功的，只是他们

的成果在时间长河中被那些投俗人之好、无足轻重的小人给淹没了；时间长河漂留给我们的是无足轻重的泡沫，而沉落河底的却是举足轻重的精华。即使如此，他们也完全没有摆脱他们民族的通病，即野心勃勃、爱慕虚荣，过多地倾向于开宗立派、哗众取宠。如果说探索真理竟然歪斜到如此琐屑之事上，那实在令人绝望。还有一种断语，准确地说是谶语，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埃及僧人在评价希腊人时所说的话："他们永远都是孩童，既无知识之古，亦无古之知识。"的确，他们具有孩子般的特点：敏于言，拙于行，即他们的智慧长于文字，而短于行动。因此，从现行哲学的源头和诞生地看，这些都是些不好的迹象。

LXXII

七十二

Nor does the character of the time and age yield much better signs than the character of the country and nation. For at that period there was but a narrow and meager knowledge either of time or place, which is the worst thing that can be,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rest all on experience. For they had no history worthy to be called history that went back a thousand years—but only fables and rumors of antiquity. And of the regions and districts of the world they knew but a small portion, giving indiscriminately the name of Scythians to all in the North, of Celts to all in the West; knowing nothing of Africa beyond the hither side of Ethiopia, of Asia beyond the Ganges. Much less were they acquainted with the provinces of the New World, even by hearsay or any well-founded rumor; nay, a multitude of climates and zones, wherein innumerable nations breathe and live, were pronounced by them to be uninhabitable;

and the travels of Democritus, Plato, and Pythagoras, which were rather suburban excursions than distant journeys, were talked of as something great. In our times, on the other hand, both many parts of the New World and the limits on every side of the Old World are known, and our stock of experience has increased to an infinite amount. Wherefore if (like astrologers) we draw signs from the season of their nativity or birth, nothing great can be predicted of those systems of philosophy.

与国家和民族的特性相比，时间和年代的特性所产生的迹象好不了多少。因为在那个时期，人们对时间或地域的了解很片面、很贫乏，尤其是对那些一切都依靠经验的人来说，这是最糟糕的事情。回到一千年前，他们没有可被称作历史的“历史”——拥有的只是古代的寓言和传闻。对于世界各地，他们所了解的也屈指可数，所以不加区分地把所有北方人都称为西叙亚人，把所有西方人都称为凯尔特人；而对非洲南至埃塞俄比亚以外，亚洲东至恒河以外，也就一无所知了。至于新世界各地，他们知之更少，甚至既没有道听途说过，也没有听人有鼻子有眼地谣传过；非但如此，他们也不知道世界气候不一、地带众多，竟然还有人居住在他们断言不可居住的地方；而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他们的游历与其说是长途旅行，不如说是郊外散步，却被人们说成是一种壮举。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新世界的许多地方，还是旧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已为人知了，我们积累的经验库都已经无限丰富了。因此，如果我们（像星相学家那样）从诞辰季节抽出种种征兆迹象，那么，我们是无法从那些哲学体系中推测出伟大的东西来的。

LXXIII

七十三

Of all signs there is none more certain or more noble than that taken from fruits. For fruits and works are as it were sponsors and sureties for the truth of philosophies. Now, from all these systems of the Greeks, and their ramifications through particular sciences, there can hardly after the lapse of so many years be adduced a single experiment which tends to relieve and benefit the condition of man, and which can with truth be referred to the speculations and theories of philosophy. And Celsus ingenuously and wisely owns as much when he tells us that the experimental part of medicine was first discovered, and that afterwards men philosophized about it, and hunted for and assigned causes; and not by an inverse process that philosophy and the knowledge of causes led to the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xperimental part. And therefore it was not strange that among the Egyptians, who rewarded inventors with divine honors and sacred rites, there were more images of brutes than of men; inasmuch as brutes by their natural instinct have produced many discoveries, whereas men by discussion and the conclusions of reason have given birth to few or none.

在所有迹象中，没有什么比从成果中获得的迹象更加踏实，更加壮观了。因为成果和成就实际上才是哲学真理的见证和保证。现在，在希腊人的那些哲学体系及其衍生出来的分门别类的科学中，过了这么多年，竟然找不到一个实验是旨在为人类谋福利的，也找不到一个实验是来自哲学思考和哲学理论的。塞尔萨斯很率直、明智、坦承地告诉我们说，医学实验是发现在先，再对其进行哲学探讨以寻找和解释其中原因的，而不是倒行逆施，先有哲学和知识之因，后有实验发现和发展。因此，难怪埃及人的动物偶像多于人物偶像，原来埃及人崇拜那些带着神的荣誉和庄严的仪式的发明者。动物凭其自然本能创造出的发明不计其数，而人类凭其讨论和理性的结论产生的发明微乎

其微或颗粒无收。

Some little has indeed been produced by the industry of chemists; but it has been produced accidentally and in passing, or else by a kind of variation of experiments, such as mechanics use, and not by any art or theory. For the theory which they have devised rather confuses the experiments than aids them. They, too, who have busied themselves with natural magic, as they call it, have but few discoveries to show, and those trifling and imposture-like. Wherefore, as in religion we are warned to show our faith by works, so in philosophy by the same rule the system should be judged of by its fruits, and pronounced frivolous if it be barren, more especially if, in place of fruits of grape and olive, it bear thorns and briers of dispute and contention.

化学家的勤劳确实也产生了些许成果；但这只是偶然的结果，或者说是实验变化的结果，即是机械的功劳，而不是任何技艺或理论的功劳。化学家们设计的理论与其说有助于实验，不如说搞乱了实验。他们虽然忙于自然魔法（就按他们这样称呼吧），也能提供极少的发明，但太肤浅，有点欺世盗名的感觉。所以，宗教之中，我们受到警告，要通过行动来表示我们的忠诚；同样，哲学之中，我们也应按照相同的规则，要通过成果来评判学说体系；如果没有成果，那么我们就要宣告该学说体系毫无价值，尤其当其不仅不能产生出葡萄和橄榄等果实，反而充满了争执和论战这样的针刺和荆棘的时候。

LXXIV

七十四

Signs also are to be drawn from the increase and progress of systems and sciences. For what is founded on nature grows and increases, while what is founded on opinion varies but increases not. If therefore those doctrines had not plainly been like a plant torn up from its roots, but had remained attached to the womb of nature and continued to draw nourishment from her, that could never have come to pass which we have seen now for twice a thousand years; namely, that the sciences stand where they did and remain almost in the same condition, receiving no noticeable increase, but on the contrary, thriving most under their first founder, and then declining. Whereas in the mechanical arts, which are founded on nature and the light of experience, we see the contrary happen, for these (as long as they are popular) are continually thriving and growing, as having in them a breath of life, at the first rude, then convenient, afterwards adorned, and at all times advancing.

另外，有些迹象是从哲学体系和各种科学的增长和发展中抽取出来的。凡是植根于自然的东西都会生长与增加；凡是建立于意见的东西都会改变，但不会增加。植物只要不全断其根系，而是依然孕育于自然之子宫，那么就会继续吸取营养。如果那些学说也像植物一样，那么概不可能出现我们两千年来所见到的情形，即各种科学待在原地，几乎原封不动，非但没有显著的增长，反而从其初创时的繁荣最终走向了衰落。再看机械技艺，由于机械技艺建立在自然之上，并且有经验的帮助，所以我们见到的情形完全相反：这些技艺（只要人们喜欢）仿佛有一种生命的气息，不停地在繁荣和发展——初始粗糙，继而便利，终而精细。

LXXV

七十五

There is still another sign remaining (if sign it can be called, when it is rather testimony, nay, of all testimony the most valid). I mean the confession of the very authorities whom men now follow. For even they who lay down the law on all things so confidently, do still in their more sober moods fall to complaints of the subtlety of nature, the obscurity of things,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human mind. Now if this were all they did, some perhaps of a timid disposition might be deterred from further search, while others of a more ardent and hopeful spirit might be whetted and incited to go on farther. But not content to speak for themselves, whatever is beyond their own or their master's knowledge or reach they set down as beyond the bounds of possibility, and pronounce, as if on the authority of their art, that it cannot be known or done; thus most presumptuously and invidiously turning the weakness of their own discoveries into a calumny of nature herself, and the despair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Hence the school of the New Academy, which held *Acatalepsia* as a tenet and doomed men to perpetual darkness. Hence the opinion that forms or true differences of things (which are in fact laws of pure act) are past finding out and beyond the reach of man. Hence, too, those opinions in the department of action and operation; as, that the heat of the sun and of fire are quite different in kind—lest men should imagine that by the operations of fire anything like the works of nature can be educed and formed. Hence the notion that composition only is the work of man, and mixture of none but nature—lest men should expect from art some power of generating or transforming natural bodies. By this sign, therefore, men will easily take warning not to mix up their fortunes and labors with dogmas not only despaired of but

dedicated to despair.

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迹象（与其称为迹象，不如称为证据，而且是最为有力的证据）。我是指那种至今还受人追捧的权威人士的论调。这些人即便信心十足，想为一切事物制定法则，但心平气和时，也不免抱怨自然太过微妙，事物难以尽知，而人心却虚弱无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秉性懦弱者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惊吓，固步不前；而性情刚烈者可能会因此而磨刀霍霍，奋勇向前。但他们并不满足于为自我辩护，而是进而将自己或老师的知识及其所涉范围视为不可企及，并仿佛根据技艺上的权威声称，这既不可知，亦不可为；原本是他们发现自身存在的弱点，结果却一气之下转而诬陷是自然本身的缘故；最终转而对世上其他人感到绝望。由此产生了新学院派——他们将“不可理解论”尊奉为主义，认定世人永处黑暗之中。并由此形成了这么一种见解，认为事物的形式或真正区别（实为纯粹的行为法则）难以察清，而且人力莫及。由此，形成了关于行为和操作的意见，认为两者就好比日与火的热量一样，分属不同的种类——唯恐人们有这种设想，即凭借火的作用，任何事情都可以像自然运作那样推演形成。由此形成这么一种概念，认为组合只是人的工作，而混合才是自然的工作——唯恐人们企图从技艺中获取某种力量来生成或改变自然物体。因此，从这个迹象，人们很容易得到警示，切勿把前程和努力与教条混为一谈，因为教条非但令人绝望，而且导向绝望。

LXXVI

七十六

Neither is this other sign to be omitted: that formerly there existed among philosophers such great disagreement, and such

diversities in the schools themselves, a fact which sufficiently shows that the road from the senses to the understanding was not skillfully laid out, when the same groundwork of philosophy (the nature of things to wit) was torn and split up into such vague and multifarious errors. And although in these times disagreements and diversities of opinion on first principles and entire systems are for the most part extinguished, still on parts of philosophy there remain innumerable questions and disputes, so that it plainly appears that neither in the systems themselves nor in the modes of demonstration is there anything certain or sound.

还有一种迹象不可略而不论。以前哲学家之间分歧巨大，门派纷争，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从感官通往理解力的路径铺设得并不精细，而哲学的共同基础（即事物的性质）则被撕裂成各种含混不清的谬误。那时，尽管在第一性原理和整个体系上，分歧意见大部分都已消除，但哲学的某些方面，依然存在无数问题和争执，因此，可以清楚看出，无论是体系本身，还是论证模式，都存在不够准确或不够健全的地方。

LXXVII

七十七

And as for the general opinion that in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at any rate, there is great agreement, since after its publication the systems of older philosophers died away, while in the times which followed nothing better was found, so that it seems to have been so well laid and established as to have drawn both

ages in its train—I answer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the common notion of the falling off of the old systems upon the publication of Aristotle's works is a false one; for long afterwards, down even to the times of Cicero and subsequent ages, the works of the old philosophers still remained. But in the times which followed, when on the inundation of barbarians into the Roman empire human learning had suffered shipwreck, then the systems of Aristotle and Plato, like planks of lighter and less solid material, floated on the waves of time and were preserved. Upon the point of consent also men are deceived, if the matter be looked into more keenly. For true consent is that which consists in the coincidence of free judgments, after due examination. But far the greater number of those who have assented to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have addicted themselves thereto from prejudgment and upon the authority of others; so that it is a following and going along together, rather than consent. But even if it had been a real and widespread consent, still so little ought to consent to be deemed a sure and solid confirmation, that it is in fact a strong presumption the other way. For the worst of all auguries is from consent in matters intellectual (divinity excepted, and politics where there is right of vote). For nothing pleases the many unless it strikes the imagination, or binds the understanding with the bands of common notions, as I have already said. We may very well transfer, therefore, from moral to intellectual matters the saying of Phocion, that if the multitude assent and applaud, men ought immediately to examine themselves as to what blunder or fault they may have committed. This sign, therefore, is one of the most unfavorable. And so much for this point; namely, that the signs of truth and soundness in the received systems and sciences are not good, whether they be drawn from their origin, or from their fruits, or from their progress, or from the confessions of their founders, or from general consent.

一般人们都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得到了人们的极大认同，因其一经发表，旧有的哲学体系就宣告消亡，而其后也没有更好的东西出现，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似乎建立得很完美，以至前后两代人都把它奉为金科玉律；对此，我首先要说的是，一般认为的，旧体系因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出版而宣告消亡的说法，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之后，过了很久，直到西塞罗时代及其之后的若干年，旧哲学家们的著作安然无恙，依旧存在。但是，到了后来的罗马帝国时代，人类学术因野蛮而遭遇“海难”，而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体系犹如漂浮于时间波浪上的船板得以保存。至于普遍认可这一点，只要稍加仔细地调查一下，就知道人们也是受到了蒙骗。因为真正的认可应当是指各种自由判断经过充分验证而达到一致。但是在认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先入为主，崇尚权威而已；因此，这种认可实属随大流，谈不上是认可。即使曾经是真正而又广泛的认可，也不该把认可当作牢不可破的证实；相反，这种认可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很强的揣测而已。在所有揣测中，最糟糕的要数在知识问题上以认可为依据的臆测（神学除外，还有政治学也除外，因为这些领域有投票权）。因为如前所述，但凡能取悦众人者，要么能打动人的想象力，要么是用普通概念作为绳索来束缚理解力。因此，我们最好还是把福基翁关于道德问题的言论转移到知识问题上来，即如果认可和掌声过多，就应该立刻自我反省，扪心自问，犯有何种错误和过失。因此，这种迹象最为不利。这一点，就谈到这里，换句话说，以上所述是从现行哲学和科学的根源、成果、进步、创始人自述以及大众认可的角度加以讨论，其中种种迹象不容乐观，不尽如人意。

LXXVIII

七十八

I now come to the *causes* of these errors, and of so long a continuance in them through so many ages, which are very many and very potent; that all wonder how these considerations which I bring forward should have escaped men's notice till now may cease, and the only wonder be how now at last they should have entered into any man's head and become the subject of his thoughts—which truly I myself esteem as the result of some happy accident, rather than of any excellence of faculty in me—a birth of Time rather than a birth of Wit. Now, in the first place, those so many ages, if you weigh the case truly, shrink into a very small compass. For out of the five and twenty centuries over which the memory and learning of men extends, you can hardly pick out six that were fertile in sciences or favorable to their development. In times no less than in regions there are wastes and deserts. For only three revolutions and periods of learning can properly be reckoned: one among the Greeks, the second among the Romans, and the last among us, that is to say, the nations of Western Europe. And to each of these hardly two centuries can justly be assigned. The intervening ages of the world, in respect of any rich or flourishing growth of the sciences, were unprosperous. For neither the Arabians nor the Schoolmen need be mentioned, who in the intermediate times rather crushed the sciences with a multitude of treatises, than increased their weight. And therefore the first cause of so meager a progress in the sciences is duly and orderly referred to the narrow limits of the time that has been favorable to them.

现在我要谈谈这些错误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原因很多而且很有力；这样，我的看法为何至今都没有引起人注意，也就不足为怪，唯一奇怪的是，我的看法最终是如何得以进入人们的大脑，成为他们思考的话题的——说实话，我自己倒宁愿视为机缘巧合而非我的卓越才能所致——是时间所致，而非智慧所致。现在，首先谈谈错误长存

这么多年的原因；如果认真掂量掂量，就可以把原因缩到极小的范围。人类的记忆和学问经历了二十五个世纪，而科学繁荣和利于其发展的时期也只能挑出六个世纪。无论是时间还是地域都存在荒原和沙漠。正经算起来也只能算出三次学术革命，即三个学术时期：第一期是希腊人，第二期是罗马人，第三期是我们，也就是说，西欧各民族。这三个时期中，每一个时期能持续两百年也算是不错的了。就科学的繁荣及其发展而言，在这个世界中，间断存续的这三个时期也并不顺利。阿拉伯人和经院学派不值一提；在这些间断期，他们与其说给科学增添了分量，不如说用堆积如山的论文蹂躏了科学。因此，科学发展如此不足，恰当地说，首要的原因在于时间有限，对科学不利。

LXXIX

七十九

In the second place there presents itself a cause of great weight in all ways, namely, that during those very ages in which the wits and learning of men have flourished most, or indeed flourished at all, the least part of their diligence was given to natural philosophy. Yet this very philosophy it is that ought to be esteemed the great mother of the sciences. For all arts and all sciences, if torn from this root, though they may be polished and shaped and made fit for use, yet they will hardly grow. Now it is well known that after the Christian religion was received and grew strong, by far the greater number of the best wits applied themselves to theology; that to this both the highest rewards were offered, and helps of all kinds most abundantly supplied; and that this devotion to theology chiefly occupied that third portion or epoch of time among us Europeans of

the West, and the more so because about the same time both literature began to flourish and religious controversies to spring up. In the age before, on the other hand,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the second period among the Romans, the meditations and labors of philosophers were principally employed and consumed on moral philosophy, which to the heathen was as theology to us. Moreover, in those times the greatest wits applied themselves very generally to public affairs, the magnitude of the Roman empire requiring the services of a great number of persons. Again, the age in which natural philosophy was seen to flourish most among the Greeks was but a brief particle of time; for in early ages the Seven Wise Men, as they were called (all except Thales), applied themselves to morals and politics; and in later times, when Socrates had drawn down philosophy from heaven to earth, moral philosophy became more fashionable than ever, and diverted the minds of men from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其次，有一点，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理由，也就是，即使在人类智慧和学术最为昌盛的时代，或者说曾经昌盛过的时代，人们在自然哲学上所下的功夫也只是微乎其微。然而正是这个哲学才理应尊为伟大的科学之母。因为一切技艺和一切科学，如果拔掉了哲学这条根，即使加以粉饰和打扮，并被赋予实用价值，也很难生存下去。众所周知，基督教得到人们的信仰，并变得强大起来之后，绝大多数大智之人都投身于神学；他们不仅投入了最高的报酬，甚至还为此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帮助；这种对神学的关注整整占据了我们西欧人第三段时期；文学开始繁荣的同时，宗教争论也开始崛起，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而在前一个时期，即罗马人所属的第二个时期，哲学家们主要把精力消耗到道德哲学上了。道德哲学之于异教徒，犹如神学之于我辈。而且，那时大智之人普遍投身于公共事务之中，因为庞大的罗马帝国需要大量的人去服务。再看看希腊人时期，这个时期被视为自然哲学最为昌盛的时期，但实际上好景不长；因为早期所谓的

七哲（除泰勒斯以外）都投身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学；而后期的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堂拉到了地上，道德哲学空前流行，从而使人心偏离了自然哲学。

Nay, the very period itself in which inquiries concerning nature flourished, was by controversies and the ambitious display of new opinions corrupted and made useless. Seeing therefore that during those three periods natural philosophy was in a great degree either neglected or hindered, it is no wonder if men made but small advance in that to which they were not attending.

非但如此，即使是在自然研究的繁荣时期，哲学家们也是无谓地争论和故意炫耀新见解，不仅败坏了这个时代而且使这个时代显得一无是处。如此看来，以上三个时期中，自然哲学很大程度上要么被人忽略，要么被人阻止；所以如果说在不受关注的事情上人们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也不必感到诧异。

LXXX

八十

To this it may be added that natural philosophy, even among those who have attended to it, has scarcely ever possessed, especially in these later times, a disengaged and whole man (unless it were some monk studying in his cell, or some gentleman in his country house), but that it has been made merely a passage and bridge to something else. And so this great mother of the sciences

has with strange indignity been degraded to the offices of a servant, having to attend on the business of medicine or mathematics, and likewise to wash and imbue youthful and unripe wits with a sort of first dye, in order that they may be the fitter to receive another afterwards. Meanwhile let no man look for much progress in the sciences—especially in the practical part of them—unless natural philosophy be carried on and applied to particular sciences, and particular sciences be carried back again to natural philosophy. For want of this, astronomy, optics, music, a number of mechanical arts, medicine itself—nay, what one might more wonder at,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logical sciences—altogether lack profoundness, and merely glide along the surface and variety of things. Because after these particular sciences have been once distributed and established, they are no more nourished by natural philosophy, which might have drawn out of the true contemplation of motions, rays, sounds, texture and configuration of bodies, affections, and intellectual perceptions, the means of imparting to them fresh strength and growth. And therefore it is nothing strange if the sciences grow not, seeing they are parted from their roots.

除此以外，还可以补充一个原因，那就是，自然哲学即使在那些专注的人当中，尤其是在后两个时期，也很难找到一个不顾一切、全力从事研究的人（除了在僧房中从事研究的僧侣，或是在别墅中从事研究的绅士），而只是被当作达到其他目的的通道与桥梁。因此，这个伟大的科学之母竟然丧失其尊严，沦落到仆役的境地，不得不去侍候医学或数学的业务，不得不用底料去洗染幼稚而不成熟的哲人们，以便将来更加适合于接受其他染料。与此同时，不必指望科学——尤其是实用科学——会有多大的进步，除非把自然科学运用到具体科学，再将具体科学带回到自然哲学上来。因为如果缺少了这一点，天文学、光学、众多机械技术、医学本身都缺乏深度，只是在事物的表面上和花样上一滑而过。因为这些具体科学一旦分工建立起来，就不

再吸取自然哲学的营养了；自然哲学却是从思辨中抽取出来，而思辨的对象包括运动、光线、声音、物体结构及布局、人的情感、理智的知觉，所有这些都为具体科学注入了新鲜力量和生机。因此，如果说具体科学因从根系中分离出来就停止了生长，也不足为奇。

LXXXI

八十一

Again there is another great and powerful cause why the sciences have made but little progress, which is this. It is not possible to run a course aright when the goal itself has not been rightly placed. Now the true and lawful goal of the sciences is none other than this: that human life be endowed with new discoveries and powers. But of this the great majority have no feeling, but are merely hireling and professorial; except when it occasionally happens that some workman of acuter wit and covetous of honor applies himself to a new invention, which he mostly does at the expense of his fortunes. But in general, so far are men from proposing to themselves to augment the mass of arts and sciences, that from the mass already at hand they neither take nor look for anything more than what they may turn to use in their lectures, or to gain, or to reputation, or to some similar advantage. And if any one out of all the multitude court science with honest affection and for her own sake, yet even with him the object will be found to be rather the variety of contemplations and doctrines than the severe and rigid search after truth. And if by chance there be one who seeks after truth in earnest, yet even he will propose to himself such a kind of truth as shall yield satisfaction to the mind and

understanding in rendering causes for things long since discovered, and not the truth which shall lead to new assurance of works and new light of axioms. If then the end of the sciences has not as yet been well placed, it is not strange that men have erred as to the means.

另外，导致各门具体科学进步甚微的还有一个重要的而且具有说服力的原因，即：人行于路，目标不正，路途必斜。科学，其真正而又合法的目标不外乎是：用新发现和新力量施惠于人类生活。但绝大数人对此都毫无感觉，他们都不过是唯利是图之辈，而且充满了学究气；只是偶尔有工匠，因智慧敏捷但又贪图荣誉，才投身于新发明，但多半又是以其财产为代价。不过，一般而言，人们无意于扩大技术与科学的总量，因此，从手边已有的总量中，他们所追求的不外乎是这些目标，即有利于演讲、有利于收益、有利于成名，或者有利于获得类似的好处。即使在众多人群中，有人以真诚的情感来巴结科学，为科学而科学；然而即使对他而言，其意图与其说是旨在严肃认真地追寻真理，不如说是旨在建立各种各样的思辨和学说。如果说碰巧有人真心诚意地追求真理，实际上，他倾心追求的是这样一种真理，即给早已发现的事物寻找原因，以满足人心及理解力的真理，而不是给各种成果寻求新的保证、给各种公理寻找新的亮点。既然至今都没有摆正科学的目标，那么人们在方法上出现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LXXXII

八十二

And as men have misplaced the end and goal of the sciences, so again, even if they had placed it right, yet they have chosen a way

to it which is altogether erroneous and impassable. And an astonishing thing it is to one who rightly considers the matter, that no mortal should have seriously applied himself to the opening and laying out of a road for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direct from the sense, by a course of experiment orderly conducted and well built up, but that all has been left either to the mist of tradition, or the whirl and eddy of argument, or the fluctuations and mazes of chance and of vague and ill-digested experience. Now let any man soberly and diligently consider what the way is by which men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proce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discovery of things, and in the first place he will no doubt remark a method of discovery very simple and inartificial, which is the most ordinary method, and is no more than this. When a man addresses himself to discover something, he first seeks out and sets before him all that has been said about it by others; then he begins to meditate for himself; and so by much agitation and working of the wit solicits and as it were evokes his own spirit to give him oracles; which method has no foundation at all, but rests only upon opinions and is carried about with them.

以上讨论的是人们将科学的目的和目标摆错了位置；其实，即使是他们摆正了位置，但他们所选择的方法也完全错误，完全行不通。人只要仔细思考一下就会明白，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竟然没有人严肃认真地通过严谨的实验，从感官中开辟一条通往人类理解力的道路；反而将一切或归结到传统的迷雾之中，或归结于争论的漩涡之中，或归结于机会的波动之中，或归结于模糊杂乱的经验迷宫之中。现在，任何人只要冷静下来，用心思考一下人们习惯于走何种道路来调查发现事物，那么他肯定会首先注意到，发现事物的方法也是最普通的方法，简单自然；不外乎就是这样的：当有人致力于发现事物时，他首先要找出别人先前对这一事物的看法，然后自己要开动脑筋加以思索，再激发自己的智慧来引出，或者说，唤起自己的灵性来获

得神示。这种方法完全没有根基，只是建立在各种意见之上，而且受其左右。

Another may perhaps call in logic to discover it for him, but that has no relation to the matter except in name. For logical invention does not discover principles and chief axioms, of which arts are composed, but only such things as appear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m. For if you grow more curious and importunate and busy, and question her of probations and invention of principles or primary axioms, her answer is well known; she refers you to the faith you are bound to give to the principles of each separate art.

其次，也许有人把逻辑召唤进来为自己的发现寻找理据，但是除了名称之外，逻辑与发现毫无关联。因为逻辑发明并不旨在发现构成技艺的原理和主要公理，而是旨在找到在那些能适合这些原理和公理的东西。如果你过于好奇，坚持己见，而且爱管闲事，去质询逻辑如何鉴定和发明原理或初始公理，那么逻辑给出的答案就显而易见；逻辑就会促使你信任你不得不信任的每一个技艺原理。

There remains simple experience which, if taken as it comes, is called accident; if sought for, experiment. But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is no better than a broom without its band, as the saying is—a mere groping, as of men in the dark, that feel all round them for the chance of finding their way, when they had much better wait for daylight, or light a candle, and then go. But the true method of experience, on the contrary, first lights the candle, and then by means of the candle shows the way; commencing as it does with experience duly ordered and digested, not bungling or erratic, and from it educing axioms, and from established axioms again new

experiments; even as it was not without order and method that the divine word operated on the created mass. Let men therefore cease to wonder that the course of science is not yet wholly run, seeing that they have gone altogether astray, either leaving and abandoning experience entirely, or losing their way in it and wandering round and round as in a labyrinth; whereas a method rightly ordered leads by an unbroken route through the woods of experience to the open ground of axioms.

最后就是简单经验，如果自行出现，则称为偶遇；如果刻意寻求，则称为实验。但这种经验只不过是脱箍的扫帚，常言说得好："人行于黑暗，唯有四处摸索，方有机会寻得出路。"其实，与其如此，不如等到天明，或秉烛而行。所以真正的经验方法是先点燃蜡烛，后持烛示路；也就是说，真正的经验始于归纳恰当、整列有序的经验，而不是始于随意拼凑或飘忽不定的经验，再根据这些经验推导出公理，最后根据公理进行新实验；就好比神谕创造万物一般，不可没有秩序和方法。因此，人们也不必大惊小怪，科学连一条完整的路径都未走完，因为人们完全误入歧途了，要么彻底摈弃了经验，要么迷失于经验而在迷宫中四处乱走。相反，稳妥的方法是通过畅达之路，穿过经验之林，再通往原理这一片开阔之地。

LXXXIII

八十三

This evil, however, has been strangely increased by an opinion or conceit, which though of long standing is vain and hurtful, namely, that the dignity of the human mind is impaired by long and

close intercourse with experiments and particulars, subject to sense and bound in matter; especially as they are laborious to search, ignoble to meditate, harsh to deliver, illiberal to practice, infinite in number, and minute in subtlety. So that it has come at length to this, that the true way is not merely deserted, but shut out and stopped up; experience being, I do not say abandoned or badly managed, but rejected with disdain.

不过，奇怪的是，这种毛病因这种见解或理解而加剧了，即人们认为固执己见必徒劳无益，甚至有害。换句话说，如果与局限于感官、囿于物质的实验和特殊事物保持长久紧密的接触，就必然伤害人心的尊严；尤其是那些须费力搜寻的事情，思索起来不值当，传授起来太粗俗，实践起来太拘谨，而其数目难以计数，又过于细致。这样一来，人们对经验的态度，弃之不理或处置不当，姑且不论，而竟然对其加以排斥和鄙视，最后达到如此地步：真正的道路不仅是被放弃了，而且也被堵塞了。

LXXXIV

八十四

Again, men have been kept back as by a kind of enchantment from progress in the sciences by reverence for antiquity, by the authority of men accounted great in philosophy, and then by general consent. Of the last I have spoken above.

人们在科学上之所以止步不前，还由于他们崇古，即被哲学大家

的威望和大众认可所禁锢。至于最后一点，前面已有论及。

As for antiquity, the opinion touching it which men entertain is quite a negligent one and scarcely consonant with the word itself. For the old age of the world is to be accounted the true antiquity; and this is the attribute of our own times, not of that earlier age of the world in which the ancients lived, and which, though in respect of us it was the elder, yet in respect of the world it was the younger. And truly as we look for greater knowledge of human things and a riper judgment in the old man than in the young, because of his experience and of the number and variety of the things which he has seen and heard and thought of, so in like manner from our age, if it but knew its own strength and chose to essay and exert it, much more might fairly be expected than from the ancient times, inasmuch as it is a more advanced age of the world, and stored and stocked with infinite experiments and observations.

至于古老，人们对它的认识极为粗浅，与“古老”一词不相匹配。世界的古老才算得上真正的古老；这种古老是相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于古人所生活的那个世界而言的；古人的世界，对我们来说，虽说叫“老”，但相对于世界本身而言，只能说是“幼”。说实话，有关世事，我是向老人而不是向青年寻求更多的知识和更加成熟的判断，因为老人的经验丰富，而且所见所闻所思之事众多且广博；同样，只要相信这个时代已然成熟，并愿意奋力表现出来，我们还是有希望从我们这个时代而不是从古代获取更多的东西，因为这才是一个更加古老的世界，其中已经蕴藏了无数的实验和观察。

Nor must it go for nothing that by the distant voyages and travels which have become frequent in our times many things in

nature have been laid open and discovered which may let in new light upon philosophy. And surely it would be disgraceful if, while the regions of the material globe—that is, of the earth, of the sea, and of the stars—have been in our times laid widely open and revealed, the intellectual globe should remain shut up within the narrow limits of old discoveries.

而且也不能说一事无成，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远航和远游已经成为习惯，自然中的许多事情已被发现，这可能给哲学带来新的曙光。在我们这个时代，物质地球的各个地域——如大地、海洋以及星宿——都已经暴露无遗，而智力地球若依然固步自封于旧有的有限发现之中，就实在是太可耻了。

And with regard to authority, it shows a feeble mind to grant so much to authors and yet deny time his rights, who is the author of authors, nay, rather of all authority. For rightly is truth called the daughter of time, not of authority. It is no wonder therefore if those enchantments of antiquity and authority and consent have so bound up men's powers that they have been made impotent (like persons bewitched) to accompany with the nature of things.

至于权威，人如果过多地折服于作家而否认时间的权利，则表明他心智衰弱；因为时间是作家的作家，更是所有权威的作家。有人将真理称为时间之女，而非权威之女，此言甚是。这样看来，人类软弱无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人类的力量深受古老、权威和认可等蛊惑之术的束缚，从而变得萎弱无力（如受蛊着魔之人一般），无法接近事物的本质。

LXXXV

八十五

Nor is it only the admiration of antiquity, authority, and consent, that has forced the industry of man to rest satisfied with the discoveries already made, but also an admiration for the works themselves of which the human race has long been in possession. For when a man looks at the variety and the beauty of the provision which the mechanical arts have brought together for men's use, he will certainly be more inclined to admire the wealth of man than to feel his wants; not considering that the original observations and operations of nature (which are the life and moving principle of all that variety) are not many nor deeply fetched, and that the rest is but patience, and the subtle and ruled motion of the hand and instruments—as the making of clocks (for instance) is certainly a subtle and exact work: their wheels seem to imitate the celestial orbs, and their alternating and orderly motion, the pulse of animals; and yet all this depends on one or two axioms of nature.

促使人们竭力满足于现有发现的，不仅仅是崇古、尚威、认可，还有对人类已有成果的迷恋。人如果看重的是机械技艺给人类带来的各种用途及其美好，那么他会更多倾向于赞赏自己的富足，而无法觉察自己还有所欠缺：他没有意识到对自然的创造性观察和改造（这才是丰富多彩的事物的生命和动因）既不丰富，也未深入挖掘；他也没有意识到，除此之外，人类的一切都不过是耐心所致，是手艺和工具的精妙及其有规则的运动所致；拿钟表（为例）来说，钟表制作必定是一项精微而细密的工作。钟表齿轮仿佛在模仿天体轨道，其往返循序的运动似乎在模仿动物的脉动，而所有这些依据的都不过是一两条

自然公理而已。

Again, if you observe the refinement of the liberal arts, or even that which relates to the mechanical preparation of natural substances, and take notice of such things as the discovery in astronomy of the motions of the heavens, of harmony in music, of the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to this day not in use among the Chinese) in grammar; or again in things mechanical,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ks of Bacchus and Ceres—that is, of the arts of preparing wine and beer, and of making bread; the discovery once more of the delicacies of the table, of distillations and the like; and if you likewise bear in mind the long periods which it has taken to bring these things to their present degree of perfection (for they are all ancient except distillation), and again (as has been said of clocks) how little they owe to observations and axioms of nature, and how easily and obviously and as it were by casual suggestion they may have been discovered; you will easily cease from wondering, and on the contrary will pity the condition of mankind, seeing that in a course of so many ages there has been so great a dearth and barrenness of arts and inventions. And yet these very discoveries which we have just mentioned are older than philosophy and intellectual arts. So that, if the truth must be spoken, when the rational and dogmatical sciences began, the discovery of useful works came to an end.

再者，仔细看看人文科学的精细程度吧；甚至仔细看看与自然实体制作技艺相关的精细程度；再留心一下诸如此类的发现，如天文学中的天体运动、音乐中的和声、文法中的表音符号字母（汉语至今都未采用）；再留心一下机械事物中的发现，如酒神巴克斯和谷神刻瑞斯的神来之作——琼浆玉液的酿造工艺、面包食物的烘制技艺，还有

诸如此类的发现，如餐桌上珍馐佳肴、蒸馏技术等等；想想流传至今的精湛技艺所经历过的漫长岁月（以上技艺除了蒸馏技术，其余全都是自古流传下来的技艺）；想想那些来自对自然的观察和自然公理的技艺（如上面谈到的钟表）是何等稀少；想想发现那些技艺是何等容易和明显，它们其实都是偶然的联想所致。你如果对此都仔细观察了，认真思考了，你就不会对它们感到大惊小怪了；反而会对人类生活状况产生怜悯之心，因为你所看到的是，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技艺和发明如此稀少，如此匮乏。然而以上提及的发现比哲学和知识性技艺都还古老悠久。因此，如果一定要讲真话的话，那么当唯理科学和教条科学开始之时，有用成果的发现也就宣告结束了。

And again, if a man turn from the workshop to the library, and wonder at the immense variety of books he sees there, let him but examine and diligently inspect their matter and contents, and his wonder will assuredly be turned the other way. For after observing their endless repetitions, and how men are ever saying and doing what has been said and done before, he will pass from admiration of the variety to astonishment at the poverty and scantiness of the subjects which till now have occupied and possessed the minds of men.

还有，假设有人从小作坊来到图书馆，看到浩瀚的书籍而感到惊讶不已的话，那么只要让他仔细审查、认真检视一下这些书籍的实质与内容，他肯定就不会这么大惊小怪了。因为只要发现人们所言所行都不过是在不停地重复前人的所言所行，他就不会赞叹那些浩瀚的书籍，反而会惊讶占据人们心灵的各类学科却是如此地贫乏。

And if again he descen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ose arts which are deemed curious rather than safe, and look more closely

into the works of the alchemists or the magicians, he will be in doubt perhaps whether he ought rather to laugh over them or to weep. For the alchemist nurses eternal hope and when the thing fails, lays the blame upon some error of his own; fearing either that he has not sufficiently understood the words of his art or of his authors (whereupon he turns to tradition and auricular whispers), or else that in his manipulations he has made some slip of a scruple in weight or a moment in time (whereupon he repeats his trials to infinity). And when, meanwhile, among the chances of experiment he lights upon some conclusions either in aspect new or for utility not contemptible, he takes these for earnest of what is to come, and feeds his mind upon them, and magnifies them to the most, and supplies the rest in hope. Not but that the alchemists have made a good many discoveries and presented men with useful inventions. But their case may be well compared to the fable of the old man who bequeathed to his sons gold buried in a vineyard, pretending not to know the exact spot; whereupon the sons applied themselves diligently to the digging of the vineyard, and though no gold was found there, yet the vintage by that digging was made more plentiful.

假设他再屈驾看看那些堪称奇异却并不可靠的技艺，近距离调查那些炼金术士或魔术师的所作所为，那么他也许真不知道自己对此是该笑还是该哭。炼金术士心里总是怀着永久的期待；事情不成时，总是归咎于自己犯了某种错误：要么担心自己没有充分理解所使用技艺的要旨或书籍作者的要旨（他就会转身求助于古法和耳传），要么担心自己炼丹时分量和火候把握上出现了毫厘之差（他就会无限重复自己的实验）。与此同时，在实验过程中，如果碰巧得到某些新颖或有用的结论时，他会迫不及待把这些结论看作大功将至的机会，以满足其心灵的渴望，并且将其夸张到极致，而对其他一切充满着希望。炼金术士们并不是毫无建树，并不是没有给人们提供有用的发明。不

过，他们的情况可以用一个寓言故事来比喻：有一老人给自己的儿子们留下遗言，谎称葡萄园下埋有金子，但不知其确切位置，于是老人的儿子们卖力地翻挖园子，尽管金子没有挖出来，但是园子经过翻挖，葡萄得以丰产。

Again the students of natural magic, who explain everything by sympathies and antipathies, have in their idle and most slothful conjectures ascribed to substances wonderful virtues and operations; and if ever they have produced works, they have been such as aim rather at admiration and novelty than at utility and fruit.

再说那些从事自然幻术的人。凡事他们都要用同意和反感来解释，用毫无价值、最为懒惰的臆测给物质赋予奇异的性质和神奇的动作；即便他们取得了什么成果，也不过是旨在标新立异、博人赞叹，而非务实求用、有所成就。

In superstitious magic on the other hand (if of this also we must speak), it is especially to be observed that they are but subjects of a certain and definite kind wherein the curious and superstitious arts, in all nations and ages, and religions also, have worked or played. These therefore we may pass. Meanwhile it is nowise strange if opinion of plenty has been the cause of want.

而谈到迷信式幻术（如果我们也必须谈的话），尤其要指出的是，这些都只不过是那些荒诞迷信方术中的杂耍项目而已，这些杂耍项目在各个民族、各个时代、各种宗教中也起到过或产生过某种作用。因此，这些可以一笔带过。由此可见，正是意见不一才导致人们

无知，这样说一点也不足为奇。

LXXXVI

八十六

Further, this admiration of men for knowledges and arts—an admiration in itself weak enough, and well-nigh childish—has been increased by the craft and artifices of those who have handled and transmitted sciences. For they set them forth with such ambition and parade, and bring them into the view of the world so fashioned and masked as if they were complete in all parts and finished. For if you look at the method of them and the divisions, they seem to embrace and comprise everything which can belong to the subject. And although these divisions are ill filled out and are but as empty cases, still to the common mind they present the form and plan of a perfect science. But the first and most ancient seekers after truth were wont, with better faith and better fortune, too, to throw the knowledge which they gathered from the contemplation of things, and which they meant to store up for use, into aphorisms; that is, into short and scattered sentences, not linked together by an artificial method; and did not pretend or profess to embrace the entire art. But as the matter now is, it is nothing strange if men do not seek to advance in things delivered to them as long since perfect and complete.

再进一步考察人们对知识和技艺的赞赏——这种赞赏本身就极为脆弱、近乎幼稚——有增无减，这要归因于那些人在运用和传授科学

时所采用的伎俩。因为他们在世人面前总是虚夸卖弄科学，粉饰装扮科学，竟然把科学弄得门类齐全，精湛完美。如果从方法和门类上看，科学似乎包罗万象，包其所能包。科学的门类齐全但内容拙劣，且匮乏如空箱，但尽管如此，在常人看来，这些门类还是体现出了一门完整科学应具有的形式和计划。但是最先和最早寻找真理的人，他们都有着良好的信念，对前程也充满着乐观，乐于将他们静观事物所得、将旨在储存备用的知识化为格言警语，也就是说，把这些知识化为简短零散的语句，而不是用矫揉造作的方法加以拼凑，也不自命不凡地说一切技艺皆包罗其中。但就现状而言，如果人们把前人所传视为完美无缺而不思进取的话，这也并不奇怪。

LXXXVII

八十七

Moreover, the ancient systems have received no slight accession of reputation and credit from the vanity and levity of those who have propounded new ones, especially in the active and practical department of natural philosophy. For there have not been wanting talkers and dreamers who, partly from credulity, partly in imposture, have loaded mankind with promises, offering and announcing the prolongation of life, the retardation of age, the alleviation of pain, the repairing of natural defects, the deceiving of the senses; arts of binding and inciting the affections, of illuminating and exalting the intellectual faculties, of transmuting substances, of strengthening and multiplying motions at will, of making impressions and alterations in the air, of bringing down and procuring celestial influences; arts of divining things future, and bringing things distant near, and revealing things secret; and many

more. But with regard to these lavish promisers, this judgment would not be far amiss: that there is as much difference in philosophy between their vanities and true arts as there is in history between the exploits of Julius Caesar or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exploits of Amadis of Gaul or Arthur of Britain. For it is true that those illustrious generals really did greater things than these shadowy heroes are even feigned to have done; but they did them by means and ways of action not fabulous or monstrous. Yet surely it is not fair that the credit of true history should be lessened because it has sometimes been injured and wronged by fables. Meanwhile it is not to be wondered at if a great prejudice is raised against new propositions, especially when works are also mentioned, because of those impostors who have attempted the like; since their excess of vanity, and the disgust it has bred, have their effect still in the destruction of all greatness of mind in enterprises of this kind.

另外，旧体系的声誉还在不断扩大，这是因为新体系提倡者的虚妄和轻浮，自然哲学中的实践哲学尤其如此。世间从来不乏健谈者和空想家，他们或出于轻信，或出于欺骗，在人们面前许下诺言，声称能延长寿命，能缓解病痛，能修复残肢，能蒙蔽感官；还声称不乏各种技艺，可以约束和激发情感，可以启迪和提升智力，可以改变物质，可以任意加强和加大各种运动，可以呼风唤雨，招来天体之力；声称有技术可以预测未来事物、隔空远物近移、曝光隐秘的事物等诸如此类之事。对这些夸夸其谈的许诺家们，我们做出如下判断也不为过：在哲学上，他们的虚妄与真正的技艺之间的差异，就像历史上的凯撒或亚历山大大帝的业绩与高卢的阿马迪斯或英国的亚瑟王之间的业绩之差异一样，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与那些鲜为人知、虚构的英雄们的伟迹相比，这些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将军们的功勋确实要卓著伟大些；而且这些功勋并不是用荒诞怪异的手段和方法做出来的。当然，真正的历史有时因受到寓言的中伤，从而声誉受损，这的确很不公

平。同时，面对新的提议，尤其是面对与功效有关的提议，人们都会产生一种极大的偏见。如果是这样，也不足为怪，因为那些骗子们曾经就做过类似的事情；他们过度虚妄，令人作呕，这对那些真正具有壮志雄心的人来说至今都还有破坏性影响。

LXXXVIII

八十八

Far more, however, has knowledge suffered from littleness of spirit and the smallness and slightness of the tasks which human industry has proposed to itself. And what is worst of all, this very littleness of spirit comes with a certain air of arrogance and superiority.

然而，知识之所以受到限制，更多的是人类气魄的渺小及其所从事的工作细微和琐碎所致。最糟糕的是，这种渺小的气魄竟然还夹杂着一种傲慢自大和盛气凌人的神气。

For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is found in all arts one general device, which has now become familiar—that the author lays the weakness of his art to the charge of nature: whatever his art cannot attain he sets down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same art to be in nature impossible. And truly no art can be condemned if it be judge itself. Moreover, the philosophy which is now in vogue embraces and cherishes certain tenets, the purpose of which (if it be diligently examined) is to persuade men that nothing difficult, nothing by

which nature may be commanded and subdued, can be expected from art or human labor; as with respect to the doctrine that the heat of the sun and of fire differ in kind, and to that other concerning mixture, has been already observed. Which things, if they be noted accurately, tend wholly to the unfair circumscription of human power, and to a deliberate and factitious despair, which not only disturbs the auguries of hope, but also cuts the sinews and spur of industry, and throws away the chances of experience itself. And all for the sake of having their art thought perfect, and for the miserable vainglory of making it believed that whatever has not yet been discovered and comprehended can never be discovered or comprehended hereafter.

首先，所有技艺中都可发现一种司空见惯的伎俩，即作者总是把自己技艺不精归责于自然：凡是自认为权威的技艺都无法企及的，那么自然也难以企及。的确，如果单就技艺本身来评判，技艺无可指责。其次，现行的哲学所信奉和尊崇的某些教义，其旨在（只要用心审查即知）劝人信服这样的理念：但凡困难之事，但凡足以支配自然、征服自然之事，都不能寄望于技艺和人力；正如前文所论，日热火热不同说，还有混合工作说，皆属此类。如果观察无误，就会发现这类事情必定会越来越限制人类的力量，必定会故意导向绝望；这不但搅乱了人们对希望的预测，而且切断了人们勤奋必需的动力和鞭策，从而抛掉经验本身具有的机会。而这一切都可归咎于人们视其技艺至臻完美，归咎于人们有一种可悲的虚荣之心，即要使人相信，迄今尚未发现、尚未了解的一切事物，将来也无法发现，也无法理解。

And even if a man apply himself fairly to facts, and endeavor to find out something new, yet he will confine his aim and intention to the investigation and working out of some one discovery and no more; such as the nature of the magnet, the ebb and flow of the sea,

the system of the heavens, and things of this kind, which seem to be in some measure secret, and have hitherto been handled without much success. Whereas it is most unskillful to investigate the nature of anything in the thing itself, seeing that the same nature which appears in some things to be latent and hidden is in others manifest and palpable; wherefore in the former it produces wonder, in the latter excites no attention; as we find it in the nature of consistency, which in wood or stone is not observed, but is passed over under the appellation of solidity without further inquiry as to why separation or solution of continuity is avoided; while in the case of bubbles, which form themselves into certain pellicles, curiously shaped into hemispheres, so that the solution of continuity is avoided for a moment, it is thought a subtle matter. In fact, what in some things is accounted a secret has in others a manifest and well-known nature, which will never be recognized as long as the experiments and thoughts of men are engaged on the former only.

即使有人竭力专心于事实，努力寻找新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和意图也会局限于调查和规划某一发现，而且仅此而已。比如磁石的特性，海潮的涨落，天体的系统等，此类东西似乎多少有些神秘，因而迄今鲜有成功。其实，仅凭事物本身去调查事物的本质，最没有技术含量；因为同一性质在某些事物中隐含不露，而在另一些事物中显而易见；因此，前者眩人眼目，后者难招人眼；以黏性为例，木头或石料，很难见到其黏性，却能见其所谓的“坚实”，因此我们并没有深入探讨如何避免连续性的分离或分解；而水泡是先化为薄膜，说来也怪，后来竟变为半球形状，这样，对连续性的分解就得以暂时避免，因此，被视为微妙之事。事实上，某些事物，其性质此处看似隐秘，而彼处却显而易见；人们如果将实验和思想只用来探索前者，那么其性质永远都难为人知。

But generally speaking, in mechanics old discoveries pass for new if a man does but refine or embellish them, or unite several in one, or couple them better with their use, or make the work in greater or less volume than it was before, or the like.

但是一般而言，在力学上，只要稍稍将旧发现加以提炼或粉饰，或者将众多发现整合一体，或者将发现与用途更好地耦合在一起，或者将作品原有的体积变大或变小，或者其他类似情形，旧发现也会一跃而成新发现。

Thus, then, it is no wonder if inventions noble and worthy of mankind have not been brought to light, when men have been contented and delighted with such trifling and puerile tasks, and have even fancied that in them they have been endeavoring after, if not accomplishing, some great matter.

这就难怪人类没有高贵和有价值的发明了，原来他们满足于并沾沾自喜于琐碎而幼稚的工作，甚至幻想着自己在努力追求着某种事情，这种事情即使不是完美的，也是伟大的。

LXXXIX

八十九

Neither is it to be forgotten that in every age natural philosophy has had a troublesome and hard to deal with adversary

—namely, superstition, and the blind and immoderate zeal of religion. For we see among the Greeks that those who first proposed to men's then uninitiated ears the natural causes for thunder and for storms were thereupon found guilty of impiety. Nor was much more forbearance shown by some of the ancient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to those who on most convincing grounds (such as no one in his senses would now think of contradicting) maintained that the earth was round, and of consequence asserted the existence of the antipodes.

下面这种情形也不可忘：无论在哪个时代，自然哲学都会遇到一个棘手难缠的对手——对迷信和宗教的盲目狂热。我们在希腊人中发现，那些率先向蒙昧未开的听众解释风雨雷电的自然原因的人，在当时可谓犯下了不敬神明之罪。就算到了后来的基督教时代，当有人主张地圆说并提出对跖说时，即使证据确凿（即是正常人都不会反对这种证据），有些神父也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宽容。

Moreover, as things now are, to discourse of nature is made harder and more perilous by the summaries and systems of the schoolmen who, having reduced theology into regular order as well as they were able, and fashioned it into the shape of an art, ended in incorporating the contentious and thorny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more than was fit, with the body of religion.

此外，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讨论自然越来越困难，而且越来越危险，其原因就是那些经院学者们做出总结和构建理论体系时，尽其所能将神学归纳成有规律的法则，将神学变成一种技艺，最后将亚里士多德那好辩却棘手的哲学与宗教体系生拉硬扯地糅合在一起。

To the same result, though in a different way, tend the speculations of those who have taken upon them to deduce the truth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from the principles of philosophers, and to confirm it by their authority, pompously solemnizing this union of the sense and faith as a lawful marriage, and entertaining men's minds with a pleasing variety of matter, but all the while disparaging things divine by mingling them with things human. Now in such mixtures of theology with philosophy only the received doctrines of philosophy are included; while new ones, albeit changes for the better, are all but expelled and exterminated.

有些哲学家，尽管思考途径与上述不同，但结果却趋于一致。他们所选择的途径是从哲学家的一些原则中演绎基督教的真理，并根据其权威来证实真理；他们把感官与信仰比拟成合法的婚姻，并铺张浪费地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婚礼，花样翻新地去愉悦人心，但同时他们还将人神混杂，从而把神事世俗化。这种神学与哲学的混杂体只收录那些公认的哲学；而新的哲学，纵使有好的思想萌芽，也会遭到驱逐而被赶尽杀绝。

Lastly, you will find that by the simpleness of certain divines, access to any philosophy, however pure, is well-nigh closed. Some are weakly afraid lest a deeper search into nature should transgress the permitted limits of sober-mindedness, wrongfully wresting and transferring what is said in Holy Writ against those who pry into sacred mysteries, to the hidden things of nature, which are barred by no prohibition. Others with more subtlety surmise and reflect that if second causes are unknown everything can more readily be referred to the divine hand and rod, a point in which they think religion greatly concerned—which is in fact nothing else but to seek to gratify God with a lie. Others fear from past example that

movements and changes in philosophy will end in assaults on religion. And others again appear apprehensive that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something may be found to subvert or at least shake the authority of religion, especially with the unlearned. But these two last fears seem to me to savor utterly of carnal wisdom; as if men in the recesses and secret thought of their hearts doubted and distrusted the strength of religion and the empire of faith over the sense, and therefore feared that the investigation of truth in nature might be dangerous to them. But if the matter be truly considered, natural philosophy is, after the word of God, at once the surest medicine against superstition and the most approved nourishment for faith, and therefore she is rightly given to religion as her most faithful handmaid, since the one displays the will of God, the other his power. For he did not err who said, “Ye err in that ye know not the Scriptures and the power of God,” thus coupling and blending in an indissoluble bon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his will and meditation concerning his power. Meanwhile it is not surprising if the growth of natural philosophy is checked when religion, the thing which has most power over men's minds, has by the simpleness and incautious zeal of certain persons been drawn to take part against her.

最后，还可以发现，有些神学家很浅薄，通往哲学的途径，无论怎么纯洁，他们几乎统统予以封杀。有些人很脆弱，唯恐深入探寻自然会违背澄心清意所应有的境界，于是故意歪曲和转引圣经箴言来反对那些探寻神圣奥秘、探寻自然隐微的人，而事实上，任何禁令都难以掩盖自然的奥秘和隐微。有些人很精明，不仅揣度，还反思，认为如果找不到第二种原因，那么一切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归结为圣手与神杖；他们认为这一点才与宗教大有关联；但实际上，这恰恰是用谎言来媚承上帝。还有些人，对以往的范例颇为介怀，唯恐哲学的变迁最终演变成了对宗教的抨击。还有些人担忧，在探究自然中，可能发现

某些东西会颠覆，或者至少说，会撼动宗教的权威，对蒙昧无知之人尤其如此。后两种担忧，对我来说，完全是庸人自扰；仿佛人们在内心深处和思想深处对控制感官的宗教力量和信仰帝国产生了怀疑，失去了信任，从而担忧探究自然中存在的真理有可能危及宗教和信仰。仔细想想，自然哲学，用上帝的话来说，是医治迷信最有把握的良药，是培养信仰最受认可的补药，所以理应把她献给宗教，让她成为宗教最忠实的侍女，因为宗教展示的是上帝的意志，而自然哲学展现的是上帝的威力。有人说，“人之犯错，皆因不知圣经，不知上帝之威力”，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会犯错，他会把对上帝意志的理解与对上帝威力的思索融合为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与此同时，自然哲学的发展遭到了阻碍，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有些人很浅薄又很狂热，把宗教这种对人心最有控制力的东西拉进来反驳自然哲学。

XC

九十

Again, in the customs and institutions of schools, academies, colleges, and similar bodies destined for the abode of learned me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learning, everything is found adverse to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For the lectures and exercises there are so ordered that to think or speculate on anything out of the common way can hardly occur to any man. And if one or two have the boldness to use any liberty of judgment, they must undertake the task all by themselves; they can have no advantage from the company of others. And if they can endure this also, they will find their industry and largeness of mind no slight hindrance to their fortune. For the studies of men in these places are confined and as it were imprisoned in the writings of certain authors, from whom if

any man dissent he is straightway arraigned as a turbulent person and an innovator. But surely there is a great distinction between matters of state and the arts; for the danger from new motion and from new light is not the same. In matters of state a change even for the better is distrusted, because it unsettles what is established; these things resting on authority, consent, fame and opinion, not on demonstration. But arts and sciences should be like mines, where the noise of new works and further advances is heard on every side. But though the matter be so according to right reason, it is not so acted on in practice; and the points above mentioned i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ment of learning put a severe restraint upon the advancement of the sciences.

再说，诸如学校、学院、大学等类似的各种团体，旨在集中学者，培育学术，但它们所形成的习惯与制度都与科学进步背道而驰。那儿的演讲与实践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任何人都很难去思考或思索那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如果说有谁胆敢尝试判断的自由，那么他们只能单打独斗，无法得到他人的相伴之益处。如果他们不思悔改，强行忍耐，那么他们就会发现，无论自己多么勤劳，气魄如何雄伟，自己的前程都不会一帆风顺，毫无阻碍。因为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研究仅限于，可以说，禁锢于某些作家的著作；谁要是敢对这些作家提出异议，立刻就会被指控为叛乱分子和变革者。的确，国事与技艺差别甚大；因为新运动与新见解带来的危险并不相同。就国事而言，即使旨在改善的变革也不受人信任，因为这种变革动摇了业已确立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建立在权威、认可、声誉和意见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论证的基础之上。而技艺与科学应该像矿场一样，可以接收来自四面八方的新事物、新进步的声音。然而，虽然理应如此，但实践并非如此。关于学术的管理和治理，以上提及的各点严重限制了科学的发展。

XCI

九十一

Nay, even if that jealousy were to cease, still it is enough to check the growth of science that efforts and labors in this field go unrewarded. For it does not rest with the same persons to cultivate sciences and to reward them. The growth of them comes from great wits; the prizes and rewards of them are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or of great persons, who are but in very few cases even moderately learned. Moreover, this kind of progress is not only unrewarded with prizes and substantial benefits; it has not even the advantage of popular applause. For it is a greater matter than the generality of men can take in, and is apt to be overwhelmed and extinguished by the gales of popular opinions. And it is nothing strange if a thing not held in honor does not prosper.

不仅如此，即使消除嫉恨，只要人们在科学这块园地付出的努力和劳动得不到回报，科学的发展依然会受到极大的阻碍。因为人们的科学耕耘与科学回报并不成正比。科学发展得益于伟大的才智之士；而科学回报却掌控在平庸之辈或官员要人的手中，除了极少数之外，这些人甚至连中等学问也不具有。而且，这类进步不但得不到奖品和物质利益，甚至连人们的鼓掌喝彩也得不到。因为这类事情很难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反而容易被舆论的狂风吹倒吹灭。这样以来，不受尊崇者难以兴旺发达，也就不足为奇了。

XCII

九十二

But by far the greatest obstacle to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o the undertaking of new tasks and provinces therein is found in this—that men despair and think things impossible. For wise and serious men are wont in these matters to be altogether distrustful, considering with themselves the obscurity of nature, the shortness of life, the deceitfulness of the senses, the weakness of the judgment, the difficulty of experiment, and the like; and so supposing that in the revolution of time and of the ages of the world the sciences have their ebbs and flows; that at one season they grow and flourish, at another wither and decay, yet in such sort that when they have reached a certain point and condition they can advance no further. If therefore anyone believes or promises more, they think this comes of an ungoverned and unripened mind, and that such attempts have prosperous beginnings, become difficult as they go on, and end in confusion. Now since these are thoughts which naturally present themselves to men grave and of great judgment, we must take good heed that we be not led away by our love for a most fair and excellent object to relax or diminish the severity of our judgment. We must observe diligently what encouragement dawns upon us and from what quarter, and, putting aside the lighter breezes of hope, we must thoroughly sift and examine those which promise greater steadiness and constancy. Nay, and we must take state prudence too into our counsels, whose rule is to distrust, and to take the less favorable view of human affairs. I am now therefore to speak touching hope, especially as I am not a dealer in promises, and wish neither to force nor to ensnare men's judgments, but to lead them by the hand with their good will. And though the strongest means of inspiring hope will be to bring men to particulars, especially to particulars digested and

arranged in my Tables of Discovery (the subject partly of the second, but much more of the fourth part of my *Instauration*), since this is not merely the promise of the thing but the thing itself; nevertheless, that everything may be done with gentleness, I will proceed with my plan of preparing men's minds, of which preparation to give hope is no unimportant part. For without it the rest tends rather to make men sad (by giving them a worse and meaner opinion of things as they are than they now have, and making them more fully to feel and know the unhappiness of their own condition) than to induce any alacrity or to whet their industry in making trial. And therefore it is fit that I publish and set forth those conjectures of mine which make hope in this matter reasonable, just as Columbus did, before that wonderful voyage of his across the Atlantic, when he gave the reasons for his conviction that new lands and continents might be discovered besides those which were known before; which reasons, though rejected at first, were afterwards made good by experience, and were the causes and beginnings of great events.

但是，对于科学的发展及其新任务和新职责的实施，其最大障碍就在于，人们对科学感到绝望，并持万事不可能论。聪明而严肃的人通常对此都毫无信心，他们脑里想的全是自然之难知，生命之短暂，感官之欺骗，判断之无力，实验之艰难等等，进而推测，在这个世界轮回的时间长河中，科学也有自己的潮涨潮落期：时而发展迅速、兴盛发达，时而枯萎凋谢、衰退没落；而且科学总是按照这种规律来发展，即达到某一点某一条件时，就会停滞不前。因此，谁要是过度相信或过度许诺，人们就会认为这是他性情豪放不羁、心智未熟所致，并且认为此类尝试总是始而兴旺，继而艰难，终而混乱。那些严肃而善断的人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这种想法，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必须时刻警惕，严防因钟爱精美的事物而迷失方向，从而放松或降低了我们自己判断的严肃性。我们必须仔细思量，给我们曙光的是何种鼓励，这

种鼓励又来自何方；我们必须放弃那些风一般飘渺的希望，彻底筛检那些更加稳固持续的希望。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要有谋国之智，即谋国之道在于：若于人事，不予信任而反揣其不利。谈到希望，那么我就谈谈自己的看法，尤其要说的是，我可不是许诺贩子，希望既不会强迫也不会诱使人作出判断，而是希望能拉着手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跟我前行。激发希望，最强劲的手段是把人引到具体事实上，尤其是引到我摘要汇编的几个《发现一览表》（部分见于《复兴论》第二部分，大部分见于其第四部分）中的具体事实上，因为这并不只是许诺之事，而是事情本身；虽说万事圆满须缓行，但我还是要按计划为人们做心理准备，其中给予希望极为重要。因为如果不给予希望，那么书中其他部分，不仅不能让人们兴奋起来或激发人们尝试的欲望，反倒使人们感到沮丧（给他们现有的观点泼泼冷水，让他们彻底明白他们的处境多么令人痛苦）。因此，我将自己的构想公之于众非常恰当；这表明我们对此事抱有希望是合情合理的，就像哥伦布那样，在横渡大西洋这种壮举前，他就坚信在已知地域之外可以发现新大陆和新大洲，他找出的各种理由，尽管最初都遭到人们的否决，但后来得到了经验的证实，最终成就了系列壮举。

XCIII

九十三

The beginning is from God: for the business which is in hand, having the character of good so strongly impressed upon it, appears manifestly to proceed from God, who is the author of good, and the Father of Lights. Now in divine operations even the smallest beginnings lead of a certainty to their end. And as it was said of spiritual things, “The kingdom of God cometh not with observation,” so is it in all the greater works of Divine Providence;

everything glides on smoothly and noiselessly, and the work is fairly going on before men are aware that it has begun. Nor should the prophecy of Daniel be forgotten touching the last ages of the world: “Many shall go to and fro, and knowledge shall be increased”; clearly intimating that the thorough passage of the world (which now by so many distant voyages seems to be accomplished, or in course of accomplishment),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he sciences, are destined by fate, that is, by Divine Providence, to meet in the same age.

事情的开端源自上帝：我们手中的事务印有善的特性，而且极其明显，这显然是源自上帝，因为上帝是善之祖、光之父。在神之所为中，事情的开端，即使最小也必定终有所成。而且，正如人们谈及圣事时所言，“天国降临，难察其行”；其实，所有神佑之大事也是这样：一切都悄然而过，无声无息，人未觉察已然进行。关于世界末世，但以理的预言不可忘，即“人来人往，知识必长”。显然，这是在暗示，世界的一切通道（似乎由许多远航来完成，或正在完成过程中），以及科学的发展都是命中注定，也即这两件事同会于一个时代，实乃天意。

XCIV

九十四

Next comes a consideration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as an argument of hope; I mean that drawn from the errors of past time, and of the ways hitherto trodden. For most excellent was the censure once passed upon a government that had been unwisely

administered. “That which is the worst thing in reference to the past, ought to be regarded as best for the future. For if you had done all that your duty demanded, and yet your affairs were no better, you would not have even a hope left you that further improvement is possible. But now, when your misfortunes are owing, not to the force of circumstances, but to your own errors, you may hope that by dismissing or correcting these errors, a great change may be made for the better.” In like manner, if during so long a course of years men had kept the true road for discovering and cultivating sciences, and had yet been unable to make further progress therein, bold doubtless and rash would be the opinion that further progress is possible. But if the road itself has been mistaken, and men's labor spent on unfit objects, it follows that the difficulty has its rise not in things themselves, which are not in our power, but in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the use and application thereof, which admits of remedy and medicine. It will be of great use therefore to set forth what these errors are. For as many impediments as there have been in times past from this cause, so many arguments are there of hope for the time to come. And although they have been partly touched before, I think fit here also, in plain and simple words, to represent them.

接下来讨论最重要的一点，即希望的证据；我认为这个证据是从过去的错误和经历的道路中总结而来的。最突出的是对管理不善的政府提出责难。昨日之非理当视作明日之是。因为如果你尽了自己应尽的职责，而事情依然不见起色，那么你连进一步改进的希望也都没有了。但如果说你的不幸并非环境之力使然，而乃自己的过错所致，那么你就还有希望，只要消除或改正错误，就可能得到巨大改善。同样，如果在如此漫长岁月中，人们在发现科学和培养科学上所走的道路正确无误，却依然没能获得进展，那么还说有可能取得更大的进步，这无疑太大胆、太轻率了。但如果说所走道路本身就错了，人们

的辛苦也就白费了，那么这表明困难的根源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人的理解力及其使用上；如果是前者，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如果是后者，倒还有补救和医治的余地。因此，指出这些错误是非常有用的。如果说这个原因在过去产生了多少障碍，那么就会给未来的希望提供多少证据。这些错误虽然前面提到一些，我认为此处还有必要用简单的话语阐释一下。

XCV

九十五

Those who have handled sciences have been either men of experiment or men of dogmas. The men of experiment are like the ant, they only collect and use; the reasoners resemble spiders, who make cobwebs out of their own substance. But the bee takes a middle course: it gathers its material from the flowers of the garden and of the field, but transforms and digests it by a power of its own. Not unlike this is the true business of philosophy; for it neither relies solely or chiefly on the powers of the mind, nor does it take the matter which it gathers from natural history and mechanical experiments and lay it up in the memory whole, as it finds it, but lays it up in the understanding altered and digested. Therefore from a closer and purer league between these two faculties, the experimental and the rational (such as has never yet been made), much may be hoped.

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要么是实验家，要么是教条论者。实验家如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如蜘蛛，用自己的身体来编织蜘蛛

网。不过，蜜蜂却采用折中之道：在田中庭院里采集鲜花原料，用自身力量来改变和消化所采集的材料。哲学的真正任务与此完全相同，既不是仅仅或主要依靠心智的力量，也不是把从自然历史与机械实验中收集的材料原封不动地置于记忆之中，而是把它加以改变和消化然后置于理解力之中。因此，从实验和理性这两种机能结合（这种结合还从没实现过）的紧密程度和纯洁程度看，可能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期待的地方。

XCVI

九十六

We have as yet no natural philosophy that is pure; all is tainted and corrupted: in Aristotle's school by logic; in Plato's by natural theology; in the second school of Platonists, such as Proclus and others, by mathematics, which ought only to give definiteness to natural philosophy, not to generate or give it birth. From a natural philosophy pure and unmixed, better things are to be expected.

迄今为止，我们的自然哲学都不是纯粹的自然哲学，而都是遭到了玷污与破坏的自然哲学：在亚里士多德学派中，遭到逻辑学玷污和破坏；在柏拉图学派中，遭到自然神学的玷污和破坏；到了后期的新柏拉图学派，如普罗克鲁斯等人，则是遭到了数学的玷污和破坏，数学只应给自然哲学以确切性，而不该产生或生成自然哲学。如果自然哲学纯洁无暇，那么我们对此还可以寄予更好的期待。

XCVII

九七

No one has yet been found so firm of mind and purpose as resolutely to compel himself to sweep away all theories and common notions, and to apply the understanding, thus made fair and even, to a fresh examination of particulars. Thus it happens that human knowledge, as we have it, is a mere medley and ill-digested mass, made up of much credulity and much accident, and also of the childish notions which we at first imbibed.

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这样一个人，即迫使自己能坚定果断地清除一切陈腐学说和通俗概念，从而公正公平地去理解和重新考证特殊事物。因此，我们现在拥有的知识，只不过都是些杂乱堆放，未经消化的东西而已；有些是出于轻信，有些是出于偶然，有些是出于我们最初吸取的一些幼稚概念。

Now if anyone of ripe age, unimpaired senses, and well-purged mind, apply himself anew to experience and particulars, better hopes may be entertained of that man. In which point I promise to myself a like fortune to that of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let no man tax me with vanity till he have heard the end; for the thing which I mean tends to the putting off of all vanity. For of Alexander and his deeds Aeschines spoke thus: “Assuredly we do not live the life of mortal men; but to this end were we born, that in after ages wonders might be told of us,” as if what Alexander had done seemed to him miraculous. But in the next age Titus Livius took a better and a deeper view of the matter, saying in effect that Alexander “had done no more than take courage to despise vain

apprehensions." And a like judgment I suppose may be passed on myself in future ages: that I did no great things, but simply made less account of things that were accounted great. In the meanwhile, as I have already said, there is no hope except in a new birth of science; that is, in raising it regularly up from experience and building it afresh, which no one (I think) will say has yet been done or thought of.

现在，如果有人成熟稳重、感官健全、心灵纯洁，而且可以专心立足于经验和特殊事物，并从头做起，那么他就被寄以厚望。在这点上，我给自己许下一个诺言，我要拥有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命运；在听完我的话之前，请不要无端责难我，因为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清除一切无端猜测。谈到亚历山大大帝及其伟绩，埃斯基涅斯这样说道："我们确实不想过那种凡夫俗子的生活，但是我们一出生就是奔着此目标而行的，就是要让后人惊叹我们的奇迹。"这话仿佛是说，亚历山大的事迹对他来说就是奇迹。后来，提图斯·李维对此事有了更好、更深刻的认识；事实上，他是说，亚历山大的"所作所为不过是鼓足勇气去鄙视那些无端的理解而已"。我想，类似判断，后人也会强加在我自己身上：其实我所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伟大，只不过是把别人认为伟大的事看得不那么重而已。同时，正如前文所说，除非科学得以新生，否则难有希望；所谓新生，是指科学有规律地从经验中升华并重新建立起来；（我想）没有人会说他就是这样做的或这样想的。

XCVIII

九十八

Now for grounds of experience—since to experience we must come—we have as yet had either none or very weak ones; no search has been made to collect a store of particular observations sufficient either in number, or in kind, or in certainty, to inform the understanding, or in any way adequate. On the contrary, men of learning, but easy withal and idle, have taken for the construction or for the confirmation of their philosophy certain rumors and vague fames or airs of experience, and allowed to these the weight of lawful evidence. And just as if some kingdom or state were to direct its counsels and affairs not by letters and reports from ambassadors and trustworthy messengers, but by the gossip of the streets; such exactly is the system of management introduced into philosophy with relation to experience. Nothing duly investigated, nothing verified, nothing counted, weighed, or measured, is to be found in natural history; and what in observation is loose and vague, is in information deceptive and treacherous. And if anyone thinks that this is a strange thing to say, and something like an unjust complaint, seeing that Aristotle, himself so great a man, and supported by the wealth of so great a king, has composed so accurate a history of animals; and that others with greater diligence, though less pretense, have made many additions; while others, again, have compiled copious histories and descriptions of metals, plants, and fossils; it seems that he does not rightly apprehend what it is that we are now about. For a natural history which is composed for its own sake is not like one that is collected to supply the understanding with information for the building up of philosophy. They differ in many ways, but especially in this: that the former contains the variety of natural species only, and not experiments of the mechanical arts. For even as in the business of life a man's disposition and the secret workings of his mind and affections are better discovered when he is in trouble than at other times, so likewise the secrets of nature reveal themselves more

readily under the vexations of art than when they go their own way. Good hopes may therefore be conceived of natural philosophy, when natural history, which is the basis and foundation of it, has been drawn up on a better plan; but not till then.

现在来谈谈经验的根据——我们最终都要归结到经验上来。迄今为止，我们要么无根无据，要么根据乏力；目前没有人去从事搜集工作，去收集数量众多、种类齐全、事实确然、详细具体的观察结果；也没有人用任何恰当的方式去赋予理解力以活力。相反，有学识的人，往往不过都是随意而又懒惰的人；在建立或证实自己的哲学时，他们所采用的根据都是一些无稽的流言、含糊的名头、似是而非的经验、并且赋予它们以合法的外衣。这好比一个国家差遣幕僚、处理国事时，不以大使和可靠使节的书札报告为凭，却以街谈巷议为据；如今人们在对待哲学与经验的关系时，引入到哲学的处理机制也正是如此。而自然历史中的一切，都未曾充分调查、证实、计算、掂量或衡量过；观察之中含混不清的东西，用于指导之时必然虚假不实。有人觉得这样说很奇怪，近乎指责而且有失公允，因为亚里士多德本人如此伟大，而且其后又有伟大君王鼎力相助，他所著的《动物史》如此精确，同时得后人精心补充，补充虽然充分，但不矫饰；除此之外，其他人还编撰有丰富的历史和书籍，描述了金属、植物以及化石；如果有人这么认为，那么他似乎没有正确领悟到我们想表达的意思。自然史的撰写，既可以是单纯地为自然史而写作，也可以是，通过收集证据为理解力提供内容而建构自然哲学；二者并非同类。二者之间区别甚大，尤其体现在下面这点上：前者仅仅包罗了自然万象，却缺乏机械技艺的各种实验。对一个人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他的性情、内心与情感的隐秘活动，只有在遇到麻烦时才容易被人发现，而在平时却很难表露出来；同样，对自然而言，它的秘密，只有在受到技艺的干扰时才更容易显露出来，而如果任其当然，则很难呈现出来。因此，只有等到自然哲学的根基即自然史，拟出一个良好的规划时，而且也只有这时，才能对自然哲学有所奢望。

XCIX

九十九

Again, even in the great plenty of mechanical experiments, there is yet a great scarcity of those which are of most use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For the mechanic, not troubling himself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truth, confines his attention to those things which bear upon his particular work, and will not either raise his mind or stretch out his hand for anything else. But then only will there be good ground of hope for the further advance of knowledge when there shall be received and gathered together into natural history a variety of experiments which are of no use in themselves but simply serve to discover causes and axioms, which I call *Experimenta lucifera* , experiments of *light* , to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ose which I call *fructifera* , experiments of *fruit* .

再说，即使机械实验极其丰富，对理解力的指导最为有用的实验也少之又少。因为技工不肯下苦功夫去探究真理，眼睛仅仅盯在与自己特定工作有关的事情上，而对其他任何事物，既提不起心劲，也无动手一做的欲望。但是，希望进一步拓展知识必须要有良好的根基，而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即自然史已经接纳和聚集了各种各样的实验；纵然实验本身无实际用途，但只要能起到帮助寻求原因和寻求公理的作用；这类实验，我称之为“求因”实验，以别于另一类实验，我称之为“求果”实验。

Now experiments of this kind have one admirable property and condition: they never miss or fail. For since they are applied, not for

the purpose of producing any particular effect, but only of discovering the natural cause of some effect, they answer the end equally well whichever way they turn out; for they settle the question.

这类实验的特点令人称道：屡试不爽。人们在做这些实验时，目的不在于产生某种特定结果，而在于寻求产生某种结果的自然原因；既然如此，那么无论结果如何，实验都同样符合人们的目的，因为实验解决了原因这个问题。

C

一百

But not only is a greater abundance of experiments to be sought for and procured, and that too of a different kind from those hitherto tried; an entirely different method, order, and process for carrying on and advancing experience must also be introduced. For experience, when it wanders in its own track, is, as I have already remarked, mere groping in the dark, and confounds men rather than instructs them. But when it shall proceed in accordance with a fixed law, in regular order, and without interruption, then may better things be hoped of knowledge.

但是，我们不仅要探求和获取更加丰富的实验，还要探求和获取前所未有、与众不同的实验，更要引进完全不同的方法、秩序和过程来推广和提高经验。因为经验在按自身的轨迹漫行时，如前文所说，

恰如在黑暗中摸索，只能使人困惑不解，而无法使人得到教诲。但是只要经验按照固定的规律，连续不断地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知识中期待更好的东西。

CI

一百零一

But even after such a store of natural history and experience as is required for the work of the understanding, or of philosophy, shall be ready at hand, still the understanding is by no means competent to deal with it offhand and by memory alone; no more than if a man should hope by force of memory to retain and make himself master of the computation of an ephemeris. And yet hitherto more has been done in matter of invention by thinking than by writing; and experience has not yet learned her letters. Now no course of invention can be satisfactory unless it be carried on in writing. But when this is brought into use, and experience has been taught to read and write, better things may be hoped.

但是，理解力或哲学要发挥作用必须储备自然史和经验的材料，即使这些储备材料可以伸手可得，理解力也绝不可能立刻单凭记忆就能对付这些材料，这无疑就像是指望一个人单凭记忆的力量去记住和掌握天文演算。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在发明上都是思考多于书写；而且人们也没有学会将经验书写成文。如果发明不书写成文，那么发明过程断难令人满意。一旦书写成文并广为运用，经验就得以传阅书写，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更好的东西了。

CII

一百零二

Moreover, since there is so great a number and army of particulars, and that army so scattered and dispersed as to distract and confound the understanding, little is to be hoped for from the skirmishings and slight attacks and desultory movements of the intellect, unless all the particulars which pertain to the subject of inquiry shall, by means of Tables of Discovery, apt, well arranged, and, as it were, animate, be drawn up and marshaled; and the mind be set to work upon the helps duly prepared and digested which these tables supply.

此外，特殊事物数目庞大，犹如一支军队，散布驻扎各地，但也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惑乱我们的理解力，因此，如果单凭智力上的小打小闹，间断无序的调动变化，那么希望必定渺茫；除非一切与讨论主题相关的特殊事物，根据《发现一览表》加以恰当精心的，或者可以说是，充满生机的安排，它们才会听从调遣，服从安排；这样，我们才能安心梳理这些由《发现一览表》提供的已经分门别类的特殊事物。

CIII

一百零三

But after this store of particulars has been set out duly and in order before our eyes, we are not to pass at once to the investigation and discovery of new particulars or works; or at any rate if we do so we must not stop there. For although I do not deny that when all the experiments of all the arts shall have been collected and digested, and brought within one man's knowledge and judgment, the mere transferring of the experiments of one art to others may lead, by means of that experience which I term literate, to the discovery of many new things of service to the life and state of man, yet it is no great matter that can be hoped from that; but from the new light of axioms, which having been educed from those particulars by a certain method and rule, shall in their turn point out the way again to new particulars, greater things may be looked for. For our road does not lie on a level, but ascends and descends; first ascending to axioms, then descending to works.

但是即使这些特殊事物恰当有序地铺排在我们眼前，我们也不应立马过渡到调查和发现新的特殊事物或新产品上；或者说，假如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止步于此。我不否认，一旦把所有技艺的实验都收集起来并加以整理，纳入人的理解力和判断之中，那么只需经验，即上面所说的“书写成文”的经验，就可以把一种技艺的实验借用到其他技艺上，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新事物来服务于人类生活和现状；尽管我不否认这点，但是也别指望从中能捣腾出什么伟大的东西来；反倒是，要想发现更为伟大的事物，还必须借用公理之光，而这种新的公理之光，虽说是通过特定的方法和规则从具体事物中提取出来的，但反过来也会给新的特殊事物指明道路。我们的道路并非一路平坦，而是有升有降；升，则成公理，降，则成结果。

CIV

一百零四

The understanding must not, however, be allowed to jump and fly from particulars to axioms remote and of almost the highest generality (such as the first principles, as they are called, of arts and things), and taking stand upon them as truths that cannot be shaken, proceed to prove and frame the middle axioms by reference to them; which has been the practice hitherto, the understanding being not only carried that way by a natural impulse, but also by the use of syllogistic demonstration trained and inured to it. But then, and then only, may we hope well of the sciences when in a just scale of ascent, and by successive steps not interrupted or broken, we rise from particulars to lesser axioms; and then to middle axioms, one above the other; and last of all to the most general. For the lowest axioms differ but slightly from bare experience, while the highest and most general (which we now have) are notional and abstract and without solidity. But the middle are the true and solid and living axioms, on which depend the affairs and fortunes of men; and above them again, last of all, those which are indeed the most general; such, I mean, as are not abstract, but of which those intermediate axioms are really limitations.

然而，绝不允许理解力从特殊一跃飞至公理上，公理非但遥远，而且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此般公理堪称技艺和事物的第一性原理）；而是应把公理视为不可动摇的真理，并立足其上，进而以此为据，去证明和建构中间性公理；这种方法过去人们一直都在沿用，人们之所以有这种理解，不仅仅出于自然冲动，也是因为人们经过训练而习惯了使用三段论式论证的缘故。但是我们如果要对科学抱有美好的期待，有且仅有这样一种方法：要选择正确的路径，一步一步地攀升，

既不受他人干扰，也不半途而废，要从特殊事物上升到低级公理，再到中间性公理，就这样一级一级地攀升到最后的最普遍的原理上。因为最低级别的公理与单纯的经验相差无几，而最高、最普遍的公理（即我们现在拥有的）却是概念而非现实、抽象而非具体、虚空而非实在的。唯有中间性公理才是真实实在，而且富有活力的；人的事业和命运正是依靠中间性公理，并由此而上，最后才到达真正的最普遍原理；所谓“真正的最普遍原理”，我不是指抽象的，而是指中间性公理所规定和限制的最普遍原理。

The understanding must not therefore be supplied with wings, but rather hung with weights, to keep it from leaping and flying. Now this has never yet been done; when it is done, we may entertain better hopes of the sciences.

因此，理解力切不可插上翅膀，而须系以重物，这样才能避免一跃而飞。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这样做过；一旦有人这样尝试，那我们对科学就可以寄予更加美好的愿望了。

CV

一百零五

In establishing axioms, another form of induction must be devised than has hitherto been employed, and it must be used for proving and discovering not first principles (as they are called) only, but also the lesser axioms, and the middle, and indeed all. For the induction which proceeds by simple enumeration is childish; its

conclusions are precarious and exposed to peril from a contradictory instance; and it generally decides on too small a number of facts, and on those only which are at hand. But the induction which is to be available for the discovery and demonstration of sciences and arts, must analyze nature by proper rejections and exclusions; and then, after a sufficient number of negatives, come to a conclusion on the affirmative instances—which has not yet been done or even attempted, save only by Plato, who does indeed employ this form of indu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for the purpose of discussing definitions and ideas. But in order to furnish this induction or demonstration well and duly for its work, very many things are to be provided which no mortal has yet thought of; insomuch that greater labor will have to be spent in it than has hitherto been spent on the syllogism. And this induction must be used not only to discover axioms, but also in the formation of notions. And it is in this induction that our chief hope lies.

在建立公理时，必须设计出另外一种归纳法，其在形式上要有别于现今所用的归纳法，而我们不仅须用这种归纳法来证明和发现第一性原理，而且必须用它来证明和发现低级公理和中间性公理，实际上包括所有的公理。归纳法，如果仅仅是采用简单的枚举法来进行，就很幼稚，得出的结论也不可靠，只要提供相反的例证即可予以反驳；一般而言，归纳法的论断建立在极少的事实之上，而且仅限于手边的事实。但是归纳法，如果要想对科学和技艺的发现和论证产生作用，就必须通过正确的排拒法或排除法来分析自然；找到足够数量的反面例证，然后再根据正面事例得出结论——这种方法，除了柏拉图之外，至今还没有人使用过或尝试过，柏拉图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用这种归纳法来讨论定义和理念。但是要想这种归纳法或论证有效，就必须为其提供充分条件；要想达到此目的，我们必须准备许许多多的至今没有人想到的事物；迄今为止，我们在三段论中耗了不少努力，但我们还必须在归纳法中做出更大的努力。这种归纳法不仅须用来发现

公理，而且须用来形成概念。正是这种归纳法才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所在。

CVI

一百零六

But in establishing axioms by this kind of induction, we must also examine and try whether the axiom so established be framed to the measure of those particulars only from which it is derived, or whether it be larger and wider. And if it be larger and wider, we must observe whether by indicating to us new particulars it confirm that wideness and largeness as by a collateral security, that we may not either stick fast in things already known, or loosely grasp at shadows and abstract forms, not at things solid and realized in matter.

但是在运用这种归纳法来建立公理时，我们还必须对这样建立起来的公理加以详查核对，即这些公理与所依据的特殊性事物仅仅是严丝合缝，还是显得更为宽泛。如果太宽太泛，我们就必须观察这个公理是否能像证人一般通过指认新的特殊事物来证实其自身的宽泛度。这样，我们就不至于仅仅拘泥于已知的事物，也不至于对一些空幻的影子和抽象的形式不求甚解，从而抓不住事物坚实的本质。

And when this process shall have come into use, then at last shall we see the dawn of a solid hope.

一旦这个过程付诸应用，那么我们就会见到坚实的希望之曙光。

CVII

一百零七

And here also should be remembered what was said above concerning the extending of the range of natural philosophy to take in the particular sciences, and the referring or bringing back of the particular sciences to natural philosophy, that the branches of knowledge may not be severed and cut off from the stem. For without this the hope of progress will not be so good.

至此，还得回顾一下前文说过的话题，也就是，既要扩大自然哲学的范围，使其能包容各种具体科学，也要将各种具体科学指向或纳入到自然哲学中去，这样，知识这颗大树的枝叶就不至于与树根彼此分割、彼此割裂。如果不这样，要期待进步也就不那么乐观了。

CVIII

一百零八

So much then for the removing of despair and the raising of hope through the dismissal or rectification of the errors of past time. We must now see what else there is to ground hope upon. And

this consideration occurs at once—that if many useful discoveries have been made by accident or upon occasion, when men were not seeking for them but were busy about other things, no one can doubt but that when they apply themselves to seek and make this their business, and that too by method and in order and not by desultory impulses, they will discover far more. For although it may happen once or twice that a man shall stumble on a thing by accident which, when taking great pains to search for it, he could not find, yet upon the whole it unquestionably falls out the other way. And therefore far better things, and more of them, and at shorter intervals, are to be expected from man's reason and industry and direction and fixed application than from accident and animal instinct and the like, in which inventions have hitherto had their origin.

关于如何通过消除或修正过去的错误来根除绝望，鼓起希望，就谈到这里。现在要看看还有其他什么可以给希望铺设基石。说到这，立刻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许多实用的发现都是出于机缘巧合，即人们并不是刻意去追求而是在忙于其他事务时有所发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没有人会怀疑，只要他们尽心尽力地把一件事当做事业来追求，就会做出更多更多的发现；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也没有人会怀疑，他们只要是采用科学的方法和遵循秩序，而不是凭着一时的冲动，就会做出更多更多的发现。一个人偶然也会遇到那么一两次栽跟斗的时候，即费心尽力地追求，却一无所获，但尽管如此，总体上看，情况无疑会与此相反。由此可见，要想获得更好更多的东西，并且使间隔期更短，必须寄望于人的理性、勤劳、指导有方和心神专注，而不能寄望于机缘巧遇，不能寄望于动物本能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然而迄今为止，以往的发明都是源自后者。

CIX

一百零九

Another argument of hope may be drawn from this—that some of the inventions already known are such as before they were discovered it could hardly have entered any man's head to think of; they would have been simply set aside as impossible. For in conjecturing what may be men set before them the example of what has been, and divine of the new with an imagination preoccupied and colored by the old; which way of forming opinions is very fallacious, for streams that are drawn from the springheads of nature do not always run in the old channels.

希望的另一个论据可以这样得来：有些已知的发明，在其发现出来之前，是很难进入人的大脑，是很难想象得到的，而且往往会被人视为不可能而弃之一旁。因为人们在揣测可能出现的东西时，总是将业已出现的东西置于面前作为范例，然后用带有成见的、夸饰的想象力去推测新的东西；用这种方法形成的见解极为荒谬；因为从自然这一泉源流淌出来的溪流并不总在陈旧的渠道中潺潺流出。

If, for instance,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ordnance, a man had described the thing by its effects, and said that there was a new invention by means of which the strongest towers and walls could be shaken and thrown down at a great distance, men would doubtless have begun to think over all the ways of multiplying the force of catapults and mechanical engines by weights and wheels and such machinery for ramming and projecting; but the notion of a fiery blast suddenly and violently expanding and exploding would hardly have entered into any man's imagination or fancy, being a

thing to which nothing immediately analogous had been seen, except perhaps in an earthquake or in lightning, which as *magnalia* or marvels of nature, and by man not imitable, would have been immediately rejected.

比如说，大炮发明之前，如果有人从效果上来描述这么一种东西，说有一种新发明，可以远距离震撼、甚至摧毁最牢固的堡垒和城墙，人们无疑会首先想到石弩和机械发射装置，想到能增强这些设备威力的一切方法，如使用重物、轮子或类似可以填塞、投射的机器；但是要说有一股烈火热浪突然猛烈膨胀并且爆炸开来，对人来说，这太难想象了，或者说太不可思议了，因为除了地震和闪电，类似这样的东西也是见所未见；而地震和闪电是自然的“杰作”或奇迹，是人类无法模拟的。于是这种想法立刻遭到了人们的拒绝。

In the same way, if, before the discovery of silk, anyone had said that there was a kind of thread discovered for the purposes of dress and furniture which far surpassed the thread of linen or of wool in fineness and at the same time in strength, and also in beauty and softness, men would have begun immediately to think of some silky kind of vegetable, or of the finer hair of some animal, or of the feathers and down of birds; but a web woven by a tiny worm, and that in such abundance, and renewing itself yearly, they would assuredly never have thought. Nay, if anyone had said anything about a worm, he would no doubt have been laughed at as dreaming of a new kind of cobwebs.

同样，在发现蚕丝以前，如果有人说，有一种细线，发现可以用来织衣服，作装饰，而且比麻线或毛线精细得多，同时还结实得多，漂亮得多，柔和得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某种丝状植物，或某种走兽

的细发，或者某种飞禽的羽绒；但要说是一种小虫编织而成的茧，而且这种小虫数量众多，年复一年地重生，这一点，他们想都没有想过。不但如此，如果有人谈到小虫的事，他无疑会遭到人们的嘲笑，人们会笑他是在做梦，梦想一种新的蜘蛛网。

So again, if, before the discovery of the magnet, anyone had said that a certain instrument had been invented by means of which the quarters and points of the heavens could be taken and distinguished with exactness, men would have been carried by their imagination to a variety of conjectures concerning the more exquisite construction of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but that anything could be discovered agreeing so well in its movements with the heavenly bodies, and yet not a heavenly body itself, but simply a substance of metal or stone, would have been judged altogether incredible. Yet these things and others like them lay for so many ages of the world concealed from men, nor was it by philosophy or the rational arts that they were found out at last, but by accident and occasion, being indeed, as I said, altogether different in kind and as remote as possible from anything that was known before; so that no preconceived notion could possibly have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them.

再举一例，在磁石发现之前，如果有人说可以发明一种工具来精确观察和辨认天体的部位和方向，人们会凭借想象力做出各种构想，想到天文仪器更加精巧的构造；但要是说到发明某种东西与天体运行完全吻合，其本身又不是天体，而只是一种金属或石类质体，他们必定认为这难以置信。以上三种东西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许多年来对人们来说都是隐而不显，而最后人们发现这些都不是哲学或理性技术的结果，而是机缘巧合的结果；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些与已为人知的东西完全属于不同种类，而且相差甚远；所以人们没有一种预

先的概念去发现这些东西。

There is therefore much ground for hoping that there are still laid up in the womb of nature many secrets of excellent use, having no affinity or parallelism with anything that is now known, but lying entirely out of the beat of the imagination, which have not yet been found out. They too no doubt will some time or other, in the course and revolution of many ages, come to light of themselves, just as the others did; only by the method of which we are now treating they can be speedily and suddenly and simultaneously presented and anticipated.

由此可见，有许多根据可以用来树立希望，即在自然这个子宫里还孕育着许多极其有用的秘密，它们与现在已知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相似之处，也没有任何可比拟之处，而是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至今还未为人发现。随着岁月的流逝，若干年后，这些秘密无疑迟早会与其他已经出现的东西一样自行显现；只有用我们现在讨论的方法，这些秘密才能同时被快速地、突然地呈现和预想出来。

CX

一百一

But we have also discoveries to show of another kind, which prove that noble inventions may be lying at our very feet, and yet mankind may step over without seeing them. For however the discovery of gunpowder, of silk, of the magnet, of sugar, of paper,

or the like, may seem to depend on certain properties of things themselves and nature, there is at any rate nothing in the art of printing which is not plain and obvious. Nevertheless for want of observing that although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arrange types of letters than to write letters by the motion of the hand, there is yet thi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hat types once arranged serve for innumerable impressions, but letters written with the hand for a single copy only; or perhaps again for want of observing that ink can be so thickened as to color without running (particularly when the letters face upwards and the impression is made from above)—for want, I say, of observing these things, men went for so many ages without this most beautiful discovery, which is of so much service in the propagation of knowledge.

不过，还有另一类发现需要指出，这类发现证明伟大的发明可能就躺在我们脚边，而人们却践踏而过，视而不见。虽然火药、蚕丝、磁石、食糖、纸张等事物的发现看似取决于事物本身和自然的某种属性，但在印刷术中，无论如何，一切都太显而易见了。而且有一点，人们没有观察到，即排版虽说比手写难，但二者还是存在这么一种区别，即一次排版印本无数，而用手书写仅此一本；还有一点，人们也没有观察到，即墨水可以浓化，这样印色就不会流走（字型朝上，由上而下地印刷时尤其如此）；由于没有，我是说，没有观察到以上两种情况，人们在悠悠岁月中居然没有做出这种最美妙的发明，来极大地服务于知识的传播。

But such is the infelicity and unhappy disposition of the human mind in this course of invention, that it first distrusts and then despises itself: first will not believe that any such thing can be found out; and when it is found out, cannot understand how the world should have missed it so long. And this very thing may be

justly taken as an argument of hope, namely, that there is a great mass of inventions still remaining which not only by means of operations that are yet to be discovered, but also through the transferring, comparing, and applying of those already known, by the help of that learned experience of which I spoke, may be deduced and brought to light.

这是人类心灵在发明过程中的不幸和悲哀，开始时不自信，接着自轻自贱：开始时不相信任何此类事物能被人发现，而发现之后，又无法理解怎么世人就不能早些发现呢。而这正好可以成为希望的依据，这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还有大量的发明等待人们去发现；发现方法，不仅可以使用未曾发现的手段，也可以使用已有的方法，并将它们进行转化或比较，再借助于我曾说过的习得的经验，去推导和揭示那些尚待发现的东西。

CXI

一百一十一

There is another ground of hope that must not be omitted. Let men but think over their infinite expenditure of understanding, time, and means on matters and pursuits of far less use and value; whereof, if but a small part were directed to sound and solid studies, there is no difficulty that might not be overcome. This I thought good to add, because I plainly confess that a collection of history natural and experimental, such as I conceive it and as it ought to be, is a great, I may say a royal work, and of much labor and expense.

关于希望，还有一个依据不可略而不论。只要让人们想想：他们把无限的理解、时间和方法耗费在了用处和价值都不大的事情和追求上；其实，只要把其中一小部分转移到健全而坚实的研究上，就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克服的了。这一点，我认为补充出来也是有益处的，因为坦率地说，自然史和实验史，如果是我设想的而且理应如此的那样，那编撰出来必定是一部巨著，也可说，是一部鸿篇巨著，是一部极其耗费人力和财力的巨著。

CXII

一百一十二

Meantime, let no man be alarmed at the multitude of particulars, but let this rather encourage him to hope. For the particular phenomena of art and nature are but a handful to the inventions of the wit, when disjoined and separated from the evidence of things. Moreover, this road has an issue in the open ground and not far off; the other has no issue at all, but endless entanglement. For men hitherto have made but short stay with experience, but passing her lightly by, have wasted an infinity of time on meditations and glosses of the wit. But if someone were by that could answer our questions and tell us in each case what the fact in nature is, the discovery of all causes and sciences would be but the work of a few years.

同时，人切不可因特殊事物众多而感到恐慌，反而应以此来鼓励自己树立起希望。技艺中的特殊现象和自然中的特殊现象，相对于来

自人类智慧无根无据的遐想来说，不盈一掬。此外，前一条路犹如露天空地设有目标——转眼即至；后一条路则毫无目标——两眼迷茫。迄今为止，对待经验，人们只是短短接触、轻轻掠过，而对待智慧，人们却费时费力、苦思冥想。如果有人能以此解答我们的问题，并能告诉我们各种情况下自然的真相是什么，那么一切原因和一切科学的发现只不过耗费短短几年功夫而已。

CXIII

一百一十三

Moreover, I think that men may take some hope from my own example. And this I say not by way of boasting, but because it is useful to say it. If there be any that despond, let them look at me, that being of all men of my time the most busied in affairs of state, and a man of health not very strong (whereby much time is lost), and in this course altogether a pioneer, following in no man's track nor sharing these counsels with anyone, have nevertheless by resolutely entering on the true road, and submitting my mind to Things, advanced these matters, as I suppose, some little way. And then let them consider what may be expected (after the way has been thus indicated) from men abounding in leisure, and from association of labors, and from successions of ages—the rather because it is not a way over which only one man can pass at a time (as is the case with that of reasoning), but one in which the labors and industries of men (especially as regards the collecting of experience) may with the best effect be first distributed and then combined. For then only will men begin to know their strength when instead of great numbers doing all the same things, one shall

take charge of one thing and another of another.

再者，我认为，人们可以以我为例，从中得到一些希望。我这样说，并无自夸之意；而是因为有用才这样说。如果有人感到沮丧绝望，那就让他们看看我：在与我同时代的人中，我是国事最忙的一个，再加上身体不好（因而许多光阴白白丢失了），而且在这个领域里，我完全是一个开拓者，既无他人轨迹可循，也无法与他人进行商讨；尽管如此，我还是坚定不移地踏上了这条正确的道路，对自然心悦诚服，因此，我认为多少还是把事情向前推进了一步。那么，他们应该想一想，在道路指明之后，从闲暇之人那儿，从共同的劳动中，从历史的长河里，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希望：当然应该是更大的希望，因为这条路并非仅凭一人之力就可以一蹴而就（就像推理那样）；而是对许多人的努力，要首先精心有效地分工、然后通力协调地合作（尤其在经验习得过程中）。人们应当避免众人均做同一事，而应各人分管一件事，只有这样人们才会知道自己的力量。

CXIV

一百一十四

Lastly, even if the breath of hope which blows on us from that New Continent were fainter than it is and harder to perceive, yet the trial (if we would not bear a spirit altogether abject) must by all means be made. For there is no comparison between that which we may lose by not trying and by not succeeding, since by not trying we throw away the chance of an immense good; by not succeeding we only incur the loss of a little human labor. But as it is, it appears to me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and also from what has been left

unsaid, that there is hope enough and to spare, not only to make a bold man try, but also to make a sober-minded and wise man believe.

最后，从新大陆吹来的一丝希望之风，即使是比其实际要微弱，要难以觉察，也必须千方百计试一试（假如我们的精神还没有沮丧到极致的话）。因为不加尝试与未能成功，二者导致的损失并无可比性：如果是前者，我们就抛弃了获得巨大利益的机会；如果是后者，我们只是损失了一丁点儿劳力而已。但事实上，从前面已做的论述和尚未提及的东西来看，我认为，希望绰绰有余，不仅可以使英勇无畏者大胆一试，还可以让神清智明者确信无疑。

CXV

一百一十五

Concerning the grounds then for putting away despair, which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causes of delay and hindrance to the progress of knowledge, I have now spoken. And this also concludes what I had to say touching the signs and causes of the errors, sluggishness, and ignorance which have prevailed; especially since the more subtle causes, which do not fall under popular judgment and observation, must be referred to what has been said on the Idols of the human mind.

关于如何根除人们的绝望之心——这是延阻知识进步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我就谈到这里。不过，还要做一个小结，对过去所有的

错误、懒惰和无知的迹象和原因，我必须说几句话；尤其是那些更加微妙的原因必须与前面谈过的人心幻象联系起来，因为这些原因从未受到公众的辨别观察。

And here likewise should close that part of my *Instauration* which is devoted to pulling down, which part is performed by three refutations: first, by the refutation of the natural human reason, left to itself; secondly, by the refutation of the demonstrations; and thirdly, by the refutation of the theories, or the received systems of philosophy and doctrine. And the refutation of these has been such as alone it could be: that is to say, by signs and the evidence of causes, since no other kind of confutation was open to me, differing as I do from the others both on first principles and on rules of demonstration.

至此，我的《复兴论》专论破坏的部分同样也该结束了，这部分包括三个辩驳：第一是关于人类天生的理性——任其自然——的辩驳；第二是关于论证的辩驳；第三是关于学说的辩驳，或关于公认哲学体系和教义的辩驳。这些辩驳按照本应如此的方式去辩驳：也就是说，根据迹象和原因证据去辩驳，因为除了这种辩驳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辩驳方式可以让我更加容易接受，因为在第一性原理和论证形式上，我不赞同采用其他方式去辩驳。

It is time therefore to proceed to the art itself and rule of interpreting nature. Still, however, there remains something to be premised. For whereas in this first book of aphorisms I proposed to prepare men's minds as well for understanding as for receiving what is to follow, now that I have purged and swept and leveled the floor of the mind, it remains that I place the mind in a good position and

as it were in a favorable aspect toward what I have to lay before it. For in a new matter it is not only the strong preoccupation of some old opinion that tends to create a prejudice, but also a false preconception or prefiguration of the new thing which is presented. I will endeavor therefore to impart sound and true opinions as to the things I propose, although they are to serve only for the time, and by way of interest (so to speak), till the thing itself, which is the principal, be fully known.

至此，该是继续讨论技艺本身和阐释自然的规则的时候了。不过，还有些东西要交代在前。因为本书的上卷旨在为人类心灵做准备，以便理解和接受下卷的讨论；既然心灵这个平台，我已经清扫干净、铺设平整了，那么剩下的就是要摆好心灵的位置，具体地说，就是从一个有利的方位去看我所要摆在它面前的东西。人们对新东西产生偏见，不仅仅是由于过度关注旧信念所致，而且也是由于对面前的新东西形成一种错误的先入为主或先入之见所致。因此，至于我提到的事情，我竭力主张先给出合理正确的看法，这些看法（姑且比作）是利息，事情本身可以比作本金，而本金有待下文详解。

CXVI

一百一十六

First, then, I must request men not to suppose that after the fashion of ancient Greeks, and of certain moderns, as Telesius, Patricius, Severinus, I wish to found a new sect in philosophy. For this is not what I am about, nor do I think that it matters much to the fortunes of men what abstract notions one may entertain

concerning nature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ings. And no doubt many old theories of this kind can be revived and many new ones introduced, just as many theories of the heavens may be supposed which agree well enough with the phenomena and yet differ with each other.

那么，首先，我请求大家不要以为我愿意模仿古希腊哲学家和某些当代哲学家，如泰莱西奥，帕特里齐，塞维里努斯，去建立一个新的哲学派别。因为我意不在此，而且也并不认为，人只要对自然和事物的原则怀有某种抽象概念，就可能对他的命运产生多大的影响。无疑，诸如此类的许多旧学说都会再次流行起来，许多新学说也会呈现出来，正如有许多天体假说一样，既能吻合各种天文现象，又能彼此不同。

But for my part I do not trouble myself with any such speculative and withal unprofitable matters. My purpose, on the contrary, is to try whether I cannot in very fact lay more firmly the foundations and extend more widely the limits of the power and greatness of man. And although on some special subjects and in an incomplete form I am in possession of results which I take to be far more true and more certain and withal more fruitful than those now received (and these I have collected into the fifth part of my *Instauration*), yet I have no entire or universal theory to propound. For it does not seem that the time is come for such an attempt. Neither can I hope to live to complete the sixth part of the *Instauration* (which is destined for the philosophy discovered by the legitimat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but hold it enough if in the intermediate business I bear myself soberly and profitably, sowing in the meantime for future ages the seeds of a purer truth, and performing my part toward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great

undertaking.

但是，对我而言，我不会用任何妄加揣测而且徒劳无益的事情来给自己找麻烦。相反，我的目的是试一试能否真的为人类的力量和伟大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从而拓宽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况且，在某些特殊题目上，我掌握的结果虽然形式不够完备，但我自认为比那些现有公认的东西更真实、更确定，而且更实惠（这些我已收入《复兴论》第五部分），虽说如此，但我也没有整套或普遍性的学说可以提出。因为做这种尝试好像还未到时候。我也并不指望有生之年能完成《复兴论》的第六部分（这部分注定要讨论合理阐释自然时发现的哲学）；但是我能秉持中立，既保持清醒，又有利可图；既为后世播下一些更加纯洁的真理种子，又为开创这一伟大事业尽一份责任；如果能这样，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

CXVII

一百一十七

And as I do not seek to found a school, so neither do I hold out offers or promises of particular works. It may be thought, indeed, that I who make such frequent mention of works and refer everything to that end, should produce some myself by way of earnest. But my course and method, as I have often clearly stated and would wish to state again, is this—not to extract works from works or experiments from experiments (as an empiric), but from works and experiments to extract causes and axioms, and again from those causes and axioms new works and experiments, as a legitimate interpreter of nature. And although in my tables of

discovery (which compose the fourth part of the *Instauration*), and also in the examples of particulars (which I have adduced in the second part), and moreover in my 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y (which I have drawn out in the third part), any reader of even moderate sagacity and intelligence will everywhere observe indications and outlines of many noble works; still I candidly confess that the natural history which I now have, whether collected from books or from my own investigations, is neither sufficiently copious nor verified with sufficient accuracy to serve the purposes of legitimate interpretation.

我并不企求开宗立派，同样，也不会馈赠或许诺出某些具体成果来。的确，人们可能会认为，既然我经常这样提及成果，而且把一切都归结到这一目的上，那么我自己也应该认真地做出一些成果来。但是我的方式方法，我已经屡次清楚地说明过，也愿意再说明一次，就是，绝不是为做事而做事，或为实验而实验（像经验主义者那样），而是为了原因和公理而做事做实验；然后再根据这些原因和公理去做事做实验，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自然阐释者。无论是在我的《发现一览表》中（即《复兴论》第四部分），还是在特殊事例中（见第二部分中的引证），就是在我的历史论集里（第三部分节选），任何读者，即使只有中等智慧，也能随处见到许多丰功伟绩的征兆和轮廓。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直言不讳地承认，我现在掌握的自然历史，无论是从书堆中收集而来，还是由我切身调查而来，既不充裕丰富，也未经充分核实，因此，无法满足或起到合格的阐释之用。

Accordingly, if there be anyone more apt and better prepared for mechanical pursuits, and sagacious in hunting out works by the mere dealing with experiment, let him by all means use his industry to gather from my history and tables many things by the way, and apply them to the production of works, which may serve as interest

until the principal be forthcoming. But for myself, aiming as I do at greater things, I condemn all unseasonable and premature tarrying over such things as these, being (as I often say) like Atalanta's balls. For I do not run off like a child after golden apples, but stake all on the victory of art over nature in the race. Nor do I make haste to mow down the moss or the corn in blade, but wait for the harvest in its due season.

如前所述，有些人比较适合于机械研究，准备也比较充分，而且还有智慧，仅凭实验都能捣腾出成果来；如果真能有这种人，就让他千方百计、尽其努力地从我的历史论集和《发现一览表》中顺便搜集出许多事物来，用来产生新的成果，以充当即将到期的本金所产生的利息。但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目标更为远大，因此，我认为，把精力放在这类事情上太不合时宜，也为时过早了，这和（我经常提及的）阿塔兰忒的赛跑会有什么区别呢？我可不像小孩那样为了金苹果跑到岔道上，而要在这场竞赛中拿出一切赌注来博取战胜自然的技艺。我也不会匆匆忙忙割掉那些尚在萌芽的小草或谷穗，而是要等到适当的季节获取丰收。

CXVIII

一百一十八

There will be found, no doubt, when my history and tables of discovery are read, some things in the experiments themselves that are not quite certain, or perhaps that are quite false, which may make a man think that the foundations and principles upon which my discoveries rest are false and doubtful. But this is of no

consequence, for such things must needs happen at first. It is only like the occurrence in a written or printed page of a letter or two mistaken or misplaced, which does not much hinder the reader, because such errors are easily corrected by the sense. So likewise may there occur in my natural history many experiments which are mistaken and falsely set down, and yet they will presently, by the discovery of causes and axioms, be easily expunged and rejected. It is nevertheless true that if the mistakes in natural history and experiments are important, frequent, and continual, they cannot possibly be corrected or amended by any felicity of wit or art. And therefore, if in my natural history, which has been collected and tested with so much diligence, severity, and I may say religious care, there still lurk at intervals certain falsities or errors in the particulars, what is to be said of common natural history, which in comparison with mine is so negligent and inexact? And what of the philosophy and sciences built on such a sand (or rather quicksand)? Let no man therefore trouble himself for this.

毫无疑问，只要读完我的自然史和《发现一览表》，就会发现实验本身中的一些事情并不准确，甚至非常错误；这可能让人觉得，如果以那些基础和原则为根据，那么做出的发现也是错误的、靠不住的。但这算不上什么，因为这类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只不过就像写完或印完后，文中出现了一两个字母的拼写错误或排版错误而已，并不妨碍读者阅读，因为这类错误很容易根据语义而纠正过来。同样，我的自然史中也有许多实验做错了而且设计也错了，不过，这些实验很快就会随着原因和公理的发现，很容易清除掉和剔除掉。虽然如此，这一点倒是不假，即如果我的自然史和实验史中这些错误影响很大、又时常发生、而且还连续不断，那么这些错误即使是再怎么巧妙使用智慧或技术也难以纠正或补救。再说，我的自然史在选材和检验上可谓精心审慎之作，也可以说是虔诚之作；如果其中都还不时地潜伏着某些细节上的瑕疵或错误，那么对那种相比之下粗枝

大叶、不够精确的普通自然史，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因为与我的自然史相比起来，普通自然史太粗陋不精了。要是哲学和科学建立在这种沙滩上（准确地说是流沙），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因此，请大家不要为此而自寻烦恼。

CXIX

一百一十九

There will be met with also in my history and experiments many things which are trivial and commonly known; many which are mean and low; many, lastly, which are too subtle and merely speculative, and that seem to be of no use; which kind of things may possibly avert and alienate men's interest.

在我的自然史和实验史中，还可以看到许多无关宏旨而且是众所周知的东西；可以看到许多平庸低级的东西；最后还可以看到许多不可思议、仅属揣测、而且看来毫无用处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让人们感到索然无味。

And first, for those things which seem common. Let men bear in mind that hitherto they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do no more than refer and adapt the causes of things which rarely happen to such as happen frequently, while of those which happen frequently they never ask the cause, but take them as they are for granted. And therefore they do not investigate the causes of weight, of the rotation of heavenly bodies, of heat, cold, light, hardness, softness,

rarity, density, liquidity, solidity, animation, inanimation, similarity, dissimilarity, organization, and the like; but admitting these as self-evident and obvious, they dispute and decide on other things of less frequent and familiar occurrence.

首先，来谈谈那些看似常见的东西。人们应该把这一点牢记在心，即他们已经习惯于把罕见事物的原因都归结于常见事物；而对那些常见事物，从不过问其原因，而是视之当然。正因如此，至于重量、天体运行、热、冷、光、硬、软、稀有、密度、流动性、坚固性、生气勃勃与死气沉沉、相似性与差异性、机体组织等诸如此类，他们从不调查其原因，而将其认定为不证自明、显而易见的现象，并以此为据来争辩和决断其他不太常见、不太熟悉的事物。

But I, who am well aware that no judgment can be passed on uncommon or remarkable things, much less anything new brought to light, unless the causes of common things, and the causes of those causes, be first duly examined and found out, am of necessity compelled to admit the commonest things into my history. Nay, in my judgment philosophy has been hindered by nothing more than this, that things of familiar and frequent occurrence do not arrest and detain the thoughts of men, but are received in passing without any inquiry into their causes; insomuch that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ings which are not known is not oftener wanted than attention concerning things which are.

但是我很清楚，对待常见事物的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如果事先不做充分调查与核实，那就不能对罕有或罕见的事物下任何判断，因此，我有必要而且不得不将那些最常见的事物纳入我的自然史。非但如此，根据我的判断，哲学之所以一直受到阻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

因：熟悉而常见的事物不但没有约束阻碍人的思维，反而被人不假思索、不明就里地接受；正因如此，人们与其说想获知那些未知事物的信息，不如说更加常常地对已知事物加以关注。

CXX

一百二十

And for things that are mean or even filthy—things which (as Pliny says) must be introduced with an apology—such things, no less than the most splendid and costly, must be admitted into natural history. Nor is natural history polluted thereby, for the sun enters the sewer no less than the palace, yet takes no pollution. And for myself, I am not raising a capitol or pyramid to the pride of man, but laying a foundation in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for a holy temple after the model of the world. That model therefore I follow. For whatever deserves to exist deserves also to be known, for knowledge is the image of existence; and things mean and splendid exist alike. Moreover, as from certain putrid substances—musk, for instance, and civet—the sweetest odors are sometimes generated, so, too, from mean and sordid instances there sometimes emanates excellent light and information. But enough and more than enough of this, such fastidiousness being merely childish and effeminate.

至于那些平庸乃至低贱的事物，也就是（正如普林尼所说）必须先道歉后说出口的事物，与那些最为高尚珍贵的事物一样，这些事物同样必须纳入自然史中。自然史也不会因此遭到玷污，这好比太阳既

照射宫殿，同样也照射阴沟，但并不因此而遭受玷污。至于我自己，我并不是要建立一座万神殿或金字塔以供世人矜夸，而是在人类的理解中以世界为模型给神圣的庙宇打下根基。那就是我所遵循的模型。但凡有存在价值的东西就值得去求知，因为但凡知识都是存在的表象；既存在平庸低贱的事情，也不乏高尚珍贵的事情。而且，某些气味刺鼻的物质——如麝香鹿和香猫——有时却能产生出最芬芳的香气；同样，平庸低贱的事例有时也能发出最闪耀的光芒和信息。关于这一点，我说得足够多了，这般吹毛求疵不过就是妇孺之见而已。

CXXI

一百二十一

But there is another objection which must be more carefully looked to, namely, that 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this History which to common apprehension, or indeed to any understanding accustomed to the present system, will seem to be curiously and unprofitably subtle. Upon this point, therefore, above all I must say again what I have said already: that at first, and for a time, I am seeking for experiments of light, not for experiments of fruit, following therein, as I have often said, the example of the divine creation which on the first day produced light only, and assigned to it alone one entire day, nor mixed up with it on that day any material work.

还有一点异议必须更加仔细，更加留心，也就是说，在这部自然史中，有许多东西对普通理解力，或对习惯于当前体系的理解力来说，仿佛太微妙了，微妙得稀奇古怪、毫无用处。至于这一点，首先

我必须把我业已说过的话重说一遍。也就是说，我首先要暂时寻求光的实验，而不是寻求果的实验；正如我常说的那样，我是以上帝创世为典范，第一天只创造光，即用一整天的功夫来做这一件事，而不在这天夹杂任何物质性工作。

To suppose, therefore, that things like these are of no use is the same as to suppose that light is of no use, because it is not a thing solid or material. And the truth is that the knowledge of simple natures well examined and defined is as light: it gives entrance to all the secrets of nature's workshop, and virtually includes and draws after it whole bands and troops of works, and opens to us the sources of the noblest axioms; and yet in itself it is of no great use. So also the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in themselves and apart have no use or meaning, yet they are the subject matter for the composition and apparatus of all discourse. So again the seeds of things are of much latent virtue, and yet of no use except in their development. And the scattered rays of light itself, until they are made to converge, can impart none of their benefit.

因此，如果说诸如此类的事情毫无用途，那么无疑是说上帝之光毫无益处，因为光不是坚实或物质性的东西。事实是有关质朴性质的知识有如光一般，须要仔细核查、精心界定。它给自然这个作坊中的一切秘密指明方向，事实上还包含着和附带着层出不穷的成果，甚至把那些最高尚的公理的源头也展露在我们眼前；而其本身却无多大用处。同样，表音符号系统中的字母，如果分开来看，本身毫无用处或意义，但却是作文的素材，是所有谈话的工具。又好比种子这种东西有许多潜在的品性，然而除了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外，毫无用处。又如光这种东西，如果其光线散乱而不能辐合，那么也不能传递其功用。

But if objection be taken to speculative subtleties, what is to be said of the schoolmen, who have indulged in subtleties to such excess—in subtleties, too, that were spent on words, or at any rate on popular notions (which is much the same thing), not on facts or nature; and such as were useless not only in their origin but also in their consequences; and not like those I speak of, useless indeed for the present, but promising infinite utility hereafter. But let men be assured of this, that all subtlety of disputation and discourse, if not applied till after axioms are discovered, is out of season and preposterous, and that the true and proper or at any rate the chief time for subtlety is in weighing experience and in founding axioms thereon. For that other subtlety, though it grasps and snatches at nature, yet can never take hold of her. Certainly what is said of opportunity or fortune is most true of nature: she has a lock in front, but is bald behind.

如果说反对思考中的精微，那么对那些经院学者们，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他们对精微的痴迷达到了极致，而且这种精微的功夫花在了文字之上，或至少说是花在了通俗概念上（其实文字与概念大致是一回事），而不是花在事实或自然之上，这些精微不仅初始无用而且后效也全无；这和我所说的完全一样，即眼前确无用，后效当无限。人们应该确信这么一点，即争论演讲中的一切精微在公理发现之后若不加应用，那就不合时令、不合常理了；精微的妥当应用或主要时机是用来衡量经验、建立公理。另一种精微虽然能抓获自然，却无法将其紧紧抓牢在手。关于机遇或运气，有一种说法用来说明自然最为准确，那就是“前额长发飘，脑后秃无毛”。

Lastly, concerning the disdain to receive into natural history things either common, or mean, or oversubtle and in their original condition useless, the answer of the poor woman to the haughty

prince who had rejected her petition as an unworthy thing and beneath his dignity may be taken for an oracle: “Then leave off being king. " For most certain it is that he who will not attend to things like these as being too paltry and minute, can neither win the kingdom of nature nor govern it.

最后，至于鄙视向自然史中纳入诸如此类的事情，如常见、卑贱、过于精微以及初始时一无是处，可以用这么一个妇人所说的话来作为一种喻解——这个穷妇人向一位高贵的王子请愿，王子拒绝，斥责她冒渎尊严，妇人回答道：“那你就别当国王了。”可以肯定的是，但凡将此类事物视为琐屑零碎者，概不能赢得、更不能统治自然这一王国。

CXXII

一百二十二

It may be thought also a strange and a harsh thing that we should at once and with one blow set aside all sciences and all authors; and that, too, without calling in any of the ancients to our aid and support, but relying on our own strength.

我们应该一举把所有科学和所有作家弃之一旁，而且无需任何古人的帮助与支持，仅凭自己的力量；如果这样的话，有人可能认为太奇怪，也太鲁莽了。

And I know that if I had chosen to deal less sincerely, I might easily have found authority for my suggestions by referring them either to the old times before the Greeks (when natural science was perhaps more flourishing, though it made less noise, not having yet passed into the pipes and trumpets of the Greeks), or even, in part at least, to some of the Greeks themselves; and so gained for them both support and honor, as men of no family devise for themselves by the good help of genealogies the nobility of a descent from some ancient stock. But for my part, relying on the evidence and truth of things, I reject all forms of fiction and imposture; nor do I think that it matters any more to the business in hand whether the discoveries that shall now be made were long ago known to the ancients, and have their settings and their risings according to the vicissitude of things and course of ages, than it matters to mankind whether the new world be that island of Atlantis with which the ancients were acquainted, or now discovered for the first time. For new discoveries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light of nature, not fetched back out of the darkness of antiquity.

我知道，如果说我以前选定的做法缺乏诚意，那么我可以很容易地给我的提议找到权威，要么把建议归功于希腊人以前的远古时代（那时自然哲学兴许更加繁荣，虽然未经希腊人这个传声筒而显得有些悄无声息），要么甚至只将其中部分归功到一些希腊人身上；这样我的提议既找到了声援又找到了声誉，这就好比家世不明者总是翻阅家谱来为自己编造一个名门世家的身份。但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凭借的是事实证据和事实真相，我拒绝一切形式的虚构和欺骗；我认为，当前要做的发现，是否早已为古人所知晓，是否随着事情的变迁、年代的更迭而兴衰起伏，这与当前我手中的任务没有丝毫关系；新世界是否就是那个古人熟知的大西岛，是否是第一次被人发现，这也与人类没有多大关系。新发现必须求助于自然之光亮，而绝不能倒行求助于古代之黑暗。

And as for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censure, certainly if the matter be truly considered such a censure is not only more probable but more modest, too, than a partial one would be. For if the errors had not been rooted in primary notions,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true discoveries to correct the false. But the errors being fundamental, and not so much of false judgment as of inattention and oversight, it is no wonder that men have not obtained what they have not tried for, nor reached a mark which they never set up, nor finished a course which they never entered on or kept.

至于责难的普遍性，只要认真考量一下，这样的责难必定比那种局部性的责难更有根据，也更加客气些。因为如果错误不是植根于初始的概念，那么必定早就有真正的发现来纠正虚妄的发现。但是正因为这些错误是根本性的错误，而不是那种因疏忽失察导致的判断失误；所以，未曾尝试，自然难有收获；未曾设有目标，自然难以到达目标；未曾上路或未曾坚持，自然难以完成旅程，这就不足为怪了。

And as for the presumption implied in it, certainly if a man undertakes by steadiness of hand and power of eye to describe a straighter line or more perfect circle than anyone else, he challenges a comparison of abilities; but if he only says that he with the help of a rule or a pair of compasses can draw a straighter line or a more perfect circle than anyone else can by eye and hand alone, he makes no great boast. And this remark, be it observed, applies not merely to this first and inceptive attempt of mine, but to all that shall take the work in hand hereafter. For my way of discovering sciences goes far to level men's wit and leaves but little to individual excellence, because it performs everything by the surest rules and demonstrations. And therefore I attribute my part in all

this, as I have often said, rather to good luck than to ability, and account it a birth of time rather than of wit. For certainly chance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men's thoughts, as well as with their works and deeds.

说到我那种责难中的自夸，如果一个人自称单凭手稳眼尖就能比别人画出更直的线，或画出更正的圆，那么他当然是在与人挑战能力；但如果他只是说可以借助于直尺或圆规比别人单凭手稳眼尖画出的线和圆还直还正，那他绝无吹牛夸口之意。希望大家注意，这种看法不仅仅适用于我自己的初始尝试，而且也适用于所有日后担任目前此项工作的人。若论发现科学，我的方法足以平衡人们的智慧，而几乎不依赖于个人的卓越性，因为用这种方法都是按照最可靠的规则和论证来做一切事情的。因此，我在此中的作用，正如我经常所说的那样，与其说是能力强，不如说是运气好，与其说是智慧的产物，不如说是时间的产物。当然，机会多少与人的思想、工作和行为有关。

CXXIII

一百二十三

I may say then of myself that which one said in jest (since it marks the distinction so truly), “It cannot be that we should think alike, when one drinks water and the other drinks wine.” Now other men, as well in ancient as in modern times, have in the matter of sciences drunk a crude liquor like water, either flowing spontaneously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r drawn up by logic, as by wheels from a well. Whereas I pledge mankind in a liquor strained from countless grapes, from grapes ripe and fully seasoned,

collected in clusters, and gathered, and then squeezed in the press, and finally purified and clarified in the vat. And therefore it is no wonder if they and I do not think alike.

既然说到这里，我可以引用前人说过的戏谑之言来调侃一下自己（因为它真切地标明了我与他人的区别）：“如果一人喝水，一人喝酒，那么我们的想法不会一致。”如今在科学问题上，其他的人，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他们喝了一种像水一样的天然饮料；这种饮料，要么是自发地从理解力中潺潺流出，要么就像轱辘取水一般通过逻辑汲取上来。而我在向人类举杯祝福时，杯里的美酒是用无数葡萄滤制而成，而那些葡萄是在成熟季节时一簇一簇地摘下来，聚集在一起，然后在压榨机中压汁，最后装在大桶中加以纯化和净化。这样一来，我和他们想法不同，也就不足为怪了。

CXXIV

一百二十四

Again, it will be thought, no doubt, that the goal and mark of knowledge which I myself set up (the very point which I object to in others) is not the true or the best, for that the contemplation of truth is a thing worthier and loftier than all utility and magnitude of works; and that this long and anxious dwelling with experience and matter and the fluctuations of individual things, drags down the mind to earth, or rather sinks it to a very Tartarus of turmoil and confusion, removing and withdrawing it from the serene tranquility of abstract wisdom, a condition far more heavenly. Now to this I readily assent, and indeed this which they point at as so

much to be preferred is the very thing of all others which I am about. For I am building in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a true model of the world, such as it is in fact, not such as a man's own reason would have it to be; a thing which cannot be done without a very diligent dissection and anatomy of the world. But I say that those foolish and apish images of worlds which the fancies of men have created in philosophical systems must be utterly scattered to the winds. Be it known then how vast a difference there is (as I said above) between the idols of the human mind and the ideas of the divine. The former are nothing more than arbitrary abstractions; the latter are the Creator's own stamp upon creation, impressed and defined in matter by true and exquisite lines. Truth, therefore, and utility are here the very same things [2_2] ; and works themselves are of greater value as pledges of truth than as contributing to the comforts of life.

毫无疑问，又有人会认为，我自己设定的知识目标和知识标靶（这一点也正是我要反对别人的地方）并不精确，也并非最好，因为与一切丰硕成果及其用途相比，思索真理显得更加崇高，更有价值；如果长期急迫地沉迷于经验、物质以及个别事物的流变，这无异于把心灵从抽象智慧这个纯净的天界中撤离出来，再把心灵拖至地面，准确地说，是将心灵打入骚动混乱的地狱之中。至于这一点，我倒是非常认可，而且他们所指的、更喜欢的事情，也正是我特别想做的。因为我正是要在理解力中给世界建造一个真实模型，真如其实的模型，而不是人自己理性所期待的模型；如果不对世界加以精心剖析，模型建造难以完成。但是我要说的是，那些哲学体系中凭幻想创造出来的世界影像极其荒谬、极其愚蠢，必须彻底撕裂撒入风中。应该知道，人心幻象与神意理念（正如前文所说），二者之间，差异极大。前者不过是任意的抽象，后者却是造物主自己造物时留下的印迹，用真实而精细的线条印在物质上的痕迹。因此，真理与实用在这里实际上是同一回事 [3_2] ；成果作为真理的信物，其本身的价值远远大于真理给

人生带来的舒适。

CXXV

一百二十五

It may be thought again that I am but doing what has been done before; that the ancients themselves took the same course which I am now taking; and that it is likely therefore that I too, after all this stir and striving, shall come at last to some one of those systems which prevailed in ancient times. For the ancients, too, it will be said, provided at the outset of their speculations a great store and abundance of examples and particulars, digested the same into notebooks under heads and titles, from them completed their systems and arts, and afterward, when they understood the matter, published them to the world, adding a few examples here and there for proof and illustration; but thought it superfluous and inconvenient to publish their notes and minutes and digests of particulars, and therefore did as builders do: after the house was built they removed the scaffolding and ladders out of sight. And so no doubt they did. But this objection (or scruple rather) will be easily answered by anyone who has not quite forgotten what I have said above. For the form of inquiry and discovery that was in use among the ancients is by themselves professed and appears on the very face of their writings. And that form was simply this. From a few examples and particulars (with the addition of common notions and perhaps of some portion of the received opinions which have been most popular) they flew at once to the most general conclusions, or first principles of science. Taking the truth of these

as fixed and immovable, they proceeded by means of intermediate propositions to educe and prove from them the inferior conclusions; and out of these they framed the art. After that, if any new particulars and examples repugnant to their dogmas were mooted and adduced, either they subtly molded them into their system by distinctions or explanations of their rules, or else coarsely got rid of them by exceptions; while to such particulars as were not repugnant they labored to assign causes in conformity with those of their principles. But this was not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experience that was wanted; far from it. And besides, that flying off to the highest generalities ruined all.

还有人这样想，我只不过是在重复前人做过的事；前人走过的路，我现在才去走；因此，也可以这样说，经过这一番折腾，我最终还是归结到古代盛行的诸多体系中的某个体系。有人会说，古人在思考之初，都要准备大量丰富的事例和特殊事物，然后分门别类，分章划节，集为书稿，以此完成其体系和技术，在把事情弄明白之后，将其体系和技术公开发表，其中不时地插入几个事例以当证据和说明之用；其实，如果把札记、笔记和摘要等资料公开出版，古人反而会认为太肤浅，也很麻烦；他们这样做与现在的工人建造房屋没什么两样，即房屋造好之后，脚架搭梯均被拆除一空。毫无疑问，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对这一点的反对意见（准确地说是顾忌），只要还记得我上文所说的话，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给予答复。古人自己也坦承他们常用调查发现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只需从他们作品的表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形式，简单地说，就是：他们从少数事例和特殊事物中（加上一些普通概念，也许增加部分最流行公认的意见），直接飞跃到最普遍的结论上，或科学的第一性原理上。他们把这些当作坚定不移的真理，通过中间命题，进而从中演绎和证明一些低级结论，又从这些结论中构架出操作技艺。然后，新的特殊事物和事例，凡是与他们的教条有所抵触的，都会拿出来讨论和引证；对于这些事物和事例，他们要么通过对规则的区分和解释，巧妙地将它们融入自己的体

系之中，要么是把它们当作例外粗暴地剔除掉；至于那些与教条没有抵触的特殊事物，他们会想方设法为这些特殊事物寻找各种原因，以便与自己的原则保持一致。但这种自然史和实验史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远远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除此以外，那种跃飞到最高的普遍性的做法将一切都毁灭了。

CXXVI

一百二十六

It will also be thought that by forbidding men to pronounce and to set down principles as established until they have duly arrived through the intermediate steps at the highest generalities, I maintain a sort of suspension of the judgment, and bring it to what the Greeks call *Acatalepsia* —a denial of the capacity of the mind to comprehend truth. But in reality that which I meditate and propound is not *Acatalepsia* , but *Eucatalepsia* ; not denial of the capacity to understand, but provision for understanding truly. For I do not take away authority from the senses, but supply them with helps; I do not slight the understanding, but govern it. And better surely it is that we should know all we need to know, and yet think our knowledge imperfect, than that we should think our knowledge perfect, and yet not know anything we need to know.

也有人会认为，未经正当中间步骤而达到最高普遍性的东西，就不能将其当作业已建立的原理加以宣布和制定；如果我这样做，那么我就是在持一种判断悬置论，从而回到希腊人所谓的“不可理解论”上，即否认人心具有理解真理的能力。然而，实际上，我思考和

主张的并非“不可理解论”，而是“利解论”，不是否认理解的能力，而是为理解提供真正的便利。我并非剥夺感官的权威，而是为之提供帮助；我不是轻视理解力，而是控制理解力。我们不应该视所知之事为尽知，而不知须知之事；而是应该知道一切须知之事，并且明白我们所知之事尚不完全；如果这样，那就再好不过了。

CXXVII

一百二十七

It may also be asked (in the way of doubt rather than objection) whether I speak of natural philosophy only, or whether I mean that the other sciences, logic, ethics, and politics, should be carried on by this method. Now I certainly mean what I have said to be understood of them all; and as the common logic, which governs by the syllogism, extends not only to natural but to all sciences, so does mine also, which proceeds by induction, embrace everything. For I form a history and table of discovery for anger, fear, shame, and the like; for matters political; and again for the mental operations of memory, composition and division, judgment, and the rest; not less than for heat and cold, or light, or vegetation, or the like. But, nevertheless, since my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 after the history has been prepared and duly arranged, regards not the working and discourse of the mind only (as the common logic does) but the nature of things also, I supply the mind such rules and guidance that it may in every case apply itself aptly to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therefore I deliver many and diverse precepts in the doctrine of interpretation, which in some measure modify the method of invention according to the quality and condition of the

subject of the inquiry.

也许有人会问（那口气与其说是反对，不如说怀疑），到底只是自然哲学应该按照此种方法实施呢，还是其他科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也都应该按照此种方法实施呢？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所说的是针对所有这些学科而言的；既然三段论统治下的普通逻辑不仅可以扩展到自然，还可以扩展到所有科学，同样，我这种归纳法也可以涵盖一切。我写的自然史和发现表所涵盖的范围，有愤怒、恐惧、羞耻及类似的情感，还有各类政治事件，还有记忆、综合、分解、判断及类似的思维活动；也少不了冷热、光线、植被及类似的东西。但是要知道，自然史准备安排妥当之后，由于我的阐释方法不仅涉及到心灵的活动和思辨（如普通逻辑那样），而且也涉及到事物的本质，所以我要给心灵提供规则和指导，这样，任何情况下，这种方法都可以恰如其分地用到事情的本质上。因此，我在阐释论中提出了许多不同条规，这样人们可以根据调查主题的性质和条件来灵活调整发明方法。

CXXVIII

一百二十八

On one point not even a doubt ought to be entertained, namely, whether I desire to pull down and destroy the philosophy and arts and sciences which are at present in use. So far from that, I am most glad to see them used, cultivated, and honored.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 arts which are now in fashion should not continue to supply matter for disputation and ornaments for discourse, to be employed for the convenience of professors and men of business, to

be, in short, like current coin, which passes among men by consent. Nay, I frankly declare that what I am introducing will be but little fitted for such purposes as these, since it cannot be brought down to common apprehension save by effects and works only. But how sincere I am in my professions of affection and good will toward the received sciences, my published writings, especially the books 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sufficiently show; and therefore I will not attempt to prove it further by words. Meanwhile I give constant and distinct warning that by the methods now in use neither can any great progress be made in the doctrines and contemplative part of sciences, nor can they be carried out to any magnitude of works.

还有一点甚至连怀疑都不应该，即我是否企图推翻并摧毁现行的哲学、技艺和科学。相反，让我最高兴的是看到这些东西能得到人们的使用、学习和崇敬。当前流行的技艺不应继续成为人们的辩资，不应作为教授或商人方便之用，简言之，不应像流通货币一样在人们的认可下流行通用，那太没有道理了。非但如此，我要坦率地声明一下，我所倡导的东西满足不了以上那些目的，因为除了效果和成果外，我倡导的东西不可能降低到普通人都能理解的程度。但是我坦承了自己对公认的科学的情感和善意，态度有多大的诚恳，在我发表的著作，特别是几卷《论学问的进步》中有充分的体现，因此，我不想再费口舌证明了。同时，我也要时常明确地提出警告，现行的方法既不可能让学说和科学的思辨取得巨大进步，也不可能用来结出丰硕成果。

CXXIX

一百二十九

It remains for me to say a few words touching the excellency of the end in view. Had they been uttered earlier, they might have seemed like idle wishes, but now that hopes have been raised and unfair prejudices removed, they may perhaps have greater weight. Also if I had finished all myself, and had no occasion to call in others to help and take part in the work, I should even now have abstained from such language lest it might be taken as a proclamation of my own deserts. But since I want to quicken the industry and rouse and kindle the zeal of others, it is fitting that I put men in mind of some things.

若论目标的卓越性，我只有几句话要说。这些话如果说早了，那肯定显得有点像空想，但现在既然鼓起了希望，而且又消除了偏见，这些话兴许就有更大的分量。另外，如果说我过去仅靠我自己来完成了一切，而现在也没有机会邀请他人来帮忙参与工作，那么就算是现在我也要避免说这样的话，以免被人误认为我是在邀功论赏。但是既然我想促进人们勤奋努力、唤起和点燃他人的热情，那么我让人们把心思放在某些事情上也是合适的。

In the first place, then, the introduction of famous discoveries appears to hold by far the first place among human actions; and this was the judgment of the former ages. For to the authors of inventions they awarded divine honors, while to those who did good service in the state (such as founders of cities and empires, legislators, saviors of their country from long endured evils, quellers of tyrannies, and the like) they decreed no higher honors than heroic. And certainly if a man rightly compare the two, he will find that this judgment of antiquity was just. For the benefits of discoveries may extend to the whole race of man, civil benefits only to particular places; the latter last not beyond a few ages, the

former through all time. Moreover, the reformation of a state in civil matters is seldom brought in without violence and confusion; but discoveries carry blessings with them, and confer benefits without causing harm or sorrow to any.

首先，引进著名的发现，这在人类活动中似乎应该占居首位；而且这也是历代前人的定论。历代对发明家都赋予了神圣的荣誉，而对那些劳苦功高的人（即城市和帝国创立者、立法者、多灾多难国家的拯救者、铲除暴君者以及诸如此类者）授予的荣誉最高不过是英雄而已。只要恰当地将二者比较一番，就必定会发现古人的判断正确无误。因为发现之利可利于整个人类，民事之益仅益于具体之处；后者持续不过几代，而前者则可永载千秋。再者，国家民事的改革很少不会导致暴力与混乱；但是发现随之带来的是福祉，利于人而不害人不伤人。

Again, discoveries are as it were new creations, and imitations of God's works, as the poet well sang:

还有，发现可以说是崭新创造，可以说是模仿上帝之手法，有诗人说得好：

To man's frail race great Athens long ago

原始初民脆而弱，

First gave the seed whence waving harvests grow,

雅典人民独雄卓；率先播种收硕果，

And re-created all our life below.

重铸凡间新生活。

And it appears worthy of remark in Solomon that, though mighty in empire and in gold, in the magnificence of his works, his court, his household, and his fleet, in the luster of his name and the worship of mankind, yet he took none of these to glory in, but pronounced that “The glory of God is to conceal a thing; the glory of the king to search it out.”

所罗门似乎值得称道，他帝国辉煌，金银无数，功绩卓著，朝臣满座，仆人成群，舰船无数，声名显赫，凡间膜拜；尽管如此，他丝毫不引以为荣，反而声称：“上帝之光在于藏物，国王之荣在于将其搜出。”

Again, let a man only consider what a difference there is between the life of men in the most civilized province of Europe, and in the wildest and most barbarous districts of New India; he will feel it be great enough to justify the saying that “man is a god to man,” not only in regard to aid and benefit, but also by a comparison of condition. And this difference comes not from soil, not from climate, not from race, but from the arts.

再者，人们只要想一想，世上最开化之地欧洲和最蛮荒之地新印度，只要比一比这两个地方人们的生活差异，就会感受到这句话的内涵，即“人才是人之上帝”；这句话不仅体现在二者在受助受益方面，也体现在二者的生活条件之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不是土壤、气候和人种，而是技艺。

Again, it is well to observe the force and virtue and consequences of discoveries, and these are to be seen nowhere more conspicuously than in those three which were unknown to the ancients, and of which the origin, though recent, is obscure and inglorious; namely, printing, gunpowder, and the magnet. For these three have changed the whole face and state of thing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first in literature, the second in warfare, the third in navigation; whence have followed innumerable changes, insomuch that no empire, no sect, no star seems to have exerted greater power and influence in human affairs than these mechanical discoveries.

还有，应该好好留心一下发现带来的力量、威力和效果；这三者显然无处不见，而最能体现这三者的是三种发明，即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即使古人也有所不知，其起源虽然不远，但依然不清，也未被人传颂过。这三种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目和情势；印刷体现在文学上，火药体现在战争上，磁石体现在航海上；随之而来的还有无数的变化；若论对人类事务的作用和影响，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也难以抗衡这三种机械发明。

Further, it will not be amiss to distinguish the three kinds and, as it were, grades of ambition in mankind. The first is of those who desire to extend their own power in their native country, a vulgar

and degenerate kind. The second is of those who labor to extend the power and dominion of their country among men. This certainly has more dignity, though not less covetousness. But if a man endeavor to establish and extend the power and dominion of the human race itself over the universe, his ambition (if ambition it can be called) is without doubt both a more wholesome and a nobler thing than the other two. Now the empire of man over things depends wholly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For we cannot command nature except by obeying her.

再进一步说，不妨辨析一下人类的三种，也可以说是，三级野心。第一种野心是欲在本国之内扩张自己的威力，这种野心低俗而卑贱。第二种野心是欲在人群当中竭力扩张自己国家的威力和疆域。当然，这种野心，尊严的成分更多一些，不过贪婪的成分也不少。但是如果有人设法向宇宙挑战，建立和扩张人类自己的威力和疆域，那么他的野心（如果可以称为野心的话）毫无疑问比起前两种野心显得更加健全，更加高贵。人类要在万物之上建立帝国，完全取决于技艺和科学。因为我们如果不服从自然，就无法支配自然。

Again, if men have thought so much of some one particular discovery as to regard him as more than man who has been able by some benefit to make the whole human race his debtor, how much higher a thing to discover that by means of which all things else shall be discovered with ease! And yet (to speak the whole truth), as the uses of light are infinite in enabling us to walk, to ply our arts, to read, to recognize one another—and nevertheless the very beholding of the light is itself a more excellent and a fairer thing than all the uses of it—so assuredly the very contemplation of things as they are, without superstition or imposture, error or confusion, is in itself more worthy than all the fruit of inventions.

此外，既然人们如此看重某一具体的发现，从而不会把一个惠及整个人类的人看作是一个普通人，那么若能发现一种东西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来发现所有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该是何等的高贵啊！仍然（纯属真心话）以光为例，光的用途无限，可以让我们看清路途，让我们实施技术，让我们看书，让我们彼此认识——不过，看见光本身比光的所有用途更加卓越，更加美好；同样，我们在思索事物时，只要能如实对待、既不迷信也不欺骗、既正确无误又不慌不忙，那么思索本身比一切发明的成果都更有价值。

Lastly, if the debasement of arts and sciences to purposes of wickedness, luxury, and the like, be made a ground of objection, let no one be moved thereby. For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all earthly goods: of wit, courage, strength, beauty, wealth, light itself, and the rest. Only let the human race recover that right over nature which belongs to it by divine bequest, and let power be given it; the exercise thereof will be governed by sound reason and true religion.

最后，如果有人因邪恶奢侈而贬低技艺和科学，并加以反对，那么请不要为此所动。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也可以找到理由来反对世间一切美德了，如智慧、勇气、力量、美丽、财富、光本身等。只须让人类恢复那种由神馈赠、为其固有的对自然的权利，并赋予人类权力；至于如何运用，健全的理性和真正的宗教会各司其职。

CXXX

一百三

And now it is time for me to propound the art itself of interpreting nature, in which, although I conceive that I have given true and most useful precepts, yet I do not say either that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as if nothing could be done without it) or that it is perfect. For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if men had ready at hand a just history of nature and experience, and labored diligently thereon, and if they could bind themselves to two rules—the first, to lay aside received opinions and notions; and the second, to refrain the mind for a time from the highest generalizations, and those next to them—they would be able by the native and genuine force of the mind, without any other art, to fall into my form of interpretation. For interpretation is the true and natural work of the mind when freed from impediments. It is true, however, that by my precepts everything will be in more readiness, and much more sure.

现在是时候由我来提出阐释自然的技艺本身了；这些技艺，尽管我觉得我已经提出了真实而最有用途的条规，但我既不会说技艺绝对必要（仿佛缺了技艺，什么都干不了一样），也不会说技艺完美无缺。因为在我看来，人们只要手边备有一部正确的自然史和实验史，并据此而辛勤努力，只要能恪守两条规则——第一是将公认的意见和概念置之一旁；第二是暂时不要遏制心灵，不要萦绕在最高的普遍性上，或稍低一级的普遍性上，那么他们就能凭借内心固有的、纯真的力量，无需任何其他技艺，就可以发现我这种阐释自然的方式。所谓阐释，就是心无障碍时真实而自然的内心活动。然后，我的条规可以使一切更有准备，更加确定，那也一点不假。

Nor again do I mean to say that no improvement can be made upon these. On the contrary, I regard that the mind, not only in its own faculties, but in its connection with things, must needs hold that the art of discovery may advance as discoveries advance.

我并不是说那些条规不容改进了。相反，我不仅要论心的机能，还要论心与事物的联系，而且还偏要主张发现的技艺可以随着发现的进步而进步。

[2_1].[*Conspissatio* .—Ed.]

[2_2].*Ipsissimæ res* . I think this must have been Bacon's meaning, though not a meaning which the word can properly bear. —J. S.

[3_1].拉丁本原文为：Conspissatio，见贾&西版本的《新工具》。

[3_2].拉丁原文是Ipsissimæ res。尽管拉丁原文的意思并非指“同一回事（the same thing）”，但我认为培根是把拉丁原文看作是此意。——丽莎·贾丁（Lisa Jardine）、迈克尔·西尔弗索恩（Michael Silverthorne），后文注释简称“贾&西”。

Book Two

卷二

I

一

On a given body, to generate and superinduce a new nature or new natures is the work and aim of human power. Of a given nature to discover the form, or true specific difference, or nature-engendering nature, or source of emanation (for these are the terms which come nearest to a description of the thing), is the work and aim of human knowledge. Subordinate to these primary works are two others that are secondary and of inferior mark: to the form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crete bodies, so far as this is possible; to the latter, the discovery, in every case of generation and motion, of the *latent process* carried on from the manifest efficient and the manifest material to the form which is engendered; and in like manner the discovery of the *latent configuration* of bodies at rest and not in motion.

人类权力的任务和目标就是在某一特定物体上产生和添置一种或多种新性质。而人类知识的任务和目标就是发现某一特定性质的形式，或发现该性质的真正具体的区别，或发现产生该性质的性质，或发现该性质的发射之源（这些术语最接近于对该事物的描写）。这两种主要任务还附带了另外两种次要的低级任务：属于前者的是尽可能

转变具体物体；属于后者的是在每一次生成和运动中发现隐秘过程，即从明显的动力因和质料因到产生形式的“隐秘过程”，同样，发现物体静止不动时的“隐秘结构”也属于后者。

II

二

In what an ill condition human knowledge is at the present time is apparent even from the commonly received maxims. It is a correct position that “true knowledge is knowledge by causes.” And causes again are not improperly distributed into four kinds: the material, the formal, the efficient, and the final. But of these the final cause rather corrupts than advances the sciences, except such as have to do with human action. The discovery of the formal is despaired of. The efficient and the material (as they are investigated and received, that is, as remote causes,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latent process leading to the form) are but slight and superficial, and contribute little, if anything, to true and active science. Nor have I forgotten that in a former passage I noted and corrected as an error of the human mind the opinion that forms give existence. For though in nature nothing really exists besides individual bodies, performing pure individual acts according to a fixed law, yet in philosophy this very law, and the investigation, discovery, and explanation of it, is the foundation as well of knowledge as of operation. And it is this law with its clauses that I mean when I speak of *forms* , a name which I the rather adopt because it has grown into use and become familiar.

人类知识如今所处环境极其恶劣，这一点甚至可以从一般公认的准则中看出来。人们说："原因所致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此言不假。而原因又分为四种，而且这种分法并无不当，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不过，四因说中，目的因与人类活动有关，除此之外，对科学与其说起到了促进作用，不如说起到了败坏作用。发现形式因则让人们感到绝望。动力因和质料因（被当作遥不可及的原因来研究和接受，与导致形式的隐秘过程毫无关联）如果说对真正、能动的科学有什么作用的话，也只是微乎其微、流于肤浅，甚至毫无益处。我并未忘记前文提及和纠正过的错误——人心本身的错误，即认为形式产生存在。自然之中，物体的确是以个体形式存在，而且是按照固定的法则进行单纯的个体活动，除此之外，便一无所有；但哲学之中，这个法则本身以及对法则的调查、发现及解释既是知识的基础，同时也是实施行为的基础。这个法则连同其各项条款就是我提及的那个"形式"的意思，我更喜欢"形式"这个名称，因为它沿用已久而且为人熟知。

III

三

If a man be acquainted with the cause of any nature (as whiteness or heat) in certain subjects only, his knowledge is imperfect; and if he be able to superinduce an effect on certain substances only (of those susceptible of such effect), his power is in like manner imperfect. Now if a man's knowledge be confined to the efficient and material causes (which are unstable causes, and merely vehicles, or causes which convey the form in certain cases) he may arrive at new discoveries in reference to substances in some degree similar to one another, and selected beforehand; but he does

not touch the deeper boundaries of things. But whosoever is acquainted with forms embraces the unity of nature in substances the most unlike, and is able therefore to detect and bring to light things never yet done, and such as neither the vicissitudes of nature, nor industry in experimenting, nor accident itself, would ever have brought into act, and which would never have occurred to the thought of man. From the discovery of forms therefore results truth in speculation and freedom in operation.

如果一个人仅仅熟识某些东西的某一个性质（如白或热）之原因，那么他的知识并不完备；如果他只能在某些敏感的物质上增添某种效果，那么他的力量同样也并不完备。一个人，即使他的知识仅仅局限于动力因和质料因（二者并不稳固，只是起承载作用，或在某些情况下引出形式），也可能在某些物质上获得一些新发现，但这些物质只是与预定的类似物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类似性而已；但是他并没有接触到事物之间更深一层的区别。然而，谁熟知形式，谁就能在迥然各异的物质中把握其本质的统一性，就能发现和揭示那些从未做过的事物，就能发现和揭示那些既非自然变迁，亦非实验努力，更非机缘巧合而致的事物，就能发现和揭示人未曾想的事物。由此可见，形式的发现使人类在思辨时获得真理，在行动时获得自由。

IV

四

Although the roads to human power and to human knowledge lie close together and are nearly the same, nevertheless, on account of the pernicious and inveterate habit of dwelling on abstractions it

is safer to begin and raise the sciences from those foundations which have relation to practice, and to let the active part itself be as the seal which prints and determines the contemplative counterpart. We must therefore consider, if a man wanted to generate and superinduce any nature upon a given body, what kind of rule or direction or guidance he would most wish for, and express the same in the simplest and least abstruse language. For instance, if a man wishes to superinduce upon silver that yellow color of gold or an increase of weight (observing the laws of matter), or transparency on an opaque stone, or tenacity on glass, or vegetation on some substance that is not vegetable—we must consider, I say, what kind of rule or guidance he would most desire. And in the first place, he will undoubtedly wish to be directed to something which will not deceive him in the result nor fail him in the trial. Secondly, he will wish for such a rule as shall not tie him down to certain means and particular modes of operation. For perhaps he may not have those means, nor be able conveniently to procure them. And if there be other means and other methods for producing the required nature (besides the one prescribed) these may perhaps be within his reach; and yet he shall be excluded by the narrowness of the rule, and get no good from them. Thirdly, he will desire something to be shown him, which is not as difficult as the thing proposed to be done, but comes nearer to practice.

虽然通往人类权力的道路与通往人类知识的道路，二者紧密相邻，而且几乎合二为一，然而鉴于人们养成了耽于抽象这种致命的陈规陋习，较为稳妥的方法是，从那些与实践有关系的基础来建立和提高科学，把行动部分自身当作印章印出和裁定出它的符契，即思辨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人想在特定物体上生成和添入一种性质，他最希望得到的到底是怎样一种规则、指导或引导；而且我们必须用一种最简明的语言将这些表述出来。例如，

如果有人想在银子中注入金黄色或增加些重量（要遵循物质法则），或者在非透明石头中注入透明的性质，或者在玻璃中注入柔韧的性质，或者在某些非植物体上注入植物的属性，那么我就要说，我们必须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他到底最想得到怎样一种规则或指导。第一，他无疑是期望自己被引导到这样一种事情上，即既不会在结果上欺骗他，也不会在实验中辜负他。第二，他必定期望得到这样一种规则，即不至于将他束缚于某些手段和特定动作方式之上。因为他可能既没有这样的手段，也无法轻易得到这样的手段。即使真有其他手段和方法来产生（除了规定性质以外）所需的性质，那么这些手段和方法也是在他伸手可及的范围内；但是由于规则的狭隘性，他会受到这些手段和方法的排拒，自然也就无法享受其益了。第三，他必定期望给他这么一种事情，这种事情做起来不像计划中的事情那么困难，反而更接近实践。

For a true and perfect rule of operation, then, the direction will be *that it be certain, free, and disposing or leading to action* . And this is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discovery of the true form. For the form of a nature is such, that given the form, the nature infallibly follows. Therefore it is always present when the nature is present, and universally implies it, and is constantly inherent in it. Again, the form is such that if it be taken away the nature infallibly vanishes. Therefore it is always absent when the nature is absent, and implies its absence, and inheres in nothing else. Lastly, the true form is such that it deduces the given nature from some source of being which is inherent in more natures, and which is better known in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than the form itself. For a true and perfect axiom of knowledge, then, the direction and precept will be, *that another nature be discovered which is convertible with the given nature and yet is a limitation of a more general nature, as of a true and real genus* . Now these two directions, the one active the other contemplative, are one and the same thing; and what in operation is

most useful, that in knowledge is most true.

由此说来，对一种真正而完美的实施规则而言，指导性应当具有确切性、自由性和行动倾向性或者说行动导向性 。而真正形式的发现也如同此理。首先，所谓某种性质的形式就是这样的：形式一经给定，性质必定随之而至。也就是说，性质在，形式必在；形式具有普遍性，总是暗示着性质，而且经常内含于性质之中。其次，形式一经取消，性质就必定随之消亡。也就是说，性质亡，形式必亡；形式暗示着性质必亡，而且性质不在，形式则无所依存。最后，真正的形式可以从存在的本源之中演绎出特定的性质，而这种存在的本源内含于更多的性质，而且在事物自然秩序之中，比形式本身更为人知。由此说来，要从知识中获得一个真正而完美的原理，其指导规则应当是：找到另一种与特定性质彼此转化的性质，而且对某种更加普遍的性质加以限定，对真实的种类加以限定 。可见，以上两条指导规则，一是属于行动，一是属于思辨，二者实属一回事：凡是对动作最有益者，对知识则最为真实。

V

五

The rule or axiom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bodies is of two kinds. The first regards a body as a troop or collection of simple natures. In gold,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meet. It is yellow in color, heavy up to a certain weight, malleable or ductile to a certain degree of extension; it is not volatile and loses none of its substance by the action of fire; it turns into a liquid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fluidity; it is separated and dissolved by particular

means; and so on for the other natures which meet in gold. This kind of axiom, therefore, deduces the thing from the forms of simple natures. For he who knows the forms of yellow, weight, ductility, fixity, fluidity, solution, and so on, and the methods for superinducing them and their gradations and modes, will make it his care to have them joined together in some body, whence may follow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at body into gold. And this kind of operation pertains to the first kind of action. For the principle of generating some one simple nature is the same as that of generating many; only that a man is more fettered and tied down in operation, if more are required, by reason of the difficulty of combining into one so many natures which do not readily meet, except in the beaten and ordinary paths of nature. It must be said, however, that this mode of operation (which looks to simple natures though in a compound body) proceeds from what in nature is constant and eternal and universal, and opens broad roads to human power, such as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ings) human thought can scarcely comprehend or anticipate.

物体转变有两条规则或公理。第一条公理是将一个物体视为若干简单性质的集结或集合。例如，金子聚集了如下性质：黄色，有一定重量，可适度锤展或延展；不易挥发，即使用火也不失其实体；可化为某种程度的流动液体；用特殊手段方可分离和熔解，还有其他性质都聚集于金子之中。由此可见，此条公理是从诸多简单性质的若干形式中来演绎事物。人们只要知道下面这些形式，即黄色、重量、可展性、固定性、流动性、分解性等，以及知道如何将这些性质及其层次与形态添入进去，那么他们必然关注并将这些性质集合到某种物体上，从而把那个物体转变为金子。这属于物体转变的第一种活动。产生多种单纯性质的原理与产生某一种单纯性质的原理是一样的；但唯一区别是，要求越多，人的动作受到的羁绊和约束就越多，因为把本不易聚集在一起的许多性质合并在一起，这很困难，除非用经历了自

然千锤百炼最为普通的方法，方有可能。然而，须要指出的一点是，这种动作方式（着眼于复合物体中的单纯性质）始于自然当中经常、永恒和普遍的东西、并开辟出了通往人类权力的广阔之路，这（就现状而论）是人类思想难以领会或预想的。

The second kind of axiom,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discovery of the *latent process* , proceeds not by simple natures, but by compound bodies, as they are found in nature in its ordinary course. As, for instance, when inquiry is made from what beginnings, and by what method and by what process, gold or any other metal or stone is generated, from its first menstrua and rudiments up to the perfect mineral; or in like manner, by what process herbs are generated, from the first concretion of juices in the ground or from seeds up to the formed plant, with all the successive motions and diverse and continued efforts of nature. So also in the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 from coition to birth; and in like manner of other bodies.

第二条公理与“隐秘过程”的发现有关，但并不是按单纯性质来进行，而是按复合物体来进行的，这一点在自然进程中可谓司空见惯。例如，我们要探究黄金或其他金属或石头形成的源头、方法和过程，要探究它们如何从最初的液态和雏形演变成完整的矿物；同样，我们也要探究植物的产生过程，探究最初土地中凝结的汁液和种子如何演变成有形的植物，即探究它们是如何经过不停的运动和自然各种持续的努力而演变成有形的植物。同样，我们还要探究动物的形成发展过程，即探究它们从交配到出生的过程；此外，还要探究其他物体的形成过程。

It is not however only to the generations of bodies that this investigation extends, but also to other motions and operations of nature. As, for instance, when inquiry is made concerning the whole course and continued action of nutrition, from the first reception of the food to its complete assimilation; or again, concerning the voluntary motion of animals from the first impression on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continued efforts of the spirit up to the bendings and movements of the limbs; or concerning the motion of the tongue and lips and other instruments, and the changes through which it passes till it comes to the utterance of articulate sounds. For these inquiries also relate to natures concrete or combined into one structure, and have regard to what may be called particular and special habits of nature, not to her fundamental and universal laws which constitute forms. And yet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is plan appears to be readier and to lie nearer at hand and to give more ground for hope than the primary one.

然而，这种调查不仅仅局限于物体的生成，也可以延展到自然的其他运动和动作。例如，我们要探究营养产生的整个过程和持续作用，即探究食物从最初的摄取到完全消化的过程和作用。又如，我们要探究动物的自发运动，即探究从最初想象上的感受，经由精气的持续努力，再到肢体的屈伸及其各种活动的过程和作用。再如，我们还要探究唇舌及其他器官的运动，即探究这种运动如何经过一些变化而最后发出清晰的声音。上述各项探究也涉及到各种具体的性质，也涉及到合成一种结构的各种性质，而且这些探究还要顾及的是那些所谓特定和特有的自然习惯，而不是构成自然形式的基本而又普遍的法则。但是必须承认，较之于那个初始计划，这个计划显得更加方便，更加切近，给希望提供的根据更多。

In like manner the operative which answers to this speculative

part, starting from the ordinary incidents of nature, extends its operation to things immediately adjoining, or at least not far removed. But as for any profound and radical operations on nature, they depend entirely on the primary axioms. And in those things too where man has no means of operating, but only of knowing, as in the heavenly bodies (for these he cannot operate upon or change or transform),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fact itself or truth of the thing, no less than the knowledge of the causes and consents, must come from those primary and catholic axioms concerning simple natures, such as the nature of spontaneous rotation, of attraction or magnetism, and of many others which are of a more general form than the heavenly bodies themselves. For let no one hope to decide the question whether it is the earth or heaven that really revolves in the diurnal motion until he has first comprehended the nature of spontaneous rotation.

同样，与这种思辨相对应的是实践，由于是以自然的普通事件为出发点，因此，实践都是作用于那些紧邻的事物，或者说至少作用于那些距离不远的事物。但是若论对自然产生深刻和根本的作用，那完全取决于初始公理。而且，有些事物，人类只能有所知，但无法有所为，如天体（因为人类对这些天体既无法有所施为，也无法对其有所改变）；对事实本身或事物真相的调查，不亚于对原因和一致性的了解，都必须从那些有关简单性质的初始原理和普遍原理着手，例如有关自发旋转性质的原理、有关引力或磁性的原理，以及其他比天体本身更具普遍性形式的原理。一个人，如果不事先理解自发旋转的性质，也就别指望去断定每天的运动是地在转还是天在转。

VI

六

But this latent process of which I speak is quite another thing than men, preoccupied as their minds now are, will easily conceive. For what I understand by it is not certain measures or signs or successive steps of process in bodies, which can be seen; but a process perfectly continuous, which for the most part escapes the sense.

但是若论隐秘过程，人们心里随意预想的是一回事，而我所说的又是另一回事。我所理解的隐秘过程并非指在物体中所能看见的某些度量、某些标志、或渐进步骤；而是指一个完整的持续过程，而且大都是不为感官所觉察的过程。

For instance: in all gen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bodies, we must inquire what is lost and escapes; what remains, what is added; what is expanded, what contracted; what is united, what separated; what is continued, what cut off; what propels, what hinders; what predominates, what yields; and a variety of other particulars.

例如：在物体的所有产生和改变过程中，我们必须探究如下问题：损失和忽略了什么，保留和增添了什么，扩展和压缩了什么，合并和分解了什么，延续和割裂了什么；什么具有促进作用，什么具有阻碍作用；什么占有优势，什么处于劣势；还要探究其他各种具体细节。

Again, not only in the generation or transformation of bodies

are these points to be ascertained, but also in all other alterations and motions it should in like manner be inquired what goes before, what comes after; what is quicker, what more tardy; what produces, what governs motion; and like points; all which nevertheless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sciences (the texture of which is as rude as possible and good for nothing) are unknown and unhandled. For seeing that every natural action depends on things infinitely small, or at least too small to strike the sense, no one can hope to govern or change nature until he has duly comprehended and observed them.

此外，以上几点不仅要在物体的产生或改变过程中加以核实明确，而且在一切其他变化和运动中也都要加以探究，探究这些变化和运动孰先孰后、孰快孰慢、是什么产生这些变化和运动、是什么统辖着这些变化和运动。然而在科学状态下，所有这些都不为人知，而且也未经处理过。由于每种自然活动所依存的事物都无限细小，至少说是小得难以打动感官，因此，无法指望有人去管理或改变自然，除非他对这些细微的事物有充分的了解和观察。

VII

七

In like manner the investigation and discovery of the *latent configuration* in bodies is a new thing, no less than the discovery of the latent process and of the form. For as yet we are but lingering in the outer courts of nature, nor are we preparing ourselves a way into her inner chambers. Yet no one can endow a given body with a

new nature, or successfully and aptly transmute it into a new body, unless he has attained a competent knowledge of the body so to be altered or transformed. Otherwise he will run into methods which, if not useless, are at any rate difficult and perverse and unsuitable to the nature of the body on which he is operating. It is clear therefore that to this also a way must be opened and laid out.

同样，调查和发现物体中的“隐秘结构”是一种新事物，不亚于去发现隐秘过程和形式。因为至今我们还只是徘徊于自然外庭之内，未能为自己准备一条通往自然内室之路。然而，谁都无法把一种新性质赋予某一特定物体，或者能够成功而巧妙地把该物体转变成一种新物体，除非他掌握了改变或转变该物体所需的充足知识。否则他就会陷入到方法论上，这些方法即使并非毫无用处，但至少对他所实施动作的物体的性质来说，有点困难，也有相悖和不当之处。因此，显然，还必须为隐秘结构开辟和铺设出一条路来。

And it is true that upon the anatomy of organized bodies (as of man and animals) some pains have been well bestowed and with good effect; and a subtle thing it seems to be, and a good scrutiny of nature. Yet this kind of anatomy is subject to sight and sense, and has place only in organized bodies. And besides it is a thing obvious and easy, when compared with the true anatomy of the latent configuration in bodies which are thought to be of uniform structure, especially in things and their parts that have a specific character, as iron, stone; and again in parts of uniform structure in plants and animals, as the root, the leaf, the flower, flesh, blood, and bones. But even in this kind, human industry has not been altogether wanting; for this is the very thing aimed at in the separation of bodies of uniform structure by means of distillations and other modes of analysis; that the complex structure of the

compound may be made apparent by bringing together its several homogeneous parts. And this is of use too, and conduces to the object we are seeking, although too often fallacious in its results, because many natures which are in fact newly brought out and superinduced by fire and heat and other modes of solution are taken to be the effect of separation merely, and to have subsisted in the compound before. And after all, this is but a small part of the work of discovering the true configuration in the compound body; which configuration is a thing far more subtle and exact, and such as the operation of fire rather confounds than brings out and makes distinct.

的确，人们对有机体（如人和动物）的解剖已经下了不少功夫，而且也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似乎是一件微妙之事，同时也是对自然的详细观察。然而这种解剖学受到视觉和感官的限制，并且只有在有机体中才占有一席之地。此外，较之于真正的解剖，这种解剖就太浅显，太容易了，而真正的解剖是对各种物体隐秘结构的解剖，人们认为各种物体在结构上都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尤其体现在具有种属性的事物及其部分上，如铁、石之类；这种一致性还体现在植物和动物中具有一致性结构的部分上，如根、叶、花以及血、肉、骨之类。但是即使在这种真正的解剖中，人类也不是完全没有做出努力；人们应用蒸馏法和其他分析方式来对结构上具有一致性的物体加以分解，把复合物中的各种同质分子聚集在一起以使其复杂结构显现出来，其目的正是进行这种解剖。这种解剖也是有用的，有益于我们正在追求的目标；不过，这种解剖在结果上也经常出现谬误，因为许多性质只是分解的结果，认为原本就存在于复合体中；其实这些是通过火和热以及其他分解方式新生和添加进去的性质。毕竟，对发现复合体中的真正结构来说，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工作，因为这种真正结构要微妙得多、精确得多，若单凭火炼这种手段只能把事情搞砸，无法揭示和弄清其真正的结构。

Therefore a separation and solution of bodies must be effected, not by fire indeed, but by reasoning and true induction, with experiments to aid; and by a comparison with other bodies, and a reduction to simple natures and their forms, which meet and mix in the compound. In a word, we must pass from Vulcan to Minerva if we intend to bring to light the true textures and configurations of bodies on which all the occult and, as they are called, specific properties and virtues in things depend, and from which, too, the rule of every powerful alt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s derived.

因此，对物体进行分剖和分解时，的确要严禁用火，而必须用推理和真正的归纳法，并辅之以实验；要用比较法，与其他物体相互比较；要用还原法，把在复合物体中原本聚集混合在一起的性质和形式还原为若干单纯的性质和形式。简言之，如果我们想要揭示物体的真正组织和结构，那么我们必须从求助于火神伏尔甘转向求助于工艺女神密涅瓦才行；因为这些组织和结构正好决定了事物中的一切神秘的性质、所谓的种属性质和种属品性，同时也衍生出了所有强力改变和转变的规律。

For example, we must inquire what amount of spirit there is in every body, what of tangible essence; and of the spirit, whether it be copious and turgid, or meager and scarce; whether it be fine or coarse, akin to air or to fire, brisk or sluggish, weak or strong, progressive or retrograde, interrupted or continuous, agreeing with external and surrounding objects or disagreeing, etc. In like manner we must inquire into the tangible essence (which admits of no fewer differences than the spirit), into its coats, its fibers, its kinds of texture. Moreover, the disposition of the spirit throughout the corporeal frame, with its pores, passages, veins and cells, and the rudiments or first essays of the organized body, falls under the same

investigation. But on these inquiries also, and I may say on all the discovery of the latent configuration, a true and clear light is shed by the primary axioms which entirely dispels darkness and subtlety.

例如，我们必须探究出每一物体中具有多少精气，具有何种可触性。至于精气，我们还必须探究它是丰盈还是贫乏；是精细还是粗糙；是似气还是似火；是敏捷还是迟钝；是强健还是羸弱；是前进还是后退；是间断还是持续；与外部环境是协调一致还是格格不入等等。同样，我们必须探究可触性（其中容许存在差异，而且这些差异数量不亚于精气），探究其表层、纤维及其组织的种类。此外，精气、连同其孔穴、通道、脉络和细胞，在整个实体构架中的分布，以及有机体雏形或初次尝试，这些都应进行相同的调查。不过，这些探究，也可以说所有隐秘结构的发现，也须借助于初始原理的真正明亮之光，只有它才能彻底驱散黑暗和微妙。

VIII

八

Nor shall we thus be led to the doctrine of atoms, which implies the hypothesis of a vacuum and that of the unchangeableness of matter (both false assumptions); we shall be led only to real particles, such as really exist. Nor again is there any reason to be alarmed at the subtlety of the investigation, as if it could not be disentangled. On the contrary, the nearer it approaches to simple natures, the easier and plainer will everything become, the business being transferred from the complicated to the simple; from the incommensurable to the commensurable; from surds to

rational quantities; from the infinite and vague to the finite and certain; as in the case of the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and the notes of music. And inquiries into nature have the best result when they begin with physics and end in mathematics. Again, let no one be afraid of high numbers or minute fractions. For in dealing with numbers it is as easy to set down or conceive a thousand as one, or the thousandth part of an integer as an integer itself.

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被引到原子论上，因为这个原子论暗含着两条假设，即虚空假设论和物质不变论（二者皆为虚妄的假设）；我们只应被引导到那种确实存在的真正的分子论上。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对调查的精微性感到惊慌失措，仿佛精微不可分解似的。正好相反的是，一切事物，对其研究越是接近单纯性质，就越是会变得容易、浅显；这样就把工作从复杂变为简单，从难以计量变为易于计量，从无理数变为有理数，从无限模糊的事物变为有限明确的事物，正如字母表中的字母和音乐中的音符。而且对自然的探究，如果是始于物理学而终于数学，那么就会得到最好的结果。还有，人们也不必害怕极大的数目或极小的分数。因为处理数目时，想象和处理“千”与想象和处理“一”一样容易；想象和处理整数的“千分之一”与想象和处理整数“千”一样容易。

IX

九

From the two kinds of axioms which have been spoken of arises a just division of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s, taking the received terms (which come nearest to express the thing) in a sense

agreeable to my own views. Thus, let the investigation of forms, which are (in the eye of reason at least, and in their essential law) eternal and immutable, constitute *Metaphysics* ; and le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icient cause, and of matter, and of the latent process, and the latent configuration (all of which have reference to the common and ordinary course of nature, not to her eternal and fundamental laws) constitute *Physics* . And to these let there be subordinate two practical divisions: to Physics, *Mechanics* ; to Metaphysics, what (in a purer sense of the word) I call *Magic* , on account of the broadness of the ways it moves in, and its greater command over nature.

根据以上所说的两种原理，可以对哲学和科学做出一个合理的划分；这种划分可以用公认的、在某种意义上与我自己观点相符的术语（最切近表述这个事物）来加以表述。因此，对那种永恒不变的形式（至少用理性的眼光和本质的法则来看是这样的）的调查便构成了“形而上学”；而对动力因、质料因、隐秘过程和隐秘结构的调查（所有这些都涉及到自然的普通而平常的进程，而并不涉及自然的永恒而基本的法则）便构成了“物理学”。这两种划分还下分两个带有实践性的分支：物理学下分“力学”；形而上学下分“幻术”（按该词本义来取名），因为“幻术”的活动途径广阔，控制自然更加强劲。

X

十

Having thus set up the mark of knowledge, we must go on to precepts, and that in the most direct and obvious order. Now my

direction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embrace two generic divisions: the one how to educe and form axioms from experience; the other how to deduce and derive new experiments from axioms. The former again is divided into three ministrations: a ministration to the sense, a ministration to the memory, and a ministration to the mind or reason.

既然制定了知识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须继续讨论各项条规，而且这还必须按照最直接最明显的秩序来进行。我用来解释自然的指导说明包括两类：一类是指导人们怎样从经验中推断和形成原理；另一类是指导人们怎样从原理中演绎和派生出新的实验。前者按其用途又分为三个：一是服务于感官；二是服务于记忆；三是服务于心灵或理性。

For first of all we must prepare a natural and experimental history, sufficient and good; and this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for we are not to imagine or suppose, but to discover, what nature does or may be made to do.

第一，我们必须准备一部自然史和实验史，既要充分又要优秀——这是最基本的；因为我们不是去想象或假定，而是要去发现自然在做什么，或者能让自然做什么。

But natural and experimental history is so various and diffuse that it confounds and distracts the understanding, unless it be ranged and presented to view in a suitable order. We must therefore form tables and arrangements of instances, in such a method and order that the understanding may be able to deal with them.

但自然史和实验史纷繁而复杂，如果不按照适当的秩序整列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必定混淆和分散人们的理解力。因此，第二，我们必须用这种方法和秩序把事例制定成表格加以排列，这样理解力才能对付这些事例。

And even when this is done, still the understanding, if left to itself and its own spontaneous movements, is incompetent and unfit to form axioms, unless it be directed and guarded. Therefore in the third place we must use induction, true and legitimate induction, which is the very key of interpretation. But of this, which is the last, I must speak first, and then go back to the other ministrations.

即使做到这一点，若对理解力置之不理，任其自然，那么要形成原理，既无能为力，也难以胜任；除非理解力得到指导和保护。因此，第三，我们必须使用归纳法，使用真正的、合情合理的归纳法，因为这才是解释自然的钥匙。不过，这一点虽然置于最后，但我必须最先论述，然后再回头论述前面两种用途。

XI

十一

The investigation of forms proceeds thus: a nature being given, we must first of all have a muster or presentation before the understanding of all known instances which agree in the same nature, though in substances the most unlike. And such collection

must be made in the manner of a history, without premature speculation, or any great amount of subtlety. For example, let the investigation be into the form of heat.

形式调查按如下程序进行：假设有一个特定的性质，那么我们首先必须把所有具有这种性质的已知事例集中或呈现在理解力面前，尽管这些事例体现在完全不同的质体上。这种事例的收集必须按照历史记录的方式去进行，不得妄加揣想，也无需多大的精微性。举例说明，以热这种形式作为调查对象。

Instances Agreeing in the Nature of Heat

表一：《热性一致的事例表》

1．The rays of the sun, especially in summer and at noon.

（一）太阳光线，尤其是夏天和正午时的阳光。

2．The rays of the sun reflected and condensed, as between mountains, or on walls, and most of all in burning glasses and mirrors.

（二）经过反射和聚集的太阳光线，如两山之间、墙壁之上、尤其是取火镜和反射镜所聚集和反射的太阳光线。

3．Fiery meteors.

（三）燃烧的流星。

4．Burning thunderbolts.

（四）霹雳雷电。

5．Eruptions of flame from the cavities of mountains.

（五）山口喷火。

6．All flame.

（六）所有的火焰。

7．Ignited solids.

（七）点燃的固体。

8．Natural warm baths.

（八）天然的温泉。

9．Liquids boiling or heated.

（九）沸腾或加热的液体。

10．Hot vapors and fumes, and the air itself, which conceives the most powerful and glowing heat if confined, as in reverbatory furnaces.

（十）滚烫的蒸汽和熏烟，还有空气本身，空气一旦受到密闭便孕育出最有力最强烈的热，反射炉便是如此。

11．Certain seasons that are fine and cloudless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ir itself, without regard to the time of year.

（十一）某些晴朗无云的天气，那是因空气本身构造的缘故形成的，与一年的季节更迭无关。

12．Air confined and underground in some caverns, especially in winter.

（十二）密闭和地穴中的空气，尤其是在冬天。

13．All villous substances, as wool, skins of animals, and down of birds, have heat.

（十三）所有带有绒毛的物质，如羊毛、兽皮、鸟羽，都有热。

14．All bodies, whether solid or liquid, whether dense or rare (as the air itself is), held for a time near the fire.

（十四）所有物体，无论是固体还是液体，无论是浓还是稀（空气本身也是如此），只要靠近片刻就会带热。

15．Sparks struck from flint and steel by strong percussion.

（十五）燧石与钢猛烈撞击而产生的火花。

16．All bodies rubbed violently, as stone, wood, cloth, etc., insomuch that poles and axles of wheels sometimes catch fire; and the way they kindled fire in the West Indies was by attrition.

（十六）所有物体，如石头、木头、布匹等，强烈摩擦都会生热，由于轮的轴杆和轴端有时会着火，因此，在西印度，人们就用摩擦来生火。

17．Green and moist vegetables confined and bruised together,

as roses packed in baskets; insomuch that hay, if damp, when stacked, often catches fire.

（十七）将鲜嫩而潮湿的植物捣碎闷闭起来，如玫瑰花压装在筐中就会生热；草垛潮湿时堆积在一起往往会着火。

18．Quicklime sprinkled with water.

（十八）浇过水的生石灰。

19．Iron, when first dissolved by strong waters in glass, and that without being put near the fire. And in like manner tin, etc., but not with equal intensity.

（十九）被强水溶解于玻璃杯中而无须靠近火的铁。锡等也是如此，不过热的强度不一。

20．Animals, especially and at all times internally; though in insects the heat is not perceptible to the touch by reason of the smallness of their size.

（二十）动物，尤其是动物内脏一直有热；昆虫因体积太小，体中的热，触觉难以感知。

21 . Horse dung and like excrements of animals, when fresh.

（二十一）刚刚排出的马粪和类似的动物排泄物都有热。

22 . Strong oil of sulphur and of vitriol has the effect of heat in burning linen.

（二十二）高浓度的硫磺油和硫酸发出的热可以烧坏亚麻织物。

23 . Oil of marjoram and similar oils have the effect of heat in burning the bones of the teeth.

（二十三）墨角兰油以及类似的油发出的热可以烧坏牙齿的骨质。

24 . Strong and well rectified spirit of wine has the effect of heat, insomuch that the white of an egg being put into it hardens and whitens almost as if it were boiled, and bread thrown in becomes dry and crusted like toast.

（二十四）精馏出来的酒精强劲有力，发出的热，甚至可以使投入的蛋白立刻变硬变白，就像煮熟了的鸡蛋一般；生面包投入其中，也会变干起壳，宛如烘烤过一般。

25．Aromatic and hot herbs, as *dracunculus*，*nasturtium vetus*，etc., although not warm to the hand (either whole or in powder), yet to the tongue and palate, being a little masticated, they feel hot and burning.

（二十五）香草和辛草，如“龙蒿草”和“水田芥”等（无论整体状还是粉末状），若用手触摸，也毫无热感，若略加咀嚼，舌腭顿感热辣灼痛。

26．Strong vinegar, and all acids, on all parts of the body where there is no epidermis, as the eye, tongue, or on any part when wounded and laid bare of the skin, produce a pain but little differing from that which is created by heat.

（二十六）强醋和一切酸类，溅到身体任何部位，只要没有表皮，如眼睛、舌头，或者溅到身体上有脱皮之处，立即就会产生痛感，这种痛感与热所造成的痛感几乎没有差别。

27．Even keen and intense cold produces a kind of sensation of burning, “Nec Boreæ penetrabile frigus adurit.“ [3_1]

（二十七）甚至极寒酷冷也会产生一种灼痛感，有诗句云：“北风刺骨兮如灼”。

28．Other instances.

（二十八）其他事例。

This table I call the *Table of Essence and Presence* .

以上列表，我称之为《本质与外显列表》。

XII

十二

Secondly, we must make a presenta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stances in which the given nature is wanting; because the form, as stated above, ought no less to be absent when the given nature is absent, than present when it is present. But to note all these would be endless.

第二，我们必须把缺乏某一特定性质的事例呈现在理解力之前；因为如上所论，形式应该是随性质的不在而不在，这一点不亚于形式随性质的存在而存在。不过，所有这些事例，若要一一记录，势必毫无尽头。

The negatives should therefore be subjoined to the affirmatives, and the absence of the given nature inquired of in those subjects only that are most akin to the others in which it is present and forthcoming. This I call the *Table of Deviation, or of Absence in*

Proximity .

反面事例应该附缀于正面事例之后。而且调查所缺乏的特定性质只能限于那些事例中，即与其他存在和即将出现该特定性质的事例极为相似的事例。我把这种事例表称之为《偏差事例表》，或《近似事例缺省表》。

Instances in Proximity where the Nature of Heat is Absent

表二：《热性质缺省的近似事例表》

Answering to the first affirmative instance.

下例对应前面的正面事例表第一例。

1 . The rays of the moon and of stars and comets are not found to be hot to the touch; indeed the severest colds are observed to be at the full moons.

（一）月亮、星星和彗星的光线在触觉上感受不到其热，岂止如此，满月之时还让人感到一种严寒。

The larger fixed stars, however, when passed or approached by the sun, are supposed to increase and give intensity to the heat of

the sun, as is the case when the sun is in the sign Leo, and in the dog days.

然而，更大的恒星，在太阳经过或靠近时，据说太阳发出的热就会得到增强，如太阳在狮子座和三伏天时就是如此。

To the 2nd.

下例对应前表第二例。

2 . The rays of the sun in what is called the middle region of the air do not give heat; for which there is commonly assigned not a bad reason, viz., that that region is neither near enough to the body of the sun from which the rays emanate, nor to the earth from which they are reflected. And this appears from the fact that on the tops of mountains, unless they are very high, there is perpetual snow.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on the Peak of Tenerife, and among the Andes of Peru, the very tops of the mountains are free from snow, which lies only somewhat lower down. Moreover, the air itself at the very top is found to be by no means cold, but only rare and keen; insomuch that on the Andes it pricks and hurts the eyes by its excessive keenness, and also irritates the mouth of the stomach, producing vomiting. And it was observed by the ancients that on the top of Olympus the rarity of the air was such that those who ascended it had to carry sponges with them dipped in vinegar and water, and to apply them from time to time to the mouth and nose, the air being from its rarity not sufficient to support respiration; and it was further stated that on

this summit the air was so serene, and so free from rain and snow and wind, that letters traced by the finger in the ashes of the sacrifices on the altar of Jupiter remained there still the next year without being at all disturbed. And at this day travelers ascending to the top of the Peak of Tenerife make the ascent by night and not by day, and soon after the rising of the sun are warned and urged by their guides to come down without delay, on account of the danger they run lest the animal spirits should swoon and be suffocated by the tenuity of the air.

（二）在所谓的空气中间层，太阳光线并不发热；对此，人们找到一个不错的解释理由，认为这个区域，不仅离发光的太阳不够近，而且离反光的地球也不够近。这一点可以从山顶积雪现象看出来，山高则积雪不化。而据观察，在特内里费峰和秘鲁安第斯山脉，山顶未见有积雪，反而在稍低缓的山坡上有雪。而且，山顶上空气本身一点也不冷，而只是稀薄锋利而已；所以，在安第斯山顶，空气因过度锋利，不仅刺伤人的眼睛，而且使人反胃和呕吐。古人曾说，奥林匹斯山顶，空气很稀薄，登山者必须携带浸泡过醋水的海绵，而且时不时地捂在口鼻，原来空气稀薄到难以呼吸的地步了。古人还记载说，这个山顶的空气很安静，无风、无雨、无雪，就是人们用手指在朱庇特圣坛前的祭灰中所画的字迹，隔年都还依然留在那儿，丝毫没有遭到破坏。而直到今天，攀登到特内里费峰顶上的游客都还是晚上攀爬白天不动；太阳一出，导游就要警告敦促游客立即下山，不得延误，否则就有危险，即因空气稀薄而导致动物精气发生晕厥而窒息的现象。

To the 2nd.

下例对应前表第二例。

3 . The reflection of the rays of the sun in regions near the polar circles is found to be very weak and ineffective in producing heat, insomuch that the Dutch who wintered in Nova Zembla and expected their ship to be freed from the obstructions of the mass of ice which hemmed her in by the beginning of July, were disappointed in their expectation and obliged to take to their boat. Thus the direct rays of the sun seem to have but little power, even on the level ground; nor have the reflex much, unless they are multiplied and combined, which is the case when the sun tends more to the perpendicular, for then the incident rays make acuter angles, so that the lines of the rays are nearer each other; whereas on the contrary, when the sun shines very obliquely, the angles are very obtuse, and thus the lines of rays are at a greater distance from each other. Meanwhile, it should be observed that there may be many operations of the sun, and those too depending on the nature of heat, which are not proportioned to our touch, so that in respect to us their action does not go so far as to produce sensible warmth, but in respect to some other bodies they have the effect of heat.

（三）在接近南北极圈地带，太阳光线的反射很弱，生热效果不佳，以致那队荷兰人感到极度失望。原来他们的船在七月就被冰块围困住了，本期望早日脱离这种困境，结果却在新地岛（Nova Zembla）度过了整个冬天后才回到船上。太阳的直射光线看来也没有多大的热力，即便是照射在平地上，其反射的光线也没有多大的热力，除非这些光线得以倍增和聚集起来。如太阳照射越是趋于垂直，随之反射的光线越是容易形成锐角，光线之间就靠得越近；反之，太阳照射越是倾斜，反射的光线越是容易构成钝角，光线之间就离得越远。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太阳有许多活动，而且这些活动取决于热这种性质，而热在我们的触觉上并不均匀，因此，对我们而言，太阳活动的作用并不能远距离地产生可以感觉到的温暖，但对其他物体而言，却能产生热效应。

To the 2nd.

下例对应前表第二例。

4 . Try the following experiment. Take a glass fashioned in a contrary manner to a common burning glass and, placing it between your hand and the rays of the sun, observe whether it diminishes the heat of the sun, as a burning glass increases and strengthens it. For it is evident in the case of optical rays that according as the glass is made thicker or thinner in the middle as compared with the sides, so do the objects seen through it appear more spread or more contracted. Observe therefore whether the same is the case with heat.

（四）试试下面的实验。取一面与普通取火镜功能正好相反的玻璃镜，放在你的手与太阳光线之间，观察该玻璃镜是否会减少太阳的热力，就像观察用取火镜做实验，看它是是否会增强太阳的热力一样。显然，在视觉光线这个例子中，玻璃镜片中间和四周由于厚薄不一，就使得透过镜片看到的物体会有扩散和聚集的不同。因此，要观察热是否有类似的情况。

To the 2nd.

下例对应前表第二例。

5 . Let the experiment be carefully tried, whether by means of the most powerful and best constructed burning glasses, the rays of the moon can be so caught and collected as to produce even the last degree of warmth. But should this degree of warmth prove too subtle and weak to be perceived and apprehended by the touch, recourse must be had to those glasses which indicate the state of the atmosphere in respect to heat and cold. Thus, let the rays of the moon fall through a burning glass on the top of a glass of this kind, and then observe whether there ensues a sinking of the water through warmth.

（五）小心尝试这样的实验，看是否能用强度最大、制作最精致的取火镜来捕获聚集月光，哪怕产生出最低程度的暖度。但是如果这种程度的暖度太微弱，微弱到触觉都难以觉察到，那就必须借助于那些玻璃仪器来指示大气的冷热状态。这样，让月光通过取火镜聚落在这种玻璃器皿顶端，然后观察其中的水是否会因受热而跌落下来。

To the 2nd.

下例对应前表第二例。

6 . Let a burning glass also be tried with a heat that does not emit rays or light, as that of iron or stone heated but not ignited, boiling water, and the like; and observe whether there ensues an increase of the heat, as in the case of the sun's rays.

（六）还可以用取火镜来实验不会发出光线或光亮的热，如受热

但未到炽热的铁或石头所发出的热，沸水发出的热等等，看看它们是否像太阳光线那样产生增热现象。

To the 2nd.

下例对应前表第二例。

7．Let a burning glass also be tried with common flame.

（七）再用取火镜实验普通火焰。

To the 3rd.

下例对应前表第三例。

8．Comets (if we are to reckon these too among meteors) are not found to exert a constant or manifest effect in increasing the heat of the season, though it is observed that they are often followed by droughts. Moreover bright beams and pillars and openings in the heavens appear more frequently in winter than in summertime, and chiefly during the intensest cold, but always accompanied by dry weather. Lightning, however, and coruscations and thunder seldom occur in the winter, but about the time of great heat. Falling stars, as they are called, are commonly supposed to consist rather of some bright and lighted viscous substance, than to

be of any strong fiery nature. But on this point let further inquiry be made.

（八）彗星（如果我们将其归入流星之列）在增加时令的热力方面还没有发现有持续而明显的作用，不过，据观察，彗星经常伴随着干旱而至。此外，天空中出现明亮的光线、光柱和光洞的频率，冬天多于夏天，而且主要出现在严寒之时，但也总是伴随着干燥天气。然而，电闪雷鸣在冬天难以见到，总是发生在大热之际。所谓陨星，通常认为是由某种带光发亮的黏性物质构成，不具备强烈的火的性质。但是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To the 4th.

下例对应前表第四例。

9 . There are certain coruscations which give light but do not burn. And these always come without thunder.

（九）有某种闪光，但发光不发热。而且往往并无雷声相随。

To the 5th.

下例对应前表第五例。

10 . Eructations and eruptions of flame are found no less in cold than in warm countries, as in Iceland and Greenland. In cold countries, too, the trees are in many cases more inflammable and more pitchy and resinous than in warm; as the fir, pine, and others. The situations however and the nature of the soil in which eruptions of this kind usually occur have not been carefully enough ascertained to enable us to subjoin a negative to this affirmative instance.

（十）寒带国家发生山口喷火现象并不亚于温带国家，如在冰岛和格陵兰岛。多数情况下，寒带国家的树木比暖带国家的树木易发火灾，而且这些树木所含的松脂和树脂多于温带国家树木，如枞树、松树和其他树种。然而这种经常喷火的地方，其土壤状况和性质还未经仔细而充分的鉴定，因此，我们还不能把这种现象视为一个反面事例来附缀在正面事例之后。

To the 6th.

下例对应前表第六例。

11 . All flame is in all cases more or less warm; nor is there any negative to be subjoined. And yet they say that the *ignis fatuus* (as it is called), which sometimes even settles on a wall, has not much heat, perhaps as much as the flame of spirit of wine, which is mild and soft. But still milder must that flame be which, according to certain grave and trustworthy histories has been seen shining about the head and locks of boys and girls, without at all burning the hair, but softly playing round it. It is also most certain that about a horse,

when sweating on the road, there is sometimes seen at night, and in clear weather, a sort of luminous appearance without any manifest heat. And it is a well-known fact, and looked upon as a sort of miracle, that a few years ago a girl's stomacher, on being slightly shaken or rubbed, emitted sparks, which was caused perhaps by some alum or salts used in the dye, that stood somewhat thick and formed a crust, and were broken by the friction. It is also most certain that all sugar, whether refined or raw, provided only it be somewhat hard, sparkles when broken or scraped with a knife in the dark. In like manner sea and salt water is sometimes found to sparkle by night when struck violently by oars. And in storms, too, at nighttime, the foam of the sea when violently agitated emits sparks, and this sparkling the Spaniards call *Sea Lung* . With regard to the heat of the flame which was called by ancient sailors Castor and Pollux, and by moderns St. Elmo's Fire, no sufficient investigation thereof has been made.

（十一）一切火焰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多少都有些温度，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反面事例可以补充。不过，有一种火，俗称“鬼火”，有时停留在墙上，却没有多少热，也许与酒精火焰热度差不多，温和微弱。但是还有一种更温和的火焰，根据某些正经可靠的记载，说在孩童头上和鬈发上看见过这种火焰在闪烁，但头发却未曾有丝毫灼烧迹象，只是在头发边上忽隐忽现。还有一种现象最为肯定，即马在行进中流汗，有时会在夜晚天清气朗之时闪现出一种光辉，却没有明显的热。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人们把它视为一种奇迹，即几年前，有一女孩，其胸衣稍经抖动或轻微揉搓，即可发出火花。也许这是由于布料染色时使用了明矾或盐质所致，布料因明矾或盐质而变得有点厚实并形成一层硬壳，一经摩擦便迸裂开来。还有最肯定的是，一切糖，无论是精糖还是粗糖，只要偏硬，在黑暗中用刀切割或刮削时都会发出火花。同样，海水和咸水有时在夜间遭到船桨猛击时也看得到火花。还有在暴风雨之夜，海水浪花遭到猛烈搅动时也会发出火

花，西班牙人称之为“海肺”。有一种火焰，古代船员称之为“双子星座”，今称“圣爱摩火”；至于这种火焰能发出多少热，目前还未曾有充分调查。

To the 7th.

下例对应前表第七例。

12 . Every body ignited so as to turn to a fiery red, even if unaccompanied by flame, is always hot; neither is there any negative to be subjoined to this affirmative. But that which comes nearest seems to be rotten wood, which shines by night and yet is not found to be hot; and the putrefying scales of fish, which also shine in the dark and yet are not warm to the touch; nor, again, is the body of the glowworm, or of the fly called *Luciola* , found to be warm to the touch.

（十二）物体一经烧红，即使没有火焰伴随，也总是炽热的，这一点只有正面事例，没有反面事例可以补充。不过，朽木与反面事例最为近似，它夜间发光，但并不见发热；还有腐烂的鱼磷也在黑暗中发光，但触觉上也感觉不到热；萤火虫和所谓意大利火蝇，触觉上也感觉不到热。

To the 8th .

下例对应前表第八例。

13 . In what situation and kind of soil warm baths usually spring 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examined; and therefore no negative is subjoined.

（十三）何种情况之下以及何种土壤可以经常出现温泉，目前还未作充分查究，因此，没有反面事例可以补充。

To the 9th.

下例对应前表第九例。

14 . To warm liquids I subjoin the negative instance of liquid itself in its natural state. For we find no tangible liquid which is warm in its own nature and remains so constantly; but the warmth is of an adventitious nature, superinduced only for the time being, so that the liquids which in power and operation are hottest, as spirit of wine, chemical oil of spices, oil of vitriol and sulphur, and the like, which burn after a while, are at first cold to the touch. The water of natural warm baths, on the other hand, if received into a vessel and separated from its springs, cools just like water that has been heated on a fire. But it is true that oily substances are less cold to the touch than watery, oil being less cold than water, and silk than linen. But this belongs to the *Table of Degrees of Cold* .

（十四）我给热液补充的反面事例就是指自然状态下的液体本身。我们从未见过这么一种可接触液体，即具有热的性质且保持常

热；但这种热并非其固有性质，只是暂时添加上去的，所以，诸如酒精、化学油料、浓硫酸和硫磺以及其他类似物质，在能力和作用上，只要燃烧一会即刻变成最热的液体，但其最初在感觉上却是凉的。但是，如果将天然温泉水倒入器皿中，与泉源隔开，就会像经火加热过的水一样冷却下去。但是有一点倒不假，即油性物质比水性物质的冷感要小些，油比水的冷感小，丝绸比亚麻的冷感小。不过，此例应该归入《冷度表》。

To the 10th.

下例对应前表第十例。

15 . In like manner to hot vapor I subjoin as a negative the nature of vapor itself, such as we find it with us. For exhalations from oily substances, though easily inflammable, are yet not found to be warm unless newly exhaled from the warm body.

（十五）同样，我给热蒸汽补充的反面事例就是蒸汽性质本身，这种事例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油性物质的蒸发虽然容易着火，但却未见有变热现象，除非刚从温热的物体中蒸发而出。

To the 10th.

下例对应前表第十例。

16 . In like manner I subjoin as a negative to hot air the nature of air itself. For we do not find here any air that is warm, unless it has either been confined, or compressed, or manifestly warmed by the sun, fire, or some other warm substance.

（十六）同样，我给热气补充的反面事例就是气体性质本身。我们这儿找不到热性的空气，除非空气受到闭塞，或受到压缩，或者明显因太阳、火以及其他发热性物质而变热。

To the 11th.

下例对应前表第十一例。

17 . I here subjoin the negative of colder weather than is suitable to the season of the year, which we find occurs during east and north winds; just as we have weather of the opposite kind with the south and west winds. So a tendency to rain, especially in wintertime, accompanies warm weather; while frost accompanies cold.

（十七）我此处补充的反面事例就是那种比正常时令更冷的天气，刮东北风时可以见到这种冷天气，而刮西南风时可以见到相反的暖天气。降雨的到来，尤其是在冬天，总是伴随着温暖天气，而霜降的到来则总是伴随着寒冷天气。

To the 12th.

下例对应前表第十二例。

18 . Here I subjoin the negative of air confined in caverns during the summer. But the subject of air in confinement should by all means be more diligently examined. For in the first place it may well be a matter of doubt what is the nature of air in itself with regard to heat and cold. For air manifestly receives warmth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 heavenly bodies, and cold perhaps from the exhalations of the earth; and, again, in the middle region of air, as it is called, from cold vapors and snow. So that no opinion can be formed as to the nature of air from the examination of air that is at large and exposed, but a truer judgment might be made by examining it when confined. It is, however, necessary for the air to be confined in a vessel of such material as will not itself communicate warmth or cold to the air by its own nature, nor readily admit the influence of the outer atmosphere. Let the experiment therefore be made in an earthen jar wrapped round with many folds of leather to protect it from the outward air, and let the vessel remain tightly closed for three or four days; then open the vessel and test the degree of heat or cold by applying either the hand or a graduated glass.

（十八）此处补充的反面事例是夏天地穴中受闭塞的空气。但是至于空气受到密闭的话题，还应更加孜孜不倦地加以查究。因为就冷热而言，首先可能受到怀疑的是空气本身究竟具有何种性质。空气变热显然是受到了天体的影响，空气变冷可能受到地面蒸发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处于所谓的空气中间层的冷气和雪的影响。这样一来，空气若是在自由自在暴露无遗的状态下加以查究，那就得不出有关空气性质的看法；但是若把空气封闭起来加以查究，得出的判断可能会更加

真实一些。但是有必要把空气密闭在这样一种质料构成的器皿中，即器皿质料本身性质不会对空气传递冷热，也不容易受到外面空气的影响而遭到侵入。因此，应当用一个陶罐来做这个实验，即把空气装入陶罐中，四周用几层皮革裹好，以防外面空气进入；严密封闭这个器皿三四天，再打开陶罐，用手或用刻有度数的玻璃仪器来测试冷热度数。

To the 13th.

下例对应前表第十三例。

19 . In like manner a doubt suggests itself whether the warmth in wool, skins, feathers, and the like, proceeds from a faint degree of heat inherent in them, as being excretions from animals; or from a certain fat and oiliness, which is of a nature akin to warmth; or simply, as surmised in the preceding article, from the confinement and separation of the air. For all air that is cut off from connection with the outer air seems to have some warmth. Try the experiment therefore with fibrous substances made of linen; not of wool, feathers, or silk, which are excretions from animals. It should also be observed that all powders (in which there is manifestly air enclosed) are less cold than the whole substances they are made from; as likewise I suppose that all froth (as that which contains air) is less cold than the liquor it comes from.

（十九）同样，还存在一个疑问：羊毛、兽皮、鸟羽以及类似东西中的暖热，是源自动物排泄物所固有的微热呢，还是源自其性质上近似暖热的脂肪和油性；或者是源自前文简单揣测的受密闭和隔离的

空气。因为但凡是空气，一旦与外界空气隔断似乎多少都要发热。因此，可以用亚麻所制成的纤维物质来试一下，但不要用羊毛、羽毛或蚕丝等制成的纤维质体，因为这些都是动物的排泄物。还应该看到，但凡粉末（显然其中含有空气）总比其所属整个物质的冷感要小；同理，我可以假设，但凡泡沫（同样含有空气）都比其所属液体的冷感要小。

To the 14th.

下例对应前表第十四例。

20 . To this no negative is subjoined. For there is nothing found among us, either tangible or spirituous, which does not contract warmth when put near fire. There is this difference however, that some substances contract warmth more quickly, as air, oil, and water; others more slowly, as stone and metal. But this belongs to the *Table of Degrees* .

（二十）此例没有反面事例可以补充。因为我们周围也找不到一种靠近火边而不受热的东西，无论这种东西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然而存在这么一种差异：有些物质受热较快，如空气、油和水；有些受热较慢，如石头和金属。但此例应归入《程度表》。

To the 15th.

下例对应前表第十五例。

21 . To this instance I subjoin no negative, except that I would have it well observed that sparks are produced from flint and steel, or any other hard substance, only when certain minute particles are struck off from the substance of the stone or metal; and that the attrition of the air does not of itself ever produce sparks, as is commonly supposed. And the sparks themselves, too, owing to the weight of the ignited body, tend rather downwards than upwards; and on going out become a tangible sooty substance.

（二十一）此类事例，我们没有反面事例可以补充，不过我还是对下面这种现象进行了仔细观察，即燧石、钢或任何其他硬性物质，只有在擦落其某些细小微粒时才会产生火花；而空气摩擦本身则不会按照这种通常认为的方式产生火花。火花本身，也因燃烧物体有重量而趋于向下坠落而非向上飘浮；火花一旦熄灭，即可变成有形的煤黑物质。

To the 16th.

下例对应前表第十六例。

22 . There is no negative, I think, to be subjoined to this instance. For we find among us no tangible body which does not manifestly gain warmth by attrition; insomuch that the ancients fancied that the heavenly bodies had no other means or power of producing warmth than by the attrition of the air in their rapid and hurried revolution. But on this subject we must further inquire whether bodies discharged from engines, as balls from cannon, do

not acquire some degree of heat from the very percussion, so as to be found somewhat warm when they fall. Air in motion, however, rather chills than warms, as appears from wind, bellows, and blowing with the mouth contracted. But motion of this kind is not so rapid as to excite heat, and is the motion of a mass, and not of particles; so that it is no wonder if it does not generate heat.

（二十二）我认为，此类事例没有反面事例。因为我们周围找不到那种即使摩擦受热也不明显的有形物体，因此，古人就幻想说，天体之所以产生热是因为空气在急促运转时引起摩擦所致，而非其他方法或力量所致。但是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究这么一个问题，即从引擎中发射出来的物体是否因猛烈碰撞而产生某种程度的热，以致落下后多少还能发现这个物体有点烫，如从大炮射出的炮弹。然而，空气运动致冷而不致热，如刮风、拉风箱和缩口吹气。但是此类运动并不急速，难以生热，是一种块体运动，而非微粒运动，不生热也不足为奇。

To the 17th.

下例对应前表第十七例。

23．On this instance should be made more diligent inquiry. For herbs and vegetables, when green and moist seem to contain some latent heat, though so slight that it is not perceptible to the touch when they are single, but only when they are collected and shut up together, so that their spirits may not breathe out into the air, but may mutually cherish each other; whereupon there arises a palpable heat, and sometimes flame in suitable matter.

（二十三）此类事例应当更加用心调查。草类和蔬菜类，青嫩潮湿时似乎都含有某种潜在的热；不过，单独搁置时，所含的热微乎其微，触觉难以感知；将草类和蔬菜类聚集密闭在一起，这样，精气就不会外泄到空气之中，而是互相渗透；只有这样才会产生可以感知到的热，有时如果物质适当还会产生火焰。

To the 18th.

下例对应前表第十八例

24．On this instance too should be made more diligent inquiry. For quicklime sprinkled with water seems to contract heat either by the concentration of heat before dispersed, as in the above-mentioned case of confined herbs, or because the igneous spirit is irritated and exasperated by the water so as to cause a conflict and reaction. Which of these two is the real cause will more readily appear if oil be poured on instead of water, for oil will serve equally well with water to concentrate the enclosed spirit, but not to irritate it. We should also extend the experiment both by employing the ashes and rusts of different bodies, and by pouring in different liquids.

（二十四）此类事例也应当更加用心调查。生石灰洒上水就能生热，这似乎有两个原因：要么是因为原本散居各处的热聚集一起的，要么是因火而成的精气被水刺激和激怒，从而引起冲突和反应。以上两个原因，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原因，只需用油代替水泼在生石灰上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来，因为油与水一样都可以很好地起到集中

封闭精气的作用，而又不会对它产生刺激。我们也应该把这个实验方式加以扩展，既要用不同物体的灰烬和锈屑来做实验，又要泼洒不同的液体来做实验。

To the 19th.

下例对应前表第十九例。

25 . To this instance is subjoined the negative of other metals which are softer and more fusible. For gold leaf dissolved by *aqua regia* gives no heat to the touch; no more does lead dissolved in aqua fortis; neither again does quicksilver (as I remember); but silver itself does, and copper too (as I remember); tin still more manifestly; and most of all iron and steel, which not only excite a strong heat in dissolution but also a violent ebullition. It appears therefore that the heat is produced by conflict, the strong waters penetrating, digging into, and tearing asunder the parts of the substance, while the substance itself resists. But where the substances yield more easily, there is hardly any heat excited.

（二十五）此类事例可用更柔软、更易溶解的金属作为反面事例来补充。金叶受到王水分解时并不生热，也感觉不到热；铅受到硝酸分解时也不生热，（我记得）水银也是如此；但银却可生热，（我记得）铜也是如此；锡更为明显；尤其是铁和钢，在溶解时不仅产生强热，而且引起猛烈沸腾。由此可见，热产生于冲突，一方面强水穿刺、发掘和分解物质的各个部分，另一方面物质本身竭力抵抗强水。物质屈服得越是容易，激发出来的热就越少。

To the 20th.

下例对应前表第二十例。

26 . To the heat of animals no negative is subjoined, except that of insects (as above-mentioned) on account of their small size. For in fishes, as compared with land animals, it is rather a low degree than an absence of heat that is noted. But in vegetables and plants there is no degree of heat perceptible to the touch, either in their exudations or in their pith when freshly exposed. In animals, however, is found a great diversity of heat, both in their parts (there being different degrees of heat about the heart, in the brain, and on the skin) and in their accidents, as violent exercise and fevers.

（二十六）动物的热没有反面事例可以补充，除了昆虫（如前所及）因体积太小可作反面事例之外。以鱼为例，与陆地动物相比，看得出鱼所含的热只是相当低而并不是没有。但蔬菜和草木之中，无论其渗出的汁液，还是其新露的木髓，都感觉不到有任何程度的热。然而在动物之中可以发现不同种类的热，这些热不仅存在于动物的各个部分（心、脑和皮肤各部分热的程度不同），而且存在于动物的偶然事件之中，如剧烈运动和发烧。

To the 21st.

下例对应前表第二十一例。

27 . To this instance it is hard to subjoin a negative. Indeed the excrements of animals when no longer fresh have manifestly a potential heat, as is seen in the enriching of soil.

（二十七）此类事例要补充其反面事例很难。动物排泄物诚然不再新鲜，但明显含有一种潜在的热，这一点从其可以肥沃土壤就可以看出来。

To the 22nd and 23rd.

下例对应前表第二十二和二十三例。

28 . Liquids, whether waters or oils, which possess a great and intense acridity, act like heat in tearing asunder bodies and burning them after some time; yet to the touch they are not hot at first. But their operation is relative and according to the porosity of the body to which they are applied. For *aqua regia* dissolves gold but not silver; *aqua fortis* , on the contrary, dissolves silver, but not gold; neither dissolves glass, and so on with others.

（二十八）液体，无论是水还是油，都具有巨大而强烈的刺激性，都具有热一样的分裂物体的作用，即一段时间之后就烧毁物体，但是触觉最初感觉不到热。但这种液体的作用是相对的，而且要根据所实施的物体疏密度而定。例如，王水分解金却无法分解银；相反，硝酸分解银却无法分解金；二者都不能分解玻璃；其他情况也以此类推。

To the 24th.

下例对应前表第二十四例。

29 . Let trial be made of spirit of wine on wood, and also on butter, wax, or pitch; and observe whether by its heat it in any degree melts them. For the twenty-fourth instance exhibits a power in it that resembles heat in producing incrustation. In like manner therefore try its power in producing liquefaction. Let trial also be made with a graduated or calendar glass, hollow at the top; pour into the hollow spirit of wine well rectified, cover it up that the spirit may better retain its heat, and observe whether by its heat it makes the water sink.

（二十九）用酒精做实验，即将酒精施于木头、黄油、蜡或松脂上，看看是否可用热使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熔化。因为第二十四则事例展示酒精在产生硬壳时具有与热相似的能力。因此，同样还要试一试酒精的液化能力。做这个实验也可以用刻有度数的玻璃仪器或温度表，将仪器顶部置空，并在其中注入蒸馏酒精，然后密封仪器，使酒精可以更好地保存其热，最后观察酒精的热是否可以让其中的水下降。

To the 25th.

下例对应前表第二十五例。

30 . Spices and acrid herbs strike hot on the palate, and much hotter on the stomach. Observe therefore on what other substances they produce the effects of heat. Sailors tell us that when large parcels and masses of spices are, after being long kept close, suddenly opened, those who first stir and take them out run the risk of fever and inflammation. It can also be tried whether such spices and herbs when pounded would not dry bacon and meat hung over them, as smoke does.

（三十）香料和辛草会在腭上激起热辣的感觉，在胃中更易激起灼热的感觉。因此，还要观察这些东西对其他什么物质会产生热效应。船员们告诉我们说，大包大堆的香料，经过长时间密闭之后突然打开，谁先去搅动和取出香料，谁就会有患热病炎症的危险。也可以实验一下捣烂的香料和草类，看看捣烂的东西是否能把挂在上头的腌肉和鲜肉熏干，就像用烟熏肉那样熏干。

To the 26th.

下例对应前表第二十六例。

31 . There is an acridity or pungency both in cold things, as vinegar and oil of vitriol, and in hot, as oil of marjoram and the like. Both alike therefore cause pain in animate substances, and tear asunder and consume the parts in such as are inanimate. To this instance again there is no negative subjoined. Moreover we find no pain in animals, save with a certain sensation of heat.

（三十一）冷东西和热东西都有一种刺激性和辛辣性，前者如醋和硫酸，后者如薄荷油等。可见，这两类东西既可引起有生命物质的痛感，也可撕裂和耗蚀无生命物质的各个部分。此类事例也同样没有反面事例可以补充。而且，我们发现，凡是有痛感的动物一定有热的感觉。

To the 27th.

下例对应前表第二十七例。

32 . There are many actions common both to heat and cold, though in a very different manner. For boys find that snow after a while seems to burn their hands; and cold preserves meat from putrefaction, no less than fire; and heat contracts bodies, which cold does also. But these and similar instances may more conveniently be referred to the inquiry concerning cold.

（三十二）许多活动对冷与热都是相通的，虽然体现方式各不相同。孩子们发现，雪玩过一会儿，手上似乎就有灼烧之感；冷藏可以防止食肉腐坏，其作用不亚于火；热可以使物体收缩，冷也可以使物体收缩。不过，这些以及类似事例归入冷的探究范围，更为方便。

XIII

十三

Thirdly, we must make a presenta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stances in which the nature under inquiry is found in different degrees, more or less; which must be done by making a comparison either of its increase and decrease in the same subject, or of its amount in different subjects, as compared one with another. For since the form of a thing is the very thing itself, and the thing differs from the form no otherwise than as the apparent differs from the real, or the external from the internal, or the thing in reference to man from the thing in reference to the universe, it necessarily follows that no nature can be taken as the true form, unless it always decrease when the nature in question decreases, and in like manner always increase when the nature in question increases. This Table therefore I call the *Table of Degrees or the Table of Comparison* .

第三，我们还必须在理解力面前呈现一类事例，这些事例或多或少地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所探究的性质；这种探究必须采用比较法：要么对这个性质在同一东西中的增和减进行比较，要么对这个性质在不同东西中的多和少进行比较。既然事物的形式就是事物本身；而事物与形式的不同，不外乎就是表象与真实之间、内在与外在之间的不同，或者说是关乎人的事物与关乎宇宙的事物之间的不同；由此必定得出如此推断，性质若非总是随所论性质之增减而增减，概不能视之为真正的形式。因此，我将这个表称为《程度表》或《比对表》。

Table of Degrees or Comparison in Heat

表三：《热度表或热度比对表》

I will therefore first speak of those substances which contain no degree at all of heat perceptible to the touch, but seem to have a certain potential heat only, or disposition and preparation for hotness. After that I shall proceed to substances which are hot actually, and to the touch, and to their intensities and degrees.

首先，我要讨论的是那些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程度的热的物质，这些物质似乎是只有潜在的热，或者说只有热的倾向和准备。其次，我要讨论那些确实含热的物质，再讨论它们的触觉、强度和程度。

1 . In solid and tangible bodies we find nothing which is in its nature originally hot. For no stone, metal, sulphur, fossil, wood, water, or carcass of animal is found to be hot. And the hot water in baths seems to be heated by external causes; whether it be by flame or subterraneous fire, such as is thrown up from Etna and many other mountains, or by the conflict of bodies, as heat is caused in the dissolution of iron and tin. There is therefore no degree of heat palpable to the touch in animate substances; but they differ in degree of cold, wood not being equally cold with metal. But this belongs to the *Table of Degrees in Cold* .

（一）凡是坚实而可接触的物体，我们都找不到其中原本热性的东西。石头、金属、硫磺、化石、木头、水以及动物尸体都未曾见其是原本热性的东西。温泉中的热水似乎有外在原因才导致其热：要么是因火焰或地下火致使其热，如埃特纳火山和许多其他高山中的喷射物致使水热；要么就是物体相互冲突致使变热，如铁和锡溶解时致使水变热。因此，无生命物质中并不存在任何程度的可以感知的热；但却存在不同程度的冷，如木头的冷与金属的冷并不相同。但是此类应归入《冷度事例表》。

2．As far, however, as potential heat and aptitude for flame is concerned, there are many inanimate substances found strongly disposed thereto, as sulphur, naphtha, rock oil.

（二）然而，就潜在的热和可燃性而论，许多无生命物质中也可以见到这种强烈的倾向，如硫磺、石油精和石油。

3．Substances once hot, as horse dung from animal heat, and lime or perhaps ashes and soot from fire, retain some latent remains of their former heat. Hence certain distillations and resolutions of bodies are made by burying them in horse dung, and heat is excited in lime by sprinkling it with water, as already mentioned.

（三）物体一旦受热，如来自动物体热的马粪，经过火燎的石灰、灰烬和煤渣，都保留有一些潜在的余热。因此，某些物体埋入马粪就会蒸发和溶解，用水浇石灰，就会如前所述那样激发出热来。

4．In the vegetable creation we find no plant or part of plant (as gum or pitch) which is warm to the human touch. But yet, as stated above, green herbs gain warmth by being shut up; and to the internal touch, as the palate or stomach, and even to external parts, after a little time, as in plasters and ointments, some vegetables are perceptibly warm and others cold.

（四）在植物界中，我们还找不到这么一种植物，人类一触摸它或它的一部分（如树胶或树脂）就会有热感。但如上所述，青嫩植物

密闭时可以获得温热；对内部触觉而言，如腭和胃，有些植物属于温性植物，而其他植物属于寒性植物；而对外部触觉而言，如植物药膏和植物药油，只需涂抹一会儿功夫，就会感觉到其温寒。

5．In the parts of animals after death or separation from the body, we find nothing warm to the human touch. Not even horse dung, unless enclosed and buried, retains its heat. But yet all dung seems to have a potential heat, as is seen in the fattening of the land. In like manner carcasses of animals have some such latent and potential heat, insomuch that in burying grounds, where burials take place daily, the earth collects a certain hidden heat which consumes a body newly laid in it much more speedily than pure earth. We are told too that in the East there is discovered a fine soft texture, made of the down of birds, which by an innate force dissolves and melts butter when lightly wrapped in it.

（五）动物死后，在其分割下的块体或肢体上，我们也感觉不到热。甚至马粪，除非闷闭起来，否则也难保存其热。但是一切马粪似乎都存在一种潜在的热，这一点在其肥沃土壤之中就可以看出来。同样，动物的尸体也潜隐着这种热，因而在每天都有人入葬的坟地里，其土壤里聚集了一定的隐热，这种热对新埋尸体的腐蚀要比纯净土壤快得多。我们还得知东方发现了一种精致而柔软的纺织品，用鸟绒织成，其内在的力量能消解和熔化稍加包装的牛油。

6．Substances which fatten the soil, as dung of all kinds, chalk, sea sand, salt, and the like, have some disposition to heat.

（六）凡是能肥沃土壤的质体，如各种粪便、白垩、海滩沙子、

盐以及类似东西，都有热的秉性。

7．All putrefaction contains in itself certain elements of a slight heat, though not so much as to be perceived by the touch. For not even those substances which on putrefaction turn to animalculae, as flesh, cheese, etc., feel warm to the touch; no more does rotten wood, which shines in the dark. Heat, however, in putrid substances sometimes betrays itself by foul and powerful odors.

（七）一切腐物本身都含有某些微热成分，不过，其热的程度触觉还感觉不到。即使是那些因腐化而变成微生物的物质，如肉、奶酪等，触觉也感觉不到其热；还有在黑暗中发亮的朽木也是这样。不过，腐化物质中的热有时会因其强烈的恶臭味而泄露其本性。

8．The first degree of heat therefore among those substances which feel hot to the touch, seems to be the heat of animals, which has a pretty great extent in its degrees. For the lowest, as in insects, is hardly perceptible to the touch, but the highest scarcely equals the sun's heat in the hottest countries and seasons, nor is it too great to be borne by the hand. It is said, however, of Constantius, and some others of a very dry constitution and habit of body, that in violent fevers they became so hot as somewhat to burn the hand that touched them.

（八）在触觉能感觉到热的质体中，第一级热似乎要算动物之热，其热度又分为许多层次。最低层如昆虫身上的热，几乎感觉不到；但即使是最高层次的热也很难与最热国家中最热季节的太阳之热

相媲美，也不会热到手不能忍受的地步。然而，据说君士坦提乌斯以及其他一些人，体质干燥，发高烧时身体烫得几乎灼手。

9．Animals increase in heat by motion and exercise, wine, feasting, venus, burning fevers, and pain.

（九）活动和锻炼、饮酒、饱食、做爱、高烧和疼痛都可以使动物增热。

10．When attacked by intermittent fevers, animals are at first seized with cold and shivering, but soon after they become exceedingly hot, which is their condition from the first in burning and pestilential fevers.

（十）动物在患间歇性热症时，先是发冷发抖，随后发热发烧；在患热病和瘟疫性热症时，一开始就是发热发烧。

11．Let further inquiry be made into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heat in different animals, as in fishes, quadrupeds, serpents, birds; and also according to their species, as in the lion, the kite, the man; for in common opinion fish are the least hot internally, and birds the hottest, especially doves, hawks, and sparrows.

（十一）热度的进一步探究，可以根据不同动物具有不同的体热度来探究，如鱼、兽、蛇、鸟；也可以根据动物的种属来探究，如狮、鸢、人；一般认为鱼的内热最少，而鸟的内热最多，尤其是家

鸽、老鹰和麻雀。

12 . Let further inquiry be made into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heat in the different parts and limbs of the same animal. For milk, blood, seed, eggs, are found to be hot only in a moderate degree, and less hot than the outer flesh of the animal when in motion or agitated. But what the degree of heat is in the brain, stomach, heart, etc., has not yet been in like manner inquired.

（十二）可以根据同一动物的不同部位和肢体来对热度做进一步的探究。乳、血、籽、卵，据查只有中等程度的热，这种热不如动物运动或受刺激时外部肌肉的热。而在大脑、胃脏和心脏等内部热度如何，同样还有待探究。

13 . All animals in winter and cold weather are cold externally, but internally they are thought to be even hotter.

（十三）在冬天和寒冷天气，所有动物都是外冷内热。

14 . The heat of the heavenly bodies, even in the hottest countries, and at the hottest times of the year and day, is never sufficiently strong to set on fire or burn the driest wood or straw, or even tinder, unless strengthened by burning glasses or mirrors. It is, however, able to extract vapor from moist substances.

（十四）天体的热，即使在最热的国度和最热的日子，也绝不至

于热到可以生火或点燃干柴或干草的地步，甚至火绒也点不燃，除非用取火镜或镜子来加强热度。不过，这种热可以把潮湿的物质烤出蒸汽来。

15．By the tradition of astronomers some stars are hotter than others. Of planets, Mars is accounted the hottest after the sun; then comes Jupiter, and then Venus. Others, again, are set down as cold: the moon, for instance, and above all Saturn. Of fixed stars, Sirius is said to be the hottest, then Cor Leonis or Regulus, then Canicula, and so on.

（十五）根据天文学家传统的说法，有些星星比其他星星要热。除太阳之外，行星之中，火星要算最热的、木星次之、金星又次之。其他星星都被认定为冷星：如月亮就是冷星，土星最冷。恒星之中，据说天狼星最热，狮心星次之，小天狼星再次之，等等。

16．The sun gives greater heat the nearer he approaches to the perpendicular or zenith; and this is probably true of the other planets also,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 of their heat. Jupiter, for instance, is hotter, probably, to us when under Cancer or Leo than under Capricorn or Aquarius.

（十六）太阳越靠近地平垂直线或越接近天顶时，所发出的热就越强；其他行星，根据其热度比例，可能也是这样。例如对我们来说，木星在巨蟹座或狮子座时比在摩羯座或水瓶座时很可能更热一些。

17 . We must also believe that the sun and other planets give more heat in perigee, from their proximity to the earth, than they do in apogee. But if it happens that in some region the sun is at the same time in perigee and near the perpendicular, his heat must of necessity be greater than in a region where he is also in perigee, but shining more obliquely. And therefore the altitude of the planets in their exalt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ought to be noted, with respect to perpendicularity or obliquity.

（十七）我们还必须相信，太阳和其他行星在近地点时，因离地球较近，所发出的热要多于在远地点时所发出的热。但是如果太阳在某一区域碰巧既处于近地点又近于地平垂直线照射，那么此时的太阳必定比其倾斜照射时发出的热更多。由此可见，行星在不同区域所升至的高度与垂直度或倾斜度的关系应该引起注意。

18 . The sun and other planets are supposed to give greater heat when nearer to the larger fixed stars. Thus when the sun is in Leo he is nearer Cor Leonis, Cauda Leonis, Spica Virginis, Sirius and Canicula, than when he is in Cancer, in which sign, however, he is nearer to the perpendicular. And it must be supposed that those parts of the heavens shed the greatest heat (though it be not at all perceptible to the touch) which are the most adorned with stars, especially of a larger size.

（十八）还可以假定，太阳和其他行星离较大的恒星越近，所发出的热就越多。因此，太阳在狮子座时比在巨蟹座时离狮心星、狮尾星、处女星、天狼星和小天狼星较近，不过，太阳在巨蟹座时离地平垂直线较近。而且我们还必须假定，天空中某些区域发出的热更多，尤其是较大星星点缀最密的区域，发出的热量最大（尽管感觉不

到）。

19．Altogether, the heat of the heavenly bodies is increased in three ways: first, by perpendicularity; secondly, by proximity or perigee; thirdly, by the conjunction or combination of stars.

（十九）总之，有三条途径能增加天体的热：一是对地平线的垂直度；二是邻近地球或近地点；三是与众星的会聚或结合。

20．The heat of animals, and of the rays of the heavenly bodies also (as they reach us), is found to differ by a wide interval from flame, though of the mildest kind, and from all ignited bodies; and from liquids also, and air itself when highly heated by fire. For the flame of spirit of wine, though scattered and not condensed, is yet sufficient to set paper, straw, or linen on fire, which the heat of animals will never do, or of the sun without a burning glass or mirror.

（二十）我们还发现，动物的热和天体光线的热，与最温和火焰的热和来自物体燃烧的热，区别很大；并且这两种热与经火高温加热的液体和空气本身的热有很大的区别。酒精的火焰，即便分散而不集中，也依然足以把纸张、稻草和麻布点燃，而动物身上的热永远都点不燃这些东西，就是太阳的热不经过取火镜或镜子也引不燃这些东西。

21．There are, however, many degrees of strength and weakness in the heat of flame and ignited bodies. But as they have

never been diligently inquired into, we must pass them lightly over. It appears, however, that of all flame that of spirit of wine is the softest, unless perhaps *ignis fatuus* be softer, and the flames or sparklings arising from the sweat of animals. Next to this, as I suppose, comes flame from light and porous vegetable matter, as straw, reeds, and dried leaves, from which the flame from hairs or feathers does not much differ. Next perhaps comes flame from wood, especially such as contains but little rosin or pitch; with this distinction, however, that the flame from small pieces of wood (such as are commonly tied up in fagots) is milder than the flame from trunks and roots of trees. And this you may try any day in furnaces for smelting iron, in which a fire made with fagots and boughs of trees is of no great use. After this I think comes flame from oil, tallow, wax, and such like fat and oily substances, which have no great acrimony. But the most violent heat is found in pitch and rosin; and yet more in sulphur, camphor, naphtha, rock oil, and salts (after the crude matter is discharged), and in their compounds, as gunpowder, Greek fire (commonly called wildfire), and its different kinds, which have so stubborn a heat that they are not easily extinguished by water.

（二十一）然而，火焰发出的热和物体燃烧时发出的热，二者的强弱程度有许多的不同。不过，这些从未得到认真研究过，因此，我们只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然而，在一切火焰中，酒精的火焰似乎最柔和，除此之外，鬼火和动物流汗时产生的火焰或火花也许更弱。仅次于这种火焰的，我认为，要数那种轻巧的多孔植物（如稻草、芦苇和干叶等）发出的火焰，这种火焰与头发或羽毛发出的火焰没多大区别。也许较强一点的火焰当属木头发出的火焰，尤其是那种仅含有少量松香或松脂的木头所发出的火焰；不过，其中也有区别，即小片木柴（如普通捆扎的柴火）发出的火焰比大块木材和树根所发出的火焰要温和些。这一点，你可以随时用熔铁炉试一试，柴火和树枝在熔铁

炉中发出的火没有多大用途。我认为，接下来的火焰要数油类、脂肪、蜡烛以及类似多脂含油物质发出的火焰，这些物质火力也不太强。但是最强的热可以在松脂和松香中找到，也可以在硫磺、樟脑、油精、石油以及（去掉杂质的）盐中找到；还可以在这些物质的混合体如火药、希腊火药（通称野火）以及其不同种类中找到，这些东西产生的火焰非常顽强，即便用水也难以扑灭。

22 . I think also that the flame which results from some imperfect metals is very strong and eager. But on these points let further inquiry be made.

（二十二）我还认为，某些非纯金属中发出的火焰也很强，很活跃。不过，这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23 . The flame of powerful lightning seems to exceed in strength all the former, for it has even been known to melt wrought iron into drops, which those other flames cannot do.

（二十三）威猛的闪电火焰在力度上似乎强于以上所有火焰，我们甚至知道闪电火焰可以将熟铁熔化为水滴状，而以上所有火焰概难达到此程度。

24 . In ignited bodies too there 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heat, though these again have not yet been diligently examined. The weakest heat of all, I think, is that from tinder, such as we use to kindle flame with; and in like manner that of touchwood or tow, which is used in firing cannon. After this comes ignited wood or

coal, and also bricks and the like heated to ignition. But of all ignited substances, the hottest, as I take it, are ignited metals, as iron, copper, etc. But these require further investigation.

（二十四）物体不同，燃烧时发热的力度也就不同；不过，这些也未曾有人认真考察过。我认为，其中力度最弱的热要数我们用来点火的火绒所发出的热；还有那种发射炮弹时所用的引火木或火捻所发出的热也是最弱的。其次，要数木头或煤炭燃烧时发出的热，还有燃烧着的砖头以及类似烧热的东西。在所有燃烧的物质中，我认为，最热的要数燃烧的金属，如铁、铜等。但是这些亦有待进一步调查。

25 . Some ignited bodies are found to be much hotter than some flames. Ignited iron, for instance, is much hotter and more consuming than flame of spirit of wine.

（二十五）某些物体燃烧时比一些火焰还要热。例如，铁燃烧时，比酒精燃烧时发出的火焰要热得多，烧毁力更强。

26 . Of substances also which are not ignited but only heated by fire, as boiling water and air confined in furnaces, some are found to exceed in heat many flames and ignited substances.

（二十六）某些物质只能被火加热但并不能被火点燃，例如沸腾的水和密闭在火炉中的空气；这些物质中，有些比许多火焰和燃着的物质还要热。

27 . Motion increases heat, as you may see in bellows and by blowing; insomuch that the harder metals are not dissolved or melted by a dead or quiet fire, till it be made intense by blowing.

（二十七）运动可以增加热，这可以从风箱和吹火筒中见到；较硬的金属是死火或静火难以分解或熔化掉的，除非用吹火筒增强火力。

28 . Let trial be made with burning glasses, which (as I remember) act thus. If you place a burning glass at the distance of (say) a span from a combustible body, it will not burn or consume it so easily as if it were first placed at the distance of (say) half a span, and then moved gradually and slowly to the distance of the whole span. And yet the cone and union of rays are the same; but the motion itself increases the operation of the heat.

（二十八）这可以用取火镜（按照我的记忆）实验一下。如果你将取火镜置于离可燃物体有（比如说）一掌距离的地方，燃烧和烧毁可燃物体的容易度就不如一开始就将取火镜置于（比如说）半掌远的距离，然后逐渐慢慢移至一掌距离的地方。光线聚集成圆锥体亦同此理；但是运动本身却增强了热的作用。

29 . Fires which break out during a strong wind are thought to make greater progress against than with it; because the flame recoils more violently when the wind gives way than it advances while the wind is driving it on.

（二十九）在烈风中燃烧起来的火，据猜想，逆风时比顺风时燃烧得更快；因为火焰在风力退让时反弹的速度比在顺风时受火驱使前进的速度更加猛烈些。

30．Flame does not burst out, nor is it generated, unless some hollow space be allowed it to move and play in; except the explosive flame of gunpowder and the like, where compression and imprisonment increase its fury.

（三十）火焰不会突然爆发出来，也不会产生出来，除非火焰得到运动和活动的空间；火药等爆炸性的火焰除外，因为火药的紧压与密闭增加了火焰的猛烈度。

31．An anvil grows very hot under the hammer, insomuch that if it were made of a thin plate it might, I suppose, with strong and continuous blows of the hammer, grow red like ignited iron. But let this be tried by experiment.

（三十一）铁砧在锤打之下就会变得很热；锤打的铁砧如果是由薄铁片制成，那么我想铁毡在强力持续锤打之下甚至会变得好似燃烧着的红铁。不过，这有待实验来证明一下。

32．But in ignited substances which are porous, so as to give the fire room to move, if this motion be checked by strong compression, the fire is immediately extinguished. For instance, when tinder, or the burning wick of a candle or lamp, or even live charcoal or coal, is pressed down with an extinguisher, or with the

foot, or any similar instrument, the operation of the fire instantly ceases.

（三十二）燃烧着的物质因有孔穴让火有活动的余地，一旦这种活动受到强力压制，火立刻就会熄灭。例如火绒，或燃烧的烛芯和灯芯，甚至是燃烧的木炭或煤炭，一旦受到灭火器、脚或任何类似工具的压制，火就会立刻停止活动。

33．Approximation to a hot body increases heat in proportion to the degree of approximation. And this is the case also with light; for the nearer an object is brought to the light, the more visible it becomes.

（三十三）靠近热物体可以增热，增热程度与靠近程度成正比。光也如同此理，因为物体越接近光，该物体就看得越清晰。

34．The union of different heats increases heat, unless the hot substances be mixed together. For a large fire and a small fire in the same room increase one another's heat; but warm water plunged into boiling water cools it.

（三十四）不同的热聚合在一起也能增热，除非混合在一起的属于不同的发热物质。例如大小炉火同聚一室时可以彼此增热；但温水倒入烫水时却可以降低后者的温度。

35．The continued application of a hot body increases heat,

because heat perpetually passing and emanating from it mingles with the previously existing heat, and so multiplies the heat. For a fire does not warm a room as well in half an hour as it does if continued through the whole hour.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light; for a lamp or candle gives no more light after it has been long lighted than it did at first.

（三十五）连续使用热物体可以增热，因为其中一直传递着的热和先前存在的热融合在一起，这样热就得到倍增。单一的炉火在半小时内不能像持续燃烧一个小时那样将房间烘得那么热。但光却非如此；例如灯烛点燃很久之后所发出的光并不比点燃之初所发出的光多。

36 . Irritation by surrounding cold increases heat, as you may see in fires during a sharp frost. And this I think is owing not merely to the confinement and contraction of the heat, which is a kind of union, but also to irritation. Thus, when air or a stick is violently compressed or bent, it recoils not merely to the point it was forced from, but beyond it on the other side. Let trial therefore be carefully made by putting a stick or some such thing into flame, and observing whether it is not burnt more quickly at the sides than in the middle of the flame.

（三十六）因四周冷气产生的刺激也能增热，这一点可以从严寒中的火势看到。这种情况，我认为，不应仅仅归因于热受到密闭、受到缩聚（这也是一种聚合），也应归因于热受到刺激。因此，空气被猛压或木棍被猛掰时，不仅会反弹回到受力前的起始点，而且会超过这个起始点弹向另一边。因此，可以精心设定一个实验，即将木棍或某种其他类似东西投入火焰，观察木棍等东西是置于火周边时燃烧得

快还是置于火中央时燃烧得快。

37 . There are many degrees in susceptibility of heat. And first of all it is to be observed how slight and faint a heat changes and somewhat warms even those bodies which are least of all susceptible of heat. Even the heat of the hand communicates some heat to a ball of lead or any metal, if held in it a little while. So readily and so universally is heat transmitted and excited, the body remaining to all appearance unchanged.

（三十七）对热的敏感性分为许多程度。首先，要注意这种微弱之热是如何改变原本对热迟钝的物体的，并注意该物体受热的微弱程度。甚至手中的热也可以部分传递给铅球或任何金属物，只需把铅球或该金属物握在手中片刻即可。传递热和产生热很容易，也很普遍，而且在传递和产生热的过程中，物体明显保持不变。

38 . Of all substances that we are acquainted with, the one which most readily receives and loses heat is air; as is best seen in calendar glasses (air thermoscopes), which are made thus. Take a glass with a hollow belly, a thin and oblong neck; turn it upside down and lower it, with the mouth downwards and the belly upwards, into another glass vessel containing water; and let the mouth of the inserted vessel touch the bottom of the receiving vessel and its neck lean slightly against the mouth of the other, so that it can stand. And that this may be done more conveniently, apply a little wax to the mouth of the receiving glass, but not so as to seal its mouth quite up, in order that the motion, of which we are going to speak, and which is very facile and delicate, may not be impeded by want of a supply of air.

（三十八）在我们熟知的一切物质中，最容易接受也最容易丢失热的就是空气了；这一点从寒暑仪（即气温计）中看得最为清楚；寒暑仪的制作方法如下：取一个腹空而颈部细长的方形玻璃瓶；口部朝下，腹部向上，插入另一盛水玻璃器皿中，使其口部触及器皿底部，颈部微微靠着器皿口端，而得以端立器皿中。要想轻而易举做到这点，可以在器皿口沿处稍许涂蜡，但不可封住口端，以免我们后文将谈及的那种轻捷灵巧的运动或因空气匮乏而受到阻碍。

The lowered glass, before being inserted into the other, must be heated before a fire in its upper part, that is its belly. Now when it is placed in the position I have described, the air which was dilated by the heat will, after a lapse of time sufficient to allow for the extinction of that adventitious heat, withdraw and contract itself to the same extension or dimension as that of the surrounding air at the time of the immersion of the glass, and will draw the water upwards to a corresponding height. To the side of the glass there should be affixed a strip of paper, narrow and oblong, and marked with as many degrees as you choose. You will then see, according as the day is warm or cold, that the air contracts under the action of cold, and expands under the action of heat; as will be seen by the water rising when the air contracts, and sinking when it dilates. But the air's sense of heat and cold is so subtle and exquisite as far to exceed the perception of the human touch, insomuch that a ray of sunshine, or the heat of the breath, much more the heat of one's hand placed on the top of the glass, will cause the water immediately to sink in a perceptible degree. And yet I think that animal spirits have a sense of heat and cold more exquisite still, were it not that it is impeded and deadened by the grossness of the body.

方形玻璃瓶在插入玻璃器皿之前，须先用火烘烤其上端即腹部。接着把它放在刚才描述的位置，原本受热膨胀的空气，经过足够的时间之后，其外来之热就会退尽；之后，就会收缩到与方形玻璃瓶插入时周围空气相同的体积；同时会把水吸到相应的高度。方形玻璃瓶上应该贴上一张长方形窄纸条，按个人选择标上刻度。接着，你就会看到，空气会随天气的冷暖而出现热胀冷缩现象；同样，也会看到，水位会随空气的收缩而上升，随空气的膨胀而下降。但是空气对冷热的敏感度极其精微和敏锐，远远超过人类触觉的感知，方形玻璃瓶顶部只要接受到太阳光线，或者呼吸的热、尤其是手上的热，立刻就会使其水位明显下降。不过，我还认为，动物的精气，如果不受到臃肿身体的阻碍和抵消，对冷热的感知将更加敏锐。

39．Next to air, I take those bodies to be most sensitive to heat which have been recently changed and compressed by cold, as snow and ice; for they begin to dissolve and melt with any gentle heat. Next to them, perhaps, comes quicksilver. After that follow greasy substances, as oil, butter, and the like; then comes wood; then water; and lastly stones and metals, which are slow to heat, especially in the inside. These, however, when once they have acquired heat retain it very long; in so much that an ignited brick, stone, or piece of iron, when plunged into a basin of water, will remain for a quarter of an hour, or thereabouts, so hot that you cannot touch it.

（三十九）仅次于空气而对热最敏感的物体，我认为，要数那种被冷改变和压缩成的物体，例如雪和冰，因为只要稍事加热它们就会开始分解和溶化。仅次于冰与雪的，或许是水银。随后要数含油的物质，如油、奶油等类似东西；接下来要数木头；然后是水；最后要数石头和金属，二者对热的敏感最为迟钝，其内部尤其如此。然而，这些东西一经受热，热就会持续很长时间，例如烧红的砖头、石头或铁

片，一旦投入一盆水中，即使约一刻钟之后，也烫得不敢触摸。

40 . The less the mass of a body, the sooner is it heated by the approach of a hot body; which shows that all heat of which we have experience is in some sort opposed to tangible matter.

（四十）块状物体越小，靠近热物体时受热就越快；这表明，我们从经验中得知的一切热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有形物质相反。

41 . Heat, as far as regards the sense and touch of man, is a thing various and relative; insomuch that tepid water feels hot if the hand be cold, but cold if the hand be hot.

（四十一）热这种东西，对人类的感官和知觉来说，因人而异，而且其程度也是相对而言的。冷手入温水，温水也觉得烫；热手入冷水，冷水也觉冰。

XIV

十四

How poor we are in history anyone may see from the foregoing tables, where I not only insert sometimes mere traditions and reports (though never without a note of doubtful credit and authority) in place of history proved and instances certain, but am

also frequently forced to use the words “Let trial be made,” or “Let it be further inquired.”

从前面几个表中，谁都可以看出，我们在自然史和实验史上是多么匮乏，因此，我在表中不仅有时要插入一些传说和传闻（虽然我们还是察觉到了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值得质疑）来代替已经证实的历史和确信无疑的事例，而且常常还必须使用“须加实验”或“有待调查”等字眼。

XV

十五

The work and office of these three tables I call the Presentation of Instances to the Understanding. Which presentation having been made, induction itself must be set at work; for the problem is, upon a review of the instances, all and each, to find such a nature as is always present or absent with the given nature, and always increases and decreases with it; and which is, as I have said, a particular case of a more general nature. Now if the mind attempt this affirmatively from the first, as when left to itself it is always wont to do, the result will be fancies and guesses and notions ill defined, and axioms that must be mended every day, unless like the schoolmen we have a mind to fight for what is false; though doubtless these will be better or worse according to the faculties and strength of the understanding which is at work. To God, truly, the Giver and Architect of Forms, and it may be to the angels and higher intelligences, it belongs to have an affirmative knowledge of

forms immediately, and from the first contemplation. But this assuredly is more than man can do, to whom it is granted only to proceed at first by negatives, and at last to end in affirmatives after exclusion has been exhausted.

以上三个表的工作和任务，我称之为“给理解力陈列事例”。只要事例一经陈列，就必定会采用归纳法；因为只要逐一浏览一遍所有事例，就可以发现问题，即要找到这么一种性质：总是伴随某一特定性质的出现及消失而出现或消失，同时总是伴随该特定性质的增减而增减；而且这种性质，正如前文所说，对于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性质来说只是一个特例。如果心灵一开始就坚定不移、顺其自然、总是按照习惯方式去尝试，那么所得结果就会是幻想猜测，就会是些界定不明的概念，就会是些随时须加修正的公理，除非我们像经院学者一样，有一颗为错误抗争的心灵；不过，是好是坏还要取决于工作中理解力的强弱优劣。的确，上帝这位形式的赋予者和设计者，还有天使与其他高智慧者，他们从一开始思辨时就可能对形式具有正面认识。然而这实非人之所能，对人而言，只能允许他从反面开始，排除一切例外之后，他才能最终达到正面结果。

XVI

十六

We must make, therefore, a complete solution and separation of nature, not indeed by fire, but by the mind, which is a kind of divine fire. The first work, therefore, of true induction (as far as regards the discovery of forms) is the rejection or exclusion of the several natures which are not found in some instance where the

given nature is present, or are found in some instance where the given nature is absent, or are found to increase in some instance when the given nature decreases, or to decrease when the given nature increases. Then indeed after the rejection and exclusion has been duly made, there will remain at the bottom, all light opinions vanishing into smoke, a form affirmative, solid, and true and well defined. This is quickly said; but the way to come at it is winding and intricate. I will endeavor, however, not to overlook any of the points which may help us toward it.

因此，我们必须用心而不是用火来对性质做出一个完整的分析和划分，因为心才是一种神圣的火。因此，真正的归纳法（就形式发现而言），其首要任务是排拒这些特性：有些事例的特性在其本性出现时就会消失，而有些事例的特性在其本性消失时就会显现；有些事例的特性在其本性减弱时就增强，而有些事例的特性在其本性增强时就减弱。的确，在充分做完排拒工作之后，所有轻浮观点皆烟消云散，最后将会剩下一种坚实、准确而意义明确的正面形式。这个说起来容易，但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却是曲折而复杂的。但是，任何一个要点，只要有助于我们实现目标，我都会尽力不放弃。

XVII

十七

But when I assign so prominent a part to forms, I cannot too often warn and admonish men against applying what I say to those forms to which their thoughts and contemplations have hitherto been accustomed.

当我赋予形式如此重要的职责时，我还要不厌其烦地警告劝诫人们，不要把我所说的话应用到那些人们思辨时所习惯的形式上。

For in the first place I do not at present speak of compound forms, which are, as I have remarked, combinations of simple natures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course of the universe: as of the lion, eagle, rose, gold, and the like. It will be time to treat of these when we come to the latent processes and latent configuration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m, as they are found in what are called substances or natures concrete.

首先，我现在不谈复合形式；所谓复合形式就是指简单属性结合的形式，正如我曾经评述的那样，狮子、老鹰、玫瑰、金子等等，都是按照宇宙的普通进程来结合。谈论这些复合形式，要等到适当的时候，即要等到我们了解了隐秘进程和隐秘结构，而且发现了这些复合形式的时候；而这些复合形式只有存在于所谓物质或具体属性中时才能被人发现。

And even in the case of simple natures I would not be understood to speak of abstract forms and ideas, either not defined in matter at all, or ill defined. For when I speak of forms, I mean nothing more than those laws and determinations of absolute actuality which govern and constitute any simple nature, as heat, light, weight, in every kind of matter and subject that is susceptible of them. Thus the form of heat or the form of light is the same thing as the law of heat or the law of light. Nor indeed do I ever allow myself to be drawn away from things themselves and the operative part. And therefore when I say (for instance)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form of heat, “reject rarity,” or “rarity does not belong to the form of heat,” it is the same as if I said, “It is possible to superinduce heat on a dense body”; or, “It is possible to take away or keep out heat from a rare body.”

其次，即使就简单性质而言，我也不想被人理解为我在谈论抽象的形式和理念，而这些抽象的形式和理念在物质上，要么未加界定，要么界定有误。说到形式，我所指的不过是那些绝对现实的法则和规定性，是它们控制并构成了物质的简单性质，即热、光、重量；这些简单性质存在于任何对它们敏感的物质中。这样一来，热的形式或光的形式与热的法则或光的法则，二者实际上就是一回事。其实，我也从不允许自己从事物本身及其动作上抽身出来。因此，当我在调查热的形式时说“拒绝稀疏性”，或“稀疏性不属于热的形式”，这实际上就是说“给稠密物体增热是可能的”，或者是说，“从稀疏性物体中去掉或摒除热是可能的”。

But if anyone conceive that my forms too are of a somewhat abstract nature, because they mix and combine things heterogeneous (for the heat of heavenly bodies and the heat of fire seem to be very heterogeneous; so do the fixed red of the rose or the like, and the apparent red in the rainbow, the opal, or the diamond; so again do the different kinds of death: death by drowning, by hanging, by stabbing, by apoplexy, by atrophy; and yet they agree severally in the nature of heat, redness, death); if anyone, I say, be of this opinion, he may be assured that his mind is held in captivity by custom, by the gross appearance of things, and by men's opinions. For it is most certain that these things, however heterogeneous and alien from each other, agree in the form or law which governs heat, redness and death; and that the power of man cannot possibly be emancipated and freed from the common course

of nature, and expanded and exalted to new efficients and new modes of operation, except by the revelation and discovery of forms of this kind. And yet, when I have spoken of this union of nature, which is the point of most importance, I shall proceed to the divisions and veins of nature, as well the ordinary as those that are more inward and exact, and speak of them in their place.

不过，如果有人认为我所说的形式有点抽象，那是因为这些形式掺杂和结合了异质性东西（例如天体之热与火之热似乎属于异质；同样，玫瑰或类似东西中固定的红色与彩虹、蛋白石、钻石中显现的红色似乎也属异质；再比如死亡也各不相同：溺死、缢死、刺死、中风而死、衰弱致死；但这些分别归属于热、红、死的性质）；我认为，如果有人持这种观点，那么可以确切地告诉他，他的心灵已经被习俗所俘虏、被事物的粗俗表象所蒙蔽、被公众意见所左右。因为最确定的是，这些事物之间不管有多大异质性和差异性，但在形式或法则上始终同一，都可以用来界定热、红和死；而且人的力量不可能从自然的一般进程中摆脱出来获得解放，也不可能扩展和提高到新的效率、新的运作模式上，除非将此类形式揭示出来、发现出来。然而，谈了最重要的一点即性质的统一性后，我还要继续讨论性质的区分和脉络，不论是普通的还是更加深入而精确的，而且在该提及的地方就要提及。

XVIII

十八

I must now give an example of the exclusion or rejection of natures which by the Tables of Presentation are found not to belong

to the form of heat; observing in the meantime that not only each table suffices for the rejection of any nature, but even any one of the particular instances contained in any of the tables. For it is manifest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that any one contradictory instance overthrows a conjecture as to the form. But nevertheless for clearness' sake and that the use of the tables may be more plainly shown, I sometimes double or multiply an exclusion.

现在我必须根据《事例陈列表》举例，把不属于热形式的性质排拒出去；同时指出，不仅每个表足以排拒任何一个性质，甚至表中的任何一个具体事例也都是可以的。从以上所述来看，很明显任何一个矛盾的事例都足以推翻有关形式的揣测。但是为了清晰起见，也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示几个表的用处，我有时用双倍或多倍事例来排除。

An Example of Exclusion, or Rejection of Natures from the Form of Heat

《热形式性质排除或排拒事例表》

1 . On account of the rays of the sun, reject the nature of the elements.

（一）根据太阳光线，可以排除四大元素的性质。

2 . On account of common fire, and chiefly subterraneous fires (which are the most remote and most completely separate from the

rays of heavenly bodies), reject the nature of heavenly bodies.

（二）根据普通火，主要是地下火（这种火离天体光线最遥远，最无关联），可以排除天体的性质。

3．On account of the warmth acquired by all kinds of bodies (minerals, vegetables, skin of animals, water, oil, air, and the rest) by mere approach to a fire, or other hot body, reject the distinctive or more subtle texture of bodies.

（三）根据所有物体（矿物、植物、动物皮、水、油、空气等）一靠近火或其他热物体就获得热度，可以排除物体特异的或更加精微的结构。

4．On account of ignited iron and other metals, which communicate heat to other bodies and yet lose none of their weight or substance, reject the communication or admixture of the substance of another hot body.

（四）根据炽铁或其他金属的传热而不失自身重量和物质的特性，可以排除其他热物体的物质传送或混合。

5．On account of boiling water and air, and also on account of metals and other solids that receive heat but not to ignition or red heat, reject light or brightness.

（五）根据沸水和空气，根据金属，以及其他受热但不燃不炽的固体，可以排除光或亮。

6．On account of the rays of the moon and other heavenly bod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sun, also reject light and brightness.

（六）根据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光线——太阳光线除外，可以排除光和亮。

7．By a comparison of ignited iron and the flame of spirit of wine (of which ignited iron has more heat and less brightness, while the flame of spirit of wine has more brightness and less heat), also reject light and brightness.

（七）根据炽铁与酒精火焰的比较（前者热多亮少，后者亮多热少），也可以排除光和亮。

8．On account of ignited gold and other metals, which are of the greatest density as a whole, reject rarity.

（八）根据炽金和其他金属整体具有最大的密度，可以排除稀薄性。

9．On account of air, which is found for the most part cold and

yet remains rare, also reject rarity.

（九）根据空气绝大多数是冷而稀薄的，也可以排除稀薄性。

10 . On account of ignited iron, which does not swell in bulk, but keeps within the same visible dimensions, reject local or expansive motion of the body as a whole.

（十）根据炽铁不胀而保持原有体积，可以排除整个物体的本位运动或扩张运动。

11 . On account of the dilation of air in calendar glasses and the like, wherein the air evidently moves locally and expansively and yet acquires no manifest increase of heat, also reject local or expansive motion of the body as a whole.

（十一）根据温度计或类似仪器中的空气膨胀——显然有本位运动或扩张运动，但热度增加不明显，也可排除整个物体的本位运动或扩张运动。

12 . On account of the ease with which all bodies are heated, without any destruction or observable alteration, reject a destructive nature, or the violent communication of any new nature.

（十二）根据物体易热而无损毁或可见的变化，可以排除其毁灭性性质或任何新性质的暴力性的传送。

13．On account of the agreement and conformity of the similar effects which are wrought by heat and cold, reject motion of the body as a whole, whether expansive or contractive.

（十三）根据热和冷所产生的相似性效果中的吻合性和一致性，可以排除整个物体的运动，不论是扩张式运动还是收缩式运动。

14．On account of heat being kindled by the attrition of bodies, reject a principial nature. By principial nature I mean that which exist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positively, and not as the effect of any antecedent nature.

（十四）根据物体摩擦生热，可以排除本体性质。所谓本体性质，是指事物本性中固有的性质，而且这种性质不受任何先前性质的影响。

There are other natures beside these; for these tables are not perfect, but meant only for examples.

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性质；因为这些表还不够完美，而只是用来列举事例而已。

All and each of the above-mentioned natures do not belong to the form of heat. And from all of them man is freed in his operations of heat.

以上所列性质，没有一种性质属于热形式。人们没有必要关心这些热运动中罗列出来的性质。

XIX

十九

In the process of exclusion are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true induction, which however is not completed till it arrives at an affirmative. Nor is the exclusive part itself at all complete, nor indeed can it possibly be so at first. For exclusion is evidently the rejection of simple natures; and if we do not yet possess sound and true notions of simple natures, how can the process of exclusion be made accurate? Now some of the above-mentioned notions (as that of the nature of the elements, of the nature of heavenly bodies, of rarity) are vague and ill defined. I, therefore, well knowing and nowise forgetting how great a work I am about (viz., that of rendering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a match for things and nature), do not rest satisfied with the precepts I have laid down, but proceed further to devise and supply more powerful aids for the use of the understanding; which I shall now subjoin. And assuredl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the mind should by all means be so prepared and disposed that while it rests and finds footing in due stages and degrees of certainty, it may remember withal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that what it has before it depends in great measure upon what remains behind.

排除过程为真正的归纳法打下了基础，而真正的归纳法只有达到正面的结论时才算完整。但是排除部分本身并不完整，即使初始时也不可能完整。因为排除显然就是拒绝简单性质；如果我们对简单性质没有健全而正确的概念，排除过程怎么能如此精确呢？上面提及的概念（如元素的性质，天体的性质、稀薄的性质），有些模糊不清而且界定有误。因此，我非常了解而且绝不会忘记我从事的工作（即使人类理解力能与事物和自然相匹敌）是何等的伟大，所以我不会停留在满足于自己制定的规则上，反而会进一步设计并提供更加有力的帮助，以方便理解力的使用；这就是我要补充的话。确实，在阐释自然过程中，心灵务必要有准备而且要心甘情愿，这样才能对适当程度的确然性心满意足；此外，心灵还可以记住（尤其是初始阶段）：心灵当前拥有的一切大多取决于心灵是否留待后用。

XX

二十

And yet since truth will sooner come out from error than from confusion, I think it expedient that the understanding should have permission, after the three Tables of First Presentation (such as I have exhibited) have been made and weighed, to make an essa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in the affirmative way, on the strength both of the instances given in the tables, and of any others it may meet with elsewhere. Which kind of essay I call the *Indulgence of the Understanding, or the Commencement of Interpretation, or the First*

Vintage .

既然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显露得更快，那么我认为，权宜之计是允许理解力尝试正面阐释自然，但在此之前须制作出以上三个初步陈列表（如前文所示）并加以斟酌，这种尝试不仅要借助表中所列事例，还要借助其他地方所遇到的事例。这种尝试，我称之为“放纵理解力”，或“初始阐释”或“初步收获”。

First Vintage Concerning the Form of Heat

“关于热形式的初步收获”

It is to be observed that the form of a thing is to be found (as plainly appears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in each and all the instances in which the thing itself is to be found; otherwise it would not be the form. It follows therefore that there can be no contradictory inst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form is found much more conspicuous and evident in some instances than in others, namely in those wherein the nature of the form is less restrained and obstructed and kept within bounds by other natures. Instances of this kind I call Shining or Striking Instances. Let us now therefore proceed to the first vintage concerning the form of heat.

须要指出的是，事物的形式须从事物本身所在的每一个事例和全部事例中去寻找（前文所述非常清楚）；否则就不成其为形式。由此可见，不能出现矛盾的事例。同时，还须指出的是，形式在某些事例中体现得更加明晰显眼；也就是说，这些事例中，形式的性质较少受

到其他性质的约束、阻碍和限制。这类事例，我称之为耀眼或醒目性事例。因此，我们现在来谈谈关于热形式的初步收获。

From a survey of the instances, all and each, the nature of which heat is a particular case, appears to be motion. This is displayed most conspicuously in flame, which is always in motion, and in boiling or simmering liquids, which also are in perpetual motion. It is also shown in the excitement or increase of heat caused by motion, as in bellows and blasts; on which see Tab. 3. Inst. 29.; and again in other kinds of motion, on which see Tab. 3. Inst. 28. and 31. Again it is shown in the extinction of fire and heat by any strong compression, which checks and stops the motion; on which see Tab. 3. Inst. 30. and 32. It is shown also by this, that all bodies are destroyed, or at any rate notably altered, by all strong and vehement fire and heat; whence it is quite clear that heat causes a tumult and confusion and violent motion in the internal parts of a body, which perceptibly tend to its dissolution.

以上所列的每一个事例都是个案，表明热具有一种性质，即运动。这在火焰和沸水中体现得最显眼：火焰总是在运动着，滚沸或渐沸的液体也是不停地在运动着。这也体现在运动生热增热的现象中，例如风箱和爆炸，见表三，第二十九例；还有其他运动，见表三第二十八和三十一例。这还表现在通过任何强压来熄灭火与热中，而强压是阻止运动，见表三第三十和三十二例。还体现在这种情形中，即所有物体都因火与热太强太猛而遭到毁坏，至少是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清楚地表明，热能够导致物体内的分子产生骚动混乱和猛烈的运动，而这些一看就知道容易导致物体解体。

When I say of motion that it is as the genus of which heat is a

species, I would be understood to mean not that heat generates motion or that motion generates heat (though both are true in certain cases), but that heat itself, its essence and quiddity, is motion and nothing else; limited however by the specific differences which I will presently subjoin, as soon as I have added a few cautions for the sake of avoiding ambiguity.

当我谈及运动，即把运动看作是热的一类时，不要误解我，我的意思并不是指热产生运动或运动产生热（尽管二者在特定的情况下都是真实的），而是指热本身及其本质和实质就是运动而非其他；但是这种运动受到了种差的限制，随后我将谈到这点，为了避免模棱两可，我先补充几点警告。

Sensible heat is a relative notion, and has relation to man, not to the universe, and is correctly defined as merely the effect of heat on the animal spirits. Moreover, in itself it is variable, since the same body, according as the senses are predisposed, induces a perception of cold as well as of heat. This is clear from Inst. 41. Tab. 3.

感觉上的热是一种相对运动，与人有关，而与宇宙无关，因此，正确的定义应是仅仅在动物精气上产生的热效应。而且，热本身具有可变性，因为同一物体引起冷热感觉要视感官的倾向性而定。这一点在表三第四十一例很清楚。

Nor again must the communication of heat, or its transitive nature, by means of which a body becomes hot when a hot body is applied to it, be confounded with the form of heat. For heat is one

thing, heating another. Heat is produced by the motion of attrition without any preceding heat, an instance which excludes heating from the form of heat. And even when heat is produced by the approach of a hot body, this does not proceed from the form of heat, but depends entirely on a higher and more general nature, viz., on the nature of assimilation or self-multiplication, a subject which requires a separate inquiry.

另外，严禁将热传递或热的可传性与热能形式混为一谈；所谓可传性指一个物体靠近一个热的物体时就变热的性质。因为热是一回事，传热是另一回事。热因摩擦运动而产生，而不需要任何预先存在的热，这个事例表明传热不属于热的形式。即使是靠近热的物体而产生热，这种热也不能源自于热的形式，而完全是取决于更高更普遍的性质，即完全取决于同化或自身倍增的性质，这个问题需要单独研究。

Again, our notion of fire is popular, and of no use, being made up of the combination in any body of heat and brightness, as in common flame and bodies heated to redness.

还有，我们关于火的概念太通俗，而且毫无用处，即认为火这个概念是指任何物体中的热和亮的结合，例如在普通的火焰与红热的物体常可以看到的那样。

Having thus removed all ambiguity, I come at length to the true specific differences which limit motion and constitute it the form of heat.

消除了所有的模棱两可之后，最后我来谈谈那些限制运动并使它构成热形式的真正种差。

The first difference then is this. Heat is an expansive motion whereby a body strives to dilate and stretch itself to a larger sphere or dimension than it had previously occupied. This difference is most observable in flame, where the smoke or thick vapor manifestly dilates and expands itself into flame.

第一个种差是：热是一种扩张性运动，物体受热就会竭力膨胀并自我扩展成一个更大的球体或其他更大的形体，比之前占据更大体积。第二个种差在火焰中最容易观察到，火焰就是由烟或浓雾膨胀并扩张而成，这是最明显的。

It is shown also in all boiling liquid which manifestly swells, rises, and bubbles, and carries on the process of self-expansion till it turns into a body far more extended and dilated than the liquid itself, namely, into vapor, smoke, or air.

这一点也表现在所有沸腾的液体之中。液体膨胀、上升、起泡非常明显，而这种自我扩张的过程一直要持续到将自己变成一种比液体更能膨胀扩张的物体，即变成蒸汽、烟雾或空气。

It appears likewise in all wood and combustibles, from which there generally arises exudation and always evaporation.

同样，这也表现在所有木头和可燃物中。一般而言这些物体受热时会产生溢液现象，而且总是发生蒸发现象。

It is shown also in the melting of metals which, being of the compactest texture, do not readily swell and dilate, but yet their spirit being dilated in itself, and thereupon conceiving an appetite for further dilation, forces and agitates the grosser parts into a liquid state. And if the heat be greatly increased it dissolves and turns much of their substance to a volatile state.

这还表现在金属熔化过程中。金属由于有最紧密的组织，不易扩张膨胀，但其精气本身在扩张，因此，就产生了进一步膨胀的欲望，强行把较粗的分子搅成液态。如果热度大大增加，热就会熔化金属，并把其中大部分物质变成能够蒸发的状态。

It is shown also in iron or stones which, though not melted or dissolved, are yet softened. This is the case also with sticks, which when slightly heated in hot ashes become flexible.

这一点还体现在铁或石头上，石头尽管不会熔化或溶解，但可以软化。木棍便属这种情形，如果将其置于热灰中稍稍加热，就变得柔韧易曲。

But this kind of motion is best seen in air, which continuously and manifestly dilates with a slight heat, as appears in Inst. 38. Tab. 3.

但这种运动最常见于空气之中，空气只要稍稍加热就会持续明显地膨胀，见表三第三十八例。

It is shown also in the opposite nature of cold. For cold contracts all bodies and makes them shrink, insomuch that in intense frosts nails fall out from walls, brazen vessels crack, and heated glass, on being suddenly placed in the cold, cracks and breaks. In like manner air is contracted by a slight chill, as in Inst. 38. Tab. 3. But on these points I shall speak more at length in the inquiry concerning Cold. Nor is it surprising that heat and cold should exhibit many actions in common (for which see Inst. 32. Tab. 2.), when we find two of the following specific differences (of which I shall speak presently) suiting nature; though in this specific difference (of which I am now speaking) their actions are diametrically opposite. For heat gives an expansive and dilating, cold a contractive and condensing motion.

这也体现在与热相反的冷这一性质之中。因为冷可以把一切物体缩紧，使其变小，以至于在寒霜之中，钉子可以从墙中脱落，铜质器皿会破裂，热杯也会因突遇寒冷而爆碎。同样，空气稍加遇寒就会收缩，如表三第三十八例。但以上几点，我将在讨论冷时再详加细说。我们发现下面两个种差属于不同的性质（我马上要谈及）时，却又发现热与冷竟呈现出许多相似的活动（见表二第三十二例）；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不要诧异；尽管在这个种差上（我在谈论的），二者的活动完全相反相悖。这是因为热胀冷缩。

The second difference is a modification of the former, namely, that heat is a motion expansive or toward the circumference, but with this condition, that the body has at the same time a motion

upward. For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re are many mixed motions. For instance, an arrow or dart turns as it goes forward, and goes forward as it turns. And in like manner the motion of heat is at once a motion of expansion and a motion upward. This difference is shown by putting a pair of tongs or a poker in the fire. If you put it in perpendicularly and hold it by the top, it soon burns your hand; if at the side or from below, not nearly so soon.

第二个种差是对第一个种差的修正；也就是说，热是一种膨胀运动或扩展至周围的运动，但有这么一个前提条件，即物体同时向上运动。无疑有许多混合的运动。例如，箭头或飞镖前进时会转弯，转弯时会前进。同样，热的运动既是膨胀运动又是向上运动。这个种差可以通过把火钳或火钩置入火中的实验来观察。如果你手拿着火钳或火钩顶端，将其从上至下放入火中，手立刻就有灼热之感；如果从侧面或从下至上将其放入火中，手不会立刻出现灼热之感。

It is also observable in distillations *per descensorium* , which men use for delicate flowers that soon lose their scent. For human industry has discovered the plan of placing the fire not below but above, that it may burn the less. For not only flame tends upward, but also all heat.

还可以通过蒸馏瓶中的蒸馏实验来观察，即人们用蒸馏瓶从香气易失的花卉中提取香露的实验。人类经过努力发现，火置于上端比置于下端时传热要慢。因为不仅仅火焰趋于向上运动，所有的热都是向上运动的。

But let trial be made of this in the opposite nature of cold, viz.,

whether cold does not contract a body downward as heat dilates a body upward. Take therefore two iron rods, or two glass tubes, exactly alike; warm them a little and place a sponge steeped in cold water or snow at the bottom of the one, and the same at the top of the other. For I think that the extremities of the rod which has the snow at the top will cool sooner than the extremities of the other which has the snow at the bottom; just as the opposite is the case with heat.

至于这一点，可用相反性质的冷来做一下实验，即来验证一下冷是否可以使物体向下收缩，就像用热实验验证热可以使物体向上膨胀一般。取两根完全相同的铁棍或玻璃管，稍稍加热，然后把这两个东西一上一下地夹靠着在冷水或雪中浸过的海绵。我想，雪上面的铁棍两端的温度比雪下面的铁棍两端的温度要降得快些；这与热实验的结果正好相反。

The third specific difference is this: that heat is a motion of expansion, not uniformly of the whole body together, but in the smaller parts of it; and at the same time checked, repelled, and beaten back, so that the body acquires a motion alternative, perpetually quivering, striving and struggling, and irritated by repercussion, whence springs the fury of fire and heat.

第三个种差是这样的：热的膨胀运动在整个物体中并不是均匀一致的；而只有一些较小分子才是这样运动的；同时它们还会被阻碍，排斥和击回，从而导致物体产生交替运动，总是不停地在振颤着，在奋斗挣扎着，愤怒地回应着，从而迸发出火与热的愤怒。

This specific difference is most displayed in flame and boiling liquids, which are perpetually quivering and swelling in small portions, and again subsiding.

这个种差在火焰和沸液中最为明显，火焰和沸液总是不停在振颤，在小部分区域膨胀着，最后又平息下来。

It is also shown in those bodies which are so compact that when heated or ignited they do not swell or expand in bulk, as ignited iron, in which the heat is very sharp.

这个种差还体现在那些密实性物体中，密实到即使加热或烧红也不膨胀或发生肿胀式扩张，就像烧红的炽热的铁一样。

It is shown also in this, that a fire burns most briskly in the coldest weather.

还可以体现在这种现象上，即天气最冷，火势最烈。

Again, it is shown in this, that when the air is extended in a calendar glass without impediment or repulsion—that is to say, uniformly and equably—there is no perceptible heat. Also when wind escapes from confinement, although it burst forth with the greatest violence, there is no very great heat perceptible; because the motion is of the whole, without a motion alternating in the particles. And with a view to this, let trial be made whether flame

does not burn more sharply toward the sides than in the middle of the flame.

也体现在这种现象中，即温度计中的空气扩张时若没有受到阻碍或阻力——或者说均匀稳定地扩张时，我们就不会觉察到热。还有，当受阻的风突然爆发出来时，尽管最猛最烈，我们也感觉不到丝毫的热，那是因为这种运动是整体运动，而不是分子的来回运动。鉴于此，那就实验一下，验证火焰是否是周边比中心还炽热。

It is also shown in this, that all burning acts on minute pores of the body burnt; so that burning undermines, penetrates, pricks, and stings the body like the points of an infinite number of needles. It is also an effect of this, that all strong waters (if suited to the body on which they are acting) act as fire does, in consequence of their corroding and pungent nature.

也可以体现在这种现象中，即所有燃烧都是作用于燃烧物体中的细微空隙；这样，烧灼就会像无数针尖一般损毁、穿透、刺扎、叮咬着物体。火和所有烈性酒（如果适合于其作用的身体的话）具有同种效果，即，二者都有腐蚀性和刺激性。

And this specific difference (of which I am now speaking) is common also to the nature of cold. For in cold the contractive motion is checked by a resisting tendency to expand, just as in heat the expansive motion is checked by a resisting tendency to contract. Thus, whether the particles of a body work inward or outward, the mode of action is the same though the degree of strength be very different; because we have not here on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anything that is intensely cold. See Inst. 27. Tab. 1.

这个（即我现在谈论的）种差，冷这种性质也同样具有。因为冷时，收缩运动会受到扩张这种相反运动的阻碍，同样，热时扩张运动会受到收缩这种相反运动的阻碍。这样，物体的分子运动无论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运动的方式却是相同的，尽管力度有所不同；因为我们这个地球上面根本就不存在极度寒冷的东西。见表一第二十七例

The fourth specific difference is a modification of the last: it is, that the preceding motion of stimulation or penetration must be somewhat rapid and not sluggish, and must proceed by particles, minute indeed, yet not the finest of all, but a degree larger.

第四个种差是对上一个种差的修正。即上一种针刺或刺激运动必定有些疾速而非缓慢，必定也始于细小但非最小的分子运动，而是从比最小的分子稍大一些的分子开始的。

This difference is shown by a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fire with the effects of time or age. Age or time dries, consumes, undermines and reduces to ashes, no less than fire; indeed, with an action far more subtle; but because such motion is very sluggish, and acts on particles very small, the heat is not perceived.

这个种差体现在火与时间或岁月二者的后果比较上。岁月或时间可以使物体干枯、耗尽、消弱直至化为灰烬，这个过程的确比火更加细微得多，但其作用不亚于火；因为这类运动非常缓慢，而且仅仅作用于非常细小的分子，因此感觉不到热。

It is also shown by comparing the dissolution of iron and gold. Gold is dissolved without any heat being excited, while the dissolution of iron is accompanied by a violent heat, though it takes place in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reason is that in gold the separating acid enters gently and works with subtlety, and the parts of the gold yield easily; whereas in iron the entrance is rough and with conflict, and the parts of the iron have greater obstinacy.

这个种差也体现在铁与金子熔化过程的差异中。金熔解时不会产生任何热；而铁熔解时伴随着剧热，不过散热与熔解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原因是，在金子中，分离酸进入缓慢，运行极其精细，金粒子很容易产生；而铁中的分离酸是强行进入并且伴有冲突的，同时铁分子更为顽强。

It is shown also to some degree in some gangrenes and mortifications, which do not excite great heat or pain on account of the subtle nature of putrefaction.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体现在坏疽，坏疽由于腐烂时比较细微，因此不会产生剧热或疼痛。

Let this then be the First Vintage or Commencement of Interpretation concerning the form of heat, made by way of indulgence to the understanding.

以上就是热形式的“初步收获”或“初始阐释”，这都要得益于大胆

开放的理解力。

Now from this our First Vintage it follows that the form or true definition of heat (heat, that is, in relation to the universe, not simply in relation to man) is, in few words, as follows: *Heat is a motion, expansive, restrained, and acting in its strife upon the smaller particles of bodies* . But the expansion is thus modified: *while it expands all ways, it has at the same time an inclination upward* . And the struggle in the particles is modified also: *it is not sluggish, but hurried and with violence* .

我们目前的初步收获是，热的形式或热的真正定义（这种热是跟宇宙相关连的，不仅仅是人类），简述如下："热是一种扩散的、受到抑制的、作用于物体内分子的冲撞式运动。"但这种扩散受到修正："全方位扩散，同时有一种向上的倾向。"分子中的冲撞也可以得到修正："这种冲撞不是缓慢的，而是急速猛烈的。"

Viewed with reference to operation it is the same thing. For the direction is this: *If in any natural body you can excite a dilating or expanding motion, and can so repress this motion and turn it back upon itself that the dilation shall not proceed equably, but have its way in one part and be counteracted in another, you will undoubtedly generate heat* ; without taking into account whether the body be elementary (as it is called) or subject to celestial influence; whether it be luminous or opaque; rare or dense; locally expanded or confined within the bounds of its first dimension; verging to dissolution or remaining in its original state; animal, vegetable, or mineral, water, oil or air, or any other substance whatever susceptible of the above-mentioned motion. Sensible heat is the same thing; only it must be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sense. Let us now proceed to further aids.

就动作而言，这是一回事。说明如下："在任何自然物体中，如果你能激发一种膨胀式或扩散式运动，也能抑制这种运动，并将这种运动反转至其自身，从而导致膨胀不能均衡发生，而是部分膨胀，部分遭到抗阻，那么你一定会产生出热来"；不用考虑物体是（所谓的）元素构成的还是受到天体的影响；是发光的还发暗的；是稀薄的还是稠密的；是局部扩散还是局限于原有体积内；是倾向于溶解还是保持其初始状态；是动植物还是矿物、水、石油或空气，以及任何其他容易被以上提及的运动影响的物质。感官上的热也是这么一回事，不过必须联系到感官来考虑。现在，让我们讨论其他帮助。

XXI

二十一

The Tables of First Presentation and the Rejection or process of Exclusion being completed, and also the First Vintage being made thereupon, we are to proceed to the other helps of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and true and perfect Induction. In propounding which, I mean, when Tables are necessary, to proceed upon the Instances of Heat and Cold; but when a smaller number of examples will suffice, I shall proceed at large; so that the inquiry may be kept clear, and yet more room be left for the exposition of the system.

完成了以上那些初步陈列表或排除过程后，随即又得到了初步的

收获，现在我们准备往下讨论理解力在阐释自然、运用真正而又完美的归纳法时的作用。在指出这些作用时，如果说以上各类表格有必要的话，我打算按冷热事例表来进行；但是如果几个例子就足够了的话，我会详尽叙述；这样就可以保持探索的清晰性，同时还可以留下更多的空间来阐述系统。

I propose to treat, then, in the first place, of *Prerogative Instances* ; secondly, of the *Supports of Induction* ; thirdly, of the *Rectification of Induction* ; fourthly, of *Varying the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Subject* ; fifthly, of *Prerogative Natures with respect to Investigation* , or of what should be inquired first and what last; sixthly, of the *Limits of Investigation* , or a synopsis of all natures in the universe; seventhly, of the *Application to Practice* , or of things in their relation to man; eighthly, of *Preparations for Investigation* ; and lastly, of the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Scale of Axioms* .

我计划讨论九个部分；第一、“优先权事例”；第二、“归纳法证据”；第三、“归纳法校正”；第四、“调查随主题性质改变而改变”；第五、“调查的优先权或调查内容的先后性”；第六、“调查的范围或宇宙万物性质纲要”；第七、“实践应用或事物与人的关系”；第八、“调查的准备工作”；第九、“公理升降级阶”。

XXII

二十二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lace first *Solitary Instances*. Those are solitary instances which exhibit the nature under investigation in subjects which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other subjects except that nature; or, again, which do not exhibit the nature under investigation in subjects which resemble other subjects in every respect in not having that nature. For it is clear that such instances make the way short, and accelerate and strengthen the process of exclusion, so that a few of them are as good as many.

（一）讨论优先权事例中的“独特性事例”。某些调查对象与别的调查对象，除了在所展示的性质上有相似之外，毫无共同之处，这些调查对象就属独特性事例；还有一些调查对象与别的调查对象，除了所展示的性质不同之外，其他方面都很相似；这些调查对象也属独特性事例。显然，这些独特性事例不仅缩短了排除法的进程，而且还加快和增强了排除法的进程，这样，只需少数独特性事例，就能起到许多事例才能起到的作用。

For instance, if we are inquiring into the nature of color, prisms, crystals, which show colors not only in themselves but externally on a wall, dews, etc., are solitary instances. For they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colors fixed in flowers, colored stones, metals, woods, etc., except the color. From which we easily gather that color is nothing more than a modification of the image of light received upon the object, resulting in the former case from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incidence, in the latter from the various textures and configurations of the body. These instances are solitary in respect to resemblance.

比如说调查颜色的本质时，三棱镜和水晶就是独特性事例，不仅其本身可以显示出色彩，而且将色彩显示到墙壁、露珠等上面。这些事例，除了呈现出来的颜色之外，与花卉、彩石、金属、木头等固定的色彩，毫无共同之处。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很容易做出这样的推测，即颜色不过就是对物体所吸收的光影所进行的改变，在前一种独特性事例中，颜色是由于投射角度的不同而产生的，在后一种独特性事例中，颜色是由于物体组织结构的不同而产生的。这些就是相似性上的独特性事例。

Again, in the same investigation, the distinct veins of white and black in marble, and the variegation of color in flowers of the same species, are solitary instances. For the black and white streaks in marble, or the spots of pink and white in a pink, agree in everything almost except the color. From which we easily gather that color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a body, but simply depends on the coarser and as it were mechanical arrangement of the parts. These instances are solitary in respect to difference. Both kinds I call *solitary instance* s, or *ferine* , to borrow a term from astronomers.

还有，在相同的对颜色的调查中，大理石中黑白分明的纹理以及同种花卉中的斑斓色彩，都属独特性事例。因为大理石中的黑白条纹或石竹花中的红白斑点，除了颜色不同外，其他方面都一致。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很容易做出这样的推测，即颜色与物体的内在本质没有多大关系，而只是取决于其分子简陋或者说是机械的排列。这些都是种差上的独特性事例。这两种事例，我都把它们称为独特性事例，借用占星家的术语，叫“非常之星”。

XXIII

二十三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next place *Migratory Instances* . They are those in which the nature in question i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produced when it did not previously exist, or on the other hand of disappearing when it existed before. And therefore, in either transition, such instances are always twofold, or rather it is one instance in motion or passage, continued till it reaches the opposite state. Such instances not only accelerate and strengthen the exclusive process, but also drive the affirmative or form itself into a narrow compass. For the form of a thing must necessarily be something which in the course of this migration is communicated, or on the other hand which in the course of this migration is removed and destroyed. And though every exclusion promotes the affirmative, yet this is done more decidedly when it occurs in the same than in different subjects. And the betrayal of the form in a single instance leads the way (as is evident from all that has been said) to the discovery of it in all. And the simpler the migration, the more must the instance be valued. Besides, migratory instances are of great use with a view to operation, because in exhibiting the form in connection with that which causes it to be or not to be, they supply a clear direction for practice in some cases; whence the passage is easy to the cases that lie next. There is, however, in these instances a danger which requires caution; viz., lest they lead us to connect the form too much with the efficient, and so possess the understanding, or at least touch it, with a false opinion concerning the form, drawn from a view of the efficient. But the efficient is always understood to be merely the vehicle that carries the form. This is a danger, however, easily remedied by the process of exclusion legitimately conducted.

（二）讨论优先权事例中的“转换性事例”。所谓转换性事例，是指这么两类事例：一类是指所讨论的性质先无而后有，一类是指所讨论的性质先有而后失。因此，无论是在哪一种转变过程中，这些事例总是具有两面性，确切地说，在运动或转变中某个事例的状态演变到相反状态。这些事例不仅加快和增强了排除过程，而且把正面的东西或形式本身归纳到一个狭窄的范围。因为事物的形式要么是在转换过程中能够被传递的东西，要么是在这个过程中会被移除或毁坏的东西。每一次排除都会使正面得以提升，虽说如此，但这种提升在相同事物中比在不同事物中更加明显。单个事例的形式得到揭示，往往会带来所有同类事例形式的揭示（从前面所说来看非常明显）。转换越是简单，事例就越应该得到重视。此外，转换性事例，就操作过程而言，具有很大用途，因为通过展现与造成形式的原因所关联的形式，这些事例在某些情形下能给实践提供一个确切的指导，转换对于接下来的案例来说很容易。然而这些事例也存在危险，要小心提防；也就是说，要避免这些事例使我们把形式与动力因过多地联系在一起，进而避免带着对形式的错误观念，从动力因的角度，获得一种理解，或者说是沾染上这种理解；不过，动力因，就是指总是被人理解为只是承载形式的工具。然而这个危险只要采用恰当的排除法就很容易得到补救。

I must now give an example of a migratory instance. Let the nature to be investigated be whiteness. An instance migrating to production or existence is glass whole and pounded. Again, simple water and water agitated into froth. For glass and water in their simple state are transparent, not white, whereas pounded glass and water in froth are white, not transparent. We must therefore inquire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glass or water from this migration. For it is obvious that the form of whiteness is communicated and conveyed by that pounding of the glass and that agitation of the water. We find, however, that nothing has been added except the breaking up of the glass and water into small part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ir. But we have made no slight advance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form of whiteness when we know that two bodies, both transparent but in a greater or less degree (viz., air and water, or air and glass), do when mingled in small portions together exhibit whiteness, through the unequal refraction of the rays of light.

现在我得举一个转换性例子了。假设要被调查的性质是白。玻璃和碎玻璃就是一个转换导致产生或存在的例子。还有白水以及搅动成泡沫的水。玻璃和水，其本质状态是透明的，但不是白的；而碎玻璃和泡沫水是白的，但不是透明的。因此，我们必须调查玻璃或水在转换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情况。显然，白的形式是通过砸碎玻璃和搅水成沫表现出来的。然而我们看到的只是些砸碎的玻璃、搅成的水沫和吸进的空气，其他什么也没有增加。两个本身或多或少透明的物体（即空气与水，或空气与玻璃）一旦变成碎粉，由于光线折射不均的缘故而呈现出“白”的性质。然而即使知道这一点，我们在发现白的形式上依然没有取得丝毫的进步。

But an example must at the same time be given of the danger and caution to which I alluded. For at this point it might readily suggest itself to an understanding led astray by efficient causes of this kind, that air is always required for the form of whiteness, or that whiteness is generated by transparent bodies only—notions entirely false, and refuted by numerous exclusions. Whereas it will be found that (setting air and the like aside) bodies entirely even in the particles which affect vision are transparent, bodies simply uneven are white; bodies uneven and in a compound yet regular texture are all colors except black; while bodies uneven and in a compound, irregular, and confused texture are black. Here then I have given an example of an instance migrating to production or

existence in the proposed nature of whiteness. An instance migrating to destruction in the same nature of whiteness is froth or snow in dissolution. For the water puts off whiteness and puts on transparency on returning to its integral state without air.

但同时还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提及到的危险和警戒。因为在这一点上，动力因带来了一个错误的理解，即认为空气对白的形式来说是必需的，或认为白只是透明性物体产生的——这些观念完全错误，而且可以用许多反例来反驳。相反，可以发现（空气及类似东西姑且不论），凡是其内部影响视觉的分子完全均匀的物体都是透明的，而不均匀的物体都是白的；纹理不均匀但很规则的复合物体，可以是黑色之外的任何颜色，而纹理既不均匀又不规则而且还很混杂的复合物体必然是黑色的。以上所给事例就是性质转换性事例，即向白这一性质转换生成的事例。至于白这一性质的转换消减，转换性事例就是溶解中的泡沫或雪。水没有空气而处于整体状态时就透露出白色，而且呈现出透明性。

Nor must I by any means omit to mention that under migratory instances are to be included not only those which are passing toward production and destruction, but also those which are passing toward increase and decrease; since these also help to discover the form, as is clear from the above definition of form and the *Table of Degrees* . The paper, which is white when dry, but when wetted (that is, when air is excluded and water introduced) is less white and approaches nearer to the transparent, is analogous to the above given instances.

无论如何，有一点我还是不能不提，即转换性事例不仅包括向生或向灭的转换性事例，也包括向增或向减的转换性事例；因为这些事

例也有助于发现形式，这一点在上文的形式界定和《程度表》中说得很清楚。纸，干燥时呈白色，浸湿时（即排气吸水）却是浅白色，而且接近透明；这与以上事例并无二致。

XXIV

二十四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third place *Striking Instances* , of which I have made mention in the First Vintage Concerning Heat, and which I also call *Shining Instances* , or *Instances Freed and Predominant* . They are those which exhibi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naked and standing by itself, and also in its exaltation or highest degree of power; as being disenthralled and freed from all impediments, or at any rate by virtue of its strength dominant over, suppressing and coercing them. For since every body contains in itself many forms of natures united together in a concrete state, the result is that they severally crush, depress, break, and enthrall one another, and thus the individual forms are obscured. But certain subjects are found wherein the required nature appears more in its vigor than in others, either through the absence of impediments or the predominance of its own virtue. And instances of this kind strikingly display the form. At the same time in these instances also we must use caution, and check the hurry of the understanding. For whatever displays the form too conspicuously and seems to force it on the notice of the understanding should be held suspect, and recourse be had to a rigid and careful exclusion.

（三）讨优先权事例中“醒目性事例”。这些事例，我在“关于热形式的初步收获”中已有所提及，我把它们称为“耀眼事例”，或“独立而又占优势的事例”。这些事例将正在讨论的性质赤裸裸地，单独地展示出来，同时也将具有最高地位和最高力量的性质展示出来；这是它们因为摆脱了一切障碍，或者说至少借助于力量上的优势，压制并克服了这些障碍。每个物体在固体状下本身都具有多重性质，而且这些性质的形式具有多重性，正因如此，这些性质会彼此冲突，彼此抑制，彼此约束；从而磨灭了各自独特的形式。但是在某些物体中，我们发现所需的性质比在其他物体中更加有力，原因是它们要么摆脱了障碍，要么其本性占有优势。这类事例非常醒目地将形式展现出来。同时在这些事例中，我还必须有所警戒，要避免理解上的冒进性。凡是形式突显而且似乎要迫使理解力去关注的事物，都应该引起怀疑，解决办法就是借助严格而仔细的排除。

To take an example: let the nature inquired into be heat. A striking instance of the motion of expansion, which (as stated above) is the main element in the form of heat, is a calendar glass of air. For flame, though it manifestly exhibits expansion, still, as susceptible of momentary extinction, does not display the progress of expansion. Boiling water, too, on account of the easy transition of water to vapor or air, does not so well exhibit the expansion of water in its own body. Again, ignited iron and like bodies are so far from displaying the progress of expansion that in consequence of their spirit being crushed and broken by the coarse and compact particles which curb and subdue it, the expansion itself is not at all conspicuous to the senses. But a calendar glass strikingly displays expansion in air, at once conspicuous, progressive, permanent, and without transition.

举例说明：假设要讨论的性质是热。关于膨胀运动，醒目性事例

就是空气温度计；所谓膨胀运动（如上所述），就是热的形式的主要要素。火焰尽管能非常明显地呈现出膨胀性，但可能转瞬即熄，因此，无法显示出其膨胀过程。由于水容易蒸发或汽化，沸水本身无法很好展现出水的膨胀性。还有，炽铁和类似的物体也远远不能显示膨胀的过程，因其分子本遏制精华，而且由于分子太粗糙、太紧凑，进而压制击碎了精华，因此，我们感官几乎感知不到膨胀。但温度计展示空气的膨胀性非常醒目，并且清晰可见，循序渐进，永远不变，而且无须过渡。

To take another example: let the nature inquired into be weight. A striking instance of weight is quicksilver. For it far surpasses in weight all substances but gold, and gold itself is not much heavier. But quicksilver is a better instance for indicating the form of weight than gold, because gold is solid and consistent, characteristics which seem related to density; whereas quicksilver is liquid and teeming with spirit, and yet is heavier by many degrees than the diamond and other bodies that are esteemed the most solid. From which it is obvious that the form of heaviness or weight depends simply on quantity of matter and not on compactness of frame.

再举一例：假设所讨论的性质是重量。关于重量，水银就是醒目性事例。水银比除金子以外的所有物质都要重得多，但金本身并没有比水银重太多。但是要论说明重量，水银这个事例比金子更具有说服力，因为金子是固体，而且结实，这些特点仿佛与密度有关；而水银是液体，充满着精华，但却比钻石和其他被视为最坚实的物体还要重许多。这些事例很明显，沉或重这种形式只是取决于物质的量，而不取决于物质的结构紧密性。

XXV

二十五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fourth place *Clandestine Instances* , which I also call *Instances of the Twilight* , and which are pretty nearly the opposites of Striking Instances. For they exhibit the nature under investigation in its lowest degree of power, and as it were in its cradle and rudiments; striving indeed and making a sort of first attempt, but buried under and subdued by a contrary nature. Such instances, however, are of very great service for the discovery of forms; because as striking instances lead easily to specific differences, so are clandestine instances the best guides to *genera* , that is, to those common natures whereof the natures proposed are nothing more than particular cases.

（四）讨论优先权事例中的“隐晦性事例”，又称“半暗半明事例”，与醒目性事例几乎正好相反。因为这些事例用来展示所研究的性质，力度级别最低，而它们所展示的性质仿佛还是在摇篮和雏形中，这些事物虽然的确在尽力而且初步尝试着展示所研究的性质，但却被相反的性质所掩埋和压制。然而这种事例对发现形式具有极大的帮助；因为醒目性事例很容易导致种差，同样，隐性事例最善于引导到“类别”，就是说，引导到共同性质，而所提出的性质不过是具体事例而已。

For example, let the nature proposed be consistency, or the nature of that which determines its own figure, opposed to which is fluidity. Those are clandestine instances which exhibit some feeble

and low degree of consistency in a fluid: as a bubble of water, which is a sort of consistent pellicle of determined figure, made of the body of the water. Of a similar kind are the droppings from a house, which if there be water to follow, lengthen themselves out into a very thin thread to preserve the continuity of the water; but if there be not water enough to follow, then they fall in round drops, which is the figure that best preserves the water from a solution of continuity. But at the very moment of time when the thread of water ceases and the descent in drops begins, the water itself recoils upward to avoid discontinuation. Again in metals, which in fusion are liquid but more tenacious, the molten drops often fly to the top and stick there. A somewhat similar instance is that of children's looking glasses, which little boys make on rushes with spittle, where also there is seen a consistent pellicle of water. This, however, is much better shown in that other childish sport when they take water, made a little more tenacious by soap, and blow it through a hollow reed, and so shape the water into a sort of castle of bubbles which by the interposition of the air become so consistent as to admit of being thrown some distance without discontinuation. But best of all is it seen in frost and snow, which assume such a consistency that they can be almost cut with a knife, although they are formed out of air and water, both fluids. All which facts not obscurely intimate that consistent and fluid are only vulgar notions, and relative to the sense; and that in fact there is inherent in all bodies a disposition to shun and escape discontinuation; but that it is faint and feeble in homogeneous bodies (as fluids), more lively and strong in bodies compounded of heterogeneous matter; the reason being that the approach of heterogeneous matter binds bodies together, while the insinuation of homogeneous matter dissolves and relaxes them.

比如，假设所调查的性质为凝聚性，所谓凝聚性即决定事物形状，与流动性相反的性质。这些属于隐性事例，在液体中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软柔性和低度浓稠性：如水泡，是一种由水这个物体构成的具有一定形状和浓稠度的薄膜。类似的事例还有屋檐滴水；如果滴水不断，那么水滴就会变连成细细密密的线条，从而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但如果无水续流，那么水就以水珠的状态掉落；而水滴落时最能保持水的持续性。每当水停止其线状滴落而开始点状滴落时，水落下后再向上回弹，以避免中断。又比如熔化的金属呈液体状但具有黏性，熔化的液滴往往飞溅到顶层并黏附在那儿。有几分类似的事例就是孩子们用的眼镜，眼镜是用灯草和唾沫做成的，镜中也可看见一个由水构成的稠状薄膜。不过，还有一个儿童运动更能体现这一点，即用肥皂将水调黏，用芦苇杆把水吹成由一个个气泡构成的城堡，肥皂泡因有空气而变得很结实，即使扔到很远也不破灭。但是最好的事例要算霜与雪，尽管它们是由空气和水这两种液体构成，但由于其凝聚性，能承受刀剑切割。以上所有事例都清晰地揭示了：凝聚性和液体都不过是模糊的概念，相对于感觉而已；而事实上，所有物体都有一种内在的、可避免断续的倾向；然而这种倾向在同质性物体（如流质）中软弱无力，而在异质性合成物体中更加活跃和强劲；理由是，异质加入可黏结物体，而同质渗入可松解物体。

To take another instance, let the proposed nature be the attraction or coming together of bodie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its form the most remarkable striking instance is the magnet. But there is a contrary nature to the attractive; namely, the nonattractive, which exists in a similar substance. Thus there is iron which does not attract iron, just as lead does not attract lead, nor wood wood, nor water water. Now a clandestine instance is a magnet armed with iron, or rather the iron in an armed magnet. For it is a fact in nature that an armed magnet at some distance off does not attract iron more powerfully than an unarmed magnet. But if the iron be brought so near as to touch the iron in the armed magnet, then the

armed magnet supports a far greater weight of iron than a simple and unarmed magnet, on account of the similarity of substance between the pieces of iron; an operation altogether clandestine and latent in the iron before the magnet was applied. Hence it is manifest that the form of coition is something which is lively and strong in the magnet, feeble and latent in iron. Again,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small wooden arrows without an iron point, discharged from large engines, pierce deeper into wooden material (say the sides of ships, or the like) than the same arrows tipped with iron, on account of the similarity of substance between the two pieces of wood; although this property had previously been latent in the wood. In like manner, although air does not manifestly attract air or water water in entire bodies, yet a bubble is more easily dissolved on the approach of another bubble than if that other bubble were away, by reason of the appetite of coition between water and water, and between air and air. Such clandestine instances (which, as I have said, are of the most signal use) exhibit themselves most conspicuously in small and subtle portions of bodies; the reason being that larger masses follow more general forms, as shall be shown in the proper place.

另举一例，假设所调查的性质是吸引力，或物体的聚合。在调查该性质的形式时，磁石是最明显、最显性的事例。但也有一种与吸引相反的性质，即物质相斥性，所谓相斥指相同物质之间存在着排斥性。因此，铁与铁不相吸引，同样，铅与铅不相吸引，木与木不相吸引，水与水也不相吸引。这里有一个隐性事例，即嵌入铁内的磁石，准确地说是嵌了磁石的铁。嵌入铁内的磁石如果置于一定距离之外，其吸引力并不如无铁的磁石，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如果把铁拿近带有磁石的铁时，那么嵌入铁的磁石比普通磁石吸住铁的重量远远重得多，因为铁与铁属于同类物质；而铁的这种活动，在磁石靠近之前，完全是隐而不显，藏而不露。由此可见，相吸这种形式在磁石中

极为活跃而且极为强烈，但在铁中却极为微弱而且藏而不露。还有一例，从中可以看到，未装铁箭头的小木箭，如果用大型机弩发射，钻入木质（如船体或类似的物体）物体的深度比装有铁箭头的箭还要深，这是因为木与木质物质相同的缘故；然而此前这种特性在木头中是藏而不露的。同样，虽然从整体来看，显然空气与空气、或者水与水不相吸引，但是水泡靠近水泡时就比水泡之间保持距离时更加容易破裂，这是因为水与水，空气与空气有相互吸引的欲望。此类隐性事例（如前所举的例子最为明显）最明显地体现于物体的细小和精微部分；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物体都要遵循更为普遍的形式，这一点在合适的时候我们会谈到。

XXVI

二十六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fifth place *Constitutive Instances* , which I also call *Manipular* . They are those which constitute a single species of the proposed nature, a sort of Lesser Form. For since the genuine forms (which are always convertible with the proposed natures) lie deep and are hard to find, it is required by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nd the infirmity of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that particular forms, which collect together certain groups of instances (though not all) into some common notion, be not neglected, but rather be diligently observed. For whatever unites nature, though imperfectly, paves the way to the discovery of forms. Instances, therefore, which are useful in this regard are of no despicable power, but have a certain prerogative.

（五）讨论优先权事例中“构成性事例”，又称为“操作性事例”。这些事例单独构成调查性质中的一个种类，一种次级形式。因为真正的形式（总是与所调查的性质互逆的）位于深处，不易发现，由于事情有各种情况以及人类理解力有缺陷，这就要求对各种具体形式，不能忽而略之，反而要勤加关注，因为这些具体形式将许多事例分组（尽管并不全面）然后聚集形成了某种公共观念。凡是能合成一种性质的东西，尽管并不完美，但都给形式的发现铺平了道路。因此，凡是能达到这一目的事例，尽管具有不可轻视的权力，但也具有某种优先权。

But great caution must here be employed lest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after having discovered many of those particular forms and thereupon established partitions or divisions of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content to rest therein, and instead of proceeding to the legitimate discovery of the great form,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the nature from its very roots is manifold and divided, and so reject and put aside any further union of the nature, as a thing of superfluous subtlety and verging on mere abstraction.

但是这里必须慎重警告，人类理解力切不可满足于而且只停留在发现许多具体形式并确立所调查性质的切分或归类，非但不继续去发现伟大形式，反而认为性质从根本上说具有多面性和可分性，将性质的任何进一步结合都视为一种没有必要的精细而且近似纯抽象的东西，而加以拒绝而置之一旁。

For example, let the proposed nature be memory, or that which excites and aids the memory. Constitutive instances are: order or distribution, which clearly aids the memory; also topics or “places” in artificial memory; which may either be places in the proper sense

of the word, as a door, angle, window, and the like; or familiar and known persons; or any other things at pleasure (provided they be placed in a certain order), as animals, vegetables; words, too, letters, characters, historical persons, and the like; although some of these are more suitable and convenient than others. Such artificial places help the memory wonderfully, and exalt it far above its natural powers. Again, verse is learned and remembered more easily than prose. From this group of three instances, viz., order, artificial places, and verse, one species of aid to the memory is constituted. And this species may with propriety be called the cutting off of infinity. For when we try to recollect or call a thing to mind, if we have no prenotion or perception of what we are seeking, we seek and toil and wander here and there, as if in infinite space. Whereas, if we have any sure prenotion, infinity is at once cut off, and the memory has not so far to range. Now in the three foregoing instances the prenotion is clear and certain. In the first it must be something which suits the order; in the second it must be an image which bears some relation or conformity to the places fixed; in the third, it must be words that fall into the verse; and thus infinity is cut off. Other instances, again, will give us this second species: that whatever brings the intellectual conception into contact with the sense (which is indeed the method most used in mnemonics) assists the memory. Other instances will give us this third species: that things which make their impression by way of a strong affection, as by inspiring fear, admiration, shame, delight, assist the memory. Other instances will give us this fourth species: that things which are chiefly imprinted when the mind is clear and not occupied with anything else either before or after, as what is learned in childhood, or what we think of before going to sleep, also things that happen for the first time, dwell longest in the memory. Other instances will give us this fifth species: that a multitude of circumstances or points to take hold of aids the

memory; as writing with breaks and divisions, reading or reciting aloud. Lastly, other instances will give us this sixth species: that things which are waited for and raise the attention dwell longer in the memory than what flies quickly by. Thus, if you read anything over twenty times, you will not learn it by heart so easily as if you were to read it only ten, trying to repeat it between whiles, and when memory failed, looking at the book. It appears, then, that there are six lesser forms of aids to the memory; viz.: the cutting off of infinity; the reduc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to the sensible; impression made on the mind in a state of strong emotion; impression made on the mind disengaged; multitude of points to take hold of; expectation beforehand.

比如，假设所调查的性质是记忆或是那种可激起和帮助记忆的东西。构成性事例有：秩序或分布，这显然有助于记忆；其次是人工记忆中的话题或“情境”；所谓“情境”，要么指门、角、窗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要么指熟悉而知名的人，要么就是任何其他为人所喜的东西（只要置于特定位置），如动物、植物、文字，还有字母、剧中人物、历史人物等诸如此类；尽管这些东西中有些比其他更适用、更方便。这种人为的“情境”非常有助于记忆，使其能超越自然能力。第三是韵文，韵文较之于散文易学易记。这一组的三个事例，即秩序、情境、韵文，构成了一种对记忆的帮助。这种记忆可以确切地称为对无限性的切断。因为当我们力图回忆一件事，或说一件事涌上心头时，如果我们对正在追求的东西没有先入的观念或认识，那么我们就会四处寻觅，到处跋涉，东游西荡，仿佛置身于无限空间之中。但是，只要有任何确切的先入观念，无限性立刻就会被切断，记忆也就不会无边遐想了。以上三个事例中，先入观念很清楚也很确切。第一个事例是指必须适合于秩序的东西；第二个事例是指必须与具体的“情境”有某种关系或一致的意象；第三个事例是指押韵成文的文字；这样就可以切断无限性了。给我们提供帮助的第二种事例是：凡是将智力概念与感官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这是记忆术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方法）都有

助于记忆。给我们提供帮助的第三种事例是：那些通过强烈情感而让人产生印象的东西，比如引起人恐惧、钦佩、羞愧、愉悦等，有助于记忆。给我们提供帮助的第四种事例是：那些心明灵净，既不思前也不虑后时而铭刻于心的主要东西，如儿时所学或睡前所思的东西，还有那些第一次经历而永存记忆中的东西。给我们提供帮助的第五种事例是：那些萦绕心头的各种境遇或情况有助于记忆；比如写作时的停顿分章，大声阅读或朗读。给我们提供帮助的最后一种事例是：有些事情令人期待而且引人注意，有些事情转瞬即逝；前者比后者记忆得更为长久。因此，如果说任何东西读了二十多遍都还记不住，那还不如边读边背，忘了就背，而且尽力反复重复，即使只读十遍也能记住。有助于记忆的似乎有六种次级形式，即：切断无限性；将智力还原于感官；怀有强烈情感时所产生的心理印象；超然状态下所产生的心理印象；萦绕心头的各种情况；预先期待。

To take another example, let the proposed nature be taste or tasting. The following instances are Constitutive. Persons who are by nature without the sense of smell cannot perceive or distinguish by taste food that is rancid or putrid, nor food that is seasoned with garlic, or with roses, or the like. Again, persons whose nostrils are accidentally obstructed by a catarrh cannot distinguish or perceive anything putrid or rancid or sprinkled with rosewater. Again, persons thus affected with catarrh, if while they have something fetid or perfumed in their mouth or palate they blow their nose violently, immediately perceive the rancidity or the perfume. These instances, then, will give and constitute this species, or rather division, of taste: that the sense of taste is in part nothing else than an internal smell, passing and descending from the upper passages of the nose to the mouth and palate. On the other hand the tastes of salt, sweet, sour, acid, rough, bitter, and the like, are as perceptible to those in whom the sense of smell is wanting or stopped as to anyone else; so that it is clear that the sense of taste is a sort of

compound of an internal smell and a delicate power of touch—of which this is not the place to speak.

另举一例，假设所调查的性质是味道或味觉。下面的事例属于可构性事例。天生没有嗅觉的人，是无法通过嗅觉感知或区分变质食品，也无法判断或区分出加有大蒜、玫瑰或类似调料的食品。还有，如果偶患感冒而鼻塞，变质或洒有玫瑰香水的东西，人也是无法区分或感知到的。再者，人患感冒时，口中或上颚的东西无论是香的还是臭的，只要猛力擤出鼻涕，臭气还是香味立刻便知。因此，这些事例就会给出和构成这么一种味觉，确切地说，是味觉的一个分支：所谓味觉，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内嗅觉，从鼻子的上端通道向下通至口和上颚。另一方面，咸、甜、酸、辣、苦、涩和类似的味觉，即使那些没有嗅觉或嗅觉受阻的人，也能像别人一样感知得到；所以显然味觉是一种内嗅觉力和微妙触觉力的复合体，关于微妙的触觉力量，此处不讲。

To take another example, let the proposed nature be the communication of quality without admixture of substance. The instance of light will give or constitute one species of communication; heat and the magnet another.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light is momentaneous, and ceases at once on the removal of the original light. But heat and the virtue of the magnet, after they have been transmitted to or rather excited in a body, lodge and remain there for a considerable time after the removal of the source of motion.

另举一例，假设所调查的性质是不掺杂物质的特质传递。光这种事例就会给出或构成一种传递；热和磁石给出或构成另一种传递。因为光的传递具有瞬时性，光源一旦消除，光的传递就会立刻终止。但

热和磁性，一旦转换到某一物体上，确切地说，在某一物体中激活出来，就算移开运动之源，也会在那儿停留和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Very great, in short, is the prerogative of constitutive instances; for they are of much use in the forming of definitions (especially particular definitions) and in the division and partition of natures; with regard to which it was not ill said by Plato, “That he is to be held as a god who knows well how to define and to divide.”

总之，可构性事例具有很大的优点；因为这些事例在形成定义（尤其是具体的定义）和区分鉴别性质时很管用；关于这一点，柏拉图说得不错：“但凡知道如何界定区分者皆可视为神灵。”

XXVII

二十七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sixth place *Instances Conformable* , or *of Analogy* ; which I also call *Parallels* , or *Physical Resemblances* . They are those which represent the resemblances and conjugations of things, not in lesser forms (as constitutive instances do) but merely in the concrete. Hence they may be called the first and lowest steps toward the union of nature. Nor do they constitute any axiom immediately from the beginning, but simply point out and mark a certain agreement in bodies. But although they are of little use for the discovery of forms, they nevertheless are very serviceable in revealing the fabric of the parts

of the universe, and anatomizing its members; from which they often lead us along to sublime and noble axioms, especially those which relate to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world rather than to simple forms and natures.

（六）讨论优先权事例中“契合性事例”，或“相似性事例”，又称“孪生性事例”，或“外观相似性事例”。这类事例表明，事物之间的相似和共轭性不仅体现在次级形式上（如可构性事例），也体现在内质上。因此，这类事例可谓走向性质联合的最初和最低级的步骤。这类事例也并非一开始就直接构成公理，而只是指出和标记物体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不过，这类事例，尽管对发现形式没有什么用处，但在揭示宇宙各部分的结构和解剖其成分时非常有用；这类事例常常将我们引向雄伟崇高的公理，尤其是将我们引向那些涉及世界结构的公理，而不是引向那些简单形式和性质。

For example, these following are instances of conformity: a looking glass and the eye; and aga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ar and places returning an echo. From which conformity, to say nothing of the mere observation of the resemblance which is in many respects useful, it is easy to gather and form this axiom—that the organs of the senses, and bodies which produce reflections to the senses, are of a like nature. Again, upon this hint the understanding easily rises to a higher and nobler axiom, which is this: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sents or sympathies of bodies endowed with sensation and those of inanimate bodies without sensation, except that in the former an animal spirit is added to the body so disposed, but is wanting in the latter. Whence it follows that there might be as many senses in animals as there are sympathies between inanimate bodies, if there were perforations in the animate body allowing the animal spirit to pass freely into a member rightly

disposed, as into a fit organ. Again, as many as are the senses in animals, so many without doubt are the motions in an inanimate body where animal spirit is wanting; though necessarily there are many more motions in inanimate bodies than there are senses in animate, on account of the paucity of organs of sense. And of this a manifest example is exhibited in pain. For though there are many kinds and varieties of pain in animals (as the pain of burning, for one, of intense cold for another; again, of pricking, squeezing, stretching, and the like), it is yet most certain that all of them, as far as the motion is concerned, exist in inanimate substances; for example, in wood or stone, when it is burned or frozen or pricked or cut or bent or stretched, and so on, though they do not enter the senses for want of the animal spirit.

比如，下面这些事例就是契合性事例：眼镜与眼睛；还有耳朵结构与回声壁。从这种契合性事例中就可轻而易举地推测和形成这么一条公理，即感觉器官与作用于感官的物体之间具有某种相似的性质，更何况这种相似性有许多用处，只须观察一下即可。而且有了这点暗示，理解力就容易上升到更高级更高贵的公理，也就是：有感觉的物体之间存在感应或交感，没有感觉的物体之间也存在感应或交感；这两类感应或交感并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前者物体之中多了一种动物的精气，而后者少了这种的精气。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有生命体的孔穴可让动物精气自由输入其固有的肢体以及适当的器官之中，那么动物身上存在的感觉与无生命体上存在的交感是等量的。还可推断出，动物有多少感觉，缺乏动物精气的无生命体无疑就有多少运动；不过，无生命体，由于缺乏感觉器官，因此，它产生的运动就要比有生命体的感觉要多得多。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明显的事例就是疼痛。动物身上有许多种类各异的疼痛（灼痛、冷痛、还有刺痛、压痛、伸痛等等）；尽管如此，最肯定的是，所有这些疼痛在无生命物质中都是以运动形式存在，比如，木头或石头在遭到火烧、冷冻、戳破、劈刺、弯压、拉直时等等，由于没有动物精气，所以感觉不到这些疼痛。

Again, the roots and branches of plants (which may seem strange) are conformable instances. For all vegetable matter swells and pushes out its parts to the surface, as well upward as downward. Nor is there any other difference between roots and branches than that the root is buried in the ground, while the branches are exposed to the air and sun. For if you take a tender and flourishing branch of a tree, and bend it down into a clod of earth, although it does not cohere with the ground itself, it presently produces not a branch but a root. And vice versa, if earth be placed at the top, and so kept down with a stone or any hard substance as to check the plant and prevent it from shooting upward, it will put forth branches into the air downward.

还有植物的根与枝（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也属于契合性事例。所有植物性物质都会膨胀扩展到物质表层部分，向上向下的膨胀扩展是一样的。树根与树枝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不同就在于，前者埋藏于土壤之下，后者暴露于空气之中，暴露于阳光之下。如果将一条柔嫩而繁茂的树枝埋入土中，虽与土壤难以黏合，但随即生出来的不是枝而是根。相反，如果将土放置在上面，并用石头或其它坚硬物质压着，阻止其向上生长，树枝就会向下在空气中分出枝来。

Again, the gums of trees, and most rock gems, are conformable instances. For both of these are nothing else than exudations and filterings of juices, the former from trees, the latter from rocks; whence is produced the splendor and clearness in each, that is, by the fine and delicate filtering. Hence, too, it is that the hairs of animals are not generally so beautiful and of so vivid a color as the feathers of birds, viz., because the juices do not filter so finely through skin as through quills.

契合性事例还有树胶和大多数的石中宝物。因为二者都不过是渗滤出来的汁液，前者从树中渗滤出来，后者从岩石中渗滤出来；二者之所以光彩夺目、澄净明晰，都是因为经过了精细过滤的缘故。同样，兽毛之所以不如鸟羽那么美丽，那么色彩鲜艳，也是这个原因，即从皮肤中滤出的汁液不如从羽茎中过滤的汁液那么精细。

Again, the scrotum in males and the matrix in females are conformable instances. So that the great organ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xes (in land animals at least) appears to be nothing more than that the one organization is external and the other internal. That is to say, the greater force of heat in the male thrusts the genitals outward; whereas in the female the heat is too feeble to effect this, and thus they are contained within.

还有，男性的阴囊和女性的子宫，也属于契合性事例。两性（至少是陆地动物）器官最大的区别看似只是在器官组织上：一个在外，一个在内。也就是说，男性热力较大而将生殖器突出在外，而女性热力较弱难以达此效果，所以生殖器只能藏于内。

The fins of fish, again, and the feet of quadrupeds, or the feet and wings of birds, are conformable instances; to which Aristotle has added the four folds in the motions of serpents. Whence it appears that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the motions of living creatures are generally effected by a quaternion of limbs or of bendings.

还有鱼鳍兽足、鸟脚翅翼都属契合性事例；亚里士多德还为此加

上蛇类的四重摺叠而行。由此可见，宇宙结构中，但凡生物，其运动一般皆以肢体四分或四曲而行。

Again, the teeth of land animals and the beaks of birds are conformable instances; from which it is manifest that in all perfect animals there is a determination of some hard substance to the mouth.

还有陆地动物的牙齿和鸟嘴也属于契合性事例；在这些事例中，显然所有完整的动物，口中都有某种坚硬的物质。

Nor is that an absurd similitude of conformity which has been remarked between man and a plant inverted. For the root of the nerves and faculties in animals is the head, while the seminal parts are the lowest—the extremities of the legs and arms not reckoned. In a pla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root (which answers to the head) is regularly placed in the lowest part, and the seeds in the highest.

同样，如果说人与倒置的植物之间在契合性上存在某种相似之处，这也没什么荒谬的。动物器官和神经的根本在头部，而生殖器官却在最下部——腿与臂两端除外。而植物却相反，其根本（相当于头）通常在最下部，种子却长在最高处。

To conclude, it cannot too often be recommended and enjoined that men's diligence in investigating and amassing natural history be henceforward entirely changed and turned into the direction opposite to that now in use. For hitherto men have used great and

indeed overcurious diligence in observing the variety of things, and explaining the exact specific differences of animals, herbs, and fossils; most of which are rather sports of nature than of any serious use toward science. Such things indeed serve to delight, and sometimes even give help in practice; but for getting insight into nature they are of little service or none. Men's labor therefore should be turned to the investigation and observation of the resemblances and analogies of things, as well in wholes as in parts. For these it is that detect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itution of sciences.

总之，我要不厌其烦地说，从今以后，在调查和收集自然历史时，人应该把功夫完全用到与目前所用的相反方向。迄今为止，人们下了很大工夫，精心观察事物的多样性，解释动物、草类和化石的精确种差；其中大部分，与其说它们对科学有什么真正的用途，还不说它们是在戏弄自然。此类东西诚然有助于娱乐，甚至有时有助于实践；但若论洞察自然，用处不大或一无是处。因此，人们应该将功夫转到调查和观察事物的相似性和类似性，既要观察整体，又要观察局部。只有这样才能探测出自然的统一性，为科学的建立奠定一个基础。

But here must be added a strict and earnest caution, that those only are to be taken for conformable and analogous instances which indicate (as I said at the beginning) physical resemblances, that is, real and substantial resemblances; resemblances grounded in nature, not accidental or merely apparent; much less superstitious or curious resemblances, such as the writers on natural magic (very frivolous persons, hardly to be named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serious matters as we are now about) are everywhere parading—similitudes and sympathies of things that have no reality, which

they describe and sometimes invent with great vanity and folly.

但在这儿，还得提出一个严格而又诚恳的警告，即只有那些呈现出（正如我在开头所说的）真正相似外形的事例，才能称为契合性事例；也就是说，真正物质上的相似性是指本质上相似性，而不是偶然的相似或只是外观相似；更不是那种迷信和幻奇的相似性，这些都是自然幻术作家们四处炫耀的，是他们虚妄愚蠢之极描写的而且有时是虚构出来的。

But to leave these. The very configuration of the world itself in its greater parts presents conformable instances which are not to be neglected. Take, for example, Africa and the region of Peru with the continent stretching to the Straits of Magellan, in each of which tracts there are similar isthmuses and similar promontories, which can hardly be by accident.

这些撇开不谈。但就世界结构本身，其绝大部分都为我们提供了契合性事例，这一点不可忽视。以非洲和秘鲁地区及其延伸至麦哲伦海峡的大陆为例，这里随处都有相似的地峡和相似的海角，这决不能说是纯属偶然。

Again, there is the Old and New World, both of which are broad and extended towards the north, narrow and pointed towards the south.

还有，如今存在新与旧两个世界，二者都地域辽阔，北部宽敞开阔，南部狭窄辽远。

We have also most remarkable instances of conformity in the intense cold existing in what is called the middle region of the air and the violent fires which are often found bursting forth from beneath the ground, which two things are *ultimities* and extremes; that is to say, the extreme of the nature of cold toward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sky, of heat toward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by *antiperistasis* or the rejection of the contrary nature.

还有最显著的契合性事例，即存在于所谓中间大气层中的极寒与常见于地下突然喷发的烈火，二者是两个“极点”或极端，换句话说，一个是天之外的冷至极端，一个是地之腹的热至极端，都是由对立性质的“相反”相斥所致。

Lastly, the conformity of instances in the axioms of science is deserving of notice. Thus the rhetorical trope of deceiving expectation is conformable with the musical trope of avoiding or sliding from the close or cadence; the mathematical postulate that if two things are equal to the same thing they are equal to one another is conformable with the rule of the syllogism in logic which unites propositions agreeing in a middle term. In fine, a certain sagacity in investigating and hunting out physical conformities and similitudes is of very great use in very many cases.

最后，科学原理中的契合性事例也值得注意。修辞学上有奇峰突起的转义，乐谱中有避免突止的顿扬法，二者两相契合。数学有这么一个假设，即“两物若与一物相等，那么此两物彼此相等”，逻辑学有这么一个三段论规则，即命题与命题由中项相连；二者两相契合。最后，调查和猎取外形上的契合性和相似性时，如果敏锐一点，那么在

许多时候都有很大用处。

XXVIII

二十八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seventh place *Singular Instances* , which I also call *Irregular* or *Heteroclite* , to borrow a term from grammarians. They are such as exhibit bodies in the concrete, which seem to be out of the course and broken off from the order of nature, and not agreeing with other bodies of the same kind. For conformable instances are like each other; singular instances are like themselves alone. The use of singular instances is the same as that of clandestine, namely, to raise and unite nature for the purpose of discovering kinds of common natures, to be afterward limited by true specific differences. For we are not to give up the investigation until the properties and qualities found in such things as may be taken for miracles of nature be reduced and comprehended under some form or fixed law, so that all the irregularity or singularity shall be found to depend on some common form, and the miracle shall turn out to be only in the exact specific differences, and the degree, and the rare concurrence, not in the species itself. Whereas now the thoughts of men go no further than to pronounce such things the secrets and mighty works of nature, things as it were causeless, and exceptions to general rules.

（七）讨论优先权事例中的“特殊性事例”，借用语法学家的术语，又称“不规则或非常规事例”。这些事例揭示具体状态下的物体，

这些物体仿佛偏出了自然的轨迹，脱离了自然的秩序，与其他同类物体不一致。因为契合性事例彼此相似；特殊性事例则自身相似。特殊性事例与隐性事例，二者作用相同，即突显和整合性质，其目的是发现各种共性，以便以后用真正的种差来加以限制。我们绝不会放弃调查，除非在这些事物中找到了其属性和特质；而这些事物可能被视为自然奇迹，并且归入某种形式或固定的法则来理解，这样就会发现所有非规则性或特性都是依赖于某种普通形式，而奇异之事最终只不过在于真正的种差，在于程度，在于寡同，而不在于种属本身。然而如今人们还没有摆脱这种思想，即仍然声称此类事情乃自然之秘密，自然之杰作；声称此类事情仿佛是无因而致，不受普遍规律的约束。

Examples of singular instances are the sun and moon among stars; the magnet among stones; quicksilver among metals; the elephant among quadrupeds; the venereal sense among kinds of touch; the scent of hounds among kinds of smell. So among grammarians the letter S is held singular, on account of its easy combination with consonants, sometimes with two, sometimes even with three, which property no other letter has. Such instances must be regarded as most valuable, because they sharpen and quicken investigation and help to cure the understanding depraved by custom and the common course of things.

特殊性事例还包括行星中的日与月，石头中的磁石，金属中的水银，四足兽中的大象；还包括各种触觉中的性交感觉，各种嗅觉中的猎犬的嗅觉。同样，在语法学家那里，字母S就被看作是独特性事例，因为S容易跟辅音连缀，有时连缀两个，有时甚至连缀三个，这种属性，其他任何字母都不具有。此类事例必须视为最有价值的事例，因为这些事例加快了调查，有助于纠正因习俗和惯例而遭到玷污的理解力。

XXIX

二十九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eighth place *Deviating Instances* , that is, errors, vagaries, and prodigies of nature, wherein nature deviates and turns aside from her ordinary course. Errors of nature differ from singular instances in this, that the latter are prodigies of species, the former of individuals. Their use is pretty nearly the same, for they correct the erroneous impressions suggested to the understanding by ordinary phenomena, and reveal common forms. For in these also we are not to desist from inquiry until the cause of the deviation is discovered. This cause, however, does not rise properly to any form, but simply to the latent process that leads to the form. For he that knows the ways of nature will more easily observe her deviations;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 that knows her deviations will more accurately describe her ways.

（八）讨论优先权事例中的“偏差性事例”，即自然的讹舛、奇想和奇观性；这些事例表明自然偏离和脱离了自身的常轨。自然的讹舛不同于与前节所说的特殊性事例；后者属于种属上的特殊性，前者属于个别上的奇特性。但二者用处相同，同样可以纠正由普通现象导致的理解力产生的讹舛印象，从而揭示出共同形式。因为在这些事例中，我们只有找到偏离的原因才会停止调查。然而，这个理由并不能正当地上升到任何形式，而只能上升到通往形式的隐秘过程。但凡知道自然之道者，更易于觉察自然之偏离；反之，但凡知道自然之偏离者，更能精确地描写出自然之道。

They differ in this also from singular instances, that they give much more help to practice and the operative part. For to produce new species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but to vary known species and thereby produce many rare and unusual results is less difficult. Now it is an easy passage from miracles of nature to miracles of art. For if nature be once detected in her deviation, and the reason thereof made evident, there will be little difficulty in leading her back by art to the point whither she strayed by accident; and that not only in one case, but also in others. For errors on one side point out and open the way to errors and deflections on all sides. Under this head there is no need of examples, they are so plentiful. For we have to make a collection or particular natural history of all prodigies and monstrous births of nature; of everything in short that is in nature new, rare, and unusual. This must be done, however, with the strictest scrutiny, that fidelity may be ensured. Now those things are to be chiefly suspected which depend in any way on religion, as the prodigies of Livy, and those not less which are found in writers on natural magic or alchemy, and men of that sort, who are a kind of suitors and lovers of fables. But whatever is admitted must be drawn from grave and credible history and trustworthy reports.

这类事例与特殊性事例还是有些区别，即这类事例给予实践和操作的帮助比后者更多。要产生新种属非常难，但要改变已有种属，并藉此产生出许多罕见和非常的结果，困难要小些。从自然的奇迹过渡到技艺的奇迹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察觉自然出现了偏差，而且弄清出其原因，那么用技术将其引回到偶然出现偏差之处并不难；可谓一应俱应。因为只要某一方面出了差错，那就说明所有方面都出了差错和偏差。此名下的例子极多，无须列举。我们必须把自然界产生的一切奇闻怪事，简言之，把自然界一切新颖、罕见和独特的事情都辑录成集、或编成一部特殊的自然史。不过，此事须严厉审查以确保其真实性。凡是那些建立在宗教之上的东西都应当成为主要怀疑对

象，如李维所记录的那些奇闻；还有那些自然幻术家、炼金术士以及诸如此类酷爱无稽之谈的人，他们所辑录的东西也应成为主要怀疑对象。但凡得到认可的东西都必须出自正经可信的历史和值得信任的报告。

XXX

三十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ninth place *Bordering Instances* , which I also call *Participles* . They are those which exhibit species of bodies that seem to be composed of two species, or to be rudiments between one species and another. These instances might with propriety be reckoned among singular or heteroclite instances, for in the whole extent of nature they are of rare and extraordinary occurrence. But nevertheless for their worth's sake they should be ranked and treated separately, for they are of excellent use in indicating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ings, and suggesting the causes of the number and quality of the ordinary species in the universe, and carrying on the understanding from that which is to that which may be.

（九）讨论优先权事例中“跨界性事例”，又称为“分词性事例”。这些事例展示的物体种属仿佛是由两个种属组合而成，或者说是介于两个种属之间尚未成熟的物体。这些事例可以恰当地归为特殊性事例或非常规事例，因为整个自然范围之内，它们都属于罕见而非凡的东西。但是就其价值而言，这些事例应该分门别类，个别对待，因为这些事例最大的用途是用来表明事情的构成和结构，用来揭示宇宙中平

常物种数量及属性的原因，用来把理解力从现状推向可能成为的状态。

Examples of these are: moss, which holds a place between putrescence and a plant; some comets, between stars and fiery meteors; flying fish, between birds and fish; bats, between birds and quadrupeds; also the ape, between man and beast—

此类事例有：苔藓，介于腐物与植物之间；某些彗星，介于恒星与带火流星之间；飞鱼，介于鸟与鱼之间；蝙蝠，介于鸟与兽之间；还有猿，介于人与兽之间。

Simia quam similis turpissima bestia nobis ; likewise the biformed births of animals, mixed of different species, and the like.

猿，可恶的畜生，与我们何等相似；还有那些两形动物，由不同种类以及类似的东西混合而成。

XXXI

三十一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tenth place *Instances of Power* , or of the *Fasces* (to borrow a term from the badges of empire); which I also call *Instances of the Wit,* or *Hands of*

Man . These are the noblest and most consummate works in each art, exhibiting the ultimate perfection of it. For since our main object is to make nature serve the business and conveniences of man, it is altogether agreeable to that object that the works which are already in man's power should (like so many provinces formerly occupied and subdued) be noted and enumerated, especially such as are the most complete and perfect; because starting from them we shall find an easier and nearer passage to new works hitherto unattempted. For if from an attentive contemplation of these a man pushes on his work with zeal and activity, he will infallibly either advance them a little further, or turn them aside to something in their neighborhood, or even apply and transfer them to some more noble use.

（十）讨论优先权事例中“权力性事例”，或“权杖性事例”（借用帝国仪仗中的术语）；又称“智慧事例”，或“人类手艺事例”。这类事例在每种技艺中都堪称最高贵、最完美的成就，可以展示技术的极致完美。既然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让自然服务于人类的事业，给人类方便，那么要想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但凡人类权力已臻完备的成就（如先前占领和征服的若干区域），都应该注明并罗列出来，尤其是那些最完备最完美的成就；因为有了这些成就，我们就可以找到一条更加便捷的迄今尚未尝试的途径，通向新成就。因为人们在对这些事例仔细关注深思时，如果用热情和行动，其结果要么是将其成就稍加推进，要么是将其成就转向邻近其他事物之上，甚至将其成就转移到某些更加高贵的用途之上。

Nor is this all. But as by rare and extraordinary works of nature the understanding is excited and raised to the investigation and discovery of forms capable of including them, so also is this done by excellent and wonderful works of art, and that in a much greater

degree, because the method of creating and constructing such miracles of art is in most cases plain, whereas in the miracles of nature it is generally obscure. But with these also we must use the utmost caution lest they depress the understanding and fasten it as it were to the ground.

还不止于此。有了罕见非凡的自然杰作，理解力才得以激发和提升，这样就可以调查和发现能包容自然杰作的形式；同样，有了卓越精妙的技艺成果，理解力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而且可以达到更大程度，因为创造和创立这类技术奇迹的方法浅显明了，而创造和创立自然奇迹的方法一般隐晦难见。但是在这儿，我们还得小心提防，以免这些成就压制理解力，并且加速这压制，仿佛要把理解力压倒在地。

For there is danger lest the contemplation of such works of art, which appear to be the very summits and crowning points of human industry, may so astonish and bind and bewitch the understanding with regard to them, that it shall be incapable of dealing with any other, but shall think that nothing can be done in that kind except by the same way in which these were done—only with the use of greater diligence and more accurate preparation.

因为这里存在一种危险，即技艺成果仿佛是人类努力的顶峰，人一旦一门心思地期盼这种顶峰，就有可能惊吓、束缚和蛊惑理解力，从而导致理解力难以应对任何其他成就，反而认为同类事情如不按旧法行事便不可能成功——只须加倍努力、更加精确准备即可。

Whereas on the contrary this is certain: that the ways and

means of achieving the effects and works hitherto discovered and observed are for the most part very poor things, and that all power of a high order depends on forms and is derived in order from the sources thereof; not one of which has yet been discovered.

相反，可以肯定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和观察的效果和成就，其实现的方式方法绝大多数都比较低级次劣，所有高级的权力都取决于形式，而且是有条不紊地来自于形式这个源头；而这些形式迄今一个也没有发现出来。

And therefore (as I have said elsewhere) if a man had been thinking of the war engines and battering-rams of the ancients, though he had done it with all his might and spent his whole life in it, yet he would never have lighted on the discovery of cannon acting by means of gunpowder. Nor again, if he had fixed his observation and thought on the manufacture of wool and cotton, would he ever by such means have discovered the nature of the silkworm or of silk.

因此（正如我在别处说过的那样），如果一个人老想着古代战争机器和攻城器械，即使他穷尽其毕生的精力去想，也想象不出用火药来驱动大炮这种发明。同样，如果他把注意力和心思只放在羊毛和棉质品的制造上，他也不可能凭借这种方法发现蚕或丝的性质。

Hence it is that all the discoveries which can take rank among the nobler of their kind have (if you observe) been brought to light, not by small elabor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arts, but entirely by accident. Now there is nothing which can forestall or anticipate

accident (which commonly acts only at long intervals) except the discovery of forms.

由此可见，凡是可以列入更高级别的发现，都不是仅凭通过技术上稍加精细和扩展就可以揭示出来的，而完全是偶然所致。要想发现先于偶然（通常间隔周期很长），非借助形式的发现不可。

Particular examples of such instances it is unnecessary to adduce, for there is such an abundance of them. For what we have to do is simply this: to seek out and thoroughly inspect all mechanical arts, and all liberal too (as far as they deal with works), and make therefrom a collection or particular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asterly and most perfect works in every one of them, together with the mode of their production or operation.

这类事例的具体例子，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因为例子太多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出并彻底审查所有机械技艺和所有人文技艺，并把它们辑录成集，或编成一部成就史，把那些卓越、精湛、完美的成就，连同其产生或操作的方式，一并辑录下来。

And yet I do not tie down the diligence that should be used in such a collection to those works only which are esteemed the masterpieces and mysteries of any art, and which excite wonder. For wonder is the child of rarity; and if a thing be rare, though in kind it be no way extraordinary, yet it is wondered at.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ings which really call for wonder on account of the difference in species which they exhibit as compared with other species, yet if we have them by us in common use, are but slightly

noticed.

但是，我并不是要束缚人们的辛勤努力，去辑录由技艺产生的那种成就，辑录那种只被人们尊称为杰作的、神秘的以及激起人们诧异的成就。因为诧异是罕见的产物；如果一个事物罕见，尽管种类上并不非凡，也会使人诧异。而有些事物只有在与其他种属相比时方显种差，也只有种差才能真正引起人们诧异；不过，如果与我们周围常用的事物雷同，这些事物也就很难引人注目了。

Now the singularities of art deserve to be noticed no less than those of nature, of which I have already spoken. And as among the singularities of nature I placed the sun, the moon, the magnet, and the like—things in fact most familiar, but in nature almost unique—so also must we do with the singularities of art.

若论引人注目，技艺上的特性不亚于自然的特性；后者我在前文已经讨论过。自然中的特殊性事例，我列举了太阳、月球、磁石等等，这些东西最为熟悉，但在本质上几乎是独一无二；同样，技术上的特殊性事例，我们还得举例说明。

For example, a singular instance of art is paper, a thing exceedingly common. Now if you observe them with attention, you will find that artificial materials are either woven in upright and transverse threads, as silk, woolen or linen cloth, and the like; or cemented of concreted juices, as brick, earthenware, glass, enamel, porcelain, etc., which are bright if well united, but if not, are hard indeed but not bright. But all things that are made of concrete juices are brittle, and no way cohesive or tenacious. On the

contrary, paper is a tenacious substance that may be cut or torn; so that it imitates and almost rivals the skin or membrane of an animal, the leaf of a vegetable, and the like pieces of nature's workmanship. For it is neither brittle like glass, nor woven as cloth; but is in fibers, not distinct threads, just like natural materials; so that among artificial materials you will hardly find anything similar; but it is altogether singular. And certainly among things artificial those are to be preferred which either come nearest to an imitation of nature, or on the contrary overrule and turn her back.

比如，纸就是一个技艺上的特殊性事例，也是一种极其平常的东西。如果你注意观察，就会发现，但凡人工制造的材料，要么由丝线纵横编织而成，如丝绸、毛布或麻布等等，要么由水泥黏合而成，如砖头、瓷器、玻璃、珐琅、瓷器等等，所有这些如果精心调和，必然光彩照人。如果随意拼凑，虽然坚实，但黯然无光。但凡是由水泥浆构成的一切东西都脆而易碎，既无黏性，也无韧性。相反，纸这种质体虽然易剪易撕，但却很有韧性；而且可与动物皮肤或薄膜、植物的叶子等自然杰作相仿，几乎可相匹敌。因为纸既不像玻璃那样脆而易碎，也不像布那样编织而成，反倒像自然材料那样有纤维的组织，但却看不见明显的丝线；而在人工材料中，很难找到任何相似的东西；它完全是独特的东西。当然，在人工制品中，更好的独特性事例，要么是那些模拟自然最为贴近的东西，要么与自然不相似的东西，即压制和遏制自然的东西。

Again, as instances of the wit and hand of man, we must not altogether contemn juggling and conjuring tricks. For some of them, though in use trivial and ludicrous, yet in regard to the information they give may be of much value.

还有，就人类智慧和手艺方面的事例而言，我们不可完全蔑视魔术与符咒这类把戏。因为其中有些东西，尽管使用起来有些琐碎可笑，但若论其所提供的信息，可能具有极高的价值。

Lastly, matters of superstition and magic (in the common acceptation of the word) must not be entirely omitted. For although such things lie buried deep beneath a mass of falsehood and fable, yet they should be looked into a little. For it may be that in some of them some natural operation lies at the bottom, as in fascination, strengthening of the imagination, sympathy of things at a distance, transmission of impressions from spirit to spirit no less than from body to body, and the like.

最后，迷信与魔术（就人们一般了解到的意义而言）这类事情也不能完全略而不论。这些东西虽然潜藏着大量谎言和奇谈，但是也应该调查一番。因为其中有些东西，如符咒中的想象力的加强、物体隔空交感以及不少于物物传送的意念传递，都可能潜伏着某种自然运作原理。

XXXII

三十二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it is clear that the five classes of instances last mentioned (namely, Instances Conformable, Singular, Deviating, Bordering, and of Power) ought not to be reserved until some certain nature be in question (as the other instances which I

have placed first, and most of those that are to follow should), but a collection of them must be begun at once, as a sort of particular history; because they serve to digest the matters that enter the understanding, and to correct the ill complex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itself, which cannot but be tinged and infected, and at length perverted and distorted, by daily and habitual impression.

以上所论表明，最后提到的五类事例（即契合性事例、特殊性事例、偏离性事例、跨界性事例和权力性事例）不应该保留到讨论某种性质的时候（如第一点讨论的其他例子及其随后所列例子）再作处理，而应该立马辑录成集，辑录成一种特殊史；因为这些事例有助于理解那些进入理解力事业的事情，有助于矫正理解力本身那脆弱的一面——理解力由于日常习见的印象而不可能不先遭到玷污，感染，继而遭到曲解，歪曲。

These instances therefore should be employed as a sort of preparative for setting right and purging the understanding. For whatever withdraws the understanding from the things to which it is accustomed, smooths and levels its surface for the reception of the dry and pure light of true ideas.

因此，这些事例应该当作一种矫正和净化理解力的准备措施。因为凡是能把理解力从其所习惯的事物中抽身出来，就能把理解力磨光铲平，以便其接纳纯净的、真正的理念之光。

Moreover such instances pave and prepare the way for the operative part, as will be shown in the proper place, when I come to speak of deductions leading to Practice.

此外，这些事例还可为操作铺设准备道路，这一点，要等到适当的时候，即在以后谈到演绎法走向实践时，再予以说明。

XXXIII

三十三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eleventh place *Instances of Companionship and of Enmity* , which I also call *Instances of Fixed Propositions* . They are those which exhibit a body or concrete substance in which the nature inquired into constantly attends, as an inseparable companion; or in which on the contrary it constantly retreats, and is excluded from companionship as an enemy and foe. For from such instances are formed certain and universal propositions, either affirmative or negative, in which the subject will be a body in concrete, and the predicate the nature itself that is in question. For particular propositions are in no case fixed. I mean propositions in which the nature in question is found in any concrete body to be fleeting and movable, that is to say accruing or acquired, or on the other hand departing or put away. Wherefore particular propositions have no prerogative above others, save only in the case of migration, of which I have already spoken. Nevertheless even these particular propositions being prepared and collated with universal propositions are of great use, as shall be shown in the proper place. Nor even in the universal propositions do we require exact or absolute affirmation or negation. For it is sufficient for the purpose in hand even if they admit of some rare and singular exception.

（十一）讨论优先权事例中“敌友性事例”，又称“恒定性命题事例”。这些事例呈现的是一种物体或具体的物质，其中所调查的性质，不可避免地，要么像朋友一样形影不离，要么就像仇敌见面转身即走，毫无共性。从这些事例中，可以构成确定的而且是全称性的命题，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其中主词都是具体的物体，而谓词都是要讨论的性质本身。特称命题绝对不会恒定不变。我是指，在这些命题中，要讨论的性质在任何具体物体中，要么转瞬即逝，变化不定，即自然增长或后天获得，要么消失得无影无踪或为人所弃。所以特称命题比其他任何命题都要有优先权，但前文所说的转换性事例中的命题除外。但是这些特称命题用来校核全称命题还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这一点待合适的时候讨论。即使是在全称命题中，我们也不苛求精确的或绝对的肯定或否定。因为即使这些命题拥有某种罕见和独特的例外，也足以满足当前的目的。

The use of instances of companionship is to bring the affirmative of the form within narrow limits. For if by migratory instances the affirmative of the form is narrowed to this, that the form of the thing must needs be something which by the act of migration is communicated or destroyed; so in instances of companionship, the affirmative of the form is narrowed to this, that the form of the thing must needs be something which enters as an element into such a concretion of body, or contrariwise which refuses to enter; so that he who well knows the constitution or configuration of such a body will not be far from bringing to light the form of the nature under inquiry.

友伴性事例的作用在于缩小形式所肯定的范围。如果说通过转换性事例可以把形式所肯定的东西加以缩小，即事物的形式必须通过转换行为来传递或消灭某种东西，那么通过友伴性事例可以把形式所肯

定的东西加以缩小，即事物的形式必须要求某种东西作为一种要素要么进入物体的内核之中，或者与此相反拒绝进入物体的内核之中；任何人只要充分了解了这种物体的组织或结构，那么他离揭示所调查性质的形式就为期不远了。

For example,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heat. An instance of companionship is flame. For in water, air, stone, metal, and most other substances, heat is variable, and may come and go, but all flame is hot, so that heat is always in attendance on the concretion of flame. But no hostile instance of heat is to be found here. For the senses know nothing of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and of all the bodies which we do know there is not a single concretion that is not susceptible to heat.

比如，假设所讨论的性质是热。其友伴性例子就是火焰。因为热在水、空气、石头、金属等绝大多数其他物质中，都变化不定，时有时无；但是所有的火焰都是热的，所以热在火焰内核中总是无处不在。但是，相反性事例在这儿还有待挖掘。就地球内核而言，我们的感官还一无所知，而就已知物体而论，我们知道无物不受热。

But to take another instance: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consistency. A hostile instance is air. For metal can be fluid and can also be consistent; and so can glass; water also can be consistent, when it is frozen; but it is impossible that air should ever be consistent, or put off its fluidity.

另举一例：假设讨论的性质是凝聚性。敌对性例子就是空气。金属既能流动，也能凝固；玻璃亦然；水冷却也能凝固；但空气既不可

能具有凝聚性，也不可能放弃其流动性。

But with regard to such instances of fixed propositions I have two admonitions to give, which may help the business in hand. The first is that, if a universal affirmative or negative be wanting, that very thing be carefully noted as a thing that is not; as we have done in the case of heat, where a universal negative (as far as the essences that have come under our knowledge are concerned) is not to be found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In like manner, if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eternity or incorruptibility, no universal affirmative is to be found here. For eternity or incorruptibility cannot be predicated of any of the bodies lying below the heavens and above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The other admonition is that to universal propositions, affirmative or negative, concerning any concrete body, there be subjoined those concretes which seem to approach most nearly to that which is not; as in heat, the gentlest and least burning flames; in incorruptibility, gold which comes nearest to it. For all such indicate the limits of nature between that which is and that which is not, and help to circumscribe forms and prevent them from escaping and straying beyond the conditions of matter.

但是就恒定性命题事例而言，我要提出两点忠告，这有助于手中的事务。第一个忠告是，如果没有全称肯定或全称否定，那么就必须仔细关注此事，视其为虚无；如在前文热的案例中那样，就事物的本质而言，找不到全称否定（就我们了解的本质而言）。同样，如果要讨论永恒性或不朽性，这儿也找不到一个全称肯定。因为天地之间的任何物体都不能断定其有永恒性或不朽性。第二个忠告是，有关任何一个具体物体的全称命题，无论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应将不似尽然的具体物体附缀于后；比如若论热，就应该把热度最柔和、灼烧最弱的火焰包括进来；若论不朽性，金子最为贴切。因为所有这些都表

明，然与不然的自然界限有助于界定形式的范围，防止形式脱离和偏离到物质条件之外。

XXXIV

三十四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twelfth place those *Subjunctive Instances* mentioned in the last aphorism, which I otherwise call *Instances of Ultimity or Limit* . For such instances are not only useful when subjoined to fixed propositions, but also by themselves and in their own properties. For they point out not obscurely the real divisions of nature and measures of things, and how far in any case nature may act or be acted upon, and then the passages of nature into something else. Of this kind are gold in weight; iron in hardness; the whale in animal bulk; the dog in scent; the combustion of gunpowder in rapid expansion; and the like. Nor should extremes in the lowest degree be less noticed than extremes in the highest; such as spirit of wine in weight; silk in softness; the worms of the skin in animal bulk; and the like.

（十二）讨论优先权事例中“虚拟性事例”，即上一条语录中附缀的具体物体，我另行命名为“终极性或极限性事例”。这些事例不仅在附缀在恒定性命题时管用，而且其本身及其属性也有用。因为这些事例清楚地表明了自然的真正界限及事物的度量方式，表明了在任何情况下自然可能改变或人类能够改变自然的程度，从而表明了从自然通向其他东西的过渡过程。此类事例，重量方面有金，硬度方面有铁，动物体积方面有鲸，嗅觉方面有狗，急速膨胀方面有火药燃烧等等。

向上的极端事例受到关注，向下的极端事例也不应该被忽略；例如，重量上有酒精，柔性上有丝绸，动物体积上有皮蠕虫等等。

XXXV

三十五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thirteenth place *Instances of Alliance or Union* . They are those which mingle and unite natures supposed to be heterogeneous, and marked and set down as such in the received divisions.

（十三）讨论优先权事例中“同盟式或联盟式事例”。这些事例把那些在公认的区分中认定为异质的性质揉合在了一起。

Instances of alliance show that operations and effects attributed to some one heterogeneous nature as peculiar to it may belong also to other heterogeneous natures; that this supposed heterogeneity is proved to be not real or essential, but only a modification of a common nature. They are therefore of most excellent use in raising and elevating the understanding from specific differences to *genera* , and in dispelling phantoms and false images of things, which in concrete substances come before us in disguise. For example,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heat. We are told (and it seems to be a division quite received and authorized) tha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heat: the heat of heavenly bodies, the heat of animals, and the heat of fire; and that these heats (especially one of them a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are in their very essence and species—that is to say, in their specific nature—distinct and heterogeneous, since the heat of heavenly bodies and of animals generates and cherishes, while the heat of fire wastes and destroys. We have, therefore, an instance of alliance in that common case, when the branch of a vine is brought within a house where a fire is constantly kept up, and the grapes ripen on it a whole month sooner than they do out of doors; so that the ripening of fruit, even while it hangs on the tree, may be brought about by fire, though such ripening would seem to be the proper work of the sun. From this beginning, therefore, the understanding, rejecting the notion of essential heterogeneity, easily rises to inquire what are in reality those points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eat of the sun and of fire which cause their operations to be so dissimilar, however they may themselves partake of a common nature.

同盟式事例表明某种异质性所特有的效用，也可以为其他异质性所拥有；这还表明这种原先认定的异质性经证明并不是真实的或本质性的，只不过是一种共性的变异而已。因此，这些事例用途极大，可以把理解力从种差提升到“种类”，可以把具体物质以伪装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幻影和假象扫除。例如，假设讨论的性质是热。有人告诉我们说，热有三种（似乎成为了一种公认的、权威的分类）：天体之热，动物之热，火之热；这些热（尤其是其中一种与另外两种相比）都有其自身的本质或属于独特的一种——即都有其自身种属和性质——各自分明，异种异质；因为天体之热和动物之热可生能育，而火之热易尽易灭。因此，我们可以举一个常规情况下的同盟式事例：试把葡萄藤枝牵入房间，室内生火不断，那么室内葡萄比室外葡萄要早成熟整整一月；可见，水果即使还挂在树上也可以通过火来使其成熟，尽管让水果成熟似乎应是太阳的职责。因此，有了这么一种开端，理解力就会排拒本质性差异概念，容易进一步调查太阳之热与火之热之间实实在在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二者具有不同的作

用，尽管二者本身可能具有某种共性。

These differences will be found to be four. The first is that the heat of the sun compared with the heat of fire is far milder and softer in degree; the second is that in quality (at least as it reaches us through the air) it is far moister; the third (and this is the main point) is that it is exceedingly unequal, now approaching and increased, now receding and diminished; which thing chiefly contributes to the generation of bodies. For Aristotle was right in asserting that the principal cause of the generations and corruptions which are going on here on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is the oblique course of the sun through the zodiac; whence the heat of the sun, partly by the alternation of day and night, partly by the succession of summer and winter, becomes strangely unequal. And yet this great man must go on at once to corrupt and deprave what he has rightly discovered. For laying down the law to nature (as his way is), he very dictatorially assigns as the cause of generation the approach of the sun, and as the cause of corruption his retreat; whereas both together (the approach of the sun and his retreat), not respectively, but as it were indifferently, afford a cause both for generation and production; since inequality of heat ministers to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 equality to conservation only. There is also a fourth specif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eat of the sun and of fire, and one of very great moment; viz., that the sun operates by gentle action through long spaces of time, whereas the operations of fire, urged on by the impatience of man, are made to finish their work in shorter periods. But if anyone were to set to work diligently to temper the heat of fire and reduce it to a milder and more moderate degree, as is easily done in many ways, and were then to sprinkle and intermix a little moisture; and if above all he were to imitate the heat of the sun in its inequality; and lastly if he could

submit to a slow procedure, not indeed corresponding to the operations of the sun, but yet slower than men generally adopt in working with fire; he would speedily get rid of the notion of different kinds of heat, and would attempt to imitate, if not equal or in some cases even surpass the works of the sun by the heat of fire. We have a similar instance of alliance in the revival of butterflies stupefied and half dead with cold, by slightly warming them at a fire. So that you may easily see that fire is no more without the power of giving life to animals than of ripening vegetables. Thus also Fracastorius' celebrated invention of the heated pan with which doctors cover the heads of apoplectic patients who are given over, manifestly expands the animal spirits, compressed and all but extinguished by the humors and obstructions of the brain, and exciting them to motion, just as fire acts on air or water, by consequence quickens and gives them life. Eggs also are sometimes hatched by the heat of fire, which thus exactly imitates animal heat. And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of the same kind, so that no one can doubt that the heat of fire may in many subjects be modified so as to resemble the heat of heavenly bodies and of animals.

这些差异可以找到四个：第一体现在程度上，较之于火之热，太阳之热更为温和、更为柔和；第二体现在质上（至少是在穿过空气到达我们时），太阳之热更加温润；第三体现在（主要是这一点）太阳之热极不匀称，临近时热升，退隐远离时热降；而这一点正有利于物体的生长。亚里士多德所言极是，地表的生死枯荣是太阳经黄道时轨道倾斜所致；因此，或因昼夜更替，或因冬夏变更，太阳的热异常不均。然而这位伟人随即将自己的正确发现毁坏殆尽了。因为他在为自然（按照他的惯例）制定法则时，武断地将生荣归因于太阳的临近，而将死枯归咎于太阳的退隐；其实二者（即太阳的临近与退隐）都会导致生死荣枯，并非与生死荣枯一一对应，因为热不均衡有助于生死荣枯，而热均衡仅仅利于保存。太阳之热与火之热，二者还存在第四

个种属差异，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太阳生热的过程缓柔，时间漫长，而火生热则不同，因人急躁，旨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工作，所以过程急迫。要调节火之热须要下功夫；首先要采取许多容易的方法把火之热降到更加温和、更加适度的程度；接着喷洒混杂些水分；尤其还要模仿太阳之热的不均衡性；最后过程要缓慢，虽说不必像太阳那样缓慢，但至少应比一般人工生火那样要缓慢；假如有人这样做，那么他立刻就会抛弃热有不同种类的想法，就会去努力模仿太阳生热的方式来让火生热，即使无法与太阳相提并论或在某种程度上超过太阳。我们还有一个类似的同盟式事例，即蝴蝶，它们冻得半死而毫无知觉时，如果置于火旁，略受温暖，即可苏醒。显而易见，火与其说让植物成熟，不如说能给予动物生命。还有费拉卡斯托罗的著名发明即加热盘也属此类事例，也就是医生将加热盘罩在用其他方法医治不了的中风病人头上；这种病是动物精气受到大脑溢出的汁液和各种障碍的压制到几乎灭绝而致，显然，加热盘是将这种动物精气扩放出来，并刺激其活跃起来。蛋有时也可通过火之热来孵化，不过，这种火之热是精确模仿动物之热。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因此，毋庸置疑，火之热在许多事物上都可以通过调节来达到与天体和动物之热相类似。

Again, let the natures in question be motion and rest. It appears to be a received division and drawn from the depths of philosophy, that natural bodies either move in circle, or move straight forward, or remain at rest. For there is either motion without limit, or rest at a limit, or progress toward a limit. Now, that perpetual motion of rotation seems to be proper to the heavenly bodies, station or rest seems to belong to the globe of the earth, while other bodies (which they call heavy or light, being indeed placed out of the region to which they naturally belong) are carried toward the masses or congregations of their likes; light bodies upward toward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heaven, heavy bodies downward towards the earth. And this is pretty talk.

再举一例，假设讨论的性质是运动与静止。有一种分类，仿佛已经得到普遍承认，而且很有哲学深度，即自然物体，要么做圆周运动，要么做直线运动，要么就静止不动。就是说，要么运动无极限，要么静止有涯际，要么发展有限度。循环往复的旋转运动仿佛是天体固有的，静止不动仿佛是地球专属；而其他物体（人称轻与重，实际上已非自然归属）却是同类相聚相融；轻物体向上飘向天边，重物体向下坠向地球。此言极是。

But we have an instance of alliance in one of the lower comets, which though far below the heaven, nevertheless revolve. And Aristotle's fiction of a comet being tied to or following some particular star has long been exploded, not only because the reason for it is not probable, but because we have manifest experience of the discursive and irregular motion of comets through various parts of the sky.

但我们有一个同盟式事例，即有一颗较低的彗星，尽管在天之下，且离天较远，却还是在做旋转运动。亚里士多德有一个假说，说彗星系于或跟从于某个具体的恒星；这个假说早已被人推翻了，不仅仅是因为不可能，而且是因为我们的经验表明，彗星在穿越天空各个部分时做出的是无规律、不规则的运动。

Again, another instance of alliance on this subject is the motion of air, which within the tropics, where the circles of rotation are larger, seems itself also to revolve from east to west.

至于这个话题，还有一个同盟式事例，即空气运动；空气在范围

更为广阔的回归线内做循环运动，自身看起来也是从东向西旋转。

Again, another instance would be the ebb and flow of the sea, if it be found that the waters themselves are carried in a motion of rotation (however slow and evanescent) from east to west, though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of being driven back twice in the day. For if things be so, it is manifest that that motion of rotation is not limited to heavenly bodies, but is shared also by air and water.

还有一个例子，即如果发现水流从东到西自行旋转运动（缓慢短暂姑且不论），就会发生海水潮涨潮落的现象，尽管要受一日两次退回条件的限制。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旋转运动显然并非仅限于天体，空气和水流也享有此特点。

Even that property of light substances, viz., that they tend upward, is somewhat at fault. And on this point a bubble of water may be taken as an instance of alliance. For if there be air under the water it rapidly ascends to the surface by that motion of percussion (as Democritus calls it) by which the descending water strikes and raises the air upward; not by any effort or struggle of the air itself. And when it is come to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then the air is stopped from further ascent by a slight resistance it meets with in the water, which does not immediately allow itself to be separated; so that the desire of air to ascend must be very slight.

即使是轻质体，即倾于向上运动的质体，其特性也有例外。关于这一点，可以用水泡来作为同盟式事例。如果水下有空气，空气瞬即就会上升冲击水面，通过这种冲击运动（正如德谟克利特所称的那

样），水就下沉，冲击和抬升空气向上，而不是空气自身竭力或挣扎的结果。空气一旦到达水面，便不再继续上升，因为空气在水中遇到的阻力不足，难以使其破裂，这样空气上升的欲求必定微乎其微了。

Again,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weight. It is quite a received division that dense and solid bodies move toward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rare and light toward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heaven, as to their proper places. Now as for this notion of places, though such things prevail in the schools, it is very silly and childish to suppose that place has any power. Therefore philosophers do but trifle when they say that if the earth were bored through, heavy bodies would stop on reaching the center. Certainly it would be a wonderful and efficacious sort of nothing, or mathematical point, which could act on bodies, or for which bodies could have desire, for bodies are not acted on except by bodies. But this desire of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depends either on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body moved or on its sympathy or consent with some other body. Now if there be found any body which, being dense and solid, does not move to the earth, there is an end of this division.

再举一例，假设讨论的性质是重量。有一种分类也是得到了普遍承认，即密实且坚实的物体倾向于坠向地心，罕见而轻飘的物体倾向于飘向天边，二者各居其位。至于位置这个概念，尽管盛行于学院派之中，但如果要设想位置具有某种力量，那实在是很愚蠢，很幼稚。因此，哲学家们说，如果钻穿地球，重物体在达到地球重心时就会停止不动了；要是这样说，那只不过是哲学家们随口开玩笑而已。这个位置肯定是一种奇妙而又灵验的虚无，或叫理论之点，这个点作用于物体，或物体对这个点有所欲求；其实，物体只受物体的作用。但是上升与下降这种欲求，要么取决于物体移动时的结构，要么取决于与

其他物体所产生的交感或感应。现在只要找到任何一个密实、坚固、而且并不产生向地运动的物体，这种划分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But if Gilbert's opinion be received, that the earth's magnetic power of attracting heavy bodies does not extend beyond the orb of its virtue (which acts always to a certain distance and no more), and if this opinion be verified by a single instance, in that we shall have got at last an instance of alliance on the subject of weight. But at present there does not occur any instance on this subject certain and manifest. What seems to come nearest to one is that of the waterspouts, often seen in the voyage over the Atlantic Ocean toward either of the Indies. For so great is the quantity and mass of water suddenly discharged by these waterspouts that they seem to have been collections of water made before, and to have remained hanging in these places, and afterward to have been rather thrown down by some violent cause, than to have fallen by the natural motion of gravity. So that it may be conjectured that a dense and compact mass, at a great distance from the earth, would hang like the earth itself and not fall unless thrust down. But on this point I affirm nothing certain. Meanwhile in this and many other cases it will easily be seen how poor we are in natural history, when in place of certain instances I am sometimes compelled to adduce as examples bare suppositions.

吉尔伯特有一个见解，说地球吸引重物的磁力并不会超出其固有的范围（即磁力所及总是在一定范围之内），但是如果这个见解得到承认和证实，哪怕只有一个事例，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关于重量这个话题上的同盟性事例。但是至今也没有找到这个话题上的确定而又明显的事例。最为贴近的事例好像要数龙卷风水柱了，这种水柱常见于由大西洋驶向两个印度的航线上。龙卷风水柱铺天盖地陡然倾泻

出大量海水，仿佛是预先聚集悬挂在那儿，随后受到巨压，从而铺天盖地抛落而下，不像是受到自然的引力而致。这就让人产生了这样的揣测：密实结实的团状物，可以向地球本身那样，悬挂于地球上方很远的地方，非经力压不会自行落下。但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不敢肯定。同时在这一点上和许多其他情况下，很容易看得出，我们在自然史上多么贫乏，有时还被迫举出一些纯属假设的例子来冒充确然的事例。

Again,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discourse of reas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 reason and the sagacity of brutes appears to be a perfectly correct one. Yet there are certain instances of actions performed by animals, by which it seems that brutes too have some power of syllogizing; as in the old story of the crow which, in a time of great drought being half dead with thirst, saw some water in the hollow trunk of a tree, and finding it too narrow to get in, proceeded to drop in a number of pebbles till the water rose high enough for it to drink; and this afterward passed into a proverb.

再举一例，假设讨论的性质是推理。人类的理性与畜生的智慧，二者的区别倒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事例。然而动物行为中，有些事例仿佛表明畜生也有某种三段论式推理能力；比如说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说，一只乌鸦因遭遇大旱，口渴至半死，这时看见一颗空心树干，里面有水，但入口很小，难以取水，于是乌鸦往里面扔掷了许多石块，水升而得以饮用；后来这一故事便演变成了一个寓言。

Again,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visibility. It appears to be a very correct and safe division which regards light as primarily visible, and affording the power of seeing; while color is secondarily

visible, and cannot be seen without light, so that it appears to be nothing more than an image or modification of light. And yet there appear to be instances of alliance on either side, namely, snow in great quantities, and the flame of sulphur; in one of which there appears to be a color primarily giving light, in the other a light verging on color.

再举一例，假设讨论的性质是能见度。在能见度上，光是主要的，它为视觉提供动力；而色彩是次要的，没有光就看不见，因此，色彩不过是光的一种影像或变像而已；这种光与色彩的区分似乎非常正确而且十分稳妥。但是在这一点上好像还有些事例可从两方面来看待，如量大的雪和硫磺的火焰；前者仿佛是色生光，后者仿佛是光成色。

XXXVI

三十六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fourteenth place *Instances of the Fingerpost* , borrowing the term from the fingerposts which are set up where roads part, to indicate the several directions. These I also call *Decisive and Judicial* , and in some cases, *Oracular and Commanding Instances* . I explain them thus. When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any nature the understanding is so balanced as to be uncertain to which of two or more natures the cause of the nature in question should be assigned on account of the frequent and ordinary concurrence of many natures, instances of the fingerpost show the union of one of the natures with the nature in

question to be sure and indissoluble, of the other to be varied and separable; and thus the question is decided, and the former nature is admitted as the cause, while the latter is dismissed and rejected. Such instances afford very great light and are of high authority, the course of interpretation sometimes ending in them and being completed. Sometimes these instances of the fingerpost meet us accidentally among those already noticed, but for the most part they are new, and are expressly and designedly sought for and applied, and discovered only by earnest and active diligence.

（十四）讨论优先权事例中的“路标性事例”，此处借用分岔路口处设置的指路牌这一术语来指明几个方向。这些事例也可称为“判定性和裁决性事例”，有时称“神谕性和昭告性事例”。解释如下。在调查某一性质时，理解力如果不加偏重，就势必无法确定何种性质才是所讨论性质的原因，因为所讨论的性质在调查时往往会出现许多性质共现的现象；这时路标性事例就能表明，在这些性质中，哪些性质与所讨论的性质是确信无疑而且密不可分的，哪些与所讨论的性质是变化不定而且可分可离的；问题一旦判定下来，那么前者可以认定为原因，而后者就予以摒弃和排除。这些事例给人以巨大的启示，而且具有高度的权威性，有时阐释自然的过程就以此为终点，就此宣告结束。有时，这些路标性事例，我们在已经讲到的事例中偶尔遇到过，但绝大部分是崭新的事例，是特意寻找、特意使用的事例，而且是只有认真主动地付出辛劳才能发现的事例。

For example,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the ebb and flow of the sea; each of which is repeated twice a day, and takes six hours each time, subject to some slight difference which coincides with the motion of the moon. The following will be a case of the parting of the roads.

举例说明，假定讨论的性质是大海的涨落。潮涨潮落每日重复两次，六小时一次，随着月球的运动而微微做出相应的变化。下面就是分岔路口式例子。

This motion must necessarily be caused either by the advance and retreat of the waters, as water shaken in a basin leaves one side when it washes the other; or else by a lifting up of the waters from the bottom and falling again, as water in boiling rises and falls. The question is to which of these two causes the ebb and flow should be assigned. Now, if we take the first, it follows that when there is a flood on one side of the sea, there must be at the same time an ebb somewhere on the other. To this point therefore the inquiry is brought. Now it has been observed by Acosta and others, after careful research, that on the shores of Florida and the opposite shores of Spain and Africa the floods take place at the same times, and the ebbs take place at the same times also; and not that there is an ebb from the shores of Spain and Africa when there is a flood on the shores of Florida. And yet if you look at it more closely, this does not prove the case in favor of the rising and against the progressive motion. For waters may move in progression, and yet rise upon the opposite shores of the same channel at the same time, as when they are thrust together and driven on from some other quarter. For so it is with rivers, which rise and fall on both banks at the same hours. And yet that motion is clearly one of progression, namely, of the waters entering the mouth of the rivers from the sea. It may therefore happen in a like manner that waters coming in a vast mass from the East Indian Ocean are driven together and pushed into the channel of the Atlantic, and on that account flood both sides at once. We must inquire therefore whether there be any other channel in which the water can be retreating and ebbing at that same time; and we have the South Sea, a sea at least as wide,

indeed wider and larger than the Atlantic, which is sufficient for the purpose.

导致这种运动的原因必定有二，要么海水涨落如盆中之水，激荡时倾向一边，必定从另一边退落，要么海水如水上下沸腾，由下而上把水上提，然后重新落下。问题在于，这两种原因中，哪一种可定为海水涨落的原因呢？如果我们确定为前者，那么势必是大海的一边潮涨时，另一边必定潮落。因此，对这一点，可以探讨一番。阿科斯塔等人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指出，在佛罗里达海岸及其对面的西班牙海岸和非洲海岸，涨潮的同时就发生退潮，而并不是西班牙和非洲海岸发生涨潮时，而佛罗里达正好就发生退潮。但如果再仔细观察一下，这也证明不了这个例子就支持潮涨潮落是海水上下运动而致，而反对潮涨潮落是海水前行运动而致。因为在同一条海峡里，水流前行运动的同时也可以对海峡两边产生上升运动；就像各股水流是从其他地方汇流涌进而来。河流也是如此，在两岸同时起落。而显然这种运动，即海水涌入河口的运动，是一种前行运动。因此，同样也可能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即来自东印度洋海水大量地一起涌入大西洋入口，正因如此，导致大西洋两岸同时发生涨潮。因此，我们必须调查一下，看是否存在其他海峡，可以让大西洋海水退入其中的同时发生退潮现象；我们有南海，至少与大西洋一样宽，岂止如此，比大西洋还要宽、还要大，足以实现我们调查的目的。

At length then, we have come to an instance of the fingerpost in this case, and it is this. If we find for certain that when there is a flood on the opposite coasts of Florida and Spain in the Atlantic, there is also a flood on the coasts of Peru and the back of China in the South Sea, then indeed on the authority of this decisive instance we must reject the assertion that the ebb and flow of the sea, which is the thing inquired into, takes place by a progressive motion; for there is no sea or place left in which the retreat or ebbing can be

going on at the same time. And this may be most conveniently ascertained by asking the inhabitants of Panama and Lima (where the two oceans, the Atlantic and Pacific, are separated by a small isthmus) whether the ebb and flow of the sea takes place on the opposite sides of the isthmus at the same time; or contrariwise, when it is ebbing on one side it is flowing on the other. Now this decision or rejection appears to be certain, if we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the earth is immovable. But if the earth revolves, it is perhaps possible that in consequence of the unequal rotation (in point of speed) of the earth and waters of the sea, the waters are violently driven upwards into a heap, which is the flood, and (when they can bear no more piling) released and let down again, which is the ebb. But on this inquiry should be made separately. Still, even on this hypothesis, our position remains equally fixed, that there must of necessity be an ebb of the sea going on in some parts at the same time that a flood is going on in others.

接下来，我们终于在这种情况下详细讨论一个路标事例，事例如下。如果我们确实发现大西洋两边的佛罗里达和西班牙海岸发生涨潮时，南海的秘鲁和中国的海岸也发生涨潮，那么面对这种判定性事例，我们的确不得不拒绝这种观点，即正在调查的海水涨落是因海水前行运动而产生的；因为没留下什么海或余地来容纳同时产生的海水退却或落潮。要确定这一点最方便的是，只须问问巴拿马和利马居民即可，问问他们巴拿马地峡两岸是同时发生海水涨落现象呢，还是正好相反，一边发生退潮，而另一边却发生涨潮。现在这个似乎可以确定了，但前提是我们要假定地球静止不动。但是如果地球旋转，那么地球和海水很有可能因为非对称旋转（就速度而言），导致水流猛烈向上挤压成团，从而形成涨潮，然后（当水流难以承载堆积的水团时）释放跌落下来，便形成退潮。但这一点须要另作调查。还有，即使在这个假设之下，我们的立场仍然很坚定，认为某些地方发生涨潮时，其他地方必定而且不可避免地同时发生退潮。

Again,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the latter of the two motions we have supposed, namely, the rising and sinking motion, if on careful examination we reject the former motion of which I spoke—the progressive. With regard to this nature the road branches into three. For the motion by which the waters rise in the flood and sink in the ebb without any accession of other waters rolling in, must necessarily be brought about in one of these three ways. Either there is an accession of water poured out from the interior of the earth, and again retreating into it; or there is no accession to the mass of water, but the same waters (without increase of quantity) are extended or rarefied so as to occupy a greater space and dimension, and again contract themselves; or there is no increase either of supply or of extension, but the same waters (the same in quantity as in density) are raised by some magnetic force attracting them from above, and by consent therewith, and then fall back again. Let us now dismiss the two former causes of motion and reduce our inquiry to the last; that is to say, let us inquire whether any such raising by consent or magnetic force may happen. Now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waters, as they lie in the trench or hollow of the sea, cannot all be raised at once for want of something to take their place at the bottom; so that even if there were in water any such desire to rise, it would be barred and checked by the cohesion of things, or (as it is commonly called) the abhorrence of a vacuum. It remains that the waters must be raised in one part, and thereby be diminished and retreat in another. Again, it will follow of necessity that the magnetic force, since it cannot act upon the whole, will act with the greatest intensity on the middle, so as to raise up the water in the middle; upon which the rest must follow and fall away from the sides.

此外，前面我们提及了两种运动：前行运动和升降运动；经过仔细考察，我们否决了前一种运动，即前行运动；现在假定要讨论的性质是后一种运动，即升降运动。关于这一性质，有三条岔路：因为没有其他水流涌进而产生升降式涨落运动，必定而且不可避免是下面三种方式中的一种导致而成的。要么水流出自地球内部，同时又返回地球内部；要么水的总量并无增加，而（同等的水量）只是扩展或密度稀疏从而占据更大空间和厚度，同时又回缩至原初；要么水既无数量的增加，也无体积的增大（即量与密度保持不变），而是受到来自上方某种磁力吸引，借感应作用而升起，同时又回落下去。前两种原因，我们现在避而不谈，专论最后一个原因；即是说，探讨一下是否存在因感应或磁力而产生上升现象。首先，水流，如深海海沟或峡谷中的海水，显然是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提升起来，因为海底没有什么可以填补因海水上升留下来的空当；因此，即使水有上升的欲求，也会因为事物的粘合性或（通称）排斥真空的性质，而受到阻碍和抑制。还剩下一种情况，即水流必定是一部分上升，一部分消退。那么，必定会出现磁力现象，即由于无法作用于整体，因此，磁力就以最大的强度作用于中间，从而从中间将水提升起来；而其他部分的水必然随之从四周跌落下去。

Thus at length we come to an instance of the fingerpost on this subject. For if we find that in the ebb of the sea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is more arched and round, the waters ris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sea and falling away from the sides, that is, the shores; and that in the flood the same surface is more even and level, the waters returning to their former position; then indeed on the authority of this decisive instance the raising by magnetic force may be admitted; otherwise it must be utterly rejected. And this would not be difficult to ascertain by trial in straits with sounding lines, viz., whether during ebbs the sea be not higher or deeper toward the middle than during floods. It is to be observed however that, if this be the case, the waters must (contrary to the common opinion) rise

in ebbs and sink in floods, so as to clothe and wash the shores.

那么，最后我们来讨论这个话题的路标性事例。在退潮时，水面呈现拱形和圆状，水从中间升起，而从四周即海岸跌落；而在涨潮时，水面显得更加平滑平整，水回到先前的态势。如果我们发现有这种现象，那么面对这种判定式事例的权威性，我们就必须承认是磁力导致了上升运动，否则，就必须完全放弃这种观点。这一点要得到确认并不难，只须用水深探测绳在海峡中测试一下即可，也就是说，测试一下海中心是否在退潮时要比涨潮时还要高或深。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如果真是这样，水必定退潮时升起，涨潮时跌落（与通常看法相反），从而产生岸边海水冲刷现象。

Again, let the nature investigated be the spontaneous motion of rotation, and in particular whether the diurnal motion whereby to our eyes the sun and stars rise and set, be a real motion of rotation in the heavenly bodies, or a motion apparent in the heavenly bodies, and real in the earth. We may here take for an instance of the fingerpost the following. If there be found in the ocean any motion from east to west, however weak and languid; if the same motion be found a little quicker in the air, especially within the tropics, where because of the larger circles it is more perceptible; if the same motion be found in the lower comets, but now lively and vigorous; if the same motion be found in planets, but so distributed and graduated that the nearer a planet is to the earth its motion is slower, the further a planet is distant from the earth its motion is quicker, and quickest of all in the starry sphere; then indeed we should receive the diurnal motion as real in the heavens, and deny such motion to the earth. Because it will be manifest that motion from east to west is perfectly cosmical, and by consent of the universe, being most rapid in the highest parts of the heavens, and

gradually falling off, and finally stopping and becoming extinct in the immovable—that is, the earth.

再举一列，假定所调查的性质是自发性旋转运动，尤其是调查我们白天看到的太阳和恒星起落的运动，是真正的天体旋转运动，还是看似天旋实是地转的运动。我们这里所举例子可以看作是路标性事例，即如果存在某种由东到西的运动，在海洋中显得虚弱无力，在空气中尤其是在回归线内更易觉察——因旋转圈子更大；在更低一些彗星中却很活跃而有力；在行星中，因分布和等次不同，离地球越近者，其运动就越慢，离地球越远者，其运动就越快，而在恒星中，其运动最快。如果以上情况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天体在做日转运动，而不是地球在做日转运动。因为很明显，这种从东到西的运动完全是宇宙运动；由于宇宙的交感作用，位置最高的天体，其运动速度就最快，沿地球方向逐步递减，最终到静止不动的地球时停止下来，完全静止不动。

Again,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that other motion of rotation so much talked of by philosophers, the resistant and contrary motion to the diurnal, viz., from west to east, which old philosophers attribute to the planets, also to the starry sphere, but Copernicus and his followers to the earth as well. And let us inquire whether any such motion be found in nature, or whether it be not rather a thing invented and supposed for the abbreviation and convenience of calculation, and for the sake of that pretty notion of explaining celestial motions by perfect circles. For this motion in the heavens is by no means proved to be true and real, either by the failing of a planet to return in its diurnal motion to the same point of the starry sphere, or by this, that the poles of the zodiac differ from the poles of the world; to which two things we owe this idea of motion. For the first phenomenon is well accounted for by

supposing that the fixed stars outrun the planets and leave them behind; the second, by supposing a motion in spiral lines; so that the inequality of return and the declination to the tropics may rather be modifications of the one diurnal motion than motions contrary or round different poles. And most certain it is, if one may but play the plain man for a moment (dismissing the fancies of astronomers and schoolmen, whose way it is to overrule the senses, often without reason, and to prefer what is obscure), that this motion does actually appear to the sense such as I have described; for I once had a machine made with iron wires to represent it.

再举一例，假定讨论的性质是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另一种旋转运动，即与日转相背相反的运动，即由西向东的旋转运动。不仅旧哲学家们曾说行星有这种运动，还说恒星亦然，哥白尼及其追随者亦说有这种运动。我们就来考察一番，看看自然界是否都有这种运动，或者准确地说是否是一种假说，即为了用完美的圆圈论来解释天体运动的美妙概念而杜撰出来的东西。天体中，这种运动的真实性绝对无法通过以下两种现象得到证实，一种现象是行星在日转运动中无法回到恒星的原点，另一种现象是黄道各极不同于世界各极，而正是这两种现象，我们才得出这种运动概念。因为这两种现象只须通过假设就可以解释清楚；第一种现象只须假设恒星运行快于行星，而且将行星落在后面，就可解释清楚；第二种现象只须假设螺旋线运动，就可解释清楚；因此，无法回到原点和倾向回归线，与其说是与日转相反的运动或绕不同极点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次日转运动的变化。只要人能稍加正常一点（即抛弃天文学家和经院学者那种幻想，这些人的做法是毫无理性地贬斥感官，喜好暧昧不清的玩意儿），谁都能断定这种运动确实会像前面所描绘的那样呈现在感官面前；我曾经还用铁丝做过一个机器来模仿这种运动。

The following would be an instance of the fingerpost on this

subject. If it be found in any history worthy of credit that there has been any comet, whether high or low, which has not revolved in manifest agreement (however irregular) with the diurnal motion, but has revolve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en certainly we may set down thus much as established, that there *may be* in nature some such motion. But if nothing of the kind can be found, it must be regarded as questionable, and recourse be had to other instances of the fingerpost about it.

下面事例堪称此话题上的路标性事例。假设有一部值得信任的自然史，其中发现曾有一个彗星，高低不论，其旋转方向明显与日转不一致（不规则姑且不论），反而是以相反的方向旋转，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自然界“可能”存在这种运动。但是如果找不到此类运动，那么就必定会认为其中必有问题，而且必须求助于其他相关的路标性事例。

Again,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weight or heaviness. Here the road will branch into two, thus. It must needs be that heavy and weighty bodies either tend of their own nature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by reason of their proper configuration; or else that they are attracted by the mass and body of earth itself as by the congregation of kindred substances, and move to it by sympathy. If the latter of these be the cause, it follows that the nearer heavy bodies approach to the earth, the more rapid and violent is their motion to it; and that the further they are from the earth, the feebler and more tardy is their motion (as is the case with magnetic attraction); and that this action is confined to certain limits. So that if they were removed to such a distance from the earth that the earth's virtue could not act upon them, they would remain suspended like the earth itself, and not fall at all. With regard to

this, then, the following would be an instance of the fingerpost. Take a clock moved by leaden weights, and another moved by the compression of an iron spring. Let them be exactly adjusted, that one go not faster or slower than the other. Then place the clock moving by weights on the top of a very high steeple, keeping the other down below, and observe carefully whether the clock on the steeple goes more slowly than it did on account of the diminished virtue of its weights. Repeat the experiment in the bottom of a mine, sunk to a great depth below the ground; that is, observe whether the clock so placed does not go faster than it did on account of the increased virtue of its weights. If the virtue of the weights is found to be diminished on the steeple and increased in the mine, we may take the attraction of the mass of the earth as the cause of weight.

再举一例，假设讨论的性质是重量或沉重。里路径将会分为两条，如下：重物体之所以倾向于地心，原因有二，要么是物体自身结构的缘故，要么是受地球这个团状体的吸引，就像物质相近则易聚一样，受交感作用而趋近地球。如果是后一种原因，那必定出现这种现象，即重物体离地球越近，其运动速度就越快越猛；离地球越远，其运动速度就越弱越缓（这与磁力相吸一样）；而且这种活动限于一定范围之内。即是说，如果将重物体移开使其与地球保持一定的距离，地球特性难以有所作用时，它们就会像地球自身那样悬停在那里而绝不会掉落下来。关于这一点，下面例子可作为路标性事例。先拿一个铅坠驱动钟，再拿一个上紧的铁制发条钟为例。将二者时间校准，速度保持一致，避免一快一慢。然后将铅坠驱动钟放置在高高的尖阁塔顶，把另一只钟放在塔底；再仔细观察塔顶钟是否会因铅坠的特性有所减少而比塔底钟走得慢些。还可以在离地面很深的矿井井底来重复这个实验，即观察井底的铅坠驱动钟是否因铅坠的特性有所增加比以前要走得快些。如果发现铅坠在塔顶时，其特性有所减少，而在矿底时，其特性有所增加，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地球块体的吸力就是重量

的原因。

Again, let the nature investigated be the polarity of the iron needle when touched with the magnet. With regard to this nature the road will branch into two, thus. Either the touch of the magnet of itself invests the iron with polarity to the north and south; or it simply excites and prepares the iron, while the actual motion is communicat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earth, as Gilbert thinks, and labors so strenuously to prove. To this point therefore tend the observations which he has collected with great sagacity and industry. One is, that an iron nail which has lain for a long time in a direction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gathers polarity without the touch of the magnet by its long continuance in this position; as if the earth itself, which on account of the distance acts but feebly (the surface or outer crust of the earth being destitute, as he insists, of magnetic power), were yet able by this long continuance to supply the touch of the magnet and excite the iron, and then shape and turn it when excited. Another is, that if iron that has been heated white-hot be, while cooling, laid lengthwis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it also acquires polarity without the touch of the magnet; as if the parts of the iron, set in motion by ignition and afterwards recovering themselves, were at the very moment of cooling more susceptible and sensitive to the virtue emanating from the earth than at other times, and thus became excited by it. But these things, though well observed, do not quite prove what he asserts.

再举一例，假设讨论的性质是磁针的磁极。关于这一性质，有两条途径，如下：要么是磁石本身的触感赋予铁针以南北两极；要么是磁石的触感刺激铁针使其具备磁性，而其实际运动则是由于地球出现而得以传递，这也正如吉尔伯特所主张并不遗余力要证明的观点。因

此，他用卓越的智慧并且下了很大功夫去收集的观察材料，也都倾向于证明这一点。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一颗铁钉如果长时间按南北方向置放，即使在相同位置没有磁石的持续磁化，也会获得极性现象；地球本身似乎因距离之故而作用甚微（他坚持认为，地球表面或外壳没有磁力），但久而久之，地球依然能够提供磁力而且激活铁钉的磁性，接着调整和改变被激活铁钉的方向。另一个观察到的现象是，铁加热到白热化程度时再冷却，再长时间按南北方向置放，即使没有被磁石磁化也会获得极性现象，这个过程仿佛就是铁分子燃烧——运动——复原的过程，其中铁分子在冷却时比其他时候，似乎更易受到来自地球散发出来的特性的影响，对此特性更加敏感，从而也变得活跃起来。以上事物虽然观察得很仔细，但并不能证明吉尔伯特的论断。

Now with regard to this question an instance of the fingerpost would be the following. Take a magnetic globe and mark its poles; and set the poles of the globe toward the east and west, not toward the north and south, and let them remain so. Then place at the top an untouched iron needle, and allow it to remain in this position for six or seven days.

关于这一问题，下面所述可以作为一个路标性事例。拿一个球形磁石，标明两极；将它的两极按东西方向置放，而不是南北方向置放，始终保持这种位置不动。再将一颗未经磁化的铁针置于磁球上方，并在此位置放上六至七天。

The needle while over the magnet (for on this point there is no dispute) will leave the poles of the earth and turn toward the poles of the magnet; and therefore, as long as it remains thus, it points east and west. Now if it be found that the needle, on being removed from the magnet and placed on a pivot, either starts off at once to

the north and south, or gradually turns in that direction, then the presence of the earth must be admitted as the cause; but if it either points as before east and west, or loses its polarity, this cause must be regarded as questionable, and further inquiry must be made.

铁针一旦放到磁石上方就会离开地球两极而转向磁石的两极；因此，只要铁针保持这种位置不动，铁针都会呈东西方向指向。现在如果看到的是，铁针一旦移开磁石而置于一个支轴上时，无论是立刻转为南北方向，还是渐进转向南北方向，那么不得不承认地球在场才是原因所在；但是如果铁针依然保持先前的东西指向，或者是失去极性现象，那么这个原因不得不看作有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Again,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the corporeal substance of the moon; that is, let us inquire whether it be rare, consisting of flame or air, as most of the old philosophers opined, or dense and solid, as Gilbert and many moderns, with some ancients, maintain. The reasons for the latter opinion rest chiefly on this, that the moon reflects the rays of the sun; nor does light seem to be reflected except by solid bodies. Therefore instances of the fingerpost on this question will (if any) be those which prove that reflection may take place from a rare body, as flame, provided it be of sufficient denseness. Certainly, one cause of twilight, among others,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rays of the sun from the upper part of the air. Likewise we occasionally see rays of the sun in fine evenings reflected from the fringes of dewy clouds with a splendor not inferior to that reflected from the body of the moon, but brighter and more gorgeous; and yet there is no proof that these clouds have coalesced into a dense body of water. Also we observe that the dark air behind a window at night reflects the light of a candle, just as a dense body would. We should also try the experiment of allowing

the sun's rays to shine through a hole on some dusky bluish flame. For indeed the open rays of the sun, falling on the duller kinds of flame, appear to deaden them so that they seem more like white smoke than flame. These are what occur to me at present as instances of the fingerpost with reference to this question, and better may perhaps be found. But it should always be observed that reflection from flame is not to be expected, except from a flame of some depth, for otherwise it borders on transparency. This however may be set down as certain—that light on an even body is always either received and transmitted or reflected.

再举一例，假设讨论的性质是月球的物质，即我们来调查一下月球是稀薄的还是密固的；前者是绝大多数哲学家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月球是由火焰或者空气构成，后者是吉尔伯特和许多现代人以及部分古人所持的观点。持后一种观点的理由主要是根据这么一个事实，即月球反射太阳光线，因为光似乎是非坚固性物体，不会反射。因此，这个问题上的路标性事例（假如有的话）要证明诸如火焰的稀薄性物体，只要有足够的浓度，也会发生反射现象。当然，晨光形成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太阳光线在大气顶部受到反射。同样，我们偶尔在美丽的晚晴中看到的太阳光线是受到了来自雨云边际的反射，其光辉不亚于从月球反射出来的光辉，但却更加明亮、更加灿烂，但是并无证据证明这些云聚结了水这种密实物体。我们还观察到这种现象，即窗玻璃后面那黑暗的空气在夜晚时会反射蜡烛的光，正如密实物体会反射光一样。我们还应该试做这么一个实验：让太阳光线穿过一洞口照射到淡蓝的火焰上。明亮阳光照射在幽暗的火焰上，似乎让火焰黯然失色，所以看上去更像白色的烟雾，不像火焰。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些现象都可以当作关于这个问题的路标性事例，兴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事例。但是随时都应该引起注意，别想指望火焰有什么反射，除非火焰具有某种深度，不然火焰就近似于透明了。然而这一点还是可以确定的——照在平滑物体上的光总是要么被吸收，要么被传递，要么被反射。

Again,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the motion of projectiles (darts, arrows, balls, etc.) through the air. This motion the schoolmen, as their way is, explain in a very careless manner, thinking it enough to call it a violent motion as distinguished from what they call a natural motion; and to account for the first percussion or impulse by the axiom that two bodies cannot occupy the same place on account of the impenetrability of matter, and not troubling themselves at all how the motion proceeds afterward. But with reference to this inquiry the road branches into two in this way. Either this motion is caused by the air carrying the projected body and collecting behind it, as the stream in the case of a boat, or the wind in that of straws; or it is caused by the parts of the body itself not enduring the impression, but pushing forward in succession to relieve themselves from it. The former of these explanations is adopted by Fracastorius and almost all who have entered into the investigation with any subtlety, an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air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it. But the other notion is undoubtedly the true one, as is shown by countless experiments. Among others the following would be an instance of the fingerpost on this subject: that a thin iron plate or stiffish iron wire, or even a reed or pen split in half, when pressed into a curve between the finger and thumb, leaps away. For it is obvious that this motion cannot be imputed to the air gathering behind the body, because the source of motion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plate or reed, not in the extremities.

再举一例，假设讨论的性质是划空而过的投射物（标枪、射箭、抛球等）运动。这种运动，经院学家们的解释照例是极其粗心草率的，他们认为只须将其称为暴力运动以别于他们所谓的自然运动就足够了；他们对初始冲击力或推力的说明用的是这么一条公理，即两个

物体，由于物质具有不可穿入性，因此不能占据同一位置；至于这种运动以后到底是如何进行，他们也无心过问。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存在两个分歧。这种运动要么是因空气而产生，空气运送投射物体而同时在其后拥推，就像溪中之舟，风中之草一样；要么是因投射物体自身而产生，投射物体的分子难以禁受内压，而持续向前推进以释放这种推压力。前者是费拉卡斯托罗以及几乎所有带着神秘色彩进行调查的人所采用的解释，毫无疑问，空气与此存在某种联系。而后者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解释，这一点得到了无数实验的证明。这个问题上其他事例中，下面这个事例可以看作是路标性事例：一张薄铁片或一截硬铁丝，乃至剖开的芦管或羽茎，当被拇指和食指压弯变成弧状时，就会弹跳出去。显然这种弹跳出去的运动不能归咎于其后的空气聚结，因为这个运动产生于铁片或芦管的中部，而不是产生于两端。

Again,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the rapid and powerful motion of the expansion of gunpowder into flame, by which such vast masses are upheaved, such great weights discharged, as we see in mines and mortars. With respect to this nature the road branches into two in this way. The motion is excited either by the mere desire of the body to expand when set on fire, or partly by that and partly by the desire of the crude spirit in the body, which flies rapidly away from the fire and bursts violently from its embrace as from a prison house. The schoolmen and common opinion deal only with the former desire. For men fancy themselves very fine philosophers when they assert that the flame is endowed by its elementary form with a necessity of occupying a larger space than the body had filled when in the form of powder, and that hence the motion ensues. Meanwhile, they forget to notice that although this be true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flame is generated, it is yet possible for the generation of flame to be hindered by a mass of matter sufficient to suppress and choke it; so that the case is not reduced to the necessity they insist on. For that expansion must necessarily

take place, and that there must needs follow thereon a discharge or removal of the opposing body, if flame be generated, they rightly judge. But this necessity is altogether avoided if the solid mass suppress the flame before it be generated. And we see that flame, especially in its first generation, is soft and gentle, and requires a hollow space wherein to play and try its strength. Such violence therefore cannot be attributed to flame by itself. But the fact is that the generation of these windy flames, or fiery winds as they may be called, arises from a conflict of two bodies of exactly opposite natures; the one being highly inflammable, which is the nature of sulphur, the other abhorring flame, as the crude spirit in niter. So that there ensues a strange conflict, the sulphur kindling into flame with all its might (for the third body, the willow charcoal, does no more than incorporate and combine the other two), while the spirit of the niter bursts forth with all its might and at the same time dilates itself (as air, water, and all crude bodies do when affected by heat), and by thus flying and bursting out fans meanwhile the flame of the sulphur on all sides as with hidden bellows.

再举一例，假设所讨论的性质是火药变成火焰时产生的迅猛运动；这种运动就像我们在地雷和臼炮见到的场景，可以将巨大块状物体炸飞，将沉重的物体发射出去。关于这个性质，存在着如下两条歧路。激起这种运动，要么仅仅是因为物体点燃后有膨胀的欲求，要么部分是因为膨胀的欲求，部分是因为物体的天然精气有急速从火中飞出的欲求，从而产生猛烈爆炸，就像犯人越狱一般，逃出火的重围。经院学家和普通人只讨论了前一种欲求。他们断言，根据其要素形式，火焰所占据的空间必然要大于火药这种物体形式所占据的空间，正因如此就必然产生这种爆炸性运动；他们以为只要做出这种断言，自己可称得上优秀的哲学家了。与此同时，他们没有注意到，尽管在火焰是生成的这种假设上，是正确的，但也有可能火焰生成会受到块状物质的阻碍，足以抑制窒息火焰；因此，这种情况并不能归咎于他

们坚持的必然性。如果说火焰产生时，必然产生膨胀，而且必定把阻碍膨胀的物体发射出去或移开，那么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但这个必定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条件是密实块体在火焰产生前就将火焰抑制住。我们知道，火焰，尤其是在产生初期，比较柔弱温和，需要有空间来活跃积蓄力量。因此，这种暴烈性火焰本身并不具有。但事实上，那种带风的火焰，或称为带火焰的风，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物体因冲突而产生的：一个是极度的易燃性，硫磺就具有这种性质，一个是恶燃性，如硝石就具有这种固有的精气。因此，必然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冲突，硫磺不遗余力地燃烧成火焰（木炭作为第三种物体只不过联合和结合其他两种物体），而硝石的精气不遗余力地冲出去，同时产生膨胀（空气、水以及所有天然物体受热必膨胀），飞奔逃逸的同时从四面八方扇动着硫磺产生的火焰，仿佛四周暗装着风箱在鼓着风。

On this subject we may have instances of the fingerpost of two kinds. The first, of those bodies which are most highly inflammable, as sulphur, camphor, naphtha and the like, with their compounds, which catch fire more quickly and easily than gunpowder if not impeded (from which it appears that the desire of bursting into flame does not produce by itself that stupendous effect); the other, of those bodies which shun and abhor flame, as all salts. For we find that if salts are thrown into the fire their aqueous spirit bursts out with a crackling noise before flame is caught; which is the case also, though in a milder degree, with the stiffer kinds of leaves, the aqueous part escaping before the oily catches fire. But this is best seen in quicksilver, which is not inaptly called mineral water. For quicksilver, without bursting into flame, by mere eruption and expansion almost equals the force of gunpowder, and is also said, when mixed with gunpowder, to increase its strength.

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可以找到两类路标性事例。一类是那些最具

易燃性的物体，如硫磺、樟脑、石油精等及其混合体；这些物体如果不受阻碍，比火药更快更易着火（由此可见，火药本身有爆发成火焰的欲求，但这个欲求本身并不能产生出这种恢宏的效果）；另一类是那些躲避憎恶火焰的物体，如所有的盐。我们发现，如果将盐撒入火中，盐中水质立刻会发出爆裂声，然后才燃烧出火焰；这种情形也见于坚硬的树叶，不过程度较轻一些，水分子逃离后，其油分子就燃烧起来。但是这种情形体现得最明显的还是水银，不愧为矿物水。水银无须燃烧成火焰，只须喷发膨胀，几乎就可以达到火药的威力，而且据说，若与火药混合，其力量会增加。

Again,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the transitory nature of flame and its instantaneous extinction. For the nature of flame appears to have no fixed consistency here with us, to be every moment generated and every moment extinguished; for it is clear that in flames which continue and last, the continuance we see is not of the same individual flame, but is caused by a succession of new flame regularly generated. Nor does the flame remain numerically identical, as is easily seen from this, that if the food or fuel of flame be taken away, the flame instantly goes out. With reference to this nature the roads branch into two, thus: the instantaneous nature proceeds either from a cessation of the cause which at first produced the flame, as in light, sound, and the motion called “violent”; or from this, that the flame, though able by its own nature to remain with us, suffers violence and is destroyed by the contrary natures that surround it.

再举一例，假设所讨论的性质是火焰的瞬时性和短暂性。火焰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没有固定持续性，随生随灭；显然，在持续不断的火焰中，我们看到的那种持续性，实际上并不是同一股火焰，而是由连续不断地有规则地产生的新火焰而导致的。如果用数字计算的

话，火焰前后并不一致，这一点很容易看出来，因为只要把燃料抽走，火焰立刻熄灭。关于这一性质，存在着两条歧路，如下：瞬熄性的产生，要么是由于最初产生火焰的火源停止的缘故，如光、声以及称为“强力”的运动停止下来；要么就是由于火焰按其本性虽然能保持下来，但遭受强力而被周围相反性质所摧灭。

On this subject therefore we may take the following as an instance of the fingerpost. We see in large fires how high the flames ascend, for the broader the base of the flame, the higher is its vertex. Thus extinction appears to commence at the sides, where the flame is compressed and troubled by the air. But the heart of the flame, which is not touched by the air but surrounded by other flame on all sides, remains numerically identical; nor is it extinguished until gradually compressed by the surrounding air. Thus all flame is in the form of a pyramid, being broader at the base where the fuel is, but sharp at the vertex, where the air is antagonistic and fuel is wanting. But smoke is narrow at the base and grows broader as it ascends, like an inverted pyramid; the reason being that the air admits smoke and compresses flame. For let no one dream that lighted flame is air, when in fact they are substances quite heterogeneous.

因此，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下面例子作为路标性事例。我们看见火大时火焰跃腾得很高，因为火焰底部越宽，火焰跃腾得就越高。因此，熄灭是从周边开始，因为周边的火焰受到了空气的驱压和干扰。但是火心接触不到空气，反而周围全是其他火焰，因此，在数量上前后保持相同；火心也不会熄灭，除非渐渐受到周边空气的挤压。由此看来，所有火焰都呈金字塔形，底部宽，顶部尖，底部为燃料区，顶部面对空气而又缺乏燃料。而烟雾底部窄，升得越高，散布越宽，呈倒金字塔形；原因是空气吸纳烟雾而挤压火焰。千万别以为

点燃火焰的是空气，实际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物质。

But we may have an instance of the fingerpost more nicely adapted to this purpose, if the thing can be made manifest with bicolored lights. Fix a lighted wax taper in a small metal stand; place the stand in the middle of a bowl, and pour round it spirit of wine, but not enough to reach the top of the stand. Then set fire to the spirit of wine. The spirit of wine will yield a bluish, the taper a yellow flame. Observe therefore whether the flame of the taper (which is easily distinguished by its color from the flame of the spirit of wine, since flames do not mix at once, as liquids do) remains in a conical or rather tends to a globular form, now that there is nothing to destroy or compress it. If the latter is found to be the case, it may be set down as certain that flame remains numerically identical as long as it is enclosed within other flame and feels not the antagonistic action of the air.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更适合说明这一点的路标性事例，条件是能用双色光使事情更加明显。把一只点燃的蜡烛插在一个小金属烛台上，放在一只碗中，周围倒上酒精，但不要太多以免漫过烛台。然后点燃酒精。酒精发出浅蓝色的火焰，烛火发出黄色火焰。仔细观察蜡烛火焰（这很容易凭颜色与酒精的火焰区分开来，因为火焰不像液体那么容易混合）是保持圆锥体，还是更加倾向于形成球体，因为此时并没有什么东西来摧灭或挤压烛火。如果发现是后一种形状，那就可以断定，火焰在其他火焰的围护之下而且感受不到来自空气的威胁，那么在数字上就会保持前后相同。

Let this suffice for instances of the fingerpost. I have dwelt on them at some length to the end that men may gradually learn and

accustom themselves to judge of nature by instances of the fingerpost and experiments of light, and not by probable reasonings.

关于路标性事例，就到此为止了。在这一点上，我讲得有点详细，旨在让人们逐渐学会和习惯通过路标性事例和借用光的实验，而不是使用或然性推理来判断性质。

XXXVII

三十七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fifteenth place *Instances of Divorce* , which indicate the separation of natures of most familiar occurrence. They differ from the instances subjoined to the instances of companionship, in that the latter indicate the separation of a nature from some concrete substance with which it is ordinarily in conjunction, while these instances indicate the separation of one nature from another. They differ from instances of the fingerpost, in that they determine nothing, but simply notify the separability of one nature from another. Their use is to detect false forms and to dissipate slight theories suggested by what lies on the surface, and so serve as ballast to the understanding.

（十五）讨论优先权事例中“离异性事例”，离异性事例指的是最常见的性质分离。这些事例与友伴性事例不同，后者是指一个性质通常与其所依附的具体物质相背离，而离异性事例指的是一个性质与另一个性质相背离。离异性事例不同于路标性事例，因为离异性事例什

么也不能确定，而只是表明一个性质与另一个性质具有可分离性。离异性事例的用途是检查错误形式，驱散流于表面的轻浮学说，因此可以充当理解力的镇舱之物。

For example, let the natures investigated be those four natures which Telesius accounts as messmates and chamber fellows, namely: heat, brightness, rarity, mobility or promptness to motion. We find, however, many instances of divorce between them. For air is rare and mobile, not hot or bright; the moon is bright without heat; boiling water is hot without light; the motion of an iron needle on a pivot is quick and nimble, and yet the body is cold, dense, and opaque; and there are many more of the kind.

举例说明，假设要讨论的性质是泰莱西奥所描述为互为食友和室友所具有的四种性质，即热、亮、稀薄、易动或敏捷。不过，从中我们找到不少离异性事例。例如，空气空薄易动；月亮亮而不热；沸水热而无光；铁针在支点上运转迅速敏捷，但针身冰凉，密实而不透明；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不少。

Again, let the natures investigated be corporeal nature and natural action. For it seems that natural action is not found except as subsisting in some body. Yet in this case also we shall perhaps be able to find some instance of divorce; such, for example, as magnetic action, by which iron is drawn to the magnet, heavy bodies to the globe of the earth. There may also be added some other operations performed at a distance. For such action takes place both in time, occupying moments not a mere instant of time, and in space, passing through degrees and distances. There is therefore some moment of time, and some distance of space, in

which the virtue or action remains suspended between the two bodies which produce the motion. The question therefore is brought to this: whether the bodies which are the limits of the motion dispose or alter the intermediate bodies, so that by a succession of actual contacts the virtue passes from limit to limit, meanwhile subsisting in the intermediate body; or whethe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but only the bodies, the virtue, and the distances. In rays of light, indeed, and sounds, and heat, and certain other things acting at a distance,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intermediate bodies are disposed and altered, the more so because they require a medium qualified for carrying on the operation. But that magnetic or attractive virtue admits of media without distinction, nor is the virtue impeded in any kind of medium. And if the virtue or acti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intermediate body, it follows that there is a natural virtue or action subsisting for a certain time and in a certain space without a body, since it neither subsists in the limiting nor in the intermediate bodies. And therefore magnetic action may be an instance of divorce between corporeal nature and natural action. To which may be appended as a corollary or advantage not to be omitted that here is a proof furnished by merely human philosophy of the existence of essences and substances separate from matter and incorporeal. For allow that natural virtue and action, emanating from a body, can exist for a certain time and in a certain space altogether without a body, and you are not far from allowing that it can also emanate originally from an incorporeal substance. For corporeal nature appears to be no less requisite for sustaining and conveying natural action than for exciting or generating it.

再如，假设要调查的性质是自然物体和自然活动。自然活动离开某种物体似乎就找不到了。但在这个例子中，或许我们也能找到某种

离异性事例；以磁效应为例，如磁石吸铁，地球吸引重物体。还可以补充一些远距离操作活动为例。此类活动的发生，就其所占用的时间而言，是时段而不是时刻；就其穿越的空间而言，是渐进而成的距离。这个性质或活动，在某个时刻、某一空间点上，依然会存留在产生运动的两个物体之间。是否运动两端的物体影响或改变了中介物体，从而导致力量连续紧密地从一端移向另一端，并在一定时间里存续于中介物中——真是如此的呢，还是除了物体、力量和空间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确，在光线、声、热、以及某些其他隔空发生作用的事物中，中介物或许受到影响和改变，而且多半是这样，因为这些都需要一个合格的中介物来实施操作。但磁性或粘力对中介物没有任何影响，反而这种特性在任何中介物中都会受到阻碍。如果这种特性和活动与中介物没有关系，那么某一自然特性或自然活动无须依赖物体也必然存续某一时间或某一个空间，因为它既不存续于两端，也不存续于中介物体。因此，磁性活动可以看作是自然物质和自然活动之间的离异性事例。对此，还有一点可以看作是不可忽略的推论或收益而应该补充出来，即只需人类哲学就可以证明存在着分离的、无形的本体和物质。因为一旦承认自然特性和自然活动发自于物体，而且完全可以在某一时空中脱离物体而存在，那么你就几乎承认这种活动最初是源自于无形的物质。实体性在维持和保持自然活动时必不可少，在激发和产生自然活动时也必不可少，而且前者不亚于后者。

XXXVIII

三十八

Now follow five classes of instances which under one general name I call *Instances of the Lamp* , or of *First Information* . They are those which aid the senses. For since all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commences with the senses and leads from the perceptions of the

senses by a straight, regular, and guarded path to the perceptions of the understanding, which are true notions and axioms, it follows of necessity that the more copious and exact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nses, the more easily and prosperously will everything proceed.

接下来的五种事例，可以用一个名称来统称，即“明灯事例”或“初始信息事例”。这些事例有助于感官。既然所有的自然阐释都始于感官，而且从感官的认识达到理解的认识的途径是直接的、有序的、谨慎的，即真实的概念和公理，那么势必导致感官的表象越丰富精确，一切事情就进行得越容易顺利。

Of these five instances of the lamp, the first strengthen, enlarge, and rectify the immediate actions of the senses; the second make manifest things which are not directly perceptible by means of others which are; the third indicate the continued processes or series of those things and motions which are for the most part unobserved except in their end or periods; the fourth provide the sense with some substitute when it utterly fails; the fifth excite the attention and notice of the sense, and at the same time set bounds to the subtlety of things. Of these I shall now speak in their order.

在五种明灯事例中，第一种是强化、扩大、修正直接的感官活动；第二种是通过其他可以直接感知的事物来彰显不能直接感知的事物；第三种指连续的过程或连续的事情和运动，其中绝大部分都不到结束或告一段落时不会为人所观察到；第四种在感官失效时代替感官；第五种激发感官的注意和关注，同时对事物的精微设定界限。以上这些，我现在逐一论述。

XXXIX

三十九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sixteenth place *Instances of the Door or Gate* , this being the name I give to instances which aid the immediate actions of the senses. Now of all the senses it is manifest that sight has the chief office in giving information. This is the sense, therefore, for which we must chiefly endeavor to procure aid. Now the aids to sight are of three kinds: it may be enabled to perceive objects that are not visible; to perceive them further off; and to perceive them more exactly and distinctly.

（十六）讨论优先权事例中“门户性事例”，这样命名有助于感官的直接活动。所有感官中，视觉的主要任务显然是提供信息。因此，视觉才是我们必须而且是主要努力提供帮助的感官。对视觉的帮助分三种：一是要让视觉能看见看不见的东西；二是要让视觉看见更加遥远的东西；三是要让视觉看得更加准确，更加清楚。

Of the first kind (not to speak of spectacles and the like, which serve only to correct or relieve the infirmity of a defective vision, and therefore give no more information) are those recently invented glasses which disclose the latent and invisible minutiae of bodies and their hidden configurations and motions by greatly increasing their apparent size; instruments by the aid of which the exact shape and outline of body in a flea, a fly, a worm, and also colors and motions before unseen, are not without astonishment discerned. It is also said that a straight line drawn with a pen or pencil is seen

through such glasses to be very uneven and crooked, the fact being that neither the motion of the hand, though aided by a ruler, nor the impression of the ink or color, is really even, although the unevenness is so minute that it cannot be detected without such glasses. And here (as is usual in things new and wonderful) a kind of superstitious observation has been added, viz., that glasses of this sort do honor to the works of nature but dishonor to the works of art. The truth however is only this, that natural textures are far more subtle than artificial. For the microscope, the instrument I am speaking of, is only available for minute objects. So that if Democritus had seen one, he would perhaps have leaped for joy, thinking a way was now discovered of discerning the atom, which he had declared to be altogether invisible. The incompetency however of such glasses, except for minutiae alone, and even for them when existing in a body of considerable size, destroys the use of the invention. For if it could be extended to larger bodies, or to the minutiae of larger bodies, so that the texture of a linen cloth could be seen like network, and thus the latent minutiae and inequalities of gems, liquors, urine, blood, wounds, etc., could be distinguished, great advantages might doubtless be derived from the discovery.

属于第一种帮助的（眼镜等类似的东西除外，因为这些只能起到纠正或弥补视觉缺陷的作用，而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有新近发明的玻璃镜，这种玻璃镜可以把物体尺寸放大若干倍，把潜隐而难见的细节以及暗藏的结构和运动显示出来；通过这种工具，不仅跳蚤、苍蝇和蠕虫的准确形状和身体轮廓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先前难见的色彩和运动也都可以鉴别出来，清楚程度令人吃惊。据说，用钢笔或铅笔画出的直线，如果用这种玻璃镜来看，都显得参差不匀、弯弯曲曲；因为画线时即使借助直尺，手的运动也并不真正均匀，而且墨水或颜色的渗印也并不真正均匀，尽管这种参差不匀细小得不用这种玻

璃镜难以觉察。这儿（就像对新奇的事物一样）有一种迷信的论调，即这类玻璃镜对自然作品而言是锦上添花，但对技术作品而言却是丢人现眼。然而真实的情况只能这样的，即自然肌理远比技术精微得多。显微镜，即我谈及到的工具，只对微小的物体有用。因此，如果说德谟克利特看到了这种显微镜，兴许他早就高兴得跳了起来，认为，现在发现了一种方法来观察他声称完全看不见的原子。然而这种镜子除了对细微的事情之外毫无用处，甚至对体积巨大的物体中的细小部分也毫无用处，因此这种发明的用途也就被抹杀了。如果这种用途能扩展到更大的物体，或扩展到更大物体的细微之处，扩展到能看得见麻布的网状组织，能鉴别出宝石、酒精、尿液、血液、创伤等的隐微不匀之处，那么这种发现无疑会产生巨大的益处。

Of the second kind are those other glasses discovered by the memorable efforts of Galileo, by the aid of which, as by boats or vessels, a nearer intercourse with the heavenly bodies can be opened and carried on. For these show us that the Milky Way is a group or cluster of small stars entirely separate and distinct, of which fact there was but a bare suspicion among the ancients. They seem also to point out that the spaces of the planetary orbits, as they are called, are not altogether destitute of other stars, but that the heaven begins to be marked with stars before we come to the starry sphere itself, although with stars too small to be seen without these glasses. With this instrument we can descry those small stars wheeling as in a dance round the planet Jupiter, whence it may be conjecture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centers of motion among the stars. With this the inequalities of light and shade in the moon are more distinctly seen and placed, so that a sort of selenography can be made. With this we descry spots on the sun, and similar phenomena—all indeed noble discoveries, so far as we may safely trust to demonstrations of this kind, which I regard with suspicion chiefly because the experiment stops with these few discoveries,

and many other things equally worthy of investigation are not discovered by the same means.

属于第二种帮助的是另一种玻璃镜，那可是伽利略不断努力发明出来的，令人难忘；借助于这种镜子的帮助，就像借助于舟或船，可以开辟出一条通往天体的神交之路。这种玻璃镜告诉我们，银河是一群或一组完全分离、彼此不同的小星星组成；其实，银河对古人来说只是空想而已。这种镜子似乎还指明行星轨道的空间并非完全没有其他恒星，而是在我们看到恒星界本身之前，天空原就标注好了恒星，不过恒星很小，没有这种玻璃镜，小得几乎看不见罢了。有了这种工具，我们就能看见那些围绕行星木星跳舞般旋转的小恒星；由此可以推测到恒星中有若干运动中心。有了这种工具，我们还可以把月亮中光与影的不平衡之处看得更加清楚，从而绘制出一种月相图。有了这种工具，我们就可以看见太阳中的斑点及其类似的现象——所有这些的确都是高贵的发现，只要我们能确信这类实证；但对这类实证，我抱以怀疑，主要是因为这种实验竟然仅仅限于这些很少的发现，而许多其他同样值得调查的事物却未能用同样的手段发现出来。

Of the third kind are measuring rods, astrolabes, and the like, which do not enlarge the sense of sight, but rectify and direct it. And if there are other instances which aid the remaining senses in their immediate and individual actions, and yet are of a kind which add nothing to the information already possessed; they are not to the present purpose, and therefore I have omitted to mention them.

属于第三种帮助的有测量杆、观象仪以及类似的东西；这些东西并没有扩展视觉感官，而只是矫正和指导了视觉感官而已。其他事例有助于其他感官的直接的个体活动，但属于那种不能在已知信息之外有所增添；这种事例并非当前的目的，所以我就略而不提了。

XL

四十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seventeenth place *Summoning Instances* , borrowing the name from the courts of law, because they summon objects to appear which have not appeared before. I also call them *Evoking Instances* . They are those which reduce the nonsensible to the sensible, that is, make manifest things not directly perceptible by means of others which are.

（十七）讨论优先权事例中“传票性事例”，这是借自法庭上的一个术语，因为要把原未出现的对象传唤出来，又称“传唤性事例”。这些事例将不可感知的事物变为可感知的事物，即通过那些可以直接察觉的东西使那些不能直接察觉的东西清楚地显现出来。

An object escapes the senses either on account of its distance; or on account of the interposition of intermediate bodies; or because it is not fitted for making an impression on the sense; or because it is not sufficient in quantity to strike the sense; or because there is not time enough for it to act on the sense; or because the impression of the object is such as the sense cannot bear; or because the sense has been previously filled and occupied by another object, so that there is not room for a new motion. These cases have reference principally to the sight, and secondarily to the touch. For these two senses give information at large and concerning objects in general, whereas the other three give hardly any information but

what is immediate and relates to their proper objects.

一个对象之所以逃脱人的感官，或者是因为对象距离较远，或者是因为有中间物的阻隔，或者是因为它不适合给感官留下印象，或者是因为它的量不够而难以打动感官，或者是因为它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对感官产生作用；或者是因为它的印象感官难以承受；或者因为感官早已被其它对象所填塞，以致没有余地来接纳新的运动。这几种情况首先涉及视觉，其次涉及触觉。因为这两种感官提供的信息详尽，涉及的对象广泛，而其他三种感官，除了与特定对象直接有关的东西外，很难提供任何信息。

In the first kind, where an object is imperceptible by reason of its distance, there is no way of manifesting it to the sense but by joining to it or substituting for it some other object which may challenge and strike the sense from a greater distance—as in communication by beacons, bells, and the like.

在第一种情形下，一个对象由于距离较远，所以很难被人察觉，要想将这个对象显露到感官面前，只有将较远距离之外而且能打动感官的其他对象加进来，或用其他对象来代替；如通信用的烽火、鸣钟和类似的东西。

In the second kind, this reduction or secondary manifestation is effected when objects that are concealed by the interposition of bodies within which they are enclosed and cannot conveniently be opened out are made manifest to the sense by means of those parts of them which lie on the surface, or make their way from the interior. Thus the condition of the human body is known by the

state of the pulse, urine, and the like.

在第二种情形下，当对象隐藏在周围的间隔物中且不便打开时，要想把它还原或显露到感官面前，只有借助于裸露在外的表层部分，或借助于来自内部的部分。例如，人的身体状况可以通过脉搏、便溺和类似状态来查知。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kind, reductions are applicable to a great many things, and in the investigations of nature should be sought for on all sides. For example, it is obvious that air and spirit, and like bodies, which in their entire substance are rare and subtle, can neither be seen nor touched. Therefore,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bodies of this kind it is altogether necessary to resort to reductions.

在第三、四种情况下，还原法适合绝大多数事物，因此，我们在调查自然过程中应该竭力寻求使用这种方法。例如，空气、精气以及其他在整个质体上稀薄而精微的物体，显然既看不见也触及不到。因此，在调查此类物体时，使用还原法完全必要。

Thus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the action and motion of the spirit enclosed in tangible bodies. For everything tangible that we are acquainted with contains an invisible and intangible spirit which it wraps and clothes as with a garment. Hence that three-fold source, so potent and wonderful, of the process of the spirit in a tangible body. For the spirit in a tangible substance, if discharged, contracts bodies and dries them up; if detained, softens and melts them; if neither wholly discharged nor wholly detained, gives them shape, produces limbs, assimilates, digests, ejects, organizes, and

the like. And all these processes are made manifest to the sense by conspicuous effects.

举例说明，假设所讨论的性质内含在有形物体中之精气的活动和运动。我们熟悉的一切有形的东西都内含有一种难以看见、难以触摸的精气，精气外面仿佛包裹着一件外套。因此有形物体中精气有三重奇异而有力的过程。因为有形物质的精气，如释放出去，物体就会收缩和干化；如阻留在内，物体就会软化和熔化；如既未全部释放出去，也未全部阻留在内，那么就会赋予物体以形状，形成肢体，产生同化、消化、排阻、组织等活动。这些过程全都会呈现在感官面前，而且效果非常明显。

For in every tangible inanimate body the enclosed spirit first multiplies itself and, as it were, feeds upon those tangible parts which are best disposed and prepared for that purpose and so digests and elaborates and turns them into spirit; and then they escape together. Now this elaboration and multiplication of the spirit is made manifest to the sense by diminution of weight. For in all desiccation there is some decrease of quantity, not only of the quantity of spirit previously existing in the body, but also of the body itself, which was before tangible and is newly changed. For spirit is without weight. Now the discharge or emission of the spirit is made manifest to the sense in the rust of metals and other similar putrefactions which stop short before they come to the rudiments of life; for these belong to the third kind of process. For in compact bodies the spirit finds no pores or passages through which to escape and is therefore compelled to push and drive before it the tangible parts themselves, so that they go out along with it; whence proceed rust and the lik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traction of the tangible parts after some of the spirit is discharged (upon which desiccation

ensues), is made manifest to the sense not only by the increased hardness of the body, but much more by the rents, contractions, wrinklings, and shrivelings in the body which thereupon take place. For the parts of wood split asunder and are contracted; skins shrivel; and not only that, but if the spirit is suddenly discharged by the heat of fire, they hasten so fast to contraction as to curl and roll themselves up.

在一切有形的无生命物体中，其内含的精气，首先自我繁殖，宛若精气以专为其贮备的有形分子为食，然后把它们消化、转变成精气；接着，精气全部逃逸出来。精气这种转变和繁殖是以减轻重量的方式呈现在感官面前。在一切干化过程中，数量都会有所减少，不仅物体原先存有的精气数量有所减少，而且物体本身的数量也有所减少，即先前的可解除分子而现在产生了新的变化。因为精气没有重量。金属生锈及其他类似的腐坏过程将精气的释放或散发呈现在感官面前，这个过程要持续到化为生命的残骸为止；因为这属于第三类过程。由于在密实物体中，精气找不到可以逃逸的空隙或出口，不得不把有形分子本身驱赶在前面，这样有形分子就与精气一起逃逸；这样便出现了生锈一类的东西。另一方面，精气释放出来后（随后便出现干化现象），有形分子就产生压缩现象，即呈现在我们感官面前的不仅是物体会变硬，物体还会出现破裂、压缩、起皱、干枯等现象。例如木头分子发生龟裂和瘪缩；皮肤起褶皱；非但如此，但如果精气因遇火之热而突然释放出来，它们就会迅速瘪缩以致盘曲和卷曲起来。

On the contrary, where the spirit is detained and yet expanded and excited by heat or something analogous thereto (as happens in the more solid or tenacious bodies), then are bodies softened, as white hot iron; or they become fluid, as metals; or liquid, as gums, wax, and the like. Thus the contrary operations of heat, which hardens some substances and melts others, are easily reconciled,

since in the former the spirit is discharged, in the latter it is excited and detained; whereof the melting is the proper action of the heat and spirit, the hardening is the action of the tangible parts only on occasion of the discharge of the spirit.

相反，精气即使受到阻留，但在热或类似东西的扩张刺激下（如更加坚固或坚实的物体中发生的那样），物体就会软化，如白热化的铁，或者变成流体，如金属，或者变成液体，如树胶，蜡烛及类似的东西。热会软化某些质体而熔化其他实体，这两种相反动作很容易解释，因为前者是释放精气，后者刺激精气而又阻留精气；就这两种活动而言，熔化是热和精气固有的活动，而硬化是有形分子只有在释放精气时的活动。

But when the spirit is neither wholly detained nor wholly discharged, but only makes trials and experiments within its prison house, and meets with tangible parts that are obedient and ready to follow, so that wheresoever the spirit leads they go along with it, then ensues the forming of an organic bod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parts, and all the other vital actions as well in vegetable as in animal substances. And these operations are made manifest to the sense chiefly by careful observation of the first beginnings and rudiments or essays of life in animalculae generated from putrefaction, as in ants' eggs, worms, flies, frogs after rain, etc. There is required, however, for the production of life both mildness in the heat and pliancy in the substance, that the spirit may neither be so hurried as to break out, nor be confined by the obstinacy of the parts, but may rather be able to mold and model them like wax.

精气既未全部释放出去，也未全部阻留在内，但只能在监房内做

做实验，而且所遇到的都是一些善于服从和敏于追随的有形分子，精气引至何处，分子便跟随到何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随之而来就是一个有机体的形成，一些有机部分的发展，以及植物和动物体中出现的一切其他的有生命活动。这些动作呈现在感官面前，主要是通过仔细观察因腐生微生物的生命开端、雏形或最初的努力，这些微生物包括蚁卵、蠕虫、苍蝇以及雨后之蛙等。然而热度中的温和性和物质中的柔顺性，对生命的产生而言，必不可少。这样，精气才不至于亟不可待地爆裂而出，也不致于受制于分子的顽固性，反而能像对待蜡烛一样塑造这些分子，将它们铸型。

Again, that most noble distinction of spirit which has so many applications (viz., spirit cut off; spirit simply branching; spirit at once branching and cellulate—of which the first is the spirit of all inanimate substances, the second of vegetables, the third of animals), is brought as it were before the eyes by several instances of this kind of reduction.

再者，精气有许多用途，其最高级别的区分（即孤立的精气、分枝式精气、分枝式和细胞式精气——第一种属于所有无生命质体，第二种属于植物，第三种属于动物）是通过这种还原法的一些事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In like manner it appears that the more subtle textures and configurations of things (though the entire body be visible or tangible) are perceptible neither to the sight nor touch. And therefore in these also, our information comes by way of reduction. Now the most radical and primary difference between configurations is drawn from the abundance or scantiness of the matter occupying the same space or dimensions. For all other

configurations (which have reference to the dissimilarity of the parts contained in the same body, and to their collocation and position) are but secondar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former.

同样，事物比较精微的肌理和结构（尽管整个物体看得见或摸得着），既不能被视觉所察知，也不能被触觉所察知。因此，这几种情况中，我们获取的信息也是来自于还原法。结构之间最基本、最主要的区别是通过物质占据相同空间或容积的多少来区分的。所有其他结构（我是指同一物体中分子之间的差异之处以及分子排列与布局），较之于前者，只能算是次要的。

Thus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the expansion or coition of matter in bodies compared one with another, viz., how much matter occupies how much space in each. For there is nothing more true in nature than the twin propositions that “nothing is produced from nothing,” and “nothing is reduced to nothing,” but that the absolute quantum or sum total of matter remains unchanged, without increase or diminution. Nor is it less true that of that quantum of matter more or less is contained under the same space or dimensions according to the diversity of bodies; as in water more, in air less. So that to assert that a given volume of water can be changed into an equal volume of air is as much as to say that something can be reduced to nothing; as on the other hand to maintain that a given volume of air can be turned into an equal volume of water is the same as to say that something can be produced out of nothing. And it is from this abundance and scantiness of matter that the abstract notions of dense and rare, though variously and promiscuously used, are, properly speaking, derived. We must also take for granted a third proposition which is also sufficiently certain, viz., that this greater or less quantity of

matter in this or that body is capable of being reduced by comparison to calculation and to exact or nearly exact proportions. Thus one would be justified in asserting that in any given volume of gold there is such an accumulation of matter, that spirit of wine, to make up an equal quantity of matter, would require twenty-one times the space occupied by the gold.

假设讨论的性质是物质的扩张性或会聚性在一些物体之间的比较；也就是说，要比较一下每个物体中有多少物质占据了多少空间。自然之中，真实莫过于一对命题所言，即“无物生于虚无”和“无物归于虚无”；物质的绝对总量保持不变，既不增加也不减少。这种说法也是真实无误的，即物体不同，相同空间或相同体积所包含的物质数量也就有多有少之别，如在水中多一些，在空气中就少一些。因此，如果声称一定体积的水能够变成相等体积的空气，那就等于说有些东西可以化归于虚无；反之，如果主张一定体积的空气能够变成相等体积的水，那就等于说有些东西产生于虚无。浓密与稀薄这两个抽象概念，尽管人们用法不一而且凌乱，但确切的说，还是从物质含量的多少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我们还必须承认第三个命题，即这个或那个物体中物质数量的多与少，通过比较可以计算出来的，并且可以得出精确或近乎精确的比例。因此，人们有理由断言，质量相等的情况下，酒精所占据的空间是黄金所占据的空间的21倍。

Now the accumulation of matter and its proportions are made manifest to the sense by means of weight. For the weight answers to the quantity of matter in the parts of a tangible body, whereas spirit and the quantum of matter which it contains cannot be computed by weight, for it rather diminishes the weight than increases it. But I have drawn up a very accurate table on this subject, in which I have noted down the weights and volumes of all the metals, the principal stones, woods, liquors, oils, and many other bodies,

natural as well as artificial—a thing of great use in many ways, as well for light of information as for direction in practice, and one that discloses many things quite beyond expectation. Not the least important of which is this—it shows that all the variety in tangible bodies known to us (such bodies I mean as are tolerably compact and not quite spongy and hollow, and chiefly filled with air) does not exceed the limit of the ratio of 1 to 21—so limited is nature, or at any rate that part of it with which we have principally to do.

物质的累积量及其比例是通过重量显露在我们的感官面前的。因为重量就是一个物体中所包含的物质数量，即有形物体分子的物质数量，而精气及其所含的物质数量是不能用重量来计算，因为精气与其说是增加了重量，不如说是减轻了重量。至于这一点，我曾绘制了一张非常准确的表格，表中记录了所列物体的重量和体积，有金属、主要的石类、木头、液体、油类以及许多其他自然和人工物体——这个表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有用，既可以用来获取信息之光，也可以用来指导实践，还可以用来揭示许多出人意料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即我们所知的各种有形物体（我是指这些物体相当密实，毫无填充空气的空隙）都不会超过1:20的比例——因此，自然，至少是与我们紧密相关的那部分自然很有限。

I have also thought it worth while to try whether the proportions can be calculated which intangible or pneumatic bodies bear to bodies tangible. This I attempted by the following contrivance. I took a glass phial, capable of holding about an ounce, using a small vessel that less heat might be required to produce evaporation. This phial I filled with spirit of wine almost to the neck, selecting spirit of wine, because I found by the former table that of all tangible bodies (which are well united and not hollow) this is the rarest and contains the least quantity of matter in a given

space. After that, I noted exactly the weight of the spirit and phial together. I then took a bladder capable of holding about a quart from which I squeezed out, as well as I could, all the air, until the two sides of the bladder met. The bladder I had previously rubbed over gently with oil, to make it closer, and having thus stopped up the pores, if there were any, I inserted the mouth of the phial within the mouth of the bladder, and tied the latter tightly round the former with a thread smeared with wax in order that it might stick more closely and tie more firmly. After this I set the phial on a chafing dish of hot coals. Presently the steam or breath of the spirit of wine, which was dilated and rendered pneumatic by the heat, began gradually to expand the bladder and swelled it out on all sides like a sail. When this took place, I immediately took the glass off the fire, placing it on a carpet that it might not crack with the cold,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a hole in the bladder lest the steam should turn liquid again on the cessation of the heat and so disturb the calculations. I then removed the bladder, and weighing the spirit of wine which remained, computed how much had been converted into steam or air. Then, comparing the space which the body had occupied while it was spirit of wine in the phial with the space which it afterward occupied when it had become pneumatic in the bladder, I computed the results, which showed clearly that the body had acquired by the change a degree of expansion a hundred times greater than it had had before.

还有，我认为还值得试试无形的物体或气体与有形物体之间的比例是否可以计算出来。对此，我曾用下面这个发明试了试。拿一个能容纳大约一盎司的小玻璃瓶，用小器皿是因为即使使用较少的热也可以产生蒸发。用酒精装满至瓶颈，用酒精是因为从上述表中我发现，所有有形物体中（凝合很好并无中空的物体），酒精是最稀薄的，即在一定空间中包含的物质量最少。之后，一起精确地观察酒精和玻璃

瓶的重量。然后再拿一个能容纳大约一夸脱的水囊，尽可能压出所有空气，直到水囊两面黏合在一起。用油轻轻地揉搓水囊，要使其更加严密，但凡有缝隙就要塞住；然后，将小瓶口插入水囊口，用绳子将水囊绕着瓶口扎紧，并用蜡烛涂封，使其黏得更紧，贴得更稳。接着将小瓶放在一盆熊熊燃烧的火炭上面。很快，酒精受热膨胀气化为蒸气，开始逐渐撑起水囊，水囊像船帆一样从四面充涨起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立即把玻璃瓶从火上拿开，放在一块毛毡上，以防骤然遇冷炸裂，同时在水囊上刺一小孔，以免蒸气停热之后化为液体流回瓶中，从而影响计算。然后去掉水囊，秤瓶中剩下的酒精，算出有多少酒精化为蒸气或空气。将原先瓶中酒精所占据的空间与化成的气体后在水囊中所占据的空间相比，就算出结果了；这一结果清楚地表明，物体产生了膨胀变化，比以前大了一百倍。

Again,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heat or cold, in a degree too weak to be perceptible to the sense. These are made manifest to the sense by a calendar glass such as I have described above. For the heat and cold are not themselves perceptible to the touch, but the heat expands the air, and the cold contracts it. Nor again is this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of the air perceptible to the sight, but the expansion of the air depresses the water, the contraction raises it, and so at last is made manifest to the sight; not before, nor otherwise.

再如，假设讨论的性质是热或冷，冷热温度要低到感觉不到。这些是通过前文描述的那种温度计显示到感官面前的。因为这样的冷热本身触觉无法感知，但热使空气膨胀，冷使空气收缩。空气这种膨胀和收缩也非视觉所能看到，但空气的膨胀使水位降低，空气收缩使水位升高，这样膨胀收缩这种性质便显示在视觉面前，而且非此时不行，非如此亦不行。

Again, let the nature in question be the mixture of bodies, viz., what they contain of water, oil, spirit, ash, salt, and the like; or (to take a particular instance) what quantity of butter, curd, whey, etc., is contained in milk. These mixtures, so far as relates to tangible elements, are made manifest to the sense by artificial and skillful separations. But the nature of the spirit in them, though not immediately perceived, is yet discovered by the different motions and efforts of the tangible bodies in the very act and process of their separation and also by the acridities and corrosions, and by the different colors, smells, and tastes of the same bodies after separation. And in this department men have labored hard, it is true, with distillations and artificial separations, but not with much better success than in the other experiments which have been hitherto in use. For they have but groped in the dark and gone by blind ways and with efforts painstaking rather than intelligent, and (what is worst of all), without attempting to imitate or emulate nature, but rather destroying by the use of violent heats and overstrong powers all that more subtle configuration in which the occult virtues and sympathies of things chiefly reside. Nor do they remember or observe, while making such separations,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I have elsewhere pointed out, namely, that when bodies are tormented by fire or other means, many qualities are communicated by the fire itself and by the bodies employed to effect the separation which did not exist previously in the compound; whence strange fallacies have arisen. For it must not be supposed that all the vapor which is discharged from water by the action of fire was formerly vapor or air in the body of the water, the fact being that the greatest part of it was created by the expansion of the water from the heat of the fire.

再举一例，假设讨论的性质是混合物体，即含有水、油、酒精、

灰、盐和类似的东西混合物；或者（举一特定事例）牛奶中含多少奶油、凝乳、乳水。这些混合物，就有形的要素而言，是通过人工技巧的分解显露到感官面前的。但其中的精气，虽不能直接感知，却可以通过有形物体在分解活动和过程中不同运动和努力揭示出来，也可以通过刺激性和腐蚀性，通过相同物体分解之后的不同色彩、不同气味、不同滋味揭示出来。说真的，人们在这方面下过苦功夫，方法是蒸馏法和人工分解法，但这些方法取得的成功并不比惯用的实验取得的成功多。因为他们只是在暗中摸索，盲目前行，努力有余，智慧不足，最糟糕的是他们从不企图仿效自然，而是使用暴热和超强力量破坏了一切更加精微的结构，这种结构正是事物隐秘特性和交感作用的主要依存形式。在进行这种分解时，他们忘了或者没有注意到我在其他地方指出过的情形，即当物体受到火或其他手段的折磨时，许多原本在复合物中并不存在的特性，是通过火本身和用来实施分解的物体来传递的；从而产生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差错。决不能有这种假设，认为，通过火而产生的水蒸气原本就是存在于水这个物体中的蒸气或空气；事实上，绝大部分蒸气是因为火产生的热而引起水膨胀产生出来的。

So in general, all the nice tests of bodies whether natural or artificial by which the genuine ar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adulterated, the better from the viler sort, should be referred to this division; for they make manifest to the sense things not directly perceptible by means of those which are. They should therefore be sought and collected from all quarters with diligent care.

因此，一般而言，对物体所做的所有精细实验都应参照这种区分方式，即无论是自然物体还是人工物体，都可以按真与假，较优与较劣来分类；因为这种实验通过可直接感知的东西把不可直接感知的事物显示在感官面前。因此，我们应该费心尽力地注意寻求和搜集这种实验。

With regard to the fifth way in which objects escape the sens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action of sense takes place in motion, and that motion takes place in time. If therefore the motion of any body be either so slow or so quick that it bears no proportion to the moments which the sense takes to act in, the object is not perceived at all, as in the motion of the hand of a clock and again in the motion of a musket ball. Now motion which is too slow to be perceived is easily and usually made manifest to the sense by means of aggregates of motion. Motion which is too quick has not hitherto been competently measured, and yet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requires that this be done in some cases.

至于第五种情况，即对象逃脱感官的注意，很显然，感官活动发生于运动之中，而运动发生于时间之中。因此，任何物体的运动如果慢到或快到与感官所用的时间不成比例，那么对象根本就感知不到，慢如钟表的指针，快如短枪的子弹。运动如果慢到难以感知，那通常很容易通过运动积累来显示到感官面前。过快的运动迄今还难以有效测定，但自然的调查某些时候要求必须将其测定出来。

In the sixth kind, where the sense is hindered by the too great power of the object, the reduction may be effected either by removing the object to a greater distance from the sense; or by deadening its effects by the interposition of a medium which will weaken without annihilating the object; or by admitting and receiving the reflection of the object where the direct impression is too powerful, as that of the sun, for instance, in a basin of water.

在第六种情况下，即当感官因对象力量过强而受到阻碍，还原法

的作用可以通过这么几种方式来实施，即要么将对象搬离到离感官较远的地方；要么削弱它的影响力，即通过插入一个既可弱化又不损毁对象的中间物；要么允许和接收对象的反射，因为直接印象过于强烈，就像一盆水反射出来的太阳光。

The seventh cause, where the sense is so charged with one object that it has no room for the admission of another, is almost wholly confined to the sense of smell and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matter in hand. So much then for the reduction of the nonsensible to the sensible—or the modes of making manifest to the sense things not directly perceptible by means of others which are.

第七种情况是感官塞满了某一对象，从而没有余地接纳其他对象，这几乎完全局限于嗅觉，与当前所谈的事情没多大关系。至于把不可感知的对象变为可感知的对象，或者至于如何通过可直接感知的事物把不可直接感知的事物显示在我们的感官面前，到此就谈这么多。

Sometimes, however, the reduction is made not to the sense of a man, but of some other animal whose sense in some cases is keener than man's; as of certain scents to the sense of a dog; of the light which is latent in air when not illumined from without to the sense of a cat, owl, and similar animals which see in the dark. For Telesius has justly observed that there is in the air itself a certain original light, though faint and weak, and hardly of any use to the eyes of men and most animals; inasmuch as animals to whose sense this light is adapted see in the dark, which it is hardly to be believed they do either without light, or by a light within.

然而，有时还原法并非是作用于人的感官，而是作用于其他动物，因为动物的感官在某些情况下比人的感官要灵敏；比如对某些气味，狗的感官特别灵敏；又如空气中有一种潜在的光，即使在没有外来光线照射时，猫、鹰以及其他类似夜视动物也可以在黑暗中看得很清楚。泰莱西奥所言极是，空气本身存在某种原光，然而这种光昏暗弱劣，人眼和大多数动物的眼睛都难以看得见；有些动物适应这种光，因此在黑暗中也能看见东西，这并非说，这些动物无光也能视物，而是说这些动物是借内光见物。

Observe also that at present I am dealing with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senses and their remedies. The deceptions of the senses must be referred to the particular inquiries concerning sense and the objects of sense, excepting only that grand deception of the senses, in that they draw the lines of nature with reference to man and not with reference to the universe; and this is not to be corrected except by reason and universal philosophy.

还要注意一点，我现在所讨论的是感官的缺陷及其修正之法。感官的欺骗性应该另作实际调查；除了感官有巨大的欺骗性，感官对事物的分类是参照人的模式而非参照宇宙的模式分类，这一点不靠理性和普遍哲学难以纠正。

XLI

四十一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eighteenth place

Instances of the Road , which I also call *Traveling Instances* and *Articulate Instances* . They are those which point out the motions of nature in their gradual progress. This class of instances escapes the observation rather than the sense. For it is strange how careless men are in this matter; for they study nature only by fits and at intervals, and when bodies are finished and completed, not while she is at work upon them. Yet if anyone were desirous of examining and studying the contrivances and industry of an artificer, he would not be content with beholding merely the rude materials of the art and then the completed works, but would rather wish to be present while the artificer was at his labors and carrying his work on. And a like course should be taken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For instance, if we are inquiring into the vegetation of plants, we must begin from the very sowing of the seed, and observe (as we may easily do, by taking out day after day the seeds that have lain in the ground two days, three days, four days, and so on, and carefully examining them) how and when the seed begins to puff and swell and to be, as it were, filled with spirit; secondly, how it begins to burst the skin and put forth fibers, at the same time raising itself slightly upwards, unless the ground be very stiff; also, how it puts forth its fibers, some for the root downwards and some for the stem upwards, and sometimes also creeping sideways if it there finds the ground more open and yielding; and so with many other things of the kind. In the same way we should examine the hatching of eggs, in which we might easily observe the whole process of viv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 and see what parts proceed from the yolk and what from the white of the egg, and so forth. A similar course should be taken with animals generated from putrefaction. For to prosecute such inquiries concerning perfect animals by cutting out the fetus from the womb would be too inhuman, except when opportunities are afforded by abortions, the chase, and the like. There should therefore be set a sort of night watch over nature, as

showing herself better by night than by day. For these may be regarded as night studies by reason of the smallness of our candle and its continual burning.

（十八）讨论优先权事例中“路程性事例”，又称“旅程性事例”和“衔接性事例”。这些事例指出自然运动的渐进过程。与其说这类事例逃脱了人们的感官，不如说人们忽略了观察。在这件事上，人们粗心得出奇；他们对自然的研究时断时续，并且是在物体完工和完成之后才来研究，而不是在到自然正作用于物体时来研究。然而任何人，如果要想考究匠人的技艺和辛劳，他不会仅仅满足于去看看这些技艺所用的原材料及其成品，而更愿意亲临现场观看匠人如何劳动，如何工作。调查自然应该采用相同的途径。例如，我们如果要探究植物的生长过程，就必须从播种开始，首先要观察（我们很容易做到这点，将种子埋在地下两天、三天、四天等，然后将地下种子逐日取出，仔细观察这些种子）种子是如何和何时开始鼓起来，或可以说是，充满精气；其次观察种子是如何开始破皮发芽，同时要观察种子是如何缓缓向上生长，只要土地不太僵硬的话；如说观察种子如何发芽，还要观察有些向下破皮成根，向上成茎，有时如果泥土较为松软的话还会斜生；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事情。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检视孵蛋过程；从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生命诞生组织的整个过程，看到哪些部分是由蛋黄繁衍生息，哪些部分是从蛋白生长而成等等。我们应该采取相同的方法去探究从腐化中产生的动物。将完整的动物开膛剖腹取胎来彻底调查实在太不人道，除非有流产或打猎等提供的机会。因此，应该安排一种夜间观察来观察自然，因为在夜晚比在昼日显露得更加清楚。因为那些通过流产或打猎等来进行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一种夜间研究，因为此时烛光虽然微弱，但不断燃烧着。

The same too should be attempted with inanimate substances, as I have done myself in investigating the expansion of liquids by fire. For there is one mode of expansion in water, another in wine,

another in vinegar, another in verjuice, and quite another in milk and oil; as was easily to be seen by boiling them over a slow fire and in a glass vessel in which everything may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These matters, however, I touch but briefly, meaning to treat of them more fully and exactly when I come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Latent Process* of things. For it should all along be borne in mind that in this place I am not handling the things themselves, but only giving examples.

对无生命物质，亦应尝试采取相同的方法研究；在进行火使液体膨胀的调查时，我自己曾经尝试过这种方法。水的膨胀是一种方式，酒的膨胀是一种方式，醋的膨胀是一种方式，果酸的膨胀是一种方式，牛奶和油的膨胀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方式；这些轻而易举就可以看出来，只要用文火渐渐煮沸火上装有这些东西的玻璃器皿即可，器皿中的一切都可以观察得一清二楚。然而，这些事情，我只是简单提一下，打算以后在发现事物的“隐秘过程”时，再做更加详细准确的讨论。应该随时牢记在心的是，我在此处讨论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举例罢了。

XLII

四十二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nineteenth place *Supplementary* or *Substitutive Instances* , which I also call *Instances of Refuge* . They are those which supply information when the senses entirely fail us, and therefore we fly to them when appropriate instances are not to be had. Now substitution is made in two ways:

either by gradual approximation or by analogy. To take an example: There is no medium known by the interposition of which the operation of the magnet in drawing iron is entirely prevented. Gold placed between does not stop it, nor silver, nor stone, nor glass, wood, water, oil, cloth or fibrous substances, air, flame, etc. But yet by nice tests some medium may possibly be found to deaden its virtue more than any other; comparatively, that is, and in some degree. Thus it may be that the magnet would not attract iron as well through a mass of gold as through an equal space of air, or through ignited silver as well as through cold; and so in other cases. For I have not made the trial myself in these cases. It is enough to propose such experiments by way of example. Again, there is no body we are acquainted with which does not contract heat on being brought near the fire. And yet air contracts heat much more quickly than stone. Such is the substitution which is made by gradual approximation.

（十九）讨论优先权事例中的“补救性事例”或“替代性事例”，又称“避难所事例”。这些事例在完全无能为力时给我们提供信息，因此，这些事例欲求不得时，我们便亟不可待地飞扑上去。替代有两种方式：一是近似，一是类推。举例说明：磁石吸铁的行为即使不插入任何中间物也完全可以阻挡。插入金子无法阻挡的磁性，插入银子、石头、玻璃、木头、水、布或纤维类物质、空气、火焰等也阻挡不了。但是通过精细的检验，还是有可能找到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消除磁性的中间物；实际上是相对而言，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较强的消磁性。兴许磁石隔着金子吸铁不如隔着相同空气吸铁，隔着炙热的银子不如隔着冰冷的银子，还有其他类似情形。这些情形，我并没有亲自做过实验。提出这些实验来充当替代性事例也足以。又如，据我们所知，物体不靠近火不受热。但是空气比石头受热要快得多。这种替代叫近似替代。

Substitution by analogy is doubtless useful, but is less certain, and should therefore be applied with some judgment. It is employed when things not directly perceptible are brought within reach of the sense, not by perceptible operations of the imperceptible body itself, but by observation of some cognate body which is perceptible. For example, suppose we are inquiring into the mixture of spirits, which are invisible bodies. There seems to be a certain affinity between bodies and the matter that feeds or nourishes them. Now the food of flame seems to be oil and fat substances; of air, water and watery substances; for flame multiplies itself over exhalations of oil, air over the vapor of water. We should therefore look to the mixture of water and oil, which manifests itself to the sense, since the mixture of air and flame escapes the sense. Now oil and water, which are mingled together very imperfectly by composition or agitation, are in herbs and blood and the parts of animals very subtly and finely mingled. It is possible, therefore, that something similar may be the case with the mixture of flame and air in pneumatic bodies, which, though not readily mingling by simple commixture, yet seem to be mingled together in the spirits of plants and animals, especially as all animate spirit feeds on moist substances of both kinds, watery and fat, as its proper food.

类推替代无疑很实用，但缺乏准确性，因此使用时应该有所判断。使用类推替代就是指把不能直接感知的东西带到感官的范围之内，其方法不是通过不可感知的物体本身所产生的可感知行为，而是通过观察可感知物体的同类。比如，假定我们探究的是精气混合物，而精气是无形的物体。好像物体与喂养滋养物体的物质之间存在某种姻亲关系。火焰似乎是以油脂类物质为燃料；空气是以水和水性物质为燃料；因为火焰由于油的气化而更加猛烈，而空气通过蒸发水来增多。既然空气与火焰的混合物无法为感官所觉察，那我们就应该通过水与油的混合物展示到感官面前。油水通过结合或搅合方式融合得并

不彻底，但在草、血液和动物肢体之中却融合得很精微和精致。由此可知，气体中的火焰与空气的混合也有类似情况，二者因混合方式简单，融合起来并不容易，但似乎在植物和动物精气中轻而易举地融合在一起；尤其是一切有生命的精气都以两类湿润物质为主食，即水性物质与脂肪类物质。

Again, if the inquiry be not into the more perfect mixtures of pneumatic bodies but simply into their composition, that is, whether they be readily incorporated together; or whether there be not rather, for example, certain winds and exhalations or other pneumatic bodies which do not mix with common air, but remain suspended and floating therein globules and drops and are rather broken and crushed by the air than admitted into or incorporated with it—this is a thing which cannot be made manifest to the senses in common air and other pneumatic bodies, by reason of their subtlety. Yet how far the thing may take place we may conceive, by way of image or representation, from what takes place in such liquids as quicksilver, oil, or water, and likewise from the breaking up of air when it is dispersed in water and rises in little bubbles; and again in the thicker kinds of smoke; and lastly, in dust raised and floating in the air; in all of which cases no incorporation takes place. Now the representation I have described is not a bad one for the matter in question, provided that diligent inquiry has been first made whether there can be such a heterogeneity in pneumatic bodies as we find there is in liquids. For if there can, then these images by analogy may not inconveniently be substituted.

再假定调查的不是气体更加完美的混合，而调查的是组合，也就是它们是否易于融合在一起；或者是否有某些风、呼气或其他气体与普通空气并不混合在一起，而空中悬浮的球状颗粒，非但不进入或融

入空气之中，反而被空气击碎——这种东西很精微，在普通空气或气体中无法显露在感官面前。但是这种东西可以发生到何种程度，我们可以通过影像或表象来想像，想像一下诸如水银、油或水发生的情形；想像一下空气散入水中产生出小气泡而破裂时的情形；也想像一下浓烟中的情形；最后，再想像一下扬起而漂浮在空中的尘埃；所有这些情形都不会出现融合现象。以上做出的表述对所调查的问题来说并非没有益处，只要我们首先辛勤地调查出气体中是否存在着像液体中存在的异质性。如果能调查出这种异质性，那么用类推法来替换这些影像不能说不方便。

But with regard to these supplementary instances, although I stated that information was to be derived from them in the absence of instances proper, as a last resource, yet I wish it to be understood that they are also of great use even when proper instances are at hand—for the purpose, I mean, of corroborating the information which the others supply. But I shall treat of them more fully when I come in due course to speak of the *Supports of Induction* .

关于这些补救性事例，我虽然说过这样的话，即补救性事例只有在缺乏专门事例时才能当作最后的策略来提供信息，但我还是希望人们将其理解为，即使手边有专门事例，这些补救性事例仍然有很大用途——我是说，在参证其他事例提供信息时很有用。关于这一点，我在按预定计划讲到“归纳法的证据”时还要更加全面地论述。

XLIII

四十三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twentieth place *Dissecting Instances* , which I also call *Awakening Instances* , but for a different reason. I call them awakening, because they awaken the understanding; dissecting, because they dissect nature. For which reason also I sometimes call them *Democritean* . They are those which remi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nderful and exquisite subtlety of nature, so as to stir it up and awaken it to attention and observation and due investigation. Such, for example, as these following: that a little drop of ink spreads to so many letters or lines; that silver gilt stretches to such a length of gilt wire; that a tiny worm, such as we find in the skin, possesses in itself both spirit and a varied organization; that a little saffron tinges a whole hogshead of water; that a little civet or musk scents a much larger volume of air; that a little incense raises such a cloud of smoke; that such exquisite differences of sounds, as articulate words, are carried in every direction through the air, and pierce even, though considerably weakened, through the holes and pores of wood and water, and are moreover echoed back, and that too with such distinctness and velocity; that light and color pass through the solid substances of glass and water so speedily, and in so wide an extent, and with such copious and exquisite variety of images, and are also refracted and reflected; that the magnet acts through bodies of all sorts, even the most compact; and yet (which is more strange) that in all these, passing as they do through an indifferent medium (such as the air is), the action of one does not much interfere with the action of another. That is to say, tha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carried through spaces of air so many images of visible objects, so many impressions of articulate sound, so many distinct odors, as of a violet, rose, etc.; moreover, heat and cold and magnetic influences —all (I say) at once without impeding one another, just as if they had their own roads and passages set apart, and none ever struck or ran against other. To these dissecting instances it is useful however

to subjoin instances which I call limits of dissection, as that in the cases above mentioned, though one action does not disturb or impede another action of a different kind, yet one action does overpower and extinguish another action of the same kind; as the light of the sun extinguishes that of a glowworm; the report of a cannon drowns the voice; a strong scent overpowers a more delicate one; an intense heat a milder one; a plate of iron interposed between a magnet and another piece of iron destroys the action of the magnet. But this subject also will find its proper place among the supports of induction.

（二十）讨论优先权事例中的“剖析性事例”，又称“唤醒式事例”；不过，称呼不同，理由也不同。我之所以称为唤醒，是因为这些事例可以唤醒理解力；之所以称为剖析，是因为这些事例可以剖析自然。根据后者，我有时又把这些事例称为“德谟克利特式事例”。这种事例使理解力想起自然的奇妙和精微，从而刺激理解力、唤醒理解力去注意、观察、并作适当的调查。例子如下：一小滴墨水扩散成众多的字行；镀银伸展成长长的金属丝线；一条如皮肤中所见的蠕虫既有精气又有各种组织；一点藏红花竟然染红一大桶水；一点麝香或香猫泌液竟能熏香一大片空气；一柱熏香竟然升腾化为云烟；差别极细的声音，如发音清晰的语句，竟能透过空气传播四方，即使极为虚弱，也能穿过木头和水的孔隙发出回声，而且清晰迅速；光和色竟既能迅疾、甚至远距离地穿过玻璃和水这种坚实的物质，带着丰富精妙的影像，又能折射和反射回去；磁力能穿过各种物体，甚至穿过最精密的物体；然而尤为奇怪的是，以上种种事例中物体都穿过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中间物（即空气），但彼此不干涉对方的活动。也就是说，如此众多的可视物体的影像、如此众多清晰的声音的印象、如此众多各异的气味，如紫罗兰、玫瑰的气味等都同时穿过空气的空间；还有热、冷和磁力——所有这些（我是说）都同时进行，彼此毫无妨碍，就好像这些物体各自都有自己的道路和途径，无一彼此冲突和冲撞。然而对以上这些剖析性事例，增加一些我称为剖析限度的事例，还是

有用的。如上提及的情形，尽管不同种类的活动互不干扰或互不妨碍，但同一种类的活动却有一个压倒甚至遏止另一个的情形，如阳光足以湮没萤光；炮声足以淹没杂声；浓香足以盖过柔香；强热压倒温热；磁石与铁片之间插入另一铁片足以破坏磁石与铁片之间的活动。不过，这一个话题可以在证实归纳法时找到适当位置。

XLIV

四十四

So much for instances which aid the senses, instances which are chiefly useful for the informative part of our subject. For information commences with the senses. But the whole business terminates in works, and as the former is the beginning, so the latter is the end of the matter. I will proceed therefore with the instances which are pre-eminently useful for the operative part. They are of two kinds, and seven in number, though I call them all by the general name of *Practical Instances* . In the operative part there are two defects and two corresponding prerogatives of instances. For operation either fails us or it overtasks us. The chief cause of failure in operation (especially after natures have been diligently investigated) is the ill determin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forces and actions of bodies. Now the forces and actions of bodies are circumscribed and measured, either by distances of space, or by moments of time, or by concentration of quantity, or by predominance of virtue. And unless these four things have been well and carefully weighed we shall have sciences fair perhaps in theory, but in practice inefficient. The four instances which are useful in this point of view I class under one head as *Mathematical*

Instances and *Instances of Measurement* .

有助于感官的事例就到此为止，这些事例的主要作用体现在这个话题的知识内容上。因为知识始于感官。但是整个任务以成就为归宿，如果说知识乃事之始端，那么成就乃事之终端。因此，我将进一步讲到那些对动作部分特别有用的事例。这类事例分两类，数量七个，但全都可以统称为“实践性事例”。在动作部分有两个缺陷，对应两类优先权事例。因为动作要么使我们失败，要么使我们负担过重。动作部分失败（特别是已经对各种性质进行过细致彻底的查究后）的主要原因是对物体力量和动作做出判定和计量时有误。物体力量和活动有四种界定和计量方式，即空间上的距离、时间上的时刻、数量上的集中、品性上的优势。如果这四点没有很好地仔细计量，那么我们的科学虽然理论上不错，但实践上必定无效。从这种角度看，以上四种有用事例，我把它们归为一类，统称为“数学事例”和“计量事例”。

Operation comes to overtask us, either through the admixture of useless matters, or through the multiplicity of instruments, or through the bulk of the material and of the bodies that may happen to be required for any particular work. Those instances therefore ought to be valued which either direct practice to the objects most useful to mankind; or which save instruments; or which spare material and provision. The three instances which serve us here I class together as *Propitious* or *Benevolent Instances* . These seven instances I will now discuss separately, and with them conclude that division of my subject which relates to the Prerogative or Rank of Instances.

动作导致我们负担过重的情形有三种：掺杂有无用的物质、工具繁杂、特定工作所需的材料和物体体积太大。因此，凡是可以将实践

导向对人类最为有用的对象、可以减少使用工具、可以节省材料和供应的事例，都应该加以珍视。这三类对我们有用的事例，我把它们全部归类为“慈悲或仁慈性事例”。这七类事例，我现在要分别讨论，并以此结束我的论题中关于事例的优先权或等级性的这一章节。

XLV

四十五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twenty-first place *Instances of the Rod or Rule* , which I also call *Instances of Range* or *of Limitation* . For the powers and motions of things act and take effect at distances not indefinite or accidental, but finite and fixed; so that to ascertain and observe these distance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everal natures is of the greatest advantage to practice, not only to prevent its failure but also to extend and increase its power. For we are sometimes enabled to extend the range of powers and, as it were, to diminish distances, as for instance by the use of telescopes.

（二十一）讨论优先权事例中的“标杆或标尺性事例”。这类事例又称“范围或界限性事例”。事物的力量和运动要隔一定距离才能发挥作用和产生效力，这种发挥作用和产生效力并非没有限制或纯属偶然，而是受到限制和固定不变的；因此在调查几种性质时要查明和观察这些距离，这对实践具有最大的益处，不仅有益于防止失败，还可以拓展提高能力。有时还能拓展我们的能力范围，也可以说是，缩短距离，望远镜的使用便是一例。

Most of these powers act and take effect only by manifest contact, as in the impact of two bodies, where the one does not move the other from its place unless they touch each other. Also medicines that are applied externally, as ointments or plasters, do not exert their virtues without touching the body. Finally, the objects of the taste and touch do not strike those senses unless they be contiguous to the organs.

大多数力量只是通过明显的接触来发挥作用和产生效力，比如两个物体发生冲撞，如果彼此不相接触，一物则不能推开另一物。例如，外用药软膏或石膏，若不接触身体，就发挥不出药效。最后，物体，若不接触味觉和触觉器官，也就无法打动味觉和触觉。

There are also powers which act at a distance, though a very small one; and of these only a few have been hitherto observed, albeit there are many more than men suspect; as (to take common examples) when amber or jet attracts straws; bubbles dissolve bubbles on being brought together; certain purgative medicines draw humors downward, and the like. So, too, the magnetic power by which iron and a magnet, or two magnets, are made to meet, operates within a fixed but narrow sphere of action; but if there be any magnetic virtue flowing from the earth (a little below the surface), and acting on a steel needle in respect of its polarity, the action operates at a great distance.

还有些力量要隔一定距离才能发挥作用，虽然距离非常短；关于这些力量，迄今为止，还只观察到少数，虽然比人们揣度的要多得多。比如（一些普通例子）琥珀或黑玉吸附稻草；水泡彼此靠拢就彼此解体；某些泻药能使体液下流等等。同样，让铁与磁石、磁石与磁

石吸附在一起的磁力，其作用范围是固定不变的，不过作用范围较窄；但是如果地球（地表浅层）有磁性流出，并作用于一颗钢针的极性，那么这种磁性的作用范围就非常大。

Again, if there be any magnetic power which operates by consent between the globe of the earth and heavy bodies, or between the globe of the moon and the waters of the sea (as seems highly probable in the semimenstrual ebbs and floods), or between the starry sphere and the planets whereby the latter are attracted to their apogees, all these must operate at very great distances. There are found also certain materials which catch fire a long way off, as we are told the naphtha of Babylon does. Heat also insinuates itself at great distances, as also does cold; insomuch that by the inhabitants of Canada the masses of ice that break loose and float about the northern ocean and are borne through the Atlantic toward that coast are perceived at a great distance by the cold they give out. Perfumes also (though in these there appears to be always a certain corporeal discharge) act at remarkable distances, as those find who sail along the coasts of Florida or some parts of Spain, where there are whole woods of lemon and orange and like odoriferous trees, or thickets of rosemary, marjoram, and the like. Lastly, the radiations of light and impressions of sound operate at vast distances.

再如，地球与重物之间、月球与海水之间（从半月发生一次的涨潮与退潮来看极有可能），还有恒星系与行星之间，如果存在着感应性磁力，后者就会被前者吸引到顶点，这种吸引力必须在极远的距离进行。我们还发现，某些材料可以远距离点燃，比如我们就听说过巴比伦的石油精就发生过此事。热本身也能传及到很远的距离；冷亦是这样，甚至北冰洋破碎漂浮的冰块经过大西洋飘向加拿大海岸时，加

拿大的居民在很远的距离都能通过冰块发出的冷气感受到它们。香气（虽然似乎总是存在于某种实体之中）也可以作用于相当距离之外的感官，凡是航行于佛罗里达或西班牙部分地区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原来那里有成林的柠檬、橘子和类似的香树，还有成丛的迷迭香、墨角兰和类似的香草。最后，光的辐射和声音效果作用距离巨大。

But whether the distances at which these powers act be great or small, it is certain that they are all finite and fixed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so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limit never exceeded, and a limit which depends either on the mass or quantity of matter in the bodies acted on; or on the strength or weakness of the powers acting; or on the helps or hindrances presented by the media in which they act—all which things should be observed and brought to computation. Moreover, the measurements of violent motions (as they are called), as of projectiles, guns, wheels, and the like, since these also have manifestly their fixed limits, should be observed and computed.

但是这些力量的作用距离不论是大还是小，可以肯定的是，其作用的距离是有限的，而且在事物的性质中是固定不变的，因此都有一定的而且不可逾越的限度；这个限度的依据要么是指受作用的物体中物质的体积或数量；要么是指作用力的强弱程度；要么是起作用的中间物产生的助力或阻力；这三点都应该加以观察和计算。而且，所谓强力运动，如投射物、枪弹、轮盘等的测量也应该加以观察和计算，因为它们都有明显而固定的限度。

There are found also certain motions and virtues of a contrary nature to those which operate by contact and not at a distance,

namely, those which operate at a distance and not by contact; and again those which operate more feebly at a lesser distance, and more powerfully at a greater. The act of sight for instance is not well performed in contact but requires a medium and a distance. Yet I remember being assured by a person of veracity that he himself under an operation for the cataract, when a small silver needle was inserted within the first coat of the eye in order to remove the pellicle of the cataract and push it into a corner, saw most distinctly the needle passing over the very pupil. But though this may be true, it is manifest that large bodies are not well or distinctly seen except at the vertex of a cone, the rays from the object converging at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it. Moreover, old people see objects better at a little distance than if quite close. In projectiles, too, it is certain that the impact is not so violent at too small a distance as it is a little further off. These, therefore, and like things should be observed in the measurements of motions with regard to distances.

以上运动和特性是通过接触产生的，而不是在一定距离之外产生的，也可以找到与此类性质相反的运动和特性，即在一定距离之外产生，而不是通过接触来产生的；还有些运动和特性距离愈近作用愈弱，距离愈大作用愈强。比如，近距离视物反而看不清，而是需要一个中间物，而且要保持一定距离。不过，我记得有一个诚实可信的人确切地说过，他自己曾因白内障而接受手术，当一根小针刺入眼中第一层薄膜，以便将白内障的翳膜剔向眼角时，掠过瞳仁的针，他看得一清二楚。这事有可能是真的，但很明显，物体太大，要看清楚就不那么容易了，除非大物体达到眼珠这个圆锥体顶点，即对象发出的若干光线在一定距离之外聚集到那一点上。还有，对老人而言，离得远的物体看得更清楚，离得近的物体反而看不清。又如投射物，近距离产生的冲击力必定不如远距离产生的冲击力。因此，这些以及类似的东西在测量运动时都应该加以观察。

There is also another kind of local measurement of motions which must not be omitted. This has to do with motions not progressive, but spherical, that is, with the expansion of bodies into a greater sphere or their contraction into a less. For among our measurements of motions we must inquire what degree of compression or extension bodies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e) easily and freely endure, and at what point they begin to resist, till at last they will bear no more. Thus, when a blown bladder is compressed, it allows a certain compression of the air, but if the compression be increased the air does not endure it and the bladder bursts.

还有一种本位运动的测量不可略而不论。要计算的不是直线前行的运动，而是螺旋运动，也就是要计算物体扩大或缩小的圆圈式运动。因为在对运动进行的计量中，我们必须调查物体（根据自身性质）轻松自如地扩大或压缩的极限，即调查物体无法再承受而产生抵抗的限度。因此，当气泡吹胀受压时，空气受压只能容忍一定程度，但如果再增压，空气难以承受，气泡就破裂。

But this same thing I have tested more accurately by a subtle experiment. I took a small bell of metal, light and thin, such as is used for holding salt, and plunged it into a basin of water so that it carried down with it the air contained in its cavity to the bottom of the basin, where I had previously placed a small globe, on which the bell was to light. I found then that if the globe was small enough in proportion to the cavity, the air contracted itself into a less space and was simply squeezed together, not squeezed out. But if it was too large for the air to yield freely, then the air, impatient of greater pressure, raised the bell on one side and rose to the surface in bubbles.

不过，就此事我曾做过一次精巧的实验来更加准确地检验。拿一个轻而薄的金属小盅，就像餐桌上的盐罐，口朝下扣入一盆水中，这样盅中空气带到盆底，盆底预先置一小球，将盅扣住小球。然后我发现，如果小球与盅口相称，空气就会压缩到一个较小空间，不过只是压缩在一起，但空气并没有挤压出去。但如果球太大而让空气无法自由逃逸，那么空气难以忍受更大压力，则把盅顶倒在一边，而自身升至水面成为气泡。

Again, to test the extension as well as compression of which air was susceptible, I had recourse to the following device. I took a glass egg with a small hole at one end of it, and, having drawn out the air through the hole by violent suction, I immediately stopped up the hole with my finger and plunged the egg into water, and then took away my finger. The air, having been extended by the suction and dilated beyond its natural dimensions, and therefore struggling to contract itself again (so that if the egg had not been plunged into the water it would have drawn in air with a hissing sound), now drew in water in sufficient quantities to allow the air to recover its old sphere or dimension.

为了检验空气所能承受的张力和压力，我还借助于下面的设计来进行。拿出一个玻璃蛋，一端留有一小孔，猛力吸出其中的空气，立即用手指堵住小孔，把蛋放入水中，放开手指。空气经抽吸扩展膨胀到其自然体积，因此会挣扎着收缩回去（假如蛋没有放进水里，蛋就会嘶嘶地吸回空气），如今吸进足够的水允许空气恢复原有形状或体积。

Now it is certain that the rarer bodies (such as air) allow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contraction, as has been stated, but that tangible bodies (such as water) suffer compression with much greater difficulty and to a lesser extent. How far they do suffer it I have investigated in the following experiment. I had a hollow globe of lead made, capable of holding about two pints, and sufficiently thick to bear considerable force. Having made a hole in it, I filled it with water and then stopped up the hole with melted lead, so that the globe became quite solid. I then flattened two opposite sides of the globe with a heavy hammer, by which the water was necessarily contracted into less space, a sphere being the figure of largest capacity. And when the hammering had no more effect in making the water shrink, I made use of a mill or press, till the water, impatient of further pressure, exuded through the solid lead like a fine dew. I then computed the space lost by the compression and concluded that this was the extent of compression which the water had suffered, but only when constrained by great violence.

如上所述，可以肯定的是比较稀薄的物体（如空气）容许相当程度的收缩，但可有形物体（如水）忍受压缩就要困难得多，而且只能做到较小的程度。至于能忍受到何种程度，我曾用下面的实验调查过。做一个空心铅球，大约能装两品脱水，其厚度能承受相当大的力量。球身钻一孔，装满水，用铅水封孔，这样铅球变为实心球。然后用重锤将球身两对边砸平，这样水必然压缩到较小空间，因为球形才具有最大容量。当砸压也无法使水收缩时，再用石磨或压缩机施压，直到水再也无法承受施压，水透过坚实的铅封，像细细的露珠一般渗透出来。接着计算经过锤压而失去的空间，从而得出水承压的程度，不过这只是在猛力施压下才能达到的程度。

But the compression or extension endured by more solid, dry, or more compact bodies, such as wood, stones and metals, is still

less than this, and scarcely perceptible. For they free themselves either by breaking, or by moving forward, or by other efforts, as is apparent in the bending of wood or metal, in clocks moving by springs, in projectiles, hammerings, and numberless other motions. And all these things with their measures should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be explored and set down, either in their certitude, or by estimate, or by comparison, as the case will admit.

不过，较硬、较干和较密的物体，如木头、石头和金属所承受的压缩或扩展比水还要少，而且难以觉察。因为这些物体在遇到两种力量时要么破裂、要么前移、要么通过其他方式来自我释放，这在木头或金属弯曲时、在弹簧驱动的钟表中，在投射物中，在锤击中，以及无数其他运动中，都非常明显。所有这些东西及其对它们的测量在调查自然中都应该加以探究和确定，其方式要么精确计算，要么估算，要么比较，因情况而定。

XLVI

四十六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twenty-second place *Instances of the Course* , which I also call *Instances of the Water* , borrowing the term from the hourglasses of the ancients, which contained water instead of sand. These measure nature by periods of time, as the instances of the rod by degrees of space. For all motion or natural action is performed in time, some more quickly, some more slowly, but all in periods determined and fixed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Even those actions which seem to be performed

suddenly and (as we say)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are found to admit of degree in respect to duration.

（二十二）讨论优先权事例中的“进程性事例”，又称“滴水事例”，借用古人水漏计时器的术语，所谓水漏指玻璃管中装的是水而不是沙。这种事例以时间段来计量自然，正如标杆用空间度来计量自然一样。一切运动或自然活动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有的要快一点，有的要慢一点，但快与慢都是根据事物性质来决定地，而且固定在某个时刻发生的。即使看似是突发性的、（如我们所说）眨眼即至的活动，我们也发现活动的持续是有度可计的。

First, then, we see that the revolutions of heavenly bodies are accomplished in calculated times, as also the flux and reflux of the sea. The motion of heavy bodies to the earth, and of light bodies toward the heavens, is accomplished in definite periods, varying with the bodies moved and the medium through which they move. The sailing of ships, the movements of animals, the transmission of missiles, are all performed likewise in times which admit (in the aggregate) of measurement. As for heat, we see boys in wintertime bathe their hands in flame without being burned, and jugglers by nimble and equable movements turn vessels full of wine or water upside down and then up again without spilling the liquid; and many other things of a similar kind. The compressions also and expansions and eruptions of bodies are performed, some more quickly, some more slowly,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body and motion, but in certain periods.

首先，我们看到天体运转的完成是可以计时的，海水涨潮与退潮亦是如此。重物体落向地球，轻物体飘向天空，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在

一定的时间中完成的，时间随运行物体及其间隔的中间物的不同而不同。船的航行、动物的行动、投掷物的飞行，也全都是在一定时间内进行的，而时间（在总量上）都可以计算出来。至于热，我们看见孩子们冬日用手在火焰上烤火取暖，但未见有灼伤；玩把戏者用敏捷平稳的手法上下倒腾盛满酒水的杯子，但未见有液体出；诸如此类的东西还有许多。至于物体的收缩、膨胀和爆发，有的迅捷，有的缓慢，这都由物体及其运动的性质而定，但都是在一定时间中发生的。

Moreover, in the explosion of several guns at once, which are heard sometimes to the distance of thirty miles, the sound is caught by those who are near the spot where the discharge is made sooner than by those who are at a greater distance. Even in sight, whereof the action is most rapid, it appears that there are required certain moments of time for its accomplishment, as is shown by those things which by reason of the velocity of their motion cannot be seen—as when a ball is discharged from a musket. For the ball flies past in less time than the image conveyed to the sight requires to produce an impression.

此外，炮弹瞬间齐鸣，有时三十英里之外都能耳闻，离爆炸点近的人比离爆炸点远的人先听到。即使最快捷的视觉活动仿佛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这可以体现在快得难以目见的东西上——如短枪发射的子弹。子弹飞过眼睛所需的时间少于子弹进入视觉所需的时间。

This fact, with others like it, has at times suggested to me a strange doubt, viz., whether the face of a clear and starlit sky be seen at the instant at which it really exists, and not a little later; and whether there be not, as regards our sight of heavenly bodies, a real

time and an apparent time, just like the real place and apparent place which is taken account of by astronomers in the correction for parallaxes. So incredible did it appear to me that the images or rays of heavenly bodies could be conveyed at once to the sight through such an immense space and did not rather take a perceptible time in traveling to us. But this suspicion as to any considerable interval between the real time and the apparent afterward vanished entirely when I came to think of the infinite loss and diminution of quantity which distance causes in appearance between the real body of the star and its seen image; and at the same time when I observed the great distance (sixty miles at the least) at which bodies merely white are instantly seen here on earth; whil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light of heavenly bodies exceeds many times over in force of radiation not merely the vivid color of whiteness, but also the light of every flame that is known to us. Again, the immense velocity in the body itself as discerned in its daily motion (which has so astonished certain grave men that they preferred believing that the earth moved) renders this motion of ejaculation of rays therefrom (although wonderful, as I have said, in speed) more easy of belief. But what had most weight of all with me was that if any perceptible interval of time were interposed between the reality and the sight, it would follow that the images would oftentimes be intercepted and confused by clouds rising in the meanwhile, and similar disturbances in the medium. And thus much for the simple measures of time.

这一事实，连同其他类似的事实，经常让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怀疑，即那远处可见的明净的星空是本身如实地存在那里呢，还是稍后才印入人的视觉；就我们看到的天体而言，是否存在一个天体本身存在的时间和一个天体显现在视觉中的时间；就像天文学家在思考天体的实际位置和显现位置来纠正视差那样。我不太相信下面这种说法，

即天体的影像或光线可以瞬间穿过茫茫空间传递到视觉中，而且传递过程中，我们丝毫感觉不到耗费了时间。我曾怀疑真实时间和显现的时间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间隔，但随后完全消除了一切怀疑，因为后来我意识到，是距离导致所见的星像与真实的星体相比在外观的大小上产生了无限的损失和减小；同时还因为我观察到，只有白色的物体可以立刻在远距离（至少六十英里）的地球上看到，而毋庸置疑，在照射的力度上，天体之光不仅超过了鲜亮的白色许多倍，而且超过我们熟知的任何火焰之光许多倍。再说，既然天体自身的高速运转都可以从其日转（使那些稳重的人吃惊得也宁可相信地动说）中看出来，这种远处射来的光线的突发运动（虽然我说过是令人惊异的速度）也就更容易让人相信了。而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最有力的理由，即如果在实在与视觉之间插入一段可以感知的时间间隔，那么天体影像势必常常会受到同时升起的云彩以及中间物中类似障碍物的阻碍和干扰。至于时间的简单测量，就到此为止。

But not only must we seek the measure of motions and actions by themselves but much more in comparison, for this is of excellent use and very general application. Now we find that the flash of a gun is seen sooner than its report is heard, although the ball must necessarily strike the air before the flame behind it can get out. And this is owing, it seems, to the motion of light being more rapid than that of sound. We find, too, that visible images are received by the sight faster than they are dismissed. Thus the strings of a violin when struck by the finger are to appearance doubled or tripled, because a new image is received before the old one is gone; which is also the reason why rings being spun round look like globes, and a lighted torch, carried hastily at night, seems to have a tail. And it was upon this inequality of motions in point of velocity that Galileo built his theory of the flux and reflux of the sea, supposing that the earth revolved faster than the water could follow, and that the water therefore first gathered in a heap and then fell down, as we

see it do in a basin of water moved quickly. But this he devised upon an assumption which cannot be allowed, viz., that the earth moves, and also without being well informed as to the sex horary motion of the tide.

但是我们不仅要通过运动和活动本身来测量，更要通过比较来测量，因为这样在用途上才具有卓越性，在实际运用上才具有普遍性。我们发现，炮弹发射时，先看到闪光而后听到爆炸声，虽然炮弹必定是先冲击空气，后才发出火光。看来，这是因为运动时光速快于声速。我们还发现，视觉接收可见影像的速度快于消除影像的速度。因此，一根琴弦经手指拨动后，仿佛会出现两根、三根琴弦，这是因为旧有的影像还未消失就出现了新的影像；这也是为什么一枚旋转的戒指看起来像一个个圆球；夜间持火把疾行，看上去就像是火上带着一个尾巴。伽利略海水涨落论也是建立在这种运动速度不平衡之上的，这种理论假定，地球自转速度快，而海水速度跟不上，因而海水堆拥向前，接着退落下来，这种情形，我们也可以从一盆迅速晃动的水中看到。但是伽利略这一设想，即地动说，其依据无法得到认可，而且海潮六小时运动论也知之不详。

But an example of the thing I am treating of, to wit, the comparative measures of motions—and not only of the thing itself, but also of its eminent use (of which I spoke just now)—is conspicuous in mining with gunpowder where vast masses of earth, buildings, and the like are upset and thrown into the air by a very small quantity of powder. The cause of which is doubtless this: that the motion of expansion in the impelling powder is quicker many times over than the motion of the resisting gravity, so that the first motion is over before the countermotion is begun, and thus at first the resistance amounts to nothing. Hence too it happens that in projectiles it is not the strong blow but the sharp and quick that

carries the body furthest. Nor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the small quantity of animal spirit in animals, especially in such huge creatures as the whale or elephant, to bend and guide such a vast mass of body were it not for the velocity of the spirit's motion, and the slowness of the bodily mass in exerting its resistance.

但是有一个例子正好说明我所讨论的东西，即运动比较测量法——不仅讨论事物本身，而且也讨论其突出的用途（如上文刚刚说过）——这个例子显然就是用火药开矿，即只需极少量的炸药就可以将大量泥土、建筑等东西掀翻在地、炸飞上天。其原因无疑如下：驱使的炸药的张力运动快于抗拒的重力运动许多倍，因此，张力运动结束之后，反张力运动才开始，这样，从一开始，阻力几乎等于零。因此，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投射物中，投得最远的并非是强力投射，而是敏捷的投射。在动物中，尤其如鲸或象这种巨型动物中，要想小量的动物精气去带动如此庞大的身躯，那是不太可能的，除非精气运动速度快，而身躯抗拒运动慢。

This one thing indeed is a principal foundation of the experiments in natural magic (of which I shall speak presently) wherein a small mass of matter overcomes and regulates a far larger mass—I mean the contriving that of two motions one shall by its superior velocity get the start and take effect before the other has time to act.

自然幻术中（即在谈的话题），实验的主要依据的确在此，即量小的物质克制和支配着量大的物质——我是指，根据速度来设计两种运动，让一种运动先启动、先生效，而另一种运动后启动、后生效。

Lastly, this distinction of foremost and hindmost ought to be observed in every natural action. Thus in an infusion of rhubarb the purgative virtue is extracted first, the astringent afterward. And something of the kind I have found on steeping violets in vinegar, where the sweet and delicate scent of the flower is extracted first, and then the more earthy part of the flower, which mars the scent. Therefore, if violets be steeped in vinegar for a whole day the scent is extracted much more feebly, but if you keep them in for a quarter of an hour only and then take them out, and (since the scented spirit in violets is small) put in fresh violets every quarter of an hour as many as six times, the infusion is at last so enriched that although there have not been violets in the vinegar, however renewed,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a half altogether, there nevertheless remains in it a most grateful odor, as strong as the violet itself, for an entire year. It should be observed, however, that the odor does not gather its full strength till after a month from the time of infusion. In the distillation too of aromatic herbs crushed in spirit of wine, it appears that there first rises an aqueous and useless phlegm, then a water containing more of the spirit of wine, and lastly, a water containing more of the aroma. And of this kind there are to be found in distillations a great many facts worthy of notice. But let these suffice for examples.

最后，这种最先与最后的区别应该在每一种自然活动中都可以观察得到。例如在炮制大黄时，首先提取出来的是泻性，其次是敛性。又如把紫罗兰浸渍于醋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形，即首先提取出来的是花的甜香味，接着是泥土味，香味遭到破坏。因此，如果紫罗兰在醋中浸泡一整天，所提取的香气反而见弱，但如果只浸泡一刻钟就拿出来（因为紫罗兰所含香精极少），每隔一刻钟又放入新鲜紫罗兰，连续六次，最后泡剂极其浓郁，虽然醋中的紫罗兰，不管怎么更换，浸泡的时间总共不过一个半小时而已，但留在醋中那最宜人的香气，

如紫罗兰花一样那么浓郁，可以持续整整一年。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这种香气要在炮制后一个月才能积聚起所有的力量。再如香草的蒸馏；将香草捣碎，放入酒精中，就会看到，首先产生一种无用的水质粘液，然后产生一种含有较多酒精的水，最后产生一种含有较多香气的水。在各种蒸馏中，还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事实都值得注意。不过，所举事例也够多的了。

XLVII

四十七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twenty-third place *Instances of Quantity* , which (borrowing a term from medicine) I also call *Doses of Nature* . These are they which measure virtues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y* of the bodies in which they subsist and show how far the *mode* of the virtue depends upon the *quantity* of the body. And first there are certain virtues which subsist only in a cosmical quantity, that is, such a quantity as has consent with the configuration and fabric of the universe. The earth for instance stands fast; its parts fall. The waters in seas ebb and flow; but not in rivers, except through the sea coming up. Secondly, almost all particular virtues act according to the greater or less quantity of the body. Large quantities of water corrupt slowly, small ones quickly. Wine and beer ripen and become fit to drink much more quickly in bottles than in casks. If an herb be steeped in a large quantity of liquid, infusion takes place rather than impregnation; if in a small, impregnation rather than infusion. Thus in its effect on the human body a bath is one thing, a slight sprinkling another. Light dews, again, never fall in the air but are dispersed and incorporated with

it. And in breathing on precious stones you may see the slight moisture instantly dissolved, like a cloud scattered by the wind. Once more, a piece of a magnet does not draw so much iron as the whole magne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virtues in which smallness of quantity has more effect, as in piercing, a sharp point pierces more quickly than a blunt one; a pointed diamond cuts glass, and the like.

（二十三）讨论优先权事例中的“数量性事例”，（借用医学术语）又称“自然剂量”。这种事例是根据依附在物体中的“数量”来计量特性的，并表明这种特性对物体数量的依附程度。首先，某些特性只依附在一种宇宙般大小的数量之中，即与宇宙组织结构相对应的数量。例如，地球巍然不动；但其各个部分却纷落而下。海水有涨有落；但河水却未见有此现象，除非有海水涌入。其次，几乎一切特性都是根据物体分量的大小来活动的。水多不易腐，水少臭得快。酒和啤酒置于瓶中比置于桶中，酿造得更快，更适合于饮用。草如果泡在大量的液体之中，与其说是在浸制，不如说是在泡制；如果泡在少量的液体中，与其说是在泡制，不如说是在浸制。因此，就对人的身体而言，盆汤沐浴是一种效果，而微水滴洒是另一种效果。又如空中轻露不坠落，而是分散融于空气中。宝石上哈气，只见微薄的雾气转瞬即逝，犹如风吹云散时。再拿磁石为例，一片磁石不如整块磁石吸铁多。另一方面，有些性质因量小效果才大，如穿刺为例，尖头快于钝头；金刚石磨尖可以削切玻璃等等。

But we must not stay here among indefinites, but proceed to inquire what *proportion* the quantity of a body bears to the mode of its virtue. For it would be natural to believe that the one was equal to the other; so that if a bullet of an ounce weight falls to the ground in a given time, a bullet of two ounces ought to fall twice as quickly, which is not the fact. Nor do the same proportions hold in

all kinds of virtues, but widely different. These measures, therefore, must be sought from experiment, and not from likelihood or conjecture.

但是我们不要纠缠于此，而应该继续探究物体的数量与其品性模式之间存在何种“比例”。人们相信二者相等，这也自然，所以如果说一盎司重的子弹落地需用一定的时间，那么一个两盎司重的子弹落速应比前者快一倍，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样，性质不同，其所含力量的比例也就不同，而且差异巨大。因此，这些计算必须求诸实验，而不应求诸可能性或揣测。

Lastly, in all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the quantity of body—the dose, as it were—required to produce any effect must be set down, and cautions as to the too little and too much be interspersed.

最后，对自然的一切调查，必须确定何种结果需要何等的量（也可以说，剂量）；需要提醒的是，量不宜过多，也不宜太少。

XLVIII

四十八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twenty-fourth place *Instances of Strife* , which I also call *Instances of Predominance* . These indicate the mutual predominance and subjection of virtues: which of them is stronger and prevails, which of them is weaker

and gives way. For the motions and efforts of bodies are compounded, decomposed, and complicated, no less than the bodies themselves. I will therefore first propound the principal kinds of motions or active virtues in order that we may be able more clearly to compare them together in point of strength, and thereby to point out and designate more clearly the instances of strife and predominance.

（二十四）讨论优先权事例中的“竞争性事例”，又称“支配性事例”。这些事例指明品性之间存在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些品性中，强者获胜，弱者让路。因为物体的运动和努力有许多关系，如复合、分解和交错关系，其实物体本身也有这些关系。因此，我首先要列出主要运动类型或主要活动性类别，以便我们能够把它们放在一起，更加清楚地比较它们的力量，藉此更加清楚地指明和标出竞争性和支配性事例。

Let the first motion be that motion of *resistance* in matter which is inherent in each several portion of it, and in virtue of which it absolutely refuses to be annihilated. So that no fire, no weight or pressure, no violence, no length of time can reduce any portion of matter, be it ever so small, to nothing, but it will ever be something, and occupy some space; and, to whatever straits it may be brought, will free itself by changing either its form or its place; or if this may not be, will subsist as it is; and will never come to such a pass as to be either nothing or nowhere. This motion the Schoolmen (who almost always name and define things rather by effects and incapacities than by inner causes) either denote by the axiom “two bodies cannot be in one place,” or call “the motion to prevent penetration of dimensions.” Of this motion it is unnecessary to give examples, as it is inherent in every body.

第一种运动是物质中的“反抗”运动，反抗运动是物质的每一个部分所固有的运动，正因如此，物质才断然拒绝被毁灭。因此，火、重力或压力、暴力、时间等，无一能让物质的任何部分，哪怕是极小极小部分，化为虚无；物质总是以某种东西的形式存在，占据着某些空间；无论处于何种窘境，物质都会通过改变形式或位置来获得自由；或者如果这还不行，物质就会按其本来样子存续下去，绝不至于落到无所有或无所处的境地。这种运动，经院学家们（他们几乎总是从事物的结果及其力所不能两方面而不是从其内在原因方面来给事物命名和下定义），要么是指“两个物体不能同处”这个公理，要么称之为“防止空间渗透的运动”。此类运动是每个物体所固有的，因此无须举例说明。

Let the second motion be what I call motion of *connection* , by which bodies do not suffer themselves to be separated at any point from contact with another body, as delighting in mutual connection and contact. This motion the Schoolmen call “motion to prevent a vacuum,” as when water is drawn up by suction or in a pump; the flesh by cupping glasses; or when water stops without running out in perforated jars unless the mouth of the jar be opened to let in the air; and in numberless instances of a similar kind.

第二种运动，我称之为“连接”运动。所谓连接运动就是指物体之间彼此接触，无法忍受从任何一处拆散开来，仿佛彼此以连接和紧贴为乐。这种运动，经验学家们称之为“防止虚空的运动”。例如，水被吸吮或泵吸、肌肉被拔火罐吸附，就属于这种运动；打孔的罐子如果不让空气进入，罐中的水就不会流出也属于这种运动，此类事例数不胜数。

Let the third motion be what I call motion of *liberty* , by which bodies strive to escape from preternatural pressure or tension and to restore themselves to the dimensions suitable to their nature. Of this motion also we have innumerable examples, such as (to speak first of escape from pressure) the motion of water in swimming, of air in flying, of water in rowing, of air in the undulations of winds, of a spring in clocks—of which we have also a pretty instance in the motion of the air compressed in children's popguns, when they hollow out an alder twig or some such thing and stuff it up at both ends with a piece of pulpy root or the like, and then with a ramrod thrust one of the roots or whatever the stuffing be toward the other hole, from which the root at the further end is discharged with a report, and that before it is touched by the nearer root or the ramrod. As for bodies escaping from tension, this motion displays itself in air remaining in glass eggs after suction; in strings, in leather and in cloth, which recoil after tension, unless it has gained too great strength by continuance; and in similar phenomena. This motion the Schoolmen refer to under the name of “mo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rm of the element”; an injudicious name enough, since it is a motion which belongs not only to fire, air, and water, but to every variety of solid substance, as wood, iron, lead, cloth, parchment, etc.; each of which bodies has its own proper limit of dimension out of which it cannot easily be drawn to any considerable extent. But since this motion of liberty is of all the most obvious, and is of infinite application, it would be a wise thing to distinguish it well and clearly. For some very carelessly confuse this motion with the two former motions of resistance and connection, the motion, that is, of escape from pressure with the motion of resistance; of escape from tension with the motion of connection—just as if bodies when compressed yield or expand, that there may not ensue penetration of dimensions; and, when stretched, recoil and contract, that there may not ensue a vacuum.

Whereas if air when compressed had a mind to contract itself to the density of water, or wood to the density of stone, there would be no necessity for penetration of dimensions, yet there might be a far greater compression of these bodies than they ever do actually sustain. In the same way, if water had a mind to expand to the rarity of air, or stone to the rarity of wood, there would be no need for a vacuum to ensue, and yet there might be effected a far greater extension of these bodies than they ever do actually sustain. Thus the matter is never brought to a penetration of dimensions or to a vacuum, except in the extreme limits of condensation and rarefaction, whereas the motions of which I speak stop far short of these limits, and are nothing more than desires which bodies have for preserving themselves in their consistencies (or, if the Schoolmen like, in their forms), and not suddenly departing therefrom unless they be altered by gentle means, and with consent. But it is far more necessary (because much depends upon it) that men should know that violent motion (which we call mechanical, but which Democritus, who in expounding his primary motions is to be ranked even below second-rate philosophers, called motion of stripe) is nothing more than this motion of liberty, that is, of escape from compression to relaxation. For either in a mere thrust, or in flight through the air, there occurs no movement or change of place until the parts of the body moved are acted upon and compressed by the impelling body more than their nature will bear. Then, indeed, when each part pushes against the next, one after the other, the whole is moved. And it not only moves forward, but revolv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arts seeking in that way also to free themselves or to distribute the pressure more equally. And so much for this motion.

第三种运动，我称之为“自由”运动。所谓自由运动指物体竭力逃

避超自然压力或张力，而自行恢复到适合自己性质的体积。这种运动，我们也可以找到数不胜数的例子，比如（先说逃避压力的运动）游泳时水的运动、飞行时的空气运动、划船时水的运动、狂风中的空气运动、钟表中的弹簧运动。至于空气受压时的运动，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小事例，即儿童气枪；孩子们掏空一根赤杨枝或类似东西，枝条两端用软木塞或类似东西塞住，然后用推弹杆把一端的软塞或填充物猛然推向另一端口，另一端口的软塞就砰地一声就发射出去了，而发射出去的软塞其实没有接触到推弹杆和前端的软塞。至于物体逃避张力的问题，这种运动体现在经过抽吸而存留在玻璃蛋中的空气里；还体现在弦、皮革和布匹松紧现象中，即拉紧后只要不持续强力拉住都要回缩，也体现在类似现象中。这种运动，经院学家们统称为“依据元素形式的运动”，这种说法真是太欠考虑了，因为这种运动并非火、空气和水所特有，各种坚实物质都有，如木、铁、铅、布、羊皮纸等；不过，这些物体，各自都有各自适宜的限度，即使超出限度也不可能有多大。在所有运动中，这个自由运动最明显，并且，其应用具有无限性，因此，认真仔细鉴别清楚不失为明智之举。有些人竟然粗心大意地将这种运动与前两种运动即抵抗运动和连接运动混为一谈，也就是，将这种逃避压力的运动与抵抗运动混为一谈，将这种逃避张力的运动与连接运动混为一谈；仿佛物体受压时就退让或扩张是为了避免产生渗透空间现象；当物体拉伸时就弹回和压缩是为了避免产生虚空现象。事实上，如果空气在受压时有意把自己收缩到水一样的密度，或是木头受压时有意把自己收缩到石头一样的密度，那么空间渗入就根本没有必要了；但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即物体承受的压力远远大于其实际承受力。同样，如果水有意把自己扩展到与空气一样稀薄，或石头有意把自己扩展到木材一样稀薄，那么随之而来的虚空也就没有必要了，但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即物体产生的张力远远大于其实际承受力。由此可见，只要不凝缩和稀松到极限，物质永远不会出现渗入空间或虚空现象。这里所说的两种逃逸活动还不至于达到极限，只不过是物体所需的两种欲求以维持其自身的坚固性（或者说，如经院学家喜欢，这里按他们的形式来说吧），而不会突然离开其坚固性，除非物体借助于温和的方法和感应作用来改变自身。但是还有一点是人们有必要而且应该知道的，即猛力运动（我们称之为机械运

动，而德谟克利特，这个甚至连列为二流哲学家都不够格的人，在阐释其基本运动时称之为鞭笞运动），只不过就是这种自由运动，也就是，逃避压缩趋向松弛的运动。因为无论是仅仅一掷，还是破空飞行，位置都不会发生移动或改变，直到被移动的物体部分受到推进物体的影响和压缩，其影响和压缩程度超过其性质所能承受的程度。的确，当每一部分推顶着下一个部分，一前一后，整体才移动起来。而且不仅仅向前移动，而且同时还自行旋转，这是因为各个部分也藉此释放自己或把压力等量平分掉了。这种运动就说到此为止。

Let the fourth motion be that to which I have given the name of the motion of *matter* , which is in some sort the converse of the last named motion. For in the motion of liberty bodies dread, loathe, and shun a new dimension, or a new sphere, or new expansion or contraction (which are all names for the same thing), and strive with all their might to recoil, and recover their old consistency. On the contrary, in this motion of matter bodies desire a new sphere or dimension and aspire thereto readily and quickly, and sometimes, as in the case of gunpowder, with most violent effort. Now the instruments of this motion, not indeed the sole, but the most potent, or at any rate the most common, are heat and cold. For instance, air, if expanded by tension, as by suction in glass eggs, labors under a strong desire to recover itself. But if heat be applied, it longs, on the contrary, to expand, and desires a new sphere and passes into it readily as into a new form (so they phrase it); and after a certain degree of expansion cares not to return, unless invited thereto by the application of cold, which is not a return, but a renewed transmutation. In the same way water, if made to contract by pressure, resists and wishes to become such as it was, that is, larger. But if there intervene intense and continued cold, it changes itself spontaneously and gladly to the density of ice; and if the cold be continued long, without interruption from heat, as in

grottoes and caverns of some depth, it turns to crystal or some similar material and never recovers its form.

第四种运动，我给它取名为“物质”运动，这种运动与上述第三种运动有几分相反。在自由运动中，物体惧怕、憎恶而且规避新的体积、新的范围、新的扩张或压缩（这些词都指同一件事），并竭力产生反作用，恢复原有的坚固性。相反，在这种物质运动中，物体渴求达到一个新的范围或体积，而且其渴望的程度十分急切，有时就像火药爆炸一般竭尽全力。这种运动的工具，虽然的确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具说服力的，或者说至少最普通的，那就是热和冷。例如，空气一旦因张力而扩张，就像玻璃蛋中被抽吸的那样，在强烈的欲求之下，尽力恢复自身。但是如果此时加热，空气反而渴望扩张，渴求一个新范围，并会立即进入，就像进入一种新形式一样（按经院学家的说法）；而且在扩大到某种程度之后，空气并不愿意返回，除非借助冷把空气召唤回去；其实，这并不是一种原样返回，而是一种崭新的嬗变。同样，水，一经压力而收缩时，必定进行抵抗，希望恢复其原先那么大的体积。但是如果此时有强烈而持续的冷插入进来，那么水会自发地改变自己、乐意将自己转变到冰的密度；如果冰长时间持续，而没有热深如穴窟一般插进来，冰还会变成晶体或及其类似的物质，永不会恢复到其原有的形状。

Let the fifth motion be the motion of *continuity* , by which I do not mean simple and primary continuity with some other body (for that is the motion of connection), but self-continuity in a given body. For it is most certain that all bodies dread a solution of continuity, some more, some less, but all to a certain extent. For while in hard bodies, as steel or glass, the resistance to discontinuity is exceedingly strong, even in liquids, where it seems to disappear or at all events to be very feeble, it is not altogether absent but is certainly there, though in its lowest degree of power,

and betrays itself in very many experiments as in bubbles, in the roundness of drops, in the thin threads of droppings from roofs, in the tenacity of glutinous bodies, and the like. But most of all does this appetite display itself if an attempt be made to extend the discontinuity to minute fragments. For in a mortar, after a certain amount of pulverization, the pestle produces no further effect; water does not penetrate into minute chinks; even air itself, notwithstanding its subtlety, does not suddenly pass through the pores of solid vessels but only after long insinuation.

第五种运动是“连续”运动。所谓连续运动，我并不是指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之间那种简单、原有的连续性（因为那就是一种连接运动），而是指该物体内部自身存在的连续性。最明确的一点是，一切物体都畏惧连续性的分解，有的畏惧得多一些，有的畏惧得少一些，但这种畏惧都有一定的限度。在硬物体中，如钢或玻璃，其对中断的抗拒运动极其强烈，即使是在液体中，这种抗拒运动看似没有或非常微弱，但也不是不存在，而是确实在那里，虽然其力量最弱，而且表现在许多如冒泡、水滴涟漪、檐水坠落成线、胶水粘合以及类似的活动中。但是我们如果试图将这种中断活动扩展到细碎物，那么这种抗拒活动倾向就表现得尤其显著。例如臼中捣物，捣碎到一定程度后，杵捣也捣不出效果了；水穿透不了细小的裂缝；即使空气本身，尽管很精微，也无法突然穿过坚实器皿的裂隙，除非空气软磨硬泡才能穿过裂隙。

Let the sixth motion be that which I call motion *for gain* , or motion *of want* . It is that by which bodies, when placed among quite heterogeneous and hostile bodies, if they find an opportunity of escaping from these and uniting themselves to others more cognate (though these others be such as have no close union with them) do nevertheless embrace the latter and choose them as

preferable; and seem to view this connection in the light of a gain (whence the term), as though they stood in need of such bodies. For instance, gold or any other metal in the leaf does not like the surrounding air. If therefore it meet with any thick tangible body (as a finger, paper, what you will) it instantly sticks to it and is not easily torn away. So too paper, cloth, and the like do not agree well with the air which is lodged in their pores. They are therefore glad to imbibe water or other moisture and eject the air. A piece of sugar too, or a sponge, if dipped at one end in water or wine, while the other stands out far above the surface, draws the water or the wine gradually upward.

第六种运动，我把它称为“谋利”运动，或“渴求”运动。物体，如果在置于一些极其异质乃至敌对的物体之中时，只要找到机会，就可以避开这些异质、敌对性物体，并借机使自己与更加亲近的物体联合在一起（尽管这些其他物体与自己毫无亲近密切的关系），正是这种谋利运动，物体会拥抱后者，视后者为自己倾意的对象，看待这种亲近关系仿佛就是一种利益（此名由此得来）关系，仿佛急需这种亲近性物体。例如，薄叶状金或任何其他金属都不喜欢四周的空气。因此，一遇到任何厚实的物体（如手指、纸片，随你列举），就会立刻紧贴上去，而且还难以扯开。同样，纸、布及其他类似的东西与寓居其裂隙中的空气也不相契合。因此，它们乐于吸取水或其他湿气来排挤空气。还有，一块糖或一块海绵，当一端浸入水或酒中，而另一端突出水面许多时，就会把水或酒渐渐吸附到上端。

Hence we derive an excellent rule for opening and dissolving bodies. For (to say nothing of corrosives and strong waters which open for themselves a way) if there can be found a body proportioned to and more in harmony and affinity with a given solid body than that with which it is as of necessity mixed, the solid

body immediately opens and relaxes itself, and shutting out or ejecting the latter, receives the former into itself. Nor does this motion for gain act or exist only in immediate contact. For electricity (of which Gilbert and others after him have devised such stories) is nothing else than the appetite of a body when excited by gentle friction—an appetite which does not well endure the air but prefers some other tangible body, if it be found near at hand.

因此，我们就可以为展开和分解物体推导出一条优秀的规律。（腐蚀剂和酸有自己开辟道路的方式，在此姑且不论）如果能找到这么一个物体，即一个与某种坚固的物体相匹相称的物体，其关系比与其强行结合的物体的关系还更契合、更亲密，那么这个物体就会张开怀抱松弛下来，将其吸为己有，排拒那种强行结合的物体。这种谋利运动也并非仅仅通过直接接触时才发生或存在。电（吉尔伯特及后人对此杜撰了许多故事）不过就是一个物体的欲求，即轻微摩擦时激发出来的欲求——这种欲求无法忍受空气，而更喜欢其他有形的物体，只要在近如手边找到这种有形物体。

Let the seventh motion be what I call the motion *of the greater congregation* , by which bodies are carried toward masses of a like nature with themselves—heavy bodies to the globe of the earth, light to the compass of the heaven. This the Schoolmen have denoted by the name of *natural motion* from superficial considerations; either because there was nothing conspicuous externally which could produce such motion (and therefore they supposed it to be innate and inherent in things themselves), or perhaps because it never ceases. And no wonder; for the earth and heaven are ever there, whereas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most other motions are sometimes absent, sometimes present. Accordingly this motion, because it ceases not but when others cease is felt instantly,

they deem perpetual and proper, all others adscititious. This motion, however, in point of fact is sufficiently weak and dull, being one which, except in bodies of considerable bulk, yields and succumbs to all other motions, as long as they are in operation. And though this motion has so filled men's thoughts as to have put all others almost out of sight, yet it is but little that they know about it, being involved in many errors with regard to it.

第七种运动，我称之为“大聚合运动”。所谓大聚合运动，是指物体趋向于靠近性质与自己相似的众多物体的运动——重物体趋向于地球，轻物体趋向于天际。这种运动，经院学家们给它取名为“自然运动”，这种命名出自于浅薄的认识：即任何明显的东西都不可能凭白无故地产生这种运动（因此，经院学家们认为，这是事物本身内在的、天生具有的运动），或者说也许因为这种运动永不停止。这并不奇怪，因为地常在、天亦常在，而绝大多数运动，其根其源时有时无。同样，这种运动，由于永不停止，而一旦其他运动停止时，就立刻感觉得到，所以经院学家就将这种运动认定为永恒的、固有的，所有其他的运动都是外加的。然而，这种运动实际上十分虚弱和迟钝，块头巨大的物体除外，因为这种运动，只要遇到其他运动在运转时，它就会妥协屈服。人们对这种运动太过于专注，以致于对其他运动几乎视而不见，尽管如此，但对这种运动的了解也微乎其微，因为他们陷入这种运动的许多错误之中。

Let the eighth motion be the motion *of the lesser congregation*, by which the homogeneous parts in a body separate themselves from the heterogeneous and combine together; by which also entire bodies from similarity of substance embrace and cherish each other, and sometimes are attracted and collected together from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as when in milk, after it has stood a while, the cream rises to the top, while in wine the dregs sink to the

bottom. For this is not caused by the motion of heaviness and lightness only, whereby some parts rise up and some sink down, but much more by a desire of the homogeneous parts to come together and unite in one.

第八种运动是“小聚合运动”。所谓“小聚合运动”，是指一个物体中的同质分子自觉地与同质分子结合起来，而与异质分子分离开来的运动；也可以说，质体相同的整个物体彼此相拥，彼此相抱，甚至有时远距离吸引而聚合在一起；例如牛奶停留一会儿，就会在表层产生乳脂；而酒停留一会儿，就会在底层产生沉渣。这并非仅仅因为轻重运动之故导致有些分子上升，有些分子下降，更主要是因为同质分子有聚合在一起的欲求。

Now this motion differs from the motion of want in two points. One is that in the latter there is the stronger stimulus of a malignant and contrary nature, whereas in this motion (provided there be nothing to hinder or fetter it) the parts unite from friendship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 foreign nature to stir up strife. The other point is that the union is here closer and, as it were, with greater choice. In the former, if only the hostile body be avoided, bodies not closely related come together, whereas in the latter, substances are drawn together by the tie of close relationship and, as it were, combine into one. And this motion resides in all composite bodies and would readily show itself were it not bound and restrained by other appetites and necessities in the bodies which interfere with the union in question.

这种运动与渴求运动有两点不同。一是后者具有更大刺激物，因为所含的性质正好相反而且充满恶意，而这个运动（只要不受到任何

东西的阻碍或约束）中，分子之间是友谊式的联合，甚至没有异己性质来挑起战争。二是这里的联合更加紧密，也可以说是，具有更大的选择性。前面的渴求运动中，只要避免了敌对物体，本无密切关系的物体也会聚合在一起；而这种运动中，各种质体以紧密联系为纽带而聚合在一起，也可说是，合而为一。这种运动存在于所有复合物体中，而且会随时表现出来，只要不受物体中其他的欲求和需求的约束和限制，因为这些欲求和需求会干涉这种所谓的联合。

Now the binding of this motion takes place generally in three ways: by the torpor of bodies; by the check of a dominant body; and by external motions. Now, for the torpor of bodies, it is certain that there resides in tangible substances a certain sluggishness, more or less, and an aversion from change of place; insomuch that, unless they be excited, they had rather remain as they are than change for the better. Now this torpor is shaken off by the help of three things: either by heat, or by the eminent virtue of some cognate body, or by lively and powerful motion. And as for the help of heat,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heat has been denned to be “that which separates Heterogeneous and congregates Homogeneous parts”; a definition of the Peripatetics justly derided by Gilbert, who says it is much the same as if a man were to be denned as that which sows wheat and plants vines—for that it is, a definition simply by effects, and those particular. But the definition has a worse fault, inasmuch as these effects, such as they are, arise not from a peculiar property of heat, but only indirectly (for cold does the same, as I shall afterwards show); being caused by the desire of homogeneous parts to unite, heat simply aiding to shake off the torpor which had previously bound the desire. As for the help derived from the virtue of a cognate body, it is well seen in an armed magnet which excites in iron the virtue of detaining iron by similarity of substance, the torpor of the iron being cast off by the virtue of the magnet. And as

for help derived from motion, it is shown in wooden arrows, having their points also of wood, which penetrate more deeply into wood than if they were tipped with steel, owing to the similarity of substance, the torpor of the wood being shaken off by the rapid motion. Of these two experiments I have spoken also in the Aphorism on Clandestine Instances.

言及约束，这种运动受到的约束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受到物体钝性的约束，二是受到一个支配物体的阻碍，三是受到外面运动的约束。就物体的钝性而言，肯定的是有形物质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种惰性，反感位置改变，其反感几乎达到如此程度，以致除非受到刺激，有形实体宁可保持原样也不肯变得更好。要除掉这种惰性可借助于三类东西：一是借助于热，二是借助于同族物体的显性特性，三是借助于活跃而有力的运动。首先说借助于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逍遥派曾将热界定为“分离异质分子而聚合同质分子的性质”，这个定义遭到了吉尔伯特的嘲笑。他说，这种界定无异于把人界定为种植麦子、种植葡萄的东西，因为这种定义是唯结果论、唯特定结果论。但这种定义还有一个更糟糕的错误，因为这些结果，如所列举的结果，并非源自于热所特有的性质，而只是与热有间接的关系（因为冷也可达到同样的结果，我在下文将有论述），这些结果是同质分子有联合的欲求所导致的，热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辅助除掉原先约束这种欲求的惰性。至于借助于同族物体的显性特性，这在铁磁石中看得很清楚。磁石激活铁的性质，使其借助于物质的同类性来吸住另一块铁；即铁的钝性被磁性消除掉了。至于借助于运动，这可以从木箭中可以看出来。木箭的箭头也是木质的，刺入木头时比钢箭头还要刺得深，这要归功于木箭与木头具有相同的质体，因为木头的惰性被急速运动消除掉了。这两个实验，我已经在隐性事例的语录中提及过。

That binding of the motion of the lesser congregation which is caused by the restraint of a dominant body is seen in the resolution

of blood and urine by cold. For as long as those bodies are filled with the active spirit which, as lord of the whole, orders and restrains the several parts of whatsoever sort, so long the homogeneous parts do not meet together on account of the restraint. But as soon as the spirit has evaporated, or been choked by cold, then the parts being freed from restraint meet togeth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natural desire. And thus it happens that all bodies which contain an eager spirit (as salts and the like) remain as they are, and are not resolved, owing to the permanent and durable restraint of a dominant and commanding spirit.

小聚合运动受到的约束是支配物体的阻碍所导致的，这可以从冷对血和尿的分解作用中看到。只要那些物体充满着活跃的精气，而精气是整个物体的主宰，命令和约束着各种各样的分子，其中同质分子由于受到阻碍长期不能聚合在一起。但是一旦精气蒸发掉，或受到冷的阻碍，分子摆脱约束后就会按照自然欲求聚合在一起。碰巧的是，凡是含有一种奋争的精气的物体所有物体（如盐等类似东西）都可以保持原状而不会遭到分解，这是因为一个具有支配性的、发号施令的精气具有稳固而持久的约束性。

That binding of the motion of lesser congregation which is caused by external motion is most conspicuous in the shaking of bodies to prevent putrefaction. For all putrefaction depends on the assembling together of homogeneous parts, whence there gradually ensues the corruption of the old form, as they call it, and the generation of a new. For putrefaction, which paves the way for the generation of a new form, is preceded by a dissolution of the old, which is itself a meeting together of homogeneous parts. That, indeed, if not impeded, is simple resolution. But if it be met by various obstacles there follow putrefactions, which are the

rudiments of a new generation. But if (which is the present question) a frequent agitation be kept up by external motion, then indeed this motion of uniting (which is a delicate and tender one, and requires rest from things without) is disturbed and ceases, as we see happen in numberless instances. For example, the daily stirring or flowing of water prevents it from putrefying; winds keep off pestilence in the air; corn turned and shaken in the granary remains pure; all things, in short, that are shaken outwardly are the slower to putrefy inwardly.

小聚合运动受到的约束是由外部运动导致的，这一点在通过振动物体来防止腐化中看得最明显。因为一切腐化都是基于同质分子的聚合，其结果就是旧形式的灭亡（如经院学家们所称的那样），新形式的诞生。腐化，虽说为新形式的诞生铺平了道路，但却以旧形式的解体为前奏，旧形式的解体本身就是同质分子的聚合。的确，这种聚合如果不遭到阻碍，就只是分解而已。不过，这种聚合如果遇到各种阻碍，那就必定产生腐化，即新生的雏形。但是如果通过外在运动来保持频繁的振动（即当前讨论的话题），那么这种联合运动（这是一种微妙柔弱的运动，需要外在事物的宁静）会受到干扰而停止下来，我们可以在无数事例中见到这种现象。例如每天搅动水或让水流动起来可以避免其腐臭，风可以驱散空气中的瘟疫；经常翻动仓中谷物可以保持其纯净；总之，一切东西，如果受到外面振动，内部腐化就比较缓慢。

Lastly, I must not omit that meeting of the parts of bodies which is the chief cause of induration and desiccation. For when the spirit, or moisture turned to spirit, has escaped from some porous body (as wood, bone, parchment, and the like), then the grosser parts are with stronger effort drawn and collected together; whence ensues induration or desiccation, which I take to be owing not so

much to the motion of connection to prevent a vacuum as to this motion of friendship and union.

最后，还有一点，我决不能略而不论，即物体分子的聚合，这是硬化和干化的主要原因。当精气或变成精气的湿气从某一多孔物体（如木头、骨头、羊皮纸及类似东西）中逃逸出来时，较粗分子就以更强的努力相互吸引、相互聚合在一起；继而产生硬化或干化现象，这种结果，我认为，与其说归因于可以阻止虚空产生的连接运动，不如说归因于友谊和结合的这种运动。

As for the meeting of bodies from a distance, that is a rare occurrence, and yet it exists in more cases than are generally observed. We have illustrations of it when bubble dissolves bubble; when medicines draw humors by similarity of substance; when the chord of one violin makes the chord of another sound a unison, and the like. I suspect also that this motion prevails in the spirits of animals, though it be altogether unknown. At any rate it exists conspicuously in the magnet and magnetized iron. And now that we are speaking of the motions of the magnet, they ought to be carefully distinguished. For there are four virtues or operations in the magnet which should not be confounded but kept apart, although the wonder and admiration of men have mixed them up together. The first is, the attraction of magnet to magnet, or of iron to magnet, or of magnetized iron to iron. The second is its polar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s declination. The third, its power of penetrating through gold, glass, stone, everything. The fourth, its power of communicating its virtue from stone to iron, and from iron to iron, without communication of substance. In this place, however, I am speaking only of the first of these virtues—that is, its attractive power. Remarkable also is the motion of attraction

between quicksilver and gold, insomuch that gold attracts quicksilver, though made up into ointments; and men who work amid the vapors of quicksilver usually hold a piece of gold in their mouths to collect the exhalations which would otherwise penetrate into their skulls and bones; by which also the piece of gold is presently turned white. And so much for the motion of the lesser congregation.

至于远距离物体的聚合，则比较罕见，但也比一般观察所及的还要多。我们还可以找到这种运动的事例，水泡促使水泡解体；泻药借助于同类物质泻出体液；一根琴弦能使另一根琴弦产生共鸣。我也怀疑这种运动在动物精气中具有强势性，尽管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至少这种运动在磁石和磁铁中尤为明显。既然我们谈到了磁石的各种运动，我们就应该仔细辨别。磁石有四种性质或动作，不应混淆不清而该区分开来，尽管人们在惊奇和钦佩之下把这四种性质或动作混为一谈。第一是吸引力，即磁石相吸，或铁与磁石相吸，或磁铁与铁相吸。第二是磁引力，同时带有磁偏差。第三是穿透力，即穿透金、玻璃、石头以及一切东西的能力。第四是磁传力，即将磁石的特性从石头传递给铁，从铁传递给铁，但无法传递物质本身。不过，我这里讨论的只是这四种性质的第一种，即吸引力。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金子与水银之间的吸引运动，即金子吸引水银，即使水银加进药膏里，也能吸引；人们在水银蒸气中工作时，通常会口衔一块金子，用以吸收水银蒸气，否则其就会钻入人的大脑和骨头里，这样，金子接触到水银立刻变成白色。小聚合运动就说到此为止了。

Let the ninth motion be the *magnetic* , which, though it be of the same genus with the motion of the lesser congregation, yet if it operates at great distances and on large masses, deserves a separate investigation, especially if it begin not with contact, as most, nor lead to contact, as all motions of congregation do, but simply raises

bodies or makes them swell, and nothing more. For if the moon raises the waters, or makes moist things swell; if the starry heaven attracts planets to their apogees; if the sun holds Venus and Mercury so that their elongations never exceed a certain distance; these motions seem to fall properly neither under the greater nor the lesser congregation, but to be of a sort of intermediate and imperfect congregation, and therefore ought to constitute a species by themselves.

第九种运动是“磁性”运动。不过，这种运动与小聚合运动属于同一类型；如果这种运动是在远距离外对大块物体实施作用，那么倒值得分别调查一番，尤其是这种磁性运动在大多数场合并没有一开始就有接触，也没有像一切聚合运动那样都具有接触的倾向，而除了提升物体或使物体扩张外，什么也不做。例如，月球把水提升起来，或使潮湿的东西膨胀；星空把行星吸引到远地点；太阳把持着金星和水星，使二者的距角永远不能超过一定度数；所有这些运动似乎既不能恰当地归为大聚合运动，也不能归为小聚合运动，而是属于一种中间而非完美的聚合运动，因此，它们自当另归一类。

Let the tenth motion be that of *flight* (a motion the exact opposite of that of the lesser congregation), by which bodies from antipathy flee from and put to flight hostile bodies, and separate themselves from them or refuse to mingle with them. For although in some cases this motion may seem to be an accident or a consequence of the motion of the lesser congregation, because the homogeneous parts cannot meet without dislodging and ejecting the heterogeneous, still it is a motion that should be classed by itself and formed into a distinct species, because in many cases the appetite of flight is seen to be more dominant than the appetite of union.

第十种运动是“逃避”运动（这种运动与小聚合运动正相反），即物体出于反感逃避敌对物体，也要让敌对物体躲开，使自己与敌对物体分开，或者说拒绝与它们掺杂在一起。这种运动在某些时候看似是小聚合运动的一个意外或结果，因为同质分子如果不驱逐和排拒异质分子就无法聚合在一起；还有，这种运动应该按其自身归类，形成一个单独的种类，因为在许多情况下，逃避的欲求看起来比结合的欲求更占优势。

This motion is eminently conspicuous in the excretions of animals and not less in objects odious to some of the senses, especially the smell and the taste. For a fetid odor is so rejected by the sense of smell as to induce by consent in the mouth of the stomach a motion of expulsion; a rough and bitter taste is so rejected by the palate or throat as to induce by consent a shaking of the head and a shudder. But this motion has place in other things also. It is observed in certain forms of reaction; as in the middle region of the air, where the cold seems to be the effect of the rejection of the nature of cold from the confines of the heavenly bodies; as also the great heats and burnings which are found in subterranean places appear to be rejections of the nature of heat from the inner parts of the earth. For heat and cold, in small quantities, kill one another. But if they be in large masses, and as it were in regular armies, the result of the conflict is that they displace and eject each other in turn. It is also said that cinnamon and other perfumes retain their scent longer when placed near sinks and foul-smelling places because they refuse to come out and mingle with stenches. It is certain that quicksilver, which of itself would reunite into an entire mass, is kept from doing so by spittle, hog's lard, turpentine, and the like, owing to the ill consent which its parts have with such bodies, from which, when spread around

them, they draw back, so that their desire to fly from these intervening bodies is more powerful than their desire of uniting with parts like themselves. And this is called the *mortification* of quicksilver. The fact also that oil does not mix with water is not simply ow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weight, but to the ill consent of these fluids, as may be seen from the fact that spirit of wine, though lighter than oil, yet mixes well enough with water. But most of all is the motion of flight conspicuous in niter and such like crude bodies, which abhor flame; as in gunpowder, quicksilver, and gold. But the flight of iron from one pole of the magnet is well observed by Gilbert to be not a flight strictly speaking, but a conformity and meeting in a more convenient situation.

这种运动在动物排泄物中尤其明显，在对一些感官（尤其是嗅觉和味觉）有反感的物体中亦是这样。比如臭味会遭到嗅觉的排拒，因感应作用而引起反胃；苦味涩味会遭到颚喉的排拒，因感应作用而引起摇头和噤战。但这种运动也会出现在其他事物中。这一点可以从某种反作用形式观察得到；比如大气中间层的冷是天体外界排拒出冷这种性质所产生的结果；又如地下的巨热和火热也像是地球内部排拒出热这种性质所产生的结果。因为热与冷，在量小时，就相互厮杀；但是如果量大，就仿佛是两支正规军，冲突的结果就是轮番彼此排拒、彼此取代。据说，桂皮及其他香料，如果放在附近的地沟和恶臭的地方，其香气就会保持得更长久，因为香气拒绝出来与臭气相投。可以肯定的是，水银自愿重新聚合成一整片，但唾沫、猪油、松油以及类似东西可以将整片的水银分开，这是因为水银分子对这些东西具有不良感应，一旦这些东西散布在周围，水银分子就会引退，由此可见，对这些骚扰性东西，水银分子有一种唯恐躲之不及的欲求，而且这种欲求比其同类分子结合的欲求还要强烈。这就叫水银“克星”。有一个事实是油水不相融，这不仅仅是因为重量上的差异，更是因为这两种液体具有不良感应，这一点从酒精与水关系这一事实中一看就明白，酒精尽管比油还轻，但依然与水融合得很好。但这种逃避运动在硝石

以及类似粗质物体中体现得最明显，这些东西憎恶火焰；同样在火药、水银和金子也体现得最明显。但铁逃避磁石的一极这种现象，吉尔伯特说得好，严格地说算不上逃避，而且如果情景更为合适，那就是一种契合和聚集。

Let the eleventh motion be that of *assimilation* , or of *self-multiplication* , or again of simple *generation* . By which I mean not the generation of integral bodies, as plants or animals, but of bodies of uniform texture. That is to say, by this motion such bodies convert others which are related, or at any rate well disposed to them, into their own substance and nature. Thus flame over vapors and oily substances multiplies itself and generates new flame; air over water and watery substances multiplies itself and generates new air; spirit, vegetable and animal, over the finer parts as well of watery as of oily substance in its food, multiplies itself and generates new spirit; the solid parts of plants and animals, as the leaf, flower, flesh, bone, and the like, severally assimilate new substance to follow and supply what is lost out of the juices of their food. For let no one adopt the wild fancy of Paracelsus who (blinded I suppose by his distillations) will have it that nutrition is caused only by separation, and that in bread and meat lie eye, nose, brain, liver; in the moisture of the ground, root, leaf, and flower. For as the artist out of the rude mass of stone or wood educes, by separation and rejection of what is superfluous, leaf, flower, eye, nose, hand, foot, and the like, so, he maintains, does Archæus, the internal artist, educe out of food by separation and rejection the several members and parts of our body. But to leave such trifles, it is most certain that the several parts, as well similar as organic, in vegetables and animals do first attract with some degree of selection the juices of their food, which are alike or nearly so for all, and then assimilate them and turn them into their own nature.

Nor does this assimilation or simple generation take place only in animate bodies, but inanimate also participate therein, as has been stated of flame and air. Moreover, the non-vital spirit, which is contained in every tangible animated substance, is constantly at work to digest the coarser parts and turn them into spirit, to be afterwards discharged; whence ensues diminution of weight and desiccation, as I have stated elsewhere. Nor must we set apart from assimilation that accretion which is commonly distinguished from alimentation; as when clay between stones concretes and turns into a stony substance, or the scaly substance on the teeth turns into a substance as hard as the teeth themselves, and so on. For I am of opinion that there resides in all bodies a desire for assimilation as well as for uniting with homogeneous substances; but this virtue is bound, as is the other, though not by the same means. But these means, as well as the way of escape from them, ought to be investigated with all diligence because they pertain to the rekindling of the vital power in old age. Lastly, it seems worthy of observation that in the nine motions of which I have spoken bodies seem to desire only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nature, but in this tenth the propagation of it.

第十一种运动是“同化”运动，或称“自我繁殖”运动，又称简单的“生殖”运动。我所指的这种运动并不是完整物体的生成，如植物或动物，只是组织上有一致性的物体的生成。也就是说，这些物体通过这种运动，把那些与自己相关的或倾向于自己的另外一些物体变为自己的物质和性质。火焰遇到气体和含油物质就会自我增殖，产生出新的火焰；空气遇到水和含水的质体就会自我增殖，产生出新的空气；精气，无论是植物的还是动物的，遇到食物中水质和油质较为精细的分子时，就会自我增殖，产生出新的精气；植物和动物的固体部分，如叶、花、肉、骨及类似的东西，分别从各自食物的汁液中同化新的物质以补充其所失。奉劝大家切勿相信巴拉塞尔士的妄念，他（我猜

是被他的蒸馏法蒙蔽了）竟然这样认为，营养不过是由分化而得，还认为，面包和肉食之中含有眼、鼻、脑、肝成分，土壤湿气之中含有根、叶、花的成分。比如，工匠通过削弃多余部分，从粗质大块石头或木头中雕刻出叶、花、眼、鼻、手、脚等类似形状，所以，他认为，“元气”这个内在的工匠，也是通过削弃之法，从食物中雕琢出我们身体的四肢和器官。不过，撇开这些琐事不谈，最肯定的一点是，植物和动物的各个部分，还有类似的器官，首先是通过适当的选择来吸取食物的汁液——所有事物原理相同或相近——然后，将汁液加以同化，并将其转变为各自的性质。这种同化或简单生成不仅发生于有生命物体之上，也发生于非生命物体之上，而且还参与其中，如刚才所说的火焰和空气便是。此外，每个有生命的有形物质都含有无生命的精气，这种无生命精气不停地消化较粗的分子，并将其转变为精气，留待后来释放；由此发生我在别处说过的减轻和干化现象。我们也决不能把附生与同化分隔开来，而附生通常有别于滋养。例如石头之间的粘土凝固成石质物质，或牙齿上垢壳凝固成一种物质，与牙齿本身一样坚硬等等。我的意见是，所有物体都既存在一种同化的欲求，也存在一种与同质物质相互结合的欲求；这种性质也要受约束，正如后者要受到约束一样，不过所受约束的方式不同。但这些受约束的方式和逃避约束方式一样，我们都应该辛勤努力地去调查，因为这些都涉及到如何点燃年老后的生命力。最后，值得注意的似乎还有一点，即前面的九种运动中，我曾提及过的物体似乎仅仅渴求保持自己的性质，而唯独在第十种运动中物体渴求繁衍自己的性质。

Let the twelfth motion be that of *excitation* , a motion which seems to belong to the genus of assimilation and which I sometimes call by that name. For it is a motion diffusive, communicative, transitive, and multiplicative, as is the other, and agreeing with it generally in effect though differing in the mode of effecting and in the subject matter. For the motion of assimilation proceeds, as it were, with authority and command; it orders and forces the assimilated body to turn into the assimilating. But the motion of

excitation proceeds, so to speak, with art and by insinuation, and stealthily, simply inviting and disposing the excited body to the nature of the exciting. Again, the motion of assimilation multiplies and transforms bodies and substances. Thus more flame is produced, more air, more spirit, more flesh. But in the motion of excitation virtues only are multiplied and transferred; more heat being engendered, more magnetic power, more putrefying. This motion is particularly conspicuous in heat and cold. For heat does not diffuse itself, in heating a body, by communication of the original heat but simply by exciting the parts of the body to that motion which is the form of heat, of which I have spoken in the First Vintage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heat. Consequently heat is excited far more slowly and with far greater difficulty in stone or metal than in air, owing to the unfitness and unreadiness of those bodies to receive the motion. So that it is probable that there may exist materials in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which altogether refuse to be heated, because through their greater condensation they are destitute of that spirit with which this motion of excitation generally begins. In like manner the magnet endues iron with a new disposition of its parts and a conformable motion, but loses nothing of its own virtue. Similarly leaven, yeast, curd, and certain poisons excite and invite a successive and continued motion in dough, beer, cheese, or the human body, not so much by the force of the exciting as by the predisposition and easy yielding of the excited body.

第十二种运动是“诱发”运动，这种运动似乎属于一种同化运动，有时我也用同化运动这个名字来称呼它。因为这种运动与同化运动一样，都具有散播性、传递性、转移性和繁殖性，二者虽然在产生结果的方式以及题材上有所不同，但在结果上却大体一致。就方式而言，同化运动仿佛是按权威和命令来进行，即命令和迫使被同化的物体转变成具有同化作用的物体。而诱发运动可以说是通过技巧和诱导方式

悄然进行，只是对被诱物体加以诱导和安排，使其具有诱导物体所具有的性质。就题材而言，同化运动增加和转变的是物体和物质。火焰越来越猛、空气越来越多、精气越来越足、肉体越来越多等就是这个道理。而在诱发运动中繁殖和转变的只是品性；如热量产生得更多，磁力便得更强，腐化更加严重。这种运动在热和冷中尤为突出。因为在加热一个物体时，热并不是通过传递自身的热来散发，而只是通过诱发被加热物体的分子产生运动，而这个运动就是热的形式，这一点，我在关于热的本质初步收获中已经谈及过了。因此，石头或金属与空气相比，热的诱发要慢得多，要难得多，因为石头或金属不适合，也不便于接受运动。很有可能地球腹中存在一些完全拒绝受热的物质，因为这些物质承受了更大的压缩从而导致完全缺乏某种精气，即诱发运动借以开始的那种精气。同样，磁石赋予铁分子以一种新的秉性和相应的运动，而且丝毫不损失磁石的品性。同样，酵素、酵母、凝乳以及某些毒药，分别在面团、啤酒、奶酪和人体中诱发和引起一种连续不断的运动，而引发这种运动的与其说是诱发物体的力量，不如说是被诱物体具有产生这种运动的癖性以及易发性。

Let the thirteenth motion be the motion of *impression* , which also is of the same genus with the motion of assimilation, and is of diffusive motions the most subtle. I have thought fit, however, to make a distinct species of it, on account of a remarkable difference between it and the two former. For the simple motion of assimilation actually transforms the bodies themselves, so that you may take away the first mover, and there will be no difference in what follows. For the first kindling into flame, or the first turning into air, has no effect on the flame or air next generated. In like manner, the motion of excitation continues, after the first mover is withdrawn, for a very considerable time: as in a heated body when the primary heat has been removed; in magnetized iron when the magnet has been put away; in dough when the leaven has been taken out. But the motion of impression, though diffusive and

transitive, seems to depend forever on the prime mover. So that if that be taken away or cease to act, it immediately fails and comes to an end, and therefore the effect must be produced in a moment, or at any rate in a very brief space of time. The motions therefore of assimilation and excitation I call motions of the *generation of Jupiter* , because the generation continues; but this, the motion of the *generation of Saturn* , because the birth is immediately devoured and absorbed. It manifests itself in three things: in rays of light, in the percussions of sounds, and in magnetism, as regards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influence. For if you take away light, colors and its other images instantly disappear; if you take away the original percussion and the vibration of the body thence produced, the sound soon after dies away. For though sounds are troubled as they pass through their medium by winds, as if by waves, yet it must be carefully noted that the original sound does not last all the time the resonance goes on. For if you strike a bell, the sound seems to be continued for a good long time, whereby we might easily be led into the error of supposing that during the whole of the time the sound is, as it were, floating and hanging in the air, which is quite untrue. For the resonance is not the identical sound, but a renewal of it, as is shown by quieting or stopping the body struck. For if the bell be held tight so that it cannot move, the sound at once comes to an end and resounds no more—as in stringed instruments, if after the first percussion the string be touched, either with the finger, as in the harp, or with the quill, as in the spinet, the resonance immediately ceases. Again, when the magnet is removed, the iron immediately drops. The moon indeed cannot be removed from the sea, nor the earth from the falling body, and therefore we can try no experiment in these cases; but the principle is the same.

第十三种运动是“感染”运动。此种运动也可以归为同化运动，属

于散播性运动，而且属于最精微的散播性运动。不过，我认为适宜单独归为一类单独运动，因为与前两种运动相比，差异相当明显。因为简单的同化运动实际上是转变物体本身，即使移除了原动者，也对后动者没有妨碍。例如最初点燃的火焰，或最初生出的空气，对后来生出的火焰或空气并无影响。同样，诱发运动在原动者移开之后仍然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如移开施热物体后的受热物体，以及移开磁石后的被磁化的铁，还有离开酵素的面团，皆属此理。而感染运动，尽管具有散播性和传递性，但似乎永远都要取决于原动者。也就是说，一旦原动者移开或不再发生作用，感染运动立刻衰退而宣告结束；因此，其效果必定是产生于瞬间，或者至少可以说产生于极短的时间之内。因此，同化运动和诱发运动，我把他们称为“木星生成”运动，因为这种生成可以持续不断；而这种感染运动，我把称为“土星生成”运动，因为其在诞生之时立刻就被吞没、被吸收。这种运动体现在三种东西上：光线、声震和磁力，这三种都可以说明影响力的传递性。因为如果把光移开，那么色彩及其他影像立刻就消失掉；如果把声音的震源以及由此而生的物体震荡驱除掉，那么音响就会立刻消失掉。声音在穿过中间物时尽管受到风的阻扰，而似呈波浪状传播，但是我们必须仔细注意的是原音并非随着共鸣的持续而持续。比如，如果你撞击一下钟，声音似乎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误入歧途，认为声音在整个时间段里似乎都是漂浮和悬挂在空气之中，其实这并非事实。因为共鸣与原音并非同一声音，而是对原音的更新，只要把被撞击的钟的声音静下来，或不让钟发出声音就可以清晰地证实这一点。如果把钟抱紧不动，钟声立刻结束，而共鸣也随之消失——又如，弹击弦乐如竖琴之后，再用手指或羽茎轻触弦线，共鸣立刻就停止了。又如，磁石一旦去掉之后，铁便立刻掉落下来。的确，大海运动离不开月球，同样，物体坠落离不开地球；虽然我们无法对这两种情况做实验验证，但其中的原理却是一样的。

Let the fourteenth motion be the motion of *configuration* or *position* , by which bodies seem to desire not union or separation, but position, collocation, and configuration with respect to others.

This motion is a very abstruse one and has not been well investigated. In some cases, indeed, it seems to be without a cause, though not, I believe, really so. For if it be asked why the heavens revolve rather from east to west than from west to east, or why they turn on poles placed near the Bears rather than about Orion, or in any other part of heaven, such questions seem to border on insanity, since these phenomena ought rather to be received as results of observation, and merely positive facts. But though there are no doubt in nature certain things ultimate and without cause, this does not appear to me to be one of them, being caused in my opinion by a certain harmony and consent of the universe which has not yet fallen under observation. And if we admit the motion of the earth from west to east, the same questions remain. For it also moves on certain poles. And why, it might be asked, should these poles be placed where they are, rather than anywhere else? Again the polarity, direction, and declination of the magnet are referable to this motion. There are also found in bodies natural as well as artificial, especially in solids, a certain collocation and position of parts, and a kind of threads and fibers, which ought to be carefully investigated since, until they are understood, these bodies cannot be conveniently managed or controlled. But those eddyings in fluids, by which when pressed, before they can free themselves, they relieve each other that they may all have a fair share of the pressure, belong more properly to the motion of liberty.

第十四种运动是“配置”运动或“定位”运动。处于该运动中的物体似乎既不期待与其他物体结合，也不指望与其他物体分离，而是期望同其他物体确定位置、寻求配置、构成布局。这一运动十分令人费解，因此，人们尚未深入调查。的确，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运动似乎无缘无故，虽然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要问天体的旋转为什么是自东向西而非自西向东，或者问天体绕极旋转时为什么是靠近大小熊

星而不是靠近猎户座或者天空的任何其他地方；提问这类问题几近疯狂，因为这些现象确实应该被视作观察的结果，且只能当作客观事实来接受。尽管自然界中无疑存在某些只见其果未见其因的东西，但我认为上述问题并属于此列；我认为那些东西是宇宙中的某种和谐感应所致，只是至今仍未被我们观察清楚而已。而且即使我们承认地球是自西向东旋转，依然存在相同的问题。因为地球还是绕着某个极在运动。也许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极就存在于它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而不在任何其他地方？磁石的磁引力、方向性和和磁偏性可能也属于这类运动。还有，无论是在自然物体中还是在人造物体中，尤其是在固体物体中，也都发现了分子之间存在排列和位置分布现象，并呈纵横分布，这些都应该加以仔细调查，因为若不弄懂查清，要处理和控制这些物体，就不可能方便快捷地实现。但是在那些流质物体中出现的漩涡运动，是因为流质物体在受压时，为了获得自由而采取一种相互解救的行动，以平分所受的压力；因此，把这种漩涡运动归为自由运动更为恰当。

Let the fifteenth motion be the motion of *transition* , or motion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s* , by which the virtues of bodies are more or less impeded or promoted by their media,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body and of the acting virtues, and also of the medium. For one medium suits light, another sound, another heat and cold, another magnetic virtues, and so on.

第十五种运动是“过渡”运动，或称“通道”运动。在这种运动中，物体的品性多少受到中间物的阻碍或促进；而受阻碍或促进的程度既取决于物体及其活动品性的性质，也取决于中间物的性质。比如，一种中间物适合光，另一种中间物却适合声音；一种中间物适合热和冷，另一种中间物却适合磁性，依此类推。

Let the sixteenth motion be the *royal* (as I call it) or *political* motion, by which the predominant and commanding parts in any body curb, tame, subdue, and regulate the other parts, and compel them to unite, separate, stand still, move, and range themselve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desires, but as may conduce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commanding part; so that there is a sort of government and polity exerted by the ruling over the subject parts. This motion is eminently conspicuous in the spirits of animals where, as long as it is in vigor, it tempers all the motions of the other parts. It is found however in other bodies in a lower degree; as I said of blood and urine, which are not decomposed till the spirit which mixes and keeps together their parts be discharged or quenched. Nor is this motion confined to spirits, though in most bodies the spirits are masters owing to their rapid and penetrating motion. But in bodies of greater density and not filled with a lively and quickening spirit (such as there is in quicksilver and vitriol), the thicker parts are the masters, so that unless this yoke and restraint be by some expedient shaken off, there is very little hope of any new transformation of such bodies. But let no one suppose that I am forgetful of the point at issue, because while this series and distribution of motions tends to nothing else but the better investigation of their predominancy by instances of strife, I now make mention of predominancy among the motions themselves. For in describing this royal motion I am not treating of the predominancy of motions or virtues, but of the predominancy of parts in bodies; such being the predominancy which constitutes the peculiar species of motion in question.

第十六种运动是“王权”运动（我是这样称呼的），或者“政治”运动。这种运动中，物体中占优势和统治地位的分子控制、压制、抑制并管制着其他分子，而且迫使其他分子合并、分离、静止、运动和排

列；占统治地位的分子并不会迎合其他分子的欲求，而是看如何才会有助于加强自己的掌控；所以这些具有统治地位的分子类似于政府和政权，凌驾于被管辖而臣服的分子之上。这种运动在动物精气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凡精气充满活力，其他分子之一切运动皆受其控制。然而这种运动在其他物体上的体现程度相对较小；比如我曾提及，血和尿，只有在调和与维系其分子的精气外泄或熄灭之时，才会解体腐烂。这种运动也非仅限于精气，尽管大多数物体的精气因运动的迅捷性和穿透性而成为掌控者。但在密度较大、活跃精气不足的物体中（比如水银和硫酸），厚重分子成为掌控者；以致必须采取某种手段来摆脱枷锁和约束，否则，这种物体要想有新的转变，希望极为渺茫。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忘了本部分所谈论的要点，因为这一系列分门别类的运动只不过是倾向于借用斗争性事例来更好地调查运动的优势，而我现在又提及这些运动本身的优势。在描述这种王权运动时，我并不是在论述运动或品性的优势，而是在论述物体中的分子优势；而正是这种分子优势构成了所讨论的特定类别的运动。

Let the seventeenth motion be the *spontaneous motion of rotation* , by which bodies delighting in motion and favorably placed for it enjoy their own nature, and follow themselves, not another body, and court (so to speak) their own embraces. For bodies seem either to move without limit, or to remain altogether at rest, or to tend to a limit at which,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e, they either revolve or rest. Those which are favorably placed, if they delight in motion, move in a circle, with a motion, that is, eternal and infinite. Those which are favorably placed, and abhor motion, remain at rest. Those which are not favorably placed move in a right line (as the shortest path) to consort with bodies of their own nature. But this motion of rotation admits of nine differences regarding 1. the center round which the bodies move; 2. the poles on which they move; 3. their circumference or orbit, according to their distance from the center; 4. their velocity, according to the

greater or less rapidity of their rotation; 5. the course of their motion, as from east to west, or from west to east; 6. their declination from a perfect circle by spiral lines more or less distant from their center; 7. their declination from a perfect circle by spiral lines more or less distant from their poles; 8. the greater or lesser distance of these spirals from each other; 9. and lastly, the variation of the poles themselves, if they be movable; which, however, has nothing to do with rotation unless it be circular. This motion in common and long received opinion is looked upon as the proper motion of heavenly bodies, though there is a grave dispute with regard to it among some both of the ancients and of the moderns, who have attributed rotation to the earth. But a juster question perhaps arises upon this (if it be not past question), namely, whether this motion (admitting that the earth stands still) is confined to the heavens, and does not rather descend and communicate itself to the air and waters. The motion of rotation in missiles, as in darts, arrows, musket balls, and the like, I refer to the motion of liberty.

第十七种运动是“自发旋转运动”。所谓自发旋转运动，就是物体乐于运动，而且其位置利于运动，因此其随性而为，自我享悦，而不必看其他物体眼色行事，甚至（可以说）是孤芳自赏。物体仿佛要么无限制地运动，要么完全静止不动，要么在达到某种极限后或旋转或停止。那些位置利于运动的物体，如果乐于运动，便做圆圈运动，而且是一种永恒的、无限的运动；如果它们厌恶运动，则保持静止不动。那些位置不宜运动的物体，则按直线进行运动（直线距离最短），以便与具有相同性质的物体连接在一起。但是这种旋转运动包含九种不同之处：1．物体运动围绕的中心不同；2．物体运动所依靠的极不同；3．物体运动所形成的圆周或轨道不同——这要视其与中心的距离而定；4．物体运动速度不同——这要视物体旋转速度的大小而定；5．物体运动的路程不同——要么从东到西，要么从西到

东；6．物体运动离正圆的偏角不同——这要视螺旋线与中心点距离长短而定；7．物体运动离正圆的偏角不同——这要视螺旋线与极的距离长短而定；8．这些螺旋形彼此之间的距离不同——非大即小；9．若极会动，极与极之间在变动上有所不同。不过，除非做圆圈式旋转，否则最后一点不同是与旋转无关的。人们普遍而且长期都把这种运动视为天体固有的运动，尽管从古到今人们都对此都存在着严重争议，这些人都认为地球在旋转。不过，由此还可能产生一个更为恰当的问题（但愿不是过时的问题），即这种运动（承认地球是静止不动的）是否仅限于天体，是否还可以下传到空气和水中。投射物中的旋转运动，如标枪、矢箭、子弹等，我称之为自由运动。

Let the eighteenth motion be the motion of *trepidation* , to which, as understood by astronomers, I do not attach much credit. But in searching carefully everywhere for the appetites of natural bodies this motion comes before us and ought, it seems, to constitute a species by itself. It is a motion of what may be called perpetual captivity and occurs when bodies that have not quite found their right place, and yet are not altogether uneasy, keep forever trembling and stirring themselves restlessly, neither content as they are nor daring to advance further. Such a motion is found in the heart and pulses of animals, and must of necessity occur in all bodies which so exist in a mean state between conveniences and inconveniences that when disturbed they strive to free themselves, and being again repulsed, are yet forever trying again.

第十八种运动，若按天文学家们的理解，是“震颤”运动。不过，我不太相信这种运动。但是若要四处仔细查究自然物体的倾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运动似乎应该单独列为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可以称为永久监禁运动。若这种运动产生于物体尚未找到适当的位置之时，这种运动会处于一种彻底的不安之中，并因此不安地震颤和动荡着，

既不满足于现状，又不敢向前多行一步。这种运动常见于动物心脏和脉搏，而且必然发生于一切物体之中。也就是，一切物体在处于便与不便的中间状态之时，一旦受到扰动就会奋力寻求自由，但必然遭到反击，如此反复，永不停息。

Let the nineteenth and last motion be one which, though it hardly answers to the name, is yet indisputably a motion; and let us call it the motion of *repose* , or of *aversion to move* . It is by this motion that the earth stands still in its mass while its extremities are moving toward the middle—not to an imaginary center, but to union. By this appetite also all bodies of considerable density abhor motion. Indeed, the desire of not moving is the only appetite they have; and though in countless ways they be enticed and challenged to motion, they yet, as far as they can, maintain their proper nature. And if compelled to move, they nevertheless seem always intent on recovering their state of rest and moving no more. While thus engaged, indeed, they show themselves active and struggle for it with agility and swiftness enough, as weary and impatient of all delay. Of this appetite but a partial representation can be seen, since here with us, from the subduing and concocting power of the heavenly bodies, all tangible substances are not only not condensed to their utmost, but are even mixed with some portion of spirit.

第十九种运动，也就是最后一种运动，虽然难以名状，但的确是一种运动，这不容争辩；我们称之为“安息”运动或“厌动”运动。正是这种运动，使地球的大部分处于静止不动状态，而地球两端做向心运动——并不是向着我们想象的中心运动，而是趋于聚合。正是这种倾向致使一切密度极大的物体都厌恶运动。的确，寻求静止状态是这些物体唯一的嗜好；即使千方百计地挑逗其运动，这些物体也会尽其所能地保持其固有性质。即使被迫运动起来，这些物体似乎总是宁愿恢

复其静止状态，而不想再运动下去。因此他们竭力恢复静止，但自身又显得活跃，像是在用足够的敏捷和迅疾来获取这种静止，表现出迫不及待、刻不容缓的样子。关于这个倾向，我们只能看见其的部分表现，因为验证我们观点的证据是一切有形的物质。由于天体的压制力和调制力，一切实体不仅不能被压缩到极致，其中一些甚至还混杂着某种精气。

Thus, then, have I set forth the species or simple elements of motions, appetites, and active virtues, which are in nature most general. And under these heads no small portion of natural science is sketched out. I do not, however, mean to say that other species may not be added, or that the divisions I have made may not be drawn more accurately according to the true veins of nature, or reduced to a smaller number. Observe, nevertheless, that I am not here speaking of any abstract divisions, as if one were to say that bodies desire either the exaltation or the propagation or the fruition of their nature; or again, that the motions of things tend to the preservation and good either of the universe, as resistance and connection; or of great wholes, as the motions of the greater congregation, rotation, and aversion to move; or of special forms, as the rest. For though these assertions be true, yet unless they be defined by true lines in matter and the fabric of nature, they are speculative and of little use. Meanwhile, these will suffice and be of good service in weighing the predominancies of virtues and finding out instances of strife, which is our present object.

至此，我们已经罗列出了运动、倾向和活跃品性的类别或简单要素，这些都是自然界中最普遍存在的。在这些标题之下，就可以涵盖不小一部分的自然科学了。不过，我并不是说不能增添其他种类的运动了，也不是说我以上所做的分类不能再根据自然界的真正脉络而变

得更加精确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在此所讨论的不是任何抽象的分类，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物体要么欲求升华其性质，要么欲求繁衍其性质，要么欲求实现其性质；也并非另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事物的运动，要么倾向于保存宇宙并维护宇宙的利益（比如抵抗运动和连接运动），要么倾向于保存巨大的整体并维护其利益（如大趋聚运动、旋转运动、厌动运动），要么倾向于保护特殊形式并维护其利益，如静止不动。因为即使那些论断是真实可信的，但是如果不用物质的真实线条和自然的结构来界定，那些论断也只是揣想而毫无用处。与此同时，我们当前的目标是考量各种品性的优劣并找出种种斗争性事例，所以，以上所列已经非常实用并且已经足够了。

For of the motions I have set forth some are quite invincible; some are stronger than others, fettering, curbing, arranging them; some carry farther than others; some outstrip others in speed; some cherish, strengthen, enlarge, and accelerate others.

我所罗列的运动，有些是不可征服的；有些比那些束缚、限制和摆布着其他运动的运动要更强；有些比其他运动更远；有些在速度上超过其他运动；有些则能够维护、加强、扩大和加速其他运动。

The motion of resistance is altogether adamantine and invincible. Whether the motion of connection be so, I am still undecided. For I am not prepared to say for certain whether or no there be a vacuum, either collected in one place or interspersed in the pores of bodies. But of one thing I am satisfied, that the reason for which a vacuum was introduced by Leucippus and Democritus (namely, that without it the same bodies could not embrace and fill sometimes larger and sometimes smaller spaces) is a false one. For matter is clearly capable of folding and unfolding itself in space,

within certain limits, without the interposition of a vacuum; nor is there in air two thousand times as much of vacuity as there is in gold, which on their hypothesis there should be. Of this I am sufficiently convinced by the potency of the virtues of pneumatical bodies (which otherwise would be floating in empty space like fine dust) and by many other proofs. As for the other motions, they rule and are ruled in turn, in proportion to their vigor, quantity, velocity, force of projection, and also to the helps and hindrances they meet with.

抗拒运动完全硬如磐石，不可战胜。连接运动是否如此，我还难以确定。因为我内心没有把握肯定地说是否存在一种虚空，或聚集在一起，或散布在物体的孔隙之中。但有一件事，我倒是确信无疑，即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所倡导的虚空说的理由（即认为如果没有虚空，相同物体无法时而拥有和充斥于更大的空间，时而又拥有和充斥于更小的空间）是很虚妄的。因为物质显然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在空间中紧缩和舒展自己，而且无需另外插入一块虚空；空气中有虚空，金子中也有虚空，但前者的虚空并不是后者的虚空的2000倍；而按他们的假设，前者的虚空应该是后者的虚空的2000倍。关于这一点，我自己是充分信服的，其说服力来自于气体的品性（否则气体就会像微尘一样漂浮于虚空之中）和许多其他的证据。至于其他运动，是处于统治地位还是被统治地位，要视这些运动的力量、数量、速度、发射力以及所遇的助力和阻力的比例而定。

For instance, there are some armed magnets that hold and suspend iron of sixty times their own weight, so far does the motion of the lesser prevail over the motion of the greater congregation; but if the weight be increased, it is overcome. A lever of given strength will raise a given weight, so far does the motion of liberty prevail over that of the greater congregation; but if the weight be

increased, it is overcome. Leather stretches to a certain extent without breaking, so far does the motion of continuity prevail over the motion of tension; but if the tension be increased, the leather breaks and the motion of continuity is overcome. Water runs out at a crack of a certain size, so far does the motion of the greater congregation prevail over the motion of continuity; but if the crack be smaller, it gives way, and the motion of continuity prevails. If you charge a gun with ball and sulphur only, and apply the match, the ball is not discharged, the motion of the greater congregation overcoming in this case the motion of matter. But if you charge with gunpowder, the motion of matter in the sulphur prevails, being aided by the motions of matter and of flight in the niter. And so of other cases. Instances of strife, therefore, which point out the predominancies of virtues together with the manner and proportion in which they predominate or give place, should be sought and collected from all quarters with keen and careful diligence.

例如，有些精良的磁铁能够吸住和悬挂比自己重六十倍的铁，这就是小趋集运动胜过大趋集运动；但是如果再增加重量，小趋集运动就要受到克制。一个具有一定力度的杠杆可以支撑起一定的重量；这就是自由运动战胜大趋集运动；但是如果再增加重量，那么自由运动就必定受到克制。皮革伸展到一定程度而仍不破裂，这就是连续运动战胜张力运动；但是如果再增加张力，那么皮革必定破裂，连续运动必定受到克制。水从一定大小的裂口流出，这是大聚集运动战胜连续运动；但是如果裂缝小一些，那么前者就会让位，后者得胜。如果枪只装上子弹和硫磺，然后用火柴去燃放，子弹是发射不出去的；这种情况属于大聚集运动制胜物质运动。但如果装上的是火药，那么硫磺中的物质运动就获得了胜利，这是得益于物质中的各种运动和硝石中的逃逸运动。其他运动依此类推。由此看来，反例不仅指出了各种品性的优劣，而且也指出了这些品性或胜或败的方式和均衡关系，因此，应当用敏锐的眼光和精心的努力去寻求和收集各种斗争性事例反

例。

Nor should we examine less carefully the modes in which these motions give way. That is to say, whether they stop altogether or whether they continue to resist but are overpowered. For in bodies here with us there is no real rest, either in wholes or in parts, but only in appearance. And this apparent rest is caused either by equilibrium, or by absolute predominancy of motions: by equilibrium, as in scales, which stand still if the weights be equal; by predominancy, as in watering pots with holes in them, where the water rests and is kept from falling out by the predominancy of the motion of connection. But it should be observed, as I have said, how far these yielding motions carry their resistance. For if a man be pinned to the ground, tied hand and foot, or otherwise held fast, and yet struggle to rise with all his might, the resistance is not the less though it be unsuccessful. But the real state of the case (I mean whether by predominancy the yielding motion is, so to speak, annihilated, or rather whether a resistance is continued, though we cannot see it) will perhaps, though latent in the conflicts of motions, be apparent in their concurrence. For example, let trial be made in shooting. See how far a gun will carry a ball straight, or as they say point-blank, and then try whether, if it be fired upward, the stroke will be feebler than when it is fired downward, where the motion of gravity concurs with the blow.

同样，我们对这些运动退败的方式不能不加以考察，而且不能粗心大意。也就是说，我们要仔细考察这些运动是否完全停止了，或者要仔细考察这些运动是否是继续抵抗而遭到压制。因为在我们看来，物体中，无论其整体还是部分，并不存在真正的静止，而静止只是表面的静止。这种表面的静止要么是平衡所致，要么是某些运动的绝对

优势所致：就平衡而言，可用天秤为例，天秤两端如果重量相等则保持静止；就优势而言，可以用带有小孔的水罐为例，水保持静止而不外溢是因为连接运动占有优势。然而我已经说过，应该考察的是这些退让运动抵拒到何种程度。例如一个人如果被按倒在地，手脚捆绑，或以其他方法将其绑紧，都还要全力挣扎站起身来，那么抵拒就算不成功也不会减少。但此时的真实情况（我的意思说这种退让运动是否会因其优劣而可以说是遭到毁灭，还是在继续悄然抵抗）虽然潜藏在各种运动冲突中，但又可能在各种运动冲突中同时显现出来。例如，拿放炮来做个实验。观察一门炮的炮弹能射多远，或者说平射时射程有多远，然后测试一下仰射时的射击力是否弱于俯射时的射击力，因为在俯射时引力运动与射击力是会聚在一起的。

Lastly, such canons of predominance as we meet with should be collected; for instance, that the more common the good sought, the stronger the motion. Thus the motion of connection, which regards communion with the universe, is stronger than the motion of gravity, which regards only communion with dense bodies. Again, that appetites which aim at a private good seldom prevail against appetites which aim at a more public good, except in small quantities—rules which I wish held good in politics.

最后，我们应该将我们碰到的优胜法则积聚起来；例如，所追求的利益越是普遍，运动就越是强而有力。因此，连接运动就强于引力运动，前者涉及到与宇宙的交流，后者只涉及到与密实物体的交流。又如，有两类倾向：旨在获取私利的倾向和旨在获取公利的倾向，除了极少数情况下，前者很少能战胜后者——我希望这些规则能适用于政治。

XLIX

四十九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twenty-fifth place *intimating instances* , those, I mean, which intimate or point out what is useful to man. For mere power and mere knowledge exalt human nature, but do not bless it. We must therefore gather from the whole store of things such as make most for the uses of life. But a more proper place for speaking of these will be when I come to treat of applications to practice. Besides, in the work itself of interpretation in each particular subject, I always assign a place to the *human chart* , or *chart of things to be wished for* . For to form judicious wishes is as much a part of knowledge as to ask judicious questions.

（二十五）讨论优先权事例中的“暗示性事例”。我是指，这些事例暗示或指明什么是对人类有用的东西。仅有权力和知识固然能提高人性，但并不能赐福于人性。因此，我们必须从所有事物中收集那些对人类有用的东西。但是若要给所言及的事物更加恰当的定位，须要等到我讨论实践运用之时了。此外，在对每一特定对象做出解释的过程中，我总是会留出些余地来讨论“人生规划图”，或“人生所求事物愿望图”。要知道拥有明智的愿望与提出明智的问题，二者都是知识的一部分。

L

五十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twenty-sixth place *Polychrest Instances* , or *Instances of General Use* . They are those which relate to a variety of cases and occur frequently and therefore save no small amount of labor and fresh demonstration. Of the instruments and contrivances themselves the proper place for speaking will be when I come to speak of applications to practice and modes of experimenting. Moreover, those which have been already discovered and come into use will be described in the particular histories of the several arts. At present I will subjoin a few general remarks on them as examples merely of this general use.

（二十六）讨论优先权事例中的“多用途事例”，又称“通用事例”。这种事例涉及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而且经常出现，因而为人们不仅节省了不少劳动，而且省却了不少重复论证。至于工具和设计，若要在讨论中给予其更加恰当的定位，须要等到我讨论实际运用以及实验模式之时了。而且，那些已被发现而且已付诸应用的事例将会在各种技术特殊史中加以叙述。对此，我要补充几点，只当是通用事例罢了。

Besides the simple bringing together and putting asunder of them, man operates upon natural bodies chiefly in seven ways, viz., either by exclusion of whatever impedes and disturbs; or by compressions, extensions, agitations, and the like; or by heat and cold; or by continuance in a suitable place; or by the checking and regulation of motion; or by special sympathies; or by the seasonable and proper alternation, series, and succession of all these ways, or at any rate of some of them.

人们在对自然物体施加作用时，除了对其进行简单的拆分和组装之外，主要还有七种方式，具体如下：一是排除一切阻碍和干扰因素；二是对其采取施压、扩展、震动等诸如此类的动作；三是对其加热和冷却；四是保持其适当的位置；五是遏制和规定其运动；六是对其施加特殊的交感作用；七是适时适当地逐个、依次、不断使用以上方法，至少说，对其中某些方法应当如此。

With regard to the first, the common air, which is everywhere about us and pressing in, and the rays of the heavenly bodies, cause much disturbance. Whatever therefore serves to exclude them may justly be reckoned among things of general use. To this head belong the material and thickness of the vessels in which the bodies are placed on which we are going to operate; also the perfect stopping up of vessels by consolidation and *lutums sapientiæ* , as the chemists call it. Also the closing in of substances by liquids poured on the outside is a thing of very great use, as when they pour oil on wine or juices of herbs, which spreading over the surface like a lid preserves them excellently from the injury of the air. Nor are powders bad things; for though they contain air mixed up with them, they yet repel the force of the body of air round about, as we see in the preservation of grapes and other fruits in sand and flour. It is good too to spread bodies over with wax, honey, pitch, and like tenacious substances, for the more perfect enclosure of them and to keep off the air and heavenly bodies. I have sometimes tried the effect of laying up a vessel or some other body in quicksilver, which of all substances that can be poured round another is far the densest. Caverns, again, and subterraneous pits are of great use in keeping off the heat of the sun and that open air which preys upon bodies, and such are used in the north of Germany as granaries. The sinking of bodies in water has likewise the same effect, as I remember to have heard of bottles of wine being let down into a

deep well to cool, but through accident or neglect being left there for many years, and then taken out; and that the wine not only was free from sourness or flatness, but tasted much finer, owing, it would seem, to a more exquisite commixture of its parts. And if the case require that bodies be let down to the bottom of the water, as in a river or the sea, without either touching the water or being enclosed in stopped vessels, but surrounded by air alone, there is good use in the vessel which has been sometimes employed for working under water on sunk ships whereby divers are enabled to remain a long while below, and take breath from time to time. This machine was a hollow bell made of metal which, being let down parallel to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carried with it to the bottom all the air it contained. It stood on three feet (like a tripod) the height of which was somewhat less than that of a man, so that the diver, when his breath failed, could put his head into the hollow of the bell, take breath, and then go on with his work. I have heard also of a sort of machine or boat capable of carrying men under water for some distance. Be that as it may, under such a vessel as I have described bodies of any sort can easily be suspended, and it is on that account that I have mentioned this experiment.

先论第一种方法。我们周围存在的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空气，还有天体发出的光线，都会产生许多干扰的东西。因此，凡是有助于排除它们的事物理当纳入通用事物之列。当我们作用于物体时，用来盛物的器皿的材料和厚度也能归入此列；还有用来完全封堵器皿的方法，凝固法和化学家们所谓的“封泥”法同样也属于这个范畴。浇注液体于物质表面而使其得以掩藏也是一种用处极大的方法，比如把油倒在酒或植物汁液上，仿佛盖上了盖子一样，使其得到保护免遭空气的侵害。粉状物也不错，虽然掺杂有空气，但也能排斥四周气体的影响；举个例子，常见的葡萄或其他水果用沙粒或谷粉来贮存的方法就是这样。在物体上敷抹蜡烛、蜂蜜和松脂等类似黏性物质也是很好的

方法，这样就可以把物体保护得更加严实，以隔绝空气和天体。在过去的某个时间，我已经试了试这种方法的效果，即将一个器皿或其他某些物体置入水银中，水银在所有浸泡其他物体的物质中密度是最大的。此外，洞穴和地坑也具有很大的用途，既可以阻隔太阳的热力，也可以阻隔侵蚀物体的洞外空气。洞穴和地坑在德国北部当作谷仓来使用。把物体沉入水中也具有同样的效果；我记得我曾听说，有人把几瓶酒坠入深井冷却，但因一时疏忽而遗留井中多年，再取出时，酒不但没有变酸变淡，反而味道更佳更醇；这似乎要归功于酒分子混合得更加精致细腻。假如情况是这样的，即把物体沉入水底（如河底或海底），要求不接触水或密封在容器中，只须周围保持空气流通即可，那么这种水下容器非常有用，有时可以用于沉船作业，通过这种水下容器，潜水员可以在水下呆很长时间，而且可以不时地呼吸空气。这种机器是一种中空的钟形金属物体，放入水中后使其与水面平行，这样就把所含的空气带到水底。这个机器带有三只脚（形如三足鼎），高度不低于一个人的高度，这样，潜水员窒息时可以将头伸入空钟，呼吸一下，然后继续作业。我还听说，有一种机器或船，能把人带到水下一定深度。既然如此，在我描述的这种容器中，任何物体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浮起来，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才提及这种实验。

There is also another advantage in the careful and complete closing of bodies. For not only does it keep the outer air from getting in (of which I have already spoken), but also it keeps the spirit of the body, on which the operation is going on inside, from getting out. For it is necessary for one who operates on natural bodies to be certain of his total quantities, that is, that nothing evaporates or flows away. For then and then only are profound alterations made in bodies when, while nature prevents annihilation, art prevents also the loss or escape of any part. On this subject there has prevailed a false opinion which, if true, would make us well nigh despair of preserving the perfect quantity without diminution, namely, that the spirits of bodies, and air when

rarefied by a high degree of heat, cannot be contained in closed vessels but escape through their more delicate pores. To this opinion men have been led by common experiment of an inverted cup placed on water with a candle in it or a piece of paper lighted; the consequence of which is that the water is drawn up; and also by the similar experiment of cupping glasses which when heated over flame draw up the flesh. For in each of these experiments they imagine that the rarefied air escapes, and that its quantity being thereby diminished, the water or flesh comes up into its place by the motion of connection. But this is altogether a mistake. For the air is not diminished in quantity, but contracted in space; nor does the motion of the rising of the water commence till the flame is extinguished or the air cooled. And therefore physicians, to make their cupping glasses draw better, lay on them cold sponges dipped in water. And therefore there is no reason why men should be much afraid of the easy escape of air or spirits. For though it be true that the most solid bodies have pores, still air or spirit do not easily submit to such extremely fine comminution, just as water refuses to run out at very small chinks.

这种精心密封的物体还有一个优点。这种物体不仅可以阻隔外面空气的进入（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而且还可以在内部作业时防止物体的精气外泄。凡是要作用于自然物体的人，必须明确知晓自己所了解的总量，也就是说，必须做到没有任何东西蒸发掉或流失。大自然可以防止分子的毁灭，技术也可以防止分子的损失或消失，这样，也只有这样，物体才能彻底改变。关于这一点，盛行着一种荒谬的观点，即物体的精气以及经高热稀释化的气体都不能保存于密封的容器之中，而一定会从其中精微的细孔中逃逸出去；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那么要想完好无损地保存其数量，我们就不要对此抱任何希望了。致使人们形成这种观点的是两个普通实验：一个实验是，在一只杯中点燃一段蜡烛或一片纸，然后倒放在水上，结果就是水被吸起

来；另一个实验是，拔火罐在火焰上加热后，倒扣在肌肉上，肌肉即刻拱拔起来。在这两个实验中，人们都设想稀化的空气逃逸了，空气量也就随之减少；水或肌肉通过连接运动而鼓胀起来，接替了空气逃走留下的位置。但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因为空气的数量并未减少，而是在空间上受到压缩；同样，水的上升运动也并非是火焰熄灭或空气冷却之后才开始产生的。因此，为了使拔火罐效果更好，医生们会在罐子上蒙上浸过水的海绵。因此，人们竟然会担心空气或精气逃逸，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即使最坚固的物体也有孔隙这句话是真的，空气或精气也依然不会轻易委曲求全地从如此精微的孔隙中逃逸出去，正如水也拒绝从细小的裂缝流出一样。

With regard to the second of the seven modes of operating above mentioned, it is particularly to be observed that compression and such violent means have indeed, with respect to local motion and the like, a most powerful effect, as in machines and projectiles, an effect which even causes the destruction of organic bodies and of such virtues as consist altogether in motion. For all life, nay all flame and ignition, is destroyed by compression, just as every machine is spoiled or deranged by the same. It causes the destruction likewise of virtues which consist in the position and coarser dissimilarity of parts. This is the case with colors, for the whole flower has not the same color as when it is bruised, nor the whole piece of amber as the same piece pulverized. So also it is with tastes. For there is not the same taste in an unripe pear as there is in a squeezed and softened one, for it manifestly contracts sweetness by the process. But for the more remarkable transformations and alterations of bodies of uniform structure such violent means are of little avail, since bodies do not acquire thereby a new consistency that is constant and quiescent, but one that is transitory and ever striving to recover and liberate itself. It would not be amiss, however, to make some careful experiments for the

purpose of ascertaining whether the condensation or the rarefaction of a body of nearly uniform structure (as air, water, oil, and the like), being induced by violence, can be made to be constant and fixed, and to become a kind of nature. This should first be tried by simple continuance, and then by means of helps and consents. And the trial might easily have been made (if it had but occurred to me) when I was condensing water, as mentioned above, by hammer and press, till it burst forth from its enclosure. For I should have left the flattened sphere to itself for a few days, and after that drawn off the water, that so I might have seen whether it would immediately occupy the same dimensions which it had before condensation. If it had not done so, either immediately or at any rate soon after, we might have pronounced the condensation a constant one; if it had, it would have appeared that a restoration had taken place and that the compression was transitory. Something of a similar kind I might have tried also with the expansion of air in the glass eggs. For after powerful suction I might have stopped them suddenly and tightly; I might have left the eggs so stopped for some days and then tried whether on opening the hole the air would be drawn up with a hissing noise, or whether on plunging them into water, as much water would be drawn up as there would have been at first without the delay. For it is probable—at least it is worth trying—that this might have been, and may be, the case; since in bodies of structure not quite so uniform the lapse of time does produce such effects. For a stick bent for some time by compression does not recoil, and this must not be imputed to any loss of quantity in the wood through the lapse of time, since the same will be the case with a plate of steel if the time be increased, and steel does not evaporate. But if the experiment succeed not with mere continuance, the business must not be abandoned, but other aids must be employed. For it is no small gain if by the application of violence we can communicate to bodies fixed and permanent natures. For thus air

can be turned into water by condensation, and many other effects of the kind can be produced, man being more the master of violent motions than of the rest.

至于以上提及的七种方式中的第二种，尤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对于本位运动及类似运动而言——如机器运动和投射运动——压力和这种粗暴手段可以产生最强的效果，强至可以摧毁有机体及其完全寓存其中的品性。举个例子，一切生命，甚至连一切火焰和燃烧都会因为受到压力而熄灭，同样，任何一种机器都会因为受到压力而遭到破坏和扰乱。这种压力同样还可以导致品性的毁灭，即使这些品性都寓存其位并寓存于差异较大的分子之间。颜色就属于这种情况。一朵完整的花在捣碎之后，前后颜色就不相同了，又如一块完整的琥珀，粉碎之后，前后颜色也不相同。口感也是这个道理。未成熟的梨子和挤软的梨子，二者口感也不相同；因为被挤软的梨子显然集中了梨的甜味。但对结构一致的物体而言，要使其实现更加明显的改变和变化，粗暴手段用处不大，因为这类物体并不会因粗暴手段而重新获得一种恒定不变的凝固性，而所获得的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凝固性，这凝固性终会竭力恢复和实现自我解放。然而，不妨仔细做一些实验来验证这样一个问题，即结构几乎一致的物体（如空气、水和石油等）通过粗暴手段而实现的凝结或稀释，能否恒定不变而且最终变成一种性质。我们首先应该通过简单的时间延续来实验，然后通过助力和感应来实验。在上文中我曾提及过，当我用重锤和压缩机来压缩铁球，直到把水从铁球中挤压出来时，这种实验就轻而易举地做出来了（如果我当时意识到的话）。当时我本该把那个压扁的铁球任其自然搁置几天，然后把水倒出来，这样就可能看出水是否立刻就占据了其压缩前的空间。如果倒出来的水，无论是立刻还是稍后不久，都没有占据其压缩前的空间，我们就可以断言凝缩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如果占据了其压缩前的空间，那么显而易见水产生了恢复现象，而压缩则是暂时性的。我曾用玻璃蛋中的空气扩张也做过同类实验。当时我强力吸出蛋内空气之后，突然把蛋封紧；封紧几天之后，再试试看封口打开后是否有空气被嘶嘶吸入的声音，或把蛋投入水中，看其吸入的水量

是否与未经搁置的蛋吸入的水量相同。事情有可能是这样——至少是值得一试——因为在结构并不一致的物体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会产生这种结果。举个例子，木棍受压而弯曲一段时间之后就难以复原，这未必可以归咎于木头的量有所丧失，因为钢盘时间搁置久了也同样难以恢复，但钢盘并没有蒸发掉。但是这个实验仅仅凭时间的延续并不能成功，即使如此，也绝对不能放弃，但必须采用其他有益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凭借强力而将固定永久的性质传递给物体，这也将是个不小的收获。因为这样的话，空气经过凝结可以变成水，许多其他类似的效果也可以产生，因为比起其他运动，人类更精通强力运动。

The third of the seven modes above-mentioned relates to that which, whether in nature or in art, is the great instrument of operation, viz., heat and cold. And herein man's power is clearly lame on one side. For we have the heat of fire which is infinitely more potent and intense than the heat of the sun as it reaches us, or the warmth of animals. But we have no cold save such as is to be got in wintertime, or in caverns, or by application of snow and ice, which is about as much perhaps in comparison as the heat of the sun at noon in the torrid zone, increased by the reflections of mountains and walls. For such heat as well as such cold can be endured by animals for a short time. But they are nothing to be compared to the heat of a burning furnace, or with any cold corresponding to it in intensity. Thus all things with us tend to rarefaction, and desiccation, and consumption; nothing hardly to condensation and inteneration except by mixtures and methods that may be called spurious. Instances of cold therefore should be collected with all diligence. And such it seems may be found by exposing bodies on steeples in sharp frosts; by laying them in subterranean caverns; by surrounding them with snow and ice in deep pits dug for the purpose; by letting them down into wells; by burying them in quicksilver and metals; by plunging them into

waters which petrify wood; by burying them in the earth, as the Chinese are said to do in the making of porcelain, where masses made for the purpose are left, we are told, underground for forty or fifty years, and transmitted to heirs, as a kind of artificial minerals; and by similar processes. And so too all natural condensations caused by cold should be investigated, in order that, their causes being known, they may be imitated by art. Such we see in the sweating of marble and stones; in the dews condensed on the inside of windowpanes toward morning after a night's frost; in the formation and gathering of vapors into water under the earth, from which springs often bubble up. Everything of this kind should be collected.

第三种方式涉及到作用于物体的重要工具（无论是自然方面还是技术方面），即热和冷。据此看来，人类的力量显然有所欠缺。就热而言，火给我们的热比太阳传至我们的热或动物的热都要强烈而有力得多。但是除了在冬天、从洞穴或通过冰雪产生冷之外，我们得不到任何冷；这种冷与另一种热可以相提并论，这种热就是热带地区中午时分经过山陵或城墙反射而增强的太阳的热。因为这种热和这种冷才是动物短时间内可以禁受得住的热和冷。但是这种热无法与熊熊炉火发出的热相提并论，这种冷也无法和与火炉的热程度相当的冷相提并论。因此我们接触的一切东西都倾向于稀释、燥化和耗损；而很少有东西凝结和软化，除非借用混合物和一些虚假的方法。因此，我们应该努力收集有关冷却的事例。此类事例似乎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找到：在霜冻严寒的天气里把物体暴露于尖塔之上；把物体藏于地下洞穴之中；把物体放在为此专门挖掘的深窖之中并用冰雪围起来；把物体坠入井中；把物体浸入水银和金属之中；把物体投入可以使木头石化的水中；把物体埋入地下，就像传说中的中国人制作陶瓷那样，把土坯埋入地下四五十年之久，而作为人工矿物传承给子孙后代；类似过程还有许多。而且一切因冷而产生的自然凝结现象都应该予以调查；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其原因以便进行技术模仿。这种凝结现象，我们可

以在以下事例中见到：云母和各种石头渗出水气；经过一夜霜冻之后，清晨玻璃窗上的水汽会凝结；地下蒸气聚集而化成水，而且经常冒出气泡。凡此种种，皆应当搜集。

Besides things which are cold to the touch, there are found others having the power of cold, which also condense, but which seem to act on the bodies of animals only, and hardly on others. Of this sort we have many instances in medicines and plasters, some of which condense the flesh and tangible parts, as astringent and inspissatory medicaments; while others condense the spirits, as is most observable in soporifics. There are two ways in which spirits are condensed by medicaments soporific, or provocative of sleep: one by quieting their motion, the other by putting them to flight. Thus violets, dried rose leaves, lettuce, and like benedict or benignant medicaments, by their kindly and gently cooling fumes invite the spirits to unite and quiet their eager and restless motion. Rose water, too, applied to the nose in a fainting fit, causes the resolved and too relaxed spirits to recover themselves and, as it were, cherishes them. But opiates and kindred medicaments put the spirits utterly to flight by their malignant and hostile nature. And therefore if they be applied to an external part, the spirits immediately flee away from that part and do not readily flow into it again; if taken internally, their fumes, ascending to the head, disperse in all directions the spirits contained in the ventricles of the brain; and these spirits thus withdrawing themselves, and unable to escape into any other part, are by consequence brought together and condensed, and sometimes are utterly choked and extinguished; though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same opiates taken in moderation do by a secondary accident (namely, the condensation which succeeds the coming together) comfort the spirits and render them more robust, and check their useless and inflammatory

motions; whereby they contribute no little to the cure of diseases and prolongation of life.

除了触觉上感觉冷的东西外，还可以找到其他具有冷却作用的东西，他们同样具有凝结作用，但这类东西似乎只对动物有效，而对其他物体没有作用。我们在药物和膏药上可以找到许多类似事例，其中有些可以凝结肌肉和有形分子，如收敛剂和浓缩剂；另外有些可以凝结精气，其中催眠剂最为显著。催眠剂或促睡剂凝结精气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使其安静不动；一是迫使其飞奔。例如紫罗兰、干玫瑰叶、莴苣和诸如此类的温性药剂，借其温和柔性的清凉香气，可以促使精气凝结在一起，从而对急促不休的运动产生镇静作用。又如人昏厥时，用玫瑰水涂抹于鼻孔，可以使散乱且过于松弛的精气得以恢复，仿佛是在精心呵护其精气。但是鸦片及其类似药剂则凭借其危害性和敌对性，迫使精气急于奔命。因此，如果把这些毒药敷于外部，该处的精气就立刻逃之夭夭，而且一经离去难再复返；如果将鸦片吸入体内，其香气一经升至头部，促使脑室中的精气散至各方。这些精气既已消退，又不能逃入其他部位，结果就聚集在一起而凝固起来，有时会使人窒息过度而灭亡；另一方面，同样是鸦片，如果吸入量适中，反而可以安抚精气并使之强壮，而且可以避免精气产生无用的躁动上火运动；因此，这类东西在治病延寿上贡献也不小。

Nor should we omit the means of preparing bodies to receive cold. Among others I may mention that water slightly warm is more easily frozen than quite cold.

关于如何准备物体使其接受冷冻，我们也不应该略而不谈。尤其应该提出的一点是温水较之于冷水易冻。

Besides, since nature supplies cold as sparingly, we must do as the apothecaries do who, when they cannot get a simple, take its succedaneum or *quid pro quo* , as they call it—such as aloes for balsam, cassia for cinnamon. In like manner we should look round carefully to see if there be anything that will do instead of cold, that is to say, any means by which condensations can be effected in bodies otherwise than by cold, the proper office of which is to effect them. Such condensations, as far as yet appears, would seem to be limited to four. The first of these is caused by simple compression, which can do but little for permanent density, since bodies recoil, but which perhaps may be of use as an auxiliary. The second is caused by the contraction of the coarser parts in a body after the escape of the finer, such as takes place in indurations by fire, in the repeated quenchings of metals, and like processes. The third is caused by the coming together of those homogeneous parts in a body which are the most solid, and which previously had been dispersed and mixed with the less solid; as in the restoration of sublimated mercury, which occupies a far greater space in powder than as simple mercury, and similarly in all purging of metals from their dross. The fourth is brought about through sympathy, by applying substances which from some occult power condense. These sympathies or consents at present manifest themselves but rarely, which is no wonder, since before we succeed in discovering forms and configurations we cannot hope for much from an inquiry into sympathies. With regard to the bodies of animals, indee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re are many medicines, whether taken internally or externally, which condense as it were by consent, as I have stated a little above. But in the case of inanimate substances such operation is rare. There has indeed been spread abroad, as well in books as in common rumor, the story of a tree in one of the Tercera or Canary Isles (I do not well remember which) which is constantly dripping, so as to some extent to supply the inhabitants with water.

And Paracelsus says that the herb called *Ros Solis* is at noon and under a burning sun filled with dew, while all the other herbs round it are dry. But both of these stories I look upon as fabulous. If they were true, such instances would be of most signal use and most worthy of examination. Nor do I conceive that those honeydews, like manna, which are found on the leaves of the oak in the month of May, are formed and condensed by any peculiar property in the leaf of the oak, but while they fall equally on all leaves, they are retained on those of the oak as being well united and not spongy as most of the others are.

除此之外，既然自然提供的冷如此吝啬，我们就必须仿效药剂师所为，当找不到某一味药时就采用代用药，即他们所谓的“替代品”；比如用芦荟代替香脂，用普通（中国）肉桂代替锡兰肉桂。同样，我们应该仔细观察周围是否存在可以代替冷的东西；也就是说，看看是否存在不用冷而仍然可以起到使物体凝结的方法，即具有冷可以凝结物体的功能。就目前所见到的情形而言，此类凝结似乎仅限于以下四种。第一种方法是通过简单压缩形成凝结；这种方法无法保持永久的凝结度，因为物体会反弹，但是要使其作为辅助方法兴许还是很有用的。第二种方法是在物体中较细小的分子出逃之后，通过压缩其较大的分子而形成凝结，例如，物体在受火变硬的过程，金属反复骤冷的过程，但凡此类过程都会出现此类现象。第三种方法是将物体中那些原本分散的、最坚实的同质分子与那些非坚实的同质分子混杂在一起；这些分子聚集在一起便会形成凝结。例如升华在粉状物中的水银所占空间比单纯的水银所占空间大得多，一经恢复为单纯的水银，所占空间就变小，同样，一切金属的提纯过程也都如此。第四种方法是通过交感作用，借助于物质的某种隐秘力量而形成凝结。这种交感或感应作用目前甚为罕见；这一点不足为怪，因为我们在成功发现形式和结构之前，并不能指望从对交感作用的调查中得到多少收获。的确，就动物身体而言，无疑存在许多药物，无论是内服还外用，仿佛凝结都是通过感应而产生的；这一点，我在上文中有所提及。但是在

那些无生命的物质中，此类作用极为罕见。的确，有一个广为传播的故事——既有书本记载，又有民间口传——记录的是特塞拉岛或加那利群岛（具体哪一个岛，我记得不太清楚）上有一棵树在不停地滴水，滴水量足以供给岛民用水之需。帕拉切尔苏斯说，有一种名为“日露”的草，在中午酷日之下会充满露水，而周围其他所有的草都呈现干枯之状。不过，这两个故事，在我看来，纯属无稽之谈。倘若真有其事，此类事例当极为有用，亦最值得细究核实。五月的橡树叶上见到的甘露，宛若天赐，如果说这是橡树叶子中有某种特殊本性而形成的凝结，我倒不这样认为，其实这不过是露水均匀地撒落在所有树叶上而已，同时露水所停留的橡树叶具有组织完密的特点，不像其他树叶那样绵软多孔。

As regards heat, man indeed has abundant store and command thereof, but obser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are wanting in some particulars, and those the most necessary, let the alchemists say what they will. For the effects of intense heat are sought for and brought into view, but those of a gentler heat, which fall in most with the ways of nature, are not explored and therefore are unknown. And therefore we see that by the heats generally used the spirits of bodies are greatly exalted, as in strong waters and other chemical oils; that the tangible parts are hardened and, the volatile being discharged, sometimes fixed; that the homogeneous parts are separated, while the heterogeneous are in a coarse way incorporated and mixed up together; above all, that the junctures of composite bodies and their more subtle configurations are broken up and confounded. Whereas the operations of a gentler heat ought to have been tried and explored, whereby more subtle mixtures and regular configurations might be generated and educed, after the model of nature and in imitation of the works of the sun—as I have shadowed forth in the Aphorism on Instances of Alliance. For the operations of nature are performed by far smaller portions at a

time, and by arrangements far more exquisite and varied than the operations of fire, as we use it now. And it is then that we shall see a real increase in the power of man when by artificial heats and other agencies the works of nature can be represented in form, perfected in virtue, varied in quantity, and, I may add, accelerated in time. For the rust of iron is slow in forming, but the turning into *Crocus Martis* is immediate; and it is the same with verdigris and ceruse; crystal is produced by a long process, while glass is blown at once; stones take a long time to grow, while bricks are quickly baked. Meanwhile (to come to our present business), heats of every kind, with their effects, should be diligently collected from all quarters and investigated—the heat of heavenly bodies by their rays direct, reflected, refracted, and united in burning glasses and mirrors; the heat of lightning, of flame, of coal fire; of fire from different materials; of fire close and open, straitened and in full flow, modified in fine by the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furnaces; of fire excited by blowing; of fire quiescent and not excited; of fire removed to a greater or less distance; of fire passing through various media; moist heats, as of a vessel floating in hot water, of dung,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animal warmth, of confined hay; dry heats, as of ashes, lime, warm sand; in short, heats of all kinds with their degrees.

若就热而言，人类诚然拥有丰足的储量可供支配，但是若就某些详情以及最为必需的细节而言，则观察不够，调查亦不足；至于那些化学家们，随他们怎么说吧。酷暑效应，人们既找到了也见识过了，但是温热效应——与自然最吻合的方式——则还未曾予以探究，故不为人知。正因如此，我们才看到一般在使用热时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热可以大幅提升物体的精气，如在使用强水和其他化学油时就是如此；热可以使有形分子硬化，有时会使易挥发、不稳定分子变得稳固牢靠；热既可以使同质分子分离，也可以使异质分子以粗糙的方式

杂糅在一起；最重要的是，热可以使合成物体的一些接合及其更加精微的结构遭到破坏，从而变得混乱不堪。然而温热作用本应早做实验和探究，这样就可以按照自然的模式，通过模仿太阳的运行来生成推导出更加精微的混合物和更加规则的结构——正如我在联盟事例那则语录中所暗示的那样。自然运作，在步骤和安排上，比我们目前所用的火的运作，要细密和精致繁复得多。要想看到人类的真正提升，只有等到那个时候——等到自然成就在人工热力和其他力量的帮助下，在形式上得以复制，在品性上得以完善，在分量上得以改变的时候；并且我再补充一点，这一进程只有在时间得以加快的时候，才能看到提升。例如铁锈是渐进而成，但铁酸化为“紫色磨粉”则是瞬间的事情；铜绿与铅粉的生成，亦同此理；再如水晶须经漫长过程方能形成，而玻璃则瞬即吹制而成；岩石需长时间方能形成，而砖头很快即可烧制而成。与此同时（回到目前的话题），我们应该不辞辛苦地从各个方面对每一种热及其效果加以收集和研究。这些热包括一切天体通过直射、反射、折射以及聚集在取火镜和普通镜子的光线所发之热，闪电之热、火焰之热、炭火之热，还包括各种不同燃料之火热；火热根据火炉的不同结构而有所改变，既有封闭与敞开之别，又有小火与旺火之别；火热根据吹气燃火的方式，既有动火与静火之别，又有远火与近火之别；火热还有因中间媒介各异而有所不同；热还包括各种湿热，如热水中的器皿发热、粪便之热、动物体外体内之热、干草受闷所发之热；热还包括各种燥热，如灰烬之热、石灰之热、热沙之热；可见，凡此种种之热皆有程度之别。

But above all we must try to investigate and discover the effects and operations of heat when applied and withdrawn gradually, orderly, and periodically, at due distances and for due times. For such orderly inequality is in truth the daughter of the heavens and mother of generation; nor is anything great to be expected from a heat either vehement or precipitate or that comes by fits and starts. In vegetables this is most manifest; and also in the wombs of animals there is a great inequality of heat, from the

motion, sleep, food, and passions of the female in gestation. Lastly, in the wombs of the earth itself, those I mean in which metals and fossils are formed, the same inequality has place and force. Which makes the unskillfulness of some alchemists of the reformed school all the more remarkable—who have conceived that by the equable warmth of lamps and the like, burning uniformly, they can attain their end. And so much for the operations and effects of heat. To examine them thoroughly would be premature, till the forms of things and the configurations of bodies have been further investigated and brought to light. For it will then be time to seek, apply, and adapt our instruments when we are clear as to the pattern.

但是尤为重要的是，无论使用或去除热的过程是渐进有序的，还是固定周期性的，无论距离远或近，时间长或短，我们必须尽力调查和发现在使用热或去除热时热所产生的效应和作用。这种秩序上的不平衡实际上正是天体之女，繁衍之母；无论是猛烈之热、还是突然之热，亦或是持续之热，要想从中获取重大结果，概不可能。这一点在植物之中最为明显，在动物的子宫之内，妊娠母体随着运动、睡眠、饮食和喜怒的不同，其热也极不均匀。最后，在大地子宫里，我是说金属和化石的形成之地，这种不均匀状态也有其地位和力量。这就让某些改良派炼金术士的拙技更加暴露无遗了，这些炼金术士曾设想只要保持灯火等的热度平衡，燃烧均匀，就能到达自己的目的。我们关于热的作用和效应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在事物的形式得到揭示和物体的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查之前，要想彻底查清热的作用和效应还为时过早。只有在弄清其中格局之后，我们才能寻求、运用和调整我们的工具。

The fourth mode of operating is by continuance, which is as it were the steward and almoner of nature. Continuance I call it when

a body is left to itself for a considerable time, being meanwhile defended from all external force. For then only do the internal motions exhibit and perfect themselves when the extraneous and adventitious are stopped. Now the works of time are far subtler than those of fire. For wine cannot be so clarified by fire as it is by time; nor are the ashes produced by fire so fine as the dust into which substances are resolved and wasted by ages. So too the sudden incorporations and mixtures precipitated by fire are far inferior to those which are brought about by time. And the dissimilar and varied configurations which bodies by continuance put on, such as putrefactions, are destroyed by fire or any violent heat. Meanwhile it would not be out of place to observe that the motions of bodies when quite shut up have in them something of violence. For such imprisonment impedes the spontaneous motions of the body. And therefore continuance in an open vessel is best for separations; in a vessel quite closed for commixtures; in a vessel partly closed, but with the air entering, for putrefactions. But, indeed, instances showing the effects and operations of continuance should be carefully collected from all quarters.

第四种作用方法是持续，持续宛如自然的管家和施赈人员。我所谓的持续，是说让某一物体任其自然地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同时保护其免遭一切外来力量的影响。因为只有偶发的外部运动停止之后，内部运动才会展露和完善起来。现在看来，时间的作用远比火的作用要微妙得多。例如，若论酒的醇化，火不如时间有效；同样，若论灰烬，通过火产生的灰烬就不如物质经过岁月的消解而成的尘埃那么精细。凡是因火而骤然形成的混合物和混杂物，远比不上由时间形成的混合物和混杂物。而且，物体的结构既然可以因时间的流逝而产生变异变形，也同样可以用焚烧或暴热而付之一炬。与此同时，如果说在物体运动受到禁锢之时，其中必有些许暴力的东西。因为此种禁闭会阻碍物体的自发运动。正因如此，物体若持续出现在敞开的器皿之

中，则最宜于分解；若出现在部分封闭而仍有空气进入的器皿之中，则最宜于腐坏。不过，岂止如此，但凡显示出持续效果和作用的事例，我们都应仔细从各个方面加以搜集。

The regulation of motion (which is the fifth mode of operating) is of no little service. I call it regulation of motion when one body meeting another impedes, repels, admits or directs its spontaneous motion. It consists for the most part in the shape and position of vessels. Thus the upright cone in alembics helps the condensation of vapors; the inverted cone in receivers helps the draining off of the dregs of sugar. Sometimes a winding form is required, and one that narrows and widens in turn, and the like. For all percolation depends on this, that the meeting body opens the way to one portion of the body met and shuts it to another. Nor is the business of percolation or other regulation of motion always performed from without. It may also be done by a body within a body, as when stones are dropped into water to collect the earthy parts; or when syrups are clarified with the whites of eggs that the coarser parts may adhere thereto, after which they may be removed. It is also to this regulation of motion that Telesius has rashly and ignorantly enough attributed the shapes of animals, which he says are owing to the channels and folds in the womb. But he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show the like formation in the shells of eggs, in which there are no wrinkles or inequalities. It is true, however, that the regulation of motion gives the shapes in molding and casting.

运动规限（也即第五种方法），用处一点也不小。所谓运动规限，我是指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相遇时就会阻碍、排拒、容许或诱发该物体的自发运动。这种运动绝大多数取决于容器的形状和位置。蒸馏器中的正置圆锥体有助于蒸气的凝结；而容纳器中的倒置圆锥体

有助于排出糖质中的糟粕。有时需要一种螺旋形器具，有时需要一种宽窄相间的器具，有时又需要其他形状的东西。一切过滤都取决于这一点，即接触物体在容纳部分被接触物体的同时，又向其封闭了另一部分。过滤行为或其他规限运动并非总是体现在物体外部，也可发自物体内部；例如把石头投入水中收集尘浊分子，或用蛋白澄清糖浆，其中较粗分子可以粘住，随之而被分离开来。泰莱西奥把动物形状归因于这种运动规限，认为动物的形状是因为子宫通道的皱褶所致，这种观点轻率且无知。但是他应该注意到了鸡蛋内部具有相同的构造，不过，蛋中并没有褶皱或凹凸不平之处。然而，如果说规限运动在铸造过程中就赋予了物体形状，此言不假。

Operations by consents or aversions (which is the sixth mode) often lie deeply hid. For what are called occult and specific properties, or sympathies and antipathies, are in great part corruptions of philosophy. Nor can we have much hope of discovering the consents of things before the discovery of forms and simple configurations. For consent is nothing else than the adaptation of forms and configurations to each other.

由感应性或悖逆性而产生的作用（即第六种方式），经常深藏不显。因为所谓隐秘的和特有的性质，交感与反感，大多属于哲学腐朽。要想在发现形式和简单结构之前发现事物的感应性，对此，我们不能寄予厚望。因为感应只不过是形式与结构之间相互调适。

The broader and more general consents of things are not, however, quite so obscure. I will therefore begin with them. Their first and chief diversity is this, that some bodies differ widely as to density and rarity but agree in configurations, while others agree as to density and rarity but differ in configurations. For it has not been

ill observed by the chemists in their triad of first principles that sulphur and mercury run through the whole universe. (For what they add about salt is absurd, and introduced merely to take in bodies earthy, dry, and fixed.) But certainly in these two one of the most general consents in nature does seem to be observable. For there is consent between sulphur, oil, and greasy exhalation, flame, and perhaps the body of a star. So is there between mercury, water and watery vapors, air, and perhaps the pure and intersidereal ether. Yet these two quaternions or great tribes of things (each within its own limits) differ immensely in quantity of matter and density, but agree very well in configuration; as appears in numerous cases. On the other hand metals agree well together in quantity and density, especially as compared with vegetables, etc., but differ very widely in configuration; while in like manner vegetables and animals vary almost infinitely in their configurations, but in quantity of matter or density their variation is confined to narrow limits.

然而事物之间更加广泛、更加普遍的感应性并非那么隐晦难知。因此，我就此予以论述。主要分歧之处在于，有些物体在疏密度上存在很大差别，但在结构上具有一致性；而有些物体在疏密度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性。在第一性原理上，化学家们在其所谓的三元法中指出，硫磺和水银遍布整个宇宙，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他们在这些成分中增加了盐却很荒谬，同时他们概括进去的只不过是土性的、干燥的和固定物体罢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二者之中似乎可以观察到最普遍的感应性。硫磺、油液、甚至油气、火焰或者星体，这四者之间都存在感应性。同样，水银、水及其水汽、空气和兴许存于星际中的纯洁以太之间也存在感应性。然而这两个“四元法”或两大家族的事物（分属各界）在物质数量上和密度上差异巨大，但是在结构上却非常具有一致性；这在无数的事例上都可以看出。另一方面，金属在数量和密度上完全一致（尤其是与植物相

比），但在结构上却差异极大；同样，植物和动物，二者在结构上几乎完全不同，但在物质数量和密度上差异较小。

The next most general consent is that between primary bodies and their supports, that is, their menstrua and foods. We must therefore inquire, under what climates, in what earth, and at what depth, the several metals are generated; and so of gems, whether produced on rocks or in mines; also in what soil the several trees and shrubs and herbs thrive best and take, so to speak, most delight; moreover what manurings, whether by dung of any sort, or by chalk, sea sand, ashes, etc., do the most good; and which of them are most suitable and effective according to the varieties of soil. Again, the grafting and inoculating of trees and plants, and the principle of it, that is to say, what plants prosper best on what stocks, depends much on sympathy. Under this head it would be an agreeable experiment, which I have heard has been lately tried, of engrafting forest trees (a practice hitherto confined to fruit trees), whereby the leaves and fruit are greatly enlarged and the trees made more shady. In like manner the different foods of animals should be noted under general heads, and with their negatives. For carnivorous animals cannot live on herbs, whence the order of Feuillans (though the will in man has more power over the body than in other animals) has after trial (they say) well nigh disappeared, the thing not being endurable by human nature. Also the different materials of putrefaction, whence animalculae are generated, should be observed.

其次，最普遍的感应要数原生物体与其给养物之间的感应，即元质与其质料之间的感应。因此，我们必须探究各种金属产生于何种气候、土壤和深度；同样，我们必须探究宝石是产生于岩石之上，还是

产生于矿穴之中；我们还必须探究不同树木、灌木和杂草在何种土壤之中繁殖得最好，也可以说，繁殖得最为愉悦；此外，我们还要探究何种肥料（如粪便、白垩、海沙和灰烬）最有用，以及何种肥料最适宜，最有效力。还有，树木和植物的嫁接，也就是说，何种植物移植于何种根茎上长势最好，也大都取决于交感作用。就这一项而言，我曾听说，最近有人对此做过实验，即对林木进行移接（这种实践迄今仅限于果木），实验结果是果树叶大和果肥，树荫更加茂密；这是一个可喜的实验。同样，动物的不同食物，应该分为几类加以考察，并且应该结合其反面进行考察。例如肉食性动物就不能以草为生，因此素食派戒律（虽然人类控制肉体的意志力强于动物）在经过尝试之后（他们说），便因人性难以忍受而最终几乎消失了。同时，滋生各种微生物的腐化物质，人们也应予以观察。

The consents of primary bodies with their subordinates (for such those may be considered which I have noted) are sufficiently obvious. To these may be added the consents of the senses with their objects. For these consents, since they are most manifest and have been well observed and keenly sifted, may possibly shed great light on other consents also which are latent.

原生物体与次生物体（我在前文所说的那些事物都可归为此类），二者之间的感应是相当明显的了。除此之外，还可增加一种，即感官对其对象所产生的感应。这种感应，由于最明显，且既受到了充分关注，也经过了精心筛选，因此，有可能给其他潜在的感应带来巨大启示。

But the inner consents and aversions, or friendships and enmities, of bodies (for I am almost weary of the words sympathy and antipathy on account of the superstitions and van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m) are either falsely ascribed, or mixed with fables, or from want of observation very rarely met with. For if it be said that there is enmity between the vine and colewort, because when planted near each other they do not thrive, the reason is obvious—that both of these plants are succulent and exhaust the ground, and thus one robs the other. If it be said that there is consent and friendship between corn and the corn cockle or the wild poppy, because these herbs hardly come up except in ploughed fields, it should rather be said that there is enmity between them, because the poppy and corn cockle are emitted and generated from a juice of the earth which the corn has left and rejected; so that sowing the ground with corn prepares it for their growth. And of such false ascriptions there is a great number. As for fables, they should be utterly exterminated. There remains indeed a scanty store of consents which have been approved by sure experiment, such as those of the magnet and iron, of gold and quicksilver, and the like. And in chemical experiments on metals there are found also some others worthy of observation. But they are found in greatest abundance (if one may speak of abundance in such a scarcity) in certain medicines which by their occult (as they are called) and specific properties have relation either to limbs, or humors, or diseases, or sometimes to individual natures. Nor should we omit the consents between the motions and changes of the moon and the affections of bodies below, such as may be gathered and admitted, after strict and honest scrutiny, from experiments in agriculture, navigation, medicine, and other sciences. But the rarer all the instances of more secret consents are, the greater the diligence with which they should be sought after, by means of faithful and honest traditions and narrations; provided this be done without any levity or credulity, but with an anxious and (so to speak) a doubting faith. There remains a consent of bodies, inartificial perhaps in mode of operation, but in use a polychrest, which should in no wise be

omitted, but examined into with careful attention. I mean the proneness or reluctance of bodies to draw together or unite by composition or simple apposition. For some bodies are mixed together and incorporated easily, but others with difficulty and reluctance. Thus powders mix best with water, ashes and lime with oils, and so on. Nor should we merely collect instances of the propensity or aversion of bodies for mixture, but also of the collocation of their parts, of their distribution and digestion when they are mixed, and finally of their predominancy after the mixture is completed.

但是物体的内在感应性和悖逆性，或者说友谊和敌意（我几乎厌烦了交感和反感这两个字眼，因为这两个字带有迷信和虚妄的色彩），要么解释错误，要么与各种无稽之谈相互掺杂混杂，要么因缺乏观察而彼此难以契合。例如人们因见葡萄与甘蓝种植得太近而难以繁茂，于是说二者之间存在敌意，理由很明显，即这两种植物都属于多汁性植物，极耗地力，于是彼此相克。又如人们因见玉蜀黍、麦仙翁和野罂粟生长于耕犁之地，于是认为二者之间存有感应和友谊，但与其如此认为，倒不如说它们之间存有敌意，因为麦仙翁和野罂粟是凭借玉蜀黍所排遗在地的汁液才得以繁生起来；所以在土地上播种玉蜀黍便为麦仙翁和野罂粟的生长准备了条件。诸如此类之错误解释还有很多。至于无稽之谈，理应彻底铲除。现在的确只有少数感应经过了确切实验的证实，如磁石与铁，金子与水银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对金属的化学实验中也发现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感应性观察。但最大量的感应性（如果人们可以把这种罕见现象称为大量的话）还是发现于某些药物之中，这些药物凭借其隐秘（人们都这样说）和特有的性质，要么对四肢、体液，要么对疾病产生影响，有时也对个别性质产生影响。我们也不应略而不论这些感应现象——月亮的运行变化与月下物体的感受之间的感应现象——他们常见于诸如从农业、航海、医药以及其他科学实验中经过严格认真调查而搜索认定的事例。但是一切感应事例愈秘密愈稀罕，就应当愈加努力地搜集这些事例；这必须

借助于忠实和诚信的传说与叙述；如果在搜集这些传说和叙述时能够不掉以轻心或盲目轻信，而是既有急切之心，又有质疑之意的话（姑且这么说）。物体之间还有一种感应；这种感应也许不是人工运作方式，但却具有多种用途；因此，这种感应亦不可略而不顾，而应当审慎查究。我是指物体之间，要么倾向于通过拼合或简单骈置而联聚在一起，要么不情愿通过拼合或简单骈置来联聚在一起。有些物体容易混合和结合在一起，但有些物体很难混合和结合在一起。例如粉状物最易与水混合，灰烬和石灰最易与油混合，依此类推。我们也不应仅仅搜集物体间对混合或向或背的事例，也应搜集那些物体分子配置的事例，同时应搜集物体混合时分子分布和分列的事例，最后还应搜集混合之后物体占有优势的事例。

There remains the seventh and last of the seven modes of operation, namely, the means of operating by the alternation of the former six. But it would not be seasonable to bring forward examples of this till our search has been carried somewhat more deeply into the others singly. Now a series or chain of such alternations, adapted to particular effects, is a thing at once most difficult to discover and most effective to work with. But men are utterly impatient both of the inquiry and the practice, though it is the very thread of the labyrinth as regards works of any magnitude. Let this suffice to exemplify the polychrest instances.

要谈的第七种也是最后一种作用方式，也就是交替使用前面六种作用方式。但是举出第七种方式的事例不太合适，因为我们分别针对其他六种方式中的事例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到一定程度。现在，找到一系列或一连串轮替方式来达到特定效果，是一件最难办到的事情，同时也是运用起来最有效的事情。但是人们无论是研究上还是实践上完全没有耐心，而若论主要结果，耐心正是走出迷宫的线索。以上对多用途事例的事例，到此为止足矣。

LI

五十一

Among Prerogative Instances I will put in the twenty-seventh and last place *Instances of Magic* , by which I mean those wherein the material or efficient cause is scanty or small as compared with the work and effect produced. So that even where they are common they seem like miracles; some at first sight, others even after attentive consideration. These, indeed, nature of herself supplies sparingly, but what she may do when her folds have been shaken out, and after the discovery of forms and processes and configurations, time will show. But these magical effects (according to my present conjecture) are brought about in three ways: either by self-multiplication, as in fire, and in poisons called specific, and also in motions which are increased in power by passing from wheel to wheel; or by excitation or invitation in another body, as in the magnet, which excites numberless needles without losing any of its virtue, or in yeast and the like; or by anticipation of motion, as in the case already mentioned of gunpowder and cannons and mines. Of which ways the two former require a knowledge of consents, the third a knowledge of the measurement of motions. Whether there be any mode of changing bodies *per minima* (as they call it) and of transposing the subtler configurations of matter (a thing required in every sort of transformation of bodies) so that art may be enabled to do in a short time that which nature accomplishes by many windings, is a point on which I have at present no sure indications. And as in matters solid and true I aspire to the ultimate and supreme, so do I forever hate all things vain and

tumid, and do my best to discard them.

（二十七）讨论优先权事例中的“幻术性事例”。所谓幻术性事例，我是指以少而小的质料或动因而产生多而大的结果和效果的事例。因而这些事例虽然平常，但看起来也很神奇；有些事例乍一看如此，有些事例即便在受到专注和考量之后还是如此。的确，自然本身在提供这种事例时就表现得很吝啬，自然究竟会发生什么，在抖落其卷褶之后，在发现其形式、过程及结构之后，时间将会表明一切。但是这些幻术效果（据我现在揣测）的产生有三种方式：一是自我繁殖，如火、所谓的特效药，还有导致力量增加的多轮递转运动；二是激发或诱发另一物体，如磁石激发无数磁针而丝毫不损自身的品性，又如酵母等类似物；三是预知运动，例如前文提及的火药、火炮和地雷。在以上三种方式中，前两种需要感应的相关知识，第三种需要运动计量知识。至于是否存在某种方式可以从“最细微处”（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来改变物体，来转换物质的更精细结构（这是物体的每一种转换中所必需的），从而使技术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到自然需要费尽周折才能完成的事情，这一点，目前我尚无确证足以说明。因为在那些坚实而真正的事情上，我总是渴求其极致，所以一切虚妄和浮夸的东西，我都深恶痛绝，而且会尽全力排除掉。

LII

五十二

So much then for the dignities or prerogatives of instances. It must be remembered, however, that in this Organon of mine I am handling logic, not philosophy. But since my logic aims to teach and instruct the understanding, not that it may with the slender

tendrils of the mind snatch at and lay hold of abstract notions (as the common logic does), but that it may in very truth dissect nature, and discover the virtues and actions of bodies, with their laws as determined in matter; so that this science flows not merely from the nature of the mind, but also from the nature of things—no wonder that it is everywhere sprinkled and illustrated with speculations and experiments in nature, as examples of the art I teach. It appears then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that there are twenty-seven prerogative instances, namely, solitary instances; migratory instances; striking instances; clandestine instances; constitutive instances; conformable instances; singular instances; deviating instances; bordering instances; instances of power; instances of companionship and of enmity; subjunctive instances; instances of alliance; instances of the fingerpost; instances of divorce; instances of the door; summoning instances; instances of the road; instances supplementary; dissecting instances; instances of the rod; instances of the course; doses of nature; instances of strife; intimating instances; polychrest instances; magical instances. Now the use of these instances, wherein they excel common instances, is found either in the informative part or in the operative, or in both. As regards the informative, they assist either the senses or the understanding: the senses, as the five instances of the lamp; the understanding, either by hastening the exclusion of the form, as solitary instances; or by narrowing and indicating more nearly the affirmative of the form, as instances migratory, striking, of companionship, and subjunctive; or by exalt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leading it to genera and common natures, either immediately, as instances clandestine, singular, and of alliance, or in the next degree, as constitutive, or in the lowest, as conformable; or by setting the understanding right when led astray by habit, as deviating instances; or by leading it to the great form or fabric of the universe, as bordering instances; or by guarding it against false

forms and causes, as instances of the fingerpost and of divorce. In the operative part they either point out, or measure, or facilitate practice. They point it out by showing with what we should begin, that we may not go again over old ground, as instances of power; or to what we should aspire if means be given, as intimating instances. The four mathematical instances measure practice: polychrest and magical instances facilitate it.

关于显贵性事例或优先权事例的论述就到此为止。但须当谨记，我这本工具论讨论的是逻辑而非哲学。但是我的逻辑旨在教导人们的理解力，不是用心灵那纤弱的卷须去攫取抽象的概念（同普通逻辑所做的那样），而是要去真正地剖解自然、发现物体的品性和活动，发现其在物质中确定的法则；既然如此，那么这门科学的源头不仅是发自心灵的性质，也是发自事物的性质；既然如此，为了倡导这门技艺，有关自然的揣想和实验散布本书各处以作例证，也就不足为怪了。综上所述，以上所见的优先权事例共有二十七种，即（1）独特性事例；（2）转换性事例；（3）醒目性事例；（4）隐晦性事例；（5）构成性事例；（6）契合性事例；（7）特殊性事例；（8）偏差性事例；（9）跨界性事例；（10）权力性事例；（11）敌友性事例；（12）虚拟性事例；（13）同盟性事例；（14）路标性事例；（15）离异性事例；（16）门户性事例；（17）传票性事例；（18）路程性事例；（19）补救性事例；（20）剖析性事例；（21）标杆性事例；（22）进程性事例；（23）数量性事例；（24）竞争性事例；（25）暗示性事例；（26）多用途事例；（27）幻术性事例。以上事例优于普通事例，若论其用途，或体现于知识部分，或体现于操作部分，或体现于二者之中。若论知识部分，这些事例，或有助于感官，或有助于理解力：若论有助于感官，正如那五种明灯性事例；若论有助于理解力，以途径来分有许多事例——有些事例旨在促进形式排除，如独特性事例；有些事例旨在缩小并指明形式之肯定面，如转换性事例、触目性事例、友伴性事例和极限性事例；有些事例旨在提升理解力，使其指向类别和共同性质，而其中

又有直接性事例，如隐微性事例、特殊性事例、和联盟性事例，也有程度渐次的事例，如构成性事例，还有最低级别的事例，如契合性事例；有些事例旨在纠正因习惯而误入歧途的理解力，如偏差性事例；有些事例旨在把理解力引向伟大的宇宙形式或宇宙结构，如跨界性事例；有些事例旨在防护理解力抵御错误形式和错误原因，如路标性事例和离异性事例。若论操作部分，这些事例要么对实践具有指示作用，要么具有测量作用，要么具有促进作用。这些事例还具有指导性，即告诉我们应当从何处开始，这样就不致于走回头路，如权力性事例；或者就是告诉我们若有法则应有所期求，如暗示性事例。测量实践有四种数学事例：而促进实践有万用性事例和幻术性事例。

Again, out of these twenty-seven instances there are some of which we must make a collection at once, as I said above, without waiting for the particular investigation of natures. Of this sort are instances conformable, singular, deviating, bordering, of power, of the dose, intimating, polychrest, and magical. For these either help and set right the understanding and senses, or furnish practice with her tools in a general way. The rest need not be inquired into till we come to make Tables of Presentation for the work of the interpreter concerning some particular nature. For the instances marked and endowed with these prerogatives are as a soul amid the common instances of presentation and, as I said at first, a few of them do instead of many; and therefor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Tables they must be investigated with all zeal and set down therein. It was necessary to handle them beforehand because I shall have to speak of them in what follows. But now I must proceed to the supports and rectifications of induction, and then to concretes, and Latent Processes, and Latent Configurations, and the rest, as set forth in order in the twenty-first Aphorism; that at length (like an honest and faithful guardian) I may hand over to men their fortunes, now their understanding is emancipated and come as it were of age;

whence there cannot but follow an improvement in man's estate and an enlargement of his power over nature. For man by the fall fell at the same time from his state of innocency and from his dominion over creation. Both of these losses however can even in this life be in some part repaired; the former by religion and faith, the latter by arts and sciences. For creation was not by the curse made altogether and forever a rebel, but in virtue of that charter “In the sweat of thy face shall thou eat bread,” it is now by various labors (not certainly by disputations or idle magical ceremonies, but by various labors) at length and in some measure subdued to the supplying of man with bread, that is, to the uses of human life.

而且，在这二十七种事例中，有些事例，我们必须立刻按照我上文所说的那样去收集，而不必等到要对自然加以特别调查之后才去收集。属于此类事例的有契合性事例、独特性事例、偏差性是事例、跨界性事例、权力性事例、剂量性事例、暗示性事例、万能性事例和幻术性事例。因为这些事例，或帮助和矫正理解力及感官，或者能够按普通方式为实践装备工具。其余事例没有必要予以查究，除非我们为了阐释者的工作而制作陈列表以阐释某种特定性质。因为凡标有和秉有优先权的事例，就宛如所陈列的普通事例中的灵魂；这些事例正如我开头所说的那样，可以以少抵多，因此，要制作各个陈列表，必须在事例调查过程中投入满腔热忱。对此般事例有必要预先处理，因为我在后文必须得提及此般事例。现在我必须进而讨论归纳法的证据和归纳法的矫正，接着讨论具体的东西，再进而讨论隐秘过程、隐秘结构，再进而讨论第二十一条语录所依次提出的其余各项。最后，我（就要像一个诚实而忠诚之卫士）就可以把人类的财富还给人类，一旦人类的理解力得以解放，其就仿佛已经成年；随之而来就是人类环境的改善，继而是其征服自然的力量的增强。人类在堕落的同时也失去了其天真的状态，失去了其对自然万物的统治。然而，这两种损失此生之中皆可得以部分弥补，前者可补之以宗教与忠诚；后者可补之以技术与科学。自然万物并未因诅咒而彻底、永久地变成一个背叛

者，反而凭借其宪条——“勤劳流汗自然有面包可吃”——同时凭借人类各种劳动（当然不是口头之争或无聊的幻术仪式，而是各种各样的劳动），最终被征服并为人类供给面包，即为人类生活所用。

[3_1].Nor burns the sharp cold of the northern blast.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Rhetoric
修辞学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修辞学

Rhetoric

亚里士多德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Book I 第一卷
- Book II 第二卷
- Book III 第三卷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Book I

第一卷

Chapter1

第一章

Rhetoric is a counterpart [1_1] of Dialectic; for both have to do with matters that are in a manner within the cognizance of all men and not confined [1_2] to any special science. Hence all men in a manner have a share of both; for all, up to a certain point, endeavor to criticize or uphold an argument, to defend themselves or to accuse. Now, the majority of people do this either at random or with a familiarity arising from habit. But since both these ways are possible, it is clear that matters can be reduced to a system, for it is possible to examine the reason why some attain their end by familiarity and others by chance; and such an examination all would at once admit to be the function of an art. [1_3]

修辞学与辩证法相对应，因为二者均必须探讨所有人都或多或少能够理解的事物，而不局限于任何具体学科。因此可以说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这两种技艺，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力图批判或支持某个观点，来捍卫自己或攻击他人。大多数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么是随机为之，要么是熟能生巧。但是，既然这两种方式都有可能，那么我们显然可以将其纳入一个体系，因为我们可以探究为什么有的人因熟能生巧而达成目的，有的人则依靠运气。大家应该都会同意，这种探究正是一门艺术的功能。

Now, previous compilers of “Arts” [1_4] of Rhetoric have provided us with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this art, for proofs are the only things in it that come within the province of art; everything else is merely an accessory. And yet they say nothing about enthymemes which are the body of proof, but chiefly devote their attention to matters outside the subject; for the arousing of prejudice, compassion, anger, and similar emotions has no connection with the matter in hand, but is directed only to the dicast. [1_5] The result would be that, if all trials were now carried on as they are in some States, especially those that are well administered, there would be nothing left for the rhetorician to say. For all men either think that all the laws ought so to prescribe, [1_6] or in fact carry out the principle and forbid speaking outside the subject, as in the court of Areopagus, and in this they are right. For it is wrong to warp the dicast's feelings, to arouse him to anger, jealousy or compassion, which would be like making the rule crooked which one intended to use. Further, it is evident that the only business of the litigant is to prove that the fact in question is or is not so, that it has happened or not; whether it is important or unimportant, just or unjust, in all cases in which the legislator has not laid down a ruling, is a matter for the dicast himself to decide; it is not the business of the litigants to instruct him.

先前修辞学“艺术”的编纂者们只为我们提供了这门艺术的一小部分，须知论证才是这门艺术唯一的核心内容，其他仅能算作附属品。但是，这些编纂者却完全忽视了作为论证主体的省略推理法，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非核心内容上；须知激发偏见、怜悯、愤怒及类似情感的做法与正在讨论的案情毫无关系，只是指向审理官的一种诉求，而这些恰恰是编撰者关注的内容。结果就是，如果所有庭审都按照现在某些城邦——尤其是那些管理比较规范的城邦——的做法来执行的话，那么修辞学家就无话可说了。须知人们要么认为所有法律就应该制定

这样的原则，要么像雅典最高法院所做的那样，已经实施了这样的原则，即在法庭上禁止谈论与主题无关的内容，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对的。须知影响审理官的情感，激发他的愤怒、嫉妒和怜悯都是错谬的。这种行为如同扭曲人们意欲用来度量的尺子一样。再者，诉讼当事人所要做的显然只是证明所诉事件是否属实以及是否已经发生。至于所诉之事是重要还是不重要，是正义还是不正义，只要立法者没有给出详细规定，就必须交由审理官自己来决断；诉讼当事人无权指导审理官。

First of all, therefore, it is proper that laws, properly enacted, should themselves define the issue of all cases as far as possible, and leave as little as possible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judges; in the first place, because it is easier to find one or a few men of good sense, capable of framing laws and pronouncing judgements, than a large number; secondly, legislation is the result of long consideration, whereas judgements are delivered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so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judges properly to decide questions of justice or expediency. But what is most important of all is that the judgement of the legislator does not apply to a particular case, but is universal and applies to the future, whereas the member of the public assembly and the dicast have to decide present and definite issues, and in their case love, hate, or personal interest is often involved, so that they are no longer capable of discerning the truth adequately, their judgement being obscured by their own pleasure or pain.

如此一来，首要的一点便是，凡妥当拟就的法律条文应该尽可能地明确界定所有案件的事项，尽量减少法官裁决的空间。原因如下：第一，寻找一个或几个审慎精明、善于立法和作出判决的人容易，而寻找大批此类人员则要困难得多；其次，立法是长时间斟酌的结果，

而庭审判决却需要当场作出，因此庭审法官难以正确判断涉及正义或利益的问题。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立法者的决定针对的并非某个具体案例，而是普遍的、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而公共集会成员和审理官则需要对面前具体的案例作出裁决，在这种情况下，友爱、仇恨或私利等因素常常掺杂进来，以致集会成员和审理官失去了充分洞察事实真相的能力，他们的判决也受到个人喜乐或痛苦的蒙蔽。

All other cases, as we have just said, should be left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judge as seldom as possible, except where it is a question of a thing having happened or not, of its going to happen or not, of being or not being so; this must be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judges, for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legislator to foresee such questions. If this is so, it is obvious that all those who definitely lay down, for instance, what should be the contents of the exordium or the narrative, or of the other parts of the discourse, are bringing under the rules of art what is outside the subject; for the only thing to which their attention is devoted is how to put the judge into a certain frame of mind. They give no account of the artificial proofs, [1_7] which make a man a master of rhetorical argument.

如前所述，除了少数几种情况外，其他所有案件审理都应该尽可能少地留待审理官判决。以下几种情况例外：某事是否曾经发生、将来是否会发生、是否真实等。这些问题必须交由法官来裁决，因为立法者无法对其作出预判。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很显然，当人们言之凿凿地规定诸如开场白、叙述或诉讼演讲的其他部分应包括哪些内容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将修辞学这一主题之外的东西纳入修辞艺术的体系，因为这些人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即如何给法官限定一个可靠的思维框架。他们对属于修辞艺术本身的论证只字不提，而恰恰是这些论证可以帮助人们成为修辞辩论的高手。

Hence, although the method of deliberative and forensic Rhetoric is the same, and although the pursuit of the former is nobler and more worthy of a statesman than that of the latter, which is limited to transactions between private citizens, they say nothing about the former, but without exception endeavor to bring forensic speaking under the rules of art. The reason of this is that in public speaking it is less worthwhile to talk of what is outside the subject, and that deliberative oratory lends itself to trickery less than forensic, because it is of more general interest. [1_8] For in the assembly the judges decide upon their own affairs, so that the only thing necessary is to prove the truth of the statement of one who recommends a measure, but in the law courts this is not sufficient; there it is useful to win over the hearers, for the decision concerns other interests than those of the judges, who, having only themselves to consider and listening merely for their own pleasure, surrender to the pleaders but do not give a real decision. [1_9]

因此，尽管议政演讲和诉讼演讲的方法一样，尽管从事前者比从事后者更高贵，也更应该为从政者所推崇——因为后者仅限于私人间的交易——但是他们（即先前的修辞学著作编纂者）却闭口不提议政演讲，而是无一例外地致力于将诉讼演讲纳入修辞艺术。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在公开的议政演讲中讨论主题之外的东西不那么值得，而且议政演讲也不像诉讼演讲那样动辄采用欺骗手段，因为它们关注的是更具普遍意义的话题。须知在公共集会中，裁决人是就关乎自身的事情作出判断，因此唯一需要做的是证明某项措施的动议者言论的真实性，但这在法庭上是不够的。在法庭上征服听众往往能够奏效，因为法官裁决的是别人而非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仅考虑自身利益、凭一己好恶偏听偏信，而不是作出真正的裁决。

That is why, as I have said before, in many places the law

prohibits speaking outside the subject in the law courts, whereas in the assembly the judges themselves take adequate precautions against this.

如我上文所说，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地方，法律明文规定庭审时禁止讨论无关内容，而裁决人自己在公共集会上就会十分谨慎地避免这种倾向的原因。

It is obvious, therefore, that a system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art is only concerned with proofs; that proof is a sort of demonstration, [1_10] since we are most strongly convinced when we suppose anything to have been demonstrated; that rhetorical demonstration is an enthymeme, which, generally speaking, is the strongest of rhetorical proofs and lastly, that the enthymeme is a kind of syllogism. Now, as it is the function of Dialectic as a whole, or of one of its parts, [1_11] to consider every kind of syllogism in a similar manner, it is clear that he who is most capable of examining the matter and forms of a syllogism will be in the highest degree a master of rhetorical argument, if to this he adds a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s with which enthymemes deal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logical syllogisms. For, in fact, the true and that which resembles it come under the purview of the same faculty, and at the same time men have a sufficient natural capacity for the truth and indeed in most cases attain to it; wherefore one who divines well in regard to the truth will also be able to divine well in regard to probabilities. [1_12]

如此一来，有几点就很明显：根据修辞艺术的规则所建立的体系只关注论证；论证是明示的一种，因为当我们感觉某事被明示时，我

们会被最有力地说服；修辞明示是一种省略推理法，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最有力的修辞论证；最后，省略推理法是一种三段论。无论作为一个整体抑或作为几个部分的整合，辩证法的主要功能都是用类似的方法来看待任何形式的三段论；显然，如果一个人非常善于考察三段论的内容和形式，并且在此之上又了解省略推理法所讨论的主题以及省略推理法与逻辑三段论的区别，那么他就是最高级别的修辞辩论高手。须知，事实上，真理和近似真理属于同一认知机制的范畴；不仅如此，人们还拥有足够的本能辨别真伪，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确实能够把握真相。因此，善于推测真相的人也善于推测各种或然性。

It is clear, then, that all other rhetoricians bring under the rules of art what is outside the subject, and [1_13] have rather inclined to the forensic branch of oratory. Nevertheless, Rhetoric is useful, because the true and the just are naturally superior to their opposites, so that, if decisions are improperly made, they must owe their defeat to their own advocates; which is reprehensible. Further, in dealing with certain persons, even if we possessed the most accurate scientific knowledge, we should not find it easy to persuade them by the employment of such knowledge. For scientific discourse is concerned with instruction, [1_14] but in the case of such persons instruction is impossible; our proofs and arguments must rest on generally accepted principles, as we said in the *Topics* , [1_15] when speaking of converse with the multitude. Further, the orator should be able to prove opposites, as in logical arguments; not that we should do both (for one ought not to persuade people to do what is wrong), but that the real state of the case may not escape us, and that we ourselves may be able to counteract false arguments, if another makes an unfair use of them. Rhetoric and Dialectic alone of all the arts prove opposites; for both are equally concerned with them. However, it is not the same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but, generally speaking, that which is true and better is

naturally always easier to prove and more likely to persuade. Besides, it would be absurd if it were considered disgraceful not to be able to defend oneself with the help of the body, but not disgraceful as far as speech is concerned, whose use is more characteristic of man than that of the body. If it is argued that one who makes an unfair use of such faculty of speech may do a great deal of harm, this objection applies equally to all good things except virtue, and above all to those things which are most useful, such as strength, health, wealth, generalship; for as these, rightly used, may be of the greatest benefit, so, wrongly used, they may do an equal amount of harm.

至此，有一点已得到说明，即一般的修辞学者所做的是将修辞学主旨之外的东西纳入修辞艺术的条规，因此这些人更愿意讨论诉讼演说术。无论如何，修辞学是有用的，因为凡是真实和正义的事物，同它们的对立面比起来，都具有天然的优势，所以，如果裁决者作出不恰当的判决，那么失败的原因一定在于这些决议的动议者；这是应该受到指责的。此外，在有些听众面前，我们即使拥有最精确的科学知识，也不容易运用这些知识去说服他们。须知科学语篇关注的是教化，但在面对这类听众时，教化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让自己的论证和论据都建立在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原则之上，这一点我们在《部目篇》中探讨如何与普通听众对话时已经讲过。接下来要讨论的一点，就像在逻辑论证中一样，演讲者必须能够证明（其论题的）对立面；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双管齐下（因为我们不能劝说他人去做错事），而是指我们不应该错过案情的真相，在有人不正当地运用这些论点时，我们要能对他们的这些错误论点予以反驳。在所有技艺中，唯有辩证法和修辞学会求证论题的对立面，因为它们对论题的对立面给予同等的关注。不过，主题本身却并非如此（即不偏不倚地支持论题及其对立面）；但是，一般而言，真实且更加美好的事物本身总是（比其对立面）更容易被论证，也更容易使人们相信。加之，一个人如果无力用身体保护自己就会被视作耻辱，而无法用言语来为自己辩护却

被视为正常，这该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因为诉诸语言比诉诸蛮力更能体现人之为人的特征。有人可能会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以不正当的方式诉诸语言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但是，这种指责同样适用于除美德以外的所有美好事物，尤其适用于那些最有用的事物，比如，力量、健康、财富和将才。正如正确地使用这些禀赋可以带来最大的益处一样，错误地使用它们也可能带来同样大的害处。

It is thus evident that Rhetoric does not deal with any one definite class of subjects, but, like Dialectic, (i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also, that it is useful; and further, that its function is not so much to persuade, as to find out in each case the existing means of persuasion. [1_16] The same holds good in respect to all the other arts. For instance, it is not the function of medicine to restore a patient to health, but only to promote this end as far as possible; for even those whose recovery is impossible may be properly treated. It is further evident that it belongs to Rhetoric to discover the real and apparent means of persuasion, just as it belongs to Dialectic to discover the real and apparent syllogism. For what makes the sophist is not the faculty but the moral purpose. But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Rhetoric, one who acts in accordance with sound argument, and one who acts in accordance with moral purpose, are both called rhetoricians; but in Dialectic it is the moral purpose that makes the sophist, the dialectician being one whose arguments rest, not on moral purpose but on the faculty. [1_17]

综上可见，修辞学并不局限于某一类确定的主题，而是和辩证法一样具有普遍性；而且，修辞学是一门有用的学问。此外，修辞学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劝说本身，而在于发掘存在于每一个特定场合的劝说方式。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所有技艺。比如，医术的作用不是让一个病人恢复健康，而是尽可能地帮助人们实现健康的目标；须知即使是

那些没有康复可能的人也可以得到合适的治疗。此外还有一点不言自明，即发现那些真实的和未必真实的劝说方法同样也是修辞学的职责，正如发现真实的和未必真实的三段论是辩证法的职责一样。须知使人变成“诡辩者”的不是他的认知能力，而是他的道德目的。但是，二者也有区别：对修辞学来说，依据确凿的论证来行事和依据道德企图来行事的人都可以被称为“修辞者”；但对于辩证法而言，一个人成为“诡辩者”是因为他有某种道德企图，“辩证法学者”则单指那些将论证建立在认知能力而非道德企图之上的人。

Let us now endeavor to treat of the method itself, to see how and by what means we shall be able to attain our objects. And so let us as it were start again, and having defined Rhetoric anew, pass on to the remainder of the subject.

接下来，我们将试图研究修辞方法本身，看看如何以及以何种方式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上文重新定义了修辞学，下面让我们从头开始，讨论修辞学的其他内容。

Chapter 2

第二章

Rhetoric then may be defined as the faculty of discovering the possible means of persuasion in reference to any subject whatever. This is the function of no other of the arts, each of which is able to instruct and persuade in its own special subject; thus, medicine deals with health and sickness, geometry with the properties of magnitudes, arithmetic with number, and similarly with all the other arts and sciences. But Rhetoric, so to say, appears to be able

to discover the means of persuasion in reference to any given subject. That is why we say that as an art its rules are not applied to any particular definite class of things.

故此，修辞可被定义为针对任何主题找出可能的劝说方法的能力。其他任何一门技艺都不具备这种功能，而只能够针对各自的特定主题进行教导和劝说；比如，医学探讨健康和疾病，几何学探讨维度的特性，算术探讨数字，所有其他技艺或学科都是如此。但是修辞学则不同，可以说，它几乎能够针对任一既定主题找到劝说方法。正因如此，我们说，作为一种技艺，修辞学的规则不针对任何一种具体的、确定的事物类别。

As for proofs, some are artificial, others inartificial. By the latter I understand all those which have not been furnished by ourselves but were already in existence, such as witnesses, tortures, contracts, and the like; by the former, all that can be constructed by system and by our own efforts. Thus we have only to make use of the latter, whereas we must invent the former.

至于论证，有些是修辞艺术所创造的，有些则不然。我将后者理解为非由我们提供的、业已存在的证据，如证人、刑讯、契约及类似证据；而将前者理解为可以根据修辞体系或靠我们自身的努力制造出来的证据。因此，对于后者，我们只需要拿来使用；而对于前者，我们却必须将其谋划出来。

Now the proofs furnished by the speech are of three kinds. The first depends upon the moral character of the speaker, the second upon putting the hearer into a certain frame of mind, the third upon

the speech itself, in so far as it proves or seems to prove.

演说所能提供的证明分为三种。第一种取决于演讲者的道德品格，第二种取决于把听者带入一种思维定式，第三种取决于演说本身——如果一场演说的确证明了或似乎提供了证明的话。

The orator persuades by moral character when his speech is delivered in such a manner as to render him worthy of confidence; for we feel confidence in a greater degree and more readily in persons of worth in regard to everything in general, but where there is no certainty and there is room for doubt, our confidence is absolute. But this confidence must be due to the speech itself, not to any preconceived idea of the speaker's character; for it is not the case, as some writers of rhetorical treatises lay down in their “Art,” that the worth of the orator in no way contributes to his powers of persuasion; on the contrary, moral character, so to say, constitute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proof. The orator persuades by means of his hearers, when they are roused to emotion by his speech; for the judgements we deliver are not the same when we are influenced by joy or sorrow, love or hate; and it is to this alone that, as we have said, the present-day writers of treatises endeavor to devote their attention. (We will discuss these matters in detail when we come to speak of the emotions.) Lastly, persuasion is produced by the speech itself, when we establish the true or apparently true from the means of persuasion applicable to each individual subject.

当演说者的演说方式能够为他赢得信任，他就是在利用道德品格进行劝说。因为总体说来，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更加并且更愿意相信品格高尚的人；在没有确定性或没有理由存疑的情况下，我们对这

样的演说者的信任更是绝对的。不过，这种信任应该来自演说本身，而不是对演讲者品格的先入之见；须知事实并不像有些修辞学者在其“修辞艺术论”中所声称的那样，认为演说者的品德无助于其说服力；恰恰相反，道德品格可以说算得上是最有效的论证手段。当演说者借助演说激发听众的情感，他就是在利用听众进行劝说；须知当我们受到喜悦或悲伤、友爱或仇恨等情绪影响时，会作出不同的判断；如前所述，这是现今一些修辞学作者所关注的唯一内容（在后文讨论情感时我们将详细探讨这些内容）。最后，如果我们利用适合各个特定主题的劝说方法来论证某事为真或未必为真，我们就是在利用演说本身进行说服。

Now, since proofs are effected by these means, it is evident that, to be able to grasp them, a man must be capable of logical reasoning, of studying characters and the virtues, and thirdly the emotions—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each, its origin,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it is produced. Thus it appears that Rhetoric is as it were an offshoot of Dialectic and of the science of Ethics, which may be reasonably called Politics. [1_18] That is why Rhetoric assumes [1_19] the character of Politics, and those who claim to possess it, partly from ignorance, partly from boastfulness, and partly from other human weaknesses, do the same. For, as we said at the outset, Rhetoric is a sort of division or likeness of Dialectic, since neither of them is a science that deals with the nature of any definite subject, but they are merely faculties of furnishing arguments. We have now said nearly enough about the faculties of these arts and their mutual relations.

既然论证是通过这些手段（即道德品格、听众情感和演说本身）来实现的，那么很明显，要想掌握它们，演说者必须擅长于进行逻辑推理，能够分析人的性格和品德，还有人的情感，包括每种情感的性

质和特点、起源以及产生的方式。如此一来，修辞学似乎成了辩证法和伦理学的分支，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可以被称为政治学。正因如此，修辞学具有政治学的特征。有些出于无知，有些出于傲慢，有些出于其他人性弱点的人，他们宣称拥有修辞能力，也是如此。如我们在本书开篇所言，修辞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辩证法的分支或类似物，因为二者探讨的都不是某个具有特定主题性质的学科，而只涉及实施论证的能力。至此，对于这两种技艺所涉及的能力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

But for purposes of demonstration, real or apparent, just as Dialectic possesses two modes of argument, induction and the syllogism, real or apparent, the same is the case in Rhetoric; for the example is induction, and the enthymeme a syllogism, and the apparent enthymeme an apparent syllogism. Accordingly, I call an enthymeme a rhetorical syllogism, and an example rhetorical induction. Now all orators produce belief by employing as proofs either examples or enthymemes and nothing else; so that if,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necessary to prove any fact whatever either by syllogism or by induction—and that this is so is clear from the *Analytics* [1_20] —each of the two former must be identical with each of the two latter. [1_2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xample and enthymeme is evident from the *Topics* , [1_22] where, in discussing syllogism and induction, it has previously been said that the proof from a number of particular cases that such is the rule, is called in Dialectic induction, in Rhetoric example; but when, certain things being posited, something different results by reason of them, alongside of them, from their being true, either universally or in most cases, such a conclusion in Dialectic is called a syllogism, in Rhetoric an enthymeme.

不过正如辩证法拥有两种论证方式，即归纳法和三段论，包括真实的和未必真实的，修辞学为了进行真实的或未必真实的论证，也是如此：修辞学的例证法就是一种归纳，省略推理法就是一种三段论，未必真实的省略推理法就是未必真实的三段论。因此，我把省略推理法叫做修辞式三段论，把例证叫做修辞式归纳。为了让听众产生信任，所有的演说者为取得人们信任而采用的证据不外乎例证和省略推理法，此外再无其他。因此，一般说来，如果需要使用三段论或者归纳法论证某事——事实也的确如此，对此《分析篇》中有明确论述——那么前两者一定要与后两者一一对应。例证与省略推理法之间的差异在《部目篇》中已有明确论述。在探讨三段论和归纳法时，《部目篇》曾提到，用多个具体事例进行论证得出一个一般规律，这在辩证法中叫做归纳，在修辞学中叫做例证；但是，在前提预设的情况下，通过对前提的推理，从前提的普遍真实性或大多数情况下的真实性产生出一个和前提并行的不同前提的结论，这在辩证法中叫做三段论，在修辞学中叫做省略推理法。

It is evident that Rhetoric enjoys both these advantages [1_23] —for what has been said in the *Methodica* [1_24] holds good also in this case—for rhetorical speeches are sometimes characterized by examples and sometimes by enthymemes, and orators themselves may be similarly distinguished by their fondness for one or the other. Now arguments that depend on examples are not less calculated to persuade, but those which depend upon enthymemes meet with greater approval. Their origin and the way in which each should be used will be discussed later; [1_25] for the moment let us define more clearly these proofs themselves.

很明显，修辞学可以同时享有上述两种方法带来的便利——《方法篇》中的有关论述同样适用于此——须知修辞演说有时多用例证，有时多用省略推理法；同样，演说者也因对两者的不同偏好而具有各

自的特点。虽然依赖例证的论证的说服力并不逊于依赖省略推理法的论证，但是后者更受欢迎。这两种论证的起源及使用方法将在下文讨论；现在，让我们先更加明确地定义上述几种论证。

Now, that which is persuasive is persuasive in reference to some one, and is persuasive and convincing either at once and in and by itself, or because it appears to be proved by propositions that are convincing; [1_26] further, no art has the particular in view, medicine for instance what is good for Socrates or Callias, but what is good for this or that class of persons (for this is a matter that comes within the province of an art, whereas the particular is infinite and cannot be the subject of a true science); similarly, therefore, Rhetoric will not consider what seems probable in each individual case, for instance to Socrates or Hippias, but that which seems probable to this or that class of persons. It is the same with Dialectic, which does not draw conclusions from any random premises—for even madmen have some fancies—but it takes its material from subjects which demand reasoned discussion, as Rhetoric does from those which are common subjects of deliberation.

一个观点有说服力是针对某人而言的，其说服力和可信度要么是即时的、固有的，要么是由貌似可信的命题证明的；进一步说，没有一种技艺关注个别的事物，比如医术研究的不是什么东西对苏格拉底或者卡利阿斯的健康有益，而是什么东西对某一类人的健康有益（因为这才属于一门技艺所研究的范围，而个别的事物数量是无限的，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所关注的主题）；因此，与此相似，修辞学也不研究针对每个具体案例的可能的劝说方式，比如针对苏格拉底或希庇亚斯的劝说方式，而是研究针对某一类人的可能的劝说方式。辩证法也一样。它不会根据任意的散乱前提得出结论——须知即使疯子也

有一定的想象力——它从需要理性探讨的主题中取材，就像修辞学从人们探讨的普通主题中取材一样。

The function of Rhetoric, then, is to deal with things about which we deliberate, but for which we have no systematic rules; and in the presence of such hearers as are unable to take a general view of many stages, or to follow a lengthy chain of argument. But we only deliberate about things which seem to admit of issuing in two ways; as for those things which cannot in the past, present, or future be otherwise, no one deliberates about them, if he supposes that they are such; for nothing would be gained by it. Now, it is possible to draw conclusions and inferences partly from what has been previously demonstrated syllogistically, partly from what has not, which however needs demonstration, because it is not probable. [1_27] The first of these methods is necessarily difficult to follow owing to its length, for the judge is supposed to be a simple person; the second will obtain little credence, because it does not depend upon what is either admitted or probable. The necessary result then is that the enthymeme and the example are concerned with things which may, generally speaking, be other than they are, the example being a kind of induction and the enthymeme a kind of syllogism, and deduced from few premises, often from fewer than the regular [1_28] syllogism; for if any one of these is well known, there is no need to mention it, for the hearer can add it himself. For instance, to prove that Dorieus [1_29] was the victor in a contest at which the prize was a crown, it is enough to say that he won a victory at the Olympic games; there is no need to add that the prize at the Olympic games is a crown, for everybody knows it.

所以，修辞学的功能是研究那些我们会反复思量但尚未掌握系统

规律的事物以及如何说服那些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多个步骤或者无法听懂一长串论证的听众。不过我们只思量那些看起来有两种可能性的事物。至于那些在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不可能有什么变化的事物，没有人会去费心考量——只要他认定那些事物就是如此——因为这样的考量毫无益处。要作出结论和推断，可以部分依据已被三段论法论证的命题，也可以部分依据尚未被三段论法论证的命题，不过后一种命题因为一般不被人相信，仍然需要证明。第一种方法由于过于冗长，必定难以理解，因为裁决者一般是头脑简单的人；第二种方法的可信度很低，因为它不是建立在被大众接受的或相信的命题上。于是，必然的结果是：省略推理法和例证法关注的是那些一般说来会有另一种状态的事物。例证是一种归纳法，省略推理法是一种三段论，而且其结论可以从较少的前提——往往少于典型的三段论的前提——导出，因为如果其中一个前提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就无需提及，听者总归会自行加上。比如，为了证明多里欧司赢得了一场比赛，赢得的奖项是顶级的，只要说他赢得的是一场奥林匹克赛事就够了，不需要补充奥林匹克赛事的奖项是顶级的，因为这是人尽皆知的。

But since few of the propositions of the rhetorical syllogism are necessary, for most of the things which we judge and examine can be other than they are, human actions, which are the subject of our deliberation and examination, being all of such a character and, generally speaking, none of them necessary; since, further, facts which only generally happen or are merely possible can only be demonstrated by other facts of the same kind, and necessary facts by necessary propositions (and that this is so is clear from the *Analytics* [1_30]), it is evident that the materials from which enthymemes are derived will be sometimes necessary, but for the most part only generally true; and these materials being probabilities and signs, it follows that these two elements must correspond to these two kinds of propositions, each to each. [1_31] For that which is probable is that which generally happens, not

however unreservedly, as some define it, but that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ings that may be other than they are, being so related to that in regard to which it is probable as the universal to the particular. As to signs, some are related as the particular to the universal, others as the universal to the particular. Necessary signs are called *tekmēria* ; those which are not necessary have no distinguishing name. I call those necessary signs from which a logical syllogism can be constructed, wherefore such a sign is called *tekmērion* ; for when people think that their arguments are irrefutable, they think that they are bringing forward a *tekmērio* n, something as it were proved and concluded; for in the old language *tekmar* and *peras* have the same meaning (limit, conclusion).

不过，修辞式三段论的前提很少，这是必然的，须知我们判断和考察的事情大都会有另一种状态；而作为我们思考和研究的主题，人类行为更是普遍具有这种特征——一般说来，没有任何一种人类行为是必然的。此外，一方面，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或仅仅具有可能性的事情（即或然的事情）只能通过同类的其他事实（即或然的前提）得以证明；另一方面，必然的事情只能通过必然的前提得以证明，这一点在《分析篇》中有明确论述。显然，产生省略推理法的材料有时是必然的，但是大多数时候只是通常情况下为真，即是或然的。既然这些材料皆为或然之事和证据，可以推知，它们应该与（或然和必然的）两种前提一一对应。或然之事就是那些经常发生的事，但并非像某些人定义的那样无条件发生，而是指那些可能具有另一种状态的事物，该事物对于另一事物而言是或然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恰似一般与个别之间的关系。至于证据（与其所证明的论点之间的关系），有些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另一些则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必然的证据叫做“tekmēria”，非必然的证据没有专属名称。我把那些可以用于构建逻辑三段论的证据叫做必然证据，因此这种证据又被称作“tekmērion”。因为当人们认为自己的论点无可辩驳时，就会认定自己搬出的是一个tekmērion，也就是一个已被论证且有了定论的证

据。须知在从前的语言里“tekmar”和“peras”意思相同（都表示“限制、结论”之义）。

Among signs, some are related as the particular to the universal; for instance, if one were to say that all wise men are just, because Socrates was both wise and just. Now this is a sign, but even though the particular statement is true, it can be refuted, because it cannot be reduced to syllogistic form. But if one were to say that it is a sign that a man is ill, because he has a fever, or that a woman has had a child because she has milk, this is a necessary sign. This alone among signs is a *tekmērion* ; for only in this case, if the fact is true, is the argument irrefutable. Other signs are related as the universal to the particular, for instance, if one were to say that it is a sign that this man has a fever, because he breathes hard; but even if the fact be true, this argument also can be refuted, for it is possible for a man to breathe hard without having a fever. We have now explained the meaning of probable, sign, and necessary sign,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n the *Analytics* [1_32] we have defined them more clearly and stated why some of them can be converted into logical syllogisms, while others cannot.

在各种证据中，有的与论点的关系恰如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比如，有人可能会说“所有智慧之人都是正义的，因为苏格拉底就是既智慧又正义的”。这里苏格拉底的确构成一个证据，但是即使上述个别断言为真，它仍然可以被驳倒，因为它无法以三段论的形式呈现。但是，如果有人说“一个人生病了，证据是他发烧了”，或者“一个女人有孩子，证据是她有奶水”，这就是必然的证据。在各种证据中，只有这类证据才是tekmērion；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为证据的事实为真，则其论点不可辩驳。其他证据与论点的关系则如同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比如，有人可能会说“这个人发烧，证据是他呼吸困

难”。但是即使这个事实（即这个人发烧）为真，该论点还是可以驳倒的，因为一个人呼吸困难时可能并不发烧。至此，我们已经解释了或然性、证据和必然证据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分析篇》对此给过更清晰的定义，并解释了为什么有些证据可以转化为逻辑三段论，有些却不可以。

We have said that example is a kind of induction and with what kind of material it deals by way of induction. It is neither the relation of part to whole, nor of whole to part, nor of one whole to another whole, but of part to part, of like to like, when both come under the same genus, but one of them is better known than the other. For example, to prove that Dionysius is aiming at a tyranny, because he asks for a bodyguard, one might say that Pisistratus before him and Theagenes of Megara did the same, and when they obtained what they asked for made themselves tyrants. All the other tyrants known may serve as an example of Dionysius, whose reason, however, for asking for a bodyguard we do not yet know. All these examples are contained under the same universal proposition, that one who is aiming at a tyranny asks for a bodyguard.

上文已经说过，例证是一种归纳，并介绍了例证法在进行归纳时所使用的材料。例证与论点之间既不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也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也不是一个整体与另一个整体的关系，而是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是同类事物之间的关系；两者属于同一类别，但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比如，为了证明（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企图专权，因为他要求贴身护卫，我们可以说“在他之前，雅典的庇西特拉图以及麦加拉城的特埃吉尼斯都有过同样的要求，并且二人在获得贴身护卫后都成为了暴君”。其他有名的暴君也可以用作狄奥尼修斯一案的例证，尽管我们尚不知道狄奥尼修斯索要贴身护卫的真实原因。所有这些例证都属于同一个全称命题，即：力图专权者都

索要贴身护卫。

We have now stated the materials of proofs which are thought to be demonstrative. But a very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enthymemes has escaped the notice of nearly every one, although it also exists in the dialectical method of syllogisms. For some of them belong to Rhetoric, some syllogisms only to Dialectic, and others to other arts and faculties, some already existing and others not yet established. Hence it is that this escapes the notice of the speakers, and the more they specialize in a subject, the more they transgress the limits of Rhetoric and Dialectic. But this will be clearer if stated at greater length.

至此，我们探讨了被认为可以用于论证的论证材料。但是，大家几乎全都忽视了不同的省略推理法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尽管这一区别在辩证法形式的三段论中也存在。须知有些省略推理法属于修辞学，有些三段论则只属于辩证法，还有一些属于其他的技艺和能力，其中有些已经存在，有些尚未建立。这便是演说者所忽视的一点，而且他们越是专于某一学科，就越容易脱离修辞学和辩证法的边界。更加详细地描述一下，就会使这一点更加明了。

I mean by dialectical and rhetorical syllogisms those which are concerned with what we call “topics,” which may be applied alike to Law, Physics, Politics, and many other sciences that differ in kind, such as the topic of the more or less, which will furnish syllogisms and enthymemes equally well for Law, Physics, or any other science whatever, although these subjects differ in kind. Specific topics on the other hand are derived from propositions which are peculiar to each species or genus of things; there are, for

example, propositions about Physics which can furnish neither enthymemes nor syllogisms about Ethics, and there are propositions concerned with Ethics which will be useless for furnishing conclusions about Physics; and the same holds good in all cases. The first kind of topics will not make a man practically wise about any particular class of things, because they do not deal with any particular subject matter; but as to the specific topics, the happier a man is in his choice of propositions, the more he will unconsciously produce a science quite different from Dialectic and Rhetoric. For if once he hits upon first principles, it will no longer be Dialectic or Rhetoric, but that science whose principles he has arrived at. [1_33] Most enthymemes are constructed from these specific topics, which are called particular and special, fewer from those that are common or universal. As then we have done in the *Topics* , [1_34] so here we must distinguish the specific and universal topics, from which enthymemes may be constructed. By specific topics I mean the propositions peculiar to each class of things, by universal those common to all alike. Let us then first speak of the specific topics, but before doing so let us ascertain the different kinds of Rhetoric, so that, having determined their number, we may separately ascertain their elements and propositions. [1_35]

我所说的辩证法和修辞学的三段论指的是那些与我们称作“部目”的事物有关的论证，适用于法律、物理、政治学以及其他不同类别的学科；例如，比较部目在法律、物理或其他任何学科中都可以很好地用于制造三段论和省略推理法，尽管这些学科属于不同类别。相反，专用部目则来自那些只适用于某一种类或类别事物的命题，比如，物理学的命题就不适用于关于伦理学的省略推理法或三段论；同样，伦理学的命题也无法用于得出物理学的结论；所有其他学科皆是如此。第一类部目无法帮助人们在实践中精通任何一类具体的事物，因为它们并不涉及任何具体学科；专用部目则不同，一个人越擅长自

己所选的命题，就越容易不知不觉地炮制出一个迥异于辩证法和修辞学的学科。因为一旦他触及一些基本原则，他所探讨的就不再是辩证法或修辞学，而是他所悟出的那些原则所属的学科。大多数省略推理法都是基于这些被视为“具体的”或“专属的”专用部目所构建的，基于“通用”或“普遍”的部目构建的省略推理法则相对较少。正如我们在《部目篇》中所做的那样，这里我们也应该区分可以用于构建省略推理法的专用部目和普遍部目。所谓专用部目，指的是专属于某一类事物的命题；普遍部目则是指适用于所有类别事物的命题。我们不妨首先探讨专用部目，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不同类型的修辞，这样，在确定了修辞的种类和数量之后，我们才好分别确定它们各自的要素和命题。

Chapter 3

第三章

The kinds of Rhetoric are three in number, corresponding to the three kinds of hearers. For every speech i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the speaker, the subject of which he treats, and the person to whom it is addressed, I mean the hearer, to whom the end or object of the speech refers. Now the hearer must necessarily be either a mere spectator or a judge, and a judge either of things past or of things to come. [1_36] For instance, a member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is a judge of things to come; the dicast, of things past; the mere spectator, of the ability of the speaker. Therefore there are necessarily three kinds of rhetorical speeches, deliberative, forensic, and epideictic.

修辞有三种，分别与三类听众相对应。每场演说都由三要素构成：演讲者、讨论的主题以及演说的对象，即听众，也是演说的目的

或目标所指。听众要么是看客，要么是裁决人，而后者所裁决的要么是过去的事情，要么是将来的事情。比如，公共集会的成员裁决的是将来之事；审理官裁决的是既往之事；普通观众裁决的是演说者的能力。与此相应，修辞演说也势必分成三类，即（针对公共集会裁决人的）议政演说、（针对审理官的）诉讼演说和（针对普通观众的）宣德演说。

The deliberative kind is either hortatory or dissuasive; for both those who give advice in private and those who speak in the assembly invariably either exhort or dissuade. The forensic kind is either accusatory or defensive; for litigants must necessarily either accuse or defend. The epideictic kind has for its subject praise or blame.

议政演说不外乎劝说和劝阻，须知无论是私下进言者还是集会演说者，其所做的无非是劝说或者劝阻。诉讼演说不外乎指控或辩护，须知诉讼当事人必然要控告对方或者为自己辩护。宣德演说则以赞颂或谴责为主旨。

Further, to each of these a special time is appropriate: to the deliberative the future, [1_37] for the speaker, whether he exhorts or dissuades, always advises about things to come; to the forensic the past, for it is always in reference to things done that one party accuses and the other defends; to the epideictic most appropriately the present, for it is the existing condition of things that all those who praise or blame have in view. It is not uncommon, however, for epideictic speakers to avail themselves of other times, of the past by way of recalling it, or of the future by way of anticipating it.

进一步而言，三种演说都有各自适宜的特定时间：议政演说面向未来，因为演说者无论是劝说还是劝阻，总是就将要发生的事提出建议；诉讼演说面向过去，因为控辩双方总是就已经发生的事展开控辩；宣德演说最适宜着眼于当前，因为在称赞或者谴责时，演说者关注的总是眼下的状况。不过，宣德演讲者提及其他时段的情况也并不鲜见，比如回顾过去或者预测未来。

Each of the three kinds has a different special end, and as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Rhetoric, so there are three special ends. The end of the deliberative speaker is the expedient or harmful; for he who exhorts recommends a course of action as better, and he who dissuades advises against it as worse; all other considerations, such as justice and injustice, honor and disgrace, are included as accessory in reference to this. The end of the forensic speaker is the just or the unjust; in this case also all other considerations are included as accessory. The end of those who praise or blame is the honorable and disgraceful; and they also refer all other considerations to these. A sign that what I have stated is the end which each has in view is the fact that sometimes the speakers will not dispute about the other points. For example, a man on trial does not always deny that an act has been committed or damage inflicted by him, but he will never admit that the act is unjust; for otherwise a trial would be unnecessary. Similarly, the deliberative orator, although he often sacrifices everything else, will never admit that he is recommending what is inexpedient or is dissuading from what is useful; but often he is quite indifferent about showing that the enslavement of neighboring peoples, even if they have done no harm, is not an act of injustice. Similarly, those who praise or blame do not consider whether a man has done what is expedient or harmful, but frequently make it a matter for praise that, disregarding his own interest, he performed some deed of honor.

For example, they praise Achilles because he went to the aid of his comrade Patroclus, [1_38] knowing that he was fated to die, although he might have lived. [1_39] To him such a death was more honorable, although life was more expedient.

三种演说都有各自特定的目的，而且正如修辞有三种，演说目的也有三种。议政演讲者的目的是阐明利弊，因为演说者在劝说时会力陈某种行为的好处，在劝阻时则会强调它的坏处；所有其他因素——如正义和非正义、荣誉和耻辱——则作为利弊之外的补充被包括进来。诉讼演讲者的目的是明辨正义或不正义，为此目的，所有其他因素都是次要的。宣德演讲者称赞或指责的目的是明示光荣和耻辱，其他所有因素都以此为参照。有一种现象可以证实以上所言确为每一种演讲的目的，即有时演说者不会就目的之外的其他话题展开争论。比如，被告在受审时不一定总是否认他做了某事或造成了伤害，但是他绝不会承认他的行为是不正义的；否则就无需审判了。同样，虽然议政演说者常常在各个方面让步，但却绝不会承认他所建议的事情是无益的，或者承认他所劝阻的事情是有用的；不过，对证明诸如奴役邻邦人民这种行为是正义的，即使他们的确无辜，他一般不感兴趣。同样，宣德演说者在赞扬或谴责某人时，一般不考虑这个人所做的事是有利还是有害，而是常常称赞他不顾个人利益的高尚行为。比如，他们会赞颂阿基利斯，因为他向自己的同伴普特洛克勒斯施以援手，尽管他知道这样做自己注定会丧命，而不这样做却可能性命无忧。对阿基利斯来说，虽然生更加有利，但是死却无比荣耀。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it is evident that the orator must first have in readiness the propositions on these three subjects. [1_40] Now, necessary signs, probabilities, and signs are the propositions of the rhetorician; for the syllogism universally [1_41] consists of propositions, and the enthymeme is a syllogism composed of the propositions above mentioned. Again, since what is impossible can

neither have been done nor will be done, but only what is possible, and since what has not taken place nor will take place can neither have been done nor will be done, it is necessary for each of the three kinds of orators to have in readiness propositions dealing with the possible and the impossible, and as to whether anything has taken place or will take place, or not. Further, since all, whether they praise or blame, exhort or dissuade, accuse or defend, not only endeavor to prove what we have stated, but also that the same things, whether good or bad, honorable or disgraceful, just or unjust, are great or small, either in themselves or when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it is clear that it will be necessary for the orator to be ready with propositions dealing with greatness and smallness and the greater and the less, both universally and in particular; for instance, which is the greater or less good, or act of injustice or justice; and similarly with regard to all other subjects. We have now stated the topics concerning which the orator must provide himself with propositions; after this, we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each of them individually, that is, what the three kinds of Rhetoric, deliberative, epideictic, and forensic, are concerned with.

综上所述，很明显，演说者必须首先熟知与上述三种主题相关的命题。修辞学家使用的命题包括必然的证据、或然之事和（或然的）证据；整体而言，三段论是由命题构成的，而省略推理法则是由上述三种命题构成的一种三段论。再者，既然那些不可能之事，过去不可能做过，将来也不可能去做（只有可能之事过去可能做过，将来也可能去做）；既然未曾发生且将来也不可能发生之事，过去不可能做过，将来也不可能去做，那么上述三种演说者都需要掌握与可能之事和不可能之事相关的命题，与已经发生或将会发生之事相关的命题以及与未曾发生或将来也不会发生之事相关的命题。另外，无论演说者是称赞还是谴责、劝说还是劝阻、指控还是辩护某事，他们不仅会努力证明上文所述的观点，而且还会证明其讨论的事情——无论是好还

是坏，是荣耀还是耻辱，是正义还是不正义——本身或彼此之间是大还是小。由此可见，演说者需要掌握与一般和个别事物的大和小、较大和较小相关的命题。比如，哪件事的益处大，哪件事的益处小；哪个行为正义，哪个行为不正义；其他所有主题皆与此类似。至此，我们探讨了演说者应该掌握其相关命题的部目。接下来，我们应该逐个区分这些部目，即探讨议政、宣德和诉讼修辞分别与哪些部目有关。

Chapter 4

第四章

We must first ascertain about what kind of good or bad things the deliberative orator advises, since he cannot do so about everything, but only about things which may possibly happen or not. Everything which of necessity either is or will be, or which cannot possibly be or come to pass, is outside the scope of deliberation. Indeed, even in the case of things that are possible advice is not universally appropriate; for they include certain advantages, natural and accidental, about which it is not worth while to offer advice. But it is clear that advice is limited to those subjects about which we take counsel; and such are all those which can naturally be referred to ourselves and the first cause of whose origination is in our own power; for our examination is limited to finding out whether such things are possible or impossible for us to perform.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议政演说者所游说的好的或坏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他无法对所有事物展开游说，而只能就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进言献策。凡是现在和将来一定会存在或者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均不在议政演说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即使对于

那些可能的事物，游说也未必普遍适用；须知那些事物包含某些机巧，有天然的，也有偶然的，为此进言殊为不值。显然，游说仅限于我们需要纳谏的话题；这些话题指的是那些自然地归属于我们且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在我们掌控之中的事情；须知我们的考察仅限于探明自己有无可能完成那些事情。

However, there is no need at present to endeavor to enumerate with scrupulous exactness or to classify those subjects which men are wont to discuss, or to define them as far as possible with strict accuracy, since this is not the function of the rhetorical art but of one that is more intelligent and exact, and further, more than its legitimate subjects of inquiry have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it. For what we have said before is true [1_42] : that Rhetoric is composed of analytical science and of that branch of political science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Ethics, and that it resembles partly Dialectic and partly sophistical arguments. But in proportion as anyone endeavors to make of Dialectic or Rhetoric, not what they are, faculties, but sciences, to that extent he will, without knowing it, destroy their real nature, in thus altering their character, by crossing over into the domain of sciences, [1_43] whose subjects are certain definite things, not merely words. Nevertheless, even at present we may mention such matters as it is worthwhile to analyze, while still leaving much for political science to investigate.

不过，现在还没有必要去精确地列举或者划分人们惯于讨论的话题，也没有必要去极尽精确地为它们下定义，因为这并不是修辞学的功能，而是一种更具智慧也更为精确的学科的功能。再说，我们对修辞学探讨的内容已经超越了它的正当范围。须知我们先前所述是正确的：修辞学包括分析科学以及政治学中与伦理学有关的分支；修辞学一方面像辩证法，一方面像诡辩术。然而，人们越是企图使辩证法或

修辞学成为科学，而不是保持它们各自的本来面目，即能力，他们就越有可能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破坏辩证法和修辞学的真实本质，并因此改变它们的性质，跨入科学的范畴；但科学所讨论的话题是具体的事物，而不是单纯的文字。无论如何，让我们现在就谈一谈各种值得分析的事物，同时将足够多的内容留给政治学去研究。

Now, we may say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s about which all men deliberate and deliberative orators harangue, are five in number, to wit: ways and means, war and peace, the defence of the country, imports and exports, legislation.

可以说，所有人讨论的以及所有议政演说者滔滔不绝演讲的最重要的话题不外乎五个，即赋税征收、战争与和平、国防、进出口和立法。

Accordingly, the orator who is going to give advice on ways and means should be acquainted with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State resources, so that if any is omitted it may be added, and if any is insufficient, it may be increased. Further, he should know all the expenses of the State, that if any is superfluous, it may be removed, or, if too great, may be curtailed. For men become wealthier, not only by adding to what they already possess, but also by cutting down expenses. Of these things it is not only possible to acquire a general view from individual experience, but in view of advising concerning them it is further necessary to be well informed about what has been discovered among others.

与此相应，意欲就赋税征收进言的演说者就应该熟悉城邦各种资

源的属性和数量。这样，如果某种税赋被遗漏了，则可以添加；如果征收不足，则可以增量。此外，他还应该了解城邦的各项开支。这样，如果某项开支纯属冗余，则可以去除；如果某项开支太大，则可以削减。须知人之致富，不仅要增加已有的财富，还要削减各项开支。对于上述事情，演讲者不仅可以从个人经历中获得综合的认知，而且为了就这些事情进言献策，还有必要充分了解其他人的发现。

In regard to war and peace, the orator should be acquainted with the power of the State, how great it is already and how great it may possibly become; of what kind it is already and what additions may possibly be made to it; further, what wars it has waged and its conduct of them. These things he should be acquainted with, not only as far as his own State is concerned, but also in reference to neighboring States, and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whom there is a likelihood of war, so that towards the stronger a pacific attitude may be maintained, and in regard to the weaker, the decision as to making war on them may be left to his own State. Again, he should know whether their forces are like or unlike his own, for herein also advantage or disadvantage may lie. With reference to these matters he must also have examined the results, not only of the wars carried on by his own State, but also of those carried on by others; for similar results naturally arise from similar causes.

关于战争与和平，演说者应该熟悉城邦的实力：现今实力如何，未来实力可能如何；拥有何种兵力，还可能增添什么；还有迄今已发动过哪些战争，历次战争有何作为。演说者不仅需要了解自己城邦的情况，而且需要了解各相邻城邦的情况，特别是那些可能与之交战的城邦。这样，面对强国，可以保持和平态势；面对弱国，是否与其交战则可任由己方决定。另外，演说者还需要了解对方军队与己方军队是相同还是相异，因为这里面可能暗含敌我双方的优劣。针对这些问

题，演说者还应当研究历次战争的结果，不仅包括自己城邦所卷入的战争，还包括其他城邦所卷入的战争；须知相似的结果自然产生于相似的原因。

Again, in regard to the defense of the country, he should not be ignorant how it is carried on; he should know both the strength of the guard, its character, and the positions of the guard-houses (which is impossible for one who is unacquainted with the country), so that if any guard is insufficient it may be increased, or if any is superfluous it may be disbanded, and greater attention devoted to suitable positions.

再者，关于国防，演讲者不能对防卫的执行一无所知；他应该了解驻军的兵力、特点和驻扎的位置（对国家的情况不熟悉的人，不可能了解这些信息）。这样，如果驻军不足，就可以补足；如果驻军过剩，就可以削减；还可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要塞位置上。

Again, in regard to food, he should know what amount of expenditure is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State; what kind of food is produced at home or can be imported; and what exports and imports are necessary, in order that contracts and agreements may be made with those [1_44] who can furnish them; for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the citizens free from reproach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two classes of people—those who are stronger and those who are useful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再者，关于粮食，演讲者应该了解维持城邦日常供应需要多少粮食，哪些粮食种类是国内生产的，哪些可以进口；还要了解哪些进口

和出口是必须的，以便与各个供货方订立合同和契约；须知我们有必要使公民在与两个阶层的人士——有势力的人和因商业目的而有用的人——相处时免受责难。

With a view to the safety of the State,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orator should be able to judge of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an understanding of legislation is of special importance, for it is on the laws that the safety of the State is based. Wherefore he must know how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there are; what is expedient for each; and the natural causes of its downfall, whether they are peculiar to the particular form of government or opposed to it. By being ruined by causes peculiar to itself, I mean th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perfect form of government, all the rest are ruined by being relaxed or strained to excess. Thus democracy, not only when relaxed, but also when strained to excess, becomes weaker and will end in an oligarchy; similarly, not only does an aquiline or snub nose reach the mean, when one of these defects is relaxed, but when it becomes aquiline or snub to excess, it is altered to such an extent that even the likeness of a nose is lost. Moreover, with reference to acts of legislation, it is useful not only to understand what form of government is expedient by judging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but also to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hose in existence in other nations, and to learn what kinds of government are suitable to what kinds of people. It is clear, therefore, that for legislation books of travel are useful, since they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laws of other nations, and for political debates historical works. [1_45] All these things, however, belong to Politics and not to Rhetoric.

考虑到城邦的安全，演说者必须能够对上述问题作出判断，不过，理解立法程序尤其重要，须知城邦的安全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

上的。因此，演说者必须清楚政府的形式有几种；对每一种政体而言什么是有利的；什么因素——无论是某种特定的政体所特有的还是与之相对的——必然会导致政府的灭亡。我说的“被自身特有的因素毁灭”指的是，除了完美的政府形式之外，所有其他的政府形式皆毁灭于过度松散或过度严苛。因此，民主政府不论是在过度松散时，还是在过度严苛时，都会被削弱并最终成为寡头政治；同理，以鹰钩鼻子和塌鼻子为例，不但在这两种缺陷其中的一种减弱时，鼻子的高度会接近平均值，而且在它们各自接近极限时，鼻子的形状也会被扭曲到都不像鼻子了。再者，关于立法行为，不仅要参照过去来弄清楚什么样的政体是有益的，而且还要熟悉其他国家现存的政体，并了解什么样的政府适合什么样的人民。因此，很显然，对立法而言，游记类书籍是很有用的，因为这类书籍能帮助我们理解其他国家的法律；而对政治辩论而言，历史著作是很有用的。不过，这些问题都属于政治学，而不属于修辞学了。

Such, the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s upon which the would-be deliberative orator must be well informed. Now let us again state the sources whence we must derive our arguments for exhortation or discussion on these and other questions.

以上便是未来的议政演说者必须熟知的最重要的议题。接下来，我们将再次说明，对于这些议题及其他议题，我们应该从哪些来源提取进行讨论或规劝的论点。

Chapter 5

第五章

Men, individually and in common, nearly all have some aim, in

the attainment of which they choose or avoid certain things. This aim, briefly stated, is happiness and its component parts. Therefore, for the sake of illustration, let us ascertain what happiness, generally speaking, is, and what its parts consist in; for all who exhort or dissuade discuss happiness and the things which conduce or are detrimental to it. For one should do the things which procure happiness or one of its parts, or increase instead of diminishing it, and avoid doing those things which destroy or hinder it or bring about what is contrary to it.

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几乎都有一个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们会选择或者规避某些事物。这个目标，简言之，就是幸福及其组成部分。为了便于阐述，让我们先确定总体而言幸福是什么，幸福包括哪些组成部分；须知所有进行劝说或劝阻的人都会讨论幸福以及有助于或有损于幸福的事情。要知道人总归应该做能够使人产生幸福感或催生些幸福感的事情，做能增进幸福而不是减少幸福的事情，同时避免做那些损害幸福、阻碍幸福或会招致人们走向不幸的事情。

Let us then define happiness as well-being combined with virtue, or independence of life, or the life that is most agreeable combined with security, or abundance of possessions and slaves, [1_46] combined with power to protect and make use of them; [1_47] for nearly all men admit that one or more of these things constitutes happiness. If, then, such is the nature of happiness, its component parts must necessarily be: noble birth, numerous friends, good friends, wealth, good children, numerous children, a good old age; further, bodily excellences, such as health, beauty, strength, stature, fitness for athletic contests, a good reputation, honor, good luck, virtue. For a man would be entirely independent, provided he possessed all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ods; for there are no others.

Internal goods are those of mind and body; external goods are noble birth, friends, wealth, honor. To these we think should be added certain capacities [1_48] and good luck; for on these conditions life will be perfectly secure. Let us now in the same way define each of these in detail.

我们不妨将幸福定义为安乐加美德，或者生活自足自立，或者舒适且安稳的一生，或者财产及奴隶皆富足有余并有能力保护和使用自己的财产和奴隶；要知道几乎所有人都会承认上述诸因素中的一项或几项正是构成幸福的要素。如果这就是幸福的本质，那么幸福的组成部分必定包括：高贵的出身、众多的朋友、挚友、财富、优秀的子嗣、众多的儿女和安乐的晚年；还包括身体方面的优点，比如健康、美貌、力量、身材和体育竞技素质，此外还有美名、荣誉、好运和美德。要知道如果一个人拥有所有内在和外在的美好，他就会完全自足自立；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内在的美好与心智和身体有关，外在的美好则指高贵的出身、友人、财富和荣誉。此外，我们认为还应该加上某些能力和好运；须知只有这样，生活才能完全无虞。现在，让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来一一界定这些美好。

Noble birth, in the case of a nation or State, means that its members or inhabitants are sprung from the soil, [1_49] or of long standing; that its first members were famous as leaders, and that many of their descendants have been famous for qualities that are highly esteemed. In the case of private individuals, noble birth is derived from either the father's or the mother's side, and on both sides there must be legitimacy; and, as in the case of a State, it means that its founders were distinguished for virtue, or wealth, or any other of the things that men honor, and that a number of famous persons, both men and women, young and old, belong to the family.

高贵的出身，对一个国家或城邦而言，是指其成员发源自其长期居住的土地，或指其先民曾是著名的领袖，并有众多后裔因备受推崇的品质而闻名。对于个人而言，高贵的出身可以来自父亲一方，也可以来自母亲一方，但是双方都必须具有正统的出身；与城邦的情况一样，对个人而言，高贵的出身还意味着家族创始人因美德、财富或为人推崇的其他品质而著称，意味着这个家族拥有众多名人，无论男女或长幼。

The blessing of good children and numerous children needs little explanation. For the commonwealth it consists in a large number of good young men, good in bodily excellences, such as stature, beauty, strength, fitness for athletic contests; the moral excellences of a young man are self-control and courage. For the individual it consists in a number of good children of his own, both male and female, and such as we have described. Female bodily excellences are beauty and stature, their moral excellences self-control and industrious habits, free from servility. [1_50] The object of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of the community should be to secure the existence of each of these qualities in both men and women; for all those States in which the character of women is unsatisfactory, as in Lacedaemon, [1_51] may be considered only half-happy.

优秀的子嗣和众多的儿女所带来的福祉无需太多解释。对于联邦而言，这体现在拥有众多优秀的青年上，这些青年身体素质，比如身材、美貌、力量和体育竞技素质良好，还拥有自律和勇敢等优秀品质。对于个人而言，这体现在其所养育的多个优秀后代身上，如前所述，不论男女。女性身体方面的优点包括美貌和身材，道德方面的优点包括自律、习惯勤勉及不卑不亢。个人和群体所追求的目标都应该是确保上述品质在男女身上均能得以体现；须知那些女性性格欠佳的

城邦，例如古代斯巴达，人们最多会认为他们只拥有一半的幸福。

Wealth consists in abundance of money, ownership of land and properties, and further of movables, cattle, and slaves, remarkable for number, size, and beauty, if they are all secure, liberal, and useful. Property that is productive is more useful, but that which has enjoyment for its object is more liberal. By productive I mean that which is a source of income, by enjoyable that which offers no advantage beyond the use of it—at least, none worth mentioning. Security may be defined as possession of property in such places and on such conditions that the use of it is in our own hands; and ownership as the right of alienation or not, [1_52] by which I mean giving the property away or selling it. In a word, being wealthy consists rather in use than in possession; for the actualization [1_53] and use of such things is wealth.

财富体现在大量的金钱以及土地和房产的所有权上，也体现在拥有动产、家畜和奴隶上，这些东西如果都安稳、自在、有用，就足以夸耀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质量之优。能带来收益的财产更有用；不过以愉悦为功能的财产更随性。我所说的“能带来收益”指的是一种收入的来源；“愉悦”指的是除了本身的用途之外，并无其他益处，至少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益处。“安稳”可以定义为在一些地方拥有房产，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随意使用；“所有权”可以定义为决定是否出让的处置权，即赠与或出售房产的权利。总之，财富体现在使用而不是在拥有上；因为驾驭和使用财产才算是真正的财富。

A good reputation consists in being considered a man of worth by all, or in possessing something of such a nature that all or most men, or the good, or the men of practical wisdom desire it.

一个人的好名声体现在其被公众所认可，或者体现在其拥有所有人或多数人、好人或拥有常识的人都希望获得的品质上面。

Honor is a token of a reputation for doing good; and those who have already done good are justly and above all honored, not but that he who is capable of doing good is also honored. Doing good relates either to personal security and all the causes of existence; or to wealth; or to any other good things which are not easy to acquire, either in any conditions, or at such a place, or at such a time; for many obtain honor for things that appear trifling, but this depends upon place and time. The components of honor are sacrifices, memorials in verse and prose, privileges, grants of land, front seats, public burial, State maintenance, and among the barbarians, prostration and giving place, and all gifts which are highly prized in each country. For a gift is at once a giving of a possession and a token of honor; wherefore gifts are desired by the ambitious and by those who are fond of money, since they are an acquisition for the latter and an honor for the former; so that they furnish both with what they want.

荣誉是善行带来声望的象征；行善之人理当并且尤其应当获得荣誉，而不是有行善能力的人常常受到推崇。大凡行善事，要么涉及个人安全及所有性命攸关的事情，要么涉及财富或是任何条件下在当时当地难以获得的好东西；须知很多人因看似无足轻重的事情获得荣誉，不过这取决于时间和地点。荣誉的组成体现在祭祀、诗文中的纪念、特权、土地的授予、前排的座位、公共葬礼、国家供养以及在各国备受珍视的所有礼物上，在野蛮之邦还包括俯伏和让位。须知礼物既是财物的馈赠，也是荣誉的象征；因此有野心者向往之，恋财物者渴求之。因为对于前者，礼物是荣誉；对于后者，礼物是敛财。总

之，礼物使得两类人各取所需。

Bodily excellence is health, and of such a kind that when exercising the body we are free from sickness; for many are healthy in the way Herodicus [1_54] is said to have been, whom no one would consider happy in the matter of health, because they are obliged to abstain from all or nearly all human enjoyments.

身体方面的优点是健康，也就是在活动身体时没有疾患的困扰；要知道很多人的健康是像传说中的赫洛狄科斯那样的，但是没人会觉得这些人的健康是种幸福，因为他们为获得健康必须戒除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的人类享受。

Beauty varies with each age. In a young man, it consists in possessing a body capable of enduring all efforts, either of the racecourse or of bodily strength, while he himself is pleasant to look upon and a sheer delight. This is why the athletes in the pentathlon [1_55] are most beautiful, because they are naturally adapted for bodily exertion and for swiftness of foot. In a man who has reached his prime, beauty consists in being naturally adapted for the toils of war, in being pleasant to look upon and at the same time awe-inspiring. In an old man, beauty consists in being naturally adapted to contend with unavoidable labors and in not causing annoyance [1_56] to others, thanks to the absence of the disagreeable accompaniments of old age.

美则因年龄而异。对于年轻人来说，美丽表现在拥有能够忍受所有辛劳的身体上，无论是赛跑还是体力的较量，同时让人看上去觉得

赏心悦目。从事铁人五项竞赛的运动员美丽无比，是因为他们能自然地适应体能挑战，且脚步如风。对于成年人来说，美丽体现为能自然地适应征战的苦役，同时看上去很悦目且令人敬畏。对于老年人来说，美丽体现为能自然地适应以对抗各种无法避免的劳作，也体现为疾患没有伴随年老而产生，从而不给其他人添麻烦。

Strength consists in the power of moving another as one wills, for which purpose it is necessary to pull or push, to lift, to squeeze or crush, so that the strong man is strong by virtue of being able to do all or some of these things.

力量体现为随心所欲地移动他物的能力，为此必须拉、推、举、挤、压；强壮者之所以强壮，就在于他们能够做到上述的全部或部分事情。

Excellence of stature consists in being superior to most men in height, depth, and breadth, but in such proportion as not to render the movements of the body slower as the result of excess.

身材方面的优点体现为身高、肢长和肩宽都超过多数人，而且比例得当，不至于因超出常人而动作迟缓。

Bodily excellence in athletics consists in size, strength, and swiftness of foot; for to be swift is to be strong. For one who is able to throw his legs about in a certain way, to move them rapidly and with long strides, makes a good runner; one who can hug and grapple, a good wrestler; one who can thrust away by a blow of the

fist, a good boxer; one who excels in boxing and wrestling is fit for the pancratium, [1_57] he who excels in all for the pentathlon.

运动方面的身体优点体现在体型、力量和脚步的灵活性上；须知迅捷就是强壮。能够以某种方式迈开双腿、快速移动、大步向前的人可以成为跑步好手；能紧抱不舍、扭住不放的人可以成为摔跤好手；能抡拳猛砸的人可以成为拳击好手；而在拳击和摔跤上都技高一筹的人，则适合从事拳击摔跤。至于在所有项目上都出类拔萃的人，当然是适合铁人五项竞赛。

A happy old age is one that comes slowly with freedom from pain; for neither one who rapidly grows old nor one who grows old insensibly but with pain enjoys a happy old age. This also depends upon bodily excellences and good fortune; for unless a man is free from illness and is strong, he will never be free from suffering, nor will he live long and painlessly without good fortune. Apart from health and strength, however, there is a power of vitality in certain cases; for many live long who are not endowed with bodily excellences. But a minute examination of such questions is needless for the present purpose.

安乐的晚年是指慢慢且没有痛苦地变老；须知无论是快速衰老，还是不知不觉间痛苦地老去的人，都无法安享晚年。这（即安乐的晚年）也取决于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好运；须知除非一个人无疾无患、身体强壮，否则他就无法避免病痛；除非有好运降临，否则他就无法长寿，也无法无痛无苦。不过，除健康和力量外，在某些情况下，生命力也很重要；要知道很多身体条件并不优越的人也能长寿。但是我们暂且没有必要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The meaning of numerous and worthy friends is easy to understand from the definition of a friend. A friend is one who exerts himself to do for the sake of another what he thinks is advantageous to him. A man to whom many persons are so disposed, has many friends; if they are virtuous, he has worthy friends.

朋友众多且值得交往的含义参照朋友的定义就很好理解。朋友，指的是竭尽全力为他人做自己认为有益之事的人。能得到多人如此对待的人，自然拥有众多朋友；如果这些朋友都德行良好，他就算是拥有良友。

Good fortune consists in the acquisition or possession of either all, or the most, or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ose goods of which fortune is the cause. Now fortune is the cause of some things with which the arts also are concerned, and also of many which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art, for instance, such as are due to nature (though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results of fortune may be contrary to nature); for art is a cause of health, but nature of beauty and stature. [1_58] Speaking generally, the goods which come from fortune are such as exciting envy. Fortune is also a cause of those goods which are beyond calculation; for instance, a man's brothers are all ugly, while he is handsome; they did not see the treasure, while he found it; the arrow hit one who stood by and not the man aimed at; or, one who frequented a certain place was the only one who did not go there on a certain occasion, while those who went there then for the first time met their death. All such instances appear to be examples of good fortune.

好运气体现为获得或拥有全部的、或多数的或最重要的运气带来的好处。运气既可以带来某些关乎技艺的东西，也可以带来很多与技艺无关的东西，例如各种天然的东西（尽管运气的结果可能违背自然）；须知技艺能带来健康，而美貌和身材则有赖于天赐。一般说来，凭着运气获得的好处都会招致嫉妒。运气还能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好事，例如，某人的兄弟们都相貌丑陋，而他却很英俊；别人都没有发现这笔宝藏，而他发现了；箭射中了站在旁边的人，被瞄准的人却没有被射中；或者一个人总去某个地方，却是在某个时间唯一没去那里的人，而这个时间里那些第一次去的人都丧了命。这些应该都算是好运气的例子。

The definition of virtue, with which the topic of praise is most closely connected, must be left until we come to treat of the latter.

美德同赞扬这一话题联系最密切，其定义必须留到之后我们讨论赞扬的时候再作讲述。

Chapter 6

第六章

It is evident, then, what things, likely to happen or already existing, the orator should aim at, when exhorting, and what when dissuading; for they are opposites. But since the aim before the deliberative orator is that which is expedient, and men deliberate, not about the end, but about the means to the end, which are the things which are expedient in regard to our actions; and since, further, the expedient is good, we must first grasp the elementary notions of good and expedient in general.

在劝说和劝阻时，演讲者显然应该分别瞄准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业已存在的事物，因为它们（即劝说之事和劝阻之事）截然相反。但是因为议政演讲者针对的是有利的事情，而且人们并不是就目的进行磋商，而是就实现目的的手段，即那些对我们的行动来说有利的事情展开争论；再者，有利的就是好的，所以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好”和“有利”一般说来包括哪些基本观念。

Let us assume good to be whatever is desirable for its own sake, or for the sake of which we choose something else; that which is the aim of all things, or of all things that possess sensation or reason; or would be, if they could acquire the latter. Whatever reason might assign to each and whatever reason does assign to each in individual cases, that is good for each; and that whose presence makes a man fit and also independent; and independence in general; and that which produces or preserves such things, or on which such things follow, or all that is likely to prevent or destroy their opposites.

我们不妨假设好事情，即是所有本身令人满意的事情，或者我们会为之选择他物的事情，或者是一切存在所追求的目标，至少是一切有感觉或理性的存在都在追求或意欲追求的目标，如果他们能获得理性的话。理性可能赋予每个人的，以及理性在具体情况下赋予每个人的所有事物，对接受者来说都是好的。此外，其存在能使人健康而自主，而且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自主；其存在能够催生或保留这类好事物，或者使好事情紧随其后，或可能阻止或破坏所有与好事物相对立的事物。

Now things follow in two ways—simultaneously or

subsequently; for instance, knowledge is subsequent to learning, but life is simultaneous with health. Things which produce act in three ways; thus, healthiness produces health; and so does food; and exercise as a rule. This being laid down, it necessarily follows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good things and the loss of evil things are both good; for it follows simultaneously on the latter that we are rid of that which is bad, and subsequently on the former that we obtain possession of that which is good. The same applies to the acquisition of a greater in place of a less good, and a less in place of a greater evil; for in proportion as the greater exceeds the less, there is an acquisition of the one and a loss of the other. The virtues also must be a good thing; for those who possess them are in a sound condition, and they are also productive of good things and practical. However, we must speak separately concerning each—what it is, and of what kind. Pleasure also must be a good; for all living creatures naturally desire it. Hence it follows that both agreeable and beautiful things must be good; for the former produce pleasure, while among beautiful things some are pleasant and others are desirable in themselves.

事物发生的方式不外乎两种，或同时，或先后；例如，知识发生在学习之后，但是生命与健康同时存在。事物产生结果的方式有三种：比如，健康的状态产生健康；食物也产生健康；锻炼一般说来也产生健康。确定了这一点之后，则必然可以说，好事的获得和坏事的失去都是好事情；因为后者意味着我们同时摆脱了坏事，而前者意味着我们随后拥有了好事。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小善的失去和大善的获得，或者大害的失去和小害的获得；因为与大善超过小善、小害超过大害成比例，一方的获取即另一方的失去。美德也肯定是好的，因为拥有美德的人处于健全的状态，而且美德还能带来各种好事情，而且很实用。不过，我们必须分开讨论各种美德：它是什么？属于什么类别？快乐也肯定是好的；须知所有生物都本能地追求快乐。因此，宜

人的东西和漂亮的东西一定是好的；须知前者（即宜人的东西）产生快乐，至于漂亮的东西，其中有的是宜人的，有的本身是人皆向往的。

To enumerate them one by one, the following things must necessarily be good. Happiness, since it is desirable in itself and self-sufficient, and to obtain it we choose a number of things. Justice, courage, self-control, magnanimity, magnificence, and all other similar states of mind, for they are virtues of the soul. Health, beauty, and the like, for they are virtues of the body and produce many advantages; for instance, health is productive of pleasure and of life, wherefore it is thought to be best of all, because it is the cause of two things which the majority of men prize most highly. Wealth, since it is the excellence of acquisition [1_59] and productive of many things. A friend and friendship, since a friend is desirable in himself and produces many advantages. Honor and good repute, since they are agreeable and produce many advantages, and are generally accompanied by the possession of those things for which men are honored. Eloquence and capacity for action; for all such faculties are productive of many advantages. Further, natural cleverness, good memory, readiness to learn, quick-wittedness, and all similar qualities; for these faculties are productive of advantages. The same applies to all the sciences, arts, and even life, for even though no other good should result from it, it is desirable in itself. Lastly, justice, since it is expedient in general for the common weal.

还是将好的事情逐一列举吧，以下事情必定是好的：幸福，因其本身是人人皆向往的和自足的，而且为了获得幸福，我们会做出很多选择。公正、勇气、自律、宽宏、大度以及其他类似的心态都是好的，因为它们均为灵魂的美德。健康、美貌及诸如此类的禀赋也是好

的，因为这些都是身体的优点，并且能产生很多优势；例如，健康能产生快乐和生命；它之所以被视为最好的事物，也正因为它能带来大多数人最为珍视的这两样东西。财富，因为它是聚敛的成就，且能带来众多收益。朋友和友谊，因为朋友本身就是人人皆向往的，而且能够带来众多好处。荣誉和美名，因为它们是令人愉悦的，也能够带来很多好处，而且常有人们引以为荣的东西与之相随。能言善辩和办事干练；须知所有这些能力都能带来诸多优势。另外还有天资聪颖、记忆力好、好学、机敏和其他类似品质；须知这些能力都可以带来很多优势。同样，所有的科学、艺术乃至生命也都是好的，因为就算它们不能产生其他好事情，但其本身已是人人皆向往的。最后，正义也是好的，因为总体而言它有益于公共福利。

These are nearly all the things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good; in the case of doubtful goods, the arguments in their favor are drawn from the following. That is good the opposite of which is evil, or the opposite of which is advantageous to our enemies; for instance, if it is specially advantageous to our enemies that we should be cowards, it is clear that courage is specially advantageous to the citizens. And, speaking gener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our enemies desire or of that in which they rejoice, appears to be advantageous; wherefore it was well said: “Of a truth Priam would exult.“ [1_60]

上面所举几乎穷尽了所有公认的好事情；至于有些存疑的好事情，下面的论述可以为其正名。首先，凡是其对立面是坏的事情，或者其对立面是对敌人有利的事情，它们本身就都是好事情。比如，如果我们的怯懦对敌人大有好处，那么很明显勇气就是对我方民众特别有利的好事情。其次，一般来讲，敌人所希望的事情的对立面，或者他们为之欢呼的事情的对立面，对我们来说也应该是有利的；在这一点上，荷马有一句话说得好：“普里阿摩斯一定会欢呼。”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but only as a general rule, for there is nothing to prevent one and the same thing being sometimes advantageous to two opposite parties; hence it is said that misfortune brings men together, when a common danger threatens them.

但这只是一般规律，事情并不总是如此，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同一种事物有时对于敌我双方都有利；因此，人们常说，当共同的危险来袭时，厄运使人团结。

That which is not in excess [1_61] is good, whereas that which is greater than it should be, is bad. And that which has cost much labor and expense, for it at once is seen to be an apparent good, and such a thing is regarded as an end, and an end of many efforts; now, an end is a good. Wherefore it was said: “And they would (leave Argive Helen for Priam and the Trojans) to boast of,“ [1_62] and, “It is disgraceful to tarry long,“ [1_63] and the proverb, “(to break) the pitcher at the door.“ [1_64]

第三，不过分的事情是好的，如果某一事物超过其应有的份量，它就是不好的。第四，消耗大量劳力和开支的事情是好的，因为首先它显然被视作好事，同时又被视为目的，而且是值得为之大量付出的目的，而目的总是好的。因此，荷马史诗中说：“他们将把希腊的海伦留给普里阿摩斯和特洛伊人去夸耀”，还说：“逗留那么久却无功而返乃是耻辱”，另外还有一句谚语叫做“到了门口摔坏水罐”。

And that which many aim at and which is seen to be competed for by many; for that which all aim at was recognized as a good,

and the majority may almost stand for “all.” And that which is the object of praise, for no one praises that which is not good. And that which is praised by enemies; for if even those who are injured by it acknowledge its goodness, this amounts to a universal recognition of it; for it is because of its goodness being evident that they acknowledge it, just as those whom their enemies praise are worthless. [1_65] Wherefore the Corinthians imagined themselves insulted by Simonides, when he wrote, “Ilium does not blame the Corinthians.“ [1_66]

第五，众人目标之所及和众人为之争斗的事情是好的；须知所有人都向往的事情可被视为好事情，而众人差不多可以代表“所有人”。第六，被赞扬的事情是好的，因为没有人会赞扬不好的东西。第七，被敌人赞扬的事情是好的；因为如果连那些深受其害的人都承认它的好，这就等于说所有人都认可它；要知道正是由于它的好显而易见，敌人才会予以承认，这正如那些为敌人所乐见的人对我方而言毫无价值一样。因此，科林斯人感觉自己被西摩尼得斯羞辱了，因为他写道：“伊利翁不责备科林斯人。”

And that which one of the practically wise or good, man or woman, has chosen before others, as Athene chose Odysseus, Theseus Helen, the goddesses Alexander (Paris), and Homer Achilles.

第八，被精明或睿智的男人或女人优先选中的事情是好的，正如雅典娜选择了奥德修斯，忒修斯选择了海伦，众女神选择了特洛伊王子亚历山大（帕里斯），荷马选择了阿基利斯。

And, generally speaking, all that is deliberately chosen is good. Now, men deliberately choose to do the things just mentioned, and those which are harmful to their enemies, and advantageous to their friends, and things which are possible. The last are of two kinds: things which might happen, [1_67] and things which easily happen; by the latter are meant things that happen without labor or in a short time, for difficulty is defined by labor or length of time. And anything that happens as men wish is good; and what they wish is either what is not evil at all or is less an evil than a good, which will be the case for instance, whenever the penalty attached to it is unnoticed or light. And things that are peculiar to them, or which no one else possesses, [1_68] or which are out of the common; for thus the honor is greater. And things which are appropriate to them; such are all things befitting them in respect of birth and power. And things which they think they lack, however unimportant; for none the less they deliberately choose to acquire them. And things which are easy of accomplishment, for being easy they are possible; such things are those in which all, or most men, or those who are equals or inferiors have been successful. And things whereby they will gratify friends or incur the hatred of enemies. And all things that those whom they admire deliberately choose to do. And those things in regard to which they are clever naturally or by experience; for they hope to be more easily successful in them. And things which no worthless man would approve, for that makes them the more commendable. And things which they happen to desire, for such things seem not only agreeable, but also better. Lastly, and above all, each man thinks those things good which are the object of his special desire, as victory of the man who desires victory, honor of the ambitious man, money of the avaricious, and so in other instances. These then are the materials from which we must draw our arguments in reference to good and the expedient.

第九，一般来说，所有被人们有意选取的事情都是好的。人们会有意选取上述事情，是刚才所提到那些，还有那些对敌人有害而对朋友有益的事情以及那些可能的事情。最后一种包括两类：可能发生的事和容易发生的事；后者指的是不需劳动或者用很短时间就能完成的事情，因为难度是用劳动和所消耗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的。第十，所有如人所愿的事情都是好的；因为人之所愿要么是毫无坏处的事，要么是利大于弊的事，例如，所给的判罚不为人注意或者很轻，便是这情况。第十一，专属自己或者没有其他人拥有或者不寻常的事情是好的；须知这样荣誉会更大。第十二，与己相宜的事情是好的；在出身和权力方面能给人带来利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好事。第十三，人们认为自己缺乏的事情，无论多么不重要，也都是好的；须知不管怎样，人们还是有意选择去获取它们。第十四，容易完成的事情是好的，因为容易，所以可能；这里指的是所有人或多数人或普通人或下等人都已成功做到的事情。第十五，能让朋友开心或者招致敌人仇恨的事情是好的。第十六，受众人崇拜的人有意选取的事情也都是好的。第十七，人们天生擅长或因熟生巧的事情也是好的；须知人们都希望在这些事情上更轻松地获得成功。第十八，无一卑贱者赞许的事情是好的，因为这更彰显了它们的价值。第十九，人们碰巧喜欢的事情是好的，因为这些事情似乎不仅宜人，而且更好。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每个人都将其当作自己特殊欲望的对象的事情是好的，例如胜利之于渴望胜利的人，荣誉之于雄心勃勃的人，金钱之于贪财的人以及其他种种。以上便是我们在论及好的和有利的事情时应该从中提取论点的材料。

Chapter 7

第七章

But since men often agree that both of two things are useful, but dispute which is the more so, we must next speak of the greater

good and the more expedient. Let one thing, then, be said to exceed another, when it is as great and something more—and to be exceeded when it is contained in the other. “Greater” and “more” always imply a relation with less; “great” and “small,” “much” and “little” with the general size of things; the “great” is that which exceeds, and that which falls short of it is “small”; and similarly “much” and “little.” Since, besides, we call good that which is desirable for its own sake and not for anything else, and that which all things aim at and which they would choose if they possessed reason and practical wisdom; and that which is productive or protective of good, or on which such things follow; and since that for the sake of which anything is done is the end, and the end is that for the sake of which everything else is done, and that is good for each man which relatively to him presents all these conditions, it necessarily follows that a larger number of good things is a greater good than one or a smaller number, if the one or the smaller number is reckoned as one of them; [1_69] for it exceeds them and that which is contained is exceeded.

人们通常会认可两种事物都有用，至于哪个更有用，则经常争论不休。因此我们接下来应该讲一讲更好的事物和更有利的事物。当某事物和另一事物一样大且在某一方面有所超出时，我们说该事物超过另一事物；当某事物包含于另一事物时，我们说该事物小于另一事物。“更大”和“更多”总意味着与“较小”和“较少”的比较关系；“大”与“小”、“多”与“少”都关乎事物的一般体积；“大”指的是超过一般体积，不足一般体积的就是“小”；“多”与“少”与此类似。此外，由于我们称之为好事物的事物包括：那些本身（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就吸引人的事物；所有事物都以之为目的的事物；任何拥有理性和实践智慧的生物都会选择的事物；能够催生或者保护好事物的事物，或者好事物与之相随的事物。既然人们为之采取行动的事物就是目标，换言之目标就是人们为之采取行动的事物，而能针对每个个体

提供所有这些相应条件的事物即好事物，那么必然的结论就是较多的好事物胜过一个或者较少的好事物——假如后者被视作前者的一部分的话；须知前者超过后者，而被包含的事物即被另一事物超过。

And if that which is greatest in one class surpass that which is greatest in another class, the first class will surpass the second; and whenever one class surpasses another, the greatest of that class will surpass the greatest of the other. For instance, if the biggest man is greater than the biggest woman, men in general will be bigger than women; and if men in general are bigger than women, the biggest man will be bigger than the biggest woman; for the superiority of classes and of the greatest things contained in them are proportionate. And when this follows on that, but not that on this (then "that" is the greater good); [1_70] for the enjoyment of that which follows is contained in that of the other. Now, things follow simultaneously, or successively, or potentially; thus, life follows simultaneously on health, but not health on life; knowledge follows subsequently on learning (but not learning on knowledge); and simple theft potentially on sacrilege, for one who commits sacrilege will also steal. And things which exceed the same thing by a greater amount (than something else) are greater, for they must also exceed the greater. [1_71] And things which produce a greater good are greater; for this we agreed was the meaning of productive of greater. And similarly, that which is produced by a greater cause; for if that which produces health is more desirable than that which produces pleasure and a greater good, then health is a greater good than pleasure. And that which is more desirable in itself is superior to that which is not; for example, strength is a greater good than the wholesome, which is not desirable for its own sake, while strength is; and, this we agreed was the meaning of a good. And the end is a greater good than the means; for the latter is desirable for

the sake of something else, the former for its own sake; for instance, exercise is only a means for the acquirement of a good constitution. And that which has less need of one or several other things in addition is a greater good, for it is more independent (and “having less need” means needing fewer or easier additions). And when one thing does not exist or cannot be brought into existence without the aid of another, but that other can, then that which needs no aid is more independent, and accordingly is seen to be a greater good.

如果某一类别中的最大者超过另一类别中的最大者，则第一类别超过第二类别；而且只要某一类别超过另一类别，则该类别的最大者一定超过另一类别的最大者。例如，如果体型最大的男人比体型最大的女人大，那么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体型大；如果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体型大，那么体型最大的男人会比体型最大的女人大；须知类别的优势和其所包括的最好成员的优势是成比例的。还有，如果甲物追随在乙物之后，而乙并不追随在甲之后，那么乙是更大的好事物；须知对甲的享受包含于对乙的享受之中。事物的相随关系有三种，即同时、先后或者潜在。比如，生命与健康同时相随，但是健康并不与生命同时相随；知识跟随在学习之后，而不是学习跟随在知识之后；小偷小摸与渎神潜在相随，因为渎神的人也可能偷窃。与其他事物相比，以较大数量超过同一事物者更大，因为这样的事物也必定超过其他较大的事物。能产生更大的好事物者是更好的事物；须知我们都同意这就是“能产生更大的好事物”的意思。与之类似，由更好的因由导致的事物相应也更好；须知如果产生健康的东西比产生快感的东西更令人向往，是更大的好东西，那么健康就是比快感更伟大的好东西。那些本身更吸引人的事物胜过那些本身不那么吸引人的事物；例如，力量是比健康更大的好东西，因为健康本身并不吸引人，而力量则很诱人；而我们都认同这就是好东西的含义。目标是比手段更大的好事物；须知后者是由于其他东西才受人追捧，而前者本身就很诱人；例如，锻炼只是获取健壮体魄的手段，而作为目标的健康则是更大的好东西。那些较少需要其他一种或几种附加物的事物是更大的好事物，

因为它们更加独立（“较少需要”指的是需要的附加物较少或较容易得到）。如果没有其他事物的帮助，某一事物就不存在或者无法产生，而另一事物则可以存在或产生，那么无需帮助的事物更加独立，并因此可被视为更大的好事物。

And if one thing is a first principle, and another not; if one thing is a cause and another not, for the same reason; for without cause or first principle nothing can exist or come into existence. And if there are two first principles or two causes, that which results from the greater is greater; and conversely, when there are two first principles or two causes, that which is the first cause or principle of the greater is greater. It is clear then,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that a thing may be greater in two ways; for if it is a first principle but another is not, it will appear to be greater, and if it is not a first principle (but an end), while another is; for the end is greater and not a first principle. [1_72] Thus,Leodamas, when accusing Callistratus, [1_73] declared that the man who had given the advice was more guilty than the one who carried it out; for if he had not suggested it, it could not have been carried out. And conversely, when accusing Chabrias, he declared that the man who had carried out the advice was more guilty than the one who had given it; for it could not have been carried out, had there not been some one to do so, and the reason why people devised plots was that others might carry them out.

如果某一事物是本原，而另一事物不是，那么前者比后者更好；同样的道理，如果某一事物是因由，而另一事物不是，那么前者比后者更好；须知如果没有因由或本原，则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存在或产生。如果某一事物有两个本原或两个因由，那么由其中较重大的本原或原由所产生的事物更好；反之，如果有两个本原或两个因由，那么

能产生更好的事物的因由或本原更重大。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某物可能在两个方面优于他物：第一，该物是本原而他物不是，则该物似乎会更好；第二，该物不是本原而是目的，而他物是本原，则该物似乎更好；须知目的比本原更重大。所以，勒俄达马斯指控卡利特剌托斯时，声称出谋划策者比实施恶行者更加罪恶深重，因为如果不是他的建议，罪行本来无法实施。与之相反，在指控卡布里阿斯时，他（即勒俄达马斯）认为听从建议实施恶行者比出谋划策者更加罪恶深重；须知如果没有人实施，该恶行就不会发生，而人们之所以策划各种阴谋，正是因为会有人将其付诸行动。

And that which is scarcer is a greater good than that which is abundant, as gold than iron, although it is less useful, but the possession of it is more valuable, since it is more difficult of acquisition.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that which is abundant is to be preferred to that which is scarce, because the use of it is greater, for “often” exceeds “seldom,“; whence the saying: “Water is best.“ [1_74] And, speaking generally, that which is more difficult is preferable to that which is easier of attainment, for it is scarcer; but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that which is easier is preferable to that which is more difficult; for its nature is as we wish. And that, the contrary or the deprivation of which is greater, is the greater good. [1_75] And virtue is greater than non-virtue, and vice than non-vice; for virtues and vices are ends, the others not. And those things whose works are nobler or more disgraceful are themselves greater; and the works of those things, the vices and virtues of which are greater, will also be greater, since between causes and first principles compared with results there is the same relation as between results compared with causes and first principles. Things, superiority in which is more desirable or nobler, are to be preferred; for instance, sharpness of sight is preferable to keenness of smell for sight is better than smell. And loving one's friends more than money

is nobler, whence it follows that love of friends is nobler than love of money.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better and nobler things are, the better and nobler will be their superiority; and similarly, those things, the desire for which is nobler and better, are themselves nobler and better, for greater longings are directed towards greater objects. For the same reason, the better and nobler the object, the better and nobler are the desires.

稀缺的东西比丰富的东西更好，正如金胜过铁，尽管金不如铁有用，但是因为金更难获得，所以更有价值。从另一个角度看，数量巨大的东西胜过稀缺的东西，因为前者用处更大，要知道“经常”胜过“间或”，因此才有这样的谚语：“水乃至善。”一般来说，难以获得的东西比易于获得的东西更受人青睐，因为前者更加稀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易于获得的东西又比难以获得的东西更招人喜欢，须知它的本性符合我们的期望。如果某物的反面或缺失更为重大，则该物是更大的好事物。美德比无德更重大，恶行比无恶行更重大；须知美德和恶行都是目的，而无德和无恶行不是。功效更高尚或更可鄙的事物，本身更重大；其功效所带来的恶行或善行更重大的事物，本身更重大；因为因由和本原与结果的关系和结果与因由及本原的关系相同。如果在某类事物上表现出众是更诱人、更高尚的，那么这类事物也是更可取的；例如，视力敏锐比嗅觉灵敏更可取，因为视觉优于嗅觉。关爱朋友比贪恋钱财更高尚，因此，对朋友的关爱比对钱财的贪恋也更高尚。另一方面，某类事物越好越高尚，其优势也就越好越高尚；与此类似，对某物的欲求越好越高尚，则该物也越好越高尚，因为人们总是更加向往更好的目标。同理，目标越好越高尚，对目标的追求也就越好越高尚。

And when the sciences are nobler and more dignified, the nobler and more dignified are their subjects; for as is the science, so is the truth which is its object, and each science prescribes that

which properly belongs to it; and, by analogy, the nobler and more dignified the objects of a science, the nobler and more dignified is the science itself, for the same reasons. And that which men of practical wisdom, either all, or more, or the best of them, would judge, or have judged, to be a greater good, must necessarily be such, either absolutely or in so far as they have judged as men of practical wisdom. The same may be said in regard to everything else; for the natur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ings are such as would be defined by science and practical wisdom. But our statement only applies to goods; for we defined that as good which everything, if possessed of practical wisdom, would choose; hence it is evident that that is a greater good to which practical wisdom assigns the superiority. So also are those things which better men possess, either absolutely, or in so far as they are better; for instance courage is better than strength. And what the better man would choose, either absolutely or in so far as he is better; thus, it is better to suffer wrong than to commit it, for that is what the juster man would choose. And that which is more agreeable rather than that which is less so; for all things pursue pleasure and desire it for its own sake; and it is by these conditions that the good and the end have been defined. And that is more agreeable which is less subject to pain and is agreeable for a longer time. And that which is nobler than that which is less noble; for the noble is that which is either agreeable or desirable in itself. And all things which we have a greater desire to be instrumental in procuring for ourselves or for our friends are greater goods, and those as to which our desire is least are greater evils. And things that last longer are preferable to those that are of shorter duration, and those that are safer to those that are less so; for time increases the use of the first and the wish that of the second; for whenever we wish, we can make greater use of things that are safe.

各种科学越高尚越有尊严，则其主题也越高尚越有尊严，因为科学如此，其追求的真理也是如此，每门科学都规定了各自恰当的范畴；以此类推，科学所追求的目标越高尚越有尊严，则该科学本身也就越高尚越有尊严，原因同上。凡即将或者已经被全体或多数或最优秀的拥有实践智慧的人认定为更大的好事物者，一定是更大的好事物，要么绝对如此，要么对于那些被判断为拥有实践智慧者如此。其他一切事物莫不如此，因为事物的属性、数量和质量都是由科学和实践智慧界定的。不过我们的陈述仅限于各种好事物；我们将好事物界定为拥有实践智慧的万物均会选择的事物。因此，很显然，实践智慧认定的优越事物是更大的好事物。那些为更优秀的人所拥有的东西是更大的好东西，要么绝对如此，要么对他们而言如此；例如，勇气比力量更好。优秀的人想要选择的东西是更好的东西，要么绝对如此，要么对于优秀的人来说如此；因此，遭受冤屈比制造冤屈要好，因为前者是更正义的人才会选择的。更加宜人的东西，同不甚宜人的东西相比，是更好的东西；因为万物都追求快乐，并且因快乐本身而向往之，而好东西和目的正是由这些条件界定的。不太招致痛苦的东西更讨人喜欢，而且其讨人喜欢的时间也更长。高贵者较之不甚高贵者更好，因为前者本身就讨人喜欢或者令人向往。如果我们更希望某物帮助自己或朋友实现目标，则所有这类事物都是更大的好事物，而我们最不喜欢的东西是较坏的事物。耐久的东西比不耐久的东西更受欢迎，安全的东西比不安全的东西更受欢迎；因为时间增加了第一类东西的用处，而期望增加了第二类东西的用处；须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总能让那些安全的东西发挥更大的用处。

And things in all cases follow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ordinates and similar inflections; for instance, if “courageously” is nobler than and preferable to “temperately,” then “courage” is preferable to “temperance,” and it is better to be “courageous” than “temperate.” And that which is chosen by all is better than that which is not; and that which the majority choose than that which the minority choose; for, as we have said, the good is that which all desire, and

consequently a good is greater, the more it is desired. The same applies to goods which are recognized as greater by opponents or enemies, by judges, or by those whom they select; for in the one case it would be, so to say, the verdict of all mankind, in the other that of those who are acknowledged authorities and experts. And sometimes a good is greater in which all participate, for it is a disgrace not to participate in it; sometimes when none or only a few participate in it, for it is scarcer. And things which are more praiseworthy, since they are nobler. And in the same way things which are more highly honored, [1_76] for honor is a sort of measure of worth; and conversely those things are greater evils, the punishment for which is greater. And those things which are greater than what is acknowledged, or appears, to be great, are greater. And the same whole when divided into parts appears greater, for there appears to be superiority in a greater number of things. [1_77] Whence the poet says that Meleager was persuaded to rise up and fight by the recital of [1_78] "All the ills that befall those whose city is taken; the people perish, and fire utterly destroys the city, and strangers carry off the children."

在任何情况下，事物都遵循语言中的并列与类似的曲折变化的关系；例如，如果"勇敢地"比"克制地"更高尚更可取，那么"勇敢"就比"克制"更可取，而"勇敢的"也要胜过"克制的"。所有人都选择的东西优于不被所有人选择的东西；多数人选择的东西优于少数人选择的东西；因为，如前所述，好东西是所有人向往的，因此，越是被人向往的东西就越好。同理，被敌人或对手、裁决者或者其所选拔的人所看重的东西是更好的东西；原因有二：其一，这可以说是所有人的判断；其二，也可以说是被众人认可的权威和专家所作的判断。有时，所有人参与的事情是更好的事情，因为不参与该事是一种耻辱；有时，没有人或者少有人参与的事情是更好的事情，因其稀缺。还有，更值得赞颂的事物是更好的事物，因为它们更高尚。同理，更受尊崇

的事物也是更好的事物，因为荣誉是衡量价值的一种方式；反之，所受惩罚更重的事物是更坏的事物。如果某事物比公认的或者貌似重大的事物更重大，则该事物更重大。同一个整体被分割成各部分以后，会显得更重大，因为数量较多会显得格外突出。因此，诗人荷马说，墨勒阿革罗斯被如下吟诵所说服，继而奋起斗争："城池失陷，灾祸横行，生灵涂炭，烈焰噬城，异邦人掳掠儿童。"

Combination and building up, as employed by Epicharmus, [1_79] produce the same effect as division,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for combination is an exhibition of great superiority and appears to be the origin and cause of great things. And since that which is harder to obtain and scarcer is greater, it follows that special occasions, ages, places, times, and powers, produce great effects; for if a man does things beyond his powers, beyond his age, and beyond what his equals could do, if they are done in such a manner, in such a place, and at such a time, they will possess importance in actions that are noble, good, or just, or the opposite. Hence the epigram [1_80] on the Olympian victor: "Formerly, with a rough basket [1_81] on my shoulders, I used to carry fish from Argos to Tegea."

同理，组合与叠加，如埃庇卡摩斯所采用的那样，可以产生与分割相同的效果；因为组合能够大大展现其优越性，并且似乎是重大事物的缘起和动因。由于更难获取之物或者稀缺之物是更好的事物，因此特定的机缘、年龄、地点、时间和能力等因素都可以产生巨大影响；须知如果一个人所做之事超越了自己的能力、年龄和同类所及，且他在某时、某地、以某种方式做成了此事，他们在这类高尚、美好、正义的行为或相反的行为中的重要性就会彰显出来。因此，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胜利者有这样的名言："过去，我肩扛粗制的篮子，从阿耳戈斯运鱼到忒格亚"。

And Iphicrates lauded himself, saying, “Look what I started from!” And that which is natural is a greater good than that which is acquired, because it is harder. Whence the poet says: “Self-taught am I.“ [1_82]

伊菲克拉底曾经自诩：“看看我的发迹之处！”天生的好东西胜过后天获得的好东西，因为前者更难获得。因此，诗人荷马说：“我是自学的！”

And that which is the greatest part of that which is great is more to be desired; as Pericles said in his *Funeral Oration* , that the removal of the youth from the city was like the year being robbed of its spring. [1_83] And those things which are available in greater need, as in old age and illness, are greater goods. And of two things that which is nearer the end proposed is preferable. And that which is useful for the individual is preferable to that which is useful absolutely; [1_84] that which is possible to that which is impossible; for it is the possible that is useful to us, not the impossible. And those things which are at the end of life; for things near the end are more like ends.

人们更加向往好东西最好的那部分，这部分较之其他部分更好；正如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中所讲，城邦失去青年人，好比一年被剥夺了春天。在有更大需求的时候能够派上用场的东西是更好的东西，如人在年老和生病时所需求的东西。两件事物之中，越接近所设目标者越好。对个人有用的东西比对所有人有用的东西更好；力所能及的东西比无法企及的东西更好；因为对我们有用的是前者，而非后者。属于人生目标的东西是更好的东西，因为接近目标的东西更像目

标。

And real things are preferable to those that have reference to public opinion, the latter being defined as those which a man would not choose if they were likely to remain unnoticed by others. It would seem then that it is better to receive than to confer a benefit; for one would choose the former even if it should pass unnoticed, whereas one would not choose to confer a benefit, if it were likely to remain unknown. Those things also are to be preferred, which men would rather possess in reality than in appearance, because they are nearer the truth; wherefore it is commonly said that justice is a thing of little importance, because people prefer to appear just than to be just; and this is not the case, for instance, in regard to health.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things that serve several ends; for instance, those that assist us to live, to live well, to enjoy life, and to do noble actions; wherefore health and wealth seem to be the greatest goods, for they include all these advantages. And that which is freer from pain and accompanied by pleasure is a greater good; for there is more than one good, since pleasure and freedom from pain combined are both goods. And of two goods the greater is that which, added to one and the same, makes the whole greater. And those things, the presence of which does not escape notice, are preferable to those which pass unnoticed, because they appear more real; whence being wealthy would appear to be a greater good than the appearance of it. [1_85] And that which is held most dear, sometimes alone, sometimes accompanied by other things, is a greater good. Wherefore he who puts out the eye of a one-eyed man and he who puts out one eye of another who has two, does not do equal injury; [1_86] for in the former case, a man has been deprived of that which he held most dear.

真实的东西比那些关乎民意的东西更好，后者的定义是：如果不为人所知就不会有人选择的东西。如此一来，接受恩惠似乎比给予恩惠更好；因为即使不为人所知，人们也会选择前者，而如果可能不为人知，人们通常不会选择后者。人们更愿意实际拥有而不是表面上拥有的东西更好，因为这些东西更接近真理；之所以人们常说公正是微不足道的事物，就是因为人们更愿意表现得公正，而不是真正做到公正；比如，人们对健康的态度就并非如此公正。同理，那些有助实现多个目标的东西是更好的东西；例如，那些有助于我们生存、生活富足、享受生活以及行高尚之事的东西，就是好东西；健康和财富之所以看起来是最好的东西，就是因为它们都具备这些优点。远离痛苦且伴随快乐的东西是更大的好东西；因为这里的好不只一种，快乐和远离痛苦本身也都是好的，结合之后更佳。两件好东西中，添加到同一事物之上能使整体更好者，是更好的东西。不会被人忽视的东西比那些不为人所知的东西更好，因为前者显得更真实；这就是为什么富裕要比貌似富裕更好。那些在单独存在或有他物相伴时均被人珍视的东西，是更大的好东西。挖掉独眼人的那只独眼和挖去健全人的双目之一所造成的伤害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独眼人被剥夺了他最珍视的东西。

Chapter 8

第八章

These are nearly all the topics from which arguments may be drawn in persuading and dissuading; but the most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of all the means of persuasion and good counsel is to know all the forms of government and to distinguish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of each; for all men are guided by considerations of expediency, and that which preserves the State is expedient. Further, the declaration of the authority is authoritative, [1_87] and the different kinds of authority are

distinguished according to forms of government; in fact, there are as many authorities as there are forms of government.

上文所述差不多穷尽了在劝说和劝阻时可资提取论点的所有部目。不过在所有劝说和进谏手段当中，最重要、最有效的是了解全部的政体，区分各政体的风俗、习惯、机构和利益；因为人皆趋利而动，而能保护城邦政体的政策才是有利的。再者，掌权者的敕令具有权威性，不同种类的掌权者可按照不同的政体进行区分。事实上，有多少种政体，就有多少种掌权者。

Now,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government, democracy, oligarchy, aristocracy, monarchy, so that the supreme and deciding authority is always a part or the whole of these. Democracy is a for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offices are distributed by the people among themselves by lot; in an oligarchy, by those who possess a certain property-qualification; in an aristocracy, by those who possess an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 meaning an education that is laid down by the law. In fact, in an aristocracy, power and office are in the hands of those who have remained faithful to what the law prescribes, and who must of necessity appear best, whence this form of government has taken its name. In a monarchy, as its name indicates, one man alone is supreme over all; if it is subject to certain regulations, it is called a kingdom; if it is unlimited, a tyranny.

政体有四种，即民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和君主制，因此，拥有决策权的最高掌权者总是这些政体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在民主制政体下，官员职位由人民通过抽签的方法来分配；在寡头制下，由掌握一定财产资格的人来分配；在贵族制下，由拥有某种教育资格的人来分

配，这里的教育资格指的是法律规定的教育。事实上，在贵族制下，权力与职位掌握在遵纪守法的人手中，这些人必须表现得最好，这种体制也因此而得名。在君主制下，如其名所示，只有一人至高无上。如果君主权力受到某些规定的约束，这种体制就被称为“王国”；如果其权力不受约束，就被称为“专制”。

Nor should the end of each form of government be neglected, for men choose the things which have reference to the end. Now, the end of democracy is liberty, of oligarchy wealth, of aristocracy things relating to education and what the law prescribes, …, [1_88] of tyranny self-protection. It is clear then that we must distinguish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of each form of government, since it is in reference to this that men make their choice. But as proofs are established not only by demonstrative, but also by ethical argument—since we have confidence in an orator who exhibits certain qualities, such as goodness, goodwill, or both—it follows that we ought to be acquainted with the characters of each form of government; for, in reference to each, the character most likely to persuade must be that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it. These characters will be understood by the same means; for characters reveal themselves in accordance with moral purpose, and moral purpose has reference to the end.

各种政体的目的也不应该被忽视，因为人们往往选择那些与目的有关的东西。民主制的目的是自由，寡头制的目的是财富，贵族制的目的是与教育及法律规定有关的事物，专制的目的是自保。很明显，我们必须区分各种政体的风俗、习惯、机构和利益，因为人们的选择正是针对这些而作出的。但是，由于证据的确立不仅依赖推理论证，而且依赖道德论证，因为我们对那些表现出优秀、善意或兼具二者的演讲者有信心，所以我们应该熟悉每种政体的特点；因为就各种政体

而言，最具说服力的特点必然是其最典型的特点。我们将依据这些特点来理解各种政体的特点；因为特点体现在相应的道德目的上，而道德目的与政体的目标有关。

We have now stated what things, whether future or present, should be the aim of those who recommend a certain course; from what topics they should derive their proofs of expediency; further, the ways and means of being well equipped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racters and institutions of each form of government, so far as wa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 occasion; for the subject has been discussed in detail in the *Politics* . [1_89]

至此，我们已经叙述了哪些事情（现在的也好，未来的也好）应该成为进言者的目标；也叙述了进言者应该从哪些部目来为所言之事提取论据；还叙述了掌握各种政体的特点和政府制度的方式和途径，当然，只是在本书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个话题已经在《政治学》中详细讨论过了。

Chapter 9

第九章

We will next speak of virtue and vice, of the noble and the disgraceful, since they constitute the aim of one who praises and of one who blames; for, when speaking of these, we shall incidentally bring to light the means of making us appear of such and such a character, which, as we have said, is a second method of proof; for it is by the same means that we shall be able to inspire confidence in ourselves or others in regard to virtue. But since it happens that

men, seriously or not, often praise not only a man or a god but even inanimate things or any ordinary animal, we ought in the same way to make ourselves familiar with the propositions relating to these subjects. Let us, then, discuss these matters also, so far as may serve for illustration.

下面我们将讨论美德与恶德、高尚与可耻，因为它们是人们褒贬的目标。讨论这些的时候，我们会顺便介绍能使我们表现出某种品质或与之类似的品质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如上所述，就是第二种论证方法；须知激发听众对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美德的信任也依赖于同样的方法。既然人们不仅经常颂扬人或神祇，甚至颂扬无生命的事物或者普通动物，真心也好，假意也罢，那么我们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去熟悉这些话题的相关命题。接着，我们不妨就此做一番讨论，来具体论证这一话题。

The noble, then, is that which, being desirable in itself is at the same time worthy of praise, or which, being good, is pleasant because it is good. If this is the noble, then virtue must of necessity be noble, for, being good, it is worthy of praise. Virtue, it would seem, is a faculty of providing and preserving good things, a faculty productive of many and great benefits, in fact, of all things in all cases. [1_90] The components of virtue are justice, courage, self-control, magnificence, magnanimity, liberality, gentleness, practical and speculative wisdom. The greatest virtues are necessarily those which are most useful to others, if virtue is the faculty of conferring benefits. For this reason justice and courage are the most esteemed, the latter being useful to others in war, the former in peace as well. Next is liberality, for the liberal spend freely and do not dispute the possession of wealth, which is the chief object of other men's desire. Justice is a virtue which assigns to each man his du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law; injustice claims what belongs to others, in opposition to the law. Courage makes men perform noble acts in the midst of dangers according to the dictates of the law and in submission to it; the contrary is cowardice. Self-control is a virtue which disposes men in regard to the pleasures of the body as the law prescribes; the contrary is licentiousness. Liberality does good in many matters; the contrary is avarice. Magnanimity is a virtue productive of great benefits; the contrary is little-mindedness. Magnificence is a virtue which produces greatness in matters of expenditure; the contraries are little-mindedness and meanness. Practical wisdom is a virtue of reason, which enables men to come to a wise decision in regard to good and evil things, which have been mentioned as connected with happiness. [1_91]

高尚的事情是那些本身令人向往且同时值得表扬的事情，或者是那些本身就是好的并因此令人愉悦的事情。如果高尚者如斯，那么美德就一定是高尚的，因为美德因其好而值得颂扬。美德应该是一种能够提供和保存各种好东西的能力，一种能够产生许多较大益处的能力。事实上，美德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产生一切事物。美德包括公正、勇气、自律、大度、宽宏、慷慨、谦和、实践智慧和思辨智慧。如果美德是施惠的能力的话，最大的美德必然是那些对他人最有用的美德。因此，在所有美德中，公正和勇气最受推崇，因为在战争中后者对他人有用，而在和平年代，前者对他人也有用。其次就是慷慨，因为慷慨者随心付出，不为财富的归属而争执，而财富正是他人最想要的东西。作为一种美德，公正指的是依法给予每个人应得之物；而不公正则是违法占有属于别人的东西。勇气使置身险境的人依法顺法行高尚之事；怯懦则与其相反。作为一种美德，自律帮助人们把肉体的享乐置于法律规约之内；放荡则与其相反。慷慨使人们乐善好施；贪婪则与其相反。作为一种美德，宽宏能产生诸多大益处；狭隘则与其相反。大度作为一种美德，能够使人们在花钱时表现出大气；狭隘和吝啬则与其相反。作为一种理性的美德，实践智慧能让人明辨以上所

讲的种种关乎幸福的善恶之事，并做出明智的决定。

Concerning virtue and vice in general and their separate parts, enough has been said for the moment. To discern the rest [1_92] presents no difficulty; for it is evident that whatever produces virtue, as it tends to it, must be noble, and so also must be what comes from virtue; for such are its signs and works. But since the signs of virtue and such things as are the works and sufferings of a good man are noble, it necessarily follows that all the works and signs of courage and all courageous acts are also noble.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just things and of just actions; (but not of what one suffers justly; for in this alone amongst the virtues that which is justly done is not always noble, and a just punishment is more disgraceful than an unjust punishment). The same applies equally to the other virtues. Those things of which the reward is honor are noble; also those which are done for honor rather than money. Also, those desirable things which a man does not do for his own sake; things which are absolutely good, which a man has done for the sake of his country, while neglecting his own interests; things which are naturally good; and not such as are good for the individual, since such things are inspired by selfish motives.

至此，关于美德和恶德之整体及各自的组成，我们已做了充分介绍。要明辨余下的内容并不困难；须知所有能产生美德的事情，因其趋近美德，所以它们显然是高尚的，而产生于美德的事情显然也是高尚的，因为这些恰恰是美德的标志和影响。不过，既然美德的标志和诸如好人的影响及苦难遭遇这类的事情都是高尚的，那么勇气及所有勇敢行为（作为美德的一种），其影响和标志也必然是高尚的。公正的事情和公正的行为也是如此；（不过一个人理应遭受的惩罚则并非如此，因为在所有公正实施的美德当中，只有这个并不总是高尚的，

而且得到公正的惩罚比得到不公正的惩罚更加可耻）。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其他美德。能得到荣誉奖赏的事情是高尚的，为了荣誉而非钱财所做的事情也是高尚的；还有非为私利所做的好事也是高尚的；纯粹的好事，即不顾个人利害、为国家所做的好事是高尚的；天性即为好的事情也是高尚的。但仅对个人有益的事情则不是高尚的，因为这些事情受自私动机的驱动。

And those things are noble which it is possible for a man to possess after death rather than during his lifetime, for the latter involve more selfishness; all acts done for the sake of others, for they are more disinterested; the successes gained, not for oneself but for others; and for one's benefactors, for that is justice; in a word, all acts of kinds, for they are disinterested. And the contrary of those things of which we are ashamed; for we are ashamed of what is disgraceful, in words, acts, or intention; as, for instance, when Alcaeus said: “I would fain say something, but shame holds me back,“ [1_93] Sappho rejoined: “Hadst thou desired what was good or noble, and had not thy tongue stirred up some evil to utter it, shame would not have filled thine eyes; but thou would'st have spoken of what is right.“ [1_94]

死后（而非此生）才可能拥有的东西是高尚的，因为在世的时候拥有的东西会更多地涉及私利；为他人所做的事情是高尚的，因为这些事情更无私；为他人而非自己取得的成功是高尚的；为自己的捐助人所做的事情是高尚的，因为这就是公正之所在；总之，所有善行都是高尚的，因为它们都不关乎个人私利。还有，与我们引以为耻之事相反的事情是高尚的，因为令我们感到羞耻的都是可鄙的事情，包括言语、行为或意图；例如，当阿尔凯奥斯说：“我想说点什么，但是羞耻心让我说不出口。”萨福回答道：“如果你追求美好或者高尚的东西，如果你的舌头不曾激发邪恶进而念叨它，你的眼里就不会充盈着

羞耻，你就会说出恰当的话。”

Those things also are noble for which men anxiously strive, but without fear; for men are thus affected about goods which lead to good repute. Virtues and actions are nobler, when they proceed from those who are naturally worthier, for instance, from a man rather than from a woman. It is the same with those which are the cause of enjoyment to others rather than to ourselves; this is why justice and that which is just are noble. To take vengeance on one's enemies is nobler than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m; for to retaliate is just, and that which is just is noble; and further, a courageous man ought not to allow himself to be beaten. Victory and honor also are noble; for both are desirable even when they are fruitless, and are manifestations of superior virtue. And things worthy of remembrance, which are the more honorable the longer their memory lasts; those which follow us after death; those which are accompanied by honor; and those which are out of the common. Those which are only possessed by a single individual, because they are more worthy of remembrance. And possessions which bring no profit; for they are more gentlemanly. Customs that are peculiar to individual peoples and all the tokens of what is esteemed among them are noble; for instance, in Lacedaemon it is noble to wear one's hair long, for it is the mark of a gentleman, the performance of any servile task being difficult for one whose hair is long. And not carrying on any vulgar profession is noble, for a gentleman does not live in dependence on others.

人们一无所惧、急于实现的事情是高尚的；须知人们就是这样被能够带来好名声的事情所影响的。那些生而尊贵者所拥有的美德和行为更加高尚，例如，出自男人的行为和美德会更加高尚，而不是女人

的。同样，能为他人而不是自己带来快乐的事情也更加高尚，这就是为什么公正和公正的事情是高尚的。向敌人寻仇要比同敌人和解更高尚，因为复仇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情是高尚的；再者，勇敢者也不应该容许自己被打败。胜利和荣誉也是高尚的，因为两者即使是徒劳，也都是令人向往的，且彰显了高贵的美德。值得铭记的事情是高尚的，被人铭记越久，就越尊贵；肉身消逝之后仍然留存的事情是高尚的；有荣誉相伴的事情是高尚的；不同寻常的事情是高尚的。被一人独有的事情是高尚的，因为这样的事情更值得铭记。不带来收益的财富是高尚的，因为这样的财富更温文尔雅。某些民族独有的风俗习惯以及代表该民族尊崇之物的所有符号都是高贵的；例如，在古代斯巴达，蓄长发是高贵的，因为这是绅士的标志，留着长发的人很难从事任何卑贱的劳作。不从事任何粗俗行当是高贵的，因为绅士不依赖他人而生活。

We must also assume, for the purpose of praise or blame, that qualities which closely resemble the real qualities are identical with them; for instance, that the cautious man is cold and designing, the simpleton good-natured, and the emotionless gentle. And in each case we must adopt a term from qualities closely connected, always in the more favorable sense; for instance, the choleric and passionate man may be spoken of as frank and open, the arrogant as magnificent and dignified; those in excess as possessing the corresponding virtue, [1_95] the fool-hardy as courageous, the recklessly extravagant as liberal. For most people will think so, and at the same time a fallacious argument may be drawn from the motive; for if a man risks his life when there is no necessity, much more will he be thought likely to do so when it is honorable; and if he is lavish to all comers, the more so will he be to his friends; for the height of virtue is to do good to all. We ought also to consider in whose presence we praise, for, as Socrates said, it is not difficult to praise Athenians among Athenians. [1_96] We ought also to speak

of what is esteemed among the particular audience, Scythians, Lacedaemonians, or philosophers, [1_97] as actually existing there. And, generally speaking, that which is esteemed should be classed as noble, since there seems to be a close resemblance between the two. [1_98] Again, all such actions as are in accord with what is fitting are noble; if, for instance, they are worthy of a man's ancestors or of his own previous achievements; for to obtain additional honor is noble and conduces to happiness. Also, if the tendency of what is done is better and nobler, and goes beyond what is to be expected; for instance, if a man is moderate in good fortune and stout-hearted in adversity, or if, when he becomes greater, he is better and more forgiving. Such was the phrase of Iphicrates: “Look what I started from!“ [1_99] and of the Olympian victor: “Formerly, with a rough basket on my shoulders, I used to carry fish from Argos to Tegea.“ [1_100] and of Simonides: “Daughter, wife, and sister of tyrants.“ [1_101]

为了褒奖或谴责，我们还必须假定凡酷似真实的品质等同于真实品质；例如，审慎之人会表现得冷漠且工于算计；单纯之人会表现得性格淳良；平和之人会表现得温文尔雅。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应该从那些联系密切的品质中选取一个更具褒义的词汇：例如，对于暴躁而感情用事的人，不妨用坦率和豪爽等字眼；对于傲慢自大的人，不妨说成大度和威严；再就是把过度的方面说成对应的优点：例如，对于蛮干的人，不妨说成勇敢；对于挥霍无度者，不妨说成慷慨。须知大多数人就是这样认为的。此外，人们也可能从动机中推断出站不住脚的论断：例如，如果一个人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惜生命，那么在人们认为不惜生命是高尚之举时他更有可能这样做；同样，如果一个人对所有来者都很慷慨，那么人们也会认为他对朋友将更加慷慨；总之，美德的最高境界就是为所有人做善事。我们还应该考虑当着谁的面进行表扬，因为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在雅典人中间表扬雅典人并不困难。我们还应该讨论为特定观众所推崇且确实存在的事情，例

如，锡西厄人、古代斯巴达人或哲学家等。一般而言，被人们推崇的事情应被列为高尚的事情，因为二者看起来极为相似。再者，所有合适的行为都是高尚的，比如，能够配得上自己的祖先或者已有成就的行为就是高尚的；须知获取额外的荣誉是高尚的，而且能够带来幸福感。如果已做的事情趋向于更好更高尚，并且超过人们的期望，那么它就是高尚的；例如，如果某人在顺境中是谦谦君子，在逆境中坚忍不拔；或者如果某人地位越高，反而越善良越宽容，那么他就是高尚的。正如伊菲克拉底所说："看看我的发迹之处吧！"又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胜利者所说："过去，我肩扛粗制的篮子，从阿耳戈斯运鱼到忒格亚。"又如西摩尼得斯所说："她是暴君的女儿，暴君的妻子，暴君的姐妹。"

Since praise is founded on actions, and acting according to moral purpose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worthy man, we must endeavor to show that a man is acting in that manner, and it is useful that it should appear that he has done so on several occasions. For this reason also one must assume that accidents and strokes of good fortune are due to moral purpose; for if a number of similar examples can be adduced, they will be thought to be signs of virtue and moral purpose.

因为表扬是基于行为的，而按照道德目的行事乃是可敬之人的特点，所以我们在演说中应该努力证明某人是按照道德目的行事的；如果能说明他曾经多次如此行事，也很有用。因此，演说者还得假定各种巧合和好运也是出于道德目的发生的；如果能够举出多个类似的例子，那么这些例子就可被视作美德和道德目的的标志。

Now praise is language that sets forth greatness of virtue; hence it is necessary to show that a man's actions are virtuous. But

encomium deals with achievements—all attendant circumstances, such as noble birth and education, merely conduce to persuasion; for it is probable that virtuous parents will have virtuous offspring and that a man will turn out as he has been brought up. Hence we pronounce an encomium upon those who have achieved something. Achievements, in fact, are signs of moral habit; for we should praise even a man who had not achieved anything, if we felt confident that he was likely to do so. Blessing and felicitation are identical with each other, but are not the same as praise and encomium, which, as virtue is contained in happiness, are contained in felicitation.

表扬是用语言展示美德之伟大，因此，演说者有必要说明某人的行为富含美德。但是颂词讲的是成就及其所有的附带情况，如高贵的出身和所受的教养等，仅能协助演讲人进行说服，须知品行端正的父母很有可能养育出品行端正的后代，而且一个人的言行会反映其教养的优劣。因此，我们只为那些有所建树的人作颂词。成就其实就是道德习惯的标志；为此，如果我们觉得某人很可能有所建树，即使他尚无任何成就，我们也应该颂扬他。祝福和祝贺类似，但是二者与表扬和颂词不同，正如美德属于幸福，表扬和颂词属于祝贺。

Praise and counsels have a common aspect; for what you might suggest in counseling becomes encomium by a change in the phrase. Accordingly, when we know what we ought to do and the qualities we ought to possess, we ought to make a change in the phrase and turn it, employing this knowledge as a suggestion. For instance, the statement that “one ought not to pride oneself on goods which are due to fortune, but on those which are due to oneself alone,” when expressed in this way, has the force of a suggestion; but expressed thus, “he was proud, not of goods which

were due to fortune, but of those which were due to himself alone," it becomes praise. Accordingly, if you desire to praise, look what you would suggest; if you desire to suggest, look what you would praise. The form of the expression will necessarily be opposite, when the prohibitive has been changed into the non-prohibitive. [1_102]

表扬和劝告有一个共同之处；须知在劝告的措辞上稍作修改，它便可成为赞颂之词。因此，当我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后，就应该在演讲中改变措辞，运用这些知识进言献策。例如，“人不应该以运气所赐自居，而应以自身努力所获为荣”这句话，如果表达如上，就有劝谏之意；但是如果表述如下：“他不以运气所赐自居，而以自身努力所获为荣”，这句话就成了表扬。因此，如果想要进行表扬，不妨先看看你会提出忠告；如果想要提出忠告，不妨先看看你会如何进行表扬。当禁止之意变成了非禁止之意，表述的方式必然相反。

We must also employ many of the means of amplification; for instance, if a man has done anything alone, or first, or with a few, or has been chiefly responsible for it; all these circumstances render an action noble. Similarly, topics derived from times and seasons, that is to say, if our expectation is surpassed. Also, if a man has often been successful in the same thing; for this is of importance and would appear to be due to the man himself, and not to be the result of chance. And if it is for his sake that distinctions which are an encouragement or honor have been invented and established; and if he was the first on whom an encomium was pronounced, as Hippolochus, [1_103] or to whom a statue was set up in the market-place, as to Harmodius and Aristogiton. [1_104] And similarlyin opposite cases. If he does not furnish you with enough material in

himself, you must compare him with others, as Isocrates used to do, because of his inexperience [1_105] of forensic speaking. And you must compare him with illustrious personages, for it affords ground for amplification and is noble, if he can be proved better than men of worth. Amplification is with good reason ranked as one of the forms of praise, since it consists in superiority, and superiority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are noble. That is why, if you cannot compare him with illustrious personages, you must compare him with ordinary persons, since superiority is thought to indicate virtue. Speaking generally, of the topics common to all rhetorical arguments, amplification is most suitable for epideictic speakers, whose subject is actions which are not disputed, so that all that remains to be done is to attribute beauty and importance to them. Examples are most suitable for deliberative speakers, for it is by examination of the past that we divine and judge the future. Enthymemes are most suitable for forensic speakers, because the past, by reason of its obscurity, above all lends itself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causes and to demonstrative proof. Such are nearly all the materials of praise or blame, the things which those who praise or blame should keep in view, and the sources of encomia and invective; for when these are known their contraries are obvious, since blame is derived from the contrary things.

我们还应该使用多种能增强表达效果的铺陈手段；例如，说一个人独自完成了某事，或者说是某人第一次完成了某事，或者说其与少数人一起完成了某事，或者说那人在某事中扮演主要角色等等，这些情况的铺陈都可以使某种行为变得高尚。同样，我们还可以从时代或契机的角度进行铺陈，也就是说，如果某种行为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的话，我们可以这么做。此外，如果一个人在某件事情上总是取得成功，那这一点就值得大书特书；须知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应该归于这个人自身，而不是归于偶然性。还有，如果人们为了某人而创造或确

立了各种荣誉以资鼓励或奖赏，那这就是值得铺陈的；如果他是人们第一个用颂词赞颂的人，如希波罗科斯，或者如果他的塑像被树立在集市上，如哈摩狄俄斯和阿里斯托格通，那这也是值得铺陈的。与上述情况相反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你要表扬的人能够提供给你的素材不够多，你就应该把他与其他人作比较，正如伊索克拉底过去所做的那样，因为他不善于诉讼演讲。而且你最好把他与杰出人士相比，因为这样能够为铺陈提供依据，同时如果确实能论证他优于其他可敬之人的话，那这种做法也是高妙的。铺陈无疑是一种表扬方式，因为它能展示表扬对象的卓越，而卓越是一种高贵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无法将某人与杰出人士相提并论的话，你就应该把此人与普通人相比，因为即使只比普通人卓越也会被视为一种美德。总而言之，在所有修辞论证的共有部目中，铺陈最适合宣德演说者，他们的话题事关毫无争议的行为，因此只需要为之加上美感和重要性即可。举例是最适合议政演讲者的方式，因为正是通过审视过去，我们才能推测和判断未来。省略推理法最适合诉讼演讲者，因为过去的情况不甚明晰，最适合探究原因，进行推理论证。以上，我们几乎穷尽了颂扬或谴责所涉及的全部素材，颂扬者或谴责者应该了解的事情以及赞誉和诋毁的根源，因为在人们了解了有关颂扬的这些知识之后，就很清楚与它们的对立的事情了，而谴责就源自它们的对立面。

Chapter 10

第十章

We have next to speak of the number and quality of the propositions of which those syllogisms are constructed which have for their object accusation and defence. Three things have to be considered; first, the nature and the number of the motives which lead men to act unjustly; secondly, what is the state of mind of those who so act; thirdly, the character and dispositions of those who are exposed to injustice. We will discuss these questions in

order, after we have first defined acting unjustly.

我们接下来讲一讲构成三段论命题，以控告和辩护为目的的数量和性质。有三点必须厘清：第一，诱使人们行不义之事的动机是何性质以及数量多少；第二，行不义之事者的思维状态；第三，遭遇不义之事者的品格和性情。在界定了不义之事后，我们将依次探讨这些问题。

Let injustice, then, be defined as voluntarily causing injury contrary to the law. Now, the law is particular or general. By particular, I mean the written law in accordance with which a state is administered; by general, the unwritten regulations which appear to be universally recognized. Men act voluntarily when they know what they do, and do not act under compulsion. What is done voluntarily is not always done with premeditation; but what is done with premeditation is always known to the agent, for no one is ignorant of what he does with a purpose. [1_106] The motives which lead men to do injury and commit wrong actions are depravity and incontinence. For if men have one or more vices, it is in that which makes him vicious that he shows himself unjust; for example, the illiberal in regard to money, the licentious in regard to bodily pleasures, the effeminate in regard to what makes for ease, [1_107] the coward in regard to dangers, for fright makes him desert his comrades in peril; the ambitious in his desire for honor, the irascible owing to anger, one who is eager to conquer in his desire for victory, the rancorous in his desire for vengeance; the foolish man from having mistaken ideas of right and wrong, the shameless from his contempt for the opinion of others. Similarly, each of the rest of mankind is unjust in regard to his special weakness.

我们可以将不义之事定义为违反法律、有意造成伤害的行为。而法律又分为特别法与普通法。我这里说的特别法，指的是以其为依据来治理邦国的成文法；普通法指的是看似被普遍认可的不成文法。如果人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且不是出于强迫而做，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是自发的。自愿为之的事情并不总是有预谋的，但是有预谋而为之的事一定是肇事者明知的，因为没有人会对自己有目的而为之的事情一无所知。诱使人造成伤害和做错事的动机则是堕落和无节制。因为如果人有一种或多种恶德，他的不义之处就会体现在使其变得邪恶的恶德上；比如，吝啬者之于金钱，放荡者之于肉体享乐，柔弱者之于安逸，怯懦者之于危险（因为恐惧使他抛弃身处险境的同伴），野心勃勃者之于对荣耀的觊觎，暴躁者之于愤怒，醉心征服者之于对胜利的渴求，怀恨者之于复仇的欲望，愚蠢者之于对是非的误判，无耻者之于对他人看法的无视。同样，其他人也都可能由于各自的弱点而成为不义之人。

This will be perfectly clear, partly from what has already been said about the virtues, and partly from what will be said about the emotions. It remains to state the motives and character of those who do wrong and of those who suffer from it. First, then, let us decide what those who set about doing wrong long for or avoid; for it is evident that the accuser must examine the number and nature of the motives which are to be found in his opponent; the defendant, which of them are not to be found in him. Now, all human actions are either the result of man's efforts or not. Of the latter some are due to chance, others to necessity. Of those due to necessity, some are to be attributed to compulsion, others to nature, so that the things which men do not do of themselves are all the result of chance, nature, or compulsion. As for those which they do of themselves and of which they are the cause, some are the result of habit, others of longing, and of the latter some are due to rational, others to irrational longing. Now wish is a (rational)

longing for good, for no one wishes for anything unless he thinks it is good; irrational longings are anger and desire. Thus all the actions of men must necessarily be referred to seven causes: chance, nature, compulsion, habit, reason, anger, and desire.

根据我们已讲的关于美德的部分内容，以及我们将要讲的部分关于情感的内容，这一点将再清楚不过了。剩下的就是探讨行不义之事的人以及受其伤害之人的动机和性格。下面我们首先确定图谋不轨者希望获得或避免什么；因为很显然，原告必须分析对方可能具有的动机的数目和性质；而被告则必须分析其中哪些自己并没有。因为所有的人类活动，要么是有意为之，要么是无意为之。在后一种情况中，有些是出于机缘，有些则是出于必然。而在那些出于必然的事情中，有些是出于强迫，有些则出于本性，因此人们并非主动为之的事情都是三种因由所导致的结果，即机缘、本性或强迫。至于人们自发为之的事情以及以他们为因由的事情，有些是习惯所致，其他则是渴求的结果，而在后者中，有些是出于理性的渴求，其他的则是出于非理性的渴求。希望是对好东西的理性渴求，因为除非一个人认为某件东西是好的，否则他不会希望获得这件东西。非理性的渴求则包括愤怒和欲望。总之，人类的所有行为必定可以归结为七种因由：机缘、本性、强迫、习惯、理性、愤怒和欲望。

But it is superfluous to establish further distinctions of men's acts based upon age, moral habits, or anything else. For if the young happen to be [1_108] irascible, or passionately desire anything, it is not because of their youth that they act accordingly, but because of anger and desire. Nor is it because of wealth or poverty; but the poor happen to desire wealth because of their lack of it, and the rich desire unnecessary pleasures because they are able to procure them. Yet in their case too it will not be wealth or poverty, but desire, that will be the mainspring of their action. Similarly, the

just and the unjust, and all the others who are said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moral habits, will act from the same causes, either from reason or emotion, but some from good characters and emotions, and others from the opposite. Not but that it does happen that such and such moral habits are followed by such and such consequences; for it may be that from the outset the fact of being temperate produces in the temperate man good opinions and desires in the matter of pleasant things, in the intemperate man the contrary. Therefore we must leave these distinctions on one side, but we must examine what are the usual consequences of certain conditions. For, if a man is fair or dark, tall or short, there is no rule that any such consequences should follow, but if he is young or old, just or unjust, it does make a difference. In a word,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take account of all the circumstances that make men's characters different; for instance, if a man fancies himself rich or poor, fortunate or unfortunate, it will make a difference. We will, however, discuss this later; [1_109] let us now speak of what remains to be said here.

不过，根据年龄、道德习惯或者其他标准来进一步区分人的行为就是多余的了。因为即使年轻人性情暴躁或欲念强烈，他们相应的行为也不是因为年轻，而是出于愤怒和欲望。这也不是富裕或贫穷所致，虽然穷人难免会因为缺少财富而渴望财富，富人也会因为有能力获得奢侈的享乐而对此有欲求和渴望。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人们行为的主要诱因并不是财富或贫穷，仍然是欲望。同样，正义之人和不义之人以及其他所谓凭自己的道德习惯行事之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行事，要么是理性，要么是情感，只不过有些人是出于良好的品性和情感，而其他人则是出于相反的品性和情感。但是，并不是说某种道德习惯碰巧导致了某种结果；须知或许从一开始节制就可以让节制之人对愉悦之事产生好的想法和欲望，而让无节制之人产生相反的想法和欲望。因此，我们有必要暂时撇开这些区别，但是稍后必须

考察某些条件一般会导致什么结果。因为一个人是白还是黑，是高还是矮，并不一定导致任何结果，但他是年轻还是年长，正义还是不正义，则会产生影响。总之，我们有必要考虑塑造人们不同性格的所有因素；比如，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富还是穷，是幸运还是不幸，都会对其性格有所影响。但是，这一点我们后文再说，现在我们接着讲本章未尽之内容。

Things which are the result of chance are all those of which the cause is indefinite, those which happen without any end in view, and that neither always, nor generally, nor regularly. The definition of chance will make this clear. Things which are the result of nature are all those of which the cause is in themselves and regular; for they turn out always, or generally, in the same way. As for those which happen contrary to nature there is no need to investigate minutely whether their occurrence is due to a certain force of nature or some other cause (it would seem, however, that such cases also are due to chance). Those things are the result of compulsion which are done by the agents themselves in opposition to their desire or calculation. Things are the result of habit, when they are done because they have often been done. Things are the result of calculation which are done because, of the goods already mentioned, they appear to be expedient either as an end or means to an end, provided they are done by reason of their being expedient; for even the intemperate do certain things that are expedient, for the sake, not of expediency, but of pleasure. Passion and anger are the causes of acts of revenge. Bu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revenge and punishment; the latter is inflicte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sufferer, the former in the interest of him who inflicts it, that he may obtain satisfaction. We will define anger when we come to speak of the emotions. [1_110] Desire is the cause of things being done that are apparently pleasant. The things which are

familiar and to which we have become accustomed are among pleasant things; for men do with pleasure many things which are not naturally pleasant, when they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them.

机缘所致之事包括原因不明确的事情，预期不到结果的事情以及并不总是发生但经常发生或有规律发生的事情。机缘的定义可以使这一点更明晰。须知本性所致之事，即其因由在于自身且有规律的事情总是或经常以同样的方式发生。至于违背本性而发生的事情，我们不需要详细分析其是出于某种本性的力量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但这种情形看起来也是机缘所致）。强迫所致之事指的是当事人亲自为之但违背了自己的欲望或预想的事情。习惯所致之事即人们因为经常所做之事。预想所致之事，指的是人们做这些事是作为目的或者作为达到目的的途径，这些事对于前文所述的种种好事是有利的，只要人们做这些事是因为认识到其用处；要知道无节制之人甚至也会为了享乐（而不是为了利益）而做某些有利之事。冲动和愤怒是报复行为的因由。但是报复和惩罚之间有一点不同：后者的实施是为了实现受罚者的利益，而前者的实施则是为了实现报复者的利益，即获得满足。关于愤怒，我们将留待下文讨论情感时再做界定。欲望是人们做一些貌似令人愉悦之事的因由。我们熟悉且做惯了的事是令人愉悦之事；因为有些事虽然本身并不令人愉悦，但是一旦人们习以为常，就会愉快地去做。

In short, all things that men do of themselves either are, or seem, good or pleasant; and since men do voluntarily what they do of themselves, and involuntarily what they do not, it follows that all that men do voluntarily will be either that which is or seems good, or that which is or seems pleasant. For I reckon among good things the removal of that which is evil or seems evil, or the exchange of a greater evil for a less, because these two things are in a way

desirable; in like manner, I reckon among pleasant things the removal of that which is or appears painful, and the exchange of a greater pain for a less. We must therefore make ourselves acquainted with the number and quality of expedient and pleasant things. We have already spoken of the expedient when discussing deliberative rhetoric; [1_111] let us now speak of the pleasant. And we must regard our definitions as sufficient in each case, provided they are neither obscure nor too precise.

简而言之，人们主动做的事情要么是好的或愉悦的，要么看起来是好的或愉悦的；而且既然人们主动做的事情都是自愿为之，不主动做的事情都非自愿为之，那么很显然，所有人们自愿为之的事情都要么是好的或令人愉悦的，要么看起来是好的或令人愉悦的。我认为好事包括去除恶行或者那些看似恶行的事件，或者以程度更甚之恶换取程度较浅之恶，因为这两种事情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可取的；同样，我认为令人愉悦之事包括去除那些痛苦的或看似痛苦的东西，或者以程度更甚之痛换取程度较轻之痛。因此，我们必须熟悉有利和愉悦之事的数量和性质。我们在讨论议政修辞时已经讲过有利之事，接下来我们说说愉悦之事。还有，只要我们所下的定义既不模糊，也不过度精确，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认为自己所下的定义已然十分完善。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Let it be assumed by us that pleasure is a certain movement of the soul, a sudden and perceptible settling down into its natural state, and pain the opposite. If such is the nature of pleasure, it is evident that that which produces the disposition we have just

mentioned is pleasant, and that that which destroys it or produces the contrary settling down is painful. Necessarily, therefore, it must be generally pleasant to enter into a normal state (especially when what is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state has come into its own again); [1_112] and the same with habits. For that which has become habitual becomes as it were natural; in fact, habit is something like nature, for the distance between “often” and “always” is not great, and nature belongs to the idea of “always,” habit to that of “often.” That which is not compulsory is also pleasant, for compulsion is contrary to nature. That is why what is necessary is painful, and it was rightly said, “For every act of necessity is disagreeable.“ [1_113]

让我们将愉悦理解为灵魂的一种运动，一种突然的、能够感觉到的灵魂回归本真状态的运动。痛苦则与此相反。如果这是愉悦的本质，那么显而易见，能够产生上述状态的事物就是令人愉悦的，而破坏上述状态或产生相反状态的事物就是痛苦的。因此，一般而言，进入正常状态一定是令人愉悦的（尤其是在按照该状态所做之事，再次回到其自然状态时）；习惯也是如此。须知已成习惯之事似乎也会变得自然。其实，习惯是一种类似本性的东西，因为“经常”和“总是”的差距并不大，本性属于“总是”的范畴，习惯则属于“经常”范畴。未经强迫所做之事也是令人愉悦的，因为强迫是违背本性的。正因如此，必做之事总是令人痛苦的。有个说法很有道理：“每件必做之事都令人苦恼”。

Application, study, and intense effort are also painful, for these involve necessity and compulsion, if they have not become habitual; for then habit makes them pleasant. Things contrary to these are pleasant; wherefore states of ease, idleness, carelessness, amusement, recreation, [1_114] and sleep are among pleasant things, because none of these is in any way compulsory. Everything of

which we have in us the desire is pleasant, for desire is a longing for the pleasant.

发奋勤勉、求学研究和异常努力也都是令人痛苦的，因为它们都包含必要和强迫的成分，如果这些事情尚未成为习惯的话，因为习惯可以使它们变得令人愉悦。与此相反的事是令人愉悦的；因此，闲适、慵懒、无忧、消遣、娱乐、睡眠等状态都令人愉悦，因为这些没有一件是属于强迫性的。我们自身对其怀有欲望的所有事情都是愉悦的，因为欲望就是对愉悦之事的向往。

Now, of desires some are irrational, others rational. I call irrational all those that are not the result of any assumption. [1_115] Such are all those which are called natural; for instance, those which come into existence through the body—such as the desire of food, thirst, hunger, the desire of such and such food in particular; the desires connected with taste, sexual pleasures, in a word, with touch, smell, hearing, and sight. I call those desires rational which are due to our being convinced; for there are many things which we desire to see or acquire when we have heard them spoken of and are convinced that they are pleasant.

而有些欲望是无理性的，有些是理性的。我所指的无理性的欲望是那些未经任何思考而产生的欲望。所谓的自然的欲望都属此列；比如，因肉体而生的欲望，包括食物、饥渴等此类欲望或此类对某种具体食物的欲望，还包括与味觉和性欲相关的欲望；总之，一切与触觉、味觉、听觉和视觉相关的欲望，都属于自然欲望。我说的理性的欲望指的是我们被劝服后产生的欲望；因为当听说并相信某些事物令人愉悦时，我们就会想要看到或得到它们。

And if pleasure consists in the sensation of a certain emotion, and imagination is a weakened sensation, then both the man who remembers and the man who hopes will be attended by an imagination of what he remembers or hopes. [1_116] This being so, it is evident that there is pleasure both for those who remember and for those who hope, since there is sensation. Therefore all pleasant things must either be present in sensation, or past in recollection, or future in hope; for one senses the present, recollects the past, and hopes for the future. Therefore our recollections are pleasant, not only when they recall things which when present were agreeable, but also some things which were not, if their consequence subsequently proves honorable or good; whence the saying: “Truly it is pleasant to remember toil after one has escaped it,“ [1_117] and, “When a man has suffered much and accomplished much, he afterwards takes pleasure even in his sorrows when he recalls them.“ [1_118]

再者，如果愉悦是对某种情感的感知，而想象是一种弱化了的感知，那么心存回忆或期望的人，总会有其回忆或期望之事所激发的想象相伴。这样的话，很显然，心存回忆或期望的人都是愉悦的，因为在回忆和期望中存在着感知。因此，所有愉悦之事一定是感知中的当下，或回忆中的过去，或期望中的将来；须知人可以感知当下，回忆过去，期望将来。因此，我们的回忆是愉悦的，不仅在于它们会唤起当初发生就令人愉悦的事，还在于它们也会唤起一些当初并不令人愉悦之事，只要这些事的结果后来证明是高尚的或美好的；因此人们才会说：“摆脱苦难以后再回忆苦难，确是一件愉悦之事。”还有人说：“若饱受苦难而成就非凡，则日后回忆起来，悲伤也变成愉悦。”

The reason of this is that even to be free from evil is pleasant. Things which we hope for are pleasant, when their presence seems

likely to afford us great pleasure or advantage, without the accompaniment of pain. In a word, all things that afford pleasure by their presence as a rule also afford pleasure when we hope for or remember them. Wherefore even resentment is pleasant, as Homer said of anger that it is “Far sweeter than dripping honey;“ [1_119] for no one feels resentment against those whom vengeance clearly cannot overtake, or those who are far more powerful than he is; against such, men feel either no resentment or at any rate less.

这是因为即使只是摆脱苦难也是令人愉悦的。我们所期望的事也是愉悦的，只要它们的存在看起来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快乐和利益，而不是伴随着痛苦。总之，凡是在发生之时即能带来快乐之事，一般而言，在我们期望或回忆时，也会带来快乐。因此，连愤恨也是愉悦的，正如荷马在谈及愤怒时所说，“它比欲滴的蜂蜜更加甘甜”；因为没有人会对显然不可能被报复的人或者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怀有愤恨之情；对这两种人，人们要么没有愤恨之情，要么即使有，程度也比较轻。

Most of our desires are accompanied by a feeling of pleasure, for the recollection of a past or the hope of a future pleasure creates a certain pleasurable enjoyment; thus, those suffering from fever and tormented by thirst enjoy the remembrance of having drunk and the hope that they will drink again. The lovesick always take pleasure in talking, writing, or composing verses [1_120] about the beloved; for it seems to them that in all this recollection makes the object of their affection perceptible. Love always begins in this manner, when men are happy not only in the presence of the beloved, but also in his absence when they recall him to mind. This is why, even when his absence is painful, there is a certain amount of pleasure even in mourning and lamentation; for the pain is due

to his absence, but there is pleasure in remembering and, as it were, seeing him and recalling his actions and personality. Wherefore it was rightly said by the poet; “Thus he spake, and excited in all a desire of weeping.“ [1_121]

我们的大多数欲望都伴随着愉悦的感觉，因为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愉悦之事的期望都能带来某种愉悦的体验；因此，受发烧和口渴折磨之人会因为回忆起曾经的畅饮和期望再次畅饮而感到快乐。遭受相思之苦的人总会因为谈论、书写或创作怀念爱人之诗而感到快乐；因为对他们而言，回忆能使他们感受到钟爱的对象。爱总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即人们不但能在与爱人相处时感到快乐，而且当爱人不在而回忆起爱人时也会感到快乐。正因如此，虽然爱人不在是痛苦的，但是即使是在悲恸和哀伤中也有一点快乐的成分；因为痛苦是由于爱人不在，但在回忆起爱人时，恍如爱人就在眼前，对方的举止和品貌都历历在目，这是有一种快乐存在的。因此，诗人荷马才这样言之凿凿：“他这样一说，就激起了众人哭泣的欲望。”

And revenge is pleasant; for if it is painful to be unsuccessful, it is pleasant to succeed. Now, those who are resentful are pained beyond measure when they fail to secure revenge, while the hope of it delights them. Victory is pleasant, not only to those who love to conquer, but to all; for there is produced an idea of superiority, which all with more or less eagerness desire. And since victory is pleasant, competitive and disputatious [1_122] amusements must be so too, for victories are often gained in them; among these we may include games with knuckle-bones, ball-games, dicing, and draughts. It is the same with serious sports; for some become pleasant when one is familiar with them, while others are so from the outset, such as the chase and every description of outdoor sport; for rivalry implies victory. It follows from this that practice in the

law courts and disputation are pleasant to those who are familiar with them and well qualified. Honor and good repute are among the most pleasant things, because every one imagines that he possesses the qualities of a worthy man, and still more when those whom he believes to be trustworthy say that he does. Such are neighbors rather than those who live at a distance; intimate friends and fellow-citizens rather than those who are unknown; contemporaries rather than those who come later; the sensible rather than the senseless; the many rather than the few; for such persons are more likely to be trustworthy than their opposites. As for those for whom men feel great contempt, such as children and animals, they pay no heed to their respect or esteem, or, if they do, it is not for the sake of their esteem, but for some other reason.

报复也是令人愉悦的；因为如果报复失败是痛苦的，那么报复成功就是快乐的。所以，心怀愤恨之人，如果未能实施报复，是无比痛苦的，但是对报复的期待却能带给他快乐。胜利是令人愉悦的，不仅对好胜之人如此，对所有人都是如此；因为胜利会产生一种优越感，而所有人或多或少都会期望获得这种感觉。再者，既然胜利是令人愉悦的，那么竞技和争辩游戏一定也是如此，因为胜利常常在这类游戏中产生；这些游戏可能包括玩羊骨、打球、掷骰子和下跳棋。严肃的体育运动也是如此；因为有些运动在熟练了之后就是令人愉悦的，而有些从一开始就是令人愉悦的，比如狩猎和所有的户外运动；因为对抗孕育着胜利。由此亦可推知，法庭辩论和争辩对熟悉和擅长此道之人来说也是令人愉悦的。荣耀和美名属于最令人愉悦的事物，因为每个人都会幻想自己具有正人君子的品格，尤其是当他所信赖的人这样称赞他时。人们信赖的这些人包括近邻而非远客、密友和同胞而非陌生人、同时代的人而非后来者、有见识的人而非荒唐的人、多数人而非少数人；因为前一类人可能比后一类人更值得信任。至于人们极度轻视的人，比如孩童和牲畜，人们并不在乎他们的尊敬或赞誉，或者即使在乎，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赞誉，而是因为一些别的原因。

A friend also is among pleasant things, for it is pleasant to love [1_123] —for no one loves wine unless he finds pleasure in it—just as it is pleasant to be loved; for in this case also a man has an impression that he is really endowed with good qualities, a thing desired by all who perceive it; and to be loved is to be cherished for one's own sake. And it is pleasant to be admired, because of the mere honor. Flattery and the flatterer are pleasant, the latter being a sham admirer and friend. It is pleasant to do the same things often; for that which is familiar is, as we said, pleasant. Change also is pleasant, since change is in the order of nature; for perpetual sameness creates an excess of the normal condition; whence it was said: “Change in all things is sweet.“ [1_124] This is why what we only see at intervals, whether men or things, is pleasant; for there is a change from the pres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rare. And learning and admiring are as a rule pleasant; for admiring implies the desire to learn, so that what causes admiration is to be desired, and learning implies a return to the normal. [1_125] It is pleasant to bestow and to receive benefits; the latter is the attainment of what we desire, the former the possession of more than sufficient means, [1_126] both of them things that men desire. Since it is pleasant to do good, it must also be pleasant for men to set their neighbors on their feet, and to supply their deficiencies. And since learning and admiring are pleasant, all things connected with them must also be pleasant; for instance, a work of imitation, such as painting, sculpture, poetry, and all that is well imitated, even if the object of imitation is not pleasant; for it is not this that causes pleasure or the reverse, but the inference that the imitation and the object imitated are identical, so that the result is that we learn something.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sudden changes and narrow escapes from danger; for all these things excite wonder. And since that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 is pleasant, and things which are akin are

akin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 all things akin and like are for the most part pleasant to each other, as man to man; horse to horse, youth to youth. This is the origin of the proverbs: “The old have charms for the old, the young for the young”, “Like to like” [1_127] , “Beast knows beast”,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1_128] and all similar sayings.

朋友也是令人愉悦的，因为爱别人是令人愉悦的，须知除非喝酒时能感到快乐，否则没有人会爱酒，正如被爱也是令人愉悦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即爱别人），人会认为自己的确具有良好品质，这是所有能感受到的人都期望获得的一种体验；而被爱意味着因自身而被人珍惜。再者，被仰慕也是令人愉悦的，因为这意味着独特的荣耀。阿谀和阿谀者也是令人愉悦的，后者是伪装出来的仰慕者和朋友。经常做同一件事是令人愉悦的，因为如前所述，熟悉之事是令人愉悦的。变化也是令人愉悦的，因为变化符合自然规律；须知长久不变会致使人超出正常状态，因此有人说：“所有事物的变化都是甜美的。”正因如此，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才能看到的人或物是令人愉悦的，因为这给现状带来了改变，而同时这种改变又不常见。再者，求知和仰慕一般而言也是令人愉悦的；须知仰慕意味着求知的欲望，所以人们渴求能引发其仰慕之物，而求知意味着回归本真状态。施惠和受惠是令人愉悦的；后者意味着得到我们渴求之物，前者意味着拥有财物且有富余，二者都是人们所渴求的。既然行善是令人愉悦的，那么扶助邻居并给予对方所缺之物，一定也是令人愉悦的。再者，既然求知和仰慕是令人愉悦的，那么与之相关的所有事情一定也是令人愉悦的；比如，摹仿的作品，包括绘画、雕塑、诗歌以及所有摹仿得很好的作品，是令人愉悦的，即使摹仿的对象并不令人愉悦；因为带来愉悦或与其相反的情绪的并不是摹仿的对象，而是这一结论，即摹仿品和被仿者完全相同，总之结果是我们学有所获。这些也适用于突变和脱险，因为二者皆可激发惊奇之情。再者，既然符合本性之事是令人愉悦的，而事物之所以同类皆是因其本性类似，那么所有同类和类似之物对彼此而言大抵也是使之愉悦的，比如人对人，马对马，年轻

人对年轻人。这正是——“老娱老，少娱少”、“物以类聚”、“兽兽相识”、“鸟以群分”等类似的谚语的来源。

And since things which are akin and like are always pleasant to one another, and every man in the highest degree feels this in regard to himself, it must needs be that all men are more or less selfish; for it is in himself above all that such conditions [1_129] are to be found. Since, then, all men are selfish, it follows that all find pleasure in what is their own, such as their works and words. That is why men as a rule are fond of those who flatter and love them, of honor, and of children; for the last are their own work. It is also pleasant to supply what is wanting, [1_130] for then it becomes our work. And since it is most pleasant to command, it is also pleasant to be regarded as wise [1_131] for practical wisdom is commanding, and philosophy consists in the knowledge of many things that excite wonder. Further, since men are generally ambitious, it follows that it is also agreeable to find fault with our neighbors. And if a man thinks he excels in anything, he likes to devote his time to it; as Euripides says: “And allotting the best part of each day to that in which he happens to surpass himself, he presses eagerly towards it.“ [1_132] Similarly, since amusement, every kind of relaxation, and laughter are pleasant, ridiculous things—men, words, or deeds—must also be pleasant. The ridiculous has been discussed separately in the *Poetics* [1_133] . Let this suffice for things that are pleasant; those that are painful will be obvious from the contraries of these.

再者，既然同类和类似之物对彼此而言总是使之愉悦的，而每个人最大程度地都在自己身上感受到这一点，那么必然能得出的结论就是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是自私的，因为上述情况首先存在于每个人自身之中。既然所有人都是自私的，那么与此相应，所有人都会因自己的

一切，诸如作品和言语，而感到愉悦。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般都喜欢阿谀奉承和喜爱自己的人，喜欢荣耀，喜欢孩子；因为孩子恰是他们自己的作品。补足匮乏的东西也是令人愉悦的，因为这样一来它就成了我们自己的成就。再者，既然指挥他人是非常令人愉悦的，那么被认为拥有智慧也是令人愉悦的，因为实践智慧可以用来号令他人，而哲学智慧在于知晓很多能激发人们惊奇之情的事物。另外，既然人们一般都是有野心的，那么对邻居吹毛求疵也是令人愉快的。再者，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擅长某事，他就会乐于在上面花费时间；正如欧里庇得斯所说："他把每天最好的时光投在自己碰巧能力超群的事情上，并为之付出热切的努力。"同样，既然娱乐、各种消遣以及欢笑都是令人愉悦的，那么可笑的事物、人、言语或者行为也一定是令人愉悦的。可笑之事在《诗学》中已经单独探讨过。关于愉悦之事，我们就讲到这里。至于痛苦之事，从其对立面进行思考即可明晰。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Such are the motives of injustice; let us now state the frame of mind of those who commit it, and who are the sufferers from it. Men do wrong when they think that it can be done and that it can be done by them; when they think that their action will either be undiscovered, or if discovered will remain unpunished; or if it is punished, that the punishment will be less than the profit to themselves or to those for whom they care. As for the kind of things which seem possible or impossible, we will discuss them later, [1_134] for these topics are common to all kinds of rhetoric. Now men who commit wrong think they are most likely to be able to do so with impunity, if they are eloquent, business-like, experienced in judicial trials, if they have many friends, and if they are wealthy. They think there is the greatest chance of their being able to do so, if

they themselves belong to the above classes; if not, if they have friends, servants, or accomplices who do; for thanks to these qualities they are able to commit wrong and to escape discovery and punishment. Similarly, if they are friends of those who are being wronged, or of the judges; for friends are not on their guard against being wronged and, besides, they prefer reconciliation to taking proceedings; and judges favor those whom they are fond of, and either let them off altogether or inflict a small penalty.

以上就是人们行不义之事的各种动机；现在我们来讲行不义之事者的心态以及遭受不义之事的是哪些人。人们行不义之事时，要么认为这件事能做且能由他们来做；要么认为他们的行为不会被发现，或者即使被发现了也不会受到惩罚，或者即使被惩罚，也会小于他们自己或他们所在意的人将得到的益处。至于那些看似可能或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谈，因为这些部目适用于所有的修辞类型。行不义之事者认为，在以下条件下他们最有可能如此行事而不被惩罚：如果他们口才好、效率高且精于诉讼，或者如果他们朋友众多，财富众多。他们认为如果自己属于上述类别，就最有可能行不义之事而不被惩罚；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的朋友、仆人或同伴属于上述类别亦可；因为依靠这些条件，他们也能够行不义之事而不被发现和惩罚。与此相似，如果他们是受害者或者法官的朋友亦可；因为朋友对不义之事没有防备，而且朋友更愿意和解，而不是起诉；而法官则偏袒自己喜欢的人，要么将其赦免，要么从轻处罚。

Those are likely to remain undetected whose qualities are out of keeping with the charges, for instance, if a man wanting in physical strength were accused of assault and battery, or a poor and an ugly man [1_135] of adultery. Also, if the acts are done quite openly and in sight of all; for they are not guarded against, because no one would think them possible. Also, if they are so great and of

such a nature that no one would even be likely to attempt them, for these also are not guarded against; for all guard against ordinary ailments and wrongs, but no one takes precautions against those ailments from which no one has ever yet suffered. And those who have either no enemy at all or many; the former hope to escape notice because they are not watched, the latter do escape because they would not be thought likely to attack those who are on their guard and because they can defend themselves by the plea that they would never have attempted it. [1_136] And, those who have ways or places of concealment for stolen property, or abundant opportunities of disposing of it. And those who, even if they do not remain undetected, can get the trial set aside or put off, or corrupt the judges. And those who, if a fine be imposed, can get payment in full set aside or put off for a long time, or those who, owing to poverty, have nothing to lose. And in cases where the profit is certain, large, or immediate, while the punishment is small, uncertain, or remote. And where there can be no punishment equal to the advantages, as seems to be the case in a tyranny. And when the unjust acts are real gains and the only punishment is disgrace; and when, on the contrary, the unjust acts tend to our credit, for instance, if one avenges father or mother, as was the case with Zeno, [1_137] while the punishment only involves loss of money, exile, or something of the kind. For men do wrong from both these motives and in both these conditions of mind; but the persons are not the same, and their characters are exactly opposite. [1_138] And those who have often been undetected or have escaped punishment; and those who have often been unsuccessful; for in such cases, as in actual warfare, there are always men ready to return to the fight. And all who hope for pleasure and profit at once, while the pain and the loss come later; such are the intemperate, intemperance being concerned with all things that men long for. And when, on the contrary, the pain or the loss is immediate, while the pleasure

and the profit are later and more lasting; [1_139] for temperate and wiser men pursue such aims. And those who may possibly be thought to have acted by chance or from necessity, from some natural impulse or from habit, in a word, to have committed an error rather than a crime. And those who hope to obtain indulgence; and all those who are in need, which is of two kinds; for men either need what is necessary, as the poor, or what is superfluous, as the wealthy. And those who are highly esteemed or held in great contempt; the former will not be suspected, the latter no more than they are already.

那些与被诉人的特质不相符的人也较有可能行不义之事而不被发现，比如，一个体弱者被控暴力殴打，或者一个贫穷之人或丑陋之人被控通奸。再者，如果不义之事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也较有可能不被发现；因为人们对其没有防备，没人认为它们有发生的可能。再者，如果它们（即不义之事）极为恶劣，性质超常，以至于没有人会尝试去做，它们也比较可能不被发现，因为人们不会提防这类事情。须知所有人都会提防普通的病痛和不义之事，但是没有人会谨防未曾有人遭受过的病痛。没有敌人或敌人众多之人也有可能行不义之事。前者有望躲过别人的注意，因为没有人监视他们；后者则的确能躲过别人的注意，因为别人不会认为他们会去攻击那些早有防范的敌人，再说他们还可以利用自己不可能有此企图作为托词来为自己辩护。那些有途径或地方藏匿赃物或者有很多销赃手段的人以及那些即使被发现也能驳回或拖延诉讼或者能收买法官的人，也都有可能行不义之事。那些即使被处以罚款也能够对其长期置之不理或拖延缴款的人，或者那些由于贫穷而不会有任何损失的人，也有可能行不义之事。在利益明确、巨大且能即刻兑现，而惩罚微小、不确定或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人们亦可能行不义之事。在没什么惩罚能比得过获益的情况下，人们亦可能行不义之事，暴政下的情形就是如此。当不义之事能带来切实的利益，而唯一的惩罚只是坏名声；或者与此相反，当不义之事可以使我们受到赞誉，比如芝诺为父亲或母亲报仇，而惩罚不过

是罚款、放逐或者其他的类似处罚，人们亦可能行不义之事。总之人们在这两种情形下，出于这些动机（即为了利益无视毁誉，或为了荣誉无视惩罚）都可能行不义之事；但是这两种情形下的人是不同的，其性格是完全相反的。此外，那些常常不被发现或躲过惩罚的人，还有那些常常失手的人，也可能行不义之事；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在真实的战争中一样，总有人愿意再试试身手。还有所有希望即刻获得享乐和利益，而认为痛苦和损失稍后才会出现的人，亦可能行不义之事；无节制之人就是这样，他们的无节制涉及人们渴求的所有东西。在相反的情况下，即痛苦或损失就在眼前，而享乐和利益来得较晚但更长久时，人们也可能行不义之事；比如自律者和智者就追求这样的目标，即吃苦在先，享乐在后。还有一些人，人们会认为他们行不义之事是出于偶然、不得已或是某种自然的冲动或习惯，总之，人们会认为他们是犯了错误而不是罪行，这样的人亦有可能行不义之事。还有那些希望得以放纵的人以及一切有所需求的人，都有可能行不义之事，这样的人分两种：要么需要必需品，如穷人；要么需要奢侈品，如富人。那些声望极高或名誉扫地的人，亦有可能行不义之事；前者不会被怀疑，后者已经被轻贱，也就不会更糟了。

In such a frame of mind men attempt to do wrong, and the objects of their wrongdoing are men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following kind. [1_140] Those who possess what they themselves lack, things either necessary, or superfluous, or enjoyable; both those who are far off and those who are near, for in the one case the gain is speedy, in the other reprisals are slow, as if, for instance, Greeks were to plunder Carthaginians. [1_141] And those who never take precautions and are never on their guard, but are confiding; for all these are easily taken unawares. And those who are indolent; for it requires a man who takes pains to prosecute. And those who are bashful; for they are not likely to fight about money. And those who have often been wronged but have not prosecuted, being, as the proverb says, “Mysian booty.“ [1_142] And those who have never, or

those who have often, suffered wrong; for both are off their guard, the one because they have never yet been attacked, the others because they do not expect to be attacked again. And those who have been slandered, or are easy to slander; for such men neither care to go to law, for fear of the judges, nor, if they do, can they convince them; to this class belong those who are exposed to hatred or envy. And those against whom the wrongdoer can pretend that either their ancestors, or themselves, or their friends, have either committed, or intended to commit, wrong either against himself, or his ancestors, or those for whom he has great regard; for, as the proverb says, "evil-doing only needs an excuse." And both enemies and friends; for it is easy to injure the latter, and pleasant to injure the former. And those who are friendless. And those who are unskilled in speech or action; for either they make no attempt to prosecute, or come to terms, or accomplish nothing. And those to whom it is no advantage to waste time waiting for the verdict or damages, such as strangers or husbandmen; for they are ready to compromise on easy terms and to drop proceedings. And those who have committed numerous wrongs, or such as those from which they themselves are suffering; for it seems almost an act of justice that a man should suffer a wrong such as he had been accustomed to make others suffer; if, for instance, one were to assault a man who was in the habit of outraging others. [1_143] And those who have already injured us, or intended, or intend, or are about to do so; for in such a case vengeance is both pleasant and honorable, and seems to be almost an act of justice. And those whom we wrong [1_144] in order to ingratiate ourselves with our friends, or persons whom we admire or love, or our masters, in a word, those by whom our life is ruled. And those in reference to whom there is a chance of obtaining merciful consideration. [1_145] And those against whom we have a complaint, or with whom we have had a previous difference, as Callippus acted in the matter of Dion; [1_146] for in such cases it

seems almost an act of justice. And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attacked by others, if we do not attack first, since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to deliberate; thus, Aenesidemus is said to have sent the prize in the game of cottabus to Gelon, [1_147] who, having reduced a town to slavery, had anticipated him by doing what he had intended to do himself. And those to whom, after having injured them, we shall be enabled to do many acts of justice, in the idea that it will be easy to repair the wrong; as Jason the Thessalian [1_148] said one should sometimes commit injustice, in order to be able also to do justice often.

在上述所列心态下，人们会试图行不义之事，而遭受不义之事的是如下的人和情形。那些拥有心怀不轨者所缺物品的人，不管是必需品、奢侈品还是享乐之物，都可能受害，无论是远方之人，还是近处之人，亦皆可能受害，因为在一种情况下，即伤害近处之人，获益来得快，而在另一种情况，即伤害远方的人，报复来得慢，正如希腊人劫掠迦太基人的情形一样；那些从不警惕、从不提防、只是一味轻信的人亦可能受害，因为他们很容易在毫无防备之时受害。还有懒惰的人，因为愿意耗费精力者才会去起诉。还有胆怯的人，因为他们不太可能为钱财而争斗。还有常常遭受不义之事却从不起诉的人，正如谚语所云，“他们是密细亚牺牲者。”还有从未遭受或者经常遭受不义之事的人；因为这两种人都不会设防，前者是由于从未遭受过攻击，后者是由于没有预料到会再次遭受攻击。还有曾被诽谤或容易被诽谤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要么因为害怕法官而不愿意打官司，要么即使打官司，也无法说服法官；易招人忌恨和嫉妒之人亦属于此类。还有，行不义之事者可以对一些人谎称他们的祖先、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朋友曾经对他或其祖先或其尊重之人行不义之事，或者意图对他们行不义之事，这些人亦可能被害；因为，正如谚语所云，“恶行只需要一个借口。”此外，敌人和朋友也都有可能被害；因为伤害后者是容易的，而伤害前者是愉悦的。还有那些没有朋友的人，也容易遭受伤害。还有那些不善于讲演或行动的人，同样如此；因为他们要么不会

尝试起诉，要么会和解，要么一无所获。还有的人，浪费时间等待审判或赔偿对他们来说是不利的，比如外地人和自耕农，这样的人亦可能被害；因为他们愿意轻易和解，放弃诉讼。还有人自己曾经做过许多不义之事，或者他们自己现在正遭受不义之事，这样的人也可能被害；因为一个常常伤害别人的人会遭受同样的伤害，这几乎可被视为正义之事；比如，如果有人攻击一个惯于凌辱别人的人，这是会被视为正义之举的。还有曾经伤害过我们，或者曾经试图、正在试图或者打算这样做的人，亦可能被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报复既是令人愉悦的，也是荣耀的，而且几乎可被视为正义之举。还有一种人，如果我们对其行不义之事是为了讨好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尊敬或喜爱的人，或者我们的主人，总之，所有掌控我们生活的人，那么这种人也可能被害。还有的人，如果对其行不义之事有机会赢得他人的同情，那么这种人也可能被害。还有曾与我们有过纠纷的人，或者曾与我们有过分歧的人，亦可能被害，比如卡利波斯对狄翁所行之事；因为在这些情况下，这几乎算是正义之举。还有的人，假如我们不先攻击他们，他们就会被别人攻击，因为已经不可能与他们进行磋商了，这样的人亦可能被害；比如，据说埃奈西德穆将泼酒游戏的奖品送给革隆，因为革隆曾先他一步做了他想做之事——将一个城池的人掠为奴隶。还有的人，在伤害他们之后，我们能够做很多正义之事，因为弥补过错将是很容易的，这样的人亦可能被害；正如帖撒利人伊阿宋所说，一个人应该不时行不义之事，以便能够常常行正义之事。

Men are ready to commit wrongs which all or many are in the habit of committing, for they hope to be pardoned for their offences. They steal objects that are easy to conceal; such are things that are quickly consumed, as eatables; things which can easily be changed in form or color or composition; things for which there are many convenient hiding-places, such as those that are easy to carry or stow away in a corner; those of which a thief already possesses a considerable number exactly similar or hard to distinguish. Or they commit wrongs which the victims are ashamed to disclose, such as

outrages upon the women of their family, upon themselves, or upon their children. And all those wrongs in regard to which appeal to the law would create the appearance of litigiousness; such are wrongs which are unimportant or venial. These are nearly all the dispositions which induce men to commit wrong, the nature and motive of the wrongs, and the kind of persons who are the victims of wrong.

人们倾向于做那些所有人或很多人惯于做的不义之事，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过错会被原谅。他们偷窃易于藏匿之物，这些东西包括：能够快速用完的物品，如食品；能够轻易改变形状或颜色或构成的物品；有很多便于藏匿之处的物品，如易于搬运或存放于角落的物品；还有窃贼已经拥有大量同类的或难以辨别的物品。人们还会做受害者羞于声张的不义之事，比如对家里的女性、对自己或对子女施暴。还有些不义之事，如果受害者诉诸法律就给人以诉讼成癖的印象，也是人们所惯做的；不重要或琐碎的不义之事就属于此类。这些差不多是引诱人们行不义之事的所有情形、不义之事的性质和动机以及遭受不义之事的人的种类。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Let us now classify just and unjust actions generally, starting from what follows. Justice and injustice have been defined in reference to laws and persons in two ways. Now there are two kinds of laws, particular and general. By particular laws I mean those established by each people in reference to themselves, which again are divided into written and unwritten; by general laws I mean those based upon nature. In fact, there is a general idea of just and

unjust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 as all men in a manner divine, even if there is neither communication nor agreement between them. This is what Antigone in Sophocles [1_149] evidently means, when she declares that it is just, though forbidden, to bury Polynices, as being naturally just: “For neither to-day nor yesterday, but from all eternity, these statutes live and no man knoweth whence they came.” And as Empedocles says in regard to not killing that which has life, for this is not right for some and wrong for others, “But a universal precept, which extends without a break throughout the wide-ruling sky and the boundless earth.” Alcidamas [1_150] also speaks of this precept in his *Messeniacus* … And in relation to persons, there is a twofold division of law; for what one ought to do or ought not to do is concerned with the community generally, or one of its members.

我们现在大体上划分一下正义之事和非正义之事，从下面的分析开始。就其与法律和人的关系，正义与非正义可以用两种方法进行定义。而法律分为两种，特别法和普通法。我所说的特别法指每个民族为约束自己的成员而制定的那些法律，又可分为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我所说的普通法指基于自然法则制定的那些法律。其实，与自然法则相吻合，存在一个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一般理念，如同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凭直觉感知的一样，即使他们并没有进行沟通或者协商。索福克勒斯悲剧中的人物安提戈涅表达的便是这个意思。她声称，埋葬波吕涅刻斯虽然是被禁止的行为，但是按照自然法则却是正义的：“因为这些法则存在着，不限于昨今，而是归于永久，没有人知道它们来自何处。”再如恩培多克勒劝人不要杀生，因为这对某些生物来说是不对的，对其他生物来说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普遍的戒律，绵延不断，穿越无垠的天宇和广袤的大地。”阿尔西达麦在他的《墨塞尼阿克斯辞》里也提到这条戒律。就与人的关系来说，法律也可以分为两种。一个人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事，要么涉及全社会，要么涉及其中某一个成员。

Therefore there are two kinds of just and unjust acts, since they can be committed against a definite individual or against the community; he who commits adultery or an assault is guilty of wrong against a definite individual, he who refuses to serve in the army of wrong against the State. All kinds of wrong acts having been thus distinguished, some of which affect the State, others one or several individuals, let us repeat the definition of being wronged, [1_151] and then go on to the rest. Being wronged is to suffer injustice at the hands of one who voluntarily inflicts it, for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that injustice is a voluntary act. And since the man who suffers injustice necessarily sustains injury and that against his will, it is evident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in what the injuries consist; for things good and bad have already been distinguished in themselves, [1_152] and it has been said that voluntary acts are all such as are committed with knowledge of the case. [1_153] Hence it necessarily follows that all accusations concern the State or the individual, the accused having acted either ignorantly and against his will, or voluntarily and with knowledge, and in the latter case with malice aforethought or from passion. We will speak of anger when we come to treat of the passions, [1_154] and we have already stated [1_155] in what circumstances and with what dispositions men act with deliberate purpose.

因此，正义之事和非正义之事也可分为两类，因为它们针对的要么是某一个人，要么是全社会；比如一个人如果通奸或攻击他人，那么他危害的就是某个具体的人；如果他拒绝服兵役，那么他危害的就是国家。这样我们就区分了所有种类的不义之事，有一些涉及国家，其他的则涉及一个或数个个体。我们先重复一下“受害”的定义，然后再讨论其他内容。受害是指在有意为之者手里遭受不义之事，因为前文已经论述过不义之事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既然遭受不义之事的

人必定会蒙受伤害且违背其意愿，那么从上文所说就可以明显知道伤害的构成是什么；而此前我们已经区分了本身为好的和坏的事情，并且也已经说过有意为之的行为是指明知而为的行为。因此可以肯定，所有的指控要么涉及国家，要么涉及个人；被告的所作所为要么是出于无知且违背其意愿，要么是有意而为且知晓其所为；在后一种情况中要么是有预谋的，要么是一时冲动。下文探讨冲动时，我们再讲愤怒；而前文我们已经讲过人们在何种情形下、本着何种心态蓄意而为。

But since a man, while admitting the fact, often denie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harge or the point on which it turns—for instance, admits that he took something, but did not steal it; that he was the first to strike, but committed no outrage; that he had relations, but did not commit adultery, with a woman; or that he stole something but was not guilty of sacrilege, since the object in question was not consecrated; or that he trespassed, but not on public land; or that he held converse with the enemy, but was not guilty of treason—for this reason it will be necessary that a definition should be given of theft, outrage, or adultery, in order that, if we desire to prove that an offence has or has not been committed, we may be able to put the case in a true light. In all such instances the question at issue is to know whether the supposed offender is a wrongdoer and a worthless person, or not; for vice and wrongdoing consist in the moral purpose, and such terms as outrage and theft further indicate purpose; for if a man has struck, it does not in all cases follow that he has committed an outrage, but only if he has struck with a certain object, for instance, to bring disrepute upon the other or to please himself. Again, if a man has taken something by stealth, it is by no means certain that he has committed theft, but only if he has taken it to injure another [1_156] or to get something for himself. It is the same in all other

cases as in these.

但是一个人承认事实的同时，往往会否认控词中的陈述或所指——比如，一个人会承认自己拿了东西，但是不承认偷窃；承认自己先动手打人，但是不承认攻击他人；承认与某个女人发生关系，但是不承认与其通奸；或者承认自己偷了东西，但是不承认偷盗圣器，因为所偷物品并非祭品；或者承认侵占土地，但是不承认侵占公有土地；或者承认与敌人有过对话，但是不承认叛国。因此，我们有必要定义偷窃、暴行或者通奸等罪行，以便当我们想证明某人犯了某罪或没有犯某罪时，能够正确地处置案件。在上述所有案例中，根本的问题都是要弄清楚假定的肇事者是否犯了罪，是否是卑劣之人；须知恶德和罪行在于其所蕴涵的道德目的，而暴行和偷窃等指控则进一步彰显了其目的；比如，一个人动手打人，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犯了暴行罪，除非他动手打人有一定目的，比如为了侮辱对方或者愉悦自己。再如，一个人偷了某件东西，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犯了偷窃罪，除非他偷东西是为了伤害另一个人或者自己占有这件东西。所有其他情况都与此相似。

We have said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just and unjust actions (for some are written, but others are unwritten), and have spoken of those concerning which the laws are explicit; of those that are unwritten there are two kinds. One kind arises from an excess of virtue or vice, which is followed by praise or blame, honor or dishonor, and rewards; for instance, to be grateful to a benefactor, to render good for good, to help one's friends, and the like; [1_157] the other kind contains what is omitted in the special written law. For that which is equitable seems to be just, and equity is justice that goes beyond the written law. These omissions are sometimes involuntary, sometimes voluntary, on the part of the legislators; involuntary when it may have escaped their notice, voluntary

when, being unable to define for all cases, [1_158] they are obliged to make a universal statement, which is not applicable to all, but only to most, cases; and whenever it is difficult to give a definition owing to the infinite number of cases, as, for instance, the size and kind of an iron instrument used in wounding; for life would not be long enough to reckon all the possibilities. If then no exact definition is possible, but legislation is necessary, one must have recourse to general terms; so that, if a man wearing a ring lifts up his hand to strike or actually strikes, according to the written law he is guilty of wrongdoing, but in reality he is not; and this is a case for equity.

我们已经说过正义之事和不义之事可分为两种（有些是成文法规定的，其他则是未成文法规定的），还讲了那些涉及法律明文规定的事情；至于那些涉及不成文法的事情，亦可分为两类。一类来自至善或极恶，它们会得到赞扬或谴责，荣誉或耻辱，回报或报应；比如，对恩人心怀感激，以善报善，帮助自己的朋友，诸如此类；另一类则包含特别的成文法中所缺失的内容。要知道适合衡平法的事情似乎也是公正的，但是却没有被成文法所覆盖，而所谓衡平就是成文法之外的公正。从立法者的角度看，这些缺失有时是无意的，有时是有意的；无意是指立法者没有注意到的情况，有意是指因为无法为所有情形作出界定，立法者不得不给出一个笼统的说法，这个说法无法适用于所有情形，只适用于大多数情形；还有些时候因为涉及无限量的情形，所以下定义很困难，比如用于伤人的铁器的大小和种类；须知人穷尽一生也无法尽数所有的可能性。那么，如果不可能给出确切的定义，而立法又是必须的，立法者就不得不诉诸普遍的条款；因此，如果一个戴着戒指的人抬手准备打人或者确实打了人，那么根据成文法他犯了罪，但事实上他并未犯罪；这就是使用衡平法的案例。

If then our definition of equity is correct, it is easy to see what

things and persons are equitable or not. Actions which should be leniently treated are cases for equity; errors, wrong acts, and misfortunes, must not be thought deserving of the same penalty. Misfortunes are all such things as are unexpected and not vicious; errors are not unexpected, but are not vicious; wrong acts are such as might be expected and vicious, for acts committed through desire arise from vice. And it is equitable to pardon human weaknesses, and to look, not to the law but to the legislator; not to the letter of the law but to the intention of the legislator; not to the action itself, but to the moral purpose; not to the part, but to the whole; not to what a man is now, but to what he has been, always or generally; to remember good rather than ill treatment, and benefits received rather than those conferred; to bear injury with patience; to be willing to appeal to the judgement of reason rather than to violence; [1_159] to prefer arbitration to the law court, for the arbitrator keeps equity in view, whereas the dicast looks only to the law, and the reason why arbitrators were appointed was that equity might prevail. Let this manner of defining equity suffice.

如果我们对衡平法的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就很容易判断哪些事情和人符合或不符合公平法。应当宽恕的行为适用于衡平法；比如，过失、罪行及不幸事件就不应该被认为应得到同样的惩罚。不幸事件是指所有那些出乎意料但不是出于恶德的事件；过失不是出乎意料的，但是并非出于恶德；罪行则可能是意料之中的或出于恶德的，因为欲望所致之事皆源自恶德。下面这些做法都是符合衡平法的：原谅人性的弱点，不拘泥于法律，而是考虑立法者的立场；不拘泥于法律的文字，而是多考虑立法者的用意；不拘泥于行为本身，而是多考虑道德意图；不拘泥于局部，而是通览全局；不拘泥于一个人的现状，而是虑及他的过去，即一直以来或者总体而言其人品如何；多记住善待，而不是虐待；多记住所受之惠，而不是所施之恩；隐忍所受之伤害；愿意诉诸理性的判断，而不是诉诸暴力；选择仲裁，而不是法庭诉

讼，因为仲裁者会考虑衡平法，而法官只考虑成文法，而之所以任命仲裁者也是为了衡平法能够流行。姑且就这样定义衡平法吧。

Chapter 14

第十四章

Wrong acts are greater in proportion to the injustice from which they spring. For this reason the most trifling are sometimes the greatest, as in the charge brought by Callistratus [1_160] against Melanopus that he had fraudulently kept back three consecrated half-obols from the temple-builders; [1_161] whereas, in the case of just actions, it is quite the contrary. The reason is that the greater potentially inheres in the less; for he who has stolen three consecrated half-obols will commit any wrong whatever. Wrong acts are judged greater sometimes in this way, sometimes by the extent of the injury done. A wrong act is greater when there is no adequate punishment for it, but all are insufficient; when there is no remedy,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repair it; [1_162] and when the person injured cannot obtain legal satisfaction, since it is irremediable; for justice and punishment are kinds of remedies. And if the sufferer, having been wronged, has inflicted some terrible injury upon himself, the guilty person deserves greater punishment; wherefore Sophocles, [1_163] when pleading on behalf of Euctemon, who had committed suicide after the outrage he had suffered, declared that he would not assess the punishment at less than the victim had assessed it for himself. A wrong act is also greater when it is unprecedented, or the first of its kind, or when committed with the aid of few accomplices; [1_164] and when it has been frequently committed; or when because of it new prohibitions and penalties have been sought and found: thus, at Argos the citizen owing to

whom a new law has been passed, is punished, as well as those on whose account a new prison had to be built. The crime is greater, the more brutal it is; or when it has been for a long time premeditated; when the recital of it inspires terror rather than pity. Rhetorical tricks of the following kind may be used:the statement that the accused person has swept away or violated several principles of justice, for example, oaths, pledges of friendship, plighted word, the sanctity of marriage; for this amounts to heaping crime upon crime. Wrong acts are greater when committed in the very place where wrongdoers themselves are sentenced, as is done by false witnesses; for where would a man not commit wrong, if he does so in a court of justice? They are also greater when accompanied by the greatest disgrace; when committed against one who has been the guilty person's benefactor, for in that case, the wrongdoer is guilty of wrong twice over, in that he not only does wrong, but does not return good for good. So too, again, when a man offends against the unwritten laws of right, for there is greater merit in doing right without being compelled; [1_165] now the written laws involve compulsion, the unwritten do not. Looked at in another way, wrongdoing is greater, if it violates the written laws; for a man who commits wrongs that alarm him [1_166] and involve punishment, will be ready to commit wrong for which he will not be punished. Let this suffice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greater or less degree of wrongdoing.

罪行的动机越不正当，由其引发的罪行就越严重。因此，最微小的罪行有时却是最严重的，比如卡利特剌托斯控告莫拉诺波斯从建庙工人处骗得三枚小奥波币圣款；而正义之举则与此相反。这是因为严重的行为可能从微小的行为衍生而来；要知道一个偷窃三枚小奥波币圣款的人，任何罪行都干得出来。有时人们会以这种方式认定罪行的轻重，有时则会根据所造成的伤害程度来判定。如果对一个罪行没有

足够的惩罚，所有的惩罚都差强人意，那么这个罪行就更严重；如果对其而言无法补偿，即使弥补其伤害并非不可能却很难进行，那么这个罪行也更严重；如果受害者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满意结果，因为其所承受的罪行是无法补偿的，那么这个罪行也更严重；须知伸张正义和实施惩罚都属于补偿。如果受害者在被害后戕害了自己，那么罪犯也应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因此，索福克勒斯在其作品中为遭受暴行之后自杀身亡的欧克忒蒙申诉时声称，对罪犯的惩罚不应小于受害者，即欧克忒蒙，对自己的戕害。如果一个罪行没有先例，或者是其种类的第一例，或者没有同类的共犯，那么它也更严重；如果一个罪行被频繁实施，或者如果新的禁令和惩罚因其而设，那么它也更严重。因此，在阿耳戈斯，必须为其通过一项新法律的人会被惩罚，必须为其建造新监狱的人也会被惩罚。罪行越残忍，就越严重；或者如果它经过长期预谋，讲出来会引发恐惧而不是同情，那么这样的罪行也更严重。我们在庭审时还可以使用以下这种修辞技巧，使罪行显得更严重，即指控被告无视或违反了多项关于正义的准则，比如神祇的誓言、交好的承诺、保证词和婚姻的神圣性；须知这种指控相当于罪上加罪。在罪犯本人受审的地方，即法庭，犯下的罪行更严重，比如作伪证；因为如果一个人胆敢在法庭上犯罪，那么他在哪里不敢犯罪呢？如果一个罪行伴随莫大的耻辱，或者如果它危害的是犯罪者的恩人，那么它也更加严重，因为在后一种情形下，犯罪者的罪行是双重的：他不但犯了罪，而且没有报恩。此外，当一个人违反不成文法所界定的义举时，其罪行更加严重，须知一个人不因被强迫而做好事是更高尚的美德；而成文法有强制性，不成文法则没有。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一个罪行违反了成文法，那么它也更严重；因为一个人若犯下那些会使之恐惧并受罚的罪行，即违反成文法的罪行，那么他也会犯下那些不会因之受到惩罚的罪行，即违反不成文法的罪行。关于对罪行的严重程度的处理，就说这些吧。

Chapter 15

第十五章

Following on what we have just spoken of, we have now briefly to run over what are called the inartificial proofs, for these properly belong to forensic oratory. These proofs are five in number: laws, witnesses, contracts, torture, oaths. Let us first then speak of the laws, and state what use should be made of them when exhorting or dissuading, [1_167] accusing or defending. For it is evident that, if the written law is counter to our case, we must have recourse to the general law and equity, as more in accordance with justice; and we must argue that, when the dicast takes an oath to decide to the best of his judgement, he means that he will not abide rigorously by the written laws; that equity is ever constant and never changes, even as the general law, which is based on nature, whereas the written laws often vary (this is why Antigone in Sophocles justifies herself for having buried Polynices contrary to the law of Creon, but not contrary to the unwritten law: "For this law is not of now or yesterday, but is eternal… this I was not likely [to infringe through fear of the pride]of any man);" [1_168] and further, that justice is real and expedient, but not that which only appears just; nor the written law either, because it does not do the work of the law; [1_169] that the judge is like an assayer of silver, whose duty is to distinguish spurious from genuine justice; that it is the part of a better man to make use of and abide by the unwritten rather than the written law. [1_170] Again, it is necessary to see whether the law is contradictory to another approved law or to itself; for instance, one law enacts that all contracts should be binding, while another forbids making contracts contrary to the law. If the meaning of the law is equivocal, we must turn it about, and see in which way it is to be interpreted so as to suit the application of justice or expediency, and have recourse to that. If the conditions which led to the enactment of the law are now obsolete, while the law itself remains, one must endeavor to make this clear and to combat the law by this argument. But if the written law favors our case, we must say that

the oath of the dicast “to decide to the best of his judgement” does not justify him in deciding contrary to the law, but is only intended to relieve him from the charge of perjury, if he is ignorant of the meaning of the law; that no one chooses that which is good absolutely, but that which is good for himself;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not using the laws and their not being enacted; that in the other arts there is no advantage in trying to be wiser than the physician, for an error on his part does not do so much harm as the habit of disobeying the authority; that to seek to be wiser than the laws is just what is forbidden in the most approved laws. Thus much for the laws.

紧接着前面所讲的内容，我们现在简要地谈一谈所谓的不属于修辞艺术本身的证明，因为这些理当属于诉讼演说的范畴。这些证明可分为五类：法律、证人、契约、刑讯、誓言。我们先说法律，讲一讲劝说或者劝阻、指控或者辩护时应该如何使用它们。很明显，如果一项成文法对我们的案件不利，那么我们就应该诉诸普通法和衡平法，以期更加公正。我们应当像下面这样据理力争：当法官发誓会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来作判决，他的意思就是自己不会拘泥于成文法；衡平法是永恒不变的，就像基于自然法则的普通法一样，而成文法则是经常变化的（正因如此，索福克勒斯悲剧中的安提戈涅才这样为自己埋葬波吕涅刻斯的行为辩护，认为这虽然违反了克瑞翁的法律，却没有违反不成文法：“须知这项天条不属于昨今，而归于永恒，我不会因为惧于任何人的骄矜而违反它”）；还有，正义是真实的、有益的，仅仅貌似正义的东西则不是真实的、有益的；成文法也不总是真实的、有益的，因为它并非总是履行法律的职能；法官就像鉴定银子的技师，其职责是区分虚假和真正的正义；好人的本分就是使用和遵守不成文法而不是成文法。再者，我们还需要考查某项法律是否有悖于另一项已被认可的法律或者其自身；比如，一项法律要求所有的合同都应有约束力，而另一项法律则禁止制定违反法律的合同。如果某项法律的意思模棱两可，我们就应该仔细权衡，看以何种方式阐释它才

能符合正义或利益的要求，进而诉诸此种阐释。如果促成该法律颁布的情况已过时，而该法律仍在使用，我们就应该努力澄清这一点，并据此反对该法律。但是，如果一项成文法对我们的案件有利，我们就应该这样说：法官“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来作判决”的誓词不能成为他违反法律进行判决的借口，而只是在他因不明白该法律的意思而作出错误判决时使他免遭作伪誓的指控；没有人会选择绝对好的东西，而只会选择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不使用法律无异于不颁布法律；在以医术为代表的其他技艺中，试图比医生更聪明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医生即使犯错，他所造成的伤害也没有漠视医生权威的恶习所造成的伤害多；同样，试图比法律更高明恰是那些最被认可的法律所禁止的。关于法律我们就说这些。

Witnesses are of two kinds, ancient and recent; of the latter some share the risk of the trial, others are outside it. By ancient I mean the poets and men of repute whose judgements are known to all; for instance, the Athenians, in the matter of Salamis, appealed to Homer [1_171] as a witness, and recently the inhabitants of Tenedos to Periander of Corinth [1_172] against the Sigeans. Cleophon also made use of the elegiacs of Solon against Critias, to prove that his family had long been notorious for licentiousness, otherwise Solon would never have written: “Bid me the fair-haired Critias listen to his father.“ [1_173] One should appeal to such witnesses for the past, but also to interpreters of oracles for the future; thus, for instance, Themistocles interpreted the wooden wall to mean that they must fight at sea. [1_174] Further, proverbs, as stated, [1_175] are evidence; for instance, if one man advises another not to make a friend of an old man, he can appeal to the proverb, “Never do good to an old man.” And if he advises another to kill the children, after having killed the fathers, he can say, “Foolish is he who, having killed the father, suffers the children to live.“ [1_176]

证人分两种，古代的和近代的；后者中，有些要承担被审判的风险，其他的则置身于审判之外。我所说的古代证人是指诗人和其他知名人士，他们的判断是人所共知的；比如，雅典人在萨拉米斯事件中就把荷马引为证人，最近忒涅多斯岛的居民也把科林斯的佩里安德引为证人，来反驳西革昂人。克莱奥丰也曾经用过梭伦的挽歌来攻击克里提阿斯，以证明后者的家族长久以来因淫荡而臭名昭著，否则梭伦绝不会这样写道："叫红头发的克里提阿斯听他父亲的话。"对于过往之事，我们必须诉诸这些古代证人，但是对于未来之事则还需要求助于神谕的解释者；比如地米斯托克利对神谕中木墙的解释是他们必须在海上作战。另外，如前所述，谚语也是证据；比如，如果一个人建议另一个人不要与老年人交友，他可以诉诸这条谚语："莫敬老者。"而如果他建议另一个人杀了父亲之后还要杀孩子，就可以说："愚蠢啊，那些杀了父亲却饶了子女的人！"

By recent witnesses I mean all well-known persons who have given a decision on any point, for their decisions are useful to those who are arguing about similar cases. Thus for instance, Eubulus, [1_177] when attacking Chares in the law courts, made use of what Plato said against Archibius, namely, "that the open confession of wickedness had increased in the city." And those who share the risk of the trial, if they are thought to be perjurers. Such witnesses only serve to establish whether an act has taken place or not, whether it is or is not the case; but if it is a ques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act, for instance, whether it is just or unjust, expedient or inexpedient, they are not competent witnesses; but witnesses from a distance [1_178] are very trustworthy even in regard to this. But ancient witnesses are the most trustworthy of all, for they cannot be corrupted. In regard to the confirmation of evidence, when a man has no witnesses, he can say that the decision should be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probabilities, and that this is the meaning of the oath "according to the best of one's judgement"; that probabilities

cannot be bribed to deceive, and that they cannot be convicted of bearing false witness. But if a man has witnesses and his adversary has none, he can say that probabilities incur no responsibility, and that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need of evidence, if an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the arguments were sufficient. Evidence partly concerns ourselves, partly our adversary, as to the fact itself or moral character; so that it is evident that one never need lack useful evidence. For, if we have no evidence as to the fact itself, neither in confirmation of our own case nor against our opponent, it will always be possible to obtain some evidence as to character that will establish either our own respectability or the worthlessness of our opponent. As for all the other questions relative to a witness, whether he is a friend, an enemy, or neutral, of good or bad or middling reputation, and for all other differences of this kind, we must have recourse to the same topics as those from which we derive our enthymemes.

我所说的近代证人是指对某一问题作过判断的知名人士，因为他们的判断对于正在论证类似案件的人来说是有用的。比如，欧部罗斯在法庭上攻击卡瑞斯时，引用了柏拉图攻击阿耳喀比俄斯的话，即："在这座城市里，对自己的恶行大言不惭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些人，如果他们被认为作了伪证，就会有被审判的危险，这类人也可以充当证人。不过这类证人的作用只是确定某个行为是否曾经发生，是否属实；但是对于涉及该行为的性质的问题，比如，该行为是否正义，是否有益，这些人就不是合格的证人了；而来自远方的证人在这一点上则依然值得信赖，因为他们与案件毫无瓜葛。不过，古代证人是所有证人中最可信的，因为他们不可能被贿赂。针对证据的确认效果，如果一个人没有证人，那么他可以说：法庭应该根据或然性来判决，这才是法官的誓词"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来作判决"的意思；或然之事不可能被贿赂而说谎，也不可能被判伪证罪，因此应该根据或然性而不是证人来判决。但是如果一个人有证人而对方没有，那么

他可以说或然之事不会招致任何责任，所以不可信，而且如果单凭论辩揆清已经足够，就不需要证据了。就事实本身或者道德品性而言，证据一部分与我们自身有关，一部分与我们的对手有关；因此显而易见，我们永远都不会缺少有用的证据。要知道即使我们缺乏证据来证明事实本身，即既缺乏证实我方的证据，也缺乏攻击对方的证据，我们也总有可能找到一些证据来证明我们在品格上是高尚的，或者对方是可鄙的。至于与证人有关的所有其他问题，例如，他是朋友、敌人或者中立者，他的名声是好、坏或者普通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差异，我们都应该诉诸那些用于制造修辞式推理的部目。

As for contracts, argument may be used to the extent of magnifying or minimizing their importance, of proving that they do or do not deserve credit. If we have them on our side, we must try to prove them worthy of credit and authoritative; but if they are on the side of our opponent, we must do the opposite. In view of rendering them worthy or unworthy of credit, the method of procedure is exactly the same as in the case of witnesses; for contracts are trustworth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 of their signatories or depositaries. When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tract is admitted, if it is in our favor, we must strengthen it by asserting that the contract is a law, special and partial; and it is not the contracts that make the law authoritative, but it is the laws that give force to legal contracts. And in a general sense the law itself is a kind of contract, so that whoever disobeys or subverts a contract, subverts the laws. Further, most ordinary and all voluntary transactions ar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contract; so that if you destroy the authority of contracts, the mutual intercourse of men is destroyed. All other arguments suitable to the occasion are easy to see. But if the contract is against us and in favor of our opponents, in the first place those arguments are suitable which we should oppose to the law if it were against us; that it would be strange if,

while we consider ourselves entitled to refuse to obey ill-made laws, whose authors have erred, we should be obliged to consider ourselves always bound by contracts. Or, that the judge is the dispenser of justice; so that it is not the contents of the contract that he has to consider, but what is juster. Further, that one cannot alter justice either by fraud or compulsion, for it is based upon nature, whereas contracts may be entered into under both conditions. In addition to this, we must examine whether the contract is contrary to any written law of our own or foreign countries, or to any general law, or to other previous or subsequent contracts. For either the latter are valid and the former not, or the former are right and the latter fraudulent; we may put it in whichever way it seems fit. We must also consider the question of expediency—whether the contract is in any way opposed to the interest of the judges. There are a number of other arguments of the same kind, which are equally easy to discern.

而契约则可以利用论证来夸大或贬低其重要性，证明它们值得或不值得信赖。如果契约对我们有利，我们就应该努力证明它们是可信的、权威的；但是如果契约对我们的对手有利，我们就应该证明它们不足信、不权威。如何让契约可信或不可信，可用的方法与证明证人可信或不可信的方法完全一样；因为契约的可信度取决于其签署方或受托人的品德。在承认契约存在的情况下，如果它对我们有利，我们就应该强化它，坚称契约就是法律，是特设的、不完全的法律；不是契约使法律具有权威，而是法律赋予了合法的契约以效力。而且从一般意义上讲，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契约，因此无论谁违反或者破坏契约，都是在破坏法律。再者，大多数普通以及所有的自愿交易都是根据契约实施的；因此如果你破坏了契约的权威，你就破坏了人们之间的交往。适合这种情形，即契约对我们有利的所有其他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契约对我们不利，而对对方有利，那么那些可用于反驳不利于我们的法律的论点就是可用的；我们还可以说：如果我们

认为自己有权拒绝遵守因制定者的错误而谬定的法律，但是却必须永远受契约约束，那也未免太奇怪了。我们还可以说，法官是掌管正义的人，因此他应该考虑的不是契约的内容，而是什么判决更加正义。再者，我们还可以说，正义是不会因造假或强迫而更改的，因为它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但这两种情况，即造假和强迫，都可能导致契约的签订。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考查所涉契约是否与我们国家或外国的任何一项成文法、或普通法、或其他的之前或之后的契约相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后者有效，前者无效；要么前者正确，后者虚假。我们可以按照任何一种看起来合适的方式来进行申述。我们还应该考虑利益的问题，即契约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法官的利益。其他同类论点还有不少，不过都很容易厘清。

Torture is a kind of evidence, which appears trustworthy, because a sort of compulsion is attached to it. Nor is it difficult to see what may be said concerning it, and by what arguments, if it is in our favor, we can exaggerate its importance by asserting that it is the only true kind of evidence; but if it is against us and in favor of our opponent, we can destroy its value by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all kinds of torture generally; for those under compulsion are as likely to give false evidence as true, some being ready to endure everything rather than tell the truth, while others are equally ready to make false charges against others, in the hope of being sooner released from tortur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be able to quote actual examples of the kind with which the judges are acquainted. It may also be said that evidence given under torture is not true; for many thick-witted and thick-skinned persons, and those who are stout-hearted heroically hold out under sufferings, while the cowardly and cautious, before they see the sufferings before them, are bold enough; wherefore evidence from torture may be considered utterly untrustworthy.

刑讯也是一种证据，因其带有一种强迫性而似乎值得相信。关于刑讯可讲的东西和可以使用的论点是不难找到的：如果它对我们有利，就坚称它是唯一一种真实的证据，以夸大它的重要性；但是，如果它不利于我们，却利于对方，我们就可以指出各类刑讯的普遍真相，以破坏它的价值；这个真相即是：那些处于强迫之下的人既有可能说出实情，亦有可能提供伪证；有些人宁可忍受各种酷刑也不吐露真相；同样，另一些人则随时准备诬告他人，以求尽早摆脱刑讯之苦。我们还应该能够引用上述法官熟悉的种种实例。我们还可以说，刑讯逼供的证据是不真实的；因为很多头脑迟钝、皮糙肉厚的人，还有那些意志坚定的人，在酷刑之下仍会坚贞不屈，而那些生性懦弱、谨小慎微的人，没看到酷刑之前可能还很嘴硬，看到之后就会屈服了；因此，刑讯得来的证据可以说是完全不足信的。

As to oaths [1_179] four divisions may be made; for either we tender an oath and accept it, or we do neither, or one without the other, and in the last case we either tender but do not accept, or accept but do not tender. Besides this, one may consider whether the oath has already been taken by us or by the other party. If you do not tender the oath to the adversary, it is because men readily perjure themselves, and because, after he has taken the oath, he will refuse to repay the money, while, if he does not take the oath, you think that the dicasts will condemn him; and also because the risk incurred in leaving the decision to the dicasts is preferable, for you have confidence in them, but not in your adversary. [1_180] If you refuse to take the oath yourself, you may argue that the oath is only taken with a view to money; that, if you had been a scoundrel, you would have taken it at once, for it is better to be a scoundrel for something than for nothing; that, if you take it, you will win your case, if not, you will probably lose it; consequently, your refusal to take it is due to moral excellence, not to fear of committing perjury. And the apophthegm of Xenophanes [1_181] is

apposite—that “it is unfair for an impious man to challenge a pious one,” for it is the same as a strong man challenging a weak one to hit or be hit. If you accept the oath, you may say that you have confidence in yourself, but not in your opponent, and, reversing the apophthegm of Xenophanes, that the only fair way is that the impious man should tender the oath and the pious man take it; and that it would be monstrous to refuse to take the oath yourself, while demanding that the judges should take it before giving their verdict. But if you tender the oath, you may say that it is an act of piety to be willing to leave the matter to the gods; that your opponent has no need to look for other judges, for you allow him to make the decision himself; and that it would be ridiculous that he should be unwilling to take an oath in cases where he demands that the dicasts should take one.

至于誓言，有四种情形：我们提供并接受誓言；我们既不提供也不接受誓言；我们只做其一，不做其二，即：要么我们只提供但是不接受誓言；要么我们只接受但是不提供誓言。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考虑我们或对方是否已经立下某项誓言。如果你不向对方提供誓言，你可以这样为自己辩解：你这样做是因为人们总是立伪誓，而且立誓之后就会拒绝赔款，但如果一个人不立誓，法官就会判他有罪；你还可以说你不向对方提供誓言，是因为让法官来裁决的风险比较小，因为你相信法官，不相信对方。如果是你自己拒绝立誓，那么你可以辩解说：人们立誓都是为了钱；如果你是一条恶棍，你早就立誓了，因为与其不立誓而枉担虚名，还不如立誓而自认恶棍；而且如果你立誓，你就可以打赢官司，不立誓就可能输掉；因此，你拒绝立誓是由于道德高尚，而不是由于害怕犯伪誓罪。色诺芬尼的名言在这里很适用，即“让一个不虔诚的人挑战一个虔诚的人，这是不公平的”，就如同一个强壮的人要和一个体弱的人决斗一样。如果你接受了誓言，你可以说这是因为你相信自己，但是不相信对方；你还可以颠倒色诺芬尼的名言，说唯一公平的方式就是让不虔诚的人提供誓言，让虔诚的

人接受誓言；自己拒绝立誓，却要求法官在宣判前立誓，这是很荒谬的。但是如果是你提供的誓言，你就可以这样说：愿意让神明来判决是一种虔诚的行为；你的对手不需要寻找其他法官，因为你允许他自己来作决定；如果他不愿意立誓，却要求法官立誓，那将是很可笑的。

Now, since we have shown how we must deal with each case individually, it is clear how we must deal with them when taken two and two; for instance, if we wish to take the oath but not to tender it, to tender it but not to take it, to accept and tender it, or to do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For such cases, and similarly the arguments, must be a combination of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And if we have already taken an oath which contradicts the present one, we may argue that it is not perjury; for whereas wrongdoing is voluntary, and perjury is wrongdoing, what is done in error or under compulsion is involuntary. Here we must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perjury consists in the intention, not in what is said. [1_182] But if the opponent has taken such an oath, we may say that one who does not abide by what be has sworn subverts everything, for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dicasts take an oath before applying the laws; and [we may make this appeal]: “They demand that you abide by your oath as judges, while they themselves do not abide by theirs.” Further, we should employ all means of amplification. Let this suffice for the inartificial proofs.

至此，既然我们已经介绍了如何分别应对每一种情形，那么两种情形放在一起该如何应对也就很清楚了；比如，如果我们想接受但是不想提供誓言，或者想提供但是不想接受誓言，或者既想接受又想提供誓言，或者既不想接受又不想提供誓言。这些情形以及与其相应的论点，必然是上述论点的组合。另外，如果我们曾经立过的誓言与现

今的这个相矛盾，我们可以辩解说它，即曾经立的誓言，并不是伪誓；因为虽然犯罪是故意的，而立伪誓的确是犯罪，但是出于过失或强迫的事情不能算故意。至此，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伪誓体现在作伪誓的意图上，而不是所说的内容上。但是，如果对方立过这样与现今誓言相矛盾的誓言，我们就可以说一个不遵守自己的誓言的人败坏了一切，正因如此，法官才在使用法律之前立誓；而且我们还可做此指控："他们要求你作为法官遵守你的誓言，可是他们自己却不遵守他们的誓言。"另外，我们还应该利用所有的铺陈法。关于不属于修辞艺术本身的各种证明，就说这些吧。

[1_1].Not an exact copy, but making a kind of pair with it, and corresponding to it as the antistrophe to the strophe in a choral ode.

[1_2].Or "and they (Rhetoric and Dialectic) are not confined."

[1_3].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an art is the discovery of a system or method, as distinguished from mere knack (ἐμπειρία).

[1_4].Manuals or handbooks treating of the rules of any art or science.

[1_5].His functions were a combination of those of the modern judge and juryman.

[1_6].That is, forbid speaking of matter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ase.

[1_7].Systematic logical proofs (enthymeme, for example), including testimony as to character and appeals to the emotions(2.3), which the rhetorician has to invent (εὑρεῖν, inventio) for use in particular cases. They are contrasted with "inartificial" proofs, which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ules of the art, but are already in existence, and only need to be made use of. The former are dealt with in chaps. 4-14, the latter in chap. 15 of this book.

[1_8].κοινότερον: or, "more intelligible to the ordinary man."

[1_9].The case as a rule being a matter of personal indifference, the judges are likely to be led away by the arguments which seem most plausible.

[1_10].Exact scientific proof (ἀπόδειξις), which probable proof (πίστις) only to a certain extent resembles.

[1_11].Dialectic here apparently includes logic generally, the "part" being either the Analytica Priori, which deals with the syllogism, or the Sophistici Elenchi, on Fallacies.

[1_12].ἔνδοξα, "resting on opinion"; defined in the *Topics* (1.1) as "things generally admitted by all, or by most men, or by the wise, and by all or most of these, or by the most notable and esteemed."

[1_13].διότι either = ὅτι, "that"; or, (it is clear) "why."

[1_14].Almost equivalent to demonstration or strictly logical proof.

[1_15].1.2. The *Topics* is a treatise in eight books on Dialectic and drawing conclusions from probabilities.

[1_16].The early sophistical definition was "the art of persuasion."

[1_17].The essence of sophistry consists in the moral purpose, the deliberate use of fallacious arguments. In Dialectic, the dialectician has the power or faculty of making use of them when he pleases; when he does so deliberately, he is called a sophist. In Rhetoric, this distinction does not exist; he who uses sound arguments as well as he who uses false ones are both known as rhetoricians.

[1_18].Rhetoric, as dealing with human actions, characters, virtues, and emotions,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Politics, which includes Ethics. The two latter treat of the same subject from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Both deal with happiness and virtue, but the object of Politics is, by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t forms of States to find the one in which man will be most virtuous. Lastly, Rhetoric, 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citizen and of the members of the State as a whole, may be described as an offshoot of Politics, with which the sophistical rhetoricians identified it.

[1_19].Or, "slips into the garb of" (Jebb). Probably a stage metaphor.

[1_20].Aristot. *Pr. Anal.* 2.23; Aristot. *Post. Anal.* 1.1.

[1_21].That is, enthymeme and example must be the same as syllogism and

induction.

[1_22].From the definitions of syllogism (1.1) and induction (1.12). No particular passage, however,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here mentioned.

[1_23].The employment of syllogism and induction, τὸ εἶδος τῆς ῥητορικῆς being taken as simply = ἡ ῥητορική. Another rendering is: "that each kind of Rhetoric (that which depends upon example or upon enthymeme) enjoys some special advantage."

[1_24].A lost treatise, mentioned by Diogenes Laertius in his *Life of Aristotle* , 24, and by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in the first letter to Ammaeus, 6. It is supposed to have dealt with some branch of Logic.

[1_25].2.20-24.

[1_26].Or, "by persons which are so" (Jebb).

[1_27].Certain propositions, which seem paradoxical and improbable to a popular audience, must be proved before it is able to understand them.

[1_28].πρῶτος: the primary, typical syllogism of the first figure.

[1_29].Son of Diagoras of Rhodes, and like his father celebrated for his victories in the Greek athletic contests. He played a considerable part in political and naval affairs in support of the Spartans (412-407 B.C.) whom he afterwards offended, and by whom he is said to have been put to death.

[1_30].Aristot.*Pr. Anal.* 1.8.13.

[1_31].That is, probabilities and signs correspond to general and necessary propositions. This is not strictly correct; only the τεκμήρια correspond to the necessary propositions, the other signs and the other probabilities to the general or contingent propositions.

[1_32].Aristot. *Pr. Anal* . 2.27.

[1_33].The common topics do not deal with particular subject matter, as the specific topics do. In making use of the latter, the "better" (that is, in regard to a special science) the propositions chosen by a man, the more he will without knowing

it quit the domain of Rhetoric and Dialectic, and become a professor of that special science whose first principles he has hit upon.

[1_34].Aristot. Sophist. Elenchi (Fallacies) 9. This treatise is really the ninth and concluding part of the *Topics* .

[1_35].Propositions (or premises), the name given to the two first statements in a syllogism from which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All men are mortal (major premise); Socrates is a man (minor premise); therefore Socrates is mortal.

[1_36].All three kinds of hearers are regarded as judges (the mere spectator as a "critic"), although strictly κριτής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law courts.

[1_37].In 1.6.I and 8.7 the present is also mentioned as a time appropriate to deliberative Rhetoric.

[1_38].The omission of οὐκ before ἄδικον has been suggested. The sense would then be: "As to the injustice of enslaving...he is quite indifferent." There is no doubt a reference to the cruel treatment by Athens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island of Melos (416 B.C.) for its loyalty to the Spartans 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uc. 5.84-116). The Athenian envoys declined to discuss the question of right or wrong, which they said was only possible between equal powers, and asserted that expediency was the only thing that had to be considered. The question of justice or injustice (in the Melian case entirely disregarded), even when taken into account, was merely accessory and intended to serve as a specious justification for the policy of might.

[1_39].To protect his body and avenge his death (Hom. *Il.* 18.).

[1_40].The expedient, the just, the honorable, and their contraries.

[1_41].ὅλως: or, reading ὅλος, "the syllogism as a whole."

[1_42].The analytical science is Dialectic, incorrectly regarded as a branch of Analytics, which properly implies scientific demonstration.

[1_43].Taking εἰς ἐπιστήμας with μεταβαίνειν. If taken with ἐπισκευάζων, the sense will be: "by changing his ground (μεταβαίνειν being used absolutely) while altering their characters from faculties to sciences."

[1_44].τούτους: those who will receive exports and send imports.

[1_45].This rendering, although convenient, hardly represents the Greek, which, literally translated, is "the investigations of those who write about human actions" (cf. ἱστορικός, 4.8).

[1_46].This is the usual rendering, although it is hardly satisfactory. Jebb translates "a flourishing state...of body."

[1_47].Or, "bring about," "effect them."

[1_48].i.e. of mind and body; or δυνάμεις may mean "positions of authority and influence."

[1_49].This was a favorite boast of the Athenians.

[1_50].ἀνελευθερία: literally, qualities unbecoming to a free man or woman, ungentlemanly, unladylike; hence, mean, servile, sordid.

[1_51].A similar charge against the Spartan woman is made in Aristot. *Pol.* 2.9.5: "Further the looseness (ἄνεσις) of the Spartan women is injurious both to the purpose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State...their life is one of absolute luxury and intemperance" (compare Eur. Andr. 595-596 "even if she wished it, a Spartan girl could not be chaste"). The opinion of Xenophon and Plutarch is much more favorable.

[1_52].ἢ μή: in the MS. readings these words follow τοῦ οἰκεῖα εἶναι: "ownership or non-ownership." The alteration is Spengel's.

[1_53].ἐνέργεια: realization in action or fact.

[1_54].Of Selymbria, physician and teacher of hygienic gymnastics (c. 420 B.C.). He is said to have made his patients walk from Athens to Megara and back, about 70 miles. He was satirized by Plato and by his old pupil Hippocrates as one who killed those for whom he prescribed (cf. 2.23.29).

[1_55].Five contests: jumping, running, discus-throwing, javelin-throwing, wrestling.

[1_56].Or simply, "freedom from pain" (5.15).

[1_57].A combination of wrestling and boxing.

[1_58].The results of art and the results due to nature are often assisted (or hindered) by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irregular operations of fortune or chance. Health may be the result of fortune, as well as art (a sick man may be cured by a drug taken by chance, one not prescribed by the physician); beauty and strength, of fortune as well as nature. It is parenthetically remarked that fortune may also produce unnatural monstrosities. The removal of the brackets and the substitution of a comma for the colon after φύσις have been suggested. The meaning would then be: "for instance, such as are due to nature, but possibly may be also contrary to nature."

[1_59].The excellence of anything is proportionate to its success in the performance of its proper function. The function of acquisition is to get something valuable, such as money, and its "excellence" may be judges by the amount of wealth obtained.

[1_60].Hom. *Il.* 1.255. The words are those of Nestor to Achilles and Agamemnon, in which he points out how their enemies would rejoice if they heard all the story of their quarrel.

[1_61].Reading ὅ. The ordinary reading οὗ is taken to mean "that which does not permit excess," that which is midway between two extremes, the mean. Another suggested rendering is, "that of which one cannot have too much."

[1_62].Hom. *Il.* 2.160. Addressed by Hera to Athene, begging her to prevent the Greeks departing from Troy and leaving Helen behind.

[1_63].Hom. *Il.* 2.298. Spoken by Odysseus. While sympathizing with the desire of the army to leave, he points out that it would be "disgraceful after waiting so long" to return unsuccessful, and exhorts them to hold out.

[1_64].Proverbial for "lost labor." Cf. French "faire naufrage au port," and the English "there's many a slip twixt cup and lip."

[1_65].Meaning that they cannot have done their duty against their enemies, who would then have blamed them. Another suggested reading is οὓς οἱ φίλοι ψέγουσι καὶ οὓς οἱ ἐχθροὶ μὴ ψέγουσι ("those whom their friends blame and whom their enemies do not blame.")

[1_66].In the Iliad Glaucus, a Corinthian, is described as an ally of the Trojans.

Simonides meant to praise, but the Corinthians were suspicious and thought his words were meant satiric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iew just expressed by Aristotle. The Simonides referred to is Simonides of Ceos (Frag. 50, P.L.G. 3, where the line is differently given). Aristotle is evidently quoting from memory, as he often does, although not always accurately.

[1_67].γενόμενα ἄν: Spengel omits ἄν: i.e. "things which have happened."

[1_68]."Or which no one else has done" (Jebb).

[1_69].The one, the smaller number, and the greater number must be of the same species. Thus, 5 pounds is a greater good than 2 pounds; but 5 farthings is not a greater good than 2 pounds, since the smaller number is not reckoned in with the greater Buckley.

[1_70].If B (life) follows on, is the consequent of A (health), but A is not the consequent of B, then A is a greater good than B.

[1_71].Eight is greater than 2 by 6, which itself is greater than 2.

[1_72].A thing may be of greater importance in two ways: (a) that which is a first principle is superior to that which is not; (b) that which is not a first principle, but an end, is superior to that which is a first principle; for the end is superior to the means. In the illustration that follows: (a) the first principle (suggesting the plot) is said to be of more importance (worse) than the end or result (carrying out the plot); (b) on the other hand, this end is said to be worse than the first principle, since the end is superior to the means. Thus the question of the amount of guilt can be argued both ways.

[1_73].Oropus, a frontier-town of Boeotia and Attica, had been occupied by the Thebans (366 B.C.). Callistratus suggested an arrangement which was agreed to and carried out by Chabrias—that the town should remain in Theban possession for the time being. Negotiations proved unsuccessful and the Thebans refused to leave, whereupon Chabrias and Callistratus were brought to trial. Leodamas was an Athenian orator, pupil of Isocrates, and pro-Theban in his political views.

[1_74].Pind. *O.* 1.1.

[1_75].e.g. it is worse to be blind than deaf; therefore sight is better than hearing (Schrader).

[1_76]."Things of which the prices are greater, price being a sort of worth" (Jebb).

[1_77].Or, "superiority over a greater number of things."

[1_78].After πεῖσαι all the MSS. except A Paris have λέγουσαν. If this is retained, it must refer to Meleager's wife Cleopatra, who "persuaded him...by quoting." As the text stands, the literal rendering is: "the poet says that (the recital of the three verses) persuaded." The passage is from Hom. *Il.* 9.592-594 (slightly different).

[1_79].Epicharmus (c. 550-460 B.C.) writer of comedies and Pythagorean philosopher, was born at Megara in Sicily (according to others, in the island of Cos). His comedies, written in the Doric dialect, and without a chorus, were either mythological or comedies of manners, as extant titles show. Plato speaks of him as "the prince of comedy" and Horace states definitely that he was imitated by Plautus.

[1_80].Simonides, Frag. 163 (P.L.G. 3.).

[1_81].Or, the yoke to which the basket, like our milk-pails long ago, was attached.

[1_82].Hom. *Od.* 22.347. The words are those of the minstrel Phemius, who was forced to sing to the suitors of Penelope.

[1_83].Not in the oration in *Thuc.* 2.35.

[1_84].Or, reading καὶ ἁπλῶς: "that which is useful both to the individual and absolutely is a greater good" (than that which is only useful in one way), but this necessitates a considerable ellipse.

[1_85].It is difficult to see the connection here. Munro's suggestion, τῷ δοκεῖν for τοῦ δοκεῖν, adopted by Roemer, would mean "by the show of it," that is, by its attracting notice.

[1_86].Or, "is not punished equally."

[1_87].The pronouncements of the supreme authority are themselves authoritative as laying down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citizens.

[1_88].The "end" of monarchy is wanting here.

[1_89].Aristot. *Pol.* 3.7.

[1_90].Or, "a faculty of doing many and great benefits to all men in all cases" (Jebb).

[1_91].Or, taking εἰς εὐδαιμονίαν with βουλεύεσθαι, "come to a wise decision conducive to their happiness."

[1_92].i.e. the causes and results of virtue (Cope); or, the noble and the disgraceful (Jebb).

[1_93].Frag. 55 (P.L.G. 3.).

[1_94].Frag. 28 (P.L.G. 3.).

[1_95].Those whose qualities are extreme may be described as possessing the virtues of which these are the excess.

[1_96].Plat. *Menex.* 235d.

[1_97].Thus, the Scythians may be assumed to be brave and great hunters; the Spartans hardy, courageous, and brief in speech; the Athenians fond of literature—and they should be praised accordingly.

[1_98].That is, τὸ τίμιον looks as if it were really καλόν, and should be spoken as if it were so.

[1_99].Cp. 7.32 above.

[1_100].Frag. 111 (P.L.G. 3.).

[1_101].Archedice, daughter of Hippias, tyrant of Athens, and wife of Aeantides, son of Hippocles, tyrant of Lampsacus.

[1_102].In the first sentence, the statement is imperative, there is a prohibition; in the second, it is a simple affirmative, implying praise. In the one case there is forbidding, in the other not-forbidding, which are opposites.

[1_103].Nothing more is known of him.

[1_104].Who slew Hipparchus, tyrant of Athens.

[1_105].Reading ἀσυνήθειαν. He had no legal practice, which would have shown the irrelevancy of comparisons in a law court, whereas in epideictic speeches they are useful. συνήθειαν gives exactly the opposite sense, and must refer to his having written speeches for others to deliver in the courts.

[1_106].προαίρεσις (premeditation, deliberate or moral choice) is always voluntary, but all voluntary action is not premeditated; we sometimes act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Choice is a voluntary act, the result of deliberate counsel, including the use of reason and knowledge. In Aristot. Nic. Eth. 11 Aristotle defines προαίρεσις as "a deliberate appetition of (longing for, ὄρεξις) things in our power," as to which we should necessarily be well-informed.

[1_107].Or, "in the matter of ease," taking τὰ ῥάθυμα as = ῥαθυμία.

[1_108].In the cases of the young, the poor, and the rich, their youth etc. are only "accidents," accidental not real causes. Aristotle defines τὸ συμβεβηκός (Aristot. *Met.* 4.30) as "that which is inherent in something, and may be predicated of it as true, but neither necessarily, nor in most cases; for instance, if a man, when digging a hole for a plant, finds a treasure." The color of a man's eyes is an "inseparable" accident, the fact that a man is a lawyer is a "separabIe" accident.

[1_109].Book 2.12-18.

[1_110].Book 2.2.

[1_111].Cf. Book 1.6 above.

[1_112].The true nature of the "normal state" was lost during the period of disturbance and unsettlement.

[1_113].From Evenus of Paros (Frag. 8, P.L.G. 2.): see Introd.

[1_114].Or "rest" (bodily).

[1_115].There is no consideration or "definite theory" (Jebb, Welldon) of the results that may follow. The desires arise without anything of the kind; they simply

come.

[1_116].The passage ἐπεὶ δ᾽ ἐστὶ . . . αἴσθησις has been punctuated in two ways. (1) With a full stop at ἐλπίζει (Roemer, Jebb). The conclusion then drawn is that memory and hope are accompanied by imagination of what is remembered or hoped. To this it is objected that what Aristotle really wants to prove is that memory and hope are a cause of pleasure. (2) With a comma at ἐλπίζει (Cope, Victorius). The steps in the argument will then be: if pleasure is the sensation of a certain emotion; if imagination is a weakened (faded) sensation; if one who remembers or hopes is attended by an imagination of what he remembers or hopes; then, this being so, pleasure will attend one who remembers or hopes, since there is sensation, and pleasure is sensation and a kind of movement (sect. 1). φαντασία, the faculty of forming mental images (variously translated "imagination," "mental impression," "fantasy") is defined by Aristotle (Aristot. *De Anima* 3.3.11) as a kind of movement, which cannot arise apart from sensation, and the movement produced must resemble the sensation which produced it. But φαντασία is more than this; it is not merely a faculty of sense, but occupies a place midway between sense and intellect; while imagination has need of the senses, the intellect has need of imagination. If φαντασία is referred to an earlier perception of which the sense image is a copy, this is memory. Imagination carries the sense images (φαντάσματα) to the seat of memory. They are then transformed into memory (of something past) or hope (of something future) and are handed on to the intellect. (See Cope here, and R. D. Hicks in his edition of the De Anima.)

[1_117].Euripides, Andromeda (Frag. 133, T.G.F.).

[1_118].Hom. *Od.* 15.400-401, but misquoted in the second line, which runs: ὅς τις δὴ μάλα πολλὰ πάθῃ καὶ πόλλ᾽ ἐπαλ.ηθῇ.

[1_119].Hom. *Il.* 18.109.

[1_120].Or "doing something that has to do with the beloved."

[1_121].Hom. *Il.* 23.108, on the occasion of the mourning for Patroclus; Hom. *Od.* 4.183, referring to the mourning for the absence of Odysseus.

[1_122].Controversiae or school rhetorical exercises, as well as arguing in the law courts; unless ἐριστικάς means simply "in which there is rivalry."

[1_123].For the meaning of φιλία, φιλεῖν cf. Book 2.4.

[1_124].Eur. *Orest.* 234.

[1_125].True knowledge or philosophy, which is the result of learning, is the highest condition of the intellect, its normal or settled state. Consequently, a return to this is pleasure, which is defined (11.1) as a settling down of the soul into its natural state after a period of disturbance.

[1_126].Or, "larger means than the person benefited."

[1_127].Hom. *Od.* 17.218 ὡς αἰεὶ τὸν ὁμοῖον ἄγει θεὸς ὡς τὸν ὁμοῖον.

[1_128].Literally, "ever jackdaw to jackdaw."

[1_129].Of likeness and kinship.

[1_130].11.22.

[1_131].Both practically and speculatively or philosophically.

[1_132].Antiope (Frag. 183, T.G.F.).

[1_133].Only the definition appears in the existing text; "The ridiculous is an error, painless and non-destructive ugliness (Aristot. *Poet.* 5)."

[1_134].Book 2.19.

[1_135].Two different persons. If the second ὁ be omitted, the reference is to one.

[1_136].Or, a "resourceful mind."

[1_137].Who Zeno was, and what the story, is unknown.

[1_138].Some do wrong for the sake of gain, others for the sake of praise; but the former sacrifice honor for self-interest, the latter self-interest for honor.

[1_139]."More distant" (Jebb).

[1_140].With a comma or colon after τὰ τοιαῦτα; without these render: "those who possess such things as they..."

[1_141].Who were too far off to retaliate.

[1_142].A proverb meaning "an easy prey." The Mysians were regarded as cowardly and unwarlike.

[1_143].αἰκία (assault) was a less serious offence than ὕβρις (wanton outrage).

[1_144].οἷς i.e. supplying ἀδικουμένοις, "by whose being wronged." οὓς has been suggested, i.e. supplying ἀδικοῦντες, "wronging whom."

[1_145].In our relations with whom, almost = from whom. Another interpretation is: "In reference to whom there is a chance... consideration from others, meaning the judges" (Welldon).

[1_146].Callipus was a friend of Dion, who freed Syracuse from Dionysius the Younger. He afterwards accused Dion and contrived his murder. His excuse was that Dion knew what he intended to do, and would be likely to strike first, if he did not anticipate him.

[1_147].Aenesidemus, tyrant of Leontini, being anticipated by Gelon, tyrant of Syracuse, in the enslavement of a neighboring state, sent him the cottabus prize, as a compliment for having "played the game" so skilfully. The cottabus was originally a Sicilian game.

[1_148].Tyrant of Pherae.

[1_149].Soph. *Ant.* 456.

[1_150].Of Elis, pupil of Gorgias. The oration is not extant, but the scholiast supplies his words: ἐλευθέρους ἀφῆκε πάντας θεός: οὐδένα δοῦλον ἡ φύσις πεποίηκεν ("God has left all men free; Nature has made none a slave"). The Messenians had revolted from Sparta.

[1_151].1.10.3.

[1_152].Book 1.6.

[1_153].1.10.3.

[1_154].Book 2.2.

[1_155].Book 1.11, 12.

[1_156].Roemer reads, after Dittmeyer, εἰἐπὶβλάβῃ(τούτουἀφ᾽οὗἔλαβε)καὶ... from the old Latin translation.

[1_157].Laws are special and general, the former being written or unwritten. The unwritten law, again, is of two kinds: (1)general; (2)supplementary to the special written law. This general law(not the same as the general law "based upon nature" sect. 2)refers to acts which go beyond the legal standard of virtuous or vicious acts and are characterized by a remarkable degree(καθ᾽ὑπερβολήν)of virtue or the opposite. For these laws do not prescribe any special reward or punishment, but acts are praised or blamed, honored or dishonored, rewarded or pun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feeling of mankind.

[1_158]."Inexperience"(Jebb).

[1_159]."To be willing that a judicial sentence should be nominal rather than real" (Jebb).

[1_160].1.7.13. Callistratus and Melanopus were rival orators. Nothing is known of this particular charge.

[1_161].The magistrates who superintended the building and repairing operations.

[1_162].Understanding ἰᾶσθαι. Or "to punish adequately," supplying οὖμὴἴσητιμωρία.

[1_163].An orator, not the tragic poet.

[1_164]."Or has been seldom paralleled" (Cope, but cp. 1.9.38).

[1_165].And therefore the violation of them is more discreditable.

[1_166].When he thinks of the punishment they may entail.

[1_167].Although the use of inartificial proofs is almost entirely confined to forensic oratory, they may be used in deliberative oratory.

[1_168].The first line is quoted 1.13.2. The second differs somewhat from Soph.

Ant., where the passage runs, , , ("I was not likely, through fear of the pride of any man, to incur the penalty for violating these statutes at the bar of heaven").

[1_169].Which is the administration of real justice, not that which appears to the legislator to be such and is embodied in legal enactments.

[1_170].Cp.14.7 above.

[1_171].Αἴαςδ᾽ἐκΣαλαμῖνοςἄγενδυοκαίδεκανῆας, στῆσεδ᾽ἄγωνἵν᾽Α᾽θηναίωνἵσταντοφάλαγγες, Hom. *Il.* 2.557-558. The Lacedaemonians, acting as arbitrators between Athens and Megara, who were fighting for the possession of Salamis, decided in favor of Athens on the strength of the two lines in the Iliad, which were taken to show that Salamis belonged to Athens.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second line was the invention of Solon.

[1_172].It is not known to what this refers.

[1_173].(Frag. 22, P.L.G. 2, where the line runs, εἰπέμεναιΚριτίᾳξανθότριχιπατρὸςἀκούειν). The Critias attacked by Cleophon is the well-known oligarch and grandson of the first. Cleophon argued from the phrase "bid him listen to his father" that his ancestor was a disobedient son and a degenerate. In reality, Solon had a high opinion of the family, and probably meant to praise the father.

[1_174].Hdt. 7.141.

[1_175].They have not been mentioned before. Spengel would therefore omit εἴρηται, and remove the commas: "proverbs are, as it were, evidence."

[1_176].From the Cypria of Stasinus, of the "epic cycle."

[1_177].Opponent of Demosthenes. Chares was an Athenian commander, both naval and military. Nothing is known of Archibius. Plato is probably the comic poet.

[1_178].Or, "witnesses wholly unconnected with the case."

[1_179].In Attic legal procedure, the challenge (πρόκλησις) to take an oath on the question at issue was one method of deciding it. One party offered the other something to swear by (δίδωσιὅρκον), this being the real meaning of ὅρκος, and the other party either accepted (λαμβάνει, δέχεται) it or refused it. Both parties, of

their own accord, might propose to take the oath.

[1_180].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or not tendering the oath: (1)men are always ready to perjure themselves, if they are likely to benefit by doing so; (2)if your adversary takes the oath, he will decline to pay, trusting that he will be acquitted, whereas, if he is not on his oath, he will probably be condemned; (3)there is less risk in leaving the decision to the dicasts, who can be trusted.

[1_181].Born at Colophon in Asia Minor, he migrated to Elea in Italy, where he founded the Eleatic school of philosophy.

[1_182].The defence in such cases is: (1) that the previous oath was taken as a result of fraud or compulsion; (2) that you did not mean what you said.

Book II

第二卷

Chapter 1

第一章

Such then are the materials which we must employ in exhorting and dissuading, praising and blaming, accusing and defending, and such are the opinions and propositions that are useful to produce conviction in these circumstances; for they are the subject and source of enthymemes, which are specially suitable to each class (so to say) of speeches. [2_1] But since the object of Rhetoric is judgement—for judgements are pronounced in deliberative rhetoric and judicial proceedings are a judgement—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consider how to make the speech itself demonstrative and convincing, but also that the speaker should show himself to be of a certain character and should know how to put the judge into a certain frame of mind. For it makes a great difference with regard to producing conviction—especially in demonstrative, and, next to this, in forensic oratory—that the speaker should show himself to be possessed of certain qualities and that his hearers should think that he is disposed in a certain way towards them; and further, that they themselves should be disposed in a certain way towards him. [2_2] In deliberative oratory, it is more useful that the orator should appear to be of a certain character, in forensic, that the hearer should be disposed in a certain way; for opinions vary, according as men love or hate, are wrathful or mild, and things appear either altogether different, or different in degree; for when a man is favorably disposed towards one on whom he is

passing judgement, he either thinks that the accused has committed no wrong at all or that his offence is trifling; but if he hates him, the reverse is the case. And if a man desires anything and has good hopes of getting it, if what is to come is pleasant, he thinks that it is sure to come to pass and will be good; but if a man is unemotional or not hopeful, [2_3] it is quite the reverse.

以上就是我们进行劝说和劝阻、赞扬和指责、指控与辩护时应该使用的材料，以及在这些场合有助于说服听众的观点和命题；它们是分别适用于每一种演说的修辞式推理的话题和来源。既然修辞学的对象是判断，议政修辞要宣讲各种判断，而审判即诉讼修辞是一种判断，那我们就不仅需要考虑如何使演讲本身更具证明性和说服力，而且还应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某种品质的人，并且应该懂得如何将法官置于某种心境之中。这是因为在制造可信度上，演说者展现自己的某些品质，使观众认为他对他们有某种好感，进而让观众觉得他们也应该对他有某种好感，这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尤其是在推理演说中，其次是在诉讼演说中。在议政演说中，演说者表现出某种品性；在诉讼演说中，演说者使听话人对自己怀有某种好感，这些都很有益处；因为人们的观点因爱恨和喜怒而异，而很多事情也因此要么大相径庭，要么程度有别。如果裁决者对被裁决者有好感，那他要么会认为被告根本没有犯罪，要么会认为被告所犯的罪行微不足道；但是如果裁决者憎恶被裁决者，情况就恰恰相反。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某样东西并认为很有希望得到它，如果即将到来之物是令人愉悦的，那么这个人会觉得这样东西一定会出现并且是好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怀着无所谓的心情或者不抱希望，情况就将截然相反。

For the orator to produce conviction three qualities are necessary; for, independently of demonstrations, the things which induce belief are three in number. These qualities are good sense, virtue, and goodwill; for speakers are wrong both in what they say

and in the advice they give, because they lack either all three or one of them. For either through want of sense they form incorrect opinions, or, if their opinions are correct, through viciousness they do not say what they think, or, if they are sensible and good, [2_4] they lack goodwill; wherefore it may happen that they do not give the best advice, although they know what it is. These qualities are all that are necessary, so that the speaker who appears to possess all three will necessarily convince his hearers. The means whereby he may appear sensible and good [2_5] must be inferred from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virtues; [2_6] for to make himself appear such he would employ the same means as he would in the case of others. We must now speak of goodwill and friendship in our discussion of the emotions.

要说服他人，演说者必须具有三种品质，因为独立于逻辑推理之外且可用于说服的东西就是三种，分别是见识、美德和善意。如果演说者所说之事和所建议之事不正确，原因即在于他们缺乏以上三种品质或者其中之一。人们因缺乏见识而形成错误的观点；或者，即使他们的观点正确，然而出于恶德他们口是心非；或者，他们有见识亦有好人品，但是却缺乏善意；因此他们有可能明知何为最佳建议却不肯提出。这些便是说服他人时所需要的全部品质，因此，一个明显拥有这三种品质的演说者必然可以说服其听众。演说者用以表现见识和美德的方法应该从关于美德的分类中推知，须知为了使自己表现出这样的品质，演说者会采用他人表现出这些品质的相同的方法。我们将在讨论情感时说说善意与友谊。

The emotions are all those affections which cause men to change their opinion in regard to their judgements, and are accompanied by pleasure and pain; such are anger, pity, fear, and all similar emotions and their contraries. And each of them must be

divided under three heads; for instance, in regard to anger, the disposition of mind which makes men angry, the persons with whom they are usually angry, and the occasions which give rise to anger. For if we knew one or even two of these heads, but not all three,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arouse that emotion. The same applies to the rest. Just as, then, we have given a list of propositions [2_7] in what we have previously said, we will do the same here and divide the emotions in the same manner.

情感是能够使人改变观念、影响判断的种种情绪，伴随着快乐和痛苦；愤怒、怜悯以及各种类似情感和它们的反面便是这样。每种情感应分为三个部分。例如，愤怒可分为使人愤怒的心境、经常使人愤怒的人以及导致愤怒的情形。如果我们只懂得其中之一二，而不是全部，我们就无法激发听众的愤怒。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情感。我们在前面已经就所述内容列出了一系列命题，这里我们也将如此，采用同样的方法对情感进行分类。

Chapter 2

第二章

Let us then define anger as a longing, accompanied by pain, for a real or apparent revenge for a real or apparent slight, [2_8] affecting a man himself or one of his friends, when such a slight is undeserved. If this definition is correct, the angry man must always be angry with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for instance, with Cleon, but not with men generally), and because this individual has done, or was on the point of doing, something against him or one of his friends; and lastly, anger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a certain pleasure, due to the hope of revenge to come. For it is pleasant to

think that one will obtain what one aims at; now, no one aims at what is obviously impossible of attainment by him, and the angry man aims at what is possible for himself. Wherefore it has been well said of anger, that “Far sweeter than dripping honey down the throat it spreads in men's hearts.“ [2_9] for it is accompanied by a certain pleasure, for this reason first, [2_10] and also because men dwell upon the thought of revenge, and the vision that rises before us produces the same pleasure as one seen in dreams.

姑且将愤怒定义为一种伴随着痛苦的欲望，一种由于当事人或其朋友受到了本不应受到的真实或显然的轻慢而产生的真实或显然的报复欲望。如果此定义准确无误，那么发怒者肯定总是对某个特定的个人发怒（例如，对克勒翁发怒，而不是对所有人发怒），而且是因为此人曾轻慢过或者正在轻慢发怒者或其朋友；最后，因为对报复的预期，愤怒往往伴随着某种快乐。须知想到自己将得偿所愿，这是令人愉悦的；而且，没有人会以自己明显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作为目标，所以发怒者也是以那些对他来说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目标的。因此，关于愤怒，有句话说得好，“愤怒在人心中蔓延开来，远比顺着喉咙滴下的蜂蜜还要甜美”，因为它总是伴随着某种快乐，这是首要的原因；还因为人们念念不忘报复，而我们想象报复的时候会感到如同在梦境之中的快乐。

Slighting is an actualization of opinion in regard to something which appears valueless; for things which are really bad or good, or tend to become so, we consider worthy of attention, but those which are of no importance or trifling [2_11] we ignore. Now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slight: disdain, spitefulness, and insult. For he who disdains, slights, since men disdain those things which they consider valueless and slight what is of no account. And the spiteful man appears to show disdain; for spitefulness consists in placing

obstacles in the way of another's wishes, not in order that any advantage may accrue to him who spites, but to prevent any accruing to the other. Since then he does not act in this manner from self-interest, it is a slight; for it is evident that he has no idea that the other is likely to hurt him, for in that case he would be afraid of him instead of slighting him; nor that he will be of any use to him worth speaking of, for in that case his thought would be how to become his friend. [2_12]

轻慢乃是对看似无价值的东西所持想法的外在表现；那些真正好的或者坏的东西，或者趋向于好的或坏的东西，我们认为值得重视，而那些不甚重要或者细枝末节的东西，我们则视而不见。轻慢有三种形式：鄙视、怨毒和侮辱。鄙视他人即是轻慢他人，因为人们鄙视那些他们认为一文不名的东西，轻慢那些他们认为无足重轻的东西。怨毒之人显然也在轻慢他人，怨毒体现在阻碍他人实现愿望上，其目的不在于让怨毒者本人获益，而是为了阻止他人得利。既然怨毒者如此行事并不是出于私利，其行为便是一种对他人的轻慢。很显然，怨毒者并不认为对方会伤害他，否则，他会惧怕而不是轻慢对方；而且他也不认为对方会对他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用处，否则他所考虑的将是如何与对方交好。

Similarly, he who insults another also slights him; for insult [2_13] consists in causing injury or annoyance whereby the sufferer is disgraced, not to obtain any other advantage for oneself besid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ct, but for one's own pleasure; for retaliation is not insult, but punishment. The cause of the pleasure felt by those who insult is the idea that, in ill-treating others, they are more fully showing superiority. That is why the young and the wealthy are given to insults; for they think that, in committing them, they are showing their superiority. Dishonor is characteristic of insult; and

one who dishonors another slights him; for that which is worthless has no value, either as good or evil. Hence Achilles in his wrath exclaims: “He has dishonored me, since he keeps the prize he has taken for himself,“ [2_14] and “[has treated me] like a dishonored vagrant,“ [2_15] as if being angry for these reasons. Now men think that they have a right to be highly esteemed by those who are inferior to them in birth, power, and virtue, and generally, in whatever similar respect [2_16] a man is far superior to another; for example, the rich man to the poor man in the matter of money, the eloquent to the incompetent speaker in the matter of oratory, the governor to the governed, and the man who thinks himself worthy to rule to one who is only fit to be ruled. Wherefore it has been said: “Great is the wrath of kings cherished by Zeus,“ [2_17] and “Yet it may be that even afterwards he cherishes his resentment,“ [2_18] for kings are resentful in consideration of their superior rank. Further, men are angry at slights from those by whom they think they have a right to expect to be well treated; such are those on whom they have conferred or are conferring benefits, either themselves, or someone else for them, or one of their friends; and all those whom they desire, or did desire, to benefit.

同理，侮辱他人也是轻慢他人；因为侮辱体现在伤人肉体或致人恼怒上，从而使被辱者蒙受耻辱。除了实施侮辱行为之外，侮辱者的目的并不是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而是为了得到快感；须知报复不是侮辱，而是惩罚。那些侮辱他人者之所以感到快乐，是因为他们认为在恶意对待他人时自己更能充分展示优越性。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和有钱人总是惯于侮辱别人；因为他们认为侮辱别人时，自己在展示优越性。羞辱是侮辱的特征，羞辱他人也即轻慢他人；须知一文不名的东西，无论好坏，都毫无价值可言。因此，阿喀琉斯愤怒地喊道，“他（阿伽门农）羞辱了我，因为他把奖赏据为己有”，而且还“视我如同一个毫无颜面的乞丐”，看起来他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而愤怒。

人们习惯于认为自己应该被那些在出身、权力、美德以及诸如此类的所有事情上远不及自己的人所尊崇。例如，有钱人在金钱方面之于穷人，能言善道者在口才方面之于不善言辞者，统治者之于被统治者，认为自己有权统治的人之于只适合被统治的人等等。因此有人说，“为宙斯所宠爱的国王总是怒气冲天”，而且“事后他可能仍不善罢甘休”，要知道位高权重的国王脾气也大。再者，人们会因为被那些他们认为应该善待他们的人所轻慢而愤怒。这些人包括：他们自己或者代表他们的人，或者他们的朋友曾经或正在施以恩德的人，以及所有他们希望施以恩德或者曾经希望施以恩德的人。

It is now evident from these considerations what is the disposition of those who are angry, with whom they are angry, and for what reasons. Men are angry when they are pained, because one who is pained aims at something; if then anyone directly opposes him in anything, as, for instance, prevents him from drinking when thirsty, or not directly, but seems to be doing just the same; and if anyone goes against him or refuses to assist him, or troubles him in any other way when he is in this frame of mind, he is angry with all such persons. Wherefore the sick, the necessitous, [those at war], the lovesick, the thirsty, in a word, all who desire something and cannot obtain it, are prone to anger and easily excited, especially against those who make light of their present condition; for instance, the sick man is easily provoked in regard to his illness, [2_19] the necessitous in regard to his poverty, the warrior in regard to warlike affairs, the lover in regard to love affairs, and so with all the rest; for the passion [2_20] present in his mind in each case paves the way for his anger. Again, men are angry when the event is contrary to their expectation, for the more unexpected a thing is, the more it pains; just as they are overjoyed if,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what they desire comes to pass. From this it is obvious what are the seasons, times, states of mind, and conditions of age in

which we are easily moved [2_21] to anger; and what are the various times, places, and reasons, which make us more prone to anger in proportion as we are subject to their influence.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了发怒者的性情、他们生气的对象以及原因。人们在遭受痛苦时会愤怒，因为痛苦者必然是对某物有所求。假如这时有人直接阻碍他，比如不允许口渴之人喝水，或者虽然不直接阻碍，但是做出的事情恰是如此；假如有人反对他或拒绝支持他，或者在他处在这种心境时，即对某物有所求时，用其他方式制造困难，那么他会对所有这些人发怒。因此，病人、穷人、参战之人、相思之人、饥渴之人，总之，所有有求而不得之人，都动辄发怒，容易激动，尤其容易对那些轻视他们现状的人发怒；比如，病人很容易因别人无视他们的病痛而被激怒；穷人很容易因别人无视他们的贫穷而生气；武士很容易因别人无视其战功而生气；相思之人很容易因别人无视其情事而生气；其他人等莫不如此，须知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一个人内心的冲动都能使他发怒。当某事的发生与预期相反时，人们会动怒，须知一件事情越是始料未及，越是令人苦恼；正如当心中所愿之事出乎意料地实现时，人们会欣喜若狂。从上所述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什么季节、什么时候、什么心境下和什么年龄段容易被激怒，以及哪些时节、地点和理由会令我们受制于其影响从而更容易动怒。

Such then are the dispositions of those who are easily roused to anger. As to the objects of their anger, men are angry with those who ridicule, mock, and scoff at them, for this is an insult. And with those who injure them in ways that are indications of insult. But these acts must be of such a kind that they are neither retaliatory nor advantageous to those who commit them; for if they are, they then appear due to gratuitous insult. And men are angry with those who speak ill of or despise things which they themselves consider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for instance, if a man speaks

contemptuously of philosophy or of personal beauty in the presence of those who pride themselves upon them; and so in all other cases. But they are far more angry if they suspect that they do not possess these qualities, either not at all, or not to any great extent, or when others do not think they possess them. For when they feel strongly that they do possess those qualities which are the subject of mockery, they pay no heed to it. And they are more angry with those who are their friends than with those who are not, for they think that they have a right to be treated well by them rather than ill. And they are angry with those who have been in the habit of honoring and treating them with respect, if they no longer behave so towards them; for they think that they are being treated with contempt by them, otherwise they would treat them as before. And with those who do not return their kindnesses nor requite them in full; and with those who oppose them, if they are inferiors; for all such appear to treat them with contempt, the latter as if they regarded them as inferiors, the former as if they had received kindnesses from inferiors.

以上便是易怒之人的性情。至于人们发怒的对象，人们通常对那些讥笑、嘲弄和讥讽他们的人发怒，因为这些都是一种侮辱。人们也对那些以暗含侮辱的方式伤害他们的人动怒。不过这些伤害行为肯定具有两个特点：既不是出于报复，也不会给实施者带来好处；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明显是由无端的侮辱所导致。人们对那些恶语中伤或者蔑视他们最为珍视之物的人也会动怒；例如，如果有人在那些以哲学自居或以美貌为荣的人面前不屑地谈论哲学或美貌，肯定会招致愤怒；其他情况也是如此。不过，人们更易动怒的情况，是当他们觉得自己并不具备最为珍视的那些品质，要么完全不具备，要么程度勉强，或者当别人并不认为他们具备那些品质时。要知道当人们坚信自己的确具有某些被人嘲笑的品质时，他们是不会理睬那些嘲笑的。此外，人们对朋友的愤怒胜过对不是朋友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理当

被朋友厚待，而不是薄待。人们会因那些一向尊重、礼遇自己的人不再如此对待自己而动怒；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那些人蔑视了，否则那些人会一如既往地尊重、礼遇他们。对那些忘恩负义或者不充分报恩的人，还有那些不如自己却反对自己的人，人们也会愤怒；因为这两种人似乎都在蔑视他们，后者似乎把他们视为下等人，前者似乎认为自己当初所受之惠来自下等人。

And they are more angry with those who are of no account, if they slight them; for anger at a slight was assumed to be felt at those who ought not to behave in such a manner; for inferiors ought not to slight their superiors. And they are angry with friends, if they neither speak well of nor treat them well, and in an even greater degree, if they do the opposite. And if they fail to perceive that they want something from them, as Plexippus [2_22] in Antiphon's tragedy reproached Meleager; for failure to perceive this is a sign of slight; since, when we care for people, these things are noticed. [2_23] And they are angry with those who rejoice, or in a general way are cheerful when they are unfortunate; for this is an indication of enmity or slight. And with those who do not care if they pain them; whence they are angry with those who bring bad news. And with those who listen to the tale of their faults, or look on them with indifference, for they resemble slighters or enemies; for friends sympathize and all men are pained to see their own faults exposed. [2_24] And further, with those who slight them before five classes of persons: namely, their rivals, those whom they admire, those by whom they would like to be admired, those whom they respect, or those who respect them; when anyone slights them before these, their anger is greater. They are also angry with those who slight such persons as it would be disgraceful for them not to defend, for instance, parents, children, wives, and dependents. [2_25] And with those who are ungrateful, [2_26] for the slight is contrary to all sense

of obligation. And with those who employ irony, when they themselves are in earnest; for irony shows contempt. And with those who do good to others, but not to them; for not to think them worthy of what they bestow upon all others also shows contempt. Forgetfulness also is a cause of anger, such as forgetting names, although it is a mere trifle, since even forgetfulness seems a sign of slight; for it is caused by indifference, and indifference is a slight. We have thus stated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the frame of mind and the reasons which make men angry, and the objects of their anger. It is evident then that it will be necessary for the speaker, by his eloquence, to put the hearers into the frame of mind of those who are inclined to anger, and to show that his oppon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things which rouse men to anger and are people of the kind with whom men are angry.

如果被那些无足轻重的人所轻慢，人们会更加愤怒，须知一般认为由轻慢所致的愤怒是向那些不应如此行事的人发作的，而不如别人的人不应轻慢别人。如果朋友既不称赞也不善待他们，人们还会对朋友发怒；如果朋友做出相反的事情，即贬损或恶待他们，则人们会更加愤怒。如果人们对朋友有所求，朋友却没有看出来，人们也会动怒，正如安提丰的悲剧中普勒克西波斯对墨勒阿革罗斯的斥责。因为看不到朋友的所求是一种轻慢的表现，要知道当我们在乎某人时，我们是会注意到这些事情的，即我们在乎的人需要什么。当人们面临不幸，他人却幸灾乐祸或一如往常地快乐无忧时，人们会感到愤怒；因为这是敌意或轻慢的表现。人们还会对那些给自己带来痛苦却毫不在乎的人发怒，正因如此，人们会对那些带来坏消息的人感到愤怒。还有那些道听途说他们过错的人，那些漠然对待他们的人，也都令人气愤，因为这些人与轻慢者或敌对者毫无二致；要知道朋友会表现出同情，而所有人都会因自己的过错为人所知而怫然不悦。此外，人们会对在下述五种人面前轻慢自己的人发怒，即他们的竞争对手、他们敬佩的人、他们希望敬佩自己的人、他们尊重的人和尊重他们的人。如

果在这五种人面前被人轻慢，人们会格外愤怒。人们还会对轻慢如下这些人的人发怒，因为不去保护这些被轻慢者是一种耻辱，例如，父母、子女、妻子以及自己赡养的人。人们也对那些忘恩负义者发怒，因为这种轻慢与报恩的责任背道而驰。当人们以诚相待，他人却含讥带讽时，人们亦会发怒；因为讥讽中透出蔑视。人们还会对那些给其他人带来好处、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人动怒；因为认为他们配不上那些施与别人的好处也是一种蔑视。遗忘也能导致愤怒，比如忘记别人的姓名，尽管这只是小事一桩，因为遗忘也是一种轻慢的表现，它由漠不关心引起，而漠不关心就是一种轻慢。至此，我们已经同时讨论了导致人们愤怒的心境、原因和愤怒的对象。很显然，演讲者必须凭借自己的口才将听众置于容易发怒的心境，证明其对手应该为使人愤怒之事负责，而且就是人们应该发怒的对象。

Chapter 3

第三章

And since becoming angry is the opposite of becoming mild, and anger of mildness, we must determine the state of mind which makes men mild, towards whom they become mild, and the reasons which make them so. Let us then define making mild as the quieting and appeasing of anger. If then men are angry with those who slight them, and slight is voluntary, it is evident that they are mild towards those who do none of these things, or do them involuntarily, or at least appear to be such; and towards those who intended the opposite of what they have done, and all who behave in the same way to themselves, for no one is likely to slight himself. And towards those who admit and are sorry for a slight; for finding as it were satisfaction in the pain the offenders feel at what they have done, men cease to be angry. Evidence of this may be seen in the punishment of slaves; for we punish more severely those who

contradict us and deny their offence, but cease to be angry with those who admit that they are justly punished. The reason is that to deny what is evident is disrespect, and disrespect is slight and contempt; anyhow, we show no respect for those for whom we entertain a profound contempt. Men also are mild towards those who humble themselves before them and do not contradict them, for they seem to recognize that they are inferior; now, those who are inferior are afraid, and no one who is afraid slights another. Even the behavior of dogs proves that anger ceases towards those who humble themselves, for they do not bite those who sit down. [2_27] And men are mild towards those who are serious with them when they are serious, for they think they are being treated seriously, not with contempt. And towards those who have rendered them greater services. [2_28] And towards those who want something and deprecate their anger, for they are humbler. And towards those who refrain from insulting, mocking, or slighting anyone, or any virtuous man, or those who resemble themselves. And generally speaking, one can determine the reasons that make for mildness by their opposites. Thus, men are mild towards those whom they fear or respect, as long as they feel so towards them, for it is impossible to be afraid and angry at the same time. And against those who have acted in anger they either feel no anger or in a less degree, for they do not seem to have acted from a desire to slight. For no one slights another when angry, since slight is free from pain, but anger is accompanied by it. And men are not angry with those who usually show respect for them. [2_29]

既然生气与消气相反，愤怒与温和相对，那么作为演说者，我们也应该明了哪些心境、哪些人和哪些原因能使人变得温和。让我们权且将温和定义为平怒和消气。如果说人们对轻慢自己的人动怒，且轻慢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么很显然，人们会对没有轻慢他们的人，或

者不是故意轻慢他们的人，或者至少表面上没有轻慢他们的人，持温和态度；还有那些只是无意间轻慢了他们的人和那些待人如己的人，人们也都会抱温和态度，因为没有人会轻慢他们自己。人们还会温和地对待那些承认轻慢行为并为之感到抱歉的人；因为如果发现冒犯自己的人为其所作所为感到痛苦，人们便会消怒。这方面的证据可见于对奴隶的惩罚，因为我们总是更严厉地惩罚那些忤逆并且拒不承认冒犯行为的奴隶，但是对于那些承认自己罪有应得的人，我们会平息愤怒。原因在于，否认显而易见的事情是一种不敬，而不敬就是轻慢和蔑视。毕竟，我们不会尊重那些自己满怀鄙视的人。人们还会对那些行事谦卑而且不忤逆的人抱温和态度，因为这样的人似乎承认自己不如他人；承认自己不如他人者心存畏惧，而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会轻慢别人。甚至狗的行为都能证明这一点：狗会对那些谦卑者息怒，要知道它们不咬那些坐下来的人。如果他人以诚意对待自己的诚意，人们也会对其抱温和态度，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重视，而不是被蔑视。还有那些为他们带来更大益处的人，人们也会抱温和态度。还有那些虽急需某物却能控制怒气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更谦卑。人们还会温和地对待那些不侮辱、嘲弄或轻慢他人的人，那些品德高尚的人以及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总而言之，我们可以通过其反面，即使人发怒的原因，来确定使人变得温和的各种原因。可以推知，人们会对他们害怕或者敬重的人抱温和态度，只要他们的确害怕或敬重那些人，要知道人不可能同时既害怕又愤怒。对于那些出于愤怒而行事的人，人们要么并不感到生气，要么即使生气，也不会太厉害，因为这些人，即出于愤怒而行事的人，似乎并不是因有意轻慢而如此行事。要知道没有人会在发怒时轻慢他人，因为轻慢与痛苦无关，但愤怒却与痛苦相伴。还有，人们通常不会对那些一贯尊重自己的人动怒。

It is also evident that those are mild whose condition is contrary to that which excites anger, as when laughing, in sport, at a feast, in prosperity, in success, in abundance, [2_30] and, in general, in freedom from pain, in pleasure which does not imply insult, or in virtuous hope. Further, those whose anger is of long standing and

not in its full flush, for time appeases anger. Again, vengeance previously taken upon one person appeases anger against another, even though it be greater. Wherefore Philocrates, [2_31] when someone asked him why he did not justify himself when the people were angry with him, made the judicious reply, “Not yet.” “When then?” “When I see someone accused of the same offence”; for men grow mild when they have exhausted their anger upon another, as happened in the case of Ergophilus. [2_32] For although the Athenians were more indignant with him than with Callisthenes, they acquitted him, because they had condemned Callicrates to death on the previous day Men also grow mild towards those whom they pity; [2_33] and if an offender has suffered greater evil than those who are angry would have inflicted, for they have an idea that they have as it were obtained reparation. And if they think that they themselves are wrong and deserve what they suffer, for anger is not aroused against what is just; they no longer think that they are being treated otherwise than they should be, which, as we have said, is the essence of anger. Wherefore we should inflict a preliminary verbal chastisement, for even slaves are less indignant at punishment of this kind. And men are milder if they think that those punished will never know that the punishment comes from them in requital for their own wrongs; for anger has to do with the individual, as is clear from our definition. [2_34] Wherefore it is justly said by the poet: “Tell him that it is Odysseus, sacker of cities,“ [2_35] as if Polyphemus would not have been punished, [2_36] had he remained ignorant who had blinded him and for what. So that men are not angry either with any others who cannot know who punishes them, [2_37] or with the dead, since they have paid the last penalty and can feel neither pain nor anything else, which is the aim of those who are angry. [2_38] So then, in regard to Hector, Homer, when desirous of restraining the anger of Achilles against a dead man, well says: “For it is senseless clay that he outrages in his

wrath.“ [2_39] It is evident, then, that men must have recourse to these topics when they desire to appease their audience, putting them into the frame of mind required and representing those with whom they are angry as either formidable or deserving of respect, or as having rendered them great services, or acted involuntarily, or as exceedingly grieved at what they have done.

此外，显而易见的是，若身处于与激发愤怒的心境相反的心境中，人们也会心平气和，例如欢笑、游乐、宴饮、繁华、成功、富足，总而言之，是处于没有痛苦的自在、不含欺侮的快乐或美好愿望的伴随中。再者，那些怀怒已久且已不再盛怒的人也会比较温和，因为时间能抚平怒气。还有，之前对某个人的报复也能抚慰对另一个人的怨怒，即使后者更严重。因此，当有人问菲罗克拉忒斯，众人对他发怒而他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时，他审慎地回答道：“还没到时候。”“那要到什么时候呢？”“等我看到别人也遭到同样指责时”。须知人们将怒气发泄到他人身上后，也就消怒了，正如厄尔戈菲罗斯的情形：尽管较之卡利斯提尼斯，雅典人更恨厄尔戈菲罗斯，但是却放过了他，因为前一天雅典人已经将卡利斯提尼斯判处了死刑。人们还会对那些他们怜悯的人变得温和；另外，如果一个冒犯者所受之灾祸远远超过发怒者可能施与之程度，发怒者的愤怒也会消歇，因为他们认为好像已经得到了补偿。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有错，并且理应遭受所遭受的痛苦，通常也会心平气和，因为人们不会对公正的事情发怒。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这，如前所述，正是愤怒的核心所在。因此，我们首先应该以言语相斥，须知即使奴隶对这种惩罚也不会那么愤慨。如果人们认为受罚者永远不会知道惩罚来自谁，也不知道这惩罚是针对受罚者的恶行的报应，那么人们也会心平气和一些；因为怒气与特定的个人有关，这一点在我们的定义中再清楚不过了。因此诗人荷马讲得好，“告诉他，就说是掳城者奥德修斯”，好像如果独目巨人不知道是谁因为什么原因弄瞎了他的眼睛，他就等于没被惩罚一样。因此人们不会对那些不可能知道谁处罚了他们的人发怒，也不会对死者发怒，因为这些人已经受到了最

终的惩罚，即死亡，他们既感觉不到痛苦，也感觉不到其他任何事情，而让人感到痛苦恰恰是发怒之人的目的。因此，在众神谈及赫克托耳时，阿波罗想克制阿喀琉斯对死者的怒火，对此诗人荷马写得好："他施暴泄怒的对象乃是一坨没有生命的烂泥。"很显然，如果想安抚观众，人们，即演讲者，应该诉诸上述部目，将观众置于必要的心境之中，将他们原本怨怒的对象描述成令人敬畏或值得尊敬的样子，或者将他们说成对于观众曾有大益处，或者并不是存心做坏事，或者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极度悲伤。

Chapter 4

第四章

Let us now state who are the persons that men love [2_40] or hate, and why, after we have defined love and loving. Let loving, then, be defined as wishing for anyone the things which we believe to be good, for his sake but not for our own, and procuring them for him as far as lies in our power. A friend is one who loves and is loved in return, and those who think their relationship is of this character consider themselves friends. This being granted, it necessarily follows that he is a friend who shares our joy in good fortune and our sorrow in affliction, for our own sake and not for any other reason. For all men rejoice when what they desire comes to pass and are pained when the contrary happens, so that pain and pleasure are indications of their wish. And those are friends who have the same ideas of good and bad, and love and hate the same persons, since they necessarily wish the same things; wherefore one who wishes for another what he wishes for himself seems to be the other's friend.

让我们首先定义一下友谊和关爱，然后说明哪些人为人们喜爱或者仇恨以及爱恨的理由是什么。不妨把关爱定义为出于利他而不是利己的考虑，希望某人获得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并尽力为他谋取这些好东西。朋友是关爱他人并被他人关爱的人，那些认为彼此间的关系属于此类的人即互认对方为朋友。以此为前提，结论必然是那些为了我们而非其他原因，在顺境时与我们共享快乐、在逆境时与我们分担忧伤的人，是我们的朋友。所有人在得偿所愿时都会满心欢喜，而在事与愿违时则满心苦恼，苦恼与欢喜正是他们内心愿望的表现。在判断事物好坏方面与我们看法相同、爱我所爱、恨我所恨者是我们的朋友，因为这样的人必然和我们怀有相同的愿望；因此，一个人若希望我们获得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人便可算作我们的朋友。

We also like those who have done good either to us or to those whom we hold dear, if the services are important, or are cordially rendered, or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and for our sake only; and all those whom we think desirous of doing us good. And those who are friends of our friends and who like those whom we like, and those who are liked by those who are liked by us; and those whose enemies are ours, those who hate those whom we ourselves hate, and those who are hated by those who are hated by us; for all such persons have the same idea as ourselves of what is good, so that they wish what is good for us, which, as we said,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a friend. Further, we like those who are ready to help others in the matter of money or personal safety; wherefore men honor those who are liberal and courageous and just. And such we consider those who do not live upon others; the sort of men who live by their exertions, and among them agriculturists, and, beyond all others, those who work with their own hands. [2_41] And the self-controlled, because they are not likely to commit injustice; and those who are not busybodies, for the same reason. And those with whom we wish to be friends, if they also seem to wish it; such are

those who excel in virtue and enjoy a good reputation, either generally, or amongst the best, or amongst those who are admired by us or by whom we are admired. [2_42] Further, those who are agreeable to live or spend the time with; such are those who are good-tempered and not given to carping at our errors, neither quarrelsome nor contentious, for all such persons are pugnacious, and the wishes of the pugnacious appear to be opposed to ours.

我们也喜爱那些曾为我们或我们所珍视的人做过好事的人，只要这些事情是重要的，或者是真诚为之的，又或者是在恰当的情境下而做的，并且是只为了我们而做的；我们也喜爱所有自己认为乐于为我们做好事的人。我们还喜爱朋友的朋友、那些喜爱我们所喜爱的人的人以及那些被我们喜爱的人所喜爱的人；还有那些与我们的敌人为敌的人，那些仇恨我们所仇恨的人的人以及那些被我们仇恨的人所仇恨的人。须知所有这些人在判断何为好事方面与我们看法一致，所以他们希望我们得到对我们有好处的东西，而这，如前所述，正是朋友的特点。此外，我们还喜爱那些乐于在金钱或人身安全方面帮助别人的人；正因为如此，人们尊重那些慷慨、勇敢和公正的人。我们将以下这些人归于此类：那些不依赖他人而活的人；那些凭着自己的劳动谋生的人，包括农民；最重要的是，那些靠双手谋食的人。我们还喜爱那些有自制力的人，因为他们不大可能去行不义之事；也喜爱那些不好管闲事的人，原因同上。我们还喜爱那些我们希望与之交好的人，如果他们看起来也有此愿。这些人包括品德高尚者、享有美名的人、最好的人、我们所敬仰的人以及敬仰我们的人所推崇的人。我们还喜爱那些可与之愉快地共同生活或者共享时光的人，比如，那些脾气好、不会对我们的过错喋喋不休的人，他们不吵架，不争辩，须知吵架和争辩者都好斗，而好斗者所希望的与我们截然相反。

And those are liked who are clever at making or taking a joke, for each has the same end in view as his neighbor, being able to

take a joke and return it in good taste. And those who praise our good qualities, especially those which we ourselves are afraid we do not possess; those who are neat in their personal appearance and dress, and clean-living; those who do not make our errors or the benefits they have conferred a matter of reproach, for both these are inclined to be censorious; those who bear no malice and do not cherish the memory of their wrongs, but are easily appeased; for we think that they will be to ourselves such as we suppose them to be to others; and those who are neither given to slander, or eager to know the faults of their neighbors nor our own, but only the good qualities; for this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good man acts. And those who do not oppose us when we are angry or occupied, for such persons are pugnacious; and those who show any good feeling towards us; for instance, if they admire us, think us good men, and take pleasure in our company,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so disposed towards us in regard to things for which we particularly desire to be either admired or to be thought worthy or agreeable. And we like those who resemble us and have the same tastes, provided their interests do not clash with ours and that they do not gain their living in the same way; for then it becomes a case of "Potter [being jealous] of potter." [2_43] And those who desire the same things, provided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share them; otherwise the same thing would happen again. And those with whom we are on such terms that we do not blush before them for faults merely condemned by public opinion, provided that this is not due to contempt; and those before whom we do blush for faults that are really bad. And those whose rivals we are, [2_44] or by whom we wish to be emulated, but not envied—these we either like or wish to be friends with them. And those whom we are ready to assist in obtaining what is good, provided greater evil does not result for ourselves. And those who show equal fondness for friends, whether absent or present; wherefore all men like those who show such

feeling for the dead.

我们也喜爱那些善于开玩笑或者乐于接受玩笑的人，因为这两类人和他们的邻居持有相同的看法，能够接受别人的玩笑，也能够风雅地回应别人的玩笑。我们还喜爱那些表扬我们优点的人，特别是那些我们担心自己并不具备的优点；那些仪容大方、衣着整洁、生活干净的人；那些不拿我们的错误或者他们所施的恩惠来谴责我们的人，要知道这两种谴责者都比较吹毛求疵；那些不怀恶意、不念旧恨、愿意和解的人，因为我们觉得这类人如何对待他人，就会如何对待我们；那些不恶语中伤或打听邻居或者我们的过错、而是只关注他人优点的人，因为这正是好人的行事方式。我们还喜爱那些不在我们生气或忙碌时跟我们对抗的人，须知对抗者皆好斗；那些对我们示好的人，例如，崇拜我们、认为我们是好人并且乐于同我们作伴的人，尤其是那些因为我们特别希望被人称颂或认可或赞同的品质而如此对待我们的人。我们还喜爱那些与我们相似且趣味相投的人，只要他们的利益和我们没有冲突，而且他们的谋生手段和我们不同；否则，就会出现“陶匠（嫉恨）陶匠”的事情，即同业相仇。我们也喜爱那些和自己追求事物相同的人，只要我们能够与其分享这些事物；否则就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即同业相仇。我们还喜欢那些与其相处时，我们不会在其面前因被公众观念所谴责的错事而脸红的人，只要这不是因为我们藐视那人；还有那些在其面前我们会因为真正恶劣的错事而脸红的人。我们也喜欢那些作为自己对手的人，或者我们希望被其羡慕而不是嫉妒的人，这样的人我们要么会喜欢，要么乐于与其为友。我们亦喜欢那些我们乐成其美的人，只要此举不会为我们招致大麻烦。我们还喜欢那些无论朋友在场与否都能善待朋友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那些对逝者表现出如此情感的人。

In a word, men like those who are strongly attached to their friends and do not leave them in the lurch; for among good men they chiefly like those who are good friends. And those who do not

dissemble with them; such are those who do not fear to mention even their faults. (For, as we have said, before friends we do not blush for faults merely condemned by public opinion; if then he who blushes for such faults is not a friend, he who does not is likely to be one). [2_45] And men like those who are not formidable, and in whom they have confidence; for no one likes one whom he fears. Companionship, intimacy, kinship, and similar relations are species of friendship. Things that create friendship are doing a favor, and doing it unasked, and not making it public after doing it; for then it seems to have been rendered for the sake of the friend, and not for any other reason.

总而言之，人们喜欢那些与朋友关系密切、并且不会在朋友摔跟头时弃之于不顾的人；须知在好人中间，人们最喜欢的是好友。人们还喜欢那些不遮遮掩掩的人，比如，那些不害怕提及自己过错的人。（因为，如前所述，在朋友面前，我们不会因为那些仅为公众所谴责的过错而脸红；如果因此类事情而脸红的人不是朋友，那么不因此类事情而脸红的人就可能是朋友）。人们还喜欢那些不令人生畏、可以向其吐露心声的人，须知没有人会喜欢他害怕的人。伙伴、密友、亲人以及类似的关系，都属于友谊。能产生友谊的事情包括：为别人做好事，并且不待对方张口就做，而做完之后并不张扬；要知道只有这样才算是为了朋友，而不是出于其他原因。

As for enmity and hatred, it is evident that they must be examined in the light of their contraries. The causes which produce enmity are anger, spitefulness, slander. Anger arises from acts committed against us, enmity even from those that are not; for if we imagine a man to be of such and such a character, we hate him. Anger has always an individual as its object, for instance Callias or Socrates, whereas hatred applies to classes; for instance, every one

hates a thief or informer. Anger is curable by time, hatred not; the aim of anger is pain, of hatred evil; for the angry man wishes to see what happens; [2_46] to one who hates it does not matter. Now, the things which cause pain are all perceptible, while things which are especially bad, such as injustice or folly, are least perceptible; for the presence of vice causes no pain. Anger is accompanied by pain, but hatred not; for he who is angry suffers pain, but he who hates does not. One who is angry might feel compassion in many cases, but one who hates, never; for the former wishes that the object of his anger should suffer in his turn, the latter, that he should perish. It is evident, then, from what we have just sai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prove that men are enemies or friends, or to make them such if they are not; to refute those who pretend that they are, and when they oppose us through anger or enmity, to bring them over to whichever side may be preferred. The things and persons that men fear and in what frame of mind, will be evident from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至于敌意和仇恨，很显然，我们要从它们的反面来探讨。产生敌意的原因有愤怒、怨毒和中伤。愤怒源自那些针对我们的不利之事，敌意则还可能源自那些并非针对我们的不利之事；因为当我们想象某人具有某种特点时，我们也会仇恨他们。愤怒总是以个人为对象，例如卡利阿斯或苏格拉底；而仇恨则是针对一类人，例如每个人都仇恨窃贼或告密者。愤怒可以被时间抚平，仇恨则不然；愤怒的目的是使人痛苦，而仇恨的目的是造成祸害；要知道愤怒的人希望看到将会发生什么，而仇恨的人对此则并不在乎。导致痛苦的事情都是可以感知的，而那些特别恶劣的事情，比如不公正或蠢行，则最难以感知；须知罪恶的存在并不导致痛苦。愤怒与痛苦相伴，仇恨则不然；因为愤怒者忍受着痛苦，而仇恨者并非如此。愤怒者可能在很多情况下会生发怜悯之情，而仇恨者永远不会；因为前者只是希望其愤怒的对象遭受自己所受的痛苦，而后者则希望对方彻底毁灭。从以上所述可见，

证明某人是敌人还是朋友是可能的；如果他们不是的话，将其说成敌人或朋友也是可能的；我们还可以戳穿那些伪装朋友的人；并且当他们出于愤怒或敌意反对我们时，我们亦可以使他们的态度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以下将讨论人们所恐惧的人和事以及恐惧时的心境。

Chapter 5

第五章

Let fear be defined as a painful or troubled feeling caused by the impression of an imminent evil that causes destruction or pain; for men do not fear all evils, for instance, becoming unjust or slow-witted, but only such as involve great pain or destruction, and only if they appear to be not far off but near at hand and threatening, for men do not fear things that are very remote; all know that they have to die, but as death is not near at hand, they are indifferent. If then this is fear, all things must be fearful that appear to have great power of destroying or inflicting injuries that tend to produce great pain. That is why even the signs of such misfortunes are fearful, for the fearful thing itself appears to be near at hand, and danger is the approach of anything fearful. Such signs are the enmity and anger of those able to injure us in any way; for it is evident that they have the wish, [2_47] so that they are not far from doing so. And injustice possessed of power is fearful, for the unjust man is unjust through deliberate inclination. [2_48] And outraged virtue when it has power, for it is evident that it always desires satisfaction, whenever it is outraged, and now it has the power. And fear felt by those able to injure us in any way, for such as these also must be ready to act. And since most men are rather bad than good and the slaves of gain and cowardly in time of danger, being at the mercy of another is generally fearful, so that one who has committed a crime has reason

to fear his accomplices as likely to denounce or leave him in the lurch. And those who are able to ill-treat others are to be feared by those who can be so treated; for as a rule men do wrong whenever they can. Those who have been, or think they are being, wronged, are also to be feared, for they are ever on the look out for an opportunity. And those who have committed some wrong, when they have the power, since they are afraid of retaliation, which was assumed to be something to be feared. And those who are our rivals for the same things, whenever it is impossible to share them, for men are always contending with such persons. And those who are feared by those who are stronger than we are, for they would be better able to injure us, if they could injure those stronger than ourselves and those whom those who are stronger than ourselves are afraid of, for the same reason. And those who have overthrown those who are stronger than us and those who attack those who are weaker, for they are either already to be feared, or will be, when they have grown stronger.

我们将恐惧定义为人们由于感觉到灾祸迫在眉睫而且可能带来毁灭或痛苦，从而产生的痛苦或不安的情绪；人们并不害怕所有的灾祸，例如变得不公正或者头脑变得迟钝之类，就不足恐惧，而只是害怕那些能带来巨大痛苦或者毁灭的灾祸，并且只在这些灾祸似乎并不遥远，而是近在咫尺、令人畏惧时。要知道人们并不害怕那些非常遥远的坏事，比如，所有人都知道自己会死，但是死亡并非迫在眉睫，所以人们不以为意。如果这就是恐惧的话，那么所有看似具有极大破坏力的事情，或者能导致巨大伤痛的事情，就一定是可怕的。这就是为什么连厄运的端倪都令人恐惧，因为这些端倪使得可怕的事情看似迫在眉睫，而危险正是可怕之事的逼近。例如，那些能够以某种方式伤害我们的人所怀有的敌意和愤怒，便是端倪，因为，很显然，既然他们有这样的念想，那么他们距离如此行事，即伤害我们，也就不远了。此外，掌权的不义之人也是可怕的，因为不义之人的不义就在于

他们有意行不义之事。还有曾被激怒的勇敢者，一旦有了权力，也是可怕的，因为，很显然，这样的人只要被激怒，就会寻求报复，何况现在他们又有了权力。那些从有能力以某种方式伤害我们的人身上所感受到的恐惧，也是可怕的，因为这些人肯定已准备行动，即伤害我们。既然多数人品性恶劣而不是纯良，追逐利益，临危退缩，那么一般来说，落入他人之手都是可怕的。因此犯下罪行的人有理由害怕其同伙会告发他或者弃他于不顾。可能被虐待的人会惧怕那些有能力虐待他人者，因为一般而言，只要能够作恶，人们就会作恶。那些曾经受害或者认为自己正在受害的人也是可怕的，因为这些人一直在伺机报复。那些曾经作恶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也是可怕的，因为他们害怕报复，而报复当然是可怕的。还有那些和我们竞争同样东西的人，只要这些东西无法共享，他们就是可怕的，因为人们总是在与这样的人争斗。那些令强于我们的人惧怕的人，也是可怕的，因为如果这些人能够伤害强于我们的人，那么他们就更有能力伤害我们；那些强于我们的人都害怕的人，也是可怕的，理由同上。还有那些曾经打败过强于我们的人的人和那些攻击弱于我们的人的人，也都是可怕的，因为他们要么已经令人生畏，要么待他们强大之后就会变得如此。

And among those whom we have wronged, or are our enemies or rivals, we should fear not the hot-tempered or outspoken, but those who are mild, dissemblers, and thorough rascals; for it is uncertain whether they are on the point of acting, so that one never knows whether they are far from it. [2_49] All things that are to be feared are more so when, after an error has once been committed, it is impossible to repair it, either because it is absolutely impossible, or no longer in our power, but in that of our opponents; also when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help or it is not easy to obtain. In a word, all things are to be feared which, when they happen, or are on the point of happening, to others, excite compassion. These are, so to say, nearly al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which are to be feared and

which men fear. Let us now state the frame of mind which leads men to fear.

在那些我们曾经冤枉过、敌视过或者与其竞争过的人当中，我们无须害怕那些性格暴烈者或口无遮拦者，而应该害怕那些性格温和、吞吞吐吐的人以及纯粹的无赖，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将采取报复行动，也因此无从知晓他们离报复行动有多远。在下述两种情形下，那些可怕的事物会更加可怕：第一，某个过失一旦发生就无法弥补，要么因为完全没有可能弥补，要么因为它不再由我们掌控，而是由对手掌控；第二，我们无法获得帮助或者很难获得帮助。总之，如果某事一旦降临或者即将降临到他人身上就会激发怜悯之情，那么这件事就是可怕的。可以说，以上就是几乎所有可怕的、而且也是人人都害怕的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接下来讲讲导致人们恐惧的心境。

If then fear is accompanied by the expectation that we are going to suffer some fatal misfortune, it is evident that none of those who think that they will suffer nothing at all is afraid either of those things which he does not think will happen to him, or of those from whom he does not expect them, or at a time when he does not think them likely to happen. It therefore needs be that those who think they are likely to suffer anything should be afraid, either of the persons at whose hands they expect it, or of certain things, and at certain times. Those who either are, or seem to be, highly prosperous do not think they are likely to suffer anything; wherefore they are insolent, contemptuous, and rash, and what makes them such is wealth, strength, a number of friends, power. It is the same with those who think that they have already suffered all possible ills and are coldly indifferent to the future, like those who are being beaten to death; for it is a necessary incentive to fear that there should remain some hope of being saved from the cause of

their distress. A sign of this is that fear makes men deliberate, whereas no one deliberates about things that are hopeless. So that whenever it is preferable that the audience should feel afraid,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m think they are likely to suffer, by reminding them that others greater than they have suffered, and showing that their equals are suffering or have suffered, and that at the hands of those from whom they did not expect it, in such a manner and at times when they did not think it likely.

如果说恐惧总是伴随着对即将遭受某种致命厄运的预期，那么显而易见，那些认为自己不会遭受任何厄运的人，既不会惧怕他们认为不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事情，也不会惧怕不可能给他们带来厄运的人，亦不会在他们觉得不会发生厄运时心生恐惧。与此相应，那些认为自己可能遭受某些坏事的人必然会心怀恐惧，要么害怕那些可能给他们带来厄运的人，要么害怕那些可能给他们带来厄运的事，在那些他们觉得坏事将要发生的时候。那些志得意满或者似乎志得意满的人，认为自己不可能遭受任何坏事；因此，他们傲慢、轻蔑而且鲁莽，他们如此行事，是因为他们家资殷盛、身强体健、朋友众多和权力显赫。那些认为自己已经遭受了所有可能的厄运并且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的人也是如此，例如，正在被人往死里打的人；须知要想让人心生恐惧，就必须让他残留一丝从其惨状中得救的希望。这方面的证据是恐惧会让人三思，但没有人会思考那些毫无希望的事情。因此，当我们需要观众体验恐惧时，我们就必须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也可能遭受厄运，比如，提醒他们那些比他们更强大的人都已遭此灾祸，告诉他们与他们能力相当者正在遭受或者已经遭受此祸，而且是由那些他们没有料想到的人，以出乎预料的方式，在意想不到的时间所致。

Now, since we have made clear what fear and fearful things are, and the frame of mind in each case which makes men fear, one can see from this what confidence is,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give

it, and the frame of mind of those who possess it; for confidence is the contrary of fear and that which gives confidence of that which causes fear, so that the hope of what is salutary is accompanied by an impression that it is quite near at hand, while the things to be feared are either non-existent or far off. Confidence is inspired by the remoteness of fearful things, or by the nearness of things that justify it. [2_50] If remedies are possible, if there are means of help, either great or numerous, or both; if we have neither committed nor suffered wrong; if we have no rivals at all, or only such as are powerless, or, if they have power, are our friends, or have either done us good or have received it from us; if those whose interests are the same as ours are more numerous, or stronger, or both. We feel confidence in the following states of mind: if we believe that we have often succeeded and have not suffered, or if we have often been in danger and escaped it; for men are unaffected by fear in two ways, either because they have never been tested or have means of help; thus, in dangers at sea, those who have never experienced a storm and those who have means of help as the result of experience have confidence as to the future. We are also reassured, when a thing does not inspire fear in our equals, our inferiors, or those to whom we think ourselves superior; and we think ourselves superior to those whom we have conquered, either themselves or their superiors or equals. And if we think we possess more or more considerable advantages, such as make their possessors formidable; such are abundance of money, strength of body, friends, territory, military equipments, either all or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f we have never done wrong to anyone, or only to a few, or not to such as are to be feared; and, generally, if it is well with us in regard to the gods, especially as to intimations from signs and oracles, and everything else of the kind; for anger inspires confidence, and it is the wrong that we suffer and not that which we inflict upon others that causes anger, and the gods are supposed

to assist those who are wronged. [2.51] Lastly, we feel confidence when, at the beginning of any undertaking, we do not expect disaster either in the present or future, or hope for success. Such are the things that inspire fear or confidence.

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恐惧和可怕的事情为何物，明确了各种使人心生恐惧的心境，那么据此可见，信心为何物，何物能产生信心以及自信者的心境；须知信心与恐惧相反，产生信心的事物也和产生恐惧的事物相反，所以在对有益之事怀抱希望时，人们会觉得这件事近在咫尺，而可怕的事情要么不存在，要么远在天边。信心的产生，要么由于可怕之事离我们很远，要么由于能带来信心的事情离我们很近。如果有补救的可能，如果有强有力的、众多的或者有力且众多的施以援手的办法，我们就会有信心。如果我们既没有犯错也没有受害，如果我们完全没有对手，或者只有一些实力不强的对手，或者对手实力虽强，但是我们的朋友或对手曾经为我们做过好事或者受惠于我们，我们就会有信心。如果那些与我们利益一致的人，比与我们利益相左的人更多或者更强，或者既多且强，我们就会有信心。处于以下心境时，我们也会有信心：我们认为自己常常成功而从未挫败，或者我们曾经屡遭危难但都成功逃脱。要知道人们在两种情况下不受恐惧困扰：要么他们从未经历考验，要么他们有办法应对。因此，在海上面临危险时，那些从未经历过风暴的人和那些因为经验丰富而有办法应对的人都会对前途抱有信心。如果某事并不会让那些与我们旗鼓相当的人恐惧，或者不会让那些不如我们的人恐惧，或者不会让那些我们觉得自己远远胜出的人恐惧，我们也会安心。我们认为自己胜过那些被我们征服的人，包括被征服者本人、比他们强的人或者和他们旗鼓相当的人。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具有越来越多的优势，特别是能够让其拥有者更加可畏的优势，比如财产富足、身体强健、朋友众多、领土广袤、军械精良，无论是以上所有优势还是其中最重要的优势，都会令我们充满信心。如果我们没有对任何人犯过错，或者仅仅对少数人犯过错，或者没有对那些令人生畏者犯过错，我们也会充满信心。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与神祇关系良好，特别是从各种神迹、神谕以及其

他类似征兆中获悉这一点，我们也会充满信心。要知道愤怒能激发信心，而导致愤怒的是我们所受的伤害，不是我们对他人的伤害，而神灵是会帮助那些被害者的。最后，在一件事情的开始阶段，当我们料想现在或将来都不会有灾祸，而只期待成功时，我们也会充满信心。以上就是能引起恐惧或激发信心的各种事物。

Chapter 6

第六章

What are the things of which men are ashamed or the contrary, and before whom, and in what frame of mind, will be clear from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Let shame then be defined as a kind of pain or uneasiness in respect of misdeeds, past, present, or future, which seem to tend to bring dishonor; and shamelessness as contempt and indifference in regard to these same things. If this definition of shame is correct, it follows that we are ashamed of all such misdeeds as seem to be disgraceful, either for ourselves or for those whom we care for. Such are all those that are due to vice, such as throwing away one's shield or taking to flight, for this is due to cowardice; or withholding a deposit, for this is due to injustice. And illicit relations with any persons, at forbidden places or times, for this is due to licentiousness. And making profit out of what is petty or disgraceful, or out of the weak, such as the indigent or dead; whence the proverb, “to rob even a corpse,” for this is due to base love of gain and stinginess. And to refuse assistance in money matters when we are able to render it, or to give less than we can; to accept assistance from those less able to afford it than ourselves; to borrow when anyone seems likely to ask for a loan, to ask for a loan from one who wants his money back, and asking for repayment from one who wants to borrow; to praise in order to

seem to be asking for a loan, and when you have failed to obtain it to keep on asking; for all these are signs of stinginess. And to praise people when they are present, to overpraise their good qualities and to palliate the bad, to show excessive grief at another's grief when present, and all similar actions; for they are signs of flattery.

人们对什么事情引以为耻、对什么事情引以为荣以及在什么人面前、在什么心境下会感到羞耻，可以从下面的讨论中看出来。我们权且将羞耻定义为一种由过去、现在或者将来所做的、可能带来耻辱的不端行为所导致的痛苦或者不安；无耻则是对这类行为的不屑和漠然。如果上述定义无误，那么我们就会因所有看似有辱于自己或我们所关爱的人的事情而感到羞耻。所有因恶德导致的事情都可归入此类，比如：扔掉盾牌或者临阵脱跑，这是懦弱所致；再如截留定金，这是不义所致；还有在禁止的地点和时间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这是淫荡所致；还有从卑鄙或者不光彩的事情中捞取好处，或者从弱者，比如穷人或者死者，身上榨取好处，正如谚语云，“连死人都抢”，这是卑劣的贪财和吝啬所致。可耻的事情还包括：有能力施与金钱却拒绝帮助他人，或者不肯尽力帮助他人；接受那些境况不如自己的人的帮助；在别人似有可能需要借钱时向其张口借钱，或者在别人想要收回借款时向其借钱，或者在别人想要借钱时向其讨债；似乎是为了跟别人借钱而夸奖那人，在没有借到时继续纠缠。以上这些都是可耻的行为，因为它们都是吝啬的表现。还有当面表扬他人、言过其实地颂赞他们的优点、粉饰他们的缺点，当面对别人的悲痛表现出过度的悲痛以及所有类似的行为，都是可耻的；因为这些都是谄媚的表现。

And not to submit to toils, which those put up with who are older or live luxuriously or hold higher positions, or, generally speaking, are less fitted to do so; for all these are signs of effeminacy. To accept favors from another and often, and then to

throw them in his teeth; for all these things are signs of littleness and abasement of soul. And to speak at great length about oneself and to make all kinds of professions, and to take the credit for what another has done; for this is a sign of boastfulness. Similarly, in regard to each of all the other vices of character, the acts resulting from them, their signs, and the things which resemble them, all these are disgraceful, and should make us ashamed. It is also shameful not to have a share in the honorable things which all men, or all who resemble us, or the majority of them, have a share in. By those who resemble us I mean those of the same race, of the same city, of the same age, of the same family, and, generally speaking, those who are on an equality; for then it is disgraceful not to have a share, for instance, in education and other things, to the same extent. All these things are the more disgraceful, if the fault appears to be our own; for they are at once seen to be due rather to natural depravity if we ourselves are the cause of past, present, or future defects. And we are ashamed when we suffer or have suffered or are likely to suffer things which tend to ignominy and reproach; such are prostituting one's person or performing disgraceful actions, including unnatural lust. And of these actions those that promote licentiousness are disgraceful, whether voluntary or involuntary (the latter being those that are done under compulsion), since meek endurance and the absence of resistance are the result of unmanliness or cowardice.

还有人不胜劳作之苦，不能承受连年长者、养尊处优者、职位更高者或一般而言不应该吃苦的人都能忍受的辛苦，这也是可耻的，因为这些都是娇弱的表现。经常受人恩惠，然后却非难施惠之人，这也是可耻的；因为这些事情是灵魂渺小、卑劣的表现。长篇阔论地讲自己的事情，做各种各样的表白，拿别人的成就来博取赞扬，亦是可耻的，因为这是自吹自擂的表现。同样，就人性的其他所有恶德而言，

它们所导致的行为、表现以及与其类似的东西，也都是可耻的，应该使我们感到羞愧。不分担所有人、所有或大多数类似我们的人都参与的正大光明的事情也是可耻的。我说的那些类似我们的人指的是与我们种族相同、来自同一个城市、年纪相仿、家庭条件类似的人，总而言之，就是那些和我们地位平等的人。如果在某件事情上，比如教育或其他方面，我们与他们的参与程度不同，就是可耻的。如果过错似乎在我们自己身上，那么上述事情会更加可耻；因为如果是我们自己在过去、现在或未来导致了这类事情，那么人们会即刻将其归为性格的缺陷。再者，如果我们遭受或者已经遭受或者很可能遭受那些导致耻辱和指责的事情，我们也会感到羞耻；诸如出卖肉体，或者下作的行为，包括变态的淫欲。在这些行为中，那些助长淫荡的行为，无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后者是指被迫为之），都是可耻的，因为逆来顺受和不抵抗都是由于没有胆量或者生性懦弱。

These and similar things are those of which men are ashamed. And since shame is an impression about dishonor, and that for its own sake and not for its results; and since no one heeds the opinion of others except on account of those who hold it, it follows that men feel shame before those whom they esteem.

这些和类似的事情人们都引以为耻。因为羞耻是令人们名誉扫地的感受，非为结果，且全因其自身；此外，因为除非很在乎某人，否则没有人会在意他人的看法，所以人们会在自己敬重的人面前感到羞耻。

Now men esteem those who admire them and those whom they admire, those by whom they wish to be admired, those whose rivals they are, and whose opinion they do not despise. They desire to be admired by those, and admire those who possess anything good that

is greatly esteemed, or from whom they urgently require something which it is in their power to give, as is the case with lovers. And they are rivals of those who are like them; and they give heed to the men of practical wisdom as likely to be truthful; such are the older and well educated. They are also more ashamed of things that are done before their eyes and in broad daylight; whence the proverb: The eyes are the abode of shame. [2_52] That is why they feel more ashamed before those who are likely to be always with them or who keep watch upon them, because in both cases they are under the eyes of others.

人们敬重的人包括：那些仰慕他们的人，那些他们仰慕的人，那些他们希望仰慕自己的人，那些与他们处于竞争关系的人以及那些他们并不鄙视其观点的人。人们希望被那些拥有备受推崇品质的人仰慕，同时也仰慕那些人；人们也仰慕那些掌握着他们迫切需要之物的人，如情人。人们与类似自己的人竞争，而看重那些有见识的人，认为他们更加诚信，比如年长者和有教养者。人们会因那些众目睽睽和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事情而感到更加羞耻。故有谚云：目之炯兮，耻之所居。正因如此，在那些可能一直陪伴或者关注自己的人面前，人们会感到更加羞耻，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处在别人的目光之下。

Men are also ashamed before those who are not open to the same accusations, for it is evident that their feelings are contrary. And before those who are not indulgent towards those who appear to err; for a man is supposed not to reproach others with what he does himself, so it is clear that what he reproaches them with is what he does not do himself. And before those who are fond of gossiping generally; for not to gossip about the fault of another amounts to not regarding it as a fault at all. Now those who are

inclined to gossip are those who have suffered wrong, because they always have their eyes upon us; and slanderers, because, if they traduce the innocent, still more will they traduce the guilty. And before those who spend their time in looking for their neighbors' faults, for instance, mockers and comic poets; for they are also in a manner slanderers and gossips. And before those from whom they have never asked anything in vain, [2_53] for they feel as if they were greatly esteemed. For this reason they feel ashamed before those who ask them for something for the first time, as never yet having lost their good opinion. Such are those who have recently sought their friendship (for they have only seen what is best in them, which is the point of the answer of Euripides to the Syracusans), [2_54] or old acquaintances who know nothing against us. And men are ashamed not only of the disgraceful things we have spoken of, but also of indications of them, for instance, not only of sensual pleasures, but also of the indications of them; and not only of doing, but also of saying disgraceful things. Similarly, men are ashamed not only before those who have been mentioned, but also before those who will reveal their faults to them, such as their servants or friends. In a word, they are not ashamed either before those whose opinion in regard to the truth they greatly despise—for instance, no one feels shame before children or animals—or of the same things before those who are known to them and those who are not; before the former, they are ashamed of things that appear really disgraceful, before strangers, of those which are only condemned by convention.

人们也会在那些没有遭受相同指控的人面前感到羞耻，因为很显然后者的感受会截然不同。人们还会在那些不纵容过错的人面前感到耻辱；因为一般说来，人们不应拿自己也会做的事情去指责别人，因此，很显然，一个人所指责的一定是他自己不会去做的事情。人们也

会在那些通常喜欢传播流言的人面前感到羞耻；因为不议论他人的过失就等于不认为那是一种过失。喜欢传播流言的通常是那些曾经被冤枉的人，因为他们时刻关注着我们以伺机报复；还有诽谤者，因为如果他们连清白的人都诽谤，当然更会诽谤犯过错的人。人们还会在那些整天对邻居吹毛求疵的人面前感到羞耻，例如，嘲弄者和喜剧诗人；因为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诽谤者和流言传播者。人们还会在那些向来对自己有求必应的人面前感到羞耻，因为人们觉得自己似乎被这些人很是看重。因此，人们会在那些第一次有求于他们却被拒绝的人面前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此前从未失去这些人对自己的好印象。比如，那些最近寻求与之交好的人（因为这些人只看到了他们最好的一面，欧里庇得斯对叙拉古人的回答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还有那些不了解我们负面的老熟人。此外，人们不仅因为上述可耻之事而羞耻，而且会因这些事情的端倪而羞耻。例如，人们不仅会因肉体之欢而羞耻，而且会因其端倪而羞耻；不仅会因为做了某些不光彩的事而羞耻，而且会因为说过某些不光彩的话而羞耻。与此类似，不仅在上述人等面前人们会感到羞耻，在可能向这些人揭露自己错误的人面前，人们也会感到羞耻，比如仆人或朋友。总体说来，在那些他们极度鄙视其是非观念的人面前，人们不会感到羞耻，例如，没有人会在儿童或动物面前感到羞耻。在熟识的人面前和在不熟识的人面前，人们引以为耻的事情也不相同：面对前者，人们会因为显然可耻的事情感到羞耻，而面对陌生人，人们只会因为被公序良俗所谴责的事情感到羞耻。

Men are likely to feel shame in the following situations; first, if there are any who are so related to them as those before whom we said that they feel shame. These, as we pointed out, are those who are admired by them or who admire them, or by whom they wish to be admired, or from whom they need some service, which they will not obtain if they lose their reputation. These, again, are either persons who directly see what is going on (just as Cydias, when haranguing the people about the allotment of the territory of

Samos, begged the Athenians to picture to themselves that the Greeks were standing round them and would not only hear, but also see what they were going to decree); or neighbors; or those likely to be aware of what they say or do. That is why men do not like, when unfortunate, to be seen by those who were once their rivals, for rivalry presumes admiration. Men also feel shame when they are connected with actions or things which entail disgrace, [2.55] for which either they themselves, or their ancestors, or any others with whom they are closely connected are responsible. In a word, men feel shame for those whom they themselves respect; [2.56] such are those mentioned and those who have any relation to them, for instance, whose teachers or advisers they have been; similarly, when they are in rivalry with others who are like them; for there are many things which they either do or do not do owing to the feeling of shame which these men inspire. And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 ashamed when they have to be seen and to associate openly with those who are aware of their disgrace. Wherefore the tragic poet Antiphon, [2.57] when he was about to be flogged to death by order of Dionysius, seeing that those who were to die with him covered their faces as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gates, said, “Why cover your faces? Is it because you are afraid that one of the crowd should see you tomorrow?” Let this account of shame suffice; as for shamelessness, it is evident that we shall be able to obtain ample knowledge of it from the contrary arguments.

人们还会在以下情况感到羞耻：首先，如果在场的人当中，有人与他们的关系，如前所述，在其面前他们会感到羞耻，我们已经说过，这些人包括那些人们赞赏的人，或者赞赏他们的人，或者他们希望赞赏自己的人，或者他们对其有所求的人，如果失去了好名声，所求之事就将无法获得。另外，这些人要么将目睹即将发生之事（正如库狄阿斯就如何分配萨摩斯的领土对民众讲话时，请求雅典人想象一

下希腊诸国的人正站在他们四周，不仅会听到而且会看到他们的裁决），要么是邻居，要么是可能知晓人们所说或所做之事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身处不幸时，不喜欢被那些曾经是竞争对手的人看到，须知竞争蕴含着赞赏。如果人们与那些意味着耻辱的行为或事情有关，他们也会感到羞耻。这些耻辱可能是他们自己或者祖先或者与其关系密切之人造成的。总之，人们会因给那些他们尊重的人带来耻辱而感到羞耻，比如，上文所述之人以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包括人们曾经教过或进言过的人；同理，也包括那些类似自己且互为对手的人，须知正是由于这些人激发的羞耻感，有很多事情人们会去做，也有很多事情人们不会去做。当人们不得已被看到与那些知晓他们可耻之事的人公开交往的时候，会更有可能感到羞耻。因此，当悲剧诗人安提丰即将被人按照狄奥尼西奥斯的命令鞭挞至死的时候，看到那些将要与他一起赴死的人掩面经过城门，便问道："为什么要掩面？是不是害怕人群之中有人明天会看见你们的尸体？"关于羞耻，我们就讲到这里；至于无耻，我们显然可以从相反的论述中获得充分的了解。

Chapter 7

第七章

The persons towards whom men feel benevolent, [2_58] and for what reasons, and in what frame of mind, will be clear when we have defined what favor is. Let it then be taken to be the feeling in accordance with which one who has it is said to render a service to one who needs it, not in return for something nor in the interest of him who renders it, but in that of the recipient. And the favor will be great if the recipient is in pressing need, or if the service or the times and circumstances are important or difficult, or if the benefactor is the only one, or the first who has rendered it, or has done so in the highest degree. By needs I mean longings, especially

for things the failure to obtain which is accompanied by pain; such are the desires, for instance, love; also those which arise in bodily sufferings and dangers, for when a man is in pain or danger he desires something. That is why those who help a man who is poor or an exile, even if the service be ever so small, are regarded with favor owing to the urgency and occasion of the need; for instance, the man who gave the mat [2_59] to another in the Lyceum. It is necessary then, if possible, that the service should be in the same direction; [2_60] if not, that it should apply to cases of similar or greater need.

人们乐善好施的对象、原因及心境，在我们定义了恩惠是什么之后，就清楚了。恩惠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情绪，处在这种情绪中的人会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不是为了得到回报，也不是为了施惠者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受助者的利益。在下列情形下所给予的恩惠尤其重大：受助者的需求很急迫，或者施惠者所提供的帮助及时机或环境是重要的或艰难的，或者施惠者是唯一提供帮助的人，或者是第一个提供帮助或帮助最大的人。我所说的“需求”指的是渴望，尤其是对求之不得且因此而苦恼之物的渴望，比如对爱情的渴望；还有那些由身体的痛苦和危险所引起的渴望，须知当一个人处于痛苦或危险之中时，他就会渴望获得一些东西。正因如此，那些帮助穷人或离乡者的人，即使所提供的帮助非常小，也会被认为是施了恩惠，因为这种情况下，受助者的需求及情况非常急迫；比如，一个人在吕刻昂运动场给了别人一张垫子。总之，如果可能的话，人们都应该让自己给予的帮助朝着同样的方向，即给予需求最急迫的人；即使不可能，也应该提供帮助给有类似的或更急迫需求的人。

Since then it is evident on what occasions, [2_61] for what reasons, and in what frame of mind a feeling of benevolence arises, it is clear that we must derive our arguments from this—to show

that the one side either has been, or still is, in such pain or need, and that the other has rendered, or is rendering, such a service in such a time of need. It is evident also by what means it is possible to make out that there is no favor at all, or that those who render it are not actuated by benevolence; [2_62] for it can either be said that they do, or have done so, for their own sake, in which case there is no favor; or that it was mere chance; or that they acted under compulsion; or that they were making a return, not a gift, whether they knew it or not; for in both cases it is an equivalent return, so that in this case also there is no favor. And the action must be considered in reference to all the categories; for if there is a favor it is so because of substance, quantity, quality, time, or place. [2_63] And it denotes lack of goodwill, if persons have not rendered a smaller service, [2_64] or if they have rendered similar, equal, or greater services to our enemies; for it is evident that they do not act for our sake in this case either. Or if the service was insignificant, and rendered by one who knew it; for no one admits that he has need of what is insignificant.

既然施惠之情产生的情形、原因和心境已很清楚，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应该从以下这点展开论证，即证明一方曾经或正处于痛苦之中或有需求，而另一方在这种情景下曾经或正在提供某种帮助。综上所述，我们还可以明了用什么方法能够证明并不存在任何恩惠，或者施惠之人并非出于乐善好施之心而提供帮助。可以这样说：他们现在或过去提供帮助，是为了私利，因此毫无恩惠可言；或者，他们这么做纯粹出于偶然；或者，他们是被迫这么做的；或者，他们是在回报，而不是在施惠，无论有意与否；须知在后面这两种情况下，即有意和无意，他们所做的都是一报还一报，因此并不存在什么恩惠。考虑施惠行为时必须结合所有范畴，因为就算一个行为中存在恩惠，它也是因为具有一定的内容、数量、质量、时间和地点才成为恩惠的。下列情形说明施惠之人缺乏善意：他们未曾提供过更小一些的帮助，

或者他们曾经向我们的敌人提供类似、同等或更大的帮助；因为由此可以看出，他们这次也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如此行事。还有一种情形：所提供的帮助微不足道，而且施惠者是有意这样做的，这也说明施惠者缺乏善意，须知没有人会承认自己需要微不足道的帮助。

Chapter 8

第八章

Let this suffice for benevolence and the opposite. We will now state what things and persons excite pity, and the state of mind of those who feel it. Let pity then be a kind of pain excited by the sight of evil, deadly or painful, which befalls one who does not deserve it; an evil which one might expect to come upon himself or one of his friends, and when it seems near. For it is evident that one who is likely to feel pity must be such as to think that he, or one of his friends, is liable to suffer some evil, and such an evil as has been stated in the definition, or one similar, or nearly similar. Wherefore neither those who are utterly ruined, are capable of pity, for they think they have nothing more to suffer, since they have exhausted suffering; nor those who think themselves supremely fortunate, who rather are insolent. For if they think that all good things are theirs, it is clear that they think that they cannot possibly suffer evil, and this is one of the good things. Now those persons who think they are likely to suffer are those who have already suffered and escaped; the advanced in age, by reason of their wisdom and experience; and the weak, and those who are rather more timid; and the educated, for they reckon rightly; and those who have parents, children, or wives, for these are part of them and likely to suffer the evils of which we have spoken; and those who are not influenced by any courageous emotion, such as anger or confidence,

for these emotions do not take thought of the future and those who are not in a wantonly insolent frame of mind, for they also take no thought of future suffering; but it is those who are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that feel pity. Those who are not in great fear; for those who are panic-stricken are incapable of pity, because they are preoccupied with their own emotion. And men feel pity if they think that some persons are virtuous; for he who thinks that no one is will think that all deserve misfortune. And, generally speaking, a man is moved to pity when he is so affected that he remembers that such evils have happened, or expects that they may happen, either to himself or to one of his friends.

关于施惠及其反面，就讲到这里。现在我们来讲讲什么样的人和事能激发怜悯以及人们在什么样的心境下会感到怜悯。怜悯可以理解为由于看到无辜之人遭受致命或痛苦的不幸而产生的一种苦痛心情；这种不幸是人们设想自己或朋友也会遭受，且似乎近在咫尺。因为可以看出，会产生怜悯之情的人一定是那些认为自己或其朋友也可能遭受不幸的人，而且这种不幸正是上面定义中所讲的，或者是与之类似的，或者几乎类似的。因此，受尽折磨的人不可能怜悯，因为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已经受尽所有不幸，就再没有其他不幸需要承受。认为自己超级幸运的人也不可能怜悯，这类人通常会因自己的运气而不可一世。要知道如果他们认为所有的好事都归自己所有，那么很明显他们也会认为自己不可能遭受不幸，而这也正是他们所享有的好事之一。认为自己可能遭受不幸的人包括：已经遭受过或逃脱过不幸的人；年长之人，因为他们有智慧和经验；体弱之人；极为胆怯之人；有教养的人，因为他们可以理智地判断；拥有父母、子女或者妻子的人，因为这些人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且有可能遭受上面所说的不幸；未受诸如愤怒或信心等关乎勇气的情绪影响的人，因为处在这些情绪中的人不会考虑将来；还有不是处于狂傲心境中的人，因为他们也不会考虑将来的不幸；只有介于极度狂傲和极度恐惧两个极端之间的人才会产生怜悯之情。还有未陷入极度恐惧的人，因为处于恐慌中的人无法

体会怜悯，他们已完全被恐惧感所支配。如果认可有些人是善良的，人们也会感受到怜悯之情；须知一个人如果认为世界上没有善良之人，那么他就会认为所有人都活该遭受不幸。再者，一般而言，当一个人被触动并想起一种不幸曾经发生在他自己或朋友身上，或者设想这种不幸可能会发生在他自己或朋友身上时，亦会生发怜悯之心。

We have stated the frame of mind which leads men to pity; and the things which arouse this feeling are clearly shown by the definition. They are all painful and distressing things that are also destructive, and all that are ruinous; and all evils of which fortune is the cause, if they are great. Things distressing and destructive are various kinds of death, personal ill-treatment and injuries, old age, disease, and lack of food. The evils for which fortune is responsible are lack of friends, or few friends (wherefore it is pitiable to be torn away from friends and intimates), ugliness, weakness, mutilation; if some misfortune comes to pass from a quarter whence one might have reasonably expected something good; and if this happens often; and if good fortune does not come until a man has already suffered, as when the presents from the Great King were not dispatched to Diopithes until he was dead. Those also are to be pitied to whom no good has ever accrued, or who are unable to enjoy it when it has.

至此，我们已经讲了使人产生怜悯之情的心境。根据怜悯的定义，激发这种感情的事物也很明确了。它们包括所有令人痛苦、沮丧的破坏性事物，所有灾难性事物以及命运所致的所有不幸（如果这些不幸很严重的话）。令人沮丧的破坏性事物包括：各种形式的死亡、个人遭受的虐待和伤害、衰老、疾病以及饥荒。命运所致的不幸包括：没有朋友或者朋友很少（因此被迫与朋友及知己分离是值得怜悯的），相貌丑陋，身体羸弱，手脚残废，本应发生好事的时分却发生

了不幸之事，而且这种情况时常发生，还有遭受不幸之后好运才降临，比如狄俄配忒斯死后国王的礼物才送到。从未交过好运的人，或者好运来临之时已经无法享受的人，也值得怜悯。

These and the like things, then, excite pity. The persons men pity are those whom they know, provided they are not to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m for if they are, they feel the same as if they themselves were likely to suffer. This is why Amasis [2_65] is said not to have wept when his son was led to execution, but did weep at the sight of a friend reduced to beggary, for the latter excited pity, the former terror. The terrible is different from the pitiable, for it drives out pity, and often serves to produce the opposite feeling. Further, the nearness of the terrible makes men pity. [2_66] Men also pity those who resemble them in age, character, habits, position, or family; for all such relations make a man more likely to think that their misfortune may befall him as well. For, in general, here also we may conclude that all that men fear in regard to themselves excites their pity when others are the victims. And since sufferings are pitiable when they appear close at hand, while those that are past or future, ten thousand years backwards or forwards, either do not excite pity at all or only in a less degree, because men neither expect the one nor remember the other, it follows that those who contribute to the effect by gestures, voice, dress, and dramatic action generally, are more pitiable; for they make the evil appear close at hand, setting it before our eyes as either future or past. And disasters that have just happened or are soon about to happen excite more pity for the same reason. Pity is also aroused by signs and actions, such as the dress of those who have suffered, and all such objects, and the words and everything else that concerns those who are actually suffering, for instance, at the point of death. And when men show themselves undaunted [2_67] at such critical times it

is specially pitiable; for all these things, [2_68] because they come immediately under our observation, increase the feeling of pity, both because the sufferer does not seem to deserve his fate, and because the suffering is before our eyes.

上述事物及类似的事物均能激发怜悯之情。人们怜悯的对象通常是他们认识的人，但联系又并不很紧密，因为如果联系非常紧密，人们就会感同身受，似乎觉得自己也可能遭受不幸。正因如此，据说阿马西斯在儿子被处决时没有流泪，看到朋友沦为乞丐却流泪了，因为后者激发的是怜悯，而前者激发的是恐惧。可惧之事不同于可怜之事，因为它会使怜悯之情消失，并且常常带来相反的情绪。不过，可惧之事的临近会使人产生怜悯之情。人们还会怜悯那些在年龄、性格、习惯、地位或家庭背景与自己相近的人，须知所有这些关系都会使人更容易想到他人的不幸也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在此得出结论：若人们担心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发生在他人身上，就会生出怜悯之情。再者，既然近在咫尺的不幸才会引发怜悯，那过往的或将来的不幸，比如一万年以前的或一万年以后的，要么根本不会激发怜悯之情，要么激发的怜悯之情很微弱，因为人们不会预料到一万年以后的不幸，也不会记得一万年以前的不幸；那么显而易见，一般而言，那些通过手势、声音、服装或剧烈的行为增强不幸效果的人更令人同情，因为他们将未来或过往的不幸置于我们眼前，使其历历在目。因为同样的原因，刚刚或即将发生的灾难也会激发更多的怜悯。如下这些表征和行为也会激发怜悯之情，比如遭受不幸之人的衣服以及所有此类物件，还有与正在遭受不幸之人，比如垂死之人，相关的言语和其他任何东西。人们在上述危急时刻表现出无畏时，尤其让人同情。因为所有这些事情都历历在目，故而增强了怜悯之情：一则因为受害者似乎命运不该如此，二则因为不幸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Chapter 9

第九章

Now what is called indignation [2_69] is the antithesis to pity; for the being pained at undeserved good fortune is in a manner contrary to being pained at undeserved bad fortune and arises from the same character. And both emotions show good character, for if we sympathize with and pity those who suffer undeservedly, we ought to be indignant with those who prosper undeservedly; for that which happens beyond a man's deserts is unjust, wherefore we attribute this feeling even to gods. It would seem that envy also is similarly opposed to pity, as being akin to or identical with indignation, although it is really different; envy also is indeed a disturbing pain and directed against good fortune, but not that of one who does not deserve it, but of one who is our equal and like. Now, all who feel envy and indignation must have this in common, that they are disturbed, not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any harm will happen to themselves, but on account of their neighbor; for it will cease to be indignation and envy, but will be fear, if the pain and disturbance arise from the idea that harm may come to themselves from another's good fortune. And it is evident that these feelings will be accompanied by opposite feelings; for he who is pained at the sight of those who are undeservedly unfortunate will rejoice or will at least not be pained at the sight of those who are deservedly so; for instance, no good man would be pained at seeing parricides or assassins punished; we should rather rejoice at their lot, and at that of men who are deservedly fortunate; for both these [2_70] are just and cause the worthy man to rejoice, because he cannot help hoping that what has happened to his like may also happen to himself. And all these feelings arise from the same character and their contraries from the contrary; for he who is malicious is also envious, since, if the envious man is pained at another's possession or acquisition of good fortune, he is bound to rejoice at the

destruction or non-acquisition of the same. Wherefore all these emotions are a hindrance to pity, although they differ for the reasons stated; so that they are all equally useful for preventing any feeling of pity.

所谓愤慨是怜悯的对立面。在某种意义上，因别人得到不应有的好运而痛苦，和因别人得到不应有的厄运而痛苦，是两种相对的情绪，但是都来自同样的性格。这两种情绪都代表了善良，因为如果我们同情和怜悯那些不应遭受却遭受了不幸的人，那么对于不应发达却发达了的人，我们也应当感到愤慨；因为一个人的所得超过其所应得是不公正的，我们甚至认为神明都具有这种感情。与此相似，嫉妒似乎也与怜悯相对，而与愤慨相近或者相同，但实际上嫉妒是另一回事情。嫉妒的确也是一种令人坐卧不安的痛苦，并且也针对别人的好运，但它不是针对不应得到好运的人，而是针对与我们地位相当或类似的人。所有心怀嫉妒和愤慨之情的人，肯定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感到不安，并且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可能受到伤害，而是因为邻人交到了好运；如果他们感到痛苦不安，是因为想到别人的好运可能给自己造成伤害，那他们的情绪就不会是愤慨和嫉妒，而是恐惧。很明显，上述情绪总是与它们各自的对立情绪相伴：如果一个人在看到他人遭受不应有的厄运时感到难过，那么在看到他人遭受应有的厄运时，他就会感到欣喜，至少不会难过。比如，没有一个好人会因为看到弑亲者或刺客被惩罚而难过；相反，我们会因为他们被惩罚的命运而欣喜；我们还会因为他人交到应有的好运而欣喜。须知这两种情况都是正义的，都会使好人欢喜，因为在看到同类所交的好运时，好人会禁不住希望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自己身上。所有这些情绪都源自同样的性格，其相反的情绪也都产生自相反的性格。比如邪恶之人嫉妒心也重，因为既然一个嫉妒心重的人会因为他人拥有或获得好运而痛苦，那么他必定会因为他人的好运被破坏或失去而欢喜。因此，这些情绪虽然由于上述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它们都会妨碍怜悯之情的产生，所以它们在阻止怜悯之情上具有同样的功效。

Let us then first speak of indignation, the persons with whom men feel indignant, for what reasons, and in what frame of mind; and then proceed to the rest of the emotions. What we have just said will make matters clear. For if indignation is being pained at the sight of good fortune that is apparently undeserved,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clear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to feel indignation at all good things; for no one will be indignant with a man who is just or courageous, or may acquire any virtue (for one does not feel pity in the case of opposites of those qualities), [2_71] but men are indignant at wealth, power, in a word, at all the advantages of which good men are worthy. [And those who possess natural advantages, such as noble birth, beauty, and all such things.] [2_72] And since that which is old seems closely to resemble that which is natural, it follows that, if two parties have the same good, men are more indignant with the one who has recently acquired it and owes his prosperity to it; for the newly rich cause more annoyance than those who have long possessed or inherited wealth. The same applies to offices of state, power, numerous friends, virtuous children, and any other advantages of the kind. And if these advantages bring them some other advantage, men are equally indignant; for in this case also the newly rich who attain to office owing to their wealth cause more annoyance than those who have long been wealthy; and similarly in all other cases of the same kind. The reason is that the latter seem to possess what belongs to them, the former not; for that which all along shows itself in the same light suggests a reality, so that the former seem to possess what is not theirs. [2_73] And since every kind of good is not suitable to the first comer, but a certain proportion and suitability are necessary (as for instance beautiful weapons are not suitable to the just but to the courageous man, and distinguished marriages not to the newly rich but to the nobly born), if a virtuous man does not obtain what is suitable to him, we feel indignant. Similarly, if the inferior

contends with the superior, especially among those engaged in the same pursuit,—whence the saying of the poet, “He avoided battle with Ajax, son of Telamon, [2.74] for Zeus was indignant with him, when he would fight with a better man;” or, if the pursuit is not the same, wherever the inferior contends with the superior in anything whatever, as for instance, the musician with the just man; for justice is better than music.

下面我们先讲讲什么是愤慨，我们会对什么样的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在什么样的心境下感到愤慨，然后再讲其他的情感。上文所述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清晰。如果愤慨是因为看到他人交到明显不应得的好运而愤愤不平，那么首先有一点很明显，即人不可能对一切好东西都感到愤慨；须知不会有人对正义、勇敢或者可能具有其他美德的人感到愤慨（正如没有人会对这些品质的对立面感到怜悯一样），人们愤慨的对象总是不义之财和不义之权，总之，是好人才应当享有而坏人不应当享有的所有好处。（人们愤慨的对象还包括拥有先天优势的坏人，比如高贵的出身、美貌以及诸如此类的禀赋。）再者，既然有年头的东西看起来比较接近自然，那么很显然，如果有两方拥有同样的好东西，人们愤慨的对象往往是新近得到这个好东西并因此而发达的一方，比如，暴发户就比一向富裕或世袭富裕的人更容易让人恼怒。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城邦官职、权力、朋友众多、子嗣优秀以及其他此类优势。如果这些优势为其拥有者带来其他的好处，人们同样会感到愤慨；须知在这种情况下，诸如暴发户以金钱谋取官职之类的事情，比久富之人获得官职更令人恼怒；其他所有同类的情形也是如此。原因在于，后者拥有的东西似乎本来就属于他们，而前者则不是；要知道一件事情长期表现如一，就显得像事实，所以前者拥有的东西似乎不属于他们。不过并不是每一种好东西都适合先到者，而是需要一定的比例和匹配（比如精良的武器就不适合正直的人，而适合勇敢者；显赫的联姻不适合新贵，而适合出身高贵者），因此如果善良之人得不到适合他的东西，我们也会感到愤慨。类似地，如果地位较低者同地位较高者相争，尤其是争夺同一件东西，我们也会感到愤

慨；因此，诗人荷马说："他避免与忒拉蒙之子埃阿斯交战，因为他若与强者争斗，宙斯会感到愤慨"；即使他们争夺的不是同一件东西，只要是地位低者与地位高者相争，无论争夺什么，我们都会感到愤慨，比如乐师与正义者相争；须知正义比音乐重要。

From this it is clear, then, with whom men are indignant and for what reasons; they are these or of such a kind. Men are prone to indignation, first, if they happen to deserve or possess the greatest advantages, for it is not just that those who do not resemble them should be deemed worthy of the same advantages; secondly, if they happen to be virtuous and worthy, [2_75] for they both judge correctly and hate what is unjust. And those who are ambitious and long for certain positions, especially if they are those which others, although unworthy, have obtained. [2_76] And, in general, those who think themselves worthy of advantages of which they consider others unworthy, are inclined to be indignant with the latter and because of these advantages. This is why the servile and worthless and unambitious are not inclined to indignation; for there is nothing of which they think themselves worthy. It is evident from this what kind of men they are whose ill fortunes, calamities, and lack of success must make us rejoice or at least feel no pain; for the opposites are clear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If then the speaker puts the judges into such a frame of mind and proves that those who claim our pity (and the reasons why they do so) are unworthy to obtain it and deserve that it should be refused them, then pity will be impossible.

从以上所述可见，人们对什么人、出于什么原因感到愤慨，这些人和这些原因如以上所列或与之类似。此外，下面这些人容易愤慨：第一，如果他们碰巧应该得到或已经拥有最好的东西，则容易愤慨，

须知如果与他们不相似的人被认为应该得到同样的好东西，那就是不正当的；第二，如果他们碰巧是有德有才的人，也容易愤慨，因为这类人既能正确地进行判断，也会憎恨不义之事；第三，他们是有抱负、期望获得某些职位的人，如果这些职位已为其他不配之人获取，他们尤其容易愤慨。总之，人们如果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某些他人不配的好处，就容易由于后者获得这些好处而感到愤慨。正因如此，被奴役的、卑贱的、无抱负的人不易感到愤慨，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从这一点亦可见，哪些人遭受厄运、灾难和失意会使我们欢喜，或者至少不感到难过；须知其对立面可以从上述内容明显地看出来。那么，如果演说者让裁决人进入这种心境，证明那些要求我们怜悯的人（以及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不应该得到怜悯，而是应该被拒绝，那么裁决人就不会有怜悯之情了。

Chapter 10

第十章

It is equally clear for what reason, and of whom, and in what frame of mind, men are envious, if envy is a kind of pain at the sight of good fortune in regard to the goods mentioned; in the case of those like themselves; and not for the sake of a man getting anything, but because of others possessing it. For those men will be envious who have, or seem to have, others “like” them. I mean like in birth, relationship, age, moral habit, reputation, and possessions. And those will be envious who possess all but one of these advantages; [2_77] that is why those who attempt great things and succeed are envious,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every one is trying to deprive them of their own. And those who are honored for some special reason, especially for wisdom or happiness. And the ambitious are more envious than the unambitious. And those who are wise in their own conceit, for they are ambitious of a reputation

for wisdom; and, in general, those who wish to be distinguished in anything are envious in regard to it. And the little-minded, because everything appears to them to be great.

如果嫉妒是指看到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到好运、得到上述好东西而感到的一种痛苦，不是因为自己可能得到某件东西，而是因为他人拥有这件东西，那人们因为什么原因、对什么人、由于何种心境感到嫉妒就同样非常清楚了。须知如果有或者似乎有与自己“相像”但运气更好的人，人们就会嫉妒。我所说的“相像”是指在出身、亲属关系、年龄、道德习性、声誉和财产方面。还有那些拥有所有这些优势、却独缺其一的人，也会嫉妒；正因如此，谋大事且成功者会嫉妒，因为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在试图抢夺他的好东西。那些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尤其是智慧或者幸福，而被人尊敬者，也会嫉妒。有抱负的人比没有抱负的人嫉妒心更强。还有以智慧自居的人亦会嫉妒，因为他们渴望凭智慧获得声誉；总之，期望在某方面超出众人的人都会在这方面有嫉妒之心。心胸狭窄的人也会嫉妒，因为任何事在他们看来都很重大。

The advantages which excite envy have already been stated. Nearly all the actions or possessions which make men desire glory or honor and long for fame, and the favors of fortune, create envy, especially when men long for them themselves, or think that they have a right to them, or the possession of which makes them slightly superior or slightly inferior.

能激发嫉妒之情的种种优势前面已有论述。几乎所有使人觊觎的荣耀或荣誉、使人渴望声誉的行为和所有物以及命运的眷顾，都会激发嫉妒之情；当人们期望自己获得这些东西，或者认为自己应当获得这些东西，或者拥有这些东西会让他们感到自己略强或略逊于他人时，尤其会嫉妒。

And it is evident whom men envy, for it has just been stated by implication. They envy those who are near them in time, place, age, and reputation, whence it was said, “Kinship knows how to envy also;“ [2_78] and those with whom they are in rivalry, who are those just spoken of; for no man tries to rival those who lived ten thousand years ago, or are about to be born, or are already dead; nor those who live near the Pillars of Hercules; [2_79] nor those who, in his own opinion or in that of others, are either far inferior or superior to him; and the people and things which one envies are on the same footing. [2_80] And since men strive for honor with those who are competitors, or rivals in love, in short, with those who aim at the same things, they are bound to feel most envious of these; whence the saying, “Potter [being jealous]of potter.“ [2_81] And those who have succeeded with difficulty or have failed envy those whose success has been rapid. And those whose possessions or successes are a reproach to themselves, and these, too, are those near or like them; for it is clear that it is their own fault that they do not obtain the same advantage, so that this pains and causes envy. And those who either have or have acquired what was naturally theirs or what they had once acquired; this is why an older man is envious of a younger one. Those who have spent much envy those who have only spent little to obtain the same thing. And it is clear at what things and persons the envious rejoice, and in what frame of mind; for, as when they do not possess certain things, they are pained, so when they do possess them, they will rejoice in the opposite circumstances. [2_82] So that if the judges are brought into that frame of mind, and those who claim their pity or any other boon are such as we have stated, it is plain that they will not obtain pity from those with whom the decision rests.

人们嫉妒什么样的人，至此也很清楚了，因为上述内容已包含了这些信息。人们嫉妒在时间、地点、年龄和声誉上与自己相近的人，因此诗人说："亲属也会嫉妒。"人们还会嫉妒自己的竞争对手，这也属于刚才说的与己相近的那种人，因为人们不会和一万年前的人或尚未出生的人或已经过世的人竞争，不会和居住在赫拉克勒斯石柱旁的人竞争，也不会和在他看来或在别人看来远远弱于他或强于他的人竞争。人们嫉妒的人和事，总是与自己地位相当。人们与竞争对手争夺荣誉，与情敌争夺爱情，简而言之，人们与志在同样东西的人竞争，因此注定最嫉妒这些人，所以诗人说："陶匠（嫉恨）陶匠。"经历磨难才成功的人或者已经失败的人，会嫉妒快速获得成功的人。人们还会嫉妒那些拥有的财产或成功使自己蒙羞的人，而这些人通常就是与嫉妒者自身相近或相像的人；因为很明显，嫉妒者没有获得与自己相近或相像的人同样的优势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这是令人痛苦的，且会导致嫉妒。人们还会嫉妒那些拥有或已经得到原本属于他们或他们曾经得到过的东西的人，正因如此，年长者会嫉妒年幼者。为获得同一件东西，付出较多者会嫉妒付出较少者。从以上所述可见，嫉妒之人因何物何人、在何种心境下会感到欢喜，也很清楚了。正如他们不拥有某些东西时会痛苦，那么处于相反的境地中，他们必定会感到欢喜。因此，如果让裁决者进入这种心境，且那些企图求得裁决者怜悯或其他恩惠的人，如我们所述，满足了被嫉妒的条件，那么很明显，这些人就将无法获得裁决者的怜悯。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The frame of mind in which men feel emulation, what things and persons give rise to it, will be clear from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Let us assume that emulation is a feeling of pain at the evident presence of highly valued goods, which are possible for us to obtain, in the possession of those who naturally resemble us—

pain not due to the fact that another possesses them, but to the fact that we ourselves do not. Emulation therefore is virtuous and characteristic of virtuous men, whereas envy is base and characteristic of base men; for the one, owing to emulation, fits himself to obtain such goods, while the object of the other, owing to envy, is to prevent his neighbor possessing them. Necessarily, then, those are emulous who hold that they have a claim to goods that they do not possess; [2_83] for no one claims what seems impossible. Hence the young and high-minded are emulous. And so are those who possess such advantages as are worthy of honorable men, which include wealth, a number of friends, positions of office, and all similar things. For, believing it their duty to be good, because such goods naturally belong to those who are good, they strive to preserve them. And those are emulous, whom others think worthy of them. Honors obtained by ancestors, kinsfolk, intimates, nation, or city make men emulous in regard to such honors; for they think that these honors really belong to them and that they are worthy of them. And if highly valued goods are the object of emulation, it necessarily follows that the virtues must be such and all things that are useful and beneficial to the rest of mankind, for benefactors and virtuous men are honored; to these we may add all the goods which our neighbors can enjoy with us, such as wealth and beauty, rather than health. [2_84]

人在何种心境下、因何物何人感到羡慕，通过下面的讨论就能清楚。我们把羡慕定义为一种由于明白地看见生来与我们相似的人拥有我们可能得到、且为我们珍视的好东西后而生发的苦恼情绪，不是因为他人拥有这些东西，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因此，羡慕是高尚的，是高尚之人的特点；而嫉妒则是卑鄙的，是卑鄙之人的特点。须知一个人若是出于羡慕，会努力使自己获得那些好东西；若是出于嫉妒，则会阻碍其邻人获得那些好东西。由此，很显然，羡慕之人会认

为自己有权拥有目前尚未拥有的好东西，因为没有人会谋求看似不可能的东西。因此，年轻人和志向高远者都会有产生羡慕之情。拥有与其高尚身份相称之优势的人也会有羡慕之情，这些优势包括财富、朋友众多、官职以及所有类似之物。因为这类人认为自己有责任成为好人，而那些好东西本就属于好人，所以他们会努力保有那些东西。被别人认为应该得到那些好东西的人也会有羡慕之情。祖先、亲属、密友、民族或城市获得的荣耀会使他人对其产生羡慕之情，因为人们认为这些荣耀实际上属于他们自己，而他们也应该得到这些荣耀。如果人们极为珍视的好东西是羡慕的对象，那么很显然，美德一定是羡慕的对象，对其他人有用、有益的所有东西也一定如此，因为施惠者由于对他人有益和有用、高尚的人由于美德都备受推崇。羡慕的对象还包括所有可以与邻人分享的好东西，比如财富和美貌，但是不包括健康。

It is also evident who are the objects of emulation; for they are those who possess these or similar goods, such as have already been spoken of, for instance, courage, wisdom, authority; for those in authority, such as generals, orators, and all who have similar powers, can do good to many. And those whom many desire to be like, or to be their acquaintances or friends; [2_85] those whom many or ourselves admire; those who are praised or eulogized either by poets or by prose writers. [2_86] The opposite characters we despise; for contempt is the opposite of emulation, and the idea of emulation of the idea of contempt. And those who are in a condition which makes them emulate, or be emulated by, others, must be inclined to despise those persons [2_87] (and for that reason) who suffer from defects contrary to the good things which excite emulation. That is why we often despise those who are fortunate, whenever their good fortune is not accompanied by highly valued goods. The means of producing and destroying the various emotions in men, from which the methods of persuasion that concern them are derived, have now

been stated.

至于哪些人是羡慕的对象，至此也很清楚了：他们是拥有上述这些或类似好东西的人，比如前述的像勇气、智慧、权威这样的好东西；因为拥有权威的人，如将军、雄辩家以及所有拥有类似权力的人，可以惠及很多人。羡慕的对象还包括很多渴望与其相像或相识或交友的人，被很多人或者我们自己敬仰的，以及诗人和演说作家赞扬或讴歌的人。与他们相反的人则是我们蔑视的对象。蔑视是羡慕的反面，羡慕之念是蔑视之念的反面。那些羡慕他人或被他人羡慕的人，对那些深受与令人羡慕之事相反的坏事之苦的人，必定倾向于（因此）心怀鄙视。正因如此，如果侥幸之人徒有运气但没有为人珍视的好东西的话，我们常常鄙视他们。激发和打消各种情感的方法，从中我们也得到就这些情感进行说服的方式，到这里就讲完了。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Let us now describe the nature of the characters of men according to their emotions, habits, ages, and fortunes. By the emotions I mean anger, desire, and the like, of which we have already spoken; by habits virtues and vices, of which also we have previously spoken, as well as the kind of things men individually and deliberately choose and practise. The ages are youth, the prime of life, and old age. By fortune I mean noble birth, wealth, power, and their contraries, and, in general, good or bad fortune. [2_88]

我们现在根据人的情感、习性、年龄及命运描述人的性格本质。我所说的情感是指我们已经讲过的愤怒、欲望及类似的情感；习性是

指我们已经讲过的美德和恶德，还有人们各自有意选择且实施的各种事情。年龄包括青年、盛年和老年。我所说的命运是指高贵的出身、财富、权力以及它们的反面，总而言之，就是好运和厄运。

The young, as to character, are ready to desire and to carry out what they desire. Of the bodily desires they chiefly obey those of sensual pleasure and these they are unable to control. Changeable in their desires and soon tiring of them, they desire with extreme ardor, but soon cool; for their will, like the hunger and thirst of the sick, is keen rather than strong. They are passionate, hot-tempered, and carried away by impulse, and unable to control their passion; for owing to their ambition they cannot endure to be slighted, and become indignant when they think they are being wronged. They are ambitious of honor, but more so of victory; for youth desires superiority, and victory is a kind of superiority. And their desire for both these is greater than their desire for money, to which they attach only the slightest value, because they have never yet experienced want, as Pittacus [2_89] said in his pithy remark on Amphiaraus. They are not ill-natured but simple-natured, [2_90] because they have never yet witnessed much depravity; confiding, because they have as yet not been often deceived; full of hope, for they are naturally as hot-blooded as those who are drunken with wine, and besides they have not yet experienced many failures. For the most part they live in hope, for hope is concerned with the future as memory is with the past. For the young the future is long, the past short; for in the morning of life it is not possible for them to remember anything, but they have everything to hope; which makes them easy to deceive, for they readily hope. And they are more courageous, for they are full of passion and hope, and the former of these prevents them fearing, while the latter inspires them with confidence, for no one fears when angry, and hope of

some advantage inspires confidence. And they are bashful, for as yet they fail to conceive of other things that are noble, but have been educated solely by convention. [2.91] They are high-minded, for they have not yet been humbled by life nor have they experienced the force of necessity; further, there is high-mindedness in thinking oneself worthy of great things, a feeling which belongs to one who is full of hope.

青年人，在性格方面，欲望强烈，且急于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身体的欲望方面，他们主要受声色之欲驱使，并且无法控制这些欲望。他们的欲望变化无常，很快就会腻烦；来势凶猛，但是很快就会消退。他们的欲望就像病人的饥渴之欲，急迫而不强韧。他们热情，急躁，容易冲动，无法控制自己的热情。由于雄心勃勃，他们无法忍受被轻慢，而且一旦感觉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就会怒气冲冲。他们渴望荣誉，但是更渴望胜利，因为他们追求优越，而胜利就是一种优越。他们对这两者的欲望都比对金钱的欲望更加强烈，对金钱他们只给予最小的关注，因为他们尚未经历过穷困，就像庇塔科斯对安菲阿拉俄斯的警语中所说的。他们不会心怀恶意，而是心地单纯，因为他们尚未亲历多少邪恶；他们容易轻信别人，因为他们尚未被多次欺骗；他们满怀憧憬，因为他们天生热血，如同醉酒之人，而且尚未经历多少失败。他们大多生活在希望之中，因为希望面向未来，而回忆面向过往。对青年人来说，来日方长，而去日尚短；在生命的清晨，他们没有什么事需要记住，却有很多事可以希冀，这就使他们容易上当，因为他们总是愿意憧憬。他们比其他人更勇敢，因为他们充满热情和憧憬，前者使他们无所畏惧，后者使他们满怀信心，须知愤怒者不会恐惧，而憧憬获得某种优势者会充满信心。他们也很腼腆，因为他们还只接受了习俗的教育，尚未理解更高贵的东西。他们志向远大，因为他们尚未经历生活的坎坷，也没有经历匮乏的难处。再者，他们心高气傲，认为自己能干大事，这是一种满怀憧憬之人才会有的心境。

In their actions, they prefer the noble to the useful; their life is guided by their character [2_92] rather than by calculation, for the latter aims at the useful, virtue at the noble. At this age more than any other they are fond of their friends and companions because they take pleasure in living in company and as yet judge nothing by expediency, not even their friends. All their errors are due to excess and vehemence and their neglect of the maxim of Chilon, [2_93] for they do everything to excess, love, hate, and everything else. And they think they know everything, and confidently affirm it, and this is the cause of their excess in everything. If they do wrong, it is due to insolence, not to wickedness. And they are inclined to pity, because they think all men are virtuous and better than themselves; [2_94] for they measure their neighbors by their own inoffensiveness, so that they think that they suffer undeservedly. And they are fond of laughter, and therefore witty; for wit is cultured insolence. Such then is the character of the young.

在行为方面，他们宁愿做高尚的事，而不愿做有用的事；他们随性而活，而不是靠理智指引，因为后者追求有用的东西，而天性中的美德则追求高尚的东西。与其他任何年龄的人相比，在这个年龄的他们更喜欢朋友和伴侣，因为有人做伴令他们感到快乐，而且他们尚不会用有益与否来判断任何事物，尤其是朋友。他们所有的错误都是由于太过火，太激烈，无视奇伦的格言，因为他们做任何事都会过度，爱、恨以及其他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他们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并且自信地断言这一点，而这正是导致他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过火的原因。如果他们害人，那也是因为傲慢，而不是因为邪恶。他们还容易怜悯他人，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是善良的，都比他们好；他们自己没有怀揣恶意，并以此来衡量邻人，所以认为邻人不应该受苦。他们喜欢嬉笑，因此十分风趣，而风趣是一种有教养的傲慢。这就是青年人的性格。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Older men and those who have passed their prime have in most cases characters opposite to those of the young. For, owing to their having lived many years and having been more often deceived by others or made more mistakes themselves, and since most human things turn out badly, they are positive about nothing, and in everything they show an excessive lack of energy. They always “think,” but “know” nothing; and in their hesitation they always add “perhaps,” or “maybe”; all their statements are of this kind, never unqualified. They are malicious; for malice consists in looking upon the worse side of everything. Further, they are always suspicious owing to mistrust, and mistrustful owing to experience. And neither their love nor their hatred is strong for the same reasons; but, according to the precept of Bias, [2_95] they love as if they would one day hate, and hate as if they would one day love. And they are little-minded, because they have been humbled by life; for they desire nothing great or uncommon, but only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They are not generous, for property is one of these necessar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know from experience how hard it is to get and how easy to lose. And they are cowardly and inclined to anticipate evil, for their state of mind is the opposite of that of the young; they are chilled, whereas the young are hot, so that old age paves the way for cowardice, for fear is a kind of chill. And they are fond of life, especially in their last days, because desire is directed towards that which is absent and men especially desire what they lack. And they are unduly selfish, for this also is littleness of mind. And they live not for the noble, but for the useful, more than they ought, because they are selfish; for the useful is a good for the individual, whereas the noble is good

absolutely.

在大多数情况下，年龄较长者以及已过盛年之人，性格都与青年人相反。由于经历的岁月很多，曾屡被欺骗，屡犯错误，而大多人事皆不如意，因此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持乐观态度，对所有事情都没有过度的激情。他们总是在“想”，却什么都不“知道”；在犹豫中，他们说话总是加上“大概”或“也许”；他们的言语都属此类，从不绝对化。他们心怀恶意揣度，体现在他们总是从较坏的角度看待任何事情。而且，由于不信任他人，他们总是多疑，而不信任源自他们的人生阅历。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的爱和恨都不强烈，而是听从比阿斯的劝告：在爱一个人时做好有朝一日会恨他的准备，在恨一个人时则做好有朝一日会爱他的准备。他们志向不高，因为生活已经磨蚀了他们的骄傲；他们不奢求任何伟大或非凡的成就，只希望能满足生活的必需。他们做不到慷慨，因为钱财是必需品之一；同时，经验让他们知道钱财来得艰难，去得容易。他们怯懦，事情未发生已害怕在先，因为他们的心境与青年人相反：他们冷淡，而青年人热情；衰老为怯懦铺平了道路，须知恐惧就是一种冰冷的感觉。他们惜命，尤其是在暮年，因为他们的欲望总是指向已经缺失之物，而人们总是特别渴望得到自己缺少的东西。他们过度自私，这也是志向短浅的表现。他们追求的不是高尚之物，而是有用之物，因为他们自私，这一点很是过分；须知有用之物的好只针对个人，而高尚之物的好是绝对的。

And they are rather shameless than modest; for since they do not care for the noble so much as for the useful, they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what people think. And they are little given to hope owing to their experience, for things that happen are mostly bad and at all events generally turn out for the worse, and also owing to their cowardice. They live in memory rather than in hope; for the life that remains to them is short, but that which is past is long, and hope belongs to the future, memory to the past. This is the reason

of their loquacity; for they are incessantly talking of the past, because they take pleasure in recollection. Their outbursts of anger are violent, but feeble; of their desires some have ceased, while others are weak, so that they neither feel them nor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m, but only from motives of gain. Hence men of this age are regarded as self-controlled, for their desires have slackened, and they are slaves to gain. In their manner of life there is more calculation than moral character, for calculation is concerned with that which is useful, moral character with virtue. If they commit acts of injustice it is due to vice rather than to insolence. The old, like the young, are inclined to pity, but not for the same reason; the latter show pity from humanity, the former from weakness,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ey are on the point of suffering all kinds of misfortunes, and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incline men to pity. That is why the old are querulous, and neither witty nor fond of laughter; for a querulous disposition is the opposite of a love of laughter. Such are the characters of the young and older men. Wherefore, since all men are willing to listen to speeches which harmonize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 and to speakers who resemble them, [2_96] it is easy to see what language we must employ so that both ourselves and our speeches may appear to be of such and such a character.

与其说他们是谦虚，毋宁说他们是寡廉鲜耻，因为他们既然不像在乎有用的东西那样在乎高尚的东西，也就不会在意他人的看法。他们也很少怀抱希望，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阅历，已经发生的事情大多是坏的，而且事情整体上总是越来越坏，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怯懦。他们生活在回忆之中而不是憧憬之中，因为他们来日无多，去日渐长，而憧憬属于将来，回忆属于过往。这也是他们唠叨的原因。他们不停地谈论过往，因为他们在回忆中得到快乐。他们亦会暴怒，但是不会持久；他们有些欲望已经停息，余下的也很微弱，所以他们既

感受不到多少欲望，也不会出于欲望行事；他们的行为只因贪财。因此，这个年龄段的人会被认为自制力较强，因为他们的各种欲望已经减弱，只会沦为钱财的奴隶。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理智大于道德习性，因为理智关注有用的东西，而道德习性关注美德。他们要是做了什么不义之事，那是因为邪恶，而不是傲慢。老年人，像青年人一样，也容易怜悯他人，但是原因不同；后者的怜悯是出于人性，前者则是出于衰弱，因为老年人认为自己亦将遭受种种不幸，而这正是使人产生怜悯之情的原因之一。也由于这个缘故，老年人爱发牢骚，既不诙谐，也不喜爱开玩笑，因为爱发牢骚的品性与喜爱玩笑截然相反。这就是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性格。因此，既然所有人都愿意听与自己性格相符的演讲，听与自己相像的演讲者的演讲，那么也就很容易看出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让自己以及我们的演讲表现出某种性格。

Chapter 14

第十四章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haracter of those in the prime of life will be the mean between that of the other two, if the excess in each case be removed. At this age, men are neither over-confident, which would show rashness, nor too fearful, but preserving a right attitude in regard to both, neither trusting nor distrusting all, but judging rather in accordance with actual facts. Their rule of conduct is neither the noble nor the useful alone, but both at once. They are neither parsimonious nor prodigal, but preserve the due mean. It is the same in regard to passion and desire. Their self-control is combined with courage and their courage with self-control, whereas in the young and old these qualities are found separately; for the young are courageous but without self-control, the old are self-controlled but cowardly. Speaking generally, all the advantages that

youth and old age possess separately, those in the prime of life possess combined; and all cases of excess or defect in the other two are replaced by due moderation and fitness. The body is most fully developed from thirty to thirty-five years of age, the mind at about forty-nine. Let this suffice for youth, old age, and the prime of life, and the characters which belong to each.

很明显，处于盛年之人，其性格是老年人和青年人性格的中和，只要拿掉两者当中过度的部分即可。在这个年龄段，人们既不会过度自信，这会显得鲁莽，也不会过度胆怯，而是在这两方面都保持一种恰当的态度，既不会相信一切，也不会怀疑一切，而是根据事实作出判断。壮年人的行为准则不单单是高尚或者有用，而是两者兼具。他们不会过于节俭，也不会铺张浪费，而是保持适度。对于激情和欲望也是如此。他们的自制中融合了勇气，勇气中也不乏自制；而在青年人和老年人身上，这些特质都是分开的：青年人勇敢但是缺少自制，老年人自制却未免怯懦。一般而言，青年和老年分别具有的所有优势，盛年之人都是兼而有之；而前两者身上所有的过度或不足，在壮年人身上都被适中和适度所替代。人的身体在三十到三十五岁之间完全成熟，心智则是在四十九岁臻于成熟。关于人生的青年、盛年和老年以及各个阶段的性格，就讲到这里。

Chapter 15

第十五章

Let us next speak of the goods that are due to fortune, all those, at least, which produce certain characters in men. A characteristic of noble birth is that he who possesses it is more ambitious; for all men, when they start with any good, are accustomed to heap it up, and noble birth is a heritage of honor from one's ancestors. Such

men are prone to look down even upon those who are as important as their ancestors, because the same things [2_97] are more honorable and inspire greater vanity when remote than when they are recent. The idea of noble birth refers to excellence of race, that of noble character to not degenerating from the family type, a quality not as a rule found in those of noble birth, most of whom are good for nothing. For in the generations of men there is a kind of crop as in the fruits of the field; sometimes, if the race is good, for a certain period men out of the common are born in it, and then it deteriorates. Highly gifted families often degenerate into maniacs, as, for example, the descendants of Alcibiades and the elder Dionysius; those that are stable into fools and dullards, like the descendants of Cimon, Pericles, and Socrates.

我们接下来讲讲运气带来的好东西，至少该讲讲那些能在人身上造成某些性格的好东西。出身高贵的性格特点之一是拥有它的人更加志向高远；因为所有人，只要有点基础起家，就习惯于在这基础之上叠加，而高贵的出身便是祖先遗留的一种荣耀。这样的人甚至会瞧不起那些与他们的祖先地位相近的人，因为同样一件东西，久远的总是比新近的更具荣耀，更值得骄傲。高贵的出身是指出身于优秀的家族；高贵的品质是指没有丧失家族传统，一般而言，这种品质在出身高贵者中并不多见，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一无所长。因为在人的世代繁衍中，就像地里的果实一样，会有一种收成；有时，如果一个家族是好的，它就会在一定的时期孕育出非凡的子嗣，然后就会退化。天资聪颖的家族常常退化出疯癫之人，比如亚西比德和老狄奥尼西奥斯的后代；意志坚强的家族则常常退化出蠢材和懒汉，比如西门、伯里克利和苏格拉底的后代。

Chapter 16

第十六章

The characters which accompany wealth are plain for all to see. The wealthy are insolent and arrogant, being mentally affected by the acquisition of wealth, for they seem to think that they possess all good things; for wealth is a kind of standard of value of everything else, so that everything seems purchasable by it. They are luxurious and swaggerers, luxurious because of their luxury and the display of their prosperity, swaggerers and ill-mannered because all men are accustomed to devote their attention to what they like and admire, and the rich suppose that what they themselves are emulous of is the object of all other men's em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feeling is not unreasonable; for those who have need of the wealthy are many in number. Hence the answer of Simonides to the wife of Hiero concerning the wise and the rich, when she asked which was preferable, to be wise or to be rich. “Rich,” he answered, “for we see the wise spending their time at the doors of the rich.” And the rich think they are worthy to rule, because they believe they possess that which makes them so. [2_98] In a word, the character of the rich man is that of a fool favored by fortun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aracter of the newly rich and of those whose wealth is of long standing, because the former have the vices of wealth in a greater degree and more; for, so to say, they have not been educated to the use of wealth. Their unjust acts are not due to malice, but partly to insolence, partly to incontinence, which tends to make them commit assault and battery and adultery.

伴随财富的性格是显而易见的。富人骄慢狂妄，财富的聚敛影响了他们的心灵，因为他们似乎认为自己拥有所有的好东西；须知财富是衡量其他一切事物价值的一种标准，因此似乎什么都能用钱财买

到。他们骄奢、自负：骄奢是因为他们的奢华和炫富；自负是因为所有人都习惯于关注自己喜爱和赞慕的东西，而富人认为他们所追逐的东西也是其他人追逐的目标。不过，这种想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需要富人帮助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当希罗的妻子问西摩尼得斯智慧和富有哪一个更好时，西摩尼得斯就二者如此作答："富有更好，因为我们常看到智者在富人的门口打发时光。"而且，富人认为自己理应统治他人，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拥有这样的本钱。简言之，富人的性格就是受到命运眷顾的愚人的性格。不过，暴发户的性格和久富之人的性格有所区别，因为前者身上财富的恶性更强烈，也更多；可以说，他们尚未学会如何使用财富。他们若是行不义之事，那不是出于邪恶，而是部分出于傲慢，部分出于无节制，这两者都容易使他们犯下暴行和通奸之罪。

Chapter 17

第十七章

In regard to power, nearly all the characters to which it gives rise are equally clear; for power, compared with wealth, exhibits partly identical, and partly superior characteristics. Thus, the powerful are more ambitious and more manly in character than the rich, since they aim at the performance of deeds which their power gives them the opportunity of carrying out. And they are more energetic; for being obliged to look after their power, they are always on the watch. [2_99] And they are dignified rather than heavily pompous; for their rank renders them more conspicuous, so that they avoid excess; and this dignity is a mild and decent pomposity. And their wrongdoings are never petty, but great.

至于权力，它所滋生的几乎所有性格是同样显而易见的；因为与

财富相比，权力表现出的特征一部分与其相同，一部分更好。因此，当权者在性格上比富人更有抱负，也更果敢，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利用权力带来的机会而有所作为。较之富人，他们精力更加充沛，因为他们必须确保自己的权力，所以总是时刻警惕。他们有威仪而不过度浮夸，因为他们的地位使他们更受关注，所以他们会避免过度；他们的威仪是一种温和、得体的作派。他们做的坏事必定不是小事，而是大恶。

Good fortune in its divisions [2_100] exhibits characters corresponding to those which have just been mentioned; for those which appear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kinds of good fortune tend in their direction; further, good fortune furnishes advantages over others in the blessing of children and bodily goods. Now, although men are more arrogant and thoughtless owing to good fortune, it is accompanied by a most precious quality. Fortunate men stand in a certain relation to the divinity and love the gods, having confidence in them owing to the benefits they have received from fortune. We have spoken [2_101] of the character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ages and fortunes; the opposite characters to those described, for instance, of the poor, of the unfortunate, and of the weak, are obvious from their opposites.

好运的各个部分会养成上述种种性格，因为看似最重要的几种好运都指向这些性格；此外，好运还使人在儿女和身体方面比别人多得些益处。虽然好运会使人比较傲慢和轻率，但是却有一种极珍贵的品质与其相伴。幸运者和神灵维持着某种关系，他们因为命运给予的种种眷顾而敬爱、信仰众神。至此，我们已经讲了与不同年龄和命运有关的各种性格；与之相反的性格，如穷人、不幸之人以及无权之人的性格，从其反面便可以明显看出。

Chapter 18

第十八章

Now [2_102] the employment of persuasive speeches is directed towards a judgement; for when a thing is known and judged, there is no longer any need of argument. And there is judgement, whether a speaker addresses himself to a single individual and makes use of his speech to exhort or dissuade, as those do who give advice or try to persuade, for this single individual is equally a judge, since, speaking generally, he who has to be persuaded is a judge; if the speaker is arguing against an opponent or against some theory, it is just the same, for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use of speech to destroy the opposing arguments, against which he speaks as if they were the actual opponent; and similarly in epideictic speeches, for the speech is put together with reference to the spectator as if he were a judge. Generally speaking, however, only he who decides questions at issue in civil controversies [2_103] is a judge in the proper sense of the word, for in judicial cases the point at issue is the state of the case, in deliberative the subjects of deliberation. [2_104] We have already spoken of the characters of forms of government in treating of deliberative rhetoric, [2_105] so that it has been determined how and by what means we must make our speeches conform to those characters.

说服性演讲的目的在于下判断，因为一件事情若是已知的且已经被下过判断，就不再需要任何争辩了。演说者即使只面对一个听者，利用自己的演说对其进行劝说或劝阻，如同谏言或游说之人那样，这里面也有判断的成分，因为这个听者同样是个判断者，要知道一般而言，我们要去说服的人就是判断者；如果演说者是在与对手或就某种理论进行争辩，情况也是一样的，因为他必须使用演说驳倒相反的观

点，他与这些观点进行争辩，把它们当作真实的对手。宣德演说也是如此，因为这种演说也是把听众当作判断者。不过，总体而言，只有对具有社会争议性的问题作裁决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裁决人，因为在诉讼演讲中争论的要点是案件的状态，而议政演讲的要点则是所议的主题。我们在讨论议政修辞时已经讲过各种政体的特点，所以我们应该如何以及通过哪些方式让我们的演说符合这些特点皆已确定。

Now, since each kind of Rhetoric, as was said, [2_106] has its own special end, and in regard to all of them we have gathered popular opinions and premises whence men derive their proofs in deliberative, epideictic, and judicial speeches, [2_107] and, further, we have determined [2_108] the special rules according to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make our speeches ethical, it only remains to discuss the topics common to the three kinds of rhetoric. For all orators are obliged, in their speeches, also to make use of the topic of the possible and impossible, and to endeavor to show, some of them that a thing will happen, others that it has happened. Further, the topic of magnitude is common to all kinds of Rhetoric, for all men employ extenuation or amplification whether deliberating, praising or blaming, accusing or defending. When these topics have been determined, we will endeavor to say what we can in general about enthymemes and examples, in order that, when we have added what remains, we may carry out what we proposed at the outset. Now, of the commonplaces amplification is most appropriate to epideictic rhetoric, as has been stated; [2_109] the past to forensic, since things past are the subject of judgement; and the possible and future to deliberative.

如前所述，既然每种修辞都有各自的特殊目的；而且，针对三种修辞，我们都已经收集了在议政、宣德和诉讼演说中人们提取证据所

依循的常见意见和命题；再者，我们也已经确定了使自己的演说符合道德标准所需依循的特殊规则，那么就只剩下这三种修辞所通用的部目有待讨论了。所有的演说者，在其演说中，都需要使用可能和不可能的部目：有些演说者需要力图证明某事将要发生，有些则需要证明某事已经发生。另外，大小部目也是各种修辞通用的，因为所有人都要使用缩小或夸大之法，无论是议政，是称赞或谴责，还是控告或辩护。确定了这些部目之后，我们将尽可能从整体上讲讲修辞式推理和例证法；这样，把剩下的内容补上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本书开篇提议的内容了。如前所述，在通用部目中，夸大法最适宜宣德修辞；过往部目最适宜诉讼修辞，因为过往之事是庭审的议题；可能部目和将来部目则最适宜议政修辞。

Chapter 19

第十九章

Let us first speak of the possible and the impossible. If of two contrary things it is possible that one should exist or come into existence, then it would seem that the other is equally possible; for instance, if a man can be cured, he can also be ill; for the potentiality of contraries, qua contraries, is the same. [2_110] Similarly, if of two like things the one is possible, so also is the other. And if the harder of two things is possible, so also is the easier. And if it is possible for a thing to be made excellent or beautiful, it is possible for it to be made in general; for it is harder for a beautiful house to be made than a mere house. [2_111] Again, if the beginning is possible, so also is the end; for no impossible thing comes, or begins to come, into existence; for instance, that the diameter of a square should be commensurable with the side of a square is neither possible nor could be possible. And when the end is possible, so also is the beginning; for all things arise from a

beginning. And if that which is subsequent in being or generation can come into being, so then can that which is antecedent; for instance, if a man can come into being, so can a child, for the child is antecedent; and similarly, if a child can come into being, so can a man, for the child is a beginning. And things which we love or desire naturally are possible; for as a rule no one loves the impossible or desires it. And those things which form the subject of sciences or arts can also exist and come into existence. And so with all those things, the productive principles of which reside in those things which we can control by force or persuasion, when they depend upon those whose superiors, masters, or friends we are. And if the parts are possible, so also is the whole; and if the whole is possible, so also are the parts, speaking generally; for instance, if the front, toe-cap, and upper leather, [2_112] can be made, then shoes can be made, and if shoes, then the above parts. And if the whole genus is among things possible to be made, so is the species, and if the species, so the genus; for example, if a vessel can be built, so can a trireme, if a trireme can, so can a vessel. If of two naturally corresponding things one is possible, so also is the other; for instance, if the double is possible, so is the half, if the half, so the double. If a thing can be made without art or preparation, much the more can it be made with the help of art and carefulness. Whence it was said by Agathon [2_113] : "And moreover we have to do some things by art, while others fall to our lot by compulsion or chance." And if a thing is possible for those who are inferior, or weaker, or less intelligent, it will be still more so for those whose qualities are the opposite; as Isocrates said, it would be very strange if he were unable by himself to find out what Euthynus had learnt [with the help of others]. As for the impossible, it is clear that there is a supply of arguments to be derived from the opposite of what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possible.

我们先讲可能和不可能部目。如果在一对相反的事物中，一个可能存在或出现，那么另一个应该也同样如此；比如，如果一个人可能被治愈，那么他也可能害病；因为相反的事物只要确实互相对立，其可能性就是一样的。与此相似，如果在一对相像的事物中，一个是可能的，那么另一个也是如此。在一对事物中，如果较难的那个是可能的，那么较易的那个也是可能的。如果使某事物变得优异或美好是可能的，那么使它变得普通也是可能的；毕竟，建造一所漂亮的房子比建造一所普通的房子要困难。另外，如果开头是可能的，那么结尾也是可能的；要知道不可能之事不会存在或出现；比如，方形的对角线与它的边同长就是既不可能也不会成为可能。如果结尾是可能的，那么开头也是可能的；因为所有事物都起自一个开头。如果在存在或生成状态中比较靠后的事物有可能产生，那么比较靠前的事物也有可能产生；比如，如果成年人可能产生，那么孩童也可能产生，因为孩童比较靠前；类似地，如果孩童可能产生，那么成年人也可能产生，因为孩童是开头。我们天性喜爱或渴求的事物是可能的，因为，一般而言，没有人会喜爱或渴求不可能的事物。构成科学或技艺主题的事物也是可能存在或出现的。如果某些事物的生产准则依赖于我们可以靠强力或说服来控制的东西，如果我们是它们所依赖者的上级、主人或朋友，那么这些事物就都是可能的。如果部分是可能的，那么整体也是可能的；如果整体是可能的，那么，一般而言，部分也是可能的；比如，如果鞋帮、鞋头和鞋面都可以制造出来，那么鞋也就可以制造出来；如果鞋可以制造出来，那么上述这些部分也都可以制造出来。如果整个属是可能制造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个属所包含的种也是可能制造出来的；如果种是可能制造出来的，那么由这些种所构成的属也是可能制造出来的；比如，如果可以造船，那么也可以造三层桨战船；如果可以造三层桨战船，那么也可以造船。如果在一对天然相配的事物中，一个是可能的，那么另一个也是可能的；比如，如果双倍是可能的，那么一半也是可能的；如果一半是可能的，那么双倍也是可能的。如果一件东西无需技术或准备就可以制造，那么在有技术和精心准备的情况下就更有可能制造。因此，阿伽松说：“有些东西我们必须凭技术去做，其他的东西则是靠强迫或运气获得。”如果一件事情是较下等、较弱小或较不聪明的人可能做到的，那么拥有相反特

质的人就更有可能做到；正如伊索克拉底所说，欧梯诺斯（在他人的帮助下）所学的东西，他自己若是发现不了，就太奇怪了。至于不可能之事，很显然，我们可以从上述可能之事的反面来提取充足的论点。

The question whether a thing has or has not happened must be considered from the following points of view. In the first place, if that which is naturally less likely has happened, then that which is more likely will most probably have happened. If that which usually happens afterwards has happened, then that which precedes must also have happened; for instance, if a man has forgotten a thing, he must once have learnt it. If a man was able and wished to do a thing, he has done it; for all men do a thing, when they are able and resolve to do it, for nothing hinders them. Further, if a man wished to do it and there was no external obstacle; if he was able to do it and was in a state of anger; if he was able and desired to do it; for men as a rule, whenever they can, do those things which they long for, the vicious owing to want of self-control, the virtuous because they desire what is good. And if anything was on the point of being done, it most probably was done; for it is likely that one who was on the point of doing something has carried it out. And if all the natural antecedents or causes of a thing have happened; for instance, if it has lightened, it has also thundered; and if a man has already attempted a crime, he has also committed it. And if all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or motives of actions have happened, then the antecedent or the cause has happened; for instance, if it has thundered, it has also lightened, and if a man has committed a crime, he has also attempted it. Of all these things some are so related necessarily, others only as a general rule. To establish that a thing has not happened, it is evident that our argument must be derived from the opposite of what has been said.

关于某事是否曾经发生这样的问题，应该从以下这些视角来看。首先，如果本身较不可能的事已经发生，那么较有可能的事就极有可能也已经发生。如果通常作为后续发生的事已经发生，那么先行之事肯定也已经发生；比如，如果一个人忘记了一件事，那么他必定曾经知道过这件事。如果一个人曾经有能力且有意愿去做一件事，那么他肯定已经做了这件事；须知人们若有能力又决意去做一件事，就一定会去做，因为没有什么阻止他们。再者，如果一个人曾经有意愿做一件事，且没有外部的阻碍；如果他曾经有能力做一件事，且处于愤怒的状态；或者如果他曾经有能力且有欲望去做一件事，在这三种情形下，他肯定已经做了这件事；要知道一般而言，只要有可能，人们都会做自己期望的事情，邪恶之人是由于缺乏自制，善良之人是出自他们的良好愿望。如果一个人即将做某事，他极有可能已经做了；因为一个人若即将做某事，那么很有可能他已经将其付诸实践。如果作为某事的自然先兆或起因的事情皆已发生，那么这件事很可能也已经发生；比如，如果已经闪了电，那么很可能也已经响了雷；如果一个人曾经企图犯罪，那么很可能他也已经实施了犯罪。如果作为某事的必然后果或者行为目的的事情皆已发生，那么其先兆或者起因必定也已经发生；比如，如果已经响了雷，那么肯定也已闪了电；如果某人已经实施犯罪，那么肯定他也已经企图犯罪。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有些事物是有必然联系的，其他的则只有一般的相关性。为了证明某事未曾发生，很明显，我们应该从上述内容的反面来提取论点。

In regard to the future, it is clear that one can argue in the same way; for if we are able and wish to do a thing, it will be done; and so too will those things which desire, anger, and reasoning urge us to do, if we have the power. For this reason also, if a man has an eager desire, or intention, of doing a thing, it will probably be done; since, as a rule, things that are about to happen are more likely to happen than those which are not. And if all the natural antecedents have happened; for instance, if the sky is cloudy, it will probably

rain. And if one thing has been done with a view to another,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latter will also be done; for instance, if a foundation has been laid, a house will probably be built.

至于将来部目，很显然，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进行论证：须知如果我们现在有能力且有意愿做某事，我们将来就会去做；欲望、愤怒或理智驱使我们去做的事情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有这个能力。因为同样的原因，如果某人有急切的欲望或意愿做某事，他就很有可能去做这件事；因为，一般而言，打算做的事比不打算做的事更有可能发生。还有，如果所有自然的先兆之事都已经发生，那么这件事也很可能会发生；比如，如果天空阴云密布，就很可能会下雨。还有，如果为另一件事情而做的事情已经做成，那么这后一件事情就很可能也会进行；比如，如果已经打好了地基，就很可能会建房。

What we have previously said clearly shows the nature of the greatness and smallness of things, of the greater and less, and of things great and small generally. For, when treating of deliberative rhetoric, [2_114] we spoke of greatness of goods, and of the greater and less generally.Therefore, since in each branch of Rhetoric the end set before it is a good, such as the expedient, the noble, or the just, it is evident that all must take the materials of amplification from these. To make any further inquiry as to magnitude and superiority absolutely would be waste of words; for the particular has more authority than the general for practical purposes. Let this suffice for the possible and impossible; for the question whether a thing has happened, or will happen, or not; and for the greatness or smallness of things.

至于事物的大或小、较大或较小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大事或小事的

本质，从前面所述就可以看清楚。要知道在探讨议政修辞时，我们已经讲了好东西的大小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较大或较小。如此一来，既然每种修辞的目的都在于追求好东西，比如有用、高尚或正义的东西，那么显而易见，所有演说者都应该从这些好东西中提取可用于夸大法的材料。再进一步探讨绝对的大小或优劣将是白费唇舌；因为在实际运用中，个别比一般更有权威性。关于可能和不可能部目，某事是否已发生或者是否会发生以及事物的大或小，我们就讲到这里。

Chapter 20

第二十章

It remains to speak of the proofs common to all branches of Rhetoric, since the particular proofs have been discussed. These common proofs are of two kinds, example and enthymeme (for the maxim is part of an enthymeme). Let us then first speak of the example; for the example resembles induction, and induction is a beginning. [2_115]

专用或然式证明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只剩下适用于所有修辞种类的通用或然式证明要讲。这些通用证明分为两种——例证和修辞式推理（格言是修辞式推理的一部分）。我们不妨先讲例证，因为例证类似归纳，而归纳是演绎的起点。

There are two kinds of examples; namely, one which consists in relating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before, and another in inventing them oneself. The latter are subdivided into comparisons or fables, such as those of Aesop and the Libyan. [2_116] It would be an instance of the historical kind of example, if one were to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preparations against the Great King and not to allow him to subdue Egypt; for Darius did not cross over to Greece until he had obtained possession of Egypt; but as soon as he had done so, he did. Again, Xerxes did not attack us until he had obtained possession of that country, but when he had, he crossed over; consequently, if the present Great King shall do the same, he will cross over, wherefore it must not be allowed. Comparison is illustrated by the sayings of Socrates; for instance, if one were to say that magistrates should not be chosen by lot, for this would be the same as choosing as representative athletes not those competent to contend, but those on whom the lot falls; or as choosing any of the sailors as the man who should take the helm, as if it were right that the choice should be decided by lot, not by a man's knowledge. [2_117]

例证也分为两种：一种采用从前发生过的事情，另一种采用自己虚构的事情。后者又可细分为类比和寓言，比如伊索寓言和利比亚寓言。下面是使用历史事件作例证的一个例子：如果有人谏言必须防备波斯国王，不让他侵占埃及，因为大流士在征服埃及之前没有渡海前来入侵希腊，但是在征服埃及之后便即刻来犯；再者，薛西斯在征服埃及之前也一直没有攻打希腊，但是刚征服埃及就渡海前来；所以，如果现在的波斯国王也这么做，那么他也一定会渡海来犯，因此决不能允许他侵占埃及。类比可以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解释：比如，有人说不能通过抽签来选拔官吏，因为这样做无异于在挑选运动员代表时不选竞技能力强的，而是选抽签抽到的；或者在挑选掌舵的水手时，不是根据水手的知识而是根据抽签的结果。

A fable, to give an example, is that of Stesichorus concerning Phalaris, or that of Aesop on behalf of the demagogue. For Stesichorus, when the people of Himera had chosen Phalaris

dictator and were on the point of giving him a body-guard, after many arguments related a fable to them: “A horse was in sole occupation of a meadow. A stag having come and done much damage to the pasture, the horse, wishing to avenge himself on the stag, asked a man whether he could help him to punish the stag. The man consented, on condition that the horse submitted to the bit and allowed him to mount him javelins in hand. The horse agreed to the terms and the man mounted him, but instead of obtaining vengeance on the stag, the horse from that time became the man's slave. So then,” said he, “do you take care lest, in your desire to avenge yourselves on the enemy, you be treated like the horse. You already have the bit, since you have chosen a dictator; if you give him a body-guard and allow him to mount you, you will at once be the slaves of Phalaris.” Aesop, when defending at Samos a demagogue who was being tried for his life, related the following anecdote. “A fox, while crossing a river, was driven into a ravine. Being unable to get out, she was for a long time in sore distress, and a number of dog-fleas clung to her skin. A hedgehog, wandering about, saw her and, moved with compassion, asked her if he should remove the fleas. The fox refused and when the hedgehog asked the reason, she answered: 'They are already full of me and draw little blood; but if you take them away, others will come that are hungry and will drain what remains to me.' You in like manner, O Samians, will suffer no more harm from this man, for he is wealthy; but if you put him to death, others will come who are poor, who will steal and squander your public funds.” Fables are suitable for public speaking, and they have this advantage that, while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similar things that have really happened in the past, it is easier to invent fables; for they must be invented, like comparisons, if a man is capable of seizing the analogy; and this is easy if one studies philosophy. [2_118] Thus, while the lessons conveyed by fables are easier to provide, those derived from facts are more useful for

deliberative oratory, because as a rule the future resembles the past.

至于寓言，吟游诗人斯特西科罗斯所讲的关于暴君法拉里斯的故事以及伊索代表那位民众领袖所讲的故事都是例子。在希墨拉人推选法拉里斯为执政官且正要为他配备卫队时，斯特西科罗斯列举了很多证据，并讲了一个寓言："有一匹马独占着一片草场。一头鹿跑来，践踏了草地。马想报复鹿，于是问一个人能否帮他惩罚鹿。那人同意了，条件是马必须带上嚼子，并且让他手持标枪骑到身上。马答应了这些条件，于是那人骑到了马背上。但是他并没有帮助马惩罚鹿，而马从此沦为那人的奴隶。所以，你们要当心，在报复敌人的欲望的驱使下，你们有可能遭受那匹马的命运。你们已经戴上了嚼子，因为你们已经推选了法拉里斯做执政官；如果你们再给他配备卫队，让他骑到你们身上，你们就会立刻沦为法拉里斯的奴隶。"伊索在萨摩斯为一位即将被判处死刑的民众领袖辩护时，讲了下面这个寓言："有一只狐狸，在过河的时候被冲进了石洞里。她钻不出来，吃了很久的苦头，而且好多狗虱粘在她身上。一只刺猬在闲逛时看到了她，起了同情心，问她要不要他帮忙赶走虱子。狐狸拒绝了。刺猬问她为什么，狐狸答道：'这些虱子已经喝饱了我的血，现在不怎么喝了；如果你把他们赶走，其他饥饿的虱子就会赶来，喝光我身上剩下的血。'萨摩斯人啊，你们也一样，这个人不会再让你们受害了，因为他已经很富有；但是如果你们处死了他，其他的人就会出现，他们很穷，会偷窃、挥霍你们的公款。"寓言适合公共演讲，它们有一个优势：寻找切实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很难，但是编造寓言却很容易；要知道寓言必须编造，就像类比一样，只要演讲者能够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似点就行；如果演讲者学过哲学的话，这一点是很容易做到的。不过，虽然寓言能阐释的道理更容易讲解，但是根据过去的事实提取的例证对议政演说更有用，因为一般而言，未来与过去十分相像。

If we have no enthymemes, we must employ examples as demonstrative proofs, for conviction is produced by these; but if we

have them, examples must be used as evidence and as a kind of epilogue to the enthymemes. [2_119] For if they stand first, they resemble induction, and induction is not suitable to rhetorical speeches except in very few cases; if they stand last they resemble evidence, and a witness is in every case likely to induce belief. Wherefore also it is necessary to quote a number of examples if they are put first, but one alone is sufficient if they are put last; for even a single trustworthy witness is of use. We have thus stated how many kinds of examples there are, and how and when they should be made use of.

如果我们没有修辞式推理可用，那就应该使用例证作为论点，因为例证具有说服力；但是如果有修辞式推理可用，那么例证就应该用作证据，作为修辞式推理的结束语。这是因为，如果例子摆在开头，就很像归纳，而除了极少数情况，归纳不适于修辞演说；但如果例子摆在结尾，就很像证据，比如，在任何案件中，目击证人都很有可能使人信服。因此，如果摆在开头，就需要多举几个例子；如果摆在结尾，举一个就够了，要知道一个可信的见证就已经够用。关于例证的种类、如何使用例证以及应该何时使用例证，我们就讲到这里。

Chapter 21

第二十一章

In regard to the use of maxims, it will most readily be evident on what subjects, and on what occasions, and by whom it is appropriate that maxims should be employed in speeches, after a maxim has been defined. Now, a maxim is a statement, not however concerning particulars, as, for instance, what sort of a man Iphicrates was, but general; it does not even deal with all general

things, as for instance that the straight is the opposite of the crooked, but with the objects of human actions, and with what should be chosen or avoided with reference to them. And as the enthymeme is, we may say, [2_120] the syllogism dealing with such things, maxims are the premises or conclusions of enthymemes without the syllogism. For example: “No man who is sensible ought to have his children taught to be excessively clever,“ [2_121] is a maxim; but when the why and the wherefore are added, the whole makes an enthymeme; for instance, “for, not to speak of the charge of idleness brought against them, [2_122] they earn jealous hostility from the citizens.” Another example: “There is no man who is happy in everything;“ [2_123] or, “There is no man who is really free.” The latter is a maxim, but taken with the next verse it is an enthymeme: “for he is the slave of either wealth or fortune.“ [2_124] Now, if a maxim is what we have stated, it follows that maxims are of four kinds; for they are either accompanied by an epilogue or not. [2_125] Now all those that state anything that is contrary to the general opinion or is a matter of dispute, need demonstrative proof; but those that do not, need no epilogue, [2_126] either because they are already known, as, for instance, “Health is a most excellent thing for a man, at least in our opinion,“ [2_127] for this is generally agreed; or because, no sooner are they uttered than they are clear to those who consider them, for instance, “He is no lover who does not love always.“ [2_128] As for the maxims that are accompanied by an epilogue, some form part of an enthymeme, as “No one who is sensible, etc.,“ [2_129] while others are enthymematic, but are not part of an enthymeme; [2_130] and these are most highly esteemed. Such are those maxims in which the reason of what is said is apparent: for instance, “Being a mortal, do not nourish immortal wrath;“ [2_131] to say that one should not always nourish immortal wrath is a maxim, but the addition “being a mortal” states the reason. It is the same with “A mortal should have mortal, not

immortal thoughts.“ [2_132]

至于格言的用法，在我们对格言做出界定后，在演说中应该就何种议题、于何种情形下使用格言以及何人适于使用格言就会非常清楚了。格言是一种陈述，但不是针对个别事物（比如伊菲克拉底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一般意义上的；它甚至也不是针对所有的一般事物（比如直线和曲线相反），而是针对人类行为的对象，探讨人们应该选择和规避什么。如果说修辞式推理是论证上述问题的三段论，那么格言就是去掉三段论形式之后剩下的修辞式推理的前提或者结论。比如：“头脑清醒者都不应该把子女教育成过度聪明的人”是一句格言，但是加上原因和因由之后，它整体上就变成了一个修辞式推理，比如：“因为他们不但会得到书呆子的骂名，还会招惹市民的恶意嫉妒”。再比如：“没有人能事事顺心”；或者，“没有人是真正自由的”。后面这句也是格言，但是加上下一句，它就成了修辞式推理：“因为任何人都是财富或命运的奴隶。”格言如果就是我们所讲的这样，那么它就应该可以分为四类；因为格言要么伴有解释语，要么没有。如果格言所述内容与大众意见相悖或者有争议，就需要加以解释说明；否则，就不需要解释语，因为这样的格言所述的道理要么已经众所周知，比如：“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健康，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的”，这便是众人都认可的，要么一经说出，意思就很明了，比如：“不会永远爱你的人不能算作爱人。”至于有解释语相伴的格言，有些构成修辞式推理的一部分，比如：“理智之人绝不应当如何如何”；其他的则是带有修辞式推理的特点，但不属于修辞式推理，这种格言最受欢迎。那些所述道理的原因显而易见的格言就属此类，比如：“身为凡人，不可滋生神的愤怒。”说一个人不应当总是滋生神的愤怒是一句格言，而附加语“身为凡人”则点明了原因。“凡人应当有凡人的想法，而不是神的想法”这一句也是如此。

It is evident, therefore,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how many kinds of maxims there are, and to what it is appropriate to apply

them in each case. For in the case of matters of dispute or what is contrary to the general opinion, the epilogue is necessary; but either the epilogue may be put first and the conclusion used as a maxim, as, for example, if one were to say, “As for me, since one ought neither to be the object of jealousy nor to be idle, I say that children ought not to be educated”; or put the maxim first and append the epilogue. In all cases where the statements made, although not paradoxical, are obscure, the reason should be added as concisely as possible. In such cases Laconic apophthegms and riddling sayings are suitable; as, for instance, to say what Stesichorus said to the Locrians, that they ought not to be insolent, lest their cicadas should be forced to chirp from the ground. [2_133] The use of maxims is suitable for one who is advanced in years, and in regard to things in which one has experience; since the use of maxims before such an age is unseemly, as also is story-telling; and to speak about things of which one has no experience shows foolishness and lack of education. A sufficient proof of this is that rustics especially are fond of coining maxims and ready to make display of them.

根据以上所述，格言的种类以及在不同情况下哪种格言适用就很清楚了。如果格言的议题涉及分歧之事或者与大众意见相悖，就需要解释语；不过既可以把解释语放在开头，把结论当作格言，比如，我们可以说：“在我看来，既然人不可招人嫉妒，也不可成为书呆子，因此我认为不应当让孩子接受教育”；也可以把格言放在开头，再加上解释语。如果所述内容，虽不是悖论却意思模糊，就应该尽可能简明扼要地把原因加进去。这种情况下，拉孔式警句 [3_1] 和谜语就很适合；比如，斯特西科罗斯 [3_2] 对洛克里斯人说：不要傲慢，免得知了只能在地上鸣叫。格言适合年长者使用，用来讲述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年轻人使用格言是不适宜的，还有讲故事同样不适合年轻人；讲自己并未经历过的事是愚蠢和没有教养的表现。这方面的一个有力证据，便是乡下人尤其喜欢杜撰格言，随时炫耀。

To express in general terms what is not general is especially suitable in complaint or exaggeration, and then either at the beginning or after the demonstration. One should even make use of common and frequently quoted maxims, if they are useful; for because they are common, they seem to be true, since all as it were acknowledge them as such; for instance, one who is exhorting his soldiers to brave danger before having sacrificed may say, “The best of omens is to defend one's country,“ [2_134] and if they are inferior in numbers, “The chances of war are the same for both,“ [2_135] and if advising them to destroy the children of the enemy even though they are innocent of wrong, “Foolish is he who, having slain the father, suffers the children to live.“ [2_136]

以通用的方式表达非通用的内容尤其适于抱怨和夸张，要么放在开头，要么放在证明之后。普通的、流行的格言，只要有用，也不妨使用；要知道它们正是由于普通，所以才显得正确，因为它们似乎为公众所认可；比如，如果在祭神前就想鼓动士兵冒险作战，那么可以说：“最好的预兆是保卫祖国！”如果己方兵力较弱，那么可以说：“战神不偏不倚！”如果要煽动士兵杀戮敌方的无辜儿童，那么可以说：“愚蠢啊，那些杀了父亲却饶了子女的人！”

Further, some proverbs are also maxims; for example, “An Attic neighbor.“ [2_137] Maxims should also be used even when contrary to the most popular sayings, such as “Know thyself” and “Nothing in excess,” either when one's character is thereby likely to appear better, or if they are expressed in the language of passion. It would be an instance of the latter if a man in a rage were to say, “It is not true that a man should know himself; at any rate, such a man as this, if he had known himself, would never have claimed the chief

command.” And one's character would appear better, if one were to say that it is not right, as men say, to love as if one were bound to hate, but rather to hate as if one were bound to love. The moral purpose also should be made clear by the language, or else one should add the reason; for example, either by saying “that it is right to love, not as men say, but as if one were going to love for ever, for the other kind of love would imply treachery”; or thus, “The maxim does not please me, for the true friend should love as if he were going to love for ever. Nor do I approve the maxim 'Nothing in excess,' for one cannot hate the wicked too much.”

另外，有些谚语也是格言，比如“雅典人邻居 [3_3] ”。即使某些格言与最流行的说法是相反的，比如“了解你自己”和“凡事勿过度”，我们也不妨使用，只要它们能使我们的性格显得更好，或者只要我们能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将其表述出来。下面是关于后者的一个例子。一个发怒的人说：“劝人要有自知之明纯属胡扯；不管怎么说，如果一个人真有自知之明，就不会当将军。”下面是让人性格显得更好的例子：一个人可以说，人们常说的“在爱一个人时要做好日后会恨他的准备”是不对的，而应该是“在恨一个人时要做好日后会爱他的准备”。道德意图也应当用语言表达清楚，或者指出其原因；比如，可以说：“我们爱一个人，不应当像众人挂在嘴边的那样去爱他，而是应该永远爱他，因为众人挂在嘴边的那种爱有背叛的意味。”或者可以说：“我不喜欢那句格言，因为真正的朋友若爱一个人，就会永远爱他。我也不同意‘凡事勿过度’这句格言，因为对于坏人，怎样仇恨都不过分。”

Further, maxims are of great assistance to speakers, first, because of the vulgarity [2_138] of the hearers, who are pleased if an orator, speaking generally, hits upon the opinions which they specially hold. [2_139] What I mean will be clear from the following,

and also how one should hunt for maxims. The maxim, as we have said, is a statement of the general; accordingly, the hearers are pleased to hear stated in general terms the opinion which they have already specially formed. For instance, a man who happened to have bad neighbors or children would welcome any one's statement that nothing is more troublesome than neighbors or more stupid than to beget children. Wherefore the speaker should endeavor to guess how his hearers formed their preconceived opinions and what they are, and then express himself in general terms in regard to them. This is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use of maxims, but another is greater; for it makes speeches ethical. Speeches have this character, in which the moral purpose is clear. And this is the effect of all maxims, because he who employs them in a general manner declares his moral preferences; if then the maxims are good, they show the speaker also to be a man of good character. Let this suffice for what we had to say concerning maxims, their nature, how many kinds of them there are, the way they should be used, and what their advantages are.

格言对演说者的帮助很大，这主要是由于听众的庸俗，只要演说者在论及一般情况时能够触及听众的特殊想法，就能讨好听众。这一点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搜寻格言，大家在看完下文后就会明白了。我们已经说过，格言是对一般事理的陈述；因此，听众若听到演讲者用普遍性的语言把自己对个别事理形成的想法表述出来，就会很高兴。比如，某人碰巧遭遇恶邻或孽子，他就会很高兴听到有人说“最麻烦的莫过于邻居”或者“最愚蠢的事莫过于生孩子”。因此，演说者应当努力揣摩听众原有的想法是如何形成的，这些想法又是什么，然后再用普遍性的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这是使用格言的好处之一，但是另一个好处更大，因为它让演说符合道德标准。演说是有个性的，其中有明确的道德意图。而这就是格言的作用，因为人们在用概括的方式使用格言时就表明了自己的道德偏好：如果那些格言是好的，它们就会展

现出演说者的好性格。关于格言、格言的性质、种类、用法和好处，我们就讲到这里。

Chapter 22

第二十二章

Let us now speak of enthymemes in general and the manner of looking for them, and next of their topics; for each of these things is different in kind. We have already said that the enthymeme is a kind of syllogism, what makes it so, and in what it differs from the dialectic syllogisms; for the conclusion must neither be drawn from too far back [2_140] nor should it include all the steps of the argument. In the first case its length causes obscurity, in the second, it is simply a waste of words, because it states much that is obvious. It is this that makes the ignorant more persuasive than the educated in the presence of crowds; as the poets say, “the ignorant are more skilled at speaking before a mob.“ [2_141] For the educated use commonplaces and generalities, whereas the ignorant speak of what they know and of what more nearly concerns the audience. Wherefore one must not argue from all possible opinions, but only from such as are definite and admitted, for instance, either by the judges themselves or by those of whose judgement they approve. Further,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this is the opinion of all or most of the hearers; and again, conclusions should not be drawn from necessary premises alone, but also from those which are only true as a rule.

我们现在先从整体上讲修辞式推理，再讲寻找它们的方法，然后讲它们的部目；须知这些都是不同的内容。我们已经说过，修辞式推

理是一种三段论，还讲了它为何是一种三段论以及它与辩证法三段论的区别；要知道在修辞式推理中，结论既不能从很远的步骤推导出来，也不应当包括所有的论证步骤。在第一种情形中，论证的长度会导致意思模糊；第二种情形则纯属浪费口舌，因为很多话已是不言自明。正因如此，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教养的人比有教养的人往往更有煽动性；正如诗人所说："没有教养的人更善于在大众面前讲话。"这是因为有教养的人讲的是普遍的、一般的事理，而无教养的人讲的是自己知晓的事情，是听众更关切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根据所有可能的观点来论证，而只能根据确定的、已被认可的观点来论证，比如裁决者自己认同的观点或者其所认同之人接受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显然还应该是所有或者大多数听众的观点；另外，结论不应当单单根据必然的前提得出，还应当使用那些只有作为规则才正确的前提。

First of all, then, it must be understood that, in regard to the subject of our speech or reasoning, whether it be political or of any other kind, it is necessary to be also acquainted with the elements of the question, either entirely or in part; for if you know none of these things, you will have nothing from which to draw a conclusion. I should like to know, for instance, how we are to give advice to the Athenians as to making war or not, if we do not know in what their strength consists, whether it is naval, military, or both, how great it is, their sources of revenue, their friends and enemies, and further, what wars they have already waged, with what success, and all similar things? Again, how could we praise them, if we did not know of the naval engagement at Salamis or the battle of Marathon, or what they did for the Heraclidae, and other similar things? For men always base their praise upon what really are, or are thought to be, glorious deeds. Similarly, they base their censure upon actions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se, examining whether those censured have really, or seem to have, committed them; for example, that the Athenians subjugated the Greeks, and reduced to

slavery the Aeginetans and Potidaeans who had fought with distinction on their side against the barbarians, and all such acts, and whatever other similar offences may have been committed by them. Similarly, in accusation and defence, speakers argue from an examin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It makes no difference in doing this, whether it is a question of Athenians or Lacedaemonians, of a man or a god. For, when advising Achilles, praising or censuring, accusing or defending him, we must grasp all that really belongs, or appears to belong to him, in order that we may praise or censur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if there is anything noble or disgraceful; defend or accuse, if there is anything just or unjust; advise, if there is anything expedient or harmful. And similarly in regard to any subject whatever. For instance, in regard to justice, whether it is good or not, we must consider the question in the light of what is inherent in justice or the good.

那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一点：针对我们演讲或推理的题材，无论是政治性的还是任何其他种类的，都需要了解问题的要素[3_4]，要么了解全部，要么了解部分；因为假若你对这些一无所知，你就没有任何材料来推导结论。比如，我想问问大家，假若我们不知道雅典的兵力构成（是海军或陆军？还是两者兼具？）、兵力规模、收入来源、敌友情况以及曾参与的战争和胜负等等，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向雅典人进言呢？同样，假若我们不知道萨拉米斯海战或者马拉松战役，不知道雅典人对赫拉克勒斯家族的帮助以及类似的事情，那么我们又如何能赞扬他们呢？要知道人们的称赞总是以真实的光荣事迹或者被认为是光荣的事迹为依据。同样，人们的谴责总是以与这些相反的行为为依据，调查被谴责的人是否确实或似乎曾有过这些行为；比如，雅典人奴役过希腊人，并且使曾与之并肩抵抗蛮族的埃伊纳人和波提狄亚人沦为奴隶，还有所有此类行为以及雅典人曾做过的其他类似的不义之事。同样，在控告和辩护中，演说者通过调查案情进行论证。无论是关于雅典人还是拉栖第梦人，是关于人还是

神，这么做都没有区别。比如，在劝告阿喀琉斯、称赞或谴责他、控告或为他辩护时，我们应该了解所有属于他或看似属于他的事情，这样的话，假如有任何光荣或可耻之事，我们便能以此为依据进行称赞或谴责；假如有任何正义或不正义之事，我们便能以此为依据进行控告或辩护；假如有任何有益或有害之事，我们便能以此为依据进行劝告。任何题材都是如此。比如，对于“正义是好还是坏”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根据“正义”或“好东西”的固有本质来考量。

Therefore, since it is evident that all men follow this procedure in demonstration, whether they reason strictly or loosely—since they do not derive their arguments from all things indiscriminately, but from what is inherent in each particular subject, and reason makes it clear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prove anything in any other way [2_142] —it is evidently necessary, as has been stated in the *Topics* , [2_143] to have first on each subject a selection of premises about probabilities and what is most suitable. As for those to be used in sudden emergencies, the same method of inquiry must be adopted; we must look, not at what is indefinite but at what is inherent in the subject treated of in the speech, marking off as many facts as possible, particularly those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subject; for the more facts one has, the easier it is to demonstrate, and the more closely connected they are with the subject, the more suitable are they and less common. [2_144] By common I mean, for instance, praising Achilles because he is a man, or one of the demigods, or because he went on the expedition against Troy; for this is applicable to many others as well, so that such praise is no more suited to Achilles than to Diomedes. By particular I mean what belongs to Achilles, but to no one else; for instance, to have slain Hector, the bravest of the Trojans, and Cycnus, who prevented all the Greeks from disembarking, being invulnerable; to have gone to the war when very young, and

without having taken the oath; and all such things.

因此，既然很明显所有人都按照这个步骤进行证明，无论他们的推理是严密还是松散，既然他们不是毫无区分地从所有事情中推导论点，而是考虑每种具体题材的固有特征，既然理性告诉人们，显然无法用其他方式来证明任何事情，因此，就如《部目篇》所讲，我们显然必须首先针对每个主题准备一些或然之事和最适切的命题为证据。至于应对突发问题时使用的命题，我们也应该采取同样的调查方法：不要漫无目的地搜寻，而是寻找演讲的主题本身固有的特征，尽可能多地划出来，尤其是那些与主题有密切关系的事实；须知掌握的事实越多，证明就越容易；事实与主题的关系越密切，就越适用，越不流于普通。比如，要称赞阿喀琉斯，而理由是：他是人或半神或他曾经远征特洛伊。这就是我所说的流于普通，要知道这些事迹适用于其他很多人，所以将这种称赞用于阿喀琉斯并不比用于狄俄墨得斯更恰当。我所说的特别，是指只属于阿喀琉斯的事迹；比如，曾杀死最英勇的特洛伊武士赫克托耳，还杀死了阻碍希腊人登陆的刀枪不入的库克诺斯，还有少年之时就参加了特洛伊战争，并且未曾立誓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One method of selection then, and this the first, is the topical. Let us now speak of the elements of enthymemes (by element and topic of enthymeme I mean the same thing). But let us first make some necessary remark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enthymemes, the one demonstrative, which proves that a thing is or is not, and the other refutative, the two differing like refutation and syllogism in Dialectic. The demonstrative enthymeme draws conclusions from admitted premises, the refutative draws conclusions disputed by the adversary. [2_145] We know nearly all the general heads of each of the special topics that are useful or necessary; for the propositions relating to each have been selected, so that we have in like manner

already established all the topics from which enthymemes may be derived on the subject of good or bad, fair or foul, just or unjust, characters, emotions, and habits.

选择修辞式推理的一种方法，而且是第一种方法，是部目法。现在我们就来讲讲修辞式推理的要素（我所说的修辞式推理的要素和部目是同一个东西）。但是首先要做一些必要的说明。有两种修辞式推理：一种是证明性的，为了证明某事是还是不是；另一种是反驳性的，二者的区别如同辩证法中反驳与三段论的区别。证明性的修辞式推理根据双方承认的前提推导结论，反驳性的修辞式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对方不同意的。我们已经了解了几乎所有有用的和必需的专有部目，与每个部目有关的命题都已选好，我们也已经用类似的方法明确了就以下主题建立修辞式推理所依据的部目，这些主题包括：好或坏、公正或邪恶、正义或不正义、性格、情绪以及习性。

Let us now endeavor to find topics about enthymemes in general in another way, noting in passing [2_146] those which are refutative and those which are demonstrative, and those of apparent enthymemes, which are not really enthymemes, since they are not syllogisms. After this has been made clear, we will settle the question of solutions and objections, and whence they must be derived to refute enthymemes.

现在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寻找构建修辞式推理的一般部目，顺便指出哪些是反驳性的修辞式推理，哪些是证明性的修辞式推理，哪些貌似是但不是真正的修辞式推理，因为它们不是三段论。这些讲清楚之后，我们再探讨反证和异议以及为什么必须构建反证和异议来反驳 [3_5] 修辞式推理。

Chapter 23

第二十三章

One topic of demonstrative enthymemes is derived from opposites; for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whether one opposite is predicable of the other, as a means of destroying an argument, if it is not, as a means of constructing one, if it is; [2_147] for instance, self-control is good, for lack of self-control is harmful; or as in the *Messeniacus* , [2_148] “If the war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resent evils, one must repair them with the aid of peace.” And, “For if it is unfair to be angry with those who have done wrong unintentionally, it is not fitting to feel beholden to one who is forced to do us good.“ [2_149] Or, “If men are in the habit of gaining credit for false statements, you must also admit the contrary, that men often disbelieve what is true.“ [2_150]

证明性修辞式推理的部目之一源自相互对立的命题，这是因为我们有必要考查对立命题能否推断其对立面：如果不可以，那么它就是破坏某个论点的手段；如果可以，那么它就是建立某个论点的手段。例如，自律是好的，因为缺乏自律是有害的；又如，在《墨塞尼阿克斯辞》 [3_6] 中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是战争导致了现今的灾祸，那么就应该凭借和平来予以消弭。”又如：“如果说对那些无意犯错的人动怒是不公平的，那么对那些迫不得已为我们做好事的人感恩戴德也是不合适的。”又如：“如果人们惯于用谎言来博取赞扬，那么你就必须承认其反面，即人们往往不相信真实的事情”。

Another topic is derived from similar inflections, for in like manner the derivatives must either be predicable of the subject or not; for instance, that the just is not entirely good, for in that case

good would be predicable of anything that happens justly; but to be justly put to death is not desirable.

另一个部目来自类似词语的屈折变化。与对立面部目相似，派生词语必然也是要么可以推断相关主题，要么不可以。例如，“公正”未必全是好的，因为要是那样的话，“好”就可以用来断言所有公正的事情，但是被“公正地”处决就不是什么好事。

Another topic is derived from relative terms. For if to have done rightly or justly may be predicated of one, then to have suffered similarly may be predicated of the other; there is the same relation between having ordered and having carried out, as Diomedon the tax-gatherer said about the taxes, “If selling is not disgraceful for you, neither is buying disgraceful for us.“ [2_151] And if rightly or justly can be predicated of the sufferer, it can equally be predicated of the one who inflicts suffering; if of the latter, then also of the former. However, in this there is room for a fallacy. For if a man has suffered justly, he has suffered justly, but perhaps not at your hands. Wherefore one must consider separately whether the sufferer deserves to suffer, and whether he who inflicts suffering is the right person to do so, and then make use of the argument either way; for sometimes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such a case, and nothing prevents [its being argued], as in the *Alcmaeon* of Theodectes [2_152] : “And did no one of mortals loathe thy mother?” Alcmaeon replied: “We must make a division before we examine the matter.” And when Alphesiboea asked “How?“, he rejoined, “Their decision was that she should die, but that it was not for me to kill her.” Another example may be found in the trial of Demosthenes and those who slew Nicanor. [2_153] For since it was decided that they had justly slain him, it was thought that he had been justly put to death.

Again, in the case of the man who was murdered at Thebes, when the defendants demanded that the judges should decide whether the murdered man deserved to die, since a man who deserved it could be put to death without injustice.

另一部目来自相关的说法。如果“正当地或公正地做了某事”可以推断相关说法其一，那么“正当地或公正地受到惩罚”就可以推断相关说法其二。在“下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关联，正如包税人狄俄墨冬关于赋税曾经说过的话，“如果出卖征税权对你们而言不是可耻的事情，那么我们购买征税权也不可耻。”如果“正当地或者公正地”可以用来断言受害者的行为，那么它也同样可以用来断言施罚者的行为；同理，如果它可以用来断言施罚者的行为，那么它也可以用来断言受罚者的行为。不过，这里面有悖论存在的可能。要知道，如果一个人受到了公正的惩罚，那就是说他所受之罚是公正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应该在你手中受罚。因此，我们必须分开考虑受罚者是否应该受罚和施罚者是否有权施罚，然后分别论述。要知道有时候就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见解，而且没有什么能阻止双方就其展开争论，比如塞奥德克泰斯的《阿尔克迈昂》就有这样的记述：“难道没有一个凡人憎恶你的母亲吗？”对此阿尔克迈昂回答道：“我们应该分清问题，再做讨论。”阿尔斐西玻亚问道：“怎么分清？”阿尔克迈昂回答：“他们判了她死罪，但并没有裁定由我来执行。”另一个例子是对狄摩西尼和那些杀死尼卡诺耳的人的审判。因为既然陪审团判定他们正当地杀死了尼卡诺耳，那么大家就都认为他的被杀是正当的。又如，在那个发生在底比斯的杀人案中，被告要求法官裁定被杀之人是否该死，理由是如果一个人该死，那么杀死他便没有什么不正当。

Another topic is derived from the more and less. For instance, if not even the gods know everything, hardly can men; for this amounts to saying that if a predicate, which is more probably affirmable of one thing, does not belong to it, it is clear that it does

not belong to another of which it is less probably affirmable. And to say that a man who beats his father also beats his neighbors, is an instance of the rule that, if the less exists, the more also exists. [2_154] Either of these arguments may be used, according as it is necessary to prove either that a predicate is affirmable or that it is not. Further, if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greater or less; whence it was said, “Thy father deserves to be pitied for having lost his children; is not Oeneus then equally to be pitied for having lost an illustrious offspring?“ [2_155] Other instances are: if Theseus did no wrong, [2_156] neither did Alexander (Paris); if the sons of Tyndareus did no wrong, neither did Alexander; and if Hector did no wrong in slaying Patroclus, neither did Alexander in slaying Achilles; if no other professional men are contemptible, then neither are philosophers; if generals are not despised because they are frequently defeated, [2_157] neither are the sophists; or, if it behoves a private citizen to take care of your reputation, it is your duty to take care of that of Greece.

另一个部目来自较多或较少。例如，“如果连神都不是无所不知，遑论凡人”。这句话等于说，如果一个可能更适于推断关于某事物的断言尚且不适用于该事物，那么这个断言显然更不适用于另一个不那么适合的事物了。推断殴打父亲的人也会殴打邻居，就是这一规则的一个实例，即如果可能性较小的情况存在，那么可能性较大的情况也存在。这两种论述，视其必要性，可以分别被用来证明某个断言是否成立。另外，即使不是数量多少的问题，也可以这样论证，因此，有人说：“你的父亲失去了孩子们固然值得同情，而俄纽斯失去了一个那么优秀的孩子，难道不是同样值得同情吗？”其他例子还有：如果说忒修斯没有犯错 [3_7] ，那么亚历山大·帕里斯也没有犯错；如果说廷达瑞俄斯的儿子们没有犯错，那么亚历山大也没有犯错；如果赫克托耳杀死普特洛克勒斯没有犯错，那么亚历山大杀死阿喀琉斯也没有犯错；如果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不可鄙，那么哲学家也不可鄙；

如果将军们屡打败仗却并未遭人鄙视，那么诡辩家们也不应该被鄙视；如果一个普通公民有义务爱护你的名誉，那么你也有义务爱护希腊的名誉。

Another topic is derived from the consideration of time. Thus Iphicrates, in his speech against Harmodius, says: “If, before accomplishing anything, I had demanded the statue from you in the event of my success, you would have granted it; will you then refuse it, now that I have succeeded? Do not therefore make a promise when you expect something, and break it when you have received it.“ [2_158] Again, to persuade the Thebans to allow Philip to pass through their territory into Attica, they were told that “if he had made this request before helping them against the Phocians, they would have promised; it would be absurd, therefore, if they refused to let him through now, because he had thrown away his opportunity and had trusted them.”

另一个部目源自对时间的考虑。伊菲克拉底在与哈摩狄俄斯争辩时说：“如果在我有所成就之前，我要求你在我功成之后为我树立一座塑像，你会答应；那么现在我成功了，你就应该拒绝吗？不要在期待得到某事时许诺，待你得手后却背弃承诺。”再比如，为了说服底比斯人允许腓力借道其领土进入阿提卡，就对他们说：“如果腓力在帮助他们对付佛西斯人之前提出借道，他们会答应，那么，如今因为他放弃了机会，并且信任了他们，他们便不肯借道，那该是多么荒唐。”

Another topic consists in turning upon the opponent what has been said against ourselves; and this is an excellent method. [2_159] For instance, in the *Teucer* … [2_160] and Iphicrates employed it

against Aristophon, when he asked him whether he would have betrayed the fleet for a bribe; when Aristophon said no, “Then,” retorted Iphicrates, “if you, Aristophon, would not have betrayed it, would I, Iphicrates, have done so?” But the opponent must be a man who seems the more likely to have committed a crime; otherwise, it would appear ridiculous, if anyone were to make use of such an argument in reference to such an opponent, for instance, as Aristides; [2_161] it should only be used to discredit the accuser. For in general the accuser aspires to be better than the defendant; accordingly, it must always be shown that this is not the case. And generally, it is ridiculous for a man to reproach others for what he does or would do himself, or to encourage others to do what he does not or would not do himself.

另一个部目体现在用对手攻击我们的话反攻对手。这是非常好的做法。例如，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透克罗斯》中，伊菲克拉底也曾经用此法反驳阿里斯托芬 [3_8] 。他问后者是否会为了受贿而出卖舰队，阿里斯托芬说不会；伊菲克拉底便反驳道：“那么，如果你阿里斯托芬都不会出卖舰队，我伊菲克拉底又怎么会出卖呢？”不过，在使用此法时对方必须是看起来更有可能犯下某罪的人，否则，这种做法就显得荒谬。如果有什么人用这种论证来攻击诸如亚里斯泰迪斯 [3_9] 这样正直的人，就是如此。这种方法只适合用来质疑原告。须知，一般来说，原告总是希望表现得比被告人品更好；因此，我们必须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一般来说，一个人若拿自己做的或者可能做的事情去指责别人，或者鼓励别人去做那些他自己没有做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都是很荒唐的。

Another topic is derived from definition. For instance, that the daimonion [2_162] is nothing else than a god or the work of a god; but he who thinks it to be the work of a god necessarily thinks that

gods exist. When Iphicrates desired to prove that the best man is the noblest, he declared that there was nothing noble attaching to Harmodius and Aristogiton, before they did something noble; and, “I myself am more akin to them than you; at any rate, my deeds are more akin to theirs than yours.” And as it is said in the *Alexander* [2_163] that it would be generally admitted that men of disorderly passion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enjoyment of one woman's person alone. Also, the reason why Socrates refused to visit Archelaus, declaring that it was disgraceful not to be in a position to return a favor as well as an injury. [2_164] In all these cases, it is by definition and the knowledge of what the thing is in itself that conclusions are drawn upon the subject in question.

另一个部目来自定义。例如，精灵不过是神或者神的创造物；凡是相信神的创造物的人，必然相信神的存在。当伊菲克拉底想要证明最好的人也就是最高尚的人时，他说在哈摩狄俄斯和阿里斯托格通做出高尚的事情之前，他们并无任何高尚之处。他还说：“我比你们更像他们二人，因为不管怎么说，我的行为比你们的行为更像他们。”正如波吕克拉底在宣德演说《亚历山大》 [3_10] 中说的那样，一般认为，滥情者不会满足于仅仅消受一个女人，而亚历山大只钟情海伦，这证明他不是滥情之辈。还有，苏格拉底拒绝拜访阿刻拉俄斯 [3_11] ，他说无法报答恩德犹如无法报仇雪恨，都是可耻的。在这些例子中，人们都是通过对事物的定义和其本质的了解，得出有关主题的结论。

Another topic is derived from the different significations of a word, as explained in the *Topics* , where the correct use of these terms has been discussed. [2_165]

另一个部目来自一词多义，比如《部目篇》中所讲的正确使用字词的方法。

Another, from division. For example, “There are always three motives for wrongdoing; two are excluded from consideration as impossible; as for the third, not even the accusers assert it.”

另一个部目是分类。例如，“任何犯错都只有三种动机；两个已经被认为不可能而被排除了；至于第三个，就连控告方也未曾提及。”

Another, from induction. For instance, from the case of the woman of Peparethus, it is argued that in matters of parentage women always discern the truth; similarly, at Athens, when Mantias the orator was litigating with his son, the mother declared the truth; [2_166] and again, at Thebes, when Ismenias and Stilbon were disputing about a child, Dodonis [2_167] declared that Ismenias was its father, Thettaliscus being accordingly recognized as the son of Ismenias. There is another instance in the “law” of Theodectes: “If we do not entrust our own horses to those who have neglected the horses of others, or our ships to those who have upset the ships of others; then, if this is so in all cases, we must not entrust our own safety to those who have failed to preserve the safety of others.” Similarly, in order to prove that men of talent are everywhere honored, Alcidamas said: “The Parians honored Archilochus, in spite of his evil-speaking; the Chians Homer, although he had rendered no public services; [2_168] the Mytilenaeans Sappho, although she was a woman; the Lacedaemonians, by no means a people fond of learning, elected Chilon one of their senators; the

Italiotes honored Pythagoras, and the Lampsacenes buried Anaxagoras, although he was a foreigner, and still hold him in honor… [2_169] The Athenians were happy as long as they lived under the laws of Solon, and the Lacedaemonians under those of Lycurgus; and at Thebes, as soon as those who had the conduct of affairs became philosophers, [2_170] the city flourished."

另一个部目是归纳。例如，在佩帕瑞托斯妇女一案中，演说者认为在孩子的父亲是谁的问题上，女人总能洞悉真相。同理，在雅典，当演说家曼提阿斯和自己的儿子对簿公堂时，孩子的母亲道出了真相。又如，在底比斯，当伊斯美尼俄斯与斯提尔帮为一个孩子争执不下时，多多尼斯宣称伊斯美尼俄斯是孩子的父亲，忒塔利斯科斯则被认作是伊斯美尼俄斯的儿子。又如，塞奥德克泰斯在名为《法律》的演讲中说："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马匹托付给那些疏于照顾他人马匹的人，也不把我们的舰船托付给那些使他人舰船倾覆的人，如果在所有类似情况下我们都如此行事，那么我们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安全托付给那些未能保护他人安全的人。"同理，为了证明有才能的人处处受人尊敬，阿尔西达麦说："帕洛斯岛的人敬重阿喀罗科斯，尽管他言辞恶毒；开俄斯岛的人敬重荷马，尽管他并未担任过公职；米蒂利尼人敬重萨福，尽管她是女人；拉栖第梦人虽然根本不是喜爱学问的民族，但是他们却将奇伦选为议员；意大利人敬重毕达哥拉斯；兰普萨科斯人埋葬了阿那克萨哥拉并且至今仍然尊重他，尽管他是异邦人。雅典人只要在梭伦的律法下生活，就很开心；拉栖第梦人只要在莱客格斯的律法下生活，也会很开心；而在底比斯，当执政者们成为哲人，城邦便繁荣起来。"

Another topic is that from a previous judgement in regard to the same or a similar or contrary matter, if possible when the judgement was unanimous or the same at all times; if not, when it was at least that of the majority, or of the wise, either all or most,

or of the good; or of the judges themselves or of those whose judgement they accept, or of those whose judgement it is not possible to contradict, for instance, those in authority, or of those whose judgement it is unseemly to contradict, for instance, the gods, a father, or instructors; as Autocles [2_171] said in his attack on Mixidemides, “If the awful goddesses were content to stand their trial before the Areopagus, should not Mixidemides?” Or Sappho, “Death is an evil; the gods have so decided, for otherwise they would die.” Or as Aristippus, when in his opinion Plato had expressed himself too presumptuously, said, “Our friend at any rate never spoke like that,” referring to Socrates. Hegesippus, [2_172] after having first consulted the oracle at Olympia, asked the god at Delphi whether his opinion was the same as his father's, meaning that it would be disgraceful to contradict him. Helen was a virtuous woman, wrote Isocrates, because Theseus so judged; the same applies to Alexander (Paris), whom the goddesses chose before others. Evagoras was virtuous, as Isocrates says, for at any rate Conon [2_173] in his misfortune, passing over everyone else, sought his assistance.

另一个部目来自之前所做的关于相同或者类似或者相反事物的判断，这种判断可能为所有人赞同或在所有时间都成立；如果不是，它至少是大多数人的判断，或者智者的判断（所有智者或者多数智者），或者好人的判断；又或者是裁决者本人或其认可之人的判断，又或者是那些其判断无法驳斥之人的判断，例如权威人士，或者那些其判断不宜驳斥之人的判断，例如神祇、父亲或老师；正如奥托克勒斯在攻击密克西德密德时所说：“如果可畏的女神们心甘情愿地在战神山受审，你，密克西德密德，难道就不应该如此吗？”又如萨福所说：“死亡是灾难；众神已然如此裁决，否则他们也愿意去死。”又如菲洛梅拉，他认为柏拉图说话太自负了，他说：“我们的朋友无论如何不会那样说话”，他指的是苏格拉底。再如赫革西波斯，他在奥林

匹亚求得神谕之后，问德尔斐的神祇（即太阳神阿波罗），其观点是不是和他父亲相同，意思是如果跟父亲的意见相冲突，那将是可耻的。海伦是贞洁的女人，伊索克拉底这样写道，因为忒修斯就是如此判断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亚历山大·帕里斯，因为众女神青睐他而不是别人。欧阿戈洛斯是品德高尚的人，伊索克拉底这样说道，因为不管怎么说，困境中的科农没有考虑其他任何人，唯独寻求欧阿戈洛斯的帮助。

Another topic is that from enumerating the parts, as in the *Topics* : What kind of movement is the soul? for it must be this or that. [2_174] There is an instance of this in the *Socrates* of Theodectes: “What holy place has he profaned? Which of the gods recognized by the city has he neglected to honor?”

另一个部目来自对各部分的列举，如《部目篇》中所写：灵魂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须知灵魂必然是这样或那样的运动。在塞奥德克泰斯的《苏格拉底辞》 [3_12] 中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亵渎了什么圣地？怠慢了为城邦所笃信的众神中的哪一个？”

Again, since in most human affairs the same thing is accompanied by some bad or good result, another topic consists in employing the consequence to exhort or dissuade, accuse or defend, praise or blame. For instance, education is attended by the evil of being envied, and by the good of being wise; therefore we should not be educated, for we should avoid being envied; nay rather, we should be educated, for we should be wise. This topic is identical with the “Art” of Callippus, when you have also included the topic of the possible and the others which have been mentioned.

另外，但凡人事，其结果不是好就是坏，因此有一个部目体现在运用后果来劝诫或劝阻，指控或辩护，称赞或指责。例如，受教育的坏结果是会遭人嫉妒，好结果是能使人明智；因此，可以说“我们不应该受教育，因为我们要避免遭人嫉妒”；也可以说“哦，不，我们应该受教育，因为我们应该变聪明”。这个部目加上可能部目以及前面提到的其他部目，就与卡利波斯 [3_13] 的“修辞术”相同了。

Another topic may be employed when it is necessary to exhort or dissuade in regard to two opposites, and one has to employ the method previously stated in the case of both. But there is this difference, that in the former case things of any kind whatever are opposed, in the latter opposites. For instance, a priestess refused to allow her son to speak in public; “For if,” said she, “you say what is just, men will hate you; if you say what is unjust, the gods will.” On the other hand, “you should speak in public; for if you say what is just, the gods will love you, if you say what is unjust, men will.” This is the same as the proverb, “To buy the swamp with the salt”; [2_175] and retorting a dilemma on its proposer takes place when, two things being opposite, good and evil follow on each, the good and evil being opposite like the things themselves.

当人们必须针对两个对立的事物进行劝诫或劝阻时，可以动用另一个部目，并且必须用前述方法从两方面进行论证。不过这两种情况存在差异：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对立面部目，是任何两件事情相对立；在后一种情况下，即对立部目，是两件对立的事情相对立。例如，女祭司拒绝让儿子在公共场合演讲，“因为，”她说，“如果你说正义的话，世人会憎恨你；如果你说不义的话，神祇会憎恶你。”另一方面，她也可以对儿子说：“你应该在公共场合演讲；因为如果你说正义的话，神祇会喜欢你；如果你说不义的话，世人会喜欢你。”这就如同谚语所说：“把盐和盐沼地 [3_14] 一起买下来”；两事物互相对

立，结果都有好有坏，好处和坏处如同这两件事物一样互相对立，这样就反击了提出两难悖论的人。

Again, since men do not praise the same things in public and in secret, but in public chiefly praise what is just and beautiful, and in secret rather wish for what is expedient, another topic consists in endeavoring to infer its opposite from one or other of these statements. [2_176] This topic is the most weighty of those that deal with paradox.

再者，既然人们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赞美的不是相同的东西，而是在公共场合主要赞美正义和美好的东西，在私下里却希望获得有利的东西，那么还有一个部目便体现在从以上陈述的任何一个方面推断出其对立面。在用来对付自相矛盾的说法的部目中，这一个最有分量。

Another topic is derived from analogy in things. For instance, Iphicrates, when they tried to force his son to perform public services because he was tall, although under the legal age, said: “If you consider tall boys men, you must vote that short men are boys.” Similarly, Theodectes in his “law,“ [2_177] says: “Since you bestow the rights of citizenship upon mercenaries such as Strabax and Charidemus on account of their merits, will you not banish those of them who have wrought such irreparable misfortunes?”

另一个部目来自事物中的类比。例如，虽然伊菲克拉底的儿子没有达到法定年龄，但是因为长得高，被迫去担任公职。伊菲克拉底说：“如果你们觉得高个子男孩是成人，那么，你们也应该投票表决

把矮个子的成人当作小孩。”同理，塞奥德克泰斯在他名为《法律》的演讲中说：“既然你们考虑到斯特拉巴克和卡里得摩斯等雇佣兵的种种优点，而给他们公民权，难道你们就不应该驱逐那些造成致命灾难的雇佣兵吗？”

Another topic consists in concluding the identity of antecedents from the identity of results. [2_178] Thus Xenophanes said: “There is as much impiety in asserting that the gods are born as in saying that they die; for either way the result is that at some time or other they did not exist.” And, generally speaking, one may always regard as identical the results produced by one or other of any two things: “You are about to decide, not about Isocrates alone, but about education generally, whether it is right to study philosophy.“ [2_179] And, “to give earth and water is slavery,” and “to be included in the common peace [2_180] implies obeying orders.” Of two alternatives, you should take that which is useful.

另一个部目体现在从结果的相似性来推断前因的相似性。因此，色诺芬尼说：“断言神祇出生和断言其死亡一样，都是大不敬的言论；因为无论是哪种说法，结论都是在某个时期神并不存在。”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可以把任何两件事情产生的结果看作完全相同：“你即将作出的判断不仅仅关乎伊索克拉底，而且关乎教育的总体：学哲学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又比如：“割让河山就是臣服”以及“缔结和平同盟就意味着服从命令”。在两个选项之中，你应该选择对你有用的那一个。

Another topic is derived from the fact that the same men do not always choose the same thing before and after, but the contrary. The following enthymeme is an example: “If, when in exile, we

fought to return to our country, [it would be monstrous] if, now that we have returned, we were to return to exile to avoid fighting!“ [2_181] This amounts to saying that at one time they preferred to hold their ground at the price of fighting; at another, not to fight at the price of not remaining. [2_182]

另一个部目来自这样的事实，即同一个人在事前和事后并不总是做作出同样的选择，而是往往相反。下面这个修辞式推理就是一个例证：“如果说，在流亡时我们为了回到祖国而战斗，那么现在我们回来了，如果还要重归流亡以避免战争，那将多么荒谬！”这相当于说，在某个时候人们愿意以战争为代价来保卫国土，但在另一个时候却以放弃国土为代价而避免战斗。

Another topic consists in maintaining that the cause of something which is or has been is something which would generally, or possibly might, be the cause of it; for example, if one were to make a present of something to another, in order to cause him pain by depriving him of it. Whence it has been said: “It is not from benevolence that the deity bestows great blessings upon many, but in order that they may suffer more striking calamities.“ [2_183] And these verses from the *Meleager* of Antiphon: “Not in order to slay the monster, but that they may be witnesses to Greece of the valor of Meleager.“ [2_184] And the following remark from the *Ajax* of Theodectes, that Diomedes chose Odysseus before all others, [2_185] not to do him honor, but that his companion might be his inferior; for this may have been the reason.

另一个部目体现在把通常或可能导致某事物的原因当作该事物实际存在或曾经存在的原因。例如，有人要送一件礼物给他人，就说他

送礼的目的是通过剥夺这份礼物来给那人带来痛苦。因此，有人说："神祇并不是出于慈悲而给予众生祝福，而是为了让他们遭受更大的灾难。"安提丰的《墨勒阿革罗斯》中有这样一句诗："并不是为了杀掉怪兽，而是为了用他们向希腊人证明墨勒阿革罗斯的勇武。"在塞奥德克泰斯的悲剧《埃阿斯》中也有这样的言论：狄俄墨得斯选择奥德修斯而不是其他人，并不是为了给奥德修斯荣誉，而是想找一个不如自己的随从；须知这可能才是他的动机。

Another topic common to forensic and deliberative rhetoric consists in examining what is hortatory and dissuasive, and the reasons which make men act or not. Now, these are the reasons which, if they exist, determine us to act, if not, not; for instance, if a thing is possible, easy, or useful to ourselves or our friends, or injurious and prejudicial to our enemies, or if the penalty is less than the profit. From these grounds we exhort, and dissuade from their contraries. It is on the same grounds that we accuse and defend; for what dissuades serves for defence, [2_186] what persuades, for accusation. This topic comprises the whole "Art" of Pamphilus and Callippus.

另一个部目常见于诉讼和议政演说，体现在考察那些劝告性的和劝阻性 [3_15] 的论据以及促使或者阻止人们采取行动的原因上。以下这些原因，如果存在，就会促使我们采取行动；如果不存在，就不会。例如，如果某事是可能的、容易的，或者对我们或朋友有好处，或者对敌人有伤害、有坏处，或者其惩罚小于所得，就会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我们依据这些原因进行劝说，依据其反面进行劝阻。我们也利用相同的依据来指控和辩护，须知能用于劝阻的事情可用来辩护，能用来劝说的事情可以用作指控。这个部目包括了潘菲洛斯和卡利波斯所说的全部"修辞术"。

Another topic is derived from things which are thought to happen but are incredible, because it would never have been thought so, if they had not happened or almost happened. And further, these things are even more likely to be true; for we only believe in that which is, or that which is probable: if then a thing is incredible and not probable, it will be true; for it is not because it is probable and credible that we think it true. [2_187] Thus, Androcles [2_188] of Pitthus, speaking against the law, being shouted at when he said “the laws need a law to correct them,” went on, “and fishes need salt, although it is neither probable nor credible that they should, being brought up in brine; similarly, pressed olives need oil, although it is incredible that what produces oil should itself need oil.”

另一个部目来自被认为已经发生但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如果它们没有发生或者几乎要发生，人们便不会这么认为。再者，这样的事情更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只相信那些存在或可能的事情；那么，如果一件事情是不可思议而且不可能的，它就更应该是真实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因为它是可能的和可信的才相信它的真实性。皮特苏斯的安德罗克勒斯曾经当众批判法律，当他说到“法律需要法律来修正”时，遭到一片嘘声，而他接着讲道：“腌制鱼需要盐，尽管在咸水中长大的它们仍需要盐是不可能也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样，食用压榨过的橄榄渣需要加油，尽管本身含油的东西仍然需要油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Another topic, appropriate to refutation, consists in examining contradictories, whether in dates, actions, or words, first, separately in the case of the adversary, for instance, “he says that he loves you, and yet he conspired with the Thirty;” next, separately in your own case, “he says that I am litigious, but he cannot prove that I have

ever brought an action against anyone”; lastly, separately in the case of your adversary and yourself together: “he has never yet lent anything, but I have ransomed many of you.”

另一个部目适合反驳，体现在考察各方面的矛盾上，包括日期、行为或言语上的矛盾。首先，单独考虑对手的情况，例如，“他说他爱你们，却与三十暴君合谋”；其次，单独考虑你自己的情况，“他说我爱打官司，但却无法证明我曾经跟任何人打过官司”；最后，分别考虑对手和你自己的情况，“他从来没有借给你们任何东西，而我却花赎金救了你们很多人。”

Another topic, when men or things have been attacked by slander, in reality or in appearance, [2_189] consists in stating the reason for the false opinion; for there must be a reason for the supposition of guilt. For example, a woman embraced her son in a manner that suggested she had illicit relations with him, but when the reason was explained, the slander was quashed. Again, in the *Ajax* of Theodectes, Odysseus explains to Ajax why, although really more courageous than Ajax, he is not considered to be so.

另一个部目适宜在某人或某事被诽谤或者看似被诽谤时使用，它体现在陈述导致错误看法的缘由上，因为推测一项罪名必定有其原因。例如，有个女人拥抱儿子，拥抱的方式让人以为他们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但是当原因解释清楚之后，流言也就平息了。还有，在塞奥德克泰斯的《埃阿斯》中，奥德修斯向埃阿斯解释为什么别人认为他没有埃阿斯勇敢，尽管他确实如此。

Another topic is derived from the cause. If the cause exists, the

effect exists; if the cause does not exist, the effect does not exist; for the effect exists with the cause, and without cause there is nothing. For example, Leodamas, when defending himself against the accusation of Thrasybulus that his name had been posted in the Acropolis [2_190] but that he had erased it in the time of the Thirty, declared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Thirty would have had more confidence in him if his hatred against the people had been graven on the stone.

另一个部目来自原因。有因就有果，无因便无果；须知因果同在，没有原因，一切都不存在。例如，色拉西布洛斯指控勒俄达马斯[3_16]，说他的名字曾经被刻在卫城上，只是他在三十暴君掌权的时候把它擦去了。面对这一指责，勒俄达马斯为自己辩护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他对平民的仇恨被刻在石头上的话，三十暴君会更信任他，他也就没有必要擦掉了。

Another topic consists in examining whether there was or is another better course than that which is advised, or is being, or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it is evident that, if this has not been done, [2_191] a person has not committed a certain action; because no one, purposely or knowingly, chooses what is bad. However, this argument may be false; for often it is not until later that it becomes clear what was the better course, which previously was uncertain.

另一个部目体现在考察是否曾经有过或存在一种方案胜过正在审议的、正被执行的或者已经被执行的方案。很显然，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做（即采取那种更好的方案），那么他也就没有做那件事；因为没有人会故意或者知情地选择坏的方案。不过，这个论证可能是错的；因为往往直到后来什么是更好的方案才会明确起来，而之前并不

确定。

Another topic, when something contrary to what has already been done is on the point of being done, consists in examining them together. For instance, when the people of Elea asked Xenophanes if they ought to sacrifice and sing dirges to Leucothea, [2_192] or not, he advised them that, if they believed her to be a goddess they ought not to sing dirges, but if they believed her to be a mortal, they ought not to sacrifice to her.

另一个部目，适宜在已做之事相反的事情即将发生时使用，它体现在综合考虑这两件事上。例如，当爱利亚人问色诺芬尼，他们是否应该为琉科忒亚献祭并唱挽歌，色诺芬尼劝告他们：如果他们觉得她是神，那就不应该唱挽歌；如果他们觉得她是凡人，那就不应该向她献上祭品。

Another topic consists in making use of errors committed, for purposes of accusation or defence. For instance, in the *Medea* of Carcinus, [2_193] some accuse Medea of having killed her children, — at any rate, they had disappeared; for she had made the mistake of sending them out of the way. Medea herself pleads that she would have slain, not her children, but her husband Jason; for it would have been a mistake on her part not to have done this, if she had done the other. This topic and kind of enthymeme is the subject of the whole of the first “Art” of Theodorus. [2_194]

另一个部目体现在用已犯的错误来指责或辩护上。例如，在卡耳喀诺斯写的《美狄亚》中，有人指控美狄亚，说她杀死了自己的孩

子，不管怎么说，她的孩子们不见了，要知道她曾经犯过将孩子们送走的错误。美狄亚自己辩解说，即使她要杀人，她想杀掉的也不是孩子，而是她丈夫伊阿宋；因为如果不杀死丈夫，却杀死孩子，那么对她而言会是个错误。这个部目和这种修辞式推理构成了忒俄多洛斯最初“修辞术”的全部内容。

Another topic is derived from the meaning of a name. For instance, Sophocles says, “Certainly thou art iron, like thy name.“ [2_195] This topic is also commonly employed in praising the gods. Conon used to call Thrasybulus “the man bold in counsel,” and Herodicus said of Thrasymachus, “Thou art ever bold in fight,” and of Polus, “Thou art ever Polus (colt) by name and colt by nature,“ [2_196] and of Draco the legislator that his laws were not those of a man, but of a dragon, so severe were they. Hecuba in Euripides [2_197] speaks thus of Aphro-dite: “And rightly does the name of the goddess begin like the word aphro-syne (folly);” and Chaeremon [2_198] of Pentheus, “Pentheus named after his unhappy future.”

另一个部目来自名字的意思。例如，索福克勒斯说：“你真是块铁，跟你的名字一个样。”这个部目也经常被用来赞颂众神。科农常常称色拉西布洛斯为“勇于直谏的人”，赫洛狄科斯则说塞拉西马柯“你总是这么勇于战斗”；说波罗斯“你名叫波罗斯（小马），性格也总是如此”；他还说立法者德拉古 [3_17] 的法律不是人的法律，而是蛇的法律，因为它们如此严酷。因此，在欧里庇得斯的剧作中，赫卡柏曾这样说阿佛洛狄特：“这位女神的名字起首的几个字母与傻瓜相同，真是太对了。”开瑞蒙则这样说彭透斯 [3_18] ：“彭透斯因他那悲伤的未来而得名。”

Enthymemes that serve to refute are more popular than those

that serve to demonstrate, because the former is a conclusion of opposites [2_199] in a small compass, and things in juxtaposition are always clearer to the audience. But of all syllogisms, whether refutative or demonstrative, those are specially applauded, the result of which the hearers foresee as soon as they are begun, and not because they are superficial (for as they listen they congratulate themselves on anticipating the conclusion); and also those which the hearers are only so little behind that they understand what they mean as soon as they are delivered.

用于反驳的修辞式推理比用于证明的修辞式推理更受欢迎，因为前者是简短地从对立之事得出结论，而并置的对立之事对观众而言总是更加清晰。不过，在所有三段论当中，无论是反驳性的还是证明性的，特别受欢迎的总是那些能够在推论一开始就让观众预知结论且又不流于肤浅的三段论（因为观众在听的过程中会因为自己能够预知结论而窃喜）；特别受欢迎的还有那些观众能够紧随其后、话一说完马上就能理解的三段论。

Chapter 24

第二十四章

But as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 syllogisms may be real, and others not real but only apparent, there must also be real and apparent enthymemes, since the enthymeme is a kind of syllogism.

既然三段论中，有的是真实的，有的不是真实的而只是貌似真实的，那么，修辞式推理也必然有真实的和貌似真实的，因为修辞式推理就是一种三段论。

Now, of the topics of apparent enthymemes one is that of diction, which is of two kinds. The first, as in *Dialectic* , consists in ending with a conclusion syllogistically expressed,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no syllogistic process, “therefore it is neither this nor that,” “so it must be this or that”; and similarly in rhetorical arguments a concise and antithetical statement is supposed to be an enthymeme; for such a style appears to contain a real enthymeme. This fallacy appears to be the result of the form of expression. For the purpose of using the diction to create an impression of syllogistic reasoning it is useful to state the heads of several syllogisms: “He saved some, avenged others, and freed the Greeks”; [2_200] for each of these propositions has been proved by others, but their union appears to furnish a fresh conclusion.

貌似修辞式推理的部目之一是措辞部目，包括两类。第一类，如《辩证法》中所说，体现在用三段论形式的结论来收尾，尽管并没有三段论形式的论证过程。例如“因此，它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以及“因此，它必然是这样或那样。”与此相似，在修辞论证中，简洁扼要且对仗工整的陈述也往往被认为是修辞式推理，因为这种风格似乎包含了真正的修辞式推理。这种悖论似乎源自措辞的形式。为了通过措辞来制造三段论论证的印象，把分别来自几个三段论的要素拼凑到一起，是很有用的。例如，“他拯救了一些人，报复了一些人，解放了希腊人”；这些命题已经分别被其他命题证明过，而它们结合在一起似乎能产生新的结论。

The second kind of fallacy of diction is homonymy. [2_201] For instance, if one were to say that the mouse is an important animal, since from it is derived the most honored of all religious festivals, namely, the mysteries; [2_202] or if, in praising the dog, one were to

include the dog in heaven (Sirius), or Pan, because Pindar said, [2_203] “O blessed one, whom the Olympians call dog of the Great Mother, taking every form,” or were to say that the dog is an honorable animal, since to be without a dog is most dishonorable. And to say that Hermes is the most sociable of the gods, because he alone is called common; [2_204] and that words are most excellent, since good men are considered worthy, not of riches but of consideration; forλόγου ἄξιος has a double meaning. [2_205]

措辞方面的第二种悖论是一词多义。例如，有人说老鼠是了不起的动物，因为所有宗教仪式中最尊贵的秘密教仪（mystery）是从老鼠一词（希腊语词根mus，表示“闭着嘴”）衍生而来；又如在赞扬狗的时候，把天上的狗（天狼星）甚至潘包括进来，因为抒情诗人品达说过：“哦，蒙恩的神啊，奥林匹亚山的诸神称你为伟大母亲 [3_19] 的狗，你可以幻化为任何模样”；又比如，说狗是高贵的动物，因为没有狗看家是非常羞耻的。还比如，将赫尔墨斯 [3_20] 说成是众神之中最爱社交的，因为只有他被称作“common”；又比如，把话语说成是最美好的东西，因为好人被视为可敬，不是因为钱财，而是因为consideration（对应的希腊语单词是λόγου），要知道λόγου ἄξιος（即“值得λόγου”）一词具有双重意思 [3_21] 。

Another fallacy consists in combining what is divided or dividing what is combined. For since a thing which is not the same as another often appears to be the same, one may adopt the more convenient alternative. Such was the argument of Euthydemus, to prove, for example, that a man knows that there is a trireme in the Piraeus, because he knows the existence of two things, the Piraeus and the trireme; [2_206] or that, when one knows the letters, one also knows the word made of them, for word and letters are the same thing. Further, since twice so much is unwholesome, one may argue

that neither is the original amount wholesome; for it would be absurd that two halves separately should be good, but bad combined. In this way the argument may be used for refutation, in another way for demonstration, if one were to say, one good thing cannot make two bad things. But the whole topic is fallacious. Again, one may quote what Polycrates said of Thrasybulus, that he deposed thirty tyrants, [2_207] for here he combines them; or the example of the fallacy of division in the *Orestes* of Theodectes [2_208] : “It is just that a woman who has killed her husband” should be put to death, and that the son should avenge the father; and this in fact is what has been done. But if they are combined, perhaps the act ceases to be just. The same might also be classed as an example of the fallacy of omission; for the name of the one who should put the woman to death is not mentioned.

另一类悖论在于将原本分散的陈述并到一起，或者将原本合在一起的陈述割裂开来。这是因为既然两件并不相同的事情往往看似相同，那么人们便可能采取简便的做法。比如，智者欧梯得摩斯的论点便是如此，他要证明的是一个人知道在比雷埃夫斯 [3_22] 有三层桨的战船，理由是这人知道二者——比雷埃夫斯和那艘三层桨的战船——的存在。又如，一个人认识字母，我们就说他也认识由字母组成的单词，理由是单词和字母是一回事。又比如，既然两倍于原来的数量是不健康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原来一份的数量也是不健康的，理由是如果两份中的每一份分开来都是好的，而结合到一起就变坏，这是说不通的。这种方式的论证可以用于反驳，另一种方式的论证可以用于证明。比如若有人说一件好事情不可能造成两件坏事情（就可以用上述论证证明）。但这整个部目是个悖论。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引用智者波吕克拉底的话，他说色拉西布洛斯废黜了三十个暴君 [3_23] ，他这是把他们加起来计算；又如塞奥德克泰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 [3_24] 中由割裂事实而产生悖论的例子：“这是公正的：杀死了丈夫的妇人”应该被处死，儿子应该为父亲报仇；俄瑞斯忒斯正是做了这两件

事情。但是如果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或许这个行为就不再正义了。这个例子也可被视为省略悖论的例子，因为应该由谁来处死那个妇人并没有被提到。

Another topic is that of constructing or destroying by exaggeration, which takes place when the speaker, without having proved that any crime has actually been committed, exaggerates the supposed fact; for it makes it appear either that the accused is not guilty, when he himself exaggerates it, or that he is guilty, when it is the accuser who is in a rage. Therefore there is no enthymeme; for the hearer falsely concludes that the accused is guilty or not, although neither has been proved.

另一个部目是通过夸张来构建或破坏论证，即演说者在没有证明有罪行被实施的情况下，夸大臆想的事实；这样，如果是被告自己夸大，被告就会显得无罪；如果是原告义愤填膺地渲染事实，被告就会显得有罪。因此，这里并不存在修辞式推理，因为这种做法使听话人错误地得出被告有罪或者无罪的结论，尽管这两点没有一个得到证明。

Another fallacy is that of the sign, for this argument also is illogical. For instance, if one were to say that those who love one another are useful to States, since the love of Harmodius and Aristogiton overthrew the tyrant Hipparchus; or that Dionysius is a thief, because he is a rascal; for here again the argument is inconclusive; not every rascal is a thief although every thief is a rascal.

另外一个悖论是或然式证据的悖论，因为这种论证也是不符合逻辑的。例如，有人说相爱的人对城邦有利，理由是哈摩狄俄斯 [3_25] 和阿里斯托格通的爱情推翻了暴君希帕科斯，这便是一个证据的悖论；又如，有人说狄奥尼西奥斯是个窃贼，理由是他是个无赖，这里的论证依然没有说服力，因为并不是每个无赖都是窃贼，尽管每个窃贼都是无赖。

Another fallacy is derived from accident; for instance, when Polycrates says of the mice, that, they rendered great service by gnawing the bowstrings. [2_209] Or if one were to say that nothing is more honorable than to be invited to a dinner, for because he was not invited Achilles was angry with the Achaeans at Tenedos; whereas he was really angry because he had been treated with disrespect, but this was an accident due to his not having been invited. [2_210]

还有一种悖论来自偶然事件；例如波吕克拉底提到老鼠时说老鼠咬断弓弦可是帮了大忙 [3_26] 。又比如，有人说被邀赴宴是无上的荣耀，理由是当初阿喀琉斯就是因为没被邀请而对忒涅多斯的希腊人动怒。但是，阿喀琉斯生气的真正原因，是他被阿伽门农轻视，而这只是他没有被邀请导致的偶然事件。

Another fallacy is that of the Consequence. [2_211] For instance, in the *Alexander (Paris)* it is said that Paris was high-minded, because he despised the companionship of the common herd and dwelt on Ida by himself; for because the high-minded are of this character, Paris also might be thought high-minded. Or, since a man pays attention to dress and roams about at night, he is a libertine, because libertines are of this character. Similarly, the poor sing and

dance in the temples, exiles can live where they please; and since these things belong to those who are apparently happy, those to whom they belong may also be thought happy. But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conditions; [2_212] wherefore this topic also falls under the head of omission.

另一类悖论是后果悖论 [3_27] 。例如，在演讲辞《亚历山大·帕里斯》中，帕里斯被说成生性高傲，因为他不屑于同普通人为伍，独自住在艾达；须知高傲者就是这样一种性格，所以帕里斯可以被视为高傲。又如，因为某人讲究穿着，喜欢夜晚四处游荡，就说这个人行为放荡，理由是放荡的人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同理，穷人在神庙里载歌载舞，流亡者随遇而安；既然这些事情都属于那些显然幸福的人，那么它们的拥有者也可以被视作幸福的人。但是，这些事情背后的情况不同；因此，这个部目也属于省略部目。

Another fallacy consists of taking what is not the cause for the cause, as when a thing has happened at the same time as, or after, another; for it is believed that what happens after is produced by the other, especially by politicians. Thus, Demades declared that the policy of Demosthenes was the cause of all the evils that happened, since it was followed by the war.

另一种悖论在于把不是原因的事情当作原因。比如，当某事与另一件事情同时或者在其后发生，前者就被当作后者的原因。政客们尤其喜欢相信发生在后面的事情是由发生在前面的事情引起的。因此，德马德斯宣称，狄摩西尼的政策是一切灾祸的根源，因为在政策施行之后发生了战争。

Another fallacy is the omission of when and how. For instance, Alexander (Paris) had a right to carry off Helen, for the choice of a husband had been given her by her father. But (this was a fallacy), for it was not, as might be thought, for all time, but only for the first time; for the father's authority only lasts till then. Or, if one should say that it is wanton outrage to beat a free man; for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but only when the assailant gives the first blow.

另外一种悖论是省略时间和方式。例如，有人说亚历山大·帕里斯有权带走海伦，理由是海伦的父亲给了她选择丈夫的权利。但这是个悖论，因为这种权利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任何时间，而是仅限于第一次婚约，因为父亲的权力到那时就结束了。又比如，有人说殴打自由人是恣意施暴；这种说法并不总是正确，只有在行凶者先出手打人的情况下才是如此。

Further, as in sophistical disputations, an apparent syllogism arises as the result of considering a thing first absolutely, and then not absolutely, but only in a particular case. For instance, in *Dialectic* , it is argued that that which is not is, for that which is not is that which is not; [2_213] also, that the unknown can be known, for it can be known of the unknown that it is unknown. Similarly, in *Rhetoric* , an apparent enthymeme may arise from that which is not absolutely probable but only in particular cases. But this is not to be understood absolutely, as Agathon says: “One might perhaps say that this very thing is probable, that many things happen to men that are not probable;” for that which is contrary to probability nevertheless does happen, so that that which is contrary to probability is probable. If this is so, that which is improbable will be probable. But not absolutely; but as, in the case of sophistical

disputations, the argument becomes fallacious when the circumstances, reference, and manner are not added, so here it will become so owing to the probability being not probable absolutely but only in particular cases. The “Art” of Corax is composed of this topic. For if a man is not likely to be guilty of what he is accused of, for instance if, being weak, he is accused of assault and battery, his defence will be that the crime is not probable; but if he is likely to be guilty, for instance, if he is strong, it may be argued again that the crime is not probable, for the very reason that it was bound to appear so. It is the same in all other cases; for a man must either be likely to have committed a crime or not. Here, both the alternatives appear equally probable, but the one is really so, the other not probable absolutely, but only in the conditions mentioned. And this is what “making the worse appear the better argument” means. Wherefore men were justly disgusted with the promise of Protagoras; [2_214] for it is a lie, not a real but an apparent probability, not found in any art except Rhetoric and Sophistic. So much for real or apparent enthymemes.

再者，在诡辩术中，先把事情说成绝对的，再说成非绝对的，只能算一个特例，由此便产生了一个貌似的三段论。例如，在《辩证法》中，我们说过，那些不存在的事物是存在的，因为那些不存在的事物存在于不存在；还有，未知的事物可以被认识，因为我们已知未知事物是未知的。同理，在《修辞学》中，貌似的修辞式推理可以来自并非绝对可能、而是仅限于特定情形的事物。但是这一点也不能像阿伽松说的那样绝对化：“有人可能会说这件事情是可能的，因为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发生在人们身上”；须知那些与可能性相反的事情确实在发生，所以与可能性相反的事情是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被视为不可能的事情也是可能的。但是并非绝对如此；因为，正如在诡辩中，如果没有加上条件、参照以及方式，论证就会变得像错谬一样，在这里它也会因为可能性并非绝对、而只是在特例下才有可

能而变得错谬。科拉克斯 [3_28] 的“修辞术”便是由这个部目构成的。如果一个人不大可能犯下被指控的罪行，例如，一个身体虚弱的人被指控袭击和殴打别人，他就可以为自己辩护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就算他有可能犯罪，比如，他身体健壮，他仍然可以说这个罪行是不可能的，因为由于身体健壮，他显然会被认为有可能犯下此罪，所以他不会这么做。在其他情况下也是如此；须知人要么有可能犯过罪，要么没有可能。在这里，两种情况看似同样可能，但一个是绝对可能，另一个则不是绝对可能，而只是在上述条件下才有可能。这就是“让无理的论点看似有理”的意思。正因为如此，人们有理由对智者普罗泰哥拉的承诺感到反感；因为那是一个谎言，不具真实的可能性，只有貌似的可能性，在修辞术和诡辩术之外的其他任何技艺中都无法找到。关于真实的和貌似的修辞式推理，我们就讲到这里。

Chapter 25

第二十五章

Next to what has been said we must speak of refutation. An argument may be refuted either by a counter-syllogism [2_215] or by bringing an objection. It is clear that the same topics may furnish counter-syllogisms; for syllogisms are derived from probable materials and many probabilities are contrary to one another. An objection is brought, as shown in the *Topics* , in four ways: it may be derived either from itself, [2_216] or from what is similar, or from what is contrary, or from what has been decided. In the first case, if for instance the enthymeme was intended to prove that love is good, two objections might be made; either the general statement that all want [2_217] is bad, or in particular, that Caunian love [2_218] would not have become proverbial, unless some forms of love had been bad. An objection from what is contrary is brought if, for instance, the enthymeme is that the good man does good to all his

friends; it may be objected: But the bad man does not do harm (to all his friends). [2_219] An objection from what is similar is brought, if the enthymeme is that those who have been injured always hate, by arguing that those who have been benefited do not always love. The fourth kind of objection is derived from the former decisions of well-known men. For instance, if the enthymeme is that one should make allowance for those who are drunk, for their offence is the result of ignorance, it may be objected that Pittacus then is unworthy of commendation, otherwise he would not have laid down severer punishment for a man who commits an offence when drunk.

接下来我们讲讲反驳。针对一个论证，我们既可以通过相反的三段论来反驳，也可以通过提出异议来反驳。显然，相同的部目可以构成相反的三段论，因为三段论来自或然的素材，而很多或然性之间会彼此抵触。如《部目篇》中所讲，异议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提出，即可以从自身、类似的事情、相反的事情或者从已经认定的事实中提出。第一，从自身提出异议。例如，如果有人使用修辞式推理来证明“爱情是好的”，我们可以提出两种异议：既可以做一般的论述，说所有欲望都是坏的 [3_29] ；亦可以做具体的论述，说如果不是因为有些爱情是不好的，考尼俄斯式的爱情 [3_30] 就不会成为话柄。第二，从相反的事情中提出异议。例如，如果某个修辞式推理说“好人为所有朋友做好事”，我们可以这样提出异议：但是坏人并不是对所有朋友都干坏事。第三，从类似的事情提出异议。例如，如果某个修辞式推理是“受伤害者永远心怀仇恨”，我们可以这样反驳：受益者并不都是满怀爱意。第四种方式是从名人所做的裁决提出异议。例如，如果某个修辞式推理是“应该包容醉酒之人，因为他们犯罪是出于无知”，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异议：那样的话，庇塔科斯就不值得称赞了；如果值得称赞的话，他就不应该制定严惩醉酒肇事者的法律。

Now the material of enthymemes is derived from four sources —probabilities, examples, necessary signs, and signs. Conclusions are drawn from probabilities, when based upon things which most commonly occur or seem to occur; from examples, when they are the result of induction from one or more similar cases, and when one assumes the general and then concludes the particular by an example; from necessary signs, when based upon that which is necessary and ever [2_220] exists; from signs, when their material is the general or the particular, whether true or not. Now, the probable being not what occurs invariably but only for the most part, it is evident that enthymemes of this character can always be refuted by bringing an objection. But the objection is often only apparent, not real; for he who brings the objection endeavors to show, not that the argument is not probable, but that it is not necessary. Wherefore, by the employment of this fallacy, the defendant always has an advantage over the accuser. For since the latter always bases his proof upon probabilities, and it is not the same thing to show that an argument is not probable as to show that it is not necessary, and that which is only true for the most part is always liable to objection (otherwise it would not be probable, but constant and necessary),then the judge thinks, if the refutation is made in this manner, [2_221] either that the argument is not probable, or that it is not for him to decide, [2_222] being deceived by the fallacy, as we have just indicated. For his judgement must not rest upon necessary arguments alone, but also upon probabilities; for this is what is meant by deciding according to the best of one's judgement. It is therefore not enough to refute an argument by showing that it is not necessary; it must also be shown that it is not probable. This will be attained if the objection itself is specially based upon what happens generally. This may take place in two ways, from consideration either of the time or of the facts. [2_223] The strongest objections are those in which both are combined; for

a thing is more probable, 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similar cases.

修辞式推理的素材有四个来源，即或然之事、例子、必然的证据和或然的证据。我们可以从或然性中得出结论，如果依据是最常发生或者似乎最常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从例子中得出结论，如果这些例子是从一个或多个类似案例归纳得来；或者如果我们先假定一般，再从一个例子推出个别。我们还可以从必然的证据中得出结论，如果建立在必然而且一直存在的事情之上。我们亦可以从或然的证据得出结论，无论其素材是一般还是特殊，是真实还是不真实。既然或然之事并不总是发生，只是多数情况下发生，那么很显然，此类修辞式推理总是可以通过提出异议的方式来予以驳斥。但是异议经常只是貌似为真，而不是确实为真，因为提出异议的人力图证明的不是某个论点不具或然性，而是它不具必然性。因此，凭借这类悖论，被告总比原告占优势。既然后者总是将其证明建立在或然性之上，既然证明某论点不具或然性和不具必然性不是一回事，而且那些只在多数情况下为真的事情总是容易被人提出异议（否则它就不是或然的，而是恒久必然的），那么，如果以上述方式进行反驳，裁决者因被悖论所蒙蔽，正如我们刚刚说过的那样，就会要么认为原告的论证不是或然的，要么认为这件事情不应该由他判决。如果不想被蒙蔽，他的判决不应该仅仅依靠必然的论点，而且要考虑各种或然之事，这才是“竭尽自己的理解能力来判案”的意思。因此，仅仅通过证明不是必然如此来反驳一个论点是不够的，还必须证明该论点也不是或然的。如果异议本身是建立在普遍发生的事情之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一点。提出建立在普遍发生的事情之上的异议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考虑时间和事实。将二者相结合的异议最有分量，因为类似的事情越多，一件事就越有可能。

Signs and enthymemes based upon signs, even if true, may be refuted in the manner previously stated; [2_224] for it is clear from the *Analytics* [2_225] that no sign can furnish a logical conclusion. As

for enthymemes derived from examples, they may be refut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probabilities. For if we have a single fact that contradicts the opponent's example, the argument is refuted as not being necessary, even though examples, more in number and of more common occurrence, are otherwise; [2_226] but if the majority and greater frequency of examples is on the side of the opponent, we must contend either that the present example is not similar to those cited by him, or that the thing did not take place in the same way, or that there is some difference. But necessary signs and the enthymemes derived from them cannot be refuted on the ground of not furnishing a logical conclusion, as is clear from the *Analytics* ; [2_227] the only thing that remains is to prove that the thing alleged is non-existent. But if it is evident that it is true and that it is a necessary sign, the argument at once becomes irrefutable; for, by means of demonstration, everything at once becomes clear. [2_228]

或然的证据和基于或然证据的修辞式推理，即使是真实的，也可以被人用上述方法反驳；因为从《分析篇》中可见，任何或然的证据都无法推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至于建立在例子之上的修辞式推理，可以用反驳或然性论据的方法来予以驳斥。这是因为，只要我们有一个事例与对方的例子相反，就足以反驳对方的论点，说它不是必然的，尽管对方拥有更多、更常见的例子会对其有利；但是如果绝大多数以及更常见的例子都是对对手有利的，那么我们就应该辩称当前的例子和他所举的例子并不相似，或者当前的例子与他所说的例子发生的方式不同，或者说存在某种差异。不过，必然的证据及从中得出的修辞式推理不能通过说对方没有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来反驳，这一点从《分析篇》一书中可以看出。面对这种情况，只剩下一招，即证明所指控之事并不存在。但是如果很显然某事是真实的，而且有必然的证据，那么有关的论点马上就成了不可辩驳的了，因为通过明示，一切一目了然。

Chapter 26

第二十六章

Amplification and depreciation are not elements of enthymeme (for I regard element and topic as identical), since element (or topic) is a head under which several enthymemes are included, but they are enthymemes which serve to show that a thing is great or small, just as others serve to show that it is good or bad, just or unjust, or anything else. All these are the materials of syllogisms and enthymemes; so that if none of these is a topic of enthymeme, neither is amplification or depreciation. Nor are enthymemes by which arguments are refuted of a different kind from those by which they are established; for it is clear that demonstration or bringing an objection is the means of refutation. By the first the contrary of the adversary's conclusion is demonstrated; for instance, if he has shown that a thing has happened, his opponent shows that it has not; if he has shown that a thing has not happened, he shows that it has. This, therefore, will not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for both employ the same arguments; they bring forward enthymemes to show that the thing is or that it is not. And the objection is not an enthymeme, but, as I said in the *Topics* , it is stating an opinion which is intended to make it clear that the adversary's syllogism is not logical, or that he has assumed some false premise. Now, since there are three things in regard to speech, to which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devoted, let what has been said suffice for examples, maxims, enthymemes, and what concerns the intelligence [2_229] generally; for the sources of a supply of arguments and the means of refuting them. It only remains to speak of style and arrangement.

铺陈和贬低不是修辞式推理的要素（我认为要素和部目是一回事），因为要素（或者说部目）包括数个修辞式推理，而它们（即铺陈和贬低）则是被用来证明某事是大还是小的修辞式推理，正如其他的修辞式推理是被用来证明某事是好还是坏，正义还是非正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三段论和修辞式推理的素材；如果它们都不是修辞式推理的部目，那么铺陈和贬低也不是。用于反驳的修辞式推理与用于立论的修辞式推理并无二致；因为，很显然，明示或者提出异议都是反驳的手段。通过第一种，与对方结论相反的结论得以证明；例如，如果一方证明某事发生了，对方就证明该事件并未发生；如果一方证明某事没有发生，对方就证明该事件发生了。因此，这并不是二者之间的差别，因为它们都运用相同的论证，都搬出修辞式推理来证明某事是或者不是。提出异议并不是修辞式推理，而是，如我在《部目篇》中所讲，陈述一个观点，旨在说明对方的三段论不符合逻辑，或者对方使用了某些错误的前提。既然关于演讲有三件事 [3_31]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那么，有关举例、格言、修辞式推理、智力、论证的来源以及反驳的手段等，我们就讲到这里。剩下的就是讨论风格和安排了。

[2_1].This is Cope's interpretation. Jebb renders: "If we take each branch of Rhetoric by itself." The classes are of course the deliberative, forensic, and epideictic.

[2_2].The instructions given for enthymematic or logical proof should suffice; but since the function of Rhetoric is to find the available means of persuasion and its end is a judgement; and since an appeal to the speaker's own character and to the passions of those who are to give the judgement is bound to carry great weight, the speaker must be provided with rules for ethical and "pathetic" (emotional) proofs. In Book 1.5 Aristotle mentions appeals to the emotions with disapproval, but this does not apply to all such appeals, but only to those which are likely to bias the judges unfairly (e.g. stirring up envy, hatred, a desire for revenge).

[2_3].Opposed to εὐέλπιδι. Others render "in a bad humor."

[2_4].ἐπιεικής and σπουδαῖος both = ἀγαθός. In a restricted sense ἐπιεικής is "respectable," σπουδαῖος "serious."

[2_5].See previous note.

[2_6].Book 1.9.

[2_7].In Book 1 generally (cp. 1.2.22).

[2_8].Gomperz translates φαινομένης "real or apparent"; Jebb omits φαινομένης and translates φαινομένην "apparent"; Cope confines both to the meaning "manifest."

[2_9].Hom. *Il.* 18.109(cp. 1.11.9).

[2_10].The thought of revenge in the future, as distinguished from dwelling upon it in the present.

[2_11].Or, "those in which this tendency does not exist, or is trifling."

[2_12].Or, "how to make him his friend," φίλος being for φίλον by attraction.

[2_13].In Attic law ὕβρις(insulting, degrading treatment) was a more serious offence than αἰκία(bodily ill-treatment). It was the subject of a State criminal prosecution (γραφή), αἰκία of a private action (δίκη) for damages. The penalty was assessed in court, and might even be death. It had to be proved that the defendant struck the first blow (2.24.9). One of the best known instances is the action brought by Demosthenes against Midias for a personal outrage on himself, when choregus of his tribe and responsible for the equipment of a chorus for musical competitions at public festivals.

[2_14].Hom. *Il.* 1.356.

[2_15].Hom. *Il.* 9.648. μετανάστης, lit. "one who changes his home," used as a term of reproach.

[2_16].ταὐτῷ. Other readings are ταῦτα, or τις.

[2_17].Hom. *Il* . 2.196.

[2_18].Hom. *Il.* 1.82. The words are those of the soothsayer Calchas to Achilles, and the reference is to Agamemnon.

[2_19].τοῖςπρὸςτὴννόσον: lit. "the sick man [is angry with those who slight him] in regard to his illness," that is, by making light of it.

[2_20].Or, "his suffering at the moment."

[2_21].εὐκίνητοι refers grammatically to διαθέσεις and ἡλικίαι.

[2_22].Plexippus was the uncle of Meleager. The allusion is obscure. It may refer to Meleager giving the skin of the Calydonian boar to Atalanta, which his uncle wanted. One of Antiphon's tragedies was named Meleager(T.G.F. p.792).

[2_23].Literally, "for the things which (= the persons whom) one respects, do not escape notice."

[2_24].The real friend, therefore, would feel as much pain as the other whose faults are exposed.

[2_25].Cope translates "rulers and governors"; but can ἄρχεσθαι be used in a middle sense?

[2_26].To avoid the apparent tautology(2.17), Roemer(Rhein. Mus. 39 p. 503)boldly conjectures χαίρειν: "not to return another's greeting."

[2_27].ἐξαπίνης δ᾽ Ο᾽ δυσῆ ἴδον κύνες ὑλακόμωποι: οἱ μὲν κεκλήγοντες ἐπέδραμον: αὐτὰρ Ο᾽ δυσσεὺς ἔζετο κερδοσύνῃ(Hom. *Od* . 14.29-31).

[2_28].That is, greater than their present disservices.

[2_29].They regard the disrespectful treatment as merely a temporary lapse.

[2_30].πλήρωσις: lit. "filling up." The reference may be to the "fulfillment" of one's desires, or to "repletion" in the matter of food(L. and S.), which seems less likely; "in fulness of content"(Jebb).

[2_31].Opponent of Demosthenes, and one of the Pro-Macedonian party. Impeached for his share in the disastrous "Peace of Philocrates," he went into exile and was condemned to death during his absence.

[2_32].Ergophilus failed in an attack on Cotys, king of Thrace, while Callisthenes concluded a premature peace with Perdiccas, king of Macedonia.

[2_33].Another reading is ἐὰν ἕλωσι, "if they have convicted him." This is

adopted by Roemer, who refers to Plat. *Rep.* 558a, where, in speaking of the freedom allowed to all who live under a democracy, it is remarked that, even if a man is convicted by a court of justice, he takes no heed of the sentence, which is very often not enforced.

[2_34].Therefore, if you think that a man will never learn who took vengeance on him, you will be less cruel; for anger is personal, and so Odysseus, because he was angry, inflicted a savage punishment, and wished Polyphemus to know it.

[2_35].Hom. *Od.* 9.504.

[2_36].Or, "as if Odysseus would not have considered himself avenged, had P. remained ignorant..."

[2_37].Or, "with any who can no longer feel their anger." Cope translates: "with all the rest(besides those actually within reach)who are out of sight."

[2_38].To make the offender feel pain as part of the punishment.

[2_39].Hom. *Il* . 24.54.

[2_40].φιλεῖν may be translated "to love" or "to like"; φιλία by "love," "liking," or "friendship"; for φίλος "friend" alone is suitable. For the two meanings cp. the use of aimer in French, and lieben in German.

[2_41].Aristotle's opinion of husbandry, in which tillage and planting, keeping of bees, fish, and fowl were included, was not nearly so favorable as that of Xenophon in his Oeconomicus. In two lists of the elements of a State given in the *Politics* , it comes first at the head of the lower occupations. In its favor it is said that it forms the best material of a rural democracy, furnishes good sailors, a healthy body of men, not money-grabbers like merchants and tradesmen, and does not make men unfit to bear arms. On the other hand, it claims so much of a man's time that he is unable to devote proper attention to political duties, and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holding office. He further says that husbandmen, if possible, should be slaves (neither of the same race nor hot-tempered, for they will work better and are less likely to revolt); or, as the next best alternative, barbarians or serfs. The favorable view taken by Aristotle here and in the Oeconomics (probably not his) does not agree with that put forward in the *Politics* .

[2_42].Spengel reads ἢἐνοῖςθαυμάζουσιναὐτοί and brackets [

ἢἐντοῖςθαυμαζομένοιςὑφ᾽αὑτῶν]. ἅπασιν, βελτίστοις, and οἷς will then all be neuter.

[2_43].Two of a trade never agree (Hes. WD 25).

[2_44].Those with whom we are ambitious of entering into competition "in the race for distinction"(Cope). There is no unfriendliness, whereas envy produces it.

[2_45].A parenthetical remark. Aristotle explains that he is not thinking of merely conventional faults; if, then, one who is ashamed of these is no friend, then one who is not...

[2_46].He wishes to see and know the result of the measures taken against those with whom he is angry. Or, it may mean that he wishes the object of his anger to feel his wrath, and to know by whom, and for what, he is punished.

[2_47].By the definitions of anger and hatred.

[2_48].And therefore, having the inclination to be unjust, if he has the power, he will be so.

[2_49].Or simply, "near... far from us."

[2_50].τὰσωτήρια or some other word instead of τὰθαρραλέα would be expected, to avoid the tautology. The fact of remoteness inspires confidence, because we do not expect fearful things to happen; while salutary things inspire it if near at hand, because we expect them to happen.

[2_51].It is assumed that the gods will be on our side if we have suffered wrong; suffering wrong rouses anger and at the same time inspires confidence, if our relations with the gods are such that we feel we can rely upon them for assistance.

[2_52].Euripides, Cresphontes: αἰδὼςἐνὀφθαλμοῖσιγίγνεται, τέκνον(T.G.F. frag. 457).

[2_53].Jebb translates, "who have never seen us break down."

[2_54].The Greek scholiast says: "Euripides, having been sent as ambassador to the Syracusans, to ask for peace and friendship, when they refused said: O Syracusans, if for no other reason than that we are just feeling the need of your

friendship, you ought to respect our admiration." Nothing is known of this embassy. Hyperides has been suggested instead of Euripides.

[2_55].This rendering involves a plural neuter with a plural verb. Others take the actions or things in a good sense, "deeds and fortunes, their own or their ancestors, which they are likely to disgrace."

[2_56].i.e. when they have done anything disgraceful.

[2_57].When on an embassy to Syracuse, he was asked by Dionysius which was the best kind of brass. On his replying, "that from which the Athenians made their statues of Harmodius and Aristogiton," Dionysius ordered him to be put to death.

[2_58].χάρις may mean(1)benevolence, the feeling which prompts a favor; (2)an actual favor conferred; (3)gratitude.

[2_59].Probably given to a beggar or vagrant who had nothing to sleep on.

[2_60].That is, should have in view the satisfaction of urgent wants and desire(Cope).

[2_61].Reading ὅτε; others read οἷς, "by whom."

[2_62].ἀχαρίστους: the word generally means "ungrateful," and so Jebb takes it here: "and to make men ungrateful."

[2_63].The other five categories in Aristotle's list are: relation, position, possession, activity, passivity.

[2_64].Because in that case their motives in rendering the greater service cannot be disinterested.

[2_65].Hdt. 3.14, where the story is told, not of Amasis, by of his son Psammenitus.

[2_66].Jebb renders: "Again men pity when the danger is near themselves," which may mean when they see something terrible happening to others and likely soon to befall themselves. Vahlen inserts οὐγὰρ before ἔτι: "for men cease to pity when the terrible comes close to themselves.

[2_67]."When the men, who are in such crises, are good men" (Jebb). If they were not, their misfortune would appear deserved.

[2_68].The signs and actions, and the demeanor of the sufferer.

[2_69].νεμεσᾶν: "the nobler brother of envy" (Nietzsche).

[2_70].There is justice both in the punishment of the parricide and in the deserved good fortune of others. The conclusion must refer to the latter; if his like is fortunate, he hopes he may be.

[2_71].Because it is a man's own fault, and pity is only felt for what is undeserved.

[2_72].The first part of the sentence is clear: men are indignant when what good men deserve is possessed by those who are not good.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o the text as it stands is: "Men are indignant . . . at all the advantages of which good men and those who possess natural advantages are worthy"; but this cannot be right, since there is nothing in natural advantages to arouse moral indignation,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their being deserved or undeserved. Something may have fallen out like "but they will not be indignant with those who possess natural advantages." Roemer (Rhein. Mus. 39 p. 504) suggests οὐδ᾽εἰτὰφύσειἔχουσινἀγαθά(understanding νεμεσήσειτούτοις).

[2_73].δοκεῖν is a stronger word than φαίνεσθαι, indicating an intellectual operation as opposed to an impression received through the senses. The idea is that where anything has been so long in a person's possession, it has come to he regarded as his by right.

[2_74].Hom. *Il.* 11.542. Only the first verse is given in the received text of Homer; the second is not found in any of the mss. The reference is to Cebriones, a son of Priam slain by Patroclus.

[2_75].It has been suggested to insert μὴ before τυγχάνωσι: "if, although virtuous and worthy, they do not happen to possess such advantages."

[2_76].Or, "of which others happen to be unworthy."

[2_77].If some one else possesses the one thing which they think necessary to complete their happiness, they are envious of him, because they consider it ought to

be theirs.

[2_78].According to the scholiast, from Aeschylus.

[2_79].Two rocks at the east end of the Straits of Gibraltar, supposed to be the limit westwards of the ancient world.

[2_80].That is, no one will attempt to compete with them in their special branch of study. Roemer reads καὶπρὸςτοὺςπερὶτὰτοιαῦτα, translated by Jebb as if there were a full stop at ὑπερέχειν. "In like manner we vie with those engaged in such or such pursuits."

[2_81].2.4.21.

[2_82]."The same state of mind which is absent in the painful feeling will be present in the joy excited by the opposite occasions," meaning that, if one set of circumstances produces pain, the opposite will produce pleasure (Cope). Or, omitting οὐκ before ἔχοντες, "For in the same frame of mind as they are pained (at another's good fortune) they will rejoice in the contrary state of things" (at another's bad fortune).

[2_83].Something like "although they are within their grasp" is needed to complete the sense.

[2_84].Spending one's money benefits one's neighbor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beauty is always pleasant to look upon. One does not admire anyone because he is in good health, so much as because he is handsome.

[2_85]."Who have many acquaintances or friends" (Jebb).

[2_86].λογογράφοι means either the oldest Greek historians (or rather "chroniclers"), or the writers of speeches for use in the law courts, or of panegyrics.

[2_87].καὶἐπὶτούτοις. According to Cope, an unnecessary parenthetical note ("and on such occasions"). Jebb refers both τούτων and τούτοις to persons: "tend to show contempt to or about those who." The "reason" in the translation above is that they suffer from the want of "the highly valued goods."

[2_88].The πίστιςἠθική is resumed from 2.1.8. As the πάθη and ἕξεις have been discussed already, only the ages and their character remain.

[2_89].One of the Seven Wise Men of Greece.

[2_90].Or, "they do not look at things in a bad light, but in a good," i.e., they are not always ready to suspect.

[2_91].Social convention is the only law that they know, and they are ashamed if they violate it, because as yet they have no idea of higher laws which may command them to do so.

[2_92].ἦθος "in the widest sense, includes all that is habitual and characteristic; in a limited sense, it expresses the habitual temper or disposition" (Twining).

[2_93].One of the Seven Wise Men of Greece. The maxim was Μηδὲνἄγαν, Ne quid nimis, Never go to extremes.

[2_94].Or, "better than they really are."

[2_95].One of the Seven Wise Men of Greece.

[2_96].Or, "speeches which resemble (or reflect) it" (their character).

[2_97].i.e., the advantages and distinctions the family possessed of old; such distinctions, when possessed by those of later date, are less thought of.

[2_98]."What makes power worth having" (Cope).

[2_99].ἐνἐπιμελείᾳ: "because they are administrators"(Jebb).

[2_100].The three divisions are noble birth, wealth, and power. The meaning is that the highest kinds of good fortune tend or converge to these (i.e., to noble birth, wealth, and power). κατὰτὰμόρια might also mean "in part." Hobbes, in his Brief of the Art of Rhetorick, paraphrases: "the manners of men that prosper, are compounded of the manners of the nobility, the rich, and those that are in power, for to some of these all prosperity appertains."

[2_101].Book 2.12-14, 15-17.

[2_102].Having dealt with ethical and pathetic proofs, Aristotle proceeds to the discussion of topics of enthymemes common to all three kinds of Rhetoric. The difficulty in the Greek lies in the absence of a suitable apodosis to the long sentence

beginning ἐπεὶδὲἡτῶνπιθανῶν. Grammatically, it might be ὥστεδιωρισμένονἂνεἴη, but it by no means follows that "since the employment of persuasive speeches is directed towards a judgement . . . therefore it has been determined how . . . we must make our speeches ethical." Spengel, regarding ἐπεὶδὲ . . . βουλεύονται merely as an enlargement of Book 2.1, 2, brackets the passage. Cope suggests that something has fallen out after βουλεύονται: "Since in all the three kinds of Rhetoric the object is to secure a judgement, [I have shown how to put the judges into a certain frame of min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characters and emotions]. I have also spoken of the characters of the forms of government; so that this part of the subject need no longer detain us."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we have not the Chapter as originally arranged, although it is not supposed that any part of it is non-Aristotelian (see Cope and note in Jebb's translation).

[2_103].Both forensic and deliberative.

[2_104].Or, "for in both forensic and deliberative arguments the issue is the state of the case."

[2_105].Book 1.8.

[2_106].Book 1.3.

[2_107].Book 1.4-8.

[2_108].Book 1.9, 10-15.

[2_109].1.9.40. Amplication is to be understood of the exaggeration of both great and small things. It is most suited to epideictic oratory, in which there is no doubt as to the facts; so that it is only necessary to accentuate their importance or non-importance.

[2_110].As a general rule, from their nature as contraries, although it may not be true in particular cases. If a man is ill, he may also be well, although in particular cases certain qualities may make him more liable to one or the other, e.g. he may suffer from an incurable disease (Schrader).

[2_111].An argument a fortiori. If a beautiful house can be built, so can a house of any kind; for this is easier.

[2_112].The meaning of the Greek words is quite uncertain.

[2_113].T.G.F. p. 765.

[2_114].Book 1.7.

[2_115].As a starting-point and first principle of knowledge.

[2_116].The Libyan fables were of African origin. They are mentioned by Quintilian (Quint. Inst. Orat. 5.11.20) and belonged to the class of animal fables.

[2_117].Theπαραβολήas understood by Aristotle is a comparison and application of cases easily supposable and such as occur in real life, for the purpose of illustrating the point in question; the fable, on the other hand, is pure fiction.

[2_118]."Literary knowledge"(Jebb); "literature"(Cope, Introd. p. 256, who, however, in his annotated ed. explains: "intellectual study and mental exercises in general").

[2_119].If we have no enthymemes, we must use examples instead of them; for they are useful for persuasion, although they do not really demonstrate anything. If we have enthymemes, we must use examples in corroboration of them (see 21.3 note).

[2_120].Putting the comma after σχεδόν.

[2_121].Eur. *Med.* 294-297.

[2_122]."The idle habits which they contract" (Cope).

[2_123].Euripides, Stheneboea (frag. 661, T.G.F.).

[2_124].Eur. *Hec.* 864-865.

[2_125].Maxims with an epilogue are (1) imperfect enthymemes, or (2) enthymematic in character, but not in form; those without an epilogue are (1) such as are well known, or (2) such as are clear as soon as they are uttered.

[2_126].Something added as a supplementary proof, the why and the wherefore; in Book 3.19 it is used for the peroration of a speech.

[2_127].From Simonides or Epicharmus.

[2_128].Eur. *Tro* . 1051.

[2_129].See sect. 2.

[2_130].They partake of the nature of, but not of the form of, enthymemes.

[2_131].Author unknown (T.G.F. p. 854).

[2_132].According to Bentley, from Epicharmus.

[2_133].Meaning that the land would be devastated and the trees cut down.

[2_134].Hom. *Il.* 12.243.

[2_135].Hom. *Il.* 18.309.

[2_136].1.15.14.

[2_137].Cf. *Thuc.* 1.70, where the Corinthians complain of the lack of energy shown by the Spartans, as compared with their own restless and troublesome neighbors, the Athenians.

[2_138]."Want of cultivation and intelligence" (Cope). "Amour-propre" (St. Hilaire).

[2_139].In reference to their own particular case.

[2_140].The conclusion must not be reached by means of a long series of arguments, as it were strung together in a chain: cp. 1.2.12, where the hearers are spoken of as unable to take in at a glance a long series of arguments or "to follow a long chain of reasoning" (οὐδὲ λογίζεσθαι πόρρωθεν).

[2_141].Eur. *Hipp.* 989.

[2_142].Or, "by means of the speech it is impossible to prove anything otherwise" (Cope).

[2_143].Aristot. *Top.* 1.14. πρῶτον: i.e. "the speaker's chief care should be..."

[2_144].The more suitable they will be, and the less they will resemble ordinary,

trivial generalities.

[2_145].The demonstrative enthymeme draws its conclusion from facts admitted by the opponent; the refutative draws its conclusion from the same, but the conclusion is one which is disputed by the opponent.

[2_146].Or, "noting in addition" (Victorius); or, "pointing out, side by side" (Jebb).

[2_147].Assuming that self-control is good, then if the opposite of good (that is, bad) can be predicated of lack of self-control, this proves the truth of the first proposition; otherwise, it may be refuted.

[2_148].Cf. 1.13.2 note.

[2_149].Authorship unknown.

[2_150].Euripides, Thyestes(Frag. 396, T.G.F.).

[2_151].The argument is that if there was no disgrace in selling the right of farming the taxes, there could be none in purchasing this right.

[2_152].Pupil of Plato and Isocrates, great friend of Aristotle, the author of fifty tragedies and also of an "Art" of Rhetoric. Alcmaeon murdered his mother Eriphyle. Alphesiboea, his wife, says to him, Was not your mother hated? To this he replied, Yes, but there is a distinction; they said she deserved to die, but not at my hands.

[2_153].Nothing is known of this trial.

[2_154].The argument is that since men beat their fathers less commonly than they do their neighbors, if they beat their fathers they will also beat their neighbors, and the Paris ms. in a longer form of this argument has an explanatory addition to this effect, inserting after ὑπάρχει the words τοὺς γὰρ πατέρας ἧττον τύπτουσιν ἢ τοὺς πλησίον. In a similar passage in Aristot. *Top.* 2.10 εἰκός (or δοκοῦν) is inserted after μᾶλλον and ἧττον. Welldon suggests that here also the reading should be τὸ ἧττον εἰκός and τὸ μᾶλλον εἰκός (Grote, Aristotle, p. 294).

[2_155].From the *Meleager* of Antiphon (T.G.F. p. 885).

[2_156].In carrying off Helen.

[2_157].The Paris ms. has θανατοῦνται, "are put to death."

[2_158].Fragment of a speech of Lysias. It was proposed to put up a statue to the famous Athenian general Iphicrates in honor of his defeat of the Spartans (393 B.C.). This was later opposed by Harmodius, probably a descendant of the tyrannicide. The speech, which is considered spurious, was called ἡ περὶ τῆς εἰκόνος.

[2_159].Or, "the ways of doing this are various" (Jebb).

[2_160].The illustration is lost or perhaps purposely omitted as well known. The *Teucer* was a tragedy of Sophocles.

[2_161].It would be absurd to use such an argument against the accusation of a "just man" like Aristides, and to pretend that he is more likely to have committed the crime. It must only be used when the opponent's character is suspect, and lends itself to such a retort.

[2_162].The reference is obviously to Socrates, who claimed that a daimonion (a certain divine principle that acted as his internal monitor) checked his action in many cases. When accused of not believing in the gods, he was able to prove, by his definition of the daimonion, that he was no atheist. Similarly, Iphicrates, by his definition of γενναῖος and συγγενής could refute the allegation that he was ignoble and show that his deeds were more akin to those of Harmodius and Aristogiton than to those of his opponents. Paris could say that he was not intemperate, because he was satisfied with Helen alone. Lastly, Socrates refused an invitation to visit Archelaus, king of Macedonia, because he would be unable to return the benefits received, which would imply his being put to shame, and make the invitation a kind of insult.

[2_163].Of Polycrates.

[2_164]."Just as it is to requite them with evil" (Jebb).

[2_165].Supplying [λελέκται] περὶ τοῦ ὀρθῶς [χρῆσθαι αὐτοῖς]. Others render "in reference to the use of the word ὀρθῶς" (but ὀρθῶς does not occur in the passage in Aristot. *Top.* 1.15). A suggested reading is περὶ τούτου ὀρθῶς εἴρηται.

[2_166].Mantias had one legitimate son Mantitheus and two illegitimate by a certain Plangon. Mantias at first refused to acknowledge the latter as his sons, until the mother declared they were.

[2_167].The name of the mother; or simply, "the woman of Dodona," like "the woman of Peparethus."

[2_168].Others read πολίτην, "although he was not their fellow-citizen" (but Chios was one of the claimants to his birthplace).

[2_169].Something has fallen out, what follows being intended to prove that the best rulers for a state are the philosophers.

[2_170].Epaminondas and Pelopidas. One would rather expect, "as soon as philosophers had the conduct of affairs."

[2_171].Athenian ambassador to Sparta (371 B.C.), whose aggressive policy he attacked. His argument is that, if the Eumenides could agree without any loss of dignity to stand their trial before the Areopagus, as described in Aeschylus, surely Mixidemides could do the same. Nothing is known of Mixidemides, but it is clear that he refused to submit his case to it, when charged with some offense.

[2_172].The story is told of Agesipolis (which others read here) in Xen. Hell. 4.7.2. The Argives, when a Lacedaemonian army threatened to invade their territory, were in the habit of alleging that it was festival time, when there should be a holy truce. This obviously left the door open to fraud, so Agesipolis (one of the Spartan kings) consulted the oracle of Zeus at Olympia to ask whether he was to respect such a truce. The reply of the oracle was that he might decline a truce fraudulently demanded. To confirm this, Agesipolis put the same question to Apollo: "Is your opinion as to the truce the same as that of your father (Zeus)?" "Certainly," answered Apollo. Agesipolis thereupon invaded Argos. The point is that really Apollo had little choice, since it would have been disgraceful for the son to contradict the father.

[2_173].After his defeat at Aegospotami (405 B.C.) the Athenian general Conon, fearing for his life, took refuge with Evagoras, king of Cyprus—a proof, according to Aristotle, of the goodness of the latter.

[2_174].If the genus can be affirmed of any subject, then one or other of the species, which make up the genus, must also be predicable of it. If the proposition to be maintained is, the soul is moved,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whether any of the different kinds of motion (increase, decrease, decay, change of place, generation, alteration) can be predicated of the soul. If not, the generic predicate is not applicable, and the proposition is refuted.

[2_175].The bad with the good. The exact meaning of βλαίσωσις has not been satisfactorily explained. In the definition given of the retortion of a dilemma, the two opposite things would be speaking truth or untruth; the two opposite consequences, pleasing men and pleasing God.

[2_176].e.g. a man may say that an honorable death should be preferred to a pleasant life, and honest poverty to ill-acquired wealth, whereas really he wishes the opposite. "If then his word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his real wishes, he must be confronted with his public statements; if they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tter, he must be confronted with his secret wishes. In either case he must fall into paradox, and contradict either his publicly expressed or secret opinions." (Aristot. Sophist. Elenchi 2.12, Post's translation).

[2_177].This "law" (already mentioned in 23.11) is said to have been an oration on the legal position of mercenaries.

[2_178].Cause and effect.

[2_179].Isoc. 15.173.

[2_180].The peace concluded between the Greeks (although the Lacedaemonians held aloof)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after the death of Philip of Macedon (336 B.C.).

[2_181].*Lys.* 34.11.

[2_182].i.e., after their return, they preferred to leave the city rather than fight. This is Cope's explanation, but the meaning of the clause ὁτὲ μὲν... ᾑροῦντο is then somewhat obscure. A more suitable interpretation would be: "At one time they preferred to return from exile at the price of fighting; at another, not to fight at the price of being exiled a second time (St. Hilaire)," but one does not see how this can be got out of the Greek.

[2_183].The author is unknown.

[2_184].Frag. 2 (T.G.F. p. 792).

[2_185].Hom. *Il.* 10.218; cp. T.G.F. p. 801.

[2_186].By pointing out what is likely to deter a man from committing a crime, and vice versa.

[2_187].The argument is: we accept either that which really is, or that which is probable; if then a statement is made which is incredible and improbable, we assume that it would not have been made, unless it was true.

[2_188].Athenian demagogue and opponent of Alcibiades, for whose banishment he was chiefly responsible. When the Four Hundred were set up, he was put to death. Pitthus was an Athenian deme or parish.

[2_189].Understanding διαβεβλῆσθαι. Others read μὴ (for ἢ) δοκοῦσι, "when there seems no reason to suspect them."

[2_190].The names of traitors were inscribed on a brazen pillar in the Acropolis. Leodamas supported the oligarchic, Thrasybulus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answer to the charge that he had had his name removed from the pillar when his party came into power, Leodamas replied that, if he had been originally posted as an enemy of the people and a hater of democracy, he would have preferred to keep the record, as likely to increase the confidence of the Thirty in him, than to have it erased, even though it branded him as a traitor.

[2_191].If a person has not taken the better course, when he had the chance of doing so, he cannot be guilty.

[2_192].Leucothea was the name of the deified Ino. She was the daughter of Cadmus and the wife of Athamas king of Thebes. The latter went mad and, in order to escape from him, Ino threw herself into the sea with her infant son Melicertes. Both became marine deities.

[2_193].Tragic poet, contemporary of Aristophanes (T.G.F. p. 798).

[2_194].An early edition, afterwards enlarged. It must have contained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topic of "errors" to be of any use.

[2_195].Sophocles, Tyro, Frag. 597 (T.G.F.). The reference is to Sidero (σίδηρος, iron), the cruel stepmother of Tyro.

[2_196].Thompson's rendering (Introd. to his edition of Plato's Gorgias p. 5). "Colt" refers to Polus's skittishness and frisking from one subject to another.

[2_197].Eur. *Tro.* 990.

[2_198].Frag. 4 (T.G.F.). The name Pentheus is from πένθος (sorrow).

[2_199]."Admitting the apparent correctness of the opposing argument, we may prove the contradictory of its conclusion by an unassailable argument of our own, which is then called an elenchus" (Thomson, Laws of Thought, section 127).

[2_200].Isoc. 9.65-69.

[2_201].Or equivocation, in which a single term has a double meaning.

[2_202].Deriving μυστήρια (μύειν, to close the lips) from μῦς (mouse).

[2_203].A fragment from the Parthenia (songs sung by maidens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the flute). Pan is called "the dog of Cybele," the great nature-goddess of the Greeks, as being always in attendance on her, being himself a nature-god. The fact that Pindar calls Pan "dog" is taken as a glorification of that animal.

[2_204].κοινὸς Ἑ̓ρμῆς is an expression meaning "halves!" When anyone had a stroke of luck, such as finding a purse full of money in the street, anyone with him expected to go halves. Hermes was the god of luck, and such a find was called ἑρμαῖον. κοινωνικός is taken to mean (1) liberal to others, or (2) sociable.

[2_205].λόγος: (1) speech; (2) account, esteem.

[2_206].Very obscure and no explanation is satisfactory. The parallel passage in Aristot. Sophist. Elenchi 20.6 is: "Do you being in Sicily now know that there are triremes in the Piraeus?" The ambiguity lies in the position of "now," whether it is to be taken with "in Sicily" or with "in the Piraeus." At the moment when a man is in Sicily he cannot know that there are at this time triremes in the Piraeus; but being in Sicily he can certainly know of the ships in the Piraeus, which should be there, but are now in Sicily (Kirchmann). St. Hilaire suggests that the two clauses are: Do you now, being in Sicily, see the triremes which are in the Piraeus? and, Did you when in Sicily, see the triremes which are now in the Piraeus? The fallacy consists in the two facts (being in the Piraeus and the existence of triremes in Sicily), true separately, being untrue combined.

[2_207].Thrasybulus deposed the thirty individuals and put down the single tyranny which they composed; he then claimed a thirtyfold reward, as having put down thirty tyrannies.

[2_208].Frag. 5 (T.G.F.).

[2_209].Hdt. 2.141. The story was that, when Sennacherib invaded Egypt, a host of field-mice devoured all the quivers, bowstrings and leather shield-holders of the Assyrians. Apollo was called Smintheus (σμίνθος, mouse) and was represented on coins with a mouse in his hand, either as the mouse-slayer and protector of crops, or because the animal was sacred to him. The story, alluded to elsewhere, was of Greek, not of Egyptian origin. Similar panegyrics on ridiculous things or animals included pots, counters, salt, flies, bees, and such subjects as death, sleep, and food.

[2_210].Sophocles, *The Gathering of the Greeks* (T.G.F. p. 161), a satyric drama. His not being invited was a mere accident of the disrespect.

[2_211].Assuming a proposition to be convertible, when it is not; it does not follow, assuming that all the high-minded dwell by themselves, that all who dwell by themselves are highminded.

[2_212].The poor want to get money; the rich dance and sing to amuse themselves, or to show that they can do as they like. Exiles can certainly live where they like in a foreign land, but would prefer to live in their own country; the rich, who are not exiles, travel to amuse themselves.

[2_213].The first "is" means "has a real, absolute existence"; the second "is" merely expresses the identity of the terms of the proposition, and is particular; but the sophistical reasoner takes it in the same sense as the first. The same applies to the argument about the unknown.

[2_214].This utterance of Protagoras gave particular offense as apparently implying that the weaker cause was really identical with the worse, so that to support it was to support injustice. But, considering the high moral character ascribed to Protagoras, it seems more probable to take the formula as a statement of the aim of all ancient orators—how to overcome stronger arguments by arguments weaker in themselves.

[2_215].In which the contrary of an opponent's conclusion is proved.

[2_216].i.e., the opponent's enthymeme.

[2_217].Love is regarded as a desire, and therefore as bad as any other desire. It is here included under the general head of want.

[2_218].Incest: *Ovid Met.* 9.454.

[2_219].The contrary of "good men do good to all their friends" is "bad men do harm to all their friends," but this is not always true. Jebb gives the objection as: "No, the bad man does not do evil to all his enemies."

[2_220].Translating ἀεί inserted by Vahlen before ὄντος.

[2_221].That is, if the argument is shown to be not "necessary."

[2_222].The important point in the conclusion drawn is that the judge thinks it is not his business to decide, because the argument is not necessary, whereas his duty is to decide, not about things that are necessary but about things that are probable.

[2_223].χρόνῳ... πράγμασιν. If χρόνῳ be taken to mean the date, there are the following alternatives. The date may be questioned, the facts admitted; both date and facts may be questioned; both date and facts may be admitted, but circumstances may have altered (a pound was worth twenty shillings in 1914, not in 1924). Others take χρόνῳ to mean the greater number of times the same fact has occurred, πράγμασι the more numerous facts that increase probability. But χρόνῳ can hardly bear this meaning (see Jebb's note).

[2_224].1.2.18; or, "at the beginning," i.e., of this book.

[2_225].Aristot. *Pr. Anal.* 2.27.

[2_226].On the other side, in the opponent's favor.

[2_227].Aristot. *Pr. Anal.* 2.27.

[2_228].That is, "when the tekmērion is converted into a syllogism." For tekmērion see 1.2.16.

[2_229]."Intellectual capacity, as evinced in language (or actions), and seen when the actors argue or make an appeal to the feelings of others, in other words, when they reason or plead with one of the other dramatis personae in the same sort of way as a rhetor might do" (Bywater on Aristot. *Poet.* 1450a 6, where the text is speaking of the διάνοια of the actors in a play).

[3_1].拉孔式警句，指斯巴达式的句子。据说斯巴达人说话很简明扼要。

[3_2].斯特西科罗斯所说警句的意思是，不要太傲慢，否则敌人可能将他们的城池夷为平地，那样的话知了就只好在地上鸣叫了。

[3_3].这个谚语是说与雅典人为邻，将不得安宁。在古代，雅典人有喜怒无常的坏名声，常常让邻人苦恼不堪。

[3_4].问题的要素包括该问题所致之事、该问题的自然属性和逻辑属性以及该问题的相关事实和信息等。

[3_5].参见本卷第二十五章：反驳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是反证，即通过反三段论推导出与对方结论相反的结论，从而反驳对方。第二种是提出异议，具体包括指出与对方的观点相左的事件等四个方式。另参见本卷第二十六章关于明示的论述。

[3_6].《墨塞尼阿克斯辞》，参见第一卷第十三章第127页注2。

[3_7].忒修斯，曾经抢走海伦，海伦的兄弟将其救回，后来，亚历山大（即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也抢走了海伦。

[3_8].阿里斯托芬控告伊菲克拉底在某次战役中出卖舰队，按兵不动，但是据说实情是当时风浪太大，无法作战。后来伊菲克拉底被判无罪。

[3_9].亚里斯泰迪斯，古希腊政治家，以为人正直著称。

[3_10].在该演说中波吕克拉底旨在赞颂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也名亚历山大），而不是亚历山大大帝。

[3_11].阿刻拉俄斯，马其顿的国王。尽管他经常滥施恩德，但是苏格拉底并不喜欢他。他某次邀请苏格拉底前来，准备施以恩德，但是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将无以回报，这种邀请只会使自己陷入窘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邀请就是一种耻辱。

[3_12].指塞奥德克泰斯为苏格拉底申辩的演说辞。

[3_13].卡利波斯，伊索克拉底的学生，编有一本《修辞术手册》。

[3_14].盐沼地是用来晒盐的低洼沼泽地。在古希腊时代，作为日用必需品，盐是宝贵的，而沼泽地无疑是不好的。连沼泽地一起买，意思是好的和坏的一起买。

[3_15].用于劝阻的事情对当事人没有好处，被告可以据此称自己不可能做这样的事，从而为自己辩护，用于劝说的事情对当事人有好处，原告可以据此称对方可能做这样的事，从而指控对方。

[3_16].在古希腊时代，雅典人把叛徒的名字刻在卫城上。色拉西布洛斯指控勒俄达马斯曾是叛徒，说他的名字曾被刻在卫城上，在三十暴君掌权时被他自己擦掉了。勒俄达马斯反驳说，如果自己真的曾经是叛徒，就不会擦掉名字，因为保留名字反而能让三十暴君更信任他。

[3_17].德拉古（Draco），与希腊语中的“drakon（蛇）”相近。

[3_18].彭透斯（Pentheus），和希腊语中的“忧愁”一词发音相似。

[3_19].伟大母亲，指希腊神话中的大自然女神库柏勒，潘并不是狗，而是库柏勒的侍者，所以众神称潘为狗。

[3_20].赫尔墨斯是幸运之神，而common一词对应的希腊语单词有“慷慨大方”和“好交往”两个意思。

[3_21].希腊语的λόγου一词有“言语”和“考虑、敬重”两个意思。

[3_22].比雷埃夫斯，希腊的海港城市。

[3_23].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建立了亲斯巴达的寡头政府，三十个寡头执掌政权，实施暴政，迫害异己。后来流亡将领色拉西布洛斯废黜了这三十个寡头，推翻了他们的独裁统治。之后，色拉西布洛斯要求得到三十倍的奖励，因为他推翻了三十个暴君。

[3_24].俄瑞斯忒斯的父亲被母亲杀死，他为父报仇，杀死了母亲。

[3_25].哈摩狄俄斯和阿里斯托格通是雅典的一对同性恋人，为反抗压迫刺杀了僭主希庇阿斯的兄弟希帕科斯。虽然这个偶然事件对城邦有利，但其出发点只是一起私人纠纷。

[3_26].亚述人进攻埃及时，一天晚上，一大群老鼠涌进亚述人的营地，咬坏了他们的箭筒、弓箭和盾牌把手，导致亚述人第二天不得不撤兵。

[3_27].这种谬误是把原来不可逆的命题认定为可逆的命题。例如，把“高傲者好独处”这一命题反过来说成“独居者就是高傲者”。

[3_28].科拉克斯，修辞术的奠基人，他编写的《修辞术课本》是古希腊最早的修辞术著作。

[3_29].爱情亦是一种欲望，所以和其他欲望一样，也是不好的。

[3_30].考尼俄斯式的爱情，指不伦之爱，源于希腊神话中考尼俄斯对其姐妹的欲念。

[3_31].这“三件事”指证明的来源、风格和安排，参见第三卷第一章。

Book III

第三卷

Chapter 1

第一章

There are three things which require special attention in regard to speech: first, the sources of proofs; secondly, style; and thirdly, the arrangement of the parts of the speech. We have already spoken of proofs and stated that they are three in number, what is their nature, and why there are only three; for in all cases persuasion is the result either of the judges themselves being affected in a certain manner, or because they consider the speakers to be of a certain character, or because something has been demonstrated. We have also stated the sources from which enthymemes should be derived —some of them being special, the others general commonplaces.

关于演说，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证明的来源；第二，风格；第三，演说各部分的安排。我们已经讲完了证明，阐明了它们可分为三种 [4_1] ，它们的性质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只有三种；须知在所有案件中，说服都产生于以下三种情况：要么是因为裁决人自己受到某种影响，要么是因为他们认为演说者具有某种品格，要么是因为某事已得到证明。我们还讲了用于推导修辞式推理的题材 [4_2] ，有些是专有的，其他则是通用的。

We have therefore next to speak of style; for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know what one ought to say, but one must also know how to say

it, and this largely contributes to making the speech appear of a certain character. In the first place, following the natural order, we investigated that which first presented itself—what gives things themselves their persuasiveness; in the second place, their arrangement by style; and in the third place, delivery, which i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but has not yet been treated of by anyone. In fact, it only made its appearance late in tragedy and rhapsody, for at first the poets themselves acted their tragedies. [3_1] It is clear, therefore,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of the sort in rhetoric as well as in poetry, and it has been dealt with by Glaucon of Teos among others. Now delivery is a matter of voice, as to the mode in which it should be used for each particular emotion; when it should be loud, when low, when intermediate; and how the tones, that is, shrill, deep, and intermediate, should be used; and what rhythms are adapted to each subject. For there are three qualities that are considered—volume, harmony, rhythm. Those who use these properly nearly always carry off the prizes in dramatic contests, and as at the present day actors have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stage than the poets, it is the same in political [3_2] contests, owing to the corruptness of our forms of government. But no treatise has yet been composed on delivery, since the matter of style itself only lately came into notice; and rightly considered it is thought vulgar. [3_3] But since the whole business of Rhetoric is to influence opinion, [3_4]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it, not as being right, but necessary; for, as a matter of right, one should aim at nothing more in a speech than how to avoid exciting pain or pleasure. For justice should consist in fighting the case with the facts alone, so that everything else that is beside demonstration is superfluous; nevertheless, as we have just said,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owing to the corruption of the hearer. However, in every system of instruction there is some slight necessity to pay attention to style; for it does make a difference,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a thing

clear, to speak in this or that manner; still, the difference is not so very great, but all these things [3_5] are mere outward show for pleasing the hearer; wherefore no one teaches geometry in this way.

因此，我们接下来要讲风格；因为仅仅知道应该说什么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怎么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能使演说显得独具特色。首先，按照自然的顺序，我们已经探讨了位列第一的问题 [4_3] ，即是什么使事物本身具有说服力；第二，我们将探讨如何根据风格来安排这些素材；第三，我们还将探讨朗诵技巧，这是最重要的，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研究过。其实，朗诵最近才出现在悲剧和史诗诵读中，因为最早都是诗人亲自表演自己创作的悲剧，所以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专业演员和关于朗诵表演的研究。因此很明显，演讲术和诗艺中都有朗诵的成分，忒俄斯人格劳孔以及其他一些人已经讨论过这一点。朗诵涉及声音的运用，比如应该使用何种声音表达何种情绪；何时声大，何时声小，何时声音适中；如何使用尖锐、低沉和适中等各种音调以及针对各种题材应该使用何种节奏。声音有三个特质需要注意：音量、音高和节奏。能够娴熟地运用这三点的人，几乎总能够在戏剧比赛中获奖，而且正如现在演员在台上的影响比创作戏剧的诗人要大 [4_4] ，在政治角逐中也是如此，这源于我们的政体中存在的缺陷。但是，迄今还没有人写过关于朗诵的专著，因为风格问题本身也只是刚刚引起人们的注意；另外，朗诵理当被视为庸俗的技艺。但是，既然修辞术的全部任务就是影响听众的判断，那么我们就必须关注朗诵技巧，不是因为理应如此，而是因为必须如此。若论理应与否，那么我们在演讲中最应该致力于避免激发听众的痛苦或喜乐，而不是其他。这是因为，正义应该体现在仅仅依靠事实就案件进行论争，所以除了证明之外，其他任何说辞都是多余的；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听众自身的缺陷，朗诵技巧对于演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各个讲授方法中，都有关注风格的些许必要；要知道为了澄清一件事，是采取这种还是那种方式进行演说的确会产生区别；不过，区别并不太大，而且所有这些都纯属外在的表演，旨在取悦听众；所以不会有人用这种方式教授几何学。

Now, when delivery comes into fashion, it will have the same effect as acting. Some writers have attempted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it, as Thrasymachus, in his *Eleoi* ; [3_6] and in fact, a gift for acting is a natural talent and depends less upon art, but in regard to style it is artificial. Wherefore people who excel in this in their turn obtain prizes, just as orators who excel in delivery; for written speeches owe their effect not so much to the sense as to the style.

演讲开始流行后，会产生和表演一样的效果。有些修辞学著作的编纂者曾经论及朗诵，比如智者塞拉西马柯在他的《论怜悯》中的尝试；其实，表演才能是一种天赋，对技巧的依赖较少，但是表演的风格则有技巧的成分。因此，擅长此道的人就会获得奖赏，正如善于演讲的雄辩家一样，因为对书面讲稿而言，它的效果更依赖于风格而不是意义。

The poets, as was natural, were the first to give an impulse to style; for words are imitations, and the voice also, which of all our parts is best adapted for imitation, was ready to hand; thus the arts of the rhapsodists, actors, and others, were fashioned. And as the poets, although their utterances were devoid of sense, appeared to have gained their reputation through their style, it was a poetical style that first came into being, as that of Gorgias. [3_7] Even now the majority of the uneducated think that such persons express themselves most beautifully, whereas this is not the case, for the style of prose is not the same as that of poetry. And the result proves it; for even the writers of tragedies do not employ it in the same manner, but as they have changed from the tetrametric to the iambic meter, because the latter, of all other meters, most nearly resembles prose, they have in like manner discarded all such words

as differ from those of ordinary conversation, with which the early poets used to adorn their writings, and which even now are employed by the writers of hexameters. It is therefore ridiculous to imitate those who no longer employ that manner of writing. Consequently, it is evident that we need not enter too precisely into all questions of style, but only those which concern such a style as we are discussing. As for the other kind of style, [3_8] it has already been treated in the *Poetics* .

诗人是最早促使风格形成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须知语词就是模仿，而声音在我们的所有官能中最适宜模仿，且是现成的模仿工具；游吟诗人、演员及其他人的技艺便是这样形成的。虽然诗人的语言缺少内容，但是其风格却似乎为他们赢得了声誉，所以首先出现的是诗歌化的风格，比如高尔吉亚 [4_5] 的风格。甚至到现在，大多数未受过教育的人仍然认为这类使用诗歌化风格的人的表达非常华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散文与诗歌的风格迥然不同。文体风格演变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如今连悲剧作家都不再原样采用这种诗化风格了，正如他们从四双音步长短格转向了短长格音步，因为在所有音步中，后者最贴近散文，他们也同样摒弃了所有那些不同于人们日常会话用词的词汇，早期的诗人便是用这些非日常用词汇装饰自己的作品的，现在六步格诗歌的作家也还在沿用。这样说来，作家们自己都已经不再使用的写作方式，其他人还要去模仿，就很可笑了。总之，显而易见，我们无需深入探究有关风格的所有问题，只需考虑与我们正在讨论的风格相关的问题就好了。至于另一种风格，《诗学》中已经讲过了。

Chapter 2

第二章

Let this suffice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se points. In regard to style, one of its chief merits may be defined as perspicuity. This i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the speech, if it does not make the meaning clear, will not perform its proper function; neither must it be mean, nor above the dignity of the subject, but appropriate to it; for the poetic style maybe is not mean, but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prose. Of nouns and verbs it is the proper ones that make style perspicuous; [3_9] all the others which have been spoken of in the *Poetics* *[3_10]* elevate and make it ornate; for departure from the ordinary makes it appear more dignified. In this respect men feel the same in regard to style as in regard to foreigners and fellow-citizens. Wherefore we should give our language a "foreign [3_11] air"; for men admire what is remote, and that which excites admiration is pleasant. In poetry many things conduce to this and there it is appropriate; for the subjects and persons spoken of are more out of the common. But in prose such methods are appropriate in much fewer instances, for the subject is less elevated; and even in poetry, if fine language were used by a slave or a very young man, or about quite unimportant matters, it would be hardly becoming; for even here due proportion consists in contraction and amplification as the subject requires. Wherefore those who practise this artifice must conceal it and avoid the appearance of speaking artificially instead of naturally; for that which is natural persuades, but the artificial does not. For men become suspicious of one whom they think to be laying a trap for them, as they are of mixed wines. Such was the case with the voice of Theodorus as contrasted with that of the rest of the actors; for his seemed to be the voice of the speaker, that of the others the voice of someone else. Art is cleverly concealed when the speaker chooses his words from ordinary language [3_12] and puts them together like Euripides, who was the first to show the way.

关于以上各点，我们就说到这里。说回风格，它的一个主要优点可定义为明晰。这体现在一篇演说如果意思表达得不清楚，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上；它既不应该太平实，也不应该超出题材的庄严性，而是应该力求适切；须知诗化风格也许并不平淡，却不适合散文。在名词和动词中，只有普通词语才能使风格明晰；《诗学》中讲到的所有其他词语都会提升风格，使之华美；须知偏离常见词语会使风格显得更加庄严。在这方面，人们对风格的感觉就像对外地人和本地人的感觉一样。因此，我们应该使自己的语言具有一种“异域情调”，因为人们仰慕远方的东西，而能够激发仰慕之情的东西是令人愉悦的。在诗歌创作中，很多东西都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点，而且对诗歌而言也很是适宜，因为诗歌的题材和人物是超越平凡的。可是在散文中，适合这些方法的情况就少得多，因为散文的题材升华得没有那么高；而且即使是在诗歌中，假如华美的语言出自奴隶或年轻人之口，或者讲述的是相当琐碎的事情，也很难做到相宜；因为即使在诗歌中，为求适合，也需要根据题材压低或拔高风格。因此，运用这种技巧的人必须把它遮掩起来，以免说话显得矫揉造作，而非语出自然；须知自然的东西才有说服力，矫揉造作则没有。因为人们会怀疑在他们看来给自己设圈套的人，就像怀疑酒里掺了水一样。演员忒俄多洛斯的声音有别于其他演员的声音，就是这种情况；他的声音就像是剧中说话人的声音，而其他演员的声音则像别的什么人的声音。演讲者如果像欧里庇得斯一样从日常语言中选取词汇，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巧妙地遮掩技巧。欧里庇得斯开了这方面的先河。

Nouns and verbs being the components of speech, and nouns being of the different kinds which have been considered in the *Poetics* , of these we should use strange, compound, or coined words only rarely and in few places. We will state later [3_13] in what places they should be used; the reason for this has already been mentioned, namely, that it involves too great a departure from suitable language. Proper and appropriate words and metaphors are alone to be employed in the style of prose; this i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no one employs anything but these. For all use metaphors in conversation, as well as proper and appropriate words; wherefore it is clear that, if a speaker manages well, there will be some thing “foreign” about his speech, while possibly the art may not be detected, and his meaning will be clear. And this, as we have said, is the chief merit of rhetorical language. (In regard to nouns, homonyms are most useful to the sophist, for it is by their aid that he employs captious arguments, and synonyms to the poet. Instances of words that are both proper and synonymous are “going” and “walking”: for these two words are proper and have the same meaning.) [3_14]

名词和动词是构成话语的成分，名词的不同种类在《诗学》里已经讲过。在这些不同种类的名词中，奇词、双字复合词 [4_6] 或新创词只能在很少的场合下偶尔使用。我们稍后会讲在什么场合应该使用这些词；至于原因，前面已经讲过了，即这类词语过度偏离适中的语言。在散文风格中，只有普通的、本义的词语和隐喻才合用。这一点，体现在除此之外没有人使用其他词汇和隐喻上。这是因为所有人都会在对话中不仅使用普通和本义的词语，而且使用隐喻；因此，很明显，如果一个演讲者能够拿捏得当，他的演讲就会带上一些“异域”情调，而且他的技巧还可能不被听众发觉，他的意思也会清楚明了。这一点，如前所述，恰是修辞性语言最主要的优点。（在各类名词中，同形异义词对诡辩家最有用，因为诡辩家正是借助同形异义词才能抛出诡辩的论证，而同义词对诗人最有用。比如，going和walking就既是普通词又是同义词，因为二者皆普遍使用，且意思相同，都是“走”的意思。）

It has already been stated, as we have said, in the *Poetics* , [3_15] what each of these things [3_16] is, how many kinds of metaphor there are, and that it is most important both in poetry and in prose.

But the orator must devote the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m in prose, since the latter has fewer resources than verse. It is metaphor above all that gives perspicuity, pleasure, and a foreign air, and it cannot be learnt from anyone else; [3_17] but we must make use of metaphors and epithets that are appropriate. This will be secured by observing due proportion; otherwise there will be a lack of propriety, because it is when placed in juxtaposition that contraries are most evident. We must consider, as a red cloak suits a young man, what suits an old one; for the same garment is not suitable for both. And if we wish to ornament our subject, we must derive our metaphor from the better species under the same genus; if to depreciate it, from the worse. Thus, to say (for you have two opposites belonging to the same genus) that the man who begs prays, or that the man who prays begs (for both are forms of asking) [3_18] is an instance of doing this; as, when Iphicrates [3_19] called Callias [3_20] a mendicant priest instead of a torch-bearer, Callias replied that Iphicrates himself could not be initiated, otherwise he would not have called him mendicant priest but torch-bearer; [3_21] both titles indeed have to do with a divinity, but the one is honorable, the other dishonorable. And some call actors flatterers of Dionysus, whereas they call themselves "artists." Both these names are metaphors, but the one is a term of abuse, the other the contrary. Similarly, pirates now call themselves purveyors; [3_22] and so it is allowable to say that the man who has committed a crime has "made a mistake," that the man who has "made a mistake" is "guilty of crime", and that one who has committed a theft has either "taken" or "ravaged." The saying in the *Telephus* of Euripides, "Ruling over the oar and having landed in Mysia," is inappropriate, because the word ruling exceeds the dignity of the subject, and so the artifice can be seen. Forms of words also are faulty, if they do not express an agreeable sound; for instance, Dionysius the Brazen [3_23] in his elegiacs speaks of poetry

as “the scream of Calliope;” both are sounds, but the metaphor is bad, because the sounds have no meaning. [3_24]

如前所述 [4_7] ，《诗学》里面已经讲过各种词语分别指什么，隐喻有多少种类，还提到隐喻在诗歌和散文中都非常重要。不过，散文中的隐喻运用，尤其需要演说者多加注意，因为可供后者使用的隐喻资源比诗歌要少。隐喻比其他任何手段都更能使风格明晰、愉悦和富有异域情调，而且隐喻手法是无法向别人学习的；不过，我们在使用隐喻和附加描述词 [4_8] 时应求其适合。要把握这一点，需要依循匀称的比例，否则就会显得不恰当，因为在隐喻中，两件事并列在一起时，对立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红斗篷适合年轻人，至于什么适合老年人就需要斟酌，因为同一件斗篷不会同时适合这两者。如果我们想赞美某个主题，就应该从同类事物中较好的那个提取隐喻；如果想贬低某个主题，就应该从同类事物中较差的那个提取隐喻。举个例子（因为同一个类别中会有两个对立体），既可以说乞讨者在祈祷，也可以说祈祷者在乞讨 [4_9] （因为二者都是请求的方式）。再比如，伊菲克拉底称卡利阿斯为化缘祭司，而不是火炬祭司；卡利阿斯则回敬说，伊菲克拉底本人一定未被教会接受，否则他就不会称自己为化缘祭司而是火炬祭司了。这两个称呼都与圣职有关，但是一个是光荣的，另一个则是不光荣的。再比如，有些人把演员称为狄俄尼索斯的奉承者，演员们却称自己为“艺术家”。这两个称呼都是隐喻，但是第一个是侮辱性的，第二个则相反。与此相似，海盗现在自称为“物资筹备者”；同样，我们可以说一个犯罪的人“犯了错”，也可以说一个犯错的人“犯了罪”；而一个窃贼既可以说是“拿了东西”，也可以说是“抢了东西”。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忒勒福斯》中所说的“他主宰着船桨，在密细亚登陆”是不恰当的，因为“主宰”这个词超过了题材的庄严度，剧作家的手法也因此被暴露。词汇的形式如果没有悦耳的声音相伴，也是一种缺陷；比如，青铜诗人狄奥尼西奥斯 [4_10] 在他的碑铭体诗中把诗歌称作“卡利俄珀 [4_11] 的尖叫”；虽然二者，即尖叫和诗歌，都发出声音，但是这个隐喻却很蹩脚，因为尖叫的声音是毫无意义的。

Further, metaphors must not be far-fetched, but we must give names to things that have none by deriving the metaphor from what is akin and of the same kind, so that, as soon as it is uttered, it is clearly seen to be akin, as in the famous enigma, “I saw a man who glued bronze with fire upon another.” There was no name for what took place, but as in both cases there is a kind of application, he call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upping-glass gluing. [3_25] And, generally speaking, clever enigmas furnish good metaphors; for metaphor is a kind of enigma, so that it is clear that the transference is clever. Metaphors should also be derived from things that are beautiful, the beauty of a word consisting, as Licymnius says, in its sound or sense, and its ugliness in the same. There is a third condition, which refutes the sophistical argument; for it is not the case, as Bryson [3_26] said, that no one ever uses foul language, if the meaning is the same whether this or that word is used; this is false; for one word is more proper than another, more of a likeness, and better suited to putting the matter before the eyes. Further, this word or that does not signify a thing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thus for this reason also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one word is fairer or fouler than the other. Both, indeed, signify what is fair or foul, but not qua fair or foul; or if they do, it is in a greater or less degree. Metaphors therefore should be derived from what is beautiful either in sound, or in signification, or to sight, or to some other sense. For it does make a difference, for instance, whether one says “rosy-fingered morn,” rather than “purple-fingered,” or, what is still worse, “red-fingered.”

另外，隐喻一定不能牵强；给没有名字的东西命名时要从同类相近的东西中提取隐喻，如此一来，这个名字一经说出口，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与所命名的东西相近，比如那则有名的谜语：“我看到

一个人用火把铜黏贴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个动作本来是没有名字的，但是两者，即谜面和谜底所指的事情，都包含敷贴动作，所以拔火罐被称作黏贴。一般而言，巧妙的谜语都包含很好的隐喻；因为隐喻就是一种谜语，显而易见，其中的转义是巧妙的。隐喻还应当从美好的事物中提取，而词汇的美好，正如利铿尼俄斯 [4_12] 所言，在于其声音或意义；词汇的丑陋也在于此。还有第三点需要注意，这一点可用来驳斥诡辩论的说法：事实并非像诡辩论者布律宋所说，没有人会说丑陋的话，只要意思相同，用这个词或那个词都可以。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在两个词当中一定有一个比另一个更合适，更与事物相配，更能将其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且，这个词或那个词并不是在同样的情形下指代同一个事物；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一个词会比另一个词更美或者更丑。诚然，两个词都可以表示美或丑的东西，但并非只表示美丑；即使是，也有程度高低之分。因此，隐喻应当从具有声音美或意义美或能引起视觉或其他感官上的美感的东西中提取。比如，说“玫瑰色手指的曙光女神”比说“紫色手指的曙光女神”的确要好，比说“红色手指的曙光女神”更要好得多。

As for epithets, they may be applied from what is vile or disgraceful, for instance, “the matricide,” or from what is more honorable, for instance, “the avenger of his father.“ [3_27] When the winner in a mule-race offered Simonides a small sum, he refused to write an ode, as if he thought it beneath him to write on half-asses; but when he gave him a sufficient amount, he wrote, “Hail, daughters of storm-footed steeds!“ [3_28] and yet they were also the daughters of asses. Further, the use of diminutives amounts to the same. It is the diminutive which makes the good and the bad appear less, as Aristophanes in the *Babylonians* jestingly uses “goldlet, cloaklet, affrontlet, diseaselet” instead of “gold, cloak, affront, disease.” But one must be careful to observe the due mean in their use as well as in that of epithets.

至于附加描述词，它们的使用可以着眼于邪恶或可耻的意义，比如“弑母者[4_13]”；也可以着眼于荣耀的意义，比如“为父报仇者”。再比如，当骡车竞赛的获胜者给诗人西摩尼得斯的钱很少时，西摩尼得斯就拒绝为他写颂诗，好像他觉得吟咏“半驴”有失身份似的；但是当那个获胜者给他的钱足够多时，他就写道：“为你欢呼，风驰电掣般的良驹的女儿！”尽管它们（即骡子[4_14]）还是驴的女儿。此外，使用指小词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正是指小词使事物显得没有那么好，或没有那么坏，比如阿里斯多芬尼斯在喜剧《巴比伦人》中诙谐地使用“小金币、小斗篷、小嘲弄、小病痛”[4_15]代替“金币、斗篷、嘲弄、病痛”。但是，使用它们和附加描述词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分寸。

Chapter 3

第三章

Frigidity of style arises from four causes: first, the use of compound words, as when Lycophron [3_29] speaks of the “many-faced sky of the mighty-topped earth,” “narrow-passaged shore”; and Gorgias of “a begging-poet flatterer,” “those who commit perjury and those who swear right solemnly.“ [3_30] And as Alcidamas says, “the soul full of anger and the face fire-colored,” “he thought that their zeal would be end-accomplishing,” “he made persuasive words end-accomplishing,” and “the azure-colored floor of the sea,” for all these appear poetical because they are compound.

风格的呆板是由四种原因造成的：第一，使用双字复合词，比如吕科佛戎的“崇山峻岭上的多面孔的天空”、“通道狭窄的海岸”，还有高尔吉亚的“乞丐诗人一样的奉承者”、“那些假惺惺赌咒的人和那些正

儿八经发誓的人”。再比如阿尔西达麦的“充满愤怒的灵魂和烈火般颜色的面庞”，“他以为他们的热诚是会实现目标的”，“他使劝说的话变得目标明确”以及“天蓝色的海底”。所有这些表达都运用了双字复合词，所以听起来像诗歌。

This is one cause of frigidity; another is the use of strange words; as Lycophron calls Xerxes “a monster of a man,” Sciron “a human scourge”; [3_31] and Alcidamas says “plaything in poetry,” “the audaciousness of nature,” “whetted with unmitigated wrath of thought.”

这是风格呆板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使用奇词，比如吕科佛戎称薛西斯为“人怪”，称斯喀戎为“瘟人”；再比如阿尔西达麦说的“诗歌中的玩物”、“大自然的孟浪”和“被思想的强烈愤怒所磨砺”。

A third cause is the use of epithets that are either long or unseasonable or too crowded; thus, in poetry it is appropriate to speak of white milk, but in prose it is less so; and if epithets are employed to excess, they reveal the art and make it evident that it is poetry. And yet such may be used to a certain extent, since it removes the style from the ordinary and gives a “foreign” air. But one must aim at the mean, for neglect to do so does more harm than speaking at random; for a random style lacks merit, but excess is vicious. That is why the style of Alcidamas appears frigid; for he uses epithets not as a seasoning but as a regular dish, so crowded, so long, and so glaring are they. For instance, he does not say “sweat” but “damp sweat”; not “to the Isthmian games” but “to the solemn assembly of the Isthmian games”; not “laws”, but “the laws, the rulers of states”; not “running”, but “with a race-like impulse of

the soul”; not “museum”, but “having taken up the museum of nature”; [3_32] and “the scowling anxiety of the soul”; “creator”, not “of favor”, but “all-popular favor”; and “dispenser of the pleasure of the hearers”; “he hid,” not “with branches,” but “with the branches of the forest”; “he covered,” not “his body,” but “the nakedness of his body.” He also calls desire “counter-initiative of the soul”—an expression which is at once compound and an epithet, so that it becomes poetry—and “the excess of his depravity so beyond all bounds.” Hence those who employ poetic language by their lack of taste make the style ridiculous and frigid, and such idle chatter produces obscurity; for when words are piled upon one who already knows, it destroys perspicuity by a cloud of verbiage. People use compound words, when a thing has no name and the word is easy to combine, as χρονοτριβεῖν, to pass time; but if the practice is abused, the style becomes entirely poetical. This is why compound words are especially employed by dithyrambic poets, who are full of noise; strange words by epic poets, for they imply dignity and self-assertion; metaphor to writers of iambics, who now employ them, as we have stated.

第三个原因是使用的附加描述词太长、不合时宜或者太滥。因此，在诗歌中说“白色的牛奶”是适宜的，但是在散文中就不那么恰当；而且如果附加描述词使用过度，就会暴露手法，让人一眼就觉察这是诗歌。不过，附加词还是可以适度地使用的，因为这样可以使风格超脱平凡，带上“异域”情调。但是我们必须力求适中，因为过度修饰比随口胡诌还要有害；要知道随意的风格只是无益，而过度的雕琢却是有害。这就是为什么阿尔西达麦的风格显得呆板，因为他不是把附加描述词作为调料使用，而是当作主菜，显得格外拥挤、冗长、刺眼。比如，他不说“汗水”，而说“潮湿的汗水”；不说“赴伊斯米亚运动会 [4_16] ”，而说“赴伊斯米亚运动的庄严集会”；不说“法律”，而说“法律，城邦的统治者”；不说“跑”，而说“灵魂的飞速冲动”；不说“博物

馆”，而说“承载了大自然的博物馆”；还说“灵魂的愁眉不展的焦虑”；不说“恩惠的创造者”，而说“全民恩惠的创造者”；还有“播撒愉悦给听众的人”；不说“他用树枝掩盖”，而说“他用森林的树枝掩盖”；不说“他遮住身体”，而说“他遮住身体的赤裸”。他还把欲望叫做“灵魂的反创造力”，这个说法既是双字复合词，又是附加描述词，直奔诗歌风格，更不用说“过度的邪恶超过了所有局限”这样的说法了。总之，因没有品味而滥用诗化语言的人，会使风格笨拙呆板，这种徒劳的唠叨只会使得意思模糊不清；要知道听者已经懂了，你却还要堆砌词藻，这只会给语言蒙上一层赘语的阴云，破坏其明晰度。如果一件东西没有名字，而相关的字又比较好复合，人们就会使用双字复合词，比如χρονοτριβεῖν，以消磨时间；但是如果滥用这种方法，风格就会完全诗化。这就是为什么写酒神赞歌的诗人尤其爱用双字复合词，因为他们喧闹异常；而写史诗的诗人爱用奇词，因为这种词突显庄严和高傲；写短长格诗的诗人爱用隐喻，并且，如前所述，现在还在使用。

The fourth cause of frigidity of style is to be found in metaphors; for metaphors also are inappropriate, some because they are ridiculous—for the comic poets also employ them—others because they are too dignified and somewhat tragic; and if they are farfetched, they are obscure, as when Gorgias says: “Affairs pale and bloodless”; [3.33] “you have sown shame and reaped misfortune”; for this is too much like poetry. And as Alcidamas calls philosophy “a bulwark of the laws,“ [3.34] and the *Odyssey* “a beautiful mirror of human life,” and “introducing no such plaything in poetry.” All these expressions fail to produce persuasion, for the reasons stated. As for what Gorgias said to the swallow which, flying over his head, let fall her droppings upon him, it was in the best tragic style. He exclaimed, “Fie, for shame, Philomela!” For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thing in this act disgraceful for a bird, whereas it would have been for a young lady. The reproach

therefore was appropriate, addressing her as she was, not as she is.

风格呆板的第四个原因与隐喻有关。隐喻也有不适宜的，有些是因为滑稽，须知喜剧诗人也使用隐喻，另一些则是因为太过庄严，还有点悲剧意味；而且如果隐喻比较牵强，意思就会含糊，比如高尔吉亚所说的“苍白而没有血色的事件”和“你种下耻辱，收获灾难”；须知这类表达太像诗歌了。再比如，阿尔西达麦把哲学称为“法律的堡垒”，把荷马史诗《奥德赛》称为“人类生活的美丽镜子”，还说“不要在诗歌中介绍这种玩物”。所有这些表达都不足以说服听众，原因如前所述。至于高尔吉亚对那只飞过他头顶、将屎拉在他身上的燕子所说的话，倒是最具悲剧风格。他喊道：“呸！真丢脸，菲洛梅拉 [4_17] ！”要知道这件事对鸟儿来说并没有什么丢脸的，而对少女而言则的确很丢脸。叫她过去的名字而不是现在的名字，这样的责备真是巧妙。

Chapter 4

第四章

The simile also is a metaphor; for there is very little difference. When the poet says of Achilles, [3_35] “he rushed on like a lion,” it is a simile; if he says, “a lion, he rushed on,” it is a metaphor; for because both are courageous, he transfers the sense and calls Achilles a lion. The simile is also useful in prose, but should be less frequently used, for there is something poetical about it. Similes must be used like metaphors, which only differ in the manner stated. The following are examples of similes. Androtion [3_36] said of Idrieus that he was like curs just unchained; for as they attack and bite, so he when loosed from his bonds was dangerous. Again, Theodamas likened Archidamus to a Euxenus ignorant of geometry,

by proportion; [3_37] for Euxenus “will be Archidamus acquainted with geometry.” Again, Plato in the *Republic* [3_38] compares those who strip the dead to curs, which bite stones, but do not touch those who throw them; he also says that the people is like a ship's captain who is vigorous, but rather deaf; [3_39] that poets' verses resemble those who are in the bloom of youth but lack beauty; [3_40] for neither the one after they have lost their bloom, nor the others after they have been broken up, [3_41] appear the same as before. Pericles said that the Samians were like children who cry while they accept the scraps. [3_42] He also compared the Boeotians to holm-oaks; for just as these are beaten down by knocking against each other, [3_43] so are the Boeotians by their civil strife. Demosthenes compared the people to passengers who are seasick. [3_44] Democrates said that orators resembled nurses who gulp down the morsel and rub the babies' lips with the spittle. [3_45] Antisthenes likened the skinny Cephisodotus to incense, for he also gives pleasure by wasting away. All such expressions may be used as similes or metaphors, so that all that are approved as metaphors will obviously also serve as similes which are metaphors without the details. But in all cases the metaphor from proportion should be reciprocal and applicable to either of the two things of the same genus; for instance, if the goblet is the shield of Dionysus, then the shield may properly be called the goblet of Ares. [3_46]

明喻也是一种隐喻，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小。诗人荷马在提到阿喀琉斯时，如果说“他像一头雄狮一样奔跑”，这是明喻；如果说“他这头雄狮在奔跑”，这便是隐喻；因为喻体和本体两者都是勇敢的，所以诗人转移意义，直接把阿喀琉斯叫做雄狮。明喻对散文也是有用的，但是使用频率应该低一些，因为明喻中有诗化因素。使用明喻应该和使用隐喻一样，差异只有上面提到的一点。下面都是明喻的例子。安德洛提翁提到伊德里欧斯 [4_18] 时，说他像刚刚被解开锁链的恶犬：

狗会攻击，会咬人，伊德里欧斯一旦被释放也会如此，所以很危险。再比如，忒俄达玛斯用类比法把阿尔喀达摩斯比作不懂几何学的欧克塞诺斯，因为欧克塞诺斯就是“懂几何学的阿尔喀达摩斯”。再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剥死者衣服的人比作恶犬，后者撕咬石头，却不敢碰扔石头的人；他还说民众就像一艘船的船长，精力充沛却未免耳聋；又说诗人的诗行就像正值青春却缺乏美貌的人，因为诗行一旦被打乱，就如同没有美丽容颜的青年人失去青春，会显得跟从前大不一样。伯里克利 [4_19] 说萨摩斯岛的人就像孩子，一边接受面包屑，一边哭泣。他还把皮奥夏人比作圣栎树，因为圣栎树是被用圣栎树做把手的斧头砍倒的 [4_20] ，同样，皮奥夏人是被国内纷争拖垮的。狄摩西尼把民众比作晕船的乘客 [4_21] 。德摩克拉提斯说演说家就像奶妈，自己把食物一口吞下，只用唾沫擦擦婴儿的嘴 [4_22] 。安提斯忒涅斯把瘦削的刻菲索多托斯比作熏香，因为他也像熏香一样消耗自己，愉悦他人。所有这些表达都既可用作明喻，亦可用作隐喻，因此所有受欢迎的隐喻显然也都可以用作明喻，而明喻去掉了细节其实就是隐喻。不过，在所有情形下，类比式隐喻的本体和喻体都应当是可以互换的，而且对同一种类的两个事物都适用；比如，如果说酒杯是狄俄尼索斯的盾，那么盾也可以说是阿瑞斯的酒杯 [4_23] 。

Chapter 5

第五章

Such then are the elements of speech. But purity,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style, depends upon five rules. First, connecting particles should be introduced in their natural order, before or after, as they require; thus, μέν and ἐγὼ μέν require to be followed by δέ and ὁ δέ . Further, they should be made to correspond whilst the hearer still recollects; they should not be put too far apart, nor should a clause be introduced before the necessary connection; [3_47] for this is rarely appropriate. For instance, “As for me, I, after he

had told me—for Cleon came begging and praying—set out, taking them with me." For in this phrase several connecting words have been foisted in before the one which is to furnish the apodosis; and if the interval between "I" and "set out" is too great, the result is obscurity. The first rule therefore is to make a proper use of connecting particles; the second, to employ special, not generic terms. The third consists in avoiding ambiguous terms, unless you deliberately intend the opposite, like those who, having nothing to say, yet pretend to say something; such people accomplish this by the use of verse, after the manner of Empedocles. [3_48] For the long circumlocution takes in the hearers, who find themselves affected like the majority of those who listen to the soothsayers. For when the latter utter their ambiguities, they also assent; for example, "Croesus, by crossing the Halys, shall ruin a mighty dominion." [3_49] And as there is less chance of making a mistake when speaking generally, diviners express themselves in general terms on the question of fact; for, in playing odd or even, one is more likely to be right if he says "even" or "odd" than if he gives a definite number, and similarly one who says "it will be" than if he states "when." This is why soothsayers do not further define the exact time. All such ambiguities are alike, wherefore they should be avoided, except for some such reason. [3_50] The fourth rule consists in keeping the genders distinct—masculine, feminine, and neuter, [3_51] as laid down by Protagoras; these also must be properly introduced: "She, having come (fem.) and having conversed (fem.) with me, went away." The fifth rule consists in observing number, according as many, few, or one are referred to: "They, having come (pl.), began to beat (pl.) me."

以上就是语言的组成部分。但是，作为风格的基础，语言的纯洁性依赖于五条准则。第一，连接词 [4_24] 必须以其自然的顺序出现，

或前或后，视需要而定；比如，μέν（一方面……）和ἐγὼ μέν（我一方面……）之后需要跟δέ（另一方面……）和ὁ δέ（我另一方面……）。再者，应该在听众仍有印象时使用相呼应的连接词，而且还不应分得太开；另外，进行必要的连接之前不应引出子句，要知道这样做很少是适宜的。比如，“至于我，在他告诉我之后，因为克勒翁过来又是乞求又是祈祷，出发了，还带上了他们。”在这个短句中，插入了好几个连接词之后才用一个连接词引出完结子句[4_25]；而且，因为“我”和“出发”之间间隔太长，所以造成了模糊。因此，第一条规则就是恰当地使用连接词。第二条是使用具体名称，而不是泛指名称[4_26]。第三条是避免使用含糊的说法，除非你有意讲含糊的话。比如有些人，明明没什么可说的，却假装有话要说；这些人通常效法哲学家恩培多克勒，利用韵文来做到这一点。要知道冗长而又迂回的话语可以欺骗听众，他们会发现自己受到感染，就像听占卜者讲话的大多数人一样。因为当后者讲模棱两可的话时，听众也会表示同意，比如：“克洛索斯王[4_27]，渡过哈律斯河，将毁灭一个强大的帝国。”另外，因为讲笼统的话比较不容易犯错，所以预言者谈论事实问题时总是使用笼统的说法；要知道，在奇偶猜数游戏中，说“奇数”或“偶数”比给出一个具体数字猜对的机会要大得多；类似地，预言者说“将会发生”比说“何时发生”正确的机会也要大得多。正因如此，占卜者们都不会进一步明示具体的时间。所有这些含糊的话语皆大同小异，因此都应该避免，除非为了上述误导听众的目的。第四条规则是遵修辞学家普罗泰哥拉确定的标准，分清词性，是阳性、阴性还是中性，将这些都交待清楚，比如：“她来了，与我交谈了一番，然后走了[4_28]。”第五条规则是遵守数的要求，厘清所指的是多数、少数还是单数，比如：“他们来了之后，开始打我[4_29]。”

Generally speaking, that which is written should be easy to read or easy to utter, which is the same thing. Now, this is not the case when there are a number of connecting particles, or when the punctuation is hard, as in the writings of Heraclitus. [3_52] For it is hard, since it is uncertain to which word another belongs, whether

to that which follows or that which precedes; for instance,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composition he says: “Of this reason which exists [3_53] always men are ignorant,” where it is uncertain whether “always” should go with “which exists” or with “are ignorant.” Further, a solecism results from not appropriately connecting or joining two words with a word which is equally suitable to both. For instance, in speaking of “sound” and “color”, the word “seeing” should not be used, for it is not suitable to both, whereas “perceiving” is. It also causes obscurity, if you do not say at the outset what you mean, when you intend to insert a number of details in the middle; for instance, if you say: “I intended after having spoken to him thus and thus and in this way to set out” instead of “I intended to set out after having spoken to him,” and then this or that happened, in this or that manner.

一般而言，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易于阅读或言说，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不过，如果有很多连接词，或者很难加标点断句，比如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给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加标点很难，因为不确定哪个字从属哪个字，是后面的还是前面的。比如，在其著作的开头，他说：“这个原因存在着永远人们却不了解”，在这里我们无法确定“永远”是和“存在着”在一起还是和“不了解”在一起。另外，如果有一个词与两个词连用同样适合，却未能恰当地使用该词来连接或组合这两个词，也会造成语法错误。比如，提到“声音”和“颜色”时，就不应该用“看”字，因为这个字不能同时描述声音和颜色，而“感知”却可以。一开始没有把意思交代清楚，却打算在中间插入大量细节，也会造成含糊；比如，如果你说：“我打算先跟他谈谈这事那事，以这种方式出发”，而不是说“我打算跟他谈过之后就出发”，然后“这事那事以这种那种方式发生了 [4_30] ”，意思就会含糊不清。

Chapter 6

第六章

The following rules contribute to loftiness of style. Use of the description instead of the name of a thing; for instance, do not say “circle,” but “a plane figure, all the points of which are equidistant from the center.” But for the purpose of conciseness the reverse—use the name instead of the description. You should do the same to express anything foul or indecent; if the foulness is in the description, use the name; if in the name, the description. Use metaphors and epithets by way of illustration, taking care, however, to avoid what is too poetical. Use the plural for the singular,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poets, who, although there is only one harbor, say “to Achaean harbors,” and, “Here are the many-leaved folds of the tablet.“ [3_54] You should avoid linking up, but each word should have its own article: τῆς γυναικὸς τῆς ἡμετέρας . But for conciseness, the reverse: τῆς ἡμετέρας γυναικός . Employ a connecting particle or for conciseness omit it, but avoid destroying the connection; for instance “having gone and having conversed with him,” or, “having gone, I conversed with him.” Also the practice of Antimachus is useful, that of describing a thing by the qualities it does not possess; thus, in speaking of the hill Teumessus, [3_55] he says, “There is a little windswept hill;” for in this way amplification may be carried on ad infinitum. This method may be applied to things good and bad, in whichever way it may be useful. Poets also make use of this in inventing words, as a melody “without strings” or “without the lyre”; for they employ epithets from negations, a course which is approved in proportional metaphors, as for instance, to say that the sound of the trumpet is a melody without the lyre.

下面这些准则可以帮助实现崇高的风格。第一，描述某物而不称

其名，比如，不说“圆圈”，而说“平面中到中心点的距离为等值的所有点的集合”。但是，为了精简起见，就需要使用相反的手法，即称某物之名而不是描述它。讲述不雅或粗鄙之事时应使用同样的手法；若不雅之处在于描述，就称其名；若在于名称，就述其状。第二，使用隐喻和附加描述词来说明，但是要谨慎，避免过于诗化。第三，使用复数代替单数，诗人们便是这样做的，比如，即使只有一个港口，他们也会说“去亚加亚 [4_31] 的各个港口”，再比如“这就是写字板的众多折页”。第四，避免用一个冠词统领不同的词，而应该让每个词都拥有自己的冠词，比如：τῆς γυναικὸς τῆς ἡμετέρας（属于我们的女人）。但是为了精简起见，就要使用相反的手法，比如：τῆς ἡμετέρας γυναικός（属于我们的女人）。第五，使用连接词，或者为了精简省去连接词，但要避免破坏衔接；比如“去到那里并且与他谈了话”，或者“我去到那里，与他谈了话”。诗人安提玛科斯的做法也很有用，即描述一件东西不具备的品质。比如讲到特摩索斯山的时候，他说：“有一座微风拂过的小山”；须知用这种方式进行铺陈，可以没有止境。这种方法既适于好事物，也适于坏事物，就看哪种对描写有用。诗人们也用此法创造新词，比如说“无弦的”或“无琴的”乐曲；这里他们用否定的方法使用附加描述词，这也是类比式隐喻中被认可的做法，比如，说号角的声音是无琴的曲调 [4_32] 。

Chapter 7

第七章

Propriety of style will be obtained by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and character, and by proportion to the subject matter. Style is proportionate to the subject matter when neither weighty matters are treated offhand, nor trifling matters with dignity, and no embellishment is attached to an ordinary word; otherwise there is an appearance of comedy, as in the poetry of Cleophon, [3_56] who used certain expressions that reminded one of saying “madam fig.”

Style expresses emotion, when a man speaks with anger of wanton outrage; with indignation and reserve, even in mentioning them, of things foul or impious; with admiration of things praiseworthy; with lowliness of things pitiable; and so in all other cases. Appropriate style also makes the fact appear credible; for the mind of the hearer is imposed upon [3_57]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speaker is speaking the truth, because, in such circumstances, his feelings are the same, so that he thinks (even if it is not the case as the speaker puts it) that things are as he represents them; and the hearer always sympathizes with one who speaks emotionally, even though he really says nothing. This is why speakers often confound their hearers by mere noise.

风格若能表现情感和品性，又切合主题，就是适合的。不草率对待重要的主题，不过分抬高不重要的主题，不雕饰普通词汇，这样的风格就是切合主题的。否则，就会显得像滑稽剧，如同克莱奥丰的诗歌一样，他用的一些词句会让人想起“无花果夫人”之类的滑稽说法。风格可以表达情感，比如，演讲者讲到暴行时使用愤怒的口吻，讲到甚至提及丑陋或邪恶之事时使用愤慨和慎重的口吻，讲到可称赞之事时使用赞赏的口吻，讲到可怜之事时使用忧郁的口吻，其他情况依此类推。合适的风格还能使事实显得可信，须知听者心里会由此得出错误的印象，认为演讲者说的是真话，因为听者自己在那种情形下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所以会认为事情正如演讲者所说（即使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听者总是同情那些言语动情的演说者，即使他言之无物。正因如此，演说者常常只是大嚷大叫，迷惑听者。

Character also may be expressed by the proof from signs, because to each class and habit there is an appropriate style. I mean class in reference to age—child, man, or old man; to sex—man or woman; to country—Lacedaemonian or Thessalian. I call habits

those moral states which form a man's character in life; for not all habits do this. If then anyone uses the language appropriate to each habit, he will represent the character; for the uneducated man will not say the same things in the same way as the educated. But the hearers also are impressed in a certain way by a device employed ad nauseam by writers of speeches [3_58] : “Who does not know?” “Everybody knows”; for the hearer agrees, because he is ashamed to appear not to share what is a matter of common knowledge.

利用现象进行证明也能表现品性，因为不同种类和习惯的人都有各自适合的风格。我所说的种类指的是年龄，是儿童、成人或老人；性别，是男人或女人；还有国家，比如拉栖第梦人或帖撒利人。我所说的习惯是指构成一个人生活中的品性的道德习性，要知道并非所有习性都能如此。那么，只要使用切合某种习惯的语言，任何人都能表现出相应的品性；须知无教养的人和有教养的人所说的话以及说话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不过，听众亦会被演说辞作者滥用的一个伎俩所打动，即问听众：“这件事谁人不知？”“这件事人尽皆知”；听闻此言，听者都会认同，因为他若表现出不知道一件众所周知的事会很丢人。

The opportune or inopportune use of these devices applies to all kinds of Rhetoric. [3_59] But whenever one has gone too far, the remedy may be found in the common piece of advice—that he should rebuke himself in advance; [3_60] then the excess seems true, since the orator is obviously aware of what he is doing. Further, one ought not to make use of all kinds of correspondence [3_61] together; for in this manner the hearer is deceived. I mean, for instance, if the language is harsh, the voice, features, and all things connected should not be equally harsh; otherwise what each really is becomes evident. But if you do this in one instance and not in another, the

art escapes notice, although the result is the same. If mild sentiments are harshly expressed or harsh sentiments mildly, the speech lacks persuasiveness.

这些手法的恰当运用和不恰当运用，均见于所有修辞种类。但是，无论哪种手法用得过火了，挽救之法皆在一句老生常谈：演说者应该预先自责，如此一来过火处也就显得真实了，因为能预先自责的演说者看起来显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4_33] 。再者，演说者不可同时使用各种匹配手法，因为这样才能骗过听众。我指的是，比如，如果措辞凌厉，则声音、面孔以及相关的其他方面就不必同样凌厉；否则各种手法都会暴露无疑。但是，如果你只在某处偶然为之，在别处则不用此法，就不会被听众发现，可是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如果用严厉的话语表达温和的情绪或用温和的话语表达严厉的情绪，演讲都会缺少说服力。

Compound words, a number of epithets, and “foreign” words especially, are appropriate to an emotional speaker; for when a man is enraged it is excusable for him to call an evil “high-as-heaven” or “stupendous.” He may do the same when he has gripped his audience and filled it with enthusiasm, either by praise, blame, anger, or friendliness, as Isocrates does at the end of his *Panegyricus* [3_62] : “Oh, the fame and the name!” and “In that they endured.” For such is the language of enthusiastic orators, and it is clear that the hearers accept what they say in a sympathetic spirit. Wherefore this style is appropriate to poetry; for there is something inspired in poetry. It should therefore be used either in this way or when speaking ironically, after the manner of Gorgias, or of Plato in the *Phaedrus* . [3_63]

双字复合词，一部分附加描述词，尤其是“外来”词，适合情绪激动的演说者使用；要知道一个人盛怒之下即使说一桩恶行“罪恶滔天”或“惊世骇俗”，也是会被听众原谅的。演说者若已经控制住听众，并用赞扬、谴责、愤怒或友谊等激发起听众的热情，比如伊索克拉底在《泛希腊集会辞》结尾时所说的“哦，多么伟大的名誉和名声！”和“他们看到城邦荒废，心中多么难受”。要知道情绪激昂的演说者用的便是此类语言，可见，听众也是怀着同样的情绪接受演说者所说之言的。因此，这种风格适用于诗歌，因为诗歌中总有一些东西能被激发出来。也因此，这种风格应该在上述情况下使用或用于讥讽，比如像高尔吉亚或者像柏拉图在《斐德若篇》[4_34] 中的做法。

Chapter 8

第八章

The form of diction should be neither metrical nor without rhythm. If it is metrical, it lacks persuasiveness, for it appears artificial,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distracts the hearer's attention, since it sets him on the watch for the recurrence of such and such a cadence; just as, when the public criers ask, “Whom does the emancipated [3_64] choose for his patron?” the children shout “Cleon.” If it is without rhythm, it is unlimited, whereas it ought to be limited (but not by meter); for that which is unlimited is unpleasant and unknowable. Now all things are limited by number, and the number belonging to the form of diction is rhythm, of which the meters are divisions. [3_65] Wherefore prose must be rhythmical, but not metrical, otherwise it will be a poem. Nor must this rhythm be rigorously carried out, but only up to a certain point.

散文的措辞形式不应有格律，亦不能无节奏。如果有格律，就会

缺乏说服力，因为这样会显得做作，同时还会干扰听众的注意力，因为格律会使听众留心某某格何时再次出现。正如公告人问“获释的奴隶选谁做保护人”时，孩子们高喊“克勒翁”。如果没有节奏，就会缺少约束，而散文应该是有些约束的（只是不用格律而已）；因为没有约束的东西不讨人喜欢，也不好懂。所有事物都受数的限制，归属措辞形式的数 [4_35] 就是节奏，格律是节奏的分节。因此，散文必须有节奏，但不能有格律，否则就变成了诗。这种节奏还不能太严格，只要达到一定程度即可。

Of the different rhythms the heroic is dignified, but lacking the harmony of ordinary conversation; the iambic is the language of the many, wherefore of all meters it is most used in common speech; but speech should be dignified and calculated to rouse the hearer. The trochaic is too much like the cordax; this is clear from the tetrameters, which form a tripping rhythm. There remains the paean, used by rhetoricians from the time of Thrasymachus, although they could not define it.

在各种节奏中，英雄格最庄严，但它缺乏日常对话的和谐；短长格是大多数人的语言，因此在所有的格律中，它在日常说话中使用最多；但是演说应该具有一定的庄严性，且运筹得当，以调动听众的情绪。长短格太像科耳达克斯舞蹈的轻快节奏，这在构成轻快节奏的四音步诗行中显而易见。还剩下一种节奏是派安格，自塞拉西马柯时代就为修辞学家所运用，但当时他们并未能定义这种节奏。

The paean is a third kind of rhythm closely related to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for its proportion is 3 to 2, that of the others 1 to 1 and 2 to 1, with both of which the paean, whose proportion is 1 1/2 to 1, is connected. [3_66] All the other meters then are to be

disregarded for the reasons stated, and also because they are metrical; but the paean should be retained, because it is the only one of the rhythms mentioned which is not adapted to a metrical system, so that it is most likely to be undetected. At the present day one kind of paean alone is employed, at the beginning as well as at the end; [3_67] the end, however, ought to differ from the beginning. Now there are two kinds of paeans, opposed to each other. The one is appropriate at the beginning, where in fact it is used. It begins with a long syllable and ends with three short: “Δα¯λο˘γε˘νε˘ςεἴτεΛυ˘κι˘αν, ('O Delos-born, or it may be Lycia'),” and “Χρυ¯σε˘ο˘κό˘μα¯ Ἕ˘κα˘τε˘ παῖΔιό˘ς('Golden-haired far-darter, son of Zeus').” The other on the contrary begins with three short syllables and ends with one long one: “με˘τὰ˘ δε˘ γᾶνὕ˘δα˘τά˘ τ᾽ὠκε˘α˘νὸνἠφά˘νι˘σε˘νύξ *[3_68]* ('after earth and waters, night obscured ocean').” This is a suitable ending, for the short syllable, being incomplete, mutilates the cadence. But the period should be broken off by a long syllable and the end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not by the scribe nor by a punctuation mark, [3_69] but by the rhythm itself. That the style should be rhythmical and not unrhythmical, and what rhythms and what arrangement of them make it of this character, has now been sufficiently shown.

派安格是与上述节奏密切相关的第三种节奏，其比例是3：2，另外两种节奏的比例是1：1和2：1，派安格的比例亦可看作1.5：1，与这两种节奏均密切相关。这样，所有其他的节奏都无需考虑了，除了上面的原因，还因为它们都是格律化的；但是派安格则应该保留，因为在上述节奏中只有派安格不从属格律体系，因此最不容易被听众发觉。如今只有一种派安格为人所用，既用于句头，亦用于句尾；但是，结尾的节奏应该有别于开头。派安格其实有两种，彼此相反。其中一种适用于句头，事实上它也是这样被使用的。它以一个长音节开始，以三个短音节结束，比如：“Δα¯λο˘γε˘νε˘ς εἴτε Λυ˘κι˘αν（哦，

得罗斯或者吕西亚所生的孩子啊）”和“Χρυ῞σε῞ο῞κό῞μα῞ Ἕ῞κα῞τε῞ παῖ Διό῞ς（金发的远投手，宙斯的儿子）”。另一种正好相反，以三个短音节开头，以一个长音节结尾，比如：“με῞τὰ῞ δε῞ γᾶν ὕ῞δα῞τά῞ τ᾽ ὠκε῞α῞νὸν ἠφά῞νι῞σε῞νύξ（在覆盖了地和水之后，夜晚又笼罩了海洋）”。这种结尾是适宜的，要知道短音节因其不完整，会使节奏显得残缺。但是，整句应该以一个长音节收尾，而且结尾必须明确标识：不是由抄写员或标点符号标注，而是由节奏本身表明 [4_36] 。风格应该有节奏，不能无节奏，应该有什么样的节奏以及如何安排使之具有节奏等，到这里就讲清楚了。

Chapter 9

第九章

The style must be either continuous and united by connecting particles, like the dithyrambic preludes, or periodic, like the antistrophes of the ancient poets. The continuous style is the ancient one; for example, “This is the exposi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Herodotus of Thurii.” It was formerly used by all, but now is used only by a few. By a continuous style I mean that which has no end in itself and only stops when the sense is complete. It is unpleasant, because it is endless, for all wish to have the end in sight. That explains why runners, just when they have reached the goal, [3_70] lose their breath and strength, whereas before, when the end is in sight, they show no signs of fatigue. Such is the continuous style. The other style consists of periods, and by period I mean a sentence that has a beginning and end in itself and a magnitude that can be easily grasped. What is written in this style is pleasant and easy to learn, pleasant because it is the opposite of that which is unlimited, because the hearer at every moment thinks he is securing something for himself and that some conclusion has been reached; whereas it

is unpleasant neither to foresee nor to get to the end of anything. It is easy to learn, because it can be easily retained in the memory. The reason is that the periodic style has number, which of all things is the easiest to remember; that explains why all learn verse with greater facility than prose, [3_71] for it has number by which it can be measured. But the period must be completed with the sense and not stop short, as in the iambics of Sophocles, [3_72] “This is Calydon, territory of the land of Pelops;” for by a division of this kind it is possible to suppose the contrary of the fact, as in the example, that Calydon is in Peloponnesus.

风格 [4_37] 要么必须连贯，由连接词统一起来，像酒神赞歌的前奏那样；要么必须回旋，像古代诗人的回旋歌那样。连贯的风格是一种古老的句式，比如：“这是图里人希罗多德 [4_38] 对历史调查的展示。”过去所有人都用这种句式，但是现在只有少数人在用。我所说的连贯风格本身没有结尾，只到意思完成时才停住。这种句式会让人不舒服，因为它没完没了，而人们都希望能看到结尾。这就是为什么赛跑的人一到达终点，就会感到呼吸困难，浑身无力；而在此之前，即使终点就在前方，他们也不会表现出任何疲劳之状。这就是连贯的风格。另一种风格由环形句构成，我所说的环形句是指本身有头有尾、长度容易掌控的句式。用这种风格写出来的句子讨人喜欢，容易理解；讨人喜欢是因为它和没有限制的句子正好相反，能让听众任何时候都觉得自己有所得、有所悟；如果某事的终点遥不可见、遥不可及，那会让人很不舒服。这种句子容易理解是因为容易记住。原因是回旋的风格有数的限制，而数在所有事物中是最容易记住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所有人学韵文都比学散文容易，因为韵文有数律，这使其更容易记忆。但是，环形句必须意思完整，不能中途而断，比如索福克勒斯的短长格诗句：“这地方是卡吕冬，属于伯罗普斯的领土 [4_39] ”，要知道这样划分可能推出相反的意思，即如此例所示，认为卡吕冬在伯罗奔尼撒境内。

A period may be composed of clauses, or simple. The former is a complete sentence, distinct in its parts and easy to repeat in a breath, not divided like the period in the line of Sophocles above, but when it is taken as a whole. [3_73] By clause I mean one of the two parts of this period, and by a simple period one that consists of only one clause. But neither clauses nor periods should be curtailed or too long. If too short, they often make the hearer stumble; for when he is hurrying on towards the measure of which he already has a definite idea, if he is checked by the speaker stopping, a sort of stumble is bound to occur in consequence of the sudden stop. If too long, they leave the hearer behind, as those who do not turn till past the ordinary limit leave behind those who are walking with them. Similarly long periods assume the proportions of a speech and resemble dithyrambic preludes. This gives rise to what Democritus of Chios [3_74] jokingly rebuked in Melanippides, [3_75] who instead of antistrophes composed dithyrambic preludes: “A man does harm to himself in doing harm to another, and a long prelude is most deadly to one who composes it;“ [3_76] for these verses may be applied to those who employ long clauses. Again, if the clauses are too short, they do not make a period, so that the hearer himself is carried away headlong.

环形句可以由多个从句或简单句构成。前者是一个完整句，各部分界限分明，容易一口气读完，不像上面所举的索福克勒斯的环形句那样断开，而是被当作一个整体。我所说的从句是指环形句的两部分之一，简单环形句是指只由一个子句构成的环形句。但是无论从句还是环形句都不应当太短或太长。如果太短，就会让听众摔跤；要知道听众正按照他理解的拍子前行，如果他被演讲者的停顿阻挡，这一突然的中断势必导致某种摔跤。如果太长，就会把听众落在后面，就像越过了界线才返回的人把同行者落在后面一样。与此相似，长的环形句端起了演说的架势，像酒神赞歌的序诗一样散漫。因此，就有开俄

斯岛人德谟克利特 [4_40] ，这样挖苦不写回旋歌却写散漫的酒神赞歌的诗人墨拉尼庇得斯：“要害别人反而害了自己，冗长的酒神赞歌序诗对作者的危害最大”；这话也适用于那些使用冗长子句的人。不过，如果子句太短，就无法构成环形句，以至于听众会向前跌倒。

The clauses of the periodic style are divided or opposed; divided, as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 “I have often wondered at those who gathered together the general assemblies and instituted the gymnastic contests”; [3_77] opposed, in which, in each of the two clauses, one contrary is brought close to another, or the same word is coupled with both contraries; for instance, “They were useful to both, both those who stayed and those who followed; for the latter they gained in addition greater possessions than they had at home, for the former they left what was sufficient in their own country.” Here “staying behind,” “following,” “sufficient,” “more” are contraries. Again: “to those who need money and those who wish to enjoy it”; where “enjoying” is contrary to “acquiring.” Again: “It often happens in these vicissitudes that the wise are unsuccessful, while fools succeed”; “At once they were deemed worthy of the prize of valor and not long after won the command of the sea”; “To sail over the mainland, to go by land over the sea, bridging over the Hellespont and digging through Athos”; “And that, though citizens by nature, they were deprived of the rights of citizenship by law”; “For some of them perished miserably, others saved themselves disgracefully”; “Privately to employ barbarians as servants, [3_78] but publicly to view with indifference many of the allies reduced to slavery”; “Either to possess it while living or to leave it behind when dead.“ [3_79] And what some one said against Pitholaus and Lycophron [3_80] in the lawcourt: “These men, who used to sell you when they were at home, having come to you have bought you.” All these passages are examples of antithesis. This kind of style is

pleasing, because contraries are easily understood and even more so when placed side by side, and also because antithesis resembles a syllogism; for refutation is a bringing together of contraries.

具有环形句风格的从句有分立式和对立式两种。分立式，如下面这个句子："我常常对召集公共集会和组织体育竞赛的人感到惊奇"；在对立式的子句中，两个子句中的对立词相互并列，或者同一个词与两个对立词相结合，比如："他们对留守在家和追随他们的人皆有好处：为后者他们占领了比在本国更多的土地，为前者他们留下了本国的足够的土地。"这里，"留守"和"追随"、"足够"和"更多"就是对立词。再比如："对于需要挣钱的人和想要享乐的人"；在这里，"享乐"和"挣钱"相对。再比如："在这样的变革中，往往是智者失败，愚者胜出"，"他们立即获得了勇气的奖赏，不久又赢得了海上的霸权"，"在陆上行船，在海上过兵，在赫勒斯邦海峡搭桥，在亚陀斯山挖河"，"他们虽生为公民，却被法律剥夺了公民权"，"他们中一些人悲惨地死去，另一些人耻辱地偷生"，"私下里把蛮夷当作家奴使用，却公开地坐视许多盟友沦为奴隶"，"要么生时拥有，要么死后留下"。又例如有人在法庭上控告彼托劳斯和吕科佛戎："这些人，在家时曾出卖你们，来到这里又收买了你们。"所有这些句子都是对立句的例子。这种风格很讨人喜欢，因为对立很容易理解，并列起来就更好理解；还因为对立句很像三段论，要知道反驳就是把对立体放在一起。

Such then is the nature of antithesis; equality of clauses is parisosis; the similarity of the final syllables of each clause paromoiosis. This must take place at the beginning or end of the clauses. At the beginning the similarity is always shown in entire words; at the end, in the last syllables, or the inflections of one and the same word, or 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word. For instance, at the beginning: Ἀγρὸνγὰρἔλαβενἀργὸνπαρ᾽αὐτοῦ, [3_81] "for he received from him land untilled";

δωρητοίτ᾽ἐπέλοντοπαράρρητοίτ᾽ἐπέεσσιν, [3_82] “they were ready to accept gifts and to be persuaded by words;” at the end: ᾠήθησαναὐτὸνπαιδίοντετοκέναι, ἀλλ᾽αὐτοῦαἴτιονγεγονέναι, [3_83] “they thought that he was the father of a child, but that he was the cause of it”; ἐνπλείσταιςδὲφροντίσικαὶἐνἐλαχίσταιςἐλπίσιν, “in the greatest anxiety and the smallest hopes.” Inflections of the same word: ἄξιοςδὲσταθῆναιχαλκοῦς, οὐκἄξιοςὧνχαλκοῦ, “worthy of a bronze statue, not being worth a brass farthing.” Repetition of a word: σὺδ᾽αὐτὸνκαὶζῶνταἔλεγεςκακῶςκαὶνῦνγράφειςκακῶς, “while he lived you spoke ill of him, now he is dead you write ill of him.” Resemblance of one syllable: τίἂνἔπα*θ*εςδεινόν, εἰἄνδρ᾽εἶδεςἀργόν , “what ill would you have suffered, if you had seen an idle man?” All these figures may be found in the same sentence at once—antithesis, equality of clauses, and similarity of endings. In the *Theodectea* [3_84] nearly all the beginnings [3_85] of periods have been enumerated. There are also false antitheses, as in the verse of Epicharmus: τόκα*μ*ὲνἐντήνωνἐγὼνῆν, τόκα*δ*ὲπαρὰτήνοιςἐγών , “at one time I was in their house, at another I was with them.“ [3_86]

以上便是对立句的性质；两个子句等长的是平衡句，两个子句中尾音缀相似的是谐音句。这必须出现在子句的开头或结尾。若是在开头，则相似性总是体现在完整的字词上；若是在结尾，则体现在最后一个音缀或者同一个词的屈折变化上，或者体现在同一个词的重复出现上。出现在开头的例子：Ἀγρὸν γὰρ ἔλαβεν ἀργὸν παρ᾽ αὐτοῦ（因为他从他那里接受了休耕的土地）；δωρητοί τ᾽ ἐπέλοντο παράρρητοί τ᾽ ἐπέεσσιν（他们愿意接受礼物，听取进言）；出现在结尾的例子：ᾠήθησαν αὐτὸν παιδίον τετοκέναι，ἀλλ᾽ αὐτοῦ αἴτιον γεγονέναι（他们不认为他是孩子的父亲，但孩子却因他而生 [4_41] ）；ἐν πλείσταις δὲ φροντίσι καὶ ἐν ἐλαχίσταις ἐλπίσιν（心怀最大的焦虑和最小的希望）。同一个词屈

折变化的例子：ἄξιος δὲ σταθῆναι χαλκοῦς， οὐκ ἄξιος ὢν χαλκοῦ（应得到一尊铜像，却不值一文铜钱）。同一个词重复出现的例子：σὺ δ᾽ αὐτὸν καὶ ζῶντα ἔλεγες κακῶς καὶ νῦν γράφεις κακῶς（ 他活着的时候，你们说诋毁他的话；现在他死了，你们写诋毁他的文”）。同一个音节重复的例子：τί ἂν ἔπαθες δεινόν， εἰ ἄνδρ᾽ εἶδες ἀργόν（如果看到一个懒汉，你会有多愤慨？）一个句子可以同时具有上述所有句式特点——对立、平衡及尾音缀相似。在《忒俄得克忒亚》 [4_42] 中，环形句的几乎所有优点都被列举出来了。当然，也有假冒的对立句，比如喜剧诗人埃庇卡摩斯的诗句：τόκα μὲν ἐν τήνων ἐγὼν ἦν, τόκα δὲ παρὰ τήνοις ἐγών（有一回我在他们家里，还有一回我和他们在一起 [4_43] ）。

Chapter 10

第十章

Having settled these questions, we must next state the sources of smart and popular sayings. They are produced either by natural genius or by practice; to show what they are is the function of this inquiry. Let us therefore begin by giving a full list of them, and let our starting-point be the following. Easy learning is naturally pleasant to all, and words mean something, so that all words which make us learn something are most pleasant. Now we do not know the meaning of strange words, and proper terms we know already. It is metaphor, therefore, that above all produces this effect; for when Homer [3_87] calls old age stubble, he teaches and informs us through the genus; for both have lost their bloom. The similes of the poets also have the same effect; wherefore, if they are well constructed, an impression of smartness is produced. For the simile, as we have said, is a metaphor differing only by the addition of a word, [3_88] wherefore it is less pleasant because it is longer; it does

not say that this is that, so that the mind does not even examine this. Of necessity, therefore, all style and enthymemes that give us rapid information are smart. This is the reason why superficial enthymemes, meaning those that are obvious to all and need no mental effort, and those which, when stated, are not understood, are not popular, but only those which are understood the moment they are stated, or those of which the meaning, although not clear at first, comes a little later; for from the latter a kind of knowledge results, from the former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3_89]

解决了上述问题之后，接下来，我们有必要讲一讲巧妙的和受欢迎的话语出自何处。这样的话语要么出自天赋，要么出自苦练，本章要探讨的就是这类话语的性质。因此，我们不妨先将这些性质全部列出，从下面这一条开始讨论。对所有人来说，轻松学习自然都是愉快的，而词总有一定的意思，这样一来所有能让我们轻松学到东西的词都能带来极大的愉快。生词的意思我们不懂，而普通词的意思我们又都已知道。因此，在所有词汇中最能产生这种效果的是隐喻；比如荷马在《奥德赛》中称老年人为“残株”，他这是通过其所属种类来让我们有所学和有所悟，因为二者都已枯萎。诗人用的明喻也有同样的效果，因此，如果明喻用得好，也会给人以巧思的印象。我们曾说过，明喻就是一种隐喻，其区别只是添加了一个比喻词；明喻由于比较长，其愉悦度也有所降低；另外，它不是直接说此物是彼物，所以我们的头脑甚至不需要加以思索就能理解明喻。总之，能让我们快速领悟的所有风格和修辞式推理必定都是巧妙的。正因如此，肤浅的修辞式推理，指的是所有人都能明白、不需要加以思索的修辞式推理，还有说出来也无法叫人明白的修辞式推理，都不受欢迎；只有一说出来就能叫人明白的修辞式推理，或者其意思虽然一开始不甚明确，但是稍后就能领会的修辞式推理，才是受欢迎的；因为后两者能使我们获得某种知识，而前两者让我们一无所获，无论是在当时还是过后。

In regard to the meaning of what is said, then, such enthymemes are popular. As to style, popularity of form is due to antithetical statement; for instance, “accounting the peace that all shared to be a war against their private interests,“ [3_90] where “war” is opposed to “peace”; as to words, they are popular if they contain metaphor, provided it be neither strange, for then it is difficult to take in at a glance, nor superficial, for then it does not impress the hearer; further, if they set things “before the eyes”; for we ought to see what is being done rather than what is going to be done. We ought therefore to aim at three things—metaphor, antithesis, actuality.

就所说话语的意义而言，这样的修辞式推理才是受欢迎的。至于风格，对立句的形式是受欢迎的，比如：“所有人都共享的和平，他们却视为妨碍一己私利的战争”，这里“战争”与“和平”相对立；至于词语，含有隐喻的一般都受欢迎，只要不是奇词，否则很难立即听懂，也不显得肤浅，否则就不会打动听众；另外，如果词语能够使事物“活现于眼前”，也会受欢迎；须知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正在做什么而不是将要做什么。如此一来，我们应该瞄准三点：隐喻、对立句和活现性。

Of the four kinds of metaphor [3_91] the most popular are those based on proportion. Thus, Pericles said that the youth that had perished during the war had disappeared from the State as if the year had lost its springtime. [3_92] Leptines, speaking of the Lacedaemonians, said that he would not let the Athenians stand by and see Greece deprived of one of her eyes. When Chares was eager to have his accounts for the Olynthian war examined, Cephisodotus indignantly exclaimed that, now he had the people by the throat, he was trying to get his accounts examined; [3_93] on another occasion

also he exhorted the Athenians to set out for Euboea without delay "and provision themselves there, like the decree of Miltiades." [3_94] After the Athenians had made peace with Epidaurus and the maritime cities, Iphicrates indignantly declared "that they had deprived themselves of provisions for the war." [3_95] Pitholaus called the Paralus [3_96] "the bludgeon of the people," and Sestos "the corn-chest [3_97] of the Piraeus." Pericles recommended that Aegina, "the eyesore of the Piraeus," should be removed. Moerocles, mentioning a very "respectable" person by name, declared that he was as much a scoundrel as himself; for whereas that honest man played the scoundrel at 33 per cent. he himself was satisfied with 10 per cent. [3_98] And the iambic of Anaxandrides, [3_99] on girls who were slow to marry, "My daughters are 'past the time' of marriage." And the saying of Polyeuctus [3_100] upon a certain paralytic named Speusippus, "that he could not keep quiet, although Fortune had bound him in a five-holed pillory of disease." Cephisodotus called the triremes "parti-colored mills," [3_101] and [Diogenes] the Cynic used to say that the taverns [3_102] were "the messes" of Attica. Aesion [3_103] used to say that they had "drained" the State into Sicily, [3_104] which is a metaphor and sets the thing before the eyes. His words "so that Greece uttered a cry" are also in a manner a metaphor and a vivid one. And again, as Cephisodotus bade the Athenians take care not to hold their "concourses" too often; and in the same way Isocrates, who spoke of those "who rush together" in the assemblies. [3_105] And as Lysias says in his *Funeral Oration* , that it was right that Greece should cut her hair at the tomb of those who fell at Salamis, since her freedom was buried along with their valor. If the speaker had said that it was fitting that Greece should weep, her valor being buried with them, it would have been a metaphor and a vivid one, whereas "freedom" by the side of "valor" produces a kind of antithesis. And as Iphicrates said, "The path of my words leads through the center of the deeds of

Chares”; here the metaphor is proportional and the words “through the center” create vividness. Also, to say that one “calls upon dangers to help against dangers” is a vivid metaphor. And Lycoleon on behalf of Chabrias said, “not even reverencing the suppliant attitude of his statue of bronze,“ [3_106] a metaphor for the moment, not for all time, but still vivid; for when Chabrias is in danger, the statue intercedes for him, the inanimate becomes animate, the memorial of what he has done for the State. And “in every way studying poorness of spirit,“ [3_107] for “studying” a thing implies to increase it. [3_108] And that “reason is a light that God has kindled in the soul,” for both the words reason and light make something clear. “For we do not put an end to wars, but put them off,“ [3_109] for both ideas refer to the future—putting off and a peace of such a kind. And again, it is a metaphor to say that such a treaty is “a trophy far more splendid than those gained in war; for the latter are raised in memory of trifling advantages and a single favor of fortune, but the former commemorates the end of the whole war”; [3_110] for both treaty and trophy are signs of victory. Again, that cities also render a heavy account to the censure of men; for rendering an account [3_111] is a sort of just punishment.

在四种隐喻中，最受欢迎的是基于类比的隐喻。因此，伯里克利说城邦失去了毁灭于战火中的青年，就像一年当中缺失了春天。在谈到拉栖第梦人时，勒普提涅斯说，他不会任由雅典人袖手旁观，坐视希腊被夺去一只眼睛 [4_44] 。当卡瑞斯急于将他写的俄林托斯战争报告交付审查时，刻菲索多托斯愤慨地说，卡瑞斯现在已经扼住了人民的咽喉，就图谋让自己的报告通过审查；而在另一个场合，刻菲索多托斯劝说雅典人开赴埃维亚岛，切勿延误，“在那里备好口粮，就像米太亚德 [4_45] 的法令一样”。另外一个例子是，雅典人与埃皮达鲁斯城及沿海城镇和解后，伊菲克拉底愤慨地说：“他们剥夺了自己作战的辎重 [4_46] 。”彼托劳斯把帕拉罗斯号快艇 [4_47] 称为“人民的大头

棒”，把塞斯托斯[4_48]称为“比雷埃夫斯的粮囤”。伯里克利提议，埃伊纳岛，“比雷埃夫斯的眼中钉”，应该被除掉。摩洛克勒斯在提到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的名字时，说那人跟他自己一样无耻，要知道那个好人干的坏事是提取33％的利息，而他自己只抽10％的利息。喜剧作家阿那珊里得斯在短长格诗句中谈到迟迟不嫁的女儿：“我的女儿已经待嫁‘过期’。”波吕欧克托斯这样描述一个叫斯剖西波斯的瘫子：“他无法保持安静，虽然命运已将他束缚在疾病的五孔枷上。”刻菲索多托斯把三桨战船称为“彩色的磨坊[4_49]”，犬儒第欧根尼曾说酒馆是阿提卡人的“公共餐厅[4_50]”。埃西翁曾说他们把雅典城邦“耗干”在西西里[4_51]，这也是一个隐喻，使该事件活现在眼前。他的“所以希腊叫出了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隐喻，而且还很生动。此外，刻菲索多托斯曾劝告雅典人要注意不要开太多的“吵闹会”；同样，伊索克拉底也曾提到那些“推搡着涌向”公共集会的人。在其《葬礼演说》中，吕西阿斯说，希腊应该在牺牲于萨拉米斯的英雄的墓前削发，因为她的自由和他们的勇气被埋在一起。如果演说者吕西阿斯说的是希腊应当哭泣，因为她的勇气和英雄们埋在一起，这也是一个隐喻，而且也很生动，何况“自由”和“勇气”并列制造了一种对立。再如伊菲克拉底说过的话：“我的言辞之路直通卡瑞斯行为的中心”；这里的隐喻是类比式的，而且“直通中心”一语创造出逼真感。此外，说某人“以险克险”也是形象的隐喻。吕科勒翁为卡布里阿斯辩护时说：“甚至不尊重他的铜像的恳求姿势”，这在当时是隐喻，但后来并非一直如此，不过至今仍然非常形象；要知道在卡布里阿斯处于危险之中时，铜像就像是在为他求情，无生命的物体作为他功在城邦的纪念物，变得有生命。还有“用各种方式研习谦卑的精神”也是一个隐喻，因为“研习”某个东西意味着使之增加。还有“理智是神在灵魂里点亮的火光”也是一个隐喻，因为“理智”和“火光”都可使事物明晰。“我们并没有结束战争，只是将其推迟”也是一个隐喻，因为两者都指向将来，“推迟”和“某种和平”。还有，说这样的条约是“比从战争中赢得的胜利纪念碑更光荣的纪念碑，因为后者只是为纪念微不足道的成就和一次幸运的眷顾而矗立，而前者纪念的却是整个战争的结束”，这也是一个隐喻；因为“条约”和“胜利纪念碑”都是胜利的象征。再者，“各城市也因人们的谴责开具巨额账单”也是一个隐喻，因为开具

账单是一种正当的惩罚。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We have said that smart sayings are derived from proportional metaphor and expressions which set things before the eyes. We must now explain the meaning of “before the eyes,” and what must be done to produce this. I mean that things are set before the eyes by words that signify actuality. For instance, to say that a good man is “four-square” [3_112] is a metaphor, for both these are complete, but the phrase does not express actuality, whereas “of one having the prime of his life in full bloom” [3_113] does; similarly, “thee, like a sacred animal ranging at will” [3_114] expresses actuality, and in “Thereupon the Greeks shooting forward with their feet” [3_115] the word “shooting” contains both actuality and metaphor. And as Homer often, by making use of metaphor, speaks of inanimate things as if they were animate; and it is to creating actuality in all such cases that his popularity is due, as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s: “Again the ruthless stone rolled down to the plain.“ [3_116] “The arrow flew.“ [3_117] “[The arrow] eager to fly [towards the crowd] .“ [3_118] “[The spears] were buried in the ground, longing to take their fill of flesh.“ [3_119] “The spear-point sped eagerly through his breast.“ [3_120] For in all these examples there is appearance of actuality, since the objects are represented as animate: “the shameless stone,” “the eager spear-point,” and the rest express actuality. Homer has attached these attributes by the employment of the proportional metaphor; for as the stone is to Sisyphus, so is the shameless one to the one who is shamelessly treated. In his popular similes also he proceeds in the same manner with

inanimate things: “Arched, foam-crested, some in front, others behind;“ [3_121] for he gives movement and life to all, and actuality is movement.

我们刚刚说过，各种妙语都来自类比式隐喻和能够使事物活现于眼前的表达法。现在我们来解释什么叫“活现于眼前”以及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想说的是使用活现性的词汇可以使事物活现于眼前。例如，说一个好人“方方正正”是一个隐喻，因为二者都是完满的。但这个短语并未传达出活现性，而“正处在花开的盛年”却能传达活现性；类似地，“你，像一只自由漫步的神兽”也能够传达活现性；在“希腊人甩步向前”中，“甩”字也既有活现性，又含隐喻。荷马常常使用隐喻，将无生命的事物描绘成有生命；他正是通过在下述各种情形下创造出活现性而获得盛名，比如下例：“无情的石头再次滚落到平原上 [4_52] 。”“那箭飞出去了。”“（那箭）急切地飞（向人群）。”“（矛）插在地里，仍想啖肉。”“矛头急切地穿透了他的胸膛。”在这些例子中都有活灵活现的意象，因为其中的物体都被表征为有生命的东西：“无耻 [4_53] 的石头”、“急切的矛头”以及其他说法都传达出活现性。荷马运用类比式隐喻赋予物体上述生命属性；例如石头之于西西弗斯，就如同无耻的人之于受到无耻对待的人。在荷马广受欢迎的明喻里，他对无生命的事物也采用了相同的手法，例如“拱着脊背，顶着泡沫，有的在前，有的在后 [4_54] ”；须知他赋予所有事物以运动和生命，而活现性就在于运动。

As we have said before, metaphors should be drawn from objects which are proper to the object, but not too obvious; just as, for instance, in philosophy it needs sagacity to grasp the similarity in things that are apart. Thus Archytas said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an arbitrator and an altar, for the wronged betakes itself to one or the other. Similarly, if one were to say that an anchor and a pot-hook hung up were identical; for both are the

same sort of thing, but they differ in this—that one is hung up above and the other below. [3_122] And if one were to say “the cities have been reduced to the same level,” this amounts to the same in the case of things far apart—the equality of “levelling” in regard to superficies and resources. [3_123]

如前所述，隐喻应该取自那些与该事物相配的事物，但是这种相配性不能太强，否则不需要加以思索就能理解；正如在哲学中需要凭借睿智来捕捉不同事物的相似点。因此，阿尔库塔斯说，仲裁者和神坛之间没有差别，因为受害者总是求助于二者之一 [4_55] 。同理，有人会说锚和陶罐挂钩没有区别，因为两者是同一类事物，只有一点不同：一个挂在上面，一个垂在下面。如果有人说“各城邦被削减至同一个水平”，这也相当于在差别很大的事物中寻找相似点，即外观的平整和资源数量的扯平之间的对等。

Most smart sayings are derived from metaphor, and also from misleading the hearer beforehand. [3_124] For it becomes more evident to him that he has learnt something, when the conclusion turns out contrary to his expectation, and the mind seems to say, “How true it is! But I missed it.” And smart apophthegms arise from not meaning what one says, as in the apophthegm of Stesichorus, that “the grasshoppers will sing to themselves from the ground.“ [3_125] And clever riddles are agreeable for the same reason; for something is learnt, and the expression is also metaphorical. And what Theodorus calls “novel expressions” arise when what follows is paradoxical, and, as he puts it, not in accordance with our previous expectation; just as humorists make use of slight changes in words. The same effect is produced by jokes that turn on a change of letter; for they are deceptive. These novelties occur in poetry as well as in prose; for instance, the following verse does not

finish as the hearer expected: “And he strode on, under his feet—chilblains,” whereas the hearer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say “sandals.” This kind of joke must be clear from the moment of utterance. Jokes that turn on the word are produced, not by giving it the proper meaning, but by perverting it; for instance, when Theodorus said to Nicon, the player on the cithara, “you are troubled” (θράττει); for while pretending to say “something troubles you,” he deceives us; for he means something else. [3_126] Therefore the joke is only agreeable to one who understands the point; for if one does not know that Nicon is a Thracian, he will not see any joke in it. Similarly, “you wish to destroy him (πέρσαι).“ [3_127] Jokes of both these kinds [3_128] must be suitably expressed. Similar instances are such witticisms as saying that “the empire of the sea” was not “the beginning of misfortunes” for the Athenians, for they benefited by it; or, with Isocrates, [3_129] that “empire” was “the beginning of misfortunes for the city”; in both cases that which one would not have expected to be said is said, and recognized as true. For, in the second example, to say that “empire is empire” shows no cleverness, but this is not what he means, but something else; in the first, the ἀρχή which is negatived is used in a different sense. In all these cases, success is attained when a word is appropriately applied, either by homonym or by metaphor. For example, in the phrase Anaschetos (Bearable) is Unbearable, [3_130]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of the homonym, which is only appropriate, if Anaschetus is an unbearable person. And, “Thou shalt not be more of a stranger than a stranger,” or “not more than you should be,” which is the same thing. And again, “The stranger must not always be a stranger,” for here too the word repeated is taken in a different sense. [3_131] It is the same with the celebrated verse of Anaxandrides, “It is noble to die before doing anything that deserves death;“ [3_132] for this is the same as saying that “it is worthy to die when one does not deserve to die,” or, that “it is

worthy to die when one is not worthy of death," or, "when one does nothing that is worthy of death." Now the form of expression of these sayings is the same; but the more concisely and antithetically they are expressed, the greater is their popularity. The reason is that antithesis is more instructive and conciseness gives knowledge more rapidly. Further, in order that what is said may be true and not superficial, it must always either apply to a particular person or be suitably expressed; for it is possible for it to have one quality and not the other. For instance, "One ought to die guiltless of any offence," "The worthy man should take a worthy woman to wife." There is no smartness in either of these expressions, but there will be if both conditions are fulfilled: "It is worthy for a man to die, when he is not worthy of death." The more special qualities the expression possesses, the smarter it appears; for instance, if the words contain a metaphor, and a metaphor of a special kind, antithesis, and equality of clauses, and actuality.

大多数妙语都来自隐喻，亦可来自预先误导听众。当结论与其预料相反时，听众会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悟出了什么，心里似乎在说："果然如此！可我竟没猜着。"巧妙的警句还来自意在言外，正如斯特西科罗斯的警句："蚂蚱将在地上自吟自唱 [4_56] 。"出于相同的原因，巧妙的谜语也讨人喜欢；因为人们从谜语中可以有所领悟，而且其表达也包含隐喻。如果后面所说的事情似是而非，而且，如修辞学家忒俄多洛斯所说，出乎我们原先的预料，这时他所谓的"新奇表达法"就产生了；这就像幽默家对字词的微小变化善加利用一样。利用一个字母之差制造的笑话也有同样的效果；须知它们具有欺骗性。这样的新奇用法不仅见于散文，而且见于诗歌；例如，以下诗行就没有按听者的预期结尾："他继续前行，脚下是冻疮，"听者本来以为诗人要说的是"拖鞋"。这种笑话必须一讲出来就十分明了。那些因改变字词而生出的笑话，不是通过赋予字词其本义，而是通过颠覆字词的本义来实现的；例如，演员忒俄多洛斯对竖琴师尼孔说："你有麻烦

了（θράττει）”；这里他表面上在说“有事情困扰着你”，以此蒙蔽我们；要知道他意在其他。因此，这个笑话只是对那些了解其中奥妙的人才有趣；如果不知道尼孔是个色雷斯人，就无法看出其中的可笑之处。类似的还有“你想要搏死他（πέρσαι）”。这两种笑话都必须以恰当的方式表述。类似的妙语还有“海上的帝国”并不是雅典人“厄运的源头”，因为他们雅典人曾从中受益；又比如，在伊索克拉底看来，“海上帝国”恰是“城邦厄运的源头”；在这两例中，所说的话语都出人意料，而且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在第二个例子中，如果说成“帝国是帝国”就毫无机智可言，但是伊索克拉底意不在此，而是另有他意；在第一个例子中，那个被否定的ἀρχή同样有别于其本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如果词语运用得当，要么通过同音字，要么通过隐喻，就能获得成功。例如，在“Anaschetos（可忍受的）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这句话中，有一对同音字的对立，只有当Anaschetus其人的确令人难以忍受，这句话才算恰当。又如，“不要比外人还像外人[4_57]”，或者“不要比你应该扮演的角色更甚”，也是同样的意思。又如，“外人不要永远是外人”，这里重复出现的词语“外人”被用于表达不同的意思。阿那珊里得斯的那句著名诗句也是如此，“在犯下死罪之前死去是高贵的”；这相当于说“在不该死的时候去死是值得称道的”，或者“在不值得死的时候去死是值得的”，或者“在没有做任何该死的事情时死去是值得称道的”。这些说法的形式相同；但表达越简明，对立越明显，就越受欢迎。原因在于对立更有启发性，而简明的风格能够更快地传递知识。再者，为了使所说的话既正确又不肤浅，它应当总是要么针对某个特定的个人，要么以恰当的方式表述；要知道一句话可能具有上述品质之一，如正确性，而不具备之二，如不肤浅。例如，“人应至死都不作奸犯科”，“值得敬重的人应该娶一个值得敬重的女子为妻。”这两个说法都不算巧妙，但是如果它们能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就会很巧妙。例如，“在不值得死去的时候死去是值得的。”一个说法所拥有的特殊品质越多，就越显得巧妙；例如，如果文字中包括隐喻、特殊隐喻、对立子句和平衡子句以及活现性，就会显得巧妙。

Similes also, as said above, are always in a manner approved

metaphors; [3_133] since they always consist of two terms, like the proportional metaphor, as when we say, for instance, that the shield is the goblet of Ares, and the bow a lyre without strings. But such an expression is not simple, but when we call the bow a lyre, or the shield a goblet, it is. [3_134] And similes may be formed as follows: a flute-player resembles an ape, [3_135] a short-sighted man a spluttering lamp; for in both cases there is contraction. [3_136] But they are excellent when there is a proportional metaphor; for it is possible to liken a shield to the goblet of Ares and a ruin to the rag of a house; to say that Niceratus is a Philoctetes bitten by Pratys, to use the simile of Thrasymachus, when he saw Niceratus, defeated by Pratys in a rhapsodic competition, still dirty with his hair uncut. [3_137] It is herein that poets are especially condemned if they fail, but applauded if they succeed. I mean, for instance, when they introduce an answering clause [3_138] : “He carries his legs twisted like parsley,” or again, “Like Philammon punching the leather sack.” All such expressions are similes, and similes, as has been often said, are metaphors of a kind.

明喻，如前所述，在某种意义上也都是被认可的隐喻；因为它们总是包括两个可比项，就像类比式隐喻；例如，我们可以说盾牌 [4_58] 是阿瑞斯的酒杯，弓是无弦的竖琴。不过，这样的表达并不是简单的隐喻；但是当我们把弓称作竖琴，或者把盾牌称作酒杯时，就是简单隐喻。明喻可以用如下方法构成：例如，说吹笛子的人像大猩猩，因为二者的姿态很像；说近视眼像飞溅的灯火 [4_59] ，因为这两种情形下都有收缩的动作。但是明喻以含有类比式隐喻的为最佳 [4_60] ；比如，可以把盾牌比作阿瑞斯的酒杯；把废墟比作房子的碎屑；把尼克拉托斯说成被普拉梯斯咬伤的菲罗克忒忒斯 [4_61] ，当时，塞拉西马柯在一次赛诗会上看到尼克拉托斯被普拉梯斯击败，衣衫褴褛，头发凌乱，便用了这个明喻来形容尼克拉托斯。诗人们在使用明喻上，如果失败，则饱受谴责；如果成功，则大受追捧。我指的是，例如，当

他们给出这样的答句："他拖着弯曲如芹菜的双腿"或者"像拳击手菲兰蒙捶击皮囊那样痛揍某人"，都会大受追捧。诸如此类的表达都是明喻，而明喻，我已经一再说过，就是一种隐喻。

Proverbs also are metaphors from species to species. If a man, for instance, introduces into his house something from which he expects to benefit, but afterwards finds himself injured instead, it is as the Carpathian [3_139] says of the hare; for both have experienced the same misfortunes. This is nearly all that can be said of the sources of smart sayings and the reasons which make them so.

谚语也是种与种之间的隐喻。例如，一个人带了一样东西回家，指望从中受益，但是后来却发现自己反受其害，这就像卡帕托斯人和野兔的故事 [4_62] ；因为这人和卡帕托斯人都经历了相同的不幸。以上就是差不多所有巧语的来源和它们之所以巧妙的原因。

Approved hyperboles are also metaphors. For instance, one may say of a man whose eye is all black and blue, "you would have thought he was a basket of mulberries," because the black eye is something purple, but the great quantity constitutes the hyperbole. Again, when one says "like this or that" there is a hyperbole differing only in the wording: "Like Philammon punching the leather sack," or, "you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he was Philammon fighting the sack"; "Carrying his legs twisted like parsley," or, "you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he had no legs, but parsley, they being so twisted." There is something youthful about hyperboles; for they show vehemence. Wherefore those who are in a passion most frequently make use of them: "Not even were he to offer me gifts as many in number as the sand and dust… but a daughter of

Agamemnon, son of Atreus, I will not wed, not even if she rivalled golden Aphrodite in beauty, or Athene in accomplishments.“ [3_140] (Attic orators are especially fond of hyperbole.) [3_141] Wherefore [3_142] it is unbecoming for elderly people to make use of them.

人所乐见的夸张也是隐喻。例如，人们可以这样描述被打得眼睛乌青的人：“你会以为他是一篮桑葚”，因为黑色的眼睛有点儿发紫，而这一篮的数量构成了夸张。又如，我们说“像这个或那个”时，也有夸张的成分，只不过措辞不同。例如，“像拳击手菲兰蒙捶击皮囊那样痛揍某人”一句可以改成“你会觉得他就是那痛揍皮囊的菲兰蒙”；“拖着他那如同芹菜一样弯曲的双腿”可以改成“他的双腿如此弯曲，你会觉得他根本没长腿，只拖着两根芹菜。”夸张的运用有年轻人的味道，因为它们饱含激情。这也就是为什么情绪激动的人最常使用夸张，比如：“即使他给我如同沙粒和尘土一样多的礼物，阿特柔斯的儿子、阿伽门农的女儿，我也誓不与之成婚，就算其美貌堪比金发的阿佛洛狄特，才艺堪比雅典娜 [4_63] 。”（雅典的演说家尤其喜欢使用夸张。）这就是为什么老年人不适合用夸张手法。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But we must not lose sight of the fact that a different style is suitable to each kind of Rhetoric. That of written compositions is not the same as that of debate; nor, in the latter, is that of public speaking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law courts. But it is necessary to be acquainted with both; for the one requires a knowledge of good Greek, while the other prevents the necessity of keeping silent when we wish to communicate something to others, which happens to those who do not know how to write. The style of written

compositions is most precise, that of debate is most suitable for delivery. Of the latter there are two kinds, ethical and emotional; this is why actors are always running after plays of this character, and poets after suitable actors. However, poets whose works are only meant for reading are also popular, as Chaeremon, who is as precise as a writer of speeches, and Licymnius [3_143] among dithyrambic poets. When compared, the speeches of writers appear meagre in public debates, while those of the rhetoricians, however well delivered, are amateurish when read. The reason is that they are only suitable to public debates; hence speeches suited for delivery, when delivery is absent, do not fulfil their proper function and appear silly. For instance, asyndeta and frequent repetition of the same word are rightly disapproved in written speech, but in public debate even rhetoricians make use of them, for they lend themselves to acting. [3_144] (But one must vary the expression when one repeats the same thing, for this as it were paves the way for declamation: [3_145] as, “This is he who robbed you, this is he who deceived you, this is he who at last attempted to betray you.” This is what Philemon the actor did in *The Old Man's Folly* of Anaxandrides, when he says “Rhadamanthus and Palamedes,” and when he repeats the word “I” in the prologue to *The Pious* . [3_146] For unless such expressions are varied by action, it is a case of “the man who carries the beam” [3_147] in the proverb.)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不同的风格适合不同的修辞。书面文章与口头辩论的风格不同；在后者之中，议政演说又与诉讼演说的风格不同。但这两种风格我们都有必要熟悉；口头辩论的风格要求精通希腊语，书面文章的风格则可以使我们在希望向不在此时此地的人传达信息时不至于被迫沉默，就像那些不会写作的人一样。书面文章的风格最精准，辩论的风格则最适合口头宣讲。后者又分两种：道德和情感；这就是为什么演员们总是追求此类剧本，而诗人们 [4_64] 总是追

求合适的演员。但是，那些只创作用来阅读的作品的诗人也很受欢迎，比如悲剧诗人开瑞蒙，他的风格像演说词作者一样精确，写酒神赞歌的诗人利铿尼俄斯也是如此。两相比较，作家的演讲在公共辩论中往往显得贫乏；而修辞家的演说，无论讲得多么精彩，阅读的时候都会显得平庸。原因在于，修辞家的演说只适合口头的公共辩论；因此，适合口头宣讲的演讲稿，如果不用于宣讲，就无法实现其真正的功用，而且会显得笨拙。例如，省略连接词和频繁地重复字词在书面演讲稿中是理当被诟病的，但是在口头公共辩论中，即使是修辞高手也会动用这样的手段，因为它们适合表演。（但是，重复的时候也应在表达方式上力求变化，因为这样可以做到琅琅上口：例如，“正是他抢劫了你，正是他欺骗了你，也正是他最后想要背叛你。”演员腓利门在阿那珊里得斯的戏剧《年老昏聩》中念到“拉达曼提斯和帕拉墨得斯”这句台词时就是这么做的，在重复《虔诚者》序诗中的那个“我”字时，他也是这么做的。要知道除非这些重复的语词在表述方式上有所变化，否则就如同谚语“扛横梁的人”所说的情形了。）

It is the same with asyndeta: “I came, I met, I entreated.” For here delivery is needed, and the words should not be pronounced with the same tone and character, as if there was only one clause. Further, asyndeta have a special characteristic; for in an equal space of time many things appear to be said, because the connecting particle makes many things one, so that, if it be removed, it is clear that the contrary will be the case, and that the one will become many. Therefore an asyndeton produces amplification: thus, in “I came, I conversed, I besought,” the hearer seems to be surveying many things, all that the speaker said. [3_148] This also is Homer's intention in the passage “Nireus, again, from Syme…, Nireus son of Aglaia…, Nireus, the most beautiful…;“ [3_149] for it is necessary that one of whom much has been said should be often mentioned; if then the name is often mentioned, it seems as if much has been said; [3_150] so that, by means of this fallacy, Homer has increased

the reputation of Nireus, though he only mentions him in one passage; he has perpetuated his memory, though he never speaks of him again.

省略连接词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比如："我来了，我遇见了，我恳求了。"这里也需要运用朗读技巧，不要用同一个音调、同一个方式来念那些字词，好像只有一个子句似的。再者，省略连接词的句子有一个特点：在相同的时段内，似乎讲了很多事情；这是因为连接词将许多事物变成了一件，所以如果去掉连接词，情况显然就会截然相反，一件事会变成多件事。因此，连接词的省略能产生夸张的效果：比如，在"我来了，我说话了，我恳求了"这个句子中，听者似乎从演说者的话语中目睹了很多事情。这也是荷马在《伊利亚特》的这个段落中的意图："尼柔斯，再一次，来自叙墨；尼柔斯，阿格拉伊亚的儿子；尼柔斯，最漂亮的男子。"要知道一个经常被谈论的人，其名字也必然经常被提起；而如果名字经常被提起，那人也就会显得经常被谈论。这样，借助这种悖论，荷马增加了尼柔斯的名声，尽管荷马只在一段话中提到他，此后亦再未提起，但是荷马已经让他留名了。

The deliberative style is exactly like a rough sketch, [3_151] for the greater the crowd, the further off is the point of view; wherefore in both too much refinement is a superfluity and even a disadvantage. But the forensic style is more finished, and more so before a single judge, because there is least opportunity of employing rhetorical devices, since the mind more readily takes in at a glance what belongs to the subject and what is foreign to it; there is no discussion, [3_152] so the judgement is clear. This is why the same orators do not excel in all these styles; where action is most effective, there the style is least finished, and this is a case in which voice, especially a loud one, is needed.

议政演说的风格恰似草草勾勒的略图，观众越多，视点越远；所以对二者而言，繁复的修饰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而诉讼演说的风格更精致，若只有一位听众作为裁决者，情况就更是如此，因为这种情形下几乎没有机会使用修辞技巧，原因是裁决者凭借自己的头脑更能一眼辨别出哪些内容与主题有关，哪些与主题无关；须知没有不同裁决者之间的商讨，所以判决很清晰。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演说者无法在上述所有风格中胜出。表演技巧最奏效的场合，最不要求精致的风格，这种情况需要的是一副好嗓子，特别是大嗓门。

The epideictic style is especially suited to written compositions, for its function is reading; [3_153] and next to it comes the forensic style. It is superfluous to make the further distinction that style should be pleasant or magnificent. Why so, any more than temperate, liberal, or anything else that indicates moral virtue? For it is evident that, if virtue of style has been correctly defined, what we have said will suffice to make it pleasant. For why, if not to please, need it be clear, not mean, but appropriate? If it be too diffuse, or too concise, it will not be clear; but it is plain that the mean is most suitable. What we have said will make the style pleasant, if it contains a happy mixture of proper and “foreign” words, of rhythm, and of persuasiveness resulting from propriety. This finishes what we had to say about style; of all the three kinds of Rhetoric in general, and of each of them in particular. It only remains to speak of arrangement.

典礼演讲的风格特别适合书面文章，因为它的主要用处是供人阅读；诉讼演讲的风格紧随其后。至于进一步区分风格是应该愉悦轻快还是恢宏大气，就是多余的了。为什么单单是这二者，而不是节制、自由或者任何其他能标识道德美德的特点呢？其实，只要风格之美被正确定义，那很显然，我们前面所讲的已经足够使其令人愉悦了。要

知道如果不是为了愉悦众人，风格又何须清晰、恰当而又不流于平庸呢？如果太啰唆或太简洁，风格都会不够清晰；中庸显然才是最恰当的。至此，我们所讲的内容，包括巧妙搭配的本土和“外来”词汇、节奏、靠得体实现的说服力，都会使风格为人所乐见。关于风格、三种修辞风格的共性以及它们各自的特点，我们就讲到这里。只有布局尚待讨论。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A speech has two parts. It is necessary to state the subject, and then to prove it. Wherefore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a statement without proving it, or to prove it without first putting it forward; for both he who proves something, and he who puts something forward does so in order to prove it. The first of these parts is the statement of the case, the second the proof, a similar division to that of problem and demonstration. But the division now generally made is absurd; for narrative only belongs in a manner to forensic speech, but in epideictic or deliberative speech how is it possible that there should be narrative as it is defined, or a refutation; or an epilogue in demonstrative speeches? [3_154] In deliberative speeches, again, exordium, comparison, and recapitulation are only admissible when there is a conflict of opinion. For both accusation and defence are often found in deliberative, but not qua deliberative speech. And further, the epilogue does not even belong to every forensic speech, for instance, when it is short, or the matter is easy to recollect; for in the epilogue what happens is that there is a reduction of length. [3_155]

演讲包括两部分。必须先陈述主题，然后证明主题。因此，不可能只陈述主题而不作证明，或者只证明而不陈述主题；因为进行证明的人总要证明某事，而陈述某个主题的人也是为了证明才进行陈述。第一部分是陈述，第二部分是证明，与问题和明示的划分类似。但是现在流行的划分方法却很荒谬，因为叙述只在某种意义上属于诉讼演说，而在典礼演说或议政演说中，怎么可能有所谓的“叙述”或者“反驳”，证明性的演说 [4_65] 中又怎么可能有“结束语”呢？同样，在议政演说中，只有当观点相冲突时，才能有开场白、对比及总结等。指控和辩护常见于议政演说，不过并非只见于议政演说。再者，并不是每一种诉讼演说都有结束语，例如，如果篇幅短小，或者所述之事很容易回忆，就无需结束语；因为结束语无非是所述内容的缩写。

So then the necessary parts of a speech are the statement of the case and proof. These divisions are appropriate to every speech, and at the most the parts are four in number—exordium, statement, proof, epilogue; for refutation of an opponent is part of the proofs, and comparison is an amplification of one's own case, and therefore also part of the proofs; for he who does this proves something, whereas the exordium and the epilogue are merely aids to memory. Therefore, if we adopt all such divisions we shall be following Theodorus [3_156] and his school, who distinguished narrative, additional narrative, and preliminary narrative, refutation and additional refutation. But one must only adopt a name to express a distinct species or a real difference; otherwise, it becomes empty and silly, like the terms introduced by Licymnius in his “Art”, where he speaks of “being wafted along,” “wandering from the subject,“ [3_157] and “ramifications.”

因此，演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是陈述主题和证明主题。这两个组成部分适用于各种演说。演说的组成部分最多能有四个：开场白、

陈述、证明和结束语；须知反驳对手其实是证明的一部分，而对比则是对自己所述内容的彰显，因此也属于证明，要知道这样做的演说者都是为了证明什么；至于开场白和结束语，仅仅是辅助记忆而已。故此，如果采纳上述这些划分，我们就是在追随修辞学家忒俄多洛斯及其学派了。他们区分了“叙述”、“附加叙述”和“预叙述”，还区分了“反驳”和“附加反驳”。但是，我们应该只为了明确表示类别或者描述真实的差异而命名事物；否则，命名就会空洞而愚蠢，如同修辞学家利铿尼俄斯在其《修辞术教材》中介绍的那些术语，诸如推动法、离题法和分支法之类。

Chapter 14

第十四章

The exordium is the beginning of a speech, as the prologue in poetry and the prelude in flute-playing; for all these are beginnings, and as it were a paving the way for what follows. The prelude resembles the exordium of epideictic speeches; for as flute-players begin by playing whatever they can execute skilfully and attach it to the key-note, so also in epideictic speeches should b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xordium; the speaker should say at once whatever he likes, give the key-note and then attach the main subject. And all do this, an example being the exordium of the *Helen* of Isocrates; for the eristics and Helen have nothing in common. [3_158] At the same time, even if the speaker wanders from the point, this is more appropriate than that the speech should be monotonous.

开场白是演说的开头，正如诗歌的序诗和长笛演奏的序曲；因为这些都是开头，都是为后面的内容做铺垫。序曲与典礼演说的开场白

类似，因为正如长笛演奏者以演奏自己擅长的乐曲开始，把它与基调连起来，在典礼演说中，开场白的拟定也是如此：演讲者应该先说点他想说的事情，引出基调，然后与主题相连。所有的演说者都是这样做的，比如伊索克拉底的演讲《海伦颂》的开场白 [4_66] ，要知道辩论术与海伦本来并没有什么共同点。另外，即使演说者游离了主题，也比通篇单调乏味要合适。

In epideictic speeches, the sources of the exordia are praise and blame, as Gorgias, in the *Olympiacus* , says, “Men of Greece, you are worthy to be admired by many,” where he is praising those who instituted the solemn assemblies. Isocrates on the other hand blames them because they rewarded bodily excellences, but instituted no prize for men of wisdom. Exordia may also be derived from advice, for instance, one should honor the good, wherefore the speaker praises Aristides, or such as are neither famous nor worthless, but who, although they are good, remain obscure, as Alexander, son of Priam; for this is a piece of advice. Again, they may be derived from forensic exordia, that is to say, from appeals to the hearer, if the subject treated is paradoxical, difficult, or commonly known, in order to obtain indulgence, like Choerilus [3_159] : “But now when all has been allotted.” These then are the sources of epideictic exordia—praise, blame, exhortation, dissuasion, appeals to the hearer. And these exordia [3_160] may be either foreign or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speech.

在典礼演说中，开场白往往从赞扬和谴责中取材。比如高尔吉亚在其《奥林匹亚》演说辞中，这样称颂那些创立庄严集会的人：“希腊人啊，你们值得被众人景仰。”而伊索克拉底则谴责这些人，因为他们奖励身强体健者，却不奖励富有智慧者。开场白也可以从忠告中取材，例如，“我们应该尊重好人”，演说者据此褒奖亚里斯泰迪斯；

或者“我们应该尊重那些虽无甚名气却并不卑贱的人”，即“品质虽好但不见经传的人”，比如普里阿摩斯的儿子亚历山大。这便是一条忠告。再者，如果讨论的主题似是而非、难以理解或者早已广为人知，开场白亦可效法诉讼演说的开头，诉求听众同情以获得谅解，如科伊里洛斯所说的：“但是现在所有的主题都被分配完了 [4_67] 。”以上就是典礼演说开场白的素材：夸赞、指责、劝说、劝阻以及诉诸听众的理解。这些开场白既可以与演说的正文毫不相干，也可以与它密切相关。

As for the exordia of the forensic speech, it must be noted that they produce the same effect as dramatic prologues and epic exordia (for those of dithyrambs resemble epideictic exordia: “For thee and thy presents or spoils.“ [3_161]) But in speeches [3_162] and epic poems the exordia provide a sample of the subject, in order that the hearers may know beforehand what it is about, and that the mind may not be kept in suspense, for that which is undefined leads astray; so then he who puts the beginning, so to say, into the hearer's hand enables him, if he holds fast to it, to follow the story. Hence the following exordia: “Sing the wrath, O Muse.“ [3_163] “Tell me of the man, O Muse.“ [3_164] “Inspire me with another theme, how from the land of Asia a great war crossed into Europe.“ [3_165] Similarly, tragic poets make clear the subject of their drama, if not at the outset, like Euripides, at least somewhere in the prologue, like Sophocles, “My father was Polybus.“ [3_166] It is the same in comedy. So then the most essential and special function of the exordium is to make clear what is the end or purpose of the speech; wherefore it should not be employed, if the subject is quite clear or unimportant. All the other forms of exordia in use are only remedies, [3_167] and are common to all three branches of Rhetoric. These are derived from the speaker, the hearer, the subject, and the opponent. From the speaker and the opponent, all that helps to

destroy or create prejudice. But this must not be done in the same way; for the defendant must deal with this at the beginning, the accuser in the epilogue. The reason is obvious. The defendant, when about to introduce himself, must remove all obstacles, so that he must first clear away all prejudice; the accuser must create prejudice in the epilogue, that his hearers may have a livelier recollection of it.

至于诉讼演说的开场白，应该注意的是它们要产生与戏剧和史诗序诗一样的效果（酒神赞歌的开场则与典礼演说的开场白相似，比如："为你、你的礼物或者战利品[4_68]！"）。不过在诉讼演说和史诗中，开场白要透露主题的端倪，以便听众提前了解其内容，不至于心存悬念，要知道不确定的东西会让人感到迷惑；因此可以说，把开场白交到听众手中，如果听众能好好把握的话，就能帮助他们跟随故事的发展。所以才有下面这样的开场白："高歌吟唱那愤怒吧，哦，女神[4_69]！""请给我讲讲那人的故事吧，哦，女神[4_70]！""赐予我另一个故事的灵感吧，关于一场大战如何从亚细亚打到欧罗巴。[4_71]"与此相似，悲剧诗人也会明确表达其剧作的主题，即使不是像欧里庇得斯那样在一开始就表述，至少也会像索福克勒斯那样在序诗的某个部分表白，比如："我父亲是波吕波斯。[4_72]"喜剧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开场白最核心、最特殊的功能，是明确演说的目标或者目的；因此，如果主题相当明确或者无关紧要的话，就不应该使用开场白。开场白的所有其他通用形式，都只是针对听众注意力涣散等问题的补救手段，三类演说都是如此。这些手段取自演讲者、听者、主题以及反方。从演讲者和反方那里，可以提取能帮助消除或者制造偏见的开场白。不过双方不应采用相同的方式；因为被告应该在一开始就处理这个问题，而控方应该在结束语中处理这个问题。其中的缘由显而易见。被告在准备介绍自己的时候，必须消除所有障碍，因此他应该首先清除所有的偏见；而原告应该在结束语中制造偏见，以便让听众记得更清楚。

The object of an appeal to the hearer is to make him well disposed or to arouse his indignation, and sometimes to engage his attention or the opposite; for it is not always expedient to engage his attention, which is the reason why many speakers try to make their hearers laugh. As for rendering the hearers tractable, everything will lead up to it if a person wishes, including the appearance of respectability, because respectable persons command more attention. Hearers pay most attention to things that are important, that concern their own interests, that are astonishing, that are agreeable; wherefore one should put the idea into their heads that the speech deals with such subjects. To make his hearers inattentive, the speaker must persuade them that the matter is unimportant, that it does not concern them, that it is painful.

诉诸听众的目的在于使他们对自己产生好感或者激发他们的愤慨，有时也在于吸引或者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须知吸引注意力也并不总是有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演说家都力图使听众发笑。至于驾驭听众，只要愿意，任何手段都可以实现这一点，包括表现自己的可敬之处，因为可敬之人总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听众最关注那些重要的事情，那些关乎他们自身利益的事情，那些耸人听闻的事情，那些令人愉快的事情；因此，演说者应该让听众觉得自己的演说就是在讲这样的事情。为了让听众注意力分散，演说者则应当让他们相信所讲的事情并不重要，并不涉及他们的利益或使他们痛苦。

But we must not lose sight of the fact that all such things are outside the question, for they are only addressed to a hearer whose judgement is poor and who is ready to listen to what is beside the case; for if he is not a man of this kind, there is no need of an exordium, except just to make a summary statement of the subject, so that, like a body, it may have a head. Further, engaging the

hearers' attention is common to all parts of the speech, if necessary; for attention slackens everywhere else rather than at the beginning. Accordingly, it is ridiculous to put this [3_168] at the beginning, at a time when all listen with the greatest attention. Wherefore, when the right moment comes, one must say, “And give me your attention, for it concerns you as much as myself”; and, “I will tell you such a thing as you have never yet” heard of, so strange and wonderful. This is what Prodicus used to do; whenever his hearers began to nod, he would throw in a dash of his fifty-drachma lecture. But it is clear that one does not speak thus to the hearer qua hearer; [3_169] for all in their exordia endeavor either to arouse prejudice or to remove their own apprehensions: “O prince, I will not say that with haste [I have come breathless].“ [3_170] “Why this preamble?“ [3_171] This is what those also do who have, or seem to have, a bad case; for it is better to lay stress upon anything rather than the case itself. That is why slaves never answer questions directly but go all round them, and indulge in preambles. We have stated [3_172] how the hearer's goodwill is to be secured and all other similar states of mind. And since it is rightly said, “Grant that on reaching the Phaeacians I may find friendship or compassion,“ [3_173] the orator should aim at exciting these two feelings.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这些事情都与演说主题无关，因为它们只针对那些判断力很差、爱听无关主题之事的听者；因此，如果听者不是这样的人，就没有必要做这种开场白，除了简述一下主题，以便让演说像人的身体一样有个头。再者，如果确实有必要，吸引听众注意力的做法适用于演说的所有部分；须知在演说的任何部分，听众的注意力都比在开头容易涣散。因此，把这些吸引注意力的手段用在开头，即所有听众的注意力都最集中的时候，是荒唐的。所以，要到适当的时候，演说者才有必要说：“请注意听，因为这不仅关乎我自己，而且关乎大家”以及“我将告诉你们一件你们从

未”听过而且非常奇异美妙的事情。这正是普罗狄科斯经常使用的手法；只要听众开始打瞌睡，他就会穿插一句他那篇著名的价值五十德拉克马的讲稿里的妙语 [4_73] 。但是很显然，人们并不以这样的方式，对那些合格的听众 [4_74] 来发表演讲；须知所有演讲者都在各自的开场白里用力激发偏见或消除自身的不安，比如：“哦，君王啊，我不愿急急忙忙地说（我刚刚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 [4_75] ）。”“为什么这样开场呢？”那些遇到或者似乎遇到倒霉事的人，也这样说话，因为对他们而言，强调任何事情都胜过强调那件倒霉事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奴隶们从不直接回答问题，而总是拐弯抹角，做大量的铺垫。我们已经讲过如何争取听众的善意以及其他类似心境 [4_76] 。有句话说得好：“请让我到那里得到菲埃克斯人的友谊或同情。 [4_77] ”演说家也应该以激发这两种情感为目的。

In epideictic exordia, one must make the hearer believe that he shares the praise, either himself, or his family, or his pursuits, or at any rate in some way or other. For Socrates says truly in his *Funeral Oration* that “it is easy to praise Athenians in the presence of Athenians, but not in the presence of Lacedaemonians.“ [3_174]

在典礼演说的开场白中，演说者应该让听众相信他本人、他的家族或者他追求的东西都受到夸赞，至少是某种程度的夸赞。苏格拉底在其《葬礼演说》中说得好：“当着雅典人的面夸赞雅典人是容易的，但是当着拉栖第梦人的面夸赞雅典人却不容易。”

Deliberative oratory borrows its exordia from forensic, but naturally they are very uncommon in it. For in fact the hearers are acquainted with the subject, so that the case needs no exordium, except for the orator's own sake, or on account of his adversaries, or if the hearers attach too much or too little importance to the

question according to his idea. Wherefore he must either excite or remove prejudice, and magnify or minim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subject. Such are the reasons for exordia; or else they merely serve the purpose of ornament, since their absence makes the speech appear offhand. For such is the encomium on the Eleans, in which Gorgias, without any preliminary sparring or movements, starts off at once, “Elis, happy city.”

议政演说可以从诉讼演说借用开场白，但是二者在这一点上当然很不相同。要知道，听众其实很熟悉议政演说所讲的话题，因此并不需要开场白，除非出于演说者自身的原因，或者由于其对手的原因，或者如果演说者认为听众非常重视或者非常不重视某个问题。在这些情形下，他就必须激发或者消除偏见，夸大或者贬低话题的重要性。以上就是使用开场白的原因；除此之外，开场白只是起装饰作用，因为如果没有开场白，演说就会显得突兀。正如在给伊利斯人的颂词中，高尔吉亚预先没有做任何热身活动，开口就道：“伊利斯啊，幸福的城邦！”

Chapter 15

第十五章

One way of removing prejudice is to make use of the arguments by which one may clear oneself from disagreeable suspicion; for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ether this suspicion has been openly expressed or not; and so this may be taken as a general rule. Another way [3_175] consists in contesting the disputed points, either by denying the fact or its harmfulness, at least to the plaintiff; or by asserting that its importance is exaggerated; or that it is not unjust at all, or only slightly so; or neither disgraceful nor

important. These are the possible points of dispute: as Iphicrates, in answer to Nausicrates, admitted that he had done what the prosecutor alleged and inflicted damage, but denied that he had been guilty of wrongdoing. Again, one may strike the balance, when guilty of wrongdoing, by maintaining that although the action was injurious it was honorable, painful but useful, or anything else of the kind.

消除偏见的方法之一，是用辩解来消弭不友善的怀疑。无论这种怀疑是否公开表达，结果都是一样，所以这一方法可被视为普遍的准则。另一个方法是对争议点提出异议，包括：否认事实或者否认其有害，说明至少对原告无害；或者断言它的重要性被夸大；或者断言它本非不义，或者不义程度很轻微；或者断言它既不可耻也不重要。这些都是可能的争议点：正如在回应瑙西克拉底时，伊菲克拉底承认自己曾做过起诉者所说的事情，也造成了损害，但否认自己犯了罪。再者，即便犯下罪行，也可以坚称虽然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伤害，但却是高尚的；虽然造成了痛苦，但却是有利的，诸如此类。

Another method consists in saying that it was a case of error, misfortune, or necessity; as, for example, Sophocles said that he trembled, not, as the accuser said, in order to appear old, but from necessity, for it was against his wish that he was eighty years of age. [3_176] One may also substitute one motive for another, and say that one did not mean to injure but to do something else, not that of which one was accused, and that the wrongdoing was accidental: “I should deserve your hatred, had I acted so as to bring this about.”

另一个方法是宣称自己的所为是出于差错，出于不幸，或者情非得已；例如，索福克勒斯说，他的颤抖不是像原告所说的是为了做出

老态，而是情非得已，因为年届八旬也不是他所情愿的。还可以用一种动机取代另一种动机，说自己并没有存心伤害，而是原本打算做另外一件并非被指控之事，而且罪行乃是出于意外，比如："我若是存心做此事的话，理应遭你痛恨。"

Another method may be employed if the accuser, either himself or one closely related to him, has been involved in a similar charge, either now or formerly; or, if others are involved who are admittedly not exposed to the charge; for instance, if it is argued that so-and-so is an adulterer, because he is a dandy, then so-and-so must be.

如果原告自己或者与原告关系密切之人，过去或当前涉嫌类似指控，被告就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消除偏见；或者，如果另有他人涉案却众所周知未被指控，也可以采用这一方法；例如，可以这样反责，如果因为某某人是花花公子就说他是奸夫，那么也可以说另外那个某某人也一定是奸夫，因为那个人也是花花公子。

Again, if the accuser has already similarly accused others, or himself been accused by others; [3_177] or if others, without being formally accused, have been suspected as you are now, and their innocence has been proved.

再者，如果原告已经用类似方法控告过他人，或者原告自己曾被他人指控；或者如果他人虽未被正式指控，但和你现在一样被人怀疑，而后来又被证明是清白的，那么你也可以说自己是清白的。

Another method consists in counter-attacking the accuser; for it would be absurd to believe the words of one who is himself unworthy of belief.

另一个方法是反击原告；因为若他自身不值得信任，那么再相信他的话就很荒谬了。

Another method is to appeal to a verdict already given, as Euripides did in the case about the exchange of property; [3_178] when Hygiaenon accused him of impiety as having advised perjury in the verse, “My tongue hath sworn, but my mind is unsworn,“ [3_179] Euripides replied that his accuser did wrong in transferring the decisions of the court of Dionysus to the law courts; for he had already rendered an account of what he had said there, [3_180] or was still ready to do so, if his adversary desired to accuse him.

另一个方法是诉诸已经作出的判决，正如欧里庇得斯在一起财产交换案中的做法：胡格埃农指控欧里庇得斯不敬神，因为他在诗歌中教唆人们作伪证：“我的口舌发了誓，但是心灵却没有”，对此，欧里庇得斯回应道，原告错把酒神节竞赛中的裁决挪到法庭上；要知道他早已为自己在酒神节竞赛场地所说的话作过解释，如果他的敌人想要指控他，他愿意再作解释。

Another method consists in attacking slander, showing how great an evil it is, and this because it alters the nature of judgements, [3_181] and that it does not rely on the real facts of the case.

另一个方法体现在攻击对方的诽谤上，说明诽谤是多么严重的恶行，因为它不仅会改变判决的性质，而且不依据事实真相。

Common to both parties is the topic of tokens, as in the *Teucer* , [3_182] Odysseus reproaches Teucer with being a relative of Priam, whose sister his mother Hesione was; to which Teucer replied that his father Telamon was the enemy of Priam, and that he himself did not denounce the spies. [3_183]

迹象部目适用于控辩双方，正如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透克罗斯》 [4_78] 中，奥德修斯谴责透克罗斯是普里阿摩斯的亲戚，因为他母亲赫西俄涅是普里阿摩斯的妹妹；对此，透克罗斯回应说，他的父亲忒拉蒙是普里阿摩斯的敌人，而且他本人也没有揭发希腊人派往特洛伊的探子。 [4_79]

Another method, suitable for the accuser, is to praise something unimportant at great length, and to condemn something important concisely; or, putting forward several things that are praiseworthy in the opponent, to condemn the one thing that has an important bearing upon the case. Such methods [3_184] are most artful and unfair; for by their use men endeavor to make what is good in a man injurious to him, by mixing it up with what is bad.

还有一个方法适用于原告，即长篇累牍地夸赞某个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三言两语地谴责某个重要的事情；或者在列举对方的几件好品质之后，随即谴责对方对本案造成重大影响的一件事情。这两种方法都非常狡猾且不公正；因为通过此法，人们竭力把美德与恶行混淆起来，利用他人的美德来伤害他人。

Another method is common to both accuser and defender. Since the same thing may have been done from several motives, the accuser must disparage it by taking it in the worse sense, while the defender must take it in the better sense. For instance, when Diomedes chose Odysseus for his companion, it may be said on the one hand that he did so because he considered him to be the bravest of men, on the other, that it was because Odysseus was the only man who was no possible rival for him, since he was a poltroon. Let this suffice for the question of prejudice.

还有一种方法适合控辩双方。既然人们做同一件事可能出于数个动机，那么原告应该从较坏的方面入手来贬损该事，而被告则应当从较好的方面入手。例如，当狄俄墨得斯挑选奥德修斯作为侦察敌营的同伴时，一方面可以说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奥德修斯最勇敢；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原因在于奥德修斯是唯一不可能抢他风头的人，因为他认为奥德修斯无足挂齿。关于偏见的问题就讲到这里。

Chapter 16

第十六章

In the epideictic style the narrative should not be consecutive, but disjointed; for it is necessary to go through the actions which form the subject of the speech. For a speech is made up of one part that is inartificial (the speaker being in no way the author of the actions which he relates), and of another that does depend upon art. The latter consists in showing that the action did take place, if it be incredible, or that it is of a certain kind, or of a certain importance, or all three together. This is why it is sometimes right not to narrate

all the facts consecutively, because a demonstration of this kind [3_185] is difficult to remember. From some facts a man may be shown to be courageous, from others wise or just. Besides, a speech of this kind is simpler, whereas the other is intricate and not plain. It is only necessary to recall famous actions; wherefore most people have no need of narrative—for instance, if you wish to praise Achilles; for everybody knows what he did, and it is only necessary to make use of it. But if you wish to praise Critias, narrative is necessary, for not many people know what he did… [3_186]

在典礼演说风格中，叙述不应该连续铺陈，而应该分段进行；因为演讲者必须讲述构成演说主题的各个行动。须知演说的一部分并不依赖于修辞艺术（演说者本非他所讲述行为的执行者），另一部分则依赖于修辞艺术。后者在于证明某事的确发生了，如果它令人难以置信的话，或者证明它属于某一种类，或者证明它具有某种重要意义，或者同时证明这三点。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不应该流水账似地罗列所有事实，因为这样的明示难以被记住。我们可以通过某些事实证明某人勇敢，通过其他事实证明某人明智或者正直。另外，这类演说比较简单，而其他类型的演说则较为微妙且不那么直白。著名的事迹只需要提一下就够了；因此对多数名人的行为都没必要赘述，例如，如果你想赞扬阿喀琉斯，因为人人都知道他的事迹，只需拿来用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想赞扬克里提阿斯，铺叙就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事迹。

But at the present day it is absurdly laid down that the narrative should be rapid. And yet, as the man said to the baker when he asked whether he was to knead bread hard or soft, “What! Is it impossible to knead it well?” so it is in this case; for the narrative must not be long, nor the exordium, nor the proofs either. For in this case also propriety does not consist either in rapidity or

conciseness, but in a due mean; that is, one must say all that will make the facts clear, or create the belief that they have happened or have done injury or wrong, or that they are as important as you wish to make them. The opposite party must do the opposite. And you should incidentally narrate anything that tends to show your own virtue, for instance, “I always recommended him to act rightly, not to forsake his children”; or the wickedness of your opponent, for instance, “but he answered that, wherever he might be, he would always find other children,” an answer attributed by Herodotus [3_187] to the Egyptian rebels; or anything which is likely to please the dicasts.

可是现在居然有人规定叙述应当快速进行，这可真是荒唐。就如面包师问一个人面是要揉得软一点还是硬一点，那人回答：“什么？难道就没法揉得好一点吗？”这里也是如此：叙述千万不要太长，开场白和证据也都不要太长。因为在这种情形下，适当与否既不体现在快速上，也不体现在简洁上，而是体现在适中上；即只需说出足以阐明事实的内容，或使人相信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或者曾经造成伤害或者构成罪行，或证明这些事情如同你希望呈现的那样重要。对方则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另外，还应该顺便讲讲任何能够展示你的美德的事情，例如：“我经常劝他行正义之事，不要抛弃孩子”；或者讲讲对手的恶德，例如：“他竟然回答说无论到哪里，他总会再有孩子”，这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转述的埃及叛军 [4_80] 的回答；或者讲讲任何可能讨好法官的事情。

In defence, the narrative need not be so long; for the points at issue are either that the fact has not happened or that it was neither injurious nor wrong nor so important as asserted, so that one should not waste time over what all are agreed upon, unless anything tends to prove that, admitting the act, it is not wrong. Again, one should

only mention such past things as are likely to excite pity or indignation if described as actually happening; for instance, the story of Alcinous, because in the presence of Penelope it is reduced to sixty lines, [3_188] and the way in which Phayllus dealt with the epic cycle, [3_189] and the prologue to the *Oeneus* . [3_190]

作为辩护，叙述不需要太长；因为争议的要点是所诉事实并未发生，或者并未造成伤害，或者并无过错，或者并非像宣称的那么重要。所以不应该在那些众人意见一致的事情上浪费时间，除非有什么能够帮助证明某行为虽的确发生，却并无过错。再者，应该只讲那些只要描述得栩栩如生便能激发同情或者义愤的往事。例如，奥德修斯讲给阿尔喀诺俄斯听的故事，在讲给珀涅罗珀听的时候被缩减为六十行 [4_81] ，又如法宇罗斯 [4_82] 处理史诗的方式以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俄纽斯》序诗的写作手法。

And the narrative should be of a moral character, and in fact it will be so, if we know what effects this. One thing is to make clear our moral purpose; for as is the moral purpose, so is the character, and as is the end, so is the moral purpose. For this reason mathematical treatises have no moral character, because neither have they moral purpose; for they have no moral end. But the Socratic dialogues have; for they discuss such questions. Other ethical indications are the accompanying peculiarities of each individual character; for instance, “He was talking and walking on at the same time,” which indicates effrontery and boorishness. Nor should we speak as if from the intellect, after the manner of present-day orators; but from moral purpose: “But I wished it, and I preferred it; and even if I profited nothing, it is better.” The first statement indicates prudence, the second virtue; for prudence consists in the pursuit of what is useful, virtue in that of what is

honorable. If anything of the kind seems incredible, then the reason must be added; of this Sophocles gives an example, where his Antigone says that she cared more for her brother than for her husband or children; for the latter can be replaced after they are gone, “but when father and mother are in the grave, no brother can ever be born.“ [3_191] If you have no reason, you should at least say that you are aware that what you assert is incredible, but that it is your nature; for no one believes that a man ever does anything of his own free will except from motives of self-interest. [3_192]

叙述还应该表现出一定的道德品性。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是什么促成了品性的形成，我们的叙述就会表现出来。方法之一，是明示我们的道德目的；道德目的清楚了，品性也就清楚了；目标清楚了，道德目的也就清楚了。从这个角度看，数学著作不具有任何道德品性，因为它们并不具有道德目的，而这是因为它们没有道德目标。但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拥有这些；因为它们讨论此类问题。其他道德表现，则包括伴随每种品性的特征；例如，“他一边走，一边说”，这表现出无礼和粗俗。此外，我们也不要像如今的演说者那样靠机巧说话，而应该从道德目的出发，比如：“但是我希望如此，宁可如此；即使我一无所获，也认为这样更好。”第一句陈述体现了谨慎，而第二句体现了美德；谨慎表现在追求有用的事物，美德表现在追求高尚的事物。如果某种品性看似不可思议，就得加上理由；索福克勒斯给出了一个例子：他著作中的安提戈涅说她爱自己的哥哥胜过爱丈夫和孩子，因为后者失去了还可以被替代，“但是当父母入土后，就不会生出兄弟了”。如果没有理由，你至少应该说，你已意识到你所说的话叫人难以置信，但这就是你的天性；要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一个人会主动做任何事情，除非出于利己的动机。

Further, the narrative should draw upon what is emotional by the introduction of such of its accompaniments as are well known,

and of what is specially characteristic of either yourself or of the adversary: “And he went off looking grimly at me”; and as Aeschines [3_193] says of Cratylus, that he hissed violently and violently shook his fists. Such details produce persuasion because, being known to the hearer, they become tokens of what he does not know. Numerous examples of this may be found in Homer: “Thus she spoke, and the aged nurse covered her face with her hands;“ [3_194] for those who are beginning to weep lay hold on their eyes. And you should at once introduce yourself and your adversary as being of a certain character, that the hearers may regard you or him as such; but do not let it be seen. That this is easy is perfectly clear [3_195] from the example of messengers; we do not yet know what they are going to say, but nevertheless we have an inkling of it.

再者，叙述应该诉诸情感，介绍与情感相关的各种为人所知之事以及有关己方或对方的典型事例，比如：“他离开时冷酷地看了我一眼”；又如埃斯喀涅斯关于克拉图鲁所说的话：他发出激烈的嘘声，并且猛烈地挥舞着拳头。这样的细节能说服人，是因为它们既然已为听众所了解，就会成为一种迹象，来标识听众所不了解的事物。荷马作品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她说完了，年老的奶妈双手掩面”，要知道刚开始哭泣的人会用手捂住眼睛。你还应该一开始就把自己和对手塑造成具有某种品性的人，以便让观众认为你或他就是那样；但是不要被人看穿你的意图。从信使的例子可以显见，这一点是很容易做到的：我们虽然还不知道他们将要说什么，但多少能猜到些。

Again, the narrative should be introduced in several places, sometimes not at all at the beginning. In deliberative oratory narrative is very rare, because no one can narrate things to come; but if there is narrative, it will be of things past, in order that, being reminded of them, the hearers may take better counsel about the

future. This may be done in a spirit either of blame or of praise; but in that case the speaker does not perform the function of the deliberative orator. If there is anything incredible, you should immediately promise both to give a reason for it at once and to submit it to the judgement of any whom the hearers approve; [3_196] as, for instance, Jocasta in the *Oedipus* of Carcinus [3_197] is always promising, when the man who is looking for her son makes inquiries of her; [3_198] and similarly Haemon in Sophocles.

再者，叙述应该在多处进行，有时根本不在开头。在议政演说中叙述很少见，因为没有人能够叙述未来的事情；但是如果有叙述，那一定是关于过去的事情，旨在提醒听众，以便他们能为将来作出更好的决断。这样的叙述可以本着指责的态度，也可以本着夸赞的态度；但若是这样，演说者就不是在扮演议政演说者的角色了。如果有什么事情令人难以置信，你应该马上承诺说自己会立刻给出理由，并提交给听众认可的人作出裁决；例如，在卡耳喀诺斯的戏剧《俄狄浦斯》中，当那个寻找她 [4_83] 儿子的人问她的时候，伊俄卡斯忒一直在给承诺；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的海蒙也是如此。

Chapter 17

第十七章

Proofs should be demonstrative, and as the disputed points are four, the demonstration should bear upon the particular point disputed; for instance, if the fact is disputed, proof of this must be brought at the trial before anything else; or if it is maintained that no injury has been done; or that the act was not so important as asserted; or was just, then this must be proved, the three last questions being matters of dispute just as the question of fact. But

do not forget that it is only in the case of a dispute as to this question of fact that one of the two parties must necessarily [3_199] be a rogue; for ignorance is not the cause, as it might be if a question of right or wrong were the issue; so that in this case one should spend time on this topic, but not in the others.

或然式证明应当能够证明论点，而且既然争议的要点有四种，那么证明就应该针对特定的争议点；比如，如果争议的要点是所诉之事是否属实，则必须在庭审时首先证明这一点；如果被告坚称没有造成伤害，或者坚称其行为不像他人所说的那样重要，或者坚称该行为是正义的，那么他就必须证明相应的那一点；后面这三个问题与事情是否属实的问题一样都是争议之所在。但是不要忘记，只有在关于事情是否属实的争议中，控辩双方才必有一方在撒谎；因为此时不知情并不是导致争议的原因，不像人们就对或错存有疑问时那样；因此，在事情是否属实这个问题上，人们应该着力讨论对方撒谎这一点，而其他三种情况下就不需要如此。

In epideictic speeches, amplification is employed, as a rule, to prove that things are honorable or useful; for the facts must be taken on trust, since proofs of these are rarely given, and only if they are incredible or the responsibility is attributed to another. [3_200]

在典礼演说中，铺陈一般被用来证明事情是高尚或者有用的；要知道人们采信事实一定是基于信任，因为人们很少为事实给出或然式证明；只有在它们难以置信的时候，或者人们认为背后另有其人的时候，才需要证明。

In deliberative oratory, it may be maintained either that certain consequences will not happen, or that what the adversary recommends will happen, but that it will be unjust, inexpedient, or not so important as supposed. But one must also look to see whether he makes any false statements as to things outside the issue; for these look like evidence that he makes misstatements about the issue itself as well.

在议政演说中，人们可能坚称某些后果不会发生，或者坚称对方建议的事情会发生，但是那将是不正义的、不利的，或者不如人们所想的那么重要。不过，人们还必须注意观察，对方是否就与所议话题无关的事说了假话；须知这些假话或许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对方对于所议话题也说了假话。

Examples are best suited to deliberative oratory and enthymemes to forensic. The first is concerned with the future, so that its examples must be derived from the past; the second with the question of the 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 of facts, in which demonstrative and necessary proofs are more in place; for the past involves a kind of necessity. [3_201] One should not introduce a series of enthymemes continuously but mix them up; otherwise they destroy one another. For there is a limit of quantity; thus, “Friend, since thou hast said as much as a wise man would say,“ [3_202] where Homer does not say τοιαῦτα (such things as), but τόσα (as many things as). Nor should you try to find enthymemes about everything; otherwise you will be imitating certain philosophers, who draw conclusions that are better known and more plausible than the premises from which they are drawn. [3_203] And whenever you wish to arouse emotion, do not use an enthymeme, for it will either drive out the emotion or it will be useless; for simultaneous

movements drive each other out, the result being their mutual destruction or weakening. Nor should you look for an enthymeme at the time when you wish to give the speech an ethical character; for demonstration involves neither moral character nor moral purpose.

例证最适合用于议政演说，修辞式推理最适合诉讼演说。议政演说关乎未来之事，因此所举的例子应该来自过去；而诉讼演说关乎事实存在与否，因此具有证明性和必然性的证据更合适；而过去的事情皆带有某种必然性。演说者不应将一系列修辞式推理连续铺陈开来，而应该穿插摆放，否则它们会破坏彼此的效果。要知道，听众能够理解的量是有限的，所以在“朋友，你既已说了智者才会说的那么多话”这个例子中，荷马没有用τοιαῦτα（如智者所说之事），而是用的τόσα（如智者所说之多）。演说者也不应企图寻找关于每一件事情的修辞式推理；否则你就是在模仿某些哲学家，他们得出来的结论能比导致结论的前提更广为人知，更可信。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想要激发情感，你就不要使用修辞式推理，因为它可能削弱情感，也可能毫无用处；要知道头脑中同时进行的运动会彼此排斥，结果是相互破坏或者彼此削弱。不要在你希望赋予演说某种道德品性的时候寻求修辞式推理，因为利用修辞式推理进行的证明，既不具备道德品性，也不具备道德目的。

Moral maxims, on the other hand, should be used in both narrative and proof; for they express moral character; for instance, “I gave him the money and that although I knew that one ought not to trust.” Or, to arouse emotion: “I do not regret it, although I have been wronged; his is the profit, mine the right.”

另一方面，可以在叙述和或然式证明中使用道德格言，因为它们

能够表达道德品性；例如，“我给了他钱，尽管我知道不应该相信他人的道理。”或者，为了激发情感，也可以这样说：“我并不后悔，尽管我被人害过；他获得的是利益，而我获得的是道义。”

Deliberative speaking is more difficult than forensic, and naturally so, because it has to do with the future; whereas forensic speaking has to do with the past, which is already known, even by diviners, as Epimenides the Cretan said; for he used to divine, not the future, but only things that were past but obscure. [3_204] Further, the law is the subject in forensic speaking; and when one has a starting-point, it is easier to find a demonstrative proof. Deliberative speaking does not allow many opportunities for lingering—for instance, attacks on the adversary, remarks about oneself, or attempts to arouse emotion. In this branch of Rhetoric there is less room for these than in any other, unless the speaker wanders from the subject. Therefore, when at a loss for topics, one must do as the orators at Athens, amongst them Isocrates, for even when deliberating, he brings accusations against the Lacedaemonians, for instance, in the *Panegyricus* , [3_205] and against Chares in the *Symmachikos* (*On the Peace*). [3_206]

议政演说比诉讼演说要难，这是必然的，因为议政演说涉及未来；相反，诉讼演说关注过去，而过去的事情早已为人所知，这一点，正如克里特人厄庇墨尼得斯所说，是连预言家都知道的；厄庇墨尼得斯曾经为人占卜，但是不卜未来，只卜过去模糊不清的事情。再者，法律是诉讼演说的依据；有了这个出发点，就很容易找到证明的证据。议政演说没有多少说闲话的机会，例如攻击对手、介绍自己或者激发听众的情感等。在修辞术的议政演说这个分支中，做这些事情的空间比其他演说类型要小，除非演说者跑题。因此，无话可说时，不妨效法雅典的演说家，特别是伊索克拉底：即使是在议政演说中，

他也会攻击他人，例如在《泛希腊集会辞》中攻击拉栖第梦人，在《联盟辞》（又名《论和平》）中攻击卡瑞斯。

Epideictic speeches should be varied with laudatory episodes, after the manner of Isocrates, who is always bringing somebody in. This is what Gorgias meant when he said that he was never at a loss for something to say; for, if he is speaking of Peleus, he praises Achilles, then Aeacus, then the god; similarly courage, which does this and that, [3_207] or is of such a kind. If you have proofs, then, your language must be both ethical and demonstrative; if you have no enthymemes, ethical only. In fact, it is more fitting that a virtuous man should show himself good than that his speech should be painfully exact.

典礼演说应该穿插一些赞美之词，像伊索克拉底那样，他总是引入一些人物加以赞扬。高尔吉亚说他从来不会无话可说，也是这个意思；比如，如果他在讲佩琉斯，他可以赞颂佩琉斯的儿子阿喀琉斯，然后赞颂佩琉斯的父亲爱考士，然后赞颂佩琉斯的祖父宙斯天神；同理，如果他在讲勇气，他可以说勇气成就了这样那样的壮举，或者说勇气本身就是一种壮举。如果你动用逻辑论证，那么，你的语言应该既符合道德又具有证明性；如果没有修辞式推理，那么你的语言只需要符合道德即可。事实上，一个有德行的人，表现出自己的德行要比自己的言辞精准得不差分毫且更加得体。

Refutative enthymemes are more popular than demonstrative, because, in all cases of refutation, it is clearer that a logical conclusion has been reached; for opposites are more noticeable when placed in juxtaposition. [3_208] The refutation of the opponent is not a particular kind of proof; his arguments should be refuted

partly by objection, partly by counter-syllogism. [3_209] In both deliberative and forensic rhetoric he who speaks first should state his own proofs and afterwards meet the arguments of the opponent, refuting or pulling them to pieces beforehand. But if the opposition is varied, [3_210] these arguments should be dealt with first, as Callistratus did in the Messenian assembly; in fact, it was only after he had first refuted what his opponents were likely to say that he put forward his own proofs. He who replies should first state the arguments against the opponent's speech, refuting and answering it by syllogisms, especially if his arguments have met with approval. For as the mind is ill-disposed towards one against whom prejudices have been raised beforehand, it is equally so towards a speech, if the adversary is thought to have spoken well. One must therefore make room in the hearer's mind for the speech one intends to make; and for this purpose you must destroy the impression made by the adversary. Wherefore it is only after having combated all the arguments, or the most important, or those which are plausible, or most easy to refute, that you should substantiate your own case: “I will first defend the goddesses, for I [do not think] that Hera…“ [3_211] in this passage the poet has first seized upon the weakest argument.

反驳性的修辞式推理比证明性的更受欢迎，因为在所有的反驳中都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得出的结论符合逻辑，要知道放到一起时，对立事物的对立性会更加明显。反驳对方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或然式证明；反驳对方的论点，一方面靠提出异议，另一方面靠反三段论 [4_84]。在议政演说和诉讼演说中，首先发言的人都应该陈述自己的或然式证明，然后迎击对方的论点，预先将其驳倒或者粉碎。但是如果对方的论点多种多样，就必须首先对付这些论点，正如卡利特剌托斯在麦西尼亚公民大会上所做的；事实上，他是在反驳了对方可能说的话之后才提出自己的或然式证明。而回应对方的人，应该先提出用于反驳

对方演说的论点，利用三段论来予以驳斥和答复，特别是当对方的论点已经获得肯定的时候。如果人们预先对某个人产生了偏见，就不会对其怀有好感；对演讲来说也一样，如果听众认为我们的对手讲得很好，就不会对我们的演说怀有好感。因此，演说者应该在听众心里为自己即将发表的演说预留空间；为此目的，演说者应该破坏对方在听众心中留下的好印象。因此，只有在驳斥了所有论点，或最重要的论点，或看似可信的论点，或最易驳斥的论点之后，演说者才应该建立自己的论点，比如："我将首先为女神们辩护，因为我（并不认为）赫拉……" [4_85] ，在这段话中，说话者首先抓住了对方最不堪一击的论点。

So much concerning proofs. In regard to moral character, since sometimes, in speaking of ourselves, we render ourselves liable to envy, to the charge of prolixity, or contradiction, or, when speaking of another, we may be accused of abuse or boorishness, we must make another speak in our place, as Isocrates does in the *Philippus* [3_212] and in the *Antidosis* . [3_213] Archilochus uses the same device in censure; for in his iambics he introduces the father speaking as follows of his daughter: "There is nothing beyond expectation, nothing that can be sworn impossible," [3_214] and the carpenter Charon in the iambic verse beginning "I [care not for the wealth] of Gyges;" [3_215] Sophocles, also, [3_216] introduces Haemon, when defending Antigone against his father, as if quoting the opinion of others. One should also sometimes change enthymemes into moral maxims; for instance, "Sensible men should become reconciled when they are prosperous; for in this manner they will obtain the greatest advantages,"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enthymeme "If men should become reconciled whenever it is most useful and advantageous, they should be reconciled in a time of prosperity."

关于或然式证明，我们就讲到这里。至于道德品性，有时，我们在评说自己的时候，会招人嫉妒，被认为啰里啰嗦或者前后矛盾；而当我们评说他人的时候，又可能被指责为口出恶言或者粗鲁无礼；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让他人替自己说这类话语，正如伊索克拉底在《致腓力书》和《交换法》中的做法。阿喀罗科斯在攻击他人时也使用了相同的手段：在他的短长格诗句中，他借父亲之口责备女儿："没有什么坏事是想不到的，没有什么坏事是可以被称为不可能的[4_86]"；他在同一篇短长格诗中介绍木匠卡戎时，用木匠的口吻这样开篇："我（不在乎）古阿斯的（财富）[4_87]"；再如，索福克勒斯在其著作中介绍海蒙在父亲面前替安提戈涅求情时，也仿佛在引用他人的观点[4_88]。有时演说者还可以将修辞式推理化作格言；例如，"智者应该在发达时与人和解，因为这样他们能获得最大的好处"，这句话相当于下面这个修辞式推理："如果说人们应该在最有利而且最占优势的时候与人和解，那么他们就应该在发达时与人和解。"

Chapter 18

第十八章

In regard to interrogation, its employment is especially opportune, when the opponent has already stated the opposite, so that the addition of a question makes the result an absurdity; [3_217] as, for instance, when Pericles interrogated Lampon about initiation into the sacred rites of the savior goddess. On Lampon replying that it was not possible for one who was not initiated to be told about them, Pericles asked him if he himself was acquainted with the rites, and when he said yes, Pericles further asked, "How can that be, seeing that you are uninitiated?" Again, interrogation should be employed when one of the two propositions is evident, and it is obvious that the opponent will admit the other if you ask him. But

the interrogator, having obtained the second premise by putting a question, should not make an additional question of what is evident, but should state the conclusion. For instance, Socrates, when accused by Meletus of not believing in the gods, asked [3_218] whether he did not say that there was a divine something; and when Meletus said yes, Socrates went on to ask if divine beings were not either children of the gods or something godlike. When Meletus again said yes, Socrates rejoined, “Is there a man, then, who can admit that the children of the gods exist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admitting that the gods exist?” Thirdly, when it is intended to show that the opponent either contradicts himself or puts forward a paradox. Further, when the opponent can do nothing else but answer the question by a sophistical solution; for if he answers, “Partly yes, and partly no,” “Some are, but some are not,” “In one sense it is so, in another not,” the hearers cry out against him as being in a difficulty. [3_219] In other cases interrogation should not be attempted; for if the adversary raises an objection, the interrogator seems to be defeated; for it is impossible to ask a number of questions, owing to the hearer's weakness. Wherefore also we should compress our enthymemes as much as possible.

至于质问，若对方已经陈述了相反的论点，再追加一个问题即可证明其荒谬时，是特别适合的。例如，伯里克利曾向兰蓬询问有关守护女神的神圣祭礼之事。兰蓬回答说没有入教的人不能被告知，于是伯里克利问兰蓬本人是否熟知那些礼仪，兰蓬回答“是”，伯里克利便进一步追问：“你又没有入教，你怎么可能知道呢？”再者，当两个命题之一显然成立，并且你若质问对手，显然他也会承认另一个命题时，就应该提出质问，以推导出结论。但是，质问者在已经通过提问获得第二个前提后，就不应该就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继续追问，而应该立即得出结论。例如，当苏格拉底被墨勒托斯指控为不信神的时候，苏格拉底问后者，他自己是不是说过有神灵存在这样的话；在墨

勒托斯给出肯定答复之后，苏格拉底又问神灵是不是神祇的孩子或者类似神的东西。在墨勒托斯再次给出肯定答复之后，苏格拉底反驳道："难道会有人承认天神之子存在而不承认天神存在吗？"第三，当我们想要证明对方的说法自相矛盾或似是而非时，也可以进行质问。再者，如果对方无计可施，只能通过诡辩手段来回答问题，我们也可以进行质问；要知道如果他回答"部分是，部分不是"，"有的是，有的不是"，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不是"，听众就会大喝倒彩，以示他已陷入困境。在其他情况下，就不要动辄质问了；须知如果对方提出异议，质问方貌似就会被击溃；况且，限于听众的理解能力，我们也不可能问很多问题。因此，我们还应该尽可能地压缩修辞式推理。

Ambiguous questions should be answered by defining them by a regular explanation, and not too concisely; those that appear likely to make us contradict ourselves should be solved at once in the answer, before the adversary has time to ask the next question or to draw a conclusion; for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e drift of his argument. Both this, however, and the means of answering will be sufficiently clear from the *Topics* . *[3_220]* If a conclusion is put in the form of a question, we should state the reason for our answer. For instance, Sophocles [3_221] being asked by Pisander whether he, like the rest of the Committee of Ten, had approved the setting up of the Four Hundred, he admitted it. "What then?" asked Pisander, "did not this appear to you to be a wicked thing?" Sophocles admitted it. "So then you did what was wicked?" "Yes, for there was nothing better to be done." The Lacedaemonian, who was called to account for his ephoralty, being asked if he did not think that the rest of his colleagues had been justly put to death, answered yes. "But did not you pass the same measures as they did?" "Yes." "Would not you, then, also be justly put to death?" "No; for my colleagues did this for money; I did not, but acted according to my conscience." For

this reason we should not ask any further questions after drawing the conclusion, nor put the conclusion itself as a question, unless the balance of truth is unmistakably in our favor.

回答意思含糊的问题，应该通过规范的解释来为之定义，而且回答不能太简短。那些看似可能使我们自相矛盾的问题，应该在回答中立刻予以解决，不要给对方提出下一个问题或者得出结论的时间；须知对方论证的走向是不难看出来的。不过，关于这一点以及回答的方式，《部目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对方的结论是以问题的形式提出的，我们除了回答还应该陈述我们如此作答的理由。例如，佩珊德洛斯质问索福克勒斯是否像“十人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样，同意成立“四百人议事会”，索福克勒斯承认了。“然后呢？”佩珊德洛斯问道，“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件邪恶的事情吗？”索福克勒斯又承认了。“那么，你是干了邪恶的事情喽？”“是的，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又如，那位遭传唤并被要求解释其执政行为的拉栖第梦人，当被问道其同事被处死是否正当时，他回答说是。“但是难道你没有做跟他们一样的事情吗？”“做了。”“那么，如果你被处死，也是正义的了？”“不；因为我的同伴如此行事是为了金钱；而我不是，我的行为是出于良心。”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之后就不要继续提问，也不要以问题的形式表述结论，以防给对方回答和解释的机会，除非真相的天平毫无争议地向我们倾斜。

As for jests, since they may sometimes be useful in debates, the advice of Gorgias was good—to confound the opponents' earnest with jest and their jest with earnest. We have stated in the *Poetics* [3_222] how many kinds of jests there are, some of them becoming a gentleman, others not. You should therefore choose the kind that suits you. Irony is more gentlemanly than buffoonery; for the first is employed on one's own account, the second on that of another.

至于戏谑，在辩论中它们有时也能派上用场，既如此，高尔吉亚的建议是不错的，即用戏谑扰乱对方的认真，用认真挫败对方的戏谑。我们已在《诗学》中讲过戏谑的种类，其中有的适合绅士，有的不适合。因此，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种类。讽刺比插科打诨更适合绅士，因为前者是娱己，后者是娱人。

Chapter 19

第十九章

The epilogue is composed of four parts: to dispose the hearer favorably towards oneself and unfavorably towards the adversary; to amplify and depreciate; to excite the emotions of the hearer; to recapitulate. For after you have proved that you are truthful and that the adversary is false,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is to praise ourselves, blame him, and put the finishing touches. [3_223] One of two things should be aimed at, to show that you are either relatively or absolutely good and the adversary either relatively or absolutely bad. The topics which serve to represent men as good or bad have already been stated. [3_224] After this, when the proof has once been established, the natural thing is to amplify or depreciate; for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facts should be admitted, if it is intended to deal with the question of degree; just as the growth of the body is due to things previously existing. The topics of amplification and depreciation have been previously set forth. [3_225] Next, when the nature and importance of the facts are clear, one should rouse the hearer to certain emotions—pity, indignation, anger, hate, jealousy, emulation, and quarrelsomeness. The topics of these also have been previously stated, [3_226] so that all that remains is to recapitulate what has been said. This may appropriately be done at this stage in the way certain rhetoricians wrongly recommend for the exordium,

when they advise frequent repetition of the points, so that they may be easily learnt. In the exordium we should state the subject, in order that the question to be decided may not escape notice, but in the epilogue we should give a summary statement of the proofs.

结束语拥有四个功能：使听众对自己产生好感而对敌方产生恶感；进行铺陈和贬低；激发听众的各种情感；进行总结。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而对方是错误的之后，按照自然顺序，就该表扬自己，谴责对方，顺势收束。演说者应该努力实现下面两个目标之一：要么证明自己比较好，要么证明自己绝对好；或者要么证明对方比较坏，要么证明对方绝对坏。描述人之好坏的部目，我们早已讨论过 [4_89] 。好坏已辨之后，当或然式证明业已确立，下一件事情自然就是铺陈或贬低；须知要讨论某事的程度问题，首先得承认该事；正如身体的生长是基于肉体的存在一样。铺陈和贬低的部目，我们也已讨论过 [4_90] 。之后，当事实的性质和重要性都已明晰，就应该激发听众的种种情感：怜悯、义愤、愤怒、仇恨、嫉妒、羡慕和好斗。与这些相关的部目，我们之前也已讨论过 [4_91] ，所以在听众的情感被激发之后，下面要做的只剩下概括演讲中已经讲过的内容了。在这个阶段，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某些修辞学家错误地劝我们用于开场白的方法，即频频重复，以便让听众了解要点。在开场白中，我们应当陈述主题，以便使待议之题不至于被人忽视；但在结束语中，我们应该扼要地重述各项论证。

We should begin by saying that we have kept our promise, and then state what we have said and why. Our case may also be closely compared with our opponent's; and we may either compare what both of us have said on the same point, or without direct comparison: “My opponent said so-and-so, and I said so-and-so on this point and for these reasons.” Or ironically, as for instance, “He said this and I answered that; what would he have done, if he had

proved this, and not simply that?" Or by interrogation: "What is there that has not been proved?" or, "What has my opponent proved?" We may, therefore, either sum up by comparison, or in the natural order of the statements, just as they were made, our own first, and then again, separately, if we so desire, what has been said by our opponent.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speech [3_227] the most appropriate style is that which has no connecting particles, in order that it may be a peroration, but not an oration: "I have spoken; you have heard; you know the facts; now give your decision." [3_228]

我们应该首先声明自己信守了承诺，然后重述我们说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说。我们还可以比较我方和对方的论点：既可以针对同一个要点比较双方的论述，也可以不作直接的比较，例如："针对这个问题，我的对手如是说，我如是说，原因如下。"或者，可以进行讽刺，例如："他说了这，而我回答了那；如果他证明了这一点，却没有证明那一点，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呢？"或者可以进行质问："我还有什么没证明吗？"，或者："我的对手到底证明了什么？"总之，我们既可以通过比较来总结，也可以沿袭演讲前半部分陈述的自然顺序，先总结我们自己的陈述，然后，如果愿意的话，再单独总结对手的陈述。对演说的结论而言，最恰当的风格是省略连接词，这样才是结束演说，而不是继续演说，例如："我已说完；你们已听到；你们已知道了事实；现在请做决定吧。"

[3_1].Since the authors of tragedies acted their own plays, there was no need for professional actors, nor for instruction in the art of delivery or acting. This explains why no attempt had been made to deal with the question. Similarly, the rhapsodists (reciters of epic poems) were at first as a rule the composers of the poems themselves.

[3_2].In the law courts and public assembly.

[3_3].Cope prefers: "is thought vulgar, and rightly so considered."

[3_4].Or, "is concerned with appearance."

[3_5].i.e. style, delivery, and acting, which are of no use to serious students.

[3_6].A treatise on Pathos.

[3_7].Of Leontini in Sicily, Greek sophist and rhetorician (see Introduction).

[3_8].i.e. the poetic style. See Aristot. *Poet.* 22, where the choice of words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out-of-the-way words and phrases may be used in poetry is discussed.

[3_9]."Nouns and verbs" is a conventional expression for all the parts of speech. Cp. Hor. AP 240 "non ego inornata et dominantia nomina solum verbaque," where dominantia is a literal adaptation of κύρια, the usual Latin equivalent for which is propria.

[3_10].Aristot. *Poet.* 21.

[3_11].It is impossible to find a satisfactory English equivalent for the terms ξένος, ξενικός, τὸξενίζον, as applied to style. "Foreign" does not really convey the idea, which is rather that of something opposed to "home-like,"—out-of-the-way, as if from "abroad." Jebb suggests "distinctive."

[3_12].Cp. Hor. AP. 46, where it is said that the choice and use of words requires subtlety and care, skill in making an old word new by clever combination (callida iunctura) being especially praised.

[3_13].Chaps. 3 and 7.

[3_14].This is a parenthetical note.

[3_15].Aristot. *Poet.* 21, 22.

[3_16].The different kinds of words.

[3_17].Aristot. *Poet.* 22.9: "for this alone cannot be borrowed from another."

[3_18].Begging (as a beggar does) and praying (as a priest might) are both forms of asking, and by substituting one for the other, you can amplify or depreciate.

[3_19].See 1.7.32.

[3_20].Head of a distinguished Athenian family which held the office of torch-bearer at the Eleusinian mysteries. A man of notoriously dissipated character, he took some part in politics.

[3_21].The δᾳδοῦχος or hereditary torch-bearer ranked next to the hierophant or chief priest. In addition to holding the torch during the sacrifices, he took part in the recitation of the ritual and certain purificatory ceremonies. The μητραγύρται or mendicant priests collected alms on behalf of various deities, especially the great Mother Cybele (whence their name). They included both men and women of profligate character, addicted to every kind of lewdness.

[3_22].Cf. "'convey' the wise it call"(Merry Wives, I. iii.). Either the euphemistic or unfavorable application of the term may be adopted.

[3_23].According to Athenaeus, p. 669, he was a poet and rhetorician who recommended the Athenians to use bronze money.

[3_24].A scream is neither articulate nor agreeable, like the sound of poetry, although both are voices or sound, and to that extent the metaphor is correct.

[3_25].Athenaeus, p. 452.

[3_26].Rhetorician and sophist of Heraclea in Pontus.

[3_27].Eur. *Orest.* 1588. In the preceding line Menelaus accuses Orestes as a matricide and ready to heap murder on murder, to which Orestes replies, you should rather call me the avenger of my father Agamemnon, who had been murdered by his wife Clytaemnestra, the mother of Orestes. "Matricide" and "avenger of his father" show the good and bad sides of the deed of Orestes.

[3_28].Frag. 7 (P.L.G. 3, p. 390). The winner of the mule race was Anaxilaus of Rhegium.

[3_29].A sophist, not the poet (author of the obscure Alexander or Cassandra), who was later than Aristotle.

[3_30].Lobeck conjectured κατεπιορκήσαντας, "who commit out-and-out perjury."

[3_31].Sciron and Sinnis were both robbers slain by Theseus, by Lycophron turns Sinnis into a γλῶττα, using it adjectivally = "destructive"; cf. σῖνος, "harm"; σίντης = σίννις.

[3_32].The meaning of παραλαβών is quite obscure: various renderings are "having taken to himself," "received," "grasped," "inherited." The word μουσεῖον, originally a haunt of the Muses, came to mean a school of art or literature. The fault appears to consist in the addition of τῆς φύσεως, but it is difficult to see why. Cope confesses his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passage. Jebb translates: "he does not say, 'having taken to himself a school of the Muses,' but 'to Nature's school of the Muses.'"

[3_33].On this passage Thompson (Gorgias, p.179) says: "The metaphor of reaping and sowing is a mere commonplace... but 'pallid and bloodless affairs' is a phrase which would need apology even from a modern."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difficult to see what objection there is to calling the Odyssey "a beautiful mirror of human life." Another reading is ἔναιμα, which Cope translates "events fresh with the blood in them." If the two extracts are taken together, it is suggested (apparently by the editor of Cope's notes) that the sense may be: "things green and unripe (flushed with sap), and this was the crop which you...," the adjectives referring to green and unripe stalks of corn.

[3_34].Or, "a barrier against the laws." This is the general meaning of ἐπιτείχισμα, a border fortress commanding an enem's country.

[3_35].Compare Hom. *Il.* 22.164ἐνάντιον ὧρτο λεὼν ὥς.

[3_36].Pupil of Isocrates and historical writer. Idrieus was a prince of Caria, who had been imprisoned.

[3_37].Meaning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Euxenus without a knowledge of geometry and Archidamus with a knowledge of geometry. The proportion of geometrical knowledge will remain the same, so that Archidamus can be called an ungeometrical Euxenus, and Euxenus a geometrical Archidamus (see 4.4, note for "by proportion").

[3_38].Plat. *Rep.* 469d.

[3_39].Plat. *Rep.* 488a.

[3_40].Plat. *Rep.* 601b.

[3_41].If metrical restrictions have been removed and they are read as prose.

[3_42].Meaning that they did not appreciate the benefits received from the Athenians, who conquered the islands (440 B.C.).

[3_43].Or, "are cut down by axes, the handles of which are made of their own wood."

[3_44].It is disputed whether Demosthenes is the orator or the Athenian general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e point of the comparison is that in a democracy the general instability of political conditions makes the people sick of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ings and eager for a change.

[3_45].Aristoph. *Kn.* 715-718.

[3_46].As the shield is to Ares, so is the goblet to Dionysus. Proportion is defined (Aristot. Nic. Eth. 5.3.8) as "an equality of ratios, implying four terms at the least," and the proportional metaphor is one in which the second term is to the first as the fourth is to the third; for then one can by metaphor substitute the fourth for the second, or the second for the fourth. Let A be Dionysus, B a goblet, C Ares, D a shield. Then by the definition, the goblet is to Dionysus as the shield is to Ares. The metaphor consists in transferring to the goblet the name belonging to its analogue the shield. Sometimes an addition is made by way of explanation of the word in its new sense, and the goblet may be described as the shield of Dionysus and the shield as the goblet of Ares. The shield and the goblet both come under the same genus, be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deity, and can therefore be reciprocally transferred (Aristot. *Poet.* 21.4).

[3_47].The apodosis. ἀποδιδόναι is used in the sense of introducing a clause answering to the πρότασις, and ἀπόδοσις for this answering clause.

[3_48].Of Agrigentum(c. 490-430), poet, philosopher, and physician. Among other legends connected with him, he is said to have thrown himself into the crater of Etna, so that by suddenly disappearing he might be thought to be a god. His chief work was a poem called Nature, praised by Lucretius. The principles of things are the four elements, fire, air, water, and earth, which are unalterable and indestructible. Love and hate, alternately prevailing, regulate the period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ld. The existing fragments corroborate Aristotle's statement.

[3_49].Hdt.1.53, Hdt.1.91. Croesus consulted the Delphian oracle whether he

should attack Cyrus the Persian or not. Encouraged by the ambiguous oracle, he did so, but was utterly defeated.

[3_50].The deliberate intention to mislead.

[3_51].σκεύη, "inanimate things," the classification probably being male, female, and inanimate, not the grammatical one of masculine, feminine, and neuter.

[3_52].Heraclitus of Ephesus(c. 535-475). His chief work was on Nature. From the harshness of his language and the carelessness of his style he was called ὀσκοτεινός(the obscure). According to him, fire was the origin of all things; all things become fire, and then fire becomes all other things. All thing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flux; all is the same and yet not the same. Knowledge is founded upon sensual perception, but only the gods possess knowledge in perfection.

[3_53].Or, "although this reason exists for ever men are born...without understanding" (Welldon).

[3_54].Eur. *IT* 727.

[3_55].In Boeotia. The quotation is from the Thebaid of Antimachus of Claros (c. 450 B.C.). The Alexandrians placed him next to Homer among the epic poets. In his eulogy of the little hill, he went on to attribute to it all the good qualities it did not possess, a process which could obviously be carried on ad infinitum.

[3_56].By some identified with the tragic poet spoken of in Aristot. *Poet.* 2. His manner of expression, due to the wish to use fine language, was ridiculous owing to its being out of harmony with the subject. Others consider that he was not a poet at all but an orator. πότνια was a title of respect, applied to females, whether they were goddesses or ordinary women.

[3_57].Or, "draws a wrong conclusion."

[3_58].Alluding to Isocrates.

[3_59].Or, "to all the special rules given above."

[3_60].The exaggeration should be brought forward first, by way of forestalling the objection, and accompanied by some limiting phrase. Quintilian (Quint. Inst. Orat. 8.3.37) gives as examples: "so to say," "if I may be allowed to say so."

[3_61].Adaptation of voice, features, etc., to the subject.

[3_62].Isoc. 4.186, where μνήμη is the reading, translated "name" above (lit. memory) for the sake of the jingle, which also appears in the Greek of Isocrates. All the Mss. of Aristotle give γνώμην here, which shows that it is a misquotation.

[3_63].Plat. *Phaedrus* 238d, Plat. *Phaedrus* 241e. In the first of these passages Socrates attributes his unusual flow of words to the inspiration of the nymphs, and tells Phaedrus not to wonder if he seems to be in a divine fury, for he is not far from breaking out into dithyrambs. An example of the irony (a term implying a certain amount of contempt (2.2.25)) of Gorgias is given in Aristot. *Pol.* 3.1. When asked how a person comes to be a citizen, he answers: "as those are mortars which have been made by mortar-makers, so those are Larissaeans who have been made by artisans (δημιουργούς); for some of these were Larissa-makers (λαρισοποιούς)." There is a play on the double meaning of δημιουργός, (1) artisan, (2) magistrate, lit. people-maker. Larissa-makers means makers of Larissaeans in such numbers that they might be regarded as makers of Larissa itself. It has also been suggested that λαρισοποιούς may mean "kettle-makers," from λάρισα "a kettle," so called from having been first made at Larissa, but this seems unnecessary. The point is that Gorgias maintained that all were citizens who were made so by the magistrates, that citizenship was a manufactured article (see W. L. Newman's note on the passage, and W. H. Thompson's Appendix to his edition of Plato's *Gorgias*).

[3_64].He did not generally possess full rights of citizenship. The point of the illustration is that the hearer looks for the cadence just as confidently as, when a freedman is asked what patron he selects, every one expects him to say "Cleon."

[3_65].Bywater's emendation for τμητά of the Mss. Aristotle seems to be referring to the Pythagorean theory that "number" is the regulating force in all things, and in giving shape to language "number" is rhythm, which reduces a formless mass of words to order.

[3_66].The heroic rhythm (dactyls, spondees, and anapests) is as 1 to 1, two short syllables being equal to one long; trochaic and iambic 2 to 1 on the same principle; paean, 3 to 2 (three shorts and one long), being the mean between the other two.

[3_67].Understanding καὶτελευτῶντες.

[3_68].All three attributed to Simonides (Frag. 26 B: P.L.G.).

[3_69].A dash below the first word of a line, indicating the end of a sentence.

[3_70].καμπτῆρες, properly the turning-point of the δίαυλος or double course, is here used for the goal itself.

[3_71].τῶνχύδην: lit. what is poured fourth promiscuously: in flowing, unfettered language(Liddell and Scott).

[3_72].Really from the *Meleager* of Euripides, Frag. 515(T.G.F.). The break in the sense comes after γαῖα, Πελοπίαςχθονός really belonging to the next line: ἐνἀντιπόρθμοιςπέδι᾽ἔχουσ᾽εὐδαίμονα. As it stands in the text, the line implies that Calydon was in Peloponnesus, which of course it was not. The meaning then is: "This is the land of Calydon, with its fertile plains in the country over against Peloponnesus"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strait, near the mouth of the Corinthian gulf).

[3_73].It does not consist in simply dividing off any words from the context as the speaker pleases, but the parts of the sentence as a whole are properly constructed and distinguished and the sense also is complete.

[3_74].A well-known musician.

[3_75].Of Melos. He wrote rambling dithyrambic preludes without strophic correspondence. Others take ἀναβολήto mean an entire ode

[3_76].Hes. WD 265. The second line is a parody of 266, ἡδὲκακὴβουλὴτῷβουλεύσαντικακίστη.

[3_77].The beginning of Isoc. 4.

[3_78]."To dwell with us" (Jebb). The point seems to be that the barbarian domestics were in a comfortable position a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allies who were reduced to slavery; and there is a contrast between the desire of getting servants for private convenience, while in a matter affecting public life indifference was shown.

[3_79].All the above quotations are from Isoc. 4.1, 35, 41, 48, 72, 89, 105, 149, 181, 186, with slight variations. The last quotation is part of the sentence of which the beginning appears in 7.11 above. The whole runs: "And how great must we consider the fame and the name and the glory which those who have highly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in such deeds of valor will either have when living or will leave behind after their death."

[3_80].They murdered Alexander, tyrant of Pherae, being instigated by their sister, his wife. Nothing is known of the case referred to. According to Cope, the meaning is: "When they were at Pherae, they used to sell you as slaves, but now they have come to buy you" (referring to bribery in court). Others take ὠνεῖσθαι in a passive sense: "they have been bought," i.e. have had to sell themselves to you.

[3_81].Aristoph. frag. 649 (Kock, Com. Att. Frag. 1.1880).

[3_82].Hom. *Il.* 9.526.

[3_83].The text is obviously corrupt.

[3_84].See Introduction.

[3_85].Roemer's text has ἀρεταί(excellences).

[3_86].There is no real antithesis, the sense of both clauses being the same.

[3_87].Hom. *Od.* 24.213ἀλλ᾽ἔμπηςκαλάμηνγέσ᾽ὀΐμαιεἰσορόωνταγιγνώσκειν. The words are those of Odysseus, whom Athene had changed into an old beggar, to Eumaeus, his faithful swineherd, in whose house he was staying unrecognized.

[3_88].προσθέσει: the addition of the particle of comparison ὡς. προθέσει(the reading of the Paris ms.)would mean, (1)"manner of setting forth"(Cope), or(2)"a metaphor, with a preface"(Jebb)(but the meaning of this is not clear). The simile only says that one thing resembles another, not, like the metaphor, that it is another; since the speaker does not say thi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mind of the hearer does not go into the matter, and so the chance of instruction, of acquiring some information, is lost.

[3_89].The meaning is: the two kinds of enthymemes mentioned last do convey some information, whereas the superficial enthymemes teach nothing, either at once, or a little later, when reflection has made the meaning clear.

[3_90].Isoc. 5.73.

[3_91].In Aristot. *Poet* . 21 metaphor and its four classes are defined: "Metaphor

consists in assigning to a thing the name of something else; and this may take place either from genus to species, or from species to genus, or from species to species, or proportionally. An instance of a metaphor from genus to species is 'here stands my ship,' for 'standing' is a genus, 'being moored' a species; from species to genus: 'Odysseus truly has wrought a myriad good deeds,' for 'myriad' is a specific large number, used for the generic 'multitude'; from species to species: 'having drawn off the life with the bronze' and 'having cut it with the unyielding bronze,' where 'drawn off' is used in the sense of 'cut,' and 'cut' in the sense of 'drawn off,' both being species of 'taking away.'" For the proportional metaphor see note on 4.4 above.

[3_92].1.7.34.

[3_93].εὔθυνα was the technical term for the examination of accounts to which all public officers had to submit when their term of office expired. Cephisodotus and Chares were both Athenian generals. "Having the people by the throat" may refer to the condition of Athens financially and his unsatisfactory conduct of the war. But the phrase εἰςπνῖγματὸνδῆμονἔχοντα is objected to by Cope, who reads ἀγαγόντα and translates: "that he drove the people into a fit of choking by his attempts to offer his accounts for scrutiny in this way," i.e. he tried to force his accounts down their throats, and nearly choked them. Another reading suggested is ἄγχοντα(throttling so as to choke).

[3_94].This may refer to a decree of Miltiades which was so speedily carried out that it became proverbial. The expedition was undertaken to assist Euboea against Thebes.

[3_95].By making peace, Iphicrates said that the Athenians had deprived themselves of the opportunity of attacking and plundering a weak maritime city, and so securing provisions for the war. The word ἐφόδια properly means provisions for a journey and travelling expenses.

[3_96].The Paralus and Salaminia were the two sacred galleys which conveyed state prisoners.

[3_97].It commanded the trade of the Euxine.

[3_98].Moerocles was a contemporary of Demosthenes, and an anti-Macedonian in politics. He seems to have been a money-grubber and was once prosecuted for extortion. The degree of the respectability(or rather, the swindling practices)of each is calculated by their respective profits.

[3_99].Poet of the Middle Comedy: Frag. 68(Kock, Com. Att. Frag. 2). The metaphor in ὑπερήμενοι is from those who failed to keep the term of payment of a fine or debt. Cope translates: "I find(μοι) the young ladies are..."

[3_100].Athenian orator, contemporary of Demosthenes

[3_101].As grinding down the tributary states. They differed from ordinary mills in being gaily painted.

[3_102].Contrasted with the Spartan "messes," which were of a plain and simple character, at which all the citizens dined together. The tavern orgies, according to Diogenes, represented these at Athens.

[3_103].Athenian orator, opponent of Demosthenes.

[3_104].Referring to the disastrous Sicilian expedition.

[3_105].Isoc. 5.12. Both οννδδομάς and οντρέχοντάς, refer to the collecting of a mob in a state of excitement.

[3_106].The statue of Chabrias, erected after one of his victories, represented him as kneeling on the ground, the position which he had ordered his soldiers to take up when awaiting the enemy. The statue was in the agora and could be seen from the court. Lycoleon points to it, and bases his appeal on its suppliant attitude.

[3_107].Isoc. 4.151.

[3_108].Metaphor from species to genus(10.7, first note.), "studying" being a species of "increasing." As a rule one studies to increase some good quality, not a bad one.

[3_109].Isoc. 4.172.

[3_110].Isoc. 4.180(apparently from memory).

[3_111].εὔθυνα(see 10.7, third note)further implies the punishment for an unsatisfactory statement of accounts.

[3_112].Simonides, frag. 5(P.L.G. 2.). Both a good man and a square are complete as far as they go, but they do not express actuality.

[3_113].Isoc. 5.10.

[3_114].Isoc. 5.127. This speech is an appeal to Philip to lead the Greeks against Persia. As a sacred animal could roam where it pleased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its temple, so Philip could claim the whole of Greece as his fatherland, while other descendants of Heracles(whom Isocrates calls the author of Philip's line)were tied down and their outlook narrowed by the laws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city in which they dwelt.

[3_115].Eur. *IA* 80, with δορί for ποσίν.

[3_116].Hom. *Od.* 11.598, with ἔπειταπέδονδε for ἐπὶδάπεδόνδε.

[3_117].Hom. *Il* . 13.587.

[3_118].Hom. *Il* . 4.126.

[3_119].Hom. *Il.* 11.574.

[3_120].Hom. *Il* . 15.541.

[3_121].Hom. *Il.* 13.799. The reference is to the "boiling waves of the loud-roaring sea."

[3_122].The anchor keeps a ship steady below, the pot hook is above, and the pot hangs down from it.

[3_123].Cope, retaining ἀνωμαλίσθαι(as if from ἀνομαλίζειν, aequalitatem restituere Bonitz, cf. ἀνομάλωσις) says: "the widely dissimilar things here compared are the areas of properties and the state offices and privileges, which are to be alike equalized," translating: "And the re-equalization of cities, when the same principle is applied to things standing wide apart, viz. to surface (area) and powers (functions, offices)." (ἀν- is not negative, but = re.) But the passage quoted by Victorius from Isoc. 5.40: "for I know that all the cities of Greece have been placed on the same level (ὡμαλίσθαι) by misfortunes" suggests this as a preferable reading here, ὡμαλίσθαι meaning (1) have been levelled to the ground (although the Lexica give no instance of this use), (2) reduced to the same level of weakness.

[3_124].προεξαπατᾶν. Or, reading προσεξαπατᾶν, "by adding deception."

[3_125].See 2.21.8.

[3_126].According to Cope, Θρᾷττ᾽εἶ, "you are no better than a Thracian slave-girl."

[3_127].There is obviously a play on πέρσαι(aor. 1 infin. of πέρθω)and Πέρσαι(Persians), but no satisfacto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joke has been suggested.

[3_128].The paradoxical and verbal. "Suitably" may refer to the manner of delivery; to being used at the proper time; or to taking care that the word is one that may be used in the two senses.

[3_129].Isoc. 5.61; Isoc. 8.101. The point in the illustrations lies in the use of ἀρχή, first in the sense of "empire," then in that of "beginning." It could be said that the "empire" of the sea was or was not "the beginning of misfortunes" for Athens; for at first it was highly beneficial to them, but in the end brought disaster, and thus was the "beginning" of evil.

[3_130].Usually translated, "There is no bearing Baring."

[3_131].Kock, C.A.F. 3.209, p. 448. In the two first examples "stranger" refers to a distant and reserved manner, as we say "don't make yourself a stranger"; in the third ξένος is apparently to be taken in the sense of "alien." Cope translates: "for that too is of a different kind"(foreign, alien to the two others; ἀλλότριον, belonging to something or somebody else, opposed to οἰκεῖον). But the whole passage is obscure.

[3_132].Kock, C.A.F. 2. Frag. 64, p. 163.

[3_133].Or, reading αἰ for ἀεὶ, "approved similes are..."

[3_134].In the simple metaphor "goblet" is substituted for "shield," but sometimes additions are made to the word as differently applied, such as "of Ares" and "without strings." These additions, besides involving greater detail(a characteristic of the simile), distinctly bring out the contrast of the two terms and make a simile, whereas the metaphor simply transfers the meaning.

[3_135].In posture.

[3_136].Contraction of eyelids and flame.

[3_137].Like Philoctetes on Lemnos after he had been bitten by the snake.

[3_138].When the concluding corresponds with the introductory expression. This "answering clause" is called apodosis (5.2), not restricted, as in modern usage, to the conclusion of a conditional sentence.

[3_139].Or, "he says it is a case of the Carpathian and the hare." An inhabitant of the island of Carpathus introduced a brace of hares, which so multiplied that they devoured all the crops and ruined the farmers(like the rabbits in Australia).

[3_140].Hom. *Il.* 9.385.

[3_141].This must be taken as a parenthetical remark, if it is Aristotle's at all.

[3_142].Because they are boyish.

[3_143].See 2.13 of this book.

[3_144].What follows, to the end of sect. 3, is of the nature of a parenthesis, not immedi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subject of the Chapter.

[3_145].The variation in the form of the expression suggests a similar variation in the form of the delivery or declamation.

[3_146].The meaning of this has not been satisfactorily explained. On the face of it, it seems to mean that the excellence of Philemon's delivery consisted in his way of declaiming passages in which the same words were repeated. Philemon is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the writer of the New Comedy, the rival and contemporary of Menander.

[3_147].Used of a stiff, ungraceful speaker.

[3_148].Spengel's reading here is: πολλὰδοκεῖ: "ὑπερεῖδενὅσαεἶπον," πολλὰδοκεῖ being parenthetical, and ὑπερεῖδονὅσαεἶπον part of the quotation. Jebb translates: "I came, I spoke to him, I besought"(these seem many things); "he disregarded all I said"(which certainly gives a more natural sense to ὑπερεῖδον).

[3_149].Hom. *Il.* 2.671 ff.

[3_150].Cope translates: "they think that, if the name is often repeated, there

must be a great deal to say about its owner"; but can this be got out of the Greek (εἰρῆσθαι)?

[3_151].Intended to produce the effect of finished work at a distance before a large number of spectators.

[3_152].The meaning apparently is that there is no discussion, as might be the case when there were several judges, so that the decision is clear and unbiased. ἀγών and ἀγωνιστικὴλέξις are terms used for debate (e.g. in the law courts) and the style suited to it (cf sect. 1). Cope's editor refers to Cic. Ad Att. 1.16.8 "remoto illo studio contentionis, quem vos [you Athenians] ἀγῶνα appellatis." Jebb translates: "the turmoil is absent, so that the judgement is serene" (in a note, "unclouded").

[3_153].This does not seem to agree with the general view. *Funeral orations* of the nature of panegyrics, for instance, were certainly meant to be spoken; but the ἔργον or proper function of an epideictic may be said to consist in reading, in its being agreeable to read. Its τέλος or end is to be read.

[3_154].The generally accepted divisions are: προοίμιον (exordium), διήγησις (narrative), πίστις (proof), ἐπίλογος (peroration). (διήγησις is a species of πρόθεσις , which is used instead of it just before.) Aristotle objects that it is (as a rule) only the forensic speech which requires a regular διήγησις , a full and detailed statement of what has happened before. In epideictic and demonstrative (deliberative) speeches, the object of which is to prove something, there is no need of another existing division called the refutation of the adversary, and in the demonstrative there can be no room for an epilogue, which is not a summary of proofs and arguments. Thus the necessary divisions of a speech are really only two; πρόθεσις and πίστις , or at most four.

[3_155].i.e. its use is to recall the main facts briefly (sect. 4 end), which in a short speech is needless.

[3_156].Plat. *Phaedrus* 266d, where the additional kinds of narrative are omitted, and their place taken by πίστωσις and ἐπιπίστωσις (confirmation of the proof).

[3_157].Or, "diverting the judge's attention."

[3_158].The subject of the oration was the praise of Helen, but Isocrates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attacking the sophists. This exemplifies his skill in the introduction of

matter not strictly proper to, or in common with, the subject. The key-note is Helen; but the exordium is an attack on the Eristics, with special allusion to the Cynics and the Megarians.

[3_159].Of Samos, epic poet, author of a poem on the Persian war, from which this half-line and the context preserved in the Scholiast are taken. He complains that whereas the poets of olden times had plenty to write about, the field of poetry being as yet untilled, it was now all apportioned, and he, the last of the poets, was left behind, unable to find "a new chariot for the race-course of his song."

[3_160].ἐνδόσιμα = προοίμια.

[3_161].A parenthetical remark to the effect that epideictic exordia are different. Those of a forensic speech are like prologues and epic exordia, but it is different with epideictic, which may be wild, high-flown, as in the example given from an unknown author.

[3_162].That is, forensic speeches. δράμασι has been suggested for λόγοις.

[3_163].Hom. *Il* 1.1.

[3_164].Hom. *Od.* 1.1.

[3_165].From Choerilus (sect. 4).

[3_166].Soph. *OT* 774. But this can hardly be called the prologue.

[3_167].That is, special remedies in the case of the hearers suffering from "inattention, unfavorable disposition, and the like" (Cope).

[3_168].i.e., to claim the hearer's attention at the beginning, for every one is keen to listen then, but later on attention slackens.

[3_169].The hearer qua hearer should be unbiased, but in fact hearers often suffer from the defects referred to in sect. 7, for which certain forms of exordia are remedies.

[3_170].Soph. *Ant.* 223.

[3_171].Eur. *IT* 1162.

[3_172].2.1.7, 8.

[3_173].Hom. *Od.* 7.327.

[3_174].See 1.9.30.

[3_175].Another reading is τόπος(topic) and so throughout.

[3_176].Sophocles had two sons, Iophon and Ariston, by different wives; the latter had a son named Sophocles. Iophon, jealous of the affection shown by Sophocles to this grandson, summoned him before the phratores (a body which had some jurisdiction in family affairs) on the ground that his age rendered him incapable of managing his affairs. In reply to the charge, Sophocles read the famous choric ode on Attica from the Oedipus Coloneus, beginning Εὐίππου, ξένε, τᾶσδεχώρας(Soph. OC 668 ff.), and was acquitted. The story in this form is probably derived from some comedy, which introduced the case on the stage (see Jebb's Introd. to the tragedy).

[3_177].In the reading in the text, αὐτούς must apparently refer to the defendant, and one would rather expect αὐτόν. Spengel suggested ἢἄλλοςἢαὐτός for ἢἄλλοςαὐτούς: if he (i.e. the adversary) or another has similarly accused others.

[3_178].When a citizen was called upon to perform a "liturgy" or public service (e.g. the equipment of a chorus), if he thought that one richer than himself had been passed over he could summon him and compel him to exchange properties.

[3_179].Eur. *Hipp.* 612. This well-known verse is three times parodied in Aristophanes (Aristoph. Thes. 275; Aristoph. Frogs 101, Aristoph. Frogs1471). In the first passage, the sense is reversed: Euripides has dressed up a certain Mnesilochus as a woman in order that he may attend the Thesmophorian assembly. Mnesilochus first requires Euripides to take an oath that he will help him out of any trouble that may arise. Euripides takes an oath by all the gods, whereupon Mnesilochus says to Euripides: "Remember that it was your mind that swore, but not your tongue." When Euripides was engaged in a lawsuit, his adversary quoted the line, implying that even on oath Euripides could not be believed; Euripides replied that his adversary had no right to bring before the law courts a matter which had already been settled by the theatrical judges.

[3_180].In the great Dionysiac theater.

[3_181].Or, "makes extraneous points the subject of decision" (Cope), "raises false issues" (Jebb).

[3_182].Of Sophocles.

[3_183].Who had been sent to Troy by the Greeks to spy upon the Trojans. It seems that he was afterwards accused of treachery, the token being the fact that Teucer was a near connection of Priam; to which he replied with another token that his father was an enemy of Priam, and further, when the Greek spies were in Troy, he never betrayed them.

[3_184].Jebb refers τοιοῦτοι to the accusers, translating τεχνικοί "artistic," certainly the commoner meaning.

[3_185].Involving a continuous succession of proof.

[3_186].Something has been lost here, as is shown by the transition from epideictic to forensic Rhetoric. All the mss. have a gap, which in several of them is filled by introducing the passage ἔστιδ᾽ἔπαινος...μετατεθῇ(1.9.33-37).

[3_187].Hdt. 2.30. The story was that a number of Egyptian soldiers had revolted and left in a body for Ethiopia. Their king Psammetichus begged them not to desert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to which one of them made answer (τῶνδέτιναλέγεταιδέξαντατὸαἰδοῖονεἰπεῖν, ἔνθαἂντοῦτοῇ, ἔσεσθαιαὐτοῖσιἐνθαῦτακαὶτέκνακαὶγυναῖκας).

[3_188].Hom. *Od.* 23.264-284, Hom. *Od.* 23.310-343. The title referred to the narrative in Books 9-12. It became proverbial for a long-winded story.

[3_189].he apparently summarized it.

[3_190].OfEuripides. It was apparently very compact.

[3_191].Soph. *Ant.* 911-912, where the mss. have κεκενθότοιν instead of Aristotle's.

[3_192].Whereas this man makes his temperament responsible for the strange things he does; he is built that way and cannot help it.

[3_193].Supposed to be Aeschines called Socraticus from his intimate friendship

with Socrates. A philosopher and writer of speeches for the law courts, he had a great reputation as an orator.

[3_194].Hom. *Od* . 19.361.

[3_195].δεῖ(omitted by others) = "one cannot help seeing."

[3_196].Omitting τε. The difficulty is διατάττειν, which can apparently only mean "arrange." Jebb retains τε, and reads ὡς for οἷς: "the speaker must make himself responsible for the fact...and marshal his reasons in a way acceptable to the hearers." The old Latin translation vadiarequibusvolunt suggested to Roemer διαιτηταῖς, "to the arbitrators they approve."

[3_197].According to Jebb, Jocasta tells the inquirer incredible things about her son, and pledges her word for the facts. Cope says: "promises (to do something or other to satisfy him)."

[3_198].Soph. *Ant.* 683-723. On this Cope remarks: "This last example must be given up as hopeless;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extant play which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required here." According to Jebb, the "incredibility" consists in the fact that Haemon, although in love with Antigone, and strongly opposed to the sentence pronounced upon her by his father Creon, still remains loyal to the latter. Haemon explains the reason in lines 701-3, where he says that he prizes his father's welfar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for a father's good name and prosperity is the greatest ornament for children, as is the son's for the father.

[3_199].Aristotle's argument is as follows. But it must not be forgotten that it is only in a dispute as to this question of fact that one of the two parties must necessarily be a rogue. For ignorance is not the cause (of there being a dispute about the fact, e.g. "you hit me," "no, I didn't," where both know the truth), as it might be in a dispute on what was right or wrong, so that this is the topic on which you should spend some time (i.e. because here you can prove or disprove that A is πονηρός). The passage is generally taken to mean that when it is a question of fact it is universally true that one of the disputants must be a rogue. Cope alone among editors makes any comment. In his note he says: "all that is meant is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class of cases which fall under this issue, in which this topic may be safely used." For instance, A may on justifiable grounds charge B with theft; B denies it, and he may be innocent, although the evidence is strongly against him. In such a case, neither of the parties is necessarily πονηρός.

[3_200].Or, reading ἄλλως, "if there is some other reason."

[3_201].It is irrevocable, and it is possible to discuss it with some degree of certainty, whereas the future is quite uncertain, and all that can be done is to draw inferences from the past.

[3_202].Hom. *Od.* 4.204.

[3_203].For this passage see 1.2.12-13. The meaning is that it is absurd to prove what every one knows already.

[3_204].The remark of Epimenides is by many editors interpreted as a sarcasm upon the fraternity of soothsayers, who pretended to be able to foretell the future. But how is this to be got out of the Greek? The point is perhaps something like: "it is easy enough to talk about the past, for even soothsayers know it." What Aristotle says here is that Epimenides practised a different kind of divination, relating to the obscure phenomena of the past. The following is an instance. After the followers of Cylon, who tried to make himself tyrant of Athens(c. 632) had been put to death by the Alcmaeonid archon Megacles, in violation of the terms of surrender, a curse rested upon the city and it was devastated by a pestilence. On the advice of the oracle, Epimenides was summoned from Crete, and by certain rites and sacrifices purified the city and put a stop to the pestilence.

[3_205].Isoc. 4.110-114.

[3_206].Isoc. 8.27.

[3_207].He enumerates all the deeds that proceed from courage. Another reading is ἢτὰκαὶτά, ποιεῖὃτοιόνδεἐστίν, i.e. when praising courage, and this or that, he is employing a method of the kind mentioned.

[3_208].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form between the demonstrative and refutative enthymeme, but the latter draws opposite conclusions; and opposites are always more striking when they are brought together, and a parallel drawn between them. It is then easy to see where the fallacy lies. Cf. 2.23.30: "Refutative enthymemes are more effective (popular) than demonstrative, because they bring opposites together in a small compass, which are more striking (clearer) to the hearer from being put side by side."

[3_209].In the translation τῶν πίστεων is taken with ἔστι : it is the business of,

the proper function of, proofs. Others take it with τὰ μὲν...τὰ δέ : some...other (of the opponent's arguments).

[3_210].If the opponent's arguments are numerous and strong, by reason of the varied nature of the points dealt with.

[3_211].Eur. *Tro.* 969-971. Hecuba had advised Menelaus to put Helen to death; she defends herself at length, and is answered by Hecuba in a reply of which these words form part. Her argument is that none of the three goddesses who contended for the prize of beauty on Mt. Ida would have been such fools as to allow Argos and Athens to become subject to Troy as the result of the contest, which was merely a prank.

[3_212].Isoc. 5.4-7. Isocrates says that his friends thought very highly of one of his addresses, as likely to bring peace.

[3_213].Isoc. 15.132-139, Isoc. 15.141-149. Here again Isocrates puts compliments on his composition into the mouth of an imaginary friend.

[3_214].Archilochus (c. 650) of Paros was engaged to Neobule, the daughter of Lycambes. Her father broke off the engagement, whereupon Archilochus pursued father and daughter with furious and scurrilous abuse. It is here said that, instead of attacking the daughter directly, he represented her as being attacked by her father. The meaning of ἄελπτον is not clear. It may be a general statement: the unexpected often happens; or, there is nothing so bad that you may not expect it. B. St. Hilaire translates: "There is nothing that money cannot procure," meaning that the father was prepared to sell his daughter (Frag. 74).

[3_215].The line ends: τοῦ πολυχρύσου μέλει . Archilochus represents Charon the carpenter as expressing his own disapproval of the desire for wealth and of the envy caused by others possessing it.

[3_216].Here again, Haemon similarly puts his own feeling as to Creon's cruel treatment of Antigone into the mouth of the people of the city, and refers to popular rumor.

[3_217].The words ὅταν...ᾖ have been variously translated: (1) when one of the two alternatives has already been stated; (2) when the opponent has stated w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fact; (3) when the opponent has already conceded so much, "made one admission" (Jebb).

[3_218].Reading ἤρετο.

[3_219].For the first of the quibbles Sandys refers to Aristoph. Ach. 396, where Cephisophon, being asked if Euripides was indoors, replies, "Yes and no, if you understand me"; and he gives the explanation, his mind is outside, collecting scraps of poetry, while he himself is upstairs (ἀναβάδην, unless it means "with his legs up") composing a tragedy. The reference in the second instance is to the adversary being reduced to such a position that he cannot answer without having recourse to sophistical divisions and distinctions, which seem to imply uncertainty. Aristotle himself is fond of such "cautiously limited judgements" (Gomperz). The translation is that of the reading ἀποροῦντος, a conjecture of Spenge's. The audience will be ready to express its disapproval of his shuffling answers, which are evidence of his perplexity. The ordinary reading ἀποροῦντες attributes the "perplexity" to the hearers. Or, "the hearers, thinking he is puzzled, applaud us [the interrogator]" (Jebb).

[3_220].Aristot. *Top.* 8.4.

[3_221].Cp. 1.14.3.

[3_222].The Chapters are lost (cp. 1.11.29).

[3_223].Or, "mould the hearers to one's will" (L. and S.).

[3_224].Book 1.9.

[3_225].Book 2.19.

[3_226].Book 2.1-11.

[3_227].Reading τελευτῇ, a conjecture of Victorius. With τελευτή, the sense will be: "as a conclusion, the asyndectic style is appropriate."

[3_228].It is generally supposed that this example of a suitable peroration is an echo of the conclusion of the speech of Lysias Against Eratosthenes.

[4_1].参见第一卷第二章："通过演说实现的证明分为三种：第一种证明取决于演讲者的道德品格，第二种证明取决于把听者带入一种思维定式，第三种证明取决于演说本身。"

[4_2].参见第一卷第四至第十四章。

[4_3].参见第二卷第二十三章。

[4_4].此处用戏剧表演类比政治演说。“演员的影响比诗人大”是指在戏剧演出中观众更关注表演，而不是诗人创作的戏剧的内容；同样，在民主政体中，参加公民大会的人要更关注演说者的“表演”，而不是演说本身的内容。而这，大概就是作者所说的“政体的缺陷”。

[4_5].高尔吉亚，古希腊哲学家和修辞学家。

[4_6].这里的compound word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复合词”，而是把两个不常放在一起的词放在一起构成新词，参见下一章。

[4_7].参见本卷第三章和第七章。

[4_8].附加描述指一般附在名词后面、表示其性质或特征的描述性的词或词语。参见下文。

[4_9].“祈祷”和“乞讨”在希腊语和英语中都是同一个词，这就是“同一个词具有两个对立体”的例子。说乞讨者在祈祷是赞美人，说祈祷者在乞讨则是贬低人。

[4_10].狄奥尼西奥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古希腊人非常崇拜酒神，而古希腊的戏剧艺术也是从酒神崇拜的纪念仪式演化而来的。因此，有人把演员称为“酒神的奉承者”，但是这个称呼明显没有“艺术家”体面。

[4_11].卡利俄珀，掌管史诗的缪斯女神。

[4_12].利铿尼俄斯，公元前五世纪的酒神赞歌诗人和修辞学家。

[4_13].这个例子引自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俄瑞斯忒斯的父亲阿伽门农被母亲杀害，他为父报仇，杀死母亲。称他为“弑母者”着眼于其行为的不合理，称他为“为父报仇”则着眼于其行为的合理。

[4_14].骡子是马和驴所生，所以既可以说是“半驴”或者“驴的女儿”以耻笑骡车竞赛的获胜者，也可以说是“良驹的女儿”以赞颂获胜者。

[4_15].指小词，词的一种形式，一般是在名词后面加上表示“小”或“微”的意思的后缀。

[4_16].伊斯米亚运动会，古希腊时期仅次于奥林匹亚运动会的运动会。

[4_17].传说中菲洛梅拉本是雅典国王潘迪翁的女儿，后来变成燕子。

[4_18].伊德里欧斯，小亚细亚加里亚的国王，登基前曾被人监禁。这里所说的“被释放”即指他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

[4_19].伯里克利，参见第一卷第七章第75页注1。他这个比喻是说，萨摩斯岛人一边享受他带给他们的好处，一边抱怨。

[4_20].斧头的把手一般是用圣栎树做的，结果斧头又用来砍伐圣栎树。皮奥夏是古希腊的一个地区。

[4_21].这个明喻是指由于政治局势不稳定，雅典人就像晕船一样，感到恶心。

[4_22].这个明喻所说的演说家指侵吞公款的政治家。

[4_23].狄俄尼索斯是酒神，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杯；阿瑞斯是战神，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盾。所以，杯之于狄俄尼索斯和盾之于阿瑞斯构成类比，可以互相借用。

[4_24].连接词指起连接作用的词，包括小品词、前置词和连词。

[4_25].完结子句，指在含有表示时间、条件等从句的句子中表示结果的句子。比如，在原文所引述的例子中，“在他告诉我之后”是表示时间的从句，“出发了”是表示主体动作的完结子句。

[4_26].比如称狗为“狗”，而不是“动物”。前者是具体名称，后者是泛指名称。

[4_27].克洛索斯王是吕底亚国的国王，他想渡过哈律斯河去攻打波斯，为此派人去占卜。占卜的祭司给出了例子中的这个回答。结果，克洛索斯打了败仗，毁灭了自己的帝国。这里祭司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帝国”既可以指吕底亚，也可以指波斯。

[4_28].在这个例子中，原文希腊语的“来”和“交谈”使用的都是阴性形式。

[4_29].在这个例子中，原文希腊语的“来”和“打”使用的都是复数形式。

[4_30].根据乔治·肯尼迪2007年的英译本，“this or that happened, in this or that manner”是引文，应放在引号中，与前面的“I intended to set out after having spoken to him”相连。

[4_31].亚加亚，古希腊的一个地区。

[4_32].号之于号声相当于琴之于曲调，这就构成类比，所以可以说号声是没有琴的曲调。

[4_33].这个建议是指，演说者在使用某种手法过火后，要主动承认火的事实，批评自己，这样就抢占了先机，听众就会认为演说者过火的话是有道理的，就不至于不相信他了。

[4_34].《斐德若篇》，柏拉图《对话录》中的一篇。

[4_35].古希腊时代，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认为，“数”规约着万物，能规约语言的“数”就是节奏，它能给混乱不堪的话语带来秩序。

[4_36].在古希腊语中，在句首第一个词下面画一条线，表示上一个句子在该词之前完结。

[4_37].风格，本章所讲的“风格”主要指句式。

[4_38].希罗多德，古希腊历史学家。

[4_39].这句诗的完整形式是“这地方是卡吕冬，属于伯罗普斯的领土／面对着它富饶的平原。”因为一个句子被分成两行，致使第一行产生歧义，即“卡吕冬在伯罗奔尼撒境内”。其实，卡吕冬在在伯罗奔尼撒以北，中间隔着海湾。

[4_40].德谟克利特，这里指古希腊音乐家，并非著名哲学家德谟克利特。

[4_41].这句话是用来讽刺生私生子的人的。其中的“不”为译者加译。罗念生（2005）和英文译者乔治·肯尼迪（2007）都认为此处应为否定。

[4_42].《忒俄得克忒亚》，亚里士多德早年为纪念学生忒俄得克忒亚所写的修辞学著作。

[4_43].“在他们家里”与“和他们在一起”都是在别人家里做客的意思、不构成对立，所以这是假冒的对立句。

[4_44].“希腊被夺去一只眼睛”比喻的是雅典被拉栖第梦人攻占。

[4_45].米太亚德，雅典统帅，他的某条建议曾经很快被通过，成为法令。所以“米太亚德的法令”指速成之物，在这里指让雅典人迅速开赴埃维亚岛。

[4_46].这句话是说雅典人与这些城镇和解，失去了掠夺它们、获取作战辎重的机会。

[4_47].帕拉罗斯号快艇常被用来运载罪犯，被喻为“人民的大头榜”，是指政府用这种方式来威吓人民。

[4_48].黑海沿岸的粮食首先集中在塞斯托斯，然后再运到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所以塞斯托斯被喻为“比雷埃夫斯的粮屯”。

[4_49].磨坊喻指三浆战船是用来压榨盟邦的工具。

[4_50].公共餐厅是指斯巴达人会餐的简陋食堂，酒店是阿提卡人饮酒作乐的场所，所以酒店之于阿提卡人就是公共餐厅之于斯巴达人，构成类比关系。

[4_51].把雅典“耗干”在西西里，指的是雅典远征军于公元前413年在西西里全军覆没。

[4_52].这句引文讲的是下文将提到的西西弗斯。他是科林斯的暴君，生性诡诈，大肆绑架和残杀客商，甚至一度绑架了死神，让世间没有了死亡。由于触怒了众神，他死后被判在冥域推一块石头。每次他快把巨石推到山顶时，巨石都会滚下来，于是他只能永无休止地重复推石头。

[4_53].这里的“无耻”和上文的“无情”不一致，可能是英语译者的失误。

[4_54].这句诗选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述的是咆哮翻滚的海浪。

[4_55].在古希腊时代，任何人都不得抓捕那些逃到神坛避难的人。因此，受害者既可以诉诸法律请求仲裁，也可以去神坛避难。

[4_56].这个警句此处的英译疑有误，其中的“蚂蚱”应该是“知了”，参见第二卷第二十一章第261页注2。

[4_57].这里的两个“外人”分别指的是“陌生人”和“举止拘谨矜持的人”。

[4_58].关于“盾牌”的隐喻参见本卷第四章第341页注2。弓弦之于弓和琴弦之于琴构成类比关系，在古希腊，弓平时不上弦，只有用时才上弦，所以说“弓是无弦的琴”。这是一个类比式隐喻。

[4_59].近视的人看东西需要眯着眼睛，不断收放眼睑，而火焰会或高或低，或明或暗地跳跃，二者有相似之处。

[4_60].因为这样的表达建立在类比关系的基础上，是复杂隐喻。

[4_61].菲罗克忒忒斯，古代英雄，曾被毒蛇咬伤。

[4_62].当初，卡帕托斯岛上的人引入了一种野兔。这种野兔繁殖速度惊人，很快就吃光了庄稼，使农夫遭殃。

[4_63].这段话选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是阿喀琉斯所说。因为阿伽门农曾夺其所爱，所以他发誓绝不娶阿伽门农的女儿。其中提到的阿特柔斯是阿伽门农的父亲。

[4_64].这里的诗人指戏剧家，因为古希腊最初的戏剧都是由诗人创作的，而且用的是诗歌化的风格。参见本卷第一章。

[4_65].当时“流行的划分方法”是把所有演讲都分为四个部分：开场白、叙述、证明和结束语。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诉讼演说才需要叙述，即全面而详细地叙述之前发生的事情。在宣德演说和议政演说中，目标是证明某事，因此没有必要叙述。

[4_66].伊索克拉底的演讲《海伦颂》，该演讲的主题是褒奖海伦，但伊索克拉底旨在借此机会攻击智者学派。

[4_67].在这句话中，诗人科伊里洛斯抱怨可写之事已经所剩无几。

[4_68].作者引用此诗是为了证明宣德演说的开场白比较华丽和豪迈。

[4_69].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开篇诗句。

[4_70].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开篇诗句。

[4_71].科利罗斯的残诗《波斯战争》的开篇诗句，其中的“大战”指波斯人与希腊人的战争，其中的亚细亚应该是小亚细亚。

[4_72].这句话选自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

[4_73].普罗狄科斯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诡辩家。德拉克马是古希腊的银币。据说普罗狄科斯有一篇著名的讲稿卖了五十德拉克马。

[4_74].合格的听众，指不带任何偏见的听众。

[4_75].这句话选自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出自一个士兵之口。他奉国

王克瑞翁的命令看守波吕涅刻斯的尸首。但是，尸首后来被安提戈涅埋葬。士兵前来向克瑞翁通报这个消息时，说了文中所引的开场白。

[4_76].参见第二卷第一、四和八章。

[4_77].这句话选自荷马史诗《奥德赛》。奥德修斯向雅典娜祷告，乞求得到菲埃克斯人的善待。

[4_78].《透克罗斯》，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剧中透克洛斯的父亲忒拉蒙曾经帮助赫拉克利特攻打特洛伊，后者将特洛伊女俘赫西俄涅送给忒拉蒙。由于赫西俄涅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姊妹，所以忒拉蒙和透克罗斯与普里阿摩斯就产生了亲戚关系。后来，透克罗斯曾被人以通敌叛逆罪起诉，理由就是他与普里阿摩斯是亲戚。

[4_79].在这个例子中，亲戚关系和敌对关系都被视为迹象。

[4_80].一群埃及士兵叛乱并准备逃走，国王普萨米提科斯请求他们不要抛妻弃子，其中一人作此回答。

[4_81].奥德修斯曾经向费埃克斯国王阿尔喀诺俄斯讲述自己的历险故事，从巨人国到冥府，绘声绘色，洋洋洒洒，绵延达四章之多。回到家后，奥德修斯又向妻子珀涅罗珀讲自己的经历，但是这次讲的内容大大压缩，只有六十多行。

[4_82].法宇罗斯，其著作均已失传，其人亦不可考。

[4_83].伊俄卡斯忒回答问讯的人时，说的话令人难以置信，所以一直承诺会作出解释。

[4_84].反三段论，指得出与对方结论相反结论的三段论。

[4_85].这句话出自欧里庇得斯的戏剧《特洛伊妇女》，是赫卡柏驳斥海伦的话。赫卡柏劝海伦的丈夫墨涅拉俄斯处死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私奔的海伦，海伦辩护说，自己之所以嫁给帕里斯，是因为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特这三位女神竞美并答应将海伦许给帕里斯。赫卡柏先抓住海伦最不堪一击的论点，回应道，三位女神不会蠢到出卖希腊。赫卡柏在驳斥完海伦的观点之后，才提出自己的观点，即海伦是因为爱上了帕里斯才背弃自己的丈夫而私奔，因此该死。

[4_86].阿喀罗科斯曾经与吕侃波斯的女儿尼奥布尔订婚，但是女方的父亲却毁掉了婚约携女逃跑。阿喀罗科斯愤怒地追赶父女二人，同时恶语相向。不过阿喀罗科斯并没有直接骂与自己订婚的尼奥布尔，却借其父亲之口来咒骂她。

[4_87].阿喀罗科斯借木匠卡戎之口，表达自己对敛财之欲以及嫉妒他人钱财等恶性的不满。

[4_88].海蒙在为安提戈涅求情时，对于克瑞翁残酷对待安提戈涅的做法并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立场，而是利用舆情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说城邦民众的看法如何如何。

[4_89].参见第一卷第九章。

[4_90].参见第二卷第十九章。

[4_91].参见第二卷第一至十一章。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First Treatise of Government

政府论（上）

John Locke

约翰·洛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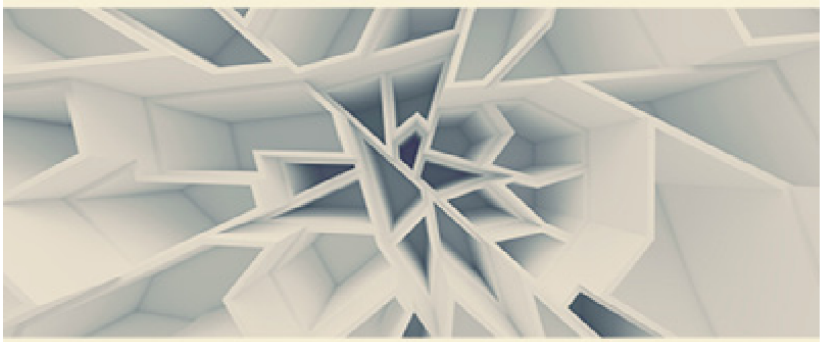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政府论（上）

The First Treatise of Government

约翰·洛克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Chapter I　The First Treatise of Government 第一章　导读
- Chapter II　Of Paternal and Regal Power 第二章　论父权和王权
- Chapter III　Of Adam's Title to Sovereignty, by Creation 第三章　论亚当基于神造而享有主权
- Chapter IV　Of Adam's Title to Sovereignty, by Donation 第四章　论亚当基于神赐而享有主权
- Chapter V　Of Adam's Title to Sovereignty, by the Subjection of Eve 第五章　论亚当因夏娃的从属而享有主权
- Chapter VI　Of Adam's Title to Sovereignty, by Fatherhood 第六章　论亚当因父亲身份而享有主权
- Chapter VII　Of Fatherhood and Property Considered Together as Fountains of Sovereignty 第七章　论“父权”和“财产权”作为统治权的共同来源
- Chapter VIII　Of the Conveyance of Adam's Sovereigns Monarchical Power 第八章　论亚当最高君权的转移
- Chapter IX　Of Monarchy by Inheritance from Adam 第九章　论从亚当继承下来的君主制
- Chapter X　Of the Heir to Adam's Monarchical Power 第十章　论亚当君权的继承者
- Chapter XI　Who Heir? 第十一章　继承者是谁？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Chapter I　The First Treatise of Government

第一章　导读

1．Slavery is so vile and miserable an estate of man, and so directly opposite to the generous temper and courage of our nation, that it is hardly to be conceived that an Englishman, much less a gentleman, should plead for it. And truly I should have taken Sir Robert Filmer's *Patriarcha* , as any other treatise, which would persuade all men that they are slaves, and ought to be so, for such another exercise of wit as was his who write the encomium of Nero; rather than for a serious discourse meant in earnest, had not the gravity of the title and epistle, the picture in the front of the book, and the applause that followed it, required me to believe that the author and publisher were both in earnest. I therefore took it into my hands with all the expectation, and read it through with all the attention due to a treatise that made such a noise at its coming abroad, and cannot but confess myself mightily surprised that in a book, which was to provide chains for all mankind, I should find nothing but a rope of sand, useful perhaps to such whose skill and business it is to raise a dust, and would blind the people, the better to mislead them; but in truth not of any force to draw those into bondage, who have their eyes open, and so much sense about them, as to consider that chains are but an ill wearing, how much care soever hath been taken to file and polish them.

1．奴隶制是一种可耻和悲惨的人类状态，完全背离了我们民族宽宏的性格及无畏的精神，以至于很难想象一个英国人——更不用说一位绅士——居然会为其申辩。说实话，要不是因为罗伯特·菲尔默爵

士这本《君权论》标题和卷书的严肃性、封面上的图片以及发行后引来的赞美之辞，让我不得不相信作者及出版者说的都是真话，我会把它当成又一篇企图使民众相信他们是奴隶，并且理应如此的文章，或者是那位写下尼罗颂歌的聪明人的又一杰作，其意只在炫耀其智慧，而并非将其认真地当成一篇严肃的论著。因此，当我把这本自出版以来引起如此轰动的书拿到手的时候，我满怀期望，并全神贯注地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我不得不承认我完全震惊了：在这本旨在为人类设置枷锁的书里，我所看到的不过是一条沙绳，对于那些制造谣言引起骚乱的人，它也许有用，它能蒙蔽民众双眼，使人迷失方向；而实际上它对于那些明眼人却毫无束缚之力，因为他们对这些手段已经了然于心，不管它们如何被精心锻造和打磨，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层拙劣的外衣而已。

2．If anyone think I take too much liberty in speaking so freely of a man, who is the great champion of absolute power, and the idol of those who worship it; I beseech him to make this small allowance for once, to one, who, even after the reading of Sir Robert's book, cannot but think himself, as the laws allow him, a freeman; and I know no fault it is to do so, unless anyone, better skilled in the fate of it than I, should have it revealed to him that this treatise, which has lain dormant so long, was, when it appeared in the world, to carry by strength of its arguments, all liberty out of it; and that from thenceforth, our author's short model was to be the pattern in the mount, and the perfect standard of politics for the future. His system lies in a little compass, it is no more but this,

2．如果有人认为我如此自由地评论一位绝对权力的捍卫者，一位绝对权力的崇拜者的偶像，未免过于胆大妄为，那么我恳请他这次稍加宽恕，允许像我这样一个人，即使在通读罗伯特爵士的书以后，也只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法律所认可的自由人。而且，我认为这样做

并没有什么错，除非有比我更了解本书命运的人向我这样的人宣布，这本蛰伏已久的书一经问世就能凭借其论据的力量剥夺我们所有的自由，并且从今往后，我们这位作者的精简模式将成为基督训诫那样的典范，并为后世政治树立理想规范。他的理论基础范围狭小，不外乎是说：

“That all government is absolute monarchy.”

“一切政府都是绝对君主制。”

And the ground he builds on, is this,

其所依据的理由是:

“That no man is born free.”

“没有人是生而自由的。”

3．In this last age, a generation of men has sprung up amongst us, that would flatter princes with an opinion, that they have a divine right to absolute power, let the laws by which they are constituted, and are to govern, and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y enter upon their authority, be what they will, and their engagements to observe them ever so well ratified by solemn oaths and promises. To make way for this doctrine, they have denied

mankind a right to natural freedom; whereby they have not only, as much as in them lies, exposed all subjects to the utmost misery of tyranny and oppression, but have also unsettled the titles, and shaken the thrones of princes; (for they too, by these men's system, except only one, are all born slaves, and by divine right, are subjects to Adam's right heir) as if they had designed to make war upon all government, and subvert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human society, to serve their present turn.

3．在最近这个时代，我们中冒出这样一部分人：他们谄媚君主，说不管任命他们为君主并给予其统治权的法律如何，不管他们获得权力的条件如何，也不管他们遵守法律条款的义务是如何完美地以庄严的誓言和承诺的形式固定下来，他们都享有神权所赋予的绝对权力。为了给他们的理论开路，这些人否认天赋自由权，因此他们所说的谎言不仅使得所有臣民蒙受暴政和压迫的莫大灾难，同时还扰乱君主们的权力，动摇了君主们的王位；（根据这些人的理论，君主只有一人，其他皆是天生的奴隶，根据君权神授论来说，他们都是亚当权力继承人的臣民）似乎他们就是打算向一切政府开战，颠覆人类社会的根基以为己所用。

4．However, we must believe them upon their own bare words, “when they tell us, we are all born slaves, and we must continue so”; there is no remedy for it;life and thraldom we entered into together, and can never be quit of the one till we part with the other. Scripture or reason, I am sure, do not anywhere say so, notwithstanding the noise of divine right, as if divine authority hath subjected us to the unlimited will of another. An admirable state of mankind, and that which they have not had wit enough to find out till this latter age! For however Sir Robert Filmer seems to condemn the novelty of the contrary opinion, [1_1] yet I believe it will be hard

for him to find any other age, or country of the world, but this, which has asserted monarchy to be jure divino. And he confesses, [1_2] that “Heyward, Blackwood, Barclay and others, that have bravely vindicated the right of kings in most points, never thought of this; but with one consent admitted the natural liberty and equality of mankind”.

4．然而，当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生下来就是奴隶，而且必须继续做奴隶”的时候，我们只有相信他们的空话，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我们获得生命的同时也获得了奴隶身份，我们永远不能放弃我们的奴隶身份，除非我们放弃生命。尽管这些人搬出关于神权的理论，试图令我们相信神的权威已经将我们置于别人无限制的意志之下，但我确信《圣经》和理性绝对没有这种说法。这是多么绝妙的人类状态，这些人所具备的才智让他们最近才发现这一点！因为，不管罗伯特·菲尔默爵士如何斥责这种异议的标新立异， [2_1] 我确信他很难再找到承认君权神授的另一个时代或者另一个国家。而他也承认，“像海沃德、布莱克伍德、巴克利这样经常勇于维护君权之流也从未想到过这点，而是一致承认人类的天赋自由和平等。” [2_2]

5．By whom this doctrine came at first to be broached, and brought in fashion amongst us, and what sad effects it gave rise to, I leave to historians to relate, or to the memory of those, who were contemporaries with Sibthorp and Manwering, to recollect. My business at present is only to consider what Sir Robert Filmer, who is allowed to have carried this argument farthest, and is supposed to have brought it to perfection, has said in it; for from him everyone, who would be as fashionable as French was at court, has learned and runs away with this short system of politics, viz.,“Men are not born free, and therefore could never have the liberty to choose either governors, or forms of government.” Princes have their

power absolute, and by divine right; for slaves could never have a right to compact or consent. Adam was an absolute monarch, and so are all princes ever since.

5．至于这种学说首先由谁提出并使其在我们中间盛行，以及引起了什么样的悲惨结果，这一切留给历史学家去讲述，或者让与西布索普和曼纳林同时代的人去回忆吧。我现在要做的只是考虑罗伯特·菲尔默爵士在此文中就这一方面所说的内容，人们认为他已经把这一观点发挥到极致，并已经使其尽善尽美；因为，每一个想要像法国宫廷里的人一样时髦的人都已经从他那里学到并到处宣扬这个浅薄的政治理论，即：人非生而自由，因此永远不能自由选择统治者，或者是政府的形式。君主们通过神权获得绝对权力，因为奴隶们永远没有立约和赞同的权力。自亚当开始实施绝对专制起，以后所有的君主皆如此。

[1_1].Patriarchap. 3.

[1_2].Patriarchap. 4.

[2_1].《君权论》，第3页。

[2_2].《君权论》，第4页。

Chapter II　Of Paternal and Regal Power

第二章　论父权和王权

6 . Sir Robert Filmer's great position is, that “men are not naturally free”. This is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his absolute monarchy stands, and from which it erects itself to a height, that its power is above every power:*caput inter nubila* , so high above all earthly and human things, that thought can scarce reach it; that promises and oaths, which tie the infinite Deity, cannot confine it. But if this foundation fails, all his fabric falls with it, and governments must be left again to the old way of being made by contrivance, and the consent of men (Ἀνθρωπίνη χτίσις) making use of their reason to unite together into society. To prove this grand position of his, he tells us, [2_1] “Men are born in subjection to their parents”,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free. And this authority of parents, he calls “royal authority”, [2_2] “fatherly authority, right of fatherhood” [2_3] . One would have thought he would, in the beginning of such a work as this, on which was to depend the authority of princes, and the obedience of subjects, have told us expressly, what that fatherly authority is, have defined it, though not limited it, because in some other treatises of his he tells us, it is unlimited, andunlimitable;he should at least have given us such an account of it, that we might have had an entire notion of this fatherhood, or fatherly authority, whenever it came in our way in his writings:this I expected to have found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his *Patriarcha* . But instead thereof, having, 1. *En passant* , made his obeisance to the *arcana imperii* , [2_4] ; 2. Made his compliment to the “rights and liberties of this, or any other nation” [2_5] , which he is going presently to null and destroy; and, 3. Made his leg to those

learned men, who did not see so far into the matter as himself; [2_6] he comes to fall on Bellarmine, [2_7] and, by a victory over him, establishes his fatherly authority beyond any question. Bellarminebeing routed by his own confession, [2_8] the day is clear got, and there is no more need of any forces: for having done that, I observe not that he states the question, or rallies up any arguments to make good his opinion, but rather tells us the story, as he thinks fit, of this strange kind of domineering phantom, called the fatherhood, which whoever could catch, presently got empire, and unlimited absolute power. He acquaints us how this fatherhood began in Adam, continued its course, and kept the world in order all the time of the patriarchs till the flood, got out of the ark with Noah and his sons, made and supported all the kings of the earth till the captivity of the Israelites in Egypt, and then the poor fatherhood was under hatches, till “God, by giving the Israelites Kings, re-established the ancient and prime right of the lineal succession in paternal government.“ [2_9] . And then obviating an objection, and clearing a difficulty or two with one half reasons, [2_10] “to confirm the natural right of regal power”, he ends the first chapter. I hope it is no injury to call a half quotation an half reason; for God says, “Honour thy father and mother”; but our author contents himself with half, leaves out “thy mother” quite, as little serviceable to his purpose. But of that more in another place.

6．罗伯特·菲尔默爵士的重要论点是：“人非生而自由”，这是其绝对君主制立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绝对君主制被抬到这样一个超越一切权利的高度——一个“不切实际”的高度：它高出世间一切，以至于人类的思想根本无法企及，甚至连约束无限神权的承诺和誓言也无法限制它。但是一旦这个基础倒塌，其所有的结构便随之倒塌，于是，那些依靠自己的理性组成社会的人们（Ἀνθρωπίνη χτίσις），不得不依旧通过商议并达成共识的方式组建政府。为了证

明他这个重要的论点，作者告诉我们：“人类生来就必须服从他们的父母，因此是没有自由的。”[3_1] 这个父母的权威，他称之为“王权”[3_2]、“父权”或者“父亲身份的权利”[3_3]。我们本以为，像这样一本为“君王的权威”以及“臣民的顺从”提供理论依据的著作，作者一定会在开头部分明确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父权”，本以为就算是因为作者在其他论文中告诉我们，“它是无限制的，也是不可限制的”，也要给其下个定义。至少，他应该对其做一个说明，以便我们在他的文章中碰到“父亲身份”或是“父权”这样的字眼时，能有个完整的概念。我本指望在他的《君权论》第一章中见到这样的解释，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首先向统治秘术表示敬意；[3_4] 其次作者赞美了他马上就要取消和摧毁的“本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权力和自由”[3_5]；最后向那些虽然博学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他本人看得那么深远的学者致敬。[3_6] 在完成了这一切之后，他向贝拉尔米内（十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发起了攻击，[3_7] 并因为战胜了贝拉尔米内，便理所当然地建立起他所谓的“父权”。既然贝拉尔米内自己承认已被打败，[3_8] 那么大局已定，也就没有必要花费更多的努力了。在完成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没见他再提及这个问题，或者是收集任何证据来完善他的观点，而是随心所欲地对我们讲述这个称之为“父亲身份”的奇怪而专制的幽灵的故事——任何人只要能抓住它，就马上获得整个帝国和无限的绝对权力。他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父权”如何起源于亚当，如何传承下来，以及如何在大洪水到来之前的先祖时代维持世界秩序，如何随挪亚和挪亚的儿子离开方舟，创建家园并支持世间的所有君王，直到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随后可怜的父权便遭到压制，“直到上帝通过赐予以色列诸王，重建起这种古老而原始的父权统治世袭权利”。[3_9] 接下来，“为了确认王权的自然权利”，他用一半的理由先排除了一项异议，再清除掉一两块绊脚石，[3_10] 然后就结束了第一章。我把他的这种“一半”的引证称为“一半”的理由，希望这不会构成对作者的侮辱，因为上帝说，“尊敬你的父亲和母亲”；但是我们的作者却满足于引用其中的一半，只是因为“你的母亲”对于其目的没什么用处，就干脆将其省略。关于这一点，在其他地方再详述吧。

7 . I do not think our author so little skilled in the way of writing discourses of this nature, nor so careless of the point in hand, that he by oversight commits the fault that he himself, in his *Anarchy of a Mixed Monarchy* , objects to Mr. Hunton in these words: “Where first I charge the author that he hath not given us any definition, or description of monarchy in general; for by the rules of method, Sir Robert should have first defined.“ [2_11] And by the like rule of method, Sir Robert should have told us, what his fatherhood or fatherly authority is, before he had told us, in whom it was to be found, and talked so much of it. But perhaps Sir Robert found, that this fatherly authority, this power of fathers, and of Kings, for he makes them both the same, [2_12] would make a very odd and frightful figure, and very disagreeing, with what either children imagine of their parents, or subjects of their Kings, if he should have given us the whole draught together, in that gigantic form, he had painted it in his own fancy; and therefore, like a wary physician, when he would have his patient swallow some harsh or corrosive liquor, he mingles it with a large quantity of that, which may dilute it; that the scattered parts may go down with less feeling, and cause less aversion.

7 . 我认为我们的作者在写作此类性质文章的时候不会如此生疏，对正在讨论的观点不会如此漫不经心，以至于由于疏忽而犯下了他本人在《混合君主制的无政府状态》 [3_11] 一书中批评亨顿先生时所犯的错误：“我首先要指责的地方是作者对于君主制不曾给出任何一般的定义和描述，因为根据方法论原则，他首先应该给出定义。”据相似的方法论，罗伯特爵士也应该告诉我们他所说的“父亲的身份”或者“父权”究竟是什么，而不是在此之前就大谈特谈谁享有这种“父权”。但是，罗伯特爵士大概发现，如果他把按照自己想象描绘出来的规模宏大的理论草图完整交给我们时，他的这个父亲和君王的权力（因为他把这两者等同起来了） [3_12] 会显出一个很奇怪而可怕

的形象，而且和孩子们心目中的父母形象或是臣民心目中的君王形象大相径庭。于是，他就像一个谨慎的医生，当他想要病人喝下某些苦涩或者刺激性很强的药水的时候，他会在这个药水中添加大量稀释物，这样，经过稀释后的药水喝下去的时候没有多大感觉，也不至于引起强烈的恶心感。

8 . Let us then endeavour to find what account he gives us of this fatherly authority, as it lies scattered in the several parts of his writings. And first, as it was vested in Adam, he says, “Not only Adam, but the succeeding patriarchs, had, by right of fatherhood, royal authority over their children. [2_13] This lordship, which Adam by command had over the whole world, and by right descending from him the patriarchs did enjoy, was as large and ample as the absolute dominion of any monarch which hath been since the creation. [2_14] “Dominion of life and death, making war, and concluding peace”. [2_15] “Adam and the patriarchs had absolut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2_16] “Kings, in the right of parents, succeed to the exercise of supreme jurisdiction”. [2_17] “As kingly power is by the law of God, so it hath no inferior law to limit it; Adam was lord of all”. [2_18] “The father of a family governs by no other law, than by his own will”. [2_19] “The superiority of princes is above laws”. [2_20] “The unlimited jurisdiction of Kings is so amply described by Samuel,“. [2_21] “Kings are above the laws”. [2_22] And to this purpose, see a great deal more which our A.Delivers in Bodin's words: “It is certain, that all laws, privileges, and grants of princes, have no force, but during their Life; if they be not ratified by the express consent, or by sufferance of the prince following, especially privileges”. [2_23] “The reason why laws have been also made by Kings, was this; When Kings were either busied with wars, or distracted with public cares, so that every private man could not have access to their persons, to learn their wills and pleasure, then

were laws of necessity invented, that so every particular subject might find his prince's pleasure deciphered unto him in the tables of his laws”. [2_24] “In a monarchy, the King must by necessity be above the laws”. [2_25] “A perfect Kingdom is that, wherein the King rules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his own will”. [2_26] “Neither common nor statute laws are, or can be, any diminution of that general power, which Kings have over their people by right of fatherhood”. [2_27] “Adam was the father, King, and lord over his family; a son, a subject, and a servant or slave, were one and the same thing at first. The father had power to dispose or sell his children or servants, whence we find, that the first reckoning up of goods in Scripture, the man-servant, and the maid-servant, are numbered among the possessions and substance of the owner, as other goods were” [2_28] .“God also hath given to the father a right or liberty, to alien his power over his children to any other, whence we find the sale and gift of children to have been much in us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when men had their servants for a possession and an inheritance, as well as other goods, whereupon we find the power of castrating and making eunuchs much in use in old times” [2_29] . “Law is nothing else but the will of him that hath the power of the supreme father”. [2_30] “It was God's ordinance that the supremacy should be unlimited in Adam, and as large as all the acts of his will, and as in him, so in all others that have Supreme power”. [2_31]

8．那么让我们努力搜索，看看那些散落于他的著作各处的有关“父权”的说明究竟是什么。首先，当提到亚当被授予父权的时候，他说：“不只是亚当，所有后继的先祖们，根据父权，对他们的子孙都享有王权”。 [3_13] “亚当根据神命所取得的统治世界的权力，依据自亚当传承下来的权利，其后继先祖们也享有和自创世以来任何君王的绝对统治权一样广泛而充分的权力”。 [3_14] “生杀之权、宣战媾和之权都为他掌握”。 [3_15] “亚当和先祖们具有生杀的绝对权力”。 [3_16]

“君王们根据亲权继承最高权限的行使权”。[3_17] “王权既然是依据上帝的法律而来，就不受任何低级法律的限制，亚当是众人之主”。[3_18] “一个家庭的父亲只凭自己的意志而无须根据其他任何法律来进行统治”。[3_19] “君主的地位高于法律”。[3_20] “君王的无限管辖权已在《撒母耳书》中予以充分说明”。[3_21] “君主的地位高于法律”。[3_22] 我们还可以看到，为了这一目的，作者还借用了许多博丁的话：“毫无疑义，君主的一切法律、特权和君王的授权，如果继位的君主不以认同或容忍的形式加以批准，那只能在原来的君主在世时发生效力，特权尤其是如此”。[3_23] 而之所以所有的法律也皆由君王们制定，原因如下：“君王平时不是忙于战争，就是为公共事务所分心，因此个人根本无法接近其本人以了解其意志和喜好，那么就有必要制定各种法律，以便每个臣民都可以通过法律的条款了解其中传达的君王的意愿”。[3_24] “在君主专制国家，君主必须要高于一切法律”。[3_25] “理想的王国应该是这样的：在这个国家里，君王根据自己的意愿统治一切”。[3_26] “不管习惯法还是成文法都不会、也不可能损害君王根据其父权所获得的统治民众的广泛权力”。[3_27] “亚当在家族中是父亲，君主和主人。儿子也好，臣民也好，仆人或者奴隶也好，最初都是一回事。父亲有权处置或买卖他的子女或仆人。因此我们看到《圣经》上最初统计货物时，男仆和女仆如同其他货物一样，是按所有者个人物资和资产来计算的”。[3_28] “上帝还授予父亲一项权力或者是自由，可以把对子女的支配权转让给他人，因此我们发现在世界历史之初，买卖和馈赠孩子曾经相当盛行，那时候，人们把他们的奴仆当成其他的货物一样占有和继承，而且我们也看到那个时代的古人阉割和使人成为阉宦的权力的盛行”。[3_29] “法律不过是具有至高无上的父权者的意志”。[3_30] “上帝规定亚当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无限制的，其范围与基于其意志的一切行为一样宽广，其他所有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也一样”。[3_31]

9 . I have been fain to trouble my reader with these several quotations in our A.’ s own words, that in them might be seen his own description of his fatherly authority, as it lies scattered up and

down in his writings, which he supposes was first vested in Adam, and by right belongs to all princes ever since. This fatherly authority there, or right of fatherhood, in our A.'s sense, is a divine unalterable right of sovereignty, whereby a father or a prince hath an absolute, arbitrary, unlimited, and unlimitable power, over the lives, liberties, and estates of his children and subjects; so that he may take or alienate their estates, sell, castrate, or use their persons as he pleases, they being all his slaves, and he lord or proprietor of everything, and his unbounded will their law.

9．我只得引用我们作者的原话来烦扰我的读者，其中可发现他本人对父权的描述，而父权遍及他作品的始终。他认为，亚当最先被授予了父权，此后所有君主便名正言顺拥有父权。依作者之意，此种父权，或为父之权，是一种神圣且不可动摇的主权。据此权力，父亲或君主对其后代或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拥有绝对的、独断的权力，该权力不受限且不可受限。因此，他们是他的奴隶，他主宰一切、拥有一切，他的意志无边无际，是他们须得遵从的法律，他有权取得或转让其财产，任意出卖、阉割或驱使其人身。

10．Our A. having placed such a mighty power in Adam, and upon that supposition founded all government and all power of princes, it is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he should have proved this with arguments clear and evident, suitable to the weightiness of the cause.That since men had nothing else left them, they might in slavery have such undeniable proofs of its necessity, that their consciences might be convinced, and oblige them to submit peaceably to that absolute dominion, which their governors had a right to exercise over them. Without this, what good could our A. do, or pretend to do, by erecting such an unlimited power, but flatter the natural vanity and ambition of men, too apt of itself to

grow and increase with the possession of any power? And by persuading those, who, by the consent of their fellow-men, are advanced to great, but limited, degrees of it, that by that part which is given them, they have a right to all that was not so; and therefore may do what they please, because they have authority to do more than others, and so tempt them to do what is neither for their own, nor the good of those under their care; whereby great mischiefs cannot but follow.

10．既然我们的作者赋予亚当如此强大的权力，而且基于这种假设建立起君王们的一切统治和权力，我们便有理由期待他用清楚而确凿、与其观点重要性相当的论据来证实这一点。人们既然已经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身处奴隶境地，他们也应该得到无可否认的证据，证实奴隶制的必然性，以使他们心悦诚服，并因此心甘情愿地屈服于统治者对他们行使的绝对统治权。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作者树立这样一种无限制的权力，除了迎合人们天生的虚荣心和野心——这种虚荣心和野心随着权力的获得非常容易滋生和膨胀——还能有什么用处，或者宣称有什么用处呢？倒是应该劝告那些取得了同胞的认可而攀上高位但是权力受限的人，他们依仗被给予的那部分权力，有权获得没有被给予的一切，因此他们会因为有权力比其他人做更多的事情而为所欲为，受引诱去做一些既无益于自己也无益于自己管辖下的那些人的事情，那么接下来的只有巨大的祸害了。

11．The sovereignty of Adam, being that on which, as a sure basis, our A. builds his mighty absolute monarchy, I expected, that, in his *Patriarcha*, this his main supposition would have been proved and established with all that evidence of arguments, that such a fundamental tenet required; and that this, on which the great stress of the business depends, would have been made out with reasons sufficient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with which it was assumed. But

in all that treatise, I could find very little tending that way; the thing is there so taken for granted, without proof, that I could scarce believe myself, when, upon attentive reading that treatise, I found there so mighty a structure raised upon the bare supposition of this foundation. For it is scarce credible, that in a discourse, where he pretends to confute the erroneous principle of man's natural freedom, he should do it by a bare supposition of Adam's authority, without offering any proof for that authority. Indeed, he confidently says, that Adam had “royal authority”. [2_32] “Absolute lordship and dominion of life and death”. [2_33] “An universal monarchy”. [2_34] “Absolut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2_35] He is very frequent in such assertions; but, what is strange, in all his whole *Patriarcha* I find not one pretense of a reason to establish this his great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 not anything that looks like an argument, but these words: “To confirm this natural right of regal power, we find in the *Decalogue* , that the law which enjoys obedience to Kings, is delivered in the terms, Honour thy father, as if all power were originally in the father.” And why may I not add as well, that in the *Decalogue* , the law that enjoys obedience to queens is delivered in the terms of “Honour thy mother”, as if all power were originally in the mother? The argument, as Sir Robert puts it, will hold as well for one as the other; but of this, more in its due place.

11．既然我们的作者把亚当的主权作为其建立强大的绝对君主制的牢固基础，因此，我期待在他的《君权论》一书中，他会提出这样一条基本教义所需要的论据来证明和树立他的这一主要假设。同时，对于这样一个支撑整个理论的论点的提出，我期望他会拿出足够的论据对他提出这一论点的信心作出解释。但是，我在他的全文当中几乎看不到任何此类的东西。整篇文章完全是不加证明的臆想，以至于当我仔细读了这篇论文之后发现，我几乎不能相信，一个如此强大的结

构居然建立在这样一个单薄的假设基础之上。在这样一篇自诩为驳斥人类“天赋自由”的“谬误原则”的文章中，他只提出了“亚当的权威”这样一个简单的假设，对这个“权威”却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的确满怀信心地说：亚当享有“王权”[3_32]、“绝对的统治权和生杀大权”[3_33]、“广泛的君主政体”[3_34]、“生杀的绝对权力”[3_35]。他经常做出这样的断言，但奇怪的是在他的《君权论》全文当中，我找不到任何一个理由足以构成其建立政府的伟大基础，也没有任何像是论据的东西，我们能找到的只有这些文字：“为了证实这种王权的自然权利，我们可以在《摩西十诫》中看到让人服从君主的法律是这样措辞的：‘尊敬你的父亲’，就好像所有的权力原本都来自于父亲。”那么，为什么我不能补充道：“在《摩西十诫》中，教民众服从他们的王后的法律是用‘尊敬你的母亲’这样的词语来表达的，似乎所有的权力都来源于母亲”，罗伯特爵士所用的论据，既适用于父亲，也可以适用于母亲。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会在适当的地方进行详叙。

12 . All that I take notice of here is, that this is all our A. says, in this first, or any of the following chapters, to prove the absolute power of Adam, which is his great principle; and yet, as if he had there settled it upon sure demonstration, he begins his second chapter with these words, “By conferring these proofs and reasons, drawn from the authority of the Scripture”. Where those proofs and reasons for Adam's sovereignty are, bating that of Honour thy father above-mentioned, I confess, I cannot find; unless what he says, [2_36] “In these words, we have an evident confession, viz., of Bellarmine, that creation made man prince of his posterity”, must be taken for proofs and reasons drawn from scripture, or for any sort of proof at all: though from thence by a new way of inference in the words, immediately following, he concludes, the royal authority of Adamsufficiently settled in him.

12．这里我所注意到的是，我们的作者在书中的第一章，或后面各章中用来证明他的主要原则“亚当的绝对权力”的所有论据就是这些了。然而，就好像已经用确凿的论证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样，接下来他以“根据从《圣经》的权威中所得到的证据和理由”这些字眼开始了他的第二章。至于这些有关亚当主权的证据和理由在什么地方，我承认，除了上面提到的“尊敬你的父亲”之外，我的确找不出来，除非把他所说的当作从《圣经》中获得的证据和理由或是任何一种证据，他说道，[3_36]“我们看到一种明确的自我认识，即贝拉尔米内承认上帝造人并使其成为其后裔的君主”，尽管他紧随其后又使用一种新的推论法得出结论说亚当的王权就充分地落到了他身上。

13．If he has in that chapter, or anywhere in the whole treatise, given any other proofs of Adam's royal authority, other than by often repeating it, which, among some men, goes for argument, I desire anybody for him to show me the place and page, that I may be convinced of my mistake, and acknowledge my oversight. If no such arguments are to be found, I beseech those men, who have so much cried up this book, to consider, whether they do not give the world cause to suspect, that it is not the force of reason and argument, that makes them for absolute monarchy, but some other by interest, and therefore are resolved to applaud any author, that writes in favour of this doctrine, whether he support it with reason or no. But I hope they do not expect that rational and indifferent men should be brought over to their opinion, because this their great doctor of it, in a discourse made on purpose, to set up the absolute monarchical power of Adam, in opposition to the natural freedom of mankind, has said so little to prove it, from whence it is rather naturally to be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little to be said.

13．如果我们的作者在那一章，或是文章中任何地方除了反复强调“亚当的王权”本身（这一点，在一些人看来就可以当作论据）以外，还给出了“亚当的王权”的任何其他论据的话，我希望有人能替他大声指出相关的位置和页码，以便我可以确信自己犯了错误，并承认自己的疏忽。如果找不到这样的论据，那么我恳求那些大肆吹嘘这本书的人考虑一下，看看他们是否给予世人理由来怀疑他们之所以拥护绝对君主制，并非出于理性和论证的力量，而是出于与利益相关的其他原因，因此才坚决赞扬任何著书拥护这一教义的作者，而不管他的拥护是否出于理性。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指望那些有理性和公正的人，会仅因为他们的这位伟大学者在这本专门为了树立“亚当的绝对君权”，反对人类的“天赋自由权”而写的书中说了为数不多的几句话作为证明，就转而接受他们的观点，相反，从他的文中，我们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根本没有东西可说。

14 . But that I might omit no care to inform myself in our author's full sense, I consulted his *Observations on Aristotle, Hobbes, & c.* to see whether in disputing with others he made use of any arguments, for this his darling tenet of Adam's sovereignty; since in his treatise of the *Natural Power of Kings* , he hath been so sparing of them. In his *Observations on Mr. Hob's Leviathan* , I think he has put, in short, all those arguments for it together, which in his writings I find him anywhere to make use of: his words are these: “If God created only Adam, and of a piece of him made the woman, and if by generation from them two, as parts of them, all mankind be propagated: if also God gave to Adam not only the dominion over the woman and the children that should issue from them, but also over the whole earth to subdue it, and over all the creatures on it, so that as long as Adam lived, no man could claim or enjoy anything but by donation, assignation, or permission from him, I wonder”, *&c* .. [2_37] Here we have the sum of all his arguments, for Adam's sovereignty and against natural freedom, which I find up

and down in his other treatises; and they are these following: *God's Creation of Adam* , the *Dominion He Gave Him Over Eve,* and the *Dominion He Had As Father Over His Children* ; all which I shall particularly consider.

14．但是，为了能完全理解我们这位作者的意思，我不遗余力地参考了他的《对亚里士多德、霍布斯的评论》等著作，看看在与别人辩论的过程中他是否运用了任何可以用于论证他那挚爱的“亚当的主权”教义的论据，因为在他的《君主的自然权力》一文中鲜有提及。而在他的《对霍布斯先生的〈利维坦〉的评论》一文中，简而言之，我认为他把他在所有的著作中任何地方曾经用过的所有的论据都拿了出来。他的那些话是：“如果上帝只创造出亚当，并用他的一块骨肉造出了女人，如果通过他们两人的繁衍，整个人类作为他们的一个部分得以延续：如果上帝给予亚当的不仅仅是对于这个女人及他们的儿女的统治权，还有对被征服的整个世间，以及生活在陆上世界的所有动物的统治权的话，那么我认为只要亚当活着，任何人除非得到亚当的赐予、转让或者是同意，否则都不能要求或享有任何东西。”我认为我们找到了他支持“亚当的主权”和反对“天赋自由”的所有论据，[3_37] 这些论据遍布于他的以下文章当中：《上帝创造亚当》、《上帝给予亚当对夏娃的统治权》和《亚当作为父亲对于其儿女的统治权》，所有的这些论据，我将会专门进行考究。

[2_1].Patriarcha p. 12.

[2_2].Patriarcha p. 12, 14.

[2_3].Patriarcha p. 12, 20.

[2_4].Patriarcha p. 5.

[2_5].Patriarcha p. 6.

[2_6].Patriarcha p. 7.

[2_7].Patriarcha p. 8.

[2_8].Patriarcha p. 11.

[2_9].Patriarcha p. 11-19.

[2_10].Patriarcha p. 23.

[2_11].Anarchy of a Mixed Monarchy p.239.

[2_12].Patriarcha p. 24.

[2_13].Patriarcha p. 12.

[2_14].Patriarcha p. 15.

[2_15].Patriarcha p. 13.

[2_16].Patriarcha p. 35.

[2_17].Patriarcha p. 19.

[2_18].Patriarcha p. 40.

[2_19].Patriarcha p. 78.

[2_20].Patriarcha p. 79.

[2_21].Patriarcha p. 80.

[2_22].Patriarcha p. 93.

[2_23].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79.

[2_24].Patriarcha p. 92.

[2_25].Patriarcha p. 100.

[2_26].Patriarcha p. 100.

[2_27].Patriarcha p. 115.

[2_28].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c, Pref.

[2_29].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p. 155.

[2_30].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23.

[2_31].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45.

[2_32].Patriarcha p. 12, 13.

[2_33].Patriarcha p. 13.

[2_34].Patriarcha p. 33.

[2_35].Patriarcha p. 35.

[2_36].Patriarcha p. 11.

[2_37].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165.

[3_1].《君权论》，第12页。

[3_2].《君权论》，第12、14页。

[3_3].《君权论》，第12、20页。

[3_4].《君权论》，第5页。

[3_5].《君权论》，第6页。

[3_6].《君权论》，第7页。

[3_7].《君权论》，第8页。

[3_8].《君权论》，第11页。

[3_9].《君权论》，第12页至19页。

[3_10].《君权论》，第23页。

[3_11].《混合君主制的无政府状态》，第239页。

[3_12].《君权论》，第24页。

[3_13].《君权论》，第12页。

[3_14].《君权论》，第15页。

[3_15].《君权论》，第13页。

[3_16].《君权论》，第35页。

[3_17].《君权论》，第19页。

[3_18].（君权论》，第40页。

[3_19].《君权论》，第78页。

[3_20].《君权论》，第79页。

[3_21].《君权论》，第80页。

[3_22].《君权论》，第93页。

[3_23].《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79页。

[3_24].《君权论》，第92页。

[3_25].《君权论》，第100页。

[3_26].《君权论》，第100页。

[3_27].《君权论》，第115页。

[3_28].《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前言。

[3_29].《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55页。

[3_30].《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23页。

[3_31].《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45页。

[3_32].《君权论》，第12、13页。

[3_33].《君权论》，第13页。

[3_34].《君权论》，第33页。

[3_35].《君权论》，第35页。

[3_36].《君权论》，第11页。

[3_37].《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65页。

Chapter III　Of Adam's Title to Sovereignty, by Creation

第三章　论亚当基于神造而享有主权

15 . Sir Robert, in his preface to his *Observations on Aristotle's Politics* , tells us, “A natural freedom of mankind cannot be supposed without the denial of the creation ofAdam”; but how Adam's being created, which was nothing but his receiving a being, immediately from omnipotence and the hand of God, gave Adam a sovereignty over anything, I cannot see, nor consequently understand, how a supposition of natural freedom is a denial of Adam's creation, and would be glad anybody else (since our A. did not vouchsafe us the favour) would make it out for him. For I find no difficulty to suppose the freedom of mankind, though I have always believed the creation of Adam. He was created, or began to exist, by God's immediate power,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parents, or the pre-existence of any of the same species to beget him, when it pleased God he should; and so did the lion, the king of beasts, before him, by the same creating power of God; and if bare existence by that power, and in that way, will give dominion, without any more ado, our A., by this argument, will make the lion have as good a title to it, as he, and certainly the ancients. No; for Adam had his title “by the appointment of God”, says our A.in another place. Then bare creation gave him not dominion, and one might have supposed mankind free, without the denying the creation of Adam, since it was God's appointment made him monarch.

15 . 罗伯特爵士在他的《对亚里士多德〈政治论〉的评论》一书

的前言中告诉我们，“人类天赋自由的假设必须以否定上帝创造亚当为前提”。但是我不明白，亚当被神所造只不过指的是直接从万能的主和上帝的手中接过了生命，如何能够授予亚当主宰万物的权力？因此我也不明白，为何对于天赋自由的假设就是否定了亚当为神所造这一事实呢？如果有人（既然我们的作者没有帮我们这个忙）能替他把这点说清楚，我会很高兴。因为我虽然一直相信“神造亚当”，但是还是不难假设有“人类的自由”这一点。上帝通过直接权力创造亚当或者说使其开始存在，并不需父母的参与或者是任何先他存在的同类种属生养他，只要上帝乐意，他就被创造出来了。凭借同样的创造力量，上帝在他之前创造了万兽之王狮子；如果仅凭神创造了亚当的存在这一点，而没有其他的论据就令亚当获得了统治权的话，那么，根据这一论证，我们的作者也能使狮子获得和亚当一样的封号，而且时间更为久远。不对！我们的作者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亚当是通过“上帝的指定”而获得这一封号的。那么仅由神创造这一点是不足以使亚当获得统治权的。既然我们的作者说“上帝的指定使亚当成为君主”，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不否定“上帝创造亚当”的前提下假设“人生而自由”。

16．But let us see how he puts his creation and this appointment together. By the appointment of God, says Sir Robert, “as soon as Adam was created, he was monarch of the world, though he had no subjects; for though there could not be actual government till there were subjects, yet by the right of nature it was due to Adam to be governor of his posterity: though not in act, yet at least in habit, Adam was a king from his creation.“I wish he had told us here, what he meant by God's appointment. For whatsoever providence orders, or the law of nature directs, or positive revelation declares, may be said to be by Gods appointment; but I suppose it cannot be meant here in the first sense, i.e., by providence; because that would be to say no more, but that as soon as Adam was created, he was *de facto* monarch, because by right of

nature it was due to Adam to be governor of his posterity. But he could not, *de facto* , be by providence constituted the governor of the world, at a time when there was actually no government, no subjects to be governed, which our author here confesses. Monarch of the world is also differently used by our author; for sometimes he means by it a proprietor of all the world, exclusive of the rest of mankind, and thus he does in the same page of his preface before cited: “Adam, says he, being commanded to multiply and people the earth, and subdue it, and having dominion given him over all creatures, was thereby the monarch of the whole world; none of his posterity had any right to possess anything but by his grant or permission, or by succession from him.”

16．但是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是如何把“神造亚当”和“指定”联系在一起的。罗伯特爵士说：“因为上帝指定了亚当，所以亚当一创造出来就成为了世界的君主，即使他还没有臣民；因为即便在臣民存在之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政府，但是凭借自然的权利，亚当理应成为了其后裔的统治者，即使不是在行动上，至少在表面上，亚当自创生就是君主。”我希望我们的作者能在此处说明他所谓的“上帝的指定”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凡是神命所命令、自然法则所指示、或是明确的启示所宣告的，它都可能被说成是“基于上帝的指定”。但是我认为这里指的不是第一层意思，即“据神的旨意”。因为那就等于说，亚当一创生就成为了事实上的君主，因为根据自然权利亚当理应成为其后嗣的统治者。但是，当实际上还没有政府，也没有可统治的臣民的时候，亚当实际上不可能根据神命被指定为统治者，这是我们的作者在此承认的。关于“世界的君主”一词，我们作者的用法也不一致，因为有的时候它所指的是除了其余人类以外的世界的所有者，在前面所引用过的作者的前言的同页，我们见到了这种用法：“亚当授命繁衍人类并使他们遍及世间，征服世界，并获得对所有生物的统治权，因此成为了世界的君主。他的子孙除非得到他的赐予或是许可，或者根据继承权，否则无权占有他的任何东西。”

Let us understand then by monarch proprietor of the world, and by appointment God's actual donation, and revealed positive grant made to Adam, [3_1] as we see Sir Robert himself does in this parallel place, and then his argument will stand thus: “by the positive grant of God: as soon as Adam was created, he was proprietor of the world, because by the right of nature it was due to Adam to be governor of his posterity.” In which way of arguing, there are two manifest falsehoods. First, it is false, that God made that grant to Adam, as soon as he was created, since, tho’ it stands in the text immediately after his creation, yet it is plain it could not be spoken to Adam, till after Eve was made and brought to him: and how then could he be monarch by appointment as soon as created, especially since he calls, if I mistake not, that which God says to Eve, [3_2] the original grant of government, which not being till after the fall, when Adam was somewhat, at least in time, and very much distant in condition, from his creation, I cannot see, how our author can say in this sense, that “by God's appointment, as soon as Adam was created, he was monarch of the world.” Secondly, were it true, that God's actual donation appointed Adam monarch of the world, as soon as he was created, yet the reason here given for it would not prove it; but it would always be a false inference, that God, by a positive donation, “appointed Adam monarch of the world, because by right of nature it was due to Adam to be governor of his posterity”: for having given him the right of government by nature, there was no need of a positive donation; at least it will never be a proof of such a donation.

那么，正如我们看到罗伯特爵士本人在同一地方的立论，让我们把“君主”理解成“世界的所有者”，把“上帝的指定”理解成上帝对亚当的“真实赐予”以及“明确的授予”。 [4_1] 那么，他的立论将会是：“基

于上帝的明确的授予，亚当一创造出来即成为世界的君主，因为，基于自然的权利，亚当理应成为他后嗣的统治者。”然而，这种论证的方式者显示了两个谬误：首先，“亚当一创造出来上帝就实施了授予行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这部分原话虽然紧跟在亚当的创生之后，但是，很明显这是在上帝创造出夏娃并把她交给亚当之后才说出的，那么，作者怎么能说亚当一创造出来就基于上帝指定成为了君主呢？尤其是他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帝对夏娃所说的话称之为“最初的统治权的授予”，[4_2] 而这一点，直到“原罪”发生时才能成为事实，在原罪发生之后，亚当——至少在时间上，更多的是在条件上——距离其创生十分遥远。因此，我不明白的是，我们的作者怎么能够在这个意义上说“亚当创生后就基于上帝的指定成为了世界的君主。”第二，即使“亚当一经创生就被上帝指定成为世界的君主”这一事是真实的，那么作者在此处提出的理由并不足以证明这一点，无论如何，上帝通过明确的赐予指定亚当成为世界的君主这样一个推理过程都是错误的：因为，基于自然的权利，亚当理应成为他的子嗣的统治者。如果亚当在创生后已经获得了自然所赋予的统治权，那么统治权的获得就不需要上帝明确的赐予，至少这种说法绝不能成为这样一种赐予的证明。

17 . On the other side, the matter will not be much mended, if we understand by God's appointment the law of nature, (though it be a pretty harsh expression for it in this place) and by monarch of the world, sovereign ruler of mankind: for then the sentence under consideration must run thus: “By the law of nature, as soon as Adam was created, he was governor of mankind, for by right of nature it divas due to Adam to be governor of his posterity”; which amounts to this, he was governor by right of nature, because he was governor by right of nature. But supposing we should grant, that a man is by nature governor of his children, Adam could not hereby be monarch as soon as created: for this right of nature being founded in his being their father, how Adam could have a natural

right to be governor, before he was a father, Men by being a father only he had that right, is, methinks, hard to conceive, unless he would have him to be a father before he was a father, and have a title before he had it.

17．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上帝的指定”理解成“自然法则”（虽然此处这个说法比较不成熟），而把“世界的君主”理解成“人类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话，那么我们所讨论的句子就应该这么写：“根据自然法则，亚当一创造出来就成为人类的统治者，因为根据自然的权利，亚当理应成为其后嗣的统治者；”这就等于说，亚当是基于自然权利的统治者，因为他是基于自然权利的统治者。但是假设我们承认，一个人是他的儿女的天生统治者，那么亚当并不能因此“一创造出来就成为君主”，因为这个自然权利建立在他作为他们的父亲的基础上。既然如此，那么亚当如何在他成为父亲之前就具有成为统治者的自然权利了呢？我认为这一点很难想象，除非作者让他在没有成为父亲之前成为父亲，在没有称号之前享有称号。

18．To this foreseen objection, our A.answers very logically, “He was governor in habit, and not in act”: a very pretty way of being a governor without government, a father without children, and a king without subjects. And thus Sir Robert was an author before he writ his book; not in act it is true, but in habit; for when he had once published it, it was due to him, by the right of nature, to be an author, as much as it was to Adam to be governor of his children, when he had begot them; and if to be such a monarch of the world, an absolute monarch in habit, but not in act, will serve the turn, I should not much envy it to any of Sir Robert's friends, that he thought fit graciously to bestow it upon; though even this of act and habit, if it signified anything but our A.'s skill in distinctions be not to his purpose in this place. For the question is not here

about Adam's actual exercise of government, but actually having a title to be governor. Government says our A. was “due to Adam by the right of nature”: what is this right of nature? A right fathers have over their children by begetting them; “generatione jus acquirituparentibus in liberos”, says our A.out of Grotius. The right then follows the begetting as arising from it; so that, according to this way of reasoning or distinguishing of our A. Adam, as soon as he was created, had a title only in habit, and not in act, which in plain English is, he had actually no title at all.

18．我们的作者非常有逻辑地回应了这个预料中的反驳，说，“他是表面上的统治者，而不是行为上的统治者”——要成为一个没有政府的统治者，没有儿女的父亲，没有臣民的君主，这倒是个相当不错的方式。那么，罗伯特爵士俨然在写书之前已经成了作者——的确不错，一个“表面上”而非“行为上”的作者。因为只要他出版了他的书，那么他就理应“基于自然的权利”成了一名作者，正如亚当一旦生了儿女就理应成为其儿女的统治者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成为这样一个“世界的君主”：“表面上”的绝对君主，而非“行动上”的君主也有任何用处的话，罗伯特爵士把这样的头衔优雅地授予任何一个他认为合适的朋友，我也不会太羡慕。至于这个所谓的“行为上”和“表面上”的说法，如果除了向我们展示了作者的分辨技巧外还能说明其他什么问题的话，在这里也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因为现在的问题无关乎亚当统治权的实施，而在于亚当是否享有统治者的权限。我们的作者说，“亚当基于自然的权利理应成为统治者”。那么这个“自然的权利”指什么呢？它是父亲们因为生育儿女而对他们享有的一种权利，我们的作者引用格罗蒂乌斯［荷兰法学家（1583-1645）］的话说：“父母由于生育而获得的对儿女的权利。”这种权利随着生儿育女的行为而来。所以根据我们作者的这种推理和辨识的方式，亚当一创造出来便获得的只是“表面上”的权限，而不是“行动上”的权限——用简单的话来说，那就是他实际上根本没有统治的权限。

19．To speak less learnedly, and more intelligibly, one may say of Adam, he was in a possibility of being governor, since it was possible he might beget children, laid thereby acquire that right of nature, be it what it will, to govern them, that accrues from thence; but what connexion has this with Adam's creation, to make him saythat “as soon as he was created, he was monarch of the world?” For it may as well be said of Noah, that as soon as he was born, he was monarch of the world, since he was in possibility (which in our A.'s sense is enough to make a monarch, “a monarch in habit”), to outlive all mankind but his own posterity. What such necessary connexion there is betwixt Adam's creation and his right to government, so that a “natural freedom of mankind cannot be supposed without the denial of the creation of Adam”, I confess for my part I do not see; nor how those words, “by the appointment”, &c.. [3_3] However explained, can be put together, to make any tolerable sense, at least to establish this position, with which they end, viz., “Adam was a king from his creation”; a king, says our author, “not in act, but in habit”, i.e., actually no king at all.

19．如果用浅显易懂的话来说，你大可以说亚当具有成为统治者的可能性，因为他有可能生育儿女，并因此获得统治日后繁衍出来儿女们的那种自然权利——不管这种权力指的是什么。但是这和“亚当的创生”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的作者可以说“亚当一创生就成为世界之主”呢？我们也大可以说挪亚一创造出来，他就成为世界之主，因为除了他的后代以外，挪亚有可能（按我们作者的意思，“有可能”这一点已经足以使其成为君主——“表面上”的君主）活得比所有人类都长久。亚当的创生和他统治的权利之间究竟有什么必要联系，以至于我们“对于人类天赋自由的设想必须以否定亚当的创生为前提”？我承认，我是看不出什么必然的联系的；我也不明白，那些“基于指定……” [4_3] 这样的字词，不管做何解释，是如何能够拼凑成一句还算通顺的话，至少还能支持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即：“亚当自

创生就成为了君主”，而我们的作者说，这是“表面上而不是行为上的君主”，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根本没有君主。

20．I fear I have tired my reader's patience, by dwelling longer on this passage than the weightiness of any argument in it seems to require; but I have unavoidably been engaged in it by our author's way of writing, who, huddling several suppositions together, and that in doubtful and general terms, makes such a medley and confusion,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show his mistakes, without examining the several senses wherein his words may be taken, and without seeing how, in any of these various meanings, they will consist together, and have any truth in then: for in this present passage before us, how can anyone argue against this position of histhat Adam was a king from his creation”, unless one examine, whether the words, “from his creation”, be to be taken, as they may, for the time of the commencement of his government, as the fore going words import, “as soon as he was created he was monarch”; or, for the cause of it, as he says, [3_4] “creation made man prince of his posterity”? How farther can one judge of the truth of his being thus king, till one has examined whether king be to be taken, as the words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passage would persuade, on supposition of his private dominion which was, by God's positive grant, “monarch of the world by appointment”; or king on supposition of lies fatherly power over his offspring, which was by nature, “due by the right of nature”; whether, I say, king be to be taken in both, or one only of these two senses, or in neither of them, but only this, that creation made him prince, in a way different from both the other? For though this assertion that “Adam was king from his creation”, be true in no sense, yet it stands here as an evident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e preceding words, though in truth it be but a bare assertion joined to other assertions of the

same kind, which confidently put together in words of undetermined and dubious meaning, look like a sort of arguing, when there is indeed neither proof nor connexion: a way very familiar with our author: of which having given the reader a taste here, I shall, as much as the argument will permit me, avoid touching on hereafter; and should not have done it here, were it not to let the world see, how incoherence in matter, and suppositions without proofs put handsomely together in good words and a plausible style, are apt to pass for strong reason and good sense, till they come to be looked into with attention.

20．我在这个段落上花费的功夫似乎已经超过了其中任何论点的重要性所需，恐怕我的读者都快失去耐性了，但是，由于我们这位作者的写作方式，我却不得不这么做：他把几个假设混在一起，所用的术语含糊笼统，意思模糊不清，以至于如果我们不仔细考察这些字词可能的一些解释，以及他是如何把这些不同意思的字词结合在一起，并使其表达一定的真实性，我们就没有办法指出他的错误。因为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段落里，除非我们仔细考察他所说的“从他一创造出来”各种可能的解释，是理解为亚当开始统治的时间（前面所说的“亚当一创造出来就成为了君主”可能含有此意），还是理解为亚当获得统治权的原因（作者所说的 [4_4] “亚当的创生使他成为他后裔的君主”可能含有此意），否则我们如何能够反驳他的“亚当一创生就成为了君主”这一论点呢？我们必须考察一下，看看这个所谓的“君主”，正如这一段话的开头企图使人相信的那样，建立在他的“个人统治权”的假设之上（“基于上帝的明确授予，被选为世界的君主”），还是建立在“对其后裔应享有作为父亲的权力”的假设之上（基于“自然”，依据“自然权利”）——究竟这个“君主”指的是上述两个意思呢，还是其中的一个，或者两者都不是，而仅仅指的是上帝创造亚当并用区别于上述方法的其他方法使其成为君主。如果不经过这样的考察，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判断亚当成为所谓的君主的真实性呢？因为，虽然这个“亚当自创生以来就是君主”的论断完全不具有真实性，但是它作为

前面所说的内容所引出的结论明白的写在这里，事实上它不过是和其他类似断言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空泛的断言。这些断言被自信地用那些意义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字词拼凑在一起，看上去似乎是一种论证，而实际上既无证据，也无联系。这是我们的作者惯用的一种手法。既然我已经让我们的读者略尝其味，那么，以后只要在论证许可的情况下，我会尽可能避免触及这个问题。那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和假设，即使毫无根据，假如把漂亮的字句和精巧的文体巧妙结合在一起，如果人们不仔细考察，它们就很可能被当成强有力的推论和正确的判断蒙混过去。如果不是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一点，我原本也不会在这里把它指出来。

[3_1].Genesis.i. 28.

[3_2].Genesis.iii. 16.

[3_3].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54.

[3_4].Patriarcha p. 11.

[4_1].《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4_2].《创世记》，第三章第十六节。

[4_3].《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54页。

[4_4].《君权论》，第11页。

Chapter IV　Of Adam's Title to Sovereignty, by Donation

第四章　论亚当基于神赐而享有主权

[4_1]

[5_1]

21 . Having at last got through the foregoing passage, where we have been so long detained, not by the force of arguments and opposition, but by the intricacy of the words, and the doubtfulness of the meaning; let us go on to his next argument, for Adam's sovereignty. Our author tells us in the words of Mr. Selden, that “Adam by donation from God, [4_2] was made the general lord of all things, not without such a private dominion to himself, as without his grant did exclude his children. This determination of Mr. Selden, says our author, is consonant to the history of *the Bible* , and natural reason”. [4_3] And in his Pref. to his *Observations on Aristotle* , he says thus, “The first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was monarchical in the father of all flesh, Adam being commanded to multiply and people the earth, and to subdue it, and having dominion given him over all creatures, was thereby the monarch of the whole world. None of his posterity had any right to possess anything, but by his grant or permission, or by succession from him. The earth, saith the Psalmist, hath he given to the children of men, which shows the title comes from fatherhood.”

21．前面一段的讨论我们颇费周章，不是因为论点或反驳得有力，而是因为文字的复杂难懂和意思的含混不清。现在让我们接着讨论他对“亚当的统治权”的下一个论证。我们的作者以塞尔登先生的话告诉我们，“亚当基于上帝的赐予而成为万物之主，其本人原本是没有个人统治权的，正如若无亚当的授权，他的儿女也不能享受这种权利一样”[5_2]。我们的作者说，“塞尔登先生的这一断言是和《圣经》的历史以及自然理性相一致的”[5_3]。在其《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的序文中，他是这样说的：“世界最早的政府是一切人类之父的君主制政府，亚当受命繁衍人类，并遍布世间，征服世界，并取得对所有生物的统治权，因此成为全世界的君主，任何其后裔除非得到他的授权或者许可，或者凭借从他那里继承的权利，否则没有权利占有任何东西。《诗篇》的作者说：‘他把世界给予人类的儿女’，这表明君主的称号来自父亲的身份。”

22．Before I examine this argument, and the text on which it is founded, it is necessary to desire the reader to observe, that our author, according to his usual method, begins in one sense, and concludes in another; he begins here with Adam's propriety, or private dominion, by donation; and his conclusion is, “which shows the title comes from fatherhood.”

22．在考察这一论点以及所依据的《圣经》原文之前，我有必要让读者注意到这一点：根据我们这位作者的一贯做法，他总是以一种意思开始，却以另外一种意思结束。这里他从“亚当基于上帝赐予的所有权或个人统治权”出发，但是，他的结论却是“这显示君主的称号来自父亲的身份。”

23．But let us see the argument. The words of the text are these: “And God blessed them, and God said unto them,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and replenish the earth and subdue it, and have dominion over the fish of the sea, and over the fowl of the air, and over every living thing that moveth upon the earth”; [4_4] from whence our author concludes “that Adam, having here dominion given him over all creatures, was thereby the monarch of the whole world”: whereby must be meant, that either this grant of God gave Adam property, or, as our author calls it, private dominion over the earth, and all inferior or irrational creatures, and so consequently that he was thereby monarch; or, secondly, that it gave him rule and dominion over all earthly creatures whatsoever, and thereby over his children; and so he was monarch: for, as Mr. Selden has properly worded it, “Adam was made general lord of all things”, one may very clearly understand him, that he means nothing to be granted to Adam here but property, and therefore he says not one word of Adam's monarchy. But our author says “Adam was hereby monarch of the world”, which, properly speaking, signifies sovereign ruler of all the men in the world; and so Adam, by this grant, must be constituted such a ruler. If our author means otherwise, he might with much clearness have said that “Adam was hereby proprietor of the whole world.“But he begs your pardon in that point: clear distinct speaking not serving everywhere to his purpose, you must not expect it in him, as in Mr. Selden, or other such writers.

23．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论证。其所依据的《圣经》原文如下：“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大量繁殖，遍布大地，还要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 [5_4] 基于这部分文字，我们的作者得出这个结论：“亚当既然取得了对一切生物的统治权，因此他就成为了全世界的君主”。这个结论的意思要么是说由于上帝的这种授予给予了亚当所有权，或者作者所说的“对于世间，以及所有低级或非理性生物的个人统治权”，他因此成为了

全世界的君主；要么是说上帝的这一授予使得亚当可以治理和统治地球上的一切生物，从而统治他的子嗣，他便因此成为世界的君主。其意二者必居其一。因为，正如塞尔登先生曾用正确的字词说道，“亚当成为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共同主人”，从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理解他的意思，那就是上帝授予亚当的除了所有权之外，别无他物，因此他对亚当的“君权”只字未提。但是我们的作者却说：“亚当因此成为全世界的君主”，确切地说，这指的就是全世界人类的主权统治者。因此，基于这个赐予，亚当必须被确立为这样一个统治者。如果我们的作者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他应该非常清楚地说，“亚当因此成为世界的所有者”。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作者要请你原谅，清楚明确的说法并不总是符合他的目的，所以你就不要在这方面，像对塞尔登先生或者其他此类作家那样，对他有所期待。

24 . In opposition, therefore, to our author's doctrine, that “Adam was monarch of the whole world” founded on this place, I shall show,

24 . 因此，为了反驳我们这位作者此处的“亚当是全世界的君主”这一学说，我想要指出：

(1) That by this grant [4_5] , God gave no immediate power to Adam over men, over his children, over those of his own species; and so he was not made ruler, or monarch, by this charter.

第一，基于这个授权 [5_5] ，上帝并没有给予亚当统治人类、他的儿女及他自己的同类任何直接的权力，因此，他并没有基于这种特许而成为“统治者”或“君主”。

(2) That by this grant God gave him not private dominion over the inferior creatures, but right in common with all mankind; so neither was he monarch upon the account of the property here given him.

第二，上帝并没有基于此次授权给予亚当对于次等生物的个人统治权，而是和其他人类相同的权利，因此他不能基于给予他的“所有权”而成为“君主”。

25 . That this donation, [4_6] gave Adam no power over men, will appear if we consider the words of it: for since all positive grants convey no more than the express words they are made in will carry, let us see which of them here will comprehend mankind, or Adam's posterity; and those I imagine, if any, must be these, “every living thing that moveth”: the words in Hebrew are חיה הרמשת i.e., *bestiam reptantem* , of which words the Scripture itself is the best interpreter: God having created the fishes and fowls the 5th day, the beginning of the 6th, he creates the irrational inhabitants of the dry land, which, ver., are described in these words, “Let the earth bring forth the living creature after his kind; cattle and creeping thins, and beasts of the earth, after his kind”; [4_7] and “and God made the beasts of the earth after his kind, and cattle after their kind, and everything that creepeth on the earth after his kind” [4_8] . Here, in the creation of the brute inhabitants of the earth, he first speaks of them all under one general name, of living creatures, and then afterwards divides them into three ranks, (1) Cattle, or such creatures as were or might be tame, and so be the private possession of particular men; (2)חיה which, in our *Bible* , is translated beasts, [4_9] and by the Septuagintθηρία, wild beasts, and is the same word, that here in our text, where we have this great

charter to Adam, is translated living thing, [4_10] and is also the same word used, where this grant is renewed to Noah, and there likewise translated beast. [4_11] (3) The third rank were the creeping animals, which, are comprised under the word[12_4] ,חרמשת] the same that is used here, ver., and is translated moving, [4_13] but in the former verses creeping, and by the Septuagint in all these places, ἑπετὰor reptiles; from whence it appears, that the words which we translate here in God's donation. “Living creatures moving” are the same, [4_14] which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eation, [4_15] signify two ranks of terrestrial creatures, viz., wild beasts and reptiles, and are so understood by the Septuagint.

25．如果我们仔细揣摩其中的语言，就会发现这个授权 [5_6] 并没有给予亚当统治人类的权力。因为，一切明确授权所给予的东西都不能超越其明文表达的内容范围。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圣经》原文中哪些字词可以理解成“人类”或“亚当的子嗣”：我想，如果确实有的话，一定是这个词——“所有爬行的生物”，希伯来语是חהרמשת即拉丁文“bestiamreptantem”，《圣经》的原文对这句话做出了最好的解释：上帝在第五日创造了鱼和禽鸟，第六天伊始，上帝创造了陆地上的非理性生物。《圣经》对这事是这样记载的：“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 [5_7] 又说：“上帝创造地上的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以及一切爬行于地上之物，各从其类。” [5_8] 在此，讲到地上兽类的创造时，上帝先用“生物”这一个笼统的名词表示它们全体，然后把它们分作三级：（一）牲畜，即驯服的或可以被驯养的动物，因此成为某些特定人们的私有财产；（二）חה，在我们的《圣经》里译为“兽” [5_9] ，希腊文θηρία，在《旧约·圣经》七十人译本则译为“野兽”，这和现在经文中记载上帝对于亚当的本次特许中被译为“生物”的是同一个词， [5_10] 当这种授予重新给予挪亚时，所使用的同样也是这个词， [5_11] 在那里，同样被译为“兽”；（三）第三级是爬行动物，用חרמשת一词来表示， [5_12] 这就是《圣经》原文中使用并被译为“走动”的词 [5_13] ，但在前头的

章节里则为“爬行”，希腊文《旧约·圣经》七十人译本将这些地方一律译为ἑπετὰ，即“爬行动物”。由此可见，我们在翻译上帝的赐予时所译的“走动的生物” [5_14] 一词，就是创世的历史中所指的两种陆栖生物——野兽和爬虫， [5_15] 希腊文的《旧约·亚经》七十人译本也是这样理解的。

26 . When God had made the irrational animals of the world, divided into three kinds, from the places of their habitation, viz., fishes of the sea, fowls of the air, and living creatures of the earth, and these again into cattle, wild beasts, and reptiles; he considers of making man, and the dominion he should have over the terrestrial world, [4_16] and then he reckons up the inhabitants of these three kingdoms, but in the terrestrial leaves out the second rank חלה or wild beasts; but here, [4_17] where he actually exercises this design, and gives him this dominion, the text mentions the fishes of the sea, and fowls of the air, and the terrestrial creatures in the words that signify the wild beasts and reptiles, though translated living thing that moveth, leaving out cattle. In both which places, though the word that signifies wild beasts be omitted in one, and that which signifies cattle in the other, yet, since God certainly executed in one lilacs, what he declares he designed in the other, we cannot but understand the same in both places, and have here only an account how the terrestrial irrational animals, which were already created and reckoned up at their creation, in three distinct ranks of cattle, wild beasts, and reptiles, were here, [4_18] actually put under the dominion of man, as they were designed; [4_19] nor do these words contain in them the least appearance of anything that can be wrested to signify God's giving to one man dominion over another, to Adam over his posterity.

26．上帝创造出了世上的非理性动物后，根据其栖息地将其分作三类——“海中的鱼、空中的鸟以及陆上生物”，又将陆上生物再划分为“牲畜、野兽和爬虫”。完成之后，上帝便考虑创造人类，以及人类对陆上世界应有的统治权。 [5_16] 接下来上帝计算出这三界的生物的总数量，但是在计算陆上生物的时候漏掉了第二类生物חיה，也就是“野兽”，然而经文中在叙述上帝执行其设想并把这个统治权交给人类的地方时， [5_17] 其文字提到的是“海中的鱼，空中的鸟”，以及用表示“野兽”和“爬虫”的字眼表示陆上生物，只不过译为“走动的生物”，并漏掉了“牲畜”。在这两处地方，虽然一处遗漏了指示“野兽”的词，另一处则遗漏了指示“牲畜”的词，但是，既然上帝确实在一处执行了他在另一处所宣布的设想，我们只能把两处理解为同一意思，而且只有一种说法来解释到底陆上的非理性动物是如何按上帝的设想 [5_18] 以三个不同种类——“牲畜，野兽和爬行动物”——被创造并计算出来，并置于人类的管辖之下； [5_19] 这些话里也根本没有任何字眼可以被牵强地理解为上帝给予一个人对于其他人的统治权，及亚当对于其子嗣的统治权。

27．And this further appears front [4_20] , where God renewing this charter to Noah and his sons, he gives them dominion over the fowls of the air, and the fishes of the sea, and the terrestrial creatures, expressed by דרמשחה wild beasts and reptiles, the same words that in the text before us, [4_21] are translated every moving thing that moveth on the earth, which by no means can comprehend man, the grant being made to Noah and his sons, all the men then living, and not to one part of men over another; which is yet more evident from the very next words, [4_22] where God gives every "every moving thing”, the very words used, רמש [4_23] to them for food. By all which it is plain that God's donation to Adam, and his designation, [4_24] and his grant again to Noah and his sons; refer to and contain in them,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the works of the creation the fifth da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h, as they are set down from the both to 26th ver. inclusively of the 1st ch. and so comprehend all the species of irrational animals of the terraqueous globe, though all the words, whereby they are expressed in the history of their creation, are nowhere used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grants, but some of them omitted in one, and some in another. From whence, I think it is past all doubt that man cannot be comprehended in this grant, nor any dominion over those of his own species be conveyed to Adam. All the terrestrial irrational creatures are enumerated at their creation, [4_25] under the names “beasts of the earth, cattle, and creeping things”; but man, being not then created, was not contained under any of those names; and therefore, whether we understand the Hebrew words right or no, they cannot be supposed to comprehend man, in the very same history, and the very next verses following, especially since that Hebrew word רמש which, if any in this donation to Adam [4_26] , must comprehend man, is so plainly used in contradistinction to him, as Gen. vi. 20. vii. 14, 21, 28. Gen. viii. 17, 19. And if God made all mankind slaves to Adam and his heirs, by giving Adam dominion over “every living thing that moveth on the earth”, [4_27] as our author would have it; methinks Sir Robert should leave carried his monarchical power one step higher, and satisfied the world that princes might eat their subjects too, since God gave as full power to Noah and his heirs, to eat “every living thing that moveth”, [4_28] as he did to Adam to have dominion over them, the Hebrew word in both places being the same.

27．这样的文字再次出现， [5_20] 记叙上帝把这种特许延续给了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让他们统治“空中的鸟”、“海洋的鱼”以及“陆上生物”的权利。陆上生物是以“野兽”和“爬行动物”的字眼来描述的，它们分别是用חה和דרמש表示的，这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地球上一切行走的生物” [5_21] 的表述是一致的。而这句话是决不能理解成一切行走的动

物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因为此次授权的对象是挪亚和他的儿子们，也就是当时生存的所有人类，而不是人类中的一部分人，令其统治另一部分人。而关于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更加明显，[5_22]“上帝把一切行走的生物23_5]רמש]，赐予他们作为食物。”根据以上的陈述，我们可以了然，上帝对于亚当的赐予[5_24]和指派[5_25]，以及上帝对于挪亚及其儿子们的再次授予的所指和所含不多不少正好是上帝在第五天和第六天伊始的创造之物。如第一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六节中的记载，也就是整个水陆相连的地球上的所有非理性的物种，尽管用来表示他们的所有的名词都是他们被创造时的指称，在接下来提到的各次授予中也绝对没有完全使用到，但是其中的一些词在某次授予中被省略掉，一些词在另外的授予中被省略掉。因此我认为，毋庸置疑，人类不应被包括在这些授予的范围内，对同类的统治权也绝对没有赐予亚当。第二十五节中以“地上的兽”、“牲畜”以及“爬行生物”之名枚举了所有的被创造出来的陆上非理性生物，但是人当时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因此并不包括在任何的这些名目之下。所以，不管我们是否能正确理解希伯来文字，这些词在创世史和接下来的诸节经文中都不应该理解成包括人类在内，尤其是那个希伯来词语רמש。如果上帝对于亚当的赐予中一定要理解为包括人类的话[5_26]，显然和《创世记》第六章第二十节，第七章第十四、二十一、二十三节，第八章第十七和十九节中关于人的说法互相矛盾了。如果按照我们作者的意图，上帝通过给予亚当对地球上一切行走的生物的统治权，使所有的人类成为亚当及其继承人的奴隶的话，[5_27]那么，我认为罗伯特爵士本应该把这个君主权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向世界证明：君主也可以吃掉他的臣民，因为正如上帝给予亚当对于“一切行走的生物”的统治权，上帝也给予挪亚及其继承人以“一切行走的生物”为食的充分权力。[5_28]这两处的希伯来文字表述完全一致。

28 . David, who might be supposed to understand the donation of God in this text, and the right of kings too, as well as our author, in his comment on this place, as the learned and judicious Ainsworth calls it, in the 8th *Psalm* , finds here no such charter of

monarchical power, his words are, “Thou hast made him, i.e. man, the son of man, a little lower than the angels; thou maddest him to have dominion over the works of thy hands; thou hast put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all sheep and oxen, and the beasts of the field, and fowls of the air, and fish of the sea, and whatsoever passeth through the paths of the sea.“In which words, if anyone can find out, that there is meant any monarchical power of one man over another, but only the dominion of the whole species of mankind over the inferior species of creatures, he may, for aught I know, deserve to be one of Sir Robert's monarchs in habit, for the rareness of the discovery. And by this time, I hope it is evident, that he that gave “dominion over every living thing that moveth on the earth”, gave Adam no monarchical power over those of his own species, which will yet appear more fully in the next thing I am to show.

28．除我们的作者之外，大卫大概可以算得上是另一个可以理解《圣经》中上帝的赐予以及君王的权利的人，他在《诗篇》第八篇中对此处的注释（博学和贤明的安斯沃思这样称呼它）中并没有找到对亚当君主权力的特许，他的原话为：“尔把他——即人类、人类的子孙——造成比天使低一点；尔派他管理尔手所造的；尔令万事万物，即所有牛羊、野兽、空中的鸟、海中的鱼和一切凡经行海道的，都臣服在他的脚下。”在这段话里，除了全人类对于低级生物的统治权，如果任何人还能找出一个人对于其他同类享有君主特权的意思的话，那么我认为，他凭借这个罕有的发现理应够得上罗伯特爵士所说的“表面上的君主”当中的一员了。至此，我希望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即上帝给予亚当对于“一切行走的生物的统治权”并没有使其享有对自己同族的君权。关于这点，在下面我要指出的第二点中，将更充分地表现出来。

29．Whatever God gave by the words of this grant [4_29] , it was

not to Adam in particular, exclusive of all other men; whatever dominion he had thereby, it was not a private dominion, but a dominion in common with the rest of mankind. That this donation was not made in particular to Adam, appears evidently from the words of the text, it being made to more than one; for it was spoken in the plural number, God blessed them, and said unto them, have dominion. God says unto Adam and Eve, have dominion; thereby, says our author, “Adam was monarch of the world”; but the grant being to them, i.e., spoken to Eve also, as many interpreters think with reason, that these words were not spoken till Adam had his wife, must not she thereby be lady, as well as he lord of the world? If it be said that Eve was subjected to Adam, it seems she was not so subjected to him as to hinder her dominion over the creatures, or property in them: for shall we say that God ever made a joint grant to two, and one only was to have the benefit of it?

29．不管上帝本次“授权”所言包括什么， [5_29] 这个权利都并非将其他人排除在外，而单独许给亚当个人。因此，不管亚当获得了什么统治权，这个统治权都不是个人的，而是和其他同类相同的权利。这个赐予并非单独给予亚当，这一点在原文中显而易见的，因为赐予的对象用的是复数——上帝祝福“他们”，并对“他们”说他们“享有统治权”。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享有统治权”，我们的作者因此便说“亚当是全世界的君主”。但这个授予是对“他们”做出的，即也是对夏娃说的——很多注释者有理由相信，这些话是亚当有了妻子夏娃以后上帝对他们所说的——那么，亚当既然成为了世界的君主，夏娃不应当成为世界的女王吗？即便有人说夏娃是从属于亚当的，似乎这种从属也不致影响她对于所有生物的统治权，或者是所有权，因为难道我们可以说上帝使两人共同享有权力，却只有一人应独享其利益吗？

30．But perhaps it will be said Eve was not made till

afterward: grant it so, what advantage will our author get by it? The text will be only the more directly against him, and show that God, in this donation, gave the world to mankind in common, and not to Adam in particular. The word them in the text must include the species of man, for it is certain them can by no means signify Adam alone. In the 26th verse, where God declares his intention to give this dominion, it is plain he meant that he would make a species of creatures that should have dominion over the other species of this terrestrial globe. The words are, “And God said, let us make man in our image, after our likeness, and let them have dominion over the fish”, &c. They then were to have dominion. Who? Even those who were to have the image of God, the individuals of that species of man that he was going to make; for that *them* should signify Adam singly, of the rest that should be in the world with him, is against both Scripture and all reason; and it cannot possibly be made sense, if man in the former part of the verse do not signify the same with *them* in the latter; only man there, as is usual, is taken for the species, and *them* the individuals of that species; and we leave a reason in the very text. God makes him “in his own image, after his own likeness; makes him an intellectual creature, and so capable of dominion”: for wherein soever else the image of God consisted, the intellectual nature was certainly a part of it, and belonged to the whole species, and enabled them to have dominion over the inferior creatures; and therefore David says in the 8th *Psalm* above cited, “Thou hast made him little longer than the angels; thou hast made him to have dominion.“It is not of Adam king David speaks here [4_30] . It is plain, it is of man, and the son of man, of the species of mankind.

30．但是可能有人会说，夏娃是后来才被创造出来的。假设事实果真如此，这对我们的作者又会有何益处呢？他得到的只有《圣经》

原文对他更直接的反驳。原文显示，上帝在这次赐予中，把整个世界给了全体人类，而不是亚当个人。文中“他们”一词必定包括了人类全族，因为“他们”绝不会单独指亚当一个人，这是肯定的。在第二十六节中，上帝宣布了他要交付这个统治权的意愿，很明显，他的意思是他将创造出一个生物种类来统治陆上世界的其他生物种类。原文是这样的：“上帝说，让我们以我们的形象和外貌来造人吧，让他们对鱼享有统治权。”那么，享有统治权的“他们”是谁呢？正是那些将具有上帝的形象、上帝正准备创造的人的族类中的一切个人。因为，如果“他们”单指亚当，而不包括将与其共存世间的其余的人类，那就违背了《圣经》和一切理性。而且，如果这一章节中前面的“人”和后面的“他们”所指不一样，这样是讲不通的，除非我们把那里的“人”按平常那样理解成“人的物种”，而把“他们”理解成这一物种里面的所有个体。我们正是在原文里找到了一个理由，即：“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外貌造出人，使他成为一个有智力的生物，因此能够执行统治权”。因为不管上帝的形象包含什么样的具体特征，智力肯定是其中一个部分，而且为整个物种所拥有并因此能够对低等生物执行统治权。因此，大卫王在前面引用的《诗篇》中说道：“尔把他造得比天使寿命更久一点，尔使他具有支配之权。”[5_30] 大卫王在这儿所讲的绝不是亚当个人，因为他在第四节中已经明确表示，他讲的是人、人的子孙、人类种群。

31 . And that this grant spoken to Adam was made to him, and the whole species of man, is clear from our author's own proof out of the *Psalmist* . “The earth, saith the Psalmist, hath he given to the children of men, which shows the title comes from fatherhood.“These are Sir Robert's words in the preface before cited, and a strange inference it is he makes: “God hath given the earth to the children of men, *ergo* the title comes from fatherhood.“It is pity the propriety of the Hebrew tongue had not used fathers of men, instead of children of men, to express mankind: then indeed our author might have had the countenance of talc socials of the words

to have placed the title in the fatherhood. But to conclude, that the fatherhood lead the right to the earth, because God gave it to the children of men, is a way of arguing peculiar to our author; and a man must have a great mind to go contrary to the sound as well as sense of the words, before he could light on it. But the sense is yet harder, and more remote from our author's purpose: for as it stands in his preface it is to prove Adam's being monarch, and his reasoning is thus “God gave the partly to the children of men, *ergo* Adam was monarch of the world.“I defy any man to make a more pleasant conclusion than this, which cannot be excused from the most obvious absurdity, till it can be shown that by children of men, he who had no father, Adam alone is signified; but whatever our author does, the Scripture speaks not nonsense.

31．这里所说的对亚当的授予，既是对亚当也是对整个人类物种的授予，这一点从作者自己引自《诗篇》的证据可以看得很清楚。“《诗篇》的作者说：‘他把整个陆上世界给予人类的子孙’，这表明统治权来自父亲的身份。”这是罗伯特爵士在前面引述过的序言里的话，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推理：“上帝把陆上世界给予了人类的子孙，因此这种权力来自父亲的身份。”遗憾的是，希伯来语言恰当地使用了“人类的子孙”而不是“人类的父亲”来表达全人类的概念，那么我们的作者把君权的获得归因于父亲的身份，确实有可能在字音上得到支持。但是，因为上帝把陆上世界的所有权给予了人类的子孙，就因此得出结论说君权的获得是源于父亲的身份，这一直是我们的作者特有的论证方式。一个读者必须非常聪明，能够反过来理解他所用词的音和义，才能够明白他的意思。然而，其意却更艰深，离我们作者的目的更加遥远。因为正像他在前言里表达的那样，他的目的是要证明亚当成为君主的必然性，他的推理是这样的：“上帝将陆上世界给予了人类的子孙，因此亚当就成为了世界的君主。”我敢说再也没有人能够做出比这个更加滑稽可笑、荒唐透顶的结论了，除非他能够表明“人类的子孙”恰恰指的是那个没有父亲的亚当。但不管我们的作者

怎么做，《圣经》是不会说出如此荒诞的话的。

32 . To maintain this property and private dominion of Adam, our author labours in the following page to destroy the community granted to Noah and his sons, in that parallel place, [4_31] and he endeavours to do it two ways.

32．为了维护亚当的所有权和个人统治权，我们的作者设法在下一页 [5_31] 中推翻在另一类似的地方授予挪亚和他儿子的共同权利。他竭力以两种方式来做这件事情：

1 . Sir Robert would persuade us against the express words of the Scripture, that what was here granted to Noah, was not granted to his sons in common with him. His words are, “As for the general community between Noah and his sons, which Mr. Selden will have to be granted to them, [4_32] the text doth not warrant it.“What warrant our author would have, when the plain express words of Scripture, not capable of another meaning, will not satisfy him, who pretends to build wholly on Scripture, is not easy to imagine. The text says, “God blessed Noah and his sons, and said unto them”, i.e.as our author would have it unto him: for saith he, “although the sons are there unmentioned with Noah in the blessing, yet it may best be understood, with a subordination or benediction m succession” [4_33] . That indeed is best for our author to be understood, which best serves to his purpose; but that truly may best be understood by anybody else, which best agrees with the plain construction of the words, and arises from the obvious meaning of the place; and then with subordination and in succession will not be best understood in a grant of God, where he

himself put them not, nor mentions any such limitation. But yet our author has reasons why it may best be understood so. “The blessing, says he in the following words, might truly be fulfilled, if the sons, either under or after their father, enjoyed a private dominion” [4_34] ; That is to say, that a grant, whose express words give a joint title in present (for the text says, into your hands they are delivered) may best be understood with a subordination or in succession; because it is possible, that in subordination, or in succession, it may be enjoyed. Which is all one as to say, that a grant of anything in present possession may best be understood of reversion; because it is possible one may live to enjoy it in reversion. If the grant be indeed to a father and to his sons after him, who is so kind as to let his children enjoy it presently in common with him, one may truly say, as to the event one will be as good as the other; but it can never be true that what the express words grant in possession, and in common, may best be understood to be in reversion. The sum of all his reasoning amounts to this: God did not give to the sons of Noah the world in common with their father, because it was possible they might enjoy it under or after him. A very good sort of argument against an express text of Scripture; but God must not be believed, though he speaks it himself, when he says he does anything which will not consist with Sir Robert's hypothesis.

第一，在直接违背了《圣经》明文的情况下，罗伯特爵士想要劝说并让我们相信，这里给予挪亚的权利并没有同样地授予挪亚的儿子们。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关于塞尔登先生不得不赋予挪亚和他的儿子们普遍的共同权利， [5_32] 《圣经》原文中并不能找到依据。”如果这些完全不可能做出其他解释的简单明确的圣经文字都无法满足我们这位自诩完全以《圣经》为依据的作者的话，很难想象他到底需要怎样的依据。经文说，“上帝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并对他们说”，按照我们作者的意思应该是“对他说”，因为我们的作者说：“虽然在上帝

的赐福中，挪亚的儿子们和挪亚一道被提起，但是最好理解成从属关系或者是继承关系的祝福。”[5_33] 对于我们的作者来说，最能服务于其目的的解释就是最好的解释。但是，对于作者以外的其他人来说，最能与字词本来的简单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显而易见的意思相吻合的解释才是最好的解释。而至于上帝授予中含有从属和继承关系的解释不会是最好的解释，因为上帝自己并没有在授予中加入这种意思，也没有提到任何这样的对于授予的限制。但是，关于为什么最好理解成从属关系或者是继承关系的祝福，我们的作者自有道理。他在随后的文字中说道，“如果挪亚的儿子们不管是因为从属于还是继承自其父而享有个人统治权，那么上帝的赐福就能够真实地实现”[5_34] 。这就是说，以明文当面授予的共同权利（因为原文说，“把它们交到你们的手里”）最好理解为具有从属关系或者是继承关系，因为在从属关系或者继承关系里，挪亚的儿子们也得以享受到这种权利。这无异于说，对于任何当前占有东西的赐予都最好理解为继承权的赐予，因为人们有可能通过继承关系在活着的时候享受它。如果这种赐予确实只是先给予父亲，在父亲之后给予儿子们，而这个父亲又非常仁慈，让儿子们当下就和自己一起享受这种权利的话，那么你确实可以说，当前的赐予与继承权的赐予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把明文授予的可以共同享有的占有权最好理解为继承权的享有，那是绝对不正确的。他所有的推理的结果等于说，上帝没有给予挪亚的儿子们和父亲共同享有世界的权利，因为“他们可以在其下或其后享受到这种权利”。好一个漂亮的论证啊——完全违背了《圣经》的原文！要是上帝说自己做了任何与罗伯特爵士的假设不相符的事情，就算是上帝本人说的，那么连上帝本人也是不可信的。

33 . For it is plain, however he would exclude them, that part of this benediction, as he would have it in succession, must needs be meant to the sons, and not to Noah himself at all: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and replenish the earth”, says God, in this blessing. This part of the benediction, as appears by the sequel, concerned not Noah himself at all: for we read not of any children he had after

the flood; and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 where his posterity is reckoned up, there is no mention of any; and so this benediction in succession was not to take place till 350 years after: and to save our author's imaginary monarchy, the peopling of the world must be deferred 350 years; for this part of the benediction cannot be understood with subordination, unless our author will say that they must ask leave of their father Noah to lie with their wives. But in this one point, our author is constant to himself in all his discourses; he takes care there should be monarchs in the world, but very little that there should be people; and indeed his way of government is not the way to people the world: for how much absolute monarchy helps to fulfill this great and primary blessing of God Almighty,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and replenish the earth”, which contains in it the improvement too of arts and sciences, and the conveniences of life; may be seen in those large and rich countries which are happy under the Turkish government, where are not now to be found one-third, nay in many, if not most parts of them, one-thirtieth, perhaps I might say not one-hundredth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formerly, as will easily appear to anyone, who will compare the accounts we have of it at this time, with ancient history. But this by the by.

33．因为这显而易见，不管我们的作者如何把挪亚的儿子们排除在权利之外，罗伯特爵士想要以继承来理解的那部分赐福必须解释成是对挪亚的儿子们而言的，而根本不是对挪亚本人而言的。上帝在此次赐福中说道，“尔们要繁衍生息，遍布大地”，这个部分的赐福，根据上下文，根本与挪亚无关，因为我们没有读到挪亚在洪水后生育过任何儿女；而在接下来的一章里计算他的子嗣的时候，也没有提到任何子嗣，所以这个继承权的赐福是直到三百五十年以后才发生的。为了挽救我们作者这个幻想中的君主制，世界上人类繁衍的时间被延后了三百五十年。因为这部分的赐福不能以从属关系来理解，除非我们的作者说，挪亚的儿子们必须得到挪亚的许可，才能和他们的妻子同

居。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作者在他所有的著作里面都是一致的，他所关注的是世界上应该有君主，但对世界上应该有民众却不甚关心。他的这种统治方式确实不是使世界遍布人类的方法：因为绝对君主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助于实现万能的上帝的“尔们要繁衍生息，遍布大地”，这个首要而重大的赐福（这其中也包含了艺术、科学以及生活设施的完善）可以从那些有幸受到土耳其政府统治的广大富饶的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到。这些地方的人口记载，如果我们跟古时候进行比较，我们很容易发现，其现有人口不及古代的三分之一，在许多地方——如果不是大部分的地方——不及以往的三十分之一，或许我可以说不及百分之一。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谈。

34．The other parts of this benediction or grant are so expressed, that they must needs be understood to belong equally to them all; as much to Noah's sons as to Noah himself, and not to his sons with subordination, or in succession. “The fear of you, and the dread of you, says God, shall be upon every beast”, & c. Will anybody but our author say that the creatures feared and stood in awe of Noah only, and not of his sons without his leave, or till after his death? And the following words, “into your hands they are delivered”, are they to be understood as our author says, if your father please, or they shall be delivered into your hands hereafter? If this be to argue from Scripture, I know not what may not be proved by it; and I can scarce see how much this dithers from that fiction and fancy, or how much a surer foundation it will prove than the opinions of philosophers and poets, which our author so much condemns in his preface.

34．这个赐福或者授予的其他部分是如此表述的，它们必须理解成平等地属于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而且儿子们享有的权利丝毫不少于父亲，也不包含任何从属或者是继承的限制。上帝说：“我令一切

兽类都对你们感到惊恐和畏惧”，除了我们的作者，有谁会说，除非得到挪亚同意或者等到挪亚死后，否则那些兽类就只是畏惧挪亚，而不畏惧他的子孙呢？接下来的文字“把它们交到你们的手里”，也要像我们的作者所说的那样理解成“如果你们的父亲高兴，或许它们今后会交到你们的手上”吗？如果这是依据《圣经》论证得出的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圣经》不能证明的。而且我看不出他的论证跟虚构和想象有多大的区别，或者相比那些在作者前言中饱受其抨击的哲学家们和诗人们的观点，它的基础又在多大程度上更为可靠呢？

35 . But our author goes on to prove that “it may best be understood with a subordination, or a benediction in succession; for, says he, it is not probable that the private dominion which God gave to Adam, and by his donation, assignation, or cession to his children, was abrogated, and a community of all things instituted between Noah and his sons—Noah was left the sole heir of the world; why should it be thought that God would disinherit him of his birth right, and make him of all men in the world the only tenant in common with his children?“ [4_35]

35．但是我们的作者继续论证说：“最好理解成从属关系或者继承关系的祝福，这是因为上帝给予亚当以及亚当通过赐予、指定或者转让的方式给予他的子孙的个人统治权不可能被废除，让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共享一切也是不太可能的——挪亚是遗留下来的世界唯一的继承人；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上帝会剥夺他与生俱来的继承权，使他在所有人当中成为唯一一个与他的子孙一起共享权力的所有者呢？” [5_35]

36 . The prejudices of our own ill-grounded opinions, however by us called probable, cannot authorize us to understand Scripture contrary to the direct and plain meaning of the words. I grant it is

not probable that Adam's private dominion was here abrogated, because it is more than improbable (for it will never be proved) that Adam had any such private dominion; and since parallel places of Scripture are most probable to make us know how they may be best understood, there needs but the comparing this blessing here to Noah and his sons, after the flood, with that to Adam after the creation, [4_36] to assure anyone that God gave Adam no such private dominion. It is probable, I confess, that Noah should have the same title, the same property and dominion after the flood, that Adam had before it; but since private dominion cannot consist with the blessing and grant God gave to him and his sons in common, it is a sufficient reason to conclude that Adam had none, especially since, in the donation made to him, there are no words that express it, or do in the least favour it; and then let my reader judge whether it may best be understood, when in the one place there is not one word for it, not to say what has been above proved, that the text itself proves the contrary; and in the other, the words and sense are directly against it.

36．我们缺乏根据的观点中的偏见，不管我们如何称之为可能，都不能给予我们权利，以背道而驰的方式来理解《圣经》原文直接而明白的含义。我承认，亚当的个人统治权不太可能被废除，因为，亚当享有任何此类的个人统治权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不可能的范围（因为，这点绝对不会得到证明）；由于《圣经》中有相似的地方，最有可能让我们明白该如何理解最好，所以我们这里只要比较一下上帝在大洪水后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的赐福以及上帝在创世后对亚当的赐福， [5_36] 我们就可以让所有人明白，上帝并没有给予亚当这样的个人统治权。我承认，挪亚在洪水后得到了洪水前亚当所获得的同样的称号、同样的所有权以及统治权是可能的。但是，既然个人统治权与上帝给予挪亚和他的儿子共同享有的赐福和授予不一致，我们便有足够的理由说亚当没有得到这种个人统治权，尤其是在对他做出的赐予

中，根本没有表达这种意思的话，或者至少是支持这种说法的话。既然在《圣经》的其中一处地方，没有一句话肯定亚当获得了个人统治权——更不用说上文已经论证了原文本身支持与之相反的说法，而在《圣经》另一处，原文文字及其意思都与其说法直接相对。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什么才是最好的理解方法，还是让我们的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37．But our author says, “Noah was the sole heir of the world; why should it be thought that God would disinherit him of his birth right?” Heir indeed, in England, signifies the eldest son, who is by the law of England to have all his father's land; but where God ever appointed any such heir of the world, our author would have done well to have showed us; and how God disinherited him of his birth right, or what harm was done him if God gave his sons a right to make use of a part of the earth for support of themselves and families, when the whole was not only more than Noah himself, but infinitely more than they all could make use of, and the possessions of one could not at all prejudice, or, as to any use, straighten that of the other.

37．但是我们的作者说，“挪亚是世界的唯一继承人；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上帝剥夺了他与生俱来的继承权呢？”诚然，“继承人”一词在英语里面指根据英国的法律拥有其父所有的土地的长子。但是上帝曾在何处指定这一类的“世界继承人”，我们的作者今后也应该给我们做出解释；以及上帝如何剥夺了挪亚与生俱来的继承权，或者如果上帝给予挪亚的儿子们以权利，允许他们使用一部分土地赡养自己和家人，又会对挪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因为所有的土地不仅足够挪亚本人使用，而且就算儿子们集体使用也用之不尽，一方的占有和使用根本不会损害或者阻碍另一方的占有和使用。

38 . Our author probably foreseeing he might not be very successful in persuading people out of their senses, and, say what he could, men would be apt to believe the plain words of Scripture, and think, as they say, that the grant was spoken to Noah and his sons jointly; he endeavours to insinuate, as if this grant to Noah conveyed no property, no dominion; because “subduing the earth and dominion over the creatures are therein omitted, nor the earth once named.“And therefore, says he,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texts; the first blessing gave Adam a dominion over the earth and all creatures the latter allows Noah liberty to use the living creatures for food: here is no alteration or diminishing of his title to a property of all things, but an enlargement only of his commons” [4_37] . So that, in our author's sense, all that was said here to Noah and his sons, gave them no dominion, no property, but only enlarged the commons; their commons, I should say, since God says, “to you are they given”; though our author says *his* ; for as to Noah's sons, they, it seems, by Sir Robert's appointment, during their father's lifetime, were to keep fasting days.

38．我们的作者大概事先预见到，他在劝诱人们丧失理性上不会太成功，不管他说什么，人们还是会倾向于相信《圣经》中的浅显易懂的文字，并且认为，如书中所说，这个赐福是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共同说出的。于是，作者想方设法地暗示，似乎这个对挪亚的赐福并不包括所有权和统治权，因为“征服陆上世界和对生物的统治权在这里被忽略掉了，陆上世界一次也没有提起过”。因此，他说：“这两处原文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处的赐福给予了亚当对陆上世界以及所有生物的统治权，第二处赐福则给予挪亚随意使用生物作为食物的自由，在这里，他对于万物的所有权并没有变更或者缩小，只是他的取食范围扩大了。” [5_37] 那么我们的作者的意思是，此处上帝对挪亚和他的儿子所说的一切，并没有给予他们统治权和所有权，只是扩大了食物

的范围——应该说“他们的”食物范围，因为上帝说：“我将这一切赐予你们”；而我们的作者使用的是“他的”。这样看来，由于罗伯特爵士的规定，挪亚的儿子们在他们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要禁食了。

39 . Anyone but our author would be mightily suspected to be blinded with prejudice, that in all this blessing to Noah and his sons, could see nothing but only an enlargement of commons: for as to dominion which our author thinks omitted, “the fear of you, and the dread of you”, says God, “shall be upon every beast”, which I suppose expresses the dominion, or superiority, was designed man over the living creatures, as fully as may be; for in that fear and dread seems chiefly to consist what was given to Adam over the inferior animals; who, as absolute a monarch as he was, could not make bold with a lark or rabbit to satisfy his hunger, and had the herbs but in common with the besets, as is plain from Gen. i. 2, 9, and 30. In the next place, it is manifesting that in this blessing to Noah and his sons, property is not only given in clear words, but in a larger extent than it was to Adam. “Into your hands they are given”, says God to Noah and his sons; which words, if they give not property, nay, property in possession, it will be hard to find words that can; since there is not a way to express a man's being possessed of anything more natural, nor more certain, than to say, it is delivered into his hands. And ver. 3, to show, that they had then given them the utmost property man is capable of, which is to have a right to destroy anything by using it: “Every moving thing that liveth”, saith God, “shall be meat for you”; which was not allowed to Adam in his charter. Thisour author calls, “a liberty of using them for food, and also an enlargement of commons, but no alteration of property” [4_38] . What other property man can have in the creatures, but the “liberty of using them”, is hard to be understood: so that if the first blessing, as our author says, gave

Adam “dominion over the creatures”, and the blessing to Noah and his sons gave them “such a liberty to use them” as Adam had not; it must needs give them something that Adam with all his sovereignty wanted, something that one would be apt to take for a greater property; for certainly he has no absolute dominion over even the brutal part of the creatures; and the property he has in them is very narrow and scanty, who cannot make that use of them, which is permitted to another. Should anyone, who is absolute lord of a country, have bidden our author subdue the earth, and given him dominion over the creatures in it, but not have permitted him to have taken a kid or a lamb out of the flock, to satisfy his hunger, I guess, he would scarce leave thought himself lord or proprietor of that land, or the cattle on it; but would have fou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aving dominion”, which a shepherd may have, and having full property as an owner. So that, had it been his own case, Sir Robert, I believe, would have thought here was an alteration, nay an enlarging of property; and that Noah and his children had by this grant, not only property given them, but such a property given them in the creatures, as Adam had not: for however, in respect of one another, men may be allowed to have propriety in their distinct portions of the creatures; yet in respect of God the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who is sole lord and proprietor of the whole world, man's propriety in the creatures is nothing but that “liberty to use them”, which God has permitted; and so man's property may be altered and enlarged, as we see it was here, after the flood, when other uses of them are allowed, which before were not. From all which I suppose it is clear, that neither Adam, nor Noah, had any “private dominion”, any property in the creatures, exclusive of his posterity, as they should successively grow up into need of them, and come to be able to make use of them.

39．在这个对挪亚和他的儿子的赐福里，除了我们的作者以外，如果任何人看到的只有食物范围的扩大，除此之外别无他物，都非常值得怀疑是受到了偏见的蒙蔽。因为就我们的作者认为的被省略掉的统治权来说，我认为上帝说的“使所有的野兽惊恐和畏惧你们”，已经完整地表达了上帝关于人对其他一切生物的统治权，或者是人对其他生物优越性的设想。因为这个“惊恐和畏惧”中似乎主要体现了亚当被给予的高于低等生物的权利。亚当，身为一个绝对的专制者，却不能为了充饥而贸然对云雀和兔子采取行动，而是和其他的野兽一样吃草，这一点在《创世记》第一章第二、第九、第三十节中看得非常清楚。其次，很明显，在这次对挪亚和他的儿子的赐福中，所给予的所有权不仅以明白的文字表述出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大过上帝给予亚当的权利。上帝对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把它们交付到你们的手里”，这句话，如果说没有表达出所有权的给予——不，应该是占有权的话，那么就没有能够表达这个意思的话了；因为，要想自然和明确地表达一个人占有任何东西的状态，再也没有比“交付到你们的手里”更合适的表达了。第三节中为了表示人类已被给予了所能有的最大所有权，也就是通过使用任何东西而消耗掉它们的权利，上帝说道，“任何活着的行走的生物，都成为你们的食物”；这点在对亚当的特许中是没有的。我们的作者把这个权利称为“有以它们为食的自由，也仅是粮食范围的扩大而已，而非所有权的变更”[5_38]，人类对于其他动物的所有权，除了有以它们为食的权利，还能包括些什么，这很难理解。因此，像我们的作者所说的那样，如果第一个赐福给予了亚当“对于所有生物的统治权”，的话，对于挪亚和他的儿子的赐福则给予他们利用这些生物的权利。上帝必须给予他们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即便是拥有所有主权的亚当也仍然缺乏，一种人们倾向于看成是更大的所有权的东西。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对于野兽，亚当也没有绝对的统治权，而且他对于这些野兽的所有权范围也是狭窄和有限的，不能够像上帝许可他人那样利用它们。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对统治者命令我们的作者去征服陆上世界，并给予他对于陆上生物的统治权，却从不允许他从羊群里拿走一只小山羊或者小绵羊来充饥的话，我猜想，他应该不会把自己看成那片土地或者是那片土地的畜群的主人或所有者，倒是会发现作为一个牧羊人所“拥有的统治权”，和

作为所有者的完全所有权是不同的。因此，如果这是我们作者本人的事情，我相信罗伯特爵士会认为对于挪亚及其儿子的赐予是一个变更，而不仅仅是所有权的扩大，即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基于上帝的授予不仅获得了所有权，而且是亚当不曾拥有的对于生物的权利。然而，就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言，人类虽然被许可对生物中的特定部分享有所有权，但是考虑到上帝是天地的造物主，也就是全世界唯一的主人和所有者，人类对于生物的所有权只不过是上帝所许可的“利用它们的自由”，因此，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人类的所有权可以被更改和扩大，在大洪水之后，之前不被许可的其他用途也得到了许可。从所说的这些来看，我认为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不管是亚当还是挪亚，都没有任何“个人统治权”，以及排除其子嗣在外的对于生物的所有权，除非情况发展到他们产生了需要，并能够利用它们的时候，才享有这种权力。

40 . Thus we have examined our author's argument for Adams monarchy, founded on the blessing pronounced. [4_39] Wherein I think it is impossible for any sober reader to find any other but the setting of mankind above the other kinds of creatures in this habitable earth of ours. It is nothing but the giving to man, the whole species of man, as the chief inhabitant, who is the image of his Maker, the dominion over the other creatures. This lies so obvious in the plain words, that anyone, but our author, would have thought it necessary to have shown, how these words, that seemed to say the quite contrary, gave “Adam monarchical absolute power” over other men, or the sole property in all the creatures; and methinks in a business of this moment, and that whereon he builds all that follows, he sh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more than barely cite words, which apparently make against him; for I confess, I cannot see anything in them tending to Adam's monarchy, or private dominion, but quite the contrary. And I the less deplore the dullness of my apprehension herein, since I find the apostle seems

to have as little notion of any such “private dominion of Adam” as I, when he says, “God gives us all things richly to enjoy”; which he could not do, if it were all given away already to monarch Adam, and the monarchs his heirs and successors. To conclude, this text is so far from proving Adam sole proprietor, that, on the contrary, it is a confirmation of the original community of all things amongst the sons of men, which appearing from this donation of God, as well as other places of Scripture, the sovereignty of Adam, built upon his “private dominion”, must fall, not having any foundation to support it.

40．那么，我们就考察了我们的作者关于亚当根据上帝所宣布的赐福 [5_39] 而取得君权的论证。我想，只要是头脑清醒的读者，从原文中读出的，除了上帝在我们这个适宜居住的陆上世界将人类置于其他生物种类之上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意思。这不过是说把对其他生物的统治权交付给陆上世界的主要居住者——具有造物主形象的整个人类种族。这个意思在《圣经》简单的文字中已经显露无遗，以至于除了我们的作者，没有任何人会认为有必要去说明这些意思看起来截然相反的文字如何给予亚当对其他同类的“绝对君权”，或是对于所有生物的独占权。我认为，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正是作者构建后文的基础，在这个重要的事情上，他应该做的远远不止仅引用那些明显与其目的相悖的文字。因为，坦白地说，在他所引用的这些文字里面，除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我根本看不出任何倾向于支持“亚当的君权”或是“个人统治权”的意思。既然使徒似乎和我一样，对于亚当享有任何此类的个人统治权都鲜有知晓，我就更不会悲叹自己理解的愚钝了，因为使徒说：“上帝给予我们丰盛的万物，供我们享受”；如果这种权利被给予亚当君主，以及其他的君主子嗣和继任者的话，他就不会那么说了。总之，这部分的原文远不能证明亚当是唯一的所有者，相反，它证明了一切东西最初都是人类共享的，这从上帝的这个赐予以及《圣经》的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出来。建立于个人统治权基础上的亚当的主权，没有任何基础的支持，势必站不住脚。

41 . But yet, if after all, anyone will need have it so, that by this donation of God Adam was made sole proprietor of the whole earth, what will this be to his sovereignty? And how will it appear, that propriety in land gives a man power over the life of another? Or how will the possession even of the whole earth give anyone a sovereign arbitrary authority over the persons of men? The most specious thing to be said is that he is proprietor of the whole world, may deny all the rest of mankind food, and so at his pleasure starve them, if they will not acknowledge his sovereignty, and obey his will. If this were true, it would be a good argument to prove, that there never was any such property, that God never gave any such private dominion; since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think, that God, who bid mankind increase and multiply, should rather himself give them all a right to make use of the food and raiment, and other conveniences of life, the materials whereof he had so plentifully provided for them; than to make them depend upon the will of a man for their subsistence, who should have power to destroy them all when he pleased, and who, being no better than other men, was in succession likelier, by want and the dependence of a scanty fortune, to tie them to hard service, than by liberal allowance of the conveniences of life to promote the great design of God, “increase and multiply”; he that doubts this, let him look into the absolute monarchies of the world, and see what becomes of the conveniences of life, and the multitudes of people.

41 . 但是，归根结底，如果有人必须要这样做，主张亚当凭借上帝的这次赐予已成为了全世界的唯一所有者，可是这与他的主权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对于土地的所有权怎么能够给予他对于另一个人生命的主宰权呢？即便是拥有整个世界，又怎能给予他以支配别人人身的至高无上的专断权呢？最荒诞可笑的是，作为全世界所有者的那个

人，对于那些不承认他的主权、不服从他的意志的其余人类，可以不给他们食物，随心所愿地让他们饿死。如果事情果真如此，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论据，证明从来没有这样的所有权，上帝从来没有赐予过任何人以个人统治权。因为，这样想反而更合理，既然上帝吩咐人类繁衍生息，他自己就应该给予全体人类一种利用食物、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权利——上帝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这些东西的丰富原料——而不应该使他们的生存维系于一个人的意志，这个人如果高兴的话就可以将他们集体毁灭，而且这个人因为自己过得不比别人好，接下来很可能因为对于稀有财物的渴求，或出于这个的影响而强迫他们从事苦役，而不是慷慨地给予他们生活必需品以更好地实现上帝“繁衍生息”；的伟大意图。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的话，那么请他考察一下世界上的绝对君主国，看一看那里的生活必需品和人民大众的命运变成了什么样子。

42．But we know God hath not left one man so to the mercy of another, that he may starve him if he please: God, the Lord and Father of all, has given no one of his children such a property in his peculiar portion of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but that he has given his needy brother a right to the surplus age of his goods; so that it cannot justly be denied him, when his pressing wants call for it; and therefore no man could ever have a just power over the life of another by right of property in land or possessions; since it would always be a sin, in any man of estate, to let his brother perish for want of affording him relief out of his plenty. As justice gives every man a title to the product of his honest industry, and the fair acquisitions of his ancestors descended to him; so charity gives every man a title to so much out of another's plenty, as will keep him from extreme want, where he has no means to subsist otherwise; and a man can no mare justly make use of another's necessity, to force him to become his vassal, by withholding that relief, God requires him to afford to the wants of his brother, than

he that has more strength can seize upon a weaker, master him to his obedience, and with a dagger at his throat offer him death or slavery.

42．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从来不会让一个人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任由另外一个人将其饿死。作为万物之主和万物之父的上帝，没有给予他的任何一个儿女对于世界上某一部分东西的所有权，而是给予了他的贫困的兄弟以使用其剩余财物的权利，以便当他的兄弟有紧急需要时，不会遭到不正当的拒绝。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够基于对土地或者财产的所有权而取得支配别人生命的正当权利，因为任何有财产的人如果不肯从他的丰厚财物中拿出一部分施与救济，而让他的兄弟死去，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宗罪。正如正义给予每个人以享受其正直勤劳的果实以及祖先传给他的正当的财物的权利一样，“仁爱”也给予每个人在没有其他办法维持生命的情况下，从他人的丰厚财物中分取一部分的权利，以使其摆脱极度匮乏的境地。一个人如果乘人之危，通过拒绝上帝所要求拿出的救济办法来逼迫他人成为他的奴隶，这种行为之不义无异于一个强者抓住一个弱者，逼迫其就范，并以匕首抵住其咽喉，威胁说不做奴隶就是死亡。

43．Should anyone make so perverse an use of God's blessings poured on him with a liberal hand; should anyone be cruel and uncharitable to that extremity; yet all this would not prove that propriety in land, even in this case, gave any authority over the persons of men, but only that compact might since the authority of the rich proprietor, and the subjection of the needy beggar, began not from the possession of the lord, but the consent of the poor man, who preferred being his subject to starving. And the man he thus submits to, can pretend to no more power over him than he has consented to, upon compact. Upon this ground, a man's having his stores filled in a time of scarcity, having money in his pocket,

being in a vessel at sea, being able to swim, & c. may as well be the foundation of rule and dominion, as being possessor of all the land in the world; any of these being sufficient to enable me to save a man's life, who would perish if such assistance were denied him; and anything, by this rule, that may be an occasion of working upon another's necessity, to save his life, or anything dear to him, at the of his freedom, may be made a foundation of sovereignty, as well as property. From all which it is clear, that though God should have given Adam private dominion, yet that private dominion could give him no sovereignty; but we have already sufficiently proved that God gave him no “private dominion”.

43．纵使有人如此地滥用上帝以其慷慨之手赐予他的祝福，纵使有人残酷不仁达到那样的极点，即使在这个例子中，这一切仍然不能证明对土地的所有权能给予人支配他人人身的权力，可以给予人这种权力的只有契约。富裕的所有者的权威和贫穷的乞丐的从属地位，并不是起源于主人的所有权，而是起源于穷人宁愿做奴仆也不愿挨饿的情况下所表示的认同。而他表示服从的那个人，对其享有的权利不能够超过他在契约中认同的限度，其根据是这样的：一个人在物资奇缺时却拥有丰富的储备，口袋里有钱，在海上坐着船，能够泅水等等条件，和拥有世界上所有土地一样；这些都可以成为支配和统治权的基础，其中的任何一项条件都足以使我拯救一条生命，而只要我拒绝提供这种救助则该生命就会消亡。根据这条规则，任何东西，只要能让一个人为了保全性命或自己所珍视之物，不惜以牺牲自由为代价进行换取，都可能成为主权和所有权的基础。上述的一切表明，即便上帝曾给予亚当个人统治权，这种个人统治权也不能给予他主权：但是我们已经充分证明：上帝并没有给予他“个人统治权”。

[4_1].Genesis. i. 28.

[4_2].Genesis. i. 28.

[4_3].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10.

[4_4].Genesis. i. 28.

[4_5].Genesis. i. 28.

[4_6].Genesis. i. 28.

[4_7].Genesis. i. 24.

[4_8].Genesis. i. 2.

[4_9].Genesis. i. 24, 25.

[4_10].Genesis. i. 28.

[4_11].Genesis. ix. 2.

[4_12].Genesis. i. 24, 25.

[4_13].Genesis. i. 28.

[4_14].Genesis. i. 28.

[4_15].Genesis.i. 24, 25.

[4_16].Genesis. i. 26.

[4_17].Genesis. i. 28.

[4_18].Genesis. i. 28.

[4_19].Genesis. i. 26.

[4_20].Genesis. ix. 2.

[4_21].Genesis. i.28.

[4_22].Genesis. i. 3.

[4_23].Genesis. i. 28.

[4_24].Genesis. i. 26.

[4_25].Genesis. i. 25.

[4_26].Genesis. i. 28.

[4_27].Genesis. i. 28.

[4_28].Genesis.Ix. 2.

[4_29].Genesis. i. 28.

[4_30].verse 4.

[4_31].Genesis. ix. 1, 2, 3.

[4_32].Genesis. ix. 2.

[4_33].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11.

[4_34].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11.

[4_35].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11.

[4_36].Genesis. i. 28.

[4_37].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11.

[4_38].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11.

[4_39].Genesis. i. 28.

[5_1].《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2].《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3].《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10页。

[5_4].《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5].《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6].《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7].《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四节。

[5_8].《创世记》，第一章第二节。

[5_9].《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四、二十五节。

[5_10].《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11].《创世记》，第九章第二节。

[5_12].《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四、二十五节。

[5_13].《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14].《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15].《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五节。

[5_16].《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六节。

[5_17].《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18].《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19].《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六节。

[5_20].《创世记》，第九章第二节。

[5_21].《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22].《创世记》，第一章第三节。

[5_23].《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24].《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25].《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六节。

[5_26].《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27].《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28].《创世记》，第九章第二节。

[5_29].《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30].《诗篇》，第八篇。

[5_31].《创世记》，第九章第一、二、三节。

[5_32].《创世记》，第九章第二节

[5_33].《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11页。

[5_34].《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11页。

[5_35].《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11页。

[5_36].《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5_37].《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11页。

[5_38].《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11页。

[5_39].《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Chapter V　Of Adam's Title to Sovereignty, by the Subjection of Eve

第五章　论亚当因夏娃的从属而享有主权

44 . The next place of Scripture we find our author builds his monarchy of Adam on, is Gen. iii. 26. “And thy desire shall be to thy husband, and he shall rule over thee. Here we have (says he) the original grant of government”, from whence he concludes, in the following part of the page. [5_1] “That the supreme power is settled in the fatherhood, and limited to one kind of government, that is, to monarchy.“For let his premises be what they will, this is always the conclusion; let rule, in any text, be but once named, and presently absolute monarchy is by divine right established. If anyone will but carefully read our author's own reasoning from these words, [5_2] and consider, among other things, “the line and posterity of Adam”, as he there brings them in, he will find some difficulty to make sense of what he says; but we will allow this at present to his peculiar way of writing, and consider the force of the text in hand. The words are the curse of God upon the woman for having been the first and forwardest in the disobedience; and if we will consider the occasion of what God says here to our first parents, that he was denouncing judgment, and declaring his wrath against them both for their disobedience, we cannot suppose that this was the time wherein God was granting Adam prerogatives and privileges, investing him with dignity and authority, elevating him to dominion and monarchy; for though, as a helper in the temptation, Eve was laid below him, and so he had accidentally a superiority over her, for her greater punishment; yet he too had his share in the fall, as well as the sin, and was laid lower, as may be seen in the following verses; and it would be hard to imagine, that

God, in the same breath, should make him universal monarch over all mankind, and a day-labourer for his life; turn him out of "paradise to till the ground", [5_3] and at the same time advance him to a throne, and all the privileges and case of absolute power.

44．我们发现，作者建立"亚当君权说"的下一处依据出自《圣经》中《创世记》的第三章第十六节："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据此作者认为"我们有了最初形态的政府授予" [6_1] 。在该页后面部分作者总结道："最高权力落在父亲身份上，管理方法只限于一种形式，即君主制"。前提不论如何，结论总是这样的。只要"统治"一词在任何经文上被提及，"绝对君主制"便马上基于神权建立了。任何人只要仔细看看作者根据这些话的推理， [6_2] 想想他在其他事情之外加上"亚当的家族和后裔"这句话，就会发现要理解作者的话是有些困难的。但是眼下我们暂且认为这是他特殊的写作方式使然，不妨先看看手头这些经文的确切含义。这些话是上帝对夏娃的诅咒，因为是她最先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里上帝对我们的始祖说话的场合，想想上帝是在对他们俩违反旨意的行为进行审判，表示愤怒，我们就不能认为上帝这时候是在授予亚当特权，给予他尊严和权威，并将他推上统治者和君主的位置。因为虽然夏娃作为被引诱者，被置于亚当之下，亚当也因夏娃被重罚而偶然获得较高的地位；但是亚当在这次原罪堕落中同样有责任，从《圣经》后面的章节就可以看出亚当也被贬低；很难想象，上帝让他终身劳苦的同时，会让他做全人类的君主；把他赶出"伊甸园去耕种土地" [6_3] 的同时，会把他推上王位，享受特权与绝对权力。

45．This was not a time when Adam could expect any favours, any grant of privileges, from his offended Maker. If this be "the original grant of government", as our author tells us, and Adam was now made monarch, whatever Sir Robert would have him, it is plain, God made him but a very poor monarch, such a one, as our

author himself would have counted it no great privilege to be. God sets him to work for his living, and seems rather to give him a spade into his hand to subdue the earth, than a scepter to rule over its inhabitants. “In the sweat of thy face thou shalt eat thy bread”, says God to him [5_4] . This was unavoidable, may it perhaps be answered, because he was yet without subjects, and had nobody to work for him; but afterwards, living as he did above 900 years, he might have people enough, whom he might command to work for him: no, says God, “not only whilst thou art without other help, save thy wife, but as long as thou livest, shalt thou live by thy labour”, “In the sweat of thy face, shalt thou eat thy bread, till thou return unto the ground, for out of it wast thou taken; for dust thou art, and unto dust shalt thou return”. [5_5] It will perhaps be answered again in favour of our author, that these words are not spoken personally to Adam, but in him, as their representative, to all mankind, this being a curse upon mankind, because of the fall.

45．所以这不是亚当期待从被触怒的造物主处索要任何恩惠和特权的时候。如果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最初形态的政府授予”，亚当当上了罗伯特爵士想要他成为的那种君主，很明显上帝也只不过让亚当做了一个可怜的君主，可怜到作者本人也不会把这王位的拥有算作什么大的特权。上帝让他去劳作谋生，更确切点说好像是给了他一把铲子去开垦土地，而不是授予他节杖去统治地球上的居民。上帝对他说“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6_4] ，有人可能会回答说，这一点不可避免，因为当时亚当还没有臣民，没人替他劳动；他活到900多岁以后，应该有不少人可以任他差遣了。“不，”上帝说，“除了你妻子以外，你不能得到其他任何人的帮助，你将一直劳作到老”，“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土为止，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6_5] 也许还有人要为作者辩护，认为这些话不是对亚当一人讲的，而是对全人类，亚当只不过是全人类的代表，这是上帝在原罪堕落后对全人类的诅咒。

46 . God, I believe, speaks differently from men, because he speaks with more truth, more certainty; but when he vouchsafes to speak to men, l do not think he speaks differently from them, in crossing the rules of language in use amongst them: this would not be to condescend to their capacities, when he humbles himself to speak to them, but to lose his design in speaking what, thus spoken,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 And fact thus must we think of God, if the interpretations of Scripture, necessary to maintain our author's doctrine, must be received for good: for by the ordinary rules of language, it will be very hard to understand what God says, if what he speaks here, in the singular number, to Adam, must be understood to be spoken to all mankind, and what he says in the plural number, [5_6] must be understood of Adam alone, exclusive of all others, and what he says to Noah and his sons jointly, must be understood to be meant to Noah alone. [5_7]

46．我相信上帝讲话与人类不同，因为他讲的话更富真理，更有确定性：但是当他屈尊和人类讲话时，我想他不会破坏人类的语言规范，讲与人类不同的话：他屈尊和人类讲话，倒不是将他的理解能力降至人类的水平，而是由于人类无法理解他讲的话，他用意尽失。事实既定，我们必须考虑到，人们对《圣经》的理解是否必须为正面的阐释，而这对于作者自身的信条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依照语言的一般规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上帝所说的话，如果上帝在这里用单数对亚当所讲的话，一定要被理解成是针对全人类的；他用复数所讲的话， [6_6] 一定要被理解成是针对亚当一人的，不含其他人；他对挪亚和挪亚的儿子们一起所讲的话，一定要被理解成是针对挪亚一人的， [6_7] 那么，理解上帝的话将会是十分困难的。

47 . Farther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hese words here of Gen. iii.

16, which our author calls “the original grant of government”, were not spoken to Adam, neither indeed was there any grant in them made to Adam, but a punishment laid upon Eve; and if we will take them as they were directed in particular to her, or in her, as their representative, to all other women, they will at most concern the female sex only, and import no more, but that subjection they should ordinarily be in to their husbands; but there is here no more law to oblige a woman to such subjection, if the circumstances either of her condition, or contract with her husband, should exempt her from it, than there is, that she should bring forth her children in sorrow and pain, if there could be found a remedy for it, which is also a part of the same curse upon her: for the whole verse runs thus, “Unto the woman he said, I will greatly multiply thy sorrow and thy conception; in sorrow thou shalt bring forth children, and thy desire shall be to thy husband, and he shall rule over thee.“It would, I think, have been a hard matter for anybody, but our author, to have found out a grant of “monarchical government” to Adam in these words, which were neither spoken to, nor of him: neither will anyone, I suppose, by these words, think the weaker sex, as by a law, so subjected to the curse contained in them, that it is their duty not to endeavour to avoid it. And will anyone say that Eve, or any other woman, sinned, if she were brought to bed without those multiplied pains God threatens her here with? Or that either of our queens, Mary or Elizabeth, had they married any of their subjects, had been by this text put into a political subjection to him? Or that he should thereby have had monarchical rule over her? God, in this text, gives note that I see, any authority to Adam over Eve, or to men over their wives, but only foretells what should be the woman's lot; how by his providence he would order it so, that she should be subject to her husband, as we see that generally the Laws of mankind and customs of nations leave ordered it so; and there is, I grant, a foundation in

nature for it.

47．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创世记》第三章第十六节中那些话，即我们的作者称之为“最初的政府授予”的那些话，其实不是对亚当说的，也根本没有授予亚当什么，那只是对夏娃的惩罚。如果我们认为这些话只针对夏娃，或者针对夏娃所代表的所有女人，那这些话也顶多是和女性相关，其所含之意也至多是女性通常要服从他们的丈夫。但是如果因为她自身的条件或和丈夫所立的契约关系，她可以不用服从的话，这里也没有什么规定说她非服从不可。她所受诅咒的另一部分是要承受生儿育女的痛苦，同样，如果有办法让她免于疼痛，这里也没有什么法律规定让她非承受这种痛苦不可。《圣经》这一节全文如下：“他对女人说，‘我必多增加你怀胎的痛苦，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我认为，除了我们的作者以外，任何人要在这几句话中发现授予亚当“君主制政府”这一点，都是很难的。因为这些话既不是对他说的，也不是说他的：我想也不会有人因为这些话，而认为处于弱势的女性，会像服从法律一样服从这番话包含的诅咒，认为自己有义务放弃逃脱痛苦的努力。有没有人说，如果夏娃，或者任何其他妇女在分娩时没有承受上帝在这儿恐吓她的那样多的痛苦，她就犯罪了呢？或者，假设我们的女王玛丽或伊丽莎白和她们的任何一个臣民结婚，那根据《圣经》中这段话，是不是说女王从政治上就从属于这位臣民了呢？他是否从此就可以对女王进行君主式的统治呢？在我看来，在这段经文中，上帝并没有给亚当任何凌驾于夏娃之上的权威，或者男性凌驾于其妻子之上的权威，他只是预言女性的命运应该怎样，如何按自己的旨意命令女性必须这样，这就像常见的人类法律和各国习俗的规定一样。这种规定，我认为，是有一个自然基础的。

48．Thus when God says of Jacob and Esau, “that the elder should serve the younger”, [5_8] nobody supposes that God hereby made Jacob Esau's sovereign, but foretold what should *de facto*

come to pass.

48．因此，当上帝说到雅各和以扫，“将来哥哥要服侍弟弟”，[6_8] 没有人会认为上帝这样说是要让弟弟雅各统治哥哥以扫，他只是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

But if these words were spoken to Eve must needs be understood as a law to bind her and all other women to subjection, it can be no other subjection than what every wife owes her husband; and then if this be the “original grant of govern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monarchical power”, there will be as many monarchs as there are husbands: if therefore these words give any power to Adam, it can be only a conjugal power, not political; the power that every husband hath to order the things of private concernment in his family, as proprietor of the goods and land there, and to have his will take place before that of his wife in all things of their common concernment; but not a political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over her, much less over anybody else.

但是，如果一定要将上帝在这里对夏娃所讲的话，当作一条命令夏娃和其他女人必须服从其丈夫的条款，这种服从也无非是每一位妻子对丈夫应有的从属。假如把这个当作“最初的政府授予和君权的基础”，那么世界上有多少丈夫就该有多少君主了。如果这些话确实给了亚当什么权力的话，那也只能是一种婚姻上的权力，而不是政治上的。也就是，作为家庭财物和土地的所有者，丈夫在家庭中拥有决定私人事务的权力，在处理夫妻共同事务上享有意志优先的权力；而不是说他拥有什么政治权力：他无权定夺妻子的生死，更不用说决定其他人的存亡。

49 . This I am sure: if our author will have this text to be a “grant, the original grant of government”, political government, he ought to have proved it by some better arguments than by barely saying, that “thy desire shall be unto thy husband"was a law whereby Eve, and “all that should come of her"were subjected to the absolute monarchical power of Adam and his heirs. “Thy desire shall be to thy husband” is too doubtful an expression, of whose signification interpreters are not agreed, to build so confidently on, and in a matter of such moment, and so great and general concernment; but our author, according to his way of writing, having once named the text, concludes presently, without any more ado, that the meaning is as he would have it. Let the words rule and subject be but found in the text or margin, and it immediately signifies the duty of a subject to his prince; the relation is changed, and though God says husband, Sir Robert will have it king; Adam has presently absolute monarchical power over Eve, and not only over love, but “all that should come of her”, though the Scripture says not a word of it, nor our author a word to prove it. But Adam must for all that be an absolute monarch, and so down to the end of the chapter. And here I leave my reader to consider whether my bare saying, without offering any reasons to evince it, that this text gave not Adam that absolute monarchical power, our author supposes, be not as sufficient to destroy that power, as his bare assertion is to establish it, since the text mentions neither prince nor people, speaks nothing of absolute or monarchical power, but the subjection of Eve to Adam, a wife to her husband. And he that would trace our author so all through, would make a short and sufficient answer to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grounds he proceeds on, and abundantly confute them by barely denying; it being a sufficient answer to assertions without proof, to deny them without giving a reason. And therefore should I have said nothing, but barely denied that by this text “the supreme power” was settled and

founded by God himself, in the fatherhood, limited to monarchy, and that to Adam's person and heirs, all which our author notably concludes from these words, as may be seen in the same page, [5_9] it had been a sufficient answer: should I have desired any sober man only to have read the text, and considered to whom and on what occasion it was spoken, he would no doubt have wondered how our author found out monarchical absolute power in it, had he not had an exceeding good faculty to find it himself, where he could not show it others. And thus we have examined the two places of Scripture, all that I remember our author brings to prove Adam's sovereignty, that supremacy which he says, “it was God's ordinance should be unlimited in Adam, and as large as all the acts of his will”, [5_10] viz. Gen. i. 28, and Gen. iii. 16; one whereof signifies only the subjection of the inferior ranks of creatures to mankind, and the other the subjection that is due from a wife to her husband; both far enough from that which subjects owe the governors of political societies.

49．我确信：如果作者要把这几句话看作一种“授予，最初的政府授予”，并且是政治性质的政府，他就应该有更好的论证，而不是简单地把“你必须恋慕你丈夫”这句话当作一条法律，接着据此法律，认为夏娃以及她之后的所有女人都要服从她们丈夫的绝对君权。“你必须恋慕你丈夫”这句话本身意义含糊不清，多种解释互不一致，不足以成为可信的依据，在如此重要、涉及面如此之广的问题上更不能如此。但是我们的作者，依照其个人的写作方式，只要提出这句经文，便不假思索，立即断定意思是他所想的那样。只要看到“统治”和“臣民”，不论是在正文还是页边上，就马上断定这意味着臣民对君主应尽的责任；关系立即就发生了改变，即使上帝说的是“丈夫”，在罗伯特爵士这里也变成了“君王”。亚当于是立刻对夏娃以及“她之后的所有人”拥有绝对的君权，即使《圣经》原文对此只字未提，作者也找不到一个能证明的字眼。尽管如此，亚当在该书从头至尾，仍然

必须是一个绝对的君主。这里我要让读者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的这种简单说法没有提供任何理由证明《圣经》上这句话，不像作者假想的那样，赋予了亚当绝对君权，不知道是否足以推翻罗伯特凭空断言而建立起来的权力。之所以说他凭空断言，是因为《圣经》原文没有提及“君主”和“臣民”，除了谈到夏娃作为妻子要服从其丈夫亚当之外，也没讲什么绝对君权。愿意追究到底的人，会对作者最主要的论据作简短而充分的回应，接着直接否定它就足够了。对于没有根据的论断，不给原因直接否定就行。因此，我本该什么都不说，直接否定作者在同页 [6_9] 明显根据那几句话推断出来的“上帝在父亲身份上建立最高权力并将之授予他们，定之为君权，赐予亚当及其继承者”的说法，这样应该就足够了。恳请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去读读原文，他只要考虑一下这些话是在什么场合对谁说的，就必然会感到诧异，作者何以从无法向他人显示的地方发现了绝对君权，除非他具有超人的能力。至此我们考察了我所记起的、作者引用的《圣经》两处原文，他借此证明亚当拥有君权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并说“上帝指定该权力可供亚当无限制使用，任由他的意志行使” [6_10] 。这两处原文，即《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和第三章的第十六节，第一处讲的是低级动物对人类的从属，第二处讲的是妻子对丈夫应有的服从，两者都和政治社会中臣民对于君主的从属相差甚远。

[5_1].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44.

[5_2].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44.

[5_3].Genesis. iii. 23.

[5_4].Genesis. iii. 19.

[5_5].Genesis. iii. 19.

[5_6].Genesis.i. 20, 28.

[5_7].Genesis. ix.

[5_8].Genesis. xxv. 23.

[5_9].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44.

[5_10].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54.

[6_1].《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44页。

[6_2].《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44页。

[6_3].《创世记》，第三章第二十三节。

[6_4].《创世记》，第三章第十九节。

[6_5].《创世记》，第三章第十九节。

[6_6].《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二十八节。

[6_7].《创世记》，第九章。

[6_8].《创世记》，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三节。

[6_9].《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44页。

[6_10].《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54页。

Chapter VI　Of Adam's Title to Sovereignty, by Fatherhood

第六章　论亚当因父亲身份而享有主权

50．There is one thing more, and then I think I have given you all that our author brings for proof of Adam's sovereignty, and that is a supposition of a natural right of dominion over his children, by being their father; and this title of fatherhood he is so pleased with, that you will find it brought in almost in every page; particularly he says, “not only Adam, but the succeeding patriarchs had, by right of fatherhood, royal authority over their children” [6_1]．And in the same page, “this subjection of children being the fountain of all regal authority”, &c. This being, as one would think by his so frequent mentioning it, the main basis of all his frame, we may well expect clear and evident reason for it, since he lays it down as a position necessary to his purpose, that “every man that is born is so far from being free, that by his very birth he becomes a subject of him that begets him” [6_2]．So that Adam being the only man created, and all ever since being begotten, nobody has been born free. If we ask how Adam comes by this power over his children, he tells us here it is lay begetting them; and so again, “This natural dominion of Adam,” says he, “may be proved out of Grotius himself, who teacheth that ‘generations jus acquirituparentibus in liberos’“. [6_3] And indeed the act of begetting being that which makes a man a father, his right of a father over his children can naturally arise from nothing else.

50．我们的作者还有一个论点证明亚当的主权，我想我讲完这点，我们作者的所有的证据就都呈现给大家了。他的论点是，作为父

亲，亚当拥有统治儿女的自然权利：我们的作者很喜欢“父亲的身份”这个词，几乎在每一页都用到，而且还特别指出“不仅是亚当，亚当之后的男性家长，同样都因其父亲身份拥有对儿女的统治权” [7_1] 。在同页，我们的作者还说到“儿女的这种从属是一切王权的来源”等等。他屡屡提到这一点，可见这就是他整个框架的主要基础。于是，我们满心期待他明确给出理由，因为他把这一点作为达到他的目标论点必备的观点，他的目标论点即“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不自由的，他一出生就成为他父亲的下属” [7_2] 。只有亚当是上帝创造的，自他以后的人都是生出来的，生出来的人没有自由。如果我们问亚当如何取得了统治儿女的权力，我们的作者说因为亚当生了他们。同样，他还说“亚当这种自然的统治权也许可以用格劳秀斯的话来证明”，格劳秀斯曾教导我们：“生育让父母获得对子女的权力” [7_3] 。的确，生育行为让一个男人成为父亲，父亲对儿女的权力自然不会产生于父亲身份之外。

51 . Grotius tells us not here how far this “jus in liberos”, this power of parents over their children extends; but our author, always very clear in the point, assures us it is supreme power, and like that of absolute monarchs over their slaves, absolut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He that should demand of him how, or for what reason it is, that begetting a child gives the father such an absolute power over him, will find him answer nothing: we are to take his word for this, as well as several other things, and by that the laws of nature and the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must stand or fall. Had he been an absolute monarch, this way of talking might have suited well enough; “pro rationevoluntas”, might have been of force in his mouth; but in the way of proof or argument is very unbecoming, and will little advantage his plea for absolute monarchy. Sir Robert has too much lessened a subject's authority to leave himself the hopes of establishing anything by his bare saying it; one slave's opinion without proof, is not of weight enough to

dispose of the liberty and fortunes of all mankind. If all men are not, as I think they are, naturally equal, I am sure all slaves are; and then I may without presumption oppose my single opinion to his; and be confident that my saying, “that begetting of children makes them not slaves to their fathers”, as certainly sets all mankind free, as his affirming the contrary makes them all slaves. But that this position,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their doctrine, who would have monarchy to be “juredivino”, may have all fair play, let us hear what reasons others give for it, since our author offers none.

51．格劳秀斯在这里没有讲这种父母对孩子的统治权力有多大，但是我们的作者却讲得很明确，断定它是最高权力，就像君主对于奴隶那样的可以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如果有人问他，生育子女何以给父亲如此绝对的权力，会发现他不会回答：他说的话我们就该相信，包括他一些其他言论；自然法则和政府宪法的确立和取消都要由他决定。如果他是一名绝对君主，这种说话方式倒是很合适。“源于意志的理由”在他口中也许管用，但是用它来证明或论证就十分不妥了，这种理由在他对绝对君权的辩护中起不到什么作用。罗伯特爵士过分缩小了臣民的权力，仅凭空讲讲是不能建立什么的。一个奴隶缺乏证据的观点，是不足以剥夺全人类的自由和幸福的。如果全人类不是如我所想的那样生来平等，我相信所有奴隶也是生来平等的。然后我或许可以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反对他的观点，并且对我以下说法充满自信：“生育儿女并不会使儿女们成为父亲的奴隶”，而会使全人类都获得自由，就像我们的作者坚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生育会使全人类变成奴隶。但这个观点作为整个君权神授学说的根基，理应被公平对待，那在我们的作者没有提供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且让我们听听他人对此列举的理由吧。

52．The argument I leave heard others make use of to prove that fathers, by begetting them, come by an absolute power over

their children, is this, that “fathers have a power over the lives of their children, because they give them life and being”, which is the only proof it is capable of: since there can be no reason why naturally one man should have any claim or pretense of right over that in another, which was never his, which he bestowed not, but was received from the bounty of another. 1. I answer, that everyone who gives another anything, has not always thereby a right to take it away again. But 2. They who say the father gives life to children, are so dazzled with the thoughts of monarchy, that they do not, as they ought, remember God, who is “the author and giver of life”: it is in him alone we live, move, and have our being.How can he be thought to give life to another, that knows not wherein his own life consists Philosophers are at a loss about it, after their most diligent inquiries; and anatomists, after their whole lives and studies spent in dissections, and diligent examining the bodies of men, confess their ignorance in the structure and use of many parts of man's body, and in that operation wherein life consists in the whole. And doth the rude ploughman, or the more ignorant voluptuary, frame or fashion such an admirable engine as this is, and then put life and sense into it? Can any man say he formed the parts that are necessary to the life of his child? Or can he suppose himself to give the life, and yet not know what subject is fit to receive it, nor what actions or organs are necessary for its reception or preservation?

52．我听到别人为了证明父亲因生育而对孩子拥有绝对权力，列举了这样的理由：“父亲给了孩子生命并维持他们的生存，因而对他们的生命享有一种权力。”这是唯一可以用作证据的理由：因为没有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这样自然而然就声称或直接拥有了对他人的权力，这权力他之前不曾有，也不由他给予，而是他人慷慨相送的。首先，我想说，但凡赠与他人东西，不一定就拥有将之收回的权利。但是，第二，那些说父亲给予孩子生命的人，满脑子装着君

权，居然忘记了他们本该记着的上帝，是上帝“创造我们并给了我们生命，正是因为他我们才得以生活、行动和存在”。一个连自己的生命构成都不清楚的人，怎么给他人生命？对此，哲学家们虽不断探究却仍感到十分困惑；解剖学家们耗尽毕生心血从事解剖研究，孜孜不倦地观察人体，最后也承认他们仍未弄清人体许多部分的结构和功能，以及生命是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难道粗鲁的庄稼汉，或者更为无知的喜好酒色之徒，会构建或制造出一部如此绝妙的机器，然后将生命和意识放进去？有谁可以说他组建了他孩子生命所需的各个部件？或者他会不会想到自己给孩子生命时，发现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样的主体适合接受生命，也不清楚要接受并保存该生命需要什么功能器官？

53 . To give life to that which has yet no being, is to frame and make a living creature, fashion the parts, and mould and suit them to their uses; and having proportioned and fitted them together, to put into them a living soul. He that could do this, might indeed have some pretense to destroy his own workmanship. But is there anyone so bold that dares thus far arrogate to himself the incomprehensible works of the Almighty? Who alone did at first, and continues still to make a living soul, he alone can breathe in the greatly of life. If anyone thinks himself an artist at this, let lain number up the parts of his child's body will he hath made, tell me their uses and operations, and when the living and rational soul began to inhabit this curious structure, when sense began, and how this engine, which he has framed, thinks and reasons: if he made it, let him, when it is out of order, mend it, at least tell wherein the defects lie. “Shall he that made the eye not see?” says the Psalmist. [6_4] See these men's vanities! The structure of that one part is sufficient to convince us of an all-wise Contriver, and he has so visible a claim to us as his workmanship, that one of the ordinary appellations of God in Scripture is, “God our maker”, and “the Lord

our maker”.And therefore though our author, for the magnifying his fatherhood, be pleased to say [6_5] . “That even the power which God himself exerciseth over mankind is by right of fatherhood”, yet this fatherhood is such a one as utterly excludes all pretense of title in earthly parents; for he is king, because he is indeed maker of us all, which no parents can pretend to be of their children.

53．将生命赋予一个暂不存在的事物，是在构建一个生命，改造好各部分，根据其各自功能按合适的比例装配好，然后将一个鲜活的灵魂搁置其中。能够做到这些的人，也许确实可以毁灭他自己这个制作。但是有谁如此胆大，敢独占出自万能的上帝这些深不可测的作品？是上帝最先制造了这个作品，接着创造了一个活的灵魂，只有他才可以给这作品吹进生命的气息。如果有人认为自己能够做到以上这些，那么请他数数他造的孩子身上有多少部件；请告诉我，各部分的用处和运作功能是什么？理性的活灵魂是什么时候进驻这个奇怪的构造的？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的？他所制造的这部机器如何思辨？如果是他造的，那么，出故障的时候请他去修，或者至少请他说明问题出在哪儿。《圣经·诗篇》的作者问：“制造眼睛者自己看不见吗？” [7_4] 请看看这些人的虚荣吧！单是眼睛的构造就足以让我们相信我们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很显然是他创造了我们，所以在《圣经》里上帝通常被称为“创造我们的上帝”、“造物主。”因此即使为了夸大其“父亲身份”，我们的作者会说“即使上帝自己对人类行使的权力都来自于他的父亲身份” [7_5] ，但这种父亲身份是完全不同于世俗家长的任何称谓的；他之所以为王，是因为他确实创造了我们，而任何父母都不能称自己是孩子的创造者。

54 . But had men skill and power to make their children, it is not so slight a piece of workmanship, that it can be imagined they could make them without designing it. What father of a thousand, when he begets a child, thinks farther than the satisfying his prey

sent appetite? God in his infinite wisdom has put strong desires of copulation into the constitution of men, thereby to continue the race of mankind, which he doth most commonly without the intention, and often against the consent and will of the begetter. And indeed those who desire and design children, are but the occasions of their being, and, when they design and wish to beget them, do little more towards their making than Deucalion and his wife in the fable did towards the making of mankind, by throwing pebbles over their heads.

54．然而，即使人类确有创造孩子的技巧和能力，这也不是件简单的手艺以至于简单到让他们觉得都不需要设计。一千个父亲当中，在生孩子的时候有哪一个除了觉得欲望得到满足以外会想那么多。上帝用他无穷的智慧，赋予男性强烈的性欲，让人类得以繁衍，而男性性交一般都不是为了生育，通常还未经生育者准许，甚至违背生育者的意愿。当然，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有生孩子的意愿和计划，于是孩子才来到世上。希腊神话中，丢卡利翁和他妻子想要造人，只需各自往身后抛石头，这些人计划并想要生育孩子，要费的力气也不比他们多。

55．But grant that the parents made their children gave them life and being, and that hence there followed an absolute power. This would give the father but a joint dominion with the mother over them: for nobody can deny but that the woman lath an equal share, if not the greater, as nourishing the child a long time in her own body out of her own substance: there it is fashioned, and from her it receives the materials and principles of its constitution; and it is so hard to imagine the rational soul should presently inhabit the yet unformed embryo, as soon as the father has done his part in the act of generation, that if it must be supposed to derive anything

from the parents, it must certainly owe most to the mother. But be that as it will, the mother cannot be denied an equal share in begetting of the child nod so the absolute authority of the father will not arise from hence. Our author indeed is of another mind; for he says, “we know that God at the creation gave the sovereignty to the man over the woman, as being the nobler and principal agent in generation” [6_6] . I remember not this in my *Bible* ; and when the place is brought where God at the creation gave the sovereignty to man over the woman, and that for this reason, because “he is the nobler and principal agent in generation”, it will be time enough to consider, and answer it. But it is no new thing for our author to tell us his own fancies for certain and divine truths, though there be often a great deal of difference between his and divine revelations; for God in the Scripture says, “his father and his mother that begot him”.

55．但即使父母因为创造了儿女并给了他们生命和存在而对之享有绝对权力，这种权力也应该是父母共有：没人可以否认，如果不说母亲功劳更大的话，那也有一半功劳，因为是母亲在很长时间内，用自己的血肉滋养体内的孩子：在母亲的体内，孩子得以成形，也是从母亲那里，孩子获得人体所需的各种物质和本源。很难想象，一旦父亲完成他的生育行为之后，就可以往一个尚未成形的胚胎里注入理性的灵魂。如果确实要认为孩子从父母那里获得了什么，那主要也是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不论怎样，在生育孩子这件事上，不能否认母亲也有一半功劳，因此父亲的绝对权力并非来自生儿育女。我们的作者确实有另一种想法，因为他说：“我们知道，上帝造人时赋予男人统治女人的权力，因为男人比女人高贵，是生育行为的主要参与者” [7_6] ，我不记得我的《圣经》上有这样的话。要是有人把这个地方指给我看，即上帝造人时赋予男人统治女人的权力因为“男人比女人高贵，是生育行为的主要参与者”，那就是该考虑并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但我们的作者把自己的个人想象当成神圣的、确定的事实，绝不

是头一次了，即使他本人和上帝的表述有天壤之别，《圣经》里，上帝说的是“他的父亲和母亲生育了他”。

56 . They who allege the practice of mankind, for exposing or selling their children, as a proof of their power over them, are with Sir Robert happy arguers; and cannot but recommend their opinion, by founding it on the most shameful action, and most unnatural murder human nature is capable of. The dens of lions and nurseries of wolves know no such cruelty as this: these savage inhabitants of the desert obey God and nature in being tender and careful of their offspring; they will hunt, watch, fight, and almost starv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young; never part with them never forsake them, till they are able to shift for themselves. And is it the privilege of man alone to act more contrary to nature than the wild and most untamed part of the creation? Doth God forbid us under the severest penalty, that of death, to take away the life of any man, a stranger, and upon provocation? And does he permit us to destroy those he has given us the charge and care of; and by the dictates of nature and reason, as well as his revealed command, requires us to preserve? He has in all the parts of creation taken a peculiar care to propagate and continue the several species of creatures, and makes the individuals act so strongly to this end, that they sometimes neglect their own private good for it, and seem to forget that general rule, which nature teaches all things, of self-preservat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young, as the strongest principle in them, over-rule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ir particular natures. Thus we see, when their young stand in need of it, the timorous become valiant, the fierce and savage kind, and the ravenous, tender and liberal.

56．有些人认为，人类的弃婴、卖子行为是父母对孩子有绝对权力的证据之一。他们和罗伯特爵士一样，是巧妙的辩论家，只能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人类最可耻、可能做出的最泯灭人性的行为上。连狮子洞和豺狼窝里都不会发生这样残忍的事情：生活在荒野中的野兽都听从上帝的旨意，对自己的后代细心温柔。它们照顾自己的幼儿，为它们去觅食、争斗，宁愿自己挨饿都要让它们存活下来，在它们自立之前绝对不离不弃。荒野中动物最难驯服，难道人类独享特权，可以比它们更违反自然地行事？上帝不是用最严厉的惩罚——死刑——来禁止我们，告诉我们即使是在被激怒的情况下都不能伤害任何人或者一个陌生人的性命吗？上帝交给我们照顾的人，根据“理性”和“自然本性”规定，明确下令要求我们必须保护的人，他是否允许我们伤害呢？上帝造物时格外注意几个物种的繁衍，令其行动皆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以致他们有时竟顾不上自己，似乎忘记了“自然”教导万物“自我保护”的总原则；保护孩子成了最高原则，超越了他们的本性。所以我们看到，一旦孩子需要保护，懦弱者会变得勇敢，残暴野蛮者会变得温柔，贪婪者会变得慷慨。

57．But if the example of what hath been done be the rule of what ought to be, history would have furnished our author with instances of this absolute fatherly power in its height and perfection, and he might have showed us in Peru people that begot children on purpose to fatten and eat them. The story is so remarkable, that I cannot but set it down in the author's words. “In some provinces,” says he, “they were so liquorish after man's flesh,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the patience to stay till the breath was out of the body, but would suck the blood as it ran from the wounds of the dying man; they had public shambles of man's flesh, and their madness herein was to that degree, that they spared not their own children, which they had begot on strangers taken in war: for they made their captives their mistresses, and choicely nourished the children they lead by them, till about thirteen years old they

butchered and eat them; and they served the mothers after the same fashion, when they grew past child-bearing, and ceased to bring them any more roasters.“ [6_7]

57．但是，如果发生过的事例就要被当成理应发生的规范，那么，历史将为我们的作者提供证明“绝对父权”的绝佳例子，秘鲁人生养孩子的目的是养肥了拿来吃，我们的作者本该拿这个来做例子的。引用这个事例实在是再好不过，所以我不得不引用我们的作者的原话：“在某些省份，人们十分爱吃人肉，不等那临死的人断气就开始吮吸从他伤口中流出的血。他们有公共的人肉屠宰场，人们疯狂到连自己跟战争中俘虏的女子所生的孩子都不放过。被俘的女子拿来作妾，然后把跟她们生的孩子精心饲养到十三岁左右，屠宰来吃。这些女子一旦过了生育年龄，不能再给他们生产肉食，也一样被屠宰来吃。” [7_7]

58．Thus far can the busy mind of man carry him to a brutality below the level of beasts, when he quits his reason, which places him almost equal to angels. Nor can it be otherwise in a creature, whose thoughts are more than the sands, and wider than the ocean where fancy and passion must needs run him into strange courses, if reason, which is his only star and compass, be not that he steers by. The imagination is always restless, and suggests variety of thoughts, and the will, reason being laid afield, is ready for every extravagant project; and in this state, he that goes farthest out of the way, is thought fittest to lead, and is sure of most followers; and when fashion hath once established what folly or craft began, custom makes it sacred, and it will be thought impudence, or madness, to contradict or question it. He that will impartially survey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will find so much of their religious governments and manners, brought in and continued amongst them by these means,

that he will have but little reverence for the practices which are in use and credit amongst men; and will have reason to think, that the woods and forests, where the irrational untaught inhabitants keep right by following nature, are fitter to give us rules, than cities and palaces, where those that call themselves civil and rational, go out of their way, by the authority of example. If precedents are sufficient to establish a rule in this case, our author might have found in holy writ children sacrificed by their parents, and this amongst the people of God themselves: The Psalmist tells us, “They shed innocent blood, even the blood of their sons and of their daughters, whom they sacrificed unto the idols of Canaan.“ [6_8] But God judged not of this by our author's rule, nor allowed of the authority of practice against his righteous law; but, as it follows there, “the land was polluted with blood; therefore was the wrath of the Lord kindled against his people, insomuch that he abhorred his own inheritance.“The killing of their children, though it was fashionable, was charged on them as innocent blood, and so had in the account of God the guilt of murder, as the offering them to idols had the guilt of idolatry.

58．理性把人类放在和天使几乎相同的位置上，当他们抛弃理性，杂乱的大脑会使他们做出比野兽还残忍的事。人类的想法比沙子还多，比海洋还宽，如果没有理性这唯一的星星和指针引导，幻想和激情定会将他们引向各种奇怪的路。人的想象一刻不息，总是不停地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一旦理性被抛至一边，人的意志就随时准备做各种无法无天的事情。处于上述状态的人，离正道最远，人们认为他最适合做领袖，其追随者也最多。源于愚蠢和狡猾的事情，一旦成了风尚，风俗便将其神圣化，谁敢违背或质疑它，就是自大或疯狂的表现。公正地纵观世界各国，人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宗教、政府、习俗大多就是以这种方式形成并延续的，因而就不会再敬畏人类盛行的行为惯例；就会有足够的理性去思考，森林中那些无理性、未经教养的

栖息者们因顺从自然过得很好，比起那些住在都市和宫殿中自称文明理性的智者更适合为我们提供法则，因为在榜样的权威性影响下，他们往往会逾越常轨，那么，森林是否更适合为我们提供法则？如果先例能够为后世树立规范，那我们的作者本应该发现《圣经》上有父母拿孩子做祭品的例子，《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这种事情也存在于上帝的子民之间："他们滥杀无辜，甚至用他们自己儿女的血祭祀迦南的偶像。" [7_8] 但上帝不会用我们的作者的规范去判断此事，也不允许惯例的权威违背他的公正之法。紧接上文的是"那土地被鲜血玷污了；因此上帝的怒气便向他的子民发作，以致他厌恶自己的产业。"杀孩子虽然风行，但属于滥杀无辜，在上帝那儿就是犯了谋杀罪，就像把孩子祭献给偶像也犯了盲目崇拜之罪。

59 . Be it then, as Sir Robert says, that anciently it was usual for men "to sell and castrate their children" [6_9] . Let it be, that they exposed them; add to it, if you please, for this is still greater power, that they begot them for their tables, to fat and eat them; if this proves a right to do so, we may, by the same argument, justify adultery, incest, and sodomy, for there are examples of these too,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sins, which I suppose have their principal aggravation from this, that they cross the main intention of nature, which willeth the increase of mankind,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species in the highest perfection, and the distinction of families, with the security of the marriage-bed, as necessary thereunto.

59．即便像罗伯特爵士所说，古时候人们常常"阉割或买卖自己的孩子" [7_9] ，甚至会抛弃孩子；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加一条，因为这权力相对更大，那就是孩子生下来之后，养肥了拿来吃：如果这些例子能够证明有权力这样做，那我们采用同样的论证方法，也许就可以证明通奸、乱伦、鸡奸的合理性，因为从古至今都不乏这样的实例；我认为罪恶的主要严重性就在于它违背了自然的旨意：自然旨意

是在保障婚姻关系的基础上繁衍人类，在最完美的状态下延续种族，划分家庭界限，这些迄今为止都是十分必要的。

60 . In confirmation of this natural authority of the father, our author brings a lame proof from the positive command of God in Scripture: his words are, “To confirm the natural right of regal power, we find in the *Decalogue* , that the law which enjoins obedience to kings, is delivered in the terms, Honour thy father [6_10] . Whereas many confess, that government only in the abstract, is the ordinance of God, they are not able to prove any such ordinance in the Scripture, but only in the fatherly power; and therefore we find the commandment, that enjoins obedience to superiors, given in the terms, Honour thy father; so that not only the power and right of government, but the form of the power governing, and the person having the power, are all the ordinances of God. The first father had not only simply power, but power monarchical, as he was father immediately from God” [6_11] . To the same purpose, the same law is cited lay our author in several other places, and just after the same fashion; that is, “and mother”, as apocryphal words, are always left out; a great argument of our author's ingenuity, and the goodness of his cause, which required in its defender zeal to a degree of warmth, able to warp the sacred rule of the word of God, to make it comply with his present occasion; a way of proceeding not unusual to those who embrace not truths because reason and revelation offer them, but espouse tenets and parties for ends deferent from truth, and then resolve at any rate to defend then; and so do with the words and sense of authors, they would fit to their purpose, just as Procrustes did with his guests, lop or stretch them, as clay best fit them to the size of their notions; and they always prove, like those so served, deformed, lame, and useless.

60．为了证实父亲有天赋权威，我们的作者从《圣经》里上帝的一条训诫中找到了一个蹩脚论据：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为证实王权是自然权利，我们看到《圣经》十诫中训诫人们服从君王的话，说的是‘孝敬你的父亲’。 [7_10] 许多人承认，上帝只规定了抽象意义的政府，但在《圣经》里除了父权外找不到证据来证明《圣经》中的这种规定。于是我们看到了十诫中这句用来训诫人们服从尊长的话：‘孝敬你的父亲’。就因这句话，不但是政府的职权和权力，就连权力的管理形式、管理者，都成了上帝规定的了。人类的第一位父亲拥有的不仅仅是权力，而是君权，因为这位父亲直接出自上帝之手” [7_11] 。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的作者还在其他几处引用了这条法则，方式是一样的，即视“和母亲”三字为不足为凭之词，不予考虑。这是我们的作者论证的巧妙所在，也是他目标的核心，拥护他的主张的人要有十足的热情，能歪曲上帝训诫人类时所讲的神圣规定，才可以与他保持一致。这种行为方式对于有些人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些人不会因为真理源自理性和神示而去信奉它，但是会为了违背真理的目的去拥护某些教义和党派，然后无论如何，坚决为他们辩护；作者们的言语和想法也是一样，为达目的，他们就像普罗库斯特（古希腊的强盗）那样，拉长或截短客人的身躯以适合自己心目中所需要的尺寸。结果这些论证就像那些被截断腿脚的客人一样，畸形无用，站不住脚。

61．For had our author set down this command without garbling, as God gave it, and joined another to father, every reader would have seen, that it had made directly against him, and that it was so far from establishing the “monarchical power of the father”, that it set up the mother equal with him, and enjoined zing but was due. In common to both father and mother: for that is the constant tenor of the Scripture. “Honour thy father and thy another”, [6_12] “He that smiteth his father or mother, shall surely be put to death”, [6_13] “He that curseth his father or mother, shall surely be put to death” [6_14] . Repeated Lev. xx 9, and by our Saviour, Matth. xv. 4.

“Ye shall fear every man his mother and his father”. [6_15] “If any man has a rebellious son, which will not obey the voice of his father or the voice of his mother; then shall his father and his mother lay hold an him, and say, This our son is stubborn and rebellious, he will not obey our voice”. [6_16] “Cursed be he that setteth light by his father or his mother”. [6_17] “My son, hear the instructions of thy father, and forsake not the law of thy mother”, are the words of Solomon, a king who was not ignorant of what belonged to him as a father or a king; and yet he joins father and mother together, in all the instructions he gives children quite through his book of Proverbs. “Woe unto him, that saith unto his father, What begettest thou? Or to the woman, what hast thou brought forth?“ [6_18] “In thee have they set light by father and mother”. [6_19] “And it shall come to pass, that when any shall yet prophesy, then his father and his mother that begat him shall say unto him, Thou shalt not live; and his father anti his mother that begat him shall thrust him through when he prophesieth”. [6_20] Here not the father only, but the father and mother jointly, had power in this case of life and death. Thus ran the law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in the New they are likewise joined, in the obedience of their children. [6_21] The rule is,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and 1 do not remember, that I anywhere read, “Children, obey your father”, and no more: the Scripture joins mother too in that homage which is due from children; and had there been any text, where the honour or obedience of children had been directed to the father alone, it is not likely that our author, who pretends to build all upon Scripture, would have omitted it: nay, the Scripture makes the authority of father and mother, in respect of those they have begot, so equal, that in some places it neglects even the priority of order, which is thought due to the father, and the mother is put first, as Lev. xix. A. From which so constantly joining father and mother together, as is found quite through Scripture,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honour

they have a title to from their children is one common right belonging so equally to them both, that neither can claim it wholly, neither can be excluded.

61．如果我们的作者将上帝这条训诫用原话引出，不断章取义，把“母亲”加回来，那么，所有读者都会发现这句话直接否定了我们的作者的观点，根本不是确立了“父亲的君权”，而是确定母亲与父亲地位相等，上帝的训诫也无非是说父亲和母亲应当共同承担的责任：那才是《圣经》恒久不变的要义。“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7_12] “打父母的，必要把那人处死”，[7_13] “咒骂父母的，必要把那人处死”[7_14]。《旧约·利未记》第二十章第九节重复了这句话，在《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中，我们的救世主也重复过这句。“各人都要孝敬自己的父母”，[7_15] “任何人的儿子如果顽逆、不听父母的话，父母就应该抓他到长老们面前，告诉他们‘我们的儿子顽逆倔强，不听我们的话’”，[7_16] “轻慢父母的，必受诅咒”，[7_17] “我的孩子，请听从你父亲的教导，记住你母亲的规定”——这是所罗门讲的话。身为一个父亲、君王，他很清楚自己的权力，但是在他所写的《箴言》中，凡是讲给孩子听的，他始终都把父亲和母亲放在一起。“让那些对父亲说‘你生出什么？’或者对母亲说‘你养出什么？’的人蒙受灾殃。”[7_18] “他们在主面前轻慢父母”，[7_19] “若有人再敢做预言，他的生父母必要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之名假说预言，父母在他说预言时要将他刺死。”[7_20] 在这句话中，母亲和父亲一起拥有生杀权力。《旧约》中的条律都是如此，《新约》中也同样，谈到儿女的顺从问题时，都把母亲和父亲放在一起。[7_21] 条律上都是说“孩子们，你们要听从你们的父母”，我从未在什么地方看到“孩子们，你们要听从你们的父亲”，然后对母亲只字不提。《圣经》上谈到儿女对家长的尊敬时，是包括母亲的。如果原经文中有任何地方说儿女只尊敬或服从他们的父亲一人，那么，我们这位自诩一切根据源自《圣经》的作者，是不会把它漏掉的。不但如此，在生育子女方面，《圣经》赋予母亲和父亲的权力十分平等，甚至在有些地方忽略了父亲的优先地位，把母亲放在前面，如《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三

节。既然《圣经》全文常常把父亲和母亲结合在一起，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父亲和母亲对孩子所享有的是一种平等的共同权力，不可由一人独占，也不能有一人被排除。

62 . One would wonder then how our author infers from the fifth commandment, that all “power was originally in the father”; how he finds “monarchical power of government settled and fixed by the commandment, Honour thy father and thy mother”.If all the honour due by the commandment, be it what it will, be the only right of the father, because he, as our author says, “has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 woman, as being the nobler and principal agent in generation”, why did God afterwards all along join the mother with him, to share in his honour? Can the father, by this sovereignty of his, discharge the child front paying this honour to his mother? The Scripture gave no such licence to the Jews, and yet there were often breaches wide enough betwixt husband and wife, even to divorce and separation: and, I think, nobody will say a child may withhold honour from his mother, or, as the Scripture terms it, “set light by her”, though his father should command him to do so; no more than the mother could dispense with him for neglecting to honour his father: whereby it is plain, that this command of God gives the father no sovereignty, no supremacy.

62．于是有人不禁要问，我们的作者是怎么从第五诫中推断出一切“权力最初起源于父亲”的呢？他又是如何从“政府的君权落在父亲身上并确立下来，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这条诫言的呢？如果诫言中规定的孩子应有的孝敬，不问内容，都为父亲一人享有，因为根据我们的作者所说，父亲“拥有对女性的统治权，在生育行为上比女性高贵，是主要参与者”，那么，为什么上帝随后都把“母亲”和父亲放在一起，分享他的权力？父亲能否运用他的这种主权，剥夺孩子对母亲的

尊敬？《圣经》没有准许犹太人做这样的事情，但夫妻关系还是常常出现裂痕，甚至到了分居、离婚的地步。我想，没人会说一个孩子可以不尊敬他的母亲，或者像《圣经》上说的“怠慢她”，就算那是他父亲下的命令。同样母亲也不能免去孩子对父亲的尊敬。因此，很明显上帝这一诫言根本没有授予父亲任何主权或最高权力。

63 . I agree with our author that the title to this honour is vested in the parents by nature, and is a right which accrues to them by their having begotten their children, and God by many positive declarations has confirmed it to them. I also allow our author's rule, “that in grants and gifts, that have their original from God and nature, as the power of the father”, (let me add “and mother” for whom God hath joined together let no man put asunder) “no inferior power of men can limit, nor make any law of prescription against them” [6_22] ; so that the mother having, by this law of God, a right to honour from her children, which is not subject to the will of her husband, we see this “absolute monarchical popover of the father” Can neither be founded on it, nor consist with it; and he has a power very far from monarchical, very far from that absoluteness our author contends for, when another has over his subjects the same power he hath, and by the same title: and therefore he cannot forbear saying himself that “he cannot see how any man's children can be free from subjection to their parents” [6_23] , which, in common speech, I think, signifies mother as well as father, or if parents here signifies only father, it is the first time I ever yet knew it to do so, and by such an use of words one may say anything.

63 . 我们的作者说孩子对其父母的孝敬是自然赋予父母的权利，这种权利通过生育孩子而产生，我同意这个观点。上帝也在多处明确

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作者还说“像父亲的权力这样一种来自上帝和自然的权力与恩赐”，“人类较低级的权力不能对之进行约束，也不可制定与之相悖的法律”，[7_22] 我也同意这一看法：不过要在“父亲”后面加上“母亲”，因为上帝已经把他们放在一起，不许任何人将之分开。那么，根据上帝这个诫言，母亲也享有被孩子孝敬的权利，且这种权利不受制于她丈夫的意志，看来，这个“父亲绝对的君权”不但不能以《圣经》为据，还与其内容不符。况且只要有另外一个父亲和这位父亲一样，以相同的名义拥有同样的权力，那他所拥有的权力远不可能是我们的作者声称的“君权”或“绝对权力”。我们的作者自己也不得不说“他没发现有谁的孩子可以不服从自己的双亲”[7_23]，“双亲”，按常规语言应该指的是“母亲”和“父亲”，如果它仅指“父亲”，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词语若是都可以这样使用，那还有什么话不能说。

64 . By our author's doctrine, the father having absolute jurisdiction over his children, also has the same over their issue; and the consequence is good, were it true that the father had such a power; and yet I ask our author whether the grandfather, by his sovereignty, could discharge the grandchild from paying to his father the honour due to him by the fifth commandment. If the grandfather hath, by “right of fatherhood”, sole sovereign power in him, and that obedience which is due to the supreme magistrate he commanded in these words, “Honour thy father”, it is certain the grandfather might dispense with the grandson's honouring his father, which since it is evident in common sense he cannot, it follows from hence, that “honour thy father and mother” cannot mean an absolute subjection to a sovereign power, but something else. Belie right therefore which parents have by nature, and which is confirmed to them by the fifth commandment, cannot be that political dominion which our author would derive from it: for that being in every civil society supreme somewhere, can discharge any subject from any political obedience to anyone of his fellow-

subjects. But what law of the magistrate can give a child liberty not to “honour his father and mother”? It is an eternal law, annexed purely to the relation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so contains nothing of the magistrate's power in it, nor is subjected to it.

64．按照我们的作者的信条，父亲对子女拥有绝对管辖权，那么，父亲对子女的后代也应该拥有同样的权力；只要他这个“父亲拥有绝对管辖权”属实，这个推断就不会错；但我想问我们的作者的是，既然祖父也拥有这种“绝对管辖权”，那他可否取消他的孙辈基于第五诫对其父亲的尊敬？如果祖父因其“父亲身份”获得的权力只能其一人独享，并且“孝敬你的父亲”指的是对君主的服从，那么显然祖父可以取消孙子对其父亲的尊敬，但这明显又不符合常理。所以据此我们认为“孝敬你的父母”并非表示对一种最高权力的绝对服从，而是另有所指。在第五诫中所确认的父母自然享有的权利，不可能是我们的作者欲从中推断出来的政治统治权，因为政治统治权在所有人类文明社会中都是最高权力，几乎可以取消任何公民对任何其他臣民政治上的服从。统治者有什么法律可以赋予孩子自由，不“孝敬他父母”？尊敬父母是条永恒的定律，只关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其中绝不包含统治者的权力，也不从属于它。

65．Our author says, “God hath given to a father a right or liberty to alien his power over his children to any other” [6_24]．I doubt whether he can alien wholly the right of honour that is due from them; but be that as it will, this I am sure, he cannot alien and retain the same power. If therefore the magistrate's sovereignty be, as our author would have it, “nothing but the authority of a supreme father” [6_25]，it is unavoidable, that if the magistrate hath all this paternal right, as he must have if fatherhood be the fountain of all authority; then the subjects, though fathers, can have no power over their children, no right to honour from them: for it

cannot be all in another's hands, and a part remain with the parents. So that, according to our author's own doctrine, “Honour thy father and mother” cannot possibly be understood of political subjection and obedience; since the laws both i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 that commanded children to “honour and obey their parents” were given to such, whose fathers were under civil government and fellow-subjects with them in political societies; and to have bid them “honour and obey their parents”, in our author's sense, had been to bid them be subjects to those who had no title to it: the right to obedience from subjects being all vested in another; and instead of teaching obedience, this had been to foment sedition, by setting up powers that were not. If therefore this command, “Honour thy father and mother”, concern political dominion, it directly overthrows our author's monarchy; since it being to be paid by every child to his father, even in society, every father must necessarily have political dominion, and there will be as many sovereigns as there are fathers; besides that the mother too hath her title, which destroys the sovereignty of one supreme monarch. But if “Honour thy father and mother” mean something distinct from political power, as necessarily it must, it is besides our author's business, and serves nothing to his purpose.

65．我们的作者说：“上帝给予了父亲把对孩子的权力转让给他人的权利或自由”[7_24] ，我怀疑他是否能全部转让这个权力。但不管怎样，我能确定的是，对这同一个权力，他不能既转让又保留。如果像我们的作者所说的那样，统治权“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父亲的权力”[7_25] ，假设君王拥有这个父权（若父亲身份是一切权力之源，他也必须拥有），那他的臣民，即使身为父亲，也难免失去对子女的权力，得不到他们的尊敬。因为权力既然都掌握在他人手中，自己就不可能再拥有，哪怕是一部分。所以，根据我们的作者自己的学说，“请尊敬你的父母”不能理解为政治上的从属和服从：因为无论是在《旧

约》还是《新约》上，谈到孩子“孝敬和服从他们的父母”的条律，其对象都是指父母生活在政府下，并且在同一政治社会中同他们一样充当臣民的儿女们。如果按我们的作者的意思，让这些臣民也去孝敬和服从“他们”的父母，那就意味着让这些人去服从根本无权管理他们的人，因为子女对自己父母的尊敬都属于他人。这不是教孩子孝敬父母，而是要建立不存在的权力，引发骚乱。所以，“孝敬你的父母”这条诫命如果意味着政治统治，它就直接推翻了我们的作者所说的“君权”，因为既然所有的孩子都要孝敬他们的父母，在社会中也一样，那么，每一位父亲都拥有这个政治统治权，所有的父亲成了统治者。此外，母亲也同样拥有这个权力，这样也就不可能只有唯一一个最高统治者。可如果“孝敬你的父母”这句话指的是政治权力之外的东西——其实本来如此——那它就与我们的作者的事情无关了，对实现他的目的也毫无用处。

66 . “The law that enjoins obedience to kings is delivered”, says our author, “in the terms, Honour thy father, as if all power were originally in the father”, [6_26] and that law is also delivered, say I, in the term, “Honour thy mother”, as if all power were originally in the mother. I appeal whether the argument be not as good on one side as the other, father and mother being joined all along i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wherever honour or obedience is enjoined children. Again, our author tells us, [6_27] “that this command, Honour thy father, gives the right to govern, and makes the form of government monarchical”. To which I answer, that if by “Honour thy father” be meant obedience to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magistrate, it concerns not any duty we owe to our natural fathers, who are subjects; because they, by our author's doctrine, are divested of all that power, it being placed wholly in the prince, and so being equally subjects and slaves with their children, can have no light, by that title, to any such honour or obedience is contains in it political subjection; if “Honour thy father and mother”

signifies the duty we owe our natural parents, as by our Saviour's interpretation, Matth. xv. 4, and tall the other mentioned places, it is plain it does; then it; cannot concern political obedience, but a duty that it owing to persons who have no title to sovereignty, nor any political authority as magistrates ever subjects, For the person of a private father, and a title to obedience, due to the supreme magistrate, are things inconsistent; and therefore this command, which must necessarily comprehend the persons of natural fathers, must mean a duty we owe them distinct from, our obedience to the magistrate, and from which the most absolute poorer of princes cannot absolve us. What this duty is, we shall in its due place examine.

66．我们的作者说："让人服从君主的诫命是用'孝敬你的父亲'来表达的，好像一切权力原本起源于父亲一样" [7_26] 。依我看，这条诫命也是用"孝敬你的母亲"来表达的，好像一切权力都起源于母亲。我恳请大家考虑，这样是不是和我们的作者的论证一样讲得通。在《旧约》和《新约》里，只要讲到儿女的孝敬或服从的地方，都是把父亲和母亲放在一起的。同样，我们的作者还告诉我们 [7_27] ："孝敬你的父亲这一诫命授予父亲统治权，统治形式为君主制政府。"对此我想说，如果"孝敬你的父亲"指的是对官员政治权力的服从，那就不涉及到我们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应尽的义务，因为根据我们的作者的信条，权力全部在君王身上，作为臣民的亲生父亲无法拥有，他们和孩子一样同为臣民和奴隶，纵然是生父，也无权享有这种政治意义上的尊敬和服从。如果"孝敬你的父母"这句话，按照我们救世主的解释， [7_28] 就是指我们对自己生身父母应尽的责任，很明显这是正确的，那这句话就与政治服从无关，而只是对那些既没有统治权，也没有官员支配臣民那样的权利的人们应尽的一种义务。因为只有父亲身份的个人，与享有支配权的最高长官，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这条诫命，必须指的是具有自然父亲身份的个人，我们对之应尽的义务也必然和我们对长官的服从不同。这种义务即使绝对君权也无法解除。至于这种义务到

底是什么，到时候我们再探讨。

67 . And thus we have at last got through all, that in our author looks like an argument for that absolute unlimited sovereignty described, sect. 8, which he supposes in Adam, so that mankind has ever since been all born slaves, without any title to freedom. But if creation, which gave nothing but a being, made not Adam prince of his posterity; if Adam, was not constituted lord of mankind, nor had a private dominion given him exclusive of his children, but only a right and power over the earth and inferior creatures in common with the children of men; [6_28] if also, God gave not any particular power to Adam over his wife and children, but only subjected Eve to Adam, as a punishment, or foretold the subjection of the weaker sex, in the ordering the common concernments of their families, but gave not thereby to Adam, as to the husband,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which necessarily bet longs to the magistrate; [6_29] if fathers by begetting their children acquire no such power over them; and if the command, “Honour thy father and mother”, give it not, but only enjoins a duty owing to parents equally whether subjects or not, and to the mother as well as the father; if all this be so, as I think by what has been said is very evident; then man has a natural freedom, notwithstanding all our author confidently says to the contrary; since all that share in the same common nature, faculties, and powers, are in nature equal, and ought to partake in the same common rights and privileges, till the manifest appointment of God, who is “Lord over all, blessed forever”, can be produced to show any particular person's supremacy; or a man's own consent subjects him to a superior. This is so plain, that our author confesses, that Sir John Hayward, Blackwood and Barclay, “the great vindicators of the right of kings”, could not deny it, “but admit with one consent the natural

liberty and equality of mankind", for a truth unquestionable. And our author hath been so far from producing anything that may make good his great position, "that Adam was absolute monarch", and so "men are not naturally free", that even his own proofs make against him; so that, to use his own way of arguing, "the first erroneous principle failing, the whole fabric of this vast engine of absolute power and tyranny drops down of itself", and there needs no more to be said in answer to all that he builds upon so false and frail a foundation.

67．因此最终我们发现，我们的作者在第八部分看似在论述绝对的无限的统治权，并且假设将该权力授予亚当，因此所有人一生下来就成了奴隶，没有任何自由。但假设上帝创造亚当，除了让他存在以外，并没有让他成为他子孙后代的君主；假设不是确立亚当为王，除了对孩子的支配权外也没有赋予他支配他人的权力，他被赋予的只不过是凡人皆有的对土地及低级动物的支配权； [7_29] 假设上帝也没有赋予亚当支配其妻子和儿女的特殊权力，而是作为惩罚，让夏娃服从亚当，或者在家庭共同事务管理方面，对女性的弱势地位作了预言，但没有赋予身为丈夫的亚当法官才有的生杀权； [7_30] 假设亚当也不能因为生育行为获得对儿女的支配权；假设"孝敬你的父母"，这条训诫也没有赋予他这种权力，无非是规定对父母双方一致应尽的责任，不论他们是臣民与否；如果上面所有的假设都成立，那么在我看来，接着要说的就很清楚了；无论我们的作者的否定如何坚决，人类都是生而自由的；因为人们生来就有的天性、身体官能、能力都是平等的，应该享有共同的权益，除非我们的"万物之主"、"永远被祝福的上帝"，亲自钦点某一个人并授予他最高权力；或者是有人批准他高人一等。这点其实很明显，就连我们的作者自己也承认，像约翰·海沃德、布莱克伍德和巴克利这样"强力拥护王权的人"，也"承认人人生而平等和自由"，这是无法否认、毋庸置疑的事实。我们的作者提出的任何论据，也远不能证明他"亚当是绝对的君主"，这一伟大的主张，并且据此主张"人人并非生而自由"，连他自己的论据都与自己的主张

相悖。所以，用他自己的论证方式，“一旦最初的错误原则不成立，整个绝对权力和君主专制的庞大机构就随之坍塌了”，所以，对于我们的作者建立在如此错误和脆弱的基础上的一切，我们都不必再予以回答。

68 . But to save others the pains, were there any need, he is not sparing himself to show, by his own contradictions, the weakness of his own doctrine Adam's absolute and sole dominion is that which he is everywhere full of, and all along builds on, and yet he tells us [6_30] , “that as Adam was lord of his children, so his children under him had a command and power over their own children.” The unlimited and undivided sovereignty of Adam's fatherhood, by our author's computation, stood but a little while, only dur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but as soon as he had grandchildren, Sir Robert could give but a very ill account of it. “Adam, as father of his children,” saith he, “hath an absolute, unlimited, royal power over them, and by virtue thereof over those that they begot, and so to all generations”; and yet his children, viz., Cain and Seth, have a paternal power over their children at the same time; so that they are at the same time absolute lords, and yet vassals and slaves; Adam has all the authority, as “grandfather of the people”, and they have a part of it as fathers of a part of them; he is absolute over them and their posterity, by having begotten them, and yet they are absolute over their children by the same title. “No,” says our author, “Adam's children under him had power over their own children, but still with subordination to the first parent.” A good distinction, that sounds well; and it is pity it signifies nothing, nor can be reconciled with our author's words. I readily grant, that supposing Adam's absolute power over his posterity, any of his children might hare from him a delegated, and so a subordinate power over a part, or all the rest; but that cannot

be the power our author speaks of here; it is not a power by grant and commission, but the natural paternal power he supposes a father to have over his children. For 1, he says, “As Adam was lord of his children, so his children under him had a power over their own children”; they were then lords over their own children after the same manner, and by the same title, that Adam was; i.e., by right of generation, by right of fatherhood. 2. It is plain he means the natural power of fathers, because he limits it to be only “over their own children”; a delegated power has no such limitation, as only over their own children, it might be over others, as well as their own children. 3. If it were a delegated power, it must appear in Scripture; but there is no ground in Scripture to affirm, that Adam's children had any other power over theirs than what they naturally had as fathers.

68．但必要的时候，为了省去他人的麻烦，他会不惜用自己的矛盾展示自己主张的弱点。他几乎无处不用亚当绝对和唯一的支配权做理论基础，但是他告诉我们 [7_31] “因为亚当是他的孩子的主，所以他的孩子对其自己的子女也有支配权。”那么按照我们的作者的方法估算，亚当因其父亲身份所享有的这种无限的、不可分割的统治权，不是长久的，只存在于第一代。一旦亚当有了孙辈，罗伯特爵士就难讲得通了。他说“亚当作为他孩子的父亲，对孩子拥有绝对的、无限的王权，据此他也对孩子所生儿女以及之后的世世代代均拥有该权力”；但是，他的儿子们，该隐和塞思，同时也对各自的子女拥有父权；于是该隐和塞思一方面是绝对的主，另一方面又是下属和奴隶；作为“全族的祖父”的亚当，拥有一切权力，作为“全族中部分人的父亲”的该隐和塞思，只有部分权力；亚当因为生育拥有对该隐和塞思及其所有后代绝对的权力，那么该隐和塞思是否也因为生育对各自的孩子拥有绝对权力呢？我们的作者说：“不是，在亚当之下，亚当的孩子对自己的子女拥有权力，但从属于最初的父权。”这种区分听上去似乎不错，可惜却没有意义，与我们的作者自己的话也不一致。我

满以为，如果亚当对其后代拥有绝对权力，他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一种委托的权力，一种对于部分人或所有其他人的附属权力，但那又不是我们的作者在这儿所讲的权力。我们的作者所讲的权力不是因授予或委托而来，而是一个父亲对孩子自然拥有的权力。首先，他说："因为亚当是他孩子的主，所以在亚当之下，他的孩子对其子女也有支配权"；亚当的孩子以同种方式和名义成为各自孩子的主，也就是因为生育孩子，因为父亲的身份。其次，很明显，我们的作者所讲的是父亲的自然权力，因为他说这个权力只"对他们自己的孩子"拥有，但一份委托而来的权力是不会仅针对自己的孩子的，它还针对他人的孩子。第三，如果它确实是一份委托的权力，《圣经》上一定会讲到；但在《圣经》上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亚当的孩子除了对其子女拥有自然父权以外，还拥有什么其他的权力。

69 . But that he means here paternal power, and no other, is past doubt, from the inference he makes ill these words immediately following, "I see not then how the children of Adam, or of any man else, can be free from subjection to their parents". Whereby it appears that the power on one side, and the subjection on the other, our author here speaks of, is that natural power and subjec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for that which every men's children owed could be no other; and that our author always affirms to be absolute and unlimited. This natural power of parents over their children, Adam had over his posterity, says our author; and this power of parents over their children, his children had over theirs in his lifetime, says our author also; so that Adam, by a natural right of father, had an absolute, unlimited power over all his Poster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his children had by the same right absolute, unlimited power over theirs. Here then are two absolute, unlimited powers existing together, which I would love anybody reconcile one to another, or to common sense. For the salvo he has put in of subordination, makes it more absurd: to have

one absolute, unlimited, nay unlimitable power in subordination to another, is so manifest a contradiction, that nothing can be more. “Adam is absolute prince with the un limited authority of fatherhood over all his posterity”; all his posterity are then absolutely his subjects; and as our author says, his slave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re equally in this state of subjection and slavery; and yet, says our author, “the children of Adam have paternal, i.e. absolute, unlimited power over their own children”; which in plain English is, they are slaves and absolute princes at the same time, and in the same government; and one part of the subjects have an absolute, unlimited power over the other by the natural right of parentage.

69．可是，我们的作者在这里讲的是父权，绝不是其他权力，这一点毫无疑问，根据这个推论，他紧接着说出了错误判断的话，“亚当的孩子也好，其他人的孩子也好，我发现没有人可以不服从他们的父母。”由此看来，我们的作者在这儿所讲的一方的“权力”和另一方的“服从”，其实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自然的权力和孩子对父母的自然的服从。每个人的子女应忠于的这种权力不是别的权力，但我们的作者却断言它是绝对的、无限的。我们的作者说，亚当对于其后裔拥有父母对孩子那样的自然权力；我们的作者还说，这种父母对孩子的权力，孩子长大后对自己的儿女也终生拥有。于是亚当依据其作为父亲的自然权力，对他的全部后裔都有绝对、无限的权力，同时，基于同样的权力，亚当的孩子对自己的后裔也有同样绝对、无限的权力。两个绝对、无限的权力同时存在，我倒愿意有人能让两者和谐共存，或者使之符合常理。我们的作者把“从属”一词放进两者之间，结果更加荒谬：让一个绝对、无限，也不可限制的权力去从属于另一个，无疑是矛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亚当是绝对的君主，对其后裔有着无限的权力”，所有的后裔都是他绝对的臣民。正如我们的作者所说，他的奴隶、儿孙都一样处于从属和奴役状态。但我们的作者又说：“亚当的孩子对他们自己的子女享有父权，也即绝对、无限的权力”，这

句话简单地说，就是在同一政府下，他们集绝对君王和奴隶于一身，一部分臣民基于父亲身份的自然权力对另一部分臣民拥有绝对、无限的权力。

70 . If anyone will suppose in favour of our author, that he here meant that parents, who are in subjection themselves to the absolute authority of their father, have yet some power over their children; I confess he is something nearer the truth; but he will not at all hereby help our author: for he nowhere speaking of the paternal power, but as an absolute, unlimited authority, cannot be supposed to understand anything else here, unless he himself had limited it, and showed how far it reached; and that he means here paternal authority in that large extent, is plain from the immediately following words: “This subjection of children being,” says he, “the foundation of all regal authority” [6_31] . The subjection then that in the former line, he says, “every man is in to his parents”, and consequently what Adam's grandchildren were in to their parents, was that which was the fountain of all regal authority, i.e., according to our author, absolute, unlimitable authority. And thus Adam's children had regal authority over their children, whilst they themselves were subjects to their father, and fellow-subjects with their children. But he mean as he pleases, it is plain he allows “Adam's children to have paternal power” [6_32] , as also all other fathers to have “paternal power over their children” [6_33] . From whence one of these two things will necessarily follow, that either Adam's children, even in his life time, had, and so all other fathers have, as he phrases it, “by right of fatherhood, royal authority over their children”, or else that Adam, “by right of fatherhood, had not royal authority” [6_34] . For it cannot be lout that paternal power does, or does not, give royal authority to them that have it; if it does not, then Adam could not be sovereign by this

title, nor anybody else; and then there is an end of all our author's politics at once; if it does give royal authority, then everyone that has paternal power has royal authority; and then, by our author's patriarchal government, there will be as many kings as there are fathers.

70．假如有任何人想支持我们的作者，认为他在这里的意思是：原本就从属于自己父亲的父母，对自己所生的儿女有一定权力。我承认这个更接近事实，但这对我们的作者毫无用处。因为我们的作者只要讲到父权，就说是绝对、无限的权力，除非他自己之前对这个权力有过限制，规定权力范围有多广，否则我们无法有其他理解。并且他这里的“父权”所指广泛，由下面他说的“孩子的从属是一切王权的基础” [7_32] ，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他在前面说到“每个人都从属于他的父母，”这里的“从属”同样适用于亚当的孙子们对他们父亲的从属，这是一切王权之源，这王权，用我们的作者的话说，就是绝对、无限的权力。所以亚当的孩子对自己的子女拥有王权，同时他们和自己的子女一同为他们父亲亚当的臣民。但让我们的作者喜欢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吧，很明显他让“亚当的孩子拥有父权” [7_33] ，就像他同样让其他父亲们“对各自的孩子拥有父权” [7_34] 一样。因此下面两种情况必然出现一种：要么，亚当在世时，他的孩子和其他父亲一样，如我们的作者所说“因其父亲身份，对其子女拥有王权” [7_35] ；要么，亚当“不能根据其父亲身份享有君权”。因为对于已有父亲权力的人来说，父权只能给予或不给予他们王权：如果是能给他们带来王权，亚当就不可能因为是父亲而成为统治者，其他人也不行；这样一来，我们的作者所有的政治学说就走到了尽头，如果确实有父权的人就有君权；那在我们的作者的父权社会里，有多少父亲就有多少君主。

71 . And I thus what a monarchy he hath set up, let him and his disciples consider. Princes certainly will have great reason to thank him for these new politics, which set up as many absolute

kings in every country as there are fathers of children. And yet who can blame our author for it, it lying unavoidably in the way of one discoursing upon our author's principles? For having placed an “absolute power in fathers by right of begetting”, he could not easily resolve how much of this power belonged to a son over the children he had begotten; and so it fell out to be a very hard matter to give all the power, as he does, to Adam, and yet allow a part in his life time to his children when they were parents, and which he knew not well how to deny them. This makes him so doubtful in his expressions, and so uncertain where to place this absolute natural power which he calls fatherhood. Sometimes Adam alone has it all, as p. 13, O. 244, 245 and Pref.

71．我们的作者确定了什么样的君主制，让他和他的拥护者们去考虑吧。当然君主们大可以感谢他的这种新政治学，因为这种政治学促使每一个国家中有多少孩子的父亲就设立多少君主。这是依据我们的作者的原理推断出的必然结果，但是谁会因此责怪我们的作者呢？既然我们的作者赋予父亲们“因生育获得的一种绝对权力”，他就很难确定儿子对孙子拥有的这种权力有多大；结果要像我们的作者那样把所有的权力授予亚当，亚当在世期间，在他的孩子做了父亲之时又要给予他们部分权力，这就十分困难了。我们的作者也不太清楚如何拒绝这种权力给予。这就让我们的作者用语十分令人生疑，他也不确定该把这个他称之为“父权”的绝对、自然的权力安置在何处。有时候是亚当一人，如《君权论》第13页，《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44、245页，及前言里。

Sometimes parents have it, which word scarce signifies the father alone, as p. 12, 19.

有时候是父母，但这个词又很少单指父亲一人，如《君权论》第12、19页。

Sometimes children during their father's lifetime, as p.12.

有时候是父亲在世时的孩子们，如《君权论》第12页。

Sometimes fathers of families, as p.78 and 79.

有时候是家族里的父亲们，如《君权论》第78、79页。

Sometimes fathers indefinitely, as O. 155.

有时候泛指父亲们，如《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55页。

Sometimes the heir to Adam, as O. 258.

有时候是亚当的后嗣，如《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58页。

Sometimes the posterity of Adam, as O.244, 246.

有时候是亚当的后裔，如《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44、246页。

Sometimes prime fathers, all sons of grandchildren of Noah, as O. 244.

有时候是元祖们，挪亚所有的子孙，如《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44页。

Sometimes the eldest parents, as p. 12.

有时候是最年长的父母，如《君权论》第12页。

Sometimes all kings, as p. 19.

有时候是所有君王，如《君权论》第19页。

Sometimes all that have supreme power, as O. 245.

有时候是一切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如《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45页。

Sometimes heirs to those first progenitors who were at first the

natural parents of the whole people, as p. 19,

有时候是人类最早的祖先，即人类最初的生父母的后嗣，如《君权论》19页。

Sometimes an elective king, as p. 23.

有时候又是一位选出的君王，如《君权论》第23页。

Sometimes those, whether a few or a multitude, that govern the commonwealth, as p. 23.

有时候是那些治理国家的少数或众多人，如《君权论》第23页。

Sometimes he that can catch it, a usurper, as p. 23. O. 155.

有时候是夺取这个权力的人，一个篡位者，如《君权论》第23页，《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55页。

72 . Thus this new nothing, that is to carry with it all power, authority and government; this fatherhood, which is to design the person, and establish the throne of monarchs, whom the people are to obey; may, according to Sir Robert, come into any hands, anyhow, and so by his politics give to democracy royal authority,

and make an usurper a lawful prince. And if it will do all these fine feats, much good do our author and all his followers with their omnipotent fatherhood, which can serve for nothing but to unsettle and destroy all the lawful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and to establish in their room disorder, tyranny and usurpation.

72．于是这个承载一切权力、权威和政府的莫须有的新事物，这个指定人选和确立君王统治地位的父亲身份，根据罗伯特爵士的意思，可以凭任何方式落在任何人身上。依据他的政治学，他可以给民主制加上王权，让篡位者成为合法的君王。如果他的政治学能有这么多妙处，那我们的作者和他的支持者们凭借这个万能的“父亲身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个“父亲身份”可以推翻、摧毁世上一切合法的政府，并代之以动乱、专制和篡权，此外它就没有什么别的用处了。

[6_1].Patriarcha. p.12.

[6_2].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p. 156.

[6_3].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p. 223.

[6_4].Psalm xc. iv. 9.

[6_5].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159.

[6_6].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172.

[6_7].Garcilasso de la Vega, Hist. des Yncas de Peru, 1. i. c. 12.

[6_8].Psalm cvi. 38.

[6_9].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155.

[6_10].Patriarcha p. 23.

[6_11].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p. 254.

[6_12].Exodus. xx.

[6_13].Exodus. xx. 15.

[6_14].Exodus. xx. 17.

[6_15].Leviticus. xix. 3.

[6_16].Deuteronomy xxi. 18, 19, 20, 21.

[6_17].Deuteronomy. xxvii. 16.

[6_18].Isaiah. xiv. 10.

[6_19].Ezeli. xxii. 2

[6_20].Zechariah. xiii. 3.

[6_21].Ephesians. vi. 1.

[6_22].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158.

[6_23].Patriarcha p. 12.

[6_24].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155.

[6_25].Patriarcha p. 23.

[6_26].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54.

[6_27].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p. 254.

[6_28].Genesis. i. 28.

[6_29].Genesis. iii 16.

[6_30].Patriarcha p. 12.

[6_31].Patriarcha p. 12

[6_32].Patriarcha p. 12

[6_33].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156.

[6_34].Patriarcha p. 12

[7_1].《君权论》，第12页。

[7_2].《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56页。

[7_3].《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23页。

[7_4].《诗篇》，第九十四章第九节。

[7_5].《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59页。

[7_6].《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72页。

[7_7].加西拉索·德·拉·维加，《秘鲁印卡族历史》卷一，第12页。

[7_8].《诗篇》，第一百零六章第三十八节。

[7_9].《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55页。

[7_10].《君权论》，第23页。

[7_11].《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54页。

[7_12].《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7_13].《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十五节。

[7_14].《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十七节。

[7_15].《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三节。

[7_16].《申命记》，第二十一章第十八至二十一节。

[7_17].《申命记》，第二十七章第十六节。

[7_18].《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节。

[7_19].《以西结书》，第二十二章第二节。

[7_20].《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三节

[7_21].《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

[7_22].《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58页。

[7_23].《君权论》，第12页。

[7_24].《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55页。

[7_25].《君权论》，第23页。

[7_26].《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54页。

[7_27].《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54页。

[7_28].《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以及其他多处都提及。

[7_29].《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7_30].《创世记》，第三章第十六节。

[7_31].《君权论》，第12页。

[7_32].《君权论》，第12页。

[7_33].《君权论》，第12页。

[7_34].《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56页。

[7_35].《君权论》，第12页。

Chapter VII Of Fatherhood and Property Considered Together as Fountains of Sovereignty

第七章 论“父权”和“财产权”作为统治权的共同来源

73 . In the foregoing chapters, we have seen what Adam's monarchy was in our author's opinion, and upon what titles he founded it. The foundations which he lays the chief stress on, as those from which he thinks he may best derive monarchical power to future princes, are two, viz., “fatherhood and property”; and therefore the way he proposes to “remove the absurdities and inconveniencies of the doctrine of natural freedom” is “to maintain the natural and private dominion of Adam” [7_1] . Conformable hereunto, he tells us, “the grounds and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necessarily depend upon the original of property” [7_2] . “The subjection of children to their parents is the fountain of all regal authority [7_3] “. “And all power on earth is either derived or usurped from the fatherly power, there being no other original to be found of any power whatsoever” [7_4] . I will not stand here to examine how it can be said without a contradiction, that the “first grounds and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necessarily depend upon the original of property”, and yet, “that there is no other original of any power whatsoever but that of the father”; it being hard to understand how there can be “no other original but fatherhood” and yet that the “grounds and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depend upon the original of property”; property and fatherhood being as far different as lord of a manor and father of children. Nor do I see how they will either of them agree with what our author says, of God's sentence against Eve, [7_5] “that it is the original grant of government” [7_6] ; so that if that were the original, government had

not its original, by our author's own confession, either from property or fatherhood; and this text, which he brings as a proof of Adam's power over Eve, necessarily contradicts what he says of the fatherhood, that it is the “sole fountain of all power”: for if Adam had any such regal power over Eve as our author contends for, it must be by some other title than that of begetting.

73．在前面几章，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作者所讲的亚当的君主政治是什么，以及他建立该君主政治的依据。我们的作者强调的理论基础，即他认为君权和君主的两个最佳来源，就是“父权”和“财产权”。所以他提出“维持亚当自然、独立的统治，以去除天赋自由论的各种荒谬和障碍”[8_1]，到目前为止，他类似的说法还有：“统治权的根据和原则须以财产权为根源”。[8_2]“孩子对其父母的服从是一切君权的源泉”。[8_3]“世上的一切权力要么源于父权，要么由篡夺父权而来，此外找不出任何其他权力来源”，[8_4]关于怎样既说“除了父权以外没有别的权力来源”，“又说统治的根据和原则须以财产权的起源为依据”，而不陷入矛盾，我暂不想讨论，但是很难理解。财产权和父权，就像庄园主和孩子之父，远不是一回事。对于上帝惩罚夏娃的话，[8_5]我们的作者说是“最初的统治权授予”：[8_6]我也看不出前面那两个源泉与这句话相符。因此如果统治权的产生源于上帝惩罚夏娃那句话，那么根据我们的作者自己的观点，它就不会源于“父权”或“财产权”。我们的作者引用惩罚夏娃的经文证明亚当有支配她的权力，这必定与其“父权为一切权力的唯一源泉”之说相矛盾。因为如果亚当对夏娃拥有我们的作者声称的那样的“王权”，那这王权一定是根据别的名义，而不是根据生育儿女的名义所获得的。

74．But I leave him to reconcile these contradictions, as well as many others, which may plentifully be found in him by anyone, who will but read him with a little attention; and shall come now to consider, how these two originals of government, “Adam's natural

and private dominion”, will consist and serve to make out and establish the titles of succeeding monarchs, who, as our author obliges them, must all derive their popover from these fountains. Let us then suppose Adam made, “by God's donation”, lord and sole proprietor of the whole earth, in as large and ample a manner as Sir Robert could wish; let us suppose him also, “by right of fatherhood”, absolute ruler over his children with an unlimited supremacy; I ask then, upon Adam's death, what becomes of both his natural and private domination? And I doubt not it will be answered, that they descended to his next heir, as our author tells us in several places. But this way, it is plain, cannot possibly convey both his natural and private dominion to the same person: for should we allow that all the property, all the estate of the father, ought to descend to the eldest son, (which will need some proof to establish it) and so he has by that title all the private dominion of the father, yet the father's natural dominion, the paternal power, cannot descend to him by inheritance: for it being a right that accrues to a man only by begetting, no man can have this natural dominion over anyone he does not beget; unless it can be supposed that a man can have a right to anything, without doing that upon which that right is solely founded: for if a father by begetting, and no other title, has natural dominion over his children, he that does not beget them cannot have this natural dominion over them; and therefore be it true or false, that our author says, that “every man that is born, by his very birth, becomes a subject to him that begets him” [7_7] , this necessarily follows, viz., that a man by his birth cannot become a subject to his brother, who did not beget him; unless it can be supposed that a man by the very same title can come to be under the “natural and absolute dominion” of two different men at once; or it be sense to say, that a man by birth is under the natural dominion of his father, only because he begat him, and a man by birth also is under the natural dominion of his

eldest brother, though he did not beget him.

74．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矛盾之处，都暂且留给我们的作者自己去解决吧，任何读者阅读时只需稍加留意都能发现不少。我们现在不妨考虑一下，统治权的两个起源，“亚当自然的和个人的支配权”，两者如何并存，如何共同产生并确立后继君王的地位，按我们的作者规定，这些君王只能通过这些源泉获得权力。让我们假设，亚当因为“上帝的恩赐”成为整个世界的主人和唯一所有者，其权限之大之广，皆可随罗伯特爵士所愿；我们还可以假设，亚当凭借其父亲身份，成为其儿女的绝对统治者，并拥有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那么，我的问题是：亚当死后，他“自然的支配权”和“个人的支配权”怎么办？我确信答案会是“传给下一个继承人了”，我们的作者在好几处也这样提到。但是显然，亚当的自然支配权和个人支配权不可能都传给同一个人：因为如果我们承认父亲的所有权力和财产都应该传给长子（这点还需要证据证明），那么据此名义，长子就拥有了父亲所有的“个人的支配权”，但父亲的“自然的支配权”，即父亲权力，不能通过继承的方式传递：因为父权只有通过生育行为才可获得，没有人可以对他人的孩子行使这种自然权力，除非我们假定一个人可以在不具备唯一必须条件的情况下拥有权力。一个父亲，只有通过生育，才能获得对孩子的自然支配权，这种权利外人不得享有。所以，我们的作者说“所有的人一旦出生，就因为为人所生，成了生他之人的属下”[8_7]，无论这话是对是错，其结果必然是：人不可能是其兄长的属下，因为他兄长不可能生他，除非我们能够假设某人一出生就据以相同的名义同时被两个不同男人“自然、绝对地支配”，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仅因为是父亲所生而处于其父亲的自然支配之下，同时他生来也要受其兄长的自然支配，尽管他不是兄长所生。

75．If then the private dominion of Adam, i.e., his property in the creatures, descended at his death all entirely to his eldest son, his heir; (for, if it did not, there is presently an end of all Sir

Robert's monarchy) and his natural dominion, the dominion a father has over his children by begetting them, belonged, immediately upon Adam's decease, equally to all his sons who had children, by the same title their father had it, the sovereignty founded upon property, and the sovereignty founded upon fatherhood, come to be divided; since Cain, as heir, had that of property alone; Seth, and the other sons, that of fatherhood equally with him, This is the best can be made of our author's doctrine, and of the two titles of sovereignty he sets up in Adam: one of them will either signify nothing; or, if they both must stand, they can serve only to confound the rights of princes, and disorder government in his posterity; for by building upon two titles to dominion, which cannot descend together, and which he allows may be separated, (for he yields that “Adam's children had their distinct territories by right of private dominion” [7_8]) he makes it perpetually a doubt upon his principles where the sovereignty is, or to whom we owe our obedience; since fatherhood and property are distinct titles, and began presently upon Adam's death to be in distinct persons. And which then was to give way to the other?

75．那么，如果亚当的“个人的支配权”，即他对万物的所有权，在他死后全部传给他的长子，即他的继承人（不然的话，罗伯特爵士的君主制会就此全部崩塌）；亚当因生育获得的“自然的支配权”，在其过世之后，立即以与亚当取得这种权利的同样名义被平均分配给其育有子女的后裔，那么，基于“财产权”的主权和基于“父权”的主权，就被分离了；因为该隐作为继承人，独享基于“财产权”的主权；塞思和其他兄弟平等地享有和该隐一样的基于“父权”的主权，我们的作者的学说只能这样理解了，他建立在亚当身上的两种主权：要么其中一个无意义，要么就是如果两种权力都必须成立的话，只会混淆君主们的权力，搅乱后世统治：因为这两种主权建立基础不同，不能同时传袭，我们的作者允许两者分离， [8_8] 那么，“统治权在哪儿”和“我们

该服从谁”就成为人们对他的原则的恒久疑问，因为“父权”和“财产权”两种是不同的权力，在亚当过世之后落在了不同人的身上。那么两种权力到底哪一个该让步呢？

76 . Let us take the account of it, as he himself gives it us. He tells us out of Grotius, that “Adams children, by donation, assignation, or some kind of cession before he was dead, had their distinct territories by right of private dominion; Abel had his flocks, and pastures for them; Cain had his fields for corn, and the land of Nod, where he built him a city” [7_9] . Here it is obvious to demand, which of these two after Adam's death was sovereign? Cain, says our author [7_10] . By what title? “As heir; for heirs to progenitors, who were natural parents of their people, are not only lords of their own children, but also of their brethren”, says our author [7_11] . What was Cain heir to? Not the entire possessions not all that which Adam had private dominion in; for our author allows that Abel, by a title derived from his father, “had his distinct territory for pasture by right of private dominion”. What then Abel had by private dominion, was exempt from Cain's dominion; for he could not have private dominion over that which was under the private dominion of another, and therefore his sovereignty over his brother is gone with this private dominion, and so there are presently two sovereigns, and his imaginary title of fatherhood is out of doors, and Cain is no prince over his brother; or else if Cain retain his sovereignty over Abel, notwithstanding his private dominion, it will follow, that the “first grounds and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roperty, whatever our author says to the contrary. It is true, Abel did not outlive his father Adam; but that makes nothing to the argument, which will hold good against Sir Robert in Abel's issue, or in Seth, or any of the posterity of Adam, not descended from Cain.

76．对此，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作者的解释。他引用格劳秀斯的话：“亚当在世时，其子女可以通过亚当的恩赐、指定，或某种转让，凭借其个人支配权拥有各自的管辖范围：亚伯有草地牧羊，该隐有田地种粮食，并在挪得之地建了一座城，” [8_9] 。那么很明显的问题是，亚当死后，这两兄弟到底谁是统治者？我们的作者说是该隐。[8_10] 以什么名义呢？“以继承人的名义，作为元祖的继承人——元祖是同族人民的生身父母——他们不但是自己子女的君主，还是他们兄弟的君主”， [8_11] 该隐继承了什么？他继承的不是亚当全部的“个人支配权”，不是亚当拥有的一切，因为我们的作者承认，亚伯从他父亲那里分得部分权力，凭借其“个人支配权拥有自己的草地”。那么亚伯通过个人支配获得的东西就不该属于该隐的支配范围，因为该隐不能对别人私人支配的东西拥有支配权。这样，该隐对其兄弟就没有支配权，于是现在就有两个君主，他所想象的父权也被搁置一边，该隐不能统治他的兄弟：否则，如果尽管亚伯有“个人支配权”，还是服从于该隐，那么不论我们的作者如何反驳，“统治权的最初根据和原则”与“财产权”将没有任何关系。诚然，亚伯确实是先其父而死，但这对他的论点没有意义，因为只要不是该隐的孩子，我们都可以用这点来反对罗伯特爵士，不管谈的是亚伯、塞思，还是亚当其他的后裔。

77．The same inconvenience he runs into about the three sons of Noah, who, as he says, [7_12] “had the whole world divided amongst them by their father”. I ask then, in which of the three we shall f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al power” after Noah's death? If in all three, as our author there seems to say, then it will follow, that regal power is founded in property of land, and follows private dominion, and not in paternal power or natural dominion; and so there is an end of paternal power as the fountain of regal authority and the so much magnified fatherhood quite vanishes If the regal power descended to Shem as eldest, and heir to his father, then “Noah's division of the world by lot to his sons”, or “his ten years’

sailing about the Mediterranean to appoint each son his part", which our author tells of, [7_13] was labour lost; his division of the world to them, was to ill, or to no purpose: for his grant to Cham and Japhet was little worth, if Shem, notwithstanding this grant, as soon as Noah was dead, was to be lord over them. Or, if this grant of private dominion to them, over their assigned territories' were good, here were set up two distinct sorts of power, not subordinate one to the other, with all those inconveniencies which he musters up against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7_14] which I shall set down in his own words, only changing property for people. "All power on earth is either derived or usurper! from the fatherly power, there being no other original to be found of any power whatsoever: for if there should be granted two sorts of power, without any subordination of one to the other, they would be in perpetual strife which should be supreme, for two supremes cannot agree: if the fatherly power be supreme, then the power grounded on private dominion must be subordinate, and depend on it; and if the power grounded on property be supreme, then the fatherly power must submit to it, and cannot be exercised without the licence of the proprietors, which must quite destroy the frame and course of nature." This is his own arguing against two distinct independent powers, which I have set down in his own words, only putting power rising from property, for power of the people; and when he has answered what he himself has urged here against two distinct powers, we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see how, with any tolerable sense, he can derive all regal authority "from the natural and private dominion of Adam," from fatherhood and property together, which are distinct titles, that do not always meet in the same persons; and it is plain, by his own confession, presently separated as soon both as Adam's and Noah's death makes way for succession: though our author frequently in his writings jumbles them together, and omits not to make use of either, where he thinks it will sound

best to his purpose. But the absurdities of this will more fully appear in the next chapter, where we shall examine the ways of conveyance of the sovereignty of Adam to princes that were to reign after him.

77．我们的作者讲到挪亚的三个儿子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他说："他们的父亲把整个世界分配给他们。" [8_12] 那么我就要问，挪亚死后，我们会在哪个儿子身上发现"王权的建立"？如果三个人都有——我们的作者似乎也是这样说的——那么，王权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权之上，这个属于"个人支配权"，而不是"父权"或"自然支配权"；这样一来，父权就不再是王权的来源，我们的作者如此大肆声张的"父权"就此消失了。闪是挪亚的长子、继承人，如果王权传给了他，那么，我们的作者所讲的"挪亚之子抓阄分世界"，和"挪亚十年环游地中海指定儿子们的各自属地"， [8_13] 便全是白费力气；挪亚分配世界给几个孩子，要么引起祸害，要么根本无意义，因为如果挪亚去世之后，不论之前如何分配，闪都要成为他兄弟含和雅弗的君主，这样的话，挪亚之前给含和雅弗的分配承诺便失去价值。或者，假设三人对各自分得的领地享有的"个人支配权"都有效，那么，在他历尽千辛万苦反对"人民的权利" [8_14] 之后，就产生两种互不从属的权力。关于这点，我除了将"人民的权力"换成"财产权"外，其他都引用我们的作者原文："世上的一切权力要么源于父权，要么由篡夺父权而获得，此外找不出任何其他权力来源，原因在于如果同时承认两种互不从属的权力，那么关于哪个是最高权力的争论将永无休止，因为两个最高权力无法共存。假设父权是最高权力，那么基于'个人支配权'的权力就要从属于、依附于它；反之，如果源于财产的权力是最高权力，父权就要归于从属地位，未经财产所有者许可不得行使，这势必破坏自然的安排和进程。"这是我们的作者自己对两种不同的独立权力进行反驳的言论，我除了将"人民的权力"换成"财产权"外，其他都引用原文。当我们的作者对自己极力反对两种不同权力的言论进行答复之后，我们能更明显地看到，他是如何竭尽所能"从亚当个人的和自然的支配权"，即从父权和财产权这两个并不总是集于一身的不同权力

中，推断出王权的。很明显，我们的作者自己也承认，一旦亚当和挪亚过世权力需要有人继承之时，这两个权力就分开了。尽管如此，我们的作者还是经常在他的文章中把两者混在一起，需要的时候，他绝不放过使用其中任何一个的机会。但是这种荒谬在下一章体现得更加明显。下一章，我们将对亚当传授统治权给后世君王的方式加以考察。

[7_1].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22.

[7_2].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108.

[7_3].Patriarcha p. 12.

[7_4].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158.

[7_5].Genesis. iii. 16.

[7_6].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44.

[7_7].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156

[7_8].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10; Patriarcha p. 40.

[7_9].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10.

[7_10].Patriarcha p.19.

[7_11].Patriarcha p.19.

[7_12].Patriarcha p. 13.

[7_13].Patriarcha p. 15

[7_14].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158

[8_1].《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22页。

[8_2].《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08页。

[8_3].《君权论》，第12页。

[8_4].《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58页。

[8_5].《创世记》，第三章第十六节。

[8_6].《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44页。

[8_7].《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56页。

[8_8].在《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10页和《君权论》第40页中，他承认“亚当的儿子们可以根据他们的个人主权拥有不同的管辖范围”。

[8_9].《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10页。

[8_10].《君权论》，第19页。

[8_11].《君权论》，第19页。

[8_12].《君权论》，第13页。

[8_13].《君权论》，第15页。

[8_14].《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58页。

Chapter VIII　Of the Conveyance of Adam's Sovereigns Monarchical Power

第八章　论亚当最高君权的转移

78 . Sir Robert, having not been very happy in any proof he brings for the sovereignty of Adam, is not much more fortunate in conveying it to future princes; who, if his politics be true, must all derive their titles from that first monarch. The ways he has assigned, as they lie scattered up and down in his writings, I will set down in his own words: in his preface he tells us, that “Adam being monarch of the whole world, none of his posterity had any right to possess anything, but by his grant or permission, or by succession from him.” Here he makes two ways of conveyance of anything Adam stood possessed of; and those are grants or succession. Again he says, “All kings either are, or arc to be reputed, the next heirs to those first progenitors, who were at first the natural parents of the whole people” [8_1] —“there cannot be any multitude of men whatsoever but that in it, considered by itself, there is one man amongst them, that in nature hath a right to be the king of all the rest, as being the next heir to Adam” [8_2] . Here in these places inheritance is the only way he allows of conveying monarchical power to princes. In other places he tells us, [8_3] “All power on earth is either derived or usurped from the fatherly power”, [8_4] “All kings that now are, or ever were, are or were either fathers of their people, or heirs of such fathers, or usurpers of the right of such fathers” [8_5] . And here he makes inheritance or usurpation the only way whereby kings come by this original power: but yet he tells us. “This fatherly empire, as it was of itself hereditary, so it was alienable by patent, and seizable by a usurper” [8_6] . So then here

inheritance, grant, or usurpation, will convey it. And last of all, which is most admirable, he tells us, “It skills not which way kings come by their power, whether by election, donation, succession, or by any other means; for it is still the manner of the government by supreme popover that makes them properly kings, and not the means of obtaining their crowns. [8_7] " Which I think is a full answer to all his whole hypothesis and discourse about Adam's royal authority, as the fountain from which all princes were to derive theirs: and he might have spared the trouble of speaking so much as he does, up and down, of heirs and inheritance, if to make anyone properly a king, needs no more but “governing by supreme power, and it matters not by what means he came by it”.

78．罗伯特爵士为亚当的君权提供的任何证据都不算令人满意，在对后世君权继承的讨论上，其结果也未见更好；如果他的政治学说成立，后世君王们就全都必须从最初的统治者那里获得权力。我们的作者指定的权力转让方式，散见于其著作各处，在此我还是引用原文。他在序言里告诉我们：“亚当是整个世界的君王，他的后裔无权占有任何东西，除非是亚当授予、准许或从他那里继承。”在这句话中，他提出了亚当转让自己所有物的两种方式，即“授予”或“继承”。我们的作者还说：“人类最初的祖先生育了全人类，所有君王都被认为或将被认为是祖先之后的继承人” [9_1] ，“一个族群，无论人数多少，其中必有一人被认为是亚当之后的继承人，此人自然拥有做其他人的君主的权利” [9_2] 。在这两处，“继承”是我们的作者唯一承认的君权转让方式。我们的作者在其他地方告诉我们：“地球上一切权力要么源于父权，要么是篡夺父权而来” [9_3] ，“所有国王，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不是人民的父亲或这些父亲的继承人，就是这些父亲权力的篡夺者” [9_4] 。在这里，他把“继承”和“篡夺”视为获取这种最根本权力的仅有的两种方式，但是他说：“这种父系的帝国，其本身是世袭的，所以可以经准许转让，也可以通过篡夺获取。” [9_5] 所以在这儿“继承”、“授予”，或“篡夺”可实现王权转移。最让人惊叹的是他最

后还告诉我们“不论是选举、授予、继承，还是任何其他获得王权的方式，这些都无意义，因为真正使他们成为君王的不是获取王位的方式，而是用最高权力进行统治的方式” [9_6] 。我们的作者的一切有关“亚当君权是后世君王权力来源”的假说和言论，我认为，用这句话可以充分答复。我们的作者大可不必在他书中到处就“继承人”、“继承”大讲特讲，既然真正当上君王和获得权力的方式不相关，需要的只是“用最高权力去统治，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得到这个权力。”

79 . By this notable way, our author may make Oliver as properly king as anyone else he could think of； and had he had the happiness to live under Massaniello's government, he could not by this his own rule have forborne to have done homage to him, with “O king live forever”, since the manner of his government by supreme power made him properly king, who was but the day before properly a fisherman. And if Don Quixote had taught his squire to govern with supreme authority, our author no doubt could have made a most loyal subject in Sancho Pancha's island; and he must needs have deserved some preferment in such governments, since I think he is the first politician who, pretending to settle government upon its true basis, and to establish the thrones of lawful princes, ever told the world, that he was “properly a king, whose manner of government was by supreme power, by what means soever he obtained it”; which in plain English is to say, that regal and supreme power is properly and truly his, who can by any means seize upon it; and if this be to be properly a king, I wonder how he came to think of, or where he will find, a usurper.

79 . 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我们的作者可以让奥利弗或任何一个他能想到的人当上真正的国王； [9_7] 如果他有幸生活在马萨尼罗的政府之下，根据他自己的规定推断，他一定会忍不住对马萨尼罗表达自己

的敬仰之情，对他说“我王万岁”，因为正是他“以最高权力统治的方式”让前一天还是渔夫的马萨尼罗第二天成了真正的君王。如果堂吉诃德教导他的随从用最高权力进行统治，我们的作者一定可以成为桑舒服·潘沙所居住的岛屿上的一位十分忠诚的臣民，并且他还应当被这个政府委以重任，因为在我看来，他当属首个这样的政治家，既假装声称要把政府建立在真正的基础之上，建立合法的王位，同时又告诉世界“一个真正的君主只需要用最高权力进行统治，至于其获取权力的方式如何可以不论”。他的这些话，简单地说，就是不论使用什么方法，谁获取了王权和最高权力，这权力就该真正、正当地归属于他。如果这样就可正当地成为君王，我不知道他之前是怎么想到、在哪找到“篡夺者”这个词的。

80 . This is so strange a doctrine, that the surprise of it hath made me pass by, without their due reflection, the contradictions he runs into, by making sometimes inheritance alone, sometimes only grant or inheritance, sometimes only inheritance or usurpation, sometimes all these three, and at last election, or any other means, added to them, the ways whereby Adam's royal authority, that is, his right to supreme rule, could be conveyed down to future kings and governors, so as to give them a title to the obedience and subjection of the people. But these contradictions lie so open, that the very reading of our author's own words will discover them to any ordinary understanding; and though what I have quoted out of him (with abundance more of the same strain and coherence, which might be found in him) might well excuse me from any farther treble in this argument, yet having proposed to myself to examine the main parts of his doctrine, I shall a little more particularly consider how inheritance, grant, usurpation, or election, can any way make out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upon his principles; or derive to anyone a right of empire, from this regal authority of Adam, had it been ever so well proved that he had been absolute

monarch, and lord of the whole world.

80．这个奇怪的主张让我很吃惊，所以对于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我都只匆匆掠过，没有做出适合的反应。这些矛盾包括他认为亚当进行最高统治的王权传给后世君王和统治者，他们得到这个权力才能令人民臣服，作者这里所讲的转移方式有时是“单靠继承”，有时是只能依靠“授予”或“继承”，有时是只能依靠“继承”或“篡夺”，有时三种方式皆有，最后还可能是“选举”或任何其他方式。这些矛盾实在是很明显，任何一个有普通理解能力的人只要读一读我们的作者的话都能发现。我所引用的他的话（较他之前所说更为连贯，语调一致）虽然足以让我大可不必在论证上多费工夫，不过，既然我要考察他学说的主要部分，我还是要更为仔细地考虑一下，看看“继承”、“授予”、“篡夺”或“选举”依照他的原理是如何在世界上建立政府；或如何从亚当的王权中获取统治一个帝国的权力，毕竟作者对于亚当曾经是全世界的绝对君主和主人这一点论证得如此充分。

[8_1].Patriarcha p. 19.

[8_2].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53.

[8_3].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155.

[8_4].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158.

[8_5].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53.

[8_6].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190.

[8_7].Patriarcha p. 100.

[9_1].《君权论》，第19页。

[9_2].《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53页。

[9_3].《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55页。

[9_4].《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58页。

[9_5].《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53页。

[9_6].《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90页。

[9_7].《君权论》，第100页。

Chapter IX　Of Monarchy by Inheritance from Adam

第九章　论从亚当继承下来的君主制

81 . Though it be ever so plain, that there ought to be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nay, should all men be of our author's mind, that divine appointment had ordained it to be monarchical; yet, since men cannot obey anything that cannot command; and ideas of government in the fancy, though ever so perfect, though ever so right, cannot give laws, nor prescribe rules to the actions of men; it would be of no behoof for the settling of order, and establishment of government in its exercise and use amongst men, unless there were a way also taught how to know the person, to whom it belonged to have this power, and exercise this dominion over others. It is in vain then to talk of subjection and obedience without telling us whom we are to obey; for where I ever so fully persuaded that there ought to be magistracy and rule in the world; yet I am nevertheless at liberty still, till it appears who is the person that hath right to my obedience; since, if there be no marks to know him by, and distinguish him that hath right to rule from other men, it may be myself, as well as any other; and therefore, though submission to government be every one's duty, yet since that signifies nothing but submitting to the direction and laws of such men as have authority to command, it is not enough to make a man a subject, to convince him that there is regal power in the world; but there must be ways of designing, and knowing the person to whom this regal power of right belongs; and a man can never be obliged in conscience to submit to any power, unless he can be satisfied who is the person who has a right to exercise that power over him. If this were not so, there would b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pirates and lawful princes; he that has force is without any more ado to be obeyed, and crowns and scepters would become the inheritance only of violence and rapine. Men too might as often and as innocently change their governors, as they do their physicians, if the person cannot be known who has a right to direct me, and whose prescriptions I am bound to follow. To settle therefore men's consciences, under an obligation to obedience,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y know not only that there is a power somewhere in the world, but the person who by right is vested with this power over them.

81．虽然世界上应该有政府是很明显的事情，虽然所有人都同意我们的作者的观点，认为神的旨意规定政府为君主制；但是，因为人类不能听从无法下命令的事物；想象中的政府再完美、再正确也不能颁布法律，制定人类行为规范；那么，按照它的意志维持秩序、确立政府以行使政权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有一种办法，能教人们去认识那位掌握这个权力并行使这个支配权力的人。如果不告诉我们该服从谁，那么讲臣服和顺从是白费力气：因为即使我已经完全接受世界上应该有统治机构和法规；但在那位具有统治权的人出现之前，我还是自由的；反正又没有什么标志能让人识别出他，将拥有统治权的他和别人区别开来，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这个人，包括我自己。因此，服从政府虽然是每个人的义务，但由于那仅仅意味着对一个拥有支配权力的人的服从，服从他的指导和法律，因此要想让一个人称臣，让他相信世上有王权，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方法指定某人拥有王权，有方法让他为人所知；一个人如果都不知道是谁对他拥有支配权，他从内心上是绝不愿意服从任何权力的。否则，海盗和合法君王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强有力的人可以轻易让人服从，皇冠和节杖只会是他暴力和争夺的遗产。如果人们不知道有权支配自己的是谁，要听从谁的指示，那么，他们就可以经常随意地更换自己的统治者，就像给自己换医生一样。所以为了让人们从心底上认为服从是他们的义务，就必须让他们既知道这世上存在这么一种权力，又知道是谁被赋予了这个支配他们的权力。

82．How successful our author has been in his attempts to set up a monarchical absolute power in Adam, the reader may judge by what has been already said; but were that absolute monarchy as clear as our author would desire it, as I presume it is the contrary, yet it could be of no use to the government of mankind now in the world, unless he also make out these two things.

82．我们的作者一直试图在亚当身上建立一种绝对君权，成就有多显著，读者可以通过他讲过的话作判断；但即使这个绝对君权如我们的作者期望的那样十分清楚（我认为恰好相反），这对现世人类政府也毫无作用，除非他能同时证明以下两点。

First, that this power of Adam was not to end with him, but was upon his decease conveyed entire to some other person, and so on to posterity.

第一，亚当的权力不随他的过世而终止，而是在他过世之后全部转让给某一个人，后世以此类推。

Secondly, that the princes and rulers now on earth are possessed of this power of Adam, by a right way of conveyance derived to them.

第二，人类现世的君王和统治者都拥有亚当的这种权力，并且是通过正当转让的方式获得的。

83 . If the first of these fails, the power of Adam, were it ever so great, ever so certain, will signify nothing to the present government and societies in the world; but we must seek out some other original of power for the government of polities than this of Adam, or else there will be none at all in the world. If the latter fail, it will destroy the authority of the present governors, and absolve the people from subjection to them, since they, having no better claim than others to that power, which is alone the fountain of all authority, can have no title to rule over them.

83．如果第一点不成立，亚当的权力就算再大、再确定无疑，它对现世政府和社会也没有意义；我们就得为国家政府寻找亚当权力之外的其他权力来源，否则这世上就根本没有政府存在了。如果第二点不成立，那么现世统治者的权威以及人民对他们的臣服将不复存在，因为对于这种作为一切权威唯一来源的权力，统治者们也解释不清为什么就该他们拥有，也就无法以此名义统治人民。

84 . Our author, having fancied an absolute sovereignty in Adam, mentions several ways of its conveyance to princes, that were to be his successors; but that which he chiefly insists on is that of inheritance, which occurs so often in his several discourses; and I having in the foregoing chapter quoted several of these passages, I shall not need here again to repeat them. This sovereignty he erects, as has been said, upon a double foundation, viz., that of property, and that of fatherhood. One was the right he was supposed to have in all creatures, a right to possess the earth with the beasts, and other inferior ranks of things in it, for his private use, exclusive of all other men. The other was the right he was supposed to have to rule and govern men, all the rest of mankind.

84．我们的作者先是在亚当身上虚构出一种绝对统治权，然后提出几种把权力转让给后世君王的方式；在这几种方式中他尤其强调的是“继承”这在他几篇文章中都有体现；关于这个，我在前面一章已经引用过几段，所以在此就不再赘述了。前面已经说过，他把这种统治权建立在“财产权”和“父权”这两个基础之上。“财产权”被认为是对万物的权力，即占有土地、地上的野兽以及其他低等生物的权力都为亚当一人所用，他人不得分享。“父权”被认为是亚当享有的统治和管理其余所有人的权力。

85．In both of these rights, there being supposed an exclusion of all other men, it must be upon some reason peculiar to Adam, that they must both be founded.

85．这两项权力，亚当以外的人都被认为不得享有，那亚当拥有这两种权力，一定有其特殊的理由，而这两个理由我们也应该能找到。

That of his property, our author supposes to rise from God's immediate donation, [9_1] and that of fatherhood from the act of begetting. Now in all inheritance, if the heir succeeds not to the reason upon which his father's right was founded, he cannot succeed to the right which followeth from it. For example, Adam had a right of property in the creatures upon the donation and grant of God Almighty, who was lord and proprietor of them all: let this be so as our author tells us, yet upon his death his heir can have no title to them, no such right of property in them, unless the same reason, viz., God's donation, vested a right in the heir too: for if Adam could have had no property in, nor use of the creatures, without this positive donation from God, and this donation were

only personally to Adam, his heir could have no right by it; but upon his death it must revert to God, the lord and owner again;for positive grants give no title farther than the express words convey it, and by which only it is held. And thus, if, as our author himself contends, that donation, [9_2] were made only to Adam personally, his heir could not succeed to his property in the creatures; and if it were a donation to any but Adam, let it be shown that it was to his heir in our author's sense, i.e., to one of his children, exclusive of all the rest.

关于“财产权”，我们的作者认为是上帝对亚当的恩赐； [10_1] 关于“父权”，我们的作者认为是亚当由于生育行为所得。那么，就一切继承而言，如果继承人无法继承他父亲权利来源的依据，他就不能获得以此为根据的权利。比如，就算如我们的作者所说，万能的上帝——万物的主人和所有者，赐予亚当支配万物的权利，但是，亚当去世后，除非其后人同样受到上帝恩赐，否则该继承人就无法拥有这种支配万物的权利：因为如果必须由上帝恩赐，亚当才能占有并使用万物，并且这个恩赐只限于亚当一人，那么根据这个限定，亚当的后人没有这个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在亚当死后必须全部归还万物的主人和所有者——上帝：因为正式授予的权利不能超过其明文规定的范围，这种权利也只依据该规定享有。所以，如果像我们的作者主张的那样，上帝的恩赐 [10_2] 只是针对亚当个人，那亚当的后人就不能继承他支配万物的权力。如果上帝的恩赐针对的是亚当以外的任何一个人，那就应指明是赐予其继承人，按我们的作者的意思即亚当孩子中的一个，其他的都排除在外。

86 . But not to follow our author too far out of the way, the plain of the case is this: God having made man, and planted in him, as in all other animals, a strong desire of self-preservation, and furnished the world with things fit for food and raiment, and other

necessaries of life, subservient to his design, that man should live and abide for some time up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and not that so curious and wonderful a piece of workmanship, by his own negligence, or want of necessaries, should perish again, presently after a few moments continuance; God, I say, having made man and the world thus, spoke to him, (that is) directed him by his senses and reason, as he did the inferior animals by their sense and Instinct, which were serviceable for his subsistence, and given him as the means of his preservation; and therefore I could not, but before these words were pronounced, [9_3] (if they must be understood literally to have been spoken) and without any such verbal donation, man had a right to an use of the creatures, by the will and grant of God; for the desire, strong desire, of preserving his life and being, having been planted in him as a principle of action by God himself, reason, “which was the voice of God in him”, could not but teach him and assure him that pursuing that natural inclination he had to preserve his being, he followed the will of his Maker, and therefore had a right to make use of those creatures which by his reason or senses he could discover would be serviceable thereunto. And thus man's property in the creatures was founded upon the right he had to make use of those things that were necessary or useful to his being.

86．然而，我们不要跟着我们的作者离题太远，事情很明显：上帝创造了人类，并在他们身上种下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欲望，如同他在其他动物身上所做的一样。上帝还在世界上为人类准备了衣食及其他生活所需的东西，正是由于上帝的这些安排，人类才得以在地球上存活并生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不至令这件如此奇妙的作品因为他的疏忽或缺乏生活必需品，短暂存在后便就此消亡；上帝将人类和世界造成这样之后，就对人类进行指示，让他们通过感官和理性维持生存和保护自我，对于低等动物则让他们依靠感官和本能。因此，在

上帝这些话还未宣布之前 [10_3] （如果一定要将这些话理解成以文字的形式说出），甚至连这文字形式的“恩赐”都没有的时候，我敢确定，依照上帝的旨意和特许，人类已经有了使用万物的权利：因为上帝已经把这种欲望，这种强烈的生存和自我保护欲望，根种在人类身上，支配他们的行为；他们身上的理性，亦即“上帝的声音”，只会教他们并让他们坚信要按照人类自我保护的自然欲望行事，这是顺从上帝的旨意。因此，对于那些通过理性和感官发现的可以为人所用的东西，人类有权使用。这样看来，人类为了维持生存而使用必需、有用之物的权利，才是人类对万物的“财产权”的基础。

87 . This being the reason and foundation of Adam's property, gave the same title on the same ground to all his children, not only after his death, but in his life time: so that here was no privilege of his heir above his other children, which could exclude them from an equal right to the use of the inferior creatures, for the comfortable preservation of their beings, which is all the property man hath in them; and so Adam's sovereignty built on property, or, as our author calls it, private dominion, comes to nothing. Every man had a right to the creatures by the same title Adam had, viz., by the right everyone had to take care of and provide for their subsistence; and thus men had a right in common, Adam's children in common with him. But if anyone had begun, and made himself a property in any particular thing, (which how he, or anyone else, could do, shall be shown in another place) that thing, that possession, if he disposed not otherwise of it by his positive grant, descended naturally to his children, and they had a right to succeed to it and possess it.

87 . 亚当“财产权”的这种依据和基础，他的孩子也有，据此他们也有同样的权利，不论亚当在世与否：在亚当所有的孩子中，他的继

承人没有凌驾于其兄弟之上的特权，这种特权能让其兄弟失去享有平等利用低等生物以充分维持生存的权利，这种权利就是人类对万物享有的“财产权”，这样一来，建立在财产权之上的亚当的统治权，或者，按照我们的作者的说法，亚当的个人支配权，就化为乌有。人人都有保护自我和维持生存的权利，于是人人和亚当一样，都可以支配万物。这种权利凡人皆有，亚当的孩子和亚当同样享有。但是，一开始如果有人把某样东西占为己有（此人，或其他任何一个人，是如何做到的，将在别处说明），那么，这样物品，这件财产，如果没有经过此人正式授予而另做其他处理的话，就自然传给他的孩子，他们有权继承和占有。

88 . It might reasonably be asked here, how come children by this right of possessing, before any other, the properties of their parent's upon their decease? For it being personally the parents, when they die, without actually transferring their right to another, why does it not return again to the common stock of mankind? It perhaps be answered, that common consent hath disposed of it to their children. Common practice, we see indeed, does so dispose of it; but we cannot say that it is the common consent of mankind; for that hath never been asked, nor actually given; and it common tacit consent hath established it, it would make but a positive, and not a natural right of children to inherit the goods of their parents; but where the practice is universal, it is reasonable to think the cause is natural. The ground then I think to be this: the first and strongest desire God planted in men, and wrought into the very principles of their nature, being that of self-preservation, t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a right to the creatures for the particular support and use of each individual person himself. But, next to this, God planted in men a strong desire also of propagating their kind, and continuing themselves in their posterity; and this gives children a title to share in the property of their parents, and a right to inherit their

possessions. Men are not proprietors of what they have, merely for themselves; their children have a title to part of it, and have their kind of right joined with their parents in the possession, which comes to be wholly theirs, when death, having put an end to their parents' use of it, hath taken them from their possessions; and this eve call inheritance men being by a like obligation bound to preserve what they have begotten, as to preserve themselves, their issue come to have a right in the goods they are possessed of. That children have such a right is plain from the laws of God; and that men are convinced that children have surly a right is evident from the law of the land; both which laws require parents to provide for their children.

88．至此我们有理由问一问，为什么在父母去世之后，他们的孩子就优先获得了他们的财产权呢？父母在过世时并没有把这个权利转让给谁，为什么这个权利不归还人类共有？也许有人会说，公众已经同意把它让给他们的孩子了。公众的做法，就如我们看到的，确实是那样；但我们不能说那是全人类一致同意的做法，因为没人问过，也没谁得到过；如果公众已经默许孩子有优先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那这也应该是一种人为的，而不是自然的权利：但在这种行为十分普遍的地方，人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权利是自然的了。我想依据应该是这样的：上帝根植在人类身上、揉进其本性中最原始、最强烈的需求就是自我保护，这是每一个人为保生存享有支配万物权利的基础。但是，紧接着上帝又在人类身上根植下繁衍、延续后代的强烈需求，这就赋予了孩子分享和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人类拥有财产，不仅是为了自己，他们的儿女对之也享有部分权利，这部分权利和父母的连在一起。父母过世后，不再占有、使用财产，财产于是全部为儿女占有，全部权利归他们所有，这就是继承，人类像履行责任一样保护自己的孩子，如同保护自己，于是孩子就有了分享父母财产的权利。从上帝的法则来看，孩子享有这种权利是很明显的，人们也深信，从国家法律来看这依然毋庸置疑，上帝和国家都规定父母要供养孩子。

89 . For children being by the course of nature born weak, and unable to provide for themselves, they have by the appointment of God himself, who hath thus ordered the course of nature, a right to be nourished and maintained by their parents; nay, a right not only to a bare subsistence, but to the conveniences and comforts of life, as far as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parents can afford it. Hence it comes, that when their parents leave the world, and so the care due to their children ceases, the effects of it are to extend as far as possibly they can, and the provisions they have made in their lifetime are understood to be intended, as nature requires they should, for their children, whom, after themselves, they are bound to provide for: though the dying parents, by express words, declare nothing about them, nature appoints the descent of their property to their children, who thus come to have a title, and natural right of inheritance to their fathers' goods, which the rest of mankind cannot pretend to.

89．因为在自然过程中，孩子生来柔弱，无法养活自己，上帝因此设计了自然过程，给予孩子权利由父母抚养长大；这不仅仅指维持生存的权利，还包括享受父母可提供的一切便利和舒适条件的权利。因此，当父母离世之时，他们对孩子的照顾停止，但这种照顾产生的影响会尽可能长久的延续下去，父母留下的东西，根据自然要求，也应当传给儿女，因为父母除了供养自己以外，还必须供养子女：即使父母临死之时没有用言语说明，按自然规定他们的财产理应由子女继承。子女于是便有了继承父亲财产的资格和自然权利，这是其他人不能妄想的。

90 . Were it not for this right of being nourished and maintained by their parents, which God and nature has given to

children, and obliged parents to as a duty, it would be reasonable that the father should inherit the estate of his son, and be preferred in the inheritance before his grandchild; for to the grandfather there is due a long score of care and expenses laid out upon the breeding and education of his son, which one would think in justice ought to be paid. But that haying teen done in obedience to the same law, whereby he received nourishment and education from his own parents; this score of education, received from a man's father, is paid by taking care and providing for his own children; is paid, I say, as much as is required of payment by alteration of property, unless present necessity of the parents require a return of goods for their necessary support and subsistence; for we are not now speaking of that reverence, acknowledgment, respect, and honour, that is always due from children to their parents; but of possessions and commodities of life valuable by money. But though it be incumbent on parents to bring up and provide for their children, yet this debt to their children does not quite cancel the score to their parents; but only is made by nature preferable to it: for the debt a man owes his father takes place, and gives the father a right to inherit the son's goods, where, for want of issue, the right of issue doth not exclude that title; and therefore a man having a right to be maintained by his children, where he needs it, and to enjoy also the comforts of life from them, when the necessary provision due to them end their children will afford it; if his son die without issue, the father has a right in nature to possess his goods and inherit his estate, (whatever the municipal laws of some countries may absurdly direct otherwise); and so again his children and their issue from him; or, for want of such, his father and his issue. But where no such are to be found, i.e. no kindred, there we see the possessions of a private man revert to the community, and so in politic societies come into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magistrate; but in the state of nature become again perfectly common, nobody having

a right to inherit them: nor can anyone have a property in them, otherwise than in any other things common by nature; of which I shall speak in its due place.

90．如果不是上帝和自然给予子女被父母抚养的权利，给予父母抚养子女的义务，那么说，一个人的父亲应该继承儿子的遗产，而且应该先于他的孙子继承，这应当是合理的。因为他的父亲曾经花大量的心血抚养、教育他，按公道也应有所回报。但是父亲也是根据同一法则，被祖父母抚养、教育的。一个人在父母处接受的教养，就应该以照顾和养育下一代来偿还。这种偿还通过财产变更的方式实现，要多少就得给多少，除非父母为了维持目前生活，要求归还财物；因为我们在这儿讲的不是儿女一直以来对父母的孝敬、感激和尊崇，而是以金钱来计算的财产和生活用品。但是，虽然人们有义务抚养自己的子女，这也不能取消他们对自己父母的责任，只不过按自然要求更偏重前者，因为一个人一旦欠他父亲的，那么，如果他没有子嗣，他的父亲就有权继承他的财产，这种情况下子女权利也不能排除这个权利。所以，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应当享受由子女抚养的权利，只要子女和孙辈条件允许，他还有权利享受舒适的生活。如果他的孩子去世时没有子嗣，他就自然享受继承孩子物品和财产的权利（尽管有些国家的国法可能违背常理另有规定）；之后再由他的其他子女及其子嗣继承，如果这些人都没有的话，那就由他父亲和他父亲的其他孩子继承。但是，如果他连一个这样的血亲也没有，那么，私人财产将回归社会，在政治社会就落入公共官员之手，在自然状态下再一次变成完全公有，任何人都无权继承。它就像自然共有物一样，不被任何人占为己有。关于这一点，我到适当的地方再讲。

91．I have been the larger, in showing upon what ground children have a right to succeed to the possession of their fathers' properties, not only because by it, it will appear, that if Adam had a property (a titular, insignificant, useless property; for it could be no

better, for he was bound to nourish and maintain his children and posterity out of it) in the whole earth and its product; yet all his children coming to have, by the law of nature, and right of inheritance, a joint title, and a right of property in it after his death, it could convey no right of sovereignty to anyone of his posterity over the rest; since everyone having a right of inheritance to his portion, they might enjoy their inheritance, or any part of it, in common, or share it, or some parts of it, by division, as it best liked them. But no one could pretend to the whole inheritance, or any sovereignty supposed to accompany it; since a right of inheritance gave everyone of the rest, as well as anyone, a title to share in the goods of his father. Not only upon this account, I say, have I been so particular in examining the reason of children's inheriting the property of their fathers, but also because it will give us farther light in the inheritance of rule and power, which in countries where their particular municipal laws give the whole possession of land entirely to the first-born, and descent of power has gone so to men by this custom, that some have been apt to be deceived into an opinion, that there was a natural or divine right of primogeniture to both estate and power; and that the inheritance of both rule over men, and property in things, sprang from the same original, and were to descend by the same rules.

91．我用较长的篇幅讨论孩子为什么有权继承父亲的财产，不单是因为从中我们会发现以下情况：亚当对这个世界及其物品拥有所有权（一种名义上的、无意义、无用的财产权；因为他必须用这些东西来抚养后代，维持他们的生存，不过如此而已）；但根据自然法则和继承权，亚当的孩子有权与他一起共享财产，并在亚当过世之时获得财产权。亚当后裔所享有的这种财产权，没有赋予他们其中的任何人统治他人的权利，他们都可以继承到自己的那部分，他们可以选择共同或分摊享受各自的全部或部分，他们认为怎样做最合适就怎样做。

但是没有人能妄想继承全部财产，或妄想拥有随之存在的统治权。因为继承权赋予所有人分享其父亲财产的权利。我仔细考察孩子为什么能继承父亲财产，不单是因为要说明上述情况，同时还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把“统治”和“权力”的继承弄得更明白。有些国家法律规定土地所有权全部由长子继承，权力的传承也依照这个习俗。于是有人就为这些现象所蒙蔽，认为长子继承“财产”和“权力”是自然规定或神的旨意，认为对人的统治权和对事物的财产权，来源相同，并根据同一法则传承下去。

92．Property, whose original is from the right a man has to use any of the inferior creatures, for the subsistence and comfort of his life, is for the benefit and sole advantage of the proprietor, so that he may even destroy the thing, that he has property in by his use of it, where need requires; but government being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every man's right and property, by preserving him from the violence or injury of others, is for the good of the governed; for the magistrate's sword being for a “terror to evil doers”, and by that terror to enforce men to observe the positive laws of the society, made conformable to the laws of nature, for the public good, i.e., the good of every particular member of that society, as far as by common rules it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sword is not given the magistrate for his own good alone.

92．人利用低等生物以维持生存和舒适生活的权利，是财产权的起源。财产只为其所有者提供利益和好处，必要的时候，为了使用该物品人甚至可以毁坏它。但是，统治权却不同，它要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财产，保护他免受他人的暴力或侵犯，它要维护被统治者的利益：统治者的剑是“为恶之人的震慑物”，它能迫使人们遵守社会明文法律。这些法律是依自然法则制定，为公众服务的，也就是说，为公共法规管理范围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服务的。统治者的剑不只是为他

个人谋利益。

93 . Children, therefore, as has been showed, by the dependence they have on their parents for subsistence, have a right of inheritance to their fathers' property, as that which belongs to them for their proper good and behoof, and therefore are fitly termed goods, wherein the firstborn has not a sole or peculiar right by any law of God and nature, the younger children having an equal title with him, founded on that right they all have to maintenance, support and comfort from their parents, and on nothing else. But government being for the benefit of the governed, and not the sole advantage of the governors, (but only for theirs with the rest, as they make a part of that politic body, each of whose parts and members are taken care of, and directed in its peculiar functions for the good of the whole, by the laws of society) cannot be inherited by the same title that children have to the goods of their father. The right a son has to be maintained and provided with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es of life out of his father's stock, gives him a right to succeed to his father's property for his own good; but this can give him no right to succeed also to the rule which his father had over other men. All that a child has right to claim from his father is nourishment and education, and the things nature furnishes for the support of life; but he has no right to demand rule or dominion from him: he can subsist and receive from him the portion of good things and advantages of education naturally due to him, without empire and dominion. That (if his father hath any) was vested in him, for the good and behoof of others: and therefore the son cannot claim or inherit it by a title, which is founded wholly on his own private good and advantage.

93．前面讲过，孩子因为依靠父母养育，因而有权继承父亲的财产。这些财产是为了他们的好处（good）和利益才为其所有，因此称为物品（goods）很合适。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上帝和自然的任何法则，长子都不具有独享或特殊的权利，他的弟兄和他一样，都是因为依靠父母养育、扶持、和提供舒适生活而获得财产权，仅此而已。但“统治权”是为被统治者谋福利的，不是仅为统治者谋利益。（但仅仅是为了包括他们一起的所有人，因为他们是政治团体的一部分，作为政治团体的部分和成员受到政府照顾，并按照社会法律规定恪尽职守，为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人服务。）因此“统治权”不能像孩子继承父亲的财产那样被人继承。儿子有权依靠父亲的财产维持生存和生活便利，这种权利能赋予他为了自身利益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利，但是不能赋予他继承其父亲统治他人的权利。孩子有权要求父亲对其进行抚养和教育，提供维持生活的自然物品，但是他没有权利向他父亲索要“统治权”或“支配权”：他可以无需“帝国”和“统治权”，从他父亲那儿获得生活物品并接受教育的。如果将“帝国”和“统治权”（假设他父亲拥有的话）转交给他，为的是他人的利益和需求，所以，儿子不能完全凭借一种基于个人利益和需求的权利，索要或继承父亲的“帝国”和“统治权”。

94．We must know how the first ruler, from whom anyone claims, came by his authority, upon what ground any one has empire, what his title is to it, before we can know who has a right to succeed him in it, and inherit it from him: if the agreement and consent of men first gave a scepter into anyone's hand, or put a crown on his head, that also must direct its descent and conveyance; for the same authority, that made the first a lawful ruler, must make the second too, and so give right of succession: in this case inheritance, or primogeniture, can in itself have no right, no pretense to it, any farther than that consent, which established the form of the government, hath so settled the succession. And thus we see the succession of crowns, in several countries, places it

on different heads, and he comes by right of succession to be a prince in one place, who would be a subject in another.

94．对于其他人向其索要权利的第一位的统治者，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他的权力由何而来，他依据什么建立帝国，他有何资格，然后，我们才能知道谁有权利接替他，继承他的权力。如果最初是人们同意和认可把节杖和王冠交给某人，那么这也应该是指定王位传承、转让的办法，因为能造就第一个合法统治者的权力，必定可以造就第二个，这样一来也就有了王位继承权。在这种情况下，继承权，或者长子继承权本身都不能成为继承王位的权利或口实。唯有人们的一致认可，才能决定王位的接替，因为是它确定了政府的形式。所以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国家，王冠会落在不同人的头上，在一个国家依法成为国王的人，在另一个国家可能会是臣民。

95．If God, by his positive grant and revealed declaration, first gave rule and dominion to any man, he that will claim by that title, must have the same positive grant of God for his succession: for if that has not directed the course of its descent and conveyance clown to others, nobody can succeed to this title of the first ruler. Children have no right of inheritance to this, and primogeniture can lay no claim to it, unless God, the Author of this constitution, hath so ordained it. Thus we see the pretensions of Saul's family, who received his crown from the immediate appointment of God, ended with his reign; and David, by the same title that Saul reigned, viz., God's appointment, succeeded in his throne, to the exclusion of Jonathan, and all pretensions of paternal inheritance; and if Solomon had a right to succeed his father, it must be by some other title than that of primogeniture. A cadet, or sister's son, must have the preference in succession, if he has the same title the first lawful prince had; and in dominion that has its foundation only in the

positive appointment of God himself, Benjamin, the youngest, must have the inheritance of the crown, if God so direct, as well as one of that tribe had the first possession.

95．如果上帝通过正式授予和明确宣布，将“统治权”和“支配权”交给某人，那么，要接替王位的人，必须同样由上帝正式授予其继承权；如果上帝没有指明王位传承和转让的方式，那就没有人可以接替第一位的统治者。他的儿女无权继承，长子继承制也没有用，除非制定这些制度的上帝有规定他们可以。因此让我们来看看扫罗（以色列第一位国王）的例子吧，他的王位是由上帝直接授予的，他的统治结束以后，他家族的权力也就自此终止。大卫（以色列第二位国王）和扫罗一样，也是由上帝亲自指定，接替了扫罗的王位。扫罗的长子约拿单被排除在外，无权继承他父亲的一切：如果大卫之子所罗门有权接替他父亲的王位，那一定是基于其他权利，绝对不是基于长子继承权。如果弟弟妹妹的孩子和第一位合法君主有同样的资格，那么在王位接替上他们应该有优先权。在“支配权”只建立在上帝亲自正式指定的基础上时，如果上帝如此指明，雅各的幼子本杰明本杰明就和同族中最先获得该权利的人一样，势必登上王位。

96．If paternal right, the act of begetting, give a man rule and dominion, inheritance or primogeniture can give no title, for he that cannot succeed to his father's title, which was begetting, cannot succeed to that power over his brethren, which his father had by paternal right over them. But of this I shall have occasion to say more in another place. This is plain in the meantime, that any government, whether supposed to be at first founded in paternal right, consent of the people, or the positive appointment of God himself, which can supersede either of the other, and so begin a new government upon a new foundation; I say, any government began upon either of these, can by right of succession come to those

only, who have the title of him they succeed to: power founded on contract can descend only to him who has right by that contract; power founded on begetting, he only can have that begets; and power founded on the positive grant or donation of God, he only can have by right of succession to whom that grant directs it.

96．如果“父权”、“生育行为”赋予一个人“统治权”和“支配权”，这些权力就不能通过继承或长子继承获得。因为不能继承父亲生育行为的人也无法继承统治其弟兄的权力，这是他父亲基于父权才有的权力。关于这点，我还会在其他地方再加说明。同时，很明显的是，任何最初建立的政府，不论它是基于“父权”、“一致的民意”，还是基于“上帝的明确指定”，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取代另一个，成为一个新建政府的新的基础。我的意思是说，任何依此新建的政府，根据继承权规定，只能传给有相同权利的人：这种根据契约建立的权力，只能传给依此契约享有该权力的人：因生育获得的权力只能归生育者所有；由上帝正式授予或恩赐的权力，只能由上帝指定的人来继承。

97．From what I have said, I think this is clear that a right to the use of the creatures, being founded originally in the right a man has to subsist and enjoy the conveniences of life; and the natural right children have to inherit the goods of their parents being founded in the right they have to the same subsistence and commodities of life, out of the stock of their parents, who are therefore taught by natural love and tenderness to provide for them, as a part of themselves; and all this being only for the good of the proprietor or heir; it can be no reason for children's inheriting of rule and dominion, which has another original and a different end. Nor can primogeniture have any pretense to a right of solely inheriting either property or power, as we shall, in its due place, see more fully. It is enough to have showed here, that Adam's property

or private dominion could not convey any sovereignty or rule to his heir, who not having a right to inherit all his father's possessions, could not thereby come to have any sovereignty over his brethren; and therefore, if any sovereignty on account of his property had been vested in Adam, which in truth there was not, yet it would have died with him.

97．从我上述文字来看，我想以下几点应该是很清楚的了：人们使用万物的权利，源于人类拥有的维持生存和生活便利的权利；孩子自然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源于他们对父母积聚的生存和生活物资享有的权利，他们的父母在自然慈爱的教导下，把子女当成自己的一部分来抚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所有者和继承者的利益；而“统治权”和“支配权”的根源和目的与此都不相同，因此上述财产继承依据不能成为子女对父母“统治权”和“支配权”的继承理由。长子继承权也不能成为独自继承财产或权力的依据，这点在适当的地方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在这里，只要说明亚当的“财产权”或“个人支配权”不能把任何统治或管理权传给他的后嗣就够了。亚当的后嗣无权继承父亲的一切，也就无权支配他的弟兄。因此，即使亚当因为其财产获取了某些统治权——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他的这些统治权也会随着他的去世而终止。

98．As Adam's sovereignty, if, by virtue of being proprietor of the world, he had any authority over men, could not have been inherited by any of his children over the rest, because they had the same title to divide the inheritance, and every one had a right to a portion of his father's possessions. So neither could Adam's sovereignty by right of fatherhood, if any such he had, descend to anyone of his children; for it being, in our author's account, a right acquired by begetting to rule over those he had begotten, it was not a power possible to be inherited, because the right being

consequent to, and built on, an act perfectly personal, made that power so too, and impossible to be inherited: for paternal power, being a natural right rising only from the relation of father and son, is as impossible to be inherited as the relation itself; and a man may pretend as well to inherit the conjugal power of the husband, whose heir he is, had over his wife, as he can to inherit the paternal power a father over his children; for the power of the husband being founded on contract, and the power of the father on begetting, he may as well inherit the power obtained by the conjugal contract, which was only personal, as he may the power obtained by begetting, which could reach no farther than the person of the begetter, unless begetting can be a title to power in him that does not beget.

98．假设亚当因为拥有全世界而对人类享有支配权的话，他的任何一个儿子都不可能继承该权利来支配他的兄弟，因为所有儿子都有分享财产的同等权利，每个人都能分得父亲财产的一部分：所以，倘若亚当因为父权拥有统治权，该统治权不可能传给他的任何孩子：因为按照我们的作者所说，父权是因生育所得，是一种不可继承的对所生儿女的权力。之所以说不可继承，是因为该权利完全源于并建立在一种完全个人的行为上，那么源于父权的统治权也是如此，不可继承。父权是一种源于父子关系的自然权利，它不可继承，正如父子关系本身不可继承一样。如果一个人可以继承父亲支配其儿女的权力，那么，作为他父亲的继承人，他还可以自称能继承其父作为丈夫对妻子的婚姻权力。因为丈夫的权力建立在契约之上，父亲的权力建立在生育行为之上，既然本来只能为生育者独有的建立在生育行为上的权力他都能继承（除非生育行为可以赋予一个非生育者该权力），那建立在婚姻契约上的权力他也可以继承。

99．Which makes it a reasonable question to ask, whether

Adam, dying before Eve, his heir, (suppose Cain or Seth) should have by right of inheriting Adam's fatherhood, sovereign power over Eve his mother; for Adam's fatherhood being nothing but a right he had to govern his children, because he begot them, he that inherits Adam's fatherhood, inherits nothing, even in our author's sense, but the right Adam had to govern his children, because he begot them: so that the monarchy of the heir would not have taken in Eve; or if it did, it being nothing but the fatherhood of Adam descended by inheritance, the heir must have right to govern Eve, because Adam begot her; for fatherhood is nothing else.

99．这样的话，我们理应问一问，亚当先夏娃去世之后，他的后嗣（比如该隐或塞思）根据继承来的父权，是否对其母亲夏娃有统治权呢？因为亚当的父权只不过是因为生育而获得的一种统治儿女的权利。继承亚当父权的人，就算按照我们的作者的意思，除了亚当因生育获得的统治儿女的权利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继承。所以，亚当后嗣的君权不针对夏娃；如果针对夏娃的话，那也无非是亚当传袭下来的父权，因为夏娃由亚当而生，他才有权利统治她。因为父权除了跟生育相关，就不含其他。

100 . Perhaps it will be said with our author, that a man can alien his power over his child; and what may be transferred by compact, may be possessed by inheritance. I answer a father cannot alien the power he has over his child; he may perhaps to some degrees forfeit it, but cannot transfer it; and if any other man acquire it, it is not by the father's grant, but by some act of his own. For example, a father, unnaturally careless of his child, sells or gives him to another man and he again exposes him; a third man finding him breeds him up, cherishes, and provides for him as his own. I think in this case, nobody will doubt, but that the greatest

part of filial duty and subjection was here owing, and to be paid to this foster-father; and if anything could be demanded from the child by either of the other, it could be only due to his natural father, who perhaps might have forfeited his right to much of that duty comprehended in the command, “Honour your parents”, but could transfer none of it to another. He that purchased and neglected the child, got by his purchase and grant of the father no title to duty or honour from the child; but only he acquired it, who by his own authority, performing the office and care of a father to the forlorn and perishing infant, made himself, by paternal care, a title to proportionable degrees of paternal power. This will be more easily admitted, upon considerations of the nature of paternal power, for which I refer my reader to the second book.

100．也许我们的作者会说，一个人可以转让他对孩子的权力；能通过契约转让的东西，就可以通过继承获得。我的回答是：父亲不能转让他对自己孩子的权力：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这种权力，但是不能转让；如果有其他人获得该权力，那也不是父亲给予的，而是此人通过某种行为获取的。例如某位父亲反乎常性，不在乎自己的孩子，把他买卖或送给别人，孩子到了此人手里之后又被抛弃；最后被第三个人发现，带回去抚养、爱护，视如己出：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应该都认为，这个孩子的孝顺和服从大部分应该献给他的养父，以当回报。如果其他两位父亲还要向他要求什么，那也只有他的生父有这个权利，他或许也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在“孝敬你的父母”这一训诫中规定孩子对父母应尽的义务，但他也不能把它转交给别人。买了这个孩子却不照管他的人，不能通过他的购买行为或孩子生父的转让得到孩子的服从和孝敬；只有那位凭借自己的权力，对一个垂死的弃婴像对自己孩子一般尽职尽责呵护的人，才能得到，他是通过尽父亲之责，才得到相应程度的父亲权力。如果考虑父权的本质，这点会更容易理解。关于父权本质，请读者参阅本书第二卷。

101 . To return to the argument in hand; this is evident that paternal power arising only from begetting, for in that our author places it alone, can neither be transferred nor inherited; and he that does not beget, can no more have paternal power, which arises from thence, than he can have a right to anything, who performs not the condition, to which only it is annexed. If one should ask, by what law has a father power over his children? It will be answered, no doubt, by the law of nature, which gives such a power over them to him that begets them. If one should ask likewise, by what law does our author's heir come by a right to inherit? I think it would be answered, by the law of nature too: for I find not that our author brings one word of Scripture to prove the right of such an heir he speaks of. Why then the law of nature gives fathers paternal power over their children, because they did beget them; and the same law of nature gives the paternal power to the heir over his brethren who did not beget them; whence it follows, that either the father has not his paternal power by begetting, or else that the heir has it not at all; for it is hard to understand how the law of nature, which is the law of reason, can give the paternal power to the father over his children, for the only reason of begetting; and to the first-born over his brethren without this only reason, i.e. for no reason at all; and if the eldest, by the law of nature, can inherit this paternal power, without the only reason that gives a title to it, so may the youngest as well as he, and a stranger as well as either; for where there is no reason for anyone, as there is not, but for him that begets, all have an equal title. I am sure our author offers no reason; and when anybody does, we shall see whether it will hold or no.

101．再回到当前我们讨论的话题；可以明确的是，父权只源于生育行为（因为我们的作者只给了父权这么一个依据），不可转让或继承：未生育者不再获得源于生育行为的父权，正如某些权利，它的

产生就唯有一个条件，不履行就不能获得。如果有人问，父亲支配儿子是依据什么法律？答案无疑是自然法则，自然法则给予生育孩子的父亲以支配他们的权力。如果有人再问，我们的作者所说的后嗣又依据什么法律获得继承权？我想答案还是自然法则：因为我发现我们的作者根本没有引用《圣经》中的一个字来证明他所说的后嗣继承权。为什么同一自然法则，一方面因为父亲生育孩子才赋予他支配子女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将这种父权给予后嗣，让他支配非他所生的兄弟呢？其结论要么是父亲的权力并非源于生育行为，要么是后嗣根本没有这种权力；否则就很难理解，合乎理性的自然法则，怎么会既把生育作为父亲获得支配儿女权力的唯一依据，又让长子在缺此依据（或者说毫无依据）的条件下获得支配其弟兄的权力。如果长子根据自然法则，可以不需这条唯一依据继承父权，那么幼子，甚至一个陌生人，也同样可以；反正唯一具备条件的生育者不在了，其余的人谁都一样。我相信我们的作者对此无法解释，如果有人能解释的话，我们得看看那是否站得住脚。

102 . In the meantime, it is as good sense to say, that by the law of nature a man has right to inherit the property of another, because he is of kin to him, and is known to be of his bloods and therefore, by the same law of nature, an utter stranger to his blood has right to inherit his estate; as to say that, by the law of nature, he that begets them has paternal power over his children, and therefore, by the law of nature, the heir that begets them not, has this paternal power over them; or supposing the law of the land gave absolute power over their children, to such only who nursed them, and fed their children themselves, could anybody pretend that this law gave anyone, who did no such thing, absolute power over those who were not his children?

102．如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根据自然法则，一个人因为和某

人是亲属，有血缘关系，便可以继承他的财产，因此，一个跟他完全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也可以继承他的财产；那我们也可以说，根据自然法则，生育孩子者有支配孩子的父权，因此根据同一法则，未生这些孩子的继承人也对他们享有父权；或者，假设国家法律规定，只有那些亲自照顾、抚养自己子女的人才享有对子女的绝对权力，那么，还有谁会说，那些既未照顾又未抚养子女的人，会依照国家法律享有对别人孩子的绝对权力？

103．When therefore it can be showed that conjugal power can belong to him that is not an husband, it will also I believe be proved, that our author's paternal power, acquired by begetting, may be inherited by a son; and that a brother, as heir to his father's power, may have paternal power over his brethren, and by the same rule conjugal power too: but till then, I think we may rest satisfied, that the paternal power of Adam, this sovereign authority of fatherhood, were there any such, could not descend to, nor be inherited by his next heir. Fatherly power, I easily grant our author, if it will do him any good, can never be lost, because it will be as long in the world as there are fathers: but none of them will have Adam's paternal power, or derive theirs from him; but everyone will have his own by the same title Adam had his, viz., by begetting, but not by inheritance or succession, no more than husbands have their conjugal power by inheritance from Adam. And thus we see, as Adam had no such property, no such paternal power, as gave him sovereign jurisdiction over mankind; so likewise his sovereignty built upon either of these titles, if he had any such, could not have descended to his heir, but must have ended with him. Adam, therefore, as has been proved, being neither monarch, nor his imaginary monarchy hereditable, the power which is now in the world is not that which was Adam's, since all that Adam could have upon our author's grounds, either of property or fatherhood,

necessarily cried with him, and could not be conveyed to posterity by inheritance. In the next place we will consider whether Adam had any such heir to inherit his power as our author talks of.

103．因此，如果丈夫权力可以不为丈夫所有，那我就能相信，我们的作者所说的源于生育行为的父权可以为儿子继承；继承父权的后嗣，可以对他的兄弟们行使父亲权力，并根据同一原则对其母亲享有丈夫权力：但在这些得到证明之前，我们还是大可以相信，亚当的父权，这种父亲身份的最高权力（如果确实有的话），不能转让或继承给他的后嗣。“父亲的权力”这个词如果对我们的作者有用的话，我可以轻易承认它。只要这世界上有父亲，这个权力就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没有哪位父亲能够拥有亚当的父权，或者从亚当那儿获得他们的父权。但每个人拥有和亚当相同的获得父权的资格，即通过生育行为，并非继承或接替，正如他们的丈夫权力不是从亚当那儿继承而来的一样。因此我们发现，亚当没有那种赋予他对人类实行最高统治的“财产权”或“父权”，如果确实有的话，那基于这两者之一的“统治权”也不能传给他的继承人，而是随着亚当的去世而终止。所以，就像前面已经证明的，亚当不是君主，他那虚构的君主制也无法传承，现在世界上的权力不是当初亚当的权力。因为亚当依据我们的作者所说的理由所拥有的一切，不论是“父权”，还是“财产权”，都会随着亚当的去世而终止，也不能通过继承传给后代。在下一章，我们将讨论亚当是否有那样一位如我们的作者所说的继承人，来继承他的权力。

[9_1].Genesis. i. 98.

[9_2].Genesis. i. 28.

[9_3].Genesis.i. 28, 29.

[10_1].《创世记》，第一章第九十八节。

[10_2].《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10_3].《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二十九节。

Chapter X　Of the Heir to Adam's Monarchical Power

第十章　论亚当君权的继承者

104 . Our author tells us, [10_1] “That it is a truth undeniable, that there cannot be any multitude of men whatsoever, either great or small, though gathered together from the several corners and remotest regions of the world, but that in the same multitude, considered by itself, there is one man amongst them that in nature hath a right to be king of all the rest, as being the next heir to Adam, and all the other subjects to him; every man by nature is a king or a subject”. And again, “If Adam himself were still living, and now ready to die, it is certain that there is one man, and but one in the world, who is next heir.“ [10_2] Let this multitude of men be, if our author pleases, all the princes upon the earth, there will then be, by our author's rule, “one amongst them that in nature hath a right to be king of all the rest, as being the right heir to Adam”; an excellent way to establish the thrones of princes, and settle the obedience of their subjects, by setting up an hundred, or perhaps a thousand titles (if there be so many princes in the world) against any king now reigning, each as good, upon our author's grounds, as his who wears the crown. If this right of heir carrier any weight with it, if it be the ordinance of God, as our author seems to tell us, [10_3] must not all be subject to it, from the highest to the lowest? Can those who wear the name of princes, without having, the right of being heirs to Adam, demand obedience from their subjects by this title, and not be bound to pay it by the same law? Either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are not to be claimed, and held by this title of Adam's heir; and then the starting of it is to no purpose, the being or not being Adam's heir signifies nothing as to the title of

dominion; or if it really be, as our author says, the true title to government and sovereignty, the first thing to be done is to find out this true heir of Adam, seat him in his throne, and then all the kings and princes of the world ought to come and resign up their crowns and scepters to him, as things that belong no more to them than to any of their subjects.

104．我们的作者说：[11_1] “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群体，不论规模大小，成员来自何处，他们都会认为在这个群体里必有一个人是接替亚当的继承人，天生为王，所有其他的人都应该臣服于他：所有人生来不为君就为臣。”同样在《君权论》第20页，他说：“如果亚当还在世，濒临死亡，肯定有一个人，这世上也仅有这么一个，是接替他的继承人。”[11_2] 如果我们的作者愿意的话，可以假设这群人全是地球上的君主，那么，按照他的意思，就“必有一个人是接替亚当的继承人，天生为王”；这办法真够好，确定这么多王位，设立成百上千个君主头衔（如果世上确有这么多君主的话）让各自的臣民服从，再让这些君主们与现在进行统治的君王相对抗，而且，根据我们的作者的意思，同现在的君主们的王位同样有效。如果这种“继承人”的权利还有点分量，并且这权力是上帝的旨意（我们的作者似乎是这么告诉我们的），[11_3] 那岂不是所有人，不论地位高下，都要臣服于它？那些拥有君主称号，但没有“亚当继承人”的权利的人，难道可以用自己的王位要求他的臣民臣服于他，却不必因为他人的王位而臣服于他人吗？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亚当继承人”的权利不能作为要求或占有世上的统治权的依据，但这样的话，提出这个依据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是否是亚当的继承人，对于统治权已经无关紧要；要么就是，真如我们的作者所讲，“亚当继承人”的权利确实是获得统治权和王权的依据。最重要的事情是先找到亚当的真正继承人，让他登上王位，然后世上所有的君王都来觐见，把自己的王冠和节杖上交给他，这些东西和他们的臣民一样，都不再归他们所有。

105 . For either this right in nature, of Adam's heir, to be king over all the race of men, (for all together they make one multitude) is a right not necessary to the making of a lawful king, and so there may be lawful kings without it, and then kings' titles and pointer depend not on it; or else all the kings in the world but one are not lawful kings, and so have no right to obedience; either this title of heir to Adam is that whereby kings hold their crowns, and have a right to subjection from their subjects, and then one only can have it, and the rest being subjects can require no obedience from other men who are but their fellow subjects; or else it is not the title whereby kings rule, and have a right to obedience from their subjects, and then kings are kings without it, and this dream of the natural sovereignty of Adam's heir is of no use to obedience and government; for if kings be a right to dominion and the obedience of their subjects who are not, nor can possibly be, heirs to Adam, what use is there of such a title, when we are obliged to obey without it? If kings, who are not heirs to Adam, have no right to sovereignty, we are all free, till our author, or anybody for him, will show us Adam's right heir. If there be but one heir of Adam, there can be but one lawful king in the world, and nobody in conscience can be obliged to obedience till it be resolved who that is; for it may be anyone, who is not known to be of a younger house, and all others have equal titles. If there be more than one heir of Adam, everyone is his heir, and so everyone has regal power; for if two sons can be heirs together, then all the sons equally are heirs, and so all are heirs, being all sons, or sons' sons of Adam. Betwixt these two, the right of heir cannot stand; for by it either but one only man, or all men are kings. Take which you please, it dissolves the bonds of government and obedience; since if all men are heirs, they can owe obedience to nobody; if only one, nobody can be obliged to pay obedience to him till he be known, and his title made out.

105．原因亦非此即彼，要么是，亚当继承人自然有权成为天下人之王（所有人一起就形成一个群体），但这权利不是确立合法国王的必要条件，因而没有该条件的人也可以成为合法君主，君王的指定和君主资格都不取决于它；要么是，所有的君王中，只有一个是合法的，其余的都无权让人臣服；要么就是，可以依据“亚当继承人”这一身份借此保住王位，一统天下臣民，进而君王只有一个，其余的都是臣民，无权要求其他臣民服从自己；否则，不能依据“亚当继承人”的这一名义统治天下，让人臣服，这样一来，即便没有这种资格，国王依旧为王，关于亚当继承人自然为王的空想对于获取臣服和统治权毫无用处：原因是，如果国王不是也不可能是亚当的继承人，却照样享有统治权，令人民服从，他不依此资格为王我们仍然必须服从他，那这个资格有什么用？如果非亚当后嗣的君主就没有统治权，那我们就都自由了，除非我们的作者，或任何一个他的代言人，为我们指出真正的亚当继承人。如果亚当的继承人只有一个，世上就只有一位合法的国王，那么，在未弄清此人是谁之前，没有人会甘心臣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有可能是暂不为人知的年轻后嗣，大家都是平等的。如果亚当的继承人不止一个，那么，每个人都是他的继承人，都享有王权：因为若两个儿子可以同为继承人，那所有的儿子都可以，所有人都是继承人，他们不是亚当的儿子，就是亚当儿子的儿子。继承人的权利只能存在于上述两种情况，非此即彼，因为根据这种说法，要么就是只有一人为王，要么就是天下人皆为王。无论你选择哪种，统治权和服从之间的关系都被瓦解了。因为如果所有人皆为继承人，不存在谁服从谁；若只有一人为王，在未确定此人是谁之前、王位未定之前，没有人有义务服从谁。

[10_1].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58.

[10_2].Patriarcha p.20.

[10_3].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44.

[11_1].《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58页。

[11_2].《君权论》，第20页。

[11_3].《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44页。

Chapter XI　Who Heir?

第十一章　继承者是谁？

106．The great question which in all ages has disturbed mankind, and brought on them the greatest part of those mischiefs which have ruined cities, depopulated countries, and disordered the peace of the world, has been, not whether there be power in the world, nor whence it came, but who should have it. The settling of this point being, of no smaller moment than the security of princes, and the peace and welfare of their estates and kingdoms, a reformer of politics, one would think, should lay this sure, and be very clear in it; for if this remain disputable, all the rest will be to very little purpose; and the skill used in dressing up power with all the splendor and temptation absoluteness can add to it, without showing who has a right to have it, will serve only to give a greater edge to man's natural ambition, which of itself is but too keen. What can this do but set men on the more eagerly to scramble, and so lay a sure and lasting foundation of endless contention and disorder, instead of that peace and tranquility, which is the blurriness of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human society?

106．古往今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并带来许多重大的灾难，它毁灭城市，灭绝人口，破坏和平。。这个问题不是权力是否存在，也不是权力由何而来，而是权力该由谁掌握。这一问题的确定，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君王的安危、社稷的福祉以及城邦的安宁。我们认为，一个政治改革家应当明确这个问题，并且观点应该清晰明了。因为如果连这一点都有争议，那其余的一切将失去意义。用极权主义携带的一切光辉和诱惑来粉饰权力，却不表明谁才是这个权力的

拥有者，只会让人们与生俱来的野心更加膨胀，何况这种野心本来就十分强烈。这样做只会让人们更加热衷于权力争夺，定为以后永无休止的争斗和混乱埋下长久的祸根，政府和人类社会最终追求的和平与安宁也将不复存在。

107 . This designation of the person our author is more than ordinary obliged to take care of, because he affirming that “the assignment of civil power is by divine institution”, hath made the conveyance as well as the power itself sacred; so that no consideration, no act or art of man, can divert it from that person to whom, by this divine right, it is assigned; no necessity, or contrivance can substitute another person in his room: for if the “assignment of civil power be by divine institution”, and Adam's heir be he to whom it is thus assigned, as in the foregoing chapter our author tells us, it would be as much sacrilege for anyone to be king, who was not Adam's heir, as it would have been amongst the Jews for anyone to have been priest who had not been of Aaron's posterity; for not only the priesthood in general being by divine institution, but the assignment of itto the sole line and posterity of Aaron, made it impossible to be enjoyed or exercised by anyone but those persons who revere else offspring of Aaron whose succession therefore was carefully observed, and by that the persons who had a right to the priesthood certainly known.

107．我们的作者之所以比常人更有责任和义务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断言“统治权是由神授予的”，这就使得这种权力本身及其转让变得神圣。于是，没有任何人类的图谋、行径或伎俩，能够将这一权力从被神指定的人手中夺走，没有必要也没有办法使人取而代之因为正如我们的作者在前面的章节告诉我们的那样，如果“统治权是由神授予的”，而且继承亚当的继承人也是用这种方式指定，那

么，任何非亚当继承人的人做了国王，其亵渎神明之程度，就像在犹太人中，一个非亚伦（第一任大祭司）后裔的人当了祭司一样；因为不仅“祭司”这一职位是由神安排的，而且“只能由亚伦一族和其后裔担任”这一规定，让所有除此以外的人都不得担任该职并行使职责。所以，对于“祭司”一职的接任，人们都严格遵守规定，并且，按此规定，人们当然也都明白谁有资格担任。

108 . Let us see then what care our author has taken, to make us know who is “this heir, who by divine institution leas a right to be king over all men”. The first account of him we meet with is in these words: “This subjection of children being the fountain of all regal authority, by the ordination of God himself; it follows that civil power, not only in general, is by divine institution, but even the assignment of it, specifically to the eldest parents.“ [11_1] Matters of such consequence as this is should be in plain words, as little liable as might be to doubt or equivocation; and I think if language be capable of expressing anything distinctly and clearly, that of kindred, and the several degrees of nearness of blood, is one. It was therefore to be wished that our author had used a little more intelligible expressions here, that we might have better known who it is to whom the assignment of civil power is made by divine institution; or at least would have told us what he meant by eldest parents; for I believe if land had been assigned or granted to him, and the eldest parents of his family, he would have thought it had needed an interpreter; and it would scarce have been known to whom next it belonged.

108．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作者花了多少心思让我们了解谁是“这个由神授权统治芸芸众生的继承人”。他的第一次相关描述：“儿女对父母的服从是一切王权的来源，这是上帝亲自规定的；

由此可见，不论是整体上的统治权，还是具体指定给最年长的父母的统治权，都是由神规定的。”[12_1] 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事情，应该用平实易懂的话表达，尽量避免可疑或模棱两可的倾向。我认为，如果语言能够做到清楚无疑地表述任何事情，那么，“血亲”和“血缘亲近的几种程度”是可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事物之一。所以，我们本来期望我们的作者在这里能够用更明白易懂的话，以便让我们更清楚“被神授予统治权的人”是谁，或者，至少也应该告诉我们“最年长的父母”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认为，如果土地被指定划分或授予给他和家族里“最年长的父母”，恐怕他也会觉得需要有人给他解释一下，而且他也很难知道继他之后，土地归谁。

109 . In propriety of speech, (and certainly propriety of speech is necessary in a discourse of this nature) eldest parents signifies either the eldest men and women that have had children, or those who have longest had issue; and then our author's assertion will be, that those fathers and mothers who have been longest in the world, or longest fruitful, have by divine institution a right to civil power. If there be any absurdity in this, our author must answer for it; and if his meaning be different from my explication, he is to be blamed, that he would not speak it plainly. This I am sure, parents cannot signify heirs male, nor eldest parents an infant child who yet may sometimes be the true heir, if there can be but one. And we are hereby still as much at a loss who civil power belongs to, notwithstanding this “assignment by divine institution”, as if there had been no such assignment at all, or our author had said nothing of it. This of eldest parents leaving us more in the dark, who by divine institution has a right to civil power, than those who never heard anything at all of heir or descent, of which our author is so full. And though the chief matter of his writing be to teach obedience to those who have a right to it, which he tells us is conveyed by descent; yet who those are, to whom this right by

descent belongs, he leaves like the philosopher's stone in politics, out of the reach of anyone to discover from his writings.

109．在正规的语言中，（正规的语言是此类论文中必不可少的）“最年长的父母”既可以指年纪最大的、有孩子的一对男女，也可以指最早生孩子的一对男女。于是，根据我们作者的论断，年纪最长的父母，或最早生育的父母，根据神的授意拥有统治权。如果这话听起来有些荒谬，我们的作者必须对此做出解释：如果他的意思与我的解释有出入，他也难辞其咎，因为是他没把话说清楚。我能肯定的是，“父母”不可能单指男性后嗣，“最年长的父母”也不可能是一个婴孩，当然，有时在只有一个婴孩的情况下，他还的确是继承者。然而，尽管说有“神的规定和指派”，对于统治权该归何人，我们仍不清楚，仿佛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指派”或者我们的作者对此从未说明一样。对于按神的旨意拥有统治权的“最年长的父母”，我们比那些从未听说过什么继承人、血统之类的人还摸不着头脑，我们的作者却能通篇使用。虽然我们的作者写作的主要目的是教人服从那些拥有统治权的人，并且他告诉我们这种权力通过继承的方式传递，但是拥有继承权的到底是哪些人，却像政治学中的“点金石”一样，任何人在他的书中都遍寻不着。

110．This obscurity cannot be imputed to want of language in so great a master of style as Sir Robert is, when he is resolved with himself what he would say; and therefore, I fear, finding how hard it would be to settle rules of descent by divine institution, and how little it would be to his purpose, or conduce to the clear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titles of princes, if such rules of descent were settled, he chose rather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doubtful and general terms, which might make no ill sound in men's ears, who were willing to be pleased with them; rather than offer any clear rules of descent of this fatherhood of Adam, by which men's

consciences might be satisfied to whom it descended, and know the persons who had a right to regal power, and with it to their obedience.

110．对罗伯特爵士这样一位文体大师来说，当他决定了要说什么但笔下的文字又显得含糊晦涩时，我们决不能归咎于其语言的贫乏。因此，恐怕是他发现用神的授意确定继承法则十分困难，而且即使这些法则确定了，对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对弄清和确立君主地位，都作用甚微，所以他宁愿选择模糊和笼统的词汇，让那些乐于接受的人听上去不至于刺耳，也不愿提出任何有关亚当父权继承的明确法则，而人们恰恰需要知道这个权利到底传给了谁，内心才会满足，并且还能知道哪些人可以获得王权，进而让人臣服于他。

111．How else is it possible, that laying so much stress, as he does, upon descent, and Adam's heir, next heir, true heir, he should never tell us what heir means, nor the way to know who the next or true heir is? Thus, I do not remember he does anywhere expressly handle; but, where it comes in his way, very warily and doubtfully touches; though it be so necessary, that without it all discourses of government and obedience upon his principles would be to no purpose, and fatherly power, never so well made out, will be of no use to anybody. Hence he tells us, [11_2] “That not only the constitution of power in general, but the limitation of it to one kind, i.e., monarchy,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it to the individual person and line of Adam, are all three ordinances of God; neither Eve nor her children could either limit Adam's power, or join others with him; and what was given unto Adam was given in his person to his posterity.” Here again our author informs us, that the divine ordinance hath limited the descent of Adam's monarchical power. To whom? “To Adam's line and posterity”, says our author. A

notable limitation, a limitation to all mankind: for if our author can find anyone amongst mankind that is not of the line and posterity of Adam, he may perhaps tell him who this next heir of Adam is; but for us, I despair how this limitation of Adam's empire to his line and posterity will help us to find out one heir. This limitation indeed of our author will save those the labour who would look for him amongst the race of brutes, if any such there were; but will very little contribute to the discovery of one next heir amongst men, though it make a short and easy determination of the question about the descent of Adam's regal power, by telling us that the line and posterity of Adam is to have it, that is, in plain English, anyone may have it, since there is no person living that hath not the title of being of the line and posterity of Adam; and while it keeps there, it keeps within our author's limitation by God's ordinance. Indeed, he tells us, “that such heirs are not only lords of their own children, but of their brethren” [11_3] ; whereby, and by the words following, which we shall consider anon, he seems to insinuate that the eldest son is heir; but he nowhere, that I know, says it in direct words, but by the instances of Cain and Jacob, that there follow, we may allow this to be so far his opinion concerning heirs, that where there are divers children, the eldest son has the right to be heir. That primogeniture cannot give any title to paternal power, we have already showed. That a father may have a natural right to some kind of power over his children, is easily granted; but that an elder brother has so over his brethren, remains to be proved: God or nature has not anywhere, that I know, placed such jurisdiction in the first born; nor can reason find any such natural superiority amongst brethren. The law of Moses gave a double portion of the goods and possessions to the eldest; but we find not anywhere that naturally, or by God's institution, superiority or dominion belonged to him; and the instances there brought by our author are but slender proofs of a right to civil power and dominion in the first

born, and do rather show the contrary.

111．罗伯特爵士既然如此强调“继承”、“亚当的继承人”、“下一代继承人”、“真正的继承人”等，他怎么能够根本不告诉我们“继承人”的含义，也不告诉我们确定“下一任继承人”或“真正的继承人”的方法？我实在不记得他在什么地方明确处理过这个问题，相反每每触及此事，他便非常小心，很模糊地一带而过，尽管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如果没有解决它，一切有关建立在我们的作者原则之上的“统治权”、“服从”的言论都会失去意义，“父权”解释得再好也于任何人无益了。所以，我们的作者告诉我们：“不仅是一般的权力结构，还有将其限定在某一类型——即君主制的限制，以及权利只归于亚当个人及其后裔所有的决定，是上帝的三道法令。夏娃和她的孩子既不能限制亚当的权力，也不能让其他人和亚当一起享有权力；凡是给予亚当的权力，都是给予他个人，然后传给他后人的。”[12_2] 在这里，我们的作者再次告诉我们，神已经规定了亚当的君权传承，但传承给谁呢？我们的作者说：“传给亚当的世族和后裔”。这个答案足够引人注意的，因为它限定了全人类。如果我们的作者能在世上找出一个不是亚当世族和后裔的人，那个人也许能告诉他谁是亚当的下一个继承人。但是，对我们来说，根据他把亚当帝国限定于亚当的“世族和后裔”这一规定找到继承人我看没有希望。我们的作者的限定倒是可以为那些要在兽类中寻找继承者的人省些力气，如果兽类中确实存在继承者的话。但是要在人类中找，这个限定就没什么用处，虽然他用“只有亚当的世族和后裔才可以继承王权”几个字简短地回答了亚当王权的继承问题。这几个字，简单地说，就是指任何人都有可能继承，因为所有在世的人都是亚当的世族和后裔，只要有这个名义，他们就都在上帝规定的范围之内。确实，他说：“这种继承人不但是他们自己子女的主人，还是他们兄弟的主人。”[12_3] 根据这句以及后面我们即将要考察的一些话，他似乎在暗示长子是继承人，但是，据我所知，他没有在任何地方直接表明，而是以该隐和亚伯为例，然后随之发表一些我们可以看做是关于继承人的意见，他说道，如果有几个儿子的话，只有长子有继承权。不过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长子继承权不能给予

孩子继承父权的资格。一个父亲有某种支配自己子女的权力，父亲的这种自然权利很容易理解，但是，长兄是否也具有支配其弟弟的权力还有待证明。据我所知，上帝或自然从未在任何地方给予长子这种支配权，长子在所有孩子中有天生的优势这一点从道理上也讲不通。摩西律法规定，长子可以得到双倍的财产和物品，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长子天生或根据上帝规定，有优势地位和支配权”的说法；我们的作者所举的例子，不过是对长子享有统治权和支配权的无力证明，它们恰好说明了与之相反的情况。

112．His words are in the fore-cited place: “And therefore, we find God told Cain of his brother Abel, his desire shall be subject unto thee, and thou shalt rule over him.” To which I answer:

112．我们的作者还在之前引用处说道，“因此我们看到上帝曾对该隐这样说起他的弟弟亚伯：‘他必恋慕你，你要制服他’。”对此，我想说：

(1) These words of God to Cain are by many interpreters, with great reason, understood in a quite different sense than what our author uses them in.

第一，上帝对该隐说的这些话，已经有不少人注释，且有理有据，他们的理解与我们的作者引用之意相差甚远。

(2) Whatever was meant by them, it could not be that Cain, as elder, had a natural dominion over Abel; for the words are conditional, “If thou dost well”; and so personal to Cain: and

whatever was signified by them did depend on his carriage, and not follow his birthright; and therefore could by no means be an establishment of dominion in the firstborn in general: for before this Abel had his “distinct territories by right of private dominion”, as our author himself confesses, [11_4] which he could not have had to the prejudice of the heir's title, “if by divine institution” Cain as heir were to inherit all his father's dominion.

第二，这话不论怎么理解，都不可能理解为该隐作为兄长对其弟亚伯具有天上的统治权，因为这话还有一个条件——“如果你做得好”；并且还是私下对该隐说的；不管这话是什么意思，也先得视该隐的行为而定，他的权力并非生来就有；因此，这句话绝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确定了长子的支配权：因为我们的作者自己也承认，在此之前亚伯就“根据自己的个人支配权拥有自己的土地” [12_4] ，如果“根据神的规定”，该隐作为继承人继承了他父亲的所有支配权，亚伯就不应该有这个会侵害继承者权利的“个人支配权”。

(3) If this were intended by God as the charter of primogeniture, and the grant of dominion to the elder brothers in general as such, by right of inheritance, we might expect it should have included all his brethren: for we may well suppose, Adam, from whom the world was to be peopled, had by this time, that these were grown up to be men, more sons than these two: whereas Abel himself is not so much as named; and the words in the original can scarce, with any good construction, be applied to him.

第三，如果上帝有意将这句话作为长子继承权的特许状，和一般意义上对所有长子依继承权而取得支配权的认可，我们可以推想，这句话本该包括他的所有兄弟：因为我们能想象，人类从亚当开始不断

繁衍，等这些人都成年之时，亚当的孩子已不止该隐和亚伯两个：亚伯本人倒是很少被提及，那句话的原话，只要结构正确，都不能应用到亚伯身上。

(4) It is too much to build a doctrine of so mighty consequence upon so doubtful and obscure a place of Scripture, which may well, nay better, be understood in a quite different sense, and so can be but an ill proof, being as doubtful as the thing to be proved by it; especially when there is nothing else in Scripture or reason to be found, that favours or supports it.

第四，把如此事关重大的学说建立在《圣经》这么一处意义含糊不定的地方未免太过于随意。在《圣经》上这句话本身就有很多不同解释，它本身和它要证明的观点之可疑程度不相上下，这样也还好，既然他从《圣经》和理性中找不到任何有力支撑，这好歹也算一个拙劣的证据。

113 . It follows, “accordingly when Jacob bought his brother's birthright, Isaac blessed him thus; be lord over thy brethren, and let the sons of thy mother bow before thee. [11_5] ” Another instance, I take it, brought by our author to evince dominion due to birthright, and an admirable one it is: for it must be no ordinary way of reasoning in a man, that is pleading for the natural power of kings, and against all compact, to bring, for proof of it, an example, where his own account of it founds all the right upon compact, and settles empire in the younger brother, unless buying and selling be no compact; for he tells us, “when Jacob bought his birthright”. But passing by that, let us consider the history itself, with what use our author makes of it, and we shall find the following mistakes about

it.

113．我们的作者接着说："因此，当雅各买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之时，以扫对他这样祝福道：'你将做你的众弟兄的主人，你母亲的儿子们都要向你跪拜'。" [12_5] 这应该可以看作是我们的作者用来证明长子继承权的另一个例子，这例子可真不错：因为对于一个为天赋王权辩护，反对契约论的人，这真是非同寻常的论证方法。他拿这个例子作证，依据他自己的论述，却发现一切权力基于契约，且落在弟弟身上，除非买卖不算契约，因为他告诉我们"雅各买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这个暂且不谈，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史实，看看我们的作者怎么运用它，我们就能发现以下错误：

(1) That our author reports this, as if Isaac given Jacob this blessing immediately upon his purchasing the birthright; for he says, "when Jacob bought", "Isaac blessed him"; which is plainly otherwise in the Scripture: for it appears, there was a distance of time between, and if we will take the story in the order it lies, it must be no small distance; all Isaac's sojourning in Gerar, and transactions with Abimelech, [11_6] coming between; Rebecca being then beautiful, and consequently young: but Isaac, when he blessed Jacob, was old and decrepit: and Esau also complains of Jacob, that two times he had supplanted him; "he took away my birthright," says he, "and behold now he hath taken away my blessing"; [11_7] words that I think signify distance of time and difference of action.

第一，我们的作者在陈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仿佛雅各买了长子名分之后就立即得到了以扫的祝福似的，因为他说"当雅各买……时，以扫祝福了他；"在《圣经》中显然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中间间隔有一段时间，如果我们按故事情节顺序来看，这时间还不短：以扫在

热拉耳的旅居，和亚比米勒王的交涉 [12_6] 都发生在这期间。那时候以扫的妻子丽贝卡还很漂亮，因此她当时应该还年轻：但是，以扫祝福雅各之时已经衰老了：并且以扫也曾两次抱怨其弟弟雅各欺骗了他："他之前夺走了我的长子名分，（以扫说），现在他又夺走了属于我的祝福；" [12_7] 这句话，在我看来，表明两件事情之间有时间间隔。

(2) Another mistake of our author is, that he supposes Isaac gave Jacob the blessing, and bid him be "lord over his brethren", because he had the birthright; for our author brings this example to prove, that he that has the birthright, has thereby a right to "be lord over his brethren". But it is also manifest by the text, that Isaac had no consideration of Jacob's having bought the birthright; for when he blessed him, he considered him not as Jacob, but took him for Esau. Nor did Esau understand any such connexion between birthright and the blessing; for he says, "He hath supplanted me these two times; he took away my birthright, and behold now he hath taken away my blessing"; whereas had the blessing, which was to be "lord over his brethren", belonged to the birthright, Esau could not have complained of this second as a cheat, Jacob having got nothing but what Esau had sold him, when he sold him his birthright; so that it is plain, dominion, if these words signify it, was not understood to belong to the birthright.

第二，我们的作者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他认为以扫是因为雅各有了"长子名分"才给他祝福，并让他做"众兄弟之主"，因为我们的作者举这个例子来证明只要有了"长子名分"，就有权做"众兄弟之主"。但是，根据经文，以扫祝福雅各之时，并未把他当成雅各，而当他是以扫，可见以扫没注意到雅各买了"长子名分"这件事。以扫也不认为"长子名分"和"祝福"之间有这样的关联；因为他说："他欺骗了我两次，

之前夺走了我的长子名分，（以扫说），现在他又夺走了属于我的祝福：”如果做“众兄弟之主”这个祝福就是基于“长子名分”的，那以扫就不会抱怨第二桩是欺骗，雅各得到的不过是以扫卖给雅各“长子名分”时所卖给他的罢了；所以，很显然，如果“做众兄弟之主”指的是支配权，这个权力不可能因“长子名分”获得。

114 . And that, in those days of the patriarchs, dominion was not understood to be the right of the heir, but only a greater portion of goods, is plain from Gen. xxi. 10; for Sarah, taking Isaac to be heir, says, “cast out this bondwoman and her son, for the son of this bondwoman shall not be heir with my son”:

114 . 在先祖时期，支配权不是指继承人的权力，而仅仅指份额较大的物品。这点从《创世记》第二十一章第十节可明显看出；认为以扫才是继承人的撒拉，对她丈夫亚伯拉罕说：“把这女仆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她的儿子可不能和我儿子一起继承产业。”

whereby could be meant nothing, but that he should not have a pretense to an equal share of his father's estate after his death, but should have his portion presently, and be gone. Accordingly, we read, “That Abraham gave all that he had unto Isaac; but unto the sons of the concubines which Abraham had, Abraham gave gifts, and sent them away from Isaac his son, while he yet lived.“ [11_8] That is, Abraham having given portions to all his other sons, and sent them away, that which he had reserved, being the greatest part of his substance, Isaac as heir possessed after his death: but by being heir, he had no right to be “lord over his brethren”; for if he had, why should Sarahendeavour to rob him of one of his subjects, or lessen the number of his slaves, by desiring to have Ishmael sent

away.

这句话只不过是说，女仆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在其父亲过世之后，没有平分财产的权利，他应该现在就拿着他该得的东西离开。于是我们看到这些话："亚伯拉罕把一切都给了以扫。但是趁自己还在世之时，分给其妾所生众子一些财物，让他们离开了以扫。" [12_8] 这就是说，亚伯拉罕给了其他儿子部分财物，才打发他们离开，他留下的是最大的一份，在他死后由以扫继承。但是以扫作为继承人，也没有"做众兄弟之主"；的权利，如果有的话，撒拉为什么还要花费心思赶走以扫的这个兄弟以实玛利（亚伯拉罕与女仆之子），夺走他一个臣民，或者减少他一个奴隶呢？

115 . Thus, as under the law, the privilege of birthright was nothing but a double portion; so we see that before Moses, in the patriarchs' time, from whence our author pretends to take his model, there was no knowledge, no thought, that birthright gave rule or empire, paternal or kingly authority, to anyone over his brethren. If this be not plain enough in the story of Isaac and Ishmael, he that will look into 1 Chron. v. 1, may there read these words: "Reuben was the first-born; but for as much as he defiled his father's bed, his birthright was given unto the sons of Joseph, the son of Israel; and the genealogy is not to be reckoned after the birthright; for Judah prevailed above his brethren, and of him came the chief ruler; but the birthright was Joseph's." What this birthright was, Jacob blessing Joseph, telleth us in these words, "Moreover I have given thee one portion above thy brethren, which I took out of the hand of the Amorite, with my sword and with my bow." [11_9] Whereby it is not only plain that the birthright was nothing but a double portion, but the text in Chronicles is express against our author's doctrine, and shows that dominion was no part

of the birthright; for it tells us, that Joseph the birthright, but Judah the dominion. One would think our author were very fond of the very name of birthright, when he brings this instance of Jacob and Esau, to prove that dominion belongs to the heir over his brethren.

115．因此，就像法律规定的那样，长子的特权无非是比其他兄弟多得一份财产：所以我们发现，在摩西以前的先祖时代（我们的作者自称他的模式从这个时代得出），没有人听说或想过，“长子名分”可以给人凌驾于其弟兄之上的统治权、帝位、父权或王权。如果这点用以扫和以实玛利的故事还不够证明，请查阅《旧约·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一节，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话：“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为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他的长子名分就归了以色列的儿子约瑟，但按照族谱他不是长子。后来以色列的第四个儿子犹大胜过他的所有兄弟，他成了君王，但长子名分仍归约瑟所有。”长子名分是什么？雅各祝福约瑟的话是这样说的：“此外，我用刀和弓亲自从亚摩利人手中夺得的那块地，我已分给你，这样你就比其他兄弟多得一份。”[12_9] 由此不但可以明显看出，长子名分不过是比其他弟兄多得一份，而且，《历代志·上》的原文也明显和我们的作者的学说相反。它上面说长子名分归约瑟所有，支配权却在犹大，这表明支配权并不是长子名分的一部分。我们的作者既然拿雅各和以扫的例子来证明继承人拥有对其他弟兄的支配权，我们只好认为他非常喜欢“长子名分”这个词。

116．(1) Because it will be but an ill example to prove, that dominion by God's ordination belonged to the eldest son, because Jacob the youngest here had it, let him come by it how he would; for if it prove anything, it can only prove, against our author, that the “assignment of dominion to the eldest is not by divine institution”, which would then be unalterable; for if by the law of God, or nature, absolute power and empire belongs to the eldest son

and his heirs, so that they are supreme monarchs, and all the rest of their brethren slaves, our author gives us reason to doubt whether the eldest son has a popover to part with it, to the prejudice of his posterity, since he tells us, [11_10] “That in grants and gifts that have their original from God or nature, no inferior power of man can limit, or make any law of prescription against them”.

116．第一，因为要证明上帝规定支配权归长子所有，这实在是个拙劣的例子，因为毕竟是幼子雅各获得了支配权，不管获得的方式如何。如果这个例子确实能证明什么，那其结果也与我们的作者意图相反，只能证明“支配权归长子所有不是上帝所定”，而且这个结果一旦得出就不可变更；因为如果上帝或自然规定绝对权力和王位归长子和其继承者所有，从而确定他们是最高君主，其他弟兄成为奴隶，那么，我们的作者给了我们理由去质疑，长子是否有权力不顾其后裔的利益，放弃支配权。因为他说 [12_10] ：“从上帝或自然处获得的授予和恩赐，任何人类低级的权力都不能对之加以限制，或者制定与之相违背的法律。”

117．(2) Because this place, brought by our author, [11_11] concerns not at all the dominion of one brother over the other, nor the subjection of Esau to Jacob; for it is plain in history, that Esau was never subject to Jacob, but lived apart in mount Seir, where he founded a distinct people and government, and was himself prince over them, as much as Jacob was in his own family. The text, if considered, can never be understood of Esau himself, or the personal dominion of Jacob over him; for the words brethren and sons of thy mother, could not be used literally by Isaac, who knew Jacob had only one brother; and these words are so far from being true in a literal sense, or establishing any dominion in Jacob over Esau, that in the story we find the quite contrary; for Gen. Jacob

several times calls Esau lord, and himself his servant [11_12] ; and “He bowed himself seven times to the ground to Esau.“ [11_13] Whether Esau then were a subject and vassal (my, as our author tells us, all subjects are slavesto Jacob), and Jacob his sovereign prince by birthright, I leave the reader to judge; and to believe if he can, that these words of Isaac, “be lord over thy brethren, and let thy mother's sons bow down to thee”, confirmed Jacob in a sovereignty over Esau, upon the account of the birthright he had got from him.

117．其二，我们的作者引用的《创世记》 [12_11] ，这个地方跟一个兄弟支配其他弟兄这件事毫无关系，同样也无关以扫对雅各的服从：因为在历史上，以扫很明显从未服从过雅各，而是在西珥山（mountSeir）建立了独立的宗族和政府，自己为王，就像雅各在他的家族为王一样。如果对原经文进行考察，会发现他绝不是指以扫本人，或者雅各对其的个人支配权：因为以扫明知道雅各只有一个弟兄，字面上不可能使用“众弟兄”和“你母亲的儿子们”；这话不但从字面上讲不正确，也远不能为雅各建立对以扫的支配权提供依据。在《圣经》的故事中，事实上刚好相反；在《创世记》中，雅各多次称以扫为主人，称自己为奴仆 [12_12] ；同时也有，“他一共七次伏地向以扫行礼。 [12_13] ”那么，以扫是不是臣民和奴仆（按我们的作者所说，雅各的一切臣民都是他的奴仆），雅各是否凭借“长子名分”称王，我想让读者自己判断，并且可能的话，也让读者相信，以扫说的“你将做你的众弟兄的主人，你母亲的儿子们都要向你跪拜”这句话，证实了雅各凭借从以扫处获得的长子名分，拥有对以扫的统治权。

118．He that reads the story of Jacob and Esau, will find there never was any jurisdiction or authority, that either of them had over the other, after their father's death; they lived with the friendship and equality of brethren, neither lord, neither slave to his

brother; but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were both heads of their distinct families, where they received no laws from one another, but lived separately, and were the roots out of which sprang two distinct people under two distinct governments. This blessing then of Isaac, whereon our author would build the dominion of the elder brother, signifies no more, but what Rebecca had been told from God, “Two nations are in thy womb, and two manner of people shall be separated from thy bowels; and the one people shall be stronger than the other people, and the elder shall serve the younger”; [11_14] and so Jacob blessed Judah, [11_15] and gave him the scepter and dominion; from whence our author might have argued as well, that jurisdiction and dominion belongs to the third son over his brethren, as well as from this blessing of Isaac, that it belonged to Jacob: both of these places contain only predictions of what should long after happen to their posterities, and not any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to dominion in either. And thus, we have our author's two great and only arguments to prove, that “heirs are lords over their brethren”.

118．读过雅各和以扫故事的人，都知道在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后，他们俩谁都没有支配对方的权力和权威：他们的关系是兄弟间的平等和友好关系，不存在什么“主”与“仆”；但他们是相互独立的，各自为其宗族之首领，居住的地方不一样，彼此也不受对方的法律约束，由他们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宗族和政府。以扫的祝福——我们的作者想用来确立长兄支配权——实际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以扫的妻子丽贝卡从上帝那儿听到的：“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一族必强于另一族，将来年长的要服务于年幼的” [12_14] ，雅各也是这样祝福犹大的，并给了犹大节杖和支配权 [12_15] 。在这里，我们的作者也许可以说，他的第三个儿子对其兄弟拥有管辖权和支配权，就像他从以扫的祝福，推断出雅各拥有此权一样。上述两个祝福，其实只是预言很久之后发生在他们后裔身上的事情，而不是宣告两人之中谁

能继承支配权。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作者用来证明“继承者就是他众兄弟的主人”的仅有的两大论据：

(1) Because God tells Cain, [11_16] that however sin might set upon him, he ought or might be master of it; for the most learned interpreters understood the words of sin, and not of Abel, and give so strong, reasons for it, that nothing can convincingly be inferred from so doubtful a text to our author's purpose.

第一，因为上帝告诉该隐， [12_16] 无论罪恶如何唆使，他也应该，或者可能制服它。对于此句，即使最渊博的注释者，也不会把“罪恶”（sin）这个词理解为亚伯。他们给出的理由十分充分，所以我们的作者根本不能从一个意义如此不定的经文中推断出什么。

(2) Because Isaac foretells that the Israelites, [11_17] the posterity of Jacob, should have dominion over the Edomites, the posterity of Esau; therefore, says our author, “Heirs are lords of their brethren”; I leave anyone to judge of the conclusion.

第二，以扫预言， [12_17] 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将会支配以扫的后裔以东人，所以，我们的作者说：“继承者是他众兄弟的主人”这个结论正确与否让任何一个人评判都可以。

119 . And now we see our author has provided for the descending, and conveyance down of Adam's monarchical power, or paternal dominion, to posterity, by the inheritance of his heir, succeeding to all his father's authority, and becoming upon his

death as much lord as his father was, “not only over his own children, but over his brethren”, and all descended from his father, and so *in infinitum* . But yet who this heir is, he does not once tell us; and all the light we have from him in this so fundamental a point, is only that in his instance of Jacob, by using the word birthright, as that which passed from Esau to Jacob, he leaves us to guess, that by heir, he means the eldest son; though I do not remember he anywhere mentions expressly the title of the first-born, but all along keeps himself under the shelter of the indefinite term heir. But taking it to be has meaning, that the eldest son is heir (for if the eldest be not, there will be no pretense why the sons should not be all heirs alike) and so by right of primogeniture has dominion over his brethren; this is but one step towards the settlement of success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remain still as much as ever, till he can show us who is meant by right heir, in all those cases which may happen where the present possessor hath no son. This he silently passes over, and perhaps wisely too; for what can be wiser, after one has affirmed, that “the person having that power, as well as the power and form of government, is the ordinance of God, and by divine institution” [11_18] , viz. than to be careful, not to start any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person, the resolution whereof will certainly lead him into a confession, that God and nature hath determined nothing about him? And if our author cannot show who by right of nature, or a clear positive law of God, has the next right to inherit the dominion of this natural monarch he has been at such pains about, when he died without a son, he might have spared his pains in all the rest; it being more necessary for the settling men's consciences, and determining their subjection and allegiance, to show them who, by original right, superior and antecedent to the will, or any act of men, hath a title to this paternal jurisdiction, than it is to show that by nature there was such a jurisdiction; it being to no purpose for me to know there is such a paternal power,

which I ought, and am disposal to obey, unless where there are many pretenders, I also know the person that is rightfully invested and endowed with it.

119．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作者通过嗣子继承的方式来实现亚当君权或父亲支配权的传承，嗣子继承父亲的一切权力，并在父亲过世之后成为和父亲一样的主人，“不但支配他自己的儿女，还支配他的弟兄”，这一切都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并将永远传承下去。但是继承人是谁，他一次也没告诉我们；对于这个如此基本的问题，我们从他那儿得到的全部信息，就是他举了雅各的例子，说到了雅各从以扫身上获得的“长子名分”，然后他就让我们去推测，他说的继承人指的是长子；不过我真不记得他在什么地方明确讲过长子权利，一直以来，他都是拿一个不确定的“继承人”来做掩饰。但就算继承人指的是长子（如果不是长子的话，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儿子不能都同为继承人了），根据长子继承权他享有支配其他弟兄的权力；但这只是跨向成功的一小步，结果还是困难重重，除非他能告诉我们，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正当的继承人是谁，万一现在在位的统治者没有儿子怎么办？我们的作者一声不响地跳过了这个问题，这样做也许很聪明：因为先断定“享有统治权的人、统治权本身及其形式都是上帝规定的，是神的旨意”[12_18]，然后十分谨慎，不再提关于人的问题，这不是很聪明吗？否则，如果他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可想而知，他一定得承认上帝和自然没有规定这个人是谁。如果我们的作者讲不出，一旦他这么用心制造出来的自然君主过世了，并且没有儿子，那根据自然权利或上帝明确规定，谁是下一个继承该支配权的人，他完全就无需费力讨论其他问题了；因为在安定人们的思想，决定他们该服从和效忠他人之前，更为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谁根据最原始的权利（它优先于人类意志和任何人类行为）享有“父权”资格，而不是告诉他们自然存在这么一个“权利”。除非在有很多人声称有此权力的时候，我都能分辨出那个正当合法的拥有者，否则，告诉我有这么一种父亲的权限，我应该也必须服从它，是没有意义的。

120 . For the main matter in question being concerning the duty of my obedience, and the obligation of conscience I am under to pay it to him that is of right my lord and ruler, I must know the person that this right of paternal power resides in, and so empowers him to claim obedience from me. For let it be true what he says, “that civil power not only in general is by divine institution, but even the assignment of it specially to the eldest parents [11_19] “; and"That not only the power or right of government, but the form of the power of governing, and the person having that power, are all the ordinance of God” [11_20] ; yet unless he shows us in all cases who is this person ordained by God, who is this eldest parent; all his abstract notions of monarchical power will signify just nothing, when they are to be reduced to practice, and men are conscientiously to pay their obedience; for paternal jurisdiction being not the thing to be obeyed, because it cannot command, but is only that which gives one man a right which another hath not, and if it come by inheritance, another man cannot have, to command and be obeyed; it is ridiculous to say, I pay obedience to the paternal power, when I obey him, to whom paternal power gives no right to my obedience; for he can have no divine right to my obedience, who cannot show his divine right to the power of ruling over me, as well as that by divine right there is such a power in the world.

120 .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的关键关系到我服从的义务，关系到我良心上的责任，甘心服从一位有权做我主人和统治者的人，所以我必须知道这个父权落在谁身上，有了父权他才可以让我臣服。我们的作者说：“不但一般意义上的统治权，就连具体的将该权力给予最年长的父母都是神的授意”； [12_19] “不仅政府的权力和权利，还有统治权的形式和拥有该权力的人，都是由上帝指定的”。 [12_20] 假设他说的这些都是真的，他也得让我们知道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上帝指定的这

个人是谁，谁是“最年长的父母”；否则他的一切有关君权的抽象观念，在运用到实践中的时候，在要让人们甘心臣服的时候，都失去意义：父亲的管理权不能下命令，因此也不能让人服从，它只能赋予某个人一种他人没有的权利。如果一个人通过他人没有的继承权获得父权，去支配他人并让人服从，那么，当我服从这个人，而父权并没有赋予他令我臣服的权利，我说我服从于父权是很可笑的：因为一个既不能证明他对我的统治权是神权，也不能证明世上真有这种神授的权力的人，他是不可能有让我服从的神权的。

121 . And hence not being able to make out any prince's title to government, as heir to Adam, which therefore is of no use, and had been better let alone, he is fain to resolve all into present possession, and makes civil obedience as due to a usurper as to a lawful king; and thereby the usurper's title as good. His words are, [11_21] and they deserve to be remembered: “If a usurper dispossesses the true heir, the subjects’ obedience to the fatherly popover must go along, and wait upon God's providence.” But I shall leave his title of usurpers to be examined in its due place, and desire my sober reader to consider what thanks princes owe such politics as this, which can suppose paternal power (i.e.,) a right to government in the hands of a Cade or a Cromwell; and so all obedience being due to paternal power, the obedience of subjects will be due to them, by the same right, and upon as good grounds, as it is to lawful princes; and yet this, as dangerous a doctrine as it is, must necessarily follow from making all political power to be nothing else but Adam's paternal power by right and divine institution, descending from him without being able to show to whom it descended, or who is heir to it.

121 . 由于我们的作者不能通过任何君主是亚当的继承人这个角

度确定君主获得统治权的资格，所以这个方法是无用的，不如搁置一边为好。他还喜欢将一切归结到当前的占有之上，让篡位者同合法国王一样享受人民的服从，同时还证明篡位者的资格同样有效。他说“如果有人篡夺了合法继承人的位置，人民对父权的服从必须继续，然后等待上帝的安排。”[12_21] 这些话值得我们记住。但是我们的作者有关篡权者的资格问题，且等到合适的时候再讨论。我希望清醒的读者们想想，君主们该怎样感谢他这样的政治学说。这种学说可以把父权，也即统治权，交给凯德（Cade）或克伦威尔（Cromwell）这一类的人；于是一切对于父权的服从，都要变成对他们的服从，依据同样的权利，其依据之有效，就像他们是合法君王一样。然而，像这样危险的学说，却一定要先依照神的旨意将所有政治权力归于亚当的父权，然后说权力由亚当继续传承却不说明传给了谁，或者谁才是这个继承人。

122 . To settle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and to lay obligations to obedience on any man's conscience, it is as necessary (supposing with our author that all power be nothing but the being possessed of Adam's fatherhood) to satisfy him, who has a right to this power, this fatherhood, when the possessor dies, without sons to succeed immediately to it; as it was to tell him, that upon the death of the father, the eldest son had a right to it: for it is still to be remembered, that the great question is, (and that which our author would be thought to contend for, if he did not sometimes forget it) what persons have a right to be obeyed, and not whether there be a power in the world, which is to be called paternal, without knowing in whom it resides; for so it be a power, i.e. right to govern, it matters not, whether it be termed paternal or regal, natural or acquired; whether you call it supreme fatherhood, or supreme brotherhood, will be all one, provided we know who has it.

122．如果要在世上建立政府，然后让某人心甘情愿地承担服从的责任，就有必要让他知道（假定按我们的作者之意，一切权力都集于亚当的父权），该权力的所有者去世之后，如果他没有儿子来直接继承，谁有权获得这个父权；就像告诉人们，父亲去世之后，长子有权继承一样：因为我们要始终记住，最重要的问题是（若不是我们的作者有时忘记，也本该是他极力主张的问题）什么人有权令人臣服，而不是在连谁拥有这个权力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谈论世上是否有这么个叫做父权的权力：因为它是一种权力，即统治权，所以不论是自然的还是获取的，写成“父权”还是“王权”，称之为“最高父权”还是“最高兄权”，那都不重要，关键是我们得知道谁拥有这个权力。

123．I go on then to ask, whether in the inheriting of this paternal power, this supreme fatherhood, the grandson by a daughter hath a right before a nephew by a brother? Whether the grandson by the eldest son, being an infant, before the younger son, a man and able? Whether the daughter before the uncle? Or any other man, descended by a male line? Whether a grandson, by a younger daughter, before a grand-daughter by an elder daughter? Whether the elder son by a concubine, before a younger son by a wife? From whence also will arise many questions of legitimation, and what in nature is the difference betwixt a wife and a concubine? For as to the municipal or positive laws of men, they can signify nothing here. It may farther be asked, whether the eldest son, being a fool, shall inherit this paternal power, before the younger, a wise man? And what degree of folly it must be that shall exclude him? And who shall be judge of it? Whether the son of a fool, excluded for his folly, before the son of his wise brother who reigned? Who has the paternal power whilst the widow-queen is with child by the deceased king, and nobody knows whether it will be a son or a daughter? Which shall be heir of the two male twins, who by the dissection of the mother were laid open to the world?

Whether a sister by the half-blood, before a brother's daughter by the whole blood?

123．我想接着问，在“父权”或“最高父权”的继承上，女儿所生的儿子是否比兄弟所生的儿子有优先权？长子的儿子如果还是婴儿，他是否比他成年能干的叔叔有优先权？女儿是不是优先于她叔叔或任何其他父系所生的男子？幼女的儿子是否优先于长女的女儿？小妾所生的长子是否优先于妻子所生的幼子？这样一来，关于合法与否的问题就多了，妻与妾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因为对于人类的民法或明文法来说，他们都不能说明什么。我们还可以继续问，如果长子是个傻子，他是否应该比聪明的幼子优先继承父权？傻到什么程度才能剥夺他这个权利呢？能做这个判断的人是谁？因为傻而未能继承的傻子，他的儿子是否比他在位的弟弟所生的儿子有优先权？如果国王去世之时，皇后有孕在身，没人知道她会生男还是生女，那谁来享有这个父权？如果母亲剖腹生出一对男双胞胎，那哪个儿子是继承人呢？半血亲的姊妹是否比全血亲的兄弟所生的女儿有优先权？

124．These, and many more such doubts, might be proposed about the titles of succession, and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and that not as idle speculations, but such as in history we shall find have concerned the inheritance of crowns and kingdoms; and if we want them, we need not go farther for famous examples of it than the other kingdom in this very island, which having been fully related by the ingenious and learned author of *Patriarchanon Monarcha* , I need say no more of. Till our author hath resolved all the doubts that mall arise about the next heir, and showed that they are plainly determined by the law of nature, or the revealed law of God, all his suppositions of a monarchical, absolute, supreme, paternal power in Adam, and the descent of that power to his heirs, would not be of the least use to establish the authority, or make out the title of any

one prince now on earth; but would rather unsettle and bring all into question; for let our author tell us as long as he pleases, and let all men believe it too, that Adam had a paternal, and thereby a monarchical power; that this (the only power in the world) descended to his heirs; and that there is no other power in the world but this: let this be all as clear demonstration, as it is manifest error; yet if it be not past doubt to whom this paternal power descends, and whose now it is, nobody can be under any obligation of obedience, unless anyone will say that I am bound to pay obedience to paternal power in a man who has no more paternal power than I myself; which is all one as to say, I obey a man, because he has a right to govern; and if I be asked how I know he has a right to govern, I should answer it cannot be known that he has any at all: for that cannot be the reason of my obedience, which I know not to be so; much less can that be a reason of my obedience, which nobody at all can know to be so.

124．以上这些有关继承资格和继承权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提出更多；那不是随意的想法，而是在历史上，继承王位和王国时经常遇见的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也不用去更远的地方，在英国三岛上就能找到著名的例子。对此，《族长非君王》（PatriarchanonMonarcha）一书博学多才的作者已经讲的十分详尽，我就不再赘述了。除非我们的作者把关于继承人的一切可能的问题解决了，告诉我们这些问题明显由自然法则或上帝的明确指示决定，否则，他一切关于亚当君主的、绝对的、最高的、父亲的权力的假设，还有有关该权力的传承的假设，对于王权的建立以及对于现世君主资格的确立，非但毫无用处，还会引起混乱，让一切成为问题：因为只要我们的作者愿意，让他说去吧，也让所有的人相信：亚当拥有父权，于是有了君权；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权力）可以传给他的后嗣子孙；世上唯有这个权力：让我们认为他所有的论证十分清楚，清楚得像他的错误一样；可是，如果没有解决“父权传给谁”，“谁现在

拥有这个权力”这两个疑问，那就没有人有服从他人的义务。除非有人说“我必须服从于一个同样没有‘父权’的人身上的‘父权’”。这就相当于说，我服从这个人，因为他有统治权，若要问我怎知他有权统治，我就回答说，他到底有无此权无从知晓。因为我不知道的不可能是我服从的原因，没有人知道的就更不会是我服从的原因。

125 . And therefore, all this ado about Adam's fatherhood, the greatness of its power, and the necessity of its supposal, helps nothing to establish the power of those that govern, or to determine the obedience of subjects who are to obey, if they cannot tell whom they are to obey, or it cannot be known who are to govern, and who to obey. In the state, the world is now, it is irrecoverably ignorant, who is Adam's heir. This fatherhood, this monarchical power of Adam, descending to his heirs, would be of no more use to the government of mankind, than it would be to the quieting of men's consciences, or securing their health, if our author had assured them that Adam had a power to forgive sins, or cure diseases, which by divine institution descended to his heir, whilst this heir is impossible to be known. And should not he do as rationally, who upon this assurance of our author went and confessed his sins, and expected a good absolution; or took physic with expectation of health, from anyone who had taken on himself the name of priest or physician, or thrust himself into those employments, saying, I acquiesce in the absolving power descending from Adam, or I shall be cured by the medicinal power descending from Adam; as he who says, I submit to and obey the paternal lower descending from Adam, when it is confessed all these powers descend only to his single heir, and that heir is unknown?

125．因此，所有关于亚当的父权如何强大，以及父权假设的必

要性等言论，在弄清要服从谁、谁有权统治、谁应该服从之前，对于建立统治者的权力或决定哪些人要服从统治没有任何帮助。在现在的世界上，谁是亚当的继承人仍然未知，这是不可挽回的事实。如果我们的作者告诉人们亚当有赦罪、治病的“权力”，这个权力按照神的旨意传给其继承人，但继承人是谁却无从知晓，那么亚当的父权，这个能传给继承人的王权，除了稳定民心、保证人民健康以外，对于人类统治也没有更多用处。如果有人听信了我们的作者这些言之确凿的话，去向任何一个自称牧师的人忏悔以得到赦免，或者找任何一个自称医生的人进行治疗以得到健康；或者，跑到这些职业者面前说：“我接受这个传自亚当的赦免权”或“我的病将被传自亚当的医疗权治愈”，那就好比说：“我接受并服从这个传自亚当的父权，虽然知道这个权利只传给他唯一的一个继承人，但这个继承人是谁还不清楚”一样，不合常理。

126 . It is true the civil lawyers have pretended to determine some of these cases concerning the succession of princes; but by our author's principles they have meddled in a matter that belongs not to them: for if all political power be derived only from Adam, and be to descend only to his successive heirs, by the ordinance of God and divine institution, this is a right antecedent and paramount to all government; and therefore the positive laws of men cannot determine that which is itself the foundation of all law and government, and is to receive its rule only from the law of God and nature. And that being silent in the case, I am apt to think there is no such right to be conveyed this way: I am sure it would be to no purpose if there were, and men would be more at a loss concerning government, and obedience to governors, than if there were no such right; since by positive laws and compact, which divine institution (if there be any) shuts out, all these endless inextricable doubts can be safely provided against: but it can never be understood how a divine natural right, and that of such moment as is all order and

peace in the world, should be conveyed down to posterity, without any plain natural or divine rule concerning it. And there would be an end of all civil government, if the assignment of civil power were by divine institution to the heir, and yet by that divine institution the person of the heir could not be known. This paternal regal power being by divine right only his, it leaves no room for human prudence, or consent, to place it anywhere else; for if only one man hath a divine right to the obedience of mankind, nobody can claim bleat obedience, but he that can show that right; nor can men's consciences by any other pretense he obliged to it. And thus this doctrine cuts up all government by the roots.

126．诚然，世间的律师自诩能解决一些王权继承的问题；但是根据我们的作者的原则，他们是干预了不属于他们职责范围的事情：因为，如果依照上帝和神的旨意，一切政治权力都来自亚当，并只能传给继承他的嗣子，那么，这个权力就优先并凌驾于一切政府权力之上；既然这权力是人类一切法律和政府的基础，那么人类制定的明文法规是不能决定它的，其法则也只能自上帝或自然接受而来。如果我们的作者对此不作回答，我就会认为，根本不存在如此传递的这种权利。如果有，我相信也没有用处，人们只会对“统治”、“服从统治者”等问题感到更加困惑。因为依据神的旨意（如果确实有）所排斥的人类明文法和契约，所有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就能妥善解决，但是我们无法理解，一种与世界秩序与和平一样重要的神授的自然权利，它如何能不经过自然或神的法则传给后人。如果统治权是神规定传给继承人的，而根据神的规定继承人是谁无从知晓，那一切世俗的统治权就该结束了。这种父亲的王权根据神的旨意只能这样传，那在权利转移的时候，就没有给人类的思考和许可留有任何余地，因为如果只有一个人享有为人类所服从的神授权利，那除了那个可以证明自己有这个权利的人之外，任何人不能要求他人服从，人们也不会因为其他的理由感到有服从他的义务。这样的话，这个学说就从根本上推翻了一切政府。

127 . Thus we see how our author, laying it for a sure foundation, that the very person that is to rule, is the ordinance of God, and by divine institution; tells us at large, only that this person is the heir, but who this heir is he leaves us to guess; and so this divine institution, which assigns it to a person whom vie have no rule to know, is just as good as an assignment to nobody at all. But whatever our author does, divine institution makes no such ridiculous assignments; nor can God be supposed to make it a sacred law, that one certain person should have a right to something, and yet not give rules to mark out, and know that person by; or give an heir a divine right to power, and yet not point out who that heir is. It is rather to be thought that an heir had no such right by divine institution, than that God should give such a right to the heir, but yet leave it doubtful and undeterminable who such heir is.

127 . 可见我们的作者，将“统治者由上帝指定，其确定是神的旨意”作为可靠的基础后，就笼统地告诉我们，这个人就是继承人，至于具体是谁，他让我们自己去猜测。如果按神的规定指派的人我们无从知晓，那这个指派就无异于根本没指派任何人。但是不论我们的作者怎么说，神的旨意从没有做这样荒谬的指派：神不可能规定某个人拥有某种权利，却不告诉我们辨认此人的法则，或者给予继承人掌权的神权，却不指明继承人是谁。与其说上帝给了继承人这种权利却不明确说明继承人是谁，还不如说继承人按照神的旨意并不享有这种神授的权利。

128 . If God lead given the land of Canaan to Abraham, and in general terms to somebody after him, without naming his seed, whereby it might be known who that somebody was; it would have

been as good and useful an assignment to determine the right to the land of Canaan, as it would be the determining the right of crowns, to give empire to Adam and his successive heirs after him, without telling who his heir is; for the word heir, without a rule to know who it is, signifies no more than somebody, I know not whom. God making it a divine institution that men should not marry those who were of near of kin, thinks it not enough to say, “None of you shall approach to any that is near of kin to him, to uncover albeit nakedness”; but moreover gives rules to know who are those near of kin, forbidden by divine institution; or else that law would have been of no use; it being to no purpose to lay restraint or give privileges to men, in such general terms, as the particular person concerned cannot be known by. But God not having anywhere said the next heir shall inherit all his father's estate or dominion, we are not to wonder that he hath nowhere appointed who that heir should be; for never having intended any such thing, never designed any heir in that sense, we cannot expect he should anywhere nominate or appoint any person to it, as we might, had it been otherwise. And therefore, in Scripture, though the word heir occurs; ye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heir in our author's sense, one that was by right of nature to inherit all that his father had; exclusive of his brethren. Hence, Sarah supposes that if Ishmael staid in the house to share in Abraham's estate after his death, this son of a bond-woman might be heir with Isaac; and therefore, says she, “cast out this bond-woman and her son, for the son of this bondwoman shall not be heir with my son.” But this cannot excuse our author, who telling us there is, in every number of men, one who is right and next heir to Adam, ought to have told us what the laws of den scent are: but he having been so sparing to instruct us by rules how to know who is heir; let us see in the next place what his history out of Scripture, on which he pretends wholly to build his government, gives us in this necessary and fundamental point.

128．如果上帝把迦南的土地赐给了亚伯拉罕，然后笼统地规定在亚伯拉罕身后赐给某人，也不说明是否是他的子孙，以防让人知道这个“某人”是谁，那么，对于迦南土地所有权的规定，就像规定王位继承权一样，把王国给予亚当及其身后的继承人却不指明继承人具体是谁，是无效也没有意义的：因为“继承人”这个词，如果没有明确的依据，就不知道是什么人，至多也只是“某人”。上帝立下神圣的规定，世人不得与近亲结婚，但是只说“你们都不得接近任何近亲看见他们赤裸”；是不够的，还应该制定明确的规定，用以得知哪些人属于“近亲”，是神意所禁止的，否则前面的规定就没有作用。只笼统地给人以限制或特权，具体给谁却不说清楚，这是无意义的。既然上帝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继承父亲财产和支配权的继承人是谁，我们也就不怀疑上帝根本就没有在什么地方指定过继承人是谁。正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从这个意义上指定什么继承人，我们就不能指望他在某个地方指定或任命某个人做继承人；否则我们就会有所期待了。所以，《圣经》里虽然出现了“继承人”这个词，但决不能根据我们的作者的意思理解成“根据自然权利继承父亲的一切，将所有弟兄排除在外的人”。所以萨拉认为，如果以实玛利留在家里，在亚伯拉罕去世之后分享他的财产，那么，这位女仆的儿子和以扫会同为继承人。所以她才对丈夫亚伯拉罕说：“把这女仆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她的儿子不可和我儿子一起继承产业”；但这不能成为我们的作者的理由，因为他说在每一群人中，就有一个是“接替亚当的继承人”，那就应该告诉我们接替的规则，但他不肯告诉我们辨认继承人的规则；紧接着，让我们看看他引用的《圣经》的一段历史——他声称他的政府论完全建立在这个历史之上，能为我们这个必要的、基本的问题提供什么启示。

129．Our author, to make good the title of his look, [11_22] begins his history of the descent of Adam's regal power in these words: “This lordship which Adam by command had over the whole world, and by right descending from him, the patriarchs did enjoy,

was a large” [11_23] . How does he prove that the patriarchs by descent did enjoy it? For “dominion of life and deaths,” says he, “we find Judah the father pronounced sentence of death against Thamar his daughter-in-law for playing the harlot.“ [11_24] How does this prove that Judah had absolute and sovereign authority? “He pronounced sentence of death.” The pronouncing of sentence of death is not a certain mark of sovereignty, but usually the office of inferior magistrates. The power of making laws of life and death is indeed a mark of sovereignty, but pronouncing the sentence according to those laws may be done by others, and therefore this will but ill prove that he had sovereign authority; as if one should say, judge Jefferies pronounced sentence of death in the late times, therefore judge Jefferies had sovereign authority. But it will be said Judah did it not by commission from another and therefore did it in his own right. Who knows whether he had any right at all? Heat of passion might carry him to do that which he had no authority to do. “Judah had dominion of life and death”; how does that appear? He exercised it, he “pronounced sentence of death against Thamar”. Our author thinks it is very good proof that because he did it, therefore he had a right to do it. He lay with her also; by the same way of proof he had a right to do that too. If the consequence be good from doing, to a right of doing, Absalom too may be reckoned amongst our author's sovereigns; for he pronounced such a sentence of death against his brother Amnon, and much upon a like occasion, and had it executed too, if that be sufficient to prove a dominion of life and death.

129．我们的作者，为了给自己的书名带来声誉， [12_22] 用这样的话来为亚当王权的传承的历史开头：“亚当凭上帝命令拥有对全世界的统治权，先祖们凭着亚当传下来的权利确实享有的统治权范围很广” [12_23] 。他怎么证明先祖们凭借传承的确享有统治权呢？他说因

为“我们发现犹大作为父亲，有生杀之权，曾因儿媳塔玛做妓女宣告将她处死” [12_24] ，这如何证明犹大有绝对的统治权呢？“是他宣告判处的死刑。”宣告判处死刑不是统治权的必然标志，而通常是下级法官的职权。制定关乎生死的法律确实是统治权的标志，但是宣判，可能根据的是他人制定的法律，所以用这个证明他享有统治权不够充分，无异于说“最近法官杰弗里斯做了死刑宣判，所以杰弗里斯有统治权。”但是有人会说，犹大那样做，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受人委托。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权利啊？情绪一时冲动就有可能让他做出他本无权做的事情。“犹大有生杀支配权：”何以见得？他行使了这个权利，他“宣判塔玛死刑”。我们的作者以为他做了这个事情，就足以证明他有这个权利。犹大还和她同过床，那根据这个证据，是否也能证明他有这样做的权利呢？如果做了某种事情就意味着有做这种事情的权利的话，阿布萨隆犹太王的第三子，深得其父王宠爱，后因背叛其父被杀）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作者所说的统治者，因为他也在类似情况下宣告了他兄弟阿姆农的死刑，并且亲自动手，这些是否能充分证明他有生杀权。

But allowing this all to be clear demonstration of sovereign power, who was it that had this “lordship by right descending to him from Adam, as large and ample as the absolutest dominion of any monarch”? “Judah,” says our author, “Judah, a younger son of Jacob, his father and elder brethren living; so that if our author's own proof be to be taken, a younger brother may, in the life of his father and elder brothers, by right of descent, enjoy Adam's monarchical power”; and if one so qualified may be a monarch by descent, why may not every man? If Judah, his father and elder brethren living, were one of Adam's heirs, I know not who can be excluded from this inheritance; all men by inheritance may be monarchs as well as Judah.

不过，就算这些都是统治权的证明，那么，“凭借亚当传承下来的权利而拥有广大到如君主的绝对统治权一般的权力的人究竟是谁呢？”我们的作者说是犹大。犹大是雅各的小儿子，其父亲和长兄都还在世。如果我们接受我们的作者自己的证据，结果就是，一个弟弟，在其父亲和长兄还在世的时候，“根据继承权，享有亚当的君权”，如果一个只有这等条件的人都可以继承王位，那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行？如果父亲和长兄都健在的犹大是亚当的继承人之一，我不知道还有谁可以被排除在外。所有人都可以像犹大一样继承王位。

130 . “Touching war, we see that Abraham commanded an army of 318 soldiers of his own family, and Esau met his brother Jacob with 400 men at arms; for matter of peace, Abraham made a league with Abimelech” [11_25] . Is it not possible for a man to have 318 men in his family without being heir to Adam? A planter in the West Indies has more, and might, if he pleased (who doubts?) muster them up and lead them out against the Indians to seek reparation upon any injury received from them; and a this without the “absolute dominion of a monarch, descending to him from Adam”. Would it not be an admirable argument to prove, that all power by God's institution descended from Adam by inheritance, and that the very person and power of this planter were the ordinance of God, because he had power in his family over servants born in his house, and bought with his money? For this was just Abraham's case; those who were rich in the patriarch's days, as in the West Indies now, bought men and maid-servants, and by their increase, as well as purchasing of new, came to have large and numerous families, which though they made use of in war or peace, can it be thought the power they had over them was an inheritance descended from Adam, when it was the purchase of their money? A man's riding, in an expedition against an enemy, his horse bought in a fair, would be as good a proof that the owner enjoyed the lordship

which Adam by command had over the whole world, by right descending to him, as Abraham's leading out the servants of his family is, that the patriarchs enjoyed this lordship by descent from Adam; since the title to the power the master had in both cases, whether over slaves or horses, was only from his purchase; and the getting a dominion over anything by bargain and money, is a new way of proving one had it by descent and inheritance.

130．“谈到战争，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其家族领导着三百一十八名士兵；以扫带领四百名武装人士去会他的兄弟雅各；亚伯拉罕为了和平与亚比米勒结盟”，[12_25] 一个人不是亚当的继承人，就不可能在家中带领三百一十八人吗？西印度群岛的一名种植园主拥有的人更多，如果他愿意（谁会怀疑？），他可以把他的人集合起来，带领他们去攻打印第安人，向他们索取伤害赔偿。做所有这些事都没有使用“从亚当传下来的君主的绝对支配权”。这难道不是个绝妙的论证，足以证明一切权力都是根据上帝的规定由亚当传承下来的，这个种植园主本人及其权力都是上帝指定的，其根据是，在种植园主的家里，他对生在他家、被他花钱买来的奴仆拥有权力？亚伯拉罕的情况正是如此。先祖时代的那些富人，就像现在西印度的富人一样，购买男女奴仆，通过他们的自身繁殖以及再购买新的，就组成了规模庞大、人口众多的家庭。富人们在平时和战时都要使用这些奴仆，我们能认为这种用钱买来的支配权是从亚当处继承而来的吗？说亚伯拉罕率领他家的奴仆出兵，就证明先祖们享有传自亚当的统治权，那就好比说，一个人骑着马远征抗敌，这匹马是他从市场上买来的，就足够证明马的主人“根据继承的权利，享有亚当根据上帝规定而享有的对全世界的支配权”。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主人拥有这种权力的资格，对奴仆也好，对马也罢，都是通过购买获得的。于是通过交易或购买获取支配权，成了证明一个人通过继承获得权力的一种新的方式。

131．“But making war and peace are marks of sovereignty”.

Let it be so in politic societies: may not therefore a man in the West Indies, who hath with him sons of his own, friends or companions, soldiers under pay; or slaves bought with money, or perhaps a band made up of all these, make war and peace, if there should be occasion, and ratify the articles too with an oath, without being a sovereign, an absolute king over those who went with him? He that says he cannot, must then allow many masters of ships, many private planters, to be absolute monarchs, for as much as this they have done. War and peace cannot be made for politic societies, but by the supreme power of such societies; because war and peace, giving a different motion to the force of such a politic body, none can make war or peace, but that which has the direction of the force of the whole body, and that in politic societies is only the supreme power. In voluntary societies for the time, he that has such a power by consent may make war and peace, and so may a single man for himself, the state of war not consisting in the number of partisans, but the enmity of the parties, where they have no superior to appeal to.

131．“但宣战与讲和是统治权的标志。”在政治社会里诚然如此；但是，如果在西印度群岛，有一个人带领的是他自己的一群儿子、一群朋友、一群同伴、一群雇佣的士兵；一群花钱买来的奴仆，或是一支由上述所有人构成的队伍，他可不可以宣战，讲和（如果有这种情况），以及“用宣誓的方式批准条约”，而不必是一个支配他的群体的绝对君王呢？如果有人说不可以，那他就必须承认，许多船主和私人种植园主都是绝对的君王，因为上述的事情他们都做。在政治社会，宣战和讲和只能由社会最高权力者执行，因为战争或和平对这种政治团体的力量起着不同的推动作用，除了对整个团体力量有指挥力量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宣战或讲和。在政治社会中，这就只能是最高权力。在临时自由组成的社会中，通过一致同意获得这种权力的人可以实施宣战与讲和；一个人为了自己也可以有这种权力。战争

的态势不在于参战的人数多少，而在于双方之间在无上级可以申诉的情况下是否存在敌意。

132 . The actual making of war or peace is no proof of any other power, but only of disposing those to exercise or cease acts of enmity for whom he makes it, and this power in many cases anyone may have without any politic supremacy; and therefore the making of war or peace will not prove that every one that does so is a politic ruler, much less a king; for then commonwealths must be kings too, for they do as certainly make war and peace as monarchical government.

132．宣战和讲和这件事本身不能证明任何其他权力，只能证明做此决定的人有权支配他的人来为他进行或停止敌对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任何没有最高政治地位的人都可以有这种权力。所以，宣战和讲和都不能证明凡行此事之人就是政治意义上的统治者，更不能说是君主，那样的话共和政府也是君主，因为他们像君主制政府一样宣战讲和。

133 . But granting this a “mark of sovereignty in Abraham”, is it a proof of the descent to him of Adam's sovereignty over the whole world? If it be, it will surely be as good a proof of the descent of Adam's lordship to others too. And then commonwealths, as well as Abraham, will be heirs of Adam, for they make war and peace as well as he. If you say that the “lordship of Adam” doth not by right descend to commonwealths, though they make war and peace, the same say I of Abraham, and then there is an end of your argument; if you stand to your argument, and say those that do make war and peace, as commonwealths do without doubt, “do inherit Adam's

lordship”, there is an end of your monarchy, unless you will say that commonwealths “by descent enjoying Adam's lordship” are monarchies; and that indeed would be a new way of making all the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monarchical.

133．但就算这是亚伯拉罕“统治权的标志”，它是否就证明亚伯拉罕继承了亚当支配全世界的“统治权”呢？如果是，它必然也就成为亚当的“统治权”传给别人的一个有力证据。那么，共和国也和亚伯拉罕一样，都是亚当的继承者，因为共和国也同亚伯拉罕一样可以宣战讲和。如果你说“亚当的统治权”并没有根据权利传给共和国，虽然它也可以宣战讲和，那我同样可以这样说亚伯拉罕，那你的论证便就此结束了：如果你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凡可以宣战讲和的——毫无疑问共和国确实是这样做的——就“一定继承了亚当的统治权”，那么，你的君主制又站不住脚了，除非你说“继承亚当统治权”的共和国是君主国，那这种做法确实是让世上一切政府变成君主制的新方法。

134．To give our author the honour of this new invention, for I confess it is not I have first found it out by tracing his principles, and so charged it on him, it is fit my readers know that (as absurd as it may seem) he teaches it himself, where he ingenuously says, “In all kingdoms and commonwealths in the world, whether the prince be the supreme father of the people, or but the true heir to such a father, or come to the crown by usurpation or election, or whether some few or a multitude govern the commonwealth; yet still the authority that is in anyone, or in many, or in all these, is the only right and natural authority of a supreme father” [11_26] ; which right of fatherhood, he often tells us, is “regal and royal authority”; as particularly, the page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is instance of Abraham. This regal authority, he says, those that govern commonwealths have [11_27] ; and if it be true, that regal and

royal authority be in those that govern commonwealths, it is as true that commonwealths are governed by kings; for if regal authority be in him that governs, he that governs must needs be a king, and so all commonwealths are nothing but downright monarchies; and then what need any more ado about the matter?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are as they should be; there is nothing but monarchy in it. This, without doubt, was the surest way our author could have found to turn all other governments, but monarchical, out of the world.

134．为了给我们的作者这种新发明一点奖赏——我承认并不是我在考察他的原理时首先发现并强加于他的——最好还是让读者知道这些话出自他本人之口（虽然看上去很荒谬）。《君权论》第28页，他率直地说："世上一切王国和共和国，不论君主是人民最高的父亲，还是这位父亲的真正继承人，或是通过篡权、选举取得王位的人，或者是管理共和国的几个或一群人，这个人或这些人所拥有的权力仍是最高的父亲的唯一的、自然的权力"[12_26]；这种"父亲身份的权利"，我们的作者常告诉我们，就是"君王的权力"，特别是亚伯拉罕例子的前一页。他说，统治共和国的人也有这种王权[12_27]；如果这是真的，统治共和国的人真有君王权力的话，那么，说共和国由君主统治应该是对的了。既然统治者享有王权，那他作为统治者必定为王，一切共和国便都是彻头彻尾的君主国。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们还需要再费什么口舌呢？世上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就得是什么样，是政府就是君主制的。这无疑是我们的作者发现的将一切非君主制政府排除于世界之外的最可靠的办法。

135．But all this scarce proves Abraham to have been a king as heir to Adam. If by inheritance he had been king, Lot, who was of the same family, must needs have been his subject by that title, before the servants in his family; but we see they lived as friends

and equals, and when their herdsmen could not agree, there was no pretense of jurisdiction or superiority between them, but they parted by consent, [11_28] hence he is called, both by Abraham and by the text, Abraham's brother, the name of friendship and equality, and not of jurisdiction and authority, though he were really but his nephew. And if our author knows that Abraham was Adam's heir, and a king, it was more, it seems, than Abraham himself knew, or his servant whom he sent a wooing for his son; for when he sets out the advantages of the match, [11_29] thereby to prevail with the young woman and her friends, he says, “I am Abraham's servant, and the Lord hath blessed my master greatly, and he is become great; and he hath given him flocks and herds, and silver and gold, and men-servants and maid-servants, and camels and asses; and Sarah, my master's wife, bare a son to my master when she was old, and unto him hath he given all he hath.” Can one think that a discreet servant, that was thus particular to set out his master's greatness, would have omitted the crown Isaac was to have, if he had known of any such? Can it be imagined he should have neglected to have told them, on such an occasion as this, that Abraham was a king, a name well known at that time, for he had nine of them his neighbours, if he or his master had thought any such thing, the likeliest matter of all the rest, to make his errand successful?

135．但这一切都很难证明亚伯拉罕做君王的依据是他是亚当的继承人。如果他是通过继承的权利做了君王，那么，与他同族的洛特（亚伯拉罕的侄儿）就一定凭借家人的身份先于他家的奴仆成为他的臣民；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像朋友一样平等相处，当他们的放牧人发生争执的时候，他们之间不存在谁管理谁或地位高低，只是协商一致彼此分开， [12_28] 因此亚伯拉罕和《圣经》原文都称洛特为亚伯拉罕的兄弟，一个平等友好的称呼，不含统治和权威之意，虽然事实上洛

特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如果我们的作者知道亚伯拉罕是亚当的继承人，将成为一个君王，那他似乎比亚伯拉罕自己，以及亚伯拉罕打发去替儿子以扫娶亲的仆人知道的还多。因为这位仆人去说服那位少女和她朋友的时候，说了这门亲事的好处，[12_29]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我的主人深受主的祝福而变得强大；主赐给他成群的牛羊、金银、男女奴仆、骆驼、驴子；他妻子撒拉年老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将一切都给了这个儿子。"我们能否想象，一个谨慎的仆人，如此详细地列举他主人的强大之处，如果他知道以扫将来要继承王位，他会把此事略去不说？我们能否想象，在这样的场合，他会因疏忽忘记告诉他们亚伯拉罕是一位君王，毕竟君王这个称谓在那时应该十分出名，亚伯拉罕邻地就有九个君王；他或他的主人是否想过，说了这个最可能将事情办成？

136．But this discovery it seems was reserved for our author to make two or three thousand years after, and let him enjoy the credit of it; only he should have taken care that some of Adam's land should have descended to this his heir; as well as all Adam's lordship; for though this lordship which Abraham, (if we may believe our author) as well as the other patriarchs, "by right descending to him, did enjoy, was as large and ample as the absolute dominion of any monarch which hath been since the creation"; yet his estate, his territories, his dominions, were very narrow and scanty; for he had not the possession of a foot of land, till he bought a field and a cave of the sons of Heth to bury Sarah in.

136．但是，这事似乎是在二三千年后被我们的作者发现的，那就让他好好享受这份荣誉吧；不过，他本该注意到，亚当有些土地和亚当全部的统治权本应传给这位继承人，因为，虽然亚伯拉罕的统治权（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作者认为他有），像其他的先祖们一样，

是“根据权利继承，确实享有，权力之大就和创世以来任何君主的绝对支配权一样”；但事实上他的产业、领地、支配的范围十分狭小，因为在向赫人的子孙购买一块土地和一个洞穴来埋葬妻子撒拉以前，他连一寸土地也没有。

137 . The instance of Esau joined with this of Abraham, to prove that the “lordship which Adam had over the whole world, by right descending from him, the patriarchs did enjoy”, is yet more pleasant than the former. “Esau met his brother Jacob with 400 men at arms”; he therefore was a king by right of heir to Adam. Four hundred armed men then, however got together, are enough to prove him that leads them to be a king and Adam's heir. There have been Tories in Ireland, (whatever there are in other countries) who would have thanked our author for so honourable an opinion of them, especially if there had been nobody near with a better title of 500 armed men, to question their royal authority of 400. It is a shame for men to trifle so, to say no worse of it, in so serious an argument. Here Esau is brought as a proof that Adam's lordship, “Adam's absolute dominion, as large as that of any monarch, descended by right to the patriarchs” [11_30] ; and in this very chap, Jacob is brought as an instance of one, that by “birthright was lord over his brethren”. So we have here two brothers absolute monarchs by the same title, and at the same time heirs to Adam; the eldest, heir to Adam, because he met his brother with 400 men; and the youngest heir to Adam by birthright: “Esau enjoyed the lordship which Adam had over the whole world by right descending to him, in as large and ample manner as the absolute dominion of any monarch; and at the same time, Jacob lord over him, by the right heirs have to be lords over their brethren”.*Risum teneatis* ? I never, I confess, met with any man of parts so dexterous as Sir Robert at this way of arguing; but it was his misfortune to light upon a hypothesis

that could not be accommodated to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human affairs; his principles could not be made to agree with that constitution and order which God lead settled in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must needs often clash with common sense and experience.

137．除了亚伯拉罕的例子以外，我们的作者还举出以扫的例子以证明“先祖们的确根据权利，继承并享有亚当支配全世界的权力”，这个例子更加有趣。“以扫带领四百名武装人士去会他的兄弟雅各”；于是他依据亚当继承人这一权利成为一名君王。“四百名武装人士”，不论是怎样聚集到一起的，就能充分证明其带领者是一名君王，是亚当的继承人了。爱尔兰的保守党（其他国家有什么党暂且不管），真应该感谢我们的作者对他们有那样可敬的看法，特别是如果附近有人带领五百名武装人士，资格更高，却没人出来质疑“四百名武装人士”之带领者的王权，他们更加感激。对于这等严肃的话题，有人竟如此随意（且不用更糟的词来形容），那是十分让人遗憾的。在这里提以扫，是要证明亚当的君主地位，“亚当的绝对统治权和任何其他君主的权力一样大，并凭权利传给先祖们。”[12_30] 就在该章节，我们的作者又以雅各为例说明他凭借“长子名分成为他众兄弟的统治者”。这样一来，我们发现两兄弟凭借同一名义都是绝对的君主，同时都是亚当的继承人。哥哥是亚当的继承人，因为是他曾率领四百人和他的兄弟相会；幼子依据“长子的名分”也成为继承人：“以扫凭借传给他的权利享有亚当支配全世界的统治权，其权力之广大同任何君主的绝对支配权一样；与此同时，雅各作为继承人，有权成为他众兄弟的主人，可以支配以扫。”你能忍住笑吗？我得承认，我从未见过像罗伯特爵士这样机敏的人会这样辩论。可惜的是，他的假设与事物和人类事务的本质不相符，他的原则与上帝在世上确立的结构和秩序也不一致，因此它们势必不时地与人们的常识和经验相冲突。

138．In the next section, he tells us, “This patriarchal power

continued not only till the flood, but after it, as the name patriarch cloth in part prove". The word "patriarch cloth" more than in part prove, that patriarchal power continued in the world as long as there were patriarchs; for it is necessary that patriarchal power should be whilst there are patriarchs, as it is necessary there should be paternal or conjugal power whilst there are fathers or husbands; but this is but playing with names. That which he would fallaciously insinuate is the thing in question to be proved viz. that the lordship which Adam had over the world, the supposed absolute universal dominion of Adam by right descending from him, the patriarchs did enjoy. If he affirms such an absolute monarchy continued to the flood in the world, I would be glad to know what records he has it from; for I confess I cannot find a word of it in my *Bible* : if by patriarchal power he means anything else, it is nothing to the matter in hand. And how the name patriarch in some part proves, that those who are called by that name had absolute monarchical power, I confess, I do not see, and therefore I think needs no answer till the argument from it be made out a little clearer.

138．在下一节，我们的作者告诉我们："这种先祖的权力一直延续到那场大洪水之后，对此，'先祖'一词可以部分为证。""先祖"一词不只是部分证明了只要世上有先祖，就一直有这种先祖的权力；因为只要有先祖就必有先祖权，正如只要有父亲和丈夫，就必有父权和夫权；但这只不过是个名字游戏罢了。他想谬误地进行暗示的东西，正是我们要讨论证明的。他想暗示的是"先祖们确实享有亚当支配全世界的权力，假定亚当这个绝对、普遍地统治权可以依法往下传。"如果他敢断定，在世间有一个这样的绝对君权一直持续到洪水时代，我倒很想知道他是从什么记载中得知的。我得说明，我翻遍我的《圣经》都找不到一个相关文字：如果他的"先祖权"另有所指，那它就与我们当前的话题无关了。至于"先祖"一词如何可以部分证明凡是被如

此称呼的人就有绝对的君权，我承认我确实不明白。因此我认为，在据此得出的论点未进一步弄清之前，不必对此作答。

139.“The three sons of Noah had the world,” says our author, “divided amongst them by their father, for of them was the whole world overspread” [11_31] . The world might be overspread by the offspring of Noah's sons, though he never divided the world amongst them; for the earth might be replenished without being divided: so that all our author's argument here proves no such division. However, I allow it to him, and then ask, the world being divided amongst them, which of the three was Adam's heir? If Adam's lordship, Adam's monarchy, by right descended only to the eldest, then the other two could be but his subjects, his slaves; if by right it descended to all three brothers, by the same right it will descend to all mankind; and then it will be impossible what he says, that “heirs are lords of their brethren” [11_32] , should be true; but all brothers, and consequently all men, will be equal and independent, all heirs to Adam's monarchy, and consequently all monarchs too, one as much as another. But it will be said, Noah their father divided the world amongst them; so that our author will allow more to Noah than he will to God Almighty, for O. 211, he thought it hard, [11_33] that God himself should give the world to Noah and his sons, to the prejudice of Noah's birthright. His words are, “Noah was left sole heir to the world; why should it be thought that God would disinherit him of his birthright, and make him, of all men in the world, the only tenant in common with his children?” and yet he here thinks it fit that Noah should disinherit Shem of his birthright, and divide the world betwixt him and his brethren; so that his birthright, when our author pleases, must, and when he pleases, must not, be sacred and inviolable.

139．“挪亚的三个儿子拥有了整个世界，”我们的作者说，“他们的父亲把世界分配给他们，因为他们的后裔遍及整个世界”[12_31]，世界可能是因挪亚儿子的子孙后裔逐渐繁衍生息的，尽管挪亚从未把世界分配给他的儿子们；因为地球不用分配也可以为生生不息的人类所填满，那我们的作者在这儿所有的论证，都不能证明这种分配。不过，就算我承认他证明了，我也想再问一下，既然世界都分配给他三个儿子了，那其中谁是亚当的继承人呢？如果亚当的统治权和君权，根据权利只传给长子，那其余俩人就只能做他的臣民和奴隶。如果根据权利，亚当的统治权和君权传给了三个兄弟，那么据此全人类都可继承享有，那他所说的“继承人是他众兄弟的主人”[12_32]，这句话就不可能是对的；但所有的兄弟进而便会意味着所有的人类，他们全都是平等的独立的，都是亚当君权的继承者，大家都是君主，彼此都一样。但是，有人会说，他们的父亲挪亚把世界分给他们，这样我们的作者就让挪亚胜过万能的上帝了，因为我们的作者认为，[12_33]上帝要亲自损害挪亚的长子权利，把世界分给他和他的儿子们，是很困难的。原文是这样的：“挪亚是留在世间唯一的继承人，为什么有人认为，上帝会剥夺他的长子权利，让他在一切世人中，与他的儿子们一样成为唯一的所有者呢？”但在这里，他又认为挪亚剥夺闪的长子权利，将世界分配他和他的兄弟，是适合的。看来只要我们的作者喜欢，这个“长子权利”有时一定，有时又不一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140．If Noah did divide the world between his sons, and his assignment of dominions to them were good, there is an end of divine institution; all our author's discourse of Adam's heir, with whatsoever he builds on it, is quite out of doors; the natural power of kings falls to the ground; and then the form of the power governing, and the person having that power, will not be (as he says they are [11_34]), the ordinance of God, but they will be ordinances of man; for if the right of the heir be the ordinance of God, a divine right; no man, father or not father, can alter it; if it be not a divine right, it is only human, depending on the will of man;

and so where human institution gives it not, the first-born has no right at all above his brethren; and men may put government into what hands, and under what form they please.

140．如果挪亚确实把世界分给了他的几个儿子，并且该分配有效，那么，神授之说就站不住脚，我们的作者有关亚当继承人的全部论述，连同他以此为据建立起来的一切，就都站不住脚，天赋王权就被推翻了。于是“统治权的形式和具有该权力的人，都不再出于上帝的旨意，而是由人决定” [12_34] ；因为如果继承人的权利由上帝决定，是一种神授的权利，那就没有人可以改变它，不管这个人是不是父亲：如果它不是一种神授的权利，是人为的，取决于人的意志，那么，若非人类制度规定，长子就根本没有优于其弟兄的权利，人类可以将政府交给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择他们喜欢的政府形式。

141．He goes on, “Most of the civilest nations of the earth labour to fetch their original from some of the sons or nephews of Noah.“ [11_35] How many do most of the civilest nations amount to? And who are they? I fear the Chinese, a very great and civil people, as well as several other people of the East, West, North, and South, trouble not themselves much about this matter. All that believe *the Bible* , which I believe are our author's “most of the civilest nations”, must necessarily derive themselves from Noah; but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y think little of his sons or nephews. But if the heralds and antiquaries of all nations, for it is these men generally that labour to find out the originals of nations, or all the nations themselves, should labour to fetch their original from some of the sons or nephews of Noah, what would this be to prove, that the lordship which Adam had over the whole world, by a right descended to the patriarchs? Whoever, nations, or races of men, labour to fetch their original from, may be concluded to be thought

by them men of renown, famous to posterity for the greatness of their virtues and actions; but beyond these they look not, nor consider who they were heirs to, but look on them as such as raised themselves by their own virtue to a degree that would give a luster to those who in future ages could pretend to derive themselves from them. But if it were Ogyges, Hercules, Brama, Tamerlain, Pharamond; nay, if Jupiter and Saturn were the names, from whence divers races of men,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have laboured to derive their original; will that prove, that those men "enjoyed the lordship of Adam by right descending to them"? If not, this is but a flourish of our author's to mislead his reader that in itself signifies nothing.

141．他接着说："世界上大多数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都很想从挪亚的儿子或侄子那儿追本溯源" [12_35] ，这个"大多数"到底指的是多少？是哪些民族？恐怕像中国人这个伟大、文明的民族，以及东西南北各处的其他几个民族，他们好像不大关心这个吧。估计我们的作者所讲的"大多数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指的是信仰《圣经》的民族，他们是不得不从挪亚那里去追寻本源；但对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是不大会去想挪亚的儿子或侄子的。但是，如果各国的宗谱官和考古学家（因为通常是他们极力去追溯民族根源），或所有的民族本身，都"努力从挪亚的儿子或侄子那儿追溯根源"，这对于证明"亚当享有支配全世界的统治权，并依据权利传给先祖们"有什么用处？无论各民族或种族从哪些人身上追溯自己的根源，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其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些人的高尚道德或伟大事迹在后世享有盛名。但是人们却不想、也不关心这些人又是谁的后嗣，只当他们是依靠自己而获得崇高地位的人，这地位能给后世那些自称是其后代的人带来荣耀。古往今来都有很多民族努力从奥古吉斯、海格利斯、婆罗门、坦伯连、法拉蒙德，甚至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宙斯神）和萨腾（罗马神话中的农业之神）这些人身上寻找根源，但是即使他们是这些民族的根源，那是否就说明这些民族的人就"依据传给他们的权利而享有

亚当的统治权”呢？如果不是，这就只不过是我们的作者误导读者们的一种措辞而已，其本身毫无意义。

142 . To as much purpose is what he tells us, concerning this division of the world, “That some say it was by lot, and others that Noah sailed round the Mediterranean in ten years, and divided the world into Asia, Africa and Europe, portions for his three sons” [11_36] . America then, it seems, was left to be his that could catch it. Why our author takes such pains to prove the division of the world by Noah to his sons, and will not leave out an imagination, though no better than a dream, that he can find anywhere to favour it, is hard to guess, since such a division, if it prove anything, must necessarily take away the title of Adam's heir; unless three brothers can all together be heirs of Adam; and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words, “howsoever the manner of this division be uncertain, yet it is most certain the division was by families from Noah and his children, over which the parents were heads and princes” [11_37] , if allowed him to be true, and of any force to prove, that all the power in the world is nothing but the lordship of Adam's descending by right, they will only prove, that the fathers of the children are all heirs to this lordship of Adam; for if in those days Cham and Japhet, and other parents, besides the eldest son, were heads and princes over their families, and had a right to divide the earth by families, what hinders younger brothers, being fathers of families, from having the same right? If Cham and Japhet were princes by right descending to them, notwithstanding any title of heir in their eldest brother, younger brothers by the same right descending to them are princes now; and so all our author's natural power of kings will reach no farther than their own children; and no kingdom, by this natural right, can be bigger than a family; for either this lordship of Adam over the whole world, by right descends only to

the eldest son, and then there can be but one heir, as our author says [11_38] ; or else it by right descends to all the sons equally, and then every father of a family will have it, as well as the three sons of Noah: take which you will, it destroys the present governments and kingdoms, that are now in the world; since whoever has this natural power of a king, by right descending to him, must have it, either as our author tells us Cain had it, and be lord over his brethren, and so be alone king of the whole world; or else, as he tells us here, Shem, Cham, and Japhet had it, three brothers, and so be only prince of his own family, and all families independent one of another: all the world must be only one empire by the right of the next heir, or else every family be a distinct government of itself, by the “lordship of Adam's descending to parents of families”. And to this only tend all the proofs he here gives us of the descent of Adam's lordship, for continuing his story of this descent, he says.

142．为了同一目的，关于世界的划分一事中他说：“有人说那是通过抓阄的方式决定的，其他人说是挪亚花了十年时间环游地中海，将世界划分为亚细亚、阿非利加，和欧罗巴，他三个儿子每人分得一部分。” [12_36] 亚美利加似乎被留下来，谁能获取它便归谁所有。我们的作者为什么不愿抛弃一个如梦一般的想象，非认为自己可以从什么地方找到支持他的证据？为什么不辞劳苦去证明挪亚将世界划分给他的儿子？其原因很难想象，因为这种划分如果能证明什么，那必将剥夺亚当继承人的资格，除非挪亚三个儿子都是亚当的继承人。因此，下面这些话：“尽管分配方式尚未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分配是由挪亚和他儿子的家族执行，在家族里，父母是首领和君主” [12_37] ，如果他所说是真的，并且对“世上一切权力都是从亚当处继承而来的统治权”有所证明，那就只能说明，有孩子的父亲都是亚当统治权的继承者。因为如果在那个时代，闪、雅弗，以及其他父母，包括长子在内，都是其家族的首领和君主，都享有按家族分得土地的权利；那么，已为人父的幼子为什么不能享有同样的权利？如果闪和雅弗没有

因为他们的长兄有继承人的资格而失去继承权，也可以成为君主，则现在弟弟们和长兄一样，也可凭借继承的权利成为君主。因此我们的作者所讲的君主的自然权力涉及的范围也就仅限于他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王国凭借这个自然权利可以大过一个家族。因为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亚当的统治权依据权利只传给长子，继承人只有一个，就像我们的作者所说的那样 [12_38] ；另一种是，该权力依据权利由所有的儿子平等享有，每个家庭的父亲都拥有这个权力，就像挪亚的三个儿子一样。但不论你选择哪一种情况，它都会摧毁世上现有的政府和王国，因为不论谁依据权利继承了这种君王的自然权力，他要么像我们的作者所讲的该隐的情况一样，获得权力并成为他弟兄的支配者，进而成为世上唯一的君王；否则，就只能像我们的作者在这里所说的这样，闪、含、雅弗三兄弟分得这种权力，并成为各自家族的君主，彼此之间不相隶属：整个世界要么是依据嫡嗣权利形成一个帝国，就是所有的家庭依据“亚当传给家族父母的统治权。”自成一个政府。我们的作者提供的有关亚当统治权传袭的一切证据，只能作如此归结，因为在继续权力承袭这一话题时，我们的作者接着说：

143 . “In the dispersion of Babel, we must certainly f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oyal power, throughout the kingdoms of the world” [11_39] . If you must find it, pray do, and you will help us to a new piece of history; but you must show it us before we shall be bound to believe, that regal power was established in the world upon your principles; for, that regal power was established “in the kingdoms of the world”, I think nobody will dispute; but that there should be kingdoms in the world, whose several kings enjoyed their crowns, “by right descending to them from Adam”, that we think not only apocryphal, but also utterly impossible. If our author has no better foundation for his monarchy than a supposition of what was done at the dispersion of Babel, the monarchy he erects thereon, whose top is to reach to heaven to unite mankind, will serve only to divide and scatter them as that tower did; and, instead

of establishing civil government and order in the world, will produce nothing but confusion.

143．“自从挪亚的家族在巴别塔分散之后，我们必然发现，世界各地的王国都建立了自己的王权”，[12_39] 如果你一定要发现，那就请你发现吧。这样你将帮助我们发现一页新的历史；但是，在我们信任您之前，你必须对此加以证明，证明王权是依据你的原则而建立，因为我想没有人会质疑王权是在“世上的王国中”建立的；但是若说世上有一些王国，几个国王都依据“亚当传给他们的权利”登上王位，我们认为这不仅可疑，而且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的作者除了巴别塔分散的相关假说外，找不到更好的依据作为其君主制的基础，那么他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君主制，纵使高耸云端，只能像巴别塔一样，起到分散人类的作用，也不能在世上建立文明政府和秩序，只能制造混乱。

144．For he tells us, the nation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were distinct families, which had fathers for rulers over them; whereby it appears, that even in the confusion, God was careful to preserve the fatherly authority, by distributing the diversity of languages according to the diversity of families” [11_40] . It would have been a hard matter for anyone but our author to have found out so plainly, in the text he here brings, that all the nations in that dispersion were governed by fathers, and that “God was careful to preserve the fatherly authority”. The words of the text are, “These are the sons of Shem after their families, after their tongues in their lands, after their nations”; and the same thing is said of Cham and Japhet, after an enumeration of their posterities; in all which there is not one word said of their governors, or forms of government; of fathers, or fatherly authority. But our author, who is very quick sighted to spy out fatherhood, where nobody else could see any the least glimpses

of it, tells us positively their “rulers were fathers, and God was careful to preserve the fatherly authority”; and why? Because those of the same family spoke the same language, and so of necessity in the division kept together. Just as if one should argue thus: Hannibal in his army, consisting of divers nations, kept those of the same language together; therefore fathers were captains of each band, and Hannibal was careful of the fatherly authority; or in peopling of Carolina, the English, French, Scotch, and Welsh, that are there plant themselves together, and by them the country is divided “in their lands after their tongues, after their families, after their nations”; therefore care was taken of the fatherly authority; or because, in many parts of America, every little tribe was a distinct people, with a different language, one should infer that therefore “God was careful to preserve the fatherly authority”, or that therefore their rulers “enjoyed Adam's lordship by right descending to them”, though we know not who were their governors, nor what their form of government: but only that they were divided into little independent societies, speaking different languages.

144．因为我们的作者告诉我们，王国被划分成“不同的家族，各有父亲作为统治者，所以，即便发生纷乱，上帝根据不同的家族设置不同的语言，从而小心地维护父亲的权威” [12_40] ，除了我们的作者以外，其他人很难从他引用的这段《圣经》原文中发现巴别塔分散之后各家族由其父亲统治，同时还能发现“上帝小心地维护父亲的权威”。这段《圣经》原文是这样的：“这就是闪的后代，有着自己的家族，在各自的土地上有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邦国”；在列举了含和雅弗的后人之后，《圣经》原文也用同样的语言描述了含和雅弗：所有这些文字中，没有一个字提到统治者或统治形式、父亲或父亲权力。但是，我们的作者在他人未曾看到父权的一丝踪迹的时候，就能敏锐地察见其中的父权了。他肯定地告诉我们：“父亲是统治者，上帝小心地保存父亲权力”；原因何在呢？因为同一家族的人讲同样的语言，

所以分散的时候他们必然聚在一起。这就好比我们可以这样辩论：汉尼拔的军队中包含几个不同族的人，他把讲同种语言的人归到一起，所以在每个小团队里，父亲是队长，并且汉尼拔十分小心地保存这种父亲权力：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卡罗莱纳殖民时期，英格兰人、法国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都各自聚集在一起，于是卡罗莱纳州因为他们“各随其语言、家族和邦国”被划分开来，因此，父亲的权力被小心保存：或者，还可以说，因为在美洲的许多地方，每一个小部落就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有它自己的语言，所以人们可以推断“上帝十分小心地保存父亲权力”，或部落的统治者们“依据传给他们的权利享有亚当的统治权”，虽然我们并不知道统治者是谁，统治形式是什么，只知道它们分别是独立的小社会，讲着不同的语言。

145 . The Scripture says not a word of their rulers or forms of government, but only gives an account how mankind came to be divided into distinct languages and nations; and therefore it is not to argue from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to tell us positively, fathers were their rulers, when the Scripture says no such thing; but to set up fancies in one's own brain, when we confidently aver matter of fact, where records are utterly silent. Upon a like ground, i.e., none at all, he says, “That they were not confused multitudes without heads and governors, and at liberty to choose what governors or governments they pleased”.

145 .《圣经》原文对于统治者和统治形式只字未提，只是讲述了人类是如何被分成不同的民族，讲不同的语言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明确说父亲是统治者，不是利用《圣经》的权威来证明什么，而是凭空想象，自以为是事实，却根本没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凭借同样的根据（其实根本无此根据），他说：“他们不是没有首领和统治者的杂乱人群，不能随便选择自己喜欢的统治者和政府。”

146 . For I demand, when mankind were all yet of one language, all congregated in the plain of Shinar, were they then all under one monarch, who enjoyed else lordship of Adam by right descending to him? If they were not, there were then no thoughts, it is plain, of Adam's heir, no right to government known then upon that title; no care taken, by God or man, of Adam's fatherly authority. If when mankind were but one people, dwelt altogether, and were of one language, and were upon building a city together; and when it is plain they could not but know the right heir; for Shem lived till Isaac's time, a long while after the division at Babel; if then, I say, they were not under the monarchical government of Adam's fatherhood, by right descending to the heir, it is plain there was no regard had to the fatherhood, no monarchy acknowledged due to Adam's heir, no empire of Shem's in Asia, and consequently no such division of the world by Noah, as our author has talked of. As far as we can conclude anything from Scripture in this matter, it seems from this place, that if they had any government, it was rather a commonwealth than an absolute monarchy; for the Scripture tells us, [11_41] “They said:“it was not a prince commanded the building of this city and tower, it was not by the command of one monarch, but by the consultation of many, a free people; “let us build us a city”, they built it for themselves as free men, not as slaves for their lord and master, “that we be not scattered abroad”; having a city once built, and fixed habitations to settle our abodes and families. This was the consultation and design of a people, that were at liberty to part asunder, but desired to keep in one body; and could not have been either necessary or likely in men tied together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one monarch, who if they had been, as our author tells us, all slaves under the absolute dominion of a monarch, needed not have taken such care to hinder themselves from wandering out of the reach of his dominion. I demand whether this be not plainer in Scripture than anything of

Adam's heir or fatherly authority?

146．我想问，如果全人类都讲同一语言，都聚居在希纳尔的平原上，那么，他们是否统一受一位君主统治，“谁依据继承而来的权利享有亚当的统治权呢？”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很明显就没有亚当继承人的想法，那时候也没有人知道根据这一名义能获取什么统治权，没有什么上帝或什么人细心地保存父亲的权力。当人类还是同一民族，居住在一起，讲同一语言，共建同一座城的时候，当他们显然知道谁是合法继承人的时候（因为闪一直活到以扫时代，活到巴别塔分散之后很久），如果人们不处于亚当的父权君主统治之下，该权力依法传给继承者，那很显然就不存在什么父权，没有人承认有什么亚当继承人的君权，在亚细亚没有闪的帝国，因此也就没有如我们的作者所说的挪亚分世界一事。似乎从原文这个地方，就这个事情，我们从《圣经》上至多能推断出一个共和制政府，而不是绝对君主制政府。因为，《圣经》原文是这样的：“他们说：”（不是一个君王命令人们建立了这座城和塔，这不是出自一个君王的命令，而是许多自由的人商量的结果），“让我们建一座城”（他们是自由的人，为自己建城，而不是作为奴隶，为主人和君王建城），“免得我们分散各地”；[12_41]（因为建好一座城后才有固定的住所来安顿自己和家人）商量和策划这件事情的人们，他们是可以自由分离的，但是他们却愿意结为一体，这种事情对于君主制政府下聚在一起的人来说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发生的。如果在君主制政府下，如我们的作者所言，他们全是奴隶，处于绝对君权的统治之下，没有必要想方设法阻止自己游离出君王的统治。我想问，这一点是否比我们的作者有关亚当继承人或父权的说法，在《圣经》上体现得更为清楚呢？

147．But if being, as God says, [11_42] one people, they had one ruler, one king by natural right, absolute and supreme over them, “what care had God to preserve the paternal authority of the supreme fatherhood”, if on a sudden, he suffers 72 (for so many our

author talks of) distinct nations to be erected out of it, under distinct governors, and at once to withdraw themselves from the obedience of their sovereign? This is to entitle God's care how, and to what we please. Can it be sense to say, that God was careful to preserve the fatherly authority in those who had it not? For if these were subjects under a supreme prince, what authority had they? Was it an instance of God's care to preserve the fatherly authority, when he took away the true supreme fatherhood of the natural monarch? Can it be reason to say, that Go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therly authority, lets several new governments with their governors startup, who could not all have fatherly authority? And is it not as much reason to say, that God is careful to destroy fatherly authority, when he supers one, who is in possession of it, to have his government torn in pieces, and shared by several of his subjects? Would it not be an argument just like this, for monarchical government to say, when any monarchy was shattered to pieces, and divided amongst revolted subjects, that God was careful to preserve monarchical popover, by rending a settled empire into a multitude of little governments? If anyone will say, that what happens in providence to be preserved, God is careful to preserve as a thing therefore to be esteemed by men as necessary or useful, it is a peculiar propriety of speech, which everyone will not think fit to imitate; but this I am sure is impossible to be either proper, or true speaking, that Shem, for example (for he was then alive), should have fatherly authority, or sovereignty by right of fatherhood, over that one people at Babel, and that the next moment, Shem yet living, 72 others should have fatherly authority, or sovereignty by right of fatherhood, over the same people, divided into so many distinct governments: either these 72 fathers actually were rulers, just before the confusion, and then they were not one people, but that God himself says they were; or else they were a commonwealth, and then where was monarchy? Or else, these 72

fathers had fatherly authority, but knew it not. Strange! That fatherly authority should be the only original of government amongst men, and yet all mankind not know it; and stranger yet, that the confusion of tongues should reveal it to them all of a sudden, that in an instant these 72 should know that they had fatherly power, and all others know that they were to obey it in them, and everyone know that particular fatherly authority to which he was a subject. He that can think this arguing from Scripture, may from thence make out what model of an Utopia will best suit with his fancy or interest; and this fatherhood, thus disposed of; will justify both a prince who claims an universal monarchy, and his subjects, who, being fathers of families, shall quit subjection to him, and canton his empire into less governments for themselves; for it will always remain a doubt in which of these the fatherly authority resided, till our outlook resolves us, whether Shem, who was then alive, or these 72 new princes, beginning so many new empires in his dominions, and over his subjects, had right to govern, since our author tells us, that both one and the other had fatherly, which is supreme authority, and are brought in by him as instances of those who did “enjoy the lordships of Adam by right descending to them, which was as large and ample as the absolutest dominion of any monarch”. This at least is unavoidable, that if “God was careful to preserve the fatherly authority, in the 72 new-erected nations”, it necessarily follows, that he was as careful to destroy all pretenses of Adam's heir; since he took care, and therefore did preserve the fatherly authority in so many, at least 71, that could not possibly be Adam's heirs, when the right heir (if God had ever ordained any such inheritance) could not but be known; Shem then living, and they being all one people.

147．但是，如果像上帝所说， [12_42] 一个民族有一个统治者，

一位根据自然权利能绝对支配他们的君王。倘若上帝突然又从他们中间另立七十二个不同的邦国，各有不同的统治者，并立即脱离原来君主的统治，那么，上帝何必费心去保存最高的父亲的权力呢？这完全是将个人心意随意加诸于上帝的关心。我们能说上帝小心地保存没有父权的人的父权吗？如果他们只是最高君王统治下的臣民，他们又有什么权力？上帝夺走了自然君主的最高的父亲身份，这是否也是上帝小心地保存父权的例子呢？我们可否说，上帝为了保存父权，让几个新的政府建立起来，并各有其统治者，但统治者不一定都拥有父权？我们是否同样可以说，上帝让一个拥有父权的人的政府分裂，让他的几位臣民分而享之，上帝这是在小心地破坏父亲权力？这也就好比说，当一个君主国瓦解，为叛臣瓜分的时候，该君主制政府认为上帝将一个稳定的帝国分裂成许多小国，他是在小心地保存君主的权力。如果有人说，大凡上帝有意要保存的，上帝会小心保存，因此该事物将被人类认为是必需或有用的而予以尊重，这是一种特别的说法，谁也不应当效仿。但是，如果说闪（那时候他还在世）对巴别城那个部族的人有父亲权力或根据父权对他们有统治权，之后，在闪仍在世的情况下，另有七十二个人对分裂成众多政府的同一族人拥有父权或统治权，那绝不可能是合理或真实的。要么，这七十二位父亲在混乱之前实际上已经是统治者，并且事实上他们并非同族，是上帝说他们是同族；要么，他们就是一个共和国，如果这样那君主国在哪儿呢？或者，这七十二位父亲不知道自己拥有父亲权力。奇怪！父权既是人类政府的唯一根源，可人类却不知道它。更为奇怪的是，语言的变化突然就让这七十二个人明白，他们是有父亲权力的，其他人也知道要服从他们的父权，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臣服于哪个特定的父权。能从《圣经》上得出这种结论的人，也许同样可以从中找到最符合他幻想和利益的乌托邦模型，经过这样处理的父亲身份，不但允许一位君主统管天下，也允许身为一家之父的臣民脱离该君主的统治，分裂出小国自己称王。因为我们始终不明白父权在谁身上，除非我们弄清仍在人世的闪和那七十二位建立新邦国、统治臣民的新君主，到底谁有统治权。既然我们的作者告诉我们，双方都有父权，其权力都是最高的，且我们的作者以此为例，证明这些人确实“根据传给他们的权利，享有亚当的统治权，该权之大之广与任何君主的绝对统治权一

样。”这样的话，无法回避的是，如果上帝小心地保存新建的七十二国的父权，他势必也在小心地摧毁亚当继承人的一切理由；因为既然上帝关心，那他因此一定保存如此之多的人（至少七十一个人）的父权，而这些人不可能是亚当的继承人，因为真正的继承人（如果上帝确曾有这样的继承权规定），大家都知道，那时闪还活着，所有的人都同族。

148 . Nimrod is his next instance of enjoying this patriarchal power [11_43] , but I know not for what reason our author seems a little unkind to him, and says, that he “against right enlarged his empire, by seizing violently on the rights of other lords of families”. These lords of families here were called fathers of families, in his account of the dispersion at Babel: but it matters not how they were called, so we know who they are; for this fatherly authority must be in them, either as heirs to Adam, and so there could not be 72, nor above one at once; or else as natural parents over their children, and so every father will have paternal authority over his children by the same right, and in as large extent as those 72 had, and so be independent princes over their own offspring. Taking his lords of families in this latter sense (as it is hard to give those words any other sense in this place), he gives us a very pretty account of the original of monarchy, in these following words, “And in this sense he may be said to be the author and founder of monarchy”, viz., [11_44] As against right seizing violently on the rights of fathers over their children; which paternal authority, if it be in them, by right of nature (for else how could those 72 come by it?), nobody can take from them without their own consents; and then I desire our author and his friends to consider, how far this will concern other princes, and whether it will not, according, to his conclusion of that paragraph, resolve all regal power of those, whose dominions extend beyond their families, either into tyranny and usurpation, or

election and consent of fathers of families, which will differ very little from consent of the people.

148．尼姆罗德是他所举的拥有先祖权力的又一个例子， [12_43]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作者对此人的态度不太友善，我们的作者说他“违反道义扩充帝国，用暴力侵犯他人家族之主的权力”。这里的“家族之主”，在他叙述巴别城分散的时候，被称之为“家族之父”。怎样称呼都不要紧，我们能明白他们指的是谁，因为这个父权也必定落在他们身上，要么是作为亚当的继承人，因此就不能同时有七十二个，一次只能有一个；要么是作为孩子的生身父亲，那每位父亲据此权利都对自己的孩子拥有父权，其权之大之广与那七十二位父亲一样，他们也应该是统治自己子女的独立君主。我们的作者将“家族之主”作了后一种解释之后（因为在这里很难作其他解释），他巧妙地给我们讲述了君主制的起源，原文如下：“在这个意义上，他可以说是君主制的创建者”， [12_44] 也就是说，他违背道义，用暴力侵占他人对孩子的父权，这种父权，如果依据自然权利落在他们身上（否则那七十二个父亲怎么获得权力？），未经他们许可，没有任何人可以将之夺走。于是，我想问我们的作者以及他的朋友们，这与别的君主们有多大关系？根据他在那一段的结论，那是否会将扩张到家族以外的一切王权归为暴政和篡权，或者归为与民众认可相差无几的族父的选举和许可呢？

149．All his instances, in the next section, [11_45] of the 12 dukes of Edom, the nine kings in a little corner of Asia in Abraham's days, the 31 kings in Canaan destroyed by Joshua, and the care he takes to prove that these were all sovereign princes, and that every town in those days had a king, are so many direct proofs against him, that it was not the lordship of Adam by right descending to them, that made kings. For if they had held their royalties by that title, either there must have been but one sovereign over them all,

or else every father of a family had been as good a prince, and had as good a claim to royalty, as these; for if all the sons of Esau had each of them, the younger as well as the eldest, the right of fatherhood, and so were sovereign princes after their father's death; the same right had their sons after them, and so on to all posterity; which will limit all the natural power of fatherhood, only to be over the issue of their own bodies, and their descendants; which power of fatherhood dies with the head of each family, and makes way for the like power of fatherhood to take place in each of his sons over their respective posterities: whereby the power of fatherhood will be preserved indeed, and is intelligible, but will not be at all to our author's purpose. None of the instances he brings are proofs of any power they had, as heirs of Adam's paternal authority, by the title of his fatherhood descending to them; no, nor of any power they had by virtue of their own. For Adam's fatherhood being over all mankind, it could descend to but one at once, and from him to his right, heir only, and so there could by that title be but one king in the world at a time: and by right of fatherhood, not descending from Adam, it must be only as they themselves were fathers, and so could be over none but their own posterity. So that if those 12 dukes of Edom; if Abraham and the nine kings his neighbours; if Jacob and Esau, and the 31 kings in Canaan, the 72 kings mutilated by Adonibeseck, the 32 kings that came to Benhadad, the 70 kings of Greece making war at Troy, were, as our author contends, all of them sovereign princes; it is evident that kings derived their power from some other original than fatherhood, since some of these had power over more than their own posterity; and it is demonstration, they could not be all heirs to Adam: for I challenge any man to make any pretense to power by right of fatherhood, either intelligible or possible in anyone, otherwise, than either as Adam's heir, or as progenitor over his own descendants, naturally sprung from him. And if our author could show that anyone of these

princes, of which he gives us here so large a catalogue, had his authority by either of these titles, I think I might yield him the cause; though it is manifest they are all impertinent, and directly contrary to what he brings them to prove, viz., “That the lordship which Adam had over the world by right descended to the patriarchs”.

149．我们的作者在下一节所举的所有例子， [12_45] 如以东十二王、亚伯拉罕时期亚细亚一角的九位君王，乔舒亚乔舒亚在迦南消灭的三十一位君王，以及他为了证明这些王都是有统治权的君主，证明那时每座城都有一个君王所花费的努力，都是大量与他观点相左的证据，证明让这些人称王的，不是依据权利传给他们的亚当的统治权。因为，如果他们是因此资格称王的，那么只有两种情况，要么只有一个人来统治他们所有人，否则就是每家的父亲像这些人一样，都是君主，都同样有资格称王。如果以扫的所有儿子，不分长幼，都有父权，在其父亲过世之后，都成为有统治权的君王，那么，之后的儿孙同样如此，以此可以类推到后面的世世代代。这样下去，父亲的自然权力将被限制为只能支配自己的子女和子女的后代，这样父亲的权力随着家长的去世而终止，紧跟着他的每个儿子就有了支配各自子女的父权。这样说来，父亲权力确实被保存下来，这点可以理解，但是与我们作者的目的却毫不相干。他举的这些例子，都不能证明他们所拥有的任何权力，是基于亚当父权的继承人的身份获得了他传下来的父权，也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资格。因为亚当的父亲身份是针对全人类的，一次只能传给一个人，只能由他传给他的合法继承人，所以据此名义，同一时期，世上只能有一位君主：如果依据的不是传自亚当的父权，那么，他们就只是父亲，能支配的也就只能是他们自己的后代。所以，如果以东十二王、亚伯拉罕和邻国九王、雅各和以扫，以及迦南三十一王，被亚多尼伯锡克残杀的七十二王，到便哈达来的三十二王，在特洛伊城交战的希腊七十王，都如我们的作者所讲，是统治的君王，那么，很显然这些君王的权力来自父权之外的某种根源，因为他们之中有些人支配的对象远不止他自己的后裔，这也说明他们

不可能全是亚当的继承人。任何人凭借父亲身份要求某种权力，我敢保证只有以下两种情况是可能、可理解的：一种情况是，此人是亚当的继承人；另一种情况是，此人是可以支配他亲生子孙后代的祖辈。如果我们的作者能够证明以上所列举的众多君王中有任何一个是根据上述任何一种情况获得权力的，我也许会同意他的主张。不过很显然，他们都与我们的作者要证明的观点不相干，甚至直接冲突。我们的作者要证明的是："亚当支配整个世界的权力依据权利传给了先祖们"。

150．Having told us that "the patriarchal government continued in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until the Egyptian bondage" [11_46] , he tells us, "by manifest footsteps we may trace this paternal government unto the Israelites coming into Egypt, where the exercise of the supreme patriarchal government was intermitted, because they were in subjection to a stronger prince." [11_47] What these footsteps are of paternal government, in our author's sense, i.e., of absolute monarchical power descending from Adam, and exercised by right of fatherhood, we have seen, that is, for 2290 years no footsteps at all; since in all that time he cannot produce anyone example of any person who claimed or exercised regal authority by right of fatherhood; or show anyone who being a king was Adam's heir: all that his proofs amount to is only this, that there were fathers, patriarchs, and kings, in that age of the world; but that the fathers and patriarchs had any absolute arbitrary power, or by what titles those kings had theirs, and of what extent it was, the Scripture is wholly silent; it is manifest by right of fatherhood they neither did, nor could claim any title to dominion or empire.

150．我们的作者告诉我们："先祖统治持续存在于亚伯拉罕、以

扫和雅各身上，直至被埃及奴役的时代”[12_46]，他又说：“根据明显踪迹我们也许可以将父权统治追溯到进入埃及的以色列人那里，他们进入埃及以后，因为被更强的君主征服，所以其最高父权中断行使。”[12_47] 我们看到的这些在我们的作者看来是父权统治的踪迹，即由亚当传下来的绝对君权的踪迹，这种权力依据父权行使，事实上两千二百九十年间根本没有踪迹可寻。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我们的作者无法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什么人依据父亲权利要求或行使王权，或指出哪怕一个人，说他是亚当的继承人。他所有的证据能证明的无非是，在那个时候的世界里，有父亲、先祖和君王，但父亲和先祖是否有绝对专断的权力，君王凭借什么名义获得权力，权力多大，《圣经》上完全没讲。显然，根据父亲权利他们不曾也不能要求享有统治权或帝王资格。

151 . To say, “That the exercise of supreme patriarchal government was intermitted, because they were in subjection to a stronger prince”, proves nothing but what I before suspected, viz., “That patriarchal jurisdiction or government” is a fallacious expression, and does not in our author signify (what he would yet insinuate by it) paternal and regal power, such an absolute sovereignty as he supposes was in Adam.

151 . “因为被更强的君主征服，所以最高父权中断行使”的说法只证明了之前我的猜想，即“先祖统治权”是一种错误的说法，不能如我们的作者试图用此进一步暗示的父亲和君王的权力，这种绝对统治权属于亚当。

152 . For how can he say that patriarchal jurisdiction was intermitted in Egypt, where there was a king, under whose regal government the Israelites were, if patriarchal were absolute

monarchical jurisdiction? And if it were not, but something else, why does he make such ado about a power not in question, and nothing to the purpose? The exercise of patriarchal jurisdiction, if patriarchal be regal, was not intermitted whilst the Israelites were in Egypt. It is true, the exercise of regal power was not then in the hands of any of the promised seed of Abraham, nor before neither that I know; but what is that to the intermission of regal authority, as descending from Adam, unless our author will have it, that this chosen line of Abraham had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to Adam's lordship? And then to what purpose are his instances of the 72 rulers, in whom the fatherly authority was preserved in the confusion at Babel? Why does he bring the 12 princes sons of Ismael, and the dukes of Edom, and join them with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as examples of the exercise of true patriarchal government, if the exercise of patriarchal jurisdiction were intermitted in the world, whenever the heirs of Jacob had not supreme power? I fear, supreme patriarchal jurisdiction was not only intermitted, but from the time of the Egyptian bondage quite lost in the world, since it will be hard to find, from that time downwards, anyone who exercised it as an inheritance descending to him from the patriarchs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I imagined monarchical government would have served his turn in the hands of Pharaoh, or anybody. But one cannot easily discover in all places what his discourse tends to, as, particularly in this place, it is not obvious to guess what he drives at, when he says, “the exercise of supreme patriarchal jurisdiction in Egypt”, or how this serves to make out the descent of Adam's lordship to the patriarchs, or anybody else.

152．因为，如果先祖权是绝对统治权，那么，在埃及有一位君主且以色列人受其统治的情况下，怎么能说先祖统治权就此中断了

呢？如果先祖权不是绝对统治权，而是别的什么东西，那我们的作者为什么费这么多心思讲一个不相关的、于其目的毫无益处的权力呢？先祖统治权，如果是王权的话，在以色列人进入埃及之时就没有中断。诚然，那时的王权不是由神许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行使，在此之前我知道也不是。但这与传自亚当的王权的中断有什么关系？除非我们的作者认为，只有获神许的亚伯拉罕的宗系才可继承亚当的统治权。那他举七十二王的例子，说他们在巴别塔混乱之后保存了父亲权力，目的又何在？他举以实玛利十二位王子和以东十二王的例子，并将他们与亚伯拉罕、以扫和雅各一起作为真正行使父权统治的例证，如果雅各的后裔一旦没有了最高权力，父权统治就要中断，那他举这些例子干什么？我想，最高父亲统治权不仅是中断了，而是自埃及奴役之时起基本消失于世间了。因为自那以后，很难发现谁行使这种从先祖亚伯拉罕、以扫、雅各等处继承下来的权力。我想君主统治权要是在埃及法老或其他什么人身上会更满足他的需要。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很难发现他讨论的目的是什么，尤其在这里更是如此，他说道，“最高父权在埃及的行使”，我们很难猜测其目的，也不知道这怎么就能推断出亚当的统治权传给了先祖或其他人。

153 . For I thought he had been giving us out of Scripture, proofs and examples of monarchical government, founded on paternal authority, descending from Adam; and not an history of the Jews; amongst whom yet we find no kings, till many years after they were a people: and when kings were their rulers, there is not the least mention or room for a pretense that they were heirs to Adam, or kings by paternal authority. I expected, talking so much as he does of Scripture, that he would have produced thence a series of monarchs, whose titles were clear to Adam's fatherhood, and who, as heirs to him, owned and exercised paternal jurisdiction over their subjects, and that this was the true patriarchal government; whereas he neither proves that the patriarchs were kings, nor that either kings or patriarchs were heirs to Adam, or so

much as pretended to it: and one may as well prove that the patriarchs were all absolute monarchs; that the power both of patriarchs and kings was only paternal; and that this power descended to them from Adam. I say all these propositions may be as well proved by a confused account of a multitude of little kings in the West-Indies, out of Ferdinando Soto, or any of our late histories of the Northern America, or by our author's 70 kings of Greece, out of Homer, as by anything he brings out of Scripture, in that multitude of kings he has reckoned up.

153．我本以为他会从《圣经》中为我们提供一些有关传自亚当的、建立在父亲权威基础上的君主统治的证据和例子，而不是讲述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直到成为一个民族之后才有君主，君主成为统治者之时，也丝毫没有提及他们是亚当的继承人，或者因为父权称王。我们的作者讲了这么多有关《圣经》的事情，我期待他必定从中指出一系列君王，他们都明确拥有继承亚当父权的资格，并且作为亚当的继承人，对他们的臣民拥有并执行父亲统治权，那才是真正的父权统治。不料，他既未证明先祖们是君主，也未证明君主或先祖是亚当的继承人，甚至都没有冒充一下。人们也可以证明所有先祖都是绝对君主，先祖和君主的权力都只是父权，并且这权力传自亚当。我认为所有这些主张也许可以在费迪南多·索托有关西印度一群小王的杂乱记述中得到证明，或者在北美洲的近代史中，或者在我们的作者引用自荷马的希腊七十王的故事中得到证明，其效果就像他引自《圣经》列出的众多君王一样好。

154．And methinks he should have let Homer and his wars of Troy alone, since his great zeal to truth or monarchy carried him to such a pitch of transport against philosophers and poets, that he tells us in his preface, that “there are too many in these days who please themselves in running after the opinions of philosophers and

poets, to find out such an original of government as might promise them some title to liberty, to the great scandal of Christianity and bringing in of atheism." And yet these heathens, philosopher Aristotle, and poet Homer, are not rejected by our zealous Christian politician, whenever they over anything that seems to serve his turn: whether "to the great scandal of Christianity and bringing in of atheism", let him look. This I cannot but observe in authors who it is visible write not for truth, how ready zeal for interest and party is to entitle Christianity to their designs, and to charge atheism on those who will not, without examining, submit to their doctrines, and blindly swallow their nonsense.

154．另外，我认为他其实可以不谈荷马和他的特洛伊战争，因为他对真理或君主制的强烈热情已让他对哲学家和诗人十分不满，以至于在他的序言中，他告诉我们："有太多人喜欢跟着哲学家和诗人的想法走，想从中找到一种可给他们带来某些自由权利的政府起源，这让基督教蒙羞，是引进无神论的做法。"但是，这些异教徒，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诗人荷马，只要能提供一些似乎可以符合他的需求的东西，我们这位热忱的基督教政治家从不拒绝接受，至于是否是"让基督教蒙羞，是引进无神论的做法"，让他自己看。这我令就不得不考察一些作者，他们明显不为事实写作，热衷于利益和政党，试图从基督教中为其图谋寻求依据，不经考察地控诉那些拒绝接受其学说、绝不盲目信服他们的人是无神论者。

But to return to his Scripture history, our author farther tells us that "after the return of the Israelites out of bondage, God, out of a special care of them, chose Moses and Joshua successively to govern as princes in the place and stead of the supreme fathers." [11_48] If it be true that they returned out of bondage, it must be in a state of freedom, and must imply, that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is

bondage they were free, unless our author will say that changing of masters is returning out of bondage; or that a slave returns out of bondage, when he is removed from one gaily to another. If then they returned out of bondage, it is plain that in those days, whatever our author in his preface says to the contrary, there wa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son, a subject, and a slave; and that neither the patriarchs before, nor their rulers after this “Egyptian bondage, numbered their sons or subjects amongst their possessions”, and disposed of them with as absolute a dominion, as they did their other goods.

但且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作者的《圣经》历史上吧，他接着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摆脱奴役回去之后，上帝十分关心他们，相继选择摩西和乔舒亚作为君主取代最高的父亲的地位统治他们。” [12_48] 如果他们真是逃脱了奴役，他们一定重返了自由的状态，这也暗示，他们受奴役前后都是自由的，除非我们的作者说，更换一下主人就是脱离了奴役，或者一个奴隶从一个地方被转到另一个地方是脱离了奴役。如果他们脱离了奴役，在那个时代，一个儿子、一个臣民和一个奴隶之间很明显是有区别的，尽管我们的作者在序言中说了相反的话。无论是受埃及奴役之前的先祖，还是之后的统治者，都没有“把他们的儿子或臣民当作他们的所有物”，像处置别的物品那样用绝对支配权处置他们。

155 . This is evident in Jacob to whom Reuben offered his two sons as pledges; and Judah was at last surety for Benjamin's safe return out of Egypt. which all had been vain, superfluous, and but a sort of mockery, if Jacob had had the same power over every one of his family as he had over his ox or his ass, as an owner over his substance; and the offers that Reuben or Judah made had been such a security for returning of Benjamin, as if a man should take two

lambs out of his lord's flock, and offer one as security that he will safely restore the other.

155．流便将两个儿子交给雅各做担保，犹大为了让雅各的幼子本杰明平安逃出埃及，最终自己充当了担保人，这都是明显的例证。如果雅各对自己的家人像他的牛和驴一样有同样地支配权，就像主人对自己的物品那样，那上面的事情就是虚假、多余的，没有价值；那流便提供的担保、犹大为保证本杰明安全回去自己充当担保一事，就好比一个人从他主人的羊群中牵出两只羊，然后拿出一只作担保，保证他会将另一只安全送返一样。

156．When they were out of this bondage, what then? “God out of a special care of them, the Israelites.” It is well that once in his book he will allow God to have any care of the people; for in other places he speaks of mankind as if God had no care of any part of them, but only of their monarchs, and that the rest of the people, the societies of men, were made as so many herds of cattle, only for the service, use, and pleasure of their princes.

156．他们逃脱奴役之后呢？“上帝对以色列人十分关心”。我们的作者居然有这么一次在他书上让上帝对人类表示一点关心。因为在其他地方，他提起人类，就仿佛上帝除了关心君王外不关心其他任何人，其他的这些人、人类社会，就仿佛是一群群家畜，只为他们的君王服务，供君主役使和取乐。

157．“Chose Moses and Joshua successively to govern as princes”; a shrewd argument our author has found out to prove God's care of the fatherly authority, and Adam's heirs, that here, as

an expression of his care of his own people, he chooses those for princes over them that had not the least pretense to either. The persons chosen were, Moses of the tribe of Levi, and Joshua of the tribe of Ephraim, neither of which had any title of fatherhood. But, says our author, they were in the place and stead of the supreme fathers. If God had anywhere as plainly declared his choice of such fathers to be rulers, as he did of Moses and Joshua, we might believe Moses and Joshua were in their place and stead: but that being the question in debate, till that be better proved, Moses being chosen by God to be ruler of his people, will no more prove that government belonged to Adam's heir, or to the fatherhood, than God's choosing Aaron of the tribe of Levi to be priest, will prove that the priesthood belonged to Adam's heir, or the prime fathers; since God would choose Aaron to be priest, and Moses ruler in Israel, though neither of those offices were settled on Adam's heir, or the fatherhood.

157．“相继选中摩西和乔舒亚作为君主统治他们；这是我们的作者为证明上帝关心父权，关心亚当的继承人而找到的一个精明的论据。在这里，为了表达对其子民的关心，上帝选择两位根本没有君主资格的人来做他们的君主。摩西在利未一族中没有父亲身份，乔舒亚在以法莲一族中也没有。但我们的作者说，他们是取代最高的父亲身份的人。如果上帝曾在任何地方像选择摩西和乔舒亚一样明确选择这样的父亲作为统治者，我们也许相信摩西和乔舒亚确实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但是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更好的证明之前，它仍是有争议的。摩西被上帝选为他的人民的统治者，不能再证明统治权属于亚当的继承人或属于父亲身份。正如上帝选择利未族的亚伦做祭司一样，不能说明祭司一职为亚当继承人或最高父亲所有。因为尽管这两个职位都不固定为亚当继承人或父亲身份所有，上帝仍可选择亚伦做祭司，选摩西做以色列人的统治者。

158 . Our author goes on, “And after them likewise for a time he raised up judges, to defend his people in time of peril” [11_49] . This proves fatherly authority to be the original of government, and that it descended from Adam to his heirs just as well as what went before. Only here our author seems to confess that these judges, who were all the governors they then had, were only men of velour, whom they made their generals to defend them in time of peril; and cannot God raise up such men, unless fatherhood have a title to government?

158 . 我们的作者接着说：“随后不久，上帝同样又设置了士师，在危险的时候可以保护他的子民” [12_49] ，这证明父权是政府的来源，它就像从前一样，自亚当传给他的继承人。只是在这里，我们的作者似乎承认在当时都是统治者的士师们，只不过是一些勇敢的人，在人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被推出来做护卫将军。难道除了父亲身份，上帝就不能以其他名义推举这些人吗？

159 . But says our author, “when God gave the Israelites kings, he re-established the ancient and prime right of lineal succession to paternal government.“ [11_50]

159 . 但我们的作者说：“上帝为以色列设立君主的时候，他重新建立了父权政府世代传袭这一古老而原始的权利。” [12_50]

160 . How did God re-establish it? By a law, a positive command? We find no such thing. Our author means then, that when God gave them a king, in giving them a king, he re-established the right, &c. To re-establish de facto the right of lineal

succession to Paternal government is to put a man in possession of that government which his fathers did enjoy, and he by lineal succession had a right to. For, first, if it were another government than what his ancestor had, it was not succeeding to an ancient right, but beginning a new one; for if a prince should give a man, besides his ancient patrimony, which for some ages his family had been disseized of, an additional estate, never before in the possession of his ancestors, he could not be said to re-establish the right of lineal succession to any more than what had been formerly enjoyed by his ancestors. If therefore, the power the kings of Israel had were anything more than Isaac or Jacob had, it was not the re-establishing in them the right of succession to a power, but giving them a new power, however you please to call it, paternal or not; and whether Isaac and Jacob had the same power that the kings of Israel had, I desire anyone, by what has been above said, to consider; and I do not think he will find that either Abraham Isaac, or Jacob, had any regal power at all.

160．上帝是怎么重建的？通过法律，还是通过明确命令？我们找不出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作者的意思是，上帝赐予他们一位君主，通过设立君王重建了这种权利。实际上重建父权统治的世代传袭权，是让一个人享有他祖先曾享有的统治权，根据承袭权他也可以享有该权利。因为，第一，如果已经不是他祖先的政府，那就不是承袭一个古老的权利，而是开启了一种新的权利：因为如果王位带给一个人的，除了他家族被霸占已久的财产，还有他的祖先从未曾有过的财产，那他除了对自己祖先曾有的那份财产属于重建以外，对其他的财产就不能说是重建。所以，如果以色列诸王拥有的权力比以扫或雅各多，那就不是在他们身上重建对一种权力的继承权，而是给予了他们一种新的权力，不论你怎么称呼这种权力，叫父权与否无所谓。至于以扫和雅各是不是与以色列诸王有同样的权力，我请大家根据上面所讲的话考虑一下。我不相信谁会发现亚伯拉罕、以扫或雅各拥有任何

王权。

161 . Next, there can be “no re-establishment of the prime and ancient right of lineal succession” to anything, unless he that is put in possession of it has the right to succeed, and be the true and next heir to him he succeeds to. Can that be a re-establishment which begins in a new family? or that the “re-establishment of an ancient right of lineal succession,” when a crown is given to one who has no right of succession to it; and who, if the lineal succession had gone on, had been out of all possibility of pretense to it, Saul, the first king God gave the Israelites, was of the tribe of Benjamin. Was the “ancient and prime right of lineal succession re-established” in him? The next was David, the youngest son of Jesse, of the posterity of Judah, Jacob's third son. Was the “ancient and prime right of lineal succession to paternal government reestablished in him?” or in Solomon, his younger son and successor in the throne? Or in Jeroboham over the ten tribes? Or in Athaliah, a woman who reigned six years, an utter stranger to the royal blood? “If the ancient and prime right of lineal succession to paternal government were re-established” in any of these or their posterity, “the ancient and prime right of lineal succession to paternal government” belongs to younger brothers as well as elder, and may be re-established in any man living; for whatever younger brothers, “by ancient and prime right of lineal succession”, may have as well as the elder, that every man living may have a right to by lineal succession, and Sir Robert as well as any other. And so what a brave right of lineal succession to his paternal or regal government our author has re-established, for the securing the rights and inheritance of crowns, where every one may have it, let the world consider.

161．第二，不存在“古老而原始的世袭权力之重建”，除非获得该权力的人确实有权继承，是他所继承之人之后真正的下一任继承者。在一个新家族中开始的事情，能算作重建吗？把王位给予一个没有继承权的人，况且如果世代承袭没有中断，此人根本没有取得王位的理由，这能说是“古老的世袭权力的重建”吗？扫罗是上帝赐予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君王，他来自本杰明部族，那“古老而原始的世代承袭权利”是否在他身上重建了呢？第二位君王是大卫（David），他是耶西（Jesse）的幼子，耶西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犹大的后代。是否“古老而原始的父权统治的世袭权在大卫身上重建”了呢？或者是在王位的继承者——他的儿子所罗门身上重建了？还是在掌管十个部族的耶罗波安身上？或者是在统治了六年却与王族血统完全无关的亚他利雅这个女人身上？在父系政治中，若直系继承人的原始的首要权利在任何一个人或其后裔身上得以重建，那么该权利可归其弟弟或长兄所有，也可以在任何在世的人身上重建，因为依据“古老而原始的父权统治的世袭权，”凡是弟弟和兄长一样能拥有的，每个在世的人也皆有权拥有，包括罗伯特爵士和其他所有人在内。我们的作者为了保证王权和王位的继承而重建的这种父权或王权统治的世袭权，每个人都有权利享有，让整个世界的人们想想，他重建的是多么勇敢的一个权利啊！

162．But says our author, however, “whensoever God made choice of any special person to be king, he intended that the issue also should have benefit thereof, as being comprehended sufficiently in the person of the father, although the father was only named in the grant.“ [11_51] This yet will not help out succession, for if, as our author says, the benefit of the grant be intended to the issue of the grantee, this will not direct the succession; since, if God give anything to a man and his issue in general, the claim cannot be to anyone of that issue in particular; every one that is of his race will have an equal right. If it be said, our author meant heir, I believe our author was as willing as anybody to have used that

word, if it would have served his turn; but Solomon, who succeeded David in the throne, being no more his heir than Jeroboham, who succeeded him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ten tribes, was his issue, our author had reason to avoid saying, that God intended it to the heirs, when that would not hold in a succession, which our author could not except against; and so he has left his succession as undetermined, as if he had said nothing about it: for if the regal power be given by God to a man and his issue, as the land of Canaan was to Abraham and his seed, must they not all have a title to it, all share in it? And one may as well say that by God's grant to Abraham and his seed, the land of Canaan was to belong only to one of his seed, exclusive of all others, as by God's grant of dominion to a man and his issue, this dominion was to belong in peculiar to one of his issue exclusive of all others.

162．但我们的作者又说："每当上帝选择某个人做君王的时候，他也让此人的子孙从此享受恩泽，虽然授予王位之时只提及父亲的名字，但这种恩泽已充分包含在父亲身上。"[12_51] 这也解决不了继承问题：因为，如果像我们的作者所说，被授予王位者，其子孙也享受授予的恩泽，这就并非指继承权。试想，如果上帝将某样东西赐予某人，同时一般来说也赐予其子孙，那么，其子孙中就不能由某一个人来单独要求得到该权利，该族的每个人都将享有平等的权利。如果有人说，我们的作者的意思是指继承人，我相信他和其他人一样十分愿意这么讲，如果这样符合他要求的话。但是，继承大卫王位的所罗门，与继大卫之后统治十个部族的耶罗波安一样，都不是大卫的继承人，只是他的后代，所以我们的作者不说指的是继承人，是有理由的，因为那在继承上讲不通，我们的作者只能反对这种说法。所以他的继承问题并未解决，就像他什么都没有说过一样，因为如果上帝将王权给予某人及其子孙，就像上帝把迦南赐予亚伯拉罕及其子孙一样，岂不是说明大家权利共享，人人有份？同样有人会说，上帝把迦南赐予亚伯拉罕及其子孙，根据其意，迦南将来只能为其子孙中某一

人所有，其他人应排除在外，正如上帝将统治权赐予某人及其子孙，这种统治权将来只能为其子孙中某一人所有，其余人不含在内。

163 . But how will our author prove that whensoever God made choice of any special person to be a king he intended that “the (I suppose he means his) issue also should have benefit thereof”? Has he so soon forgotten Moses and Joshua, whom in this very section, he says, “God out of a special care chose to govern as princes”, and the judges that God raised up? Had not these princes, having the same authority of the supreme fatherhood, the same power that the kings had; and being specially chosen by God himself, should not their issue have the benefit of that choice, as well as David's or Solomon's? If these had the paternal authority put into their hands immediately by God, why had not their issue the benefit of this grant in a succession to this power? Or if they had it as Adam's heirs, why did not their heirs enjoy it after them by right descending to them? For they could not be heirs to one another. Was the power the same, and from the same original, in Moses, Joshua, and the Judges, as it was in David and the Kings; and was it inheritable in one and not in the other? If it was not paternal authority, then God's own people were governed by those that had not paternal authority, and those governors did well enough without it; if it were paternal authority, and God chose the persons that were to exercise it, our author's rule fails, that “whensoever God makes choice of any person to be supreme ruler”, (for I suppose the name king has no spell in it, it is not the title, but the power makes the difference) “he intends that the issue also should have the benefit of it”, since from their coming out of Egypt to David's time, 400 years, the issue was never “so sufficiently comprehended in the person of the father”, as that any son, after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succeeded to the government amongst all

those judges that judged Israel. If to avoid this, it be said, God always chose the person of the successor, and so, transferring the fatherly authority to him, excluded his issue from succeeding to it, that is manifestly not so in the story of Jephthah [11_52] , where he articled with the people, and they made him judge over them, as is plain.

163．但是，我们的作者如何证明，每当上帝指定某人为王的时候，上帝也让“此人的子孙（我猜我们的作者的意思是子孙）受恩泽”呢？难道他这么快就忘记了摩西和乔舒亚，忘记他自己就在这节讲到的“上帝十分关心以色列人，特选他俩做君主来统治他们”？还有上帝安排的士师呢？这些长官难道不和君王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力和最高的父权吗？他们既是上帝亲自特别选定的，他们的子孙难道不应该也因此享受这种选任的恩泽，就像大卫和所罗门的子孙一样吗？如果上帝就此将父权交给他们，那他们的子孙为何不能因此享受恩泽来继承这个权力呢？或者，如果他们作为亚当继承人的身份获取该权力，他们的继承人为何在他们之后不能根据承袭的权利享有该权呢？毕竟他们又不可能成为其他人的继承人。摩西、乔舒亚和这些士师的权力，与大卫和以色列诸王的权力相同吗？它们是否同源？是否有的权力可以继承，有的不可继承？如果这权力不是父权，那么，上帝的子民被一个没有父权的人统治，统治者们没有父权照样管理得很好：如果这权力是父权，上帝选择这些人去执行它，这样，我们的作者所讲的“每当上帝选择某个人为最高统治者”（因为我认为君王这个名称没有魔力，重要的不是称呼，而是权力），“他也让此人的子孙享受恩泽”这一原则就无用了。因为，从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到大卫时代有四百年之久，子女从未“充分包含在父亲身上”，任何一个儿子都只是在其父亲过世之后，和诸士师一起继承审判以色列人的权力。如果为了回避这点，说上帝总是选择继承者，授予他父权，不让他的子孙继承，这明显在耶弗他的故事 [12_52] 中讲不通，显然，耶弗他是与人民立约，然后人民让他来做他们的士师。

164 . It is in vain then to say, that “whensoever God chooses any special person to have the exercise of paternal authority”, (for if that be not to be king, I desire to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king and one having the exercise of paternal authority) “he intends the issue also should have the benefit of it”, since we find the authority the judges had ended with them, and descended not to their issue; and if the judges had not paternal authority, I fear it will trouble our author, or any of the friends to his principles, to tell who had then the paternal authority, that is, the government and supreme power amongst the Israelites: and I suspect they must confess that the chosen people of God continued a people several hundreds of years, without any knowledge or thought of this paternal authority, or any appearance of monarchical government at all.

164 . 那么，我们的作者说：“每当上帝选择某人行使父亲权力”，（如果这里说的不是君王，我想知道君王与行使父亲权力的人之间的区别），“他也想要此人的子孙享受该权力的恩泽”，这句话算是白说了。因为我们发现士师们的权力都及身而止，不传给子孙。如果士师们不享有父亲权力，我恐怕要麻烦我们的作者或任何一个赞成他的学说的朋友来说明那时候到底谁有父亲权力，即对以色列人的统治权和最高权力。我估计他们一定会承认，这些上帝的选民，作为一个民族已存在几百年之久，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想过什么父亲权力，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君主政府。

165 . To be satisfied of this, he need but read the story of the Levite, and the war thereupon with the Benjamites, in the three last chapters of Judges; and when he finds, that the Levite appeals to the people for justice, that it was the tribes and the congregation that debated, resolved, and directed all that was done on that

occasion; he must conclude, either that God was not “careful to preserve the fatherly authority” amongst his own chosen people; or else that the fatherly authority may be preserved where there is no monarchical government. If the latter, then it will follow, that though fatherly authority be ever so well proved, yet it will not infer a necessity of monarchical government; if the former, it will seem very strange and improbable, that God should ordain fatherly authority to be so sacred amongst the sons of men, that there could be no power or government without it, and yet that amongst us own people, even whilst he is providing a government for them, and therein prescribes rules to the several states and relations of men, this great and fundamental one, this most material and necessary of all the rest, should he concealed, and lie neglected for 400 years after.

165．想要充分弄清这一点，大家只需读《士师记》最后三章，了解一下利未人的故事和因他们导致的以色列人与本杰明人战争的故事就行了。当有人看到利未人号召人民起来伸张正义，做讨论、决议和指挥的都是以色列的众部族和他们的公会时，他就一定会推断，要么上帝没有在他的选民中“小心地保存父亲权力”，要么是父亲权力被保存在一个没有君主政府的地方。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尽管父亲权力得到有力证明，但有它并不一定要有君主制政府。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就很奇怪也很不合理了，上帝一方面在人类子孙中确立父权的神圣地位，一切权力和统治都离不开它，另一方面，在自己的选民之中，他甚至在为他们设立政府，为一些国家和人群关系制定法规之时，却隐藏如此伟大、如此根本的一点，这一点在剩下的事情中恰恰是最重要、最必需的，却被忽略长达四百年之久。

166．Before I leave this, I must ask how our author knows that

“whensoever God makes choice of any special person to be king, he intends that the issue should have the benefit thereof.” Does God by the law of nature or revelation say so? By the same law also he must say, which of his issue must enjoy the crown in succession, and so point out the heir, or else leave his issue to divide or scramble for the government: both alike absurd, and such as will destroy the benefit of such grant to the issue. When any such declaration of God's intention is produced, it will be our duty to believe God intends it so; but till that be done, our author must show us some better warrant, before we shall be obliged to receive lain as the authentic revealer of God's intentions.

166．在停止谈论该问题之前，我必须问一问，我们的作者是怎么知道“每当上帝选择某人为王之时，他企图让此人的子孙也享受恩泽”的？上帝通过自然法则或启示来说了吗？根据同一法则，我们的作者也必须说明，此王的哪一位子孙能继承他的王位，必须指出谁是继承人，否则他就是让这些子孙们去瓜分或争夺统治权。其实两种情况都是荒谬的，它们甚至会损害子孙们从这种恩赐中获得的利益。如果什么时候有人找到了证据，证明上帝确有这种意思，我们就有责任相信上帝确有此意。但在证据找到之前，我们的作者必须为我们提供更好的证据，我们才有义务相信他是上帝旨意的权威透露者。

167．“The issue,” says our author, “is comprehended sufficiently in the person of the father, although the father only was named in the grant”; and yet God, when he gave the land of Canaan to Abraham, [11_53] thought fit to put his seed into the grant too: so the priesthood was given to Aaron and his seed; and the crown God gave not only to David, but his seed also: and however our author assures us that “God intends that the issue should have the benefit of it, when he chooses any person to be king,” yet we see that the

kingdom which he gave to Saul, without mentioning his seed after him, never came to any of his issue: and why, when God chose a person to be king, he should intend that his issue should have the benefit of it, more than when he chose one to be judge in Israel, I would fain know a reason; or why does a grant of fatherly authority to a king more comprehend the issue, than when a like grant is made to a judge? Is paternal authority by right to descend to the issue of one, and not of the other? There will need some reason to be shown of this difference more than the name, when the thing given is the same fatherly authority, and the manner of giving it, God's choice of the person, the same too; for I suppose our author, when he says, “God raised up judges”, will by no means allow they were chosen by the people.

167．我们的作者说：“子孙已充分包含在父亲身上，虽然在授予时提及的只是父亲的名字”；但上帝将迦南赐予亚伯拉罕时，[12_53] 他想到也应该将其子孙包含在内；同样，祭司职位也是赐给了亚伦及其子孙；上帝授予大卫王位时，也同时将其授予大卫的子孙。不论我们的作者如何向我们保证“当上帝选某人为王时，他也想要此人的子孙享受恩泽”，我们都看到，上帝给了扫罗王位，但没有提及其他身后的子孙，王位也没有由他的子孙继承。为什么当上帝选某人为王之时，上帝就想要此人的子孙也享受这种利益，而当他为以色列人选士师时却不这样？我真想知道原因。为什么给予一个君王父权时就包括他的子孙，而对情况类似的士师却不同了呢？父亲权力是不是根据权利在一个人那里传给他的子孙，在另一个人那里就不传给子孙了呢？如果给的同样是父亲权力，授予方式一样，同是上帝选择的人，那么，我们的作者确实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除了称呼以外，还有这样的差别？因为我想，当我们的作者说“上帝选定士师”时，绝不承认这些士师为人民所选。

168 . But since our author has so confidently assured us of the care of God to preserve the fatherhood, and pretends to build all he says upon the authority of the Scripture, we may well expect that that people, whose law, constitution, and history are chiefly contained in the Scripture, should furnish him with the clearest instances of God's care of preserving the fatherly authority in that people who it is agreed he had a most peculiar care of. Let us see then what state this paternal authority or government was in amongst the Jews from their beginning to be a people. It was omitted by our author's confession, from their coming into Egypt, till their return out of that bondage, above 200 years.From thence till God gave the Israelites a king, about 400 years more, our author gives but a very slender account of it; nor indeed all that time are there the least footsteps of paternal or regal government amongst them. But then, says our author, “God re-established the ancient and prime right of lineal succession to paternal government.”

168 . 但是，既然我们的作者如此满怀信心地向我们保证上帝小心地保存父权，并且声称自己所言皆以《圣经》的权威为基础，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其法律、制度和历史都主要包含在《圣经》里的民族，应该为他提供一个最清楚的例证，说明上帝为保护这个民族父权显示出的关心，人们也公认上帝这种特别关心。让我们来看看，从犹太人始为一个民族以来，这种父权或统治权在他们那里是什么状况。根据我们的作者的自白，从进入埃及到脱离埃及的束缚这两百多年间，这种权力状态都被省略未谈；之后到上帝为以色列人安排君王这共约四百多年间，我们的作者对此只作了一点十分简单的描述。的确，在上述所有时间内，从犹太人中找不到父权或王权的丝毫踪迹。但是我们的作者却说：“上帝重建了古老而原始的父权政府的世袭权利。”

169 . What a “lineal succession to paternal government” was then established we have already seen. I only now consider how long this lasted, and that was to their captivity, about 500 years; from thence to their destruction by the Romans, above 650 years after, the “ancient and prime right of lineal succession to paternal government” was again lost, and they continued a people in the Promised Land without it. So that of 1750 years that they were God's peculiar people, they had hereditary kingly government amongst them not one-third of the time; and of that time there is not the least footstep of one moment of “paternal government, nor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ancient and prime right of lineal succession to it”, whether we suppose it to be derived, as from its fountain, from David, Saul, Abraham, or, which upon our author's principles is the only true, from Adam.

169 .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世代传袭的父权政府”是怎样建立的。现在我只是在想，这种父权统治持续了多久。到他们被囚为止大约是五百年，从那时起到六百五十多年后他们被罗马人所灭，“古老而原始的父权政府的世袭权利”再次丢失，此后在无此权利的情况下，他们在上帝赐予的这块土地上还是一个民族。所以在作为上帝特殊选民的一千七百五十年间，他们保有世袭君主统治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在那段时间，没有丝毫“父权统治或重建古老而原始的父权统治世袭权”的影子，无论我们认为这权力是源自大卫、扫罗、亚伯拉罕，还是按我们作者的原则那样，来自唯一真正的源头——亚当。

[11_1].Patriarcha p. 12.

[11_2].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p. 244.

[11_3].Patriarcha p. 19.

[11_4].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p. 210.

[11_5].Patriarcha p. 19.

[11_6].Genesis. xxvi.

[11_7].Genesis. xxvii. 36.

[11_8].Genesis. xxv. 5, 6.

[11_9].Genesis. xlviii. 22.

[11_10].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158.

[11_11].Genesis.xxvii. 29.

[11_12].Gen. xxxii.

[11_13].Genesis.xxxiii.

[11_14].Genesis. xxv. 23.

[11_15].Genesis.xlix.

[11_16].Genesis. iv.

[11_17].Gen. xxvii.

[11_18].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p. 254；Patriarcha p. 12.

[11_19].Patriarcha p. 12.

[11_20].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54.

[11_21].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53

[11_22].Patriarcha p. 13.

[11_23].Patriarcha p. 13.

[11_24].Patriarcha p. 13.

[11_25].Patriarcha p. 13.

[11_26].Patriarcha p. 28.

[11_27].Patriarcha p. 12.

[11_28].Genesis. xiii.

[11_29].Genesis. xxiv. 35.

[11_30].Patriarcha p. 19.

[11_31].Patriarcha p. 14.

[11_32].Patriarcha p. 19.

[11_33].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211.

[11_34].Observations on Hobbes, Milton, &c. p. 254.

[11_35].Patriarcha p. 14.

[11_36].Patriarchap. 15.

[11_37].Patriarchap. 15.

[11_38].Patriarchap. 19.

[11_39].Patriarchap. 14.

[11_40].Patriarchap. 14.

[11_41].Genesis.xi.

[11_42].Genesis. xi. 6.

[11_43].Patriarchap. 16.

[11_44].Patriarchap. 16.

[11_45].Patriarcha p. 17.

[11_46].Patriarchap. 16.

[11_47].Patriarchap. 17.

[11_48].Patriarchap. 18.

[11_49].Patriarchap. 18.

[11_50].Patriarchap. 18.

[11_51].Patriarchap. 19.

[11_52].Judg. xi.

[11_53].Genesis. xiii. 15.

[12_1].《君权论》，第12页。

[12_2].《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44页。

[12_3].《君权论》，第19页。

[12_4].《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10页。

[12_5].《君权论》，第19页。

[12_6].《创世记》，第二十六章。

[12_7].《创世记》，第二十七章第三十六节。

[12_8].《创世记》，第二十五章第五、六节。

[12_9].《创世记》，第四十八章第二十二节。

[12_10].《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158页。

[12_11].《创世记》，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九节。

[12_12].《创世记》，第三十二章。

[12_13].《创世记》，第三十三节。

[12_14].《创世记》，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三节。

[12_15].《创世记》，第四十九章。

[12_16].《创世记》，第四章。

[12_17].《创世记》，第二十七章。

[12_18].《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54页；《君权论》，第12页。

[12_19].《君权论》，第12页。

[12_20].《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54页。

[12_21].《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53页。

[12_22].《君权论》，第13页。

[12_23].《君权论》，第13页。

[12_24].《君权论》，第13页。

[12_25].《君权论》，第13页。

[12_26].《君权论》，第28页。

[12_27].《君权论》，第12页。

[12_28].《创世记》，第十三章。

[12_29].《创世记》，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五节。

[12_30].《君权论》，第19页。

[12_31].《君权论》，第14页。

[12_32].《君权论》，第19页。

[12_33].《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11页。

[12_34].《对霍布斯、弥尔顿等的看法》，第254页。

[12_35].《君权论》，第14页。

[12_36].《君权论》，第15页。

[12_37].《君权论》，第15页。

[12_38].《君权论》，第19页。

[12_39].《君权论》，第14页。

[12_40].《君权论》，第14页。

[12_41].《创世记》，第十一章。

[12_42].《创世记》，第十一章第六节。

[12_43].《君权论》，第16页。

[12_44].《君权论》，第16页。

[12_45].《君权论》，第17页。

[12_46].《君权论》，第16页。

[12_47].《君权论》，第17页。

[12_48].《君权论》，第18页。

[12_49].《君权论》，第18页。

[12_50].《君权论》，第18页。

[12_51].《君权论》，第19页。

[12_52].《旧约·士师记》，第十一章。

[12_53].《创世记》，第十三章第十五节。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政府论（下）

John Locke

约翰·洛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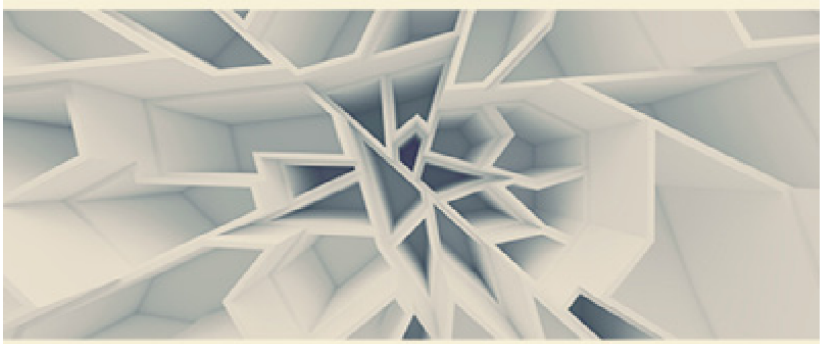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政府论（下）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约翰·洛克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Chapter I　Of Political Power 第一章　论政治权力
- Chapter II　Of the State of Nature 第二章　论自然状态
- Chapter III　Of the State of War 第三章　论战争状态
- Chapter IV　Of Slavery 第四章　论奴役
- Chapter V　Of Property 第五章　论财产
- Chapter VI　Of Paternal Power 第六章　论父权
- Chapter VII　Of Political or Civil Society 第七章　论政治社会或公民社会
- Chapter VIII　Of the Beginning of Political Societies 第八章　论政治社会的发轫
- Chapter IX　Of the Ends of Political Society and Government 第九章　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 Chapter X　Of the Forms of a Commonwealth 第十章　论国家的形式
- Chapter XI　Of the Extent of the Legislative Power 第十一章　论立法权的范围
- Chapter XII　Of the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Federative Power of the Commonwealth 第十二章　论国家的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
- Chapter XIII　Of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Powers of the Commonwealth 第十三章　论国家权力的统属
- Chapter XIV　Of Prerogative 第十四章　论特权
- Chapter XV　Of Paternal, Political and Despotical Power, Considered Together 第十五章　综论父权、政治权力和专制权力

- Chapter XVI　Of Conquest 第十六章　论征服
- Chapter XVII　Of Usurpation 第十七章　论篡夺
- Chapter XVIII　Of Tyranny 第十八章　论暴政
- Chapter XIX　Of the Dissolution of Government 第十九章　论政府的解体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Chapter I　Of Political Power

第一章　论政治权力

It having been shown in the foregoing discourse:

上篇已经表明：

Firstly, that Adam had not, either by natural right of fatherhood or by positive donation from God, any such authority over his children, nor dominion over the world, as is pretended.

第一，亚当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依据父亲身份的自然权利或上帝的明确赐予，而享有对其子女的那种权力或对世界的统治权。

Secondly, that if he had, his heirs yet had no right to it.

第二，即使他享有这种权力，他的继承人也无权享之。

Thirdly, that if his heirs had, there being no law of Nature nor positive law of God that determines which is the right heir in all cases that may arise, the right of succession, and consequently of bearing rule, could not have been certainly determined.

第三，即使他的继承人享有这种权力，但由于既不存在自然法也不存在上帝的明文律法来确定在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下谁是合法继承人，所以就无法确定继承权，也就无法确定统治权归属何人。

Fourthly, that if even that had been determined, yet the knowledge of which is the eldest line of Adam's posterity being so long since utterly lost, that in the races of mankind and families of the world, there remains not to one above another the least pretence to be the eldest house, and to have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第四，即使这些也都已确定，但何人是亚当的长房子嗣，早就完全无从查证，因而在人类各种族和世上各家族中，皆无人能自称是其长房子嗣，进而享有继承权。

All these premises having, as I think, been clearly made out,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 rulers now on earth should make any benefit, or derive any the least shadow of authority from that which is held to be the fountain of all power, “Adam's private dominion and paternal jurisdiction”; so that he will not give just occasion to think that all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is the product of only force and violence, and that men live together by no other rules but that of beasts, where the strongest carries it, and so lay a foundation for perpetual disorder and mischief, tumult, sedition, and rebellion (things that the followers of that hypothesis so loudly cry out against), must of necessity find out another rise of government, another original of political power, and another way of designing and knowing the persons that have it than what Sir Robert Filmerhastaught us.

我认为所有这些前提均已得到清楚说明，那么，现世的统治者便不可能从“亚当的个人统治权和父权”是所有权力的来源这个说法中得到任何好处，或从中获取一丁点儿权威。所以无论何人，只要他无法给出正当的理由认为世上的所有政府都只是武力和暴力的产物，人们只是依据弱肉强食的野兽法则，而非其他法则共同生活——这条法则为长期的混乱、祸害、暴动、骚扰和叛乱（这些都是拥护那种假说的人们所竭力呼吁反对的事情）奠定了根基——他就必须抛开罗伯特·菲尔默爵士 [2_1] 的教导，寻求政府的另一种起源和政治权力的另一种渊源，以及用以安排和确认何人享有此种权力的另一种方法。

To this purpose, I think it may not be amiss to set down what I take to be political power. That the power of a magistrate over a subject may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at of a father over his children, a master over his servant, a husband over his wife, and a lord over his slave. All which distinct powers happening sometimes together in the same man, if he be considered under these different relations, it may help us to distinguish these powers one from another, and show the difference betwixt a ruler of a commonwealth, a father of a family, and a captain of a galley.

为此，我认为提出什么是政治权力的意见并无不当。我认为行政长官之于臣民的权力，应该有别于父亲之于子女的权力、主人之于仆役的权力、丈夫之于妻子的权力及贵族之于奴隶的权力。由于这些不同的权力有时聚集在同一个人身上，倘若我们将这个人置于这些不同的关系之下进行考察，会有助于将这些权力彼此区分，显示一国之统治者、一家之父和一船之长之间的区别。

Political power, then, I take to be a right of making laws, with

penalties of death, and consequently all less penalties for the regulating and preserving of property, and of employing the force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execution of such laws, and in the defence of the commonwealth from foreign injury, and all this only for the public good.

所以，依我所见，政治权力就是为规范并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力，即有权力用死刑和一切较轻处罚，及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并保卫国家免受外侵；而所有这一切皆仅为公众福利。

[2_1].罗伯特·菲尔默爵士（Sir Robert Filmer，1588-1653），英国政治理论家，《论父权制》的作者。

Chapter II　Of the State of Nature

第二章　论自然状态

To understand political power aright, and derive it from its original, we must consider what state all men are naturally in, and that is, a state of perfect freedom to order their actions, and dispose of their possessions and persons as they think fit, within the bounds of the law of Nature, without asking leave or depending upon the will of any other man.

我们要想正确地理解政治权力并追本溯源，就必须探究所有人本来处于何种自然状态。那是一种人们处于自然法界限内并按他们认为适合的方法决定其行为及处置其财产和人身，而不必获得他人许可或遵从他人意志的完全自由状态。

A state also of equality, wherein all the power and jurisdiction is reciprocal, no one having more than another, there being nothing more evident than that creatures of the same species and rank, promiscuously born to all the same advantages of Nature, and the use of the same faculties, should also be equal amongst another, without subordination or subjection, unless the lord and master of them all should, by any manifest declaration of his will, set one above another, and confer on him, by an evident and clear appointment, an undoubted right to dominion and sovereignty.

这也是一种平等状态，在此状态中，所有权力和统辖权都是相互

的，无人享有比另一个人更多的权力。没有什么比这更明显了：同种和同等的人们虽然出生各异，却享有来自自然的、完全相同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因而他们应该彼此平等，而不存在附属或臣服的关系，除非他们所有人的头领通过某种方式彰显他的意志，将一人置于另一人之上，并通过明确的委任授予他确定无疑的统治权及主权。

This equality of men by Nature, the judicious Hooker looks upon as so evident in itself, and beyond all question, that he makes it the foundation of that obligation to mutual love amongst men on which he builds the duties they owe one another, and from whence he derives the great maxims of justice and charity. His words are,

睿智的胡克 [3_1] 认为人类基于自然的平等是如此不言自明且毋庸置疑，因此他将其视为人们互爱义务的根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人们相互之间应尽的各种义务，并由此引伸出正义和仁爱的重要准则。他的原话是：

> “The like natural inducement hath brought men to know that it is no less their duty to love others than themselves, for seeing those things which are equal, must needs all have one measure; if I cannot but wish to receive good, even as much at every man's hands, as any man can wish unto his own soul, how should I look to have any part of my desire herein satisfied, unless myself be careful to satisfy the like desire, which is undoubtedly in other men, being of one and the same nature: to have anything offered them repugnant to this

desire must needs, in all respects, grieve them as much as me; so that if I do harm, I must look to suffer, there being no reason that others should show greater measure of love to me than they have by me showed unto them; my desire, therefore, to be loved of my equals in Nature, as much as possible may be, impose upon me a natural duty of bearing to them-ward fully the like affection. From which relation of equality between ourselves and them that are as ourselves, what several rules and canons natural reason hath drawn for direction of life no man is ignorant.“ [2_1]

“相同的自然动机促使人们懂得他们有爱人和爱己的同等责任。因为，要看到同等的事物，人们就必须采用同一尺度；如果我希望得到好处，甚至想从每个人手里得到任何人都希望得到的那么多，那么除非我设法满足本性相同的其他人无疑也会怀有的同样要求，否则，我怎么能希望我的全部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呢？如果给其他人与此要求相悖的东西，一定会使他们在各方面感到不悦，如同我在此情况下也会不悦一样。所以如果我伤害他人，我只能等待受罚，因为我并无理由要求他人给我的爱心超过我给他人的爱心。因此，如果我渴望本性与我相同的人们尽可能多地爱我，我便负有一种自然的义务对他们怀有完全相同的爱心。基于我们及与我们相同的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便自然、理性地引伸出了若干众所周知的、指引生活的规则和教义。” [3_2]

But though this be a state of liberty, yet it is not a state of

licence; though man in that state have an uncontrollable liberty to dispose of his person or possessions, yet he has not liberty to destroy himself, or so much as any creature in his possession, but where some nobler use than its bare preservation calls for it. The state of Nature has a law of Nature to govern it, which obliges everyone, and reason, which is that law, teaches all mankind who will but consult it, that being all equal and independent, no one ought to harm another in his life, health, liberty or possessions; for men being all the workmanship of one omnipotent and infinitely wise Maker; all the servants of one sovereign Master, sent into the world by His order and about His business; they are His property, whose workmanship they are made to last during His, not one another's pleasure. And, being furnished with like faculties, sharing all in one community of Nature, there cannot be supposed any such subordination among us that may authorise us to destroy one another, as if we were made for one another's uses, as the inferior ranks of creatures are for ours. Everyone as he is bound to preserve himself, and not to quit his station wilfully, so by the like reason, when his own preservation comes not in competition, ought he as much as he can to preserve the rest of mankind, and may not unless it be to do justice on an offender, take away or impair the life, or what tends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life, the liberty, health, limb, or goods of another.

尽管这是一种自由的状态，却绝非放任的状态。尽管人在那种状态中具有处置自己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但他并无毁灭自身或他所占有的任何创造物之自由，除非有一种比单纯地保存它更高贵的用途要求将它毁灭。自然状态被一种要求人人遵循的自然法则所统治；而理性，即自然法则，教导愿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既然所有人都是平等和独立的，那么任何人皆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因为既然人们都是全能和拥有无限智慧的造物主所创造之物，都

是唯一的最高主宰的仆人，都是按照他的命令来到这世上为他的事业服务，他们就是他的财产，他们作为其创造物存世多久乃是出于他的意志，而非他们彼此的喜好。既然我们被赋予相同的能力，分享同一自然社会里的一切，就不能设想彼此之间存在任何从属关系，否则我们就拥有了相互毁灭的权力，仿佛我们生来就为相互利用，如同低等生物生而为我们所利用一样。正因为人人必须保护自己，不能随意改变其地位，所以基于同理，当他自保不成问题时，他就应竭尽所能保护他人。除非是为了惩戒一个罪犯，否则不应剥夺或侵害他人的生命及一切有助于保存另一个人生命、自由、健康、肢体或物品的事物。

And that all men may be restrained from invading others' rights, and from doing hurt to one another, and the law of Nature be observed, which willeth the peace and preservation of all mankind, the execution of the law of Nature is in that state and put into every man's hands, whereby everyone has a right to punish the transgressors of that law to such a degree as may hinder its violation. For the law of Nature would, as all other laws that concern men in this world, be in vain if there were nobody that in the state of Nature had a power to execute that law, and thereby preserve the innocent and restrain offenders; and if anyone in the state of Nature may punish another for any evil he has done, everyone may do so. For in that state of perfect equality, where naturally there is no superiority or jurisdiction of one over another, what any may do in prosecution of that law, everyone must need to have a right to do.

为了使所有人都遵守维护和平和保护全人类的自然法，使所有人受到约束，不去侵犯他人的权利、不去相互伤害，在自然状态下，自然法的执行就交到每一个人手中，使人人都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惩罚能够阻止违反自然法即可。自然法同世上关乎人类的所有其

他法律一样，倘若在自然状态下无人有权执行自然法以保护无辜者并约束罪犯，那么自然法将形同虚设。而一旦在自然状态下任何人都可以惩治他人所犯的任何罪恶，那么人人就皆可为之。因为，在那种完全平等的状态下，自然无人享有高于他人的地位或支配他人的管辖权。所以，任何人为执行自然法所做之事，人人必有权为之。

And thus, in the state of Nature, one man comes by a power over another, but yet no absolute or arbitrary power to use a criminal, when he has got him in his hands, according to the passionate heats or boundless extravagancy of his own will, but only to retribute to him so far as calm reason and conscience dictate, what is proportionate to his transgression, which is so much as may serve for reparation and restraint. For these two are the only reasons why one man may lawfully do harm to another, which is called punishment. In transgressing the law of Nature, the offender declares himself to live by another rule than that of reason and common equity, which is that measure God has set to the actions of men for their mutual security, and so he becomes dangerous to mankind; the tie which is to secure them from injury and violence being slighted and broken by him, which being a trespass against the whole species, and the peace and safety of it, provided for by the law of Nature, every man upon this score, by the right he hath to preserve mankind in general, may restrain, or where it is necessary, destroy things noxious to them, and so may bring such evil on anyone who hath transgressed that law, as may make him repent the doing of it, and thereby deter him, and, by his example, others from doing the like mischief. And in the case, and upon this ground, every man hath a right to punish the offender, and be executioner of the law of Nature.

于是，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就这样获得了支配另一个人的权力。然而，当他抓获一个罪犯时，却没有绝对或任意的权力，凭感性冲动或按自己的意志肆意处置罪犯，而只能依据冷静的理性和良知的指示，根据罪犯所犯罪行来进行相应的惩罚，以尽量起到纠正和制止之作用。因为这两种行为（纠正和制止）是一个人能够合法地伤害他人——即我们所谓的惩罚——的唯一理由。当罪犯违反自然法时，他就宣告了自己在依据理性和公道之外的另一种规则生活，而理性和公道的规则正是上帝为人类的相互安全而设定的行为准则，所以谁轻视和打破了保障人类免受损害和暴行的约束，谁就对人类构成威胁。这种违法行为既侵害了全人类，也侵害了自然法所规定的全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因此，每一个人基于其所享有的保障全人类之权力，都有权制止或在必要时摧毁所有对其有害之物，就可以让任何触犯自然法的人遭受不幸，使犯法者懊悔自己违法，由此使犯法者本人及其他人以犯法者为例，不敢再犯同样的错误。在此情况下并基于此前提，人人皆有惩罚罪犯及充当自然法执行者的权利。

I doubt not but this will seem a very strange doctrine to some men; but before they condemn it, I desire them to resolve me by what right any prince or state can put to death or punish an alien for any crime he commits in their country? It is certain their laws, by virtue of any sanction they receive from the promulgated will of the legislature, reach not a stranger. They speak not to him, nor, if they did, is he bound to hearken to them? The legislative authority by which they are in force over the subjects of that commonwealth hath no power over him. Those who have the supreme power of making laws in England, France, or Holland are, to an Indian, but like the rest of the world—men without authority. And therefore, if by the law of Nature every man hath not a power to punish offences against it, as he soberly judges the case to require, I see not how the magistrates of any community can punish an alien of another country, since, in reference to him, they can have no more power

than what every man naturally may have over another.

我毫不怀疑，在有些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非常怪异的学说。但我希望他们在对我解释此问题之后再谴责这一学说：任何君主或国家能够处死或惩罚一个在其国家中犯下任何罪行的外国人是依据什么权利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法律是通过立法机关公布决定后才获得法律效力的，对外国人并无效力。这些法律并非针对外国人而制定，即便是，外国人也没有受其约束的义务。那么对该国臣民具有效力的立法权对外国人却是无效的。于一个印第安人而言，那些在英国、法国或荷兰拥有最高立法权的人不过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是无权威之人。因此，自然法没有授予任何人惩罚违反自然法的行为。即便他理性地判案后发现有必要进行惩罚，那么我也理解不了任何社会的行政长官如何能惩罚归属另一国家的人，因为，对他而言，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并不多于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力。

Besides the crime which consists in violating the law, and varying from the right rule of reason, whereby a man so far becomes degenerate, and declares himself to quit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 and to be a noxious creature, there is commonly injury done to some person or other, and some other man, receives damage by his transgression; in which case, he who hath received any damage has (besides the right of punishment common to him, with other men) a particular right to seek reparation from him that hath done it. And any other person who finds it just may also join with him that is injured, and assist him in recovering from the offender so much as may make satisfaction for the harm he hath suffered.

违法和不符合正当理性规则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一个人由此堕

落，并宣告自己舍弃人性的原则而成为有危害之人；此外，他通常还对某一个人造成了伤害，并且另一个人会由于他的违反行为而受到损害。在此情况下，那个受到任何损害的人除了与其他人共享处罚权，还享有向罪犯索赔的特殊权利。其他任何人若认为这样做是公道的，也可以和受害人一道，协助他向罪犯索取与所受伤害相当的赔偿。

From these two distinct rights, the one of punishing the crime, for restraint and preventing the like offence, which the right of punishing is in everybody, the other of taking reparation, which belongs only to the injured party, comes it to pass that the magistrate, who by being magistrate hath the common right of punishing put into his hands, can often, where the public good demands not the execution of the law, remit the punishment of criminal offences by his own authority, but yet cannot remit the satisfaction due to any private man for the damage he has received. That he who hath suffered the damage has a right to demand in his own name, and he alone can remit. Thedamnified person has this power of appropriating to himself the goods or service of the offender by the right of self-preservation, as every man has a power to punish the crime to prevent its being committed again, by the right he has of preserving all mankind, and doing all reasonable things he can in order to that end. And thus it is that every ma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has a power to kill a murderer, both to deter others from doing the like injury (which no reparation can compensate) by the example of the punishment that attends it from everybody, and also to secure men from the attempts of a criminal who, having renounced reason, the common rule and measure God hath given to mankind, hath, by the unjust violence and slaughter he hath committed upon one, declared war against all mankind, and therefore may be destroyed as a lion or a tiger, one of those wild savage beasts with whom men can have no society nor

security. And upon this is grounded that great law of nature, “Whoso sheddethman's blood, by man shall his blood be shed.” And Cain was so fully convinced that everyone had a right to destroy such a criminal, that, after the murder of his brother, he cries out, “Everyone that findeth me shall slay me,” so plain was it wrote in the hearts of all mankind.

这两种不同的权利（一种是为约束和防止同类犯罪而惩罚犯罪行为的权利，此惩罚权人皆有之；另一种是要求赔偿的权利，此权利只属于受到侵害的一方）会导致以下情况：法官由于其职位而掌握了人类共有的惩罚权，当出于公共利益而不要求执行法律的情况下，法官经常可以凭借自己的职权免除犯罪行为应受的惩罚，却不能使受到损害的任何私人放弃应得的赔偿。受害人享有以自己的名义要求赔偿的权利，只有他自己才有权将之免除。受害人依据自我保护的权利，有权将罪犯的物品或劳役划归已有，正如每一个人基于保卫全人类的权利而有权惩罚犯罪并防止犯罪的再次发生，并为达到该目的做出一切合理行动。因此，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权处死一位杀人犯，既以对人人皆有警示效果的例子来阻止他人做出同样的、无法补偿的侵害行为，从而保障人们不受罪犯的侵犯。这个罪犯既然已经抛弃理性这一上帝赐予人类的共同准则，并以他对另一个人所犯下的不义暴行和残杀向全人类宣战，那么我们可以将其毁灭，因为他们可以被视为狮子或老虎，被视为人类不能与之组成社会或安全相处的一种野兽。“谁使人流血的，人亦必使他流血”，这一重要的自然法则就是基于上述情况。该隐对此深信无疑：人人皆享有毁灭这种罪犯的权利，以至于他弑兄之后喊道，“凡遇见我的必杀我”，显而易见，这种观念早已铭刻人心。

By the same reason may a ma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punish the lesser breaches of that law, it will, perhaps, be demanded, with death? I answer: Each transgression may be punished to that

degree, and with so much severity, as will suffice to make it an ill bargain to the offender, give him cause to repent, and terrify others from doing the like. Every offence that can be committed in the state of Nature may, in the state of Nature, be also punished equally, and as far forth, as it may, in a commonwealth. For though it would be beside my present purpose to enter here into the particulars of the law of Nature, or its measures of punishment, yet it is certain there is such a law, and that too as intelligible and plain to a rational creature and a studier of that law as the positive laws of commonwealths, nay, possibly plainer; as much as reason is easier to be understood than the fancies and intricate contrivances of men, following contrary and hidden interests put into words; for truly so are a great part of the municipal laws of countries, which are only so far right as they are founded on the law of Nature, by which they are to be regulated and interpreted.

同理，一个人在自然状态下可以惩罚较轻地违反自然法的行为。也许有人会问，是否可以处以死刑？我的回答是，惩罚每一种犯罪的程度和轻重，要以是否足以使罪犯觉得得不偿失，使其知道懊悔，并能警示他人不犯同样的罪行为准。在自然状态下犯下的每一桩罪行都可以在自然状态下受到同样的和同等程度的处罚，就像在一个国家中一样。尽管我并不打算在此讨论自然法的细节或它的处罚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一种律法确实存在。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和自然法的研究者而言，它如同各国的实在法一样浅显易懂，甚至可能更浅显些，就像比起人们追求用文字表达的矛盾的和隐含的利益时所作的幻想和复杂的谋略，合理的议论更容易理解一样。各国大部分国内法确实如此，这些法律唯有以自然法为依据时才显公正，也必须依据自然法来做出规定和解释。

To this strange doctrine, viz., that in the state of Nature

everyone has the executive power of the law of Nature—I doubt not but it will be objected that it is unreasonable for men to be judges in their own cases, that self-love will make men partial to themselves and their friends; and, on the other side, that ill nature, passion, and revenge will carry them too far in punishing others, and hence nothing but confusion and disorder will follow, and that therefore God hath certainly appointed government to restrain the partiality and violence of men. I easily grant that civil government is the proper remedy for the inconveniences of the state of Nature, which must certainly be great where men may be judges in their own case, since it is easy to be imagined that he who was so unjust as to do his brother an injury will scarce be so just as to condemn himself for it. But I shall desire those who make this objection to remember that absolute monarchs are but men; and if government is to be the remedy of those evils which necessarily follow from men being judges in their own cases, and the state of Natureis, therefore, not to be endured, I desire to know what kind of government that is, and how much better it is than the state of nature, where one man commanding a multitude has the liberty to be the judge in his own case, and may do to all his subjects whatever he pleases without the least question or control of those who execute his pleasure? And in whatsoever he doth, whether led by reason, mistake, or passion, must be submitted to? Which me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re not bound to do one to another. And if he that judges, judges amiss in his own or any other case, he is answerable for it to the rest of mankind.

对于这一怪异的学说——即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皆享有自然法的执行权——我相信肯定会有人提出异议：人们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定者是不合理的，因为自私会让人们袒护自己及其朋友，而另一方面，生性邪恶、感性用事和复仇心理都会使他们过度地惩罚别人，结果唯

有混乱无序；所以上帝派政府来约束人们的偏袒和暴力。我也承认，公民政府恰恰是矫正自然状态之种种不便情况的一剂良方。让人们充当自己案件的审判者确实有很大的弊病，因为不难设想，一个伤害自己兄弟的不义之徒绝不会如此正义地宣告自己有罪。但我希望那些提出异议的人记住，专制君主也是凡人而已；倘若人们充当自己案件的审判者导致了必然的弊端，使得自然状态无以为继，而政府就是用来补救这些弊端的话，那么我倒想知道，倘若一个统御民众的人能够自由充当自己案件的审判者，可以随意处置他所有的臣民，而丝毫不受那些执行其意愿之人的任何质疑或控制，并且不论他所作所为是由理性、谬误还是感情冲动所支配，臣民都必须臣服，那是一种怎样的政府？它究竟比自然状态好多少？在自然状态下，情况要好很多，在那里，人们不必遵从另一个人的意志。倘若审判者在他自己或其他的案件中做了错误的判决，他就要为此对其余的人负责。

It is often asked as a mighty objection, where are, or ever were, there any men in such a state of nature? To which it may suffice as an answer at present, that since all princes and rulers of “independent” governments all through the world are in a state of nature, it is plain the world never was, nor never will be, without numbers of men in that state. I have named all governors of “independent” communities, whether they are, or are not, in league with others; for it is not every compact that puts an end to the state of naturebetween men, but only this one of agreeing together mutually to enter into one community, and make one body politic; other promises and compacts men may make one with another, and yet still be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e promises and bargains for truck, &c, between the two men in Soldania, the desert island, mentioned by Garcilasso de la Vega, in his history of Peru; or between a Swiss and an Indian, in the woods of America, are binding to them, though they are perfectly in a state of Nature in reference to one another for truth, and keeping of faith belongs to

men, as men, and not as members of society.

人们常常把它当作一个重大的反对论点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哪里有或曾经有过处于此种自然状态下的人呢？对此问题，现在这样回答即可：既然全世界的独立政府之所有统治者和君主都处于自然状态下，那就显而易见，不论过去或将来，世界上都会存在一些处在那种状态下的人。我指的是“独立”社会的所有统治者，无论他们是否与他人结成同盟。因为并非每一个契约都能终止人们之间的自然状态，唯有一致同意加入同一社会，从而构成一个国家的契约才起作用；人们可以相互订立其他协议和契约却仍处于自然状态下。索尔达尼亚[3_3]（加西拉梭在他的秘鲁历史中所提到的荒芜不毛的岛屿）的两个人，或美洲森林中的一个瑞士人和一个印第安人，尽管他们彼此完全处于自然状态，但他们所订立的交换协议和契约对他们是有约束力的，因为诚实和守信是属于作为人而非作为社会成员的品质。

To those that say there were never any me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I will not oppose the authority of the judicious Hooker, [2_2] where he says, “the laws which have been hitherto mentioned”—, i.e., the laws of Nature—“do bind men absolutely, even as they are men, although they have never any settled fellowship, never any solemn agreement amongst themselves what to do or not to do; but for as much as we are not by ourselves sufficient to furnish ourselves with competent store of things needful for such a life as our Nature doth desire, a life fit for the dignity of man, therefore to supply those defects and imperfections which are in us, as living single and solely by ourselves, we are naturally induced to seek communion and fellowship with others; this was the cause of men uniting themselves at first in politic societies.” But I, moreover, affirm that all men are naturally in that state, and remain so till, by their own consents, they make themselves members of some politic

society, and I doubt not, in the sequel of this discourse, to make it very clear.

对于那些宣称人类从未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我赞同引证睿智的胡克在《宗教政治》[3_4]中的权威论述[3_5]，他说："上述法则"——即自然法——"对于人类而言，哪怕是以个人身份出现，也是有绝对约束力的，尽管他们从无任何固定的组织，相互之间也从无关于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的庄严协定。但既然我们不能凭借自身充分提供我们天性所要求的生活——即适合人尊严地生活——所必需的物资，进而弥补我们在单独生活时必然产生的缺点和缺陷，我们本能地想要去和他人群居并共同经营生活，这就是人们最初联合起来形成政治社会的原因"。然而，我还要进一步断言，所有人会自然地处于那种状态并一直保持如此，直到他们同意成为某种政治社会的成员为止。我相信这篇论文的后面部分会把这一观点阐述得极为清楚。

[2_1].Eccl. Pol. Lib. 1.

[2_2].Eccl. Pol. lib.i. sect. 10.

[3_1].睿智的胡克（the judicious Hooker，1553-1600），英格兰基督教神学家，《论教会体制的法则》的作者。

[3_2].《宗教政治》，第一卷。

[3_3].索尔达尼亚（Soldania），南非西海岸靠近好望角的一处疗养胜地。

[3_4].《宗教政治》第1卷，第10节

[3_5].《宗教政治》，第1卷，第10节。

Chapter III　Of the State of War

第三章　论战争状态

The state of war is a state of enmity and destruction, and therefore declaring by word or action, not a passionate and hasty, but a sedate, settled design upon another man's life puts him in a state of war with him against whom he has declared such an intention, and so has exposed his life to the other's power to be taken away by him, or anyone that joins with him in his defence, and espouses his quarrel; being reasonable and just, I should have a right to destroy that which threatens me with destruction; for by the fundamental law of Nature, man being to be preserved as much as possible, when all cannot be preserved, the safety of the innocent is to be preferred, and one may destroy a man who makes war upon him, or has discovered an enmity to his being,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he may kill a wolf or a lion, because such men are not under the ties of the common law of reason, have no other rule but that of force and violence, and so may be treated as beasts of prey, those dangerous and noxious creatures that will be sure to destroy him whenever he falls into their power.

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的和毁灭的状态。因此，如果一个人用语言或行动宣布对另一人的生命有图谋，而且这种图谋并非出于感情用事的仓促决定，而是沉着的明确决定，他就让自己与他宣告这种图谋的目标者处于战争状态。由此他就使自己的生命受制于那个人或协同那个人进行防御和支持其斗争的任何人，有被夺去生命的危险。我合理而正当地享有摧毁那以毁灭来胁迫我的东西的权利。因为，依据基本的自然法，人应竭力保护自己，当不能保护全体时，应优先保卫无辜

之人的安全。一个人可以摧毁向他宣战或对他的存在持有敌意的人。他这样做与他可以消灭一只豺狼或狮子拥有同样的理由。因为这种人不受制于共同的理性法则，除了武力和暴力的法则，别无其他法则，因此可以被当成野兽对待，一旦他落入这些危险而有害的动物之爪牙，定会遭其毁灭。

And hence, it is that he who attempts to get another man into his absolute power does thereby put himself into a state of war with him; it being to be understood as a declaration of a design upon his life. For I have reason to conclude that he who would get me into his power without my consent would use me as he pleased when he had got me there, and destroy me too when he had a fancy to it; for nobody can desire to have me in his absolute power, unless it be to compel me by force to that which is against the right of my freedom, i.e. make me a slave. To be free from such force is the only security of my preservation, and reason bids me look on him as an enemy to my preservation who would take away that freedom which is the fence to it; so that he who makes an attempt to enslave me, thereby puts himself into a state of war with me. He that in the state of Nature would take away the freedom that belongs to anyone in that state must necessarily be supposed to have a design to take away everything else, that freedom being the foundation of all the rest; as he that in the state of society would take away the freedom belonging to those of that society or commonwealth must be supposed to design to take them away from everything else, and so be looked on as in a state of war.

因此，那个企图把他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的人就使自己与那个人处于战争状态，这应被理解成宣告对那个人的生命有所图谋。因为，我有理由断定，那个未经我同意而将我置于其权力之下的人，

在他达到目的后将会随心所欲地处置我，甚至随意毁灭我。任何人都别想将我置于其绝对权力之下，除非是通过武力强迫我陷入有悖于我的自由权利之处境，也就是使我沦为奴隶。摆脱这种武力是我自保的唯一保障，自由是自我保护的屏障，基于理性，我将那企图剥夺我自由之人视作威胁我生存的敌人；因此谁企图奴役我，他就将自己与我置于战争状态。那个在自然状态中想剥夺处于该状态的任何人之自由的人，必定被认为企图夺取其他一切东西，因为自由是其他一切的基础。同样，在社会状态下，那个试图夺去那个社会或国家的人之自由的人，也必定被认为有企图夺取他们的其他一切，因此被视为处于战争状态。

This makes it lawful for a man to kill a thief who has not, in the least, hurt him, nor declared any design upon his life, any farther than by the use of force, so to get him in his power as to take away his money, or what he pleases, from him; because using force, where he has no right to get me into his power, let his pretence be what it will, I have no reason to suppose that he who would take away my liberty would not, when he had me in his power, take away everything else. And, therefore, it is lawful for me to treat him as one who has put himself into a state of war with me, i.e., kill him if I can; for to that hazard does he justly expose himself whoever introduces a state of war, and is aggressor in it.

因此，一个人可以合法地杀死一名窃贼，尽管那名窃贼丝毫没有伤害他，亦没有表示对其生命有任何图谋，只不过是运用武力将他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以从他身上夺取他的金钱或他喜欢的东西。因为那名窃贼无权用武力使我受制于他，所以不论他有什么借口，没有理由认为，那个企图夺取我自由的人会在掌控我后不会夺取我其他的一切东西。因此，我完全可以合法地把他当作那个将自己与我置于战争状态的人，换言之，只要有可能我就应该杀死他。无论何人，只要他

造成战争状态并且是此种状态中的侵略者，就应当被置于这种危险境地。

And here we have the pl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the state of war, which however some men have confounded, are as far distant as a state of peace, goodwill, mutual assistance, and preservation; and a state of enmity, malice, violence and mutual destruction are one from another. Men living together according to reason without a common superior on earth, with authority to judge between them, is properly the state of Nature. But force, or a declared design of force upon the person of another, where there is no common superior on earth to appeal to for relief, is the state of war; and it is the want of such an appeal gives a man the right of war even against an aggressor, though he be in society and a fellow subject. Thus, a thief whom I cannot harm, but by appeal to the law, for having stolen all that I am worth, I may kill when he sets on me to rob me but of my horse or coat, because the law, which was made for my preservation, where it cannot interpose to secure my life from present force, which if lost, is capable of no reparation, permits me my own defence and the right of war, a liberty to kill the aggressor, because the aggressor allows not time to appeal to our common judge, nor the decision of the law, for remedy in a case where the mischief may be irreparable. Want of a common judge with authority puts all men in a state of Nature; force without right upon a man's person makes a state of war, both where there is and is not, a common judge.

这即是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的明显差别，无论有些人 [4_1] 怎样将二者混为一谈，它们之间的差之间的差别那样巨大。人们依据理性而共同生活，他们当中并不存在一个有权对他们进行裁判的共同上级，

这就是自然之状态。相反，对另一个人的人身使用武力或表现出使用武力的企图，而人世间又不存在一个可以向其请求解围的共同上级，这就是战争状态。正是由于这种无可诉求，使人享有向一个侵犯者宣战的权利，虽然侵犯者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和同一国之臣民。因此，我虽不能因一个窃贼偷了我的全部财产而伤害他，而只能诉诸法律，但是当他攻击我，要抢我的马或我的衣服时，我便可以杀死他。因为如果为保卫我而制订的法律因无法干预当时的武力而无法保全我的生命——生命一经丧失就无法补救——法律就允许我享有自卫权和战争权，即有权杀死侵犯者，因为侵犯者不容我有时间诉诸我们的共同审判者或法律的判决，来补救一个案子中无法补偿的损害。缺少权威的共同裁定者使人们处于自然状态；而不论有没有共同审判者，对人身施以未经授权的武力都会造成一种战争状态。

But when the actual force is over, the state of war ceases between those that are in society and are equally on both sides subject to the judge; and, therefore, in such controversies, where the question is put, “Who shall be judge?” It cannot be meant who shall decide the controversy; everyone knows what Jephtha here tells us, that “the Lord the Judge” shall judge. Where there is no judge on earth the appeal lies to God in Heaven. That question then cannot mean who shall judge, whether another hath put himself in a state of war with me, and whether I may, as Jephtha did, appeal to Heaven in it? Of that I myself can only be judged in my own conscience, as I will answer it at the great day to the Supreme Judge of all men.

但武力一旦终止，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的战争状态便告结束，双方都平等地服从裁定者；因此，倘若在此争议中提出“谁是裁定者？”这一问题并不能意味着，谁应对此争议进行判决。每一个人都知道，耶弗他 [4_2] 在这里想告诉我们的是，“审判者耶和华”应当裁

决。如果人世间没有裁定者，那就只能诉诸天上的上帝。因此那个问题便不能意味着谁应当判断究竟别人是否将他自己与我置于战争状态，以及我可否像耶弗他那样诉诸上天。就此问题，我唯有凭良心判断，因为在最后的审判日，我将就此对所有人的最高审判者做出回答。

[4_1].有些人（some men）在此指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他在《利维坦》一书中认为君主专制政体是最符合理性、最为可取的政府形式。

[4_2].耶弗他（Jephtha），《圣经·旧约·士师记》11:12-40中记载的人物。他是以色列的法官，为了履行誓言，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

Chapter IV　Of Slavery

第四章　论奴役

The natural liberty of man is to be free from any superior power on earth, and not to be under the will or legislative authority of man, but to have only the law of Nature for his rule. The liberty of man in society is to be under no other legislative power but that established by consent in the commonwealth, nor under the dominion of any will, or restraint of any law, but what that legislative shall enact according to the trust put in it. Freedom, then, is not what Sir Robert Filmer tells us: “A liberty for everyone to do what he lists, to live as he pleases, and not to be tied by any laws”; [4_1] but freedom of men under government is to have a standing rule to live by, common to everyone of that society, and made by the legislative power erected in it. A liberty to follow my own will in all things where the rule prescribes not, not to be subject to the inconstant, uncertain, unknown, arbitrary will of another man, as freedom of nature is to be under no other restraint but the law of Nature.

人有自然自由，这意味着人不受制于人世间任何上级权力，不受人的意志或立法权的支配，而仅以自然法作为准则。处于社会中的人之自由，是指仅受制于经人们同意在国家里建立的立法权而不受制于其他任何立法权；除了受制于由立法机关依据其所受委托制订的法律外，不受任何意志的支配或任何法律的约束。因此，自由并不像罗伯特·菲尔默爵士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人人做他赞同的事，过他想过的生活，而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 [5_1] 而处在政府之下的人们之自由，应有一种长期有效的生活准则，这种准则由社会中建立的立法机

关制定，全社会成员都应遵守。这是一种在规则未做规定的所有事情上遵从自己的意志、不受制于另一个人反复无常、无法确定、无从知晓、武断专横的意志之自由；正如自然之自由除了自然法而不受其他约束一样。

This freedom from absolute, arbitrary power is so necessary to, and closely joined with, a man's preservation, that he cannot part with it but by what forfeits his preservation and life together. For a man, not having the power of his own life, cannot by compact or his own consent enslave himself to anyone, nor put himself under the absolute, arbitrary power of another to take away his life when he pleases. Nobody can give more power than he has himself, and he that cannot take away his own life cannot give another power over it. Indeed, having, by his fault, forfeited his own life by some act that deserves death, he to whom he has forfeited it may, when he has him in his power, delay to take it, and make use of him to his own service; and he does him no injury by it. For, whenever he finds the hardship of his slavery outweigh the value of his life, it is in his power, by resisting the will of his master, to draw on himself the death he desires.

这种摆脱绝对的、专断的权力的自由十分必要，与个人的自我保护密切相关。除非有什么会同时剥夺他的保护手段和生命，否则他不可能放弃这种自由。因为一个人既然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生命，他就不能通过契约或经由自己同意就成为任何人的奴隶，也不能使自己受制于另一人的绝对且任意的权力，任凭他剥夺自己的生命。无人可以把超过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交给他人；一个不能剥夺自己生命的人，亦不能把支配自己生命的权力交给别人。的确，倘若一个人由于自己的过错做了某些死有余辜的事而丧失了生命权，那么获得剥夺这个人生命权的人在控制住这个人的时候，可以选择延迟剥夺这个人的生命，

并利用这个人来为己服役；这样做对这个人并未造成伤害。因为当这个人发现自己生命的价值抵不上自己受奴役的痛苦时，便有权反抗主人的意志，情愿死亡。

This is the perfect condition of slavery, which is nothing else but the state of war continued between a lawful conqueror and a captive, for if once compact enter between them, and make an agreement for a limited power on the one side, and obedience on the other, the state of war and slavery ceases as long as the compact endures; for, as has been said, no man can by agreement pass over to another that which he hath not in himself—a power over his own life.

这是最彻底的奴役情形，它不过是延续了合法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战争状态。因为他们之间一旦订立契约并达成协议，同意一方拥有有限的权力而另一方必须臣服，那么只要这一契约继续有效，战争和奴役状态就会终止。因为如前所述，没有人能够通过协议把自己所未曾拥有的东西交给另一个人，即支配自己生命的权力。

I confess, we find among the Jews, as well as other nations, that men did sell themselves; but it is plain this was only to drudgery, not to slavery; for it is evident the person sold was not under an absolute, arbitrary, despotic power, for the master could not have power to kill him at any time, whom at a certain time he was obliged to let go free out of his service; and the master of such a servant was so far from having an arbitrary power over his life that he could not at pleasure so much as maim him, but the loss of an eye or tooth set him free. [4_2]

不能否认，在犹太人当中乃至在其他民族中，我们确实看到有人出卖自身；但那显然只是为了服劳役而并非做奴隶。因为，被出卖的人显然没有处在一种绝对的、任意的专制权力之下。无论何时，主人都无权处死他，而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必须解除他的服役，让他自由；此类奴仆的主人无权任意处置奴仆的生命，也不能随意伤害他，只要奴仆失去一只眼睛或一颗牙齿，主人就要将其释放。[5_2]

[4_1].Observations, A. 55.

[4_2].Exod. xxi.

[5_1].《亚里士多德〈政治论〉评述》，第55页。

[5_2].《出埃及记》，第21章。

Chapter V　Of Property

第五章　论财产

Whether we consider natural reason, which tells us that men, being once born, have a right to their preservation, and consequently to meat and drink and such other things as Nature affords for their subsistence, or “revelation,” which gives us an account of those grants God made of the world to Adam, and to Noah and his sons, it is very clear that God, as King David says, [5_1] “has given the earth to the children of men,” given it to mankind in common. But, this being supposed, it seems to some a very great difficulty how anyone should ever come to have a property in anything. I will not content myself to answer, that, if it be difficult to make out “property” upon a supposition that God gave the world to Adam and his posterity in common, it is impossible that any man but one universal monarch should have any “property” upon a supposition that God gave the world to Adam and his heirs in succession, exclusive of all the rest of his posterity; but I shall endeavour to show how men might come to have a property in several parts of that which God gave to mankind in common, and that without any express compact of all the commoners.

不管我们从自然理性（它告诉我们人生而享有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利，因此有权享用肉类和饮料以及自然提供以维持生存的其他物品）考虑，还是从上帝的启示（它告诉我们上帝把世界上的东西赐予亚当、挪亚和他的儿子们）来考虑，事实都很明显，如大卫王所说，[6_1] 上帝“已经把地给了人类的子女”，将它赐予人类共有。然而，就算假设如此，有些人还是很难理解，任何人究竟是如何拥有对任何东

西的财产权的呢？我对如下的回答并不满意：倘若说根据上帝将世界赐予亚当及其后代共有这一假设难以理解财产权的话，那么，除了唯一的世界君主，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根据上帝将世界赐予亚当及其继承人并排除他所有其他后代的假设而享有任何财产权。但是我将努力说明，人们如何能够在没有全体世人的任何明确协议之情况下，使上帝赐予人类所共有的东西的一部分成为他们的财产的。

God, who hath given the world to men in common, hath also given them reason to make use of it to the best advantage of life and convenience. The earth and all that is therein is given to men for the support and comfort of their being. And though all the fruits it naturally produces, and beasts it feeds, belong to mankind in common, as they are produced by the spontaneous hand of Nature, and nobody has originally a private dominion exclusive of the rest of mankind in any of them, as they are thus in their natural state, yet being given for the use of men, there must of necessity be a means to appropriate them some way or other before they can be of any use, or at all beneficial, to any particular man. The fruit or venison which nourishes the wild Indian, who knows no enclosure, and is still a tenant in common, must be his, and so his, i.e., a part of him, that another can no longer have any right to it before it can do him any good for the support of his life.

上帝在把世界赐予人类共有的同时也将理性赐予了人类，让他们利用理性来获得生活和便利的最大好处。土地及土地上的所有东西，都赐予人类用于维持他们的生存和舒适的生活。土地上所有自然生产的果实和它所养育的兽类均为人类所共有，因为它们都是由自然自发地生产出来的。最初没有人对其中的任何部分拥有排他性的私人所有权，因为它们都是这样处于自然状态中。然而，既然这些东西是给人类使用的，那就必然有某一种方法将它们归为特定的人所有，在这之

前，它们都无法对任何个人产生用处或者带来益处。养活野蛮的印第安人（他们不懂得圈用土地，仍是公有土地上的住户）的果实和鹿肉必须属于这个特定的人并成为他的财产，即变成他的一部分。这些果实和鹿肉能够对维持他的生命带来任何好处，别人也不再对它享有任何权利。

Though the earth and all inferior creatures are common to all men, yet every man has a “property” in his own “person”. This nobody has any right to but himself. The “labour” of his body and the “work” of his hands, we may say, are properly his. Whatsoever, then, he removes out of the state that Nature hath provided and left it in, he hath mixed his labour with it, and joined to it something that is his own, and thereby makes it his property. It being by him removed from the common state Nature placed it in, it hath by this labour something annexed to it that excludes the common right of other men. For this “labour” being the unquestionable property of the labourer, no man but he can have a right to what that is once joined to, at least where there is enough, and as good left in common for others.

尽管土地和一切低等生物为全人类所共有，但是人人皆对自己的人身享有所有权。除了他本人，无人有此权利。我们可以说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做的“工作”是正当地属于他的。于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他使之脱离自然所提供的状态及其原来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将自己的劳动与之相混合，在它上面加入了自己的某些东西，也就因此将它变成他自己的财产。既然是他使这个东西摆脱了自然所设置的公有状态，他通过劳动也就为这个东西添加了某些东西，由此也就排除了其他人对这个东西的共有权。因为既然这种“劳动”是劳动者无可非议的财产，那么只有他本人有权享有加入他本人劳动的那个东西，至少在还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供其他人共同享

用的情况下是这样。

He that is nourished by the acorns he picked up under an oak, or the apples he gathered from the trees in the wood, has certainly appropriated them to himself. Nobody can deny but the nourishment is his. I ask, then, when did they begin to be his? When he digested? Or when he ate? Or when he boiled? Or when he brought them home? Or when he picked them up? And it is plain, if the first gathering made them not his, nothing else could. That labour put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and common. That added something to them more than Nature, the common mother of all, had done, and so they became his private right. And will anyone say he had no right to those acorns or apples he thus appropriated because he had not the consent of all mankind to make them his? Was it a robbery thus to assume to himself what belonged to all in common? If such a consent as that was necessary, man had starved, notwithstanding the plenty God had given him. We see in commons, which remain so by compact, that it is the taking any part of what is common, and removing it out of the state Nature leaves it in, which begins the property, without which the common is of no use. And the taking of this or that part does not depend on the express consent of all the commoners. Thus, the grass my horse has bit, the turfs my servant has cut, and the ore I have digged in any place where I have a right to them in common with others become my property without the assignation or consent of anybody. The labour that was mine, removing them out of that common state they were in, hath fixed my property in them.

那个从橡树下拾起橡子或从林子的树上摘下苹果食用的人，他无疑已经把它们归为己用了。没有人能够否认那些食物是完全归他所有

的。那么我要问问，这些东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属于他的呢？是在他消化时？还是在他食用时？还是在他烹煮时？还是在他把它们带回家时？还是在他拾起它们时？显而易见，倘若最初的采集活动没有使它们归属于他，其他情况就更不能了。劳动使它们有别于共有之物。在万物共有之母的自然已造就它们的基础上，劳动又给它们添加一些东西，这样它们就成为他的私有权利。难道会有人说，因为这个人没有得到全人类的同意就把这些橡子和苹果占为己有，就不能享用它们吗？以这种方式把属于全体共有的东西归为己有，算不算是盗窃呢？倘若必须得到这样的同意，尽管上帝赐予了人类十分丰富的东西，人类也早就饿死了。我们在共有关系（此种关系以合约来维系）中看到，财产权的出现，正是始于从共有之物中取出任何一部分并使之脱离自然安排其所处之状态。若非如此，共有之物会没有任何用处。而从共有之物中取出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并不取决于所有共有者的明确同意。所以，我的马所吃的草，我的仆人所割的草皮，以及我在同他人共同享有开采权的任何地方所挖出的矿石，皆无需任何人的转让或同意就成为我的财产。我对它们的财产权是通过用自己的劳动使它们脱离曾经所处的共有状态来确定的。

By making an explicit consent of every commoner necessary to anyone's appropriating to himself any part of what is given in common. Children or servants could not cut the meat which their father or master had provided for them in common without assigning to everyone his peculiar part. Though the water running in the fountain is every one's, yet who can doubt but that in the pitcher is his only who drew it out? His labour hath taken it out of the hands of Nature where it was common, and belonged equally to all her children, and hath thereby appropriated it to himself.

倘若规定任何人在将共有之物的任何一部分划为己用时必须得到每一个共有者的明确同意，那么孩子和仆人就不能分割他们的父亲和

主人提供给他们共同食用却没有指明具体划分给每个人哪部分的肉。尽管流动的泉水为每个人所共有，但是装在水壶里的水仅属于取水的人，这一点谁能怀疑呢？他通过他的劳动将水从自然之手里取出来，从而将水划归己用，而当水在自然手里时，它是共有的，同等地属于自然的所有子女。

Thus, this law of reason makes the deer that Indian's who hath killed it; it is allowed to be his goods who hath bestowed his labour upon it, though, before, it was the common right of everyone. And amongst those who are counted as the civilised part of mankind, who have made and multiplied positive laws to determine property, this original law of Nature for the beginning of property, in what was before common, still takes place, and by virtue thereof, what fish anyone catches in the ocean, that great and still remaining common of mankind; or what ambergris anyone takes up here is by the labour that removes it out of that common state Nature left it in, made his property who takes that pains about it. And even amongst us, the hare that anyone is hunting is thought his who pursues her during the chase. For being a beast that is still looked upon as common, and no man's private possession, whoever has employed so much labour about any of that kind as to find and pursue her, has thereby removed her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wherein she was common, and hath begun a property.

所以，这一理性法则在印第安人中通行：谁把鹿杀死，鹿就归谁所有；一件东西在一个人对之付出劳动后就成为他的财物，虽然那原是人人享有共同权利的东西。属于文明人的那部分人已经制定并增加了一些明文法来确定财产权，但最初的自然法说明了原为共有的东西如何产生财产权，所以仍然适用。根据这一点，任何人在仍为人类共有的广阔海洋中捕获的鱼，或在那里采集的什么龙涎香，通过劳动使

它脱离了自然为它安排的共有状态，使它成为付出辛劳之人的财产。甚至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在狩猎时追赶一只野兔，那只野兔就被认为是属于他的。因为野兽仍被视为是共有的，而非任何人之私有财产，所以只要有人对那类动物付出了如此多的劳动去发现并追赶它，他就由此使它脱离了它原来所处的共有的自然状态，转而成为一种财产。

It will, perhaps, be objected to this, that if gathering the acorns or other fruits of the earth, &c, makes a right to them, then anyone may engross as much as he will. To which I answer, not so. The same law of Nature that does by this means give us property, does also bound that property too. “God has given us all things richly.“ [5_2] Is the voice of reason confirmed by inspiration? But how far has He given it us “to enjoy”? As much as anyone can make use of to any advantage of life before it spoils, so much he may by his labour fix a property in. Whatever is beyond, this is more than his share, and belongs to others. Nothing was made by God for man to spoil or destroy. And thus considering the plenty of natural provisions, there was a long time in the world, and the few spenders, and to how small a part of that provision the industry of one man could extend itself and engross it to the prejudice of others, especially keeping within the bounds set by reason of what might serve for his use. There could be then little room for quarrels or contentions about property so established.

可能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倘若采集橡子或其他土地所生长的果实等等就能对这些东西享有权利，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尽可能多地占有。对此我的回答是，并非如此。同一自然法通过这种方式赋予我们财产权的同时，也对这种财产权加以限制。“上帝将万物赐予我们。” [6_2] 这是已被神的启示所证实的理性之声吗？然

而上帝在多大程度上给予我们财产，让我们享用呢？一件东西在败坏之前，任何人能够为生活所需对之利用多少，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在这东西上面确定多少财产权。凡超过这个范围的就不是他应得的份额，而属于他人所有。上帝创造之物，无一是让人们糟蹋或破坏的。因此，考虑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世界上自然物资充裕而使用者却很少，一个人的辛勤劳动所能达到并占为己有而不让他人分享的东西，仅是自然物资中极小的一部分，而且还被理性限制在可供他使用的范围内，那时对这样确定的财产权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余地。

But the chief matter of property being now is not the fruits of the earth and the beasts that subsist on it, but the earth itself, as that which takes in and carries with it all the rest, I think it is plain that property in that too is acquired as the former. As much land as a man tills, plants, improves, cultivates, and can use the product of, so much is his property. He by his labour does, as it were, enclose it from the common. Nor will it invalidate his right to say everybody else has an equal title to it, and therefore he cannot appropriate, he cannot enclos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all his fellow-commoners, all mankind. God, when He gave the world in common to all mankind, commanded man also to labour, and the penury of his condition required it of him. God and his reason commanded him to subdue the earth, i.e., improve it for the benefit of life and therein lay out something upon it that was his own, his labour. He that, in obedience to this command of God, subdued, tilled, and sowed any part of it, thereby annexed to it something that was his property, which another had no title to, nor could without injury taking from him.

然而，现在财产权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土地所产出的果实和依靠土地生存的野兽，而在于土地本身，以及附属于土地的一切，我认为土

地的所有权显然也是像前者那样取得的。一个人能耕作、播种、改良、开垦多少土地，能使用多少土地的产品，就有多少土地是他的财产。他是通过劳动获得财产权的，就像他是通过他的劳动从公地中圈出那块土地一样。就算其他人对那土地也有同样的权利，如果他没有得到全体共有者（即全人类）的同意，他就不能划归己用、不能圈占土地，也不能使他的权利失效。当上帝将世界赐予全人类时，也命令人们要辛勤劳作，且人的贫困处境也要求他这么做。上帝和人的理性命令他去开垦土地，换而言之，他是为了生活需要而改良土地，将属于他的某些东西，即他的劳动注入其中。那个服从了上帝这一命令的人开垦、耕作和播种土地的任何部分，由此将原属于他的某些东西附加在这土地上，这东西是他人无权享有的，若要从他手中夺取所有权就不可能不伤害他。

Nor was this appropriation of any parcel of land, by improving it, any prejudice to any other man, since there was still enough and as good left, and more than the yet unprovided could use. So that, in effect, there was never the less left for others because of his enclosure for himself. For he that leaves as much as another can make use of does as good as take nothing at all. Nobody could think himself injured by the drinking of another man, though he took a good draught, who had a whole river of the same water left him to quench his thirst. And the case of land and water, where there is enough of both, is perfectly the same.

这种通过开垦任何一块土地将之归为己用的做法，并没有对其他任何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因为还剩下足够多、同样好的土地，比还没获得土地的人能够利用的还要多。所以，事实上，他为自己圈占土地的做法并不会减少留给他人的土地。因为只要他留下足够他人利用的土地，就等于是根本没有占有任何土地。没有人会因为另一个人喝了水而觉得自己受到了损害，因为尽管那个人喝了很多水，却仍然有一

整条同样的河水留给他解渴。就土地和水而言，因两者都充足，所以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God gave the world to men in common, but since He gave it to them for their benefit and the greatest conveniences of life they were capable to draw from it, it cannot be supposed He meant it should always remain common and uncultivated. He gave it to the use of the industrious and rational (and labour was to be his title to it); not to the fancy or covetousness of the quarrelsome and contentious. He that had as good left for his improvement as was already taken up needed not complain, ought not to meddle with what was already improved by another's labour; if he did it is plain he desired the benefit of another's pains, which he had no right to, and not the ground which God had given him, in common with others, to labour on, and whereof there was as good left as that already possessed, and more than he knew what to do with, or his industry could reach to.

上帝将世界赐予人类所共有，然而他将世界赐予人类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他们能够从中获得生活的最大便利，我们就不能假设上帝的意图是使世界永远保持共有状态而不加以耕种。他是将世界赐予勤劳而富有理性的人来利用（而劳动使这些人取得所有权），而不是赐予喜好吵闹和纷争的人来幻想和垂涎的。一个人只要还拥有和已被占用的东西同样好的东西，并为其所利用，他就不必抱怨，也不应干涉他人已经通过劳动改进的东西。倘若他这样做，他显然是想占有别人的辛勤劳动成果，而他没有这样的权利；这并不是因为上帝赐予他和其他人所共有并在其上从事劳动的那块土地，而是除了已被占有的土地，还剩下一样好的土地，比他知道如何利用或他的辛勤劳作所能企及的更多。

It is true, in land that is common in England or any other country, where there are plenty of people under government who have money and commerce, no one can enclose or appropriate any part without the consent of all his fellow-commoners; because this is left common by compact, i.e., by the law of the land, which is not to be violated. And, though it be common in respect of some men, it is not so to all mankind, but is the joint property of this country, or this parish. Besides, the remainder, after such enclosure, would not be as good to the rest of the commoners as the whole was, when they could all make use of the whole; whereas in the beginning and first peopling of the great common of the world it was quite otherwise. The law man was under was rather for appropriating. God commanded, and his wants forced him to labour. That was his property, which could not be taken from him wherever he had fixed it. And hence subduing or cultivating the earth and having dominion, we see, are joined together. The one gave title to the other. So that God, by commanding to subdue, gave authority so far to appropriate. And the condition of human life, which requires labour and materials to work on, necessarily introduces private possessions.

的确，在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公有土地上，有许多人受制于政府，他们有钱又从事商业，却无人能够在没得到全体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将任何部分的公有土地圈起或占为己用，因为这是契约，即国家法律规定这种土地是公有的，是不可侵犯的。尽管这种土地对有些人来说是公有的，但并非对全人类都如此，它是这个国家或这个教区的共有财产。而且，对于其余的共有人而言，经过这样的圈占后所剩下的土地不会同当初的全部土地一样好，因为那时他们都可以使用全部土地；而起初人们最早聚居在世界广袤的公有土地上时，情况并非如此。那时，统治人们的法律确实鼓励占有土地。上帝的命令以及人的需要迫使他从事劳动。那是他的财产，只要他确定了所有权，这些财

产就不能被剥夺。因此，我们看到开垦或耕种土地和土地占有权是相互结合的。前者成为后者的依据。所以，上帝通过命令人们开拓土地，赐予人们在此范围内占有土地的权力。人类生活的状况既然需要劳动和从事劳动的资料，就必然导致私人占有。

The measure of property Nature has well set, by the extent of men's labour and the conveniencies of life. No man's labour could subdue or appropriate all, nor could his enjoyment consume more than a small part; so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any man, this way, to entrench upon the right of another or acquire to himself a property to the prejudice of his neighbour, who would still have room for as good and as large a possession (after the other had taken out his) as before it was appropriated. Thismeasure did confine every man's possession to a very moderate proportion, and such as he might appropriate to himself without injury to anybody in the first ages of the world, when men were more in danger to be lost, by wandering from their company, in the then vast wilderness of the earth than to be straightened for want of room to plant in.And thesame measure may be allowed still,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body, as full as the world seems. For, supposing a man or family, in the state they were at first, peopling of the world by the children of Adam or Noah, let him plant in some inland vacant places of America. We shall find that the possessions he could make himself, upon the measures we have given, would not be very large, nor, even to this day, prejudice the rest of mankind or give them reason to complain or think themselves injured by this man's encroachment, though the race of men have now spread themselves to all the corners of the world, and do infinitely exceed the small number at the beginning. Nay, the extent of ground is of so little value without labour that I have heard it affirmed that in Spain itself a man may be permitted to plough, sow, and reap, without

being disturbed, upon land he has no other title to, but only his making use of it. But, on the contrary, the inhabitants think themselves beholden to him who, by his industry on neglected, and consequently waste land, has increased the stock of corn, which they wanted. But be this as it will, which I lay no stress on, this I dare boldly affirm, that the same rule of propriety, viz. that every man should have as much as he could make use of, would hold still in the world, without straitening anybody, since there is land enough in the world to suffice double the inhabitants, had not the invention of money, and the tacit agreement of men to put a value on it, introduced (by consent) larger possessions and a right to them; which, how it has done, I shall by and by show more at large.

自然根据人类的劳动和生活所需之范围很好地规定了财产的范围。任何人的劳动都不能开垦或占用所有的土地，他的享用也只不过消耗一小部分，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去侵犯另一个人的权利，或为自己取得一份财产而损害他的邻居，因为他的邻居（在别人拿走属于自己的一份后）仍有机会得到和归为己用前一样好、一样多的财产。在世界之初，人们在当时的荒野上面临的离群流浪而迷失之危险，要大于缺乏土地种植的困境，那时，财产的权限的确将每个人的私有财产限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这样他可以归为己用而不损害别人。尽管世界现在似乎人满为患，同样的限度仍然可以被采用而不损害任何人。这是因为，假设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处于亚当或挪亚的子孙们起初在世界上居住的状态：让他在美洲腹地空旷的地方种植，我们会发现，尽管人类现在已经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且大大超过了最初的微小数目，依据我们所定的限度，他能划归己有的土地不会很大，就算在今天也不会损害其余的人类，导致他们有理由抱怨或认为这个人的侵占侵害了他们。而且，若没有劳动，土地的面积就没有多大价值，我听说在西班牙这样的情况得到了证实，一个人可以在他没有所有权的土地上耕耘、播种和收获而不受他人打扰，只要他对土地加以利用。但是，相反地，当地居民还认为自己受了他的好处，因为

他在因未开垦而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动，增加了他们所需粮食的储备。然而无论如何，这并不是我所要强调的。而我敢大胆地断言，同样的所有权法则，即每个人能利用多少就可以占有多少，在世界上会仍然有效，这并不会让任何人穷困潦倒，因为世上仍有足够的土地来满足成倍居民的需要，除非人们发明了货币，心照不宣地赋予了土地价值，又（基于共识）占有了更多土地，拥有了更多土地所有权；我将逐步详细说明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

This is certain, that in the beginning, before the desire of having more than men needed had altered the intrinsic value of things, which depends only on their usefulness to the life of man, or had agreed that a little piece of yellow metal, which would keep without wasting or decay, should be worth a great piece of flesh or a whole heap of corn, though men had a right to appropriate by their labour, each one of himself, as much of the things of Nature as he could use, yet this could not be much, nor to the prejudice of others, where the same plenty was still left, to those who would use the same industry. To which let me add, that he who appropriates land to himself by his labour, does not lessen, but increase the common stock of mankind: for the provisions serving to the support of human life, produced by one acre of inclosed and cultivated land, are (to speak much within compass) ten times more than those which are yielded by an acre of land of an equal richness lying waste in common. And therefore he that incloses land, and has a greater plenty of the conveniencies of life from ten acres, than he could have from an hundred left to nature, may truly be said to give ninety acres to mankind: for his labour now supplies him with provisions out of ten acres, which were but the product of a hundred lying in common. I have here rated the improved land very low, in making its product but as ten to one, when it is much nearer a hundred to one: for I ask, whether in the wild woods and

uncultivated waste of America, left to nature, without any improvement, tillage or husbandry, a thousand acres yield the needy and wretched inhabitants as many conveniencies of life, as ten acres of equally fertile land do in Devonshire, where they are well cultivated?

毫无疑问，最初，人们不仅仅希望占有自己所需的东西，正是这种欲望改变了事物的内在价值，而这种价值只由它们对人类生活的功用而决定；或者，人们同意让一小块可以保存、不会损耗或腐烂的黄色金属等同于一大块肉或一大堆粮食的价值；尽管人们有权通过自己的劳动将他所能利用的自然之物尽可能多地划归己有，但那不会很多，亦不会损害他人，因为对那些会付出同样辛劳的人们来说，剩下的东西仍然很丰富。对此，我还要补充一下，若一个人根据他的劳动把土地归为己用，这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人类的共同积累。因为一英亩被圈用和耕作的土地所生产的供人类生存的食物，（说得尽量保守些）是一英亩肥力相同但荒芜不治的公有土地所生产的粮食的十倍。因此，圈用土地之人从十英亩土地所获得的生活必需品，比从一百英亩荒芜的土地所获得的要多得多，真可以说是他送给了人类九十英亩土地：因为他的劳动现在使得十英亩土地的产出相当于一百英亩公有土地的产出。此处我把改良的土地的产量定得很低，仅仅把它的产出估计为10:1，但事实上却更接近100:1。试问，在任其发展且从未进行任何改良、耕种或管理的美洲森林和未开垦的荒地上，一千英亩土地为贫穷困苦的居民所提供的生存所需，能否和得文郡的十英亩肥力相同但耕作良好的土地的产出相同呢？

Before the appropriation of land, he who gathered as much of the wild fruit, killed, caught, or tamed as many of the beasts as he could—he that so employed his pains about any of the spontaneous products of Nature as any way to alter them from the state Nature put them in, by placing any of his labour on them, did thereby

acquire a propriety in them; but if they perished in his possession without their due use—if the fruits rotted or the venison putrefied before he could spend it, he offended against the common law of Nature, and was liable to be punished: he invaded his neighbour's share, for he had no right farther than his use called for any of them, and they might serve to afford him conveniences of life.

在将土地归为己有前，谁尽可能多地采集野果，杀死、捕捉或驯养尽可能多的野兽，谁对自然的天然产品付出如此的辛劳，通过将他自己的劳动倾注在产品上而改变了自然使该产品所处的状态，谁就因此取得了对这些产品的所有权。然而，倘若这些产品未经适当利用就在他手里毁坏，倘若果实和鹿肉在他未能消费之前腐烂或变质，他就违背了自然的共同法则，就会受到惩罚：他侵犯了他的邻居应享用的份额，因为他只有权享有他能利用的任何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可以为他的生活提供方便。

The same measures governed the possession of land, too. Whatsoever he tilled and reaped, laid up and made use of before it spoiled, that was his peculiar right; whatsoever he enclosed, and could feed and make use of, the cattle and product was also his. But if either the grass of his enclosure rotted on the ground, or the fruit of his planting perished without gathering and laying up, this part of the earth, notwithstanding his enclosure, was still to be looked on as waste, and might be the possession of any other. Thus, at the beginning, Cain might take as much ground as he could till and make it his own land, and yet leave enough to Abel's sheep to feed on: a few acres would serve for both their possessions. But as families increased and industry enlarged their stocks, their possessions enlarged with the need of them; but yet it was commonly without any fixed property in the ground they made use

of till they incorporated, settled themselves together, and built cities, and then, by consent, they came in time to set out the bounds of their distinct territories and agree on limits between them and their neighbours, and by laws within themselves settled the properties of those of the same society. For we see that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hich was first inhabited, and therefore like to be best peopled, even as low down as Abraham's time, they wandered with their flocks and their herds, which was their substance, freely up and down—and this Abraham did in a country where he was a stranger; whence it is plain that, at least, a great part of the land lay in common, that the inhabitants valued it not, nor claimed property in any more than they made use of; but when there was not room enough in the same place for their herds to feed together, they, by consent, as Abraham and Lot did, [5_3] separated and enlarged their pasture where it best liked them.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Esau went from his father and his brother, and planted in Mount Seir. [5_4]

土地的占有也受同样限度的制约。“无论他耕种和收获什么，在它腐烂变质前将之储存并加以利用，那是他的特权；无论他圈占什么，能够饲养和利用的牲畜和产品也属于他。”然而，倘若他圈占土地上的草腐烂，或他所种植的果实还未采集和储存就腐坏，尽管这部分土地已经被他圈占，却仍应视为荒地，可以成为任何其他人的财产。因此，最初虽然该隐能耕种多少土地就能占有多少土地并使之成为他自己的土地，但仍留有足够多的土地给亚伯放羊：几英亩的土地就够他俩占用了。然而，随着家庭增多且通过勤劳劳作扩充了牲畜的数量，他们的占有便随着他们需求的增加而扩大。但是，在他们联合起来、一起定居并建造城市之前，他们所利用的土地还属于公有，并没有任何确定的财产权。后来，经过同意，他们最后划定各人领地的范围，约定他们与邻居之间的界限，再通过他们内部的法律来确定那些处于同一社会之人们的财产权。因为我们知道，在世界最初有人居

住的那些地方——因此也可能是那时居民最多的地方——直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人们还赶着他们的牛羊群（他们的财产）自由地四处游牧；而这亚伯拉罕确实是在异乡放牧。显然，在那里，至少大部分土地是公有的，当地居民却对此并不重视，也不对他们利用之外的土地声称拥有财产权。然而，当同一地方没有足够的土地以共同饲养他们的羊群时，他们经过同意，像亚伯拉罕和罗得那样，[6_3] 分开并扩大他们的牧场，到最适合他们的地方去。基于同样的原因，以扫离开他的父亲和兄弟，到西珥山安家立业。[6_4]

And thus, without supposing any private dominion and property in Adam over all the world, exclusive of all other men, which can no way be proved, nor anyone's property be made out from it, but supposing the world, given as it was to the children of men in common, we see how labour could make men distinct titles to several parcels of it for their private uses, wherein there could be no doubt of right, no room for quarrel.

因此，不必假设亚当对整个世界拥有任何排他性的个人所有权和财产权——这种权利无以为证，亦不能从中引出任何人的财产权——而是假设世界原是人类子孙所共有，我们就能看到劳动如何能够使人为了他们个人的用途，对世界上一些土地享有明确的财产权。此举没有对错之说，亦无争论之余地。

Nor is it so strange, as perhaps before consideration, it may appear, that the property of labour should be able to overbalance the community of land, for it is labour indeed that puts the difference of value on everything; and let anyone consider what the difference is between an acre of land planted with tobacco or sugar, sown with wheat or barley, and an acre of the same land lying in

common without any husbandry upon it, and he will fin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labour makes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value. I think it will be but a very modest computation to say, that of the products of the earth useful to the life of man, nine-tenths are the effects of labour. Nay, if we will rightly estimate things as they come to our use, and cast up the several expenses about them—what in them is purely owing to Nature and what to labour—we shall find that in most of them ninety-nine hundredths are wholly to be put on the account of labour.

劳动的财产权应该能够优于土地的公有状态，这种说法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前可能显得奇怪，实则不然。因为确实是劳动赋予了每件事物不同的价值。让任何人考虑一下一英亩种植烟草或甘蔗、播种小麦或大麦的土地和一英亩处于公有状态且没有经过任何开垦的土地之间的差别，他就会发现是劳动的改进创造了绝大部分的价值。依我之见，说对人类生活有利的土地产品中十分之九是劳动的结果都有点保守。倘若我们正确地估算供我们使用的东西，并计算关于它们的各项费用——它们当中哪些纯粹源于自然，哪些得于劳动——我们会发现，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即百分之九十九完全归于劳动。

There cannot be a clearer demonstration of anything than several nations of the Americans are of this, who are rich in land and poor in all the comforts of life; whom Nature having furnished as liberally as any other people with the materials of plenty, i.e., a fruitful soil, apt to produce in abundance what might serve for food, raiment, and delight; yet, for want of improving it by labour, have not one hundredth part of the conveniences we enjoy, and a king of a large and fruitful territory there feeds, lodges, and is clad worse than a day-labourer in England.

没有比美洲几个民族的情况能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的了。那些民族土地资源丰富，生活却没什么享受。像对任何其他民族一样，自然也慷慨地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资，即能够大量生产供衣食享用所需的肥沃土地，然而由于缺乏改进所需的劳动，他们拥有的生活用品不到我们所享受的百分之一。在那儿，一个拥有辽阔而肥沃土地的统治者，在衣食住行方面还不如英国的一个劳工。

To make this a little clearer, let us but trace some of the ordinary provisions of life, through their several progresses, before they come to our use, and see how much they receive of their value from human industry. Bread, wine, and cloth are things of daily use and great plenty; yet notwithstanding acorns, water, and leaves, or skins must be our bread, drink and clothing, did not labour furnish us with these more useful commodities. For whatever bread is more worth than acorns, wine than water, and cloth or silk than leaves, skins or moss, that is wholly owing to labour and industry. The one of these being the food and raiment which unassisted Nature furnishes us with; the other provisions which our industry and pains prepare for us, which how much they exceed the other in value, when anyone hath computed, he will then see how much labour makes the far greatest part of the value of things we enjoy in this world; and the ground which produces the materials is scarce to be reckoned in as any, or at most, but a very small part of it; so little, that even amongst us, land that is left wholly to nature, that hath no improvement of pasturage, tillage, or planting, is called, as indeed it is, waste; and we shall find the benefit of it amount to little more than nothing.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一点，我们追溯几件日常生活用品在为我们所用之前的几个进程，了解一下它们的价值有多少源于人类的劳动。

面包、酒和布匹是日用所需且数量很多的东西。但是，若劳动不为我们提供这些更有用的物品，橡子、水和树叶或兽皮则必然成为我们的面包、饮料和衣服。因为面包的价值高于橡子，酒的价值高于水，布匹或丝绸之价值高于树叶、兽皮或苔藓，这完全归功于劳动和辛劳。其中，一种纯粹是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衣食，另一种则是我们通过勤劳和辛苦为自己准备的。任何人只要计算一下后者在价值上超过前者的程度，就会看到劳动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享用的东西之绝大部分价值。而生产这些资料的土地却很少被算成价值的任何部分，或最多只能算很小的部分。土地的价值如此之小，以致我们甚至把完全听凭自然而未经放牧、耕耘和种植的土地称为荒地（确实如此）；我们觉得这种荒地几乎没有任何益处。

This showshow much numbers of men are to be preferred to largeness of dominions; and that the increase of lands, and the right employing of them, is the great art of government: and that prince, who shall be so wise and godlike, as by established laws of liberty to secure protection and encouragement to the honest industry of mankind, against the oppression of power and narrowness of party, will quickly be too hard for his neighbours: but this by the by.To return to the argument in hand.

这就说明人口众多比领土广阔更有优势好，土地扩张和正当的土地利用是施政的伟大艺术。倘若君主能够贤明如神，用既定的自由法保护并鼓励人类的正当劳做，反对权力压迫和党派偏狭，那么各邻国很快就会感到压力重重。这里只是顺便一提，我们再回到当前的主题。

An acre of land that bears here twenty bushels of wheat, and another in America, which, with the same husbandry, would do the

like, are, without doubt, of the same natural, intrinsic value. But yet the benefit mankind receives from the one in a year is worth five pounds, and from the other possibly not worth a penny; if all the profit an Indian received from it were to be valued and sold here, at least I may truly say, not one thousandth. It is labour, then, which puts the greatest part of value upon land, without which it would scarcely be worth anything; it is to that we owe the greatest part of all its useful products; for all that the straw, bran, bread, of that acre of wheat, is more worth than the product of an acre of as good land which lies waste is all the effect of labour. For it is not barely the ploughman's pains, the Reaper's and thresher's toil, and the baker's sweat that is to be counted into the bread we eat; the labour of those who broke the oxen, who digged and wrought the iron and stones, who felled and framed the timber employed about the plough, mill, oven, or any other utensils, which are a vast number, requisite to this corn, from its being feed to be sown to its being made bread, must all be charged on the account of labour, and received as an effect of that; Nature and the earth furnished only the almost worthless materials as in themselves. It would be a strange catalogue of things that industry provided and made use of about every loaf of bread before it came to our use if we could trace them; iron, wood, leather, bark, timber, stone, bricks, coals, lime, cloth, dyeing-drugs, pitch, tar, masts, ropes, and all the materials made use of in the ship that brought any of the commodities made use of by any of the workmen, to any part of the work, all which it would be almost impossible, at least too long, to reckon up.

在这里，一英亩土地年产20蒲式耳小麦，另一英亩土地在美洲用同样的方法耕种，可以获得同样的收成。毫无疑问，它们具有同样的自然的内在价值。但是，人类一年从这土地上所得的收益是五英镑，而从另一块地上所得的收益可能分文不值；倘若一个印第安人从那土

地上所得的所有收益在这儿估价出售，我可以如实说，其价值仅为千分之一。可见，是劳动将绝大部分的价值赋予土地，没有劳动，土地几乎一文不值。我们将土地的所有有用产品的最大部分归因于劳动。因为一英亩小麦所产的麦秆、麸皮和面包的价值要高于一英亩同样肥沃的荒地所产之价值，这全都是劳动的结果。除了犁地人的辛劳，收割人和打麦人的劳累和面包师的汗水都要算进我们所吃的面包里，那些驯养耕牛，采掘、冶炼铁和矿石，砍伐树木并用木材来制造犁、磨盘、烤炉或其他为数众多的工具的人们之劳动，凡是对这种粮食从播种到制成面包所必需的，都必须计算在劳动之账上，并承认它起到那样的效果。自然和土地只是提供了本身几乎毫无价值的资料。倘若我们可以追溯每一条面包在供我们食用前所需勤劳提供和利用的东西，那将是一张奇怪的物品清单：铁、树木、皮革、树皮、木材、石头、砖头、煤、石灰、布、染料、沥青、焦油、桅杆、绳索以及船上应用的所有材料（船只运来任何工人在工作的任何部分所要使用的任何物品），所有这些，几乎无法穷举——这个清单太长，也没法穷举。

From all which it is evident, that though the things of Nature are given in common, man (by being master of himself, and proprietor of his own person, and the actions or labour of it) had still in himself the great foundation of property; and that which made up the great part of what he applied to the support or comfort of his being, when invention and arts had improved the conveniences of life, was perfectly his own, and did not belong in common to others.

由此可见，尽管自然万物是赐予人类共有的，但人既然是自己的主人，是自身和自身行为或劳动的所有者，本身就仍具有财产的重大基础。当发明和技艺改善了生活的便利条件时，他用以维持自身生存或享受的大部分东西完全是属于他自己的，并不与他人共有。

Thus labour, in the beginning, gave a right of property, wherever anyone was pleased to employ it, upon what was common, which remained a long while, the far greater part, and is yet more than mankind makes use of Men at first, for the most part, contented themselves with what unassisted Nature offered to their necessities; and though afterwards, in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where the increase of people and stock, with the use of money, had made land scarce, and so of some value, the several communities settled the bounds of their distinct territories, and, by laws, within themselves, regulated the properties of the private men of their society, and so, by compact and agreement, settled the property which labour and industry began. And the leagues that have been made between several states and kingdoms, either expressly or tacitly disowning all claim and right to the land in the other's possession, have, by common consent, given up their pretences to their natural common right, which originally they had to those countries; and so have, by positive agreement, settled a property amongst themselves, in distinct parts of the earth; yet there are still great tracts of ground to be found, which the inhabitants thereof, not having joined with the rest of mankind in the consent of the use of their common money, lie waste, and are more than the people who dwell on it, do, or can make use of, and so still lie in common; though this can scarce happen amongst that part of mankind that have consented to the use of money.

所以，最初无论在什么地方，任何人只要愿意对原来共有的东西付出劳动，劳动就将财产权赋予他。在一段很长的时期里，绝大部分的东西仍然是共有的，至今依然比人类能利用的东西多。最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都满足于自然供给他们且未经加工的必需品。后来，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那里人口和牲畜增多，加上货币的使用，使得土地稀缺，因而有了些价值），一些社会确定了各自的地域范

围，又通过其内部的法律调整了其社会的私人财产，因此通过契约和协议确定由劳动和勤劳开创的财产。一些城邦和王国之间缔结盟约，明确或默认放弃对另一方所占土地之全部要求和权利，从而一致同意放弃了它们对那些国家原有的自然的公有权利之主张。于是，依据明文协议，在地球上的不同地方确定了两方间的财产权。尽管这样，仍有大片的土地荒芜（那里的居民还未同意和其余的人类一起使用他们共同的货币），比居住在其上的人们所利用或能够利用的还多，因此它们仍是公有的。已经同意使用货币的那部分人中间则很少发生这种情况。

The greatest part of things really useful to the life of man, and such as the necessity of subsisting made the first commoners of the world look after—as it doth the Americans now—are generally things of short duration, such as—if they are not consumed by decay and perish of themselves. Gold, silver, and diamonds are things that fancy or agreement hath put the value on, more than real use and the necessary support of life. Now of those good things which Nature hath provided in common, everyone hath a right (as hath been said) to them as much as he could use; and had a property in all that he could effect with his labour; all that his industry could extend to, to alter from the state Nature had put it in, was his. He that gathered a hundred bushels of acorns or apples had thereby a property in them; they were his goods as soon as gathered. He was only to look that he used them before they spoiled, else he took more than his share, and robbed others. And, indeed, it was a foolish thing, as well as dishonest, to hoard up more than he could make use of if he gave away a part to anybody else, so that it perished not uselessly in his possession, these he also made use of and if he also bartered away plums that would have rotted in a week, for nuts that would last good for his eating a whole year, he did no injury; he wasted not the common stock;

destroyed no part of the portion of goods that belonged to others, so long as nothing perished uselessly in his hands. Again, if he would give his nuts for a piece of metal, pleased with its colour, or exchange his sheep for shells, or wool for a sparkling pebble or a diamond, and keep those by him all his life, he invaded not the right of others; he might heap up as much of these durable things as he pleased; the exceeding of the bounds of his just property not lying in the largeness of his possession, but the perishing of anything uselessly in it.

绝大部分对人类生活真正有用的东西，以及诸如世界上最初处于公有状态时人们所寻求的维持生存必需品——像美洲人现在所寻求的一样——通常都是储存期很短的东西，倘若它们未经使用而被消费，就会自行腐烂和损坏。人们出于喜好或通过协议赋予金、银和钻石超过其实际用处和对生活需要的价值。如前所说，现在，对于自然提供给人们所共有的那些好东西，每个人都有能使用多少就拥有多少的权利，而对于他能通过劳动加以影响的所有东西，他均拥有财产权。所有他的勤劳所能企及并改变自然使之所处状态的东西，都是属于他的。那个采集了一百蒲式耳橡子或苹果的人因此获得了对它们的财产权；这些东西一经采集就成为他的财物。他只要注意在它们腐烂之前加以利用，不然他就拿了超过他应得的份额，就是掠夺了别人。确实，储存多于他能使用的东西是一件愚蠢又不诚实的事。假如他将一部分赠予别人，使之不致在自己的占有下无谓地毁坏，这些也算他利用了。又假如他用一周内就会腐烂的梅子换取能完好保存并供他食用一年的干果，他就没有损坏任何东西。只要没东西在他手里无谓地毁坏，他就没有浪费公有财物，就没有毁坏属于他人之财物的任何部分。再假如他用他的干果去换一块其颜色为他所喜爱的金属，或用他的绵羊换一些贝壳，或用羊毛换一块闪亮的卵石或钻石，并由他终身保存这些东西，他就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他可以随其所好，尽可能多地积聚这些经久耐用的东西。是否超过他的正当财产之界限，不在于他占有多少，而在于他的占有物中是否有任何东西无用地毁损掉。

And thus came in the use of money; some lasting thing that men might keep without spoiling, and that, by mutual consent, men would take in exchange for the truly useful but perishable supports of life.

货币的使用就这样开始了。人们可以保存某种不易损坏的持久之物，并经过相互同意，用它来交换真正有用却易腐坏的生活必需品。

And as different degrees of industry were apt to give men possessions in different proportions, so this invention of money gave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and enlarge them. For supposing an island, separate from all possible commerc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erein there were but a hundred families, but there were sheep, horses, and cows, with other useful animals, wholesome fruits, and land enough for corn for a hundred thousand times as many, but nothing in the island, either because of its commonness or perishableness, fit to supply the place of money. What reason could anyone have there to enlarge his possessions beyond the use of his family, and a plentiful supply to its consumption, either in what their own industry produced, or they could barter for like perishable, useful commodities with others? Where there is not something both lasting and scarce, and so valuable to be hoarded up, there men will not be apt to enlarge their possessions of land, were it never so rich, never so free for them to take. For I ask, what would a man value ten thousand or an hundred thousand acres of excellent land, ready cultivated and well stocked, too, with cattle, in the middle of the inland parts of America, where he had no hopes of commerce with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o draw money to him by the sale of the product? It

would not be worth the enclosing, and we should see him give up again to the wild common of Nature whatever was more than would supply the conveniences of life, to be had there for him and his family.

与不同程度的勤劳会给人们不同数量的财产一样，货币的发明给了人们继续积累和扩大其财产的机会。假设有一座无法与世界其他地方进行任何商业活动的海岛，岛上只有一百户人家，但有羊、马、奶牛和其他有用的动物，营养丰富的水果，以及能生产足够粮食供千百倍人口食用的土地。可是，岛上的东西由于平凡或易损，没有一样适合充当货币。如此一来，除了家庭使用和供其消费的充足供应外，岛上的人还有什么理由要扩大他的财产（不论是他们辛勤劳动所得，还是通过与他人交换获得的同样易损、有用的物品）呢？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既持久又稀少、十分珍贵、值得储藏的东西，哪怕土地有多肥沃、占有土地有多方便，人们都不会倾向于占有更多的土地。试问，倘若一个人在美洲腹地中部拥有一万英亩或十万英亩的肥沃土地，耕种良好，牛羊繁多，但他无望与世界的其他地方进行贸易，从而通过出售产品来换取货品，那他将如何评估这片土地的价值呢？圈占这些土地是不值得的。我们将会看到，他只会在那儿保留一块能够供应他和家人生活必需品的土地，将多出的部分再次放弃，归还给自然的公有荒地。

Thus, in the beginning, all the world was America, and more so than that is now; for no such thing as money was anywhere known. Find out something that hath the use and value of money amongst his neighbours, you shall see the same man will begin presently to enlarge his possessions.

因此，在最初，全世界都像美洲，跟现在相比更是如此，因为那

时任何地方都不知道有货币这样的东西。倘若一个人在他的邻居中发现可以用作货币并具有货币价值的某种东西，你就会看到这个人会立即开始扩大他的财产。

But, since gold and silver, being little useful to the life of man, in proportion to food, raiment, and carriage, has its value only from the consent of men—whereof labour yet makes in great part the measure—it is plain that the consent of men have agreed to a disproportionate and unequal possession of the earth—I mean out of the bounds of society and compact; for in governments the laws regulate it; they having, by a tacit and voluntary consent, found out and agreed in the way how a man may, rightfully and without injury, possess more land than he himself can use the product by receiving in exchange for the overplus gold and silver, which may be hoarded up without injury to any one; these metals not spoiling or decaying in the hands of the possessor. This partage of things in an inequality of private possessions, men have made practicable out of the bounds of society, and without compact, only by putting a value on gold and silver, and tacitly agreeing in the use of money: for in governments, the laws regulate the right of property, and the possession of land is determined by positive constitutions.

然而，既然比起食物、衣服和车马，金银对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用处，其价值只来自人们的约定，且大部分是由劳动的尺度决定的，那么显而易见，人们已经同意对土地不平均和不平等地占有——我指的是超出社会和契约之外，因为政府制定了进行监管的法律。通过默许和自愿的同意，他们找到并愿意使用一种方法，让一个人以正当且没有伤害的方式，完全占有更多的产量超过个人消费量的土地，那个方法就是把剩余产品拿去交换可以长久保存而不致损害任何人的金银；这些金银在占有人手中不会损坏或腐烂。人们之所以能够超出社

会的范围、不通过社会契约把物品不平等地分成私有财产，只是由于他们赋予金银以价值并默认货币的使用。因为政府通过法律规定财产权，而土地所有权则由成文宪法规定。

And thus, I think, it is very easy to conceive, without any difficulty, how labour could at first begin a title of property in the common things of Nature, and how the spending it upon our uses bounded it; so that there could then be no reason of quarrelling about title, nor any doubt about the largeness of possession it gave. Right and conveniency went together. As a man had a right to all he could employ his labour upon, so he had no temptation to labour for more than he could make use of. This left no room for controversy about the title, nor for encroachment on the right of others. What portion a man carved to himself was easily seen; and it was useless, as well as dishonest, to carve himself too much, or take more than he needed.

如此一来，我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象，劳动最初如何能够在自然的共有物中开始确立财产权，以及将财产用于我们的需要又如何限制了财产权，如此一来，对财产权就没有争执的理由，对于财产权容许占有多少亦无任何怀疑。权利与生活之便利并肩而行：因为既然一个人有权享有他能运用自己的劳动所取得的所有东西，那么他不会愿意去为超过他能利用的东西而劳动。这就使人们对财产权没有争论的余地，亦不会出现侵犯他人权利的事情。很容易看到一个人会把多大部分占为己有，而过多地占为己有或占取超过他所需之物，是无用且不诚实的。

[5_1].Psal. cxv. 16.

[5_2].Tim. vi. 12.

[5_3].Gen. xiii. 5.

[5_4].Gen. xxxvi. 6.

[6_1].《诗篇》，第115章，第16节。

[6_2].《新约》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2节

[6_3].《创世记》，第13章，第5节。

[6_4].《创世记》，第36章，第6节。

Chapter VI　Of Paternal Power

第六章　论父权

It may be censured as an impertinent criticism in a discourse of this nature to find fault with words and names that have obtained in the world. And yet possibly it may not be amiss to offer new ones when the old are apt to lead men into mistakes, as this of paternal power probably has done, which seems so to place the power of parents over their children wholly in the father, as if the mother had no share in it; whereas if we consult reason or revelation, we shall find she hath an equal title, which may give one reason to ask whether this might not be more properly called parental power? For whatever obligation Nature and the right of generation lays on children, it must certainly bind them equal to both the concurrent causes of it. And accordingly we see the positive law of God everywhere join them together without distinction, when it commands the obedience of children: “Honour thy father and thy mother”; [6_1] “Whosoever curseth his father or his mother”; [6_2] “Ye shall fear every man his mother and his father”; [6_3]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6_4] , &c, is the style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在这类论文里，对世上已公认的词语和名称吹毛求疵，也许会被指责为无礼的批评。然而，如果旧的称谓容易误导人，那提出新的称谓也许并无不当；父权这一名称可能就是这样：父权似乎将父母对孩子的权力完全归于父亲，仿佛母亲在其中没有权力似的；然而，如果我们凭理性和启示判断，就会发现母亲有着同样的权力，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提出一个问题：将它称为“亲权”不是更贴切吗？因为无论自然或是生命繁衍赋予孩子何种义务，都必然约束他们对共同给予生命的

双方承担同样的义务。因此，我们看到上帝的明文法在训诫孩子遵从父母时，处处都将他们一视同仁地对待。如“当孝敬父母”[7_1]；“凡辱骂父母的”[7_2]；“你们各人都当孝敬父母”[7_3]；“你们作为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7_4]等等，《旧约》和《新约》就是这样规定的。

Had but this one thing been well considered without looking any deeper into the matter, it might perhaps have kept men from running into those gross mistakes they have made about this power of parents, which however it might without any great harshness bear the name of absolute dominion and regal authority, when under the title of “paternal” power, it seemed appropriated to the father; would yet have sounded but oddly, and in the very name shown the absurdity, if this supposed absolute power over children had been called parental, and thereby discovered that it belonged to the mother too. For it will but very ill serve the turn of those men who contend so much for the absolute power and authority of the fatherhood, as they call it, that the mother should have any share in it. And it would have but ill supported the monarchy they contend for, when by the very name it appeared that fundamental authority from whence they would derive their government of a single person only was not placed in one, but two persons jointly. But to let this of names pass.

倘若当初很好地考虑了这一称谓而不深究，人们可能不会在父母权力这一问题上酿成大错；这样，尽管父母权力在“父权”的名称下似乎为父亲所独享时可能并不太生硬地带上“绝对控制”和“君权”的名义；可是，如果这一假定对孩子的绝对权威被称为“亲权”，那人们自然会发现它也属于母亲，这样一来，原先的名称听起来就会很古怪，且显出这名称本身的荒谬。如果母亲在其中也有权力，那么对那些打

着父亲身份旗号来极力倡导父权绝对权力及权威的人来说，这个名称是不适用的。这将无法为他们所主张的君主制提供有力支持，因为就这一名称而言，他们所依据的作为一人统治基础的根本权威，似乎并非集于一人之身，而是由两人共同所有。还是暂且不追究称谓问题吧。

Though I have said above [6_5] that all men by nature are equal, I cannot be supposed to understand all sorts of “equality”. Age or virtue may give men a just precedency. Excellency of parts and merit may place others above the common level. Birth may subject some, and alliance or benefits others, to pay an observance to those to whom Nature, gratitude, or other respects, may have made it due; and yet all this consists with the equality which all men are in respect of jurisdiction or dominion one over another, which was the equality I there spoke of as proper to the business in hand, being that equal right that every man hath to his natural freedom, without being subjected to the will or authority of any other man.

尽管我在之前提到“所有的人生而平等” [7_5] ，但我却不敢说自己能够理解各种各样的“平等”。年龄或德行可能会让人处于正当的优势地位。某些方面的特长和优点可能让一些人高于一般水平。人们会尊重由于天性、知恩图报或是其他原因值得敬重的人，部分人这样做是因为出身使然，另一部分人这样做是出于盟约或利益的缘故，但这一切都与“涉及司法或统治的主从方，所有人都平等”相吻合。这一平等与我目前行文中所提及的平等相一致，即每一个人所享有的平等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受任何人的权威或意志所控制。

Children, I confess, are not born in this full state of equality, though they are born to it. Their parents have a sort of rule and

jurisdiction over them when they come into the world, and for some time after, but it is but a temporary one. The bonds of this subjection are like the swaddling clothes they arewrapt up in and supported by in the weakness of their infancy. Age and reason as they grow up loosen them, till at length they drop quite off, and leave a man at his own free disposal.

我承认孩童并非生来就处于这种完全平等的状态中，尽管他们生来就应该享有这种平等。他们出生时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其父母对其有一种统治和管辖权，但那只是暂时的。孩童承受的支配就像在他们脆弱的婴儿期用来包裹和呵护他们的襁褓。随着他们的成长，年龄和理智将挣脱这些钳制，直至最终完全解脱而使一个人获得自由支配的权利。

Adam was created a perfect man, his body and mind in full possession of their strength and reason, and so was capable from the first instant of his being to provide for his own support and preservation, and govern his actions according to the dictates of the law of reason which God had implanted in him. From him the world is peopled with his descendants, who are all born infants, weak and helpless, without knowledge or understanding. But to supply the defects of this imperfect state till the improvement of growth and age hath removed them, Adam and Eve, and after them all parents were, by the law of Nature, under an obligation to preserve, nourish and educate the children they had begotten, not as their own workmanship, but the workmanship of their own maker, the Almighty, to whom they were to be accountable for them.

亚当被创造之时便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身体和心智具备完全的体力和理性，因此从他存在之初就可以自给自足，并依据上帝赐予他的理性法则之指令行事。在他之后，世界到处是他的后裔，他们生为婴孩，脆弱无助，无知无识。这一不完美阶段中存在的种种身心缺陷，直至成年后才能去除。为了弥补这些缺陷，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之后的所有父母依据自然法担当起保护、养育和教育他们所生子女的责任，不是将子女看作他们自己的艺术品，而是看作他们自己的创造者即无所不能的上帝的艺术品，为了上帝，他们要对自己的子女负责。

The law that was to govern Adam was the same that was to govern all his posterity, the law of reason. But his offspring having another way of entrance into the world, different from him, by a natural birth, that produced them ignorant, and without the use of reason, they were not presently under that law. For nobody can be under a law that is not promulgated to him; and this law being promulgated or made known by reason only, he that is not come to the use of his reason cannot be said to be under this law; and Adam's children being not presently as soon as born under this law of reason, were not presently free. For law, in its true notion, is not so much the limitation as the direction of a free and intelligent agent to his proper interest, and prescribes no farther than is for the general good of those under that law. Could they be happier without it, the law, as a useless thing, would of itself vanish; and that ill deserves the name of confinement which hedges us in only from bogs and precipices. So that however it may be mistaken, the end of law is not to abolish or restrain, but to preserve and enlarge freedom. For in all the states of created beings, capable of laws, where there is no law there is no freedom. For liberty is to be free from restraint and violence from others, which cannot be where there is no law; and is not, as we are told, “a liberty for every man

to do what he lists”. For who could be free, when every other man's humour might domineer over him? But a liberty to dispose and order freely as he lists his person, actions, possessions, and his whole property within the allowance of those laws under which he is, and therein not to be subject to the arbitrary will of another, but freely follow his own.

制约亚当的法律，即理性之法则，同样制约着其子孙后代。但他的后裔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与他不同。他们不是天然生成，而是经由另一种途径降生，这让他们生来愚昧，无法运用理性，亦无法立刻受理性法则规约。任何人都不会受制于没有向他颁布的法律，而这法律只能通过理性来传达或知晓，因而还无法运用理性的人是不能说他受制于这个法律的。亚当的后裔没有在出生时立刻受制于这一理性法则，也就无法即刻获得自由。法律的真正含义不是限制，而是为自由而有才智的个体追求其正当利益提供指引，其所做出的规定皆在那些依法行事之人的普遍权益范围之内。倘若没有了法律他们会更快乐的话，法律作为一种无用之物会自行消亡；仅是为了防止我们掉入沼泽和悬崖而树立的篱笆不应被称为限制。所以无论人们对它有何种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是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拓展自由。因为在上帝创造的能够接受法律约束的人类的所有状态中，没有法律就不会有自由。因为自由不受他人约束或强暴，没有法律的地方自由就不可能存在；不像人们告诉我们的那样：“自由就是每一个人都做自己想做的”。当所有其他人全凭一时兴起而压制某个人时，谁可以自由呢？而自由是指一个人在他所受制的法律许可范围内，按其意志自由地处置和安排自己的人身、行动、财物及其所有财产，在此范围内，他不受制于他人的独断意志，而全凭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

The power, then, that parents have over their children arises from that duty which is incumbent on them, to take care of their offspring during the imperfect state of childhood. To inform the

mind, and govern the actions of their yet ignorant nonage, till reason shall take its place and ease them of that trouble, is what the children want, and the parents are bound to. For God having given man an understanding to direct his actions, has allowed him a freedom of will and liberty of acting, as properly belonging thereunto within the bounds of that law he is under. But whilst he is in an estate wherein he has no understanding of his own to direct his will, he is not to have any will of his own to follow. He that understands for him must will for him too; he must prescribe to his will, and regulate his actions, but when he comes to the estate that made his father a freeman, the son is a freeman too.

因而父母对子女所享有的权力源于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有责任照顾处于儿童时期而尚未成熟的后代。培养他们的心智，约束他们未成年时的无知行为，直至理性取代无知，将他们从麻烦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这些正是子女所需要的，也是父母一定要做到的。因为上帝赐予人一种领悟力，帮助人指导自己的行动，允许人在自己所受约束的法律范围内自由行使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这种行为的自由必须是正当的，且在意志自由范围之内。但是当人还处于没有领悟力的状态而无法控制自己的意志时，人是没有任何自己的意志可以遵循的。理解他人必替他人拿出主张；人必须规范自己的意志、制约自己的行为；但是当儿子成长到可以使父亲获得解放的阶段时，他也就成了一个自由人。

This holds in all the laws a man is under, whether natural or civil. Is a man under the law of Nature? What made him free of that law? What gave him a free disposing of his property, according to his own will,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at law? I answer, a state of maturity wherein he might be supposed capable to know that law, that so he might keep his actions within the bounds of it. When he

has acquired that state, he is presumed to know how far that law is to be his guide, and how far he may make use of his freedom, and so comes to have it; till then, somebody else must guide him, who is presumed to know how far the law allows a liberty. If such a state of reason, such an age of discretion made him free, the same shall make his son free too. Is a man under the law of England? What made him free of that law, that is, to have the liberty to dispose of his actions and possessions, according to his own will, within the permission of that law? A capacity of knowing that law, which is supposed by that law, at the age of twenty-one, and in some cases sooner. If this made the father free, it shall make the son free too. Till then, we see the law allows the son to have no will, but he is to be guided by the will of his father or guardian, who is to understand for him. And if the father die and fail to substitute a deputy in his trust, if he hath not provided a tutor to govern his son during his minority, during his want of understanding, the law takes care to do it: some other must govern him and be a will to him till he hath attained to a state of freedom, and his understanding be fit to take the government of his will. But after that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re equally free, as much as tutor and pupil, after nonage, equally subjects of the same law together, without any dominion left in the father over the life, liberty, or estate of his son, whether they be only in the state and under the law of Nature, or under the positive laws of an established government.

这一点适用于一个人所受约束的所有法律，无论是自然法还是民事法。一个人也受自然法的约束吗？是什么使他免受那种法律的约束？是什么让他能够在自然法的范围内遵循自己的意志来自由处置他的财产？我的回答是，是成熟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下他被假定有能力知晓那种法律，那样他可以用那种法律的界限来规约自己的行为。当

他达到那种状态时，人们假定他知道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受那种法律的制约以及他在什么范围内可以运用自由，从而获得自由；在此之前，别人必须指引他，那指引他的人就被假定知道法律在何范围内允许自由。倘若此种理性的状态，此种心智成熟的阶段使一个人获得自由，那么它同样也使其子获得自由。一个人是否受英国法律的制约？是什么让他不受那种法律的约束——确切来说，在哪种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让他得以遵循自己的意志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行动和财产？是对那种法律的知晓能力。依据那种法律，假定获得知晓能力的年龄为21岁，在某些情况下要更早些。如果这使父亲获得了自由，它也将会使儿子获得自由。在此之前，法律不容许儿子有意志，他要受父亲或监护人理智意志的指导。如果父亲去世而又没有委托一个代理人，如果他在儿子未成年和没有领悟力的时期没有为儿子配备一个导师对其进行管教，那么法律会去负责此事：在他儿子达到自由的阶段、领悟力足以驾驭自我意志之前，必须有人来指导他的儿子，支配其意志。但在那之后，父与子，就像导师与成年之后的学生一样，都享有平等的自由，他们是同一法律下的平等臣民，父亲对儿子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再有任何控制权，无论他们是处于自然状态而受自然法的制约，还是受到一个已建立的政府之实在法的制约。

But if through defects that may happen out of the ordinary course of Nature, anyone comes not to such a degree of reason wherein he might be supposed capable of knowing the law, and so living within the rules of it, he is never capable of being a free man, he never lets loose to the disposure of his own will, because he knows no bounds to it, has not understanding, its proper guide, but is continued under the tuition and government of others all the time his own understanding is incapable of that charge. And so lunatics and idiots are never set free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ir parents: “Children who are not as yet come unto those years whereat they may have, and innocents, which are excluded by a natural defect from ever having.” Thirdly: “Madmen, which, for the present,

cannot possibly have the use of right reason to guide themselves, have, for their guide, the reason that guideth other men which are tutors over them, to seek and procure their good for them," says Hooker. [6_6] All which seems no more than that duty which God and Nature has laid on man, as well as other creatures, to preserve their offspring till they can be able to shift for themselves, and will scarce amount to an instance or proof of parents' regal authority.

但倘若自然常规进程之外可能产生的某种缺陷，导致任何人无法达到理性的程度，无法获得那假定知晓法律的能力，无法在它的规则之内生活，那他将永远无法成为一个自由人，也永远不能放任他去按他自己的意志行事，因为他不知自由是有限度的，也无法知晓自由的正当指引。在他自己的领悟力还无法担当起那责任时，他将无时无刻继续接受他人的管教和控制。因此疯子和傻子绝不能不受其父母的管制，胡克说："未到可以拥有理性的年龄的儿童，由于先天缺陷而被排除在理性之外的傻子"。此外，第三类是"那些目前还无法运用正确的理性来指导自己的疯子，可以用指导他们的导师的理性来指导他们，为他们寻求并获得权益。" [7_6] 所有一切似乎只是上帝和自然赋予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责任，用以保护他们的后代直到他们能够自我照顾；这不足以构成父母享有王权的证据。

Thus we are born free as we are born rational; not that we have actually the exercise of either: age that brings one, brings with it the other, too. And thus we see how natural freedom and subjection to parents may consist together, and are both founded on the same principle. A child is free by his father's title, by his father's understanding, which is to govern him till he hath it of his own. The freedom of a man at years of discretion, and the subjection of a child to his parents, whilst yet short of that age, are so consistent and so distinguishable that the most blinded contenders for

monarchy, “by the right of fatherhood,” cannot miss this difference; the most obstinate cannot but allow their consistency: for their doctrine were all true, the right heir of Adam now were known, and, by that title, settled a monarch in his throne, invested with all the absolute unlimited power Sir Robert Filmer talks of, if he should die as soon as his heir were born, must not the child, notwithstanding he were never so free, never so much sovereign, be in subjection to his mother and nurse, to tutors and governors, till age and education brought him reason and ability to govern himself and others? The necessities of his life, the health of his body, and the information of his mind would require him to be directed by the will of others and not his own; and yet will anyone think that this restraint and subjection were inconsistent with, or spoiled him of, that liberty or sovereignty he had a right to, or gave away his empire to those who had the government of his nonage? This government over him only prepared him the better and sooner for it. If anybody should ask me when my son is of age to be free, I shall answer, just when his monarch is of age to govern. “But at what time,” says the judicious Hooker, [6_7] “a man may be said to have attained so far forth the use of reason as sufficeth to make him capable of those laws whereby he is then bound to guide his actions; this is a great deal more easy for sense to discern than for anyone, by skill and learning, to determine.”

因此我们生而自由，也生而具有理性；并不是说我们确实能运用这两者：年龄在带给我们自由的同时也带给我们理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生而自由与服从父母二者可以共存，它们都建立在同样的原则基础上。父亲通过自己的职责，通过自己的领悟力带给子女自由，这种领悟力将一直制约子女直到其拥有自己的领悟力。一个成年人的自由与一个还尚未达到成年年龄的儿童对父母的服从是如此和谐共生却又彼此有别，乃至那些打着父权旗号来支持君主制的最盲目之支持者也

无法对这种差别熟视无睹；最顽固的人也必须承认它们的一致性。倘若他们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倘若已经知晓谁是亚当的合法继承人，并依据那种权利立此人为君王，赋予他罗伯特·菲尔默爵士所提及的所有绝对的无限权力，如若此人在他的继承人一出世时就死亡，那么无论他的子女是如何自由、如何高高在上，这个子女在年龄和教育使他拥有理性和管理自己和他人的能力之前，难道不应该服从他的母亲、保姆、导师和监护人吗？这个子女生活的所需，身体的健康和心智的形成都要求接受他人意志的指导，而不是接受他自己的意志指导；但是是否会有人认为这样的约束和服从会违背或是损害这个子女所享有的自由或是主权，抑或是将这个子女的王国让给那些未成年时对其加以管束的人呢？这样的管束只是为这个子女更好、更快地行使自由权或主权做准备。如若有人问我，我的儿子在什么年龄可以获得自由，我会回答，恰好是他的君主能够治国之时。睿智的胡克说道："但是，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才可以说是已经将理性运用到了这样的地步，足以让他知晓那些他之后必定要用以指导他的行动的法律？对于任何人来说，靠感觉来辨明比靠技术和知识要容易得多。" [7_7]

Commonwealths themselves take notice of, and allow that there is a time when men are to begin to act like free men, and therefore, till that time, require not oaths of fealty or allegiance, or other public owning of, or submission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ir countries.

国家本身就注意到并承认要到某一时期人们才开始像自由人那样行事，因此在那以前，不必作出忠诚或是立下效忠的誓约，或是对自己国家之政府进行其他的公开承认和服从。

The freedom then of man, and liberty of acting according to his own will, is grounded on his having reason, which is able to

instruct him in that law he is to govern himself by, and make him know how far he is left to the freedom of his own will. Turn him loose to an unrestrained liberty, before he has reason to guide him, is not allowing him the privilege of his nature to be free, but to thrust him out amongst brutes, and abandon him to a state as wretched and as much beneath that of a man as theirs. This is that which puts the authority into the parents' hands to govern the minority of their children. God hath made it their business to employ this care on their offspring, and hath placed in them suitable inclinations of tenderness and concern to temper this power, to apply it as His wisdom designed it, to the children's good as long as they should need to be under it.

可见，人的自由及他遵循自己意志行动自由的前提是他拥有理性，理性能够指导他知晓他将用以约束自己的法律，且使他明白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行使其意志自由。在他拥有理性来指导自己之前让他完全不受束缚地去享受无限制的自由，并不会给予他生而自由的特权，反而会将他驱逐到野兽中并与之为伍，让他处于远远低于人的、不幸的野兽般的状态。这就是将管教未成年子女的权力交付到父母手中的原因。上帝赋予他们职责去管教自己的子女，并赐予他们恰到好处的怜爱之心与关切之情来协调这一权力，只要儿女需要接受这种权力的约束，他们就应遵循上帝智慧的安排，为了子女的权益来行使这一权力。

But what reason can hence advance this care of the parents due to their offspring into an absolute, arbitrary dominion of the father, whose power reaches no farther than by such a discipline as he finds most effectual to give such strength and health to their bodies, such vigour and rectitude to their minds, as may best fit his children to be most useful to themselves and others, and, if it be

necessary to his condition, to make them work when they are able for their own subsistence; but in this power the mother, too, has her share with the father.

但是有什么理由可以将父母应给予其后代的这种管教职责上升为父亲的一种绝对而专横的控制权呢？父亲的权力只能延伸到他认为最有效的训练方式，给子女的身体以如此的力量与健康，给子女的心灵以如此的气势和正直，从而能让子女具备最合适的条件，成为对己对人都最为有用之才；此外，根据他的情况，如果必要，可以让子女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自己的生存而工作；但在这项权力里，母亲同父亲一样，也有她的一份。

Nay, this power so little belongs to the father by any peculiar right of Nature, but only as he is the guardian of his children, that when he quits his care of them, he loses his power over them, which goes along with their nourishment and education, to which it is inseparably annexed, and belongs as much to the foster-father of an exposed child as to the natural father of another. So little power does the bare act of begetting give a man over his issue, if all his care ends there, and this be all the title he hath to the name and authority of a father. And what will become of this paternal power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here one woman hath more than one husband at a time? Or in those parts of America where, when the husband and wife part, which happens frequently, the children are all left to the mother, follow her, and are wholly under her care and provision? And if the father die whilst the children are young, do they not naturally everywhere owe the same obedience to their mother, during their minority, as to their father, were he alive? And will anyone say that the mother hath a legislative power over her children that she can make standing rules which shall be of

perpetual obligation, by which they ought to regulate all the concerns of their property, and bound their liberty all the course of their lives? Or can she inforce the observation of them with capital punishments? For this is the proper power of the magistrate, of which the father hath not so much as the shadow. His command over his children is but temporary, and reaches not their life or property. It is but a help to the weakness and imperfection of their nonage, a discipline necessary to their education. And though a father may dispose of his own possessions as he pleases when his children are out of danger of perishing for want, yet his power extends not to the lives or goods which either their own industry, or another's bounty, has made theirs, nor to their liberty neither when they are once arrived to the enfranchisement of the years of discretion. The father's empire then ceases, and he can from thence forwards no more dispose of the liberty of his son than that of any other man. And it must be far from an absolute or perpetual jurisdiction from which a man may withdraw himself, having licence from divineauthority to leave father and mother and cleave to his wife.

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特殊的自然权利决定这个权力属于父亲，权力归属只是因为他是他子女的监护人，从他不再监护子女的那一刻起他就失去了对他们的权力。这个权力与对子女的养育和教导是同步存在，密不可分的，而且对一个弃儿的养父和一个孩子的生父而言，这种权力是同样的。一个男人倘若仅仅只有生育行为，在此之后没有尽任何照顾子女的责任，他作为父亲所享有的所有权力和权威不过如此，那他对子女的权力是少之又少的。在世界上的有些地区，一个女人同时拥有不止一个丈夫。另外，在美洲一些地区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丈夫与妻子分开，子女都交给母亲，完全由母亲照顾和养育，在这些地方父权将会怎样演变呢？倘若父亲在子女年幼时死亡，他们在未成年时难道不会自然地处处服从他们的母亲吗，就像他们父亲没有

死时服从他们的父亲一样？有没有人会说，母亲对她的子女有一种立法权，她能制定具有永久性义务的条例，这些条例用以规定涉及子女财产的一切事宜，限制他们一生的自由，并通过死刑来保证它们得以执行？这是执法官的正当权力，父亲根本没有这种权力。父亲对其子女的控制只是暂时的，这种权力不能触及他们的生命或财产。这种权力不过是在他们未成年时就其弱点和缺点给予帮助，是其教育之必不可少的训诫。尽管父亲在其子女没有被饿死的危险情况下可以任意处置他的财产，但他的权力却不能触及其子女的生命或他们通过辛勤劳动或他人赠与所得之财产，也不能触及他们的自由。一旦他们成年并拥有选举权，父亲的绝对支配权便到此为止，从此之后他不能再限制他儿子的自由，如同他无法限制其他任何人的自由。并且这远非一种绝对的或永久的权限，因为上帝之权威允许人摆脱此束缚以离开父母而与妻子在一起。

But though there be a time when a child comes to be as free from subjection to the will and command of his father as he himself is free from subjection to the will of anybody else, and they are both under no other restraint but that which is common to them both, whether it be the law of Nature or municipal law of their country, yet this freedom exempts not a son from that honour which he ought, by the law of God and Nature, to pay his parents, God having made the parents instruments in His great design of continuing the race of mankind and the occasions of life to their children. As He hath laid on them an obligation to nourish, preserve, and bring up their offspring, so He has laid on the children a perpetual obligation of honouring their parents, which, containing in it an inward esteem and reverence to be shown by all outward expressions, ties up the child from anything that may ever injure or affront, disturb or endanger the happiness or life of those from whom he received his, and engages him in all actions of defence, relief, assistance, and comfort of those by whose means he

entered into being and has been made capable of any enjoyments of life. From this obligation, no state, no freedom can absolve children. But this is very far from giving parents a power of command over their children, or an authority to make laws and dispose as they please of their lives or liberties. It is one thing to owe honour, respect, gratitude, and assistance; another to require an absolute obedience and submission. The honour due to parents a monarch on his throne owes his mother, and yet this lessens not his authority nor subjects him to her government.

然而，虽然有那么一天，子女将不再受制于父亲的意志和控制，如同父亲不受制于任何人的意志一样，即除了大家都要遵守自然法或他们国家的国内法之外，他们不受其他任何限制，但这种自由却没有免除一个儿子依据上帝或自然法则对父母应有的尊重，上帝通过父母来完成他延续人类种族的宏伟大业，让他们养育自己的子女。正如他让父母担任起养育、保护和教育子女的责任，他也让子女承担起永远尊敬父母的义务，这种义务包括子女通过一切外在形式体现出对父母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敬意，不做任何可能会伤害或冒犯、妨碍或危害亲生父母幸福或生命的事情，做一切保护、宽慰、协助和安慰父母的事情，因为他们赐予自己生命，使自己得以享受生活的乐趣。任何国家、任何自由都不能免除子女的这种义务。然而，这绝非给了父母一种控制其子女的权力，抑或一种制定法律并任意处置其子女生命和自由的权威。应当给予尊重、敬佩、感激和帮助是一回事；要求绝对地服从和臣服则是另一回事。根据孝道，一个在位的君主应当给予母亲以尊重，但这并不削弱他的权威，也不使他受控于她。

The subjection of a minor places in the father a temporary government which terminates with the minority of the child; and the honour due from a child places in the parents a perpetual right to respect, reverence, support, and compliance, too, more or less, as

the father's care, cost, and kindness in his education has been more or less, and this ends not with minority, but holds in all parts and conditions of a man's life. The want of distinguishing these two powers, viz. which the father hath, in the right of tuition, during minority, and the right of honour all his life, may perhaps have caused a great part of the mistakes about this matter. For, to speak properly of them, the first of these is rather the privilege of children and duty of parents than any prerogative of paternal power. The nourishment and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is a charge so incumbent on parents for their children's good, that nothing can absolve them from taking care of it. And though the power of commanding and chastising them go along with it, yet God hath woven into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 such a tenderness for their offspring, that there is little fear that parents should use their power with too much rigour; the excess is seldom on the severe side, the strong bias of nature drawing the other way. And therefore God Almighty, when He would express His gentle dealing with the Israelites, He tells them that though He chastened them, “He chastened them as a man chastens his son” [6_8] , i.e. with tenderness and affection, and kept them under no severer discipline than what was absolutely best for them, and had been less kindness, to have slackened. This is that power to which children are commanded obedience, that the pains and care of their parents may not be increased or ill-rewarded.

子女在未成年阶段会服从父亲，这使得父亲拥有一种短暂的控制权，一旦子女成年，控制权就会终止；而子女对父母的尊重使父母享有一种受敬佩、尊重、赡养和孝顺的永久性权利，这种权利或多或少是与父亲所付出的照顾、花费和对他们进行教育时所倾注的关怀相当的，这并不会随着子女的成年而终结，而是会延伸到子女一生各个时期的方方面面。无法区分这两种权力，即父亲对其未成年子女的教导

权和他终身应受子女尊敬的权力，也许是造成关于这个问题一大部分错误的原因：要正确地谈及这两种权力，前者与其说是父权的什么特权，不如说是子女的特殊权益和父母的责任。对子女进行养育和教育是父母为让子女获益需承担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免除这种责任。尽管对子女的命令和惩罚与此种责任并存，但上帝将父母对其子女的怜爱之情交织于人性中，以至于压根不必担心父母会过度严格地行使权力；过度很少体现在严厉程度上，父母天生非常倾向于选择不严厉的方式。所以，万能的上帝表达他对以色列人的宽容时，会告诉他们尽管他惩罚他们，但是“他管教他们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7_8] ——换言之，上帝用怜爱与慈悲之心，对他们的严厉管教绝不超出让他们完全受益的范围，而放松此种管教却是不够慈爱。这就是子女要服从的权力，那样其父母才不至于加倍辛苦操劳或徒劳无功。

On the other side, honour and support all that which gratitude requires to return; for the benefits received by and from them is the indispensable duty of the child and the proper privilege of the parents. This is intended for the parents’ advantage, as the other is for the children's; though education, the parents’ duty, seems to have most power, because the ignorance and infirmities of childhood stand in need of restraint and correction, which is a visible exercise of rule and a kind of dominion. And that duty which is comprehended in the word “honour” requires less obedience, though the obligation is stronger on grown than younger children. For who can think the command,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requires in a man that has children of his own the same submission to his father as it does in his yet young children to him, and that by this precept he were bound to obey all his father's commands, if, out of a conceit of authority, he should have the indiscretion to treat him still as a boy?

另一方面，孝敬和赡养是子女为感谢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恩惠而给予父母的报答，是孩子必要的责任和做父母应享的特权。这是为了父母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子女的利益。不过作为父母之责的教育似乎具有最大的权力，因为孩童时期的无知和弱点需要加以约束和纠正，这是控制的一种有形实施，是一种统治。“尊重”一词包含的责任不要求那么多的服从，尽管成年的子女所承担的义务要比年幼的子女更多些。因为对于像“孩子们，要服从你们的父母”这样的命令，谁会认为它要求一个已为人父母的人对自己父亲的服从，和要求他那尚年幼的孩子对他自己的服从一样；如果他的父亲由于其权威而骄傲自大，还轻率地把他当成小孩子来对待，谁又会根据这戒律认为他还得一定服从他父亲的所有命令呢？

The first part, then, of paternal power, or rather duty, which is education, belongs so to the father that it terminates at a certain season. When the business of education is over, it ceases of itself, and is also alienable before. For a man may put the tuition of his son in other hands; and he that has made his son an apprentice to another has discharged him, during that time, of a great part of his obedience, both to himself and to his mother. But all the duty of honour, the other part, remains nevertheless entire to them; nothing can cancel that. It is so inseparable from them both, that the father's authority cannot dispossess the mother of this right, nor can any man discharge his son from honouring her that bore him. But both these are very far from a power to make laws, and enforcing them with penalties that may reach estate, liberty, limbs and life. The power of commanding ends with nonage, and though after that honour and respect, support and defence, and whatsoever gratitude can oblige a man to, for the highest benefits he is naturally capable of being always due from a son to his parents, yet all this puts no sceptre into the father's hand, no sovereign power of commanding. He has no dominion over his son's property or actions, nor any right

that his will should prescribe to his son's in all things; however, it may become his son in many things, not very inconvenient to him and his family, to pay a deference to it.

因此，教育作为父亲的权力，或者说是义务，其首要部分同样是属于父亲的，它到某一时候就会结束。当教育的职责结束时，这部分的义务也就自行终止了，而在此之前，教育的职责是可以让渡的。因为一个人可以将儿子托付给他人教导，而那个将自己的儿子送予他人当学徒的人，则免除了儿子在此期间对他或母亲服从的大部分义务。但是其他服从的义务，即所有孝敬父母的义务，仍然完全属于他们，什么都无法将之取消。这种义务与父母二人都密不可分，父亲的权威不能剥夺母亲的这一权利，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免除子女孝敬生身母亲的义务。但二者与那种通过制定法律或可能涉及财产、自由、身体和生命的惩罚来实施这些法律的权力是大不相同的。那种掌控的权力终于子女成年之时，尽管在那之后，他仍然要礼待和尊敬，赡养和保护父母，并尽到感恩之心要求一个人所要尽到的一切义务，因为他自然而然获得的最大益处总是缘于他的父母。然而，这并非将权杖交到父亲的手里，从而让父亲拥有最高的命令权。对于儿子的财产或行动，父亲没有支配权，也没有任何权力要求儿子在一切事情上遵从他的意志；然而，对于儿子来说，在很多事情上遵从父亲的意志行事是合适的，这对于他或他的家人也没有什么不方便。

A man may owe honour and respect to an ancient or wise man, defence to his child or friend, relief and support to the distressed, and gratitude to a benefactor, to such a degree that all he has, all he can do, cannot sufficiently pay it. But all these give no authority, no right of making laws to anyone over him from whom they are owing. And it is plain that all this is due, not to the bare title of father, not only because as has been said, it is owing to the mother too, but because these obligations to parents, and the degrees of

what is required of children, may be varied by the different care and kindness trouble and expense, which is often employed upon one child more than another.

一个人需要礼待及尊敬古人或智者，需要保护其子女或朋友，需要宽慰和赞助不幸之人，需要感谢恩人，面对如此多的这些义务，他倾尽所有竭尽所能也不足以回报。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给他履行这些义务的对象以权威，使其具有权利制定凌驾于他之上的法律。显而易见，这一切并不单单由于父亲的头衔，也不仅因为如前所说它也受之于母亲，而是因为对父母应尽的那些义务，以及子女所做要求的程度，可随着照顾、慈爱、操心和花费之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一个孩子身上付出的往往要比在另一个孩子身上付出的多。

This shows the reason how it comes to pass that parents in societies, where they themselves are subjects, retain a power over their children and have as much right to their subjection as those who are in the state of Nature, which could not possibly be if all political power were only paternal, and that, in truth, they were one and the same thing; for then, all paternal power being in the prince, the subject could naturally have none of it. But these two powers, political and paternal, are so perfectly distinct and separate, and built upon so different foundations, and given to so different ends, that every subject that is a father has as much a paternal power over his children as the prince has over his. And every prince that has parents owes them as much filial duty and obedience as the meanest of his subjects do to theirs, and can therefore contain not any part or degree of that kind of dominion which a prince or magistrate has over his subject.

这就揭示了为何处于社会中的父母作为社会中的臣民，对子女拥有一种权力，并且同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一样有权要求子女服从。倘若所有的政治权力只是父权，情况就不可能是这样，否则政治权力和父权便在事实上成了一回事。因为如此一来，一切父权即属于君主，臣民自然就一点都得不到了。然而，政治权力和父权这两种权力如此迥异而相互有别，它们建立的基础与目标如此不同，以至于每一个作为父亲的臣民对其子女拥有的父权，与君主对其子女拥有的父权一样多。每一个有父母的君主，对其父母应尽的孝道和应有的服从，同他身份最卑微的臣民对其父母的一样多，因此父权和一个君主或行政长官对其臣民的那种统治权在任何部分或程度上都不同。

Though the obligation on the parents is to bring up their children, and the obligation on children is to honour their parents, contain all the power, on the one hand, and submission on the other, which are proper to this relation, yet there is another power ordinarily in the father, whereby he has a tie on the obedience of his children, which, though it be common to him with other men, yet the occasions of showing it, almost constantly happening to fathers in their private families and the instances of it elsewhere being rare, and less taken notice of, it passes in the world for a part of “paternal jurisdiction.” And this is the power men generally have to bestow their estates on those who please them best. The possession of the father being the expect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children ordinarily, in certain proportions,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custom of each country, yet it is commonly in the father's power to bestow it with a more sparing or liberal hand, according as the behaviour of this or that child hath comported with his will and humour.

尽管父母养育其子女的责任和子女孝敬父母的义务意味着一方拥

有全部权力和另一方必须服从，这于二者关系来说并无不妥，但是父亲通常还有另一种权力，借此让他的子女们对其服从，虽然别人同他一样拥有此种权力，但父亲们几乎总是在自己家里显示此种权力，而在别处这样的情况很罕见，也不太受人注意，所以现在人们认为它是父权的一部分——它就是人们通常将他们的财产赠予最讨他们欢心的人的权力。父亲的财产一般会由子女继承，通常按照一定的比例，根据每一国家的法律和习俗来分配，但是父亲通常有权根据这个或是那个子女的行为是否迎合他的意志和脾气来决定赠予多少。

This is no small tie to the obedience of children; and there being always annexed to the enjoyment of land a submission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 of which that land is a part, it has been commonly supposed that a father could oblige his posterity to that government of which he himself was a subject, that his compact held them; whereas, it being only a necessary condition annexed to the land, and the inheritance of an estate which is under that government, reaches only those who will take it on that condition, and so is no natural tie or engagement, but a voluntary submission; for every man's children being, by Nature, as free as himself or any of his ancestors ever were, may, whilst they are in that freedom, choose what society they will join themselves to, what commonwealth they will put themselves under. But if they will enjoy the inheritance of their ancestors, they must take it on the same terms their ancestors had it, and submit to all the conditions annexed to such a possession. By this power, indeed, fathers oblige their children to obedience to themselves, even when they are past minority, and most commonly, too, subject them to this or that political power. But neither of these by any peculiar right of fatherhood, but by the reward they have in their hands to enforce and recompense such a compliance, and is no more power than what a Frenchman has over an Englishman, who, by the hopes of an

estate he will leave him, will certainly have a strong tie on his obedience; and when it is left him, he will enjoy it, he must certainly take it upon the conditions annexed to the possession of land in that country where it lies, whether it be France or England.

这对子女的服从起到不可小觑的限制。对一片土地所属国家政府的服从总会成为享用这片土地的附加条件，因而人们一般就假定父亲有权强迫其后代服从他作为臣民的政府，假定他的契约也束缚其子女。然而，它只是附着于政府管辖下土地的一项必要条件，而那个政府管辖之下的地产的继承，只能约束那些愿意在此条件上拥有土地的人，因此它不是一种自然约束或约定，而是一种自愿地臣服。理由是，每一个人的子女生来与他自己乃至他祖先中的任何一个一样自由，在享有那种自由时他们可以选择加入他们想要加入的社会和他们愿意臣服的国家。但是倘若他们想要享有其祖先的遗产，就必须接受其祖先在拥有这种财产时所接受的同样条件，并且服从于这种财产所附带的所有条件。确实，父亲可以借着这种权力来强迫其子女即使在成年之后仍服从他们，而且更为普遍的是，还迫使其子女臣服于这个或者那个政治权力。然而，服从并非因为父亲享有任何特殊权利，而是因为他们用手中的奖赏来迫使和犒劳这种服从——就像法国人并不比英国人享有更多权力一样，父亲并没有任何特殊权力——子女由于希望父亲会留下一份财产，无疑会加强服从。倘若财产留给了子女，子女若想要享有这种财产，就必须接受土地所属的国家，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对土地占有所规定的附带条件。

To conclude, then, though the father's power of commanding extends no farther than the minority of his children, and to a degree only fit for the discipline and government of that age; and though that honour and respect, and all that which the Latins called piety, which they indispensably owe to their parents all their lifetime, and in all estates, with all that support and defence, is due to them,

gives the father no power of governing, i.e., making laws and enacting penalties on his children; though by all this he has no dominion over the property or actions of his son, yet it is obvious to conceive how easy it was, in the first ages of the world, and in places still where the thinness of people gives families leave to separate into unpossessed quarters, and they have room to remove or plant themselves in yet vacant habitations, for the father of the family to become the prince of it[1] ; he had been a ruler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infancy of his children; and when they were grown up, since without some government it would be hard for them to live together, it was likeliest it should, by the express or tacit consent of the children, be in the father, where it seemed, without any change, barely to continue. And when, indeed, nothing more was required to it than the permitting the father to exercise alone in his family that executive power of the law of Nature which every free man naturally hath, and by that permission resigning up to him a monarchical power whilst they remained in it. But that this was not by any paternal right, but only by the consent of his children, is evident from hence, that nobody doubts but if a stranger, whose chance or business had brought to his family, had there killed any of his children, or committed any other fact, he might condemn and put him to death, or otherwise have punished him as well as any of his children, which was impossible he should do by virtue of any paternal authority over one who was not his child, but by virtue of that executive power of the law of Nature which, as a man, he had a right to; and he alone could punish him in his family where the respect of his children had laid by the exercise of such a power, to give way to the dignity and authority they were willing should remain in him above the rest of his family.

于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父亲只在子女未成年阶段行使

控制权，而且一定程度上，这种控制权只适合那个年纪的管教和约束；尽管子女在其一生中的所有阶段都要必不可少地对父母尽到孝敬和尊敬，以及拉丁人所称之为“孝道”的一切义务，对父母倾尽所能地赡养和保护，但是父亲并没有任何控制权——即制定法律和惩罚其子女的权力——尽管这一切都让他无权控制其儿子的财产或行动。可以显而易见地设想，在人类存在的早期和现今的某些地方，人口稀少使一些家庭可以分散到尚没有被人们占有的区域，他们可以移居或定居到尚未有人居住的地方，这样一来，一个家庭中的父亲成为家庭中的大王是极为容易的[1]。他从子女的婴儿期开始就是一个统治者。由于没有某种统治他们很难共同生活，当子女长大成人时，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明确同意或默许父亲享有统治权。这样看来，这个统治权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只是继续下去罢了。其实，要实现这一点只需允许父亲一人在他的家庭里行使每一个自由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法的执行权即可，而通过这种允许，在大家仍呆在家里时，就把一种君权交给了父亲。然而由此得知，这种君权并非基于任何父权，而是基于子女的同意，所以才无人对这种权力进行怀疑。但是，倘若一个陌生人偶然或因故到他家里来，杀了他子女中的任何一个，又或犯了什么其他事，父亲可以将他判罪处死，或者像惩罚任何子女一样惩罚他。父亲对一个不是他子女的人这样做不可能是凭借任何父权，而是凭借他作为一个人被自然法赋予的执行权。在他家里只有自己能够惩罚他，因为他的子女出于对他的尊敬愿意让他享有高于家庭中其他所有成员的尊严和权威而行使这一权力。

1: "It is no improbable opinion, therefore, which the arch-philosopher was of, That the chief person in every household was always, as it were, a king; so when numbers of households joined themselves in civil societies together, kings were the first kind of governors among them, which is also, as it seemeth, the reason why the name of fathers

continued still in them, who of fathers were made rulers; as also the ancient custom of governors to do as Melchizedec; and being kings, to exercise the office of priests, which fathers did, at the first, grew, perhaps, by the same occasion. Howbeit, this is not the only kind of regimen that has been received in the world. The inconveniences of one kind have caused sundry others to be devised, so that, in a word, all public regimen, of what kind soever, seemeth evidently to have risen from the deliberate advice, consultation and composition between men, judging it convenient and behoveful, there being no impossibility in Nature, considered by itself, but that man might have lived without any public regimen." Hooker, Eccl. Pol, lib. i. sect. 10.

1: “因此，那位大哲学家所持的看法并没有什么不可能，那就是：每个家庭的家长总是像个国王一样。因此，当许多家庭以公民社会的形式联合在一起时，国王成了他们之中最早的一种统治者，这似乎也是为何父亲的名称一直存在于他们之身的原因，他们都是由父亲变成统治者的。统治者依据的古老习俗也是那样，如麦基洗德王。国王要行使祭司的职责，而这种职责最早是由父亲行使的，也许是在同一情况下逐渐形成的。不过，这并非世界唯一公认的一种统治。一种统治的不便导致人们策划各种各样其他统治，产生了所有的公共制度。总而言之，无论是哪一种制度，显然都是来源于人与人之间慎重的建议、协商和和

解，从而变得方便和合适。而从自然本身考虑，人类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公共统治的情况下生活。”胡克，《宗教政治》，第1卷，第10节。

Thus it was easy and almost natural for children, by a tacit and scarce avoidable consent, to make way for the father's authority and government. They had been accustomed in their childhood to follow his direction, and to refer their little differences to him; and when they were men, who was fitter to rule them? Their little properties and less covetousness seldom afforded greater controversies; and when any should arise, where could they have a fitter umpire than he, by whose care they had everyone been sustained and brought up. And who had a tenderness for them all? It is no wonder that they made no distinction betwixt minority and full age, nor looked after twenty-one, or any other age, that might make them the free disposers of themselves and fortunes, when they could have no desire to be out of their pupilage. The government they had been under during it continued still to be more their protection than restraint; and they could nowhere find a greater security to their peace, liberties, and fortunes than in the rule of a father.

因此，对于子女来说，通过默认和难以避免的同意来接受父亲的权威和统治是件极为容易又几乎顺其自然的事情。从孩提时代他们就习惯于服从他的命令，将他们琐碎的争执交由他处理；而当他们成年时，谁更适合来统治他们呢？他们微薄的财产和些许的贪婪极少导致较大的争执。而任何争执一旦出现，他们去哪儿找一个比父亲更合适的仲裁人，能像父亲那样把他们每一个人都抚养成人，并对他们都怜爱有加？难怪当他们无意摆脱被监护的身份时，对未成年和成年不加以区分，也不期待21岁的到来，或是任何可以让他们自由处置自己人

身和财产的年龄。在此期间他们所受统治的保护性多于控制性；除了在父亲的统治下，他们再也无法在别处获得更多的安心、自由和财产的保障。

Thus the natural fathers of families, by an insensible change, became the politic monarchs of them too; and as they chanced to live long, and leave able and worthy heirs for several successions or otherwise, so they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hereditary or elective kingdoms under several constitutions and manors, according as chance, contrivance, or occasions happened to mould them. But if princes have their titles in the father's right, and it be a sufficient proof of the natural right of fathers to political authority, because they commonly were those in whose hands we find, de facto, the exercise of government, I say, if this argument be good, it will as strongly prove that all princes, nay, princes only, ought to be priests, since it is as certain that in the beginning “the father of the family was priest, as that he was the ruler in his own household.”

因此，家庭中子女的亲生父亲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子女政治上的君主；倘若他们恰好长寿，留下几代能干又优秀的继承人，或是由于其他原因，随着时机、计策或是某些情况碰巧促成，他们为一些组织形式和形态的世袭或是选举制王国奠定了基础。然而，倘若君主以父亲的权利而获得他们的头衔，就足以证明父亲享有政治权力是其自然权利，因为我们发现他们通常是那些事实上手里掌握统治权的人——我得说，假如这个论证是正确的，它同样可以证明所有君主，且仅有君主，应该成为祭司，因为可以肯定的是，最初“一家中的父亲是祭司，正如他是自家的统治者一样”。

[6_1].Exod. xx. 12.

[6_2].Lev. xx. 9.

[6_3].Lev. xix. 3.

[6_4].Eph. vi. 1.

[6_5].Chap. II.

[6_6].Eccl. Pol. lib. i. sec. 7.

[6_7].Eccl. Pol. l. i. sect. 6.

[6_8].Deut. viii. 5.

[7_1].《出埃及记》，第20章，第12节。

[7_2].《利未记》，第20章，第9节。

[7_3].《利未记》，第19章，第3节。

[7_4].《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

[7_5].第二章

[7_6].《宗教政治》，第1卷，第7节。

[7_7].《宗教政治》，第1卷，第6节。

[7_8].《申命记》，第8章，第5节。

Chapter VII　Of Political or Civil Society

第七章　论政治社会或公民社会

God having made man such a creature that, in hisown judgment, it was not good for him to be alone, put him under strong obligations of necessity, convenience, and inclination, to drive him into society, as well as fitted him with understanding and language to continue and enjoy it. The first society was between man and wife, which gave beginning to that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to which, in time, that between master and servant came to be added. And though all these might, and commonly did, meet together, and make up but one family, wherein the master or mistress of it had some sort of rule proper to a family, each of these, or all together, came short of "political society" as we shall see if we consider the different ends, ties, and bounds of each of these.

在将人造成这样一种动物后，上帝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人独自生活不利。于是，上帝使人受到需要、方便和爱好的强烈要求，迫使他加入社会，并且让他具有理性和语言从而继续享受社会生活。最早的社会存在于夫妻之间，它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社会的开端，最后在此之外加上了主仆社会。尽管所有这些通常可以交融在一起并只构成一个家庭——男主人或女主人拥有适合于家庭的某种统治权——倘若我们考虑每种社会的不同目的、关系和范围，就可以看出这些社会中的每一个或是所有的联合在一起都不足以形成"政治社会"。

Conjugal society is made by a voluntary compact between man and woman, and though it consists chiefly in such a communion

and right in one another's bodies as is necessary to its chief end, procreation, yet it draws with it mutual support and assistance, and a communion of interests too, as necessary not only to unite their care and affection, but also necessary to their common offspring, who have a right to be nourished and maintained by them till they are able to provide for themselves.

夫妻社会是依据男女之间的自愿契约建立的。尽管它主要包括对彼此身体的共有和权利——这是为实现主要目的，即生育所必须的条件，但是，它同时还包括相互扶持和帮助以及利益共享，这不仅是加强他们相互关怀和感情的必要前提，也是他们有共同后代的必要前提，他们的后代有权获得他们的养育和扶持，直至能够自给自足。

For the end of conjuncti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being not barely procreation, but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species, this conjunction betwixt male and female ought to last, even after procreation, so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the nourishment and support of the young ones, who are to be sustained by those that got them till they are able to shift and provide for themselves. This rule, which the infinite wise Maker hath set to the works of his hands, we find the inferior creatures steadily obey. In those viviparous animals which feed on grass the conjuncti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lasts no longer than the very act of copulation, because the teat of the dam being sufficient to nourish the young till it be able to feed on grass. The male only begets, but concerns not himself for the female or young, to whose sustenance he can contribute nothing. But in beasts of prey, the conjunction lasts longer because the dam, not being able well to subsist herself and nourish her numerous offspring by her own prey alone (a more laborious as well as more dangerous way of living than by feeding on grass), the assistance of

the male is necessary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common family, which cannot subsist till they are able to prey for themselves, but by the joint care of male and female. The same is to be observed in all birds (except some domestic ones, where plenty of food excuses the cock from feeding and taking care of the young brood), whose young, needing food in the nest, the cock and hen continue mates till the young are able to use their wings and provide for themselves.

因为男女之间结合并不只是为了生育，而是为了物种的繁衍，所以男女之间的这种结合只要是养育和扶持年幼子女的必要前提，那么这种结合即使在生育之后也应该持续下去。幼子要由生育他们的父母来赡养，直到能够自给自足为止。我们发现，对于由智慧无边的造物主亲手制定的这条规则，低等动物是坚决服从的。在那些食草的胎生动物中，雌雄之间的结合在交配行为完成后不再持续，因为母乳足以养育幼兽直至它能够以草为生。雄兽只是传种，并不关心雌兽或幼兽，对抚养它们也不能起到任何作用。但就猛兽而言，雌雄的结合要持续得更长些，因为母兽无法只靠自己捕食来很好地养活自己和养育为数众多的幼兽（以捕食其他动物为生要比以草食为生更费力也更危险），所以雄兽的帮助是维持它们共同家庭的必要前提，因为幼兽在自己能够捕食之前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只能由雄兽和雌兽共同照顾。在所有的鸟类中也可以观察到相同的情况（除了一些被驯养的家禽，丰足的食物使得雄禽不必喂养和照顾幼禽），在巢中的幼禽需要得到食物，雄禽和雌禽保持配偶关系，直至幼禽能够飞翔并独自觅食。

And herein, I think, lies the chief, if not the only reason, why the male and female in mankind are tied to a longer conjunction than other creatures, viz. because the female is capable of conceiving, and, de facto, is commonly with child again, and brings forth to a new birth, long before the former is out of a dependency

for support on his parents' help and able to shift for himself and has all the assistance due to him from his parents, whereby the father, who is bound to take care for those he hath begot, is under an obligation to continue in conjugal society with the same woman longer than other creatures, whose young, being able to subsist of themselves before the time of procreation returns again, the conjugal bond dissolves of itself, and they are at liberty, till Hymen at his usual anniversary season, summons them again to choose new mates. Wherein one cannot but admire the wisdom of the great Creator, who, having given to man foresight and an ability to lay up for the future as well as to supply the present necessity, hath made it necessary that society of man and wife should be more lasting than of male and female amongst other creatures, that so their industry might be encouraged, and their interest better united, to make provision and lay up goods for their common issue, which uncertain mixture, or easy and frequent solutions of conjugal society, would mightily disturb.

我认为人类男女的结合比其他生物的结合更长久的主要原因——倘若不是唯一原因——就在于此——女人能够怀孕，而且事实上通常再次怀孕，并生产出新生儿，而之前生下的孩子还需要依赖父母的帮助和扶持，还不能自力更生，还需要得到父母的各种援助。因此，父亲有责任照顾他所生育的子女，也有义务与同一女子继续维持夫妻社会；人类夫妻社会的维系时间比其他生物要长，因为其他生物在生育季节再度来临之前，幼子已能自谋生存，所以配偶关系也就自行解除，它们也就自由了，直至婚姻之神在一年一度的惯常季节里再次召唤它们选择新偶为止。在这一方面，人们不得不钦佩伟大造物主的智慧，他赋予人一种储存以备未来之需同时又能兼顾当前需要的先见和能力，使夫妻社会必须比其他生物两性结合更持久，从而鼓励他们辛勤劳作，更好地结合他们的利益，为他们共同的后代供给和储备。而夫妻结合不稳定，或是夫妻社会轻易而经常地解体，就会极大地危害

他们共同的后代。

But though these are ties upon mankind which make the conjugal bonds more firm and lasting in a man than the other species of animals, it would give one reason to inquire why this compact, where procreation and education are secured and inheritance taken care for, may not be made determinable, either by consent, or at a certain time, or upon certain conditions, as well as any other voluntary compacts, there being no necessity, in the nature of the thing, nor to the ends of it, that it should always be for life—I mean, to such as are under no restraint of any positive law which ordains all such contracts to be perpetual.

然而，尽管对人类的这些束缚使得人类的配偶关系比其他种类的动物更稳固和持久，但人们却有理由发问，为什么这个保障生育和教育并考虑到继承的契约，不能同其他一切自愿的契约一样，或经过同意、或在某一时期、在某些条件下终止呢？因为就这事情的性质和目的而言，它没有持续终身的必要——我指的是那些不被实在法规定为永久性条约的那些契约。

But the husband and wife, though they have but one common concern, yet having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will unavoidably sometimes have different wills too. Therefore being necessary that the last determination (i.e. the rule) should be placed somewhere, it naturally falls to the man's share as the abler and the stronger. But this, reaching but to the things of their common interest and property, leaves the wife in the full and free possession of what by contract is her peculiar right, and at least gives the husband no more power over her than she has over his life; the power of the

husband being so far from that of an absolute monarch that the wife has, in many cases, a liberty to separate from him where natural right or their contract allows it, whether that contract be made by themselves in the state of Nature or by the customs or laws of the country they live in, and the children, upon such separation, fall to the father or mother's lot as such contract does determine.

然而，尽管夫妻共同关注的问题只有一个，但由于有不同的理解，他们有时就不可避免地有不同的意愿。因此有必要将最后的决定（即统治权）归属某方，于是，这种权力自然而然地归于更能干、更强壮的男性了。但是，这种统治只涉及他们的共同利益和财产，妻子仍完全并自由享有依据契约规定属于她的特有权利，至少让丈夫无权支配她的生命，如她亦无权支配他的生命那样。丈夫所享有的权力与一个专制君主所享有的权力相去甚远，以至于妻子在许多情况下，在自然权利或他们的契约允许的范围内，有权与他分离，而不管契约是由他们在自然状态下立下的，还是依据他们国家的习俗或法律立下的；而子女在父母分离时将依据契约的规定划归父亲或母亲负责。

For all the ends of marriage being to be obtained under politic government, as well as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e civil magistrate doth not abridge the right or power of either, naturally necessary to those ends, viz., procreation and mutual support and assistance whilst they are together, but only decides any controversy that may arise between man and wife about them. If it were otherwise, and that absolute sovereignty and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naturally belonged to the husband, and were necessary to the society between man and wife, there could be no matrimony in any of those countries where the husband is allowed no such absolute authority. But the ends of matrimony requiring no such power in the husband, it was not at all necessary to it. The condition of

conjugal society put it not in him, it being not at all necessary to that state. Conjugal society could subsist and attain its ends without it; nay, community of goods, and the power over them, mutual assistance and maintenance, and other things belonging to conjugal society, might be varied and regulated by that contract which unites man and wife in that society, as far as may consist with procreation and the bringing up of children till they could shift for themselves; nothing being necessary to any society that is not necessary to the ends for which it is made.

婚姻的所有目的是在政府统治下，同时也是在自然状态中达成的，政府官员不能剥夺夫妻中任何一方为达到那些目的——即生育以及在一起时相互扶持和帮助——而必然所需的权利和权力，而只是在夫妻之间就这些事引起争执时进行裁决。若非如此，如果绝对统治权和生死大权自然而然地为丈夫所享有，并成为夫妻社会的必要前提的话，在丈夫不被允许享有这种绝对权威的任何国家中将不可能有婚姻。但是婚姻的目的并不要求丈夫拥有这样的权力，这对婚姻而言是根本不需要的。夫妻社会的状况没有赋予他这种权力，因为这对于婚姻状况是根本不必要的。夫妻社会在没有这种权力的情况下，也能存在和达到它的目的；至于财产的共有、处理财产的权力、互相帮助和支持以及属于夫妻社会的其他事情，则可以基于结成夫妻社会的契约而有所不同、有所调整，只要与生育和扶养儿女直到他们能自力谋生为止的精神相符合就行。任何对于组成社会目的没必要的东西，对于这个社会就没必要。

The society betwixt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the distinct rights and powers belonging respectively to them, I have treated of so largely in the foregoing chapter that I shall not here need to say anything of it; and I think it is plain that it is far different from a politic society.

对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社会，以及他们双方各自拥有的截然不同的权利和权力，我已经在上一章里详细论述，此处无需再提及；我认为这种社会与政治社会的迥然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Master and servant are names as old as history, but given to those of far different condition; for a freeman makes himself a servant to another by selling him for a certain time the service he undertakes to do in exchange for wages he is to receive; and though this commonly puts him into the family of his master, and under the ordinary discipline thereof, yet it gives the master but a temporary power over him, and no greater than what is contained in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m. But there is another sort of servant which by a peculiar name we call slaves, who being captives taken in a just war are, by the right of Nature, subjected to the absolute dominion and arbitrary power of their masters. These men having, as I say, forfeited their lives and, with it, their liberties, and lost their estates, and being in the state of slavery, not capable of any property, cannot in that state be considered as any part of civil society, the chief end whereof is the preservation of property.

主人和仆人的称谓和历史一样久远，但这是对条件极不相同的人的称谓。因为一个自由人是通过出卖一定时期内从事的劳务来换取将得到的工资让自己成为他人仆人的；虽然这通常使他住在主人家，并因此受到一般的管束，然而，这只让主人拥有暂时支配他的权力，这种权力不超过他们之间契约所包含之范围。但是还有另一类仆人，我们用一个特殊的名字称之为奴隶，他们是在一场正义的战争中被俘，依据自然权利，服从于他们主人的绝对支配和随心所欲之权力。这些人，如我所说，既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权，随之也失去了自由，并且丧失了他们的财产。他们既处于奴隶的状态，就不能有任何财产，其所

处状态就不能视为政治社会的任何部分，而政治社会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财产。

Let us therefore consider a master of a family with all these subordinate relations of wife, children, servants and slaves, united under the domestic rule of a family; which, what resemblance soever it may have in its order, offices, and number too, with a little commonwealth, yet is very far from it both in its constitution, power, and end; or if it must be thought a monarchy, and the paterfamilias the absolute monarch in it, absolute monarchy will have but a very shattered and short power, when it is plain by what has been said before, that the master of the family has a very distinct and differently limited power both as to time and extent over those several persons that are in it; for excepting the slave (and the family is as much a family, and his power as paterfamilias as great, whether there be any slaves in his family or no) he has no legislativ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over any of them, and none too but what a mistress of a family may have as well as he. And he certainly can have no absolute power over the whole family who has but a very limited one over every individual in it. But how a family, or any other society of men, differ from that which is a properly political society, we shall best see by considering wherein political society itself consists.

因此让我们考虑一下一家之主及与家庭相关的一切从属关系，如妻子、子女、主仆，他们在家庭内部规则下结合在一起，无论这种家庭在秩序、职务连同人数上与一个小国家如何相似，它在体制、权力和目的上却与小国家相去甚远。又或者，倘若必须把家庭看作君主制，把家长看作其中至高无上的君主，那么君主专制将只有支离破碎和短暂的权力。如前所述，一家之主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家里那几

个人具有极为明确又截然不同的有限权力。因为除了奴隶（不管他家中是否有奴隶，家庭仍是家庭，他作为家长的权威仍一样大），他对他们没有任何生杀的立法权，而他们中只有女主人享有同他一样的权力。他对整个家庭没有绝对的权力，对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力。然而，一个家庭或人类的任何其他社会与真正的政治社会有着怎样的差别呢？我们通过考虑政治社会本身如何构成，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理解这种差别。

Man being born, as has been proved, with a title to perfect freedom and an uncontrolled enjoyment of all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w of Nature, equally with any other man, or number of men in the world, hath by nature a power not only to preserve his property—that is, his life, liberty, and estate against the injuries and attempts of other men, but to judge of and punish the breaches of that law in others, as he is persuaded the offence deserves, even with death itself, in crimes where the heinousness of the fact, in his opinion, requires it. But because no political society can be, nor subsist, without having in itself the power to preserve the property, and in order thereunto punish the offences of all those of that society, there, and there only, is political society where everyone of the members hath quitted this natural power, resigned it up into the hands of the community in all cases that exclude him not from appealing for protection to the law established by it. And thus all private judgment of every particular member being excluded, the community comes to be umpire, and by understanding indifferent rules, and the same to all parties; and by men having authority from the community for their execution of those rules, decides all the differences that may happen between any members of that society concerning any matter of right, and punishes those offences which any member hath committed against the society with such penalties as the law has established; whereby

it is easy to discern who are, and who are not, in political society together. Those who are united into one body, and have a common established law and judicature to appeal to, with authority to decide controversies between them and punish offenders, are in civil society one with another; but those who have no such common appeal, I mean on earth, are still in the state of Nature, each being where there is no other, judge for himself and executioner, which is, as I have before showed it, the perfect state of Nature.

前文已经证明，人生而享有完全的自由权，并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群人一样，不受控制地享受自然法赋予的所有权利和特权，他天生具有一种不仅可以保护其所有物——即他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他人损害和侵犯的权力，而且在他相信侵犯者罪有应得时，可以审判和处罚侵犯者的违法行为，当他认为侵犯者罪行十恶不赦并有判处死刑的需要时，甚至可以将其判处死刑。然而，任何政治社会如果不具有保护所有物的权力，由此去惩罚社会中所有的犯罪行为，就无法成为政治社会，也就无法存在下去；只有当一个政治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放弃自然赋予的这一权力，在保证他仍然可以向社会所订立的法律提出保护诉求的情况下，将此权力交由社会处理，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唯一的政治社会。这样，每一个成员的所有私人判断都被排除，社会成为仲裁员，并且通过中立的法规和社会授权的法规执行人来裁决可能发生在任何社会成员之间和涉及任何权利问题的各类争执，用法律规定的刑罚来惩罚任何成员对社会所犯的罪行；由此可以轻而易举地辨明谁是以及谁不是同处于一个政治社会中。那些结成一个团体的人，可以诉诸共同制定的法律和司法系统来裁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并惩罚罪犯，他们共同处于公民社会中；而那些没有这种共同申诉——我指的是人世间的共同申诉——的人们仍处于自然状态中，即没有其他的仲裁人，个人就成为自己的仲裁者和执行人。如前文所述，这种情况是理想的自然状态。

And thus the commonwealth comes by a power to set down what punishment shall belong to the several transgressions which they think worthy of it, committed amongst the members of that society (which is the power of making laws), as well as it has the power to punish any injury done unto any of its members by anyone that is not of it (which is the power of war and peace); and all thi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property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at society, as far as is possible. But though every man who has entered into civil society, and is become a member of any commonwealth, has thereby quitted his power to punish offences against the law of Nature in prosecution of his own private judgment, yet with the judgment of offences which he has given up to the legislative, in all cases where he can appeal to the magistrate, he has given up a right to the commonwealth to employ his force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judgments of the commonwealth whenever he shall be called to it, which, indeed, are his own judgments, they being made by himself or his representative. And herein we have the original of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 of civil society, which is to judge by standing laws how far offences are to be punished when committed within the commonwealth; and also to determine, by occasional judgments founded on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of the fact, how far injuries from without are to be vindicated, and in both these to employ all the force of all the members when there shall be needed.

因此，国家有规定对社会成员所犯不同罪行进行何种惩罚的权力（这是制定法律的权力），同时它还有对社会之外的任何人伤害这个社会的任何成员进行惩罚的权力（这是发动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权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地保护这个社会中所有成员的财产。然而，尽管加入了政治社会而成为任何国家成员的人均已放弃通过自己的私人判决来惩罚违背自然法的行为的权力，但随着他已经把

他能向法官申诉的所有案件的罪行仲裁权交给了立法机构，他也就给予了国家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可以使国家在任何需要他的时候利用其力量执行国家判决；而国家判决的确就是他自己的判决，是由他自己或他的代表进行的判决。这便是公民社会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之起源，它根据长期有效的法律来判定在国内所犯罪行该如何惩罚，同时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的临时判决来决定对外来的侵害给予何种程度的惩罚；为了这两个目的，只要有需要，就能调动所有成员的全部力量。

Wherever, therefore, any number of men are so united into one society as to quit everyone his executive power of the law of Nature, and to resign it to the public, and there only is a political or civil society. And this is done wherever any number of me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enter into society to make one people and one body politic under one supreme government; or else when anyone joins himself to, and incorporates with any government already made. For hereby he authorises the society, or which is all one, the legislative, thereof, to make laws for him as the public good of the society shall require, to the execution whereof his own assistance (as to his own decrees) is due. And this puts men, out of a state of Nature, into that of a commonwealth by setting up a judge on earth with authority to determine all the controversies and redress the injuries that may happen to any member of the commonwealth, which judge the legislative or magistrates appointed by it. And wherever there are any number of men, however associated, that have no such decisive power to appeal to, there they are still in the state of Nature.

所以，无论在何处、无论多少人如此结合成了一个社会，使得每个人都放弃自然法的执行权，并将其让渡给公众，在那儿——也仅在那儿——才有了一个政治的或公民的社会。在任何地方，当处于自然

状态中的任何数量的人们加入一个社会，形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并处于一个至高无上的政府之下，就形成了公民社会；要么他们就是主动加入或被动并入一个业已存在的政府。通过这种方法，人们授权给这个社会，或授权给同样性质的社会之立法机构，让其依据社会公共利益所需来为自己制定法律，而人们应该适当协助这些法律的执行（视之为自己的判决）。在人间设立裁判员来判决所有的纠纷，赔偿可能发生在国家任何成员身上的伤害，能让人们脱离自然状态进入国家状态。这个裁判员是立法机构或由立法机构任命的长官。无论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人，不论他们怎样结合，如果没有这种可以申诉的决断权，他们则仍然处于自然状态中。

Hence it is evident that absolute monarchy, which by some men is counted for the only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is indeed inconsistent with civil society, and so can be no form of civil-government at all. For the end of civil society being to avoid and remedy those inconveniences of the state of Nature which necessarily follow from every man's being judge in his own case by setting up a known authority to which everyone of that society may appeal upon any injury received, or controversy that may arise, and which everyone of the society ought to obey. [7_1] Wherever any persons are who have not such an authority to appeal to, and decide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there, those persons are still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so is every absolute prince in respect of those who are under his dominion.

因此，显而易见，尽管君主专制政体被一些人看成是唯一的政体形式，但它其实是和公民社会相背离的，所以完全不可能是公民政府的一种形式。因为公民社会旨在避免和弥补自然状态的种种不便，而这些不便是人人可以仲裁自己案件的必然结果，通过设立一个公认的权威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在受到任何伤害或发生争执时可以向其申

诉，并且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服从于这权威 [8_1] 。任何人无论身处何处，若无法诉诸这样的权威来裁决他们之间的纷争，那么这些人则仍处于自然状态中。所以对于在每一个专制君主统治下的人们也是如此，他们也是处于自然状态。

For he being supposed to have all, both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 in himself alone, there is no judge to be found, no appeal lies open to anyone, who may fairly and indifferently, and with authority decide, and from whose decision, relief and redress may be expected of any injury or inconveniency that may be suffered from him, or by his order. So that such a man, however entitled, Czar, or Grand Seignior, or how you please, is as much in the state of Nature, with all under his dominion, as he is with the rest of mankind. For wherever any two men are, who have no standing rule and common judge to appeal to on earth,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ontroversies of right betwixt them, they are still in the state of Nature,[1] and under all the inconveniences of it, with only this woeful difference to the subject, or rather slave of an absolute prince. That whereas, in the ordinary state of Nature, he has a liberty to judge of his right, according to the best of his power to maintain it; but whenever his property is invaded by the will and order of his monarch, he has not only no appeal, as those in society ought to have, but, as if he were degraded from the common state of rational creatures, is denied a liberty to judge of, or to defend his right, and so is exposed to all the misery and inconveniences that a man can fear from one, who being in the unrestrained state of Nature, is yet corrupted with flattery and armed with power.

因为假如这个权威拥有一切，集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那就不存在仲裁者了。当君主或他的命令造成伤害和不便时，无人能诉诸一

个公正无私并有权威的人，通过这个人的裁决来获得救济和补偿。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其称号是什么，是沙皇、长老或是任何什么称号，和他统治下的所有人，以及其余人类一样，都处于自然状态中。任何两个人无论处在什么地方，若无法在人世间通过持久的法规和共同的仲裁者判决他们之间的纷争，他们就仍处于自然状态之下，仍然受制于其种种不便。于一个专制君主的臣民或不如说是奴隶来说，只有这个可悲的区别；[1] 然而，在一般的自然状态下，他有评判自己权利的自由，并竭尽其权力来维护这种自由；但每当他的财产因他君主的意志和命令遭到侵犯时，他不仅没有处于社会中的人们应该享有的申诉权，他还好像从理性动物的共同状态中被降格了，被剥夺了评判或维护自己权利的自由，因而他可能会遭受所有不幸和麻烦，而这些不幸和麻烦是由人最为害怕的一种人造成的——这种人处于无拘无束的自然状态，并因为他人的阿谀奉承变得道德败坏，并且拥有权力。

1: "To take away all such mutual grievances, injuries, and wrongs—, i. e., such as attend me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ere was no way but only by growing into composition and agreement amongst themselves by ordaining some kind of government public, and by yielding themselves subject thereunto, that unto whom they granted authority to rule and govern, by them the peace, tranquillity, and happy estate of the rest might be procured. Men always knew that where force and injury was offered, they might be defenders of themselves. They knew that, however men may seek their own commodity, yet if this were done with injury unto others, it was not to be suffered, but by all men and all good means to be withstood. Finally, they knew that no man might, in reason, take upon him to

determine his own right, and according to his own determination proceed in maintenance thereof, in as much as every man is towards himself, and them whom he greatly affects, partial; and therefore, that strifes and troubles would be endless, except they gave their common consent, all to be ordered by some whom they should agree upon, without which consent there would be no reason that one man should take upon him to be lord or judge over another." Hooker, Eccl. Pol. l. sect. 10.

1: “要消除所有这些相互怨恨、伤害和罪过——也就是说，伴随处于自然状态中之人的上述种种，除了在他们中间进行调解与协定来组成某种公共政府，并且让他们臣服于那些他们授予其统治权的人们，通过他们来获得和平、安宁和其他设法获得的幸福状态之外，别无他法。人们总是知道，哪里有暴力和伤害（施加于他们），哪里就有抵抗。他们知道，虽然人们可以谋求财物，但倘若这是以对他人造成损害而获得，那是不允许的，而只有通过所有人，使用一切好的方法来反抗。最后，他们知道没有人可以合理地决定自己的权利，并根据他自己的决定来维护之，因为每个人对自己和他深深喜爱之人都是有所偏袒的。因此冲突和纠纷将永无止息，除非他们一致同意让所有人受命于一些他们共同商定的人，没有这种同意就没有任何理由让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主人或是仲裁者。”胡克，《宗教政治》，第1卷，第10节。

For he that thinks absolute power purifies men's blood, and corrects the baseness of human nature, need read but the history of this, or any other age, to be convinced to the contrary. He that would have been insolent and injurious in the woods of America would not probably be much better on a throne, where perhaps learning and religion shall be found out to justify all that he shall do to his subjects, and the sword presently silence all those that dare question it. For what the protection of absolute monarchy is, what kind of fathers of their countries it makes princes to be, and to what a degree of happiness and security it carries civil society, where this sort of government is grown to perfection, he that will look into the late relation of Ceylon may easily see.

认为绝对权力能净化人的心境、纠正人的恶劣品质之人，只需读一读当代或是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事实正好相反。那些在美洲森林里蛮横不公的人，登上王位也不可能会变得更好；他在位时也许会找到学说和宗教为自己对臣民的所作所为做辩护，而武力能让敢于质疑他的所有人立即保持沉默。当这种君主政体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时，君主专制能提供何种保护，他们统治的国家会塑造怎样的家长，公民社会的幸福和安全能达到何种程度，只要了解一下斯里兰卡的近况就很容易明白了。

In absolute monarchies, indeed, as well as other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the subjects have an appeal to the law, and judges to decide any controversies, and restrain any violence that may happen betwixt the subjects themselves, one amongst another. Thus everyone thinks necessary, and believes: he deserves to be thought a declared enemy to society and mankind who should go about to take it away. But whether this be from a true love of mankind and society, and such a charity as we owe all one to another, there is

reason to doubt. For this is no more than what every man, who loves his own power, profit, or greatness, may, and naturally must do to keep those animals from hurting or destroying one another who labour and drudge only for his pleasure and advantage; and so are taken care of, not out of any love the master has for them, but love of himself, and the profit they bring him. For if it be asked what security, what fence is there in such a state against the violence and oppression of this absolute ruler, the very question can scarce be borne. They are ready to tell you that it deserves death only to ask after safety. Betwixt subject and subject, they will grant, there must be measures, laws, and judges for their mutual peace and security. But as for the ruler, he ought to be absolute, and is above all such circumstances; because he has a power to do more hurt and wrong, it is right when he does it. To ask how you may be guarded from or injury on that side, where the strongest hand is to do it, is presently the voice of faction and rebellion. As if when men, quitting the state of Nature, entered into society, they agreed that all of them but one should be under the restraint of laws; but that he should still retain all the liberty of the state of Nature, increased with power, and made licentious by impunity. This is to think that men are so foolish that they take care to avoid what mischiefs may be done for them by polecats or foxes;but are content, nay, think it safety, to be devoured by lions.

的确，在专制君主制以及世上其他政体之下，臣民可以诉诸法律和法官裁决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纠纷，并抑制他们相互间的任何暴行。人人都认为这是有必要的，并且相信任何试图剥夺这种权力的人都理应被视为社会和人类的公敌。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否出于对人类和社会的真爱，以及我们大家对彼此的那种慈爱之心。因为每一个热爱自己的权力、利益或是强大的人都可能会也必然会不让那些只为他的享乐和好处而辛苦劳作的牲畜相互残杀；它们之所以得到

照顾，并不是出于主人对它们的什么爱，而是出于主人对自己的爱，因它们带给他利益。倘若有人问道，在这种状态下有什么安全和保障可以抵御这个专制统治者的暴行和压迫，这个问题本身就不会被容忍。他们会立即告诉你，只要问起安全问题就当受死。他们会承认，为了共同的安宁和安全，在臣民之间必须有措施、法律和法官。但对统治者而言，他应该不受任何约束，高于所有这些情况之上；因为他有权做出更多的伤害和坏事，而当他这样做时是合法的。倘若你询问你何以受到保护，不受最强有力者之手的伤害，那么这马上会成为内讧和造反的声音。这就好像人们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时，他们同意，除了一个人以外，大家都该受制于法律一样；但这个人仍然保持在自然状态中的一切自由，这种自由随着他的权力而增加，最终他会因为不用受到惩罚而放肆。这就是说人们如此愚蠢，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狸猫和狐狸的伤害，却甘心被狮子吞食，却还觉得这是安全的。

But, whatever flatterers may talk to amuse people's understandings, it never hinders men from feeling; and when they perceive that any man, in what station soever, is out of the bounds of the civil society which they are of, and that they have no appeal, on earth, against any harm they may receive from him, they are apt to think themselves in the state of Nature, in respect of him whom they find to be so; and to take care, as soon as they can, to have that safety and security, in civil society, for which it was first instituted, and for which only they entered into it. And therefore, though perhaps at first, as shall be showed more at large hereafter, in the following part of this discourse, some one good and excellent man having got a pre-eminency amongst the rest, had this deference paid to his goodness and virtue, as to a kind of natural authority, that the chief rule, with arbitration of their differences, by a tacit consent devolved into his hands, without any other caution but the assurance they had of his uprightness and wisdom; yet when time giving authority, and, as some men would persuade

us, sacredness of customs, which the negligent and unforeseeing innocence of the first ages began, had brought in successors of another stamp, the people finding their properties not secure under the government as then it was (whereas government has no other end but the preservation of property [7_2]), could never be safe, nor at rest, nor think themselves in civil society, till the legislative was placed in collective bodies of men, call them senate, parliament, or what you please, by which means every single person became subject equally with other the meanest men, to those laws, which he himself, as part of the legislative, had established; nor could anyone, by his own authority, avoid the force of the law, when once made, nor by any pretence of superiority plead exemption, thereby to license his own, or the miscarriages of any of his dependants. [7_3] No man in civil society can be exempted from the laws of it. For if any man may do what he thinks fit and there be no appeal on earth for redress or security against any harm he shall do, I ask whether he be not perfectly still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so can be no part or member of that civil society, unless anyone will say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civil society are one and the same thing, which I have never yet found anyone so great a patron of anarchy as to affirm.

然而，无论阿谀奉承者如何愚弄人们的理智，愚弄人的话语从来无法麻痹人们的感觉；而当他们察觉不论处于何种地位的任何人不受他们所属之公民社会的约束，且他们对于可能源自他的伤害在人间却又无以诉诸时，他们会认为自己处于自然的状态，而且他们会发现，自己确实如此；此外，他们会尽可能快地在公民社会中享有安全和保障——这正是公民社会建立之最初目标，也是他们参与公民社会的唯一目的。因此，尽管最初（在下文将加以详述）也许有一个品性杰出的人在众人中脱颖而出，由于其善良和德行受到尊重，他被视为自然的权威，于是大家默许同意他享有主要的统治权，连同仲裁人们之间分歧的权力，大家只能信赖他的公正与明智，并无其他保证。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时代漫不经心和缺乏预见的天真心理所造成的种种惯例获得了权威（有些人会说服我们事实正是如此）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产生了另一种类型的继承者；那时，人民发现自己的财产在这个政府下不如以前那样有保障（而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财产 [8_2] ），他们永远不会感到安全或是安心，也不会认为自己处于公民社会中，直到他们把立法权交由人们的集合体为止（随你称它为参议院、议会或别的什么）。通过这种方式，每一个人和其他最卑微的人一样，都平等地受制于他自己作为立法机关的一部分所制定的法律。法律一旦制定，任何人都不能仗着自己的权威不受法律的约束；也不能打着地位优越的幌子，准许自己或是任何下属为非作歹而请求免除法律的制裁。 [8_3] 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无法免受其法律的制裁。因为倘若任何人都可以做他认为正当的事而对他造成的伤害在人世间却无法诉诸以获得赔偿或保障，我就想问，他不就仍完全处于自然状态中，因而无法成为那个公民社会中的一部分或一员吗？除非有人说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是同一事物，但我还从未见过如此支持无政府状态而这样断言的人。

[7_1]."The public power of all society is above every soul contained in the same society, and the principal use of that power is to give laws unto all that are under it, which laws in such cases we must obey, unless there be reason showed which may necessarily enforce that the law of reason or of God doth enjoin the contrary." Hooker, Eccl. Pol, l. i. 16.

[7_2]."At the first, when some certain kind of regimen was once appointed, it may be that nothing was then further thought upon for the manner of governing, but all permitted unto their wisdom and discretion which were to rule till, by experience, they found this for all parts very inconvenient, so as the thing which they had devised for a remedy did indeed but increase the sore which it should have cured. They saw that to live by one man's will became the cause of all men's misery. This constrained them to come unto laws wherein all men might see their duty beforehand, and know the penalties of transgressing them." Hooker, Eccl. Pol. l. i. sect. 10.

[7_3]."Civil law, being the act of the whole body politic, doth therefore overrule each several part of the same body." Hooker, ibid.

[8_1].“所有社会的公共权力超越处于这同一社会中的每个人，此权力的首要用途是为受这种权力支配的人所有人制定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遵从这法律，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证明，理性法则或上帝的法律有相违背之规定。”胡克，《宗教政治》，第1卷，第16节。

[8_2].“起初，当某种类型的政体一旦选定，可能人们当时没有进一步思考关于统治方式的问题，一切听任统治者凭他们的智慧和斟酌来支配，直到后来根据经验，他们才发现这对各方面都非常不便，于是他们设计了补救方法，但这些方法只是增加了它本该治愈的伤处。他们看到在一人的意志支配之下生活是造成所有人痛苦的原因。这就驱使他们制定法律，让所有人事先看到他们的义务，且知道违背这些法律将受到何种惩罚。”胡克，《宗教政治》，第1卷，第10节。

[8_3].“民法作为整个国家的行为，支配着同一政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胡克，同上。

Chapter VIII　Of the Beginning of Political Societies

第八章　论政治社会的发轫

Men being, as has been said, by nature all free, equal, and independent, no one can be put out of this estate and subjected to the political power of another without his own consent. The only way whereby any one divests himself of his natural liberty, and puts on the bonds of civil society, is done by agreeing with other men, to join and unite into a community for their comfortable, safe, and peaceable living, one amongst another, in a secure enjoyment of their properties, and a greater security against any that are not of it. This any number of men may do, because it injures not the freedom of the rest; they are left, as they were, in the liberty of the state of Nature. When any number of men have so consented to make one community or government, they are thereby presently incorporated, and make one body politic, wherein the majority have a right to act and conclude the rest.

如前所述，人生而自由、平等、独立，不经本人同意，不能将任何人从这种状态中抽离并使之受制于另一人的政治权力。任何人放弃自然自由并受到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的唯一方法只有：他与其他人同意为他们彼此间的舒适、安全与和平的生活而联结组成一个共同体，从而安全地享有他们的财产并拥有抵御共同体以外任何人侵犯的更大保障。任何人数的人群都可以这样做，因为它不会损害其余人的自由；他们仍然像从前一样保有自然状态中的自由。当任何数量的人群同意建立这样一个共同体或政府时，他们便由此立即结合并组成一个国家，其中大多数人有权代替其余人采取行动及做决定。

For when any number of men have, by the consent of every individual, made a community, they have thereby made that community one body, with a power to act as one body, which is only by the will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majority. For that which acts any community, being only the consent of the individuals of it, and it being necessary to that which is one body to move one way, it is necessary the body should move that way where the greater force carries it, which is the consent of the majority, or else it is impossible it should act or continue one body, one community, which the consent of every individual that united into it agreed that it should; and so everyone is bound by that consent to be concluded by the majority. And therefore we see that in assemblies empowered to act by positive laws where no number is set by that positive law which empowers them, the act of the majority passes for the act of the whole, and of course determines as having, by the law of Nature and reason, the power of the whole.

因为当任何数量之人通过每一个人的同意而组成一个共同体时，他们使得共同体成为一个整体，使之具有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权力，而这只有经过大多数人的同意和决定才能够办到。因为任何共同体只有经过它的每个人的同意才能行动，而作为一个整体又必须行动一致，那么这整体就有必要依照较大力量的方向行动，这较大的力量就是大多数人的赞同。否则它就不可能以一个整体、一个共同体的形式行动或继续存在，组成这个共同体的每一个人都同意它应该是这样的整体；所以每一个人根据这一同意而受约束于大多数人。因此，我们看到一些由实在法授权行动的议会，在实在法上并未规定授权议会之法定人数，这时，大多数人的行为被当成是整体的行为，而根据自然法和理性法则，当然也就决定了其具有整体的权力。

And thus every man, by consenting with others to make one

body politic under one government, puts himself under an obligation to everyone of that society to submit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ajority, and to be concluded by it; or else this original compact, whereby he with others incorporates into one society, would signify nothing, and be no compact if he be left free and under no other ties than he was in, before in the state of Nature. For what appearance would there be of any compact? What new engagement if he were no farther tied by any decrees of the society than he himself thought fit and did actually consent to? This would be still as great a liberty as he himself had before his compact, or anyone else in the state of Nature, who may submit himself and consent to any acts of it, if he thinks fit.

于是每一个人通过同意与其他人建立一个由政府管辖的国家，使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每一成员负有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并受大多数人约束的义务；否则那个他借以与其他人结合成为一个社会的原始契约就没有意义，而如果他仍像之前在自然状态中那样自由且只受其处于自由状态时之约束，那就不存在契约了。因为那样的话，契约哪里还有契约的样子呢？如果除了自己认为合适且实际上通过了的法令，他不受这个社会的任何法令之约束，那么他还担负什么新义务呢？这样就还是像他签订契约之前或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任何人所享有的自由一样大，可以在他认为恰当时服从和同意社会的任何法令。

For if the consent of the majority shall not in reason be received as the act of the whole, and conclude every individual, nothing but the consent of every individual can make anything to be the act of the whole, which, considering the infirmities of health and avocations of business, which in a number though much less than that of a commonwealth, will necessarily keep many away from the public assembly; and the variety of opinions and

contrariety of interests which unavoidably happen in all collections of men, it is next impossible ever to be had. And, therefore, if coming into society be upon such terms, it will be only like Cato's coming into the theatre, only to go out again. Such a constitution as this would make the mighty leviathan of a shorter duration than the feeblest creatures, and not let it outlast the day it was born in, which cannot be supposed till we can think that rational creatures should desire and constitute societies are only to be dissolved. For where the majority cannot conclude the rest, there they cannot act as one body, and consequently will be immediately dissolved again.

因为倘若大多数人的同意不能被合理地接受为全体的行为并约束每一个人，那么只有每一个人的同意才能使任何行为成为全体的行为；而考虑到许多人因病、因事必然不能参加集会，尽管这数目远少于一个联合体的人数，加之在各种人的集合体中会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意见不合和利益冲突，但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达成这样的一致。因此，倘若基于这样的条件进入社会，那就只会像加图进剧院，一进去就出来。像这样的组成会使强大的利维坦 [9_1] 比最弱小的生物还短命，使它无法活过出生的当天，这是无法想象的，除非我们认为理性动物想要组成社会只是为了让之解散。因为，若大多数无法替其余的人做决定，他们就无法以一个整体来行事，其结果将会是立即再次解体。

Whosoever, therefore, out of a state of Nature unite into a community, must be understood to give up all the power necessary to the ends for which they unite into society to the majority of the community, unless they expressly agreed in any number greater than the majority. And this is done by barely agreeing to unite into one political society, which is all the compact that is, or needs be,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that enter into or make up a

commonwealth. And thus, that which begins and actually constitutes any political society is nothing but the consent of any number of freemen capable of majority, to unite and incorporate into such a society. And this is that, and that only, which did or could give beginning to any lawful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因此，任何脱离自然状态而联合成一个共同体的人，必然会为了让共同体多数人联合成一个社会而放弃所必须放弃的全部权力，除非他们的人数超过大多数，并明确约定不用放弃权力。只要同意联合成一个政治团体，就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加入或组成一个国家的个人之间现存的或必须具备的全部契约。因此，任何政治社会的开端和实际组成不过是一些能够服从大多数的自由人同意联合并组成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且只有这样，世界上才出现过或才可能会出现任何合法的政府。

To this I find two objections made: 1. That there are no instances to be found in the story of a company of men, independent and equal one amongst another, that met together, and in this way began and set up a government. 2. It is impossible of right that men should do so, because all men, being born under government, are to submit to that, and are not at liberty to begin a new one.

对于这一点有两种反对意见：第一，一群彼此独立而平等的人聚在一起，以这种方式开始并组成一个政府，在历史上并无先例；第二，人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所有人既然生来就处于政府的管辖下，他们就要服从于那个政府，而没有权利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To the first there is this to answer: that it is not at all to be wondered that history gives us but a very little account of men that lived together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e inconveniences of that condition, and the love and want of society, no sooner brought any number of them together, but they presently united and incorporated, if they designed to continue together. And if we may not suppose men ever to have bee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because we hear not much of them in such a state, we may as well suppose the armies of Salmanasser or Xerxes were never children, because we hear little of them till they were men and embodied in armies. Government is everywhere antecedent to records, and letters seldom come in amongst a people till a long continuation of civil society has, by other more necessary arts, provided for their safety, ease, and plenty. And then they begin to look after the history of their founders, and search into their original when they have outlived the memory of it. For it is with commonwealths as with particular persons, they are commonly ignorant of their own births and infancies; and if they know anything of their original, they are beholden for it to the accidental records that others have kept of it. And those that we have of the beginning of any polities in the world, excepting that of the Jews, where God Himself immediately interposed, and which favours not at all paternal dominion, are all either plain instances of such a beginning as I have mentioned, or at least have manifest footsteps of it.

对于第一个反对意见的回答是：历史仅为我们提供极少数关于人们群居在自然状态中的叙述，这不足为奇。自然状态下存在不便之处，人们喜欢社会却又没有社会，很快就会让任何数量的人聚集在一起，倘若他们想要继续在一起的话，这些人就立即联合并组成一个社会。倘若我们因很少得悉人们处于自然状态的情况，而不能推测人们曾经处于那样的状态中，那么我们也可以因为没有听说过撒缦以色王

或是薛西斯一世的军队在成人并入编以前的情况，就推测他们从未经历过童年了。无论在哪里，政府都先于记载而存在，而一个民族只有等到持续长久的公民社会通过其他更必需的技艺为人们提供安全、舒适和富足的生活后才会使用文字。此后，当有关创始人的记忆都不存在的时候，人们会开始追述创始人的历史，开始寻根溯源。因为国家就如同个人一样，它们通常对于自己的出生和婴儿期的情况一无所知；而就算它们知道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也是通过参看他人所保存的偶然记载而得来的。那些我们已有的世界上任何政体之起源，除了上帝自己直接干预其中的犹太民族（它完全不赞成父权统辖），全部都是我所说的那种起源之明显示例，或至少有它的显然迹象。

He must show a strange inclination to deny evident matter of fact, when it agrees not with his hypothesis, who will not allow that the beginning of Rome and Venice were by the uniting together of several men, free and independent one of another, amongst whom there was no natural superiority or subjection. And if Josephus Acosta's word may be taken, he tells us that in many parts of America there was no government at all.“There are great and apparent conjectures,” says he, “that these men (speaking of those of Peru) for a long time had neither kings nor commonwealths, but lived in troops, as they do this day in Florida—the Cheriquanas, those of Brazil, and many other nations, which have no certain kings, but, as occasion is offered in peace or war, they choose their captains as they please”. [8_1] If it be said, that every man there was born subject to his father, or the head of his family. that the subjection due from a child to a father took away not his freedom of uniting into what political society he thought fit, has been already proved; but be that as it will, these men, it is evident, were actually free; and whatever superiority some politicians now would place in any of them, they themselves claimed it not; but, by consent, were all equal, till, by the same consent, they set rulers over themselves.

So that their politic societies all began from a voluntary union, and the mutual agreement of men freely acting in the choice of their governors and forms of government.

如果一个人不承认罗马和威尼斯的创始之源是一些彼此自由独立且没有自然优越或臣属之分的人们相互结合，在明显的事实与他的假设不相符时，他一定会奇怪地倾向于否定事实。倘若可以引用约瑟夫斯·阿科斯塔 [9_2] 的话，他会告诉我们在美洲的许多地方，以前根本没有政府的存在。他说道："根据有力且明显的推测，这些人（秘鲁原住民）有很长一段时间既没有国王也没有国家，而是在军队里生活，正如今天的佛罗里达人、巴西的吉里夸那人以及许多其他民族那样，他们没有确定的国王，仅仅是在和平或战争的重大场合，他们才随自己喜欢选出他们的首领。" [9_3] 如果说那里的每一个人生来就要服从他的父亲或是他的家长，如前已证，一个孩子对父亲的臣服并不能剥夺他加入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政治社会之自由。但即便如此，显然这些人实际上是自由的。不管一些政客现在想要给他们中的一些人以什么优越地位，他们自己却没有这样要求；经过同意他们全都平等，直到他们以一样的同意将统治者置于他们之上。因此他们的政治社会都源自一种自愿结合体及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之相互协定。

And I hope those who went away from Sparta with Palantus, mentioned by Justin, [8_2] will be allowed to have been freemen independent one of another, and to have set up a government over themselves by their own consent. Thus I have given several examples out of history of people, free and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at, being met together, incorporated and began a commonwealth. And if the want of such instances be an argument to prove that government were not nor could not be so begun, I suppose the contenders for paternal empire were better let it alone than urge it

against natural liberty; for if they can give so many instances out of history of governments begun upon paternal right, I think (though at least an argument from what has been to what should of right be of no great force) one might, without any great danger, yield them the cause. But if I might advise them in the case, they would do well not to search too much into the original of governments as they have begun de facto, lest they should find at the foundation of most of them something very little favourable to the design they promote, and such a power as they contend for.

我希望查士丁 [9_4] 所提到的那些跟巴兰杜斯一起离开斯巴达的人 [9_5] 会被视作彼此独立的自由人，且他们曾经经过自己的同意建立了一个统治他们的政府。如此我已经从自由的及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民族之历史中得出一些例子，那些人们聚集在一起，联合起来并开创一个共同体。倘若缺乏这种例子可以证明政府不是也不可能这样开始，那我以为父权帝国的主张者比起用这种论调来反对自然之自由，还不如放弃它来得更好。因为倘若他们能从历史中举出如此多的例子来证明政府源于父权（尽管用这种至少存在过的论据来证明应当有过的事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我想一个人就此问题向他们让步不会有任何大的危险。然而，倘若我能在这个问题上给他们建议，那他们最好不要如他们实际上已经开始的那样去过分探寻政府之起源，以免他们发现在政府之基础上的大部分东西对他们所提倡的布局和他们所主张的那种权力是非常不利的。

But, to conclude: reason being plain on our side that men are naturally free; and the examples of history showing that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that were begun in peace, had their beginning laid on that foundation, and were made by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there can be little room for doubt, either where the right is, or what has been the opinion or practice of mankind about

the first erecting of governments.

最终的结论为：我们关于人生而自由的论证显然是有道理的，而历史的实例又显示世界上那些在和平中创建的政府都是以此基础为开端，经过人民的同意而建立；因此，关于最初建立政府的权利从哪里来，或那时人类对建立政府的看法或实践是什么，都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

I will not deny that if we look back, as far as history will direct us, towards the original of commonwealths, we shall generally find them under the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one man. And I am also apt to believe that where a family was numerous enough to subsist by itself, and continued entire together, without mixing with others, as it often happens, where there is much land and few people, the government commonly began in the father. For the father having, by the law of Nature, the same power, with every man else, to punish, as he thought fit, any offences against that law, might thereby punish his transgressing children, even when they were men, and out of their pupilage; and they were very likely to submit to his punishment, and all join with him against the offender in their turns, giving him thereby power to execute his sentence against any transgression, and so, in effect, make him the law-maker and governor over all that remained in conjunction with his family. He was fittest to be trusted; paternal affection secured their property and interest under his care, and the custom of obeying him in their childhood made it easier to submit to him rather than to any other. If, therefore, they must have one to rule them, as government is hardly to be avoided amongst men that live together, who so likely to be the man as he that was their common father, unless negligence, cruelty, or any other defect of mind or body,

made him unfit for it? But when either the father died, and left his next heir—for want of age, wisdom, courage, or any other qualities—less fit for rule, or where several families met and consented to continue together, there, it is not to be doubted, but they used their natural freedom to set up him whom they judged the ablest and most likely to rule well over them. Conformable hereunto we find the people of America, who(living out of the reach of the conquering swords and spreading domination of the two great empires of Peru and Mexico) enjoyed their own natural freedom, though, caeteris paribus, they commonly prefer the heir of their deceased king; yet, if they find him any way weak or incapable, they pass him by, and set up the stoutest and bravest man for their ruler.

我不会否认，倘若我们根据历史线索尽可能远地追溯国家起源，我们通常会发现它们总是受一个人的统治和管理。我也倾向于相信当一个家庭的成员多得足以自给自足，且继续整体延续而不与其他人混合（地广人稀的地方时常发生这种情况）时，政府一般发端于父亲。因为父亲根据自然法，与其他每一个人享有同样的权力，即当他认为恰当时去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任何罪行，因此也可以惩罚他那犯法的子女，即使当他们已经成人并脱离了被监护人的状态；而他们很可能甘受他的处罚，且全都会与他一块抗击犯罪者，由此就赋予他执行判决任何犯罪的权力，从而事实上使他成为所有与他的家族联合在一起的人们的立法者和统治者。他是被信任的最佳人选；父亲的爱使他们的财产和利益在他照料下得以保障；而他们在年幼时对他服从的习惯使他们对他臣服比对任何其他人臣服来得更容易。因此，倘若他们必须要有一个人来统治他们，像群居的人们中间不可避免地要有政府那样，那么除非粗心大意、生性残忍或是其他任何的身心缺陷使他不能胜任外，还有谁能像他——他们共同的父亲那样适合成为这个人呢？然而，当父亲死了，留下他的下任继承人——尚未成年，缺乏智慧、勇气或其他任何品质——不适合于统治，或几个家族聚在一起并同意

继续群居，在那里，毫无疑问，他们行使自己自然的自由来立下他们认为最能干且最有可能恰当地统治他们的人。到此为止情况是一致的，我们发现美洲人——他们还没有受到秘鲁和墨西哥两大帝国的武力征服和扩张统治——享受着他们自己自然的自由，尽管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们通常更偏爱他们已故国王的嗣子，但倘若他们发现他软弱无能，他们就会撇开他，另行选立最强壮和最勇敢的人做他们的统治者。

Thus, though looking back as far as records give us any account of peopling the world, and the history of nations, we commonly find the government to be in one hand, yet it destroys not that which I affirm, viz., that the beginning of politic society depends upon the consent of the individuals to join into and make one society, who, when they are thus incorporated, might set up what form of government they thought fit. But this having given occasion to men to mistake and think that, by Nature, government was monarchical, and belonged to the father, it may not be amiss here to consider why people, in the beginning, generally pitched upon this form, which, though perhaps the father's pre-eminency might, in the first institution of some commonwealths, give a rise to and place in the beginning the power in one hand, yet it is plain that the reason that continued the form of government in a single person was not any regard or respect to paternal authority, since all petty monarchies, that is, almost all monarchies, near their original, have been commonly, at least upon occasion, elective.

因此，尽管我们尽可能早地追溯任何有关世界上人口聚居和各民族历史的记载，我们通常发现政府是掌控在一个人手里的；但这并不能摧毁我所肯定的，即政治社会的起源依赖于加入和组成这一社会的每一个人的同意；而当他们如此结合成一个整体时，他们就可以建立

他们认为恰当的政府形式。然而，因为这样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认为政府就是君主制的，并且属于父亲，我们在这里研究一下为什么人们一开始通常选定这种政府形式，这个问题也并非不合时宜。尽管也许在一些国家最初建立时，父亲的优越地位可能会促使并在一开始将权力交于某一人之手，然而，明显的是，这种权力集于一人之手的政府形式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并不是出于对父权的任何敬意或尊重，因为所有小的君主国，也就是几乎所有的君主国，在接近它们起源的时候，通常或至少有时是选举产生的。

First then, in the beginning of things, the father's government of the childhood of those sprung from him having accustomed them to the rule of one man, and taught them that where it was exercised with care and skill, with affection and love to those under it, it was sufficient to procure and preserve men (all the political happiness they sought for in society), it was no wonder that they should pitch upon and naturally run into that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from their infancy, they had been all accustomed to, and which, by experience, they had found both easy and safe. To which if we add, that monarchy being simple and most obvious to men, whom neither experience had instructed in forms of government, nor the ambition or insolence of empire had taught to beware of the encroachments of prerogative or the inconveniences of absolute power, which monarchy, in succession, was apt to lay claim to and bring upon them; it was not strange at all that they should not much trouble themselves to think of methods of restraining any exorbitances of those to whom they had given the authority over them, and of balancing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by placing several parts of it in different hands. They had neither felt the oppression of tyrannical dominion, nor did the fashion of the age, nor their possessions or way of living, which afforded little matter for covetousness or ambition, give them any reason to apprehend or

provide against it; and, therefore, it is no wonder they put themselves into such a frame of government as was not only, as I said, most obvious and simple, but also best suited to their present state and condition, which stood more in need of defence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s and injuries than of multiplicity of laws. The equality of a simple poor way of living, confining their desires within the narrow bounds of each man's small property, made few controversies, and so no need of many laws to decide them, or variety of officers to superintend the process, or look after the execution of justice, where there were but few trespassers and few offenders. Since, then, those who liked one another so well as to join into society cannot but be supposed to have some acquaintance and friendship together, and some trust one in another, they could not but have greater apprehensions of others than of one another; and, therefore, their first care and thought cannot but be supposed to be, how to secure themselves against foreign force. It was natural for them to put themselves under a frame of government which might best serve to that end, and choose the wisest and bravest man to conduct them in their wars and lead them out against their enemies, and in this chiefly be their ruler.

首先，在开始的时候，父亲对其亲生子女在幼年时期的统治使他们习惯于受一个人的统治，并使他们明白只要这种统治是对被统治者的关怀、循循善诱、感情和喜爱，就足以取得和保护人们在社会中所寻求的所有政治幸福。子女们要选定并自然而然组成那种政府形式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从儿时起他们就完全习惯，并且，根据经验，觉得这种形式既简便又安全。倘若对此进行补充，我们还可以说君主制对人们来说最为简单明了，因为经验没有告诉他们政府有各种形式，帝国的野心或蛮横也没有给他们以教训，让他们谨防特权的侵蚀和专制权力的骚扰，而特权和专制权力正是不断继承的君主宣称拥有并施加于臣民的。所以无需奇怪为何这些臣民没有费心去想出一些办法，

来限制那些他们赋予其权力却支配他们的人的任何不当行为，以及通过将政府的权力分别掌握在不同人手里来平衡政府的权力。他们没有感受过暴君统治的压迫，而时代风气和他们那一点都不足以构成贪婪或野心的财产和生活方式也没有给他们任何理由去担忧或防范这种压迫，因此难怪他们将自己置身于这种不仅如我所说是最为简单明了的而且是最适合他们当时的状态和情况的政府框架下，因为他们当时的处境更多地需要抵御外来入侵和伤害而不是法律的多样性。一种简单而贫乏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平等把他们的欲望局限在各人很少的财产范围内，就很少造成矛盾，因而不需要很多的法律来加以裁决，同时又很少有违法者和犯罪者，所以不需要各种官员来指导和监督法律的执行。既然当时人们情意相投地加入了社会，他们只好被假定相互认识、彼此友爱，而且只能假定一些人彼此信任，他们对外人的猜疑只能比对彼此间的猜疑要大，所以他们首要关心和考虑的，只能被认为是如何抵御外来入侵以保护自己。自然而然地，他们使自己置身于一个最能服务于这个目的的政体之下，选出最贤明和最勇敢的人在战争中指挥他们，带领他们去攻打他们的敌人，因而主要在这方面做他们的统治者。

Thus we see that the kings of the Indians in America, which is still a pattern of the first ages in Asia and Europe, whilst the inhabitants were too few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want of people and money gave men no temptation to enlarge their possessions of land or contest for wider extent of ground, are little more than generals of their armies; and though they command absolutely in war, yet at home, and in time of peace, they exercise very little dominion, and have but a very moderate sovereignty, the resolutions of peace and war being ordinarily either in the people or in a council, though the war itself, which admits not of pluralities of governors, naturally devolves the command into the king's sole authority.

于是我们看到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国王——美洲仍是亚洲和欧洲原始时代的一种模式，那里地广人稀，人力和财力的缺乏使人没有欲念去扩大他们的土地，亦不会为扩大土地范围而争斗——只是他们军队的将领；尽管这些国王在战争中具有绝对的指挥权，但在和平时期，他们在国家行使很小的统治权，而且只有非常有限的主权。和平与战争的决定权一般由人民或议会掌握，而由于战争本身不容许有多人来领导，指挥权就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国王一人之权力。

And thus, in Israel itself, the chief business of their judges and first kings seems to have been to be captains in war and leaders of their armies, which (besides what is signified by “going out and in before the people,” which was, to march forth to war and home again in the heads of their forces) appears plainly in the story of Jephtha. The Ammonites making war upon Israel, the Gileadites, in fear, send to Jephtha, a bastard of their family, whom they had cast off, and article with him, if he will assist them against the Ammonites, to make him their ruler, which they do in these words: “And the people made him head and captain over them”, [8_3] which was, as it seems, all one as to be judge. “And he judged Israel” [8_4] —that is, was their captain-general"six years.” So when Jotham upbraids the Shechemites with the obligation they had to Gideon, who had been their judge and ruler, he tells them: “He fought for you, and adventured his life for you, and delivered you out of the hands of Midian”. [8_5] Nothing mentioned of him but what he did as a general, and, indeed, that is all what found in his history, or in any of the rest of the judges. And Abimelech particularly is called king, though at most he was but their general. And when, being weary of the ill -conduct of Samuel's sons, the children of Israel desired a king, “like all the nations, to judge them, and to go out before them, and to fight their battles”, [8_6] God, granting their desire, says to Samuel, “I will send thee a man, and thou shalt

anoint him to be captain over my people Israel, that he may save my people out of the hands of the Philistines”. [8_7] As if the only business of a king had been to lead out their armies and fight in their defence; and, accordingly, at his inauguration, pouring a vial of oil upon him, declares to Saul that “the Lord had anointed him to be captain over his inheritance”. [8_8] And therefore those who, after Saul being solemnly chosen and saluted king by the tribes at Mispah, were unwilling to have him their king, made no other objection but this, “How shall this man save us?“ [8_9] as if they should have said: “this man is unfit to be our king, not having skill and conduct enough in war to be able to defend us.” And when God resolved to transfer the government to David, it is in these words: “But now thy kingdom shall not continue: the Lord hath sought Him a man after His own heart, and the Lord hath commanded him to be captain over His people”. [8_10] As if the whole kingly authority were nothing else but to be their general; and therefore the tribes who had stuck to Saul's family, and opposed David's reign, when they came to Hebron with terms of submission to him, they tell him, amongst other arguments, they had to submit to him as to their king, that he was, in effect, their king in Saul's time, and therefore they had no reason but to receive him as their king now. “Also,” say they, “in time past, when Saul was king over us, thou wast he that leddest out and broughtest in Israel, and the Lord said unto thee, Thou shalt feed my people Israel, and thou shalt be a captain over Israel.” [8_11]

因此，就以色列民族本身而言，他们的士师和早期国王的主要职责似乎就是担任战时的首领和军队的统帅（不仅是“出入时身先民众”所表明的那样，即出征和归来时都走在队伍的前面），这一点在耶弗他的故事里说得清楚明白。亚扪人向以色列开战，基列人在惊恐之中派人去把耶弗他请回来。耶弗他本是基列族人的私生子，是被他

们赶走的。此时他们与耶弗他立约，说倘若耶弗他愿意帮他们抵抗亚扪人，他们就立他为他们的统治者。《圣经》里是这样记载此事的："百姓就立耶弗他作领袖、作元帅"[9_6]，这似乎就等于立他为士师。所以《圣经》又说，"他作以色列的士师"[9_7]，也就是他做了他们六年的统帅。因此当约坦责备示剑人背弃了曾是他们的士师和统治者的基甸时，他对他们说道："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争战，救你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9_8]。《圣经》中除了提到他曾作为将军所做的事情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记载。的确，这就是在他的历史中或其他任何士师的历史中所能看到的所有情况。亚比米勒被特别称为国王，尽管他至多不过是示剑人的将军。当以色列的百姓由于厌恶撒母耳的儿子之恶行而想要立一个国王，"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他们，统领他们，为他们争战"[9_9]，这时上帝应允了他们的要求，对撒母耳说："我必使一个人到你这里来，你要他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9_10]。仿佛国王的唯一职责就是率领他们的军队，为保护他们而战。因此，在扫罗登基时，撒母耳将一瓶膏油浇在扫罗的头上，对他宣布："耶和华膏他作为他产业的君"。[9_11] 所以当以色列的各族人在米斯巴庄严地推选并欢呼扫罗为国王之后，那些不愿意立他为国王的人也只能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这人怎能救我们呢？"[9_12] 仿佛他们本想说："这个人不适合做我们的国王，他在战争中没有足够的谋略和才干来保护我们。"当上帝决定把统治权转交给大卫时，这样说道："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9_13] 仿佛国王的全部权威只是做他们的将军，所以那些仍旧忠于扫罗家族、反对大卫登上王位的以色列各族带着臣服于他的条件来到希伯仑，除去其他的理由，他们告诉他说，他们不得不像臣服于他们的国王那样臣服于他，因为在扫罗时期，他事实上已是他们的王，因此他们现在没有理由不接纳他为他们的国王。他们说："从前扫罗作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9_14]

Thus, whether a family, by degrees, grew up into a

commonwealth, and the fatherly authority being continued on to the elder son, everyone in his turn growing up under it tacitly submitted to it, and the easiness and equality of it not offending anyone, everyone acquiesced till time seemed to have confirmed it and settled a right of succession by prescription; or whether several families, or the descendants of several families, whom chance, neighbourhood, or business brought together, united into society; the need of a general whose conduct might defend them against their enemies in war, and the great confidence the innocence and sincerity of that poor but virtuous age, such as are almost all those which begin governments that ever come to last in the world, gave men one of another, made the first beginners of commonwealths generally put the rule into one man's hand, without any other express limitation or restraint but what the nature of the thing and the end of government required; whichever of those it was that at first put the rule into the hands of a single person, certain no body was intrusted with it but for the public good and safety, and to those ends, in the infancies of commonwealths, those who had it commonly used it; and unless they had done so, young societies could not have subsisted. Without such nursing fathers tender and careful of the public weal, all governments would have sunk under the weakness and infirmities of their infancy, the prince and the people had soon perished together.

因此，一个家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父亲的权威会由长子继承，在这种权威下成长起来的每一个人都默默地臣服于它，而这种统治自在而和平，并不侵害任何人，每个人都默认这种统治，直至时间的推移似乎确认了这种统治，且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继承的权利；或者是，几个家族或几个家族的后裔因机缘巧合、毗邻而居或事务联系而聚在一起，组合成为一个社会——无论是哪种情况，人们都需要一位能够在战争中指挥他们抵御敌人的将军，而且在那艰苦而道德高

尚的时代，天真和诚实使人们彼此深信不疑（世界上能够延续下来的政府在其开始时几乎都是这样）。这就使国家的最初创立者们通常把统治权交由一个人之手，除了事情的本质及政府的目的所需，没有其他任何明确的限制或约束。不论当初是哪种情况使统治权归为一人，可以肯定地说，把统治权交付于一人之手，只是为了公众的福利和安全；且在建国初期，他们通常是为了这些目的而行使统治权的。倘若他们不那样做，年幼的国家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倘若没有这种保姆式的父亲，倘若没有统治者的悉心照料和审慎安排公共福利，所有政府都会在它们建国初期的软弱和和孱弱中消亡，而其君主和臣民也很快一并灭亡。

But though the golden age (before vain ambition, and amorsceleratushabendi, evil concupiscence had corrupted men's minds into a mistake of true power and honour) had more virtue, and consequently better governors, as well as less vicious subjects; and there was then no stretching prerogative on the one side to oppress the people, nor, consequently, on the other, any dispute about privilege, to lessen or restrain the power of the magistrate; and so no contest betwixt rulers and people about governors or government. Yet, when ambition and luxury, in future ages, [8_12] would retain and increase the power, without doing the business for which it was given, and aided by flattery, taught princes to have distinct and separate interests from their people, men found it necessary to examine more carefully the original and rights of government, and to find out ways to restrain the exorbitances and prevent the abuses of that power, which they having entrusted in another's hands, only for their own good, and they found was made use of to hurt them.

但是，黄金时代（在自负的野心、邪恶的占有欲和不正之风腐蚀

人的心智，使人们曲解权力和荣誉的真正意义之前）具有更多的美德，因此有较好的统治者和不那么顽劣的臣民。那时，一方面没有不断扩张的特权以压迫人民；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关于特权的争执以削减或限制行政长官的权力，所以统治者和臣民之间也没有发生有关统治者或政府问题的斗争。然而到了后世， [9_15] 野心和奢侈驱使君主保持和扩大权力，而不去做人们当初授予他权力时要他做的事，再加上阿谀奉承使君主认为自己的利益与他们的臣民截然不同且不相关联，于是人们感到有必要更为仔细地考察政府的起源和权利，并找出限制专横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他们原先把那权力交付于另一个人之手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现在却发现那权力被用来损害他们了。

Thus we may see how probable it is that people were naturally free, and, by their own consent, either sub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ir father, or united together, out of different families, to make a government, should generally put the rule into one man's hands, and choose to be under the conduct of a single person, without so much, as by express conditions, limiting or regulating his power, which they thought safe enough in his honesty and prudence; though they never dreamed of monarchy being lure Divino, which we never heard of among mankind till it was revealed to us by the divinity of this last age, nor ever allowed paternal power to have a right to dominion or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all government. And thus much may suffice to show that, as far as we have any light from history, we have reason to conclude that all peaceful beginnings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laid in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I say “peaceful”, because I shall have occasion, in another place, to speak of conquest, which some esteem a way of beginning of governments.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的情况是完全可能的：人生而自由，并

根据他们自己的同意要么服从于他们父亲的统治，要么由不同的家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府。他们一般将统治权交到一个人手里，自愿受一个人的统治，没有以明确的条件来限制或控制他的权力，因为他们认为权力在他诚实和谨慎地掌握下十分安全。尽管他们从未梦想过君主政体是神授的，而在现代神学未向我们揭示这种说法之前，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观念；他们也从未允许父权拥有一种支配权或成为所有政权的基础。因此有许多证据足以证明，就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线索看来，我们有理由断定政府一切和平的起源都是建立在人民同意之基础上。我之所以说是“和平的”，是因为在其他地方我将有必要谈到征服，有些人认为它是政府起源的一个途径。

The other objection, I find, urged against the beginning of polities, in the way I have mentioned, is this, viz.

对于我所阐述的政府之起源，我发现有另外一种反对意见，即：

> “That all men being born under government, some or other, it is impossible any of them should ever be free and at liberty to unite together and begin a new one, or ever be able to erect a lawful government.”

“既然所有人生而受制于这个或那个政府，他们中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自由而随意地联合起来创立一个新的政府，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合法的政府。”

If this argument be good, I ask, how did so many lawful

monarchies come into the world? For if anybody, upon this supposition, can show me anyone man, in any age of the world, free to begin a lawful monarchy, I will be bound to show him ten other free men at liberty, at the same time, to unite and begin a new government under a regal or any other form. It being demonstration that if anyone born under the dominion of another may be so free as to have a right to command others in a new and distinct empire, everyone that is born under the dominion of another may be so free too, and may become a ruler or subject of a distinct separate government. And so, by this, their own principle, either all men, however born, are free, or else there is but one lawful prince, one lawful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and then they have nothing to do but barely to show us which that is, which, when they have done, I doubt not but all mankind will easily agree to pay obedience to him.

倘若此观点正确，试问世界上怎会有那么多合法的君主国呢？因为倘若有人能根据这个论断向我证明任何一个人在这世上的任何时代都能自由地创立一个合法的君主国，我就一定要向他指出有其他十个自由人也能自由地联合起来创建一个新的君主制或其他形式的政体。显而易见，倘若一个生而受另一人支配的人可以如此自由，以至于自己有权建立一个新的王国来支配他人，那么每一个生而受另一个人支配的人也可以如此自由，可以成为另一个政府统治者或臣民。因此，依据他们自己的这个原则，要么所有人无论出生如何都是自由的，要么全世界只有一个合法的君主和一个合法的政府。那么他们无需做任何事，只要向我们说明两者之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即可。当他们做出说明之后，我深信全人类都会毫不犹豫地对他表示服从。

Though it be a sufficient answer to their objection to show that it involves them in the same difficulties that it doth those they use

it against, yet I shall endeavour to discover the weakness of this argument a little farther. “All men,” say they, “are born under government, and therefore they cannot be at liberty to begin a new one. Everyone is born a subject to his father or his prince, and is therefore under the perpetual tie of subjection and allegiance.” It is plain that mankind never owned nor considered any such natural subjection that they were born in, to one or to the other, that tied them, without their own consents, to a subjection to them and their heirs.

尽管这足以回应他们的反对意见，证明这个观点在使那些他们所反对的人陷入困境的同时也使他们自己陷于同样的困境，但我仍要努力进一步揭示这个观点的薄弱之处。他们说：“所有人都生而受制于政府，因此他们不能自由地创立一个新政府。每一个人生来就服从于他的父亲或君主，所以他永远都要受到从属和忠诚的束缚。”显而易见，人类从未承认或考虑过这种他们生而处于其中的自然臣属于这个或那个人的状态，这种状态未经人们的同意就使他们臣服于这些人或其后代。

For there are no examples so frequent in history, both sacred and profane, as those of men withdrawing themselves and their obedience from the jurisdiction they were born under, and the family or community they were bred up in, and setting up new governments in other places, from whence sprang all that number of petty commonwealths in the beginning of ages, and which always multiplied as long as there was room enough, till the stronger or more fortunate swallowed the weaker; and those great ones, again breaking to pieces, dissolved into lesser dominions, all which are so many testimonies against paternal sovereignty, and plainly prove that it was not the natural right of the father

descending to his heirs that made governments in the beginning; since it was impossible, upon that ground, there should have been so many little kingdoms; all must have been but only one universal monarchy if men had not been at liberty to separate themselves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the government, be it what it will that was set up in it, and go and make distinct commonwealths and other governments as they thought fit.

因为无论是在宗教史还是在世俗史里，下面的例子总是最常见的：有些人从生来就从受的管辖中及养育他们的家庭或社会中退出，不再服从，而在别处建立新的政府，由此产生了历史初期的众多小国。只要有足够的地方，小国的数量就总是不断增加，直到更强或更为幸运的国家吞并了弱小的国家，而那些大国又分裂成许多小国。所有这些都是父系统治权的大量反证，清楚地证明最初构成政府的并非世代相传的父亲的自然权利，因为基于这种观点，倘若人们当时没有自由地脱离他们的家庭和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政府，并去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形式建立不同的国家和其他政府的话，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小王国而只有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君主国。

This has been the practice of the world from its first beginning to this day; nor is it now any more hindrance to the freedom of mankind, that they are born under constituted and ancient polities that have established laws and set forms of government, than if they were born in the woods amongst the unconfined inhabitants that run loose in them. For those who would persuade us that by being born under any government, we are naturally subjects to it, and have no more any title or pretence to the freedom of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have no other reason (bating that of paternal power, which we have already answered) to produce for it, but only because our fathers or progenitors passed away their natural liberty,

and thereby, bound up themselves and their posterity to a perpetual subjection to the government which they themselves submitted to. It is true that whatever engagements or promises anyone made for himself, he is under the obligation of them, but cannot by any compact whatsoever bind his children or posterity. For his son, when a man, being altogether as free as the father, any act of the father can no more give away the liberty of the son than it can of anybody else. He may, indeed, annex such conditions to the land he enjoyed, as a subject of any commonwealth, as may oblige his son to be of that community, if he will enjoy those possessions which were his father's, because that estate being his father's property, he may dispose or settle it as he pleases.

这就是世界上从古至今的实际情况。对于那些生在拥有既定法律和固定政体组织并通过选举产生的古老国家的现代人而言，他们所享有的自由并不比他们生在森林里并处于那些无拘无束的野人中要受更多的限制。因为那些要我们相信我们既生而处于任何政府之下，就自然是它的臣民，不再有任何权利或借口享有自然状态的自由的人们，他们提不出其他理由作为论据（除了我们已经回复过的关于父权的理由之外），他们的论据只是：因为我们的父亲或祖先放弃了他们的自然自由，使得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代必须永远臣服于他们自己所服从的政府。的确，任何人无论立下了任何约定或是许下任何承诺，他都有履行的义务，但他不能以任何契约约束他的子女或后代。因为儿子成年后完全同他的父亲一样自由，父亲的任何行为都不能剥夺儿子的自由，正如他不能剥夺其他任何人的自由那样。诚然，他可以把这样的条件附加在他作为任何国家的一个臣民所享有的土地之上，从而迫使他的儿子成为那个国家的臣民，倘若儿子要享有他父亲的财产的话，因为地产既然是父亲的财产，他就可以对地产进行随意处置或安排。

And this has generally given the occasion to the mistake in this matter; because commonwealths not permitting any part of their dominions to be dismembered, nor to be enjoyed by any but those of their community, the son cannot ordinarily enjoy the possessions of his father but under the same terms his father did, by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society, whereby he puts himself presently under the government he finds there established, as much as any other subject of that commonwealth. And thus, the consent of freemen, born under government, which only makes them members of it, being given separately in their turns, as each comes to be of age, and not in a multitude together, people take no notice of it, and thinking it not done at all, or not necessary, conclude that they are naturally subjects as they are men.

这一点常常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误解。因为国家既不允许其领土的任何部分被分裂，也不允许除了其臣民以外的任何人享有，因此儿子通常只有在他父亲所处的同样条件下，即成为那个社会中的一员时，才能享有他父亲的财产。由此，他就同那个国家中的任何其他臣民一样，立即使自己受制于那个他发现已经建立的政府。因此生而受制于政府的自由人，只有他们的同意才能成为政府的成员，而这种同意是在他们各自成年时分别表示的，而不是大家一起表示的。人们没有注意这一事实，以为人们根本没有表示过这种同意或认为没此必要，就断言他们自然就是臣民，如同他们自然就是人一样。

But it is plain governments themselves understand it otherwise; they claim no power over the son because of that they had over the father; nor look on children as being their subjects, by their fathers being so. If a subject of England hasa child by an Englishwoman in France, whose subject is he? Not the King of England's; for he must have leave to be admitted to the privileges of it. Nor the King of

France's, for how then has his father a liberty to bring him away, and breed him as he pleases; and whoever was judged as a traitor or deserter, if he left, or warred against a country, for being barely born in it of parents that were aliens there? It is plain, then, by the practice of governments themselves, as well as by the law of right reason, that a child is born a subject of no country or government. He is under his father's tuition and authority till he comes to the age of discretion, and then he is a freeman, at liberty what government he will put himself under, what body politic he will unite himself to. For if an Englishman's son born in France be at liberty, and may do so, it is evident there is no tie upon him by his father being a subject of this kingdom, nor is he bound up by any compact of his ancestors; and why then hath not his son, by the same reason, the same liberty, though he be born anywhere else? Since the power that a father hath naturally over his children is the same wherever they be born, and the ties of natural obligations are not bounded by the positive limits of kingdoms and commonwealths.

然而，显而易见，政府自身并不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政府并不因为对父亲拥有权力就声称对儿子也拥有权力，也不因为父亲是其臣民就把其子女也视为臣民。倘若英国的一个臣民在法国同一个英国妇女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是谁的臣民呢？他不是英国国王的臣民，因为他必须得到批准后才能获得作为英国臣民的权利。他也不是法国国王的臣民，因为倘若他是的话，他的父亲怎能自由地把他带走并随意抚养他呢？无论是谁，倘若他离开一个国家或对之作战，难道可以仅仅因为他出生在这个国家时他的父母在那里是外国人而被判为叛国者或逃亡者吗？那么，很显然，无论依据政府自身的实践还是依据正当的理性法则，一个孩子并非生来就是哪个国家或政府的臣民。在他成年以前，他处于父亲的教养和权威之下；在他成年之后，他就成了一个自由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服从于哪个政府，加入哪一个

国家。倘若一个出生在法国的英国人的儿子有这样的自由，可以这样做，那么很显然，他的父亲是英国的臣民这一点对他并没有约束，他也不受制于他的祖先所订立的任何契约。那么为什么他的儿子不能依据同样的理由享有同样的自由，即使他出生在别的任何地方呢？因为无论子女出生在何处，父亲对他们自然享有的支配权是一样的，自然的义务关系不受王国和国家的具体疆界的限制。

Every man being, as has been showed, naturally free, and nothing being able to put him into subjection to any earthly power, but only his own consent, and it is to be considered what shall be understood to be a sufficient declaration of a man's consent to make him subject to the laws of any government. There is a common distinction of an express and a tacit consent, which will concern our present case. Nobody doubts but an express consent of any man, entering into any society, makes him a perfect member of that society, a subject of that government. The difficulty is, what ought to be looked upon as a tacit consent, and how far it binds, i.e. how far anyone shall be looked on to have consented, and thereby submitted to any government, where he has made no expressions of it at all. And to this I say, that every man that hath any possession or enjoyment of any part of the dominions of any government doth thereby give his tacit consent, and is as far forth obliged to obedience to the laws of that government, during such enjoyment, as anyone under it, whether his possession be of land to him and his heirs for ever, or a lodging only for a week; or whether it be barely travelling freely on the highway; in effect, it reaches as far as the very being of anyone within the territories of that government.

如上文所示，既然每个人生而自由，除非他自己同意，没有什么能够使他臣服于世俗的任何权力，那么我们就可以琢磨一下，究竟什

么才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人同意服从任何政府之法律的充分宣示。明确同意和默认一般是有区别的，这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有关。任何人只有明确同意加入某个社会和政府，才能使自己成为那个社会的正式成员和那个政府的臣民，这一点无人会质疑。困难在于，什么行为该被视为默认，且这种行为有多大的约束力，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根本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时，到底怎样才能认为他已经同意，并由此臣服于任何政府。对于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每一个人，只要拥有或享有任何政府的任何部分领土，就表示他已经默认，就和服从于那个政府的任何人一样，在享有土地期间必须服从那个政府的法律。无论他所占有的是永久性属于他或他子孙的土地，还是仅住一星期的住所，或只是在公路上自由地旅行。事实上，任何人只要身处那个政府的领土范围之内，就构成了默认。

To understand this better, it is fit to consider that every man when he at first incorporates himself into any commonwealth, he, by his uniting himself thereunto, annexes also, and submits to the community those possessions which he has, or shall acquire, that do not already belong to any other government. For it would be a direct contradiction for anyone to enter into society with others, for the securing and regulating of property, and yet to suppose his land, whose property is to be regulated by the laws of the society, should be exempt from the jurisdiction of that government to which he himself, the proprietor of the land, is a subject. By the same act, therefore, whereby anyone unites his person, which was before free, to any commonwealth, by the same he unites his possessions, which were before free, to it also; and they become, both of them, person and possession, subject to the government and dominion of that commonwealth as long as it hath a being. Whoever therefore, from thenceforth, by inheritance, purchase, permission, or otherwise enjoys any part of the land so annexed to, and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that commonwealth, must take it with the condition

it is under—that is, of submitting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under whose jurisdiction it is, as far forth as any subject of it.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考虑，每一个人最初加入任何国家时，他加入这个国家的行为，也把他已有的或将要获得的且不属于任何其他政府的那些财产并入并隶属于这个共同体。因为不这样做会产生一种直接的矛盾：任何人为了保障和规定财产权而和其他人一起加入社会，却认为他的土地的所有权由社会的法律来规定，所以可以免受他作为土地所有者而身为其臣民的那个政府的管辖。因此，同样，任何人以之前自由的人身加入任何国家，也就将之前自由的财产加入了这个国家。只要这个国家继续存在，他的人身和财产就都要受制于这个国家的统治和支配。因此，任何人此后通过继承、购买、许可或其他方式享有以此种方式并入那个国家并受其管辖的土地的任何部分，他都必须接受支配该土地的条件才能占有它，即像那个国家的任何臣民一样臣服于对该土地有管辖权的政府。

But since the government has a direct jurisdiction only over the land and reaches the possessor of it (before he has actually incorporated himself in the society) only as he dwells upon and enjoys that, the obligation anyone is under by virtue of such enjoyment to submit to the government begins and ends with the enjoyment; so that whenever the owner, who has given nothing but such a tacit consent to the government will, by donation, sale or otherwise, quit the said possession, he is at liberty to go and incorporate himself into any other commonwealth, or to agree with others to begin a new one in vacuislocis,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they can find free and unpossessed; whereas he that has once, by actual agreement and any express declaration, given his consent to be of any commonwealth, is perpetually and indispensably obliged

to be, and remain unalterably a subject to it, and can never be again in the liberty of the state of Nature, unless by any calamity the government he was under comes to be dissolved, or else by some public act cuts him off from being any longer a member of it.

但是，既然政府只对土地拥有直接管辖权，且只在它的所有者（事实上，在他把自己加入这个社会之前）居住在其上并享用之时，管辖权才会涉及他本人，那么，任何人因享用土地而承担的服从政府之义务，就同这种享有同始同终。因此，每当只对政府给予这种默认的土地所有者以赠与、出售或其他方式放弃上述土地时，他就可以自由地去加入其他任何国家，或同其他人达成协议，在“空的地方”，在他们能够找到的空旷且未被人占有的世界上之任何地方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但是，一个人一旦曾经通过实际的协议和明确的声明来表示他同意属于任何国家，他就永远而且必然成为、并且永远不变地成为那个国家的臣民，再也不能再次回到自然状态的自由中，除非他所从属的那个政府由于任何灾难开始解体，或某种公共行为使他不能再继续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

But submitting to the laws of any country, living quietly and enjoying privileges and protection under them makes not a man a member of that society; it is only a local protection and homage due to and from all those who, not being in a state of war, come within the territories belonging to any government, to all parts whereof the force of its law extends. But this no more makes a man a member of that society, a perpetual subject of that commonwealth, than it would make a man a subject to another in whose family he found it convenient to abide for some time, though, whilst he continued in it, he were obliged to comply with the laws and submit to the government he found there. And thus we see that foreigners, by living all their lives under another government, and enjoying the

privileges and protection of it, though they are bound, even in conscience, to submit to its administration as far forth as any denizen, yet do not thereby come to be subjects or members of that commonwealth. Nothing can make any man so but his actually entering into it by positive engagement and express promise and compact. This is that which, I think, concerning the beginning of political societies, and that consent which makes anyone a member of any commonwealth.

然而，服从任何国家的法律，依照法律平静地生活并享受权利和保护，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那个社会的一员。当那些不处于战争状态中的人们来到属于某个政府的领土之内，来到其法律效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时，这只是应该给予他们的地方保证和他们对该政府应尽有的敬意。但这并不能使他成为那个社会的一个成员和那个国家的永久公民，正如一个人为了方便而暂时居住在另一个人的家里，并不能使他从属那个人一样，尽管当他继续在那里时，他必须遵守那里的法律，服从那里的政府。因此我们看到，那些终身处在另一个政府之下并享有其权利和保护的外国人，虽然他们在良心上不得不像任何公民一样服从那个政府的管理，但却并不因此成为那个国家的臣民或成员。除了他通过明确约定以及明确的诺言和契约确实加入一个国家之外，什么也无法使任何人成为那个国家的臣民或成员。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关于政治社会之起源，以及那使任何人成为任何国家成员的同意。

[8_1].l.i. c. 25.

[8_2].l.iii. c. 4.

[8_3].Judg. xi, ii.

[8_4].Judg. xii. 7.

[8_5].Judg. ix. 17.

[8_6].I.Sam viii. 20.

[8_7].Ch. ix. 16.

[8_8].Ch. x. 1.

[8_9].Ch. v. 27.

[8_10].Ch. xiii. 14.

[8_11].Ch. v. 2

[8_12]."At first, when some certain kind of regiment was once approved, it may be nothing was then further thought upon for the manner of governing, but all permitted unto their wisdom and discretion, which were to rule till, by experience, they found this for all parts very inconvenient, so as the thing which they had devised for a remedy did indeed but increase the sore which it should have cured. They saw that to live by one man's will became the cause of all men's misery. This constrained them to come unto laws wherein all men might see their duty beforehand, and know the penalties of transgressing them." Hooker, Eccl. Pol. 1. i. sect. 10.

[9_1].利维坦（Leviathan），《圣经·以赛亚书》中提到的海中怪兽，霍布斯的同名著作中用利维坦比喻国家，洛克在此处为借用。

[9_2].约瑟夫斯·阿科斯塔（Josephus Acosta，1539-1600），16世纪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拉美自然主义者，代表作为《印第安人的自然道德史》。

[9_3].《印第安人的自然和道德历史》，第1卷，第25章。

[9_4].查士丁（Justin，100-165），基督教早期神学家，结合教义与希腊哲学奠定了历史神学的基础，最后被罗马皇帝判处死刑。

[9_5].《印第安人的自然和道德历史》，第3卷，第4章。

[9_6].《士师记》，第11章，第11节。

[9_7].《士师记》，第12章，第7节。

[9_8].《士师记》，第9章，第17节。

[9_9].《撒母耳记上》，第8章，第20节。

[9_10].《撒母耳记上》，第9章，第16节。

[9_11].《撒母耳记上》，第10章，第1节。

[9_12].《撒母耳记上》，第10章，第27节。

[9_13].《撒母耳记上》，第13章，第14节。

[9_14].《撒母耳记下》第5章，第2节。

[9_15].“最初，人们在选定某种类型的统治时，可能当时并没有进一步考虑关于统治方式的问题，只是全都听凭他们的智慧和判断来支配一切，直到后来他们根据经验，发现这在各方面都很不便，而他们策划出来的补救办法实际上却增加了它本该治愈的创伤。他们看到，按照一个人的意志来生活会成为一切人痛苦的原因。这就促使他们制定法律，让所有的人能够从法律中事前看到他们的义务，并且知道违反这些法律将受到的惩罚。”胡克，《宗教政治》，第1卷，第10节。

Chapter IX　Of the Ends of Political Society and Government

第九章　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If ma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be so free as has been said, if he be absolute lord of his own person and possessions, equal to the greatest and subject to nobody, why will he part with his freedom? Why will he give up this empire, and subject himself to the dominion and control of any other power? To which it is obvious to answer, that though in the state of Nature he hath such a right, yet the enjoyment of it is very uncertain and constantly exposed to the invasion of others; for all being kings as much as he, every man his equal, and the greater part no strict observers of equity and justice, the enjoyment of the property he has in this state is very unsafe, very insecure. This makes him willing to quit a condition which, however free, is full of fears and continual dangers; and it is not without reason that he seeks out and is willing to join in society with others who are already united, or have a mind to unite for the mutual preservation of their lives, liberties and estates, which I call by the general name—property.

倘若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如前所说的那样自由，可以完全主宰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和最尊贵的人一样平等且不受制于任何人，那为什么他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舍弃这个王国，使自己服从任何其他权力的支配和控制呢？显然，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他拥有这样一种权利，但这种权利的享有是非常不稳定的，时常受到他人的侵犯。因为所有人都同他一样可以成为王，人人都与他平等，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严格遵守公平和正义，所以他在这种状态下享有的财产权就很不安全稳定。这使他愿意放弃这一无论多么自由却

都充满恐惧和持续危险的状态，因此他愿意并设法联合起来加入社会以相互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和地产——我将这些统称为财产——这并非没有理由。

The great and chief end, therefore, of men uniting into commonwealths, and putting themselves under government,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property; to which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anting.

因此，人们联合成国家并使自身受制于政府的首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而自然状态在这方面有许多缺陷。

Firstly, there wants an established, settled, known law, received and allowed by common consent to be the standard of right and wrong, and the common measure to decide all controversies between them. For though the law of Nature be plain and intelligible to all rational creatures, yet men, being biased by their interest, as well as ignorant for want of study of it, are not apt to allow of it as a law binding to them in the application of it to their particular cases.

首先，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业已制定、根深蒂固、众所周知的法律，这种法律需经一致同意接受并承认为是非标准，成为裁定他们之间所有纠纷的共同尺度。因为尽管自然法对于一切有理性的生物而言都明白易懂，但人们由于自己的利益而心存偏见，加上人们对自然法缺乏研究而知之甚少，所以不会轻易承认自然法是对他们有约束力、可以应用于他们各自的情况的法律。

Secondly,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ere wants a known and indifferent judge, with authority to determine all differences according to the established law. For everyonein that state being both judge and executioner of the law of Nature, men being partial to themselves, passion and revenge is very apt to carry them too far, and with too much heat in their own cases, as well as negligence and unconcernedness, to make them too remiss in other men's.

第二，自然状态中缺乏一个知名、公正并有权按照既定的法律裁定一切分歧的裁定者。因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既是自然法的裁定者又是执行者，而由于人又偏袒自己，所以情感和报复之心很容易让他们过于偏激，对自己的案件过于热心而疏忽和漠不关心又使他们对别人的案件过于冷漠。

Thirdly,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ey often want power to back and support the sentence when right, and to give it due execution. They who by any injustice offended will seldom fail where they are able by force to make good their injustice. Such resistance many times makes the punishment dangerous, and frequently destructive to those who attempt it.

第三，自然状态中常常缺乏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恰当的执行。那些受到任何不公行为冒犯的人，只要他们能够借用武力来纠正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待遇，那么很少有不成功的。这种抵抗常常使惩罚行为变得危险，还经常对那些试图执行惩罚的人造成伤害。

Thus mankind, notwithstanding all the privileges of the state of Nature, being but in an ill condition while they remain in it are

quickly driven into society. Hence it comes to pass, we seldom find any number of men live any time together in this state. The inconveniences that they are therein exposed to by the irregular and uncertain exercise of the power every man has of punishing the transgressions of others, make them take sanctuary under the established laws of government, and therein seek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property. It is this that makes them so willingly give up everyone's single power of punishing to be exercised by such alone as shall be appointed to it amongst them, and by such rules as the community, or those authorised by them to that purpose, shall agree on. And in this, we have the original right and rise of both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 as well as of the governments and societies themselves.

因此，尽管人类在自然状态中享有种种权利，但是由于仍处于一种恶劣的状态，他们很快被迫加入社会。所以，我们很少发现有什么人能在自然状态中共同生活很长时间。在自然状态中，人人有权惩罚他人的违法行为，而这种权力的实施既不正规又不可靠，这样的不便促使他们在政府的既定法律下寻求庇护，借以保护他们的财产。正是这种情况使他们如此心甘情愿地放弃各自单独行使的惩罚权，而将之交由他们中被指定的人来专门行使，而且要依据社会或他们为此目的而授权的那些人一致同意的规则来行使。这就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原始权力及两者兴起的原因，政府和社会本身也起源于此。

For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o omit the liberty he has of innocent delights, a man has two powers.

在自然状态中，人除了享有天真乐趣的自由，还有两种权力。

The first is to do whatsoever he thinks fit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himself and others within the permission of the law of Nature; by which law, common to them all, he and all the rest of mankind are one community, make up one society distinct from all other creatures, and were it not for the corruption and viciousness of degenerate men, there would be no need of any other, no necessity that men should separate from this great and natural community, and by positive agreements combine into smaller and divided associations.

第一种是为了保护他自己和其他人，可以在自然法准许的范围内做他认为恰当的任何事。根据适用于他们所有人的自然法，他和所有其他人都属于一个共同体，组成一个不同于所有其他生物的社会。若非因为一些堕落者的腐败和邪恶，人们无需组成任何其他社会，也没有必要从这个庞大的自然共同体中分离出来，转而结成较小的联合体。

The other power a man has in the state of Nature is the power to punish the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at law. Both these he gives up when he joins in a private, if I may so call it, or particular political society, and incorporates into any commonwealth separate from the rest of mankind.

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人所拥有的另一种权力是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罪行。这两种权力在他加入一个私人的（倘若我可以这样称呼它）或特定的政治社会，脱离其他人而结成任何国家时就都放弃了。

The first power, viz., of doing whatsoever he thought fit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himself and the rest of mankind, he gives up to be regulated by laws made by the society, so far forth as the preservation of himself and the rest of that society shall require, which laws of the society in many things confine the liberty he had by the law of Nature.

他放弃了第一种权力，即做他认为正当的任何事情来保护他自己和其他人的权力，将它给了社会，由社会所制定的法律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只要达到保护他自己和那个社会其他人所需要的程度即可。社会的这些法律在许多方面限制了他依据自然法所享有的自由。

Secondly, the power of punishing he wholly gives up, and engages his natural force, which he might before employ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law of Nature, by his own single authority, as he thought fit, to assist the executive power of the society as the law thereof shall require. For being now in a new state, wherein he is to enjoy many conveniences from the labour, assistance, and society of others in the same community, as well as protection from its whole strength, he is to part also with as much of his natural liberty, in providing for himself, as the good, prosperity, and safety of the society shall require, which is not only necessary but just, since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society do the like.

第二，他完全放弃了惩罚的权力，而是依据社会法律的需要，运用他的自然力量来协助社会执行行政权；而以前，他可以在他认为正当的时候依据他自己独享的权威行使自然法。因为现在他处于一种新的状态，得以从同一社会其他人的劳动、帮助和交往中享有许多便利，还可以享有社会整体力量的保护，所以为了维生，也为了社会的幸福、繁荣和安全，他要放弃自己的许多自然权利。这不但必要而且

公道，因为社会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行事。

But though men when they enter into society give up the equality, liberty, and executive power they had in the state of Nature into the hands of the society, to be so far disposed of by the legislative as the good of the society shall require, yet it being only with an intention in everyone the better to preserve himself, his liberty and property (for no rational creature can be supposed to change his condition with an intention to be worse), the power of the society or legislative constituted by them can never be supposed to extend farther than the common good, but is obliged to secure everyone's property by providing against those three defects above mentioned that made the state of Nature so unsafe and uneasy. And so, whoever has the legislative or supreme power of any commonwealth, is bound to govern by established standing laws, promulgated and known to the people, and not by extemporary decrees, by indifferent and upright judges, who are to decide controversies by those laws; and to employ the force of the community at home only in the execution of such laws, or abroad to prevent or redress foreign injuries and secure the community from inroads and invasion. And all this to be directed to no other end but the peace, safety, and public good of the people.

然而，虽然人们在加入社会时将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所享有的平等、自由和行政权放弃给了社会，由立法机关在社会利益需要的范围内加以处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每一个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因为我们无法设想任何有理性的生物会为了过得更糟糕而改变他的现状），他们永远不允许社会或由他们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力扩张到公众福利需要的范围之外，他们必须通过预防上述所提的使自然状态如此不安全且不稳定的三种缺点来保障每一

个人的财产。因此，不管谁掌握了任何国家的立法权或最高权力，其统治一定要依据既定的、向人民公布并为其知晓的、长期有效的法律，而非依据临时的法令；纷争要由公正无私且正直诚实的法官依据那些法律来裁定；且只有在对内执行这些法律、对外预防或索赔外来伤害，以及保障社会不受破坏和侵犯时，才能运用社会的力量。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别无其他目的。

Chapter X　Of the Forms of a Commonwealth

第十章　论国家的形式

The majority having, as has been showed, upon men's first uniting into society, the whole power of the community naturally in them, may employ all that power in making laws for the community from time to time, and executing those laws by officers of their own appointing, and then the form of the government is a perfect democracy; or else may put the power of making laws into the hands of a few select men, and their heirs or successors, and then it is an oligarchy; or else into the hands of one man, and then it is a monarchy; if to him and his heirs, it is a hereditary monarchy; if to him only for life, but upon his death the power only of nominating a successor, to return to them, an elective monarchy. And so accordingly of these, the community may make compounded and mixed forms of government, as they think good. And if the legislative power be at first given by the majority to one or more persons only for their lives, or any limited time, and then the supreme power to revert to them again, when it is so reverted the community may dispose of it again anew into what hands they please, and so constitute a new form of government; for the form of government depending upon placing the supreme power, which is the legislative, it being impossible to conceive that an inferior power should prescribe to a superior, or any but the supreme make laws, according as the power of making laws is placed, such is the form of the commonwealth.

如前所示，因为大多数人在人类最初加入社会时自然地拥有属于

共同体的全部权力，便可以不时地利用全部权力来为社会制定法律，而这些法律由他们自己委派的官员来执行，于是这种政府形式是一种完美的民主制；或者将制定法律的权力交到选举出来的少数人和他们的后嗣或继承人手中，那就成了寡头政体；或者将之交到一个人手里，那就成了君主制；倘若交给他和他的后嗣，那就成了世袭君主制；倘若只是交给他终身享有，一旦他死亡，推选继承人的权力又归还到大多数人手中，那就成了选任君主制。所以人们可以根据这些形式建立他们认为合适的复合型或混合型的政府形式。倘若立法权最初由大多数人交由一个或更多的人并仅由其终身或在任何有限期内行使，然后他们重新收回此最高权力，那么共同体可以在这样收回权力之后将之再交给他们喜欢的人，由此组成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因为政府的形式取决于最高权力——立法权——的归属，我们无法设想下级权力来规定上级，也无法设想除了最高权力还有什么能制定法律，所以立法权的归属决定国家的形式。

By “commonwealth” I must be understood all along to mean not a democracy, o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ut any independent community which the Latins signified by the word civitas, to which the word which best answers in our language is “commonwealth,” and most properly expresses such a society of men which “community” does not (for there may be subordinate communities in a government), and “city” much less. And city amongst us has a quite different notion from commonwealth: and therefore, to avoid ambiguity, I crave leave to use the word “commonwealth” in that sense, in whichI find the word used by King James himself, which I think to be its genuine signification, which, if anybody dislike, I consent with him to change it for a better.

我们必须始终理解我所用的“commonwealth”一词不是指民主政体或任何政府形式，而是指任何独立的社会。拉丁人用“civitas”一词

来表示，而在我们的语言里最能与之相对应的是“commonwealth”一词。它最恰当地表达了那样一种人类社会，而英语中的“community”则无法表达（因为在一个政府之下可能有各种从属的共同体），而“city”就更不恰当了。城市，对我们说来，具有与“commonwealth”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为了避免产生歧义，我恳请读者让我在此意义上用“commonwealth”一词。我发现詹姆斯国王曾在此意义上使用过这个词，我认为那是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倘若任何人不喜欢这个词，我同意他用一个更好的词来取而代之。

Chapter XI　Of the Extent of the Legislative Power

第十一章　论立法权的范围

The great end of men's entering into society being the enjoyment of their properties in peace and safety, and the great instrument and means of that being the laws established in that society, the first and fundamental positive law of all commonwealths is the establishing of the legislative power, as the first and fundamental natural law which is to govern even the legislative. Itself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ociety and (as far as will consist with the public good) of every person in it. This legislative is not only the supreme power of the commonwealth, but sacred and unalterable in the hands where the community have once placed it. Nor can any edict of anybody else, in what form soever conceived, or by what power soever backed, have the force and obligation of a law which has not its sanction from that legislative which the public has chosen and appointed; for without this the law could not have that which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its being a law,[1] the consent of the society, over whom nobody can have a power to make laws but by their own consent and by authority received from them; and therefore, all the obedience, which by the most solemn ties anyone can be obliged to pay, ultimately terminates in this supreme power, and is directed by those laws which it enacts. Nor can any oaths to any foreign power whatsoever, or any domestic subordinate power, discharge any member of the society from his obedience to the legislative, acting pursuant to their trust, nor oblige him to any obedience contrary to the laws so enacted or farther than they do allow, it being ridiculous to imagine that one can be tied ultimately to obey any power in the society which is not

the supreme.

人们加入社会的主要目的是和平、安全地享受他们的各种财产，而社会所制定的法律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因此一切国家最初的基本明文法就是确立立法权，就像甚至可以支配立法权的最初的基本自然法本身就是为了保护社会并且（只要与公众福利相一致）保护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一样。这一立法权不仅仅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一旦共同体将这种立法权交到某些人手中，它就成了神圣且不可改变的。其他任何人的任何命令，不论以何种形式或凭借何种权力支持，若未经公众选举或委任的立法机关批准，就不具备法律效力和强制性。因为若没有这种最高权力，法律就不具备成为法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1] 即社会之首肯。除了基于人们的同意或其所给予的授权外，任何人都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所以，所有的服从（任何人因受最严肃的约束而不得不予以服从）最终都归结于此最高权力，并受其所制定的法律的指导。对任何外国权力或任何国内下级权力许下的任何誓言，都不能使任何社会成员免于服从立法机关（立法机关要依据他们的委托行使权力），也不能迫使他服从违反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或超越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如果你去想象一个人可以最终被迫服从社会中并非最高权力的任何权力，那么这种想法就很可笑。

1: "The lawful power of making laws to command whole politic societies of men, belonging so properly unto the same entire societies, that for any prince or potentate, of what kind soever upon earth, to exercise the same of himself, and not by express commission immediately and personally received from God, or else by authority derived at the first from their consent, upon whose persons they impose laws, it is no better than mere tyranny.

Laws they are not, therefore, which public approbation hath not made so." Hooker, Eccl. Pol. l. i. sect. 10.

1: “既然制定法律来支配整个政治社会的合法权力如此正当地属于同一完整的社会，那么无论世界上的哪种君主或统治者，如果以他自己的意志，而不是依据直接来自于上帝的明确委托，也不是依据受制于这些法律的人们之最初同意而赋予的权威来行使这种权力，那就几乎等于纯粹的暴政。因此，未经公众同意而制定的法律就不是法律。”胡克，《宗教政治》，第1卷，第10节。

"Of this point, therefore, we are to note that such men naturally have no full and perfect power to command whole politic multitudes of men, therefore utterly without our consent we could in such sort be at no man's commandment living. And to be commanded, we do consent when that society, whereof we be a part, hath at any time before consented, without revoking the same after by the like universal agreement."

“因此，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注意，既然人们基于自然并不拥有充分和正当的权力来命令全部政治民众，那么倘若这种命令完全未经我们同意，我们就可以选择不听命于任何人生活。倘若我们所在的社会在以前任何时候曾同意被统治，之后又没有以同样的全体协

议来取消这一同意，那就表明我们确实是同意被统治的。”

"Laws therefore human, of what kind soever, are available by consent." Hooker, Ibid.

“因此，无论哪种人类法律都是基于同意才生效的。”胡克，同上。

Though the legislative, whether placed in one or more, whether it be always in being or only by intervals, though it be the supreme power in every commonwealth, yet, firstly, it is not, nor can possibly be, absolutely arbitrary over the lives and fortunes of the people. For it being but the joint power of every member of the society given up to that person or assembly which is legislator, it can be no more than those persons had in a state of Nature before they entered into society, and gave it up to the community. For nobody can transfer to another more power than he has in himself, and nobody has an absolute arbitrary power over himself, or over any other, to destroy his own life, or take away the life or property of another. A man, as has been proved, cannot subject himself to the arbitrary power of another; and having, in the state of Nature, no arbitrary power over the life, liberty, or possession of another, but only so much as the law of Nature gave him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himself and the rest of mankind, this is all he doth, or can give up to the commonwealth, and by it to the legislative power, so that the legislative can have no more than this. Their power in the utmost bounds of it is limited to the public good of the society. It is a power that hath no other end but preservation, and therefore can

never[2] have a right to destroy, enslave, or designedly to impoverish the subjects; the obligations of the law of Nature cease not in society, but only in many cases are drawn closer, and have, by human laws, known penalties annexed to them to enforce their observation. Thus the law of Nature stands as an eternal rule to all men, legislators as well as others. The rules that they make for, other men's actions must, as well as their own and other men's actions, be conformable to the law of Nature, i.e. to the will of God, of which that is a declaration, and the fundamental law of Nature being the preservation of mankind, no human sanction can be good or valid against it.

虽然立法权是每一个国家中的最高权力，但是无论它被交给一个还是更多的人，无论它是经常或只是不时地存在，首先，它不是，也不可能绝对专横地凌驾于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之上。因为既然它只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交给作为立法者的那个个人或议会的联合权力，那么它就不能超过那些人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的权力（在他们加入社会后才将此权力放弃给社会）。因为无人能将超过他本人所拥有的权力转让给别人，亦无人拥有一种绝对专断的权力来支配自己或任何其他人，从而毁灭他自己的生命或夺取另一个人的生命或财产。如前所证，一个人不能服从于另一个人的专断权力。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人并不拥有支配另一个人生命、自由或财产的专断权力，而只拥有自然法所赋予他的保护自己和其余人类的权力，这就是他让渡给或能够让渡给国家的所有权力，再通过国家将它交给立法机关，所以，立法机关不能拥有超过这一限度的权力。他们权力的最大范围不能超过保护社会之公共福利的限度。这是一种除了实施保护别无其他目的的权力，[2] 因此绝无权毁灭、奴役臣民或故意让臣民陷入贫困。自然法所规定的义务并没有在社会中消失，而是在许多场合里表达得更清楚，并通过附有明确处罚的人类法来迫使人们遵守。因此，自然法是一切人的永恒典范，这对立法者和其他人也亦然。他们为规范其他人的行为而制定的规则，以及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行为都必须符合自然法，

即符合上帝的意志，而自然法就是上帝意志的一种宣示。既然基本的自然法是为了保护人类，那么任何与之相违背的人类制裁都是错误或无效的。

2: "Two foundations there are which bear up public societies; the one a natural inclination whereby all men desire sociable life and fellowship; the other an order, expressly or secretly agreed upon, touching the manner of their union in living together. The latter is that which we call the law of a commonweal, the very soul of a politic body, the parts whereof are by law animated, held together, and set on work in such actions as the common good requireth. Laws politic, ordained for external order and regimen amongst men, are never framed as they should be, unless presuming the will of man to be inwardly obstinate, rebellious, and averse from all obedience to the sacred laws of his nature; in a word, unless presuming man to be in regard of his depraved mind little better than a wild beast, they do accordingly provide notwithstanding, so to frame his outward actions, that they be no hindrance unto the common good, for which societies are instituted. Unless they do this they are not perfect." Hooker, Eccl. Pol. l. i. sect. 10.

2: “有两个支柱支撑着公共社会：一个是所有人都向往社会生活和交往的自然倾向，另一个是他们明确同

意或默认的有关他们群居生活方式的秩序。我们把后者称为大众福利的法律，它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法律赋予国家的各个部分以生命，使之团结在一起，并促使它按公共福利的要求来采取行动。针对人们之间的外在秩序和统治而制定的国家法律，并不符合它们应有的样子，除非假设人在意志上顽固、反叛、绝对不愿服从其天性的神圣法则。总而言之，只有假设人的劣根性与野兽不相上下，他们才会针对这种情况做出规定，用于规范人的外在行为，使他们不对组成社会所要谋求的公共福利造成妨碍。除非法律有此效用，否则它们就是不完美的。”胡克，《宗教政治》，第1卷，第10节。

Secondly, the legislative or supreme authority cannot assume to itself a power to rule by extemporary arbitrary decrees, but is bound to dispense justice and decide the rights of the subject by promulgated standing laws [11_1] , and known authorised judges. For the law of Nature being unwritten, and so nowhere to be found but in the minds of men, they who, through passion or interest, shall miscite or misapply it, cannot so easily be convinced of their mistake where there is no established judge; and so it serves not as it ought, to determine the rights and fence the properties of those that live under it, especially where everyone is judge, interpreter, and executioner of it too, and that in his own case; and he that has right on his side, having ordinarily but his own single strength, hath not force enough to defend himself from injuries or to punish delinquents. To avoid these inconveniences which disorder men's properties in the state of Nature, men unite into societies that they may have the united strength of the whole society to secure and defend their properties, and may have standing rules to bound it by

which everyone may know what is his. To this end, it is that men give up all their natural power to the society which they enter into, and the community put the legislative power into such hands as they think fit, with this trust, that they shall be governed by declared laws, or else their peace, quiet, and property will still be at the same uncertainty as it was in the state of Nature.

第二，立法或最高权力机关不能独揽权力，以临时的专断命令来统治，而是必须依据已颁布且长期有效的法律 [12_1] ，通过获得授权的知名法官来执行法律及判定臣民的权利。因为自然法并未成文，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所以，倘若没有专职的法官，人们因激愤或利益关系，就会错误地引证或应用自然法而不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一来，自然法就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无法用以决定那些依据它生活的人们的权利，并保护他们的财产，尤其在人人都是自然法和他自己案件的裁定者、解释者和执行者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有理的一方通常只能利用他自己个人的力量，却没有足够的实力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或惩罚违法者。人们联合组成社会，从而规避自然状态中会损害人们财产的缺陷，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用整个社会的集体力量来保障和保护他们的财产，并以长期有效的规则来加以约束，由此人人都可知道什么是属于他自己的。人们将他们所有的自然权力交给他们所加入的社会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社会将立法权交到那些他们认为合适的人手中，加以委任，以便他们受制于正式公布的法律，若非如此，他们的和平、安宁和财产就仍如原来处于自然状态中那样不稳定。

Absolute arbitrary power, or governing without settled standing laws, neither of them can consist with the ends of society and government, which men would not quit the freedom of the state of Nature for, and tie themselves up under, were it not to preserve their lives, liberties, and fortunes, and by stated rules of

right and property to secure their peace and quiet. It cannot be supposed that they should intend, had they a power so to do, to give anyone or more an absolute arbitrary power over their persons and estates, and put a force into the magistrate's hand to execute his unlimited will arbitrarily upon them; this were to put themselves into a worse condition than the state of Nature, wherein they had a liberty to defend their right against the injuries of others, and were upon equal terms of force to maintain it, whether invaded by a single man or many in combination. Whereas by supposing they have given up themselves to the absolute arbitrary power and will of a legislator, they have disarmed themselves, and armed him to make a prey of them when he pleases; he being in a much worse condition, who is exposed to the arbitrary power of one man who has the command of a hundred thousand than he that is exposed to the arbitrary power of a hundred thousand single men, nobody being secure, that his will who has such a command is better than that of other men, though his force be a hundred thousand times stronger. And, therefore, whatever form the commonwealth is under, the ruling power ought to govern by declared and received laws, and not by extemporary dictates and undetermined resolutions, for then mankind will be in a far worse condition tha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if they shall have armed one or a few men with the joint power of a multitude, to force them to obey at pleasure the exorbitant and unlimited decrees of their sudden thoughts, or unrestrained, and till that moment, unknown wills, without having any measures set down, which may guide and justify their actions. For all the power the government has, being only for the good of the society, as it ought not to be arbitrary and at pleasure, so it ought to be exercised by established and promulgated laws, that both the people may know their duty, and be safe and secure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law, and the rulers, too, kept within their due bounds, and not be tempted by the power

they have in their hands to employ it to such purposes, and by such measures as they would not have known, and own not willingly.

运用绝对的专断权力，或是不以确定的长效法律统治，二者无一与社会和政府的目的相一致。倘若不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财产，倘若不是为了用有关权利和财产的明确规定来保障他们的和平与安宁，人们就不会放弃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而加入社会并愿受其约束。倘若他们有权这样做，也不能假设他们会打算给一个或更多人以支配自己人身和财产的绝对专断权力，并赋予行政长官力量，让他对他们实施他那不受限制的任意意志。倘若这样，那就是要将自己置于比自然状态更为糟糕的处境，因为在自然状态中，他们还有自由保护自己的权利免受他人侵害，并在受到单个或多个纠集起来的人侵犯时得以用同等的力量来自卫。然而，倘若他们使自己臣服于一个立法者的绝对专断权力和意志，他们就自我解除了武装，而将立法者武装起来，使自己任凭其宰割。比起一个受制于十万个个人的专断权力之人，一个受制于有权支配十万人的行政长官之人的处境要糟糕得多。尽管拥有这种支配权的人具有强大十万倍的实力，但无人能保证他的意志要比其他人的意志更好。因此，不论国家采取何种形式，统治者应当依据正式公布并为人民所接受的法律，而非临时的命令和未定的决议进行统治。因为，倘若人们以民众的集体力量来武装一个或少数人，任凭他们随意迫使人们服从他们突发奇想或直至那时仍无人知晓、不受约束的意志而发布的无比苛刻的命令，且没有制定任何规定当作其行为的准则和依据，那么人类所处之境地就会远比自然状态更为糟糕。因为政府所拥有的所有权力既然只是为了谋求社会福利，它就不该是专断和随意的，其行使应依据既定的和已公布的法律。如此一来，一方面，人民可以知道他们的责任并在法律范围内获得安全和保障；另一方面，统治者也被限制在他们的适当范围内，不会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受到手中的权力所诱惑，或是利用他们本不熟悉或不愿承认的手段来行使权力。

Thirdly, the supreme power cannot take from any man any part of his property without his own consent.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property being the end of government, and that for which men enter into society, it necessarily supposes and requires that the people should have property, without which they must be supposed to lose that by entering into society which was the end for which they entered into it; too gross an absurdity for any man to own. Men, therefore, in society having property, they have such a right to the goods, which by the law of the community are theirs, that nobody hath a right to take them, or any part of them, from them without their own consent; without this, they have no property at all. For I have truly no property in that which another can by right take from me when he pleases against my consent. Hence it is a mistake to think that the supreme or legislative power of any commonwealth can do what it will, and dispose of the estates of the subject arbitrarily, or take any part of them at pleasure. This is not much to be feared in governments where the legislative consists wholly or in part in assemblies which are variable, whose members upo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assembly are subjects under the common laws of their country, equally with the rest. But in governments where the legislative is in one lasting assembly, always in being, or in one man as in absolute monarchies, there is danger still, that they will think themselves to have a distinct interest from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 and so will be apt to increase their own riches and power by taking what they think fit from the people. For a man's property is not at all secure, though there be good and equitable laws to set the bounds of it between him and his fellow-subjects, if he who commands those subjects have power to take from any private man what part he pleases of his property, and use and dispose of it as he thinks good.

第三，未经本人同意，最高权力不能夺取任何人的任何一部分财产。因为既然政府的目的是保护财产，人们也是因此目的才加入社会的，我们就必然会假设并要求人民应该享有财产，否则就必然会假设他们会因参加社会而丧失加入社会想要得到东西。这种事情太过荒谬，任何人都不会承认。所以，人既然在社会中享有财产权，他们对于那些根据社会法律应属于他们的财产就享有这样一种权利：无人有权从他们那里夺取他们的全部或部分财产，除非经由他们本人同意。若不是这样，他们就根本没享有财产权。因为如果别人可以不经得我的同意就有权随意从我手中夺去东西，那么我的确对这种东西没有财产权。所以，认为任何国家的最高权力或立法权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任意处置民众产业或随意夺取其中的任何部分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不必太担心在政府中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政府的立法权全部或部分属于可以改选的议会，政府成员在议会解散时和其余的人一样受制于他们国家的共同法律。然而，在政府中，如果立法权属于一个长期存在的议会，或像在专制君主国里那样归一人所有，危险就仍然存在。他们会认为自己拥有区别于社会其余成员的利益，因而会从人民那里夺取他们认为合适的东西，从而增加他们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倘若支配民众的人有从任何个人那里夺取其财产中他所喜欢的部分的权力，并对这部分随心所欲地使用和处置，就算有良好和公正的法律来规定他和一般臣民之间的财权界限，个人的财产权也压根没有任何保障。

But government, into whosesoever hands it is put, being as I have before shown, entrusted with this condition, and for this end, that men might have and secure their properties, the prince or senate, however it may have power to make laws for the regulating of property between the subjects one amongst another, yet can never have a power to take to themselves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subjects' property, without their own consent; for this would be in effect to leave them no property at all. And to let us see that even absolute power, where it is necessary, is not arbitrary by being absolute, but is still limited by that reason and confined to those

ends which required it in some cases to be absolute, we need look no farther than the common practice of martial disciplin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army, and in it of the whole commonwealth, requires an absolute obedience to the command of every superior officer, and it is justly death to disobey or dispute the most dangerous or unreasonable of them; but yet we see that neither the sergeant that could command a soldier to march up to the mouth of a cannon, or stand in a breach where he is almost sure to perish, can command that soldier to give him one penny of his money; nor the general that can condemn him to death for deserting his post, or not obeying the most desperate orders, cannot yet with all his absolut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dispose of one farthing of that soldier's estate, or seize one jot of his goods; whom yet he can command anything, and hang for the least disobedience. Because such a blind obedience is necessary to that end for which the commander has his power, viz.,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rest, but the disposing of his good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

然而，如我前文所述，无论将政府授予何人，既然让人们能够拥有和保障他们的各种财产是授予的条件和目的，那么不管君主或议会怎样有权制定法律来规定臣民彼此之间的财产权，若没有得到臣民的同意，君主或议会就不可能有权将臣民财产的全部或任何部分夺为己有，如果有这样的权力，那事实上臣民就根本不享有财产权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绝对权力是必要的，那也不能因它是绝对的就一定是专断的；它仍在某些情况下受到为何需要绝对权力的理由的限制并且被局限于达到这些目的之范围内。我们只需看一下军队纪律的一般实行情况即可。因为保护军队进而可以保护整个国家，所以要求军人对每一个上级长官的命令绝对服从；即使是最危险和最不合理的命令，若不服从或表示异议，处死也是应该的。然而，我们看到，一个军官能够命令一个士兵向炮口前进或独守阵地，而不用管那种情况下士兵是否必死无疑，但是，军官却不能命令那个士兵给他

一分钱。同样，一个将军有权处死一个擅离职守或不服从进行孤注一掷的命令的士兵，却不能凭借自己决定生死之一切的绝对权力，来处置那个士兵的任何一丁点儿财产，或攫取他的些许财物，尽管他能对这个士兵下任何命令，也能因受到些许违抗而将士兵处死。这是因为，盲目服从对于司令官拥有权力的目的——即保护其他人——来说是必要的，但处置士兵的财物却与此目的毫不相关。

It is true governments cannot be supported without great charge, and itfitseveryone who enjoys his share of the protection should pay out of his estate his proportion for the maintenance of it. But still it must be with his own consent, i.e. the consent of the majority, giving it either by themselves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chosen by them; for if anyone shall claim a power to lay and levy taxes on the people by his own authority, and without such consent of the people, he, thereby, invades the fundamental law of property, and subverts the end of government. For what property I have in that which another may by right take when he pleases to himself?

确实，政府如果没有庞大的经费就无法维持，所以每一个享受保护的人应该从自己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但这仍须经由每个人自己的同意，换言之，就是需要经由大多数人的同意，而不论“大多数人”是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组成。因为倘若任何人依仗自己的权势声称无需得到人民的此种同意就有权向人民征收赋税，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法律，破坏了政府的目的。因为倘若另一个人可以拥有凭其所好就夺取我的东西的权利，那么我还有什么财产权可言呢？

Fourthly, the legislative cannot transfer the power of making laws to any other hands, for it being but a delegated power from

the people, they who have it cannot pass it over to others. The people alone can appoint the form of the commonwealth, which is by constituting the legislative, and appointing in whose hands that shall be. And when the people have said, “We will submit to rules, and be governed by laws made by such men, and in such forms,” nobody else can say other men shall make laws for them; nor can the peoplebe bound by any laws but such as are enacted by those whom they have chosen and authorised to make laws for them. The power of the legislative, being derived from the people by a positive voluntary grant and institution, can be no other than what that positive grant conveyed, which being only to make laws, and not to make legislators, the legislative can have no power to transfer their authority of making laws, and place it in other hands.

第四，立法机关不能将制定法律的权力转让到任何其他人的手里，因为它既然仅仅是源于人民的一种委托权力，那些拥有这种权力的人就不能将它转让给其他人。唯有人民才能通过组成立法机关和指定行使立法权之人来决定国家的形式。当人民已经表示“我们愿意服从并受制于那些人所制定的、采取那些形式的法律”时，其他任何人就不能声称其他人可以替他们制定法律。除了受那些他们选出并授权来为他们制定法律的人所制定的法律之约束，他们不受任何其他法律的约束。

These are the bounds which the trust that is put in them by the society and the law of God and Nature have set to the legislative power of every commonwealth, in all forms of government.

这些就是社会给予他们的委托以及上帝和自然对各种政体下每一国家的立法机关的权力所设的限制：

Firstly, they are to be governed by promulgated established laws, not to be varied in particular cases, but to have one rule for rich and poor, for the favourite at Court, and the countryman at plough.

首先，这些立法机关应该通过正式公布的既定法律来统治，这些法律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所变化，对于穷人和富人、宫廷权贵和乡村农夫都一视同仁。

Secondly, these laws also ought to be designed for no other end ultimately but the good of the people.

第二，这些法律的目的也只应是为人民谋福利，而别无其他目的。

Thirdly, they must not raise taxes on the property of the peopl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given by themselves or their deputies. And this properly concerns only such governments where the legislative is always in being, or at least where the people have not reserved any part of the legislative to deputies, to be from time to time chosen by themselves.

第三，这些立法机关不能在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的情况下对人民的财产征税。这一点当然只与那种立法机关长期固定不变，或者至少人民没有定期选出代表并将立法权授予这些代表的政府有关。

Fourthly, legislative neither must nor can transfer the power of making laws to anybody else, or place it anywhere but where the people have.

第四，立法机构既不该也不能将制定法律的权力转让给其他任何人，或将这种权力用于并非人民所安排的其他任何地方。

[11_1]."Human laws are measures in respect of men whose actions they must direct, howbeit such measures they are as have also their higher rules to be measured by, which rules are two—the law of God and the law of Nature; so that laws human must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laws of Nature, and without contradiction to any positive law of Scripture, otherwise they are ill made." Hooker, Eccl. Pol. iii. 9.
"To constrain men to anything inconvenient doth seem unreasonable." Ibid. i. 10.

[12_1].“人类法是指导人们行为的尺度，而还有更高的法则来规范这些尺度。更高的法则有两种：上帝的法则和自然法。所以，必须根据一般的自然法来制定人类法，并且与《圣经》中的任何实在法不相违背，否则就是制定得不好。”胡克，《宗教政治》，第3卷，第9节。
“强迫人们做任何不便之事似乎是不合理的。”同上书，第1卷第10节。

Chapter XII　Of the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Federative Power of the Commonwealth

第十二章　论国家的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

The legislative power is that which has a right to direct how the force of the commonwealth shall be employed for preserving the community and the members of it. Because those laws which are constantly to be executed, and whose force is always to continue, may be made in a little time, therefore, there is no need that the legislative should be always in being, not having always business to do. And because it may be too great a temptation to human frailty, apt to grasp at power, for the same persons who have the power of making laws to have also in their hands the power to execute them, whereby they may exempt themselves from obedience to the laws they make, and suit the law, both in its making and execution, to their own private advantage, and thereby come to have a distinct interest from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 contrary to the end of society and government. Therefore in well-ordered commonwealths, where the good of the whole is so considered as it ought, the legislative power is put into the hands of divers persons who, duly assembled, have by themselves, or jointly with others, a power to make laws, which when they have done, being separated again, they are themselves subject to the laws they have made; which is a new and near tie upon them to take care that they make them for the public good.

立法权是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保护社会及社会成员的权力。由于那些必须经常加以执行并且长期有效的法律可以在短期内制定，

既然立法机关并不是经常有事可做，那么立法机关就没有一直存在的必要。此外，倘若制定法律的权力和执行法律的权力都掌握于同一批人之手，也许会对人类的弱点造成太大的诱惑，使他们有攫取权力的倾向，从而让自己不必服从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与自己的个人利益相符合，由此，他们就逐渐拥有与社会其他成员不同的利益，与社会和政府之目的相违背。所以，在秩序井然的国家里，整体的福利受到应有的重视，立法权被置于定期集会、有权自己制定或与他人联合制定法律的若干人手中。而当法律制定后，他们再次分开，并且自己也受所制定的法律的管辖。这是对他们的全新的切身束缚，旨在确保他们制定法律是为了公众的福利。

But because the laws that are at once, and in a short time made, have a constant and lasting force, and need a perpetual execution, or an attendance thereunto,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here should be a power always in being which should see to the execution of the laws that are made, and remain in force. And thus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 come often to be separated.

然而，因为那些在短期内一次性制定出来的法律具有长期持续的效力，需要经常予以执行和关注，所以，必须存在一个长期的权力机构来确保业已制定且持续有效的法律得以执行。于是，立法权和执行权常保持分立状态。

There is another power in every commonwealth which one may call natural, because it is that which answers to the power every man naturally had before he entered into society. For though in a commonwealth the members of it are distinct persons, still, in reference to one another, and, as such as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the society, yet, in reference to the rest of mankind, they make one

body, which is, as every member of it before was, still in the state of Nature with the rest of mankind, so that the controversies that happen between any man of the society with those that are out of it are managed by the public, and an injury done to a member of their body engages the whole in the reparation of it. So that under this consideration, the whole community is one body in the state of Nature in respect of all other states or persons out of its community.

每一个国家中还存在另一种权力，可以称之为自然的权力，因为它与每个人在加入社会之前享有的自然权力是相同的。尽管在一个国家中，人们就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言，仍是不同的个人，并以此身份受社会法律的支配，然而，相对于外人而言，他们则构成了一个整体，正如其每个成员在加入社会之前那样，这个整体仍和外人处于自然状态。所以，应由公众来解决社会的任何成员与社会以外的其他人之间所发生的纠纷；全体成员都要参与对他们这个整体中的一员所造成损害之索赔。因此，从这一角度考虑，就所有其他国家或这个社会之外的人而言，整个社会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一个整体。

This, therefore, contains the power of war and peace, leagues and alliances, and all the transactions with all persons and communities without the commonwealth, and may be called federative if anyone pleases. So the thing be understood, I am indifferent as to the name.

所以，这种权力包括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处理与国外一切人士和社会的所有事务之权力。如若任何人愿意，可称之为对外权。只要能够便于理解，怎么称呼我无所谓。

These two powers, executive and federative, though they be really distinct in themselves, yet one comprehend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municipal laws of the society within itself upon all that are parts of it, the oth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security and interest of the public without with all those that it may receive benefit or damage from, yet they are always almost united. And though this federative power in the well or ill management of it be of great moment to the commonwealth, yet it is much less capable to be directed by antecedent, standing, positive laws than the executive, and so must necessarily be left to the prudence and wisdom of those whose hands it is in, to be managed for the public good. For the laws that concern subjects one amongst another, being to direct their actions, may well enough precede them. But what is to be done in reference to foreigners depending much upon their actions, and the variation of designs and interests, must be left in great part to the prudence of those who have this power committed to them, to be managed by the best of their skill for the advantage of the commonwealth.

这两种权力，即执行权和对外权，尽管本身的确不相同，前者包括对社会内部所有成员执行国内法，而后者是指管理有关公众安全和利益的事项，以及所有可能由此带来的利益或损害的对外事务，但这两种权力几乎总是相互结合的。尽管对外权的行使是否得当对国家影响至关重大，但它远不及执行权能受事先制定、长期有效的明文法的指导，所以，这种权力就必然要交由掌握此权力的人以公共福利为目的，依他们的智慧和审慎来行使。至于涉及臣民间相互关系的法律，既然是为了指导他们的行动，完全可以预先制定。但是如何处理外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人的行动以及其企图和兴趣的变化，这种情况就必须主要由被委以此权力的人们凭其智谋来决定，他们需要为了国家利益竭尽己能来处理。

Though, as I said, the executive and federative power of every community be really distinct in themselves, yet they are hardly to be separated and plac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hands of distinct persons. For both of them requiring the force of the society for their exercise, it is almost impracticable to place the force of the commonwealth in distinct and not subordinate hands, or that the executive and federative power should be placed in persons that might act separately, whereby the force of the public would be under different commands, which would be apt some time or other to cause disorder and ruin.

如我所说，尽管每个社会的执行权和对外权本身的确不相同，但几乎无法将它们分开并同时交到不同的人手里。因为行使这两种权力都需要社会的力量，所以将国家的力量置于不同且互不隶属的人们手中确实不可行；而倘若将执行权和对外权交给可以分别行动的人，那么，公众的力量由此就会受不同的人支配，如此一来，混乱和毁灭迟早会发生。

Chapter XIII Of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Powers of the Commonwealth

第十三章　论国家权力的统属

Though in a constituted commonwealth standing upon its own basis and acting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ure, that is, acting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ommunity, there can be but one supreme power, which is the legislative, to which all the rest are and must be subordinate, yet the legislative being only a fiduciary power to act for certain ends, there remains still in the people a supreme power to remove or alter the legislative, when they find the legislative act contrary to the trust reposed in them. For all power given with trust for attaining an end being limited by that end, whenever that end is manifestly neglected or opposed, the trust must necessarily be forfeited, and the power devolve into the hands of those that gave it, who may place it anew where they shall think best for their safety and security. And thus the community perpetually retains a supreme power of saving themselves from the attempts and designs of anybody, even of their legislators, whenever they shall be so foolish or so wicked as to lay and carry on designs against the liberties and properties of the subject. For no man or society of men having a power to deliver up their preservation, or consequently, the means of it, to the absolute will and arbitrary dominion of another, whenever anyone shall go about to bring them into such a slavish condition, they will always have a right to preserve what they have not a power to part with, and to rid themselves of those who invade this fundamental, sacred, and unalterable law of self-preservation for which they entered into society. And thus the community may be said in this respect to be

always the supreme power, but not as considered und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ause this power of the people can never take place till the government be dissolved.

虽然在一个依靠自身基础并按照自己的性质，即为保护社会而行事的有组织的国家里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其余的一切权力都必须从属于它。但立法权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使的一种受托的权力，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违背他们的委托时，人民依然拥有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的最高权力。因为，既然所有的权力都是为了达到一种目的而被委托的，就必然受到这种目的的限定，当这种目的明显被忽略或遭到反对时，委托必然被取消，权力又重回当初授权的人们手里，他们可以将之重新授予他们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安全和保障之人。因此，社会始终保留一种使自己免受任何人，甚至是他们的立法者的攻击和谋算之最高权力：有时他们竟会愚蠢或邪恶到对人民的权力和财产有所图谋并付诸行动的地步。因为任何人或人类社会都没有将自我保护的任务或与此相关的手段交付于另一个人的绝对意志和专断统治的权力。每当任何人想要置他们于这样一种奴役状态时，他们总是拥有权力保护他们无权放弃的东西，并且有权让自己摆脱那些对至关重要、不可侵犯且不可变更的自卫法则进行侵犯的人，而人们之所以加入社会正是为了自我保护。因此，我们可以说共同体在这方面总是享有最高权力，却不能认为在任何政体下都是如此，因为直到政府解体，人民的这一权力才能产生。

In all cases, whilst the government subsists, the legislative is the supreme power. For what can give laws to another must need be superior to him, and since the legislative is no otherwise legislative of the society but by the right it has to make laws for all the parts, and for every member of the society prescribing rules to their actions, and giving power of execution, where they are transgressed, the legislative must need be the supreme, and all

other powers in any members or parts of the society derived from and subordinate to it.

在政府存在的任何情况下，立法权就是最高权力，因为一定是凌驾于一个人之上的人才能对那个人立法。而且，立法权之所以成为社会的立法权就在于它有权为社会的各个部分和每个成员制定法律，为他们的行为制定准则，在法律被违反时有权授予执行权。立法权必须是最高权力，而社会的任何成员或任何组成部分所拥有的其他一切权力都源于它并从属于它。

In some commonwealths where the legislative is not always in being, and the executive is vested in a single person who has also a share in the legislative, there that single person, in a very tolerable sense, may also be called supreme; not that he has in himself all the supreme power, which is that of law-making, but because he has in him the supreme execution from whom all inferior magistrates derive all their several subordinate powers, or, at least,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m; having also no legislative superior to him, there being no law to be made without his consent, which cannot be expected should ever subject him to the other part of the legislative, he is properly enough in this sense supreme. But yet, it is to be observed that though oaths of allegiance and fealty are taken to him, it is not to him as supreme legislator, but as supreme executor of the law made by a joint power of him with others, allegiance being nothing but an obedience according to law, which, when he violates, he has no right to obedience, nor can claim it otherwise than as the public person vested with the power of the law, and so is to be considered as the image, phantom, or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monwealth, acted by the will of the society declared in its laws, and thus he has no will, no power, but that of the law. But when he quits this

representation, this public will, and acts by his own private will, he degrades himself, and is but a single private person without power and without will, that has any right to obedience; the members owing no obedience but to the public will of the society.

在一些并非常设立法机关的国家里，执行权被授予一个参与立法的独立个人。在此情况下，那个人在广义上也可以被称为是至高无上的。这并非因为他本身拥有一切最高的权力，即制定法律的权力，而是因为他拥有最高的执行权，而一切下级官吏都从他那里得到所有各自的或至少最大部分的从属性权力；并且，既然没有立法机关凌驾于他之上，未经他的同意就不能制定法律，也就不能指望他会愿意屈从于立法机关的其他部分，那么在此意义上，说他至高无上再合适不过了。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别人向他宣誓效忠，但并不是把他视为最高立法者，而是把他视为法律（通过他与别人联合的权力而制定）的最高执行者来宣誓的。效忠不过是依照法律的服从，倘若他自己触犯了法律，他就无权要求别人服从，而且要不是因为他是被赋予了法律权力的公仆，他也不能要求别人服从他，所以他应被视为国家的象征、化身或代表，依照国家法律所表明的社会意志行事。因此，他没有意志，没有权力，而只有法律的意志与权力。然而，当他不再作为这种代表，而是放弃公共意志凭自己的私人意志行事时，他就降低了自己，成为了一个没有权力和意志的个人，他就不要别人服从他的权利，因为除了公共意志，社会成员无需服从其他意志。

The executive power placed anywhere but in a person that has also a share in the legislative is visibly subordinate and accountable to it, and may be at pleasure changed and displaced; so that it is not the supreme executive power that is exempt from subordination, but the supreme executive power vested in one, who having a share in the legislative, has no distinct superior legislative to be subordinate and accountable to, farther than he himself shall join

and consent, so that he is no more subordinate than he himself shall think fit, which one may certainly conclude will be but very little. Of other ministerial and subordinate powers in a commonwealth we need not speak, they being so multiplied with infinite variety in the different customs and constitutions of distinct commonwealth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give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m all. Only thus much which is necessary to our present purpose we may take notice of concerning them, that they have no manner of authority, any of them, beyond what is by positive grant and commission delegated to them, and are all of them accountable to some other power in the commonwealth.

倘若执行权不属于有权参与立法的人，那么它显然从属于立法机关，立法机关需要对这种权力负责，也可以随意变动和更换它。所以，并不是最高执行权免于从属他人，而是当最高执行权归属于一个参与立法权的人时才如此。既然一个人参与立法，那么，除了他所参加和同意的立法机关，他并不从属于其他更高的立法机关并对之负责。因此，他只在自己认为适当时才从属于别人，而人们可以断定，此种情况少之又少。我们不必谈及一个国家的其他辅助性和从属性的权力，因为它们因各个国家不同的习惯和组织而种类如此繁多，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对它们进行详细的描述。关于这些权力，我们只关注那些于本文之目的有必要的方面，即它们唯有依据明文授予和委托而获得的权威而别无其他权威，且都对国家的其他某种权力负责。

It is not necessary—no, nor so much as convenient—that the legislative should be always in being; but absolutely necessary that the executive power should, because there is not always need of new laws to be made, but always need of execution of the laws that are made. When the legislative hath put the execution of the laws they make into other hands, they have a power still to resume it out

of those hands when they find cause, and to punish for any maladministration against the laws. The same holds also in regard of the federative power, that and the executive being both ministerial and subordinate to the legislative, which, as has been shown, in a constituted commonwealth is the supreme, the legislative also in this case being supposed to consist of several persons; for if it be a single person, it cannot but be always in being, and so will, as supreme, naturally have the supreme executive power, together with the legislative, may assemble and exercise their legislature, at the times that either their original constitution or their own adjournment appoints, or when they please, if neither of these hath appointed any time, or there be no other way prescribed to convoke them. For the supreme power being placed in them by the people, it is always in them, and they may exercise it when they please, unless by their original constitution they are limited to certain seasons, or by an act of their supreme power they have adjourned to a certain time, and when that time comes, they have a right to assemble and act again.

立法机关长期存在既无必要，亦不方便。但是执行机关的长期存在就完全有必要，因为并非总是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却总是需要执行所制定的法律。当立法机关将执行其所制定之法律的权力交于他人之手后，它们仍有权在其认为有必要时从那些人手中收回这一权力，并惩罚任何违法的弊政。这也同样适用于对外权。对外权和执行权都辅助并从属于立法权，而立法权，如前所述，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中最高的权力。在此情况下，立法机关还应包括一些人（因为倘若它是单独一个人，就只能总是存在，因而作为最高权力，它自然就同时拥有立法权和最高执行权），他们可以依据最初宪法所规定的时间或在休会时所指定的时间集会和行使立法权；倘若两者都未指定任何召集时间或未规定其他召集方法，他们便可以在自认为合适的时间集会并行使立法权。因为最高权力既是由人民授予他们的，它就总是由他们掌

握，而他们可以在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行使它，除非他们依据最初的宪法只能在一定时期开会，或依据他们最高权力的某个条例已经决定休会到某一时候，而这一时间一旦到来，他们就有权再次集会并行使其权力。

If the legislative, or any part of it, be made up of representatives, chosen for that time by the people, which afterwards return into the ordinary state of subjects, and have no share in the legislature but upon a new choice, this power of choosing must also be exercised by the people, either at certain appointed seasons, or else when they are summoned to it; and, in this latter case, the power of convoking the legislative is ordinarily placed in the executive, and has one of these two limitations in respect of time—that either 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requires their assembling and acting at certain intervals; and then the executive power does nothing but ministerial issue directions for their electing and assembling according to due forms; or else it is left to his prudence to call them by new elections when the occasions or exigencies of the public require the amendment of old or making of new laws, or the redress or prevention of any inconveniences that lie on or threaten the people.

倘若组成立法机关或其任何部分的代表是由人民在某个时期所选，期满后那些代表将恢复为普通臣民，只有重新当选才能参与立法机关，那么这种选举权也必须由人民在指定的时间或在他们被召集来参加选举立法机关时行使。在后一种情况下，召集立法机关开会的权力通常被赋予执行机关，在时间上受制于以下二者之一：要么最初的宪法规定立法机关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集会并行使职权，那样的话，执行权仅从行政方面发出指令，要选举和集会依据正当形式进行；要么由执行权在有特殊情况或者有公众紧急需求时要求修改旧法

律或制定新法律，或者在有必要消除或防止困扰或威胁人民的任何麻烦时刻，审慎地通过举行新的选举来召集大家开会。

It may be demanded here, what if the executive power, being possessed of the force of the commonwealth, shall make use of that force to hinder the meeting and acting of the legislative, when 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or the public exigencies require it? I say, using force upon the people, without authority, and contrary to the trust put in him that does so, is a state of war with the people, who have a right to reinstate their legislative in the exercise of their power. For having erected a legislative with an intent they should exercise the power of making laws, either at certain set times, or when there is need of it, when they are hindered by any force from what is so necessary to the society, and wherein the safety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people consists, the people have a right to remove it by force. In all states and conditions, the true remedy of force without authority is to oppose force to it. The use of force without authority always puts him that uses it into a state of war as the aggressor, and renders him liable to be treated accordingly.

在此，有人可能提出一个问题：执行权掌握国家的力量，倘若最初的宪法或公众却又急切需要立法机关开会以行使职权，而执行权却利用国家力量阻碍开会，又该怎么办呢？我的回答是：未经授权并违背他所受的委托而对人民施以暴力，就是对人民宣战，人民有权恢复立法机构，让其行使权力。因为既然人民设立一个立法机关的目的是使其在某些固定的时间或在需要它时行使制定法律的权力，这一权力对社会是如此必要并关系到人民的安全和保障，那么当立法机关受到任何武力的阻碍而不能行使这一权力时，人民有权用武力将阻碍清除。在各种情况和条件下，纠正未经授权而使用武力的真正办法是以武力对付武力。未经授权就使用武力常常将使用武力之人置于战争状

态而使他成为侵略者，所以人们必须把他当成侵略者来对待。

The power of assembling and dismissing the legislative, placed in the executive, gives not the executive a superiority over it, but is a fiduciary trust placed in him for the safety of the people in a case where the uncertainty and variableness of human affairs could not bear a steady fixed rule. For it not being possible that the first framers of the government should by any foresight be so much masters of future events as to be able to prefix so just periods of return and duration to the assemblies of the legislative, in all times to come, that might exactly answer all the exigencies of the commonwealth, the best remedy could be found, for this defect was to trust this to the prudence of one who was always to be present, and whose business it was to watch over the public good. Constant, frequent meetings of the legislative, and long continuations of their assemblies, without necessary occasion, could not but be burdensome to the people, and must necessarily in time produce more dangerous inconveniences, and yet the quick turn of affairs might be sometimes such as to need their present help; any delay of their convening might endanger the public; and sometimes, too, their business might be so great that the limited time of their sitting might be too short for their work, and rob the public of that benefit which could be had only from their mature deliberation. What, then, could be done in this case to prevent the community from being exposed some time or other to imminent hazard on one side or the other, by fixed intervals and periods set to the meeting and acting of the legislative, but to entrust it to the prudence of some who, being present and acquainted with the state of public affairs, might make use of this prerogative for the public good? And where else could this be so well placed as in his hands who was entrusted with the execution of the laws for the same end? Thus, supposing

the regulation of times for the assembling and sitting of the legislative not settled by 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it naturally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executive; not as an arbitrary power depending on his good pleasure, but with this trust always to have it exercised only for the public weal, as the occurrences of times and change of affairs might require. Whether settled periods of their convening, or a liberty left to the prince for convoking the legislative, or perhaps a mixture of both, hath the least inconvenience attending it, it is not my business here to inquire, but only to show that, though the executive power may have the prerogative of convoking and dissolving such conventions of the legislative, yet it is not thereby superior to it.

赋予执行机关召集和解散立法机关的权力并不是将执行机关置于立法机关之上，而只是为了人民的安全，在人类事务的变化无常不能适应固定不变的规则之情况下给予执行机关的一种委托。因为，政府的创建者不可能如此有远见，不可能对未来的事件预料如神，不可能能为未来长时间里立法机关集会的恢复和期限预定如此适当的时间，从而完全满足国家的所有急迫需要。因此，弥补这一缺陷的最佳方法就是将这件事情委托给一个长期存在的负责照管公众福利的人，由他审慎地做出决定。对于人民而言，立法机关的频繁集会和无必要的漫长会期只能是个负担，迟早会造成更危险的不利情况；但是，事情的突变有时又会需要他们的及时帮助。召集会议的任何推延都会危及到公众；有时他们的任务如此繁重以至于有限的会期让他们难以完成工作，结果使公众失去了只有靠他们的深思熟虑才能得到的益处。于是，在此情况下，为了防止社会因立法机关召集会议和行使职权的固定间隔时间和会议期限而遭受随时发生的各种危险，除了把这件事情委托给一些在任并熟悉公共事务的人们来审慎地决定，利用此特权为公众谋福利外，还能做什么呢？这件事情除了交给已受托并为同一目的而执行法律的人，还有谁能更好地担此重任呢？因此，倘若最初的组织法没有规定立法机关召集会议的时间和会议期限，那么自然而然

地，这件事情就落到执行机关的手里。这不是作为一种随心所欲的专断权力，被委任者应该根据时局变化和事态变迁的需要，总是只为公共福利而行使这一权力。到底是为立法机关安排固定的会期，还是让君主有召集立法机关的自由，还是二者混用，哪种方式所带来的麻烦最少，不需要我在这里探讨。我只是想指出，虽然执行权有召开和解散立法机关会议的特权，但它并不因此就凌驾于立法机关之上。

Things of this world are in so constant a flux that nothing remains long in the same state. Thus people, riches, trade, power, change their stations; flourishing mighty cities come to ruin, and prove in time neglected desolate corners, whilst other unfrequented places grow into populous countries filled with wealth and inhabitants. But things not always changing equally, and private interest often keeping up customs and privileges when the reasons of them are ceased, it often comes to pass that in governments where part of the legislative consists of representatives chosen by the people, that in tract of time, this representation becomes very unequal and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reasons it was at first established upon. To what gross absurdities the following of custom when reason has left it may lead, we may be satisfied when we see the bare name of a town, of which there remains not so much as the ruins, where scarce so much housing as a sheepcote, or more inhabitants than a shepherd is to be found, send as many representatives to the grand assembly of law-makers as a whole county numerous in people and powerful in riches. This strangers stand amazed at, and everyone must confess needs a remedy; though most think it hard to find one, becaus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legislative being the original and supreme act of the society, antecedent to all positive laws in it, and depending wholly on the people, no inferior power can alter it. And, therefore, the people when the legislative is once constituted, having in such a

government as we have been speaking of no power to act as long as the government stands, this inconvenience is thought incapable of a remedy.

世间万物总是处于这样不断变化的状态，没有任何事物长期处于同一状态。于是民族、财富、贸易、权力的状况发生改变；欣欣向荣的大城市开始衰败，最后变成备受忽视的穷乡僻壤，而其他人迹罕至的地方却发展成富裕的人口稠密区。然而，事物的变化并不总是平均的，私人利益常常把某些习俗和特权保留下来，纵然它们已无存在的理由。所以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在一些政府里，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立法机关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代表的分配变得很不平等，和当初分配代表的理由很不相称。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徒然保留了城市的虚名，留下的不过是废墟，在那里所能看到的房屋不过是个别的羊栏，所能找到的人不过是个别的牧羊人，但是它们还能派出与人口众多且财力雄厚的郡同样多的代表出席庞大的立法会议。于是，我们就会确信，沿袭已无存在理由的习俗会造成很大的谬误。外人对此瞠目结舌，每个人都承认必须纠正这种状况，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很难找到纠正的方法，因为立法机关的组成法既是社会最初的和最高的法令，先于社会的一切明文法而存在，并且完全依赖于人民，所以没有任何下级权力能改变它。因此，立法机关一旦构成，只要政府还继续存在，而人民在我们如上所述的政府中没有权力可以行使，那么就认为这种缺陷是无法补救的。

Saluspopuli suprema lexis certainly so just and fundamental a rule, that he who sincerely follows it cannot dangerously err. If, therefore, the executive who has the power of convoking the legislative, observing rather the true proportion than fashion of representation, regulates not by old custom, but true reason, the number of members in all places, that have a right to be distinctly represented, which no part of the people, however incorporated,

can pretend to, but in proportion to the assistance which it affords to the public, it cannot be judged to have set up a new legislative, but to have restored the old and true one, and to have rectified the disorders which succession of time had insensibly as well as inevitably introduced; for it being the interest as well as intention of the people to have a fair and equal representative, whoever brings it nearest to that is an undoubted friend to and establisher of the government, and cannot miss the consent and approbation of the community; prerogative being nothing but a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prince to provide for the public good in such cases which, depending upon unforeseen and uncertain occurrences, certain and unalterable laws could not safely direct. Whatsoever shall be done manifestly fo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and establishing the government upon its true foundations is, and always will be, just prerogative. The power of erecting new corporations, and therewith new representatives, carries with it a supposition that in time the measures of representation might vary, and those places have a just right to be represented which before had none; and by the same reason, those cease to have a right, and be too inconsiderable for such a privilege, which before they had it. It is not a change from the present state which, perhaps, corruption or decay has introduced, that makes an inroad upon the government, but the tendency of it to injure or oppress the people, and to set up one part or party with a distinction from and an unequal subjection of the rest. Whatsoever cannot but be acknowledged to be of advantage to the society and people in general, upon just and lasting measures, will always, when done, justify itself; and whenever the people shall choose their representatives upon just and undeniably equal measures, suitable to the original frame of the government, it cannot be doubted to be the will and act of the society, whoever permitted or caused them to do so.

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确实是公正和根本的准则。只要真诚地遵守这一准则的人就不会犯严重的错误。所以，倘若有权召集立法机关开会的执行机关，真正遵守代表比例制而非它的形式，不是根据旧习俗而是根据真正的理性来规定各地有权选出作为代表的数量——这种权力并非任何一部分的人怎样结合就能自称拥有的，而是与其对公众的贡献成比例——那么，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只是恢复了原有的真正的立法机关而非建立了一个新的立法机关，只是纠正了因时间推移不知不觉而又无可避免地引起的失调状况。因为人民的利益和意图是享有公平和平等的代表制，所以无论谁使它最接近于这一目的，谁无疑就是政府的真正朋友和创立者，不会得不到社会的同意和认可。特权不过是君主掌握的一种权力，在出现无法预见和不能确定的情况使得确定和不可变更的法律无法运用自如的情况下，可以为公众谋福利。无论任何行为，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将政府建立在其真正的基础上，都是而且永远是正当的特权。建立新选区并随之分配新代表的权力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分配代表的规定迟早会发生变动，那些以前无权推选代表的地方可以享有推选代表的正当权利；基于同理，那些以前享有此种权利的地方可以失去这种权利，并且对此权利而言变得无足轻重。政府受到损害并不是由于腐败和衰退可能引起的现状的改变，而是由于政府伤害或压迫人民的倾向，以及扶植一部分人或党派使之有别于其余人并将其余人置于不平等的臣服地位之做法。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依据公正和持久的法则被认为是对社会和一般人民有利，一旦做了，总是能证明其正当性。无论何时，只要人民以公正且无懈可击的平等办法来选举他们的代表，适合于政府原来的组织结构，那无疑是社会的意志和行为，不论是谁允许和建议他们这样做的。

Chapter XIV　Of Prerogative

第十四章　论特权

Where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 are in distinct hands, as they are in all moderated monarchies and well-framed governments, there the good of the society requires that several things should be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him that has the executive power. For the legislators not being able to foresee and provide by laws for all that may be useful to the community, the executor of the laws, having the power in his hands, has by the common law of Nature a right to make use of it for the good of the society, in many cases where the municipal law has given no direction, till the legislative can conveniently be assembled to provide for it; nay, many things there are which the law can by no means provide for, and those must necessarily be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him that has the executive power in his hands, to be ordered by him as the public good and advantage shall require; nay, it is fit that the laws themselves should in some cases give way to the executive power, or rather to this fundamental law of Nature and government, viz., that as much as may be all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are to be preserved. For since many accidents may happen wherein a strict and rigid observation of the laws may do harm, as not to pull down an innocent man's house to stop the fire when the next to it is burning; and a man may come sometimes within the reach of the law, which makes no distinction of persons, by an action that may deserve reward and pardon; it is fit that the ruler should have a power in many cases to mitigate the severity of the law, and pardon some offenders, since the end of government being the preservation of all as much as may be, even the guilty are to be spared where it

can prove no prejudice to the innocent.

在不同的人掌握立法权和执行权的情况下，就像在一切有节制的君主国和组织良好的政府中那样，社会的福利要求拥有执行权的人来裁处一些事情。因为既然立法者不能预见并以法律来规定一切对社会有益的事情，那么在国内法未做出规定的许多情形下，在立法机关能够被方便地召集来对其加以规定之前，拥有执行权的法律执行者有权依据一般的自然法，利用自然法来为社会谋福利。再者，存在许多法律根本不能规定的事情，这些事情必须交给拥有执行权的人来自由裁定，由他依据公众福利和利益的要求来处理。不仅如此，法律本身在某些情况下要让位于执行权，或更确切地说，让位于自然和政府的这一根本法，即应当尽可能地保护社会的所有成员。这是恰当的，因为可能会发生许多偶然的事情，而在那些情况下严格而呆板地执行法律可能会造成损害（例如当邻居失火时，不拆掉一个无辜者的房子来阻止火势蔓延），而一个人若做了一件值得嘉奖和宽恕之事，有时可能会受到法律不加区别地制裁。所以，统治者在许多情况下正当地拥有减轻法律的严厉性和赦免某些罪犯的权力，因为既然政府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保护所有人，那么只要能证明不会损害到无辜者，即使有罪之人也可以被赦免。

This power to act according to discretion for the public good, without the prescription of the law and sometimes even against it, is that which is called prerogative; for since in some governments the lawmaking power is not always in being and is usually too numerous, and so too slow for the dispatch requisite to execution, and also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to foresee and so by laws to provide for all accidents and necessities that may concern the public, or to make such laws as will do no harm, if they are executed with an inflexible rigour on all occasions and upon all persons that may come in their way, therefore there is a latitude left

to the executive power to do many things of choice which the laws do not prescribe.

这种没有法律规定，有时甚至与法律相违背，但为了公众福利而酌情裁处的权力，被称为特权。因为在一些政府里，制定法律的权力机关并非总是存在，而且就执行法律所需之速度而言，这种机关的成员太多，行动又太慢；并且，因为无法预见，所以也就无法用法律规定所有与公众相关的偶然事件和紧急情况，而且倘若所制定的法律对于相关的一切情况和所有人都毫不变通地严厉地加以执行，也无法不造成伤害；因此，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许多特殊情况，要给执行机关留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来加以裁定。

This power, whilst employ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mmunity and suitably to the trust and ends of the government, is undoubted prerogative, and never is questioned. For the people are very seldom or never scrupulous or nice in the point; they are far from examining prerogative whilst it is in any tolerable degree employed for the use it was meant, that is, fo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and not manifestly against it. But if there comes to be a question between the executive power and the people about a thing claimed as a prerogative, the tendency of the exercise of such prerogative, to the good or hurt of the people, will easily decide that question.

当这种权力是为了社会福利而行使，并且符合政府所受的委托和其目的时，就是毫无疑问的特权，绝不会受到质疑。因为，当特权的运用是在任何尚可忍受的程度上为了它本来的目的，即为人民谋求福利，而不是明显地与之相抵触时，人民就很少或从不会在细节上过于苛刻或斤斤计较，不至于去质疑特权。然而，倘若执行权和人民之间就某个被称为特权的东西产生分歧，那么根据行使这一特权的倾向是

有利还是有害于人民，便很容易裁决这一问题。

It is easy to conceive that in the infancy of governments, when commonwealths differed little from families in number of people, they differed from them too, but little in number of laws; and the governors being as the fathers of them, watching over them for their good, the government was almost all prerogative. A few established laws served the turn, and the discretion and care of the ruler supplied the rest. But when mistake or flattery prevailed with weak princes, to make use of this power for private ends of their own and not for the public good, the people were fain, by express laws, to get prerogative determined in those points wherein they found disadvantage from it, and thus declared limitations of prerogative were by the people found necessary in cases which they and their ancestors had left in the utmost latitude to the wisdom of those princes who made no other but a right use of it, that is, for the good of their people.

设想政府建立之初的情况并非难事，那时国家与家族在人口数量上差别甚微，在法律的数量上差别也没有多大；既然统治者就像他们的父亲，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照料他们，那么政府就几乎全凭特权进行统治。少数几个既定的法律就足够了，其余的事情由统治者凭其斟酌和审慎灵活处理。然而，当软弱的君主使错误或阿谀奉承占了上风，利用这种特权不是为了公共福利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私人的目的时，人民就只得通过明文的法律就他们认为不利于自己的那些方面对特权做出规定，宣布在那些方面对特权加以限制，而在以前，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将这些特权最大限度地留给君主，让他们凭其智慧只作正当的利用，换言之，只在为其人民谋福利时才使用特权。

And therefore they have a very wrong notion of government who say that the people have encroached upon the prerogative when they have got any part of it to be defined by positive laws. For in so doing, they have not pulled from the prince anything that of right belonged to him, but only declared that that power which they indefinitely left in his or his ancestors' hands, to be exercised for their good, was not a thing which they intended him, when he used it otherwise. For the end of government being the good of the community, whatsoever alterations are made in it tending to that end cannot be an encroachment upon anybody; since nobody in government can have a right tending to any other end; and those only are encroachments which prejudice or hinder the public good. Those who say otherwise speak as if the prince had a distinct and separate interest from the good of the community, and was not made for it; the root and source from which spring almost all those evils and disorders which happen in kingly governments. And indeed, if that be so, the people under his government are not a society of rational creatures, entered into a community for their mutual good; they are not such as have set rulers over themselves, to guard and promote that good; but are to be looked on as a herd of inferior creatures under the dominion of a master, who keeps them and works them for his own pleasure or profit. If men were so void of reason and brutish as to enter into society upon such terms, prerogative might indeed be, what some men would have it, an arbitrary power to do things hurtful to the people.

所以，那些说人民用实在法对特权的任何部分加以界定就是侵犯了特权的人，他们对政府有一种非常错误的看法。人民这样做并没有剥夺君主应享有的任何权利，而仅仅是在宣告：人民以前未加限定地交给他或他的祖先之权力，只能为了替人民谋福利而行使，而当他并非为此目的而使用这一权力时，就是在做人民不希望他做的事了。因

为既然政府的目的是为社会谋福利，那么无论做出何种变革，只要是为了这一目的，都不能算是对任何人的侵犯，因为政府中无人拥有背离该目标的权力。唯有那些不利于或阻碍公众福利的变革才算是侵犯。那些主张相反观点的人们仿佛认为，君主享有与社会福利截然不同且相互分开的利益，君主的设立不是为了社会福利；这就是发生在君主制政府中几乎一切罪恶和混乱的根源。倘若真是如此，处于君主统治之下的人民就不是一群理性动物，为了他们共同的福利而加入社会，为了保护和促进那一福利而将统治者置于自己之上；相反，他们被看成一群处于主人统治下的低等动物，主人养活和使用它们是为了自己的愉悦或利益。倘若人类是如此缺乏理性，如此野蛮愚钝，以此种条件加入社会，那么特权确实会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成为一种损害人民的专断权力。

But since a rational creature cannot be supposed, when free, to put himself into subjection to another for his own harm (though where he finds a good and wise ruler he may not, perhaps, think it either necessary or useful to set precise bounds to his power in all things), prerogative can be nothing but the people's permitting their rulers to do several things of their own free choice where the law was silent, and sometimes too against the direct letter of the law, for the public good and their acquiescing in it when so done. For as a good prince, who is mindful of the trust put into his hands and careful of the good of his people, cannot have too much prerogative- that is, power to do good, so a weak and ill prince, who would claim that power which his predecessors exercised with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law, as a prerogative belonging to him by right of his office, which he may exercise at his pleasure to make or promote an interest distinct from that of the public, gives the people an occasion to claim their right and limit that power, which, whilst it was exercised for their good, they were content and should be tacitly allowed.

然而，既然人们无法假设一个理性的动物在不受他人控制时会为了伤害自己而臣服于另一个人（尽管当他找到一个善良英明的统治者时，他也许认为没有必要也无益在各个方面对统治者的权力加以明确限制），那么特权就只能是人民允许他们的统治者在法律没有规定甚至有时在与法律明文相抵触的情况下，为了公共福利依据自由抉择来做一些事情，并且这样做的时候得到了人们的默许。因为一个不忘人民赋予他的委托并关心人民福利的贤明君主拥有再多的特权（造福人民的权力）也不为过；一个软弱昏庸的君主会要求享有其前辈曾行使过、法律对之未加以规定、因其职位理应属于他的特权，这样他可以随意行使此特权来谋求或获得与公众福利截然不同的利益。这就促使人民重申其权利并限制这种特权，而倘若君主行使这一特权是为人民谋福利，那么人民本会默认同意的。

And therefore, he that will look into the history of England will find that prerogative was always the largest in the hands of our wisest and best princes, because the people observing the whole tendency of their actions to be the public good, contested not what was done without law to that end: or, if any human frailty or mistake (for princes are but men, made as others) appeared in some small declinations from that end, yet it was visible the main of their conduct tended to nothing but the care of the public. The people, therefore, finding reason to be satisfied with these princes, whenever they acted without, or contrary to the letter of the law, acquiesced in what they did, and without the least complaint, let them enlarge their prerogative as they pleased, judging rightly that they did nothing herein to the prejudice of their laws, since they acted conformably to the foundation and end of all laws—the public good.

所以，纵览英国历史就会发现，我们最为贤明善良的君主总是享有最大的特权，因为人民注意到他们所作所为的整个趋势是为了公共福利，因而并不计较他为此目的而做出的一切行动没有法律根据的；或者纵然由于人性的任何弱点或过失（因为君主也是人，同其他人一样）而与这一目的稍有偏差，但是显而易见，他们行动的主要趋向只不过是关心公众。因此，既然每当这些君主在法律未作规定或与法律的明文相抵触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时，人民都能找到对他们感到满意的理由，那么人民就默认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且让他们随意扩大自己的特权而毫无怨言。他们正确地断定，君主于此没有做任何不利于他们法律的事情，因为君主的行为符合一切法律的基础和目的，即公众福利。

Such God-like princes, indeed, had some title to arbitrary power by that argument that would prove absolute monarchy the best government, as that which God Himself governs the universe by, because such kings partake of His wisdom and goodness. Upon this is founded that saying, “That the reigns of good princes have been always most dangerous to the liberties of their people.” For when their successors, managing the government with different thoughts, would draw the actions of those good rulers into precedent and make them the standard of their prerogative—as if what had been done only fo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was a right in them to do for the harm of the people, if they so pleased—it has often occasioned contest, and sometimes public disorders, before the people could recover their original right and get that to be declared not to be prerogative which truly was never so; since it is impossible that anybody in the society should ever have a right to do the people harm, though it be very possible and reasonable that the people should not go about to set any bounds to the prerogative of those kings or rulers who themselves transgressed not the bounds of the public good, for “prerogative is nothing but the power of

doing public good without a rule.”

确实，依据能够证明专制君主制是最佳政体的那一论点，这种像神一般的君主有权享有专断的权力，正如上帝自己也是用专断权力来统治宇宙那样，因为这样的君主具有上帝的智慧与美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这样的说法：“对于其人民的权利而言，贤明君主的统治总是最危险的。”因为当他们的继承人以不同的思想管理政府时，就会援引那些贤明君主所做之事为先例，使之成为他们特权的标准，好像从前只是为了人民之福利才做的事，倒给了他们随意危害人民的权利。在人民能重新获得他们原来的权利，并且宣布那种权利从来就并非真正的特权之前，这一点已经时常引发争论，有时甚至导致公共秩序混乱。因为在社会中，任何人从来都不可能有权去伤害人民，纵然极有可能且合理的是，人民不应对那些本身并未逾越公共福利之界限的君主或统治者所享有的特权设定任何界限。因为“特权不过是在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为公众谋福利的权力罢了”。

The power of calling parliaments in England, as to precise time, place, and duration, is certainly a prerogative of the king, but still with this trust, that it shall be made use of for the good of the nation as the exigencies of the times and variety of occasions shall require. For it being impossible to foresee which should always be the fittest place for them to assemble in, and what the best season, the choice of these was left with the executive power, as might be most subservient to the public good and best suit the ends of parliaments.

在英国召集议会的权力，包括确切的会议时间、地点和会期，无疑是国王的特权。但是，却仍需保证在行使此权力时必须依据时代的迫切需要和各种不同情形的要求为国家谋福利。既然不可能预知召集

议会的最佳时间及地点，那就把这些交由执行权来抉择，从而符合最适于公共福利和议会的目的。

The old question will be asked in this matter of prerogative, “But who shall be the judge when this power is made a right use of?” I answer: between an executive power in being, with such a prerogative, and a legislative that depends upon his will for their convening, there can be no judge on earth. As there can be none between the legislative and the people, should either the executive or the legislative, when they have got the power in their hands, design, or go about to enslave or destroy them, the people have no other remedy in this, as in all other cases where they have no judge on earth, but to appeal to Heaven; for the rulers in such attempts, exercising a power the people never put into their hands, who can never be supposed to consent that anybody should rule over them for their harm, do that which they have not a right to do. And where the body of the people, or any single man, is deprived of their right, or is under the exercise of a power without right, having no appeal on earth, then they have a liberty to appeal to Heaven whenever they judge the cause of sufficient moment. And therefore, though the people cannot be the judge, so as to have,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at society, any superior power to determine and give effective sentence in the case, yet they have reserved that ultimate determination to themselves which belongs to all mankind, where there lies no appeal on earth, by a law antecedent and paramount to all positive laws of men, whether they have just cause to make their appeal to Heaven. And this judgment they cannot part with, it being out of a man's power so to submit himself to another as to give him a liberty to destroy him; God and Nature never allowing a man so to abandon himself as to neglect his own preservation. And since he cannot take away his own life, neither

can he give another power to take it. Nor let anyone think this lays a perpetual foundation for disorder; for this operates not till the inconvenience is so great that the majority feel it, and are weary of it, and find a necessity to have it amended. And this the executive power, or wise princes, never need come in the danger of; and it is the thing of all others they have most needed to avoid, as of all others, the most perilous.

有人会提出关于特权的一个老问题：由谁来裁定这一权力是否运用得当呢？我的回答是：在一个拥有如此特权的现存执行权和一个由执行权决定召集的立法机关之间，尘世间不可能有裁定者。正如执行机关或立法机关在掌握权力时企图或开始奴役或摧残人民，在立法机关和人民之间也不可能有裁定者一样。在此情况下，如同在尘世间没有裁定者的其他所有情况一样，人民别无补救办法，唯有诉诸上天；因为统治者在做此尝试时行使了人民从未授予他们的权力（绝无法设想人民会同意任何人为危害他们而统治他们），做了他们无权做的事情。倘若全体人民或任何个人被剥夺了权利，或受无权行使的权力所支配，而在尘世间又无以诉求，那么每当他们评判足够重大的案件时，就有权诉诸上天。因此，纵使在此情况下人民不能成为裁定者，无法依据那个社会的宪法而拥有任何更高的权力来判断案件并做出有效的宣判，但在尘世间无以诉求的情况下，他们依据一种先于并高于人类一切实在法的法律，为自己保有属于全人类的最后决定权：决定他们是否有正当理由诉诸上天。这种决定权是他们所不能放弃的，因为使自己如此屈从于另一个人以致给了那人毁灭自己的权利，这就超出了人类的权力范围。上帝与自然从不允许一个人如此自暴自弃以致忽视自我保护。既然一个人不能剥夺自己的生命，他也就不能将剥夺自己生命的权力交给另一个人。不要让任何人认为这就会为动乱埋下永远的祸根，因为这种决定权，不到祸害大到大多数人都感受到并对此忍无可忍，且认为必须要加以纠正时，是不会加以行使的。这是执行权或贤明的君主应该永远提防的事情，是所有事情当中他们最需要避免的，也是所有事情当中最为危险的。

Chapter XV Of Paternal, Political and Despotical Power, Considered Together

第十五章　综论父权、政治权力和专制权力

Though I have had occasion to speak of these separately before, yet the great mistakes of late about government having, as I suppose, arisen from confounding these distinct powers one with another, it may not perhaps be amiss to consider them here together.

尽管先前我已有机会分别谈到这几种权力，但是我认为近来关于政府的理论产生重大错误。正是由于混淆了这几种彼此不同的权力，所以在这里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也许并无不当。

Firstly, then, paternal or parental power is nothing but that which parents have over their children to govern them, for the children's good, till they come to the use of reason, or a state of knowledge, wherein they may be supposed capable to understand that rule, whether it be the law of Nature or the municipal law of their country, they are to govern themselves by—capable, I say, to know it, as well as several others, who live as freemen under that law. The affection and tenderness which God hath planted in the breasts of parents towards their children makes it evident that this is not intended to be a severe arbitrary government, but only for the help, instru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ir offspring. But happen as it will, there is, as I have proved, no reason why it should be thought to extend to life and death, at any time, over their children,

more than over anybody else; neither can there be any pretence why this parental power should keep the child in subjection to the will of his parents when he grown to a man and can make the perfect use of reason, any farther than as having received life and education from his parents obliges him to respect, honour, gratitude, assistance, and support, all his life, to both father and mother. And thus, it is true, the paternal is a natural government, but not at all extending itself to the ends and jurisdictions of that which is political. The power of the father doth not reach at all to the property of the child, which is only in his own disposing.

第一，父权或亲权只不过是父母支配其子女的权力。父母为了子女的利益，在他们能够运用理性或达到一种认知状态之前管束他们。我们可以假定他们在那种状态下能够理解那一准则并且应该用它来规范自己，不管它是自然法还是他们国家的国内法。我说“能够”，是指他们像在法律之下作为自由人而生活的其他人一样理解那一法律。上帝将对子女的温情和慈爱植入父母心中，由此可见他的本意并非要使这种管束成为严厉的专断统治，而只是为了帮助、教育和保护他们的后代。但是无论如何，如我在前文中已经证明过的那样，我们都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权力可以扩大到使父母在任何时候对其子女握有生杀大权，正如他们对其他人并不拥有这种权力一样；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当孩子长大成人并能正确运用理性时，这种权力仍使他服从于父母的意志，超过子女因受到父母的生育教育而负有终身尊重、孝敬、感激和赡养父母的义务。因此，虽然父权确实是一种自然的统治，但决不能扩展到政治目的和管辖方面。父权决不触及子女的财产，子女的财产只由他们自己处理。

Secondly, political power is that power which every man having in the state of Nature has given up into the hands of the society, and therein to the governors whom the society hath set

over itself, with this express or tacit trust, that it shall be employed for their good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property. Now this power, which every man has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which he parts with to the society in all such cases where the society can secure him, is to use such means for the preserving of his own property as he thinks good and Nature allows him; and to punish the breach of the law of Nature in others so as it (according to the best of his reason) may most conduce to the preservation of himself and the rest of mankind; so that the end and measure of this power, when in every man's hands, in the state of Nature, being the preservation of all of his society, that is, all mankind in general, it can have no other end or measure, when in the hands of the magistrate, but to preserve the members of that society in their lives, liberties, and possessions, and so cannot be an absolute, arbitrary power over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which are as much as possible to be preserved; but a power to make laws, and annex such penalties to them as may ten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hole, by cutting off those parts, and those only, which are so corrupt that they threaten the sound and healthy, without which no severity is lawful. And this power has its original only from compact and agreement and the mutual consent of those who make up the community.

第二，所谓政治权力，就是每个人在自然状态中享有的但主动交给社会的权力，这种权力又由社会交给社会确立的统治者，社会明确或默许这种转交，即这一权力的使用必须要为社会谋福利并且必须保护社会的财产。如今，这一权力——即每个人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并且由他在社会能给予他保障的各个方面交给社会的权力——就是使用他认为适当的且自然允许他使用的那些办法来保护他的财产，并且惩罚他人违反自然法的权力，以便在他理性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他自己和其余人类。因此，在自然状态下，当这一权力为每个人所掌握时，

其目的和尺度在于保护他所处社会的所有人，即全人类；当行政长官掌握这一权力时，除了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权利和财产，并没有其他目的或尺度。所以，这一权力不能是一种支配他们生命和财产的绝对的、专断的权力，因为生命和财产是应当尽可能受到保护的；而只能是一种对人们制定法律的权力，并且附加刑罚，以便除去部分来保护全体，因为这些部分腐败透顶，威胁到了全人类的生命和安全。若非如此，任何严厉的刑罚都是不合法的。而且这一权力只能源于契约和协议，以及组成社会的那些人们之间的相互同意。

Thirdly, despotical power is an absolute, arbitrary power one man has over another, to take away his life whenever he pleases; and this is a power which neither Nature gives, for it has made no such distinction between one man and another, nor compact can convey.Man, not having such an arbitrary power over his own life, cannot give another man such a power over it, but it is the effect only of forfeiture which the aggressor makes of his own life when he puts himself into the state of war with another. For having quitted reason, which God hath given to be the rule betwixt man and man, and the common bond whereby human kind is united into one fellowship and society; and having renounced the way of peace which that teaches, and made use of the force of war, to compass his unjust ends upon another where he has no right; and so revolting from his own kind to that of beasts, by making force, which is theirs, to be his rule of right, he renders himself liable to be destroyed by the injured person, and the rest of mankind, that will join with him in the execution of justice, as any other wild beast, or noxious brute, with whom mankind can have neither society nor security. And thus captives, taken in a just and lawful war, and such only, are subject to a despotical power, which, as it arises not from compact, so neither is it capable of any, but is the state of war continued. For what compact can be made with a man

that is not master of his own life? What condition can he perform? And if he be once allowed to be the master of his own life, the despotical, arbitrary power of his master ceases. He that is the master of himself and his own life has a right, too, to the means of preserving it, so that as soon as compact enters, slavery ceases, and he so far quits his absolute power and puts an end to the state of war who enters into conditions with his captive.

第三，专制权力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所拥有的绝对的专断权力，可以随时随心所欲地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这一权力不是自然赋予的，因为自然在人们彼此之间并未做出这种区别。它也不是契约所能让渡的权力。因为人既然对他自己的生命没有这种专断的权力，也就不能将这样一种支配自己生命的权力给另一个人。它只是侵略者将自己和他人置于战争状态时丧失自己生命的结果。既然侵略者已经抛弃上帝赐予人类作为人与人之间准则的理性，脱离了使人类联结成为一个团体和社会的共同约束，放弃了理性所启示的和平之路，并且利用战争的武力来达到他无权强加于另一个人的不正当目的，背离人类而沦为野兽，用野兽的强力作为自己的权利准则，那么，他就使得自己被受害人和会同受害人执行法律的其余人类毁灭，就像其它任何凶猛的野兽或毒虫一样，因为人类不能和它们共同生活，而且和它们在一起时也不能得到安全。因此只有在正义和合法战争中捕获的俘虏才受专制权力的支配，由于这种权力并非源于契约，所以也不能订立任何契约，而只是战争状态的继续。因为和一个不能主宰自己生命的人能订立什么契约呢？他能履行什么条件？倘若他一旦主宰自己的生命，他主人的专断权力也就告终了。一个能主宰自己和自己生命的人也就有权采用各种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因此，一旦缔结契约，奴役就会终止。一个人一旦和他的俘虏议定条件，他就放弃了自己的绝对权力并终止了战争状态。

Nature gives the first of these, viz., paternal power to parents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children during their minority, to supply their want of ability and understanding how to manage their property. (By property I must be understood here, as in other places, to mean that property which men have in their persons as well as goods.) Voluntary agreement gives the second, viz., political power to governors,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subjects, to secure them in the possession and use of their properties. And forfeiture gives the thirddespotical power to lords for their own benefit over those who are stripped of all property.

自然将这些权力中的第一种，即父权，赐予父母，让父母在其子女未成年时为他们谋利益，从而弥补子女们在如何管理自己财产方面的无能无知。（必须指出，我所说的财产，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意指人们在其人身和物质方面的财产。）第二种权力，即政治权力，通过自愿的约定给予统治者，让他们来为臣民谋利益，从而保障他们占有并使用自己的财产。第三种权力，即专制权力，通过人权的丧失赐予主子们，让他们为谋自己的利益并奴役那些被剥夺了所有财产的人。

He that shall consider the distinct rise and extent, and the different ends of these several powers, will plainly see that paternal power comes as far short of that of the magistrate as despotical exceeds it; and that absolute dominion, however placed, is so far from being one kind of civil society that it is as inconsistent with it as slavery is with property. Paternal power is only where minority makes the child incapable to manage his property; political where men have property in their own disposal; and despotical over such as have no property at all.

一个人只要考察一下这几种权力截然不同的起源、范围和目的，就会清楚地看到，父权不及统治者权力的程度，正如专制权力超过统治者权力的程度；而绝对统治权，无论如何设置，都不可能是一种公民社会的权力，它与公民社会格格不入，就像奴隶制度与财产权格格不入一样。只有在孩子尚未成年而不能管理自己的财产时，父权才存在；只有在人们拥有归他们自己处理的财产时，政治权力才存在；而专制权力是支配那些根本没有财产的人之权力。

Chapter XVI　Of Conquest

第十六章　论征服

Though governments can originally have no other rise than that before mentioned, nor polities be founded on anything but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yet such have been the disorders ambition has filled the world with, that in the noise of war, which makes so great a part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his consent is little taken notice of; and, therefore, many have mistaken the force of arms for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and reckon conquest as one of the originals of government. But conquest is as far from setting up any government as demolishing a house is from building a new one in the place. Indeed, it often makes way for a new frame of a commonwealth by destroying the former; but,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can never erect a new one.

尽管除了上文所提及的起源之外，政府别无其他起源，而且社会的建立也只能基于人民的同意，但是，野心使世界充满了混乱，导致人们在战争的喧嚣声中（战争的喧嚣声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很少注意人民的这种同意。所以，许多人错把武力当成人民的同意，把征服视为政府的起源之一。然而，征服和任何政府的建立相差甚远，正如拆毁房屋和在原处重建新屋相差甚远一样。诚然，摧毁旧的国家结构往往是为了建立新的国家结构，但如若没有得到人民的同意，绝对不能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结构。

That the aggressor, who puts himself into the state of war with another, and unjustly invades another man's right, can, by such an

unjust war, never come to have a right over the conquered, will be easily agreed by all men, who will not think that robbers and pirates have a right of empire over whomsoever they have force enough to master, or that men are bound by promises which unlawful force extorts from them. Should a robber break into my house, and, with a dagger at my throat, make me seal deeds to convey my estate to him, would this give him any title? Just such a title by his sword has an unjust conqueror who forces me into submission. The injury and the crime is equal, whether committed by the wearer of a crown or some petty villain. The title of the offender and the number of his followers make no difference in the offence, unless it be to aggravate it. The only difference is, great robbers punish little ones to keep them in their obedience; but the great ones are rewarded with laurels and triumphs, because they are too big for the weak hands of justice in this world, and have the power in their own possession which should punish offenders. What is my remedy against a robber that so broke into my house? Appeal to the law for justice. But perhaps justice is denied, or I am crippled and cannot stir, robbed, and have not the means to do it. If God has taken away all means of seeking remedy, there is nothing left but patience. But my son, when able, may seek the relief of the law, which I am denied; he or his son may renew his appeal till he recover his right. But the conquered, or their children, have no court—no arbitrator on earth to appeal to. Then they may appeal, as Jephtha did, to Heaven, and repeat their appeal till they have recovered the native right of their ancestors, which was to have such a legislative over them as the majority should approve and freely acquiesce in. If it be objected this would cause endless trouble, I answer, no more than justice does, where she lies open to all that appeal to her. He that troubles his neighbour without a cause is punished for it by the justice of the court he appeals to. And he that appeals to Heaven must be sure he has right on his

side, and a right, too, that is worth the trouble and cost of the appeal, as he will answer at a tribunal that cannot be deceived, and will be sure to retribute to everyone according to the mischiefs he hath created to his fellow subjects, that is, any part of mankind. From whence it is plain that he that conquers in an unjust war can thereby have no title to the subjection and obedience of the conquered.

一个将他自己与另一个人置于战争状态并且不义地侵犯另一个人权利的侵略者，不可以通过这样一场不义之战享有支配被征服者的权利，人们很容易对此达成一致，因为他们不会认为强盗和海盗有权支配他们用足够的武力征服的人，亦不会认为人们应受缚于因非法武力胁迫所做的承诺。倘若一个强盗闯入我家，用刺刀对着我的喉咙，强迫我签下将我的产业转让给他的契约，这会成为给予他任何权利的依据吗？一个不义的征服者用其利剑逼迫我屈从时所得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权利。这种行为论是由头戴王冠之人所为还是由卑贱之人所为，伤害和罪行都是一样的。罪犯的头衔和其追随者的数目除了加重罪行，并不使罪行有所差别。唯一的差别是，大盗会惩罚小盗，使小盗服从自己，而大盗却因此得到桂冠和胜利的奖赏，因为他们的势力对于这世上软弱的司法力量而言过于强大，反而将惩罚罪犯的权力掌控于手中。一个强盗就这样闯入我家，我有什么办法补救呢？唯有诉诸法律以求公正。然而，或者因残疾而不能行动，或者因遭到抢劫却没有诉诸法律的财力，我可能得不到公正的裁判。倘若上帝剥夺了我寻求补救的一切手段，那么我唯有忍耐。然而，我的儿子可以在他有能力时寻求我所没有得到的法律救济；他或他的儿子还可以重新起诉，直到他获得应享的权利。但是，被征服者或他们的子女，在人世间没有可以求助的法庭或仲裁者。于是，他们可以像耶弗他那样诉诸上天，在他们恢复其祖先与生俱来的权利（要有这样一个得到大多数人赞同和自由默认的立法机关来支配他们）之前重复申诉。倘若有人以这样会引起无休止的纠纷为理由提出反对意见，假如司法受理所有向它提出的申诉的话，这不会比司法引起更多的纠纷。一个无缘无故骚扰其邻

居的人，应受其邻居所诉诸的法庭的惩罚。那个诉诸上天的人必须确信他是正义的一方，而且还有理由认为为申诉所付出的辛劳和费用是值得的，因为他将对一个无法蒙骗的法庭负责，而这个法庭肯定会依据每个人对和他一样的臣民，也就是对人类的任何部分所造成的损害而予以惩罚。由此可见，不义战争中的征服者不能因此有权享有被征服者的臣服和顺从。

But supposing victory favours the right side, let us consider a conqueror in a lawful war, and see what power he gets, and over whom.

然而，假定胜利属于正义的一方，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合法战争中的征服者，看看他获得什么权力以及对谁拥有此种权力。

Firstly, it is plain he gets no power by his conquest over those that conquered with him. They that fought on his side cannot suffer by the conquest, but must, at least, be as much freemen as they were before. And most commonly they serve upon terms, and on condition to share with their leader, and enjoy a part of the spoil and other advantages that attend the conquering sword, or, at least, have a part of the subdued country bestowed upon them. And the conquering people are not, I hope, to be slaves by conquest, and wear their laurels only to show they are sacrifices to their leader's triumph. They that found absolute monarchy upon the title of the sword make their heroes, who are the founders of such monarchies, arrant “draw-can-sirs,” and forget they had any officers and soldiers that fought on their side in the battles they won, or assisted them in the subduing, or shared in possessing the countries they mastered. We are told by some that the English monarchy is founded in the

Norman Conquest, and that our princes have thereby a title to absolute dominion, which, if it were true (as by the history it appears otherwise), and that William had a right to make war on this island, yet his dominion by conquest could reach no farther than to the Saxons and Britons that were then inhabitants of this country. The Normans that came with him and helped to conquer, and all descended from them, are freemen, and no subjects by conquest, let that give what dominion it will. And if I or anybody else shall claim freedom as derived from them, it will be very hard to prove the contrary; and it is plain, the law that has mad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one and the other intends not there should be any difference in their freedom or privileges.

第一，显而易见，他的征服并不使他有权支配那些同他一道进行征服的人。那些同他并肩奋战的人不能因征服而遭受损失，他们至少还必须是同从前一样自由的人。最为普遍的情况是，他们会基于一定的条件效劳，并且按照一定的条件与他们的首领分享一部分战利品和胜利带来的其他利益，或至少拥有赐给他们的那个被征服之国家的一部分。我希望那些征服者没有因征服而沦为奴隶，并且他们戴上桂冠并不只是为了显示他们是其首领的胜利之牺牲品。那些将专制君主统治建立于武力之上的人使得他们的英雄，即此类君主国家的创立者，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德洛坎塞” [17_1] 之流，却忘了他们还有将士在他们所赢得的战争中对他们鼎力相助，或协助他们征服，或和他们一起占有他们所吞并的国家。有些人告诉我们，英国的君主制是在诺曼人的征服时期中建立的，我们的君主由此获得享有绝对统治权的资格。倘若真是这样（根据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倘若征服者威廉有权向这个岛国开战，那么他靠征服得来的统治权只限于当时居住在这个国家的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不管伴随征服而来的是什么样的统治权，和威廉一同前来并帮他征服的诺曼人，以及他们所有的后裔，都是自由人，并不由于征服而变为臣民。倘若我或其他任何人以他们后裔的身份来要求自由，那么要证明相反的情况则绝非易事。显而易

见，对这些人未加区别的法律并不打算使他们的自由或权益有任何差别。

But supposing, which seldom happens, that the conquerors and conquered never incorporate into one people under the same laws and freedom; let us see next what power a lawful conqueror has over the subdued, and that I say is purely despotical. He has an absolute power over the lives of those who, by an unjust war, have forfeited them, but not over the lives or fortunes of those who engaged not in the war, nor over the possessions even of those who were actually engaged in it.

然而，假设（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从未在同样的法律和自由之下合并成一个民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一个合法的征服者对被征服者拥有什么权力。我认为这种权力是纯粹的专制权力。征服者对于那些因不义之战而丧失其生命权的人之生命享有绝对的权力，但对于那些没有参加战争的人的生命或财产，甚至那些实际上参加战争的人的财产，却并不享有这种绝对的权力。

Secondly, I say, then, the conqueror gets no power but only over those who have actually assisted, concurred, or consented to that unjust force that is used against him. For the people having given to their governors no power to do an unjust thing, such as is to make an unjust war (for they never had such a power in themselves), they ought not to be charged as guilty of the violence and injustice that is committed in an unjust war any farther than they actually abet it, no more than they are to be thought guilty of any violence or oppression their governors should use upon the people themselves or any part of their fellow subjects, they having

empowered them no more to the one than to the other. Conquerors, it is true, seldom trouble themselves to make the distinction, but they willingly permit the confusion of war to sweep all together; but yet this alters not the right; for the conqueror's power over the lives of the conquered being only because they have used force to do or maintain an injustice, he can have that power only over those who have concurred in that force; all the rest are innocent, and he has no more title over the people of that country who have done him no injury, and so have made no forfeiture of their lives, than he has over any other who, without any injuries or provocations, have lived upon fair terms with him.

第二，我可以说，征服者只对那些实际上曾帮助、赞成或同意使用不义的武力攻击他的人拥有权力。因为既然人民没有给予其统治者做不义之事的权力，例如发动不义之战（因为他们自己也从未拥有这样一种权力），那么就不该认为人民应对不义之战中所犯下的暴行和不义行为承担罪责，除非他们实际上煽动了这场战争；正如不该认为人民应对其统治者对人民或本国臣民的任何部分施以的任何暴行或压迫负有罪责，因为他们并未授权其统治者去做任何这样或那样的事情。的确，征服者极少费力对此加以区分，而是乐于让战争的混乱将一切混淆，但是这并改变不了正义，因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生命享有的支配权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被征服者曾用武力来进行或支持不义之事，所以他只能对那些赞成武力的人拥有支配权，而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征服者对那个国家里不曾伤害他也因此没有放弃其生命权的人民不享有支配权，正如他对其他任何丝毫没有伤害或挑衅他，而是与他和睦共处的人不享有支配权。

Thirdly, the power a conqueror gets over those he overcomes in a just war is perfectly despotical; he has an absolute power over the lives of those who, by putting themselves in a state of war, have

forfeited them, but he has no, thereby, right and title to their possessions. This I doubt not, but at first sight will seem a strange doctrine, it being so quite contrary to the practice of the world; there being nothing more familiar in speaking of the dominion of countries than to say such a one conquered it, as if conquest, without any more ado, conveyed a right of possession. But when we consider that the practice of the strong and powerful, how universal soever it may be, is seldom the rule of right, however it be one part of the subjection of the conquered not to argue against the conditions cut out to them by the conquering sword.

第三，征服者在正义之战中取得的支配他所战胜的那些人的权力是完全专制的。对于那些由于将自己置于战争状态而放弃自己生命权的人来说，征服者对这种人的生命享有一种绝对的权力，但征服者并不因此有权拥有这种人的财产。毫无疑问，这种学说乍听起来似乎很奇怪，因为它与世界上的惯例如此背道而驰。在谈到国家的领地时，没有什么比那种通过征服得到土地更常见的说法了，仿佛光凭征服就立即转移了占有权。然而，如若我们稍加考虑，尽管被征服者必须顺从征服者用刀剑强加给他们的境遇，无论强势者的做法多么具有普遍性，这种做法都难以成为正确的准则。

Though in all war there be usually a complication of force and damage, and the aggressor seldom fails to harm the estate when he uses force against the persons of those he makes war upon, yet it is the use of force only that puts a man into the state of war. For whether by force he begins the injury, or else having quietly and by fraud done the injury, he refuses to make reparation, and by force maintains it, which is the same thing as at first to have done it by force; it is the unjust use of force that makes the war. For he that breaks open my house and violently turns me out of doors, or

having peaceably got in, by force keeps me out, does, in effect, the same thing; supposing we are in such a state that we have no common judge on earth whom I may appeal to, and to whom we are both obliged to submit, for of such I am now speaking. It is the unjust use of force, then, that puts a man into the state of war with another, and thereby he that is guilty of it makes a forfeiture of his life. For quitting reason, which is the rule given between man and man, and using force, the way of beasts, he becomes liable to be destroyed by him he uses force against, as any savage ravenous beast that is dangerous to his being.

尽管在所有战争中，武力与损害通常相互交织，当侵略者运用武力来攻击与之交战的那些人的人身时，很少不损害到他们的财产，然而，唯有武力的使用才将人置于战争状态。因为无论他是用武力开始造成损害，还是悄悄地以欺诈造成损害，他都拒绝赔偿并通过武力维持那种损害（这和最初使用武力造成损害是一回事）。引发战争的正是不义地使用武力。因为一个破门而入并凶暴地将我逐出家门，或者和平地进入我家后用武力将我置于门外的人，其实做的是一样的事。我现在所讲的情况是这样：假定我们所处的状态让我们在人世间没有一个裁定者能倾听我们的哭诉，能让双方都必须服从，那么，正是不义地使用武力让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处在了战争状态，而犯此罪的人就因此放弃了他的生命。因为，倘若他放弃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准则的理性，像野兽那样使用武力，那么，他就有可能像任何危及他生命的残暴野兽一样，被那个他用武力侵犯的人毁灭。

But because the miscarriages of the father are no faults of the children, who may be rational and peaceable, notwithstanding the brutishness and injustice of the father, the father, by his miscarriages and violence, can forfeit but his own life, and involves not his children in his guilt or destruction. His goods which Nature,

that willeth the preservation of all mankind as much as is possible, hath made to belong to the children to keep them from perishing, do still continue to belong to his children. For supposing them not to have joined in the war either through infancy, absence, or choice, they have done nothing to forfeit them, nor has the conqueror any right to take them away by the bare right of having subdued him that by force attempted his destruction, though, perhaps, he may have some right to them to repair the damages he has sustained by the war, and the defence of his own right, which how far it reaches to the possessions of the conquered we shall see by-and-by; so that he that by conquest has a right over a man's person, to destroy him if he pleases, has not thereby a right over his estate to possess and enjoy it. For it is the brutal force the aggressor has used that gives his adversary a right to take away his life and destroy him, if he pleases, as a noxious creature; but it is damage sustained that alone gives him title to another man's goods; for though I may kill a thief that sets on me in the highway, yet I may not (which seems less) take away his money and let him go; this would be robbery on my side. His force, and the state of war he put himself in, made him forfeit his life, but gave me no title to his goods. The right, then, of conquest extends only to the lives of those who joined in the war, but not to their estates, but only in order to make reparation for the damages received and the charges of the war, and that, too, with reservation of the right of the innocent wife and children.

然而，因为父亲的过错并非子女的过错，就算父亲残暴不仁，子女们却有可能是有理性而和平的，所以父亲只能因为过错和暴力丧失他自己的生命权，并不将子女牵扯进他的罪行或破坏行为。自然本着竭尽所能保护全人类的意愿，已经将父亲的财产归属子女，使他们不致死亡，所以父亲的财产仍继续属于子女。因为，倘若子女因年幼、

离开或自行选择而未曾参加战争，那么他们就没有做任何放弃财产的事情，征服者也不能只凭他已征服那个企图以武力毁灭他的人而有任何权利夺走这些子女的财产，虽然为了补偿自己在战争中和在保护他自己的权利时所遭受的损失，征服者可能对那些财产拥有某些权利，而我们会在后面看到这权利在多大程度上与被征服者的财产有关。由此可见，一个人通过征服有权支配另一个人的人身，可以随意毁灭他，却并不因此对另一个人的财产享有权利，并不可以占有或享用这个人的产业。因为正是侵略者所使用的暴力给予他的对手把他当成野兽、随意夺去他的生命并毁灭他的权利，但只有他所遭受的损害才使他享有支配另一个人财物的权利。这是因为，虽然我可以杀死一个拦路抢劫的强盗，却不能（这种情况似乎较少发生）夺去他的钱财并把他放走，如此一来，就变成我在抢劫了。强盗的武力和他将自己置身其中的战争状态使他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权，但却并不给予我任何享有其财产的权利。因此，征服的权利只限于参加战争者的生命，仅在为战争中遭受的损失和战争费用进行索赔时才涉及他们的产业，而且即使在此情况下，无辜的妻子和子女的权利也要予以保留。

Let the conqueror have as much justice on his side as could be supposed, he has no right to seize more than the vanquished could forfeit; his life is at the victor's mercy, and his service and goods he may appropriate to make himself reparation; but he cannot take the goods of his wife and children, they too had a title to the goods he enjoyed, and their shares in the estate he possessed. For example, I,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all commonwealths are in the state of Nature one with another) have injured another man, and refusing to give satisfaction, it comes to a state of war wherein my defending by force what I had gotten unjustly makes me the aggressor. I am conquered; my life, it is true, as forfeit, is at mercy, but not my wife's and children's. They made not the war, nor assisted in it. I could not forfeit their lives, they were not mine to forfeit. My wife had a share in my estate, that neither could I forfeit. And my

children also, being born of me, had a right to be maintained out of my labour or substance. Here then is the case: the conqueror has a title to reparation for damages received, and the children have a title to their father's estate for their subsistence. For as to the wife's share, whether her own labour or compact gave her a title to it, it is plain her husband could not forfeit what was hers. What must be done in the case? I answer: the fundamental law of Nature being that all, as much as may be, should be preserved, it follows that if there be not enough fully to satisfy both, viz., for the conqueror's losses and children's maintenance, he that hath and to spare must remit something of his full satisfaction, and give way to the pressing and preferable title of those who are in danger to perish without it.

即使征服者这方拥有所能设想的最充分的正义，他也无权夺取多于战败者所能丧失的东西。战败者的生命听凭胜利者的摆布，胜利者为了获得赔偿可以占用战败者的劳役和财产，但胜利者却不能夺走战败者的妻子及其子女的财物。因为战败者所享有的财产，他的妻子和子女也有权享用；对于他所拥有的产业，他们也有一份。例如，如果我在自然状态中（所有国家都彼此处于自然状态）曾经损害另一个人，并且因我拒绝赔偿而进入了战争状态；这时，由于我以武力保护我所得的不义之财让自己成为了侵略者。结果，我被征服了，我的生命权确实由于已经丧失而任人摆布，但我的妻子和子女的生命权却并非这样。他们没有发动战争，亦没有帮助作战。我不能放弃他们的生命权，它们并非我所能放弃的。因为我的妻子分享我的产业，所以她的那一份我也不能放弃。还有我的子女，既然他们是我生的，他们就有权被我的劳动和财产抚养。于是情况就是这样：征服者有权就所遭受的损害要求赔偿，而被征服者的子女为了维持生计有权享有其父亲的产业。就妻子的那一份而言，不管是她享有这份财产的权力是源于自己的劳动还是契约的规定，她的丈夫显然不能放弃属于她的东西。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我的回答是：既然基本的自然法是要竭尽所能地保护全人类，那么，倘若没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完全满足双方，即

赔偿征服者的损失和扶养被征服者的子女，富足有余的人应该推迟享有使他获得完全满足的东西，让那些若没有这些东西就会有死亡危险的人优先享用急需的权利。

But supposing the charge and damages of the war are to be made up to the conqueror to the utmost farthing, and that the children of the vanquished, spoiled of all their father's goods, are to be left to starve and perish, yet the satisfying of what shall, on this score, be due to the conqueror will scarce give him a title to any country he shall conquer. For the damages of war can scarce amount to the value of any considerable tract of land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where all the land is possessed, and none lies waste. And if I have not taken away the conqueror's land which, being vanquished, it is impossible I should, scarce any other spoil I have done him can amount to the value of mine, supposing it of an extent any way coming near what I had overrun of his, and equally cultivated too. The destruction of a year's product or two (for it seldom reaches four or five) is the utmost spoil that usually can be done. For as to money, and such riches and treasure taken away, these are none of Nature's goods, they have but a fantastical imaginary value; Nature has put no such upon them. They are of no more account by her standard than the Wampompeke of the Americans to a European prince, or the silver money of Europe would have been formerly to an American. And five years' product is not worth the perpetual inheritance of land, where all is possessed and none remains waste, to be taken up by him that is disseised, which will be easily granted, if one do but take away the imaginary value of money, the disproportion being more than between five and five hundred; though, at the same time, half a year's product is more worth than the inheritance where, there being more land than the inhabitants possess and make use of,

anyone has liberty to make use of the waste. But their conquerors take little care to possess themselves of the lands of the vanquished. No damage therefore that me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s all princes and governments are in reference to one another) suffer from one another can give a conqueror power to dispossess the posterity of the vanquished, and turn them out of that inheritance which ought to be the possession of them and their descendants to all generations. The conqueror indeed will be apt to think himself a master; and it is the very condition of the subdued not to be able to dispute their right. But, if that be all, it gives no other title than what bare force gives to the stronger over the weaker; and, by this reason, he that is strongest will have a right to whatever he pleases to seize on.

假设征服者发起的战争导致的赔偿和损失会使被征服者倾尽所有，而被征服者的子女在父亲所有的财物被掠夺一空后就会饿死，那么，即使侵略者的正当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他仍不能获得占有他所征服的任何国土的权利。这是因为，战争的损失很难等同于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任何大片土地之价值，倘若那里所有的土地都被占有，没有任何荒地。倘若我未曾夺取征服者的土地（既然我被打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那么，我对他所造成的其他任何损失都不及我的土地之价值，假如我的土地与我所蹂躏过的他的土地在面积上大致相当，而且也同样被开垦过的话，通常所能造成的最大损失是一年或两年的收成（因为很少达到四五年的收成）。至于被夺走的货币以及财物珍宝之类，它们都不是自然的财物，只有一种想象的虚拟价值，而自然并没有将那种价值赋予它们。它们依照自然的标准自然没有价值，正如美洲的贝壳串珠对于一个欧洲君主，或者欧洲的银币对于从前的美洲人是没有价值的一样。在所有土地都被占有且没有余下任何荒地的地方，五年的收成之价值不及征服者所强夺的土地之永久继承权的价值。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倘若人们抛开货币的虚拟价值，损失量和土地价值之间的差异将大于5比500。尽管另一方面，在那些土地多于居

民所能占有和利用的数量并且任何人都有利用荒地之权利的地方，半年的收成之价值就超过土地继承权的价值。但是在那些地方，征服者对占有被征服者的土地也就不太感兴趣了。因此，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因为所有君主和政府都彼此处于自然状态中）彼此所受的损害，不能赋予征服者权力，让征服者能剥削被征服者的后代，将他们赶出应由他们和他们后代继承的土地。的确，征服者往往容易以主人自居，而正是被征服者所处的境地使他们不能质疑征服者的权利。然而，倘若情况就是如此，它所给予的只不过是赤裸裸的暴力给予强者支配弱者的权利。基于这一理由，那个最强有力的人将拥有占有任何他所想要的东西的权利。

Over those, then, that joined with him in the war, and over those of the subdued country that opposed him not, and the posterity even of those that did, the conqueror, even in a just war, hath, by his conquest, no right of dominion. They are free from any subjection to him, and if their former government be dissolved, they are at liberty to begin and erect another to themselves.

因此，对于那些跟随征服者参加战争的人，以及那些被征服者的国家中并未反对他的人，甚至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们的后代，征服者即使打的是正义之战，也并不能因为征服而享有统治这些人的权利。这些人不受征服者的任何支配。倘若他们原来的政府解体了，这些人有权为自己创建另一个政府。

The conqueror, it is true, usually by the force he has over them, compels them, with a sword at their breasts, to stoop to his conditions, and submit to such a government as he pleases to afford them; but the inquiry is, what right he has to do so? If it be said they submit by their own consent, then this allows their own

consent to be necessary to give the conqueror a title to rule over them. It remains only to be considered whether promises, extorted by force, without right, can be thought consent, and how far they bind. To which I shall say, they bind not at all; because whatsoever another gets from me by force, I still retain the right of, and he is obliged presently to restore. He that forces my horse from me ought presently to restore him, and I have still a right to retake him. By the same reason, he that forced a promise from me ought presently to restore it, i.e. quit me of the obligation of it; or I may resume it myself, i.e. choose whether I will perform it. For the law of Nature laying an obligation on me, only by the rules she prescribes, cannot oblige me by the violation of her rules; such is the extorting anything from me by force. Nor does it at all alter the case, to say I gave my promise, no more than it excuses the force, and passes the right, when I put my hand in my pocket and deliver my purse myself to a thief who demands it with a pistol at my breast.

确实，征服者常常凭借他更强的武力，用剑指着这些人的胸口，强迫他们屈从于他的条件，使他们臣服于他随意为他们建立的政府。然而问题是，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倘若说他们是基于自己的同意而屈从的，那么这就承认他们自己的同意是给征服者以统治他们的权力的必要条件。现在我们只需要考虑：我们能否将受武力胁迫而非基于权利做出的承诺视为同意，这些承诺又有多大的约束力？对此我可以说，这些承诺一点儿约束力也没有。因为无论别人用武力夺走我的什么东西，我对这些东西仍保有权利，而他也有立即归还的义务。那个强夺我的马的人应该立即把马归还，而我仍然有权夺回它。同理，那个强迫我做出承诺的人应该立即“归还”，即解除我履行承诺的义务；否则，我可以自己收回承诺，即决定我是否履行承诺。因为我所承担的义务是由自然法只能基于它所规定的准则来确定的，却不能由此违背自然法的准则，例如以武力向我勒索任何东西，来迫使我承担。当一个强盗用手枪对着我的胸口，要我交出钱包时，我自己伸手

从衣袋里掏出钱包并亲手递给他。在此情况下，说我曾做出承诺根本不能改变案情，也并不意味着宽恕武力或转移权利。

From all which it follow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a conqueror, imposed by force on the subdued, against whom he had no right of war, or who joined not in the war against him, where he had right, has no obligation upon them.

基于上述探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征服者的政府是以武力强加于被征服者的，而征服者当初并无权对被征服者发动战争，或者他虽有权发动战争而他们（被征服者）却未曾加入对他的战争，所以不能使被征服者承担任何义务。

But let us suppose that all the men of that community being all members of the same body politic, may be taken to have joined in that unjust war, wherein they are subdued, and so their lives are at the mercy of the conqueror.

然而，让我们暂且假定，既然那个社会的所有人是同一国家的成员，那么他们就可以被认为曾参加了那场他们于其中被打败的不义之战，因此他们的生命就要受征服者的摆布。

I say this concerns not their children who are in their minority. For since a father hath not, in himself, a power over the life or liberty of his child, no act of his can possibly forfeit it; so that the children, whatever may have happened to the fathers, are freemen, and the absolute power of the conqueror reaches no farther than

the persons of the men that were subdued by him, and dies with them; and should he govern them as slaves, subjected to his absolute, arbitrary power, he has no such right of dominion over their children. He can have no power over them but by their own consent, whatever he may drive them to say or do, and he has no lawful authority, whilst force, and not choice, compels them to submission.

我还是认为他们未成年的子女与此无关。因为既然父亲本身对其子女的生命或自由并无支配权，那么他的任何行为也就不可能获得支配权。所以无论父亲发生了什么事情，子女仍是自由人，征服者的绝对权力所涉及的范围不能超过那些被他所征服的人本身，并且随着他们的死亡而丧失。倘若他统治他们像对待奴隶一般，使其臣服于他的绝对专断权力，那么，他对这些人的子女却没有这样的统治权。不管他可以迫使他们说什么或做什么，唯有他们自己的同意才使他对他们享有任何权力。只要他是以武力，而非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来迫使他们服从的，他就没有合法的权威。

Every man is born with a double right. Firstly, a right of freedom to his person, which no other man has a power over, but the free disposal of it lies in himself; Secondly, a right before any other man, to inherit, with his brethren, his father's goods.

人人生而具有双重的权利。第一种是他的人身自由权利，他的人身唯有他自己可以自由处理，而其他任何人无权加以支配。第二种是他和他的弟兄先于其他任何人继承其父亲的财产的权利。

By the first of these, a man is naturally free from subjection to

any government, though he be born in a place under its jurisdiction. But if he disclaims the lawful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 he was born in, he must also quit the right that belonged to him, by the laws of it, and the possessions there descending to him from his ancestors, if it were a government made by their consent.

根据这两者中的第一种权利，即使一个人出生于政府管辖下的某一个地方，他生来却不受制于任何政府。然而，若当初那个政府的建立是基于他们（祖先们）的同意而建立的话，倘若这个人否认自己出生地国家的合法政府，那么他就必须放弃依据那个政府的法律而属于他的权利，连同在那里由他的祖先们传给他的财产。

By the second, the inhabitants of any country, who are descended and derive a title to their estates from those who are subdued, and had a government forced upon them, against their free consents, retain a right to the possession of their ancestors, though they consent not freely to the government, whose hard conditions were, by force, imposed on the possessors of that country. For the first conqueror never having had a title to the land of that country, the people, who are the descendants of, or claim under those who were forced to submit to the yoke of a government by constraint, have always a right to shake it off, and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usurpation or tyranny which the sword hath brought in upon them, till their rulers put them under such a frame of government as they willingly and of choice consent to… (Who doubts but the Grecian Christians, descendants of the ancient possessors of that country, may justly cast off the Turkish yoke, which they have so long groaned under, whenever they have an opportunity to do it? For no government can have a right to obedience from a people who have not freely consented to it; which

they can never be supposed to do, till either they are put in a full state of liberty to choose their government and governors, or at least till they have such standing laws to which they have, by themselves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given their free consent, and also till they are allowed their due property, which is so to be proprietors of what they have that nobody can take away any part of it without their own consent, without which, men under any government are not in the state of freemen, but are direct slaves under the force of war.

根据第二种权利，任何国家的居民，倘若他们是被征服者的后裔并且从那些被征服者那里获得继承产业的权利，而那些被征服者曾有一个违背其自由同意而强加于他们的政府，虽然他们（这个国家的居民）并非自由地同意那个政府（它以武力将其苛刻的条件强加于那个国家的土地所有者），他们仍保有继承其祖先之财产的权利。因为最初的征服者既然对那个国家的土地不享有任何权利，那么作为那些被迫臣服于一个政府的人们之后裔或基于他们的权利而有所要求的人民，总有权摆脱那种政府，使自己不再受制于他人以武力强加于他们的篡夺或暴政，直至他们的统治者将他们置于那样一种他们自愿选择同意的政府框架之下。谁会怀疑希腊的基督教徒们，即希腊古代土地所有人的子孙，他们在土耳其人的压迫下呻吟已久，只要一有机会，就可以正当地摆脱土耳其人的压迫？因为任何政府都无权要求那些未曾自由地对它表示同意的人民服从。决不能假定他们表示过这种同意，除非他们被置于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可以选择他们的政府和统治者，或至少直至他们拥有自己或他们的代表自由地表示同意的那种长期有效的法律，并且直至他们被允许享有其正当财产，从而使他们成为自己拥有而任何人未经他们同意不能拿走其任何部分的财物之所有者。如若没有这些条件，处于任何政府统治下的人们都并非身处自由人的状态，而只是处于战争暴力下的十足的奴隶。

But granting that the conqueror, in a just war, has a right to the estates, as well as power over the persons of the conquered, which, it is plain, he hath not, nothing of absolute power will follow from hence in the continuance of the government. Because the descendants of these being all freemen, if he grants them estates and possessions to inhabit his country, without which it would be worth nothing, whatsoever he grants them they have so far as it is granted property in; the nature whereof is, that, without a man's own consent, it cannot be taken from him.

然而，即使征服者在正义之战中拥有支配被征服者人身的权利和支配被征服者产业的权利（当然，他显然没有此种权利），在继续统治期间，这些权利也不会产生任何的绝对权力。因为这些被征服者的后代都是自由人，倘若他给予他们产业和财产以居住在他的国家里（若非如此，国家就一文不值），那么不管他给予他们什么东西，只要是被给予的，他们就对这些东西拥有财产权。财产权的性质是：未经他本人同意，不能将之从他那里夺走。

Their persons are free by a native right, and their properties, be they more or less, are their own, and at their own dispose, and not at his, or else it is no property. Supposing the conqueror gives to one man a thousand acres, to him and his heirs for ever; to another he lets a thousand acres, for his life, under the rent of £50 or £500 per annum. Has not the one of these a right to his thousand acres for ever, and the other during his life, paying the said rent? And hath not the tenant for life a property in all that he gets over and above his rent, by his labour and industry, during the said term, supposing it be double the rent? Can anyone say, the king, or the conqueror, after his grant, may, by his power of conqueror, take away all, or part of the land, from the heirs of one, or from the

other during his life, he paying the rent? Or, can he take away from either the goods or money they have got upon the said land at his pleasure? If he can, then all free and voluntary contracts cease, and are void in the world; there needs nothing but power enough to dissolve them at any time, and all the grants and promises of men in power are but mockery and collusion. For can there be anything more ridiculous than to say, I give you and yours this forever, and that in the surest and most solemn way of conveyance can be devised, and yet it is to be understood that I have right, if I please, to take it away from you again tomorrow?

他们的人身本身就是自由的，他们的财产，不论是多是少，都属于他们自己，由他们自己处理，而非任由征服者处置，否则，它就不是财产了。假设征服者给一个人1000英亩土地，归他和他的子孙永久所有；租给另一个人1000英亩土地，让他终身租用，年租为50或500英镑。那么难道前者不是永久有权享有他那1000英亩的土地，而后者倘若如数支付上述地租，难道不是终身享有此权利吗？难道那个终身佃户在上述租期内无权通过辛勤劳作享有他所得的超过地租的所有收入，譬如说是地租之两倍的收入？有没有人能够说，国王或征服者在给予财产后可以凭他作为征服者的权力，从前者的子孙或尚在人世并照付地租的后者那里夺走全部或部分土地呢？或者说，他能否随意夺走两者在上述土地上所得的财物或金钱呢？倘若他能这样做，那么世界上所有自由自愿的契约就都会终止和无效。无需任何别的东西，只要有足够的权力就可以在任何时候解除它们。这样，有权之人的所有给予和诺言都不过是愚弄和欺骗。因为倘若有人说“我将这件东西永远给你和你的子孙”，这是所能表达的最肯定、最郑重的转移方式，但这却应该被理解为“倘若我愿意，明天我仍有权从你那里取回”，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诞可笑的事吗？

I will not dispute now whether princes are exempt from the

laws of their country, but this I am sure, they owe subjection to the laws of God and Nature. Nobody, no power can exempt them from the obligations of that eternal law. Those are so great and so strong in the case of promises, that Omnipotency itself can be tied by them. Grants, promises, and oaths are bonds that hold the Almighty, whatever some flatterers say to princes of the world, who, all together, with all their people joined to them, are, in comparison of the great God, but as a drop of the bucket, or a dust on the balance- inconsiderable, nothing!

君主们是否可以免受他们本国法律的约束，我不想在此加以争论，但我可以肯定这一点，即他们应服从上帝和自然的法律。任何人和任何权力都不能使他们免受这个永恒法则的约束。就承诺而言，对永恒法应尽的义务十分重大，连全能的上帝本身也被这些义务所约束。给予、承诺和誓言是约束全能上帝的枷锁。无论谄媚之徒对人世间的君主们说什么奉承话，即使把所有的君主和与他们相结合的人民加在一起，相较于伟大的上帝，只不过是滴水之微，微尘之渺，形同乌有，轻若鸿毛！

The short of the case in conquest, is this: the conqueror, if he hasa just cause, has a despotical right over the persons of all that actually aided and concurred in the war against him, and a right to make up his damage and cost out of their labour and estates, so he injure not the right of any other. Over the rest of the people, if there were any that consented not to the war, and over the children of the captives themselves or the possessions of either he has no power, and so can have, by virtue of conquest, no lawful title himself to dominion over them, or derive it to his posterity; but is an aggressor, if he attempts upon their properties, and thereby puts himself in a state of war against them, and has no better a right of

principality, he, nor any of his successors, than Hingar, or Hubba, the Danes, had here in England, or Spartacus, had he conquered Italy, would have had; which is to have their yoke cast off as soon as God shall give those under their subjection courage and opportunity to do it. Thus, notwithstanding whatever title the kings of Assyria had over Judah, by the sword, God assisted Hezekiah to throw off the dominion of that conquering empire. “And the Lord was with Hezekiah, and he prospered; wherefore he went forth, and he rebelled against the king of Assyria, and served him not”. [16_1] Whence it is plain that shaking off a power which force, and not right, hath set over anyone, though it hath the name of rebellion, yet is no offence before God, but is that which He allows and countenances, though even promises and covenants, when obtained by force, have intervened. For it is very probable, to anyone that reads the story of Ahaz and Hezekiah attentively, that the Assyrians subdued Ahaz, and deposed him, and made Hezekiah king in his father's lifetime, and that Hezekiah, by agreement, had done him homage, and paid him tribute all this time.

征服的问题可以概括成这样：征服者，倘若进行的是正义之战，就享有对所有实际参加和同意与他作战者的专制权利，并且享有用他们的劳动和财产来赔偿他的损失和费用的权利，他这样并不损害其他任何人的权利。征服者对于其他人——倘若他们中有任何人不同意战争——以及对于战俘本人的子女或对于二者的财产，并不享有任何权利，所以他不能凭借征服而拥有统治他们的任何合法权利，亦不能将此权利传给他的后代。但如果他企图侵犯他们的财产，他就成了一个侵略者，从而将自己置于与他们敌对的战争状态。他或他的任何继承者都不享有君权，如同丹麦人兴加尔或胡巴在英格兰或斯巴达克斯（倘若他曾征服意大利）在意大利并不享有君权。只要上帝将勇气和机会给予那些被他们所征服的人，他们就会挣脱征服者的枷锁。所以，无论亚述的国王们通过武力对犹大拥有了什么权利，上帝还是帮

助犹大国王希西家摆脱了那个征服帝国的统治。“耶和华与希西家同在，无论他去往何处，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 [17_2] 由此可见，摆脱一种以武力而非正义施加于任何人的权力，虽然背负背叛之名，但在上帝面前并非罪行，反而被他允许和赞同，纵然以武力获得的诺言和契约对此加以阻碍也无济于事。对于任何留心阅读过亚哈斯和希西家的故事之人而言，亚述人征服了亚哈斯，废黜了他，并在他尚在人世时立他的儿子希西家为王，而希西家在此期间一直依据协议服从他并向他进贡，这些都是极有可能的事。

[16_1].II Kings xviii. 7.

[17_1].德洛坎塞（draw-can-sirs），出自乔治·维尔利斯（George Villiers）《预演》（The Rehearsal）一书中的人物名，愿意或为to draw a can of liquor，泛指凶暴之徒。

[17_2].《列王纪下》，第18章，第7节。

Chapter XVII　Of Usurpation

第十七章　论篡夺

As conquest may be called a foreign usurpation, so usurpation is a kind of domestic conquest, with this difference—that an usurper can never have right on his side, it being no usurpation but where one is got into the possession of what another has right to. This, so far as it is usurpation, is a change only of persons, but not of the forms and rules of the government; for if the usurper extends his power beyond what, of right, belonged to the lawful princes or governors of the commonwealth, it is tyranny added to usurpation.

既然征服可以称为外来的篡夺，那么篡夺就是一种国内的征服，差别在于：篡夺者这一方永远不可能拥有正义，因为篡夺只有在一个人占有另一个人有权享有的东西时才成立。篡夺的范围只限于人事的变更，而非政府形式和规则的改变。因为倘若篡夺者扩张其权力，超出了本应属于国家的合法君主或统治者的权力之范围，那么就是篡夺加暴政。

In all lawful governments the designation of the persons who are to bear rule being as natural and necessary a part as the form of the government itself, and that which had its establishment originally from the people—the anarchy being much alike, to have no form of government at all, or to agree that it shall be monarchical, yet appoint no way to design the person that shall have the power and be the monarch—all commonwealths, therefore, with the form of government established, have rules also

of appointing those who are to have any share in the public authority, and settled methods of conveying the right to them: for the anarchy is much alike, to have no form of government at all; or to agree that it shall be monarchical, but to appoint no way to know or design the person that shall have the power, and be the monarch. Whoever gets into the exercise of any part of the power by other ways than what the laws of the community have prescribed hath no right to be obeyed, though the form of the commonwealth be still preserved, since he is not the person the laws have appointed, and, consequently, not the person the people have consented to. Nor can such an usurper, or any deriving from him, ever have a title till the people are both at liberty to consent, and have actually consented, to allow and confirm in him the power he hath till then usurped.

在所有合法的政府里，指派由谁实行统治如同政体本身一样，是政府自然而必要的一部分，并且这种办法的确立最初来自于人民。无政府状态都极其相似，即根本没有政府形式或同意政体应为君主制却没有指定任何办法来选任拥有统治权的人来担任君主。所以，有既定政府的国家都有规则以指派参与国家权力的人及授予这些人权利。因为无政府状态都极其相似，即根本没有政府形式或同意政体应为君主制却没有指定任何办法来选任拥有统治权的人来担任君主。不管谁只要不是通过国家法律所规定的方法，而是通过其他方法取得行使任何统治权的权力，都无权让人服从，纵使国家的形式仍被保留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不是法律所指定的人，所以也就不是人民所同意的人。这样的篡夺者或他的任何继承人亦无资格享有统治权，除非人民能够自由地表示同意，并在实际上已同意承认和确认他已经篡夺而来的权力。

Chapter XVIII　Of Tyranny

第十八章　论暴政

As usurpation is the exercise of power which another hath a right to, so tyranny is the exercise of power beyond right, which nobody can have a right to; and this is making use of the power anyone has in his hands, not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are under it, but for his own private, separate advantage. When the governor, however entitled, makes not the law, but his will, the rule, and his commands and actions are not direct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properties of his people, but the satisfaction of his own ambition, revenge, covetousness, or any other irregular passion.

正如篡夺是行使另一个人有权行使的权力一样，暴政则是行使越权的、无人有权行使的权力；也就是任何人并非为了受此权力支配的人们谋福利，而是为了谋取他自己私人利益而运用他手中的权力。不管统治者有多么正当的权利，当他不以法律而以他自己的意志为准则时，当他不以保护其人民的财产而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婪和其他任何不正当的欲望为其命令和行为的目的时，那就是暴政。

If one can doubt this to be truth or reason because it comes from the obscure hand of a subject, I hope the authority of a king will make it pass with him. King James the first, in his speech to the Parliament, 1603, tells them thus: “I will ever prefer the weal of the public and of the whole commonwealth, in making of good laws and constitutions, to any particular and private ends of mine, thinking ever the wealth and weal of the commonwealth to be my

greatest weal and worldly felicity—a point wherein a lawful king doth directly differ from a tyrant; for I do acknowledge that the special and greatest point of difference that is between a rightful king and an usurping tyrant is this—that whereas the proud and ambitious tyrant doth think his kingdom and people are only ordained for satisfaction of his desires and unreasonable appetites, the righteous and just king doth, by the contrary, acknowledge himself to be ordained for the procuring of the wealth and property of his people.“And again, in his speech to the Parliament, 1609, he hath these words:

倘若有人因为这话出自一个卑微臣民之口而怀疑它是否是真实而理性的，那么，我希望一个国王的权威会使他接受这个说法。1603年，詹姆斯国王在对议会的演说中这样告诉议员们：“我将永远以公众和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不以我的任何特殊和私人的目的来制定好的法律和宪法；我始终认为国家的富足和幸福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尘世的乐趣，一个合法的国王和一个暴君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因为我确认，一个正德仁君和一个暴敛昏侯之间突出的和最大的差别在于这一点：骄傲自大而野心勃勃的暴君认为他的王国和人民只是受命来满足他的愿望和过分的贪欲；与之相反，正直而公正的国王认为自己是受命来为人民谋取财富和财产的。”1609年，他在对议会的演说中又说了这样的话：

“The king binds himself, by a double oath, to the observ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his kingdom—tacitly, as by being a king, and so bound to protect, as well the people as the laws of his kingdom; and expressly by his oath at his coronation; so as every just king, in a settled kingdom, is bound to observe that paction made to his people, by his laws, in framing his government agreeable thereunto, according to that paction which God made

with Noah after the deluge: 'Hereafter, seedtime, and harvest, and cold, and heat, and summer, and winter, and day, and night, shall not cease while the earth remaineth.' And therefore a king, governing in a settled kingdom, leaves to be a king, and degenerates into a tyrant, as soon as he leaves off to rule according to his laws." And a little after: "Therefore, all kings that are not tyrants, or perjured, will be glad to bound themselves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ir laws, and they that persuade them the contrary are vipers, and pests, both against them and the commonwealth." Thus, that learned king, who well understood the notions of things, makes the difference betwixt a king and a tyrant to consist only in this: that one makes the laws the bounds of his power, and the good of the public, the end of his government; the other makes all give way to his own will and appetite.

"国王通过双重誓言来约束自己以遵守他王国的根本法律：一种是默示的，即作为一个国王，就必须保护他王国的人民和法律；另一种是在他加冕时用誓言明确表达的。所以，在一个稳定的王国里，每一个道德明君都必须遵守他根据他的法律与人民订立的契约，并在此基础上按照上帝在大洪水之后同挪亚订立的契约'地还存在的时候，庄稼、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来组织他的政府。因此，一个在稳定的王国里进行统治的国王，一旦他不再按照他的法律来进行统治，就不再是一个国王，而堕落为一个暴君了。"他稍后又说："所以，一切既非暴君又不违背誓言的国王，都将乐意把自己束缚于其法律范围内。谁劝诱他们不这样做，谁就是阴险恶毒之徒，既背叛国王也背叛国家。"由此可见，这位明白事理而知识渊博的国王只从这一点上区分国王和暴君：国王将法律作为其权力的界限，将公众的福利作为政府的目的，而暴君则使一切都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和欲望。

It is a mistake to think this fault is proper only to monarchies.

Other forms of government are liable to it as well as that; for wherever the power that is put in any hand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properties is applied to other ends, and made use of to impoverish, harass, or subdue them to the arbitrary and irregular commands of those that have it, there it presently becomes tyranny, whether those that thus use it are one or many. Thus we read of the thirty tyrants at Athens, as well as one at Syracuse; and the intolerable dominion of the Decemviri at Rome was nothing better.

认为只有君主制才存在这种缺点是错误的。同君主制一样，其他的政体也会有这种缺点。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这种为了管理人民和保护他们的财产而交由某些人掌握的权力被应用于其他目的，被利用来使人民变得贫困、骚扰他们或使他们屈从于掌权者专横而不正当的命令时，就立刻成为暴政，不管运用权力的人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到雅典有30个暴君，锡拉库萨 [19_1] 也有一个暴君，而罗马十大执政官那令人无法忍受的统治也好不到哪里去。

Wherever law ends, tyranny begins, if the law be transgressed to another's harm, and whosoever in authority exceeds the power given him by the law, and makes use of the force he has under his command to compass that upon the subject which the law allows not, ceases in that to be a magistrate, and acting without authority may be opposed, as any other man who by force invades the right of another. This is acknowledged in subordinate magistrates. He that hath authority to seize my person in the street may be opposed as a thief and a robber if he endeavours to break into my house to execute a writ, notwithstanding that I know he has such a warrant and such a legal authority as will empower him to arrest me

abroad. And why this should not hold in the highest, as well as in the most inferior magistrate, I would gladly be informed. Is it reasonable that the eldest brother, because he has the greatest part of his father's estate, should thereby have a right to take away any of his younger brothers' portions? Or that a rich man, who possessed a whole country, should from thence have a right to seize, when he pleased, the cottage and garden of his poor neighbour? The being rightfully possessed of great power and riches, exceedingly beyon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sons of Adam, is so far from being an excuse, much less a reason for rapine and oppression, which the endamaging another without authority is, that it is a great aggravation of it. For exceeding the bounds of authority is no more a right in a great than a petty officer, no more justifiable in a king than a constable. But so much the worse in him as that he has more trust put in him, has already a much greater share than the rest of his brethren, and is supposed, from the advantage of education, employments and counsellors, to be more knowing in the measures of right and wrong.

倘若践踏法律伤害他人，法律的终点便是暴政的起点。无论哪个掌权者，只要他超越法律所赋予他的权力，利用他所能控制的武力来强迫臣民接受违法的行为，那种做法就使他不再是一个行政官；未经授权的行为同以武力侵犯他人的权利一样会遭到反抗。就下级官员而言，这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那个有权在街上逮捕我的人，倘若他企图闯入我家来执行令状，纵然我知道他持有逮捕令并具有合法的职权来使他有权在室外逮捕我，他仍然可以被我当成小偷或强盗那样加以反抗。为什么这对于最下级的官员有效，而对于最高的长官就不行呢？我很乐意有人告诉我其中缘由。一个长兄因为拥有其父亲的绝大部分产业，就有权剥夺他任何一个兄弟应得的那份，这合理吗？或者一个富人是否因为他占有整个地区而有权随意夺取他穷苦邻居的茅舍和园圃呢？一个人能够合法地拥有远远超过亚当的绝大多数子孙所拥

有的巨大的权力和财富，这非但不能作为借口，更不能作为进行掠夺和压迫的理由，那样做是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损害他人，只能更加恶化事态。因为超越职权之界限对于大小官员而言，都不是一种权利，对国王或警察而言，也都一样不合道理。然而，当一个人得到人民的更多信托，已享有比他的其余同胞更大的份额，且由于他的教育和顾问等有利条件时，理应有更好的认识而更没有理由这么做，倘若他竟还如此，那就更恶劣了。

May the commands, then, of a prince be opposed? May he be resisted, as often as anyone shall find himself aggrieved, and but imagine he has not right done him? This will unhinge and overturn all polities, and instead of government and order, leave nothing but anarchy and confusion.

那么，君主的命令可以加以反抗吗？只要任何人觉得自己受到伤害，且认为君主无权对他这样做，是否就可以随时反抗君主？这样做会扰乱和推翻所有政体，结果没有了政府和秩序，有的只是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

To this I answer: that force is to be opposed to nothing but to unjust and unlawful force. Whoever makes any opposition in any other case draws on himself a just condemnation, both from God and man; and so no such danger or confusion will follow, as is often suggested. For:

我对此的回答是：武力只能用来反对不义和非法的暴力。无论谁在其他任何情况下进行任何反抗，都会为自己招致来自上帝和人类的正当谴责，所以那种如人们常说的危险或混乱就不会接踵而来。因

为：

Firstly, as in some countries the person of the prince by the law is sacred, and so whatever he commands or does, his person is still free from all question or violence, not liable to force, or any judicial censure or condemnation. But yet opposition may be made to the illegal acts of any inferior officer or other commissioned by him, unless he will, by actually putting himself into a state of war with his people, dissolve the government, and leave them to that defence, which belongs to everyone in the state of Nature. For of such things, who can tell what the end will be? And a neighbour kingdom has showed the world an odd example. In all other cases the sacredness of the person exempts him from all inconveniences, whereby he is secure, whilst the government stands, from all violence and harm whatsoever, than which there cannot be a wiser constitution. For the harm he can do in his own person not being likely to happen often, nor to extend itself far, nor being able by his single strength to subvert the laws nor oppress the body of the people, should any prince have so much weakness and ill-nature as to be willing to do it. The inconveniency of some particular mischiefs that may happen sometimes when a heady prince comes to the throne are well recompensed by the peace of the public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person of the chief magistrate, thus set out of the reach of danger; it being safer for the body that some few private men should be sometimes in danger to suffer than that the head of the republic should be easily and upon slight occasions exposed.

第一，在一些国家里，依据法律君主的人身是神圣的，所以不管他命令什么或做什么，他的人身仍然免受一切质疑或侵犯，不受武力

和任何司法的制裁或谴责。但是人民可以反抗任何低级官吏或他委任的其他人的不法行为，除非他想要通过将自己与其人民置于实际战争状态来解散他的政府，任由人民有权采取防卫手段，而这一手段属于自然状态中的每一个人。谁能知道这种情况的结局会如何呢？一个邻近的王国已经给全世界展示了一个异常的例子 [19_2] 。在其他所有情况下，君主人身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使他免受一切妨害，只要政府存在，他就是安全的，免受一切暴力和伤害。这个制度再明智不过了。因为他个人所能造成的损害不可能时常发生，其影响本身也不至于很深远；即使任何君主如此软弱和心术不正以致想要推翻法律或压迫全体人民，他亦不能凭借一己之力达到目的。当一个任性的君主即位后，有时会造成一些特殊的过错，但公众的安宁和政府的稳定可以充分补偿这些错误所造成的损害，从而保证行政首脑的人身处于安全范围之内。比起国家元首随便而轻易地暴露于危险的境地，少数私人有时有受害的危险对于整体而言更安全。

Secondly, but this privilege, belonging only to the king's person, hinders not but they may be questioned, opposed, and resisted, who use unjust force, though they pretend a commission from him which the law authorises not, as is plain in the case of him that has the king's writ to arrest a man which is a full commission from the king, and yet he that has it cannot break open a man's house to do it, nor execute this command of the king upon certain days nor in certain places, though this commission have no such exception in it; but they ar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law, which, if anyone transgress, the king's commission excuses him not. For the king's authority being given him only by the law, he cannot empower anyone to act against the law, or justify him by his commission in so doing. The commission or command of any magistrate where he has no authority, being as void and insignificant as that of any private m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ne and the other being that the magistrate has some authority so

far and to such ends, and the private man has none at all; for it is not the commission but the authority that gives the right of acting, and against the laws there can be no authority. But notwithstanding such resistance, the king's person and authority are still both secured, and so no danger to governor or government.

第二，这一特权，既只属于国王的人身，就并不妨碍人民对那些尽管自称受国王委托却未经法律授权而使用不义武力的人加以质疑、反问和抵抗。典型的例子是：一个持有国王的令状去逮捕的官僚，他虽受国王的全权委托，却不能闯入那人的住所去逮捕他，亦不能在某些特定的日子或地方执行国王的这一命令，虽然逮捕令上并没有规定此种例外，但这些是法律的限制，倘若任何人违背，国王的委任亦无法使他豁免。因为既然国王的权威只由法律所授予，那么他就不能授权任何人去违法，亦不能以国王的授权来证明他这样做是正当的。任何行政官越权发出的委任或命令同任何私人的委任或命令一样无效而无用，两者的差别在于，行政长官拥有为某些目的而规定的职权，而私人则一点职权也没有。因为不是委任而是职权给予人行动的权利，而违反了法律则无职权可言。然而，虽然可以进行这种反抗，国王的人身和权威仍受到保障，因而不会对统治者或政府构成危险。

Thirdly, supposing a government wherein the person of the chief magistrate is not thus sacred, yet this doctrine of the lawfulness of resisting all unlawful exercises of his power will not, upon every slight occasion, endanger him or embroil the government; for where the injured party may be relieved and his damages repaired by appeal to the law, there can be no pretence for force, which is only to be used where a man is intercepted from appealing to the law. For nothing is to be accounted hostile force but where it leaves not the remedy of such an appeal. And it is such force alone that puts him that uses it into a state of war, and makes

it lawful to resist him. A man with a sword in his hand demands my purse on the highway, when perhaps I have not twelve pence in my pocket. This man I may lawfully kill. To another, I deliver 100 pounds to hold only whilst I alight, which he refuses to restore me when I am got up again, but draws his sword to defend the possession of it by force. If I endeavour to retake it, the mischief this man does me is a hundred, or possibly a thousand times more than the other perhaps intended me (whom I killed before he really did me any); and yet I might lawfully kill the one and cannot so much as hurt the other lawfully. The reason whereof is plain; because the one using force which threatened my life, I could not have time to appeal to the law to secure it, and when it was gone it was too late to appeal. The law could not restore life to my dead carcass. The loss was irreparable, which to prevent the law of Nature gave me a right to destroy him who had put himself into a state of war with me and threatened my destruction. But in the other case, my life not being in danger, I might have the benefit of appealing to the law, and have reparation for my 100 pounds that way.

第三，假定一个政府首脑的人身并非如此神圣不可侵犯，但这种关于反抗一切非法行使权力的行为是合法的学说，也不会动辄危及他或使政府陷入混乱。因为受害方在可以得到救济、他所遭受的损害可以通过诉诸法律获得赔偿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诉诸武力。武力只在一个人受到阻挠而无法诉诸法律时，才能加以使用。唯有那种让人无法诉诸法律的武力，才能被认为是怀有敌意的暴力。也唯有这种暴力才将运用它的人置于战争状态，使反抗他成为合法。如果一个人手持利刃在公路上强行索要我的钱包，尽管当时我口袋里的钱可能还不到12便士，但我可以合法地杀死这个人。又比如我交给另一个人100英镑，只是让他在我下车时替我拿着，但当我再次上车时他拒绝把钱还给我，反而在我试图重新收回我的钱时拔出他的剑来以武力保卫他所占

有的钱。比起前者试图对我造成的损害（我在他真正对我造成任何损害前就把他杀了），这个人对我造成的损害要大一百倍，甚至一千倍，然而，我可以合法地杀死前者，却不能合法地伤害后者。其中的缘由显而易见，因为前者使用武力来威胁我的生命，我不可能有时间去诉诸法律来保障我的生命安全，而生命一旦失去，诉诸法律也就来不及了。法律不能让我起死回生。这种损失不可弥补，为了防止这种损失，自然法赋予我权利杀死那个将他自己与我置于战争状态并以毁灭对我构成威胁的人。然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没有生命危险，可以有诉诸法律的便利，并可以此种方式收回我的100英镑。

Fourthly, but if the unlawful acts done by the magistrate be maintained (by the power he has got), and the remedy, which is due by law, be by the same power obstructed, yet the right of resisting, even in such manifest acts of tyranny, will not suddenly, or on slight occasions, disturb the government. For if it reach no farther than some private men's cases, though they have a right to defend themselves, and to recover by force what by unlawful force is taken from them, yet the right to do so will not easily engage them in a contest wherein they are sure to perish; it being as impossible for one or a few oppressed men to disturb the government where the body of the people do not think themselves concerned in it, as for a raving madman or heady malcontent to overturn a well-settled state, the people being as little apt to follow the one as the other.

第四，倘若行政官通过他所获得的权力坚持他的不法行为，并运用同样的权力阻挠人们获得依据法律应得的补偿，那么，就算人们有权对这种明显的暴虐行为加以反抗，也不敢突然或轻易地扰乱政府。因为，倘若这只涉及一些私人案件，虽然他们有权自卫，并且有权通过武力收回他们被非法暴力所夺去的东西，但可以这样做的权利不会

轻易地使他们卷入一场必死的搏斗。再者，正如一个暴怒的疯子或鲁莽的反叛者不可能推翻一个稳固的国家一样，一个或少数几个被压迫者不可能动摇政府，倘若广大人民认为此事与己无关。对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人民都不会随便追随。

But if either these illegal acts have extended to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or if the mischief and oppression has lighted only on some few, but in such cases as the precedent and consequences seem to threaten all, and they are persuaded in their consciences that their laws, and with them, their estates, liberties, and lives are in danger, and perhaps their religion too, how they will be hindered from resisting illegal force used against them I cannot tell. This is an inconvenience, I confess, that attends all governments whatsoever, when the governors have brought it to this pass, to be generally suspected of their people, the most dangerous state which they can possibly put themselves in; wherein they are the less to be pitied, because it is so easy to be avoided. It being as impossible for a governor, if he really means the good of his peopl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m and their laws together, not to make them see and feel it, as it is for the father of a family not to let his children see he loves and takes care of them.

然而，不论这些非法行为是已经伤及大多数人民，还是只有少数人受到损害和压迫，在此情况下，不论是从先例还是从后果看，这些行为都威胁到了所有人，使他们由衷相信他们的法律、产业、权利和生命，甚至宗教也都受到了威胁，那么，该如何阻止他们反抗有害于他们的非法暴力呢？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承认，当统治者使政府陷入被人民普遍怀疑的境地时，无论什么政府都会遇到麻烦。这是统治者能使自己陷入的最危险状态，而他们身陷其中更不值得怜悯，因为避免此事发生是如此易如反掌。倘若一个统治者确实想为他的人民

谋福利，要保护他们和他们的法律，是不可能不让他们看到和感觉到这一点的，就像一个家庭的父亲不可能不让他的子女看到他对他们的慈爱和照顾一样。

But if all the world shall observe pretences of one kind, and actions of another, arts used to elude the law, and the trust of prerogative (which is an arbitrary power in some things left in the prince's hand to do good, not harm, to the people) employed contrary to the end for which it was given; if the people shall find the ministers and subordinate magistrates chosen, suitable to such ends, and favoured or laid by proportionably as they promote or oppose them; if they see several experiments made of arbitrary power, and that religion underhand favoured, though publicly proclaimed against, which is readiest to introduce it, and the operators in it supported as much as may be; and when that cannot be done, yet approved still, and liked the better, and a long train of acting show the counsels all tending that way, how can a man any more hinder himself from being persuaded in his own mind which way things are going; or, from casting about how to save himself, than he could from believing the captain of the ship he was in was carrying him and the rest of the company to Algiers, when he found him always steering that course, though cross winds, leaks in his ship, and want of men and provisions did often force him to turn his course another way for some time, which he steadily returned to again as soon as the wind, weather,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would let him?

然而，倘若所有的人都看到言行不一致，看到权术被用来规避法律，看到特权的委任（这是在某些事情上赋予君主的一种专断权力，以使他有益而非有害于人民）被用来违背原来授权之目的，倘若人民

发现大小官吏的选任是为了适合于这样的目的，相应的升职和罢免完全取决于官吏们促成或反对这些目的的情况，倘若人民看到专断权力已被多次试用，宗教方面对此尽管公开宣布反对，但私下里却表示赞同，还随时准备采用这种权力，甚至尽量支持实施专断权力之人——而当这样做不可行时，官吏们还是对这些行为表示认可和赞赏——倘若一连串的行动表明政府官员都有此种倾向，一个人如何能够再阻止自己发自内心地去判断事情其实在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呢？如同当他发现他所搭乘的那一艘船的船长总是朝阿尔及尔方向航行，虽然逆风、漏水、缺乏水手和供给常常迫使船长暂时改道，然而一旦风向、天气及其他情况许可，船长又坚决地转回原来的航道时，他不得不相信船长正把他和其他人运往阿尔及尔去受奴役。在这种情况下，他怎能不想方设法自救？

[19_1].锡拉库扎（Syracuse），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港口城市，曾是最具影响力的希腊城市。

[19_2].一个异常的例子（an odd example），可能指1649年1月英国人民处死国王查理一世的实践。

Chapter XIX　Of the Dissolution of Government

第十九章　论政府的解体

He that will, with any clearness, speak of the dissolution of government, ought in the first plac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ciety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at which makes the community, and brings men out of the loose state of Nature into one politic society, is the agreement which everyone has with the rest to incorporate and act as one body, and so be one distinct commonwealth. The usual, and almost only way whereby this union is dissolved, is the inroad of foreign force making a conquest upon them. For in that case (not being able to maintain and support themselves as one entire and independent body) the union belonging to that body, which consisted therein, must necessarily cease, and so everyone return to the state he was in before, with a liberty to shift for himself and provide for his own safety, as he thinks fit, in some other society. Whenever the society is dissolved, it is certain the government of that society cannot remain. Thus conquerors' swords often cut up governments by the roots, and mangle societies to pieces, separating the subdued or scattered multitude from the protection of and dependence on that society which ought to have preserved them from violence. The world is too well instructed in, and too forward to allow of this way of dissolving of governments, to need any more to be said of it; and there wants not much argument to prove that where the society is dissolved, the government cannot remain; that being as impossible as for the frame of a house to subsist when the materials of it are scattered and displaced by a whirlwind, or jumbled into a confused heap by an earthquake.

谁想要清楚地说明政府的解体问题，谁就应该首先区别社会解体和政府解体的不同。每个人与其他人通过订立协议组成一个整体行动的团体，进而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从而产生了共同体，并使人们脱离自然的松散状态，转而进入政治社会。外国武力入侵并征服他们，通常且几乎是解散这种联合的唯一途径。在那种情况下（由于他们不能作为一个完整而独立的整体保卫或保存自己），属于那个整体、由他们所组成的联合就必然终结，每个人因此都回到联合之前的状态，可以按他可以接受的方式在其他的社会里自由地谋生和自保。一旦社会解体，毋庸置疑，那个社会的政府就不能继续存在。于是，征服者的武力常常将政府连根拔起，并将社会解体，使被征服或被分散的民众不再能够依赖那个社会，脱离那个本应保护他们不受暴力侵犯的社会的保护。世人坚决反对这种解散政府的方式，因为他们太了解这种方式了，因此我不必对这种方式多加论述。“社会一旦解体，政府无法继续存在”这一点也不需要多加论述就可以证明。这就如同飓风吹散、吹开房屋的材料，或房屋因地震而变成一堆瓦砾时，房屋的构架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一样。

Besides this overturning from without, governments are dissolved from within: firstly, when the legislative is altered, civil society being a state of peace amongst those who are of it, from whom the state of war is excluded by the umpirage which they have provided in their legislative for the ending all differences that may arise amongst any of them; it is in their legislative that the members of a commonwealth are united and combined together into one coherent living body. This is the soul that gives form, life, and unity to the commonwealth; from hence, the several members have their mutual influence, sympathy, and connection; and therefore when the legislative is broken, or dissolved, dissolution and death follows. For the essence and union of the society consisting in having one will, the legislative, when once established

by the majority, has the declaring and, as it were, keeping of that will.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legislative is the first and fundamental act of society, whereby provision is made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their unio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ersons and bonds of laws, made by persons authorised thereunto, by the consent and appointment of the people, without which no one man, or number of men, amongst them can have authority of making laws that shall be binding to the rest. When anyone, or more, shall take upon them to make laws whom the people have not appointed so to do, they make laws without authority, which the people are not therefore bound to obey; by which means, they come again to be out of subjection, and may constitute to themselves a new legislative, as they think best, being in full liberty to resist the force of those who, without authority, would impose anything upon them. Everyone is at the disposure of his own will, when those who had, by the delegation of the society, the declaring of the public will, are excluded from it, and others usurp the place who have no such authority or delegation.

除了这种外部颠覆的情形，政府也会从内部解体：首先，在立法机关更迭的情况下。成员之间处于和平状态，即构成了公民社会，任何人之间可能出现的一切分歧都由立法机关作为仲裁者来解决，因此战争状态就被解除了。一个国家的成员正是通过立法机关才联合并结成一个协调的有机体。立法机关赋予了国家的形态、生命和统一的灵魂，立法机关让分散的成员产生相互的影响、同情和联系。所以，一旦立法机关被破坏或解散，国家就会随之解体和消亡。拥有一个统一的意志是社会的本质及和谐之根本，所以，一旦大多数人建立了立法机关，就表达或是保存了这一意志。社会首要的和基本的法令是立法机关的组织法，它规定了人们在一些人的指导和法律的约束下结合的持续时间，由人民的同意和委派所授权的一些人来制定这些法律。如果不以此为基础，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人都无权制定对其余人有

约束力的法律。倘若任何一个或更多的人未经人民的委派就擅自制定法律，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就毫无权威，因此人民没有服从的义务。借此方式，人民再次摆脱了从属状态，可以为自己组成一个他们认为最好的新的立法机关，可以完全自由地抵抗那些越权将任何东西强加于他们的人所使用的暴力。倘若那些受社会之托来表达公众意志的人被排挤出立法机关，而另一些无此权威或未经此种委任的人却篡夺了他们的位置，那么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行事了。

This being usually brought about by such in the commonwealth, who misuse the power they have, it is hard to consider it all right, and know at whose door to lay it, without knowing the for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it happens. Let us suppose, then, the legislative placed in the concurrence of three distinct persons: firstly, a single hereditary person having the constant, supreme, executive power, and with it the power of convoking and dissolving the other two within certain periods of time. Secondly, an assembly of hereditary nobility. Thirdly, an assembly of representatives chosen, pro tempore, by the people. Such a form of government supposed, it is evident:

国内滥用权力的人通常会造成上述情况，倘若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发生于哪种政府形式之下，就很难对此问题加以正确判断并知道该由谁负其责。那么，让我们假设立法权同时属于三种不同的人：第一，一个世袭的个人，此人拥有永久的最高执法权，并有权在一定时期里召集和解散其他两者；第二，一个世袭贵族的会议；第三，一个由民选代表组成、有一定任期的议会。假定政府是这样一种形式，那么显而易见：

Firstly, that when such a single person or prince sets up his

own arbitrary will in place of the laws which are the will of the society declared by the legislative, then the legislative is changed. For that being, in effect, the legislative whose rules and laws are put in execution, and required to be obeyed, when other laws are set up, and other rules pretended and enforced than what the legislative, constituted by the society, have enacted, it is plain that the legislative is changed. Whoever introduces new laws, not being thereunto authorised, by the fundamental appointment of the society, or subverts the old, disowns and overturns the power by which they were made, and so sets up a new legislative.

第一，倘若这样一个个人或君主用他的专断意志来代替通过立法机关表达、作为社会意志的法律，那么，立法机关就被改变了。因为立法机关要成为立法机关，其规章和法律就要得以执行并得到人们的服从；倘若制定其他法律，假托并执行并非由社会组成的立法机关所颁布的法规，立法机关就显然被改变了。无论谁实行新的法令或推翻旧的法律，倘若未经社会基本委托的授权，他就是在否认和颠覆制定这些法律的权力，因而就建立了一个新的立法机关。

Secondly, when the prince hinders the legislative from assembling in its due time, or from acting freely, pursuant to those ends for which it was constituted, the legislative is altered. For it is not a certain number of men—no, nor their meeting, unless they have also freedom of debating and leisure of perfecting what is for the good of the society, wherein the legislative consists; when these are taken away, or altered, so as to deprive the society of the due exercise of their power, the legislative is truly altered. For it is not names that constitute governments, but the use and exercise of those powers that were intended to accompany them; so that he who takes away the freedom, or hinders the acting of the legislative

in its due seasons, in effect takes away the legislative, and puts an end to the government.

第二，倘若君主阻止立法机关如期集会，或阻止它依据当初组织它的那些目的来自由行使职权，立法机关就被改变了。因为立法机关的存在并不在于有一定数量的人，也不在于开多少会，而在于他们还有辩论的自由和充足的时间来完成为社会谋福利的任务。倘若这些都被剥夺或变更，导致社会无法适当地行使他们的权力，那么立法机关就确实被变更了。因为组成政府的并非名称，而是伴随着那些名称原应具有的权力的运用和行使过程，所以一个人若是剥夺了立法机关的自由或阻止它如期执行职权，他就在事实上取消了立法机关并且终止了政府。

Thirdly, when, by the arbitrary power of the prince, the electors or ways of election are altered without the consent and contrary to the common interest of the people, there also the legislative is altered. For if others than those whom the society hath authorised thereunto do choose, or in another way than what the society hath prescribed, those chosen are not the legislative appointed by the people.

第三，倘若君主凭借专断权力，未经人民同意，通过违反人民共同利益的方式变更了选民和选举方式，立法机关也就被改变了。因为倘若不由社会所授权的那些人去选举，或不按社会所规定的方法进行选举，那些当选的人就不是人民所任命的立法机关。

Fourthly, the delivery also of the people into the subjection of a foreign power, either by the prince or by the legislative, is certainly

a change of the legislative, and so a dissolution of the government. For the end, why people entered into society being to be preserved one entire, free, independent society to be governed by its own laws, this is lost whenever they are given up into the power of another.

第四，倘若君主或立法机关迫使人民屈从于外国势力，这就无疑改变了立法机关，并因此导致政府解体。因为人民之所以加入社会是为了保持一个完整、自由而独立的社会，受它自己法律的约束，一旦把他们交给另一个国家的权力支配，就丧失了这一目的。

Why, in such a constitution as thi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se cases is to be imputed to the prince is evident, because he, having the force, treasure, and offices of the State to employ, and often persuading himself or being flattered by others, that, as supreme magistrate, he is incapable of control; he alone is in a condition to make great advances towards such changes under pretence of lawful authority, and has it in his hands to terrify or suppress opposers as factious, seditious, and enemies to the government; whereas no other part of the legislative or people is capable by themselves to attempt any alter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without open and visible rebellion, apt enough to be taken notice of, which, when it prevails, produces effects very little different from foreign conquest. Besides, the prince, in such a form of government, having the power of dissolving the other parts of the legislative, and thereby rendering them private persons, they can never, in opposition to him, or without his concurrence, alter the legislative by a law, his consent being necessary to give any of their decrees that sanction. But yet, so far as the other parts of the legislative any way contribute to any attempt upon the government,

and do either promote, or not, what lies in them, hinder such designs, they are guilty, and partake in this, which is certainly the greatest crime which men can partake of one towards another.

在这种政体下，显而易见，我们应该把政府在这些情况下的解体归咎于君主。因为君主可以运用国家的武力、财富和机构，并且常常由于自信或别人的奉承而自立为首脑，不受任何制约，所以只有他才能打着合法职权的幌子大肆进行这种变革，而且还有权把反对者视为分裂者、叛乱者和政府的敌人来恫吓或镇压。而立法机关的其他部分或人民则不能自行试图对立法机关进行任何变更，除非发动足以引起注意的公开而明显的叛变，而这种叛变一旦成功，所产生的影响几乎无异于外来征服。而且，在此政体之下，君主有权解散立法机关的其他部分，从而使他们成为没有公职的人，而他们决不能与君主对抗或未经他同意就以一项法律规定来变更立法机关，因为他们的法令要生效就必须得到君主的同意。然而，只要立法机关的其他部分以任何方式帮助或鼓励颠覆政府的任何企图，或者不竭尽所能来阻止这样的阴谋，它们就都是有罪的，就都参与了这种无疑是人们彼此间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

There is one way more whereby such a government may be dissolved, and that is: when he who has the supreme executive power neglects and abandons that charge, so that the laws already made can no longer be put in execution; this is demonstratively to reduce all to anarchy, and so effectively to dissolve the government. For laws not being made for themselves, but to be, by their execution, the bonds of the society to keep every part of the body politic in its due place and function. When that totally ceases, the government visibly ceases, and the people become a confused multitude without order or connection. Where there is no long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for the securing of men's rights, nor any

remaining power within the community to direct the force, or provide for the necessities of the public, there certainly is no government left. Where the laws cannot be executed, it is all one as if there were no laws, and a government without laws is, I suppose, a mystery in politics inconceivable to human capacity, and inconsistent with human society.

要使这样的一个政府解体，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倘若拥有最高执行权的人玩忽职守并且放弃职责，导致已经制定的法律不再得以执行。这显然会使一切陷入无政府状态，因而实际上使政府解体。因为法律的制定并非为了法律自身，而是通过法律的执行使其成为社会的约束，使国家的各个部分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当这一切完全停止时，政府就显然停止了运作，人民就成了没有秩序、没有联系的乌合之众。那里不再有司法机构来保障人们的权利，社会内部没有其他权力来指挥武力或为公众提供必需品，那里无疑就不再有政府。法律在哪里不能得以执行，那里就等于没有法律；而我认为一个没有法律的政府在政治上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人类所不能想象的，而且是与人类社会相违背的。

In these, and the like cases, when the government is dissolved, the people are at liberty to provide for themselves by erecting a new legislative differing from the other by the change of persons, or form, or both, as they shall find it most for their safety and good. For the society can never, by the fault of another, lose the native and original right it has to preserve itself, which can only be done by a settled legislative and a fair and impartial execution of the laws made by it. But the state of mankind is not so miserable that they are not capable of using this remedy till it be too late to look for any. To tell people they may provide for themselves by erecting a new legislative, when, by oppression, artifice, or being delivered

over to a foreign power, their old one is gone, is only to tell them they may expect relief when it is too late, and the evil is past cure. This is, in effect, no more than to bid them first be slaves, and then to take care of their liberty, and, when their chains are on, tell them they may act like freemen. This, if barely so, is rather mockery than relief, and men can never be secured from tyranny if there be no means to escape it till they are perfectly under it; and, therefore, it is that they have not only a right to get out of it, but to prevent it.

基于以上情况和类似的情况，当政府解体时，人民可以自由地为自己建立一个新的立法机构，通过人选或形式的变动或这两方面都变动而使其不同于原先的立法机关，按他们认为最有利于他们的安全和福利而定。因为社会不能由于另一个人的过失而丧失自身用以保护自己生来就拥有的权利，而社会的自保只能通过一个确定的立法机关及公正无私地执行自身制定的法律才能得以实现。但是人类的处境并非如此悲惨，并不是非到为时已晚而别无他法时才能采用这一补救办法。在旧的立法机关由于受到压迫、暗算或被移交给外国势力而消失之后才告诉人民可以自己建立一个新的立法机关，无异于在病入膏肓已不可救药时才对他们说有希望得到救治。这事实上不过是叫他们先成为奴隶，然后才去考虑他们的自由；不过是当他们戴上枷锁之后才告诉他们说，他们可以像自由人那样行动。倘若是这样，这与其说是救援，倒不如说是愚弄。倘若在完全受暴政统治之前，人们没有任何办法逃避暴政，那么他们就永远不能免受暴政之害。所以，他们不但享有权利摆脱暴政，还享有权利防止暴政。

There is, therefore, secondly, another way whereby governments are dissolved, and that is, when the legislative, or the prince, either of them act contrary to their trust. For the legislative acts against the trust reposed in them when they endeavour to invade the property of the subject, and to make themselves, or any

part of the community, masters or arbitrary disposers of the lives, liberties, or fortunes of the people.

所以，其次，政府还可以通过另一种途径解体，那就是立法机关和君主中的任何一方的行动违反了他们所受的委托。一旦立法机关企图侵犯臣民的财产，企图使他们自己或社会的任何部分成为人民的生命、权利或财富的主人或任意处置者时，他们就违背了他们所受的委托。

The reason why men enter into society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property; and the end why they choose and authorise a legislative is that there may be laws made, and rules set, as guards and fences to the properties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to limit the power and moderate the dominion of every part and member of the society. For since it can never be supposed to be the will of the society that the legislative should have a power to destroy that which everyone designs to secure by entering into society, and for which the people submitted themselves to legislators of their own making: whenever the legislators endeavour to take away and destroy the property of the people, or to reduce them to slavery under arbitrary power, they put themselves into a state of war with the people, who are thereupon absolved from any farther obedience, and are left to the common refuge which God hath provided for all men against force and violence. Whensoever, therefore, the legislative shall transgress this fundamental rule of society, and either by ambition, fear, folly, or corruption, endeavour to grasp themselves, or put into the hands of any other, an absolute power over the lives, liberties, and estates of the people, by this breach of trust they forfeit the power the people had put into their hands for quite contrary ends, and it devolves to the people, who

have a right to resume their original liberty, an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legislative (such as they shall think fit), provide for their own safety and security, which is the end for which they are in society. What I have said here concerning the legislative in general holds true also concerning the supreme executor, who having a double trust put in him, both to have a part in the legislative and the supreme execution of the law, acts against both, when he goes about to set up his own arbitrary will as the law of the society. He acts also contrary to his trust when he either employs the force, treasure, and offices of the society to corrupt the representatives and gain them to his purposes; or openly pre-engages the electors, and prescribes, to their choice, such whom he has, by solicitation, threats, promises, or otherwise, won to his designs, and employs them to bring in such who have promised beforehand what to vote and what to enact. Thus to regulate candidates and electors, and new-model the ways of election, what is it but to cut up the government by the roots, and poison the very fountain of public security? For the people having reserved to themselves the choice of their representatives as the fence to their properties, could do it for no other end but that they might always be freely chosen, and so chosen, freely act and advise as the necessity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the public good should, upon examination and mature debate, be judged to require. This, those who give their votes before they hear the debate, and have weighed the reasons on all sides, are not capable of doing. To prepare such an assembly as this, and endeavour to set up the declared abettors of his own will, for the tru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 and the law-makers of the society, is certainly as great a breach of trust, and as perfect a declaration of a design to subvert the government, as is possible to be met with. To which, if one shall add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visibly employed to the same end, and all the arts of perverted law made use of to take off and destroy all that stand in

the way of such a design, and will not comply and consent to betray the liberties of their country, it will be past doubt what is doing. What power they ought to have in the society who thus employ it contrary to the trust that along with it in its first institution, is easy to determine; and one cannot but see that he who has once attempted any such thing as this cannot any longer be trusted.

人们加入社会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他们选择并授权一个立法机关的目的是制定法律并确定准则，以保卫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限制社会各个部分和各个成员的权力，并调节他们的管辖权。因为人们决不会设想，社会的意志是要使立法机关有权破坏每个人通过加入社会而得到的东西以及人民服从自己选任的立法者所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只要立法者试图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降低人民的地位，使人民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立法者就把自己和人民推入了战争状态，人民因此就没有义务继续服从，人民唯有寻求上帝给予所有人抵御武力和暴行的共同庇护。所以，每当立法机关侵犯社会的这个基本准则，并因野心、恐惧、愚蠢或腐败而试图使自己攫取或交由任何其他人掌握一种绝对权力来支配人民的生命、权利和产业时，它们就因这一违背委托的行为而丧失了人民为了完全相反的目的而交到它们手里的权力。于是，这一权力就移交给有权恢复原有自由的人民，让他们通过建立一个他们认为合适的新立法机关来谋求自己的安全和保障，而这正是他们加入社会的目的。我在这里所说的关于立法机关的话，一般也适用于最高执行者，因为他受到人民的双重委托，在参与立法机关的同时又是法律的最高执行者，所以当他把自己的专断意志当成社会的法律时，他的所作所为就违背了这两种委托。如果他运用社会的武力、财富和政府机构来腐化代表并使他们为他的目的效力，或公然预先限定选民们，指定他们选举的人是他已经通过诱惑、威胁、允诺或其他方法拉拢的，并利用他们选出事先已经允诺投什么票以及制定什么法律的人，那么他的行为也就违背了他所受的委托。如此操作候选人和选民并重新规定选举方法，其目的除了要从根本上破坏政府和毒化公共安全的本源，还会是什么呢？因为人民既然为自

己保留了选择他们的代表的权利作为其财产的保障，那么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一直可以自由地选举代表，而且代表一经选出，就可以依据通过审查和详尽的讨论来确定的国家和公共福利之需要，自由地做出决议和提出建议。那些在听到辩论并权衡各方面的理由之前就进行投票的人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筹备像这样的一种议会并且企图安排公然附和他自己意志的人来代替人民的真正代表和社会的立法者，这无疑可能是遇到的最大的背信行为和企图颠覆政府的最佳声明。倘若有人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而明显地利用赏赐和惩罚，并利用歪曲法律的各种伎俩来除掉和摧毁所有妨碍这种企图和不愿服从以及不同意出卖他们国家的权利的人，我们就能清楚地明白他们究竟是在做什么了。这些以违背社会最初成立时赋予他们的信托之方式来运用权力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应当拥有什么权力，是很容易断定的；而且人们必然看到，那些曾经试图这样做的人，就再也不会受人信任。

To this, perhaps, it will be said that the people being ignorant and always discontented, to lay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 in the unsteady opinion and uncertain humour of the people, is to expose it to certain ruin; and no government will be able long to subsist, if the people may set up a new legislative whenever they take offence at the old one. To this I answer, quite the contrary. People are not so easily got out of their old forms as some are apt to suggest. They are hardly to be prevailed with to amend the acknowledged faults in the frame they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And if there be any original defects, or adventitious ones introduced by time or corruption, it is not an easy thing to get them changed, even when all the world sees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for it. This slowness and aversion in the people to quit their old constitutions has in the many revolutions which have been seen in this kingdom, in this and former ages, still kept us to, or after some interval of fruitless attempts, still brought us back again to, our old legislative of king, lords and commons; and whatever provocations have made

the crown be taken from some of our princes' heads, they never carried the people so far as to place it in another line.

对此可能有人会说，既然人民愚昧无知且总是心怀不满，那么将人民变化无定的意见和变化无常的情绪作为政府的基础，将会使政府遭受某些破坏；倘若每当人民对旧的立法机关不满意时，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那么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长久存在。我对此的回答是：正好相反。人民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那么容易就会摆脱他们旧的组织形式。他们极难被说服去修正他们业已习惯的机构中公认的缺点。倘若有一些最初就存在的缺点或随着时间推移由腐败引起的偶然的缺点，纵然大家都看到有改变的机会，要加以改变也并非易事。当今和过去的时代里，在这个王国发生的许多次革命中，我们已经见识过人民迟迟不愿放弃他们旧制度的情况。因此，我们仍然保留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的旧有立法机关，或是在几次徒劳无效的尝试之后仍再次恢复旧有制度。尽管义愤填膺曾使人民摘掉了一些君主的王冠，但它却并未使人民另找别的王室为君。

But it will be said this hypothesis lays a ferment for frequent rebellion. To which I answer: Ffirstly, no more than any other hypothesis. For when the people are made miserable, and find themselves exposed to the ill usage of arbitrary power, cry up their governors as much as you will for sons of Jupiter, let them be sacred and divine, descended or authorised from Heaven; give them out for whom or what you please, the same will happen. The people generally ill-treated, and contrary to right, will be ready upon any occasion to ease themselves of a burden that sits heavy upon them. They will wish and seek for the opportunity, which in the change, weakness, and accidents of human affairs, seldom delays long to offer itself He must have lived but a little while in the world, who has not seen examples of this in his time; and he must have read

very little who cannot produce examples of it in all sorts of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然而，有人会说这种假设会为频繁叛乱埋下种子。我对此的回答是：第一，这一假设并不比其他任何假设更容易引起叛乱。因为当人民遭受不幸，发现自己受滥用专断权力之害时，就算你把他们的统治者极力吹捧为主神朱庇特的儿子，说他们神圣不可侵犯，来自于天、受命于天，随便你把他们吹捧成什么人或给予他们什么头衔，同样的事还会发生。只要人民普遍遭受虐待并得不到公正待遇，那么他们随时都要摆脱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他们将默默期盼并寻找机会，而此种机会在人事变迁、人性弱点和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极少会迟迟不出现。一个从未见过此等事例的人，一定是涉世太浅；而一个不能从世间各种各样的政府中举出这样事例的人，则一定是学识太浅薄。

Secondly, I answer, such revolutions happen not upon every little mismanagement in public affairs. Great mistakes in the ruling part, many wrong and inconvenient laws, and all the slips of human frailty will be borne by the people without mutiny or murmur. But if a long train of abuses, prevarications, and artifices, all tending the same way, make the design visible to the people, and they cannot but feel what they lie under, and see where they are going, it is not to be wondered that they should then rouse themselves, and endeavour to put the rule into such hands which may secure to them the ends for which government was at first erected, and without which, ancient names and specious forms are so far from being better, that they are much worse than the state of Nature or pure anarchy; the inconveniences being all as great and as near, but the remedy farther off and more difficult.

第二，我的回答是，并不是每次公共事务管理稍有不当时就会发生这种革命。人民会不加反抗或毫无怨言地容忍统治者的重大失策、各种错误和不恰当的法律以及人类弱点所造成的一切过失。然而，倘若一连串的滥用权力、渎职推诿和阴谋诡计都为着同一个昭然若揭的目的，人民则不禁要感叹自己处于何种境地，思考自己有何前途。于是，他们会奋起抗争，竭力把统治权交给能为他们保护最初建立政府之目的的人，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要是没有这些目的，古老的名称和华美的外表与自然状态或纯粹的无政府状态相比，并不会更好，而只会更糟；一切弊端都如此严重且迫在眉睫，但补救的办法却更加遥远而且难求。

Thirdly, I answer that this doctrine of a power in the people of providing for their safety anew by a new legislative when their legislators have acted contrary to their trust by invading their property is the best fence against rebellion, and the most probable means to hinder it. For rebellion being an opposition, not to persons, but authority, which is founded only in the constitutions and laws of the government: those, whoever they be, who, by force, break through, and, by force, justify their violation of them, are truly and properly rebels. For when men, by entering into society and civil-government, have excluded force, and introduced law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property, peace, and unity amongst themselves, those who set up force again in opposition to the laws, do rebellion, that is, bring back again the state of war, and are properly rebels, which they who are in power, by the pretence they have to authority, the temptation of force they have in their hands, and the flattery of those about them being likeliest to do, the most proper way to prevent the evil is to show them the danger and injustice of it who are under the greatest temptation to run into it.

第三，我的回答是，当他们的立法者侵犯他们的财产，进而违反了他们所受的委托时，人民有权通过新的立法机关来重新保障自己的安全，这一学说是抵御叛乱的最佳保障和阻止叛乱的最可靠手段。因为叛乱反对的不是个人，而是只基于政府的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那些以武力破坏法律并以武力为他们违反法律的行为做辩护的人，无论他们是谁，都是真实不虚的叛乱者。因为，人们通过加入社会和组成公民政府已经排除了武力，而采用法律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平和他们相互间的统一，这时，那些违反法律而重新使用武力的人，就是在造反，是在重新恢复战争状态，因而就是真正的叛乱者。对那些当权者而言，由于他们拥有权威的借口、手里掌握的武力的诱惑和他们周围那些人的谄媚，这样做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向那些最容易受此种诱惑去犯此种错误的人指出其危险性和非正义性，是防止这种祸害的最恰当的方法。

In both the aforementionedcases, when either the legislative is changed, or the legislators act contrary to the end for which they were constituted; those who are guilty are guilty of rebellion: for if any one by force takes away the established legislative of any society, and the laws by them made, pursuant to their trust, he thereby takes away the umpirage, which everyone had consented to for a peaceable decision of all their controversies, and a bar to the state of war amongst them. They who remove or change the legislative take away this decisive power, which nobody can have but by the appointment and consent of the people, and so destroying the authority which the people did, and nobody else can, set up, and introducing a power which the people hath not authorised, actually introduce a state of war, which is that of force without authority; and thus by removing the legislative established by the society, in whose decisions the people acquiesced and united as to that of their own will, they untie the knot, and expose the people anew to the state of war. And if those, who by force take

away the legislative, are rebels, the legislators themselves, as has been shown, can be no less esteemed so, when they who were set up for the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people, their liberties and properties shall by force invade and endeavour to take them away; and so they putting themselves into a state of war with those who made them the protectors and guardians of their peace, are properly, and with the greatest aggravation, rebellantes, rebels.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不论是立法机关发生改变还是立法者的行为违反了当初他们被任命的目的，还是那些犯有此罪行之人就是犯了叛乱罪，倘若任何人动用武力废除任何社会设立的立法机关以及立法机关依照所受委托而制定的法律，他就由此废除了人人为和平解决他们的一切争执而同意设立的仲裁者，并拆去了阻止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屏障。那些取消或改变立法机关的人废除了一种决定性权力——这种权力未经过人民的委任和同意无人能享有——也就因此破坏了人民而非其他任何人所能建立的权威，并采用了一种未经人民授予的权力；他们实际上造成了一种战争状态，即没有权力依据的暴力状态。于是，通过取消社会所设立的立法机关——人民同意立法机关的各项决定并将之统一起来作为他们自己的意志——他们就解除了这一纽带，重新置人民于战争状态。倘若那些用武力废除立法机关的人是叛乱者，那么，当为保护和保卫人民及其权利和财产而设立的立法者本身用武力侵犯并试图夺走这些权利和财产时，如上所示，也同样只能被看成是叛乱者。因此，他们既然将自己与任命他们为其和平的保护者和保卫者的人们置于战争状态，他们就真正是罪行最为深重的叛乱者。

But if they who say it lays a foundation for rebellion mean that it may occasion civil wars or intestine broils to tell the people they are absolved from obedience when illegal attempts are made upon their liberties or properties, and may oppose the unlawful violence

of those who were their magistrates when they invade their properties, contrary to the trust put in them, and that, therefore, this doctrine is not to be allowed, being so destructive to the peace of the world; they may as well say, upon the same ground, that honest men may not oppose robbers or pirates, because this may occasion disorder or bloodshed. If any mischief come in such cases, it is not to be charged upon him who defends his own right, but on him that invades his neighbour's. If the innocent honest man must quietly quit all he has for peace sake to him who will lay violent hands upon it, I desire it may be considered what kind of a peace there will be in the world which consists only in violence and rapine, and which is to be maintained only for the benefit of robbers and oppressors. Who would not think it an admirable peace betwixt the mighty and the mean, when the lamb, without resistance, yielded his throat to be torn by the imperious wolf? Polyphemus' den gives us a perfect pattern of such a peace and such a government, wherein Ulysses and his companions had nothing to do but quietly to suffer themselves to be devoured. And no doubt Ulysses, who was a prudent man, preached up passive obedience, and exhorted them to a quiet submission by representing to them of what concernment peace was to mankind, and by showing the inconveniences might happen if they should offer to resist Polyphemus, who had now the power over them?

然而，那些说我的假设为叛乱奠定基础的人其实是在说：如果告诉人民他们可以在非法企图危及他们的权利或财产时不必服从，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行政官违背其所受的委托而侵犯他们的财产时反抗行政官的非法暴力，就可能会引起内战或内部混乱；因此，这一假设对世界和平极为有害，不应该被容许。然而，他们也可以基于同样的理由说，老实人不可以反抗强盗或海盗，因为那样会引起混乱或流血。这种情况下发生任何危害，不应归咎于保卫自己权利的人，而应归咎于

侵犯邻居权利的人。倘若为了和平，无辜的老实人必须顺从地放弃他的一切，将之交给对他施以暴力的人，那么我希望人们考虑一下，倘若和平只由暴力和掠夺构成，而且维持和平只是为了强盗和压迫者的利益，那么世界上将会有怎样的一种和平。倘若羊羔让凶恶的狼咬断它的喉咙而不加以抵抗，谁会将之看作强者和弱者之间值得赞美的和平呢？波里斐谟斯的洞穴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和平和这样一种政府的完美典范。在那里，尤利西斯和他的同伴们唯有乖乖地被吞噬，别无他法。毫无疑问，尤利西斯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当时宣扬消极服从，通过向同伴解说和平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指出倘若他们反抗目前对他们享有支配权的波里斐谟斯可能会产生什么害处来劝说他们默默屈从。

The end of government is the good of mankind; and which is best for mankind, that the people should be always exposed to the boundless will of tyranny, or that the rulers should be sometimes liable to be opposed when they grow exorbitant in the use of their power, and employ it for the destruction, and not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properties of their people?

政府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那么下面哪一种情况对人类最有利：是人民必须总是遭受暴政的无限意志的支配，还是人民有时应在统治者滥用他们的权力并用权力来破坏而不是保护人民的财产时予以反抗？

Nor let anyone say that mischief can arise from hence as often as it shall please a busy head or turbulent spirit to desire the alt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It is true such men may stir whenever they please, but it will be only to their own just ruin and perdition. For till the mischief be grown general, and the ill designs of the

rulers become visible, or their attempts sensible to the greater part, the people, who are more disposed to suffer than right themselves by resistance, are not apt to stir. The examples of particular injustice or oppression of here and there an unfortunate man moves them not. But if they universally have a persuasion grounded upon manifest evidence that designs are carrying on against their liberties, and the general course and tendency of things cannot but give them strong suspicions of the evil intention of their governors, who is to be blamed for it? Who can help it if they, who might avoid it, bring themselves into this suspicion? Are the people to be blamed if they have the sense of rational creatures, and can think of things no otherwise than as they find and feel them? And is it not rather their fault who put things into such a posture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them thought to be as they are? I grant that the pride, ambition, and turbulence of private men have sometimes caused great disorders in commonwealths, and factions have been fatal to states and kingdoms. But whether the mischief hath oftener begun in the people's wantonness, and a desire to cast off the lawful authority of their rulers, or in the rulers' insolence and endeavours to get and exercise an arbitrary power over their people, whether oppression or disobedience gave the first rise to the disorder, I leave it to impartial history to determine. This I am sure, whoever, either ruler or subject, by force goes about to invade the rights of either prince or people,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overturning the constitution and frame of any just government, is highly guilty of the greatest crime I think a man is capable of, being to answer for all those mischiefs of blood, rapine, and desolation, which the breaking to pieces of governments bring on a country; and he who does it is justly to be esteemed the common enemy and pest of mankind, and is to be treated accordingly.

同样，谁也不能说：每当一个好管闲事的人或好乱成性的人希望随心所欲地变更政府时，就会引起祸害。确实，这样的人可以随时随意煽动骚乱，但这只会使他们自作自受、自取灭亡。因为，在祸害变得普遍、统治者的邪恶意图显而易见或他们的企图已为大部分人所觉察之前，人民宁愿忍受而不愿以反抗来为自己讨回公道，因此他们是不大会奋起反抗的。人民不会因为零星几个不幸之人遭遇的不公平对待或压迫而采取行动。然而，倘若他们根据明显的证据普遍相信有人正在实施侵犯他们权利的阴谋，而事态的整体进展和趋势又使他们不禁极度怀疑统治者的邪恶意图，谁该因之而受责怪呢？倘若他们本可以避免却招致这种怀疑，这又能怪谁呢？倘若人民具有理性动物的理智，能考虑他们所见所感的事情，这能责怪他们吗？这难道不是那些使事情发展到此种境地却又不愿让人知道其真相的人们的过错吗？我承认，个人的骄傲、野心和狂暴曾引起国家大乱，而派系斗争也曾对一些国家和王国造成致命打击。然而祸患的产生，究竟是经常始于人民的放肆和摆脱其统治者的合法权威的愿望，还是始于统治者的蛮横和将专断权力强加于人民之企图？最先引起混乱的究竟是压迫还是违抗？这些还是由公正的历史裁决吧。我相信这一点，即无论何人（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臣民），一旦以武力侵犯君主或人民的权利，并为推翻任何合法政府的组织和结构埋下祸根，他就犯了我认为一个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就应对政府的瓦解给一个国家所带来的流血、掠夺和破坏等所有祸害负责。凡是这样做的人就该被视为人类的公敌和大害，并且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置。

That subjects or foreigners attempting by force on the properties of any people may be resisted with force is agreed on all hands; but that magistrates doing the same thing may be resisted, hath of late been denied; as if those who had the greatest privileges and advantages by the law had thereby a power to break those laws by which alone they were set in a better place than their brethren; whereas their offence is thereby the greater, both as being ungrateful for the greater share they have by the law, and breaking

also that trust which is put into their hands by their brethren.

人们公认，若臣民或外国人企图以武力侵犯任何人的财产，人民可以对其进行武力反抗。但近来却有人否认，若官吏们做了同样的事，人民也可以加以反抗；仿佛那些依据法律拥有最大权利和益处的人因此就有权破坏法律似的，然而，恰是那些法律才使他们的地位比其同胞更为优越；他们的罪行却因此反而更大，因为他们不仅辜负了法律授予他们的较大权力，而且也违反了同胞所给予他们的委托。

Whosoever uses force without right—as everyone does in society who does it without law—puts himself into a state of war with those against whom he so uses it, and in that state all former ties are cancelled, all other rights cease, and everyone has a right to defend himself, and to resist the aggressor. This is so evident that Barclay himself—that great assertor of the power and sacredness of kings—is forced to confess that it is lawful for the people, in some cases, to resist their king, and that, too, in a chapter wherein he pretends to show that the Divine law shuts up the people from all manner of rebellion. Whereby it is evident, even by his own doctrine, that since they may, in some cases, resist, all resisting of princes is not rebellion. His words are these:

无论是谁，若无权使用武力却使用武力，正如任何一个不依法行事的人在社会中所为，就将他自己与那些他用武力来对付的人置于战争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以前所有的约束都被解除，其他所有权利均失效，而人人都拥有进行自卫和抵抗侵略者的权利。这一点十分显而易见，巴克——主张君权和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著名人物，也被迫承认人民在一些情况下反抗他们的国王是合法的，而这些话就出现在他妄想证明上帝的律法禁止人民进行各种各样造反的那一章里。由此可

见，即使根据他自己的学说，人民在一些情况下也是可以进行反抗的；那么，并非所有反抗君主的行为都是叛乱。他是这么说的：

> But if anyone should ask: Must the people, then, always lay themselves open to the cruelty and rage of tyranny—must they see their cities pillaged and laid in ashes,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exposed to the tyrant's lust and fury, and themselves and families reduced by their king to ruin and all the miseries of want and oppression, and yet sit still—must men alone be debarred the common privilege of opposing force with force, which Nature allows so freely to all other creatures for their preservation from injury? I answer: Self-defence is a part of the law of Nature; nor can it be denied the community, even against the king himself; but to revenge themselves upon him must, by no means, be allowed them, it being not agreeable to that law. Wherefore, if the king shall show an hatred, not only to some particular persons, but sets himself against the body of the commonwealth, whereof he is the head, and shall, with intolerable ill-usage, cruelly tyrannise over the whole, or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people; in this case the people have a right to resist and defend themselves from injury; but it must be with this caution, that they only defend themselves, but do not attack their prince. They may repair the damages received, but must not, for any provocation, exceed the bounds of due reverence and respect. They may repulse the present attempt, but must not revenge past

violence. For it is natural for us to defend life and limb, but that an inferior should punish a superior is against nature. The mischief which is designed them the people may prevent before it be done, but, when it is done, they must not revenge it on the king, though author of the Villany. This, therefore, is the privilege of the people in general above what any private person hath: that particular men are allowed, by our adversaries themselves (Buchanan only excepted), to have no other remedy but patience; but the body of the people may, with respect, resist intolerable tyranny, for when it is but moderate, they ought to endure it."

"但是倘若有人问：那么，人民非要总是忍受暴政的虐待和摧残吗？非要眼看他们的城市被劫掠、在灰烬中倒下，他们的妻子和子女遭受暴君的奸淫和蹂躏，他们自己和其家庭被他们的国王所毁灭，受尽各种贫困和压迫，却只能坐视不管吗？为了使其他一切生物可以保卫自己免受侵害，自然自由地允许它们拥有以暴制暴的共同权利，却非要唯独剥夺人类的此种权利吗？我的回答是：自卫是自然法的一部分，亦不能剥夺社会实行自卫的权利，哪怕是抵御君主本人也是这样。但是，不允许人民向君主报复，因为这有悖于自然法。因此，倘若国王不仅对某些个人流露憎恨，而且与其身为元首的整个国家抗衡，并以无法忍受的虐待残酷地对全部或大部分人民施行暴政，那么，人民在此情况下就享有抵抗并保卫自己免受损害的权利。然而，人民在实行自卫时必须谨记这一点：只能保卫自己，不可攻击他们的君主。他们可以补偿所受到的损害，但却不能由于激愤而逾越应有的尊敬

和敬重。他们可以击退目前的攻击，但不能对过去的暴行加以报复。因为我们保护自己的性命是天经地义的，但一个下属惩罚一个上级则是有悖自然的事。对于危害人民的企图，人民可以在其实施前加以阻止，但在实施后，即使国王是罪魁祸首，人民也不能报复他。因此，这就是人民大众优于任何个别私人所拥有的权利：个别私人唯有忍耐而别无其他补救办法，但人民的集体则可以在表示尊敬的同时对无法忍受的暴政加以反抗，因为当暴政尚有节制时，他们应予以忍受。对此，连我们的论敌（除布坎南 [20_1] 外）都予以承认。”[20_2]

Thus far that great advocate of monarchical power allows of resistance.

这位君权的著名拥护者所允许的反抗程度仅此而已。

It is true, he has annexed two limitations to it, to no purpose: Firstly, he says it must be with reverence.Secondly, it must be without retribution or punishment; and the reason he gives is, “because an inferior cannot punish a superior.”

的确，他徒劳地给反抗附加了两种限制条件：第一，他说反抗时必须带着敬意；第二，反抗必须不带报复或惩罚，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下属不能惩罚上级”。

Firstly, how to resist force without striking again, or how to

strike with reverence, will need some skill to make intelligible. He that shall oppose an assault only with a shield to receive the blows, or in any more respectful posture, without a sword in his hand to abate the confidence and force of the assailant, will quickly be at an end of his resistance, and will find such a defence serves only to draw on himself the worse usage. This is as ridiculous a way of resisting as Juvenal thought it of fighting: Ubitupulsas, ego vapulotantum. And the success of the combat will be unavoidably the same he there describes it:

首先，需要一些技巧才能使人明白如何反抗武力却不进行还击，或如何尊敬地还击。一个人在抵抗攻击时若只以盾牌挡剑，或以任何更加恭敬的姿势，手不持剑来削弱攻击者的自信和武力，那么，很快他就会穷尽抵抗之力，并将发现此种防卫只会给自己招致更严重的伤害。这是一种如同尤维纳利斯所设想的作战方式一样可笑的抵抗方式：当你动手打人时，我就任凭你打。战斗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同他在书中所描写的一样：

> Libertaspauperishaecest; Pulsatusrogat, etpugnisconcisus, adorat, Utliceatpaucis cum dentibusindereverti.

> “这就是穷人的自由：人们殴打他——他请求，用拳头殴打他——他哀求，如果人家让他走开，倒多少还能保留几颗牙齿。”

This will always be the event of such an imaginary resistance, where men may not strike again. He, therefore, who may resist

must be allowed to strike. And then let our author, or anybody else, join a knock on the head or a cut on the face with as much reverence and respect as he thinks fit. He that can reconcile blows and reverence may, for aught I know, deserve for his pains a civil, respectful cudgelling wherever he can meet with it.

这种人们不能还击的、假想的反抗，其结果总是如此。因此，必须允许那个可以反抗的人可以进行还击。那么，让我们的作者或其他任何人将当头一棒或迎面一刀与他认为适当的尊敬和敬重相联系吧。那个能把打击和尊敬相协调的人，每当他能有此机会时，也许就该为自己的劳苦吃上别人有礼而又恭敬的一棒。

Secondly, as to his second—“An inferior cannot punish a superior”—that is true, generally speaking, whilst he is his superior. But to resist force with force, being the state of war that levels the parties, cancels all former relation of reverence, respect, and superiority; and then the odds that remains is—that he who opposes the unjust aggressor has this superiority over him, that he has a right, when he prevails, to punish the offender, both for the breach of the peace and all the evils that followed upon it. Barclay, therefore, in another place, more coherently to himself, denies it to be lawful to resist a king in any case. But he there assigns two cases whereby a king may un-king himself. His words are:

第二，至于他的第二点，即“下属不能惩罚上级”，只要他是他的上级，这一般说来是正确的。然而，以暴制暴既是一种使双方平等的战争状态，原先的尊敬、敬重和上级地位就无效了，那么，剩下之差别是，反抗不义侵略者的人比侵略者有优势，即当他取胜时，他享有惩罚罪犯的权利，不仅惩罚他破坏和平，而且惩罚他由此造成的一切

祸害。因此在另一处，巴克利就更加坚持自己的主张，否认在任何情况下反抗国王是合法的。然而，他在那里指出一个国王在两种情况下可以让自己丧失的王位。他是这么说的：

What, then, can there no case happen wherein the people may of right, and by their own authority, help themselves, take arms, and set upon their king, imperiously domineering over them? None at all whilst he remains a king. 'Honour the king,' and 'he that resists the power, resists the ordinance of God,' are Divine oracles that will never permit it. The people, therefore, can never come by a power over him unless he does something that makes him cease to be a king; for then he divests himself of his crown and dignity, and returns to the state of a private man, and the people become free and superior; the power which they had in the interregnum, before they crowned him king, devolving to them again. But there are but few miscarriages which bring the matter to this state. After considering it well on all sides, I can find but two. Two cases there are, I say, whereby a king, ipso facto, becomes no king, and loses all power and regal authority over his people, which are also taken notice of by Winzerus.

> “那么，难道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人民有权根据自己的权威进行自助，拿起武器攻击专横统治他们的国王？当国王仍是国王时，这样的事决不能发生。‘尊敬国王’和‘谁反抗权力就是反抗上帝的命令’是决不允许人民这样做的神谕。人民因此决不能有权支配国王，除非国王做了一些使自己不再是国王的事情。因为那时他放弃了自己的王冠及尊贵的地位并且回到不担任公职的状态，而人民则变得自由和优越，他们在奉他为国王之前的王位空缺期里所拥有的权力

又再次移交给他们。然而，只有极少数的失政行为才会使事情落到如此地步。在充分考虑了各个方面后，我只能找到两种情况。我认为，使一个国王事实上不再是国王，并且失去支配其人民的全部权力和王权的只有两种情况。温泽鲁斯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情况。

The first is, if he endeavour to overturn the government, that is, if he have a purpose and design to ruin the kingdom and commonwealth, as it is recorded of Nero that he resolved to cut off the senate and people of Rome, lay the city waste with fire and sword, and then remove to some other place; and of Caligula, that he openly declared that he would be no longer a head to the people or senate, and that he had it in his thoughts to cut off the worthiest men of both ranks, and then retire to Alexandria; and he wished that the people had but one neck that he might dispatch them all at a blow. Such designs as these, when any king harbours in his thoughts, and seriously promotes, he immediately gives up all care and thought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consequently, forfeits the power of governing his subjects, as a master does the dominion over his slaves whom he hath abandoned.

第一种情况是，倘若国王企图推翻政府，也就是说，倘若他有毁灭王国和国家之图谋，如史上记载，尼禄，公然宣称自己不再是人民或元老院的首脑，并已打算在铲除这两方最杰出的人物之后退居亚历山大城。他只愿全体人民只有一个脖子，好让他一刀就了断他们。任何国王一旦心怀此等企图并认真地付诸实践，就立即放弃了对国家的一切照料和关心，也就因此丧失了统治其臣民的权力，这就如同一个抛弃其奴隶的主人丧失了对其奴隶的支配权一样。

“The other case is, when a king makes himself the dependent of another, and subjects his kingdom, which his ancestors left him, and the people put free into his hands, to the dominion of another. For however, perhaps, it may not be his intention to prejudice the people, yet because he has hereby lost the principal part of regal dignity, viz., to be next and immediately under God, supreme in his kingdom; and also because he betrayed or forced his people, whose liberty he ought to have carefully preserved, into the power and dominion of a foreign nation. By this, as it were, alienation of his kingdom, he himself loses the power he had in it before, without transferring any the least right to those on whom he would have bestowed it; and so by this act sets the people free, and leaves them at their own disposal. One example of this is to be found in the Scotch Annals.”

> “第二种情况是，倘若一个国王依附于另一个国王，并使他的祖先传给他、人民慷慨交给他的王国臣服于另一个国家的统治。因为，虽然损害人民也许并非他的本意，但因为他由此丧失了其王位的主要部分，即在王国内仅次于上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也因为他背叛了他本该精心维护其自由的人民，或强迫他们受制于外国的权力和统治。可以说，他的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割让了他的王国，他自己失去了以前在王国里所曾拥有的权力，却未转让给他本要授予的人以任何一丁点儿权利，所以，他这样做使人民获得了自由，让他们可以自行支配。我们可以在苏格兰的历史中找到这样一个例子。” [20_3]

In these cases, Barclay, the great champion of absolute

monarchy, is forced to allow that a king may be resisted, and ceases to be a king. That is in short, not to multiply cases, in whatsoever he has no authority, there he is no king, and may be resisted.For wheresoever the authority ceases, the king ceases too, and becomes like other men who have no authority. And these two cases that he instances differ little from those above mentioned, to be destructive to governments, only that he has omitted the principle from which his doctrine flows, and that is the breach of trust in not preserving the form of government agreed on, and in not intending the end of government itself, which is the public good and preservation of property. When a king has dethroned himself, and put himself in a state of war with his people, what shall hinder them from prosecuting him who is no king, as they would any other man, who has put himself into a state of war with them, Barclay, and those of his opinion, would do well to tell us. This farther I desire may be taken notice of out of Barclay, that he says, “The mischief that is designed them, the people may prevent before it be clone”, whereby he allows resistance when tyranny is but in design. Such designs as these (says he) when any king harbours in his thoughts and seriously promotes, he immediately gives up all care and thought of the commonwealth; so that, according to him, the neglect of the public good is to be taken as an evidence of such design, or at least for a sufficient cause of resistance. And the reason of all, he gives in these words, because he betrayed or forced his people, whose liberty he ought carefully to have preserved. What he adds, into the power and dominion of a foreign nation, signifies nothing, the fault and forfeiture lying in the loss of their liberty, which he ought to have preserved, and not in any distinction of the persons to whose dominion they were subjected. The peoples right is equally invaded, and their liberty lost, whether they are made slaves to any of their own, or a foreign nation; and in this lies the injury, and against this only have they the right of defence. And there are instances to be

found in all countries, which shew, that it is not the change of nations in the persons of their governors, but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that gives the offence. Bilson, a bishop of our church, and a great stickler for the power and prerogative of princes, does, if I mistake not, in his treatise of “Christian Subjection,” acknowledge that princes may forfeit their power and their title to the obedience of their subjects; and if there needed authority in a case where reason is so plain, I could send my reader to Bracton, Fortescue, and the author of the “Mirror,” and others, writers that cannot be suspected to be ignorant of our government, or enemies to it. But I thought Hooker alone might be enough to satisfy those men who, relying on him for their ecclesiastical polity, are by a strange fate carried to deny those principles upon which he builds it. Whether they are herein made the tools of cunninger workmen, to pull down their own fabric, they were best look. This I am sure, their civil policy is so new, so dangerous, and so destructive to both rulers and people, that as former ages never could bear the broaching of it, so it may be hoped those to come, redeemed from the impositions of these Egyptian under-task-masters, will abhor the memory of such servile flatterers, who, whilst it seemed to serve their turn, resolved all government into absolute tyranny, and would have all men born to what their mean souls fitted them for, slavery.

专制君主制的著名拥护者巴克利在上述这些情况下也被迫承认人民可以反抗君主，而君主也可以不再是君主。我们不必旁征博引，简而言之，无论国王在什么情况下丧失了他的权威，他就不再是国王，就可以被人民反抗，因为权威止于何处，国王也就不复存在，并且变成同其他没有权威的人一样。他所指出的两种情况与前面提到的破坏政府的情况大同小异，只是他省略了他的学说所依据的原则。那就是，国王违反了人民的委托，没有保护人民所同意的政府形式，没有

设法达到政府本身谋求公共福利和保护财产的目的。当一个国王自我废黜，并将自己和其人民置于战争状态时，有什么能阻止人民控诉利和那些与他持同样观点的人最好能告诉我们答案。在巴尔克莱所说的话中，我希望有一点能引起注意，他说："人民可以在针对他们的危害尚未到来之前就予以防止"。这一说法意味着他容许反抗尚在谋划中的暴政。这些企图，（他说）如果国王已胸有成竹并认真地加以推动，他就放弃了他对于国家的一切关心和考虑；所以，根据他的说法，疏忽公共福利就应当被看作这种企图的证据，抑或至少被看作是反抗的充分理由。他对全部理由是这样概括的：因为国王背叛了或强迫了人民，而人民的自由应该是他加以小心维护的。而他补充的"受制于一个外国的权力和统辖权"的话，则并无意义，因为他的过错和丧权在于人民丧失了他应加以保护的自由，而并不在于统辖他们的人有所不同。不论人民是变成本国的奴隶还是外国的奴隶，他们的权利同样都受到侵犯，他们的自由也同样都遭到剥夺；这就是他们所受的损害，而他们仅有的就是抵抗这种损害的自卫权利。在所有的国家中都能找到事例证明：施行凌辱的不是执政人员的民族改变，而是政府的改变。比尔逊是我们教会的一位主教，是君主权力和特权的坚定拥护者，在他的论文《基督教徒的服从》中——倘若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承认君主可以丧失其权力和使其臣民服从的资格。倘若在道理如此明白的问题上仍需权威的话，我可以把布雷克顿、福特斯丘、《镜子》的作者和其他人的作品推荐给我的读者，这些作家都不能被怀疑为不了解我们的政府或与政府为敌。然而，我认为仅胡克一人就足以满足那些依赖他的理论来主张教会行法的人，因为他们在一种奇怪命运的支配下竟然会否定胡克建立其理论的那些原则。他们最好想一想，他们是否于此成为更狡猾的工人的工具，拆毁了自己的建筑物。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社会政策是如此新异、如此危险、如此危害统治者和人民双方，以至于过去绝不允许提倡这些政策，同样可以预料，人们在未来摆脱了埃及奴隶监工的强加管制后，会憎恶地想起这些奴颜婢膝的谄媚者，这些人尽管似乎有用，但实际上却把一切政体都变成绝对暴政，并想让所有人生来就处于与他们低贱的灵魂相符的奴役状态。

Here, it is like the common question will be made: Who shall be judge whether the prince or legislative act contrary to their trust? This, perhaps, ill-affected and factious men may spread amongst the people, when the prince only makes use of his due prerogative. To this I reply, the people shall be the judge; for who shall be the judge whether his trustee or deputy acts well and according to the trust reposed in him, but he who deputes him and must, by having deputed him, have still a power to discard him when he fails in his trust? If this be reasonable in particular cases of private men, why should it be otherwise in that of the greatest moment, where the welfare of millions is concerned and also where the evil, if not prevented, is greater, and the redress very difficult, dear, and dangerous?

有人可能会在此提出这个常提的问题：应该由谁来评判君主或立法机关的行为是否违反了他们所受的委托呢？也许，当君主只是行使其应有的特权时，动机不良和爱搞分裂的人会在人民中间散布这种疑问。我的回答是：人民应该是裁定者，因为除了委托人之外，谁能评判受托人或代表是否恰当并根据其所受之委托来采取行动？委托人既然给予委托，则当受托人辜负他所受的委托时，委托人就仍有权撤换他。倘若在私人的个别情况下这是合理的，那么在关系到千万人福利的重大情况下，以及倘若祸害不加以阻止就会更大而补偿就会极为困难、昂贵和危险的情况下，为什么反而并非如此呢？

But, farther, this question “who shall be judge?” cannot mean that there is no judge at all. For where there is no judicature on earth to decide controversies amongst men, God in heaven is judge. He alone, it is true, is judge of the right. But every man is judge for himself, as in all other cases so in this, whether another hath put himself into a state of war with him, and whether he should appeal

to the Supreme Judge, as Jephtha did.

但是进一步而言，谁应是裁定者这一问题不能意味着没有裁定者。因为人世间哪里没有司法机关来裁决人们之间的纠纷，天上的上帝就是裁定者。确实，只有他才是正义的裁定者。但在此情况下，如同在其他一切情况下，另一个人是否已将自己和他置于战争状态，以及他是否应像耶弗他那样诉诸最高的裁定者，则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判断。

If a controversy arises betwixt a princ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in a matter where the law is silent or doubtful, and the thing be of great consequence, I should think the proper umpire in such a case should be the body of the people. For in such cases where the prince hath a trust reposed in him, and is dispensed from the common, ordinary rules of the law, there, if any men find themselves aggrieved, and think the prince acts contrary to, or beyond that trust, who so proper to judge as the body of the people (who at first lodged that trust in him) how far they meant it should extend? But if the prince, or whoever they be in the administration, decline that way of determination, the appeal then lies nowhere but to Heaven. Force between either person who have no known superior on earth or, which permits no appeal to a judge on earth, being properly a state of war, wherein the appeal lies only to heaven; and in that state the injured party must judge for himself when he will think fit to make use of that appeal and put himself upon it.

倘若君主和人民在法律没有规定或悬而未决却又关系重大的一部分事情上发生了争执，我认为这种情况下适当的仲裁者应该是人民的

集体。因为在君主被人民授予委托而免受一般普通法律规则之约束的情况下，倘若有任何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损害，认为君主违反了委托或超出了委托的范围而行事，那么，什么人能像人民的集体（最初是他们委托他的）那样如此适当地判断他们当初所委托的范围呢？然而，倘若君主或任何执政者拒绝这种解决方法，那么唯有诉诸上天。倘若使用武力的双方在世间没有公认的尊长或情况不允许诉诸世间的裁定者，那么这种武力的使用正是一种战争状态，在此情况下，则唯有诉诸上天。在那种状态中，受害的一方必须自己判断何时适合使用那种申诉并向上天申诉。

To conclude, the power that every individual gave the society when he entered into it can never revert to the individuals again, as long as the society lasts, but will always remain in the community, because without this there can be no community—no commonwealth,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original agreement; so also when the society hath placed the legislative in any assembly of men, to continue in them and their successors, with direction and authority for providing such successors, the legislative can never revert to the people whilst that government lasts: because, having provided a legislative with power to continue for ever, they have given up their political power to the legislative, and cannot resume it. But if they have set limits to the duration of their legislative, and made this supreme power in any person or assembly only temporary; or else when, by the miscarriages of those in authority, it is forfeited; upon the forfeiture of their rulers, or a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time set, it reverts to the society, and the people have a right to act as supreme, and continue the legislative in themselves or erect a new form, or under the old form place it in new hands, as they think good.

结论是：只要社会继续存在，每个个人在加入社会时交予社会的权力就决不能复归于个人，而将永远留在社会中，因为若非如此，就不会有社会，不会有国家，而这是违反最初协议的。同样，当社会已将立法权给予由若干人组成的议会，由他们及其后继者继续行使，并规定产生后继者的范围和职权时，只要那个政府继续存在，立法权就决不能复归于人民，因为，既然他们已经赋予立法机关永远存在的权力，那么他们就将自己的政治权力让渡给了立法机关，不能重新收回。然而，倘若他们对其立法机关的期限做了规定，使这一最高权力只为任何个人或议会暂时享有，或倘若当权者由于施政不当而丧失了权力，那么在其统治者丧失权力或规定的期限期满时，这种权力就复归于社会，人民就有权充当最高权力的行使者，由他们自己继续行使立法权，或把立法权给予一个新的政府，或在旧政府的形式下将其给予他们认为合适的新人。

[19_1].1.iii. c. 8.

[19_2].1.iii. c. 16.

[20_1].布坎南（Buchanan，1506-1582），苏格兰历史学家、人文主义学者，他指出人民能够合法地反抗甚至惩罚暴君。

[20_2].本文第三章，第八节。

[20_3].本文第三章，第十六节。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A Political Treatise

政治论

Benedict de Spinoza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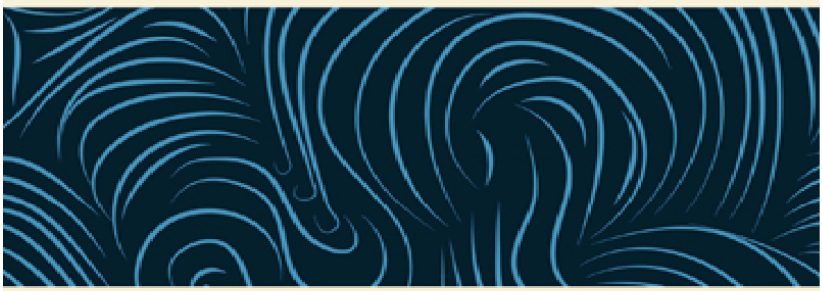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政治论

A Political Treatise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reface 序言
- Chapter 1 Introduction 第一章　引论
- Chapter 2 Of Natural Right 第二章　自然权利
- Chapter 3 Of the Right of Supreme Authorities 第三章　最高当权者的权利
- Chapter 4 Of the Functions of Supreme Authorities 第四章　最高当权者的职能
- Chapter 5 Of the Best State of a Dominion 第五章　国家的最佳状态
- Chapter 6 Of Monarchy 第六章　关于君主政体
- Chapter 7 Of Monarchy (Continuation) 第七章　关于君主政体（续）
- Chapter 8 Of Aristocracy 第八章　关于贵族政体
- Chapter 9 Of Aristocracy (Continuation) 第九章　关于贵族政体（续）
- Chapter 10 Of Aristocracy (Conclusion) 第十章　关于贵族政体（结论）
- Chapter 11 Of Democracy 第十一章　关于民主政体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reface

序言

From the Editor's Preface to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Benedict de Spinoza

编者为斯宾诺莎遗作代序

Our author composed the *Political Treatise*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in 1677]. Its reasoning is exact, its style clear. Abandoning the opinions of many political writers, he most firmly propounds therein his own judgment; and throughout draws his conclusions from his premises. In the first five chapters, he trea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general—in the sixth and seventh, of monarchy; in the eighth, ninth, and tenth, of aristocracy; lastly, the eleventh begins the subject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But his untimely death was the reason that he did not finish this treatise, and that he did not deal with the subject of laws, nor with the various questions about politics, as may be seen from the following “Letter of the Author to a Friend”, which may properly be prefixed to this *Political Treatise* , and serve it for a Preface:

我们的编者在斯宾诺莎去世（1677）前不久整理了《政治论》。此书推理严谨，文风简明。斯宾诺莎摈弃其他政治作家的观点，坚定地提出自己的判断。自始至终，他依据自己的前提得出自己的结论。此书前五章概述政治科学；第六、七两章论述君主政体；第八、九、

十章论述贵族政体；最后一章即第十一章开始论述民主政体。但是，由于他过早去世，没有完成这本专著，也就没有探讨法律和关于政治学的各种问题。从以下他写给友人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有讨论这些问题的打算。此信可置于《政治论》最前部分，作为本书序言。

Dear Friend,

“亲爱的朋友，

Your welcome letter was delivered to me yesterday. I heartily thank you for the kind interest you take in me. I would not miss this opportunity, were I not engaged in something, which I think more useful, and which, I believe, will please you more—that is, in preparing a *Political Treatise* , which I began some time since, upon your advice. Of this treatise, six chapters are already finished. The first contains a kind of introduction to the actual work; the second treats of natural right; the third, of the right of supreme authorities. In the fourth, I inquire, what political matters are subject to the direction of supreme authorities; in the fifth, what is the ultimate and highest end which a society can contemplate; and, in the sixth, how a monarchy should be ordered, so as not to lapse into a tyranny. I am at present writing the seventh chapter, wherein I make a regular demonstration of all the heads of my preceding sixth chapter, concerning the ordering of a well-regulated

monarchy. I shall afterwards pass to the subjects of aristocratic and popular dominion, and, lastly, to that of laws and other particular questions about politics. And so, farewell.

我昨日收到了你寄来的欢迎函件，衷心感谢你对我的亲切关怀。如果不是因为我手头正忙着某件我认为更有用的事情，我不会错失这个机会。我相信你也会对这事情感兴趣，即应你的建议而早些时候开始准备的《政治论》书稿。《政治论》已完成六章。第一章大致介绍现行的工作；第二章论述自然权利；第三章论述最高当权者的权利；第四章论述最高当权者管辖的各项政务；第五章论及一个社会应该考虑的终极目标；第六章论述君主政体该如何治理国家才不至于陷入暴政。目前正在撰写第七章，本章先大略论述第六章里关于组织一个管理良好的君主政体的所有要点，之后再论述贵族政体和民众的民主政体。最后，再讨论法律以及关于政治的其他特殊问题。就这样，再见。”

The author's aim appears clearly from this letter; but being hindered by illness, and snatched away by death, he was unable, as the reader will find for himself, to continue this work further than to the end of the subject of aristocracy.

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目标。但是由于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他无法继续完成这部专著，仅仅完成至贵族政体这个主题。

Chapter 1 Introduction

第一章　引论

1 . Philosophers conceive of the passions which harass us as vices into which men fall by their own fault, and, therefore, generally deride, bewail, or blame them, or execrate them, if they wish to seem unusually pious. And so they think they are doing something wonderful, and reaching the pinnacle of learning, when they are clever enough to bestow manifold praise on such human nature, as is nowhere to be found, and to make verbal attacks on that which, in fact, exists. For they conceive of men, not as they are, but as they themselves would like them to be. Whence it has come to pass that, instead of ethics, they have generally written satire, and that they have never conceived a theory of politics, which could be turned to use, but such as might be taken for a chimera, or might have been formed in Utopia, or in that golden age of the poets when, to be sure, there was least need of it. Accordingly, as in all sciences, which have a useful application, so especially in that of politics, theory is supposed to be at variance with practice; and no men are esteemed less fit to direct public affairs than theorists or philosophers.

第一节　哲学家总是把困扰我们的情感当成罪恶，认为我们会因为自身的缺陷而深陷其中，因此他们嘲笑、怨叹、斥责或者痛骂这些情感，以体现他们自己那不同于寻常人的虔诚。当他们自以为是地对人类本性进行各种各样的评论，对业已存在的事实进行诋毁时，他们以为自己达到了智慧的顶峰，他们在做神圣的事情。他们没有把人当成人原本的样子来接受，而是按他们希望的样子来想象人们。因此，

他们写作时通常笔锋讥讽，写出的作品无关伦理学，也从不去设想那些有实际使用价值的政治理论；而是根据幻想，运用乌托邦，或是诗人讴歌的黄金时代等这些根本无需伦理学和政治理论的东西。因此，虽然所有的应用科学都有理论与实践不符合的情况，但是政治学尤其如此。而且，在处理公众事务方面，理论家和哲学家被认为是最不适合的人。

2．But statesmen, on the other hand, are suspected of plotting against mankind, rather than consulting their interests, and are esteemed more crafty than learned. No doubt nature has taught them, that vices will exist, while men do. And so, while they study to anticipate human wickedness, and that by arts, which experience and long practice have taught, and which men generally use under the guidance more of fear than of reason, they are thought to be enemies of religion, especially by divines, who believe that supreme authorities should handle public affai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ame rules of piety, as bind a private individual. Yet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statesmen have written about politics far more happily than philosophers. For, as they had experience for their mistress, they taught nothing that was inconsistent with practice.

第二节　另一方面，政治家有着暗算人们的嫌疑，他们不会考虑人们的利益。与其说他们博学贤德，不如说他们老奸巨猾。无疑，是他们的本性让他们以为，只要人存在，恶念就存在。所以，他们采用各种权术，力图预防人性的邪恶。由于他们使用的权术是从长期的实践经验中学到的，也就是人们常常在恐惧之下而非理性之下所采用的手段，所以，他们被人们尤其是神学家视为宗教的反对者。神学家认为最高当权者在处理公众事务时所奉行的道德规则应当和个人所遵守的道德规则一样。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政治家们在写政治著作时，远比哲学家轻松得多，因为，由于他们对自己所称霸的国家有着丰富

的经验，他们所教导的东西没有一点是不能付诸实践的。

3．And, certainly, I am fully persuaded that experience has revealed all conceivable sorts of commonwealth, 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men's living in unity, and likewise the means by which the multitude may be guided or kept within fixed bounds. So that I do not believe that we can by meditation discover in this matter anything not yet tried and ascertained, which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experience or practice. For men are so situated, that they cannot live without some general law. But general laws and public affairs are ordained and managed by men of the utmost acuteness, or, if you like, of great cunning or craft. And so it is hardly credible, that we should be able to conceive of anything serviceable to a general society, that occasion or chance has not offered, or that men, intent upon their common affairs, and seeking their own safety, have not seen for themselves.

第三节　当然，我也完全认同，经验已经揭示出所有可能想得到的、用以维护人类和睦生活的所有国家形式，它也已揭示出用来引导民众或把民众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各种手段。所以，我并不相信我们仅仅通过深思就能发现任何符合实践经验、却还未被试验过或被确定过的东西。因为人是如此的情绪化，没有共同法则将无法生活下去。但是，普通法和公共事务都是由那些最敏锐的人，或者说是最狡猾的人制定和管理的。因此很难相信，我们能够设想出对一般社会有用的、从未有机会被提出过的，或者说从未被那些致力于公共事务和寻求自身安全的人亲身经历过的任何方法。

4．Therefore, on applying my mind to politics, I have resolved to demonstrate by a certain and undoubted course of argument, or

to deduce from the very condition of human nature, not what is new and unheard of, but only such things as agree best with practice. And that I might investigate the subject-matter of this science with the same freedom of spirit as we generally use in mathematics, I have laboured carefully, not to mock, lament, or execrate, but to understand human actions; and to this end I have looked upon passions, such as love, hatred, anger, envy, ambition, pity, and the other perturbations of the mind, not in the light of vices of human nature, but as properties, just as pertinent to it, as are heat, cold, storm, thunder, and the like to the nature of the atmosphere, which phenomena, though inconvenient, are yet necessary, and have fixed causes, by means of which we endeavour to understand their nature, and the mind has just as much pleasure in viewing them aright, as in knowing such things as flatter the senses.

第四节　所以，在致力于政治学研究时，我决心用一系列确信无疑的论据来论证，或者是基于人的本性来推断。我提出的不是新的或闻所未闻的东西，而是最能与实践相符合的东西。而且，我会把通常用于数学研究中的那种客观态度运用到我的工作中，去查证这门科学的题材选取，谨慎工作，不嘲笑、不怨叹、不斥责人类的行为，而是去理解它。为此，对于那些引起人们心灵动荡的情感，包括爱情、憎恨、愤怒、嫉妒、野心、同情心等，我不把它们看作人性的缺陷，而是把其当作人性的各种属性去中肯地对待它们，就像自然界的热、冷、风暴、雷鸣等是大气的属性一样。这些现象虽然会引起不便，但它们是必然的存在，有其存在的原因。通过这些原因我们可以了解其本性。而且，如同理解那些自然现象能给我们的感官带来喜悦，正确看待这些情感也会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愉快。

5 . For this is certain, and we have proved its truth in our

Ethics , [2_1] that men are of necessity liable to passions, and so constituted as to pity those who are ill, and envy those who are well off; and to be prone to vengeance more than to mercy: and moreover, that every individual wishes the rest to live after his own mind, and to approve what he approves, and to reject what he rejects. And so it comes to pass, that, as all are equally eager to be first, they fall to strife, and do their utmost mutually to oppress one another; and he who comes out conqueror is more proud of the harm he has done to the other, than of the good he has done to himself. And although all are persuaded, that religion, on the contrary, teaches every man to love his neighbour as himself, that is to defend another's right just as much as his own, yet we showed that this persuasion has too little power over the passions. It avails, indeed, in the hour of death, when disease has subdued the very passions, and man lies inert, or in temples, where men hold no traffic, but least of all, where it is most needed, in the law-court or the palace. We showed too, that reason can, indeed, do much to restrain and moderate the passions, but we saw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road, which reason herself points out, is very steep; [2_2] so that such as persuade themselves, that the multitude or men distracted by politics can ever be induced to live according to the bare dictate of reason, must be dreaming of the poetic golden age, or of a stage-play.

第五节　在《伦理学》一书里我们已经证明 [3_1] ，人不可避免地会受情感的影响，这是肯定无疑的。人大多是同情病者，嫉妒富者；多倾向于复仇而少有同情心。而且，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能按照他的意思生活，赞同他所赞同的，拒绝他所拒绝的。于是，所有人都争当第一，他们陷入冲突，竭尽全力互相压制；最终胜者引以为傲的是能够损毁对方，而不是自己得到了什么好处。虽然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宗教教导每个人要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像捍卫自己权利一样捍

卫别人的权利，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教导的力量远不及情感的力量强大。人只有在弥留之际，奄奄一息之时，疾病才压倒情感；或者在教堂里，当人再无力往来走动之时，宗教教导才有作用。但是，在最需要宗教教导的法院或宫廷，它却无作用。我们说过，理性能克制并缓和情感，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理性本身所指引的道路是艰难的 [3_2] 。因此，如果有人认为民众或为政治所困扰的人能够完全按照理性的指令生活，那他简直就是在梦想那个诗人所讴歌的黄金时代或童话世界。

6 . A dominion then, whose well-being depends on any man's good faith, and whose affairs cannot be properly administered, unless those who are engaged in them will act honestly, will be very unstable. On the contrary, to insure its permanence, its public affairs should be so ordered, that those who administer them, whether guided by reason or passion, cannot be led to act treacherously or basely. Nor does it matter to the security of a dominion, in what spirit men are led to rightly administer its affairs. For liberality of spirit, or courage, is a private virtue; but the virtue of a state is its security.

第六节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幸福安宁取决于某些人的善意，而且其国事的正确处理有赖于处理者的诚实信义，那么，这个国家将极其不稳定。相反地，为了保证国家的永久持续，国家事务的处理必须安排的能使国家的执行管理者，不管是出于理性或情感原因，决不做出背信弃义或下作的事情。只要能正确治理，不管用何种精神引导人们行动，都不会影响国家安定。因为自由的精神或勇气，是一种个人美德，而国家的美德在于它的安全稳定。

7 . Lastly, inasmuch as all men, whether barbarous or civilized,

everywhere frame customs, and form some kind of civil state, we must not, therefore, look to proofs of reason for the causes and natural bases of dominion, but derive them from the general nature or position of mankind, as I mean to do in the next chapter.

第七节　最后，由于所有人，不管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在任何地方都能养成风俗惯例，形成某种国家状态，所以，我们不能把理性的教训当成国家的起源及其自然基础，而应归诸人的共同本性或素质。关于这一点，将在下一章进行说明。

[2_1].*Ethics* , iv. 4, Coroll. iii. 31, note; 32, note.

[2_2].Ibid., v. 42, note.

[3_1].《伦理学》第四部分，命题四；第三部分，命题三十一、三十二，附释。

[3_2].同上，第五部分，命题四十二，附释。

Chapter 2 Of Natural Right

第二章　自然权利

1 . In our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we have treated of natural and civil right, [3_1] and in our *Ethics* have explained the nature of wrong-doing, merit, justice, injustice, [3_2] and lastly, of human liberty. [3_3] Yet, lest the readers of the present treatise should have to seek elsewhere those points, which especially concern it, I have determined to explain them here again, and give a deductive proof of them.

第一节　在《神学政治论》一书中我们论述了自然权利和城市权利 [4_1] 。在《伦理学》一书中，我们论述了罪恶、美德、公正、不公正 [4_2] 以及人类自由 [4_3] 。但是，为免读者再去别的书中查找这些与本书特别相关的问题，在这里我将再次对这些观点进行阐述并加以演绎论证。

2 . Any natural thing whatever can be just as well conceived, whether it exists or does not exist. As th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xistence of natural things cannot be inferred from their definition, so neither can their continuing to exist. For their ideal essence is the same, after they have begun to exist, as it was before they existed. As then their beginning to exist cannot be inferred from their essence, so neither can their continuing to exist; but they need the same power to enable them to go on existing, as to enable them to begin to exist. From which it follows, that the power, by which natural things exist, and therefore that by which they operate, can

be no other than the eternal power of God itself. For were it another and a created power, it could not preserve itself, much less natural things, but it would itself,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exist, have need of the same power which it needed to be created.

第二节　任何自然的东西，不管它是存在的或不存在的，都可以予以合理的设想。所以，人们无法从自然事物的定义中推断出其最初的存在，也无法由此推断出其将来的存在。由于它们的理想本质在它们存在前后都是一样的，因此，无法从它们的本质推断出它们开始的存在，也无法从其本质推断出它们将来的存在。但是它们都需要同样的一种力量来使得它们能存在并继续存在下去。这种自然物赖以存在并运行的力量，是只有上帝才有的永恒的力量。如果是其他的力量，它不可能维持下来，更别说维持自然事物的存在了。但是它为了继续存在，需要一种与它被创造时所需要过的力量相同的力量。

3 . From this fact therefore, that is, that the power whereby natural things exist and operate is the very power of God itself, we easily understand what natural right is. For as God has a right to everything, and God's right is nothing else, but his very power, as far as the latter is considered to be absolutely free; it follows from this, that every natural thing has by nature as much right, as it has power to exist and operate; since the natural power of every natural thing, whereby it exists and operates, is nothing else but the power of God, which is absolutely free.

第三节　从这一事实，即自然事物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力量是上帝的力量，我们不难理解自然权利是什么。因为上帝拥有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而且它的权利就是那种被认为绝对自由的神力，所以，每一种自然事物天生拥有的权利就是它存在和运行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上

帝绝对自由的神力。

4．And so by natural right I understand the very laws or rules of n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which everything takes place, in other words, the power of nature itself. And so the natural right of universal nature, and consequently of every individual thing, extends as far as its power: and accordingly, whatever any man does after the laws of his nature, he does by the highest natural right, and he has as much right over nature as he has power.

第四节　因此，说到自然权利，我的理解是，它就是自然界的规律或法则，万事的发生都依据它，即自然本身的力量。宇宙自然及个体的自然权利和它的力量所能及的范围一样广大，所以，任何一个人依其本性做任何事情，所依据的都是最高的自然权利，也是依其本身的力量行使他对自然的权利。

5．If then human nature had been so constituted, that men should live according to the mere dictate of reason, and attempt nothing inconsistent therewith, in that case natural right, considered as special to mankind, w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power of reason only. But men are more led by blind desire, than by reason: and therefore the natural power or right of human beings should be limited, not by reason, but by every appetite, whereby they are determined to action, or seek their own preservation. I, for my part, admit, that those desires, which arise not from reason, are not so much actions as passive affections of man. But as we are treating here of the universal power or right of nature, we cannot here recognize any distinction between desires, which are engendered in us by reason, and those which are engendered by

other causes; since the latter, as much as the former, are effects of nature, and display the natural impulse, by which man strives to continue in existence. For man, be he learned or ignorant, is part of nature, and everything, by which any man is determined to action, ought to be referred to the power of nature, that is, to that power, as it is limited by the nature of this or that man. For man, whether guided by reason or mere desire, does nothing sa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and rules of nature, that is, by natural right (Sec. 4).

第五节　假如人的本性是既定的，那么人类就应该是只依据理性的指令而生活，不去尝试违背理性的事情。若果真如此，那么被视为人类特殊权利的自然权利将由理性的力量来决定。但是，较之理性，人类更容易受盲目的欲望驱使。所以人类的自然权利或力量应该受到限制，不是受理性限制，而是受限于人们借以行动或保护自己的欲望。我承认，非理性的欲望并不是人类的主动行为，而是人的被动情感。但是，因为我们在此探讨的是自然的普遍权利或力量，所以不在这里辨别哪些欲望是理性的，哪些欲望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两种欲望都是自然的结果，体现自然的冲动，人类就是因此冲动而存续。人类，不管是博学的或是无知的，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行动的所有动机都与自然力量有关，也就是说，自然力量限制人的本性。不管人类是受理性指引或单纯的欲望驱使，人总是按照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行事，也就是按照自然权利行事（本章第四节）。

6．But most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ignorant rather disturb than follow the course of nature, and conceive of mankind, in nature as of one dominion within another. For they maintain, that the human mind is produced by no natural causes, but created directly by God, and is so independent of other things, that it has an absolute power to determine itself, and make a right use of reason. Experience, however, teaches us but too well, that it is no more in

our power to have a sound mind, than a sound body. Next, inasmuch as everything whatever, as far as in it lies, strives to preserve its own existence, we cannot at all doubt, that, were it as much in our power to live after the dictate of reason, as to be led by blind desire, all would be led by reason, and order their lives wisely; which is very far from being the case. For “Each is attracted by his own delight.“ [3_4]

第六节　但是大多数人认为，无知的人宁愿搅乱自然规律也不遵循自然规律。他们还认为人类在自然界中就是国中之国。他们坚持认为人的创造与自然规律无关，而是直接由上帝创造的，因而独立于其他一切事物，人类有绝对的力量来决定自己，做出正确的推断。然而经验充分证明，拥有健全的身体并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就像我们没有能力保证自己能拥有健全的精神一样。此外，既然任何事物都会尽其所能保全自己的存在，无疑，我们也应该具有一样的能力去依据理性的指令而生活，如同我们在盲目的欲望驱使下生活那样。那么，所有人都将受理性指引，用理性安排生活。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因为，“每个人都无法抵挡那些令自己愉悦之事的诱惑。” [4_4]

Nor do divines remove this difficulty, at least not by deciding, that the cause of this want of power is a vice or sin in human nature, deriving its origin from our first parents' fall. For if it was even in the first man's power as much to stand as to fall, and he was in possession of his senses, and had his nature unimpaired, how could it be, that he fell in spite of his knowledge and foresight? But they say, that he was deceived by the devil. Who then was it, that deceived the devil himself? Who, I say, so maddened the very being that excelled all other created intelligences, that he wished to be greater than God? For was not his effort too, supposing him of sound mind, to preserve himself and his existence, as far as in him

lay? Besides, how could it happen, that the first man himself, being in his senses, and master of his own will, should be led astray, and suffer himself to be taken mentally captive? For if he had the power to make a right use of reason, it was not possible for him to be deceived, for as far as in him lay, he of necessity strove to preserve his existence and his soundness of mind. But the hypothesis is, that he had this in his power; therefore he of necessity maintained his soundness of mind, and could not be deceived. But this from his history, is known to be false. And, accordingly,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it was not in the first man's power to make a right use of reason, but that, like us, he was subject to passions.

神学家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他们认为这种渴望力量的动机是人性中的缺点或罪过，而且它的起源自我们的第一代祖先亚当出现时就已经存在，但是，这种说法对解决这个问题也无济于事。如果亚当天生就既能抵制诱惑也会堕落犯错，同时又具有健全的头脑，天性未受侵蚀，那么他怎么可能会在明知结局的情况下甘心堕落呢？神学家说他是受到撒旦的欺骗，那么又是谁欺骗了撒旦？是谁会让那个比所有已被创造出来的智者更优秀的人失去理智，让他妄想要比上帝更伟大？如果撒旦头脑健全，那么他岂不是应想方设法保护自己并维持自己的存在？而且，如果始祖亚当头脑健全，能控制自己意愿，又怎会被引入歧途，让自己思想上收到欺骗诱惑？如果他有能力正确使用理性，他就不可能被欺骗，因为他必定会尽他所能去保全他的存在和思维的鉴别力。既然人们假定他具有这个能力，那么他一定会保全自己健全的头脑而不会被骗。但是从他的故事中我们知道他被骗了。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始祖亚当也没有能力做到正确运用理性，他和我们一样会受制于情感。

7 . But that man, like other beings, as far as in him lies, strives to preserve his existence, no one can deny. For if any distinction

could be conceived on this point, it must arise from man's having a free will. But the freer we conceived man to be, the more we should be forced to maintain, that he must of necessity preserve his existence and be in possession of his senses; as anyone will easily grant me, that does not confound liberty with contingency. For liberty is a virtue, or excellence. Whatever, therefore, convicts a man of weakness cannot be ascribed to his liberty. And so man can by no means be called free, because he is able not to exist or not to use his reason, but only in so far as he preserves the power of existing and operating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human nature. The more, therefore, we consider man to be free, the less we can say, that he can neglect to use reason, or choose evil in preference to good; and, therefore, God, who exists in absolute liberty, also understands and operates of necessity, that is, exists, understands, and operates according to the necessity of his own nature. For there is no doubt, that God operates by the same liberty whereby he exists. As then he exists by the necessity of his own nature, by the necessity of his own nature also he acts, that is, he acts with absolute liberty.

第七节　但是无可否认，人和自然界的其他东西一样，会尽其所能保全自己的存在。如果说在这方面人与其他东西之间存在什么区别，那应该是，我们认为人类拥有自由意志。然而，我们认为一个人越自由，便也越不得不承认他必然要维持生存和拥有理性。只要不把自由和偶然混为一谈，我想任何人都会同意我的观点。因为自由是一种美德，是一种优越性。因此，任何让人懦弱无能的东西都不是自由。如果一个人不能生存，或者不能运用理性，则根本不能说他是自由的。只有在他有能力能根据人性的规律维持生存和行事时，才能说他是自由的。因此，我们越认为一个人自由，我们就越不能说他会忽略理性，或者把邪恶置于善良之上。拥有绝对自由的上帝也明白，并必定会根据他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理解和行动。无疑，上帝凭

借他赖以生存的自由进行活动，所以上帝根据它自己本性的必然性去生存和行动，也就是说，他按照绝对的自由行动。

8 . So we conclude, that it is not in the power of any man always to use his reason, and be at the highest pitch of human liberty, and yet that everyone always, as far as in him lies, strives to preserve his own existence; and that (since each has as much right as he has power) whatever anyone, be he learned or ignorant, attempts and does, he attempts and does by supreme natural right. From which it follows that the law and ordinance of nature, under which all men are born, and for the most part live, forbids nothing but what no one wishes or is able to do, and is not opposed to strife, hatred, anger, treachery, or, in general, anything that appetite suggests. For the bounds of nature are not the laws of human reason, which do but pursue the true interest and preservation of mankind, but other infinite laws, which regard the eternal order of universal nature, whereof man is an atom; and according to the necessity of this order only are all individual beings determined in a fixed manner to exist and operate. Whenever, then, anything in nature seems to us ridiculous, absurd, or evil, it is because we have but a partial knowledge of things, and are in the main ignorant of the order and coherence of nature as a whole, and because we want everything to b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dictate of our own reason; although, in fact, what our reason pronounces bad, is not bad as regards the order and laws of universal nature, but only as regards the laws of our own nature taken separately.

第八节　由此我们以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处在自由的最高程度。每个人总是尽其所能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且，不管他做什么，不管他是博学的或无知的，都会

依据最高的自然权利去努力并行动（因为每个人拥有的权利和力量一样大）。由此可知，人类赖以出生并生活的自然法则只能限制那些无人想做或无人能做的事，它无法反对冲突、憎恨、愤怒和背叛，或者任何因欲望而引起的东西。因为自然的约束并不是人类理性的准则，人类理性的准则只追求人类的真正利益，保护人类的生存；而无数的其他法则，注重并制约的是宇宙自然的永恒秩序，人类在宇宙自然中只是沧海一粟而已。根据这种秩序的必然性，所有的个体在生存和行动时，都要被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方式之中。因此任何时候，如果自然中的任何事情在我们看来荒谬可笑，甚至是邪恶的，那是因为我们仅仅了解这些事情的一部分，对自然整体的秩序和相关性并不了解；因为我们是根据自己的理性的指令来安排一切事情的。事实上，我们的理性认为是坏的事，相对于宇宙自然的秩序和法则而言，并不是坏事，但若仅从我们的人性准则来说，那就是坏事。

9．Besides, it follows that everyone is so far rightfully dependent on another, as he is under that other's authority, and so far independent, as he is able to repel all violence, and avenge to his heart's content all damage done to him, and in general to live after his own mind.

第九节　由此可以推断，只要一个人处于他人的权威之下，他就是处于他人的权利之下；只要他能够去除所有暴力，自主报复所有加在他身上的伤害，并且通常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那么，他就是处在自己的权利之下。

10．He has another under his authority, who holds him bound, or has taken from him arms and means of defence or escape, or inspired him with fear, or so attached him to himself by past favour, that the man obliged would rather please his benefactor

than himself, and live after his mind than after his own. He that has another under authority in the first or second of these ways, holds but his body, not his mind. But in the third or fourth way he has made dependent on himself as well the mind as the body of the other; yet only as long as the fear or hope lasts, for upon the removal of the feeling the other is left independent.

第十节　如果一个人把他人置于自己的力量控制之下，可能会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捆住他；二是解除他的武器，剥夺他防卫或逃跑的方法；三是引起他的恐惧；四是用过去的恩惠束缚他，让他讨好他的恩人胜过取悦自己，宁愿按照恩人的意思生活。前两者情况只能控制他人的躯体，不能控制其思想；第三和第四种情况可以控制他人的躯体和思想。只要他人仍对自己心怀恐惧或希望，上述情况就会存在。一旦这些感觉消失，这个人就能再度处于他本身的权利之下。

11 . The judgment can be dependent on another, only as far as that other can deceive the mind; whence it follows that the mind is so far independent, as it uses reason aright. Nay, inasmuch as human power is to be reckoned less by physical vigour than by mental strength, it follows that those men are most independent whose reason is strongest, and who are most guided thereby. And so I am altogether for calling a man so far free, as he is led by reason; because so far he is determined to action by such causes, as can be adequately understood by his unassisted nature, although by these causes he is necessarily determined to action. For liberty, as we showed above (Sec. 7), does not take away the necessity of acting, but supposes it.

第十一节　只要一个人的思想受到蒙骗，他就无法独立作出判

断。因此可见，只要能正确运用理性，思想就是独立的。不仅如此，在估算人的力量时，往往更多是按意志的坚定来衡量，较少按体格的健壮来衡量，所以那些推理最缜密的人和最受理性引导的人，是最充分掌握自己权利的人。因此，只要一个人受理性引导，我们就把这种人称为完全自由的人，因为，他行动的原因取决于他独立的本性，这些原因必定会促使他采取行动。其实，就像前面（本章第七节）所述，自由并没有剥夺行动的必然性，反而是行动的先决条件。

12 . The pledging of faith to any man, where one has but verbally promised to do this or that, which one might rightfully leave undone, or vice versa, remains so long valid as the will of him that gave his word remains unchanged. For he that has authority to break faith has, in fact, bated nothing of his own right, but only made a present of words. If, then, he, being by natural right judge in his own case,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rightly or wrongly (for “to err is human”), that more harm than profit will come of his promise, by the judgment of his own mind he decides that the promise should be broken, and by natural right (Sec. 9) he will break the same.

第十二节　如果一个人向他人口头承诺要做某事，却又可能最终不做这事，只要他承诺时的意志没有改变，他的诺言依旧有效。对有能力违背诺言的人来说，他的权利并没有减少，只是许了诺言而已。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中，如果他——根据自然权利他自己是自己的裁判官——得出或正确或错误的结论（因为判断失误是人之常情），即他的承诺将会得不偿失，于是根据他自己的判断他决定违背诺言，那么，他是依据自然权利背弃诺言（本章第九节）。

13 . If two come together and unite their strength, they have

jointly more power, and consequently more right over nature than both of them separately, and the more there are that have so joined in alliance, the more right they all collectively will possess.

第十三节　如果两个人把他们的力量结合起来，那么他们就有更大的力量，比起各自独立分开时，当然拥有更多对自然的权利。这样联合起来的人越多，他们共同拥有的权利就越多。

14 . In so far as men are tormented by anger, envy, or any passion implying hatred, they are drawn asunder and made contrary one to another, and therefore are so much the more to be feared, as they are more powerful, crafty, and cunning than the other animals. And because men are in the highest degree liable to these passions (Chap. 1, Sec. 5), therefore men are naturally enemies. For he is my greatest enemy, whom I must most fear and be on my guard against.

第十四节　只要人们受愤怒、嫉妒或者任何一种含有憎恨的情绪的折磨，他们便表现得涣散，互相对立。因为人比其他动物更有力量，更狡猾机灵，所以更加可怕。而且，因为人类最容易受这些情感（第一章第五节）左右，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互为敌人。某一方最害怕的人和最要提防的人，就是他最大的敌人。

15 . But inasmuch as (Sec. 9) in the state of nature each is so long independent, as he can guard against oppression by another, and it is in vain for one man alone to try and guard against all, it follows hence that so long as the natural right of man is determined by the power of every individual, and belongs to everyone, so long

it is a nonentity, existing in opinion rather than fact, as there is no assurance of making it good. And it is certain that the greater cause of fear every individual has, the less power, and consequently the less right, he possesses. To this must be added, that without mutual help men can hardly support life and cultivate the mind. And so our conclusion is, that that natural right, which is special to the human race, can hardly be conceived, except where men have general rights, and combine to defend the possession of the lands they inhabit and cultivate, to protect themselves, to repel all violence, and to live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judgment of all. For (Sec. 18) the more there are that combine together, the more right they collectively possess. And if this is why the schoolmen want to call man a sociable animal— I mean because me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can hardly be independent—I have nothing to say against them.

第十五节　但是，因为（本章第九节）自然状态下的每一个人只有在能够防止别人压迫的时候，才是处于他自己的权利之下，而仅仅依靠独自一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去防范所有人。因此，只要人的自然权利是由每个个体的力量决定并属于每一个人，这种权利就不存在；或者它只是存在于空想之中，无法确保它的实现。当然，每个个体感到恐惧的原因越多，他拥有的力量就越小，结果他的权利也就越少。还有一点，如果没有相互的帮助，人类几乎难以生存，发展才智。所以我们的结论是，除非人类拥有共同的法律，并联合起来保护他们居住和耕种的土地，保护自己，驱除暴力，并按照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生活，否则难以设想人类固有的自然权利会是什么。因为，他们越联合在一起，共同拥有的权利就越多（本章第十八节）。如果这是经院哲学家把人类称为社会性动物的理由，我的意思是自然状态下的人类难以处于自己的权利之下，那么，我无话可以反驳。

16 . Where men have general rights, and are all guided, as it

were, by one mind, it is certain (Sec. 13), that every individual has the less right the more the rest collectively exceed him in power; that is, he has, in fact, no right over nature but that which the common law allows him. But whatever he is ordered by the general consent, he is bound to execute, or may rightfully be compelled thereto (Sec. 4).

第十六节　如果人们拥有共同的法律并且合心同向，宛如受同一思想指导，当然（本章第十三节）其他人联合在一起超过个人的力量越多，每个个体的权利就越少。也就是说，除了普通法赋予他的权利，个体对自然事物不拥有权利。但是，无论公共协议命令他去做什么，他一定要执行，否则他人具有的权利可能会强迫他去完成（本章第四节）。

17 . This right,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power of a multitude, is generally called Dominion. And, speaking generally, he holds dominion, to whom are entrusted by common consent affairs of state—such as the laying down, interpretation, and abrogation of laws, the fortification of cities, deciding on war and peace, etc. But if this charge belongs to a council, composed of the general multitude, then the dominion is called a democracy; if the council be composed of certain chosen persons, then it is an aristocracy; and if, lastly, the care of affairs of state and, consequently, the dominion rest with one man, then it has the name of monarchy.

第十七节　这种由民众的力量所决定的权利通常称为统治权。一般来说，共同协议委托一个人管理国家事务，比如制定、解释和废除法律，城市的防御工事，决定战争与和平等，那么这个人就拥有统治

权。但是如果这种管理权属于由普通民众组成的委员会，则称之为民主政体；如果属于由某些选定的人组成的委员会，则称之为贵族政体；最后，如果国家事务的管理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权属于一个人，那么它就是君主政体。

18 . From what we have proved in this chapter, it becomes clear to us that, in the state of nature, wrong-doing is impossible; or, if anyone does wrong, it is to himself, not to another. For no one by the law of nature is bound to please another, unless he chooses, nor to hold anything to be good or evil, but what he himself, according to his own temperament, pronounces to be so; and, to speak generally, nothing is forbidden by the law of nature, except what is beyond everyone's power (Secs. 5 and 8). But wrongdoing is action, which cannot lawfully be committed. But if men by the ordinance of nature were bound to be led by reason, then all of necessity would be so led. For the ordinances of nature are the ordinances of God (Secs. 2, 3), which God has instituted by the liberty, whereby he exists, and they follow, therefore, from the necessity of the divine nature (Sec. 7), and, consequently, are eternal, and cannot be broken. But men are chiefly guided by appetite, without reason; yet for all this they do not disturb the course of nature, but follow it of necessity. And, therefore, a man ignorant and weak of mind, is no more bound by natural law to order his life wisely, than a sick man is bound to be sound of body.

第十八节　由本章的论证可以清楚看到，在自然状态下，不可能有“罪过”的概念；或者说，如果有人犯罪，那也对他自己犯罪，不是对他人犯罪。因为按照自然法则，除非出于自愿，否则没有一个人必须得去讨好他人。除非他愿意凭借自己的性情区别善恶，否则他没必要作出判断。而且，一般来说，除了超出每个人的力量范围之外的事

（本章第五节和第八节），自然法则不会禁止任何事情。但是，罪过是不被正当承认的行为。如果根据自然法则，人类行为必须受理性指导，那么所有的事物也应该如此，因为自然法则就是神的法则（本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神用他借以存在的自由建立了法则，因此，自然法则来自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本章第七节），因此它是永恒的、不可违背的。但是，人们主要是受非理性的欲望的引导。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扰乱自然的规律，而是必定要遵循规律。因此，自然法则不会要求一个无知的、意志薄弱的人必定要理性地安排他的生活，就像不会要求一个生病的人具备健康的身体一样。

19．Therefore wrong-doing cannot be conceived of, but under dominion—that is, where, by the general right of the whole dominion, it is decided what is good and what evil, and where no one does anything rightfully, save what he do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decree or consent (Sec. 16). For that, as we said in the last section, is wrong-doing, which cannot lawfully be committed, or is by law forbidden. But obedience is the constant will to execute that, which by law is good, and by the general decree ought to be done.

第十九节　因此，罪过只有在国家里面才会存在，也就是说，在国家里，要依据全国的共同法来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国家里，除了符合共同法令或公共协议的事，没有人有权做其他事情（本章第十六节）。如上一节所述，罪过是不被正当承认的、是法律禁止的事情。而服从则是一种恒常的意志力，用以实行法律认为是善的事情，而且是共同法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20．Yet we are accustomed to calling that also wrong, which is done against the sentence of sound reason, and to giving the name

of obedience to the constant will to moderate the appetite according to the dictate of reason: a manner of speech which I should quite approve, did human liberty consist in the licence of appetite, and slavery in the dominion of reason. But as human liberty is the greater, the more man can be guided by reason, and moderate his appetite, we cannot without great impropriety call a rational life obedience, and give the name of wrong-doing to that which is, in fact, a weakness of the mind, not a licence of the mind directed against itself, and for which a man may be called a slave, rather than free (Secs. 7 and 11).

第二十节　然而，我们习惯把违反健全理性的指导而做的事情称作“罪过”，习惯把按照理性的指令而节制欲望的恒常意志力称作“服从”。假如人类的自由就在于欲望的放纵，而人类的束缚就在于理性的支配，那么我也会赞成这种说法。但是，由于人类越是受理性指引并节制欲望，他们就越自由，所以我们不能不恰当地把理性的生活称为服从，并给薄弱的意志冠以罪过的名义。实际上，意志薄弱并不是放纵意志，否则这个人与其说是自由的，不如说是处于奴役状态（本章第七节和第十一节）。

21 . However, as reason teaches one to practise piety, and be of a calm and gentle spirit, which cannot be done save under dominion; and, further, as it is impossible for a multitude to be guided, as it were, by one mind, as under dominion is required, unless it has laws ordained according to the dictate of reason; men who are accustomed to living under dominion are not, therefore, using words so improperly, when they call that wrong-doing which is done against the sentence of reason, because the laws of the best dominion ought to be framed according to that dictate (Sec. 18). But, as for my saying (Sec. 18) that man in a state of nature, if he

does wrong at all, does it against himself, see, on this point, Chap. 4. Secs. 4, 5, where is shown, in what sense we can say, that he who holds dominion and possesses natural right, is bound by laws and can do wrong.

第二十一节　然而，理性教导人们奉行道义，保持平静温和的心境，而这只有在国家里才能做到。而且，民众不可能像国家要求的那样万众一心如同受同一思想引导，除非国家拥有按照理性的指令建立起来的法律。因此，当习惯生活在国家里的人把违背理性的行为称为罪过时，他们并没有用词不当；因为要治理好国家，其法律应该要根据理性的指令来制定（本章第十八节）。但是如我之前所述（本章第十八节），自然状态下的人，如果他犯罪，也是对自己犯罪，第四章的第四节和第五节将解释这一点，也会说明从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拥有统治权和自然权利的人要受法律的约束以及可能犯罪。

22 . As far as religion is concerned, it is further clear, that a man is most free and most obedient to himself when he most loves God, and worships him in sincerity. But so far as we regard, not the course of nature, which we do not understand, but the dictates of reason only, which respect religion, and likewise reflect that these dictates are revealed to us by God, speaking, as it were, within ourselves, or else were revealed to prophets as laws; so far, speaking in human fashion, we say that man obeys God when he worships him in sincerity, and, on the contrary, does wrong when he is led by blind desire.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we are subject to God's authority, as clay to that of the potter, who of the same lump makes some vessels unto honour, and others unto dishonour. [3_5] And thus man can, indeed, act contrarily to the decrees of God, as far as they have been written like laws in the minds of ourselves or the prophets, but against that

eternal decree of God, which is written in universal nature, and has regard to the course of nature as a whole, he can do nothing.

第二十二节　就宗教方面来说，则更加明白易懂。当一个人至爱上帝并诚心崇拜上帝时，他最自由，最能从心所欲。但是目前我们不讨论我们所不了解的自然秩序，而只考虑涉及宗教的理性的指令，同时把这些指令当作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或者是以法则的形式给先知们的启示；这样，以人类的方式来说，当一个人诚心崇拜上帝时，他就是遵从上帝；相反地，当他被盲目的欲望引导时，他就是犯罪。但同时我们要记住，我们受制于上帝的权力，就像黏土之于陶匠。陶匠能把同样的一团泥做成贵重的器皿，也能做成低廉的器皿 [4_5] 。因此，人类行事时可能会违反那已经铭记在我们或先知们心中的上帝的法令，但是如果违背那铭记于宇宙自然中关于整个自然规律的永恒的上帝的法令，则他将做不成任何事情。

23 . As, then, wrong-doing and obedience, in their strict sense, so also justice and injustice cannot be conceived of, except under dominion. For nature offers nothing that can be called this man's rather than another's; but under nature everything belongs to all—that is, they have authority to claim it for themselves. But under dominion, where it is by common law determined what belongs to this man, and what to that, he is called just who has a constant will to render to every man his own, but he unjust who strives, on the contrary, to make his own that which belongs to another.

第二十三节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犯罪与服从，公正与不公正，只有在国家里才能设想。因为没有一种自然界的东西是属于这个人而不属于那个人的，自然中所有的东西属于所有的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声称自然的东西是他的。但是，在国家里，有共同的法

律规定什么东西属于这个人，什么东西属于那个人。如果一个人具有恒常意志力，让每个人拥有他自己本该拥有的东西，则他被认为是公正的；但是，如果他企图把属于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那他就是不公正的。

24．But that praise and blame are emotions of joy and sadness, accompanied by an idea of human excellence or weakness as their cause, we have explained in our *Ethics* .

第二十四节　　但是，这种赞扬或指责只是一种快乐或难过的情感，与之相伴的是这种观点：人类的美德或缺点是产生这种情感的原因。我们在《伦理学》一书中论述过这一点。

[3_1].*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 Chap. xvi.

[3_2].*Ethics* , iv. 37, note 2.

[3_3].Ibid., ii. 48, 49, note.

[3_4].Virgil, *Ecl.* ii. 65.

[3_5].*Romans* ix. 21.

[4_1].见《神学政治论》第16章。

[4_2].《伦理学》第四部分，命题三十七，附释二。

[4_3].同上，第二部分，命题四十八、四十九，附释。

[4_4].维吉尔，《牧歌》ii，65。

[4_5].《新约·罗马人书》第9章第21节。

Chapter 3 Of the Right of Supreme Authorities

第三章　最高当权者的权利

1 . Under every dominion the state is said to be Civil; but the entire body subject to a dominion is called a Commonwealth, and the general business of the dominion, subject to the direction of him that holds it, has the name of Affairs of State. Next we call men Citizens, as far as they enjoy by the civil law all the advantages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Subjects, as far as they are bound to obey its ordinances or laws. Lastly, we have already said that, of the civil state, there are three kinds—democracy, aristocracy, and monarchy (Chap. 2. Sec. 17). Now, before I begin to treat of each kind separately, I will first deduce all the properties of the civil state in general. And of these, first of all comes to be considered the supreme right of the commonwealth, or the right of the supreme authorities.

第一节　每一种统治状态都称为国家状态；统治下的整个机构称为国家。由统治者掌管的公共事务称为国务。根据国家法律享有一切好处的人们称为公民；遵守法律法规的人们称为国民。最后，如前所述，国家状态有三种类型：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第二章第十七节）。在我逐一论述各种政体之前，我想先大致论述国家状态的一般属性，其中首先要讨论的是国家的最高权利，或者是最高当权者的权利。

2 . From Chap. 2. Sec. 15, it is clear that the right of the supreme authorities is nothing else than simple natural right,

limited, indeed, by the power, not of every individual, but of the multitude, which is guided, as it were, by one mind—that is, as each individual in the state of nature, so the body and mind of a dominion have as much right as they have power. And thus each single citizen or subject has the less right, the more the commonwealth exceeds him in power (Chap. 2. Sec. 16), and each citizen consequently does and has nothing, but what he may by the general decree of the commonwealth defend.

第二节　从第二章第十五节可以清楚地看到，最高当权者的权利仅仅是纯粹的自然权利。实际上，它是受宛如有同一思想指导的民众力量的制约，而不是受公民个人力量的制约。也就是说，像自然状态下的每个个体一样，国家的实体和思想具有与其力量一样大小的权利，因此，国家在力量方面超过每个单独的个体或国民越多，每个单独的个体或国民拥有的权利就越少（第二章第十六节）。由此可见，除了根据国家的共同法令捍卫自己的权利之外，每个公民做不了其他事情，也无法占有什么东西。

3．If the commonwealth grants to any man the right, and therewith the authority (for else it is but a gift of words, Chap. 2. Sec. 12), to live after his own mind, by that very act it abandons its own right, and transfers the same to him, to whom it has given such authority. But if it has given this authority to two or more, I mean authority to live each after his own mind, by that very act it has divided the dominion, and if, lastly, it has given this same authority to every citizen, it has thereby destroyed itself, and there remains no more a commonwealth, but everything returns to the state of nature; all of which is very manifest from what goes before. And thus it follows, that it can by no means be conceived, that every citizen should by the ordinance of the commonwealth live after his

own mind, and accordingly this natural right of being one's own judge ceases in the civil state. I say expressly “by the ordinance of the commonwealth,” for, if we weigh the matter aright, the natural right of every man does not cease in the civil state. For man, alike in the natural and in the civil state, acts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his own nature, and consults his own interest. Man, I say, in each state is led by fear or hope to do or leave undone this or that; but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tates is this, that in the civil state all fear the same things, and all have the same ground of security, and manner of life; and this certainly does not do away with the individual's faculty of judgment. For he that is minded to obey all the commonwealth's orders, whether through fear of its power or through love of quiet, certainly consults after his own heart his own safety and interest.

第三节　如果国家赋予任何一个人权利，从而让他具有能依其意愿生活的力量（否则，那不过是国家许诺而已，第二章第十二节），那么国家就是放弃自身的权利，把权利让给由它赋予这种力量的人。但是，如果国家把这种权利赋予两个人或更多的人，我说的是，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权利，那么它是在分割统治权。如果国家最终把同样的权利赋予每一个公民，那么它是自我毁灭，国家将不再存在，一切都重回到自然状态。从之前的论述可以明白地看到这个结果。所以，决不能设想让每个公民都能依据国家的法规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如果这样，那么每个人在国家状态之中能自己决断事物的自然权利就会不复存在。我特别强调“依据国家法规”这一点，是因为在国家状态中如果我们正确对待权利，每个人的自然权利才不会终结。因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和在国家状态里一样，都会照着自己的本性来行事，来考虑他自己的利益。在我看来，人类在每种状态之下，都会由于恐惧或希望的原因而行动或不行动。但是这两种状态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国家状态下，所有人害怕的事情一样，安全状态一样，生活方式一样。但是，这当然不会让个人的判断能力消失。因为，决心遵守

国家所有法规的人，不管是由于畏惧国家的力量还是出于对安宁生活的热爱，都会依照自己的本意去谋求自己的安全和利益。

4．Moreover, we cannot even conceive, that every citizen should be allowed to interpret the commonwealth's decrees or laws. For were every citizen allowed this, he would thereby be his own judge, because each would easily be able to give a colour of right to his own deeds, which by the last section is absurd.

第四节　而且，我们也不能设想允许每个公民解释国家的法令法规。如果允许了，每个人就会变成自己的法官，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正当的掩饰，袒护自己的行为。如上一节中所述，这是不合理的。

5．We see then, that every citizen depends not on himself, but on the commonwealth, all whose commands he is bound to execute, and has no right to decide, what is equitable or iniquitous, just or unjust. But, on the contrary, as the body of the dominion should, so to speak, be guided by one mind, and consequently the will of the commonwealth must be taken to be the will of all; what the state decides to be just and good must be held to be so decided by every individual. And so, however iniquitous the subject may think the commonwealth's decisions, he is none the less bound to execute them.

第五节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每个公民能依靠的不是自己，而是要求他去执行所有命令的国家。公民无权决断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但反之，由于国家的实体需要一个同一思想的指导，国家的意愿就应该被当作是全体公民的意愿，国

家认定是公正与善良的事，每个公民也应当如此认定。所以，不管国民认为国家的决策多么不公正，他依然必须执行这些决定。

6 . But (it may be objected) is it not contrary to the dictate of reason to subject one's self wholly to the judgment of another, and consequently, is not the civil state repugnant to reason? Whence it would follow, that the civil state is irrational, and could only be created by men destitute of reason, not at all by such as are led by it. But since reason teaches nothing contrary to nature, sound reason cannot therefore dictate, that every one should remain independent, so long as men are liable to passions (Chap. 2. Sec. 15), that is, reason pronounces against such independence (Chap. 1. Sec. 5). Besides, reason altogether teaches to seek peace, and peace cannot be maintained, unless the commonwealth's general laws be kept unbroken. And so, the more a man is guided by reason, that is (Chap. 2. Sec. 11), the more he is free, the more constantly he will keep the laws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execute the commands of the supreme authority, whose subject he is. Furthermore, the civil state is naturally ordained to remove general fear, and prevent general sufferings, and therefore pursues above everything the very end, after which everyone, who is led by reason, strives, but in the natural state strives vainly (Chap. 2. Sec. 15). Wherefore, if a man, who is led by reason, has sometimes to do by the commonwealth's order what he knows to be repugnant to reason, that harm is far compensated by the good, which he derives from the existence of a civil state. For it is reason's own law, to choose the less of two evils; and accordingly we may conclude, that no one is acting against the dictate of his own reason, so far as he does what by the law of the commonwealth is to be done. And this anyone will more easily grant us, after we have explained, how far the power and consequently the right of the commonwealth extends.

第六节　但是（可能有人会提出异议），让一个人的自我屈服于他人的判断，难道不是与理性的指令相对立吗？如此，国家状态难道不是违背理性吗？于是，有人会由此断定国家状态是非理性的，是由那些缺乏理性的人创立的，而不是由有理性的人创立的。但是，理性不会教人以违反自然的东西，只要人们会受各种情感左右（第二章第十五节），健全的理性就不能要求每个人保留自己的权利，也就是说，理性会认为不应该保留自己的权利（第一章第五节）。此外，理性总是教人寻求和平，但是，除非所有人都遵守国家的一般法律，否则和平不可能持续。所以，一个人越理性（第二章第十一节），他就越自由，越会以国民的身份坚定遵守国家法律并执行最高当权者的命令。再者，建立国家状态就是为了消除共同的恐惧，防止共同的不幸。所以，国家状态追求的目标，也是受理性指导的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是在自然状态下，这种努力是徒劳无功的（第二章第十五节）。因此，如果一个有理性的人有时不得不按照国家的命令去做一些违背理性的事情，国家状态的实际存在给他带来的好处足以弥补这个损失，因为理性的法则是两权相害取其轻。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只要一个人依据国家法律的要求行事，他就不会违背理性的指令。在我阐明国家权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及因之而成的国家权利的范围有多大之后，人们将更容易接受我的观点。

7．For, first of all, it must be considered, that, as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e man who is led by reason is most powerful and most independent, so too that commonwealth will be most powerful and most independent, which is founded and guided by reason. For the right of the commonwealth is determined by the power of the multitude, which is led, as it were, by one mind. But this unity of mind can in no wise be conceived, unless the commonwealth pursues chiefly the very end, which sound reason teaches is to the interest of all men.

第七节　对此，首先要考虑的是，正如自然状态下受理性指导的人最有力量、最充分掌握自己的权利一样，基于理性而建立并受理性指导的国家也将是最有力量、最充分掌握自己权利的。因为，国家的权利取决于宛若受同一思想指导的民众的力量。但是，除非国家努力追求的、由健全理性指导的目标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否则根本不可能设想这种思想的同一。

8 . In the second place it comes to be considered, that subjects are so far dependent not on themselves, but on the commonwealth, as they fear its power or threats, or as they love the civil state (Chap. 2. Sec. 10). Whence it follows, that such things, as no one can be induced to do by rewards or threats, do not fall within the rights of the commonwealth. For instance, by reason of his faculty of judgment, it is in no man's power to believe. For by what rewards or threats can a man be brought to believe, that the whole is not greater than its part, or that God does not exist, or that that is an infinite being, which he sees to be finite, or generally anything contrary to his sense or thought? So, too, by what rewards or threats can a man be brought to love one, whom he hates, or to hate one, whom he loves? And to this head must likewise be referred such things as are so abhorrent to human nature, that it regards them as actually worse than any evil, as that a man should be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or torture himself, or kill his parents, or not strive to avoid death, and the like, to which no one can be induced by rewards or threats. But if we still choose to say, that the commonwealth has the right or authority to order such things, we can conceive of it in no other sense, than that in which one might say, that a man has the right to be mad or delirious. For what but a delirious fancy would such a right be, as could bind no one? And here I am speaking expressly of such things as cannot be subject to the right of a commonwealth and are abhorrent to human nature in

general. For the fact, that a fool or madman can by no rewards or threats be induced to execute orders, or that this or that person, because he is attached to this or that religion, judges the laws of a dominion worse than any possible evil, in no wise makes void the laws of the commonwealth, since by them most of the citizens are restrained. And so, as those who are without fear or hope are so far independent (Chap. 2. Sec. 10), they are, therefore, enemies of the dominion (Chap. 2. Sec. 14), and may lawfully be coerced by force.

第八节　其次要考虑的是，国民只有在畏惧国家的力量或威胁的时候，或者是出于热爱这种国家状态的时候，才受制于国家，而不处于自身的权利之下（第二章第十节）。由此可见，那些通过奖赏或威胁都没人愿意去做的事情，都不在国家的权利范围之内。比如，由于人有自己判断力，所以不会轻易相信。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奖赏或威胁能使一个人相信整体没有部分大，相信上帝不存在，相信他看到的有限之物是无限存有，相信任何与他的感知或思想相反的东西？用什么样的奖赏或威胁能让一个人去爱他恨的人或者恨一个他爱的人？同样这还包括那些违背人性，比邪恶更恶的事情，比如，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明，折磨自己，杀害父母，或不设法躲避死亡等等这些通过威胁利诱都没有人去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一定要说国家有权利或权威去命令人们做这些事情，那就等于说一个人有胡作非为的权利，因为这种不能约束任何人的权利，除了是发疯或神经错乱的胡作非为，又会什么？这里我特别说明的是那些不属于国家权利范围且违背一般人性的事情。诚然，傻瓜或疯子不用奖赏或威胁就会被诱导去执行命令；或者，由于某人皈依某种宗教，他就认为国家的法律比任何邪恶更恶。但是，国家的法律不会因此失效，因为大多数的公民仍然是遵守法律的。因此，那些无所畏惧无所希望的人只是处于自身的权利之下（第二章第十节），他们是国家的敌人（第二章第十四节），国家有权强制管束他们。

9 . Thirdly and lastly, it comes to be considered, that those things are not so much within the commonwealth's right, which cause indignation in the majority. For it is certain, that by the guidance of nature men conspire together, either through common fear, or with the desire to avenge some common hurt; and as the right of the commonwealth is determined by the common power of the multitude, it is certain that the power and right of the commonwealth are so far diminished, as it gives occasion for many to conspire together. There are certainly some subjects of fear for a commonwealth, and as every separate citizen or in the state of nature every man, so a commonwealth is the less independent, the greater reason it has to fear. So much for the right of supreme authorities over subjects. Now before I treat of the right of the said authorities as against others, we had better resolve a question commonly mooted about religion.

第九节　最后，第三点要考虑的是，那些在多数民众中引起公愤的事情差不多都不在国家权利范围之内。为了应对共同的恐惧，或为了对共同的伤害进行报复，人的本性会促使他们共同谋划。由于民众的共同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力量，所以国家给越多的人机会去勾结谋划，国家的权利和力量自然就越发减弱。的确，国家也有一些畏惧的事情，像每个公民或自然状态下的每个人一样，国家感到畏惧的原因越多，它所掌握的自己的权利就越少。最高当权者对国民的权利也是如此。现在，在论述最高当权者对其他国家的权利之前，我们先解答一个经常被提出的、关于宗教的问题。

10 . For it may be objected to us, Do not the civil state, and the obedience of subjects, such as we have shown is required in the civil state, do away with religion, whereby we are bound to worship God? But if we consider the matter, as it really is, we shall find

nothing that can suggest a scruple. For the mind, so far as it makes use of reason, is dependent, not on the supreme authorities, but on itself (Chap. 2. Sec. 11). And so the true knowledge and the love of God cannot be subject to the dominion of any, nor yet can charity towards one's neighbour (Sec. 8). And if we further reflect, that the highest exercise of charity is that which aims at keeping peace and joining in unity, we shall not doubt that he does his duty, who helps everyone, so far as the commonwealth's laws, that is so far as unity and quiet allow. As for external rites, it is certain, that they can do no good or harm at all in respect of the true knowledge of God, and the love which necessarily results from it; and so they ought not to be held of such importance, that it should be thought worth while on their account to disturb public peace and quiet. Moreover it is certain, that I am not a champion of religion by the law of nature, that is (Chap. 2. Sec. 3), by the divine decree. For I have no authority, as once the disciples of Christ had, to cast out unclean spirits and work miracles; which authority is yet so necessary to the propagating of religion in places where it is forbidden, that without it one not only, as they say, wastes one's time [4_1] and trouble, but causes besides very many inconveniences, whereof all ages have seen most mournful examples. Everyone therefore, wherever he may be, can worship God with true religion, and mind his own business, which is the duty of a private man. But the care of propagating religion should be left to God, or the supreme authorities, upon whom alone falls the charge of affairs of state. But I return to my subject.

第十节　我们可能会遭到异议，国家状态以及我们之前所述的在国家状态下要求国民做到的服从，会不会废除掉我们借以崇拜上帝的宗教？如果认真考虑一下此事，我们就不必有这种顾虑。因为，只要思想能运用理性，它就不会受制于最高当权者，而是处于自己的权利

之下（第二章第十一节）。所以对上帝的真知和爱不会受制于任何人的支配，就像对邻居的宽容不会受制于任何人一样（本章第八节）。如果更进一步思考，爱的最高行为体现在维持和平和团结上，那么我们不应怀疑，如果一个人在国家法律范围内，也即团结安定所允许的范围内帮助每一个人，他就是在尽他的义务。至于外在的宗教仪式，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对神的真知，以及随之而生的对神的爱根本无益也无害。所以不必非常重视它们，以致扰乱公共的和平安宁。此外，可以肯定的是，我当然不是凭借自然法则，即神的法令（第二章第三节）而成为宗教的捍卫者，因为我不具有耶稣门徒曾经拥有的能够祛除邪魔和创造奇迹的能力。在宗教被禁止的地方宣传宗教，这种权力是如此重要，以致如果没有它，所有的努力都是浪费时间 [5_1] ，还会引起很多不幸。这类不幸的事例，各个年代都见证过。因此，不管在哪里，每个人都能真正虔诚地崇拜上帝并管好自己的事情，这是个人应尽的义务。至于宣传宗教的事，应当留给上帝或负责国家事务的最高当权者。现在，我得转回到我的主题上来。

11 . After explaining the right of supreme authorities over citizens and the duty of subjects, it remains to consider the right of such authorities against the world at large, which is now easily intelligible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For since (Sec. 2) the right of the supreme authorities is nothing else but simple natural right, it follows that two dominions stand towards each other in the same relation as do two me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with this exception, that a commonwealth can provide against being oppressed by another; which a ma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cannot do, seeing that he is overcome daily by sleep, often by disease or mental infirmity, and in the end by old age, and is besides liable to other inconveniences, from which a commonwealth can secure itself.

第十一节　　阐释完最高当权者对公民的权利以及国民的义务之

后，我还需详细说明最高当权者对外国的权利。根据前面所述，不难理解这一点。因为，既然最高当权者的权利仅仅是单纯的自然权利（本章第二节），那么在同一关系中两个相对立的国家，就像是在自然状态下的两个人一样。但不同的是，国家能够抵制他国的压迫，而自然状态下的人无法做到。因为，人每天不得不睡觉，常被疾病困扰，或者意志薄弱，最终会老态龙钟，遭受种种麻烦，而国家不会遭受这些困扰。

12．A commonwealth then is so far independent, as it can plan and provide against oppression by another (Chap. 2. Secs. 9,15), and so far dependent on another commonwealth, as it fears that other's power, or is hindered by it from executing its own wishes, or lastly, as it needs its help for its own preservation or increase (Chap. 2. Secs. 10,5). For we cannot at all doubt, that if two commonwealths are willing to offer each other mutual help, both together are more powerful, and therefore have more right, than either alone (Chap. 2. Sec. 13).

第十二节　因此，只要一个国家能策划方案并防备其他国家的压迫（第二章第九节和第十五节），它就是独立自主的；反之，只要一个国家畏惧他国的力量或因此而无法执行自己的意志，或最终为了保全和壮大自身而需要他国的帮助（第二章第十节和第十五节），这个国家就受制于他国之下。无疑，如果两个国家愿意互相提供援助，则比起其各自独立时，两者都会更加强大，从而拥有更多的权利（第二章第十三节）。

13．But this will be more clearly intelligible, if we reflect, that two commonwealths are naturally enemies. For me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re enemies (Chap. 2. Sec. 14). Those, then, who stand

outside a commonwealth, and retain their natural rights, continue enemies. Accordingly, if one commonwealth wishes to make war on another and employ extreme measures to make that other dependent on itself, it may lawfully make the attempt, since it needs but the bare will of the commonwealth for war to be waged. But concerning peace it can decide nothing, save with the concurrence of another commonwealth's will. Whence it follows, that laws of war regard every commonwealth by itself, but laws of peace regard not one, but at the least two commonwealths, which are therefore called “contracting powers.”

第十三节　　如果我们考虑到，任何两个国家天生就是互为敌人的，上述观点就更容易理解，因为自然状态下的人都是相互为敌的（第二章第十四节）。因此，那些不是处在一国之内的、保持着他们的自然权利的人，会一直相互为敌。所以，如果一个国家（A国）想对另一个国家（B国）开战，使用种种极端措施让另一个国家（B国）受制于自己，它（A国）就可以正当地采取行动，因为，只要它（A国）有作战的意愿，它就可以发动战争。但是对于和平，它（A国）无法确立和平，除非另外一个国家（B国）也希望和平。由此可见，每一个国家都有发动战争的权利，但确立和平的权利却不仅仅属于某一个国家，它需要至少两个国家来达成和平协议。所以，这些国家被称为“盟约国家”。

14．This “contract” remains so long unmoved as the motive for entering into it, that is, fear of hurt or hope of gain, subsists. But take away from either commonwealth this hope or fear, and it is left independent (Chap. 2. Sec. 10), and the link, whereby the commonwealths were mutually bound, breaks of itself. And therefore every commonwealth has the right to break its contract, whenever it chooses, and cannot be said to act treacherously or

perfidiously in breaking its word, as soon as the motive of hope or fear is removed. For every contracting party was on equal terms in this respect, that whichever could first free itself of fear should be independent, and make use of its independence after its own mind; and, besides, no one makes a contract respecting the future, but on the hypothesis of certain precedent circumstances. But when these circumstances change, the reason of policy applicable to the whole position changes with them; and therefore every one of the contracting commonwealths retains the right of consulting its own interest, and consequently endeavours, as far as possible, to be free from fear and thereby independent, and to prevent another from coming out of the contract with greater power. If then a commonwealth complains that it has been deceived, it cannot properly blame the bad faith of another contracting commonwealth, but only its own folly in having entrusted its own welfare to another party that was independent, and had for its highest law the welfare of its own dominion.

第十四节　只要各国加入盟约的动机存在，即恐惧自己受害或希望获取利益的动机存在，这种“盟约”就会保持不变。但是，如果盟约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不再有这种希望或恐惧，那么它就会不再受约束（第二章第十节），则约束盟约国的纽带就自行瓦解了。因此，任何时候，只要希望或恐惧这种动机不再存在，每个国家都有权打破约定。不能指责这个国家玩阴谋诡计或背信弃义，因为在这一个问题上，每个缔约国的做法都会是一样的。不管是哪个国家最先去摆脱恐惧，它都会脱离约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任何人都是依据当前的情况为前提而缔结事关将来的契约。当这些情况发生了变化，整个形势的安排策略也随之变化。因此每一个盟约国都保留着确保自己利益的权利。它们会尽可能摆脱恐惧并因此独立出来，并竭力防止脱离盟约国的其他国家变得更强大。所以，如果一个国家说它遭到欺骗，它也不能指责另一个盟约国背信弃义，只能怪它自己太愚蠢，把

本国的幸福安宁托付给拥有自身权利的他国，而后者的最高原则必定是寻求它自己的幸福安宁。

15 . To commonwealths, which have contracted a treaty of peace, it belongs to decide the questions, which may be mooted about the terms or rules of peace, whereby they have mutually bound themselves, inasmuch as laws of peace regard not one commonwealth, but the commonwealths which contract taken together (Sec. 18). But if they cannot agree together about the conditions, they by that very fact return to a state of war.

第十五节　对那些缔结了和平协议的国家，它们都有权解决关于结盟的和平条款方面的分歧，因为确立和平的权力并非只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属于所有的盟约国家（本章第十八节）。但是，如果这些国家无法就所有条件达成协议，它们会因此而恢复战争状态。

16 . The more commonwealths there are, that have contracted a joint treaty of peace, the less each of them by itself is an object of fear to the remainder, or the less it has the authority to make war. But it is so much the more bound to observe the conditions of peace; that is (Sec. 13), the less independent, and the more bound to accommodate itself to the general will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第十六节　越多国家一起缔结和平协议，各国对他国的威胁就越小，也就是各国对其他盟约国发动战争的能力就越小，它就越得受和平协议的约束。也就是说（本章第十三节），它越是不能处于自己的权利之下，就会越被约束从而让自己顺从盟约各国的共同意志。

17 . But the good faith, inculcated by sound reason and religion, is not hereby made void; for neither reason nor Scripture teaches one to keep one's word in every case. For if I have promised a man, for instance, to keep safe a sum of money he has secretly deposited with me, I am not bound to keep my word, from the time that I know or believe the deposit to have been stolen, but I shall act more rightly in endeavouring to restore it to its owners. So likewise, if the supreme authority has promised another to do something, which subsequently occasion or reason shows or seems to show is contrary to the welfare of its subjects, it is surely bound to break its word. As then Scripture only teaches us to keep our word in general, and leaves to every individual's judgment the special cases of exception, it teaches nothing repugnant to what we have just proved.

第十七节　但是，这样说并不是要废除健全理性和宗教所教导的信义，因为理性和《圣经》都没有规定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遵守诺言。比如，如果我向一个人承诺，要保证他秘密存放在我这里的一笔钱的安全，但是一旦我知道或相信这钱是偷盗而来的，我便不再有义务遵守诺言，而且，我还可以有更正确的做法，即设法把这笔钱归还给它的主人。同样，如果最高当权者向其他最高当权者做出某种承诺，但是，后来的情况和它的判断表明，或似乎表明这种承诺会损害其国民的利益，他当然得违背诺言。《圣经》只是一般性地教导我们要遵守诺言，但每个个体得自己去判断什么是例外的特殊情况。《圣经》所教导的与我们刚刚论证的并没有任何矛盾。

18 . But that I may not have so often to break the thread of my discourse, and to resolve hereafter similar objections, I would have it known that all this demonstration of mine proceeds from the necessity of human nature, considered in what light you will—I

mean, from the universal effort of all men after self-preservation, an effort inherent in all men, whether learned or unlearned. And therefore, however one considers men are led, whether by passion or by reason, it will be the same thing; for the demonstration, as we have said, is of universal application.

第十八节　为了今后我的论证思路不会如此经常地被打断而去解决类似的异议，我要在此说明白，我的一切论证都是根据人性的必然性——且不论人们从什么观点来看待——也就是每个人努力自我保护的普遍意愿。这种意愿，无论是博学者或无知者，都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不管人类受什么引导，受激情驱使也好，或者受理智指引也好，结论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所论证的这些内容，普世适用。

[4_1].Literally, "oil and trouble"—a common proverbial expression in Latin.

[5_1].字面意思即“石油与麻烦”，这是一句常用的拉丁谚语。

Chapter 4 Of the Functions of Supreme Authorities

第四章　最高当权者的职能

1．That the right of the supreme authorities is limited by their power, we showed in the last chapter, and saw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at right is, that they are, as it were, the mind of the dominion, whereby all ought to be guided; and accordingly, that such authorities alone have the right of deciding what is good, evil, equitable, or iniquitous, that is, what must be done or left undone by the subjects severally or collectively. And, accordingly, we saw that they have the sole right of laying down laws, and of interpreting the same, whenever their meaning is disputed, and of deciding whether a given case is in conformity with or violation of the law (Chap. 3. Secs. 3-5); and, lastly, of waging war, and of drawing up and offering propositions for peace, or of accepting such when offered (Chap. 3. Secs. 12, 13).

第一节　在上一章里，我们说明了最高当权者的权利受到他们权力的限制。这种权利最重要的部分是：它是指导一切的国家意志。所以，只有最高当权者才有权决定什么是善良的，什么是邪恶的，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也就是说，决定国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由此可见，他们有着唯一的制定并解释法律的权利。当有争议时，只有他们才有权解释法律，只有他们能裁决某个案件是合法的或是违法的（第三章第三、四、五节）。此外，只有他们才有权发动战争，起草及确定和平协议的条件，或接受对方提出的和平条件（第三章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

2．As all these functions, and also the means required to execute them, are matters which regard the whole body of the dominion, that is, are affairs of state, it follows, that affairs of state depend on the direction of him only, who holds supreme dominion. And hence it follows, that it is the right of the supreme authority alone to judge the deeds of every individual, and demand of him an account of the same; to punish criminals, and decide questions of law between citizens, or appoint jurists acquainted with the existing laws, to administer these matters on its behalf; and, further, to use and order all means to war and peace, as to found and fortify cities, levy soldiers, assign military posts, and order what it would have done, and, with a view to peace, to send and give audience to ambassadors; and, finally, to levy the costs of all this.

第二节　所有这些职能，以及用来执行这些职能所需的手段，都是与整个国家有关的事，即国家的事务。因此，国家事务的管理完全只取决于最高当权者。因此，只有最高当权者才有权评判每个人的行为，并要求每个人报告其行为；惩罚罪犯，决断公民间的法律纠纷；任命熟悉现行法律的人为法官代表他处理上述事务；就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采用各种方法，比如建设城市并予以设防，征募军队，任命军职，颁布有关命令；基于和平的考虑派驻大使，接见大使；最后，还要为所有这些事情的开支征收费用。

3．Since, then, it is the right of the supreme authority alone to handle public matters, or choose officials to do so, it follows, that that subject is a pretender to the dominion, who, without the supreme council's knowledge, enters upon any public matter, although he believe that his design will be to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ommonwealth.

第三节　因此，既然只有最高当权者才有权利处理公众事务，或选任官员处理事务，那么，如果国民在最高当局不知情的情况下着手处理公众事务，即使他认为他的计划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他也是觊觎国家统治权的人。

4 . But it is often asked, whether the supreme authority is bound by laws, and, consequently, whether it can do wrong. Now as the words “law” and “wrong-doing” often refer not merely to the laws of a commonwealth, but also to the general rules which concern all natural things, and especially to the general rules of reason, we cannot, without qualification, say that the commonwealth is bound by no laws, or can do no wrong. For were the commonwealth bound by no laws or rules, which removed, the commonwealth were no commonwealth, we should have to regard it not as a natural thing, but as a chimera. A commonwealth then does wrong, when it does, or suffers to be done, things which may be the cause of its own ruin; and we can say that it then does wrong, in the sense in which philosophers or doctors say that nature does wrong; and in this sense we can say, that a commonwealth does wrong, when it acts against the dictate of reason. For a commonwealth is most independent when it acts according to the dictate of reason (Chap. 3. Sec. 7); so far, then, as it acts against reason, it fails itself, or does wrong. And we shall be able more easily to understand this if we reflect, that when we say, that a man can do what he will with his own, this authority must be limited not only by the power of the agent, but by the capacity of the object. If, for instance, I say that I can rightfully do what I will with this table, I do not certainly mean, that I have the right to make it eat grass. So, too, though we say, that men depend not on themselves, but on the commonwealth, we do not mean, that men lose their human nature and put on another; nor yet that the

commonwealth has the right to make men wish for this or that, or (what is just as impossible) regard with honour things which excite ridicule or disgust. But it is implied, that there are certain intervening circumstances, which supposed, one likewise supposes the reverence and fear of the subjects towards the commonwealth, and which abstracted, one makes abstraction likewise of that fear and reverence, and therewith of the commonwealth itself. The commonwealth, then, to maintain its independence, is bound to preserve the causes of fear and reverence, otherwise it ceases to be a commonwealth. For the person or persons that hold dominion, can no more combine with the keeping up of majesty the running with harlots drunk or naked about the streets, or the performances of a stage-player, or the open violation or contempt of laws passed by themselves, than they can combine existence with non-existence. But to proceed to slay and rob subjects, ravish maidens, and the like, turns fear into indignation and the civil state into a state of enmity.

第四节　然而，经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是，最高当权者是否受法律约束，以及是否会犯有罪过。由于“律法”和“罪过”这两个词，不仅仅是指国家的法律，也指涉及所有自然事物的普遍法则，尤其是指理性的共同法则，因此，我们不能不加限制地说，国家不受法律约束，或者说国家不会犯有罪过。因为，如果没有法律规则约束国家，那国家就不成为国家，我们就不会把国家当作是一种自然事物，而当作是凭空幻想出来的事物。所以，如果一个国家自己去做，或让别人去做可能会引起国家毁灭的事，国家就是犯了罪过。我们说它犯了罪过，指的是类似哲学家或医学家所说的自然界犯了罪过。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一个国家违背理性的指令行事时，它就犯了罪过。因为一个国家在按照理性的指令行事时，是最充分掌握自己权利的（第三章第七节），因此，只要它违背理性行事，它就是违背了自己本性，或者说是犯了罪过。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以下的事情，可能会更容易理

解这个道理：当我们说一个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他能做的事情时，这种权利不仅受到行事者能力的限制，也必定受到行事目标的能力的限制。比如，如果我说我有权任意处置这张桌子，我当然不是说我有权让它吃草。所以，尽管我们说，人们不是处于自己的权利之下，而是处于国家的权利之下，并不是说人们失去他们的本性而代之以另一种本性，也不是说国家有权利让人们盼望这个或那个，或者（同样不可能的事）让人们把那些他们本身讥讽或厌恶的事情当成一种荣耀。但是，确实需要一些条件，促使国民对国家有敬畏之心；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敬畏之心乃至国家本身都将不会存在。因此，国家若要掌握自己的权利，必定要保持能引起人们对其敬畏的条件，否则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但是，对拥有最高统治权的人来说，不可能一方面保持着统治者的威严，一方面醉酒狎妓，登台演出，公开触犯和藐视自己颁布的法律。这就像存在的同时又不存在一样不可能。而且，杀害并掠夺国民，强暴妇女等类似行为会把畏惧转化为愤怒，从而把国家状态变成一个充满敌意与仇恨的状态。

5．We see, then, in what sense we may say, that a commonwealth is bound by laws and can do wrong. But if by “law” we understand civil law, and by “wrong” that which, by civil law, is forbidden to be done, that is, if these words be taken in their proper sense, we cannot at all say, that a commonwealth is bound by laws, or can do wrong. For the maxims and motives of fear and reverence, which a commonwealth is bound to observe in its own interest, pertain not to civil jurisprudence, but to the law of nature, since (Sec. 4) they cannot be vindicated by the civil law, but by the law of war. And a commonwealth is bound by them in no other sense than that in which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 man is bound to take heed, that he preserve his independence and be not his own enemy, lest he should destroy himself; and in this taking heed lies not the subjection, but the liberty of human nature. But civil jurisprudence depends on the mere decree of the commonwealth,

which is not bound to please any but itself, nor to hold anything to be good or bad, but what it judges to be such for itself. And, accordingly, it has not merely the right to avenge itself, or to lay down and interpret laws, but also to abolish the same, and to pardon any guilty person out of the fullness of its power.

第五节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受法律约束和可能犯罪过指的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法律”理解成国法，把“罪过”理解成国法所禁止做的事，即按照其本意来理解这些词语，则我们根本就不能说，国家受法律约束或可能犯罪过。因为，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必定会遵循的准则和让人对其产生敬畏的动机，都不属于国法的范围，而是属于自然法则，因为（本章第四节）能维护上述准则和动机的实施的是战争法则而不是国法。一个国家接受它们约束的理由，就像是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行事理由一样：为了掌握自己的权利和不成为自己的敌人，必须留意听从，以免毁了自己。这种留意听从并不是服从，而恰好是人性自由的体现。但是，另一方面，国法完全取决于国家的决定。国家不必受制于除其自身之外的任何其他法令，也不必去判定任何事情的善恶，除了对自己而言的善恶之外。所以，国家不但有权为自己雪耻，或制定法律和解释法律，也有权废除法律，并利用自己至上的权力赦免任何有罪之人。

6．Contracts or laws, whereby the multitude transfers its right to one council or man, should without doubt be broken, when it is expedient for the general welfare to do so. But to decide this point, whether, that is, it be expedient for the general welfare to break them or not, is within the right of no private person, but of him only who holds dominion (Sec. 3); therefore of these laws he who holds dominion remains sole interpreter. Moreover, no private person can by right vindicate these laws, and so they do not really bind him who holds dominion. Notwithstanding, if they are of such

a nature that they cannot be broken,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weakening the commonwealth's strength, that is,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changing to indignation the common fear of most of the citizens, by this very fact the commonwealth is dissolved, and the contract comes to an end; and therefore such contract is vindicated not by the civil law, but by the law of war. And so he who holds dominion is not bound to observe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by any other cause than that, which bids a ma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o beware of being his own enemy, lest he should destroy himself, as we said in the last section.

第六节　对于民众藉以将其权利交于一个议事会或一个人的契约或法律，如果予以废除有利于公共利益，无疑应当予以废除。但是，要判断这一点，即废除契约或法律是否对公共利益有利的问题，不在任何个人的权利范围之内，只在那个拥有最高统治权的人身上（本章第三节）。所以，对于这些法律，最高当权者总是唯一的解释者。因为没有人拥有辩解法律的权利，所以那些法律并不能真正约束最高当权者。尽管如此，如果这些法律的性质是这样的，即破坏法律会削弱国家的力量，并使大多数公民的共同畏惧转化为愤怒，那么破坏法律就会造成国家瓦解、契约终止。所以，这种契约的实施靠的不是政治权利，而是战争法则。因此，最高当权者必须遵循契约的条款，其理由正如上一节所说的那样：他和自然状态中的人一样，必须要留意听从，不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以免毁了自己。

Chapter 5 Of the Best State of a Dominion

第五章　国家的最佳状态

1 . In Chap. 2. Sec. 2, we showed, that man is then most independent, when he is most led by reason, and, in consequence (Chap. 3. Sec. 7), that that commonwealth is most powerful and most independent, which is founded and guided by reason. But, as the best plan of living, so as to assure to the utmost self-preservation, is that which is framed according to the dictate of reason, therefore it follows, that that in every kind is best done, which a man or commonwealth does, so far as he or it is in the highest degree independent. For it is one thing to till a field by right, and another to till it in the best way. One thing, I say, to defend or preserve one's self, and to pass judgment by right, and another to defend or preserve one's self in the best way, and to pass the best judgment; and, consequently, it is one thing to have dominion and care of affairs of state by right, and another to exercise dominion and direct affairs of state in the best way. And so, as we have treated of the right of every commonwealth in general, it is time to treat of the best state of every dominion.

第一节　我们曾在第二章第二节里阐述过，当一个人最受理性引导时，他最充分掌握自己的权利，因此（第三章第七节），一个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并受理性引导的国家最有力量且最充分掌握自己的权利。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是依据理性的安排来生活，因此，只要一个人或国家处于最充分掌握自己权利的状态时，总是用最好的办法行事。因为，有权利耕种土地是一回事，把土地耕种好是另一回事。有权利捍卫自己和保护自己并作出自己的判断是一回

事，但把这些事做到最好是另一回事。同样，拥有统治权和有权治理国家事务是一回事，以最好的方式行使统治权和治理国家事务又是另一回事。至此，我们已经大体论述了各个国家的权利，接下来要论述国家的最佳状态。

2．Now the quality of the state of any dominion is easily perceived from the end of the civil state, which end is nothing else but peace and security of life. And therefore that dominion is the best, where men pass their lives in unity, and the laws are kept unbroken. For it is certain, that seditions, wars, and contempt or breach of the laws are not so much to be imputed to the wickedness of the subjects, as to the bad state of a dominion. For men are not born fit for citizenship, but must be made so. Besides, men's natural passions are everywhere the same; and if wickedness more prevails, and more offences are committed in one commonwealth than in another, it is certain that the former has not enough pursued the end of unity, nor framed its laws with sufficient forethought; and that, therefore, it has failed in making quite good its right as a commonwealth. For a civil state, which has not done away with the causes of seditions, where war is a perpetual object of fear, and where, lastly, the laws are often broken, differs but little from the mere state of nature, in which everyone lives after his own mind at the great risk of his life.

第二节　从国家状态的目的很容易可以看出国家状态的品质。国家状态的真正目的不外乎追求和平安全的生活。因此，如果人们能一生都生活在和睦的、治安良好的国家当中，则这个国家就是最好的。显然，与其说暴乱、战争、藐视法律或违反法律的原因是因为民性邪恶，不如说是由于国家治理不善引起的。人不是天生就是好公民，他是被造就为公民的。此外，在任何地方，人的自然情感都是一样的。

如果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的邪恶更盛行，犯罪更普遍，必定是因为那个国家没有以谋求和平为目的，制定法律时也不够深思远虑，因此它没有很好行使它作为国家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消除引起暴乱的原因，战争永远是国民害怕的主题，法律总遭践踏，那么这种国家状态与自然状态相差无几，因为，自然状态下的人都是随其本性生活，生命安全没有保障。

3 . But as the vices and inordinate licence and contumacy of subjects must be imputed to the commonwealth, so,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virtue and constant obedience to the laws are to be ascribed in the main to the virtue and perfect right of the commonwealth, as is clear from Chap. 2. Sec. 15. And so it is deservedly reckoned to Hannibal as an extraordinary virtue, that in his army there never arose a sedition. [6_1]

第三节　正如国民的邪恶、肆意妄行和藐视法律必定是由于国家的原因引起的，反之，国民的美德以及守法之风也主要归因于国家的德政和完善的权利，这一点从本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可以清楚看出。这是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汉尼拔拥有非凡品质的原因，因为在他的军队里从来没有发生过暴乱 [7_1] 。

4 . Of a commonwealth, whose subjects are but hindered by terror from taking arms, it should rather be said, that it is free from war, than that it has peace. For peace is not mere absence of war, but is a virtue that springs from force of character: for obedience (Chap. 2. Sec. 19) is the constant will to execute what, by the general decree of the commonwealth, ought to be done. Besides that commonwealth, whose peace depends on the sluggishness of its subjects, that are led about like sheep, to learn but slavery, may

more properly be called a desert than a commonwealth.

第四节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由于恐惧而不敢反抗，那么，与其说这个国家享有和平，不如说它不过是没有战争而已。因为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它也是一种源自人格力量的美德，因为服从（第二章第十九节）是依照国家一般法令的要求行事的恒常意志力。此外，如果一个国家的和平依赖于其国民的惰怠，国民像绵羊一样受人领导，只会被奴役，那么这个国家更适合成为沙漠，而不是国家。

5 . When, then, we call that dominion best, where men pass their lives in unity, I understand a human life, defined not by mer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and other qualities common to all animals, but above all by reason, the true excellence and life of the mind.

第五节　因此，当我们把能让人们团结和睦地生活在其中的国家称为最好的国家时，我指的是一种人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仅仅是指单纯的血液循环和所有动物共有的其他特征，最重要的是理性、真正的心智上的优越性以及（相应的）精神生活。

6 . But be it remarked that, by the dominion which I have said is established for this end, I intend that which has been established by a free multitude, not that which is acquired over a multitude by right of war. For a free multitude is guided more by hope than fear; a conquered one, more by fear than hope: inasmuch as the former aims at making use of life, the latter but at escaping death. The former, I say, aims at living for its own ends, the latter is forced to belong to the conqueror; and so we say that this is enslaved, but that free. And, therefore, the end of a dominion, which one gets by

right of war, is to be master, and have rather slaves than subjects. And although between the dominion created by a free multitude, and that gained by right of war, if we regard generally the right of each, we can make no essential distinction; yet their ends, as we have already shown, and further the means to the preservation of each are very different.

第六节　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我所说的为了和睦生活的目的而建立的国家，是指它应该是由自由的民众建立的国家，而不是通过战争征服民众而创建的国家。因为自由的民众更多是受希望的引导，而不是受恐惧的引导；而被征服的民众更多是受恐惧而不是希望的引导；前者的目标是改善生活，而后者的目标是力图避免死亡。也可以说，前者是为自己的目标而生活，后者是被迫服从征服者。所以我们说，后者是被奴役的，前者是自由的。由此可见，通过战争得到的统治，其目的是成为统治者，它拥有的是奴隶而不是国民。如果我们从大体上考虑两者的权利，我们看不出由自由民众建立的国家和通过战争获得的国家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如我们刚才所述，它们的目的以及随后采取的维持统治的手段却大不相同。

7 . But what means a prince, whose sole motive is lust of mastery, should use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his dominion, the most ingenious Machiavelli has set forth at large, [6_2] but with what design one can hardly be sure. If, however, he had some good design, as one should believe of a learned man, it seems to have been to show, with how little foresight many attempt to remove a tyrant, though thereby the causes which make the prince a tyrant can in no wise be removed, but, on the contrary, are so much the more established, as the prince is given more cause to fear, which happens when the multitude has made an example of its prince, and glories in the parricide as in a thing well done. Moreover, he

perhaps wished to show how cautious a free multitude should be of entrusting its welfare absolutely to one man, who, unless in his vanity he thinks he can please everybody, must be in daily fear of plots, and so is forced to look chiefly after his own interest, and, as for the multitude, rather to plot against it than consult its good. And I am the more led to this opinion concerning that most far-seeing man, because it is known that he was favourable to libert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which he has besides given the most wholesome advice.

第七节　对于一个唯一动机就是渴望拥有统治权的君主来说，该用什么方法去建立和维持他的统治，最具独创性的马基雅维里对此已有详细的论述 [7_2] 。不过，人们无法确定他的意图。如果他的意图是善良的，就像人们可以相信一切贤哲那样，那么他似乎是要证明，在没有消除暴政原因的情况下，想推翻暴君的做法是多么的没有远见；但反之，引起君主害怕的理由越多，君主变成暴君的理由也越多。如果民众以君主为例，把弑杀尊长当作一件荣耀的行为，情况就会如此。此外，马基雅维里也许要说明，自由的民众把自己的福祉完全托付给一个人时要有多么谨慎。除非这个人自负到自以为他能取悦天下的每一个人，否则他肯定每天都在害怕别人的阴谋中度过，因而他不得不寻求他自己的利益，宁可暗算民众也不考虑他们的利益。考虑到马基雅维里卓有远见，且赞成自由，为维护自由提出过非常有益的建议，所以这样解释他的思想，我认为更可信。

[6_1].Justin, *Histories* , xxxii. iv. 12.

[6_2].In his book called "Il Principe," or "The Prince."

[7_1].尤斯蒂努斯，《历史》xxxii. iv. 12。

[7_2].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Chapter 6 Of Monarchy

第六章　关于君主政体

1 . Inasmuch as men are led, as we have said, more by passion than reason, it follows, that a multitude comes together, and wishes to be guided, as it were, by one mind, not at the suggestion of reason, but of some common passion—that is (Chap. 3. Sec. 9), common hope, or fear, or the desire of avenging some common hurt. But since fear of solitude exists in all men, because no one in solitude is strong enough to defend himself, and procure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it follows that men naturally aspire to the civil state; nor can it happen that men should ever utterly dissolve it.

第一节　前面我们说过，由于人们更多时候是受激情而非理性的引导，所以，如果民众团结一心，宛若受同一思想指挥，并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共同的情感，即共同的希望、共同的恐惧或为共同的伤害进行报复的愿望（第三章第九节）。任何人都害怕孤立，因为一个孤立的人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无法获得生活必需品，所以人们自然而然会需求国家状态，也永远不会完全消除国家状态。

2 . Accordingly, from the quarrels and seditions which are often stirred up in a commonwealth, it never results that the citizens dissolve it, as often happens in the case of other associations; but only that they change its form into some other—that is, of course, if the disputes cannot be settled,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commonwealth at the same time preserved. Wherefore, by means necessary to preserve a dominion, I intend such things as are

necessary to preserve the existing form of the dominion, without any notable change.

第二节　因此，就算一个国家常有争端和叛乱，公民也永远不会解散国家，而对于其他的团体，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如果在现有的国家形式下，争端无法解决，公民也只是改变现有的国家形式，保留国家的特性。这里说到的保留国家所需要的各种手段，指的是在没有发生任何显著改变的情况下，为维持现存的统治形式所必需的手段。

3 . But if human nature were so constituted, that men most desired what is most useful, no art would be needed to produce unity and confidence. But, as it is admittedly far otherwise with human nature, a dominion must of necessity be so ordered, that all, governing and governed alike, whether they will or no, shall do what makes for the general welfare; that is, that all, whether of their own impulse, or by force or necessity, shall be compelled to live according to the dictate of reason. And this is the case, if the affairs of the dominion be so managed, that nothing which affects the general welfare is entirely entrusted to the good faith of any one. For no man is so watchful, that he never falls asleep; and no man ever had a character so vigorous and honest, but he sometimes, and that just when strength of character was most wanted, was diverted from his purpose and let himself be overcome. And it is surely folly to require of another what one can never obtain from one's self; I mean, that he should be more watchful for another's interest than his own, that he should be free from avarice, envy, and ambition, and so on; especially when he is one, who is subject daily to the strongest temptations of every passion.

第三节　但是，假如人类的天性最渴望那些最有用的东西，那么就不需要各种方法来保持和谐与信任。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人的本性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必须要良好地治理国家，以至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管愿意与否，都应该做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事；也就是说，所有人，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于压力或必要，都必须依据理性的指令生活。如果要达到这种状态，治理国家时就不能把有关公共利益的事情完全托付在任何个人的信义上。因为没有一个人会警醒到永不懈怠，没有一个人会永远诚实，精力充沛。在最需要意志力的时候，他有时也会因意志薄弱而被击败。因此，要求别人去做自己永远做不到的事是愚蠢的，我指的是，要求别人不顾自己利益只考虑他人利益，要求别人不贪婪、不嫉妒、不能有野心等。尤其是对于那些每天都生活在各种激情诱惑中的人，更是难以做到。

4．But, on the other hand, experience is thought to teach, that it makes for peace and concord, to confer the whole authority upon one man. For no dominion has stood so long without any notable change, as that of the Turk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ere none so little lasting, as those, which were popular or democratic, nor any in which so many seditions arose. Yet if slavery, barbarism, and desolation are to be called peace, men can have no worse misfortune. No doubt there are usually more and sharper quarrel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than between masters and slaves; yet it advances not the art of housekeeping, to change a father's right into a right of property, and count children but as slaves. Slavery then, not peace, is furthered by handing over to one man the whole authority. For peace, as we said before, consists not in mere absence of war, but in a union or agreement of minds.

第四节　但另一方面，经验似乎表明，把所有的权力赋予一个人，反而会带来和平与和谐。没有一个国家像土耳其一样统治持久而

无显著变化；反之，也没有什么国家像人民的或民主的国家那样统治短暂叛乱频发。然而，如果奴役、野蛮和荒芜都能被称为和平，那么，这将是人类遭受的最不幸的事。无疑，比起主人和奴隶，父母和孩子之间经常有更多更激烈的争吵，但是，如果把父亲变成主人，把孩子当作奴隶，也无助于提升家庭生活。所以，如果把所有权力赋予一个人，只会促进奴役，而不是和平。因为如我们前面所述，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而是人思想上的和谐一致。

5 . And in fact they are much mistaken, who suppose that one man can by himself hold the supreme right of a commonwealth. For the only limit of right, as we showed (Chap. 2), is power. But the power of one man is very inadequate to support so great a load. And hence it arises, that the man, whom the multitude has chosen king, looks out for himself generals, or counsellors, or friends, to whom he entrusts his own and the common welfare; so that the dominion, which is thought to be a perfect monarchy, is in actual working an aristocracy, not, indeed, an open but a hidden one, and therefore the worst of all. Besides which, a king, who is a boy, or ill, or overcome by age, is but king on sufferance; and those in this case have the supreme authority, who administer the highest business of the dominion, or are near the king's person; not to mention, that a lascivious king often manages everything at the caprice of this or that mistress or minion. “I had heard,” says Orsini, “that women once reigned in Asia, but for a eunuch to reign is something new.“ [7_1]

第五节　事实上，认为一个人完全依靠自己就能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利，是错误的看法。因为，如前文所述（第二章），权利只取决于力量，而一个人的力量远不足以承起这个重担，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民众推选出来的君主，还要为自己挑选将领，或顾问官，或密

友，把自己的或公共的事务委托给他们。所以，完全实行君主政体的国家，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不公开的、隐蔽的贵族政体，因此是最坏的政体。此外，如果君主是幼童，或是患病，或是年老，那他就只是名义上的君主。这种情况下，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的重臣或君主的亲信就拥有至高的权力。至于那些沉迷于声色的君主，往往肆意迎合姬妾或宠臣的私欲，就更是名义上的君主。奥尔西尼说："我听说在亚洲曾经有女人当政，但宦官专权却是初次听说。"[8_1]

6 . It is also certain, that a commonwealth is always in greater danger from its citizens than from its enemies; for the good are few. Whence it follows, that he, upon whom the whole right of the dominion has been conferred, will always be more afraid of citizens than of enemies, and therefore will look to his own safety, and not try to consult his subjects' interests, but to plot against them, especially against those who are renowned for learning, or have influence through wealth.

第六节　此外，公民对国家构成的危险，往往比敌人对国家构成的危险更大，因为好的公民只占少数。因此，被赋予国家全部统治权的人对其公民的畏惧往往超过对敌人的畏惧。因此他总是小心提防自己的安全，不会尽力去考虑国民的利益，反而会暗算他们，尤其是有名的博学之士和财势雄厚的人。

7 . It must besides be added, that kings fear their sons also more than they love them, and so much the more as the latter are skilled in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and endeared to the subjects by their virtues. Whence it comes, that kings try so to educate their sons, that they may have no reason to fear them. Wherein ministers very readily obey the king, and will be at the utmost pains, that the

successor may be an inexperienced king, whom they can hold tightly in hand.

第七节　另外要加以说明的是，君主害怕自己的儿子胜过疼爱自己的儿子。君主的儿子越是擅长军事与和平之事务，越是因自己的美德受国民爱戴，君主越害怕他们。因此，君主会尽力教育他们的儿子，以便防患于未然。在这点上，大臣也乐于奉从君主，尽力设法让继承者疏于经验，以便他们牢牢掌控。

8．From all which it follows, that the more absolutely the commonwealth's right is transferred to the king, the less independent he is, and the more unhappy is the condition of his subjects. And so, that a monarchical dominion may be duly established, it is necessary to lay solid foundations, to build it on; from which may result to the monarch safety, and to the multitude peace; and, therefore, to lay them in such a way, that the monarch may then be most independent, when he most consults the multitude's welfare. But I will first briefly state, what these foundations of a monarchical dominion are, and afterwards prove them in order.

第八节　以上种种表明，一个国家的权利越是完全集中在君主身上，君主就越没有自己的权利，国民的情况就越不幸。因此，为建立一个恰当的君主政权，必须制定一些牢固的基本原则以作为君主政权的建立基础，如此才能确保君主的安全，民众的和平，从而使君主在最充分地为民众的利益考虑时，能最充分地享受他自己的权利。接下来，我将首先简要陈述君主政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然后再逐一论证。

9 . One or more cities must be founded and fortified, whose citizens, whether they live within the walls, or outside for purposes of agriculture, are all to enjoy the same right in the commonwealth; yet on this condition, that every city provide an ascertained number of citizens for its own and the general defence. But a city, which cannot supply this, must be held in subjection on other terms.

第九节　必须建立一个或多个城市并加以设防。全体城市公民，无论是在城里生活或是在城外从事农业生产，同样享有国家的权利。不过，每个城市都要有一定数量的公民来防卫本城及整个国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城市，国家也应该依据一些其他的条件掌管它。

10 . The militia must be formed out of citizens alone, none being exempt, and of no others. And, therefore, all are to be bound to have arms, and no one to be admitted into the number of the citizens, till he has learnt his drill, and promised to practise it at stated times in the year. Next, the militia of each clan is to be divided into battalions and regiments, and no captain of a battalion chosen, that is not acquainted with military engineering. Moreover, though the commanders of battalions and regiments are to be chosen for life, yet the commander of the militia of a whole clan is to be chosen only in time of war, to hold command for a year at most, without power of being continued or afterwards re-appointed. And these last are to be selected out of the king's counsellors, of whom we shall speak in the fifteenth and following sections, or out of those who have filled the post of counsellor.

第十节　国民军必须只能由公民组成，其他人不得参加，而且不得豁免任何公民服兵役。所有公民必须持有武器。而且，只有经过军

事训练并承诺在一年中规定的时间内服兵役的人才能登记为公民。其次，每个氏族的国民军分为营和团，只有熟悉军事工程的人才能被选为军营首领。此外，军营和军团的指挥官实行终身制，但是指挥氏族全部国民军的指挥官只在战争期间选任，掌管军队时间最多一年，不能续任或以后再次选任。而且后面这些指挥官必须从君主的顾问官中选任，或者从曾任顾问官的人员中选任。在本章第十五节及其下文中我们将谈到顾问官。

11 . The townsmen and countrymen of every city, that is, the whole of the citizens, are to be divided into clans, distinguished by some name and badge, and all persons born of any of these clans are to be received into the number of citizens, and their names inscribed on the roll of their clan, as soon as they have reached the age, when they can carry arms and know their duty;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who are infamous from some crime, or dumb, or mad, or menials supporting life by some servile office.

第十一节　　每个城市的市民和农民，即全体公民，应该分成氏族，并用名称和徽章把各氏族区别开来。所有出生在各氏族里的人都应计入公民人数，等他们达到能手执武器并懂得尽义务的年龄，就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入自己所属的氏族公民名册。但是，那些因犯罪而声名狼藉的人、哑巴、疯子，或者从事奴役性工作的奴仆除外。

12 . The fields, and the whole soil, and, if it can be managed, the houses should be public property, that is, the property of him, who holds the right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let him let them at a yearly rent to the citizens, whether townsmen or countrymen, and with this exception let them all be free or exempt from every kind of taxation in time of peace. And of this rent a part is to be applied

to the defences of the state, a part to the king's private use. For it is necessary in time of peace to fortify cities against war, and also to have ready ships and other munitions of war.

第十二节　田亩与全部土地，以及房屋（如果可以实行的话），都应算作公共财产，属于拥有国家最高权利的人。然后每年出租给本国公民，即城市居民和农民，由国家收取租金。此外，在和平时期，免除各种赋税。至于租金，其中部分用于国家防卫，部分用于王室经费。在和平时期仍需设防城市，准备船舰以及其他军需品，以备战时之需。

13．After the selection of the king from one of the clans, none are to be held noble, but his descendants, who are therefore to be distinguished by royal insignia from their own and the other clans.

第十三节　从某一氏族中选定君主之后，除君主后裔外，其他人就不应再被视为贵胄。君主后裔应佩戴皇家徽章，以便区别其氏族与其他氏族。

14．Those male nobles, who are the reigning king's collaterals, and stand to him in the third or fourth degree of consanguinity, must not marry, and any children they may have had, are to be accounted bastards, and unworthy of any dignity, nor may they be recognized as heirs to their parents, whose goods must revert to the king.

第十四节　君主的旁系亲属中，三等亲或四等亲的男子身份显

贵，必须禁止结婚。如果他们有孩子，则应被认定为私生子。私生子没有资格享有尊贵，而且不得作为其父母的继承人，其父母的全部遗产应归还君主。

15 . Moreover the king's counsellors, who are next to him in dignity, must be numerous, and chosen out of the citizens only; that is (supposing there to be no more than six hundred clans) from every clan three or four or five, who will form together one section of this council; and not for life, but for three, four, or five years, so that every year a third, fourth, or fifth part may be replaced by selection, in which selection it must be observed as a first condition, that out of every clan at least one counsellor chosen be a jurist.

第十五节　君主的顾问官人数应该足够多。顾问官的显贵程度仅次于君主，他们只能从公民中选出。也就是说（假设共有不超过600个氏族），从每个氏族中选出三到五名，共同构成议事会的成员。顾问官的任期不是终身制，只有三年、四年或五年，所以每年通过选拔替换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人数。选拔时需首要注意的是：每个氏族应至少选出一名精通法律的顾问官。

16 . The selection must be made by the king himself, who should fix a time of year for the choice of fresh counsellors. Each clan must then submit to the king the names of all its citizens, who have reached their fiftieth year, and have been duly put forward as candidates for this office, and out of these the king will choose whom he pleases. But in that year, when the jurist of any clan is to be replaced, only the names of jurists are to be submitted to the king. Those who have filled this office of counsellor for the appointed time, are not to be continued therein, nor to be replaced

on the list of candidates for five years or more. But the reason why one is to be chosen every year out of every clan is, that the council may not be composed alternately of untried novices, and of veterans versed in affairs, which must necessarily be the case, were all to retire at once, and new men to succeed them. But if every year one be chosen out of every family, then only a fifth, fourth, or at most a third part of the council will consist of novices. Further, if the king be prevented by other business, or for any other reason, from being able to spare time for this choice, then let the counsellors themselves choose others for a time, until the king either chooses different ones, or confirms the choice of the council.

第十六节　顾问官的选拔必须由君主亲自进行。君主指定一年中的某个时间来选拔新的顾问官，每个氏族必须向君主呈交所有年满十五岁、并依法可以作为候选人的公民名字。君主从中选出他想要的人。但是，在替换精通法律的顾问官的那一年，只需呈交后者的名字给君主。任期已满的顾问官不再续任，而且五年或更长时间内不得再列入候选人名单。每年从每个氏族选出一个顾问官的原因在于，这样一来，就避免了议事会全部由没有经验的新手组成，或全部由经验丰富精通事务的人组成。如果所有成员一下子全部退休，换上的全是新手，那么上述情况就在所难免。但是，如果每年从每个氏族中选出一人，则只有五分之一、四分之一，或者至多三分之一的议事会成员是新手。此外，如果君主因为其他事务或某种原因无法腾出时间亲自进行选拔，可以让顾问官们先行选择，日后再由君主选定其他人或确认议事会的选择。

17 . Let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this council be to defend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the dominion, and to give advice about administration, that the king may know, what for the public good ought to be decreed: and that 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king

may not decide in any matter, without first hearing the opinion of this council. But if, as will generally happen, the council is not of one mind, but is divided in opinion, even after discussing the same subject two or three times, there must be no further delay, but the different opinions are to be submitted to the king, as in the twenty-fifth section of this chapter we shall show.

第十七节　议事会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国家的基本法律，就国家管理提出建议，藉此君主才能知道，需要颁布哪一些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指令。这样，如果君主没有先听取议事会的意见，他不能擅自做任何决定。但是，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议事会思想不统一，意见不一致，甚至于对同一件事情经过两三次的讨论后意见仍有分歧；那么，议事会就不应该再拖延下去，而应该把不同的意见提交君主。本章第二十五节将阐述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

18 . Let it be also the duty of this council to publish the king's orders or decrees, and to see to the execution of any decree concerning affairs of state, and to supervis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whole dominion, as the king's deputies.

第十八节　此外，议事会的职责还包括颁布君主的决议或法令，确保有关国家事务的法令得到执行，并作为君主的代理人监督整个国家的行政工作。

19 . The citizens should have no access to the king, save through this council, to which are to be handed all demands or petitions, that they may be presented to the king. Nor should the envoys of other commonwealths be allowed to obtain permission to

address the king, but through the council. Letters, too, sent from elsewhere to the king, must be handed to him by the council. And in general the king is to be accounted as the mind of the commonwealth, but the council as the senses outside the mind, or the commonwealth's body, through whose intervention the mind understands the state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acts as it judges best for itself.

第十九节　公民联系君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议事会。公民所有的要求或请愿书都交由议事会，再由议事会呈交君主。其他国家的公使也必须通过议事会呈报才能获准觐见君主并致辞。各地呈送给君主的信件，必须通过议事会转呈。总之，君主被当作是国家的头脑，议事会就是头脑外部的感官，或者说就是国家的躯体，君主通过它了解国家情况，从而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措施。

20．The care of the education of the king's sons should also fall on this council, and the guardianship, where a king has died, leaving as his successor an infant or boy. Yet lest meanwhile the council should be left without a king, one of the elder nobles of the commonwealth should be chosen to fill the king's place, till the legitimate heir has reached the age at which he can support the weight of government.

第二十节　议事会也担任着王子们的教育任务。如果君主逝世后，继承者年幼，议事会应承当起监护的责任。但与此同时，为避免在此期间没有君主管辖议事会，应该选择贵胄中的年长者暂时代理君主职责，直到合法的继承者成长到有能力担起国家重担的年龄。

21 . Let the candidates for election to this council be such as know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and the foundations, and state or condi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whose subjects they are. But he that would fill the place of a jurist must, besides the government and condi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whose subject he is, be likewise acquainted with those of the other commonwealths, with which it has any intercourse. But none are to be placed upon the list of candidates, unless they have reached their fiftieth year without being convicted of crime.

第二十一节　　议事会候选人的任务是熟悉本国的政制、基本法规、国家状况和情势。但对于精通法律的顾问官职位的候选人，除了要熟悉本国政制和国家情况外，还要熟悉与本国有交往的国家的政制和情况。只有年满五十岁且无犯罪记录的人才能列入候选人名单。

22 . In this council no decision is to be taken about the affairs of the dominion, but in the presence of all the members. But if anyone be unable through illness or other cause to attend, he must send in his stead one of the same clan, who has filled the office of counsellor or been put on the list of candidates. Which if he neglect to do, and the council through his absence be forced to adjourn any matter, let him be fined a considerable sum. But this must be understood to mean, when the question is of a matter affecting the whole dominion, as of peace or war, of abrogating or establishing a law, of trade, etc. But if the question be one that affects only a particular city or two, as about petitions, etc., it will suffice that a majority of the council attend.

第二十二节　只有在所有顾问官都出席议事会的情况下，议事会

才能对国家事务做出决策。如果某位顾问官因为疾病或其他原因无法出席，他必须从同氏族中选派人员代替他出席。替代者应该是曾任顾问官的人，或者是候选名单上的人。如果他没有另派代表，导致议事会因为他的缺席而被迫延迟处理事务，他应被处以一笔巨额罚金。但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要讨论的问题涉及整个国家，比如和平与战争问题、废除或制定法律问题、商业贸易问题等，则全体成员必须出席。如果讨论的问题只涉及一两个城市，比如审议请愿书等，则只要有半数以上成员出席即可。

23 . To maintain a perfect equality between the clans, and a regular order in sitting, making proposals, and speaking, every clan is to take in turn the presidency at the sittings, a different clan at every sitting, and that which was first at one sitting is to be last at the next. But among members of the same clan, let precedence go by priority of election.

第二十三节　　为保持氏族之间的完全平等，并保证议事会的席位、提案的提交及议员的发言能够井然有序，每个氏族应轮流当值会议主席，即每次会议由不同的氏族担任主席；这次居首席的氏族，下次就排在最后一个席位。但是，在同氏族的顾问官之间，则依据选拔的时间先后来确定顺序。

24 . This council should be summoned at least four times a year, to demand of the ministers account of their administration of the dominion, to ascertain the state of affairs, and see if anything else needs deciding. For it seems impossible for so large a number of citizens to have constant leisure for public business. But as in the meantime public business must none the less be carried on, therefore fifty or more are to be chosen out of this council to supply

its place after its dismissal; and these should meet daily in a chamber next the king's, and so have daily care of the treasury, the cities, the fortifications, the education of the king's son, and in general of all those duties of the great council, which we have just enumerated, except that they cannot take counsel about new matters, concerning which no decision has been taken.

第二十四节　议事会每年至少要开会四次，要求官员报告他们的施政情况，了解事情发展，并考虑是否有其他事情需要决断。因为数目如此庞大的一群公民，不可能总有空闲时间一直在一起处理国家事务。但是同时，国家事务又必须及时处理，所以须从议事会中选择五十名或更多的顾问官组成小的议事会，在大议事会休会期间代行它的职责，这个常务议事会每天就在王宫附近的会议厅开会，关注国家财政、各个城市、军防、王子的教育，以及之前所列举的、大议事会职责范围内的所有事情。但是，对于未曾做出决定的新的问题，他们无权处理。

25．On the meeting of the council, before anything is proposed in it, let five, six, or more jurists of the clans, which stand first in order of place at that session, attend on the king, to deliver to him petitions or letters, if they have any, to declare to him the state of affairs, and, lastly, to understand from him what he bids them propose in his council; and when they have heard this, let them return to the council, and let the first in precedence open the matter of debate. But, in matters which seem to any of them to be of some moment, let not the votes be taken at once, but let the voting be adjourned to such a date as the urgency of the matter allows. When, then, the council stands adjourned till the appointed time, the counsellors of every clan will meanwhile be able to debate the matter separately, and, if they think it of great moment, to consult

others that have been counsellors, or are candidates for the council. And if within the appointed time the counsellors of any clan cannot agree among themselves, that clan shall lose its vote, for every clan can give but one vote. But, otherwise, let the jurist of the clan lay before the council the opinion they have decided to be best; and so with the rest. And if the majority of the council think fit, after hearing the grounds of every opinion, to consider the matter again, let the council be again adjourned to a date, at which every clan shall pronounce its final opinion; and then, at last, before the entire council, let the votes be taken, and that opinion be invalidated which has not at least a hundred votes. But let the other opinions be submitted to the king by all the jurists present at the council, that, after hearing every party's arguments, he may select which opinion he pleases. And then let the jurists leave him, and return to the council; and there let all await the king at the time fixed by himself, that all may hear which opinion of those proposed he thinks fit to adopt, and what he decides should be done.

第二十五节　议事会开会时，在开始任何提议之前，由这次会议上位置居前的氏族选出五位、六位或者更多的精通法律的顾问官觐见君主，呈交议事会收到的请愿书或信函，汇报国家事务，听取君主向他们提出的要在议事会上讨论的议案的指示。然后他们带着指示回到议事会，按位置的顺序，从第一个人开始发言。如果有任何一个顾问官认为某事重要，则不应马上进行投票，而是要根据事情的紧迫性所允许的期限，推迟表决。在这期间议事会休会。休会期间，每个氏族的顾问官可以自行讨论此事。如果他们认为事情很重要，可以跟前任顾问官或议事会的候补顾问官商议。如果在指定时间内，任何一个氏族的顾问官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该氏族不能参加投票，因为每个氏族只能投一次票。反之，如果意见一致，则让氏族的法律顾问官在议事会上陈述他们氏族认为最好的主张。其他氏族也是这样进行。听完每一种主张的理由之后，如果议事会大多数成员认为需要重新考虑

这个问题，则应该再次休会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每个氏族都应该提出其最终的意见。最后，在整个议事会开会时进行投票表决。赞成票数至少要达到一百张，否则该意见无效。其他的意见则由出席议事会的所有法律顾问官呈交君主，君主听完各方的论证之后，决定采用哪种意见。之后，君主让法律顾问官回到议事会，所有顾问官都在君主指定的时间里等待，以便得知君主在所有呈交上去的意见中选择哪种，以及他决定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26 .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other council is to be formed of jurists, whose business should be to decide suits, and punish criminals, but so that all the judgments they deliver be tested by those who are for the time members of the great council—that is, as to their having been delivered according to the due process of justice, and without partiality. But if the losing party can prove, that any judge has been bribed by the adversary, or that there is some mutual cause of friendship between the judge and the adversary, or of hatred between the judge and himself, or, lastly, that the usual process of justice has not been observed, let such party be restored to his original position. But this would, perhaps, not be observed by such as love to convict the accused in a criminal case, rather by torture than proofs. But, for all that, I can conceive on this point of no other process of justice than the above, that befits the best system of governing a commonwealth.

第二十六节　关于司法行政，则需成立另一个由法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其职责是处理诉讼，处罚罪犯。但是，他们作出的所有判决必须经过大议事会成员的检验，即他们的判决是根据法定诉讼程序进行的，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如果败诉的一方能够证明法官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贿赂，或者法官和当事人有私交，或者法官和自己有间隙忌恨，或者案件没有遵照正当司法程序，则这个案件应重新审理。在刑

事案件中，有些人经常会使用刑讯来迫使被告承认有罪，而不是用证据证明被告有罪，因此这些人可能难以遵循以上规定。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没有什么司法程序能比以上提到的更好，这样的程序才最适于国家的统治。

27．Of these judges, there should be a large and odd number—for instance, sixty-one, or at least forty-one—and not more than one is to be chosen of one clan, and that not for life, but every year a certain proportion are to retire, and be replaced by as many others out of different clans, that have reached their fortieth year.

第二十七节　关于法官，人数要足够多，而且应该是奇数，比如六十一人或至少四十一人，而且每个氏族中只能选出一名法官。法官不实行终身制。这个委员会每年也必须有一定比例的人退休，然后从其他氏族中选出相同人数的法官来替任，而且法官都必须年满四十。

28．In this council, let no judgment be pronounced save in the presence of all the judges. But if any judge, from disease or other cause, shall for a long time be unable to attend the council, let another be chosen for that time to fill his place. But in giving their votes, they are all not to utter their opinions aloud, but to signify them by ballot.

第二十八节　在司法委员会上，只有所有的法官都出席时，才能宣布判决。假如某位法官由于疾病或其他原因长时间不能出席，在此期间应该另选一人填补他的位置。在投票表决时，所有人不能公开发表意见，只能通过无记名投票表示他们的意见。

29 . Let those who supply others' places in this and the first-mentioned council first be paid out of the goods of those whom they have condemned to death, and also out of the fines of which any are mulcted. Next, after every judgment they pronounce in a civil suit, let them receiv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the whole sum at stake for the benefit of both councils.

第二十九节　至于司法委员会及先前提到的大委员会成员的薪俸来源，首先应来源于那些死刑犯的财产和犯人的罚金；第二个来源是，在每例民事案件判决后，收取案件总额中一定比例的金额作为诉讼费用，这项收入归上述两个委员会共有。

30 . Let there be in every city other subordinate councils, whose members likewise must not be chosen for life, but must be partially renewed every year, out of the clans who live there only. But there is no need to pursue this further.

第三十节　每个城市应设有下属委员会，其成员同样不是终身制，每年必须部分更替。但是，新成员只能从住在该城市的氏族中选择。对此细节，不再详细阐述。

31 . No military pay is to be granted in time of peace; but, in time of war, military pay is to be allowed to those only, who support their lives by daily labour. But the commanders and other officers of the battalions are to expect no other advantage from war but the spoil of the enemy.

第三十一节　在和平时期，军人没有薪俸。但在战争期间，军人薪俸只发放给每日靠工作维持自己生活的军人。而军队指挥官和其他首领除了从敌人的战利品中获利外，没有其他收益可得。

32 . If a foreigner takes to wife the daughter of a citizen, his children are to be counted citizens, and put on the roll of their mother's clan. But those who are born and bred within the dominion of foreign parents should be allowed to purchase at a fixed price the right of citizenship from the captains of thousands of any clan, and to be enrolled in that clan. For no harm can arise thence to the dominion, even though the captains of thousands, for a bribe, admit a foreigner into the number of their citizens for less than the fixed price; but, on the contrary, means should be devised for more easil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citizens, and producing a large confluence of men. As for those who are not enrolled as citizens, it is but fair that, at least in war-time, they should pay for their exemption from service by some forced labour or tax.

第三十二节　如果外国人娶某个公民的女儿为妻，则他的孩子应该被承认为公民，并把名字登记在他们母亲所属的氏族名册中。如果父母是外国人而孩子是在这个国家内出生和长大，则可被允许以一定的价格向任何一个氏族的首领购买公民权，并登记入册到那个氏族中。即便外国人贿赂氏族首领，以低于固定的价格购买公民权，这也不会给国家带来害处，因为增加了公民人数。反之，应该想一些办法，使得公民人数更易增长，从而保证人口众多。那些没有登记入册成为公民的人，至少在战争期间，应该让他们提供一些劳役或赋税，作为未服兵役的补偿，才是公平的。

33 . The envoys to be sent in time of peace to other

commonwealths must be chosen out of the nobles only, and their expenses met by the state treasury, and not the king's privy purse.

第三十三节　　和平时期派往其他国家的使节，只能从贵胄中选派。他们的费用由国库支出，而不是从王室专用金中支出。

34 . Those that attend the court, and are the king's servants, and are paid out of his privy purse, must be excluded from every appointment and office in the commonwealth. I say expressly, “and are paid out of the king's privy purse,” to except the body-guard. For there should be no other body-guard, but the citizens of the king's city, who should take turns to keep guard at court before the king's door.

第三十四节　由王室专用金供俸的宫廷人员、君主的佣仆，不得担任国家官职。这里我特别指“由王室专用金供俸的”，是不包括君主的近卫兵在内的；因为只要是首都的公民，都有义务充当近卫兵，轮流保卫王宫的大门。

35 . War is only to be made for the sake of peace, so that, at its end, one may be rid of arms. And so, when cities have been taken by right of war, and terms of peace are to be made after the enemies are subdued, the captured cities must not be garrisoned and kept; but either the enemy, on accepting the terms of peace, should be allowed to redeem them at a price, or, if by following that policy, there would, by reason of the danger of the position, remain a constant lurking anxiety, they must be utterly destroyed, and the inhabitants removed elsewhere.

第三十五节　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所以战争结束后，就应该停止使用武力。通过战争占领城市并征服敌人之后，议定和平条款。对于已攻占的城市不得再设防，或者准许接受和平条款的敌方以高价买回城市。如果那些城市位居险要，让敌方买回城市将留下后患，则应该完全拆毁那些城市，将其居民迁往别处。

36 . The king must not be allowed to contract a foreign marriage, but only to take to wife one of his kindred, or of the citizens; yet, on condition that, if he marries a citizen, her near relations become incapable of holding office in the commonwealth.

第三十六节　君主不能与外国女子通婚，只能娶同族女子或公民中的女子为妻。如果他娶了平民女子，则她的近亲不得担任国家官职。

37 . The dominion must be indivisible. And so, if the king leaves more than one child, let the eldest one succeed; but by no means be it allowed to divide the dominion between them, or to give it undivided to all or several of them, much less to give a part of it as a daughter's dowry. For that daughters should be admitted to the inheritance of a dominion is in no wise to be allowed.

第三十七节　禁止分割统治权。如果君主的儿子不止一个，则应由长子承袭王位，但决不允许王子瓜分国家，或者把整个国家交给所有王子或几个王子共同治理，更不能以国家的一部分作为公主的嫁妆。任何情况下，公主都不准继承王位。

38 . If the king dies leaving no male issue, let the next to him in blood be held the heir to the dominion, unless he chances to have married a foreign wife, whom he will not put away.

第三十八节　如果君主去世后没有留下男性子嗣，应该让血缘最近的亲属作为王位继承人，除非他恰巧娶了外国女子为妻，而又不愿与她离婚。

39 . As for the citizens, it is manifest (Chap. 3.Sec. 5) that every one of them ought to obey all the commands of the king, and the decrees published by the great council, although he believes them to be most absurd, and otherwise he may rightfully be forced to obey. And these are the foundations of a monarchical dominion, on which it must be built, if it is to be stable, as we shall show in the next chapter.

第三十九节　关于公民，不言自明的是（第三章第五节），每个人必须遵从君主的命令和大议事会颁布的法令，即使他认为那些法令很荒谬。否则，依法强迫他服从。以上这些是建立君主政体的基本原则。关于君主政体的稳定性，下一章将予以阐述。

40 . As for religion, no temples whatever ought to be built at the public expense; nor ought laws to be established about opinions, unless they be seditious and overthrow the foundations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so let such as are allowed the public exercise of their religion build a temple at their own expense. But the king may have in his palace a chapel of his own, that he may practise the religion to which he belongs.

第四十节　关于宗教问题，不得使用公共经费建立教堂，也不得制定针对思想信仰的法律，除非它引起叛乱并破坏国家的基本原则。允许宗教人员用自己的经费建立教堂的公共行为。君主可以在他的宫殿里拥有自己的小教堂，可以从事他信奉的宗教活动。

[7_1].*Curtius* , x. 1.

[8_1].见库尔提乌斯·路福斯：《亚历山大大帝史》第10卷，第1章。

Chapter 7 Of Monarchy (Continuation)

第七章　关于君主政体（续）

1．After explaining the foundations of a monarchical dominion, I have taken in hand to prove here in order the fitness of such foundations. And to this end the first point to be noted is, that it is in no way repugnant to experience, for laws to be so firmly fixed, that not the king himself can abolish them. For though the Persians worshipped their kings as gods, yet had not the kings themselves authority to revoke laws once established, as appears from *Daniel* , [8_1] and nowhere, as far as I know, is a monarch chosen absolutely without any conditions expressed. Nor yet is it repugnant to reason or the absolute obedience due to a king. For the foundations of the dominion are to be considered as eternal decrees of the king, so that his ministers entirely obey him in refusing to execute his orders, when he commands anything contrary to the same, which we can make plain by the example of Ulysses. [8_2] For his comrades were executing his own order, when they would not untie him, when he was bound to the mast and captivated by the Sirens' song, although he gave them manifold orders to do so, and that with threats. And it is ascribed to his forethought, that he afterwards thanked his comrades for obeying him according to his first intention. And, after this example of Ulysses, kings often instruct judges, to administer justice without respect of persons, not even of the king himself, if by some singular accident he orders anything contrary to established law. For kings are not gods, but men, who are often led captive by the Sirens' song. If then everything depended on the inconstant will of one man, nothing would be fixed. And so, that a monarchical dominion may

be stable, it must be ordered, so that everything be done by the king's decree only, that is, so that every law be an explicit will of the king, but not every will of the king a law; as to which see Chap. 6. Secs. 3, 5, 6.

第一节　前面阐述了建立君主政权的基本原则，现在我开始逐一论述这些原则的合理性。为此首先要说明的是，决不能违背法律惯例，因为法律一经确立，就是君主本人也不能废除。如《但以理书》[9_1] 中所说，虽然波斯人奉其君主若神明般，但是，一旦法律得以制定完成，君主也不能废除。而且，就我所知，没有一个地方在选择君主时没有依照一些明确的条件。这样做并不会违背理性，也不会影响人们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国家的这些基本原则应被视为君主的永恒不变的法令，所以，当官员拒绝执行君主所发出的违背基本原则的命令时，他们实际上是服从君主的。我们可以通过尤利西斯的例子 [9_2] 来说明这一点。当被绑在船桅上的尤利西斯被海妖的歌声迷住时，尽管他百般威胁并命令他的同伴们解开他，但他的同伴并没有听从他的指示；他们其实是在执行他最初的命令，而那正归功于尤利西斯的先见之明。所以后来，尤利西斯感谢他的同伴们遵循了他最初的意图。君主们也经常参照尤利西斯的这个例子，指示他们的法官在执法时不要偏袒任何人，即使在异常情况下，君主的指令违反既定的法律，法官也应该依法执行。因为君主不是神，是人，也会经常被海妖的歌声迷住。所以，如果任何事情都取决于人类反复无常的意愿，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情会是稳固的。所以君主政体若要稳固，它必须组织有序，所有的事情都应只依据君主的法令而行，也就是说，每一条法律都是君主公开宣布的意志，而不是君主的一切意愿都具有法律效力。关于这一点，请参阅第六章第三、五、六节。

2 . It must next be observed, that in laying foundations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study the human passions: and it is not enough to have shown, what ought to be done, but it ought, above all, to be

shown how it can be effected, that men, whether led by passion or reason, should yet keep the laws firm and unbroken. For i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dominion, or the public liberty depends only on the weak assistance of the laws, not only will the citizens have no security for its maintenance (as we showed in the third section of the last chapter), but it will even turn to their ruin. For this is certain, that no condition of a commonwealth is more wretched than that of the best, when it begins to totter, unless at one blow it falls with a rush into slavery, which seems to be quite impossible. And, therefore, it would be far better for the subjects to transfer their rights absolutely to one man, than to bargain for unascertained and empty, that is unmeaning, terms of liberty, and so prepare for their posterity a way to the most cruel servitude. But if I succeed in showing that the foundation of monarchical dominion, which I stated in the last chapter, are firm and cannot be plucked up, without the indignation of the larger part of an armed multitude, and that from them follow peace and security for king and multitude, and if I deduce this from general human nature, no one will be able to doubt, that these foundations are the best and the true ones (Chap. 3. Sec. 9, and Chap. 6. Secs. 3,8). But that such is their nature, I will show as briefly as possible.

第二节　其次，还要注意一点，在确定这些基本原则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到人类的情感因素。仅仅说明应该做什么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说明怎样才能做到让人们坚守法律，不管他们是受情感的驱使还是受理性的引导。如果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或公共自由仅仅依靠法律的微弱辅助，那么，公民不仅无法保证维持规章制度（如上一章第三节所述），其自由甚至可能给公民带来灾难。因为，除了国家突然垮台和遭受奴役的情况外（这似乎不可能），没有什么情况会比一个国家由最好的状态渐渐走向危机四伏摇摇欲坠的这种情况更糟。因此，对国民来说，把权力完全交给一个人，比起去争取一些关于自由

的、不确定且空洞的、没有意义的条件从而导致自己的后代陷入残酷的奴役中，要好得多。但是如果我能证实上一章所阐述的君主政体的基本原则是牢固的、不可被废除的（除非这些原则会引起大部分武装起来的民众的义愤）；如果我能证实他们能给君主和民众带来和平与安定；如果我是从基本的人性中推断出这一些；那么没有人会怀疑这些原则是最好的最正确的原则（第三章第九节，第六章第三、八节）。这些原则的本来性质就是如此，现在我将尽量简短地予以论证。

3．That the duty of him, who holds the dominion, is always to know its state and condition, to watch over the common welfare of all, and to execute whatever is to the interest of the majority of the subjects, is admitted by all. But as one person alone is unable to examine into everything, and cannot always have his mind ready and turn it to meditation, and is often hindered by disease, or old age, or other causes, from having leisure for public busines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monarch have counsellors know the state of affairs, and help the king with their advice, and frequently supply his place; and that so it comes to pass, that the dominion or commonwealth may continue always in one and the same mind.

第三节　所有人都知道，最高当权者的职责是经常了解国家的状态和形势，关注所有民众的共同福利，履行一切对大多数国民有利的事情。但是，仅靠一个人无法做到事事过问，时时刻刻都为国事操心；而且，他也经常会由于疾病、年龄或其他原因而无暇处理公众事务。因此，君主必然需要一些顾问官来了解各种事务，为他出谋献策，并时常代他处理事务。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经常保持一贯的政策。

4 . But as human nature is so constituted, that everyone seeks with the utmost passion his own advantage, and judges those laws to be most equitable, which he thinks necessary to preserve and increase his substance, and defends another's cause so far only as he thinks he is thereby establishing his own; it follows hence, that the counsellors chosen must be such, that their private affairs and their own interests depend on the general welfare and peace of all. And so it is evident, that if from every sort or class of citizens a certain number be chosen, what has most votes in such a council will be to the interes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ubjects. And though this council, because it is composed of so large a number of citizens, must of necessity be attended by many of very simple intellect, yet this is certain, that everyone is pretty clever and sagacious in business which he has long and eagerly practised. And, therefore, if none be chosen but such as have till their fiftieth year practised their own business without disgrace, they will be fit enough to give their advice about their own affairs, especially if, in matters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a time be allowed for consideration. Besides, it is far from being the fact, that a council composed of a few is not frequented by this kind of men. For, on the contrary, its greatest part must consist of such, since everyone, in that case, tries hard to have dullards for colleagues, that they may hang on his words, for which there is no opportunity in large councils.

第四节　但是，由于人类的本性注定如此，以致每个人总是以最大的热情去谋求自己的利益；对于那些他需要藉以维护和增加自己财富的法律，他都认定是公正的；而且，如果维护他人的事情有助于他自己从事同样的事，他才会去维护。因此，选任的顾问官必须是这样的：他们自己的私事和利益必须取决于公众的福利与和平生活。这样，如果议事会里有一定数量的顾问官选自各个阶层的公民，则获最多票数通过的议案显然会是对大多数国民有利的议案。虽然这样的议

事会必定会有不少才智简单易于掌控的人（因为人员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在自己长期努力从事的事务方面异常睿智精明。所以，如果只选那些年满五十岁、一直在从事自己的行业且并无不良行为的人担任顾问官，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就其行业方面提出建议，尤其是一些重大事情，如果予以充分的时间，他们更能胜任。有人认为如果议事会组成人员少，其中才智不高易于掌控的人就会少，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如果议事会成员少，其大部分的成员反而会是这类人，因为每个人都会尽可能选择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平庸同事；而在大议事会里，他们没有机会这么做。

5 . Furthermore, it is certain, that everyone would rather rule than be ruled. “For no one of his own will yields up dominion to another,” as Sallust has it in his first speech to Caesar. [8_3] And, therefore, it is clear, that a whole multitude will never transfer its right to a few or to one, if it can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itself, without proceeding from the controversies, which generally arise in large councils, to seditions. And so the multitude does not, if it is free, transfer to the king anything but that, which it cannot itself have absolutely within its authority, namely, the ending of controversies and the using despatch in decisions. For as to the case which often arises, where a king is chosen on account of war, that is, because war is much more happily conducted by kings, it is manifest folly, I say, that men should choose slavery in time of peace for the sake of better fortune in war; if, indeed, peace can be conceived of in a dominion, where merely for the sake of war the highest authority is transferred to one man, who is, therefore, best able to show his worth and the importance to everyone of his single self in time of war; whereas, on the contrary, democracy has this advantage, that its excellence is greater in peace than in war. However, for whatever reason a king is chosen, he cannot by himself, as we said just now, know what will be to the interest of

the dominion: but for this purpose, as we showed in the last section, will need many citizens for his counsellors. And as we cannot at all suppose, that any opinion can be conceived about a matter proposed for discussion, which can have escaped the notice of so large a number of men, it follows, that no opinion can be conceived tending to the people's welfare, besides all the opinions of this council, which are submitted to the king. And so, since the people's welfare is the highest law, or the king's utmost right, it follows, that the king's utmost right is but to choose one of the opinions offered by the council, not to decree anything, or offer any opinion contrary to the mind of all the council at once (Chap. 6. Sec. 25). But if all the opinions offered in the council were to be submitted to the king, then it might happen that the king would always favour the small cities, which have the fewest votes. For though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uncil it be ordained, that the opin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the king without mention of their supporters, yet they will never be able to take such good care, but that some opinion will get divulged. And, therefore, it must of necessity be provided, that that opinion, which has not gained at least a hundred votes, shall be held void; and this law the larger cities will be sure to defend with all their might.

第五节　此外，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宁愿统治别人而不愿被人统治。正如撒路斯提乌斯对凯撒所说的那样 [9_3] ，“没有人自愿把统治权让给别人”。所以很显然，民众永远不会把他们的权利交给少数人或一个人，如果他们能自行相互间达成协议，能够阻止大议事会里经常发生的争执升级为暴乱的话。因此，如果民众能够自主决定的话，他愿意交给君主处理的事情只会是它自身力量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即解决争端和协调决议。所以，对于这种屡见不鲜的事，即为了战争原因而选任君主，因为他们认为由君主来指挥战争要得力得多，我认为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做就是为了能在战争中获利而自愿让自己

在和平时期受人统治。我的意思是，如果只为了战争的缘故而把最高权利交给一个人就能使国家得到和平，则这个人在战争中最大地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和自己对他人的重要性。而相反的是，民主国家的优点是它在和平时期的作用比战争时期的大。然而，不管选任君主是出于什么理由，如刚才所述，他不可能做到仅凭自己一人就能知道什么对国家有利。为此，如上一节所述，他需要众多公民来充当他的顾问官。所以，我们根本不会认为，对于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其解决方案会被人数众多的顾问官们所忽略，从而导致在议事会呈报给君主的所有建议之中，竟会没有事关人民利益的意见。因此，既然民众的福利就是最高的法则，亦即君主的最高权利，所以，君主的至高权利就是从议事会提供的意见中选择一种，而不是擅自发布指令或者自己临时给出一个违反整个议事会意见的意见（第六章第二十五节）。但是，如果议事会所有的意见都要提交给君主选择，则君主可能会优先考虑票数最少的城市。虽然议事会的章程规定呈报给君主的意见不得体现其支持者的名字，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小心到不会泄露意见。所以必须规定，票数没有达到一百张的意见无效，而较大的城市必然会全力维护这条规定。

6 . And here, did I not study brevity, I would show other advantages of this council; yet one, which seem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I will allege. I mean, that there can be given no greater inducement to virtue, than this general hope of the highest honour. For by ambition are we all most led, as in our *Ethics* we showed to be the case. [8_4]

第六节　假如不考虑行文的简洁性，我原会在此继续阐述这种议事会的其他好处。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好处我必须指出来。那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追求最高荣誉这个共同愿望更能诱发人的积极性这一美德，因为，我们总是受雄心驱使，像我们在《伦理学》一书中所论证的那样 [9_4] 。

7 . But it cannot be doubted that the majority of this council will never be minded to wage war, but rather always pursue and love peace. For besides that war will always cause them fear of losing their property and liberty, it is to be added, that war requires fresh expenditure, which they must meet, and also that their own children and relatives, though intent on their domestic cares, will be forced to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war and go a-soldiering, whence they will never bring back anything but unpaid-for scars. For, as we said (Chap. 6. Sec. 31), no pay is to be given to the militia, and (Chap. 6. Sec. 10) it is to be formed out of citizens only and no others.

第七节　毋庸置疑，议事会中的大多数人绝不会想要发动战争，反而更愿意追求和热爱和平。因为战争除了会让他们总是担心失去自己的财产和自由外，他们还必须去筹集战争所需要的额外的费用；而且战争会迫使他们那些只想安于本业的子女和亲戚从军作战，而作战除了给他们留下伤疤之外，不会带给他们任何好处。因为，如我们之前所述（第六章第三十一节），军人没有任何薪俸，而且军队只能由公民组成（第六章第十节）。

8 . There is another accession to the cause of peace and concord, which is also of great weight: I mean, that no citizen can have immovable property (Chap. 6. Sec. 12). Hence all will have nearly an equal risk in war. For all will be obliged, for the sake of gain, to practise trade, or lend money to one another, if, as formerly by the Athenians, a law be passed, forbidding to lend money at interest to any but inhabitants; and thus they will be engaged in business, which either is mutually involved, one man's with another's, or needs the same means for its furtherance. And thus the

greatest part of this council will generally have one and the same mind about their common affairs and the arts of peace. For, as we said (Sec. 4), every man defends another's cause, so far as he thinks thereby to establish his own.

第八节　　促成和平一致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公民不得拥有不动产（第六章第十二节）。这就意味着战争带给每个人的危险几乎是一样的。如果像以前的雅典人那样，通过法律规定禁止放贷给本邦居民以外的任何人，那么，所有人为了营生必须从事商业，或者在居民间相互放贷。于是他们都从事商业，相互间紧密关联，用来增进商业的方法也相同。这样一来，议事会的绝大部分成员对于他们共同的事务以及寻求和平的方法通常就会有一致的想法。因为，如我们所说（本章第四节），如果维护别人的事宜对自己从事同样的事有所助益，人们就会去维护。

9 . It cannot be doubted, that it will never occur to anyone to corrupt this council with bribes. For were any man to draw over to his side some one or two out of so great a number of men, he would gain nothing. For, as we said, the opinion, which does not gain at least a hundred votes, is void.

第九节　毫无疑义，决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即有人向议事会行贿而使其腐化堕落。因为，如果有人想从这么多的顾问官当中拉拢一两个人，也将无济于事。因为如我们前面所述，未获得一百张投票的意见无效。

10 . We shall also easily see, that, once this council is established its members cannot be reduced to a less number, if we

consider the common passions of mankind. For all are guided mostly by ambition, and there is no man who lives in health but hopes to attain extreme old age. If then we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actually reach their fiftieth or sixtieth year, and further take into account the number that is every year chosen of this great council, we shall see, that there can hardly be a man of those who bear arms, but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great hope of attaining this dignity. And so they will all, to the best of their power, defend this law of the council. For be it noted, that corruption, unless it creeps in gradually, is easily prevented. But as it can be more easily supposed, and would be less invidious, that a less number should be chosen out of every clan, than that a less number should be chosen out of a few clans, or that one or two clans should be altogether excluded; therefore (Chap. 6. Sec. 15) the number of counsellors cannot be reduced, unless a third, fourth, or fifth part be removed simultaneously, which change is a very great one, and therefore quite repugnant to common practice. Nor need one be afraid of delay or negligence in choosing, because this is remedied by the council itself. See Chap. 6. Sec. 16.

第十节　如果考虑到人类共有的情感，我们就不难发现，一旦议事会建立起来，其成员数量就不可能减少。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受野心驱使，就像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会希望衰老时期的到来一样。如果估计一下年龄已达五十岁或六十岁的人数，再考虑每年被选进大议事会的人数，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服兵役的人没有一个不怀着得到这份尊贵职位的希望。因此，他们都会尽其最大的能力来维护议事会选取顾问官的章程。实际上，议事会的腐败是不难防止的，除非是暗地里逐渐蔓延侵蚀。不难设想，减少每个氏族的顾问官人数比起减少几个氏族的顾问官人数或彻底取消一两个氏族的顾问官人数要稍微公平些。因此，如第六章第十五节所述，顾问官的人数不可能减少，除非同时减去那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人数，而这种改变实在太大，

也有违习惯做法。所以，不必担心顾问官的选任会被延误或疏忽，因为议事会本身对此会有补救措施（第六章第十六节）。

11 . The king, then, whether he is induced by fear of the multitude, or aims at binding to himself the majority of an armed multitude, or is guided by a generous spirit, a wish that is, to consult the public interest, will always confirm that opinion, which has gained most votes, that is (Sec. 5), [8_5] which is to the interes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dominion; and will study to reconcile the divergent opinions referred to him, if it can be done, that he may attach all to himself (in which he will exert all his powers), and that alike in peace and war they may find out, what an advantage his single self is to them. And thus he will then be most independent, and most in possession of dominion, when he most consults the general welfare of the multitude.

第十一节　所以，不管君主是出于对民众的畏惧，或是为了争取大多数武装的民众，或是出于为民众考虑公共利益的无私精神，他都要批准议事会中得票最高的议案，也就是（本章第五节）[9_5] 最有利于国家大部分民众的议案；此外，君主还得千方百计去协调呈送给他的各种不同意见；如此他便可以让所有人信服自己（他一直致力于此），从而让民众明白，无论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君主本人对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所以，在君主最为民众共同福利考虑的时候，他最充分享受自己的权利，也最充分掌握他的统治权。

12 . For the king by himself cannot restrain all by fear. But his power, as we have said, rests upon the number of his soldiers, and especially on their valour and faith, which will always remain so long enduring between men, as with them is joined need, be that

need honourable or disgraceful. And this is why kings usually are fonder of exciting than restraining their soldiery, and shut their eyes more to their vices than to their virtues, and generally, to hold under the best of them, seek out, distinguish, and assist with money or favour the idle, and those who have ruined themselves by debauchery, and shake hands with them, and throw them kisses, and for the sake of mastery stoop to every servile action. In order therefore that the citizens may be distinguished by the king before all others, and, as far as the civil state and equity permit, may remain independent,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militia should consist of citizens only, and that citizens should be his counsellors; and on the contrary citizens are altogether subdued, and are laying the foundations of eternal war, from the moment that they suffer mercenaries to be levied, whose trade is war, and who have most power in strife and seditions.

第十二节　但是，仅凭君主本人无法慑服所有臣民。如前所述，他的权力依赖于士兵的数量，尤其是士兵的英勇与忠诚。只要人与人之间有着共同的需要，不论这需要是高尚的或可耻的，这种英勇与忠诚就会持续。所以君主往往更乐于做的事情是：激励士兵多于抑制士兵，纵容士兵的劣行多于优容其善行；而且为了压制其中最好的士兵，君主会特意挑选并启用一些游手好闲、腐败堕落的人，对他们施以金钱和恩惠，抛给他们飞吻，为了掌握统治权而卑躬屈膝做出各种卑贱的行为。因此，为了让公民在君主面前能有高于他人的地位，在国家状态和公正合理所允许的范围内能享有自己的权利，必须规定军队只能由公民组成，必须由公民担任君主的顾问官。反之，一旦君主募集并组建成雇佣军，公民就会遭到压迫，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中，因为雇佣军的职业就是战争，在战争和叛乱中他们掠取最大的权力。

13 . That the king's counsellors ought not to be elected for life,

but for three, four, or five years, is clear as well from the tenth, as from what we said in the ninth section of this chapter. For if they were chosen for life, not only coul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citizens conceive hardly any hope of obtaining this honour, and thus there would arise a great inequality, and thence envy, and constant murmurs, and at last seditions, which, no doubt, would be welcome to kings greedy of mastery: but also the counsellors, being rid of the fear of their successors, would assume a great licence in all respects, which the king would be far from opposing. For the more the citizens hate them, the more they will cling to the king, and be ready to flatter him. Nay, the interval of five years seems even too much, for in such a space of time it does not seem so impossible to corrupt by bribes or favour a very large part of the council, however large it be. And therefore it will be far safer, if every year two out of every clan retire, and be replaced by as many more (supposing that there are to be five counsellors of each clan), except in the year in which the jurist of any clan retires, and a fresh one is chosen in his place.

第十三节　从我们在本章第十节和第九节中的论述可以清楚看到，君主的顾问官不应该是终身制的，其任期应该是三年、四年或五年。因为，如果是终身制，不仅使大部分公民无望得到这个荣耀的职位，造成巨大的不平等，从而引起嫉妒，怨声不绝，最终导致暴乱，而无疑这正是贪恋统治权的君主乐于看到的；而且，顾问官们自己，因为不用担心会有继任者替换他们，就会在各个方面肆意妄行；而君主也不会全力去反对，因为公民越是痛恨顾问官，他们就越会依附并阿谀奉承君主。实际上，五年的任期甚至都太长了，因为不管议事会有多大，人数有多少，在五年的时间内通过行贿或施恩惠的手段拉拢一大部分成员从而腐化议事会，似乎不是不可能。因此，更为安全的做法是，规定每个氏族每年都有两名顾问官必须退休，由两名其他人替补（假设每个氏族有五名顾问官）。但是，每个氏族的法律顾问官

新旧交替的那一年不算在内。

14 . Moreover, no king can promise himself more safety, than he who reigns in a commonwealth of this sort. For besides that a king soon perishes, when his soldiers cease to desire his safety, it is certain that kings are always in the greatest danger from those who are nearest their persons. The fewer counsellors, then, there are, and the more powerful they consequently are, the more the king is in danger of their transferring the dominion to another. Nothing in fact more alarmed David, than that his own counsellor Ahitophel sided with Absalom. [8_6] Still more is this the case, if the whole authority has been transferred absolutely to one man, because it can then be more easily transferred from one to another. For two private soldiers once took in hand to transfer the Roman Empire, and did transfer it. [8_7] I omit the arts and cunning wiles, whereby counsellors have to assure themselves against falling victims to their unpopularity; for they are but too well known, and no one, who has read history, can be ignorant, that the good faith of counsellors has generally turned to their ruin. And so, for their own safety, it behoves them to be cunning, not faithful. But if the counsellors are too numerous to unite in the same crime, and are all equal, and do not hold their office beyond a period of four years, they cannot be at all objects of fear to the king, except he attempts to take away their liberty, wherein he will offend all the citizens equally. For, as Antonio Perez [8_8] excellently observes, an absolute dominion is to the prince very dangerous, to the subjects very hateful, and to the institutes of God and man alike opposed, as innumerable instances show.

第十四节　　只有以这种方法治理国家，君主才能保证自己的安

全。因为除此之外，如果士兵不再维护君主的安全，君主将旦夕倾覆。显然，君主最大的危险来自于最亲近他的人。因此，顾问官人数越少，他们的权力也就越大，君主的政权被他们转交给他人的可能性也越大。实际上，最让大卫害怕的事情莫过于他自己的顾问官亚希多弗站到押沙龙的一边 [9_6] 。大卫的情况也说明，如果把全部权力交给一个人，那么权力从这个人手中转交到另一个人手中也就容易得多。两个亲近的士兵联手转移罗马帝国的政权，并且真的做到了 [9_7] 。我暂且不多谈顾问官为了让自己不会招人记恨而采用的种种阴谋诡计，因为这种事情众所周知。所有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顾问官常常因为忠诚而遭杀身之祸。因此，为了保全自己，他们必然变得狡诈不忠诚。但是，如果顾问官人数众多，多到他们难以在同一件罪行上串通一气，并且他们之间人人平等，且任期不超过四年，那么，他们就根本构不成对君主的威胁；除非君主企图剥夺他们的自由，而这将触犯所有的公民。安东尼奥·佩雷斯 [9_8] 曾经精妙地评述过：绝对的统治权使君主危险，让国民憎恨，不符合上帝的神律，也违背人世的惯例。无数的先例都证明了这一点。

15 . Besides these we have, in the last chapter, laid other foundations, by which the king is greatly secured in his dominion, and the citizens in their hold of peace and liberty, which foundations we will reason out in their proper places. For I was anxious above everything to reason out all those, which refer to the great council and are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Now I will continue with the others, in the same order in which I stated them.

第十五节　除了以上这些，在上一章里我们列举了一些其他的基本原则，君主可以凭借它们而保证自己的政权安全稳定，公民可以因它们而拥有和平与自由。我们将在合适的时候对它们进行论述。在所有这些原则中，我最急切首先予以论证的是与大议事会相关的原则，因为它非常重要。现在，我将按照上一章列举的顺序逐一论证其他的

基本原则。

16 . It is undoubted, that citizens are more powerful, and, therefore, more independent, the larger and better fortified their towns are. For the safer the place is, in which they are, the better they can defend their liberty, and the less they need fear an enemy, whether without or within; and it is certain that the more powerful men are by their riches, the more they by nature study their own safety. But cities which need the help of another for their preservation are not on terms of equal right with that other, but are so far dependent on his right as they need his help. For we showed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at right is determined by power alone.

第十六节　毋庸置疑，城市越大，设防越好，其公民就越有力量，也越能充分享受自己的权利。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越安全，他们就越能维护自己的自由，越无需害怕国内外的敌人。人们越是实力雄厚有力量，自然就越会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是，如果一个城市需要别的城市来帮助维持自身的安全，则它就无法拥有与那个城市相同的权利。只要它需要另一个城市的帮助，它就得依靠那另一个城市，就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述，权利的大小由力量决定。

17 . For the same reason, also, I mean that the citizens may continue independent, and defend their liberty, the militia ought to be composed of the citizens only, and none of them to be exempted. For an armed man is more independent than an unarmed (Sec. 12); and those citizens transfer absolutely their own right to another, and entrust it entirely to his good faith, who have given him their arms and the defences of their cities. Human avarice, by which most men are very much led, adds its weight to this view. For it

cannot be, that a mercenary force be hired without great expense; and citizens can hardly endure the exactions required to maintain an idle soldiery. But that no man, who commands the whole or a large part of the militia, should, except under pressure of necessity, be chosen for the extreme term of a year, all are aware, who have read history, alike sacred and profane. For there is nothing that reason more clearly teaches. For surely the might of dominion is altogether entrusted to him, who is allowed enough time to gain military glory, and raise his fame above the king's, or to make the army faithful to himself by flattery, largess, and the other arts, whereby generals are accustomed to procure the enslavement of others, and the mastery for themselves. Lastly, I have added this point for the greater safety of the whole dominion, that these commanders of the militia are to be selected from the king's counsellors or ex-counsellors—that is, from men who have reached the age at which mankind generally prefer what is old and safe to what is new and dangerous. [8_9]

第十七节　同样的道理，如果公民想要保持自己的权利并维护自由，则军队必须只能由公民组成，且任何人不能豁免兵役。因为武装的人比没有武装的人更享有自己的权利（本章第十二节），所以公民给予那些人武器和保卫城市的任务，完全是基于对他们的忠诚的信任。驱使着大多数人的人类利欲进一步佐证了这个观点。因为，雇佣一支雇佣军必然耗资巨大，而公民无法承担维持一支闲置的军队所需要的各种赋税。但是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不管他读的是宗教历史还是世俗历史，除非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任何被选出掌管整个军队或大部分军队的人，任期最长不能超过一年，因为这是理性再清楚不过的教导。因为，如果给他足够长的时间，他就能获得军功荣誉，让自己的声望超过君主；或者他会用将军们惯用的伎俩，比如献媚士兵、施加恩惠以收买人心，让军队只忠于他，并拉拢别人，控制别人，那么他就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全部力量。最后，为了国家更加安全，我再加

上一条：这些军队的指挥官只能从君主的顾问官或前任顾问官中选出，也就是说，选择那些年纪已长的人，他们更喜欢旧的安全的东西，而不愿意尝试新的危险的事物。这是人类的通性 [9_9] 。

18 . I said that the citizens were to be divided into clans, [8_10] and an equal number of counsellors chosen from each, in order that the larger towns might have,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their citizens, a greater number of counsellors, and be able, as is equitable, to contribute more votes. For the power and, therefore, the right of a dominion is to be estimated by the number of its citizens; and I do not believe that any fitter means can be devised for maintaining this equality between citizens, who are all by nature so constituted, that everyone wishes to be attributed to his own stock, and be distinguished by race from the rest.

第十八节　前面我说过，公民要分成氏族 [9_10] ，从每个氏族中选出等同数量的顾问官，这是为了使较大的城市按照公民数量的比例，能拥有较多的顾问官，并且能够公平地拥有较多的投票权。一个国家的力量是由公民的人数来衡量的，从而决定其权利；而且，人的天性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归属于自己的血统，并根据种族把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所以我不认为会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来维持公民间的这种平等。

19 . Furthermore,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ere is nothing which any man can less claim for himself, and make his own, than the soil, and whatever so adheres to the soil, that he cannot hide it anywhere, nor carry it whither he pleases. The soil, therefore, and whatever adheres to it in the way we have mentioned, must be quite common property of the commonwealth—that is, of all those

who, by their united force, can vindicate their claim to it, or of him to whom all have given authority to vindicate his claim. And therefore the soil, and all that adheres to it, ought to have a value with the citizens proportionate to the necessity there is, that they may be able to set their feet thereon, and defend their common right or liberty. But in the eighth section of this chapter we have shown the advantages that the commonwealth must necessarily derive hence.

第十九节　此外，在自然状态下，最难索取并据为己有的东西莫过于土地以及附着于土地上的一切既不能隐蔽也不能搬走的东西。因此，土地以及附着于土地的一切东西必须是国家的公共财产，也就是说，是属于那些通过联合的力量能够保护他们所拥有的东西的人们；或者只属于那个接受了人们赋予的权利而能够保护其所拥有的东西的人。由此可见，土地以及附着于土地上的东西对公民的价值在于，他们能够立足于此，保护他们的共同权利和自由。本章第八节我们说明了国家从这个原则中必定能获得的好处。

20 . In order that the citizens may be as far as possible equal, which is of the first necessity in a commonwealth, none but the descendants of a king are to be thought noble. But if all the descendants of kings were allowed to marry wives, or beget children, they would grow, in process of time, to a very large number, and would be, not only burdensome, but also a cause of very great fear, to king and all. For men who nave too much leisure generally meditate crime. And hence it is that kings are, on account of their nobles, very much induced to make war, because kings surrounded with nobles find more quietness and safety in war than in peace. But I pass by this as notorious enough, and also the points which I have mentioned in Secs. 15-27 of the last chapter. For the

main points have been proved in this chapter, and the rest are self-evident.

第二十节　为了让公民之间尽可能地平等——对国家来说最为重要的事——除王室后裔外任何人不能成为贵胄。但是，如果允许君主所有的后裔都结婚生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人数将越来越多，对君主和所有人来说，不仅成为一种负担，而且会构成可怕的威胁。因为闲暇太多的人往往会图谋犯罪。因此，由于贵胄的缘故，君主总是有意进行战争，因为平日里被众多贵胄所包围的君主发现，战争更能给他带来清静与安全。在此我不予论述这众所周知的事情，而且上一章第十五至二十七节所提到的事情也是如此。本章已经论证了其中的主要问题，其他问题也就不言自明了。

21 . That the judges ought to be too numerous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m to be accessible to the bribes of a private man, and that they should not vote openly, but secretly, and that they deserve payment for their time, is known to everyone [8_11] But they everywhere have by custom a yearly salary; and so they make no great haste to determine suits, and there is often no end to trials. Next, where confiscations accrue to the king, there frequently in trials not truth nor right, but the greatness of a man's riches is regarded. Informers are ever at work, and everyone who has money is snatched as a prey, which evils, though grievous and intolerable, are excused by the necessity of warfare, and continue even in time of peace. But the avarice of judges that are appointed but for two or three years at most is moderated by fear of their successors, not to mention, again, that they can have no fixed property, but must lend their money at interest to their fellow-citizens. And so they are forced rather to consult their welfare than to plot against them, especially if the judges themselves, as we have said, are numerous.

第二十一节　至于法官，众所周知的是：法官必须人数众多，以致任何个人无法贿赂其中的大部分人；法官不能公开表决只能秘密投票；法官应该得到应得的报酬 [9_11] 。但是，如果各个地方依照惯例付给法官年薪，则他们处理诉讼时就不会急于尽快解决，经常还会有些案件没有处理结果。此外，如果没收的财产归于君主，则经常会发生审案时不论真理或正义，只论当事人财产多寡的事情；告发的事情盛行，每个有钱人像猎物一样被抢夺。这些恶行极其恶劣且不可容忍。若在战争时期发生这些事情，也许是迫于需要因而可以原谅，但是，在和平时期却依然持续。反之，任期只有两三年的法官由于会顾忌其继任者，他们的贪欲会因此得到节制。再者，由于没有固定财产，法官要挣钱就必须向本国同胞放贷，因此他们不得不考虑为同胞谋求福利，而不是暗算他们。前文提过，尤其是当法官人数众多，情况更会如此。

22 . But we have said, that no military pay is to be voted, [8_12] for the chief reward of military service is liberty. For in the state of nature everyone strives, for bare liberty's sake, to defend himself to the utmost of his power, and expects no other reward of warlike virtue but his own independence. But, in the civil state, all the citizens together are to be considered as a ma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therefore, when all fight on behalf of that state, all are defending themselves, and engaged on their own business. But counsellors, judges, magistrates, and the like, are engaged more on others' business than on their own; and so it is but fair to pay them for their time. Besides, in war, there can be no greater or more honourable inducement to victory than the idea of liberty. But if, on the contrary,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citizens be designated as soldiers, on which account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award them a fixed pay, the king will, of necessity, distinguish them above the rest (as we showed in Sec. 12)—that is, will distinguish men who

are acquainted only with the arts of war, and, in time of peace, from excess of leisure, become debauched, and, finally, from poverty, meditate nothing but rapine, civil discord, and wars. And so we can affirm, that a monarchy of this sort is, in fact, a state of war, and in it only the soldiery enjoy liberty, but the rest are slaves.

第二十二节　前面我们说过，军人不应该有薪俸[9_12]，因为自由就是服兵役的最高报酬。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为了自由尽其所能保卫自己；除独立自主外，他英勇奋战并没有指望其他的报酬。但是，在国家状态下，所有的公民应该被视为一个人，像自然状态下的人一样，所以，当所有人为了国家而战时，他们是在保卫自己，是在做他们自己的事。而顾问官、法官、文职官员等，从事的更多是别人的事务，所以付给他们薪酬是公平合理的。此外，在战争中，没有什么能比获得自由的想法更能激发胜利的荣耀。反过来说，如果选定一部分的公民担任军职，并因此必须付给他们一份固定的薪酬，那么君主对待他们必然有别于别人（如本章第十二节所述），也就是说，君主给那些通晓战事的人的待遇会优于他人。而且，在和平时期，由于他们过于闲适而放荡颓废，最终导致入不敷出，于是整天尽想着抢劫掠夺，制造冲突并引起战争。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君主国家实际上是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只有军人享有自由，而其他人都是奴隶。

23 . Our remarks about the admission of foreigners (Chap. 6. Sec. 32) I believe to be obvious. Besides, no one can doubt that the king's blood-relations should be at a distance from him, and occupied, not by warlike, but by peaceful business, whence they may get credit and the dominion quiet. Though even this has not seemed a sufficient precaution to the Turkish despots, who, therefore, make a point of slaughtering all their brothers. And no wonder: for the more absolutely the right of dominion has been

conferred on one man, the more easily, as we showed by an instance (Sec. 14), it can be transferred from one to another. But that in such a monarchy, as we here suppose, in which, I mean, there is not one mercenary soldier, the plan we have mentioned provides sufficiently for the king's safety, is not to be doubted.

第二十三节　我们已清楚论述过外国人的准入制度（第六章第三十二节）。此外，没有人会质疑，君主的血亲应该远离君主，担任一些与战争无关的和平职务，藉此获得荣誉并使国家得到安宁。不过对土耳其的暴君们来说，即使这样做也不足以防范他们的血亲，因此坚决残杀了自己所有的兄弟。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越是把统治权完全交给一个人，这权利就越容易被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上，我们之前举过例子论证过这一点（本章第十四节）。但是，我们这里所设想的君主国家没有雇佣军，毫无疑问，上述措施足以保证君主的安全。

24 . Nor can anyone hesitate about what we have said in the thirty-fourth and thirty-fifth sections of the last chapter. But that the king must not marry a foreigner [8_13] is easily proved. For not to mention that two commonwealths, although united by a treaty, are yet in a state of hostility (Chap. 3. Sec. 14), it is very much to be avoided that war should be stirred up, on account of the king's domestic affairs, both because disputes and dissensions arise peculiarly from an alliance founded on marriage, and because questions between two commonwealths are mostly settled by war. Of this we read a fatal instance in Scripture. For after the death of Solomon, who had married the king of Egypt's daughter, his son Rehoboam waged a most disastrous war with Shishak, king of the Egyptians, who utterly subdued him. [8_14] Moreover, the marriage of Lewis XIV, king of France with the daughter of Philip IV was the seed of a fresh war. [8_15] And, besides these, very many instances

may be read in history.

第二十四节　我在上一章第三十四节和三十五节里所提到的措施也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不难论证为何君主不能娶外国女子为妻 [9_13] 。且不说即使是有盟约的两个国家也会处于敌对状态（第三章第十四节），需要特别注意防止因为君主家事的缘故而引起战争。因为以婚姻为基础的联盟尤其容易产生争论和分歧的意见，而且两国之间的问题大多是通过战争解决。《圣经》里有一个极其惨痛的例子：所罗门王娶了埃及国王的女儿为妻，他去世后，他的儿子罗波安和埃及国王示撒进行了一场最具灾难性的战争 [9_14] ，最终被完全征服。还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娶了菲利普四世的女儿为妻，播下了新战争的种子 [9_15] 。除了以上这些，历史上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25 . The form of the dominion ought to be kept one and the same, and, consequently, there should be but one king, and that of the same sex, and the dominion should be indivisible. [8_16] But as to my saying that the king's eldest son should succeed his father by right, or (if there be no issue) the nearest to him in blood, it is clear as well from Chap. 6. Sec. 13, as because the election of the king made by the multitude should, if possible, last for ever. Otherwise it will necessarily happen, that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he dominion will frequently pass to the multitude, which is an extreme and, therefore, exceedingly dangerous change. But those who, from the fact that the king is master of the dominion, and holds it by absolute right, infer that he can hand it over to whom he pleases, and that, therefore, the king's son is by right heir to the dominion, are greatly mistaken. For the king's will has so long the force of law, as he holds the sword of the commonwealth; for the right of dominion is limited by power only. Therefore, a king may indeed abdicate, but cannot hand the dominion over to another, unless

with the concurrence of the multitude or its stronger part. And that this may be more clearly understood, we must remark, that children are heirs to their parents, not by natural, but by civil law. For by the power of the commonwealth alone is anyone master of definite property. And, therefore, by the same power or right, whereby the will of any man concerning his property is held good, by the same also his will remains good after his own death, as long as the commonwealth endures.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everyone in the civil state maintains after death the same right as he had in his lifetime, because, as we said, it is not by his own power, but by that of the commonwealth, which is everlasting, that he can decide anything about his property. But the king's case is quite different. For the king's will is the civil law itself, and the king the commonwealth itself. Therefore, by the death of the king, the commonwealth is in a manner dead, and the civil state naturally returns to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consequently the supreme authority to the multitude, which can, therefore, lawfully lay down new and abolish old laws. And so it appears that no man succeeds the king by right, but him whom the multitude wills to be successor, or in a theocracy, such as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Hebrews once was, him whom God has chosen by a prophet. We might likewise infer thi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king's sword, or right, is in reality the will of the multitude itself, or its stronger part; or else from the fact, that men endowed with reason never so utterly abdicate their right, that they cease to be men, and are accounted as sheep. But to pursue this further is unnecessary.

第二十五节　　国家的形式必须保持不变，因此，只能有一个君主，而且必须是男性，并且统治权不可分割 [9_16] 。至于我提出的由君主长子依法继承王位，或（如果君主没有子嗣）由与君主血缘最亲的人继承王位之事，这不仅在第六章第十三节已论述清楚，而且还因

为，由民众选举的君主应该保持永远不变，如果可能的话。否则，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国家最高统治权会频繁复归于民众手中，这会带来极大变动，因而极其危险。有些人认为，既然君主是一国之主，拥有国家的绝对权利，他自然可以把国家交给他喜欢的人，因此君主的儿子就是法定继承人。这些人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只有君主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时候，他的意愿才具有法律效力，而统治的权利完全取决于民众的力量。所以，一个君主可以退位，但是他不能把统治权移交给别人，除非得到民众或民众中势力较强的那一方的允许。为了更清楚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指出，孩子是父母的继承人，依据的不是自然法则，而是国法。因为只有依据国家的力量，即国法，一个人才能成为一定的财产的主人。因此，依据同样的国家的力量，一个人才能按自己的意愿支配他的财产；也是依据同样的力量，一个人死后，只要国家继续存在，他的意愿就依然有效。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家状态下，每个人死后仍然保留着和他生前一样的权利，因为，如前文所述，他能借以决定自己财产的不是他个人的力量，而是永恒的国家的力量。但是君主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君主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君主本人就是国家本身，所以，如果君主去世，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也就终结了，国家状态自然也就回归到自然状态，于是最高权力又回归到民众身上，民众自然就有权利制定新的法律，废除旧的法律。所以，没有人有权继承君主王位，除非民众愿意拥护他当继承人；或者，在神权政体中，如希伯来国家，上帝通过先知选定的人可以当继承人。而且，我们这样推论的依据还在于：其一，君主的军刀，即君主的权利实际上就是民众自己的意愿，或者是民众中较为强大的那一方的意愿；其二，具有理性的人永远不会完全放弃自己的权利，以至于让自己无法成为独立的人，而是被视为绵羊般受人牵制。关于这一点，无需再进一步论述。

26 . But the right of religion, or of worshipping God, no man can transfer to another. However, we have treated of this point at length in the last chapters of our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 which it is superfluous to repeat here. And herewith I claim to have

reasoned out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monarchy, though briefly, yet with sufficient clearness. But their mutual interdependence, or, in other words, the proportions of my dominion, anyone will easily remark, who will be at the pains to observe them as a whole with some attention. It remains only to warn the reader, that I am here conceiving of that monarchy, which is instituted by a free multitude, for which alone these foundations can serve. For a multitude that has grown used to another form of dominion will not be able without great danger of overthrow to pluck up the accepted foundations of the whole dominion, and change its entire fabric.

第二十六节　此外，宗教权利，或崇拜上帝的权利，没有人能够让给别人。在《神学政治论》的最后几章，我们已详细论述过此事，在此没有重复的必要。至此，我自认为已经简要但清楚地论证了最佳的君主政体的各项基本原则。但是，那些用心从整体上研究这些基本原则的人会不难看到，这些原则是相互依存的。换句话说，即政权各部分间相互均衡。不过依然要提醒读者的是，我这里所设想的君主政体是由自由的民众建立的君主政体，所有的这些基本原则只对这样的民众有用。因为，已经习惯了另一种统治形式的民众不会冒着倾覆国家的危险去废除已经被接受的整个国家的基本原则，改变整个国家结构。

27 . And what we have written will, perhaps, be received with derision by those who limit to the populace only the vices which are inherent in all mortals; and use such phrases as, “the mob, if it is not frightened, inspires no little fear,” and “the populace is either a humble slave, or a haughty master,” and “it has no truth or judgment,” etc. But all have one common nature. Only we are deceived by power and refinement. Whence it comes that when two do the same thing we say, “this man may do it with impunity, that

man may not;” not because the deed, but because the doer is different. Haughtiness is a property of rulers. Men are haughty, but by reason of an appointment for a year; how much more then nobles, that have their honours eternal! But their arrogance is glossed over with importance, luxury, profusion, and a kind of harmony of vices, and a certain cultivated folly, and elegant villainy, so that vices, each of which looked at separately is foul and vile, because it is then most conspicuous, appear to the inexperienced and untaught honourable and becoming. “The mob, too, if it is not frightened, inspires no little fear;” yes, for liberty and slavery are not easily mingled. Lastly, as for the populace being devoid of truth and judgment, that is nothing wonderful, since the chief business of the dominion is transacted behind its back, and it can but make conjectures from the little, which cannot be hidden. For it is an uncommon virtue to suspend one's judgment. So it is supreme folly to wish to transact everything behind the backs of the citizens, and to expect that they will not judge ill of the same, and will not give everything an unfavourable interpretation. For if the populace could moderate itself, and suspend its judgment about things with which it is imperfectly acquainted, or judge rightly of things by the little it knows already, it would surely be more fit to govern, than to be governed. But, as we said, all have the same nature. All grow haughty with rule, and cause fear if they do not feel it, and everywhere truth is generally transgressed by enemies or guilty people; especially where one or a few have mastery, and have respect in trials not to justice or truth, but to amount of wealth.

第二十七节　有些人把人类天生就有的缺点说成是只有平民才有，并用这些话来描述平民：“对于乱民，不恐吓不足以使其畏惧”；“平民要么是低微卑贱的奴隶，要么就是傲慢自大的老爷”；以及“平民不识真理不懂判断”等等。这些人大概会对我们所说的观点报

以嘲笑奚落的态度。但是，实际上，所有人有着共同的天性，我们只是被别人的权势和教养所蒙蔽而已。所以，当两个人做同样的事情时，我们会说“这个人这样做可以，那个人这样做不能容忍。”不是事情不一样，而是因为做的人不同，这是因人而异，不是因事而异。统治者的特点是傲慢。如果说一个人在职一年就表现得傲慢自大，那么终身享有荣誉的贵胄们又会如何？但是，他们会用职高位重、豪华奢侈、慷慨阔绰来掩饰他们的傲慢。他们让各种恶习达成某种协调，有教养地做着荒唐的事，优雅地进行着卑劣行径。如果分开来看这些行为，种种都是邪恶卑劣的，因为这太显而易见；但是对于无经验者和无知者，这些被粉饰的行为却显得高贵荣耀而且合理得体。至于说“对乱民不恐吓不足以使其畏惧”，是因为自由和奴役难以轻易兼蓄。最后，如果说平民“不识真理不懂判断”，也不足为奇，因为国家大事并未向他们公开，他们只能根据少量隐瞒不了的情况进行推测从而做出判断。其实，遇事不做判断是非常罕见的品行。所以，如果一方面是背着公民处理所有国事，另一方面又期望公民能做出正确判断或恰当的解释，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如果平民能够克制自己，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不做评判；或者他们能根据所掌握的蛛丝马迹就对事情判断无误，那么他们便有资格统治别人而不是被人统治了。不过，如前所述，所有的人都有着一样的天性。所有的人有了统治权就会变得骄矜，而且，自己无所畏惧时就会让他人感到畏惧。而且，在任何地方，反对者或有罪者都会歪曲真相。有些地方情况尤其如此；在这些地方，往往只有一个人或少数人掌握权力，并且在审判时他们考虑的不是正义或真理，而是当事方财产的多寡。

28 . Besides, paid soldiers, that are accustomed to military discipline, and can support cold and hunger, are likely to despise a crowd of citizens as very inferior for storming towns or fighting pitched battles. But that my dominion is, therefore, more unhappy or less durable, no one of sound mind will affirm. But, on the contrary, everyone that judges things fairly will admit, that that dominion is the most durable of all, which can content itself with

preserving what it has got, without coveting what belongs to others, and strives, therefore, most eagerly by every means to avoid war and preserve peace.

第二十八节　　雇佣军习惯军队纪律，能够忍饥耐寒。在他们看来，市民群众在攻略城池或野外激战时比他们差的太多。但是，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认为我们这里所设想的国家会因为民众的这个弱点而不幸福或不稳定。反之，任何一个能够公正评判的人都会承认，一个能够保卫自己所有，从不觊觎别人之物，并尽己所能用各种方法避免战争维护和平的国家，是最为稳定持久的国家。

29 . But I admit that the counsels of such a dominion can hardly be concealed. But everyone will also admit with me that it is far better for the right counsels of a dominion to be known to its enemies, than for the evil secrets of tyrants to be concealed from the citizens. They who can treat secretly of the affairs of a dominion have it absolutely under their authority, and, as they plot against the enemy in time of war, so do they against the citizens in time of peace. Now that this secrecy is often serviceable to a dominion, no one can deny; but that without it the said dominion cannot subsist, no one will ever prove. But, on the contrary, to entrust affairs of state absolutely to any man is quite incompatible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liberty; and so it is folly to choose to avoid a small loss by means of the greatest of evils. But the perpetual refrain of those who lust after absolute dominion is, that it is to the essential interest of the commonwealth that its business be secretly transacted, and other like pretences, which end in the more hateful a slavery, the more they are clothed with a show of utility.

第二十九节　我必须承认，这种国家的计划意图是难以保密的。但是，每个人都会和我一样承认，比起对公民隐瞒暴君的阴谋罪恶，将国家的正当意图向敌人公开反而要好得多。那些秘密处理国家事务的人掌控着整个国家，他们在作战时谋划对付敌人，也会在和平时期居心叵测地算计公民。没有人会否认，保守秘密往往对国家有益，但是，如果说没有保密国家就无法存在，应该也没有人能够证明。但反之，如果把国家事务完全托付给一个人，同时又想保持自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为避小害而招大祸是极其愚蠢的做法。而那些贪恋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永远会如此高歌：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必须秘密处理国家事务，以及一些类似的借口。这些借口致使民众陷于奴役状态；它越是披着利国利民的外衣，越是让人憎恨这种奴役。

30 . Lastly, although no dominion, as far as I know, has ever been founded on all the conditions we have mentioned, yet from experience itself we shall be able to prove that this form of monarchy is the best, if we consider the causes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overthrow of any dominion that is not barbarous. But this I could not do without greatly wearying the reader. However, I cannot pass over in silence one instance, that seems worth remembering: I mean the dominion of the Aragonese, who showed a singular loyalty towards their kings, and with equal constancy preserved unbroke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For as soon as they had cast off the slavish yoke of the Moors, they resolved to choose themselves a king, but on what conditions they could not quite make up their minds, and they therefore determined to consult the sovereign pontiff of Rome. He, who in this matter certainly bore himself as Christ's vicar, blamed them for so obstinately wishing to choose a king, unwarned by the example of the Hebrews. However, if they would not change their minds, then he advised them not to choose a king, without first instituting customs equitable and suitable to the national genius, and above all

he would have them create some supreme council, to balance the king's power like the ephors of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o have absolute right to determine the disputes, which might arise between the king and the citizens. So then, following this advice, they established the laws, which seemed to them most equitable, of which the supreme interpreter, and therefore supreme judge, was to be, not the king, but the council, which they call the Seventeen, and whose president has the title of Justice. [8_17] This Justice then, and the Seventeen, who are chosen for life, not by vote but by lot, have the absolute right of revising and annulling all sentences passed upon any citizen by other courts, civil or ecclesiastical, or by the king himself, so that every citizen had the right to summon the king himself before this council. Moreover, they once had the right of electing and deposing the king. But after the lapse of many years the king, Don Pedro, who is called the Dagger, by canvassing, bribery, promises, and every sort of practice, at length procured the revocation of this right. And as soon as he gained his point, he cut off, or, as I would sooner believe, wounded his hand before them all, saying, that not without the loss of royal blood could subjects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king. [8_18] Yet he effected this change, but upon this condition, “That the subjects have had and shall have the right of taking arms against any violence whatever, whereby any may wish to enter upon the dominion to their hurt, nay, against the king himself, or the prince, his heir, if he thus encroach.” By which condition they certainly rather rectified than abolished that right. For, as we have shown (Chap. 4. Secs. 5, 6), a king can be deprived of the power of ruling, not by the civil law, but by the law of war, in other words the subjects may resist his violence with violence. Besides this condition they stipulated others, which do not concern our present design. Having by these customs given themselves a constitution to the mind of all, they continued for an incredible length of time unharmed, the king's loyalty towards his subjects

being as great as theirs towards him. But after that the kingdom fell by inheritance to Ferdinand of Castile, who first had the surname of Catholic; this liberty of the Aragonese began to displease the Castilians, who therefore ceased not to urge Ferdinand to abolish these rights. But he, not yet being accustomed to absolute dominion, dared make no such attempt, but replied thus to his counsellors: that (not to mention that he had received the kingdom of Aragon on those terms, which they knew, and had most solemnly sworn to observe the same, and that it was inhuman to break his word) he was of opinion, that his kingdom would be stable, as long as its safety was as much to the subjects' as to the king's interest, so that neither the king should outweigh the subjects, nor yet the subjects the king; for that if either party were too powerful, the weaker would not only try to recover its former equality, but in vexation at its injury to retaliate upon the other, whence would follow the ruin of either or both. Which very wise language I could not enough wonder at, had it proceeded from a king accustomed to commanding not freemen but slaves. Accordingly the Aragonese retained their liberties after the time of Ferdinand, though no longer by right but by the favour of their too powerful kings, until the reign of Philip II., who oppressed them with better luck, but no less cruelty, than he did the United Provinces. And although Philip III is supposed to have restored everything to its former position, yet the Aragonese, partly from eagerness to flatter the powerful (for it is folly to kick against the pricks), partly from terror, have kept nothing but the specious names and empty forms of liberty.

第三十节　最后，据我所知，虽然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建立时是依据我们所提到的全部的根本原则，但是，如果考察一下那些并不残暴的国家存续和覆灭的原因，那么，根据经验可以证明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形式的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我不在此处一一考察证明，因为这必定

会让读者烦不胜烦。但是，对于这一个值得牢记的例子，我不能避而不谈，那就是阿拉贡王国。阿拉贡人对他们的君主非常忠诚，坚定地维护着王国的全部制度。他们一摆脱摩尔人的统治后就决心为自己选择一位君主。但是他们无法确定挑选君主应该依据什么条件，于是决定与罗马教皇商讨。在这件事情上，教皇全然把自己当成基督的代理人，责备他们没有吸取希伯来人的教训，决意要选择一位君主。但是，由于他们不愿意改变主意，教皇就建议他们在选择君主之前，首先制定出公正的并适合国家特征的规章制度，尤其是建立起像斯巴达监督官那样的最高议事会来平衡君主的权力，而且这个最高议事会对君主和公民之间可能出现的纠纷有着绝对的裁决权。于是，按照教皇的建议，阿拉贡人制定了他们认为最公正的法律，并规定法律的最终解释者，即最高裁决者，不是君主而是议事会。他们称之为“十七人院”议事会，其议长被称为“司法官”[9_17]。司法官及十七人院不是靠投票而是靠抽签选出并终身任职。他们有绝对的权利修正或废除其他法庭对公民做出的所有判决，不管这个判决是出自世俗法庭或是教会机构或是君主本人。所以，每个公民都有权把君主本人召唤到议事会上。而且，阿拉贡公民还一度拥有选立或废黜君主的权利。不过，多年以后，别名“短剑”的唐·佩德罗国王通过游说、贿赂、许诺和各种行为，终于得以取消了公民的这项权利。据说他一达到目的就当众切断自己的手，或者说是割伤自己的手——我更相信后者，并声称，允许国民选择君主必定会导致君主流血[9_18]。他达到了取消民众选立君主或废黜君主的权利的目的，但是，是基于以下条件的：如果有任何人想凭借暴力占有统治权，伤害民众利益，并真的侵占了权利，那么民众有权拿起武器反抗这种暴力，甚至反抗君主本人，或王子，或其继承人。这个条件与其说是废除不如说是修正了选废君主的权利。因为，如前所述（第四章第五节和第六节），能剥夺君主统治权力的不是国法，而是战争法则，换句话说，即国民可以以暴力抵制君主的暴力。除了这个条件，他们还规定了一些其他的与我们目前的讨论无关的条件。这些做法使得他们的规章制度获得一致认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完整未遭破坏的，其君主忠诚于国民，国民同样忠诚于君主。但是，在王国传承给第一个被称为天主教国王的卡斯蒂尔的费迪南之后，阿拉贡人的自由引起卡斯蒂尔人的嫉恨，于是卡斯蒂尔人不停地

催促费迪南废除那些权利。但是，由于费迪南尚不习惯于绝对统治，不敢作此尝试。但是，他这样回复他的顾问官（且不说他是根据众所周知的条件接手阿拉贡王国的，而且他最庄严地宣誓过要遵守这些条件，违背誓言是可耻的）：他认为，他的王国将是稳固的，只要君主与国民的利益同等安全，国民与君主间保持均势。因为，如果一方的力量过于强大，那么较弱的一方不仅会设法恢复其先前的平等地位，而且在愤愤不平中会报复对方，从而造成两败俱伤。这么明智的语言若是出自一位惯于统治奴隶而非自由民众的君主之口，我就真是赞叹不已了。因此，在费迪南时代之后，一直到菲利普二世时期，阿拉贡人仍然保持他们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再是一种权利，而是他们强大的君主所给的恩惠。比起对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压迫，菲利普二世对阿拉贡人的压迫更为顺利但同样残酷。虽然菲利普三世看起来像是完全恢复了旧制，但是阿拉贡人，部分是出于讨好强大的君主（螳臂当车是愚蠢的事），部分是出于恐惧，所以，除了名不副实和形式空洞的自由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保留下来。

31 . We conclude, therefore, that the multitude may preserve under a king an ample enough liberty; if it contrives that the king's power be determined by the sole power, and preserved by the defence of the multitude itself. And this was the single rule which I followed in lay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narchy.

第三十一节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如果民众能设法做到让君主的权力只取决于民众本身的力量，并只能靠民众的保护才得以存续，那么，在君主统治下，他们就能拥有充分的自由。这是我在制定君主政体的各项基本原则时遵循的唯一一条规律。

[8_1].*Daniel* vi. 15.

[8_2].Hom. "Odys.," xii. 156-200.

[8_3].Chap. I. Sec. 4 of the speech, or rather letter, which is not now admitted to be a genuine work of Sallust.

[8_4].*Ethics* , iii. 29, etc.

[8_5].This seems to be a mistake for Sec. 4, "*Id majori subditorum parti utile erit, quod in hoc concilio plurima habuerit suffragia.* " "What has most votes in such a council, will be to the interes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ubjects."

[8_6].*Sam* . xv. 31.

[8_7].Tacitus, *Histories* , i., 25.

[8_8].Antonio Perez, a publicist, and professor of law in the University of Louvain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8_9].Chap. 6. Sec. 10.

[8_10].Chap. 6. Secs. 11, 15, 16.

[8_11].Chap. 6. Secs. 27, 28.

[8_12].Chap. 6. Sec. 31.

[8_13].Chap. 6. Sec. 36.

[8_14].*1 Kings* xiv. 25; *2 Chron.* xii.

[8_15].The war between France and Spain, terminated by the first peace of Aix-la-Chapelle, 1668.

[8_16].Chap. 6. Sec. 37.

[8_17].See Hallam's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Chap.4, for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Aragon. Hallam calls the Justiza the Justiciary, but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Justice, seems warranted by our own English use of the word to designate certain judges.

[8_18].Hallam says, that the king merely cut the obnoxious Privilege of Union, which he describes rather differently, through with his sword. The Privilege of Union

was so utterly "eradicated from the records of the kingdom, that its precise words have never been recovered."

[9_1].《旧约·但以理书》第6章，第15节。

[9_2].《奥德修纪》卷十二，上海译文出版社汉译本，第150页。

[9_3].见于误传为撒路斯提乌斯所著《对晚年恺撒所发表的论共和国的演说》，第1章，第4节。

[9_4].《伦理学》第三部分，命题二十九及“情绪的界说”第44；第四部分，命题五十八。

[9_5].第五节似为第四节之误，即“获得多数通过的议案显然是对多数国民有利的议案”。

[9_6].《旧约·撒母耳记下》，第15章，第31节。

[9_7].塔西佗著，《历史》第一卷，第25章（《神学政治论》第17章中第226页的注文也引用此典故）。统治权从伽尔巴皇帝转移到奥托手中。

[9_8].安东尼奥·佩雷斯，公法学家，曾于17世纪上半叶任鲁汶大学法学教授。

[9_9].本书第六章，第十节。

[9_10].见本书第六章，第十一、十五、十六节。

[9_11].本书第六章，第二十七、二十八节。

[9_12].见本书第六章，第三十一节。显然，斯宾诺莎将战争时期对士兵的开支看作一种生活补贴而非薪俸。

[9_13].见本书第六章第三十六节

[9_14].《旧约列王纪上》，第14章；第25节以下；《历代志下》，第12章。

[9_15].指1667—1668年法国和西班牙关于西属尼德兰的归属权战争，1668年双方签订《亚琛条约》，战争结束。

[9_16].本书第六章，第三十七节。

[9_17].见哈雷姆所著《中世纪史》第四章，该章记述了阿拉贡的立宪史。哈雷姆称“法官”（Justiza）为“司法官”（Justiciary），但按照英语的用法，书面翻译似乎应为“司法官”（Justice），特指某些法官。

[9_18].佩雷斯所著《叙事录》英译本（1715，译者未署名）写道：“据说废除这样一项特权，即允许国民选国王，应该以过往的流血为代价。”因此，佩德罗宣称，他以自己的流血换取废除这项习以为常的特权。斯宾诺莎对佩雷斯的话有不同解释，而且更为明确，他认为这样一项特权对君主是危险的（参阅本章第二十五节）。哈雷姆则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国王在议会上只是以佩剑切掉记载国民诸特权的文件“Priviliege of Union”，从此该文件失传，迄今未发现。

Chapter 8 Of Aristocracy

第八章　关于贵族政体

1 . So far of monarchy. But now we will say, on what plan an aristocracy is to be framed, so that it may be lasting. We have defined an aristocratic dominion as that, which is held not by one man, but by certain persons chosen out of the multitude, whom we shall henceforth call patricians. I say expressly, “that which is held by certain persons chosen.” For the chief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and a democracy is, that the right of governing depends in an aristocracy on election only, but in a democracy for the most part on some right either congenital or acquired by fortune (as we shall explain in its place); and therefore, although in any dominion the entire multitude be received into the number of the patricians, provided that right of theirs is not inherited, and does not descend by some law to others, the dominion will for all that be quite an aristocracy, because none are received into the number of the patricians save by express election. But if these chosen persons were but two, each of them will try to be more powerful than the other, and from the too great power of each, the dominion will easily be split into two factions; and in like manner into three, four, or five factions, if three, four, or five persons were put into possession of it. But the factions will be the weaker, the more there are to whom the dominion was delegated. And hence it follows, that to secure the stability of an aristocracy,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proportionate size of the actual dominion,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minimum number of patricians.

第一节　迄今我们已经讨论了君主政体。现在我们要讨论如何组织贵族政体才能让它持久延续。之前我们阐述过，贵族政体是指，不是由一个人，而是由从民众中选出的一些人来执掌国家政权。下文中我们把这些人称为贵族。我特别强调“由一些选定的人执掌政权”，因为贵族政体与民主政体的主要不同在于：在贵族政体中，要获得统治权，只能依靠贵族的选拔推荐；而在民主政体中，统治权大多是一些与生俱来的权利或者是依靠机遇运气获得的权利（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再行解释）。所以，在一个国家里，就算所有民众都被承认为贵族，只要他们的权利不是世袭的，也不是通过某种法律让给他人的，这个国家就是贵族政体国家，因为，除非是通过特定的选拔，否则没有人能被纳入贵族行列。但是，如果被选定的贵族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都会设法让自己比另一个人更强大；由于两人的权势都很强大，国家就会被分裂为两派；如果掌权者有三个、四个或五个人，则国家就分裂为三派、四派或五派。但是，国家分裂的派数越多，各派的力量就越弱。因此，为了贵族政体的稳定，必须按照国家规模的大小来确定贵族的最低人数限度。

2 . Let it be supposed, then, that for a dominion of moderate size it suffices to be allowed a hundred of the best men, and that upon them has been conferred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he dominion, and that they have consequently the right to elect their patrician colleagues, when any of the number die. These men will certainly endeavour to secure their succession to their children or next in blood. And thus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he dominion will always be with those, whom fortune has made children or kinsmen to patricians. And, as out of a hundred men who rise to office by fortune, hardly three are found that excel in knowledge and counsel, it will thus come to pass, that the authority of the dominion will rest, not with a hundred, but only with two or three who excel by vigour of mind, and who will easily draw to themselves everything, and each of them, as is the wont of human

greed, will be able to prepare the way to a monarchy. And so, if we make a right calculation,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a dominion, whose size requires at least a hundred first-rate men, should be conferred on not less than five thousand. For by this proportion it will never fail, but a hundred shall be found excelling in mental vigour, that is, on the hypothesis that, out of fifty that seek and obtain office, one will always be found not less than first-rate, besides others that imitate the virtues of the first-rate, and are therefore worthy to rule.

第二节　因此，对于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来说，估计有一百名可以赋予国家统治权的优秀人物就足够了。如果贵族之中有人去世，他们有权选拔新的贵族同僚。当然，这些人会尽最大努力让自己的后代或近亲接替自己的职位。于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总是掌握在那些有幸成为贵族子孙或贵族亲属的人手中。然而，在一百名凭借幸运获得官职的人当中，恐怕都找不到两三个知识渊博善于谋略的人，因此，统治权其实并不是在那一百人手中，而在于那两三个才智出众的人手中。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包揽一切，而且他们中的每个人，出于人类贪婪的本性，都会各自筹谋着通往君主制的道路。所以，假如我们估算正确的话，一个按其规模大小需要至少一百位优秀人物的国家，它的统治权要赋予至少五千名贵族。假设在五十个谋求并得到官职的人当中，总会有一个是异常优秀的，而且其他人也会努力效仿这个优秀人物的品性从而使自己足以掌权当政，那么，按照这个比例选出一百个才智优秀的人肯定没有问题。

3．The patricians are most commonly citizens of one city, which is the head of the whole dominion, so that the commonwealth or republic has its name from it, as once that of Rome, and now those of Venice, Genoa, etc. But the republic of the Dutch has its name from an entire province, whence it arises, that

the subjects of this dominion enjoy a greater liberty. Now, before we can determine the foundations on which this aristocratic dominion ought to rest, we must observe a very great difference, which exists between the dominion which is conferred on one man and that which is conferred on a sufficiently large council. For, in the first place, the power of one man is (as we said, Chap. 6. Sec. 5) very inadequate to support the entire dominion; but this no one, without manifest absurdity, can affirm of a sufficiently large council. For, in declaring the council to be sufficiently large, one at the same time denies, that it is inadequate to support the dominion. A king, therefore, is altogether in need of counsellors, but a council like this is not so in the least. In the second place, kings are mortal, but councils are everlasting. And so the power of the dominion which has once been transferred to a large enough council never reverts to the multitude. But this is otherwise in a monarchy, as we showed (Chap. 8. Sec. 25). Thirdly, a king's dominion is often on sufferance, whether from his minority, sickness, or old age, or from other causes; but the power of a council of this kind, on the contrary, remains always one and the same. In the fourth place, one man's will is very fluctuating and inconstant; and, therefore, in a monarchy, all law is, indeed, the explicit will of the king (as we said, Chap. 7. Sec. 1), but not every will of the king ought to be law; but this cannot be said of the will of a sufficiently numerous council. For since the council itself, as we have just shown, needs no counsellors, its every explicit will ought to be law. And hence we conclude, that the dominion conferred upon a large enough council is absolute, or approaches nearest to the absolute. For if there be any absolute dominion, it is, in fact, that which is held by an entire multitude.

第三节　贵族通常都是国家首都城市的公民，所以该城市名也就

成了国家或共和国的名称，比如曾经的罗马共和国、现在的威尼斯王国、热那亚王国等等。但是，荷兰共和国采用的是全省的名称，因此这个国家的公民享有较大的自由。在我们确定贵族政体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之前，必须看到，由一个人掌握的政权与由具有足够规模的议事会掌握的政权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首先，一个人的力量（如第六章第五节所述）不足以承当起整个国家的重任。但是，如果有人不认可一个具有足够规模的议事会的作用，那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在承认议事会具有足够规模的同时，其实也就肯定了它是足以担起国家重任的。因此，君主必然需要顾问官，而这样的议事会根本不需要顾问官。其次，君主是终有一死的，而议事会是能永久存续的，所以，交于议事会的统治权是永远不会复归民众的。但是，如前所述（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在君主政体下情况并非如此。第三，由于君主的年少、疾病、衰老或其他原因，其统治权经常是有名无实，而规模足够大的议事会的权力却总能保持始终如一。第四，个人的意志总是动摇不定反复多变的，因此，在君主政体下，虽然一切法律都是君主公开宣布的意志（第七章第一节），但并不是君主所有的意愿都具有法律效力；而在具有足够规模的议事会里，情况就不会那样。因为，如我们刚刚所述，议事会本身并不需要顾问官，它公开表述的意愿必定都具有法律效力。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赋予具有足够规模的议事会统治权，其统治权是绝对的，或者说是接近于绝对。因为，如果存在绝对的统治，这种统治实际上是依靠全体民众行使的统治。

4 . Yet in so far as this aristocratic dominion never (as has just been shown) reverts to the multitude, and there is under it no consultation with the multitude, but, without qualification, every will of the council is law, it must be considered as quite absolute, and therefore its foundations ought to rest only on the will and judgment of the said council, and not on the watchfulness of the multitude, since the latter is excluded from giving its advice or its vote. The reason, then, why in practice aristocracy is not absolute, is that the multitude is a cause of fear to the rulers, and therefore

succeeds in retaining for itself some liberty, which it asserts and holds as its own, if not by an express law, yet on a tacit understanding.

第四节　　但是，既然在贵族政体下，统治权永远不会复归民众（如刚刚所述），民众也不能参与磋商政务，议事会的所有意愿都毫无例外地具有法律效力，那么这种统治当然是绝对统治。所以，它的各项基本原则必然是基于该议事会的意愿与判断，而不是基于民众的监督，因为民众被禁止发表意见或投票表决。所以，贵族政体实际上并没有行使绝对统治的原因在于，民众是统治者惧怕的对象。因此，当民众主张要拥有一定的自由时，即使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统治者也能心照不宣，使民众得以如愿。

5．And thus it is manifest that this kind of dominion will be in the best possible condition, if its institutions are such that it most nearly approaches the absolute—that is, that the multitude is as little as possible a cause of fear, and retains no liberty, but such as must necessarily be assigned it by the law of the dominion itself, and is therefore not so much a right of the multitude as of the whole dominion, assert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aristocrats only as their own. For thus practice agrees best with theory, as appears from the last section, and is also self-evident. For we cannot doubt that the dominion rests the less with the patricians, the more rights the commons assert for themselves, such as those which the corporations of artisans in Lower Germany, commonly called Guilds, generally possess.

第五节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贵族政体的规章制度最接近于绝对统治，那么它的统治就可能处于最好的状态。也就是说，这种

制度应该是这样的：民众尽可能不成为统治者惧怕的对象；除了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自由外，民众没有其他自由。因此，这种自由与其说是民众的权利，不如说是整个国家的权利，是贵族们才能要求和维护的权利。那么，就如上一节所述那样，实践与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结合得最好。因为，毫无疑问，贵族的统治权力越小，民众要求的权利就越多。就如下日耳曼尼亚的手工业者团体（俗称行会），它们总是拥有过多的权利。

6．But the commons need not apprehend any danger of a hateful slavery from this form of dominion, merely because it is conferred on the council absolutely. For the will of so large a council cannot be so much determined by lust as by reason; because men are drawn asunder by an evil passion, and cannot be guided, as it were, by one mind, except so far as they desire things honourable, or that have at least an honourable appearance.

第六节　不过，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普通民众无需担忧遭受奴役的任何危险，因为统治权完全赋予了议事会。这么大一个议事会，它的意志不可能只是出于冲动的欲望，而会是出于理性。因为，虽然邪恶的情感会使人意见分散，但是如果他们所追求的事情是荣耀的，或者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荣耀的，那么他们就会像是受同一思想指导一般去共同完成此事。

7．In determining, then, the foundations of an aristocracy, it is above all to be observed, that they should rest on the sole will and power of the supreme council, so that it may be as independent as possible, and be in no danger from the multitude.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se foundations, which are to rest, I say, upon the sole will and power of the council, let us see what foundations of peace

are peculiar to monarchy, and unsuited to this form of dominion. For if we substitute for these equivalent foundations fit for an aristocracy, and leave the rest, as they are already laid, we shall have removed without doubt every cause of seditions; or, at least, this kind of dominion will be no less safe than the monarchical, but, on the contrary, so much the more so, and of so much better a condition, as, without danger to peace and liberty, it approaches nearer than monarchy to the absolute (Secs. 3, 6). For the greater the right of the supreme authority, the more the form of dominion agrees with the dictate of reason (Chap. 3. Sec. 5 [9_1]), and, therefore, the fitter it is to maintain peace and liberty. Let us run through, therefore, the points we stated in our sixth chapter, beginning with the ninth section, that we may reject what is unfit for this kind of dominion, and see what agrees with it.

第七节　　所以，在确定贵族政体的基本原则时，首先要注意的是，这些原则必须只能根据最高议事会的意愿和力量，从而使议事会尽可能掌握自己的权利，不会遭受来自民众威胁的危险。为了确定这些只能根据最高议事会的意愿和力量的基本原则，让我们先弄清楚哪些关于和平的原则只适用于君主政体而不适用于贵族政体。其实，如果在君主政体中我们代以适用于贵族政体的等效的基本原则，并且保留已经制定的其他原则，无疑我们将清除掉所有会引起暴乱的原因，或者，至少这种贵族政体的稳定性不会亚于君主政体。但是，反之，在没有危害和平与自由的情况下，贵族政体比君主政体越接近于绝对统治（本章第三节和第六节），它就越稳定，情况也会更好。因为，最高当权者的权利越大，国家形式越符合理性的指令（第三章第五节 [10_1] ），从而也越能维护和平与自由。因此，让我们简单扼要地回顾一下第六章第九节起所阐述的内容，以便排除不适合贵族政体的措施并找出适合它的措施。

8 . That it is necessary, in the first place, to found and fortify one or more cities, no one can doubt. But that city is above all to be fortified, which is the head of the whole dominion, and also those that are on its frontiers. For that which is the head of the whole dominion, and has the supreme right, ought to be more powerful than the rest. But under this kind of dominion it is quite unnecessary to divide all the inhabitants into clans.

第八节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必须建立一个或多个城市并加以设防。作为整个国家首都的城市和边境城市尤其需要设防，因为首都城市掌握着最高权利，它必然要比其他城市更强大。但是，在贵族政体下，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居民划分成氏族。

9 . As for the military, since under this dominion equality is not to be looked for among all, but between the patricians only, and, in particular, the power of the patrician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commons, it is certain that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o the laws o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is dominion, that the military be formed of others besides subjects. [9_2] But it is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that no one be admitted into the number of the patricians, that has not a proper knowledge of the art of war. But for the subjects to be excluded, as some would have it, from military service, is surely folly. For besides that the military pay given to subjects remains within the realm, whereas, on the contrary, what is paid to a foreign soldiery is altogether lost, the greatest strength of the dominion is also thereby weakened. For it is certain that those fight with peculiar valour who fight for altar and hearth. Whence, also, it is manifest that those are no less wrong, who lay down that military commanders, tribunes, centurions, etc., should be chosen from among the patricians only. For with what

courage will those soldiers fight who are deprived of all hope of gaining glory and advancement? But, on the other hand, to establish a law forbidding the patricians to hire foreign soldiers when circumstances require it, whether to defend themselves, and suppress seditions, or for any other reason, besides being inconsiderate, would also be repugnant to the supreme right of the patricians, concerning which see Secs. 3, 4, 5 of this chapter. But the general of a single army, or of the entire military, is to be chosen but in time of war, and among the patricians only, and is to hold the command for a year at most, without power of being continued therein, or afterwards reappointed. For this law, necessary as it is under a monarchy, is so above all under this kind of dominion. For although it is much easier, as we have said above, to transfer the dominion from one man to another than from a free council to one man; yet it does often happen, that patricians are subdued by their own generals, and that to the much greater harm of the commonwealth. For when a monarch is removed, it is but a change of tyrant, not of the form of dominion; but, under an aristocracy, this cannot happen, without an upsetting of the form of dominion, and a slaughter of the greatest men. Of which thing Rome has offered the most mournful examples. But our reason for saying that, under a monarchy, the militia should serve without pay, is here inapplicable. For since the subjects are excluded from giving their advice or votes, they are to be reckoned as foreigners, and are, therefore, to be hired for service on no worse terms than foreigners. And there is in this case no danger of their being distinguished above the rest by the patricians: nay, further, to avoid the partial judgment which everyone is apt to form of his own exploits, it is wiser for the patricians to assign a fixed payment to the soldiers for their service.

第九节　至于军队，由于贵族政体寻求的只是贵族之间的平等，而不是所有人之间的平等，特别是因为贵族的势力比平民的势力大得多，所以国家的法律或基本原则对于军队只能由国民组成 [10_2] 是否作出规定，并没有什么差别。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具有战争谋略学识的人不得进入贵族行列。有些人主张国民不得参加军队，这是极其愚蠢的。因为，付给国民士兵的薪饷仍然留在国内，而付给外国雇佣军的薪饷则是完全失去的。国家力量再强大，也会因此而被削弱。因为，那些英勇奋战的人必定是为信仰为家园而战的人。同样，那些主张只能从贵族中选拔军队指挥官、军团首领、百夫长等的人也是错误的。如果士兵连获得荣誉和晋升的希望都被剥夺了，又怎会有动机去英勇作战呢？反之，如果制定法律禁止贵族在必要的情况下雇佣外国士兵——不管他们是出于保卫自己、镇压暴乱或是其他原因——这不仅是考虑不周，而且也违反本章第三、四、五节所阐述的贵族的最高权利。此外，一支部队或整个军队的将领只能在战时选出，而且只能从贵族中选任，其任期至多一年，此后不得续任或以后重新任命。对于这条法规，在君主政体中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贵族政体中它更为重要。诚然，如前所述，把政权从一个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比从一个自由的议事会转到一个人手中要容易得多，但是，屡见不鲜的是，贵族总是被自己的将军们制约。这对国家的损害非常之大。因为，废黜一个君主只是换了一个暴君，国家形式并没有改变；而在贵族政体下，统治权的转移必定会引起国家形式的倾覆和重要人物被杀戮。在这一方面，罗马就是一个最为悲惨的实例。但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在君主政体下，不给军人发放薪俸的这条原则，在贵族政体中并不适用。因为，既然国民没有权利参与磋商政务或投票表决，他们就被看作外国人，所以雇佣他们服兵役的条件不应该比外国人差。在这种情况下，不必再担心议事会对国民士兵比对其他人更优厚。尽管如此，为了避免每个军人过高评价自己的功绩，贵族最好为军士规定一定的报酬。

10．Furthermore, for this same reason, that all but the patricians are foreigners, it cannot be without danger to the whole

dominion, that the lands and houses and the whole soil should remain public property, and be let to the inhabitants at a yearly rent. For the subjects having no part in the dominion would easily, in bad times, all forsake their cities, if they could carry where they pleased what goods they possess. And, therefore, lands and farms are not to be let, but sold to the subjects, yet on condition that they pay every year an aliquot part of the year's produce, etc., as is done in Holland.

第十节　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即国民没有权利参与砌商政务或投票表决），除了贵族以外，所有人都成为外国人。那么，如果把农田、房舍以及全部土地当作公共财产，按照每年收租金的方式出租给居民，就一定会给国家带来危险。因为，国民在国家中没有参政权利，所以在艰难时期，如果允许他们携带自己的财产自由迁徙，他们很容易放弃城市自己出走。因此，土地和农田不应该是租给国民，而应是卖给他们，并附带一些条件，比如每年要把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国家等，就像荷兰的做法一样。

11 . These points considered, I proceed to the foundations on which the supreme council should rest and be established. We have shown (Sec. 2) that, in a moderate-sized dominion, this council ought to have about five thousand members. And so we must look for means of preventing the dominion from gradually getting into fewer hands, and of insuring, on the contrary, that the number of members be increased in proportion to the growth of the dominion itself; and, next, that between the patricians, equality be as far as possible maintained; and, further, that there may be speed and expedition in their counsels, and that they tend to the general good; and, lastly, that the power of the patricians or council exceed the power of the multitude, yet so that the multitude suffer no harm

thereby.

第十一节　考虑完以上这些要点之后，接下来我们开始讨论最高议事会赖以建立的各项基本原则。我们之前已经阐明（本章第二节），在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议事会成员应该在五千人左右。因此，必须寻找一些办法，防止统治权渐渐落入少数人手中。首先要保证议事会成员的数量随着国家的增大也按比例增加；其次，要保证贵族之间尽可能保持平等；再者，要保证议事会迅速处理事务并考虑共同的利益；最后，还要保证贵族或议事会的力量大于民众的力量，但又不至于使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害。

12 . But jealousy causes a great difficulty in maintaining our first point. For men are, as we have said, by nature enemies, so that however they be associated, and bound together by laws, they still retain their nature. And hence I think it is, that democracies change into aristocracies, and these at length into monarchies. For I am fully persuaded that most aristocracies were formerly democracies. For when a given multitude, in search of fresh territories, has found and cultivated them, it retains, as a whole, its equal right of dominion, because no man gives dominion to another spontaneously. But although every one of them thinks it fair, that he should have the same right against another that that other has against him, he yet thinks it unfair, that the foreigners that join them should have equal right in the dominion with themselves, who sought it by their own toil, and won it at the price of their own blood. And this not even the foreigners themselves deny, for, of course, they migrate thither, not to hold dominion, but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own private business, and are quite satisfied if they are but allowed the liberty of transacting that business in safety. But meanwhile the multitude is augmented by the influx of foreigners,

who gradually acquire the national manners, until at last they are distinguished by no other difference than that of incapacity to get office; and while their number daily increases, that of the citizens, on the contrary, is by many causes diminished. For families often die out, and some persons are disqualified for their crimes, and a great many are driven by domestic poverty to neglect affairs of state, and meanwhile the more powerful aim at nothing else, but to govern alone; and thus the dominion is gradually limited to a few, and at length by faction to one. And here we might add other causes that destroy dominions of this sort; but as they are well known, I pass them by, and proceed now to state the laws by which this dominion, of which we are treating, ought to be maintained.

第十二节　　但是，由于人的嫉妒心理，实现第一点时会困难重重。如前所述，人们在本性上就是互相敌对的，所以尽管他们凭借法律互相结合，互为制约，但是他们的本性并未改变。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民主政体变为贵族政体，贵族政体最终又变为君主政体的原因。我完全相信，大多数贵族政体最初是民主政体。某一批寻找新的疆土的民众找到了新的领土并进行了开垦，他们肯定会完整地保持着大家平等共有的统治权，没有人会自愿把统治权交给别人。然而，虽然他们认为在他们之间，自己对他人具有的权利和他人对自己具有的权利一样，这是公平的；但是，如果有外国人加入他们并与他们享有平等的统治权，他们会认为这不公平，因为这块地是他们用自己的辛苦和血汗得来的。这一点，连那些外国人都不会否认，因为他们去往那里的目的不是为了掌管统治权，而是为了他们的营业谋生。如果能获得在那里安全地进行买卖交易的自由，他们就心满意足了。然而，由于外国人的大量涌入，民众的数量不断增加，人口不断增长，这些外国人渐渐地习惯并融入那里的风俗习惯，最终获得与本地居民一样的待遇，除了无法获得官职之外。并且，外国人的人数日益增加，而原有居民的人数却因种种原因反而减少。原居民中，有的家庭逐渐消亡，有的人因罪而被取消公民资格，还有很多人因为家庭贫困

而不问国事；而同时，又有势力较强者一心谋求独自掌权，于是，统治权渐渐落入少数人手中，直至最终通过派系斗争集中到一个人手中。我们本可以在此阐述一些导致这类国家毁灭的其他原因，但是，那些原因众所周知，我便略过不谈。所以，现在我开始说明为维持这类国家所必须拥有的各种法律。

13 . The primary law of this dominion ought to be that which determines the proportionate numbers of patricians and multitude. For a proportion (Sec. 1) ought to be maintained between the multitude and the patricians, so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ormer the number of the latter should be raised. And this proportion (in accordance with our remarks in the second section) ought to be about fifty to one, that is, the inequality between the members of each should never be greater. For (Sec. 1) without destroying the form of dominion, the number of patricians may be greater than the number of the multitude. But there is no danger except in the smallness of their number. But how it is to be provided that this law be kept unbroken, I will presently show in its own place.

第十三节　这种国家的首要的法律必须是确定贵族人数与平民人数比例的法律。平民与贵族之间必须有一个一定的比例值（本章第一节），这样一来，平民数量增加，贵族人数也按比例增加。这个比例（依照本章第二节的阐述）应该是五十比一，也就是说，平民与贵族数量的差异不能比这个数值更大（即贵族对平民的比例只能更高）。按照本章第一节所述，如果不想毁灭贵族政体，贵族的人数要大大超过平民的人数。如果贵族的人数太少，则贵族政体就有危险。至于如何维持这条法律不被破坏，我将再适当地加以说明。

14 . Patricians, in some places, are chosen only out of

particular families. But it is ruinous to lay this down expressly by law. For not to mention that families often die out, and that the other families can never be excluded without disgrace, it is also repugnant to the form of this dominion, that the dignity of patrician should be hereditary (Sec. 1). But on this system a dominion seems rather a democracy, such as we have described in Sec. 12, that is in the hands of very few citizen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o provide against the patricians choosing their own sons and kinsmen, and thereby against the right of dominion remaining in particular families, is impossible, and indeed absurd, as I shall show (Sec. 39). But provided that they hold that right by no express law, and that the rest (I mean, such as are born within the dominion, and use the vulgar tongue, and have not a foreign wife, and are not infamous, nor servants, nor earning their living by any servile trade, among which are to be reckoned those of a wine-merchant, or brewer) are not excluded, the form of the dominion will, notwithstanding, be retained, and it will be possible to maintain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patricians and the multitude.

第十四节　在有些地方，贵族只从一些特定的家族中选出。但是，由法律做出这种明文规定将祸害无穷。且不说有些家族往往绝嗣，有些家族因被排除在贵族行列之外而总感到丢脸；而且，如果贵族的荣衔变成世袭的，则违背贵族政体的本质（本章第一节）。这种明文规定会使国家很像本章第十二节所描述的民主政体，政权掌握在很少数公民手中。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为了防止统治权保留在一些特定的家族中而禁止贵族选任自己的后代或亲属，则是不可能而且不合理的。我将在本章第十九节予以论述。不过，假如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某些家族拥有统治权，且又不排除其他家族（这里指的是在本国出生的，讲本土语言的，没有娶外国女子为妻的，无罪行劣迹的，未充当奴仆的或从事卑贱行业谋生的人，比如酒商或酿酒商），那么这种政体就仍然可以保持下去，并且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比例也可能得以维

持。

15 . But if it be further by law appointed that no young men be chosen, it will never happen that a few families hold the right of government in their hands. And, therefore, be it by law appointed, that no man that has not reached his thirtieth year be put on the list of candidates.

第十五节　此外，如果法律进一步规定不得选拔年轻人，就不会发生统治权被少数家族垄断的事。所以，必须通过法律规定，只有年满三十岁的人才能列入候选人名单。

16 . Thirdly, it is next to be ordained, that all the patricians must be assembled at certain fixed times in a particular part of the city, and that whoever does not attend the council, unless he be hindered by illness or some public business, shall be fined some considerable amount. For, were it otherwise, most of them would neglect the public, for the sake of their own private affairs.

第十六节　第三，法律还要规定，所有的贵族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到城市里某一指定的地点集合开会，除非是因为疾病或公务在身，任何没有出席议事会的人应处以重罚。如果不这样做，许多贵族就会只顾个人私事而不顾公务。

17 . Let this council's functions be to pass and repeal laws, and to choose their patrician colleagues, and all the ministers of the dominion. For he, that has supreme right, as we have decided that

this council has, cannot give to anyone authority to pass and repeal laws,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abdicating his own right, and transferring it to him, to whom he gives that power. For he, that has but for one day only authority to pass and repeal laws, is able to change the entire form of the dominion. But one can, without forfeiting one's supreme right, temporarily entrust to others the daily business of dominion to be administered according to the established laws. Furthermore, if the ministers of dominion were chosen by any other but this council, then its members would be more properly called wards than patricians.

第十七节　议事会的职能应该是制定和废除各项法律，选择贵族同僚，任命所有的政府官员。最高当权者，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议事会，在把制定和废除法律的权利授予他人时，必须同时放弃他自己的权利，从而把权利转交给获得授权的人，因为，掌握制定与废除法律权利的人，即使他只掌权一天，他就能改变整个政体。不过，一个人可以依据现行法律暂时委托他人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如此他就不必放弃最高权利。况且，如果政府官员的选任不是由议事会决定，而是由他人决定，那么把议事会的贵族成员称为未成年人可能还更合适些。

18 . Hence some are accustomed to create for the council a ruler or prince, either for life, as the Venetians, or for a time, as the Genoese; but yet with such great precautions, as make it clear enough, that it is not done without great risk. And assuredly we cannot doubt but that the dominion thereby approaches the monarchical form, and as far as we can conjecture from their histories, it was done for no other reason, than that before the institution of these councils they had lived under a ruler, or doge, as under a king. And so the creation of a ruler is a necessary

requisite indeed for the particular nation, but not for the aristocratic dominion considered in itself.

第十八节　有些人习惯于为议事会设立一位执政官或首长，其职位或采取终身制，如在威尼斯王国；或采用任期制，如在热那亚王国。不过，他们这样做时非常谨慎，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清楚看到，这么做对国家有很大的危险。我们无可怀疑，这样的国家非常接近于君主政体国家。就我们从历史上所能推测到的情况而言，这么做的唯一理由是：在议事会建立以前，他们曾经受过统治者或总督的统治，就像受君主的统治一样。因此，实际上，为议事会设立执政官对某个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需要，而对贵族政体来说，并不是绝对需要的。

19 . But, inasmuch as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his dominion rests with this council as a whole, not with every individual member of it (for otherwise it would be but the gathering of an undisciplined mob),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hat all the patricians be so bound by the laws as to form, as it were, one body governed by one mind. But the laws by themselves alone are weak and easily broken, when their vindicators are the very persons who are able to transgress them, and the only ones who are to take warning by the punishment, and must punish their colleagues in order by fear of the same punishment to restrain their own desire: for all this involves a great absurdity. And, therefore, means must be sought to preserve order in this supreme council and keep unbroke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dominion, so that yet the greatest possible equality may exist between patricians.

第十九节　但是，由于这类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整个议事会，而不是议事会的个体成员（否则议事会就会成为一群乌合之众），因

此，所有贵族必须都要受法律的约束以便形成一个受同一思想指导的整体。但是，法律本身是脆弱且易遭破坏的。有时，法律的维护者正是有能力侵犯法律的人，是那些正要从他人的刑罚中让自己有所警惕的人，而这些人又必须要惩罚他们的同僚，让其由于惧怕那同样的刑罚而抑制其欲望，这一切都是非常的矛盾与悖理。所以，必须找到适当的方法来维持这个最高议事会的秩序，并保证国家的规章制度不受侵犯，以便贵族之间尽可能地保持平等。

20．But since, from a single ruler or prince, able also to vote in the debates, there must necessarily arise a great inequality, especially on account of the power, which must of necessity be granted him, in order to enable him to discharge his duty in safety; therefore, if we consider the whole matter aright, nothing can be devised more useful to the general welfare than the institution of another council of certain patricians subordinate to the supreme council, whose only duty should be to see that the constitution, as far as it concerns the councils and ministers of the dominion, be kept unbroken, and who should, therefore, have authority to summon to judgment and, in conformity with established law, to condemn any delinquent who, as a minister of the dominion, has transgressed the laws concerning his office. And these patricians we shall hereafter call syndics.

第二十节　为了让议事会的执政官或首长能安全地履行他的职责，必须赋予他很大的权力。然而，他也能够在议事会投票表决，这必然会导致很大的不平等。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考量，就会发现，最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办法莫过于在最高议事会下另外设立一个由若干贵族组成的下属议事会，它的唯一职责是确保事关各级议事会以及国家官员的规章制度不受破坏。因此，这个议事会应该有权传讯任何渎职犯法的官员，并依据现行法律予以定罪。在下文里我们把这个议事会

的成员称为“护法官”。

21 . And they are to be chosen for life. For, were they to be chosen for a time, so that they should afterwards be eligible for other offices in the dominion, we should fall into the very absurdity which we have just pointed out in the nineteenth section. But lest they should become quite haughty by very long rule, none are to be elected to this office, but those who have reached their sixtieth year or more, and have discharged the duties of senator, of which below.

第二十一节　　被选任的护法官应该实行终身制。如果实行任期制，以致以后他们还有资格被选任国家的其他官职，那么，就会陷入我们在本章第十九节里所说的悖理中。但是，为了避免他们由于长期任职而变得傲慢自大，只能选任那些年满六十且担任过元老院议员的人担任护法官。关于元老院议员，后面还将予以论述。

22 . Of these, too, we shall easily determine the number, if we consider that these syndics stand to the patricians in the same relation as the whole body of patricians together does to the multitude, which they cannot govern, if they are fewer than a proper number. And, therefore, the number of the syndics should be to that of patricians as their number is to that of the multitude, that is (Sec. 13), as one to fifty.

第二十二节　关于护法官的人数不难确定。如果我们细想，其实护法官对贵族的关系就像整个贵族阶层对平民大众的关系一样。如果贵族人数低于恰当的数量，造成贵族人数过少，则他们难以统治民众。因此，护法官对贵族的比例必须与贵族对平民的比例一样，即一

比五十（本章第十三节）。

23 . Moreover, that this council may discharge its functions in security, some portion of the soldiery must be assigned to it, and be subject to its orders.

第二十三节　　此外，为了保证护法官议事会能够安全地履行职责，必须指派给它一支军队，完全由它指挥。

24 . The syndics and other ministers of state are to have no salary, but such emoluments, that they cannot maladminister affairs of state without great loss to themselves. For we cannot doubt that it is fair, that the ministers of this kind of dominion should be awarded a recompense for their time, since the commons are the majority in this dominion, and the patricians look after their safety, while they themselves have no trouble with affairs of state, but only with their own private ones. But since, on the other hand, no man (Chap. 7. Sec. 4) defends another's cause, save in so far as he thereby hopes to establish his own interest, things must, of necessity, be so ordered that the ministers, who have charge of affairs of state, should most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 when they are most watchful for the general good.

第二十四节　护法官和其他官员不应该有固定的薪金收入。但是应该付给他们一些报酬，以使得他们不会不尽心处理国家事务，从而给自己带来巨大损失。毫无疑问，在贵族政体下，对官员的工作予以报酬，是公平合理的。因为国家的大部分人是平民，他们不操心国家事务而只致力于私事，其安全问题全由贵族照管。但是，另一方面，

由于人们维护他人利益的原因在于此举有利于他自己的利益（第七章第四节），所以，国家必须如此安排：处理国家事务的官员只有在他们最关心公共利益的时候，才能谋得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

25 . To the syndics then, whose duty, as we said, it is to see that the constitution is kept unbroken, the following emoluments are to be awarded: namely, that every householder that inhabits any place in the dominion, be bound to pay every year a coin of small value, say a quarter of an ounce of silver, to the syndics, that thus they may know the number of inhabitants, and so observe what proportion of them the patricians constitute; and next that every new patrician on his election must pay the syndics some large sum, for instance, twenty or twenty-five pounds of silver. Moreover, that money, in which the absent patricians (I mean those who have failed to attend the meeting of the council) are condemned, is also to be awarded to the syndics; and a part, too, of the goods of defaulting ministers, who are bound to abide their judgment, and who are fined a certain sum of money, or have their goods confiscated, should be devoted to them, not to all indeed, but to those only who sit daily, and whose duty it is to summon the council of syndics, concerning whom see Sec. 28. But, in order that the council of syndics may always be maintained at its full number, before all other business in the supreme council, when it is assembled at the usual time, inquiry is to be made about this. Which, if the syndics neglect, let it then devolve upon the president of the senate (concerning which we shall soon have occasion to speak), to admonish the supreme council on this head, to demand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syndics the reason of his silence, and to inquire what is the supreme council's opinion in the matter. But if the president of the senate is likewise silent, let the case be taken up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justice, or if he too is

silent by some other patrician, and let him demand an explanation of their silence from the presidents of the senate and the court of justice, as well as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syndics. Lastly, that that law, whereby young men are excluded, may likewise be strictly observed, it is to be appointed that all who have reached the thirtieth year of their age, and who are not by express law excluded, are to have their names inscribed on a list, in presence of the syndics, and to receive from them, at a fixed price, some sign of the honour conferred on them, namely, that they may be allowed to wear a particular ornament only permitted to them, to distinguish them and make them to be had in honour by the rest;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it ordained, that in elections none may nominate as patrician anyone whose name is not inscribed on the general list, and that under a heavy penalty. And, further, let no one be allowed to refuse the burden of a duty or office, which he is chosen to bear. Lastly, that all the absolutely fundamental laws of the dominion may be everlasting, it must be ordained that if anyone in the supreme council raise a question about any fundamental law, as of prolonging the command of any general of an army, or of diminishing the number of patricians, or the like, he is guilty of treason, and not only is he to be condemned to death, and his goods confiscated, but some sign of his punishment is to remain visible in public for an eternal memorial of the event. But for the confirming of the other general rights of the dominion, it is enough, if it be only ordained, that no law can be repealed nor new law passed, unless first the college of syndics, and then three-fourths or four-fifths of the supreme council agree thereto.

第二十五节　如前所述，护法官的职责是确保国家的规章制度不受侵犯，对于他们，应该按下面的方式予以报酬：全国各地的住户每年必须付给护法官少量价值的钱币，比如四分之一盎司的银子；护法

官可以借此了解居民的数量以及贵族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其次，每位新选上的贵族必须交给护法官一大笔钱，比如二十或二十五磅银子。此外，缺席议事会的贵族（指那些没能出席议事会的人）所缴的罚金也应该归护法官所有；犯法违纪的官员经审理判决后所上缴的罚金或被没收的财产中的一部分也应归护法官所有，不过不是归于全体护法官，而是给那些每天上班、负责召开护法官会议的护法官。本章第二十八节将谈及这些。为了保证护法官议事会的护法官定额人数保持满数，最高议事会在定期召开会议时，首先要做的就是查询定额数并保证补足。如果护法官疏于此事，则应由元老院的议长（下文即将论及）向最高议事会提出，要求护法官议事会的议长解释其疏于此事的原因，并征询最高议事会对此事的意见。如果元老院的议长也保持沉默，则应由最高法院院长提出此事。如果院长也不提此事，则其他任何一位贵族都可以要求元老院议长、最高法院院长以及护法官议事会的议长对他们的沉默态度做出解释。除此之外，对于年轻人不得当选贵族的这条法律，为了让它得到严格遵守，应该规定：所有年满三十岁且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参政的人，都应该在议事会护法官在场时将自己的名字登记在册，并缴交一定的费用从护法官那里获取能体现他们荣誉的标记，即穿戴一种与他人不同的服饰以示区别，并显示其荣誉。同时法律还要规定，在选拔时，贵族不得提名任何名字不在花名册上的人，否则处以重罚；而且，任何人不得拒绝接受他被选任的职责或职务。最后，为了保证国家的各项基本原则持久不变，必须规定，任何人在最高议事会上提出任何一条关于基本原则的问题，比如延长某部队将领的任期，或减少贵族的人数等类似问题，他就是犯了叛国罪，不仅应判处他死刑，还要没收其财产，而且要在公共场所刻碑记录对他的刑罚，以示永久的警戒。不过，对于国家的其他一般性权利，为使其稳固，只需规定：不得废除既定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除非首先获得护法官议事会的同意，然后再获得最高议事会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的成员同意。

26 . Let the right also of summoning the supreme council and proposing the matters to be decided in it, rest with the syndics, and

let them likewise be given the first place in the council, but without the right to vote. But before they take their seats, they must swear by the safety of that supreme council and by the public liberty, that they will strive with the utmost zeal to preserve unbroken the ancient laws, and to consult the general good. After which let them through their secretary open in order the subjects of discussion.

第二十六节　护法官议事会应当有权召开最高议事会，并在会上提出议案以供表决。在最高议事会上，护法官应当位列首席，但无权投票表决。但是，在他们出席之前，他们必须以最高议事会的安全和公众自由的名义起誓，他们会以最大的热诚尽力捍卫各项既定法律，谋求共同福利。宣誓后，他们应当通过秘书依次公布出有待讨论的各种事项。

27 . But that all the patricians may have equal authority in making decrees and electing the ministers of the dominion, and that speed and expedition in all matters may be possible, the order observed by the Venetians is altogether to be approved, for they appoint by lot a certain number of the council to name the ministers, and when these have named in order the candidates for office, every patrician signifies by ballot his opinion, approving or rejecting the candidate in question, so that it is not afterwards known, who voted in this or that sense. Whereby it is contrived, not only that the authority of all the patricians in the decision is equal, and that business is quickly despatched, but also, that everyone has absolute liberty (which is of the first necessity in councils) to give his opinion without danger of unpopularity.

第二十七节　为了确保所有的贵族在制定法令及选任国家官员方

面具有平等的权利，为了确保能迅速办理各种事务，威尼斯人执行决议的方法值得赞赏。在任命官员时，他们通过抽签从议事会中选出若干人员，并依次提名候选的官员，然后每个贵族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他的意见，是赞成或反对该候选人，事后也不可能知道谁投赞成票或反对票。这个方法不仅做到确保所有贵族在决策上权利平等，处事迅速，而且，它还保证每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对议事会来说最为重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又不会遭人记恨。

28 . But in the councils of syndics and the other councils, the same order is to be observed, that voting is to be by ballot. But the right of convoking the council of syndics and of proposing the matters to be decided in the same ought to belong to their president, who is to sit every day with ten or more other syndics, to hear the complaints and secret accusations of the commons against the ministers, and to look after the accusers, if circumstances require, and to summon the supreme council even before the appointed time, if any of them judge that there is danger in the delay. Now this president and those who meet with him every day are to be appointed by the supreme council and out of the number of syndics, not indeed for life, but for six months, and they must not have their term renewed but after the lapse of three or four years. And these, as we said above, are to be awarded the goods that are confiscated and the pecuniary fines, or some part of them. The remaining points which concern the syndics we will mention in their proper places.

第二十八节　在护法官议事会和其他议事会上，都应该采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决议，即无记名投票法。但是召开护法官议事会的权利，以及在议事会上提出各项议案以待表决的权利应该属于该议事会的议长。议长每天应该与十名以上的护法官一起上班，听取平民对官

员的不满和秘密投诉，必要时要关心安抚指控者，并且，如果其中任何一位护法官认为延误事情可能会发生危险，那么，它可以随时召开议事会。议长以及每天与他一起上班的人应该由最高议事会指定，且须从护法官议事会中选出，其任期并非终身制，而是六个月。他们不得延长任期，除非经过三年或四年的间隔，否则不能再次选任。对于这一些人，如前文所述，他们应该获得一些报酬，如没收来的财产和罚金，或其中的一部分归他们所有。关于护法官议事会的其他法律规定，我将在合适的地方加以论述。

29 . The second council, which is subordinate to the supreme one, we will call the senate, and let its duty be to transact public business, for instance, to publish the laws of the dominion, to order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cities according to law, to confer military commissions, to impose taxes on the subjects and apply the same, to answer foreign embassies, and decide where embassies are to be sent. But let the actual appointment of ambassadors be the duty of the supreme council. For it is of the greatest consequence to see that no patrician be called to any office in the dominion but by the supreme council itself, lest the patricians themselves should try to curry favour with the senate. Secondly, all matters are to be referred to the supreme council, which in any way alters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ings, as the deciding on peace and war. Wherefore, that the senate's decrees concerning peace and war may be valid, they must be confirmed by the supreme council. And therefore I should say, that it belongs to the supreme council only, not to the senate, to impose new taxes.

第二十九节　最高议事会下属的第二个议事会称为元老院。元老院的职责应该是处理公共事务，比如，公布国家法律，依法对城市进行设防，任命军队职务，向国民征税并决定税款的使用，答复外国使

节的问题，决定使节的派遣。但是，使节的选任必须由最高议事会决定。必须确保只有最高议事会才有权选派贵族出任国家公职，以防贵族自己想方设法去讨好元老院，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次，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可能改变事物现状的问题，比如，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策，都应该提交最高议事会讨论。元老院做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必须由最高议事会批准才能生效。所以，我认为，只有最高议事会才有权做出征收新的赋税的决定，元老院实际上无权做出这个决议。

30 . In 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senators these points are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irst, that all the patricians should have an equal hope of gaining senatorial rank; secondly,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same senators, whose time (for which they were elected) is elapsed, may be continued after a short interval, that so the dominion may always be governed by skilled and experienced men; and lastly, that among the senators many may be found illustrious for wisdom and virtue. But to secure all these conditions, there can be no other means devised, than that it should be by law appointed, that no one who has not reached his fiftieth year, be received into the number of senators, and that four hundred, that is about a twelfth part of the patricians, be appointed for a year, and that two years after that year has elapsed, the same be capable of re-appointment. For in this manner about a twelfth part of the patricians will be constantly engaged in the duty of senator, with only short intervening periods; and this number surely, together with that made up by the syndics, will be little less than the number of patricians that have attained their fiftieth year. And so all the patricians will always have a great hope of gaining the rank of senator or syndic, and yet notwithstanding, the same patricians, at only short intervals, will always hold senatorial rank, and (according to what we said, Sec. 2) there will never be wanting in the senate distinguished men, excelling in counsel and skill. And

because this law cannot be broken without exciting great jealousy on the part of many patricians, it needs no other safeguard for its constant validity, than that every patrician who has reached the age we mentioned, should offer the proof thereof to the syndics, who shall put his name on the list of candidates for the senatorial duties, and read the name before the supreme council, so that he may occupy, with the rest of the same rank, a place set apart in this supreme council for his fellows, next to the place of the senators.

第三十节　在决定元老院的名额时，必须考虑以下几点：第一，每个贵族获得元老院议员职位的希望必须相同；第二；尽管元老院议员任期（从当选开始计算）已满，但经过一段短暂的间隔之后，他们必须可以重新被选任，以便国家总是处于经验丰富工作熟练之人的治理之下；最后，在元老院中必须有许多才智与品德都非常出众的人物。为了实现以上几点，唯一的办法是从法律上规定：凡是年龄未满五十岁的人不得出任元老院议员；应该有四百名，即大约全部贵族的十二分之一，担任为期一年的议员；这一任期期满之后，经过两年的间隔，这些卸任的议员可以被重新选任。如此一来，大约十二分之一的贵族除了短期的间隔外，将经常担任元老院议员。元老院议员的数量加上护法官的数量，肯定不会比年满五十岁的贵族人数少太多，所以，每个贵族都有很大的希望可以获得元老院议员职位或护法官职位。但是，尽管在历次任期之间会有短暂的间隔，但担任元老院议员的总是同一批贵族，所以，如本章第二节所述，元老院永远不会缺乏经验丰富和善于决策的优秀人才。而这一条法规，只要不会激起多数贵族的嫉妒不满，就不会遭到破坏。所以，最能保证它持久有效的方法是，让每个到达规定年龄的贵族向护法官提交有关的证明，再由护法官将他们的名字列入元老院议员候补名单，并在最高议事会上宣布，于是，这些具有同样资格的贵族就可以获得最高议事会为他们规定的、最接近元老院议员职位的席位。

31 . The emoluments of the senators should be of such a kind, that their profit is greater from peace than from war. And therefore let there be awarded to them a hundredth or a fiftieth part of the merchandise exported abroad from the dominion, or imported into it from abroad. For we cannot doubt, that by this means they will, as far as they can, preserve peace, and never desire to protract war. And from this duty not even the senators themselves, if any of them are merchants, ought to be exempt; for such an immunity cannot be granted without great risk to trade, as I think no one is ignorant. Nay, on the contrary, it must be by law ordained, that no senator or ex-senator may fill any military post; and further, that no one may be declared general or praetor, which officers we said (Sec. 9) were to be only appointed in time of war, whose father or grandfather is a senator, or has held the dignity of senator within two years. Which laws we cannot doubt, that the patricians outside the senate will defend with all their might: and so it will be the case, that the senators will always have more profit from peace than from war, and will, therefore, never advise war, except the utmost need of the dominion compels them. But it may be objected to us, that on this system, if, that is, syndics and senators are to be allowed so great profits, an aristocracy will be as burdensome to the subjects as any monarchy. But not to mention that royal courts require larger expenditure, and are yet not provided in order to secure peace, and that peace can never be bought too dear; it is to be added, first, that all that under a monarchy is conferred on one or a few, is here conferred upon very many. Next kings and their ministers do not bear the burden of the dominion with the subjects, but under this form of dominion it is just the reverse; for the patricians, who are always chosen from the rich, bear the largest share of the weight of the commonwealth. Lastly, the burdens of a monarchy spring not so much from its king's expenditure, as from its secret policy. For those burdens of a dominion, that are imposed on the citizens in order to

secure peace and liberty, great though they be, are yet supported and lightened by the usefulness of peace. What nation ever had to pay so many and so heavy taxes as the Dutch? Yet it not only has not been exhausted, but, on the contrary, has been so mighty by its wealth, that all envied its good fortune. If therefore the burdens of a monarchy were imposed for the sake of peace, they would not oppress the citizens; but, as I have said, it is from the secret policy of that sort of dominion, that the subjects faint under their lord; that is, because the virtue of kings counts for more in time of war than in time of peace, and because they, who would reign by themselves, ought above all to try and have their subjects poor; not to mention other things, which that most prudent Dutchman V. H. [9_3] formerly remarked, because they do not concern my design, which is only to describe the best state of every kind of dominion.

第三十一节　元老院议员的报酬应该是这样的：和平时期他们获得的利益要大于战争时期得到的利益。因此，应该把国家进出口商品税收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付于他们。毫无疑问，这种方法会使他们尽可能地维护和平，也决不会拖延战争。如果有些元老院议员本身就是商人，他们也不能免除关税。我想任何人都会知道，这种豁免不可能不给贸易带来巨大的风险。不仅如此，法律还应该规定，任何元老院议员或前议员，不得担任军队职务；而且，元老院议员的子孙或近两年担任过元老院议员的人不得担任军队将领或军事执政官，该官职（本章第九节）只在战争时期设置。无疑，非元老院议员的贵族一定会竭力维护这些法规。而且这样一来，元老院议员在和平时期得到的利益总是比战时更多，所以，除非是到了国家最危急的时刻，否则他们决不会主张战争。然而，有人可能会反对我们的主张，认为在这种体系下，护法官和元老院议员所得的利益巨大，对国民来说，贵族政体带来的负担与君主政体带给国家的负担一样重。但是，实际上，姑且不说王室宫廷耗费更大，也不说为了维护和平，其代价有多高昂；就说说下面几点：首先，在君主政体下，所有的一切都只赋予一个人

或很少数人，而在贵族政体下，一切东西归很多人共有；其次，君主和其大臣们没有和他们的臣民一起分担国家的负担，他们没有缴纳赋税，而在贵族政体下，情况恰好相反，因为贵族总是选自富裕阶层，他们缴纳了国家最大部分的赋税；最后，在君主政体下，在国家负担来源方面，用于王室的开销还不如政府用于秘密目的的支出大。那些为了和平与自由而加诸公民的赋税，虽然沉重，但会因为和平带来的利益而足以让公民愿意承担。迄今有哪个国家负担过像荷兰一样沉重繁多的税赋？但是，荷兰不但没有因此而贫困枯竭，反而是强大得让所有人妒羡其财富。所以，如果君主制国家征收赋税是为了和平的目的，那么这种负担不会让公民感到沉重。但是，如前文所述，是君主制国家的一些秘密费用支出让公民不堪重负。确切地说，君主的优点美德在战时比在和平时期更为重要。意欲独裁统治的君主必定会尽可能让他们的国民处于贫困之中。在此我且不谈最具远见卓识的荷兰人霍夫 [10_3] 曾经说过的一些观点，因为那与本书的意图无关，本书的主旨只是说明各种政体的最佳状态。

32 . Of the syndics chosen by the supreme council, some should sit in the senate, but without the right of voting, so that they may see whether the laws concerning that assembly are duly observed, and may have the supreme council convoked, when anything is to be referred to it from the senate. For the supreme right of convoking this council, and proposing to it subjects of discussion, is, as we have already said, with the syndics. But before the votes of the contemporaries of the senators be taken, the president of the senate for the time being shall explain the state of affairs, and what the senate's own opinion is on the matter in question, and why; after which the votes shall be collected in the accustomed order.

第三十二节　由最高议事会选派的护法官应该列席元老院会议，

但是没有投票权，以便监督事关元老院的各项法律是否得到充分的遵守；并且在元老院向最高议事会提交议案时，由他们召集最高议事会开会。如前文所述，召集最高议事会开会这一最高权利，以及向最高议事会提出有待讨论的议案的权利属于护法官。但是，在元老院议员对当下事情投票表决之前，现任元老院议员应该解释有关情况，说明元老院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以及形成这些意见的理由。在此之后，按照通常的程序进行投票表决。

33 . The entire senate ought not to meet every day, but, like all great councils, at a certain fixed time. But as in the mean time the business of the dominion must be executed,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hat some part of the senators be chosen, who, on the dismissal of the senate, shall supply its place, and whose duty it shall be to summon the senate itself, when need is; to execute its orders about affairs of state; to read letters written to the senate and supreme council; and, lastly, to consult about the matters to be proposed in the senate. But that all these points, and the order of this assembly, as a whole, may be more easily conceived, I will describe the whole matter more precisely.

第三十三节　元老院全体会议不必每天召开。但是，像所有的大议事会一样，应该定期开会。但是，由于在休会期间，国家事务仍需处理，所以，必须选出部分元老院议员在休会期间代理元老院行事。他们的职责是在必要时召集元老院全体议员开会；执行元老院发布的关于国家事务的决议；阅读写给元老院和最高议事会的信件；以及商讨应该提交元老院的事项。不过，为了更容易地从整体上理解以上内容以及元老院的工作流程，我将对整个问题作出更明确的阐述。

34 . The senators who, as we have said already, are to be

chosen for a year, are to be divided into four or six series, of which let the first have the first seat in the senate for the first three or two months in the year; and at the expiration of this time, let the second series take the place of the first, and so on, observing their turns, so that that series which was first in the first months may be last in the second period. Furthermore, there are to be appointed as many presidents as there are series, and the same number of vice-presidents to fill their places when required—that is, two are to be chosen out of every series, one to be its president, the other its vice-president. And let the president of the first series preside in the senate also, for the first months; or, in his absence, let his vice-president fill his place; and so on with the rest, observing the same order as above. Next, out of the first series, some are to be chosen by vote or lot to fill the place of the senate, when it is dismiss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resident and vice-president of the same series; and that, for the same space of time, as the said series occupies the first place in the senate; and thus, when that time is past, as many are again to be chosen out of the second series, by vote or lot, to fill, in conjunction with their president and vice-president, the place of the first series, and supply the lack of a senate; and so on with the rest. And there is no need that the election of these men—I mean those that I have said are to be chosen for periods of three or two months, by vote or lot—should be made by the supreme council. For the reason which we gave in the twenty-ninth section is not here applicable, much less the reason stated in the seventeenth. It suffices, then, that they be elected by the senate and the syndics present at its meeting.

第三十四节　如前所述，当选的元老院议员任期一年。把这些议员分为四至六组。在一年的前两三个月，第一组议员位列首席。这两三个月结束后，第二组接替第一组，位列首席。以此类推，每组依次

轮流。这样，在最初两三个月里位列首席的那一组，在后面几个月则位列最下席。而且，有多少组就要选出多少位组长，以及同等数量的副组长以便必要时代理组长。也就是说，每组都要选出两名议员，一名当组长，另一名当副组长。在前两三个月，由第一组的组长担任元老院议长，如果组长缺席，则由副组长代理。其他组也是这样，轮流交替。此外，应该通过投票或抽签从第一组中选出几名议员，在元老院休会期间，协同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代表元老院行事。在这一段时间内，第一组位列元老院首席。这一段时间结束之后，同样以投票或抽签的方式，从第二组选出同等数量的议员，协同第二组的组长和副组长，接替第一组的议员，代理元老院行事。其他组也依此方法，轮流交替下去。这些人的选任，我指的是以投票或抽签的方式选出的任期为两三个月的那些人，没有必要通过最高议事会的决定。我们在本章第二十九节说的理由在这里不适用，而第十七节里所说的理由在此更不适用。因此，由元老院和出席元老院会议的护法官选任他们就可以了。在下文里，我们把这些人称为“执政官”。

35 . But of these persons we cannot so precisely ascertain the number. However, this is certain, that they must be too numerous to be easily susceptible of corruption. For though they can by themselves determine nothing concerning affairs of state, yet they can delay the senate, or, what would be worst of all, delude it by putting forward matters of no importance, and keeping back those that are of greater—not to mention that, if they were too few, the absence of one or two might delay public business. But as, on the contrary, these consuls are for that very reason appointed, because great councils cannot devote themselves every day to public business, a remedy must be looked for necessarily here, and their inadequacy of number be made up for by the shortness of their term of office. And thus, if only thirteen or so be chosen for two or three months, they will be too many to be corrupted in this short period. And for this cause, also, did I recommend that their successors

should by no means be appointed, except at the very time when they do succeed, and the others go away.

第三十五节　但是，我们无法精确确定执政官的人数。不过，他们的数量必须足够多，以免被轻易腐蚀收买。因为，虽然他们自己无权决定有关国家事务的任何事情，但是他们可以推迟元老院会议，或者，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只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提出讨论，而把一些重要的事情隐瞒下来。更不必说如果人数过少，缺席一两个人就会耽误公共事务的处理。而任命这些执政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及时处理公共事务，因为大议事会不可能天天开会处理公共事务。所以，必须找出一个解决办法，即用短暂的任期来弥补人数过少带来的弊端。这样，如果只选任十三人左右，任期两三个月，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腐蚀这么多人就没那么容易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建议，只有在前批执政官正要离任时才能指定继任者。

36 . We have said, that it is also their duty, when any, though few, of them think it needful, to convoke the senate, to put before it the matters to be decided, to dismiss it, and to execute its orders about public business. But I will now briefly state the order in which this ought to be done, so that business may not be long protracted by useless questions. Let, then, the consuls consult about the matter to be proposed in the senate, and what is required to be done; and, if they are all of one mind about it, then let them convoke the senate, and, having duly explained the question, let them set forth what their opinion is, and, without waiting for another's opinion, collect the votes in their order. But if the consuls support more than one opinion, then, in the senate, that opinion is first to be stated on the question proposed, which was supported by the larger number of consuls. And if the same is not approved by the majority of senate and consuls, but the waverers and opponents

together are in a majority, which is to be determined by ballot, as we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hen let them set forth the second opinion, which had fewer votes than the former among the consuls, and so on with the rest. But if none be approved by a majority of the whole senate, the senate is to be adjourned to the next day, or for a short time, that the consuls meanwhile may see, if they can find other means, that may give more satisfaction. But if they do not succeed in finding other means, or if the majority of the senate refuses to approve such as they have found, then the opinion of every senator is to be heard; and if the majority of the senate also refuses to support any of these, then the votes are to be taken again on every opinion, and not only the affirmative votes, as hitherto, but the doubtful and negative are to be counted. And if the affirmative prove more numerous than the doubtful or negative, then that opinion is to hold good; but, on the contrary, to be lost, if the negative prove more numerous than the doubtful or affirmative. But if on every opinion there is a greater number of doubters than of voters for and against, then let the council of syndics join the senate, and vote with the senators, with only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votes, omitting those that signify a hesitating mind. And the same order is to be observed about matters referred by the senate to the supreme council. So much for the senate.

第三十六节　如前所述，即使只是很少数的执政官认为有必要，全体执政官就得负责召开元老院会议，提出应由元老院决议的各项议案；决定元老院的休会；执行元老院对公共事务的决议。在此，我想简要说明一下，应该依照什么样的流程才可以使得事务的处理不会因无益的讨论而被延误。执政官应该商议即将提交元老院的议案，并考虑可能的解决方法。如果他们意见一致，则召开元老院会议，并在充分阐明该问题后，宣布他们自己的意见，并按既定的程序投票表决，不必等待他人发表意见。但是，如果执政官意见不一，那么，应该把

多数人支持的那条意见最先提交给元老院。如果这条意见没有获得多数元老院议员和执政官的赞同，而是在经过前面说过的无记名投票后，态度保留者和反对者居多，那么，让他们提出第二种意见，即在执政官中得票数低于第一种意见的意见。其他意见也依此方法依次提交元老院审议。如果所有意见都没有获得元老院议员的多数赞同，则元老院应该休会至次日，或者休会几天，以便执政官在此期间考虑是否能找到其他比较满意的方法。但是，如果他们未能找到其他方法，或者元老院多数议员不赞同执政官提出的方案，那么，应该征求每个元老院议员的意见。如果多数元老院议员也不赞同这些意见，则应该对各种意见进行投票表决，而且，不仅仅是像以前那样只计算赞成票数，也要计算态度保留者和反对者的票数。如果赞成者多于态度保留者或反对者，则采纳该意见；反之，如果反对者多于态度保留者或赞成者，则该意见被否决。但是，如果对所有这些意见，态度保留者多于赞成者或反对者，那么让护法官议事会和元老院召开联席会议，共同投票表决，只计算赞成票和反对票，不计算那些态度保留者的票数。元老院提交给最高议事会的各种议案，也必须遵循同样的流程。关于元老院的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37．As for the court of justice or bench, it cannot rest upon the same foundations as that which exists under a monarch, as we described it in Chap. 6. Secs. 26, and following. For (Sec. 14) it agrees not with the foundations of our present dominion, that any account be made of families or clans. And there must be a further difference, because judges chosen from the patricians only might indeed be restrained by the fear of their patrician successors, from pronouncing any unjust judgment against any of the patricians, and, perhaps, would hardly have the courage to punish them after their deserts; but they would, on the other hand, dare everything against the commons, and daily carry off the rich among them for a prey. I know that the plan of the Genoese is therefore approved by many, for they choose their judges not among the patricians, but among

foreigners. But this seems to me, considering the matter in the abstract, absurdly ordained, that foreigners and not patricians should be called in to interpret the laws. For what are judges but interpreters of the laws? And I am therefore persuaded that herein also the Genoese have had regard rather to the genius of their own race, than to the very nature of this kind of dominion. We must, therefore, by considering the matter in the abstract, devise the means which best agree with the form of this government.

第三十七节　关于法院，不能使用我们在第六章第二十六节以及其后几节所述的君主政体下的那些基本原则。因为，如本章第十四节所述，基于家族或氏族的任何阐述都不符合贵族政体的基本原则。贵族政体与君主政体还有一个差别：它只从贵族中选任法官。由于法官对作为自己继任者的贵族会有所顾忌，所以他们不敢对任何贵族做出不公正的判决，甚至可能不敢对他们做出他们应得的惩治。但反之，对待平民，他们就会为所欲为，富裕的平民可能成为他们日常的掠夺对象。据我所知，热那亚议事会的做法受到很多人的赞赏，因为，它不从贵族中选任法官，而是从外国人中选任。但是，在我看来，就这件事情而言，不选任本国贵族而是外国人来充当法律的解释者，实在是荒唐。法官难道不是法律的解释者吗？所以，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热那亚人考虑更多的是他们种族的特质，而不是本国政体的性质。因此，就此事而言，我们必须找出最适合贵族政体的解决办法。

38 . But as far as regards the number of the judges, the theory of this constitution requires no peculiar number; but as under monarchical dominion, so under this, it suffices that they be too numerous to be corrupted by a private man. For their duty is but to provide against one private person doing wrong to another, and therefore to decide disputes between private persons, as well patricians as commons, and to exact penalties from delinquents, and

even from patricians, syndics, and senators, as far as they have offended against the laws, whereby all are bound. But disputes that may arise between cities that are subject to the dominion, are to be decided in the supreme council.

第三十八节　关于法官的数量，贵族政体的理论体系里没有特别的规定。但是，就像在君主政体下一样，其人数要足够多，以至于不会被个人所收买腐蚀。法官的职责是禁止任何个人损害他人，所以他们应该解决个人（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之间的纠纷，惩处违法者，只要是触犯了每个人都应遵守的法律，即使是贵族、护法官和元老院议员也不例外。但是，本国所属的城市之间发生的纠纷，则应由最高议事会解决。

39 . Furthermore the principle regulating the time, for which the judges should be appointed, is the same in both dominions, and also the principle of a certain part of them retiring every year; and, lastly, although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every one of them to be of a different family, yet it is necessary that two related by blood should not sit on the same bench together. And this last point is to be observed also in the other councils, except the supreme one, in which it is enough, if it be only provided by law that in elections no man may nominate a relation, nor vote upon his nomination by another, and also that two relations may not draw lots from the urn for the nomination of any minister of the dominion. This, I say, is sufficient in a council that is composed of so large a number of men, and has no special profits assigned to it. And so utterly unharmed will the dominion be in this quarter, that it is absurd to pass a law excluding from the supreme council the relations of all the patricians, as we said in the fourteenth section. But that it is absurd is manifest. For that law could not be instituted by the

patricians themselves, without their thereby all absolutely abdicating their own right, and therefore not the patricians themselves but the commons would defend this law, which is directly contrary to what we proved in Secs. 5 and 6. But that law of the dominion, whereby it is ordained that the same uniform proportion be maintained between the numbers of the patricians and the multitude, chiefly contemplates this end of preserving the patricians' right and power, that is, provides against their becoming too few to be able to govern the multitude.

第三十九节　此外，关于法官任期的原则，在两种政体中是相同的。每年都应该有一部分法官退职。而且，最后一点，虽然没有必要规定每位法官必须来自不同的家族，但必须规定两位有血缘之亲的法官不得同时出席同一法庭。除了最高议事会，其他议事会也应该遵守上面提到的最后一点。对最高议事会而言，只需在法律上规定，在选拔时，任何人不得提名自己的亲属作为候选人；若有别人推举自己的亲属时，他也不得参与投票；而且，在抽签决定政府官员的候选人时，两名亲属不能同时参与抽签。在我看来，对于一个人数众多的议事会，其成员又没有什么特别的薪酬，以上规定就已经足够了。在这些规定下，政权完全不会受到损害，那么，通过法律规定贵族的亲属不得进入最高议事会，如本章第十四节所述，就显得不合理。如果制定贵族的亲属不得进入最高议事会的法律，它的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是贵族本身制定这样的法律，则意味着他们在这一点上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那么拥护这条法律的不会是贵族，而是平民。这就与我们本章第五节和第六节所述的原则相互矛盾了。那条法律规定，贵族和平民之间需要维持一个一贯的比例，主要是考虑到要维护贵族的权利与势力，防止贵族人数过少而不能统治平民。

40 . But the judges are to be chosen by the supreme council out of the patricians only, that is (Sec. 17) out of the actual authors

of the laws, and the judgments they pass, as well in civil as criminal cases, shall be valid, if they were pronounced in due course of justice and without partiality; into which matter the syndics shall be by law authorized to inquire, and to judge and determine thereof.

第四十节　另外，法官应该由最高议事会从贵族中选任，也就是说，从立法者中选任（本章第十七节）。法官做出的判决，不管是对民事诉讼的判决，还是对刑事案件的判决，只要符合法律程序且公正无偏私，都应该是有效的。对于这些判决，护法官有权依法予以调查、评判和裁决。

41 . The judges' emoluments ought to be the same, as we mentioned in the twenty-ninth section of the sixth chapter; namely, that they receive from the losing party upon every judgment which they pass in civil cases, an aliquot part of the whole sum at stake. But as to their sentences in criminal cases, let there be here this difference only, that the goods which they confiscate, and every fine whereby lesser crimes are punished, be assigned to themselves only, yet on this condition, that they may never compel anyone to confess by torture, and thus, precaution enough will be taken against their being unfair to the commons, and through fear too lenient to the patricians. For besides that this fear is tempered by avarice itself, and that veiled under the specious name of justice, they are also numerous, and vote, not openly, but by ballot, so that a man may be indignant at losing his case, but can have no reason to impute it to a particular person. Moreover the fear of the syndics will restrain them from pronouncing an inequitable, or at least absurd sentence, or from acting any of them treacherously, besides that in so large a number of judges there will always be one or two,

that the unfair stand in awe of. Lastly, as far as the commons are concerned, they also will be adequately secured if they are allowed to appeal to the syndics, who, as I have said, are by law authorized to inquire, judge, and determine about the conduct of the judges. For it is certain that the syndics will not be able to escape the hatred of the patricians, and on the other hand, will always be most popular with the commons, whose applause they will try as far as they can to bid for. To which end, opportunity being given to them, they will not fail to reverse sentences pronounced against the laws of the court, and to examine any judge, and to punish those that are partial, for nothing moves the hearts of a multitude more than this. Nor is it an objection, but, on the contrary, an advantage, that such examples can but rarely occur. For not to mention that that commonwealth is ill ordered where examples are daily made of criminals (as we showed in Chap. 5. Sec. 2), those events must surely be very rare that are most renowned by fame.

第四十一节　法官的薪俸来源应该与我们在第六章第二十九节里所提到的薪俸来源一样，也就是，从他们每次判决的民事诉讼中收取败诉方涉案金额的一部分，作为判决费用。至于刑事案件的判决，与民事诉讼唯一的不同是，他们所没收的财物，以及从较轻罪行中所处的罚金，都应归他们所有。但条件是，他们不得进行刑讯逼供。为此，应该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防止法官对平民不公正，也防止他们由于对贵族的畏惧而对贵族过于宽大优容。而其实，违法贵族的贪婪之行和其虚伪的正义美名都可以减轻法官对他们的畏惧。而且，法官人数众多，投票表决时并不公开，而是无记名投票，所以即使败诉方非常气愤，他也没有理由怪罪到某一位法官身上。再者，法官对护法官的畏惧也会阻止他们做出不公正的或者至少是不合理的判决，也会阻止他们玩弄任何阴谋诡计。此外，在人数众多的法官当中，总有一两个人会让处事不公的同僚有所畏惧。最后，就平民而言，如果允许他们向护法官申诉，他们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如前文所述，这些

护法官有权依法对法官的审判进行调查、评判和裁决。当然，这些护法官难免会遭到贵族的憎恨，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深得民心，而平民的赞扬也正是他们尽其所能想要得到的。因此，只要有机会，护法官就会撤销违反法律的判决，调查每个法官，惩处处事不公者，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样做更会让民众感动。但是，反过来说，这样的事例很少发生，并不是坏事，反而是件好事；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治理不好，其日常里必然经常发生违法乱纪的事（第五章第二节），备受称赞的好事必然非常罕见。

42 . Those who are sent as governors to cities and provinces ought to be chosen out of the rank of senators, because it is the duty of senators to look after the fortifications of cities, the treasury, the military, etc. But those, who were sent to somewhat distant regions, would be unable to attend the senate, and, therefore, those only are to be summoned from the senate itself, who are destined to cities founded on their native soil; but those whom they wish to send to places more remote are to be chosen out of those, whose age is consistent with senatorial rank. But not even thus do I think that the peace of the dominion will be sufficiently provided for, that is, if the neighbouring cities are altogether denied the right of vote, unless they are so weak, that they can be openly set at naught, which cannot surely be supposed. And so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neighbouring cities be granted the right of citizenship, and that from every one of them twenty, or thirty, or forty chosen citizens (for the number should vary with the size of the city) be enrolled among the patricians, out of whom three, four, or five ought to be yearly elected to be of the senate, and one for life to be a syndic. And let those who are of the senate be sent with their syndic, to govern the city out of which they were chosen.

第四十二节　因为元老院议员的职责是负责照管各城市的防御工事、财政和军队，所以派驻各城市和各省的地方长官应该从元老院议员中选任。由于那些派往较远地区的元老院议员将无法参加元老院会议，所以，应该只有那些将被派往本地城市的人是从元老院议员中选任；而派往较远地区的人，应该从那些年纪已达进入元老院法定年龄的人中选派。但是，就算是这样，我认为还是不足以保障全国的和平。因为，如果邻近的城市完全被剥夺投票权，会带来不安全，除非它们非常弱小，可以公然忽视它们的存在，而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给邻近的城市以城市权利，并且从每个城市中选出二十名、三十名或四十名公民（人数随城市的大小而定）登记入贵族名册，每年从中选出三名、四名或五名担任元老院议员，并选出一人担任终身制的法官，由这些元老院议员和护法官一起治理选出他们的城市。

43 . Moreover, judges are to be established in every city, chosen out of the patricians of that city. But of these I think it unnecessary to treat at length, because they concern not the foundations of this sort of dominion in particular.

第四十三节　而且，每个城市都要设立法官，法官从该城市的贵族中选任。对于他们，我认为没有必要详细阐述，因为他们与贵族政体的基本原则不是特别有关。

44 . In every council the secretaries and other officials of this kind, as they have not the right of voting, should be chosen from the commons. But as these, by their long practice of business, are the most conversant with the affairs to be transacted, it often arises that more deference than right is shown to their advice, and that the state of the whole dominion depends chiefly on their guidance: which thing has been fatal to the Dutch. For this cannot happen

without exciting the jealousy of many of the noblest. And surely we cannot doubt, that a senate, whose wisdom is derived from the advice, not of senators, but of officials, will be most frequented by the sluggish, and the condition of this sort of dominion will be little better than that of a monarchy directed by a few counsellors of the king. (See Chap. 6. Secs. 5-7). However, to this evil the dominion will be more or less liable, according as it was well or ill founded. For the liberty of a dominion is never defended without risk, if it has not firm enough foundations; and, to avoid that risk, patricians choose from the commons ambitious ministers, who are slaughtered as victims to appease the wrath of those, who are plotting against liberty. But where liberty has firm enough foundations, there the patricians themselves vie for the honour of defending it, and are anxious that prudence in the conduct of affairs should flow from their own advice only; and in lay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is dominion we have studied above all these two points, namely, to exclude the commons from giving advice as much as from giving votes (Secs. 3,4), and, therefore, to place the whole authority of the dominion with the whole body of patricians, but its exercise with the syndics and senate, and, lastly, the right of convoking the senate, and treating of matters affecting the common welfare with consuls chosen from the senate itself. But, if it is further ordained that the secretary, whether in the senate or in other councils, be appointed for four or five years at most, and have attached to him an assistant-secretary appointed for the same period, to bear part of the work during that time, or that the senate have not one, but several secretaries, employed one in one department, and another in another, the power of the officials will never become of any consequence.

第四十四节　在各个议事会，秘书之类的官员由于没有投票权，

所以应该从平民中选任。但是，由于这些人长期处理政务，经验非常丰富，人们往往遵从他们的建议而没有考虑自己的权利，于是整个国家主要处在这些人的引领之下。这类事情曾经导致荷兰垮台。而这必定会引起很多贵族的不满。显然，毫无疑问，如果元老院的意见不是出自元老院议员，而是出自一些办事的官员，则元老院议员必定是怠惰无能的。那么，这种国家不会比君主顾问官统治下的君主政体好多少（参阅第六章第五至七节）。但是，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种有害之事的影响，取决于国家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的好坏。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建立充分稳固的基本原则，那么要维护它的自由必然要冒风险。为了避免这种风险，贵族会选择热衷功名的平民担任官职，而这些官员最终会被当作牺牲品处死，以平息那些阴谋反对自由的人的愤怒。而如果自由的基础充分稳固，贵族自身就会力争获得维护自由的荣誉，而且会热切希望在处理政务时只遵从他们自己的意见。在制定贵族政体的基本原则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两点是，平民不得参与磋商政务和投票表决（本章第三和第四节）。所以，国家的全部权力属于全体贵族，但国家的执行权属于护法官议事会和元老院；而且，召开元老院会议的权利和讨论处理事关公共利益的议案的权利属于选自元老院议员的执政官。此外，如果进一步规定，元老院和其他议事会的秘书任期为四年，或至多五年，并配给他一名任期相同的助理秘书，分担其部分工作；或者规定元老院秘书不能只有一人，而是有几个人，每个部门一个秘书，各有所司；那么这些官员的权力就决不会造成任何不良的后果。

45 . Treasurers are likewise to be chosen from the commons, and are to be bound to submit the treasury accounts to the syndics as well as to the senate.

第四十五节　财务官员同样应该从平民中选任，而且他们必须向护法官议事会和元老院呈报国家财务工作的情况。

46 . Matters concerning religion we have set forth at sufficient length in our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Yet certain points we then omitted, of which it was not there the place to treat; for instance, that all the patricians must be of the same religion, that is, of that most simple and general religion, which in that treatise we described. For it is above all to be avoided, that the patricians themselve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sects, and show favour, some to this, and others to that, and thence become mastered by superstition, and try to deprive the subjects of the liberty of speaking out their opinions. In the second place, though everyone is to be given liberty to speak out his opinion, yet great conventicles are to be forbidden. And, therefore, those that are attached to another religion are, indeed, to be allowed to build as many temples as they please; yet these are to be small, and limited to a certain standard of size, and on sites at some little distance one from another. But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temples consecrated to the national religion should be large and costly, and that only patricians or senators should be allowed to administer its principal rites, and thus that patricians only be suffered to baptize, celebrate marriages, and lay on hands, and that in general they be recognized as the priests of the temples and the champions and interpreters of the national religion. But, for preaching, and to manage the church treasury and its daily business, let some persons be chosen from the commons by the senate itself, to be, as it were, the senate's deputies, and, therefore, bound to render it account of everything.

第四十六节　关于宗教问题，在《神学政治论》一书中我们已有详细论述，但是以下几点，由于不属于该书范畴，我们并没有论及。第一点是，所有贵族必须信奉同样的宗教，也就是我们在《神学政治论》中阐述的最简单和最普通的宗教教义。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要避免贵族本身分裂成几个教派，以致有些人偏袒这一派，有些人偏袒

那一派，从而致使贵族陷于迷信，而想方设法剥夺国民畅所欲言的自由。其次，尽管每个人都有畅所欲言的自由，但是必须禁止其他教派举行大型的秘密宗教集会，所以，可以允许信奉其他宗教的人随其意愿建立许多教堂，但教堂必须是小型的，其规模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而且教堂之间要相距甚远。而为国教所建立的教堂必须宏大堂皇，而且只允许贵族和元老院在那里举行主要的宗教仪式。因此，只有贵族才能施洗礼、主持婚礼和施按手礼。总之，只有他们才能担任教堂的牧师，成为国教的捍卫者和解释者。但是，对于讲道、管理教堂财务以及日常工作，可以由元老院从平民中选拔若干人员作为其代理人，但这些人必须要向元老院报告工作情况。

47 . And these are points that concern the foundations of this sort of dominion; to which I will add some few others less essential indeed, but yet of great importance. Namely, that the patricians, when they walk,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by some special garment, or dress, and be saluted by some special title; and that every man of the commons should give way to them; and that, if any patrician has lost his property by some unavoidable misfortune, he should be restored to his old condition at the public expense; but if, on the contrary, it be proved that he has spent the same in presents, ostentation, gaming, debauchery, etc., or that he is insolvent, he must lose his dignity, and be held unworthy of every honour and office. For he, that cannot govern himself and his own private affairs, will much less be able to advise on public affairs.

第四十七节　以上所述就是贵族政体的一些基本原则。除此之外，我再加上几条规定，虽然它们算不上是很基本的，但是也很重要。这就是：贵族应该有特别的服装，以示区别；贵族应该有特殊的称呼；所有平民应该给贵族让路；任何贵族如果因为无法避免的灾祸而失去财产，应该由国家经费支出帮助他恢复到原来的状况，但反

之，如果证实他是因随意馈赠、铺张炫耀、赌博放荡等原因造成债台高筑、无力偿还，那么应该剥夺其尊荣，并不予以任何荣誉和官职，因为一个无法控制自己和管好自己私事的人，更不能管理好公共事务。

48 . Those, whom the law compels to take an oath, will be much more cautious of perjury, if they are bidden to swear by the country's safety and liberty and by the supreme council, than if they are told to swear by God. For he who swears by God, gives as surety some private advantage to himself, whereof he is judge; but he, who by his oath gives as surety his country's liberty and safety, swears by what is the common advantage of all, whereof he is not judge, and if he perjures himself, thereby declares that he is his country's enemy.

第四十八节　对那些按法律要求必须宣誓的人，让他们以国家的安全自由和最高议事会的名义宣誓，比以上帝的名义宣誓更能让他们谨慎而不作伪证。因为，如果以上帝的名义宣誓，他是以个人评判的私人利益作为担保；而如果以国家安全自由的名义宣誓，则他是以个人无法评判的公共利益作为担保。如果他作伪证，就等于宣布自己是祖国的敌人。

49 . Academies, that are founded at the public expense, are instituted not so much to cultivate men's natural abilities as to restrain them. But in a free commonwealth arts and sciences will be best cultivated to the full, if everyone that asks leave is allowed to teach publicly, and that at his own cost and risk. But these and the like points I reserve for another place. [9_4] For here I determined to treat only such matters as concern an aristocratic dominion only.

第四十九节　以国家经费建立的大学，它的创立与其说是为了培养人的自身能力，不如说是抑制人的自身能力。相反，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如果允许任何人公开授课，由他们自己负担费用，自己承担风险，那么艺术和科学将得到最好的发展。但是关于这一类的问题，我将在其他地方予以论述[10_4]，本书只讨论有关贵族政体的事情。

[9_1].Ought not this reference to be to Chap. 3. Sec. 6

[9_2].Cf. Chap. 6. Sec. 10.

[9_3]."This V. H. is Pieter de la Court (1618-85), an eminent publicist, who wrote under the initials D. C. (De la Court), V. H. (Van den Hove, the Dutch equivalent). He was a friend of John de Witt, and opposed to the party of the Stadtholders."—Pollock's "Life and Philosophy of Spinoza", towards end of Chap. X.

[9_4].This promise is not kept by the author, no doubt owing to his not living to finish the work.

[10_1].第五节似应改为第六节。

[10_2].参见第六章，第十节。

[10_3].此处的霍夫是指彼得·德·拉·考特（Pieter de la Court, 1618-85），著名公法学家。其名可简写为D. C. （De la Court）或V. H. (Van den Hove，荷兰人的叫法)。他是荷兰数学家约翰·德·威特（John de Witt）的朋友，二者一致反对当时占据荷兰执政职位的奥伦治-拿骚家族——参见波洛克（Pollock）所著《斯宾诺莎的生活与哲学》（Life and Philosophy of Spinoza）第十章结尾。

[10_4].因为著者生前未完成此书，故未能另作论述。

Chapter 9 Of Aristocracy (Continuation)

第九章　关于贵族政体（续）

1．Hitherto we have considered an aristocracy, so far as it takes its name from one city, which is the head of the whole dominion. It is now time to treat of that, which is in the hands of more than one city, and which I think preferable to the former. But that we may notice its difference and its superiority, we will pass in review the foundations of dominion, one by one, rejecting those foundations, which are unsuited to the present kind, and laying in their place others for it to rest upon.

第一节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贵族制国家，都是以一个城市，即全国的首都命名的国家。接下来将讨论由几个城市共同掌握统治权的国家，我认为这第二种贵族国家比前者更优越。但是，为了能弄清这两种贵族国家的不同以及第二种贵族国家的优越性，我们将逐一估量国家的各项基本原则，摒弃不适用于第二种贵族国家的基本原则，代之以第二种贵族国家需要的其他原则。

2．The cities, then, which enjoy the right of citizenship, must be so built and fortified, that, on the one hand, each city by itself may be unable to subsist without the rest, and that yet,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not desert the rest without great harm to the whole dominion. For thus they will always remain united. But cities, which are so constituted, that they can neither maintain themselves, nor be dangerous to the rest, are clearly not independent, but absolutely subject to the rest.

第二节　建立和巩固享有城市权利的城市，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方面，（它没有强大到）离开其他城市也能单独生存的地步；而另一方面，（它也没有弱小到）即使脱离了其他城市也不会对整个国家造成损害的程度。只有这样，这些城市才会保持团结统一。而如果建立起来的城市既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又不会对其他城市构成威胁，那么它显然无法拥有自己的权利，而是完全受制于其他城市。

3 .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ninth and tenth sections of the last chapter are deduced from the general nature of aristocracy, as are also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numbers of the patricians and the multitude, and the proper age and condition of those that are to be made patricians; so that on these points no difference can arise, whether the dominion be in the hands of one or more cities. But the supreme council must here be on a different footing. For if any city of the dominion were assigned for the meeting of this supreme council, it would in reality be the head of the dominion; and, therefore, either they would have to take turns, or a place would have to be assigned for this council, that has not the right of citizenship, and belongs equally to all. But either alternative is as difficult to effect, as it is easy to state; I mean, either that so many thousands of men should have to go often outside their cities, or that they should have to assemble sometimes in one place, sometimes in another.

第三节　上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所述的基本原则，都是根据贵族政体的一般性质而推论得出的。比如，贵族与平民人数比例的确定，以及选择贵族的年龄和条件，都是依此而定。所以，不管国家的统治权是由一个城市或几个城市掌握，在这几点上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是，第二种贵族国家关于最高议事会的基本原则，肯定与第一种贵族

国家的不同。因为，任何一个城市，若被指定为最高议事会的开会地点，那么实际上它就成了国家的首都。因此，对于由几个城市共同掌握统治权的贵族国家来说，为了这几个城市间的公平起见，要么把各个城市轮流作为开会地点，要么指定一个没有城市权利、共同属于这几个城市的地方作为开会地点。但是，这两种做法都是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却有困难。我指的是，要求几千人员经常离开他们自己的城市，或者是几千人员轮流到不同的地方开会，都很困难。

4 . But that we may conclude aright what should be done in this matter, and on what plan the councils of this dominion ought to be formed, from its own very nature and condition, these points are to be considered; namely, that every city has so much more right than a private man, as it excels him in power (Chap. 2. Sec. 4), and consequently that every city of this dominion has as much right within its walls, or the limits of its jurisdiction, as it has power; and, in the next place, that all the cities are mutually associated and united, not as under a treaty, but as forming one dominion, yet so that every city has so much more right as against the dominion than the others, as it exceeds the others in power. For he who seeks equality between unequals, seeks an absurdity. Citizens, indeed, are rightly esteemed equal, because the power of each,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whole dominion, is of no account. But each city's power constitutes a large part of the power of the dominion itself, and so much the larger, as the city itself is greater. And, therefore, the cities cannot all be held equal. But, as the power of each, so also its right should be estimated by its greatness. The bonds, however, by which they should be bound into one dominion, are above all a senate and a court of justice (Chap. 4. Sec. 1). But how by these bonds they are all to be so united, that each of them may yet remain, as far as possible, independent, I will here briefly show.

第四节　为了能正确推断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以及这种贵族政体下组建各种议事会需要遵循的方案，我们必须基于这种政体的本质和情况出发，考虑下面几点：第一，每个城市的权利超过个人权利的程度，应该与该城市的力量超过个人力量的程度一样大（第二章第四节），所以每个城市在其城墙之内的权利，即管辖权，应该与它的力量一样大。其次，所有城市应该相互联合和统一，但不是作为契约之下的结盟者那样，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城市比其他城市的力量超出多少，它对国家的权利就比其他城市对国家的权利大多少；因为，要在不平等的事物中寻求平等，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公民之所以可被视为人人平等，是因为公民个人的力量与整个国家的力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各个城市的力量构成国家自身力量的很大一部分，而且，城市本身的力量越大，它在国家力量中所占的部分也越大，因此，城市之间不可能都是平等的，各个城市的力量以及它的权利必须按照城市的大小来估量。此外，把各个城市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纽带是元老院和法院（第四章第一节）。而这些纽带是如何把所有的城市结合起来，并尽可能保持各个城市自己的权利，就是我接下来要简要说明的问题。

5．I suppose then, that the patricians of every city, who, according to its size, should be more, or fewer (Sec. 3), have supreme right over their own city, and that, in that city's supreme council, they have supreme authority to fortify the city and enlarge its walls, to impose taxes, to pass and repeal laws, and, in general, to do everything which they judge necessary to their city's preservation and increase. But to manage the common business of the dominion, a senate is to be created on just the same footing as we described in the last chapter, so that there be between this senate and the former no difference, except that this has also authority to decide the disputes, which may arise between cities. For in this dominion, of which no city is head, it cannot be done by

the supreme council. (See Chap. 6. Sec. 38.)

第五节　我认为，每个城市的贵族对于自己的城市享有最高的统治权，而贵族人数的多少必须根据城市的大小来确定（本章第三节）。而且，在该城市的最高议事会中，他们全权决定着城市的设防、城界的扩张、赋税的征收、法律的制定和废除。总之，只要他们认为对保护城市和发展城市有必要，他们有权做任何事情。为了处理国家的共同事务，必须建立一个元老院，其创建的基本原则与我们在上一章里所述的一样。这样，除了还有权处理城市之间可能发生的争端外，这个元老院与上一章所述的元老院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在这种贵族国家，没有一个城市是首都城市，所以，争端不能在最高议事会上解决（参阅上一章第三十八节）。

6 . But, in this dominion, the supreme council is not to be called together, unless there is need to alter the form of the dominion itself, or on some difficult business, to which the senators shall think themselves unequal; and so it will very rarely happen, that all the patricians are summoned to council. For we have said (Chap. 8. Sec. 17), that the supreme council's function is to pass and repeal laws, and to choose the ministers of the dominion. But the laws, or general constitution of the whole dominion, ought not to be changed as soon as instituted. If, however, time and occasion suggest the institution of some new law or the change of one already ordained, the question may first be discussed in the senate, and after the agreement of the senate in the matter, then let envoys next be sent to the cities by the senate itself, to inform the patricians of every city of the opinion of the senate, and lastly, if the majority of the cities follow that opinion, it shall then remain good, but otherwise be of no effect. And this same order may be observed in choosing the generals of the army and the ambassadors

to be sent to other realms, as also about decrees concerning the making of war or accepting conditions of peace. But in choosing the other public officials, since (as we showed in Sec. 4) every city, as far as can be, ought to remain independent, and to have as much more right than the others in the dominion, as it exceeds them in power, the following order must necessarily be observed. The senators are to be chosen by the patricians of each city; that is, the patricians of one city are to elect in their own council a fixed number of senators from their colleagues of their own city, which number is to be to that of the patricians of that city as one to twelve (Chap. 8. Sec. 30); and they are to designate whom they will to be of the first, second, third, or other series; and in like manner the patricians of the other citie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number, are to choose more or fewer senators, and distribute them among the series, into a certain number of which we have said the senate is to be divided. (Chap. 8. Sec. 34.) By which means it will result, that in every series of senators there will be found senators of every city, more or fewer, according to its size. But the presidents and vice-presidents of the series, being fewer in number than the cities, are to be chosen by lot by the senate out of the consuls, who are to be appointed first. The same order is to be maintained in appointing the supreme judges of the dominion, namely, that the patricians of every city are to elect from their colleague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number more or fewer judges. And so it will be the case, that every city in choosing officials will be as independent as possible, and that each, in proportion to its power, will have the more right alike in the senate and the court of justice; supposing, that is, that the order observed by senate and court in deciding public affairs, and settling disputes is such in all respects, as we have described it in the thirty-third and thirty-fourth sections of the last chapter. [10_1]

第六节　在这种国家，除非需要改变国家形式，或是为了解决元老院议员认为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一些困难事务，否则不应该召开最高议事会。因此，召集所有贵族开会是非常罕见的事。如前所述（第八章第十七节），最高议事会的职能是制定和废除法律，选任政府官员。不过，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有必要制定新的法律或修改现行的法律，可以先在元老院提出并讨论。在元老院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后，应该派出使者到各个城市，向各个城市的贵族传达元老院的意见。最后，如果多数城市赞成元老院的意见，则意见有效；否则，意见无效。此外，像选择军队的将领或派驻外国的使节，以及关于发动战争的命令或接受和平条件的决议，都可以遵照同样的程序。但是，由于每个城市都应该尽可能保持它自己的权利（如本章第四节所述），而且，一个城市超过其他城市的力量有多少，它在国内就拥有多少大于其他城市的权利，所以，在选任其他公职官员时，必须遵循下面的程序。元老院议员必须由各城市的贵族选出，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的贵族在他们自己的议事会会议上，从该市的贵族同僚中选出一定数量的元老院议员，这个数量应该相当于该市贵族总数的十二分之一（第八章第三十节）。再由贵族指定这些元老院议员到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或其他组去。其他城市的贵族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按照人数的比例，选任或多或少的元老院议员，并把他们分派到元老院的各组去（第八章第三十四节）。通过这种方法，结果是，元老院的每个组内都有一定数量的来自各个城市的元老院议员，而议员数量的多少依其城市的大小而定。但是，各组组长和副组长的人数少于城市的数量，所以，他们应该由元老院从已经任命的执政官中抽签选任。国家最高法官的选任也应该遵照这种程序，也就是说，每个城市的贵族应该按人数比例，从他们的同僚中选出或多或少的法官。这样，每个城市在选任国家官员时，都能尽可能享有自己的权利，而且，每个城市，根据其力量的大小，在元老院和法院享有相应的权利。也就是说，元老院和法院在处理国家事务和解决争端时，应该遵循我们在上一章第三十三节和第三十四节里所阐述的程序[11_1]。

7 . Next, the commanders of battalions and military tribunes

are also to be chosen from the patricians. For as it is fair, that every city in proportion to its size should be bound to levy a certain number of soldiers for the general safety of the whole dominion, it is also fair, that from the patricians of every city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regiments, which they are bound to maintain, they may appoint so many tribunes, captains, ensigns, etc., as are needed to discipline that part of the military, which they supply to the dominion.

第七节　　营长和团长也应该从贵族中选任。为了整个国家的安全，各城市应该根据城市的大小按照比例征募一定数量的士兵，这是理所应当的；同样，为了统领每个城市必须供养的国家的军团，需要众多的团长、上尉、少尉等各级军官，而各城市也应该依据军团数量的多少按照比例从贵族中选任这些军官，这也是理所应该的。

8 . No taxes are to be imposed by the senate on the subjects; but to meet the expenditure, which by decree of the senate is necessary to carry on public business, not the subjects, but the cities themselves are to be called to assessment by the senate, so that every city, in proportion to its size, should pay a larger or smaller share of the expense. And this share indeed is to be exacted by the patricians of every city from their own citizens in what way they please, either by compelling them to an assessment, or, as is much fairer, by imposing taxes on them.

第八节　元老院不应该向国民征收赋税。但是，为了支付元老院认可的、为处理公共事务所需要的公共开销，元老院不应该要求国民，而应该要求各城市估算该缴交的份额，以便每个城市根据自己城市的大小按比例分担或多或少的开销费用。而实际上，各城市所分担

的这部分费用将由贵族向自己城市的公民收取。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意志，直接强行分摊到公民身上；或者，更合理一点，向公民征税。

9．Further, although all the cities of this dominion are not maritime, nor the senators summoned from the maritime cities only, yet may the same emoluments be awarded to the senators, as we mentioned in the thirty-first section of the last chapter. To which end it will be possible to devise means, varying with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ominion, to link the cities to one another more closely. But the other points concerning the senate and the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whole dominion in general, which I delivered in the last chapter, are to be applied to this dominion also. And so we see, that in a dominion which is in the hands of several cities, it will not be necessary to assign a fixed time or place for assembling the supreme council. But for the senate and court of justice a place is to be appointed in a village, or in a city, that has not the right of voting. But I return to those points, which concern the cities taken by themselves.

第九节　此外，尽管这国家的城市并非都是沿海城市，而且元老院议员也不全是来自沿海城市，但是，仍然可以按照上一章第三十一节所述的方法予以元老院议员薪酬。为达此目的，可以根据国家构成的不同而想出一些方法，将各城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上一章我们所阐述的关于元老院和法院，以及整个国家的其他原则，也适用于这种政体。因此，我们认为，在由几个城市共同掌握统治权的国家里，没有必要指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或地点召开最高议事会。但是，对于元老院和法院，则应该设置在乡村或没有投票权的城市里。接下来，我回过来讨论各城市本身应该采用的原则。

10 . The order to be observed by the supreme council of a single city, in choosing officials of the dominion and of the city, and in making decrees, should be the same that I have delivered in the twenty-seventh and thirty-sixth sections of the last chapter. For the policy is the same here as it was there. Next a council of syndics is to be formed, subordinate to the council of the city, and having the same relation to it as the council of syndics of the last chapter had to the council of the entire dominion, and let its functions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city be also the same, and let it enjoy the same emoluments. But if a city, and consequently the number of its patricians be so small that it cannot create more than one syndic or two, which two are not enough to make a council, then 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city is to appoint judges to assist the syndics in trials according to the matter at issue, or else the dispute must be referred to the supreme council of syndics. For from every city some also out of the syndics are to be sent to the place where the senate sits, to see tha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whole dominion is preserved unbroken, and they are to sit in the senate without the right of voting.

第十节　每一个城市在选任国家和城市的官员以及制定各种法令时，其最高议事会应该遵循上一章第三十六节和三十七节所述的程序，因为这两种贵族国家的政府组织是一样的。其次，应该设立隶属于城市最高议事会的护法官议事会。这个护法官议事会对城市最高议事会的关系，与上一章所述的护法官议事会对全国最高议事会的关系一样。而且，它在城市范围内的职责以及其议员享受的薪酬也与上一章所述的相同。但是，如果城市太小，以至于贵族人数过少而无法选任一名或两名护法官——两名护法官也不能组成一个议事会——那么，该城市的最高议事会应该根据所讨论问题的争议情况，指派法官帮助护法官进行审理，或者把问题移交最高护法官议事会。而且，每个城市也应该派出若干名护法官到元老院开会的地方，以监督国家的

规章制度不受破坏，而且，他们还应该作为无表决权的人出席元老院会议。

11 . The consuls of the cities are likewise to be chosen by the patricians of their city, and are to constitute a sort of senate for it. But their number I cannot determine, nor yet do I think it necessary, since the city's business of great importance is transacted by its supreme council, and matters concerning the whole dominion by the great senate. But if they be few, it will be necessary that they give their votes in their council openly, and not by ballot, as in large councils. For in small councils, when votes are given secretly, by a little extra cunning one can easily detect the author of every vote, and in many ways deceive the less attentive.

第十一节　每个城市的执政官也应该由该城市的贵族选任，并且组成该城市的某种元老院。但是，我不能确定执政官的人数，也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城市的重要事务都由城市最高议事会处理，而事关全国的问题则都由大元老院处理。不过，如果执政官人数很少，那么在城市议事会上投票时，他们必须公开投票，而不是像在大议事会上投票一样，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因为，在小议事会上，如果采用秘密投票，一些工于心计的人不难发现每张票是谁投的，并采用种种方法欺骗警惕性不高的人。

12 . Besides, in every city judges are to be appointed by its supreme council, from whose sentence, however, let everyone but an openly convicted criminal or confessed debtor have a right of appeal to the suprem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dominion. But this need not be pursued further.

第十二节　此外，各城市的法官也应该由城市最高议事会选任。对于法官做出的判决，除了已被公开定罪的罪犯或已自愿认罪的人之外，任何人都有权向国家的最高法院申诉。关于这一点，没有必要进一步阐述。

13 . It remains, therefore, to speak of the cities which are not independent. If these were founded in an actual province or district of the dominion, and their inhabitants are of the same nation and language, they ought of necessity, like villages, to be esteemed parts of the neighbouring cities, so that each of them should be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this or that independent city. And the reason of this is, that the patricians are chosen by the supreme council, not of the dominion, but of every city, and in every city are more or fewer,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inhabitants within the limits of its jurisdiction (Sec. 5). And so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multitude of the city, which is not independent, be referred to the census of another which is independent, and depend upon the latter's government. But cities captured by right of war, and annexed to the dominion, are either to be esteemed associates in the dominion, and though conquered put under an obligation by that benefit, or else colonies to enjoy the right of citizenship are to be sent thither, and the natives removed elsewhere or utterly destroyed.

第十三节　最后，还要讨论一下那些不具有自己权利的城市。如果这些城市位于国内的某个省或某个地区，而且其居民与其他城市的居民一样属于同一民族，说同样的语言，那么，它们应该像村庄一样，被当作邻近城市的一部分。这样，这些城市就处在某个具有自己权利的城市的管辖之下。这样做是因为贵族不是由国家最高议事会，而是由各个城市的最高议事会选出的，而每个城市贵族数量的多少，是依据其管辖范围内居民的多少而定的（本章第五节）。所以，对于

不具有自己权利的城市的民众来说，必须把自己登记在另一个具有自身权利的城市的人口名册上，并处在该城市的管辖之下。但是，对于通过战争占领得来的并归入国家版图的城市，可以把它当作是依附于国家的一个盟友，虽然已被征服，但仍应对它施以恩惠予以安抚；或者，把它当作殖民地，向那里送去享有城市权利的殖民队，并把原居民迁往别处；或者把该城市完全摧毁。

14 . And these are the things, which touch the foundations of the dominion. But that its condition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aristocracy, which is called after one city only, I conclude from this, namely, that the patricians of every city, after the manner of human desire, will be eager to keep, and if possible increase their right, both in their city and in the senate; and therefore will try, as far as possible, to attract the multitude to themselves, and consequently to make a stir in the dominion by good deeds rather than by fear, and to increase their own number; because the more numerous they are, the more senators they will choose out of their own council (Sec. 6), and hence the more right (Sec. 6) they will possess in the dominion. Nor is it an objection, that while every city is consulting its own interest and suspecting the rest, they more often quarrel among themselves, and waste time in disputing. For if, while the Romans are debating, Saguntum is lost: [10_2]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a few are deciding everything in conformity with their own passions only, liberty and the general good are lost. For men's natural abilities are too dull to see through everything at once; but by consulting, listening, and debating, they grow more acute, and while they are trying all means, they at last discover those which they want, which all approve, but no one would have thought of in the first instance. But if anyone retorts, that the dominion of the Dutch has not long endured without a count or one to fill his place, let him have this reply, that the Dutch thought, that to maintain their liberty it was

enough to abandon their count, and to behead the body of their dominion, but never thought of remoulding it, and left its limbs, just as they had been first constituted, so that the county of Holland has remained without a count, like a headless body, and the actual dominion has lasted on without the name. And so it is no wonder that most of its subjects have not known, with whom the authority of the dominion lay. And even had this been otherwise, yet those who actually held dominion were far too few to govern the multitude and suppress their powerful adversaries. Whence it has come to pass, that the latter have often been able to plot against them with impunity, and at last to overthrow them. And so the sudden overthrow of the said republic [10_3] has not arisen from a useless waste of time in debates, but from the misformed state of the said dominion and the fewness of its rulers.

第十四节　以上所述就是关于这种国家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之所以认为这种国家比只由一个城市掌权的贵族国家更好一些，是因为，在人类欲望的驱使之下，各个城市的贵族必将努力保持并尽可能扩大自己在城市以及元老院的权利。因此，为了尽可能把民众吸引到自己的城市中，从而增加自己的贵族人数，他们在执政时会做有利于民众的善事，而不是做让民众恐惧的事情，以此扩大自己的影响；因为，民众人数越多，他们就可以从自己的议事会（本章第六节）中选出更多的元老院议员，从而在国内拥有更多的权利（本章第六节）。至于各个城市都只谋求自己的利益而疑视其他城市，因而经常发生纠纷，将时间浪费在争论之中，我认为这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虽然，有谚语说“罗马人还在商议未决，萨贡托已遭毁灭” [11_2]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让少数人仅凭自己的情感行事，那么自由与公共利益也将丧失。人的自然能力天生迟钝，无法立即洞察一切；但是通过商议、倾听、辩论，思想就会变得敏锐起来。而且，通过多方设法尝试解决问题，他们最终会找到他们想要的，会发现大家都赞成的、但最初谁都没有想到的方法。如果有人反驳说，荷兰政权不能长久持续是因为国

家没有伯爵或代替伯爵的人引起的，我的回答是，荷兰人认为，为维护自由，只要离弃他们的伯爵，脱离国家的首领就足够了。但是，他们从不曾想过重组国家，而是让国家的其他部分保持最初的样子。于是，荷兰成了一个没有伯爵的国家，就像一个没有头颅的躯体一样，国家本身也没有名称。所以，它的大多数国民不知道国家政权掌握在谁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即使情况不是这样，如果实际掌握统治权的人数太少，也不能统治民众和压制强大的反对派。这样，结果就是，反对派经常得以肆无忌惮地策划阴谋，并最终推翻他们。所以，这个国家的突然倾覆 [11_3] ，不是因为它浪费时间去争论，而是因为它畸形的国家状态和统治者人数过少引起的。

15 . This aristocracy in the hands of several cities is also preferable to the other, because it is not necessary, as in the first described, to provide against its whole supreme council being overpowered by a sudden attack, since (Sec. 9) no time or place is appointed for its meeting. Moreover, powerful citizens in this dominion are less to be feared. For where several cities enjoy liberty, it is not enough for him, who is making ready his way to dominion, to seize one city, in order to hold dominion over the rest. And, lastly, liberty under this dominion is common to more. For where one city reigns alone, there the advantage of the rest is only so far considered, as suits that reigning city.

第十五节　这种由几个城市共同掌握统治权的贵族国家较之第一种贵族国家更具优越性的原因还在于：与第一种贵族国家不同，它无需担心最高议事会遭受突然袭击而被控制，因为它的最高议事会没有固定的开会时间或地点（本章第九节）；而且，在这种国家里，有势力的公民造成的威胁比较小，因为是几个城市共同享有国家的自由，所以，对于准备篡权的人来说，夺取一个城市也不足以控制其他的城市。最后，在这种国家里，更多的人能够同享自由，因为，在只有一

个城市掌握统治权的国家里，只有在对掌权的城市有利的情况下，其他城市的利益才会被考虑到。

[10_1].So the text: but the court of justice is not described till the thirty-seventh and following sections of Chap. 8.

[10_2].Livy, "Hist.," Bk. xxi. Chaps. VI. and following.

[10_3].A.D. 1672. William Henry, Prince of Orange, afterwards William III. of England, was made Stadtholder by a popular insurrection, consequent on the invasion of the French.

[11_1].原文如此；但是关于法庭的问题见于第八章第三十七节及其后诸节。

[11_2].李维,《罗马史》，第二十一卷第六章及后文。

[11_3].1672年，法国与英国联手入侵荷兰，由此爆发了一场民众骚乱。随后奥伦治亲王威廉（即日后的英王威廉三世）出任荷兰执政。

Chapter 10 Of Aristocracy (Conclusion)

第十章　关于贵族政体（结论）

1 . Having explained and made proof of the foundations of both kinds of aristocracy, it remains to inquire whether by reason of any fault they are liable to be dissolved or changed into another form. The primary cause, by which dominions of this kind are dissolved, is that, which that most acute Florentine [11_1] observes in his “Discourses on Livy” (Bk. iii. Chap. I.), namely, that like a human body, “a dominion has daily added to it something that at some time or other needs to be remedied.” And so, he says, it is necessary for something occasionally to occur, to bring back the dominion to that first principle, on which it was in the beginning established. And if this does not take place within the necessary time, its blemishes will go on increasing, till they cannot be removed, but with the dominion itself. And this restoration, he says, may either happen accidentally, or by the design and forethought of the laws or of a man of extraordinary virtue. And we cannot doubt, that this matter i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and that, where provision has not been made against this inconvenience, the dominion will not be able to endure by its own excellence, but only by good fortun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where a proper remedy has been applied to this evil, it will not be possible for it to fall by its own fault, but only by some inevitable fate, as we shall presently show more clearly. The first remedy, that suggested itself for this evil, was to appoint every five years a supreme dictator for one or two months, who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inquire, decide, and make ordinances concerning the acts of the senators and of every official, and thereby to bring back the dominion to its first

principle. But he who studies to avoid the inconveniences, to which a dominion is liable, must apply remedies that suit its nature, and can be derived from its own foundations; otherwise in his wish to avoid Charybdis he falls upon Scylla. It is, indeed, true that all, as well rulers as ruled, ought to be restrained by fear of punishment or loss, so that they may not do wrong with impunity or even advantage;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certain, that if this fear becomes common to good and bad men alike, the dominion must be in the utmost danger. Now as the authority of a dictator is absolute, it cannot fail to be a terror to all, especially if, as is here required, he were appointed at a stated time, because in that case every ambitious man would pursue this office with the utmost energy; and it is certain that in time of peace virtue is thought less of than wealth, so that the more haughty a man he is, the more easily he will get office. And this perhaps is why the Romans used to make a dictator at no fixed time, but under pressure of some accidental necessity. Though for all that, to quote Cicero's words, “the tumour of a dictator was displeasing to the good.“ [11_2] And to be sure, as this authority of a dictator is quite royal,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dominion to change into a monarchy without great peril to the republic, although it happen for ever so short a time. Furthermore, if no fixed time were appointed for creating a dictator, no notice would be paid to the interval between one dictator and another, which is the very thing that we said was most to be observed; and the whole thing would be exceedingly vague, and therefore easily neglected. Unless, then, this authority of a dictator be eternal and fixed, and therefore impossible to be conferred on one man without destroying the form of dominion, the dictatorial authority itself, and consequently the safety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republic will be very uncertain.

第一节　在阐明并论证完贵族国家的基本原则之后，还需论证的是：这些贵族国家是否会因为某些内在的原因而导致国家解体或改变国家形式？这种国家解体的主要原因，在那位精明的佛罗伦萨人[12_1]所著的《论李维》（第三卷第一章）一书中已有论述，即国家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每天都有一些东西累积下来，时不时需要加以清理。”所以，他以为，有时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以使国家恢复最初赖以立国的基本原则。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采取措施，国家的弊病就会越积越多，直至不清除国家就无法清除弊病的地步。他还说明，这种恢复可能是意外发生的，也可能是因为法律或智慧超群的人预先设计和深谋远虑而得以实现。毋庸置疑，及时清除弊病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而且，如果国家对此不采取预防措施，那么，国家的存续依靠的不是它自身的优越，而只是靠运气幸存。反之，如果采取了适当的补救措施，国家即使垮台，也不是由于它自身的缺陷引起，而是因为某种不可抗拒的遭遇引起的。接下来我就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清除积弊的第一种办法是，每五年任命一位最高独裁官，任期一个月或两个月。独裁官有权审查、评判并处理元老院议员和每位官员的行为，从而恢复国家最初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独裁官想方设法为国家清除弊病时，他所采取的措施必须出自国家的基本原则且符合国家的性质，否则他会陷入腹背受敌、进退维谷的境地。确实，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应该由于害怕受到惩罚或遭受损失而不敢肆意妄行或仗势作恶。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所有的好人与坏人都一样处于恐惧之中，那么国家必然濒临巨大的危险。而既然独裁官有着绝对的权力，他就不可能不令每一个人感到恐惧。尤其是，如果像这里要求的那样，定期选任独裁官，则情况更是如此。因为，如果定期选任独裁官，每个有野心的人都会尽他最大的努力谋取这个职位；而在和平时期，人们通常是注重财富胜过人品，那么，越是傲慢富贵的人，越容易获得此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人过去不定期选任独裁官的原因，除非是在事出偶然，非如此不可的情况下。即便如此，用西塞罗的话来说，“独裁官的妄自尊大令善良的人产生反感。”[12_2]的确，因为独裁官的权力是绝对的王权，所以，不管发生的时间有多短，国家变成君主政体必定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危险。而且，如果没有设定固定的时间选任独裁官，就无法计算两任独裁官之间的任期间隔，而

保持间隔正是最为必要的，否则，关于独裁官的整件事情就会变得极不明确，因而容易遭到忽略。因此，除非独裁官的权力是永久稳固的——而若是如此将权力完全赋予一个人，必定会改变国家形式——否则，这种独裁权力本身，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将极不稳定。

2 .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not doubt (Chap. 6. Sec. 3), that, if without destroying the form of dominion, the sword of the dictator might be permanent, and only terrible to the wicked, evils will never grow to such a pitch, that they cannot be eradicated or amended. In order, therefore, to secure all these conditions, we have said, that there is to be a council of syndics subordinate to the supreme council, to the end that the sword of the dictator should be permanent in the hands not of any natural person, but of a civil person, whose members are too numerous to divide the dominion amongst themselves (Chap. 9. Secs. 1, 2), or to combine in any wickedness. To which is to be added, that they are forbidden to fill any other office in the dominion, that they are not the paymasters of the soldiery, and, lastly, that they are of an age to prefer actual security to things new and perilous. Wherefore the dominion is in no danger from them, and consequently they cannot, and in fact will not be a terror to the good, but only to the wicked. For as they are less powerful to accomplish criminal designs, so are they more so to restrain wickedness. For, not to mention that they can resist it in its beginnings (since the council lasts for ever), they are also sufficiently numerous to dare to accuse and condemn this or that influential man without fear of his enmity; especially as they vote by ballot, and the sentence is pronounced in the name of the entire council.

第二节　但是，毫无疑义，在另一方面，如果独裁官长期拥有权

力而又不会破坏国家政体，而且只有恶人才会对他感到恐惧，那么，各种邪恶就决不会发展到无法根除或矫正的程度。所以，为了达到这些条件，我们在前面提过，应该在最高议事会下设立护法官议事会，其目的是让独裁官的权力之剑不会长期掌握在任何一个自然人手中，而是在公民手中，因为后者人数众多因而不可能在他们之间瓜分国家的统治权（第九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或者合谋犯罪。此外，还要加上几点：护法官不能兼任国家的其他官职；不能担任部队军需官；而且他们必须达到较大的年纪才能出任，如此他们才会乐于维持现状而不是热衷于新奇冒险的事情。这样，他们对国家没有任何威胁，不会也不可能让好人害怕，而只会让坏人恐惧。他们自己实现犯罪企图的力量不大，但是制止犯罪的力量却很大。他们不仅能够把坏事遏制在萌芽状态（因为护法官议事会是永久的）；而且，他们人数众多，敢于对那些有势力的人进行指控并判罪，不怕招人憎恨；尤其是因为他们进行的是无记名投票，而且判决是以整个护法官议事会的名义宣布的。

3 . But the tribunes of the commons at Rome were likewise regularly appointed; but they were too weak to restrain the power of a Scipio, and had besides to submit to the senate their plans for the public welfare, [11_3] which also frequently eluded them, by contriving that the one whom the senators were least afraid of should be most popular with the commons. Besides which, the tribunes' authority was supported against the patricians by the favour of the commons, and whenever they convoked the commons, it looked as if they were raising a sedition rather than assembling a council. Which inconveniences have certainly no place in the dominion which we have described in the last two chapters?

第三节　而在罗马，护民官也是定期任命的。但是，他们太过弱小，连西庇阿的势力都压制不住，而且，他们还得向元老院呈报有关

公共福利的各种方案。而元老院也往往谋划种种手段为难他们，设法让那些对自己没有威胁的护民官得到民众更多的支持 [12_3] ，此外，护民官对抗贵族的力量来自平民的支持，而且，只要他们召集平民开会，就好像是在煽动暴乱而不是集合开会。这些弊病在我们前两章所阐述的国家政体中是不会发生的。

4．However, this authority of the syndics will only be able to secure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form of the dominion, and thus to prevent the laws from being broken, or anyone from gaining by transgressing; but will by no means suffice to prevent the growth of vices, which cannot be forbidden by law, such as those into which men fall from excess of leisure, and from which the ruin of a dominion not uncommonly follows. For men in time of peace lay aside fear, and gradually from being fierce savages become civilized or humane, and from being humane become soft and sluggish, and seek to excel one another not in virtue, but in ostentation and luxury. And hence they begin to put off their native manners and to put on foreign ones, that is, to become slaves.

第四节　然而，护法官议事会的力量只够用以保障国家政体的维系，从而阻止任何人破坏法律或违法获利。但是，它的力量决不足以阻止那些连法律都无法禁止的恶习的蔓延滋长，比如，由于过度安逸而陷入邪恶，从而往往导致国家灭亡。因为，在和平时期，人们不再担心受怕，渐渐从野蛮状态转变为文明和人道，从人道转变为软弱和懒怠，于是，人们不再追求在德行上优于他人，而是追求在排场奢侈方面胜过别人。结果，他们摒弃原有的生活方式，追求外国的生活风尚，更确切地说，让自己的生活为外国所控制。

5．To avoid these evils many have tried to establish sumptuary

laws; but in vain. For all laws which can be broken without any injury to another, are counted but a laughing-stock, and are so far from bridling the desires and lusts of men, that on the contrary they stimulate them. For “we are ever eager for forbidden fruit, and desire what is denied.“ [11_4] Nor do idle men ever lack ability to elude the laws which are instituted about things, which cannot absolutely be forbidden, as banquets, plays, ornaments, and the like, of which only the excess is bad; and that is to be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s fortune, so that it cannot be determined by any general law.

第五节　为了避免这些恶习，许多人曾试图制定禁奢法，但徒劳无功。任何法律，若被触犯却无损于他人，那么，它不过是被当作笑柄而已；而且它永远不能抑制人的贪求私欲，反而会激发它们，因为，“我们都渴求被禁之欲，想望被拒之物” [12_4] 。因为，闲散人等永远不缺办法去规避那些专为无法完全禁止之事而制定的法律，比如，宴饮、赌博、服饰等。这类事情只有放纵过度才算恶习，而过度与否，须根据个人财富来判断，所以它不是一般性的法律所能确定的。

6 . I conclude, therefore, that the common vices of peace, of which we are here speaking, are never to be directly, but indirectly forbidden; that is, by laying such foundations of dominion, that the result may be, that the majority, I do not say are anxious to live wisely (for that is impossible), but are guided by those passions whence the republic has most advantage. And therefore the chief point to be studied is, that the rich may be, if not thrifty, yet avaricious. For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f this passion of avarice, which is general and lasting, be encouraged by the desire of glory, most people would set their chief affection upon increasing their

property without disgrace, in order to acquire honours, while avoiding extreme infamy. If then we examine the foundations of both kinds of aristocracy which I have explained in the last two chapters, we shall see, that this very result follows from them. For the number of rulers in both is so large, that most of the rich have access to government and to the offices of the dominion open to them.

第六节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和平时期常见的恶习，不能直接而应间接予以制止。也就是说，在制定国家的基本原则时，应该预先考虑到这些基本原则可能带来的结果，即不指望大多数人都渴望过理性的生活（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应该让他们受有利于国家的情感的引导。因此，必须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富人如果不愿意节俭，可以让他们保持增加自己财富的欲望。因为，如果这种普遍而又常有的贪念是因渴求荣誉而起，那么毫无疑问，在努力增加自己的财富时，大多数人会为了荣誉而避免采用极端邪恶的做法，从而不使自己蒙羞。如果仔细阅读我们在前两章所阐述的两种贵族国家的基本原则，就会看到，它们都会带来以上结果。因为这两种贵族国家都是贵族众多，所以大多数富人得以进入政府并担任国家向他们开放的公职。

7 . But if it be further ordained (as we said, Chap. 8. Sec. 47), that patricians who are insolvent be deposed from patrician rank, and that those who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by misfortune be restored to their former positio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all will try their best to keep their property. Moreover, they will never desire foreign costumes, nor disdain their native ones, if it is by law appointed, that patricians and candidates for office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by a special robe, concerning which see Chap. 8. Secs. 25, 47. And besides these, other means may be devised in every

dominion agreeable to the nature of its situation and the national genius, and herein it is above all to be studied, that the subjects may do their duty rather spontaneously than under pressure of the law.

第七节　　此外，如果再进一步规定（如第八章第四十七节所述），对于无力清偿债务的贵族，应免去其贵族荣衔；对因灾祸而丧失财产的贵族，应予以全部补偿。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保持自己的财产。而且，如果法律规定贵族和公职候补人应该穿特殊的服装以示区别，如第八章第二十五节和第四十七节所述那样，他们就不会羡慕外国的服装而鄙弃本国的衣着。除了以上这些，各国还可以设计出符合自己情况和民族特征的各种方法。于此，特别要考虑的是，要让国民自发地恪尽其职，而不是迫于法律的压力而尽其本分。

8 . For a dominion, that looks no farther than to lead men by fear, will be rather free from vices, than possessed of virtue. But men are so to be led, that they may think that they are not led, but living after their own mind, and according to their free decision; and so that they are restrained only by love of liberty, desire to increase their property, and hope of gaining the honours of the dominion. But effigies, triumphs, and other incitements to virtue, are signs rather of slavery than liberty. For rewards of virtue are granted to slaves, not freemen. I admit, indeed, that men are very much stimulated by these incitements; but, as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ey are awarded to great men, so afterwards, with the growth of envy, they are granted to cowards and men swollen with the extent of their wealth, to the great indignation of all good men. Secondly, those, who boast of their ancestors' effigies and triumphs, think they are wronged, if they are not preferred to others. Lastly, not to

mention other objections, it is certain that equality, which once cast off the general liberty is lost, can by no means be maintained, from the time that peculiar honours are by public law decreed to any man renowned for his virtue.

第八节　对一个只是企图以恐吓统治人民的国家，它就算是没有弊病，也不能说它具有德行。国家在统治人民时，应该让他们觉得自己不是被人统治，而是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依据自己的决定、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样，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会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对致富的渴望和对荣获国家公职的希望。然而，雕刻纪念塑像、举行凯旋式，以及其他的一些激发民众去获取功绩的举措，与其说是自由的标志，不如说是奴隶的象征。因为，对卓越功绩进行嘉奖的对象，只是像奴隶般工作的下属，而不会是享有特权的人。我承认，这些激励措施的确有激励的作用。但是，虽然最初奖赏是用来嘉奖一些杰出的人物，但是后来随着他人妒忌的增长，一些胆小无功、财大气粗的人也可获得奖赏，使所有善良的人感到极大的愤慨。其次，那些因自己祖先获得过纪念塑像和凯旋盛典而吹嘘炫耀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应该高人一等，否则就觉得受了委屈。最后，且不说其他的一些问题，一旦由法律规定对功绩卓越的人予以特殊的荣誉，那么平等必然无法持续下去；而一旦失去平等，全体的自由就会消亡。

9 . After which premises, let us now see whether dominions of this kind can be destroyed by any cause to which blame attaches. But if any dominion can be everlasting, that will necessarily be so, whose constitution being once rightly instituted remains unbroken. For the constitution is the soul of a dominion. Therefore, if it is preserved, so is the dominion. But a constitution cannot remain unconquered, unless it is defended alike by reason and common human passion: otherwise, if it relies only on the help of reason, it is certainly weak and easily overcome. Now since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 of both kinds of aristocracy has been shown to agree with reason and common human passion, we can therefore assert that these, if any kinds of dominion, will be eternal, in other words, that they cannot be destroyed by any cause to which blame attaches, but only by some inevitable fate.

第九节　根据以上所述，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两种贵族国家是否会因为某些自身的原因而消亡。任何国家，如果要长治久安，那么，它的政体制度一旦得以正确建立，就必须不容破坏，因为政体制度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因此，只要政体制度得以保存，国家就存在。但是，除非政体制度同时得到理性和人们共有情感的支持维护，否则，它无法保持不被破除。如果它仅仅是依靠理性，它必定是软弱无力的、易被推翻的。既然上文的论证已经表明这两种贵族国家的政体同时符合理性和人们共有的情感，我们可以断言，这些国家必然会长治久安。换句话说，如果有任何这类国家垮台，那也不是因为它的某些自身原因，而是因为它无法躲避的遭遇。

10 . But it may still be objected to us, that, although the constitution of dominion above set forth is defended by reason and common human passion, yet for all that it may at some time be overpowered. For there is no passion, that is not sometimes overpowered, by a stronger contrary one; for we frequently see the fear of death overpowered by the greed for another's property. Men, who are running away in panic fear from the enemy, can be stopped by the fear of nothing else, but throw themselves into rivers, or rush into fire, to escape the enemy's steel. In whatever degree, therefore, a commonwealth is rightly ordered, and its laws well made; yet in the extreme difficulties of a dominion, when all, as sometimes happens, are seized by a sort of panic terror, all, without regard to the future or the laws, approve only that which

their actual fear suggests, all turn towards the man who is renowned for his victories, and set him free from the laws, and (establishing thereby the worst of precedents), continue him in command, and entrust to his fidelity all affairs of state: and this was, in fact, the cause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oman dominion. But to answer this objection, I say, first, that in a rightly constituted republic such terror does not arise but from a due cause. And so such terror and consequent confus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no cause avoidable by human foresight. In the next place, it is to be observed, that in a republic such as we have above described, it is impossible (Chap. 8. Secs. 9, 25) for this or that man so to distinguish himself by the report of his virtue, as to turn towards himself the attention of all, but he must have many rivals favoured by others. And so, although from terror there arise some confusion in the republic, yet no one will be able to elude the law and declare the election of anyone to an illegal military command, without its being immediately disputed by other candidates; and to settle the dispute, it will, in the end, be necessary to have recourse to the constitution ordained once for all, and approved by all, and to order the affairs of the dominion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laws. I may therefore absolutely assert, that as the aristocracy, which is in the hands of one city only, so especially that which is in the hands of several, is everlasting, or, in other words, can be dissolved or changed into another form by no internal cause.

第十节　然而，我们仍可能遭到他人反驳。他们认为，虽然前文所述的政体制度同时得到理性和人们共有情感的支持维护，但有时仍会被推翻。因为，人的任何一种情感，有时也会被更强烈的相反的情感所压倒。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一样，贪恋他人财物的欲望会压倒对死亡的恐惧；惊恐躲避敌人追踪的人，不会惧怕任何事情，为了躲避敌人的刀剑，他们可以跳进河流或跃进火中。因此，不管一个国家组

织得有多正确，其法律制度有多完善，在国家处于极度危难时，有时仍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所有的人无暇顾及法律和将来，只会根据恐惧之下的反应行事，寄希望于因胜利而声名显赫的人，让他超越法律的约束（由此开创极坏的先例），并延长他的统治期限，把整个国家托付在他的守信尽职上。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正是如此。对于上述的反驳意见，我的回复是：首先，在一个组建得当的国家里，除非由于特定的原因，否则不会发生那样的惊慌。那种惊慌及其带来的混乱，完全是因为人们缺乏先见之明而引起。其次，应该看到，在我们所描述的国家里，不可能会让某一个人仅仅凭借他的功绩就能扬名立万，以至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第八章第九节和第二十五节）。他必定会有许多对手，而且其对手也拥有不少支持者。所以，在这种国家里，即使恐慌会引起一些混乱，但也不会有人可以无视法律，非法推举某个人为军政首脑；即使推举出人选，也会立刻引起其他候选人的抗拒。为了解决这种争端，最终必定要回到原先制定的、大家都承认的法律上去，依据现行的法律处理国家事务。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由一个城市掌权的贵族国家能够长久存续，而由几个城市共同掌权的国家更是如此。换句话说，它不会由于任何内在的原因而导致国家解体或改变国家政体。

[11_1].Machiavelli.

[11_2].Cic. ad Quint. Grat. iii. 8, 4. The better reading is "rumour," not "tumour." "The good" in such a passage means the aristocratic party.

[11_3].Not by law, except before B.C. 287 and in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dictatorship of Sulla and the consulship of Pompey and Crassus. But in the golden age of the republic the senate in fact controlled the tribunes.

[11_4].Ovid, "Amores," III. iv. 17.

[12_1].马基雅维里。

[12_2].西塞罗著《致胞弟昆图斯》(Epp.ad Quintunfratrem iii，8,4)。“妄自尊大”一词的拉丁文为tumor。但是18世纪的法文版译者Saisset认为uimor是rumor之误，故后来有些译本将此词改译为“传闻”或“话题”。

[12_3].除了公元前287年之前，以及苏拉实行独裁统治和庞培、克拉苏执政中间这段时期，这些都不具备法律依据。但是在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元老院事实上控制着护民官。

[12_4].奥维德著《爱情诗》，III.iv.17.

Chapter 11 Of Democracy

第十一章　关于民主政体

1．I pass, at length, to the third and perfectly absolute dominion, which we call democrac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and aristocracy consists, we have said, chiefly in this, that in an aristocracy it depends on the supreme council's will and free choice only, that this or that man is made a patrician, so that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vote or fill public offices by inheritance, and that no one can by right demand this right, as is the case in the dominion, whereof we are now treating. For all, who are born of citizen parents, or on the soil of the country, or who have deserved well of the republic, or have accomplished any other conditions upon which the law grants to a man right of citizenship; they all, I say, have a right to demand for themselves the right to vote in the supreme council and to fill public offices, nor can they be refused it, but for crime or infamy.

第一节　最后，我们来讨论第三种类型的国家。它执行完全绝对的统治，我们称它为民主政体。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民主国家与贵族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在贵族政体中，一个人是否能成为贵族，完全取决于最高议事会的意志和自由选择，因此，没有人能够通过世袭的方式获得投票权或担任国家公职，而且任何人都不能凭借法律索取这种权利。而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类国家里，情况并非如此。在民主国家里，所有其父母享有公民权的人，或者出生于国内的人，或者对国家有功绩的人，或者达到法律规定的、拥有公民权而所需要的任何条件的人，他们都有权要求在最高议事会上进行投票表决，并担任国家公职，除非他们是犯了罪或声名狼藉的人，否则，不能拒绝他们行使

权利。

2 . If, then, it is by a law appointed, that the elder men only, who have reached a certain year of their age, or the first-born only, as soon as their age allows, or those who contribute to the republic a certain sum of money, shall have the right of voting in the supreme council and managing the business of the dominion; then, although on this system the result might be, that the supreme council would be composed of fewer citizens than that of the aristocracy of which we treated above, yet, for all that, dominions of this kind should be called democracies, because in them the citizens, who are destined to manage affairs of state, are not chosen as the best by the supreme council, but are destined to it by a law. And although for this reason dominions of this kind, that is, where not the best, but those who happen by chance to be rich, or who are born eldest, are destined to govern, are thought inferior to an aristocracy; yet, if we reflect on the practice or general condition of mankind, the result in both cases will come to the same thing. For patricians will always think those the best, who are rich, or related to themselves in blood, or allied by friendship. And, indeed, if such were the nature of patricians, that they were free from all passion, and guided by mere zeal for the public welfare in choosing their patrician colleagues, no dominion could be compared with aristocracy. But experience itself teaches us only too well, that things pass in quite a contrary manner, above all, in oligarchies, where the will of the patricians, from the absence of rivals, is most free from the law. For there the patricians intentionally keep away the best men from the council, and seek for themselves such colleagues in it, as hang upon their words, so that in such a dominion things are in a much more unhappy condition, because the choice of patricians depends entirely upon the arbitrary will of a

few, which is free or unrestrained by any law. But I return to my subject.

第二节　所以，如果法律规定，只有达到一定年龄的人，或者是达到法定年龄的长子，或者是向国家捐助一定金额的人才有权在最高议事会上投票表决，并有权处理公共事务，那么，虽然这种规定会使其最高议事会的成员人数比前述的贵族国家的最高议事会成员人数少，但这类国家仍然应该被称为民主国家。因为，在这种国家里，那些被委派处理国家事务的人，不是由最高议事会择优选出来的，而是被依法任命的。由于在这种国家里，被任命官职的人不是由最高议事会择优选出，而是那些有幸成为富人的人，或有幸生为长子的人，所以，这种国家看似不如贵族国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人类的行为和总体情况，其实这两种国家是不相上下的。因为，贵族总是将富人，或是与自己有血亲的人，或是盟友视为优秀的人。而且，实际上，如果贵族在选择同僚时能够不受感情影响，完全以热心公共利益为指导准则，那么，没有哪一种政体能比得上贵族政体。然而，经验屡屡告诉我们，实际情况恰好相反。特别是在寡头统治的国家，由于贵族没有竞争对手，他们的意志完全不受法律约束。他们故意将优秀的人排除在议事会之外，挑选对他们言听计从的人为同僚。因此，在这类国家里，由于贵族的选任仅凭少数人的专断意志，完全不受法律约束，它的实际情况其实要差得多。不过，下面我还是回到本章的主题上来。

3 .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in the last section, it is manifest that we can conceive of various kinds of democracy. But my intention is not to treat of every kind, but of that only, “wherein all, without exception, who owe allegiance to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only, and are further independent and of respectable life, have the right of voting in the supreme council and of filling the offices of the dominion.” I say expressly, “who owe allegiance to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only," to exclude foreigners, who are treated as being under another's dominion. I added, besides, "who are independent," except in so far as they are under allegiance to the laws of the dominion, to exclude women and slaves, who ar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men and masters, and also children and wards, as long as they ar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parents and guardians. I said, lastly, "and of respectable life," to exclude, above all, those that are infamous from crime, or some disgraceful means of livelihood.

第三节　根据上一节所述，我们认为民主政体显然可以分为很多种。但是，我并不打算讨论每一种民主政体，而只讨论以下这种："在这种民主政体下，无一例外地，所有人都只受本国法律的约束，不受任何人支配，生活体面，有权在最高议事会上投票表决，有权担任国家公职。"我特别强调"只受本国法律约束"，是为了将外国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被视为其他国家的国民。此外，我还指出"不受任何人支配（除非他们是受制于国家法律）"，把妇女和奴仆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受丈夫和主人的支配；以及儿童和受监护的未成年人，因为他们受父母和监护人的管束。最后，我还提到"生活体面"，主要是为了把由于犯罪或从事贱业而声名狼藉的人排除在外。

4 . But, perhaps, someone will ask, whether women are under men's authority by nature or institution? For if it has been by mere institution, then we had no reason compelling us to exclude women from government. But if we consult experience itself, we shall find that the origin of it is in their weakness. For there has never been a case of men and women reigning together, but wherever on the earth men are found, there we see that men rule, and women are ruled, and that on this plan, both sexes live in harmony.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Amazons, who are reported to have held rule of old, did not suffer men to stop in their country, but reared only their

female children, killing the males to whom they gave birth. [12_1] But if by nature women were equal to men, and were equally distinguished by force of character and ability, in which human power and therefore human right chiefly consist; surely among nations so many and different some would be found, where both sexes rule alike, and others, where men are ruled by women, and so brought up, that they can make less use of their abilities. And since this is nowhere the case, one may assert with perfect propriety, that women have not by nature equal right with men: but that they necessarily give way to men, and that thus it cannot happen, that both sexes should rule alike, much less that men should be ruled by women. But if we further reflect upon human passions, how men, in fact, generally love women merely from the passion of lust, and esteem their cleverness and wisdom in proportion to the excellence of their beauty, and also how very ill-disposed men are to suffer the women they love to show any sort of favour to others, and other facts of this kind, we shall easily see that men and women cannot rule alike without great hurt to peace. But of this enough.

第四节　或许有人要问，妇女受男子支配是因为本性使然，还是由于制度惯例造成的？如果仅仅是因为制度惯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她们排除于统治权之外。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经验，可以看到，这其实是由于妇女自身的弱点造成的。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男女共同掌权的情况。在任何地方，都是男人支配，妇女被支配，两性在这种情况下和谐生活。不过，据说亚马孙妇女在很久以前曾经掌权过。她们禁止男子居留国内，只抚养女孩子，男孩子一出生就被杀掉[13_1]。如果妇女在本性上与男子一样，而且在性格和能力方面（这是构成人的力量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利的主要因素）也与男子一样出众，那么，在众多不同的民族当中，总会有一些民族是两性共同掌权的；也总会有一些民族是男子受妇女统治，并且男子在成长过程中，由于教育偏重的原因而使男子难以锻炼自己的能力从而不如妇女。然而，

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妇女在本性上没有与男人一样的权利，必须屈从于男子。因此，两性共同掌权的事情不可能发生，男子受妇女统治则更不可能。此外，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一下人的各种激情就会发现，实际上，男子通常只是因为贪恋色欲而爱恋妇女；他们根据妇女的美貌程度评判她们的聪明智慧；他们无法容忍他们所爱的妇女对他人表示好感，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因此，不难发现，男女共同掌权必定会给和平造成巨大的损害。关于这个问题，就讨论到这里为止。

[12_1].Justin, *Histories* , ii. 4.

[13_1].尤斯蒂努斯,《历史》，ii.4.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Politics

政治学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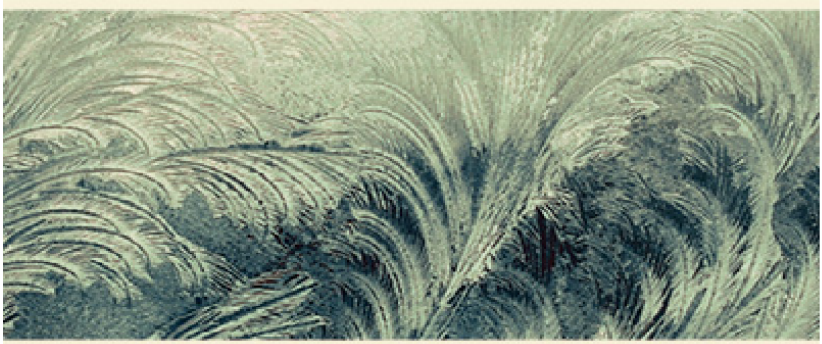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政治学

Politics

亚里士多德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Book One 第一卷
- Book Two 第二卷
- Book Three 第三卷
- Book Four 第四卷
- Book Five 第五卷
- Book Six 第六卷
- Book Seven 第七卷
- Book Eight 第八卷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Book One

第一卷

Part 1

第一章

Every state is a community of some kind, and every community is established with a view to some good; for mankind always 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at which they think good. But, if all communities aim at some good, the state or political community, which is the highest of all, and which embraces all the rest, aims at good in a greater degree than any other, and at the highest good.

每一个城邦都是一个团体，而每一个团体的建立都是为了达成某种利益；人类总是会驱利行动。但是，倘若所有团体都是以实现某种利益作为目标，无论是城邦还是政治团体，作为一种最高级的、包容了其他所有组织类型的团体，必然谋求的是一种更高级别的美好，或最高级别的美好。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qualifications of a statesman, king, householder, and master are the same, and that they differ, not in kind, but only in the number of their subjects. For example, the ruler over a few is called a master; over more, the manager of a household; over a still larger number, a statesman or king, as if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between a great household and a small state. The distinction which is made between the king and the statesman is as follows: When the government is personal, the ruler

is a king; when,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political science, the citizens rule and are ruled in turn, then he is called a statesman.

有些人认为政治家、君主、家族首领和奴隶主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在这些人看来，他们的差别不是本质上的，而是在于他们统治人数的多少。例如：少数几个人的统治者被称作奴隶主。管理更多人的是家族首领，管的人更多一些的则是政治家或者君主了；这样看来，仿佛一个大家族和一个小的城邦也没什么差别。他们是这样区别君主和政治家的：如果靠人格进行统治，统治者就是君主；而如果按政治学原理统治，既由公民治理，公民也反过来被治理，那统治者就是政治家。

But all this is a mistake; for governments differ in kind, as will be evident to any one who considers the matter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which has hitherto guided us. As in other departments of science, so in politics, the compound should always be resolved into the simple elements or least parts of the whole. We must therefore look at the elements of which the state is composed, in order that we may see in what the different kinds of rule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and whether any scientific result can be attained about each one of them.

但是，这种观点是全盘错误的；只要用我们惯用的方法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任何人都能看出，统治形式可以分成不同的种类。政治学跟其他学科一样，必须先把复合物分解为简单成分，或最小成分。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城邦的组成部分，以发现不同的统治形式之间的差别，看看是否能获得关于上述每一种统治形式的科学认识。

Part 2

第二章

He who thus considers things in their first growth and origin, whether a state or anything else, will obtain the clearest view of them.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must be a union of those who cannot exist without each other; namely, of male and female, that the race may continue (and this is a union which is formed, not of deliberate purpose, but because, in common with other animals and with plants, mankind have a natural desire to leave behind them an image of themselves), and of natural ruler and subject, that both may be preserved. For that which can foresee by the exercise of mind is by nature intended to be lord and master, and that which can with its body give effect to such foresight is a subject, and by nature a slave; hence master and slave have the same interest. Now nature has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female and the slave. For she is not niggardly, like the smith who fashions the Delphian knife for many uses; she makes each thing for a single use, and every instrument is best made when intended for one and not for many uses. But among barbarians no distinction is made between women and slaves, because there is no natural ruler among them: they are a community of slaves, male and female. Wherefore the poets say, “It is meet that Hellenes should rule over barbarians;” as if they thought that the barbarian and the slave were by nature one.

如果有谁愿意从事物的初始状态及其成长开始研究，那么无论是研究城邦还是其他事物，都能获得一种最清晰的认识。首先，有些事物必须结合在一起，它们离了对方就无法存在；比如男人和女人为了种族延续必须彼此结合（而且这种结合非刻意为之，而是和其他动植物一样，人类也有一种天然的愿望，想把自己的模样流传下去）；再

比如统治者和被统治对象也需要结合，这样二者才得以保存。一个生命如果生就了一副能够思考和预见的头脑，那么他自然就是领导者，然而那种只能用肉体让上述远见发挥作用的人注定要被统治；也就是说主人和奴隶有共同利益。但是在女人和奴隶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差异。因为“自然”不会像一个小气的工匠那样打造一把万能的特尔斐之剑，而是每个作品只有一种功能，功能单一的工具自然比功能繁多的工具更精良。然而野蛮人却没有把妇女和奴隶区分开，原因是他们当中没有天生的领导者，所以他们的团体是一个奴隶的团体，男奴隶和女奴隶。正如有诗人描述道：“野蛮人受希腊人统治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就好像说野蛮人和奴隶天生就是一体。

Out of these two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woman, master and slave, the first thing to arise is the family, and Hesiod is right when he says, “First house and wife and an ox for the plough,” for the ox is the poor man's slave. The family is the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by nature for the supply of men's everyday wants, and the members of it are called by Charondas “companions of the cupboard,” and by Epimenides the Cretan, “companions of the manger.” But when several families are united, and the association aims at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supply of daily needs, the first society to be formed is the village. And the most natural form of the village appears to be that of a colony from the family, composed of the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who are said to be suckled “with the same milk.”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Hellenic states were originally governed by kings; because the Hellenes were under royal rule before they came together, as the barbarians still are. Every family is ruled by the eldest, and therefore in the colonies of the family the kingly form of government prevailed because they were of the same blood. As Homer says: “Each one gives law to his children and to his wives.”

从男人和女人、奴隶主和奴隶这两种关系，产生的第一个事物就是家庭，赫西俄德的说法没错，“先有房子，然后有妻子，再有耕地的牛。”因为耕牛是人的奴隶。所以家庭是一种自然建立的人类团体，是为了满足人类日常需求而出现的。加隆达斯称这种家庭成员为“碗橱组合”，而克里特人厄毕米尼特称之为“管理者组合”。许多家庭聚居在一起，其目的就不仅是满足日常需求了，这就形成了第一种社会形态，村落。最初村落由同一个家庭的后代构成，也有人称其为吮吸“同一份母乳”的村子，包括同一家庭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最初的希腊城邦是由国王统治的；因为希腊人在城邦出现之前就是接受的皇家统治，就像很多野蛮人现在的统治一样。每一个家庭都由家族中的最年长者统治，所以，君主统治在家庭群落里是最常见的统治形式，因为他们都来自于同一血脉。正如荷马所说：“每个男人都统治着他的妻子和孩子。”

For they lived dispersedly, as was the manner in ancient times. Wherefore men say that the Gods have a king, because they themselves either are or were in ancient times under the rule of a king. For they imagine, not only the forms of the Gods, but their ways of life to be like their own.

他们居住得很分散，就像古时候一样。那里，人们认为天神的国度也是君主政体，这是因为人们自己古时候就生活在君主的统治之下。在他们的想象中，天神不仅模样像人，而且生活方式也和人一样。

When several villages are united in a single complete community, large enough to be nearly or quite self-sufficing, the state comes into existence, originating in the bare needs of life, and continuing in existence for the sake of a good life. And therefore, if

the earlier forms of society are natural, so is the state, for it is the end of them, and the nature of a thing is its end. For what each thing is when fully developed, we call its nature, whether we are speaking of a man, a horse, or a family. Besides, the final cause and end of a thing is the best, and to be self-sufficing is the end and the best.

当很多的村落紧密地联合成为一体时，而且规模足够大到让他们接近或完全自给自足，这就形成了城邦。城邦最初的目的是简单的生存，但其持续存在的目的是要幸福的生活。这个城邦包含了，请允许我这样说，完美统治的终极目标。因此，如果早期的社会形式是自然的，那么每一个城邦也是自然的；因为城邦是早期社会形态的进化结果，而一切事物的本质就是其结果。每一种事物发展的终极阶段，我们认为也是它的本质呈现，无论它是一个人、一匹马或是一个家族。另外，终极原因和终极结果必然是最好的，而一个自给自足的状态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所以也是最美好的。

Hen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state is a creation of nature, and that 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 And he who by nature and not by mere accident is without a state, is either a bad man or above humanity; he is like the “Tribeless, lawless, hearthless one,” whom Homer denounces—the natural outcast is forthwith a lover of war; he may be compared to an isolated piece at draughts.

所以，很显然城邦是自然的产物，而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那么任何天生而非偶然的，不容于城邦的人必然不是极坏的人就是极好的，超出人类极限的人；荷马曾鄙弃这种人为“弃家、背法、舍国”——这样的人必然天性好斗，而且就像跳棋盘上一颗孤立无援的棋子。

Now, that man is more of a political animal than bees or any other gregarious animals is evident. Nature, as we often say, makes nothing in vain, and man is the only animal whom she has endowed with the gift of speech. And whereas mere voice is but an indication of pleasure or pain, and is therefore found in other animals (for their nature attains to the perception of pleasure and pain and the intimation of them to one another, and no further), the power of speech is intended to set forth the expedient and inexpedient, and therefore likewise the just and the unjust. And it is a characteristic of man that he alone has any sense of good and evil, of just and unjust, and the like, and the association of living beings who have this sense makes a family and a state.

显然，人比蜜蜂或任何群居动物都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因为大自然不会做任何徒劳的事，而人是惟一被她授予语言能力的动物。其他的动物也会用简单的声音，表达痛苦与快乐（动物的天性仅限于感受到快乐或痛苦，并向其他个体模拟此类感觉，仅此而已），而只有人类的语言能够表达什么事物对我们有利，什么对我们不利，还能表达何为正义或非正义。这正是人的独特之处，只有人能够懂得分辨善恶、公平与否。正是拥有这些普遍情感的人之间的交往构成了家庭和城邦。

Further, the state is by nature clearly prior to the family and to the individual, since the whole is of necessity prior to the part; for example, if the whole body be destroyed, there will be no foot or hand, except in an equivocal sense, as we might speak of a stone hand; for when destroyed the hand will be no better than that. But things are defined by their working and power; and we ought not to say that they are the same when they no longer have their proper

quality, but only that they have the same name. The proof that the state is a creation of nature and prior to the individual is that the individual, when isolated, is not self-sufficing; and therefore he is like a part in relation to the whole. But he who is unable to live in society, or who has no need because he is sufficient for himself, must be either a beast or a god: he is no part of a state. A social instinct is implanted in all men by nature, and yet he who first founded the state was the greatest of benefactors. For man, when perfected, is the best of animals, but, when separated from law and justice, he is the worst of all; since armed injustice is the more dangerous, and he is equipped at birth with arms, meant to be used by intelligence and virtue, which he may use for the worst ends. Wherefore, if he have not virtue, he is the most unholy and the most savage of animals, and the most full of lust and gluttony. But justice is the bond of men in stat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which is the determination of what is just, is the principle of order in political society.

另外，因为整体必然先于部分，所以城邦的概念本质上比家庭和个人更早形成，例如一个人身体都已破坏，也就不能说他还有手有脚，好比一只石制的手，因为被摧毁以后的手跟石制的手差不多，仍将之称为手足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表达。既然对任何事物的定义都来自其运转的方式或力量，所以当这些品质不复存在了，也就不能说它还是同一个事物，只能说是同名的东西而已。城邦是天然产物，先于个人而存在，理由如下：孤立的一个人，是无法自给自足的；所以他就像整体的一部分；一个人如果不见容于城邦，或自身过于完善而不需加入城邦，那他只能是一头野兽或是一尊神灵，他不可能构成城邦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天生向往与别人交往，但是第一个创建城邦的人是最大的功臣。拥有完善人性的人是最好的动物，但是，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人就是最邪恶的动物；没有什么比武装起来的非正义更危险了，而人类拥有一些天生的武器，这些武器本来要用美德和智慧来指

挥的，但是他可能将之用于最邪恶的目的。这里，如果一个人没有美德，他将是最邪恶、最残忍、最贪婪、最残暴的生物。但是，在城邦中，正义是社会的纽带，而对正义的执行管理，即对什么是正义这一问题的认定，就是政治社会中建立秩序的原则。

Part 3

第三章

Seeing then that the state is made up of households, before speaking of the state we must speak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household. The parts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correspond to the persons who compose the household, and a complete household consists of slaves and freemen. Now we should begin by examining everything in its fewest possible elements; and the first and fewest possible parts of a family are master and slave, husband and wife, father and children. We have therefore to consider what each of these three relations is and ought to be: I mean the relation of master and servant, the marriage relation (the conjunction of man and wife has no name of its own), and thirdly, the procreative relation (this also has no proper name). And there is another element of a household, the so-called art of getting wealth, which, according to some, is identical with household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others, a principal part of it; the nature of this art will also have to be considered by us.

既然我们知道了城邦由家庭组成，那么就有必要在研究城邦之前，先来研究一下家务管理。家务管理的不同部分对应家庭的各组成成员，而一个完整的家庭包括自由人和奴隶两部分。对于每个研究对象，我们都应该从构成它的最少的几种要素开始；而一个家庭的最初

和最少几种要素分别是主人和奴隶，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子。所以，我们先研究这三种关系各自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即在主仆、婚姻（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没有专属称谓）和父子（这个也没有专用称谓）三种组合中这些人分别是什么关系。在家庭当中还有一个元素，即所谓的“养家糊口”的技艺，在有些人看来，它跟家务管理是同一事物，而对其他人而言，它只是家务管理的一个主要部分；这种技艺的本质也将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Let us first speak of master and slave, looking to the needs of practical life and also seeking to attain some better theory of their relation than exists at present. For some are of opinion that the rule of a master is a science, and that the management of a household, and the mastership of slaves, and the political and royal rule, as I was saying at the outset, are all the same. Others affirm that the rule of a master over slaves is contrary to nature, and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lave and freeman exists by law only, and not by nature; and being an interference with nature is therefore unjust.

考虑到实际生活的需要，并且希望得出一些关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更新的认识，所以我们先来讨论主人和奴隶这个组合。有人认为，管束奴隶是一种学问，就像我在一开始所说的，他们还认为家务管理、管束奴隶以及政治的和君主的统治是一回事。而其他人则认为主人对奴隶的管束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认为奴隶和自由人的区分是法律界定的，而非自然形成的；因此主人对于奴隶的权力是不正义的，因为这是干涉自然的做法。

Part 4

第四章

Property is a part of the household, and the art of acquiring property is a part of the art of managing the household; for no man can live well, or indeed live at all, unless he be provided with necessaries. And as in the arts which have a definite sphere the workers must have their own proper instruments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ir work, so it is in the management of a household. Now instruments are of various sorts; some are living, others lifeless; in the rudder, the pilot of a ship has a lifeless, in the look-out man, a living instrument; for in the arts the servant is a kind of instrument. Thus, too, a possession is an instrument for maintaining life. And so,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family, a slave is a living possession, and property a number of such instruments; and the servant is himself an instrument which takes precedence of all other instruments. For if every instrument could accomplish its own work, obeying or anticipating the will of others, like the statues of Daedalus, or the tripods of Hephaestus, which, says the poet, "of their own accord entered the assembly of the Gods;" if, in like manner, the shuttle would weave and the plectrum touch the lyre without a hand to guide them, chief workmen would not want servants, nor masters slaves. Here, however, another distinction must be drawn; the instruments commonly so called ar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whilst a possession is an instrument of action. The shuttle, for example, is not only of use; but something else is made by it, whereas of a garment or of a bed there is only the use. Further, as production and action are different in kind, and both require instruments, the instruments which they employ must likewise differ in kind. But life is action and not production, and therefore the slave is the minister of action. Again, a possession is spoken of as a part is spoken of; for the part is not only a part of something else, but wholly belongs to it; and this is also true of a possession. The master is only the master of the slave; he does not belong to him, whereas the slave is not only the slave of his master,

but wholly belongs to him. Hence we see what is the nature and office of a slave; he who is by nature not his own but another's man, is by nature a slave; and he may be said to be another's man who, being a human being, is also a possession. And a possession may be defined as an instrument of action, separable from the possessor.

财产是家庭的一部分，那么如何赚得财产当然是家务管理的一部分；因为没有生活必需品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活得幸福。正如很多具体的工艺，都需要工人有合适的工具才能完成，家务管理也离不开工具。工具可以分为很多种；有的有生命，有的无生命；比如水中行船，船舵是船长手中无生命的工具，而瞭望员则是有生命的工具；而在一门技艺中，一名雇工也是作为工具存在的。因此，一件财物也是用来维持生活的工具。同理，在家庭安排中，一名奴隶是一件有生命的财物，而财产整体则是一系列类似的工具；其中，雇工是所有工具中最重要的一种。如果每一种工具，都能服从他人的命令，或提前揣测他人的意志而自发地完成任务，就像传说中代达罗斯的雕像一样；或像诗人（荷马）笔下的火神伏尔甘打造的三脚架一样，“它总能自动地进入众神的殿堂”，那么梭子可以自己织布，琴拨可以自动拨动竖琴而不需要手的指导；那么工匠大师也不再需要工人了，也没有主人需要奴隶了。但是，工具与财物还有一点不同：通常所谓的工具是指一些生产用具，而财物不过是行为用具。例如，梭子，不仅可以使用，而且可以用来制造其他的东西，而大衣和床只能使用。而且，因为生产和行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且二者都需要工具，所以它们需要的工具也应该属于不同的种类。但是，生活是一种行为，而非生产，因此，奴隶是行为辅助者。同样，人们像谈论一个部分那样谈论一件财物；因为一个部分不仅是整体的一分子，而且完全属于该整体；一件财物也是如此。主人只能是奴隶的主人，而并不属于奴隶；而奴隶不但是主人的奴隶，而且完全属于他。这让我们认清了奴隶的本质以及他的职责；他本质上就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他的主人，奴隶是他的自然属性；可以把奴隶看成是一个沦为别人财物的人，一件人形的财物。而且，一件财物可以定义为一件行为工具，可以与拥有

者分离的工具。

Part 5

第五章

But is there any one thus intended by nature to be a slave, and for whom such a condition is expedient and right, or rather is not all slavery a violation of nature?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奴隶是否天生就是奴隶，让某种人成为奴隶对谁有利，或者奴隶制是否违背了自然规律？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on grounds both of reason and of fact. For that some should rule and others be ruled is a thing not only necessary, but expedient; from the hour of their birth, some are marked out for subjection, others for rule.

无论从理性的角度还是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难。一些人应该统治别人，其他人则应该被他们统治，这种安排不但有必要，而且对双方都有益；因为从他们出生起，有些人就被打上了服从的烙印，另一些人则被打上了统治的烙印。

And there are many kinds both of rulers and subjects (and that rule is the better which is exercised over better subjects—for example, to rule over men is better than to rule over wild beasts; for the work is better which is executed by better workmen, and where

one man rules and another is ruled, they may be said to have a work); for in all things which form a composite whole and which are made up of parts, whether continuous or discret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uling and the subject element comes to fight. Such a duality exists in living creatures, but not in them only; it originate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e; even in things which have no life there is a ruling principle, as in a musical mode. But we are wandering from the subject. We will therefore restrict ourselves to the living creature, which, in the first place, consists of soul and body: and of these two, the one is by nature the ruler, and the other the subject. But then we must look for the intentions of nature in things which retain their nature, and not in things which are corrupted. And therefore we must study the man who is in the most perfect state both of body and soul, for in him we shall see the true relation of the two; although in bad or corrupted natures the body will often appear to rule over the soul, because they are in an evil and unnatural condition. At all events we may firstly observe in living creatures both a despotical and a constitutional rule; for the soul rules the body with a despotical rule, whereas the intellect rules the appetites with a constitutional and royal rule. And it is clear that the rule of the soul over the body, and of the mind and the rational element over the passionate, is natural and expedient; whereas the equality of the two or the rule of the inferior is always hurtful. The same holds good of animals in relation to men; for tame animals have a better nature than wild, and all tame animals are better off when they are ruled by man; for then they are preserved. Again, the male is by nature superior, and the female inferior; and the one rules, and the other is ruled; this principle, of necessity, extends to all mankind.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分很多种（而且被统治者越优秀，统治行为

也会越出色——例如，对人的管理就优于对野蛮动物的管理；而工匠越优秀，作品则越好，这里有人统治，有人被统治，他们也可以说是在打造一件作品）；任何物品如果由很多部分组成，而这些部分又可以分成更小的部分，那么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就会出现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是连续性的或是间断性的。这种二元特质存在于自然界所有生命体中，甚至不仅仅是生命体；它起源于宇宙形成之中；甚至在一些不属于生命范畴的事物中，也存在一种统治原则，比如音乐形式。不过我们已经偏离了主题，所以还是把我们的讨论重点限制在生命体当中，它们首先都由身体和灵魂两部分构成；其中一部分天生是统治者，另一部分则天生是服从者。如果想知道自然的意图，那么我们应该在仍保留着自然性的事物当中去寻找，而不是在已经被腐蚀的事物中寻找。因此，我们应该检查那些灵魂和肉体都非常完美的人，在他们身上我们才能发现二者之间真正的关系；因为，在邪恶的或本性被腐蚀的人身上，灵魂往往被肉体所统治，这是由于他们处于邪恶的、不自然的条件下。无论如何，在所有生命体中，我们首先能发现的就是一种暴虐统治和一种政治统治；灵魂对肉体实行暴虐统治；智慧对贪欲的统治是政治的或君主式的。显然，灵魂对肉体的统治，以及思想和理性对激情的统治，不但是自然的而且是有益身心的；如果让二者处于平等地位或让卑劣者统治卓越者，那对统治的两端都是一种痛苦。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也是如此；驯化的动物比野生的同类更温顺，而驯化的动物在人类统治之下也受益良多；因为这样做使它们得以保全生命。同理，男人天生强大，而女人则弱小；所以一方统治，一方被统治；同样的规律必定适用于全人类。

Where then there is such a difference as that between soul and body, or between men and animals (as in the case of those whose business is to use their body, and who can do nothing better), the lower sort are by nature slaves, and it is better for them as for all inferiors that they should be under the rule of a master. For he who can be, and therefore is, another's and he who participates in rational principle enough to apprehend, but not to have, such a

principle, is a slave by nature. Whereas the lower animals cannot even apprehend a principle; they obey their instincts. And indeed the use made of slaves and of tame animals is not very different; for both with their bodies minister to the needs of life. Nature would lik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bodies of freemen and slaves, making the one strong for servile labor, the other upright, and although useless for such services, useful for political life in the arts both of war and peace. But the opposite often happens—that some have the souls and others have the bodies of freemen. And doubtless if men differed from one another in the mere forms of their bodies as much as the statues of the Gods do from men, all would acknowledge that the inferior class should be slaves of the superior. And if this is true of the body, how much more just that a similar distinction should exist in the soul? but the beauty of the body is seen, whereas the beauty of the soul is not seen. It is clear, then, that some men are by nature free, and others slaves, and that for these latter slavery is both expedient and right.

既然有这样的差别存在于灵魂和肉体之间，或人和动物之间（正如那些只知使用蛮力而不知使用智慧的人），那些低贱者天生就是奴隶，所以更有利于他们的做法就是让他们以及所有的弱者都被主人统治。因为判断天生就是奴隶的原则有两种，一种是这个人能做奴隶，所以就是奴隶；另一种是这个人能理解理性的指导，但是没有理性思维能力。可是，低等动物甚至不能理解任一种原则；它们服从自己的本能。实际上，人类对动物和奴隶的使用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二者都是用身体来获得生活所需。自然有意将自由人和奴隶的身体塑造成不同的模样，让一方强壮，适于体力劳动，而另一方则挺拔，虽不适于劳动，但适于战争技巧与和平技能等的政治生活。但是，事实通常与自然的意愿相反——有些奴隶拥有自由人的身体，有些则拥有自由人的灵魂。毫无疑问，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只在于身体方面的差异，就如同天神的雕像远比人类的躯体高大一样，那么人人都会赞成

让弱小者成为强大者的奴隶。如果这种基于肉体的区分是正确的，那么以此来划分人类的灵魂又有多少正义的成分呢？虽然灵魂之美不像肉体之美那样肉眼可见。很显然，世上有些人天生是自由人，另一些人则天生是奴隶，那么自由人对奴隶的统治既是有益的，也是正确的。

Part 6

第六章

But that those who take the opposite view have in a certain way right on their side, may be easily seen. For the words slavery and slave are used in two senses. There is a slave or slavery by law as well as by nature. The law of which I speak is a sort of convention—the law by which whatever is taken in war is supposed to belong to the victors. But this right many jurists impeach, as they would an orator who brought forward an unconstitutional measure: they detest the notion that, because one man has the power of doing violence and is superior in brute strength, another shall be his slave and subject. Even among philosophers there is a difference of opinion. 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 and what makes the views invade each other's territory, is as follows: in some sense virtue, when furnished with means, has actually the greatest power of exercising force; and as superior power is only found where there is superior excellence of some kind, power seems to imply virtue, and the dispute to be simply one about justice (for it is due to one party identifying justice with goodwill while the other identifies it with the mere rule of the stronger). If these views are thus set out separately, the other views have no force or plausibility against the view that the superior in virtue ought to rule, or be master. Others, clinging, as they think, simply to a principle of justice (for law and

custom are a sort of justice), assume that slave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stom of war is justified by law, but at the same moment they deny this. For what if the cause of the war be unjust? And again, no one would ever say he is a slave who is unworthy to be a slave. Were this the case, men of the highest rank would be slaves and the children of slaves if they or their parents chance to have been taken captive and sold. Wherefore Hellenes do not like to call Hellenes slaves, but confine the term to barbarians. Yet, in using this language, they really mean the natural slave of whom we spoke at first; for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some are slaves everywhere, others nowhere.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nobility. Hellenes regard themselves as noble everywhere, and not only in their own country, but they deem the barbarians noble only when at home, thereby implying that there are two sorts of nobility and freedom, the one absolute, the other relative. The Helen of Theodectes says: “Who would presume to call me servant who am on both sides sprung from the stem of the Gods?”

但是，显然，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也有其正当理由。奴隶和奴隶制这两种表达用于两种不同的情况。有些奴隶是天生的，有些奴隶是法律制造的。我所说的法律是一种惯例——在战争当中被缴获的物品和人是属于胜利者的财产。但是很多精通法律的人对这种权力提出了质疑，就如同他们会质疑一个演讲家提出的政策不合宪法一样：他们憎恨这种观点，即因为自己有力量强迫他人，或在蛮力上压倒他人，便以此宣布他人是自己的奴隶和从属。关于这个问题，即使在一些智者当中也存在着分歧。争论的起源，以及让这种观点介入了各自领域的原因如下：在某种意义上，美德在财富的配合下，实际上最能够挑动武力；而由于强大的力量往往只存在于有突出才德之所在，所以力量似乎暗示了美德，但是，这个争论实则只关乎正义（因为争论的一方将正义等同于善意，而另一方则将其等同于强者的统治）。如果这些观点就这样分别提出来，那么其他的观点则无法再对“美德优胜者

应该统治，或成为主人”的观点进行反驳了。有些人，则完全立足于正义（法律和惯例也算为正义），坚持认为符合战争惯例的奴隶制是合法的，但同时他们又否定了这种正义。因为，有时候发动战争的理由是非正义的；而且也没有人会称一名出身高贵的人为奴隶。因为一旦承认这一点，那么最高贵家族的人也有可能是奴隶或奴隶的后裔，因为他们或其父母可能在战争中偶然被俘并被出售。因此，希腊人并不喜欢称其他的希腊人为奴隶，而只是将这种称呼用在野蛮人身上。但这样使用这个称呼，他们真正指的是天生的奴隶，就如同我们一开始说过的一样；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人无论在哪里都是奴隶，而有些人则永远不会。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对贵族的认定。希腊人认为他们无论在哪里都是贵族，而不仅在自己的国家，这里暗示存在两种不同的贵族和自由的概念，一种是相对的，一种则是绝对的。西奥德克底笔下的海伦如是说：“我父母之血脉皆传自永生的天神，谁敢用奴隶的名号羞辱我？”

What does this mean but that they distinguish freedom and slavery, noble and humble birth, by the two principles of good and evil? They think that as men and animals beget men and animals, so from good men a good man springs. But this is what nature, though she may intend it, cannot always accomplish.

这样的话语，只能说明他们在美德和恶行上用双重标准来区分奴隶与自由人，贵族与平民。他们认为，就如同人只能孕育人，而动物只能生产动物，所以一个好人生下的孩子自然也是好人。当然，这也许是大自然的本意，但这种意愿并不能总是实现。

We see then that there is some foundation for this difference of opinion, and that all are not either slaves by nature or freemen by nature, and also that there is in some cases a marked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classes, rendering it expedient and right for the one to be slaves and the others to be masters: the one practicing obedience, the others exercising the authority and lordship which nature intended them to have. The abuse of this authority is injurious to both; for the interests of part and whole, of body and soul, are the same, and the slave is a part of the master, a living but separated part of his bodily frame. Hence, where the relation of master and slave between them is natural they are friends and have a common interest, but where it rests merely on law and force the reverse is true.

显而易见，上述观点的分歧显然是很有根据的，另外，现在所有的奴隶或自由人实际上并不都是天生的。有时候，这两个阶级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并且按这种差异有些人称为奴隶，其他的成为主人：按照自然的本意，他们一个做服从的事，另一个则做掌权者和贵族的事，而上述天然的差异使得这种划分不但有理而且有利。谁要滥用主人的权威，那就必然会损害双方的利益；因为部分之于整体，如同身体之于灵魂，是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奴隶是主人的一部分，一个有生命的，分离于他的身体之外的组成部分。但就奴隶制本身而言，奴隶从属于主人的一部分是合乎自然的。因此，如果奴隶和主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合乎各自的天性，他们就是朋友而且有共同利益，而如果这种关系仅仅是建立在法律和暴力基础上，那么他们就是敌人而且没有共同利益。

Part 7

第七章

The previous remarks are quite enough to show that the rule of a master is not a constitutional rule, and that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rule are not, as some affirm, the same with each other. For there is one rule exercised over subjects who are by nature free, another over subjects who are by nature slaves. The rule of a household is a monarchy, for every house is under one head: whereas constitutional rule is a government of freemen and equals. The master is not called a master because he has science, but because he is of a certain character, and the same remark applies to the slave and the freeman. Still there may be a science for the master and science for the slave. The science of the slave would be such as the man of Syracuse taught, who made money by instructing slaves in their ordinary duties. And such a knowledge may be carried further, so as to include cookery and similar menial arts. For some duties are of the more necessary, others of the more honorable sort; as the proverb says, “slave before slave, master before master.” But all such branches of knowledge are servile. There is likewise a science of the master, which teaches the use of slaves; for the master as such is concerned, not with the acquisition, but with the use of them. Yet this so-called science is not anything great or wonderful; for the master need only know how to order that which the slave must know how to execute. Hence those who are in a position which places them above toil have stewards who attend to their households while they occupy themselves with philosophy or with politics. But the art of acquiring slaves, I mean of justly acquiring them, differs both from the art of the master and the art of the slave, being a species of hunting or war. Enough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aster and slave.

上面的讨论足以表明对奴隶的统治不属于政治统治，而且，那些不同的统治并不都是一模一样的，尽管某些人坚信这一点。有一种统治被用在天生的自由人身上，另一种则用于天生是奴隶的人。家族统治属君主政体，因为每个家庭都只有一个首脑；而政治统治则是对自

由和平等的人的统治。主人之所以称为主人不是因为他掌握了统治奴隶的学问，而是因为他天生如此；奴隶和自由人也是如此。但是主人依然有主人的学问，奴隶有奴隶的学问。奴隶的学问大概就是那位锡拉库扎人教授的技艺，他靠着教奴隶们学习普通的活计赚钱。这些活计还可以延伸到更大的领域，如烹饪技艺，以及类似的卑贱技艺。其中有些技艺更加受人尊敬，有的则是生活必需；就像有谚语说："奴隶有强弱，主人有高低。"但是，所有这类知识的分支都是卑贱的。同样的也有一门主人的学问，即教会主人如何使用奴隶的学问；因为这样的主人关心的不是获得奴隶，而是使用奴隶。然而，这门学问一点都不伟大也不精彩；因为主人只需要知道如何命令奴隶去做一件他会做的事。因此，那些有能力摆脱这些琐事的主人会雇佣一名管家来管理家务，从而自己可以把精力放在政治或哲学研究上。而获得奴隶的本事则和主人的学问与奴隶的学问都不同，这应当属于战争技术和狩猎技术中的一部分。这些就是奴隶和主人之间的差别。

Part 8

第八章

Let us now inquire into property generally, and into the art of getting wealth, in accordance with our usual method, for a slave has been shown to be a part of property.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art of getting wealth is the same with the art of managing a household or a part of it, or instrumental to it; and if the last, whether in the way that the art of making shuttles is instrumental to the art of weaving, or in the way that the casting of bronze is instrumental to the art of the statuary, for they are not instrumental in the same way, but the one provides tools and the other material; and by material I mean the substratum out of which any work is made; thus wool is the material of the weaver, bronze of the statuary. Now it is easy to see that the art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is not identical with the art of getting wealth, for the one uses the material which the other provides. For the art which uses household stores can be no other than the art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There is, however, a doubt whether the art of getting wealth is a part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or a distinct art. If the getter of wealth has to consider whence wealth and property can be procured, but there are many sorts of property and riches, then are husbandry, and the care and provision of food in general, parts of the wealth-getting art or distinct arts? Again, there are many sorts of food, and therefore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lives both of animals and men; they must all have food,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food have made differences in their ways of life. For of beasts, some are gregarious, others are solitary; they live in the way which is best adapted to sustain them, accordingly as they are carnivorous or herbivorous or omnivorous: and their habits are determined for them by nature in such a manner that they may obtain with greater facility the food of their choice. But, as different species have different tastes, the same things are not naturally pleasant to all of them; and therefore the lives of carnivorous or herbivorous animals further differ among themselves. In the lives of men too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The laziest are shepherds, who lead an idle life, and get their subsistence without trouble from tame animals; their flocks having to wander from place to place in search of pasture, they are compelled to follow them, cultivating a sort of living farm. Others support themselves by hunting, which is of different kinds. Some, for example, are brigands, others, who dwell near lakes or marshes or rivers or a sea in which there are fish, are fishermen, and others live by the pursuit of birds or wild beasts. The greater number obtain a living from the cultivated fruits of the soil. Such are the modes of subsistence which prevail among those whose industry springs up of itself, and whose food is not acquired by exchange and retail trade—there is the shepherd, the husbandman,

the brigand, the fisherman, the hunter. Some gain a comfortable maintenance out of two employments, eking out the deficiencies of one of them by another: thus the life of a shepherd may be combined with that of a brigand, the life of a farmer with that of a hunter. Other modes of life are similarly combined in any way which the needs of men may require. Property, in the sense of a bare livelihood, seems to be given by nature herself to all, both when they are first born, and when they are grown up. For some animals bring forth, together with their offspring, so much food as will last until they are able to supply themselves; of this the vermiparous or oviparous animals are an instance; and the viviparous animals have up to a certain time a supply of food for their young in themselves, which is called milk. In like manner we may infer that, after the birth of animals, plants exist for their sake, and that the other animals exist for the sake of man, the tame for use and food, the wild, if not all at leas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for food, and for the provision of clothing and various instruments. Now if nature makes nothing incomplete, and nothing in vain, the inference must be that she has made all animals for the sake of man. And so, in one point of view, the art of war is a natural art of acquisition, for the art of acquisition includes hunting, an art which we ought to practice against wild beasts, and against men who, though intended by nature to be governed, will not submit; for war of such a kind is naturally just.

现在，我们来对财产进行一般性研究，并且研究一下获得财富的技艺，就按我们惯用的方法来，因为奴隶已经被证明是财产的一部分了。第一个问题是获得财富的技艺和家务管理的技艺是否为同一件事，还是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或者是后者的工具；如果是工具，则两者的关系是类似于制梭技术之于织布技术那样，还是类似于铸铜技术之于造像技术那样呢？这两组工具关系是不同的，前面一组是提供

工具的关系，后面一组则是提供材料的关系，材料即完成产品所需的原料：比如羊毛是织工的材料，青铜是雕刻家的材料。很显然，家务管理技术与获得财富的技术不完全相同，其中一方使用另一方提供的材料。使用家庭储备的技艺就是家务管理的技艺。但还有一个疑问，获得财富的技艺是家务管理的一部分还是一项不同的技术？如果获得财富的人必须考虑哪里能够获得财富，但是财富的种类也有很多，那么，农耕以及一般性的照料和提供食物，这些是获得财富的技艺中的一部分还是不同的技艺呢？而且，世上有很多种不同的食物；也因此有了许多种类的生命包括人类和动物；它们都必须吃食物，而不同的食物造成了它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动物界中，有些喜欢群居，有些喜欢独处，凡此种种都跟动物们摄取食物的方式有关；同理，草食、肉食和杂食动物的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大自然给了动物不同的生活习性，从而让它们可以方便的觅食。但是，正如不同物种喜欢不同的食物，同一种食物自然不可能令所有动物都满意；因此，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的群体内部又衍生了各种不同的生活。不同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多的不同。人类当中最懒惰的是牧民，他们生活懒散，靠驯养的动物生活，无忧无虑；畜群经常追逐水草丰美的地方并迁移，牧民们也被迫跟着迁移，这样的生活就仿佛是在耕种“一块生长活物的田园”。另一些人靠捕猎为生，这些人捕猎的对象各不相同。有些人以劫掠其他人类为生；有些居住于湖畔、河边、沼泽地区或海滨从事捕鱼业，他们是渔民；另一些人则以捕食鸟兽为生。更多的人靠土壤里培育出来的植物果实生存。这些人的生活方式都是遵从自然的指引，用他们各自的劳动方式换得给养，而不是靠交换和买卖以取得生活资料。这里有五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牧民、农民、渔夫、强盗和猎人。他们中有些兼营两种谋生方式，从而活地更加舒适，因为一种方式的不足可以从另一种得到补足。这样，一个牧民可以兼做强盗，或农民兼做猎人。其他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根据生活的需要来相互结合。财产，单纯从生计的角度来看，似乎是大自然为所有的动物提供的，从诞生初期到最终长大。它们当中有的从母体当中就开始获得某种营养，这种持续的营养让它们一降生就能够自己觅食，如昆虫和鸟类。胎生动物，从分娩时起就自然地分泌所谓的乳汁，在某一时期内，哺喂其婴儿。同理可见，动物出生后，植物为了它们而存在，其他动物

则为人类而存在，驯养的动物，供人食用和驱使，野生动物虽非全部，可也多数可供人食用，或者用于提供衣服和各种工具。如果说自然从不制作徒劳或缺陷的东西，那么可以认为她创造的所有动物都是为了人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战争技巧也是获取财富的自然技能；因为获取财富的技能包括狩猎，它是人类对抗野生动物的必要技艺；也可以用来对付那些人，他们天生要被统治，却不愿意屈服，那么发动对他们的战争，也自然是正义的。

Of the art of acquisition then there is one kind which by nature is a part of the management of a household, in so far as the art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must either find ready to hand, or itself provide, such things necessary to life, and useful for the community of the family or state, as can be stored. They are the elements of true riches; for the amount of property which is needed for a good life is not unlimited, although Solon in one of his poems says that "No bound to riches has been fixed for man."

因此，获取财富的技艺天生是家务管理的一部分，因为家务管理也必须提供方便或提供生活必需的，以及对家庭或城邦有用的可以储备的东西。这项技艺中包含着真正的财富，因为一个家庭必需的支撑其幸福生活的财富并非无限多；尽管梭伦在诗中曾说过："一个人可以获得的财富没有极限。"

But there is a boundary fixed, just as there is in the other arts; for the instruments of any art are never unlimited, either in number or size, and riches may be defined as a number of instruments to be used in a household or in a state. And so we see that there is a natural art of acquisition which is practiced by managers of households and by statesmen, and what is the reason of this.

但是，其对财富的摄取是有限的；任何其他的技能也是如此；原因是任何一种技艺所需要的工具都不可能无限供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体积上，而且财富被定义为用于家庭或城邦的工具总和。所以，我们发现了家务管理者和政治家践行的一种天然的获得财富的技艺，及其存在的原因。

Part 9

第九章

There is another variety of the art of acquisition which is commonly and rightly called an art of wealth-getting, and has in fact suggested the notion that riches and property have no limit. Being nearly connected with the preceding, it is often identified with it. But though they are not very different, neither are they the same. The kind already described is given by nature, the other is gained by experience and art.

还有另一种获得财富的技艺就是通常所谓的“敛财术”，这种称呼非常贴切，而且实际上暗示了财富的无穷无尽。鉴于敛财术和前一种技艺的密切联系，二者常被认为是相同的技艺。但是两者虽然相近，却不尽相同。前一种是自然给予的，后一种则是依靠技艺和经验赢得的。

Let us begin our discussion of the question with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下面我们用这些思考来开始我们的讨论：

Of everything which we possess there are two uses: both belong to the thing as such, but not in the same manner, for one is the proper, and the other the improper or secondary use of it. For example, a shoe is used for wear, and is used for exchange; both are uses of the shoe. He who gives a shoe in exchange for money or food to him who wants one, does indeed use the shoe as a shoe, but this is not its proper or primary purpose, for a shoe is not made to be an object of barter.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all possessions, for the art of exchange extends to all of them, and it arises at first from what is natural, from the circumstance that some have too little, others too much. Hence we may infer that retail trade is not a natural part of the art of getting wealth; had it been so, men would have ceased to exchange when they had enough. In the first community, indeed, which is the family, this art is obviously of no use, but it begins to be useful when the society increases. For the members of the family originally had all things in common; later, when the family divided into parts, the parts shared in many things, and different parts in different things, which they had to give in exchange for what they wanted, a kind of barter which is still practiced among barbarous nations who exchange with one another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and nothing more; giving and receiving wine, for example, in exchange for coin, and the like. This sort of barter is not part of the wealth-getting art and is not contrary to nature, but is needed for the satisfaction of men's natural wants. The other or more complex form of exchange grew, as might have been inferred, out of the simpler. When the inhabitants of one country became more dependent on those of another, and they imported what they needed, and exported what they had too much of, money necessarily came into use. For the various necessaries of life are not

easily carried about, and hence men agreed to employ in their dealings with each other something which was intrinsically useful and easily applicable to the purposes of life, for example, iron, silver, and the like. Of this the value was at first measured simply by size and weight, but in process of time they put a stamp upon it, to save the trouble of weighing and to mark the value.

我们拥有的每一件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两种用途都属于物品本体，方式却不一样，因为一种用途是正当的，而另一种则是不正当的或是次要的用途。例如一双鞋：既可以穿在脚上，也可以用来交换，两种都可以算作鞋的用途。有人把鞋交给有需要的人，以换取金钱或食物，固然也发挥了这双鞋的作用，但这却不是鞋的正当或主要用途，因为人们制鞋的本意并不是为了交换。这种观点适用于一切财物，因为交换的技艺延伸到所有财物，它起源于一种很自然的情况，即人们有的财物有富余，有的还不够。因此可以推断，零星交易并不是获得财富的技艺中天然的一部分；如果是的话，那么人们在拥有了足够的物资之后就会停止交易。这项技艺在最初的人类团体，即家庭中，显然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但是随着社会的扩大，交易变得很有用。因为最初所有的家庭财物是为成员们所共有的；后来，最初的家庭成员分裂成很多部分，这些成员共享很多物品，而且不同的成员拥有不同的物品，他们不得不用这些物品来换取自己需要的物资。这种以物易物的传统依然践行于很多野蛮民族，他们彼此只交换必需品，而从不交换其他产品；例如用酒来换金币，以及类似物品。这种物物交易不是一种敛财手段，也并没有违背自然性，而是一种满足人类自然需求的必要途径。但是，可以以此推断，从简单的形式，衍生出了其他的或更复杂的交换形式。当一个国家的居民变得更依赖另一个国家的居民，他们进口需要的物资，并出口他们过剩的产品时，必然要开始使用金钱。因为各种生活必需品并不一定方便携带，因此人们在交易中使用一种特殊物品，它必须有固有的用途，可方便地用于生活，例如铁和银，或其他任何满足上述两个要求的物品。起初，人们用这些金属的重量或体积决定其价值，随着时间推移，为了免去每次

称重的麻烦，也为了标记其价值，人们给它们盖上了一个特定的印记。

When the use of coin had once been discovered, out of the barter of necessary articles arose the other art of wealth getting, namely, retail trade; which was at first probably a simple matter, but became more complicated as soon as men learned by experience whence and by what exchanges the greatest profit might be made. Originating in the use of coin, the art of getting wealth is generally thought to be chiefly concerned with it, and to be the art which produces riches and wealth; having to consider how they may be accumulated. Indeed, riches is assumed by many to be only a quantity of coin, because the arts of getting wealth and retail trade are concerned with coin. Others maintain that coined money is a mere sham, a thing not natural, but conventional only, because, if the users substitute another commodity for it, it is worthless, and because it is not useful as a means to any of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and, indeed, he who is rich in coin may often be in want of necessary food. But how can that be wealth of which a man may have a great abundance and yet perish with hunger, like Midas in the fable, whose insatiable prayer turned everything that was set before him into gold?

钱币的用途被发现以后，从对必需品的物物交换中又产生了另一种获取财富的技艺，即“零售贸易”；起初，零售贸易的方式或许还很简单，但是人们在经验中学会了什么地方以及什么样的交换能带来最大利润，此后的贸易立刻变得复杂起来。由于起源于钱币的使用，人们通常认为敛财术最关心的就是钱，认为这种技艺的目的就是制造钱财，积累钱财。确实如此，财富在很多人看来就是钱币的数量，因为零售贸易和敛财术都很关心钱。其他人则坚持制成货币的钱只是一

个“冒牌货”，是非自然的产物，只是一种契约性存在，因为，如果使用者用另一种商品代替它，那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原因是钱币并不具备任何一种生活必需品的用途，事实上，通常有些人家财万贯却没有足够饱腹的食物。一个人坐拥大量钱币却要忍饥挨饿，我们怎么能说钱币就是财富呢？难道像寓言中的米达斯一样，用他贪婪的祈求把所有摆在他面前的东西都变成金子吗？

Hence men seek after a better notion of riches and of the art of getting wealth than the mere acquisition of coin, and they are right. For natural riches and the natural art of wealth-getting are a different thing; in their true form they are part of the management of a household; whereas retail trade is the art of producing wealth, not in every way, but by exchange. And it is thought to be concerned with coin; for coin is the unit of exchange and the measure or limit of it. And there is no bound to the riches which spring from this art of wealth getting. As in the art of medicine there is no limit to the pursuit of health, and as in the other arts there is no limit to the pursuit of their several ends, for they aim at accomplishing their ends to the uttermost (but of the means there is a limit, for the end is always the limit), so, too, in this art of wealth-getting there is no limit of the end, which is riches of the spurious kind, and the acquisition of wealth. But the art of wealth-getting which consists in household management, on the other hand, has a limit; the unlimited acquisition of wealth is not its business. And, therefore, in one point of view, all riches must have a limit; nevertheless, as a matter of fact, we find the opposite to be the case; for all getters of wealth increase their hoard of coin without limit. The source of the confusion is the near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wealth-getting; in either, the instrument is the same, although the use is different, and so they pass into one another; for each is a use of the same property, but with a difference:

accumulation is the end in the one case, but there is a further end in the other. Hence some persons are led to believe that getting wealth is the object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and the whole idea of their lives is that they ought either to increase their money without limit, or at any rate not to lose it. The origin of this disposition in men is that they are intent upon living only, and not upon living well; and, as their desires are unlimited they also desire that the means of gratifying them should be without limit. Those who do aim at a good life seek the means of obtaining bodily pleasures; and, since the enjoyment of these appears to depend on property, they are absorbed in getting wealth: and so there arises the second species of wealth-getting. For, as their enjoyment is in excess, they seek an art which produces the excess of enjoyment; and, if they are not able to supply their pleasures by the art of getting wealth, they try other arts, using in turn every faculty in a manner contrary to nature. The quality of courage, for example, is not intended to make wealth, but to inspire confidence; neither is this the aim of the general's or of the physician's art; but the one aims at victory and the other at health. Nevertheless, some men turn every quality or art into a means of getting wealth; this they conceive to be the end, and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end they think all things must contribute.

因此，人们努力寻找对财富的一种更好的理解，不仅寻找财富，而且寻找对获得财富的技艺的理解；这样做是对的。天然的财富和天然的获得财富的手段并不是同一件事；他们真正的形态是家务管理的一部分；虽然零售贸易能制造财富，不过不是通过各种渠道，而只是通过交换。贸易被认为跟钱币有关；因为钱币就是交易的单位，是衡量标准和限制。而获得财富的技艺能够产生的财富是无限的。这一点跟医药技术类似，从求得健康的角度看，人们对医药技术的使用也没有限制，其他的技能也是如此，根本没办法划定有效的界限来终止一

种技艺的使用，从业者总是希望尽可能的延伸该技艺使用的范围（但是在手段上仍然是有限的，最终目标则是永恒的界限），同理，交易在目标方面没有极限，这里的财富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富裕，其作为敛财的手段没有极限。相反，获取财富的技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是有限制的；对财富的无限获取并非其业务范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财富必需有一个限制；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因为所有的财富获取者在增加钱币数量方面都是贪求无度的。这种困惑的源头在于两种获取财富的手段之间联系太密切了；所用的工具相同，尽管用途不同，所以同一工具会在两种技能之间传递；都是对同一批财产的使用，但是目的不同：一个以积累为目的，另一个还有更深远的目的。因此，有些人坚定地相信家务管理的目标就在于得到财富，而且他们全部的人生意义就在于无限的增加财富，或尽可能不损失财富。这种心理的根源是由于他们看重的是活着，而非美好的生活；由于对金钱的欲望无穷无尽，所以他们希望拥有无穷无尽的手段满足这种欲望。即使那些致力于美好生活的人也通常沉迷于物质的享受；而物质享受需要大量金钱作为后盾，所以他们一心扑在如何赚钱上：由此产生了第二种获取财富的技艺。因为过度追求物质享受；他们努力寻找新的途径来获得与之相匹配的财富供给；倘若单纯的零售交易不能满足他们对金钱的需求，他们就会寻求其他的方式，最终会使用全部的力量做一些违背自然意志的事。比如说，勇敢原本是用来激发人们的信心，而不是帮人赚钱。士兵和医师的本领也都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战争胜利和身体健康。但有些人却把品德和技术都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觉得可以不择手段。

Thus, then, we have considered the art of wealth-getting which is unnecessary, and why men want it; and also the necessary art of wealth-getting, which we have seen to be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and to be a natural part of the art of managing a household, concerned with the provision of food, not, however, like the former kind, unlimited, but having a limit.

就这样，我们已探讨了那个非必要的获取财富的方式，并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都向往这种技术；我们也已探讨了获得财富的那个必要方式，说明它与另一个方式的差别；作为家务管理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提供食物，所以不同于前者的贪婪无度，后者是有明确界限的。

Part 10

第十章

And we have found the answer to our original question, Whether the art of getting wealth is the business of the manager of a household and of the statesman or not their business? viz., that wealth is presupposed by them. For as political science does not make men, but takes them from nature and uses them, so too nature provides them with earth or sea or the like as a source of food. At this stage begins the duty of the manager of a household, who has to order the things which nature supplies; he may be compared to the weaver who has not to make but to use wool, and to know, too, what sort of wool is good and serviceable or bad and unserviceable. Were this otherwise,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ee why the art of getting wealth is a part of the management of a household and the art of medicine not; for surely the members of a household must have health just as they must have life or any other necessary. The answer is that as from one point of view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and the ruler of the state have to consider about health,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not they but the physician; so in one way the art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in another way the subordinate art, has to consider about wealth. But, strictly speaking, as I have already said, the means of life must be provided beforehand by nature; for the business of nature is to furnish food to that which is

born, and the food of the offspring is always what remains over of that from which it is produced. Wherefore the art of getting wealth out of fruits and animals is always natural.

以前的疑问终于得到了解决：作为一家或一国之主是否应该掌握养家糊口的技艺呢？答案是，财富是先天赋予他们的。因为一个政治家不创造人，但是却从自然之母的手中接收人类，并使用他们，同样，大地、海洋、或其他类似的东西都自然给予人类做食物来源的。然后，才是而家务管理者的职责开始的时候；他只需要命令那些大自然提供给他的东西就可以了；正如织工的职责不是制造羊毛而是使用它，并区分那些羊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不能用的。如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获取财富的技艺是家务管理的一部分，而治病的技艺则不是；因为一个家庭要生存或其他的必需品与他们要保持健康这两点同样重要。对于上面的疑惑可以这样回答：从某一方面看，一家之主和城邦的统治者必须关心健康状况，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不是他们的职责而是医师的职责；前一种对健康的关心是家务管理的视角，而后一种则是一种辅助技能的角度。但是，严格地讲，如前文所述，生存方式是大自然提前设计好的；她有责任为她的后代提供食物；而所有的后代所需食物都来自于孕育他们的母体。因此，从动物和果实那里获取财富永远是自然的技艺。

There are two sorts of wealth-getting, as I have said; one is a part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the other is retail trade: the former necessary and honorable, while that which consists in exchange is justly censured; for it is unnatural, and a mode by which men gain from one another. The most hated sort, and with the greatest reason, is usury, which makes a gain out of money itself, and not from the natural object of it. For money was intended to be used in exchange, but not to increase at interest. And this term interest, which means the birth of money from money, is applied to the

breeding of money because the offspring resembles the parent. Wherefore of an modes of getting wealth this is the most unnatural.

关于获取财富，我们已经说过，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一个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而另一个则是零售贸易：前者是必要的和光荣的，而以交换为目的的那个则是应该批判的；因为它是非自然的，而是人们用之从他人那里牟利的手段。其中最可恨的一种，而且人们又最充分的理由仇视它，正是高利贷，它利用钱来获得收益，而不是利用钱的最初用途。因为钱是用于交换的，而不是生利息的。“利息”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用钱生钱”，用它来称呼这种用钱生钱的职业是因为子女会继承父母的模样。在所有的赚钱手段中，高利贷是最违背自然性的。

Part 11

第十一章

Enough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theory of wealth-getting; we will now proceed to the practical part. The discussion of such matters is not unworthy of philosophy, but to be engaged in them practically is illiberal and irksome. The useful parts of wealth-getting are, first, the knowledge of livestock—which are most profitable, and where, and how—as, for example, what sort of horses or sheep or oxen or any other animals are most likely to give a return. A man ought to know which of these pay better than others, and which pay best in particular places, for some do better in one place and some in another. Secondly, husbandry, which may be either tillage or planting, and the keeping of bees and of fish, or fowl, or of any animals which may be useful to man. These are the divisions of the true or proper art of wealth-getting and come first.

Of the other, which consists in exchange,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division is commerce (of which there are three kinds—the provision of a ship, the conveyance of goods, exposure for sale—these again differing as they are safer or more profitable), the second is usury, the third, service for hire—of this, one kind is employed in the mechanical arts, the other in unskilled and bodily labor. There is still a third sort of wealth getting intermediate between this and the first or natural mode which is partly natural, but is also concerned with exchange, viz., the industries that make their profit from the earth, and from things growing from the earth which, although they bear no fruit, are nevertheless profitable; for example, the cutting of timber and all mining. The art of mining, by which minerals are obtained, itself has many branches, for there are various kinds of things dug out of the earth. Of the several divisions of wealth-getting I now speak generally; a minute consideration of them might be useful in practice, but it would be tiresome to dwell upon them at greater length now.

关于获取财富的理论就说这么多，下面让我们来探讨它的实际应用部分。对于这类事物的讨论是一种哲学的享受，但是实际从事这些工作则是狭隘和令人厌烦的。下列事务对于家务管理用处颇多：首先，关于牲畜的知识——哪些是利润最高的，去哪里实现，如何实现——例如，哪些马，羊，牛，或其他家畜最有可能带来回报呢？一个人应该熟悉，这些事物中哪些比其他的回报高，以及它们当中的某一种在哪里回报最高，因为有些在这里长的好，而有些又在其他的地方活得好。其次，还要懂得农业，可能是管理耕地或果园，如何养蜂，养鱼，养家禽，或任何可以对人有用的动物。这些都是为了财富获取技艺的第一个、也是最正当的分支。至于另一个分支，通过交易来获取财富的手段，首要的部分是经商（方法有三：提供船只，运输货物，和展示销售——这些在安全性和利润率方面又有不同），第二种，放高利贷，第三种，靠雇用工资——包括因为自身的某种技艺而

受雇佣，和单纯的付出体力。还有第三类获取财富的技艺介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之间；第一类是自然技艺，第二类是非自然技艺，而第三类则部分依赖自然，部分依赖交换；即，那些从土地直接获取利润的行业，虽然这些土地并不生产果实，但是仍然有利润；比如伐木，或挖矿。采矿技艺，作为获得矿石的手段，又分为很多分支，因为从地底挖出的矿石种类繁多。我们只是粗略的介绍了这些获取财富的几个不同种类；虽然深入介绍其中的细节会使某种特定的工匠受益；但却不免显得啰嗦。

Those occupations are most truly arts in which there is the least element of chance; they are the meanest in which the body is most deteriorated, the most servile in which there is the greatest use of the body, and the most illiberal in which there is the least need of excellence.

在所有的行业中，最不依靠运气的一定是最考验技术的行业；最损伤身体的行业必然是最刻薄的；需要付出体力最多的一定是最卑贱的，对才能要求越低的一定是最狭隘的。

Works have been written upon these subjects by various persons; for example, by Chares the Parian, and Apollodorus the Lemnian, who have treated of Tillage and Planting, while others have treated of other branches; any one who cares for such matters may refer to their writings. It would be well also to collect the scattered stories of the ways in which individuals have succeeded in amassing a fortune; for all this is useful to persons who value the art of getting wealth. There is the anecdote of Thales the Milesian and his financial device, which involves a principle of universal application, but is attributed to him on account of his reputation for

wisdom. He was reproached for his poverty, which was supposed to show that philosophy was of no use. According to the story, he knew by his skill in the stars while it was yet winter that there would be a great harvest of olives in the coming year; so, having a little money, he gave deposits for the use of all the olive-presses in Chios and Miletus, which he hired at a low price because no one bid against him. When the harvest-time came, and many were wanted all at once and of a sudden, he let them out at any rate which he pleased, and made a quantity of money. Thus he showed the world that philosophers can easily be rich if they like, but that their ambition is of another sort. He is supposed to have given a striking proof of his wisdom, but, as I was saying, his device for getting wealth is of universal application, and is nothing but the creation of a monopoly. It is an art often practiced by cities when they are want of money; they make a monopoly of provisions.

很多人写过有关这些行业的专著，如帕洛斯岛人嘉里底特和利姆诺岛人阿波罗杜罗曾经编写了庄稼和栽培的书籍，其他作家另有其他的专著；有志于这些行业的人们可参考他们的著述。而且，每个人都应该用心的收集自己偶尔听到的各行业的人成功地用某种方法聚集大笔财富的零星故事，对于重视获取财富的技艺的人来说这些早晚用得上。曾有一个逸闻讲到了米利都人泰利斯，这个故事归在他的名下主要是因为他闻名于世的智慧，其实这个特殊的赚钱方法是可以普遍应用的。他曾经因为贫穷而受到人们的羞辱，他们认为他的贫穷证明了哲学是没用的学问。在故事里，虽然还是隆冬，但他凭借自己的星象学知识预测来年的油榄树将获丰收；于是，他把自己的一点资金，完全交给启沃岛和米利都城的各油坊作定金，约定了很低的租金，租得了各油坊的榨油设备。因为当时是冬天，所以没有人同他竞价。而当收获季节来临时，需要榨油的人纷纷到各油坊，他当即把设备以自己满意的高价租给了这些人。他由此赚了很多钱。并藉此向世人证明赚钱对哲学家来说轻而易举，只是他们的志趣却不在金钱。泰利斯确实

为自己的智慧给出了一种令人惊叹的证明，但是，正如我说过的，他获取财富的方法是有广泛的实际意义的，那就是制造专利权。许多城邦在需要钱的时候都使用过这种方法，即对某种供应进行垄断。

There was a man of Sicily, who, having money deposited with him, bought up an the iron from the iron mines; afterwards, when the merchants from their various markets came to buy, he was the only seller, and without much increasing the price he gained 200 per cent. Which when Dionysius heard, he told him that he might take away his money, but that he must not remain at Syracuse, for he thought that the man had discovered a way of making money which was injurious to his own interests. He made the same discovery as Thales; they both contrived to create a monopoly for themselves. And statesmen as well ought to know these things; for a state is often as much in want of money and of such devices for obtaining it as a household, or even more so; hence some public men devote themselves entirely to finance.

西西里岛曾经有一个人，他把人们存在他手中的一大笔钱用来买断了所有铁矿的存铁；所以当各地的商人来买铁时，只有他有铁可卖；在没有过分提价的情况下，他还是获得了百分之二百的利润。当狄奥尼修听说了他的做法之后，便让他带上赚的钱离开西西里岛，因为狄奥尼修认为他的牟利手段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这个人的做法与泰利斯的做法不谋而合；两人都用自己的手段谋得了垄断经营的机会。政治家们也应该懂得这类知识；因为很多城邦和家庭一样都需要钱和这种赚钱的方法，当然城邦对它们更为渴求；也因为这个原因，某些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会全身心地致力于理财。

Part 12

第十二章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we have seen that there are three parts—one is the rule of a master over slaves, which has been discussed already, another of a father, and the third of a husband. A husband and father, we saw, rules over wife and children, both free, but the rule differs, the rule over his children being a royal, over his wife a constitutional rule. For although there may be exceptions to the order of nature, the male is by nature fitter for command than the female, just as the elder and full-grown is superior to the younger and more immature. But in most constitutional states the citizens rule and are ruled by turns, for the idea of a constitutional state implies that the natures of the citizens are equal, and do not differ at all. Nevertheless, when one rules and the other is ruled we endeavor to create a difference of outward forms and names and titles of respect, which may be illustrated by the saying of Amasis about his foot-pan. The relation of the male to the female is of this kind, but there the inequality is permanent. The rule of a father over his children is royal, for he rules by virtue both of love and of the respect due to age, exercising a kind of royal power. And therefore Homer has appropriately called Zeus “father of Gods and men,” because he is the king of them all. For a king is the natural superior of his subjects, but he should be of the same kin or kind with them, and such is the relation of elder and younger, of father and son.

我们发现家务管理共有三个部分：一、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主奴关系；二、父子关系；三、夫妻关系。作为丈夫和父亲，对妻子与孩子都按照自由人进行统治，但是这两种统治也有所不同；对待妻子是政治统治，对待孩子应该像君主对待子民。除了个别自然意志失灵的情况，男人天生比女人更适合做领导者，这就好比年长者和成年人比年

轻人更强大和更成熟。但在大多数政治城邦中，公民们轮流执政，因为政治城邦的理念就暗示了公民的本质是平等的，没有任何差别。然而，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确定之后，我们又会努力制造一种差别，如在形态，名字，和荣誉头衔等方面，这一点可以从阿玛西斯关于脚盆的论述中得到印证。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一种，但是这里的不平等才是永恒的。而父亲对儿子的统治应该如同君主对子民一般。因为父亲的权威是建立在爱护和对年龄的尊敬之上的，这二者正是君主统治的特点。因此，荷马称呼朱庇特为“众神和人类之父”是非常贴切的，因为他确实是两者的共同父亲。君主天生就比他的子民更卓越，但是他应该与其子民系出同脉或份属同类，这就是年长者与年轻者，父与子的关系。

Part 13

第十三章

Thus it is clear that household management attends more to men than to the acquisition of inanimate things, and to human excellence more than to the excellence of property which we call wealth, and to the virtue of freemen more than to the virtue of slaves. A question may indeed be raised, whether there is any excellence at all in a slave beyond and higher than merely instrumental and ministerial qualities—whether he can have the virtues of temperance, courage, justice, and the like; or whether slaves possess only bodily and ministerial qualities. And, whichever way we answer the question, a difficulty arises; for, if they have virtue, in what will they differ from freemen?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they are men and share in rational principle, it seems absurd to say that they have no virtue. A similar question may be raised about women and children, whether they too have virtues: ought a woman to be temperate and brave and just, and is a child to be

called temperate, and intemperate, or note so in general we may ask about the natural ruler, and the natural subject, whether they have the same or different virtues. For if a noble nature is equally required in both, why should one of them always rule, and the other always be ruled? Nor can we say that this is a question of degree,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uler and subject is a difference of kind, which the difference of more and less never is. Yet how strange is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one ought, and that the other ought not, to have virtue! For if the ruler is intemperate and unjust, how can he rule well? If the subject, how can he obey well? If he be licentious and cowardly, he will certainly not do his duty. It is evident, therefore, that both of them must have a share of virtue, but varying as natural subjects also vary among themselves. Here the very constitution of the soul has shown us the way; in it one part naturally rules, and the other is subject, and the virtue of the ruler we in maintain to b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subject; the one being the virtue of the rational, and the other of the irrational part. Now, it is obvious that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generally, and therefore almost all things rule and are ruled according to nature. But the kind of rule differs; the freeman rules over the slave after another manner from that in which the male rules over the female, or the man over the child; although the parts of the soul are present in an of them, they are present in different degrees. For the slave has no deliberative faculty at all; the woman has, but it is without authority, and the child has, but it is immature. So it must necessarily be supposed to be with the moral virtues also; all should partake of them, but only in such manner and degree as is required by each for the fulfillment of his duty. Hence the ruler ought to have moral virtue in perfection, for his function, taken absolutely, demands a master artificer, and rational principle is such an artificer; the subjects, oil the other hand, require only that measure of virtue which is proper to each of them. Clearly, then, moral

virtue belongs to all of them; but the temperance of a man and of a woman, or the courage and justice of a man and of a woman, are not, as Socrates maintained, the same; the courage of a man is shown in commanding, of a woman in obeying. And this holds of all other virtues, as will be more clearly seen if we look at them in detail, for those who say generally that virtue consists in a good disposition of the soul, or in doing rightly, or the like, only deceive themselves. Far better than such definitions is their mode of speaking, who, like Gorgias, enumerate the virtues. All classes must be deemed to have their special attributes; as the poet says of women, “Silence is a woman's glory,” but this is not equally the glory of man. The child is imperfect, and therefore obviously his virtue is not relative to himself alone, but to the perfect man and to his teacher, and in like manner the virtue of the slave is relative to a master. Now we determined that a slave is useful for the wants of life, and therefore he will obviously require only so much virtue as will prevent him from failing in his duty through cowardice or lack of self-control. Some one will ask whether, if what we are saying is true, virtue will not be required also in the artisans, for they often fail in their work through the lack of self-control? But is there not a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two cases? For the slave shares in his master's life; the artisan is les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im, and only attains excellence in proportion as he becomes a slave. The meaner sort of mechanic has a special and separate slavery; and whereas the slave exists by nature, not so the shoemaker or other artisan. It is manifest, then, that the master ought to be the source of such excellence in the slave, and not a mere possessor of the art of mastership which trains the slave in his duties. Wherefore they are mistaken who forbid us to converse with slaves and say that we should employ command only, for slaves stand even more in need of admonition than children.

显然，家务管理更多地关注人而不是如何获得无生命的东西，关注人的功勋而非所谓的财产的优势，关注自由人的美德而非奴隶的美德。事实上，我们可以提一个问题，在奴隶的身上，除了纯粹的工具性的和服侍性的品质，到底还有没有更高级的优点呢？——他能否拥有一些美德如节制，勇武，正义，以及类似的；或奴隶是否只拥有身体的和服侍的品质呢？而且，无论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都会出现一个疑难：如果他们有美德，那么他们跟自由人的区别是什么？另一方面，既然他们是人，而且拥有部分理性，说他们没有美德似乎也很荒谬。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针对妇女和子女，他们是否也具备各种美德；一名妻子是否也能自我节制、勇敢而富于正义呢；一个孩子是否也能够有节制呢？这种疑问应该具有普遍性：天生的统治者与天生的被统治者是否具有相同的美德呢？如果说双方都应该具有同一种高贵品质，那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类人呢？这个问题同样不能解释为他们所拥有的这类美德的程度不同，因为统治与被统治应该是两个不同的种类，而多与少从来不是不同的类别。相反，如果说一方应有某种美德，而另一方则不应具有，这个答案同样显得怪异。因为如果一个人放荡而又懦弱，他当然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显然双方应该都具有美德，只是美德种类不同，正如自然科学各不相同一样。这里，灵魂的组成方式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其中一部分是天然的统治者，而其余的则是服从者，所以我们坚持认为统治者的美德是不同于被统治者的；前者的美德是理性的，而后者的则是非理性部分。显然，该原则还适用于更广的范畴，因此，几乎所有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都是自然决定的。但是，统治的种类各不相同；自由人对奴隶的统治不同于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也不同于成人对儿童的统治；虽然灵魂的成分也存在于这些人身上，但存在程度各不相同。奴隶完全不具备决断能力；妇女只有微弱的决断力；儿童则决断力则是不健全的。所以，在道德品质方面也必然是这样；即所有人都应该拥有道德品质，只是方式和程度不同，各自拥有道德品质的方式和程度是完成各自的职责所必需的。因此，统治者必须拥有完美的道德品质，因为他的职责，完整地看，要求有大师的技艺，而理性原则就是这样一个大师；另一方面，被统治者则只需要部分道德，符合他们的身份即可。显而易见，所有人都拥有道德品质；但是男人和女人

的节制力不同，他们的勇敢，正义感等也都不一样，尽管苏格拉底并不这样认为。男人的勇敢在于发号施令，女人的则在于服从。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美德，如果我们对它们进行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有些人认为：美德存在于善于思考，做正确的事，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情，他们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比这样的定义好得多的是他们说话的方式，比如高尔吉亚，就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品德。所有的阶级都必须拥有与其身份匹配的美德，比如索福克勒斯所说的妇女的品德："沉默就是妇女的光荣。"这种品德自然不适合男人了。由于儿童还没有发育完全，他的品德当然不能只跟他自己有关，而应该跟他品德完全的父亲和导师有关，同样，一名奴隶的品德应该与他的主人有关。我们已经确定的一点是奴隶的用途在于帮我们获得生活所需，所以，很明显，他只需要足够美德能让他不因不自律或懦弱而忽视自己的职责就行。有人可能会问：工匠们经常因为缺乏自律而工作失败，那我们说"工匠不需要美德"是否正确呢？但工匠与奴隶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奴隶与你的联系是终身的，而工匠与你的关系远没有那么漫长；参照工匠与你的关系跟奴隶与你的关系的接近程度，他所应具有的奴隶的美德也就那么多而已，这样看一名普通工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名奴隶。但是，这两种情况难道不是存在巨大差异吗？奴隶分享了主人的生活；而工匠则跟主人的关系没那么密切，而只是在成为奴隶时获得了一种特长而已。更卑微的工匠有一种特殊的独立的奴隶制；虽然奴隶是天选的，但是鞋匠或其他的工匠则并非如此。显然，主人应该成为奴隶学习美德的源泉；而不是作一个教授去教会他一门具体的技艺。因此，那些禁止人们同奴隶讲话，认为我们对奴隶只能使用命令的想法是错误的，奴隶比儿童更加需要指导。

So much for this subject; the relations of husband and wife, parent and child, their several virtues, what in their intercourse with one another is good, and what is evil, and how we may pursue the good and good and escape the evil, will have to be discussed when we speak of the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For, inasmuch as every family is a part of a state, and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the

parts of a family, and the virtue of the part must have regard to the virtue of the whole, women and children must be trained by education with an eye to the constitution, if the virtues of either of them are supposed to make any difference in the virtues of the state. And they must make a difference: for the children grow up to be citizens, and half the free persons in a state are women.

这就是我们对这一主题的最终结论；至于丈夫与妻子、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他们的美德，他们之间什么样的交往是好的，什么又是邪恶的，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趋利避害，我们在讨论不同的政体类型时，会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既然每个家庭都是城邦的一份子，而这些关系又是家庭的组成部分，那么各个部分所具有的美德应该参照整体的美德，因此有必要让妻子和孩子接受符合该城邦属性的教育，这样才能让他们的美德对城邦的集体美德具有意义。而且，他们必须有意义：因为妻子们占全体公民的一半，而儿童则是未来的公民。

Of these matters, enough has been said; of what remains, let us speak at another time. Regarding, then, our present inquiry as complete, we will make a new beginning. And, first, let us examine the various theories of a perfect state.

关于这些问题，就说这么多；其中仍有遗留问题就留在下文继续讨论。暂且认为当前的讨论完整结束，我们将开启崭新的主题。首先，让我们查看一下关于完美城邦的各种理论。

Book Two

第二卷

Part 1

第一章

Our purpose is to consider what form of political community is best of all for those who are most able to realize their ideal of life. We must therefore examine not only this but other constitutions, both such as actually exist in well-governed states, and any theoretical forms which are held in esteem; that what is good and useful may be brought to light. And let no one suppose that in seeking for something beyond them we are anxious to make a sophistical display at any cost; we only undertake this inquiry because all the constitutions with which we are acquainted are faulty.

我们的目的是讨论对于那些最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的人来说，什么形式的政治团体才是最适合他们的。因此，我们不但要考察这一种政体，还要考察其他的政体，既要考察现存于治理良好的城邦中的政体，又要考察那些只存在于理论上的受人推崇的政体形式；从而揭示出这些政体当中的合理的、有用的成分。如果有人看到我们在寻找比这些更好的政体形式，请不要认为我们在迫不及待地且不惜任何代价地炫耀我们的智慧；我们进行这种研究，惟一的原因就是所有现存的为人们所熟知的政体当中都有缺陷。

We will begin with the natural beginning of the subject. Three

alternatives are conceivable: The members of a state must either have (1) all things or (2) nothing in common, or (3) some things in common and some not. That they should have nothing in common is clearly impossible, for the constitution is a community, and must at any rate have a common place—one city will be in one place, and the citizens are those who share in that one city. But should a well ordered state have all things, as far as may be, in common, or some only and not others? For the citizens might conceivably have wives and children and property in common, as Socrates proposes in the *Republic* of Plato. Which is better, our present condition, or the proposed new order of society.

我们顺理成章地开始讨论这个主题吧。政治体制不外乎以下三种形式：（1）城邦成员的一切事物都公有；（2）城邦成员任何事物不归公有；（3）有些事物公有，有些不公有。作为一种公共团体，其成员不共有任何事物显然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会共有的一个场所——一个城市也就是一个场所，而公民们则共享这个城市。但是一个秩序良好的城邦，是否最好应该尽可能对所有的东西实行公有制呢，还是只对某些物品公有，而其他则私有呢？可以想象，有些公民可能会对孩子、妻子和财产实行公有制，就如同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描述过的图景。然而，哪一种制度更好呢？现行的制度，还是《理想国》中所建议的新社会秩序呢？

Part 2

第二章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community of women. And the principle on which Socrates rests the necessity of such an institution evidently is not established by his arguments. Further, as

a means to the end which he ascribes to the state, the scheme, taken literally is impracticable, and how we are to interpret it is nowhere precisely stated. I am speaking of the premise from which the argument of Socrates proceeds, “that the greater the unity of the state the better.” Is it not obvious that a state may at length attain such a degree of unity as to be no longer a state? since the nature of a state is to be a plurality, and in tending to greater unity, from being a state, it becomes a family, and from being a family, an individual; for the family may be said to be more than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than the family. So that we ought not to attain this greatest unity even if we could, for it would b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tate. Again, a state is not made up only of so many men, but of different kinds of men; for similars do not constitute a state. It is not like a military alliance The usefulness of the latter depends upon its quantity even wher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quality (for mutual protection is the end aimed at), just as a greater weight of anything is more useful than a less (in like manner, a state differs from a nation, when the nation has not its population organized in villages, but lives an Arcadian sort of life); but the elements out of which a unity is to be formed differ in kind. Wherefore the principle of compensation, as I have already remarked in the Ethics, is the salvation of states. Even among freemen and equals this is a principle which must be maintained, for they cannot an rule together, but must change at the end of a year or some other period of time or in some order of succession. The result is that upon this plan they all govern; just as if shoemakers and carpenters were to exchange their occupations, and the same persons did not always continue shoemakers and carpenters. And since it is better that this should be so in politics as well, it is clear that while there should be continuance of the same persons in power where this is possible, yet where this is not possible by reason of the natural equality of the citizen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just that an should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whether to govern be a good thing or a bad), an approximation to this is that equals should in turn retire from office and should, apart from official position, be treated alike. Thus the one party rule and the others are ruled in turn, as if they were no longer the same persons. In like manner when they hold office there is a variety in the offices held. Hence it is evident that a city is not by nature one in that sense which some persons affirm; and that what is said to be the greatest good of cities is in reality their destruction; but surely the good of things must be that which preserves them. Again, in another point of view, this extreme unification of the state is clearly not good; for a family is more self-sufficing than an individual, and a city than a family, and a city only comes into being when the community is large enough to be self-sufficing. If then self-sufficiency is to be desired, the lesser degree of unity is more desirable than the greater.

实行公妻制的城邦会有很多麻烦。苏格拉底提议建立这种社会，但他在论述当中并没有把他所依据的原理表述清楚。而且，他认为这种方法将帮助他实现他所描绘的最终目标，但是从字面上看，这种计划根本无法实现，最后，他并没有准确地阐述我们应如何解读他的这一计划。我指的是苏格拉底的观点的一个前提条件："一个城邦的同一性越高就越好"。一个城邦如果同一性太高，可能就不再是一个城邦了，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因为城邦的本质必然是多元性，而在令其趋于更一致的过程中，一个多元的城邦就会变成一个家庭，进而从一个家庭变成一个人；因为一个家庭比一个城邦更一致，而一个人则比一个家庭更一致。所以，即使能够实现这种最大程度的团结，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它将摧毁城邦。而且，城邦不仅仅包含许多人；他们还分别属于不同的种类；因为一群相似的人不能组成一个城邦。城邦不同于军事联盟：后者是靠数量取胜的，虽然它的成员在品质上没有差别（因为相互防卫是最终目标），正如任何事物重量大比重量小要更有用一样（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来区分城邦和民族，如

果这个民族的人不是散居在各个村落而是像阿卡迪亚人那样结成联盟）；但是，一个团结的城邦其成员应该是属于不同的类型。因此，通工等偿原则，正如我在《伦理学》中提出的，是城邦稳固之所系。这种制度在自由人和平等的公民之间也是必须要坚持的，因为所有人不可能同时统治，而只能每年或按其他时长轮换一次，或以某种顺序轮换。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执政；好比鞋匠和木匠应该交换工作，而不是一直从事同一工种。虽然这种安排也应该适用于政治学领域，但是显然，如果可能，最好由同一个人持续掌握政权；但如果没有这种可能，原因是公民之间天然的平等性，而且，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执政同时也是正义的做法（无论统治他人是好事还是坏事），那么最好要制定轮转制，让那些地位相等的人按顺序退职，并且在他们离开公职后，应该对他们平等对待。这样，一派统治，而另一派按顺序被统治，就好像他们先后不属于同一类别。同样地，他们执政时，在所担任的职责方面也会各不相同。由此可见，某些人（苏格拉底）坚持的城邦的同一性，并不是城邦的本质；而且他们所谓的城邦能实现的最高目标实际上将导致城邦的灭亡；但是，毫无疑问，对事物有利的做法应该能使其得以维持。从另一方面看，城邦的过度同一显然对其不利；家庭比个人可以达到更高程度的自给自足，城邦的自给自足程度又高于家庭，而且，城邦的形成前提就是一个团体足够大到了能自给自足的程度。而如果这种自给自足的状态有望实现，那么城邦的同一性则越低越好。

Part 3

第三章

But, even supposing that it were best for the community to have the greatest degree of unity, this unity is by no means proved to follow from the fact “of all men saying 'mine' and 'not mine' at the same instant of time,” which, according to Socrates, is the sign of perfect unity in a state. For the word “all” is ambiguous. If the

meaning be that every individual says “mine” and “not mine” at the same time, then perhaps the result at which Socrates aims may be in some degree accomplished; each man will call the same person his own son and the same person his wife, and so of his property and of all that falls to his lot. This, however, is not the way in which people would speak who had their had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in common; they would say “all” but not “each.” In like manner their property would be described as belonging to them, not severally but collectively. There is an obvious fallacy in the term “all”: like some other words, “both,” “odd,” “even,” it is ambiguous, and even in abstract argument becomes a source of logical puzzles. That all persons call the same thing mine in the sense in which each does so may be a fine thing, but it is impracticable; or if the words are taken in the other sense, such a unity in no way conduces to harmony. And there is another objection to the proposal. For that which is common to the greatest number has the least care bestowed upon it. Every one thinks chiefly of his own, hardly at all of the common interest; and only when he is himself concerned as an individual. For besides other considerations, everybody is more inclined to neglect the duty which he expects another to fulfill; as in families many attendants are often less useful than a few. Each citizen will have a thousand sons who will not be his sons individually but anybody will be equally the son of anybody, and will therefore be neglected by all alike. Further, upon this principle, every one will use the word “mine” of one who is prospering or the reverse, however small a fraction he may himself be of the whole number; the same boy will be “so and so's son,” the son of each of the thousand, or whatever be the number of the citizens; and even about this he will not be positive; for it is impossible to know who chanced to have a child, or whether, if one came into existence, it has survived. But which is better—for each to say “mine” in this way, making a man the same

relation to two thousand or ten thousand citizens, or to use the word “mine” in the ordinary and more restricted sense? For usually the same person is called by one man his own son whom another calls his own brother or cousin or kinsman—blood relation or connection by marriage either of himself or of some relation of his, and yet another his clansman or tribesman; and how much better is it to be the real cousin of somebody than to be a son after Plato's fashion!

即使我们承认对于城邦最有利的做法是让它尽可能的趋于同一性，但“同一性”决不意味着这里的全体成员会同时说，“这是我的”或“这不是我的”，尽管苏格拉底认为这是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全体一致的标志。因为“全体”这个词的意思有点含糊。如果它指的是每一个成员，那么苏格拉底的提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说，这是他自己的儿子，或那是他自己的妻子，他自己的财产，或对任何其他可能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说“这是我的”。对妻子和孩子实行公有制的人却不会这样说，他们会说“全都”却不会说“每一个”。同样，他们的财产也会被描述为属于“他们”，不是“各自的”而是“共同的”。“全体”这种字眼是明显的谬误：就像一些其他的字如“都”、“单”、“偶”那样，它的语义含糊不清，甚至在一些抽象的论述中会成为逻辑混乱的源头。因此，如果“全体”指的是每个个体，那么全体的人们对同一事物说“这是我的”，这当然是好事，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如果“全体”是指整体，那这种同一性绝对无益于整个城邦的和谐。此外，这种提议还会导致一种不妥之处。被很多人所公有的东西往往最不受爱护。人都会更加关心自己独享的事物，而很少关心公共利益，除非这样做关系到他的个人利益。除非有其他的考虑，否则每个人都更倾向于忽视一种和其他人共同承担的职责；比如在一个家庭中如果有很多人服侍，那么服务质量往往不如只有几个人服侍的情况。如果让城邦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千个孩子，但是没有一个是只属于某个人的，而是让孩子们为这些父亲所公有，那么这些孩子将被所有的父亲忽视。此外，基于这一原则，每个人都可能对一个成长良

好的或恰恰相反的孩子说，“这是我的”，即使他只占了整个人口的极小一部分；同一个孩子会是“他和她的儿子”，是一千个人当中每一个人的儿子，或者无论整个城邦有多少人，他都是他们所有人的儿子；甚至，关于这一点他都不敢肯定；因为他无法知道城邦里的人谁碰巧生过孩子，或者，如果那个人生过孩子，这孩子是否还活着。但是，哪种制度更好呢？是让每个人都说，“这是我的”，并且让他和全城两千个人，或一万个人有相同的关系，还是采用“我的”这个词通常的、更严格的意思呢？当一个人叫另一个人“儿子”时，别人就不能再叫他“儿子”，而是叫他兄弟，侄子，或其他的血亲或姻亲，另外的人则称他为同族或同宗；毫无疑问，做一个人的真正的表亲比做柏拉图式的所有人的儿子要幸福多了。

Nor is there any way of preventing brothers and children and fathers and mothers from sometimes recognizing one another; for children are born like their parents, and they will necessarily be finding indications of their relationship to one another. Geographers declare such to be the fact; they say that in part of Upper Libya, where the women are common, nevertheless the children who are born are assigned to their respective fathers on the ground of their likeness. And some women, like the females of other animals—for example, mares and cows—have a strong tendency to produce offspring resembling their parents, as was the case with the Pharsalian mare called Honest.

而且，也不存在一种方法能阻止亲兄弟之间，孩子和血缘父母之间有时候会认出彼此；因为孩子天生就像他们的父母，他们必然会发现一些证明彼此的关系特征。我们从那些记录世界各地风物的人那里得知，上述情况确实发生过。在北非就有共有的妻子们将孩子送往各自父亲那里的例子，她们依据的正是父子之间相近的容貌。有些母马和母牛天生就能让她们的后代长的特别像他们的父亲，被称为“诚

实”的法尔萨罗牝马就有这样的能力。

Part 4

第四章

Other evils, against which it is not easy for the authors of such a community to guard, will be assaults and homicides, voluntary as well as involuntary, quarrels and slanders, all which are most unholy acts when committed against fathers and mothers and near relations, but not equally unholy when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Moreover, they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occur if the relationship is unknown, and, when they have occurred, the customary expiations of them cannot be made. Again, how strange it is that Socrates, after having made the children common, should hinder lovers from carnal intercourse only, but should permit love and familiarities between father and son or between brother and broth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more unseemly, since even without them love of this sort is improper. How strange, too, to forbid intercourse for no other reason than the violence of the pleasure, as though the relationship of father and son or of brothers with one another made no difference.

另外，倡导这种社会制度的人很难避免下列邪恶之事：比如攻击和谋杀，包括故意的和非故意的，争吵和诋毁。我们如果对自己的父母或其他近亲做出上述恶行，必然会被看作是邪恶之人；当然，如果是针对与我们没有任何亲密关系的人，其邪恶程度就会减轻一些。而且，如果人们不知道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这些恶行就会发生的更加频繁。当这些恶行发生后，人们也无法从道德风俗方面对其进行谴责。奇怪的是苏格拉底把孩子们变成了城邦公有人，可他禁止男女之

间的肉欲行为的同时，却又允许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相互爱慕和亲密，没有比这些行为更加不合礼法的了，原因是即使不是父子、兄弟，这种爱情都是很不恰当的了。同样荒谬的是他禁止肉欲关系的理由居然是这种愉悦带来的暴力行为，就好像他认为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发生这种关系根本无伤大雅一样。

This community of wives and children seems better suited to the husbandmen than to the guardians, for if they have wives and children in common, they will be bound to one another by weaker ties, as a subject class should be, and they will remain obedient and not rebel. In a word, the result of such a law would be just the opposite of which good laws ought to have, and the intention of Socrates in making these regulations about women and children would defeat itself. For friendship we believe to be the greatest good of states and the preservative of them against revolutions; neither is there anything which Socrates so greatly lauds as the unity of the state which he and all the world declare to be created by friendship. But the unity which he commends would be like that of the lovers in the Symposium, who, as Aristophanes says, desire to grow together in the excess of their affection, and from being two to become one, in which case one or both would certainly perish. Whereas in a state having women and children common, love will be watery; and the father will certainly not say “my son”, or the son “my father.” As a little sweet wine mingled with a great deal of water is imperceptible in the mixture, so, in this sort of community, the idea of relationship which is based upon these names will be lost;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 so-called father should care about the son, or the son about the father, or brothers about one another. Of the two qualities which chiefly inspire regard and affection—that a thing is your own and that it is your only one-neither can exist in such a state as this.

实行妻子和孩子的公有制似乎更适合农民阶级而不是卫戍部队，因为如果农民们对妻子和孩子实行公有制，那么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会淡漠很多，而服从者本来就该如此，这样，他们就会保持遵纪守法，而不是图谋变革了。总而言之，这样一种法律产生的效果一定与好律法应该产生的效果相反，而且苏格拉底这些有关妇女和儿童的律法所包含的意图也会不攻自破。那是因为我们相信，友谊是一个城邦能够产生的最美好的事物，是保护城邦不发生叛乱的保护伞；而且受到苏格拉底最高褒奖的——城邦之同一性，似乎（他确实这样说过）也是友谊的产物；苏格拉底提倡的同一性，类似于阿里斯托芬的《情爱》中恋人们的理念，就像阿里斯托芬所说的，他们渴望在泛滥的爱慕中一起成长，从两个人变成为一个人；由此得出，恋爱的双方或其中一方必须被摧毁。但是如果一个城邦接受这种妻儿公有制，那么爱情就会变得平淡无味；这里没有一个父亲会说“这是我的儿子”，也没有一个儿子会说“这是我的父亲”。好比微量甜酒放在一大杯水中，混合后就很难再感觉到酒的存在，所以，在这种制度下，这些称呼所代表的关系，都将失去其本来的意义；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要求所谓的父亲去关心儿子，或者所谓的儿子去关心父亲，或者兄弟之间相互关爱。能够引起人类关心和爱护的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知道这是自己的物品，二是知道自己只有一件这样的物品，而这两个条件在这种城邦中均不存在。

Again, the transfer of children as soon as they are born from the rank of husbandmen or of artisans to that of guardians, and from the rank of guardians into a lower rank,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arrange; the givers or transferrers cannot but know whom they are giving and transferring, and to whom. And the previously mentioned evils, such as assaults, unlawful loves, homicides, will happen more often amongst those who are transferred to the lower classes, or who have a place assigned to them among the guardians; for they will no longer call the members of the class they have left

brothers, and children, and fathers, and mothers, and will not, therefore, be afraid of committing any crimes by reason of consanguinity. Touching the community of wives and children, let this be our conclusion.

至于让孩子在农民和工匠与卫国公民等阶层之间转移的做法，其具体安排将是一个难题；因为经手人知道他们送出的孩子来自于哪一家，以及要去向哪一家。而且，前面提到过的如攻击，乱伦，谋杀等邪恶行径，在这些被交换走的孩子当中将会更频繁地发生；因为他们不会再称呼自己本来阶级的人为兄弟，孩子，父亲，和母亲，同样，也不会因为顾忌亲缘关系而不敢犯罪了。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就不难对实行妇女和儿童公有的社会理想做出最终抉择。

Part 5

第五章

Next let us consider what should be our arrangements about property: should the citizens of the perfect state have their possessions in common or not? This question may be discussed separately from the enactments about women and children. Even supposing that the women and children belong to individuals, according to the custom which is at present universal, may there not be an advantage in having and using possessions in common? Three cases are possible: (1) the soil may be appropriated, but the produce may be thrown for consumption into the common stock; and this is the practice of some nations. Or (2), the soil may be common, and may be cultivated in common, but the produce divided among individuals for their private use; this is a form of common property which is said to exist among certain barbarians.

Or (3), the soil and the produce may be alike common.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讨论应该如何安排我们的财产：在完美的城邦中，公民财产是否应该采取公有制呢？虽然前面对妇女儿童的公有制我们已经有所定论，但财产问题应该另做考虑。即使我们承认妇女和儿童应该属于个人，那么按照现在普遍的做法，对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实行公有制难道没有任何益处吗？可能有三种情况：（1）是否应对土地的所有权实行私有，而把土地上的收成收集起来作为公有财产呢？这正是目前有些民族社会的做法；（2）或者应该对土地实行公有制，由全民共同耕种，而将其收成分配给个人进行分别使用呢？据说有些野蛮人就是这样做的；（3）或者把土地和收成全部实行公有制。

When the husbandmen are not the owners, the case will be different and easier to deal with; but when they till the ground for themselves the question of ownership will give a world of trouble. If they do not share equally enjoyments and toils, those who labor much and get little will necessarily complain of those who labor little and receive or consume much. But indeed there is always a difficulty in men living together and having all human relations in common, but especially in their having common property. The partnerships of fellow-travelers are an example to the point; for they generally fall out over everyday matters and quarrel about any trifle which turns up. So with servants: we are most able to take offense at those with whom we most we most frequently come into contact in daily life.

如果农民不是土地的主人，那么情况就会不一样，而且更容易解决；但是，如果农民为了自己而耕种，那么成堆的问题就会出现。如

果付出的劳动和获得的收成不平等，那些多劳少得的人当然会对那些少劳多得的人产生怨懑。实际上，所有人一起生活，共同拥有全部人际关系总是很困难的，尤其是涉及到财产公有制的问题。结伴旅行者的这种伙伴关系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们经常在途中为一些日常琐事而争执，时常因为一些突发小事而发生吵闹。仆人们也是这样：我们最有可能跟与我们平常接触最多的人发火。

These are only some of the disadvantages which attend the community of property; the present arrangement, if improved as it might be by good customs and laws, would be far better, and would have the advantages of both systems. Property should be in a certain sense common, but, as a general rule, private; for, when everyone has a distinct interest, men will not complain of one another, and they will make more progress, because every one will be attending to his own business. And yet by reason of goodness, and in respect of use, “Friends”, as the proverb says, “will have all things common.” Even now there are traces of such a principle, showing that it is not impracticable, but, in well-ordered states, exists already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may be carried further. For, although every man has his own property, some things he will place at the disposal of his friends, while of others he shares the use with them. The Lacedaemonians, for example, use one another's slaves, and horses, and dogs, as if they were their own; and when they lack provisions on a journey, they appropriate what they find in the field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t is clearly better that property should be private, but the use of it common; and the special business of the legislator is to create in men this benevolent disposition. Again, how immeasurably greater is the pleasure, when a man feels a thing to be his own; for surely the love of self is a feeling implanted by nature and not given in vain, although selfishness is rightly censured; this, however, is not the mere love of

self, but the love of self in excess, like the miser's love of money; for all, or almost all, men love money and other such objects in a measure. And further, there is the greatest pleasure in doing a kindness or service to friends or guests or companions, which can only be rendered when a man has private property. These advantages are lost by excessive unification of the state. The exhibition of two virtues, besides, is visibly annihilated in such a state: first, temperance towards women (for it is an honorable action to abstain from another's wife for temperance' sake); secondly, liberality in the matter of property. No one, when men have all things in common, will any longer set an example of liberality or do any liberal action; for liberality consists in the use which is made of property.

上述还只是财产公有制的一小部分缺点而已；而当前实行的制度，若能在一些更具体的方面加以完善，如建立良好的风俗和律法，便能远超上述的公有制，而且会兼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二者的优点。财产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实行公有制，但是作为普遍原则，还是应该私有；因为让每个人都有确切的利益所在，可以避免他们相互之间的不满情绪，而且会让他们取得更大的进展，原因是每个人都会用心经营自己的事业。然而，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出于实用的考虑，“朋友”，就像那句谚语所说，“应该分享一切”。即使在当下，也可以发现这种制度的痕迹，所以说它并非不可实现的，而且在那些秩序良好的城邦，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在这里，虽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会用其中的一部分帮助他的朋友，而其余的部分他也和朋友们分享其用途；比如在斯巴达，人们可以像对待自己的奴隶一样使唤彼此的奴隶，包括彼此的马匹和狗，甚至他们在一场旅行中可能需要的任何物资，都可以在整个地区随意征用。很显然，更好的做法是允许财产私有，而让其使用权成为公有；但是如何让公民们养成这种慷慨的性情就是立法者的责任了。而且，让一个人感受到一件物品属于自己，那是多么巨大无比的快乐呀！原

因是一个人对自身的喜爱是与生俱来的且绝不是毫无意义的，尽管自私自利是应该受到谴责的；然而，这里的自私自利，指的是爱自己的程度超出正常水平，我们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谴责贪财者，但其实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贪财，并贪恋其他的一些东西。而且，能带给我们最大快乐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朋友、伙伴和宾客们，而没有了财产私有制，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而这些优点在过度追求一致性的城邦里则不可能存在。此外，显然，这种城邦还禁止了人们展示两种美德；第一种，对妇女的谦卑（不对他人的女伴产生欲望是一种可敬的行为）；第二，对财产的慷慨。当一切物品实行公有制时，任何人都无法做到慷慨大方，因为慷慨就是将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赠与他人。

Such legislation may have a specious appearance of benevolence; men readily listen to it, and are easily induced to believe that in some wonderful manner everybody will become everybody's friend, especially when some one is heard denouncing the evils now existing in states, suits about contracts, convictions for perjury, flatteries of rich men and the like, which are said to arise out of the possession of private property. These evils, however, are due to a very different cause—the wickedness of human nature. Indeed, we see that there is much more quarrelling among those who have all things in common, though there are not many of them when compared with the vast numbers who have private property.

这种政体有一种似是而非的伪善面貌；人们很容易被这一点迷惑，并相信以某种神奇的方式每个人都会成为彼此的朋友，尤其是当一个人在对当今城邦中一些恶行进行批判时，如违约官司；作伪证，对富人的谄媚等等行为，而它们都被认为是私有制的产物。但是，这些邪恶的行为其实另有出处——人类的本性之恶。确实，我们在共同拥有所有财产的人们当中，会发现很多争吵，但是相比于私有制社会中的争吵数量，公有制社会中的人所产生的争吵就少多了。

Again, we ought to reckon, not only the evils from which the citizens will be saved, but also the advantages which they will lose. The life which they are to lead appears to be quite impracticable. The error of Socrates must be attributed to the false notion of unity from which he starts. Unity there should be, both of the family and of the state, but in some respects only. For there is a point at which a state may attain such a degree of unity as to be no longer a state, or at which, without actually ceasing to exist, it will become an inferior state, like harmony passing into unison, or rhythm which has been reduced to a single foot. The state, as I was saying, is a plurality which should be united and made into a community by education; and it is strange that the author of a system of education which he thinks will make the state virtuous, should expect to improve his citizens by regulations of this sort, and not by philosophy or by customs and laws, like those which prevail at Sparta and Crete respecting common meals, whereby the legislator has made property common. Let us remember that we should not disregard the experience of ages; in the multitude of years these things, if they were good, would certainly not have been unknown; for almost everything has been found out, although sometimes they are not put together; in other cases men do not use the knowledge which they have. Great light would be thrown on this subject if we could see such a form of government in the actual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for the legislator could not form a state at all without distributing and dividing its constituents into associations for common meals, and into phratries and tribes. But all this legislation ends only in forbidding agriculture to the guardians, a prohibition which the Lacedaemonians try to enforce already.

另外，我们不仅应该计算公民们可以避免多少邪恶行为，还要计

算他们会损失多少优势。他们要过的生活似乎相当的不实际。苏格拉底的错误必然源自于“同一性”这一观点，这也是他的理想社会的出发点。我们承认一个家庭和一个城邦都应该在某些局部的方面趋于同一，但这种同一性绝不是整体的。一个城邦的同一性应该存在一个界限，如果超出这个界限，那么城邦将不复存在，或者，即使城邦还存在，它也变成了更差一等的城邦，就如同和声变成了齐唱，或是一首诗的节奏被减弱到只剩单拍子。一个城邦，如我所言，应该是多元性的存在通过教育联合起来，并组成一个政治团体；而且，很奇怪的是，一个人创建了教育制度，并认为该制度能够让他城邦里的人拥有美德，可他居然希望通过这样的规则来改良他的公民，而不是学习斯巴达和克里特有关公餐制的做法，通过哲学，风俗和法律来实现这一目的，而这两个地方的立法者都对财产实行了公有制。让我们牢记这一点，即不能忽视前人的经验；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经验，如果是好的，必然不会默默无闻；这些经验几乎包含所有的知识，只不过有一些没被汇总在一起；还有一些虽为世人所知却还没有实践过。但是如果我们能看到这种统治模式的实施过程，那对我们理解这一主题将有极大的启发；立法者要建立一个城邦都离不开将其划分不同的职能部门，例如公共餐桌，防卫，和部族关系等。但是这种立法止步于禁止卫国公民参与农业劳动，这一禁令正是斯巴达人已经在努力实行的。

But, indeed, Socrates has not said, nor is it easy to decide, what in such a community will be the general form of the state. The citizens who are not guardians are the majority, and about them nothing has been determined: are the husbandmen, too, to have their property in common? Or is each individual to have his own? And are the wives and children to be individual or common. If, like the guardians, they are to have all things in common, what do they differ from them, or what will they gain by submitting to their government? Or, upon what principle would they submit, unless indeed the governing class adopt the ingenious policy of the

Cretans, who give their slaves the same institutions as their own, but forbid them gymnastic exercises and the possession of arms.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ferior classes are to be like other cities in respect of marriage and property, what will be the form of the community? Must it not contain two states in one, each hostile to the other He makes the guardians into a mere occupying garrison, while the husbandmen and artisans and the rest are the real citizens. But if so the suits and quarrels, and all the evils which Socrates affirms to exist in other states, will exist equally among them. He says indeed that, having so good an education, the citizens will not need many laws, for example laws about the city or about the markets; but then he confines his education to the guardians. Again, he makes the husbandmen owners of the property upon condition of their paying a tribute. But in that case they are likely to be much more unmanageable and conceited than the Helots, or Penestae, or slaves in general. And whether community of wives and property be necessary for the lower equally with the higher class or not, and the questions akin to this, what will be the education, form of government, laws of the lower class, Socrates has nowhere determined: neither is it easy to discover this, nor is their character of small importance if the common life of the guardians is to be maintained.

但是，苏格拉底并未提及一点，这一点的确不容易说清楚，即在公有制的城邦中一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体形式。对于卫国公民以外的大多数公民，他并没有任何明确指示；农民的财产应该实行公有制吗？他们每个人是否应有一份私产呢？另外，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是否应实行公有制呢？如果所有的一切都要实行无差别的公有制，那么农民和卫国公民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他们服从于卫国公民的统治有什么回报呢？他们又依据什么原则而屈服呢？统治阶级能否采用克里特人那种聪明的做法呢？克里特人允许他们的奴隶做任何事，只是禁止

奴隶们使用武器和锻炼身体。如果不采取克里特人的做法，而是对低等公民的婚姻和财产采用其他城邦现行的制度，那么他们的组织形式是什么？一个城邦绝不能拥有两种彼此对立的政体。他让卫国公民成为城邦的常驻军，而农民，工匠，和其他的从业者共同构成真正的公民。但是，如果这样安排，那么争吵、指责，以及其他类似的恶行，这些被苏格拉底坚称为只属于其他城邦的灾祸，实际上将在他自己的城邦同样存在。他确实说过，在他的城邦里，人们受过的良好教育使他们不需要太多法律，比如关于街道的、市场的法律；可他所说的教育却仅限于卫国公民。另外，他规定，农民只要支付一定的赋税就能拥有自己的私产。但这样做有可能让他们变得更骄傲和难于管理，其程度甚至超过赫卢太人、卑奈斯太人或所有的奴隶。他也没能回答，对低等公民实行的财产和妻子公有制，是否也应在高等公民中实行，以及另一个与此关系密切的问题，即低等公民应受的教育，管理形式，和针对他们的法律是什么？事实上，这些问题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也不容易回答，因为它们关乎到如何确保卫国公民的生活。

Again, if Socrates makes the women common, and retains private property, the men will see to the fields, but who will see to the house? And who will do so if the agricultural class have both their property and their wives in common? Once more: it is absurd to argue, from the analogy of the animals, that men and women should follow the same pursuits, for animals have not to manage a household. The government, too, as constituted by Socrates, contains elements of danger; for he makes the same persons always rule. And if this is often a cause of disturbance among the meaner sort, how much more among high-spirited warriors? But that the persons whom he makes rulers must be the same is evident; for the gold which the God mingles in the souls of men is not at one time given to one, at another time to another, but always to the same: as he says, “God mingles gold in some, and silver in others, from their very birth; but brass and iron in those who are meant to be artisans

and husbandmen." Again, he deprives the guardians even of happiness, and says that the legislator ought to make the whole state happy. But the whole cannot be happy unless most, or all, or some of its parts enjoy happiness. In this respect happiness is not like the even principle in numbers, which may exist only in the whole, but in neither of the parts; not so happiness. And if the guardians are not happy, who are? Surely not the artisans, or the common people. The Republic of which Socrates discourses has all these difficulties, and others quite as great.

而且，如果让农民的妻子归公，而他们的财产保持私有，那么男人照料田地，谁来操持家务呢？如果财产和妻子都归公了，谁来照顾他们的家庭呢？而把人和动物进行类比，主张男人和女人应该像动物一样管理他们之间关系，更是荒谬，因为动物世界里根本没有做家务的概念。苏格拉底确定执政官人选的方式也有风险；因为他会让同一阶级永远掌权。这种做法在低等阶级中都经常成为不稳定的因素，可想而知在好战的勇士们当中会引起多大的反对。虽然如此，他也只能用相同阶级的人来做统治者；因为神在为人类铸造灵魂时所渗入的真金不会一时给这些人，一时又给那些人，而是只在同一类人身上延续；他说过："从降生那一刻起，天神就给有些人的灵魂渗入了真金，有些人则被渗入了白银；而日后做农民和匠人的人们则被掺入了铜和铁"。此外，他甚至剥夺了卫国公民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力，主张立法者应该以整个城邦的幸福为己任。但是，如果不能让城邦的一部分人，大多数人或全体公民幸福，那整个城邦又怎么能幸福呢？幸福不同于做算术等式，只要特定的数字相加就能得到，虽然每个数字本身不并等于答案；幸福必须单独存在于每个个体中。如果卫国公民不幸福，谁又能幸福呢？肯定不会是匠人们或普通公民。这些就是有关苏格拉底所提倡的"理想国"的一些主要弊端，其他的问题未必都可忽视，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Part 6

第六章

The same, or nearly the same, objections apply to Plato's later work, the *Laws* , and therefore we had better examine briefly the constitution which is therein described. In the *Republic* , Socrates has definitely settled in all a few questions only; such as the community of women and children, the community of property,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The popula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one of husbandmen, and the other of warriors; from this latter is taken a third class of counselors and rulers of the state. But Socrates has not determined whether the husbandmen and artisans are to have a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and whether they, too, are to carry arms and share in military service, or not. He certainly thinks that the women ought to share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guardians, and to fight by their side. The remainder of the work is filled up with digressions foreign to the main subject, and with discussions about the education of the guardians. In the *Laws* there is hardly anything but laws; not much is said about the constitution. This, which he had intended to make more of the ordinary type, he gradually brings round to the other or ideal form. For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women and property, he supposes everything to be the same in both states; there is to be the same education; the citizens of both are to live free from servile occupations, and there are to be common meals in both.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in the *Laws* , the common meals are extended to women, and the warriors number 5000, but in the *Republic* only 1000.

他后期所写的《法律篇》一文中的观点同样存在很多谬误之处，

因此，这里必须简单地讨论一下其中有关政体的内容。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只是对相关内容的很小一部分有明确的阐述；比如，妻子和孩子实行公有制，财产公有制，政体的组织等等。他把全部人口分成两个阶级——农民和勇士；从后者当中，他又选出了第三个阶级，这些人将作为议员和执政官管理城邦。但是他没有说明农民和工匠们是否应该参与城邦管理，以及他们能否拥有武器，是否需要跟其他人一起参与战争。他主张让妇女参与战争，并让她们接受与卫国公民相同的教育。文章的剩余部分则充满了与主题无关的内容，以及对卫国公民的教育。至于《法律篇》则以法律为主要内容，关于政体说得并不多。而在这部分当中，他本想更多地谈论一种普通的政体类型，但是渐渐地又回到了其他的形式或理想的形式上。因为在他看来，除了妻子与财产的公有制以外，前后两种政体完全一样；两种政体中公民都不需要参加卑贱的体力劳动，都有公餐制。惟一不同的是在《法律篇》描述的新政体中，妇女也要参加公餐，而且勇士的数量从《理想国》中的一千人扩充为五千人。

The discourses of Socrates are never commonplace; they always exhibit grace and originality and thought; but perfection in everything can hardly be expected. We must not overlook the fact that the number of 5000 citizens, just now mentioned, will require a territory as large as Babylon, or some other huge site, if so many persons are to be supported in idleness, together with their women and attendants, who will be a multitude many times as great. In framing an ideal we may assume what we wish, but should avoid impossibilities.

苏格拉底的对话从来都是不平庸的；而是一直都充满着优雅的气质，创新性和思想；然而，想面面俱到也是不大可能的。关于上文提到这个数字，不得不说，他需要一个像巴比伦那样的国家，或者与之类似的面积广大的国家，才能供养这样一支庞大的卫队，支撑这五千

个闲人，还要加上多出他们好几倍的女人和侍从。在构想一种理想的城邦时，我们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假设一些东西，但是，要避免假设一些根本不可能的事。

It is said that the legislator ought to have his eye directed to two points—the people and the country. But neighboring countries also must not be forgotten by him, firstly because the state for which he legislates is to have a political and not an isolated life. For a state must have such a military force as will be serviceable against her neighbors, and not merely useful at home. Even if the life of action is not admitted to be the best, either for individuals or states, still a city should be formidable to enemies, whether invading or retreating.

众所周知，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应该考虑两个因素，国土和人民。但是他同样不能忽视邻邦的存在，首先，他为之而立法的城邦将拥有一种政治生活，而不是与世隔绝的生活。一个城邦必须要有一支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抵御邻国的威胁，而不仅仅用于本土。尽管战争不被认为是最好的生活，但一个城邦应该能让敌人感到畏惧，无论他们是入侵者还是败退者。

There is another point: Should not the amount of property be defined in some way which differs from this by being clearer? For Socrates says that a man should have so much property as will enable him to live temperately, which is only a way of saying “to live well;” this is too general a conception. Further, a man may live temperately and yet miserably. A better definition would be that a man must have so much property as will enable him to live not only temperately but liberally; if the two are parted, liberally will

combine with luxury; temperance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toil. For liberality and temperance are the only eligible qualities which have to do with the use of property. A man cannot use property with mildness or courage, but temperately and liberally he may; and therefore the practice of these virtues is inseparable from property. There is an inconsistency, too, in too, in equalizing the property and not regulating the number of the citizens; the population is to remain unlimited, and he thinks that it will be sufficiently equalized by a certain number of marriages being unfruitful, however many are born to others, because he finds this to be the case in existing states. But greater care will be required than now; for among ourselves, whatever may be the number of citizens, the property is always distributed among them, and therefore no one is in want; but, if the property were incapable of division as in the *Laws* , the supernumeraries, whether few or many, would get nothing. One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it was even more necessary to limit population than property; and that the limit should be fixed by calculating the chances of mortality in the children, and of sterility in married persons. The neglect of this subject, which in existing states is so common, is a never-failing cause of poverty among the citizens; and poverty is the parent of revolution and crime. Pheidon the Corinthian, who was one of the most ardent legislators, thought that the families and the number of citizens ought to remain the same, although originally all the lots may have been of different sizes: but in the Laws the opposite principle is maintained. What in our opinion is the right arrangement will have to be explained hereafter.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否应该对财产数额用一种不同于苏格拉底的方法进行重新界定，从而让这个数额更加清楚呢？苏格拉底说，每个人的财产数量应以“足够维持其简朴的生活”为度，这不过是“生活的

好”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这个概念太空洞了。而且，一种“简朴的生活”也可能是“悲惨的生活”。更好的定义应该是“足够维持其简朴而宽裕的生活”，如果分开使用，那么宽裕有可能变成奢侈，而简朴又可能流于寒酸。简朴而宽裕是惟一和使用财富有关的两种品质。一个人自然不能温柔地或勇敢地使用他的财产，但是可以说他生活的既简朴又宽裕；因此，这类美德的实践与财产是密不可分的。他的另一点自相矛盾之处就是仅仅对财产进行平均分配，但并没有限制公民数量的增加；对公民数量不加限制，而且他认为会有相当数量的家庭没有孩子，而其他的家庭则会生很多孩子，这两者就此平衡；因为他发现现有的城邦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但现在我们应该更加小心下面这种问题：在现实的城邦中，无论有多少公民，财产是在整个城邦范围内平均分配的，所以没人会食物不够；但是，如果按《法律篇》中所说，财产不能分割，那么新增长的人口，无论多少，将什么都得不到。有人可能会觉得，限制人口的问题比财产问题更重要；而且在确定这一限额时，应该考虑婴儿的死亡率和已婚不育妇女的数量。如果忽视这一点，这种忽视普遍存在于现实城邦中，就会使城邦陷入贫穷，而贫穷则是叛乱和犯罪的源泉。作为最古老的立法者之一，科林斯人斐登认为，家庭和公民的总数应该保持恒定，至于最初的各份产业大小则有可能并不相同；柏拉图的《法律篇》则坚持相反原则。至于我们所认为的最佳安排，将在下文继续解释。

There is another omission in the *Laws* : Socrates does not tell us how the rulers differ from their subjects; he only says that they should be related as the warp and the woof, which are made out of different wools. He allows that a man's whole property may be increased fivefold, but why should not his land also increase to a certain extent? Again, will the good management of a household be promoted by his arrangement of homesteads? For he assigns to each individual two homesteads in separate place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live in two houses.

《法律篇》还有一处疏忽：苏格拉底没能告诉我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有什么区别；他只说了两者间的关系应该像经线和纬线，这两种线各自用不同的羊毛制成。他允许一个人的财物可以增加到原来的五倍，但他没说明为什么土地不能同样幅度地增加；另外，他对住宅的分配能否提高家务管理的效率呢？他规定每个公民应该享有两幢分离的房屋，可这样安排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The whole system of government tends to be neither democracy nor oligarchy, but something in a mean between them, which is usually called a polity, and is composed of the heavy-armed soldiers. Now, if he intended to frame a constitution which would suit the greatest number of states, he was very likely right, but not if he meant to say that this constitutional form came nearest to his first or ideal state; for many would prefer the Lacedaemonian, or, possibly, some other more aristocratic government. Some, indeed, say that the best constitution is a combination of all existing forms, and they praise the Lacedaemonian because it is made up of oligarchy, monarchy, and democracy, the king forming the monarchy, and the council of elders the oligarchy while the democratic element is represented by the Ephors; for the Ephors are selected from the people. Others, however, declare the Ephoralty to be a tyranny, and find the element of democracy in the common meals and in the habits of daily life. In the Laws it is maintained that the best constitution is made up of democracy and tyranny, which are either not constitutions at all, or are the worst of all. But they are nearer the truth who combine many forms; for the constitution is better which is made up of more numerous elements. The constitution proposed in the Laws has no element of monarchy at all; it is nothing but oligarchy and democracy, leaning rather to oligarchy. This is seen in the mode of appointing magistrates; for although the appointment of them by lot from among those who

have been already selected combines both elements, the way in which the rich are compelled by law to attend the assembly and vote for magistrates or discharge other political duties, while the rest may do as they like, and the endeavor to have the greater number of the magistrates appointed out of the richer classes and the highest officers selected from those who have the greatest incomes, both these are oligarchical features. The oligarchical principle prevails also in the choice of the council, for all are compelled to choose, but the compulsion extends only to the choice out of the first class, and of an equal number out of the second class and out of the third class, but not in this latter case to all the voters but to those of the first three classes; and the selection of candidates out of the fourth class is only compulsory on the first and second. Then, from the persons so chosen, he says that there ought to be an equal number of each class selected. Thus a preponderance will be given to the better sort of people, who have the larger incomes, because many of the lower classes, not being compelled will not vote. These considerations, and others which will be adduced when the time comes for examining similar polities, tend to show that states like Plato's should not be composed of democracy and monarchy. There is also a danger in electing the magistrates out of a body who are themselves elected; for, if but a small number choose to combine, the elections will always go as they desire. Such is the constitution which is described in the *Laws* .

他理想的政体既不是平民政体也不是寡头政体，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人们通常称其为“共和政体”，这种政体由手持武器的战士组成。如果他本意是设计一种适合大多数城邦的政体，那么可能他的设计是对的；但如果他本意是设计一种最接近于他的第一种形式的城邦或理想的城邦，那么他的设计就错了；很多人宁愿采取斯巴达人的政体，或者其他更接近于贵族政体的形式。确实有些人认

为，最好的政体应是综合了各种政体特点的一种混合体，而他们推崇斯巴达的制度就是因为这种政体是寡头政治、君主政体、和平民政体三者的混合体，他们的两位国王是君主政体的代表，长老会代表了寡头政体；因为监察使来自于民间，所以监察会代表了平民政体。可是，另一些人则认为监察会实际表现为暴君政体，而真正能代表平民精神的是公餐制和日常生活的习惯。《法律篇》坚持认为最优良的政体是平民政体和暴君政体的混合体，但是这两种制度要么根本不是政治体系，要么就是最糟糕的政治体系。但是其中关于将多种政体混合的建议应该相当正确，因为更完美的政体总是包含很多不同元素。《法律篇》提出的政体实际上没有君主政体的元素，只有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两种元素；并且是偏向于寡头政体一方。这一点非常明显的体现在他提出的执政官遴选方法中。虽然从已经选出来的人当中用抽签的方法任命执政官的做法综合了两种政体特点，但是他的政体中用法律规定富人必需出席公民大会，或者选举执政官，或者履行其他政治义务，对于其他公民则允许其自愿决定，同时，他努力让大多数执政官从富有阶级中任命，而且收入越多者职位越高，这些做法都是寡头政体的特色。长老会选举也带有寡头性质；因为全体公民都必须参加，但是这项强制参与的规定仅限于为前三等公民投票，首先为头等公民投票，其次为二等公民投票，然后为三等公投票，可是到为四等公民投票时，则只要求第一、第二等公民必须参加，第三、第四等公民可以自愿参加。在通过这种手段选出来的人当中，他认为每一等公民的议员应该数量相同。而实际上这样选出的人当中，收入更高的上等公民数量明显占优，而很多下等公民，因为不被要求必须出席，是不会去投票的。上述安排，以及我们在后面讨论其他政体时要引出的更多例子，都表明柏拉图的政体并不包含平民政体和君主政体元素。在事先选出的人当中去任命执政官的做法也存在风险；如果他们当中一些人联合起来，即使数量不多，也可能操纵选举得到他们自己想要的结果。以上就是我们对柏拉图《法律篇》有关政体内容的讨论。

Part 7

第七章

Other constitu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some by private persons, others by philosophers and statesmen, which all come nearer to established or existing ones than either of Plato's. No one else has introduced such novelties as the community of women and children, or public tables for women: other legislators begin with what is necessary. In the opinion of some, the regulation of property is the chief point of all, that being the question upon which all revolutions turn. This danger was recognized by Phaleas of Chalcedon, who was the first to affirm that the citizens of a state ought to have equal possessions. He thought that in a new colony the equalization might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difficulty, not so easily when a state was already established; and that then the shortest way of compassing the desired end would be for the rich to give and not to receive marriage portions, and for the poor not to give but to receive them.

还有一些其他的政体形式，有一般民众提出的，有哲学家提出的，也有政治家提出的，这些都远比柏拉图提出的两种政体更接近那些曾经出现过的，或仍然存在的政体。再没有别人提出过将妻子和孩子实行公有制这种新奇的想法，也再没有人提出让妇女参加公餐，其他立法家的主张都是从实际需要出发。有些人认为，一个政体的首要目的是财产的管制，而且，这也是所有革命产生的根源。查尔西顿人法勒亚也认识到了这一危险，他率先主张应该对公民的财产实行平均制。他认为平均财产在新建城邦中不难做到，而在那些存在了多年的社会中要难于实现的多；在这样的社会，他认为实现财产平均的捷径就是让富人出彩礼，但是不收彩礼，穷人则只收不送。

Plato in the *Laws* was of opinion that, to a certain extent,

accumulation should be allowed, forbidding, as I have already observed, any citizen to possess more than five times the minimum qualification But those who make such laws should remember what they are apt to forget—that the legislator who fixes the amount of property should also fix the number of children; for, if the children are too many for the property, the law must be broken. And, besides the violation of the law, it is a bad thing that many from being rich should become poor; for men of ruined fortunes are sure to stir up revolutions. That the equalization of property exercises an influence on political society was clearly understood even by some of the old legislators. Laws were made by Solon and others prohibiting an individual from possessing as much land as he pleased; and there are other laws in states which forbid the sale of property: among the Locrians, for example, there is a law that a man is not to sell his property unless he can prove unmistakably that some misfortune has befallen him. Again, there have been laws which enjoi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original lots. Such a law existed in the island of Leucas, and the abrogation of it made the constitution too democratic, for the rulers no longer had the prescribed qualification. Again, where there is equality of property, the amount may be either too large or too small, and the possessor may be living either in luxury or penury. Clearly, then, the legislator ought not only to aim at the equalization of properties, but at moderation in their amount. Further, if he prescribe this moderate amount equally to all, he will be no nearer the mark; for it is not the possessions but the desires of mankind which require to be equalized, and this is impossible, unless a sufficient education is provided by the laws. But Phaleas will probably reply that this is precisely what he means; and that, in his opinion, there ought to be in states, not only equal property, but equal education. Still he should tell precisely what he means; and that, in his opinion, there ought to be in be in having one and the same for all, if it is of a sort

that predisposes men to avarice, or ambition, or both. Moreover, civil troubles arise, not only out of the inequality of property, but out of the inequality of honor, though in opposite ways. For the common people quarrel about the inequality of property, the higher class about the equality of honor; as the poet says, “The bad and good alike in honor share.”

然而，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提出，财产不均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被允许，但是，如前文所述，要禁止任何一个公民的财产超过最低财产标准的五倍。但是制定这一原则的立法者要牢记：这也是很容易忽视的一点，即当他们限制一个人能够拥有的财产数量时，同样应该限制他能拥有的子女数量；一旦子女数量超过规定数量的财产能够供养的规模，那关于财产定额的法律必须废止。然而，即使废除这一法律，这种现象仍会让很多家庭由富返贫，而家道败落的人必然会引起革命。财产平均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政治社会的安定，这种观点也被一些老牌立法家所熟知。雅典人梭伦曾颁布法令，其他人也做过类似规定，来阻止有些人随心所欲的占有土地；而有些城邦的法律禁止财产的买卖：比如洛克里城就有这样的禁令，它规定本邦人不准出卖自己的家产，除非能明确无误地证明他遭遇了某种厄运。还有一些法律的目的是要维持原始份额。琉卡岛就有过这样的法律，该法律废除后，那里的政体过于平民化，从而使得拥有一定数额的财产不再是成为执政官的必要条件。但是，在实施财产平均制的地方，每户财产可能过多或过少，所以人们或生活奢侈，或生活贫困。显然，立法者的职责不仅是实现财产平均，还要对每个人能拥有的财产限定一个恰当的标准。另外，如果只是把适当的财产平均分配给所有人，他还是没有接近理想的目标；因为平均人们的欲望比平均财产更重要，但是，这一点永远不可能实现，除非制定相应的法律使公民都能接受正确的教育。针对这个问题，法勒亚或许会说，这正是他所主张的；他主张不但应该在城邦中平均财产，还应该平均教育。但是他说得仍然不够精确；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应该只有一种教育，而这种教育针对所有公民；这种教育是否会让公民变得过分贪婪，去过度地追名逐利呢？

事实上，内乱会因财产不均而产生，也会因荣誉不均而产生，但是它们引起内乱的方式刚好相反。普通人会因为财产不均而争吵，而上等阶层的人则因为荣誉平均而纷争，这种情况在下列诗句中表现的恰到好处："当优秀者与平庸者平分荣誉时"。

There are crimes of which the motive is want; and for these Phaleas expects to find a cure in the equalization of property, which will take away from a man the temptation to be a highwayman, because he is hungry or cold. But want is not the sole incentive to crime; men also wish to enjoy themselves and not to be in a state of desire—they wish to cure some desire, going beyond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which preys upon them; nay, this is not the only reason—they may desire superfluities in order to enjoy pleasures unaccompanied with pain, and therefore they commit crimes.

有些人犯罪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法勒亚希望财产平均制能解决这类问题，这种做法能解除做强盗对一个人的诱惑，因为他不会饥饿和寒冷了。但是，生存的需要不是人们犯罪的惟一动机；他们也想快乐的生活，不想受欲望的煎熬——他们希望治愈某种欲望，这种欲望超出了生存必需的范围，吞噬着他们的理智；不，这还不是惟一的理由——他们渴望富裕，那样他们就可以享受没有痛苦陪伴的快乐了，因此，他们会犯罪。

Now what is the cure of these three disorders? Of the first, moderate possessions and occupation; of the second, habits of temperance; as to the third, if any desire pleasures which depend on themselves, they will fi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ir desires nowhere but in philosophy; for all other pleasures we are dependent on others. The fact is that the greatest crimes are caused by excess and

not by necessity. Men do not become tyrants in order that they may not suffer cold; and hence great is the honor bestowed, not on him who kills a thief, but on him who kills a tyrant. Thus we see that the institutions of Phaleas avail only against petty crimes.

那么，如何治愈这三种症状呢？对于第一种，适当的财产和工作就够了；第二种，教他们习于克制；至于第三种，如果有人渴望依靠自身就能获得足够的快乐，那就只有求助于哲学了；因为所有其他的快乐都要靠其他人才能满足。事实上，人类最大的罪恶不是起源于生存，而是起源于野心，例如，没有人会为了温饱而立志成为一名暴君，同理，伟大的荣誉应该给那个能杀死暴君而非杀死小偷的人；由此可知，法勒亚创立的政体只能够防止小的恶行。

There is another objection to them. They are chiefly designed to promote the internal welfare of the state. But the legislator should consider also its relation to neighboring nations, and to all who are outside of it. The government must be organized with a view to military strength; and of this he has said not a word. And so with respect to property: there should not only be enough to supply the internal wants of the state, but also to meet dangers coming from without. The property of the state should not be so large that more powerful neighbors may be tempted by it, while the owners are unable to repel the invaders; nor yet so small that the state is unable to maintain a war even against states of equal power, and of the same character. Phaleas has not laid down any rule; but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abundance of wealth is an advantage. The best limit will probably be, that a more powerful neighbor must have no inducement to go to war with you by reason of the excess of your wealth, but only such as he would have had if you had possessed less. There is a story that Eubulus, when Autophradates

was going to besiege Atarneus, told him to consider how long the operation would take, and then reckon up the cost which would be incurred in the time. “For,” said he, “I am willing for a smaller sum than that to leave Atarneus at once.” These words of Eubulus made an impression on Autophradates, and he desisted from the siege.

他的政体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它们的主要意图是提高城邦内部福利。但是，立法者还应该考虑与邻邦和外族的关系。对军事力量的考虑应该在每个政体职责之内；而关于这一点他只字未提。关于财产也是一样，财产数量不仅应该满足邦内急需，还应该能应对外敌入侵的危险境况。一个城邦的财产不应过多，这样就不至于让邻邦有觊觎之心；同时，它的财产也不应该太少，以至于跟同等力量和特点的城邦开战的能力都没有。关于这些内容，法勒亚也没能制定下任何规则；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对一个城邦而言，富有比贫穷更有利。最佳的标准或许是：你的财富数额不会让一个强大的城邦因为你的过度富裕而攻击你，可是如果你的财产低于这一数额他会攻击你。当波斯人奥托夫拉达底建议围攻亚泰尔奈城的时候，欧昆卢请他计算攻陷亚泰尔奈城所需的时间，以及这段时间内会产生的费用。这番话让奥托夫拉达底思考了一番之后放弃了围城。因为欧昆卢说：“我希望这笔费用比放弃这座城的花费更少。”

The equalization of property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end to prevent the citizens from quarrelling. Not that the gain in this direction is very great. For the nobles will be dissatisfied because they think themselves worthy of more than an equal share of honors; and this is often found to be a cause of sedition and revolution. And the avarice of mankind is insatiable; at one time two obols was pay enough; but now, when this sum has become customary, men always want more and more without end; for it is of the nature of desire not to be satisfied, and most men live only

for the gratification of it.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is not so much to equalize property as to train the nobler sort of natures not to desire more, and to prevent the lower from getting more; that is to say, they must be kept down, but not ill-treated. Besides, the equalization proposed by Phaleas is imperfect; for he only equalizes land, whereas a man may be rich also in slaves, and cattle, and money, and in the abundance of what are called his movables. Now either all these things must be equalized, or some limit must be imposed on them, or they must an be let alone. It would appear that Phaleas is legislating for a small city only, if, as he supposes, all the artisans are to be public slaves and not to form a supplementary part of the body of citizens. But if there is a law that artisans are to be public slaves, it should only apply to those engaged on public works, as at Epidamnus, or at Athens on the plan which Diophantus once introduced.

财产平均是防止公民之间争吵的举措之一。但是，其效果并不大。原因是贵族们会觉得自己应该获得更大份额的荣誉；这通常成为叛乱和革命的原因。人性的贪婪是无法满足的；刚开始，两个奥布尔的报酬就够了，可习惯了这种报酬之后，他们又会要求更多，如此下去，永无止境；欲望的本质就是无法满足，而许多人终生追求的就是填满欲望的沟壑。所以改革最初的目的并不是建立财产平均制，而是让品行端正者知足常乐，让品行恶劣者不生非分之想；而要想阻止他们的非分之想，也就是说，只能给这些人以低等的职位，但是要给予公正的待遇。而且，法勒亚提出的财产平均制并不完善，因为他只平均了田地，但是一个人的财产构成不仅有田地，还可能有奴隶，牛羊，金钱，及其他大量“可动产”。现在看来，这些财物或者必须全部平均分配，或者对它们设置一定的限额，或者全部不予理会。目前看来，法勒亚的法律意图是建立一个小城邦，在他的城邦里，工匠都属于公共奴隶，而不构成公民团体的补充成分。但是如果法律将所有工匠列为公共奴隶，那该法律将只适用于受雇于公共工程的工匠，如同

爱庇丹诺实行过的那种法令。在雅典，狄奥芳托也曾制定过类似措施。

From these observations any one may judge how far Phaleas was wrong or right in his ideas.

从这些具体的方面着手，法勒亚的城邦制度的优缺点也就一目了然了。

Part 8

第八章

Hippodamus, the son of Euryphon, a native of Miletus, the same who invented the art of planning cities, and who also laid out the Piraeus—a strange man, whose fondness for distinction led him into a general eccentricity of life, which made some think him affected (for he would wear flowing hair and expensive ornaments; but these were worn on a cheap but warm garment both in winter and summer); he, besides aspiring to be an adept in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was the first person not a statesman who made inquiries about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利都人欧吕丰的儿子，希朴达摩，开创了城市规划学说，并建设完成了拜里厄斯港的道路网络。而在其他方面，他因为喜欢引人注目，所以生活方式怪异，这让很多人认为他矫揉造作（他经常留一头飘逸的长发，满身珠光宝气，而且无论寒暑，总是穿着一件厚实的粗布马甲）；除了渴望成为一名自然科学的大师之外，他还是第一位没

有任何管理公共事务经验，却潜心研究最佳政体形式的人。

The city of Hippodamus was composed of 10,000 citizen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one of artisans, one of husbandmen, and a third of armed defenders of the state. He also divided the land into three parts, one sacred, one public, the third private: the first was set apart to maintain the customary worship of the Gods, the second was to support the warriors, the third was the property of the husbandmen. He also divided laws into three classes, and no more, for he maintained that there are three subjects of lawsuits—insult, injury, and homicide. He likewise instituted a single final court of appeal, to which all causes seeming to have been improperly decided might be referred; this court he formed of elders chosen for the purpose. He was further of opinion that the decisions of the courts ought not to be given by the use of a voting pebble, but that every one should have a tablet on which he might not only write a simple condemnation, or leave the tablet blank for a simple acquittal; but, if he partly acquitted and partly condemned, he was to distinguish accordingly. To the existing law he objected that it obliged the judges to be guilty of perjury, whichever way they voted. He also enacted that those who discovered anything for the good of the state should be honored; and he provided that the children of citizens who died in battle should be maintained at the public expense, as if such an enactment had never been heard of before, yet it actually exists at Athens and in other places. As to the magistrates, he would have them all elected by the people, that is, by the three classes already mentioned, and those who were elected were to watch over the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of strangers, and of orphans. These are the most striking point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Hippodamus. There is not much else.

他设计的一种城邦，由十万公民组成，共分三种人，工匠、农民和城邦卫戍；他将城邦的全部土地也划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用于神圣事务，一部分用于公共事务，一部分用于个人。其中第一部分土地用于为现行的众神祭祀仪式提供所需物资；第二部分土地用于供养军队；第三部分用作农民的财产。他把所有法律也分成三种，因为他坚持认为只有三种类型的案件——侮辱、伤害和杀人。他还设立了惟一的一个最高申诉法庭，所有看似受到不公正裁决的案件都可以提交该法庭；组成该法庭的人员是一些特别选出的长老们。他还认为，法庭的宣判不应该通过投票石决定，而应由每位法官带一块牌子，如果觉得被告有罪，就在牌子上写上有罪，如果认为无罪就给出空白的牌子；但是如果只赦免了其中一项罪名，而没有赦免其他，那么应该在牌子上解释清楚。对于为何反对现行的制度，他的解释是现行制度下法官只能选择完全有罪或是完全无罪，而无论哪种决定都有作伪证的嫌疑。他还制定了一条法令，规定对做出有利于城邦的发现的人进行奖赏；而且规定为城邦捐躯者的子女抚养费用应由公款支付，虽然这项法令以前从没有被任何一位立法者提起过，但是现在雅典和很多其他的城邦都已经在使用它。他认为执政官应该从全体公民中选出，即他前面提到的三种人，而且这样选举产生的执政官应该成为公民、外来者和孤儿的权益的守护者。上述内容是希朴达摩的政体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其他的内容则意义不大了。

The first of these proposals to which objection may be taken is the threefold division of the citizens. The artisans, and the husbandmen, and the warriors, all have a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But the husbandmen have no arms, and the artisans neither arms nor land, and therefore they become all but slaves of the warrior class. That they should share in all the offices is an impossibility; for generals and guardians of the citizens, and nearly all the principal magistrates, must be taken from the class of those who carry arms. Yet, if the two other classes have no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how can they be loyal citizens? It may be said that those who have arms

must necessarily be masters of both the other classes, but this is not so easily accomplished unless they are numerous; and if they are, why should the other classes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at all, or have power to appoint magistrates? Further, what use are farmers to the city? Artisans there must be, for these are wanted in every city, and they can live by their craft, as elsewhere; and the husbandmen too, if they really provided the warriors with food, might fairly have a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But in the republic of Hippodamus they are supposed to have land of their own, which they cultivate for their private benefit. Again, as to this common land out of which the soldiers are maintained, if they are themselves to be the cultivators of it, the warrior class will be identical with the husbandmen, although the legislator intended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If, again, there are to be other cultivators distinct both from the husbandmen, who have land of their own, and from the warriors, they will make a fourth class, which has no place in the state and no share in anything. Or, if the same persons are to cultivate their own lands, and those of the public as well, they will have difficulty in supplying the quantity of produce which will maintain two households: and why, in this case, should there be any division, for they might find food themselves and give to the warriors from the same land and the same lots? There is surely a great confusion in all this.

首先，有人可能会对他把公民分成三个部分的做法提出质疑。虽然工匠、农民和勇士都参与管理。但是农民没有武器，工匠则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土地，因此他们都只能成为勇士阶级的奴隶。所以让所有人都参与到公职中来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将军和护国者，以及几乎所有的执政官员都必须从拥有武器的人当中产生。既然其他两个部分的人都不能参与到城邦管理中来，他们又怎么会忠于自己的城邦呢？此外，有人可能会说，拥有武器的人理应成为另外两个阶级的主人，但

这一点不容易实现，除非他们的数量很多；而如果他们数量很多，那为什么还要允许另外两个阶级参政，为什么他们有权选举执政官？另外，农民对城邦的作用是什么？众所周知，工匠的存在是很必要的，每个城邦都需要他们，他们靠手艺谋生；这一点跟其他城邦相同；如果农民为勇士们提供食物，那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就是很正当的。但是在希朴达摩的政体中，农民是有私有土地的，并且要耕种这部分土地供养自身。此外，关于为军队提供给养的公有土地，如果战士们要亲自耕种军队的公有土地，那他们跟农民之间将没有任何差别，而立法者的意图是要把这两者区分开。如果有其他的种植者，既不同于农民，原因是农民有自己的土地，又不同于勇士，那么这个体制中将出现第四种人，他们不能参与城邦管理，也不能分享其他的任何东西。而如果这种人既要耕种自己的土地，又要耕种公有的土地，他们将很难提供足以供养两个家庭的产品；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把土地分开呢？因为他们有可能从自身的私田上就得到足够的收获，既能供养自己，也能供养勇士们。这显然是上述政体的一个令人困惑之处。

Neither is the law to commended which says that the judges, when a simple issue is laid before them, should distinguish in their judgement; for the judge is thus converted into an arbitrator. Now, in an arbitration, although the arbitrators are many, they confer with one another about the decision, and therefore they can distinguish; but in courts of law this is impossible, and, indeed, most legislators take pains to prevent the judges from holding any communication with one another. Again, will there not be confusion if the judge thinks that damages should be given, but not so much as the suitor demands? He asks, say, for twenty minae, and the judge allows him ten minae (or in general the suitor asks for more and the judge allows less), while another judge allows five, another four minae. In this way they will go on splitting up the damages, and some will grant the whole and others nothing: how is the final reckoning to be taken? Again, no one contends that he

who votes for a simple acquittal or condemnation perjures himself, if the indictment has been laid in an unqualified form; and this is just, for the judge who acquits does not decide that the defendant owes nothing, but that he does not owe the twenty minae. He only is guilty of perjury who thinks that the defendant ought not to pay twenty minae, and yet condemns him.

我也不能赞成他的法庭判决方式；他要求法官对摆在面前的每一个简单案件的审判进行详细区分；这使得法官转变为一个仲裁者。当对一件事情进行仲裁时，虽然有好几位仲裁者，他们可以就最终决定相互探讨，然后再进行区分；但是在司法审判当中，这种商谈根本不可能发生；事实上，很多立法者都特意规定法官在审案时不得相互交流。而且，如果出现了一位法官肯定受害人的损伤，但是，同时认为损伤没有原告索赔的那么多，这难道不会引起困惑吗？假如说原告要求赔偿二十米那，而法官判他获赔十米那（或概括地说，原告要求的多，而法官判罚的少），同时另一个法官判五米那，还有一个判四米那。这样下去，他们对于判罚的具体金额产生更多分歧，有的法官会判定全额赔偿，而有的则判定不需赔偿，如何得出最终决定呢？而且，没有人会认为：法官会为了一个简单的赦免或有罪的投票而去作伪证，即使判决产生的形式不是特别的严谨；而且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原因是即使法官赦免被告，也不是说被告无罪，而是说被告不应该赔偿二十米那那么多。若是法官认为被告没有造成那么大的损害，却仍然判决他赔偿二十米那的罚款，这样他才犯了伪证罪。

To honor those who discover anything which is useful to the state is a proposal which has a specious sound, but cannot safely be enacted by law, for it may encourage informers, and perhaps even lead to political commotions. This question involves another. It has been doubted whether it is or is not expedient to make any changes in the laws of a country, even if another law be better. Now, if an

changes are inexpedient, we can hardly assent to the proposal of Hippodamus; for, under pretense of doing a public service, a man may introduce measures which are really destructive to the laws or to the constitution. But, since we have touched upon this subject, perhaps we had better go a little into detail, for, as I was saying, there is a difference of opinion, and it may sometimes seem desirable to make changes. Such changes in the other arts and sciences have certainly been beneficial; medicine, for example, and gymnastic, and every other art and craft have departed from traditional usage. And, if politics be an art, change must be necessary in this as in any other art. That improvement has occurred i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old customs are exceedingly simple and barbarous. For the ancient Hellenes went about armed and bought their brides of each other. The remains of ancient laws which have come down to us are quite absurd; for example, at Cumae there is a law about murder, to the effect that if the accuser produce a certain number of witnesses from among his own kinsmen, the accused shall be held guilty. Again, men in general desire the good, and not merely what their fathers had. But the primeval inhabitants, whether they were born of the earth or were the survivors of some destruction, may be supposed to have been no better than ordinary or even foolish people among ourselves (such is certainly the tradition concerning the earth-born men); and it would be ridiculous to rest contented with their notions. Even when laws have been written down, they ought not always to remain unaltered. As in other sciences, so in politics, it is impossible that all things should be precisely set down in writing; for enactments must be universal, but actions are concerned with particulars. Hence we infer that sometimes and in certain cases laws may be changed; but when we look at the matter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great caution would seem to be required. For the habit of lightly changing the laws is an evil, and, when the advantage is small,

some errors both of lawgivers and rulers had better be left; the citizen will not gain so much by making the change as he will lose by the habit of disobedience. The analogy of the arts is false; a change in a law is a very different thing from a change in an art. For the law has no power to command obedience except that of habit, which can only be given by time, so that a readiness to change from old to new laws enfeebles the power of the law. Even if we admit that the laws are to be changed, are they all to be changed, and in every state? And are they to be changed by anybody who likes, or only by certain persons? These are very important questions; and therefore we had better reserve the discussion of them to a more suitable occasion.

关于他提议的对做出有利于城邦的发现的人授予荣誉的做法，听起来好像合理，实际上却是立法者应该避免的，因为它有可能鼓励告密者，甚至导致政治骚乱。这个问题还会引起另一种疑问。有些人对改变现行法律的做法是有益还是有害存有疑虑，即使另一种法律可能更出色。而如果所有改动都是无益于城邦的，我们更不能认同希波达摩的提议了；因为有的人可能伪装成为大众服务的模样，而实际上却制定了一些对法律和政体有很大破坏的政策。虽然如此，既然说到了这个主题，或许我们应该谈论一些有关的具体内容，正如我曾说过的，对于是否应该改变现行法律，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而且有时候这种改变看起来还是值得期待的。事实证明，在其他的一些技术和科学领域的改变显然很有益；例如，医学，体育，以及所有其他的技艺和科学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用途。如果政治学也是一种技艺，那么其改变应该和在其他的技艺中一样有必要。事实证明，社会确实发生了进步，例如，古代的法律往往过于简单和野蛮。它们允许古希腊人在城市里佩剑而行，允许人们相互交易妻子。我们已知的残存的古代法律都非常荒谬；例如，在库梅，曾有一条杀人罪的刑法，只要原告能从自己的亲戚中找到足够多的证人，就可以判定被告的罪名成立。而且，人类大都渴望美好的事物，而不是墨守成规。而世上最初的人

类，无论他们是“从大地中降生的”还是“某次灾劫的幸存者”，都应该比当今的普通人或愚蠢的人没有高明多少（这是大地中降生的人的传统）；所以满足于继承他们的观念是非常可笑的做法。即使成文的法律也不应该一直不变。所有学科当中，包括政治，在书面表达中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精确无误写下来；因为法律必须使用概括性的表达，而诉讼案关心的是具体情况。由此可见，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情况下，法律可以被改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修改需要无比谨慎。因为，让人们养成可以轻易废除法律的习惯，其后果是非常恶劣的，因此，如果改动的意义并不重大，最好的做法就是先任凭这几个执政官或立法者所犯下的小失误存在；公民从修改法律中收获的远不如不服从执政官的习惯可能带来的危害要大。在技艺方面的类比是错误的；技艺方面的修改与法律的修改有着巨大的差别。一部法律让人们服从的力量全部来自于习惯，而习惯的形成需要漫长的积累，因此，欢迎废弃旧法并树立新法的态度，只会减弱法律的权威。即使我们承认一部法律应该修改，是否所有的条文都要修改，在每一个城邦都要修改吗？是随便让谁来修改呢，还是只能让特定的人来呢？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把它们留到一个更合适的场合再作讨论。

Part 9

第九章

In the governments of Lacedaemon and Crete, and indeed in all governments, two points have to be considered: first, whether any particular law is good or bad, when compared with the perfect state; secondly, whether it is or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idea and character which the lawgiver has set before his citizens. That in a well-ordered state the citizens should have leisure and not have to provide for their daily wants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but there is a difficulty in seeing how this leisure is to be attained. The

Thessalian Penestae have often risen against their masters, and the Helots in like manner against the Lacedaemonians, for whose misfortunes they are always lying in wait. Nothing, however, of this kind has as yet happened to the Cretans; the reason probably is that the neighboring cities, even when at war with one another, never form an alliance with rebellious serfs, rebellions not being for their interest, since they themselves have a dependent population. Whereas all the neighbors of the Lacedaemonians, whether Argives, Messenians, or Arcadians, were their enemies. In Thessaly, again, the original revolt of the slaves occurred because the Thessalians were still at war with the neighboring Achaeans, Perrhaebians, and Magnesians. Besides, if there were no other difficulty, the treatment or management of slaves is a troublesome affair; for, if not kept in hand, they are insolent, and think that they are as good as their masters, and, if harshly treated, they hate and conspire against them. Now it is clear that when these are the results the citizens of a state have not found out the secret of managing their subject population.

无论是研究曾存在于斯巴达与克里特的政体，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的政体，我们都必须考虑以下两点：一、当与完美政体比较时，某一种具体法律是好还是坏？二、该政体在理念和特性方面是否与当初立法者在公民面前定下来的那些相一致？大多数人现在都认可，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城邦，公民应该有闲暇时光，且无需为日常所需而费心；但是，如何保证公民获得这种闲暇时光是一个难题。比如帖撒利亚的卑奈斯太人就频繁地对他们的主人发动攻击，而赫卢太人也经常反抗斯巴达人，这些人好像随时都在等待厄运降临在对头身上。但在克里特人那里，从来没有这种事发生；究其原因，可能是虽然克里特人经常与邻邦交战，但是这些与克里特为敌的邻邦从没有谁与叛乱的农奴结为联盟，因为这样做有损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依赖农奴的”公民。相反，所有斯巴达的邻邦都是其敌对者，比如

阿尔咯斯人、麦西尼亚人、阿卡地亚人。在帖撒利亚，同样，奴隶们开始叛乱，原因是当时帖撒利亚人正与邻邦之中的阿卡地亚人、贝尔雷比人、马格尼西亚人处于交战状态。而且，即使没有其他的麻烦，对待与管理奴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你稍微放松管束，他们就会变得骄纵无礼，想要跟主人平起平坐；而如果管束的过于严苛，他们就会仇恨你，并一刻不停地阴谋反对你。很显然，出现上述情况都是因为一个城邦的公民还没有找到管理其服从者的秘诀。

Again, the license of the Lacedaemonian women defeats the intention of the Spartan constitution, and is adverse to the happiness of the state. For, a husband and wife being each a part of every family, the state may be considered as about equally divided into men and women; and, therefore, in those states in which the condition of the women is bad, half the city may be regarded as having no laws. And this is what has actually happened at Sparta; the legislator wanted to make the whole state hardy and temperate, and he has carried out his intention in the case of the men, but he has neglected the women, who live in every sort of intemperance and luxury.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in such a state wealth is too highly valued, especially if the citizen fall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ir wives, after the manner of most warlike races, except the Celts and a few others who openly approve of male loves. The old mythologer would seem to have been right in uniting Ares and Aphrodite, for all warlike races are prone to the love either of men or of women. This was exemplified among the Spartans in the days of their greatness; many things were managed by their women. But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whether women rule, or the rulers are ruled by women? The result is the same. Even in regard to courage, which is of no use in daily life, and is needed only in war, the influence of the Lacedaemonian women has been most mischievous. The evil showed itself in the Theban invasion, when, unlike the

women other cities, they were utterly useless and caused more confusion than the enemy. This license of the Lacedaemonian women existed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and was only what might be expected. For, during the wars of the Lacedaemonians, first against the Argives, and afterwards against the Arcadians and Messenians, the men were long away from home, and, on the return of peace, they gave themselves into the legislator's hand, already prepared by the discipline of a soldier's life (in which there are many elements of virtue), to receive his enactments. But, when Lycurgus, as tradition says, wanted to bring the women under his laws, they resisted, and he gave up the attempt. These then are the causes of what then happened, and this defect in the constitution is clearly to be attributed to them. We are not, however, considering what is or is not to be excused, but what is right or wrong, and the disorder of the women, as I have already said, not only gives an air of indecorum to the constitution considered in itself, but tends in a measure to foster avarice.

斯巴达女性的特权使斯巴达政体的意图成为徒劳，她们对一个城邦的幸福完全起反作用。男人和女人各自作为家庭的一部分，一个城邦也可以认为是男人和女人两部分组成；因此，在任何一个城邦，如果对妇女没有良好的管束，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城市有一半的人不受法律约束。这正是斯巴达的真实写照；对于斯巴达的立法者来说，他期望将整个城邦打造的坚强而有节制，在男人方面，他显然已经如愿以偿；但同时，在相当程度上妇女被忽略了，她们生活骄纵奢侈毫无节制。结果就是在这样的城邦中，财富受到过分追捧，如果男人要听命于他们的妻子，这种问题会尤其严重，而且，在很多勇敢好战的民族中情况确实如此，只有凯尔特人和一些公开提倡同性爱情的地方例外。最初的神学家们将战神马尔斯和美神维纳斯当作是情侣的做法似乎没什么不妥；原因是所有好战的民族都好色，或好男色或好女色。斯巴达在鼎盛时期就是很典型的好色社会；很多的事情都是女

人做主。但是，女人直接统治，还是统治者被女人所统治，这两者有什么分别呢？结果必然是一样的。甚至是在勇气方面，斯巴达女人的影响也是有害的，尽管这种美德只在战争中需要而在日常生活中没什么用处。这一点在底比斯人入侵时已经得到了证实，在那场战争中，不像其他城邦的女人，斯巴达的女人们不但毫无作用，反而造成了比外敌入侵更大的干扰。斯巴达女人的特权，城邦创建之初就有端倪，后果也是可以预见的。因为战争期间，斯巴达人先后同阿尔咯斯人、麦西尼亚人、阿卡地亚人交战，男人们长期远离家园，所以和平归来后，他们带着在行伍中养成的优良品德，准备接受立法者的律法统治。但是，有记载显示，当莱喀古士努力想让女人也遵守他的法律时，却遭到她们反对，莱喀古士于是放弃了这个企图。由此可见，正是这些事造成了后来的局面，所以这一政体缺陷当然怪女人们。但现在，我们并不是要追究谁的过错，而是要分清楚什么是对和错；所以，如我所言，对女人的行为不加管束的做法，不但给政体蒙上一层野蛮的色彩，而且会一定程度上助长贪婪的念头。

The mention of avarice naturally suggests a criticism on the inequality of property. While some of the Spartan citizen have quite small properties, others have very large ones; hence the land has passed into the hands of a few. And this is due also to faulty laws; for, although the legislator rightly holds up to shame the sale or purchase of an inheritance, he allows anybody who likes to give or bequeath it. Yet both practices lead to the same result. And nearly two-fifths of the whole country are held by women; this is owing to the number of heiresses and to the large dowries which are customary. It would surely have been better to have given no dowries at all, or, if any, but small or moderate ones. As the law now stands, a man may bestow his heiress on any one whom he pleases, and, if he die intestate, the privilege of giving her away descends to his heir. Hence, although the country is able to maintain 1500 cavalry and 30,000 hoplites, the whole number of

Spartan citizens fell below 1000. The result proves the faulty nature of their laws respecting property; for the city sank under a single defeat; the want of men was their ruin. There is a tradition that, in the days of their ancient kings, they were in the habit of giving the rights of citizenship to strangers, and therefore, in spite of their long wars, no lack of population was experienced by them; indeed, at one time Sparta is said to have numbered not less than 10,000 citizens Whether this statement is true or not, it would certainly have been better to have maintained their numbers by the equalization of property. Again, the law which relates to the procreation of children is adverse to the correction of this inequality. For the legislator, wanting to have as many Spartans as he could, encouraged the citizens to have large families; and there is a law at Sparta that the father of three sons shall be exempt from military service, and he who has four from all the burdens of the state. Yet it is obvious that, if there were many children, the land being distributed as it is, many of them must necessarily fall into poverty.

提到贪婪，自然暗示了一种对财产不平等的批判。有些斯巴达公民过于富有，而其他人则过于贫困；因此，土地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而这种现象也跟其错误的法律难脱干系。立法者禁止任何人购买或出售私产，这一点他做的很对；但是，他允许人们随意将财产赠送或遗留给任何人。实际上这两种做法后果没什么差别。据估计，当时全邦的土地接近五分之二都掌握在女人手里，原因是女性继承人的数量多，还有当时流行奢华的嫁妆；事实上，最好的做法是不给她们嫁妆，或只给少量的或适量的嫁妆。根据斯巴达法律，每个人都有权把他的女继承人送给他中意的任何人；如果他没有留下遗嘱，那么这个权力就转到他的男继承人手中。就这样，全邦的土地本来可以供养一千五百匹马和三万步兵，但是后来斯巴达的公民人数却锐减到了一千以下。由此可见，斯巴达有关财产的法律是相当糟糕的；整个城邦仅

仅一次战败就灭亡了，但是，真正毁灭它的原因是男性公民太少。传说，斯巴达历史上的君主们经常将斯巴达公民资格授予外来人，因此，尽管长期征伐，斯巴达从来就没有缺少过人口；据说这个政策使斯巴达人的数量曾一度达到过一万人。无论这种说法是真是假，通过平均财产来维持人口显然是更好的政策。此外，他所制定的旨在鼓励人口增长的法律，同样也加剧了财产不平均。为了达到尽可能增加斯巴达人口的目的，并鼓励人们多生孩子，他曾规定，凡生有三子的父亲即可免于兵役，若是生有四个孩子，就可完全免除一切赋税。但是，很显然，依据当时的土地分配模式，即使人口增加，他们大部分人同样生活贫困。

The Lacedaemonian constitution is defective in another point; I mean the Ephoralty. This magistracy has authority in the highest matters, but the Ephors are chosen from the whole people, and so the office is apt to fall into the hands of very poor men, who, being badly off, are open to bribes. There have been many examples at Sparta of this evil in former times; and quite recently, in the matter of the Andrians, certain of the Ephors who were bribed did their best to ruin the state. And so great and tyrannical is their power, that even the kings have been compelled to court them, so that, in this way as well together with the royal office, the whole constitution has deteriorated, and from being an aristocracy has turned into a democracy. The Ephoralty certainly does keep the state together; for the people are contented when they have a share in the highest office, and the result, whether due to the legislator or to chance, has been advantageous. For if a constitution is to be permanent, all the parts of the state must wish that it should exist and the same arrangements be maintained. This is the case at Sparta, where the kings desire its permanence because they have due honor in their own persons; the nobles because they are represented in the council of elders (for the office of elder is a

reward of virtue); and the people, because all are eligible to the Ephoralty. The election of Ephors out of the whole people is perfectly right, but ought not to be carried on in the present fashion, which is too childish. Again, they have the decision of great causes, although they are quite ordinary men, and therefore they should not determine them merely on their own judgment, but according to written rules, and to the laws. Their way of life, too, i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constitution—they have a deal too much license; whereas, in the case of the other citizens, the excess of strictness is so intolerable that they run away from the law into the secret indulgence of sensual pleasures.

斯巴达政体中的另一个缺点就是监察会制度。执政官虽然对于城邦重大事务具有最终决定权，但是监察官是从平民中选出的，因此经常有很穷的人当选了这个职位，这种人由于贫穷的境况，特别容易被人收买。这种情形在斯巴达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在近期，也发生过安德罗斯岛事件。这一事件中，有些监察官受人贿赂，竟然不遗余力地灭亡本邦。而且，由于他们权力大，又独断专横，连两王都不得不讨好他们，于是，他们和王室一起，让整个政体都遭到了腐蚀，使斯巴达从贵族政体变成了平民政体。监察会确实有助于城邦团结；平民们很满意自己参与了城邦的最高领导，这种结果，无论是立法者有意为之，还是偶然发生的，对城邦都有巨大助益。因为一个城邦如果想永久的存在，其每个组成部分都必须希望它继续存在，而且希望维持本来的安排。当时的斯巴达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国王们希望它永恒，因为他们在自己阶级当中享有应有的荣誉；贵族们也希望它永恒，因为他们在长老会中也有自己权益的代表（长老的职务是对美德的回报）；还有平民，因为他们人人都有当选为监察官的机会。从全体平民中选举出监察官自然没问题，问题是现在的选举方式很幼稚。监察会对于城邦的重大事件具有决断权，但是他们相当的平庸，所以不应该靠自己的判断去做决定，而应该按法律条文或成文的规章。监察官的生活也不符合斯巴达政体的基本精神，他们有太大的特权；可是，

斯巴达其他人的生活却是非常严苛的，以致许多人违法去偷偷地寻欢作乐。

Again, the council of elders is not free from defects.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elders are good men and well trained in manly virtue; and that, therefore, there is an advantage to the state in having them. But that judges of important causes should hold office for life is a disputable thing, for the mind grows old as well as the body. And when men have been educated in such a manner that even the legislator himself cannot trust them, there is real danger. Many of the elders are well known to have taken bribes and to have been guilty of partiality in public affairs. And therefore they ought not to be irresponsible; yet at Sparta they are so. But (it may be replied), “All magistracies are accountable to the Ephors.” Yes, but this prerogative is too great for them, and we maintain that the control should be exercised in some other manner. Further, the mode in which the Spartans elect their elders is childish; and it is improper that the person to be elected should canvass for the office; the worthiest should be appointed, whether he chooses or not. And here the legislator clearly indicates the same intention which appears in other parts of his constitution; he would have his citizens ambitious, and he has reckoned upon this quality in the election of the elders; for no one would ask to be elected if he were not. Yet ambition and avarice, almost more than any other passions, are the motives of crime.

他们的长老会也有很大的缺陷。有人说老人们都是好人，而且在人类美德方面都相当出众；因此，他们的存在对城邦来说是一个优势。但是重大事件的决策者是否应该终身任职，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原因是思想和身体一样会衰老。而由于他们接受的教育方式比较

特殊，连执政官都无法信任他们，让他们任长老本就存在真实的危险。据了解，很多长老以收受贿赂而著称，他们在公共事务中偏帮偏信的事屡见不鲜。所以，不应该让他们不受任何辖制；然而在斯巴达他们就是这样。但是（有人会回答说），“所有执政官都受监察会的监督。”确实如此，但这种特权对他们来说仍然太大了，而且我们坚持认为监管应该以其他方式进行。同时，他们制定的选举长老的方式也非常幼稚；另外，让一个人为他渴望的职位奔走拉票的做法也有弊端；应该让最能胜任的人当选，无论他内心愿不愿意。显然，立法者在政体的其他部分显露出了同样的意图；就是要鼓励他的公民发挥抱负；他在选择长老时就考虑过这一点；没有这样野心的人也根本不会来竞争这个职位。可同时，野心和贪婪，比其他的激情更能成为罪恶的动机。

Whether kings are or are not an advantage to states, I will consider at another time; they should at any rate be chosen, not as they are now, but with regard to their personal life and conduct. The legislator himself obviously did not suppose that he could make them really good men; at least he shows a great distrust of their virtue. For this reason the Spartans used to join enemies with them in the same embassy, and the quarrels between the kings were held to be conservative of the state.

我们以后再讨论君主的职位是否对城邦有益；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对君主的选择应该考虑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执政能力，而不应该采用斯巴达现行的制度。显然，立法者本人并不期望他的君主们都成为拥有完美品德的人；至少他对这些人的美德表现了不信任。因此，斯巴达人把君主与其政敌安排在同一部门；国王们的争吵被认为是有利于城邦的。

Neither did the first introducer of the common meals, called “phiditia”, regulate them well. The entertainment ought to have been provided at the public cost, as in Crete; but among the Lacedaemonians every one is expected to contribute, and some of them are too poor to afford the expense; thus the intention of the legislator is frustrated. The common meals were meant to be a popular institution, but the existing manner of regulating them is the reverse of popular. For the very poor can scarcely take part in them; and, according to ancient custom, those who cannot contribute are not allowed to retain their rights of citizenship.

他们的公餐制叫做“菲第西娅”，首先倡议这一制度的人也没有把它管理好。这种活动应该像克里特那样由公款支付，而不应该像斯巴达人这样由每个人自己掏钱买自己的那一份，因为有人可能太穷，根本无法支付这笔费用；这样就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了，因为他的本意是把公餐制变成平民集会，结果，现行规定的效果恰恰相反。那些非常穷的人根本无法参加公餐；而且，根据古老的习俗，无力购买自己食物份额的人也不能保留公民资格。

The law about the Spartan admirals has often been censured, and with justice; it is a source of dissension, for the kings are perpetual generals, and this office of admiral is but the setting up of another king.

经常有人对斯巴达的海军将领的相关法律进行指责，这些指责不无道理；因为它经常引发争议，斯巴达的两王是永久的统帅，而海军将领的设立好像在设置另一个国王一样。

The charge which Plato brings, in the Laws, against the intention of the legislator, is likewise justified; the whole constitution has regard to one part of virtue only—the virtue of the soldier, which gives victory in war. So long as they were at war, therefore, their power was preserved, but when they had attained empire they fell for of the arts of peace they knew nothing, and had never engaged in any employment higher than war. There is another error, equally great, into which they have fallen. Although they truly think that the goods for which men contend are to be acquired by virtue rather than by vice, they err in supposing that these goods are to be preferred to the virtue which gains them.

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中，对斯巴达立法者的意图进行了指责，这种指责同样不无道理；整个政体只考虑了一种美德——勇士的美德，它将带来战争的胜利。因此，只要他们还在打仗，他们的力量就能够维持，但是当他们建立了帝国之后，他们爱上了自己一窍不通的和平，而且除了战争以外，他们也没从事过什么营生。他们还犯了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那就是虽然他们也认为作为人类争夺之焦点的那些东西最好靠美德而不是靠恶行来获得，但是相对于美德他们更喜欢这些东西本身。

Once more: the revenues of the state are ill-managed; there is no money in the treasury, although they are obliged to carry on great wars, and they are unwilling to pay taxe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and being in the hands of the Spartans, they do not look closely into one another's contributions. The result which the legislator has produced is the reverse of beneficial; for he has made his city poor, and his citizens greedy.

此外，斯巴达的公共财政收入的管理也很糟糕，国库里没钱，虽然他们被迫继续着伟大的战争，但是人们不愿意纳税。斯巴达人把土地的一大部分掌握在手中，可他们不会仔细察看彼此的社会贡献。立法者制造的结果对城邦有害无益；他让自己的城市变得贫穷，让他的公民则变得贪婪。

Enough respecting the Spartan constitution, of which these are the principal defects.

上述这些就是斯巴达政体的主要弊端。

Part 10

第十章

The Cretan constitution nearly resembles the Spartan, and in some few points is quite as good; but for the most part less perfect in form. The older constitutions are generally less elaborate than the later, and the Lacedaemonian is said to be, and probably is, in a very great measure, a copy of the Cretan. According to tradition, Lycurgus, when he ceased to be the guardian of King Charillus, went abroad and spent most of his time in Crete. For the two countries are nearly connected; the Lyctians are a colony of the Lacedaemonians, and the colonists, when they came to Crete, adopted the constitution which they found existing among the inhabitants. Even to this day the Perioeci, or subject population of Crete, are governed by the original laws which Minos is supposed to have enacted. The island seems to be intended by nature for dominion in Hellas, and to be well situated; it extends right across

the sea, around which nearly all the Hellenes are settled; and while one end is not far from the Peloponnese, the other almost reaches to the region of Asia about Triopium and Rhodes. Hence Minos acquired the empire of the sea, subduing some of the islands and colonizing others; at last he invaded Sicily, where he died near Camicus.

克里特的政体与斯巴达非常相似，在少数的几个细节上同样很出色，但是大部分内容远逊于斯巴达政体。早期的政体往往不如后来的详细，而斯巴达的政体，据说是，也可能是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克里特政体。有记录显示，在辞去嘉里劳王的监护人职位后，莱喀古士就去了海外，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克里特。这两国（克里特与斯巴达）之间的关系本就非常密切；岛上的吕克托人曾是斯巴达的一个属国；那些早期的移民来了之后沿用了当地居民的法律；直到今天，珀里俄基人，或者叫克里特的从属国，仍然沿用着这一套据说最初出自于米诺斯王之手的法律。这个小岛好像大自然特意为希腊打造的领土，位置非常优越；她横跨大海之上，几乎所有的希腊人都围绕在她的身边；她一边靠近伯罗奔尼撒半岛，另一边隔着特里奥滨海岬和罗得岛与亚细亚相望。靠着她出色的地理位置，米诺斯王建立了他的海上王国，其中有些岛屿被他直接征服，另一些被他派人进行殖民统治；最后他在远征西西里岛时，死在西西里的加米可附近。

The Cretan institutions resemble the Lacedaemonian. The Helots are the husbandmen of the one, the Perioeci of the other, and both Cretans and Lacedaemonians have common meals, which were anciently called by the Lacedaemonians not “phiditia” but “andria”; and the Cretans have the same word, the use of which proves that the common meals originally came from Crete. Further, the two constitutions are similar; for the office of the Ephors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Cretan Cosmi, the only difference being that

whereas the Ephors are five, the Cosmi are ten in number. The elders, too, answer to the elders in Crete, who are termed by the Cretans the council. And the kingly office once existed in Crete, but was abolished, and the Cosmi have now the duty of leading them in war. All classes share in the ecclesia, but it can only ratify the decrees of the elders and the Cosmi.

克里特人的社会形态类似于斯巴达人。赫卢太人为他们中的一个耕种土地，珀里俄基人为另一个耕种，两个城邦都有公餐制，斯巴达人最初称公餐为“安得赖亚”，跟克里特人对公餐的称呼相同，后来才改成“菲第希亚”，这也证明了斯巴达人的公餐制起源于克里特。而且，他们的政体构成也有相似点；监察会在两个国家的体制中享有同样的权力，它在克里特的名称是“哥斯谟”，惟一的差别是斯巴达的监察会由五名监察官组成，而哥斯谟则由十人组成。斯巴达的长老会在克里特也有类似的存在，克里特人称其为“议事会”。在克里特也曾经有过君主的职位，但是后来废除了，哥斯谟掌握了率领军队作战的权力。所有阶层的人民都能参与公民大会，但是他们只能赞成长老们和哥斯谟的命令。

The common meals of Crete are certainly better managed than the Lacedaemonian; for in Lacedaemon every one pays so much per head, or, if he fails, the law, as I have already explained, forbids him to exercise the rights of citizenship. But in Crete they are of a more popular character. There, of all the fruits of the earth and cattle raised on the public lands, and of the tribute which is paid by the Perioeci, one portion is assigned to the Gods and to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 and another to the common meals, so that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re all supported out of a common stock. The legislator has many ingenious ways of securing moderation in eating, which he conceives to be a gain; he likewise encourages the

separation of men from women, lest they should have too many children, and the companionship of men with one another—whether this is a good or bad thing I shall have an opportunity of considering at another time. But that the Cretan common meals are better ordered than the Lacedaemonian there can be no doubt.

克里特人的公餐制无疑要优于斯巴达人；在斯巴达，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那份公餐付费；上面已经提到过，如果他做不到这样，按照斯巴达法律他将被取消公民资格。而克里特的公餐更具平民风格。所有田地的收成、公有土地上的牛羊、珀里俄基缴纳的税收，这些物资会被分成几份，分别用于祭神、城邦急需和公餐，所以，这是一次所有男人、女人、孩子都可以享受的公款用餐。立法者想了很多好办法来保证进食的克制，他认为克制也是收获；他同样还鼓励男女分居，以免他们生过多的孩子，为此他鼓励男人之间的恋爱——关于这一点的得失我们以后再讨论。但是很显然，克里特公餐制的组织要比斯巴达的好很多。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smi are even a worse institution than the Ephors, of which they have all the evils without the good. Like the Ephors, they are any chance persons, but in Crete this is not counterbalanced by a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advantage. At Sparta every one is eligible, and the body of the people, having a share in the highest office, want the constitution to be permanent. But in Crete the Cosmi are elected out of certain families, and not out of the whole people, and the elders out of those who have been Cosmi.

另一方面，克里特的哥斯谟在组织上要比斯巴达的监察会更加糟糕，他有着斯巴达监察会的全部弊端，却没有分享其优点。在这两种制度中人选都是随机的，但是斯巴达人的政治优势是克里特人所没有

的。在斯巴达，所有平民都有资格入选监察会，所以整个平民阶层都能享有最高权力，因此所有人都希望城邦能够得以保存。然而在克里特，哥斯谟不是从全体平民中选举出来的，而是从一些特定的家庭中选举产生，然后，再从哥斯谟当中挑选长老。

The same criticism may be made about the Cretan, which has been already made about the Lacedaemonian elders. Their irresponsibility and life tenure is too great a privilege, and their arbitrary power of acting upon their own judgment, and dispensing with written law, is dangerous. It is no proof of the goodness of the institution that the people are not discontented at being excluded from it. For there is no profit to be made out of the office as out of the Ephoralty, since, unlike the Ephors, the Cosmi, being in an island, are removed from temptation.

我们对斯巴达长老会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克里特议事会。他们不受任何辖制而且终身任职，这是一种过于膨胀的特权；他们做决策时不依据法律，而是靠个人专断，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这里的平民对于不能参加监察会并无不满，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这种制度是完善的。与斯巴达的监察官不同，被选入哥斯谟根本无利可图，他们都生活一个岛上，根本就是远离了诱惑。

The remedy by which they correct the evil of this institution is an extraordinary one, suited rather to a close oligarchy than to a constitutional state. For the Cosmi are often expelled by a conspiracy of their own colleagues, or of private individuals; and they are allowed also to resign before their term of office has expired. Surely all matters of this kind are better regulated by law than by the will of man, which is a very unsafe rule. Worst of all is

the suspension of the office of Cosmi, a device to which the nobles often have recourse when they will not submit to justice. This shows that the Cretan government, although possessing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onstitutional state, is really a close oligarchy.

他们用来弥补哥斯谟漏洞的方法很离奇，它更适合于一个极端的寡头城邦而非政治城邦。一名哥斯谟成员经常会被其同事构陷而遭开除，或者被哥斯谟以外的人阴谋弹劾；哥斯谟成员还可以在任期结束之前主动辞去职务。如果辞职是依据法律进行自然好很多，而实际上却是按个人意愿而为，所以这是很不安全的一种规定。最糟糕的，就是终止哥斯谟的职权，这是贵族们不服司法判决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武器。这表明克里特的政体，虽然具有一些政治体制的特点，实际上却是一种极端寡头制。

The nobles have a habit, too, of setting up a chief; they get together a party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ir own friends and then quarrel and fight with one another. What is this but the temporary destruction of the state and dissolution of society? A city is in a dangerous condition when those who are willing are also able to attack her. But, as I have already said, the island of Crete is saved by her situation; distance has the same effect as the Lacedaemonian prohibition of strangers; and the Cretans have no foreign dominions.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Perioeci are contented in Crete, whereas the Helots are perpetually revolting. But when lately foreign invaders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island, the weakness of the Cretan constitution was revealed. Enough of the government of Crete.

贵族们也习于做首领；他们从平民和朋友中召集一个团体，然后

不同团体彼此争吵和打斗。这不就是在一次次地摧毁城邦和瓦解社会吗？一旦遇到有意愿并有能力的邻国入侵，一个城邦就危险了。但是如前文所述，克里特的地理位置保护了它；它与邻邦的距离就如同斯巴达人禁止外邦人入内的政策一样有效；而且克里特没有海外属国。因此，珀里俄基很满意地待在克里特，但是赫卢太人却从未停止过反抗。但是在不久前外国军队终于攻入克里特，他们政体的弱点暴露无遗。以上就是关于克里特政体的全部内容。

Part 11

第十一章

The Carthaginians are also considered to have an excellent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differs from that of any other state in several respects, though it is in some very like the Lacedaemonian. Indeed, all three states—the Lacedaemonian, the Cretan, and the Carthaginian—nearly resemble one another, and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s. Many of the Carthaginian institutions are excellent The superiority of their constitution is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the common people remain loyal to the constitution the Carthaginians have never had any rebellion worth speaking of, and have never been under the rule of a tyrant.

很多人认为迦太基的政体也很优秀，它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其他城邦，只是在某些具体制度上很接近于斯巴达。实际上，这三个城邦，克里特、斯巴达和迦太基彼此很相像，而同其他的城邦却又差别巨大。迦太基的很多制度都非常优秀。下列事实证明了迦太基政体的优越性：这里的公民一直保持对城邦的忠诚，这里没有发生过大的叛乱，而且从来没有产生过暴君。

Among the points in which the Carthaginian constitution resembles the Lacedaemonian are the following: The common tables of the clubs answer to the Spartan phiditia, and their magistracy of the 104 to the Ephors; but, whereas the Ephors are any chance persons, the magistrates of the Carthaginians are elected according to merit—this is an improvement. They have also their kings and their gerusia, or council of elders, who correspond to the kings and elders of Sparta. Their kings, unlike the Spartan, are not always of the same family, nor that an ordinary one, but if there is some distinguished family they are selected out of it and not appointed by senority—this is far better. Such officers have great power, and therefore, if they are persons of little worth, do a great deal of harm, and they have already done harm at Lacedaemon.

迦太基人和斯巴达人的政体有下列共同点：俱乐部的公共餐桌对应斯巴达的“菲迪西雅”，他们用一百零四人组成的执政会类似于斯巴达的监察会；但是，斯巴达人的监察会人选是随机的，迦太基的执政会成员是根据功勋挑选的——这是一个进步。他们也有国王们和长老会，与斯巴达的两王和长老会对应。迦太基的国王们，不同于斯巴达，他们不会总出自于同一家族，当然也不会来自于平民家族，而是来自于一些显贵家族，其选择也不以年长者优先——这比斯巴达的方法好多了。因为这些人权力很大，如果他们没有才德，就会对城邦造成伤害，就像在斯巴达那样。

Most of the defects or deviations from the perfect state, for which the Carthaginian constitution would be censured, apply equally to all the forms of government which we have mentioned. But of the deflections from arist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some incline more to democracy and some to oligarchy. The kings and elders, if unanimous, may determine

whether they will or will not bring a matter before the people, but when they are not unanimous, the people decide on such matters as well. And whatever the kings and elders bring before the people is not only heard but also determined by them, and any one who likes may oppose it; now this is not permitted in Sparta and Crete. That the magistrates of five who have under them many important matters should be co-opted, that they should choose the supreme council of 100, and should hold office longer than other magistrates (for they are virtually rulers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y hold office)—these are oligarchical features; their being without salary and not elected by lot, and any similar points, such as the practice of having all suits tried by the magistrates, and not some by one class of judges or jurors and some by another, as at Lacedaemon, are characteristic of aristocracy. The Carthaginian constitution deviates from aristocracy and inclines to oligarchy, chiefly on a point where popular opinion is on their side. For men in general think that magistrates should be chosen not only for their merit, but for their wealth: a man, they say, who is poor cannot rule well—he has not the leisure. If, then, election of magistrates for their wealth be characteristic of oligarchy, and election for merit of aristocracy, there will be a third form under which the constitution of Carthage is comprehended; for the Carthaginians choose their magistrates, and particularly the highest of them—their kings and generals—with an eye both to merit and to wealth.

下面我们将对迦太基政体中的一些缺点和偏离完美政体的地方进行批评，其中大部分问题在我们论及的其他政体中也都存在。迦太基人的政体包含贵族政体和平民政体两方面的元素，有些制度倾向于平民政体，其他的则倾向于寡头政体。例如，国王和长老会如果意见一致，他们可以决定是否将一个议题提交人民表决，但是如果他们意见不一致，人民同样可以对这类议题进行表决。人民不但要听取他们提

交的任何议题，还要对它们进行最终表决，其中任何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提出反对意见；这在斯巴达和克里特是不允许的。执政五人组，因为要处理很多重要的事务，所以需要增补，他们将选出一百人的最高议事会，而且五人组的任期应该比其他执政官更长，（因为他们在其他执政官开始之前和结束任期之后都在任职），上述这些都是迦太基政体倾向于寡头政体的特点；但是五人组不是抽签产生的，而且不领取报酬，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特点，例如所有的诉讼由执政官审判，而不是像在斯巴达那样，有些案件交给某一类法官或陪审员，而有些交给其他人，这些做法颇有贵族特色。迦太基的政体现在正从贵族政体向寡头政体转变，主要原因是平民的支持。这里的大多数人认为执法官的人选不应只看功勋，还要看财富；他们说，贫穷的人不可能是好的统治者——他没有闲暇时光。如果说选择有钱人做执政官是寡头风格，而选有功勋的人是贵族风格，那么，我们对迦太基政体的认识则是它属于第三种类型；因为迦太基人选择执政官是两种条件一起考虑，尤其是最高级别的官员，如国王们和将军们——既要看功勋也要看财产。

But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in thus deviating from aristocracy, the legislator has committed an error. Nothing is more absolutely necessary than to provide that the highest class, not only when in office, but when out of office, should have leisure and not disgrace themselves in any way; and to this his attention should be first directed. Even if you must have regard to wealth, in order to secure leisure, yet it is surely a bad thing that the greatest offices, such as those of kings and generals, should be bought. The law which allows this abuse makes wealth of more account than virtue, and the whole state becomes avaricious. For, whenever the chiefs of the state deem anything honorable, the other citizens are sure to follow their example; and, where virtue has not the first place, their aristocracy cannot be firmly established. Those who have been at the expense of purchasing their places will be in the habit of

repaying themselves; and it is absurd to suppose that a poor and honest man will be wanting to make gains, and that a lower stamp of man who has incurred a great expense will not. Wherefore they should rule who are able to rule best. And even if the legislator does not care to protect the good from poverty, he should at any rate secure leisure for them when in office.

必须承认，偏离贵族政体是他们的立法者犯的一个错误。要想保证最高等级的公民，无论任职和不任职，都永远不需要做任何配不上自己高贵人格的事，并永远有闲暇时光，对立法者来说没有比这一点更重要的了；而且这是他首先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为了保证闲暇时光，你必须考虑财产问题，但如果你的最高权力机构如国王们和将军们都能被收买，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允许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存在的法律重视财富更甚于美德，从而使整个城邦变得贪婪。原因是如果是城邦首脑认为很光彩的事，广大公民一定会纷纷效仿；如果哪里的最高荣誉不属于美德，那么其贵族政体也不会非常稳固。那些用金钱购得官职的人习于用职权把买官的钱赚回来；明知一个贫穷而诚实的人都会渴望捞一笔，反而认为一个品性低劣但花了大价钱购得官职的人不会努力做同样的事，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诞啊！因此，执政者应由最具才德的人担当。一名立法者即使不想保护好人不受贫穷的困扰，但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他们在职时有充足的闲暇时光。

It would seem also to be a bad principle that the same person should hold many offices, which is a favorite practice among the Carthaginians, for one business is better done by one man. The legislator should see to this and should not appoint the same person to be a flute-player and a shoemaker. Hence, where the state is large, it is more in accordance both with constitutional and with democratic principles that the offices of state should be distributed among many persons. For, as I said, this arrangement is fairer to all,

and any action familiarized by repetition is better and sooner performed. We have a proof in military and naval matters; the duties of command and of obedience in both these services extend to all.

让一个人执掌多个部门似乎也不太恰当，迦太基人却最喜欢这样做，事实上一个人专心做一件事才能做得更好。所以立法者应该注意不要让一个人既做笛子演奏家又做鞋匠。因此，在一个大城邦，既符合政治体制又符合平民原则的做法，就是城邦的各种部门应该分配给很多不同的人去做。正如我刚刚说过的，这种安排对所有人来说更公平，而且因为重复而变得熟悉的事情做起来会又快又好。这一点在陆军和海军事务中得到了验证；在这里，每个人都既有发令者的职责，又有服从者的义务。

The government of the Carthaginians is oligarchical, but they successfully escape the evils of oligarchy by enriching one portion of the people after another by sending them to their colonies. This is their panacea and the means by which they give stability to the state. Accident favors them, but the legislator should be able to provide against revolution without trusting to accidents. As things are, if any misfortune occurred, and the bulk of the subjects revolted, there would be no way of restoring peace by legal methods. Such is the character of the Lacedaemonian, Cretan, and Carthaginian constitutions, which are justly celebrated.

虽然迦太基的政体倾向于寡头政体，但是他们通过经常性的委派一部分平民到下属的一些城邦，让他们有发财的机会，这样的做法也帮他们避免了寡头政体的不良影响。这种方法百试百灵，他们靠它稳定了自己的城邦统治。只能说运气眷顾了迦太基人，但立法者在构建

自己的政体时不应该留下任何叛乱的空间，同时不能太相信运气。现在的迦太基，如果出现任何灾难，同时出现大量属民反叛的话，就不可能用司法手段恢复和平了。上述这些就是斯巴达、克里特和迦太基的政体特征，它们确实有些值得称道的地方。

Part 12

第十二章

Of those who have treated of governments, some have never taken any part at all in public affairs, but have passed their lives in a private station; about most of them, what was worth telling has been already told. Others have been lawgivers, either in their own or in foreign cities, whose affairs they have administered; and of these some have only made laws, others have framed constitutions; for example, Lycurgus and Solon did both. Of the Lacedaemonian constitution I have already spoken. As to Solon, he is thought by some to have been a good legislator, who put an end to the exclusiveness of the oligarchy, emancipated the people, established the ancient Athenian democracy, and harmonized the different elements of the state. According to their view, the council of Areopagus was an oligarchical element, the elected magistracy, aristocratical, and the courts of law, democratical. The truth seems to be that the council and the elected magistracy existed before the time of Solon, and were retained by him, but that he formed the courts of law out of an the citizens, thus creating the democracy, which is the very reason why he is sometimes blamed. For in giving the supreme power to the law courts, which are elected by lot, he is thought to have destroyed the non-democratic element. When the law courts grew powerful, to please the people who were now playing the tyrant the old constitution was changed into the

existing democracy. Ephialtes and Pericles curtailed the power of the Areopagus; Pericles also instituted the payment of the juries, and thus every demagogue in turn increased the power of the democracy until it became what we now see. All this is true; it seems, however, to be the result of circumstances, and not to have been intended by Solon. For the people, having been instrumental in gaining the empire of the sea in the Persian War, began to get a notion of itself, and followed worthless demagogues, whom the better class opposed. Solon, himself, appears to have given the Athenians only that power of electing to offices and calling to account the magistrates which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without it they would have been in a state of slavery and enmity to the government. All the magistrates he appointed from the notables and the men of wealth, that is to say, from the pentacosio-medimni, or from the class called zeugitae, or from a third class of so-called knights or cavalry. The fourth class were laborers who had no share in any magistracy.

就政体问题著书立说的人当中，有些从来没有参与过公共事务，而是一直过着普通平民的生活。他们的作品中值得关注的观点，已经被我们一一讨论过。另外一些人就是立法者，他们有些为自己的城邦效力，有些则受雇为外邦创制立法。他们当中有些人只制定过一套法律；其他人则不但制定过具体的法律，还构建过政体，比如莱喀古士和梭伦。我们已经讨论过斯巴达的政体。有人认为梭伦是一个杰出的立法者，他废除了一个纯粹的寡头制，解放了平民，并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了古希腊的平民政体；调和了政体中不同的元素。在亚留巴古布利的议会中，寡头制被保留了下来；在选举执政官的形式中，则体现了贵族制原则；而他们的司法制度则反映了平民风格。事实上无论是议事会还是投票选出执政官的制度在梭伦之前就已经存在，梭伦把两者都保留了下来；但是他用从全体平民中选出的人组成了平民法庭，并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指责。有人说他把最高权力给平民法庭，并通过

抽签选出法庭成员的做法，破坏了城邦的非平民风格。当平民法庭的权力变大之后，他们成为了像寡头一样的统治者，为了取悦他们，旧的政体就被改变成为了现行的平民政体。厄斐阿尔忒和伯利克里都削减了长老会的权力，后者还建立了给出席的陪审员们发放报酬的制度；从此以后，每一位平民领袖都在持续的提高着平民统治的力量，直到它变成今天的模样。然而，这些变化似乎都是外因所致，并非梭伦的本意。平民在对米底王国的海战胜利中成为了制胜因素，并从中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进而被别有用心的平民领袖利用，尽管他们也遭到了上等公民的抵制，最终还是成功取得了更大的权力。梭伦似乎只给了平民参与执政官选举，以及要求执政官述职这两种绝对必要的权力；原因是他认为没有这两种权力，平民可能受到其他公民的奴役，并对城邦心生敌意。他任命的执政官们都是那些声望卓著，财产殷实之人，即选择范围必须是“五百斛级”也叫“双牛级”，或者是第三级，也称骑士级。至于第四级，则由体力劳动者组成，梭伦规定他们不得担任任何公职。

Mere legislators were Zaleucus, who gave laws to the Epizephyrian Locrians, and Charondas, who legislated for his own city of Catana, and for the other Chalcidian cities in Italy and Sicily. Some people attempt to make out that Onomacritus was the first person who had any special skill in legislation, and that he, although a Locrian by birth, was trained in Crete, where he lived in the exercise of his prophetic art; that Thales was his companion, and that Lycurgus and Zaleucus were disciples of Thales, as Charondas was of Zaleucus. But their account is quite inconsistent with chronology.

只制定了法律，而没有执掌政体的人当中，札琉科斯曾经为西洛克里人制定法律，嘉隆达斯曾经为他的本邦加太那，又曾经为意大利和西西里境内但是附属于卡尔基人的一些城市制定过法律。有些人试

图证明洛克里人奥诺马克里托为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立法者，并在克里特岛上接受了立法方面的教育，在这里他靠预言术为生；这些人还说，泰利斯是他的伴侣；莱喀古士和札琉科斯是泰利斯的学徒，而嘉隆达斯则是札琉科斯的学徒；但是这些人的叙述在时间方面多有不实之处。

There was also Philolaus, the Corinthian, who gave laws to the Thebans. This Philolaus was one of the family of the Bacchiadae, and a lover of Diocles, the Olympic victor, who left Corinth in horror of the incestuous passion which his mother Halcyone had conceived for him, and retired to Thebes, where the two friends together ended their days. The inhabitants still point out their tombs, which are in full view of one another, but one is visible from the Corinthian territory, the other not. Tradition says the two friends arranged them thus, Diocles out of horror at his misfortunes, so that the land of Corinth might not be visible from his tomb; Philolaus that it might.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y settled at Thebes, and so Philolaus legislated for the Thebans, and, besides some other enactments, gave them laws about the procreation of children, which they call the “Laws of Adoption.” These laws were peculiar to him, and were intended to preserve the number of the lots.

出生于科林斯城的菲洛劳斯也曾是底比斯的立法者。菲洛劳斯是巴沽族人，是奥林匹克赛会优胜者狄奥克里的恋人，狄奥克里因为远避母亲哈耳琼妮对自己不伦的情爱而去国离乡，并最终定居在底比斯，菲洛劳斯跟随他到了底比斯，两人都在这里终老。当地人至今还向旅客介绍他俩的坟墓，两人的坟墓虽近在咫尺，但其中一座能看到科林斯，另一座却看不到。当地人的解释是，狄奥克里因为感伤自身的不幸，所以不让自己的坟墓看到科林斯，相反，菲洛劳斯却选择让

自己的坟墓能够看到故乡；这就是他们移居底比斯的经过。菲洛劳斯为底比斯人制定的法律涉及到很多的内容，其中包括收养子嗣的制度，他称之为收养法；他专门制定这样的律法来维持家庭成员的数量。

In the legislation of Charondas there is nothing remarkable, except the suits against false witnesses. He is the first who instituted denunciation for perjury. His laws are more exact and more precisely expressed than even those of our modern legislators.

除了有关作伪证的内容，加隆达斯的法律平平无奇。但是，他是第一个专门论述伪证行为的人。他制定的法律在语言准确性方面甚至超过了任何一位当代立法者。

(Characteristic of Phaleas is the equalization of property; of Plato, the community of women, children, and property, the common meals of women, and the law about drinking, that the sober shall be masters of the feast; also the training of soldiers to acquire by practice equal skill with both hands, so that one should be as useful as the other.)

菲洛劳斯的另一个特色是提出了财产平均制；柏拉图根据他的这条法律提出了妇女、儿童、和财产的公有制，以及让妇女参加公餐的制度；他还有关于醉酒的条款，让能在宴会上保持清醒的人做宴会主持；他还制定了一条关于战斗训练的法律；要求人们养成能够同样熟练的使用左右手的习惯，因为两只手在战场上同样重要。

Draco has left laws, but he adapted them to a constitution which already existed, and there is no peculiarity in them which is worth mentioning, except the greatness and severity of the punishments.

德拉科也制定了一些法律，但他的法律是为别人已经建立完成的政体而做的，而且其中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惟一的特点就是对犯罪的惩罚特别严苛。

Pittacus, too, was only a lawgiver, and not the author of a constitution; he has a law which is peculiar to him, that, if a drunken man do something wrong, he shall be more heavily punished than if he were sober; he looked not to the excuse which might be offered for the drunkard, but only to expediency, for drunken more often than sober people commit acts of violence.

毕达库斯制定了好几部法律，但是从未构建过政体；其中有一条法律属于他的独创：如果一个人在酒醉的情况下做了坏事，那么对他的惩罚应该重于他在清醒状态下做同样的事所受到的惩罚；他不理会酒醉者的犯罪理由，而单纯从保护公共利益出发，原因是人们在酒醉状态下比在清醒状态下更容易进行暴力犯罪。

Androdamas of Rhegium gave laws to the Chalcidians of Thrace. Some of them relate to homicide, and to heiresses; but there is nothing remarkable in them.

芮季俄人安德洛达马也曾为色雷基的卡尔基城制定法律。其中有

些是关于谋杀罪的，有些是关于女子继承财产的问题；但是没有任何新颖独到的内容。

And here let us conclude our inquiry into the various constitutions which either actually exist, or have been devised by theorists.

上述就是关于不同类型政体的全部内容，包括真实存在过的和人们设想的不同类型。

Book Three

第三卷

Part 1

第一章

He who would inquire into the essence and attributes of various kinds of governments must first of all determine “What is a state?” At present this is a disputed question. Some say that the state has done a certain act; others, no, not the state, but the oligarchy or the tyrant. And the legislator or statesman is concerned entirely with the state; a constitution or government being an arrangement of the inhabitants of a state. But a state is composite, like any other whole made up of many parts; these are the citizens, who compose it. It is evident, therefore, that we must begin by asking, Who is the citizen, and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For here again there may be a difference of opinion. He who is a citizen in a democracy will often not be a citizen in an oligarchy. Leaving out of consideration those who have been made citizens, or who have obtained the name of citizen any other accidental manner, we may say, first, that a citizen is not a citizen because he lives in a certain place, for resident aliens and slaves share in the place; nor is he a citizen who has no legal right except that of suing and being sued; for this right may be enjoy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a treaty. Nay, resident aliens in many places do not possess even such rights completely, for they are obliged to have a patron, so that they do but imperfectly participate in citizenship, and we call them citizens only in a qualified sense, as we might apply the term to children who are too young to be on the register, or to old men who have

been relieved from state duties. Of these we do not say quite simply that they are citizens, but add in the one case that they are not of age, and in the other, that they are past the age, or something of that sort; the precise expression is immaterial, for our meaning is clear. Similar difficulties to those which I have mentioned may be raised and answered about deprived citizens and about exiles. But the citizen whom we are seeking to define is a citizen in the strictest sense, against whom no such exception can be taken, and his special characteristic is that he shar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in offices. Now of offices some are discontinuous, and the same persons are not allowed to hold them twice, or can only hold them after a fixed interval; others have no limit of time—for example, the office of a dicast or ecclesiast. It may, indeed, be argued that these are not magistrates at all, and that their functions give them no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But surely it is ridiculous to say that those who have the power do not govern. Let us not dwell further upon this, which is a purely verbal question; what we want is a common term including both dicast and ecclesiast. Let us, for the sake of distinction, call it “indefinite office,” and we will assume that those who share in such office are citizens. This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a citizen, and best suits all those who are generally so called.

一个人要想研究政体的本质，以及各种不同政体的特点，必须先确定，“什么是城邦？”目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比如，有人说城邦采取了某种行为；可其他人却说，行为人不是城邦，而是寡头或暴君。政治家和立法者都专注于城邦；而政体或政权则是城邦居民的一种组织形式。一个城邦就是一个复合体，而且，和其他复合体一样由很多的部分构成；这些部分就是公民，公民构成了城邦。因此，显然我们首先应该问，“谁是公民，公民这个称呼意味着什么？”同样，关于这个问题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因为同一个人在

平民政体里是公民，可在寡头政体往往又不是公民。我们先不考虑那些从非公民转为公民的人，或通过偶然途径获得公民资格的人。首先，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不会因为住在特定的场所而成为公民，原因是长居的外邦人和奴隶们住在同一场所但身份并不相同；一个人如果在法律方面仅仅享有诉讼权与被诉讼权，这也不足以让他成为公民；原因是这项权利的获得可能是某种协议的规定。然而，长居的外邦人经常连这样的权力都不能完整地享有，因为他们不得不寻找一个恩主，从而使他们能享有残缺的公民权力，而我们称他们为公民只是从合格方面考虑，正如我们会称年纪太小还没有登记入册的青年为公民，或称已经从城邦的义务中退休下来的老人为公民。对于这些人，我们不会简单说他们是公民，而是会附加一些条件，如前者还没到法定年龄，而后者却已经超龄了，或其他类似的说法；而这两者之间实际并没有什么差别。具体怎么说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的意思非常明显。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那些被驱逐的，或被取消、剥夺公民权力的人当中。我们寻求的公民定义，是最严格意义上的，不存在上述例外情况的人，而且他的特点是他享有参与司法和行政的权力。关于公职，有些是非长期存在的，而且同一个人只能任职一次；或者必须在间隔足够的时间之后才能任职；而其他的职位则没有时间限制——例如陪审员，公民大会成员。但是可能有人会说，这些不是执政官，而且他们的职能没能让他们参与城邦管理。但是，说那些掌握这种权力的人不参与城邦管理，这种观点是非常可笑的。所以，让我们不要纠缠于这种文字游戏；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通用的名称来称呼陪审员和公民大会成员。为了便于区分，假设我们称呼其为“不固定部门”，而且，我们可以假设参与这些部门的人都是公民。上述就是我们对公民做出的最全面的定义了，而且它适合于所有通常被这样称呼的人。

But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things of which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differ in kind, one of them being first, another second, another third, have, when regarded in this relation, nothing, or hardly anything, worth mentioning in common. Now we see that governments differ in kind, and that some of them are prior and

that others are posterior; those which are faulty or perverted are necessarily posterior to those which are perfect. (What we mean by perversion will be hereafter explained.) The citizen then of necessity differs under each form of government; and our definition is best adapted to the citizen of a democracy; but not necessarily to other states. For in some states the people are not acknowledged, nor have they any regular assembly, but only extraordinary ones; and suits are distributed by sections among the magistrates. At Lacedaemon, for instance, the Ephors determine suits about contracts, which they distribute among themselves, while the elders are judges of homicide, and other causes are decided by other magistrates. A similar principle prevails at Carthage; there certain magistrates decide all causes. We may, indeed, modify our definition of the citizen so as to include these states. In them it is the holder of a definite, not of an indefinite office, who legislates and judges, and to some or all such holders of definite offices is reserved the right of deliberating or judging about some things or about all things. The conception of the citizen now begins to clear up.

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有些事物包含了很多隐性原则，这些原则各不相同，按主次可分成第一，第二，第三，如果这样考虑，那这些事物就几乎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共同点了。现在我们知道政体的形式各不相同，其中有些先进，有些落后；那些拥有很多错误和变态之处的政体显然要落后于那些完美的政体。（我稍后再解释变态指的是什么。）显而易见，不同的政体对公民的定义也有差异；而我们刚刚的定义最适合平民政体，对其他的政体则未必合适。因为在有些城邦，公民大会并不会通知平民，或根本没有常规的公民大会，只有紧急召集的公民大会；而不同的诉讼也分别交由不同的执政部门审理。例如在斯巴达，监察会负责决定所有契约类的诉讼，这些诉讼由监察官分别审理，长老会决定谋杀类案件，其他的案件则由执政官们分别

审理。迦太基也存在类似的制度，那里的执政官决定所有的案件，不同的执政官处理不同的案件。因此，我们之前对公民的描述必须要做一些修改了，从而让它也能够适用于这些城邦。在这些政体中，公民是一个固定部门的，或不固定部门的负责人，他制定法律并审理案件，他们中的有些人或全体都拥有审议或裁断一些或全部事务的权力。这些应该能够充分说明什么是公民了。

He who has the power to take part in the deliberative or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of any state is said by us to be a citizens of that state; and, speaking generally, a state is a body of citizens sufficing for the purposes of life.

任何一个有权在一个城邦中参与议事和司法过程的人，都可以称之为那个城邦的公民；而城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这样一个由公民组成的，能满足其生活需求的团体。

Part 2

第二章

But in practice a citizen is defined to be one of whom both the parents are citizens; others insist on going further back; say to two or three or more ancestors. This is a short and practical definition but there are some who raise the further question: How this third or fourth ancestor came to be a citizen? Gorgias of Leontini, partly because he was in a difficulty, partly in irony, said—“Mortars are what is made by the mortar-makers, and the citizens of Larissa are those who are made by the magistrates; for it is their trade to make Larissaeans.” Yet the question is really simple, for, if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just given they shared in the government, they were citizens. This is a better definition than the other. For the words, “born of a father or mother who is a citizen,” cannot possibly apply to the first inhabitants or founders of a state.

但是，在实践当中，人们对于公民的定义是那些父亲母亲都是公民；也有一些人建议追溯得更远一些，比如说两代或三代以上的祖先。这个定义简短而且实际，但是有人对此继续质疑：这种第三代或第四代祖先如何成为公民的呢？里昂底尼人高尔吉亚，一半因为自身的困境，一半出于讽刺，这样说道：“石灰浆是由灰泥匠制造的，所以公民就是由公民匠制造的，由此可得，拉里萨公民是执政官员造的；因为他们干的就是制造拉里萨公民的买卖。”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按照我们刚刚给出的定义，任何参与城邦管理的人都是其公民。这种定义比第二种定义好多了。因为“其生身父亲或母亲是公民”这种说法，无法适用于一个城邦的缔造者或者第一批居民。

There is a greater difficulty in the case of those who have been made citizens after a revolution, as by Cleisthenes at Athens after the expulsion of the tyrants, for he enrolled in tribes many metics, both strangers and slaves. The doubt in these cases is, not who is, but whether he who is ought to be a citizen; and there will still be a furthering the state, whether a certain act is or is not an act of the state; for what ought not to be is what is false. Now, there are some who hold office, and yet ought not to hold office, whom we describe as ruling, but ruling unjustly. And the citizen was defined by the fact of his holding some kind of rule or office—he who holds a judicial or legislative office fulfills our definition of a citizen. It is evident, therefore, that the citizens about whom the doubt has arisen must be called citizens.

对于那些城邦发生革命之后被授予公民资格的人，要想给他们一个合适的定义就更困难了，例如，在雅典，克勒斯叙尼在驱逐了暴君之后，吸收了许多部落中的外邦人成为雅典公民，包括陌生人和奴隶。这种情况所引发的疑问，实际上不是谁是公民的问题，而是已经是公民的人是否应该成为公民；或者更进一步，一种特定行为是否为城邦行为；原因是不应该存在的必然是错误的。有些人坐在了公职的位子上，但是却没有履行职责的能力，我们还是称他们为管理者，但是他们的管理是非正义的。而且，对于公民的定义基于这一事实，即他们从事某种统治，或担任某种公职——任何掌控某个司法或立法部门的人都满足我们对公民的定义。因此，这种引起人们质疑的公民显然必须是公民。

Part 3

第三章

Whether they ought to be so or not is a question which is bound up with the previous inquiry. For a parallel question is raised respecting the state, whether a certain act is or is not an act of the state; for exampl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n oligarchy or a tyranny to a democracy. In such cases persons refuse to fulfill their contracts or any other obligations, on the ground that the tyrant, and not the state, contracted them; they argue that some constitutions are established by force, and not for the sake of the common good. But this would apply equally to democracies, for they too may be founded on violence, and then the acts of the democracy will be neither more nor less acts of the state in question than those of an oligarchy or of a tyranny. This question runs up into another: on what principle shall we ever say that the state is the same, or different? It would be a very superficial view which considered only the place and the inhabitants (for the soil and the population may

be separated, and some of the inhabitants may live in one place and some in another). This, however, is not a very serious difficulty; we need only remark that the word “state” is ambiguous.

与前一个疑问密不可分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人是否应该成为公民。因为，有一个平行的问题是关于城邦的，即一个特定的行为是否是城邦行为；比如，在寡头政体或暴君政体向平民政体转变期间。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拒绝履行他们的契约义务或其他任何义务，理由是这些义务是那个暴君的约定，而不是城邦的约定；他们会争辩说有些政体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为了城邦的共同利益。但是，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平民政体，因为平民政体也可能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那么平民政体的行为并不能够比寡头政体或暴君政体的那些行为代表更多或更少的城邦意志。于是又出现了另一问题：我们根据什么来说，这里还是同一个城邦或已经不同了？如果只考虑土地和居民，这样得出的观点未免过于肤浅（因为人民可能会跟土地分开，或者有些人住在一个地方，而有些则在其他的地方）。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太难；我们只需要注意“城邦”这个词的模糊性。

It is further asked: When are men, living in the same place, to be regarded as a single city—what is the limit? Certainly not the wall of the city, for you might surround all Peloponnesus with a wall. Like this, we may say, is Babylon, and every city that has the compass of a nation rather than a city; Babylon, they say, had been taken for three days before some part of the inhabitants became aware of the fact. This difficulty may, however, with advantage be deferred to another occasion; the statesman has to consider the size of the state, and whether it should consist of more than one nation or not.

还可以进一步提问：当人们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时，如何才能把他们看作一个城邦——它的界限是什么？当然，我们不能把城墙当作城邦的界限，因为你可以将整个伯罗奔尼撒地区用同一道城墙包围。这样的情形，有人会说，和古巴比伦一样，以及那种包含一个民族而不是只有一座城池的大城邦；据说，在巴比伦被占领了三天之后，城内的有些居民才意识到城邦陷落了。然而，我们还是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再来解决这一问题；关于一个城邦的范围应该有多大，是否应容纳一个以上的民族，这些都是政治家应该熟稔的。

Again, shall we say that while the race of inhabitants, as well as their place of abode, remain the same, the city is also the same, although the citizens are always dying and being born, as we call rivers and fountains the same, although the water is always flowing away and coming again Or shall we say that the generations of men, like the rivers, are the same, but that the state changes? For, since the state is a partnership, and is a partnership of citizens in a constitution, when the form of government changes, and becomes different, then it may be supposed that the state is no longer the same, just as a tragic differs from a comic chorus, although the members of both may be identical. And in this manner we speak of every union or composition of elements as different when the form of their composition alters; for example, a scale containing the same sounds is said to be different, accordingly as the Dorian or the Phrygian mode is employed. And if this is tru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sameness of the state consists chiefly in the samenes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it may be called or not called by the same name, whether the inhabitants are the same or entirely different. It is quite another question, whether a state ought or ought not to fulfill engagements when the form of government changes.

另外，如果一个城邦居住着同一种族的人，虽然不停地有人去世，有人降生，就像我们对河流和池塘的称呼不变，但是里面的水却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说这是同一个城邦吗？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说人还是那代人，就像河流一样，但是城邦已经变了？既然说城邦是一个合作体，一个在政体下由公民构成的合作体，那么，一旦政体形式改变了，变得跟以前不同了，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城邦不一样了，这就如同我们会把悲剧的合唱团和喜剧的合唱团区别对待一样，虽然其中的成员完全相同。同样，每一个团体或元素复合体在其组织形式发生变化时，我们会说这个团体或元素复合体也不一样了；例如，一个包含相同音调的音列可以组成不同的调式，或者采用多里安调式，或采用弗吕吉亚调式。如果这一观点成立，显然一个城邦的不变性主要依赖于政体的不变性，我们可以用或者不用以同样的名字称呼它，无论这里的居民是否同一批人。至于当政体改变时，一个城邦是否应该遵守以前的契约，则又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了。

Part 4

第四章

There is a point nearly allied to the preceding: Whether the virtue of a good man and a good citizen is the same or not. But, before entering on this discussion, we must certainly first obtain some general notion of the virtue of the citizen. Like the sailor, the citizen is a member of a community. Now, sailors have different functions, for one of them is a rower, another a pilot, and a third a look-out man, a fourth is described by some similar term; and while the precise definition of each individual's virtue applies exclusively to him, there is, at the same time, a common definition applicable to them all. For they have all of them a common object, which is safety in navigation. Similarly, one citizen differs from another, but the salvation of the community is the common business of them all.

This community is the constitution; the virtue of the citizen must therefore be relative to the constitution of which he is a member. If, then, there are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it is evident that there is not one single virtue of the good citizen which is perfect virtue. But we say that the good man is he who has one single virtue which is perfect virtue. Hen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good citizen need not of necessity possess the virtue which makes a good man.

还有一点跟上述内容密不可分：一个好公民和一个好人是否应该具有相同的美德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一个公民所需美德进行一般性的描述。公民和水手一样，都是一个团体的一员。众所周知，不同的水手职责可能不同，有的是桨手，有的是舵手，还有的是瞭望，等等很多不同的职责；而且，尽管对一名水手之美德的准确描述只适用于他本人，但是，同时也有一种通用的描述可以适用于全体船员。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航行安全。同样，虽然公民各不相同，但是拯救他们的团体是他们的共同任务。而这个团体就是政体；因此，一个公民的美德必须与其所属的城邦有关。如果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政体，那么显而易见，没有哪一种好公民的美德是完美的美德。但是，我们对一个好人的定义就是一个拥有一种完美美德的人。因此，显然一个好公民不必具备一个好人所需要的那种美德。

The same question may also be approached by another road, from a consideration of the best constitution. If the state cannot be entirely composed of good men, and yet each citizen is expected to do his own business well, and must therefore have virtue, still inasmuch as all the citizens cannot be alike, the virtue of the citizen and of the good man cannot coincide. All must have the virtue of the good citizen—thus, and thus only, can the state be perfect; but they will not have the virtue of a good man, unless we assume that

in the good state all the citizens must be good.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即一个最好的政体要具备些什么？如果说一个城邦不可能完全由好人构成，但是它期望每个公民都出色地完成自己的职责，因此他们必须拥有相应的美德，既然每个公民不可能一样，那么一个公民的美德和一个好人的美德不可能相同。每个公民都有应该拥有好公民的美德——这样，而且只有这样，一个城邦才能完美；但他们不会都拥有好人的美德，除非我们假设一个好城邦内的每个公民都是好人。

Again, the state, as composed of unlikes, may be compared to the living being: as the first elements into which a living being is resolved are soul and body, as soul is made up of rational principle and appetite, the family of husband and wife, property of master and slave, so of all these, as well as other dissimilar elements, the state is composed; and, therefore, the virtue of all the citizens cannot possibly be the same, any more than the excellence of the leader of a chorus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performer who stands by his side. I have said enough to show why the two kinds of virtue cannot be absolutely and always the same.

同理，因为一个城邦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所以可以把它比作一个生命体：正如一个生命体首先可以分解为灵魂和肉体两大元素，又如灵魂由理性原则和欲望两部分组成，一个家庭由丈夫和妻子组成，财产由主人和奴隶组成，所以，一个城邦由这些元素，以及很多其他不同的元素共同组成；因此，所有公民的美德不可能是相同的，正如乐队中领唱歌手的特长肯定与站在他身边的普通歌手不同。关于为何这两种人的美德不能总是完全相同，我就先讲这么多。

But will there then be no case in which the virtue of the good citizen and the virtue of the good man coincide? To this we answer that the good ruler is a good and wise man, and that he who would be a statesman must be a wise man. And some persons say that even the education of the ruler should be of a special kind; for are not the children of kings instructed in riding and military exercises? As Euripides says: “No subtle arts for me, but what the state requires.”

难道好人的美德和好公民的美德从未有过完全相同吗？对此，我们的回答是，一个杰出的执政官必然是一个善良和睿智的人，而一个政治家也必须是一个睿智的人。有人甚至说统治者接受的教育也必然是特殊的；难道国王的孩子会不接受骑术和格斗的教育吗？正如欧里庇得斯说过：“不要教我那些花拳绣腿，请教我如何治国安邦。”

As though there were a special education needed by a ruler. If then the virtue of a good ruler is the same as that of a good man, and we assume further that the subject is a citizen as well as the ruler, the virtue of the good citizen and the virtue of the good man cannot be absolutely the same, although in some cases they may; for the virtue of a ruler differs from that of a citizen. It was the sense of this difference which made Jason say that “he felt hungry when he was not a tyrant,” meaning that he could not endure to live in a private stat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may be argued that men are praised for knowing both how to rule and how to obey, and he is said to be a citizen of approved virtue who is able to do both. Now if we suppose the virtue of a good man to be that which rules, and the virtue of the citizen to include ruling and obeying, it cannot be said that they are equally worthy of praise. Since, then, it is sometimes thought that the ruler and the ruled

must learn different things and not the same, but that the citizen must know and share in them both, the inference is obvious. There is, indeed, the rule of a master,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menial offices—the master need not know how to perform these, but may employ others in the execution of them: the other would be degrading; and by the other I mean the power actually to do menial duties, which vary much in character and are executed by various classes of slaves, such, for example, as handicraftsmen, who, as their name signifies, live by the labor of their hands: under these the mechanic is included. Hence in ancient times, and among some nations, the working classes had no share in the government—a privilege which they only acquired under the extreme democracy. Certainly the good man and the statesman and the good citizen ought not to learn the crafts of inferiors except for their own occasional use; if they habitually practice them, there will cease to be a distinction between master and slave.

似乎真有一种统治者需要的特殊教育。那么，如果一个好人和一个好统治者的美德是相同的，我们继续假设目标既是公民又是统治者，这个好人和这个好公民的美德不可能完全相同，尽管在有些情况下两者可能相同；原因是统治者的美德和公民的美德也有差别。正是基于对这种差别的认识，费雷城的杰森声称："如果不做暴君，他感到饥饿难耐。"意思是他不能忍受过平凡人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懂得如何统治和懂得如何服从同样值得赞赏，而且，能够在这两方面都做好被认为是公民的一种公认的美德。假设一个好人的美德仅仅在于能够统治，但是一个好公民的美德在于统治和服从两方面都做得同样出色，那么这两种人受到的赞美自然不同了。既然有时候人们认为统治者和服从者应该各自学习不同的本领，但是公民必须同时懂得并参与到这两种业务中，那么，我们的结论就不言而喻了。主人对奴隶的统治，有的与贱业有关——主人没必要知道如何从事这种贱业，只要雇佣他人做就好：其他的做法都将是自贬身

价；“其他”指的是操持贱业的能力，这些贱业特色各异，由不同等级的奴隶来从事，比如，手工业者，顾名思义，就是靠手工劳动谋生的；比这些更低等的是技师。因此，在古代的有些城邦，劳动阶级不得参与管理——这是一种在极端的平民政体下，他们才能获得的权利。当然，好人和政治家和好公民都不得学习卑贱的技艺，除非是偶尔自用；如果他们习惯性从事贱业，那么就会打破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区分。

This is not the rule of which we are speaking; but there is a rule of another kind, which is exercised over freemen and equals by birth -a constitutional rule, which the ruler must learn by obeying, as he would learn the duties of a general of cavalry by being under the orders of a general of cavalry, or the duties of a general of infantry by being under the orders of a general of infantry, and by having had the command of a regiment and of a company. It has been well said that “he who has never learned to obey cannot be a good commander.” The two are not the same, but the good citizen ought to be capable of both; he should know how to govern like a freeman, and how to obey like a freeman—these are the virtues of a citizen. And, although the temperance and justice of a ruler are distinct from those of a subject, the virtue of a good man will include both; for the virtue of the good man who is free and also a subject, e.g., his justice, will not be one but will comprise distinct kinds, the one qualifying him to rule, the other to obey, and differing as the temperance and courage of men and women differ. For a man would be thought a coward if he had no more courage than a courageous woman, and a woman would be thought loquacious if she imposed no more restraint on her conversation than the good man; and indeed their part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household is different, for the duty of the one is to acquire, and of the other to preserve. Practical wisdom only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ruler: it would seem that all other virtues must equally belong to ruler and subject. The virtue of the subject is certainly not wisdom, but only true opinion; he may be compared to the maker of the flute, while his master is like the flute-player or user of the flute.

这不是我们要谈论的统治；但是有另一种统治是针对天生的自由人和平等者的——政治统治，其中统治者通过服从来学会统治，正如他必须先听命于一名骑兵将军，然后才能学会骑兵将军的职责；而要想学会步兵将军的职责，也要先在一名步兵将军的帐前听令，还要从统领一个连、一个团做起。有句话说得好，“没学会服从命令的人，也做不了好领导。”这两者虽然不同，但好公民必须两者兼备；他应该既懂得如何以自由人的方式进行统治，又懂得如何以自由人的方式去服从——这就是公民的美德。而且，虽说统治者的节制和公正等美德不同于被统治者，但是，一个好人的美德能包含这两者；原因是具有这种美德的好人既是自由人又是被统治者，例如，他的正义不是单一的一种，而是包含了不同的种类，一种让他能够做统治者，另一种让他能够做服从者，二者的差异正如一个男人和一个妇女所需的节制和勇敢之间的差异一样。如果一个男人具有的勇敢是本应出现在女人身上的那种，那他会看作是懦夫，而一个女人如果像一个好男人那样侃侃而谈，就会被看作是一名多嘴之人；实际上，他们在家务管理方面的职责也各不相同，男人的职责是获取财产，女人的则是保持财产。只有实用智慧是统治者的特点：而其他的美德看来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样重要。但是被统治者的美德当然不是睿智，而是只要真实的观点；他们就像制笛匠，而统治者则像用吹笛子的乐师或笛子的使用者。

From these considerations may be gathered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virtue of the good man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good citizen, or different, and how far the same, and how far different.

好人和好公民是需要相同还是不同的美德，在何种程度上相同，又在何种程度上不同呢？综合上述就可以得出这一问题的答案。

Part 5

第五章

There still remains one more question about the citizen: Is he only a true citizen who has a share of office, or is the mechanic to be included? If they who hold no office are to be deemed citizens, not every citizen can have this virtue of ruling and obeying; for this man is a citizen And if none of the lower class are citizens, in which part of the state are they to be placed? For they are not resident aliens, and they are not foreigners. May we not reply, that as far as this objection goes there is no more absurdity in excluding them than in excluding slaves and freedmen from any of the above-mentioned classes?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we cannot consider all those to be citizens who are necessary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for example, children are not citizen equally with grown-up men, who are citizens absolutely, but children, not being grown up, are only citizens on a certain assumption. Nay, in ancient times, and among some nations the artisan class were slaves or foreigners, and therefore the majority of them are so now. The best form of state will not admit them to citizenship; but if they are admitted, then our definition of the virtue of a citizen will not apply to every citizen nor to every free man as such, but only to those who are freed from necessary services. The necessary people are either slaves who minister to the wants of individuals, or mechanics and laborers who are the servants of the community. These reflections carried a little further will explain their position; and indeed what

has been said already is of itself, when understood, explanation enough.

关于公民还有一个问题：是否只有参与公共管理的人才是公民，工匠们可以是公民吗？如果那些不能参与管理的人也可以看成是公民，那么就不是所有公民都可以兼具统治与服从的美德；因为那些工匠也是公民。反之，如果下层社会全都不能称为公民，那么他们应该在城邦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呢？他们既不是侨民也不是外邦人。或者我们不该这样说，就上述反对意见而言，不让他们成为公民就像把奴隶和自由人排除在上述阶级以外一样荒谬。不可否认，我们不能把所有那些对城邦不可或缺的人都看作公民；例如，孩子就不是和成人一样的公民，成人是完全的公民，而孩子，在没有长大之前，只在一定条件下算是公民。在有些古代的城邦，工匠们曾经是奴隶或外邦人，而且，现在他们中大部分人仍拥有同样的身份也是因为这种原因。最完美形式的城邦确实不承认他们为公民；但是如果他们被接受的话，那我们对公民美德的定义就不能适用于每个公民或诸如此类的自由人了，而只能适用于那些不必从事基础服务的人。这些城邦必需的人或者是为个人需求服务的奴隶，或者是服务于团体的技工和体力劳动者。只要对这些话稍加揣摩，我们就会知道他们的处境了，实际上，我们以上所说的已经言明了他们的情况，无需多做解释。

Since there are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there must be many varieties of citizen and especially of citizens who are subjects; so that under some governments the mechanic and the laborer will be citizens, but not in others, as, for example, in aristocracy or the so-called government of the best (if there be such an one), in which honors are given according to virtue and merit; for no man can practice virtue who is living the life of a mechanic or laborer. In oligarchies the qualification for office is high, and therefore no laborer can ever be a citizen; but a mechanic may, for an actual

majority of them are rich. At Thebes there was a law that no man could hold office who had not retired from business for ten years. But in many states the law goes to the length of admitting aliens; for in some democracies a man is a citizen though his mother only be a citizen; and a similar principle is applied to illegitimate children; the law is relaxed when there is a dearth of population. But when the number of citizens increases, first the children of a male or a female slave are excluded; then those whose mothers only are citizens; and at last the right of citizenship is confined to those whose fathers and mothers are both citizens.

既然有很多种不同的政体，那必然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公民，尤其是那些被统治的公民；所以在有些政体中，技工和体力劳动者会成为公民，但在其他的政体中却不是，例如，在贵族政体即所谓的最完美政体中（如果真的存在完美政体的话），公民资格是按照美德和功勋授予的；原因是没有人能够靠做技工和体力劳动来实践美德。在寡头制中，体力劳动者也是不能成为公民的，因为一个人承担公共职务的权力是根据他拥有的财富限定的；但是技工可以，因为他们当中真正的大多数都很富有。在底比斯有一种法律，它规定任何人只有在十年内没有从事贸易的经历才可以参与城邦管理。还有很多的城邦制定了详细的规则，接受外来者成为本邦公民；在有些平民城邦，只要妈妈是公民，那么儿子就是公民；类似的政策也适用于私生子；每当出现人口短缺时，就会出现这样宽松的法律。但是，随着公民人数的增加，最初，父母双方有一方是奴隶，那孩子也不是公民；后来，只有母亲是公民而父亲是非公民，他们所生的孩子也不是公民；最终，公民资格就被限制在父母双方都是公民的情况了。

Hence, as is evident,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citizens; and he is a citizen in the highest sense who shares in the honors of the state. Compare Homer's words, “like some dishonored stranger”; he

who is excluded from the honors of the state is no better than an alien. But when his exclusion is concealed, then the object is that the privileged class may deceive their fellow inhabitants.

因此，公民显然分为很多种；一个参与城邦管理的人可以说是最高等级的公民。借用荷马史诗中的话，“像对待一个没有公民权的外来者”；没有公民资格的人地位并不比外邦人高。特权阶级之所以隐瞒剥夺其权力的事实，目的就是蒙骗其他类似的居民。

As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virtue of the good man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good citizen, the considerations already adduced prove that in some states the good man and the good citizen are the same, and in others different. When they are the same it is not every citizen who is a good man, but only the statesman and those who have or may have, alone or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s, the conduct of public affairs.

综上所述，关于好人和好公民的美德是否相同，我们已经举例论证过了，在有些城邦，他们的美德是相同的，而在其他的城邦则不同。而且，在前一种城邦，也不是每个公民都兼具两种美德，而只有那些政治家和在公共事务中已经或有能力掌握领导权的人（无论是独自执政还是与他人联合执政）才能兼具两种美德。

Part 6

第六章

Having determined these questions, we have next to consider

whether there is only one form of government or many, and if many, what they are, and how many, and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在确立了上述观点之后，我们接下来继续考虑是否只有一种政体，还是有多种政体；如果是多种，具体是多少呢，分别是什么类型的，他们之间的有什么不同？

A constitution is the arrangement of magistracies in a state, especially of the highest of all. The government is everywhere sovereign in the state, and the constitution is in fact the government. For example, in democracies the people are supreme, but in oligarchies, the few; and, therefore, we say that these two forms of government also are different: and so in other cases.

所谓的政体是指对整个城邦行政部门的安排，尤其是最高权力部门。政府就是一个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政体组织实际上就是一个城邦的政权组织。例如，在平民政体中，最高权力归全体公民；相反，在寡头政体中，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此，我们说这些城邦的政体是不同的：而其他的那些城邦也彼此不同。

First, let us consider what is the purpose of a state, and how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there are by which human society is regulated. We have already said,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treatise, when discussing household management and the rule of a master, that 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 And therefore, men, even when they do not require one another's help, desire to live together; not but that they are also brought together by their common

interests in proportion as they severally attain to any measure of well-being. This is certainly the chief end, both of individuals and of states. And also for the sake of mere life (in which there is possibly some noble element so long as the evils of existence do not greatly overbalance the good) mankind meet together and maintain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we all see that men cling to life even at the cost of enduring great misfortune, seeming to find in life a natural sweetness and happiness.

首先让我们来确定，一个城邦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建立，并且指出人类社会共受过那些政体形式的统治。在第一部分的论述中，讨论家务管理和主人的权力时，我说过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因此，即使在不需要依靠外来帮助时，他也会渴望与别人一起生活；他们各自谋求生活富足的方式越多，他们聚到一起实际获得的利益就越大。而且这对全邦和对个人同样是一个伟大目标。同样，也是为了生存（生存还是有一些高贵的成分在其中的，前提是生存的美好不被苦难压倒），人们才聚在一起，维持着政治团体。显然，人们尽管看上去像在生活当中能找到天然的甜蜜和幸福，实际上却在挣扎度日，甚至会忍受巨大的苦难。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distinguishing the various kinds of authority; they have been often defined already in discussions outside the school. The rule of a master, although the slave by nature and the master by nature have in reality the same interests, is nevertheless exercised primarily with a view to the interest of the master, but accidentally considers the slave, since, if the slave perish, the rule of the master perishes with him.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of a wife and children and of a household, which we have called household management, is exercis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for the good of the governed or for the common good of

both parties, but essentially for the good of the governed, as we see to be the case in medicine, gymnastic, and the arts in general, which are only accidentally concerned with the good of the artists themselves. For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 trainer may not sometimes practice gymnastics, and the helmsman is always one of the crew. The trainer or the helmsman considers the good of those committed to his care. But, when he is one of the persons taken care of, he accidentally participates in the advantage, for the helmsman is also a sailor, and the trainer becomes one of those in training. And so in politics: when the state is framed up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likeness, the citizens think that they ought to hold office by turns. Formerly, as is natural, every one would take his turn of service; and then again, somebody else would look after his interest, just as he, while in office, had looked after theirs. But nowadays, for the sake of the advantage which is to be gained from the public revenues and from office, men want to be always in office. One might imagine that the rulers, being sickly, were only kept in health while they continued in office; in that case we may be sure that they would be hunting after places. The conclusion is evident: that governments which have a regard to the common interest are constituted in accordance with strict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are therefore true forms; but those which regard only the interest of the rulers are all defective and perverted forms, for they are despotic, whereas a state is a community of freemen.

分辨不同种类的权威是很容易的；而且我们已经用世俗的语言对他们进行了定义。主人的统治，虽然按自然性来说是对奴隶和主人双方都有利的，但是其主要目标还是主人的利益，奴隶的利益只是偶尔被考虑到；比如，如果奴隶死了，那么主人对他的权力也就终止了。但是一个男人对妻子，孩子及其家庭的权威，我们称之为家务管理，其目标或者是为了被管理者的利益，或者是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但

主要是为了被管理者的利益，正如我们在其他技艺中通常见到的那样；比如说医疗，还有体育锻炼，如果说这种活动有利于教练，这也是偶尔才会发生的。因为没有什么能阻止教练者偶尔也成为练习者中的一员，就像舵手永远是水手中的一员。但无论是体育教练还是舵手，他们考虑的都是受照料者的利益。但是，如果这个人自己也是受照料者的一员，他偶然性地分享到了其中的好处也无可厚非，因为舵手同时也是一名水手，而体育教练也是接受培训的人之一。政治也是一样：在所有基于平等原则和相似原则而建立的政体中，公民们认为他们应该轮流执政。最初，这是自然形成的做法，每个公民轮流为公众服务，同时其他人就会帮助他照料一下他的私利，就像他在任时照顾别人的利益一样。但是现在不同了，每个人都渴望持续掌权，从而可以让他享受公共财政的利润和职权为他带来的好处。人们可能会想象，统治者就像一个病人，只有继续任职下去才能保持他的健康；在那种情况下，可以肯定，他会像追逐猎物一样追逐地位。很显然，所有为公众谋福利的政体其宗旨都是极其正义的，因此，它们才是真正的政体；而那些只考虑统治者利益的政体都是错误的、变态的政体，因为它们是专制统治，而政治城邦则是自由人的团体。

Part 7

第七章

Having determined these points, we have next to consider how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there are, and what they are; and in the first place what are the true forms, for when they are determined the perversions of them will at once be apparent. The words constitution and government have the same meaning, and the government, which is the supreme authority in states, must be in the hands of one, or of a few, or of the many. The true forms of government, therefore, are those in which the one, or the few, or the many, govern with a view to the common interest; but

governments which rule with a view to the private interest, whether of the one or of the few, or of the many, are perversions. For the members of a state, if they are truly citizens, ought to participate in its advantages. Of forms of government in which one rules, we call that which regards the common interests, kingship or royalty; that in which more than one, but not many, rule, aristocracy; and it is so called, either because the rulers are the best men, or because they have at heart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citizens. But when the citizens at large administer the state for the common interest, the government is called by the generic name—a constitution. And there is a reason for this use of language. One man or a few may excel in virtue; but as the number increases it becomes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attain perfection in every kind of virtue, though they may in military virtue, for this is found in the masses. Hence in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 fighting-men have the supreme power, and those who possess arms are the citizens.

明确了上述观点之后，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共有哪些不同的政体，他们分别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确定什么是真正的政体，因为这些确定下来之后，哪些是变态的政体就不言而喻了。政体和政权，这两个词汇具有相同的含义，政权是一个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必然是掌握在一个人，几个人，或多个人手中。真正的政体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或多个人为了公众利益而进行统治；但是如果一个政权的统治只考虑私人利益，无论这个利益属于掌权的那一个人、几个人、还是多个人，那么这个政体就是变态的政体。一个城邦的成员，只要是真正的公民，就应该享受到政体的利益。如果一种政体由一个人统治，而他统治的目的是为公众谋福利，我们称其为君主政体；同样以公众利益为目标的政体，如果由少数几个人管理的，是贵族政体；采用这种称呼是因为它的统治者是全邦最好的几个人，或者因为他们把城邦和全体公民的最高利益装在心里。如果全体公民为了公众利益而

管理城邦，这样的政体有一个通称——共和政体。使用这个称呼是有理由的。一个，或少数几个可能拥有超凡的美德，而随着这个数字的增加，要让一大群人在各种美德方面都达到完美就变得更加困难，但是他们有可能在军事美德方面达到完美，因为这种美德本身就是靠数量支持的。因此，在这样的政体中，军人掌握最高权力，而拥有武器的人就是公民。

Of the above-mentioned forms, the perversions are as follows: of royalty, tyranny; of aristocracy, oligarchy;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democracy. For tyranny is a kind of monarchy which has in view the interest of the monarch only; oligarchy has in view the interest of the wealthy; democracy, of the needy: none of them the common good of all.

上述政体形式确定之后，变态政体也浮出水面：君主政体可能变态为一种暴君制，贵族制变态成寡头制，而共和制则变态为平民制。暴君制作为君主政体的一种，其统治的目标就是为一个人谋福利；而寡头制则只考虑富人的利益；平民制只考虑穷人：他们都不把公众利益作为目标。

Part 8

第八章

But there are difficulties about these forms of government, and it will therefore be necessary to state a little more at length the nature of each of them. For he who would make 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the various sciences, and does not regard practice only, ought not to overlook or omit anything, but to set forth the truth in

every particular. Tyranny, as I was saying, is monarchy exercising the rule of a master over the political society; oligarchy is when men of property have the government in their hands; democracy, the opposite, when the indigent, and not the men of property, are the rulers. And here arises the first of our difficulties, and it relates to the distinction drawn. For democracy is said to be the government of the many. But what if the many are men of property and have the power in their hands? In like manner oligarchy is said to be the government of the few; but what if the poor are fewer than the rich, and have the power in their hands because they are stronger? In these cases the distinction which we have drawn between these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would no longer hold good.

这些政体都有很多的疑难之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他们各自的本质进一步详细论述。任何人如要对各种科学进行哲学探讨，而且不仅仅考虑实用方面，那他一定不能忽视或遗漏任何事，反而要将真相的每个细节都阐述明白。就如我一直在说的那样，暴君政体是君主政体的一种，其中君主对一个政治社会及其成员行使奴隶主的权力；寡头政体，则是城邦的政权掌握在富人手中；平民政体，恰恰相反，这里的统治者不是富人，而是穷人。这里出现了第一个疑难，而且它跟上述的区分方法有关。原因是平民政体被认为是多数人的政权。但是，假如这些手握权力的多数人都是富人呢？同样，寡头政体被认为是少数人的政权；但是假如穷人是少数派，但是却靠着他们更为强大的力量掌握了政权呢？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对不同政体的区分就不再正确了。

Suppose, once more, that we add wealth to the few and poverty to the many, and name the governments accordingly—an oligarchy is said to be that in which the few and the wealthy, and a

democracy that in which the many and the poor are the rulers—there will still be a difficulty. For, if the only forms of government are the ones already mentioned, how shall we describe those other governments also just mentioned by us, in which the rich are the more numerous and the poor are the fewer, and both govern in their respective states?

那么，我们再次假设，我们给上述例子中的少数人增加财富，同时让那群多数派变贫穷，然后再相应地命名这些政体——即寡头政治是这样一种政体，其中占人口少数的富人掌握政权；平民政体是这样的，其中占人口多数的穷人掌握政权——但是还有一个难题。因为，如果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政体就是全部，那么我们怎么描述同样刚刚被我们提到过的其他政体呢？其中富人是多数派，而穷人是少数派，而且都是各自的城邦的统治者。

The argument seems to show that, whether in oligarchies or in democracies, the number of the governing body, whether the greater number, as in a democracy, or the smaller number, as in an oligarchy, is an accident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rich everywhere are few, and the poor numerous. But if so, there is a misapprehens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For the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is poverty and wealth. Wherever men rule by reason of their wealth, whether they be few or many, that is an oligarchy, and where the poor rule, that is a democracy. But as a fact the rich are few and the poor many; for few are well-to-do, whereas freedom is enjoyed by an, and wealth and freedom are the grounds on which the oligarchical and democratical parties respectively claim power in the state.

这些论述似乎表明，无论是在寡头政体还是平民政体中，政权主体的人数，无论是像平民政体中那样占据多数派，还是像寡头政体中那样占据少数派，都是一个偶然现象，这个偶然现象是由这一事实造成的，即无论在哪里都是富人少而穷人多。但是，如果这个观点属实，那么我们对造成两种政体差异之原因的理解就存在一个错误。原因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真正的差别在于贫穷和富有。所以在一个城邦，如果人们因为手中的财富而掌权，那么无论他们是多数还是少数，这就是一个寡头政体，而穷人掌权的地方，就是平民政体。然而，实际上富人总是少数，而穷人总是多数；富人数量少，自由却是所有人都享有的，而财富和自由则分别是寡头一派和平民一派争取政治权力的基础。

Part 9

第九章

Let us begin by considering the common definitions of oligarchy and democracy, and what is justice oligarchical and democratical. For all men cling to justice of some kind, but their conceptions are imperfect and they do not express the whole idea. For example, justice is thought by them to be, and is, equality, not. however, for however, for but only for equals. And inequality is thought to be, and is, justice; neither is this for all, but only for unequals. When the persons are omitted, then men judge erroneously. The reason is that they are passing judgment on themselves, and most people are bad judges in their own case. And whereas justice implies a relation to persons as well as to things, and a just distribution, as I have already said in the Ethics, implies the same ratio between the persons and between the things, they agree about the equality of the things, but dispute about the equality of the persons, chiefly for the reason which I have just

given—because they are bad judges in their own affairs; and secondly, because both the parties to the argument are speaking of a limited and partial justice, but imagine themselves to be speaking of absolute justice. For the one party, if they are unequal in one respect, for example wealth, consider themselves to be unequal in all; and the other party, if they are equal in one respect, for example free birth, consider themselves to be equal in all. But they leave out the capital point. For if men met and associated out of regard to wealth only, their share in the state would be proportioned to their property, and the oligarchical doctrine would then seem to carry the day. It would not be just that he who paid one mina should have the same share of a hundred minae, whether of the principal or of the profits, as he who paid the remaining ninety-nine. But a state exists for the sake of a good life, and not for the sake of life only: if life only were the object, slaves and brute animals might form a state, but they cannot, for they have no share in happiness or in a life of free choice. Nor does a state exist for the sake of alliance and security from injustice, nor yet for the sake of exchange and mutual intercourse; for then the Tyrrhenians and the Carthaginians, and all who have commercial treaties with one another, would be the citizens of one state. True, they have agreements about imports, and engagements that they will do no wrong to one another, and written articles of alliance. But there are no magistrates common to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who will enforce their engagements; different states have each their own magistracies. Nor does one state take care that the citizens of the other are such as they ought to be, nor see that those who come under the terms of the treaty do no wrong or wickedness at an, but only that they do no injustice to one another. Whereas, those who care for good governmen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virtue and vice in states. Whence it may be further inferred that virtue must be the care of a state which is truly so called, and not merely enjoys the

name: for without this end the community becomes a mere alliance which differs only in place from alliances of which the members live apart; and law is only a convention, “a surety to one another of justice,” as the sophist Lycophron says, and has no real power to make the citizens

首先，我们来确定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通常如何定义，以及这两种政体各自对正义的定义。所有的人都主张某种正义，但是他们对正义的理解都不完美，而且表达的也不完整。比如说，他们认为正义即平等，事实上也是如此，但这一说法并不适合所有人，而只适合于彼此平等的人。而不平等则被认为是正义，而且确实如此；但这种观点也不适合所有人，而只适合不平等的人。如果忽略人的差异，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究其原因，他们在为自身做判断，而多数人在涉及自身的事方面都是糟糕的法官。虽然正义是因人而异的，正如我在《伦理学》中所说的那样，对正义的区分既要对事也要对人，但是人们往往赞成物的平等，但是对人的平等却争执不下，主要原因我已经给出了——即人们在涉及自身的判断上都很糟糕；其次，因为争执的双方都在陈述一种片面的正义，但却想象自己谈论的是绝对的正义。对于其中一派来说，他们在某一方面不平等，例如财富，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在所有方面都不平等；而对于另一派来说，如果他们在某一方面平等，如自由的出身，他们就认为自己在所有方面都平等。但是他们漏掉了最重要的概念。如果人们聚集和交往仅仅是为了财富，他们在城邦中的权力就应与他们的财富成正比；那么寡头政体的主张似乎胜出了。如果让一个只支付一米那的人跟一个支付了九十九米那的人去平等享有这一百米那，这是不公平的，无论是这笔原始资金还是其利润都不能平均分配。城邦的存在也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如果只是为了生存，那么奴隶和野生动物就够组成一个城邦了，可他们做不到，原因是他们没有享受幸福的权力，也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城邦存在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联盟，或远离非正义，也不是为了交换和相互交往；如果是为了这些目的，那么替里尼人和迦太基人，以及其他缔结商务条约的各邦人民就可以成为同一个城邦的

公民了。确实，他们都订立过进出口的条约，约定不得相互伤害，而且有成文的盟约。但是，他们并没有设置共同的执政官员来保证缔约各方遵守约定；相反，各邦对此仍各自有不同的机构和人选。其中的一个城邦也不会要求另一城邦的公民符合自己的意愿，或者要求缔结协议的各方不能有任何非正义行为，或邪念，而只要求缔约城邦之间不得对彼此有非正义行为。但是，那些关心城邦良好管理的人考虑的是城邦里的美德和恶念。由此可进一步推断，真正的城邦，不止是个称号，它首要考虑的必然是公民的美德；偏离了这一目标，它不过是一个防御同盟，与其他同盟惟一差别就是那些同盟人分别住在不同地方而已；而法律不过是一种传统，正如智者吕哥弗隆所说，法律是“公民之间的要以正义对待彼此的誓约”，它没有真正的力量去塑造好公民。

This is obvious; for suppose distinct places, such as Corinth and Megara, to be brought together so that their walls touched, still they would not be one city, not even if the citizens had the right to intermarry, which is one of the rights peculiarly characteristic of states. Again, if men dwelt at a distance from one another, but not so far off as to have no intercourse, and there were laws among them that they should not wrong each other in their exchanges, neither would this be a state. Let us suppose that one man is a carpenter, another a husbandman, another a shoemaker, and so on, and that their number is ten thousand: nevertheless, if they have nothing in common but exchange, alliance, and the like, that would not constitute a state. Why is this? Surely not because they are at a distance from one another: for even supposing that such a community were to meet in one place, but that each man had a house of his own, which was in a manner his state, and that they made alliance with one another, but only against evil-doers; still an accurate thinker would not deem this to be a state, if their intercourse with one another was of the same character after as

before their union. It is clear then that a state is not a mere society, having a common place, established for the prevention of mutual crime and for the sake of exchange. These are conditions without which a state cannot exist; but all of them together do not constitute a state, which is a community of families and aggregations of families in well-being, for the sake of a perfect and self-sufficing life. Such a community can only be established among those who live in the same place and intermarry. Hence arise in cities family connections, brotherhoods, common sacrifices, amusements which draw men together. But these are created by friendship, for the will to live together is friendship. The end of the state is the good life, and these are the means towards it. And the state is the union of families and villages in a perfect and self-sufficing life, by which we mean a happy and honorable life.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假设有人能把两个不同的地方搬到一起，比如让梅加拉和科林斯的城墙相接，他们仍然不是同一个城邦，即使双方的居民能相互通婚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尽管通婚是专属于城邦特色的权力之一。同样，如果人们分散居住，但是距离没有远到会阻断他们的彼此往来，而且他们之间有法律禁止在交换中彼此伤害，这样的一群人也不能算是一个城邦。让我们假设一个人是木匠，另一个是农民，还有一个是鞋匠，以此类推，总人数是一万人；但是，如果他们只是相互交易，结盟等，此外便没有任何共同点，这样也不构成城邦。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当然不是他们远离彼此居住：因为即使我们假设这个群体会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每个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个房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的城邦，他们相互订立盟约，可盟约只是针对做坏事的人；但是，如果此后他们的交往仍维持联合之前的那些特点，那么对那些思维缜密的人来说，他们仍旧不能算是一个城邦。显然，如果一个人类社会，仅仅拥有同一个居住地，并且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相互之间犯罪和方便相互交易，那它不足以构成城邦。没有这些条件，城邦无法存在；但是把这些条件放在一起也不

能构成一个城邦，真正的城邦是一个家庭的集合，一个幸福健康的家庭们的聚合体，其目标是一种完美的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样的团体只能建立在那些生活在同一地方，而且相互通婚的人中间。因此，在城邦中，出现了家庭关系，兄弟关系，共同的祭祀，以及娱乐活动来增进友谊。这些活动是友谊创造的，因为友谊就是共同生活的愿望。一个城邦的终极目标就是美好生活，而这些活动则是通往这一目标的途径。所以，城邦就是一个家庭和村落的联合体，他们过着完美的自给自足生活，我们指的是一种幸福、有尊严的生活。

Our conclusion, then, is that political society exists for the sake of noble actions, and not of mere companionship. Hence they who contribute most to such a society have a greater share in it than those who have the same or a greater freedom or nobility of birth but are inferior to them in political virtue; or than those who exceed them in wealth but are surpassed by them in virtue.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政治团体的存在不仅是为了伙伴关系，更是为了高贵的行为。所以，那些对这个团体贡献最大的人，应该在其中拥有更大的权力，大于那些在家世和自由方面与他们平等甚至超过他们，但政治美德却不如他们的人；大于那些财富上超越他们但在美德方面却被他们反超的人。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it will be clearly seen that all the partisans of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speak of a part of justice only.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各派关于不同的政体形式都只提出了片面的正义观。

Part 10

第十章

There is also a doubt as to what is to be the supreme power in the state: Is it the multitude? Or the wealthy? Or the good? Or the one best man? Or a tyrant? Any of these alternatives seems to involve disagreeable consequences. If the poor, for example, because they are more in number, divide among themselves the property of the rich—is not this unjust? No, by heaven (will be the reply), for the supreme authority justly willed it. But if this is not injustice, pray what is? Again, when in the first division all has been taken, and the majority divide anew the property of the minority, is it not evident, if this goes on, that they will ruin the state? Yet surely, virtue is not the ruin of those who possess her, nor is justice destructive of a state; and therefore this law of confiscation clearly cannot be just. If it were, all the acts of a tyrant must of necessity be just; for he only coerces other men by superior power, just as the multitude coerce the rich. But is it just then that the few and the wealthy should be the rulers? And what if they, in like manner, rob and plunder the people—is this just? if so, the other case will likewise be just. But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all these things are wrong and unjust.

关于最高权力的归属也是一个难题。应该将其交给大多数人，还是有钱人，还是有美德的好人，还是一个最好的人，还是交给一个暴君？任何一种选择似乎都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例如，如果穷人，因为他们人多，而把富人的财产在穷人内部瓜分了——这难道不是非正义的吗？当然不是（答案会是这样），理由是这是最高权力的意志。但是，如果这都不算非正义，那什么才是呢？同理，如果在第一次分

割中一切都被分完了，而多数派再次分割少数派的财产，这难道还不够明显，这样继续下去，他们将毁掉城邦？然而，毫无疑问，有美德的人不会被美德摧毁，而正义也不会毁掉城邦；所以，这种没收他人合法财产的法律显然是非正义的。如果这都是正义的，那么一个暴君的全部行径也必然是正义的了；因为暴君不过是用其掌握的权力压迫他人而已，正如人数众多的穷人压迫富人一样。那么，让占人口少数的富人做统治者是正义的吗？万一他们也像刚刚讲的那样去劫掠多数派的财产呢——这样做正义吗？如果是的话，那前面那种情况同样是正义的。但是，毫无疑问，所有这类行为都是错误的和非正义的。

Then ought the good to rule and have supreme power? But in that case everybody else, being excluded from power, will be dishonored. For the offices of a state are posts of honor; and if one set of men always holds them, the rest must be deprived of them. Then will it be well that the one best man should rule? Nay, that is still more oligarchical, for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are dishonored is thereby increased. Some one may say that it is bad in any case for a man, subject as he is to all the accidents of human passion, to have the supreme power, rather than the law. But what if the law itself be democratical or oligarchical, how will that help us out of our difficulties? Not at all; the same consequences will follow.

那么，应该让好人们掌握最高权力并施行统治吗？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其他的人都被排除在权力之外，也就失去了公民的荣誉。因为城邦的公职就是作为公民的荣誉；而如果一个固定的人群一直掌权，显然其他人就都被剥夺了公民的荣誉。如果选一个最好的人来掌权是否会好一些呢？不会，这样做更具有寡头风格，原因是有更多人得不到公民荣誉。可能有人会说，让人而非法律执掌最高权力无论如何都是不好的，原因是人会受很多偶然性情感的影响。但是，万一法律本身是偏向于平民风格或寡头风格，那它又怎么帮我们摆脱上述困

境呢？这样一点帮助也没有；还是会出现相同的后果。

Part 11

第十一章

Most of these questions may be reserved for another occasion. The principle that the multitude ought to be supreme rather than the few best is one that is maintained, and, though not free from difficulty, yet seems to contain an element of truth. For the many, of whom each individual is but an ordinary person, when they meet together may very likely be better than the few good, if regarded not individually but collectively, just as a feast to which many contribute is better than a dinner provided out of a single purse. For each individual among the many has a share of virtue and prudence, and when they meet together, they become in a manner one man, who has many feet, and hands, and senses; that is a figure of their mind and disposition. Hence the many are better judges than a single man of music and poetry; for some understand one part, and some another, and among them they understand the whole. There is a similar combination of qualities in good men, who differ from any individual of the many, as the beautiful are said to differ from those who are not beautiful, and works of art from realities, because in them the scattered elements are combined, although, if taken separately, the eye of one person or some other feature in another person would be fairer than in the picture. Whether this principle can apply to every democracy, and to all bodies of men, is not clear. Or rather, by heaven, in some cases it is impossible of application; for the argument would equally hold about brutes; and wherein, it will be asked, do some men differ from brutes? But there may be bodies of men about whom our

statement is nevertheless true. And if so, the difficulty which has been already raised, and also another which is akin to it—viz., what power should be assigned to the mass of freemen and citizens, who are not rich and have no personal merit—are both solved. There is still a danger in aflowing them to share the great offices of state, for their folly will lead them into error, and their dishonesty into crime. But there is a danger also in not letting them share, for a state in which many poor men are excluded from office will necessarily be full of enemies. The only way of escape is to assign to them some deliberative and judicial functions. For this reason Solon and certain other legislators give them the power of electing to offices, and of calling the magistrates to account, but they do not allow them to hold office singly. When they meet together their perceptions are quite good enough, and combined with the better class they are useful to the state (just as impure food when mixed with what is pure sometimes makes the entire mass more wholesome than a small quantity of the pure would be), but each individual, left to himself, forms an imperfect judg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pular form of government involves certain difficulties. In the first place, it might be objected that he who can judge of the healing of a sick man would be one who could himself heal his disease, and make him whole—that is, in other words, the physician; and so in all professions and arts. As, then, the physician ought to be called to account by physicians, so ought men in general to be called to account by their peers. But physicians are of three kinds: there is the ordinary practitioner, and there is the physician of the higher class, and thirdly the intelligent man who has studied the art: in all arts there is such a class; and we attribute the power of judging to them quite as much as to professors of the art. Secondly, does not the same principle apply to elections? For a right election can only be made by those who have knowledge; those who know geometry, for example, will choose a geometrician

rightly, and those who know how to steer, a pilot; and, even if there be some occupations and arts in which private persons share in the ability to choose, they certainly cannot choose better than those who know. So that, according to this argument, neither the election of magistrates, nor the calling of them to account, should be entrusted to the many. Yet possibly these objections are to a great extent met by our old answer, that if the people are not utterly degraded, although individually they may be worse judges than those who have special knowledge—as a body they are as good or better. Moreover, there are some arts whose products are not judged of solely, or best, by the artists themselves, namely those arts whose products are recognized even by those who do not possess the art; for example, the knowledge of the house is not limited to the builder only; the user, or, in other words,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will be even a better judge than the builder, just as the pilot will judge better of a rudder than the carpenter, and the guest will judge better of a feast than the cook.

上述大部分问题，我们将留在后面再作讨论。目前，我们仍然坚持的一种原则是最高权力应该掌握在大众手中，而不是少数最好的人手中，这样虽然不能避免所有的麻烦，但是似乎包含了一丝真理。首先，民众当中的个体虽然很普通，但是当他们联合在一起，很有可能他们比少数有美德的好人要更卓越，这里说的不是他们的个人状态，而是整体状态，正如很多人共同出资的宴会远比一个人买单的大餐要丰盛一样。原因是民众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美德和智慧，当团结在一起时，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人，他有很多的手，很多的脚，还有很多的感知能力；在思维和性情方面也是具有多人份的。因此，民众对音乐和诗歌的评判比一个人的评判更准确；有人明白了这一部分，有人明白了另一部分，加起来他们就明白了整个作品的意义。好人的身上也有一种类似的不同品质的结合，他们不同于民众的任何一员，就像漂亮的人和不漂亮的人之间的区别一样，又如同艺术

品与现实的差别一样，原因是艺术品把分散的美丽融合为了一体，尽管分开来看，这个人的眼睛或那个人的其他部位，可能比画作中的更漂亮。但是这一原则能否应用于所有平民政体，或所有的人类团体，这一点仍不清楚。或者说，天啊，有些情况它是不可能适用的；理由是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兽类；这里，有人会问，人和兽类的有区别吗？但是，可能有些人类团体还是适用于上述原则的。如果属实，那么我们刚刚的疑问，以及另一个与其关系密切的问题——即应该把什么权利交给那些既不富有又没有什么个人功勋的自由人和公民组成的团体——同时都解决了。但是让他们参与城邦重要部门还是有危险，原因是他们的愚蠢会导致他们犯错，而他们的谎言会导致他们犯罪。同时，不让他们参与也有危险，如果一个城邦有很多穷人，他们不被允许担任公职，必然会对城邦产生敌意。惟一避免危险的方法就是分配给他们议事和司法的职责。因此，梭伦和一些其他的立法者，给予了他们选举公职人员的权力，还有考察执政官政绩的权力，只是拒绝了他们单独执掌行政部门的权力。当把他们集中起来时，他们就有了足够的能力完成这些职务，而且，让他们混在高等公民当中，也是对城邦有益的（正如某些未经提炼的材料，当与精炼食材混合在一起，却能让整个食物的营养比只有少数精炼食材时更全面），但是，如果把他们分开，每个人的判断却是不完善的。另一方面，这种平民形式的政体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不能说善于判断病人的恢复情况的人就是能够治好其疾病的人，并使他变得完好——换句话说，后者是医师；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每一种行业和技艺。那么，正如应该将一名医师召来接受其他医师评判，一般人都应该接受同行的评判。但是，医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普通的医师，第二类高级别的医师，第三类是专门研究医理的智者；其他行业也都有这样一类；而且我们对他们的专业判断力同样信任，就如同我们信任那些该技艺的专家一样。其次，同样的道理不应该用于选举吗？要选出正确的人，选举者也要有知识；比如，懂几何学的人，才能选出正确的几何学家，会开船人，才能选出好的舵手；而且，即使在一些具体的技艺和行业方面，普通人能力也能做出选择，但是，他们肯定也没有那些懂行的人选的好。所以，基于这一原则，我们不能把执政官的选举和对他们的工作的检查托付给普通民众。但是，很可能这些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用我们已有的答案去解决，即如果这些人没有过度退化，那么，虽然单个人判断力不如那些专业人士，但合在一起他们就会不差于这些专家甚至超过他们。而且，在有些具体的技艺方面，匠人并不是惟一最好的评判者，比如，有些行业，了解其作品的人其实并不专门从事该行业；比方说，盖房子的人不是房子的惟一评判者，使用者，或房屋的主人才是它更好的评判者，同样，一个舵手对舵柄的好坏比木匠有着更好的判断；宴会的客人比厨师对饭菜味道更有发言权。

This difficulty seems now to be sufficiently answered, but there is another akin to it. That inferior persons should have authority in greater matters than the good would appear to be a strange thing, yet the election and calling to account of the magistrates is the greatest of all. And these, as I was saying, are functions which in some states are assigned to the people, for the assembly is supreme in all such matters. Yet persons of any age, and having but a small property qualification, sit in the assembly and deliberate and judge, although for the great officers of state, such as treasurers and generals, a high qualification is required. This difficulty may be solv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preceding, and the present practice of democracies may be really defensible. For the power does not reside in the dicast, or senator, or ecclesiast, but in the court, and the senate, and the assembly, of which individual senators, or ecclesiasts, or dicasts, are only parts or members. And for this reason the many may claim to have a higher authority than the few; for the people, and the senate, and the courts consist of many persons, and their property collectively is greater than the property of one or of a few individuals holding great offices. But enough of this.

这一难题似乎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解答，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让那些更平庸的人而非好人在重大事件上拥有权威看上去很怪异，但是，最怪异的是让这些人对执政官进行选举和监察。如前文所述，在有些城邦中，这些职责确实被分配给了平民，原因是公民大会在所有这类事务中拥有至高权力。难以接受，不同年龄的人，而且只有数量很小的财产限额，坐在公民大会席位上，并议论着国家大事和审理案件，尽管对于城邦的高级官员，如财务大臣和将军，还是有更高的资质要求的。这个疑难也可以用与前一个相同的原则解决掉；而且，现行平民政体中的做法或许真地站得住脚。原因是权力并没有掌握在某一位陪审员手中，或掌握在一名长老或一名公民大会成员手中，而是交给了法庭，长老会，和整个公民大会，而其中的每个长老，或大会成员或陪审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或成员而已。因此，让多数派拥有比少数人更大的权威是正确的；因为民众，长老会，和法庭就是由很多不同的人组成的，他们的财产加起来超过任何一个或几个占据城邦重要职位的人的财产总和。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最终结论。

The discussion of the first question shows nothing so clearly as that laws, when good, should be supreme; and that the magistrate or magistrates should regulate those matters only on which the laws are unable to speak with precision owing to the difficulty of any general principle embracing all particulars. But what are good laws has not yet been clearly explained; the old difficulty remains. The goodness or badness, justice or injustice, of laws varies of necessity with the constitutions of states. This, however, is clear, that the laws must be adapted to the constitutions. But if so, true forms of government will of necessity have just laws, and perverted forms of government will have unjust laws.

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明确显示，一个城邦的法律，如果是好

的，就应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治安官或治安官们则只能在法律描述不够精确之处进行管理，因为通用的原则很难涵盖所有的细节。但是，何为好的法律，这一问题仍有待澄清；老问题依然存在。法律所代表的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等概念必然随着城邦的政体而改变。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法律必须适合于政体。如果这个观点属实，那么真正的政体必须拥有正义的法律，而变态的政体则有非正义的法律。

Part 12

第十二章

In all sciences and arts the end is a good, and the greatest good and in the highest degree a good in the most authoritative of all—this is 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which the good is justice, in other words, the common interest. All men think justice to be a sort of equality;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y agree in the philosophical distinctions which have been laid down by us about Ethics. For they admit that justice is a thing and has a relation to persons, and that equals ought to have equality. But there still remains a question: equality or inequality of what? Here is a difficulty which calls for political speculation. For very likely some persons will say that offices of state ought to be unequally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superior excellence, in whatever respect, of the citizen, although there is no other difference between him and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 for that those who differ in any one respect have different rights and claims. But, surely, if this is true, the complexion or height of a man, or any other advantage, will be a reason for his obtaining a greater share of political rights. The error here lies upon the surface, and may be illustrated from the other arts and sciences. When a number of flute players are equal in their

art,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ose of them who are better born should have better flutes given to them; for they will not play any better on the flute, and the superior instrument should be reserved for him who is the superior artist. If what I am saying is still obscure, it will be made clearer as we proceed. For if there were a superior flute-player who was far inferior in birth and beauty, although either of these may be a greater good than the art of flute-playing, and may excel flute-playing in a greater ratio than he excels the others in his art, still he ought to have the best flutes given to him, unless the advantages of wealth and birth contribute to excellence in flute-playing, which they do not. Moreover, upon this principle any good may be compared with any other. For if a given height may be measured wealth and against freedom, height in general may be so measured. Thus if A excels in height more than B in virtue, even if virtue in general excels height still more, all goods will be commensurable; for if a certain amount is better than some other, it is clear that some other will be equal. But since no such comparison can be made, it is evident that there is good reason why in politics men do not ground their claim to office on every sort of inequality any more than in the arts. For if some be slow, and others swift, that is no reason why the one should have little and the others much; it is in gymnastics contests that such excellence is rewarded. Whereas the rival claims of candidates for office can only be based on the possession of elements which enter into the composition of a state. And therefore the noble, or free-born, or rich, may with good reason claim office; for holders of offices must be freemen and taxpayers: a state can be no more composed entirely of poor men than entirely of slaves. But if wealth and freedom are necessary elements, justice and valor are equally so; for without the former qualities a state cannot exist at all, without the latter not well.

每种技艺和学问的结果都是一种美好，而最大的美好和最高级的、最权威的美好——即政治学，其中的美好就是正义，换句话说，就是共同利益。人们普遍认为正义是一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认同我们在哲学上对道德伦理所做的区分。原因是他们承认正义与人有关，而且平等的人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在什么方面平等，或是什么方面不平等呢？这个疑难，需要政治家的思考才能解决。有些人可能会说，城邦的职务应该按照公民的特长进行不平均分配，这个特长可以是任何方面的，哪怕他与团体的其他人之间没有其他任何区别；原因是在某一方面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权力和利益。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一个人的容貌或身高，或者任何其他优势，都可以成为他要求更多政治权力的理由。这种观点的错误一目了然，而且可以在其他技艺或科学上得到证明。如果许多笛师的艺术水平相当，那就没有理由把更好的笛子交给他们当中的出身更好的那些人；因为这些笛子不能让他们演奏地更好，所以更好的笛子应该留给水平更高超的艺术家。如果我说的还不清楚，那随着我们继续，这个问题会变得更清楚。假设有一个卓越的笛子演奏者，可是他在容貌和家世方面非常差，虽然这两方面的资质可能比笛子技巧要更宝贵，它们高出笛子技巧的价值远大于那个笛师在艺术上超出同行的方面，但是最好的笛子还是应该给他，除非财富和家世方面的优势能够促进笛子演奏的水平，而它们却没有这方面的功效。而且，按照这种原则，不同的特长之间都可以相互比较。假设一个特定的身高可以被测量为财富，并与自由相比较，那么所有的身高都可以这样测量。这样，如果A在身高方面卓越程度超过B在美德方面的卓越，即使美德一般比身高更有价值，那么所有的美德都成了可以测量的；如果特定的数值比另外一个更好，那么肯定有其他数值与它相等。但是，由于这种比较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显然在政治学当中，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把自己对公职的要求建立在每一种特长之上，就像在艺术方面一样。假设一个人跑得快，另一个人跑的慢，这并不能是他们应享有更多政治权力的理由，也不是另一人应享有更少政治权力的理由；这类特长只有在体育比赛中才会得到奖赏。所以，候选人对公职的竞争要求只能建立在他拥有的一些跟城邦构成有关的资质上。因此，那些出身高贵，或出身自由，或资产丰厚的人竞争这

些职务才有理由要求这些职位；因为出任公职者必须是自由人和纳税者：一个城邦不能全是穷人，就像一个城邦不能全是奴隶一样。但是如果说财富和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元素，那么正义和勇敢同样必不可少；因为没有前面两种品质，城邦根本无法生存；而没有后者它的存在也不会幸福。

Part 13

第十三章

If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is alone to be considered, then it would seem that all, or some at least, of these claims are just; but, if we take into account a good life, then, as I have already said, education and virtue have superior claims. As, however, those who are equal in one thing ought not to have an equal share in all, nor those who are unequal in one thing to have an unequal share in all, it is certain that all forms of government which rest on either of these principles are perversions. All men have a claim in a certain sense, as I have already admitted, but all have not an absolute claim. The rich claim because they have a greater share in the land, and land is the common element of the state; also they are generally more trustworthy in contracts. The free claim under the same tide as the noble; for they are nearly akin. For the noble are citizens in a truer sense than the ignoble, and good birth is always valued in a man's own home and country. Another reason is, that those who are sprung from better ancestors are likely to be better men, for nobility is excellence of race. Virtue, too, may be truly said to have a claim, for justice has been acknowledged by us to be a social virtue, and it implies all others. Again, the many may urge their claim against the few; for, when taken collectively, and compared with the few, they are stronger and richer and better. But, what if the good, the rich,

the noble, and the other classes who make up a state, are all living together in the same city, Will there, or will there not, be any doubt who shall rule? No doubt at all in determining who ought to rule in each of the above-mentioned forms of government. For states are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ces in their governing bodies-one of them has a government of the rich, another of the virtuous, and so on. But a difficulty arises when all these elements co-exist. How are we to decide? Suppose the virtuous to be very few in number: may we consider their numbers in relation to their duties, and ask whether they are enough to administer the state, or so many as will make up a state? Objections may be urged against all the aspirants to political power. For those who found their claims on wealth or family might be thought to have no basis of justice; on this principle, if any one person were richer than all the rest, it is clear that he ought to be ruler of them. In like manner he who is very distinguished by his birth ought to have the superiority over all those who claim on the ground that they are freeborn. In an aristocracy, or government of the best, a like difficulty occurs about virtue; for if one citizen be better than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however good they may be, he too, upon the same principle of justice, should rule over them. And if the people are to be supreme because they are stronger than the few, then if one man, or more than one, but not a majority, is stronger than the many, they ought to rule, and not the many.

如果只考虑城邦的生存，那么上述观点，全部或至少一部分是正义的；但是，如果目标是美好生活，那么，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教育和美德拥有更大的权重。但是，正如一个人在某一方面与他人平等，并不应在所有方面都享有平等，一个人在某一方面与别人不平等，也不应在所有方面都不平等，显然，所有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政体都是变态政体。我们已经承认，所有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有权参与城邦管

理，但并非所有人都拥有绝对的权力。富人要求参政，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田产，而土地是城邦的普遍要素；也因为他们通常在缔约方面更加可靠。自由人要求参政的理由与出身高贵之人相同；因为他们几乎是同根同源。出身高贵者比普通公民是更真实意义上的公民，而且良好的出身在一个人的家庭和祖国总是受人重视。另一个原因是，更优秀的祖先很有可能诞生出更优秀的后代，因为高贵的出身就是种族方面的特长。美德，同样，可以说有权参与管理，因为我们已经认可了正义作为一种社会美德的地位，这暗示了其他美德的权力。同理，多数派可能会辩称他们比少数派更有资格；因为就整体而言，他们比少数派更强大，更富有，且拥有更多的美德。但是，假如有美德者、有财富者、有高贵出身者，以及构成城邦的其他阶级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关于由谁来统治这个城邦的问题有没有疑问呢？在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各类政体中，关于确定统治者的人选并不存在疑问。因为这些政体的特点就在于它们政权主体的不同——其中一个拥有富人的政权，另一个是有美德者的政权，以此类推。但是，一旦所有这些元素同时存在，问题就出现了。我们该如何决定？假设有美德之人数量很少，我们应该按照他们的人数考虑他们的职责吗？并且问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服务于城邦，或有没有足够的人数来创建一个城邦？所有对于政治权力的渴望，都会遭到人们的竭力反对。对那些靠自己的财富和家世而提出权力要求的，可以认为这种要求没有正义的基础；因为按照这一原则，只要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比其他人都富有，那个人就该统治其他所有人。同样的道理，出身最高贵的人也应该凌驾于所有以自由出身为理由要求政治权力的人之上。在贵族政体或者说最好的人的统治中，关于美德也出现了类似的疑难；如果一个公民的美德超过政权中其他人的美德，无论他们拥有多少美德，按照相同的正义的原则，这个人应该统治其他所有人。而如果民众因为他们比少数派的力量强大而成为最高统治者，那么，如果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人，但是不构成多数，比多数派更强大，那么他们就应该统治，而不是多数派。

All these considerations appear to show that none of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men claim to rule and to hold all other men in subjection to them are strictly right. To those who claim to be masters of the government on the ground of their virtue or their wealth, the many might fairly answer that they themselves are often better and richer than the few—I do not say individually, but collectively. And another ingenious objection which is sometimes put forward may be met in a similar manner. Some persons doubt whether the legislator who desires to make the justest laws ought to legislate with a view to the good of the higher classes or of the many, when the case which we have mentioned occurs. Now what is just or right is to be interpreted in the sense of "what is equal"; and that which is right in the sense of being equal is to be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state, and the common good of the citizens. And a citizen is one who shares in governing and being governed. He differs under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but in the best state he is one who is able and willing to be governed and to govern with a view to the life of virtue.

所有这些研究似乎都表明，所有这些理由都不足以证明这些人对统治权力和其他人的服从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对于那些以自身德行和财富为依据而要求做政权主人的人，多数派就可以很正当地反对说，自己比少数派拥有更多的美德或更富有——这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不是作为个体而言。有时，有人提出的另一个非常聪明的反对意见会以类似的方式出现。有人曾质疑，如果出现上述情况，那么，渴望建立最正义法律的立法者在立法时应该考虑高等公民的利益还是多数派的利益呢？“什么是正义或正确”的问题应该从“什么是平等”的意义上来解读；而在平等范畴内回答“什么是正确”这一问题还应该参考城邦的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公民指一个参与统治行为并接受他人统治的人。不同的政体中公民的情况各有所不同，但是在最好的政体中，公民是一个有能力而且愿意进行以有美德的生活为目的统治和被他人统治。

If, however, there be some one person, or more than one, although not enough to make up the full complement of a state, whose virtue is so pre-eminent that the virtues or the political capacity of all the rest admit of no comparison with his or theirs, he or they can be no longer regarded as part of a state; for justice will not be done to the superior, if he is reckoned only as the equal of those who are so far inferior to him in virtue and in political capacity. Such an one may truly be deemed a God among men. Hence we see that legislation is necessarily concerned only with those who are equal in birth and in capacity; and that for men of pre-eminent virtue there is no law—they are themselves a law. Any would be ridiculous who attempted to make laws for them: they would probably retort what, in the fable of Antisthenes, the lions said to the hares, when in the council of the beasts the latter began haranguing and claiming equality for all. And for this reason democratic states have instituted ostracism; equality is above all things their aim, and therefore they ostracized and banished from the city for a time those who seemed to predominate too much through their wealth, or the number of their friends, or through any other political influence. Mythology tells us that the Argonauts left Heracles behind for a similar reason; the ship Argo would not take him because she feared that he would have been too much for the rest of the crew. Wherefore those who denounce tyranny and blame the counsel which Periander gave to Thrasybulus cannot be held altogether just in their censure. The story is that Periander, when the herald was sent to ask counsel of him, said nothing, but only cut off the tallest ears of corn till he had brought the field to a level. The herald did not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action, but came and reported what he had seen to Thrasybulus, who understood that he was to cut off the principal men in the state; and this is a policy not only expedient for tyrants or in practice confined to them, but

equally necessary in oligarchies and democracies. Ostracism is a measure of the same kind, which acts by disabling and banishing the most prominent citizens. Great powers do the same to whole cities and nations, as the Athenians did to the Samians, Chians, and Lesbians; no sooner had they obtained a firm grasp of the empire, than they humbled their allies contrary to treaty; and the Persian king has repeatedly crushed the Medes, Babylonians, and other nations, when their spirit has been stirred by the recollection of their former greatness.

假设有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德行非常出众，尽管他们的数量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城邦，但是全邦其他所有人的品德和政治才能加在一起都不如他或他们；这样的人就不应该继续被看作城邦的一部分；因为把他们同其余在品德和才能方面远逊于他们的人置于同一水平上来衡量，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这样的人就应该被看作是混迹人间的天神。由此可见，立法的考量必须针对出身和能力相等的人；而对于那些拥有远超众人之美德的人，则没有合适的法律——他们本身就是法律。任何想要为他们制定法律的尝试，都是极其荒谬的：他们可能会用安蒂叙尼的寓言中狮子对付兔子的手段来回敬这种尝试，寓言中野兔们在动物议事会上开始高谈阔论并要求给所有动物平等权利。基于这种理由，平民政体创制了“陶片放逐律”；在这些城邦中“平等”是最主要的目标，因此，他们对城邦中那些在力量，财富，朋友，或其他政治影响力方面太过强大的人，实行驱逐出境的做法，并限令他们一段时间内不得返归本邦。神话传说告诉我们，阿尔咯号船上的人们就是因此而将赫拉克利斯抛在身后；阿尔咯号船不想继续载他，因为害怕他太神勇，全体船员都无法约束他。由此可见，那些仇视暴君制并对伯利安德给司拉绪布卢的建议横加指责的人，他们的指责并不完全正确；故事说：暴君司拉绪布卢曾经派信使向伯利安德询问治国之道，后者一言不发，而是把最高的玉米铲倒了，直至整块田里玉米都一样高。信使不懂他的用意，就把看到的一幕回报司拉绪布卢，司拉绪布卢对此的理解是他应该清除邦内那些特别出众的人；这

种手段不仅对暴君有利，也不是只有暴君才会这样做，对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也同样有必要。陶片放逐律就是同样的措施，它的作用在于压制和驱逐那些最卓越的公民。强大的势力还会对弱小的城市或者民族采取相同的手段，如雅典人对付塞莫斯岛人、启沃岛人和累斯博岛人的手段；当时，雅典刚刚获得了对整个希腊的绝对霸权，就违背了和这些城邦的盟约，让他们向自己臣服；而每当米第亚人、巴比伦人和其他一些民族试图重新恢复前辈之荣耀时，波斯国王也频繁地打压他们。

The problem is a universal one, and equally concerns all forms of government, true as well as false; for, although perverted forms with a view to their own interests may adopt this policy, those which seek the common interest do so likewise. The same thing may be observed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for the painter will not allow the figure to have a foot which, however beautiful, is not in proportion, nor will the shipbuilder allow the stem or any other part of the vessel to be unduly large, any more than the chorus-master will allow any one who sings louder or better than all the rest to sing in the choir. Monarchs, too, may practice compulsion and still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ir cities, if their own government is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state. Hence where there is an acknowledged superiority the argument in favor of ostracism is based upon a kind of political justice. It would certainly be better that the legislator should from the first so order his state as to have no need of such a remedy. But if the need arises, the next best thing is that he should endeavor to correct the evil by this or some similar measure. The principle, however, has not been fairly applied in states; for, instead of looking to the good of their own constitution, they have used ostracism for factious purposes. It is true that under perverted forms of government, and from their special point of view, such a measure is just and expedient, but it is also clear that it

is not absolutely just. In the perfect state there would be great doubts about the use of it, not when applied to excess in strength, wealth, popularity, or the like, but when used against some one who is pre-eminent in virtue—what is to be done with him? Mankind will not say that such an one is to be expelled and exiled; on the other hand, he ought not to be a subject—that would be as if mankind should claim to rule over Zeus, dividing his offices among them. The only alternative is that all should joyfully obey such a ruler, according to what seems to be the order of nature, and that men like him should be kings in their state for life.

这种问题普遍存在，并与所有政体同样有关，无论是真正的政体还是变态的政体；因为，虽然有些变态政体这样做是为了统治者的私利，但是那些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政体也会这样做。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的艺术和科学领域；比如画家不会允许他人物拥有一只大得不成比例的脚，无论这只脚多美丽，造船师不会把一艘船的船柱或其他部分修得过于巨大，合唱团长也不允许队伍中有人在合唱时声音过于响亮和动听。君主们，如果其统治是为了城邦的利益，同样会采取打压政策，并保持城邦的和谐。因此，在出现了公认的超强人物的地方，支持实行陶片放逐律的观点在政治上是正义的。当然了，更好的做法是立法者在构建政体之初就能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从而不需要这种补救手段。但是，一旦这种局面出现，第二好的做法就是他要努力用这种或其他类似的方法纠正这种错误。然而，在许多城邦，这个原则并没有被正确的运用；因为他们将“陶片放逐律”当成了党同伐异的武器，而不是为了政体的利益筹谋。确实，在变态的政体中，从统治者的特殊视角出发，这种手段有其正义性和有效性，但是，其不完全合乎正义的一面也同样明显。在完美城邦中，采用这种政策可能会引起很大的质疑声，质疑声并非针对应用这种政策对付那些在力量，财富，或朋友方面过于出众者，而是说，如果这种政策被用于对付那些在美德上特别出众的人——该怎么对付这种人呢？人类不会说，这样的人应该被驱除和流放；另一方面，他也不能被别人统治——那就

好像人类声称要统治朱庇特，并在人类内部瓜分他的职能一样。惟一的选择就是让所有人遵从仿佛是自然的命令，快乐地服从于这样的统治者，而且这样的人应该成为城邦的终身君王。

Part 14

第十四章

The preceding discussion, by a natural transition, leads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royalty, which we admit to be one of the true forms of government. Let us see whether in order to be well governed a state or country should be under the rule of a king or under some other form of government; and whether monarchy, although good for some, may not be bad for others. But first we must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one species of royalty or many. It is easy to see that there are many, and that the manner of government is not the same in all of them.

前面的探讨自然地过渡到对君主政体的研究，我们承认这种政体是真正的政体之一。我们来研究一下，为了建立良好的管理秩序，一个城邦或国家是应该置于君主的统治之下还是采用其他的政体；君主政体虽然有利于某些城邦，但是否不利于其他城邦呢？但首先让我们来确定，君主政体是否只有一个种类，还是很多种类。显而易见，君主政体存在很多种类，各自的管理模式也不尽相同。

Of royalties according to law, (1) the Lacedaemonian is thought to answer best to the true pattern; but there the royal power is not absolute, except when the kings go on an expedition, and then they take the command. Matters of religion are likewise

committed to them. The kingly office is in truth a kind of generalship, irresponsible and perpetual. The king has not th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except in a specified case, as for instance, in ancient times, he had it when upon a campaign, by right of force. This custom is described in Homer. For Agamemnon is patient when he is attacked in the assembly, but when the army goes out to battle he has the power even of life and death. Does he not say—“When I find a man skulking apart from the battle, nothing shall save him from the dogs and vultures, for in my hands is death”?

（1）第一种是在法律约束之下的君主政体，其中斯巴达人的政体被认为给出了其真正形式的最佳答案；但是那里的君权并非绝对权力，除非是在征战途中，这时他们是最高统帅。宗教事务同样由他们来决定。实际上，君主的职责就是一种军事统帅权，不受辖制而且是终身的统帅。君主没有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除非是特殊的情况，例如，在古代，在大战期间，他们可以根据军法决人生死。这一传统在荷马史诗中有过描述。比如，当阿伽门农在公民大会上受到攻击时，他很有耐心，但是当军队奔赴战场时，他手握生死大权。他难道没说过：“如果我发现谁要想临阵脱逃，他必难逃鹰吻犬腹，因为我手中握着死神的权杖”？

This, then, is one form of royalty-a generalship for life: and of such royalties some are hereditary and others elective.

这就是君主政体的一种——一种终身制的军事统帅：这种君主有些是世袭制，其他的是选举产生。

(2) There is another sort of monarchy not uncommon among

the barbarians, which nearly resembles tyranny. But this is both legal and hereditary. For barbarians, being more servile in character than Hellenes, and Asiadics than Europeans, do not rebel against a despotic government. Such royalties have the nature of tyrannies because the people are by nature slaves; but there is no danger of their being overthrown, for they are hereditary and legal. Wherefore also their guards are such as a king and not such as a tyrant would employ, that is to say, they are composed of citizens, whereas the guards of tyrants are mercenaries. For kings rule according to law over voluntary subjects, but tyrants over involuntary; and the one are guarded by their fellow-citizens the others are guarded against them.

（2）还有另一种君主政体，在野蛮人当中并不罕见，其形式与暴君政体非常接近。但是，它既是法制又是世袭制。因为野蛮人在性格方面比希腊人更具奴性，而亚洲人则比欧洲人奴性更甚，面对暴政他们不会反抗。这种君主政体有暴君政体的性质，因为这里的人民有天然的奴性；但是这里不存在君主被推翻的危险，因为他们是世袭的而且是法制的。因此，他们的卫队与君主的卫队相同，而不是暴君会雇佣的那种卫队，也就是说，他们的君主卫队仍由本邦的公民构成，相反，暴君的卫队是由雇佣兵组成的。因为君主按照法律进行统治，被统治者自愿地服从，但是，被暴君统治的人们并不自愿；而且，前者受本邦公民守护，后者的卫队是用来防止公民叛乱的。

These are two forms of monarchy, and there was a third (3) which existed in ancient Hellas, called an Aesymnetia or dictatorship. This may be defined generally as an elective tyranny, which, like the barbarian monarchy, is legal, but differs from it in not being hereditary. Sometimes the office was held for life, sometimes for a term of years, or until certain duties had been

performed. For example, the Mytilenaeans elected Pittacus leader against the exiles, who were headed by Antimenides and Alcaeus the poet. And Alcaeus himself shows in one of his banquet odes that they chose Pittacus tyrant, for he reproaches his fellow-citizens for "having made the low-born Pittacus tyrant of the spiritless and ill-fated city, with one voice shouting his praises."

（3）除上述两种君主政体以外，还有第三种，存在于古希腊，称为"艾修姆乃德"或者独裁制。这种君主政体一般可以定义为一种民选的暴君政体，与野蛮人君主政体同样受法律约束，不同之处在于其王位不世袭。这种民选暴君有时终身在位，有时却只在位若干年，或以履行完特定义务为限。例如，米提利尼人拥立毕达库斯为王，率领他们抵挡安蒂米尼得和诗人阿尔喀俄带领的流亡者入侵。阿尔喀俄在自己的一首宴会颂诗中描绘他们选择毕达库斯为暴君的场景，他指责他的同胞们"拥立出身卑微的毕达库斯为暴君，让他率领着毫无斗志而且厄运临身的城邦，并且众口共一词赞美他"。

These forms of government have always had the character of tyrannies, because they possess despotic power; but inasmuch as they are elective and acquiesced in by their subjects, they are kingly.

这种制度从来都是暴君性质的，因为君主们拥有暴君的权力；但是由于他们是民选出来的，而且被统治者都是自愿的，所以它们也是君主政体。

(4) There is a fourth species of kingly rule—that of the heroic times—which was hereditary and legal, and was exercised over

willing subjects. For the first chiefs were benefactors of the people in arts or arms; they either gathered them into a community, or procured land for them; and thus they became kings of voluntary subjects, and their power was inherited by their descendants. They took the command in war and presided over the sacrifices, except those which required a priest. They also decided causes either with or without an oath; and when they swore, the form of the oath was the stretching out of their sceptre. In ancient times their power extended continuously to all things whatsoever, in city and country, as well as in foreign parts; but at a later date they relinquished several of these privileges, and others the people took from them, until in some states nothing was left to them but the sacrifices; and where they retained more of the reality they had only the right of leadership in war beyond the border.

（4）第四种君主政体——见于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时代——既是世袭制又是法制，统治对象自愿接受君主统治。这种统治者最初都是凭借某种技艺或者武力而有恩于人类的人；他们或者帮人民结成了团体，或者为人民赢得了疆土；于是人民自愿奉他们为王，而且他们的权力被其后代所世袭。他们在战时作为统帅，并主持祭祀仪式，专门由祭司执掌的仪式除外。他们也审理案件，有时要宣誓，有时则不会，当他们宣誓时，誓言的形式就是举起他们手中的王杖。在古代，他们的权力无所不包，包括城市的和全境的，以及同外邦来往等各种事件；但是后来，他们放弃了某些特权，还有一些特权被人民拿走，直到在有些城邦，留给君主的权力只剩下主持祭礼了；即便在那些还保留了更多君主政体实质的城邦，国王也仅仅保留着在出征外邦时指挥军队的权力。

These, then, are the four kinds of royalty. First the monarchy of the heroic ages; this was exercised over voluntary subjects, but

limited to certain functions; the king was a general and a judge, and had the control of religion The second is that of the barbarians, which is a hereditary despotic government in accordance with law. A third is the power of the so-called Aesynmete or Dictator; this is an elective tyranny. The fourth is the Lacedaemonian, which is in fact a generalship, hereditary and perpetual. These four forms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in the manner which I have described.

这些是四种不同的君主政体。最早的是英雄时代的君主政体；被统治者是一群自愿接受统治的人，而君主的权限是一些特定的职责；君主是统帅，法官，和宗教掌控者。第二种是野蛮人的君主政体；这是一种世袭的，专制的，并且受法律约束的政体。第三种被称为“艾修姆乃德”或独裁制；是一种民选的暴君政体。第四种是斯巴达式君主政体；实际上是一种世袭的终身统帅制。这四种君主政体的区别就是我们上面描述的那些。

(5) There is a fifth form of kingly rule in which one has the disposal of all, just as each nation or each state has the disposal of public matters; this form corresponds to the control of a household. For as household management is the kingly rule of a house, so kingly rule is the household management of a city, or of a nation, or of many nations.

（5）还有第五种君主政体，其中君主对一切事务拥有最高权力，这种形式就像一个民族或城邦拥有所有公共事务的最高权力一样；这种形式等同于一个家庭统治。因为家务管理用君权统治家庭，所以这种君主政体就是用家务管理的方式管理一个城市，一个民族或很多民族。

Part 15

第十五章

Of these forms we need only consider two, the Lacedaemonian and the absolute royalty; for most of the others he in a region between them, having less power than the last, and more than the first. Thus the inquiry is reduced to two points: first, is it advantageous to the state that there should be a perpetual general, and if so, should the office be confined to one family, or open to the citizens in turn? Secondly, is it well that a single man should have the supreme power in all things? The first question falls under the head of laws rather than of constitutions; for perpetual generalship might equally exist und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so that this matter may be dismissed for the present. The other kind of royalty is a sort of constitution; this we have now to consider, and briefly to run over the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it. We will begin by inquiring whether it is more advantageous to be ruled by the best man or by the best laws.

这些君主政体当中，我们只需要研究两种，斯巴达式君主政体和绝对君主政体；原因是其他的大都处于这两种之间的区域；君主的权力总是小于后一种而大于前一种。因此，我们的疑问归结为两点：第一点，拥有一个终身统帅是否有利于城邦？如果有利于城邦，那么，该职务是否应仅限某个家族的人担任，还是所有公民轮流担任？第二点，让一个人拥有对全邦所有事务的最高权力是否对城邦有利？第一个问题属于法律的范畴，而非政体应该考虑的；因为终身军事统帅一职同样可能存在于任何政体中，所以我们暂且摒弃这个问题。另一种君主政体属于一种政体；我们应该对此做一番研究，并对可能出现的疑难进行简单梳理。我们首先思考的是，对城邦更有利的做法是由一个最好的人来统治呢，还是由最好的法律统治？

The advocates of royalty maintain that the laws speak only in general terms, and cannot provide for circumstances; and that for any science to abide by written rules is absurd. In Egypt the physician is allowed to alter his treatment after the fourth day, but if sooner, he takes the risk. Hence it is clear that a government acting according to written laws is plainly not the best. Yet surely the ruler cannot dispense with the general principle which exists in law; and this is a better ruler which is free from passion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innate. Whereas the law is passionless, passion must ever sway the heart of man. Yes, it may be replied, but then on the other hand an individual will be better able to deliberate in particular cases.

支持君权的人坚持，法律只能是一些一般性规定；而不能满足具体情况；而且，对任何一门科学来说，只知因循成文的条例，都是很荒谬的。在埃及，一名医师在第四天以后可以改变治疗方法，但是如果更早的话，他要自己担风险。由此可见，完全按法律条文进行统治的政体显然不是最好的。但是，统治者当然不能完全抛弃法律所提供的那种一般性原则；而且，一个能不受激情影响的统治者比一个天生爱感情用事的统治者更优秀。法律是完全没有感情的；然而人类的心却时刻被感情左右。确实如此，有人会说，但是，另一方面，人更善于思考特殊事例。

The best man, then, must legislate, and laws must be passed, but these laws will have no authority when they miss the mark, though in all other cases retaining their authority. But when the law cannot determine a point at all, or not well, should the one best man or should all decide? According to our present practice assemblies meet, sit in judgment, deliberate, and decide, and their

judgments an relate to individual cases. Now any member of the assembly, taken separately, is certainly inferior to the wise man. But the state is made up of many individuals. And as a feast to which all the guests contribute is better than a banquet furnished by a single man, so a multitude is a better judge of many things than any individual.

所以，必须让最好的人来立法，而且，城邦应该批准他的法律，但是，如果法律错过目标，那么它将失去权威，但是在其他的案件中它还是可以保持权威。但是，当法律在一个问题上完全无法决定，或不能非常好地决定的时候，那么，应该让这个最好的人来决定呢，还是全体公民来决定？按照现行的方法一样，召开全体公民大会，在大会上，大家审理，商议，决定，大会所有的判决都是关于具体案件的。这里，任何一个大会成员，单独来看，肯定不如那个智者。但是城邦由很多这样的个人组成。就像一个人请客的宴席肯定没有每个客人都出资的宴席丰盛一样，因此，大众的判断在很多事务上要优于一个人的判断。

Again, the many are more incorruptible than the few; they are like the greater quantity of water which is less easily corrupted than a little. The individual is liable to be overcome by anger or by some other passion, and then his judgment is necessarily perverted; but it is hardly to be supposed that a great number of persons would all get into a passion and go wrong at the same moment. Let us assume that they are the freemen, and that they never act in violation of the law, but fill up the gaps which the law is obliged to leave. Or, if such virtue is scarcely attainable by the multitude, we need only suppose that the majority are good men and good citizens, and ask which will be the more incorruptible, the one good ruler, or the many who are all good? Will not the many? But, you will say, there

may be parties among them, whereas the one man is not divided against himself. To which we may answer that their character is as good as his. If we call the rule of many men, who are all of them good, aristocracy, and the rule of one man royalty, then aristocracy will be better for states than royalty, whether the government is supported by force or not, provided only that a number of men equal in virtue can be found.

同理，多数派比少数派更抗腐蚀；他们就好像更大的水体，所以不像小的水体那样易于被腐蚀。个人很容易被愤怒或其他感情冲昏了头脑，那时他的判断力必然发生扭曲；但很难想象许多人会同时被激情左右而出错。让我们假设他们是自由人，而且从来没有违反过法律，而只是在法律所无法涉及之处做必要的补充。或者，如果这种美德对大众来说很难获得，那么我们只需要假设大多数人都是好人和好公民，然后再来问，谁更难于被腐蚀，一个好的统治者，还是全体好人组成的多数派呢？难道不是多数派吗？但是，有人会说，多数派当中可能会有派系纷争，而一个人则不会出现自己反对自己的情况。对于这种质疑，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他们的性格与他的一样好。假设一个城邦全部由好人构成，若它由多数派统治，我们称它为贵族政体，若由一个人统治则称为君主政体，那么，贵族政体比君主政体更有利于城邦，无论这个政权有没有武力支持，当然，前提是能集齐许多同样有美德的人。

The first governments were kingships, probably for this reason, because of old, when cities were small, men of eminent virtue were few. Further, they were made kings because they were benefactors, and benefits can only be bestowed by good men. But when many persons equal in merit arose, no longer enduring the pre-eminence of one, they desired to have a commonwealth, and set up a constitution. The ruling class soon deteriorated and enriched

themselves out of the public treasury; riches became the path to honor, and so oligarchies naturally grew up. These passed into tyrannies and tyrannies into democracies; for love of gain in the ruling classes was always tending to diminish their number, and so to strengthen the masses, who in the end set upon their masters and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Since cities have increased in size, no other form of government appears to be any longer even easy to establish.

因此，最初的政权一般是君主政体，可能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古代城市很小，有突出美德的人数量也少。而且，君主们被拥立是他们对人类有功劳，而这种功劳只有好人能做出来。但是，当许多有同样功勋的人出现后，他们不再容忍一个人独领风骚，而是渴望拥有一个自由城邦，并建立一种政体。很快，统治阶级腐败了并且侵占公共财物来中饱私囊；财富成了通往荣誉的道路，所以，寡头政体自然出现。这些又过渡到了暴君政体，而暴君政体过渡到了平民政体；因为统治阶级对收益的热衷总是会让他们的数目不断减少，同时也使民众的力量不断加强，并最终打倒了他们的主人并建立了平民政体。自那以后，由于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其他类型的政体似乎很难再建立起来。

Even supposing the principle to be maintained that kingly power is the best thing for states, how about the family of the king? Are his children to succeed him? If they are no better than anybody else, that will be mischievous. But, says the lover of royalty, the king, though he might, will not hand on his power to his children. That, however, is hardly to be expected, and is too much to ask of human nature. There is also a difficulty about the force which he is to employ; should a king have guards about him by whose aid he may be able to coerce the refractory? If not, how will he administer

his kingdom? Even if he be the lawful sovereign who does nothing arbitrarily or contrary to law, still he must have some force wherewith to maintain the law. In the case of a limited monarchy there is not much difficulty in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the king must have such force as will be more than a match for one or more individuals, but not so great as that of the people. The ancients observe this principle when they have guards to any one whom they appointed dictator or tyrant. Thus, when Dionysius asked the Syracusans to allow him guards, somebody advised that they should give him only such a number.

甚至，假设我们仍然坚持君主政体是最有利于城邦的政体，那君主的家庭如何呢？君主的孩子应该继承王位吗？如果这些君主的孩子泯然众人，让他们登上王位将是城邦的灾难。支持王权的人可能会说，君主虽然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不会把权力交给这样的孩子。但是这种观点很难让人相信，因为它需要有超越人类本性的更好的美德。还有一个难题就是君主应该拥有的武力；君主是否可以拥有卫队，从而可以镇压那些桀骜不驯之徒呢？假使没有这种武力，他又如何进行统治？即使他是一个守法君主，从不专权枉法，他还是需要一种武力来保障法律权威。就一种有限的君主政体而言，回答这一问题并不难；君主必须拥有一支合适的武装，这支武装的力量应该足够让君主比城邦的任何一个人或更多人都更强大，但是这种力量必须小于人民的力量。古人在为他们任命的暴君或独裁者成立卫队时，就是遵循着这种原则。因此，狄欧尼修向叙拉古人要求设置卫队时，有人曾建议他们应该只允许他拥有这么多卫兵。

Part 16

第十六章

At this place in the discussion there impends the inquiry respecting the king who acts solely according to his own will he has now to be considered. The so-called limited monarchy, or kingship according to law, as I have already remarked, is not a distinct form of government, for under all governments, as, for example, in a democracy or aristocracy, there may be a general holding office for life, and one person is often made supreme ov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state. A magistracy of this kind exists at Epidamnus, and also at Opus, but in the latter city has a more limited power. Now, absolute monarchy, or the arbitrary rule of a sovereign over an the citizens, in a city which consists of equals, is thought by some to be quite contrary to nature; it is argued that those who are by nature equals must have the same natural right and worth, and that for unequals to have an equal share, or for equals to have an uneven share, in the offices of state, is as bad as for different bodily constitutions to have the same food and clothing. Wherefore it is thought to be just that among equals every one be ruled as well as rule, and therefore that an should have their turn. We thus arrive at law; for an order of succession implies law. And the rule of the law, it is argued, is preferable to that of any individual. On the same principle, even if it be better for certain individuals to govern, they should be made only guardians and ministers of the law. For magistrates there must be—this is admitted; but then men say that to give authority to any one man when all are equal is unjust. Nay, there may indeed be cases which the law seems unable to determine, but in such cases can a man? Nay, it will be replied, the law trains officers for this express purpose, and appoints them to determine matters which are left undecided by it, to the best of their judgment. Further, it permits them to make any amendment of the existing laws which experience suggests. Therefore he who bids the law rule may be deemed to bid God and Reason alone rule, but he who bids man rule adds an element of the beast; for desire is a wild beast, and

passion perverts the minds of rulers, even when they are the best of men. The law is reason unaffected by desire. We are told that a patient should call in a physician; he will not get better if he is doctored out of a book. But the parallel of the arts is clearly not in point; for the physician does nothing contrary to rule from motives of friendship; he only cures a patient and takes a fee; whereas magistrates do many things from spite and partiality. And, indeed, if a man suspected the physician of being in league with his enemies to destroy him for a bribe, he would rather have recourse to the book. But certainly physicians, when they are sick, call in other physicians, and training-masters, when they are in training, other training-masters, as if they could not judge judge truly about their own case and might be influenced by their feelings. Hence it is evident that in seeking for justice men seek for the mean or neutral, for the law is the mean. Again, customary laws have more weight, and relate to more important matters, than written laws, and a man may be a safer ruler than the written law, but not safer than the customary law.

讨论进行到这里，出现了对那种完全按照个人意愿来统治的君主的疑问，我们必须来探讨一下他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所谓的有限君主政体，或法制君主政体并非一种确切的政体形式，因为在任何政体中，例如，在平民政体或贵族政体中，都可能有这样一个终身制的将军，而且也经常有一个人在城邦管理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比如爱庇丹诺的执政官就是如此，又如在奥布斯，但是后者的执政官权力更有限。绝对君主政体，或君主对全体公民的专权统治，在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城邦里，被有些人认为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他们认为，那些生来平等的人必须拥有相同的、天赋的权力和价值，而且，在城邦的公职方面，让不平等的人拥有平等的权力或让平等的人拥有不平等的权力，其害处不亚于让不同体格的人吃相同的食物或穿同一种衣服。因此，人们认为，公平的做法是让那些平等的人中的每一个

都既参与统治又接受统治，所以，所有人应该轮流统治。这样就涉及到了法律；因为一种公职轮替的秩序即法律。普遍的观点是，法律的统治比任何一个公民的统治都更卓越。按照这种说法，即使将城邦交给某些人统治更为有利，他们还是应该仅仅作为法律的守护者和执行者而存在。因为执政官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为大家所公认；但是，这时人们会说，在人人平等的城邦，将权柄交给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公平的。确实，法律似乎对于有些案件无法决定，但是，对于这样的情况，人一定能有作为吗？不能，有人会回答说，法律为这一明确目标对执政官们进行了培训，并授权他们用自己最好的判断力去决定法律未决之事。而且，法律允许他们凭借经验对现行法律做适当修改。因此，那些主张法治的人，可以认为他们只主张天神和理性统治，但是，那些主张人治者，又给统治添加了一点野兽元素；因为欲望就是一只野性难驯的动物，而情感会扭曲统治者的心智，即使是那些最好的人也无法避免。而法律是剔除了欲望的理智。众所周知，病人应该找医师来诊治；如果他只是照着医书给自己治病肯定不会好转。但是，这个技艺方面的类比明显不太恰当；因为医师不会因与病人的友谊，而做出违规的举动；他只是治好病人并收取报酬；然而，执政官员们做很多事都靠个人好恶。事实上，如果病人怀疑他的医师因受贿而与其敌人串通要谋害自己时，他会宁愿向医书求取治病之法。当然了，当医师们生病时，他们也经常找来其他的医师为自己诊治；体育教练们在自己进行锻炼时，也常求教于其他的体育教练，因为涉及到自身，他们也无法避免因情感影响而做出错误的判断。由此可得，当人们寻求正义时，就是在寻找一种中间或中立；法律恰恰是这样一个中正无私的存在。同理，代表风俗习惯的“不成文法”比“成文法”实际上更具权威性，所涉及的事情也更为重要，而且，一个人可能是比成文法更安全的统治者，却无法比不成文法更安全。

Again, it is by no means easy for one man to superintend many things; he will have to appoint a number of subordinates, and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whether these subordinates always existed or were appointed by him because he needed theme If, as I said

before, the good man has a right to rule because he is better, still two good men are better than one: this is the old saying, two going together, and the prayer of Agamemnon, “Would that I had ten such councillors!”

同理，一个人要监管很多的事情绝对不容易；他必须任命一些辅助人员，而且，无论这些辅助人员是一直存在还是因为需要而临时任命的，这中间并没有什么分别。假如，像我之前所说的，好人有权统治，因为他比别人更好，可是两个好人总比一个更好：就像古语说的那样，愿二人同行，还有阿伽门农的祈祷词，“请赐我十个这样的谋士吧！”

And at this day there are magistrates, for example judges, who have authority to decide some matters which the law is unable to determine, since no one doubts that the law would command and decide in the best manner whatever it could. But some things can, and other things cannot, be comprehended under the law, and this is the origin of the nexted question whether the best law or the best man should rule. For matters of detail about which men deliberate cannot be included in legislation. Nor does any one deny that the decision of such matters must be left to man, but it is argued that there should be many judges, and not one only. For every ruler who has been trained by the law judges well; and it would surely seem strange that a person should see better with two eyes, or hear better with two ears, or act better with two hands or feet, than many with many; indeed, it is already the practice of kings to make to themselves many eyes and ears and hands and feet. For they make colleagues of those who are the friends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governments. They must be friends of the monarch and of his government; if not his friends, they will not do what he wants; but

friendship implies likeness and equality; and, therefore, if he thinks that his friends ought to rule, he must think that those who are equal to himself and like himself ought to rule equally with himself. These are the principal controversies relating to monarchy.

在当今世上，有一些执政官们，例如，法官，有权对某些法律不能决定的案件做出裁决，因为没人会怀疑在法律能够决定的案件中，它会做出最佳的裁决。但是，有些事情法律能包含，而其他的则不能，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该让最好的人还是最好的法律来统治呢？原因是由人审议的事件细节都写进法律当中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人反对把这类事件留给人来决定，但是有人认为，应该设置很多法官而不只一位。原因是每一位在法律方面训练有素的统治者都能审判地很好；但是要说一个人能用两只眼睛看的更清楚，两只耳朵听地更清楚，两只手和两只脚做得更好，并能胜过许多人的许多双眼睛，许多只耳朵，和许多只手脚，这未免显得荒谬；事实上，君主们已经在这样做了，他们给自己装上了很多的眼睛，耳朵和手脚。因为他们任命自己的朋友和城邦的朋友做自己的同僚。这些人必须是君主和他的政权的朋友；假如不是，他们就不会按君主的心意去做事；但是朋友关系暗示着相似性和平等；因此，如果一名君主认为他的朋友应该与他共同管理城邦，那么城邦之内与君主相似和平等的人们也应该参与管理。这些就是有关君主政体的主要争议所在。

Part 17

第十七章

But may not all this be true in some cases and not in others? for there is by nature both a justice and an advantage appropriate to the rule of a master, another to kingly rule, another to constitutional rule; but there is none naturally appropriate to

tyranny, or to any other perverted form of government; for these come into being contrary to nature. Now, to judge at least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it is manifest that, where men are alike and equal, it is neither expedient nor just that one man should be lord of all, whether there are laws, or whether there are no laws, but he himself is in the place of law. Neither should a good man be lord over good men, nor a bad man over bad; nor, even if he excels in virtue, should he have a right to rule, unless in a particular case, at which I have already hinted, and to which I will once more recur. But first of all, I must determine what natures are suited for government by a king, and what for an aristocracy, and what for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但是，或许我们这些主张只适合某些情况，却不适合其他？从自然性来看，主人的统治，君主的统治，和政治统治各自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正义和优势；但是没有符合暴君政体或其他的变态政体自然的正义和优势；因为他们都违背了自然规律。至少通过前面的论述，很显而易见的是，在由平等的和相似的人构成的城邦中，让一个人当所有人的君主不但没有好处而且不合乎正义，或者说无论有没有法律，他本身就占据了法律的位置。也不应该让一个好人去统治其他好人，或是让一个坏人统治其他坏人；甚至，即使一个人在美德上很卓越，也不应该让他统治其他人，除非是特殊情况，这种特殊情况我前面已经暗示过，而且还将再次提到。但首先，让我们来确定什么样的天性适宜于君主政体、或贵族政体、或共和政体。

A people who are by nature capable of producing a race superior in the virtue needed for political rule are fitted for kingly government; and a people submitting to be ruled as freemen by men whose virtue renders them capable of political command are adapted for an aristocracy; while the people who are suited for

constitutional freedom are those among whom there naturally exists a warlike multitude able to rule and to obey in turn by a law which gives office to the well-to-do according to their desert. But when a whole family or some individual, happens to be so pre-eminent in virtue as to surpass all others, then it is just that they should be the royal family and supreme over all, or that this one citizen should be king of the whole nation. For, as I said before, to give them authority is not only agreeable to that ground of right which the founders of all states, whether aristocratical, or oligarchical, or again democratical, are accustomed to put forward (for these all recognize the claim of excellence, although not the same excellence), but accords with the principle already laid down. For surely it would not be right to kill, or ostracize, or exile such a person, or require that he should take his turn in being governed. The whole is naturally superior to the part, and he who has this pre-eminence is in the relation of a whole to a part. But if so, the only alternative is that he should have the supreme power, and that mankind should obey him, not in turn, but always. These are the conclusions at which we arrive respecting royalty and its various forms, and this is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it is or is not advantageous to states, and to which, and how.

一种人如果天生能够制造一个在政治统治美德上特别突出的族群，那么这种人适于君主政体；而一种人如果天生习于作为自由人而服从于那些拥有政治统治美德的人，这种人适合于贵族政体；而一种适合于政治自由人中间天然存在一种好战的群体，他们能够按照法律去轮流统治和接受统治，这种法律按照各自的美德授权城邦富裕公民们管理城邦。如果一个家族或个人，碰巧拥有远超城邦中其他所有人的美德，那么令该家族成为王室并拥有至高权力是符合正义的，或者这个人应该做整个民族的君王。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授予他们权柄不仅符合所有城邦创建者都会提出的正确立场，无论他们是贵族政体

的，寡头政体的，或是平民政体的（因为这些政体都看重人的特长，尽管各自看重的特长不同），而且符合我们之前确定的原则。当然，对这样一个德行出众的人采取杀害，驱逐，或清除，或者让他按顺序接受他人统治的做法都是不对的。整体自然优于部分，而这样拥有超群美德的人也存在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之中。但是，承认这一点的话，那惟一的选择就是让他享有最高权力，所有人都服从他，不是轮流执政，而是永远。这些就是我们关于君主政体及其不同形式的结论，也是我们对下列问题的回答，即君主政体是否有益于城邦？对哪些城邦有益，和通过什么方式奏效。

Part 18

第十八章

We maintain that the true forms of government are three, and that the best must be that which is administered by the best, and in which there is one man, or a whole family, or many persons, excelling all the others together in virtue, and both rulers and subjects are fitted, the one to rule, the others to be ruled, in such a manner as to attain the most eligible life. We showed at the commencement of our inquiry that the virtue of the good man is necessarily the same as the virtue of the citizen of the perfect state. Clearly then in the same manner, and by the same means through which a man becomes truly good, he will frame a state that is to be ruled by an aristocracy or by a king, and the same education and the same habits will be found to make a good man and a man fit to be a statesman or a king.

我们坚持认为真正的政体形式有三种，其中最好的必然是由最好的人治理的，其中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一个家族，有时是许多人，

他们在美德上远超其他人的人，其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很适合自己的身份，一方适于统治，其他的适合被统治，这种形式是为了营造最美好的生活。在讨论之初，我们已经指出了，一个好人的美德和完美的政体中的好公民的美德必然是相同的。显然，以同样的方式，一个好人用给自己带来真正美德的同样的方法，可以构建一个由一名贵族或君主统治的城邦，而且，可以利用相同的教育和习惯去造就一个好人，一个适合做政治家或君主的人。

Having arrived at these conclusions, we must proceed to speak of the perfect state, and describe how it comes into being and is established.

达成上述结论之后，我们必须进一步谈论完美政体，并描述这种政体是怎样形成并建立起来的。

Book Four

第四卷

Part 1

第一章

In all arts and sciences which embrace the whole of any subject, and do not come into being in a fragmentary way, it is the province of a single art or science to consider all that appertains to a single subject. For example, the art of gymnastic considers not only the suitableness of different modes of training to different bodies (2), but what sort is absolutely the best (1); (for the absolutely best must suit that which is by nature best and best furnished with the means of life), and also what common form of training is adapted to the great majority of men (4). And if a man does not desire the best habit of body, or the greatest skill in gymnastics, which might be attained by him, still the trainer or the teacher of gymnastic should be able to impart any lower degree of either (3). The same principle equally holds in medicine and shipbuilding, and the making of clothes, and in the arts generally.

任何技艺或科学如果包含一个主题的整体，而不满足于片断的陈述，那么这种技艺或科学的职责就是把所有跟这一主题相关的方面全部加以考虑。例如体育学这一学科就要不仅研究各种训练模式对不同体质的适合程度（2），还要考虑什么模式是绝对的最佳（1）；（因为最好的模式必须适合拥有着先天最好的体质而且享有最优越的生活条件的人），以及哪一种普通训练方法能够适合于大多数人的体质（4）。而且，如果一个人并不渴望最佳的体质，或体育方面最伟大

的技巧，而这些都是他有可能获得的，那么教练或体育老师还是能够提供一些这两方面更低层次的训练方法（3）。虽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巧，但这并不是说那些有志于成为体育锻炼的大师并教授年轻人此类技能的人在专业方面不需要精益求精。同样的原则，也适合于适用于医疗或造船或制衣，以及其他一切技艺。

Hence it is obvious that government too is the subject of a single science, which has to consider what government is best and of what sort it must be, to be most in accordance with our aspirations, if there were no external impediment, and also what kind of government is adapted to particular states. For the best is often unattainable, and therefore the true legislator and statesman ought to be acquainted, not only with (1) that which is best in the abstract, but also with (2) that which is best relatively to circumstances. We should be able further to say how a state may be constituted under any given conditions (3); both how it is originally formed and, when formed, how it may be longest preserved; the supposed state being so far from having the best constitution that it is unprovided even with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the best; neither is it the bes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but of an inferior type.

显然，政体也是这样一门单一学科的主题，所以它必须考虑哪一种政体是最好的，在没有外来干扰的情况下，最符合我们的愿望的政体必须是哪种类型；以及什么样的政体最适合于特定的城邦。因为最好的政体通常不能实现，因此，真正的立法家和政治家不但要熟悉（1）理想条件下的最完美政体，还要熟悉（2）在具体情况下最适合的政体类型。当然，我们还应该知道，一个城邦在任何特定的条件下如何建立起来（3）；包括如何创立城邦，以及在建成以后，如何使其维持最长的时间；这里考虑的城邦不但没有建立最好的政体，甚至

不具备充足的条件去实现这样的政体；而且在当前情况下其政体也不是最合适的，而是一种较差的政体。

He ought, moreover, to know (4) the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is best suited to states in general; for political writers, although they have excellent ideas, are often unpractical. We should consider, not only what form of government is best, but also what is possible and what is easily attainable by all. There are some who would have none but the most perfect; for this many natural advantages are required. Others, again, speak of a more attainable form, and, although they reject the constitution under which they are living, they extol some one in particular, for example the Lacedaemonian. Any change of government which has to be introduced should be one which men, starting from their existing constitutions, will be both willing and able to adopt, since there is quite as much trouble in the reformation of an old constitution a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one, just as to unlearn is as hard as to learn. And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statesman already mentioned, he should be able to find remedies for the defects of existing constitutions, as has been said before. This he cannot do unless he knows how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there are. It is often supposed that there is only one kind of democracy and one of oligarchy. But this is a mistake; and, in order to avoid such mistakes, we must ascertain what differences there are in the constitutions of states, and in how many ways they are combined. The same political insight will enable a man to know which laws are the best, and which are suited to different constitutions; for the laws are, and ought to be, relative to the constitution, and not the constitution to the laws. A constitution is the organization of offices in a state, and determines what is to be the governing body, and what is the end of each community. But

laws are not to be confounded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nstitution; they are the rules according to which the magistrates should administer the state, and proceed against offenders. So that we must know the varieties, and the number of varieties, of each form of government, if only with a view to making laws. For the same laws cannot be equally suited to all oligarchies or to all democracies, since there is certainly more than one form both of democracy and of oligarchy.

此外，他还应该懂得（4）什么样的政体普遍适合于所有的城邦；因为政治学学者们，虽然有很多出色的见解，但往往脱离实际。我们不但要考虑什么是最好的政体，还要考虑什么政体在所有城邦都可能实现，而且要能够简单易行。有些政治家只追求最完美的政体；可这种政体的实现往往需要很多天然有利条件。另一些，同样研究一种更具现实性的政体，但是，他们不满意本邦政体，而往往盛赞某种具体的政体，例如，斯巴达人的政体。对政体的任何必须的修改，都应该从现有条件出发，要让人们乐于并且有能力接受它，因为完善一个旧政体比创建一个新政体的困难几乎等同，正如把已经学会的东西忘掉和学习新东西的难度不相上下。因此，政治家除了具备上述能力以外，还应该能想我们刚刚讲过的，帮助现行政体弥补他们的缺陷。如果他不熟悉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政体，他就不能做到这一点。有人认为只有一种平民政体或只有一种寡头政体。这是一种错误认识；为了避免这类错误，我们必须明确不同城邦的政体之间的差别是什么，这些差别有哪些不同的方式可以相互结合。同样的政治洞见还能让一个人懂得哪一种法律是最好的，什么法律最适合不同的政体；因为每一种法律都是、也应该是适应于政体的，而不是让政体适应于法律。政体是一个城邦不同职位的组织结构，它决定统治主体是谁，以及每个团体的最终目标。但是，不能把法律和政体的原则混为一谈；法律是执政官应该如何治理城邦的一些规定，并作为他们惩罚罪犯的依据。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各种政体的变体，及变体的数量，即使他考虑的只是制定法律。同一部法律不可能同等程度地适应所有平民政体

或寡头政体，因为这两种政体各自都有很多变体。

Part 2

第二章

In our original discussion about governments we divided them into three true forms: kingly rule, arist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three corresponding perversions—tyranny, oligarchy, and democracy. Of kingly rule and of aristocracy, we have already spoken, for the inquiry into the perfect state is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two forms thus named, since both imply a principle of virtue provided with external means. We have already determined in what aristocracy and kingly rule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and when the latter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what follows we have to describe the so-calle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which bears the common name of all constitutions, and the other forms, tyranny, oligarchy, and democracy.

在我们最初对政体的讨论中，我们把政体分成了三种真正的类型：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他们各自对应一个变态类型：暴君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我们已经对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进行了研究，因为对完美政体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在研究这两种政体；这两种政体需要一种外部条件并以建立社会美德为原则。我们已经确定了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差别所在，以及何时应该建立君主制。接下来，我们应该描述一下所谓的共和政体，它使用了所有政体的通用名称，而且我们还要研究一些其他的政体，如暴君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

It is obvious which of the three perversions is the worst, and which is the next in badness. That which is the perversion of the first and most divine is necessarily the worst. And just as a royal rule, if not a mere name, must exist by virtue of some great personal superiority in the king, so tyranny, which is the worst of governments, is necessarily the farthest removed from a well-constituted form; oligarchy is little better, for it is a long way from aristocracy, and democracy is the most tolerable of the three.

这三种变态政体当中哪一种最糟糕，哪一种在糟糕程度上仅次于前者，这个问题一目了然。从最优良而近乎神圣的政体变态而来的一定就是最糟糕的。作为真正的君主政体，而非仅仅是名义上的，其存在必然依靠君主的某种超乎寻常的个人美德，所以，暴君政体，作为最糟糕的政体，必然与健全的形式相差最远；寡头政体稍微好一点，因为它与贵族政体差距也甚大，而三者中最能够让人容忍的是平民政体。

A writer who preceded me has already made these distinctions, but his point of view is not the same as mine. For he lays down the principle that when all the constitutions are good (the oligarchy and the rest being virtuous), democracy is the worst, but the best when all are bad. Whereas we maintain that they are in any case defective, and that one oligarchy is not to be accounted better than another, but only less bad.

在我之前，已经有学者对这种区分做过论述，但是他的观点与我不同。按照他所设定的原则，所有的政体都是好的（寡头政体和其他的是有美德的），平民政体是最糟糕的；但是如果所有政体都是坏的，平民政体却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坚持认为这些观点无论如何都

有缺陷，而且，他也不应该说这个寡头政体比那个寡头政体好，只能说这一个没那么糟糕而已。

Not to pursue this question further at present, let us begin by determining (1) how many varieties of constitution there are (since of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there are several): (2) what constitution is the most generally acceptable, and what is eligible in the next degree after the perfect state; and besides this what other there is which is aristocratical and well-constituted, and at the same time adapted to states in general; (3) of the other forms of government to whom each is suited. For democracy may meet the needs of some better than oligarchy, and conversely. In the next place (4) we have to consider in what manner a man ought to proceed who desires to establish some one among these various forms, whether of democracy or of oligarchy; and lastly, (5) having briefly discussed these subjects to the best of our power, we will endeavor to ascertain the modes of ruin and preservation both of constitutions generally and of each separately, and to what causes they are to be attributed.

目前，我们暂不对这个问题做深入讨论，我们先来确定一下几个问题（1）到底有多少政体的变体（既然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各有几种不同的变体）：（2）最普遍令人满意的是何种政体，以及仅次于最佳形式的政体是什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种贵族性质的政体，并且是结构合理的，同时又适用于所有城邦的呢？（3）其余的政体分别适合于那些城邦呢？因为，平民政体可能比寡头政体更满足某些人的需要，反之亦然。然后，我们要考虑的是，（4）对于那些想要建立其中一种政体的人们来说，例如寡头政体或平民政体中的一个变体，他们应该如何进行？最后，（5）当我们在能力范围以内简单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还应努力地确定，造成这些政体毁灭和维持的

共同模式及各自特殊模式，还有其成因。

Part 3

第三章

The reason why there are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is that every state contains many elements. In the first place we see that all states are made up of families, and in the multitude of citizen there must be some rich and some poor, and some in a middle condition; the rich are heavy-armed, and the poor not. Of the common people, some are husbandmen, and some traders, and some artisans. There are also among the notables differences of wealth and property—for example, in the number of horses which they keep, for they cannot afford to keep them unless they are rich. And therefore in old times the cities whose strength lay in their cavalry were oligarchies, and they used cavalry in wars against their neighbors; as was the practice of the Eretrians and Chalcidians, and also of the Magnesians on the river Maeander, and of other peoples in Asia. Besides differences of wealth there are differences of rank and merit, and there are some other elements which were mentioned by us when in treating of aristocracy we enumerated the essentials of a state. Of these elements, sometimes all, sometimes the lesser and sometimes the greater number, have a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It is evident then that there must be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differing in kind, since the parts of which they are composed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kind. For a constitution is an organization of offices, which all the citizens distribute among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the power which different classes possess, for example the rich or the poor, or according to some principle of equality which includes both. There must therefore be as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as there are modes of arranging the offices, according to the superio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parts of the state.

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政体存在的原因是每一城邦都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首先，我们发现每一城邦由许多家庭所组成，在众多公民中一定有一些是富有的，有一些是贫穷的，还有一些处在中间水平；富人拥有许多武器；穷人则没有。普通平民当中，有一部分是农民，一部分是商人，还有一部分是工匠。而且，贵族之间也有贫富差距——比如，在他们蓄养马匹的数量方面，因为除非家境富裕，否则他们是养不起很多马匹的。因此，在古代，骑兵比较强大的城邦形成了寡头政体，而且他们用骑兵与邻邦交战；生活在迈安德河附近的爱勒特里亚人、哈尔基斯人、和马格尼西亚人，以及小亚细亚的其他民族，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除了财富的差别以外，还有等级和功勋的差别，另外，还有一些已经提到过的其他元素，我们在讨论贵族政体时曾列举过一个城邦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当中，有时全部，有时少数派，有时多数派，会参与到管理当中。显然，这样就产生了很多政权形式，而且属于不同的类型，因为不同政权的组成部彼此分属于不同类别。政体是城邦权责的组织形式，全体公民在公民内部分配这些职权，分配依据是各个阶级掌握的权力，例如，穷人或富人，或者是依据某种包含双方在内的平等原则。根据城邦各组成部分的优势和差异，权责安排的形式必然有所不同，因此政体形式具有多样性。

There are generally thought to be two principal forms: as men say of the winds that there are but two—north and south, and that the rest of them are only variations of these, so of governments there are said to be only two forms—democracy and oligarchy. For aristocracy is considered to be a kind of oligarchy, as being the rule of a few, and the so-calle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o be really a democracy, just as among the winds we make the west a variation of the north, and the east of the south wind. Similarly of musical

modes there are said to be two kinds, the Dorian and the Phrygian; the other arrangements of the scale are comprehended under one or other of these two. About forms of government this is a very favorite notion. But in either case the better and more exact way is to distinguish, as I have done, the one or two which are true forms, and to regard the others as perversions, whether of the most perfectly attempered mode or of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we may compare the severer and more overpowering modes to the oligarchical forms, and the more relaxed and gentler ones to the democratic.

通常人们认为有两种主要的政体形式：就好像人们谈论风的时候，也只说两种——北风和南风，而把其他的风向看作由这两个风向的变体，政体也是一样被人们分为两种——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贵族政体可以看作是寡头政体的一种，因为他们都是由少数派进行统治，而所谓的共和政体实际上是平民政体的一种，就好像人们把西风算作北风的变体，东风算作南风的变体一样。用类似的方法，人们把音乐也分为两种，多里亚调式和弗里吉亚调式；其他各种音乐则分别归入这两种乐调名下。关于政体类型的划分，这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观点。但是，无论如何，更好更准去的划分应该是像我所做的那样，把其中一到两种作为真正的政体，把其他的看成是他们的变态政体，或者是从最完美地调和的模式变态而来，或者是从最完美政体形式变态而来：我们可以把更严苛的、更压抑的模式比作寡头性质，而把更放松的、更温柔的模式比作平民性质。

Part 4

第四章

It must not be assumed, as some are fond of saying, that

democracy is simply that for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greater number are sovereign, for in oligarchies, and indeed in every government, the majority rules; nor again is oligarchy that for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a few are sovereign. Suppose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a city to be 1300, and that of these 1000 are rich, and do not allow the remaining 300 who are poor, but free, and in an other respects their equals, a share of the government—no one will say that this is a democracy. In like manner, if the poor were few and the masters of the rich who outnumber them, no one would ever call such a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rich majority have no share of office, an oligarchy. Therefore we should rather say that democracy is the for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free are rulers, and oligarchy in which the rich; it is only an accident that the free are the many and the rich are the few. Otherwise a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offices were given according to stature, as is said to be the case in Ethiopia, or according to beauty, would be an oligarchy; for the number of tall or good-looking men is small. And yet oligarchy and democracy are not sufficiently distinguished merely by these two characteristics of wealth and freedom. Both of them contain many other elements, and therefore we must carry our analysis further, and say that the government is not a democracy in which the freemen, being few in number, rule over the many who are not free, as at Apollonia, on the Ionian Gulf, and at Thera; (for in each of these states the nobles, who were also the earliest settlers, were held in chief honor, although they were but a few out of many). Neither is it a democracy when the rich have the government because they exceed in number; as was the case formerly at Colophon, where the bulk of the inhabitants were possessed of large property before the Lydian War. But the form of government is a democracy when the free, who are also poor and the majority, govern, and an oligarchy when the rich and the noble govern, they being at the same time few in number.

虽然有些人喜欢这样说，但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把平民政体简单地定义为一个由多数派统治的政体，因为实际上包括寡头政体在内的所有政体中，都是由多数派统治；同样，寡头政体也不是那种少数派统治的政体。假设一个城邦共有一千三百人，其中一千为富人，他们剥夺了那三百个贫穷的人参与城邦管理的权力，尽管这三百人是自由人，而且除了财富以外同他们完全平等——没有人会说这是平民政体。与之类似，如果穷人数量少而且统治着数量大于他们的富人，其中富人完全不能参与城邦管理，没人会说这是寡头政体。所以，我们更应该说的是，平民政体是自由平民统治的政体；而寡头政体则是富人统治的政体；其中自由平民属于多数派，富人属于少数派，则只是巧合而已。否则，如果一个政体的职权是根据身高来分配，据说埃塞俄比亚就是这样做的；或者按照美貌来分配，那它将是寡头政体；原因是那些高大和漂亮的人数量稀少。然而，平民和寡头这两种政体仅仅靠财富和自由这两个特点还不足以区分开。二者各自都包含很多其他元素，因此有必要把我们的分析再向前推进一步，并指出如果一个政体中的自由人，属于少数派，并对占据多数的非自由人进行统治，那它不是平民政体，如位于爱奥尼亚湾的阿波罗尼亚，还有赛拉；（因为在这些城邦中，贵族们，同时也是城邦的最早定居者，掌握着城邦最高权力，尽管他们只占人口的少数）。我们也不能因为掌握政权的富人是多数派就说它是平民政体；就像古代的科洛封那样，在吕第亚战争之前科洛封的大多数居民都拥有大量财产。平民政体是这样一种政体，即其中的自由人属于多数派而且是穷人，同时他们是统治者，而寡头政体中，富人和出身名门的人是统治者，同时他们属于少数派。

I have said that there are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and have explained to what causes the variety is due. Why there are more than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and what they are, and whence they arise, I will now proceed to consider, starting from the principle already admitted, which is that every state consists, not of one, but

of many parts. If we were going to speak of the different species of animals, we should first of all determine the organs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to every animal, as for example some organs of sense and the instruments of receiving and digesting food, such as the mouth and the stomach, besides organs of locomotion. Assuming now that there are only so many kinds of organs, but that there may be differences in them—I mean different kinds of mouths, and stomachs, and perceptive and locomotive organs—the possible combinations of these differences will necessarily furnish many variedes of animals. (For animals cannot be the same which have different kinds of mouths or of ears.) And when all the combinations are exhausted, there will be as many sorts of animals as there are combinations of the necessary organs. The same, then, is true of the forms of government which have been described; states, as I have repeatedly said, are composed, not of one, but of many elements. One element is the food-producing class, who are called husbandmen; a second, the class of mechanics who practice the arts without which a city cannot exist; of these arts some are absolutely necessary, others contribute to luxury or to the grace of life. The third class is that of traders, and by traders I mean those who are engaged in buying and selling, whether in commerce or in retail trade. A fourth class is that of the serfs or laborers. The warriors make up the fifth class, and they are as necessary as any of the others, if the country is not to be the slave of every invader. For how can a state which has any title to the name be of a slavish nature? The state is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ng, but a slave is the reverse of independent. Hence we see that this subject, though ingeniously, has not been satisfactorily treated in the *Republic* . Socrates says that a state is made up of four sorts of people who are absolutely necessary; these are a weaver, a husbandman, a shoemaker, and a builder; afterwards, finding that they are not enough, he adds a smith, and again a herdsman, to look after the

necessary animals; then a merchant, and then a retail trader. All these together form the complement of the first state, as if a state were established merely to supply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rather than for the sake of the good, or stood equally in need of shoemakers and of husbandmen. But he does not admit into the state a military class until the country has increased in size, and is beginning to encroach on its neighbor's land, whereupon they go to war. Yet even amongst his four original citizens, or whatever be the number of those whom he associates in the state, there must be some one who will dispense justice and determine what is just. And as the soul may be said to be more truly part of an animal than the body, so the higher parts of states, that is to say, the warrior class, the class engaged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that engaged in deliberation, which is the special business of political common sense-these are more essential to the state than the parts which minister to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Whether their several functions are the functions of different citizens, or of the same—for it may often happen that the same persons are both warriors and husbandmen—is immaterial to the argument. The higher as well as the lower elements are to be equally considered parts of the state, and if so, the military element at any rate must be included. There are also the wealthy who minister to the state with their property; these form the seventh class. The eighth class is that of magistrates and of officers; for the state cannot exist without rulers. And therefore some must be able to take office and to serve the state, either always or in turn. There only remains the class of those who deliberate and who judge between disputants; we were just now distinguishing them. If presence of all these elements, and their fair and equitable organization, is necessary to states, then there must also be persons who have the ability of statesmen. Different functions appear to be often combined in the same individual; for example, the warrior may also be a husbandman, or an artisan; or,

again, the councillor a judge. And all claim to possess political ability, and think that they are quite competent to fill most offices. But the same persons cannot be rich and poor at the same time. For this reaso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re regarded in an especial sense as parts of a state. Again, because the rich are generally few in number, while the poor are many, they appear to be antagonistic, and as the one or the other prevails they form the government. Hence arises the common opinion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government—democracy and oligarchy.

我已经说过了政体有许多不同的类型，而且还给出了政体出现变体的原因。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政体以外的政体形式，它们分别是什么，以及它们出现的根源是什么，下面，我们继续考虑这些问题，出发点是我们已经承认的原则，即每个城邦都不止包含一个部分而是许多部分。如果要讨论不同种类的动物，我们首先要确定每个动物都不可或缺的器官，比如说，某些感觉器官，某些获取和消化食物的器官，如嘴和胃，还有运动器官。假设这些就是一个动物的全部器官，而且不同动物的这些器官各不相同——我指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嘴、胃、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而这些不同的器官的各种组合必然造成了动物种类的多样性。（因为，两种动物如果有不同种类的嘴或者耳朵，那么它们不肯能是同一种动物。）如果穷尽所有可能的组合方式，那么动物种类应该等于这些必需器官的所有组合的数量。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上述的政体形式；城邦，就像我反复说过的那样，不是由一个，而是很多元素组成。其中之一是生产食物的阶级，即所谓的农民；第二种是工匠，他们从事各种手工技艺，离开了他们制作的东西，城邦也无法存在；其中有些技艺是绝对必须的，其他的则能促进生活的奢侈和体面。第三种是贸易商，我指的从事买卖的人，包括工商领域和零售领域。第四种是体力劳动者或农奴。战士构成第五种，他们跟其他的人同样重要，因为没有他们，整个城邦的人随时会变成入侵者的奴隶。如果一个城邦真正配得上城邦这个称呼，它怎么能具有天然的奴性呢？原因是一个城邦是独立的和自给自足的，而奴隶则

刚好相反。因此，我们发现，在《理想国》当中，对这一主题的处理虽然巧妙，但是并不能令人满意。其中苏格拉底提出一个城邦由四种不同的人组成，他们对于所有城邦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四种人分别是织工、农民、鞋匠和建筑工人；后来他觉得这些人还不够，所以补充了冶炼匠人，和牧民，来饲养那些必要的牲畜；后来又增加了商人和零售贩子。这些人共同构成了他的第一种城邦的补充，看上去好像城邦是为了提供生存必需品而建立的，并非为了美好生活，又好像城邦对鞋匠和农民的需求相等。但是，他没有把军事人员接纳入他的城邦里，直到城邦规模增加，而且开始侵占邻邦领土，于是双方开战。然而，即使在他提出的最初四种公民当中，或者无论他列举了几种跟城邦相关联的人，其中必须有人来传播正义，并决定什么是公平。正如人们认为对于动物来说灵魂比肉体更重要，城邦的高级部分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战士阶级，从事正义管理的阶级，以及商议国事的阶级，这是有政治常识的人要承担的事务——这三种人对于城邦来说比那些提供生活必需品的人更重要。无论他们的几种功能属于不同的公民还是属于同一种公民——因为经常出现同一群人既是战士又是农民——这一点与我们的讨论无关。假如把高等元素和低等元素同样看作城邦的组成部分，如果这样做，那必须把军事人员也包括在内。还有富人们用财产来服务于城邦；他们构成第七种人。第八种是执政官员和其他官员们；因为一个城邦没了统治者就无法生存。因此，必须有些人担任公职并服务于城邦；或轮流或终身。还剩下最后一种，商议国事和审理纠纷者；我们刚刚还在强调他们的重要性。如果这些元素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公平合理的组织，都是城邦必需的，那么还必须有一些拥有政治家才能的人。不同的功能似乎经常被同一个人兼具，比如一个战士同时也是一个农民，或工匠；或者，同样的，一名议事会成员同时也是一位法官。而且，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有政治才能，认为自己可以胜任城邦的大部分职责。然而，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富人又是穷人。因此，富人与穷人被看成是城邦最明显的两个组成部分。另外，由于富人一般数量少，而穷人数量多，所以他们看起来彼此对立，而且，当其中一方或另一方取得优势时，他们就会构建不同的政体。这样才有了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共有两种不同政体——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

I have already explained that there are many forms of constitution, and to what causes the variety is due. Let me now show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forms both of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as will indeed be evident from what has preceded. For both in the common people and in the notables various classes are included; of the common people, one class are husbandmen, another artisans; another traders, who are employed in buying and selling; another are the seafaring class, whether engaged in war or in trade, as ferrymen or as fishermen. (In many places any one of these classes forms quite a large population; for example, fishermen at Tarentum and Byzantium, crews of triremes at Athens, merchant seamen at Aegina and Chios, ferrymen at Tenedos.) To the classes already mentioned may be added day-laborers, and those who, owing to their needy circumstances, have no leisure, or those who are not of free birth on both sides; and there may be other classes as well. The notables again may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ir wealth, birth, virtue, education, and similar differences.

前面已经解释过，政体的类型很多，并且就变体出现的原因进行过讨论：现在我来展示，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不同种类，这一点在前面的讨论中实际上就很明显了。因为在平民和贵族这两个阶级当中，都包含许多不同的种类；就平民而言，一类是农民，另一类是工匠；还有贸易商，从事货物买卖；还有航海者，他们或者以战争为业，或者以贸易为生，也有些从事海上运输，还有些是渔民。（在很多地方，他们每一种都为数众多；例如，塔兰顿和拜占庭的渔民，雅典军舰上的船员，爱琴那和启沃岛上的航运商人，还有得内杜斯岛上的运输船主。）除上述这些种类以外，还有按日计酬的体力劳动者，以及那些由于家境贫寒而没有闲暇时光，还有父母双方并非都是自由人的那些人；还有其他可能存在的平民类型。至于贵族，他们之间的划分往往是以财富、出身、才德、教育以及其他类似的差别。

Of forms of democracy first comes that which is said to be based strictly on equality. In such a democracy the law says that it is just for the poor to have no more advantage than the rich; and that neither should be masters, but both equal. For if liberty and equality, as is thought by some, are chiefly to be found in democracy, they will be best attained when all persons alike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to the utmost. And since the people are the majority, and the opinion of the majority is decisive, such a government must necessarily be a democracy. Here then is one sort of democracy. There is another, in which the magistrates are elected according to a certain property qualification, but a low one; he who has the required amount of property has a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but he who loses his property loses his rights. Another kind is that in which all the citizens who are under no disqualification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but still the law is supreme. In another, everybody, if he be only a citizen, is ad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but the law is supreme as before. A fifth form of democracy, in other respects the same, is that in which, not the law, but the multitude, have the supreme power, and supersede the law by their decrees. This is a state of affairs brought about by the demagogues. For in democracies which are subject to the law the best citizens hold the first place, and there are no demagogues; but where the laws are not supreme, there demagogues spring up. For the people becomes a monarch, and is many in one; and the many have the power in their hands, not as individuals, but collectively. Homer says that "it is not good to have a rule of many," but whether he means this corporate rule, or the rule of many individuals, is uncertain. At all events this sort of democracy, which is now a monarch, and no longer under the control of law, seeks to exercise monarchical sway, and grows into a despot; the flatterer is held in honor; this sort of democracy being relatively to other

democracies what tyranny is to other forms of monarchy. The spirit of both is the same, and they alike exercise a despotic rule over the better citizens. The decrees of the demos correspond to the edicts of the tyrant; and the demagogue is to the one what the flatterer is to the other. Both have great power; the flatterer with the tyrant, the demagogue with democracies of the kind which we are describing. The demagogues make the decrees of the people override the laws, by referring all things to the popular assembly. And therefore they grow great, because the people have an things in their hands, and they hold in their hands the votes of the people, who are too ready to listen to them. Further, those who have any complaint to bring against the magistrates say, “Let the people be judges”; the people are too happy to accept the invitation; and so the authority of every office is undermined. Such a democracy is fairly open to the objection that it is not a constitution at all; for where the laws have no authority, there is no constitution. The law ought to be supreme over all, and the magistracies should judge of particulars, and only this should be considered a constitution. So that if democracy be a real form of government, the sort of system in which all things are regulated by decrees is clearly not even a democracy 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word, for decrees relate only to particulars.

平民政体的第一种，被认为是严格建立在平等原则之上的平民政体。在这种平民政体中，法律规定公正的做法是穷人不应比富人享有更多优势；双方都不是对方的主人，而应彼此平等。因为如果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自由和平等主要存在于平民政体中，那么要获得最大的自由和平等，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平等地参与管理。而且，因为人民是多数派，而且多数派的观点就是决定性的，所以这种政体必然是平民政体。以上就是一种平民政体。另一种平民政体中，执政官是按一定的财产限额选举出来的，但这一限额很低；任何拥有限定数量财产的人都可参与管理，而失去财产的人则失去这项权利。

另有一种，其中所有没被取消资格的公民都能参与城邦管理，但法律依然是至高无上的。又有一种，无论任何人，只要是公民就可以参与管理，但法律同上是至高无上的。第五种形式在其他方面和上一种相同，差别在于不是法律，而是民众拥有最高权力，他们的命令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种局面是“蛊惑者”造成的。原因是在一个法治的平民政体中，最好的公民拥有最高地位，这里不出现有蛊惑者；相反，在法律没有至高权力的平民政体中，蛊惑者就会冒出来。因为人民变成了君主，一个由全体公民合为一体的君主；他们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整体将权力握在了手中。荷马说：“多数派的统治不是好事，”但是我们无法确定他所指的是许多个体的统治，还是集体统治。无论如何，这种平民政体，现在已经变成了君主政体，而且不受法律约束，它追求君主般的支配地位，而且变得暴虐专制；谄媚者因此会受到掌权者的器重，这种平民政体之于其他平民政体等同于暴君政体之于其他君主政体。二者的精神是相同的，都是用专制的力量统治比他们更好的公民。人民的“命令”对应于暴君的“圣旨”；蛊惑者之于前者的作用就像谄媚者之于后者一样。这两种人都有巨大的权力；谄媚者的权力来自于暴君，蛊惑者的权力来自于我们正在描述的这种平民政体。蛊惑者让人民的命令凌驾于法律之上，靠的是把一切事情都提交给公民大会决定。他们变得权势熏天，因为人民把所有事情都握在自己手里，而他们手中掌握着人民的选票，而人民又太愿意听信他们。另外，那些对执政官心怀任何怨愤的人就会说，“让人民做裁判”；而民众则很高兴地接受邀请；于是，所有公共部门的权威都被削弱了。这样的平民政体理应受到所有人的否定，否定它作为政体的资格；原因是哪里的法律没有权威，哪里就没有政体。法律应该是高于一切的，而执政官员应该审理细节，只有这样的安排才能被看作是一种政体。所以，假如平民政体是真正的政体，那么这种用命令来决定所有事情的制度显然算不上真正的平民政体，因为命令只能与细节有关。

These then are the different kinds of democracy.

这些就是我们对各种平民政体的论述。

Part 5

第五章

Of oligarchies, too,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ne where the property qualification for office is such that the poor, although they form the majority, have no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yet he who acquires a qualification may obtain a share. Another sort is when there is a qualification for office, but a high one, and the vacancies in the governing body are fired by co-optation. If the election is made out of all the qualified persons, a constitution of this kind inclines to an aristocracy, if out of a privileged class, to an oligarchy. Another sort of oligarchy is when the son succeeds the father. There is a fourth form, likewise hereditary, in which the magistrates are supreme and not the law. Among oligarchies this is what tyranny is among monarchies, and the last-mentioned form of democracy among democracies; and in fact this sort of oligarchy receives the name of a dynasty (or rule of powerful families).

寡头政体也有不同的种类：第一种，对担任公职者有财产限制，即穷人尽管占人口多数，仍无权参政，但是，任何人只要达到财产限额，就可以参政。第二种，对担任公职者有财产限制，但是限额较高，而且管理层的空缺以推选现有成员的方式任用。如果选举在所有符合资格的人当中进行，则该政体偏向于贵族政体，如仅限于特权阶层，则偏向于寡头政体。第三种，是子袭父位制。第四种，同样为世袭制，其中执政官拥有最高权力，而非法律。它之于寡头政体相当于暴君政体之于君主政体，也相当于我们在平民政体一章中讲到的最后一种平民政体；这种寡头政体有一个特殊名字即门阀（或强大家族的

统治）。

These are the different sorts of oligarchies and democracies. It should, however, be remembered that in many states the constitution which is established by law, although not democratic, owing to the education and habits of the people may be administered democratically, and conversely in other states the established constitution may incline to democracy, but may be administered in an oligarchical spirit. This most often happens after a revolution: for governments do not change at once; at first the dominant party are content with encroaching a little upon their opponents. The laws which existed previously continue in force, but the authors of the revolution have the power in their hands.

这些就是各种不同的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在许多城邦中，其政体也是依照法律而建立的，虽然由于人民的一些固有风俗和习惯，他们并不是平民政体，但是，他们可能像平民政体一样的执政，相反，有些城邦里确立的政体可能倾向于平民政体，但是，其执政方式却具有寡头精神。这种情况最多见于革命之后：究其原因，执政风格不是一次性完成转变的；起初，主导派别应该满足于一点点蚕食对手的权力。先前的法律还在继续使用，但是权力已经握在了发动革命的人手中。

Part 6

第六章

From what has been already said we may safely infer that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democracies and of oligarchies. For it

is evident that either all the classes whom we mentioned must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or some only and not others. When the class of husbandmen and of those who possess moderate fortunes have the supreme power, the government is administered according to law. For the citizens being compelled to live by their labor have no leisure; and so they set up the authority of the law, and attend assemblies only when necessary. They all obtain a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when they have acquired the qualification which is fixed by the law—the absolute exclusion of any class would be a step towards oligarchy; hence all who have acquired the property qualification are admitted to a share in the constitution. But leisure cannot be provided for them unless there are revenues to support them. This is one sort of democracy, and these are the causes which give birth to it. Another kind is based on the distinction which naturally comes next in order; in this, every one to whose birth there is no objection is eligible, but actually shares in the government only if he can find leisure. Hence in such a democracy the supreme power is vested in the laws, because the state has no means of paying the citizens. A third kind is when all freemen have a right to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but do not actually share, for the reason which has been already given; so that in this form again the law must rule. A fourth kind of democracy is that which comes latest in the history of states. In our own day, when cities have far outgrown their original size, and their revenues have increased, all the citizens have a place in th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great preponderance of the multitude; and they all, including the poor who receive pay, and therefore have leisure to exercise their rights, share in the administration. Indeed, when they are paid, the common people have the most leisure, for they are not hindered by the care of their property, which often fetters the rich, who are thereby prevented from taking part in the assembly or in the courts, and so the state is governed by the poor, who are a majority, and

not by the laws.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断出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原因很明显，所有上述的各种人或者都能参与管理，或者有些能参与，而其他的则不能。如果农民和中产阶级掌握最高权力，其管理是依法执政。原因是不得不靠劳动谋生的公民没有闲暇时光；于是他们会树立法律的权威，而且只在有必要时才出席公民大会。所有获得法定数额财产的人都将获得参与管理的权力——将任何一种人完全排斥在外的做法都将是向寡头政体的靠拢；因此，所有满足财产限额的人其参政权都将被承认。但是这些人还是得不到闲暇时光，除非用公共财政来供养他们。这就是平民政体的一种，以及其成因。另一种平民政体以一种相邻的自然区分为基础；其中任何人只要在出身方面没有问题都有参政资格，但实际上参政的只是有闲暇时光的人。因为城邦没有为公民支付报酬的手段，所以在这种平民政体中最高权力属于法律。第三种，凡自由人皆有权参与管理，可实际上并非每个人都会参与，原因同上；所以这种政体也必然受法律统治。第四种平民政体在城邦制历史上出现地最晚。在现世，城邦的版图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规模，而公共财政收入也增加了，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依靠民众的数量优势参加管理；而且，他们所有人，包括领取了薪水的穷人，都有足够的闲暇时光参与管理。确实如此，当平民拿到报酬以后，他们拥有的闲暇时光是最多的，因为他们不像富人那样还有照料私产的牵绊，这也经常成为富人的束缚，使他们不能出席公民大会或法庭，所以城邦被穷人而非法律所统治。

So many kinds of democracies there are, and they grow out of these necessary causes.

上述就是平民政体的不同种类，以及导致它们出现必要的原因。

Of oligarchies, one form is that in which the majority of the citizens have some property, but not very much; and this is the first form, which allows to any one who obtains the required amount the right of sharing in the government. The sharers in the government being a numerous body, it follows that the law must govern, and not individuals. For in proportion as they are further removed from a monarchical form of government, and in respect of property have neither so much as to be able to live without attending to business, nor so little as to need state support, they must admit the rule of law and not claim to rule themselves. But if the men of property in the state are fewer than in the former case, and own more property, there arises a second form of oligarchy. For the stronger they are, the more power they claim, and having this object in view, they themselves select those of the other classes who are to be ad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but, not being as yet strong enough to rule without the law, they make the law represent their wishes. When this power is intensified by a further diminution of their numbers and increase of their property, there arises a third and further stage of oligarchy, in which the governing class keep the offices in their own hands, and the law ordains that the son shall succeed the father. When, again, the rulers have great wealth and numerous friends, this sort of family despotism approaches a monarchy; individuals rule and not the law. This is the fourth sort of oligarchy, and is analogous to the last sort of democracy.

至于寡头政体，一种是大多数公民都拥有一些财产，但是数额不大；这就是第一种形式，它允许任何满足财产限额的人拥有参政的权力。由于参政人数众多，所以政体必然是受法律统治，而非个人。因为这种政体与君主政体差异更大，也因为他们的财产既没有多到让他们可以完全忽略自己的私业，又没有少到需要靠公款来养活，所以，他们必须接受法律的统治而不是自己统治。但是如果城邦中有产者数

量少于上述情况，而且他们拥有更多财产，就会出现第二种寡头政体。因为他们越强大，要求的权力就会越多，带着这种目的，他们亲自选择其他的阶层当中哪些人可以参政；但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抛开法律而统治的程度，所以他们让法律代表自己的意愿。如果通过减少他们的数量并增加他们的财富而使得他们的力量进一步提升，那么就会出现寡头政体的第三种，也是下一个阶段，其中，统治阶级会把所有公职都握在自己手里，而且法律规定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权力。同理，如果统治者拥有巨大的财富和许多的朋友，这种家族专制就会接近于君主政体；其中统治者是某些个体而非法律。这就是第四种寡头政体，它与最后一种平民政体类似。

Part 7

第七章

There are still two forms besides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one of them is universally recognized and included among the four principal forms of government, which are said to be (1) monarchy, (2) oligarchy, (3) democracy, and (4) the so-called aristocracy or government of the best. But there is also a fifth, which retains the generic name of polity 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is is not common, and therefore has not been noticed by writers who attempt to enumerate the different kinds of government; like Plato, in their books about the state, they recognize four only. The term “aristocracy” is rightly applied to the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is described in the first part of our treatise; for that only can be rightly called aristocracy which is a government formed of the best men absolutely, and not merely of men who are good when tried by any given standard. In the perfect state the good man is absolutely the same as the good citizen; whereas in other states the good citizen is only good relatively to his own form of government. But there are

some states differing from oligarchies and also differing from the so-called polity 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se are termed aristocracies, and in them the magistrates are certainly chosen, both according to their wealth and according to their merit. Such a form of government differs from each of the two just now mentioned, and is termed an aristocracy. For indeed in states which do not make virtue the aim of the community, men of merit and reputation for virtue may be found. And so where a government has regard to wealth, virtue, and numbers, as at Carthage, that is aristocracy; and also where it has regard only to two out of the three, as at Lacedaemon, to virtue and numbers, and the two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and virtue temper each other. There are these two forms of aristocracy in addition to the first and perfect state, and there is a third form, viz., the constitutions which incline more than the so-called polity towards oligarchy.

除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以外，还有两种不同的政体；其中之一被广泛地认为是四种主要政体形式之一，这四种主要政体分别是：（1）君主政体，（2）寡头政体（3）平民政体，还有（4）所谓的贵族政体或最好的人的统治。但是，还有第五种主要政体，它保留了政体的通用名称，即共和政体或政治政体；这一种政体并不多见，所以没能引起那些致力于论述不同政体类型的作家的注意；像柏拉图一样，在他们关于城邦的著作中，他们只承认四种政体。“贵族政体”这个名字，刚好适用于本书第一卷中已经论述过那种政体；因为只有绝对最好的人所组成的政体才是名副其实的贵族政体，而非那些按某种标准评出的好人。在完美政体中，好人与好公民完全相同；而在其他政体中，好公民的好只是相对于本邦政体而言。但是，有一些政体不同于寡头政体和所谓的共和政体或政治政体；它们也称为贵族政体，其中的执政官当然也是按照财产和功勋来选任的。这种形式的政体不同于上述两种政体中的任意一种，而且被称为贵族政体。因为，事实上，在不以美德为集体的目标的城邦中，有功勋的人和以美德而著称

的人仍然可以找到。因此，如果一个政体像迦太基人那样，同时看重财富、美德及人数这三个方面，它就是贵族政体；如果只是重视其中两个方面还是贵族政体，例如，美德和人数，就如斯巴达人那样，而且，平民政体的两种原则可以和美德相互中和。这就是除第一种即最佳的政体形式以外的两种贵族政体，而且，还有第三个种类，这种政体比所谓的共和政体更倾向于寡头政体。

Part 8

第八章

I have yet to speak of the so-called polity and of tyranny. I put them in this order, not because a polity 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s to be regarded as a perversion any more than the above mentioned aristocracies. The truth is, that they an fall short of the most perfect form of government, and so they are reckoned among perversions, and the really perverted forms are perversions of these, as I said in the original discussion. Last of all I will speak of tyranny, which I place last in the series because I am inquiring into the constitutions of states, and this is the very reverse of a constitution

我还没有讨论所谓的共和政体与暴君政体。我按这种顺序安排，不是因为共和政体或叫政治政体比上述贵族政体更加变态。事实上，它们都跟最完美政体有一定差距，所以才被看作是变态政体的一员，可是，真正的变态政体则是从它们变态而来的，正如我在最初的讨论中所说的那样。最后，我会讨论暴君政体，把它作为政体序列的最后一个来研究，是因为我研究的是城邦的政体，而它完全是政体的反义词。

Having explained why I have adopted this order, I will proceed to conside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which the nature will be clearer now that oligarchy and democracy have been defined. For polity 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may be described generally as a fusion of oligarchy and democracy; but the term is usually applied to those forms of government which incline towards democracy, and the term aristocracy to those which incline towards oligarchy, because birth and education are commonly the accompaniments of wealth. Moreover, the rich already possess the external advantages the want of which is a temptation to crime, and hence they are called noblemen and gentlemen. And inasmuch as aristocracy seeks to give predominance to the best of the citizens, people say also of oligarchies that they are composed of noblemen and gentlemen. Now it appears to be an impossible thing that the state which is governed not by the best citizens but by the worst should be well-governed, and equally impossible that the state which is ill-governed should be governed by the best. But we must remember that good laws, if they are not obeyed, do not constitute good government. Hence there are two parts of good government; one is the actual obedience of citizens to the laws, the other part is the goodness of the laws which they obey; they may obey bad laws as well as good. And there may be a further subdivision; they may obey either the best laws which are attainable to them, or the best absolutely.

解释完了我们的研究顺序以后，我将继续讨论共和政体；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定义，那共和政体的本质也就更清楚了。原因是共和政体或者叫政治政体一般可以被描述为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一种聚合体；但是，这个称号通常应用于那些偏向于平民性质的政体，而贵族政体的称号则用于那些更加偏重于寡头性质的政体，原因是出身和教育通常与财富为伴。另外，富人已经享有了外

在的优势，而对这些优势的渴望往往诱使人们犯罪，所以他们才被称为贵族和绅士。正如贵族政体把统治权交给那些最好的公民一样，人们也把寡头政体说成是贵族和绅士组成的政体。一个政体的统治者如果不是最好的而是最坏的公民，那么社会得到良好的管理似乎是不可能的，同样的，一个政体的统治者如果是最好的人，出现管理混乱的现象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牢记一点，好的法律，如果不被遵守，也不能形成好的管理。因此，好的管理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公民真正地遵守法律；另一个是被他们遵守的法律是好法律；人们会遵守好法律，同样也会遵守坏法律。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他们可以遵守能找到的最好法律，或者绝对的最好法律。

The distribution of offices according to merit is a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aristocracy, for the principle of an aristocracy is virtue, as wealth is of an oligarchy, and freedom of a democracy. In all of them there of course exists the right of the majority, and whatever seems good to the majority of those who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has authority. Now in most states the form called polity exists, for the fusion goes no further than the attempt to unite the freedom of the poor and the wealth of the rich, who commonly take the place of the noble. But as there are three grounds on which men claim an equal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freedom, wealth, and virtue (for the fourth or good birth is the result of the two last, being only ancient wealth and virtue), it is clear that the admixture of the two elements, that is to say, of the rich and poor, is to be called a polity 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union of the three is to be called aristocracy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best, and more than any other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the true and ideal, has a right to this name.

按照功勋来分配公职是贵族政体特色，因为美德是贵族政体的原

则，正如财富之于寡头政体，自由之于平民政体一样。当然，在所有政体中都存多数派的权力，而只要是参与管理的人当中的多数派认为是好的，必然拥有权威。现在，大多数城邦都存在共和政体的形式，因为这种聚合不过是把穷人的自由和富人的财富联合在一起而已，其中富人往往取代了贵族的地位。但是，因为人们要求平等参政权的理由有三种：自由、财富和美德（家世作为第四种，实际上是后两种的衍生物，在古代就只是财富和美德），显而易见，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也就是说穷人和富人联合，应该称为共和政体或政治政体；而这三种元素混合则是贵族政体或最好的人的统治，它比其他政体都更加配的起这个称号，只有一个例外，即真正的、理想的政体。

Thus far I have shown the existence of forms of states other than monarchy,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and what they are, and in what aristocracies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and polities from aristocracies—that the two latter are not very unlike is obvious.

目前为止，我已经描述了君主政体、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以外的其他政体类型，以及他们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彼此间的差异是什么；以及不同的贵族政体之间的差别，共和政体与贵族政体的差别——显然后两者之间差别不大。

Part 9

第九章

Next we have to consider how by the side of oligarchy and democracy the so-called polity 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springs up, and how it should be organized. The nature of it will be at once understood from a comparison of oligarchy and democracy; we

must ascertain their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aking a portion from each, put the two together, like the parts of an indenture. Now there are three modes in which fusions of government may be affected. In the first mode we must combine the laws made by both governments, say concern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oligarchies they impose a fine on the rich if they do not serve as judges, and to the poor they give no pay; but in democracies they give pay to the poor and do not fine the rich. Now (1) the union of these two modes is a common or middle term between them, and is therefore characteristic of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for it is a combination of both. This is one mode of uniting the two elements. Or (2) a mean may be taken between the enactments of the two: thus democracies require no property qualification, or only a small one, from members of the assembly, oligarchies a high one; here neither of these is the common term, but a mean between them. (3) There is a third mode, in which something is borrowed from the oligarchical and something from the democratical principle. For example, the appointment of magistrates by lot is thought to be democratical, and the election of them oligarchical; democratical again when there is no property qualification, oligarchical when there is. In the aristocratical or constitutional state, one element will be taken from each—from oligarchy the principle of electing to offices, from democracy the disregard of qualification. Such are the various modes of combination.

接着，我们来讨论在平民政体、寡头政体以外，所谓的共和政体是如何出现的，这种政体应该如何组织。只要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进行对比，马上就能明白共和政体的本质；我们必须明确这它们的不同特点，然后从各取其一部分特点，再像拼图一样把两个部分拼起来。实现政体的聚合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我们必须把两种政体的法律结合在一起。例如，有关司法管理方面，寡头政体规定富人如果不

承担法官义务就要处罚金，而且穷人承担义务也拿不到报酬；但是，平民政体规定穷人承担法官义务可以获得报酬，而富人不承担也不用交罚金。这样，（1）这两种制度的结合就形成一个处于二者之间共同的或中间的规定，这也是共和政体的一种特点，因为它是两种政体的结合。这是结合两种元素的模式之一。（2）或者在两个制度中间找一个折中办法：这样，平民政体对于公民大会成员不限定财产资格，或只限定很低的财产限额，而寡头政体则设置很高的财产限额；这里的两种规定都不是两种政体的普遍规定，而是介于两种政体之间的一种折中办法。（3）第三种模式，是从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各自的原则中分别借用一些。例如，用抽签的方式任命执政官被认为是平民风格，而选举的方式则是寡头风格；同时，无财产限额是平民风格，有财产限额则是寡头风格。在贵族政体或共和政体中，我们从两种政体中各取一种元素——从寡头政体中取执政官的选举法，而从平民政体中取其不设财产限额的做法。这些就是政体的不同结合模式。

There is a true union of oligarchy and democracy when the same state may be termed either a democracy or an oligarchy; those who use both names evidently feel that the fusion is complete. Such a fusion there is also in the mean; for both extremes appear in it. The Lacedaemonian constitution, for example, is often described as a democracy, because it has many democratical feature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youth receive a democratical education. For the sons of the poor are brought up with with the sons of the rich, who are educated in such a manner as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the sons of the poor to be educated by them. A similar equality prevails in the following period of life, and when the citizens are grown up to manhood the same rule is observed;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In like manner they all have the same food at their public tables, and the rich wear only such clothing as any poor man can afford. Again, the people elect to one of the two greatest offices of state, and in the other they share; for they elect the

Senators and share in the Ephoralty. By others the Spartan constitution is said to be an oligarchy, because it has many oligarchical elements. That all offices are filled by election and none by lot, is one of these oligarchical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power of inflicting death or banishment rests with a few persons is another; and there are others. In a well attempted polity there should appear to be both elements and yet neither; al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ly on itself, and not on foreign aid, and on itself not through the good will of a majority—they might be equally well-disposed when there is a vicious form of government—but through the general willingness of all classes in the state to maintain the constitution.

如果一个政体既可以称为寡头政体又可以称为平民政体，那么它就是这两种政体的一个真正的结合体；那些同时使用两种称呼的人显然认为这种聚合是完整的。这种聚合也存在于折中点上；因为两种极端都在这里出现了。例如，斯巴达政体，经常被看成是一个平民政体，因为它有很多平民政体的特色。首先，年轻人受到的教育是平民性质的。穷人和富人的孩子从小在一起长大，富人的孩子接受的教育穷人也能负担得起。类似的平等原则也贯彻于青年时期，公民成年之后也遵守同样的原则；穷人和富人之间没有差别。同样的，在公共餐桌上，他们吃同样的食物，富人穿的都是穷人也能买得起的衣服。而且，城邦的一个最高执政部门的成员从平民中选出，而另一个则是平民与其他公民共享；原因是长老会为全体公民共享，而监察会为平民独享。也有人认为斯巴达是寡头政体；因为它有很多寡头政体的元素。例如，所有执政官员都用选举而非抽签的方式产生，这就是其寡头特色之一；判决死刑或放逐的权力只有少数人拥有，这是另外一个寡头特色，还有其他一些。一个结构合理的共和政体应该看似拥有这两种政体的元素，实际却没有；而且政体应该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不是外来援助，而且自身力量也不能靠多数派的善念——因为在一个糟糕的政体中他们同样可以安之若素——而应该靠全邦人共同的维持现行政体的意愿。

Enough of the manner in which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in which the so-called aristocracies ought to be framed.

关于共和政体和所谓的贵族政体的构建模式，这些就是全部的内容。

Part 10

第十章

Of the nature of tyranny I have still to speak, in order that it may have its place in our inquiry (since even tyranny is reckoned by us to be a form of government), although there is not much to be said about it. I have already in the former part of this treatise discussed royalty or kingship according to the most usual meaning of the term, and considered whether it is or is not advantageous to states, and what kind of royalty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from what source, and how.

接下来我还要说一下暴君政体的本质，从而让它在我们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使是暴君政体也被我们当作一种政体形式），虽然可说的内容并不多。在本书的前一部分，根据君主这个名称最普通的含义，我们讨论了皇权或君权，并考虑了这种政体对城邦是否有利，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君主制，起源是什么，以及如何建立这种政体等问题。

When speaking of royalty we also spoke of two forms of

tyranny, which are both according to law, and therefore easily pass into royalty. Among barbarians there are elected monarchs who exercise a despotic power; despotic rulers were also elected in ancient Hellas, called Aesymnetes or Dictators. These monarchies, when compared with one another, exhibit certain differences. And they are, as I said before, royal, in so far as the monarch rules according to law over willing subjects; but they are tyrannical in so far as he is despotic and rules according to his own fancy. There is also a third kind of tyranny, which is the most typical form, and is the counterpart of the perfect monarchy. This tyranny is just that arbitrary power of an individual which is responsible to no one, and governs all alike, whether equals or better, with a view to its own advantage, not to that of its subjects, and therefore against their will. No freeman, if he can escape from it, will endure such a government.

在研究君主政体时，我们还讨论了两种暴君政体，两种都是依据法律而统治的，因此很容易过渡到君主政体。在野蛮人当中，有选举产生的君主，他们实行专制统治；古希腊的一些城邦也选举过专制的统治者，人们称它们为民选暴君或独裁者。如果对这些君主政体进行比较，会发现它们的不同。只要君主依照法律统治，而且他的子民自愿服从其统治，如前文所述，这就是君主政体；而只要君主实行专制，而且按自己的心意统治，这就是暴君政体。还有第三种暴君政体，也是最典型的暴君政体，它是完美君主政体的绝对反面。这种暴君政体指的是一个人拥有绝对权力，他不受任何人辖制，对所有人实行同样的统治，无论是与其平等者还是比他更出众者，而且他只看重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被统治者的利益，因此他的统治是违背人民意愿的。没有任何一个自由人，如果他能够从中逃脱，会容忍这种统治。

The kinds of tyranny are such and so many, and for the reasons

which I have given.

这些就是不同的暴君政体，他们的统治原则，以及成因。

Part 11

第十一章

We have now to inquire what is the best constitution for most states, and the best life for most men, neither assuming a standard of virtue which is above ordinary persons, nor an education which is exceptionally favored by nature and circumstances, nor yet an ideal state which is an aspiration only, but having regard to the life in which the majority are able to share, and to the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states in general can attain. As to those aristocracies, as they are called, of which we were just now speaking, they either lie beyond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greater number of states, or they approximate to the so-calle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refore need no separate discussion. And in fact the conclusion at which we arrive respecting all these forms rests upon the same grounds. For if what was said in the Ethics is true, that the happy life is the life according to virtue lived without impediment, and that virtue is a mean, then the life which is in a mean, and in a mean attainable by every one, must be the best. And the same the same principles of virtue and vice are characteristic of cities and of constitutions; for the constitution is in a figure the life of the city.

我们现在来讨论对大多数城邦而言哪种政体最好，对大多数人而

言哪种生活最好；这里，我们既没有假设那种超出常人之美德，又不会要求特备受自然和环境眷顾的教育，或那种只存在于想象中之理想城邦；相反，我们指的是大多数人都能享有的生活，和一般城邦都能建立的政体。至于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些所谓的贵族政体，它们或者超出了大多数城邦的能力范围，或者接近所谓的共和政体，所以不需要再单独讨论。事实上，我们形成的关于这些政体的结论，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原则。假设我在《伦理学》中所提出的主张是正确的，即幸福的生活是一种不折不扣地按照美德进行的生活，而且美德就在于中庸之道，那么，中庸的生活，而且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中庸生活，必然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而且，城邦和政体所特有的美德和恶行所适用的原则必须相同；因为政体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城邦的生活。

Now in all states there are three elements: one class is very rich, another very poor, and a third in a mean. It is admitted that moderation and the mean are best, and therefore it will clearly be best to possess the gifts of fortune in moderation; for in that condition of life men are most ready to follow rational principle. But he who greatly excels in beauty, strength, birth, or wealth, or on the other hand who is very poor, or very weak, or very much disgraced, finds it difficult to follow rational principle. Of these two the one sort grow into violent and great criminals, the others into rogues and petty rascals. And two sorts of offenses correspond to them, the one committed from violence, the other from roguery. Again, the middle class is least likely to shrink from rule, or to be over-ambitious for it; both of which are injuries to the state. Again, those who have too much of the goods of fortune, strength, wealth, friends, and the like, are neither willing nor able to submit to authority. The evil begins at home; for when they are boys, by reason of the luxury in which they are brought up, they never learn, even at school, the habit of obedi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very poor, who are in the opposite extreme, are too degraded. So that

the one class cannot obey, and can only rule despotically; the other knows not how to command and must be ruled like slaves. Thus arises a city, not of freemen, but of masters and slaves, the one despising, the other envying; and nothing can be more fatal to friendship and good fellowship in states than this: for good fellowship springs from friendship; when men are at enmity with one another, they would rather not even share the same path. But a city ought to be composed, as far as possible, of equals and similars; and these are generally the middle classes. Wherefore the city which is composed of middle-class citizens is necessarily best constituted in respect of the elements of which we say the fabric of the state naturally consists. And this is the class of citizens which is most secure in a state, for they do not, like the poor, covet their neighbors' goods; nor do others covet theirs, as the poor covet the goods of the rich; and as they neither plot against others, nor are themselves plotted against, they pass through life safely. Wisely then did Phocylides pray—“Many things are best in the mean; I desire to be of a middle condition in my city.”

所有的城邦都有三种人；极富的、极穷的和位于两者之间的。大家都承认适中和中庸是最好的，因此，拥有中等规模的财产显然也是最好的；而这种生活条件下，人最乐于遵从理性原则。而任何人如果某一方面太卓越，如容貌、力量、家世、财富，或是相反，如太贫穷，太弱小，太卑贱，都很难遵从理性原则。其中第一种人会成为大奸大恶之徒，而第二种则会成为流氓无赖之辈。有两种罪行分别对应这两种人，一种是暴力犯罪，另一种则是源于欺诈。而且，中产阶级最不可能在规矩面前畏缩不前，或藐视规矩；而这两种行事方式都对城邦有危害。另外，一个人如果在运气，力量、财富、朋友以及类似的方面太过优越，他就不能也不情愿服从权威。这种恶行开始于家庭；因为在他们童年时代，由于他们成长的方式过于奢侈，所以他们从未养成服从的习惯，即使是在学校。相反，那些过于贫穷的人，处

于另一种极端，他们变得太过卑躬屈膝。于是，一种人不懂如何服从命令，而只能用暴力统治；而另一种人却不懂如何命令他人，只能像奴隶一样被人驱使。这样出现的城邦不是自由人的城邦，而是主人和奴隶的城邦，一方心存蔑视，而另一方满怀嫉妒；对于城邦中的友谊和良好的伙伴关系而言，没有什么比这些更具毁灭性了；因为良好的伙伴关系来自于友谊；而如果人们彼此敌视，他们甚至不愿意走在同一条路上。但是，一个城邦应该尽可能由平等的和相似人组成；而这些人通常是中产阶级。由此可得，就我们前面提到的构成城邦的三种天然元素而言，结构最好的城邦必然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这个阶层的公民也是城邦中最安分的阶层，因为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去觊觎他人的东西；而别人也不会觊觎他们的，就像穷人会觊觎富人的财产那样；而且，因为他们既不会谋害他人，也不会被他人谋害，所以他们会平安一生。福季里特曾经明智地祈祷，“许多事情都是中庸最好；我渴望在我的城邦做一名中产者。”

Thus it is manifest that the best political community is formed by citizens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at those states are likely to be well-administered in which the middle class is large, and stronger if possible than both the other classes, or at any rate than either singly; for the addi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turns the scale, and prevents either of the extremes from being dominant. Great then is the good fortune of a state in which the citizens have a moderate and sufficient property; for where some possess much, and the others nothing, there may arise an extreme democracy, or a pure oligarchy; or a tyranny may grow out of either extreme—either out of the most rampant democracy, or out of an oligarchy; but it is not so likely to arise out of the middle constitutions and those akin to them. I will explain the reason of this hereafter, when I speak of the revolutions of states. The mean condition of states is clearly best, for no other is free from faction; and where the middle class is large, there are least likely to be factions and dissensions. For a

similar reason large states are less liable to faction than small ones, because in them the middle class is large; whereas in small states it is easy to divide all the citizens into two classes who are either rich or poor, and to leave nothing in the middle. And democracies are safer and more permanent than oligarchies, because they have a middle class which is more numerous and has a greater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for when there is no middle class, and the poor greatly exceed in number, troubles arise, and the state soon comes to an end. A proof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 middle dass is that the best legislators have been of a middle condition; for example, Solon, as his own verses testify; and Lycurgus, for he was not a king; and Charondas, and almost all legislators.

显然，最好的政治团体是中产阶级公民组成的，而如果一个城邦的中产阶级的人数众多，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比另外两个团体合起来的力量更强大，或至少比其中任何一个更强大，那么这个城邦很可能是管理良好的；因为中产人数的增加能够调节天平，避免任何一端过于强大。那么，公民们拥有简朴而宽裕的财产对城邦而言就是一种极大的幸运；因为如果有些人拥有很多家产，而其他人一无所有，就会出现一种极端的平民政体或一种纯粹的寡头政体；或者，一种暴君政体会从这两种极端政体中产生——或者产生于最顽固的平民政体或产生于寡头政体；但是，它不太可能出现在那些处于中间位置或与其临近的政体当中。在今后讨论城邦革命时，我们解释上述现象的成因。很显然，城邦的中产阶级是最好的阶级，因为其他阶级都避免不了派系斗争；而且，在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城邦，发生派系纷争和政权瓦解的可能性是最小的。因为类似的原因，大型的城邦也比小型城邦更不容易出现派系纷争，因为这种城邦里的中产阶级人数众多；反而在小型的城邦，公民很容易分裂成两个阶级，非富即穷，没有中间状态。而且，平民政体比寡头政体更稳固也更持久；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中产阶级，而且他们在政权中享有更大份额；因为，如果没有中产阶级，而且穷人的数量远超其他人，麻烦就会出现，城邦很快就会灭

亡。中产阶级的优越性的一个明证，就是最好的立法家都是中产阶级；例如，梭伦，他的诗可以证明；还有莱喀古士，因为他不是一位君主；还有嘉隆达斯，及几乎所有的立法家。

These considerations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why most governments are either democratical or oligarchical. The reason is that the middle class is seldom numerous in them, and whichever party, whether the rich or the common people, transgresses the mean and predominates, draws the constitution its own way, and thus arises either oligarchy or democracy. There is another reason—the poor and the rich quarrel with one another, and whichever side gets the better, instead of establishing a just or popular government, regards political supremacy as the prize of victory, and the one party sets up a democracy and the other an oligarchy. Further, both the parties which had the supremacy in Hellas looked only to the interest of their own form of government, and established in states, the one, democracies, and the other, oligarchies; they thought of their own advantage, of the public not at all. For these reasons the middle form of government has rarely, if ever, existed, and among a very few only. One man alone of all who ever ruled in Hellas was induced to give this middle constitution to states. But it has now become a habit among the citizens of states, not even to care about equality; all men are seeking for dominion, or, if conquered, are willing to submit.

这些讨论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大多数政体不是平民风格的就是寡头风格。原因是这些城邦中的中产阶级往往人数太少，而且穷人或者富人的任何一派，总是会在力量上超过他们，并主导整个政体，使政体向自己的方向靠拢，从而形成平民政体或者寡头政体。还有另一个原因——穷人和富人彼此争吵，无论哪一方取得优势，都不会建

立一个公正的或大众的政体，相反，他们把政治优势当作胜利的奖品，所以，一方胜利会建立平民政体，而另一方胜利则会建立寡头政体。而且，那些征服了希腊很多城邦的霸主们，都只关注自己政体的利益，他们在被征服的城邦中或者建立了平民政体，或者建立了寡头政体；可他们只考虑什么对自己有利，而从不考虑什么对公众有利。因此，从没有中间形式的政体很少存在，，即便有也只是寥寥几个。在征服希腊的所有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曾经在他人劝说下同意各属邦建立中间形式的政体。但是，这已经成为许多城邦公民的一种习惯，即不关心平等；而是所有人都渴望领地，或者如果被征服了，就心甘情愿地服从。

What then is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and what makes it the best, is evident; and of other constitutions, since we say that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democracy and many of oligarch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which has the first and which the second or any other place in the order of excellence, now that we have determined which is the best. For that which is nearest to the best must of necessity be better, and that which is furthest from it worse, if we are judging absolutely and not relatively to given conditions: I say “relatively to given conditions,” since a particular government may be preferable, but another form may be better for some people.

那么，什么是最好的政体形式，又是什么让它成为最好的呢？答案显而易见；关于其他的政体，既然我们说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有很多不同种类，按照每个种类的优点，不难看出哪种政体应该排在第一，哪种排第二，或其他任何位置，原因是我们已经确定了最好的一种了。越接近最好政体的种类必然越好，而与它差异最大的则是最差的，前提是我们是在绝对条件下做判断而不是相对于某种特殊条件；“相对于某种特殊条件”指的是，某种政体可能比另一种更胜一筹，但另一种可能更适合某些人。

Part 12

第十二章

We have now to consider what and what kind of government is suitable to what and what kind of men. I may begin by assuming, as a general principle common to all governments, that the portion of the state which desires the permanence of the constitution ought to be stronger than that which desires the reverse. Now every city is composed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By quality I mean freedom, wealth, education, good birth, and by quantity, superiority of numbers. Quality may exist in one of the classes which make up the state, and quantity in the other. For example, the meanly-born may be more in number than the well-born, or the poor than the rich, yet they may not so much exceed in quantity as they fall short in quality; and therefore there must be a comparison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Where the number of the poor is more than proportioned to the wealth of the rich, there will naturally be a democracy, varying in form with the sort of people who compose it in each case. If, for example, the husbandmen exceed in number, the first form of democracy will then arise; if the artisans and laboring class, the last; and so with the intermediate forms. But where the rich and the notables exceed in quality more than they fall short in quantity, there oligarchy arises, similarly assuming various forms according to the kind of superiority possessed by the oligarchs.

现在应该讨论什么形式的政体适合什么样的人们。首先，我可以假设，作为一条所有城邦中都常见的普遍原则，渴望现行政体永恒存在的部分应该永远比持相反愿望的部分更强大。每一个城邦都是由质和量构成。“质”指的是自由、财富、教育和良好的出身；而“量”则指

数量上的优越性。“质”可能存在于城邦的某一个阶层，而“量”可能存在于另一个阶层。例如，出身卑微的人在数量上可能超过了出身高贵的人，或穷人的数量超过富人，但是，他们在“量”上的优势可能没有他们在“质”上的劣势那么大；因此，必须在质和量之间进行对比。如果一个城邦的穷人数量优势压倒了富人在财富上的优势，这里自然会出现平民政体，而在不同情况下，其具体形式也会随着每种情况下构成其政体的人的种类而变化。例如，如果农民的数量占优，那么这将是第一种形式的平民政体；如果工匠和体力劳动者数量占优，就会形成最后一种平民政体；其他中间位置的平民政体也是一样。但是，如果富人和贵族的质量优势压倒了他们在数量上的不足，就会出现寡头政体，类似的，根据寡头们所占优势，这个寡头政体的形式也有变化。

The legislator should always include the middle class in his government; if he makes his laws oligarchical, to the middle class let him look; if he makes them democratical, he should equally by his laws try to attach this class to the state. There only can the government ever be stable where the middle class exceeds one or both of the others, and in that case there will be no fear that the rich will unite with the poor against the rulers. For neither of them will ever be willing to serve the other, and if they look for some form of government more suitable to both, they will find none better than this, for the rich and the poor will never consent to rule in turn, because they mistrust one another. The arbiter is always the one trusted, and he who is in the middle is an arbiter. The more perfect the admixture of the political elements, the more lasting will be the constitution. Many even of those who desire to form aristocratical governments make a mistake, not only in giving too much power to the rich, but in attempting to overreach the people.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out of a false good there arises a true evil, since the encroachments of the rich are more destructive to the

constitution than those of the people.

立法者永远应该将中产阶级包括在自己的政权当中；如果他制定了寡头性质的法律，中产阶级应该成为他的依靠；如果是平民性质的，他同样应该努力用法律把这个阶级与他的城邦结为一体。只有中产阶级的人数超过其他两种人或其中一种，一个城邦才能稳定，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用害怕富人和穷人会联合谋害统治者。因为这两种人都不会为对方服务，而且，如果他们寻找的是一个对他们双方都更适合的政体，他们也找不到比目前这个更好的，因为富人和穷人永远不会同意轮流执政，他们不信任对方。仲裁者永远是双方都能信任的人，而仲裁者就是中产阶级。政治元素的混合越完美，一个政体持续的时间就越长。很多人，甚至那些想要建立贵族政体的人们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但给了富人太多权力，而且还试图过分压迫平民。有一天，从他们虚假的美好中会生出一种真正的邪恶，因为富人的蚕食对城邦的破坏力远大于穷人。

Part 13

第十三章

The devices by which oligarchies deceive the people are five in number; they relate to (1) the assembly; (2) the magistracies; (3) the courts of law; (4) the use of arms; (5) gymnastic exercises. (1) The assemblies are thrown open to all, but either the rich only are fined for non-attendance, or a much larger fine is inflicted upon them. (2) to the magistracies, those who are qualified by property cannot decline office upon oath, but the poor may. (3) In the law courts the rich, and the rich only, are fined if they do not serve, the poor are let off with impunity, or, as in the laws of Charondas, a larger fine is inflicted on the rich, and a smaller one on the poor. In

some states all citizen who have registered themselves are allowed to attend the assembly and to try causes; but if after registration they do not attend either in the assembly or at the courts, heavy fines are imposed upon them. The intention is that through fear of the fines they may avoid registering themselves, and then they cannot sit in the law-courts or in the assembly. concerning (4) the possession of arms, and (5) gymnastic exercises, they legislate in a similar spirit. For the poor are not obliged to have arms, but the rich are fined for not having them; and in like manner no penalty is inflicted on the poor for non-attendance at the gymnasium, and consequently, having nothing to fear, they do not attend, whereas the rich are liable to a fine, and therefore they take care to attend.

寡头政体欺骗平民的工具有五种；关系到（1）公民大会；（2）执政官；（3）法庭；（4）武器的使用；（5）体育锻炼。（1）公民大会面对全体公民开放，但是有的只针对缺席的富人罚款，有的对缺席的富人处以更高的罚款。（2）在执政官方面，禁止具备规定财产资格的人宣誓辞职，但是不禁止穷人这样做。（3）在法庭方面，富人，且只有富人，会因缺席受罚金，但是穷人缺席则免罚，或者像嘉隆达斯的法律那样，富户缺席罚重金，穷人则轻罚。有些城邦规定，已经登记在册的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案件审理；但是，登记入册之后无论缺席公民大会还是法庭，都将被处以很重的罚金。其意图在于利用对罚金的恐惧来使人们避免登记入册，这样他们就不能出席公民大会和法庭了。（4）关于平民持有武器，和（5）体育锻炼，也有类似的举措。因为穷人并非必须拥有武器，但富人没有就会处罚金；同理，穷人不参与体育锻炼不会受罚，结果，因为不用害怕受罚，他们不参加锻炼，而富人不参加则要受罚，所以他们认真地参与。

These are the devices of oligarchical legislators, and in

democracies they have counter devices. They pay the poor for attending the assemblies and the law-courts, and they inflict no penalty on the rich for non-attendance. It is obvious that he who would duly mix the two principles should combine the practice of both, and provide that the poor should be paid to attend, and the rich fined if they do not attend, for then all will take part; if there is no such combination, power will be in the hands of one party on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confined to those who carry arms. As to the property qualification, no absolute rule can be laid down, but we must see what is the highest qualification sufficiently comprehensive to secure that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have the rights of citizens exceeds the number of those excluded. Even if they have no share in office, the poor, provided only that they are not outraged or deprived of their property, will be quiet enough.

这些都是寡头政体立法者的工具，而在平民政体中则有相反的工具。他们会给参加公民大会和法庭的穷人发放报酬，而且对缺席的富人不处罚金。显而易见，如果一个人要把两种原则合理的混合在一起，他应该把两种做法结合使用，规定穷人出席应该领取报酬，而富人缺席则要处以罚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人都参与；如果没有这样的结合运用，权力就会落入其中一派的手中。政权参与者还应该仅限于那些拥有武器的人。关于财产限额，没法制定绝对的条令，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最高的财产限额做到足够广泛，从而确保拥有公民权力的人数超过被排除在公民之外的人数。那些穷人，即使不能参与公共管理，只要没被激怒或被剥夺财产，还是会保持安静。

But to secure gentle treatment for the poor is not an easy thing, since a ruling class is not always humane. And in time of war the poor are apt to hesitate unless they are fed; when fed, they are willing enough to fight. In some states the government is vested,

not only in those who are actually serving, but also in those who have served; among the Malians, for example, the governing body consisted of the latter, while the magistrates were chosen from those actually on service. And the earliest government which existed among the Hellenes, after the overthrow of the kingly power, grew up out of the warrior class, and was originally taken from the knights (for strength and superiority in war at that time depended on cavalry; indeed, without discipline, infantry are useless, and in ancient times there was no military knowledge or tactics, and therefore the strength of armies lay in their cavalry). But when cities increased and the heavy armed grew in strength, more had a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states which we call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s have been hitherto called democracies. Ancient constitutions, as might be expected, were oligarchical and royal; their population being small they had no considerable middle class; the people were weak in numbers and organization, and were therefore more contented to be governed.

但是，要保证温柔地对待穷人也不容易，因为统治阶级不会一直仁慈。在战争时期，穷人在得到粮饷之前通常犹豫不决；可一旦有了粮饷，他们还是很乐意参战的。在有些城邦，政权不仅握在现役军人手中，还掌握在那些曾经服过役的人手中。例如，在马里人的政体中，政权就由后者组成，而执政官员则从现役军人中选出。在古希腊，在推翻君权之后建立的最早的政体，就出自于军人阶级，而且首先来自于骑兵（因为在那个时代，军队的力量和优势都依靠骑兵；而纪律松散的步兵在战场上根本没什么作用，而且，古时候没有军事知识和战术，所以，军队的力量全靠骑兵）。可是，随着城邦版图的增加，步兵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更多的步兵参与到了城邦管理当中；因此，我们现在所谓的共和政体过去一直是称为平民政体。古代的政体，可以想见，都是寡头政体或君主政体；因为那时候城邦的人口很少，不可能找到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而平民不但在数量上和组织上

都很弱小，因此更加满足于被统治。

I have explained why there are various forms of government, and why there are more than is generally supposed; for democracy, as well as other constitutions, has more than one form: also what their differences are, and whence they arise, and what is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speaking generally and to whom the various forms of government are best suited; all this has now been explained.

我在这里解释了为什么有不同的政体形式，以及为什么他们的数量比人们一般认为的要多；因为平民政体，以及其他政体，拥有的形式都不止一种；我还讨论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以及导致各种差异的原因，另外，我们还讨论了一般而言，什么是最好的政体形式，以及哪种政体形式最适合于哪种人；关于这些问题就说这么多。

Part 14

第十四章

Having thus gained an appropriate basis of discussion, we will proceed to speak of the points which follow next in order. We will consider the subject not only in general but with reference to particular constitutions. All constitutions have three elements, concerning which the good lawgiver has to regard what is expedient for each constitution. When they are well-ordered, the constitution is well-ordered, and as they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constitutions differ. There is (1) one element which deliberates about public affairs; secondly (2) that concerned with the

magistrates—the question being, what they should be, over what they should exercise authority, and what should be the mode of electing to them; and thirdly (3) that which has judicial power.

在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之后，我们来继续讨论接下来的几个要点。我们不但要对这一主题进行一般性考虑，还会结合特定的政体做具体研究。所有的政体都有三个要素，每一个优秀的立法者都必须重视它们，并做出有利于城邦的安排。如果把它们安排好了，那么一个政体就是结构合理的，而且，因为它们在各个城邦都不相同，所以政体也会相应的改变。这三个要素分别是：（1）一个对公共事务进行审议的机构；（2）关于执政官——问题是：他们应该由谁组成，应该掌握什么样的权力，以什么样的方式被任命；（3）拥有司法权的部门。

The deliberative element has authority in matters of war and peace, in making and unmaking alliances; it passes laws, inflicts death, exile, confiscation, elects magistrates and audits their accounts. These powers must be assigned either all to all the citizens or an to some of them (for example, to one or more magistracies, or different causes to different magistracies), or some of them to all, and others of them only to some. That all things should be decided by all is characteristic of democracy; this is the sort of equality which the people desire. But there are various ways in which all may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they may deliberate, not all in one body, but by turns, a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elecles the Milesian. There are other constitutions in which the boards of magistrates meet and deliberate, but come into office by turns, and are elected out of the tribes and the very smallest divisions of the state, until every one has obtained office in his turn. The citizens, on the other hand, are assembled only for the purposes of

legislation, and to consult about the constitution, and to hear the edicts of the magistrates. In another variety of democracy the citizen form one assembly, but meet only to elect magistrates, to pass laws, to advise about war and peace, and to make scrutinies. Other matters are referred severally to special magistrates, who are elected by vote or by lot out of all the citizens Or again, the citizens meet about election to offices and about scrutinies, and deliberate concerning war or alliances while other matters are administered by the magistrates, who, as far as is possible, are elected by vote. I am speaking of those magistracies in which special knowledge is required. A fourth form of democracy is when all the citizens meet to deliberate about everything, and the magistrates decide nothing, but only make the preliminary inquiries; and that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last and worst form of democracy, corresponding, as we maintain, to the close family oligarchy and to tyranny, is at present administered. All these modes are democratical.

议事机构的权力有：做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定，缔结或解除盟约，通过法律，做出死刑、放逐和没收财物的惩罚，选举执政官，和审查执政官的述职。这些事务的决定方式有如下几种：一、全部交给全体公民共同裁定，或者全部交给某些公民裁定（例如，交给一个执政官或多个执政官决定，或不同的案件交给不同的执政官决定），二、一部分交给全体公民裁定，其余的交给某些公民。把全部事务交给全体公民共同裁定是平民政体的特征，因为这就是平民渴望的那种平等。把这些权力交给全体公民共同执掌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之一是让他们掌握议事权，但不是共同掌权而是轮流。米利都人特勒克里的政体就是这样做的。在其他一些政体中，由执政官员组成的议事会审议公共事务，公职进行轮替制，他们由不同的部落选出，从城邦最小的单位中选出，最后每个人按顺序都可获得职司。另一方面，公民们只有在立法、或对政体形式进行协商、或听取执政官员法令时才召开公民大会。在另一个平民政体的变体中，由公民组成公民大会，但是

大会仅在以下情况时召开：选举执政官、通过法律、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建议、审查执政官员。其他事务则分别交给特定执政官员处理，执政官通过抽签或投票的方式从全体公民中选出。或者还有一种变体，公民们聚会的目的有三种：一、选举执政官；二、审查执政行为；三、审议有关战争和结盟等问题；其他事务则留给执政官员们处理，而他们则尽可能由投票产生。这里的执政官需要具备特定知识。第四种平民政体中，公民大会审议一切事务，而执政官员们则无权决定任何事，只能做初步的研究；这就是最后一种也是最糟糕的一种平民政体所使用的管理方式，我们坚持认为，这种政体对应于门阀式寡头政体与暴君政体。上述这些就是平民政体的管理模式。

On the other hand, that some should deliberate about all is oligarchical. This again is a mode which, like the democratical has many forms. When the deliberative class being elected out of those who have a moderate qualification are numerous and they respect and obey the prohibitions of the law without altering it, and any one who has the required qualification shares in the government, then, just because of this moderation, the oligarchy inclines towards polity. But when only selected individuals and not the whole people share in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state, then, although, as in the former case, they observe the law, the government is a pure oligarchy. Or, again, when those who have the power of deliberation are self-elected, and son succeeds father, and they and not the laws are supreme—the government is of necessity oligarchical. Where, again, particular persons have authority in particular matters—for example, when the whole people decide about peace and war and hold scrutinies, but the magistrates regulate everything else, and they are elected by vote—there the government is an aristocracy. And if some questions are decided by magistrates elected by vote, and others by magistrates elected by lot, either absolutely or out of select candidates, or elected partly by

vote, partly by lot—these practices are partly characteristic of an aristocratical government, and party of a pur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另一方面，由部分公民审议所有事务则属寡头风格。这种模式，也像平民政体一样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如果议事者都出自于中产阶级且人数众多，而且他们尊重法律，并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任何满足财产限额的人都能参政，正是由于这种中庸特点，这种寡头政体偏向于共和政体。但是，如果只有被选定的一些人而并非所有公民都享有城邦议事权，那么，尽管像上一种政体中一样，他们遵守法律规定，这种政体还是纯粹的寡头政体。同理，如果有议事权的人是毛遂自荐的，而且是子袭父位，而且他们还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的政体必然是寡头风格。而在有些城邦，特定的人群掌握特定事务的权柄——例如，如果让全体公民决定战争与和平事务，并审查执政官员，而其余事务则由执政官处理，并且执政官是通过投票的方式产生的——这种政体是贵族政体。如果有些问题由投票产生的执政官决定，而其他的则由抽签产生的执政官决定，投票和抽签的范围可以是全体公民，或是指定的候选人，或者一部分投票产生，一部分抽签产生——这些做法的一部分属于贵族政体特色，一部分属于纯共和政体。

These are the various forms of the deliberative body; they correspond to the various forms of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of each state is administered according to one or other of the principles which have been laid down. Now it is for the interest of democracy, according to the most prevalent notion of it (I am speaking of that extreme form of democracy in which the people are supreme even over the laws), with a view to better deliberation to adopt the custom of oligarchies respecting courts of law. For in oligarchies the rich who are wanted to be judges are compelled to attend under pain of a fine, whereas in deinocracies

the poor are paid to attend. And this practice of oligarchies should be adopted by democracies in their public assemblies, for they will advise better if they all deliberate together—the people with the notables and the notables with the people. It is also a good plan that those who deliberate should be elected by vote or by lot in equal numbers out of the different classes; and that if the people greatly exceed in number those who have political training, pay should not be given to all, but only to as many as would balance the number of the notables, or that the number in excess should be eliminated by lot. But in oligarchies either certain persons should be co-opted from the mass, or a class of officers should be appointed such as exist in some states who are termed probuli and guardians of the law; and the citizens should occupy themselves exclusively with matters on which these have previously deliberated; for so the people will have a share in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state, but will not be able to disturb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nstitution. Again, in oligarchies either the people ought to accept the measures of the government, or not to pass anything contrary to them; or, if all are allowed to share in counsel, the decision should rest with the magistrates. The opposite of what is done in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s should be the rule in oligarchies; the veto of the majority should be final, their assent not final, but the proposal should be referred back to the magistrates. Whereas in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s they take the contrary course; the few have the negative, not the affirmative power; the affirmation of everything rests with the multitude.

这些就是议事机构的各种组织形式；它们对应于不同的政体形式。每个城邦的政体都是按照事先制定好的这种或那种原则进行管理的。按照时下最流行的对平民政体的认识（我指的是极端的平民政体，其中人民的权力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一种对平民政体有利的

做法就是沿用寡头政体有关法庭集会方面的惯例，从而提高议事效果。因为在寡头政体中，那些受命作陪审员的富人必须出席，否则就会被罚款，相反，在平民政体中，那些穷人来参加大会能领取报酬。寡头政体的这种制度应该被平民政体应用在其公民大会中，因为如果所有人能一起参加审议，就能提出更好的建议——平民与贵族共同议事。另一种明智的做法即让参加议事的人由各个不同阶级的公民以相等的人数组成，其人选可以通过抽签或投票的方式产生；如果平民人数远超有政治素养的人，则不应给参与大会的每一位平民都发报酬，而是只给一定数量的平民参与者发补贴，这个数量应该与出席大会的贵族人数相等，还可通过抽签方法淘汰多出的平民与会者。在寡头政体中，应该从平民中选招一些加入议事会，或专门任命一群官员，像有些城邦中那样，人们称其为预审会或法律监护会；而公民大会则专门处理这些机构预审过的一些事务；通过这种方法，平民可以参与城邦的议事，但是没有能力扰乱现有政体的秩序。同理，在寡头政体中，平民应该接受统治者的政策，或者不通过任何与之相反的提议；或者如果所有公民都可以提供意见，决定权应该握在执政官手中。而寡头政体中的议事模式应该与共和政体中的做法相反；即平民有最后否决权，而没有最后赞成权，但是，所有的提议必须交回给执政官做最终决定。共和政体中的做法刚好相反；少数派掌握否决权，而非赞成权；赞成权掌握在公众手中。

These, then, are our conclusions respecting the deliberative, that is, the supreme element in states.

关于城邦的议事机构，即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我们的结论就是这些。

Part 15

第十五章

Next we will proceed to consider the distribution of offices; this too, being a part of politics concerning which many questions arise: What shall their number be? Over what shall they preside, and what shall be their duration? Sometimes they last for six months, sometimes for less; sometimes they are annual, while in other cases offices are held for still longer periods. Shall they be for life or for a long term of years; or, if for a short term only, shall the same persons hold them over and over again, or once only? Also about the appointment to them—from whom are they to be chosen, by whom, and how? We should first be in a position to say what are the possible varieties of them, and then we may proceed to determine which are suited to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But what are to be included under the term “offices”? That is a question not quite so easily answered. For a political community requires many officers; and not every one who is chosen by vote or by lot is to be regarded as a ruler.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are the priests, who must be distinguished from political officers; masters of choruses and heralds, even ambassadors, are elected by vote. Some duties of superintendence again are political, extending either to all the citizens in a single sphere of action, like the office of the general who superintends them when they are in the field, or to a section of them only, like the inspectorships of women or of youth. Other offices are concerned with household management, like that of the corn measurers who exist in many states and are elected officers. There are also menial offices which the rich have executed by their slaves. Speaking generally, those are to be called offices to which the duties are assigned of deliberating about certain measures and ofjudging and commanding, especially the last; for to command is the especial duty of a magistrate. But the question is not of any importance in practice; no one has ever brought into cour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although such problems have a speculative interest.

下面，我们来继续研究公务的分配；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有关它的问题也很多：如应该设置多少公共部门？它们各自分管什么？以及它们维持多久？有时它们维持六个月，有时则更短，有的为期一年，其他情况下有些部门持续时间更长。它们的任期是否应该是终身制，还是一年以上的长任期？或者，如果任期很短，那么，同一批人可否重复任职，还是只得任职一次？此外，关于任命的问题——应该从什么人当中选择，由谁来选择，如何选择呢？首先我们应该确定这些方面有哪些可能的变化，然后，我们再决定哪种变化适合哪一种政体。但是，什么应该被归属于“公务”的范畴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一个政治团体需要很多不同的官员；而且，并非每个通过抽签或投票的方式产生的官员都应看作是统治者。首先就是祭司，应该将他们与政治官员区别开来；其次，合唱团经理和信使，甚至连外交使节也是投票产生的，但也不属于执政官员。还有一些监管性的职责是政治性的，其中有些涉及到全体公民在某一领域的行为，如将军的职能，就是监管战场上的所有本邦公民，有些只涉及一部分公民，如对妇女和年轻人的监管。还有一些公务跟家务管理有关，如很多城邦设置了粮食管理员，而且他们也是选举产生的官员。还有一些粗鄙的业务，由富人命令他们的奴隶去完成。一般而言，真正可以称为公职的是那些受委派去审议特定政策、审理案件、以及发布命令的机构，尤其是最后一种；因为发布命令是专属执政官的职责。但是在实际应用上，这个问题意义并不大；从没有人提请法庭裁决这个词汇的意思，虽然作为学术思考的题目，这些问题还是有一定意义。

What kinds of offices, and how many, are necessary to the existence of a state, and which, if not necessary, yet conduce to its well being are much mor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affecting all constitutions, but more especially small states. For in great states it

is possible, and indeed necessary, that every office should have a special function; where the citizens are numerous, many may hold office. And so it happens that some offices a man holds a second time only after a long interval, and others he holds once only; and certainly every work is better done which receives the sole, and not the divided attention of the worker. But in small states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many offices in a few hands, since the small number of citizens does not admit of many holding office: for who will there be to succeed them? And yet small states at times require the same offices and laws as large one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one want them often, the others only after long intervals. Hence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 care of many offices should not be imposed on the same person, for they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each other. When the population is small, offices should be like the spits which also serve to hold a lamp. We must first ascertain how many magistrates are necessary in every state, and also how many are not exactly necessary, but are nevertheless useful, and then there will be no difficulty in seeing what offices can be combined in one. We should also know over which matters several local tribunals are to have jurisdiction, and in which authority should be centralized: for example, should one person keep order in the market and another in some other place, or should the same person be responsible everywhere? Again, should offices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s with which they deal, or according to the persons with whom they deal: I mean to say, should one person see to good order in general, or one look after the boys, another after the women, and so on? Further, under different constitutions, should the magistrates be the same or different? For example, in democracy, oligarchy, aristocracy, monarchy, should there be the same magistrates, although they are elected, not out of equal or similar classes of citizen but differently under different constitutions—in aristocracies, for example, they are chosen from the educated, in

oligarchies from the wealthy, and in democracies from the free—or are the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offices answering to them as well, and may the same be suitable to some, but different offices to others? For in some states it may be convenient that the same office should have a more extensive, in other states a narrower sphere. Special offices are peculiar to certain forms of government: for example that of probuli, which is not a democratic office, although a bule or council is. There must be some body of men whose duty is to prepare measures for the people in order that they may not be diverted from their business; when these are few in number, the state inclines to an oligarchy: or rather the probuli must always be few, and are therefore an oligarchical element. But when both institutions exist in a state, the probuli are a check on the council; for the counselors is a democratic element, but the probuli are oligarchical. Even the power of the council disappears when democracy has taken that extreme form in which the people themselves are always meeting and deliberating about everything. This is the case when the members of the assembly receive abundant pay; for they have nothing to do and are always holding assemblies and deciding everything for themselves. A magistracy which controls the boys or the women, or any similar office, is suited to an aristocracy rather than to a democracy; for how can the magistrates prevent the wives of the poor from going out of doors? Neither is it an oligarchical office; for the wives of the oligarchs are too fine to be controlled.

哪些部门对城邦的生存必不可少，一共有多少这样的部门，哪些部门，虽然不是必须的，但是能够促进城邦的利益？这些都是更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所有的政体，尤其是小城邦。因为在大城邦中，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让每个部门有一个特定的功能；这里人口众多，所以很多人可以出任公职。所以，有时候，有些部门，一个人任职一次以后

要过很久才能再次任职，而其他的部门，他可能只任过一次；当然了，一项工作要做的更好，需要工人的全神贯注，而不是分散的部分注意力。但是在小城邦里，有必要把很多的公务整合到少数公民手中；原因是它们的公民太少，所以不允许很多人出任执政官员；否则谁来接替他们呢？虽然如此，小城邦也需要和大城邦相同的公共部门和法律；差别是一个要频繁地用到这些部门，而另一个则间隔很久才会用到一次。所以，如果把不同的职责托付给同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不便，因为这些不同职责之间并不会相互干扰。如果人口较少，公务部门应该像痰盂，有时也兼做灯台。我们必须确定每个城邦必需的执政官员数量，又有多少执政官并非必需但仍然应该对城邦有用，然后，就不难确定什么样的公共部门可以合并成为一个。我们还应该知道，哪些事务应该让地方执政部门管辖，以及哪些事务的权力应该集中一处：比如，是否应该由一个人负责市场的秩序，而另一个人负责其他地方呢，还是应该由同一个人负责所有地方的秩序？此外，应该按照管理的事务，还是按照管理的对象来划分不同的部门：我指的是，应该由一个人保证所有的良好秩序，还是由一个人管理孩子们的秩序，另一个管理妇女的秩序呢，依次类推？另外，在不同的政体当中，执政官的设置应该相同还是相异呢？例如，在平民政体，寡头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中，是否应该有相同的执政官呢，虽然他们不是从平等的或相似的公民中选出来的，而是在不同的政体中以不同的方式产生——例如，在贵族政体中，他们从有教养的人当中产生，在寡头政体中，从富人中产生，在平民政体中，从自由平民中产生——或者，那些受他们掌控的职能部门是否也有不同呢，是否有些同样的部门适合某些政体，而但不同的部门适合其他政体呢？原因是同一个部门在有些城邦更方便管理很大的范围，而在其他城邦则管理很小的范围。有些职能部门只为某一类的政体所独有，例如议事预审会就不是平民政体的部门，而议事会则是平民政体的职能部门。必须有一群人来提前讨论和准备将要提交给公民大会的议案，从而让公民大会成员可以专心于审议国事；如果这群人数量很少，政体就会倾向于寡头政体；或者不如说，预审会一向人数很少，因为这个机构属于寡头政体的元素。但是，当两种机构同时存在于一个城邦时，议事预审会能够限制议事会的权力；因为议事会是平民政体的元素，而议事预审会是

寡头政体的元素。甚至，在采取极端形式的平民政体中，议事会的权力完全消失了，公民大会长期存在并审议一切事务。这种情况发生在公民大会的成员可以领取丰厚报酬的城邦；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可以长期维持公民大会，按自己的意愿裁决一切政务。一个管理妇女和儿童的行为的部门，或其他类似部门，适合于贵族政体而不是平民政体；原因是没有执政官能禁止一个穷人的妻子抛头露面。这种部门也不会出现在寡头政体中，因为那里的妇女太娇贵，所以没法控制。

Enough of these matters. I will now inquire into appointments to offices. The varieties depend on three terms, and the combinations of these give all possible modes: first, who appoints? secondly, from whom? and thirdly, how? Each of these three admits of three varieties: (A) All the citizens, or (B) only some, appoint. Either (1) the magistrates are chosen out of all or (2) out of some who are distinguished either by a property qualification, or by birth, or merit, or for some special reason, as at Megara only those were eligible who had returned from exile and fought together against the democracy. They may be appointed either (a) by vote or (b) by lot. Again, these several varieties may be coupled, I mean that © some officers may be elected by some, others by all, and (3) some again out of some, and others out of all, and (c) some by vote and others by lot. Each variety of these terms admits of four modes.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就说这么多。下面我来研究一下执政官员的任命问题。任命方式的不同取决于三个方面，把它们进行不同的组合就能够得到所有可能的模式：第一，谁来任命执政官？第二，从哪里选？第三，如何选？这三个方面的各自又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变化：（A）全体公民，或（B）只有一部分公民，负责任命。或者（1）执政官从全体公民中选出，或者（2）从某个卓越的群体选出，或者是

财产资格，或出身、或美德、或某些特殊理由，比如在梅加拉，选举权属于那些一起结束流亡返回故土的人，并且他们必须一起武力对抗过平民政体。而任命的方式可以是（a）投票或（b）抽签。同理，这几种不同的模式可以进行不同的组合，首先，（C）有些执政官可以由部分公民来进行任命，而其他的则要全体公民通过才能任命，其次，（3）有些从部分公民中选出，其他的则要从全体公民中选出，另外，（c）有些通过投票的方式任命，而其他的则通过抽签决定。而这些条件的每种变体有四种组合模式。

For either (A 1 a) all may appoint from all by vote, or (A 1 b) all from all by lot, or (A 2 a) all from some by vote, or (A 2 b) all from some by lot (and from all, either by sections, as, for example, by tribes, and wards, and phratries, until all the citizens have been gone through; or the citizens may be in all cases eligible indiscriminately); or again (A 1 c, A 2 c) to some offices in the one way, to some in the other. Again, if it is only some that appoint, they may do so either (B 1 a) from all by vote, or (B 1 b) from all by lot, or (B 2 a) from some by vote, or (B 2 b) from some by lot, or to some offices in the one way, to others in the other, i.e., (B 1 c) from all, to some offices by vote, to some by lot, and (B 2 C) from some, to some offices by vote, to some by lot. Thus the modes that arise, apart from two (C, 3) out of the three couplings, number twelve. Of these systems two are popular, that all should appoint from all (A 1 a) by vote or (A 1 b) by lot—or (A 1 c) by both. That all should not appoint at once, but should appoint from all or from some either by lot or by vote or by both, or appoint to some offices from all and to others from some ("by both" meaning to some offices by lot, to others by vote), is characteristic of a polity. And (B 1 c) that some should appoint from all, to some offices by vote, to others by lot, is also characteristic of a polity, but more oligarchical than the former method. And (A 3 a, b, c, B 3 a, b, c) to appoint from both, to some

offices from all, to others from some, is characteristic of a polity with a leaning towards aristocracy. That (B 2) some should appoint from some is oligarchical—even (B 2 b) that some should appoint from some by lot (and if this does not actually occur, it is none the less oligarchical in character), or (B 2 C) that some should appoint from some by both. (B 1 a) that some should appoint from all, and (A 2 a) that all should appoint from some, by vote, is aristocratic.

因为，或者是（A 1 a）模式，即执政官由全体公民在全体公民范围内通过投票方式产生；或者是（A 1 b）模式，全体公民在全体公民范围内选，抽签产生；或者是（A 2 a）部分公民在全体公民范围内选，投票产生，或者（A 2 b）部分公民在全体公民范围内选，抽签产生（从全体公民中选，或者按照区域范围，如，按部落，区域或组织划分，一直到他们完成对整个城邦的选举为止；或者公民们不分情况无差别参选）；或者（A 1 c, A 2 c）模式，某些执政官以这样的方式产生，而其他的则以另一种方式产生。同理，如果只是少数人行使任命权，他们可以或者用（B 1 a）模式，在全体公民范围内选，投票产生，或者用（B 1 b）模式，在全体公民范围内选，抽签产生；或者（B 2 a）在部分公民范围内选，投票产生，或（B 2 b）在部分公民范围内选，抽签产生，或者有些官员用这种方式产生，其他用另一种方式产生；再比如，（B 1 c）在全体公民范围内选，有些部门靠投票，有些靠抽签，或者（B 2 C）在部分公民范围内选，有些部门靠投票，有些靠抽签。如此看来，除了两个（C, 3）模式以外，三种模式组合的数量共有十二种。这些制度当中，有两种特别受欢迎，即全体公民在全体公民范围内选，靠投票（A 1 a）或（A 1 b）靠抽签——或（A 1 c）两种兼用。全体公民不应同时参与任命，但是被任命者应该从全体公民或部分公民当中产生，方式也是通过抽签或选举或者两者兼有；或者有些部门的任命应该从全体公民中产生，其他部门的任命则从部分公民中产生（“二者兼用”指的是有些部门靠投票决定，有些靠抽签），这种做法是共和政体的特点。（B 1 c）模式，有些部门应从全体公民中任命，其中有些部门靠投票，有些部门靠抽

签，这也是共和政体的特点，但是比前一种更偏向于寡头政体。（A 3 a, b, c, B 3 a, b, c）模式，选举范围包括两种，全民和部分公民，有些部门在全体公民当中选，有些在部分公民中选，这是一种共和政体特点，但是又有点倾向于贵族政体。（B 2）模式，有些部门从部分公民中选，这属于寡头风格——甚至是（B 2 b）模式，有些部门从部分公民中靠抽签产生（即使这种情况没有真正发生，它依然是寡头风格），或者（B 2 C）模式，有些部门应该从部分公民中兼用两种手段产生。（B 1 a）模式，有些部门应该从全体公民中选出，以及（A 2 a）模式，所有部门应该从部分公民中，靠投票产生，都是贵族风格的。

These are the different modes of constituting magistrates, and these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which are proper to which, or how they ought to be established, will be evident when we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their powers. By powers I mean such powers as a magistrate exercises over the revenue or in defense of the country; for there are various kinds of power: the power of the general, for example, is not the same with that which regulates contracts in the market.

这些就是组建执政部门的各种不同方案，这些方案分别适合于不同的政体；但是，什么方案适合什么样的政体？这些执政机构应该如何建立？这些问题在我们决定了这些部门的权力之后，就会迎刃而解了。关于权力，我指的是一名执政官员如何使用公款，或如何指导城邦的防卫；因为权力也分很多种：例如，一位将军的权力就不同于在市场中管理合同的权力。

Part 16

第十六章

Of the three parts of government, the judicial remains to be considered, and this we shall divide on the same principle. There are three points on which the variedes of law-courts depend: The persons from whom they are appointed, the matters with which they are concerned, and the manner of their appointment. I mean, (1) are the judges taken from all, or from some only? (2) how many kinds of law-courts are there? (3) are the judges chosen by vote or by lot?

关于政体的三个组成部分，现在我们来讨论有关法庭的问题，而且，我们会采用同样的原则对其进行划分。法庭的组织形式取决于三个方面：即法官的人选，案件的种类，和如何任命。（1）所谓人选，指的是法官应该从全体公民中选择，还是仅限于一部分人？（2）案件种类，指的是应该设置多少不同的法庭。（3）如何任命，指的是法官产生的方式是投票还是抽签？

First, let me determine how many kinds of law-courts there are. There are eight in number: One is the court of audits or scrutinies; a second takes cognizance of ordinary offenses against the state; a third is concerned with treason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 the fourth determines disputes respecting penalties, whether raised by magistrates or by private persons; the fifth decides the more important civil cases; the sixth tries cases of homicide, which are of various kinds, (a) premeditated, (b) involuntary, (c) cases in which the guilt is confessed but the justice is disputed; and there may be a fourth court (d) in which murderers who have fled from justice are tried after their return; such as the Court of Phreatto is said to be at Athens. But cases of this sort rarely happen at all even in large

cities. The different kinds of homicide may be tried either by the same or by different courts. (7) There are courts for strangers: of these there are two subdivisions, (a)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ir disputes with one another, (b) for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etween them and the citizens. And besides all these there must be (8) courts for small suits about sums of a drachma up to five drachmas, or a little more, which have to be determined, but they do not require many judges.

让我们首先确定法庭的种类。共有八种：（1）第一种是审计或纠察法庭；（2）第二种，审理普通的损害城邦利益的案件；（3）第三种，审理背叛城邦的罪行；（4）第四种，审理对判罚不服引起的纠纷，可以由私人或执政官提出；（5）第五种，审理重大民事案件；（6）第六种，审理杀人案，其中包括几种，（a）预谋杀人，（b）非故意杀人，（c）杀人者承认杀人，但杀人行为的正义性存在争议的案件；还可能有第四种（d）负责审理杀人后逃逸，后又回归城邦的人犯；例如一种存在于雅典的称为“里托”的法庭。但是这类案件即使是在很大的城邦也很少见。不同种类的杀人案可能在同一法庭审判，也可以分别由不同的法庭进行审理。（7）有一种专门审理外来者的法庭：其中又分为两个分支，（a）处理外来者之间的纠纷，（b）处理外来者与本邦公民之间的纠纷。除这些以外，还有（8）第八种法庭，审理小型诉讼，涉案金额从一个特拉赫马至五个特拉赫马不等，或稍大一些；这些案件也应该合法的解决，但是就没必要提交到整个审判团面前了。以及杀人案件；杀人案件分为不同的种类；这些案件可分为对犯罪事实的认定不同，那么定罪就会有相应的差异。

Nothing more need be said of these small suits, nor of the courts for homicide and for strangers: I would rather speak of political cases, which, when mismanaged, create division and disturbances in constitutions.

这里对这些小型案件不做深入研究，我们也不关注谋杀案和涉及外来者的法庭；让我们特别关注那些政治案件，如果这些案件处理不当，就会在城邦内引起分裂和混乱。

Now if all the citizens judge, in all the different cases which I have distinguished, they may be appointed by vote or by lot, or sometimes by lot and sometimes by vote. Or when a single class of causes are tried, the judges who decide them may be appointed, some by vote, and some by lot. These then are the four modes of appointing judges from the whole people, and there will be likewise four modes, if they are elected from a part only; for they may be appointed from some by vote and judge in all causes; or they may be appointed from some by lot and judge in all causes; or they may be elected in some cases by vote, and in some cases taken by lot, or some courts, even when judging the same causes, may be composed of members some appointed by vote and some by lot. These modes, then, as was said, answer to those previously mentioned.

如果全体公民都要参与对所有上述案件的审理，对他们任命的方式可以是投票或抽签，或者有时靠投票产生，有时则靠抽签。再或，在审理某一类案件时，审理它们的法官可以通过部分抽签，部分投票的方式产生。这些就是从全体公民中选择法官的四种不同模式，同理，如果他们是从某一部分公民中产生的，也会有四种模式；他们可以从一部分公民中用投票方式产生，而且审理所有案件；或者从一部分公民中用抽签方式产生，而且审理所有案件；或者在有些情况下由投票方式产生，而有些情况下则由抽签方式产生，或者在有些法庭中，即使在审理同类案件时，其法庭成员也可以有些靠抽签，有些靠投票产生。这些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不同模式。

Once more, the modes of appointment may be combined; I mean, that some may be chosen out of the whole people, others out of some, some out of both; for example, the same tribunal may be composed of some who were elected out of all, and of others who were elected out of some, either by vote or by lot or by both.

同样，不同的任命模式可以结合使用；这里指的是，有些法官可以从全体公民中产生，其他的从部分公民中产生，而有些则两者都有；例如，同一个法庭的法官，可以有些从全体公民中选出，有些从部分公民中选出，或通过投票产生或抽签产生或二者兼有。

In how many forms law-courts can be established has now been considered. The first form, viz., that in which the judges are taken from all the citizens, and in which all causes are tried, is democratical; the second, which is composed of a few only who try all causes, oligarchical; the third, in which some courts are taken from all classes, and some from certain classes only, aristocra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这些就是关于法庭的不同组织形式的全部内容。第一种形式，即，法官从全体公民中选出，而且负责审理所有案件，这种法庭是平民性质的；第二种，法官只有部分公民中选出，且负责审理所有案件，这种是寡头性质的；第三种，有些法庭的法官从全体公民中选出，有些则从特定公民中选出，这种属于贵族性质或共和性质。

Book Five

第五卷

Part 1

第一章

The design which we proposed to ourselves is now nearly completed. Next in order follow the causes of revolution in states, how many, and of what nature they are; what modes of destruction apply to particular states, and out of what, and into what they mostly change; also what are the modes of preservation in states generally, or in a particular state, and by what means each state may be best preserved: these questions remain to be considered.

我们既定的计划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分析各种政体发生变革的原因——原因共有几种？其本质是什么？以及这些变革对各种具体的政体造成了什么样的破坏？通常情况下会从何种政体变革为何种政体？我们还要分析这些政体普遍可以借助何种方式来维持，以及某种特定的政体该以何种途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持：这些问题仍有待思考。

In the first place we must assume as our starting-point that in the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which have sprung up there has always been an acknowledgment of justice and proportionate equality, although mankind fail attaining them, as I have already explained. Democracy, for example, arises out of the notion that those who are equal in any respect are equal in all respects; because

men are equally free, they claim to be absolutely equal. Oligarchy is based on the notion that those who are unequal in one respect are in all respects unequal; being unequal, that is, in property, they suppose themselves to be unequal absolutely. The democrats think that as they are equal they ought to be equal in all things; while the oligarchs, under the idea that they are unequal, claim too much, which is one form of inequality. All these forms of government have a kind of justice, but, tried by an absolute standard, they are faulty; and, therefore, both parties, whenever their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accord with their preconceived ideas, stir up revolution. Those who excel in virtue have the best right of all to rebel (for they alone can with reason be deemed absolutely unequal), but then they are of all men the least inclined to do so. There is also a superiority which is claimed by men of rank; for they are thought noble because they spring from wealthy and virtuous ancestors. Here then, so to speak, are opened the very springs and fountains of revolution; and hence arise two sorts of changes in governments; the one affecting the constitution, when men seek to change from an existing form into some other, for example, from democracy into oligarchy, and from oligarchy into democracy, or from either of them into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r aristocracy, and conversely; the other not affecting the constitution, when, without disturbing the form of government, whether oligarchy, or monarchy, or any other, they try to get the administration into their own hands. Further, there is a question of degree; an oligarchy, for example, may become more or less oligarchical, and a democracy more or less democratical; and in like mann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ther forms of government may be more or less strictly maintained. Or the revolution may be directed against a por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nly, e.g., the establishment or overthrow of a particular office: as at Sparta it is said that Lysander attempted to overthrow the monarchy, and King Pausanias, the Ephoralty. At

Epidamnus, too, the change was partial. For instead of phylarchs or heads of tribes, a council was appointed; but to this day the magistrates are the only members of the ruling class who are compelled to go to the Heliaea when an election takes place, and the office of the single archon was another oligarchical feature. Everywhere inequality is a cause of revolution, but an inequality in which there is no proportion—for instance, a perpetual monarchy among equals; and always it is the desire of equality which rises in rebellion.

首先我们必须假定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各种形式的政体在发源之初都认可公平和比例平等——如前文所述，虽然这一点我们人类尚未做到。以民主为例，它源自“人若在一方面平等，则在各方面均平等”这一理念；因为人们在自由方面是平等的，因此他们就呼吁绝对意义上的平等。而寡头政体的理念基础则是“人若在一个方面不平等，则在各个方面均不平等。”也就是说，由于财富上的不平等，寡头们就认为人类是绝对不平等的。民主人士认为大家是平等的，因此应该在所有方面都是平等的；而寡头们，由于受到“大家并不平等”这一理念的影响，就会索取太多，而这正是一种不平等（的体现）。所有的政体都包含公平的成分，但是，以绝对的标准来考量，他们均不完美；因此，只要双方在政体中所占的份额与自己的先入之见不符，他们就会煽动变革。那些才德卓著的人最有权利去抗争（因为他们自身有理由被认定为与别人完全不平等），但是，他们却是所有阶层中最不愿意这样做的。这个阶层的人还宣称自己优于他人，而他们之所以被认定为贵族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其祖先兼具财富与美德。我们可以说，革命之潮因之开始喷涌，并由此在政体之中引发了两种形式的变化。其一影响到了宪政，此时，人们在试图把现存的政体转变为另一种政体，比如从平民政体转变为寡头政体，或者从二者中的某一种转变为立宪政体或贵族政体，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其二则对宪政没有影响，此时，它不会扰乱任何一种政体模式，无论是寡头政体，还是君主政体，抑或是其他模式，他们总能设法把管理权掌控在自己的手

中。进一步说，还有一个度的问题。比如，寡头政体可能会变得更独裁也可能会变得不那么独裁，平民政体可能会变得更民主也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民主，同理，其他形式的政体的特征也会得到更强或者更弱的保留。又或者说，变革可能只是针对宪政的一部分，比如创建或取缔某个特定的行政部门——据说在斯巴达，吕山德曾试图推翻君主政体，而保萨尼亚斯王则力求推翻大监督官。在艾皮丹努斯，其变革也是局部性的。因为在废除了部落首领或酋长之后，埃比达姆诺斯建立了议会，但直到今天，该地在举行地方执政官选举的时候，仍然硬性规定只有统治阶层的成员才能进入陪审委员会，而且这种单一执政官的行政方式正是寡头政体的又一特征。在任何地方，不平等都是变革的诱因之一，但是，在不实行比例平等的地方，不平等就不会（引发变革）——例如，世袭君主制就是其中一例。只有渴望平等才会引发反抗。

Now equality is of two kinds, numerical and proportional; by the first I mean sameness or equality in number or size; by the second, equality of ratios. For example, the excess of three over two is numerically equal to the excess of two over one; whereas four exceeds two in the same ratio in which two exceeds one, for two is the same part of four that one is of two, namely, the half. As I was saying before, men agree that justice in the abstract is proportion, but they differ in that some think that if they are equal in any respect they are equal absolutely, others that if they are unequal in any respect they should be unequal in all. Hence there are two principal forms of government,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for good birth and virtue are rare, but wealth and numbers are more common. In what city shall we find a hundred persons of good birth and of virtue? whereas the rich everywhere abound. That a state should be ordered, simply and wholly, according to either kind of equality, is not a good thing; the proof is the fact that such forms of government never last. They are originally based on a mistake, and,

as they begin badly, cannot fall to end badly. The inference is that both kinds of equality should be employed; numerical in some cases, and proportionate in others.

平等可以分为两类：数量上的和比例上的。就前者而言，我的意思是说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同等或平等，对后者而言，则是比率上的平等。例如，3比2多出的数值等同于2比1多出的数值；而4比2的比率则等同于2对1的比率，也就是2倍。正如我前文所说，人们认为从理论上来说公平就是均摊，但是他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部分人认为只要自己在某个方面是平等的，自己就应该绝对平等（于他人）；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只要在某个方面是不平等的，自己就应该（与他人）在各个方面均不平等。因此就出现了两种基本的政体模式：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出身优渥、品德良好者并不多见，但有钱人和总人口却相当多。我们在什么样的城邦才能找到一百个出身既好、品德又佳的人呢？反之，有钱人却到处都是。以上述两种平等中的任何一种为基础，对一个国家进行简单和统一的管理，都不是一件好事。其根据就在于事实上此种类型的政府都未能持久。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平等。因此，由于出身不好，就将不得善终。结论是两种平等都应采纳：在某种情形下，采用“数量平等”，在某种情形下，则采用“比率平等”。

Still democracy appears to be safer and less liable to revolution than oligarchy. For in oligarchies there is the double danger of the oligarchs falling out among themselves and also with the people; but in democracies there is only the danger of a quarrel with the oligarchs. No dissension worth mentioning arises among the people themselves. And we may further remark that a government which is composed of the middle class more nearly approximates to democracy than to oligarchy, and is the safest of the imperfect forms of government.

平民政体看上去仍然比寡头政体更安全，更不可能发生变革。因为在寡头政体中存在着独裁集团内部起内讧和独裁者与平民闹翻的双重危险。而在平民政体之中则只有平民与独裁者对抗这一种危险。人民内部之间产生的纷争几乎不值一提。因此，我们会进一步评判由中产阶级构成的、民主性质比独裁性质更占优势的政体，这种政体才是尚未发展完美的政体之中最为安全的一种。

Part 2

第二章

In considering how dissensions and political revolutions arise, we must first of all ascertain the beginnings and causes of them which affect constitutions generally. They may be said to be three in number; and we have now to give an outline of each. We want to know (1) what is the feeling? (2) what are the motives of those who make them? (3) whence arise political disturbances and quarrels? The universal and chief cause of this revolutionary feeling has been already mentioned; viz., the desire of equality, when men think that they are equal to others who have more than themselves; or, again, the desire of inequality and superiority, when conceiving themselves to be superior they think that they have not more but the same or less than their inferiors; pretensions which may and may not be just. Inferiors revolt in order that they may be equal, and equals that they may be superior. Such is the state of mind which creates revolutions. The motives for making them are the desire of gain and honor, or the fear of dishonor and loss; the authors of them want to divert punishment or dishonor from themselves or their friends. The causes and reasons of revolutions, whereby men are themselves affected in the way described, and

about the things which I have mentioned, viewed in one way may be regarded as seven, and in another as more than seven. Two of them have been already noticed; but they act in a different manner, for men are excited against one another by the love of gain and honor—not, as in the case which I have just supposed, in order to obtain them for themselves, but at seeing others, justly or unjustly, engrossing them. Other causes are insolence, fear, excessive predominance, contempt, disproportionate increase in some part of the state; causes of another sort are election intrigues, carelessness, neglect about trifles, dissimilarity of elements.

在考虑纷争以及政治变革是如何产生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对政体具有常规影响的这二者，其开端和诱因是什么。可以说，从数量来讲，共有三点，我们必须先列出每一点的提纲。我们想知道（1）出于什么样的情绪？（2）发起者的动机是什么？（3）政治风波与争执起于何处？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出现变革情绪的普遍和主要原因了，那就是对于平等的渴求。此时，人们认为自己和那些比自己享有更多权力的人是平等的；而另一方面，也就是对于不平等和优先权的渴求，此时，人们相信自己理应享有优先权，他们认为自己所拥有的还不够，仅仅是跟低自己一等的人一样多甚至比他们更少。这可能只是借口，也可能不是。地位低下的人发起反抗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平等，而平等之人发起反抗则是为了让自己享有优先权。就是这样的思想状态导致了变革。发动变革的动机就是为了实现获取利益和赢得尊重的愿望，或者是出于对受辱或利益受损的恐惧——变革的发起者们只是想让自己或者自己的朋友不要受到惩罚和侮辱。变革的起因和动机——即人们如何受到上述方式的影响——也就是我上面所提到的事情，从某个方面来讲可以看作有7个，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则会超过7个。我们已经关注过了其中的2个，但它们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人们总是乐于以利益和荣誉的名义互相对峙——就像我刚才所设的例子，他们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去占有它们，而是为了别人，因此，无论此事公正与否，他们都会全力以赴。其他的诱因还包括傲慢

无礼、惧怕、过度的优越感、轻视以及该国的某些地方出现的非平衡性增长。还有一类诱因则包括选举中的阴谋诡计、粗心大意、对繁杂琐事的忽视以及多种要素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Part 3

第三章

What share insolence and avarice have in creating revolutions, and how they work, is plain enough. When the magistrates are insolent and grasping they conspire against one another and also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 from which they derive their power, making their gains either at the expense of individuals or of the public. It is evident, again, what an influence honor exerts and how it is a cause of revolution. Men who are themselves dishonored and who see others obtaining honors rise in rebellion; the honor or dishonor when undeserved is unjust; and just when awarded according to merit.

傲慢无礼和贪得无厌在引发变革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其实很容易说明白。当执政官们傲慢无礼且又贪得无厌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就会勾心斗角，还会反对赋予了他们权力的宪政，这就使得他们的获利要么是某个人付出了代价，要么是公众付出了代价。而且，荣誉施加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它何以成为变革的诱因也是显而易见的。荣誉受损者和目睹他人赚取荣誉者都会发起抗争。荣誉和受辱，如果名不符实，那就是不公平，只有按功过是非施予的时候，才是公平的。

Again, superiority is a cause of revolution when one or more

persons have a power which is too much for the state and th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this is a condition of affairs out of which there arises a monarchy, or a family oligarchy. And therefore, in some places, as at Athens and Argos, they have recourse to ostracism. But how much better to provide from the first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such pre-eminent individuals instead of letting them come into existence and then finding a remedy.

此外，当一个或多个人所掌控的权力，超出了这个国家和该国政府权力所能承受的范围的时候，他们的优势地位就成了变革的诱因。这是君主政体或家族独裁背景下的一种实际情况。因此，在某些地方，比如雅典和阿尔戈斯，他们都依赖于陶片放逐制度。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不允许凌驾一切的人出现，那么，其效果会比先允许他们存在然后再寻谋求补救好多少呢？

Another cause of revolution is fear. Either men have committed wrong, and are afraid of punishment, or they are expecting to suffer wrong and are desirous of anticipating their enemy. Thus at Rhodes the notables conspired against the people through fear of the suits that were brought against them. Contempt is also a cause of insurrection and revolution; for example, in oligarchies—when those who have no share in the state are the majority, they revolt,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ey are the stronger. Or, again, in democracies, the rich despise the disorder and anarchy of the state; at Thebes, for example, where, after the battle of Oenophyta, the bad administration of the democracy led to its ruin. At Megara the fall of the democracy was due to a defeat occasioned by disorder and anarchy. And at Syracuse the democracy aroused contempt before the tyranny of Gelo arose; at Rhodes, before the insurrection.

变革的另外一种诱因就是惧怕。人们要么是犯了错误，因此惧怕惩罚；要么就是盼望出错，希望敌对势力早些出现。在罗德岛即是如此，名门望族共谋反对人民就是因为害怕人民会对他们发起诉讼。轻视则是暴乱和变革的另一种诱因，例如，在寡头政体中——无权分享国家权力的人占大多数，人们之所以会反叛，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一方更强大。而在平民政体中，富人阶层就非常鄙视国家的混乱无序。例如，在底比斯，奥诺费太战斗结束之后，民主制度的混乱无序导致了这个城邦的灭亡。在墨伽拉，由于无序和混乱造成了一次偶然的失败，这次失败又造成了民主制度的衰败。在锡拉库，平民政体在盖洛专制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在罗德岛，民主政体也是在暴乱之前就产生了的。

Political revolutions also spring from a disproportionate increase in any part of the state. For as a body is made up of many members, and every member ought to grow in proportion, that symmetry may be preserved; but loses its nature if the foot be four cubits long and the rest of the body two spans; and, should the abnormal increase be one of quality as well as of quantity, may even take the form of another animal: even so a state has many parts, of which some one may often grow imperceptibly; for example, the number of poor in democracies and in constitutional states. And this disproportion may sometimes happen by an accident, as at Tarentum, from a defeat in which many of the notables were slain in a battle with the Iapygians just after the Persian War,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consequence becoming a democracy; or as was the case at Argos, where the Argives, after their army had been cut to pieces on the seventh day of the month by Cleomenes the Lacedaemonian, were compelled to admit to citizen some of their Perioeci; and at Athens, when, after frequent defeats of their infantry at the time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e notables were reduced in number, because the soldiers had

to be taken from the roll of citizens. Revolutions arise from this cause as well, in democracies as in other forms of government, but not to so great an extent. When the rich grow numerous or properties increase, the form of government changes into an oligarchy or a government of families. Forms of government also change—sometimes even without revolution, owing to election contests, as at Heraea (where, instead of electing their magistrates, they took them by lot, because the electors were in the habit of choosing their own partisans); or owing to carelessness, when disloyal persons are allowed to find their way into the highest offices, as at Oreum, where, upon the accession of Heracleodorus to office, the oligarchy was overthrown, and changed by him into a constitutional and democratical government.

政体变革还可以源自国内某个地方的非平衡性增长。这就好比人的身体，它是由很多个器官构成的，每一个器官都应适度生长，这样才能够保持身体比例的协调。但如果脚部长达四腕尺，而其他部位却只有两腕尺，那么这个身体就不能称之为身体。此外，如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出现了非常规增长，那么人就会呈现出另一种动物的面貌。一个由多部分组成的国家也是这样，有些人的成长通常不为外人所察觉——比如民主政治和宪政国家中的穷人的数量。有时候，这种不均衡是偶然发生的，比如在塔伦特姆，波斯战争之后，很多贵族在和耶比季亚族人的战斗中战败被屠，于是立宪政体就变成了平民政体；又比如在阿尔戈斯，他们的军队被古斯巴达的克莱奥梅尼剿灭之后，当月的第七天，他们就被迫接受了大批的珀里俄基人成为他们的公民。在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步兵屡战屡败，由于士兵必须从平民阶层中选取，因此贵族人口的占比不断下降。这也算是民主政治和其他形式的政体会发生变革的原因之一，只是其作用并不大。当富人的数量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政体就会转变为寡头政体或家族统治。有时候——即便没有发生变革，政体形式也会发生变化，这是由选举竞争造成的，比如在海牙（在那里，由于选民总是习

于推选自己的派系代表，因此人们就通过抽签而不是选举的方法来举荐地方执政官）；也可以是由疏忽大意造成的，他们允许不忠之人设法进入了最高行政机关——比如在奥瑞姆，赫拉克留杜罗刚刚进入最高机构，当地的寡头独裁便即遭其推翻，转而被其变成了立宪政体或者平民政体。

Again, the revolution may be facilitated by the slightness of the change; I mean that a great change may sometimes slip into the constitution through neglect of a small matter; at Ambracia, for instance, the qualification for office, small at first, was eventually reduced to nothing. For the Ambraciots thought that a small qualification was much the same as none at all.

此外，变革可能由细微的变动促成。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由于忽略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宪法就可能会遭受巨大的变化。比如在安布拉基亚，从政的资格一开始就设置得很低，后来就慢慢变得没有任何限制了。因为安布拉基亚人认为较低的资格限制和没有资格限制其实没什么差别。

Another cause of revolution is difference of races which do not at once acquire a common spirit; for a state is not the growth of a day, any more than it grows out of a multitude brought together by accident. Hence the reception of strangers in colonies, either at the time of their foundation or afterwards, has generally produced revolution; for example, the Achaeans who joined the Troezenians in the foundation of Sybaris, becoming later the more numerous, expelled them; hence the curse fell upon Sybaris. At Thurii the Sybarites quarrelled with their fellow-colonists; thinking that the land belonged to them, they wanted too much of it and were driven

out. At Byzantium the new colonists were detected in a conspiracy, and were expelled by force of arms; the people of Antissa, who had received the Chian exiles, fought with them, and drove them out; and the Zancleans, after having received the Samians, were driven by them out of their own city. The citizens of Apollonia on the Euxine,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a fresh body of colonists, had a revolution; the Syracusans, after the expulsion of their tyrants, having admitted strangers and mercenaries to the rights of citizenship, quarrelled and came to blows; the people of Amphipolis, having received Chalcidian colonists, were nearly all expelled by them.

变革的另一个诱因就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精神融合的种族之间存在的差异。由于任何国家都不是一夜之间建成的，它只不过是偶然凝聚的多元要素的合力产物而已。因此，无论是在国家创建之初还是在成立之后，接受陌生人融入自己的部族通常都会引发变革。比如，在锡巴里斯创建之初，亚加亚人就加入到了特罗埃岑人人之中，但后来他们在人数上占了多数，就把特罗埃岑人驱逐了出去。锡巴里斯也因此背上了诅咒。在图里伊，锡巴里斯人跟他们的殖民者同伙发生了争执，他们认为图里伊的土地属于自己，因此要从中获利更多，于是惨遭驱逐。在拜占庭，新来的殖民者被察觉出心存不轨，于是被军队武力逐出。安提撒人曾接纳了希俄斯岛的流放犯人，但后来与之爆发了战争，便将其驱逐出境。赞克里人接纳了萨摩斯岛人，但自己却被后者赶出了家园。黑海的阿波罗尼亚公民在引入了一批新的居住者之后也发生了变革。锡拉库扎人在赶走了自己的暴君之后，授予了一批陌生人和雇佣兵以公民的身份，但后来他们之间就争执不断，频繁殴斗。安菲波利斯人接纳了哈尔吉斯人之后，就被后者全部驱逐出境。

Now, in oligarchies the masses make revolution under the idea that they are unjustly treated, because, as I said before, they are

equals, and have not an equal share, and in democracies the notables revolt, because they are not equals, and yet have only an equal share.

现在，在寡头政体内，公众发动变革是出于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一想法，因为，如我此前所述，他们认为自己理应是平等的，但是却并未得到平等的待遇，而在平民政体中，贵族们驱动则变革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与平民之间互不平等，却平民却和他们享有同等的待遇。

Again, the situation of cities is a cause of revolution when the country is not naturally adapted to preserve the unity of the state. For example, the Chytians at Clazomenae did not agree with the people of the island; and the people of Colophon quarrelled with the Notians; at Athens to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Piraeus are more democratic than those who live in the city. For just as in war the impediment of a ditch, though ever so small, may break a regiment, so every cause of difference, however slight, makes a breach in a city. The greatest opposition is confessedly that of virtue and vice; next comes that of wealth and poverty; and there are other antagonistic elements, greater or less, of which one is this difference of place.

此外，当一片国土因自然条件限制而不能保持国家统一的时候，城邦的处境也会成为变革的诱因。例如，克拉左美奈的丘特罗城人和生活在岛上的居民无法达成一致；克勒芬人经常和诺底翁岬人发生争执；在雅典也是如此，比雷埃夫斯区的居民比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其他居民更民主。然而，正如在战争之中，挖战壕的工作稍有延误——无论多小——都会毁掉一支部队一样，每一种差异——无论多小——都

会成为破坏城邦的诱因。众所周知，最大的对立就是善与恶的对立，其次就是富和穷的对立；此外，还有其他的敌对因素，或大或小，但对立的根源总是源于差异。

Part 4

第四章

In revolutions the occasions may be trifling, but great interests are at stake. Even trifles are most important when they concern the rulers, as was the case of old at Syracuse; for the Syracusan constitution was once changed by a love-quarrel of two young men, who were in the government. The story is that while one of them was away from home his beloved was gained over by his companion, and he to revenge himself seduced the other's wife. They then drew the members of the ruling class into their quarrel and so split all the people into portions. We learn from this story that we should be on our guard against the beginnings of such evils, and should put an end to the quarrels of chiefs and mighty men. The mistake lies in the beginning—as the proverb says—“Well begun is half done”; so an error at the beginning, though quite small, bears the same ratio to the errors in the other parts. In general, when the notables quarrel, the whole city is involved, as happened in Hesdaea after the Persian War. The occasion was the division of an inheritance; one of two brothers refused to give an account of their father's property and the treasure which he had found: so the poorer of the two quarrelled with him and enlisted in his cause the popular party, the other, who was very rich, the wealthy classes.

在变革之中，有些情况可能微不足道，但它却会威胁到巨大的利益。只要关乎到统治者，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变得极其重要，就像锡拉库扎的旧案一样：锡拉库扎宪政的变更是因两位年轻人关乎爱情的争执而起——这两人都在政权中任职。故事是这样的：当二人中的一个人离家在外的时候，他的情人被另一人夺走了，为了复仇，他诱奸了对方的妻子。随后，他们各自拉拢统治阶层的成员参与到了这次争执当中，最后把所有人都搞得四分五裂。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学会时刻警惕此类恶事的缘起，更要及时终结固执的领导者之间的争执。错误往往出现在开头——俗语云“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因此，开头时候的一个过失，虽然很小，也和其他时段的重大失误一样具有同等比率的破坏力。总体而言，在贵族发生争执的时候，整座城邦都会受到牵连，波斯战争之后发生在赫斯希亚的事情就是个例子。事情的起因是关于遗产的分配问题。兄弟二人中的一个拒绝分出他独自找到的属于父亲的那部分财产和珠宝，因此，兄弟中较为贫穷的那一个就加入了平民党派，而另一个较为富裕的，则跻身于富人阶层。

At Delphi, again, a quarrel about a marriage was the beginning of all the troubles which followed. In this case the bridegroom, fancying some occurrence to be of evil omen, came to the bride, and went away without taking her. Whereupon her relations, thinking that they were insulted by him, put some of the sacred treasure among his offerings while he was sacrificing, and then slew him, pretending that he had been robbing the temple. At Mytilene, too, a dispute about heiresses was the beginning of many misfortunes, and led to the war with the Athenians in which Paches took their city. A wealthy citizen, named Timophanes, left two daughters; Dexander, another citizen, wanted to obtain them for his sons; but he was rejected in his suit, whereupon he stirred up a revolution, and instigated the Athenians (of whom he was proxenus) to interfere. A similar quarrel about an heiress arose at

Phocis between Mnaseas the father of Mnason, and Euthycrates the father of Onomarchus;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Sacred War. A marriage-quarrel was also the cause of a change in the government of Epidamnus. A certain man betrothed his daughter to a person whose father, having been made a magistrate, fined the father of the girl, and the latter, stung by the insult, conspired with the unenfranchised classes to overthrow the state.

此外，在特尔斐，一次关乎婚姻的争执成了后续诸多麻烦最初的起点。在这个案例中，新郎预感到了一些不祥之兆，就在迎接新娘的时候，逃婚出走了。新娘的亲属认为自己一方受到了侮辱，就在男方参加祭祀的时候，把一些珍贵的财宝放进了他的祭礼中，然后杀死了他，并伪装了他在神庙里被劫杀的假象。在米蒂利尼，两位女性继承者之间的争执同样是诸多厄运的开端，最终导致了他们和雅典人之间的战争，阿柏支族人随之攫取了他们的城市：市民帖谟芳尼家境殷实，他有两个女儿；另一位市民德克珊德想让他把女儿许配给自己的两个儿子，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因此德克珊德就发动了变革，并唆使雅典人（他本人是雅典人的附庸）介入。在福基斯，也有类似的因女性继承人而起的争执，发生在蒙娜桑的父亲拿西斯和奥诺马尔库斯的父亲欧修克拉底之间，而这件事就是圣战的起因。艾皮丹努斯政府发生变革的原因同样是关乎婚姻的方面的争执。一个男子的女儿订了婚，但男方的父亲在当选为执政官之后却对女方的父亲进行了罚款，女方的父亲难堪其辱，就和那些没有选举权的阶层一起共谋颠覆了政权。

Governments also change into oligarchy or into democracy or into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because the magistrates, or some other section of the state, increase in power or renown. Thus at Athens the reputation gained by the court of the Areopagus, in the Persian War, seemed to tighten the reins of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victory of Salamis, which was gained by the common people who served in the fleet, and won for the Athenians the empire due to command of the sea, strengthened the democracy. At Argos, the notables, having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against the Lacedaemonians in the battle of Mantinea, attempted to put down the democracy. At Syracuse, the people, having been the chief authors of the victory in the war with the Athenians, changed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to democracy. At Chalcis, the people, uniting with the notables, killed Phoxus the tyrant, and then seized the government. At Ambracia, the people, in like manner, having joined with the conspirators in expelling the tyrant Periander, transferred the government to themselves. And generally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those who have secured power to the state, whether private citizens, or magistrates, or tribes, or any other part or section of the state, are apt to cause revolutions. For either envy of their greatness draws others into rebellion, or they themselves, in their pride of superiority, are unwilling to remain on a level with others.

政体转变为寡头政体或平民政体甚至立宪政体的原因还在于执政官或者该国的其他区域在权力或者声誉上增速过快。雅典即是如此，在波斯战争中，阿勒奥珀格斯山最高法院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得以巩固了他们的政权。另一方面，萨拉米斯之战的胜利源自战舰上服役的普通民众，而雅典帝国的建立又依赖于其对海洋的掌控，因此，平民政体得到了加强。在阿尔戈斯，在曼提尼亚战斗中，贵族阶层把自己和古斯巴达人区别开来，随后就力图推翻民主政治。在锡拉库扎，有些人曾作为主要掌权者领导了对雅典战争的胜利，他们就把立宪政府变革为了平民政体。在哈尔基斯，普通大众和贵族们联合起来，处死了暴君福克淑斯，随后攫取了政权。在安布拉基亚，人们以同样的方式联合了密谋者共同驱逐了君主佩里安德，把政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记住：增强了国家权力的那些人——无论

是个体公民还是执政官，抑或是某些部落甚至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或某个部门——都倾向于发动变革。这要么是因为他自己的巨大荣耀引起了别人的嫉妒而导致叛变，要么是出于维护自己的优势和荣耀，而不屑与其他人为伍。

Revolutions also break out when opposite parties, e.g., the rich and the people, are equally balanced, and there is little or no middle class; for, if either party were manifestly superior, the other would not risk an attack upon them. And, for this reason, those who are eminent in virtue usually do not stir up insurrections, always being a minority. Such are the beginnings and causes of the disturbances and revolutions to which every form of government is liable.

当对立的派别——如富人和穷人，实现了平等均衡、且不存在或者很少存在所谓的中间阶层的时候，变革也会发生。因为如果某一方占据显而易见的优势地位，另一方就不会冒险对其发动攻击。而且，出于这个原因，那些具备高尚美德的人——由于一直都是少数派——通常也不会发动暴乱。这就是政治风波和变革的缘起与诱因，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能例外。

Revolutions are effected in two ways, by force and by fraud. Force may be applied either at the time of making the revolution or afterwards. Fraud, again, is of two kinds; for (1) sometimes the citizens are deceived into acquiescing in a change of government, and afterwards they are held in subjection against their will. This was what happened in the case of the Four Hundred, who deceived the people by telling them that the king would provide money for the war against the Lacedaemonians, and, having cheated the

people, still endeavored to retain the government. (2) In other cases the people are persuaded at first, and afterwards, by a repetition of the persuasion, their goodwill and allegiance are retained. The revolutions which effect constitutions generally spring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causes.

引发变革的方式有两种：武力和欺诈。武力的使用可以是在发动变革的起始阶段，也可以是变革以后。而欺诈又分为两种：（1）有时候公民受到了欺骗，默许了政体的改变，随后他们就被迫服从于有违自我意志的体制。发生在“四百家”身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案例，“四百家”对人们说，国王将会提供军费来支持抗击斯巴达人的战争，而在欺骗了大家之后，“四百家”就竭尽全力地把持了政权。（2）在其他的一些案例中，一开始人们就被说服了，后来，通过反复说教，人们就只剩下对新政的善意和忠诚了。对立宪政体产生影响的变革通常也源自上述的原因。

Part 5

第五章

And now, taking each constitution separately, we must see what follows from the principles already laid down.

现在，在分别考虑各种体制的时候，我们必须弄清楚上述种种原则为之带来了什么。

Revolutions in democracies are generally caused by the intemperance of demagogues, who either in their private capacity

lay information against rich men until they compel them to combine (for a common danger unites even the bitterest enemies), or coming forward in public stir up the people against them. The truth of this remark is proved by a variety of examples. At Cos the democracy was overthrown because wicked demagogues arose, and the notables combined. At Rhodes the demagogues not only provided pay for the multitude, but prevented them from making good to the trierarchs the sums which had been expended by them; and they, in consequence of the suits which were brought against them, were compelled to combine and put down the democracy. The democracy at Heraclea was overthrown shortly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ony by the injustice of the demagogues, which drove out the notables, who came back in a body and put an end to the democracy. Much in the same manner the democracy at Megara was overturned; there the demagogues drove out many of the notables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be able to confiscate their property. At length the exiles, becoming numerous, returned, and, engaging and defeating the people, established the oligarchy.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with the democracy of Cyme, which was overthrown by Thrasymachus. And we may observe that in most states the changes have been of this character. For sometimes the demagogues, in order to curry favor with the people, wrong the notables and so force them to combine; either they make a division of their property, or diminish their incomes by the imposi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sometimes they bring accusations against the rich that they may have their wealth to confiscate.

平民政体中发生变革通常是由于民众领袖没有受到节制，他们要么以私人的名义散布一些反对富人阶层的信息，让富人阶层被迫联手（因为共同的危险甚至会让针锋相对的对手联合起来），要么就在公众场合公开煽动人们反对富人阶层。这一论断的真实性可以从很多例

子中得到证明。在科斯岛，民主政权之所以被推翻就是因为阴险的民众领袖层出不穷，而且贵族阶层也联合了起来。在罗德岛，民众领袖不仅出钱收买多数人群体，而且阻止他们向战船司令官缴纳已经被他们花光了的赋税。战船司令官们由于不断接到针对自己的诉讼，就被迫联合起来，消灭了平民政体。赫拉克勒亚的平民政体在殖民地建立之后不久就被推翻了，也是由于民众领袖不讲道义造成的，他们驱逐了贵族阶层，但后者卷土重来，终结了这里的平民政体。墨伽拉的平民政体很大程度上也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的。或许是为了没收和充公贵族们的财产，民众领袖驱逐了大批的贵族阶层。但随着被驱逐者的数量越来越大，他们便卷土重来，向平民开战并获得了胜利，建立了寡头政体。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库梅的平民政体当中，该地的平民政体是被特拉西马库斯推翻的。我们可能会发现，绝大多数国家的变革都具有这种特点。有时候，为了巴结普通大众，民众领袖就会诋毁贵族阶层，因此迫使他们联合起来；他们要么瓜分贵族阶层的财产，要么以公共服务的名义征收并减少贵族阶层的收入，有时候他们还会对富人提起诉讼，以便将他们的财产没收充公。

Of old, the demagogue was also a general, and then democracies changed into tyrannies. Most of the ancient tyrants were originally demagogues. They are not so now, but they were then; and the reason is that they were generals and not orators, for oratory had not yet come into fashion. Whereas in our day, when the art of rhetoric has made such progress, the orators lead the people, but their ignorance of military matters prevents them from usurping power; at any rate instances to the contrary are few and slight. Tyrannies were more common formerly than now, for this reason also, that great power was placed in the hands of individuals; thus a tyranny arose at Miletus out of the office of the Prytanis, who had supreme authority in many important matters. Moreover, in those days, when cities were not large, the people dwelt in the fields, busy at their work; and their chiefs, if they

possessed any military talent, seized the opportunity, and winning the confidence of the masses by professing their hatred of the wealthy, they succeeded in obtaining the tyranny. Thus at Athens Peisistratus led a faction against the men of the plain, and Theagenes at Megara slaughtered the cattle of the wealthy, which he found by the river side, where they had put them to graze in land not their own. Dionysius, again, was thought worthy of the tyranny because he denounced Daphnaeus and the rich; his enmity to the notables won for him the confidence of the people. Changes also take place from the ancient to the latest form of democracy; for where there is a popular election of the magistrates and no property qualification, the aspirants for office get hold of the people, and contrive at last even to set them above the laws. A more or less complete cure for this state of things is for the separate tribes, and not the whole people, to elect the magistrates.

旧时候，民众领袖通常也是将军身份，因此平民政体往往会变成暴君政体。绝大多数古代的暴君最初都是民众领袖。现在可能已经不是这样了，但当时的确如此。其原因在于他们只是将军而非演说家，在当时雄辩之术尚未流行起来。然而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修辞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演说家已经开始引领人民了，但是他们在军事上的无知却阻碍了他们攫取权力，至少，与此相反的案例的确罕见。现在，暴君政体也不像以前那么常见了，原因还是因为当时巨大的权力都是掌握在个人手中的，于是，在米利都出现了专制统治者，他出身于普律塔尼斯办公室，在很多重要事务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在当时，城市并不是很大，人们都居住在田野里，忙于劳作。因此，如果他们的领袖具备一点军事才能，就可以抓住机会，通过激发人们对富人阶层的憎恨来赢得平民的信赖，成功地建立起暴君政体。雅典的佩西斯特拉托斯就是这样做的，他带领一个小党派发起了反对平民的斗争。墨伽拉的德亚更则屠杀了富人的牛群，他是在河边发现它们的，而那里并不是富人们可以放牧的地方。此外，狄俄尼索斯也

是被认为配得上专制暴君称号的人，因为他公开抨击了达夫那俄和富人阶层。他对贵族阶层的憎恨为他赢得了人民大众的信任。平民政体还可以从最初的古老方式转变为最新的方式，现在，因为平民政体对于执政官的选举采用了普选的方式，而且没有设定财产资格，因此志在掌权的野心家就会讨好人民大众，最后甚至会努力地把人们置于法律之上。彻底解决或者部分解决这种问题现状的方案就是让各个部落分别选举自己的执政官，而不是让全体人民来选。

These are the principal causes of revolutions in democracies.

上述这些就是平民政体中发生变革的主要原因。

Part 6

第六章

There are two patent causes of revolutions in oligarchies: (1) First, when the oligarchs oppress the people, for then anybody is good enough to be their champion, especially if he be himself a member of the oligarchy, as Lygdamis at Naxos, who afterwards came to be tyrant. But revolutions which commence outside the governing class may be further subdivided. Sometimes, when the government is very exclusive, the revolution is brought about by persons of the wealthy class who are excluded, as happened at Massalia and Istros and Heraclea, and other cities. Those who had no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created a disturbance, until first the elder brothers, and then the younger, were admitted; for in some places father and son, in others elder and younger brothers, do not hold office together. At Massalia the oligarchy became more like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but at Istros ended in a democracy, and at Heraclea was enlarged to 600. At Cnidos, again, the oligarchy underwent a considerable change. For the notables fell out among themselves, because only a few shared in the government; there existed among them the rule already mentioned, that father and son not hold office together, and, if there were several brothers, only the eldest was admitted. The people took advantage of the quarrel, and choosing one of the notables to be their leader, attacked and conquered the oligarchs, who were divided, and division is always a source of weakness. The city of Erythrae, too, in old times was ruled, and ruled well, by the Basilidae, but the people took offense at the narrowness of the oligarchy and changed the constitution.

寡头政体中发生变革有2个显而易见的原因：（1）第一，当独裁者压迫人民的时候，每个人都绝对会成为反叛者的拥护者，尤其是当反叛者本人是寡头独裁集团中一员的时候——就像纳克索斯岛上的吕格达米斯，他后来成了一位专制的暴君。但是来自统治阶级之外的变革应该划分得更详细些。有时候，当政府比较排外的时候，变革通常是由那些受到排挤的富人阶层的人发起的，马萨利亚、伊斯特洛斯、赫拉克拉亚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情形就是如此。无法在政权中分得一杯羹的人引发了风波，直到他们被录用，率先发难的是年长的哥哥，接着是年幼的弟弟，因为在有些地方，父亲和儿子——有些地方的哥哥和弟弟，是不能够同时进入公职部门的。在马萨利亚，寡头政体已经越来越像是立宪政体了，但是在伊斯特洛斯，寡头政体最终变成了平民政体，在赫拉克拉亚则是由600人共同掌权。又比如在尼多斯，寡头政体也经历了意义重大的变革。由于只有少数人享有政治权利，因此，贵族成员之间爆发了内讧。如前文所述，其原因在于规则规定了父亲和儿子不能同时担任公职，如果是兄弟几人的话，则只有大哥能被接受进入公职部门。人们利用这次争执的机会，选择了其中某一位贵族成员作为自己的领袖，对独裁集团成员发起了进攻，并取得了胜利，独裁集团成员被分散安置——因为分散一直都是削弱其力量的方

法。厄里特赖这座城市在古时候是由拔西历代统治的，而且他治理有方，但是人们对独裁集团中的一小部分人十分不满，最终将其变革为立宪政体。

(2) Of internal causes of revolutions in oligarchies one is the personal rivalry of the oligarchs, which leads them to play the demagogue. Now, the oligarchical demagogue is of two sorts: either (a) he practices upon the oligarchs themselves (for, although the oligarchy are quite a small number, there may be a demagogue among them, as at Athens Charicles' party won power by courting the Thirty, that of Phrynichus by courting the Four Hundred); or (b) the oligarchs may play the demagogue with the people. This was the case at Larissa, where the guardians of the citizens endeavored to gain over the people because they were elected by them; and such is the fate of all oligarchies in which the magistrates are elected, as at Abydos, not by the class to which they belong, but by the heavy-armed or by the people, although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have a high qualification, or to be members of a political club; or, again, where the law-courts are composed of persons outside the government, the oligarchs flatter the people in order to obtain a decision in their own favor, and so they change the constitution; this happened at Heraclea in Pontus. Again, oligarchies change whenever any attempt is made to narrow them; for then those who desire equal rights are compelled to call in the people. Changes in the oligarchy also occur when the oligarchs waste their private property by extravagant living; for then they want to innovate, and either try to make themselves tyrants, or install some one else in the tyranny, as Hipparinus did Dionysius at Syracuse, and as at Amphipolis a man named Cleotimus introduced Chalcidian colonists, and when they arrived, stirred them up against the rich. For a like reason in Aegina the person who carried on the

negotiation with Chares endeavored to revolutionize the state. Sometimes a party among the oligarchs try directly to create a political change; sometimes they rob the treasury, and then either the thieves or, as happened at Apollonia in Pontus, those who resist them in their thieving quarrel with the rulers. But an oligarchy which is at unity with itself is not easily destroyed from within; of this we may see an example at Pharsalus, for there, although the rulers are few in number, they govern a large city, because they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among themselves.

（2）寡头政体发生变革的另一个核心诱因就是独裁集团成员中间出现的个人对抗，这使得其中一些人开始扮演民众领袖的角色。目前，独裁集团成员中的民众领袖可分为两类：①他活跃在独裁统治集团之中（因为，虽然独裁集团成员的数量较少，但中间也会出现民众领袖，就像雅典的卡里克勒斯一派就是通过游走在执政的“三十党”中间而夺权成功的，而普律尼科司则是通过讨好“四百家”）；②独裁者本身就扮演着民众领袖的角色。拉里萨就是这样的案例，在拉里萨，公民的守护者们都竭尽全力去讨好人民大众，因为他们是由人民推选出来的。所有实行执政官选举制度的寡头政体最终都是这样的下场，比如在阿拜多斯，执政官并不是由自己所属的阶层选举出来的，而是由全副武装的士兵或者人民大众选举出来的——当然，这些士兵和人民可能要满足较高的资格限制的要求，或者必须是某个政治俱乐部的成员。此外，如果法庭是由任职于政府公职部门以外的平民组成的，那么，独裁者就会讨好人民大众以谋取符合自己利益需求的决议，并因此而修改宪法。蓬托斯的赫拉克拉亚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此外，任何缩小独裁集团规模的企图都会引发独裁政体发生变化，因为渴求平等权利的独裁集团成员就会被迫召集人民大众。当独裁者想把自己的私人财产花费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中的时候，独裁政体也会发生变革。因为这样的独裁者想要革新，甚至想让自己成为专制暴君，或是把另外一些成员推上专制暴君的位置，就像希巴里诺在锡拉库扎把狄俄尼索斯推上宝座一样；在安菲波利斯，有一个名叫克利奥底谟斯的

人接纳了一群哈尔吉斯殖民者，随后，他就煽动他们反对富人阶层。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埃伊纳岛上，和卡瑞斯家族进行谈判的那个人也想在那个国家推行变革。有时候，独裁集团中的某一派也会直接尝试发起一次政治变革，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去劫掠国库，随后，这些窃贼、或者在行窃过程中因政见不合而拒绝行窃——在蓬托斯的阿波罗尼亚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的那些人，都会和统治者发生争执。但是当寡头政体的内部团结一致的时候，寡头政体是不容易从内部被破坏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看看发生在法萨罗的例子，在法萨罗，虽然统治者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特别能够相互理解和包容，因此可以管理好这座很大的城市。

Oligarchies, again, are overthrown when another oligarchy is created within the original one, that is to say, when the whole governing body is small and yet they do not all share in the highest offices. Thus at Elis the governing body was a small senate; and very few ever found their way into it, because the senators were only ninety in number, and were elected for life and out of certain families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Lacedaemonian elders. Oligarchy is liable to revolutions alike in war and in peace; in war because, not being able to trust the people, the oligarchs are compelled to hire mercenaries, and the general who is in command of them often ends in becoming a tyrant, as Timophanes did at Corinth; or if there are more generals than one they make themselves into a company of tyrants. Sometimes the oligarchs, fearing this danger, give the people a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because their services are necessary to them. And in time of peace, from mutual distrust, the two parties hand over the defense of the state to the army and to an arbiter between the two factions, who often ends the master of both. This happened at Larissa when Simos the Aleuad had the government, and at Abydos in the days of Iphiades and the political clubs. Revolutions also arise out of marriages or lawsuits which lead

to the overthrow of one party among the oligarchs by another. Of quarrels about marriages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some instances; another occurred at Eretria, where Diagoras overturned the oligarchy of the knights because he had been wronged about a marriage. A revolution at Heraclea, and another at Thebes, both arose out of decisions of law-courts upon a charge of adultery; in both cases the punishment was just, but executed in the spirit of party, at Heraclea upon Eurytion, and at Thebes upon Archias; for their enemies were jealous of them and so had them pilloried in the agora. Many oligarchies have been destroyed by some members of the ruling class taking offense at their excessive despotism; for example, the oligarchy at Cnidus and at Chios.

此外，当原独裁集团内部产生了新的小独裁集团的时候，原寡头政体就会被推翻，也就是说，当整个统治集团规模比较小的时候，集团成员就无法在最高行政机关共享权力。在伊利斯即是如此：统治集团只是一个很小的元老会，因其成员数量被限定在了90个，而且一经当选就终身任职，加之其出身被限定在于某些类似于古斯巴达传统家族一样的家庭，因此，很少有人能够跻身其中。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寡头政体发生变革的几率是一样的。战争时期，是因为独裁寡头们不相信自己的子民，只能被迫招募雇佣兵，而掌管军权的将军最终往往会变成一位专制暴君，就像帖谟芳尼在科林斯所做的那样；如果掌管军权的将军不止一位，那么他们就会组成一个暴君门阀。有时候，独裁寡头由于害怕此种危机，就会让平民在政府机构中担任一些职位，因为对独裁寡头而言，平民兵役是不可或缺的。在和平时期，独裁集团中的两派，由于互不信任，就会把保卫国家的重任交给军队和介于双方之间的中间仲裁人，而这位仲裁者往往会终结双方的权力。这样的例子发生在拉里萨，时任仲裁人西莫斯接管了政权；在阿拜多斯，伊菲亚第在政治俱乐部林立的状况下接管了政权。婚姻或诉讼会导致独裁集团中的一派推翻另一派，由此引发变革。关于婚姻争执，我前面已经提过几例，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是发生在埃雷特里亚

的，在那里，迪亚戈拉斯推翻了骑士阶层的独裁统治，其原因在于他在婚姻中受到了侮辱。在赫拉克利亚和底比斯，变革产生的原因在于法院对通奸行为的控诉所做的决议。在两个案例中，惩罚是很公平的，但决议的执行却富有党争意味。在赫拉克利亚，针对的是欧律提翁；而在底比斯针对的则是阿吉亚斯，对手出于嫉妒，竟然将他们在集市上戴枷示众。很多寡头政体都是被统治集团成员破坏的，他们向过度专制的暴政发起了进攻，例如，尼多斯和希俄斯岛上的独裁统治就是这样结束的。

Change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s, and also of oligarchies which limit the office of counselor, judge, or other magistrate to persons having a certain money qualification, often occur by accident. The qualification may have been originally fixed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 in such a manner as to include in an oligarchy a few only, or in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 middle class. But after a time of prosperity, whether arising from peace or some other good fortune, the same property becomes many times as valuable, and then everybody participates in every office; this happens sometimes gradually and insensibly, and sometimes quickly. These are the causes of changes and revolutions in oligarchies.

由于立宪政体和寡头政体把法律顾问、法官和其他执政官等职务限定给了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人，因此其变革通常具有偶然性。资格限定在设定之初是针对当时的条件的，因此，能够被纳入独裁统治集团的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进入立宪政府的则是中产阶级。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荣发展，由于天下太平和其他一些有利条件，几倍几倍的人都能满足那样的财产限定，因此，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任何一种行政管理之中。这种情况有时候是渐进式地、悄无声息地发生的，有时候又出现得很快。这就是寡头政体发生变化和变革的原因。

We must remark generally both of democracies and oligarchies, that they sometimes change, not into the opposite forms of government, but only into another variety of the same class; I mean to say, from those forms of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which are regulated by law into those which are arbitrary, and conversely.

我们需要注意，有时候，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通常不会变为与其相对立的政体形式，而只会变为同一类型的变体。我的意思是说，平民政体和受法律约束与规范的寡头政体不会转变为专制政体形式，也不会反其道而行之。

Part 7

第七章

In aristocracies revolutions are stirred up when a few only share in the honors of the state; a cause which has been already shown to affect oligarchies; for an aristocracy is a sort of oligarchy, and, like an oligarchy, is the government of a few, although few not for the same reason; hence the two are often confounded. And revolutions will be most likely to happen, and must happen, when the mass of the people are of the high-spirited kind, and have a notion that they are as good as their rulers. Thus at Lacedaemon the so-called Partheniae, who were the [illegitimate] sons of the Spartan peers, attempted a revolution, and, being detected, were sent away to colonize Tarentum. Again, revolutions occur when great men who are at least of equal merit are dishonored by those higher in office, as Lysander was by the kings of Sparta; or, when a brave man is excluded from the honors of the state, like Cinadon,

who conspired against the Spartans in the reign of Agesilaus; or, again, when some are very poor and others very rich, a state of society which is most often the result of war, as at Lacedaemon in the days of the Messenian War; this is proved from the poem of Tyrtaeus, entitled “Good Order”; for he speaks of certain citizens who were ruined by the war and wanted to have a redistribution of the land. Again, revolutions arise when an individual who is great, and might be greater, wants to rule alone, as, at Lacedaemon, Pausanias, who was general in the Persian War, or like Hanno at Carthage.

在贵族政体中，当只有少数人可以享有国家权力的时候，就会激起变革，如前文所示，这个要素同样导致了寡头政体中的变革。因为贵族政体也是寡头政体的一种，而且跟寡头政体一样，是少数人的政权，只是造成集权的原因并不一样，因此这二者经常会被混淆。当人民大众变得勇敢、充满生机，而且产生了一种自己与统治者一样优秀的思想的时候，变革就极有可能发生，甚至必定发生。在古斯巴达，所谓的“巴尔赛尼”是斯巴达贵族的（非婚育）子孙，他们想要发动变革，但是被察觉了，就被遣送到了塔伦图姆做殖民者。此外，当某个伟大的人物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高层统治者陷害，无法得到他应得的荣誉的时候——就像吕山德受到斯巴达国王的陷害那样，变革就会爆发。如果一个勇敢的人被剥夺了国家权力，就会触发变革，就像基那敦在阿格西劳斯统治时期密谋反对斯巴达人一样。另外，当一些人非常贫穷，而另外一些人又非常富有的时候，一个社会的政体通常是由战争的结果来决定的，美塞尼亚战争时期的古斯巴达就是这样的。这一点可以从提尔泰奥斯的诗歌《郅治》中得见一斑，他在诗中说，有些公民受到了战争的迫害，想重新分配土地。而且，当某个强势的人物，或者伟大的人物想要进行单独统治的时候，变革也会发生，在古斯巴达，波斯战争时期的鲍桑尼亚将军和迦太基的汉诺就是这样的例子。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s and aristocracies are commonly overthrown owing to some deviation from justice in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the cause of the downfall is, in the former, the ill-mingling of the two elements,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in the latter, of the three elements, democracy, oligarchy, and virtue, but especially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For to combine these is the endeavor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s; and most of the so-called aristocracies have a like aim, but differ from polities in the mode of combination; hence some of them are more and some less permanent. Those which incline more to oligarchy are called aristocracies, and those which incline to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s. And therefore the latter are the safer of the two; for the greater the number, the greater the strength, and when men are equal they are contented. But the rich, if the constitution gives them power, are apt to be insolent and avaricious; and, in general, whichever way the constitution inclines, in that direction it changes as either party gains strength,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becoming a democracy, an aristocracy an oligarchy. But the process may be reversed, and aristocracy may change into democracy. This happens when the poor, under the idea that they are being wronged, force the constitution to take an opposite form. In like manne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s change into oligarchies. The only stable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is equality according to proportion, and for every man to enjoy his own.

立宪政体和贵族政体通常是因为宪政本身偏离了公平正义而被推翻的。导致垮台的原因，在立宪政体中，就是混淆了民主和独裁这两种因素；而在贵族统治中，则是三种，即民主，独裁和美德，但主要还是民主和独裁。对立宪政体而言，其努力方向就是把二者融合到一起，而绝大多数所谓的贵族政体都有一个相似的目标，只是在政体组合的模式上有所不同。其中一些政体越来越持久而另一些则相反。倾

向于寡头政体的形式被称为贵族政体，而倾向于平民政体的则被称为立宪政体。因此，后者才是二者当中较为稳固的一种，因为人数越多，力量越大，在大家都平等的时候，大家都会感到满意。但是，富人阶层如果能从宪政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就会变得张狂傲慢，贪得无厌。通常情况下，无论宪政倾向于哪种方式，随着某一派力量的增强，它都会改变方向，立宪政体就会变成平民政体，而贵族政体则会变为寡头政体。但是这个过程有可能是相反的，贵族政体也可能会变为平民政体。当穷人认为自己受到了虐待，就会强迫宪政转变成与之对立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立宪政体就会变成寡头政体。保持政体平稳的原则就是按比公平，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自己的公平。

What I have just mentioned actually happened at Thurii, where the qualification for office, at first high, was therefore reduced, and the magistrates increased in number. The notables had previously acquired the whole of the land contrary to law; for the government tended to oligarchy, and they were able to encroach… But the people, who had been trained by war, soon got the better of the guards kept by the oligarchs, until those who had too much gave up their land.

我上面所提到的，实际上发生在图里伊。在那里，从政的门槛一开始设定得很高，后来不得不降低，于是，有资格从政的人的数量也开始增多。名门望族早已控制了全部的土地，这是当然违法的，但由于政府有寡头独裁的性质，他们就真的实现了这种侵占。但是，人民大众，由于此前曾受过战争的洗炼，因此很快就打败了独裁寡头们豢养的雇佣兵，那些侵占了太多土地的贵族只能被迫放弃那些土地。

Again, since all aristocratical governments incline to oligarchy, the notables are apt to be grasping; thus at Lacedaemon, where

property tends to pass into few hands, the notables can do too much as they like, and are allowed to marry whom they please. The city of Locri was ruined by a marriage connection with Dionysius, but such a thing c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in a democracy, or in a wellbalanced aristocracy.

此外，由于贵族政体有寡头独裁的倾向，因此，名门望族都有夺权的倾向。就像在古斯巴达，财富通常就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流转，名门望族可以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想娶谁就娶谁。洛克里这座城市就是被狄俄尼索斯的一桩联姻毁掉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在平民政体或者在较为平衡的贵族政体中是永远都不会发生的。

I have already remarked that in all states revolutions are occasioned by trifles. In aristocracies, above all, they are of a gradual and imperceptible nature. The citizens begin by giving up some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so with greater ease the government change something else which is a little more important, until they have undermined the whole fabric of the state. At Thurii there was a law that generals should only be re-elected after an interval of five years, and some young men who were popular with the soldiers of the guard for their military prowess, despising the magistrates and thinking that they would easily gain their purpose, wanted to abolish this law and allow their generals to hold perpetual commands; for they well knew that the people would be glad enough to elect them. Whereupon the magistrates who had charge of these matters, and who are called councillors, at first determined to resist, but they afterwards consented, thinking that, if only this one law was changed, no further inroad would be made on the constitution. But other changes soon followed which they in vain attempted to oppose; and the state passed into the hands of the

revolutionists, who established a dynastic oligarchy.

我早已指出，在所有政体中，变革都可以由闲杂琐事引发。只是，在贵族政体中，变革的性质是逐步的、悄无人知的。一开始，公民会抛弃一部分宪政，接下来，政府就可以更容易地改变一些相对更重要的内容，最后，他们就会谋求更改国家的整个建构。在图里伊，法律规定，必须时隔5年才能再次选举将军，而部分年轻将领因军事本领超群而在卫军士兵中饱受欢迎，他们瞧不起行政官，认为他们很容易就能实现自我目标，因此这些将领都想废除现行的法律，以支持自己的将军能够永久地掌握实权，而且他们很清楚，人民大众也乐于推选他们。于是，那些掌管国家事务的、被称为国家顾问的行政官们，最初决定反对，但随后就退让了，他们认为只要修改了这条法律，就不会再出现其他侵扰宪法的事情了，但是随后出现的一系列变化都让他们无力反对，于是，政权就会过渡到军权者的手中，随后建立起另一个朝代的寡头政体。

All constitutions are overthrown either from within or from without; the latter, when there is some government close at hand having an opposite interest, or at a distance, but powerful. This was exemplified in the old times of the Athenians and the Lacedaemonians; the Athenians everywhere put down the oligarchies, and the Lacedaemonians the democracies.

所有的立宪政体要么是从内部，要么是从外部被瓦解的。就外部而言，就是相邻的国家采取了与自己相反的政体；或者是远处的国家，但是它十分强大。旧时代的雅典和斯巴达就是这样的例子。雅典人在各处消灭寡头政体，而斯巴达人则全面摧毁平民政体。

I have now explained what are the chief causes of revolutions and dissensions in states.

现在，我已经解释过了一个国家之所以会发生变革和纷争的主要原因了。

Part 8

第八章

We have next to consider what means there are of preserving constitutions in general, and in particular cases.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evident that if we know the causes which destroy constitutions, we also know the causes which preserve them; for opposites produce opposites, and destruction is the opposite of preservation.

接下来，我们要考虑在通常情况下和特殊情况下，各有哪些方法可以保全宪政。首先，比较明确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破坏了宪政，我们就能知道什么才能够保全宪政。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也就是说，破坏的对立面就是保护。

In all well-attempered governments there is nothing which should be more jealously maintained than the spirit of obedience to law, more especially in small matters; for transgression creeps in unperceived and at last ruins the state, just as the constant recurrence of small expenses in time eats up a fortune. The expense does not take place at once, and therefore is not observed; the mind is deceived, as in the fallacy which says that “if each part is little,

then the whole is little.” this is true in one way, but not in another, for the whole and the all are not little, although they are made up of littles.

在所有管理得当的政权之中，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守法的精神更应该得到至高无上的恪守了，尤其是在小事方面——因为违法犯罪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并且最终毁掉整个国家的，这就跟反复地花小钱也会把家产败光是一个道理。花光钱并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因此很难被留意到，大脑因此而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每一部分都不大，那么整体也就不会太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却又不对，因为整个或者说全部，虽然是由小部分组成的，但它们本身其实并不小。

In the first place, then, men should guard against the beginning of change,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they should not rely upon the political devices of which I have already spoken invented only to deceive the people, for they are proved by experience to be useless. Further, we note that oligarchies as well as aristocracies may last, not from any inherent stability in such forms of government, but because the rulers are on good terms both with the unenfranchised and with the governing classes, not maltreating any who are excluded from the government, but introducing into it the leading spirits among them. They should never wrong the ambitious in a matter of honor, or the common people in a matter of money; and they should treat one another and their fellow citizen in a spirit of equality. The equality which the friends of democracy seek to establish for the multitude is not only just but likewise expedient among equals. Hence, if the governing class are numerous, many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re useful; for example, the restriction of the tenure of offices to six months, that all those who are of equal rank

may share in them. Indeed, equals or peers when they are numerous become a kind of democracy, and therefore demagogues are very likely to arise among them, as I have already remarked. The short tenure of office prevents oligarchies and aristocracies from falling into the hands of families; it is not easy for a person to do any great harm when his tenure of office is short, whereas long possession begets tyranny in oligarchies and democracies. For the aspirants to tyranny are either the principal men of the state, who in democracies are demagogues and in oligarchies members of ruling houses, or those who hold great offices, and have a long tenure of them.

首先，人们应该警惕变化的开端；其次，人们不应该单纯地依靠政治工具，因为我此前曾说过发明政治工具的目的就是为了骗人，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了它们毫无用处。此外，我们要注意到寡头政体和贵族政体一样，它们之所以能够延续，并不是因为此类政体具有固定的稳定性，而是因为统治者与无权者、与统治阶层相处得都很好，他们绝不伤害未能参政的人，反而在政权中引入了他们中间具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不会误解人们为争取荣誉而持的雄心壮志，也不会用金钱来衡量普通人，他们只会彼此善待，同时以平等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子民。善待平民政体的人想为大多数群体设立一种平等，这种平等不仅公正，而且同样有利于自己的阶层。因此，只有统治阶层的人数足够多，民主宪政才能有效。例如，把公职的任期时限设定为6个月，那么，同等阶层的人就都可以共享到公职的权力。事实上，平等之人或同僚会在自身阶层壮大的时候形成一种民主组织，民众领袖也极易在他们中间出现，我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一点。公职任期的缩短可以阻止寡头政体的出现，并能阻止贵族政体落入到家族专制之手。当一个人的公职任期很短的时候，他就不太容易造成较大的危害，因此，长期占据公职岗位就会导致寡头政体，而平民政体中则更容易出现暴君政体。因为企图实施专制的野心家要么是该国的重要人物——在平民政体中就是民众领袖，在寡头政体中就是独裁集团的成员，要么就是长

期手握重权的人。

Constitutions are preserved when their destroyers are at a distance, and sometimes also because they are near, for the fear of them makes the government keep in hand the constitution. Wherefore the ruler who has a care of the constitution should invent terrors, and bring distant dangers near, in order that the citizens may be on their guard, and, like sentinels in a night watch, never relax their attention. He should endeavor too by help of the laws to control the contentions and quarrels of the notables, and to prevent those who have not hitherto taken part in them from catching the spirit of contention. No ordinary man can discern the beginning of evil, but only the true statesman.

当破坏者远离宪政的时候，宪政可以得到维持，但有时候因为破坏者靠得太近，警惕之心就可以迫使政府把宪政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因此，关心宪政的统治者应该自创危机，把远处的危险拉近，让公民保持警觉，像夜岗哨兵一样，一刻都不能放松警惕。他还应该竭力地通过法律的手段来控制贵族之间的争吵和纠纷，阻止那些迄今尚未参与掌权的人抓取争执的焦点。普通人无法识别邪恶之开端，但真正的政治家却可以。

As to the change produced in oligarchies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s by the alteration of the qualification, when this arises, not out of any variation in the qualification but only out of the increase of money, it is well to compare the general valuation of property with that of past years, annually in those cities in which the census is taken annually and in larger cities every third or fifth year. If the whole is many times greater or many times less than

when the ratings recognized by the constitution were fixed, there should be power given by law to raise or lower the qualification as the amount is greater or less. Where this is not done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passes into an oligarchy, and an oligarchy is narrowed to a rule of families; or in the opposite cas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becomes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eithe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r democracy.

寡头政体和立宪政体的变化也会因财产资质的修改而起，就此而言，这种变化并不是源自资质的修订而是出自财富的增加，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目前的财富总量和前些年的财富总量，在有些城市中，经济普查是每年进行一次的，在较大一些的城市中则是三或五年进行一次。如果经济总量比宪政初立时的统计数据多了几倍或者少了几倍，那么，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财产资质就应该提升或者下降，因为经济总量变大了或者变小了。当这一点得不到保证的时候，立宪政府就会转变为寡头政体，而寡头政体则会规模缩减，变为家族专制；或者是与之相反，立宪政体转变成平民政体，寡头政体变成立宪政体或者平民政体。

It is a principle common to democracy, oligarchy, and every other form of government not to allow the disproportionate increase of any citizen but to give moderate honor for a long time rather than great honor for a short time. For men are easily spoilt; not every one can bear prosperity. But if this rule is not observed, at any rate the honors which are given all at once should be taken away by degrees and not all at once. Especially should the laws provide against any one having too much power, whether derived from friends or money; if he has, he should be sent clean out of the country. And since innovations creep in through the private life of individuals also, there ought to be a magistracy which will have an

eye to those whose life is not in harmony with the government, whether oligarchy or democracy or any other. And for a like reason an increase of prosperity in any part of the state should be carefully watched. The proper remedy for this evil is always to give the management of affairs and offices of state to opposite elements; such opposites are the virtuous and the many, or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other way is to combine the poor and the rich in one body, or to increase the middle class: thus an end will be put to the revolutions which arise from inequality.

对平民政体，寡头政体，甚至任何一种政体形式而言，都有一条最基本的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公民的异常强大，可以长期给予有限的荣誉，但不能使其在短期内获得巨大的荣誉。因为人很容易被宠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宠辱不惊。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无论如何都要保证瞬间获取的荣誉被逐步地剥夺掉，绝不可瞬间没收。法律尤其要限制某个人拥有过多的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源自同伴还是源自金钱，如果有人权力过大，他就应该被逐出这个国家。由于个人的私人生活中潜伏着变革的种子，因此，无论是寡头政体、平民政体还是其他形式的政体，都必须设立地方行政官来监管那些个人生活与政体理念不相符的人。同理，一个国家的某个地方出现了异常的繁荣，也要小心监管。解决此类恶行的恰当手段就是把事务管理权和国家行政部门交给反对分子。此处的反对分子是指身具美德之人对多数派，或者富人对穷人。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把富人和穷人融为一体，或者是提升中间阶级的数量，如此一来，因不平等而兴起的变革就会宣告终结。

But above all every state should be so administered and so regulated by law that its magistrates cannot possibly make money. In oligarchies special precautions should be used against this evil. For the people do not take any great offense at being kept out of the

government—indeed they are rather pleased than otherwise at having leisure for their private business—but what irritates them is to think that their rulers are stealing the public money; then they are doubly annoyed; for they lose both honor and profit. If office brought no profit, then and then only could democracy and aristocracy be combined; for both notables and people might have their wishes gratified. All would be able to hold office, which is the aim of democracy, and the notables would be magistrates, which is the aim of aristocracy. And this result may be accomplished when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making money out of the offices; for the poor will not want to have them when there is nothing to be gained from them—they would rather be attending to their own concerns; and the rich, who do not want money from the public treasury, will be able to take them; and so the poor will keep to their work and grow rich, and the notables will not be governed by the lower class. In order to avoid peculation of the public money, the transfer of the revenue should be made at a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citizens, and duplicates of the accounts deposited with the different brotherhoods, companies, and tribes. And honors should be given by law to magistrates who have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incorruptible. In democracies the rich should be spared; not only should their property not be divided, but their incomes also, which in some states are taken from them imperceptibly, should be protected. It is a good thing to prevent the wealthy citizens, even if they are willing from undertaking expensive and useless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the giving of choruses, torch-races, and the like. In an oligarchy, on the other hand, great care should be taken of the poor, and lucrative offices should go to them; if any of the wealthy classes insult them, the offender should be punished more severely than if he had wronged one of his own class. Provision should be made that estates pass by inheritance and not by gift, and no person should have more than one inheritance; for in this way properties

will be equalized, and more of the poor rise to competency. It is also expedient both in a democracy and in an oligarchy to assign to those who have less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i.e., to the rich in a democracy and to the poor in an oligarchy) an equality or preference in all but the principal offices of state. The latter should be entrusted chiefly or only to members of the governing class.

但是，首要原则是每个国家都应受到法律的管制和规范，才能保证该国的行政官无法谋取私利。在寡头政体中，必须设立特殊的预防策略才能防止这种恶行。有些人在无权参政的时候不会猛烈抗议——事实上他们可能更高兴，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就没有多余的精力来经营自己的生意——但是，当他们认为本国的统治者窃取了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暴怒不已。接下来就会怒不可遏，因为他们既失去了荣誉又失去了利益。如果公职不能带来好处，那么，只有平民政体和贵族政体的融合才能做到了，因为这样才能同时满足贵族和人民大众双方的愿望。平民政体的目标是让所有人都可以担任公职，而贵族政体的目标则是让贵族成为地方执政官。但只有当人们无法利用公职谋取私利的时候，这个目标才能实现——因为公职无利可图，所以穷人就不会谋求公职职位，他们宁愿只关心自己的私事；而富人由于不需要窃取公库来中饱私囊，所以就可以担任这些职务。如此一来，穷人就会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发家致富，而贵族也就不会受到下层阶级的统治。为了避免公共财产被侵吞，税收的变革也必须通过公民统一集会的方式来决定，对税收数目的记录和存放也应该由不同的人、公司和部族共同负责。法律应该保证那些享有清廉刚直名誉的地方官能够得到应得的荣誉。在平民政体中，富人应该得到保护，他们的财产和收入都不应被分配，相反，还应该得到保护，但是在有些国家，富人的收入是被悄无声息地剥夺掉的。防止富有的公民——即便他们乐意——从事费钱但毫无用处的公共服务，如组建合唱团，火炬传递跑等等，其实是件好事。另一方面，在寡头政体中，穷人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有利可图的公职应该交给他们。如果有富人阶层的成员做了有害于他们的事情，这位冒犯者都应该受到比伤害自己本

阶层人士更为严厉的惩罚。法律条款还应规定不动产只能继承而不能赠送，而且一个人只能接受一份遗产继承。因为通过这种方法，财产才能够保持均衡，更多的穷人才能变得富有。在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中，把平等权甚至优先权赋予在政权中占比较少的人（如平民政体中的富人和寡头政体中的穷人），把这一点作为国家公职工作的基本原则，显然是非常有利的。但在重要的国家机关里，优先权理应赋予甚至只能赋予统治阶层的成员。

Part 9

第九章

There are three qualifications required in those who have to fill the highest offices—(1) first of all, loyalty to the established constitution; (2) the greatest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3) virtue and justice of the kind proper to each form of government; for, if what is just is not the same in all governments, the quality of justice must also differ. There may be a doubt, however, when all these qualities do not meet in the same person, how the selection is to be made; suppose, for example, a good general is a bad man and not a friend to the constitution, and another man is loyal and just, which should we choose? In making the election ought we not to consider two points? what qualities are common, and what are rare. Thus in the choice of a general, we should regard his skill rather than his virtue; for few have military skill, but many have virtue. In any office of trust or stewardship, on the other hand, the opposite rule should be observed; for more virtue than ordinary is required in the holder of such an office, but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is of a sort which all men possess.

需要从事最高行政公职的人应该满足三个条件——（1）首先，是对现行宪政的忠诚；（2）最强的行政管理能力；（3）美好的德行和对应特定政体的公正，因为，如果所有政体所持的公正都不相同，那么公正的特点也应有所不同。然而，问题仍在，如果这三种品质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选举该如何进行呢？例如，一个优秀的将军人品很差，而且对宪政也不够友好，而另外一个人则既忠诚又公正，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呢？在选择的过程中，有两个点，我们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其一就是哪些品质是常见的；其二就是哪些品质是少见的。在推选将军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他的军事技能而不是他的美好德行，因为很少有人具备军事技能，但很多人都身具美德。另一方面，在任何一个需要信任和管理能力的工作岗位上，我们则需要关注与之相对的原则。因为在掌管此类公职岗位的时候，对于美德的需求比普通岗位更多，而其所需的知识却是普通人都掌握了的。

It may, however, be asked what a man wants with virtue if he have political ability and is loyal, since these two qualities alone will make him do what is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But may not men have both of them and yet be deficient in self-control? If, knowing and loving their own interests, they do not always attend to them, may they not be equally negligent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然而，有人可能会问，如果一个人具备很强的政治能力而且很忠诚，那么他还要美德做什么呢？毕竟前两种品质足以保证他能够做好公共利益方面的工作。但是，如果有人具备了这两者却在自我控制方面做得不够好呢？就好比有人明知且深爱自己的利益，但却从不关心，那么，他难道不会由此及彼地置公众利益与不顾吗？

Speaking generally, we may say that whatever legal enactments are held to be for the interest of various constitutions, all these

preserve them. And the great preserving principle is the one which has been repeatedly mentioned—to have a care that the loyal citizen should be stronger than the disloyal. Neither should we forget the mean, which at the present day is lost sight of in perverted forms of government; for many practices which appear to be democratical are the ruin of democracies, and many which appear to be oligarchical are the ruin of oligarchies. Those who think that all virtue is to be found in their own party principles push matters to extremes; they do not consider that disproportion destroys a state. A nose which varies from the ideal of straightness to a hook or snub may still be of good shape and agreeable to the eye; but if the excess be very great, all symmetry is lost, and the nose at last ceases to be a nose at all on account of some excess in one direction or defect in the other; and this is true of every other part of the human body. The same law of proportion equally holds in states. Oligarchy or democracy, although a departure from the most perfect form, may yet be a good enough government, but if any one attempts to push the principles of either to an extreme, he will begin by spoiling the government and end by having none at all. Wherefore the legislator and the statesman ought to know what democratical measures save and what destroy a democracy, and what oligarchical measures save or destroy an oligarchy. For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can exist or continue to exist unless both rich and poor are included in it. If equality of property is introduced, the state must of necessity take another form; for when by laws carried to excess one or other element in the state is ruined, the constitution is ruined.

通常来说，我们可能会认为无论何种法令，只要其颁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各自政体的利益，它们就真的可以维护这种政体。最有力的保护原则就是此前我们已经重复了很多次的——注意让忠诚者比不忠

之人更强大。我们不应该忘记“中间道路”，但在今天，在变态扭曲的政体形式中已经失去了“中间道路”的影子。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民主的行为措施事实上是对平民政体的损害，而很多看上去独裁的那些行为措施事实上却是对寡头政体的破坏。有人认为只有在他们自己一派的理念中才能找到极致真理，他们要将这种理念推向了一个极端，而且他们不认为这种不均衡会毁掉一个国家。一个鼻子，虽然形状不太理想，不够直，弯曲得像个钩子或者扁平上翘，但仍然是鼻子的基本形状，跟眼睛摆在一起也是可以搭配得起的。但是，如果它的形状的扭曲得过了头，连基本的两孔对称都不存在，那么，这个鼻子最终就不能称之为鼻子了，因为它在这一边超出了太多，而在另一边又严重短缺。人体上的其他任何部位都是这样的。这种比例上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国家。寡头政体或者平民政体，虽然偏离了政治体制的最完美形式，但终究还是较为完美的政体形式，但是，如果有人妄图把其中一个的基本原则推向极端，那么他就会以破坏政体为开始，以一无所获为结束。因此，立法者和政治家需要明白哪些民主政策可以挽救民主，哪些又会破坏民主；哪些独裁政策可以挽救独裁，哪些又会搞破坏。除非穷人和富人同时被接纳入政权之中，否则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都不可能存在和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如果引入财产均分政策，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转变为另一种政体形式，因为一旦法律倾斜得过了头，那么国内的一方或者另一方就会被毁掉，宪政也就被毁掉了。

There is an error common both to oligarchies and to democracies: in the latter the demagogues, when the multitude are above the law, are always cutting the city in two by quarrels with the rich, whereas they should always profess to be maintaining their cause; just as in oligarchies the oligarchs should profess to maintaining the cause of the people, and should take oaths the opposite of those which they now take. For there are cities in which they swear—“I will be an enemy to the people, and will devise all the harm against them which I can”; but they ought to exhibit and to entertain the very opposite feeling; in the form of their oath there

should be an express declaration—“I will do no wrong to the people.”

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错误：在平民政体中，其错误在于民众领袖会在大多数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时候，通过煽动他们与富人阶层的争执，把一座城邦分裂开来，而他们其实应该公开维护富人的利益；而在寡头政体中，独裁寡头们本应公开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因此他们的宣誓应与他们现在所做的相反。在有些城邦，他们发誓说：“我将要成为人民的敌人，我将竭尽所能地伤害他们。”但是他们应该展示和表现出相反的情绪。他们在宣誓中应该公示这样一种表达：“我绝不会做有害于人民的事情。”

But of all the things which I have mentioned that which most contributes to the permanence of constitutions is the adaptation of education to the form of government, and yet in our own day this principle is universally neglected. The best laws, though sanctioned by every citizen of the state, will be of no avail unless the young are trained by habit and education in the spirit of the constitution, if the laws are democratical, democratically or oligarchically, if the laws are oligarchical. For there may be a want of self-discipline in states as well as in individuals. Now, to have been educated in the spirit of the constitution is not to perform the actions in which oligarchs or democrats delight, but those by which the existence of an oligarchy or of a democracy is made possible. Whereas among ourselves the sons of the ruling class in an oligarchy live in luxury, but the sons of the poor are hardened by exercise and toil, and hence they are both more inclined and better able to make a revolution. And in democracies of the more extreme type there has arisen a false idea of freedom which is contradictory to the tru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For two principles are characteristic of

democracy, the government of the majority and freedom. Men think that what is just is equal; and that equality is the supremacy of the popular will; and that freedom means the doing what a man likes. In such democracies every one lives as he pleases, or in the words of Euripides, “according to his fancy.” But this is all wrong; men should not think it slavery to live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the constitution; for it is their salvation.

但是，在我上面所提到的所有事情当中，对于维持宪政最有帮助的应该就是教育人们去适应政权组织的形式。只是在我们眼下的这个时代里，这条原则基本上已经被忽略了。除非该国的子民从小就接受行为习惯的培养和宪法精神的教育，否则，即便是全民认可的最好的法律，也无用武之地。如果法律是平民政体的，那它就是民主主义的，如果法律是寡头政体的，那它就是独裁主义的。因为任何国家和个人，都需要自律。现在，接受过宪法精神的教育并不是为了表现出让独裁寡头或民主人士满意的行为，而是为了提供可以让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在我们的周围，统治阶层的子孙都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而穷人家的孩子却在操劳和艰辛中挣扎存活，双方都倾向于发动一场革命，而且他们真的具备这样的能力。在一些更为极端的平民政体中，出现了一种关于自由的错误思想，这种思想与国家的真实利益是相对立的。民主的特征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即多数人的政府和多数人的自由。人们认为公正就是平等，平等就是民意至上；自由就是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在这样的平民政体中，每个人都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或者用欧里庇得斯的话说，“随心所欲”。但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不应该把按照宪法的规则进行生活看作是一种奴隶制，因为这实际上是在拯救他们。

I have now discussed generally the causes of the revolution and destruction of states, and the means of their preservation and continuance.

现在，我已经基本上讨论完了引发变革和破坏政体的诱因，以及保护和延续政体的方法。

Part 10

第十章

I have still to speak of monarchy, and the causes of its destruction and preservation. What I have said already respecting form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pplies almost equally to royal and to tyrannical rule. For royal rule is of the nature of an aristocracy, and a tyranny is a compound of oligarchy and democracy in their most extreme forms; it is therefore most injurious to its subjects, being made up of two evil forms of government, and having the perversions and errors of both. These two forms of monarchy are contrary in their very origin. The appointment of a king is the resource of the better classes against the people, and he is elected by them out of their own number, because either he himself or his family excel in virtue and virtuous actions; whereas a tyrant is chosen from the people to be their protector against the notables, and in order to prevent them from being injured. History shows that almost all tyrants have been demagogues who gained the favor of the people by their accusation of the notables. At any rate this was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tyrannies arose in the days when cities had increased in power. Others which were older originated in the ambition of kings wanting to overstep the limits of their hereditary power and become despots. Others again grew out of the class which were chosen to be chief magistrates; for in ancient times the people who elected them gave the magistrates, whether civil or religious, a long

tenure. Others arose out of the custom which oligarchies had of making some individual supreme over the highest offices. In any of these ways an ambitious man had no difficulty, if he desired, in creating a tyranny, since he had the power in his hands already, either as king or as one of the officers of state. Thus Pheidon at Argos and several others were originally kings, and ended by becoming tyrants; Phalaris, on the other hand, and the Ionian tyrants, acquired the tyranny by holding great offices. Whereas Panaetius at Leontini, Cypselus at Corinth, Peisistratus at Athens, Dionysius at Syracuse, and several others who afterwards became tyrants, were at first demagogues.

我还要继续谈谈君主制，谈谈君主制被推翻的原因以及维护君主制的方式。我从立宪政体的角度出发所谈过那些内容几乎可以同样适用于王权统治和暴君政体。因为王权统治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贵族政体，而暴君政体则是最极端的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变体的融合物。由于它是由两种政体形式的最糟糕的变体组成的，吸纳了两种政体的曲解和谬误，因此对于它治下的子民而言，简直就是最大的灾难。君主政体的这两种表现形式在起源上是相互对立的。国王的任命是优势阶层压迫人民大众的根源所在，因为国王是由自己所在阶层的人推举出来的，被推举的原因则是国王本人或者其家族在美德和良行方面高人一等。而暴君则是人们在反对名门望族的过程中从自己的守护者中选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历史证明，几乎所有的暴君都曾是民众领袖，这些人因为谴责和谩骂名门望族而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欢迎。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都是暴君在城邦势力日增的过程中得以脱颖而出的基本方式。其他的一些方式相对更古老一些，可以追溯到国王想要超越自己所继承到的权力而转变成专制暴君的时代。还有一些方式源自于那些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的阶层，因为在古代，那些有选举权的人赋予了执政官——无论是在民事还是在宗教方面——很长的任期。另外一些则出自于寡头政体的那种总是要把某个个人凌驾于最高公职权力部门之上的习惯。上述的种种方式当中，

任何一个有野心的男人——只要他有此想法——想要开启暴君政体都毫无困难，因为他的手中已经握有极高的权力，可能是以国王的身份，也可能是以政府官员的身份。阿尔戈斯的斐冬，还有其他一些人，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最初做了国王，但最终都转变成了暴君。而另一方面，法拉里斯以及爱奥尼亚的几位暴君都是通过掌管高级公职部门而转变为暴君的。然而，莱昂蒂尼的巴乃丢，科林斯的库普塞鲁斯，雅典的佩西斯特拉托斯，锡拉库扎的狄俄尼索斯以及其他几位后来变成暴君的人，最初都是民众领袖。

And so, as I was saying, royalty ranks with aristocracy, for it is based upon merit, whether of the individual or of his family, or on benefits conferred, or on these claims with power added to them. For all who have obtained this honor have benefited, or had in their power to benefit, states and nations; some, like Codrus, have prevented the state from being enslaved in war; others, like Cyrus, have given their country freedom, or have settled or gained a territory, like the Lacedaemonian, Macedonian, and Molossian kings. The idea of a king is to be a protector of the rich against unjust treatment, of the people against insult and oppression. Whereas a tyrant, as has often been repeated, has no regard to any public interest, except as conducive to his private ends; his aim is pleasure, the aim of a king, honor. Wherefore also in their desires they differ; the tyrant is desirous of riches, the king, of what brings honor. And the guards of a king are citizens, but of a tyrant mercenaries.

因此，如我所说，王权统治可以比肩贵族政体，因为王权统治是以功绩为基础的——无论是他个人的功绩还是他的家族功绩，或者以授予他的荣誉为基础，甚至以利用权力抢来的成就为基础。获此殊荣的人为国家和民族——或许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带来了好处，就像

科德鲁斯，他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国家，使其在战争中免遭奴役；其他的，如塞勒斯，要么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自由，要么安抚一方甚至开疆拓土，古斯巴达、马其顿和米洛斯的那些国王即是这样。国王通常被认为是富人的守护者，用以反对不公正待遇；或者被认为是人民大众的守护者，用以反对凌辱和压迫。然而，正如我们反复提及的，暴君是不会在乎公众利益的，除非公共利益对他的私利有益。暴君的目标是享乐，而国王的目标则是荣耀。而且在欲望方面，二者也有所不同，暴君渴求财富，而国王则渴求能够带来荣誉的那些东西。国王的卫兵是公民，而暴君的卫兵则是雇佣兵。

That tyranny has all the vices both of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is evident. As of oligarchy so of tyranny, the end is wealth; (for by wealth only can the tyrant maintain either his guard or his luxury). Both mistrust the people, and therefore deprive them of their arms. Both agree too in injuring the people and driving them out of the city and dispersing them. From democracy tyrants have borrowed the art of making war upon the notables and destroying them secretly or openly, or of exiling them because they are rivals and stand in the way of their power; and also because plots against them are contrived by men of this dass, who either want to rule or to escape subjection. Hence Periander advised Thrasybulus by cutting off the tops of the tallest ears of corn, meaning that he must always put out of the way the citizens who overtop the rest. And so, as I have already intimated, the beginnings of change are the same in monarchies as in form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subjects attack their sovereigns out of fear or contempt, or because they have been unjustly treated by them. And of injustice, the most common form is insult, another is confiscation of property.

显然，暴君具备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全部缺点。暴君政体和

寡头政体一样，其最终目的都是财富（因为只有借助财富，暴君才能维持自己的卫兵和奢华生活）。但寡头政体和暴君政体都不信任自己的子民，因此，他们剥夺了人民的武装。在迫害人民、驱逐人民出城和遣散人民方面，二者不谋而合。暴君从平民政体那里学会了把战争引向名门望族，并且秘密地甚至公开地把名门望族消灭掉，或者将其流放，因为名门望族是暴君的反对者，阻碍暴君实现自己的权力，同时还因为那些反对暴君的密谋都是由名门望族这个阶层来完成的——他们想赢得统治权，或者想摆脱压迫。因此，佩里安德建议特扰叙布洛斯“砍掉玉米田里最高的那棵”，其意是说特扰叙布洛斯应该始终把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那些人除掉。而且，正如我早就说过的，君主政体和立宪政体的各种变体一样，其变革的开端都是相同的。被统治者攻击统治自己的君主要么是因为害怕，要么是因为受到了蔑视，还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曾经受到过君主的不公正对待。就不公正而言，最常见的形式就是侮辱，还有就是没收财产。

The ends sought by conspiracies against monarchies, whether tyrannies or royalties, are the same as the ends sought by conspiracies against other forms of government. Monarchs have great wealth and honor, which are objects of desire to all mankind. The attacks are made sometimes against their lives, sometimes against the office; where the sense of insult is the motive, against their lives. Any sort of insult (and there are many) may stir up anger, and when men are angry, they commonly act out of revenge, and not from ambition. For example, the attempt made upon the Peisistratidae arose out of the public dishonor offered to the sister of Harmodius and the insult to himself. He attacked the tyrant for his sister's sake, and Aristogeiton joined in the attack for the sake of Harmodius. A conspiracy was also formed against Periander, the tyrant of Ambracia, because, when drinking with a favorite youth, he asked him whether by this time he was not with child by him. Philip, too, was attacked by Pausanias because he permitted him to

be insulted by Attalus and his friends, and Amyntas the little, by Derdas, because he boasted of having enjoyed his youth. Evagoras of Cyprus, again, was slain by the eunuch to revenge an insult; for his wife had been carried off by Evagoras's son. Many conspiracies have originated in shameful attempts made by sovereigns on the persons of their subjects. Such was the attack of Crataeas upon Archelaus; he had always hated the connection with him, and so, when Archelaus, having promised him one of his two daughters in marriage, did not give him either of them, but broke his word and married the elder to the king of Elymeia, when he was hard pressed in a war against Sirrhas and Arrhabaeus, and the younger to his own son Amyntas, under the idea that Amyntas would then be less likely to quarrel with his son by Cleopatra—Crataeas made this slight a pretext for attacking Archelaus, though even a less reason would have sufficed, for the real cause of the estrangement was the disgust which he felt at his connection with the king. And from a like motive Hellonocrates of Larissa conspired with him; for when Archelaus, who was his lover, did not fulfill his promise of restoring him to his country, he thought tha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had originated, not in affection, but in the wantonness of power. Pytho, too, and Heracleides of Aenos, slew Cotys in order to avenge their father, and Adamas revolted from Cotys in revenge for the wanton outrage which he had committed in mutilating him when a child.

反对君主政体——无论是暴君政体还是王权统治——的密谋最终能够实现的结果，和反对其他形式政府的密谋所实现的结果是一样的。君主们拥有巨大的财富和荣誉，这是全人类最渴望得到的东西。针对君主的攻击有时候是要剥夺他们的生命，有时候是为了反对公职行政机关。当攻击的动机是源于受辱的时候，攻击的目的就是为了剥夺君主的性命。任何形式的侮辱（侮辱也分为很多种）都可能会激起

愤怒，而当人们愤怒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开始复仇，但这并不是出于野心。例如，针对庇雪斯特拉托的攻击是因为哈尔摩狄奥斯的妹妹在公共场合蒙羞，他本人也受到了侮辱。他为了自己的妹妹向暴君发起了攻击，而阿利斯托斋吞则是为了哈尔迪莫奥斯才参与进攻的。针对安布拉基亚的暴君佩里安德的反叛密谋是因为佩里安德在跟自己宠爱的少年一起喝酒的时候，问他是不是因自己而受孕。菲利普被鲍桑尼亚攻击是因为他默许了阿塔罗斯和他的朋友们羞辱了鲍桑尼亚，而小阿闵塔斯被德达斯攻击则是因为他炫耀说对方幼年时曾得到自己的宠爱。塞浦路斯的埃瓦戈拉斯之所以被杀死也是因为宦官因受辱而复仇——那位宦官的妻子被埃瓦戈拉斯的儿子抢走了。很多反叛的密谋都是由君主对自己治下的子民实施了不道德的侮辱造成的。克拉泰俄对阿奇劳斯的攻击就是这样，克拉泰俄一直都对自己跟阿奇劳斯之间的关系耿耿于怀。阿奇劳斯向他许诺会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中的一个许配给他，但最终却没有做到，阿奇劳斯不仅食言了，还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爱吕米亚的国王——那时他正身陷对抗瑟拉斯和阿拉培俄的战争之中，处境艰难；把小女儿嫁给了爱吕米亚王的儿子阿闵塔斯——阿奇劳斯认为这样一来阿闵塔斯就不会跟自己的儿子去争夺美女克里欧佩特拉了。克拉泰俄就把这次侮辱当作攻击阿奇劳斯的借口，尽管这个借口并不是一个十分充分的理由——因为事实上，他们之间关系疏远的真正原因就是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厌恶了跟阿奇劳斯之间的关系。来自拉里萨的希拉诺克拉底密谋攻击阿奇劳斯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对阿奇劳斯而言，拉诺克拉底是他的男宠，但他未能实现自己的诺言让拉诺克拉底回自己的城邦去掌权，他认为自己和拉诺克拉底之间的关系在建立伊始就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出于对权力的渴望。巴隆和埃诺城的赫拉克利图处死哥提斯则是为了替父亲报仇，而亚当斯带兵反叛哥提斯则意在为自己童年时代惨遭阉割的悲剧而复仇。

Many, too, irritated at blows inflicted on the person which they deemed an insult, have either killed or attempted to kill officers of state and royal princes by whom they have been injured. Thus, at Mytilene, Megacles and his friends attacked and slew the

Penthilidae, as they were going about and striking people with clubs. At a later date Smerdis, who had been beaten and torn away from his wife by Penthilus, slew him. In the conspiracy against Archelaus, Decamnichus stimulated the fury of the assassins and led the attack; he was enraged because Archelaus had delivered him to Euripides to be scourged; for the poet had been irritated at some remark made by Decamnichus on the foulness of his breath. Many other examples might be cited of murders and conspiracies which have arisen from similar causes.

还有很多人认为身受体罚是一种侮辱，因而愤怒不已，于是就杀死或者企图杀死让自己受到体罚的政府官员或皇室子嗣。因此，在米蒂利尼，墨伽克里和他的朋友袭击并打死了彭茜卢的族人，因为他们当时正在用棍棒四处殴打平民。后来，斯摩第斯处死了一位彭茜卢族人，也是因为自己曾败在他的手下，并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在密谋反叛阿奇劳斯的过程中，德堪尼沽成功地激起了刺客们的怒火，并率领他们发动了攻击，而他之所以被激怒，则是因为阿奇劳斯曾经把他遣送到诗人欧里庇得斯那里接受鞭挞，而这则是因为德堪尼沽把“诗人”的一首诗评价为胡言乱语。还有很多例子可以挑出来证明许多谋杀和反叛都是源于与这相似原因。

Fear is another motive which, as we have said, has caused conspiracies as well in monarchies as in more popular forms of government. Thus Artapanes conspired against Xerxes and slew him, fearing that he would be accused of hanging Darius against his orders-he having been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Xerxes would forget what he had said in the middle of a meal, and that the offense would be forgiven.

惧怕是另外一种动机，我们此前也曾说过，它会在各种盛行的政体中引起叛变，君主政体中也不例外。阿尔泰巴尼密谋反叛了磋克西，并处死了他，就是这样的案例。阿尔泰巴尼害怕自己会因绞死不遵守自己命令的达流士而受到控告——虽然磋克西曾在酒桌上说过此类过错是可以原谅的，但阿尔泰巴尼一直认为磋克西会忘记这句话。

Another motive is contempt, as in the case of Sardanapalus, whom some one saw carding wool with his women, if the storytellers say truly; and the tale may be true, if not of him, of some one else. Dion attacked the younger Dionysius because he despised him, and saw that he was equally despised by his own subjects, and that he was always drunk. Even the friends of a tyrant will sometimes attack him out of contempt; for the confidence which he reposes in them breeds contempt, and they think that they will not be found out. The expectation of success is likewise a sort of contempt; the assailants are ready to strike, and think nothing of the danger, because they seem to have the power in their hands. Thus generals of armies attack monarchs; as, for example, Cyrus attacked Astyages, despising the effeminacy of his life, and believing that his power was worn out. Thus again, Seuthes the Thracian conspired against Amadocus, whose general he was.

还有一种动机则是因为遭人轻视，就像萨尔达那巴卢的例子——如果传言属实的话——他刚好被人看到混在女人堆里理羊毛（便遭刺杀）。这个故事可能是真的，即便说的不是他，那也是别人。迪翁攻击小狄欧尼修就是因为看不起他，而且发现狄欧尼修的子民同样看不起他，而且他还经常醉酒。即便是暴君的好朋友，有时候也会出于蔑视而对暴君发起攻击，因为暴君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令人蔑视的种子，给予了他们信心，而且他们相信自己一定不会失败。对于成功的渴望应该也算是一种蔑视，攻击者准备进攻，而且认定没有危险，因为他

们好像已经胜券在握。军队的将军对君主发起进攻就是这样的例子。比如塞勒斯攻击阿斯提阿格斯，是出于看不起他女人一样娇媚的气息，认定他的权力已到尽头。此外，色雷斯人塞奥底斯叛变了亚麦杜哥，而他正是亚麦杜哥的将军。

And sometimes men are actuated by more than one motive, like Mithridates, who conspired against Ariobarzanes, partly out of contempt and partly from the love of gain.

有时候，人们会受到不止一种动机的驱使，就像米特里达特，他之所以反叛阿里奥巴尔赞，部分是出于蔑视，部分是出于贪念。

Bold natures, placed by their sovereigns in a high military position, are most likely to make the attempt in the expectation of success; for courage is emboldened by power, and the union of the two inspires them with the hope of an easy victory.

勇敢的品质，加上在军队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位置，这些最有可能促使他们对成功充满希望，而尝试进攻。因为勇气会受到权力的鼓舞，勇敢和军权的结合，激励了他们，让他们认定每一次成功都会易如反掌。

Attempts of which the motive is ambition arise in a different way as well as in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There are men who will not risk their lives in the hope of gains and honors however great, but who nevertheless regard the killing of a tyrant simply as an extraordinary action which will make them famous and honorable

in the world; they wish to acquire, not a kingdom, but a name. It is rare, however, to find such men; he who would kill a tyrant must be prepared to lose his life if he fail. He must have the resolution of Dion, who, when he made war upon Dionysius, took with him very few troops, saying “that whatever measure of success he might attain would be enough for him, even if he were to die the moment he landed; such a death would be welcome to him.” this is a temper to which few can attain.

有些攻击的动机是出于野心，它们和此前提到过的那些尝试一样，会以多种方式发起。无论收获和荣誉有多大，有些人都不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换取，但是有些人却认为杀死一位暴君是一种简单但又极为特殊的事情，这件事将会让自己名声大噪，享誉世界。他们想要谋取的，并不是一个王国，而是一种名望。然而，这样的人毕竟很少，他在杀死暴君的同时，必须做好一旦失败就会牺牲掉自己性命的准备。他必须具备迪翁那样的决心——在迪翁向狄俄尼索斯发动战争的时候，他所带领的军队数量寥寥无几，他说“无论何种程度的成功，于我而言，皆是满足，即便登陆即战死，我也衷心期待。”但是这种勇气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具备的。

Once more, tyrannies, like all other governments, are destroyed from without by some opposite and more powerful form of government. That such a government will have the will to attack them is clear; for the two are opposed in principle; and all men, if they can, do what they will. Democracy is antagonistic to tyranny, on the principle of Hesiod, “Potter hates Potter,” because they are nearly akin, for the extreme form of democracy is tyranny; and royalty and aristocracy are both alike opposed to tyranny, because they are constitutions of a different type. And therefore the Lacedaemonians put down most of the tyrannies, and so did the

Syracusans during the time when they were well governed.

另外，暴君政体也和其他政体形式一样，会被外部的与之相反且更强的政体形式消灭掉。此种政体的攻击意愿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二者在原则上相互冲突。所有人，只要有能力，都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平民政体和暴君政体是对立的，但是根据赫西奥德的“同行相杀”的原则，它们互相对立却是因为相似性，因为暴君政体是平民政体最极端的表现形式。王权统治和贵族政体是相似的，因为他们都是宪政制度的变体，因此都与暴君政体相对立。因此，古斯巴达人才会废除了绝大多数的暴君政体，锡拉库扎在实现了清平之治的时候也如法炮制。

Again, tyrannies are destroyed from within, when the reigning family are divided among themselves, as that of Gelo was, and more recently that of Dionysius; in the case of Gelo because Thrasybulus, the brother of Hiero, flattered the son of Gelo and led him into excesses in order that he might rule in his name. Whereupon the family got together a party to get rid of Thrasybulus and save the tyranny; but those of the people who conspired with them seized the opportunity and drove them all out. In the case of Dionysius, Dion, his own relative, attacked and expelled him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people; he afterwards perished himself.

此外，当统治家族自我分裂的时候，暴君政体也会从内部遭到破坏。就像盖洛，这是自狄俄尼索斯以后，最近发生的事情。在盖洛的案例中，由于希尔罗的哥哥特扰叙布洛斯对盖洛的儿子阿谀奉承，并引诱他陷入了过度荒淫奢靡的生活，以便自己可以借他的名义掌权，于是，全家人在集会的时候除掉了特扰叙布洛斯，挽救了暴君政体政体，但是那些同家人一起谋划此事的人却抓住这次机会把暴君一家全

都赶了出去。在狄俄尼索斯的故事中，迪翁和他自己的亲信在人民大众的帮助下攻击并驱逐了狄俄尼索斯，但后来，迪翁却选择了自杀。

There are two chief motives which induce men to attack tyrannies—hatred and contempt. Hatred of tyrants is inevitable, and contempt is also a frequent cause of their destruction. Thus we see that most of those who have acquired, have retained their power, but those who have inherited, have lost it, almost at once; for, living in luxurious ease, they have become contemptible, and offer many opportunities to their assailants. Anger, too, must be included under hatred, and produces the same effects. It is often times even more ready to strike—the angry are more impetuous in making an attack, for they do not follow rational principle. And men are very apt to give way to their passions when they are insulted. To this cause is to be attributed the fall of the Peisistratidae and of many others. Hatred is more reasonable, for anger is accompanied by pain, which is an impediment to reason, whereas hatred is painless.

促使人们对暴君政体采取攻击的动机主要有两种：仇恨和耻辱。对于暴君的仇恨是无法避免的，而耻辱也通常是破坏行径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看到，夺取权力的那些人基本上都保住了权力，而继承了权力的人，却基本上都丢掉了权力，甚至是刚刚继承就丢掉了。因为他们一直过着奢靡的生活，已经变得卑鄙可耻了，于是就给了那些叛变者众多的机会。愤怒，也应该归于憎恨之列，而且具有同样的效果。而在准备实施攻击方面，愤怒往往比憎恨要实施更多次——因为愤怒者在实施攻击方面更冲动，他们根本不遵守合理规则。而且，当人们受到侮辱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被自己的激情所控制。庇雪斯特拉托和其他一些暴君就是被这样的愤怒打败的。由于愤怒通常与痛苦相伴，而痛苦则是理智的最大阻碍，因此憎恨就显得更理智一些，因

为憎恨是没有痛苦的。

In a word, all the causes which I have mentioned as destroying the last and most unmixed form of oligarchy, and the extreme form of democracy, may be assumed to affect tyranny; indeed the extreme forms of both are only tyrannies distributed among several persons. Kingly rule is little affected by external causes, and is therefore lasting; it is generally destroyed from within. And there are two ways in which the destruction may come about; (1) when the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quarrel among themselves, and (2) when the kings attempt to administer the state too much after the fashion of a tyranny, and to extend their authority contrary to the law. Royalties do not now come into existence; where such forms of government arise, they are rather monarchies or tyrannies. For the rule of a king is over voluntary subjects, and he is supreme in all important matters; but in our own day men are more upon an equality, and no one is so immeasurably superior to others as to represent adequately the greatness and dignity of the office. Hence mankind will not, if they can help, endure it, and any one who obtains power by force or fraud is at once thought to be a tyrant. In hereditary monarchies a further cause of destruction is the fact that kings often fall into contempt, and, although possessing not tyrannical power, but only royal dignity, are apt to outrage others. Their overthrow is then readily effected; for there is an end to the king when his subjects do not want to have him, but the tyrant lasts, whether they like him or not.

总而言之，我上面所提到的全部诱因，不仅破坏了最新的、最纯粹的寡头政体和最极端的平民政体，而且被认为是促成暴君政体的原因。事实上，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最极端形式就是几个人之间轮转

的暴君政体。王权统治基本上不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长存，而它通常是从内部被破坏掉的。实施破坏的途径通常有两种，（1）皇室成员之间发生内讧，以及（2）国王企图按照暴君的方式过多地管理国家，想把自己的权力延展到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王权统治目前无法形成，而其他形式的政府则不断涌现，他们要么是君主政体要么是暴君政体。由于在原则上，国王是由自愿接受统治的子民推举出来的，因此他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今天，我们倾向于追求平等，没有哪个人能够无限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彰显出政府的伟大和高贵。因此，只要能够做得到，人类就不会容忍国王的存在，而任何一个通过武力或诡计获取权力的人都会立刻被贴上暴君的标签。在世袭制的君主政体国家，还有一个破坏性的诱因就是事实上国王经常会蔑视他人，他虽然不具备专制暴君那样的权力，但是他皇室的尊严却倾向于贬低别人。他们的下台也就极易实现了，因为当国王治下的子民不想再拥护他的时候，他的王位也就面临结束了，但暴君的地位却会一直持续下去，无论子民喜不喜欢他。

The destruction of monarchies is to be attributed to these and the like causes.

对于君主政体的破坏就归纳出这些以及与此相似的原因了。

Part 11

第十一章

And they are preserved, to speak generally, by the opposite causes; or, if we consider them separately, (1) royalty is preserved by the limitation of its powers. The more restricted the functions of

kings, the longer their power will last unimpaired; for then they are more moderate and not so despotic in their ways; and they are less envied by their subjects.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kingly office has lasted so long among the Molossians. And for a similar reason it has continued among the Lacedaemonians, because there it was always divided between two, and afterwards further limited by Theopompus in various respects, more particularly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phoralty. He diminished the power of the kings, but established on a more lasting basis the kingly office, which was thus made in a certain sense not less, but greater. There is a story that when his wife once asked him whether he was not ashamed to leave to his sons a royal power which was less than he had inherited from his father, “No indeed,” he replied, “for the power which I leave to them will be more lasting.”

政体，通常来说，是由与破坏相对的因素来维护的。或者说，我们不妨分别考虑（1）限制王权才能维持王权统治。对国王的权势限制得越多，国王的权力才能持续得更长久而且不被破坏，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更谦逊，而不至过于嚣张跋扈，同时，他们也不会过多地遭到治下子民的嫉恨。这就是莫洛西亚人的王权统治得以长期延续的原因所在。出于同样的原因，古斯巴达人的王权统治也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是因为君主的权力被一分为二，后来塞奥彭浦斯又在各个方面限制了王权，尤其是在大监督官制度确立以后，王权受限更甚。塞奥彭浦斯分解了国王的权力，却建立起了一种更具持久力的王权统治的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减弱了、反而是增强了王权统治。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次，塞奥彭浦斯的老婆问他是否会因为未能把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王位传递给自己的儿子而感到羞愧，他回答说：“不。因为我传递给他的权力可以永远地传下去。”

As to (2) tyrannies, they are preserved in two most opposite

ways. One of them is the old traditional method in which most tyrants administer their government. Of such arts Periander of Corinth is said to have been the great master, and many similar devices may be gathered from the Persian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ir government. There are firstly the prescriptions mentioned some distance back,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 tyranny, in so far as this is possible; viz., that the tyrant should lop off those who are too high; he must put to death men of spirit; he must not allow common meals, clubs, education, and the like; he must be upon his guard against anything which is likely to inspire either courage or confidence among his subjects; he must prohibit literary assemblies or other meetings for discussion, and he must take every means to prevent people from knowing one another (for acquaintance begets mutual confidence). Further, he must compel all persons staying in the city to appear in public and live at his gates; then he will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if they are always kept under, they will learn to be humble. In short, he should practice these and the like Persian and barbaric arts, which all have the same object. A tyrant should also endeavor to know what each of his subjects says or does, and should employ spies, like the “female detectives” at Syracuse, and the eavesdroppers whom Hiero was in the habit of sending to any place of resort or meeting; for the fear of informers prevents people from speaking their minds, and if they do, they are more easily found out. Another art of the tyrant is to sow quarrels among the citizens; friends should be embroiled with friends, the people with the notables, and the rich with one another. Also he should impoverish his subjects; he thus provides against the maintenance of a guard by the citizen and the people, having to keep hard at work, are prevented from conspiring. The Pyramids of Egypt afford an example of this policy; also the offerings of the family of Cypselus,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temple of Olympian Zeus by the Peisistratidae, and the great Polycratean monuments at Samos; all

these works were alike intended to occupy the people and keep them poor. Another practice of tyrants is to multiply taxes, after the manner of Dionysius at Syracuse, who contrived that within five years his subjects should bring into the treasury their whole property. The tyrant is also fond of making war in order that his subjects may have something to do and be always in want of a leader. And whereas the power of a king is preserved by his friends, the characteristic of a tyrant is to distrust his friends, because he knows that all men want to overthrow him, and they above all have the power.

对于暴君政体而言，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可以将其维持下来。其中一种是非常古老而传统的方式，绝大多数的暴君都是这样治理国家的。据说，科林斯的佩里安德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才成为一位伟大统治者的，此外，还有很多与此相似的方法也被汇集了起来，通常都是从波斯人的政府管理中学来的。首先，就维持暴君政体而言，上面较早所提到的那些方法，也还是可行的。也就是说，暴君应该清除掉那些权力过高的人，必须处死有精神力量的人，必须禁止聚餐，聚会，集中教育，以及诸如此类，必须利用卫兵去剪除任何能够在治下子民中激励起勇气和信心的东西，必须严禁文学传播以及任何形式的聚众讨论，而且必须采用一切可行之策阻止人们互相认识（因为熟人之间会产生相互的信心）。此外，他还必须强迫所有人都呆在一个城市，暴露在公众的视线里，生活在暴君的门口——这样他才能知道这些人在做什么。如果他们一直都受到压制，他们就会学得谨小慎微。简单点说，他必须实施这些策略以及类似于波斯的野蛮策略，因为所有的这些策略，其最终目的都是一致的。暴君还应该努力弄清楚自己的目标该如何进行表达和实施，他应该雇佣一些间谍——就像锡拉库扎的“异性间谍”，以及希尔罗经常派往各种旅游胜地和会议上的窃听者。由于对告密者充满了恐惧，人们就不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他们说了，就会很容易被发现。暴君可用的另外一种手段就是挑起公民之间的争执，让朋友反目，让人民大众和名门望族争吵，让富人

相互闹纠葛。而且，他还应该让治下的子民变得穷困潦倒，如此一来，他也就不需要卫兵了，因为治下的公民甚至全国人民都会疲于劳作，无法聚众谋逆。埃及的金字塔建造就提供了这样的范例。库普鲁塞斯的家庭供养机制、庇雪斯特拉托建造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以及波利克拉底在萨莫斯建造大纪念碑都是如此，所有的这些工程都会占用人民的大量时间，而且让他们一贫如洗。暴君们可以采用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学习锡拉库扎的狄俄尼索斯，增加税收。狄俄尼索斯竟然做到了在五年之内让治下的子民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上交国库。暴君还喜欢发动战争，以便让自己的子民无事可做，一心只想着寻求一位领袖。对比而言，国王的权力是由他的朋友帮忙保持的，而暴君的特性就是不相信自己的朋友，而且他也清醒地知道，所有人都想赶他下台，但他们必须手握权力才能做得到。

Again, the evil practices of the last and worst form of democracy are all found in tyrannies. Such are the power given to women in their families in the hope that they will inform against their husbands, and the license which is allowed to slaves in order that they may betray their masters; for slaves and women do not conspire against tyrants; and they are of course friendly to tyrannies and also to democracies, since under them they have a good time. For the people too would fain be a monarch, and therefore by them, as well as by the tyrant, the flatterer is held in honor; in democracies he is the demagogue; and the tyrant also has those who associate with him in a humble spirit, which is a work of flattery.

此外，在暴君政体中，我们能够找到平民政体中最新近出现的、最糟糕的恶习。其中包括赋予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力，寄望于她们能够检举揭发她们的丈夫；给奴隶颁发证件以便他们可以背叛自己的主人，因为奴隶和妇女不会密谋反对暴君，他们对于暴君政体和平民政

体当然都是非常友善的——因为在这两种政体下，他们过得很舒心。有些人在君主政体和暴君政体中都可以活得滋润，他们凭借阿谀奉承而得到宠幸。在平民政体中，这样的人就会成为民众领袖，但暴君的手下却有大批这样的精神鄙下、以溜须拍马为己任的人。

Hence tyrants are always fond of bad men, because they love to be flattered, but no man who has the spirit of a freeman in him will lower himself by flattery; good men love others, or at any rate do not flatter them. Moreover, the bad are useful for bad purposes; “nail knocks out nail,” as the proverb says.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a tyrant to dislike every one who has dignity or independence; he wants to be alone in his glory, but any one who claims a like dignity or asserts his independence encroaches upon his prerogative, and is hated by him as an enemy to his power. Another mark of a tyrant is that he likes foreigners better than citizens, and lives with them and invites them to his table; for the one are enemies, but the Others enter into no rivalry with him.

因此，暴君总是恩宠坏人，因为他们喜欢接受别人的奉承，但是任何一个心存自由之念的人都不会自降身份去阿谀奉承他人。君子爱人，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奉承别人。而且坏人则有助于实现肮脏的目的，俗语说，“钉子敲出钉子”。暴君的特点就是不喜欢那些爱惜尊严和独立人格的人，暴君渴望独享所有的荣耀，因此任何宣称爱惜尊严或者和他一样独立自由的人都是在侵占他的权力，都会遭到他的嫉恨，被他视作自己权力的敌人。暴君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爱外来人胜过爱自己的子民，他会邀请外来人跟自己一起生活，一起吃饭，因为他治下的子民都是他的敌人，而外来人则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竞争。

Such are the notes of the tyrant and the arts by which he

preserves his power; there is no wickedness too great for him. All that we have said may be summed up under three heads, which answer to the three aims of the tyrant. These are, (1) the humiliation of his subjects; he knows that a mean-spirited man will not conspire against anybody; (2) the creation of mistrust among them; for a tyrant is not overthrown until men begin to have confidence in one another;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yrants are at war with the good; they are under the idea that their power is endangered by them, not only because they would not be ruled despotically but also because they are loyal to one another, and to other men, and do not inform against one another or against other men; (3) the tyrant desires that his subjects shall be incapable of action, for no one attempts what is impossible, and they will not attempt to overthrow a tyranny, if they are powerless. Under these three heads the whole policy of a tyrant may be summed up, and to one or other of them all his ideas may be referred: (1) he sows distrust among his subjects; (2) he takes away their power; (3) he humbles them.

这就是暴君的特征以及他维护自己权力所用的方法，对他而言，无恶不用其极。我们上面所说的，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这三个要点恰好对应了暴君的三个目的。那就是：（1）让子民受辱。暴君都明白，卑微狭隘之人便不会密谋反叛别人；（2）让子民互相猜忌。只要子民们无法从彼此之间获得信任和信心，暴君的统治就不会被推翻，这也是暴君与君子为敌的原因。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权力遭到了君子的威胁，不仅因为他们不接受自己的专制统治而且因为他们忠于彼此，忠于他人，因此既不会互相揭发也不会去揭发他人；（3）暴君渴望自己的子民无力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在没有能力的时候，就没人会去尝试不可能之事，也就不会尝试推翻一个暴君。在这三个要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暴君的整个政策了，他或者他们的思想可以总结为：（1）在子民之间挑拨离间；（2）剥夺子民的权力；（3）

让子民变得谦卑。

This then is one of the two methods by which tyrannies are preserved; and there is another which proceeds upon an almost opposite principle of action. The nature of this latter method may be gathered from a comparison of the causes which destroy kingdoms, for as one mode of destroying kingly power is to make the office of king more tyrannical, so the salvation of a tyranny is to make it more like the rule of a king. But of one thing the tyrant must be careful; he must keep power enough to rule over his subjects, whether they like him or not, for if he once gives this up he gives up his tyranny. But though power must be retained as the foundation, in all else the tyrant should act or appear to act in the character of a king. In the first place he should pretend a care of the public revenues, and not waste money in making presents of a sort at which the common people get excited when they see their hard-won earnings snatched from them and lavished on courtesans and strangers and artists. He should give an account of what he receives and of what he spends (a practice which has been adopted by some tyrants); for then he will seem to be a steward of the public rather than a tyrant; nor need he fear that, while he is the lord of the city, he will ever be in want of money. Such a policy is at all events much more advantageous for the tyrant when he goes from home, than to leave behind him a hoard, for then the garrison who remain in the city will be less likely to attack his power; and a tyrant, when he is absent from home, has more reason to fear the guardians of his treasure than the citizens, for the one accompany him, but the others remain behind. In the second place, he should be seen to collect taxes and to require public services only for state purposes, and that he may form a fund in case of war, and generally he ought to make himself the guardian and treasurer of them, as if they

belonged, not to him, but to the public. He should appear, not harsh, but dignified, and when men meet him they should look upon him with reverence, and not with fear. Yet it is hard for him to be respected if he inspires no respect, and therefore whatever virtues he may neglect, at least he should maintain the character of a great soldier, and produce the impression that he is one. Neither he nor any of his associates should ever be guilty of the least offense against modesty towards the young of either sex who are his subjects, and the women of his family should observe a like self-control towards other women; the insolence of women has ruined many tyrannies. In the indulgence of pleasures he should be the opposite of our modern tyrants, who not only begin at dawn and pass whole days in sensuality, but want other men to see them, that they may admire their happy and blessed lot. In these things a tyrant should if possible be moderate, or at any rate should not parade his vices to the world; for a drunken and drowsy tyrant is soon despised and attacked; not so he who is temperate and wide awake. His conduct should be the very reverse of nearly everything which has been said before about tyrants. He ought to adorn and improve his city, as though he were not a tyrant, but the guardian of the state. Also he should appear to be particularly earnest in the service of the Gods; for if men think that a ruler is religious and has a reverence for the Gods, they are less afraid of suffering injustice at his hands, and they are less disposed to conspire against him, because they believe him to have the very Gods fighting on his side. At the same time his religion must not be thought foolish. And he should honor men of merit, and make them think that they would not be held in more honor by the citizens if they had a free government. The honor he should distribute himself, but the punishment should be inflicted by officers and courts of law. It is a precaution which is taken by all monarchs not to make one person great; but if one, then two or more should be raised, that they may

look sharply after one another. If after all some one has to be made great, he should not be a man of bold spirit; for such dispositions are ever most inclined to strike. And if any one is to be deprived of his power, let it be diminished gradually, not taken from him all at once. The tyrant should abstain from all outrage; in particular from personal violence and from wanton conduct towards the young. He should be especially careful of his behavior to men who are lovers of honor; for as the lovers of money are offended when their property is touched, so are the lovers of honor and the virtuous when their honor is affected. Therefore a tyrant ought either not to commit such acts at all; or he should be thought only to employ fatherly correction, and not to trample upon others—and his acquaintance with youth should be supposed to arise from affection, and not from the insolence of power, and in general he should compensate the appearance of dishonor by the increase of honor.

以上就是暴君能够维系自己统治的两种方法之一，还有一种方法则是采用完全相反的原则。这方法的本质是对破坏王国的原因的总结比较，因为破坏王权的任何模式都只会让王权管理更趋向于专制，因此，拯救暴君就是要让暴君政体更像是王权政治。但是有一件事是暴君们必须谨慎对待的：无论子民们喜欢与否，他都必须保证自己的权力足以控制住他们，因为一旦他放弃了权力，他也就放弃了自己的专制。不过，虽然权力必须作为基础保存下来，但在其他方面，暴君却必须表现出、或者说表演出一个国王的特点来。首先，他必须假装关注公共利益，而不是把钱财浪费在制作一些让普通人一见就头脑发热的物品上，因为他们会立即想到自己的辛苦经营竟然被他人剥夺了，并被用于装点歌舞伎女、外来客和艺术家。他应该均衡自己的收入和花销（不少暴君都这样做过）。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看上去是一个公仆而不是暴君了。作为一城之主，他也不用担心自己缺钱。这样的策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比在身后留下一处钱库更有利，尤其是在他离家外出的时候，因为留守城里卫戍部队不太可能对

他的权势进行攻击。而暴君离家在外的时候，有更多的理由去担心自己的财宝是否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不是关心他的子民——因为他的身边只有一位卫兵，其他的都留在了家里。其次，他应该经常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无论是收税还是要求公共服务都是出于为国的目的。他可以设立战争基金，而且通常应该把自己定位于这笔基金的保护者和管理员，表现出这笔基金好像是属于公众的而不是属于他个人的模样。他应该表现得不那么严厉，而是要显得高贵一些，当人们看见他的时候，可以对他报以崇敬之情，而不是惶恐之心。然而，如果他无法激起别人对他的尊重，而硬要让别人尊重他显然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无论他丢掉了什么的美德，都至少应该保持着一名伟大战士的特征，他要留给别人一种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印象。他或者他的属下都不应对少男少女做任何不稳重的触犯，他家的女性在面对其他女性的时候，也应该恪守自制，因为女人的恣意妄为也曾毁掉了不少暴君。在寻欢作乐方面，他应该与我们现在的暴君相反，现在的暴君不仅从早到晚都沉溺在淫欲之中，还想让其他的男人都来观摩，以便让他们羡慕和嫉妒自己的快乐与天赐好运。在这些事情当中，暴君理应尽可能地保持谦逊，或者说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大张旗鼓地把自己的恶名传遍全世界，因为一个喝醉了、昏昏欲睡的暴君很快就会受人蔑视并遭到攻击。为了避免这种状况，他理应温和谦恭，头脑清醒。他的行为理应与此前我们所说过的那些暴君的行径截然相反才对。他需要修整并改善他的城邦，让自己更像是国家的守卫者而不是一位暴君。而且，他还应该展示出对于神的事务特别用心，因为人们会认为一位统治者应该有所信仰，而且应该对神灵抱有敬畏之心，这样一来，他们就不用担心会在他的手里遭受不公，他们也就不太容易受人蛊惑来对抗他，因为他们相信他的身边自有神灵相助。与此同时，他也不会因为有所信仰而被人看作愚不可及。另外，他还应该敬重他人的功绩，让他们相信即便他们身在较为自由的政权体系下，也不可能得到比此处公民所给予的荣誉更多了。他可以为自己分配一些荣誉，但惩罚这一块则必须交由行政官和法庭来处理。所有的君主都受过的教训就是一定不要让某一个人过于伟大，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个人得到了晋升，那么他们就会彼此针锋相对。如果终究还是需要树立起一个伟大的个人形象，那么这个人绝不应该是厚颜无耻之辈，

因为这样的性情是最难克服的。如果要剥夺某个人的权力，也应该逐步地予以削弱，而不是瞬间夺走。暴君应该高度自制以避免引发众怒，尤其要慎用人身攻击，更不可对年轻人任性侮辱，因为爱财之人会因自己的财产受到触动而认为自己受到了侵犯，同理，爱惜名声和美德的人也会因为名誉受到玷污而认为自己受到了迫害。所以，暴君绝不可犯此类的错误。他理应被人看作只会像父亲那样为孩子纠错，而不是肆意蔑视他人——他和年轻人的结识也应该被看作出于情投意合，而不是出于以权压人。通常情况下，他就可以利用不断提升的声誉来弥补表面上的荣誉受损。

Of those who attempt assassination they are the most dangerous, and require to be most carefully watched, who do not care to survive, if they effect their purpose. Therefore special precaution should be taken about any who think that either they or those for whom they care have been insulted; for when men are led away by passion to assault others they are regardless of themselves. As Heracleitus says, “It is difficult to fight against anger; for a man will buy revenge with his soul.”

在那些企图实施攻击的人当中，即便其目的受到影响也不介意生死的人才是最危险的，他们必须得到最严密的监管。因此，必须特别警惕哪些人会比较介意自己或自己关爱之人会不会受到他人的侮辱，因为当人们受到盛怒的刺激而冒犯别人的时候，他们是不会顾及自己的。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你很难打败愤怒，因为人都会为自己的灵魂复仇。”

And whereas states consist of two classes, of poor men and of rich, the tyrant should lead both to imagine that they are preserved and prevented from harming one another by his rule, and

whichever of the two is stronger he should attach to his government; for, having this advantage, he has no need either to emancipate slaves or to disarm the citizens; either party added to the force which he already has, will make him stronger than his assailants.

然而，国家都是由两个阶层组成的，穷人和富人。暴君应该诱使双方都相信自己得到了保护，从而避免借助于他的统治而互相伤害。而且，无论哪一方过于强大，他都应该紧紧地把握住政权，因为这是一种优势。他没必要释放奴隶，也不需要解除市民的武装，因为任何一方加入他原有的军事力量，他就会比自己的对手更加强大。

But enough of these details; what should be the general policy of the tyrant is obvious. He ought to show himself to his subjects in the light, not of a tyrant, but of a steward and a king. He should not appropriate what is theirs, but should be their guardian; he should be moderate, not extravagant in his way of life; he should win the notables by companionship, and the multitude by flattery. For then his rule will of necessity be nobler and happier, because he will rule over better men whose spirits are not crushed, over men to whom he himself is not an object of hatred, and of whom he is not afraid. His power too will be more lasting. His disposition will be virtuous, or at least half virtuous; and he will not be wicked, but half wicked only.

细节说了这么多，暴君所需具备的基本素质也已经显而易见。他应该把自己明明白白地展示在治下子民的面前，不是以暴君的身份，而是以公仆和国王的身份。他不应占有公众的财产，而应成为他们的保护者。他应该谦逊，他的生活方式也不应过分奢华。他应该通过结

交友谊而赢得名门望族的拥戴，通过多说好话而赢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然后，他的统治就必然会更加高贵和快乐，因为他将要统治的是一些精神上未遭碾压的人，是一些未将他当作仇恨对象的人，是一些他根本不用担心和害怕的人。他的权力也将更持久。他的性情也将更加完美，至少比原来更完美。他不会变得邪恶，最多也就是有那么一点点邪恶。

Part 12

第十二章

Yet no forms of government are so short-lived as oligarchy and tyranny. The tyranny which lasted longest was that of Orthagoras and his sons at Sicyon; this continued for a hundred years. The reason was that they treated their subjects with moderation, and to a great extent observed the laws; and in various ways gained the favor of the people by the care which they took of them. Cleisthenes, in particular, was respected for his military ability. If report may be believed, he crowned the judge who decided against him in the games; and, as some say, the sitting statue in the Agora of Sicyon is the likeness of this person. (A similar story is told of Peisistratus, who is said on one occasion to have allowed himself to be summoned and tried before the Areopagus.)

然而，没有哪种类型的政体会像寡头政体和暴君政体这样短命。持续时间最长的暴君政体就是希库昂的奥达格拉斯和他的几个儿子，这段统治持续了大约一百年。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以十分谦恭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子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都在接受法律的约束，因此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受其关照的人民的拥戴。尤其是克里斯提尼，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备受推崇。如果传言可信的话，他曾真的把王位禅让给

了在比赛中击败了他的大法官，而且，还有人说，希库昂城市广场上的坐姿雕像极有可能就是他。相似的故事还说到了庇西特拉图，据说他曾经在某种场合中接受了最高法院的传唤和审判。）

Next in duration to the tyranny of Orthagoras was that of the Cypselidae at Corinth, which lasted seventy-three years and six months: Cypselus reigned thirty years, Periander forty and a half, and Psammetichus the son of Gorgus three. Their continuance was due to similar causes: Cypselus was a popular man, who during the whole time of his rule never had a bodyguard; and Periander, although he was a tyrant, was a great soldier. Third in duration was the rule of the Peisistratidae at Athens, but it was interrupted; for Peisistratus was twice driven out, so that during three and thirty years he reigned only seventeen; and his sons reigned eighteen-altogether thirty-five years. Of other tyrannies, that of Hiero and Gelo at Syracuse was the most lasting. Even this, however, was short, not more than eighteen years in all; for Gelo continued tyrant for seven years, and died in the eighth; Hiero reigned for ten years, and Thrasybulus was driven out in the eleventh month. In fact, tyrannies generally have been of quite short duration.

排在奥达格拉斯暴君统治时长之后的，就是科林斯的库鲁赛普斯一族，这次统治持续了73年零6个月。库鲁赛普斯在位30年，佩里安德则统治了40年零6个月，戈尔哥斯的儿子普萨美提克又统治了3年。他们的统治之所以能够得以延续也是出自同样的原因：库鲁赛普斯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人，他在自己的统治期内从来没有使用过保镖，而佩里安德，虽然是位暴君，但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战士。排在统治时长第三位的是雅典的庇雪斯特拉托家族，但是这段统期曾经中断过，因为庇雪斯特拉托曾经两次被放逐，因此在三段统治期内他总共掌权17年，而他的儿子则掌权18年，总共是35年。在其他的暴君当中，

锡拉库扎的希尔罗和盖洛的统治时间是最长的。但即便如此，其持续时间也很短，未能超过18年。因为盖洛的暴君统治仅仅持续了7年，他在第8年上死掉了，希尔罗继位之后，统治了10年，特扰叙布洛斯上位仅仅11个月就遭驱逐。事实上，暴君政体通常都是非常短命的。

I have now gone through almost all the causes by which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s and monarchies are either destroyed or preserved.

现在，我已经讨论过了立宪政体和君主政体之所以被破坏、以及如何才能得以保存的几乎所有因素了。

In the *Republic* of Plato, Socrates treats of revolutions, but not well, for he mentions no cause of change which peculiarly affects the first, or perfect state. He only says that the cause is that nothing is abiding, but all things change in a certain cycle; and that the origin of the change consists in those numbers “of which 4 and 3, married with 5, furnish two harmonies” (he means when the number of this figure becomes solid); he conceives that nature at certain times produces bad men who will not submit to education; in which latter particular he may very likely be not far wrong, for there may well be some men who cannot be educated and made virtuous. But why is such a cause of change peculiar to his ideal state, and not rather common to all states, nay, to everything which comes into being at all? And is it by the agency of time, which, as he declares, makes all things change, that things which did not begin together, change together? For example, if something has come into being the day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the cycle, will it change with things that came into being before? Further, why

should the perfect state change into the Spartan? For governments more often take an opposite form than one akin to them. The same remark is applicable to the other changes; he says that the Spartan constitution changes into an oligarchy, and this into a democracy, and this again into a tyranny. And yet the contrary happens quite as often; for a democracy is even more likely to change into an oligarchy than into a monarchy. Further, he never says whether tyranny is, or is not, liable to revolutions, and if it is, what is the cause of them, or into what form it changes. And the reason is, that he could not very well have told: for there is no rule; according to him it should revert to the first and best, and then there would be a complete cycle. But in point of fact a tyranny often changes into a tyranny, as that at Sicyon changed from the tyranny of Myron into that of Cleisthenes; into oligarchy, as the tyranny of Antileon did at Chalcis; into democracy, as that of Gelo's family did at Syracuse; into aristocracy, as at Carthage, and the tyranny of Charilaus at Lacedaemon. Often an oligarchy changes into a tyranny, like most of the ancient oligarchies in Sicily; for example, the oligarchy at Leontini changed into the tyranny of Panaetius; that at Gela into the tyranny of Cleander; that at Rhegium into the tyranny of Anaxilaus; the same thing has happened in many other states. And it is absurd to suppose that the state changes into oligarchy merely because the ruling class are lovers and makers of money, and not because the very rich think it unfair that the very poor should have an equal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with themselves. Moreover, in many oligarchies there are laws against making money in trade. But at Carthage, which is a democracy. there is no such prohibition; and yet to this day the Carthaginians have never had a revolution. It is absurd too for him to say that an oligarchy is two cities, one of the rich, and the other of the poor. Is not this just as much the case in the Spartan constitution, or in any other in which either all do not possess equal property, or all are not equally good men? Nobody

need be any poorer than he was before, and yet the oligarchy may change an the same into a democracy, if the poor form the majority; and a democracy may change into an oligarchy, if the wealthy class are stronger than the people, and the one are energetic, the other indifferent. Once more, although the causes of the change are very numerous, he mentions only one, which is, that the citizens become poor through dissipation and debt, as though he thought that all, or the majority of them, were originally rich. This is not true: though it is true that when any of the leaders lose their property they are ripe for revolution; but, when anybody else, it is no great matter, and an oligarchy does not even then more often pass into a democracy than into any other form of government. Again, if men are deprived of the honors of state, and are wronged, and insulted, they make revolutions, and change forms of government, even although they have not wasted their substance because they might do what they liked—of which extravagance he declares excessive freedom to be the cause.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谈到了变革，但是尚不充分，因为他并未提及对最初的、或者说理想之国产生特殊影响的那些变革是如何产生的。他只是谈到万物虽皆不久长，但凡事皆有变化轮回。而变化之起源存在于数理之中："4与3分，婚配于5，而成2个和谐律数"（他想说的是数字具有稳定不变的特点。）他认为，在某些时候，造物主会生产出一些坏人，他们不会接受教化；在这一点上——我们随后会做详细的阐述——他可能算不上说错，因为真的有一些人不受教化，但是却养成了美德。但是，为什么这种原因仅仅存在他的理想国之中，而不是通用于全部的国家？不仅如此，所有的原因都是怎样形成的呢？难道是——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时间造就了万事万物的变化，那些并非同一时间开始的事物也会在同一时间发生变化吗？例如，如果有些事情的形成时间是在一个循环即将完成的前一天，那么它也会跟此前早已形成的事物一起发生改变吗？进一步

说，理想国为什么会变成斯巴达？因为政府经常会采用与自己相反的政体而不是相似的政体吗？对于其他的变化，我们也要提出同样的问题。苏格拉底说，斯巴达宪政变成了寡头政体，寡头政体变成了平民政体，平民政体又变成了暴君政体。但是相反的情况却发生的更频繁一些，因为平民政体更有可能变为寡头政体而不是君主政体。而且，苏格拉底从未明确地说过暴君政体是否有变革的倾向，那么，如果真的有，其原因又是什么呢？它又会变成哪种政体？对于其原因，他阐述得并不清楚，只是说：无从裁定。根据他的观点，暴君政体应该会转向最理想的形式，然后才会出现一个完整的循环。但事实上，暴君政体往往会变成另一个暴君政体，就像在希库昂，弥罗的暴君政体变成了克里斯提尼的暴君政体；在转变为寡头政体反面，卡尔基斯的安蒂利昂暴君政体就转变为了寡头独裁；在转变为君主政体方面，像迦太基，以及斯巴达的卡里拉欧斯的暴君政体就变成了君主政体。寡头政体也经常会变为暴君政体，就像古时候希斯里的绝大多数的寡头政体那样。例如，在莱翁蒂尼，寡头政就变成了巴乃丢的暴君政体；在杰拉河，寡头政体就变成了克林德的暴君政体；在利基翁，寡头政体则变成了阿那克西劳的暴君政体，同样的事情在很多国家都有发生。苏格拉底的另一种想法其实是很荒谬的，比如他认为政体之所以会转变成寡头政体，仅仅是因为统治阶级是爱财、造钱之人，而没有考虑到那是因为富人阶层认为穷人阶层和自己平起平坐地参与政权份额是不公平的。而且，在很多寡头政体中，反对通过贸易谋财的法律还是存在的。但是在施行民主政治的迦太基，却并没有这样的限制，而且，直到今天，迦太基也从未发生过变革。苏格拉底认为寡头政体其实是把一个国家分裂为两个城邦，其一是富人的城邦，其二是穷人的城邦。他的这个观点也很荒谬。难道说斯巴达的立宪政体不是这样吗（贫富分离）？其他任何一种政体中都会出现大家财富不平等，德才也不平等的状况，（这难道也是寡头政体造成的吗？）没有人希望自己比之前更贫穷，但如果穷人变成了大多数，那么寡头政体就有可能转变为平民政体；如果富人阶层比人民大众更强势，那么平民政体就会变成寡头政体；二者之中，一个积极向上，另一个则薄情寡意。此外，虽然变革的原因数量繁多，但苏格拉底却只提到了一种，那就是公民因为浪费和债务而变穷，在他看来似乎所有的、至少大多数的人

最初都是富有的，但是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正确——虽然事实上的确有人会因为失去财富而成为变革的领导者。但是，很多人参与变革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而且寡头政体转变为其他任何一种政体形式的几率也并不比转为平民政体的几率更小。此外，如果有人本可以恣意作为——苏格拉底认为过度的自由是导致恣意挥霍的原因——却并未铺张浪费，并因此而被剥夺了国家荣誉，受到了误解和侮辱，那么，他们也会引发变革，进而改变国家的政体。

Finally,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forms of oligarchies and democracies, Socrates speaks of their revolutions as though there were only one form of either of them.

最后，尽管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都存在着很多种形式，但苏格拉底仍然以它们都只有一种形式为基础来看待政体的变革。

Book Six

第六卷

Part 1

第一章

We have now considered the varieties of the deliberative or supreme power in states, and the various arrangements of law-courts and state offices, and which of them are adapted to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We have also spoken of the destru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constitutions, how and from what causes they arise.

我们已经讨论了国家中的各种议事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法庭和行政组织的各种安排，以及他们所适合的政府形式。我们也研究了各种政体的倾覆和保全，以及他们产生的的方式和原因。

Of democracy and all other forms of government there are many kinds; and it will be well to assign to them severally the modes of organization which are proper and advantageous to each, adding what remains to be said about them. Moreover, we ought to consider the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these modes themselves; for such combinations make constitutions overlap one another, so that aristocracies have an oligarchical character,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s incline to democracies.

平民政体与其他形式政体都种类各异，我们应研究适应并有利于

每种政体的组织方式，并对每种做适当补充。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些政体的各种搭配方式，这些搭配使得它们互相掺杂，如贵族政体掺杂了寡头制度，或共和政体侧重了民主性。

When I speak of the combinations which remain to be considered, and thus far have not been considered by us, I mean such as these: when the deliberativ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lection of officers is constituted oligarchically, and the law-courts aristocratically, or when the courts and the deliberative part of the state are oligarchical, and the election to office aristocratical, or when in any other way there is a want of harmony in the composition of a state.

当我提到应该讨论而至今尚未讨论的各种搭配方式时，我指的是如下几种情况：议事机构和执政人员的选举是寡头制，而司法组织却是贵族制；或者司法和议事团体按寡头制，而官吏选任却是贵族制；当然也可能是其他形式的搭配，使得政体缺乏和谐。

I have shown already what forms of democracy are suited to particular cities, and what of oligarchy to particular peoples, and to whom each of the other forms of government is suited. Further, we must not only show which of these governments is the best for each state, but also briefly proceed to consider how these and other forms of government are to be established.

我们已阐明哪种平民政体适宜于哪种城市；哪种寡头政体适合于哪种民族；以及其他各种政体各所适应者。除此之外，我们不仅必须要说明哪种政体最适合于哪个国家，还应简略地揭示建立这些政体及

其他各种政体的途径。

First of all let us speak of democracy, which will also bring to light the opposite form of government commonly called oligarch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inquiry we need to ascertain all the el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emocracy, since from the combinations of these the varieties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arise. There are several of these differing from each other, and the difference is due to two causes. One (1) has been already mentioned—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 for the popular element may consist of husbandmen, or of mechanics, or of laborers, and if the first of these be added to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to the two others, not only does the democracy become better or worse, but its very nature is changed. A second cause (2) remains to be mentioned: the various proper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emocracy, when variously combined, make a difference. For one democracy will have less and another will have more, and another will have all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 is an advantage in knowing them all, whether a man wishes to establish some new form of democracy, or only to remodel an existing one. Founders of states try to bring together all the elements which accord with the ideas of the several constitutions; but this is a mistake of theirs, as I have already remarked when speaking of the destru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states. We will now set forth the principles, characteristics, and aims of such states.

让我们先讲述平民政体，阐明了平民政体后，大家对于情况与之相反的寡头政体也可有所了解。为了进行这一研究，我们必须先了解平民政体的一切因素和特征，因为正是这些因素和特征的不同组合造就了平民政体的各种形式。平民政体之所以不止一种形式，主要原因

有二。其中之一前面已经论述，即各邦各有不同的人民：可能是农民，可能是工匠，或者佣工；你如果把第一种加上第二种，或者把第三种混入前两种，这样构成的平民政体与前面各平民政体便不只是有优劣之分，而是本质相异。第二个原因在于平民政体的各种性质和特点可以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因为有的平民政体拥有的上述特点较少，有的平民政体则拥有更多一些，还有的平民政体则具有所有这些特点。无论人们是建立新的平民政体，还是改造已有的平民政体，了解这些都是有益处的。人们缔造新政体时，如果将这些因素全部纳入自己的体系，是错误的；我们在前面论述各政体的倾覆和保全时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开始研究平民政体的各种原则、特点和目的。

Part 2

第二章

The basis of a democratic state is liberty; which,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opinion of men, can only be enjoyed in such a state; this they affirm to be the great end of every democracy. One principle of liberty is for all to rule and be ruled in turn, and indeed democratic justice is the application of numerical not proportionate equality; whence it follows that the majority must be supreme, and that whatever the majority approve must be the end and the just. Every citizen, it is said, must have equality, and therefore in a democracy the poor have more power than the rich, because there are more of them, and the will of the majority is supreme. This, then, is one note of liberty which all democrats affirm to be the principle of their state. Another is that a man should live as he likes. This, they say, is the privilege of a freeman, since, on the other hand, not to live as a man likes is the mark of a slave. This is the second characteristic of democracy, whence has arisen the claim

of men to be ruled by none, if possible, or, if this is impossible, to rule and be ruled in turns; and so it contributes to the freedom based upon equality.

平民政体的基础是自由。一般来说，只有在平民政体中，人们才可以享受自由，这是每一个平民政体的伟大目标。自由的原则之一在于人人轮流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平民性质的正义不主张比例上的平等而要求数量上的平等。因此政务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便是正义。据说，全体公民必须人人平等；所以，在平民政体中，穷人的权力高于富人，因为穷人占多数，而多数决定一切。这就是自由的第一个要领，所有的平民主义者一致以此作为他们的政体的宗旨。另一个要领是“人生应任情而行，各如所愿”。平民主义者说，对照奴隶们的不得按自己的意志生活，只有这样才可算是自由人的生活。这是平民政体的第二个宗旨。根据这一宗旨，若可能，人们应不受任何人的统治；若不可能，便轮番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有利于促进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

Such being our foundation and such the principle from which we star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mocracy are as follows the election of officers by all out of all; and that all should rule over each, and each in his turn over all; that the appointment to all offices, or to all but those which require experience and skill, should be made by lot; that no property qualification should be required for offices, or only a very low one; that a man should not hold the same office twice, or not often, or in the case of few except military offices: that the tenure of all offices, or of as many as possible, should be brief, that all men should sit in judgment, or that judges selected out of all should judge, in all matters, or in most and in the greatest and most important—such as the scrutiny of accounts, the constitution, and private contracts; that the assembly should be supreme over all

causes, or at any rate over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magistrates over none or only over a very few. Of all magistracies, a council is the most democratic when there is not the means of paying all the citizens, but when they are paid even this is robbed of its power; for the people then draw all cases to themselves, as I said in the previous discussion. The next characteristic of democracy is payment for services; assembly, law courts, magistrates, everybody receives pay, when it is to be had; or when it is not to be had for all, then it is given to the law-courts and to the stated assemblies, to the council and to the magistrates, or at least to any of them who are compelled to have their meals together. And whereas oligarchy is characterized by birth, wealth, and education, the notes of democracy appear to be the opposite of these—low birth, poverty, mean employment. Another note is that no magistracy is perpetual, but if any such have survived some ancient change in the constitution it should be stripped of its power, and the holders should be elected by lot and no longer by vote. These are the points common to all democracies; but democracy and demos in their truest form are based upon the recognized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justice, that all should count equally; for equality implies that the poor should have no more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than the rich, and should not be the only rulers, but that all should rule equally according to their numbers. And in this way men think that they will secure equality and freedom in their state.

这些便是我们的基础和出发的准则，由此可以得出平民政体的各种特征：由全体公民从全体公民中选举官吏；所有人都有机会统治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亦有机会统治所有人；所有职位的任命，至少说那些不需经验和专长职位的职位，由抽签决定；对任官资格完全没有或只有很少的财产要求的职位；除了军职及偶而的例外，所有职司都不得连任；所有职司——或者说尽可能多的职司——的任期应该短

暂；所有人都应有权参与审判，或者说由从众人中选出来的法官审判所有案件——至少大多数的案件，比如审查财务报告、法制情况以及私人契约；公民大会在所有事务上享有最高治权，至少在军国大事上是这样，而执政人员完全没有治权，或者说只有极少的治权。在各个行政机构中，如果没办法支付津贴给所有公民让他们出席全体大会的，则议事会就是平民特征最为显著的机构，因为这样公民们就会去包揽一切政务到自己的掌握之中了，如我们前篇提到的那样。平民政体的另一特征是支付所有的服务；公民大会、法庭、行政机构里的每个人都可获得津贴；如果这都不行，则出席法庭、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公民在开会期间应获得津贴，执政机构也一样，至少那些按规定参会期间要一起就餐的执政人员是如此。寡头政体的显著特征在于强调出身、财富和教育，平民政体也强调，只不过方向刚好相反。平民政体的另一特征为无终身任期，如果某些职位在变革后还保留着终身任期，就必须褫夺其权力，而且不能由选举来产生，必须抽签决定。这些便是平民政体的常见特征，但是在形式上最正统的平民政体应是基于民主正义的原则的，即所有公民都同等重要；因为平等意味着穷人并不比富人更有政治权力，也不应该是惟一的统治者；相反，所有阶层都应依据其数量进行平等的共治。人们认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他们的城邦努力保障平等和自由。

Part 3

第三章

Next comes the question, how is this equality to be obtained? Are we to assign to a thousand poor men the property qualifications of five hundred rich men? and shall we give the thousand a power equal to that of the five hundred? or, if this is not to be the mode, ought we, still retaining the same ratio, to take equal numbers from each and give them the control of the elections and of the courts?—Which, according to the democratical notion, is the juster form of

the constitution—this or one based on numbers only? Democrats say that justice is that to which the majority agree, oligarchs that to which the wealthier class; in their opinion the decision should be given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property. In both principles there is some inequality and injustice. For if justice is the will of the few, any one person who has more wealth than all the rest of the rich put together, ought, upon the oligarchical principle, to have the sole power—but this would be tyranny; or if justice is the will of the majority, as I was before saying, they will unjustly confiscate the property of the wealthy minority. To find a principle of equality which they both agree we must inquire into their respective ideas of justice.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能获取这种平等？我们是应该向五百个富人与一千个穷人提出同样的财产要求并让他们享有相等的政治权力吗？还是应该用其他计算制度？比如保持同样的比例，由那五百人和一千人各自选出当量的代表，来管理选举和组织法庭？究竟哪一种——依据数量还是依据比例——更符合平民政体的正义观呢？平民主义者认为正义取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寡头主义者则认为，正义取决于大多数财产所有者的意志，应由这些人来主持政务。两种观点里都有不平等、不正义的地方。如果以少数人的意志为正义，那么如果某人的财富超过其他所有富人财产的总和，他就应该单独执政，但这会导致僭政；如果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正义，他们就会不义地没收少数富人的财产。为了找到双方都能认同的平等原则，我们现在应考察它们各自的正义观。

Now they agree in saying that whatever is decided by the majority of the citizens is to be deemed law. Granted: but not without some reserve; since there are two classes out of which a state is composed—the poor and the rich—that is to be deemed law,

on which both or the greater part of both agree; and if they disagree, that which is approved by the greater number, and by those who have the higher qualification. For example, suppose that there are ten rich and twenty poor, and some measure is approved by six of the rich and is disapproved by fifteen of the poor, and the remaining four of the rich join with the party of the poor, and the remaining five of the poor with that of the rich; in such a case the will of those whose qualifications, when both sides are added up, are the greatest, should prevail. If they turn out to be equal, there is no greater difficulty than at present, when, if the assembly or the courts are divided, recourse is had to the lot, or to some similar expedient. But, although it may be difficult in theory to know what is just and equal, the practical difficulty of inducing those to forbear who can, if they like, encroach, is far greater, for the weaker are always asking for equality and justice, but the stronger care for none of these things.

两方都主张最高权力应寄托于公民团体中的多数部分。我们接受这个原则，但不能不有所保留。城邦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富人和穷人，因此法律必须是双方或双方的大多数都同意的。如果双方有分歧，那么法律就应该是由既有最多数量又有最多财产的群体来决定。我们当然可以把最高权力归属于两部分的共同意志，或两者的大多数人的意志，但是这两方对某一政事也许意见相异，都想作出相反的裁决，那么，我们就把最高权力归属于既是人数多又兼财产多的这种多数的意志。比如说，如果有十个富人，二十个穷人，现在有一项决议被六名富人赞同，十五名穷人反对，而剩下的四名富人和五名穷人则加入了对方的阵营。在这种情况下，加起来财产总额更大的一方应具有最终决定权。如果双方的财产总额恰好相等，这也不难办，可以由抽签或者其他类似的方法来解决，就像在公民大会和公众法庭里一样。关于平等和正义这些问题，要在理论上弄明白谁是正确的，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然而比之更加困难的是劝那些本可以轻易违反正义

而不受惩罚的人遵守正义，因为弱者总是渴求平等和正义，而强者则对此无动于衷。

Part 4

第四章

Of the four kinds of democracy, as was said in the in the previous discussion, the best is that which comes first in order; it is also the oldest of them all. I am speaking of them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classification of their inhabitants. For the best material of democracy is an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forming a democracy where the mass of the people live by agriculture or tending of cattle. Being poor, they have no leisure, and therefore do not often attend the assembly, and not having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they are always at work, and do not covet the property of others. Indeed, they find their employment pleasanter than the cares of government or office where no great gains can be made out of them, for the many are more desirous of gain than of honor. A proof is that even the ancient tyrannies were patiently endured by them, as they still endure oligarchies, if they are allowed to work and are not deprived of their property; for some of them grow quickly rich and the others are well enough off. Moreover, they have the power of electing the magistrates and calling them to account; their ambition, if they have any, is thus satisfied; and in some democracies, although they do not all share in the appointment of offices, except through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in turn out of the whole people, as at Mantinea; yet, if they have the power of deliberating, the many are contented. Even this form of government may be regarded as a democracy, and was such at Mantinea. Hence it is both expedient and customary in the

aforementioned type of democracy that all should elect to offices, and conduct scrutinies, and sit in the law-courts, but that the great offices should be filled up by election and from persons having a qualification; the greater requiring a greater qualification, or, if there be no offices for which a qualification is required, then those who are marked out by special ability should be appointed. Under such a form of government the citizens are sure to be governed well (for the offices will always be held by the best persons; the people are willing enough to elect them and are not jealous of the good). The good and the notables will then be satisfied, for they will not be governed by men who are their inferiors, and the persons elected will rule justly, because others will call them to account. Every man should be responsible to others, nor should any one be allowed to do just as he pleases; for where absolute freedom is allowed, there is nothing to restrain the evil which is inherent in every man. But the principle of responsibility secures that which is the greatest good in states; the right persons rule and are prevented from doing wrong, and the people have their due. It is evident that this is the best kind of democracy, and why? Because the people are drawn from a certain class. Some of the ancient laws of most states were, all of them, useful with a view to making the people husbandmen. They provided either that no one should possess more than a certain quantity of land, or that, if he did, the land should not be within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the town or the acropolis. Formerly in many states there was a law forbidding any one to sell his original allotment of land. There is a similar law attributed to Oxylus, which is to the effect that there should be a certain portion of every man's land on which he could not borrow money. A useful corrective to the evil of which I am speaking would be the law of the Aphytaeans, who, although they are numerous, and do not possess much land, are all of them husbandmen. For their properties are reckoned in the census; not entire, but only in such

small portions that even the poor may have more than the amount required.

在平民政体的四个种类中，按照我们前面说明的，最先叙述的第一个种类是最好的，这也是最早的一种。我是依照人民的级类来分类的。组成城邦的人民以农民为最优良的级类；若境内都是以农牧为生的人民，就不难组成一个平民政体。这类人民的财产都不多，终年忙于耕耘，就没出席公民大会的闲暇时光；一家衣食并无余裕，所以终岁辛勤；他们习于知足，不贪图他人的财物；总之，他们乐于田亩之间的作息，既然参政和服务公共事务没有实际的收获，他们便不想染指。群众都爱好实利而不重名位。对古代暴君政体的容忍，可为农民知足的明证；寡头政体倘使对于他们的农事不加扰害，对于他们的收益不去侵掠，他们也会继续容忍；让他们安于耕耘，他们不久就能自脱于穷乏，或仓廪充实，达到小康。这些群众有权选举行政人员和听取并审查这些行政人员的政绩，就会感到满足了；在有些平民政体里，群众对更小的权利也可能感到满足，比如在曼底涅亚，群众就无选举行政人员的权利——这些选举由从全体公民中轮番推定的选举团体进行——但他们仍有议事的权利，他们也会满足。这样一个政治体系仍应当认为是平民政体，在曼底涅亚所施行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平民政体。由于这些情况，在我们前面所涉及的第一种平民政体就适于采取这样的安排，让群众获得惯常应有的政治地位，一方面全体公民应一律享有选举行政人员、听取审查他们的报告，以及出席公众法庭这三项权利；另一方面，重要的职司必须由选举拔擢，而被选任者当限于具备某一资格的人们，所负责任越重，则资格应越高；或设立另一类条例，使任何职司都无需资格，而实际上却只有具备相应才能的人们才能当选。具有这样的制度的城邦该可以有修明的政治——全邦的职司往往委任给最优良的公民，大众愿意选举高尚的才德之士，也不嫉贤妒能——；而高尚人士和贵族阶级在这个体系中，既然经常担任公职，也就不致于被他人或被比他们低劣的人所统治，他们也可引以自慰了；又由于民众持有审查行政工作的权利，这又保证了执政人员的一切措施必遵循法度并合乎正义。人们互相依赖而又互相牵制，谁

都不得任性行事，这在实际上对大家有利；人类若任性行事，总是难保不施展他内在的恶。责任制确保了城邦最大的利益；把政务托付给有才德的人，然而群众都赋有应具的权力。显然，平民政体以这一种类为最优良；理由就在于组成这种政体的人民属于某一群体。古代盛行的某些法规都力图使人民从事耕作安于农业——比如，绝对禁止人家占有逾量的土地，至少在城区附近或离城市中心若干距离以内，份地都有限额；在好多城邦中还通常有这样的法规：禁止各家出售其原来配给的份地。还有一条出于奥克须卢所的禁令，任何人不许以其地产的某一部分作为抵押，进行借贷。类似亚菲底人的法规可以用来作为补救，这种法规也可使农民安心耕作，谨守田园；亚菲底虽然壤地狭小，人口众多，却向来全部务农。这是由于他们田产的册籍不把每家的土地作单一的整块估值；各家田产分成若干块，注明册籍；较穷的人家只要能够保持或获得最小的一块，就尽够保持或获得财产资格。

Next best to an agricultural, and in many respects similar, are a pastoral people, who live by their flocks; they are the best trained of any for war, robust in body and able to camp out. The people of whom other democracies consist are far inferior to them, for their life is inferior; there is no room for moral excellence in any of their employments, whether they be mechanics or traders or laborers. Besides, people of this class can readily come to the assembly, because they are continually moving about in the city and in the agora; whereas husbandmen are scattered over the country and do not meet, or equally feel the want of assembling together. Where the territory also happens to extend to a distance from the city,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making an excellent democracy 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are compelled to settle in the country, and even if there is a town population the assembly ought not to meet, in democracies, when the country people cannot come. We have thus explained how the first and best form of

democracy should be constituted; it is clear that the other or inferior sorts will deviate in a regular order, and the population which is excluded will at each stage be of a lower kind.

次于农业人口者，应以牧业人口最为优良；牧民特别适于战争，他们体格健壮，适宜旷野露营。构成其他种类平民政体的人民都比他们卑下，因为他们的生活卑下；工匠、商贩和佣工所从事的工作毫无道德修养可言。这些市廛群众非常容易聚集，他们徘徊于市区与商场之间；而农民散处村落，鸡犬相闻，互相很少往来，也不亟于社会政治的集合。若是城邦的乡郊离市区辽远，也有利于建成一种优良的平民政体或共和政体，因为大部分人口必须定居于郊野的农田间，市内即使还住有一部分民众，凡是郊区居民未能入市出席时，就不能召开公民大会。现在我们已经说明了第一种最优良的平民政体应该怎样建立；很明显，其他劣等的种类应逐级地偏离，依次包揽了比较卑下的阶级。

The last form of democracy, that in which all share alike, is one which cannot be borne by all states, and will not last long unless well regulated by laws and customs. The more general causes which tend to destroy this or other kinds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pretty fully considered. In order to constitute such a democracy and strengthen the people, the leaders have been in the habit including as many as they can, and making citizens not only of those who are legitimate, but even of the illegitimate, and of those who have only one parent a citizen, whether father or mother; for nothing of this sort comes amiss to such a democracy. This is the way in which demagogues proceed. Whereas the right thing would be to make no more additions when the number of the commonalty exceeds that of the notables and of the middle class—beyond this not to go. When in excess of this point, the constitution becomes disorderly, and the

notables grow excited and impatient of the democracy, as in the insurrection at Cyrene; for no notice is taken of a little evil, but when it increases it strikes the eye. Measures like those which Cleisthenes passed when he wanted to increase the power of the democracy at Athens, or such as were taken by the founders of popular government at Cyrene, are useful in the extreme form of democracy. Fresh tribes and brotherhood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private rites of families should be restricted and converted into public ones; in short, every contrivance should be adopted which will mingle the citizens with one another and get rid of old connections. Again, the measures which are taken by tyrants appear all of them to be democratic; such, for instance, as the license permitted to slaves (which may be to a certain extent advantageous) and also that of women and children, and the aflowing everybody to live as he likes. Such a government will have many supporters, for most persons would rather live in a disorderly than in a sober manner.

把各类人民一律吸收在内的最劣的一个种类，若是没有适当的法度和习俗为之维系，就不会持久。这种政体及其他各种政体所以毁灭的原因，业已大体讲过。民主派的领袖们在建立这种政体时，总是力图尽可能地增多人数，以加强平民势力；公民资格不仅授予合法子嗣，对双亲只有父系或母系一方为公民的非合法子嗣，也一并让他们入籍；在这种平民政体内，这些人物恰好供应了“平民”的数量。这是“平民英雄”们常用的策略。正当的办法不应该如此无限制地增加数量；放宽公民的名籍不应使平民人数超过贵族与中等阶级的联合势力，超过是绝不相宜的。一旦超过，就会打破政体的平衡，贵族阶级将因此不安于心而抱憾于这种平民统治，就像在息勒尼一样；人们每每忽视小患，但这样往往酿成大错。雅典克勒斯叙尼所用以促进平民势力的各种措施，以及息勒尼平民统治创业先辈所采取的各项政策，对这种极端的平民政体是有益的。新兴的部族和宗社应当建立；各族

特殊的教仪要在公开的场院奉行；总之，应该施行各种方法使全体公民解除狭隘的关系和传统的信仰，尽可能地互相混合。此外，暴君们所用的一些策略似乎都适应于平民政体，比如对奴隶们的放纵，对妇女和儿童的放纵——这种放纵，如果不超越某一阶段，合于权宜——又例如默许大家任情行事。很多人会拥护该政体，因为群众大多数喜欢无纪律的而不是有节制的生活。

Part 5

第五章

The mere establishment of a democracy is not the only or principal business of the legislator, or of those who wish to create such a state, for any state, however badly constituted, may last one, two, or three days; a far greater difficulty is the preservation of it. The legislator should therefore endeavor to have a firm found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already laid down concerning the preserv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states; he should guard against the destructive elements, and should make laws, whether written or unwritten, which will contain all the preservatives of states. He must not think the truly democratical or oligarchical measure to be that which will give the greatest amount of democracy or oligarchy, but that which will make them last longest. The demagogues of our own day often get property confiscated in the law-courts in order to please the people. But those who have the welfare of the state at heart should counteract them, and make a law that the property of the condemned should not be public and go into the treasury but be sacred. Thus offenders will be as much afraid, for they will be punished all the same, and the people, having nothing to gain, will not be so ready to condemn the accused. Care should also be taken that state trials are as few as possible, and heavy penalties should

be inflicted on those who bring groundless accusations; for it is the practice to indict, not members of the popular party, but the notables, although the citizens ought to be all attached to the constitution as well, or at any rate should not regard their rulers as enemies.

立法者或有志于创制这种形式的政体的人会知道自己的职责不仅仅在于创建，怎样维持所创立的政体，才是更困难的。一个城邦，在无论多坏的政体之下，总可以存在两三天。所以，立法家应注意各政体所以保全和倾覆的种种原因；他们应该尽心创制一个足以持久的基础，并对于一切破坏因素及早为之预防；他们必须订定习惯法或成文法，其中包含为之保全的方法。无论其从事创制的是平民政体还是寡头政体，立法家们都必须相信真正的平民政体措施或寡头政体措施不是政体达到最大的平民化或寡头化的，而是能维护政体于久远的。当代的平民英雄们热衷于取媚于平民群众，往往凭借公众法庭没收私财以济公用。但是真心实意爱护其政体的人们应该纠正这种恶习。他们应该订立一条成例，凡经法庭判决的罚款或被没收的财物应完全交给神庙，不得转为公共财产或缴入府库。这样一来，处罚照旧，犯罪的人同样保持警戒，而平民群众既然无可作为利己的私图，就不会亟于固入人罪了。政治告发应力求减少；对诬告者应处以巨大的罚金，因为人们经常轻率地检举贵要阶级，而平民党人就不会被告发——尽管所有公民应效忠政府，而不是将政府官员视为敌人。

Now, since in the last and worst form of democracy the citizens are very numerous, and can hardly be made to assemble unless they are paid, and to pay them when there are no revenues presses hardly upon the notables (for the money must be obtained by a property tax and confiscations and corrupt practices of the courts, things which have before now overthrown many democracies); where, I say, there are no revenu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hold

few assemblies, and the law-courts should consist of many persons, but sit for a few days only. This system has two advantages: first, the rich do not fear the expense, even although they are unpaid themselves when the poor are paid; and secondly, causes are better tried, for wealthy persons, although they do not like to be long absent from their own affairs, do not mind going for a few days to the law-courts. Where there are revenues the demagogues should not be allowed after their manner to distribute the surplus; the poor are always receiving and always wanting more and more, for such help is like water poured into a leaky cask. Yet the true friend of the people should see that they be not too poor, for extreme poverty lowers the character of the democracy; measures therefore should be taken which will give them lasting prosperity; and as this is equally the interest of all classes, the proceeds of the public revenues should be accumulated and distributed among its poor, if possible, in such quantities as may enable them to purchase a little farm, or, at any rate, make a beginning in trade or husbandry. And if this benevolence cannot be extended to all, money should be distributed in turn according to tribes or other divisions, and in the meantime the rich should pay the fee for the attendance of the poor at the necessary assemblies; and should in return be excused from useless public services. By administering the state in this spirit the Carthaginians retain the affections of the people; their policy is from time to time to send some of them into their dependent towns, where they grow rich. It is also worthy of a generous and sensible nobility to divide the poor amongst them, and give them the means of going to work. The example of the people of Tarentum is also well deserving of imitation, for, by sharing the use of their own property with the poor, they gain their good will. Moreover, they divide all their offices into two classes, some of them being elected by vote, the others by lot; the latter, that the people may participate in them, and the former, that the state may be better administered.

A like result may be gained by dividing the same offices, so as to have two classes of magistrates, one chosen by vote, the other by lot.

极端的、也是最坏的平民政体一般地施行于人口繁盛的城邦，这种城邦的公民，若是没有津贴，就难以出席公民大会；假如缺乏充分的库藏来支付这种津贴，则负担势必落到贵族阶级身上；所以当局便假手恶劣的法庭实行苛罚或者没收私财，并征财产税等，聚敛所需的款项；这些措施在过去已经颠覆了许多平民政体；所以，如果城邦的库藏并不充裕，公民大会就不宜时常召集，公众法庭的陪审人数应该较多，但开庭日则尽量缩短。这样有两个好处：首先，富户不必再顾虑出席津贴的巨大支出，即使穷人可领津贴而他们没有；其次，富人们本来不可长久旷废自己的家业，现在法庭开审既然为日不多，就不难抽暇参加，这样每一案件就都可获得较好的审判。反之，若是府库充裕，足够支付津贴，不要让平民英雄们以公费取悦于群众；他们惯于把任何余款分配给群众，而群众一旦受领，跟着就会要求更多分配；用这种施济方式帮助穷人，恰如注水于漏瓶之中。可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自当注意到不使一邦的群众陷入赤贫的困境，因为贫困会导致平民政体的各种问题；因此，应该有一些措施保证人民维持某种程度的富足，这也是对所有阶层都有利的；如果可能的话，应把余款储积成大宗的款项，然后以济助贫民，理想的数额应是足够让每一个穷人购置一块耕地，或从事商贩，或开始务农。如果这样的济助不能对全邦贫民同时发放，可依部族或其他区分挨次地分批发放；富人仍应贡献其资财于城邦，以供贫民参加某些必不可缺的公民大会，同时豁免于无补实际的公益服务。迦太基政府就因施行这些政策，一直受到人民的爱护；他们经常从平民群众中抽出一些人遣送到附属城市，让他们在那里得以致富。贵族阶级中慷慨济施、胸襟开阔的人们也可以尽力分批帮助贫民谋生，让他们从事某一种行业。就济贫而言，大家可以效法塔兰顿人；那里的富室一般都让贫户利用他们自己的产业，因此他们都能得到平民的好感。塔兰顿人把所有的行政机构分成两类：一类通过选举，另一类全由抽签——这后一类机构平民就

可轮流供职，而那些出于选举的执事仍然能保证较好的统治和稳定的秩序。如果把每一行政机构的人员分成两类——一类由选举另一类由抽签任用——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

Enough has been said of the manner in which democracies ought to be constituted.

关于平民政体应该如何建置，我们已经讲得差不多了。

Part 6

第六章

From these considerations there will be no difficulty in seeing what should be the constitution of oligarchies. We have only to reason from opposites and compare each form of oligarchy with the corresponding form of democracy.

由这些说明，我们已不难推想，寡头政体应该怎样建制了。凭借两种政体的对应性，我们就可以设计同与各种平民政体相对应的寡头结构。

The first and best attempered of oligarchies is akin to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is there ought to be two standards of qualification; the one high, the other low—the lower qualifying for the humbler yet indispensable offices and the higher for the superior ones. He who acquires the prescribed qualification should

have the rights of citizenship. The number of those admitted should be such as will make the entire governing body stronger than those who are excluded, and the new citizen should be always taken out of the better class of the people. The principle, narrowed a little, gives another form of oligarchy; until at length we reach the most cliquish and tyrannical of them all, answering to the extreme democracy, which, being the worst, requires vigilance in proportion to its badness. For as healthy bodies and ships well provided with sailors may undergo many mishaps and survive them, whereas sickly constitutions and rotten ill-manned ships are ruined by the very least mistake, so do the worst forms of government require the greatest care. The populousness of democracies generally preserves them (for e state need not be much increased,since there is no necessity tha number is to democracy in the place of justice based on proportion); whereas the preservation of an oligarchy clearly depends on an opposite principle, viz., good order.

第一种，各部分势力适当平衡的最好的寡头政体，是密切地接近于所谓“共和政体”的。这一类的寡头政体，应具备一高一低两种标准：资产册籍于低级册籍中的公民可充任低级然而却必不可少的职司；较重要的官员则限于由高级册籍中的公民选任。此外，所有人只要有某一定额的财产，就可入籍成为公民。这样大多数群众参加到政府方面，其势力就可超过没有政治权利的人们；凡是册籍上添入新公民时须注意到他们应该是群众中较好的部分。这一原则若稍微收紧，便得到寡头政体的次一种类；这样依次类推，直到最后所得的相应于极端平民政体的一种寡头政体，这一寡头政体业已经成为狭隘的门阀统治，近于暴君政体了；这是最恶劣的一个种类，随时都有颠覆的危险，因而需要保持高度的警备状态。健壮的体格可经历风霜；坚固合式、有良好的舵师和水手为之驾驶的船舰，即使遇到惊涛骇浪也不至于沉没；然而一个病弱的人或者一艘构造不良而又驾驶失当的船便受不了轻微的风浪；就政体而言也是如此，最恶劣的政体统治起来就最

需要最大的谨慎。平民政体以数量为本——与凭功能分配权利的体系恰好相反，平民政体所赖以保全的因素通常就在于人口众多。寡头政体显然要从与之相反的因素上寻求其维持的方法，即良好的秩序。

Part 7

第七章

As there are four chief divisions of the common people—husbandmen, mechanics, retail traders, laborers; so also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military forces—the cavalry, the heavy infantry, the light armed troops, the navy. When the country is adapted for cavalry, then a strong oligarchy is likely to be established.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inhabitants depends upon a force of this sort, and only rich men can afford to keep horses. The second form of oligarchy prevails when the country is adapted to heavy infantry; for this service is better suited to the rich than to the poor. But the light-armed and the naval element are wholly democratic; and nowadays, where they are numerous, if the two parties quarrel, the oligarchy are often worsted by them in the struggle. A remedy for this state of things may be found in the practice of generals who combine a proper contingent of light-armed troops with cavalry and heavy-armed. And this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poor get the better of the rich in civil contests; being lightly armed, they fight with advantage against cavalry and heavy being lightly armed, they fight with advantage against cavalry and heavy infantry. An oligarchy which raises such a force out of the lower classes raises a power against itself. And therefore, since the ages of the citizens vary and some are older and some younger, the fathers should have their own sons, while they are still young, taught the agile movements of light-armed troops; and these, when they have been taken out of

the ranks of the youth, should become light-armed warriors in reality. The oligarchy should also yield a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to the people, either, as I said before, to those who have a property qualification, or, as in the case of Thebes, to those who have abstained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years from mean employments, or, as at Massalia, to men of merit who are selected for their worthiness, whether previously citizens or not. The magistracies of the highest rank, which ought to be in the hands of the governing body, should have expensive duties attached to them, and then the people will not desire them and will take no offense at the privileges of their rulers when they see that they pay a heavy fine for their dignity. It is fitting also that the magistrates on entering office should offer magnificent sacrifices or erect some public edifice, and then the people who participate in the entertainments, and see the city decorated with votive offerings and buildings, will not desire an alteration i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notables will have memorials of their munificence. This, however, is anything but the fashion of our modern oligarchs, who are as covetous of gain as they are of honor; oligarchies like theirs may be well described as petty democracies. Enough of the manner in which democracies and oligarchies should be organized.

正如人民分成了四个主要部分——农民、工匠、商贩和佣工，战斗队伍也分为四种——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和海军。凡境内地形适宜于骑兵战斗的城邦，往往建成强大的寡头政体，因为住在这种地区的居民需要骑兵为之守御，而只有的富户才有资产养育马匹以供骑乘。境内地形适宜于重装步兵队的城邦，组成次一种类的寡头政体也是合乎自然的；披甲持盾的士兵一般来源于小康之家而非贫民。轻装部队和海军实际是平民性质的武力；在现代各邦，轻装部队和海军若是人数特别多，如有内讧，他们常能挫败寡头势力。补救的办法可依从某些将军所取的组编办法，他们在骑兵和重装部队中配置相当数

目的轻装部队。发生内战时，轻装兵利于运动，往往能依靠其灵活击破骑队和重装兵。寡头城邦如果完全用平民编成轻装部队，就无异为自己培育掘墓人。兵役年龄要分成高低两等，在低役龄期间，富室子弟应当练习轻武器和轻装活动。这样，当他们到达高役龄期间，实际上就熟悉了轻装战斗。寡头政体也应让平民群众在政府中获得一定席位，要么是具有某一定额的财产的人；要么像底比斯所施行的那样，凡本来属于贱业，不操手艺若干年后，就可获得参预公务的权利；或者像马撒里亚所施行的那样，无论人们之前是否是公民，依其才能分别编入任用的预备名册。对必须由政要充任的最重要的职务，应使其负担某些花费较大的公益义务；这样，平民就自然不抱高官显职的奢望，因为他们看到煊赫一时的重任原来要支付如此多的代价。在这些显官就任之时，还应作丰盛的献祭或者奠立一些公共建筑；这样人民既能同享快乐，又能见到他们的城市中遍布着酬神的点缀和堂皇的建筑，自然会安心容忍寡头政体的长久统治，而这些贵族显要也把自己的慷慨化作了世代的纪念。但当今寡头们的作为却并不如此，他们正走着相反的路：既取盛名，更食厚利；这样的寡头政体只过是“渺小的平民政体”而已。关于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应如何组织的问题，这里已经讲得够多了。

Part 8

第八章

Next in order follows the right distribution of offices, their number, their nature, their duties, of which indeed we have already spoken. No state can exist not having the necessary offices, and no state can be well administered not having the offices which tend to preserve harmony and good order. In small states, as we have already remarked, there must not be many of them, but in larger there must be a larger number, and we should carefully consider which offices may properly be united and which separated.

接下来应该进而考虑的是行政诸职司的安排、数目、性质、以及义务——这个论题，在前面我们已经涉及。若是没有某些必不可缺的职司，就不成其为城邦；若是没有某些保证社会和谐、协调人民生活的机构，同样也不成其为城邦。我们先前已说明过，小邦应设置较少的职司，大邦即应该较多；我们也应考虑到哪些职司可以合并，哪些应该分别存在。

First among necessary offices is that which has the care of the market; a magistrate should be appointed to inspect contracts and to maintain order. For in every state there must inevitably be buyers and sellers who will supply one another's wants; this is the readiest way to make a state self-sufficing and so fulfill the purpose for which men come together into one state. A second office of a similar kind undertakes the supervision and embellishment of public and private buildings, the maintaining and repairing of houses and roads, the prevention of disputes about boundaries, and other concerns of a like nature. This is commonly called the office of City Warden, and has various departments, which, in more populous towns, are shared among different persons, one, for example, taking charge of the walls, another of the fountains, a third of harbors. There is another equally necessary office, and of a similar kind, having to do with the same matters without the walls and in the country—the magistrates who hold this office are called Wardens of the country, or Inspectors of the woods. Besides these three there is a fourth office of receivers of taxes, who have under their charge the revenue which is distributed among the various departments; these are called Receivers or Treasurers. Another officer registers all private contracts, and decisions of the courts, all public indictments, and also all preliminary proceedings. This office again is sometimes subdivided, in which case one officer is

appointed over all the rest. These officers are called Recorders or Sacred Recorders, Presidents, and the like.

在必不可少的诸职司中，第一种是负责商市管理的；这需要有一职官随时检查商务契约，维持市场秩序。因为在所有城邦里，为了互相供应各人生活所需，卖买都成为不能缺少的事业；这是达到经济自给自足最便捷的方式，而自给自足正是人们集合组成一个政治体的主要目的。与之相关联的另一种必不可少的职司是监护并装饰城区公私建筑、维持并修理房屋和街道、解决民间界务纠纷以及其他类似的业务。负责这一职司的官员，通常称为“城市监护”；在人口较繁庶的城邦，这种职司可由数人分任，每人分管一部分专责，比如一人维护城墙，另一个人管理公共水源，又一人专司港务。与之相似的第三种同样必不可缺的职司，所管的地区为城外的郊区——这一职司的官员有时被称为“乡区监护”，有时又别称为“林区监护”。在这三种以外，还有第四种职司，所管的业务是收税，并按规定分配于各个部门；这些官员称为“经征司”或“司库”。第五种职司办理民间契约及法庭判决的注册事务；一切诉讼和司法预备程序都得在这里先行登记。这一职司有时也分成若干部分，但是各部门之上仍然设有一人。该职司的官员或称诚信注册司或注册主任，或其他相似的名称。

Next to these comes an office of which the duties are the most necessary and also the most difficult, viz., that to which is committed the execution of punishments, or the exaction of fines from those who are posted up according to the registers; and also the custody of prisoners. The difficulty of this office arises out of the odium which is attached to it; no one will undertake it unless great profits are to be made, and any one who does is loath to execute the law. Still the office is necessary; for judicial decisions are useless if they take no effect; and if society cannot exist without them, neither can it exist without the execution of them. It is an

office which, being so unpopular, should not be entrusted to one person, but divided among several taken from different courts. In like manner an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distribute among different persons the writing up of those who are on the register of public debtors. Some sentences should be executed by the magistrates also, and in particular penalties due to the outgoing magistrates should be exacted by the incoming ones; and as regards those due to magistrates already in office, when one court has given judgement, another should exact the penalty; for example, the wardens of the city should exact the fines imposed by the wardens of the agora, and others again should exact the fines imposed by them. For penalti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exacted when less odium attaches to the exaction of them; but a double odium is incurred when the judges who have passed also execute the sentence, and if they are always the executioners, they will be the enemies of all.

接下来的这一职司实为各职司中既是必不可缺又是最为艰难的一种业务；这一职司专事执行已判决并已登记于册籍中的各种刑罚，他们须替城邦追取应缴的罚金，也须为城邦监守罪犯。由于这些事情深为受罚的人们所憎恶，这就成了可厌的差使；如无重酬，没有人愿意干这样的差使；即使干的人也未必愿意像法律上所规定那样严厉地执行。但是，每一城邦总少不了这样的职司；因为司法判决如果总是得不到执行，那就毫无用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司法判决，那也同样不能没有对判决的执行。鉴于这些困难，这种职责就不能全权委托给单独一个人；各个法庭应各抽出若干人员共同担任。编写欠缴公款名单而追索的事务也要按类似的方法办理。各个行政机构也应一律帮助执行依法裁断的惩罚。此外，对前任行政人员所处的惩罚，尽可以把执行的责任留给后任；如果处罚和执行的时日都在同一行政人员的任期以内，那么各机构的处罚可以各由另一机构来执行——比如城市监护们应当执行市场监理们所定的惩罚，而城市监护们所定的惩罚则由另一些机构的人员来执行。如在执行惩罚时，能够减少所招致的憎

恨，执行起来就会顺利得多。假使同一机构的人员既决定处罚，又执行这些惩罚，这个机构就会被受罚者加倍地憎恨；倘使一切惩罚都由某一组人专门执行，那这一组人就必然成为众矢之的了。

In many places, while one magistracy executes the sentence, another has the custody of the prisoners, as, for example, “the Eleven” at Athens. It is well to separate off the jailorship also, and try by some device to render the office less unpopular. For it is quite as necessary as that of the executioners; but good men do all they can to avoid it, and worthless persons cannot safely be trusted with it; for they themselves require a guard, and are not fit to guard others. There ought not therefore to be a single or permanent officer set apart for this duty; but it should be entrusted to the young, wherever they are organized into a band or guard, and different magistrates acting in turn should take charge of it.

在很多地方，执行惩罚和监守囚犯由两部分人员分担，比如雅典的“十一人”。典狱确实应分立为一项单独的业务，而且应采取一定措施使其不至于太招人怨恨。正如执行惩罚，典狱也是每一城邦必不可缺的一种职司；然而这种业务，好人既力求回避，不肯担任，而坏人又不能假托——坏人自己都需要有人监守，当然没法叫他监守别人。典狱之职不能委托给某一部分人员，要他们终身专门从事这种受人憎厌的差使；应该委任给训练和编组好的青年；此外，各机构也应抽取而合组为监狱管理的职司。

These are the indispensable officers, and should be ranked first; next in order follow others, equally necessary, but of higher rank, and requiring great experience and fidelity. Such are the officers to which are committed the guard of the city, and other military

functions. Not only in time of war but of peace their duty will be to defend the walls and gates, and to muster and marshal the citizens. In some states there are many such offices; in others there are a few only, while small states are content with one; these officers are called generals or commanders. Again, if a state has cavalry or light-armed troops or archers or a naval force, it will sometimes happen that each of these departments has separate officers, who are called admirals, or generals of cavalry or of light-armed troops. And there are subordinate officers called naval captains, and captains of light-armed troops and of horse; having others under them: all these are included in the department of war. Thus much of military command.

这六种职司必须位于前列，它们都是最不可缺少的。依次而及其他若干职司，也都是各城邦所必须具备而其级位则为更高的，也需要丰富的经验及为国效劳的忠诚。这便是城防和其他军事等职司。无论战时或平时，他们的职务都是负责守卫城门和城垣，召集一邦的公民，施以战斗教练。有些城邦，在军事方面设多种职司；另一些城邦仅有少数；至于小邦就只要一个职司就可以了；这些职司的官员通称“将军”或“统帅”。倘使邦内有骑兵队、轻装部队、弓箭手队和海军，有时就由数人分别统率；这些指挥官就分别被称为“海军统帅”、“骑兵将军”和“轻兵将军”。从属于这些将领的官员各别称为“舰长”、“骑兵大队长”与“大队长”；从属于他们之下还有其他的官员。所有这些编组构成一个军事指挥体系。军事机构的主要职司就是这些。

But since many, not to say all, of these offices handle the public money, there must of necessity be another office which examines and audits them, and has no other functions. Such officers are called by various names—Scrutineers, Auditors, Accountants, Controllers. Besides all these offices there is another which is

supreme over them, and to this is often entrusted both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ratification of measures, or at all events it presides, in a democracy, over the assembly. For there must be a body which convenes the supreme authority in the state. In some places they are called “probuli,” because they hold previous deliberations, but in a democracy more commonly “councillors.” These are the chief political offices.

既然一个城邦的许多机构，虽然不是全体机构，都须经手公款，所以该设置财务职司，这种职司不问旁的事情，只是专管各机构的收支账目，加以稽核。这一职司的官员名称各异——“审计”、“会计”、“稽核”、“财务纠察”。在上述各种职司以外，还有一个超乎于其他诸职司之上的职司。这一职司执掌着全邦所有各项政务的动议和决议；在平民政体中，这些官员实际上主持着公民大会。因为须有人为之召集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一职司的官员，在有些城邦中，因为他们“预审议案”，所以被称为议事预审官；在平民政体中则经常被称为议事官。重要的政治职司大体如此。

Another set of officers is concerned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religion priests and guardians see to the preservation and repair of the temples of the Gods and to other matters of religion. One office of this sort may be enough in small places, but in larger ones there are a great many besides the priesthood; for example, superintendents of public worship, guardians of shrines, treasurers of the sacred revenues. Nearly connected with these there are also the officers appointe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ublic sacrifices, except any which the law assigns to the priests; such sacrifices derive their dignity from the public hearth of the city. They are sometimes called archons, sometimes kings, and sometimes prytanes.

还有一个部门，专管祭司和庙祝的供养，神庙的维护和修葺，以及其他宗教业务，这些业务需要“祭司”和“庙祝”。在小邦中，设一个这样的职司就够了；但在大一点的城邦，除了祭司之外，还需设置若干职司，比如“典祀”、“神坛守护”和“祠产经纪”。和这些职司相近而另行分立的，还有一个管理全邦公祭的职司，除非法律规定这一事务由祭司负责；这种祭典的庄严性来源于它们是在城中公龛的神火前举行的。这一典礼的主祭，有时被称为执行官，有时被称为国王，有时被称为“普吕坦尼”。

These, then, are the necessary offices, which may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offices concerned with matters of religion, with war, with th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with the market, with the city, with the harbors, with the country; also with the courts of law, with the records of contracts, with execution of sentences, with custody of prisoners, with audits and scrutinies and accounts of magistrates; lastly, there are those which preside over the public deliberations of the state. There are likewise magistracies characteristic of states which are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and at the same time have a regard to good order: such as the offices of guardians of women, guardians of the law, guardians of children, and directors of gymnastics; also superintendents of gymnastic and Dionysiac contests, and of other similar spectacles. Some of these are clearly not democratic offices; for example, the guardianships of women and children—the poor, not having any slaves, must employ both their women and children as servants.

这些便是必要的诸职司，可以总结分类如下：有关神明、军务、财务收入和支出；有关市场、城区、港埠和乡郊；有关法庭、契约注册、执行惩罚、监守囚犯；有关查阅、审计、与核察各个行政机构的

账目；最后，有关政务的议事。此外，某些城邦，在繁荣的时代，还特别设置一些从事教化的职司，比如“妇女监护”、“法律监护”、“儿童监护”以及“体育训导”；还有经办体育竞赛和戏剧竞赛以及其他相似的文化活动的职司。这些职司在平民城邦里是根本不需要的，比如妇女和儿童监护——穷人们没有奴隶，就不得不让他们的妻子和子女做奴仆所任的杂事。

Once more: there are three offices according to whose directions the highest magistrates are chosen in certain states—guardians of the law, probuli, councillors—of these, the guardians of the law are an aristocratical, the probuli an oligarchical, the council a democratical institution. Enough of the different kinds of offices.

再说一次，领导选举团体选任最高执政机构官员的职司可分三种：“法律监护会”，“议事预审会”，“议事会”。第一种适于贵族政体；第二种适于寡头政体；第三种适于平民政体。我们现在对各种职司已经讲得差不多了。

Book Seven

第七卷

Part 1

第一章

He who would duly inquire about the best form of a state ought first to determine which is the most eligible life; while this remains uncertain the best form of the state must also be uncertain; for, in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those may be expected to lead the best life who are governed in the best manner of which their circumstances admit. We ought therefore to ascertain, first of all, which is the most generally eligible life, and then whether the same life is or is not best for the state and for individuals.

一个人如果要深入地研究一个城邦的完美形式，首先应该确定什么是最令人满意的生活；在还没搞清楚这一点之前，最完美的城邦形式必然也不会清晰；因为，按照万物的自然秩序，那些预期会过上最美好生活的人，都处于自身情况允许的最佳统治中。因此，我们应该确定，首先，什么是绝大多数城邦最满意的生活，然后再来考虑这种生活对于特定的城邦和人民来说是否是最好的。

Assuming that enough has been already said in discussions outside the school concerning the best life, we will now only repeat what is contained in them. Certainly no one will dispute the propriety of that partition of goods which separates them into three classes, viz., external goods, goods of the body, and goods of the

soul, or deny that the happy man must have all three. For no one would maintain that he is happy who has not in him a particle of courage or temperance or justice or prudence, who is afraid of every insect which flutters past him, and will commit any crime, however great, in order to gratify his lust of meat or drink, who will sacrifice his dearest friend for the sake of half-a-farthing, and is as feeble and false in mind as a child or a madman. These propositions are almost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as soon as they are uttered, but men differ about the degree or relative superiority of this or that good. Some think that a very moderate amount of virtue is enough, but set no limit to their desires of wealth, property, power, reputation, and the like. To whom we reply by an appeal to facts, which easily prove that mankind do not acquire or preserve virtue by the help of external goods, but external goods by the help of virtue, and that happiness, whether consisting in pleasure or virtue, or both, is more often found with those who are most highly cultivated in their mind and in their character, and have only a moderate share of external goods, than among those who possess external goods to a useless extent but are deficient in higher qualities; and this is not only matter of experience, but, if reflected upon, will easily appear to be in accordance with reason. For, whereas external goods have a limit, like any other instrument, and all things useful are of such a nature that where there is too much of them they must either do harm, or at any rate be of no use, to their possessors, every good of the soul, the greater it is, is also of greater use, if the epithet useful as well as noble is appropriate to such subjects. No proof is required to show that the best state of one thing in relation to another corresponds in degree of excellence to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natures of which we say that these very states are states: so that, if the soul is more noble than our possessions or our bodies, both absolutely and in relation to us,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 best state of either has a similar ratio to

the other. Again, it is for the sake of the soul that goods external and goods of the body are eligible at all, and all wise men ought to choose them for the sake of the soul, and not the soul for the sake of them.

假设俗世上对于什么是最美好的生活，已经进行了非常充分的讨论，我们现在只是简单地重复其中包含的一些内容。当然，没人会质疑将所有美好分为三种是否恰当，即，外物之美好，身体之美好和灵魂之美好，也没有人会否认幸福的人必须拥有全部三种美好。因为，没有人会坚持说这样的人是幸福的，他没有一丝的勇敢、克制、正义、精明，他害怕听到每一只昆虫从身边掠过的声音，他会为了满足自己对酒肉的贪欲不惜犯任何罪行哪怕是滔天大罪，他会为了蝇头小利而牺牲最要好的朋友，而且他的内心像孩子或疯子一样的不堪一击而又充满谬误。这些主张几乎在说出的一瞬间，就会获得最普遍的认同，但是人们对这三种美好各自对人的重要性和需要的多少，看法又各不相同。有人认为适量的美德就够了，但是他并没有限制人们追求财富、家产、权力、名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用事实回答他，事实轻易地证明拥有了外物之美好，并不能让人因此就获得并保持内在之美德，但是有了内在美德的帮助，人可以获得外物之美好，而且，幸福，无论存在于快乐还是美德之中，或两者都有，更常见于那些在品德和思想方面都有很高修养的人身上，而且这些人往往只拥有适量的外物之美好，然而，幸福却很少见于那些拥有过多的外物之美好，但却缺乏更高美德的人身上；而且，这不仅仅是一种经验之谈，相反，如果能对它进行认真的思考，会发现它非常有助于理性思辨。因为，外物之美好有一种限制，正如一切实用工具，而且，所有的实际应用之物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如果数量过多，它们就会对物主有害，或至少没有用处，而灵魂之美好，则是越多用处越大，假如对当前的主题使用“有用的”和“高尚的”来修饰是同样恰当的话。我们不需证明即可得知，一种事物的最好状态与另一种事物的最好状态之间的关系，完全在卓越程度上对应于两种事物的本质之间的间隔，我们认为这样的状态才是事物的真实状态；因此，无

论是绝对意义上的还是从相对于我们的意义看，灵魂都比我们的财物甚至于身体更高贵，所以必须承认，这两者在其最好状态上也存在相似的对比。同理，外物之美好和身体之美好其根本还是为了成就灵魂之美好，而且，所有明智的人都应该让它们服务于灵魂，而不是让灵魂服务于它们。

Let us acknowledge then that each one has just so much of happiness as he has of virtue and wisdom, and of virtuous and wise action. God is a witness to us of this truth, for he is happy and blessed, not by reason of any external good, but in himself and by reason of his own nature. And herein of necessity li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od fortune and happiness; for external goods come of themselves, and chance is the author of them, but no one is just or temperate by or through chance. In like manner, and by a similar train of argument, the happy state may be shown to be that which is best and which acts rightly; and rightly it cannot act without doing right actions, and neither individual nor state can do right actions without virtue and wisdom. Thus the courage, justice, and wisdom of a state have the same form and nature as the qualities which give the individual who possesses them the name of just, wise, or temperate.

那么，让我们确认这一点，即各人所拥有的幸福，应该等同于他所拥有的美德和智慧，也等于他所做的善良和明智的行为。神是我们于这一真理上的见证者，因为他是幸福和快乐的，而且不是靠外物之美好，而是靠自身和他的本性。而这一点也正是幸运和幸福之间的差异所在；因为外物之美好是由自身引起的，而机会就是始作俑者，但是没有人会因为机会而变得公正和克制。同理，而且也是通过一连串类似的观点，幸福的状态可以解释为最好的和行为正确的状态；而且如果没有正确的行为它也不会真正有作用，而一个人和一个城邦如果

没有美德和智慧都无法做出正确的行为。因此，一个城邦的勇气、正义、和智慧在形式和本质上等同于那些品质，正是那些品质使人们变得公正、明智或克制。

Thus much may suffice by way of preface: for I could not avoid touching upon these questions, neither could I go through all the arguments affecting them; these are the business of another science.

作为一个开场白，我们说这么多应该够了。因为后面必然还会涉及到这些问题，而且，我也无法在这里论述所有对它们有影响的观点；这些是另一门科学的任务了。

Let us assume then that the best life, both for individuals and states, is the life of virtue, when virtue has external goods enough for the performance of good actions. If there are any who controvert our assertion, we will in this treatise pass them over, and consider their objections hereafter.

所以，让我们假设，最美好的生活，不仅对城邦而言，也对个人而言，就是有美德的生活，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外物之美好支持美德做出美好行为。如果有人反对我们这一观点，这里我们暂且忽略，而会在后面的部分对这些反对意见进行讨论。

Part 2

第二章

There remains to be discussed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happiness of the individual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state, or different. Here again there can be no doubt—no one denies that they are the same. For those who hold that the well-being of the individual consists in his wealth, also think that riches make the happiness of the whole state, and those who value most highly the life of a tyrant deem that city the happiest which rules over the greatest number; while they who approve an individual for his virtue say that the more virtuous a city is, the happier it is. Two points here present themselves for consideration: first (1), which is the more eligible life, that of a citizen who is a member of a state, or that of an alien who has no political ties; and again (2), which is the best form of constitution or the best condition of a state, either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political privileges are desirable for all, or for a majority only? Since the good of the state and not of the individual is the proper subject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speculation, and we are engaged in a political discussion, while the first of these two points has a secondary interest for us, the latter will be the main subject of our inquiry.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个人的幸福与城邦的幸福是相同，还是相异。这里不存在任何疑问——没人否认它们是相同的。因为，那些认为幸福在于财富的人，认为财富将造就整个城邦的幸福，而那些非常赞成暴君式生活的人，会认为由一名暴君统治着绝大多数人的城邦是最幸福的；而人们如果因为一个人的美德而赞赏他，那么他们也会说一个城邦拥有的美德越多就越幸福。这里我们要考虑两个问题：（1）哪一种生活更令人们满意，是作为城邦一员的公民之生活，还是作为一名没有政治束缚的外邦人之生活？（2）哪一个是最佳的政体形式或最有利于城邦的条件，是应该让所有人对政治权利都满意，还是只让大多数人满意？既然政治思考的真正对象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城邦的利益，而且，我们正在进行政治讨论，所以，这两个问题的

第一个对我们来说就显得次要了，而后一个问题将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Now it is evident that the form of government is best in which every man, whoever he is, can act best and live happily. But even those who agree in thinking that the life of virtue is the most eligible raise a question, whether the life of business and politics is or is not more eligible than one which is wholly independent of external goods, I mean than a contemplative life, which by some is maintained to be the only one worthy of a philosopher. For these two lives—the life of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life of the statesman—appear to have been preferred by those who have been most keen in the pursuit of virtue, both in our own and in other ages. Which is the better is a question of no small moment; for the wise man, like the wise state, will necessarily regulate his life according to the best end. There are some who think that while a despotic rule over others is the greatest injustice, to exercise a constitutional rule over them, even though not unjust, is a great impediment to a man's individual well-being. Others take an opposite view; they maintain that the true life of man is the practical and political, and that every virtue admits of being practiced, quite as much by statesmen and rulers as by private individuals. Others, again, are of opinion that arbitrary and tyrannical rule alone consists with happiness; indeed, in some states the entire aim both of the laws and of the constitution is to give men despotic power over their neighbors. And, therefore, although in most cities the laws may be said generally to be in a chaotic state, still, if they aim at anything, they aim at the maintenance of power: thus in Lacedaemon and Crete the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of the laws are framed with a view to war. And in all nations which are able to gratify their ambition military power is held in esteem, for example

among the Scythians and Persians and Thracians and Celts.

显然，在最好的政体中，每一个人，无论是谁，都有最美好的行为并生活的很幸福。但是，即使那些赞成最美好的生活应该是基于美德之生活的人也有疑问，即一种是政治和实业为主的生活是否优于一种是完全脱离外物之美的生活？后者指一种冥想式的生活，有些人坚持说这是惟一配的上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两种生活——哲学家的生活和政治家的生活——似乎受到那些最热衷于追求美德的人的喜爱，无论在现世还是在其他时代都是这样。这二者哪一种更好，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原因是一个智者和一个明智的城邦一样，必然会按照最好的目标管理自己的生活。有些人认为，如果对别人的专制统治是最大的非正义，那么对他们实行政治统治，即便不属于非正义，也是对个人幸福的巨大妨碍。其他人则持相反观点；他们坚持认为真正的人类生活是实用的和政治的，而且，每一种美德都需要实践，这一点对于政治家和统治者和对于普通人都同样重要。还有一些人认为，只有独断的和暴君的统治能带来幸福；实际上，在有些城邦，法律和政体的完整目标就是让人们拥有对其邻居的专制统治。因此，虽然大多数城邦的法律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可如果他们还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维持力量：因此，在斯巴达和克里特，教育系统和大部分法律都是为了战争而打造的。任何有能力满足其野心的民族，都会崇拜军事力量，例如，塞西亚人、波斯人、色雷基人和凯尔特人。

In some nations there are even laws tending to stimulate the warlike virtues, as at Carthage, where we are told that men obtain the honor of wearing as many armlets as they have served campaigns. There was once a law in Macedonia that he who had not killed an enemy should wear a halter, and among the Scythians no one who had not slain his man was allowed to drink out of the cup which was handed round at a certain feast. Among the Iberians,

a warlike nation, the number of enemies whom a man has slain is indicated by the number of obelisks which are fixed in the earth round his tomb; and there are numerous practices among other nations of a like kind, some of them established by law and others by custom. Yet to a reflecting mind it must appear very strange that the statesman should be always considering how he can dominate and tyrannize over others, whether they will or not. How can that which is not even lawful be the business of the statesman or the legislator? Unlawful it certainly is to rule without regard to justice, for there may be might where there is no right. The other arts and sciences offer no parallel a physician is not expected to persuade or coerce his patients, nor a pilot the passengers in his ship. Yet most men appear to think that the art of despotic government is statesmanship, and what men affirm to be unjust and inexpedient in their own case they are not ashamed of practicing towards others; they demand just rule for themselves, but where other men are concerned they care nothing about it. Such behavior is irrational; unless the one party is, and the other is not, born to serve, in which case men have a right to command, not indeed all their fellows, but only those who are intended to be subjects; just as we ought not to hunt mankind, whether for food or sacrifice, but only the animals which may be hunted for food or sacrifice, this is to say, such wild animals as are eatable. And surely there may be a city happy in isolation, which we will assume to be well-governed (for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a city thus isolated might be well-administered and have good laws); but such a city would not be constituted with any view to war or the conquest of enemies—all that sort of thing must be excluded. Hence we see very plainly that warlike pursuits, although generally to be deemed honorable, are not the supreme end of all things, but only means. And the good lawgiver should inquire how states and races of men and communities may participate in a good life, and in the happiness which is attainable

by them. His enactments will not be always the same; and where there are neighbors he will have to see what sort of studies should be practiced in relation to their several characters, or how the measures appropriate in relation to each are to be adopted. The end at which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should aim may be properly made a matter of future consideration.

在有些民族中，甚至有鼓励好战品德的法律，例如，在迦太基，据说人们靠臂环的数量显示荣誉，而参加多少次战役就可以佩戴多少个臂环。马其顿曾经设置过一条法律，规定一个没杀过敌人的男子应该戴鼻环，在塞西亚人当中，没有杀过敌人的男子，就不能在某种宴庆的传杯仪式中，从传递中的酒杯里饮酒。伊比利亚人也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在那里，死者生平所杀敌人的数量，就用埋在他坟墓周围的尖石数量来标记；其他类似的民族还有许多的这样的行为，有些用法律确定下来，有些成为固定习惯。然而，在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看来，这必然显得很怪异，一个政治家时刻考虑的竟然是如何能对他人进行主宰和暴君统治，而且无视他人的意愿。这种甚至都算不上合法的事情怎么能成为一个政治家或者立法家的事业呢？不顾及正义的统治当然是不合法的，因为哪里没有权利，哪里就会有强权。其他的技艺或科学都没有这种本事，医师不可能强迫他的病人，船长也可能强迫船上的乘客。但是，很多人似乎认为专制统治的技艺是政治家的专业，而且，同样的事，用在自己身上他们确信是不公正的和不适宜的，而用在别人身上他们却没有丝毫的愧疚；关系到自己时，他们要求公平的统治，但是涉及到别人时，他们却漠不关心。这种行为是荒谬的；除非一方生来就是服务于他人的，而另一方则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有权去统治，而且不是统治所有的伙伴，而仅仅是那些生来就是被统治的人；正如，我们不应该去猎取人类以供食用或用作祭祀的动物，而应该猎取那些可以作为食物或祭祀的动物，也就是说，那些可以食用的野生动物。当然会有一些与世隔绝的地方，存在于某个幸福的城邦，假设这个城邦管理良好（因为很有可能这个孤立的城邦是管理良好的，而且有着良好的法律）；但是这样一个城邦的政体不会

以战争和征服敌国为目标——所有这类事情必须被排除在外。因此，显而易见，所有那些好战的追求，虽然被普遍认为是很光荣的事，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的最终目标，而只是其手段。所以，一个好的立法者应该考虑的是一个城邦，以及不同的种族和团体如何能参与到美好的生活中来，享受到他们可以谋求的幸福。他的法律不能一成不变；而且，对于有邻邦的地方，他应该考虑该做什么样的研究以了解邻邦的特点，或如何采取恰当的措施以适应不同的邻邦。关于一个最好的城邦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最终目标，我们以后另行论述。

Part 3

第三章

Let us now address those who, while they agree that the life of virtue is the most eligible, differ about the manner of practicing it. For some renounce political power, and think that the life of the freeman is different from the life of the statesman and the best of all; but others think the life of the statesman best. The argument of the latter is that he who does nothing cannot do well, and that virtuous activity is identical with happiness. To both we say: “you are partly right and partly wrong.” first class are right in affirming that the life of the freeman is better than the life of the despot; for there is nothing grand or noble in having the use of a slave, in so far as he is a slave; or in issuing commands about necessary things. But it is an error to suppose that every sort of rule is despotic like that of a master over slaves, for there is as great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ule over freemen and the rule over slaves as there is between slavery by nature and freedom by nature, about which I have said enough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treatise. And it is equally a mistake to place inactivity above action, for happiness is activity, and the actions of the just and wise are the realization of

much that is noble.

现在我们谈一谈这样一些人，他们一致认为有美德的生活才是最让人满意的生活，但是在这种生活的实践方式上却又各持己见。其中有些人就厌弃政治权力，认为自由人的生活不同于政治家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才是最好的；其余的人则认为政治家的生活是最好的。后者的理由是：一个什么都不做的人做什么都做不好，而且，有美德的行为就是幸福。我们要对这两种人说："你们都只对了一半，又都错了一半。"第一种人肯定自由人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好，这一点是对的；因为使用奴隶——就他是个奴隶而言，以及在日常琐事上发号施令，都没有任何高尚和伟大之处。但是认为每一种统治都是像奴隶主对奴隶那样的专制统治，这一点就错了，因为对自由人的统治与对奴隶的统治之间的差别，跟奴隶制的本质与自由的本质之间的差别一样大，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开始的部分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把无为置于有为之上的做法同样是错误的，因为幸福就是行为，而且，公平和明智的行为就是很多高尚品德的具体表现。

But perhaps some one, accepting these premises, may still maintain that supreme power is the best of all things, because the possessors of it are able to perform the greatest number of noble actions. if so, the man who is able to rule, instead of giving up anything to his neighbor, ought rather to take away his power; and the father should make no account of his son, nor the son of his father, nor friend of friend; they should not bestow a thought on one another in comparison with this higher object, for the best is the most eligible and "doing eligible" and "doing well" is the best. There might be some truth in such a view if we assume that robbers and plunderers attain the chief good. But this can never be; their hypothesis is false. For the actions of a ruler cannot really be honorable, unless he is as much superior to other men as a husband

is to a wife, or a father to his children, or a master to his slaves. And therefore he who violates the law can never recover by any success, however great, what he has already lost in departing from virtue. For equals the honorable and the just consist in sharing alike, as is just and equal. But that the unequal should be given to equals, and the unlike to those who are like, is contrary to nature, and nothing which is contrary to nature is good. If, therefore, there is any one superior in virtue and in the power of performing the best actions, him we ought to follow and obey, but he must have the capacity for action as well as virtue.

但是，有些人在接受这些观点的同时，还会坚持说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最美好的事物，因为其拥有者能够做出最多的高贵行为。如果这是对的，人们一旦执掌权力，就不应该把它出让一部分给他的邻居，相反，他应该把邻居的权力都拿走；而且，父亲不必考虑儿子，儿子也不必管父亲，朋友也不必互相关心；与权力这个更高级的目标相比，他们完全不必考虑彼此，因为最好的就是最适宜的，而“做适宜的事”和“做得好”就是最好的。假如我们认为强盗和掠夺者在努力创造美好，那么这种观点也包含了某种真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前提是错误的。一个统治者的行为不可能是真正高尚的，除非他相对于其他人真的具有相当程度的优异，如丈夫之于妻子，父亲之于子女，主人之于奴隶。因此，一个人一旦违反了法律，那么无论他再取得多大的成功，都不能恢复他因为背离美德而失去的东西。对平等的人来说，高尚和公正在于平等的分享，这就是公正和平等。但是，如果给平等的人不平等的待遇，给相似的人以不相似的待遇，这是违背自然的做法，而任何违背自然的做法都不可能是好的。因此，假如有人在美德和实施美好行为能力的方面很出众，我们就应该追随并服从他，但是他必须不但有行为的能力还要有美德。

If we are right in our view, and happiness is assumed to be

virtuous activity, the active life will be the best, both for every city collectively, and for individuals. Not that a life of action must necessarily have relation to others, as some persons think, nor are those ideas only to be regarded as practical which are pursued for the sake of practical results, but much more the thoughts and contemplations which are independent and complete in themselves; since virtuous activity, and therefore a certain kind of action, is an end, and even in the case of external actions the directing mind is most truly said to act. Neither, again, is it necessary that states which are cut off from others and choose to live alone should be inactive; for activity, as well as other things, may take place by sections; there are many ways in which the sections of a state act upon one another. The same thing is equally true of every individual. If this were otherwise, God and the universe, who have no external actions over and above their own energies, would be far enough from perfection. Hen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same life is best for each individual, and for states and for mankind collectively

如果我们的观点是对的，即幸福就是有美德的行为，那么积极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无论对于整个城邦还是对于个人都是一样。其实有为的生活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一定要和别人产生关联，有些想法也不是只有在追求实际效果时才会被认为是实用的想法；相反，更多的这类思想和考虑都是独立的，并且自身就是完整的；因为，有美德的活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某种行为，就是一种结果，而且，即使在外在行为方面，指导思想也主要是为了行动。同理，与世隔绝并选择孤立生活的城邦也不应该无为地生活；因为活动，跟其他的事情一样，可以在局部进行；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让一个城邦的部分与另一个城邦的部分相互作用。就个人的人生而言也是如此。否则，神和宇宙，这些没有超出自身能力的外在行为的存在，也就不完美了。因此，同样的生活，如果对个人而言是最好的，那么对整个城邦而言，对全人类而言都是最好的。

Part 4

第四章

Thus far by way of introduction. In what has preceded I have discussed other forms of government; in what remains the first point to be considered is what should be the conditions of the ideal or perfect state; for the perfect state cannot exist without a due supply of the means of life. And therefore we must presuppose many purely imaginary conditions, but nothing impossible. There will be a certain number of citizens, a country in which to place them, and the like. As the weaver or shipbuilder or any other artisan must have the material proper for his work (and in proportion as this is better prepared, so will the result of his art be nobler), so the statesman or legislator must also have the materials suited to him.

引言部分就这么多吧。在前面的部分，我已经讨论过其他的政体形式；而在接下来的部分，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一个理想的或完美的城邦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如果没有合适的供给来支持其生活方式，完美的城邦也没办法存在。因此，我们必须预设很多纯粹想象中的条件，但是并不包括任何不可能实现的条件。这里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公民，一片他们可以在其中生活的土地，诸如此类的。正如织布匠或造船匠，或其他任何工匠都必须拥有干活的适当原料（而且，这些原料最好按一定比例进行准备，这样他们的产品才会更好），同样的，一个政治家或立法家也得有适合他的原料。

First among the materials required by the statesman is population: he will consider what should be the number and

character of the citizens, and then what should be the size and character of the country. Most persons think that a state in order to be happy ought to be large; but even if they are right, they have no idea what is a large and what a small state. For they judge of the size of the city by the number of the inhabitants; whereas they ought to regard, not their number, but their power. A city too, like an individual, has a work to do; and that city which is best adapted to the fulfillment of its work is to be deemed greatest, in the same sense of the word great in which Hippocrates might be called greater, not as a man, but as a physician, than some one else who was taller And even if we reckon greatness by numbers, we ought not to include everybody, for there must always be in cities a multitude of slaves and sojourners and foreigners; but we should include those only who are members of the state, and who form an essential part of it. The number of the latter is a proof of the greatness of a city; but a city which produces numerous artisans and comparatively few soldiers cannot be great, for a great city is not to be confounded with a populous one. Moreover, experience shows that a very populous city can rarely, if ever, be well governed; since all cities which have a reputation for good government have a limit of population. We may argue on grounds of reason, and the same result will follow. For law is order, and good law is good order; but a very great multitude cannot be orderly: to introduce order into the unlimited is the work of a divine power—of such a power as holds together the universe. Beauty is realized in number and magnitude, and the state which combines magnitude with good order must necessarily be the most beautiful. To the size of states there is a limit, as there is to other things, plants, animals, implements; for none of these retain their natural power when they are too large or too small, but they either wholly lose their nature, or are spoiled. For example, a ship which is only a span long will not be a ship at all, nor a ship a quarter of a mile long; yet there

may be a ship of a certain size, either too large or too small, which will still be a ship, but bad for sailing. In like manner a state when composed of too few is not, as a state ought to be, self-sufficing; when of too many, though self-sufficing in all mere necessaries, as a nation may be, it is not a state, being almost incapabl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For who can be the general of such a vast multitude, or who the herald, unless he have the voice of a Stentor?

在政治家需要的原料当中，首先是人口：他要考虑公民的数量是多少，品行如何，而且要考虑土地的规模是多少，品质如何。大多数人认为一个城邦要想幸福，必然要规模大；但是，即使他们是对的，他们也不明白什么样的才是大城邦，什么是小城邦。原因是他们是按居民数量判断一个城邦规模的，可是他们应该考虑的不是居民的数量，而是他们的力量。一个城市，就像个人一样，也有任务要完成；而且，最善于完成任务的城邦也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这里伟大的含义跟希波克拉底可以被认为更伟大一样，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而言，而是作为一个医师，他比一个身材比他高的人更“伟大”。而且，即使我们按照数量来判断一个城邦的伟大程度，那也不应该把所有人都计算在内，因为总会有些城邦里有大量的奴隶，旅居者和外邦人；但是，我们只应该计算那些属于城邦成员的人，还有对城邦必不可少的那些人。后者的数量可作为一个大邦的证明；但是，一个产生了大量的工匠，却只有少量战士的城邦，不能被称为大邦，因为我们不能混淆一个人口众多的城邦和一个伟大的城邦。而且，经验表明一个人口众多的城邦很少是管理良好的，即使有也不多见；原因是所有以管理良好而著称的城邦都设置了人口限制。我们也可以从理性角度去争辩，结论也是一样的。法律就是秩序，而好的法律就是好的秩序；但太过庞大的人口不可能秩序良好，让无限的事物拥有秩序，是神力才能完成的任务——就像神力维系着整个宇宙一样。美丽是用数量和体积实现的，一个城邦如果结合了庞大的规模和良好的秩序，那它必然是最美丽的。城邦的规模有限制，正如其他的事物都有限制一样，包括动

物、植物和无生命的工具；因为当这些东西太大或太小时，它们或者完全丧失本性，或者被破坏了。例如，一艘只有一指距长的船根本不能算是船，一个四分之一英里长的船也不能叫船；但是，可能有一艘某种尺寸的船，或者太大或者太小，虽然它还是一艘船，但是，它不利于航行。同理，一个城邦如果人口过少，就不能做到城邦应有的自给自足；而如果人口太多，尽管它可能像一个民族那样在纯粹的必需品方面做到自给自足，但是它不是一个城邦，原因是它几乎不能建立政体。谁能统帅这么庞大的群众？或者谁来做传令官，除非他具有斯顿笃（Stentor）那样的嗓音？

A state, then, only begins to exist when it has attained a population sufficient for a good life in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it may indeed, if it somewhat exceed this number, be a greater state. But, as I was saying, there must be a limit. What should be the limit will be easily ascertained by experience. For both governors and governed have duties to perform; the special functions of a governor to command and to judge. But if the citizens of a state are to judge and to distribute offices according to merit, then they must know each other's characters; where they do not possess this knowledge, both the election to offices and the decision of lawsuits will go wrong. When the population is very large they are manifestly settled at haphazard, which clearly ought not to be. Besides, in an over-populous state foreigners and metics will readily acquire the rights of citizens, for who will find them out? Clearly then the best limit of the population of a state is the largest number which suffices for the purposes of life, and can be taken in at a single view. Enough concerning the size of a state.

因此，一个城邦只有在拥有足够人口可以让它拥有政治体制下的良好生活时，才能作为一个城邦而存在；如果它的人口超出这个标准

一点，那么它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城邦。但是，如我所言，必须有一个限制。这个限制是多少，可以通过经验很容易的确定下来。因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职责要履行，管理者的特殊职责是审理案件和发布命令。但是一个城邦的公民如果要审理案件并且根据功勋分配公共部门，那他们必须知道彼此的性格；如果他们不具备这种知识，那公职人员的选举和诉讼案件的决断就会出错。如果人口太多，这些公务就会处理的很随意，而这样做明显不应该。此外，在一个人口过多的城邦，外邦人和客居者会轻易地获得公民资格，因为没人能发现他们。显而易见，一个城邦的人口的最佳限制应该是能够满足生活目的前提下的一个最大值，而且要在一眼能够看遍的范围内。关于城邦的规模就说这么多。

Part 5

第五章

Much the same principle will apply to the territory of the state: every one would agree in praising the territory which is most entirely self-sufficing; and that must be the territory which is all-producing, for to have all things and to want nothing is sufficiency. In size and extent it should be such as may enable the inhabitants to live at once temperately and liberally in the enjoyment of leisure. Whether we are right or wrong in laying down this limit we will inquire more precisely hereafter, when we have occasion to consider what is the right use of property and wealth: a matter which is much disputed, because men are inclined to rush into one of two extremes, some into meanness, others into luxury.

几乎一样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到城邦的领土问题上：每个人都愿意赞美那种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领土；这种土地必然可以生产所有作

物，因为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乏就是自足。在大小和面积方面，领土应当足以使它的居民能够既简朴又宽裕地享受闲暇时光的生活。我们所拟的这种限度是否正确，我们会在后面的部分进行更细致地探讨，即当我们有机会研究如何正确地使用财产和财富时：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因为人们往往趋于两个极端，有些流于寒酸，有些过于奢侈。

It is not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territory which is required (there are, however, some points on which military authorities should be heard); it should be difficult of access to the enemy, and easy of egress to the inhabitants. Further, we require that the land as well as the inhabitants of whom we were just now speaking should be taken in at a single view, for a country which is easily seen can be easily protected. As to the position of the city, if we could have what we wish, it should be well situated in regard both to sea and land. This then is one principle, that it should be a convenient cent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the other is, that it should be suitable for receiving the fruits of the soil, and also for the bringing in of timber and any other products that are easily transported.

城邦需要的领土其一般性特点并不难确定（虽然，有些问题上需要听听军事权威的看法）；它应该不容易被敌人攻入，同时，应该方便居民的外出。此外，我们要求土地和人口规模一样，关于这一点刚刚说过，即一眼能够看遍，原因是能够方便地看见的领土也可以方便地保护。关于城市的位置，如果能按照我们的愿望选址，它应该坐落于海路和陆路都比较好的位置。一个重要原则是，它应该位于一个方便保护全邦的中心位置；另一个原则是，它的位置应该适合于接受土地的果实，运入的木材，还有其他任何方便运输的产品。

Part 6

第六章

Whether a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ea is beneficial to a well-ordered state or not is a question which has often been asked. It is argu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strangers brought up under other laws, and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will be adverse to good order; the increase arises from their using the sea and having a crowd of merchants coming and going, and is inimical to good government. Apart from these considerations, it would be undoubtedly better, both with a view to safety and to the provision of necessaries, that the city and territory should be connected with the sea; the defenders of a country, if they are to maintain themselves against an enemy, should be easily relieved both by land and by sea; and even if they are not able to attack by sea and land at once, they will have less difficulty in doing mischief to their assailants on one element, if they themselves can use both. Moreover,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y should import from abroad what is not found in their own country, and that they should export what they have in excess; for a city ought to be a market, not indeed for others, but for herself.

这是人们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海上交通对于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是否有利？有观点认为，让在外邦法律之下长大的外邦人进入城邦，以及人口的增长，都不利于良好的管理；海路的使用以及大群商人的来来往往造成的人口增长，不利于城邦的良好管理。除了这些考虑以外，拥有海路无疑是更好的，无论是从安全角度还是从必需品的供给来看，城市和领土应该跟大海相连；这样国家的守卫者，如果要保全自身和抗击敌人，在海上和陆上都应该能方便地得到救援；而且，只要他们能使用两种通道，即使不能同时从海上和陆上攻击敌人，也能在通过其中一种通道骚扰敌人时减少一些困难。而且，一个

城邦有必要从外邦进口自己国家不能生产的东西，而且，他们应该出口自己过剩的产品；因为城市应该是一个市场，这样做实际上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身。

Those who make themselves a market for the world only do so for the sake of revenue, and if a state ought not to desire profit of this kind it ought not to have such an emporium. Nowadays we often see in countries and cities dockyards and harbors very conveniently placed outside the city, but not too far off; and they are kept in dependence by walls and similar fortifications. Cities thus situated manifestly reap the benefit of intercourse with their ports; and any harm which is likely to accrue may be easily guarded against by the laws, which will pronounce and determine who may hold communication with one another, and who may not.

那些让自己成为世界市场的城邦，这样做只是为了财政收入，如果一个城邦不宜贪图这种利润，它就不该拥有这样的大商场。如今，我们经常见到有些城邦的境内及其城市有船坞和港口很方便地布置在城市的外面，但是距离城市并不遥远；而且人们用围墙和类似的堡垒使它们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坐落于这样位置的城市显然收获了其港口交通带来的利益；而且，任何可能产生的危害都能轻易地通过法律进行警戒，这类法律将宣布并决定谁可以在港口和城市之间往来，谁不可以。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possession of a moderate naval force is advantageous to a city; the city should be formidable not only to its own citizens but to some of its neighbors, or, if necessary, able to assist them by sea as well as by land. The proper number or magnitude of this naval force is relative to the character

of the state; for if her function is to take a leading part in politics, her naval power should be commensurate with the scale of her enterpris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state need not be much increased, since there is no necessity that the sailors should be citizens: the marines who have the control and command will be freemen, and belong also to the infantry; and wherever there is a dense population of Perioeci and husbandmen, there will always be sailors more than enough. Of this we see instances at the present day. The city of Heraclea, for example, although small in comparison with many others, can man a considerable fleet. Such are our conclusions respecting the territory of the state, its harbors, its towns, its relations to the sea, and its maritime power.

毫无疑问，拥有相当规模的海军力量是对城邦有利的；城邦应该不仅能威慑其公民，而且能威慑某些邻邦，或者，如果有必要，可以在海上和陆上两种渠道援助他们。海军力量的恰当人数或规模应该与城邦的性格有关；因为，如果城邦的职能是要扮演政治领袖的角色，那么她的海军力量应该与其野心的规模相匹配。城邦的人口不需要过多地增长，因为，没有必要让普通水手成为公民：掌管控制和命令的海军战士让自由人充当，而且属于步兵的一部分；而且，如果一个城邦有大量的农奴和农民，那么这里总会有用不完的水手。关于这一点，可以在现世看到很多例子。例如，赫拉克里亚，虽然与其他很多城邦相比，规模较小，却可以组织起一支强大的舰队。关于城邦的领土、海港、城市、与海洋的关系以及海军力量，这些就是我们的结论。

Part 7

第七章

Having spoken of the number of the citizens, we will proceed to speak of what should be their character. This is a subject which can be easily understood by any one who casts his eye on the more celebrated states of Hellas, and generall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races in the habitable world. Those who live in a cold climate and in Europe are full of spirit, but wanting in intelligence and skill; and therefore they retain comparative freedom, but have no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are incapable of ruling over others. Whereas the natives of Asia are intelligent and inventive, but they are wanting in spirit, and therefore they are always in a state of subjection and slavery. But the Hellenic race, which is situated between them, is likewise intermediate in character, being high-spirited and also intelligent. Hence it continues free, and is the best-governed of any nation, and, if it could be formed into one state, would be able to rule the world. There are also similar differences in the different tribes of Hellas; for some of them are of a one-sided nature, and are intelligent or courageous only, while in others there is a happy combination of both qualities. And clearly those whom the legislator will most easily lead to virtue may be expected to be both intelligent and courageous. Some say that the guardians should be friendly towards those whom they know, fierce towards those whom they do not know. Now, passion is the quality of the soul which begets friendship and enables us to love; notably the spirit within us is more stirred against our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than against those who are unknown to us, when we think that we are despised by them; for which reason Archilochus, complaining of his friends, very naturally addresses his soul in these words: “For surely thou art plagued on account of friends.”

讨论完了公民的数量之后，我们来继续讨论他们的性格应该如何。一个人如果关注一下希腊地区更加著名的那些城邦，并广泛地观

察一下在适宜人居住的范围内的种族分布情况，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那些生活在寒冷地区和欧罗巴地区的人通常勇气很足，但是在智力和技巧方面比较欠缺；他们也因此保留了相对的自由，但是没有形成政治组织，所以，没有能力统治他人。但是，亚细亚的民族聪明而且有创造力，但是勇气不够充足，因此，他们一直处于服从和受人奴役的状态。而希腊各民族，地理位置处于这两者之间，性格方面同样也是中间状态，不仅精力旺盛而且很聪明。所以，他们一直是自由的状态，也是所有民族中管理最良好的，而且，如果能够组成一个城邦的话，他们将拥有统治整个世界的能力。类似的差异也存在于希腊的不同部落之间；因为其中有些只拥有一方面的性格，只有聪明或只有勇敢，而其他的一些则将两方面性格良好地结合在一起。显然，那些能够被立法家最轻松地导向美德的应该是既聪明又勇敢的民族。有些人认为卫国公民应友善地对待相识的人，同时应残忍地对待不相识者的人。众所周知，热情是灵魂的一种品质，它能带来友谊，并给我们以爱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认为受到他人的蔑视时，如果这种蔑视来自于朋友或熟人，我们的精神更容易被搅动而敌视对方，而如果来自于陌生人，则搅动不那么强烈；所以，阿尔齐洛科斯在埋怨他的友人时，非常自然地用这些话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因为，你确实因为朋友而受了伤害。"

The power of command and the love of freedom are in all men based upon this quality, for passion is commanding and invincible. Nor is it right to say that the guardians should be fierce towards those whom they do not know, for we ought not to be out of temper with any one; and a lofty spirit is not fierce by nature, but only when excited against evil-doers. And this, as I was saying before, is a feeling which men show most strongly towards their friends if they think they have received a wrong at their hands: as indeed is reasonable; for, besides the actual injury, they seem to be deprived of a benefit by those who owe them one. Hence the saying: "Cruel is the strife of brethren," and again: "They who love in excess also

hate in excess.”

命令的能力和对自由的热爱都基于这一种品质，因为热情是威力巨大的和不可战胜的。那些说卫国公民应该残忍地对不相识者的人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对于谁都不应脾气失控；而且，一个高傲的灵魂，其本质并不残忍，而只是被邪恶之人激怒时才表现为残忍。至于邪恶，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它是一种感觉，在人们认为被朋友冤枉时最强烈地想表达出来的感觉：这种反应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除了实际的伤害以外，他们似乎还被强行剥夺了受人感激的福利，而做出这一行径的正是本该对他们心存感激之人。正像那句话说的：“兄弟相争更残忍。”以及另一句：“爱愈深，恨愈深。”

Thus we have nearly determined the number and character of the citizens of our state, and also the size and nature of their territory. I say “nearly,” for we ought not to require the same minuteness in theory as in the facts given by perception.

这样，我们几乎确定了一个理想城邦应该拥有的公民数量和性格，以及其领土的大小和特征。我用“几乎”这个词，是因为我们在进行理论探讨时不需要做到与事实上同样精准。

Part 8

第八章

As in other natural compounds the conditions of a composite whole are not necessarily organic parts of it, so in a state or in any other combination forming a unity not everything is a part, which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The members of an association have necessarily some one thing the same and common to all, in which they share equally or unequally for example, food or land or any other thing. But where there are two things of which one is a means and the other an end, they have nothing in common except that the one receives what the other produces. Such, for example, is the relation which workmen and tools stand to their work; the house and the builder have nothing in common, but the art of the builder is for the sake of the house. And so states require property, but property, even though living beings are included in it, is no part of a state; for a state is not a community of living beings only, but a community of equals, aiming at the best life possible. Now, whereas happiness is the highest good, being a realization and perfect practice of virtue, which some can attain, while others have little or none of it, the various qualities of men are clearly the reason why there are various kinds of states and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for different men seek after happiness in different ways and by different means, and so make for themselves different modes of life and forms of government. We must see also how many things are indispensable to the existence of a state, for what we call the parts of a state will be found among the indispensables. Let us then enumerate the functions of a state, and we shall easily elicit what we want:

如同其他自然合成物一样，一个复合体的构成条件不一定是它的有机部分，同理，一个城邦或其他任何通过结合构成的统一体，并非所有必要条件都是它的一部分。同一个社团的成员必然拥有某种相同的东西，而且是为所有成员共同拥有，对这件东西他们进行平等地或不平等地分享，例如，食物，土地或其他任何东西。但是，如果有两种东西，其中一个是手段，另一个是目的，那么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惟一的共同点就是，一个使用另一个生产的东西。正如建筑工人

及其工具跟他们的作品之间的关系；房子和建筑工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但是建筑工人的技术是盖房子的手段。同理，城邦需要财产，但是财产，尽管包含了有生命的个体，并不是城邦的一部分；因为城邦不仅仅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的集团，还是一个平等者的集团，其目标是最美好的生活。尽管幸福是最高级的美好，作为美德的实现和完美实践，有些人可以获得它，但是其他人却只少量拥有它或不能拥有，人的不同品质显然是导致城邦种类和政体形式多种多样的原因；因为不同的人追求幸福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也不相同，从而为自己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政体形式。我们也必须看到有多少事物对于城邦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我们所谓的城邦的部分将会出现在这些不可或缺的事物当中。下面我们来列举城邦的职责，而且，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引出我们需要的内容。

First, there must be food; secondly, arts, for life requires many instruments; thirdly, there must be arms, for the members of a community have need of them, and in their own hands, too, in order to maintain authority both against disobedient subjects and against external assailants; fourthly, there must be a certain amount of revenue, both for internal needs, and for the purposes of war; fifthly, or rather first, there must be a care of religion which is commonly called worship; sixthly, and most necessary of all there must be a power of deciding what is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what is just in men's dealings with one another.

首先，必须有粮食；其次，技艺，因为生活需要很多工具；第三，必须有武装，因为城邦的成员需要它们，而且必须掌握在成员们自己的手中，目的是维持权威，既针对不服从者，又针对外来入侵者；第四，一定要有一定数量的财政收入，既是为了内部需求，也是为了战时需要；第五，或许应该排在第一位，必须有宗教的关怀，即通常所谓的信仰；第六，也是最有必要的一个，必须有一种力量来决

定什么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以及什么是公民之间交往的公正准则。

These are the services which every state may be said to need. For a state is not a mere aggregate of persons, but a union of them sufficing for the purposes of life; and if any of these things be wanting, it is as we maintain impossible that the community can be absolutely self-sufficing. A state then should be framed with a view to the fulfillment of these functions. There must be husbandmen to procure food, and artisans, and a warlike and a wealthy class, and priests, and judges to decide what is necessary and expedient.

可以认为这些就是每个城邦必需的服务。因为一个城邦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的集合，而是一种在生活上自给自足的人的联合体；如果上述任何服务缺失，正如我们所坚持的那样，城邦就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因此，一个城邦在构建时就应该考虑这些职能的实现。所以，一个城邦必须有农民来生产食物，还要有工匠，有一个好战而且富有的阶层，有祭司，还要有法官来决定什么是必须的，什么是有利的。

Part 9

第九章

Having determined these points, we have in the next place to consider whether all ought to share in every sort of occupation. Shall every man be at once husbandman, artisan, councillor, judge, or shall we suppose the several occupations just mentioned assigned to different persons? or, thirdly, shall some employments be assigned to individuals and others common to all? The same

arrangement, however, does not occur in every constitution; as we were saying, all may be shared by all, or not all by all, but only by some; and hence arise the differences of constitutions, for in democracies all share in all, in oligarchies the opposite practice prevails. Now, since we are here speaking of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i.e., that under which the state will be most happy (and happiness, as has been already said, cannot exist without virtue), it clearly follows that in the state which is best governed and possesses men who are just absolutely, and not merely relatively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citizens must not lead the life of mechanics or tradesmen, for such a life is ignoble, and inimical to virtue. Neither must they be husbandmen, since leisure is necessary bo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al duties.

确定了这些职能以后，接下来我们将考虑是否应该让全体成员参加所有的职业。每个人要同时做农民，工匠，议事会成员，和法官，还是应该把刚提到的这几种职业分配给不同的人来做？或者，第三问题，要把有些岗位分配给一些个人，而其他的则给所有人共同承担吗？但是，相同的安排不会出现在每一个政体中；正如我们所说的，所有职能可以由全体成员共同承担，或者不是全体而是部分人承担；因此，就出现了政体的差异，因为在平民政体中，全体成员共同承担全部职能，而在寡头政体中流行的却是相反的做法。那么，既然，我们谈论的是最好的政体形式，例如，一个城邦在什么样的政体之下是最幸福的（而幸福，如前文所述，离开了美德便无法存在），由此可见，如果一个城邦拥有最好的管理，以及绝对正义的人员，而不仅仅是现行政体原则上的相对正义，那么，这里的公民必然不能以做工匠和商贩为生，因为这样的生活是不体面的，而且无助于美德。他们也不应该做农民，原因是培养美德和行使政治职能都离不开闲暇时光。

Again, there is in a state a class of warriors, and another of councillors, who advise about the expedient and determine matters of law, and these seem in an especial manner parts of a state. Now, should these two classes be distinguished, or are both functions to be assigned to the same persons? Here again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seeing that both functions will in one way belong to the same, in another, to different persons. To different persons in so far as these i.e., the physical and the employments are suited to different primes of life, for the one requires mental wisdom and the other strength. But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it is an impossible thing that those who are able to use or to resist force should be willing to remain always in subjection,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persons are the same; for those who carry arms can always determine the fate of the constitution. It remains therefore that both functions should be entrusted by the ideal constitution to the same persons, not,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but in the order prescribed by nature, who has given to young men strength and to older men wisdom. Such a distribution of duties will be expedient and also just, and is founded upon a principle of conformity to merit. Besides, the ruling class should be the owners of property, for they are citizens, and the citizens of a state should be in good circumstances; whereas mechanics or any other class which is not a producer of virtue have no share in the state. This follows from our first principle, for happiness cannot exist without virtue, and a city is not to be termed happy in regard to a portion of the citizens, but in regard to them all. And clearly property should be in their hands, since the husbandmen will of necessity be slaves or barbarian Perioeci.

另外，城邦里会有一个战士阶层，和一个审议国事的团体，后者提供对城邦有利的建议并决定法律事务，这些人似乎是城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两种职责应该区别对待，还是应该分配给相

同的一些人兼任？在这里，不难看出，一种方式使这两种职能属于不同的人，而另一种方式却让它们属于相同的人。如果属于不同的人，那么它们在体力要求和业务内容上必须适合不同年龄的优势，因为议事需要脑力和智慧，而战士却需要充沛的体力。但是，另一方面，那些能使用或抵御武力的人们，不可能永远心甘情愿的处于从属地位，从这个角度看，这两种职能最后还是归于同一种人；因为那些持有武器的人总是能决定一个政体的命运。因此，剩下的就只有让理想的城邦将两种职能托付给同一种人，但是，不是同时给他们所有人，而是按自然规定的顺序，她赋予年轻人以体力，赋予成熟者以智慧。这样的职能分配模式对城邦有利，也是公正的，而且是建立在人们的职权应该与功勋相符的原则之上的。此外，统治阶级应该是有产者，因为他们是公民，而理想城邦的公民应该家境优越；但是，工匠或其他的阶层都不是美德的制造者，也不享有城邦的权力。这与我们第一条原则相一致，因为没有美德幸福就无法存在，而且，一个幸福的城邦不应该只考虑一部分公民的幸福，而是全体公民的幸福。所以，他们显然应该拥有财产，而农民则必然是奴隶或野蛮人转化的农奴。

Of the classes enumerated there remain only the priests,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their office is to be regulated is obvious. No husbandman or mechanic should be appointed to it; for the Gods should receive honor from the citizens only. Now since the body of the citizen is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the warriors and the councillors and it is beseeming that the worship of the Gods should be duly performed, and also a rest provided in their service for those who from age have given up active life, to the old men of these two classes should be assigned the duties of the priesthood.

在我们列举的六种人中，只剩下祭司一种了，而且他们的职务的管理方式很明显。任何农民和工匠都不得被任命为祭司；因为众神只应该接受来自于公民的礼敬。既然已经把公民分为两组，战士组和议

事组，而且对众神的祭祀也应该正常举行，此外，对于那些因为年老而放弃积极生活的人而言，这种服务实际上也是一种休息，由此看来，把祭司的职务分配给这两组人中的老人是很恰当的。

We have shown what ar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what the parts of a state: husbandmen, craftsmen, and laborers of an kinds are necessary to the existence of states, but the parts of the state are the warriors and councillors. And these are distinguished severally from one another, the distinction being in some cases permanent, in others not.

我们已经说明了什么是一个城邦的必备条件，以及一个城邦的组成部分有哪些：农民，工匠，以及耕种劳动者对于城邦的存在都是必需的，但是城邦的组成部分只有两个，即战士和议事者。而且，这些人也各不相同，其差异有时是永久性的，有时则不是。

Part 10

第十章

It is not a new or recent discove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ers that the state ought to be divided into classes, and that the warriors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 husbandmen. The system has continued in Egypt and in Crete to this day, and was established, as tradition says, by a law of Sesostris in Egypt and of Minos in Crete. The institution of common tables also appears to be of ancient date, being in Crete as old as the reign of Minos, and in Italy far older. The Italian historians say that there was a certain Italus, king of Oenotria, from whom the Oenotrians were called Italians, and who

gave the name of Italy to the promontory of Europe lying within the Scylletic and Lametic Gulfs, which are distant from one another only half a day's journey. They say that this Italus converted the Oenotrians from shepherds into husbandmen, and besides other laws which he gave them, was the founder of their common meals; even in our day some who are derived from him retain this institution and certain other laws of his. On the side of Italy towards Tyrrhenia dwelt the Opici, who are now, as of old, called Ausones; and on the side towards Iapygia and the Ionian Gulf, in the district called Siritis, the Chones, who are likewise of Oenotrian race. From this part of the world originally came the institution of common tables; the separation into castes from Egypt, for the reign of Sesostris is of far greater antiquity than that of Minos. It is true indeed that these and many other things have been invented several times over in the course of ages, or rather times without number; for necessity may be supposed to have taught men the inventions which were absolutely required, and when these were provided, it was natural that other things which would adorn and enrich life should grow up by degrees. And we may infer that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same rule holds. Egypt witnesses to the antiquity of all these things, for the Egyptians appear to be of all people the most ancient; and they have laws and a regular constitution existing from time immemorial. We should therefore make the best use of what has been already discovered, and try to supply defects.

应该把城邦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而且要把战士阶级和农民阶级分离开来，这种观点并不是政治思想家的新发现。这种制度在埃及和克里特一直沿用到今天，据历史记载，在埃及，这种制度始于塞索斯特里斯的法律，而在克里特则始于米诺斯王。公餐制度似乎也年代久远，在克里特可以追溯到米诺斯王时代；而在意大利则更加古老。意大利历史学家记载，曾经有一位名叫“意大勒斯”的奥诺羯利亚君王，

后来，奥诺羯利亚人就因为这位国王而被称为“意大利人”，而且就是他把那个位于斯居勒季和拉梅托两海湾间的欧罗巴的海岬命名为“意大利”了，实际上这两个海湾之间只相隔半天的路程。史学家们说，意大勒斯把奥诺羯利亚人从牧民转变成为农民，而且，除了为他们创建的其他法律以外，他还是他们的公餐制创始人；即使到了今天，他的一些后裔还保留了这一制度和他的一些其他法律。毗邻意大利，朝着第勒尼安海的方向，居住着奥布人，他们还沿用着古时的称呼，即渥逊尼人；而在朝着耶比季亚和爱奥尼亚海湾一侧，在西里底斯地区，居住着琼尼人，他们同样属于奥诺羯利亚族。公餐制度就是起源于这个地区；而划分阶级的制度，则起源于埃及，因为塞索斯特里斯的统治要比米诺斯王的统治更加古老。确实，这些制度以及很多其他的制度在漫长的历史上曾经几次被人发明出来，或者说是无数次；可以看作是“必要性”教会了人们这些绝对必要的发明，而当有了这些制度之后，自然地，其他能够装点和丰富生活的东西就会逐步出现了。而且，就此可以推断，政治制度也适用于相同的原则。埃及见证了所有这些制度的远古状态，因为埃及人似乎是所有人类当中历史最悠久的；而且他们拥有的一些法律和规范的政体似乎在人类有记载之前就存在了。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已经被发现的这些制度，并努力弥补他们的不足之处。

I have already remarked that the land ought to belong to those who possess arms and have a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and that the husbandmen ought to be a class distinct from them; and I have determined what should be 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the territory. Let me proceed to discus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and,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agricultural class; for I do not think that property ought to be common, as some maintain, but only that by friendly consent there should be a common use of it; and that no citizen should be in want of subsistence.

我已经说过，土地应该属于那些拥有武器并参与城邦管理的人，还说过应该把农民和这些人区分开来；而且，我也确定了城邦领土应有的范围和特点。现在，我们来继续讨论土地的分配，以及农民阶级的性格；因为，有些人可能坚持认为土地应该公有，但我不这样认为，相反，我认为土地应该只能在友善的认同下被共同的使用；而且不应该让任何一个公民缺乏基本生活物资。

As to common meals, there is a general agreement that a well ordered city should have them; and we will hereafter explain what are our own reasons for taking this view. They ought, however, to be open to all the citizens. And yet it is not easy for the poor to contribute the requisite sum out of their private means, and to provide also for their household. The expense of religious worship should likewise be a public charge. The land must therefore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public and the other private, and each part should be subdivided, part of the public land being appropriated to the service of the Gods, and the other part used to defray the cost of the common meals; while of the private land, part should be near the border, and the other near the city, so that, each citizen having two lots, they may all of them have land in both places; there is justice and fairness in such a division, and it tends to inspire unanimity among the people in their border wars. Where there is not this arrangement some of them are too ready to come to blows with their neighbors, while others are so cautious that they quite lose the sense of honor. Wherefore there is a law in some places which forbids those who dwell near the border to take part in public deliberations about wars with neighbors, on the ground that their interests will pervert their judgment. For the reasons already mentioned, then, the land should be divided in the manner described. The very best thing of all would be that the husbandmen should be slaves taken from among men who are not all of the same

race and not spirited, for if they have no spirit they will be better suited for their work, and there will be no danger of their making a revolution. The next best thing would be that they should be Perioeci of foreign race, and of a like inferior nature; some of them should be the slaves of individuals, and employed in the private estates of men of property, the remainder should be the property of the state and employed on the common land. I will hereafter explain what is the proper treatment of slaves, and why it is expedient that liberty should be always held out to them as the reward of their services.

至于公餐制，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秩序良好的城邦应该建立这种制度；以后我们会解释为什么我们支持这种观点。但是，公餐制应该向所有公民开放。然而，从私产中拿出公餐所需费用对贫穷的公民来说并不容易，而且，他们还要养活家人。同样，宗教祭祀的费用也应该算作公共开支。因此，城邦的领土应该划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公共用地，另一部分为私人田产，其中每一部分还须再划分为两份，公共用地的一份用于众神的祭祀，另一份用于支付公餐费用；至于私人田产，一份应该靠近边疆，另一份靠近城市，这样，每个公民都拥有两块田产，他们所有人在两处地方都有田产；这样划分即正义又公平，而且，能够在边疆战事中激发公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假如没有这样的安排，有些公民会过于随便的与邻邦发生冲突，而其他公民则太过谨慎以致丧失尊严。因此有些城邦制定了法律，禁止住在边疆的公民参与有关邻邦战事的公共审议，理由是他们的利益会歪曲他们的判断。基于上述原因，城邦的土地应该按上述方式进行划分。对农民最好的安排是他们应该由奴隶构成，应该来自于不同种族并且不应该具有勇武的精神，因为如果没有勇气，他们就会更加适合于他们的工作，而且也不存在革命的危险。而次一级的安排是，他们应该是外邦种族构成的农奴，而且拥有同样卑微的性格；他们中有些人应该成为某些私人的奴隶，并在有产者的私产上劳作，其余的应该作为城邦的公产，并在公共用地上劳作。在后面的部分，我会解释如何正确的对待奴

隶，以及把自由拿出来作为他们的服务报酬之做法为什么有利于城邦。

Part 11

第十一章

We have already said that the city should be open to the land and to the sea, and to the whole country as far as possible. In respect of the place itself our wish would be that its situation should be fortunate in four things. The first, health—this is a necessity: cities which lie towards the east, and are blown upon by winds coming from the east, are the healthiest; next in healthfulness are those which are sheltered from the north wind, for they have a milder winter. The site of the city should likewise be convenient both for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and for war. With a view to the latter it should afford easy egress to the citizens,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inaccessible and difficult of capture to enemies. There should be a natural abundance of springs and fountains in the town, or, if there is a deficiency of them, great reservoirs may be established for the collection of rainwater, such as will not fail when the inhabitants are cut off from the country by by war. Special care should be taken of the health of the inhabitants, which will depend chiefly on the healthiness of the locality and of the quarter to which they are exposed, and secondly, on the use of pure water; this latter point is by no means a secondary consideration. For the elements which we use most and oftenest for the support of the body contribute most to health, and among these are water and air. Wherefore, in all wise states, if there is a want of pure water, and the supply is not all equally good, the drinking water ought to be separated from that which is used for other purposes.

我们已经说过，理想城邦的城市应该拥有海上和陆上两种出路，而且应尽量连通城邦全境。如果只考虑位置本身，我们希望它能具备四种有利条件。第一，健康——这是非常必要的：城市应该面朝东方，而且迎着从东面来的风，这样最利于健康；次一级的有利于健康的位置，是那些北方有屏障可以抵挡北风的地方，因为它们可以有一个温和的冬天。城市的位置应该对于政治管理和对于战争同样的方便。考虑到后者，它还应该方便公民的外出，同时，还要能阻止敌人的进入和攻陷。城内应该有许多天然溪流和泉水，或者，如果它们的数量不够，就应该修建大蓄水池以收集雨水，蓄水池的规模应该保证居民在被战争切断与乡村的联系时，也不至于没有水喝。应该特别注意保护居民的健康，这一点主要取决于城市位置和居民身处其中的环境的健康程度，第二，要使用干净的水；后面一点绝对是不容轻忽的问题。原因是在所有用来支撑身体，促进健康的元素中，我们使用最多也最频繁的就是空气和水。因此，所有明智的城邦，如果发现干净的水源不足，而且，其供应品质也参差不齐，就应该把引用水源和用于其他目的的水源分离开来。

As to strongholds, what is suitable to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varies: thus an acropolis is suited to an oligarchy or a monarchy, but a plain to a democracy; neither to an aristocracy, but rather a number of strong places. The arrangement of private houses is considered to be more agreeable and generally more convenient, if the streets are regularly laid out after the modern fashion which Hippodamus introduced, but for security in war the antiquated mode of building, which made it difficult for strangers to get out of a town and for assailants to find their way in, is preferable. A city should therefore adopt both plans of building: it is possible to arrange the houses irregularly, as husbandmen plant their vines in what are called “clumps.” The whole town should not be laid out in straight lines, but only certain quarters and regions;

thus security and beauty will be combined.

关于城防建设，适合于各种政体的方案也各不相同：因此，卫城适合于寡头政体或君主政体，但是平原工事适合于平民政体；两者都不适合于贵族政体，这种政体需要有大量的堡垒型工事。关于私人住房的布置，如果街道按照希朴达摩提出的现代风格进行铺设，这样的城市往往被认为是更美观和更方便的，但是，对于战时的安全而言，古代的建造模式更受人们青睐，因为它使陌生人很难找到出城路径，而入侵者也无法找到进城途径。所以，一个城市应该兼具两种建筑风格：将私宅进行不规则的编排是有可能的，就像农民栽培葡萄用的所谓“密垅”的方法。不应该把整个城市都按直线排列，而是只在特定的区域进行如此排列；这样就可以将安全与美观结合在一起了。

As to walls, those who say that cities making any pretension to military virtue should not have them, are quite out of date in their notions; and they may see the cities which prided themselves on this fancy confuted by facts. True, there is little courage shown in seeking for safety behind a rampart when an enemy is similar in character and not much superior in number; but the superiority of the besiegers may be and often is too much both for ordinary human valor and for that which is found only in a few; and if they are to be saved and to escape defeat and outrage, the strongest wall will be the truest soldierly precaution, more especially now that missiles and siege engines have been brought to such perfection. To have no walls would be as foolish as to choose a site for a town in an exposed country, and to level the heights; or as if an individual were to leave his house unwalled, lest the inmates should become cowards. Nor must we forget that those who have their cities surrounded by walls may either take advantage of them or not, but cities which are unwalled have no choice.

关于城墙，有些人认为，但凡有点好战名气的城邦都不应该有城墙，他们的观点太过时了；而且他们会看到抱着这种幻想而洋洋自得的城邦被现实驳倒。假如敌人与本邦性格相似而且人数也没有超出多少，那么躲在防御工事后面寻求安全感的做法确实不够勇敢；但是围攻城池者的强大有可能，而且事实往往也是如此，远超普通人或者少数超人所具有的勇敢所能抵抗；那么，他们如果要想获救，并避免被打败和凌辱，那最坚固的城墙将是最正确的、勇敢的预防措施；在当今投石机和攻城机械已经被完善到了极致的前提下更加需要坚固的城墙。所以，不设城墙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这就如同选择在没有任何屏障的空旷地上建城，而且还要把所有的高地全都夷为平地一样；或者如同一个人不给他的房子盖围墙，以免里面的人成为懦夫。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处于城墙保护之中的城邦，它们可以选择利用或不用城墙的好处，而那些没有城墙的城邦则没有选择的余地。

If our conclusions are just, not only should cities have walls, but care should be taken to make them ornamental, as well as useful for warlike purposes, and adapted to resist modern inventions. For as the assailants of a city do all they can to gain an advantage, so the defenders should make use of any means of defense which have been already discovered, and should devise and invent others, for when men are well prepared no enemy even thinks of attacking them.

如果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城邦不但要建城墙，而且要注意让它们既有装饰功能，又能满足战争要求，并且能够抵御现代攻城机械。因为，正如攻城者会竭尽所能去赢得战争的优势一样，防御者也应该利用人类已经发现的一切防御手段，而且，还要设计和发明其他的手段，因为当人们准备充分时，很多敌人根本不会动攻击他们的念头。

Part 12

第十二章

As the walls are to be divided by guardhouses and towers built at suitable intervals, and the body of citizens must be distributed at common tables, the idea will naturally occur that we should establish some of the common tables in the guardhouses. These might be arranged as has been suggested; while the principal common tables of the magistrates will occupy a suitable place, and there also will be the buildings appropriated to religious worship except in the case of those rites which the law or the Pythian oracle has restricted to a special locality. The site should be a spot seen far and wide, which gives due elevation to virtue and towers over the neighborhood. Below this spot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 agora, such as that which the Thessalians call the “freemen's agora”; from this all trade should be excluded, and no mechanic, husbandman, or any such person allowed to enter, unless he be summoned by the magistrates. It would be a charming use of the place, if the gymnastic exercises of the elder men were performed there. For in this noble practice different ages should be separated, and some of the magistrates should stay with the boys, while the grown-up men remain with the magistrates;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magistrates is the best mode of inspiring true modesty and ingenuous fear. There should also be a traders' agora, distinct and apart from the other, in a situation which is convenient for the reception of goods both by sea and land.

因为城墙应该被按适当的间隔修建的卫所和瞭望塔分隔开，而且全体公民必须被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公共餐桌，所以我们自然想到了，应该把一些公共餐桌建立在卫所里面。这些可以按照我们之前暗示过

的来安排，即执法官员们所在的公餐桌主桌占据一个合适的位置，还应该有一些建筑分配给宗教祭祀，除非是某些特殊的仪式，因为它们已经被法律或达尔菲神谕严格限制在特定的场所。公餐场所要是一个开阔而且可以从远处就看得见的地方，这样的场所既能给公餐这种美德以应有的崇敬，而且还能俯视整个临近区域。在这个场所的下方，应该修建一个公共广场，就像被帖撒利亚人称为“自由人之广场”的那种；这里应该禁止一切贸易活动，也禁止任何工匠，农民，或任何类似人等进入，除非是受到执政官的传召。如果老年人的健身活动可以在这里进行，那将成为这个广场的一个迷人的用途。因为在这项高贵的行为中，不同年龄的人应该分隔开来，尽管成年人应该留在执政官身边，但是还应该有些执政官与年轻人待在一起；因为执政官的存在是最佳的鼓励真正的谦卑和畏惧的方法。应该专门设一个商人的广场，与另一个样式不同而且彼此分开，这个广场的选址应该方便接收来自海上和陆路的货物。

But in speaking of the magistrates we must not forget another section of the citizens, viz., the priests, for whom public tables should likewise be provided in their proper place near the temples. The magistrates who deal with contracts, indictments, summonses, and the like, and those who have the care of the agora and of the city, respectively, ought to be established near an agora and some public place of meeting;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traders' agora will be a suitable spot; the upper agora we devote to the life of leisure, the other is intended for the necessities of trade.

但是，谈到执政官员，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另一群公民，即，祭司们，应该在靠近神庙的适宜的地方也为他们建立公共餐桌。那些负责处理契约、诉讼，法庭传唤，以及类似事项的执政机构，还有那些负责广场与城市公共场所的执政机构，应该分别安置在广场附近和某种公众聚会场所的附近；商人广场的临近区域就是个合适的位置；更高

处的广场我们将其专门用于休闲生活，而商业广场则用于交换必需品。

The same order should prevail in the country, for there too the magistrates, called by some “Inspectors of Forests” and by others “Wardens of the Country,” must have guardhouses and common tables while they are on duty; temples should also b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dedicated, some to Gods, and some to heroes.

同样的秩序也应该建立在乡间，因为，那里的执政官们，有人称他们为“森林视察员”，也有人称他们为“乡村管理员”，他们在执行公务时也必须有卫所和公共餐桌，神庙也应该散布在乡村地区，有些供奉众神，而有些则供奉英烈。

But it would be a waste of time for us to linger over details like these. The difficulty is not in imagining but in carrying them out. We may talk about them as much as we like, but the execution of them will depend upon fortune. Wherefore let us say no more about these matters for the present.

但纠缠于这些细节等于浪费时间。想象这些东西不难，难的是付诸实施。我们可以尽情地谈论这些事务，但是执行起来取决于命运。因此，有关这些内容，目前先说这么多。

Part 13

第十三章

Returning to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let us seek to determine out of what and what sort of elements the state which is to be happy and well-governed should be composed. There are two things in which all which all well-being consists: one of them is the choice of a right end and aim of action, and the other the discovery of the actions which are means towards it; for the means and the end may agree or disagree. Sometimes the right end is set before men, but in practice they fail to attain it; in other cases they are successful in all the means, but they propose to themselves a bad end; and sometimes they fail in both. Take, for example, the art of medicine; physicians do not always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health, and also the means which they use may not effect the desired end. In all arts and sciences both the end and the means should be equally within our control.

现在，回到政体本身，让我们来努力确定，一个城邦要想拥有幸福的生活和良好的秩序，应该由哪些元素组成。有两种事物是所有的幸福都需要的：一种是选择正确的目标和行为目的，另一种是发现达成目标的行为或手段；因为目标和手段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有时，正确的目标就摆在人们的面前，但是在实践中他们没有成功的将其实现；而其他的情况却是，他们所有的手段都成功了，但是他们为自己提出的目标是错的；而且有时他们的目标和手段都失败了。以医学为例；医师并非总能清楚健康的本质，而且，他们使用的手段也可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在所有的技艺和科学当中，我们对目标和手段应该有同等的控制。

The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which all men manifestly desire, some have the power of attaining, but to others, from some accident

or defect of nature, the attainment of them is not granted; for a good life requires a supply of external goods, in a less degree when men are in a good state, in a greater degree when they are in a lower state. Others again, who possess the conditions of happiness, go utterly wrong from the first in the pursuit of it. But since our object is to discover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that, namely, under which a city will be best governed, and since the city is best governed which has the greatest opportunity of obtaining happiness, it is evident that we must clearly ascertain the nature of happiness.

显然所有人都渴望幸福和良好的生活，其中有些人有能力获得它们，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因为某些偶然的原因或天生的缺陷，他们并没有被赋予获得幸福的能力；因为一个美好的生活离不开一定外在的物资，当人们状态良好时，对它们的需求程度较低，而当人们状态低落时，对它们的依赖程度则较高。还有一些人，他们具备了幸福的条件，但是在追求幸福之初就踏上了极端错误的道路。但是，由于我们的目标是发现最好的政体形式，即，顾名思义，在这种政体之下，一个城邦将拥有最良好的管理，而且，由于管理最良好的政体拥有最大的机会成就幸福，那么显然我们必须明确幸福的本质。

We maintain, and have said in the Ethics, if the arguments there adduced are of any value, that happiness is the realization and perfect exercise of virtue, and this not conditional, but absolute. And I used the term “conditional” to express that which is indispensable, and “absolute” to express that which is good in itself. Take the case of just actions; just punishments and chastisements do indeed spring from a good principle, but they are good only because we cannot do without them—it would be better that neither individuals nor states should need anything of the sort—but actions

which aim at honor and advantage are absolutely the best. The conditional action is only the choice of a lesser evil; whereas these are the foundation and creation of good. A good man may make the best even of poverty and disease, and the other ills of life; but he can only attain happiness under the opposite conditions (for this also has been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ethical arguments, that the good man is he for whom, because he is virtuous, the things that are absolutely good are good; it is also plain that his use of these goods must be virtuous and in the absolute sense good). This makes men fancy that external goods are the cause of happiness, yet we might as well say that a brilliant performance on the lyre was to be attributed to the instrument and not to the skill of the performer.

我们坚持认为，而且在《伦理学》中已经这样说过，假设在那里所引出的观点是价值的，那么幸福是美德的实现和完美实践，而且这不是有条件的，而是绝对的。我所说的“有条件的”，来表达那种不可或缺的条件；而“绝对的”意思是自身就是完美的，不需借助外力。以公正的行为为例，公正的惩罚依据的原则确实是好的，但是它们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我们离不开它们——但是，我们宁愿城邦也好，个人也好，都不需要这类措施——但是以荣誉和优势为目的之行为是绝对的最好。有条件的行为只不过是选择了小一点的罪恶；然而这些则不同，它们是美的奠基和创造。一个好人甚至能够用贫穷和疾病创造出至美，而其他人则只能创造出生活之痛苦；但是，他只能在相反的条件下获得幸福（因为这一点也已经确定并与《伦理学》中的观点一致，即，好人是这样的，因为他是有美德之人，所以对他来说，只有绝对好的事物才是好的；显然，他对这些事物的使用也必然是具有美德的，而且是绝对意义上的好）。这让人们以为，外物之美好是幸福的成因，然而，这就如同说一场精妙的竖琴演奏应该归功于乐器，而非琴师的琴技。

It follows then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that some things the legislator must find ready to his hand in a state, others he must provide. And therefore we can only say: May our state be constituted in such a manner as to be blessed with the goods of which fortune disposes (for we acknowledge her power): whereas virtue and goodness in the state are not a matter of chance but the result of knowledge and purpose. A city can be virtuous only when the citizens who have a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are virtuous, and in our state all the citizens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let us then inquire how a man becomes virtuous. For even if we could suppose the citizen body to be virtuous, without each of them being so, yet the latter would be better, for in the virtue of each the virtue of all is involved.

由此可见，城邦应预备某些要素，但其他的则由立法家提供。因此，我们只能说：愿命运会把她掌握的外物赐予我们（因为我们承认她的力量），让我们的城邦能有完美的政体：但是城邦的美德和善行不是幸运的产物，而是知识和目标造成的结果。一个城邦要想拥有美德，必须让所有参与城邦管理的公民都拥有美德，而在我们的城邦，所有的公民都参与城邦的管理；所以，让我们来研究如何让一个人拥有美德。因为，虽然并不是每个公民都有美德，但是有可能我们的公民整体是有美德的；当然了，如果公民个体也都有美德就更好了，因为整体的美德包含了每一个个体的美德。

There are three things which make men good and virtuous; these are nature, habit, rational principle. In the first place, every one must be born a man and not some other animal; so, too, he must have a certain character, both of body and soul. But some qualities there is no use in having at birth, for they are altered by habit, and there are some gifts which by nature are made to be

turned by habit to good or bad. Animals lead for the most part a life of nature, although in lesser particulars some are influenced by habit as well. Man has rational principle, in addition, and man only. Wherefore nature, habit, rational principle must be in harmony with one another; for they do not always agree; men do many things against habit and nature, if rational principle persuades them that they ought. We have already determined what natures are likely to be most easily molded by the hands of the legislator. An else is the work of education; we learn some things by habit and some by instruction.

有三种事物可以让一个人善良而且有美德；它们分别是天赋、习惯、和理性。首先，人必须生而为人，而不是其他的动物；同样，他必须有某种特点，既有身体方面的又有灵魂方面的。但是，有些天生的品质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会被习惯所改变，有些天生的本领就被习惯变好或变坏了。动物大多数时间是靠天赋生活，尽管在少量的细节上，它们也受习惯的影响。人是有理性思维的，而且，这是人独有的。因此，天赋、习惯、和理性三者必须协调一致；因为它们并不总是一致的，人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违背天赋和习惯的，因为理性原则说服他们应该如此。我们已经确定了什么样的天赋最容易被立法者引导向美德。其他的就需要教育来完成；因为我们有时候靠习惯学习，有时候靠教育。

Part 14

第十四章

Since every political society is composed of rulers and subjects let us consider whether the relations of one to the other should interchange or be permanent.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citizens will

necessarily vary with the answer given to this question. Now, if some men excelled others in the same degree in which gods and heroes are supposed to excel mankind in general (having in the first place a great advantage even in their bodies, and secondly in their minds), so that the superiority of the governors was undisputed and patent to their subjects, it would clearly be better that once for an the one class should rule and the other serve. But since this is unattainable, and kings have no marked superiority over their subjects, such as Scylax affirms to be found among the Indians, it is obviously necessary on many grounds that all the citizens alike should take their turn of governing and being governed. Equality consists in the same treatment of similar persons, and no government can stand which is not founded upon justice. For if the government be unjust every one in the country unites with the governed in the desire to have a revolution, and it is an impossibility that th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can be so numerous as to be stronger than all their enemies put together. Yet that governors should excel their subjects is undeniable. How all this is to be effected, and in what way they will respectively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the legislator has to consider. The subject has been already mentioned. Nature herself has provided the distinction when she made a difference between old and young within the same species, of whom she fitted the one to govern and the other to be governed. No one takes offense at being governed when he is young, nor does he think himself better than his governors, especially if he will enjoy the same privilege when he reaches the required age.

既然每个政治社会都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部分组成，那就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两者之间的位置是否可以对换，还是应该永恒不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那么对公民的教育也必然不同。假设一些人

超越他人的程度与人类想象力中众神和英雄们超越人类的程度一样（首先他们在身体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其次是他们的思想），从而使得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的优势毫无争议而且相当醒目，那么，让一种人永远统治，另一种人永远服从，这显然是更好的安排。但是，这样的假设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君王们相对于被统治者的优势，比如西拉克斯坚称的存在于印度人中间的那种显著差别，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所以，我们显然有充分理由认为，应该让全体公民无差别地轮流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平等即给相似的人以相同的待遇，而且，任何政体如果不是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之上，都不能够维持下去。因为如果一个政权是非正义的，那全国人民和被统治者们就会因为渴望革命而联合起来，而且一个政权不可能有那么多成员以至于能够比它所有的敌人加起来都更强大。然而，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即统治者应该比被统治者更优秀。如何造成这样的效果，以及用什么方法让他们各自分享政体的权力，这是立法家们应该解决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一主题。自然已经做出了区分，她把同一物种的个体分成老人和青壮年两个不同的群体，她让其中一群人适合做统治者，而让另一群人做被统治者。没有人在年轻时会因为被统治而感到受了冒犯，他也不认为自己比统治者更优秀，尤其是他知道自己只要达到了规定年龄也会享有同样的特权。

We conclude that from one point of view governors and governed are identical, and from another different. And therefore their education must be the same and also different. For he who would learn to command well must, as men say, first of all learn to obey. As I observed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treatise, there is one rule which is for the sake of the rulers and another rule which is for the sake of the ruled; the former is a despotic, the latter a free government. Some commands differ not in the thing commanded, but in the intention with which they are imposed. Wherefore, many apparently menial offices are an honor to the free youth by whom they are performed; for actions do not differ as honorable or

dishonorable in themselves so much as in the end and intention of them. But since we say that the virtue of the citizen and ruler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good man, and that the same person must first be a subject and then a ruler, the legislator has to see that they become good men, and by what means this may be accomplished, and what is the end of the perfect life.

从一个方面看，我们的结论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相同的，而从另一个角度得出的结论则是他们不相同。因此，他们的教育必须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谚语就是这么说的，“要想学会如何命令，必先学会服从命令”。正如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曾经说过，有一种统治是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另一种统治则是维护被统治者利益的，前者是“专制统治”，后者是“自由人统治”。有些命令的差别不在命令的内容，而在于发出命令者的意图。因此，很多明显是卑微的职务，对于完成它们的自由青年来说却是一种荣誉；所以行为之间没有太大的尊卑之别，真正的尊卑之别在于它们的目的或意图。但是，既然我们曾说过，公民和统治者的美德与好人的美德相同，而且，同一个人必须先做被统治者，然后才能做统治者，因此，立法者必须保证他们成为好人，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的，还有完美生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Now the soul of man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of which has a rational principle in itself, and the other, not having a rational principle in itself, is able to obey such a principle. And we call a man in any way good because he has the virtues of these two parts. In which of them the end is more likely to be found is no matter of doubt to those who adopt our division; for in the world both of nature and of art the inferior always exists for the sake of the better or superior, and the better or superior is that which has a rational principle. This principle, too, in our ordinary way of speaking, is divided into two kinds, for there is a practical and a speculative

principle. This part, then, must evidently be similarly divided. And there must be a corresponding division of actions; the actions of the naturally better part are to be preferred by those who have it in their power to attain to two out of the three or to all, for that is always to every one the most eligible which is the highest attainable by him. The whole of life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parts, business and leisure, war and peace, and of actions some aim at what is necessary and useful, and some at what is honorable. And the preference given to one or the other class of actions must necessarily be like the preference given to one or other part of the soul and its actions over the other; there must be war for the sake of peace, business for the sake of leisure, things useful and necessary for the sake of things honorable. All these points the statesman should keep in view when he frames his laws; he should consider the parts of the soul and their functions, and above all the better and the end; he should also remember the diversities of human lives and actions. For men must be able to engage in business and go to war, but leisure and peace are better; they must do what is necessary and indeed what is useful, but what is honorable is better. On such principles children and persons of every age which requires education should be trained. Whereas even the Hellenes of the present day who are reputed to be best governed, and the legislators who gave them their constitutions, do not appear to have framed their governments with a regard to the best end, or to have given them laws and education with a view to all the virtues, but in a vulgar spirit have fallen back on those which promised to be more useful and profitable. Many modern writers have taken a similar view: they commend the Lacedaemonian constitution, and praise the legislator for making conquest and war his sole aim, a doctrine which may be refuted by argument and has long ago been refuted by facts. For most men desire empire in the hope of accumulating the goods of fortune; and on this ground Thibron and all those who

have written about the Lacedaemonian constitution have praised their legislator, because the Lacedaemonians, by being trained to meet dangers, gained great power. But surely they are not a happy people now that their empire has passed away, nor was their legislator right. How ridiculous is the result, if, when they are continuing in the observance of his laws and no one interferes with them, they have lost the better part of life! These writers further err about the sort of government which the legislator should approve, for the government of freemen is nobler and implies more virtue than despotic government. Neither is a city to be deemed happy or a legislator to be praised because he trains his citizens to conquer and obtain dominion over their neighbors, for there is great evil in this. On a similar principle any citizen who could, should obviously try to obtain the power in his own state—the crime which the Lacedaemonians accuse king Pausanias of attempting, although he had so great honor already. No such principle and no law having this object is either statesmanlike or useful or right. For the same things are best both for individuals and for states, and these are the things which the legislator ought to implant in the minds of his citizens.

人的灵魂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包含一种理性原则；而另一部分，虽然不包含理性原则，却能够服从这种理性原则。我们说人性本善就是因为他有着这两个方面的美德。人生的目标更有可能发现于其中的哪一个呢？对于接受我们上述划分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艺术作品中，低劣者总是为了维护卓越者的利益而存在，而卓越者就是那些拥有理性原则者。这一原则，按照我们平时的讨论方式，又分为两种，一种实践原则和一种思辨原则。那么很显然，灵魂中理性的部分也必须进行类似的划分。而且，必须有一种对应的划分应用于行为方面；对于那些有能力获得三种行为的其中两种或全部三种的人而言，自然的更好的部分所做出的行为

应该更受他们的青睐，因为它们永远是每个人最有可能实现的最高级美好。整个生活也可以分为两部分，劳作与闲暇时光，战争与和平；在行为方面，有些以必要的和有用的为目标，而有些则以尊严为目标。而且，我们对这种或那种行为的偏爱，必须和我们对灵魂的两个部分及其各自的行为的偏爱相一致；要和平必须有战争，要闲暇时光必须有工作，要有尊严的事物必须有必要的和有用的事物。政治家在制定法律时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要点；他应该考虑灵魂的部分和它们的职能，尤其是更好的那一部分和最终目标；他同样应该记住人类生活和行为的多样性。原因是人们必须工作和参战，但是更美好的部分是闲暇时光与和平；他们必须做必需的和实际上有用的事，但是更好的是有尊严的事。孩子们和各种年龄段的要接受教育的人都应该进行上述原则的培训。但是，即使在今天，在以管理良好而著称的希腊人当中，那些立法者们，在为他们构建政体时似乎也没有考虑最美好的目标，而且在为他们制定法律和教育制度时也没有考虑所有的美德，相反，他们很庸俗地依赖那些有更高利润和更多实用价值的东西。很多现代作者也采取了相似的观点：他们推崇斯巴达政体，并赞扬其立法者把战争和征服作为立法的惟一目标，然而，这种主张是可以被驳倒的，而且很久以前就已经被事实驳倒了。因为大多数渴望建立强大帝国的人都希望积累财富；基于这种理由，茜勃隆和所有那些就斯巴达政体而著述的人们对斯巴达的立法者们大加赞扬，因为，斯巴达人通过训练如何面对危险，赢得了伟大的力量。但是，既然他们的帝国已经灭亡了，他们当然不是一个幸福的民族，他们的立法者也是错的。这个结果多么荒谬啊，即使他们能再继续遵守这种法律，而且没人干涉他们，可他们已经失去了生活中更美好的那一部分！这些作者们在立法者应该赞成什么样的政体类型这一问题上错的更多，因为自由人的统治更高尚而且暗示了比专制政体更多的美德。一个立法者也不应该因为训练他的公民去征服和奴役邻邦而受到赞扬，一个这样的城邦也不应该被认为是幸福的，因为这样的做法蕴含着巨大的邪恶。基于类似的原则，任何有能力的公民，显然都应该努力攫取本邦的权力——斯巴达人曾指责保塞尼亚斯王企图犯这种罪行，尽管他当时已经拥有了那么伟大的荣誉。任何此类原则和任何有着此类目标的法律都是不符合政治规律的，也是不正确的，和毫无用处的。因为，对于

个人和城邦而言，最好的事情都是一样的，这些才是立法者应该植入他的公民的思想的事情。

Neither should men study war with a view to the enslavement of those who do not deserve to be enslaved; but first of all they should provide against their own enslavement,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obtain empire for the good of the governed, and not for the sake of exercising a general despotism, and in the third place they should seek to be masters only over those who deserve to be slaves. Facts, as well as arguments, prove that the legislator should direct all his military and other measures to the provision of leisur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ce. For most of these military states are safe only while they are at war, but fall when they have acquired their empire; like unused iron they lose their temper in time of peace. And for this the legislator is to blame, he never having taught them how to lead the life of peace.

人们学习战争技巧也不应该以奴役那些不应该被奴役的人为目的；相反，首先，他们应该防止自己被奴役；其次，建立帝国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实行广泛的专制统治；第三，他们应该只寻求奴役那些天生应该做奴隶的人。事实和理论观点都证明，立法家应该用他的军事力量和其他的措施去提供闲暇时光和缔造和平。因为大多数好战的城邦只有在处于战争状态时才是稳固的，但是，在赢得了他们的帝国之后随即衰亡；就像一把尘封的宝剑在和平时期失去了威力一样。它们的立法者应该因此而受到指责，因为他从来没有教会他们如何过和平的生活。

Part 15

第十五章

Since the end of individuals and of states is the same, the end of the best man and of the best constitution must also be the same; it is therefore evident that there ought to exist in both of them the virtues of leisure; for peace, as has been often repeated, is the end of war, and leisure of toil. But leisure and cultivation may be promoted, not only by those virtues which are practiced in leisure, but also by some of those which are useful to business. For many necessaries of life have to be supplied before we can have leisure. Therefore a city must be temperate and brave, and able to endure: for truly, as the proverb says, “There is no leisure for slaves,” and those who cannot face danger like men are the slaves of any invader. Courage and endurance are required for business and philosophy for leisure, temperance and justice for both, and more especially in times of peace and leisure, for war compels men to be just and temperate, whereas the enjoyment of good fortune and the leisure which comes with peace tend to make them insolent. Those then who seem to be the best-off and to be in the possession of every good, have special need of justice and temperance—for example, those (if such there be, as the poets say) who dwell in the Islands of the Blest; they above all will need philosophy and temperance and justice, and all the more the more leisure they have, living in the midst of abundance.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seeing why the state that would be happy and good ought to have these virtues. If it be disgraceful in men not to be able to use the goods of life, it is peculiarly disgraceful not to be able to use them in time of leisure—to show excellent qualities in action and war, and when they have peace and leisure to be no better than slaves. Wherefore we should not practice virtue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Lacedaemonians. For they, while agreeing with other men in their conception of the highest goods, differ from the rest of mankind in

thinking that they are to be obtained by the practice of a single virtue. And since they think these goods and the enjoyment of them greater than the enjoyment derived from the virtues… and that it should be practiced for its own sake, is evident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we must now consider how and by what means it is to be attained.

既然个人和城邦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那么，最好的人和最好的政体，其目标也必然是相同的；因此，显然这两者应该都有着闲暇时光的美德；因为，正如我们反复说过的，和平是战争的目标，闲暇时光是劳动的目标。但是，闲暇时光和教养不仅能通过在闲暇时光中实践的美德来提高，还能通过那些有利于实业的事情来提高。因为，首先我们必须获得很多生活必需品的供给，然后才能拥有闲暇时光。因此，一个城邦必须克制而且勇敢，而且要能够忍耐；因为，真的像那句谚语所说，“没有为奴隶准备的闲暇时光”，那些不能像男人一样面对危险的人，面对任何入侵者只能沦为奴隶。勇敢和忍耐是实业所需要的，而哲学是闲暇时光所需要的，克制和正义是二者都必需的，而且在和平与闲暇时光时期尤为重要，因为战争迫使人做到公正和克制，但是，伴随和平而来的对财富和闲暇时光的享受会让人们变得傲慢。那些看上去最富裕，似乎拥有一切美好的人，尤其需要正义和克制——例如，那些（如果他们像诗人们描绘的那样真实存在）居住在福音岛的人们；他们最需要哲学、克制和正义，而且，他们拥有的闲暇时光越多，对这些美德之需求就越大，因为他们就生活在富足的中心。不难看出，为什么幸福和美好的城邦必须拥有这些美德。如果人们不能利用生活之美好是一种耻辱，那么不能在闲暇时光时期利用它们则是奇耻大辱——在战争和行动中表现出良好的品质，而在拥有和平与闲暇时光时却表现的像奴隶一样不堪。因此，我们不应该像斯巴达人那样去实践美德。因为他们虽然认同其他人对至高之美好的理解，但是却又跟其他的人类不同，他们相信可以通过实践单一的美德来达到至高之美好。而且，因为他们相信这些美好本身以及它们带来的享受比享受美德更重要……而且，我们应该为了美德自身而去实践

美德，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明确；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考虑通过什么方式和手段可以获得美德。

We have already determined that nature and habit and rational principle are required, and, of these, the proper nature of the citizens has also been defined by us. But we have still to consider whether the training of early life is to be that of rational principle or habit, for these two must accord, and when in accord they will then form the best of harmonies. The rational principle may be mistaken and fail in attaining the highest ideal of life, and there may be a like evil influence of habit. Thus much is clear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as in all other things, birth implies an antecedent beginning, and that there are beginnings whose end is relative to a further end. Now, in men rational principle and mind are the end towards which nature strives, so that the birth and moral discipline of the citizens ought to be ordered with a view to them. In the second place, as the soul and body are two, we see also that there are two parts of the soul, the rational and the irrational, and two corresponding states—reason and appetite. And as the body is prior in order of generation to the soul, so the irrational is prior to the rational. The proof is that anger and wishing and desire are implanted in children from their very birth, but reason and understanding are developed as they grow older. Wherefore, the care of the body ought to precede that of the soul, and the training of the appetitive part should follow: none the less our care of it must be for the sake of the reason, and our care of the body for the sake of the soul.

我们已经明确了天赋、习惯和理性是人所必需的；其中，我们已经对公民应该具有的正确天赋进行了定义。但是，我们还要考虑的

是，人生初期的训练应该是关于理性原则还是关于习惯，因为这两者必须一致，而且它们的一致能构成最好的和谐。理性原则可能会犯错，并且在获得至高生活理想方面遭遇失败，习惯也有类似的邪恶影响。因此，首先很明确的一点是，和其他事物一样，出身暗示着一个带着祖荫的开始，有一些开始，其目标关系着一个更远大的目标。现在，在人的身上，理性原则和思想是天赋努力实现的目标，所以，在对公民的出身和道德准则进行管理时应该以它们为目标。其次，由于灵魂和身体都具有独立性，而且我们知道灵魂分为两个部分，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还有两种与之对应的状态——理智和贪欲。而且，正如身体先于灵魂而产生，同样，非理性也先于理性。其证据就是饥饿、愿望和情欲在孩子出生时就已经存在于他们的身上，但是理智和理解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的。因此，对身体的照料应该早于对灵魂的关怀，而且，接下来应该是对贪欲的训练：然而，对它的关心是为了收获理智，同样，对身体的照料是为了收获高尚的灵魂。

Part 16

第十六章

Since the legislator should begin by considering how the frames of the children whom he is rearing may be as good as possible, his first care will be about marriage—at what age should his citizens marry, and who are fit to marry? In legislating on this subject he ought to consider the persons and the length of their life, that their procreative life may terminate at the same period, and that they may not differ in their bodily powers, as will be the case if the man is still able to beget children while the woman is unable to bear them, or the woman able to bear while the man is unable to beget, for from these causes arise quarrel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arried persons. Secondly, he must consider the time at which the children will succeed to their parents; there ought not to be too

great an interval of age, for then the parents will be too old to derive any pleasure from their affection, or to be of any use to them. Nor ought they to be too nearly of an age; to youthful marriages there are many objections—the children will be wanting in respect to the parents, who will seem to be their contemporaries, and disputes will arise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household. Thirdly, and this is the point from which we digressed, the legislator must mold to his will the frames of newly-born children. Almost all these objects may be secured by attention to one point. Since the time of generation is commonly limited within the age of seventy years in the case of a man, and of fifty in the case of a woman,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union should conform to these periods. The union of male and female when too young is bad for the procreation of children; in all other animals the offspring of the young are small and in-developed, and with a tendency to produce female children, and therefore also in man, as is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in those cities in which men and women are accustomed to marry young, the people are small and weak; in childbirth also younger women suffer more, and more of them die; some persons say that this was the meaning of the response once given to the Troezenians—the oracle really meant that many died because they married too young;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ingathering of the harvest. It also conduces to temperance not to marry too soon; for women who marry early are apt to be wanton; and in men too the bodily frame is stunted if they marry while the seed is growing (for there is a time when the growth of the seed, also, ceases, or continues to but a slight extent). Women should marry when they are about eighteen years of age, and men at seven and thirty; then they are in the prime of life, and the decline in the powers of both will coincide. Further, the children, if their birth takes place soon, as may reasonably be expected, will succe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ir prime, when the fathers are already in the decline of life, and

have nearly reached their term of three-score years and ten.

既然立法者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他抚养的孩子拥有尽可能好的身体，那他第一个关注的应该是婚姻——他的公民应该在什么年龄结婚，以及什么样的人适合结婚？在对这个主题进行立法时，他应该考虑人的职业以及他们的寿命，而且在同一时期他们的生育能力可能已经结束，但是他们的身体的力量可能没有变化，正如有些情况中，一个男人还有生育能力，但是他的妻子已经不能生育了，或者妻子还能够生育，但是男人已经不能生育了，因为这些原因会导致夫妻之间的争吵和分歧。第二，他必须考虑孩子们什么时间继承父母的家业；父子之间的年龄不能相差太多，因为那样的话，到时候父母就会太老了而感受不到孩子的照料带来的快乐，而且父母也不能对孩子有任何帮助了。但是，他们的年龄也不能太接近；有很多反对年轻人结婚的理由——孩子会缺乏对父母的尊敬，因为父母看起来就像他们的同龄人，而且会产生家务管理方面的纠纷。第三，这里是我们刚刚岔开话题的地方，即立法者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新出生的孩子们的体魄。几乎所有这些反对意见都可以通过关注一点而得到解决。因为对男人而言，生育年龄一般是在七十岁以内，而对于女人而言则是五十岁以内，所以男女之间结合的开始应该与这些时间一致。如果男人和女人过早结合对于生育孩子是有害的；在所有其他的动物中，年轻的动物产下的后代都是弱小且发育不完全的，而且这种动物以后更容易产生雌性后代。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类，有些城邦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里的男女习于很早结婚，所以那里的人体形瘦小孱弱；年轻女性在分娩中会遭受更多痛苦，死于分娩的也更多；有人说这就是特罗埃岑人得到的答复的真正含义——神谕真正的含义是很多特罗埃岑人死亡是因为他们结婚过早；而跟收获庄稼无关。不过早的结婚也有助于节欲；因为女性过早结婚更容易变得放荡；而男人如果在种子成长期结婚，也会妨碍他们的身体的发育（因为有一段时间种子的生长会停滞，或者即使继续生长，幅度也很微弱）。女性应该在十八岁左右结婚，而男人应该在三十七岁；那样他们都处于人生的成熟阶段，而且双方生育能力的下降也会同步。此外，如果孩子很快出生，

这一点可以合理的预见到，那么孩子可以在刚刚步入成熟年龄时继承家业，这时，父亲们已经处于生命的下行阶段，也几乎到七十岁了。

Thus much of the age proper for marriage: the season of the year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according to our present custom, people generally limit marriage to the season of winter, and they are right. The precepts of physicians and natural philosophers about generation should also be studied by the parents themselves; the physicians give good advice about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of the body, and the natural philosophers about the winds; of which they prefer the north to the south.

关于适于结婚的年龄就说这么多；还要考虑的问题是一年之中哪个季节适合结婚；按照现在的习俗，人们一般选在冬季结婚，这种选择是对的。夫妻双方应该认真学习医师和自然学家关于生育的箴言；医师们会就有利于生育的身体条件给出很好的建议，自然学家也会告诉他们关于风向的知识；其中他们更偏爱北风而非南风。

What constitution in the parent is most advantageous to the offspring is a subject which we will consider more carefully when we speak of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and we will only make a few general remarks at present. The constitution of an athlete is not suited to the life of a citizen, or to health, or to the procreation of children, any more than the valetudinarian or exhausted constitution, but one which is in a mean between them. A man's constitution should be inured to labor, but not to labor which is excessive or of one sort only, such as is practiced by athletes; he should be capable of all the actions of a freeman. These remarks apply equally to both parents.

父母应该有怎样的体质对孩子最为有益？关于这一主题，我们会在论述子女教育时进行更详细的考虑，而现在我们只做一些一般性评论。运动健将的身体并不比体弱多病或疲惫不堪的身体更适于普通公民的生活，或比普通公民更健康、更适于生育后代，但是有一种身体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中间体质。一个男人的身体应该习于劳动，但并不是像运动健将那样的过量的劳动或单一的劳动；他应该能够做出一个自由人的所有动作。这些评论对父母双方同样适用。

Women who are with child should be careful of themselves; they should take exercise and have a nourishing diet. The first of these prescriptions the legislator will easily carry into effect by requiring that they shall take a walk daily to some temple, where they can worship the gods who preside over birth. Their minds, however, unlike their bodies, they ought to keep quiet, for the offspring derive their natures from their mothers as plants do from the earth.

孕妇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应该经常的锻炼并摄入有营养的饮食。这些建议中的第一种，立法家可以轻松地实现，他可以规定她们每天必须散步到某一座神庙，在那里她们可以祭拜那些主司生育之神。相反，她们的思想和身体不同，这方面她们应该保持安详，因为后代的天赋来自于母亲就如同植物从土壤汲取养分一样。

As to the exposure and rearing of children, let there be a law that no deformed child shall live, but that on the ground of an excess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f the established customs of the state forbid this (for in our state population has a limit), no child is to be exposed, but when couples have children in excess, let

abortion be procured before sense and life have begun; what may or may not be lawfully done in these cases depends on the question of life and sensation.

至于对孩子是该抛之荒野还是悉心抚养，则应该制定法律，规定任何畸形的孩子都不得存活，但是这个法律的基础是孩子数量过多的情况，而如果一个城邦的固有习俗禁止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在我们的城邦设有人口限制），那么任何孩子都不得被抛弃，但是如果有些夫妇拥有过多的孩子，可以允许他们在孩子产生意识之前进行流产；这种行为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取决于人们对生命和意识的看法。

And now, having determined at what ages men and women are to begin their union, let us also determine how long they shall continue to beget and bear offspring for the state; men who are too old, like men who are too young, produce children who are defective in body and mind; the children of very old men are weakly. The limit then, should be the age which is the prime of their intelligence, and this in most persons, according to the notion of some poets who measure life by periods of seven years, is about fifty; at four or five years or later, they should cease from having families; and from that time forward only cohabit with one another for the sake of health; or for some similar reason.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男人和女人应该在什么年龄开始结合，然后我们来确定他们应该在多长时间内持续为城邦生产和抚养孩子；年龄过大的人和年龄过小的人一样，生育的孩子会有身体和心灵方面的缺陷；很老的男人孕育出的孩子也很孱弱。所以，这个限制应该是他们的智力的鼎盛时期，而这个时期，对很多人而言，根据有些以七年为一段来计算人生的诗人的观点，应该是在五十岁上下；在那之后四到

五年或更迟一点，他们就应该停止孕育后代了；从那以后，就只是为了健康而同居；或为了某些类似的原因。

As to adultery, let it be held disgraceful, in general, for any man or woman to be found in any way unfaithful when they are married, and called husband and wife. If during the time of bearing children anything of the sort occur, let the guilty person be punished with a loss of privileges in proportion to the offense.

至于通奸的行为，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已经成婚，而且称为夫妇的时期，任何男方或女方如果被发现有任何不忠行为，都应该被认为是可耻的。如果在孕产期间发生这类的行为，犯罪者应该按情节轻重，被处以剥夺部分公民权益的惩罚。

Part 17

第十七章

After the children have been born, the manner of rearing them may be supposed to have a great effect on their bodily strength. It would appear from the example of animals, and of those nations who desire to create the military habit, that the food which has most milk in it is best suited to human beings; but the less wine the better, if they would escape diseases. Also all the motions to which children can be subjected at their early age are very useful. But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ir tender limbs from distortion, some nations have had recourse to mechanical appliances which straighten their bodies. To accustom children to the cold from their earliest years is also an excellent practice, which greatly conduces to health, and

hardens them for military service. Hence many barbarians have a custom of plunging their children at birth into a cold stream; others, like the Celts, clothe them in a light wrapper only. For human nature should be early habituated to endure all which by habit it can be made to endure; but the process must be gradual. And children, from their natural warmth, may be easily trained to bear cold. Such care should attend them in the first stage of life.

孩子出生以后，他们的抚养方式应该说对他们的身体的力量有巨大影响。以动物为例，以及在那些渴望培养尚武之习惯的民族中，可以看出包含有大量乳制品的食物是最适合人类的；但是如果他们要避免生病，则越少饮酒越好。而且，所有孩子们在幼年时期可以从事的运动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为了保护他们娇嫩的四肢不发生畸形，有些民族借助于机械装置来让他们的身体保持挺拔。让孩子们从小就习于寒冷也是一项非常出色的练习，它可以极大地增进健康，让他们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因此，很多野蛮民族习于把刚出生的孩子贯入寒冷的溪流中；其他的，如凯尔特人，只给他们裹一层薄衫。原因是应该尽早让人类的天赋习于忍受那些他们会习于忍受的东西；但是这个过程一定要循序渐进。而且，孩子们，由于天生的热度，可以很轻松地学会忍受寒冷。这种关照应该伴随他们人生的第一阶段。

The next period lasts to the age of five; during this no demand should be made upon the child for study or labor, lest its growth be impeded; and there should be sufficient motion to prevent the limbs from being inactive. This can be secured, among other ways, by amusement, but the amusement should not be vulgar or tiring or effeminate. The Directors of Education, as they are termed, should be careful what tales or stories the children hear, for all such things are designed to prepare the way for the business of later life, and should be for the most part imitations of the occupations which

they will hereafter pursue in earnest. Those are wrong who in their laws attempt to check the loud crying and screaming of children, for these contribute towards their growth, and, in a manner, exercise their bodies. Straining the voice has a strengthening effect similar to that produced by the retention of the breath in violent exertions. The Directors of Education should have an eye to their bringing up, and in particular should take care that they are left as little as possible with slaves. For until they are seven years old they must five at home; and therefore, even at this early age, it is to be expected that they should acquire a taint of meanness from what they hear and see. Indeed, there is nothing which the legislator should be more careful to drive away than indecency of speech; for the light utterance of shameful words leads soon to shameful actions. The young especially should never be allowed to repeat or hear anything of the sort. A freeman who is found saying or doing what is forbidden, if he be too young as yet to have the privilege of reclining at the public tables, should be disgraced and beaten, and an elder person degraded as his slavish conduct deserves. And since we do not allow improper language, clearly we should also banish pictures or speeches from the stage which are indecent. Let the rulers take care that there be no image or picture representing unseemly actions, except in the temples of those Gods at whose festivals the law permits even ribaldry, and whom the law also permits to be worshipped by persons of mature age on behalf of themselves,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wives. But the legislator should not allow youth to be spectators of iambi or of comedy until they are of an age to sit at the public tables and to drink strong wine; by that time education will have armed them against the evil influences of such representations.

下一个阶段持续到五岁；在此期间，不应该对孩子做任何学习和

劳动方面的要求，以免妨碍他们的成长；而且应该有足够的运动以避免四肢变得迟钝。这一点可以通过游戏来实现，当然也有其他方法，但是这种游戏不能是粗俗的、令其疲惫的或阴柔的。所谓的“教育督导”必须注意应该让孩子听什么样的故事或传说，因为所有这类事物的设计都是为了未来的事业做铺垫，所以，应该大部分都是对孩子们今后会努力追求的那些职业的模仿。那些在立法中试图禁止孩子们大声嚎哭或尖叫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那些行为促成了他们的成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锻炼了他们的身体。用力喊叫有一种强化身体的效果，类似于在剧烈运动中屏住呼吸的效果。教育督导应该关注他们的抚养，尤其应该尽可能减少把他们交给奴隶照看的次数。因为，七岁以前，他们必须住在家里；因此，即使还那么幼小，可以预见他们会从所见所闻中受到一些卑贱的污染。确实如此，没有比这一点更应该引起立法者注意的了，即剔除不礼貌的语言；因为随意说出的可耻的话语，很快就会导致可耻的行为。所以，年轻人应该永远不被允许听到或重复这类话语。一个自由人如果被发现说了违禁的话或做了违禁的事，当他还太小以至于还没有权力享有公共餐桌上的席位时，那么就应该对他进行呵斥和体罚，而如果是一个老年人却做出像奴隶一般的言行，就应该给以与之相应的降级等处罚。既然我们不允许不当的言辞，显然，我们也应该禁止舞台上出现不体面的图片和语言。统治者应该注意禁止任何代表不雅行为的图片或雕像，除非是在某些神庙内部，在他们的节日上，法律甚至允许下流行为的存在，而且法律也允许成年男性代表自己，代表自己的孩子们以及自己的妻子们，去膜拜这些神。但是立法者应该禁止年轻人观看俚俗诗和喜剧表演，直到他们达到能够在公共餐桌上拥有席位并且可以饮用烈酒的年龄；到时候，教育应该已经给与了他们抵御这些表演的邪恶影响的能力。

We have made these remarks in a cursory manner—they are enough for the present occasion; but hereafter we will return to the subject and after a fuller discussion determine whether such liberty should or should not be granted, and in what way granted, if at all. Theodorus, the tragic actor, was quite right in saying that he would

not allow any other actor, not even if he were quite second-rate, to enter before himself, because the spectators grew fond of the voices which they first heard. And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universally to association with things as well as with persons, for we always like best whatever comes first. And therefore youth should be kept strangers to all that is bad, and especially to things which suggest vice or hate. When the five years have passed away, during the two following years they must look on at the pursuits which they are hereafter to learn. There are two periods of life with reference to which education has to be divided, from seven to the age of puberty, and onwards to the age of one and twenty. The poets who divide ages by sevens are in the main right: but we should observe the divisions actually made by nature;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nature are what art and education seek to fill up.

虽然我们的论述较为粗略，但是对于目前来讲应该够了；但是在后边的内容里，我们还会回到这个主题，并对其进行更充分的讨论，从而确定是否应该许可这样的自由，如果是的话，又以何种方式许可。悲剧演员西奥多勒斯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他说，他不允许任何其他演员先于他登台，即使是非常次要的演员也不行，因为“观众会喜欢上第一个被他们听到的声音”。同样的原理也广泛地适用于所有的事物之间的关联，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为我们总是最喜欢最早出现的那一个。因此，应该禁止年轻人接触任何坏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暗示邪恶和仇恨的东西。当最初的五年过去之后，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应该观摩一些职业，而这些将是他们今后要学习的。人生有两个重要阶段，而教育必须参照它们分为两段，从七岁到青春期为第一段，青春期一直到二十一岁为第二段。有些诗人们把人生分成每七年为一段，这种做法基本正确：但是我们还是应该遵循自然的划分；因为教育和技艺的意义就是补充自然的不足之处。

Let us then first inquire if any regulations are to be laid down about children, and secondly, whether the care of them should be the concern of the state or of private individuals, which latter is in our own day the common custom, and in the third place, what these regulations should be.

接下来的部分，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首先，是否应该制定一些关于儿童的规定，其次，照料孩子应该是城邦的责任还是个人的，后者是当今常见的做法，第三，这些规定应该是什么。

Book Eight

第八卷

Part 1

第一章

No one will doubt that the legislator should direct his attention above all to the education of youth; for the neglect of education does harm to the constitution The citizen should be molded to suit the form of government under which he lives. For each government has a peculiar character which originally formed and which continues to preserve it. The character of democracy creates democracy, and the character of oligarchy creates oligarchy; and always the better the character, the better the government.

毫无疑问，所有人都认为立法者应该首先关注年轻人的教育问题，因为无视教育对政体有害。公民应该被塑造成适应他所在政体的模样。这是因为每个城邦在形成之初都有它独特的性格，而且这种性格的形成也是为了维持政权的存在。城邦政治中的平民性格会催生出平民政体；寡头性格也能催生出寡头政体。而且永远是这种性格越好，其政体也就越好。

Again, for the exercise of any faculty or art a previous training and habituation are required; clearly therefore for the practice of virtue. And since the whole city has one end, it is manifest that education should be one and the same for all, and that it should be public, and not private—not as at present, when every one looks

after his own children separately, and gives them separate instruction of the sort which he thinks best; the training in things which are of common interest should be the same for all. Neither must we suppose that any one of the citizens belongs to himself, for they all belong to the state, and are each of them a part of the state, and the care of each par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are of the whole. In this particular as in some others the Lacedaemonians are to be praised, for they take the greatest pains about their children, and make education the business of the state.

其次，要实践一种能力或者技艺必须有前期的训练和习惯的养成；因此，显然对于美德的实践也有同样的要求。既然整个城邦有一个共同目标，所有人的教育显然也应该是同一种，而且应该是公共的，而非私人的——不像现在这样，大家都在自己的家里单独照料自己的子女，并按照自己的认为的最好的方式来给予他们单独的教导。那些关系到共同利益方面的训练，应该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也不应该认为任何一个公民只属于他自己，因为他们都属于城邦，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是城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每个部分的关照与对于整体的关照是不可分割的。在这一点上和其他方面一样，斯巴达人是值得称道的，因为他们为后代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并使教育成为城邦的职责。

Part 2

第二章

That education should be regulated by law and should be an affair of state is not to be denied, but what should be the character of this public education, and how young persons should be educated, are questions which remain to be considered. As things

are, there is disagreement about the subjects. For mankind are by no means agreed about the things to be taught, whether we look to virtue or the best life. Neither is it clear whether education is more concerned with intellectual or with moral virtue. The existing practice is perplexing; no one knows on what principle we should proceed—should the useful in life, or should virtue, or should the higher knowledge, be the aim of our training; all three opinions have been entertained. Again, about the means there is no agreement; for different persons, starting with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nature of virtue, naturally disagree about the practice of it.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children should be taught those useful things which are really necessary, but not all useful things; for occupations are divided into liberal and illiberal; and to young children should be imparted only such kinds of knowledge as will be useful to them without vulgarizing them. And any occupation, art, or science, which makes the body or soul or mind of the freeman less fit for the practice or exercise of virtue, is vulgar; wherefore we call those arts vulgar which tend to deform the body, and likewise all paid employments, for they absorb and degrade the mind. There are also some liberal arts quite proper for a freeman to acquire, but only in a certain degree, and if he attend to them too closely, in order to attain perfection in them, the same evil effects will follow. The object also which a man sets before him makes a great difference; if he does or learns anything for his own sake or for the sake of his friends, or with a view to excellence the action will not appear illiberal; but if done for the sake of others, the very same action will be thought menial and servile. The received subjects of instruction, as I have already remarked, are partly of a liberal and party of an illiberal character.

没有人会否认教育应该受法律约束，并且应该是城邦的公共事

务，但是公共教育的特点是什么，应该如何教育年轻人，这些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在许多事情上一样，人们在课程设置方面也存在分歧。原因是在“教什么”这个问题上，是以美德为目标，还是以最好的生活为目标，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我们也不清楚教育应该是关心智力还是关心道德情操。现行的做法令人感到困惑；没有人知道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原则——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对生活有用的东西，或是美德，还是更高深的知识；人们对三种观点都有过考虑。同理，人们对教育的手段也有分歧；因为不同的人，从对于美德本质的不同认识出发，所以自然对其实践方式各执己见。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被教会孩子们一些真正必要的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所有有用的东西；因为职业可以分为自由的和非自由的两种；应该只传授给年轻人那种对他们有用但又不会把他们变得庸俗的知识。无论哪种职业、艺术还是科学，如果它们会降低自由人的身体和心灵对于实践美德的适应程度，那么它们就是庸俗的；我们就把这样的技艺称作庸俗技艺是因为它们往往使身体变得畸形，全部的有偿工作也是这样，因为它们吞噬人的心灵并使其退化。也有一些相当适合自由人掌握的自由技艺，但是要把握一定尺度，如果为了达到完美的状态过于沉浸其中，也会出现同样的不良后果。一个人设定的目标也会对他的教育产生很大影响；如果他学习什么或者做什么是为了自己的或朋友的利益，或是为了出类拔萃，那么这种行为并不会显得那么不自由；如果这样做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同样的行为就会被看成是卑微的和低贱的。正如我所讲的那样，各个学科的教导应该兼具部分自由的和部分不自由的特点。

Part 3

第三章

The customary branches of education are in number four; they are—(1) reading and writing, (2) gymnastic exercises, (3) music, to which is sometimes added (4) drawing. Of these,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drawing are regarded as useful for the purposes of life

in a variety of ways, and gymnastic exercises are thought to infuse courage. concerning music a doubt may be raised—in our own day most men cultivate it for the sake of pleasure, but originally it was included in education, because nature herself, as has been often said, requires that we should be able, not only to work well, but to use leisure well; for, as I must repeat once again, the first principle of all action is leisure. Both are required, but leisure is better than occupation and is its end; and therefore the question must be asked, what ought we to do when at leisure? Clearly we ought not to be amusing ourselves, for then amusement would be the end of life. But if this is inconceivable, and amusement is needed more amid serious occupations than at other times (for he who is hard at work has need of relaxation, and amusement gives relaxation, whereas occupation is always accompanied with exertion and effort), we should introduce amusements only at suitable times, and they should be our medicines, for the emotion which they create in the soul is a relaxation, and from the pleasure we obtain rest. But leisure of itself gives pleasure and happiness and enjoyment of life, which are experienced, not by the busy man, but by those who have leisure. For he who is occupied has in view some end which he has not attained; but happiness is an end, since all men deem it to be accompanied with pleasure and not with pain. This pleasure, however, is regarded differently by different persons, and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habit of individuals; the pleasure of the best man is the best, and springs from the noblest sources. It is clear then that there are branches of learning and education which we must study merely with a view to leisure spent in intellectual activity, and these are to be valued for their own sake; whereas those kinds of knowledge which are useful in business are to be deemed necessary, and exist for the sake of other things. And therefore our fathers admitted music into education, not on the ground either of its necessity or utility, for it is not necessary, nor indeed useful in the

same manner as reading and writing, which are useful in money-mak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a household, in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and in political life, nor like drawing, useful for a more correct judgment of the works of artists, nor again like gymnastic, which gives health and strength; for neither of these is to be gained from music. There remains, then, the use of music for intellectual enjoyment in leisure; which is in fact evidently the reason of its introduction, this being one of the ways in which it is thought that a freeman should pass his leisure; as Homer says, “But he who alone should be called to the pleasant feast,” and afterwards he speaks of others whom he describes as inviting “The bard who would delight them all.”

教育通常被划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一）阅读和写作，（二）体育锻炼，（三）音乐，有时还会加上一条（四）绘画。其中阅读、写作和绘画被认为对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有用处，而体育锻炼被认为可以增添人的勇气。至于音乐，这里略有疑惑——如今人们培养这方面的能力是为了快乐，但最初把它归入教育，是因为如前文所述，大自然要求我们不仅要能够工作地好，还要能够好好地利用闲暇时光；正如我必须重申观点的一样，人类所有行为的第一原则是闲暇时光。两者都是我们需要的，但是闲暇时光比工作更好，并且是工作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闲暇时光时我们应该做什么？显然，我们不应该自娱自乐，因为那样做就让娱乐成为了生活的目标。如果这种观点令人惊讶，而且比起其他的时刻，在重要的工作间隙更加需要娱乐活动（因为辛勤劳动的人需要放松，娱乐可以让人放松，而工作则总是伴随着努力和付出），那么，我们应该只在适宜的时间引入娱乐活动，而且它们应该是我们的良药，因为它们在灵魂中激发出来的这种情感就是一种放松，而从这种愉悦中我们获得了休息。但是，闲暇时光本身就给人以愉悦、幸福和生活的享受，这些感受只有拥有闲暇时光的人能体会到，忙碌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原因是那些忙碌的人心中总有着还没有实现的目标；但是，幸福就是一种目

标，因为所有的人都明白幸福总是伴随着愉悦，而不是痛苦。然而，不同的人对这种愉悦的看法也不同，它随个体的习惯不同而变化；最好的人的愉悦感也是最好的，并且来自于最高尚的源泉。很明显，教育和知识的某些方面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只是为了花费在智力活动中的闲暇时光，而且这些知识应该因其自身而受到重视；然而，那些对实业有用的知识也应该看作是必要的，而且它们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其他事物的利益。因此，我们的父辈把音乐加入到教育当中，并不是基于它的必要性和实用性，因为它不是必需的，事实上它也不像阅读和写作一样有用，后两种技能可以用来赚钱，用于家务管理，用于获得知识和政治生活；它也不像绘画那样，可以用来更准确地评判艺术作品，它也不像体育那样，能够给人健康和力量，因为这些东西都无法从音乐中获得。那么，剩下的就是在闲暇时光时用音乐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实际上这也是它被引入教育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它被认为是自由人应该度过闲暇时光的方式之一；正如荷马所说："只有他应该被唤到我的欢愉之宴，"后来，他又谈到其他人邀请了"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的诗人"。

And in another place Odysseus says there is no better way of passing life than when men's hearts are merry and "The banqueters in the hall, sitting in order, hear the voice of the minstrel."

在另一个地方，奥德修斯说，没有什么比这样更好的度日方式了，这一刻人们满心欢愉而且"盛宴飘香，嘉宾安坐，聆听诗人吟诵。"

It is evident, then, that there is a sort of education in which parents should train their sons, not as being useful or necessary, but because it is liberal or noble. Whether this is of one kind only, or of more than one, and if so, what they are, and how they are to be

imparted, must hereafter be determined. Thus much we are now in a position to say, that the ancients witness to us; for their opinion may be gathered from the fact that music is one of the received and traditional branches of education. Further, it is clear that children should be instructed in some useful things—for example, in reading and writing—not only for their usefulness, but also because many other sorts of knowledge are acquired through them. With a like view they may be taught drawing, not to prevent their making mistakes in their own purchases, or in order that they may not be imposed upon in the buying or selling of articles, but perhaps rather because it makes them judges of the beauty of the human form. To be always seeking after the useful does not become free and exalted souls. Now it is clear that in education practice must be used before theory, and the body be trained before the mind; and therefore boys should be handed over to the trainer, who creates in them the roper habit of body, and to the wrestling-master, who teaches them their exercises.

显然，有一种教育是由父母来训练他们的孩子，不是因为它是有用的或必需的，而是因为它是自由的、高尚的。这种教育是只有一种，还是多种？如果是后者，它们分别是什么？应该如何教授？接下来我们必须确定这些问题的答案。就目前所知我们只能说，上述这些是古人为我们证明了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总结出他们的观点，即音乐是一种为人们所接受的、传统的教育内容。另外，显然孩子们应该被教授一些有用的知识——如，阅读和写作——不仅因为它们有用，而且因为通过它们能学到其他的知识。出于相似的考虑可以教授他们绘画，不是为了防止他们在自己购买画作时出错，也不是为了让他们在买卖物品不被欺骗，或许反而是因为这能让他们成为人类所塑造的美的评判者。一味地追求实用不能给人以自由和超脱的灵魂。显然，在教育中，实践应该先行于理论，而身体的训练也应先于精神的训练，因此，孩子们应该交给教官，他会培养他们正确的身

体习惯；还应该交给摔跤大师，他会教他们锻炼的方法。

Part 4

第四章

Of those states which in our own day seem to take the greatest care of children, some aim at producing in them an athletic habit, but they only injure their forms and stunt their growth. Although the Lacedaemonians have not fallen into this mistake, yet they brutalize their children by laborious exercises which they think will make them courageous. But in truth, as we have often repeated, education should not be exclusively, or principally, directed to this end. And even if we suppose the Lacedaemonians to be right in their end, they do not attain it. For among barbarians and among animals courage is found associated, not with the greatest ferocity, but with a gentle and lion like temper. There are many races who are ready enough to kill and eat men, such as the Achaeans and Heniochi, who both live about the Black Sea; and there are other mainland tribes, as bad or worse, who all live by plunder, but have no courage. It is notorious that the Lacedaemonians themselves, while they alone were assiduous in their laborious drill, were superior to others, but now they are beaten both in war and gymnastic exercises. For their ancient superiority did not depend on their mode of training their youth, but only on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y trained them when their only rivals did not. Hence we may infer that what is noble, not what is brutal, should have the first place; no wolf or other wild animal will face a really noble danger; such dangers are for the brave man. And parents who devote their children to gymnastics while they neglect their necessary education, in reality vulgarize them; for they make them

useful to the art of statesmanship in one quality only, and even in this the argument proves them to be inferior to others. We should judge the Lacedaemonians not from what they have been, but from what they are; for now they have rivals who compete with their education; formerly they had none.

在我们的时代，有些城邦似乎最重视年轻人的培养，其中有些致力于让他们养成一种运动健将的习惯，结果却损害了他们的形体，阻碍了他们的成长。尽管斯巴达人没有陷入到这样的错误当中，但是他们用繁重的训练把他们的子女变得野蛮，他们以为这样能让孩子们变得勇敢。但实际上，正如我们经常重复的那样，教育不应绝对地，或主要地指向这一目标。即使我们假设斯巴达人的目标是对的，可他们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在野蛮人和野兽身上，人们发现与勇气有关的并非最凶猛的性情，而是一种柔和的，如狮子一般的性情。有很多种族随时准备杀戮和宰食生人，如亚该亚人和赫尼欧迟人，他们都生活在黑海附近；还有其他大陆上的部落，与前二者同样的凶残或更恶劣，他们完全靠劫掠为生，但是并不勇敢。令人惋惜的是斯巴达人，他们是惟一曾对年轻人进行极度严苛体能训练的城邦；那时他们的强大远胜其他城邦，但现在却在体育竞技和战争中双双被打败。因为，他们曾经的辉煌并不是靠着训练年轻人的方式，仅仅是靠着这一事实，即他们对年轻人进行了训练，而这时候他们的对手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可以据此推断，高尚的性情应该占据首要地位而非野蛮的性情；狼群和其他动物都不会面临真正高尚的危险；这样的危险是为勇敢者准备的。有些父母让孩子完全投身于体育训练，同时却忽略了他们必需的教育，事实上这样做会让孩子变得低俗；原因是他们只让孩子们具备了一种对政治家技艺有用的品质，即便在这一方面也有研究证明他们比不上其他人。我们对于斯巴达人的判断应该基于他们现在的模样而不是曾经的强大；因为当前在教育上他们有很多竞争对手，而过去则没有。

It is an admitted principle, that gymnastic exercises should be employed in education, and that for children they should be of a lighter kind, avoiding severe diet or painful toil, lest the growth of the body be impaired. The evil of excessive training in early years is strikingly proved by the example of the Olympic victors; for not more than two or three of them have gained a prize both as boys and as men; their early training and severe gymnastic exercises exhausted their constitutions. When boyhood is over, three years should be spent in other studies; the period of life which follows may then be devoted to hard exercise and strict diet. Men ought not to labor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ir minds and with their bodies; for the two kinds of labor are opposed to one another; the labor of the body impedes the mind, and the labor of the mind the body.

这是一个公认的原则，体育锻炼应该是教育的一部分，对于孩子们应采用轻松点的训练方式，避免极度控制饮食或者进行艰苦的训练，以免损害身体的成长。年轻时过量训练的恶果在奥林匹克优胜者身上已经得到了显著的证实，因为，他们当中能在少年时和成年后都赢得一个奖项的不超过两三个人；他们早期的训练和残酷的体育锻炼累垮了他们的身体。当青少年时期过去，应该花三年时间学习其他知识，但随后的日子可能被用于艰苦的训练和严格的饮食控制。人不应该在一个阶段同时付出体力和脑力劳动；因为两种劳动是相互矛盾的，体力劳动妨碍思维，而脑力劳动也妨碍身体的发挥。

Part 5

第五章

Concerning music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which we have already raised; these we may now resume and carry further; and

our remarks will serve as a prelude to this or any other discussion of the subject. It is not easy to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music, or why any one should have a knowledge of it. Shall we say, for the sake of amusement and relaxation, like sleep or drinking, which are not good in themselves, but are pleasant, and at the same time "care to cease," as Euripides says? And for this end men also appoint music, and make use of all three alike—sleep, drinking, music—to which some add dancing. Or shall we argue that music conduces to virtue, on the ground that it can form our minds and habituate us to true pleasures as our bodies are made by gymnastic to be of a certain character? Or shall we say that it contributes to the enjoyment of leisure and mental cultivation, which is a third alternative? Now obviously youths are not to be instructed with a view to their amusement, for learning is no amusement, but is accompanied with pain. Neither is intellectual enjoyment suitable to boys of that age, for it is the end, and that which is imperfect cannot attain the perfect or end. But perhaps it may be said that boys learn music for the sake of the amusement which they will have when they are grown up. If so, why should they learn themselves, and not, like the Persian and Median kings, enjoy the pleasure and instruction which is derived from hearing others? (for surely persons who have made music the business and profession of their lives will be better performers than those who practice only long enough to learn). If they must learn music, on the same principle they should learn cookery, which is absurd. And even granting that music may form the character, the objection still holds: why should we learn ourselves? Why cannot we attain true pleasure and form a correct judgment from hearing others, like the Lacedaemonians?—for they, without learning music, nevertheless can correctly judge, as they say, of good and bad melodies. Or again, if music should be used to promote cheerfulness and refined intellectual enjoyment, the objection still remains—why should we

learn ourselves instead of enjoying the performances of others? We may illustrate what we are saying by our conception of the Gods; for in the poets Zeus does not himself sing or play on the lyre. Nay, we call professional performers vulgar; no freeman would play or sing unless he were intoxicated or in jest. But these matters may be left for the present.

关于音乐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可以继续就这些问题进一步地探讨；而且我们的见解也可以当作是对这一主题的所有讨论的序曲包括本次讨论在内。要确定音乐的本质或为什么人应该懂音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为了娱乐和休闲，正如睡觉和饮酒一样，本身虽不是好事，但是却让人快乐，同时正如欧里庇得斯所言，“谁想停下来呢？”为了同一目标，人们也使用音乐，并且把三者做类似的使用——睡觉、饮酒、音乐——在此之上还有人添加了舞蹈。或许我们应该辩解说音乐有助于形成美德，理由是它能塑造我们的精神，让我们习于真正的快乐，正如体育锻炼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具有一定的特点那样。或者我们要说音乐有助于我们享受闲暇时光，并且促进精神修养，它是我们的第三种选择。显然对年轻人的教导不能以娱乐为目标，因为学习不是娱乐，而是与痛苦相伴。精神的享受也不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们，因为它是终极目标，而还不完善的人也无法达到完美或终极目标。但是，或许可以说孩子们是为了娱乐才学习音乐，这种娱乐到成人后才会拥有。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亲自学习音乐呢？为什么不像波斯和美第安诸王们那样，享受聆听他人演奏所带来的快乐和教导呢？（因为，那些靠音乐为生，或者把音乐当作职业的人当然会是更好的表演者，比那些初学者要好。）如果说他们必须学音乐，同理他们应该学厨艺，这种观点就很荒唐。即使我们承认音乐能塑造性格，但反对意见依然有效：为什么我们要亲自学习？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聆听他人的表演来获得真正的愉悦并形成正确的判断力，就像斯巴达人那样？——因为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虽然他们不学音乐，但仍可正确地判断好的旋律和坏的旋律。同理，如果音乐应该用来提升快乐的氛围，或者提升高雅的精神享受，这一

反对意见仍然有效——为什么我们要亲自学习，而不是享受他人的表演？我们可以用我们对诸神的认识来解释我们正在谈论的内容；因为，在诗人当中，宙斯不会自己唱歌或弹奏竖琴。不但如此，我们还把职业表演者称作庸俗的人；没有自由人会弹乐器，或者唱歌，除非他喝醉了或者在开玩笑。但是，这些问题我们先说这么多。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ether music is or is not to be a part of education. Of the three things mentioned in our discussion, which does it produce?—education or amusement or intellectual enjoyment, for it may be reckoned under all three, and seems to share in the nature of all of them. Amusement is for the sake of relaxation, and relaxation is of necessity sweet, for it is the remedy of pain caused by toil; and intellectual enjoyment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o contain an element not only of the noble but of the pleasant, for happiness is made up of both. All men agree that music is one of the pleasantest things, whether with or without songs; as Musaeus says: “Song to mortals of all things the sweetest.”

第一个问题是，音乐应不应该成为教育的一部分。在我们提到的三件事上，音乐可以带来什么呢？——教育、娱乐或是精神享受，原因是我们可以认为它跟三者都有关联，同时它似乎与它们拥有共同的本质。娱乐是为了放松，放松必然是甜蜜的，因为它是疗伤药，能治愈劳作引起的痛苦；精神享受被广泛地认为包含了高尚和愉快的元素，因为幸福感是由这两种元素构成的。所有的人都赞同音乐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情之一，无论是否伴随着歌唱；正如谬色奥所言：“对凡人来说，最甜蜜的莫若于歌唱。”

Hence and with good reason it is introduced into social gatherings and entertainments, because it makes the hearts of men

glad: so that on this ground alone we may assume that the young ought to be trained in it. For innocent pleasures are not only in harmony with the perfect end of life, but they also provide relaxation. And whereas men rarely attain the end, but often rest by the way and amuse themselves, not only with a view to a further end, but also for the pleasure's sake, it may be well at times to let them find a refreshment in music. It sometimes happens that men make amusement the end, for the end probably contains some element of pleasure, though not any ordinary or lower pleasure; but they mistake the lower for the higher, and in seeking for the one find the other, since every pleasure has a likeness to the end of action. For the end is not eligible for the sake of any future good, nor do the pleasures which we have described exist for the sake of any future good but of the past, that is to say, they are the alleviation of past toils and pains. And we may infer this to be the reason why men seek happiness from these pleasures.

因此，人们有充分理由把它引入到了社交聚会和娱乐活动中，因为它令人们心情舒畅，仅仅为此，我们就会觉得年轻人都应接受这样的训练。因为纯洁的娱乐不仅与完美的生活目标和谐一致，而且会带来精神的放松。尽管很少有人达到完美的目标，但是他们经常在追求完美的路边休息，自娱自乐，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更远大的目标，也是为了愉悦，所以最好让他们时不时地在音乐当中恢复一下精神。有时候，人们把娱乐当成了目标，原因是终极目标或许包含了某种愉悦的元素，但是这种愉悦不是任何普通的或者低级的愉悦；然而，这些人错把低级的愉悦当成了高级的愉悦，而且在寻找这一种愉悦的时候却找到了那一种愉悦，因为每种愉悦都与人类行为的终极目标有一种相似性。这样的目标不符合我们的未来利益，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快乐也不是为了未来利益而存在，而是为了过去而存在，也就是说，它们能够减轻过去的辛劳和痛苦。我们可以推断，这就是人们总从这种快乐当中找幸福感的原因。

But music is pursued, not only as an alleviation of past toil, but also as providing recreation. And who can say whether, having this use, it may not also have a nobler one? In addition to this common pleasure, felt and shared in by all (for the pleasure given by music is natural, and therefore adapted to all ages and characters), may it not have also some influence over the character and the soul? It must have such an influence if characters are affected by it. And that they are so affected is proved in many ways, and not least by the power which the songs of Olympus exercise; for beyond question they inspire enthusiasm, and enthusiasm is an emotion of the ethical part of the soul. Besides, when men hear imitations, even apart from the rhythms and tunes themselves, their feelings move in sympathy. Since then music is a pleasure, and virtue consists in rejoicing and loving and hating aright, there is clearly nothing which we are so much concerned to acquire and to cultivate as the power of forming right judgments, and of taking delight in good dispositions and noble actions. Rhythm and melody supply imitations of anger and gentleness, and also of courage and temperance, and of all the qualities contrary to these, and of the other qualities of character, which hardly fall short of the actual affections, as we know from our own experience, for in listening to such strains our souls undergo a change. The habit of feeling pleasure or pain at mere representations is not far removed from the same feeling about realities; for example, if any one delights in the sight of a statue for its beauty only, it necessarily follows that the sight of the original will be pleasant to him. The objects of no other sense, such as taste or touch, have any resemblance to moral qualities; in visible objects there is only a little, for there are figures which are of a moral character, but only to a slight extent, and all do not participate in the feeling about them. Again, figures and colors are not imitations, but signs, of moral habits, indications

which the body gives of states of feeling. The connection of them with morals is slight, but in so far as there is any, young men should be taught to look, not at the works of Pauson, but at those of Polygnotus, or any other painter or sculptor who expresses moral ideas. On the other hand, even in mere melodies there is an imitation of character, for the musical modes differ essentially from one another, and those who hear them are differently affected by each. Some of them make men sad and grave, like the so-called Mixolydian, others enfeeble the mind, like the relaxed modes, another, again, produces a moderate and settled temper, which appears to be the peculiar effect of the Dorian; the Phrygian inspires enthusiasm. The whole subject has been well treated by philosophical writers on this branch of education, and they confirm their arguments by facts. The same principles apply to rhythms; some have a character of rest, others of motion, and of these latter again, some have a more vulgar, others a nobler movement. Enough has been said to show that music has a power of forming the character, and should therefore be introduced into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ng. The study is suited to the stage of youth, for young persons will not, if they can help, endure anything which is not sweetened by pleasure, and music has a natural sweetness. There seems to be in us a sort of affinity to musical modes and rhythms, which makes some philosophers say that the soul is a tuning, others, that it possesses tuning.

但是人们追求音乐不仅为了缓解过去的辛劳，也为提供娱乐。谁又能说有了这样的作用之后，音乐就不能再有更加高尚的作用了？音乐除了这种人人都能感受和分享的普通的愉悦（因为音乐带来的快乐是自然的，所有适合于所有年龄和性格的人群），难道就不会对我们的性格和灵魂也有些影响吗？如果性格会被它影响，那么上述影响必定存在。它们受到这种影响的事实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证明，尤其是奥

林匹斯山的歌曲所产生的力量；因为，毫无疑问，这些歌曲可以激发热情，而热情是灵魂中道德方面的一种情感。而且，当人们听到了类似的歌唱，尽管偏离了这些歌曲原有的节奏和曲调，他们的心情还是会为之激动。因为音乐也是一种愉悦，而美德存在于欢乐、爱和适当的憎恶，显然，我们最想得到和培养的就是正确的判断力，和能够欣赏美好的性情及高尚行为的能力。节奏和旋律能模拟出愤怒和温柔，勇敢和克制，以及与这些相反的全部品质，还有人性格当中其他的品质，这些模拟几乎与真情实感不相上下，正如我们从自身的经历当中获知的那样，原因是在聆听这样的音乐时，我们的灵魂经历着嬗变。这种从简单的表演中感受到愉悦和痛苦的习惯与我们从现实当中获得的感受差距并不大；例如，假设一个人仅仅因为雕像的美丽而喜欢看到它，那么看见雕像的原型也必然会让他感到高兴。其他任何感官的目标，如味觉的和触觉的，都没有类似道德的品质；在视觉对象中，则只有少量的，因为有些轮廓蕴含着道德品质，但是程度很低，而且并非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它们。另外，轮廓和色彩并非对道德习惯的模拟，它们只是代表道德习惯的符号，是身体给出的关于感觉状态的说明。他们与道德的联系很微弱，但只要有这样的联系，我们就应该教给年轻人去观察，不是看鲍桑的画作，而要看波利格诺托斯的画作，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表现道德理念的画家或是雕塑家的作品。另一方面，甚至在单纯的旋律中也有对性格的模仿，因为每种音乐调式都有根本的差异，它们的听众受每一种调式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其中有些使人悲伤或者肃穆，比如所谓的米索利地安调式；另一些让我的意识模糊不清，比如那些让人放松的调式；另外还有一种，能够产生柔和而稳健的气质，这似乎是多利安调式的独特效果；佛里吉亚调式能够引发人的激情。那些对这个教育的分支进行哲学思考的作家已经对整个主题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并且用事实来证实他们的观点。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节奏；其中有些使人沉静；其他的则使人躁动；而在后一种当中，有的乐章更粗俗，其他的则更高贵。关于音乐在塑造性格方面的力量，以及因此应该把它引入青年人的教育，这一方面我们已经说的够多了。在青年阶段学习音乐非常合适，因为如果可以的话，年轻人不愿意容忍任何没有被愉悦变甜蜜的东西，而音乐刚好有一种天然的甜蜜。似乎在我们的身上有一种和音乐调式与节奏的亲近感，这

让有些哲学家说灵魂就是一种调谐之音；其他的哲学家认为灵魂拥有一种调谐的能力。

Part 6

第六章

And now we have to determine the question which has been already raised, whether children should be themselves taught to sing and play or not. Clearly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difference made in the character by the actual practice of the art. It is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for those who do not perform to be good judges of the performance of others. Besides, children should have something to do, and the rattle of Archytas, which people give to their children in order to amuse them and prevent them from breaking anything in the house, was a capital invention, for a young thing cannot be quiet. The rattle is a toy suited to the infant mind, and education is a rattle or toy for children of a larger growth. We conclude then that they should be taught music in such a way as to become not only critics but performers.

现在我们就可以讨论那个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问题了，是否应该教年轻人自己唱歌和表演。显然，真正的艺术实践会对性格塑造产生很大影响。让不能表演的人来很好地评判别人的表演几乎不可能做到，即使可能做到也很困难。此外，应该让孩子们有事可做，而阿契塔所发明的摇铃，大人们把它交给自己的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感到快乐，同时也防止他们打碎家里的东西，这是一个极好的发明，因为年轻人根本静不下来。摇铃是一种适合婴儿心理的玩具，而教育则是为更大一些的孩子设计的摇铃或玩具。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年轻人接受音乐教育也应该像这样，让他们不仅成为评论者，还能作表演者。

The question what is or is not suitable for different ages may be easily answered; nor is there any difficulty in meeting the objection of those who say that the study of music is vulgar. We reply (1)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they who are to be judges must also be performers, and that they should begin to practice early, although when they are older they may be spared the execution; they must have learned to appreciate what is good and to delight in it, thanks to the knowledge which they acquired in their youth. As to (2) the vulgarizing effect which music is supposed to exercise, this is a question which we shall have no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when we have considered to what extent freemen who are being trained to political virtue should pursue the art, what melodies and what rhythms they should be allowed to use, and what instruments should be employed in teaching them to play; for even the instrument makes a difference. The answer to the objection turns upon these distinctions; for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certain method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music do really have a degrading effect. It is evident then that the learning of music ought not to impede the business of riper years, or to degrade the body or render it unfit for civil or military training, whether for bodily exercises at the time or for later studies.

什么音乐适合或不适合不同年龄的人，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现在要面对那些认为学习音乐是庸俗的人反驳意见也没有困难了。我们的回答是（1）要成为音乐评判者的人，首先必须也是演奏者，而且应该早一点开始练习，尽管当他们年龄增长后可能他们也不用表演了。他们肯定已经学会了欣赏音乐的美，而且能够乐在其中，这些都多亏了他们儿时所学的音乐知识。至于（2）第二点，有些人认为音乐会产生庸俗的影响，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一点也不难，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受过政治美德培养的自由人在什么程度上追求音乐艺术，应该

允许他们选用什么样的旋律和节奏，应该用什么样的乐器教他们演奏；因为甚至乐器也会有影响。阐明了这些区别也就回应了那些反对的声音；因为极有可能某些教授和学习音乐的方法真的会产生某种庸俗的效果。显然学习音乐不应该妨碍到那些成人后要做的正事，或者损害到身体而使其无法适应政治和军事训练，无论是对当前的体能训练而言还是对今后的学习而言均应以此为标准。

The right measure will be attained if students of music stop short of the arts which are practiced in professional contests, and do not seek to acquire those fantastic marvels of execution which are now the fashion in such contests, and from these have passed into education. Let the young practice even such music as we have prescribed, only until they are able to feel delight in noble melodies and rhythms, and not merely in that common part of music in which every slave or child and even some animals find pleasure.

学生们学习音乐应该达到的水平是在他们接近专业比赛使用的技艺时就停下来，而不要追求时下这类比赛中时髦的那种美妙的技巧，尽管这些时髦的做法也从比赛中传递到了音乐教育当中。让年轻人像我们规定的那样练习音乐，直到他们能够从高雅的旋律和节奏中感受到快乐，而不是只能从连奴隶、儿童甚至有些动物都能听懂的普通音乐中找到快乐。

From these principles we may also infer what instruments should be used. The flute, or any other instrument which requires great skill, as for example the harp, ought not to be admitted into education, but only such as will make intelligent students of music or of the other parts of education. Besides, the flute is not an instrument which is expressive of moral character; it is too exciting.

The proper time for using it is when the performance aims not at instruction, but at the relief of the passions. And there is a further objection; the impediment which the flute presents to the use of the voice detracts from its educational value. The ancients therefore were right in forbidding the flute to youths and freemen, although they had once allowed it. For when their wealth gave them a greater inclination to leisure, and they had loftier notions of excellence, being also elated with their success,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Persian War, with more zeal than discernment they pursued every kind of knowledge, and so they introduced the flute into education. At Lacedaemon there was a choragus who led the chorus with a flute, and at Athens the instrument became so popular that most freemen could play upon it. The popularity is shown by the tablet which Thrasippus dedicated when he furnished the chorus to Ecphantides. Later experience enabled men to judge what was or was not really conducive to virtue, and they rejected both the flute and several other old-fashioned instruments, such as the Lydian harp, the many-stringed lyre, the “heptagon,” “triangle,” “Sambuca,” the like—which are intended only to give pleasure to the hearer, and require extraordinary skill of hand. There is a meaning also in the myth of the ancients, which tells how Athene invented the flute and then threw it away. It was not a bad idea of theirs, that the Goddess disliked the instrument because it made the face ugly; but with still more reason may we say that she rejected it because the acquirement of flute-playing contributes nothing to the mind, since to Athene we ascribe both knowledge and art.

基于以上原则，我们还可以推断出应该使用什么样的乐器。笛子和其他一些乐器，——如竖琴，需要高超的技艺，就不必引入音乐教育了，只教那些能让学生更理解音乐或者有助于学生理解其他教育部分就足够了。此外，笛子并不是一种能够表达道德品质的乐器，它表

现出的音乐太热烈了。其正确的使用时机不是为了教学而表演的时候，而是释放激情的时候。到这里又有人反对了，吹笛子对人的声音的使用造成的困难降低了它在教育上的价值。因此，古人禁止年轻人和自由人学笛子是对的，尽管过去它也曾被允许过。因为当他们财富允许他们更多地追求享乐时，他们对卓越也有着更加高傲的理解，再加上因为胜利而得意洋洋，特别是在希波战争前后，他们带着比理解力更高的热情，学习着各种知识，也正是这个时期他们把笛子引入到了教育当中。在古代斯巴达有一个合唱团的指挥用笛子来领唱，在雅典笛子变得如此受欢迎，大多数自由人都会吹奏。笛子的风行被记载在特拉西珀斯树立的纪念碑的碑文上，该纪念碑用于纪念他为厄克芳提迪斯组织了合唱团。随后的经验使人们明白了，什么是适宜或者不适宜宣扬美德的音乐，他们拒绝了笛子和其他的一些过时的乐器，比如吕底亚竖琴、多玄里拉琴、七边琴（Heptagon）、三角琴（Triangle）和森伯加琴——这些乐器只是为了给听众带来愉悦，且需要高超的演奏技巧。上古神话中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即雅典娜发明了笛子，又将其丢弃。对于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坏主意，女神将笛子丢弃是因为吹笛子会让容颜丑陋；但是，既然我们把她归为知识和艺术之神，或许我们可以说有更多的理性因素促使她丢弃笛子，因为吹笛子对我们的思想没有丝毫的益处。

Thus then we reject the professional instruments and also the professional mode of education in music (and by professional we mean that which is adopted in contests), for in this the performer practices the art, not for the sake of his own improvement, but in order to give pleasure, and that of a vulgar sort, to his hearers. For this reason the execution of such music is not the part of a freeman but of a paid performer, and the result is that the performers are vulgarized, for the end at which they aim is bad. The vulgarity of the spectator tends to lower the character of the music and therefore of the performers; they look to him—he makes them what they are, and fashions even their bodies by the movements which

he expects them to exhibit.

因此当我们在音乐教育中摒弃了专业乐器和专业的音乐教育模式（这里的专业性指的是音乐竞赛所采用的），因为在这种表演中，表演者练习技艺，并非为了提高自我修养，而是为了给听众以愉悦，而且是那种庸俗的愉悦。正因为如此，这类音乐的演奏不是自由人演奏的，而是由一个收取酬劳的表演者演奏的，结果是艺人也变得庸俗，因为他们演奏的目的是错的。观众的庸俗可能会降低音乐的品格，并因此降低演奏者的品格，表演艺人们迎合观众——是观众让表演者变成了现在的模样，甚至引领着艺人们按照他的心愿去舞动身姿。

Part 7

第七章

We have also to consider rhythms and modes, and their use in education. Shall we use them all or make a distinction? and shall the same distinction be made for those who practice music with a view to education, or shall it be some other? Now we see that music is produced by melody and rhythm, and we ought to know what influence these have respectively on education, and whether we should prefer excellence in melody or excellence in rhythm. But as the subject has been very well treated by many musicians of the present day, and also by philosophers who have had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of musical education, to these we would refer the more exact student of the subject; we shall only speak of it now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legislator, stat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我们也要考虑选用什么样的节奏和调式，以及如何用在教育当

中。是全都用，还是区别对待？对于那些为了受教育而学习音乐的人是不是也要进行同样的区分，还是有其他分法？现在我们明白了音乐是通过旋律和节奏组合而成的，我们还应该了解二者分别对于教育的影响，以及我们是否应该追求旋律或节奏方面的卓越。但是，由于这一主题已经被当今很多的音乐家研究过，也被那些对音乐教育了解颇深的哲学家探讨过，所以我们建议那些更严格意义上的音乐学习者去找上述专家；而我们现在则只以立法者的姿态谈论一下这个问题，陈述一下一般性原则。

We accept the division of melodies proposed by certain philosophers into ethical melodies, melodies of action, and passionate or inspiring melodies, each having, as they say, a mode corresponding to it. But we maintain further that music should be studied, not for the sake of one, but of many benefits, that is to say, with a view to (1) education, (2) purgation (the word “purgation” we use at present without explanation, but when hereafter we speak of poetry, we will treat the subject with more precision); music may also serve (3) for for enjoyment, for relaxation, and for recreation after exertion. It is clear, therefore, that all the modes must be employed by us, but not all of them in the same manner. In education the most ethical modes are to be preferred, but in listening to the performances of others we may admit the modes of action and passion also. For feelings such as pity and fear, or, again, enthusiasm, exist very strongly in some souls, and have more or less influence over all. Some persons fall into a religious frenzy, whom we see as a result of the sacred melodies—when they have used the melodies that excite the soul to mystic frenzy—restored as though they had found healing and purgation. Those who are influenced by pity or fear, and every emotional nature, must have a like experience, and others in so far as each is susceptible to such emotions, and all are in a manner purged and their souls lightened

and delighted. The purgative melodies likewise give an innocent pleasure to mankind. Such are the modes and the melodies in which those who perform music at the theater should be invited to compete. But since the spectators are of two kinds—the one free and educated, and the other a vulgar crowd composed of mechanics, laborers, and the like—there ought to be contests and exhibitions instituted for the relaxation of the second class also. And the music will correspond to their minds; for as their minds are perverted from the natural state, so there are perverted modes and highly strung and unnaturally colored melodies. A man receives pleasure from what is natural to him, and therefore professional musicians may be allowed to practice this lower sort of music before an audience of a lower type. But, for 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 as I have already said, those modes and melodies should be employed which are ethical, such as the Dorian, as we said before; though we may include any others which are approved by philosophers who have had a musical education. The Socrates of the Republic is wrong in retaining only the Phrygian mode along with the Dorian, and the more so because he rejects the flute; for the Phrygian is to the modes what the flute is to musical instruments—both of them are exciting and emotional. Poetry proves this, for Bacchic frenzy and all similar emotions are most suitably expressed by the flute, and are better set to the Phrygian than to any other mode. The dithyramb, for example, is acknowledged to be Phrygian, a fact of which the connoisseurs of music offer many proofs, saying, among other things, that Philoxenus, having attempted to compose his Mysians as a dithyramb in the Dorian mode, found it impossible, and fell back by the very nature of things into the more appropriate Phrygian. All men agree that the Dorian music is the gravest and manliest. And whereas we say that the extremes should be avoided and the mean followed, and whereas the Dorian is a mean between the other modes, it is

evident that our youth should be taught the Dorian music.

我们接受某些哲学家的建议，把旋律分成，道德旋律、动作旋律、激情的和鼓舞人心的旋律，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每种旋律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调式。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认为，我们学习音乐不是为了一种，而是为了更多的好处，换句话说，我们是为了（一）教育，（二）净化（当前我们先不对这里的“净化”一词进行解释，在后面谈到诗歌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准确地处理这个主题）；音乐也可以用于（三）享受、放松、和辛劳之后的一种娱乐方式。因此，显然所有的调式都必须用到，但是并非所有调式都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在教育当中应偏重使用最具道德感的调式，但是在聆听他人表演时我们可以允许动作的和激情的调式。原因是怜悯、恐惧或者热情等情感在某些灵魂中有强烈的存在感，而且对于所有人或多或少的都有些影响。有些人会陷入到宗教的狂热中，在我们看来，那应该是神圣旋律作用的结果——当他们运用那些能够刺激灵魂的旋律使其进入神秘的狂热状态时——他们似乎因为找到了疗伤和净化的力量而得到了恢复。那些受到怜悯、恐惧和每一种情感本质影响的人一定有类似的经历，还有其他易于受到这些情感影响的人们，他们都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净化，他们的灵魂感到了轻松和喜悦。净化的旋律同样给人类一种天真的快乐。应该把那些在剧院里表演的人请来，让他们比赛演奏这些旋律和调式。但是因为观众有两类，一类是受过教育的自由人，另一类是工匠、雇佣劳动者和类似人等组成的粗俗民众——所以也应该组织供第二类观众放松心情一些竞赛和展示。而且音乐会对应他们的思想，因为正如他们的思想早已偏离了自然本真的状态那样，音乐里也有那种扭曲的调式，和神经质的、造作的香艳旋律。人都会从自己感觉自然的音乐中获得愉悦，因此，人们允许职业音乐家在低品位观众面前表演低俗的音乐。但是，用于教育的音乐，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应该采用那些有道德的调式和旋律，比如我们以前说过的多利安调式；尽管我们也可以把那些被有音乐素养的哲学家认同的调式和旋律包含进去。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仅仅保留佛里吉亚调式和多利安调式是不对的，而他拒绝使用笛子的做法则更加错误；因为就像佛里吉亚

调式在调式中的地位跟笛子在乐器中的地位一样——它们二者都能令人兴奋和情绪化。诗歌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酒神的疯狂和其他类似的情感最适合用笛子表现，它们也更适合于用佛里吉亚调式而非其他调式表达。例如，酒神赞歌被公认为最适合佛里吉亚调式，这是已经被音乐鉴赏家多次证明过的事实，他们特别指出，费罗萨努斯曾经尝试过用多利安调式来谱写他的酒神赞歌——“迈西亚”，发现不可能之后，才遵照事物的本质重新回到更为恰当的佛里吉亚调式。人们一致认为多利安调式的音乐最庄严和最有气魄。然而，我们说过要避免走极端，并采用中庸之道，在这里，多利安调式就是所有调式里的中庸之选，显然，我们的年轻人应该学习多利安音乐。

Two principles have to be kept in view, what is possible, what is becoming: at these every man ought to aim. But even these are relative to age; the old, who have lost their powers, cannot very well sing the high-strung modes, and nature herself seems to suggest that their songs should be of the more relaxed kind. Wherefore the musicians likewise blame Socrates, and with justice, for rejecting the relaxed modes in education under the idea that they are intoxicating, not in the ordinary sense of intoxication (for wine rather tends to excite men), but because they have no strength in them. And so, with a view also to the time of life when men begin to grow old, they ought to practice the gentler modes and melodies as well as the others, and, further, any mode, such as the Lydian above all others appears to be, which is suited to children of tender age, and possesses the elements both of order and of education. Thus it is clear that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upon three principles—the mean, the possible, the becoming, these three.

我们必须考虑两个原则，什么音乐可能用于教育，什么音乐适合用于教育，这是每个人应该瞄准的目标。但是，即使这两点也与年龄

有关；年长者，已经丧失了力气，不能很好地唱高亢的调式；而且，大自然本身似乎也在暗示他们的歌应该是更加轻松的类型。因此，音乐家们都指责苏格拉底，而且这种指责很正当，因为他拒绝把轻松的调式放在教育里，理由是这样的音乐令人沉醉，这里指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沉醉（因为美酒更偏向于令人兴奋），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力量感。因此，考虑到当人们处在开始衰老的人生阶段时，他们应该练习更加温柔的调式和旋律，以及其他的有此类特点的调式，和任何适合青少年学习，并蕴含着秩序和教育元素的调式，如吕底亚调式，似乎是所有调式中最温柔的。因此，音乐教育显然应该基于三种原则——中庸的音乐、可能学习的音乐、以及合适的音乐。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The Path of Law

法律之路

Oliver Wendell Holmes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法律之路

The Path of the Law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The Path of the Law 法律之路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The Path of the Law

法律之路

When we study law we are not studying a mystery but a well-known profession. We are studying what we shall want in order to appear before judges, or to advise people in such a way as to keep them out of court. The reason why it is a profession, why people will pay lawyers to argue for them or to advise them, is that in societies like ours the command of the public force is intrusted to the judges in certain cases, and the whole power of the state will be put forth, if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ir judgments and decrees. People want to know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and how far they will run the risk of coming against what is so much stronger than themselves, and hence it becomes a business to find out when this danger is to be feared. The object of our study, then, is prediction, the prediction of the incidence of the public force through the instrumentality of the courts.

我们研究法律，研究的不是什么神秘事物，而是一种大家都很熟悉的职业。我们研究的是，在出庭时或者如何向别人提供建议使其免打官司时，需要具备的知识。处理法律事务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职业，人们之所以愿意付钱给律师以获得辩护或进行咨询，是因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在某些情况下，法官受托代公众行使公共权力，在必要时会动用全部国家力量执行其判决与裁定。人们希望了解在什么情形下及多大程度上，他们会遭遇风险，即会与比他们个人强大得多的国家力量相对抗，于是，了解人们担心的这种风险何时会发生，便成为一种职业。因此，我们研究的目的，便是预测何时公共权力会通过法庭产生作用。

The means of the study are a body of reports, of treatises, and of statutes, in this country and in England, extending back for six hundred years, and now increasing annually by hundreds. In these sibylline leaves are gathered the scattered prophecies of the past upon the cases in which the axe will fall. These are what properly have been called the oracles of the law. Far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retty nearly the whole meaning of every new effort of legal thought is to make these prophecies more precise, and to generalize them into a thoroughly connected system. The process is one, from a lawyer's statement of a case, eliminating as it does all the dramatic elements with which his client's story has clothed it, and retaining only the facts of legal import, up to the final analyses and abstract universals of theoretic jurisprudence. The reason why a lawyer does not mention that his client wore a white hat when he made a contract, while Mrs. Quickly would be sure to dwell upon it along with the parcel gilt goblet and the sea-coal fire, is that he foresees that the public force will act in the same way whatever his client had upon his head. It is to make the prophecies easier to be remembered and to be understood that the teachings of the decisions of the past are put into general propositions and gathered into textbooks, or that statutes are passed in a general form. The primary rights and duties with which jurisprudence busies itself again are nothing but prophecies. One of the many evil effects of the confusion between legal and moral ideas, about which I shall have something to say in a moment, is that theory is apt to ge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and to consider the right or the duty as something existing apart from and independent of the consequences of its breach, to which certain sanctions are added afterward. But, as I shall try to show, a legal duty so called is nothing but a prediction that if a man does or omits certain things he will be made to suffer in this or that way by judgment of the court; and so

of a legal right.

我们对美国和英国的一系列判例汇编、法学专著和成文法进行研究,其中最古老的文献可追溯至六百年前，如今仍以每年数以百计的速度在增加。曾经的预言散布于这些神秘的书页之中，预测将来案件的判决。它们就是法律之神谕，这一称呼可谓恰当。法律思想的每一次新探索，其最重要甚至几乎全部的意义都在于使这些预言更精确，对其概括，并组成一个内容紧密关联的体系。这一过程始于律师的案情陈述，剔除委托人陈述中所含的戏剧化元素，保留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直到只留下理论法学的最终分析和抽象的一般概念。律师不会提及其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头戴白帽，而快嘴桂嫂定会喋喋不休地谈论镀金酒杯和炉火，原因在于，律师明白，不论其当事人头戴何物，公共权力都会以同一种方式运作。为了使这些预言更易记易懂，人们对过去的判例进行总结，将其转化为一般命题，收录在教科书中，或者以通俗易懂的形式陈述各项法规。法理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仍然只是预测而已。法律和道德观念的混淆导致的诸多恶果之一（稍后我会论述），便是按理论所导致的本末倒置，把权利或义务与对其违反的后果分开、独立来看，而一定的处罚便随之而来。但是正如我想要尝试说明的，所谓的法律义务无非是一种预测：如果有人做了或未做某些事，法庭会判决他接受这样或那样的处罚。法律权利也是如此。

The number of our predictions when generalized and reduced to a system is not unmanageably large. They present themselves as a finite body of dogma which may be mastered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It is a great mistake to be frightened by the ever-increasing number of reports. The reports of a given jurisdiction in the course of a generation take up pretty much the whole body of the law, and restate it from the present point of view. We could reconstruct the corpus from them if all that went before were burned. The use of

the earlier reports is mainly historical, a use about which I shall have something to say before I have finished.

如果将我们的预测概括简化，形成一个体系，其数量并非多得难以应付。这些预测以一系列数量有限的原则的形式展现，人们可在一定时间内掌握。要是有谁因判例汇编数量不断增长而感到惊慌，那他就陷入了一大误区。在一个既定司法管辖范围内，一代人的判例汇编几乎是法律体系内的全部内容，并从当下角度对其进行了重新阐述。即使之前的资料全部焚毁，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它们重建法律资料库。更早期的判例汇编主要用来研究法律史，这一点我在结束前还会提及。

I wish, if I can, to lay down some first principles for the study of this body of dogma or systematized prediction which we call the law, for men who want to use it as the instrument of their business to enable them to prophesy in their turn, and, as bearing upon the study, I wish to point out an ideal which as yet our law has not attained.

如果可以，我希望确定一些基本原则，用于指导研究我们称之为法律的一系列教义或者系统化的预测，使那些希望用法律作为专业工具的人能够自行做出预测。与该研究相关，我希望指出我们的法律至今尚未达到的一种理想。

The first thing for a businesslike understanding of the matter is to understand its limits, and therefore I think it desirable at once to point out and dispel a confusion between morality and law, which sometimes rises to the height of conscious theory, and more often

and indeed constantly is making trouble in detail without reaching the point of consciousness. You can see very plainly that a bad man has as much reason as a good one for wishing to avoid an encounter with the public force, and therefore you can see the practical importance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orality and law. A man who cares nothing for an ethical rule which is believed and practised by his neighbors is likely nevertheless to care a good deal to avoid being made to pay money, and will want to keep out of jail if he can.

从务实高效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法律的局限。因此，我认为最好能一举指明并消除道德与法律之间的混淆，有时，这种混淆会上升为有意而为的理论，更多情况下，的确这样，这种混淆常常是不知不觉地在细节之处制造出诸多麻烦。很明显，坏人与好人有同样多的理由希望避免与公共权力对抗。因此，区分道德与法律就有了很现实的意义。一个人可以毫不关心邻居所信奉的道德准则，却很可能非常关注如何逃避罚款，也一定想尽可能地远离牢狱之灾。

I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no hearer of mine will misinterpret what I have to say as the language of cynicism. The law is the witness and external deposit of our moral life. Its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the moral development of the race. The practice of it, in spite of popular jests, tends to make good citizens and good men. When I emphasi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aw and morals I do so with reference to a single end, that of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law. For that purpose you must definitely master its specific marks, and it is for that I ask you for the moment to imagine yourselves indifferent to other and greater things.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听众不会把我所讲的内容误解为是愤世嫉俗的话语。法律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在积淀。其历史也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历史。尽管闹出过笑话，但司法实践仍有利于塑造良善的公民和个人。我强调法律和道德的区别，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学习和理解法律。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大家必须准确掌握法律的具体特征，也鉴于此，我请大家暂时不要关注其他乃至更有意义的事情。

I do not say that there is not a wider point of view from whic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aw and morals becomes of secondary or no importance, as all mathematical distinctions vanish in presence of the infinite. But I do say that that distinction is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for the object which we are here to consider—a right study and mastery of the law as a business with well understood limits, a body of dogma enclosed within definite lines. I have just shown the practical reason for saying so.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law and nothing else, you must look at it as a bad man, who cares only for the material consequences which such knowledge enables him to predict, not as a good one, who finds his reasons for conduct, whether inside the law or outside of it, in the vaguer sanctions of conscience. The theoretical importance of the distinction is no less, if you would reason on your subject aright. The law is full of phraseology drawn from morals, and by the mere force of language continually invites us to pass from one domain to the other without perceiving it, as we are sure to do unless we have the boundary constantly before our minds. The law talks about rights, and duties, and malice, and intent, and negligence, and so forth, and nothing is easier, or, I may say, more common in legal reasoning, than to take these words in their moral sense, at some stage of the argument, and so to drop into fallacy. For instance, when we speak of the rights of man in a moral sense, we mean to mark the limits of interference with individual freedom which we

think are prescribed by conscience, or by our ideal, however reached. Yet it is certain that many laws have been enforced in the past, and it is likely that some are enforced now, which are condemned by the most enlightened opinion of the time, or which at all events pass the limit of interference, as many consciences would draw it. Manifestly, therefore, nothing but confusion of thought can result from assuming that the rights of man in a moral sense are equally rights in the sense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No doubt simple and extreme cases can be put of imaginable laws which the statute-making power would not dare to enact, even in the absence of written constitutional prohibitions, because the community would rise in rebellion and fight; and this gives some plausibility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law, if not a part of morality, is limited by it. But this limit of power is not coextensive with any system of morals. For the most part it falls far within the lines of any such system, and in some cases may extend beyond them, for reasons drawn from the habits of a particular people at a particular time. I once heard the late Professor Agassiz say that a German population would rise if you added two cents to the price of a glass of beer. A statute in such a case would be empty words, not because it was wrong, but because it could not be enforced. No one will deny that wrong statutes can be and are enforced, and we would not all agree as to which were the wrong ones.

我不否认更宽广视角的存在，从这一视角来看，法律和道德的区别变得次要甚至毫无意义，正如在无穷面前，所有数量上的区分都会消失一样。但我要指出的是，就我们在此的研究目的而言，这一区别至关重要。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法律作为一项具有公认局限性的职业、一套包含在明确界限内的教义的正确研究和掌握。我刚刚提到了该说法的实际理由。如果你只是想了解法律，而非其他，你得从一个坏人的角度，而不能从一个好人的角度来看待法律。因为坏人关心的只是

其所了解的法律知识使其能预测到的实质性后果；而好人的行为，不论合法与否，其动机皆源于更为模糊的道德约束。如果想要对你的问题正确推理的话，该区别所具有的理论重要性一点也不小。法律中充斥着源于道德领域的用语。毫无疑问，除非我们脑海中时时记得法律和道德的界限，语言本身的力量会不断地诱使我们无意识地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法律论及权利、义务、恶意、意图和过失等等。在法律推理过程中，最容易发生的，或者可以说最常见的，就是在论证的某一阶段从道德的意义理解这类措辞，从而陷入谬误。例如，如果我们从道德意义提及人的权利，我们旨在划出干涉个人自由的界限，不管如何得出这一结论，我们认为这个自由界限是由良知或我们的理想决定的。然而，不可否认，很多过去实施的法律，其中有一些现在仍很有可能在实施，却受到当代最开明人士的谴责，或者无论如何都超越了多数良知所划分的个人自由的界限。因而，很明显，认定道德意义上的人的权利等同于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人的权利，只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毫无疑问，简单和极端的案例提供了可能的法律，然而即使没有成文的宪法类禁令，立法机关也不敢贸然颁行，因为人们会起来反叛抗争；法律就算不是道德的一部分，却也受其限制，这一说法能在其中找到一些合理性。但是这一权力的限制与任何道德体系并不同延。多数时候，它在所有道德体系的范围之内，而在某些情况下，也许会超出这些体系的范围，背后诸多原因来自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各种习惯。有一次，我听已故的阿加西斯教授说，如果每杯啤酒加价两分，德国人就会揭竿而起。这种情况下的法规等于一纸空文，不是因为它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无法实施。错误的法规能够实施并且正在实施，这一点没人会否认，只是，对于哪些法规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会相左。

The confusion with which I am dealing besets confessedly legal conceptions. Take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What constitutes the law? You will find some text writers telling you that it is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what is decided by the courts of Massachusetts or England, that it is a system of reason, that it is a deduction from

principles of ethics or admitted axioms or what not, which may or may not coincide with the decisions. But if we take the view of our friend the bad man we shall find that he does not care two straws for the axioms or deductions, but that he does want to know what the Massachusetts or English courts are likely to do in fact. I am much of this mind. The prophecies of what the courts will do in fact, and nothing more pretentious, are what I mean by the law.

显然，诸多法律概念都被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所困扰。比如最根本的问题，法律由什么构成？大家会发现，有些教科书的作者，认为它不同于马萨诸塞州或者英国法庭的判决结果，它是一个理性的体系，根据道德准则或者公理之类推演而来，它可能碰巧与法庭判决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但是如果从我们的朋友即坏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他毫不在意公理或者演绎推论，但他却很想知道马萨诸塞州或者英国法庭可能会如何行事。我与他的想法很接近。预测法庭如何行事，而不是什么更故弄玄虚的东西，就是我所说的法律。

Take again a notion which as popularly understood is the widest conception which the law contains—the notion of legal duty, to which already I have referred. We fill the word with all the content which we draw from morals. But what does it mean to a bad man? Mainly, and in the first place, a prophecy that if he does certain things he will be subjected to disagreeable consequences by way of imprisonment or compulsory payment of money. But from his point of view,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fined and being taxed a certain sum for doing a certain thing? That his point of view is the test of legal principles is proven by the many discussions which have arisen in the courts on the very question whether a given statutory liability is a penalty or a tax. On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depends the decision whether conduct is

legally wrong or right, and also whether a man is under compulsion or free. Leaving the criminal law on one sid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iability under the mill acts or statutes authorizing a taking by eminent domain and the liability for what we call a wrongful conversion of property where restoration is out of the question? In both cases the party taking another man's property has to pay its fair value as assessed by a jury, and no more. What significance is there in calling one taking right and another wrong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law? It does not matter, so far as the given consequence, the compulsory payment, is concerned, whether the act to which it is attached is described in terms of praise or in terms of blame, or whether the law purports to prohibit it or to allow it. If it matters at all, still speaking from the bad man's point of view, it must be because in one case and not in the other some further disadvantages, or at least some further consequences, are attached to the act by law. The only other disadvantages thus attached to it which I ever have been able to think of are to be found in two somewhat insignificant legal doctrines, both of which might be abolished without much disturbance. One is, that a contract to do a prohibited act is unlawful, and the other, that, if one of two or more joint wrongdoers has to pay all the damages, he cannot recover contribution from his fellows. And that I believe is all. You see how the vague circumference of the notion of duty shrinks and at the same time grows more precise when we wash it with cynical acid and expel everything except the object of our study, the operations of the law.

再举一个法律中公认的含义最丰富的概念，也就是我前面已经提及的法定义务的概念。在这一词语中，我们填满了源于道德的内容。但是它对坏人意味着什么？首先，它大体上是一种预测：他如果做了某些事，就会面临监禁或者强制性付款之类的不良后果。然而从他的

角度看，因为某行为被罚款和被征以一定数量的税金，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他的观点是对法律准则的检验，这在法庭上的多次讨论已得到证明，讨论的问题恰恰就是某一既定的法律责任到底是一种惩罚还是一种税款。某行为是否合法以及某人是被迫还是自愿，都取决于该问题的答案。抛开刑法不谈，根据磨坊法或成文法，通过征用权占有的情况下应负的责任，与我们称之为非法改造房屋致其不可复原情况下应负的责任，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在这两种情况下，获取另一方财产的当事方应当支付由陪审团评估得出的公平价值，仅此而已。从法律的角度，称一种占有为合法，而另一种为非法，意义何在？相关行为是以褒扬还是以谴责的话语来予以描述，或者法律意在禁止还是允许，就其既定后果，也就是强制性付款而言，却无关紧要。若说有什么重要性，仍然从坏人的角度出发，那必定是因为在一种情况而非另外一种情况下，法律的执行会附带性地造成更进一步的损害，或者至少产生某些更进一步的后果。我所能想到的与之相关的所有其他不利之处可在两条有些不太重要的法律原则中找到，这两者皆可在不引起震动的情况下就能废止。一条是，为做违禁之事而签订的合同是非法合同，另一条是，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共同过错人中的一人需要进行全部赔偿，他不得要其同伙分摊。我认为这些就是全部。当我们以冷嘲热讽、尖酸刻薄清洗义务这一概念，抛开所有其他因素，只保留我们的研究目标也就是法律的运作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概念的模糊边界如何收缩，同时又是如何变得更加精确的。

Nowhere is the confusion between legal and moral ideas more manifest than in the law of contract. Among other things, here again the so-called primary rights and duties are invested with a mystic significance beyond what can be assigned and explained. The duty to keep a contract at common law means a prediction that you must pay damages if you do not keep it—and nothing else. If you commit a tort, you are liable to pay a compensatory sum. If you commit a contract, you are liable to pay a compensatory sum unless the promised event comes to pass, and that is all the difference. But

such a mode of looking at the matter stinks in the nostrils of those who think it advantageous to get as much ethics into the law as they can. It was good enough for Lord Coke, however, and here, as in many other cases, I am content to abide with him. In *Bromage v. Genn ing* , [1_1] a prohibition was sought in the Kings' Bench against a suit in the marches of Wales for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a covenant to grant a lease, and Coke said that it would subvert the intention of the covenantor, since he intends it to be at his election either to lose the damages or to make the lease. Sergeant Harra for the plaintiff confessed that he moved the matter against his conscience, and a prohibition was granted. This goes further than we should go now, but it shows what I venture to say has been the common law point of view from the beginning, although Mr. Harriman, in his very able little book upon Contracts has been misled, as I humbly think, to a different conclusion.

没有什么比合同法更能清楚地展现出法律与道德观念的混淆的了。和其他法律一样，所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这里又一次被赋予了无法确定和解释的神秘意义。在普通法中，遵循合同的义务意味着：如果违约，就必须赔偿损失，别无其他。如果你有侵权行为，就有责任赔付一定的金额。如果你签订了一份合同，除非承诺的事情得以兑现，否则你有责任赔付一定的金额，这就是全部的区别。但对于那些喜欢尽可能将伦理道德融入法律的人而言，这种思路对他们来说很不顺眼。然而，科克勋爵对这种思路表示满意。与很多其他情况下一样，在此我乐于与其保持一致意见。在布罗米奇诉格宁案中 [2_1] ，在威尔士边界地区，地方法庭审理有关请求履行一件租赁合同的诉讼案，该案中被告（即合同中的出租方）向王座法庭申请颁发禁令，以阻止该讼案。科克认为，出租方试图在丧失赔偿金与出租之间作出选择，因此颁发禁令必与其本意相违。原告代理律师哈里斯承认，他推动该诉讼有违自己的良心，王座法庭于是批准该禁令。这超出了我们现在应该要研究的范围，但是它表明，我斗胆提出的想法一开始就是

一种普通法的观点，虽然我不自量力，以为哈里曼先生在他精彩的短篇《合同》一书中因受误导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I have spoken only of the common law, because there are some cases in which a logical justification can be found for speaking of civil liabilities as imposing duties in an intelligible sense. These are the relatively few in which equity will grant an injunction, and will enforce it by putting the defendant in prison or otherwise punishing him unless he complies with the order of the court. But I hardly think it advisable to shape general theory from the exception,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better to cease troubling ourselves about primary rights and sanctions altogether, than to describe our prophecies concerning the liabilities commonly imposed by the law in those inappropriate terms.

我一直只在讨论普通法，因为讨论民事责任所施加的义务时，可以在有些案例中找到合乎逻辑的理由，便于理解。这些经衡平法授予禁止令的案例相对较少，而且在这些案例中，除非被告遵从法庭的指令，否则法庭会将其投入监狱或以其他方式对其进行惩罚。但是我认为根据例外情况形成的理论并不合理，我觉得与其用那些不合适的词语来描述我们对法律通常施加的责任之预测，还不如不再纠结于基本权利和义务。

I mentioned, as other examples of the use by the law of words drawn from morals, malice, intent, and negligence. It is enough to take malice as it is used in the law of civil liability for wrongs what we lawyers call the law of torts—to show that it means something different in law from what it means in morals, and also to show how the difference has been obscured by giving to principles which

have little or nothing to do with each other the same name.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a parson preached a sermon and told a story out of Fox's Book of Martyrs of a man who had assisted at the torture of one of the saints, and afterward died, suffering compensatory inward torment. It happened that Fox was wrong. The man was alive and chanced to hear the sermon, and thereupon he sued the parson. Chief Justice Wray instructed the jury that the defendant was not liable, because the story was told innocently, without malice. He took malice in the moral sense, as importing a malevolent motive. But nowadays no one doubts that a man may be liable, without any malevolent motive at all, for false statements manifestly calculated to inflict temporal damage. In stating the case in pleading, we still should call the defendant's conduct malicious; but, in my opinion at least, the word means nothing about motives, or even about the defendant's attitude toward the future, but only signifies that the tendency of his conduct under known circumstances was very plainly to cause the plaintiff temporal harm. [1_2]

属于道德领域的一些词汇也被用于法律领域。在这些例子中，我提到过“恶意”、“意图”以及“过失”。举“恶意”一词为例，就足可以说明该词的法律意义不同于其道德意义，还可以说明这种区别由于一些很少或者没有任何关联的准则被予以相同的命名而变得模糊不清，因为恶意用在民事责任法中指不当行为，而我们法律人则称之为侵权法。三百年前，一位牧师在布道时，讲述了出自福克斯《殉道史》中的一个故事，故事讲到，一个人因为参与了对一位圣人的迫害，内心受折磨而死。但是碰巧福克斯是错的。这个人没死，而且碰巧听到了这个布道，随即就起诉了这位牧师。大法官雷指示陪审团说，被告没有责任，因为他讲这个故事时动机是单纯的，没有恶意。他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恶意，认为恶意就是恶毒的动机。但是如今，即使某人没有任何不良动机，但如果很明显地故意发布虚假声明以对他人造成

身体或物质上的伤害，他仍需对此负责，没有人会对此表示怀疑。在案情申诉陈述时，我们还得称被告的行为是恶意的；但是，至少在我看来，该词与动机无关，甚至与被告对未来的态度无关，而只是意味着，在已知情形下他的行为显然意在对原告造成世俗的伤害。[2_2]

In the law of contract the use of moral phraseology has led to equal confusion, as I have shown in part already, but only in part. Morals deal with the actual internal state of the individual's mind, what he actually intends. From the time of the Romans down to now, this mode of dealing has affected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as to contract, and the language used has reacted upon the thought. We talk about a contract as a meeting of the minds of the parties, and thence it is inferred in various cases that there is no contract because their minds have not met; that is, because they have intended different things or because one party has not known of the assent of the other. Yet nothing is more certain than that parties may be bound by a contract to things which neither of them intended, and when one does not know of the other's assent. Suppose a contract is executed in due form and in writing to deliver a lecture, mentioning no time. One of the parties thinks that the promise will be construed to mean at once, within a week. The other thinks that it means when he is ready. The court says that it means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The parties are bound by the contract as it is interpreted by the court, yet neither of them meant what the court declares that they have said. In my opinion no one will understand the true theory of contract or be able even to discuss some fundamental questions intelligently until he has understood that all contracts are formal, that the making of a contract depends not on the agreement of two minds in one intention, but on the agreement of two sets of external signs—not on the parties' having meant the same thing but on their having

said the same thing. Furthermore, as the signs may be addressed to one sense or another—to sight or to hearing—on the nature of the sign will depend the moment when the contract is made. If the sign is tangible, for instance, a letter, the contract is made when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 is delivered. If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minds of the parties meet, there will be no contract until the acceptance can be read; none, for example, if the acceptance be snatched from the hand of the offerer by a third person.

正如我已经部分证明的，但仅仅也只是部分证明的，在合同法中，道德术语的使用同样导致了混淆。道德涉及的是个人思想的实际内心状态，是一个人的真正意图所在。从罗马时代到现在，这种处理方式已经影响到了合同相关法律用语，而所使用的语言又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我们说合同代表当事人想法取得了一致，因此可以推断出，在很多情况下，合同没有达成是因为他们的想法没有取得一致，也就是说，因为他们的意图不同，或者因为一方并不了解另一方的观点。然而，十分确定的是，即使双方当事人中没有任何人想到，或一方并不知道另一方是否同意，他们也仍可能被合同中的事项所约束。假设某项合同在按照规定形式执行时，书面写明了要做一场报告，但没有提及时间。一方认为，这一许诺意味着在一周内立即进行。另一方认为，这意味着当他准备好了再进行。法庭判决意味着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当事双方受到法庭对合同阐释的制约，然而双方的意图都与法庭宣称的其意图相左。我以为，一个人只有明白所有的合同都是一种形式，合同的签订并不取决于双方思想在某一想法上达成一致，而仅取决于两组外在符号的一致性，即不在于双方当事人想过同一件事，而在于他们说过同一件事，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明白合同法的真正原理或者说才能够理智地讨论一些基本问题。另外，由于符号可以传递给一种或另一种感官（如视觉或听觉），合同何时订立取决于符号的性质。如果符号是有形的，例如是一封书信，则交付同意书才算合同订立。如果签约双方想法必须一致，那么在未看到同意书以前，合同就不存在；比如，如果同意书被第三方从发函人手中夺去，则不存在

任何合同。

This is not the time to work out a theory in detail, or to answer many obvious doubts and questions which are suggested by these general views. I know of none which are not easy to answer, but what I am trying to do now is only by a series of hints to throw some light on the narrow path of legal doctrine, and upon two pitfalls which, as it seems to me, lie perilously near to it. Of the first of these I have said enough. I hope that my illustrations have shown the danger, both to speculation and to practice, of confounding morality with law, and the trap which legal language lays for us on that side of our way. For my own part, I often doubt whether it would not be a gain if every word of moral significance could be banished from the law altogether, and other words adopted which should convey legal ideas uncolored by anything outside the law. We should lose the fossil records of a good deal of history and the majesty got from ethical associations, but by ridding ourselves of an unnecessary confusion we should gain very much in the clearness of our thought.

现在要提出详细的理论为时尚早，我也无法就这些大众观点所带来的疑问或问题进行回答。我认为这些问题都不难回答，但是我现在要做的，仅仅是提供点点滴滴的提示，向通往法学理论的狭窄道路上投一缕光，指出在我看来容易落入的两个陷阱。第一个陷阱我讲得足够多了。我希望我的解释已经指出了混淆道德和法律对思辨及实践两方面造成的危险，并揭开了法律语言在我们道路的另一端设下的陷阱。对我来说，我经常会猜想，如果把每一个具有道德意义的词全部从法律中剔除，而采用那些传达法律思想、未经任何法律之外的事物渲染的语词，是不是会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可能会丢掉很多历史的原始记录以及与道德相连产生的庄严、崇高，但是通过摆脱不必要的混

淆，我们可在理清自己的思路的基础之上，大有收获。

So much for the limits of the law. The next thing which I wish to consider is what are the forces which determine its content and its growth. You may assume, with Hobbes and Bentham and Austin, that all law emanates from the sovereign, even when the first human beings to enunciate it are the judges, or you may think that law is the voice of the Zeitgeist, or what you like. It is all one to my present purpose. Even if every decision required the sanction of an emperor with despotic power and a whimsical turn of mind, we should be interested none the less, still with a view to prediction, in discovering some order, some rational explanation, and some principle of growth for the rules which he laid down. In every system there are such explanations and principles to be found. It is with regard to them that a second fallacy comes in, which I think it important to expose.

法律的界限就讲到这里。下面我想考虑的，是何种力量决定了法律的内容和及其发展。大家可以和霍布斯、边沁和奥斯丁一样假定，所有法律均始于王权——即便人类中首次公布法律的人是法官，或者大家认为法律是时代精神的声音，或者是大家所喜欢的什么东西。对我现有的目标而言，这都是一回事。即使所有决议都需要某位享有独裁权利且又古怪反复无常的帝王的批准，我们对此的兴趣也丝毫不减，并仍希望作出预测，希望发现某种顺序、某些合理的解释以及他所制定的规则的发展规律。每一个体系中都能找到一些这样的解释和原理。与此相关出现了本文所指的第二种谬误，我认为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

The fallacy to which I refer is the notion that the only force at

wo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is logic. In the broadest sense, indeed, that notion would be true. The postulate on which we think about the universe is that there is a fixed quantitative relation between every phenomenon and it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ts. If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a phenomenon without these fixed quantitative relations, it is a miracle. It is outside the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and as such transcends our power of thought, or at least is something to or from which we cannot reason. The condition of our thinking about the universe is that it is capable of being thought about rationally, or, in other words, that every part of it is effect and cause in the same sense in which those parts are with which we are most familiar. So in the broadest sense it is true that the law is a logical development, like everything else. The danger of which I speak is not the admission that the principles governing other phenomena also govern the law, but the notion that a given system, ours, for instance, can be worked out like mathematics from some general axioms of conduct. This is the natural error of the schools, but it is not confined to them. I once heard a very eminent judge say that he never let a decision go until he was absolutely sure that it was right. So judicial dissent often is blamed, as if it meant simply that one side or the other were not doing their sums right, and if they would take more trouble, agreement inevitably would come.

我说的谬误是指，有人认为在法律发展的过程中，法律乃是唯一动力。的确，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一观念应该是对的。我们对宇宙的思考，其假定前提是，在每一个现象与其前因及后果之间存在一个定量的关系。如果存在一种现象，不具备这些定量关系，那它就是一个奇迹。这在因果法则之外，因而超出了我们的思维能力，或者至少是我们无法推理其因果的东西。我们思考宇宙的条件是可以对它进行理性的思考，或者换句话说，所有的部分都存在因果关系，其意义与

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都是相同的。所以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认为法律与其他所有东西一样都是逻辑的发展是正确的。我所提到的危险不是认可支配其他现象的原则也支配法律，而是这样一个观念，即任何既定体系，例如我们的法律体系，可以像数学中一些一般性操作定理一样运作。这是各个学派的一种通病，但是不仅仅局限于它们。我曾经听到一位赫赫有名的法官说过，他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确定裁决是正确的，就不会做出这一裁决。因此，持异议的法官常常受到批评，仿佛这仅仅意味着一方或者另一方的加法没有做对，如果他们继续努力，他们就一定会达成一致意见。

This mode of thinking is entirely natural. The training of lawyers is a training in logic. The processes of analogy, discrimination, and deduction are those in which they are most at home. The language of judicial decision is mainly the language of logic. And the logical method and form flatter that longing for certainty and for repose which is in every human mind. But certainty generally is illusion, and repose is not the destiny of man. Behind the logical form lies a judgment as to the relative worth and importance of competing legislative grounds, often an inarticulate and unconscious judgment, it is true, and yet the very root and nerve of the whole proceeding. You can give any conclusion a logical form. You always can imply a condition in a contract. But why do you imply it? It is because of some belief as to the practice of the community or of a class, or because of some opinion as to policy, or, in short, because of some attitude of yours upon a matter not capable of exact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and therefore not capable of founding exact logical conclusions. Such matters really are battle grounds where the means do not exist for the determinations that shall be good for all time, and where the decision can do no more than embody the preference of a given body in a given time and place. We do not realize how large a part

of our law is open to reconsideration upon a slight change in the habit of the public mind. No concrete proposition is self evident, no matter how ready we may be to accept it, not even Mr. Herbert Spencer's “Every man has a right to do what he wills, provided he interferes not with a like right on the part of his neighbors.”

这种考虑事情的方式是非常自然的。法律人接受的训练就是一种逻辑训练。类比、辨别和演绎的过程是他们感到最为得心应手的方式。法庭裁决的语言主要是逻辑用语。逻辑方法和形式满足了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对确定性心安理得的渴望。但是确定性总体上来说是一种幻象，心安理得也不是人类的常态。逻辑形式的背后，是对相互矛盾的各种立法立场之相对价值和重要性的一种判断，事实上，这种判断常常是不清楚的或者潜意识的，但却是整个审判过程的根基和命脉。所有的结论都可以附以逻辑的形式。合同中总是可以暗含某种前提。但是为什么要暗含它呢？这是因为，人们对于某一社会或阶层做法的一些观念，或者对政策的一些观点，或者简而言之，大家对某事的态度无法进行精确的量化检测，因此无法建立准确的逻辑结论。此类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这里无法确定永久有用的方法，所做的判决只不过是代表了既定时间和地点、一个既定组织的偏好而已。我们没有意识到，法律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需要随着大众思想习惯的细微变化而重新加以考虑的。没有哪个具体主张是不证自明的，不论我们如何愿意接受它，即使是赫伯特·斯宾塞先生所说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做他所喜欢的事，只要他不干涉其邻居的类似权利”，也不例外。

Why is a false and injurious statement privileged, if it is made honestly in giving information about a servant? It is because it has been thought more important that information should be given freely, than that a man should be protected from what under other circumstances would be an actionable wrong. Why is a man at liberty to set up a business which he knows will ruin his

neighborhood? It is because the public good is supposed to be best subserved by free competition. Obviously such judgments of relative importance may vary in different times and places. Why does a judge instruct a jury that an employer is not liable to an employee for an injury received in the course of his employment unless he is negligent, and why do the jury generally find for the plaintiff if the case is allowed to go to them? It is because the traditional policy of our law is to confine liability to cases where a prudent man might have foreseen the injury, or at least the danger, while the inclination of a very large part of the community is to make certain classes of persons insure the safety of those with whom they deal. Since the last words were written, I have seen the requirement of such insurance put forth as part of the programme of one of the best known labor organizations. There is a concealed, half conscious battle on the question of legislative policy, and if any one thinks that it can be settled deductively, or once for all, I only can say that I think he is theoretically wrong, and that I am certain that his conclusion will not be accepted in practice *semper ubique et ab omnibus* .

如果有人有意提供一名政府雇员的信息，其陈述不实且有诽谤性，但其仍受到保护，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由地发布信息，要比保护一个人免受在其他情形下应加以追究的不法侵害更为重要。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自由做生意，即使明明知道这会破坏其所在社区其他人的生意？这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由竞争能最大化地促进大众的利益。显而易见，这样关于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可能会因时因地变化。为什么一个法官会指示陪审团，除非雇主疏忽，否则雇主不应对其雇员在其雇佣过程中所受工伤负责？为什么在可能的情况下，陪审团一般会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这是因为我们法律中的传统政策将责任限定在谨慎的人应预见到伤害的情形，或者至少存在危险，而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倾向于令某些阶层的人保证他们负责对象的安全。在写

下上面这段话之后，我看到此类保证要求也被一家著名的劳工组织写入自己的纲要。关于立法政策问题的争论，隐蔽且不太被人意识到，如果任何人认为其可以通过演绎法或者一劳永逸地解决争论，我只能说自己认为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我也确信他的结论永远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所有人一致的接受。

Indeed, I think that even now our theory upon this matter is open to reconsideration, although I am not prepared to say how I should decide if a reconsideration were proposed. Our law of torts comes from the old days of isolated, ungeneralized wrongs, assaults, slanders, and the like, where the damages might be taken to lie where they fell by legal judgment. But the torts with which our courts are kept busy today are mainly the incidents of certain well known businesses. They are injuries to person or property by railroads, factories, and the like. The liability for them is estimated, and sooner or later goes into the price paid by the public. The public really pays the damages, and the question of liability, if pressed far enough, is really a question how far it is desirable that the public should insure the safety of those whose work it uses. It might be said that in such cases the chance of a jury finding for the defendant is merely a chance, once in a while rather arbitrarily interrupting the regular course of recovery, most likely in the case of an unusually conscientious plaintiff, and therefore better done away with. On the other hand, the economic value even of a life to the community can be estimated, and no recovery, it may be said, ought to go beyond that amount. It is conceivable that some day in certain cases we may find ourselves imitating, on a higher plane, the tariff for life and limb which we see in the *Leges Barbarorum*.

的确，我认为，即使现在，我们对于此类事情的理论也需要重新

考虑，虽然我无法说出如果建议重新考虑，我会如何决定。我们的侵权法源于以往那些对个别出现的、并不典型的不法行为、恐吓、诽谤以及类似行为的司法判决，其损害赔偿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但是如今我们法庭所忙于处理的侵权案例，主要是在某些知名企业的发生的事故。这些是由铁路、工厂等单位所造成的对人身或财产的侵害。事故责任裁定完以后，迟早会由公众进行赔偿。公众的确要为这些侵害买单，而责任的问题，如果仔细探究，其实就是公众应在多大程度上保证那些服务提供者的安全的问题。也可以说，在此类情形下，陪审团做出对被告有利的裁决的可能性很小，偶尔会出现改变正常的赔付过程的情况，这最可能出现在原告良心发现的时候，不过可能性极低，可以不予考虑。另外一方面，甚至一条性命对于其社区的经济价值也可以估计，可以说，其补偿不应超出这一数目。可以想象，有一天在某些案件中，我们会发现自己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模仿自己在蛮族法中所看到的那样，征收生命以及肢体税。

I think that the judges themselves have failed adequately to recognize their duty of weighing considerations of social advantage. The duty is inevitable, and the result of the often proclaimed judicial aversion to deal with such considerations is simply to leave the very ground and foundation of judgments inarticulate, and often unconscious, as I have said. When socialism first began to be talked about, the comfortable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were a good deal frightened. I suspect that this fear has influenced judicial action both here and in England, yet it is certain that it is not a conscious factor in the decisions to which I refer. I think that something similar has led people who no longer hope to control the legislatures to look to the courts as expounders of the constitutions, and that in some courts new principles have been discovered outside the bodies of those instruments, which may be generalized into acceptance of the economic doctrines which prevailed about fifty years ago, and a wholesale prohibition of what a tribunal of

lawyers does not think about right. I cannot but believe that if the training of lawyers led them habitually to consider more definitely and explicitly the social advantage on which the rule they lay down must be justified, they sometimes would hesitate where now they are confident, and see that really they were taking sides upon debatable and often burning questions.

我认为，法官们完全没有认识到他们权衡各种社会利益的责任。这种责任无可推卸，而法官们却常常表示不愿意加以考虑，其结果就只会使得判决的依据和理由含糊不清，且常常是无意识的，这一点我前面已经提及。当人们刚刚开始谈论社会主义时，社会中的悠闲阶级非常恐惧。我窃以为这种惧怕对英美的司法行为都产生了影响。然而毫无疑问，这种影响在我提及的那些判决中是一种无意识的因素。我认为，类似的事情使得那些不再指望控制立法机关的人们转而指望法院，希望法院会成为宪法的阐释者；有些法院采用了法律体系之外的一些新原则，也就是接受五十年前流行的经济理论，并全面禁止被法律人组成的法庭认定为错误的东西。我不得不说，如果法律人的训练导致了他们习惯性地、更准确具体地考虑社会利益，并且他们必须以此为制定的规则提供理由，那么他们有时会对目前自信的事情有所犹豫，并且注意到他们的确在一些富有争议而棘手的问题上立场有所偏颇。

So much for the fallacy of logical form. Now let us consider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law as a subject for study, and the ideal toward which it tends. We still are fa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which I desire to see reached. No one has reached it or can reach it as yet. We are only at the beginning of a philosophical reaction, and of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worth of doctrines which for the most part still are taken for granted without any deliberate, conscious, and systematic questioning of their grounds. The development of our

law has gone on for nearly a thousand years, like the development of a plant, each generation taking the inevitable next step, mind, like matter, simply obeying a law of spontaneous growth. It is perfectly natural and right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so. Imitation is a necessity of human nature, as has been illustrated by a remarkable French writer, M. Tarde, in an admirable book, *Les Lois de l'Imitation* . Most of the things we do, we do for no better reason than that our fathers have done them or that our neighbors do them, and the same is true of a larger part than we suspect of what we think. The reason is a good one, because our short life gives us no time for a better, but it is not the best. It does not follow, because we all are compelled to take on faith at second hand most of the rules on which we base our action and our thought, that each of us may not try to set some corner of his world in the order of reason, or that all of us collectively should not aspire to carry reason as far as it will go throughout the whole domain. In regard to the law, it is true, no doubt, that an evolutionist will hesitate to affirm universal validity for his social ideals, or for the principles which he thinks should be embodied in legislation. He is content if he can prove them best for here and now. He may be ready to admit that he knows nothing about an absolute best in the cosmos, and even that he knows next to nothing about a permanent best for men. Still it is true that a body of law is more rational and more civilized when every rule it contains is referred articulately and definitely to an end which it subserves, and when the grounds for desiring that end are stated or are ready to be stated in words.

关于逻辑形式的谬误就讲到这里。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作为一门研究学科的法律的现状以及它所追求的理想。我们仍然远未达到我想达到的观点。迄今为止，无人了解这一观点或能够了解到这一观点。我们现在还处于对法律原则的价值进行哲学反思和重新考虑的初始阶

段，人们仍然认为这些原则大部分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对其依据进行细致、有意识和系统的考量。我们的法律已经发展了近千年，与一株植物的成长类似，每代人都要迈出不可避免的下一步。心智正如事物一样，只须遵循自然成长的法则。这再自然不过了，本应就是这样。正如杰出的法国作家，M·塔尔德先生在其佳作《模仿的法则》中描述的那样，模仿是人类天性之必需。我们之所以做自己所做的大多数事情，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先辈这样做过或者我们的邻居这样做而已，我们的大部分思想（要比我们自以为的更多）也是如此。这是个充分的理由，生命短暂，我们无暇去追求一个更好的理由，但这不是最好的理由。不能说因为我们必须对二手传承的大部分规则心怀崇敬，不能说因为这些规则是我们行动和思考的基础，我们就不去尝试在理性的秩序里建立自己的一片小天地，或者我们作为一个集体，不去努力地将理性运用到它力所能及的所有领域。对于法律而言，一个进化论者无疑会对其社会理想及其认为应当在立法中体现出来的原则是否放之四海皆准而犹疑不定。如果他能够证明它们在此时此刻是最好的，他就满足了。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不知道宇宙中是否存在一个绝对的至善，甚至会承认自己对人类永恒的至善也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如果一个法律体系所包含的每条规则都清楚明确地表明它们所服务的目标，而且追求该目标的根据已经或准备以言辞表达出来，那么该法律体系才真正称得上比较理性和开化。

At present, in very many cases, if we want to know why a rule of law has taken its particular shape, and more or less if we want to know why it exists at all, we go to tradition. We follow it into the Year Books, and perhaps beyond them to the customs of the Salian Franks, and somewhere in the past, in the German forests, in the needs of Norman kings, in the assumptions of a dominant class, in the absence of generalized ideas, we find out the practical motive for what now best is justified by the mere fact of its acceptance and that men are accustomed to it. The rational study of law is still to a large extent the study of history. History must be a part of the

study, because without it we cannot know the precise scope of rules which it is our business to know. It is a part of the rational study,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 an enlightened scepticism, that is, towards a deliberate reconsideration of the worth of those rules. When you get the dragon out of his cave on to the plain and in the daylight, you can count his teeth and claws, and see just what is his strength. But to get him out is only the first step. The next is either to kill him, or to tame him and make him a useful animal. For the rational study of the law the blackletter man may be the man of the present, but the man of the future is the man of statistics and the master of economics. It is revolting to have no better reason for a rule of law than that so it was laid down in the time of Henry IV. It is still more revolting if the grounds upon which it was laid down have vanished long since, and the rule simply persists from blind imitation of the past. I am thinking of the technical rule as to trespass *ab initio* , as it is called, which I attempted to explain in a recent Massachusetts case. [1_3]

在如今的许多案件中，如果我们想知道一条法律规则为什么呈现出特定的形式，或者大致我们想知道它究竟为什么会存在，我们会向传统寻找答案。我们跟随传统翻开《年鉴》，或不局限于《年鉴》而探索萨利安法兰克人的风俗习惯，或回到历史长河中的某个地方，回顾日尔曼的丛林、诺曼国王们的需求、统治阶级的主张、普遍观念的缺乏，我们会发现，它实际存在的理由最初不过是该原则被人们所接受和习惯这一事实。对法律的理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对历史的研究。历史必须成为该研究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了解我们需要了解的法律规则的精确范围。这是理性研究的一部分，因为这是迈向理性怀疑的第一步，也就是迈向仔细重新衡量这些规则价值的第一步。把一条巨龙引出山洞，放在光天化日的平地之上，你能数清它的牙齿和爪子，知晓它的力量。但是把它引出山洞只是开始。接下来或是杀了它，或是把它驯服成有用的动物。在理性研究法律的

过程中，法条主义者可能是当代的代表，而未来的代表则是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大师。如果说某一法规存在的原因只是因为它在亨利四世时期就是这么制定的，这种观点令人反感。如果说制定该法规的依据早已消失，而该法规纯粹因为对过去的盲目模仿而继续存在，那就会更加令人反感。我想起所谓的“初始非法侵入”这一技术规则，我曾试图在最近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案件中对其进行解释。[2_3]

Let me take an illustration, which can be stated in a few words, to show how the social end which is aimed at by a rule of law is obscured and only partially attained in consequence of the fact that the rule owes its form to a gradu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stead of being reshaped as a whole, with conscious articulate reference to the end in view. We think it desirable to prevent one man's property being misappropriated by another, and so we make larceny a crime. The evil is the same whether the misappropriation is made by a man into whose hands the owner has put the property, or by one who wrongfully takes it away. But primitive law in its weakness did not get much beyond an effort to prevent violence, and very naturally made a wrongful taking, a trespass, part of its definition of the crime. In modern times the judges enlarged the definition a little by holding that, if the wrong-doer gets possession by a trick or device, the crime is committed. This really was giving up the requirement of trespass, and it would have been more logical, as well as truer to the present object of the law, to abandon the requirement altogether. That, however, would have seemed too bold, and was left to statute. Statutes were passed making embezzlement a crime. But the force of tradition caused the crime of embezzlement to be regarded as so far distinct from larceny that to this day, in some jurisdictions at least, a slip corner is kept open for thieves to contend, if indicted for larceny, that they should have been indicted for embezzlement, and if indicted for embezzlement,

that they should have been indicted for larceny, and to escape on that ground.

让我用几句话来举个例子，说明规则形式的变迁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是在有意识的、明确目的下的全盘改变，由此使得某一法律规则所希望达到的社会目的模糊不清而只有部分得到实现。我们认为有必要防止某人非法侵占他人的财产，因此，我们将盗窃定为犯罪。无论是所有者把财产交给罪犯还是罪犯非法取走，它们都是一样的犯罪。但原始法律的弱点，在于它主要致力于防范暴力，从而自然地把非法取得——非法侵占——视作犯罪定义的一部分。在现代，法官们认为，如果通过诡计或欺骗取得财产即构成盗窃罪，这略微扩大了盗窃罪的内涵。这实际上逐渐放弃了构成侵害的必要条件，如果完全放弃这一条件，在逻辑上更为通畅，而且对法律现在追求的目标而言更为真实。但是，完全放弃似乎会太过冒失，于是这一难题被抛给了立法机关。人们通过了成文法，规定挪用构成犯罪。然而，依据传统的力量，人们认为挪用罪和盗窃罪之间区别很大，以至于直到今天，至少在某些司法辖区中，盗贼仍有空子可钻：如果受到盗窃的指控，他们会抗辩自己应受挪用罪的指控；如果受到挪用罪的指控，他们会抗辩自己应受盗窃罪的指控，并以此为由逃脱制裁。

Far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s still await a better answer than that we do as our fathers have done. What have we better than a blind guess to show that the criminal law in its present form does more good than harm? I do not stop to refer to the effect which it has had in degrading prisoners and in plunging them further into crime, or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fine and imprisonment do not fall more heavily on a criminal's wife and children than on himself. I have in mind more far-reaching questions. Does punishment deter? Do we deal with criminals on proper principles? A modern school of Continental criminalists plumes itself on the formula, first

suggested, it is said, by Gall, that we must consider the criminal rather than the crime. The formula does not carry us very far, but the inquiries which have been started look toward an answer of my questions based on science for the first time. If the typical criminal is a degenerate, bound to swindle or to murder by as deep seated an organic necessity as that which makes the rattlesnake bite, it is idle to talk of deterring him by the classical method of imprisonment. He must be got rid of; he cannot be improved, or frightened out of his structural reaction. If, on the other hand, crime, like normal human conduct, is mainly a matter of imitation, punishment fairly may be expected to help to keep it out of fashion. The study of criminals has been thought by some well known men of science to sustain the former hypothesis. The statistics of the relative increase of crime in crowded places like large cities, where example has the greatest chance to work, and in less populated parts, where the contagion spreads more slowly, have been used with great force in favor of the latter view. But there is weighty authority for the belief that, however this may be, “not the nature of the crime, but the dangerousness of the criminal, constitutes the only reasonable legal criterion to guide the inevitable social reaction against the criminal.“ [1_4]

除了仿效父辈的做法以外，还有些基本问题需要我们给出更好的答案。若要表明现今状况下的刑法利大于弊，我们的现状能比盲目猜测好多少呢？我想指出，刑法在剥夺罪犯的尊严，并进一步驱使他们犯罪，我还要指出，罚款和监禁对罪犯妻小的影响是否比对他本人更大这一问题。我脑海中所想的问题更为深远。惩罚具有威慑作用吗？我们处理罪犯所依据的原则合适吗？一个现代的欧洲大陆刑事专家学派引以为傲的原则是，我们应当考虑的是罪犯而不是罪行，据说该原则最早由高尔提出。该原则用处有限，但由此开始的探询却第一次以科学为依据来回答我的问题。如果典型的罪犯是一个堕落的人，因为

其根深蒂固的机体的需求不可避免地犯下诈骗或者谋杀罪，就像响尾蛇必定会咬人一样，那么以传统的监禁方式来威慑他的说法即是一派空话。此人必须被消灭掉；他无法向善，也不会因机体反应而感到恐惧。另一方面，如果犯罪和人的正常行为一样，主要是一个模仿的问题，那么公正的惩罚就有助于阻止对其效仿之势。许多著名的科学家进行的罪犯研究支持前一种假说。在大城市里那些人口密集的地区，效仿起作用的几率最高，而在人口较少的地区，犯罪的传播速度较慢，这些对犯罪相对增长的统计数据已被用来作为支持后一观点的有力证据。但是不管如何，“不是犯罪的性质，而是罪犯的危险性，构成了唯一合理的法律标准，以引导针对罪犯的必然的社会反应。”[2_4] 这一观点非常具有权威性。

The impediments to rational generalization, which I illustrated from the law of larceny, are shown in the other branches of the law, as well as in that of crime. Take the law of tort or civil liability for damages apart from contract and the like. Is there any general theory of such liability, or are the cases in which it exists simply to be enumerated, and to be explained each on its special ground, as is easy to believe from the fact that the right of action for certain well known classes of wrongs like trespass or slander has its special history for each class? I think that there is a general theory to be discovered, although resting in tendency rather than established and accepted. I think that the law regards the infliction of temporal damage by a responsible person as actionable, if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known to him the danger of his act is manifest according to common experience, or according to his own experience if it is more than common, except in cases where upon special grounds of policy the law refuses to protect the plaintiff or grants a privilege to the defendant. [1_5] I think that commonly malice, intent, and negligence mean only that the danger was manifest to a greater or less degre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known

to the actor, although in some cases of privilege malice may mean an actual malevolent motive, and such a motive may take away a permission knowingly to inflict harm, which otherwise would be granted on this or that ground of dominant public good. But when I stated my view to a very eminent English judge the other day, he said, “You are discussing what the law ought to be; as the law is, you must show a right. A man is not liable for negligence unless he is subject to a duty.” If our difference was more than a difference in words, or with regard to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exceptions and the rule, then, in his opinion, liability for an act cannot be referred to the manifest tendency of the act to cause temporal damage in general as a sufficient explanation, but must be referred to the special nature of the damage, or must be derived from som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utside of the tendency of the act, for which no generalized explanation exists. I think that such a view is wrong, but it is familiar, and I dare say generally is accepted in England.

以有关盗窃的法律为例，我说明了理性概括受到的阻碍，这不仅体现在刑法中，还体现在其他法律分支中。我将以侵权法或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不包括因合同等产生的赔偿）为例。是否存在关于此类责任的一般原则？或者我们只需要列举出存在此类责任的相关案例，并视其具体情况一一进行阐释？人们容易相信后者，因为针对某些众所周知的犯罪行为（例如非法侵入和诽谤）提请诉讼的权利，每一类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我认为有一个普遍性理论尚待发现，尽管只是一种倾向，没有建立起来，也没有被接受。我认为，如果有责任能力的行为人依据一般经验，或者不仅仅是一般经验，还根据他自己的经验，知道他的行为在既定的情况下具有明显的危险性，那么法律就会认定，可以就该当事人造成的实际损害提起诉讼，除非根据特殊的政策依据，法律拒绝保护原告或者授予被告豁免权。 [2_5] 我认为，恶意、故意或疏忽通常仅意味着，在行为人知情的状况下，危害的明显程度不同而已，尽管在一些免责案例中，恶意可能意味着实际的恶意

动机，而这种动机可能会导致不允许知情伤害，否则基于这样或那样的重要公共利益理由会准予这种许可。然而，有一天，我向一位非常杰出的英国法官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他说："你讨论的是法律应该是什么；而实际的法律是你必须表明你有权利。过失行为不产生法律责任，除非此人负有法律义务。"如果我们的分歧不仅仅是言词不同，也不仅仅是对规则及其例外情况比例有异议，那么，按照他的观点，某种行为的责任不能以该行为一般会造成的世俗损害的明显倾向作为充分理由，而应当基于损害的特殊性质，或者基于行为倾向之外的某种特殊情形，因而不存在对它的概括解释。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它很流行，我敢说它在英国受到普遍认可。

Everywhere the basis of principle is tradition, to such an extent that we even are in danger of making the role of history more important than it is. The other day Professor Ames wrote a learned article to show, among other things, that the common law did not recognize the defence of fraud in actions upon specialties, and the moral might seem to be that the personal character of that defence is due to its equitable origin. But if, as I said, all contracts are formal, the difference is not merely historical, but theoretic, between defects of form which prevent a contract from being made, and mistaken motives which manifestly could not be considered in any system that we should call rational except against one who was privy to those motives. It is not confined to specialties, but is of universal application. I ought to add that I do not suppose that Mr. Ames would disagree with what I suggest.

不论在什么地方，原则都以传统为基础，因此我们面临过分夸大历史实际作用的危险。前些日子，埃姆斯教授写了篇颇有见地的文章，观点之一就是，普通法不认可在盖印合同诉讼中对欺诈行为进行抗辩，其寓意似乎就是此种抗辩的个人特点要归因于其衡平起源。但

是如果像我前面所说，合同都是形式化的，那么，导致合同不成立的形式缺陷和任何我们称作理性的法律制度都不会考虑（与动机有利害关系的人除外）错误意图，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就不只是历史意义上的，而是理论意义上的。但这种情况并不限于盖印合同，而是具有普遍适用性。我还应补充一句，我认为埃姆斯教授不会对我的意见有异议。

However, if we consider the law of contract, we find it full of history.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debt, covenant, and assumpsit are merely historical. The classification of certain obligations to pay money, imposed by the law irrespective of any bargain as quasi contracts, is merely historical. The doctrine of consideration is merely historical. The effect given to a seal is to be explained by history alone. Consideration is a mere form. Is it a useful form? If so, why should it not be required in all contracts? A seal is a mere form, and is vanishing in the scroll and in enactments that a consideration must be given, seal or no seal. Why should any merely historical distinction be allowed to affect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business men?

但是，当我们考察合同法时，我们发现它与历史密切相关。债务契约、盖印契约和简约之诉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历史意义上的。不论何种交易，作为准合同，由法律加之的付款义务分类也只是历史意义上的。对价原则也只是历史意义上的。对封印效力的解释只能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解释。对价不过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有用吗？如果有用，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合同都有这一要求呢？封印也只是一种形式，并在卷宗和立法中逐渐消失，法令的实施过程必须提供对价，不论有无印章。为什么允许仅仅具有历史意义的区别来影响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呢？

Since I wrote this discourse I have come on a very good example of the way in which tradition not only overrides rational policy, but overrides it after first having been misunderstood and having been given a new and broader scope than it had when it had a meaning. It is the settled law of England that a material alteration of a written contract by a party avoids it as against him. The doctrine is contrary to the general tendency of the law. We do not tell a jury that if a man ever has lied in one particular he is to be presumed to lie in all. Even if a man has tried to defraud, it seems no sufficient reason for preventing him from proving the truth. Objections of like nature in general go to the weight, not to the 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Moreover, this rule is irrespective of fraud, and is not confined to evidence. It is not merely that you cannot use the writing, but that the contract is at an end. What does this mean? The existence of a written contract depends on the fact that the offerer and offeree have interchanged their written expressions, not on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those expressions. But in the case of a bond, the primitive notion was different. The contract was inseparable from the parchment. If a stranger destroyed it, or tore off the seal, or altered it, the obligee could not recover, however free from fault, because the defendant's contract, that is, the actual tangible bond which he had sealed, could not be produced in the form in which it bound him. About a hundred years ago Lord Kenyon undertook to use his reason on the tradition, as he sometimes did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law, and, not understanding it, said he could see no reason why what was true of a bond should not be true of other contracts. His decision happened to be right, as it concerned a promissory note, where again the common law regarded the contract as inseparable from the paper on which it was written, but the reasoning was general, and soon was extended to other written contracts, and various absurd and unreal grounds of policy were invented to account for the enlarged rule.

写了这篇演说词后，我遇到了一个好的例子来说明，根据某种方式，传统不仅可使理性政策无效，而且在理性政策首次遭到误解，被赋予一个新的且比它原有含义有更广泛的内涵时就使之无效了。英国成文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对书面合同作出的实质性更改，应当避免对其产生不利影响。这一原则有违法律的一般趋势。我们不会指示陪审团，如果某人曾在特定情况下撒过谎，他就会在所有的情况下撒谎。即使某人曾经试图欺诈，这似乎不能成为阻止他证明事实真相的理由。类似性质的反对理由一般会作为衡量依据，但不会作为证据采纳。而且，这条规则和欺诈无关，也不限于证据方面。这不仅仅是说你不能利用这份文件，而是说合同也终止了。这是什么意思？书面合同的成立取决于要约人和受要约人已交换过书面凭证，而不是取决于该凭证的持续存在。但是，在债券的约据中，最初的概念不是如此。那时的合同和羊皮纸无法分开。如果某第三方毁掉羊皮纸，或者撕去封印，或者改变条款，则债权人即使没有过错，也不能获得赔偿，因为被告的合同，也就是他所盖印的实物契约无法以约束他的形式出现。大约一百年前，凯尼恩勋爵以这一传统为依据处理案件，正如他有时的作为有损法律一样，他这次也没理解这一传统。在未了解实情的情况下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适用于债券的规则不能适用于其他合同形式。他的判决碰巧是正确的，因为当事案件涉及到一张本票。再说一下，普通法当时认为合同与其所载的文书密不可分。但是该推理是概括性的并很快被扩展到其他书面合同中去，而且为了解释这一扩展原则，各种荒谬和虚假的政策依据应运而生。

I trust that no one will understand me to be speaking with disrespect of the law, because I criticise it so freely. I venerate the law, and especially our system of law, as one of the vastest products of the human mind. No one knows better than I do the countless number of great intellects that have spent themselves in making some addition or improvement, the greatest of which is trifling when compared with the mighty whole. It has the final title to

respect that it exists, that it is not a Hegelian dream, but a part of the lives of men. But one may criticise even what one reveres. Law is the business to which my life is devoted, and I should show less than devotion if I did not do what in me lies to improve it, and, when I perceive what seems to me the ideal of its future, if I hesitated to point it out and to press toward it with all my heart.

我相信，没有人会因为我如此自由地批评法律而认为我对它不敬。我非常尊崇法律，尤其是我们的法律体系，它是人类思想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无数伟大的学者全力以赴来增补和改进它，尽管与法律的庞大内容相比，最伟大的完善工作也显得微不足道。尊重法律有一个终极理由，即它是切实存在的，它不是黑格尔式的梦想，而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人也可以批评自己所敬重的事物。法律是我一生所致力的事业。如果我没有根据内心的驱使去完善它，如果我预见了自己认为的它未来的理想状态却犹疑不决，未能指出它或尽全力推进它，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展现出十足的决心。

Perhaps I have said enough to show the part which the study of history necessarily plays in the intelligent study of the law as it is today. In the teaching of this school and at Cambridge it is in no danger of being undervalued. Mr. Bigelow here and Mr. Ames and Mr. Thayer there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which will not be forgotten, and in England the recent history of early English law by Sir Frederick Pollock and Mr. Maitland has lent the subject an almost deceptive charm. We must beware of the pitfall of antiquarianism, and must remember that for our purposes our only interest in the past is for the light it throws upon the present. I look forward to a time when the part played by history in the explanation of dogma shall be very small, and instead of ingenious

research we shall spend our energy on a study of the ends sought to be attained and the reasons for desiring them. As a step toward that ideal it seems to me that every lawyer ought to seek an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s. The present divorce between the school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law seems to me an evidence of how much progress in philosophical study still remains to be made.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deed, we come again upon history on a larger scale, but there we are called on to consider and weigh the ends of legislation, the means of attaining them, and the cost. We learn that for everything we have to give up something else, and we are taught to set the advantage we gain against the other advantage we lose, and to know what we are doing when we elect.

关于历史研究在如今的知性法律研究中所扮演的必要角色，我说的可能够多了。在本学院以及剑桥大学的教学中，其作用并未受到低估。该院的比奇洛先生和剑桥的埃姆斯先生以及赛耶先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在英国，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和梅特兰先生近期所著的早期英国法律历史，令这门学科带有迷惑性的魅力。我们必须警惕好古主义的陷阱，而且必须牢记，我们对过去感兴趣，唯一的目的在于借鉴。我盼望着有一天，历史在解释法律条文时只起到很小的作用，我们需要把精力放在探求自己渴望达到的目标以及追求这些目标的理由上，而不是什么别出心裁的研究。，我认为每位法律人都应该了解经济学，作为向这一理想迈进的一步。我认为目前政治经济学和法学的学派分离是哲学研究尚需大幅度进步的证据。按照目前的政治经济学状况，的确，我们又面临更大规模的历史问题，但在这里我们需要考虑和估量立法的目的、达成它的手段以及成本。我们明白有得必有失，我们学会如何以所得之利来抵消所失之利，并且对我们的选择有着清楚的认识。

There is another study which sometimes is undervalued by the practical minded, for which I wish to say a good word, although I think a good deal of pretty poor stuff goes under that name. I mean the study of what is called jurisprudence. Jurisprudence, as I look at it, is simply law in its most generalized part. Every effort to reduce a case to a rule is an effort of jurisprudence, although the name as used in English is confined to the broadest rules and most fundamental conceptions. One mark of a great lawyer is that he se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roadest rules. There is a story of a Vermont justice of the peace before whom a suit was brought by one farmer against another for breaking a churn. The justice took time to consider, and then said that he had looked through the statutes and could find nothing about churns, and gave judgment for the defendant. The same state of mind is shown in all our common digests and textbooks. Applications of rudimentary rules of contract or tort are tucked away under the head of Railroads or Telegraphs or go to swell treatises on historical subdivisions, such as Shipping or Equity, or are gathered under an arbitrary title which is thought likely to appeal to the practical mind, such as Mercantile Law. If a man goes into law it pays to be a master of it, and to be a master of it means to look straight through all the dramatic incidents and to discern the true basis for prophecy. Therefore, it is well to have an accurate notion of what you mean by law, by a right, by a duty, by malice, intent, and negligence, by ownership, by possession, and so forth. I have in my mind cases in which the highest courts seem to me to have floundered because they had no clear ideas on some of these themes. I have illustrated their importance already. If a further illustration is wished, it may be found by reading the Appendix to Sir James Stephen's Criminal Law on the subject of possession, and then turning to Pollock and Wright's enlightened book. Sir James Stephen is not the only writer whose attempts to analyze legal ideas have been confused by striving for a useless

quintessence of all systems, instead of an accurate anatomy of one. The trouble with Austin was that he did not know enough English law. But still it is a practical advantage to master Austin, and his predecessors, Hobbes and Bentham, and his worthy successors, Holland and Pollock. Sir Frederick Pollock's recent little book is touched with the felicity which marks all his works, and is wholly free from the perverting influence of Roman models.

还有另外一种研究，务实派有时会低估它，尽管我认为不少劣质的东西被归在它的名下，我还是希望为它说一句好话。我指的是被称之为法理学的研究。我认为，法理学是法律中最普遍最具有概括性的部分。虽然法理学这一名称在英语中仅限于最宽泛的规则和最基本的概念，但是从一个案件中得出一项原则的每一步努力，都具有法理学的意义。优秀法律人的一个特征，就是他知道怎样运用那些最宽泛的法则。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佛蒙特州的治安法官。该法官受理了一个案子，一位农民起诉另一位农民打破了他的搅乳器。这位法官经过考虑之后说，他查遍了法律法规，都没有找到和搅乳器有关的规定，所以他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在我们所有的判例摘要和教科书中，同样的思路屡见不鲜。合同或侵权的基本规则的运用隐藏于“铁路”或“电报”等条目之下，或集入诸如“运输法”或“衡平法”等历史分类的大部头论著中，或者收放在像“商贸法”这类被认为可能会吸引务实者的名目之下。如果一个人进入法律这一行，对其了如指掌会有回报，而这意味着必须参透所有戏剧性的事件，识别出预测的真正基础。因此，对法律、权利、义务、恶意、故意、过失、所有权以及占有等等概念的含义，大家都要有精准的了解。在我心里，最高法院之所以对几桩案件作出了错误判决，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对上述的一些主题缺乏清晰的概念。我已经说明了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如果希望得到更深入的例证，可以先读一读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刑法》后面有关占有这一话题的附录，之后再读一读波洛克和赖特有见地的著作。有些法学家，他们一方面试图分析某些法律观念，一方面又努力想要追寻某种毫无意义的所有体系的本质，而不是对一种体系进行精准的剖

析，将二者混为一谈，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并不是唯一如此的一位法学家。而奥斯丁的问题在于他对英国法了解不够。但是，全面理解奥斯丁及其先辈霍布斯、边沁以及其重要继承者霍兰和波洛克，仍然具有实用价值。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最近的短篇著作与他的其他著作一样精当得体，完全没有受到罗马法著作的负面影响。

The advice of the elders to young men is very apt to be as unreal as a list of the hundred best books. At least in my day I had my share of such counsels, and high among the unrealities I place the recommendation to study the Roman law. I assume that such advice means more than collecting a few Latin maxims with which to ornament the discourse—the purpose for which Lord Coke recommended Bracton. If that is all that is wanted, the title *De Regulis Juris Antiqui* can be read in an hour. I assume that, if it is well to study the Roman law, it is well to study it as a working system. That means mastering a set of technicalities more difficult and less understood than our own, and studying another course of history by which even more than our own the Roman law must be explained. If any one doubts me, let him read Keller's *Der Romische Civil Process und die Actionen* , a treatise on the praetor's edict, Muirhead's most interesting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rivate Law of Rome* , and, to give him the best chance, Sohn's admirable *Institutes* . No. The way to gain a liberal view of your subject is not to read something else, but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subject itself. The means of doing that are, in the first place, to follow the existing body of dogma into its highest generalizations by the help of jurisprudence; next, to discover from history how it has come to be what it is; and finally, so far as you can, to consider the ends which the several rules seek to accomplish, the reasons why those ends are desired, what is given up to gain them, and whether they are worth the price.

老人对年轻人的建议很容易就像列一份百本最佳书目那样不切实际。至少在我年轻时，我得到过这类建议，现在看来，其中最不现实的当属推荐研习罗马法。我想这一建议不是让大家去收集几句拉丁格言来装点门面——那是科克勋爵推荐布莱克顿的目的。如果那就是唯一目的，《论古代法律规则》可以在一小时内读完。我以为，如果值得研习罗马法的话，就值得把它作为一个运作体系来来研究。那意味着要去掌握一套较我们的法律更为复杂、更不为人了解的技术细节，要去研究另一法律史。对罗马法的解释比对我们现行法律的解释更需要借助历史研究。如果有人对我的观点表示怀疑，可以让他去读读凯勒有关裁判官法令的论著《罗马法民事程序与诉讼》，缪尔黑德非常有趣的《罗马私法历史导论》，而且，最好也有机会读读索姆的令人赞叹的《罗马私法》。不，获得对自己专业的宽广见解的办法不是去读其他的书，而是要对该问题本身寻根究底。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在法理学的引导下，沿寻现存的原则体系进入最具有概括性的领域；其次，从历史中寻找它演变至今的原因；最后，尽可能思考这些规则寻求实现的目标、值得追求这些目标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付出的代价以及它们是否值得付出代价。

We have too little theory in the law rather than too much, especially on this final branch of study. When I was speaking of history, I mentioned larceny as an example to show how the law suffered from not having embodied in a clear form a rule which will accomplish its manifest purpose. In that case the trouble was due to the survival of forms coming from a time when a more limited purpose was entertained. Let me now give an example to show the practical importance, for the decision of actual cases, of understanding the reasons of the law, by taking an example from rules which, so far as I know, never have been explained or theorized about in any adequate way. I refer to statutes of limitation and the law of prescription. The end of such rules is

obvious, but what is the justification for depriving a man of his rights, a pure evil as far as it goes, in consequence of the lapse of time? Sometimes the loss of evidence is referred to, but that is a secondary matter. Sometimes the desirability of peace, but why is peace more desirable after twenty years than before? It is increasingly likely to come without the aid of legislation. Sometimes it is said that, if a man neglects to enforce his rights, he cannot complain if, after a while, the law follows his example. Now if this is all that can be said about it, you probably will decide a case I am going to put, for the plaintiff; if you take the view which I shall suggest, you possibly will decide it for the defendant. A man is sued for trespass upon land, and justifies under a right of way. He proves that he has used the way openly and adversely for twenty years, but it turns out that the plaintiff had granted a license to a person whom he reasonably supposed to be the defendant's agent, although not so in fact, and therefore had assumed that the use of the way was permissive, in which case no right would be gained. Has the defendant gained a right or not? If his gaining it stands on the fault and neglect of the landowner in the ordinary sense, as seems commonly to be supposed, there has been no such neglect, and the right of way has not been acquired. But if I were the defendant's counsel, I should suggest th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acquisition of rights by lapse of time is to be looked for in the position of the person who gains them, not in that of the loser. Sir Henry Maine has made it fashionable to connect the archaic notion of property with prescription. But the connection is further back than the first recorded history. It is in the nature of man's mind. A thing which you have enjoyed and used as your own for a long time, whether property or an opinion, takes root in your being and cannot be torn away without your resenting the act and trying to defend yourself, however you came by it. The law can ask no better justification than the deepest instincts of man. It is only by way of

reply to the suggestion that you are disappointing the former owner, that you refer to his neglect having allowed the gradual dissociation between himself and what he claims, and the gradual association of it with another. If he knows that another is doing acts which on their face show that he is on the way toward establishing such an association, I should argue that in justice to that other he was bound at his peril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other was acting under his permission, to see that he was warned, and, if necessary, stopped.

我们在法律方面的理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尤其是在法理学研究方面。在谈论历史的时候，我以偷盗罪为例来说明，法律缺乏明晰的形式来表述达到其明确目标所需的规则，因而难以发挥作用。在该例中，问题在于早期的那些形式存留到了现在，而当时其目的更为狭隘。现在，我来举例说明理解法律的理由对实际案件判决所具有的实践重要性。据我所知，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我所举的例子所依据的规则进行充分的阐释或者将其理论化。我指的是有关诉讼时效的立法和时效法。这些规则的目的显而易见，但究竟有什么理由，仅仅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剥夺一个人的权利？其本身纯粹就是一种罪恶。有时，证据的灭失也是一个考虑因素，但这是个次要问题。有时是为了平息事件，但为什么二十年后人们更希望平息事件呢？如果没有立法机关的帮助，这些问题就有可能继续出现。有时，人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如果在一段时间以后法律效仿他这样做，那他就不能抱怨。如果这些就是时效规定的所有理由，在下面我讲的案例中大家很可能会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如果大家采纳我将要提出的观点，就可能就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一个人因非法侵入他人土地而被诉，他以拥有通行权为由进行辩护。他证明自己公开、未经许可使用该路已有二十年。但实际情况是原告将使用许可授权给某人，且合理地以为此人是被告的代理人，因此原告以为被告的使用是经过许可的（虽然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被告不能获得任何权利。被告是否可以获得权利呢？通常人们似乎认为，被告获得该权利是基于土地

所有者在通常意义上的错误和疏忽，如果这样，如今这种疏忽并不存在，被告也就没有获得通行权。但是，如果我是被告的律师，我会建议因时间流逝而获取权利的依据应该从权利获得者而非权利丧失者的位置来看待。亨利·梅因爵士把财产的古老观念和时效相联系，使之成为一种流行观念。但这种联系比自有记载的历史还要久远。它存在于人类思维的天性之中。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享用的事物，不管是财产还是观念，会在你身上扎根。不论你是怎样得到它的，若有外力想把它夺走，你必然怨恨这种行为并试图为自己辩护。法律能要求的最正当的理由莫过于人类内心最深处的本能。如果有人说你使原有物主感到失望了，作为回应，你应提到，原告的疏忽使其与其所有物之间的联系逐渐分离，而使所有物与被告之间逐渐建立起联系。如果原有物主了解他人公开的行为表明此人正在不断加强这样的联系时，我认为，为了公平对待此人，原有物主有责任查明此人的行为是否经他许可，以便向其发出警告，并在必要时加以阻止。

I have been speaking about the study of the law, and I have said next to nothing about what commonly is talked about in that connection—text-books and the case system, and all the machinery with which a student comes most immediately in contact. Nor shall I say anything about them. Theory is my subject, not practical details. The modes of teaching have been improved since my time, no doubt, but ability and industry will master the raw material with any mode. Theo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dogma of the law, as the architect is the most important man who takes part in the building of a house. The most important improvements of the last twenty-five years are improvements in theory. It is not to be feared as unpractical, for, to the competent, it simply means going to the bottom of the subject. For the incompetent, it sometimes is true, as has been said, that an interest in general ideas means an absence of particular knowledge. I remember in army days reading of a youth who, being examined for the lowest grade and being

asked a question about squadron drill, answered that he never had considered the evolutions of less than ten thousand men. But the weak and foolish must be left to their folly. The danger is that the able and practical minded should look with indifference or distrust upon ideas the connection of which with their business is remote. I heard a story, the other day, of a man who had a valet to whom he paid high wages, subject to deduction for faults. One of his deductions was, “For lack of imagination, five dollars.” The lack is not confined to valets. The object of ambition, power, generally presents itself nowadays in the form of money alone. Money is the most immediate form, and is a proper object of desire. “The fortune,” said Rachel, “is the measure of intelligence.” That is a good text to waken people out of a fool's paradise. But, as Hegel says, [1_6] “It is in the end not the appetite, but the opinion, which has to be satisfied.” To an imagination of any scope the most far-reaching form of power is not money, it is the command of ideas. If you want great examples, read Mr. Leslie Stephen's *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and see how a hundred years after his death the abstract speculations of Descartes had become a practical force controlling the conduct of men. Read the works of the great German jurists, and see how much more the world is governed today by Kant than by Bonaparte. We cannot all be Descartes or Kant, but we all want happiness. And happiness, I am sure from having known many successful men, cannot be won simply by being counsel for great corporations and having an income of fifty thousand dollars. An intellect great enough to win the prize needs other food besides success. The remoter and more general aspects of the law are those which give it universal interest. It is through them that you not only become a great master in your calling, but connect your subject with the universe and catch an echo of the infinite, a glimpse of its unfathomable process, a hint of the universal law.

我一直在讨论对法律进行研究的问题，但就相关的老生常谈的一些问题，比如教科书、案例体系以及整个机制（这是学生最直接接触到的一个问题），我几乎没有进行任何说明。我也不打算去讨论它们。我的主题是理论，而非实际细节。比起我做学生的时候，现在的教学方式已经有所改进，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不论何种方式，能力和勤奋都是掌握原始材料的必要条件。正如建筑师是建房中最重要的人一样，理论是法律原则中最重要的部分。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最重要的进步是理论的进步。不必担心它不切实际，因为对有能力的人而言，它只是意味着对该话题追根溯源。对能力不强的人来说，正如上文所述，对抽象概念的兴趣意味着具体知识的缺乏。我记得在部队时读到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在最低等级的晋升考试中，当被问及一个有关中队训练的问题时，他回答说自己从未考虑过万人规模以下的训练。但是对弱愚之人不必过分苛求。然而也要担心，有能力而务实的人对与自身事业关系甚远的观念漠不关心或充满怀疑。有一天，我听到一个故事，某人雇了个贴身侍从，向其支付很高的薪水，但其一旦犯错，薪水就会被扣掉一部分。其中的一个扣除项目是“缺乏想象力，扣五元。”缺乏想象力的不只是贴身侍从。在如今，雄心、权力等目标，基本上仅仅以金钱的形式表现出来。金钱是最直接的形式，也是人们的合理欲望目标。雷切尔说，“财富，是智慧的标尺。”这句话有利于把人们从黄粱美梦中唤醒。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说[2_6]：“最终必须得到满足的不是欲望，而是意见。”不论想象力的大小，最具影响力的权利形式不是金钱，而是对思想的掌控。如果大家想要著名的例证，就读一读莱斯利·斯蒂芬先生的《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看看笛卡尔死后一百年，其抽象思辨如何已经成为了控制人们行为的实际力量。读一读伟大的德国法理学家们的著述，就会看到如今的世界是如何更多受到康德，而不是波拿巴的影响。我们不可能都成为笛卡尔或康德，但我们都渴望幸福。而根据对诸多成功之士的了解，我确信，幸福无法仅仅通过成为一个大公司的律师顾问并获得五万美元的年收入获得。赢得赞誉的伟大智者，除了成功以外尚需其他的食粮。法律更为深远和更普遍的方面，正是那些使法律受到普遍关注的方面。正是通过这些方面，你不仅可以成为自己行业的大师，而

且可以把你的研究领域与宇宙联系起来，聆听来自苍穹的回响，瞥见其深不可测的过程，领悟普遍规律的蛛丝马迹。

[1_1].Rolle Rep 368

[1_2].See Hanson v. Globe Newspaper Co., 159 Mass. 293, 302.

[1_3].Commonwealth v. Rubin, 165 Mass. 453.

[1_4].Havelock Ellis, *The Criminal* , 41, citing Garofalo. See also Ferri, *Sociologie Criminelle* , passim. Compare Tarde, *La Philosophie P´enale* .

[1_5].An example of the law's refusing to protect the plaintiff is when he is interrupted by a stranger in the use of a valuable way, which he has travelled adversely for a week less than the period of prescription. A week later he will have gained a right, but now he is only a trespasser. Example of privilege I have given already. One of the best is competition in business.

[1_6].Phil. des Rechts, §190.

[2_1].Rolle Rep 368.

[2_2].参见 Hanson v. Globe Newspaper Co., 159 Mass. 293, 302.

[2_3].Commonwealth v. Rubin, 165 Mass. 453.

[2_4].Havelock Ellis，《犯罪人》，引用了加罗法洛的观点。此外还可参见菲利《社会犯罪人》，passim.比较塔尔德《刑罚的哲学》。

[2_5].法律拒绝保护原告的一个例子是，在原告距获得某物的所有权还有一星期时，如果原告对该物的使用被某人中断，那法律将判定原告是侵权，尽管只剩一周原告就可以拥有该物的所有权。豁免权的例子之前我已经给过了，最好的例子就是商业中的竞争。

[2_6].Phil. des Rechts, 190.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普通法 I

The Common Law

Oliver Wendell Holmes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普通法（上）

The Common Law I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reface 前言
- LECTURE I. EARLY FORMS OF LIABILITY. 第一讲　早期法律责任形式
- LECTURE II. THE CRIMINAL LAW. 第二讲　刑法
- LECTURE III. TORTS.—TRESPASS AND NEGLIGENCE. 第三讲　侵权——侵害和过失
- LECTURE IV. FRAUD, MALICE, AND INTENT.—THE THEORY OF TORTS. 第四讲　欺诈、恶意与蓄意——侵权法理论
- LECTURE V. THE BAILEE AT COMMON LAW. 第五讲　普通法上的受托人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reface

前言

This book is written in pursuance of a plan which I have long had in mind. I had taken a first step in publishing a number of articles in the American Law Review, but I should hardly have attempted the task of writing a connected treatise at the present time,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invitation to deliver a course of Lectures at the Lowell Institute in Boston. That invitation encouraged me to do what was in my power to accomplish my wish. The necessity of preparing for the Lectures made it easier to go farther, and to prepare for printing, and accordingly I did so. I have made such use as I thought fit of my articles in the Law Review, but much of what has been taken from that source has been rearranged, rewritten, and enlarged,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work is new. The Lectures as actually delivered were a good deal simplified, and were twelve in number. The twelfth, however, was a summary of the foregoing eleven, and has been omitted, as not necessary for a reader with the book before him.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打算要写这本书。我首先在《美国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不过，如果不是波士顿的洛威尔研究所邀请我讲授一门课程的话，现在要写出一部前后连贯的专著的任务，我几乎都不敢尝试。这一邀请促使我尽力实现自己的愿望。为了这一课程的系列讲座，我必须备课，这就使得事情更易于向前推进，并最终完稿付诸印刷，由此我也实现了我的愿望。我在《法律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在本书中都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了引用，但所引用的大部分文章我都重新进行了编排、改写或扩充，所以本书大部分内容都是

新的。实际讲座的内容也被大量简化，原来共有十二讲。但第十二讲是对前面十一讲的总结，读者读书时不需要，也就省略了。

The limits of such an undertaking as the present must necessarily be more or less arbitrary. Those to which I have confined myself have been fixed in part by the limits of the course for which the Lectures were written. I have therefore not attempted to deal with Equity, and have even excluded those subjects, like Bills and Notes, or Partnership, which would naturally require an isolated treatment, and which do not promise to throw light on general theory. If, within the bounds which I have set myself, any one should feel inclined to reproach me for a want of greater detail, I can only quote the words of Lëhurou, “Nous faisons une théorie et non un spicilège.”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内容设定一定多少有些武断。我仅局限于这些内容，部分原因是受课程内容所限，因为这些讲稿是为这门课程而准备的。我因此不打算涉及衡平法，甚至不考虑诸如票据以及合伙等问题，这些问题一般需要单独予以研究，而且不一定有助于一般性理论的得出。针对我自行设定的内容，如果有人想要指责我，说本书缺乏更多的细节，我就只好引用勒户的一句话：“我们写的是理论而不是随笔。”

O.W. HOLMES, JR.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BOSTON, February 8, 1881.

1881年2月8日于波士顿

LECTURE I. EARLY FORMS OF LIABILITY.

第一讲　早期法律责任形式

The object of this book is to present a general view of the Common Law. To accomplish the task, other tools are needed besides logic. It is something to show that the consistency of a system requires a particular result, but it is not all. 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The felt necessities of the time, the prevalent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intuitions of public policy, avowed or unconscious, even the prejudices which judges share with their fellow-men, have had a good deal more to do than the syllogism in determining the rules by which men should be governed. The law embodies the story of a nation's development through many centuries, and it cannot be dealt with as if it contained only the axioms and corollaries of a book of mathematics. In order to know what it is, we must know what it has been, and what it tends to become. We must alternately consult history and existing theories of legislation. But the most difficult labor will be to underst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into new products at every stage. The substance of the law at any given time pretty nearly corresponds, so far as it goes, with what is then understood to be convenient; but its form and machinery,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it is able to work out desired results, depend very much upon its past.

本书旨在对普通法进行概括性介绍。为此，除逻辑之外，还需要借助其他一些工具。这里有必要指出，体系的一致性要求某种特定的结果，但结果并非一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时代所必需的感受、盛行的道德及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无论

是公开宣布的还是下意识的直觉，甚至是法官及其同僚们所共有的偏见，在制定人们都应一体遵守的规则时所起到的作用都要远远大于三段论。法律体现了一个国家千百年发展的历史，对待法律，不能认为法律仅仅包含一些公理及推论，就像数学书中的公理及推论一样。要理解法律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其过往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不时参考历史与现有的立法理论。但最困难的工作是要了解，两者在每一个阶段是如何结合起来形成为新法律的过程。任何特定时代的法律，只要是行得通，其内容都相当符合当时人们所认可的便利性，但其形式与机理，及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则极大程度地取决于其过往。

In Massachusetts today, while, on the one hand, there are a great many rules which are quite sufficiently accounted for by their manifest good sens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some which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y reference to the infancy of procedure among the German tribes, or to the social condition of Rome under the Decemvirs.

今天，在马萨诸塞州，一方面，有很多规则的明显合理性足可以对其存在作出解释；但另一方面，有一些规则却必须参考萌芽时期的日耳曼部落法律程序，或者十人执政官治理下古罗马的社会条件，才可以理解。

I shall use the history of our law so far a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ain a conception or to interpret a rule, but no further. In doing so there are two errors equally to be avoided both by writer and reader. One is that of supposing, because an idea seems very familiar and natural to us, that it has always been so. Many things which we take for granted have had to be laboriously fought out or

thought out in past times. The other mistake is the opposite one of asking too much of history. We start with man full grown. It may be assumed that the earliest barbarian whose practices are to be considered, had a good many of the same feelings and passions as ourselves.

只要有必要对某个概念或某条规则进行解释，我就会涉及到我们法律发展的历史，但仅限于此。在这一过程中，作者与读者同样都要避免以下两个错误：一个是，由于某一个观念在我们看来似乎非常熟悉和自然，便想当然地认为它历来如此。很多我们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在以往却是人们必须奋力争取或是深思熟虑才能得到的。另一个错误则恰恰相反，那就是过多地询问历史。我们讨论的出发点是完全成熟进化的人类。可以假定，最早期的野蛮人也拥有许多和我们同样的情感，他们的情况也要考虑到。

The first subject to be discussed is the general theory of liability civil and criminal. The Common Law has changed a good deal since the beginning of our series of reports, and the search after a theory which may now be said to prevail is very much a study of tendencies. I believe that it will be instructive to go back to the early forms of liability, and to start from them.

第一个要讨论的主题是民事和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自我们的系列判例汇编问世以来，普通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对目前还可以说得上是比较盛行的某种理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未来趋势的研究。我相信，追溯法律责任的早期形态，并以此为出发点，将会很有教益。

It is commonly known that the early forms of legal procedure were grounded in vengeance. Modern writers have thought that the Roman law started from the blood feud, and all the authorities agree that the German law begun in that way. The feud led to the composition, at first optional, then compulsory, by which the feud was bought off. The gradual encroachment of the composition may be traced in the Anglo-Saxon laws, [2_1] and the feud was pretty well broken up, though not extinguished, by the time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The killings and house-burnings of an earlier day became the appeals of mayhem and arson. The appeals de pace et plagis and of mayhem became, or rather were in substance, the action of trespass which is still familiar to lawyers. [2_2] But as the compensation recovered in the appeal was the alternative of vengeance, we might expect to find its scope limited to the scope of vengeance. Vengeance imports a feelingof blame, and an opinion, however distorted by passion, that a wrong has been done. It can hardly go very far beyond the case of a harm intentionally inflicted: even a dog distinguishes between being stumbled over and being kicked.

众所周知，法律程序的早期形式建立在复仇的基础之上。现代法学家们认为，罗马法起源于血亲世仇，所有法学权威们也都一致认为日耳曼法的起源亦是如此。世仇导致了和解赔偿方式的出现，起初并非强制性的，后来则成为强制性的，由此世仇得以化解。在盎格鲁—撒克逊法中，可以找到和解赔偿模式逐步发展的痕迹，到了征服者威廉一世时期，世仇制度虽未完全消失，但已经差不多解体了。由早先的杀人和纵火烧房行为产生了重伤罪和纵火罪之诉。扰乱治安并造成伤害之诉以及重伤之诉产生了——或者说本质上就是——法学家们如今仍很熟悉的侵害之诉。但是，既然在诉讼中获得的赔偿是复仇的替代物，我们就会发现，赔偿的范围局限在复仇的范围之内。复仇意味着一种责难感，意味着人们认为受到了侵害，而不论其看法如何为激

情所扭曲。复仇几乎不会超出故意伤害的情况：即使一条狗也会区分人是被它绊倒了还是被踢了它一脚。

Whether for this cause or another, the early English appeals for personal violence seem to have been confined to intentional wrongs. Glanvill [2_3] mentions melees, blows, and wounds,—all forms of intentional violence. In the fuller description of such appeal given by Bracton [2_4] it is made quite clear that they were based on intentional assaults. The appeal de pace et plagis laid an intentional assault, described the nature of the arms used, and the length and depth of the wound. The appellor also had to show that he immediately raised the hue and cry. So when Bracton speaks of the lesser offences, which were not sued by way of appeal, he instances only intentional wrongs, such as blows with the fist, flogging, wounding, insults, and so forth. [2_5] The cause of action in the cases of trespass reported in the earlier Year Books and in the Abbreviatio Plaeitorum is always an intentional wrong. It was only at a later day, and after argument, that trespass was extended so as to embrace harms which were foreseen, but which were not the intended consequence of the defendant's act. [2_6] Thence again it extended to unforeseen injuries. [2_7]

不论是由于这一缘故还是别的原因，早期英国的个人暴力之诉似乎都被局限在故意不当行为的范畴之内。格兰维尔提到了群殴、殴打和身体伤害——这些都是故意伤害的形式。布拉克顿对这类诉讼的描述更为全面，其描述清楚地表明此类诉讼都建立在故意伤害的基础之上。扰乱治安并造成伤害之诉被归为一种故意侵犯行为，并规定了所使用武器的性质以及伤口的长度和深度。控诉人还必须证明他立马就发出了喊捉声。因此，在布拉克顿提到那些较轻的，不是以诉讼方式提起的不当行为时，他仅列举了诸如殴击、鞭打、伤害、侮辱等故意

不当行为。早期的《年鉴》和《高级法院判例集》所收录的侵害案例中，诉因总是故意不当行为。只是在后来，经争论之后，侵害之诉的范围才被扩大，从而包括可预见的伤害，不过这种伤害并非被告人有意行为的后果。此后，侵害之诉又逐渐扩大到意外伤害。

It will be seen that this order of development is not quite consistent with an opinion which has been held, that it was a characteristic of early law not to penetrate beyond the external visible fact, the *damnum corpore corpori datum* . It has been thought that an inquiry into the internal condition of the defendant, his culpability or innocence, implies a refinement of juridical conception equally foreign to Rome before the Lex Aquilia, and to England when trespass took its shape. I do not know any very satisfactory evidence that a man was generally held liable either in Rome [2_8] or England for the accidental consequences even of his own act. But whatever may have been the early law, the foregoing account shows the starting-point of the system with which we have to deal. Our system of private liability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a man's own acts, that is, for his trespasses, started from the notion of actual intent and actual personal culpability.

可以看出这一发展顺序不太符合人们一直持有的一种观点，认为早期法律的一大特征就是局限于外在可见事实的范畴之内，即 *damnum corpore corpori datum* （侵害人因自己的身体直接给被害人的身体或者受损物造成的伤害）。调查被告的内在情况，其是难辞其咎还是清白无辜，被看作是司法观念的一次细化，这对于《阿奎利亚法》之前的罗马以及侵害之诉成形之时的英格兰，同样都很陌生。我找不到任何令人非常满意的证据，表明在罗马或者英格兰，一个人通常还会因为甚至是其自身行为所产生的意外后果负有责任。不过，无论早期法律如何，上文已经指出了早期法律体系的出发点，这是我们

要讨论的对象。个人对其自身行为的后果负责，即对其侵害行为负责，我们这一法律体系始于有关直接故意与个人直接责任的概念。

The original principles of liability for harm inflicted by another person or thing have been less carefully considered hitherto than those which governed trespass, and I shall therefore devote the rest of this Lecture to discussing them. I shall try to show that this liability also had its root in the passion of revenge, and to point out the changes by which it reached its present form. But I shall not confine myself strictly to what is needful for that purpose, because it is not only most interesting to trace the transformation throughout its whole extent, but the story will also afford an instructive example of the mode in which the law has grown, without a break, from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Furthermore, it will throw much light upon some important and peculiar doctrines which cannot be returned to later.

与规制非法侵害的原则相比较，最初适用于因他人或物造成伤害的责任原则，人们迄今研究的还不够深入；因此，本讲接下来将主要讨论这一问题。我将试图证明这类责任也同样根植于复仇的激情，并试图指出其发展为现有形式所历经的变化。但我并不会严格局限于这一主题，因为探寻责任形式整个的变迁过程不仅非常有趣，还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例子，来说明法律从野蛮到文明、没有一丝中断的发展模式。此外，这也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重要的、特殊的以及后来无法还原的法律原理。

A very common phenomenon, and one very familiar to the student of history, is this. The customs, beliefs, or needs of a primitive time establish a rule or a formula. In the course of

centuries the custom, belief, or necessity disappears, but the rule remains. The reason which gave rise to the rule has been forgotten, and ingenious minds set themselves to inquire how it is to be accounted for. Some ground of policy is thought of, which seems to explain it and to reconcile it with the present state of things; and then the rule adapts itself to the new reasons which have been found for it, and enters on a new career. The old form receives a new content, and in time even the form modifies itself to fit the meaning which it has received. The subject under consideration illustrates this course of events very clearly.

学历史的人都很熟悉这样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原始时代的习俗、信仰或需求使某条规则或准则得以建立。在千百年的进程中，这些习俗、信仰或需求已经不复存在，但规则却被保留了下来。导致规则产生的原因早已被遗忘，聪明人于是开始探寻如何解释规则。人们对某一政策依据进行了研究，这一依据似乎可以对规则作出解释，并使其符合事物当前的状况；于是，规则就适应了人们为其找寻的新理由，从而开始了一段新生涯。旧形式纳入了新内容，形式本身为了符合新内容，也会适时加以变化。本讲的主题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样发展的过程。

I will begin by taking a medley of examples embodying as many distinct rules, each with its plausible and seemingly sufficient ground of policy to explain it.

我先随便举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包含许多明确的规则，每一规则都有其貌似有理和充分的政策依据来进行解释。

A man has an animal of known ferocious habits, which escapes and does his neighbor damage. He can prove that the animal escaped through no negligence of his, but still he is held liable. Why? It is, says the analytical jurist, because, although he was not negligent at the moment of escape, he was guilty of remote heedlessness, or negligence, or fault, in having such a creature at all. And one by whose fault damage is done ought to pay for it.

某人养了一只动物，大家都知道它性情凶猛，有一天它逃了出来，对其邻居造成了伤害。此人能够证明该动物的逃逸绝不是出于他的过失，但他对此依然负有责任。为什么？分析法学家说，这是因为尽管在动物逃逸时他没有过失，但是只要养了这类动物，他就犯了间接疏忽、过错或过失罪。一个人应当对因其过失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

A baker's man, while driving his master's cart to deliver hot rolls of a morning, runs another man down. The master has to pay for it. And when he has asked why he should have to pay for the wrongful act of an independent and responsible being, he has been answered from the time of Ulpian to that of Austin, that it is because he was to blame for employing an improper person. If he answers, that he used the greatest possible care in choosing his driver, he is told that that is no excuse; and then perhaps the reason is shifted, and it is said that there ought to be a remedy against some one who can pay the damages, or that such wrongful acts as by ordinary human laws are likely to happen in the course of the service are imputable to the service.

一个面包店的雇员，在一天早上驾着雇主的马车运送热面包卷时

撞倒了一个人。雇主必须对此予以赔偿。当雇主质问，为什么他必须为一个应受归咎的独立的人做出的不当行为赔偿时，从乌尔比安时期一直到奥斯丁时期，他都会得到这样的答复：这是因为他的过错在于用人不当。如果他回答说，他在挑选马车夫时已经尽最大可能注意了，他会被告知这绝对不是免责的理由；接下来，理由可能就变了，有人会说，因为有能力赔偿损失的人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或者有人会说，因为这些根据一般人类法则很有可能会发生于服务过程中的不当行为，可归咎于该服务。

Next, take a case where a limit has been set to liability which had previously been unlimited. In 1851, Congress passed a law, which is still in force, and by which the owners of ships in all the more common cases of maritime loss can surrender the vessel and her freight then pending to the losers; and it is provided that, thereupon, further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owners shall cease. The legislators to whom we owe this act argued that, if a merchant embark a portion of his property upon a hazardous venture, it is reasonable that his stake should be confined to what he puts at risk, —a principle similar to that on which corporations have been so largely created in America during the last fifty years.

接下来，再举一个对先前的无限制性责任进行限定的例子。185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该法令至今依然有效。根据该法令，在一般海事损害案件中，船主可将涉案船舶及船上货物让与受损失者；该法令还规定，应当随即终止对船主的进一步诉讼。该法令的立法者指出：如果一位商人把他的一部分财产投资于一项有风险的事业，其责任则应被限定在其风险投资的范围之内才是合理的——此原则类似于美国过去50年大量公司创立所依据的原则。

It has been a rule of criminal pleading in England down into the present century, that an indictment for homicide must set forth the value of the instrument causing the death, in order that the king or his grantee might claim forfeiture of the deodand, “as an accursed thing,” in the language of Blackstone.

英格兰刑事辩护制度中有一条规则一直延用到本世纪，那就是，指控杀人罪时必须阐明致人死亡的工具的作用，以便国王或其授权者可以将该工具作为赎罪奉献物，或者用布拉克斯通的话来说，“作为受诅咒之物”，而予以罚没。

I might go on multiplying examples; but these are enough to show the remoteness of the points to be brought together.—As a first step towards a generalization,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consider what is to be found in ancient and independent systems of law.

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个例子；不过，上述例子已足以表明，我们还远远不能得出结论。——要得出一般概括性的结论，首先需要考虑我们会在古代独立的法律体系中发现什么。

There is a well-known passage in Exodus, [2_9] which we shall have to remember later: “If an ox gore a man or a woman, that they die: then the ox shall be surely stoned, and his flesh shall not be eaten; but the owner of the ox shall be quit.” When we turn from the Jews to the Greeks, we find the principle of the passage just quoted erected into a system. Plutarch, in his Solon, tells us that a dog that had bitten a man was to be delivered up bound to a log four cubits long. Plato made elaborate provisions in his Laws for

many such cases. If a slave killed a man, he was to be given up to the relatives of the deceased. [2_10] If he wounded a man, he was to be given up to the injured party to use him as he pleased. [2_11] So if he did damage to which the injured party did not contribute as a joint cause. In either case, if the owner failed to surrender the slave, he was bound to make good the loss. [2_12] If a beast killed a man, it was to be slain and cast beyond the borders. If an inanimate thing caused death, it was to be cast beyond the borders in like manner, and expiation was to be made. [2_13] Nor was all this an ideal creation of merely imagined law, for it was said in one of the speeches of Aeschines, that “we banish beyond our borders stocks and stones and steel, voiceless and mindless things, if they chance to kill a man; and if a man commits suicide, bury the hand that struck the blow afar from its body.” This is mentioned quite as an every-day matter, evidently without thinking it at all extraordinary, only to point an antithesis to the honors heaped upon Demosthenes. [2_14] As late as the second century after Christ the traveller Pausanias observed with some surprise that they still sat in judgment on inanimate things in the Prytaneum. [2_15] Plutarch attributes the institution to Draco. [2_16]

《出埃及记》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这段文字我们后面还得提到：“牛若抵人，人死了，则牛应被处以石刑，牛的肉也不能吃，但牛的主人可以免罪”。当我们的视角从犹太人转到希腊人时，我们发现这段话所体现的原则上升成为一种体系。普卢塔赫在其《梭伦传》中告诉我们说，一条狗咬了人之后，应当被交出来绑在一根四腕尺长的圆木上。柏拉图在其《法律篇》中对许多诸如此类的案例做了非常详尽的规定。如果一个奴隶杀死了一个自由人，他就要被交给死者的亲属。如果他伤害了一个自由人，他就要被交给受害方，供后者随意使用。如果他造成了某种损失，而受害方没有共同造成此损失，也要如此处理。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如果奴隶所有者未能交出奴隶，他

就一定要赔偿损失。如果一头野兽致人死亡，就会被杀死并扔出界外。如果一个无生命的东西致人死亡，要以类似的方式将其扔出界外，由此算是抵罪。所有这一切都并非一种制定纯属虚构的法律的理想过程，因为埃斯基涅斯在一次演说中说道："如果树干、石头以及钢铁这些无声无知的东西偶然致人死亡，我们就把它们放逐到境外；如果一个人自杀了，就把那只摧毁他自己的手埋在远离其身体的地方"。他说的几乎就像是日常琐事，显然不觉得这有任何特别之处，只是提出了一个与堆加在雄辩家狄摩西尼身上的荣誉相对立的反题。直到公元2世纪，旅行家鲍桑尼亚还有些惊讶地发现，在古希腊城市的公共会堂中，人们依然在审理无生命的东西。普卢塔赫认为这一制度是由德拉科制定的。

In the Roman law we find the similar principles of the noxae deditio gradually leading to further results. The Twelve Tables (451 B.C.) provided that, if an animal had done damage, either the animal was to be surrendered or the damage paid for. [2_17] We learn from Gaius that the same rule was applied to the torts of children or slaves, [2_18] and there is some trace of it with regard to inanimate things.

在罗马法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损害投偿原则逐步演变成为更多法规的过程。《十二铜表法》（公元前451年）规定，如果牲畜造成了损害，须将该牲畜交出，或由其主人对损失予以赔偿。我们从盖尤斯那里得知，同一规则也适用于家子和奴隶的侵权行为，在无生命物的相关情况中，也留有该规则的一些痕迹。

The Roman lawyers, not looking beyond their own system or their own time, drew on their wits for an explanation which would show that the law as they found it was reasonable. Gaius said that it

was unjust that the fault of children or slaves should be a source of loss to their parents or owners beyond their own bodies, and Ulpian reasoned that a *fortiori* this was true of things devoid of life, and therefore incapable of fault. [2_19] This way of approaching the question seems to deal with the right of surrender as if it were a limitation of a liability incurred by a parent or owner, which would naturally an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e unlimited. But if that is what was meant, it puts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The right of surrender was not introduced as a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but, in Rome and Greece alike, payment was introduced as the alternative of a failure to surrender.

罗马的法学家们，不可能超越其自身的体系及所处的时代，但他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对此进行了一番解释，表明他们当时所发现的法律是合理的。盖尤斯说，因为家子或者奴隶的过错，却使得家父或者奴隶主而非其本人遭受损失，这是不公平的；而乌尔皮安分析指出，对于无生命的物体，这一点更是毋庸置疑，它们没有生命，因此没有能力犯错。这样来探讨这一问题，似乎把让与权当成是一项对家父或者所有人所负责任的限制来进行分析，而让与权最初自然是不受限制的。但是，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就有点本末倒置了。让与权不是作为一项责任限定条款而引入的，在罗马及希腊，如未履行让与权，则都可由金钱赔偿来替代。

The action was not based, as it would be nowadays, on the fault of the parent or owner. If it had been, it would always have been brought against the person who had control of the slave or animal at the time it did the harm complained of, and who, if any one, was to blame for not preventing the injury. So far from this being the course, the person to be sued was the owner at the time of suing. The action followed the guilty thing into whosesoever

hands it came. [2_20] And in curious contrast with the principle as inverted to meet still more modern views of public policy, if the animal was of a wild nature, that is, in the very case of the most ferocious animals, the owner ceased to be liable the moment it escaped, because at that moment he ceased to be owner. [2_21] 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no other or more extensive liability by the old law, even where a slave was guilty with his master's knowledge, unless perhaps he was a mere tool in his master's hands. [2_22] Gaius and Ulpian showed an inclination to cut the noxae deditio down to a privilege of the owner in case of misdeeds committed without his knowledge; but Ulpian is obliged to admit, that by the ancient law, according to Celsus, the action was noxal where a slave was guilty even with the privity of his master. [2_23]

这种诉讼并非像今天那样以家父或所有人的过错为基础。倘若真是如此，那么每次被起诉的对象就应当是被控损害发生时控制奴隶或牲畜的人，以及（如果有的话）未能阻止伤害发生的人。但情况却远非如此，被起诉的人是起诉时奴隶或牲畜的所有人。这一诉讼因为对涉案物的关注，而随之关注涉案物的所有人。与之形成奇特对比的是，如果造成损害的动物具有野性，即非常凶猛的动物，从该动物逃逸时起，所有人就不再负有责任，因为从那时起，他就不再是该动物的所有人了。这一原则之所以截然不同，是为了迎合公共政策中更新式的观念。依据古代法，似乎不存在其他或更宽泛的责任了，甚至当主人知道奴隶有罪时亦是如此，除非该奴隶也许只是主人手中的一个工具。盖尤斯和乌尔皮安都倾向于把损害投偿原则简化为奴隶在主人不知晓情况下犯罪时主人拥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但乌尔皮安却不得不承认，根据塞尔苏斯所述的古代法，即便奴隶主对奴隶犯罪知情，这种诉讼也为损害之诉。

All this shows very clearly that the liability of the owner was

merely a way of getting at the slave or animal which was the immediate cause of offence. In other words, vengeance on the immediate offender was the object of the Greek and early Roman process, not indemnity from the master or owner. The liability of the owner was simply a liability of the offending thing. In the primitive customs of Greece it was enforced by a judicial process expressly directed against the object, animate or inanimate. The Roman Twelve Tables made the owner, instead of the thing itself, the defendant, but did not in any way change the ground of liability, or affect its limit. The change was simply a device to allow the owner to protect his interest. [2_24]

这些都非常清楚地表明，追究所有人的责任，仅是追究直接导致侵害行为产生的奴隶或牲畜之责任的一个途径。换句话说，希腊以及早期罗马的诉讼是以对直接侵害人的复仇为目的，而不是以从主人或所有人那里获得赔偿为目的。所有人所负的责任，只不过是侵害物所负有的责任。在希腊早期的习惯法中，用来执行这一法规的一套司法程序，乃是明文直接针对侵害物，不管其有无生命。罗马的《十二铜表法》指定被告人为所有人，而非侵害物本身，但该法丝毫没有更改责任的基础，或影响责任的范围。这一变化仅仅是一种手段，使所有人能保护自己的权益。

But it may be asked how inanimate objects came to be pursued in this way, if the object of the procedure was to gratify the passion of revenge. Learned men have been ready to find a reason in the personification of inanimate nature common to savages and children, and there is much to confirm this view. Without such a personification, anger towards lifeless things would have been transitory, at most. It is noticeable that the commonest example in the most primitive customs and laws is that of a tree which falls

upon a man, or from which he falls and is killed. We can conceive with comparative ease how a tree might have been put on the same footing with animals. It certainly was treated like them, and was delivered to the relatives, or chopped to pieces for the gratification of a real or simulated passion. [2_25]

不过，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司法程序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复仇的激情，那么又如何在这种司法程序中追究无生命物的责任呢？对此，博学之士早已准备好了答案，他们认为原因就在于无生命物可以拟人化之后等同于野兽及家子，这一观点还需多方证实。如果没有这个拟人化的过程，针对无生命物的愤怒之情可能最多只是暂时的。最原始的习惯法和法律中最常见的一棵树的例子值得我们注意：一棵树倒下来砸在一个人身上，或者一个人从树上摔下来摔死了。我们可以相对轻松地设想，树木与动物是如何被相提并论的。树木死后被当成动物一样处理，交给其亲属，或是切成碎屑，以满足真实或伪装的复仇之激情。

In the Athenian process there is also, no doubt, to be traced a different thought. Expiation is one of the ends most insisted on by Plato, and appears to have been the purpose of the procedure mentioned by Aeschines. Some passages in the Roman historians which will be mentioned again seem to point in the same direction. [2_26]

在雅典的司法程序中无疑还可追溯到另外一种思想。赎罪是柏拉图最为坚持的目的之一，似乎也是埃斯基涅斯提到的司法程序之目的。下文还将要提到罗马历史学家们的一些篇章，它们似乎也指向同一个方向。

Another peculiarity to be noticed is, that the liability seems to have been regarded as attached to the body doing the damage, in an almost physical sense. An untrained intelligence only imperfectly performs the analysis by which jurists carry responsibility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a chain of causation. The hatred for anything giving us pain, which wreaks itself on the manifest cause, and which leads even civilized man to kick a door when it pinches his finger, is embodied in the noxae deditio and other kindred doctrines of early Roman law. There is a defective passage in Gaius, which seems to say that liability may sometimes be escaped by giving up even the dead body of the offender. [2_27] So Livy relates that, Brutulus Papins having caused a breach of truce with the Romans, the Samnites determined to surrender him, and that, upon his avoiding disgrace and punishment by suicide, they sent his lifeless body. It is noticeable that the surrender seems to be regarded as the natural expiation for the breach of treaty, [2_28] and that it is equally a matter of course to send the body when the wrong-doer has perished. [2_29]

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人们似乎认为责任从几乎纯物理的意义上来说是附属于造成损害的主体的。未经训练的人只能不尽完美地进行分析，而法学家通过分析则可将责任追溯到因果关系链的起点。古罗马法中的损害投偿及其他一些类似原则，体现了对任何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事物的仇恨之情，这种仇恨之情被发泄到明显的起因之上，使得甚至是文明人在手指被门夹疼了的时候，也会踹上门一脚。盖尤斯的著作中有一段残篇，好像是说，即使交出的是侵害人的死身，责任有时都可被免除。李维也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布鲁图斯·帕皮斯违反了与罗马人达成的休战协定，萨姆尼特人决定把他交与罗马人，帕皮斯为了避免耻辱以及虐待而自杀了，萨姆尼特人就把他的尸首交给了罗马人。值得注意的是，交出尸首似乎被视为对违反协定的自然赔偿，如侵害人死亡，交出其尸体同样是理所当然的。

The most curious examples of this sort occur in the region of what we should now call contract. Livy again furnishes an example, if, indeed, the last is not one. The Roman Consul Postumius concluded the disgraceful peace of the Caudine Forks (per sponsionem, as Livy says, denying the common story that it was per feedus), and he was sent to Rome to obtain the sanction of the people. When there however, he proposed that the persons who had made the contract, including himself, should be given up in satisfaction of it. For, he said, the Roman people not having sanctioned the agreement, who is so ignorant of the jus fetialium as not to know that they are released from obligation by surrendering us? The formula of surrender seems to bring the case within the noxae deditio. [2_30] Cicero narrates a similar surrender of Mancinus by the pater-patratus to the Numantines, who, however, like the Samnites in the former case, refused to receive him. [2_31]

这类最奇特的例子出现在今天我们应当称之为合同法的范畴。如果上面这个例子的确还算不上这一类例子的话，李维还提供了一个例子："古罗马执政官帕斯图密乌斯（据李维记载，依誓约，而非同盟条约）订立了耻辱性的卡夫丁峡谷和约，他于是被遣送到罗马接受人民的制裁"。但到了罗马之后，他提出，和约订立者，包括他本人，应当被交给对方以履行合约。他说，不支持和约的罗马人民，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宣战与议和法，不知道他们可以通过交出我们而免除责任。交出准则似乎使这一实例被纳入到损害投偿的范畴之内。西塞罗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例子，曼西努斯被其家族的长辈交给了努曼蒂尼人，但是努曼蒂尼人，与上例中的萨姆尼特人一样，也拒绝接受曼西努斯。

It might be asked what analogy could have been found between

a breach of contract and those wrongs which excite the desire for vengeance. But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rt and breaches of contract, and especially between the remedies for the two, is not found ready made. It is conceivable that a procedure adapted to redress for violence was extended to other cases as they arose. Slaves were surrendered for theft as well as for assault; [2_32] and it is said that a debtor who did not pay his debts, or a seller who failed to deliver an article for which he had been paid, was dealt with on the same footing as a thief. [2_33] This line of thought, together with the quasi material conception of legal obligations as binding the offending body, which has been noticed, would perhaps explain the well-known law of the Twelve Tables as to insolvent debtors. According to that law, if a man was indebted to several creditors and insolvent, after certain formalities they might cut up his body and divide it among them. If there was a single creditor, he might put his debtor to death or sell him as a slave. [2_34]

有人也许会问，在违背契约与激发复仇愿望的不当行为之间，能找到什么类似之处吗？但是，有必要记住侵权与违约之间的区别，尤其是侵权救济与违约救济之间的区别，并非一开始就存在。可以想象，一项适用于暴力救济的程序，在其他案情出现时，就会被扩展运用到新的案情中。奴隶因攻击罪以及盗窃罪而被交出；据说，一个债户如未能偿还借款，或者一个卖主如收了买主的钱却未能交货，都按窃贼同等对待。这一思路，以及上文中已经提到的以法律义务来约束实施违法行为主体的准唯物论观念，也许能够解释《十二铜表法》中著名的有关破产债务人的规定。根据该法，如果一个人对多位债主负有债务且无力偿还，经过一些程序之后，债主们则可将其身体切割成几块予以分配。如只有一位债主，则该债主可将债户处死，或将其出售为奴。

If no other right were given but to reduce a debtor to slavery, the law might be taken to look only to compensation, and to be modelled on the natural working of self-redress. [2_35] The principle of our own law, that taking a man's body on execution satisfies the debt, although he is not detained an hour, seems to be explained in that way. But the right to put to death looks like vengeance,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body shows that the debt was conceived very literally to inhere in or bind the body with a vinculum juris.

如果仅把债户贬为奴隶，而未赋予债主其他权利的话，则可认为此项法规只是以赔偿为目的，是对自然的自力救济行为的仿效。美国的法律原则，即处决一个人的身体以履行债务（虽然他一个小时也未被羁押）的原则，似乎也可以如此进行解释。但是，债主有权处死债户看起来似乎是复仇，而将身体切割，则表明债务实际上被认为存在于身体之中，或者对身体具有一种法律约束。

Whatever may be the true explanation of surrender in connection with contracts, for the present purpose we need not go further than the common case of noxae deditio for wrongs. Neither is the seeming adhesion of liability to the very body which did the harm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The Roman law dealt mainly with living creatures,—with animals and slaves. If a man was run over, it did not surrender the wagon which crushed him, but the ox which drew the wagon. [2_36] At this stage the notion is easy to understand. The desire for vengeance may be felt as strongly against a slave as against a freeman, and it is not without example nowadays that a like passion should be felt against an animal. The surrender of the slave or beast empowered the injured party to do his will upon them. Payment by the owner was merely a privilege in case he wanted to buy the vengeance off.

不管对合同相关的交出真实的解释是什么，在此我们只需讨论侵害之损害投偿的一般情况，而无需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也无需深究造成头等重要伤害的身体表面上所附着的责任。罗马法主要涉及有生命物，——涉及牲畜与奴隶。如果一个人被车碾过，被交出的并不是碾压他的车，而是拉车的牛。这一观念至此还比较容易理解。对一个奴隶所怀有的复仇欲望，可能与对自由人一样强烈，即便在今天也不乏例证表明，人们对一头牲畜也可能怀有类似的复仇激情。交出奴隶或者牲畜是为了让受损害方有权随意处置它们。由所有人进行赔偿只是所有人想要通过赔偿摆脱复仇的一种特权。

It will readily be imagined that such a system as has been described could not last when civilization had advanced to any considerable height. What had been the privilege of buying off vengeance by agreement, of paying the damage instead of surrendering the body of the offender, no doubt became a general custom. The Aquilian law, passed about a couple of centuries later than the date of the Twelve Tables, enlarged the sphere of compensation for bodily injuries. Interpretation enlarged the Aquilian law. Masters became personally liable for certain wrongs committed by their slaves with their knowledge, where previously they were only bound to surrender the slave. [2_37] If a pack-mule threw off his burden upon a passer-by because he had been improperly overloaded, or a dog which might have been restrained escaped from his master and bit any one, the old noxal action, as it was called, gave way to an action under the new law to enforce a general personal liability. [2_38] Still later, ship-owners and innkeepers were made liable as if they were wrong-doers for wrongs committed by those in their employ on board ship or in the tavern, although of course committed without their knowledge. The true reason for this exceptional responsibility was the exceptional

confidence which was necessarily reposed in carriers and innkeepers. [2_39] But some of the jurists, who regarded the surrender of children and slaves as a privilege intended to limit liability, explained this new liability on the ground that the innkeeper or ship-owner was to a certain degree guilty of negligence in having employed the services of bad men. [2_40] This was the first instance of a master being made unconditionally liable for the wrongs of his servant. The reason given for it wa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and the principle expanded to the scope of the reason.

不难想象，当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上文所描述的这样一种法律体系就难以为继了。以往根据协议通过赔偿来摆脱复仇，即赔偿损失而不用交出侵害者身体的特权，毫无疑问，就变成了一般性的惯例。比《十二铜表法》晚大约几个世纪通过的《阿奎利亚法》，扩大了人身伤害的赔偿范围。有关解释又进一步扩大了《阿奎利亚法》的适用范围。如果主人知晓奴隶实施了若干不当行为，则主人应对此负有个人责任，但以往则只需交出奴隶。如果一头驮货的骡子因为背上驮的货物没有装好，而将货物抖落砸在了一个过路人身上，或者是一条本应当被看管好的狗，却从主人手里逃脱并咬伤了人，以往所谓的损害之诉，根据新法就由追究一般个人责任的诉讼所取代。再后来，船主和客栈老板要对其在船上或客栈中雇用的人员所实施的不当行为负责，似乎他们就是行为不当者一样，即便他们肯定并不知情。他们负有这种特别的责任，真正的原因在于人们必定对船主及客栈老板寄予了特别的信任。但是，有些法学家，他们将交出家子或奴隶视为一种想要对责任进行限制的特权，他们对这种新加责任的解释依据是，客栈老板或船主因为用人不当，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犯有过失罪。这是主人无条件地为其佣人之不当行为承担责任的首例。对这一新法规的解释具有普遍适用性，而这一原则也扩大到其解释适用的范围。

The law as to ship-owners and innkeepers introduced another

and more startling innovation. It made them responsible when those whom they employed were free, as well as when they were slaves. [2_41] For the first time one man was made answerable for the wrongs of another who was also answerable himself, and who had a standing before the law. This was a great change from the bare permission to ransom one's slave as a privilege. But here we have the history of the whole modern doctrine of master and servant, and principal and agent. All servants are now as free and as liable to a suit as their masters. Yet the principle introduced on special grounds in a special case, when servants were slaves, is now the general law of this country and England, and under it men daily have to pay large sums for other people's acts, in which they had no part and for which they are in no sense to blame. And to this day the reason offered by the Roman jurists for an exceptional rule is made to justify this universal and unlimited responsibility. [2_42]

针对船主及客栈老板的法律还引入了另一项更为惊人的革新。如果雇用的是自由人，同雇用奴隶一样，船主及客栈老板都要承担责任。这是首次一个人要为另外一个也应负有责任并在法律上具有主体资格的人所实施的不当行为负责。与单纯允许赎回奴隶作为一种特权相比较，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里我们就了解了有关雇主与雇工、以及本人与代理人的整个现代法律的历史。现在，所有雇工与其雇主享有同样的自由，并同样对诉讼负有责任。但这一原则却是基于特殊的原因，在特殊的情况下，即雇工为奴隶的情况下被引入的，现已成为美国及英格兰一项普通的法令；据此，人们常常不得不因为他人的行为而支付大笔的费用，尽管他们既未参与他人的行为，也绝不对他人的行为负有责任。罗马法学家在论证特殊规则时所提出的理由，到了今天则被用来论证这一普适性及无限制的责任。

So much for one of the parents of our common law. Now let us

turn for a moment to the Teutonic side. The Salic Law embodies usages which in all probability are of too early a date to have been influenced either by Rome or the Old Testament. The thirty-sixth chapter of the ancient text provides that, if a man is killed by a domestic animal, the owner of the animal shall pay half the composition (which he would have had to pay to buy off the blood feud had he killed the man himself), and for the other half give up the beast to the complainant. [2_43] So, by chapter thirty-five, if a slave killed a freeman, he was to be surrendered for one half of the composition to the relatives of the slain man, and the master was to pay the other half. But according to the gloss, if the slave or his master had been maltreated by the slain man or his relatives, the master had only to surrender the slave. [2_44]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ice that those Northern sources which Wilda takes to represent a more primitive stage of German law confine liability for animals to surrender alone. [2_45] There is also a trace of the master's having been able to free himself in some cases, at a later date, by showing that the slave was no longer in his possession. [2_46] There are later provisions making a master liable for the wrongs committed by his slave by his command. [2_47] In the laws adapted by the Thuringians from the earlier sources, it is provided in terms that the master is to pay for all damage done by his slaves. [2_48]

对于普通法的一个起源就说到这里。现在让我们暂且看看条顿人的情况。《萨利克法》所包含的一些惯例，很可能起源非常早，所以没有受到罗马法或旧约的影响。这部古老文书的第36章规定，如家畜致人死亡，家畜所有者则应当支付一半的赔偿金（如果是他本人杀死了这个人，为摆脱血亲复仇他必须支付的赔偿金），另一半赔偿则是把该牲畜交给控诉人。同样地，根据该法第35章的规定，如果一个奴隶杀死了一个自由人，该奴隶则应当被交给死者的亲属，作为赔偿的一半，另外一半赔偿则由主人支付。但是，根据对该法的注解，如果

死者或其亲属对该奴隶或其主人很粗暴，则主人只须交出该奴隶即可。有趣的是，维尔达认为代表了日耳曼法更原始阶段的那些北方民族的法律，将牲畜的责任仅限于交出该牲畜。还有迹象表明，再晚些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主人可以通过证明该奴隶不再属于自己所有，而使自己免责。随后的规定变为主人要为受自己支配的奴隶的不当行为负责。根据这些早期法，图林根人制定了他们的法律，其中明文规定主人必须为其奴隶造成的所有损害作出赔偿。

In short, so far as I am able to trace the order of development in the customs of the German tribes, it seems to have been entirely similar to that which we have already followed in the growth of Roman law. The earlier liability for slaves and animals was mainly confined to surrender; the later became personal, as at Rome.

简而言之，就我所能追溯到的日耳曼部落习惯法的发展顺序来看，它与我们已经追溯过的罗马法的发展顺序几乎完全相似。早期奴隶及牲畜的责任主要局限于交出，后来像罗马法一样，演变为个人的责任。

The reader may begin to ask for the proof that all this has any bearing on our law of today. So far as concerns the influence of the Roman law upon our own, especially the Roman law of master and servant, the evidence of it is to be found in every book which has been written for the last five hundred years. It has been stated already that we still repeat the reasoning of the Roman lawyers, empty as it is, to the present day. It will be seen directly whether the German folk-laws can also be followed into England.

读者也许会在此要求出示证据，以证明所有这一切的确对我们今天的法律有所影响。就罗马法尤其是罗马法中有关主人和佣人的规定对我们法律的影响而言，在过去500年内所著的每一部书里都会找到证据。上文已经说过，我们直到今天依然还在重复罗马法学家们的推理过程，尽管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英格兰是否也沿袭了日耳曼民间法。

In the Kentish laws of Hlothhaere and Eadrie (A.D.680) it is said, “If any one's slave slay a freeman, whoever it be, let the owner pay with a hundred shillings, give up the slayer,” &c. [2_49]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similar provisions. In the nearly contemporaneous laws of Ine, the surrender and payment are simple alternatives. “If a Wessex slave slay an Englishman, then shall he who owns him deliver him up to the lord and the kindred, or give sixty shillings for his life.“ [2_50] Alfred's laws (A.D.871-901) have a like provision as to cattle. “If a neat wound a man, let the neat be delivered up or compounded for.“ [2_51] And Alfred, although two hundred years later than the first English lawgivers who have been quoted, seems to have gone back to more primitive notions than we find before his time. For the same principle is extended to the case of a tree by which a man is killed. “If, at their common work, one man slay another unwilfully, let the tree be given to the kindred, and let them have it off the land within thirty nights. Or let him take possession of it who owns the wood.“ [2_52]

赫洛特里和伊德里统治时代制定的肯特法（公元680年）规定：“如果某人的奴隶杀死了一个自由人，无论这个自由人是谁，奴隶的主人都应当赔偿100先令，并交出杀人者，”等等。还有几条其他类似的规定。在几乎同时期的伊尼法中，交出奴隶或牲畜与进行赔偿只是二选一。“如果一个威塞克斯奴隶杀死了一个英国人，奴隶主则

应当把奴隶交给领主和死者的亲属，或者支付60先令以赎回其生命。”《阿尔弗雷德法典》（公元871–901年）针对牲畜有一项类似的规定：“如果一头牛伤害了一个人，这头牛就当被交出，或者是进行和解”。尽管阿尔弗雷德大帝比有记载的英国最早的立法者晚了200年，他却似乎回归到更为原始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比我们所发现的其时代之前的观念还要原始。因为这一原则被扩展到适用于树木致人死亡的情况。“两人一起干活时，如果一人无意致另外一人死亡，则应当把致人死亡的这棵树交给死者的亲属，让他们在三十个晚上之内砍倒这棵树，否则树的主人应当花钱来购买这棵树。”

It is not inapposite to compare what Mr. Tylor has mentioned concerning the rude Kukis of Southern Asia. “If a tiger killed a Kuki, his family were in disgrace till they had retaliated by killing and eating this tiger, or another; but further, if a man was killed by a fall from a tree, his relatives would take their revenge by cutting the tree down, and scattering it in chips.“ [2_53]

把泰勒先生曾经提到的南亚库基原始部落的规定与此相提并论，也并无不妥。“如果一只老虎咬死了一个库基族人，在其家人杀死并吃掉这只或另外一只老虎而实现复仇之前，他们将一直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但更进一步的规定是，如果一个人从树上跌下来摔死了，其亲属可以把这棵树砍倒并剁成碎屑四处分撒来实现复仇。”

To return to the English, the later laws, from about a hundred years after Alfred down to the collection known as the laws of Henry I, compiled long after the Conquest, increase the lord's liability for his household, and make him surety for his men's good conduct. If they incur a fine to the king and run away, the lord has to pay it unless he can clear himself of complicity. But I cannot say

that I find until a later period the unlimited liability of master for servant which was worked out on the Continent, both by the German tribes and at Rome. Whether the principle when established was an indigenous growth, or whether the last step was tak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Roman law, of which Bracton made great use, I cannot say. It is enough that the soil was ready for it, and that it took root at an early day. [2_54] This is all that need be said here with regard to the liability of a master for the misdeeds of his servants.

我们再回到英国，其后来的法律，自阿尔弗雷德大帝之后约100年一直到诺曼征服很久之后才汇编而成的《亨利一世法》，都增加了领主对其家庭（包括佣人在内的）的责任，使其成为其佣人良好行为的担保人。如果佣人被国王处以罚款却逃之夭夭，领主则须支付罚金，除非他能够证明自己并非同谋。但是我不敢说，主人对佣人负有无限责任这一曾在欧洲大陆施行的原则是否延续到更晚，日耳曼部落以及罗马人都曾执行过该原则。当时确立的这项原则是否为本土的产物，或其最终的确立是否受到了罗马法的影响，如布拉克顿就借用了大量的罗马法，这些我都不敢确定。但是，只要有了孕育这一原则的土壤，而且这一原则早已生根，这就足够了。针对主人对其佣人的不当行为负有责任的问题，只需要谈这些就行了。

It is next to be shown what became of the principle as applied to animals. Nowadays a man is bound at his peril to keep his cattle from trespassing, and he is liable for damage done by his dog or by any fierce animal, if he has notice of a tendency in the brute to do the harm complained of.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any connection can b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se very sensible and intelligible rules of modern law and the surrender directed by King Alfred.

接下来要看一看适用于动物之责任原则的形成。今天，牲畜所有人应自担风险约束其牲畜的侵害行为；如果他的狗或是其他凶猛的动物造成了损害，且他已经注意到该畜生有造成所控之损害的趋势，他则应当为此承担责任。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在这些合理明晰的现代法律规则与阿尔弗雷德大帝所规定的交出规则之间找到一些关联性。

Let us turn to one of the old books of the Scotch law, where the old principle still appears in full force and is stated with its reasons as then understood, [2_55]

让我们来看一看古老的苏格兰法判例集中的一卷，其中，对这一古老的原则完全采用，并以当时所理解的依据对其进行了解释说明，

“Gifane wylde or head-strong horse, carries ane man against his will over an craig, or heuch, or to the water, and the man happin to drowne, the horse sall perteine to the king as escheit.

“如果一匹野马或者烈马将一个人在其非自愿的情况下驮到了峭壁、陡坡或水里，而此人不幸身亡，此马即被充公归国王所有。

“Bot it is otherwise of ane tame and dantoned horse; gif any man fulishlie rides, and be sharp spurres compelles his horse to take the water, and the man drownes, the horse sould not be escheit, for that comes be the mans fault or trespasse, and not of the horse, and the man has receaved his punishment, in sa farre as he is perished and dead; and the horse quha did na fault, sould not be escheit.

但一匹驯服的家养的马，情况却不同；如果一个人骑术低劣，猛踢马刺强迫其过河，此人溺亡，则这匹马就不应当被充公，因为所涉及的过错或侵害行为是此人所犯下的，而不是该匹马所犯下的，那么，既然此人死了，就已经受到了惩罚，而这匹马又没有过错，那就不应当被充公。

“The like reason is of all other beastes, quhilk slayes anie man, [it is added in a later work, “of the quhilk slaughter they haue gilt,“] for all these beasts sould be escheit.“ [2_56]

所有其他动物致人死亡的情况，也是同样的道理，（后来的一本判例集中又补充道“如果它们对致人死亡负有责任”），它们都应当被充公。”

“The Forme and Maner of Baron Courts” continues as follows:—

《男爵法庭的程式及习惯》中对此接着说明：

> “It is to witt, that this question is asked in the law, Gif ane lord hes ane milne, and any man fall in the damne, and be borne down with the water quhill he comes to the quheill, and there be slaine to death with the quheill; quhither aught the milne to be eseheir or not? The law sayes thereto nay, and be this reason, For it is ane dead thing, and ane dead thing may do na fellony, nor be made escheit

throw their gilt. Swa the milne in this case is not culpable, and in the law it is lawfull to the lord of the land to haue ane mylne on his awin water quhere best likes him.“ [2_57]

“这即是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某人拥有一个磨坊，而有人掉进了水坝，被水冲到了磨坊，在磨坊被碾死了，那么，该磨坊是否应当被充公呢？对此法律的回答是不；理由如下：磨坊一个无生命的东西，而一个无生命的东西是不可能犯罪的，也就不可能以充公的形式来消除其罪孽。因此，此案中的磨坊无罪，而且在法律上，土地的领主可以合法地在本人所有的水域内随意建造磨坊。”

The reader will see in this passage, as has been remarked already of the Roman law, that a distinction is taken between things which are capable of guilt and those which are not,—between living and dead things; but he will also see that no difficulty was felt in treating animals as guilty.

这段文字表明，有能力犯罪的物体和没有能力犯罪的物体（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体）被区分开来；同时还表明，人们觉得将动物视为有罪没有任何困难。这与上文中对罗马法的分析一样。

Take next an early passage of the English law, a report of what was laid down by one of the English judges. In 1333 it was stated for law, that, “if my dog kills your sheep, and I, freshly after the fact, tender you the dog, you are without recovery against me.“

[2_58] More than three centuries later, in 1676, it was said by Twisden, J. that, “if one hath kept a tame fox, which gets loose and grows wild, he that hath kept him before shall not answer for the damage the fox doth after he hath lost him, and he hath resumed his wild nature.“ [2_59] It is at least doubtful whether that sentence ever would have been written but for the lingering influence of the notion that the ground of the owner's liability was his ownership of the offending: thing and his failure to surrender it. When the fox escaped, by another principle of law the ownership was at an end. In fact, that very consideration was seriously pressed in England as late as 1846, with regard to a monkey which escaped and bit the plaintiff. [2_60] So it seems to be a reasonable conjecture, that it was this way of thinking which led Lord Holt, near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to intimate that one ground on which a man is bound at his peril to restrain cattle from trespassing is that he has valuable property in such animals, whereas he has not dogs, for which his responsibility is less. [2_61] To this day, in fact, cautious judges state the law as to cattle to be, that, “if I am the owner of an animal in which by law the right of property can exist, I am bound to take care that it does not stray into the land of my neighbor.“ [2_62]

下面再来看看英国法早期的一个片段，这是对其中一名英国法官所作规定的记载。1333年，法律规定如下：“如果我的狗咬死了你的羊，而我在这一事实发生之后，立即将该狗交给了你，你就不能再从我这里获得赔偿”。三个多世纪之后，到了1676年，特威斯登法官说：“如果某人驯养的一只狐狸挣脱了束缚逃走了，并有了野性，这只狐狸的前主人对于其在丢失并恢复了野性之后所造成的损害无需承担责任”。如果不是因为下面这种观念长期的影响，即所有人的责任是以对实施侵害之主体的所有权为基础的（所有人拥有该物并且未履行交出该物），该法官可能不会作出上述判决。如果狐狸逃走了，依据另外一条法律原则，所有权即告终止。事实上，直到1864年，英格

兰还在严肃强调对一只逃逸后咬伤了原告的猴子予以同样的考虑。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测，正是基于这一考虑，霍尔特勋爵在上个世纪初提出，牲畜的所有者之所以应当自行承担约束牛羊不造成侵害的责任，其原因在于，所有者在这类动物身上得到很大的财产利益，但一条狗却没有这种利益，因此其对狗所负的责任就要少一些。事实上，直到今天，谨慎的法官还在如是陈述有关牲畜的法律："如果我是一只动物的主人，其中，所有权依照法律可以存在，那么，我就有责任留意不让它跑到我邻居的土地上去"。

I do not mean that our modern law on this subject is only a survival, and that the only change from primitive notions was to substitute the owner for the offending animal. For although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early law was one of the causes which led to the modern doctrine, there has been too much good sense in every stage of our law to adopt any such sweeping consequences as would follow from the wholesale transfer of liability supposed. An owner is not bound at his peril to keep his cattle from harming his neighbor's person. [2_63] And in some of the earliest instances of personal liability, even for trespass on a neighbor's land, the ground seems to have been the owner's negligence. [2_64]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有关这一问题的现代法律只是某种残存物，其与原始观念的唯一不同只是将造成侵害的动物换成了其所有人。因为，尽管早期法很有可能是现代法律形成的一个原因，但是，法律在其发展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很具有合理性，不会受到诸如责任的全盘转移可能会产生的那种颠覆性的影响。所有人没有必要冒生命的危险，以约束其牲畜使其不致伤害邻居的人身。在有关个人责任最早期的一些案例中，即便是擅闯邻居领地的案例，责任的依据似乎仍是所有人的疏忽。

It is the nature of those animals which the common law recognizes as the subject of ownership to stray, and when straying to do damage by trampling down and eating crop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usual and easy to restrain them. On the other hand, a dog, which is not the subject of property, does no harm by simply crossing the land of others than its owner. Hence to this extent the new law might have followed the old. The right of property in the offending animal, which was the ancient ground of responsibility, might have been adopted safely enough as the test of a liability based on the fault of the owner. Bu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damage of a kind not to be expected from such animals is determined on grounds of policy comparatively little disturbed by tra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liability for fierce wild animals at Rome has been explained. Our law seems to have followed the Roman.

普通法认定为所有权主体的那些动物，其本性就是会随意走散，并且走散之后就会踩踏并啃食庄稼而造成损害。然而，约束这些动物却是平常之举，也很容易就能做到。但是，一条狗并非所有权的主体，它仅仅穿越了他人而非其所有人的领地，并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因此，这个程度上，新法也许是遵循了旧法。造成侵害的动物身上的所有权，在古代是责任认定的基础，这一原则也许被继承，非常稳妥地成为根据所有人之过错对责任进行认定的原则。但是，对于预计不可能由这类动物造成的侵害类型，其责任则由受传统影响相对较少的政策依据来进行认定。对于凶猛的野生动物的个人责任在《罗马法》中的演变，上文已经作出了解释。我们的法律似乎继承了罗马法。

We will now follow the history of that branch of the primitive notion which was least likely to survive,—the liability of inanimate things.

现在，我们来追溯一下无生命物的责任这一部分的历史发展，这是原始观念中最不可能保留下来的一部分。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King Alfred ordained the surrender of a tree, but that the later Scotch law refused it because a dead thing could not have guilt. It will be remembered, also, that the animals which the Scotch law forfeited were escheat to the king. The same thing has remained true in England until well into this century, with regard even to inanimate objects. As long ago as Bracton, [2_65] in case a man was slain, the coroner was to value the object causing the death, and that was to be forfeited as deodand "pro rege." It was to be given to God, that is to say to the Church, for the king, to be expended for the good of his soul. A man's death had ceased to be the private affair of his friends as in the time of the barbarian folk-laws. The king, who furnished the court, now sued for the penalty. He supplanted the family in the claim on the guilty thing, and the Church supplanted him.

要记住，阿尔弗雷德大帝曾经规定将造成侵害的树交出，但后来的苏格兰法却摒弃了这一规定，因为无生命的东西不可能有罪。我们还应该记得，苏格兰法中被没收的动物被上缴给了国王。直到本世纪之前，英格兰也同样如此，甚至有关无生命物也是如此。早在布拉克顿时代，如果一个人被杀，验尸官就会对致其死亡的物体进行估价，该物将被作为赎罪奉献物“上缴给国王”。该物将被奉献给上帝，也就是说以国王的名义交给教会，以使死者的灵魂得以永生。在这个时期，一个人的死亡已经不同于蛮族时期的民间法，不再是其朋友间的私事了。国王设立了法院，对此提出了处罚要求。在对有罪物进行索赔的过程中，国王取代了家族，教会又取代了国王。

In Edward the First's time some of the cases remind of the barbarian laws at their rudest stage. If a man fell from a tree, the tree was deodand. [2_66] If he drowned in a well, the well was to be filled up. [2_67] It did not matter that the forfeited instrument belonged to an innocent person. “Where a man killeth another with the sword of John at Stile, the sword shall be forfeit as deodand, and yet no default is in the owner.“ [2_68] That is from a book written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about 1530. And it has been repeated from Queen Elizabeth's time [2_69] to within one hundred years, [2_70] that if my horse strikes a man, and afterwards I sell my horse, and after that the man dies, the horse shall be forfeited. Hence it is, that, in all indictments for homicide, until very lately it has been necessary to state the instrument causing the death and its value, as that the stroke was given by a certain penknife, value sixpence, so as to secure the forfeiture. It is said that a steam-engine has been forfeited in this way.

爱德华一世时期的一些判例让我们想起了处于最蒙昧阶段的原始法律。如果一个人从树上掉下来了，树就是赎罪奉献物。如果他在一口井里淹死了，这口井就会被填平。即使被罚没的工具的所有者无罪，也不影响工具被罚没。“如果一个人用斯泰尔镇约翰的剑杀死了另外一个人，这把剑将作为赎罪奉献物被没收，即使剑的所有者没有任何过错。”这段话摘自约1530年，亨利八世时期的一部著作。自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开始，到其后一百年的时间里，以下规定被不断重复提出：如果我的马撞了一个人，然后我把这匹马卖了，之后这个人死了，这匹马仍然应当被罚没。因此，直到不久前，在所有针对谋杀的起诉中，都需要对致人死亡的工具及其价值进行说明，比如用某把价值6便士的小刀戳了一刀，要确保小刀被没收。据说有台蒸汽机就曾经以这种方式被罚没过。

I now come to what I regard as the most remarkabl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principle, and one which is a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our law as it is today. I must for the moment leave the common law and take up the doctrines of the Admiralty. In the early books which have just been referred to, and long afterwards, the fact of motion is adverted to as of much importance. A maxim of Henry Spigurnel, a judge in the time of Edward I., is reported, that “where a man is killed by a cart, or by the fall of a house, or in other like manner, and the thing in motion is the cause of the death, it shall be deodand.“ [2_71] So it was said in the next reign that “oinne illud quod mover cum eo quod occidit homines deodandum domino Regi erit, vel feodo clerici.“ [2_72] The reader sees how motion gives life to the object forfeited.

现在，我要就我所认为的这一最显著的原则变迁来谈一谈，在我们的法律成为现今的法律的过程中，这一变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得暂时撇开普通法，来谈谈海事法。在刚才所引用的早期判例集中，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运动这一因素因其非常重要而被予以重视。据记载，爱德华一世时期的法官亨利·斯皮格内尔的一条准则是：“如果某人被一辆马车撞死，或者因一间房屋倒塌而被砸死，或因其他类似方式致死，而运动的物体系致死之原由，则应当把该物体作为赎罪奉献物”。到了下一任君主统治时期，还是如此规定：“凡是与曾致人死亡的物体一起运动的物体都要被交给所在地的领主，或者神职人员”。由此可以看出，被没收的物体是如何因为运动而获得生命的。

The most striking example of this sort is a ship. And accordingly the old books say that, if a man falls from a ship and is drowned, the motion of the ship must be taken to cause the death, and the ship is forfeited,—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happens in

fresh water. [2_73] For if the death took place on the high seas, that was outside the ordinary jurisdiction. This proviso has been supposed to mean that ships at sea were not forfeited; [2_74] but there is a long series of petitions to the king in Parliament that such forfeitures may be done away with, which tell a different story. [2_75] The truth seems to be that the forfeiture took place, but in a different court. A manuscript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 only recently printed, discloses the fact that, if a man was killed or drowned at sea by the motion of the ship, the vessel was forfeited to the admiral upon a proceeding in the admiral's court, and subject to release by favor of the admiral or the king. [2_76]

这类案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船舶的例子。相应地，早期判例集提到，如果一个人从一艘船上掉下去淹死了，船舶的运动应当被认为是致死之原由，船舶则要被没收，但前提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淡水水域内。因为如果死亡发生在公海海域，这就超出了正常司法管辖权的范围。有人认为，这一限制性规定意味着，海上的船舶不应当被没收；不过，议会却有长长的请愿书，提请国王废除这类罚没，这又另当别论了。事情的真相似乎是，没收照常进行，只不过由另外一家法院来实行。最近才出版的亨利六世时期的一份手稿揭示了这一事实：如果一个人在海上因船的移动致死或淹死，那么，这只船就会在海事法院依照某种程序由海军事务大臣予以没收，海军事务大臣或国王格外开恩才可能豁免。

A ship is the most living of inanimate things. Servants sometimes say “she” of a clock, but every one gives a gender to vessels. And we need not be surprised, therefore, to find a mode of dealing which has shown such extraordinary vitality in the criminal law applied with even more striking thoroughness in the Admiralty. It is only by supposing the ship to have been treated as if endowed

with personality, that the arbitrary seeming peculiarities of the maritime law can be made intelligible, and on that supposition they at once become consistent and logical.

船舶是无生命物中最具生命性的物体。佣人们不时会用“她”来称呼钟表，但每个人都会给船舶加上一个女性化的称呼。因此，我们不必惊讶在刑法中已表现出特别活力的一种处理模式，甚至被更加彻底地适用于海事法时。只有假设似乎是在赋予了船舶以人格的情况下对船舶进行处理，才能明白海事法表面所特有的任意性，而在这一假设之下，这些任意性马上就变得协调一致、合乎逻辑了。

By way of seeing what those peculiarities are, take first a case of collision at sea. A collision takes place between two vessels, the Ticonderoga and the Melampus, through the fault of the Ticonderoga alone. That ship is under a lease at the time, the lessee has his own master in charge, and the owner of the vessel has no manner of control over it. The owner, therefore, is not to blame, and he cannot even be charged on the ground that the damage was done by his servants. He is free from personal liability on elementary principles. Yet it is perfectly settled that there is a lien on his vessel for the amount of the damage done, [2_77] and this means that that vessel may be arrested and sold to pay the loss in any admiralty court whose process will reach her. If a livery-stable keeper lets a horse and wagon to a customer, who runs a man down by careless driving, no one would think of claiming a right to seize the horse and wagon. It would be seen that the only property which could be sold to pay for a wrong was the property of the wrong-doer.

为了探究海事法的特性，我们先来看一起海上撞船的案例。有两艘船发生了碰撞，一艘船名为提康德罗加号，另一船为美拉姆波司号，两船相撞完全是提康德罗加号一方的过错。当时，提康德罗加号正在一定租赁期内，承租人有自己的船长负责船舶，而该船船主则对船舶没有任何支配权。因而，该船船主不应当被归罪，甚至是在损害为其雇工所造成的情况下，也不能把责任归咎于船主。船主依照基本原则被免除个人责任。然而，完全可以确定的是：因其所造成的一定量的损害，该船有抵押权，这就意味着，在任一海事法庭，只要其传票能到达该船，即可扣留并变卖该船以赔偿损失。如果一个车马行的店主把一辆马车出租给一个客户，而这位客户因为驾驶不小心而撞倒了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要提出扣押这辆马车的权力主张。由此可以看出，唯一可被变卖以赔偿损害的财产，应为不当行为人所属财产。

But, again, suppose that the vessel, instead of being under lease, is in charge of a pilot whose employment is made compulsory by the laws of the port which she is just entering.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holds the ship liable in this instance also.[2_78] The English courts would probably have decided otherwise, and the matter is settled in England by legislation. But there the court of appeal, the Privy Council, has been largely composed of common-law lawyers, and it has shown a marked tendency to assimilate common-law doctrine. At common law one who could not impose a personal liability on the owner could not bind a particular chattel to answer for a wrong of which it had been the instrument. But our Supreme Court has long recognized that a person may bind a ship, when he could not bind the owners personally, because he was not the agent.

但是，让我们再假设该船并未被出租，而是由一位领航员所支

配，该船行将驶入之港口的法律要求必须雇用该领航员。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船舶也应负有责任。英格兰法院则很有可能会作出相反的判决，这种事情在英格兰由立法决定。但在英国，上诉法院，即枢密院，主要由普通法法学家组成，表现出明显的吸纳普通法法规的倾向。在普通法中，如果一个人不能将个人责任加于所有者，那么，他也不能约束某一宗特定的动产，使其承担不当行为的责任，尽管该动产为行使不当行为的工具。但我们的最高法院长期以来则认为，当一个人不能追究船主的个人责任时，他可以对船舶追究责任，因为他并非代理人。

It may be admitted that, if this doctrine were not supported by an appearance of good sense, it would not have survived. The ship is the only security available in dealing with foreigners, and rather than send one's own citizens to search for a remedy abroad in strange courts, it is easy to seize the vessel and satisfy the claim at home, leaving the foreign owners to get their indemnity as they may be able. I dare say some such thought has helped to keep the practice alive, but I believe the true historic foundation is elsewhere. The ship no doubt, like a sword [2_79] would have been forfeited for causing death, in whosesoever hands it might have been. So, if the master and mariners of a ship, furnished with letters of reprisal, committed piracy against a friend of the king, the owner lost his ship by the admiralty law, although the crime was committed without his knowledge or assent. [2_80] It seems most likely that the principle by which the ship was forfeited to the king for causing death, or for piracy, was the same as that by which it was bound to private sufferers for other damage, in whose hands soever it might have been when it did the harm.

也许应当承认的是，如果这一法规没有一种表面上的合理性来支

撑的话，它就不可能延续至今。在与外国人的纠纷中，船舶是唯一能够得到的抵押品，与其派本国公民去一个陌生的外国法庭寻求补偿，还不如扣留船舶，在本国满足相关索赔，而让外国船主自行寻求可能获得的赔偿，这样要容易一些。我敢说，诸如此类的一些想法曾促使这一惯例得以继续留存，但我相信，其真正的历史原由还不在于此。就像一柄剑一样，船舶无疑也会因为致人死亡而被没收，无论它是在谁的手里。因此，如果一艘船的船长及其船员带着搜捕特许证，劫掠了一友好国家，依据海事法，船主将丧失其船舶，尽管对上述罪行之实施，船主既不知情，也不同意。致人死亡或者实施过海盗行为的船舶为国王没收所依据的原则，似乎极有可能等同于，船舶在其他损害情况下对私人受害人负有责任所依据的原则，不论损害发生时船在谁的手上。

If we should say to an uneducated man today, “She did it and she ought to pay for it,” it may be doubted whether he would see the fallacy, or be ready to explain that the ship was only property, and that to say, “The ship has to pay for it,“ [2_81] was simply a dramatic way of saying that somebody's property was to be sold, and the proceeds applied to pay for a wrong committed by somebody else.

今天，如果我们对一位未受过教育的人说，“是船舶犯的错，应当让船舶对此进行赔偿”，不知道此人能否看出其中的谬误，或者能够马上解释说，船舶不过是财产，而所谓“船舶必须对此进行赔偿”，不过是一种戏剧性的说法，其意思是说，某人的财产应当被变卖，用变卖财产所得来为他人所实施的不当行为进行赔付。

It would seem that a similar form of words has been enough to satisfy the minds of great lawyers. The following is a passage from a

judgment by Chief Justice Marshall, which is quoted with approval by Judge Story in giving the opin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not a proceeding against the owner; it is a proceeding against the vessel for an offence committed by the vessel; which is not the less an offence, and does not the less subject her to forfeiture, because it was committed without the authority and against the will of the owner. It is true that inanimate matter can commit no offence. But this body is animated and put in action by the crew, who are guided by the master. The vessel acts and speaks by the master. She reports herself by the master. It is, therefore, not unreasonable that the vessel should be affected by this report.” And again Judge Story quotes from another case: “The thing is here primarily considered as the offender, or rather the offence is primarily attached to the thing.“ [2_82]

类似形式的话语似乎足可以满足伟大的法学家们的想法。下面一段文字摘自于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的一份判词，斯托里法官在发布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时曾以赞同的态度引用过此判决：“这不是一项针对船舶所有人的诉讼，而是一项针对实施侵害行为的船舶的诉讼；不能因为其侵害行为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授权并且违背了所有人的意志，而使之不成为侵害行为，或者不被罚没。无生命物的确不可能实施任何侵害行为。但船身是由船员操纵而移动的，而船员则是受船长指挥的。船只是通过船长采取行动、发出信号的。船只是通过船长来记录自身活动情况的。因此，船舶应该会受到船长记录的影响，是不无道理的”。此外，斯托里法官还引用了另外一个案例：“此物在此基本上被认定为侵害行为的实施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侵害行为主要依附于该物体”。

In other words, those great judges, although of course aware that a ship is no more alive than a mill-wheel, thought that not only

the law did in fact deal with it as if it were alive, but that it was reasonable that the law should do so. The reader will observe that they do not say simply that it is reasonable on grounds of policy to sacrifice justice to the owner to security for somebody else but that it is reasonable to deal with the vessel as an offending thing. Whatever the hidden ground of policy may be, their thought still clothes itself in personifying language.

换句话说，那些伟大的法官们，尽管他们肯定意识到了一艘船并不比一只磨坊的水车轮更富于生命力，但他们还是认为，法律事实上的确把船只作为有生命之物来进行处理，而且法律这样处理也是合情合理的。读者会注意到，他们并未简单地说，依据政策，为了保障他人而牺牲对船只所有人的公平是合理的，而是说将船只作为侵害实施物来处理是合理的。无论这背后隐藏的政策依据是什么，他们的想法依然是用拟人化的用语表达出来的。

Let us now go on to follow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maritime law in other directions. For the cases which have been stated are only parts of a larger whole.

现在让我们继续探讨海事法其他方面的特殊性。因为以上所提到的案例只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已。

By the maritime law of the Middle Ages the ship was not only the source, but the limit, of liability. [2_83] The rule already prevailed, which has been borrowed and adopted by the English statutes and by our own act of Congress of 1851, according to which the owner is discharged from responsibility for wrongful acts

of a master appointed by himself upon surrendering his interest in the vessel and the freight which she had earned. By the doctrines of agency he would be personally liable for the whole damage. If the origin of the system of limited liability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so essential to modern commerce is to be attributed to those considerations of public policy on which it would now be sustained, that system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law of collision. But if the limit of liability here stands on the same ground as the noxae deditio, confirms the explanation already given of the liability of the ship for wrongs done by it while out of the owner's hands, and conversely existence of that liability confirms the argument here.

依据中世纪的海事法，船舶不仅仅是责任的起因，还是责任的限度所在。这一规则早已盛行，并已被英国成文法以及我国1851年的国会法案所借鉴和采纳。依据该规则，只要船舶所有人交出他在船舶中的利益及该船所获得的运费，他就不再因其所指定之船长的不当行为而承担责任。根据代理法，船舶所有人本应对全部损失负有个人责任。被认为是现代商业不可或缺的有限责任制度，如将其起源归因于对那些对公共政策的考量（尽管该制度现在可能是以公共政策为依据），那么该制度与船舶碰撞法就会毫不相干。但是，如果这里的责任限定的依据与损害投偿原则一样，就证实了上文给出的当船舶不在船主手中时，船舶应对其不当行为负有责任的解释；反过来，这种责任的存在也证实了此处的观点。

Let us now take another rule, for which, as usual, there is a plausible explanation of policy. Freight, it is said, the mother of wages; for, we are told, “if the ship perished, if the mariners were to have their wages in such cases, they would not use their endeavors, nor hazard their lives, for the safety of the ship.“ [2_84] The best commentary on this reasoning is, that the law has recently

been changed by statute. But even by the old law there was an exception inconsistent with the supposed reason. In case of shipwreck, which was the usual case of a failure to earn freight, so long as any portion of the ship was saved, the lien of the mariners remained. I suppose it would have been said, because it was sound policy to encourage them to save all they could. If we consider that the sailors were regarded as employed by the ship, we shall understand very readily both the rule and the exception. “The ship is the debtor,” as was said in arguing a case decided in the time of William III. [2_85] If the debtor perished, there was an end of the matter. If a part came ashore, that might be proceeded against.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规则，这条规则照例也有一条似乎有理的政策解释。据说运费是工资之母；有人说原因在于“假如船舶失事，假如船员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拿到工资，则不必尽力保障船舶的安全，也不必为此危及自己的生命”。对于这一推理最好的解释是，成文法最近已对此法规进行了修订。但即使依照旧法，也还是一个例外，与这种所谓的推理相矛盾。船舶失事是不能获得运费的一种常见的情况，只要船舶任何一个部分被留下来，船员就保有留置权。我想，有人可能会说，因为鼓励船员尽其所能地挽救船上的东西才是明智之举。如果我们考虑到把船员视为受雇于船舶这一点，就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一规则及其例外。“船舶是债务人”，威廉三世时期裁决的某个案件所作的辩护中曾如是说。如果债务人死亡，事情就完结了。如果船舶有一部分到岸了，该部分就可能被起诉。

Even the rule in its modern form, that freight is the mother of wages, is shown by the explanation commonly given to have reference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ship is lost or arrive safe. In the most ancient source of the maritime law now extant, which has anything about the matter, so far as I have been able to discover,

the statement is that the mariners will lose their wages when the ship is lost. [2_86] In like manner, in what is said by its English editor, Sir Travers Twiss, to be the oldest part of the Consulate of the Sea, [2_87] we read that “whoever the freighter may be who runs away or dies, the ship is bound to pay: the mariners.“ [2_88] I think we may assume that the vessel was bound by the contract with the sailors, much in the same way as it was by the wrongs for which it was answerable, just as the debtor's body was answerable for his debts, as well as for his crimes, under the ancient law of Rome.

通常给出的解释也可表明，运费为工资之母这一规则，甚至其现代形式也涉及到船舶是灭失还是安全抵达的问题。据我所能发现的现存全部有关这一问题最古老的海事法渊源中是这样陈述的：如船舶灭失，船员将丧失其工资。同样地，在被《海上领事》一书的英文编辑特拉弗斯·特威斯爵士称之为该书最古老的那一部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承运人是潜逃还是死亡，船舶都负有支付船员工资的责任”。我认为，我们可以假定船舶受到与船员签订的合同的约束，这非常类似于船舶也受到其所负责的不当行为的约束，就好比在古罗马法之下，债务人的身体为其所欠债务及罪行承担责任。

The same thing is true of other maritime dealings with the vessel, whether by way of contract or otherwise. If salvage service is rendered to a vessel, the admiralty court will hold the vessel, although it has been doubted whether an action of contract would lie, if the owners were sued at law. [2_89] So the ship is bound by the master's contract to carry cargo, just as in case of collision, although she was under lease at the time. In such cases, also, according to our Supreme Court, the master may bind the vessel when he cannot bind the general owners. [2_90] “By custom the ship is bound to the merchandise, and the merchandise to the ship.“ [2_91] “By the

maritime law every contract of the master implies an hypothecation.“ [2_92] It might be urged, no doubt, with force, that, so far as the usual maritime contracts are concerned, the dealing must be on the security of the ship or merchandise in many cases, and therefore that it is policy to give this security in all cases; that the risk to which it subjects ship-owners is calculable, and that they must take it into account when they let their vessels. Again, in many cases, when a party asserts a maritime lien by way of contract, he has improved the condition of the thing upon which the lien is claimed, and this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ground for such a lien in some systems. [2_93] But this is not true universally, nor in the most important cases. It must be left to the reader to decide whether ground has not been shown for believing that the same metaphysical confusion which naturally arose as to the ship's wrongful acts, affected the way of thinking as to her contracts. The whole manner of dealing with vessels obviously took the form which prevailed in the cases first mentioned. Pardessus, a high authority, says that the lien for freight prevails even against the owner of stolen goods, “as the master deals less with the person than the thing.“ [2_94] So it was said in the argument of a famous English case, that “the ship is instead of the owner, and therefore is answerable.“ [2_95] In many cases of contract, as well as tort, the vessel was not only the security for the debt, but the limit of the owner's liability.

涉及船舶的其他海事纠纷，无论是合同形式，还是其他方式的纠纷，也都如此。如果对一艘船实施了海难救助，海事法院即会扣押该船，尽管在所有人被依法起诉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合同之诉让人怀疑。因此，船舶是在船长订立的合同的约束之下运送货物的，这与当时在租赁期内的船舶的海上碰撞案件类似。而且，依照我们最高法院的规定，在这类案件中，船长在不能约束船舶一般所有者的情况下，

可对船舶进行约束。“依照惯例，船舶对货物负有责任，货物也对船舶负有责任。”“依据海事法，船长订立的每一份合同都意味着一份抵押契约。”毫无疑问，有人可能会极力主张：因为就通常的海事合同而言，纠纷在很多情况下必定与船舶或者货物的安全性相关，因此解决的办法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提供这种担保；这样船舶所有人因之承担的风险就可被估算出来，所有人出租船舶之时，就必定会将风险考虑在内。此外，在很多情况下，当一方当事人以合同方式主张船舶留置权时，他通常都已经对其主张留置权的物体的状况进行了改善，这在一些法律体系中被视为主张此类留置权一个依据。但这并不具有普遍性，在一些最重要的案例中也并非如此。应当留给读者自己来决定，是否有理由认为：船舶的不当行为自然引起的上述形而上的混乱对人们思考船舶合同的方式产生了影响。船舶问题的整个处理方式，显然采用了最初提到的判例中所盛行的方式。帕尔德苏斯是有关海事法的权威，他说，货物留置权甚至优先于对被盗货物货主的赔偿，“因为船长更多的是与货物打交道，而不是与人打交道”。因此，在一起著名的英国案例的辩护中提到，“船舶代替了船主，因此应当承担责任”。在许多有关合同及侵权行为的案例中，船舶不仅是债务的担保，还是船舶所有人责任的限度所在。

The principles of the admiralty are embodied in its form of procedure. A suit may be brought there against a vessel by name, any person interested in it being at liberty to come in and defend, but the suit, if successful, ending in a sale of the vessel and a payment of the plaintiff's claim out of the proceeds. As long ago as the time of James I. it was said that “the libel ought to be only against the ship and goods, and not against the party.“ [2_96] And authority for the statement was cited from the reign of Henry VI., the same reign when, as we have seen, the Admiral claimed a forfeiture of ships for causing death. I am bound to say, however, that I cannot find such an authority of that date.

海事法庭的原则具体体现在其程序形式中。在海事法庭中，可指名对船舶提起诉讼，任何对此感兴趣的人都可自由进入法庭辩护，如果胜诉将出售船舶，并以变卖船舶所得来支付原告提出的赔偿。早在詹姆斯一世时期就有人说，“原告的起诉状应当只针对船舶和货物，而不是针对当事人”。有关这一论断的先例出自亨利六世时期，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的海事法庭主张对致人死亡的船舶予以没收。不过，我必须得说我无法找到那一时期类似的先例。

We have now follow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ef forms of liability in modern law for anything other than the immediate and manifest consequences of a man's own acts. We have seen the parallel course of events in the two parents,—the Roman law and the German customs, and in the offspring of those two on English soil with regard to servants, animals, and inanimate things. We have seen a single germ multiplying and branching into products as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s the flower from the root. It hardly remains to ask what that germ was. We have seen that it was the desire of retaliation against the offending thing itself. Undoubtedly, it might be argued that many of the rules stated were derived from a seizure of the offending thing as security for reparation, at first, perhaps, outside the law. [2_97] That explanation, as well as the one offered here, would show that modern views of responsibility had not yet been attained, as the owner of the thing might very well not have been the person in fault. But such has not been the view of those most competent to judge. A consideration of the earliest instances will show, as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that vengeance, not compensation, and vengeance on the offending thing, was the original object. The ox in Exodus was to be stoned. The axe in the Athenian law was to be banished. The tree, in Mr. Tylor's instance, was to be chopped to pieces. The slave under all the systems was to be surrendered to the relatives of the slain man, that they might do

with him what they liked. [2_98] The deodand was an accursed thing. The original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to surrender, when the owner was before the court, could not be accounted for if it was his liability, and not that of his property, which was in question. Even where, as in some of the cases, expiation seems to be intended rather than vengeance, the object is equally remote from an extrajudicial distress.

至此，我们已经追溯了现代法律中除个人自身行为所产生的直接的、明显的后果以外，其他所有主要责任形式的发展过程。我们在两大母法——罗马法和日耳曼习惯法，以及二者在英国的土壤上所衍生的有关佣人、动物和无生命物的法律中可以看到责任形式并行的发展过程。我们看到，单个的种子会繁殖分化、结出多个果实，就像同根而生的花朵一样。无需多言，我们已经发现，那个种子就是对实施侵害行为的物体本身进行报复的欲望。毫无疑问，有人会提出异议说，所述规则有很多起源于扣押侵害物作为赔偿抵押品这一做法，而这起初可能并不合法。以上的解释，以及此处给出的解释都可能表明，责任的现代观念还尚未成形，因为造成侵害之物体的所有人完全可能并非侵害实施人本身。不过，这并非最有能力的法官的观点。对最早期案例的分析表明，复仇而非补偿，对实施侵害物的复仇，才是最初的目的，这是可想而知的。《出埃及记》中的牛要被石头砸死。雅典法中的斧头要被放逐。泰勒先生所举的例子中的树要被剁成碎片。在所有法律体系中，奴隶都要被交给死者的亲属，后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奴隶进行处置。赎罪奉献物是被诅咒的物体。所有人在法庭上受审时，如果是所有人自身的责任，而不是其所属物的责任，那么最初把责任限定于交出这一原则，就解释不通了，这也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即便如此，在有些案件中，人们的意图似乎是赎罪而不是复仇，其目的也同样远非被法外扣押的财物。

The foregoing history, apart from the purposes for which it has

been given, well illustrates the paradox of form and subst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w. In form its growth is logical. The official theory is that each new decision follows syllogistically from existing precedents. But just as the clavicle in the cat only tells of the existence of some earlier creature to which a collar-bone was useful, precedents survive in the law long after the use they once served is at an end and the reason for them has been forgotten. The result of following them must often be failure and confusion from the merely logical point of view.

除追溯历史的目的之外，上述责任形式的历史发展，还充分说明了法律发展过程中形式与实质之间的悖论。在形式上，法律的发展是符合逻辑的。正统的理论认为，每一项新的判决都是在已有判例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逻辑产生的。但是，正如猫体内的锁骨只能说明存在某种锁骨对其有用的早期的生物一样，同样地，某些判例在法律中被保留了下来，但其曾经的用途却早已不再，其判决的依据也早已被遗忘。从纯逻辑的角度来看，遵循惯例，结果通常只会导致失败与混乱。

On the other hand, in substance the growth of the law is legislative. And this in a deeper sense than that what the courts declare to have always been the law is in fact new. It is legislative in its grounds. The very considerations which judges most rarely mention, and always with an apology, are the secret root from which the law draws all the juices of life. I mean, of course, considerations of what is expedient for the community concerned. Every important principle which is developed by litigation is in fact and at bottom the result of more or less definitely understood views of public policy; most generally, to be sure, under our practice and traditions, the unconscious result of instinctive preferences and

inarticulate convictions, but none the less traceable to views of public policy in the last analysis. And as the law is administered by able and experienced men, who know too much to sacrifice good sense to a syllogism, it will be found that, when ancient rules maintain themselves in the way that has been and will be shown in this book, new reasons more fitted to the time have been found for them, and that they gradually receive a new content, and at last a new form, from the grounds to which they have been transplanted.

另一方面，在内容上法律的发展与立法相关。较之法院所宣称的永久性的法律，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而言，法律的发展其实具有创新性。它从根本上就与立法相关。法官们很少提及，而且提及时总会为之辩护的那些分析考量，恰恰就是法律获取整个生命之液的秘密根茎。当然，我所谓的考量，是指对相关团体来说什么才是最有利的这样一些考量。每一项通过诉讼建立起来的重要的法律原则，事实上以及本质上而言，多多少少都是明确理解公共政策的结果；当然，就最一般的情况而言，根据我们的实践与传统，这些原则是直觉偏好和难以言说的信念等无意识的产物，但归根到底却依然可以追溯到对公共政策的理解。由于法律是由一些有能力和有经验的人来掌管，他们对法律非常了解，不会为了逻辑性而牺牲合理性；因此，我们会发现，当古代的法律规则以本书前后文所述及的方式继续保留下来时，人们已经为这些规则找到了更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理据，从新的理据中，这些规则逐渐获得了新内涵，并最终获得了新形式。

But hitherto this process has been largely unconscious. It is important, on that account, to bring to mind what the actual course of events has been. If it were only to insist on a more conscious recognition of the legislative function of the courts, as just explained, it would be useful, as we shall see more clearly further on. [2_99]

但迄今为止，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无意识的过程。有鉴于此，分析事件发展的实际过程非常重要。如果只是要求对法院的立法功能有更自觉的认识，就像刚才所解释的一样，这种分析也是很有裨益的，我们在后文中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What has been said will explain the failure of all theories which consider the law only from its formal side; whether they attempt to deduce the corpus from a priori postulates, or fall into the humbler error of supposing the science of the law to reside in the elegantia juris, or logical cohesion of part with part. The truth is, that the law always approaching, and never reaching, consistency. It is forever adopting new principles from life at one end, and it always retains old ones from history at the other, which have not yet been absorbed or sloughed off. It will become entirely consistent only when it ceases to grow.

上文所述将可以解释所有仅仅从形式的角度对法律进行分析的理论的失败，不论这些理论是试图从某种先验性假设中演绎出法律大全，还是陷入了更为低级的错误之中，以为法律的艺术在于法律之精美雅致，或者法律各部分与部分之间的逻辑一致性。事情的真相是，法律总是想要趋近于一致性，但却永远不能获得一致性。一方面，法律永远在不断接受源自生活的新原则；另一方面，它却总是保留着历史上尚未被吸收，或未被抛弃的旧原则。只有停止了发展，法律才会完全一致。

The study upon which we have been engaged is necessary both for the knowledge and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law. However much we may codify the law into a series of seemingly self-sufficient

propositions, those propositions will be but a phase in a continuous growth. To understand their scope fully, to know how they will be dealt with by judges trained in the past which the law embodies, we must ourselves know something of that past. The history of what the law has been is necessary to the knowledge of what the law is.

我们进行的研究，对于了解法律，以及修订法律都很有必要。即便我们可以将法律编纂为一系列表面上似乎自我满足的命题，这些命题也不过只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为了全面了解命题的范畴，以及在过去接受法律培训的法官们将如何对待这些命题，我们自己则必须对过去有所了解，因为法律体现了过去的历史。法律的历史对于了解法律的现在很有必要。

Again, the process which I have described has involved the attempt to follow precedents, as well as to give a good reason for them. When we find that in large and important branches of the law the various grounds of policy on which the various rules have been justified are later inventions to account for what are in fact survivals from more primitive times, we have a right to reconsider the popular reasons, and, taking a broader view of the field, to decide anew whether those reasons are satisfactory. They may be, notwithstanding the manner of their appearance. If truth were not often suggested by error, if old implements could not be adjusted to new uses, human progress would be slow. But scrutiny and revision are justified.

此外，我在上文描述的法律发展的过程，也涉及到试图遵循判例，并为其找到充分的理据。我们发现，在重大的部门法中，用以解释各条法规合理性的各项政策依据，其实都是后来才提出的，以用来

解释那些实际早期留存下来的规则，当我们发现这一点时，我们有权对通行的政策依据重新进行考量，并同时拓宽视野，重新审视这些依据是否令人满意。这些依据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都可能会令人满意。如果谬误不能得出真理，如果旧的工具不能适用于新的用途，人类的进步就会变得迟缓。而审查与修订就具有了合理性。

But none of the foregoing considerations, nor the purpose of showing the materials for anthropology contain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law, are the immediate object here. My aim and purpose have been to show that the various forms of liability known to modern law spring from the common ground of revenge. In the sphere of contract the fact will hardly be material outside the cases which have been stated in this Lecture. But in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law of torts it is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It shows that they have started from a moral basis, from the thought that some one was to blame.

但是，以上的分析，以及对包含于法律史中的人类学素材的揭示，都并非本文的直接目的。我的目的和意图是要指出，现代法律包含的多种责任形式，起源于复仇这一共同的原因。在合同法的范畴内，除了本讲所涉及的有关案例外，这一事实几乎不重要。但是，在刑法和侵权法里，这一点却至关重要。它表明两者都起源于同一个道德基准，起源于有人应当被归责的想法。

It remains to be proved that, while the terminology of morals is still retained, and while the law does still and always, in a certain sense, measure legal liability by moral standards, it nevertheless, by the very necessity of its nature, is continually transmuting those moral standards into external or objective ones, from which the

actual guilt of the party concerned is wholly eliminated.

尚需证明的是：尽管有关道德的术语仍被保留了下来，尽管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仍然，而且一直是根据道德标准来衡量法律责任，但是，依其本质之必然，法律还是在不断地把这些道德标准转化为外在或客观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对涉案当事人的实际过失完全不加考虑。

[2_1].E.g. Ine, c. 74; Alfred, c. 42; Ethelred, IV. 4, Section 1.

[2_2].Bract., fol. 144, 145; Fleta, I. c. 40, 41; Co. Lit. 126b; Hawkins, P.C., Bk. 2, ch. 23, Section 15.

[2_3].Lib. I. c. 2, ad fin.

[2_4].Bract., fol. 144a, "assulto praemeditato."

[2_5].Fol. 155; cf. 103b.

[2_6].Y.B. 6 Ed. IV. 7, pl. 18.

[2_7].Ibid., and 21 H. VII. 27, pl. 5.

[2_8].D.47. 9. 9.

[2_9].xxi. 28.

[2_10].[theta], ix. Jowett's Tr., Bk. IX. p. 437; Bohn's Tr., pp. 378, 379.

[2_11].[theta], xv., Jowett, 449; Bohn, 397.

[2_12].[iota alpha], xiv., Jowett, 509; Bohn, 495.

[2_13].[theta], xii., Jowett, 443, 444; Bohn, 388.

[2_14].[Greek words]. 244, 245.

[2_15].l.28 (11).

[2_16].Solon.

[2_17]."Si quadrupes pauperiem fecisse dicetur actio ex lege duodecim tabularum descendit; quae lex voluit, aut dari [id] quod nocuit, id ist, id animal, quod noxiam commisit; aut estimationem noxiae offerre." D. 9. 1. 1, pr.; Just. Inst. 4. 9; XII Tab., VIII. 6.

[2_18].Gaii Inst. IV. Sections 75, 76; D. 9. 4. 2, Section 1. "Si servus furtum faxit noxiam ve noxit." XII Tab., XII.2. Cf. Just. Inst. 4.8, Section 7.

[2_19].D.39. 2. 7, Sections 1, 2; Gaii Inst. IV. Section 75.

[2_20]."Noxa caput sequitur." D. 9. 1. 1, Section 12; Inst. 4.8, Section 5.

[2_21]."Quia desinit dominus esse ubi fera evasit." D. 9. 1. 1, Section 10; Inst. 4. 9, pr. Compare May v. Burdett, 9 Q.B.101, 113.

[2_22].D.19. 5. 14, Section 3; Plin. Nat. Hist., XVIII. 3.

[2_23]."In lege antiqua si servus sciente domino furtum fecit, vel aliam noxiam commisit, servi nomine actio est noxalis, nec dominus suo nomine tenetur." D. 9. 4. 2.

[2_24].Gaius, Inst. IV. Section 77, says that a noxal action may change to a direct, and conversely, a direct action to a noxal. If a paterfamilias commits a tort, and then is adopted or becomes a slave, a noxal action now lies aGaiust his master in place of the direct one aGaiust himself as the wrong-doer. Just. Inst. 4. 8, Section 5.

[2_25].LL. Alfred, c. 13; 1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Am. ed., p. 285 et seq.; Bain, Mental and Moral Science, Bk. III. ch. 8, p. 261.

[2_26].Florus, Epitome, II. 18. Cf. Livy, IX 1, 8, VIII. 39; Zonaras, VII. 26, ed. Niebuhr, vol. 43, pp. 98, 99.

[2_27].Gaii Inst. IV. Section 81. I give the reading of Huschke: "Licere enim etiam, si fato is fuerit mortuus, mortuum dare; nam quamquam diximus, non etiam permissum reis esse, et mortuos homines dedere, tamen et si quis eum dederit, qui fato suo vita excesserit, aeque liberatur." Ulpian's statement, in D. 9. 1. 1, Section 13, that the action is gone if the animal dies ante litem contestatam, is directed only to the point that liability is founded on possession of the thing.

[2_28]."Bello contra foedus suscepto."

[2_29].Livy, VIII. 39: "Vir...haud dubie proximarum induciarum ruptor. De eo coacti referre praetores decretum fecerunt 'Ut Brutulus Papius Romanis dederetur."...Fetiales Romam, ut censuerunt, missi, et corpus Brutuli exanime: ipse morte voluntaria ignominiae se ac supplicio subtraxit. Placuit cum corpore bona quoque ejus dedi." Cf. Zonaras, VII. 26, ed. Niebuhr, vol. 43, p. 97: [Greek characters]. See further Livy, V. 36, "postulatumque ut pro jure gentium violato Fabii dederentur," and Ib. I. 32.

[2_30].Livy, IX. 5, 8, 9, 10. "Nam quod deditione nostra negant exsolvi religione populum, id istos magis ne dedantur, quam quia ita se res habeat, dicere, quis adeo juris fetialium expers est, qui ignoret?" The formula of surrender was as follows: "Quandoque hisce homines injussu populi Romani Quiritium foedus ictum iri spoponderunt, atque ob eam rem noxam nocuerunt; ob eam rem, quo populus Romanus scelere impio sit solutus, hosce homines vobis dedo." Cf. Zonaras, VII. 26, ed. Niebuhr, vol. 43, pp. 98, 99.

[2_31].De Orator. I. 40, and elsewhere. It is to be noticed that Florus, in his account, says deditione Mancini expiavit. Epitome, II. 18.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that the cases mentioned by Livy seem to suggest that the object of the surrender was expiation, as much as they do that it was satisfaction of a contract. Zonaras says, Postumius and Calvinus [Greek characters]. (VII. 26, ed. Niebuhr, Vol. 43, pp. 98, 99.) Cf. ib. p. 97. Compare Serv. ad Virg. Eclog. IV. 43: "In legibus Numae cautum est, ut si quis imprudens occidisset hominem pro capite occisi et natis [agnatis? Huschke] ejus in concione offerret arietem." Id. Geor. III. 387, and Festus, Subici, Subigere. But cf. Wordsworth's Fragments and Specimens of Early Latin, note to XII Tab., XII. 2, p. 538.

[2_32].D.9. 4. 2

[2_33].2 Tissot, Droit Penal, 615; 1 Ihering, Geist d. Roem. R., Section 14; 4 id. Section 63.

[2_34].Aul. Gell. Noctes Attici, 20. 1; Quintil. Inst. Orat. 3. 6. 84; Tertull. Apol., c. 4.

[2_35].Cf. Varro, De Lingua Latina, VI.: "Liber, qui suas operas in servitute pro pecunia, quam debeat, dum solveret Nexus vocatur."

[2_36].D.9. 1. 1, Section 9 But cf. 1 Hale, P.C. 420.

[2_37].D.9. 4. 2, Section 1.

[2_38].D.9. 1. 1, Sections 4, 5.

[2_39].D.4. 9. 1, Section 1; ib. 7, Section 4.

[2_40].Gaius in D. 44. 7. 5, Section 6; Just. Inst. 4. 5, Section 3.

[2_41].D.4. 9. 7, pr.

[2_42].See Austin, Jurisp. (3d ed.) 513; Doctor and Student, Dial. 2, ch. 42.

[2_43].Cf. L. Burgund. XVIII.; L. Rip. XLVI. (al. 48).

[2_44].See the word Lege, Merkel, Lex Salica, p. 103. Cf. Wilda, Strafrecht der Germanen, 660, n. 1. See further Lex Salica, XL.; Pactus pro tenore pacis Child. et Chloth., c. 5; Decretio Chlotharii, c. 5; Edictus Hilperichi, cc. 5, 7; and the observations of Sohm in his treatise on the Procedure of the Salic Law, Sections 20, 22, 27, French Tr. (Thevenin), pp. 83 n., 93, 94, 101-103, 130.

[2_45].Wilda, Strafrecht, 590.

[2_46].Cf. Wilda, Strafrecht, 660, n. 1; Merkel, Lex Salica, Gloss. Lege, p. 103. Lex Saxon. XI. Section 3: "Si servus perpetrato facinore fugerit, ita ut adomino ulterius inveniri non possit, nihil solvat." Cf. id. II. Section 5. Capp. Rip. c. 5: "Nemini liceat servum suum, propter damnum ab illo cuibet inlatum, dimittere; sed justa qualitatem damni dominus pro illo respondeat vel eum in compositione aut ad poenam petitori offeret. Si autem servus perpetrato scelere fugerit, ita ut a domino paenitus inveniri non possit, sacramento se dominus ejus excusare studeat, quod nec suae voluntatis nec conscientia fuisset, quod servus ejus tale facinus commisit."

[2_47].L.Saxon. XI. Section 1.

[2_48].Lex Angl. et Wer. XVI.: "Omne damnum quod servus fecerit dominus emendet."

[2_49].C.3; 1 Thorpe, Anc. Laws, pp. 27, 29.

[2_50].C.74; 1 Thorpe, p. 149; cf. p. 118, n. a. See LL. Hen. I., LXX. Section5.

[2_51].C.24; 1 Thorpe, p. 79. Cf. Ine, c. 42; 1 Thorpe, p. 129.

[2_52].C.13; 1 Thorpe, p. 71.

[2_53].1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Am. ed., p. 286.

[2_54].Cf. Record in Molloy, Book 2, ch. 3, Section 16, 24 Ed. III.: "Visum fuit curiae, quod unusquisque magister navis tenetur respondere de quacunque transgressione per servientes suos in navi sua facta." The Laws of Oleron were relied on in this case. Cf. Stat. of the Staple, Ed. III., Stat. 2, c. 19. Later, the influence of the Roman law is clear.

[2_55].Quon. Attach., c. 48, pl. 10 et seq. Cf. The Forme and Maner of Baron Courts, c. 62 et seq.

[2_56].Forme and Maner of Baron Courts, c. 63.

[2_57].C.64. This substantially follows the Quoniam Attachiamenta, c. 48, pl. 13, but is a little clearer. Contra, Fitzh. Abr. Corone, Pl. 389, 8 Ed. II.

[2_58].Fitzh. Abr. Barre, pl. 290.

[2_59].Mitchil v. Alestree, 1 Vent. 295; S.C. 2 Lev. 172; S.C. 3 Keb. 650. Cf. May v. Burdett, 9 Q.B.101, 113.

[2_60].May v. Burdett, 9 Q.B.101.

[2_61].Mason v. Keeling, 12 Mod. 332, 335; S.C. 1 Ld. Raym. 606, 608.

[2_62].Williams, J. in Cox v. Burbidge, 13 C.B. N.S. 430, 438. Cf. Willes, J. in Read v. Edwards, 17 C.B. N.S. 245, 261.

[2_63].Mason v. Keeling, 1 Ld. Raym. 606, 608.

[2_64].In the laws of Ine, c. 42 (1 Thorpe, Anc. Laws, 129), personal liability seems to be imposed where there is a failure to fence. But if an animal breaks hedges the only remedy mentioned is to kill it, the owner to have the skin and flesh, and forfeit the rest. The defendant was held "because it was found that this was for

default of guarding them...for default of good guard," in 27 Ass., pl. 56, fol. 141, A.D. 1353 or 1354. It is much later that the reason is stated in the absolute form, "because I am bound by law to keep my beasts without doing wrong to any one." Mich. 12 Henry VII., Keilway, 3b, pl. 7. See, further, the distinctions as to a horse killing a man in Regiam Majestatem, IV, c. 24.

[2_65].Fol. 128.

[2_66].Cf. 1 Britton (Nich.), 6a, b, 16 (top paging 15, 39); Bract., fol. 136b; LL. Alfred, c. 13 (1 Thorpe, Anc. Laws, p. 71); Lex Saxon., Tit. XIII.; Leg Alamann., Tit. CIII. 24.

[2_67].Fleta, I. 26, Section 10; Fitzh. Abr. Corone, pl. 416. See generally Staundforde, P.C., I. c. 2, fol. 20 et seq.; 1 Hale, P.C. 410 et seq.

[2_68].Doctor and Student, Dial. 2, c. 51.

[2_69].Plowd. 260.

[2_70].Jacob, Law Dict. Deodand.

[2_71].Y.B. 30 & 31 Ed. I., pp. 524, 525; cf. Bract., fol. 136b.

[2_72].Fitzh. Abr. Corone, pl. 403.

[2_73].Bract. 122; 1 Britton (Nich.), top p. 16; Fleta, Ic. 25, Section 9, fol. 37.

[2_74].1 Hale, P.C. 423.

[2_75].1 Rot. Parl. 372; 2 Rot. Parl. 345, 372a, b; 3 Rot. Parl. 94a, 120a, 121; 4 Rot. Parl. 12a, b, 492b, 493. But see 1 Hale, P.C. 423.

[2_76].1 Black Book of the Admiralty, 242.

[2_77].Cf. Ticonderoga, Swabey, 215, 217.

[2_78].China, 7 Wall. 53.

[2_79].Doctor and Student, Dial. 2, c. 51.

[2_80].1 Roll. Abr. 530 (C) 1.

[2_81].3 Black Book of Adm. 103.

[2_82].Malek Adhel, 2 How. 210, 234.

[2_83].3 Kent, 218; Customs of the Sea, cap. 27, 141, 182, in 3 Black Book of the Admiralty, 103, 243, 245.

[2_84].3 Kent's Comm. 188.

[2_85].Clay v. Snelgrave, 1 Ld. Raym. 576, 577; S.C. 1 Salk. 33. Cf. Molloy, p. 355, Book II. ch. 3, Section 8.

[2_86]."Ans perdront lurs loers quant la nef est perdue." 2 Black Book, 213. This is from the Judgments of the Sea, which, according to the editor (II., pp. xliv., xlvii.), is the most ancient extant source of modern maritime law except the decisions of Trani. So Molloy, Book II. ch. 3, Section 7, p. 354: "If the ship perishes at sea they lose their wages." So 1 Siderfin, 236, pl. 2.

[2_87].3 Black Book, pp. lix., lxxiv.

[2_88].3 Black Book, 263. It should be added, however, that it is laid down in the same book that, if the vessel is detained in port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the master is not bound to give the mariners wages, "for he has earned no freight."

[2_89].Lipson v. Harrison, 2 Weekly Rep. 10. Cf. Louisa Jane, 2 Lowell, 295.

[2_90].3 Kent's Comm. (12th ed.), 218; ib. 138, n. 1.

[2_91].3 Kent, 218.

[2_92].Justin v. Ballam, 1 Salk. 34; S.C. 2 Ld. Raym. 805.

[2_93].D.20. 4. 5 & 6; cf. Livy, XXX. 38.

[2_94].Pardessus, Droit. Comm., n. 961.

[2_95].3 Keb. 112, 114, citing 1 Roll. Abr. 530.

[2_96].Godbolt, 260.

[2_97].3 Colquhoun, Roman Civil Law, Section 2196.

[2_98].Lex Salica (Merkel), LXXVII.; Ed. Hilperich., Section 5.

[2_99].See Lecture III., ad fin.

LECTURE II. THE CRIMINAL LAW.

第二讲　刑法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Lecture it was shown that the appeals of the early law were directed only to intentional wrongs. The appeal was a far older form of procedure than the indictment, and may be said to have had a criminal as well as a civil aspect. It had the double object of satisfying the private party for his loss, and the king for the breach of his peace. On its civil side it was rooted in vengeance. It was a proceeding to recover those compositions, at first optional, afterwards compulsory, by which a wrong-doer bought the spear from his side. Whether, so far as concerned the king, it had the same object of vengeance, or was more particularly directed to revenue, does not matter, since the claim of the king did not enlarge the scope of the action.

第一讲一开始就指出了早期法中的上诉针对的仅是故意不当行为。上诉是一种比公诉要古老得多的程序形式，可以说既包括刑事方面也包括民事方面。它具有双重目的，既要补偿私人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还要因扰乱治安对国王予以补偿。从民事方面来看，它根植于复仇。它是以获得补偿为目的的一种诉讼，起初是自愿的，后来则发展为强制性的，行为不当者据此通过赔偿化解复仇。就国王而言，这一程序形式的目的是同样为了复仇，还是更多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这倒无关紧要，因为国王的权力主张并不会扩大诉讼的范围。

It would seem to be a fair inference that indictable offences were originally limited in the same way as those which gave rise to

an appeal. For whether the indictment arose by a splitting up of the appeal, or in some other way, the two were closely connected.

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断：可公诉罪行最初的适用范围和早期法中引起上诉的罪行一样。因为不管公诉是否是从上诉中分离出来，还是产生于别的方式，两者都密切相关。

An acquittal of the appellee on the merits was a bar to an indictment; and, on the other hand, when an appeal was fairly started, although the appellor might fail to prosecute, or might be defeated by plea, the cause might still be proceeded with on behalf of the king. [3_1]

依据事实宣告被诉人无罪即意味着公诉的终止；但是，诉讼彻底启动之后，即使上诉人可能不提起刑事诉讼，或可能因被告的答辩而败诉，该诉讼仍可以国王的名义继续进行。

The presentment, which is the other parent of our criminal procedure, had an origin distinct from the appeal. If, as has been thought, it was merely the successor of fresh suit and lynch law, [3_2] this also is the child of vengeance, even more clearly than the other.

（大陪审团根据对罪行调查提出的）起诉报告是我们刑事程序的另一个来源，其起源有别于上诉。如果就像人们一直所认为的那样，起诉报告只是立即追捕及私刑的后续形式的话，那么它也应当是复仇的产物，甚至比上诉显得要更清楚一些。

The desire for vengeance imports an opinion that its object is actually and personally to blame. It takes an internal standard, not an objective or external one, and condemns its victim by that.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such a standard is still accepted either in this primitive form, or in some more refined development, as is commonly supposed, and as seems not impossible, considering the relative slowness with which the criminal law has improved.

复仇的欲望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事实上，复仇对象的身体上应被归罪。这里采取的是一种内在的而非客观的或者外在的标准，并据此对复仇对象予以问责。问题在于，考虑到刑法发展所具有的相对迟缓性，人们是否仍然接受这样一种标准，而不论其是处于这种原始的形态，还是像普遍所认为的那样，而且似乎不是不可能的，处于某种更先进的形态。

It certainly may be argued, with some force, that it has never ceased to be one object of punishment to satisfy the desire for vengeance. The argument will be made plain by considering those instances in which,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compensation for a wrong is out of the question.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满足复仇的欲望从来都是刑罚的一个目标，这一观点还有些说服力。看一看那些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根本就不可能对不当行为作出补偿的例子，我们对这一观点就很清楚了。

Thus an act may be of such a kind as to make indemnity impossible by putting an end to the principal sufferer, as in the case of murder or manslaughter.

因此，某一行为可能属于主要受害人死亡，赔偿却无法实现的一类行为，就像谋杀或误杀案的情况一样。

Again, these and other crimes, like forgery, although directed against an individual, tend to make others feel unsafe, and this general insecurity does not admit of being paid for.

此外，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罪行，比如伪造文书罪等等，尽管针对的对象是个人，但往往会使其他人感到不安全，而这种普遍的不安全感却不可能得到赔偿。

Again, there are cases where there are no means of enforcing indemnity. In Macaulay's draft of the Indian Penal Code, breaches of contract for the carriage of passengers, were made criminal. The palanquin-bearers of India were too poor to pay damages, and yet had to be trusted to carry unprotected women and children through wild and desolate tracts, where their desertion would have placed those under their charge in great danger.

此外，还有一些案件无法强制执行赔偿。在麦考利起草的《印度刑法典》草案中，违反乘客运输合同的行为被定为刑事犯罪。印度的轿夫太穷了，根本无力支付赔偿，但是，人们又不得不委托他们运送无人监护的妇女及儿童穿越荒郊野外，如果轿夫将这些他们负责的乘客弃之于荒野的话，就有可能会置乘客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In all these cases punishment remains as an alternative. A pain

can be inflicted upon the wrong-doer, of a sort which does not restore the injured party to his former situation, or to another equally good, but which is inflicted for the very purpose of causing pain. And so far as this punishment takes the place of compensation, whether on account of the death of the person to whom the wrong was done, the indefinite number of persons affected, the impossibility of estimating the worth of the suffering in money, or the poverty of the criminal, it may be said that one of its objects is to gratify the desire for vengeance. The prisoner pays with his body.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刑罚依然是一种替代性方案。对侵害人可以施加某种惩罚，这种惩罚不会使受害方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或者同样很好的一种状况，但是，惩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侵害人痛苦。就刑罚取代赔偿而言，则不论是因为受害人死了，还是因为受害人人数不确定，还是因为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痛苦的价值，还是因为犯人很穷，都可以说满足复仇的欲望是刑罚的目的之一。犯人拿自己的身体来赔偿损失。

The statement may be made stronger still, and it may be said, not only that the law does, but that it ought to, make the gratification of revenge an object. This is the opinion, at any rate, of two authorities so great, and so opposed in other views, as Bishop Butler and Jeremy Bentham. [3_3] Sir James Stephen says, “The criminal law stands to the passion of revenge in much the same relation as marriage to the sexual appetite.“ [3_4]

还可以说的更绝对一些，法律不仅确实使满足复仇的欲望成为刑罚的一个目标，而且还应当如此。不管怎样，这是两位权威人士比肖

普·巴特勒和杰里米·边沁的共识，尽管这两位了不起的人物对其他问题的看法却大相径庭。詹姆士·斯蒂芬爵士说："刑罚之于复仇的激情，大致等同于婚姻之于性欲之间的关系。"

The first requirement of a sound body of law is, that it should correspond with the actual feelings and demands of the community, whether right or wrong. If people would gratify the passion of revenge outside of the law, if the law did not help them, the law has no choice but to satisfy the craving itself, and thus avoid the greater evil of private retribu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ssion is not one which we encourage, either as private individuals or as lawmakers. Moreover, it does not cover the whole ground. There are crimes which do not excite it, and we should naturally expect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purposes of punishment would be coextensive with the whole field of its application. It remains to be discovered whether such a general purpose exists, and if so what it is. Different theories still divide opinion upon the subject.

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其首要条件就是，该体系应当顺应社会的真实情感与要求，而不论这些情感与要求对错与否。如果人们能在法律之外满足复仇的激情，如果法律不曾给人们以帮助，那么法律将别无选择，只好满足这种渴望本身，以避免出现私人复仇这种更为严重的罪恶。然而，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立法者而言，这种激情都不是我们所鼓励提倡的。此外，复仇的激情并不能涵盖全部的理据。有一些犯罪活动并不会激起复仇的激情，而我们自然希望，刑罚最重要的目的应与其适用的全部范围相对应。是否存在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目的，如果存在的话，这一目的又是什么，这些还有待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不同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分歧。

It has been thought that the purpose of punishment is to reform the criminal; that it is to deter the criminal and others from committing similar crimes; and that it is retribution. Few would now maintain that the first of these purposes was the only one. If it were, every prisoner should be released as soon as it appears clear that he will never repeat his offence, and if he is incurable he should not be punished at all. Of course it would be hard to reconcile the punishment of death with this doctrine.

有人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改造罪犯；有人认为，其目的在于阻止罪犯和其他人再犯下类似的罪行；也有人认为，其目的是为报应。现在很少有人会坚持认为，第一种目的是刑罚的唯一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每一位犯人，一旦清楚他不会再次犯罪，就应当把他释放；而如果他无可救药的话，也就根本不应该对他施以刑罚。当然，也很难把死刑与这一观点统一起来。

The main struggle lies between the other two. On the one side is the notion that there is a mystic bond between wrong and punishment; on the other, that the infliction of pain is only a means to an end. Hegel, one of the great expounders of the former view, puts it, in his quasi mathematical form, that, wrong being the negation of right, punishment is the negation of that negation, or retribution. Thus the punishment must be equal, in the sense of proportionate to the crime, because its only function is to destroy it. Others, without this logical apparatus, are content to rely upon a felt necessity that suffering should follow wrong-doing.

主要的争议存在于另外两种目的之间。一方观点认为，罪与罚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关联；另一方则认为，施以刑罚只是实现目的的一

种手段罢了。黑格尔是前一种观点的伟大阐释者之一，他以其准数学形式进行解释说，因为错误是对正确的否定，那么刑罚就是对这种否定之否定，要不然就是报应。这样，从与罪行成比例的意义上而言，刑罚就必须是等量的，因为刑罚的唯一功能在于消除犯罪。其他人没有黑格尔的这种逻辑工具，则乐于相信某种人们本能感觉到的必要性：犯罪即应受罚。

It is objected that the preventive theory is immoral, because it overlooks the ill-desert of wrong-doing, and furnishes no measure of the amount of punishment, except the lawgiver's subjective opinion in regard to the sufficiency of the amount of preventive suffering. [3_5] In the language of Kant, it treats man as a thing, not as a person; as a means, not as an end in himself. It is said to conflict with the sense of justice, and to violat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all free communities, that the members of such communities have equal rights to life, liberty, and personal security. [3_6]

有人反对说，这种预防论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忽略了有些罪行是应当受到惩罚的，也没有提供衡量刑罚轻重的标准，有的只是立法者对于这种预防性惩罚量是否足够的主观性看法。用康德的话来说，预防论把人当成了物，而不是人；把人当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有人说，预防论与正义感相冲突，违背了一切自由社会的根本原则，即自由社会的成员都拥有生命、自由及人身安全的平等权利。

In spite of all this, probably most English-speaking lawyers would accept the preventive theory without hesitation. As to the violation of equal rights which is charged, it may be replied that the dogma of equality makes an equ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only, not between an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No society has ever

admitted that it could not sacrifice individual welfare to its own existence. If conscripts are necessary for its army, it seizes them, and marches them, with bayonets in their rear, to death. It runs highways and railroads through old family places in spite of the owner's protest, paying in this instance the market value, to be sure, because no civilized government sacrifices the citizen more than it can help, but still sacrificing his will and his welfare to that of the rest. [3_7]

尽管如此，可能大多数英语国家的法学家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预防论。针对违背了平等权利的指控，他们可能会回答说，平等原则仅使得个人之间形成平等，而不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等。任何社会都曾经承认过，它可能会因为自身的存在而牺牲个人的利益。如果军队需要应征士兵，它就会抓住他们，拿刺刀对着他们的后背，迫使他们走向死亡。它让公路和铁路穿越古老的住宅区，而不顾房屋所有者的抗议，当然，这种情况下它会支付一定的市场价，因为没有一个文明的政府，对公民利益的牺牲大于其所提供的帮助，但它仍然会为了其他人的意愿及利益而牺牲某个公民的意愿及利益。

If it were necessary to trench further upon the field of morals, it might be suggested that the dogma of equality applied even to individuals only within the limits of ordinary dealings in the common run of affairs. You cannot argue with your neighbor, except on the admission for the moment that he is as wise as you, although you may by no means believe it. In the same way, you cannot deal with him, where both are free to choose, except on the footing of equal treatment, and the same rules for both. The ever-growing value set upon peace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 tends to give the law of social being the appearance of the law of all being. But it seems to me clear that the ultima ratio, not only regum, but of

private persons, is force, and that at the bottom of all private relations, however tempered by sympathy and all the social feelings, is a justifiable self-preference. If a man is on a plank in the deep sea which will only float one, and a stranger lays hold of it, he will thrust him off if he can. When the state finds itself in a similar position, it does the same thing.

如果有必要就道德方面进行深究，有人可能会提出，只有局限在一般性事物的一般性处理过程中时，平等原则才尤其适用于个人。你不可能跟你的邻居争吵，除非你承认彼时他和你一样聪明，尽管你可能根本无法相信这一点。同样地，在两个人都可自由进行选择时，你只会与跟你享有同等待遇并受同样规则约束的人打交道。社会治安和社会关系被赋予的意义越来越重大，使社会人的法律表现为一切人的法律。但我却清楚地看到，最后的手段，不仅是国王的最后手段，也是私人的最后手段，乃是暴力；而一切私人关系的底线乃是一种无可非议的自我偏爱，不管这种偏爱如何因同情心以及各种社会情感而减弱。如果一个人趴在一块木板上漂流于茫茫大海之中，这块木板只能浮起一个人，而一个陌生人要占有这块木板，此人肯定会尽全力把这个陌生人推开。当国家发现自己处于类似情况时，它也会这样做。

The considerations which answer the argument of equal rights also answer the objections to treating man as a thing, and the like. If a man lives in society, he is liable to find himself so treated. The degree of civilization which a people has reached, no doubt, is marked by their anxiety to do as they would be done by. It may be the destiny of man that the social instincts shall grow to control his actions absolutely, even in anti-social situations. But they have not yet done so, and as the rules of law are or should be based upon a morality which is generally accepted, no rule founded on a theory of absolute unselfishness can be laid down without a breach

between law and working beliefs.

以上分析，是对有关平等权利之争的回答，也可以用来答复反对把人当作物及此类的观点。如果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他可能会发现自己被当成了某件物品。毫无疑问，一个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程度之高低的标准是人们愿意推己及人的程度。即使是在反社会的情势之下，人的社会性本能也会增长，以至于绝对控制人的行为，这可能就是人类的命运。但是，人的社会性本能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而且由于法律规则正是，或者应当是以人们普遍接受的道德为基础的，所以，任何建立在绝对大公无私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法规，其制定都可能会使得法律与有效的道德信仰之间出现裂痕。

If it be true, as I shall presently try to show, that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and civil liability are the same, it will follow from that alone that theory and fact agree in frequently punishing those who have been guilty of no moral wrong, and who could not be condemned by any standard that did not avowedly disregard the personal peculiarities of the individuals concerned. If punishment stood on the moral grounds which are proposed for it, the first thing to be considered would be those limitations in the capacity for choosing rightly which arise from abnormal instincts, want of education, lack of intelligence, and all the other defects which are most marked in the criminal classes. I do not say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or at least I do not need to for my argument. I do not say that the criminal law does more good than harm. I only say that it is not enacted or administered on that theory.

刑事与民事责任的一般性原理如果相同的话（我正要试图指出这一事实），那么仅由此即可得出：刑法会频繁地惩罚道德上没有任何

过错的、以及根据任何未公然无视所涉个人之个体特征的标准来说都不可能被归罪的那些人，在这一点上理论与实际是一致的。如果刑罚是立足于人们为之所提出的道德依据之上的话，那么，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即是人们正确选择能力的一些制约性因素，其可能包括反常的本能、教育的缺失、智慧的缺乏，以及所有其他在犯罪群体中表现最为明显的一些缺陷。我并不是说刑事与民事责任的一般性原理不应当相同，或者至少从我的论点出发，我没有必要这样说。我并不是说，刑法所带来的好处大于坏处。我只是说，刑法不是依据那套理论来制定与执行的。

There remains to be mentioned the affirmative argument in favor of the theory of retribution, to the effect that the fitness of punishment following wrong-doing is axiomatic, and is instinctively recognized by unperverted minds. I think that it will be seen, on self-inspection, that this feeling of fitness is absolute and unconditional only in the case of our neighbors. It does not seem to me that any one who has satisfied himself that an act of his was wrong, and that he will never do it again, would feel the least need or propriety, as between himself and an earthly punishing power alone, of his being made to suffer for what he had done, although, when third persons were introduced, he might, as a philosopher, admit the necessity of hurting him to frighten others. But when our neighbors do wrong, we sometimes feel the fitness of making them smart for it, whether they have repented or not. The feeling of fitness seems to me to be only vengeance in disguise, and I have already admitted that vengeance was an element, though not the chief element, of punishment.

接下来还要说一说赞成肯定报应论的观点，其大意是说，犯罪受罚的合理性是不证自明的，正常人都会本能地意识到这一点。我认

为，我们自我审视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合理性的感觉只有在我们邻居犯案的情况下，才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一个人如果犯了过错，就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因而就对自己很满意，当只涉及其本人及世俗的惩罚机构时，我认为他不会觉得让他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受罚具有哪怕只是最小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尽管当其他人介入时，他可能会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承认有必要惩罚自己以威慑他人。但是，当我们的邻居犯下过错时，我们有时会觉得让他们为此受罚是合理的，不论他们悔过与否。这种合理性的感觉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伪装的复仇而已，我已经指出，复仇乃是刑罚的一个因素，尽管并非其主要因素。

But, again, the supposed intuition of fitness does not seem to me to be coextensive with the thing to be accounted for. The lesser punishments are just as fit for the lesser crimes as the greater for the greater. The demand that crime should be followed by its punishment should therefore be equal and absolute in both. Again, a malum prohibitum is just as much a crime as a malum in se. If there is any general ground for punishment, it must apply to one case as much as to the other. But it will hardly be said that, if the wrong in the case just supposed consisted of a breach of the revenue laws, and the government had been indemnified for the loss, we should feel any internal necessity that a man who had thoroughly repented of his wrong should be punished for it, except on the ground that his act was known to others. If it was known, the law would have to verify its threats in order that others might believe and tremble. But if the fact was a secret between the sovereign and the subject, the sovereign, if wholly free from passion, would undoubtedly see that punishment in such a case was wholly without justification.

不过，我又要说，这种所谓合理性的直觉在我看来与下文要解释

的内容不是一回事。轻刑适用于轻罪，重刑适用于重罪。因此，犯罪即须受罚的要求，在罪与罚两方面必须是平等和绝对的。此外，法律所禁止的不法行为，与本质为恶的罪行，同为犯罪。如果存在任何刑罚的一般性原理，那么它就必然既能适用于这一起案件，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案件。但是，如果假设一起案件中的侵害行为违反了税法，而政府已经获得了损害赔偿，那就几乎不会说，我们觉得有任何内在的必要性要对这个已经为自己的侵害行为彻底悔悟的人进行惩罚，除非是基于要让其行为为他人所知晓这样的理由。而要这样做，法律就不得不证实其行为的风险性，以使他人相信并为之战栗。但是，如果这一事实是统治者和国民之间的一个秘密的话，那么，统治者在完全不受情感影响的情况下，无疑就会明白刑罚在此类情况下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can be no case in which the law-maker makes certain conduct criminal without his thereby showing a wish and purpose to prevent that conduct. Prevention would accordingly seem to be the chief and only universal purpose of punishment. The law threatens certain pains if you do certain things, intending thereby to give you a new motive for not doing them. If you persist in doing them, it has to inflict the pains in order that its threats may continue to be believed.

另一方面，任何情况下，立法者在将某种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的时候，都会借此表明某种预防这种犯罪行为的愿望和目的。因此，预防似乎是刑罚主要的以及唯一的一般性目的。如果你做了某些事情，法律威胁要予以某些惩罚，目的就是借此给你提供一个不去做这些事情的新动机。如果你还坚持要做的话，法律就不得不施以惩罚，以使人们还可以继续相信其威慑力。

If this is a true account of the law as it stands, the law does undoubtedly treat the individual as a means to an end, and uses him as a tool to increase the general welfare at his own expense. It has been suggested above, that this course is perfectly proper; but even if it is wrong, our criminal law follows it, and the theory of our criminal law must be shaped accordingly.

如果这是现有法律真实的写照，那么，法律毫无疑问确实是把个人作为实现目的的某种手段，是把个人当成某种工具，以其自身为代价来增进公共福利。上文已经表示，这一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即便是错误的，我们的刑法还是遵循了这一做法，我们还是必须据此来构造我们的刑法理论。

Further evidence that our law exceeds the limits of retribution, and subordinates consideration of the individual to that of the public well-being, will be found in some doctrines which cannot be satisfactorily explained on any other ground.

更多有关于我们的法律超出了报应论的范畴，使对于个人的考量从属于对于公共福利的考量的证据，可以在一些无法满意地予以其他解释的法律原则中找到。

The first of these is, that even the deliberate taking of life will not be punished when it is the only way of saving one's own. This principle is not so clearly established as that next to be mentioned; but it has the support of very great authority. [3_8] If that is the law, it must go on one of two grounds, either that self-preference is proper in the case supposed, or that, even if it is improper, the law

cannot prevent it by punishment, because a threat of death at some future time can never be a sufficiently powerful motive to make a man choose death now in order to avoid the threat. If the former ground is adopted, it admits that a single person may sacrifice another to himself, and a fortiori that a people may. If the latter view is taken, by abandoning punishment when it can no longer be expected to prevent an act, the law abandons the retributive and adopts the preventive theory.

其中第一个原则是，即使是有意取人性命也不会受到惩罚，如果这是挽救本人性命的唯一方法。这一原则不像下一个要提到的原则那样明确确立了下来，但却得到了一些非常有名的权威的支持。如果这就是法律，则须以如下两种理据之一为基础：或者自我偏爱在所假定的情况下是正当的；或者即使是不正当的，法律也无法通过刑罚防止自我偏爱的发生，因为发生在未来某一时间的死亡的威胁，绝不可能成为足够强大的动机，让一个人为了避免未来的死亡威胁而选择现在就死亡。如果采取前一种理据，那就是承认，一个人可以为了自己而牺牲另外一个人，一个民族就更不用说了。如果采取后一种观点，在人们不再指望刑罚能够阻止某种行为发生时而放弃刑罚，则法律就放弃了报应论，而接受了预防论。

The next doctrine leads to still clearer conclusions. Ignorance of the law is no excuse for breaking it. This substantive principle is sometimes put in the form of a rule of evidence, that every one is presumed to know the law. It has accordingly been defended by Austin and others, on the ground of difficulty of proof. If justice requires the fact to be ascertained, the difficulty of doing so is no ground for refusing to try. But every one must feel that ignorance of the law could never be admitted as an excuse, even if the fact could be proved by sight and hearing in every case. Furthermore, now

that parties can testify, it may be doubted whether a man's knowledge of the law is any harder to investigate than many questions which are gone into. The difficulty, such as it is, would be met by throwing the burden of proving ignorance on the lawbreaker.

由下一条原则可以得出更为明确的结论。对法律的无知绝不是违法的借口。这一实体性原则，即假定人人都知晓法律的原则，有时表现为证据规则的形式。奥斯丁等人据此主张废止这一原则，理由为举证困难。如果司法要求事实应予以查明的话，则难以查明事实绝不是拒绝举证的理由。但是，每一个人必定都会觉得，即使每一起案件中事实都能通过所见及所闻来予以证实，把对法律的无知作为违法的借口。此外，既然当事人能够对事实予以证实，那么，一个人对于法律的了解，是否就比其他要调查的问题更加难以查明，这或许是值得怀疑的。虽然如此，通过把举证不知晓法律的责任抛给违法者，难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The principle cannot be explained by saying that we are not only commanded to abstain from certain acts, but also to find out that we are commanded. For if there were such a second command,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guilt of failing to obey it would bear no proportion to that of disobeying the principal command if known, yet the failure to know would receive the same punishment as the failure to obey the principal law.

这表明我们不仅仅被命令要求戒绝某些行为，而且还要查明我们是被命令了，无法对这一原则予以解释。因为，如果还存在这第二条命令的话，那么很清楚，未能遵守该命令之过错，与知晓而依然违反主要命令的过错，就应该完全不一样，然而，由于对法律的无知所遭

受的惩罚将等同于未遵守主要法律所遭受的惩罚。

The true explanation of the rule is the same as that which accounts for the law's indifference to a man's particular temperament, faculties, and so forth. Public policy sacrifices the individual to the general good. It is desirable that the burden of all should be equal, but it is still more desirable to put an end to robbery and murder. It is no doubt true that there are many cases in which the criminal could not have known that he was breaking the law, but to admit the excuse at all would be to encourage ignorance where the law-maker has determined to make men know and obey, and justice to the individual is rightly outweighed by the larger interes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cales.

对于这一规则的正确解释，等同于针对法律不关心个人特有的性情、才能等这一原则的解释。公共政策为了普遍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我们希望每个人的责任平等，但我们更希望消灭抢劫与谋杀。毫无疑问，在很多案件中罪犯不可能已经知道自己正在做违法的事，但容许这一借口，就会从根本上鼓励人们对法律的无视，而立法者却决心使人们了解并遵守法律；针对个人的公平必将服从于天平另一端的更多人的利益。

If the foregoing arguments are sound, it is already manifest that liability to punishment cannot be finally and absolutely determined by considering the actual personal unworthiness of the criminal alone. That consideration will govern only so far as the public welfare permits or demands. And if we take into account the general result which the criminal law is intended to bring about, we shall see that the actual state of mind accompanying a criminal act

plays a different part from what is commonly supposed.

如果上述论证合理的话，那么，仅仅考量罪犯个人实际的罪行，不能最终并绝对决定是否予以惩罚，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这一考量只有在公共利益允许或要求的情况下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刑法意图达到的一般结果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犯罪行为伴随的实际心理状态所起的作用，有别于人们一般的看法。

For the most part, the purpose of the criminal law is only to induce external conformity to rule. All law is directed to conditions of things manifest to the senses. And whether it brings those conditions to pass immediately by the use of force, as when it protects a house from a mob by soldiers, or appropriates private property to public use, or hangs a man in pursuance of a judicial sentence, or whether it brings them about mediately through men's fears, its object is equally an external result. In directing itself against robbery or murder, for instance, its purpose is to put a stop to the actual physical taking and keeping of other men's goods, or the actual poisoning, shooting, stabbing, and otherwise putting to death of other men. If those things are not done, the law forbidding them is equally satisfied, whatever the motive.

大体上，刑法的目的仅在于实现外在的合法化。一切法律针对的都是明显可感知到的事物的状态。无论法律是运用武力使这些状态立即终止，比如由士兵保护房屋免受暴徒滋扰，或是为了公共用途而征用私有财产，或是根据某项司法裁决而绞死某个人，还是间接地借助人们的恐惧使这些状态终止，其目标同样都是某种外在的结果。例如，法律在针对抢劫或谋杀罪的时候，其目的在于终止对他人财物实际的武力掠夺与持有，或者终止导致他人死亡的实际的投毒、射杀、

刺杀及其他种种行为。不管动机如何，只要这些罪行未曾实施，则法律禁止它们的目的就同样达到了。

Considering this purely external purpose of the law together with the fact that it is ready to sacrifice the individual so far as necessary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at purpose, we can see more readily than before that the actual degree of personal guilt involved in any particular transgression cannot be the only element, if it is an element at all, in the liability incurred. So far from its being true, as is often assumed, that the condition of a man's heart or conscience ought to be more considered in determining criminal than civil liability, it might almost be said that it is the very opposite of truth. For civil liability, in its immediate working, is simply a redistribution of an existing loss between two individuals; and it will be argued in the next Lecture that sound policy lets losses lie where they fall, except where a special reason can be shown for interference. The most frequent of such reasons is, that the party who is charged has been to blame.

考虑到法律这种纯粹外在的目的，以及法律为实现这一目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牺牲个人利益这一事实，我们就能比以往更容易明白，任何具体的侵害行为所涉及的个人过失实际的轻重，不可能是责任确定的唯一因素，但它确实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与民事责任相比较，在确定刑事责任时，对人的良心或者道德心的情况通常认为应予以更多的考虑；这一看法不但不是事实，而且还几乎可以说，正好与事实相反。因为，民事责任，就其直接作用而言，仅仅就是在两个个体之间对现有损失重新进行分配；下一讲将指出，合理的政策是让损失范围保持不变，如能提出特殊理由进行干涉的情况除外。此类理由最常见的是，被指控方应被归责。

It is not intended to deny that criminal liability, as well as civil, is founded on blameworthiness. Such a denial would shock the moral sense of any civilized community; or, to put it another way, a law which punished conduct which would not be blameworthy in the average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would be too severe for that community to bear. It is only intended to point out that, when we are dealing with that part of the law which aims more directly than any other at establishing standards of conduct, we should expect there more than elsewhere to find that the tests of liability are external, and independent of the degree of evil in the particular person's motives or intentions. The conclusion follows directly from the nature of the standards to which conformity is required. These are not only external, as was shown above, but they are of general application. They do not merely require that every man should get as near as he can to the best conduct possible for him. They require him at his own peril to come up to a certain height. They take no account of incapacities, unless the weakness is so marked as to fall into well-known exceptions, such as infancy or madness. They assume that every man is as able as every other to behave as they command. If they fall on any one class harder than on another, it is on the weakest. For it is precisely to those who are most likely to err by temperament, ignorance, or folly, that the threats of the law are the most dangerous.

我的意图并不是要否认，刑事以及民事责任是建立在有过错基础之上的。否认这一点将会动摇任何文明社会的道德感；或者，换句话说，一部法律，如果对在一般社会成员看来都没有过错的行为予以了惩罚，则该法就太过于苛刻，社会将难以承受。我只想指出，如果法律的某一部分与其他部分相比较而言，目的更加直接地指向确定行为的标准，在我们讨论这一部分时，我们期望在这里最能够发现，责任判定的标准是外在的，与具体个人动机或者意图之恶的程度无关。分

析必须遵守的行为标准的性质即可直接得出这一结论。如上所述，这些标准不仅是外在的，而且还具有普适性。它们不仅要求每个人的行为都应尽可能地接近自己能够做到的最佳行为。它们还要求个人自行达到相当的高度。它们根本不考虑无行为能力的情况，除非这种情况非常明显，属于众所周知的例外情况，比如当事人未成年或患有疯癫等等。它们假定，每一个人与所有其他人一样，都有能力按照它们的命令行事。如果与其他群体相比较而言，它们对某一个群体显得更加苛刻的话，那么这个群体就属于最差的群体。因为正是针对那些最有可能由于性格、无知或者愚蠢而犯罪的人，法律的威慑力才是最大的。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doctrine that liability is founded on blameworthiness with the existence of liability where the party is not to blame, will be worked out more fully in the next Lecture. It is found in the conception of the average man, the man of ordinary intelligence and reasonable prudence. Liability is said to arise out of such conduct as would be blameworthy in him. But he is an ideal being, represented by the jury when they are appealed to, and his conduct is an external or objective standard when applied to any given individual. That individual may be morally without stain, because he has less than ordinary intelligence or prudence. But he is required to have those qualities at his peril. If he has them, he will not, as a general rule, incur liability without blameworthiness.

责任应以过错为基础，如何将这一原则与当事人无过错责任的存在统一起来，在下一讲中将进一步说明。在普通人，即具有一般智力以及理性审慎的人这一概念中可以找到这种统一。责任据说源于普通人应受谴责的那类行为。但普通人是一个理想的存在体，陪审团听诉时即由陪审团代表，在适用于任一特定的个人时，其行为就成为某种外在或客观的标准。那个人道德上可能没有污点，只是因为他比普通

人智力低下，或者不够审慎，才产生不当行为。但他必须具备一般智力及理性审慎的素质，否则就要自行承担风险。如果他具备这些素质，一般说来，只要没有什么过错，就不会招致法律责任。

The next step is to take up some crimes in detail, and to discover what analysis will teach with regard to them.

接下来就要详细讨论一些犯罪行为，并探索何种分析将在这些问题上会对我们有所教益。

I will begin with murder. Murder is defined by Sir James Stephen, in his Digest of Criminal Law, [3_9] as unlawful homicide with malice aforethought. In his earlier work, [3_10] he explained that malice meant wickedness, and that the law had determined what states of mind were wicked in the necessary degree. Without the same preliminary he continues in his Digest as follows:

我将从谋杀罪开始讨论。詹姆士·斯蒂芬爵士在其《刑法汇编》一书中将谋杀罪定义为带有恶意预谋的非法杀人行为。在其早期著作中，他解释说，恶意使指邪恶的意思，法律已经规定了什么样的心态为必要程度上的邪恶心态。同样也缺乏任何铺垫性的说明，他在其《刑法汇编》一书中继续写道：

“Malice aforethought means an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states of mind… “(a) An intention to cause the death of, or grievous bodily harm to, any person, whether such person is the person actually killed or not; “(b) Knowledge that the act which causes

death will probably cause the death of, or grievous bodily harm to, some person, whether such person is the person actually killed or not, although such knowledge is accompanied by indifference whether death or grievous bodily harm is caused or not, or by a wish that it may not be caused; “(c) An intent to commit any felony whatever; “(d) An intent to oppose by force any officer of justice on his way to, in, or returning from the execution of the duty of arresting, keeping in custody, or imprisoning any person whom he is lawfully entitled to arrest, keep in custody, or imprison, or the duty of keeping the peace or dispersing an unlawful assembly, provided that the offender has notice that the person killed is such an officer so employed.”

“恶意预谋意味着以下任何一种或多种心态……”“（a）欲致任何人死亡或者身体重伤的意图，而不论此人是否为实际被杀人员；“（b）明知致命之行为很可能会致某人死亡或者身体重伤，而不论此人是否为实际被杀人员，尽管此种知情可能伴随对是否造成痛苦的肉体伤害的冷漠态度（或并不希望造成这些伤害）；“（c）故意犯下任何一种重罪；“（d）故意以武力反抗任何要去执行、正在执行过程中、或执行完毕逮捕、拘押、或监禁任务的司法官员（该官员有依法逮捕、拘押或监禁依法治罪的人的权力）或者以武力反抗负有维持和平或解散非法聚会之任务的司法官员，条件是该罪犯已被告知此被杀人员系如此被雇佣之官员。”

Malice, as used in common speech, includes intent, and something more. When an act is said to be done with an intent to do harm, it is meant that a wish for the harm is the motive of the

act. Intent, however, is perfectly consistent with the harm being regretted as such, and being wished only as a means to something else. But when an act is said to be done maliciously, it is meant, not only that a wish for the harmful effect is the motive, but also that the harm is wished for its own sake, or, as Austin would say with more accuracy, for the sake of the pleasurable feeling which knowledge of the suffering caused by the act would excite. Now it is apparent from Sir James Stephen's enumeration, that of these two elements of malice the intent alone is material to murder. It is just as much murder to shoot a sentry for the purpose of releasing a friend, as to shoot him because you hate him. Malice, in the definition of murder, has not the same meaning as in common speech, and, in view of the considerations just mentioned, it has been thought to mean criminal intention. [3_11]

在一般用语中，恶意包含故意及更多的意义。当我们说某种行为带有故意伤害的意图时，其意思是说，意欲造成伤害是该行为的动机。然而，完全符合故意的伤害行为，人们会因此而后悔，人们也只是想把其作为达成另一件事情的一种手段。但是，当我们说一个行为是出于恶意而实施时，其意思不仅是说，意欲造成伤害是其动机，而且还意味着，目的就是为了造成伤害，或者，奥斯丁可能说的更准确一些，是为了得到明知该行为所导致的痛苦而可能激起的某种快感。现在，从詹姆士·斯蒂芬爵士的列举可以清楚地看到，恶意的这两个要素中，只有故意对于谋杀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为解救一位朋友而射杀一名哨兵，与你因为仇恨该哨兵而射杀他，同为谋杀罪。在谋杀的定义中，恶意与一般用语所说的意思不一样，鉴于上文所提及的分析，实际认为它指的是犯罪意图。

But intent again will be found to resolve itself into two things; foresight that certain consequences will follow from an act, and the

wish for those consequences working as a motive which induces the act. The question then is, whether intent, in its turn, cannot be reduced to a lower term. Sir James Stephen's statement shows that it can be, and that knowledge that the act will probably cause death, that is, foresight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act, is enough in murder as in tort.

但是，故意又可一分为二：对某一行为会产生的一定后果的预见；以及对这些后果的期望，期望乃是诱发该行为的动机。那么，问题就在于，故意反过来是否能分解为次一级的术语。詹姆士·史蒂芬爵士的论述表明这是可能的，明知该行为很有可能致人死亡，即对于该行为之后果的预见，就像侵权一样，足以构成谋杀。

For instance, a newly born child is laid naked out of doors, where it must perish as a matter of course. This is none the less murder, that the guilty party would have been very glad to have a stranger find the child and save it. [3_12]

例如，一个新生儿被赤身裸体地置于户外肯定会死亡。有罪一方可能会很高兴有陌生人发现了这个孩子并救了他一命，但这还属于谋杀。

But again, what is foresight of consequences? It is a picture of a future state of things called up by knowledge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ings, the future being viewed as standing to the present in the relation of effect to cause. Again, we must seek a reduction to lower terms. If the known present state of things is such that the act done will very certainly cause death, and the probability is a matter of

common knowledge, one who does the act, knowing the present state of things, is guilty of murder, and the law will not inquire whether he did actually foresee the consequences or not. The test of foresight is not what this very criminal foresaw, but what a man of reasonable prudence would have foreseen.

但是，对后果的预见又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对事物当前状态的了解而唤起的对于事物未来状态的一种想象，未来与现在之对立可被视为结果与原因之间的关系。同样，我们必须寻求如何将其分解为次一级的术语。如果知晓事物当前的状态是实施该行为必定会导致死亡，并且这种可能性是一种常识，那么，实施该行为的人，因为明知事物当前的状态，所以犯有谋杀罪，法律不会去探究他是否真正预见到其后果。判定预见的标准不是该罪犯本人的预见，而是一个具有合理之审慎的人的预见。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must be actual present knowledge of the present facts which make an act dangerous. The act is not enough by itself. An act, it is true, imports intention in a certain sense. It is a muscular contraction, and something more. A spasm is not an act. The contraction of the muscles must be willed. And as an adult who is master of himself foresees with mysterious accuracy the outward adjustment which will follow his inward effort, that adjustment may be said to be intended. But the intent necessarily accompanying the act ends there. Nothing would follow from the act except for the environment. All acts, taken apart from their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are indifferent to the law. For instance, to crook the forefinger with a certain force is the same act whether the trigger of a pistol is next to it or not. It is only the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of a pistol loaded and cocked, and of a human being in such relation to it, as to be manifestly likely to be hit, that make

the act a wrong. Hence, it is no sufficient foundation for liability, on any sound principle, that the proximate cause of loss was an act.

另一方面，当前必须实际了解使某一行为具有危险性的当前的事实。仅有行为本身还不够。某一行为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意图。行为是肌肉的收缩，但包括更多的含义。痉挛不是行为，肌肉的收缩必须受意志控制。就像一个能够控制自己的成年人一样，他以神奇的准确性预见到随其内心活动而出现的外部的调整，这种调整可以说是有意的调整。但是，必定相伴行为出现的故意也就到此为止。如果没有环境，从行为本身出发可能得不到任何结论。如果与相关情况隔离开来，一切行为对法律都不重要。例如，不管手枪上的扳机是否靠近食指，以一定的力量弯曲食指都是同一个行为。一把子弹已经上膛并拉开了扳机的手枪，并且有一个人与它存在显然可能会被射中这样的关系，只有这样的相关情况才会使该行为成为侵害行为。因此，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乃是某种行为，这样的说法根据任何合理性原则都绝不是确定责任的充分依据。

The reason for requiring an act is, that an act implies a choice, and that it is felt to be impolitic and unjust to make a man answerable for harm, unless he might have chosen otherwise. But the choice must be made with a chance of contemplating the consequence complained of, or else it has no bearing on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consequence. If this were not true, a man might be held answerable for everything which would not have happened but for his choice at some past time. For instance, for having in a fit fallen on a man, which he would not have done had he not chosen to come to the city where he was taken ill.

但行为又是必须的，其理由在于行为意味着某种选择，在于人们

认为让一个人对伤害负责是不恰当的以及不公平的，除非他本应该选择其他方式。但是，在做出选择时，必须有机会考虑被指控之行为的后果，否则，该选择对这一后果不负有任何责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个人可能得对所有因其在过去某个时间所做的选择而可能发生的事情负责。例如，要对一时撞到别人负责，如果他不选择到这个让他患病的城市的话，这件事就不会发生。

All foresight of the future, all choice with regard to any possible consequence of action, depends on what is known at the moment of choosing. An act cannot be wrong, even when done under circumstances in which it will be hurtful, unless those circumstances are or ought to be known. A fear of punishment for causing harm cannot work as a motive, unless the possibility of harm may be foreseen. So far, then, as criminal liability is founded upon wrong-doing in any sense, and so far as the threats and punishments of the law are intended to deter men from bringing about various harmful results, they must be confined to cases where circumstances making the conduct dangerous were known.

所有对于未来的预见，所有关于行动之可能后果的选择，都取决于在做出选择的那一刻所知晓的情况。一个行为，即使是在其将会有害的情况下实施的，也可能是正当的，除非行为人已经知晓情况、或者本应当知晓情况。如果伤害的可能性不可能被预见到，则害怕因造成伤害而受到惩罚就不可能作为一种动机。那么，只要刑事责任是基于任何意义上的不当行为，只要法律的威吓及刑罚意图在于阻止人们造成各种有害后果，人们所涉案件肯定就会局限于行为人对于使行为具有危险性的相关情况已经知晓的一些诉案中。

Still, in a more limited way,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knowledge that applies to foresight. It is enough that such circumstances were actually known as would have led a man of common understanding to infer from them the rest of the group making up the present state of things. For instance, if a workman on a house-top at mid-day knows that the space below him is a street in a great city, he knows facts from which a man of common understanding would infer that there were people passing below. He is therefore bound to draw that inference, or, in other words, is chargeable with knowledge of that fact also, whether he draws the inference or not. If then, he throws down a heavy beam into the street, he does an act which a person of ordinary prudence would foresee is likely to cause death, or grievous bodily harm, and he is dealt with as if he foresaw it, whether he does so in fact or not. If a death is caused by the act, he is guilty of murder. [3_13] But if the workman has reasonable cause to believe that the space below is a private yard from which every one is excluded, and which is used as a rubbish heap, his act is not blameworthy, and the homicide is a mere misadventure.

此外，适用于预测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知晓相关事实的情况，不过这种适用性比较有限。如果相关情况的确已为人所知晓，可以使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从中推断出构成当前事态其余的相关情况，这就足够了。例如，一个正午时分在屋顶工作的工人如果知道，他的下面是一座大城市的某条街道，则他所了解的事实就会使一个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推断出，下面会有人经过。因此，他有责任得出这一推论，或者换句话说，无论他是否得出了这一推论，他也会因知晓这一事实而被指控。那么，如果他把一根重梁往下扔到了街道上，则他所实施的行为，一个具有一般审慎的人都会预见到可能会致人死亡或身体上的重伤，因此，不论他事实上是否真的预见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假定他预见到了这一点而对他予以处理。如果其行为导致某人死亡，他就犯了谋杀罪。但是，如果该工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他的下面是一个任

何人都不准进入，并被用于堆放垃圾的私人院子，那么，他的行为就没有过错，其致人死亡只是一个意外事故而已。

To make an act which causes death murder, then, the actor ought, on principle, to know, or have notice of the facts which make the act dangerous. There are certain exceptions to this principle which will be stated presently, but they have less application to murder than to some smaller statutory crimes. The general rule prevails for the most part in murder.

要使某一致人死亡的行为成为谋杀罪行，行为人原则上则应当知晓，或者说已经注意到使该行为具有危险性的一些事实。这一原则有一些例外，后面将会予以说明，但这些例外不太适用于谋杀罪，而更适用于一些较轻的法定罪行。这条一般性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适用于谋杀罪的。

But furthermore, on the same principle, the danger which in fact exists under the known circumstances ought to be of a class which a man of reasonable prudence could foresee. Ignorance of a fact and inability to foresee a consequence have the same effect on blameworthiness. If a consequence cannot be foreseen, it cannot be avoided. But there is this practical difference, that whereas, in most cases, the question of knowledge is a question of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the defendant's consciousness, the question of what he might have foreseen is determined by the standard of the prudent man, that is, by general experience. For it is to be remembered that the object of the law is to prevent human life being endangered or taken; and that, although it so far considers blameworthiness in punishing as not to hold a man responsible for consequences which

no one, or only some exceptional specialist, could have foreseen, still the reason for this limitation is simply to make a rule which is not too hard for the average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As the purpose is to compel men to abstain from dangerous conduct, and not merely to restrain them from evil inclinations, the law requires them at their peril to know the teachings of common experience, just as it requires them to know the law. Subject to these explanations,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test of murder is the degree of danger to life attending the act under the known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3_14]

但此外，根据同一原则，已知情况下实际存在的危险应当属于具有合理审慎的人可能预见的一类危险。对事实的无知以及无法预见后果对于过错而言具有同等效果。如果不能预见后果，后果就不能避免。但是，这里存在着这一实际的差异，即大多数情况下，是否知晓相关情况这一问题即是被告实际意识状态的问题，而被告可能预见到什么这一问题却是根据审慎的人的标准制定的，也就是说，是根据一般经验而制定的。我们要记住，因为法律的目的是防止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或者人的生命被褫夺；尽管法律考虑对过错予以刑罚还没有到让一个人因为无人或者只是一些特别专家才能预见的后果负责任的地步，但对此进行限制，目的只为了所制定的法规对社会一般成员而言不至于太过苛刻。因为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迫使人们放弃危险行为，而不仅仅是要制止他们的邪恶倾向，法律要求人们必须自行了解一般经验教训，就像法律要求人们必须懂法一样。经过这些解释，我们可以说谋杀罪判定的标准就是在行为人已经知晓案件相关的情况之下，其行为所伴随的对生命危害的程度。

It needs no further explanation to show that, when the particular defendant does for any reason foresee what an ordinary man of reasonable prudence would not have foreseen, the ground of

exemption no longer applies. A harmful act is only excused on the ground that the party neither did foresee, nor could with proper care have foreseen harm.

当特定的被告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确实预见了一般具有合理谨慎的人可能没有预见到的东西时，则免责事由不再适用，这一点无需进一步解释。有害行为可被免责的唯一理由是当事人确实没有预见到危害，同时在适当谨慎的情况下，也无法预见到危害。

It would seem, at first sight, that the above analysis ought to exhaust the whole subject of murder. But it does not without some further explanation. If a man forcibly resists an officer lawfully making an arrest, and kills him, knowing him to be an officer, it may be murder, although no act is done which, but for his official function, would be criminal at all. So, if a man does an act with intent to commit a felony, and thereby accidentally kills another; for instance, if he fires at chickens, intending to steal them, and accidentally kills the owner, whom he does not see. Such a case as this last seems hardly to be reconcilable with the general principles which have been laid down. It has been argued somewhat as follows:—The only blameworthy act is firing at the chickens, knowing them to belong to another. It is neither more nor less so because an accident happens afterwards; and hitting a man, whose presence could not have been suspected, is an accident. The fact that the shooting is felonious does not make it any more likely to kill people. If the object of the rule is to prevent such accidents, it should make accidental killing with firearms murder, not accidental killing in the effort to steal; while, if its object is to prevent stealing, it would do better to hang one thief in every thousand by lot.

乍看上述分析似乎应该穷尽了整个有关谋杀罪的主题。但仍需进一步的解释。如果某人武力抗拒正在依法执行逮捕任务的警官，并在知晓这是位警官的情况下致其死亡，即使未实施任何刑事犯罪行为，但因为这位警官的职能，这都可能成为谋杀。如果某人实施某一行为是为了故意实施某一重罪，并因此碰巧致另一人死亡；比如，此人向鸡群开枪，意图偷鸡，并碰巧杀死了鸡的主人，因为他没有看见鸡的主人，这也是谋杀。这最后一种情况似乎很难与所规定的一般性原则相调和。人们多少会认为：此人唯一的过错在于明知鸡群属于他人，却向其开枪。情况正是如此，因为意外接着就发生了；击中了人是场意外，因为不可能察觉到有人在场。该开枪行为构成重罪，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其致人死亡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如果此规则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此类意外事故的发生，则应当是持枪致人意外死亡，而不是意图盗窃而致人意外死亡；但如果目的是为了阻止盗窃行为的发生，则通过拈阄的方式将每千名窃贼中的一名绞死，效果可能还要更好一些。

Still, the law is intelligible as it stands. The general test of murder is the degree of danger attending the acts under the known state of facts. If certain acts are regarded as peculiarly dangerous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a legislator may make them punishable if done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lthough the danger was not generally known. The law often takes this step, although it does not nowadays often inflict death in such cases. It sometimes goes even further, and requires a man to find out present facts, as well as to foresee future harm, at his peril, although they are not such as would necessarily be inferred from the facts known.

但是，法律就目前而言还是可以理解的。谋杀罪一般判定的标准是在事实知晓的情况下行为所伴随的对生命危害的程度。如果某些行为在一定情况下被认定为特别危险，即使其危险性一般人并不知晓，

立法者也可能会把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实施的行为归为应受惩处的行为。法律常常采取这种措施，尽管目前法律在此类情况下通常并不处以死刑。法律有时甚至会进一步要求人们必须自行查明当前的情况，以及对未来的危害进行预见，即使从已知事实中不见得一定能推出这样一些情况。

Thus it is a statutory offence in England to abduct a girl under sixteen from the possession of the person having lawful charge of her. If a man does acts which induce a girl under sixteen to leave her parents, he is not chargeable, if he had no reason to know that she was under the lawful charge of her parents, [3_15] and it may be presumed that he would not be, if he had reasonable cause to believe that she was a boy. But if he knowingly abducts a girl from her parents, he must find out her age at his peril. It is no defence that he had every reason to think her over sixteen. [3_16] So, under a prohibitory liquor law, it has been held that, if a man sells "Plantation Bitters," it is no defence that he does not know them to be intoxicating. [3_17] And there are other examples of the same kind.

因此，诱拐16岁以下的少女，使其离开其合法监护人的监护，在英格兰便是一种法定罪行。如果某人的确诱使一位16岁以下的少女离开其父母，但只要他根本不知道她处于其父母合法监护之下的事实，他就不应被指控，而且如果他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此少女是位男孩的话，我们就可以推定他不应被指控。但是，如果他故意诱拐一位姑娘脱离其父母，那他就必须自行查明其年龄。即使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她已经超过了16岁，也绝对无法为其开脱罪责。因此，根据某项禁酒法令，人们主张，如果某人售卖"庄园苦味酒"的话，他不知道其具有酒性是绝对无法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其中不乏其他一些同类型的例子。

Now, if experience shows, or is deemed by the law-maker to show, that somehow or other deaths which the evidence makes accidental happen disproportionately often in connection with other felonies, or with resistance to officers, or if on any other ground of policy it is deemed desirable to make special efforts for the prevention of such deaths, the lawmaker may consistently treat acts which, under the known circumstances, are felonious, or constitute resistance to officers, as having a sufficiently dangerous tendency to be put under a special ban. The law may, therefore, throw on the actor the peril, not only of the consequences foreseen by him, but also of consequences which, although not predicted by common experience, the legislator apprehends. I do not, however, mean to argue that the rules under discussion arose on the above reasoning, any more than that they are right, or would be generally applied in this country.

现在，如果经验表明，或者立法者认为经验表明，有这样或那样的证据证明为意外事故的死亡，往往多少都会与其他一些重罪、或与反抗警官的行为相关联；或者如果根据其他任何政策依据，认为最好要为预防这类死亡事故而采取特别措施的话，立法者可能就会始终把在知情情况下所犯下的重罪或反抗警官的一些行为当成具有足够危险性倾向的行为，要特别予以禁止。因此，法律可能让行为人自行承担风险，不仅仅包括其所预见的后果的风险，还包括那些尽管根据一般经验没有预见到、但立法者所理解的后果的风险。但是，我并不是说，这里所讨论的规则是因上述推理而产生的，而不是因为规则的正确性而产生的，也不是因为这些规则在这个国家可能普遍适用而产生的。

Returning to the main line of thought it will be instructive to

consider the relation of manslaughter to murder. On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will be found to lie in the degree of danger attaching to the act in the given state of facts. If a man strikes another with a small stick which is not likely to kill, and which he has no reason to suppose will do more than slight bodily harm, but which does kill the other, he commits manslaughter, not murder. [3_18] But if the blow is struck as hard as possible with an iron bar an inch thick, it is murder. [3_19] So if, at the time of striking with a switch, the party knows an additional fact, by reason of which he foresees that death will be the consequence of a slight blow, as, for instance, that the other has heart disease, the offence is equally murder. [3_20] To explode a barrel of gunpowder in a crowded street, and kill people, is murder, although the actor hopes that no such harm will be done. [3_21] But to kill a man by careless riding in the same street would commonly be manslaughter. [3_22] Perhaps, however, a case could be put where the riding was so manifestly dangerous that it would be murder.

回到本文的主线，考察一下误杀罪与谋杀罪之间的关系将很具有启发性。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一大区别在于一定事实情况下与行为所附带的危险程度不同。如果某人持一根小棒打另一人，这根棒子不太可能致人死亡，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根棒子只会产生轻微的身体伤害，但他确实致他人死亡了，那么他犯的就是误杀罪，而不是谋杀罪。但是，如果他持一根一英寸粗的铁棍，用尽全力猛击了一下，这即为谋杀罪。因此，如果在持小棒打人的时候，当事方还知道另外一个事实，并据此预见到轻轻一击也会致人死亡的后果，比如，被打一方有心脏病，那么这种行为也同样构成谋杀罪。在拥挤的大街上引爆一桶炸药，炸死了人，即构成谋杀罪，尽管行为人并不希望造成如此危害。但在同一条大街上，因为不小心驾驶而致他人死亡，则可能一般构成误杀罪。但是，假设驾驶动作明显很危险，则可能构成谋杀罪。

To recur to an example which has been used already for another purpose: “When a workman flings down a stone or piece of timber into the street, and kills a man; this may be either misadventure, manslaughter, or murder,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original act was done: if it were in a country village, where few passengers are, and he calls out to all people to have a care, it is misadventure only; but if it were in London, or other populous town,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ally passing, it is manslaughter, though he gives loud warning; and murder, if he knows of their passing, and gives no warning at all.“ [3_23]

再回到之前作为他用的一个例子：“如果某个工人朝街上扔了一块石头或木头，砸死了人，这可能构成意外事故、误杀罪或谋杀罪，取决于其原始行为实施时的相关情况：如果这是发生在某个村庄，几乎没有什么人路过，并且他大声提醒过所有的人要小心，这就只构成意外事故；但是，如果这是发生在伦敦，或者其他人口稠密的城镇，路上不断有行人通过，这就构成误杀罪，即便他大声警告过；如果他明知有人路过，并且根本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声，这就构成谋杀罪。”

The law of manslaughter contains another doctrine which should be referred to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riminal law. This doctrine is, that provocation may reduce an offence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murder to manslaughter. According to current morality, a man is not so much to blame for an act done under the disturbance of great excitement, caused by a wrong done to himself, as when he is calm. The law is made to govern men through their motives, and it must, therefore, take their mental constitution into account.

有关误杀罪的法律还包含另外一条原则；为全面理解刑法的一般性原则，有必要提到该原则。这一原则是，行为人如因受到挑衅，可使原本构成谋杀罪的侵权行为减轻为误杀罪。根据当前的道德观念，一个人因为受到侵害，情绪非常激动，在此情绪失调之下所实施的行为，与其在冷静时实施的行为相比较，后者更应被谴责。制定法律是为了通过影响人们的动机来治理人，法律因此必须对人们的心理素质予以考虑。

It might be urged, on the other side, that, if the object of punishment is prevention, the heaviest punishment should be threatened where the strongest motive is needed to restrain; and primitive legislation seems sometimes to have gone on that principle. But if any threat will restrain a man in a passion, a threat of less than death will be sufficient, and therefore the extreme penalty has been thought excessive.

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惩罚的目的在于预防，那么，在需要对最强烈的动机进行制止的情况下，就应当采取最严厉的刑罚进行威慑；早期法似乎有时以此为依据。但是，如果有任何威慑会制止住一个盛怒中的人的话，那么，比死刑轻一些的威慑就足够了，因此极刑被认为太过于严厉。

At the same time the objective nature of legal standards is shown even here. The mitigation does not come from the fact that the defendant was beside himself with rage. It is not enough that he had grounds which would have had the same effect on every man of his standing and education. The most insulting words are not provocation, although to this day, and still more when the law was

established, many people would rather die than suffer them without action. There must be provocation sufficient to justify the passion, and the law decides on general considerations what provocations are sufficient.

同时，此处甚至也体现了法律标准的客观性。减轻刑罚，不采取极刑并非是因为被告人被气得发狂这一事实。他所持有的理由对于每个与其地位及教养相当的人可能都会产生相同的影响，这样的理由并不充分。最具侮辱性的话语并不构成挑衅，尽管时至今日已制定了成文的法律，但许多人还是宁死也不愿意忍气吞声而不采取任何行动。必须要有极大的挑衅才能证明这种盛怒的正当性，法律只在一般意义上决定何种挑衅称得上是足够大。

It is said that even what the law admits to be “provocation does not extenuate the guilt of homicide, unless the person provoked is at the time when he does the deed deprived of the power of self-control by the provocation which he has received.“ [3_24] There are obvious reasons for taking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defendant's consciousness into account to this extent. The only ground for not applying the general rule is, that the defendant was in such a state that he could not be expected to remember or be influenced by the fear of punishment; if he could be, the ground of exception disappears. Yet even here, rightly or wrongly, the law has gone far in the direction of adopting external tests. The courts seem to have decided between murder and manslaughter on such grounds as the nature of the weapon used, [3_25] or the length of time between the provocation and the act. [3_26] But in other cases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prisoner was deprived of self-control by passion has been left to the jury. [3_27]

有人说，即使法律承认为挑衅，但“受到挑衅不会减轻杀人犯的罪过，除非被挑衅者在其实施杀人行为时，因为其所遭受的挑衅而丧失了自我控制能力”。我们有显而易见的理由在这个程度上对被告人意识的实际状况予以考虑。不适用一般性原则的唯一依据是，被告人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之下，我们不能指望他还能牢记对刑罚的恐惧或受其影响；如果他还能受其影响，则免责的依据也就消失了。但即使是这里，无论对错，法律还是朝着采用外在标准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法庭在谋杀罪与误杀罪之间进行判决，依据的似乎是诸如所使用武器的性质，或者受到挑衅与犯罪行为之间的时间间隔等证据。但在其他一些案例中，犯人是否因为激动而丧失了自我控制这一问题则留给陪审团来处理。

As the object of this Lecture is not to give an outline of the criminal law, but to explain its general theory, I shall only consider such offences as throw some special light upon the subject, and shall treat of those in such order as seems best fitted for that purpose. It will now be useful to take up malicious mischief, and to compare the malice required to constitute that offence with the malice aforethought of murder.

由于本讲的目的并非是对刑法进行概述，而是解释刑法的一般性理论，因此我将只考虑对这一主题具有特殊启发性的一些犯罪行为，并将以似乎最符合这一目的的顺序对其进行论述。现在，有必要讨论一下蓄意损毁罪，并将构成这类犯罪的恶意与谋杀罪的恶意预谋进行比较。

The charge of malice aforethought in an indictment for murder has been shown not to mean a state of the defendant's mind, as is often thought, except in the sense that he knew circumstances

which did in fact make his conduct dangerous. It is, in truth, an allegation like that of negligence, which asserts that the party accused did not come up to the legal standard of action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he found himself, and also that there was no exceptional fact or excuse present which took the case out of the general rule. It is an averment of a conclusion of law which is permitted to abridge the fac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on which it is founded.

谋杀罪起诉书中所控的恶意预谋，现已表明指的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被告人的心理状态，除非指的是被告人对于确实会使其行为具有危险性的相关情况已经知晓。这一指控事实上类似于对过失罪的指控，过失罪认定被指控的当事人没有达到其所处相关情况下法律规定之行为标准，且没有任何使案件不适用于一般性规则的异常事实或理由出现。这一指控强调允许某一法律结论简化事实依据（正反两方面）。

When a statute punishes the “wilfully and maliciously” injuring another's property, it is arguable, if not clear, that something more is meant. The presumption that the second word was not added without some meaning is seconded by the unreasonableness of making every wilful trespass criminal. [3_28] If this reasoning prevails, maliciously is here used in its popular sense, and imports that the motive for the defendant's act was a wish to harm the owner of the property, or the thing itself, if living, as an end, and for the sake of the harm. Malice in this sense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malice of murder.

当一部制定法对“故意地和恶意地”侵害他人财产的行为予以惩罚

时，即使不能清楚地认为这两个词包含更多的意思，但也有一定可能性。第二个词如果不含有某些意义，就不会被加上，这一推论得到了如下观点的附议：将每一种故意实施的侵害行为都定为刑事犯罪不具有合理性。如果这一推论成立，则这里的“恶意地”一词就是其通常意义上的用法，意思是，被告人之行为的动机乃是意图危害财产所有人、或者其财产本身（如果该财产为有生命物的话），并以此为目的，而且目的就是为了造成危害。这个意义上的恶意与谋杀罪中的恶意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Statutory law need not profess to be consistent with itself, or with the theory adopted by judicial decisions. Hence there is strictly no need to reconcile such a statute with the principles which have been explained. But there is no inconsistency. Although punishment must be confined to compelling external conformity to a rule of conduct, so far that it can always be avoided by avoiding or doing certain acts as required, with whatever intent or for whatever motive, still the prohibited conduct may not be hurtful unless it is accompanied by a particular state of feeling.

制定法不必自称能内部保持一致，或与司法裁决所采用的理论保持一致。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使这种制定法与我们前面解释过的原则相一致。但是，其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之处。尽管刑罚肯定只限于实现外在的行为合法化，以至于人们总是可以通过回避或者实施某些规定的行为——不管具有何种意图或出于何种动机——来避免遭受刑罚，但是被禁止的行为却可能不具有伤害性，除非该行为伴随某种特殊的情感状态。

Common disputes about property are satisfactorily settled by compensation. But every one knows that sometimes secret harm is

done by neighbor to neighbor out of pure malice and spite. The damage can be paid for, but the malignity calls for revenge, and the difficulty of detecting the authors of such wrongs, which are always done secretly, affords a ground for punishment, even if revenge is thought insufficient.

有关财产的一般性争议可以通过赔偿令人满意地解决。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有时候对邻居暗中进行伤害，是出于纯粹的恶意与怨恨。损失可以获得赔偿，但这种恶意需要予以惩罚，同时难以查明作恶者是谁，因为这类坏事总是偷偷干的，就足以成为惩罚的理由，即使是惩罚人们都还认为不够。

How far the law will go in this direction it is hard to say. The crime of arson is defined to be the malicious and wilful burning of the house of another man, and is generally discussed in close connection with malicious mischief. It has been thought that the burning was not malicious where a prisoner set fire to his prison, not from a desire to consume the building, but solely to effect his escape. But it seems to be the better opinion that this is arson, [3_29] in which case an intentional burning is malicious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rule. When we remember that arson was the subject of one of the old appeals which take us far back into the early law, [3_30] we may readily understand that only intentional burnings were redressed in that way. [3_31] The appeal of arson was brother to the appeal de pace et plagis. As the latter was founded on a warlike assault, the former supposed a house-firing for robbery or revenge, [3_32] such as that by which Njal perished in the Icelandic Saga. But this crime seems to have had the same history as others. As soon as intent is admitted to be sufficient, the law is on the high-road to an external standard. A man who intentionally sets fire to his own

house, which is so near to other houses that the fire will manifestly endanger them, is guilty of arson if one of the other houses is burned in consequence. [3_33] In this case, an act which would not have been arson, taking only its immediate consequences into account, becomes arson by reason of more remote consequences which were manifestly likely to follow, whether they were actually intended or not. If that may be the effect of setting fire to things which a man has a right to burn, so far as they alone are concerned, why, on principle, should it not be the effect of any other act which is equally likely under the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to cause the same harm. [3_34] Cases may easily be imagined where firing a gun, or making a chemical mixture, or piling up oiled rags, or twenty other things, might be manifestly dangerous in the highest degree and actually lead to a conflagration. If, in such cases, the crime is hel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an external standard is reached, and the analysis which has been made of murder applies here.

法律沿着这一方向还可以走多远，这不太好说。放火罪被定义为恶意地和故意地烧毁他人房屋，一般认为与蓄意毁损罪密切相关。有人认为，当囚犯放火烧毁其牢房时，不是想要烧毁建筑物，而只是想达到逃跑的目的，因而，其纵火为非恶意行为。但这一观点似乎要更好一些：这属于放火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故意纵火按规定属于恶意行为。如果我们还记得，在早期法古老的上诉中，放火罪是其中的一个指控对象，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明白，只有故意纵火以那种方式予以赔偿。纵火之诉是扰乱治安并造成伤害之诉的兄弟。后者基于类似于战争的武力攻击行为；前者想要烧毁房屋则是为了抢劫或者复仇，例如《冰岛传奇》中的尼亚就是因此被烧死的。但这种犯罪活动与其他犯罪活动似乎拥有相同的历史。一旦承认故意就足够了，法律就迅速地走向了某种外在的标准。一个人如故意放火烧自己的房屋，因为其房屋离他人房屋非常近，放火显然会危及他人房屋，则结果只要其中有一间房屋被烧毁，此人就犯有放火罪。在这起案件中，如果只考

虑其直接后果，原本并不构成放火罪的行为，但由于其显然可能会产生的不太直接的后果，则不管是否事实上意图造成这样的后果，该行为即构成放火罪。如果这就是纵火烧毁某人有权烧毁的东西的后果，只要不涉及烧毁其他东西，那么，按道理为什么这不是任何其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呢？在相关情况下，其他行为同样可能造成相同的危害。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这样一些情况，开枪射击，或者制造化学混合剂，或者堆放破油布，以及许多其他事情，危险性显然都极高，事实上会导致火灾。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如果认为罪行已经犯下了，达到了某一个外在的标准，则我们对谋杀罪的分析在此就能适用。

There is another class of cases in which intent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for quite different reasons from those which have been offered to account for the law of malicious mischief. The most obvious examples of this class are criminal attempts. Attempt and intent, of course, are two distinct things. Intent to commit a crime is not itself criminal. There is no law against a man's intending to commit a murder the day after tomorrow. The law only deals with conduct. An attempt is an overt act. It differs from the attempted crime in this, that the act has failed to bring about the result which would have given it the character of the principal crime. If an attempt to murder results in death within a year and a day, it is murder. If an attempt to steal results in carrying off the owner's goods, it is larceny.

还有一类情况，其中意图起着非常重要作用，其原因与解释蓄意损毁罪的原因有很大不同。这类情况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犯罪未遂。当然，未遂和意图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实施犯罪的意图本身并没有罪。没有任何法律针对的是某人打算在后天实施一项谋杀。法律只涉及行为。未遂是一种公开的行为。该行为与所企图的犯罪行为之间的区别在于，该行为还未产生赋予其主要犯罪性质的结果。如果谋杀的

企图在一年或一天内最终导致了致人死亡的结果，即构成谋杀罪。如果盗窃的企图导致的结果是拿走了所有人的财物，即构成偷盗罪。

If an act is done of which the natural and probable effe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s the accomplishment of a substantive crime, the criminal law, while it may properly enough moderate the severity of punishment if the act has not that effect in the particular case, can hardly abstain altogether from punishing it, on any theory.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an actual intent is all that can give the act a criminal character in such instances. [3_35] But if the views which I have advanced as to murder and manslaughter are sound, the same principles ought logically to determine the criminality of acts in general. Acts should be judged by their tendency under the known circumstances, not by the actual intent which accompanies them.

如果实施了某一项行为，而在相关情况下，其自然的、极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构成实质性犯罪，则根据任何理论，刑法都不可能完全放弃对该行为进行惩罚，尽管某些具体情况下该行为如果没有产生那种结果，刑法可能会适当减轻惩罚的力度。有人认为，在这样一些情况下，某一真实的意图完全可以赋予该行为以犯罪的性质。但是，如果我就谋杀罪和误杀罪所提出的观点是合理的话，那么，从逻辑上而言，根据同样的原则大体上应当可以确定行为是否有罪。我们应当根据在已知相关情况下行为的倾向性来对行为进行判决，而不是根据其所伴随的真实意图来进行判决。

It may be true that in the region of attempts, as elsewhere, the law began with cases of actual intent, as those cases are the most obvious ones. But it cannot stop with them, unless it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the etymological meaning of the word attempt than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punishment. Accordingly there is at least color of authority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an act is punishable as an attempt, if, supposing it to have produced its natural and probable effect, it would have amounted to a substantive crime. [3_36]

实际上，在犯罪未遂这一领域，与别处一样，法律是从真实意图的情况出发的，因为这些情况最显而易见，但法律不能仅止于此，除非它赋予未遂一词的语源意义以更大的重要性，超过了刑罚的一般性原理。因此，这一主张至少带有某种权威的色彩：某一行为作为未遂行为而言是应当予以惩罚的，如果假设该行为已产生了自然的、可能的后果，那么该行为就已构成为实体性犯罪。

But such acts are not the only punishable attempts. There is another class in which actual intent is clearly necessary, and the existence of this class as well as the name (attempt) no doubt tends to affect the whole doctrine. Some acts may be attempts or misdemeanors which could not have effected the crime unless followed by other acts on the part of the wrong-doer. For instance, lighting a match with intent to set fire to a haystack has been held to amount to a criminal attempt to burn it, although the defendant blew out the match on seeing that he was watched. [3_37] So the purchase of dies for making counterfeit coin is a misdemeanor, although of course the coin would not be counterfeited unless the dies were used. [3_38]

但这样一些行为不是唯一应当予以惩罚的未遂行为。还有另外一类行为，其中真实的意图显然是必要条件，这一类行为及其名称（未遂）之存在本身无疑可能会对整个理论有所影响。有些行为可能属于

未遂罪或者轻罪，这些行为除非犯罪一方随后实施了其他行为，否则不可能产生犯罪的后果。例如，划亮一根火柴，意图点燃一堆干草，被认为构成了点燃干草堆未遂罪，尽管被告人发现有人看到他时吹灭了火柴。因此，为制造假币而购买模具就属于一项轻罪，尽管如果不使用模具当然就造不出假币来。

In such cases the law goes on a new principle, different from that governing most substantive crimes. The reason for punishing any act must generally be to prevent some harm which is foreseen as likely to follow that 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it is done. In most substantive crimes the ground on which that likelihood stands is the common working of natural causes as shown by experience. But when an act is punished the natural effect of which is not harmful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ground alone will not suffice. The probability does not exist unless there are grounds for expecting that the act done will be followed by other acts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its effect will be harmful, although not so otherwise. But as in fact no such acts have followed, it cannot, in general, be assumed, from the mere doing of what has been done, that they would have followed if the actor had not been interrupted. They would not have followed it unless the actor had chosen, and the only way generally available to show that he would have chosen to do them is by showing that he intended to do them when he did what he did. The accompanying intent in that case renders the otherwise innocent act harmful, because it raises a probability that it will be followed by such other acts and events as will all together result in harm.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nt is not to show that the act was wicked, but to show that it was likely to be followed by hurtful consequences.

在这样一些情况下，法律提出了一项新原则，其有别于规制大多数实质性犯罪的原则。一般而言，对某一行为予以惩罚的理由必定是为了防止某种危害的产生，这一行为在被实施的情况下，预计可能会产生危害。在大多数实质性犯罪中，这种行为危害可能性的依据为自然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经验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惩罚某一行为，而在相关情况下，该行为的自然结果不具有危害性，那么仅靠这一理据是不充分的。除非有理由预计到所实施的行为将会伴随以其他行为，这些行为不结合起来不会造成危害，但结合起来结果就会造成危害，否则就不会存在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但是，因为事实上随后并没实施任何这样一些行为，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根据单单实施了行为，就认为如果行为人不被打断，这些行为随后就可能被实施。除非行为人作出了选择，否则这些行为就不会随后被实施，而唯一可用于证明他会选择实施那些行为的办法就是要证明该行为人在实施其行为时是否为故意所为。这种情况下伴随出现的故意使得否则可能无罪的行为演绎成为有害行为，因为故意使得随后出现其他一些合起来会造成危害的行为与事件的可能性提高。故意的重要性不在于指出，该行为是出于恶意，而在于指出，其有可能产生伤害性后果。

It will be readily seen that there are limits to this kind of liability. The law does not punish every act which is done with the intent to bring about a crime. If a man starts from Boston to Cambridge for the purpose of committing a murder when he gets there, but is stopped by the draw and goes home, he is no more punishable than if he had sat in his chair and resolved to shoot somebody, but on second thoughts had given up the notion. On the other hand, a slave who ran after a white woman, but desisted before he caught her, has been convicted of an attempt to commit rape. [3_39] We have seen what amounts to an attempt to burn a haystack; but it was said in the same case, that, if the defendant had gone no further than to buy a box of matches for the purpose, he

would not have been liable.

显而易见，这类责任存在着一些限制。法律并不会对每一个意图造成犯罪而实施的行为进行惩治。如果某人从波士顿出发去坎布里奇，准备到那儿之后实施一起谋杀，但却被抽彩活动所阻止，并回了家，这与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决定射杀某人，但经再三考虑之后放弃了此念头一样，都不应受到惩罚。另一方面，一名奴隶尾随一位白人妇女之后，尽管在他抓住她之前就住了手，却仍被裁定为强奸未遂罪。我们已经看到，什么构成了点燃干草堆未遂罪；但在同样的案件中，有人说，如果被告为此目的只买了一盒火柴，并未做什么其他事情，那么他就不负有法律责任。

Eminent judges have been puzzled where to draw the line, or even to state the principle on which it should be drawn, between the two sets of cases. But the principle is believed to be similar to that on which all other lines are drawn by the law. Public policy, that is to say, legislative considerations, are at the bottom of the matter; the considerations being, in this case, the nearness of the danger, the greatness of the harm, and the degree of apprehension felt. When a man buys matches to fire a haystack, or starts on a journey meaning to murder at the end of it, there is still a considerable chance that he will change his mind before he comes to the point. But when he has struck the match, or cocked and aimed the pistol, there is very little chance that he will not persist to the end, and the danger becomes so great that the law steps in. With an object which could not be used innocently, the point of intervention might be put further back, as in the case of the purchase of a die for coining.

在哪里划出这两类情况之间的界限，或者甚至阐明应据此划出界限的原则，这些都曾困扰过著名的法官们。但这一原则被认为与法律划分所有其他界线时所遵循的原则类似。归根到底取决于公共政策，也就是说，立法方面的考量；在这种情况下的考量事项包括危险的紧迫程度，造成的危害的程度，以及人们所感受到的恐惧的程度。如果某人购买了火柴，想要点燃干草堆，或者开始了一场旅行，计划在旅行终点实施谋杀，那么，在最终走向犯罪之前，他仍然有相当大的机会可能改变其想法。但是，如果他已经擦燃了火柴，或者已经拉开了扳机并瞄准了手枪，那么，他终止其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几乎没有了，危险性如此之大，法律于是介入。如果某件物品不可能用于正当的目的，那么，法律介入的时间点就可进一步往前推，就像购买制造假币的模具的案例一样。

The degree of apprehension may affect the decision, as well as the degree of probability that the crime will be accomplished. No doubt the fears peculiar to a slaveowning community had their share in the conviction which has just been mentioned.

除了犯罪既遂的可能性之外，人们感受到的恐惧的程度也可能会影响判决。蓄奴社会所特有的恐惧感，无疑是影响刚才所提到的裁决的一个因素。

There is one doubtful point which should not be passed over. It has been thought that to shoot at a block of wood thinking it to be a man is not an attempt to murder, [3_40] and that to put a hand into an empty pocket, intending to pick it, is not an attempt to commit larceny, although on the latter question there is a difference of opinion. [3_41] The reason given is, that an act which could not have effected the crime if the actor had been allowed to follow it up to

all results to which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it could have led, cannot be an attempt to commit that crime when interrupted. At some point or other, of course, the law must adopt this conclusion, unless it goes on the theory of retribution for guilt, and not of prevention of harm.

还有一个疑点不应被忽视。有人认为，把一块木头当成一个人进行射击，不构成谋杀未遂罪，而把手伸进一只空口袋意图偷窃，也不构成盗窃未遂罪，尽管在后一个问题上观点有分歧。对此所给出的理由是，如果行为人被允许继续实施某一行为，直到得到该行为自然可能会产生的一切结果，而该行为不可能形成犯罪结果，那么，如果该行为被打断，就不可能构成犯罪未遂。当然，在某个时候，法律必须采取这一结论，除非法律是以报应论为基础，而不是以预防论为基础。

But even to prevent harm effectually it will not do to be too exact. I do not suppose that firing a pistol at a man with intent to kill him is any the less an attempt to murder because the bullet misses its aim. Yet there the act has produced the whole effect possible to it in the course of nature. It is just as impossible that that bullet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should hit that man, as to pick an empty pocket. But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saying that such an ac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is so dangerous, so far as the possibility of human foresight is concerned, that it should be punished. No one can absolutely know, though many would be pretty sure, exactly where the bullet will strike; and if the harm is done, it is a very great harm. If a man fires at a block, no harm can possibly ensue, and no theft can be committed in an empty pocket, besides that the harm of successful theft is less than that of murder. Yet it might be said that even such things as these should be

punished, in order to make discouragement broad enough and easy to understand.

但是，即使是为了有效防范伤害，太过精确也不行。我并不是说，带着杀人的意图朝某人开了一枪，因为子弹偏离了其目标，就不构成谋杀未遂罪。但这里，该行为已经造成的后果，为自然可能造成的全部后果。这颗子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打中那个人，就跟手伸进了一只空口袋一样。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只要危险性可被人预见，就应当对其进行惩罚。任何人都不可能绝对精确地知道子弹会打在哪个地方，尽管很多人可能很有把握；而如果造成危害，那就是非常严重的危害。如果某人朝着一块木板开枪，可能不会造成任何危害，而在一只空口袋中也不可能实施偷盗，除此之外，成功盗窃所造成的危害也比谋杀造成的危害小。但是，有人可能会说，为了使劝阻效果足够明显，并容易为人理解，即使这样的一些事情也应当予以惩罚。

There remain to be considered certain substantive crimes, which differ in very important ways from murder and the like, and for the explanation of which the foregoing analysis of intent in criminal attempts and analogous misdemeanors will be found of service.

还有某些实质性犯罪需要加以分析，从很重要的方面来看，这些犯罪有别于谋杀罪之类的罪行，为了对这些犯罪进行解释，前面对于犯罪未遂以及与其可相提并论的轻罪中的故意的分析，将会有所帮助。

The type of these is larceny. Under this name acts are punished

which of themselves would not be sufficient to accomplish the evil which the law seeks to prevent, and which are treated as equally criminal, whether the evil has been accomplished or not. Murder, manslaughter, and arson, on the other hand, are not committed unless the evil is accomplished, and they all consist of acts the tendency of which under the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is to hurt or destroy person or property by the mere working of natural laws.

这类犯罪就是偷盗罪。盗窃行为以盗窃罪论处，这些行为本身并不足以构成法律所寻求防范的恶行，但也同样被视为刑事犯罪，而不管该恶行是否完成。另一方面，除非恶行既遂，否则就算不上犯了谋杀罪、误杀罪以及纵火罪，构成这些罪行的行为，在相关情况之下，单纯根据自然规律，有伤害或摧毁人员或财产的倾向性。

In larceny the consequences immediately flowing from the act are generally exhausted with little or no harm to the owner. Goods are removed from his possession by trespass, and that is all, when the crime is complete. But they must be permanently kept from him before the harm is done which the law seeks to prevent. A momentary loss of possession is not what has been guarded against with such severe penalties. What the law means to prevent is the loss of it wholly and forever, as i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it is not larceny to take for a temporary use without intending to deprive the owner of his property. If then the law punishes the mere act of taking, it punishes an act which will not of itself produce the evil effect sought to be prevented, and punishes it before that effect has in any way come to pass.

在偷盗罪中，由盗窃行为直接产生的后果一般对于财物所有人几

乎不产生任何危害。如果盗窃罪既遂，则财物通过非法侵占的手段不再为所有人所有，仅此而已。但是，在法律所试图防范的危害发生之前，财物必须是永久性地不再为所有人所有。这样严厉的惩罚针对的不是暂时丧失所占有的物品。法律所要防范的乃是完全地、永久性地丧失所占有的物品，因为暂时拿来用一下而无意剥夺所有者的所有权，并不构成偷盗罪。如果法律要对这种单纯拿走的行为进行惩罚，那么，其所惩罚的这种行为本身不可能造成法律所试图防范的有害后果，并且是在有害后果最终发生之前对此进行的惩罚。

The reason is plain enough. The law cannot wait until the property has been used up or destroyed in other hands than the owner's, or until the owner has die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harm which it seeks to prevent has been done.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it cannot confine itself to acts likely to do that harm. For the harm of permanent loss of property will not follow from the act of taking, but only from the series of acts which constitute removing and keeping the property after it has been taken. After these preliminaries, the bearing of intent upon the crime is easily seen.

其中原因非常简单。法律不可能等到财产被所有者之外的某个人用尽或毁坏，或者等到财产所有人死亡，才能肯定已经造成了其所试图防范的危害。同理，盗窃罪不可能将自己仅局限于可能会造成这种危害的行为。因为，永久性丧失财产这种危害，不是由拿走这一行为产生，而是由一系列行为产生，包括转移财产以及转移之后保留该财产。经过这些初步分析之后，意图对于定罪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

According to Mr. Bishop, larceny is “the taking and removing, by trespass, of personal property which the trespasser knows to belong either generally or specially to another, with the intent to

deprive such owner of his ownership therein; and perhaps it should be added, for the sake of some advantage to the trespasser, a proposition on which the decisions are not harmonious.“ [3_42]

在比肖普先生看来，偷盗罪是“通过侵占行为，拿走并转移侵占人知道属于他人一般或专门所有的私人财产，意图使该所有人丧失其财产所有权；也许还应该说，以此主张为依据作出的裁决并不一致，这对侵占人有一些好处”。

There must be an intent to deprive such owner of his ownership therein, it is said. But why? Is it because the law is more anxious not to put a man in prison for stealing unless he is actually wicked, than it is not to hang him for killing another? That can hardly be. The true answer is, that the intent is an index to the external event which probably would have happened, and that, if the law is to punish at all, it must, in this case, go on probabilities, not on accomplished facts. The analogy to the manner of dealing with attempts is plain. Theft may be called an attempt to permanently deprive a man of his property, which is punished with the same severity whether successful or not. If theft can rightly be considered in this way, intent must play the same part as in other attempts. An act which does not fully accomplish the prohibited result may be made wrongful by evidence that but for some interference it would have been followed by other acts co-ordinated with it to produce that result. This can only be shown by showing intent. In theft the intent to deprive the owner of his property establishes that the thief would have retained, or would not have taken steps to restore, the stolen goods. Nor would it matter that the thief afterwards changed his mind and returned the good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ttempt, the crime was already complete when

the property was carried off.

有人说，必须有使该所有人丧失其财物所有权的意图。但为什么呢？是因为与不因致他人死亡而绞死某人相比，法律更倾向于不因盗窃而将某人投入监狱，除非他确实怀有恶意吗？不大可能是这样的。正确的答案是，意图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外在事件的一个标志，如果法律要有所惩罚的话，那么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以可能性为依据，而不是以既成事实为依据。这显然类似于处理犯罪未遂的方式。盗窃罪可被称为使人永久性地丧失其财产的企图，不管其成功与否，都被予以同样严厉的惩罚。如果以这种方式正确地考察偷盗罪，则意图所发挥的作用，必然与其他犯罪未遂罪中所起的作用类似。一个并未完全实现被禁止之结果的行为，可根据如下证据被定为侵害行为：如果不对其进行某些干涉，则该行为可能会伴随其他行为，它们相互协调，就会产生上述被禁止之结果。而这一点只有通过揭示意图来予以证明。在盗窃罪中，使所有者丧失其财产的意图就证明了：该窃贼可能已将偷窃来的物品保留下来，或者不会采取措施将该物品归还。该窃贼后来改变想法归还了物品则无关紧要。从企图的角度来看，在财物被拿走之时，盗窃罪就已经成立了。

It may be objected to this view, that, if intent is only a makeshift which from a practical necessity takes the place of actual deprivation, it ought not to be required where the actual deprivation is wholly accomplished, provided the same criminal act produces the whole effect. Suppose, for instance, that by one and the same motion a man seizes and backs another's horse over a precipice. The whole evil which the law seeks to prevent is the natural and manifestly certain consequence of the act under the known circumstances. In such a case, if the law of larcen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ies here maintained, the act should be passed upon according to its tendency, and the actual intent of the

wrong-doer not in any way considered. Yet it is possible, to say the least, that even in such a case the intent would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I assume that the act was without excuse and wrongful, and that it would have amounted to larceny, if done for the purpose of depriving the owner of his horse. Nevertheless, if it was done for the sake of an experiment, and without actual foresight of the destruction, or evil design against the owner, the trespasser might not be held a thief.

人们可能会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意图只是一种暂时性行为，这一行为基于现实需要代替了实际使他人丧失财产的行为，那么，意图在实际使他人丧失财产既遂的情况下应当不是必要的，条件是这同一犯罪行为产生了全部后果。例如，借助于同一动作，某人抓住了他人在悬崖上的马，并骑在了马背上。整个法律试图防范的恶，就是在知晓相关情况下行为的某些自然而明显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关于偷盗罪的法律符合这里所主张的理论，则应当根据行为的趋势对行为进行判定，而根本不应考虑侵害人的真实意图。然而，至少可以说，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意图也可能关系重大。我认为，如果目的是为了从马匹的所有人手里夺走他的马，那么，该行为则是不可原谅的，也是不正当的，该行为应当构成了偷盗罪。但是，如果该行为是为了进行一次实验，并没有实际预见到毁坏的结果，或者说对于马匹的所有者并没有不良意图，那么，该侵占者就不可被定为窃贼。

The inconsistency, if there is one, seems to be explained by the way in which the law has grown. The distinctions of the common law as to theft are not those of a broad theory of legislation; they are highly technical, and very largely dependent upon history for explanation. [3_43]

如果说还存在着某种不一致之处的话，似乎可以通过法律演变的方式来解释。普通法有关盗窃罪的划分不是某种宽泛的立法理论的划分；它们高度专门化，并极大地依赖于历史予以解释。

The type of theft is taking to one's own use. It used to be, and sometimes still is, thought that the taking must be lucri catesa, for the sake of some advantage to the thief. In such cases the owner is deprived of his property by the thief's keeping it, not by its destruction, and the permanence of his loss can only be judged of beforehand by the intent to keep. The intent is therefore always necessary, and it is naturally stated in the form of a self-regarding intent. It was an advance on the old precedents when it was decided that the intent to deprive the owner of his property was sufficient. As late as 1815 the English judges stood only six to five in favor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it was larceny to take a horse intending to kill it for no other purpose than to destroy evidence against a friend. [3_44] Even that case, however, did not do away with the universality of intent as a test, for the destruction followed the taking, and it is an ancient rule that the criminality of the act must be determined by the state of things at the time of the taking, and not afterwards. Whether the law of larceny would follow what seems to be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or would be held back by tradition, could only be decided by a case like that supposed above, where the same act accomplishes both taking and destruction. As has been suggested already, tradition might very possibly prevail.

盗窃罪是占取某物为己所有。过去有人，现在有时也依然有人认为，占取必须是lucri catesa，即窃贼为了得到一些利益。在这样一些情况下，所有人由于窃贼窃取，而非财产毁坏而丧失了其财产，其是否永久性地失去了财产，只可能通过窃贼的意图来进行预测。因此，

意图总是不可避免，而且自然以某种利己主义意图的形式表现出来。使所有者丧失其财产的意图就足够确定了这一点，是在以往判例基础上的一大进步。到了1815年，英国法官11个人中仅有6人赞同如下主张：占取一匹马，并意图杀死这匹马，其目的只是为了销毁对一位朋友不利的证据，这构成偷盗罪。但是，即使这个案例，也并未忽视把意图作为一种衡量标准的普适性，因为，杀死马匹发生在占取之后，而根据某条古老的法规，该行为是否有罪，必须由占取之时而非之后的事态来决定。有关偷盗罪的法律究竟应遵循似乎属于刑法之普遍原则的东西，还是可能受到传统的阻碍，只能通过类似于以上所设想的案件来予以确定，在以上案例中同一行为既完成了占取又完成了杀死。如上所述，传统很有可能会占上风。

Another crime in which the peculiarities noticed in larceny are still more clearly marked, and at the same time more easily explained, is burglary. It is defined as breaking and entering any dwelling-house by night with intent to commit a felony therein. [3_45] The object of punishing such a breaking and entering is not to prevent trespasses, even when committed by night, but only such trespasses as are the first step to wrongs of a greater magnitude, like robbery or murder. [3_46] In this case the function of intent when proved appears more clearly than in theft, but it is precisely similar. It is an index to the probability of certain future acts which the law seeks to prevent. And here the law gives evidence that this is the true explanation. For if the apprehended act did follow, then it is no longer necessary to allege that the breaking and entering was with that intent. An indictment for burglary which charges that the defendant broke into a dwelling-house and stole certain property, is just as good as one which alleges that he broke in with intent to steal. [3_47]

我们在偷盗罪中注意到的一些独特性，在另外一种犯罪，即夜盗罪中，更为明显，同时也更容易解释。夜盗罪被定义为夜晚破门侵入他人居住的房屋，带有在其中实施重罪的意图。惩罚这种破门侵入他人房屋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非法入侵，即使是在夜晚实施的非法入侵，而只是为了防止诸如这样一种非法入侵行为进一步演变为更严重的罪行，比如抢劫或谋杀罪。在这种情况下，被证实的意图所起的作用，似乎比在盗窃罪中更为明显，但却非常相似。意图是法律试图防范的某些未来行为之可能性的一种标志。在此，法律已经证明了，这就是正确的解释。因为如果随后确实发生了那些令人担忧的行为，那就不再有必要证明，破门侵入的行为带有这种意图。一份针对夜盗罪的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闯入一间房屋盗走若干财物，完全等同于指控此人带有盗窃的意图闯入他人房屋的起诉。

It is believed that enough has now been said to explain the general theory of criminal liability, as it stands at common law. The result may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All acts are indifferent perse.

相信我们前面的讨论已经足以解释普通法中刑事责任的一般性理论了。结论可概括如下：一切行为的本身并不重要。

In the characteristic type of substantive crime acts are rendered criminal because they are done under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y will probably cause some harm which the law seeks to prevent.

在典型的实质性犯罪中，行为之所以构成刑事犯罪，是因为他们是在相关情况下实施的，而在这些情况下，这些行为将可能造成法律试图阻止的危害。

The test of criminality in such cases is the degree of danger shown by experience to attend that act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判定是否属于刑事犯罪的标准，是根据经验表明在这些情况下行为所伴随的危险程度。

In such cases the mens rea, or actual wickedness of the party, is wholly unnecessary, and all reference to the state of his consciousness is misleading if it means anything more than that the circumstances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the tendency of his act is judged are the circumstances known to him. Even the requirement of knowledge is subject to certain limitations. A man must find out at his peril things which a reasonable and prudent man would have inferred from the things actually known. In some cases, especially of statutory crimes, he must go even further, and, when he knows certain facts, must find out at his peril whether the other facts are present which would make the act criminal. A man who abducts a girl from her parents in England must find out at his peril whether she is under sixteen.

在这类案件中，当事人的犯罪意图，或者说真实的恶意，完全无关紧要；如果意图不仅仅意味着对当事人行为趋势进行判断的相关情况是当事人已知的情况，则一切对其意识状态的参考就都具有误导性。即使是知晓相关情况这一必要条件，也会受到某些限制。一个人必须发现一个理性而审慎的人应该可能从实际已知事实中推断出来的事实，否则后果自负。在有些案件中，尤其是在制定法规定的犯罪案件中，他必须更进一步，当他知道某些事实时，他必须自行查明是否存在使其行为构成为刑事犯罪的其他一些事实。在英格兰，某人如果诱拐一位少女离开其父母，必须自行发现少女是否不满16岁这一事

实。

In some cases it may be that the consequence of the 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must be actually foreseen, if it is a consequence which a prudent man would not have foreseen. The reference to the prudent man, as a standard, is the only form in which blameworthiness as such is an element of crime, and what would be blameworthy in such a man is an element;first, as a survival of true moral standards; second, because to punish what would not be blameworthy in an average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would be to enforce a standard which was indefensible theoretically, and which practically was too high for that community.

在有些案件中，有可能是这样的：在一定情况下，行为的后果必须事实上被预见到，即使这是一个审慎的人本来不可能预见到的后果。以审慎的人为参照对象，把其当成某种标准，是把过错本身作为构成犯罪的一个要素，以及把审慎的人可能会犯的过错作为犯罪的一个要素的唯一形式；——首先，真正的道德标准得以保存下来；其次，因为对社会一般成员中不应责难的行为予以惩罚，就是要执行一套从理论上站不住脚的标准，这套标准对于该社会实际上太过于苛刻。

In some cases, actual malice or intent, in the common meaning of those words, is an element in crime. But it will be found that, when it is so, it is because the act when done maliciously is followed by harm which would not have followed the act alone, or because the intent raises a strong probability that an act, innocent in itself, will be followed by other acts or events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it will accomplish the result sought to be prevented by the

law.

在有些案件中，实际的恶意或意图，从这两个词的一般意义而言，是构成犯罪的一个要素。但我们会发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行为在带有恶意的情况下实施时会造成危害，如果仅有该行为是不会造成这种危害的；或者是因为，意图使得这一可能性极大地增加，即某一行为，尽管本身无罪，但随后出现的其他行为或事件，与该行为一起将会实现法律试图防范的结果。

[3_1].Cf. 2 Hawk. P.C. 303 et seq.; 27 Ass. 25.

[3_2].2 Palgrave, Commonwealth, cxxx., cxxxi.

[3_3].Butler, Sermons, VIII. Bentham, Theory of Legislation (Principles of Penal Code, Part 2, ch. 16), Hildreth's tr., p. 309.

[3_4].General View of the Criminal Law of England, p. 99.

[3_5].Wharton, Crim. Law, (8th ed.) Section 8, n. 1.

[3_6].Ibid., Section 7.

[3_7].Even the law recognizes that this is a sacrifice. Commonwealth v. Sawin, 2 Pick. (Mass.) 547, 549.

[3_8].Cf. 1 East, P.C. 294; United States v. Holmes, 1 Wall. Jr. 1; 1 Bishop, Crim. Law, Sections 347-349, 845 (6th ed.); 4 Bl. Comm. 31.

[3_9].Art. 223.

[3_10].General View of the Criminal Law of England, p. 116.

[3_11].Harris, Criminal Law, p. 13.

[3_12].Steph. Dig. Crim. Law, Art. 223, Illustration (6), and n. 1.

[3_13].4 Bl. Comm. 192.

[3_14].Cf. 4 Bl. Comm. 197.

[3_15].Reg. v. Hibbert, L.R. 1 C.C. 184.

[3_16].Reg. v. Prince, L.R. 2 C.C. 154.

[3_17].Commonwealth v. Hallett, 103 Mass. 452.

[3_18].Stephen, Dig. Cr. Law, Art. 223, Illustr. (5); Foster, 294, 295.

[3_19].Cf. Gray's case, cited 2 Strange, 774.

[3_20].Steph. Dig., Art. 223, Illustr. (1).

[3_21].Steph. Dig., Art. 223, Illustr. (8).

[3_22].Rex v. Mastin, 6 C.&P. 396. Cf. Reg. v. Swindall, 2 C. & K. 230.

[3_23].4 Bl. Comm. 192.

[3_24].Steph. Dig. Cr. Law, Art. 225.

[3_25].Rex v. Shaw, 6 C.&P. 372.

[3_26].Rex v. Oneby, 2 Strange, 766, 773.

[3_27].Rex v. Hayward, 6 C.&P. 157.

[3_28].Commonwealth v. Walden, 3 Cush. (Mass.) 558. Cf. Steph. Gen. View of the Crim. Law, 84.

[3_29].2 Bishop Crim. Law, Section 14 (6th ed.).

[3_30].Glanv., Lib. XIV. c. 4.

[3_31].Bract., fol. 146b.

[3_32].Ibid.

[3_33].2 East, P.C., c. 21, Sections 7, 8, pp. 1027, 1031.

[3_34].1 Bishop, Crim. Law, Section 735 (6th ed.).

[3_35].Reg. v. Dilworth, 2 Moo. & Rob. 531; Reg. v. Jones, 9 C.&P. 258. The statement that a man is presumed to intend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of his acts is a mere fiction disguising the true theory. See Lecture IV.

[3_36].Reg. v. Taylor, 1 F. & F. 511.

[3_37].Reg. v. Roberts, 25 L. J. M. C. 17; S.C. Dearsly, C., C. 539.

[3_38].Lewis v. The State, 35 Ala. 380.

[3_39].See M'Pherson's Case, Dearsly & Bell, 197, 201, Bramwell, B.

[3_40].Cf. 1 Bishop, Crim. Law, Sections 741-745 (6th ed.).

[3_41].2 Bishop, Crim. Law, Section 758 (6th ed.).

[3_42].Cf. Stephen, General View of Criminal Law of England, 49 et seq.

[3_43].Cf. Stephen, General View, 49-52; 2 East, P.C. 553.

[3_44].Rex v. Cabbage, Russ. & Ry. 292.

[3_45].Cf. 4 Bl. Comm. 224; Steph. Dig. Crim. Law, Arts. 316, 319.

[3_46].Cf. 4 Bl. Comm. 227, 228.

[3_47].Starkie, Cr. Pl. 177. This doctrine goes further than my argument requires. For if burglary were dealt withonly on the footing of an attempt, the whole crime would have to be complete at the moment of breaking into the house. Cf. Rex v. Furnival, Russ. & Ry. 445.

LECTURE III. TORTS.—TRESPASS AND NEGLIGENCE.

第三讲　侵权——侵害和过失

The object of the next two Lectures is to discover whether there is any common ground at the bottom of all liability in tort, and if so, what that ground is. Supposing the attempt to succeed, it will reveal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civil liability at common law. The liabilities incurred by way of contract are more or less expressly fixed by the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but those arising from a tort are independent of any previous consent of the wrong-doer to bear the loss occasioned by his act. If A fails to pay a certain sum on a certain day, or to deliver a lecture on a certain night, after having made a binding promise to do so, the damages which he has to pay are recovered in accordance with his consent that some or all of the harms which may be caused by his failure shall fall upon him. But when A assaults or slanders his neighbor, or converts his neighbor's property, he does a harm which he has never consented to bear, and if the law makes him pay for it, the reason for doing so must be found in some general view of the conduct which every one may fairly expect and demand from every other, whether that other has agreed to it or not.

接下来的两讲旨在探明，一切侵权责任最根本的原因是否有共同之处，如果有的话，这共同之处又是什么。假使能达成这一目的，那就会揭示普通法上民事责任的一般性原则。由合同引起的责任，所涉当事人缔结的协议多少都明确予以了规定，但那些由侵权引起的责任，则与侵害人之前作出的同意承担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的任何约定无关。如果甲在某一特定日期未能支付一定款项，或者某一特定的晚

上未能发表一个讲演，在他已就此作出了具有约束力的承诺之后，那么，他就不得不支付损害赔偿，这符合其所作出的须由其承担因爽约可能带来的部分或者全部损失的承诺。但是，当甲对其邻居进行了攻击或诽谤，或者强占了其邻居的财产时，他就造成了某种损失，但他根本就没有同意承担这一损失；如果法律要让他对此予以赔偿，那么，我们就必须从人们对此行为的某种普遍看法中找到法律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每个人都可以公平地期待并要求他人持有这种看法，而不管他人赞同与否。

Such a general view is very hard to find. The law did not begin with a theory. It has never worked one out. The point from which it started and that at which I shall try to show that it has arrived, are on different planes. In the progress from one to the other, it is to be expected that its course should not be straight and its direction not always visible. All that can be done is to point out a tendency, and to justify it. The tendency, which is our main concern, is a matter of fact to be gathered from the cases. But the difficulty of showing it is much enhanced by the circumstance that, until lately, the substantive law has been approached only through the categories of the forms of action. Discussions of legislative principle have been darkened by arguments on the limits between trespass and case, or on the scope of a general issue. In place of a theory of tort, we have a theory of trespass. And even within that narrower limit, precedents of the time of the assize and jurata have been applied without a thought of their connection with a long forgotten procedure.

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难以找寻。法律并非始于某种理论。它从未制造出某种理论。其出发点和我将试图证明其业已到达的某一点，处于不同层面之上。在从起点到这另外一点的进程中，我们会发现，其

过程不应该是笔直的，方向也不会总能看得清楚。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指出一种趋势，并证明其合理性。这种趋势是从案件中归纳总结出的事实问题，是我们的主要关注点。但是，直到最近，我们都只能通过诉讼程序的范畴对实体法进行探讨，这样一种情况极大地增加了揭示这种趋势的难度。针对侵害与间接侵害之间的界限，或者概括否认的范围所进行的辩论，使得关于立法原则的讨论黯然失色。我们用有关侵害的理论，取代了关于侵权的理论。即使是在侵害这一较小的范畴之内，我们在应用巡回审判以及合意陪审时期的一些判例时，也一点都不会联想到这些判例与早已被遗忘的程序之间的关系。

Since the ancient forms of action have disappeared, a broader treatment of the subject ought to be possible. Ignorance is the best of law reformers. People are glad to discuss a question on general principles, when they have forgotten the special knowledge necessary for technical reasoning. But the present willingness to generalize is founded on more than merely negative grounds. The philosophical habit of the day, the frequency of legislation, and the ease with which the law may be changed to meet the opinions and wishes of the public, all make it natural and unavoidable that judges as well as others should openly discuss the legislative principles upon which their decisions must always rest in the end, and should base their judgments upon broad considerations of policy to which the traditions of the bench would hardly have tolerated a reference fifty years ago.

既然古代的诉讼形式已经不复存在，对这一主题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应当具有可能性。对法律改革者们而言，无知最好。当人们遗忘了进行专业推理所必需的特定知识，他们就会乐于根据一般性原则对某一问题进行探讨。然而，我们现在想要进行一般性研究的意愿倒不仅仅只是建立在以上这些否定的依据之上。当今哲学上的嗜好，立法的

频率，以及法律可被轻易地改变以迎合公众的意见和意愿，凡此种种产生的自然以及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法官及其他人应当公开对一些立法原则进行讨论，他们最终赖以决策的基础一定始终是这些立法原则；他们的判决应当以广泛的政策考量为基础，而在50年前，法律界的传统却还难以容忍涉及此类政策的考量。

The business of the law of torts is to fix the dividing lines between those cases in which a man is liable for harm which he has done, and those in which he is not. But it cannot enable him to predict with certainty whether a given act under given circumstances will make him liable, because an act will rarely have that effect unless followed by damage, and for the most part, if not always, the consequences of an act are not known, but only guessed at as more or less probable. All the rules that the law can lay down beforehand are rules for determining the conduct which will be followed by liability if it is followed by harm, that is, the conduct which a man pursues at his peril. The only guide for the future to be drawn from a decision against a defendant in an action of tort is that similar acts, under circumstances which cannot be distinguished except by the result from those of the defendant, are done at the peril of the actor; that if he escapes liability, it is simply because by good fortune no harm comes of his conduct in the particular event.

侵权法的任务是确定两类案件的分界线：一类是某人对其所造成的伤害负有责任；另一类是对其所造成的伤害不负有责任。但侵权法无法让此人准确地预测到，一项既定行为在一定情况下是否会使其招致责任，因为一起行为除非造成了损害，否则就很少会产生上述后果；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尽管也并不总是如此，一项行为的后果无法确定，而只能就其可能性的大小进行猜测。法律能够事先规定下来的

所有规则，都是对如造成伤害就会招致责任的行为进行界定的规则——也就是，对一个人须自担风险的行为进行界定的规则。在一起侵权诉讼中，从针对被告的裁决中唯一能得出的对于未来的指导是，如相关情况只能根据被告人行为的结果进行区分，则实施类似的行为，行为人须自行承担风险；如果行为人能免于责任，则只是因为他运气好，在具体事件中其行为未造成任何伤害而已。

If, therefore, there is any common ground for all liability in tort, we shall best find it by eliminating the event as it actually turns out, and by considering only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the peril of his conduct is thrown upon the actor. We are to ask what are the elements, on the defendant's side, which must all be present before liability is possible, and the presence of which will commonly make him liable if damage follows.

因此，如果所有侵权责任存在什么共同之处，那么要找到这些共同之处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考虑事件实际导致的后果，而只考虑行为人须自行承担其行为后果所遵循的原则。我们要追问，责任的构成要素是什么；从被告的角度出发，在确定责任之前哪些要件必须都存在；以及如果结果造成了损害，哪些要件的存在通常可致被告承担法律责任。

The law of torts abounds in moral phraseology. It has much to say of wrongs, of malice, fraud, intent, and negligence. Hence it may naturally be supposed that the risk of a man's conduct is thrown upon him as the result of some moral short-coming. But while this notion has been entertained, the extreme opposite will be found to have been a far more popular opinion;I mean the notion that a man is answerable for all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acts, or, in

other words, that he acts at his peril always, and wholly irrespective of the state of his consciousness upon the matter.

侵权法包含大量道德术语。它对于不当行为、欺诈、恶意、故意以及过失有诸多说明。因此，人们可能会自然地认为，由于某一道德缺陷，一个人要自行承担其行为的后果。但是，在持有这种观点的同时，我们会发现与之截然不同的一种观点要远为盛行；——我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人对其行为的一切后果都负有责任，或者换句话说，他永远都要自行承担其行为的后果，并完全无关于其有关事情的意识状态。

To test the former opinion it would be natural to take up successively the several words, such as negligence and intent, which in the language of morals designate various well-understood states of mind, and to show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law. To test the latter, it would perhaps be more convenient to consider it under the head of the several forms of action. So many of our authorities are decisions under one or another of these forms, that it will not be safe to neglect them, at least in the first instance; and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two modes of approaching the subject may be reached by beginning with the action of trespass and the notion of negligence together, leaving wrongs which are defined as intentional for the next Lecture.

要考察前一种观点，自然要逐个研究上文提到的那几个词，比如过失和故意，这几个词用道德用语明确指定了各种已为人们熟知的心理状态，并揭示其在法律中的意义。要考察后一种观点，则在几种诉讼形式的名目之下对此进行考察可能要方便一些。我们有很多判例就是在这些诉讼形式的某一种形式之下作出的裁决，忽略这些形式，至

少一开始就如此，不太稳妥；要在这一问题的两种考察研究方式之间达到某种折衷，则可同时从侵害诉讼和过失的概念开始，而把界定为故意不当的行为留到下一讲。

Trespass lies for unintentional, as well as for intended wrongs. Any wrongful and direct application of force is redressed by that action. It therefore affords a fair field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liability for unintentional wrongs at common law. For it can hardly be supposed that a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acts varies as the remedy happens to fall on one side or the other of the penumbra which separates trespass from the action on the case.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aw of torts will be found under one or the other of those two heads.

直接侵害诉讼涉及无意或故意的不当行为。任何不正当地和直接地使用暴力都可通过该诉讼予以纠正。因此，该诉讼为探讨普通法上非故意不当行为责任的一般性原理提供了一个公平的机会。因为，很难想象，一个人对其行为后果所负有的责任，会因为纠正碰巧落在直接侵害与间接侵害诉讼的分界线的这一侧或那一侧而有所不同。侵权法的大部分内容可在直接侵害与间接侵害诉讼这两个名目之下找到。

It might be hastily assumed that the action on the case is founded on the defendant's negligence. But if that be so, the same doctrine must prevail in trespass. It might be assumed that trespass is founded on the defendant's having caused damage by his act, without regard to negligence. But if that be true, the law must apply the same criterion to other wrongs differing from trespass only in some technical point; as, for instance, that the property damaged was in the defendant's possession. Neither of the above

assumptions, however, can be hastily permitted. It might very well be argued that the action on the case adopts the severe rule just suggested for trespass, except when the action is founded on a contract. Negligence, it might be sai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ommon-law liability for a nuisance, and it might be added that, where negligence was a ground of liability, a special duty had to be founded in the defendant's super se assumpsit, or public calling. [4_1] On the other hand, we shall see what can be said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even in trespass there must at least be negligence. But whichever argument prevails for the one form of action must prevail for the other. The discussion may therefore be shortened on its technical side, by confining it to trespass so far as may be practicable without excluding light to be got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law.

有人可能会轻率地认为，间接侵害诉讼建立在被告的过失基础之上。但如果是这样，则同样的原则也会在直接侵害诉讼中生效。也有人会认为，直接侵害诉讼的依据是无论被告是否存在过失，其行为已造成了损害。但如果是这样，则法律必须将同一标准运用于其他一些只是在技术细节上有别于直接侵害诉讼的不当行为，例如，所损坏的财产为被告人曾经拥有的财产。然而，对于上述两种观点，均不能轻率地予以承认。有人很有可能会说，除了以合同为基础的诉讼之外，间接侵害诉讼所采取的严格的规定恰恰就是针对直接侵害诉讼所提出的。也有人可能会说，过失与普通法上的滋扰责任没有任何关系，还补充说，当过失乃是责任的一项依据时，必须有一项基于被告的承诺或者公共使命的特殊责任。另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人们对即使在直接侵害诉讼中也至少存在过失这一命题的看法。不过，在一种诉讼形式中占上风的任何观点中，也都必然会在另一种诉讼程式中占上风。因此，只要可行，且不会排斥从法律其他部分所得到的启示，将讨论局限于直接侵害诉讼将可简化在技术层面的讨论。

As has just been hinted, there are two theories of the common-law liability for unintentional harm. Both of them seem to receive the implied assent of popular textbooks, and neither of them is wanting in plausibility and the semblance of authority.

上文已经暗示指出，普通法的非故意伤害责任存在两种理论。两种理论似乎都得到了通行课本的默示同意，且两者表面上看起来都不乏其合理性和权威性。

The first is that of Austin, which is essentially the theory of a criminalist. According to him,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law, properly so called, is a sanction or detriment threatened and imposed by the sovereign for disobedience to the sovereign's commands. A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aw only makes a man civilly answerable for breaking it, Austin is compelled to regard the liability to an action as a sanction, or, in other words, as a penalty for disobedience. It follows from this, according to the prevailing views of penal law, that such liability ought only to be based upon personal fault; and Austin accepts that conclusion, with its corollaries, one of which is that negligence means a state of the party's mind. [4_2] These doctrines will be referred to later, so far as necessary.

第一种是奥斯丁的理论，其理论从本质上而言是一位刑事专家的理论。在他看来，所谓的法律的真正典型特征就是，君主对违抗其命令的行为提出或强加的制裁或者伤害。由于法律的大部分内容只是依照民法让某人因违法而承担责任，奥斯丁因此不得不将某一行为责任视为一种制裁，或者换句话说，视为对违抗君主命令的惩罚。根据人们对刑法持有的一般性观点，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责任只应以个人

过错为基础；奥斯丁也接受了这一结论及由结论得出的推论，其中的一个推论是，过失指的是当事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后文中如有必要，仍将提及这些原则。

The other theory is directly opposed to the foregoing. It seems to be adopted by some of the greatest common law authorities, and requires serious discussion before it can be set aside in favor of any third opinion which may be maintained. According to this view, broadly stated, under the common law a man acts at his peril. It may be held as a sort of set-off, that he is never liable for omissions except in consequence of some duty voluntarily undertaken. But the whole and sufficient ground for such liabilities as he does incur outside the last class is supposed to be that he has voluntarily acted, and that damage has ensued. If the act was voluntary, it is totally immaterial that the detriment which followed from it was neither intended nor due to the negligence of the actor.

另一种理论与前一种理论则完全对立。该理论似乎为一些最伟大的普通法权威所采纳，在把该理论置之一旁，而赞同任何可能持有的第三种观点之前，我们必须对其认真予以探讨。概括而言，根据该理论，在普通法之下，一个人要自行承担其行为的后果。除非是因为自愿承担责任，否则他根本不会因为不作为而承担责任，这可被视为一种抵消。但他所实际招致的、不属于上文所述自愿承担的一些责任，其全部及充分的依据被认为是，他的行为是自愿的，并随之造成了损害。如果行为属自愿行为，则行为造成的损害，不管是出于故意还是行为人的过失，都完全无关紧要。

In order to do justice to this way of looking at the subject,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 abolition of the common-law forms of

pleading has not changed the rules of substantive law. Hence, although pleaders now generally allege intent or negligence, anything which would formerly have been sufficient to charge a defendant in trespass is still sufficient, notwithstanding the fact that the ancient form of action and declaration has disappeared.

为了公平看待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的途径，我们必须记住，普通法诉讼形式的废除并没有改变实体法的规则。因此，尽管原告现在一般以故意或过失为由提起诉讼，但以往足以指控被告侵害的任何证据现在仍然是充分的，尽管事实上古代的诉讼和控告形式已经不复存在。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said, consider generally the protection given by the law to property,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limits of the last-named action. If a man crosses his neighbor's boundary by however innocent a mistake, or if his cattle escape into his neighbor's field, he is said to be liable in trespass quare clausum fregit. If an auctioneer in the most perfect good faith, and in the regular course of his business, sells goods sent to his rooms for the purpose of being sold, he may be compelled to pay their full value if a third person turns out to be the owner, although he has paid over the proceeds, and has no means of obtaining indemnity.

有人说，首先要在这最后提及的过失诉讼的范围内外大体考量一下法律对财产所提供的保护。如果一个人无意误入了其邻居的土地，或者如果他的牲畜逃到了邻居的田里，人们就会说他对侵入他人土地负有责任。如果一位拍卖商，本着非常诚实守信的原则，在其常规的交易过程中，出售了送到其拍卖行用于出售的财物，假如事实证明第三方为该财物的所有者，则该拍卖商可能不得不对此进行全额赔付，

即便赔付额度超出了其收益，且无法获得补偿。

Now suppose that, instead of a dealing with the plaintiff's property, the case is that force has proceeded directly from the defendant's body to the plaintiff's body, it is urged that, as the law cannot be less careful of the persons than of the property of its subjects, the only defences possible are similar to those which would have been open to an alleged trespass on land. You may show that there was no trespass by showing that the defendant did no act; as where he was thrown from his horse upon the plaintiff, or where a third person took his hand and struck the plaintiff with it. In such cases the defendant's body is the passive instrument of an external force, and the bodily motion relied on by the plaintiff is not his act at all. So you may show a justification or excuse in the conduct of the plaintiff himself. But if no such excuse is shown, and the defendant has voluntarily acted, he must answer for the consequences, however little intended and however unforeseen. If, for instance, being assaulted by a third person, the defendant lifted his stick and accidentally hit the plaintiff, who was standing behind him, according to this view he is liable, irrespective of any negligence toward the party injured.

现在假设案件所处理的不是原告的财产，而是直接从被告的身体发出的力量作用于原告的身体，这就要求被告唯一可能做出的答辩类似于针对侵入土地之指控做出的答辩，因为法律对人的关心不可能还不如对财产的关心。你可以通过证明被告未实施侵害行为来证明根本不存在人身侵害；因为当时，他是被马摔下来落在了原告身上的，或者当时，有第三人抓住他的一只手，并用这只手打了原告。在这样一些情况下，被告的身体完全是某种外力作用下的被动的工具，原告赖以提出指控的身体的运动，根本就不是被告自己的行为。因此，你可

以提出一个在原告自己的行为中都可以找到的证据或理由。但如果不能提出这样的理由，而且被告的行为是自愿的，那么，即使并非故意或者无法预见，他都必须对后果负责。例如，如果在受到第三人的攻击时，被告抡起手杖，却意外打到了正站在他身后的原告，那么根据这种观点，无论对受害方是否存在过失行为，他都应对此负有责任。

The arguments for the doctrine under consideration are, for the most part, drawn from precedent, but it is sometimes supposed to be defensible as theoretically sound. Every man, it is said, has an absolute right to his person, and so forth, free from detriment at the hands of his neighbors. In the cases put, the plaintiff has done nothing; the defendant, on the other hand, has chosen to act. As between the two, the party whose voluntary conduct has caused the damage should suffer, rather than one who has had no share in producing it.

对上述原则的支持意见大多来自于判例，但有时人们认为它在理论上也站得住脚。每个人据说对其身体等都拥有绝对的权利，应使其免于受到邻居行为的伤害。在以上所举的例子当中，原告什么也没有做，但被告却是自愿选择采取行动。因为，在这两人之间，因其自愿的行为而造成了伤害的一方应当受罚，而不是与造成伤害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一方。

We have more difficult matter to deal with when we turn to the pleadings and precedents in trespass. The declaration says nothing of negligence, and it is clear that the damage need not have been intended. The words vi et armis and contra pacere, which might seem to imply intent, are supposed to have been inserted merely to give jurisdiction to the king's court. Glanvill says it belongs to the

sheriff, in case of neglect on the part of lords of franchise, to take cognizance of melees, blows, and even wounds, unless the accuser add a charge of breach of the king's peace (nisi accusator adjiciat de pace Domini Regis infracta). [4_3] Reeves observes, “In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heriff's jurisdiction and that of the king, we see the reason of the allegation in modern indictments and writs, vi et amis, of 'the king's crown and dignity,' 'the king's peace,' and 'the peace,'—this last expression being sufficient, after the peace of the sheriff had ceased to be distinguished as a separate jurisdiction.“ [4_4]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侵害诉讼中的一些诉状及判例时，我们会碰到更难处理的事情。起诉状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过失，而且很显然损害未必是故意造成的。诉状中加入“vi et armis（使用武力手段）”和“contra pacere（破坏治安）”这两个似乎暗示故意的词语，应该纯粹是为了给予国王法院以管辖权。格兰维尔说，如果是拥有特权的贵族的过失，则应由郡长对群殴、殴打、甚至身体伤害受理审判，除非原告还指控破坏了国王的治安（nisi accusator adjiciat de pace Domini Regis infracta）。里夫斯评论说：“从对郡长的管辖权与国王的管辖权的这种区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公诉书和令状中对使用武力手段（viet armis）破坏了‘国王的王权及尊严’，‘国王的治安’和‘治安’等行为进行指控的理由；在郡长治安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司法管辖权消失之后，用“治安”这最后一种说法就足够了”。

Again, it might be said that, if the defendant's intent or neglect was essential to his liability, the absence of both would deprive his act of the character of a trespass, and ought therefore to be admissible under the general issue. But it is perfectly well settled at common law that “Not guilty” only denies the act. [4_5]

此外，有人可能会说，如果被告的故意或过失对于其责任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故意或者过失两者都不存在也就使其行为不具有侵害的性质，因此要在概括否认中加以考虑。但普通法却明确规定，“无罪”仅仅是否认这一行为。

Next comes the argument from authority. I will begin with an early and important case. [4_6] It was trespass quare clausum. The defendant pleaded that he owned adjoining land, upon which was a thorn hedge; that he cut the thorns, and that they, against his will (ipso invito), fell on the plaintiff's land, and the defendant went quickly upon the same, and took them, which was the trespass complained of. And on demurrer judgment was given for the plaintiff. The plaintiff's counsel put cases which have been often repeated. One of them, Fairfax, said: “There is a diversity between an act resulting in a felony, and one resulting in a trespass. If one is cutting trees, and the boughs fall on a man and wound him, in this case he shall have an action of trespass, &c., and also, sir, if one is shooting at butts, and his bow shakes in his hands, and kills a man, ipso invito, it is no felony, as has been said, &c.; but if he wounds one by shooting, he shall have a good action of trespass against him, and yet the shooting was lawful, &c., and the wrong which the other receives was against his will, &c.; and so here, &c.” Brian, another counsel, states the whole doctrine, and uses equally familiar illustrations. “When one does a thing, he is bound to do it in such a way that by his act no prejudice or damage shall be done to &c. As if I am building a house, and when the timber is being put up a piece of timber falls on my neighbor's house and breaks his house, he shall have a good action, &c.; and yet the raising of the house was lawful, and the timber fell, me invito, &c. And so if one assaults me and I cannot escape, and I in self-defence lift my stick to strike him, and in lifting it hit a man who is behind me, in this case

he shall have an action against me, yet my raising my stick was lawful in self-defence, and I hit him, me invito, &c.; and so here, &C.”

以下是出自判例的观点。我先从一起早期非常重要的案例谈起。这是一起侵入他人土地的诉讼。被告辩称，他拥有与原告毗邻的土地，栽种了树篱，他在砍树篱的时候，这些树篱违背了他的意愿（ipso invito），掉落在原告的地里，被告很快走到原告的地里，拿走了树篱，原告称其侵入了自己的土地。根据被告做出的抗辩，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裁决。原告的律师列举了常常被重复提到的几个案例。费尔法克斯是其中一位律师，他说：“在结果构成重罪的行为与结果构成侵害罪的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如果一个人正在砍树，树枝掉在了另一个人身上并致其受伤，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提起侵害之诉。另外，阁下，如果一个人在对着靶垛射箭，他的弓在手上没拿稳，而杀死了另一个人，这并非出自他本意，我们已经说过，这根本不属于重罪。但是，如果他是放箭伤害了另外一人，他就得面临一场针对他的理由充分的侵害之诉，然而其射箭行为是合法的。另一个人受到的侵害并非出自其本意。案亦是如此”。另一位律师布莱恩对整个原则进行了说明，所举的也都是同样熟悉的例子。“一个人在做某事时，他有责任做到绝不因其行为给他人带来侵害或损害。比如我正在盖房子，木料在被吊起的时候，有一根掉落在邻居的房子上，砸坏了他的房子，他就完全有理由提起诉讼；然而，盖房子为合法行为，木料掉落也并非我的本意。同样，如果一个人攻击我，而我没办法躲开，在自卫中我抡起手杖打他，抡起手杖时却打到了我身后的另外一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对我提起诉讼，然而，我在自卫过程中抡起手杖为合法行为，我也不是故意打他；本案亦是如此，等等”。

“Littleton, J. to the same intent, and if a man is damaged he ought to be recompensed. If your cattle come on my land and eat

my grass, notwithstanding you come freshly and drive them out, you ought to make amends for what your cattle have done, be it more or less. And, sir, if this should be law that he might enter and take the thorns, for the same reason, if he cut a large tree, he might come with his wagons and horses to carry the trees off, which is not reason, for perhaps he has corn or other crops growing, &c., and no more here, for the law is all one in great things and small. Choke, C. J. to the same intent, for when the principal thing was not lawful, that which depends upon it was not lawful; for when he cut the thorns and they fell on my land, this falling was not lawful, and therefore his coming to take them out was not lawful. As to what was said about their falling in ipso invito, that is no plea, but he ought to show that he could not do it in any other way, or that he did all that was in his power to keep them out."

"利特尔顿法官也表达过相同的意思，如果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则他应当得到赔偿。如果你的牲畜进到我的地里并吃了我的草，尽管你刚过来赶走了它们，你也应当为你的牲畜的所为而对我多少作出些赔偿。阁下，要是法律规定他可以进入其邻居的土地拿走掉落在邻居土地上的树篱，那么，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他砍倒了一棵大树，他就可以用他的马车来把树运走，但这不成其为如果他在邻居土地上种植谷物或庄稼的理由。举例到此为止，因为法律在大事和小事上都一样。首席法官乔克也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他认为当主要的事情不合法时，则以其为依据的其他事情也不合法；因为在他砍树篱时，树篱掉落在我的土地上，这是不合法的，因此他过来拿走树篱也不合法。至于说到树篱掉落到原告的围地，违反了被告的意愿，这根本就不能构成辩护的理由，相反地，被告应当证明，他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或者他已尽全力不让树篱掉落到原告的土地上"。

Forty years later, [4_7] the Year Books report Rede, J. as

adopting the argument of Fairfax in the last case. In trespass, he says, “the intent cannot be construed; but in felony it shall be. As when a man shoots at butts and kills a man, it is not felony et il ser come n'avoit l'entent de luy tuer; and so of a tiler on a house who with a stone kills a man unwittingly, it is not felony. [4_8] But when a man shoots at the butts and wounds a man, though it is against his will, he shall be called a trespasser against his intent”.

40年后，《年鉴》报告说，里德法官在最新的一起案件中采用了费尔法克斯的观点。他说，在侵害诉讼中，“意图无法进行推断，但在重罪中，意图则可以进行推断。因为一个人在对着靶垛射箭时杀死了人，不属于重罪，et il ser come n' avoit l' entent de luy tuer（他没有故意杀死此人的意图）；同样，一位砖瓦匠，拿着一块石头在房顶上无意中砸死了人，也不属重罪。但是，一个人对着靶垛射箭，却伤到了某个人，尽管这并非他的本意，他还是应当被称为无意侵害者”。

There is a series of later shooting cases, Weaver v. Ward, [4_9] Dickenson v. Watson, [4_10] and Underwood v. Hewson, [4_11] follow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s of New York in Castle v. Duryee, [4_12] in which defences to the effect that the damage was done accidentally and by misfortune, and against the will of the defendant, were held insufficient.

后来还有一系列射击案件，如韦弗诉沃德案，迪肯森诉沃森案，以及安德伍德诉休森案，此后又有纽约州上诉法院审理的卡斯尔诉杜里埃案，在这些案件中，意外地以及不幸地，并非故意造成的损害的一些辩护理由被认定为不充分理由。

In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it was held that where a man with a gun at the door of his house shot at a fowl, and thereby set fire to his own house and to the house of his neighbor, he was liable in an action on the case generally, the declaration not being on the custom of the realm, “viz. for negligently keeping his fire.” “For the injury is the same, although this mischance was not by a common negligence, but by misadventure.“ [4_13]

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站在自家门口持枪射击一只家禽，并因此引燃了他自家的房屋和邻居的房屋，一般来说，他在间接侵害诉讼中负有责任，但这一宣判，“即，因为疏忽没有保管好他的枪”，不在本王国的习惯法上。“原因是，尽管这一倒霉事并非由一般性的过失所致，而是由于意外事故导致的，但造成的伤害却是相同的。”

The above-mentioned instances of the stick and shooting at butts became standard illustrations; they are repeated by Sir Thomas Raymond, in Bessey v. Olliot, [4_14] by Sir William Blackstone, in the famous squib case, [4_15] and by other judges, and have become familiar through the textbooks. Sir T. Raymond, in the above case, also repeats the thought and almost the words of Littleton, J., which have been quoted, and says further: “In all civil acts the law doth not so much regard the intent of the actor, as the loss and damage of the party suffering.” Sir William Blackstone also adopts a phrase from Dickenson v. Watson, just cited: “Nothing but inevitable necessity” is a justification. So Lord Ellenborough, in Leame v. Bray: [4_16] “If the injury were received from the personal act of another, it was deemed sufficient to make it trespass”; or, according to the more frequently quoted language of Grose, J., in the same case: “Looking into all the cases from the Year Book in the

21 H. VII. down to the latest decision on the subject, I find the principle to be, that if the injury be done by the act of the party himself at the time, or he be the immediate cause of it, though it happen accidentally or by misfortune, yet he is answerable in trespass." Further citations are deemed unnecessary.

上述手杖和对着靶垛射箭的例子成为了标准例证；这些例子，托马斯·雷蒙德法官在贝西诉奥利亚特案中，威廉·布莱克斯通法官在著名的鞭炮案中，以及其他法官都曾引用过，并通过教科书成为人们所通晓的例子。在上述案件中，托马斯·雷蒙德法官也重复了利特尔顿法官的观点，他直接引用了利特尔顿法官的话语，并进一步说："在所有民事行为中，法律关注更多的是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及损害，而不是行为人的意图"。威廉·布莱克斯通法官也引用了迪肯森诉沃森案中的一句话，现摘引如下："只有无法避免的必要性"才能作为辩护的理由。埃伦巴勒勋爵在利玛诉布雷案中也是这样说："如果受到的伤害来自另一个人的身体行为，这就足以构成侵害罪"；或者，根据格罗斯法官在同一案件中更经常被人引用的话："遍察所有从亨利七世21年《年鉴》中的案件开始，一直到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新裁决，我发现原则是，如果伤害当时是由当事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或者说他是伤害直接的起因，则不管伤害是意外发生还是不幸发生的，他都依然在侵害诉讼中负有责任"。我认为不需要引用更多的例子了。

In spite, however, of all the arguments which may be urged for the rule that a man acts at his peril, it has been rejected by very eminent courts, even under the old forms of action. In view of this fact, and of the further circumstance that, since the old forms have been abolished, the allegation of negligence has spread from the action on the case to all ordinary declarations in tort which do not allege intent, probably many lawyers would be surprised that any one should think it worth while to go into the present discussion.

Such is the natural impression to be derived from daily practice. But even if the doctrine under consideration had no longer any followers, which is not the case, it would be well to have something more than daily practice to sustain our views upon so fundamental a question; as it seems to me at least, the true principle is far from being articulately grasped by all who are interested in it, and can only be arrived at after a careful analysis of what has been thought hitherto. It might be thought enough to cite the decisions opposed to the rule of absolute responsibility, and to show that such a rule is inconsistent with admitted doctrines and sound policy. But we may go further with profit, and inquire whether there are not strong grounds for thinking that the common law has never known such a rule, unless in that period of dry precedent which is so often to be found midway between a creative epoch and a period of solvent philosophical reaction. Conciliating the attention of those who, contrary to most modern practitioners, still adhere to the strict doctrine, by reminding them once more that there are weighty decisions to be cited adverse to it, and that, if they have involved an innovation, the fact that it has been made by such magistrates as Chief Justice Shaw goes far to prove that the change was politic, I think I may assert that a little reflection will show that it was required not only by policy, but by consistency. I will begin with the latter.

不过，尽管有种种理由主张一个人须自行承担其行为的风险这一原则，但即使是在古老的诉讼形式之下，非常有名的法院也一直拒绝接纳这一原则。鉴于这一事实，再进一步考虑到，自古老的诉讼形式被废除以来，对过失的控诉已从间接侵害诉讼扩展到所有普通的侵权诉讼，在这些诉讼中，人们不再就意图提起诉讼；因此，许多法学家很有可能会感到惊讶，竟然还有人会认为值得花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便是从日常实践中得出的自然的印象。但是，即便根本不再有

人遵循这一原则（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要证实我们在如此根本性问题上的看法，除了日常实践之外，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因为至少在我看来，所有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人还远未准确地掌握真正的原则，只有对我们迄今为止已有的想法进行一番细致的分析，才有可能发现这真正的原则。有人可能会认为，援引一些与绝对责任原则相反的裁决，并证明该原则不符合公认的观点和合理的政策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很有必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以下观点是否有充分的理据：除了在判例缺乏期，普通法根本就不知道这一规则；在开创性的时期与在哲学上找到了出路的时期之间，人们常常发现有一段时期为判例缺乏期。与现代大多数业内人士相反，有些人依然坚持这一严格的原则；要引起这些人的注意，就需要再次提醒他们，有很多重量级的裁决可以用来反驳这一原则，而且如果这些裁决涉及到某种革新，革新也都是诸如首席大法官肖这样的司法官员作出的，这一事实充分证明革新是要政策性的；我想，我还可以断言，我们可以毫不费劲地发现革新不仅是政策使然，还是连贯一致性使然。我先从后一点讲起。

The same reasoning which would make a man answerable in trespass for all damage to another by force directly resulting from his own act, irrespective of negligence or intent, would make him answerable in case for the like damage similarly resulting from the act of his servant, in the course of the latter's employment. The discussions of the company's negligence in many railway cases [4_17] would therefore be wholly out of place, for although, to be sure, there is a contract which would make the company liable for negligence, that contract cannot be taken to diminish any liability which would otherwise exist for a trespass on the part of its employees.

让一个人在侵害诉讼中对因其本人行为直接给他人造成的全部损

害负责，而不管其行为是出于过失还是故意，那么基于同样的推理，此人也要对因其雇工在被雇佣期间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类似的损害负责。因此，很多铁路案件中有关公司过失的讨论可能完全不得要领，因为尽管确实存在一份合同让公司对过失负责，但我们却不能拿该合同来减轻其雇员方可能因侵害而存在的责任。

More than this, the same reasoning would make a defendant responsible for all damage, however remote, of which his act could be called the cause. So long, at least, as only physical or irresponsible agencies, however unforeseen, co-operated with the act complained of to produce the result, the argument which would resolve the case of accidentally striking the plaintiff, when lifting a stick in necessary self-defence, adversely to the defendant, would require a decision against him in every case where his act was a factor in the result complained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 direct application of force, and causing damage indirectly, or as a more remote consequence of one's act, although it may determine whether the form of action should be trespass or case, does not touch the theory of responsibility, if that theory be that a man acts at his peril.

不仅如此，同样的推理可能会使被告对其行为可能被称为起因的一切损害承担责任，而不管起因有多么间接。至少，不管后果是否无法预料，只要是有形的或者是无责任能力的媒介在与被控行为共同作用之下，导致了结果的产生，则在解决出于必要的自卫举起手杖意外地打到了原告的案件时所作出的推理，从不利于被告的角度而言，就会要求，在每一起案件中，只要被告的行为乃是导致被控诉结果产生的一个因素，就得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决。虽然直接用力，与间接造成损失或者与作为某人行为更加间接的后果之间存在的差别可以决定诉讼形式应为侵害诉讼还是间接侵害诉讼，但如果责任理论就是一个

人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风险，则它们之间的差异其实并未涉及责任理论。

As was said at the outset, if the strict liability is to be maintained at all, it must be maintained throughout. A principle cannot be stated which would retain the strict liability in trespass while abandoning it in case. It cannot be said that trespass is for acts alone, and case for consequences of those acts. All actions of trespass are for consequences of acts, not for the acts themselves. And some actions of trespass are for consequences more remote from the defendant's act than in other instances where the remedy would be case.

本讲一开始就说了，如果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严格责任，那就必须贯彻始终。我们不能说，在直接侵害诉讼中应坚持某项原则，而在间接侵害诉讼中却放弃这一原则。我们也不能说，直接侵害诉讼只针对行为，而间接侵害诉讼则针对于那些行为的后果。一切直接侵害诉讼针对的都是行为的后果，而不是行为本身。而且有些直接侵害诉讼所针对的后果与被告行为之间的关系不是很直接，而在其他一些需要进行赔偿的案件中，后果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要更直接一些。

An act is always a voluntary muscular contraction, and nothing else. The chain of physical sequences which it sets in motion or directs to the plaintiff's harm is no part of it, and very generally a long train of such sequences intervenes. An example or two will make this extremely clear.

一起行为始终只是一次肌肉的自主收缩，仅此而已。行为所调动

的或导致原告伤害的一系列身体反应根本就不是行为的一部分，而且中间的这种身体反应通常会很长。举一两个例子即可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When a man commits an assault and battery with a pistol, his only act is to contract the muscles of his arm and forefinger in a certain way, but it is the delight of elementary writers to point out what a vast series of physical changes must take place before the harm is done. Suppose that, instead of firing a pistol, he takes up a hose which is discharging water on the sidewalk, and directs it at the plaintiff, he does not even set in motion the physical causes which must co-operate with his act to make a battery. Not only natural causes, but a living being, may intervene between the act and its effect. Gibbons v. Pepper, [4_18] which decided that there was no battery when a man's horse was frightened by accident or a third person and ran away with him, and ran over the plaintiff, takes the distinction that, if the rider by spurring is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then he is guilty. In Scott v. Shepherd, [4_19] already mentioned, trespass was maintained against one who had thrown a squib into a crowd, where it was tossed from hand to hand in self-defence until it burst and injured the plaintiff. Here even human agencies were a part of the chain between the defendant's act and the result, although they were treated as more or less nearly automatic, in order to arrive at the decision.

当某人持枪进行人身攻击时，他唯一的行为就是以某种方式收缩手臂或食指的肌肉，不过，初级律师们会很得意地指出，在造成伤害之前，肯定会发生一系列巨大的身体变化。假定他不是开枪，而是拿起了人行道上正在放水的水管，并将水管对着原告，他甚至都不用调动什么身体反应来与其行为配合，就可形成殴击罪。在行为与其后果

之间，不仅可能存在自然因素，还有可能存在人的因素。吉本斯诉佩珀案裁定，如果某人的马因为意外或者第三方惊吓而脱缰狂奔并伤害到原告，则根本不存在殴击罪，但如果因为骑手策马疾驰而导致了意外的发生，骑手则有罪。该案采用了这一区分。上文已提到过的斯科特诉谢泼德案中，法庭主张向人群扔鞭炮的人造成了直接侵害，在此案中，为了自卫，鞭炮辗转经几个人之手，直至爆炸，伤害了原告。这里的人力甚至是被告行为与结果之间系列反应的一个部分，尽管为了得出上述裁决，而将其视为多少接近于无意识的反应。

Now I repeat, that, if principle requires us to charge a man in trespass when his act has brought force to bear on another through a comparatively short train of intervening causes, in spite of his having used all possible care, it requires the same liability, however numerous and unexpected the events between the act and the result. If running a man down is a trespass when the accident can be referred to the rider's act of spurring, why is it not a tort in every case, as was argued in Vincent v. Stinehour, [4_20] seeing that it can always be referred more remotely to his act of mounting and taking the horse out?

现在我再重复一遍，即使某人已经尽可能地小心，当其行为所产生的力量通过相对较少的系列中介因素而作用于另外一个人时，如果原则要求我们在侵害诉讼中对他提起控告，那么，不管其行为与行为的结果之间出现了多少不可预料的事件，这一原则还是要求他承担同样的责任。如果在意外可被归咎为骑手的刺马行为时，撞倒了人就属侵害行为，那么，就像在文森特诉斯庭豪尔案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什么不是每一次撞倒了人都属侵权行为呢，既然撞倒了人总是可以更为间接地归咎为骑手上马并带马出行这一行为？

Why is a man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an act innocent in its direct and obvious effects, when those consequences would not have followed but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a series of extraordinary, although natural, events? The reason is, that, if the intervening events are of such a kind that no foresight could have been expected to look out for them, the defendant is not to blame for having failed to do so. It seems to be admitted by the English judges that, even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acts of leaving dry trimmings in hot weather by the side of a railroad, and then sending an engine over the track, are negligent,that is, are a ground of liability,the consequences which might reasonably be anticipated are material. [4_21] Yet these are acts which,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can hardly be called innocent in their natural and obvious effects. The same doctrine has been applied to acts in violation of statute which could not reasonably have been expected to lead to the result complained of. [4_22]

直接明显的后果无害的一起行为，如果不是因为一系列异常的，但并非人为的事件的影响，可能就不会产生一定的后果。一个人为什么就不用对这样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呢？原因在于，如果中间介入的事件属于无法预见其后果的一类事件，那就不能指责被告未能预见到事件的后果。即便就以下问题而言，即在炎热的天气里，把剪修的枯树枝遗留在铁路边，然后就派列车上了轨道，这样一些行为是否有过失——也就是，是否是责任认定的依据，英国的法官们似乎都承认，可以合理预计到的后果还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过，在一定情况下，这些行为很难说就是无法了解其直接明显效果的行为。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违反制定法的行为，我们不可能合理预计到这些行为会产生所控的结果。

Bu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principle between the case where a

natural cause or physical factor intervenes after the act in some way not to be foreseen, and turns what seemed innocent to harm, and the case where such a cause or factor intervenes, unknown, at the time; as, for the matter of that, it did in the English cases cited. If a man is excused in the one case because he is not to blame, he must be in the other. The difference taken in Gibbons v. Pepper, cited above, is not between results which are and those which are no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defendant's acts: it is between consequences which he was bound as a reasonable man to contemplate, and those which he was not. Hard spurring is just so much more likely to lead to harm than merely riding a horse in the street, that the court thought that the defendant would be bound to look out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one, while it would not hold him liable for those resulting merely from the other; because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run away with when riding quietly, though familiar, is comparatively slight. If, however, the horse had been unruly, and had been taken into a frequented place for the purpose of being broken, the owner might have been liable, because “it was his fault to bring a wild horse into a place where mischief might probably be done.“ [4_23]

但是，以下两种情况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一种情况是，在行为之后，某种自然的原因或者物理性因素以某种不能预见的方式介入，并将看似无罪的行为转变成为伤害性行为；另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原因或者因素介入了，但当时却并不知晓。就这个问题而言，上引英国案例即是如此。如果某人在其中一种情况下被免于追究责任，因为不是他的责任，那么，他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应被免责。以上提到的吉本斯诉佩珀案中所采用的区别，不在于结果是不是被告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而在于，作为一个明理之人，后果是否是他有责任应当预计到的后果。在大街上用力策马比起在大街上简单地骑骑马，导致伤害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此，法院认为，被告有责任注意其中某一行为的后

果，但法院不会让他对另一种行为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因为，安静地骑马而马却失控的情况，尽管也比较常见，但可能性相对较小。但是，如果这匹马本来就不怎么驯服，而在制服它的过程中，被带入了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则马的主人就要承担责任，因为，“他的过错在于带一匹未被驯服的马，到了一个可能会造成伤害的地方”。

To return to the example of the accidental blow with a stick lifted in self-defenc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hitting a person standing in one's rear and hitting one who was pushed by a horse within range of the stick just as it was lifted, provided that it was not possi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n the one case to have known, in the other to have anticipated, the proximity. In either case there is wanting the only element which distinguishes voluntary acts from spasmodic muscular contractions as a ground of liability. In neither of them, that is to say, has there been an opportunity of choice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sequence complained of,—a chance to guard against the result which has come to pass. A choice which entails a concealed consequence is as to that consequence no choice.

再回到出于自卫举起手杖而意外打到人的那个例子，手杖打到了站在某人身后的一个人，与打到了被一匹马带进手杖抡起范围之内的一个人，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只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前一个案例中不可能已知身后有人，在后一个案例中也不可能预料到有人会冲过来。这两起案件中都缺乏唯一将自发行为区别于肌肉的痉挛性收缩从而构成责任之理据的要素。也就是说，在这两起案件中，对于所控告之后果，都没有选择的机会，——没有机会防止结果的产生。一项选择，如果自然蕴含某一隐性的后果，那么就该后果而言，也就别无选择。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our law is that loss from accident must lie where it falls, and this principle is not affected by the fact that a human being is the instrument of misfortune. But relatively to a given human being anything is accident which he could not fairly have been expected to contemplate as possible, and therefore to avoi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late Chief Justice Nelson of New York: “No case or principle can be found, or if found can be maintained, subjecting an individual to liability for an act done without fault on his part. All the cases concede that an injury arising from inevitable accident, or, which in law or reason is the same thing, from an act that ordinary human care and foresight are unable to guard against, is but the misfortune of the sufferer, and lays no foundation for legal responsibility.“ [4_24] If this were not so, any act would be sufficient, however remote, which set in motion or opened the door for a series of physical sequences ending in damage; such as riding the horse, in the case of the runaway, or even coming to a place where one is seized with a fit and strikes the plaintiff in an unconscious spasm. Nay, why need the defendant have acted at all, and why is it not enough that his existence has been at the expense of the plaintiff? The requirement of an act is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defendant should have made a choice. But the only possible purpose of introducing this moral element is to make the power of avoiding the evil complained of a condition of liability. There is no such power where the evil cannot be foreseen. [4_25] Here we reach the argument from policy, and I shall accordingly postpone for a moment the discussion of trespasses upon land, and of conversions, and will take up the liability for cattle separately at a later stage.

我们的法律的一般性原则是，意外产生的损失必定有其产生的条件，但这一原则并不会因为某个人乃是不幸产生的重要因素这一事实而受到影响。不过，对于某个特定的人而言，任何事情，如果预计他

根本不可能会想到，并从而予以避免的话，这件事情就属于意外事件。用已故纽约州首席大法官尼尔森的话来说："根本找不到让一个人对一起其自身并无过错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案例或者原则，或者即便能找到，也无法遵循……所有案例都承认，一起由无法避免的意外所造成的伤害，或者一起无论普通人怎么小心以及深谋远虑都无法防止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从法律或情理上看都是一回事，那就只能是受害者的不幸遭遇，并不构成法律责任的依据"。如果不是这样，则任何行为，不管是多么间接的行为，只要该行为调动或者产生了一系列身体反应，结果造成了损害，就足以构成法律责任的依据，例如，马匹失控案件中的骑马行为，或者甚至是某人来到一个地方，在此地突然犯病，并在一阵无意识的抽搐中打到了原告的行为。不仅如此，何必还要被告采取什么行为，为什么不就说被告的存在已经使得原告受到了伤害呢？一起行为的必要条件，就是被告本应该作出选择这一必要条件。但是，引入这一精神因素唯一可能的目的就是，使有能力避免产生所诉的伤害成为责任的一个条件。如果伤害无法预见，就根本不会存在这样一种能力。这里，我们从政策层面展开了讨论，稍后我将相应地对侵入他人土地以及侵占进行探讨，再接着单独谈谈因牲畜引起的责任。

A man need not, it is true, do this or that act, the term act implies a choice,—but he must act somehow. Furthermore, the public generally profits by individual activity. As action cannot be avoided, and tends to the public good, there is obviously no policy in throwing the hazard of what is at once desirable and inevitable upon the actor. The state might conceivably make itself a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 against accidents, and distribute the burden of its citizens' mishaps among all its members. There might be a pension for paralytics, and state aid for those who suffered in person or estate from tempest or wild beasts. As between individuals it might adopt the mutual insurance principle pro tanto, and divide damages when both were in fault, as in the rusticum

judicium of the admiralty, or it might throw all loss upon the actor irrespective of fault. The state does none of these things, however, and the prevailing view is that its cumbrous and expensive machinery ought not to be set in motion unless some clear benefit is to be derived from disturbing the status quo. State interference is an evil, where it cannot be shown to be a good. Universal insurance, if desired, can be better and more cheaply accomplished by private enterprise. The undertaking to redistribute losses simply on the ground that they resulted from the defendant's act would not only be open to these objections, but, as it is hoped the preceding discussion has shown, to the still graver one of offending the sense of justice. Unless my act is of a nature to threaten others, unles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 prudent man would have foreseen the possibility of harm, it is no more justifiable to make me indemnify my neighbor against the consequences, than to make me do the same thing if I had fallen upon him in a fit, or to compel me to insure him against lightning.

一个人的确不需要做这种或那种行为，行为这个术语本身就意味着某种选择，——但他肯定是以某种方式来行为。此外，个人行为一般会有利于公众。既然行为无法避免，并有利于公共利益，那么，很显然不会有任何一项政策，会将合理的同时又是不可避免的行为的风险加到行为人身上。国家很有可能会把自己变成一家防范意外的互助保险公司，把其公民的不幸遭遇之负担在全体成员之间进行分配。还可以给瘫痪病人发放养老金，可以给那些人身或财产受到暴风雨或野兽侵袭的人发放国家补助。由于个人之间至此可以采取互助保险原则，就像海事法院的简易裁决一样，在双方均有过错时分担损害，否则，就可能将所有损失都加在行为人身上，而不管其有无过错。但是，国家根本就没有这样做。普遍的看法是，除非打破现状能得到某些明显的好处，否则不应启动国家繁琐且成本高昂的机制。国家干涉，在不能被证明为善的情况下，即是一种恶。如果需要的话，可由

私人企业来提供更好更廉价的全民保险。仅仅基于损失是由被告行为造成的这一理由而承诺对损失进行再分配，不仅会招来这些反对意见，而且还面临冒犯了正义感这一更为严重的问题，希望以上的讨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除非我的行为具有对他人造成威胁的性质，除非是在审慎的人应该会预料到伤害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否则，让我就损害后果对邻居作出赔偿，这与我在一次痉挛发作中倒在邻居身上而让我对其作出赔偿，或者强迫我为其投保以防雷击一样，都没有道理。

I must now recur to th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innocent trespasses upon land, and conversions, and the supposed analogy of those cases to trespasses against the person, lest the law concerning the latter should be supposed to lie between two antinomies, each necessitating with equal cogency an opposite conclusion to the other.

现在，我得再回到从无意侵入他人土地和侵占这两类案例中所得出的结论，以及这些案例与人身侵犯所谓的类似之处，以免人们认为涉及到后者的法律介于两种悖论之中，且每一悖论都具有同样的说服力，必然可以驳倒另一结论。

Take first the case of trespass upon land attended by actual damage. When a man goes upon his neighbor's land, thinking it is his own, he intends the very act or consequence complained of. He means to intermeddle with a certain thing in a certain way, and it is just that intended intermeddling for which he is sued. [4_26] Whereas, if he accidentally hits a stranger as he lifts his staff in self defence, the fact, which is the gist of the action,namely, the contact between the staff and his neighbor's headwas not intended, and could not have been foreseen. It might be answered, to be sure, that

it is not for intermeddling with property, but for intermeddling with the plaintiff's property, that a man is sued; and that in the supposed cases, just as much as in that of the accidental blow, the defendant is ignorant of one of the facts making up the total environment, and which must be present to make his action wrong. He is ignorant, that is to say, that the true owner either has or claims any interest in the property in question, and therefore he does not intend a wrongful act, because he does not mean to deal with his neighbor's property. But the answer to this is, that he does intend to do the damage complained of. One who diminishes the value of property by intentional damage knows it belongs to somebody. If he thinks it belongs to himself, he expects whatever harm he may do to come out of his own pocket. It would be odd if he were to get rid of the burden by discovering that it belonged to his neighbor. It is a very different thing to say that he who intentionally does harm must bear the loss, from saying that one from whose acts harm follows accidentally, as a consequence which could not have been foreseen, must bear it.

首先，以侵入他人土地并伴有实际损害的案件为例。当一个人进入其邻居的土地，并认为这是自己的土地的时候，他就是有意实施了被动行为及后果。他想要以某种方式干涉某一事物，而他正是因为这一故意干涉行为而被起诉。然而，如果他在自卫的过程中举起棍子而意外地击中了一个陌生人，客观事实即是棍子与其邻居的头部之间有接触，此乃诉讼的要旨，但这件事却并非有意为之，并且是他无法预料到的。当然，对此我们可以辩解称，一个人之所以被起诉，不是因为干涉了财产，而是因为干涉了原告的财产；在这些假定的案件中，就跟意外打人的案件中一样，被告并不知晓其中构成整体环境的一个事实，而要使其行为构成为不当行为，就必须存在这一事实。也就是说，他并不知晓真正的所有者拥有或者主张所涉财产的某些利益这一事实，因此，他并非是有意要实施一起不当行为，因为他并不想要干

涉其邻居的财产。但对此又可辩解称，他确实是故意造成了所诉的损害。因故意损害使得财产价值减少的人知道财产是属于某个人的。如果他认为财产属于他本人，则不管他可能会造成什么伤害，他都得自掏腰包。如果他因为发现该财产属于他的邻居而推卸责任，这就很奇怪了。认为故意造成了伤害的人必须承担损失，与认为某人的行为意外地造成了伤害，这一后果无法预料，则此人必须承担损失，完全不是一回事。

Next, suppose the act complained of is an exercise of dominion over the plaintiff's property, such as a merely technical trespass or a conversion. If the defendant thought that the property belonged to himself, there seems to be no abstract injustice in requiring him to know the limits of his own titles, or, if he thought that it belonged to another, in holding him bound to get proof of title before acting. Consider, too, what the defendant's liability amounts to, if the act, whether an entry upon land or a conversion of chattels, has been unattended by damage to the property, and the thing has come back to the hands of the true owner. The sum recovered is merely nominal, and the payment is nothing more than a formal acknowledgment of the owner's title; which,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prescription and statutes of limitation upon repeated acts of dominion, is no more than right. [4_27] All semblance of injustice disappears when the defendant is allowed to avoid the costs of an action by tender or otherwise.

接下来，假设所诉行为乃是对原告的财产行使了支配权，比如某种单纯技术性的入侵或侵占。如果被告当时认为该财产属于他本人所有，则要求他知道自己所有权的界限，或者，如果他认为财产属于他人，则要求他一定在行为之前拿到所有权的证据，这些似乎都不存在任何抽象的不公平现象。还要考虑一下，如果被告的行为，不管是侵

占土地还是侵占动产，均未伴随对财产的损害，且财产已经返还到真正的所有者手中，那么这种情况下被告的责任又是什么？返还的金额只是名义上的，赔偿不过是正式承认了所有者的所有权；考虑到时效法规对重复支配行为的作用，这也就勉强算公正而已。当允许被告通过偿还或者别的手段来避免诉讼的时候，所有似乎不公平的现象就都不复存在了。

But suppose the property has not come back to the hands of the true owner. If the thing remains in the hands of the defendant, it is clearly right that he should surrender it. And if instead of the thing itself he holds the proceeds of a sale, it is as reasonable to make him pay over its value in trover or assumpsit as it would have been to compel a surrender of the thing. But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defendant has subsequently paid over the proceeds of the sale of a chattel to a third person, cannot affect the rights of the true owner of the chattel. In the supposed case of an auctioneer, for instance, if he had paid the true owner, it would have been an answer to his bailor's claim. If he has paid his bailor instead, he has paid one whom he was not bound to pay, and no general principle requires that this should be held to divest the plaintiff's right.

但假设该财产还没有返还到真正的所有者手上，如果财物还留在被告手上，他则应当交出财物，这显然毋庸置疑。如果被告所持有的，并非是财物本身，而是出售财物所获的收益，那么，在追索诉讼或者追偿诉讼中让他赔偿财物价值即是合理的，等同于迫使他交出财物一样合理。但是，至于说被告是否已随后把出售动产所得收益给了第三方，这并不会对动产真正的所有者的权利产生影响。例如，在一起假定的拍卖商相关案件中，如果拍卖商已将钱支付给了真正的所有者，他即可以此来回应寄托人的索赔。但如果拍卖商把钱支付给了寄托人，那他就是把钱付给了一个他没有必要一定要付钱的人。没有任

何一项基本原则规定应以此剥夺原告的权利。

Another consideration affecting the argument that the law as to trespasses upon property establishes a general principle, is that the defendant's knowledge or ignorance of the plaintiff's title is likely to lie wholly in his own breast, and therefore hardly admits of satisfactory proof. Indeed, in many cases it cannot have been open to evidence at all at the time when the law was settled, before parties were permitted to testify. Accordingly, in Basely v. Clarkson, [4_28] where the defence set up to an action of trespass quare clausum was that the defendant in mowing his own land involuntarily and by mistake mowed down some of the plaintiff's grass, the plaintiff had judgment on demurrer. “For it appears the fact was voluntary, and his intention and knowledge are not traversable; they can't be known.”

侵犯财产罪相关的法律是否构成一项普遍原则，影响这一观点的另一考虑因素是，被告是否知道原告拥有所有权可能完全只有他自己知道，因此很难被采信为令人满意的证据。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在允许当事人出庭作证之前，根本无法考虑证据。因此，在贝斯利诉克拉克森案中，针对侵入他人土地的诉讼，被告给出的答辩理由是，被告在自己的土地上割草的时候，无意中错割了原告的一些草；根据抗辩，原告得到了如下判决：“因为，看上去好像是故意行为，其意图以及是否知晓原告拥有所有权也无法辩驳；这些都无法知晓”。

This language suggests that it would be sufficient to explain the law of trespass upon property historically, without attempting to justify it. For it seems to be admitted that if the defendant's mistake

could be proved it might be material. [4_29] It will be noticed, further, that any general argument from the law of trespass upon land to that governing trespass against the person is shown to be misleading by the law as to cattle. The owner is bound at his peril to keep them off his neighbor's premises, but he is not bound at his peril in all cases to keep them from his neighbor's person.

这一说法表明，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侵犯财产罪相关的法律可能就足够了，用不着试图证明其合理性。因为，我们似乎可以承认，被告的错误如能被证实即为实质性错误。此外，我们还会注意到，任何一般性的观点，从侵入他人土地罪相关法律到侵犯人身罪相关法律，都表明受到了牲畜相关法律的误导。所有者必须自行确保牲畜不会进入其邻居的土地，但并非所有情况下他都必须自行确保牲畜不侵犯其邻居的人身。

The objections to such a decision as supposed in the case of an auctioneer do not rest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liability, but spring altogether from the special exigencies of commerce. It does not become unjust to hold a person liable for unauthorized intermeddling with another's property, until there arises the practical necessity for rapid dealing. But where this practical necessity exists,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find, and we do find, a different tendency in the law. The absolut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however natural to a primitive community more occupied in production than in exchange, is hardly consisten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business. Even when the rules which we have been considering were established, the traffic of the public markets was governed by more liberal principles. On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it was long ago decided that the policy of protecting titles must yield to the policy of protecting trade. Casaregis held that the

general principle nemo plus juris in alium transferre potest quam ipse habet must give way in mercantile transactions to possession vaut titre. [4_30] In later times, as markets overt have lost their importance, the Factors' Acts and their successive amendments have tended more and more in the direction of adopting the Continental doctrine.

针对诸如拍卖商案件中所认定的裁决，各种反对的理由并非基于责任的一般性理论，而是完全出于特殊的商业需要。除非因为实际要求而必须快速交易，否则，判处一个人对未经授权插手他人财产的行为承担责任并无不公之处。但是，如果存在这种实际必要性时，我们会发现法律表现出某种不同的倾向，这一点不足为奇，我们也确实发现如此。对财产予以绝对的保护，尽管在主要从事生产而非贸易的原始社会里非常自然，但却很难合乎近代商业的要求。即使我们一直所探讨的这些规则得以确立，公开市场的贸易还是遵循更为宽松的原则。欧洲大陆很早以前就已经确定，保护财产权利的政策必须让位于保护贸易的政策。凯撒吉斯主张，nemo plus juris in alium transferre potest quam ipse habet（任何人不得转让与他人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这一总原则，在商业交易中必须让位给占有即所有这一原则。后来，因为公开市场已经失去了其重要性，《代销商法》及随后陆续进行的修订都越来越倾向于采纳欧洲大陆的学说。

I must preface the argument from precedent with a reference to what has been said already in the first Lecture about early forms of liability, and especially about the appeals. It was there shown that the appeals de pace et plagis and of mayhem became the action of trespass, and that those appeals and the early actions of trespass were always, so far as appears, for intentional wrongs. [4_31]

要讨论由判例得出的观点，我有必要先提一下第一讲中关于早期责任形式，尤其是关于侵害之诉的讨论。第一讲中表明，扰乱治安之诉及重伤之诉演变为侵害之诉，而那些诉讼以及早期的侵害之诉自开始出现起，就一直属于故意不当行为。

The contra pacem in the writ of trespass was no doubt inserted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king's writ; but there seems to be no reason to attribute a similar purpose to vi et armis, or cum vi sua, as it was often put. Glanvill says that wounds are within the sheriff's jurisdiction, unless the appellor adds a charge of breach of the king's peace. [4_32] Yet the wounds are given vi et armis as much in the one case as in the other. Bracton says that the lesser wrongs described by him belong to the king's jurisdiction, “because they are sometimes against the peace of our lord the king,“ [4_33] while, as has been observed, they were supposed to be always committed intentionally. It might even perhaps be inferred that the allegation contra pacem was originally material, and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trespasses formerly involved the liability to pay a fine to the king. [4_34]

在侵害之诉令状中加入破坏治安一词，无疑为国王发布该令状奠定了基础，但似乎没有理由认为在诉令状中加入使用武力一词乃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尽管人们常常这样认为。格兰维尔说，身体伤害属于郡长司法管辖权范围之内，除非起诉人增加了一条破坏国王治安的指控。然而，在这样或那样的案件中，伤害几乎都是因为武力而致。布莱克顿说，他所描述的较轻一些的不当行为，属于国王的司法管辖权范围之内，“因为它们有时会扰乱我国国王的治安”，同时，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些行为一直都被认为是故意实施的行为。也许甚至可以推论说，破坏治安的指控最初是实质性的，这让我们想起侵害之诉以往涉及到向国王支付罚金的责任。

If it be true that trespass was originally confined to intentional wrongs, it is hardly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argument drawn from the scope of the general issue. In form it was a mitigation of the strict denial de verbo in verbum of the ancient procedure, to which the inquest given by the king's writ was unknown. [4_35] The strict form seems to have lasted in England some time after the trial of the issue by recognition was introduced. [4_36] When a recognition was granted, the inquest was, of course, only competent to speak to the facts, as has been said above. [4_37] When the general issue was introduced, trespass was still confined to intentional wrongs.

如果侵害之诉最初确实仅限于故意不当行为，那就几乎没有必要对从概括否认范畴中所得出的观点进行探讨。从形式上看，这是对古代口头程序中之严格口头否认的一种缓和，这种程序还不太了解如何根据国王的令状进行审讯。在英格兰，这一严格的程序形式似乎一直持续到确定审理系争点这一形式被引入之后的若干时间。在得到确定之后，如上所述，审理当然就能对事实进行证明。在引入了概括否认这一形式之后，侵害之诉仍然局限于故意不当行为的范畴之内。

We may now take up the authorities.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the earlier precedents are of a date when the assize and jurata had not given place to the modern jury. These bodies spoke from their own knowledge to an issue defined by the writ, or to certain familiar questions of fact arising in the trial of a cause, but did not hear the whole case upon evidence adduced. Their function was more limited than that which has been gained by the jury, and it naturally happened that, when they had declared what the defendant had done, the judges laid down the standard by which those acts were to be measured without their assistance. Hence the

question in the Year Books is not a loose or general inquiry of the jury whether they think the alleged trespasser was negligent on such facts as they may find, but a well-defined issue of law,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court, whether certain acts set forth upon the record are a ground of liability.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judges may have dealt pretty strictly with defendants, and it is quite easy to pass from the premise that defendants have been held trespassers for a variety of acts, without mention of neglect,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ny act by which another was damaged will make the actor chargeable. But a more exact scrutiny of the early books will show that liability in general, then as later, was founded on the opinion of the tribunal that the defendant ought to have acted otherwise, or, in other words, that he was to blame.

现在我们来看看判例。我们还记得，较早一些的判例，其所发生的时间是在巡回审判和合意陪审制还未让位于现代陪审制度之时。这些机构从自身所了解的情况出发，对令状所述系争点发表观点，或者对诉案审理过程中所提出的某些熟悉的事实问题发表意见，但并不根据当事人的举证来听审整个案件。相比较陪审团现有的功能而言，他们当时的功能比较有限，因此，当时很自然的情况是，在他们宣读完被告所犯罪行之后，法官即可自行制定量刑的标准，而无需他们帮助。因此，向陪审团所提出随意或一般性的询问，询问他们，根据其所发现的事情，是否认为被指控的侵害方存在疏忽，这并非各部《年鉴》所关注的问题；《年鉴》所关注的是经过严格界定的法律问题，即案卷陈述的某些行为是否为责任的依据，这一问题要由法院来界定。法官有可能对被告方非常严格，而且从被告方因为各种不同的行为，不用说疏忽，而被定为侵害方这一前提出发，很容易得出任何导致他人受损的行为，行为人都对此负有责任这一结论。但是，更仔细地研读早期判例集后会发现，一般意义上的责任，当时与后来一样，都建立在如下法庭意见的基础之上：被告本不应当这样做，或者，换句话说，他应当负有责任。

Returning first to the case of the thorns in the Year Book, [4_38]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falling of the thorns into the plaintiff's close, although a result not wished by the defendant, was in no other sense against his will. When he cut the thorns, he did an act which obviously and necessarily would have that consequence, and he must be taken to have foreseen and not to have prevented it. Choke, C. J. says, “As to what was said about their falling in, ipso invito, that is no plea, but he ought to show that he could not do it in any other way, or that he did all in his power to keep them out”; and both the judges put the unlawfulness of the entry upon the plaintiff's land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unlawfulness of dropping the thorns there. Choke admits that, if the thorns or a tree had been blown over upon the plaintiff's land, the defendant might have entered to get them. Chief Justice Crew says of this case, in Millen v. Fawdry, [4_39] that the opinion was that “trespass lies, because he did not plead that he did his best endeavor to hinder their falling there; yet this was a hard case.” The statements of law by counsel in argument may be left on one side, although Brian is quoted and mistaken for one of the judges by Sir William Blackstone, in Scott v. Shepherd.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年鉴》收录的树篱案。我们发现，树篱掉落到原告的围地，尽管被告不希望出现这一结果，但也绝不能说是违背了他的意志。在他砍倒树篱的时候，他就实施了一起显然且必然会产生那一后果的行为，应当设想他已经预见到该后果，却没有防止这一后果的发生。首席法官乔克说，“至于说到树篱掉落到原告的土地上，违反了被告的意愿，这根本就不能构成辩护的理由，相反地，被告应当证明，他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或者他已尽全力不让树篱掉落到原告的土地上”；两位法官都认为非法闯入原告土地，是让树篱掉落到原告土地这一非法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乔克承认，如果树篱或者一

棵树被风吹倒后掉入原告的土地，被告可以进入原告的土地把它们捡起来。首席大法官克鲁在米伦诉福德里案中谈及这个案子时说，裁决的理由是，“非法侵入是成立的，因为他没有辩护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防止树篱掉入原告的土地；但这依然是个棘手的案件”。辩护律师在为被告辩护时所做的法律陈述现在可以放在一边了，尽管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在斯科特诉谢泼德案中引用了布莱恩律师的话，但他误将其当作一位法官。

The principal authorities are the shooting cases, and, as shooting is an extra—hazardous act, it would not be surprising if it should be held that men do it at their peril in public places. The liability has been put on the general ground of fault, however, wherever the line of necessary precaution may be drawn. In Weaver v. Ward, [4_40] the defendant set up that the plaintiff and he were skirmishing in a trainband, and that when discharging his piece he wounded the plaintiff by accident and misfortune, and against his own will. On demurrer, the court says that “no man shall be excused of a trespass,except it may be judged utterly without his fault. As if a man by force take my hand and strike you, or if here the defendant had said, that the plaintiff ran cross his piece when it was discharging, or had set forth the case with the circumstances so as it had appeared to the court that it had been inevitable, and that the defendant had committed no negligence to give occasion to the hurt.” The later cases simply follow Weaver v. Ward.

主要的判例是射击案。由于射击是一种极端危险的行为，因此，主张人们在公共场所射击时应自担风险，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无论对必要的预防措施任何定义，责任的一般依据都在于过错。在韦弗诉沃德案中，被告提出，他和原告在民兵队团服役时参加了一场小规模战争，他在开枪时，由于意外，加上运气也不好，打伤了原告，但这

并不是他的本意。在针对抗辩作出的判决中，法庭说，“任何有侵害行为的人都不会被宽恕，除非可以判定他完全没有过错。比如，一个人因为要用力抓住我的手而打到了你，或者在这个案件中，如果被告说，原告在被告正在开枪的时候从他的手枪前跑过，或者陈述了案件当时的情况，从而使得法庭意识到，那一后果是不可避免的，被告对于造成此伤害不存在任何过失”。此后的案件完全遵循韦弗诉沃德案。

The quotations which were made above in favor of the strict doctrine from Sir T. Raymond, in Bessey v. Olliot, and from Sir William Blackstone, in Scott v. Shepherd, are both taken from dissenting opinions. In the latter case it is pretty clear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court considered that to repel personal danger by instantaneously tossing away a squib thrown by another upon one's stall was not a trespass, although a new motion was thereby imparted to the squib, and the plaintiff's eye was put out in consequence. The last case cited above, in stating the arguments for absolute responsibility, was Leame v. Bray. [4_41] The question under discussion was whether the action (for running down the plaintiff) should not have been case rather than trespass, the defendant founding his objection to trespass on the ground that the injury happened through his neglect, but was not done wilfully. There was therefore no question of absolute responsibility for one's acts before the court, as negligence was admitted; and the language used is all directed simply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damage need not have been done intentionally.

以上两段引语，都支持托马斯·雷蒙德爵士在贝西诉奥利亚特案、以及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在斯科特诉谢泼德案中所坚持的原则，且两段引语都出自法庭的异议意见。在斯科特诉谢泼德案中，显而易见，

多数法官都认为，为了消除自身危险，在一瞬间将一只由另一人扔出的爆竹乱扔到了某人的货摊上，不属于侵害行为，尽管这只鞭炮由此产生了新的运动，且原告的眼睛最终失明。在支持绝对责任观点的案例中，上引最后一个案例是利玛诉布雷案。此案所争论的问题是：如果被告反驳的理由是，伤害是因疏忽而导致的，并非是有意为之，则该动作（撞倒了原告）是否不应属于直接侵害，而应属于间接侵害。因此，呈现在法庭面前的问题，就不是一个人行为的绝对责任问题，因为已经承认存在过失；且所采用的说法完全指向了该损害没有必要蓄意为之这一命题。

In Wakeman v. Robinson, [4_42] another runaway case, there was evidence that the defendant pulled the wrong rein, and that he ought to have kept a straight course. The jury were instructed that, if the injury was occasioned by an immediate act of the defendant, it was immaterial whether the act was wilful or accidental. On motion for a new trial, Dallas, C. J. said, “If the accident happened entirely without default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 or blame imputable to him, the action does not lie….The accident was clearly occasioned by the default of the defendant. The weight of evidence was all that way. I am now called upon to grant a new trial, contrary to the justice of the case, upon the ground, that the jury were not called on to consider whether the accident was unavoidable, or occasioned by the fault of the defendant.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learned judge who presided would have taken the opinion of the jury on that ground, if he had been requested so to do”. This language may have been inapposite under the defendant's plea (the general issue), but the pleadings were not adverted to, and the doctrine is believed to be sound.

在另一起马匹脱缰奔跑案，韦客曼诉罗宾逊案中，有证据表明被

告拉错了缰绳，且本应沿直线前进。陪审团得到的指示是，只要伤害系被告直接行为所致，则该行为究竟是属于有意还是意外行为并不重要。针对重新审理该案的申请，首席大法官达拉斯说，“如果意外发生时，被告方完全没有过错，或者完全不负有责任，则该诉讼就不能成立，此意外显然是因被告方过错而致。证据的效力也完全说明了这一点。现在被告提请同意重新审理，依据是法官并未要求陪审团考虑该意外是否不可避免还是因被告过错而致，这有悖于本案的公正。毫无疑问，如果被告当初提出了这一要求的话，则主持审理本案的博学的法官可能就会据此采纳陪审团的意见”。从被告的答辩（概括否认）来看，这种说法可能不太恰当，不过此案并未免于答辩，这一原则被认为是正确的。

In America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decisions to the point. In Brown v. Kendall, [4_43] Chief Justice Shaw settled the question for Massachusetts. That was trespass for assault and battery, and it appeared that the defendant, while trying to separate two fighting dogs, had raised his stick over his shoulder in the act of striking, and had accidentally hit the plaintiff in the eye, inflicting upon him a severe injury. The case was stronger for the plaintiff than if the defendant had been acting in self-defence; but the court held that, although the defendant was bound by no duty to separate the dogs, yet, if he was doing a lawful act, he was not liable unless he was wanting in the care which men of ordinary prudence would us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nd that the burden was on the plaintiff to prove the want of such care.

针对这一点，在美国有若干种裁决。在布朗诉肯德尔案中，首席大法官肖为马萨诸塞州人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起人身侵害之诉的情况是这样的：被告在试图分开两只正在打斗的狗的时候，在打狗的行为过程中，把他的手杖举过肩膀，意外地打到了原告的眼睛，导致其重

伤。相比较被告是出于自卫而采取行为而言，在本案中原告的理由更充分一些。但法院却认为，尽管被告根本没有义务要分开两只打斗的狗，但是，如果他采取的行为是合法的，那么，除非他不够小心，未尽到普通人在那种情况下应有的小心审慎，否则，他就不存在责任，而原告则负有证明被告未能尽到这种小心审慎的职责。

In such a matter no authority is more deserving of respect than that of Chief Justice Shaw, for the strength of that great judge lay in an accurate appreciation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mmunity whose officer he was. Some, indeed many, English judges could be named who have surpassed him in accurate technical knowledge, but few have lived who were his equals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grounds of public policy to which all laws must ultimately be referred. It was this which made him, in the language of the late Judge Curtis, the greatest magistrate which this country has produced.

在这样一个问题上，首席大法官肖是最值得人尊敬的权威，因为，这位伟大法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准确把握了其所服务的群体的要求。有一些，甚至是有很多可以说得出名字的英国法官，他们在准确理解专业知识方面都超过了他，但是，就对于公共政策依据的理解方面，几乎无人可与他媲美，而一切法律归根结底都与公共政策相关。用已故法官柯蒂斯的话来说，正是这一点使得他成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地方法官。

Brown v. Kendall has been followed in Connecticut, [4_44] in a case where a man fired a pistol, in lawful self-defence as he alleged, and hit a bystander. The court was strongly of opinion that the defendant was not answerable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respass,

unless there was a failure to use such care as was practic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 foundation of liability in trespass as well as case was said to be negligence.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given the sanction of its approval to the same doctrine. [4_45] The language of Harvey v. Dunlop [4_46] has been quoted, and there is a case in Vermont which tends in the same direction. [4_47]

康涅迪格州的一起案件遵循了布朗诉肯德尔案，在这起案件中，一个人在他自己声称的合法自卫过程中，举起手枪开枪，并击中了一位旁观者。法院强烈主张，被告不应依据侵害之诉的一般原则承担法律责任，除非他没有尽到在那种情况下应尽的小心谨慎。侵害及间接侵害之诉的责任依据在当时被认为是过失。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一原则予以了认可。哈维诉邓洛普案中的说法被人们所援引，佛蒙特州有一件案子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倾向。

Supposing it now to be conceded that the general notion upon which liability to an action is founded is fault or blameworthiness in some sense, the question arises, whether it is so in the sense of personal moral shortcoming, as would practically result from Austin's teaching. The language of Rede, J., which has been quoted from the Year Book, gives a sufficient answer. “In trespass the intent” (we may say more broadly, the defendant's state of mind) “cannot be construed”. Suppose that a defendant were allowed to testify that, before acting, he considered carefully what would be the conduct of a prudent man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nd, having formed the best judgment he could, acted accordingly. If the story was believed, it would be conclusive against the defendant's negligence judged by a moral standard which would take hi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into account. But supposing any such evidence to have got before the jury,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court

would say, Gentlemen,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the defendant thought his conduct was that of a prudent man, but whether you think it was. [4_48]

假设退一步说，对诉讼责任依据的一般性看法是某种意义上的过错或可责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是个人道德缺陷意义上的过错或可责性，而根据奥斯丁的学说事实上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年鉴》引用了里德法官的话，给出了充分的回答。“在侵害之诉中，意图”（我们可以说得更宽泛一些，是被告的心理状态）“是无法进行推断的”。假设允许被告来证实，他是否在采取行动之前，认真地考虑了在那种情况之下一个审慎的人可能采取的做法，并在得出其所能得到的最佳判断之后，相应地采取了行动。假如被告的证词被采信了，那就不会得出被告存在过失的结论，而根据某种将被告的个人特征考虑在内的道德标准，被告却存在过失。但是，假设是在陪审团面前提审这样的证据，很明显，法庭会说：先生们，问题不在于被告是否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一个审慎之人的行为，而在于你们是否这样认为。

Some middle point must be found between the horns of this dilemma.

我们必须在这两难之间找到一个折衷的办法。

The standards of the law are standard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The law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infinite varieties of temperament, intellect, and education which make the internal character of a given act so different in different men. It does not attempt to see men as God sees them, for more than one sufficient reason. In the

first place, the impossibility of nicely measuring a man's powers and limitations is far clearer than that of ascertaining his knowledge of law, which has been thought to account for what is called the presumption that every man knows the law. But a more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is, that, when men live in society, a certain average of conduct, a sacrifice of individual peculiarities going beyond a certain point, is necessary to the general welfare. If, for instance, a man is born hasty and awkward, is always having accidents and hurting himself or his neighbors, no doubt his congenital defects will be allowed for in the courts of Heaven, but his slips are no less troublesome to his neighbors than if they sprang from guilty neglect. His neighbors accordingly require him, at his proper peril, to come up to their standard, and the courts which they establish decline to take his personal equation into account.

法律标准为普遍适用的标准。法律不重视气质、智力以及教育等各种变数，这些变数使得某一既定行为的内在特征在不同人身上大相径庭。法律并不试图像上帝那样看待人类，其充分理由不止有一个。首先，相比较查明一个人对法律的了解而言，准确地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及缺陷的不可能性显然要大得多，这被认为是对所谓的人人都懂法这一推论的解释。但是，更令人满意的解释是，人们在社会中生活时，对行为的某种约束，即牺牲超出某个平均点之外的那些个人特征，对于普遍福利而言是必要的。比如，一个人如果生来就比较草率而笨拙，总是引起一些事故，伤害他自己或者他的邻居。他天生的缺陷在上帝的法庭上无疑会得到宽恕，但他所犯的错误给其邻居带来的麻烦，一点都不亚于如因过失罪而导致的错误。邻居们因此要求他自担风险，达到他们的标准要求，而他们所成立的法庭会拒绝考虑他的个人因素。

The rule that the law does, in general, determine liability by

blameworthiness, is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 that minute differences of character are not allowed for. The law considers, in other words, what would be blameworthy in the average man, the man of ordinary intelligence and prudence, and determines liability by that. If we fall below the level in those gifts, it is our misfortune; so much as that we must have at our peril, for the reasons just given. But he who is intelligent and prudent does not act at his peril, in theory of law. On the contrary, it is only when he fails to exercise the foresight of which he is capable, or exercises it with evil intent, that he is answerable for the consequences.

法律一般根据可归责性来确定责任，这一规则也有其局限性，因为该规则不考虑性格上的细微差异。换句话说，法律考虑的是，对于普通人，即具有正常智力及审慎的人来说，可归责的标准是什么，并据此确定责任。如果我们在智力以及谨慎度方面都处于该标准之下，那就是我们的不幸，根据以上给出的理由，我们对此只能自担风险。但是，在法律理论中，理智而审慎的人不自行承担其行为的风险。相反地，只有当他未能运用他所具备的预见力，或者运用这种预见力时心怀邪恶的企图，他才须对后果负责。

There are exceptions to the principle that every man is presumed to possess ordinary capacity to avoid harm to his neighbors, which illustrate the rule, and also the moral basis of liability in general. When a man has a distinct defect of such a nature that all can recognize it as making certain precautions impossible, he will not be held answerable for not taking them. A blind man is not required to see at his peril; and although he is, no doubt, bound to consider his infirmity in regulating his actions, yet if he properly finds himself in a certain situation, the neglect of precautions requiring eyesight would not prevent his recovering for

an injury to himself, and, it may be presumed, would not make him liable for injuring another. So it is held that, in cases where he is the plaintiff, an infant of very tender years is only bound to take the precautions of which an infant is capable; the same principle may be cautiously applied where he is defendant. [4_49] Insanity is a more difficult matter to deal with, and no general rule can be laid down about i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n many cases a man may be insane, and yet perfectly capable of taking the precautions, and of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motives, which the circumstances demand. But if insanity of a pronounced type exists, manifestly incapacitating the sufferer from complying with the rule which he has broken, good sense would require it to be admitted as an excuse.

人人都假定拥有避免伤害其周围的人的正常能力这一原则也有一些例外。这些例外体现了一般责任制度的规则和道德基础。如果一个人具有某种明显的缺陷，人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一缺陷使他无法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那么，他就不需要对未能采取预防措施负责。法律不会要求盲人自行负有观看的责任；尽管毫无疑问，他在控制自己的行为时有义务考虑到自己的缺陷，但是，如果他正好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境况之下，而他疏于采取正常视力的人可能采取的一些防范措施，这一点不会妨碍到他因为伤害到自己而获得救济，那么，我们可以推定，他不应对因疏于采取某些防范措施伤害到他人承担责任。同样可以说，在幼儿作为原告的案件中，他只有义务采取一个幼儿有能力采取的防范措施，同样的原则可谨慎适用于幼儿为被告的案件中。精神病是更难处理的问题，对此不可能制定普适的原则。毫无疑问，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尽管患有精神病，但却完全有能力采取当时情况下所要求的防范措施，其行为完全能够受到动机的影响。但是，如果属于一类非常明显的精神病，并且明显使得患者没有能力遵守他所违反了的规则，那么，合理性会要求我们承认其为免责的理由。

Taking the qualification last establish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eneral proposition previously laid down, it will now be assumed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law presumes or requires a man to possess ordinary capacity to avoid harming his neighbors, unless a clear and manifest incapacity be shown; but that, on the other, it does not in general hold him liable for unintentional injury, unless, possessing such capacity, he might and ought to have foreseen the danger, or, in other words, unless a man of ordinary intelligence and forethought would have been to blame for acting as he did. The next question is, whether this vague test is all that the law has to say upon the matter, and the same question in another form, by whom this test is to be applied.

把最后所确定的一项条件与前面所提出的一般性命题联系起来，就可以得出：一方面，法律推定或者要求一个人具有正常的避免伤害其周围的人的能力，除非能够证明存在某种清楚、显著的无行为能力；但另一方面，除非他拥有该行为能力，他可能且应当能预见到危险，或者，换句话说，除非一个具有正常理智和预见力的人采取了同样的行为是应被归责的，否则，不能笼统地主张他对无意的伤害承担责任。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这一模糊的检验标准是否是法律有关于此的全部内容；同样的问题换一种表述方式就是，由谁来适用这一检验标准？

Notwithstanding the fact that the grounds of legal liability are moral to the extent above explained, it must be borne in mind that law only works within the sphere of the senses. If the external phenomena, the manifest acts and omissions, are such as it requires, it is wholly indifferent to the internal phenomena of conscience. A man may have as bad a heart as he chooses, if his conduct is within the rules. In other words, the standards of the law are external

standards, and, however much it may take moral considerations into account, it does so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drawing a line between such bodily motions and rests as it permits, and such as it does not. What the law really forbids, and the only thing it forbids, is the act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line, be that act blameworthy or otherwise.

尽管事实是，法律责任的依据在上述范围内乃是道德性的，但我们必须记住，法律只在理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如果法律所要求的是外部现象，是外显的行为及不作为，那么，法律对良心这种内在现象则毫无兴趣。一个人的内心，想怎么坏都行，只要他的行为处于规则范围内即可。换句话说，法律的标准是外在的标准，不管法律将多少道德因素考虑在内，其目的只是为了划出诸如法律所允许的身体的动静行为与其所不允许的身体的动静行为之间的界限。法律所真正禁止的，而且是其所唯一禁止的事情就是，处于界限错误一侧的行为，而不论其是否应受到归责。

Again, any legal standard must, in theory, be one which would apply to all men, not specially excepted, under the same circumstances. It is not intended that the public force should fall upon an individual accidentally, or at the whim of any body of men. The standard, that is, must be fixed. In practice, no doubt, one man may have to pay and another may escap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feelings of different juries. But this merely shows that the law does not perfectly accomplish its ends. The theory or intention of the law is not that the feeling of approbation or blame which a particular twelve may entertain should be the criterion. They are supposed to leave their idiosyncrasies on one side, and to represent the feeling of the community. The ideal average prudent man, whose equivalent the jury is taken to be in many cases, and whose

culpability or innocence is the supposed test, is a constant, and his conduct under given circumstances is theoretically always the same.

此外，任何法律标准理论上都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标准，在同等情况下，不存在特例。这并不意味着，公共力量可能会意外地，或是在任何团体突发奇想的情况下，攻击某个人。也就是说，标准必须是固定不变的。毫无疑问，在现实中，根据不同陪审团的不同看法，一个人可能得付出代价，另一个人却可以逃脱。但这只能说明，法律没有完全实现其目的。法律的理论或目的并不是把个别十二个人可能持有的认为有罪或者无罪的看法当成是标准。他们应当把自己的特殊想法抛在一边，代表社会的看法。在很多案件中，陪审团成员都被等同于理想中的一般审慎之人，他们眼里的有罪或者无罪应当是假定的检验标准，他们始终如一，在一定情况下的做法理论上一直保持不变。

Finally, any legal standard must, in theory, be capable of being known. When a man has to pay damages, he is supposed to have broken the law, and he is further supposed to have known what the law was.

最后，任何法律标准理论上都必须能被人知晓。如果某人必须对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他首先应当是违反了法律，其次还应当是知法犯法。

If, now, the ordinary liabilities in tort arise from failure to comply with fixed and uniform standards of external conduct, which every man is presumed and required to know, it is obvious that it ought to be possible, sooner or later, to formulate these standards at least to some extent, and that to do so must at last be

the business of the court. It is equally clear that the featureless generality, that the defendant was bound to use such care as a prudent man would do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ught to be continually giving place to the specific one, that he was bound to use this or that precaution under these or those circumstances. The standard which the defendant was bound to come up to was a standard of specific acts or omissions, with reference to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in which he found himself. If in the whole department of unintentional wrongs the courts arrived at no further utterance than the question of negligence, and left every case, without rudder or compass, to the jury, they would simply confess their inability to state a very large part of the law which they required the defendant to know, and would assert, by implication, that nothing could be learned by experience. But neither courts nor legislatures have ever stopped at that point.

如果一般侵权责任归因于违反了固定统一的外部行为标准，假定人人都要求知晓这些标准，那么，这些标准迟早应当可能明确予以表述，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予以表述，这最终肯定是法院的职责。同样很明显的是，被告有义务尽到一个审慎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可能尽到的小心谨慎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特点的笼统的表述，应当总是让位给如下具体的表述：他有义务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或那种防范措施。被告有义务遵循的标准，是具体的行为或不作为的标准，与其所处的具体环境相关。如果在整个有关无意侵权的部门法中，法院给出的意见没有超出过失的问题，并把每起案件都留给陪审团处理，却又不给其指明方向，那么，法院就该坦率地承认，它自己没有能力对这一庞大的部门法作出规定，尽管它还要求被告应当知法，且法院的言下之意是，从经验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但是，不管是法院还是立法机构，都从来没有止步于这一点。

From the time of Alfred to the present day, statutes and decisions have busied themselves with defining the precautions to be taken in certain familiar cases; that is, with substituting for the vague test of the care exercised by a prudent man, a precise one of specific acts or omissions. The fundamental thought is still the same, that the way prescribed is that in which prudent men are in the habit of acting, or else is one laid down for cases where prudent men might otherwise be in doubt.

从阿尔弗雷德大帝时代至今，制定法及法院判决都忙于对某些常见情况下应采取的防范措施进行界定；也就是说，忙于用针对具体行为或不作为的严格的检验标准，来取代审慎之人所应尽的小心这样一个模糊的检验标准。两者的基本思路还是一致的，即对审慎之人惯有的行为方式进行界定，或者在审慎之人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对某一种行为方式进行界定。

It will be observ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e external tests of liability which will be mentioned, while it illustrates the tendency of the law of tort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concrete by judicial decision and by statute,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the general doctrine maintained as to the grounds of liability. The argument of this Lecture, although opposed to the doctrine that a man acts or exerts force at his peril, is by no means opposed to the doctrine that he does certain particular acts at his peril. It is the coarseness, not the nature, of the standard which is objected to. If, when the question of the defendant's negligence is left to a jury, negligence does not mean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defendant's mind, but a failure to act as a prudent man of average intelligence would have done, he is required to conform to an objective standard at his peril, even in that case. When a more exact and specific rule has been arrived at,

he must obey that rule at his peril to the same extent. But, further, if the law is wholly a standard of external conduct, a man must always comply with that standard at his peril.

我们会发现，尽管责任外部检验标准的存在表明了侵权法通过司法裁决及制定法而变得越来越具体的趋势，但它却并未动摇有关责任依据的一般性原则。有关责任的外部检验标准，将会在后面提及。本讲所提出的观点，尽管反对一个人应对其行为或作为自行负责这样一种观点，但却无意反对一个人要对其所实施的某些具体行为自行负责这一观点。其所反对的，不是该标准的本质，而是该标准不够明确。如果法院把被告是否存在过失的问题留给了陪审团，过失指的不是被告的实际心理状态，而是指被告未能像具有正常理智的审慎之人那样行事，那么，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也必须遵守某一客观标准，否则就要承担责任。如果已经得出了一个更加准确而具体的标准，被告也必须同样遵守这一标准，否则将负有相同的责任。但进一步说，如果法律完全只是某种外部行为标准，那么，人们就必须一直遵守该标准，否则就要承担责任。

Some examples of the process of specification will be useful. In LL. Alfred, 36, [4_50] providing for the case of a man's staking himself on a spear carried by another, we read, “Let this (liability) be if the point be three fingers higher than the hindmost part of the shaft; if they be both on a level, be that without danger.”

这里有必要举一些具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例子。在《阿尔弗雷德法典》第36章中，对某人因他人所持的一根长矛致死的情形作出了规定，其中说道：“假如矛杆的尖端比杆的顶端高出三指，就存在这（责任）；假如两者处于同一水平面，就不存在危险”。

The rule of the road and the sailing rules adopted by Congress from England are modern examples of such statutes. By the former rule, the question has been narrowed from the vague one, was the party negligent? To the precise one, was he on the right or left of the road? To avoid a possible misconception, it may be observed that, of course, this ques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and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decide that of liability; a plaintiff may have been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road, as he may have been negligent, and yet the conduct of the defendant may have been unjustifiable, and a ground of liability. [4_51] So, no doubt, a defendant could justify or excuse being on the wrong side,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lleging that a defendant was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road, and that he was negligen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allegation of facts requiring to be excused by a counter allegation of further facts to prevent their being a ground of liability, and an allegation which involves a conclusion of law, and denies in advance the existence of an excuse. Whether the former allegation ought not to be enough, and wheth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act ought not to shift the burden of proof, are questions which belong to the theory of pleading and evidence, and could be answered either way consistently with analogy. I should have no difficulty in saying that the allegation of facts which are ordinarily a ground of liability, and which would be so unless excused, ought to be sufficient. But the forms of the law, especially the forms of pleading, do not change with every change of its substance, and a prudent lawyer would use the broader and safer phrase.

美国国会从英格兰所继受的道路交通与航行规则即是这类制定法的现代典范。根据道路交通规则，所争议的问题就从一个含糊的问题，即当事人是否存在过失这样一个问题，就缩小为一个具体的问题，即他是在道路的左侧还是右侧？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有必

要指出，这一具体的问题当然不见得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决定行为的责任；原告可能出于自己的过失而在道路的错误的一侧，但被告的行为可能仍不合理，并成为责任的依据。因此，毫无疑问，在有些情况下，被告可以就其处于道路错误一侧的合理性进行说明或辩解。主张被告处于道路错误的一侧，与主张他有过失，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即是如下两种主张之间的差别：一种主张是通过提供进一步的事实进行反证，从而对事实进行辩解，使之不能成为责任的依据；另一主张则涉及到某一法律结论，预先就否认了辩解的存在。前一种主张是否不太充分，对事实的确证是否转移了举证的职责，这些乃是属于诉答及举证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但不管怎样，都能通过类比一致予以回答。我可以毫不困难地说，对于通常构成责任之依据的事实进行指控应当就足够了，而这些事实除非进行辩解否则就会构成责任的依据。但是，法律的程式，尤其是诉答的程式，并不会随着其实质内容的每一次变化而变化，审慎的法学家就会运用更宽泛、更保险的措辞。

The same course of specification which has been illustrated from the statute-book ought also to be taking place in the growth of judicial decisions. That this should happen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ast history of the law. It has been suggested already that in the days of the assize and jurata the court decided whether the facts constituted a ground of liability in all ordinary cases. A question of negligence might, no doubt, have gone to the jury. Common sense and common knowledge are as often sufficient to determine whether proper care has been taken of an animal, as they are to say whether A or B owns it. The cases which first arose were not of a kind to suggest analysis, and negligence was used as a proximately simple element for a long time before the need or possibility of analysis was felt. Still, when an issue of this sort is found, the dispute is rather what the acts or omissions of the defendant were than on the standard of conduct. [4_52]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functions of court and jury does not come in question until the

parties differ as to the standard of conduct. Negligence, like ownership, is a complex conception. Just as the latter imports the existence of certain facts, and also the consequence (protection against all the world) which the law attaches to those facts; the former imports the existence of certain facts (conduct) and also the consequence (liability) which the law attaches to those facts. In most cases the question is upon the facts, and it is only occasionally that one arises on the consequence.

制定法汇编所体现的具体化过程，在司法判决的演变过程中也同样应该出现。其应该出现是合乎普通法历史的。上文已经指出，在巡回审判及合意陪审制时代，所有普通案件都要由法院来判决，事实是否构成为责任的依据。毫无疑问，有关过失的问题可能已交由陪审团来处理。判定对牲畜是否采取了必要的小心措施，与他们判定是甲还是乙拥有这头牲畜一样，常识及一般性知识通常就足够了。最早出现的那些案件不属于需要进行分析的一类案件，在人们意识到有必要或者可能需要进行分析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过失被当成一种近乎简单的因素。另外，发现了这类系争点时，引发争议的与其说是行为的标准，不如说是被告的行为或不作为是什么。在法院与陪审团对行为的标准产生分歧之后，他们两者之间功能的差异才开始被予以考虑。与所有权一样，过失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后者意味着某些事实的存在，还包括法律附着于这些事实的后果（保护所有权不受任何人的侵害）；同样地，前者也意味着某些事实（行为）的存在，还包括法律附着于这些事实的后果（责任）。在大多数案件中，系争点在于事实，偶尔才由后果引起。

It will have been noticed how the judges pass on the defendant's acts (on grounds of fault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case of the thorns, and that in Weaver v. Ward [4_53] it is said that the facts constituting an excuse, and showing that the defendant was

free from negligence, should have been spread upon the record, in order that the court might judge. A similar requirement was laid down with regard to the defence of probable cause in an action for malicious prosecution. [4_54] And to this day the question of probable cause is always passed on by the court. Later evidence will be found in what follows.

树篱案已经涉及到法官如何对被告的行为进行裁决（以过错及公共政策为依据），而韦弗诉沃德案则表明，为了使法官能够作出裁决，那些构成免责之理由、并且证明被告不存在过失的事实，应当在法庭记录中展示出来。在一起针对恶意指控提起的诉讼中，也记载了类似的需要对合理根据进行辩护的要求。直到今天，合理根据的问题还是一直由法院作出裁决。更晚期的证据还可在下文可以找到。

There is, however,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which has not yet been adverted to. It is undoubtedly possible that those who have the making of the law should deem it wise to put the mark higher in some cases than the point established by common practice at which blameworthiness begins. For instance, in Morris v. Platt, [4_55] the court, while declaring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hat, in general, negligence is the foundation of liability for accidental trespasses, nevertheless hints that, if a decision of the point were necessary, it might hold a defendant to a stricter rule where the damage was caused by a pistol, in view of the danger to the public of the growing habit of carrying deadly weapons. Again, it might well seem that to enter a man's house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a present, or inquiring after his health when he was ill, was a harmless and rather praiseworthy act, although crossing the owner's boundary was intentional. It is not supposed that an action would lie at the present day for such a cause, unless the defendant had

been forbidden the house. Yet in the time of Henry VIII. it was said to be actionable if without license, “for then under that color my enemy might be in my house and kill me.“ [4_56] There is a clear case where public policy establishes a standard of overt acts without regard to fault in any sense. In like manner, policy established exceptions to the general prohibition against entering another's premises, as in the instance put by Chief Justice Choke in the Year Book, of a tree being blown over upon them, or when the highway became impassable, or for the purpose of keeping the peace. [4_57]

不过，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还没有提到。无疑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在那些法律制定者看来，提高某些案件中的标准提高，使之高于通常所设的可归责性标准的起点是明智的。例如，在莫里斯诉普拉特案件中，法院尽管使用强硬的措辞，宣称过失一般是意外侵害责任认定的依据，但又暗示说，如果说有必要对可归责性标准的起点进行界定，那么，考虑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携带致命武器的习惯对公众造成的危险，法院可能会要求被告遵从更为严格的规则。此外，进入某人的住宅，目的是为了送礼，或者探病，这样的行为很可能没有恶意，而且毋宁说是值得称道的行为，尽管进入房主的地界属于故意行为。这就是说，今天人们不可能会因为这一缘由提起诉讼，除非被告被禁止进入该住宅。然而，在亨利八世时代，若未获得许可，即可对此行为提起诉讼，“因为当时我的仇敌可能会以此为借口进入我家杀死我”。显然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公共政策确立了外在行为的标准，但却未考虑到任何意思上的过失。同样地，针对禁止进入他人领地的一般性禁令，公共政策对一些例外情况进行了规定，比如，首席大法官乔客在《年鉴》中所列举的例外情况就包括树被风刮到了他人的领地，或者当公路无法通行的时候，或者为了睦邻友好的目的。

Another example may perhaps be found in the shape which has been given in modern times to the liability for animals, and in the

derivative principle of Rylands v. Fletcher, [4_58] that when a person brings on his lands, and collects and keeps there, anything likely to do mischief if it escapes, he must keep it in at his peril; and, if he does not do so, is prima facie answerable for all the damage which is the natural consequence of its escape. Cases of this sort do not stand on the notion that it is wrong to keep cattle, or to have a reservoir of water, as might have been thought with more plausibility when fierce and useless animals only were in question. [4_59] It may even be very much for the public good that the dangerous accumulation should be made (a consideration which might influence the decision in some instances, and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but as there is a limit to the nicety of inquiry which is possible in a trial, it may be considered that the safest way to secure care is to throw the risk upon the person who decides what precautions shall be taken. The liability for trespasses of cattle seems to lie on the boundary line between rules based on policy irrespective of fault, and requirements intended to formulate the conduct of a prudent man.

在现代动物致害责任的形成过程中，以及在赖兰兹诉弗莱彻案的派生原则中，也许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即在某人把一动物带到其领地上，并看管、饲养该动物的情况下，如果该动物逃逸就有可能造成损害，那么，此人就负有看管好该动物的责任；如果他没有尽到看管的责任，初步表明他须对动物逃逸必然会造成的一切损害承担责任。这类案件并非基于饲养牲畜或者拥有蓄水池属不当行为这一观点之上，如果所涉及的只是凶猛而无益的动物，这样的想法也许还有些道理。为了公共利益甚至可能使危险增大（这一考虑可能会对一些案件的裁决产生影响，而且不同辖区裁决也不同）；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行的调查的精确度是有限的，因此可以认为，确保人们小心谨慎的最保险的办法，是将风险加于那些决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防范措施的人身上。牲畜致害责任的认定似乎处于两种规则的交界处，

一种以公共政策为基础而不考虑过错，一种旨在对审慎之人的行为进行规范。

It has been shown in the first Lecture how this liability for cattle arose in the early law, and how far the influence of early notions might be traced in the law of today. Subject to what is there said, it is evident that the early discussions turn on the general consideration whether the owner is or is not to blame. [4_60] But they do not stop there: they go on to take practical distinctions, based on common experience. Thus, when the defendant chased sheep out of his land with a dog, and as soon as the sheep were out called in his dog, but the dog pursued them into adjoining land, the chasing of the sheep beyond the defendant's line was held no trespass, because “the nature of a dog is such that he cannot be ruled suddenly.“ [4_61]

第一讲已经指出了这种牲畜致害责任在早期法中的形成过程，以及早期观念对今天的法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根据第一讲所述，很显然早期的探讨引发了关于牲畜所有者是否应当负责这样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不过，当时的探讨并未止于此，接下来又根据一般经验作出了实用性的划分。因此，如果被告让一只狗去把羊从他的地里赶出去，等羊刚被赶出了他的地界，他就唤狗回来，但狗却追着羊到了毗邻的领地上，则这个行为不构成侵入，因为“狗的天性如此，不能立刻将它控制住”。

It was lawful in ploughing to turn the horses on adjoining land, and if while so turning the beasts took a mouthful of grass, or subverted the soil with the plough, against the will of the driver, he had a good justification, because the law will recognize that a man cannot at every instant govern his cattle as he will. [4_62] So it was

said that, if a man be driving cattle through a town, and one of them goes into another man's house, and he follows him, trespass does not lie for this. [4_63] So it was said by Doderidge, J., in the same case, that if deer come into my land out of the forest, and I chase them with dogs, it is excuse enough for me to wind my horn to recall the dogs, because by this the warden of the forest has notice that a deer is being chased. [4_64]

在犁地的时候，马掉头闯入邻地是合法的，如果马掉头的时候还吃了一口邻地的草，或者用犁弄乱了邻人的地，这都并非犁地人的本意，那么，犁地人的理由就会很充分，因为法庭会意识到，一个人不可能让其牲畜时刻都服从他的意志。同样也可以说，如果某人正赶着牲口穿过一座城镇，其中一只牲口闯入了他人的住宅，此人跟着进去，这并不构成侵入。法官多德里奇在类似的案件中也同样这样说：如果鹿出了林地闯入到我的土地，我带着狗去驱赶它们，则我吹哨子召回我的狗的行为，完全应当予以原谅，因为这样做就会让守林人会注意到，有一只鹿正在被驱赶。

The very case of Mason v. Keeling, [4_65] which is referred to in the first Lecture for its echo of primitive notions, shows that the working rules of the law had long been founded on good sense. With regard to animals not then treated as property, which in the main were the wilder animals, the law was settled that, “if they are of a tame nature, there must be notice of the ill quality; and the law takes notice, that a dog is not of a fierce nature, but rather the contrary.“ [4_66] If the animals “are such as are naturally mischievous in their kind, he shall answer for hurt done by them, without any notice.“ [4_67] The latter principle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case of a bear, [4_68] and amply accounts for the liability of the owner of such animals as horses and oxen in respect of trespasses

upon land, although, as has been seen, it was at one time thought to stand upon his ownership. It is said to be the universal nature of cattle to stray, and, when straying in cultivated land, to do damage by trampling down and eating the crops, whereas a dog does no harm. It is also said to be usual and easy to restrain them. [4_69] If, as has been suggested,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rule was different, it does not matter.

梅森诉柯林一案因其对原始观念的重复而在第一讲中提及，此案表明，法律的原理机制长期以来一直都以合理性为基础。关于当时不被看作财产的动物——其中主要是比较野性的动物，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即使它们天性比较驯服，也必须小心其发脾气；法院提请注意，狗不属于天性凶猛的动物，而是恰恰相反”。如果这些动物“是那类天生就具有危害性的动物，他就应当为它们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而毋须事先提醒”。后一原则曾适用于关于一只熊的案件，并足以说明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诸如马和牛这类动物侵入土地时动物所有者所负有的责任，尽管，如前所示，这种责任一度曾被认为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之上。牲畜挣脱缰绳，并在脱缰之后闯入农田，践踏及蚕食庄稼从而造成损害，这被认为是牲畜普遍的天性，而狗则不会造成任何损害。也有人认为牲畜通常比较容易管束。即使如前所述，有关该规则的历史起源不尽相同，但这无关紧要。

Following the same line of thought, the owner of cattle is not held absolutely answerable for all damage which they may do the person. According to Lord Holt in the above opinion, these animals, “which are not so familiar to mankind” as dogs, “the owner ought to confine, and take all reasonable caution that they do no mischief. But, if the owner puts a horse or an ox to grass in his field, which is adjoining to the highway, and the horse or the ox breaks the hedge and runs into the highway, and kicks or gores some passenger, an

action will not lie against the owner; otherwise, if he had notice that they had done such a thing before.”

遵循同一思路，就不应主张牲畜所有者对牲畜可能给人身造成的所有损害负有绝对负责。根据霍尔特勋爵在避暑别墅案的法院裁决意见书中的说法，这些动物，“人类对它们不像”对狗“那样熟悉”，“其所有者就应当管住它们，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提防他们造成伤害。但是，如果主人让一匹马或者一头牛在自己的田地里吃草，他的田毗邻公路，这匹马或者这头牛冲破了围栏，闯到了公路上，踢伤或者顶伤了某个过往的行人，则行人不得对牲畜的主人提起诉讼；但如果主人知道它们以前曾经闯过这样的祸，则应对他提起诉讼”。

Perhaps the most striking authority for the position that the judge's duties are not at an end when the question of negligence is reached, is shown by the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law of bailment. Consider the judgment in Coggs v. Bernard, [4_70] the treatises of Sir William Jones and Story, and the chapter of Kent upon the subject. There are so many attempts to state the duty of the bailee specifically,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bailment and of the object bailed. Those attempts, to be sure, were not successful, partly because they were attempts to engraft upon the native stock a branch of the Roman law which was too large to survive the process, but more especially because the distinctions attempted were purely qualitative, and were therefore useless when dealing with a jury. [4_71] To instruct a jury that they must find the defendant guilty of gross negligencebefore he can be charged, is open to the reproach that for such a body the word “gross” is only a vituperative epithet. But it would not be so with a judge sitting in admiralty without a jury. The Roman law and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gree that the word means something. [4_72]

Successful or not, it is enough for the present argument that the attempt has been made.

涉及到过失问题时，法官的职责并未结束。这一看法最引人注目的判例，也许可以在有关保释制度的论述中看到。可以看一看柯吉斯诉伯纳德案中的判决，威廉·琼斯爵士和斯托里大法官的著述，以及肯特对此问题进行论述的章节。人们多次尝试根据保释的性质以及保释的对象具体阐述受托人的义务。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尝试并不成功，部分原因是这些尝试企图将罗马法的一个分支嫁接在本土法之上，但此分支太过于庞大，无法在嫁接的过程中留存下来；但主要还是因为，试图作出的区分纯粹是性质上的区分，因此在涉及到陪审团时，没有任何用处。法官指示陪审团说，他们必须查明被告犯有重大过失之后才可对被告提起指控，但是这一指示却容易受到这样的指责，即在陪审团这样一个团体看来，“重大”一词只会是一个带有强烈否定意义的表达。但对于主持没有陪审团的海事法庭的法官而言，却并非如此。罗马法和美国最高法院一致认为，该词的确有一定内涵。不过，不管尝试是否成功，却足以说明人们曾经做出过尝试这一观点。

The principles of substantive law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courts 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somewhat obscured by having presented themselves oftenest in the form of rulings upon the sufficiency of evidence. When a judge rules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negligence, he does something more than is embraced in an ordinary ruling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 fact. He rules that acts or omissions proved or in question do not constitute a ground of legal liability, and in this way the law is gradually enriching itself from daily life, as it should. Thus, in Crafton v. Metropolitan Railway Co., [4_73] the plaintiff slipped on the defendant's stairs and was severely hurt. The cause of his slipping was that the brass nosing of the stairs had been worn smooth by

travel over it, and a builder testified that in his opinion the staircase was unsafe by reason of this circumstance and the absence of a hand-rail. There was nothing to contradict this except that great numbers of persons had passed over the stairs and that no accident had happened there, and the plaintiff had a verdict. The court set the verdict aside, and ordered a nonsuit. The ruling was in form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negligence to go to the jury; but this was obviously equivalent to saying, and did in fact mean, that the railroad company had done all that it was bound to do in maintaining such a staircase as was proved by the plaintiff. A hundred other equally concrete instances will be found in the text-books.

法院所制定的实体法原则被认为已经变得有些模糊，因为这些原则通常表现出来的形式是有关证据充分性的规定。当法官裁定不存在过失的证据时，其裁定已经超出了一起普通的、不存在某一事实证据的裁定所包含的意义。法官的裁定是，被证明或所涉及的行为或不作为并不构成法律责任认定的依据。就这样，法律不断从日常生活中吸取营养，情况也理应如此。于是，在克拉夫顿诉大都会铁路公司案中，原告在被告的台阶上滑倒并重伤。原告滑倒的原因是，台阶的黄铜包边由于被人踩踏已经磨得很光滑了，一位建筑工人作证说，由于这一原因以及楼梯缺少扶手，楼梯是不安全的。除了有很多人通过楼梯而并未发生事故外，对此不存在任何争议，陪审团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裁决。法庭则将陪审团的裁决放到一边，驳回了起诉。裁决采取了这样的程式：任何过失的证据都并未呈交陪审团；不过，这显然等于是说，并且事实上也的确意味着，就原告所证明的该楼梯的维护来说，铁路公司已经完全尽到了其责任。在教科书中也可以找到许多其他同样具体的案例。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court should rule that certain acts or

omissions coupled with damage were conclusive evidence of negligence unless explained, it would, in substance and in truth, rule that such acts or omissions were a ground of liability, [4_74] or prevented a recovery, as the case might be. Thus it is said to be actionable negligence to let a house for a dwelling knowing it to be so infected with small-pox as to be dangerous to health, and concealing the knowledge. [4_75] To explain the acts or omissions in such a case would be to prove different conduct from that ruled upon, or to show that they were not, juridically speaking, the cause of the damage complained of. The ruling assumes,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ruling, that the facts in evidence are all the facts.

另一方面，如果法院裁定某些行为或不作为以及其所造成的损害如不作辩解，即是过失的决定性证据，那么，法院本质上及事实上作出的裁定是，该行为或不作为乃是责任认定的依据，或者是无需做出赔偿的依据。因此，明知一栋房子曾被天花感染过而对健康有害，却隐瞒这一情况，将其出租供人居住，即被认为是可起诉的过失。要对这类案件中的行为或者不作为作出解释就得证明，相比较被审查的行为，其他行为的正确性；或者证明，该行为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并不是所诉损害造成的原因。为便于裁决，裁决假定证据中的事实即是全部事实。

The cases which have raised difficulties needing explanation are those in which the court has ruled that there was prima facie evidence of negligence, or some evidence of negligence to go to the jury.

那些提出异议，需要作出解释的案件，法庭作出的裁决是，初步证据表明存在过失，或者有些过失证据应交由陪审团裁定。

Many have noticed the confusion of thought implied in speaking of such cases as presenting mixed questions of law and fact. No doubt, as has been said above, the averment that the defendant has been guilty of negligence is a complex one: first, that he has done or omitted certain things; second, that his alleged conduct does not come up to the legal standard. And so long as the controversy is simply on the first half, the whole complex averment is plain matter for the jury without special instructions, just as a question of ownership would be where the only dispute was as to the fact upon which the legal conclusion was founded. [4_76] But when a controversy arises on the second half,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court or the jury ought to judge of the defendant's conduct is wholly unaffected by the accident, whether there is or is not also a dispute as to what that conduct was. If there is such a dispute,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to give a series of hypothetical instructions adapted to every state of facts which it is open to the jury to find. If there is no such dispute, the court may still take their opinion as to the standard. The problem is to explain the relative functions of court and jury with regard to the latter.

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在提到这些呈现出各种混杂的事实与法律问题的案件时，其中所隐含的观点混淆不清。毫无疑问，如上述所说，证明被告犯有过失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首先需要证明他是否做过某些事情；其次，还要证明其被指控的行为不合乎法律标准。只要争议完全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上，整个复杂的证明过程对于陪审团来说就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无需特别进行指导，就好像唯一的争议涉及到作为法律结论之基础的事实问题就是所有权问题之时那样。但是，如果在第二个问题上产生了争议，那么，应该是由法庭还是由陪审团对被告的行为进行审判这一问题，则不管对于什么是被控行为这一问题是否还存在着争议，都完全不会受到意外事件的影响。如果

还存在这样的争议，那么，就完全可以根据陪审团有待查明的每一事实状况，进行一系列推理指导。如果不存在任何这样的争议，法庭仍然可以采纳他们对行为标准的意见。问题在于，在涉及到陪审团时，要对法庭和陪审团各自的职责予以解释。

When a case arises in which the standard of conduct, pure and simple, is submitted to the jury, the explanation is plain. It is that the court, not entertaining any clear views of public policy applicable to the matter, derives the rule to be applied from daily experience, as it has been agreed that the great body of the law of tort has been derived. But the court further feels that it is not itself possessed of sufficient practical experience to lay down the rule intelligently. It conceives that twelve men taken from the practical part of the community can aid its judgment. [4_77] Therefore it aids its conscience by taking the opinion of the jury.

如果发生了一起案件，其中所涉及的行为标准非常简单，该案件被提交给了陪审团，那么，这一解释的过程就会非常简单。这就是说，公共政策针对这一问题持有的明确观点，法院并没有任何记载，法院根据日常经验得出所要适用的规则；人们一致认为，侵权法大多数规则，就是如此得出的。但法院进而却认为，其自身所拥有的实践经验还不足以明智地制定法规。法院认为，从社会实践部门中挑选出来十二名陪审团成员能对其判决过程有所帮助。因此，法院采纳陪审团意见，使自己心安理得一些。

But supposing a state of facts often repeated in practice, is it to be imagined that the court is to go on leaving the standard to the jury forever? Is it not manifest, on the contrary, that if the jury is, on the whole, as fair a tribunal as it is represented to be, the lesson

which can be got from that source will be learned? Either the court will find that the fair teaching of experience is that the conduct complained of usually is or is not blameworthy, and therefore, unless explained, is or is not a ground of liability; or it will find the jury oscillating to and fro, and will see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up its mind for itself. There is no reason why any other such question should not be settled, as well as that of liability for stairs with smooth strips of brass upon their edges. The exceptions would mainly be found where the standard was rapidly changing, as, for instance, in some questions of medical treatment. [4_78]

但是，倘若某种事实状态经常在现实中重现，那我们是不是就要设想，法院接下来就会将行为标准的问题始终都交留陪审团来决定呢？正相反，如果陪审团就整体上而言非常公正，与其所代表的审判庭一样公正，那么，陪审团所获得的实际经验教训，法院也会获得，这一点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法院会发现，从经验得出的有益教训是，被控行为通常是具有或者不具有可归责性，因此，除非作出解释，否则，它就构成或者不构成责任的依据；或者法院会发现陪审团的意见摇摆不定，自己有必要拿定主意。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包括楼梯黄铜包边磨平的责任问题，法院都没有理由不予解决。例外情况主要发生在那些标准急剧变更的领域，比如医疗领域。

If this be the proper conclusion in plain cases, further consequences ensue. Facts do not often exactly repeat themselves in practice; but cases with comparatively small variations from each other do. A judge who has long sat at nisi prius ought gradually to acquire a fund of experience which enables him to represent the common sense of the community in ordinary instances far better than an average jury. He should be able to lead and to instruct them in detail, even where he thinks it desirable, on the whole, to take

their opinion. Furthermore, the sphere in which he is able to rule without taking their opinion at all should be continually growing.

如果这就是简单案件中所得出的结论，接下来还会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在现实中，案情通常不会精确地重现；但是，彼此差异较小的案件却是如此。一位长期主持初审法庭的法官应当会逐渐获得丰富的经验，从而使他相比较普通的陪审团而言，更能代表一般情况下的社会常识。即使他认为大体上采纳陪审团的意见是可取的，他也应当有能力引导陪审团，并在细节上对他们予以指导。此外，法官能够作出裁决，而无需采纳陪审团意见的情况，应当会不断增加。

It has often been said, that negligence is pure matter of fact, or that, after the court has declared the evidence to be such that negligence may be inferred from it, the jury are always to decide whether the inference shall be drawn. [4_79] But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ourts, when they lay down this broad proposition, are thinking of cases where the conduct to be passed upon is not proved directly, and the main or only question is what that conduct was, not what standard shall be applied to it after it is established.

过失常被认为是纯粹的事实问题，或者说，在法庭已经宣布了证据为可推断出过失罪的证据之后，陪审团通常要决定是否应当作出该推断。但人们却认为，法庭在提出这一宽泛的命题时，其所考虑的是有待裁定的行为无法直接予以证明的那些案件，其中主要或唯一的问题是该行为究竟是什么，而不是在该行为成立之后，其适用的标准是什么。

Most cases which go to the jury on a ruling that there is

evidence from which they may find negligence, do not go to them principally on account of a doubt as to the standard, but of a doubt as to the conduct. Take the case where the fact in proof is an event such as the dropping of a brick from a railway bridge over a highway upon the plaintiff, the fact must be inferred that the dropping was due, not to a sudden operation of weather, but to a gradual falling out of repair which it was physically possible for the defendant to have prevented, before there can be any question as to the standard of conduct. [4_80]

提交给陪审团的大多数案件，都是根据法官作出的裁定，认为存在着陪审团可据此认定过失罪的证据。这些案件之所以交给陪审团，主要不是因为对行为标准存有疑问，而是对行为本身存有疑问。举个有待证明的事实是具体事件的案件为例，一块砖从一座架在一条公路上方的铁路桥上掉下来，砸在了原告身上，在对行为的标准产生任何怀疑之前，肯定要推导是否存在这一事实，即砖块的掉落不是因为天气骤变所致，而是因为年久失修所致，且被告从本质上而言应当可能防止这一事实的发生。

So, in the case of a barrel falling from a warehouse window, it must be found that the defendant or his servants were in charge of it, before any question of standard can arise. [4_81] It will be seen that in each of these well-known cases the court assumed a rule which would make the defendant liable if his conduct was such as the evidence tended to prove. When there is no question as to the conduct established by the evidence, as in the case of a collision between two trains belonging to the same company, the jury have, sometimes at least, been told in effect that, if they believed the evidence, the defendant was liable. [4_82]

因此，如果一只桶从一家仓库的橱窗掉落下来，在这个案件中，在对有关标准产生任何怀疑之前，肯定要认定原告或其雇员是否对这只桶负有看管责任。可以看到，这些著名案件中的每一例案件，法庭都假定有这样一条规则，即如果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的行为，则被告即负有责任。就像在同属一家公司的两列火车相撞案中一样，如果对证据所确证的行为没有任何疑问，那么，陪审团事实上就会被告知，尽管不是每次如此，只要陪审团认为证据可信，被告即负有法律责任。

The principal argument that is urged in favor of the view that a more extended function belongs to the jury as matter of right, is the necessity of continually conforming our standards to experience. No doubt the general foundation of legal liability in blameworthiness, as determined by the existing average standards of the community, should always be kept in mind, for the purpose of keeping such concrete rules as from time to time may be laid down conformable to daily life. No doubt this conformity is the practical justification for requiring a man to know the civil law, as the fact that crimes are also generally sins is one of the practical justifications for requiring a man to know the criminal law. But these considerations only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precedents should be overruled when they become inconsistent with present conditions; and this has generally happened, except with regar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eeds and will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very desirable to know as nearly as we can the standard by which we shall be judged at a given moment, and, moreover, the standards for a very large part of human conduct do not vary from century to century.

坚持认为陪审团有权拥有更多职责的观点，其首要的论据是，有必要使我们的标准永远与经验保持一致。毫无疑问，为了使不时制定

的具体法规与日常生活保持一致，我们应当始终牢记，社会现有的通行标准即决定了法律责任的一般性依据在于可归责性。毫无疑问，这种一致性乃是要求一个人必须知晓民法的现实理由，就好像“违法的罪行也一般都是违背神意的原罪”这一事实乃是要求一个人必须知晓刑法的现实理由一样。但是，这些观点只会导向以下结论：判例如不合乎现状，就应当被推翻；这种情况一般也会发生，只有涉及到对合同及遗嘱的解释时例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有必要尽可能地了解在某一时期可以对我们予以评判的标准；此外，多少个世纪以来针对大多数人类行为所制定的标准也并未随时间而变化。

The considerations urged in this Lecture are of peculiar importance in this country, or at least in States where the law is as it stands in Massachusetts. In England, the judges at nisi prius express their opinions freely on the value and weight of the evidence, and the judges in banc, by consent of parties, constantly draw inferences of fact. Hence nice distinctions as to the province of court and jury are not of the first necessity. But when judges are forbidden by statute to charge the jury with respect to matters of fact, and when the court in banc will never hear a case calling for inferences of fact, it become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understand that, when standards of conduct are left to the jury, it is a temporary surrender of a judicial function which may be resumed at any moment in any case when the court feels competent to do so. Were this not so, the almost universal acceptance of the first proposition in this Lecture, that the general foundation of liability for unintentional wrongs is conduc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 prudent man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would leave all our rights and duties throughout a great part of the law to the necessarily more or less accidental feelings of a jury.

本讲所强调的观点在本国，或者至少是在法律与马萨诸塞州相似的那些州中尤其重要。在英格兰，巡回法院的法官可以就证据的价值及分量自由地发表意见，法官席上的法官也可在征得当事方同意之后，不断地对事实进行推断。因此，把法庭与陪审团之间的界限划分清楚并非第一紧要的事情。但是，如果法律禁止法官把有关事实问题委托给陪审团，如果法官出庭，但在听审案件时却绝对不能对事实进行推断，那么，明白这一点则至关重要，即如果是由陪审团来确定行为的标准，那就等于法庭暂时放弃了某种司法职能，但在法庭认为有能力的时候，则又可以随时恢复这一职能。如若不然，则本讲所提出的第一个命题，即无意过失责任的一般性依据乃是其行为有别于审慎之人在当时情况下所采取的行为，如果人人都接受这一点观点，这就会意味着把贯穿于大部分法律之中的我们的全部权利及义务，交由陪审团来决定，他们的意见必然多少带有些偶然性。

It is perfectly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s maintained in this Lecture that the courts have been very slow to withdraw questions of negligence from the jury, without distinguishing nicely whether the doubt concerned the facts or the standard to be applied. Legal, like natural divisions, however clear in their general outline, will be found on exact scrutiny to end in a penumbra or debatable land. This is the region of the jury, and only cases falling on this doubtful border are likely to be carried far in court. Still, the tendency of the law must always be to narrow the field of uncertainty. That is what analogy, as well as the decisions on this very subject, would lead us to expect.

在没有弄清楚疑问究竟是涉及到事实还是有待适用的标准之前，法院不会轻易取消陪审团对过失问题的决定权，这与本讲所主张的观点完全一致。法律的分界线与自然界的分界线一样，尽管大致轮廓非常清晰，但是，经过仔细考察，结果总可以发现模糊或者有争议的地

方。这即是陪审团的职责范围，只有处于这一可疑的边界线上的案件，才有可能在法庭上争执很长时间。尽管这样，法律发展的趋势肯定是不断缩小不确定性因素的范围。这即是我们根据以上分析及有关这一问题的判决，可以预见到的情形。

The growth of the law is very apt to take place in this way. Two widely different cases suggest a general distinction, which is a clear one when stated broadly. But as new cases cluster around the opposite poles, and begin to approach each other, the distinction becomes more difficult to trace; the determinations are made one way or the other on a very slight preponderance of feeling, rather than of articulate reason; and at last a mathematical line is arrived at by the contact of contrary decisions, which is so far arbitrary that it might equally well have been drawn a little farther to the one side or to the other, but which must have been drawn somewher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where it falls. [4_83]

法律往往就是以这种方式不断发展的。两起差异很大的案件表明了一种大致的区分，这种区分如若概括就非常清楚。但是，当新的案件被归为这截然对立的两类案件中的一类时，新案件彼此开始相互趋近，原来的差异就难以发现了；确定属于这一边还是那一边，只能依靠少许感觉上的优势，而非明晰的理由；最终，通过与相反的观点进行对比，从而划出一条精准的界线，这是一条非常任意的界线，因此，这条线往这边或那边多偏一点，同样都可行，但是，这条线一定得划在其所处的邻近区域。

In this way exact distinctions have been worked out upon questions in which the elements to be considered are few. For instance, what is a reasonable time for presenting negotiable paper,

or what is a difference in kind and what a difference only in quality, or the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

通过这种方式，法律对有待考虑因素很少的一些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区分。例如，出示流通票据的合理时间是什么，或者种类上的区别是什么，以及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或者反永久拥有权规则又是什么。

An example of the approach of decisions towards each other from the opposite poles, and of the function of the jury midway, is to be found in the Massachusetts adjudications, that, if a child of two years and four months is unnecessarily sent unattended across and down a street in a large city, he cannot recover for a negligent injury; [4_84] that to allow a boy of eight to be abroad alone is not necessarily negligent; [4_85] and that the effect of permitting a boy of ten to be abroad after dark is for the jury; [4_86] a coupled with the statement, which may be ventured on without authority, that such a permission to a young man of twenty possessed of common intelligence has no effect whatever.

截然不同的两类案例，其所作出的裁决却彼此接近的例子，以及陪审团其间所起到作用的例子，可以从马萨诸塞州的法庭判决中看到：如果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让一个2岁零4个月大的孩子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横穿一座大城市的街道，则他所遭受的过失损伤就不能得到赔偿；允许一个8岁男孩独自外出，则不一定犯有过失罪；但允许一个10岁的男孩在天黑之后独自外出，其后果要由陪审团来判断；再加上这样一种说法，即允许一个20岁拥有正常心智的年轻人天黑之后独自外出就不会造成任何后果，尽管缺乏判例支持，但也可以大胆得出这一说法。

Take again the law of ancient lights in England. An obstruction to be actionable must be substantial. Under ordinary circumstances the erection of a structure a hundred yards off, and one foot above the ground, would not be actionable. One within a foot of the window, and covering it, would be, without any finding of a jury beyond these facts. In doubtful cases midway,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interference was substantial has been left to the jury. [4_87] But as the elements are few and permanent, an inclination has been shown to lay down a definite rule, that, in ordinary cases, the building complained of must not be higher than the distance of its base from the dominant windows. And although this attempt to work out an exact line requires much caution, it is entirely philosophical in spirit. [4_88]

再举英格兰有关采光权的古老法律为例。可被提起诉讼的遮挡了光线的障碍物必须实际存在。在正常情况下，在100码之外竖起一栋建筑，且该物体高出地面一英尺，这种情况不会引起诉讼。如果一栋建筑物与窗户相隔不到一英尺，并遮盖了窗户，则可能会引起诉讼，无需陪审团查找其他事实依据。其中那些有疑问的案件中，有关障碍物是否实际存在的问题，则交由陪审团决定。不过，由于所涉及的因素较少且比较恒定，法律倾向于制定一条明确的规则，即在一般性案件中，被控告的建筑物的高度，不得大于其地基与主要窗户之间的距离。尽管在试图制定这一明确规定的过程中，要求非常小心谨慎，但这种尝试从本质上而言完全符合逻辑。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negligence. If the whole evidence in the case was that a party, in full command of senses and intellect, stood on a railway track, looking at an approaching engine until it ran him down, no judge would leave it to the jury to say whether

the conduct was prudent. If the whole evidence was that he attempted to cross a level track, which was visible for half a mile each way, and on which no engine was in sight, no court would allow a jury to find negligence. Between these extremes are cases which would go to the jury. But it is obvious that the limit of safety in such cases, supposing no further elements present, could be determined to a foot by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

同一原则也适用于过失罪。如果案件的整个证据是，一方当事人在完全处于感觉及理智的支配之下时站在一条铁路轨道之上，眼看着一辆机车逼近，并将他撞倒；对此，任何一位法官都不会将其交给陪审团来决定该行为是否审慎。如果整个证据是，他企图穿越一个平行轨道，该轨道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半英里内都能看到，且当时没有机车进入视野，对此则不会有哪个法庭会让陪审团去查明有无过失罪。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案件才会交由陪审团处理。但是，在这类案件中，安全的界线——假设没有别的因素出现的话——显然是可以通过数学计算精确到以尺为单位的。

The trouble with many cases of negligence is, that they are of a kind not frequently recurring, so as to enable any given judge to profit by long experience with juries to lay down rules, and that the elements are so complex that courts are glad to leave the whole matter in a lump for the jury's determination.

很多过失案所碰到的问题是：这些案件属于不会频繁复现的一类案件，从而不能使某一位法官从自己与陪审团长期打交道的经验中有所教益以制定规则；而且所涉因素非常复杂，法院因此乐意将整个问题一股脑全交由陪审团来决定。

I reserve the relation between negligent and other torts for the next Lecture.

过失与其他侵权行为的关系问题留待下一讲讲解。

[4_1].See Lecture VII.

[4_2].Austin, Jurisprudence (3d ed.), 440 et seq., 474, 484, Lect. XX., XXIV., XXV.

[4_3].Lib. I. c. 2, ad fin.

[4_4].Hist. English Law, I. 113 (bis), n.a; Id., ed. Finlason, I. 178, n. 1. Fitzherbert (N.B. 85, F.) says that in the vicontiel writ of trespass, which is not returnable into the king's court, it shall not be said quare vi et armis. Cf. Ib. 86, H.

[4_5].Milman v. Dolwell, 2 Camp. 378; Knapp v. Salsbury, 2 Camp. 500; Peafey v. Walter, 6 C.&P. 232; Hall v. Fearnley, 3 Q.B. 919.

[4_6].Y.B. 6 Ed. IV. 7, pl. 18, A.D. 1466; cf. Ames, Cases in Tort, 69, for a translation, which has been followed for the most part.

[4_7].Y.B. 21 Hen. VII. 27, pl. 5, A.D. 1506.

[4_8].Cf. Bract., fol. 136 b. But cf. Stat. of Gloucester, 6 Ed. I. c. 9; Y.B. 2 Hen. IV. 18, pl. 8, by Thirning; Essays in Ang. Sax. Law, 276.

[4_9].Hobart, 134, A.D. 1616.

[4_10].Sir T. Jones, 205, A.D. 1682.

[4_11].1 Strange, 596, A.D. 1723.

[4_12].2 Keyes, 169, A.D. 1865.

[4_13].Anonymous, Cro. Eliz. 10, A.D. 1582.

[4_14].Sir T. Raym. 467, A.D. 1682.

[4_15].Scott v. Shepherd, 2 Wm. B1. 892, A.D. 1773.

[4_16].3 East, 593. See, further, Coleridge's note to 3 Bl. Comm. 123; Saunders, Negligence, ch. 1, Section I; argument in Fletcher v. Rylands, 3 H.&C. 774, 783; Lord Cranworth, in S.C., L.R. 3 H. L. 330, 341.

[4_17].Ex. gr. Metropolitan Railway Co. v. Jackson, 3 App. Cas. 193. See M'Manus v. Crickett, 1 East, 106, 108.

[4_18].1 Ld. Raym. 38; S.C. Salk. 637; 4 Mod. 404; A.D. 1695.

[4_19].2 Wm. Bl. 892. Cf. Clark v. Chambers, 3 Q.B.D. 327, 330, 338.

[4_20].7 Vt, 62.

[4_21].Smith v. London & South-Western Railway Co., L.R. 6 C.P. 14, 21. Cf. S.C., 5 id. 98, 103, 106.

[4_22].Sharp v. Powell, L.R. 7 C.P. 253. Cf. Clark v. Chambers, 3 Q.B.D. 327, 336-338. Many American cases could be cited which carry the doctrine further. But it is desired to lay down no proposition which admits of controversy, and it is enough for the present purposes that Si home fait un loyal act, que apres devint illoyal, ceo est damnum sine injuria. Latch, 13. I purposely omit any discussion of the true rule of damages where it is once settled that a wrong has been done. The text regards only the tests by which it is decided whether a wrong has been done.

[4_23].Mitchil v. Alestree, 1 Ventris, 295; S.C., 3 Keb. 650; 2 Lev. 172. Compare Hammack v. White, 11 C.B. N.S. 588; infra, p. 158.

[4_24].Harvey v. Dunlop, Hill & Denio, (Lalor,) 193.

[4_25].See Lecture II. pp. 54, 55.

[4_26].cf. Hobart v. Hagget, 3 Fairf. (Me.) 67.

[4_27].See Bonomi v. Backhouse, El. Bl. & El. 622, Coleridge, J., at p. 640.

[4_28].3 Levirtz, 87, A.D. 1681.

[4_29].Compare the rule as to cattle in Y.B. 22 Edw. IV. 8, pl. 24, stated below, p. 118.

[4_30].Disc. 123, pr.; 124, Sections 2, 3. As to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latter rule, compare Lecture V.

[4_31].Lecture I, pp. 3, 4.

[4_32].Lib. I. c. 2, ad. fin.

[4_33].Fol. 155.

[4_34].Bro. Trespass, pl. 119; Finch, 198; 3 Bl. Comm. 118, 119.

[4_35].See Brunner, Schwurgerichte, p. 171.

[4_36].An example of the year 1195 will be found in Mr. Bigelow's very interesting and valuable Placita Anglo-Normanica, p. 285, citing Rot. Cur. Regis, 38; S.C.? Abbr. Plac., fol. 2, Ebor. rot. 5. The suit was by way of appeal; the cause of action, a felonious trespass. Cf. Bract., fol. 144 a.

[4_37].An example may be seen in the Year Book, 30 & 31 Edward I. (Horwood), p. 106.

[4_38].6 Ed. IV. 7, pl. 18.

[4_39].Popham, 151; Latch, 13, 119, A.D. 1605.

[4_40].Hobart, 134, A.D. 1616.

[4_41].3 East, 593.

[4_42].1 Bing. 213, A.D. 1823.

[4_43].6 Cush. 292.

[4_44].Morris v. Platt, 32 Conn. 75, 84 et seq., A.D. 1864.

[4_45].Nitro-glycerine Case (Parrot v. Wells), 15 Wall. 524, 538.

[4_46].Hill & Denio, (Lalor,) 193; Losee v. Buchanan, 51 N.Y. 476, 489.

[4_47].Vincent v. Stinehour, 7 Vt. 62. See, further, Clayton, 22, pl. 38; Holt, C.J., in Cole v. Turner, 6 Mod. 149; Lord Hardwicke, in Williams v. Jones, Cas. temp. Hardw. 298; Hall v. Fearnley, 8 Q.B. 919; Martin, B., in Coward v. Baddeley, 4 H.&N. 478; Holmes v. Mather, 16 Ark. 308; Bizzell v. Booker, 16 Ark. 308; Brown v. Collins, 53 N.H. 442.

[4_48].Blyth v. Birmingham Waterworks Co., 11 Exch. 781, 784; Smith v. London & South-Western Ry. Co., L.R. 5 C.P. 98, 102. Compare Campbell, Negligence, Section 1 (2d ed.), for Austin's point of view.

[4_49].cf. Bro. Corone, pl. 6; Neal v. Gillett, 23 Conn. 437, 442; D. 9. 2. 5, Section 2; D. 48. 8. 12.

[4_50].I Thorpe, p. 85; cf. LL. Hen. I., c. 88, Section 3.

[4_51].Spofford v. Harlow, 3 Allen, 176.

[4_52].See 27 Ass., pl. 56, fol. 141; Y.B. 43 Edw. III. 33, pl. 38. The plea in the latter case was that the defendant performed the cure as well as he knew how, without this that the horse died for default of his care. The inducement, at least, of this plea seems to deal with negligence as meaning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party's mind.

[4_53].Hobart, 134.

[4_54].See Knight v. Jermin, Cro. Eliz. 134; Chambers v. Taylor, Cro. Eliz. 900.

[4_55].32 Conn. 75, 89, 90.

[4_56].Y.B. 12 Hen. VIII. 2 b, Pl. 2.

[4_57].Keilway, 46 b.

[4_58].L.R. 3 H.L. 330, 339; L.R. 1 Ex. 265, 279-282; 4 H.&C. 263; 3 id. 774.

[4_59].See Card v. Case, 5 C.B. 622, 633, 634.

[4_60].See Lecture I. p. 23 and n. 3.

[4_61].Mitten v. Fandrye, Popham, 161; S.C., 1 Sir W. Jones, 136; S.C., nom. Millen v. Hawery, Latch, 13; id. 119. In the latter report, at p. 120, after reciting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xt, it is said that judgment was given non obstant for the plaintiff; contrary to the earlier statement in the same book, and to Popham and Jones; but the principle was at all events admitted. For the limit, see Read v. Read, 17 C.B. N.S. 245.

[4_62].Y.B. 22 Edw. IV. 8, pl. 24.

[4_63].Popham, at p. 162; S.C., Latch, at p. 120; cf. Mason v. Keeling, 1 Ld. Raym. 606, 608. But cf. Y.B. 20 Edw. IV. 10, 11, pl. 10.

[4_64].Latch, at p. 120. This is a further illustration of the very practical grounds on which the law of trespass was settled.

[4_65].12 Mod. 332, 335; S.C., 1 Ld. Raym. 606, 608.

[4_66].12 Mod. 335; Dyer, 25 b, pl. 162, and cas. in marg.; 4 Co. Rep. 18 b; Buxendin v. Sharp, 2 Salk. 662; S.C., 3 Salk. 169; S.C., nom. Bayntine v. Sharp, 1 Lutw. 90; Smith v. Pelah, 2 Strange, 264; May v. Burdett, 9 Q.B. 101; Card v. Case, 5 C.B. 622.

[4_67].12 Mod. 335. See Andrew Baker's case, 1 Hale, P.C. 430.

[4_68].Besozzi v. Harris, 1 F.&F. 92.

[4_69].See Fletcher v. Rylands, L.R. I Ex. 265, 281, 282; Cox v. Burbridge, 13 C.B. N.S. 430, 441; Read v. Edwards, 17 C.B. N.S. 245, 260; Lee v. Riley, 18 C.B. N.S. 722; Ellis v. Loftus Iron Co., L.R. 10 C.P. 10; 27 Ass., pl. 56, fol. 141; Y.B. 20 Ed. IV. 11, pl. 10; 13 Hen. VII. 15, pl. 10; Keilway, 3 b, pl. 7. Cf. 4 Kent (12th ed.), 110, n. 1, ad fin.

[4_70].2 Ld. Raym. 909; 13 Am. L.R. 609.

[4_71].See Grill v. General Iron Screw Collier Co., L.R. 1 C.P. 600, 612, 614.

[4_72].Railroad Co. v. Lockwood, 17 Wall. 357, 383.

[4_73].L.R. 1 C.P. 300.

[4_74].See Gorham v. Gross, 125 Mass. 232, 239, bottom.

[4_75].Minor v. Sharon, 112 Mass. 477, 487.

[4_76].See Winsmore v. Greenbank, Willes, 577, 583; Rex v. Oneby, 2 Strange, 766, 773; Lampleigh v. Brathwait, Hobart, 105, 107; Wigram, Disc., pl. 249; Evans on Pleading, 49, 138, 139, 143 et seq.; Id., Miller's ed., pp. 147, 149.

[4_77].See Detroit & Milwaukee R. R. Co. v. Van Steinburg, 17 Mich. 99, 120.

[4_78].In the small-pox case, Minor v. Sharon, 112 Mass. 477, while the court ruled with regard to the defendant's conduct as has been mentioned, it held that whether the plaintiff was guilty of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in not having vaccinated his children was "a question of fact, and was properly left to the jury." p. 488.

[4_79].Metropolitan Railway Co. v. Jackson, 3 App. Cas. 193, 197.

[4_80].See Kearney v. London, Brighton & S. Coast Ry. Co., L.R. 5 Q.B. 411, 414, 417; S.C., 6 id. 759.

[4_81].Byrne v. Boadle, 2 H. & C. 722.

[4_82].See Skinnier v. Lodon, Brighton, & S. Coast Ry. Co., 5 Exch. 787. But cf. Hammack v. White, 11 C.B. N.S. 588, 594.

[4_83].7 American Law Review, 654 et seq., July, 1873.

[4_84].Callahan v. Bean, 9 Allen, 401.

[4_85].Carter v. Towne, 98 Mass. 567.

[4_86].Lovett v. Salem & South Danvers R. R. Co., 9 Allen, 557.

[4_87].Back v. Stacey, 2 C.&P. 465.

[4_88].Cf. Beadel v. Perry, L.R. 3 Eq. 465; City of London Brewery Co. v. Termant, L.R. 9 Ch. 212, 220; Hackett v. Baiss, L.R. 20 Eq. 494; Theed v. Debenham, 2 Ch. D. 165.

LECTURE IV. FRAUD, MALICE, AND INTENT.—THE THEORY OF TORTS.

第四讲　欺诈、恶意与蓄意——侵权法理论

The next subjects to be considered are fraud, malice, and intent. In the discussion of unintentional wrongs,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to be overcome was found to be the doctrine that a man acts always at his peril. In what follows,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fficulty will be to prove that actual wickedness of the kind described by the several words just mentioned is not an element in the civil wrongs to which those words are applied.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欺诈、恶意与蓄意这三个问题。我们在针对非故意不当行为的讨论中发现，要解决的最大一个难题是一个人总是要自行承担行为的风险这一原则。但接下来本讲的难题却在于，证明刚才提到的几个词所描述的那类实际的不道德行为并非这些词所适用的民事不当行为的构成要素。

It has been shown, in dealing with the criminal law, that, when we call an act malicious in common speech, we mean that harm to another person was intended to come of it, and that such harm was desired for its own sake as an end in itself.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criminal law, however, intent alone was found to be important, and to have the same consequences as intent with malevolence superadded. Pursuing the analysis, intent was found to be made up of foresight of the harm as a consequence, coupled with a desire to bring it about, the latter being conceived as the motive for the act

in question. Of these, again, foresight only seemed material. As a last step, foresight was reduced to its lowest term, and it was concluded that, subject to exceptions which were explained, the general basis of criminal liability was knowledge, at the time of action, of facts from which common experience showed that certain harmful results were likely to follow.

对刑法的分析表明，在日常用语中，当我们将一种行为称作恶意行为时，意思是说，该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是有意为之，是为了伤害而伤害，造成伤害本身即是最终目的。然而，就刑法而言，我们发现蓄意本身非常重要，与加上了恶意的蓄意具有相同的后果。循此分析可以发现，蓄意由预见结果会造成损害，再加上意欲造成那种损害两个方面构成，后者被认为是涉案行为的动机。不过，其中似乎只有预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最后，预见被分解为最低一级的术语，并最终得出：除已解释过的一些例外情况，刑事责任的一般基础是行为人在行为时对事实情况的知晓，根据这些事实，一般经验表明某种伤害性结果可能随后会发生。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a similar reduction is possible on the civil side of the law, and whether thus fraudulent, malicious, intentional, and negligent wrongs can be brought into a philosophically continuous series.

民法部分是否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术语分解现象，以及欺诈性、恶意性、蓄意性，和过失性等不当行为是否因此可被归为同一个逻辑意义上的连续系列，还有待分析。

A word of preliminary explanation will be useful. It has been

shown in the Lecture just referred to that an act, although always importing intent, is per se indifferent to the law. It is a willed, and therefore an intended coordination of muscular contractions. But the intent necessarily imported by the act ends there. And all muscular motions or co-ordinations of them are harmless apart from concomitant circumstances, the presence of which is not necessarily implied by the act itself. To strike out with the fist is the same act, whether done in a desert or in a crowd.

首先，有必要做一番初步解释。上一讲中表明，一起行为，尽管总是涉及意图，但其本身于法律却无关紧要。它是某种在意志作用之下有意协调肌肉收缩的过程。但是，行为所必然涉及的意图仅限于此。所有肌肉运动或者对肌肉运动的协调，如果撇开了所伴发的环境因素，并没有恶意，而行为本身也未必一定包含环境因素。无论是在沙漠还是在人群中挥拳猛打，做出的行为都是同样的。

The same considerations which have been urged to show that an act alone, by itself, does not and ought not to impose either civil or criminal liability, apply, at least frequently, to a series of acts, or to conduct, although the series shows a further co-ordination and a further intent. For instance, it is the same series of acts to utter a sentence falsely stating that a certain barrel contains No. 1 Mackerel, whether the sentence is uttered in the secrecy of the closet, or to another man in the course of a bargain. There is, to be sure, in either case, the further intent, beyond the co-ordination of muscles for a single sound, to allege that a certain barrel has certain contents,—an intent necessarily shown by the ordering of the words. But both the series of acts and the intent are per se indifferent. They are innocent when spoken in solitude, and are only a ground of liability when certain concomitant circumstances

are shown.

上述观点被予以强调，说明单是行为本身没有也不应当带有民事或刑事责任，这些观点适用于——至少是时常适用于——一连串的行为或行动，尽管一连串的行为表明了更进一步的协调以及更深层次的意图。例如，如果有人说了一句话，不实地宣称某个桶里装的是最好的鲭鱼，那么，不管这句话是在密室中秘密说出的，还是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对另一个人说出的，说这句话的一连串行为动作都是一样的。当然，在任何一种情况之下，除了协调肌肉发出单个的声音之外，宣称某个桶里装有某种东西还有更深一层的意图，这层意图必然会由词语的排序表现出来。但是，这一连串的行为以及意图本身都无关紧要。孤立来说，行为及意图都是无辜的，只有指出了某种伴发的环境因素时，才会构成责任的依据。

The intent which is meant when spoken of as an element of legal liability is an intent directed toward the harm complained of, or at least toward harm. It is not necessary in every case to carry the analysis back to the simple muscular contractions out of which a course of conduct is made up. On the same principle that requires something more than an act followed by damage to make a man liable, we constantly find ourselves at liberty to assume a co-ordinated series of acts as a proximately simple element, per se indifferent, in considering what further circumstances or facts must be present before the conduct in question is at the actor's peril. It will save confusion and the need of repetition if this is borne in mind in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被当成法律责任构成要素时所指的蓄意，是意图造成所诉之伤害，或者至少是为了造成伤害。不是每一个案件都有必要将分析追溯

至构成行为过程的简单的肌肉收缩动作。同理，要使一个人承担法律责任，除了造成损害的行为之外，还需要另外的条件；根据以上原则，在考虑必须具备什么另外的环境或事实因素，然后再认定涉案行为应当由行为人自担风险时，我们时常发现自己有权将一连串行为认定为近似简单的构成要素，行为本身无关紧要。如果记住了这一点，在下面的讨论中就会避免困惑，也无需我对其再三重复。

The chief forms of liability in which fraud, malice, and intent are said to be necessary elements, are deceit, slander and libel, malicious prosecution, and conspiracy, to which, perhaps, may be added trover.

视欺诈、恶意以及蓄意为构成要素的一些主要责任形式，包括欺骗、诽谤、诬告，以及共谋，除此之外，也许还可以加上非法占用。

Deceit is a notion drawn from the moral world, and in its popular sense distinctly imports wickedness. The doctrine of the common law with regard to it is generally stated in terms which are only consistent with actual guilt, and all actual guilty intent. It is said that a man is liable to an action for deceit if he makes a false representation to another, knowing it to be false, but intending that the other should believe and act upon it, if the person addressed believes it, and is thereby persuaded to act to his own harm. This is no doubt the typical case, and it is a case of intentional moral wrong. Now, what is the party's conduct here. It consists in uttering certain words, so ordered that the utterance of them imports a knowledge of the meaning which they would convey if heard. But that conduct with only that knowledge is neither moral nor immoral. Go one step further, and add the knowledge of another's

presence within hearing, still the act has no determinate character. The elements which make it immoral are the knowledge that the statement is false, and the intent that it shall be acted on.

欺骗是从道德领域引入的概念，其一般意义显然含有不道德的意思。普通法相关原则所作的规定一般只符合实际的罪行以及所有与罪行相关的实际意图。据规定，让一个人对因欺骗引起的诉讼负责的条件是，在明知为虚假的情况下，为了让另一个人相信并采取行动，而对这个人作出了一项虚假陈述，且听到上述虚假陈述的人相信了该谎言，并被说服采取行动而造成了对自身的伤害。这无疑是很典型的情况，属于一种故意不道德行为。那么，这里当事人的行为该怎么定义呢？该行为由说出了某些词语构成，这些词语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说出这些词语表明，当事人知晓这些词语如被人听到，其所传达的含义。但是，这一行为，如果仅仅伴随当事人知晓词语所传达的含义这一因素，则无所谓道德或者不道德。进一步说，即便再加上当事人知晓还有一个人在现场，可以听到他所说的话语这一因素，该行为也仍然不具有任何明确的非道德性。构成该行为非道德性的要素，即是当事人知晓陈述不实，且意图陈述会产生影响。

The principal question then is, whether this intent can be reduced to the same terms as it has been in other cases.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the answer. It is perfectly clear that the intent that a false representation should be acted on would be conclusively established by proof that the defendant knew that the other party intended to act upon it. If the defendant foresaw the consequence of his acts, he is chargeable, whether his motive was a desire to induce the other party to act, or simply an unwillingness for private reasons to state the truth. If the defendant knew a present fact (the other party's intent), which, according to common experience, made it likely that his act would have the harmful consequence, he is

chargeable, whether he in fact foresaw the consequence or not.

那么首要的问题是，意图能否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被分解为次一级的术语，对此我们不难回答。很明显，希望虚假陈述会产生影响的意图，最终可由这一证据来认定，即被告知晓另一当事人打算据其采取行动。如果被告早已预见到其行为的后果，那么，不管其动机是希望诱导另一方采取行动，还是仅仅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愿意如实加以陈述，他都可被指控。如果被告知晓某一当前事实（即原告方的打算），且根据通常的经验，原告方如此打算可能会致使被告行为产生有害后果，那么，不管被告实际上是否预见到该后果，被告都可被指控。

In this matter the general conclusion follows from a single instance. For the moment it is admitted that in one case knowledge of a present fact, such as the other party's intent to act on the false statement, dispenses with proof of an intent to induce him to act upon it, it is admitted that the lesser element is all that is necessary in the larger compound. For intent embraces knowledge sufficing for foresight, as has been shown. Hence, when you prove intent you prove knowledge, and intent may often be the easier to prove of the two. But when you prove knowledge you do not prove intent.

单从下一个例子中即可得出这一问题的一般性结论。当我们承认，在一起案件中，知晓某一当前事实，例如另一方打算根据虚假陈述采取行动这一事实，就无需再证明被告存在诱导另一方据此采取行动的意图，这也就是承认，小元素决定大物体。因为，如上所述，意图即包含知晓足以作出预见的事实情况。因此，如果证实含有某种意图，就是证实知情，在这两者中，意图通常比较容易证实。但是，证实知情却不能证实是否含有意图。

It may be said, however, that intent is implied or presumed in such a case as has been supposed. But this is only helping out a false theory by a fiction. It is very much like saying that a consideration is presumed for an instrument under seal; which is merely a way of reconciling the formal theory that all contracts must have a consideration with the manifest fact that sealed instruments do not require one. Whenever it is said that a certain thing is essential to liability, but that it is conclusively presumed from something else, there is always ground for suspicion that the essential element is to be found in that something else, and not in what is said to be presumed from it.

但是，也许有人说，在以上例子中，意图是隐含的或者推定的。但这不过是根据拟制来拯救一个错误的理论。这就好比说，我们推定一份加封盖印的文书含有某种对价性；这一说法仅仅只是某种手段，使得所有合同肯定都具有对价性这一形式化的理论，与加封盖印的文书并不需要对价性这一明显的事实统一起来。只要是说，某种东西对于责任的构成至关重要，但这一点却是根据别的东西最终作出的推定，那么，我们就总有理由怀疑，责任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否可在这别的东西里找到，而不会在所谓的推定中找到。

With regard to the intent necessary to deceit, we need not stop with the single instance which has been given. The law goes no farther than to require proof either of the intent, or that the other party was justified in inferring such intention. So that the whole meaning of the requirement is, that the natural and manifest tendency of the representation, under the known circumstances, must have been to induce the opinion that it was made with a view to action, and so to induce action on the faith of it. The standard of

what is called intent is thus really an external standard of conduct under the known circumstance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criminal law holds good here.

对于欺骗所必须的意图，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前面给出的单个例子上。法律无非是要求给出具有意图的证据，或者另一方有理由推断具有这种意图的证据。所以，该要求的全部意义在于：在知晓事实的情况下，虚假陈述自然或明显的结果，肯定会诱发这样一种看法，即作出该陈述的目的是为了诱使他人做出行动，因对该陈述的信任而诱使其做出行动。因此，所谓意图的标准其实是知晓事实情况下的某种外部标准，刑法的分析在这里依然适用。

Nor is this all. The law pursuing its course of specification, as explained in the last Lecture, decides what is the tendency of representations in certain cases,—as, for instance, that a horse is sound at the time of making a sale; or, in general, of any statement of fact which it is known the other party intends to rely on. Beyond these scientific rules lies the vague realm of the jury.

事情还远不止于此。如上一讲所述，法律在追究明确化的过程中会确定，一定情况下的陈述可能会产生的后果，——例如，一匹马在出售的时候很正常这一陈述；或者一般而言，在知晓另一方当事人打算根据陈述采取行动的情况下，所做的任何陈述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超出这些客观规则之外，即是陪审团需要面对的模糊不清的领域了。

The other moral element in deceit is knowledge that the statement was false. With this I am not strictly concerned, because

all that is necessary is accomplished when the elements of risk are reduced to action and knowledge. But it will aid in the general object of showing that the tendency of the law everywhere is to transcend moral and reach external standards, if this knowledge of falsehood can be transmuted into a formula not necessarily importing guilt, although, of course, generally accompanied by it in fact. The moment we look critically at it, we find the moral side shade away.

欺骗的另一个道德因素是，知晓陈述不实。对于这一点，我不是很关心，因为当风险要素被分解为行动和知情这两个因素之后，所有必要条件就形成了。但是，如果知晓虚假陈述这一事实能够转化成为一条未必意味着犯罪的规定，当然，尽管事实上总是伴随着犯罪行为，那么，这将有助于表明，各地法律发展的趋势即是超越道德的标准，获得外部的标准。在我们对此进行批判性分析时，我们就会发现道德方面的因素逐渐消退了。

The question is, what known circumstances are enough throw the risk of a statement upon him who makes it, if it induces another man to act, and it turns out untrue. Now, it is evident that a man may take the risk of his statement by express agreement, or by an implied one which the law reads into his bargain. He may in legal language warrant the truth of it, and if it is not true, the law treats it as a fraud, just as much when he makes it fully believing it, as when he knows that it is untrue, and means to deceive. If, in selling a horse, the seller warranted him to be only five years old, and in fact he was thirteen, the seller could be sued for a deceit at common law, although he thought the horse was only five. [5_1] The common-law liability for the truth of statements is, therefore, more extensive than the sphere of actual moral fraud. But, again, it is enough in

general if a representation is made recklessly, without knowing whether it is true or false. Now what does “recklessly” mean. It does not mean actual personal indifference to the truth of the statement. It means only that the data for the statement were so far insufficient that a prudent man could not have made it without leading to the inference that he was indifferent. That is to say, repeating an analysis which has been gone through with before, it means that the law, applying a general objective standard, determines that, if a man makes his statement on those data, he is liable, whatever was the state of his mind, and although he individually may have been perfectly free from wickedness in making it.

问题在于，如果一项陈述诱使他人采取行动，而该陈述结果被证明为虚假陈述，那么，足以使风险责任加在作出陈述的那个人身上的知晓事实情况该如何定义。显然一个人可能因为明确的协定，或者法律对其协议进行解读得出的隐含的协定，而承担其所作陈述的风险。他可以用法律语言来保证其所作陈述的真实性，如果陈述不实，法律即视其欺诈，不管他在作出该陈述时完全相信陈述为真，还是已知该陈述不实而有意进行欺骗，两种情况都一样为欺诈。如果，在出售一匹马的时候，卖马的人保证这匹马只有5岁，而事实上它已经13岁了，那么根据普通法，这名卖马的人可被指控犯有欺骗罪，尽管他当时认为这匹马的确只有5岁。因此，普通法有关陈述之真实性的责任，要比实际道德欺诈的范围更广泛一些。但同样，只要一项陈述是草率地作出的一般就足够了，而不用知道其真假。那么，“草率”又是什么意思呢？它并不意味着个人实际上可以不关心陈述的真实性。它仅仅意味着，作出该陈述的依据太不充分，一个审慎的人如果作出了该陈述，就不得不让人得出这一推论，他太满不在乎了。重复一下前面已进行过的一个分析，这也就是说，它意味着，法律采用一个一般性的客观标准来确定，如果一个人根据这些依据作出了陈述，他就得承担责任，不管他当时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尽管他本人在作出该陈述时确实完全没有恶意。

Hence similar reasoning to that which has been applied already to intent may be applied to knowledge of falsity. Actual knowledge may often be easier to prove than that the evidence was insufficient to warrant the statement, and when proved it contains the lesser element. But as soon as the lesser element is shown to be enough, it is shown that the law is ready to apply an external or objective standard here also.

因此，类似于用来分析意图的推理方法，也可以适用于对知晓虚假陈述这一事实的推理。与证明证据不足以保证陈述之正确性这一点相比较，证明是否实际知情通常要更容易一些，如果证明为实际知情，则其所包含的为次要因素。但是，一旦证明次要因素就足够了，则表明普通法在此可以适用外部或客观的标准。

Courts of equity have laid down the doctrine in terms which are so wholly irrespective of the actual moral condition of the defendant as to go to an opposite extreme. It is said that “when a representation in a matter of business is made by one man to another calculated to induce him to adapt his conduct to it, it is perfectly immaterial whether the representation is made knowing it to be untrue, or whether it is made believing it to be true, if, in fact, it was untrue.“ [5_2]

衡平法院对此已经制定了相关原则，规定完全不考虑被告的实际道德状况，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据规定，“在做生意时，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作出了一项陈述，打算诱使此人根据其陈述来调整自己的行为，那么，陈述人是否在知其为虚假陈述的情况下作出该陈述，或者陈述人是否在相信其为真实陈述的情况下作出的陈述，这都完全

不重要”。

Perhaps the actual decisions could be reconciled on a narrower principle, but the rule just stated goes the length of saying that in business matters a man makes every statement (of a kind likely to be acted on) at his peril. This seems hardly justifiable in policy. The moral starting point of liability in general should never be forgotten, and the law cannot without disregarding it hold a man answerable for statements based on facts which would have convinced a wise and prudent man of their truth. The public advantage and necessity of freedom in imparting information, which privileges even the slander of a third person, ought a fortiori, it seems to me, to privilege statements made at the request of the party who complains of them.

也许实际的判决可能会根据具体的原则来予以调整，但上述规则却详细表明，在商业事务中，一个人对于所作出的每一项陈述（属于可能会据此采取行动的一类陈述），均需自担风险。从政策方针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很难说是合理的。永远也不要忘记责任一般的道德起点，法律在没有忘记这一点的同时，不能要求一个人对其根据明智而审慎的人信以为真的事实作出的陈述承担责任。在传播信息时，为了公共利益及必要的自由，甚至可以不追究第三方的诽谤言论，那么在我看来，就更有理由不追究那些应控方要求作出的陈述。

The common law, at any rate, preserves the reference to morality by making fraud the ground on which it goes. It does not hold that a man always speaks at his peril. But starting from the moral ground, it works out an external standard of what would be fraudulent in the average prudent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and

requires every member at his peril to avoid that. As in other cases, it is gradually accumulating precedents which decide that certain statements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are at the peril of the party who makes them.

无论如何，普通法始终对道德因素予以考虑，使欺诈成为虚假陈述成立的依据。它并不主张，一个人应对他说的每句话自担风险。但是，普通法从道德基础出发，制定了一个外在的标准，一个在社会一般审慎成员看来何谓欺诈的标准，要求每一位社会成员自觉避免。与其他情况类似，普通法逐渐积累了一些判例，以确定在某些情况下所作出的某些陈述由陈述人自行承担责任。

The elements of deceit which throw the risk of his conduct upon a party are these. First, making a statement of facts purporting to be serious. Second, the known presence of another within hearing. Third, known facts sufficient to warrant the expectation or suggest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other party will act on the statement. (What facts are sufficient has been specifically determined by the courts in some instances; in others, no doubt, the question would go to the jury on the principles heretofore explained.) Fourth, the falsehood of the statement. This must be known, or else the known evidence concerning the matter of the statement must be such as would not warrant belief according to the ordinary course of human experience. (On this point also the court may be found to lay down specific rules in some cases. [5_3])

使一方当事人行为产生风险的欺骗行为，其构成要素如下：首先，对表明为重要的事实予以陈述。其次，知晓另一个人在现场，且其在可听到陈述的范围之内。第三，知晓充足的事实，确保可以预料

到或表明对方可能根据陈述采取行动。（什么事实为充足的事实，在一些情况下，由法院具体决定；而在有些情况下，则毫无疑问，根据此前解释过的原则，问题将交由陪审团确定。）第四，陈述不实。这必须已被知晓，否则，已知的有关陈述实质的证据，根据一般人类经验就是一些不能保证让人信服的证据。（关于这一点，我们发现法院在某些案件中也作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

I next take up the law of slander. It has often been said that malice i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liability, and the doctrine is commonly stated in this way: that malice must exist, but that it is presumed by law from the mere speaking of the words; that again you may rebut this presumption of malice by showing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under circumstances which made the communication privileged, for instance, by a lawyer in the necessary course of his argument, or by a person answering in good faith to inquiries as to the character of a former servant,and then, it is said, the plaintiff may meet this defence in some cases by showing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with actual malice.

接下来我要讨论一下有关口头诽谤的法律。恶意常常被说成是责任的一大构成要素，该原则通常是这样表述的：恶意肯定存在，但却是法律根据单纯的言辞表述而推定出来的；此外，你可以通过证明那些言辞是在某些情况下说出的来反驳这种恶意推定，这些情况使得言辞交流具有特权——比如，律师在其必要的辩论过程中所说的话；或者，一个人在出于好意回答针对一位前佣人性格的询问时所说的话；另外，在某些案件中，据说原告可以通过证明言辞是带有实际恶意的情况下说出的来回击这种抗辩。

All this sounds as if at least actual intent to cause the damage

complained of, if not malevolence, were at the bottom of this class of wrongs. Yet it is not so. For although the use of the phrase “malice” points as usual to an original moral standard, the rule that it is presumed upon proof of speaking certain words is equivalent to saying that the overt conduct of speaking those words may be actionable whether the consequence of damage to the plaintiff was intended or not. And this fails in with the general theory, because the manifest tendency of slanderous words is to harm the person of whom they are spoken. Again, the real substance of the defence is not that the damage was not intended,that would be no defence at all; but that, whether it was intended or not,that is, even if the defendant foresaw it and foresaw it with pleasure,the manifest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he said it were such that the law considered the damage to the plaintiff of less importance than the benefit of free speaking.

所有这些似乎都是说，这类侵权行为，即使不带有恶意，也至少实质上包含着想要造成所诉之损害的真实意图。但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尽管使用“恶意”一词通常是指向某种基本的道德标准，但是，以某些口头言辞作为证据来进行推定这一规则，就等同于说，不管对原告造成的损害后果是否是有意为之，蓄意说出这些言辞的行为即可被起诉。这不合乎一般性理论，因为诽谤性言辞明显的目的是要伤害所针对之人。此外，抗辩的实质内容，不在于损害不是蓄意为之——这根本就不是抗辩；抗辩的实质应该是，不管损害是否是有意，——也就是说，即使被告预见到了损害后果，且预见该后果时很高兴——明显的事实以及他说出那些言辞的环境，使得法律认为，与原告造成的损害相比较言论自由的好处而言不太重要。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apply the same analysis to the last stage of the process, but perhaps it is not impossible. It is said that the

plaintiff may meet a case of privilege thus made out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 by proving actual malice, that is, actual intent to cause the damage complained of. But how is this actual malice made out? It is by showing that the defendant knew the statement which he made was false, or that his untrue statements were grossly in excess of what the occasion required. Now is it not very evident that the law is looking to a wholly different matter from the defendant's intent? The fact that the defendant foresaw and foresaw with pleasure the damage to the plaintiff, is of no more importance in this case than it would be where the communication was privileged. The question again is wholly a question of knowledge, or other external standard. And what makes even knowledge important? It is that the reason for which a man is allowed in the other instances to make false charges against his neighbors is wanting. It is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that people should be free to give the best information they can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without fear, but there is no public benefit in having lies told at any time; and when a charge is known to be false, or is in excess of what is required by the occasion, it is not necessary to make that charge in order to speak freely, and therefore it falls under the ordinary rule, that certain charges are made at the party's peril in case they turn out to be false, whether evil consequences were intended or not. The defendant is liable, not because his intent was evil, but because he made false charges without excuse.

将同样的分析适用于这一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难度更大，但也许不是不可能。原告据说可以通过举证实际恶意，也就是说，怀有造成所诉之损害的真实意图，来应对不追究被告方诽谤罪的情况。但是，又如何证明这种实际恶意呢？可以通过证明被告知晓其所作出的陈述不实，或者证明其虚假陈述远非情势所需，来证明这种实际恶意。那么，法律关注的正是一个完全有别于被告意图的问题，这一点

难道不是很清楚吗？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预见到，并且是高兴地预见到对原告造成损害这一事实，并不比特殊交流情况下的事实更为重要。问题又一次完全变成了一个有关知情的问题，或者说是另外的外部标准问题。是什么使得甚至是知情如此重要？答案是其他情况下缺乏允许一个人对其邻居提出虚假指控的理由。正是为了公共利益，人们才应当自由地、无所畏惧地提供一定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最好信息，但是，说谎任何时候对公众都没有任何好处；如果已知一项指控不实，或者远非情势所需，那么，就没有必要为了言论自由而提出虚假指控，因此，这一规则属于一般性规则，即不管有害后果是否为主观有意，在结果被证明为虚假指控的情况下，当事人应自担风险。被告之所以负有责任，不是因为其意图是邪恶的，而是因为他无故提出了虚假的指控。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peril of conduct here begins farther back than with deceit, as the tendency of slander is more universally harmful. There must be some concomitant circumstances. There must at least be a human being in existence whom the statement designates. There must be another human being within hearing who understands the statement, and the statement must be false. But it is arguable that the latter of these facts need not be known, as certainly the falsity of the charge need not be, and that a man must take the risk of even an idle statement being heard, unless he made it under known circumstances of privilege. It would be no great curtailment of freedom to deny a man immunity in attaching a charge of crime to the name of his neighbor, even when he supposes himself alone. But it does not seem clear that the law would go quite so far as that.

我们发现，这里提到的行为危险性远不只是欺骗，因为诽谤可能造成的后果普遍危害性更大。且必定存在某些伴发的环境因素；必定

至少存在一个人，此人为言论的针对对象；必定还另有一人在现场，能够听到该言论，他理解该言论，且该言论一定不实。但是，存在争议的是，上述第二条事实是否无需被知晓，就好比指控之虚假性无疑不必被知晓一样；一个人是否必须为哪怕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被别人听到的言论负责，如果他不是在已知特别的情况下发表的该言论。一个人把一项犯罪的指控加于其邻居头上——即使他以为当时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场，那么，否决此人的免责要求绝不会大大减少言论的自由。但是，法律是否会到这一步，似乎并不是很清楚。

The next form of liability is comparatively insignificant. I mean the action for malicious prosecution. A man may recover damages against another for maliciously and without probable cause instituting a criminal, or, in some cases, a civil prosecution against him upon a false charge. The want of probable cause refers, of course, only to the state of the defendant's knowledge, not to his intent. It means the absence of probable cause in the facts known to the defendant when he instituted the suit. But the standard applied to the defendant's consciousness is external to it.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he thought the facts to constitute probable cause, but whether the court thinks they did.

接下来要讲的一种相对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责任形式，我指的是恶意控告。一个人可以要求他人赔偿损失，原因是此人恶意地、没有合理根据地，基于一项虚假指控而对其提起刑事、或者某些情况下提起民事诉讼。当然，缺乏合理的根据，仅指被告的知情状况，而并不指其意图。这就是说，在被告提起诉讼时，其所知晓的事实中不存在合理根据。但是，适用于被告的直觉情况的标准却与此并不相关。问题并不在于，他当时是否认为这些事实构成了合理根据，而在于法院是否认为它们构成了合理根据。

Then as to malice. The conduct of the defendant consists in instituting proceedings on a charge which is in fact false, and which has not prevailed. That is the root of the whole matter. If the charge was true, or if the plaintiff has been convicted, even though he may be able now to prove that he was wrongly convicted, the defendant is safe, however great his malice, and however little ground he had for his charge.

接下来说一说恶意。被告的行为是由根据一项实际为虚假的、站不住脚的指控而提起诉讼构成。这是整个问题的根源。如果该指控为实，或者已经证明原告有罪，即便原告现在能够证明其是被误判了，那么，不管被告怀有多大的恶意，也不管其指控是多么没有根据，被告都是安全的。

Suppose, however, that the charge is false, and does not prevail. It may readily be admitted that malice did originally mean a malevolent motive, an actual intent to harm the plaintiff by making a false charge. The legal remedy here, again, started from the moral basis, the occasion for it, no doubt, being similar to that which gave rise to the old law of conspiracy, that a man's enemies would sometimes seek his destruction by setting the criminal law in motion against him. As it was punishable to combine for such a purpose, it was concluded, with some hesitation, that, when a single individual wickedly attempted the same thing, he should be liable on similar grounds. [5_4] I must fully admit that there is weighty authority to the effect that malice in its ordinary sense is to this day a distinct fact to be proved and to be found by the jury.

但是，假定该指控不实，且没有根据。那么，我们很快就可以确

认，恶意起初的确指的是某种邪恶的动机，即以虚假指控伤害原告的真实意图。此外，这里的法律救济始于道德基础，毫无疑问，救济的理由类似于古老的共谋法的起因，即一个人的敌人有时可能试图通过调用刑法来毁灭他。既然为此目的而联合共谋应当受到惩罚，那么，也可以勉强得出如下结论，即如果某个人心怀恶意企图做同样的事情，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应当承担责任。我得完全承认，现有的判例非常有分量，普通意义上的恶意迄今已经是非常清楚的、会被陪审团证实与发现的事实。

But this view cannot be accepted without hesitation. It is admitted that, on the one side, the existence of probable cause, believed in, is a justification notwithstanding malice; [5_5] that, on the other, “it is not enough to show that the case appeared sufficient to this particular party, but it must be sufficient to induce a sober, sensible and discreet person to act upon it, or it must fail as a justification for the proceeding upon general grounds.“ [5_6] On the one side, malice alone will not make a man liable for instituting a groundless prosecution; on the other, his justification will depend, not on his opinion of the facts, but on that of the court. When his actual moral condition is disregarded to this extent, it is a little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 existence of an improper motive should be material. Yet that is what malice must mean in this case, if it means anything. [5_7] For the evil effects of a successful indictment are of course intended by one who procures all other to be indicted. I cannot but think that a jury would be told that knowledge or belief that the charge was false at the time of making it was conclusive evidence of malice. And if so, on grounds which need not be repeated, malice is not the important thing, but the facts known to the defendant.

但我无法完全接受这一观点。一方面承认，尽管怀有恶意，但可信、合理的根据可为其进行辩护；但另一方面却承认，“证明该事实情况足以使这一具体当事人采取行动还不够，还必须足以诱使一个冷静的、明白事理且稳重的人因此采取行动，否则，一般情况下不能作为提起诉讼的理由”。一方面，恶意本身并不会使一个人因为提起没有根据的控告而承担责任；但另一方面，他是否拥有正当理由，并不取决于他对事实的看法，而是取决于法院的看法。在被告真实的道德状况被漠视到如此地步时，很难相信，存在不良动机这一点会很重要。但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良动机正是恶意的全部意义所在。因为，一起成功的控告，其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当然是设法使其他人被起诉的人所意图追求的目的。我不能不认为，陪审团可能被告知，在提出指控之时知晓或者相信指控不实就是主观恶意的决定性证据。如果是这样，恶意就并非至关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被告知晓的事实情况，其原因在此就无需重复了。

Nevertheless, as it is obviously treading on delicate ground to make it actionable to set the regular processes of the law in motion, it is, of course, entirely possible to say that the action shall be limited to those cases where the charge was preferred from improper motives, at least if the defendant thought that there was probable cause. Such a limitation would stand almost alone in the law of civil liability. But the nature of the wrong is peculiar, and, moreover, it is quit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y of liability here advanced that it should be confined in any given instance to actual wrong-doing in a moral sense.

尽管如此，使得启动常规法律程序的行为可被起诉，显然是基于周密的理据，因此，当然完全可以说这种恶意控告之诉应当仅限于这样一些情况，即因为不良动机而提起指控的情况，或者至少是被告当时认为存在合理依据的情况。这种限制在民事责任法中几乎是独一无

二的。但是，这种侵权行为的性质十分独特，而且它与在此提出的有关责任的理论非常吻合，即在任何既定情况之下，恶意控告都应当被局限于某种道德意义上的实际不当行为。

The only other cause of action in which the moral condition of the defendant's consciousness might seem to be important is conspiracy. The old action going by that name was much like malicious prosecution, and no doubt was originally confined to cases where several persons had conspired to indict another from malevolent motives. But in the modern action on the case, where conspiracy is charged, the allegation as a rule only means that two or more persons were so far co-operating in their acts that the act of any one was the act of all. Generally speaking, the liability depends not on the co-operation or conspiring, but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acts done, supposing them all to be done by one man, or irrespective of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y were done by one or several. There may be cases, to be sure, in which the result could not be accomplished, or the offence could not ordinarily be proved, without a combination of several; as, for instance, the removal of a teacher by a school board. The conspiracy would not affect the case except in a practical way, but the question would be raised whether, notwithstanding the right of the board to remove, proof that they were actuated by malevolence would not make a removal actionable. Policy, it might be said, forbids going behind their judgment, but actual evil motives coupled with the absence of grounds withdraw this protection, because policy, although it does not require them to take the risk of being right, does require that they should judge honestly on the merits. [5_8]

除此之外，被告道德意识状态中比较重要的诉因，似乎就只有共

谋了。以此为名的这一古老的诉讼与恶意控告非常相似，毫无疑问，共谋最初仅限于几个人出于邪恶的动机共谋控告另一个人的情况。但是，在现代有关诉讼活动中，如被指控犯有共谋罪，这种指控通常仅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此前在此行为中一直保持合作，其中任一人做出的行为，也是所有人的行为。一般而言，责任并不取决于合作或共谋，而是取决于所做出的行为的性质，即使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一个人所为，或者不必管这些行为是由一个还是几个人所为。当然，有可能会存在这样一些情况，其中如果几个人不联合起来，其后果就不可能实现，或者行为通常没法证实；例如，一位教师被一所学校的理事会开除的情况。理论上，共谋并不会对案件造成影响，但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尽管理事会拥有开除教师的权利，但是，证明他们是出于恶意的证据是否能决定开除行为可被起诉呢？法律规章也许可以说禁止人们探究董事会决定背后的真相，但是，实际邪恶的动机，再加上理据的缺失，使他们失去了这层保护，因为尽管法律规章并不要求他们确保正确，但应诚实地判断是非曲直。

Other isolated instances like the last might, perhaps, be foun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law, in which actual malevolence would affect a man's liability for his conduct. Again, in trover for the conversion of another's chattel, where the dominion exercised over it was of a slight and ambiguous nature,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taking must be “with the intent of exercising an ownership over the chattel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al owner's right of possession.“ [5_9] But this seems to be no more than a faint shadow of the doctrine explained with regard to larceny, and does not require any further or special discussion. Trover is commonly understood to go, like larceny, on the plaintiff's being deprived of his property, although in practice every possessor has the action, and,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hortest wrongful withholding of possession is a conversion.

与上述最后一种情形类似的其他孤立案例，我们也许能在不同的部门法中找到，其中，真实恶意可能会影响一个人是否要为其行为承担责任。此外，在对侵占他人动产提起诉讼时，如果所能行使的占有权很小而且很模糊，那就可以说，这种占有必须“带有想要行使该动产所有权的主观意图，但其所拥有的所有权却与真正所有人的所有权相抵触”。但这似乎只不过是盗窃罪相关解释一个模糊的投影而已，不需要做任何进一步的或特别的讨论。动产侵占之诉，与盗窃罪类似，通常的理解是，依据原告财产被剥夺这一点来提起诉讼，尽管实际上每位财产占有人都可被起诉，而且一般来说，非法持有财产，时间即使再短，也属侵占。

Be the exceptions more or less numerous, the general purpose of the law of torts is to secure a man indemnity against certain forms of harm to person, reputation, or estate, at the hands of his neighbors, not because they are wrong, but because they are harms. The true explanation of the reference of liability to a moral standard, in the sense which has been explained, is not that it is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men's hearts, but that it is to give a man a fair chance to avoid doing the harm before he is held responsible for it. It is intended to reconcile the policy of letting accidents lie where they fall, and the reasonable freedom of others with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dividual from injury.

但不管这类例外有多少，侵权法的一般目的还是确保一个人能获得损害赔偿，具体的损害形式包括人身、声誉以及财产等，是由其邻居引起，且并非因为这些行为不当，而是因为造成了伤害。把责任与道德标准联系起来，其真正的原因，就以上的解释而言，不是为了改造人们的心灵，而是为了在确定一个人是否负有责任之前，给他一个机会以避免伤害的产生。其目的是为了将如下原则进行调和，即保留事故真相的原则，以及在保护个人不受伤害的情况下，他人拥有合理

自由的原则。

But the law does not even seek to indemnify a man from all harms. An unrestricted enjoyment of all his possibilities would interfere with other equally important enjoyments on the part of his neighbors.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which the law allows a man to do, notwithstanding the fact that he foresees that harm to another will follow from them. He may charge a man with crime if the charge is true. He may establish himself in business where he foresees that of his competition will be to diminish the custom of another shopkeeper, perhaps to ruin him. He may erect a building which cuts another off from a beautiful prospect, or he may drain subterranean waters and thereby drain another's well; and many other cases might be put.

不过，法律不是要寻求一个人能获得一切伤害的赔偿。一个人不受限制地行使其可能的权利，就可能会妨碍其邻居们行使其他同等重要的权利。有一些事情是法律允许人去做的，尽管此人预见到做这些事情会对另一个人造成伤害。他可以指控一个人犯罪，只要指控为实。他可以使自己在生意场上立足，尽管他预见到其竞争会使另一个店主的生意减少，甚至可能致其倒闭。他可以盖一栋楼，即使楼房遮挡了他人的视线，使其看不到美丽的景色，或者他还可以抽干地下水，使得他人的井水枯竭；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As any of these things may be done with foresight of their evil consequences, it would seem that they might be done with intent, and even with malevolent intent, to produce them. The whole argument of this Lecture and the preceding tends to this conclusion. If the aim of liability is simply to prevent or indemnify from harm

so far as is consistent with avoiding the extreme of making a man answer for accident, when the law permits the harm to be knowingly inflicted it would be a strong thing if the presence of malice made any difference in its decisions. That might happen, to be sure, without affecting the general views maintained here, but it is not to be expected, and the weight of authority is against it.

由于这其中任何一件事都是在可以预料到会带来不良后果的情况下所为，因此，这些事情似乎是有意为之，甚至带有主观恶意。本讲及以上各讲的整个分析论证过程目的就是得出这一结论。如果追究法律责任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预防或免于遭受伤害，从而避免使一个人对偶然事件承担责任这样极端的情况发生，那么，在法律允许伤害可以有意为之的情况下，恶意的存在是否会对法律判决产生任何影响就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种情况的确可能会发生，尽管并不会对这里所持有的总体看法产生影响，但这种情况并非人们所希望发生的，其案例权威性也不大。

As the law, on the one hand, allows certain harms to be inflicted irrespective of the moral condition of him who inflicts them, so, at the other extreme, it may on grounds of policy throw the absolute risk of certain transactions on the person engaging in them, irrespective of blameworthiness in any sense. Instances of this sort have been mentioned in the last Lecture, [5_10] and will be referred to again.

一方面，法律允许造成某些伤害，而不考虑造成这些伤害的那个人的道德状态，同样地，另一个极端是根据一定的政策依据，法律有可能会将某些事物的绝对风险扔给事物参与方，而不考虑任何意义上的可归责性。这一类事例上一讲中已经提及，下文也还会提及。

Most liabilities in tort lie 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s, and are founded on the infliction of harm which the defendant had a reasonable opportunity to avoid at the time of the acts or omissions which were its proximate cause. Rut as fast as specific rules are worked out in place of the vague reference to the conduct of the average man, they range themselves alongside of other specific rules based on public policy, and the grounds from which they spring cease to be manifest. So that, as will be seen directly, rules which seem to lie outside of culpability in any sense have sometimes been referred to remote fault, while others which started from the general notion of negligence may with equal ease be referred to some extrinsic ground of policy.

大多数侵权责任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依据是造成的伤害，而被告在行为之时是有合理的机会可以避免损害的产生的，或者是直接导致损害产生的不作为行为。在制定具体规则的同时，人们也制定了一些惯例，不再含糊地以普通人的行为作为参照，这些惯例与其他以公共政策为依据的具体规则比肩共存，惯例产生的种种依据却不再清楚。这样，我们就马上会看到，那些似乎不涉及任何罪责的规则有时适用于间接过失，而其他始于过失一般性概念的规则，则可能同样轻易地适用于一些外在的政策依据。

Apart from the extremes just mentioned, it is now easy to see how the point at which a man's conduct begins to be at his own peril is generally fixed. When the principle is understood on which that point is determined by the law of torts, we possess a common ground of classification, and a key to the whole subject, so far as tradition has not swerved the law from a consistent theory. It has been made pretty clear from what precedes, that I find that ground

in knowledge of circumstances accompanying an act or conduct indifferent but for those circumstances.

除了刚刚提到的极端情况之外，如今显而易见行为人开始自行承担行为风险的起点一般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在我们依据侵权法所确定的这个风险的起点来理解这一原则时，我们就拥有了一个进行分类的一般性依据，以及解决整个问题的答案，只要惯例并未使法律背离一套统一的理论。上文非常清楚地表明，我认为，以对某一动作或行为伴发情况的知情为依据，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伴发情况，该依据根本无关紧要。

But it is worth remarking, before that criterion is discussed, that a possible common ground is reached at the preceding step in the descent from malice through intent and foresight. Foresight is a possible common denominator of wrongs at the two extremes of malice and negligence. The purpose of the law is to prevent or secure a man indemnity from harm at the hands of his neighbors, so far as consistent with other considerations which have been mentioned, and excepting, of course, such harm as it permits to be intentionally inflicted. When a man foresees that harm will result from his conduct, the principle which exonerates him from accident no longer applies, and he is liable. But, as has been shown, he is bound to foresee whatever a prudent and intelligent man would have foreseen, and therefore he is liable for conduct from which such a man would have foreseen that harm was liable to follow.

但在讨论这一标准之前，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以上从恶意上升到对意图及预见的分析，我们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共同点。位于恶意与过失两个极端之间的不当行为，预见可能是其公分母。法律的目的是要

预防损害或确保一个人从其邻居对他的伤害中得到赔偿，只要不与上文提到的其他原由冲突，当然，那些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有意做出的伤害除外。在一个人预见到其行为会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就不再适用使其免于事故责任的原则，他应负有责任。但是，如上所述，他有责任预见到一个审慎、明智的人应当可以预见到的任何后果，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审慎、明智的人应当可能预见到会随之造成伤害的行为，他就应当负有责任。

Accordingly,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state all cases of negligence in terms of imputed or presumed foresight. It would be possible even to press the presumption further, applying the very inaccurate maxim, that every man is presumed to intend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of his own acts; and this mode of expression will, in fact, be found to have been occasionally used, [5_11] more especially in the criminal law, where the notion of intent has a stronger foothold. [5_12] The latter fiction is more remote and less philosophical than the former; but, after all, both are equally fictions. Negligence is not foresight, but precisely the want of it; and if foresight were presumed, the ground of the presumption, and therefore the essential element, would be the knowledge of facts which made foresight possible.

据此，所有过失相关案例都可以从归罪或假定预见的角度进行说明。套用这条错误十足的准则，甚至还可以将假设更推进一步，假定人人都希望自身行为造成的后果为自然的后果；事实上，我们发现这种表达模式偶尔也被运用，尤其是刑法，其中意图的概念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后一种拟制比前一种更加远离事实，更加不合逻辑；但不管怎样，两者都同属拟制。过失不是预见，而恰恰是缺乏预见的表现；如果假定是可预见的，那么假定的依据，因此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即是对使预见成为可能的事实情况的知晓。

Taking knowledge, then, as the true starting-point, the next question is how to determine the circumstances necessary to be known in any given case in order to make a man liable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act. They must be such as would have led a prudent man to perceive danger, although not necessarily to foresee the specific harm. But this is a vague test. How is it decided what those circumstances are? The answer must be, by experience.

那么，如果将知情作为真正的出发点，则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在任何既定情况下，要使一个人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其所必须知晓的情况该如何确定。其所必须知晓的情况应该可能会使一个审慎的人察觉到危险，尽管未必会预见到具体的伤害后果。但是，这只是一条含糊的标准。如何确定其所必须知晓的那些情况是什么呢？答案一定是：凭经验。

But there is one point which has been left ambiguous in the preceding Lecture and here, and which must be touched upon. It has been assumed that conduct which the man of ordinary intelligence would perceive to be dangerou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would be blameworthy if pursued by him. It might not be so, however. Suppose that, acting under the threats of twelve armed men, which put him in fear of his life, a man enters another's close and takes a horse. In such a case, he actually contemplates and chooses harm to another as the consequence of his act. Yet the act is neither blameworthy nor punishable. But it might be actionable, and Rolle, C. J. ruled that it was so in Gilbert v. Stone. [5_13] If this be law, it goes the full length of deciding that it is enough if the defendant has had a chance to avoid inflicting the harm complained of. And it may well be argued that, although he

does wisely to ransom his life as he best may, there is no reason why he should be allowed to intentionally and permanently transfer his misfortunes to the shoulders of his neighbors.

但是，有一点在上一讲中以及这里都还没有澄清，现在有必要予以探讨。人们认为，具有一般智力的人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会察觉到具有危险性的行为，如果此人实施了该行为，则应被归责。不过，事情可能并非如此。假设一个人在12名武装人员的威胁下，因为担心有生命危险而采取行动，进入了他人的围地，并牵走了一匹马。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于因其行为而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他的确是经过考虑，并且是有意为之的。然而，这一行为既不应被归责，也不应受到惩罚。但这一行为可被起诉，首席大法官罗尔曾在吉尔伯特诉斯通案中即是如此裁决的。如果这就是法律，那么，法律是在尽可能地说明：只要确定被告是否有机会能避免造成所诉之损害就足够了。完全可以说，尽管他确实聪明地以他可能想到的最好办法挽回了自己的性命，但也没有任何理由允许他可以故意地、永久地将不幸转嫁到其邻居身上。

It cannot be inferred, from the mere circumstance that certain conduct is made actionable, that therefore the law regards it as wrong, or seeks to prevent it. Under our mill acts a man has to pay for flowing his neighbor's lands, in the same way that he has to pay in trover for converting his neighbor's goods. Yet the law approves and encourages the flowing of lands for the erection of mills.

仅凭某一行为被定为可被起诉的行为这一情况，不能因此而推出法律视该行为为不当行为，或者试图防范该行为。根据我国的磨坊法，一个人必须为淹没其邻居的土地做出赔偿；同样，他在动产侵占之诉中，必须为侵占其邻居的财产做出赔偿。然而，法律也准许且支

持因兴建磨坊而淹没土地。

Moral predilections must not be allowed to influence our minds in settling legal distinctions. If we accept the test of the liability alone, how do we distinguish between trover and the mill acts? Or between conduct which is prohibited, and that which is merely taxed? The only distinction which I can see is in the difference of the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attached to the two classes of conduct. In the one, the maxim in pari delicto potior est conditio defendentis, and the invalidity of contracts contemplating it, show that the conduct is outside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In the other, it is otherwise. [5_14] This opinion is confirmed by the fact, that almost the only cases in whic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ohibition and taxation comes up concern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maxims.

在辨析法律问题时，一定不能让道德的偏好影响我们的思考。如果我们只接受责任标准，那么，我们如何把动产侵占之诉与磨坊法区分开来？或者如何区分被禁止的行为与仅仅只是被指控的行为？我能看到的唯一区别在于这两类行为所产生的附带后果不同。在其中一类行为中，双方当事人过失相当时，被告人地位更强这一原则，以及遵循此原则的合同无效，表明此类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另一类行为则并非如此。以下事实可证实这一观点，即几乎只有当被禁止的行为和被指控的行为出现差别时，才会涉及到适用这些原则。

But if this be true, liability to an ac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ort wrong-doing. And this may be admitted without at all impairing the force of the argument in the foregoing Lecture, which only requires that people should not be made to pay for accidents which they could not have avoided.

但如果真是如此，则对一起行为负有责任，未必就意味着做了错事。我们可以承认这一点，而丝毫无损于上一讲所提出的观点，上一讲中的观点只是要求人们无需对其无法避免的意外事故做出赔偿。

It is doubtful, however, whether the ruling of Chief Justice Rolle would now be followed. The squib case, Scott v. Shepherd, and the language of some text-books, are more or less opposed to it. [5_15] If the latter view is law, then an act must in general not only be dangerous, but one which would be blameworthy on the part of the average man, in order to make the actor liable. But, aside from such exceptional cases as Gilbert v. Stone, the two tests agree, and the difference need not be considered in what follows.

但是，人们现在是否还遵循首席大法官罗尔的裁决却是个疑问。那起爆竹案，即斯科特诉谢泼德案，以及一些教科书中的说法，多少都对该裁决持反对意见。如果人们无需对其无法避免的意外事故做出赔偿这一种观点为权威观点的话，那么，要让某一行为人承担责任，一般说来，其行为不仅应当具有危险性，而且是从普通人一方看来可归责的行为。但是，撇开吉尔伯特诉斯通案这样一些特殊的案例，两种标准其实是一致的，下面无需再讲其差异。

I therefore repeat, that experience is the test by which it is decided whether the degree of danger attending given conduct under certain known circumstances is sufficient to throw the risk upon the party pursuing it.

因此再重复一下，经验是一个标准，据此可以在知情情况下确定

既定行为是否足够危险，从而给实施该行为的当事人带来风险。

For instance, experience shows that a good many guns supposed to be unloaded go off and hurt people. The ordinarily intelligent and prudent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would foresee the possibility of danger from pointing a gun which he had not inspected into a crowd, and pulling the trigger, although it was said to be unloaded. Hence, it may very properly be held that a man who does such a thing does it at his peril, and that, if damage ensues, he is answerable for it. The co-ordinated acts necessary to point a gun and pull a trigger, and the intent and knowledge shown by the co-ordination of those acts, are all consistent with entire blamelessness. They threaten harm to no one without further facts. But the one additional circumstance of a man in the line and within range of the piece makes the conduct manifestly dangerous to any one who knows the fact. There is no longer any need to refer to the prudent man, or general experience. The facts have taught their lesson, and have generated a concrete and external rule of liability. He who snaps a cap upon a gun pointed in the direction of another person, known by him to be present, is answerable for the consequences.

例如，经验表明，有很多原本被认为已经退膛的枪支会走火伤人。社会中具有正常智力且审慎的成员可能会预见到，将一支未经检查的枪支对着人群，并扣下扳机，可能会导致危险，尽管据说这支枪是空枪。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一个人如果做了这样一件事，就要自行承担行为的风险，而且如果造成了损害，他就要对此承担责任。举起一支枪，并扣下扳机所必需的一些协调性动作，以及通过这些动作协调所表现出来的意图以及知情状态，整个过程都无可指责。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事实，它们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损害。但是，一个

人如果在枪口下，位于手枪射程范围之内，那么在任何了解这一事实的人看来，这一附加情况都会使该行为具有明显的危险性。这就不再需要参照审慎的人以及一般经验了。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并已形成了一条具体外在的责任规则。一个人猛然掀开了一支枪的枪盖，此枪正指向他人，且此人知道他人在场，这个人就要对后果负责。

The question what a prudent man would do under given circumstances is then equivalent to the question what are the teachings of experience as to the dangerous character of this or that conduct under these or those circumstances; and as the teachings of experience are matters of fact, it is easy to see why the jury should be consulted with regard to them. They are, however, facts of a special and peculiar function. Their only bearing is on the question, what ought to have been done or omitt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not on what was done. Their function is to suggest a rule of conduct.

这样，在既定情况下一个审慎的人会如何做这个问题就等同于下面这个问题：对于这些或那些情况下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所具有的危险性，可以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因为经验教训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所以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应就经验教训征求陪审团的意见。然而，经验教训属于具有某种独特功能的事实。经验教训的唯一意义在于在案件情况下，当作什么，或者不当作什么，而不是当事人已经做了什么。经验教训的功能在于表明一种行为规则。

Sometimes courts are induced to lay down rules by facts of a more specific nature; as that the legislature passed a certain statute, and that the case at bar is within the fair meaning of its words; or that the practice of a specially interested class, or of the public at

large, has generated a rule of conduct outside the law which it is desirable that the courts should recognize and enforce. These are matters of fact, and have sometimes been pleaded as such. But as their only importance is, that, if believed, they will induce the judges to lay down a rule of conduct, or in other words a rule of law, suggested by them, their tendency in most instances is to disappear as fast as the rules suggested by them become settled. [5_16] While the facts are uncertain, as they are still only motives for decision upon the law,grounds for legislation, so to speak, the judges may ascertain them in any way which satisfies their conscience. Thus, courts recognize the statutes of the jurisdiction judicially, although the laws of other jurisdictions, with doubtful wisdom, are left to the jury. [5_17] They may take judicial cognizance of a custom of merchants. [5_18] In former days, at least, they might inquire about it in pais after a demurrer. [5_19] They may act on the statement of a special jury, as in the time of Lord Mansfield and his successors, or upon the finding of a common jury based on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as is the practice to-day in this country. But many instances will be found in the text-books which show that, when the facts are ascertained, they soon cease to be referred to, and give place to a rule of law.

有时候，更具体的事实情况会使法院放弃一些规则，比如，立法机构通过了一条法规，而法院所审理的案件恰好在该法规所述范围之内；或者某一特殊利益阶层或者一般公众的做法已经形成为某种行为规则，超出了法律的范围，但法院最好应当予以承认并执行。这些行为规则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们有时就是如此进行辩护的。但是，因为这些规则的唯一重要性在于，如果人们相信这些规则，就会使得法官在这些规则的启发下制定一条行为规则，或者换句话说，一条新的法规。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一旦在其启发下制定的新法规被确定下来，这些行为规则也会趋于消失。当事实不明时，因为事实仍然还是

根据法律作出判决的唯一动因——可以说是立法的依据——所以法官可以以任何方式查明事实，只要问心无愧。因此，法院在法律上承认本司法管辖范围内的法律法规，尽管其他司法管辖范围内的法律，因为其中的观点拿不准，则交由陪审团来判断。法院可以对商人的某种惯例进行司法认定。从前，法院至少可以在抗辩之后，对惯例进行非正式的庭外讯问。法院可以根据特别陪审团的陈述来行事，曼斯菲尔德勋爵及其继任者所处的时代就是那样；还可以根据普通陪审团基于证人的证词作出的裁决来行事，今天本国的做法就是这样。但我们会发现，教科书里有很多例子表明，事实一旦被查明，就很快不再被提及，而让位于法律规则。

The same transition is noticeable with regard to the teachings of experience. There are many cases, no doubt, in which the court would lean for aid upon a jury;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in which the teaching has been formulated in specific rules. These rules will be found to vary considerably with regard to the number of concomitant circumstances necessary to throw the peril of conduct otherwise indifferent on the actor. As the circumstances become more numerous and complex, the tendency to cut the knot with the jury becomes greater. It will be useful to follow a line of cases up from the simple to the more complicated, by way of illustration. The difficulty of distinguishing rules based on other grounds of policy from those which have been worked out in the field of negligence, will be particularly noticed.

经验教训方面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毫无疑问，有很多案件在其办理过程中，法庭可能会仰赖陪审团的帮助；但同样也有很多案件在办理过程中，经验教训被拟定为专门的规则。我们发现，根据必要的伴发环境因素的数量，这些规则大相径庭，这些必要因素会使行为人承担行为的风险，否则与行为人无关。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及

复杂化，陪审团快刀斩乱麻的趋势也更为明显。借助于例证，很有必要对一系列从简单到复杂的案件进行追踪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很难区分基于其他政策依据的规则与过失领域中所制定的规则。

In all these cases it will be found that there has been a voluntary act on the part of the person to be charged. The reason for this requirement was shown in the foregoing Lecture. Unnecessary though it is for the defendant to have intended or foreseen the evil which he has caused, it is necessary that he should have chosen the conduct which led to it. But it has also been shown that a voluntary act is not enough, and that even a co-ordinated series of acts or conduct is often not enough by itself. But the co-ordination of a series of acts shows a further intent than is necessarily manifested by any single act, and sometimes proves with almost equal certainty the knowledge of one or more concomitant circumstances. And there are cases where conduct with only the intent and knowledge thus necessarily implied is sufficient to throw the risk of it on the actor.

在以上各种情况下，都会发现被指控一方存在自愿行为。上一讲已经指出了这一必要条件的理由。对于被告来说，尽管他是否蓄意或预见到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并非必要条件，但他有意做出导致了不良后果的行为则为必要条件。但是，上文也已说明，有自愿性行为还不够，甚至是一系列协调性动作或行为本身通常也不够。不过，协调一系列动作，其所揭示的意图比单个动作所必然揭示的意图要更深一些，而且有时几乎可以同样确切地认定对一个或多个伴发环境因素的知情。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其中，仅凭意图以及因此必然意味着知情，就足以使行为人承担行为的风险。

For instance, when a man does the series of acts called walking, it is assumed for all purposes of responsibility that he knows the earth is under his feet. The conduct per se is indifferent, to be sure. A man may go through the motions of walking without legal peril, if he chooses to practise on a private treadmill; but if he goes through the same motions on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it cannot be doubted that he knows that the earth is there. With that knowledge, he acts at his peril in certain respects. If he crosses his neighbor's boundary, he is a trespasser. The reasons for this strict rule have been partially discussed in the last Lecture. Possibly there is more of history or of past or present notions of policy in its explanation than is there suggested, and at any rate I do not care to justify the rule. But it is intelligible. A man who walks knows that he is moving over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he knows that he is surrounded by private estates which he has no right to enter, and he knows that his motion, unless properly guided, will carry him into those estates. He is thus warned, and the burden of his conduct is thrown upon himself.

例如，在某人实施被人们称为行走的一系列动作时，我们假定此人对地面在其脚下这一点知情，则他对其行为负有责任。可以肯定的是，该行为本身无关紧要。一个人如果选择在某辆私人踏车上练习行走，就可以经历这一系列的走动动作而不必承担法律风险；但是，如果他是在地面上经历同样的动作，那么，他知晓地面就在那里这一点则毋庸置疑。正因为知晓这一情况，所以他采取了行动就得在某些方面承担责任。如果他越过了邻居的地界，就属于非法侵入他人领土。制定这一严格规则的理由在上一讲中已经作出了部分说明。对这一规则的说明解释，与规则本身相比较，也许包含更多的历史、或者过去或现在的政策理念；不管怎样，这一规则是否合理，我倒并不介意。但是，这一规则并不难理解。一个步行的人知道他正在地面上移动；他知道，他的周围是私人地产，他无权进入；他知道他的动作如果控

制的不好，就会使他进入别人的土地。因此，他必须小心谨慎，其行为的责任由其本人承担。

But the act of walking does not throw the peril of all possible consequences upon him. He may run a man down in the street, but he is not liable for that unless he does it negligently. Confused as the law is with cross-lights of tradition, and hard as we may find it to arrive at perfectly satisfactory general theory, it does distinguish in a pretty sensible way,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and degree of the different perils incident to a given situation.

但是，并不会因为他走路的行为而使他承担所有可能的风险后果。他可能会在大街上撞倒一个人，但如果并非出于疏忽大意，他就不用对此承担责任。法律与不同的惯例混淆在一起，同样，我们发现也很难得出完全令人满意的一般性理论，但是，根据某一既定情况下不同风险的性质及程度，法律还是作出了明智的区分。

From the simple case of walking we may proceed to the more complex cases of dealings with tangible objects of property. It may be said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a man meddles with such things at his own risk. It does not matter how honestly he may believe that they belong to himself, or are free to the public, or that he has a license from the owner, or that the case is one in which the law has limited the rights of ownership; he takes the chance of how the fact may turn out, and if the fact is otherwise than as he supposes, he must answer for his conduct. As has been already suggested, he knows that he is exercising more or less dominion over property, or that he is injuring it; he must make good his right if it is challenged.

从走路这一简单案例出发，我们可以过渡到一些更加复杂的涉及到有形财产的案例。可以说，一般而言，一个人乱动这样一些有形财产，就要自行承担风险。他是否真的相信这些财产是属于他自己，还是对公众免费开放，或者他从财产所有人那里得到了许可，或者情况是法律对财产所有权进行了限制，这些都无关紧要；要看事实结果如何，如果事实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他就得对其行为负责。与上文一样，他知道自己多少是在行使财产支配权，还是正在损害财产；如果有人质疑其权利，他就得为此举证。

Whether this strict rule is based on the common grounds of liability, or upon some special consideration of past or present policy, policy has set some limits to it, as was mentioned in the foregoing Lecture.

这一严格的规则是以一般责任依据为基础，还是基于对新旧法规的某些特殊考量，法律法规已经对此设定了某些界限，这些在上一讲中已经提到。

Another case of conduct which is at the risk of the party without further knowledge than it necessarily imports, is the keeping of a tiger or bear, or other animal of a species commonly known to be ferocious. If such an animal escapes and does damage, the owner is liable simply on proof that he kept it. In this instance the comparative remoteness of the moment of choice in the line of causation from the effect complained of, will be particularly noticed. Ordinary cases of liability arise out of a choice which was the proximate cause of the harm upon which the action is founded. But here there is usually no question of negligence in guarding the beast. It is enough in most, if not in all cases, that the owner has

chosen to keep it.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tigers and bears are alert to find means of escape, and that, if they escape, they are very certain to do harm of a serious nature. The possibility of a great danger has the same effect as the probability of a less one, and the law throws the risk of the venture on the person who introduces the peril into the community.

还有一种行为，当事人要承担风险，而不用进一步知晓行为必然包含的意义，这种行为就是饲养老虎或熊，或者其他大家都知道是很凶猛的动物。如果这样一只动物逃脱并造成了损害，仅仅根据所有者饲养了该动物这一证据，所有者就得承担责任。尤其要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下的因果关系链条中，采取行动的时刻与所诉后果之间是相对间接的关系。通常情况下，责任源自于采取了某一个行动，这是造成损害的近因，是诉讼成立的基础。但在这里，看守动物的行为通常并不存在过失。在大多数案例中，甚至可以说所有案例中，只要所有人自行选择饲养该动物，这一点就足够了。经验表明，老虎和熊善于寻找逃脱的机会，而且一旦它们逃脱成功，肯定会造成性质严重的危害。带来更大危害的可能性与带来较小危害的可能性产生的后果一样，法律将责任加之于给社会带来危害的人身上。

This remoteness of the opportunity of choice goes far to show that this risk is thrown upon the owner for other reasons than the ordinary one of imprudent conduct.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liability stood upon remote inadvertence. [5_20] But the law does not forbid a man to keep a menagerie, or deem it in any way blameworthy. It has applied nearly as strict a rule to dealings which are even more clearly beneficial to the community than a show of wild beasts.

采取行动的机会与所诉后果之间的间接关系足以表明，把这种风险责任加在动物饲养者身上的原因并非普通的不审慎行为。有人指出，这种责任建立在间接疏忽之上。不过，法律并未禁止人们开一家动物园，或认为这种行为有任何过错。对于那些相比野生动物展显然甚至更加有益于社会的行为，法律适用几乎同样严格的规定。

This seems to be one of those cases where the ground of liability is to be sought in policy coupled with tradition, rather than in any form of blameworthiness, or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chance to avoid doing the harm as a man is usually allowed. But the fact that remote inadvertence has been suggested for an explanation illustrates what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difficulty of deciding whether a given rule is founded on special grounds, or has been worked out within the sphere of negligence, when once a special rule has been laid down.

这似乎属于这样一种情况，责任依据于政策及惯例，而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可归责性，或者是否存在一个人通常可以避免造成危害的机会。但是，有人提出把间接疏忽作为一种解释这一事实表明，一旦制定了某条具体的规则，则很难确定某既定规则是基于某些特别依据，还是属于过失的范畴，这一点在上文中已提到。

It is further to be noticed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the defendant's knowledge of the nature of tigers, although without that knowledge he cannot be said to have intelligently chosen to subject the community to danger. Here again even in the domain of knowledge the law applies its principle of averages. The fact that tigers and bears are dangerous is so generally known, that a man who keeps them is presumed to know their peculiarities. In other

words, he does actually know that he has an animal with certain teeth, claws, and so forth, and he must find out the rest of what an average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would know, at his peril.

还需要注意的是，被告对于老虎的本性无疑知情，尽管如果他对此并不知情，就不能说他是有意选择让社会遭受危险。这里，同样地，即使是在知情的问题上，法律也适用其平均法则。老虎和熊具有危险性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一个人如果养了这两种动物，可推定他对于其特性是知情的。换句话说，他实际知晓他拥有的动物长有什么牙和什么爪子等等器官，他必须还要认识到社会一般成员所知晓的其他情况，否则将后果自负。

What is true as to damages in general done by ferocious wild beasts is true as to a particular class of damages done by domestic cattle, namely, trespasses upon another's land. This has been dealt with in former Lectures, and it is therefore needless to do more than to recall it here, and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distinction based on experience and policy between damage which is and that which is not of a kind to be expected. Cattle generally stray and damage cultivated land when they get upon it. They only exceptionally hurt human beings.

凶猛的野生动物一般所造成的损害的情况也适用于家畜所造成的一类特殊的损害，即非法侵入他人土地。这一点上一讲已经分析过，所以在此只需要着重回顾一下，以经验和政策为基础进行划分的预见损害与未预见损害两类损害之间的区别。家畜通常会走失闯入他人耕地而造成损害，它们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伤人。

I need not recur to the possible historical connection of either of these last forms of liability with the noxae deditio, because, whether that origin is made out or not, the policy of the rule has been accepted as sound, and carried further in England within the last few years by the doctrine that a man who brings upon his land and keeps there anything likely to do mischief if it escape, must keep it in at his peril. [5_21] The strictness of this principle will vary in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as the balance varies between the advantages to the public and the dangers to individuals from the conduct in question. Danger of harm to others is not the only thing to be considered, as has been said already. The law allows some harms to be intentionally inflicted, and a fortiori some risks to be intentionally run. In some Western States a man is not required to keep his cattle fenced in. Some courts have refused to follow Rylands v. Fletcher. [5_22]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inciple has been applied to artificial reservoirs of water, to cesspools, to accumulations of snow and ice upon a building by reason of the form of its roof, and to party walls. [5_23]

最后这几类责任形式中每一类与损害投偿原则之间都可能存在历史关系；这一点我没有必要重新提起，因为，不管这一起源能否被确定下来，制定这一法规的原则已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且最近几年在英格兰进一步演变为如下原则，即任何逃脱后就可能造成损害的东西，如果有人把它带到了自己的土地上饲养，他就必须看管好它，不让它逃脱，否则要自行承担风险。这一原则的严格程度因地而异，因为给公众带来的好处以及涉案行为对个人造成的危害之间的平衡点不同。如上所述，给他人造成的危害并非需要考虑的唯一问题。法律允许某些损害可以有意为之，更不用说，有些风险也可以有意为之。西部有些地区并不要求人们将家畜圈养起来。有些法院曾拒绝遵循赖兰兹诉弗莱彻案的先例。但另一方面，该原则已适用于处理人工水库、化粪池，因屋顶形状致使冰雪堆积，以及界墙等问题。

In these cases, as in that of ferocious animals, it is no excuse that the defendant did not know, and could not have found out, the weak point from which the dangerous object escaped. The period of choice was further back, and, although he was not to blame, he was bound at his peril to know that the object was a continual threat to his neighbors, and that is enough to throw the risk of the business on him.

这类案件类似于凶猛动物类案件，被告不知情，未能提早发现危险物体可能失控的漏洞等都不是辩护的理由。采取行动的时间节点进一步提前了，而且，尽管不应责备被告，但他有责任知道该物体对其邻居是一种持续的威胁，这就足以将事情的风险加在他的身上。

I now pass to cases one degree more complex than those so far considered. In these there must be another concomitant circumstance known to the party in addition to those of which the knowledge is necessarily or practically proved by his conduct. The cases which naturally suggest themselves again concern animals. Experience as interpreted by the English law has shown that dogs, rams, and bulls are in general of a tame and mild nature, and that, if any one of them does by chance exhibit a tendency to bite, butt, or gore, it is an exceptional phenomenon. Hence it is not the law that a man keeps dogs, rams, bulls, and other like tame animals at his peril as to the personal damages which they may inflict, unless he knows or has notice that the particular animal kept by him has the abnormal tendency which they do sometimes show. The law has, however, been brought a little nearer to actual experience by statute in many jurisdictions.

下面要讨论的一些案例比前面所有案例要复杂一些。这些案例必定存在另外一种伴发因素，当事人是知情的；除此之外，其知情这一事实必定或实际上可通过其行为得以证实。这些案例自然也涉及到动物。根据英国的法律对经验一词的阐释表明，狗、羊以及牛等一般天性比较温和驯服，即使他们偶然表现出咬人、顶人，或者用角抵人的倾向，也属于例外现象。因此，法律并未要求一个饲养狗、羊、牛或其他同样驯服的动物的人，自行承担这些动物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除非他对此知情，或已被告知，其所饲养的某只动物性情反常，且的确已经数次表现出如此。但是，很多地方通过制定法规，已使得法律更接近实际经验。

Now let us go one step farther still. A man keeps an unbroken and unruly horse, knowing it to be so. That is not enough to throw the risk of its behavior on him. The tendency of the known wildness is not dangerous generally, but only under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Add to keeping, the attempt to break the horse; still no danger to the public is disclosed. But if the place where the owner tries to break it is a crowded thoroughfare, the owner knows an additional circumstance which, according to common experience, makes this conduct dangerous, and therefore must take the risk of what harm may be done. [5_24] On the other hand, if a man who was a good rider bought a horse with no appearance of vice and mounted it to ride home, there would be no such apparent danger as to make him answerable if the horse became unruly and did damage. [5_25] Experience has measured the probabilities and draws the line between the two cases.

下面让我们再进一步来看。某人养了一匹未被驯服且难以驾驭的马，他对此是知情的。这并不足以将马的行为风险加于此人身上。知晓这匹马有野性，知道其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有危险，只在特殊情况下

才会有危险。除了饲养这匹马之外，试图驯服此马显然也根本不会对公众造成危害。但是，如果马的主人试图驯马的地方是人来人往的大街，马的主人对这一新情况是知情的，根据一般经验，这一新情况会使其驯马行为具有危险性，他因此必须承担可能造成之损害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如果买马的人是一名优秀的骑手，他买了一匹表明看起来并不凶野的马，并骑上这匹马回家，就并不存在需要使他承担责任的明显的危险性，即使该马变得难以驾驭并造成损害。根据经验，可以得出两种案例的概率，并可划出其间的界线。

Whatever may be the true explanation of the rule applied to keeping tigers, or the principle of Rylands v. Fletcher, in the last cases we have entered the sphere of negligence, and, if we take a case lying somewhere between the two just stated, and add somewhat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circumstances, we shall find that both conduct and standard would probably be left without much discrimination to the jury, on the broad issue whether the defendant had acted as a prudent man would have don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有关饲养老虎的规则或者赖兰兹诉弗莱彻案的原理，不管其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在上述案例中，我们都已涉及到过失的范畴，而且，如果我们举出一个案例，大概处于上述两类案例情况之间，再使情况多少复杂一些，我们就会发现，关于被告的行为是否是审慎的人在一定情况下的所作所为这一宽泛的问题，行为及标准两方面可能都不会给陪审团留出多少自由裁量权。

As to wrongs called malicious or intentional it is not necessary to mention the different classes a second time, and to find them a place in this series. As has been seen, they vary in the number of

circumstances which must be known. Slander is conduct which is very generally at the risk of the speaker, because, as charges of the kind with which it deals are manifestly detrimental, the questions which practically arise for the most part concern the defence of truth or privilege. Deceit requires more, but still simple facts. Statements do not threaten the harm in question unless they are mad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s to naturally lead to action, and are made on insufficient grounds.

对于被称为恶意或故意的过错，没有必要再提及其不同的类型，也没有必要给它们在这个序列中找个位置。如上所述，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被告肯定知情的环境因素的数量不同。诽谤是说话人一般来说必须自行承担风险的行为，因为，其所涉及到的这一类指控显然具有危害性，实际出现的问题多半涉及到真实抗辩或者言行自由权。欺骗需要更多但依然很简单的事实。除非所发表的言论肯定会引起诉讼，或缺乏充分的依据，否则言论不会造成所诉损害。

It is not, however, without significance, that certain wrongs are described in language importing intent. The harm in such cases is most frequently done intentionally, if intent to cause a certain harm is shown, there need to prove knowledge of facts which made it that harm would follow. Moreover, it is often much easier to prove intent directly, than to prove the knowledge which would make it unnecessary.

但是，用意图相关的说法来描述某些过错其实非常重要。在这类案例中，损害常常是有意为之，如果证明怀有造成某种损害的意图，就有必要证明对于可能会造成损害的事实是知情的。此外，直接证明意图比证明知情要容易得多，证明知情就无需证明存有意图。

The cases in which a man is treated as the responsible cause of a given harm, on the one hand, extend beyond those in which his conduct was chosen in actual contemplation of that result, and in which, therefore, he may be to have chosen to cause that harm;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do not extend to all instances where the damages would not have happened but for some remote election on his par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hoice will be found to have extended further than a simple act, and to co-ordinated acts into conduct. Very commonly it will have extended further still, to some external consequence. But generally, also, it will be found to have stopped short of the consequence complained of.

如果某人被当成某一特定损害的可归责事由，这些案例一方面不仅限于这样一类情况，即此人实际上是为了造成损害才采取行动，他因此可以说是有意造成了损害；但另一方面，还不能囊括所有如下情况，即如果不是因为他间接地采取了行动，损害可能不会发生。一般而言，我们会发现采取行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是协调一系列动作形成的行为。通常还会进一步延伸，直到得到某一外在的后果。但一般而言，我们还会发现，如未出现所诉后果，这种延伸就会停止。

The question in each case is whether the actual choice, or, in other words, the actually contemplated result, was near enough to the remoter result complained of to throw the peril of it upon the actor.

在各种情形下，问题的关键在于实际采取的行动，或者换句话说，实际想要得到的结果，是否非常接近于所诉更间接的结果，从而

使行为人承担行为的风险。

Many of the cases which have been put thus far are cases where the proximate cause of the loss was intended to be produced by the defendant. But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same result may be caused by a choice at different points. For instance, a man is sued for having caused his neighbor's house to burn down. The simplest case is, that he actually intended to burn it down. If so, the length of the chain of physical causes intervening is of no importance, and has no bearing on the case.

迄今为止所论述的这类案例，有很多都属于被告意图造成损失为直接原因这样一类情况。但我们看到，在不同的点选择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结果却相同。例如，一个人被控致其邻居的房屋被烧毁。最简单的情况是，他实际有意烧毁该房屋。如果的确如此，则其中一系列身体动作持续的时间长短无关紧要，对案件不产生任何影响。

But the choice may have stopped one step farther back. The defendant may have intended to light a fire on his own land, and may not have intended to burn the house. Then the nature of the intervening and concomitant physical causes becomes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The question will be the degree of danger attending the contemplated (and therefore chosen) effect of the defendant's condu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known to him. If this was very plain and very great, as, for instance, if his conduct consisted in lighting stubble near a haystack close to the house, and if the manifest circumstances were that the house was of wood, the stubble very dry, and the wind in a dangerous quarter, the court would probably rule that he was liable. If the defendant lighted an

ordinary fire in a fireplace in an adjoining house, having no knowledge that the fireplace was unsafely constructed, the court would probably rule that he was not liable. Midway, complicated and doubtful cases would go to the jury.

但行动有可能提前一步终止了。被告可能只是想在自己的土地上生火，并没有想要烧毁邻居的房屋。于是，中间经历的身体伴随动作因素的性质就变得极其重要。问题就变成，被告在已经知情的情况下，其行为预期的（因此是故意的）后果所伴随的危险程度究竟有多大。如果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非常大，例如，如果其行为是在靠近邻居房屋的一个干草堆旁点燃了谷茬，且如果显而易见的环境因素是，房屋是木质结构的，谷茬很干燥，且风向也很容易引发火灾，则法院很有可能裁定被告有责任。如果被告在毗邻的房屋内的壁炉中正常地点火，对于该壁炉建造的并不安全这一点并不知情，则法院就很有可能裁定被告没有责任。介于这两者情形之间的复杂疑难案例，则可由陪审团裁定。

But the defendant may not even have intended to set the fire, and his conduct and intent may have been simply to fire a gun, or, remoter still, to walk across a room, in doing which he involuntarily upset a bottle of acid. So that cases may go to the jury by reason of the remoteness of the choice in the series of events, as well as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circumstances attending the act or conduct. The difference is, perhaps, rather dramatic than substantial.

但是，被告可能甚至并没有打算点火，其行为及意图可能只是想要开一枪，或者更间接一点，可能只是穿过一间屋子时不小心撞倒了一瓶硫酸。因此，这样一类案件可由陪审团来裁定，原因在于在这一

系列事件中，其行为具有间接性，还在于行动或行为所伴随的环境因素的复杂性。区别也许很大，但却不是实质性的。

But the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every wrong begins by determining what the defendant has actually chosen, that is to say, what his voluntary act or conduct has been, and what consequences he has actually contemplated as flowing from them, and then goes on to determine what dangers attended either the conduct under the known circumstances, or its contemplated consequence under the contemplated circumstances.

但是，对每一起过失进行这种逻辑分析，首先是要确定被告实际采取了何种行动，也就是说，其自主的动作或行为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些动作或行为，他实际上预想到了什么后果；接下来再继续确定，在知情的情况下行为所伴随的危险是什么，或者在预期的情况下所预期的后果。

Take a case like the glancing of Sir Walter Tyrrel's arrow. If an expert marksman contemplated that the arrow would hit a certain person, cadit qucoestio. If he contemplated that it would glance in the direction of another person, but contemplated no more than that, in order to judge of his liability we must go to the end of his fore-sight, and, assuming the foreseen event to happen, consider what the manifest danger was then. But if no such event was foreseen, the marksman must be judged by the circumstances known to him at the time of shooting.

举一个例子，比如沃尔特·蒂勒尔爵士的箭射偏这个例子。如果一

个老练的神射手预料到箭可能会射中某一个人，问题就在于此。如果射手预计，射出的箭可能会从另一个人的身旁一擦而过，但他只是预料到这些，那么，为了明确他的责任，我们需要深入追究其预见到的情况，在推想他预见到的事情发生时，考虑当时存在什么明显的危险。但如果并没有预见到这些事情，则须根据射手已知情的情况对其进行裁决。

The theory of torts may be summed up very simply. At the two extremes of the law are rules determined by policy without reference of any kind to morality. Certain harms a man may inflict even wickedly; for certain others he must answer, although his conduct has been prudent and beneficial to the community.

有关侵权法的理论可以非常简单地概括。在法律的这两个极端之上的那些法规，其所依据的政策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有一些损害，法律允许一个人甚至可以恶意造成，而对于其他一些损害，他则必须承担责任，尽管其行为很审慎，且对社会还有裨益。

But in the main the law started from those intentional wrongs which are the simplest and most pronounced cases, as well as the nearest to the feeling of revenge which leads to self-redress. It thus naturally adopted the vocabulary, and in some degree the tests, of morals. But as the law has grown, even when its standards have continued to model themselves upon those of morality, they have necessarily become external, because they have considered, not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the particular defendant, but whether his conduct would have been wrong in the fair average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whom he is expected to equal at his peril.

但大体上，侵权法是始于这样一些故意过失行为，它们属于最简单、最为显著的情况，也最接近会导致自我救济的复仇感。因此，侵权法自然会采用道德相关的术语，并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道德的标准。但是，随着侵权法的发展，甚至当其标准还是以道德标准为基础时，这些标准也必然演变为外在的标准，因为其所考虑的不是个别被告的实际情况，而是在社会中最一般的成员看来，其行为是否有过失，换作他们，也同样要自担风险。

In general, this question will be determined by considering the degree of danger attending the act or conduct under the known circumstances. If there is danger that harm to another will follow, the act is generally wrong in the sense of the law.

总而言之，通过考量知情情况下动作或行为所伴随的危险性可以确定这个问题。如果存在会给他人造成伤害的危险，则该行为从法律意义上而言一般就是过失。

But in some cases the defendant's conduct may not have been morally wrong, and yet he may have chosen to inflict the harm, as where he has acted in fear of his life. In such cases he will be liable, or not, according as the law makes moral blameworthiness, within the limits explained above, the ground of liability, or deems it sufficient if the defendant has had reasonable warning of danger before acting. This distinction, however, is generally unimportant, and the known tendency of the act under the known circumstances to do harm may be accepted as the general test of conduct.

但在，在有些案例中，被告的行为可能从道德的角度而言并没有

过错，然而他可能是故意造成伤害，比如他因担心有生命危险而采取行动。在这样一些情况下，他是否应负法律责任，就要看法律是将上述范围内道德的可归责性认定为责任的依据，还是认为只要被告在行为前已具有对危险的合理警惕就已足够。不过，这种区分一般说来无关紧要，在知情情况下对行为后果的知晓，可作为判断行为的一般性标准。

The tendency of a given act to cause harm under given circumstances must be determined by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either at first hand or through the voice of the jury is continually working out concrete rules, which in form are still more external and still more remote from a reference to the moral condition of the defendant, than even the test of the prudent man which makes the first stage of the division between law and morals. It does this in the domain of wrongs described as intentional, as systematically as in those styled unintentional or negligent.

某一特定行为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否可能导致伤害，一般可由经验来予以判定。不管是直接的经验还是由陪审团认定的经验，都不断形成具体的规则，这些规则，从形式上看，甚至比审慎的人这一标识着法律与道德第一阶段区别的标准，更具有外部色彩，更加不用涉及到被告的道德状况。不管是在被形容为故意过失的范畴内，还是在那些被形容为无意或疏忽的过失的范畴内，都基于经验形成了系统的规则。

But while the law is thus continually adding to its specific rules, it does not adopt the coarse and impolitic principle that a man acts always at his peril. On the contrary, its concrete rules, as well as the general questions addressed to the jury, show that the

defendant must have had at least a fair chance of avoiding the infliction of harm before he becomes answerable for such a consequence of his conduct. And it is certainly arguable that even a fair chance to avoid bringing harm to pass is not sufficient to throw upon a person the peril of his conduct, unless, judged by average standards, he is also to blame for what he does.

不过，尽管法律因此不断加入具体的规则，但却并没有采纳人们应当总是自担风险这一原则，该原则非常粗糙，且不够明智。相反地，具体的法规，以及交由陪审团处理的一般性问题都表明，被告必须至少拥有一次机会避免造成伤害，然后才须对行为的后果负责。当然，还存在争议的地方在于，即使有机会可以避免伤害的发生，也不足以让一个人承担其行为的风险，除非根据一般性标准可以判定，其行为也应被归责。

[5_1].Williamson v. Allison, 2 East, 446.

[5_2].Leather v. Simpson, L.R. 11 Eq. 398, 406.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treme moral view is stated in Weir v. Bell, 3 Ex. D. 238, 243.

[5_3].As to actual knowledge and intent, see Lecture II. p. 57.

[5_4].Cf. Knight v. German, Cro. Eliz. 70; S.C., ib. 134.

[5_5].Mitchell v. Jenkins, 5 B.&Ad. 588, 594; Turner v. Ambler, 10 Q.B. 252, 257, 261.

[5_6].Redfield, C. J. in Barron v. Mason, 31 Vt. 189, 197.

[5_7].Mitchell v. Jenkins, 5 B.&Ad. 588, 595.

[5_8].See Burton v. Fulton, 49 Penn. St. 151.

[5_9].Rolfe, B. in Fouldes v. Willoughby, 8 Meeson & Welsby, 540.

[5_10].Supra, pp. 115 et seq.

[5_11].See, e.g., Cooley, Torts, 164.

[5_12].Rex v. Dixon, 3 Maule & Selwyn, 11, 15; Reg. v. Hicklin, L.R. 3 Q.B. 360; 5 C.&P. 266, n.

[5_13].Aleyn, 35; Style, 72; A.D. 1648.

[5_14].1 Kent (12th ed.), 467, n. 1; 6 Am. Law Rev. 723-725; 7 id. 652.

[5_15].2 Wm. Bl. 892, A.D. 1773; supra, p. 92; Addison on Torts (4th ed.), 264, citing Y.B. 37 Hen. VI. 37, pl. 26, which hardly sustains the broad language of the text.

[5_16].Compare Crouch v. London & N. W. R. Co., 14 C.B. 255, 283; Calye's Case, 8 Co. Rep. 32; Co. Lit. 89 a, n. 7; 1 Ch. Pl. (lst ed,), 219, (6th ed.), 216, 217; 7 Am. Law Rev. 656 et seq.

[5_17].But cf. The Pawashick, 2 Lowell, 142.

[5_18].Gibson v. Stevens, 8 How. 384, 398, 399; Barnett v. Brandao, 6 Man. & Gr. 630, 665; Hawkins v. Cardy, 1 Ld. Raym. 360.

[5_19].Pickering v. Barkley, Style, 132; Wegerstoffe v. Keene, 1 Strange, 214, 216, 223; Smith v. Kendall, 6 T. R. 123, 124.

[5_20].Card v. Case, 5 C.B. 622, 634. Cf. Austin (3d ed.), 513.

[5_21].Rylands v. Fletcher, L.R. 3 H.L. 330; supra, p. 116.

[5_22].See Marshall v. Welwood, 38 N.J. (9 Vroom), 339; 2 Thompson, Negligence, 1234, n. 3.

[5_23].Gorham v. Gross, 125 Mass. 232; supra, p. 117.

[5_24].Mitchil v. Alestree, 1 Vent. 295; S.C., 3 Keb. 650; 2 Lev. 172; supra, p. 94.

[5_25].Hammack v. White, 11 C.B. N.S. 588.

LECTURE V. THE BAILEE AT COMMON LAW.

第五讲　普通法上的受托人

So far the discussion has been confined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liability, and to the mode of ascertaining the point at which a man begins to act at his own peril. But it does not matter to a man whether he acts at his own peril or not, unless harm comes of it, and there must always be some one within reach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act before any harm can be done. Furthermore, and more to the point, there are certain forms of harm which are not likely to be suffered, and which can never be complained of by any one except a person who stands in a particular relation to the actor or to some other person or thing. Thus it is neither a harm nor a wrong to take fish from a pond unless the pond is possessed or owned by some one, and then only to the possessor or owner. It is neither a harm nor a wrong to abstain from delivering a bale of wool at a certain time and place, unless a binding promise has been made so to deliver it, and then it is a wrong only to the promisee.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一直局限于责任的一般性原则，以及如何确定个人自行承担行为风险的起点。但是，某个人是否需要自行承担行为风险，对他而言其实无关紧要，除非其行为造成危害，并且在造成任何危害之前，还必须有人处于行为结果所及的范围之内。此外，更关键的是，某些危害，是人们不太会遭受的，也不会被人所控诉的，除非此人与行为人、或者其他人或事有特殊关系。因此，在池塘捕鱼既不是危害也不是过失，除非该池塘为某人占有或所有，更何况危害或者过失也只是对池塘占有者或所有人才存在。在某一时间及地点，有意不提供一包羊毛，既不是危害也不是过失，除非作出一个

有约束力的承诺说要提供羊毛，此时存在过失的就只是受约人。

The next thing to be done is to analyze those special relations out of which special rights and duties arise. The chief of them—and I mean by the word “relations” relations of fact simply—are possession and contract, and I shall take up those subjects successively.

接下来要分析的，是特定的权利与义务产生的特殊关系。其中最主要的关系——我所谓的“关系”一词仅指事实关系——是占有与合同，我将对一一这些主题展开论述。

The test of the theory of possession which prevails in any system of law is to be found in its mode of dealing who have a thing within their power, but not own it, norassert the position of an owner for with regard to it, bailees, in a word. It is therefore, as a preliminary to understanding the common-law theory of possession, to study the common law with regard to bailees.

我们可以在几乎任何法律体系中发现对于权力之下有一物，但却不拥有该物，也不能声称对该物享有所有者地位的那些人的处理模式，简言之，也就是受托人的模式中找到占有理论的检验标准，任何法律体系都广泛采用了该标准。因此，要理解普通法的占有理论，首先就要对普通法的受托人进行研究。

The state of things which prevailed on the border between England and Scotland within recent times, and which is brought

back in the flesh by the ballad of the Fray O'Suport, is very like that which in an earlier century left its skeleton in the folk-laws of Germany and England. Cattle were the principal property known, and cattle-stealing the principal form of wrongful taking of property. Of law there was very little, and what there was depended almost wholly upon the party himself to enforce. The Salic Law of the fifth century and the Anglo-Saxon laws of Alfred are very full in their directions about following the trail. If the cattle were come up with before three days were gone, the pursuer had the right to take and keep them, subject only to swearing that he lost them against his will. If more than three days went by before the cattle were found, the defendant might swear, if he could, to facts which would disprove the claimant's loss.

近代英格兰和苏格兰边境地区曾经出现过的比较普遍的情况，以及《萨伯特的战争》这首民歌所生动展现的情况，与早期日耳曼及英格兰民间法构筑的框架十分相似。众所周知，当时牲畜是首要财产，盗窃牲畜是非法占有财产的主要形式。当时的法律很少，且已有的法律几乎完全依赖当事人自己去执行。公元五世纪时期的《萨利克法》，以及阿尔弗雷德大帝时期的盎格鲁—撒克逊法中，关于追赶牲畜的说明非常详尽。如果在三天之内找到牲畜，则追赶的人只有发誓他不愿意丢失牲畜，才有权带走并保有牲畜。如果是在三天之后才找到牲畜，则被告人，如果可以的话，应当面对可能会反驳原告丢失牲畜的事实发誓。

This procedure was in truth a legal procedure; but it depended for its beginning and for its execution on the party making the claim. From its “executive” nature, it could hardly have been started by any other than the person on the spot, in whose keeping the cattle were. The oath was to the effect that the party had lost

possession against his will. But if all that a man had to swear was that he had lost possession against his will, it is a natural conclusion that the right to take the oath and make use of the procedure depended on possession, and not on ownership. Possession was not merely sufficient, but it was essential. Only he who was in possession could say that he had lost the property against his will, just as only he who was on the spot could follow the cattle.

这一程序其实就是一种法律程序；但是其启动及执行有赖于提出权利请求的当事方。由于其“可执行的”性质，除了在现场看护牲畜的那个人，其他人几乎都不能启动这一程序。誓言的大意是说，当事人不愿意丢失财产。但是如果只需要发誓说他不愿意丢失财产，则自然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即是否有权发誓和运用此程序，取决于占有，而非所有。占有不仅是充分的，而且是必要的条件。只有占有者才会说他不愿意丢失财产，就好比只有在现场的那个人才会去追赶牲畜一样。

This, so far as known, was the one means afforded by the early law of our race for the recovery of property lost against one's will. So that, in a word, this procedure, modelled on the self-redress natural to the case which gave rise to it, was the only remedy, was confined to the man in possession, and was not open to the owner unless he was that man.

这是目前已知的我们民族的早期法针对不愿意丧失财产所提供的一种救济手段。所以，简而言之，这一程序以自力救济为范本（适用该程序的案例自然会采取自力救济的形式），是当时唯一的救济形式，仅限于占有者；如果所有者并非占有者，则不对其适用。

To this primitive condition of society has been traced a rule which maintained itself to later times and a more civilized procedure, that, if chattels were intrusted by their owner to another person, the bailee, and not the bailor, was the proper party to sue for their wrongful appropriation by a third. It followed that if the bailee, or person so intrusted, sold or gave the goods in his charge to another, the owner could only look to the bailee, and could not sue the stranger; not from any principle in favor of trade, intended to protect those who bought in good faith from parties in possession, but because there was no form of action known which was open to him. But as the remedies were all in the bailee's hands, it also followed that he was bound to hold his bailor harmless. If the goods were lost, it was no excuse that they were stolen without his fault. He alone could recover the lost property, and therefore he was bound to do so.

从社会的这一原始形态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一条一直持续到后期的法规，以及一个更文明的法律程序，即如果所有者将动产委托给另一个人，则当此动产被第三方非法占有时，受托人，而非寄托人，才是合适的提出诉讼的当事人。由此可以得出，如果受托人或者被委以动产的人，将其看管的货物出售或转交给另一人，则所有者只能指望受托人，且不能起诉素未谋面的第三方；这并非源于任何促进贸易的政策，想要保护那些从财产占有人处诚心购买财产的人，而是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有任何适用于所有人的诉讼形式。但因为救济手段都掌握在受托人手中，因此还可以得出，受托人有责任使寄托人免受损害。如果货物丢失，则受托人是无法逃脱责任的。只有受托人才能追回被丢失的财物，因此他有责任使寄托人免受损害。

In the course of time this reason ceased to exist. An owner out of possession could sue the wrongful taker of his property, as well

as one who had possession. But the strict liability of the bailee remained, as such rules do remain in the law, long after the causes which gave rise to it had disappeared, and at length we find cause and effect inverted. We read in Beaumanoir(A.D.1283) that, if a hired thing is stolen, the suit belongs to the bailee, because he is answerable to the person from whom he hired. [6_1] At first the bailee was answerable to the owner, because he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could sue. Now it was said he could sue because he was answerable to the owner.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理由就不复存在了。不占有财物的所有者，以及占有者，都能对非法获取其财物的人提起诉讼。但是，受托人严格责任原则却被保留了下来。法律中的确仍然保留着这样一些法规，其产生的原因早已消失，最终我们发现原因与结果完全颠倒。博马努瓦尔的著作（公元1283年）中提到，如果一件租赁物被盗，则应由受托人提起诉讼，因为他应对出租人负责。起初，受托人是对所有人负有责任，因为受托人是唯一可提起诉讼的人。现在却是，他可以提起诉讼，因为他应对所有者负责。

All the above peculiarities reappear in the Anglo-Norman law, and from that day to this all kinds of bailees have been treated as having possession in a legal sense, as I shall presently show.

以上所有特性均可在盎格鲁-诺曼法中再次看到，且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各类受托人都享有法律意义上的占有权，这就是我正要指出的一点。

It is desirable to prove the native origin of our law of bailment,

in order that, when theory comes to be considered, modern German opinion may not be valued at more than its true worth. The only existing theories on the subject come from Germany. The German philosophers who have written upon law have known no other system than the Roman, and the German lawyers who have philosophized have been professors of Roman law. Some rules which we think clear are against what the German civilians would regard as first principles. To test the value of those principles, or at least to prevent the hasty assumption that they are universal, toward which there is a slight tendency among English writers, it is well to realize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a new system, of which philosophy has not yet taken account.

很有必要对我们的寄托法的本土起源予以证明，其目的是在考察理论时不至于高估近代日耳曼人的观点。有关这一问题，现存的唯一理论出自德国。那些论述法律问题的日耳曼哲学家们除了罗马法之外不知道还有任何别的法律体系，而那些哲学化的日耳曼法学家则曾经是罗马法教授。一些我们认为一清二楚的法规，却违背了日耳曼民法专家所谓的基本原则。要检验这些基本原则的价值，或者至少为了避免轻率地假定这些原则具有普遍性，在英国法学家中就有这样轻微的倾向。我们最好要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体系，而哲学尚未顾及于此。

In the first place, we find an action to recover stolen property, which, like the Salic procedure, was based on possession, not on title. Bracton says that one may sue for his chattel as stolen, by the testimony of good men, and that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the thing thus taken was his own property or another's, provided it was in his custody. [6_2]

首先，我们发现，补偿被盗财产的诉讼程序，如萨利克法的诉讼程序，是建立在占有而非所有权的基础之上的。布拉克顿说，根据守法良民的证词，被盗人可因其动产被盗提起诉讼，且只要该物在其保管之下，无论是他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财产都无关紧要。

The point of especial importance, it will be remembered, was the oath. The oath of the probi homines would seem from the letter of Bracton to have been that the thing was lost (adirata), and this we are expressly told was the fact in a report of the year 1294. “Note that where a man's chattel is lost (ou la chosse de un home est endire), he may count that he [the finder] tortiously detains it, &c., and tortiously for this that whereas he lost the said thing on such a day, &c., he [the loser] came on such a day, &c. (la vynt yl e en jour), and found it in the house of such an one, and told him, &c., and prayed him to restore the Sing, but that he would not restore it, &c., to his damage, &c.; and if he, &c. In this case, the demandant must prove (his own hand the twelfth) that he lost the thing.“ [6_3]

请记住，其中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宣誓的问题。正直的人的誓言在布拉克顿的书信中似乎是指宣誓证明财物丢失（adirata），而1294年的一则判例报告则明确告诉我们事实即如此。“注意，如果某人的动产丢失了（ou la chosse de un home est endire），此人可以认为他（拾得人）非法扣留了财物，说非法是因为，他那天丢失上述财物的时候，他（失主）那一天过来，（la vynt yl e en jour），发现丢失的财物在这个人家里，于是告诉他，并请求他归还财物，但他不会归还财物，而使自己遭受损失；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原告须证明（在被告通过誓言驳斥原告指控时，找来11个邻人宣誓证明被告无辜之后，则原告就是第十二位宣誓的人）他丢失了该财物”。

Assuming that as the first step we find a procedure kindred to that of the early German folk-laws, the more important question is whether we find any principles similar to those which have just been explained. One of these, it will be remembered, concerned wrongful transfer by the bailee. We find it laid down in the Year Books that, if I deliver goods to a bailee to keep for me, and he sells or gives them to a stranger, the property is vested in the stranger by the gift, and I cannot maintain trespass against him; but that I have a good remedy against the bailee by writ of detinue (for his failure to return the goods). [6_4] These cases have been understood, and it would seem on the whole rightly, not merely to deny trespass to the bailor, but any action whatever. Modern writers have added, however, the characteristically modern qualification, that the purchase must be bonafide, and without notice. [6_5] It may be answered, that the proposition extends to gifts as well as to sales by the bailee, that there is no such condition in the old books, and that it is contrary to the spirit of the strict doctrines of the common law to read it in. No lawyer needs to be told that, even so qualified, this is no longer the law. [6_6] The doctrine of the Year Books must be regarded as a survival from the primitive times when we have seen the same rule in force, unless we are prepared to believe that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y had a nicer feeling for the rights of bona fide purchasers than at present.

假设作为第一步我们发现了有某个程序类似于早期日耳曼民间法中的程序，但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发现一些类似于刚才所解释的原则。其中的一项原则，请记住，涉及到受托人非法转让的问题。我们发现，《年鉴》中规定，如果我把货物交付给受托人保管，而他却把货物出售或赠与第三人，则该财产通过赠与归于第三人名下，我不能对此第三人提起侵害之诉，但是我可通过非法扣押令从受托人那里得到充分的救济（因受托人未能归还财产）。可以这么理

解：这些案件不仅否定了对寄托人的侵害，而且还不让寄托人采取任何一种诉讼形式，整体来看，这样理解似乎不错。然而，现代法学家却加上了一条典型的现代限制性解释，即购买行为必须出于善意，且未事先通知。对此的回应可能是：问题延伸至受托人的赠与以及售卖行为，早期的判例集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限定条件，这有悖于对其进行阐释的普通法严格的学说精神。任何一位法学家都不用被告知说，即便加上了这样的限定性解释，该原则也已不再是现行的法律了。《年鉴》中的这一原则应被视为原始时期的遗留物，我们看到正是在那一时期实施该原则；除非我们愿意相信，与现在相比，十五世纪时期的法学家们对于善意购买人的权益更有好感。

The next point in logical order would be the degree of responsibility to which the bailee was held as towards his bailor who intrusted him. But for convenience I will consider first the explanation which was given of the bailee's right of action against third persons wrongfully taking the goods from his possession. The inverted explanation of Beaumanoir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the bailee could sue because he was answerable over, in place of the original rule, that he was answerable over so strictly because only he could sue. We find the same reasoning often repeated in the Year Books, and, indeed, from that day to this it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commonplaces of the law. Thus Hankford, then a judge of the Common Bench (circa A.D.1410), says, [6_7] “If a stranger takes beasts in my custody, I shall have a writ of trespass against him, and shall recover the value of the beasts, because I am chargeable for the beasts to my bailor, who has the property.” There are cases in which this reasoning was push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f, by the terms of the trust, the bailee was not answerable for the goods if stolen, he would not have an action against the thief. [6_8] The same explanation is repeated to this day. Thus we read in a well-known textbook, “For the bailee being responsible to the bailor, if the

goods be lost or damaged by negligence, or if he do not deliver them up on lawful demand, it is therefore reasonable that he should have a right of action," &c. [6_9] In general, nowadays, a borrower or hirer of property is not answerable if it is taken from him against his will, and if the reason offered were a true one, it would follow that, as he was not answerable over, he could not sue the wrong-doer. It would only be necessary for the wrong-doer to commit a wrong so gross as to free the bailee from responsibility, in order to deprive him of his right of action. The truth is, that any person in possession, whether intrusted and answerable over or not, a finder of property as well as a bailee, can sue any one except the true owner for interfering with his possession, as will be shown more particularly at the end of the next Lecture.

按逻辑顺序，下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将是：受托人对其寄托人应承担多大的责任。为方便起见，首先我要分析一下对受托人有权对第三方非法获得其占有物提起诉讼这一点给出的解释。请记住，博马努瓦尔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受托人可以提起诉讼，因为他对所有人负有责任，这替代了最初的规则：受托人要严格地对所有者承担责任，因为只有他才能提起诉讼。我们发现《年鉴》中常常重复同样的推理，事实上，从那时起到现在，这一直是个法律常识。因此，当时民事法院的一位法官汉克福特（约公元1410年）说："如果第三人占有了我所保管的牲畜，我就会以侵权令状起诉他，获得牲畜所具有的价值赔偿，因为就这些牲畜而言，我对寄托人负有责任，他享有牲畜的所有权"。在这些案件中，由这一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依据信托条款，受托人对货物如若被盗无需承担责任，那么，他就不会对窃贼提起诉讼。这一解释一直重复至今。于是，我们在一本著名的教科书中读到："由于受托人对寄托人负责，如货物因疏忽被丢失或损坏，或者他未按法律要求交出货物，那么，受托人应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是合理的"。现在，一般来说，某一财物若违背了其借用人或租用人的意志而被占用，借用人或租用人则对此不负有责任；如以上给出的

解释正确，则可以得出，因为他不负有责任，他就不能对不当行为人提起诉讼。为了剥夺受托人的诉讼权，只需不当行为人实施一项严重的不当行为以使其免于承担责任。事实上，任何占有者，无论是否受人委托以及负有责任，包括财产拾得人以及受托人，都可对真正所有者以外的任何妨碍其占有权的人提起诉讼，下一讲的结尾部分将对此着重解释。

The bailor also obtained a right of action against the wrong-doer at a pretty early date. It is laid down by counsel in 48 Edward III., [6_10] in an action of trespass by an agister of cattle, that, “in this case, he who has the property may have a writ of trespass, and he who has the custody another writ of trespass. Persay: Sir, it is true. But he who recovers first shall oust the other of the action, and so it shall be in many cases, as if tenant by elegit is ousted, each shall have the assize, and, if the one recover first, the writ of the other is abated, and so here.”

寄托人也很早就获得了对不当行为人提起诉讼的权利。爱德华三世48年，在一起由代人放牧牲畜者提起的诉讼中，律师写道：“在这起案件中，拥有财物的那个人可以获得一个侵害诉令状，保管财物的那个人也可获得一个侵害诉令状。就其本身而论，阁下，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先获得救济的那个人会剥夺另一个人的诉讼权，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如此，例如，如果土地扣押执行令状地产权被剥夺，各方都进行巡回审判，如果一方先获得救济，则另一方的令状即被撤除，这里也是如此”。

It would seem from other books that this was spoken of bailments generally, and was not limited to those which are terminable at the pleasure of the bailor. Thus in 22 Edward IV.,

counsel say, “If I bail to you my goods, and another takes them out of your possession, I shall have good action of trespass quare vi et armis.“ [6_11] And this seems to have been Rolle's understanding in the passage usually relied on by modern courts. [6_12]

从其他案例报道来看，这一说法似乎普遍适用于各种寄托，而不仅限于那些可由寄托人随意终止的寄托。因此，在爱德华四世22年，律师说道：“如果我将货物寄托给你，而另一个人却从你的手中拿走了它们，我就完全可以提起武力侵害之诉”。而这似乎就是罗尔大法官文中的理解，通常为现代法院所倚赖。

It was to be expected that some ac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bailor as soon as the law had got machinery which could be worked without help from the fresh pursuit and armed hands of the possessor and his friends. To allow the bailor to sue, and to give him trespass, were pretty nearly the same thing before the action on the case was heard of. Many early writs will be found which show that trespass had not always the clear outline which it developed later. The point which seems to be insisted on in the Year Books is, as Brooke sums it up in the margin of his Abridgment, that two shall have an action for a single act,—not that both shall have trespass rather than case. [6_13] It should be added that the Year Books quoted do not go beyond the case of a wrongful taking out of the custody of the bailee, the old case of the folk-laws. [6_14] Even thus the right to maintain trespass is now denied where bailee ha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 goods by lease or lien; [6_15] although the doctrine has been repeated with reference to bailments terminable at the pleasure of the bailor. [6_16] But the modified rule does not concern the present discussion, any more than the earlier form, because it still leaves open the possessory remedies to all bailees

without exception. This appears from the relation of the modified rule to the ancient law; from the fact that Baron Parke, in the just cited case of Manders v. Williams, hints that he would have been prepared to apply the old rule to its full extent but for Gordon v. Harper, and still more obviously from the fact, that the bailee's right to trespass and trover is asserted in the same breath with that of the bailor, as well as proved by express decisions to be cited.

一旦法律拥有了一套机制，无需在占有人及其朋友采取的立即追回和自我武装的帮助下就能正常运作，人们期望给予寄托人一些诉讼权。在这类案诉讼出现之前，允许寄托人提起诉讼，几乎等同于给予其提起侵害诉讼的权利。我们会发现，许多早期的令状表明，侵害之诉并非总是具有很清晰的轮廓，后来才形成清晰轮廓。《年鉴》中似乎坚持的观点，正如布鲁克在其所编辑的《法律汇编》的页边批注部分所总结的一样：二者都能就某一起行为提起诉讼——而不是二者都能提起侵害之诉，且非间接侵害之诉。还应补充一点：所援引的《年鉴》中的案例并未超出非法占有受托人保管财物的情况，即民间法早期案例的范畴。即便如此，在受托人通过租约或者留置而对货物享有专属权时，（寄托人）保有侵害之诉的权利现在还是被否定了；尽管这一原则总是与那些可由寄托人随意终止的寄托相关。但是，被修订后的规则，无异于修订前的规则，都与我们目前的讨论无关，因为它仍然将占有性救济一律留给所有受托人。这一点可以从改进后的规则与古代法的关系中看出；也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帕克男爵在刚才引用的曼德斯诉威廉姆斯案中暗示说，如果不是因为戈登诉哈珀案，他已经准备完全运用早期的规则；还可更明显地从下面事实中看出，即受托人提起侵害之诉和动产侵占之诉的权利被认定与寄托人的权利相提并论，也得到了所援引的明文判决的证实。

It is true that in Lotan v. Cross, [6_17] Lord Ellenborough ruled at nisi prius that a lender could maintain trespass for damage done to

a chattel in the hands of a borrower, and that the case is often cited as authority without remark. Indeed, it is sometimes laid down generally, in reputable text-books, that a gratuitous bailment does not change the possession, but leaves it in the bailor; [6_18] that a gratuitous bailee is quasi a servant of the bailor, and the possession of one is the possession of the other; and that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although the bailee may sue on his possession, the bailor has the same actions. [6_19] A part of this confusion has already been explained, and the rest will be when I come to speak of servants, between whom and all bailees there is a broad and well-known distinction. But on whatever ground Lotan v. Cross may stand, if on any, it cannot for a moment be admitted that borrowers in general have not trespass and trover. A gratuitous deposit for the sole benefit of the depositor is a much stronger case for the denial of these remedies to the depositary; yet we have a decision by the full court, in which Lord Ellenborough also took part, that a depositary has case, the reasoning implying that a fortiori a borrower would have trespass. And this has always been the law. [6_20] It has been seen that a similar doctrine necessarily resulted from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German procedure; and the cases cited in the note show that, in this as in other respects, the English followed the traditions of their race.

事实上，在洛顿诉克罗斯案中，埃伦巴勒勋爵在进行民事诉讼巡回审判时曾裁决指出，对借用人手中某一动产蒙受的损失，出借人可以提起侵害之诉，这一案件经常作为先例被援引而不加评说。的确，一些有名的法学教科书有时笼统地写道：无偿寄托不改变占有，占有仍归寄托人；无偿受托人是寄托人的准雇员，其中一个人的占有，也就是另一个人的占有；正因为如此，尽管受托人可因其占有而提起诉讼，寄托人也享有同样的诉讼权。这种权利的混同，其中一部分上文已经解释过，其余部分在我提到的问题时再做解释，在雇员和一切受

托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且众所周知的区别。但是，无论洛顿诉克罗斯案的依据是什么，只要还有任何依据的话，借用人一般没有提起侵害之诉和动产侵害之诉的权利这一点，从来都不会得到承认。只对寄托人有利的无偿寄托，更需要否认这些对受托人的救济；但我们有一个合议庭作出的裁决，埃伦巴勒勋爵也参与其中，即受托人有提起间接侵害之诉的权利，其论证隐含着借用人更有理由提起侵害之诉。法律一直都是如此规定的。我们已经看到，早期日耳曼诉讼程序的性质必然会产生某种类似的原则；注释中援引的那些案例也表明，与其他方面一样，英国人在这一方面也遵循了自己的民族传统。

The meaning of the rule that all bailees have the possessory remedies is, that in the theory of the common law every bailee has a true possession, and that a bailee recovers on the strength of his possession, just as a finder does, and as even a wrongful possessor may have full damages or a return of the specific thing from a stranger to the title. On the other hand, so far as the possessory actions are still allowed to bailors, it is not on the ground that they also have possession, but is probably by a survival, which has been explained, and which in the modern form of the rule is an anomaly. [6_21] The reason usually given is, that a right of immediate possession is sufficient,—a reason which excludes the notion that the bailor is actually possessed.

所有受托人均享有占有性救济是指：根据普通法理论，每一位受托人均享有真正的占有权；受托人凭借其占有权获得救济，就如同拾得人一样，甚至如同不当占有人可以从无所有权的第三人处获得全部损失赔偿或特定物的返还一样。另一方面，即便允许寄托人提起占有诉讼，但其依据却不是寄托人也享有占有权，而多半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规则，我们对此已进行了解释，这一规则也有异于其现代形式。对此通常给出的理由是，有直接占有的权利就足够了——这一理由摒弃

了寄托人是实际占有财产的观点。

The point which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ing the common-law theory of possession is now established: that all bailees from time immemorial have been regarded by the English law as possessors, and entitled to the possessory remedies. It is not strictly necessary to go on and complete the proof that our law of bailment is of pure German descent. But, apart from curiosity, the doctrine remaining to be discussed has had such important influence upon the law of the present day, that I shall follow it out with some care. That doctrine was the absolute responsibility of the bailee to the bailor, if the goods were wrongfully taken from him. [6_22]

现在，我们已经确立了理解普通法占有理论至关重要的一点：自远古时代以来，英国法就将一切受托人均视为占有人，他们有权享有占有性救济。严格来说，不再需要继续提供完整的证据来证明，我们的寄托法具有纯正的日耳曼血统。不过，除好奇心之外，由于这一尚须探讨的原则对当今法律有着如此重大的影响，我还是要对它认真探究到底。这一原则即是：如货物被不当占有，则受托人对寄托人负有绝对责任。

The early text-writers are not as instructive as might be hoped, owing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Roman law. Glanvill, however, says in terms that, if a borrowed thing be destroyed or lost in any way while in the borrower's custody, he is absolutely bound to return a reasonable price. [6_23] So does Bracton, who partially repeats but modifies the language of Justinian as to commodatum, depositum, and pignus; [6_24] and as to the duty of the hirer to use the care of a diligentissimus paterfamilias. [6_25]

受罗马法的影响，早期的法律文本作者们传达出的信息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富有启发性。但格兰维尔却明确表示，如果一件借用物在借用人保管期间以任何方式毁坏或丢失，则借用人绝对应当按合理的价格进行赔偿。布拉克顿也说过类似的话，他重复并修改了优士丁尼对使用借贷、寄托和质押的部分说法，及其有关租借者有义务像勤勉的家长一样谨慎的说法。

The language and decisions of the courts are perfectly clear; and there we find the German tradition kept alive for several centuries. I begin with the time of Edward II., about 1315. In detinue the plea was that the plaintiff delivered the defendant a chest locked with his key, that the chattels were in the chest, and that they were taken from the defendant together with his own goods by robbery. The replication was that the goods were delivered to the defendant out of enclosure, and Fitzherbert says the party was driven to that issue; [6_26] which implies that, if not in the chest, but in the defendant's custody, he was liable. Lord Holt, in Coggs v. Bernard, [6_27] denies that the chest would make any difference; but the old books agree that there is no delivery if the goods are under lock and key; and this is the origin of the distinction as to carriers breaking bulk in modern criminal law. [6_28] In the reign of Edward III., [6_29] the case of a pledge came up, which seems always to have been regarded as a special bailment to keep as one's own goods. The defence was, that the goods were stolen with the defendant's own. The plaintiff was driven to reply a tender before the theft, which would have put an end to the pledge, and left the defendant a general bailee. [6_30] Issue was taken thereon, which confirms the other cases, by implying that in that event the defendant would be liable.

法院的说法和判决十分明确，从中我们发现日耳曼传统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我首先从爱德华二世时期（约1315年）开始讲起。在请求返还非法占有的动产诉讼中，被告的答辩是原告交付给被告一个柜子，柜子被原告用自己的钥匙锁住了，有一些动产在柜子里，而这些动产连同被告本人的财物一起被抢走了。原告针对被告的答辩所给出的答复是，该货物交付给被告时没有上锁，菲茨赫伯特法官说，当事方被推到了这一争议点，这就意味着，如果货物不是在柜子里，而是在被告保管之下的话，被告则负有责任。在柯吉斯诉伯纳德案中，霍尔特勋爵认为，柜子的存在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但早期的判例集一致认为，货物如被锁，就不构成交付；这也是现代刑法中辨别有关承运人盗窃托管物品罪的起源。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质押的案例开始出现，质押似乎一直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寄托形式，是将他人货物视为自己货物来进行保管。在这起案例中被告的答辩是，被告自己的货物也一起被盗了。这就迫使原告在盗窃罪之前就争点之履行作出反诉答辩，这就可能会使质押归于终结，从而使被告成为一般受托人。以此为系争点，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被告要负有责任，这使得其他案例得以进一步确定下来。

Next I take a case of the time of Henry VI., A.D.1455. [6_31] was an action of debt against the Marshal of the Marshalsea, or jailer of the King's Bench prison, for an escape of a prisoner. Jailers in charge of prisoners were governed by the same law as bailees in charge of cattle. The body of the prisoner was delivered to the jailer to keep under the same liabilities that cows or goods might have been. [6_32] He set up in defence that enemies of the king broke into the prison and carried off the prisoner, against the will of the defendant. The question was whether this was a good defence. The court said that, if alien enemies of the king, for instance the French, released the prisoner, or perhaps if the burning of the prison gave him a chance to escape, the excuse would be good, “because then [the defendant] has remedy against no one.” But if subjects of the

king broke the prison, the defendant would be liable, for they are not enemies, but traitors, and then, it is implied, the defendant would have a right of action against them, and therefore would himself be answerable. In this case the court got very near to the original ground of liability, and distinguished accordingly. The person intrusted was liable in those cases where he had a remedy over against the wrong-doer (and in which, originally, he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had such a remedy); and, on the other hand, his liability, being founded on that circumstance, ceased where the remedy ceased. The jailer could not sue the soldiers of an invading army of Frenchmen; but in theory he could sue any British subject who carried off the prisoner, however little it was likely that he would get much satisfaction in that way.

接下来，我要举公元1455年亨利六世时期的一个案例，这是一起针对马歇尔希监狱的典狱长，也就是王座法院监狱的看守，因一名囚犯逃跑而提起的债务诉讼。看管犯人的看守，与看管牲畜的受托人，受同一法律的制约。犯人的人身被交付给看守看管，其（后者）所负有的责任相当于受托人对牛或其他货物所负有的责任。典狱长在答辩中提出，国王的敌人闯入监狱劫走犯人，并非其蓄意为之。问题是这一答辩理由能否成立。法院指出，如果是敌国的侨民，比如说法国人释放了囚犯，或者也许监狱失火给囚犯以逃脱的机会，则这个理由就能成立，“因为那样的话，（被告）无法从任何人那里获得救济”。但是，如果是国王的臣民闯入了监狱，则被告就负有责任，因为国王的臣民并非敌人，而是背叛国王的人。那么这就意味着，被告将有权对他们提起诉讼，因此，被告本人应负责任。在该案中，法院的观点非常接近于最早的责任依据，因此备受关注。在那些能从不当行为人那里获得救济的案件中，受托人应负有责任（在这些案件中，他也是最初唯一能获得这种救济的人）；另一方面，受托人的责任，因为建立在这一条件之上，当救济终止时，其责任也随之终止。典狱长无法起诉法国侵略军的士兵；但理论上，他能够对任何放走囚犯的英国臣民

提起诉讼，无论他通过起诉这种办法得到高额赔偿的可能性是多么微乎其微。

A few years later the law is stated the same way by the famous Littleton. He says that, if goods are delivered to a man, he shall have an action of trespass if they are carried off, for he is chargeable over. [6_33] That is, he is bound to make the loss good to the party who intrusted him.

几年后，大名鼎鼎的利特尔顿法官以同样方式对这条法律进行了陈述：如果货物被交付给了一个人，则此人有权在货物被夺走的情况下提起侵害之诉，因为他应当承担责任。这就是说，他应当赔偿交托给他货物的当事人的损失。

In 9 Edward IV., [6_34] Danby says if a bailee received goods to keep as his proper goods, then robbery shall excuse him, otherwise not. Again, in a later case [6_35] robbery is said not to be an excuse. There may have been some hesitation as to robbery when the robber was unknown, and so the bailee had no remedy over, [6_36] or even as to robbery generally, on the ground that by reason of the felony the bailee could not go against either the robber's body or his estate; for the one was hanged and the other forfeited. [6_37] But there is not a shadow of doubt that the bailee was not excused by an ordinary wrongful taking. “If the goods are taken by a trespasser, of whom the bailee has conusance, he shall be chargeable to his bailor, and shall have his action over against his trespasser.“ [6_38] The same point was touched in other passages of the Year Books, [6_39] and the rule of law is clearly implied by the reason which was given for the bailee's right to sue in the cases cited above.

爱德华四世9年，丹比指出，如果受托人接收货物后视若己物进行保管，则若货物被抢，他无需对此负责；否则就要承担责任。此后的一个案件又指出，货物被抢不构成免责理由。也许人们对于抢劫者未知情况下的抢劫还有些犹豫，因此受托人无法获得救济；或者甚至对于抢劫案普遍怀有这样的犹豫，其依据是：因为抢劫属重罪，则受托人无法从抢劫者的人身或者财物上获得救济，因为其人身会被绞死，其财产会被没收。但是，如果只是普通的不当占有，则毫无疑问，受托人不可以此为免责理由。“如果货物被非法侵害者占有，且受托人对此侵害者知情，则受托人应对其寄托人负有责任，并可以自己的名义对此侵害者提起诉讼。”这一点，《年鉴》的其他部分也有提及，在以上所举案例中，针对受托人有权提起诉讼的权利所给出的原因，清楚地体现了这一法规。

The principle was directly deci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ncient law in the famous case of Southcote v. Bennet. [6_40] This was detinue of goods delivered to the defendant to keep safely. The defendant confessed the delivery, and set up he was robbed of the goods by J.S. “And, after argument at the bar, Gawdy and Clench, ceteris absentibus, held that the plaintiff ought to recover, because it was not a special bailment; that the defendant accepted them to keep as his proper goods, and not otherwise; but it is a delivery, which chargeth him to keep them at his peril. And it is not any plea in a detinue to say that he was robbed by one such; for he hath his remedy over by trespass, or appeal, to have them again.” The above from Croke's report implies, what Lord Coke expressly says, that “to be kept, and to be kept safe, is all one,” and both reports agree that the obligation was founded on the delivery alone. Croke's report confirms the caution which Lord Coke adds to his report: “Note, reader, it is good policy for him who takes any goods to keep, to take them in special manner, scil. to keep them as he keeps his own

goods,… or if they happen to be stolen or purloined, that he shall not be answerable for them; for he who accepted them ought to take them in such or the like manner, or otherwise he may be charged by his general acceptance.”

这一规则是直接根据著名案例索斯科特诉贝内特案中的古代法确定下来的。此案是请求返还交与被告妥善保管的货物的诉讼。被告对交付予以承认，但却提出他的货物被乔·斯特朗抢走了。“经过法庭辩论之后，在其他人缺席的情况下，高迪和克伦奇认为，原告应当得到赔偿，因为这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寄托形式；被告收受这些货物，当作自己的货物来保管，而不是别的情形；但是，这属于一起交付行为，这一交付使得被告要求保管货物，否则后果自负。说他被这样一个人抢劫了，这在请求被告返还动产的诉讼中不是什么答辩，因为他可以通过侵害之诉获得救济，或者通过上诉获得救济。”以上摘自克洛克判例汇编的引文表明：“予以保管，与妥善予以保管，完全是一回事，”，柯克勋爵也明确表达过这一观点，两部判例汇编都一致认为责任之依据仅在于交付。克罗克的判例汇编进一步强调了柯克勋爵在自己的判例汇编中加上的提示语：“读者请注意，对于占有货物为了保管该货物的人来说，以特殊的方式占有货物，即如同保管自己的货物一样保管该货物，是明智的做法，否则货物万一被盗，他就不用承担责任；因为收受货物的人应当采用这种或类似方式来占有该货物，否则他就会因一般性收受货物而承担责任”。

Down to this time, at least, it was clear law that, if a person accepted the possession of goods to keep for another even as a favor, and lost them by wrongful taking, wholly without his fault, he was bound to make good the loss, unless when he took possession he expressly stipulated against such a responsibility. The attempts of Lord Holt in Coggs v. Bernard, and of Sir William Jones in his book on Bailments, to show that Southcote v. Bennet was not

sustained by authority, were futile, as any one who will study the Year Books for himself may see. The same principle was laid down seven years before by Peryam, C. B., in Drake v. Royman, [6_41] and Southcote's Case was followed as a leading precedent without question for a hundred years.

研究至此，我们至少非常清楚的是，如果某人哪怕是出于好意为他人保管货物而接受了该货物的占有权，而该货物被不当占有，即使完全不是他的过错，他也应当赔偿损失，除非他在接受占有时就明确约定不承担这样的责任。霍尔特勋爵在柯吉斯诉伯纳德案中，以及威廉·琼斯爵士在其有关寄托的书中都试图表明，索斯科特诉贝内特案并未得到权威的支持；但每个自学《年鉴》的人大概都能看出来，他们二位的努力都失败了。在此七年之前，英国财税法庭首席大法官佩尔亚梅就在德雷克诉罗伊曼案中制定了这同一规则。此后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索内斯科特案一直是指导性的判例，人们毫不怀疑地予以遵循。

Thus the circle of analogies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the early German law is complete. There is the same procedure for lost property, turning on the single question whether the plaintiff had lost possession against his will; the same principle that, if the person intrusted with the property parted with it to another, the owner could not recover it, but must get his indemnity from his bailee; the same inverted explanation, that the bailee could sue because he was answerable over, but the substance of the true doctrine in the rule that when he had no remedy he was not answerable; and, finally, the same absolute responsibility for loss, even when happening without fault on the part of the person intrusted. The last and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principles is seen in force as late as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We have now to

follow its later fortunes.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英国法与早期日耳曼法的类比。针对遗失财物，适用同样的诉讼程序，此程序关键只有一个问题，即原告是否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丧失了占有；适用的也是同样的原则：即如果被交托财产的人将此财产转让给了另一人，则所有者无法追回财产，必须从其受托人处得到补偿；同样也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即受托人可以提起诉讼，因为他要承担责任，而不是这一规则的实质，即得不到救济就不必承担责任；而且，最终针对遗失也适用同样的绝对责任原则，即便遗失发生时受托方并无过错。直至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这些原则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仍然有效。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该原则随后的命运。

A common carrier is liable for goods which are stolen from him, or otherwise lost from his charge except by the act of God or the public enemy. Two notions have been entertained with regard to the source of this rule: one, that it was borrowed from the Roman law; [6_42] the other, that it was introduced by custom, as an exception to the general law of bailment, in the reigns of Elizabeth and James I. [6_43]

对于从其处被盗，或因其他原因而丢失了由其保管的货物，公共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除非是因为天灾或者公敌。针对该规则的起源提出了两种观点：第一，继受自罗马法；第二，作为一般寄托法的一个例外，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通过习惯法引入。

I shall try to show that both these notions are wrong, that this strict responsibility is a fragmentary survival from the general law

of bailment which I have just explained; and that the modifications which the old law has undergone were due in part to a confusion of ideas which came the displacement of detinue by the action on the case, in part to conceptions of public policy which were read into the precedents by Lord Holt, and in part to still later conceptions of policy which have been read into the reasonings of Lord Holt by later judges.

下面我要试图证明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这种严格责任原则是我刚才所解释的一般寄托法的一个不完全遗留物；旧有的法律所经历的变动，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请求返还动产之诉被间接侵害之诉代替后产生了概念的混淆，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霍尔特勋爵在解读先例时混入了一些公共政策的概念，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后来的法官在解读霍尔特勋爵的推理时又融入了更晚期的一些概念。

Southcote's Case was decided in the forty-third year of Queen Elizabeth (A.D.1601). I think the first mention of a carrier, pertinent to the question, occurs in Woodlife's Case, [6_44] decided four or five years earlier (38 or 39 Eliz., A.D.1596 or 1597). It was an action of account for merchandise delivered to the defendant, it would seem as a factor ("pur merchandizer")—clearly not as a carrier. Plea, robbery at sea with defendant's own goods. Gawdy, one of the judges who decided Southcote's Case, thought the plea bad; but Popham, C. J. said that, though it would not be a good plea for a carrier because he was paid for his carriage, there was a difference in this respect between carriers and other servants and factors.

索斯科特案于女王伊丽莎白43年（公元1601年）予以判决。但

我认为有关这一问题第一次提到承运人的地方是在伍德莱夫案中，此案的判决比索斯科特案早四五年的时间（伊丽莎白38年或39年，公元1596或1597年）。这是一起针对交付给被告的商品的诉讼，被告似乎是作为代销商，也就是个商人，而显然不是承运人。被告的答辩理由是，这些商品连同被告自己的货物一起在海上被抢了。高迪法官也参与了对索斯科特案的判决，认为这一答辩理由并不充分；但是，首席大法官波帕姆却认为，尽管对于一名承运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因为他因其承运得到了报酬，但承运人和其他雇员及代销商之间在这个方面存在着某种差别。

This is repeated in Southcote's Case, and appears to involve a double distinction,first between paid and unpaid bailees, next between bailees and servants. If the defendant was a servant not having control over the goods, he might not fall within the law of bailment, and factors are treated on the footing of servants in the early law.

索斯科特案又重现了这一问题，似乎涉及到某种双重区别——首先是有偿和无偿受托人之间的区别，其次是受托人和雇员之间的区别。如果被告是一名雇员，对货物没有控制权，他就不在寄托法管辖的范围之内，而在早期法中，代销商则视同雇员。

The other diversity marked the entrance of the doctrine of consideration into the law of bailment. Consideration originally meant quid pro quo, as will be explained hereafter. It was thus dealt with in Doctor and Student [6_45] when the principle was still young. Chief Justice Popham probably borrowed his distinction between paid and unpaid bailees from that work, where common carriers are mentioned as an example of the former class. A little earlier, reward

made no difference. [6_46]

这另外一种区别标志着对价原则开始走进寄托法。对价最初指的是一物对一物，接下来我将对此予以解释。《博士与学生对话录》中就是这样来理解的，这是对价原则发展的初期。首席大法官波帕姆对有偿和无偿受托人的区分很有可能就是借鉴了这部书，该书也提到了公共承运人，把其作为有偿受托人的一个例子。而稍早之前，有无报酬则毫无影响。

But in Woodlife's Case, in reply to what the Chief Justice had said, Gawdy cited the case of the Marshal of the King's Bench, [6_47] stated above, whereupon Popham fell back on the old distinction that the jailer had a remedy over against the rebels, but that there was no remedy over in the case at bar.

但是，在伍德莱夫案中，高迪在回应首席大法官的说法时，引用了上述王座法院典狱长一案，于是，首席大法官波帕姆又退回到先前的区分，认为典狱长可从叛乱者那里获得救济，而正在审判的这个案件却无法获得救济。

The other cases relied on were some of those on general bailment collected above; the same authorities, in short, on which Southcote's Case was founded. The principle adopted was the same as in Southcote's Case, subject only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defendant fell within it. Nothing was said of any custom of the realm, or ever had been in any reported case before this time; and I believe this to be the first instance in which carriers are in any way distinguished from any other class of persons intrusted with goods.

There is no hint of any special obligation peculiar to them in the old books; and it certainly is not true, that this case introduced one. It will be noticed, with reference to what follows, that Popham does not speak of common carriers, but of carriers.

其他被引为依据的案例，是上文罗列的一些有关一般寄托法的案例，简而言之就是索斯科特案赖以为依据的那些判例。所采用的原则也和索斯科特案一样，唯一的问题在于被告是否在寄托法管辖范围之内。任何与寄托相关的习惯法都未被提及，在这之前也未出现任何有记录的案件；我认为，这是首个将承运人以某种方式与其他种类的被委以货物的人区分开来的案例。早期的判例集也根本就没有提到承运人所特有的义务，而这起案例当然也不会提到。根据下面的论述，我们会注意到，波帕姆没有说是公共承运人，而只是说承运人。

Next came Southcote's Case [6_48] (43 Eliz., A.D.1601), which presented the old law pure and simple, irrespective of reward or any modern innovation. In this and the earlier instances of loss by theft, the action was detinue, counting, we may presume, simply on a delivery and wrongful detainer.

接下来才是索斯科特案（伊丽莎白43年，公元1601年），此案呈现的完全是古代法，而没有考虑报酬等现代的新观点。在这起案例及早期的失窃损失案中，诉讼形式都是请求返还动产之诉，我们可以设想，依据的只是交付与不当占有行为。

But about this time important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procedure usually adopted, which must be explained. If the chattel could be returned in specie, detinue afforded no satisfaction for

damage which it might have suffered through the bailee's neglect. [6_49] The natural remedy for such damage was the action on the case. But before this could be made entirely satisfactory, there were certain difficulties to be overcome. The neglect which occasioned the damage might be a mere omission, and what was there akin to trespass in a nonfeasance to sustain the analogy upon which trespass on the case was founded? Moreover, to charge a man for not acting, you must show that it was his duty to act. As pleadings were formerly construed, it would not have been enough to allege that the plaintiff's goods were damaged by the defendant's negligence. [6_50] These troubles had been got over by the well-known words, super se assumpsit, which will be explained later. Assumpsit did not for a long time become an independent action of contract, and the allegation was simply the inducement to an action of tort. The ground of liability was that the defendant had started upon the undertaking, so that his negligent omission, which let in the damage, could be connected with his acts as a part of his dealing with the thing. [6_51] We shall find Lord Holt recognizing this original purport of assumpsit when we come to Coggs v. Bernard. Of course it was not confined to cases of bailment.

但是，大约就在这个时期，经常采用的诉讼程序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此有必要解释一下。如果动产可以原样返还的话，则针对受托人不作为给动产造成的损失，请求返还动产之诉根本就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救济。针对这种损失的救济是间接侵害之诉。但是，要想获得令人完全满意的救济，有几个难题要先解决。导致损失产生的不作为，可能仅仅只是某种疏忽，那么，在未履行职责与侵害之间有哪些类似之处有助于间接侵害之诉依据的推定？而且，指控某人没有作为，必须证明他有义务采取行动。如按以前的办法来解释诉状，就不足以指称说原告的货物因被告的过失而受损。这些麻烦已由大家熟悉的术语super se assumpsit克服了，后文再对其予以解释。违反简式合

约索赔诉讼不久之后就发展成为独立的合同诉讼，且只是指称诱发了某种侵权诉讼。责任的依据在于，被告已经开始履行其允诺，因此其导致损失发生的过失性疏忽可与其行为联合起来，成为其处理事情的一部分。在我们研究柯吉斯诉伯纳德案时，我们发现，霍尔特勋爵认识到了违反简式合约索赔诉讼这一最初的目的。当然，此诉讼并不仅限于有关寄托的案件。

But there was another way besides this by which the defendant could be charged with a duty and made liable in case, and which, although less familiar to lawyers, has a special bearing on the law of carriers in later times. If damage had been done or occasioned by the act or omission of the defendant in the pursuit of some of the more common callings, such as that of a farrier, it seems that the action could be maintained, without laying an assumpsit, on the allegation that he was a “common” farrier. [6_52] The latter principle was also wholly independent of bailment. It expressed the general obligation of those exercising a public or “common” business to practise their art on demand, and show skill in it. “For,” as Fitzherbert says, “it is the duty of every artificer to exercise his art rightly and truly as he ought.“ [6_53]

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使被告在间接侵害诉讼中负有责任并承担责任，这一方法，虽然法学家们并不是很熟悉，但却对后期有关承运人的法律有着特殊的影响。如果被告在从事某些公共服务性职业的过程中，因其作为或者不作为而造成或引发了损失，比如蹄铁匠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那么只要诉称被告是一个“公共服务性的”蹄铁匠，似乎就可以提起间接侵害诉讼，而不需要提起违反简式合约索赔诉讼。后一原则也与寄托完全无关。该原则表明，那些从事公共的或者“一般性”行业人员一般负有按照要求运用其手艺，并展示其中技能的义务。正如菲茨赫伯特所说的一样，“因为，尽可能地展

示其手艺是每一名工匠应尽的义务”。

When it had thus been established that case would lie for damage when occasioned by the omission, as well as when caused by the act, of the defendant, there was no reason for denying it, even if the negligent custody had resulted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roperty. [6_54] From this it was but a step to extend the same form of action to all cases of loss by a bailee, and so avoid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wage his law. Detinue, the primitive remedy, retained that mark of primitive procedure. The last extension was made about the time of Southcote's Case. [6_55] But when the same form of action thus came to be used alike for damage or destruction by the bailee's neglect and for loss by a wrong-doer against whom the bailee had a remedy over, a source was opened for confusion with regard to the foundation and nature of the defendant's duty.

既然已经由此确立，针对被告作为以及不作为所引发的损失都可适用间接侵害之诉，那么，即使过失性保管导致财产完全毁坏，也完全没有理由不适用这一诉讼。距此仅一步之遥，即可将同一诉讼程序扩展至一切由受托人造成损失的案件，从而避免被告仅通过发誓就不再承担责任。请求返还动产之诉这一原始的救济方式，保留了原始程序的痕迹。大约于索斯科特案件时期这一诉讼程序最终得以扩展。但是，当同一诉讼程序因此以同样的方式被适用于因受托人的疏忽而导致的损失或毁坏，以及因不当行为人造成的损害（受托人可从不当行为人处获得救济）的时候，这就给有关被告责任的基础及性质问题造成了混乱。

In truth, there were two sets of duties,—one not peculiar to bailees, arising from the assumpsit or public calling of the

defendant, as just explained; the other, the ancient obligation, peculiar to them as such, of which Southcote's Case was an example. But any obligation of a bailee might be conceived of as part of a contract of bailment, after assumpsit had become appropriated to contract, the doctrine of consideration had been developed, (both of which had happened in Lord Coke's time,) it seemed un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nicely between the two sets of duties just mentioned, provided a consideration and special promise could be alleged. Furthermore, as formerly the defendant's public calling had the same effect as an assumpsit for the purpose of charging him in tort, it seems now to have been thought an equally good substitute for a special promise, in order to charge him in assumpsit. In Rogers v. Head, [6_56] the argument was, that to charge one in assumpsit you must show either his public calling at the time of the delivery, or a special promise on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This argument assumes that a bailee who received goods in the course of a public employment, for instance as a common carrier, could be charged in this form of action for a breach of either of the above sets of duties, by alleging either his public calling or his reward and a special promise. It seems to have been admitted, as was repeatedly decided before and since that case, that one who was not a common carrier could have been charged for non-delivery in a special action; that is, in case as distinguished from assumpsit.

事实上存在两套责任——一套责任并不特别针对受托人，起因于被告的承诺或者所从事的公共服务性职业，这在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另一套是古老的责任，特别针对受托人，索斯科特案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但是，任何受托人的责任都可能被当成寄托合同的一部分，在违反简式合约索赔诉讼适用于合同，以及对价原则发展起来之后（二者都发生在柯克勋爵所处的时代），只要能指出被告有对价和特别允诺，似乎就没有必要再对上述两套责任作精细的区分了。此外，由于

从前为了指控被告侵权，被告所从事的公共服务性职业与其承诺具有同等效力，所以现在为了对被告提起违反简式合约索赔诉讼，被告所从事的公共服务性职业审查似乎被认为可充分地替代特别允诺。罗杰斯诉海德案的论点是：为了对某人提起违反简式合约索赔之诉，你必须证明，他在交付时从事公共服务性职业，或者有一个基于充分对价的特别允诺。这一论点认为：一位受托人，在其从事公共服务性职业的过程中接收了货物，例如一位公共承运人，就可以这种诉讼形式针对其违反上述任何一套责任而对其提起诉讼，可以通过主张他从事公共服务性职业，或者主张他得到了报酬并有特别允诺。人们似乎已经承认，一个人倘若不是公共承运人，即可因未交付而对其提起一项特别的诉讼——也就是，有别于简式合约索赔诉讼的间接侵害之诉，这一点在此案前后即被反复认定。

Suppose, next, that the plaintiff sued in case for a tort. As before, the breach of duty complained of might be such damage to property as had always been sued for in that form of action, or it might be a loss by theft for which detinue would formerly have been brought, and which fell on the bailee only by reason of the bailment. If the goods had been stolen, the bailee's liability rested neither on his common calling nor on his assumpsit and his neglect, but arose from the naked facts that he had accepted a delivery and that the goods were gone, and in such cases it ought to have been enough to allege those facts in the declaration. [6_57] But it was very natural that the time-honored foundations for the action on the case in its more limited application should still be laid in the pleadings, even after the scope of the action had been enlarged. We shall have to inquire, later, whether the principles of Southcote's Case were not also extende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o cases not falling within it. The reasons for the rule which it laid down had lost their meaning centuries before Gawdy and Clench were born, when owners had acquired the right to sue for the wrongful taking of

property in the hands of bailees and the rule itself was a dry precedent likely to be followed according to the letter because the spirit had departed. It had begun to totter when the reporter cautioned bailees to accept in such terms as to get rid of it. [6_58]

接下来，假设原告就侵权提起间接侵害之诉。依照以往的情况，被控的违反职责行为，可能是一直以此诉讼形式提起诉讼的那种损害财产行为；或者也可能是由于被盗造成的丧失财产行为，过去人们对此可以提起请求返还动产之诉，并且仅因为寄托的原因而由受托人承担责任。如果货物被偷，受托人的责任基础既不在于其所从事的公共服务性职业，也不在于其所作出的承诺及不作为的行为，而仅仅起因于以下简单的事实，即他接受了一起货物的交付，且货物不见了；在这类案件的起诉状中主张这些事实，应该就足够了。但是，即使间接侵害诉讼的范围被扩大了，这一传统的诉讼依据，尽管适用的范围越来越有限，却仍会在原告的答辩状中被列出来。稍后，我们需要查明，索斯科特案的原则是否朝相反的方向延伸，而适用于那些不在其范围内的案例。此案所定下的规则，早在高迪和克伦奇法官出生的前几个世纪就已经失去了意义，当时财产所有者已经获得了针对不当占有受托人所保管的财产而提起诉讼的权利，这一规则本身只是一个干巴巴的先例，人们仅仅按照字面意义遵循，因为其精髓已经没有了。当判例汇编告诫受托人收受财物的条件是要明确排除这一规则时，该规则就已经动摇了。

Accordingly, although that decision was the main authority relied on for the hundred years between it and Coggs v. Bernard whenever a peculiar responsibility was imposed upon bailees, we find that sometimes an assumpsit was laid as in the early precedents, [6_59] or more frequently that the bailee was alleged to be a common bargeman, or common carrier, or the like, without much reference to the special nature of the tort in question; and

that the true bearing of the allegation was sometimes lost sight of. At first, however, there were only some slight signs of confusion in the language of one or two cases, and if the duty was conceived to fall within the principle of Southcote's Case, pleaders did not always allege the common or public calling which was held unnecessary. [6_60] But they also adopted other devices from the precedents in case, or to strengthen an obligation which they did not well understand. Chief Justice Popham had sanctioned a distinction between paid and unpaid bailees, hence it was deemed prudent to lay a reward. Negligence was of course averred; and finally it became frequent to allege an obligation by the law and custom of the realm. This last deserves a little further attention.

因此，虽然在索斯科特案和柯吉斯诉伯纳德案之间的百余年间，每当某项特别责任被强加给受托人时，这一判决都是所依据的主要判例，但我们还是发现，人们有时会像早期先例那样提起简式合约索赔诉讼，或者更经常地还会提出受托人是公共驳船长、或公共承运人等等，而并未过多提到所涉侵权行为的特殊性质；而且还时常忽略诉称的真实意义所在。不过，最初还只是在一两起案件的说法中稍微存在一些混淆的地方，如果应承担的责任被认为属于索斯科特案的原则所适用的范畴，起诉人并未总是指出受托人的公共性职业，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如此。但是，他们也会采用间接侵害之诉的先例中的其他办法，否则就会强调某种他们自己也没有完全理解的责任。首席大法官波帕姆认定有偿和无偿受托人之间存在某种区别，因此认为支付报酬是审慎的行为。过失当然也会被主张；最终，依据相关的法律或习惯法主张负有某一项责任才变得常见起来。这最后一点我们有必要再多关注一下。

There is no writ in the Register alleging any special obligation of common carriers by the custom of the realm. But the writ against

innkeepers did lay a duty “by the law and custom of England,” and it was easy to adopt the phrase. The allegation did not so much imply the existence of a special principle, as state a proposition of law in the form which was then usual. There are other writs of trespass which allege a common-law duty in the same way, and others again setting forth a statutory obligation. [6_61] So “the judges were sworn to execute justice according to law and the custom of England.“ [6_62]

在《诉讼登记册》中没有一个令状依照相关的习惯法主张公共承运人负有什么特殊的义务。但是，针对客栈老板签发的令状的确“依照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法”主张某一责任，这一说法很容易被采用。这一主张与其说意味着存在某项特殊原则，还不如说，以当时常见的形式对某项法律主张予以说明。还有其他一些侵害令状，以同样的方式主张某种普通法上的义务，而另一些则规定了某种制定法上的义务。因此，“法官们宣誓依照英格兰的法律及习惯法秉公执法”。

The duties of a common carrier, so far as the earlier evidence goes, were simply those of bailees in general, coupled with the liabilities generally attached to the exercise of a public calling. The word “common” addressed itself only to the latter point, as has been shown above. This is further illustrated by the fact that, when the duty was thus set forth, it was not alleged as an obligation peculiar to common carriers as such, but was laid as the custom of law of common hoymen, or lightermen, &c., according to the business of the party concerned. It will be noticed that Chief Justice Holt in Coggs v. Bernard states the liability as applicable to all bailees for reward, exercising a public employment, and mentions common hoymen and masters of ships alongside of, not as embraced under, common carriers. It will also be noticed in the

cases before that time, that there is no settled formula for the obligation in question, but that it is set forth in each case that the defendant was answerable for what he was said to have done or omitted in the particular instance. [6_63]

前面的证据表明，公共承运人的责任只不过是一般受托人的责任，再加上通常附着于某一公共职业的责任。如上文所示，“公共”一词针对的只是后一点。以下事实还可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在人们以此规定这一责任的时候，并没有称其为这样的公共承运人所特有的责任，而是根据所涉当事人从事的职业，将其作为公共重型货运驳船主或驳船主等相关的习惯法提出的。我们发现，在柯吉斯诉伯纳德案中，首席大法官霍尔特认为这一责任适用于一切有偿受托人，他们从事某种公共性职业。他在提到公共重型货运驳船主时，是将他们与轮船主相提并论，而不是包含于公共承运人之中。此外，之前的案例对于相关责任并没有固定的程式，但每一起案件却都提出了在该案特定情况下，被告对于被控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行为都负有责任。

Returning now to the succession of the cases, Rich v. Kneeland [6_64] is the next in order (11 Jac. I., A.D.1613). It was an action on the case (tort), against a common hoyman. In Croke's report nothing is said of custom; but the declaration avers that the defendant was a common bargeman, that the plaintiff delivered him a portmanteau, &c. to carry, and paid him for it, and that the defendant tam negligenter custodivit, that it was taken from him by persons unknown,—like the second count in Morse v. Slue, below. The plea was demurred to, and adjudged for the plaintiff. A writ of error being brought, it was assigned that “this action lies not against a common bargeman without special promise. But all the Justices and Barons held, that it well lies as against a common carrier upon the land.” If we follow this report, it seems at the first

glance that importance was attributed to the common calling. But as the loss was clearly within the principle of Southcote's Case, which required neither special promise nor common calling for its application, and which remained unquestioned law for three quarters of a century later, the court must have referred to the form of action employed (case), and not to the liability of the defendant in some form of action (detinue). The objection was that “this action lies not,” not that the defendant not liable, “without special promise.” Even thus narrowed, it rather countenances the notion that allegations which were necessary to charge a man for damage happening through his neglect, in the more ancient and familiar use of this action, were also necessary in this new extension of it to a different class of wrongs. As it was now pretty clear that case would lie for a nonfeasance, the notion was mistaken, and we shall see that it was denied in subsequent decisions. [6_65]

现在回到这一系列案件中，按顺序下一个讲到的是里奇诉尼兰德案（詹姆斯一世11年，公元1613年）。这是一起针对一位公共重型货运驳船主的间接侵害诉讼。克洛克的判例报道根本没有提到习惯法，但在该案的起诉状中却提出，被告是一个公共驳船主，原告交付给他一个大旅行箱托运，并为此向他支付了报酬，但被告“如此疏于保管”导致旅行箱被不知名的人从被告处拿走——类似下述莫尔斯诉斯卢案中的第二项罪状。被告的答辩被驳回，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被告获得了一个纠错令状之后，所作出的说明是“针对没有作出特别允诺的公共驳船主，这一诉讼不被支持。但是所有王室法院大法官和财税法院法官都认为，该诉讼完全适用于陆地上的公共承运人”。如果我们对这一判例报道进行分析，乍一看重点似乎放在公共性职业上。但是，由于本案中旅行箱的丢失显然属于索斯科特案的原则所适用的范围，该原则的适用条件既不是特别允诺，也不是公共性职业，且该原则在此后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毋庸置疑的法律原则。因此，法院在此所指的一定是所应用的诉讼程式（间接

侵害之诉），而不是指被告在某诉讼形式（请求返还非法占有的动产诉讼）中所负有的责任。异议的理由是，“没有特别允诺”，“这一诉讼即不被支持”，而不是被告不负有责任。即便被如此限定之后，异议仍然支持以下观点：更早期的，也是人们更熟悉的该诉讼程序中，针对某人因疏忽所造成的损失提起诉讼所必需的主张，在其新扩展到其他种类的不当行为时，仍是必需的。现在已经很清楚，可对失职提出间接侵害之诉，因此上述观点有误，我们会看到随后的判决即对此予以了否定。

According to Hobart's report, it was alleged that the defendant was a common hoyman, to carry goods by water, for hire, &c., that by the custom of England such carriers ought to keep the goods, &c., so as they should not be lost by the default of them or their servants, &c. “And it was resolved that, though it was laid as a custom of the realm, yet indeed it is common law.” This last resolution may only mean that the custom of the realm and the common law are the same thing, as had been said concerning innkeepers long before. [6_66] But the law as to innkeepers, which was called the custom of the realm in the writ, had somewhat the air of a special principle extending beyond the law of bailment, inasmuch as their liability extended to goods within the inn, of which they had not the custody, and the court may have meant to make an antithesis between such a special principle and the common law or general law of bailment governing the present case.

依照霍巴特的判例报道，原告诉称被告是一名公共性重型货运驳船主，通过水路运输货物，收取酬金……根据英格兰的习惯法，此类承运人应该保管货物以便货物不会因承运人或其雇员未履行职责而丢失。“最终的裁决是，尽管这一规则是作为本王国的一项习惯法提出的，其实却是普通法”。这一裁决也许只不过是说，本王国的习惯法

与普通法是一回事，如上述有关很久以前的客栈老板的法律一样。但是，有关客栈老板的法律，在令状中被称之为本王国的习惯法，还多少带有某种超出寄托法特别原则之外的气息，因为客栈老板的责任扩展及于客栈内的一切货物，但这些货物并不处于客栈老板的保管之下，而法院也许只是想要在这样一项特别原则和指导本案的普通法或一般寄托法之间作一个对比。

Whatever doubts some of Croke's language might raise, standing alone, the fact remains indisputable, that for nearly a century from Woodlife's Case the liability of carriers for loss of goods, whether the custom of the realm or the defendant's common calling was alleged or not, was placed upon the authority and was intended to be decided on the principle of Southcote's Case.

无论克洛克判例汇编中的一些说法可能会引起什么样的疑义，单独来看，以下事实却是无可辩驳，那就是在伍德莱夫案之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无论本国的习惯法或者被告所从事的公共性职业是否被提到，承运人丢失货物所负有的责任都是以案例为基础，倾向于根据索斯科特案的原则来进行判决。

Symons v. Darknell [6_67] (4 Car. I., A.D.1628) is precisely in point. The declaration was, that, by the common law, every lighterman ought so to manage his lighter that the goods carried therein should not perish. “And although no promise laid, it seemed to the court that the plaintiff should recover; and not alleging that defendant was common lighterman was no harm. Hyde, C. J., delivery makes the contract.” This did not mean that delivery was a good consideration for a promise; but, as was laid down in Southcote's Case, that delivery, without a special acceptance to keep

only as one's own goods, bound the bailee to keep safely, and therefore made it unnecessary to allege either an assumpsit or the defendant's common calling. Whitlock, J. called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 action was tort, not contract. “Et en cest case… Southcote's Case fuit cite.”

西蒙斯诉达科内尔案（查理一世4年，公元1628年）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起诉状中称，依照普通法，每个驳船长都应如此管理其驳船以使其所运送的货物不致毁损。“尽管没有作出任何允诺，但在法院看来，原告仍应获得赔偿；原告没有提出被告是公共驳船长也无碍于此。首席大法官海德说，交付即构成合同。”这并不是说交付就构成了允诺的有效对价；但是，正如索斯科特案中所规定的那样，即使没有说要当成自己的货物那样予以特别收受，交付也使得受托人有责任安全保管货物，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提出以承诺或被告的公共性职业作为理由。维特洛克法官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这起诉讼属于侵权，而不是合同诉讼。“而且从此案中能看到索斯科特案中忘了说的（Et en cest case… Southcote's Case fuit cite）”。

The same rule is stated as to bailments in general, the same year, by Sergeant Maynard arguendo in Williams v. Hide, [6_68] again citing Southcote's Case.

同一年，梅纳德警官在威廉姆斯诉海德案庭辩过程中针对一般寄托的情况再次引用索斯科特案，陈述了同一规则。

In Kenrig v. Eggleston [6_69] (24 Car. I., A.D.1648), “case against a country carrier for not delivering a box,” &c., of which he was robbed, nothing was said about custom, nor being a common

carrier, unless the above words imply that he was; but it was laid down, as in Southcote's Case, that “it must come on the carrier's part acceptance” if he would lessen his liability as bailee.

肯里格诉埃格尔斯顿案（查理一世24年，公元1648年）是“一起针对乡村承运人未能交付一只箱子的案件”等等，因为箱子被人抢走了，在这起案件中，根本就没有提到习惯法，也没有提到被告是公共承运人，只是上述用语隐含着这个意思；但此案却如索斯科特案一样规定说，如果承运人想要减轻其作为受托人的责任，“就必须看承运方的收受行为”。

Nichols v. Moore [6_70] (13 Car. II., A.D.1661) was case against a “water carrier,” between Hull and London, laying a delivery to him at York. It was moved in arrest of judgment, that the defendant did not undertake to carry the goods from York to Hull. “But notwithstanding this per totam curiam, the defendant shall be charged on his general receipt at York, according to Southcote's Case.”

尼科尔斯诉摩尔案（查理二世13年，公元1661年）是针对一位往返于赫尔和伦敦之间的“水路承运人”的案件，他在约克接受了一起交付。中止判决申请中提出被告并未承诺要将货物从约克运往赫尔。“但是，尽管有这一法庭的一致决断，根据索斯科特案，被告仍应因其在约克的一般性接收行为而承担责任。”

It is fair to mention that in Matthews v. Hopkins [6_71] (17 Car.II.) the declaration was on the custom of the realm against a common carrier, and there was a motion in arrest of judgment,

because there was a misrecital of the custom of the realm, and the defendant was not alleged to have been a carrier at the time of the receipt, and also because counts in trover, and in case on the custom, were joined. Judgment was arrested, it would seem on the latter ground, but the court continued: “And, although the declaration may be good without recital of the custom of the realm, as Hobart says, still it is the better way to recite it.”

还有必要提到的是，在马修斯诉霍普金斯案（查理二世17年）中，其起诉状是依据王国习惯法对一位公共承运人提起的诉讼，被告申请中止判决，理由是：对王国的习惯法有一处错误陈述；对方并未主张被告在接受货物时为承运人；动产侵占之诉中的诉因，和依习惯法的间接侵害之诉中的诉因被合并起来了。判决被中止，似乎是以后一点为依据，但法庭却继续说：“尽管如霍巴特所述，即使不援引王国的习惯法，这一起诉状也能成立，不过最好还是引述一下”。

We now come to the great case of Morse v. Slue [6_72] (23 & 24 Car. II., A.D.1671, 1672). This was an action against the master of a ship lying in the river Thames, for the loss of goods intrusted to him. The goods in question were taken away by robbers,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ship had the usual guard at the time. There seem to have been two counts, one on the law and custom of England (1 Vent. 190), for masters of ships “carefully to govern, preserve, and defend goods shipped, so long as said ship should remain in the river Thames” (2 Keb. 866); “to keep safely [goods shipped to be carried from London beyond sea] without loss or subtraction, ita quodpro defectu of them they may not come to any damage” (1 Vent. 190); “to keep safely goods delivered to them to carry, dangers of the sea excepted” (2 Levinz, 69; the exception last was perhaps drawn by the reporter from the usual bills of lading

referred to in argument). The second count, which is usually overlooked, was a special count “on delivery and being stolen by his neglect.“ [6_73]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重要的莫尔斯诉斯卢案（查理二世23和24年，公元1671和1672年）。这是一起针对泰晤士河上一艘船的船长提起的诉讼，原因是交托给他的货物丢失。涉案货物被强盗抢走了，同时船只被抢时船处于通常的防护状态。此案似乎有两个诉因，一个是基于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法（文特里斯《王座法院判例汇编》第1卷，190页），因为“只要该船还在泰晤士河上”，轮船长“就应谨慎地管理、保存和保护装船的货物”（基布尔《王座法院判例汇编》第2卷，866页）；“安全地保管这些要从伦敦运送出海的装船货物，不使其丢失或者减少，通过对它们的保护（ita quo dpro defectu），使其不遭受任何损失（文特里斯《王座法院判例汇编》第1卷，190页）；“安全地保管交付给他们运送的货物，海上危险除外”（莱文兹《王座法院判例汇编》2卷，69页；海上危险这一例外也许是判例汇编编者从辩论中提到的那些常用提单形式中总结出来的）。另一个诉因，是一个特别的“基于交付和由于其疏忽而被盗”的诉因，但此诉因却常常被忽略。

The case was twice argued, and all the reports agree, as far as they go, in their statements of the points insisted on.

该案在此是第二次进行讨论了，针对所强调的那些观点，所有判例汇编在提及它们时都尽可能保持一致。

Holt, for the plaintiff, maintained: [6_74] 1. That the master receives goods generally, citing Southcote's Case, and that in “only

guardian in socage who hath the custody by law, and factor who is servant at the master's dispose, and so cannot take care, are exempt.” 2. That the master has a reward for his keeping, and is therefore a proper person to be sued. 3. That the master has a remedy over, citing the case of the Marshal of the King's Bench. [6_75] That the mischief would be great if the master were not liable, as merchants put their trust in him, and no particular default be shown, as appears by the bill of lading, and, finally, that neglect appeared.

霍尔特支持原告，他坚持认为：1．援引索斯科特案，船主属一般性接收货物；“免责的只有依法律享有监管权的农役土地保有者的监护人，和代销商，因为代销商是受船长支配的雇员，因此不负有责任”。2．船长因其保管货物而得到了报酬，因此对其起诉是合适的。3．援引王座法院典狱长一案，船长可以获得救济。如果船长不承担责任，麻烦就大了，因为商人对他们表示信赖，且如提单所示没有出现任何不履行职责的行为，而最终却出现了疏忽。

On the other side, it was urged that no neglect was found, and that the master was only a servant; so that, if any one was liable, the owners were. [6_76] It was also suggested that, as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liability if the goods had been taken at sea, when the case would have within the admiralty law, it was absurd that a different rule should govern the beginning of the voyage from would have governed the rest of it. [6_77]

另一方面，也有人坚持认为，被告根本不存在疏忽，且船长也只不过是个雇员；所以，如果有人要负责任，这人则应是船主本人。此外还有人表示，如果货物是在海上被抢的，则被告可能全无责任，如

果此案适用海事法，那么航程开始时适用一种规则，剩下的航程却适用另一规则，这实属荒谬。

On the second argument, it was again maintained for the plaintiff that the defendant was liable “at the common law on the general bailment,” citing Southcote's Case, and also that, by the Roman and maritime law, he was liable as a public carrier and master of a ship.

在第二种观点中，人们引用索斯科特案，再次主张原告胜诉，认为“依照普通法上的一般性寄托”，被告应负有责任；且依照罗马法和海事法，他作为公共承运人和船长也应负有责任。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was delivered by Chief Justice Hale. It was held that, the ship being within the body of the county, the admiralty law did not apply; or, according to 1 Mod. 85, note a, “the master could not avail himself of the rules of the civil law, by which masters are not chargeable pro damno fatali”; that the master was liable to an action because he took a reward; that “he might have made a caution for himself, which he omitting and taking in the goods generally, he shall answer for what happens.“ [6_78] The case of Kenrig v. Eggleston [6_79] seems also to have been referred to. It was further said that the master was rather an officer than a servant, and in effect received his wages from the merchant who paid freight. Finally, on the question of negligence, that it was not sufficient to have the usual number of men to guard the ship, but that it was neglect not to have enough to guard the goods, unless in case of the common enemies, citing the case of the Marshal, which it will be remembered was merely the principle of Southcote's Case

and the common law of bailment in another form. [6_80]

法院的判决意见书由首席大法官黑尔宣布。判决意见书认为，由于船还在内陆水域内，因此不适用海事法；或者，根据利奇的《现代判例汇编》1卷，85页，注释a，“船长不能适用民法规则，依照民法规则，船长不对注定的损失（por damno fatali）负有责任”；船长对某起诉讼负有责任，是因为他收取了报酬；“船长可能已经提醒过自己小心，但因为疏忽，且是一般性地接收了货物，所以他应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肯里格诉埃格尔斯顿案似乎也被提及。意见书还进一步指出，船长其实是个指挥官，而不是雇员，他实际上是从支付运费的商人处获得报酬。最后，关于过失问题，意见书认为，指派一般数量的人手来保护船只是不够的，没有让足够的人手来保护货物即构成过失，除非出现王座法院典狱长一案中的公共敌人的情况；请记住，王座法院典狱长一案其实不过是索斯科特案的原则以及寄托相关普通法的另外一种形式。

It will be observed that this case did not go on any special custom, either as to common carriers or shipmasters, but that all the arguments and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assumed that, if the case was to be governed by the common law, and not by the milder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relied on for the defence, and if the defendant could be regarded as a bailee, and not merely a servant of the owners, then the general law of bailment would apply, and the defendant would be charged, as in Southcote's Case, “by his general acceptance.”

可以看出，此案并未依照任何专门的习惯法，包括有关公共承运人以及有关船长的习惯法，但所有的论据及法院的观点都认定，此案如果以普通法为准则，而不是以被告答辩所倚赖的较为温和的民法为

准则，如果能视被告为受托人而不只是所有者的一个雇员，那就可适用有关寄托的一般性法律，被告也将如同索斯科特案一样，“因其一般性的收受行为”而负有责任。

It can hardly be supposed, however, that so enlightened a judge as Sir Matthew Hale would not have broken away the Year Books, if a case had arisen before him where property had been received as a pure favor to the plaintiff, without consideration or reward, and was taken from the defendant by robbery. Such a case was tried before Chief Justice Pemberton, and he very sensibly ruled that no action lay, declining to follow the law of Lord Coke's time to such extreme results [6_81] (33 Car.II., A.D.1681).

但是，像马修·黑尔爵士这样有见识的法官，如果出现在他面前的案件是，被告接收财产纯粹是为了给原告帮一个忙，既没有对价也没有报酬，而财产被从被告处抢走了，我们很难想象他不会打破《年鉴》中的规定。首席大法官彭伯顿曾审理过类似的一起案件，他作出了合理的裁决，认定诉讼并不成立，而拒绝遵循柯克勋爵时代的法律，以免得出极端的裁决结果（查理二世33年，公元1681年）。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defendant's common calling began to assume a new importance. The more important alternative allegation, the assumpsit, had the effect in the end of introducing the not intrinsically objectionable doctrine that all duties arising from a bailment are founded on contract. [6_82] But this allegation, having now a special action to which it had given rise, was not much used where the action was tort, while the other averment occurs with increasing frequency. The notion was evidently gaining ground that the liability of common carriers for loss of goods,

whatever the cause of the loss might be, arose from a special principle peculiar to them, and not applicable to bailees in general. The confusion of independent duties which has been explained, and of which the first trace was seen in Rich v. Kneeland, was soon to become complete. [6_83] Holt became Chief Justice. Three of the cases in the last note were rulings of his. In Lane v. Cotton [6_84] (13 Will. III., A.D.1701), he showed his disapproval of Southcote's Case, and his impression that the common law of bailment was borrowed from Rome. The overthrow of Southcote's Case and the old common law may be said to date from Coggs v. Bernard [6_85] (2 Anne, A.D.1703). Lord Holt's famous opinion in the latter case quotes largely from the Roman law as it filtered to him through Bracton; but, whatever influence that may have had upon his general views, the point decided and the distinctions touching common carriers were of English growth.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被告从事的公共性职业开始再次显示出重要性。更为重要的另一主张，即简式合约索赔诉讼，最终产生的效应是引出了由寄托所产生的所有责任都以合同为基础这一原则，该原则本质上不会引起异议。但是，由于这一主张已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诉讼形式，因此，当诉讼为侵权时，它并不常被使用，而另一项主张倒是用得越来越频繁。很显然，以下观点逐渐开始流行起来，即无论丢失的原因是什么，公共承运人对货物丢失的责任，都是基于特别针对他们而不是一般受托人的一条专门的原则。相互独立的责任之间的混淆现象，上文已解释过，其最初的痕迹可以在里奇诉尼兰德案中看到，但很快就终结了。霍尔特当上了首席大法官，上一条注释中提到的三起案例都是由他作出的裁决。在莱恩诉科顿案（威廉三世13年，公元1701年）中，他表明自己不赞成索斯科特案，并认为寄托相关的普通法继受自罗马法。对索斯科特案和原有普通法的摈弃，可以说是始于柯吉斯诉伯纳德案（安妮女王2年，公元1703年）。霍尔特勋爵在其著名的对后一起案件的判决意见书中，大量引用了经由布拉克顿传输

给他的罗马法；但是，无论这对他的总体观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所定下的争议点和对公共承运人的区分却源自于英国。

The action did not sound in contract. The cause was for damage to the goods, and the plaintiff sued for a tort, laying an assumpsit by way of inducement to a charge of negligence, as in the days of Henry VI. The plea was not guilty. But after verdict for the plaintiff, there was a motion in arrest of judgment, “for that it was not alleged in the declaration that the defendant was a common porter, nor averred that he had anything for his pains.” Consideration was never alleged or thought of in the primitive assumpsit, but in the modern action of contract in that form it was required. Hence, it was inferred that, wherever an assumpsit was laid, even in an action of tort for damage to property, it was the allegation of a contract, and that a consideration must be shown for the undertaking, although the contrary had been decided in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6_86] But the motion did not prevail, and judgment was given for the plaintiff. Lord Holt was well aware that the use of an assumpsit was not confined to contract. It is true that he said, “The owner's trusting [the defendant] with the goods is a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to oblige him to a careful management,” or to return them; but this means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consideration sufficient to oblige him to carry them, which he thought the defendant would not have been bound to do. He then expressly says, “This is a different case, for assumpsit does not only signify a future agreement, but, in such cases as this, it signifies an actual entry upon the thing and taking the trust upon himself”; following the earlier cases in the Year Books. [6_87] This was enough for the decision, and the rule in Southcote's Cas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atter. But as the duty of common carriers by reason of their calling was now supposed to extend to all kinds of losses, and

the doctrine of Southcote's Case was probably supposed to extend to many kinds of damage, it became necessary, in a general discussion, to reconcile or elect between the two principles.

该诉讼并不是针对合同的诉讼。诉因是对货物的损毁，原告起诉侵权，就像亨利六世时代那样，诉状的引言部分提出了过失指控，据此提起简式合约索赔之诉。被告提出无罪答辩。但在陪审团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裁断之后，被告提出了中止判决的动议，“因为起诉状中既没有主张被告是公共行李搬运人，也没有主张他就其劳动获得了任何报酬”。原始的简式合约索赔诉讼从来没有主张或者考虑过对价的问题，但现代以简式合约索赔之诉的程式所体现的合同诉讼却要求有对价。由此可以推断，只要提出简式合约索赔诉讼，即使是一起因财产损失而提起的侵权诉讼，它也是针对合同提出的主张，因此允诺必须证明有对价的支持，尽管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曾作出过相反的判决。但是这一中止判决的动议并未成功，仍然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霍尔特勋爵清楚地意识到，简式合约索赔诉讼的使用并不仅限于合同。他的确说过：“所有者将货物信托给[被告]即构成一个充分的对价，迫使被告必须小心予以管理，”或者迫使被告返还货物；但这是为了以示区别于足以使被告运送货物的对价，在他看来，被告并没有义务运送货物。他遵循《年鉴》中的早期案例，还非常明确地说：“这是一起不同的案件，因为简式合约索赔诉讼不仅意味着一个未来的约定，而且，在本案这类案件中，它还意味着实际登记货物，并建立了信托关系”。这对于判决来说已经足够了，索斯科特案中的规则与此毫无关系。但是，既然公共承运人因其职业而承担的责任现已被认为扩展到一切类型的丧失，而索斯科特案的原则可能被认为扩展至许多类型的损害，因此，在进行一般性讨论时，就有必要调和这两个原则或者对其进行取舍。

The Chief Justice therefore proceed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bailees for reward exercising a public employment, such as common

carriers, common hoymen, masters of ships, &c., and other bailees; denied the rule in Southcote's Case as to the latter; said that the principle of strict responsibility was confined to the former class, and was applied to them on grounds of public policy, and that factors were exonerated, not because they were mere servants, as had always been laid down (among others, by himself in arguing Morse v. Slue), but because they were not within the reason of the rule.

因此，这位首席大法官继续把从事公共性职业的有偿受托人，例如公共承运人、公共重型货运驳船主和轮船长等等，与其他受托人进行区分，对后者不再适用索斯科特案中的规则；并表示，严格责任的原则仅限于前一类受托人，并且是基于公共政策的原因而适用于他们；而代销商之所以被免责，不是因为他们只是雇员，尽管一直也都是如此规定的（他本人在论证莫尔斯诉斯卢案中也曾这样规定），而是因为他们不在这一规则的合理范围之内。

The reader who has followed the argument so far, will hardly need to be convinced that this did not mean the adoption of the Praetor's Edict. There is further evidence at hand if required.

以上论述已足以使一直关注这个问题的读者相信这并不意味着采纳了古罗马法中裁判官的告示。如有必要，还可以举出更多证据加以说明。

In the first place, as we have seen, there was a century of precedents ending with Morse v. Slue, argued by Holt himself, in which the liability of masters of ships, hoymen, carriers, &c. had

been adjudicated. Morse v. Slue is cited and relied on, and there is no hint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other cases. On the contrary, they furnished the examples of bailees for reward exercising a public call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ailees for reward and others is Chief Justice Popham's; the latter qualification (exercising a public calling) was also English, as has partly appeared already, and as will be explained further on.

首先，我们看到霍尔特亲自为此案辩护说：在以莫尔斯诉斯卢案为终结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判例中，都曾裁定轮船长、重型货运驳船长及承运人等负有责任。人们援引并倚赖莫尔斯诉斯卢案，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其他案例有所不满。相反地，其他案例倒是提供了从事某种公共性职业的有偿受托人的例子。有偿受托人和其他受托人之间的区别是首席大法官波帕姆提出的；后一种限制（即从事公共性职业）也是英国式的，上文也提到过，其后还有待进一步解释。

In the next place, the strict rule is not confined to nautae, caupones, and stabularii, nor even to common carriers; but is applied to all bailees for reward, exercising a public calling.

其次，这一严格规则并不限于船主、车行主和旅店主，甚至也不限于公共承运人；而是适用于一切从事公共性职业的有偿受托人。

In the next place, the degree of responsibility is precisely that of bailees in general, as worked out by the previous decisions; but quite unlike and much more severe than that imposed by the Roman law, as others have observed. [6_88]

第三，责任的程度准确说就是一般受托人的责任程度，以往的判决便是如此规定的；这与罗马法的规定十分不同，而且要严厉得多，其他人也都发现了这一点。

And, finally, the exemption from liability for acts of God or the public enemy is characteristically English, as will be proved further on.

最后，因天灾或公共敌人而免责也是典型的英国式规定，后文将进一步说明。

But it has been partially shown in this Lecture that the law of to-day has made the carrier's burden heavier than it was in the time of the Year Books. Southcote's Case, and the earlier authorities which have been cited, all refer to a loss by robbery, theft, or trespass, and hold the bailee liable, where, in theory at least, he has a remedy over. It was with reference to such cases, as has been seen, that the rule arose, although it is not improbable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applied to an unexplained loss; the writ against innkeepers reads absque subtractionie seu amissione custodire. In later times, the principle may have been extended from loss by theft to loss by destruction. In Symons v. Darknoll [6_89] (4 Car.I.), already cited as decided on the authority of Southcote's Case, the goods were spoiled, not stolen, and probably had not even perished in specie. Before this time, the old rule had become an arbitrary precedent, followed according to its form with little thought of its true intent.

但本讲已部分表明，今天的法律加之于承运人的责任较之《年鉴》时期要重一些。索斯科特案和前文援引过的其他早期案例，都提到过由抢劫、偷窃或侵害造成的丧失，并都主张受托人承担责任，因为至少从理论上而言他可以获得救济。我们知道，正是针对这些案例才产生了这条规则，尽管将这一规则适用于无法解释的丧失，并不是不可能的；针对客栈老板签发的令状中就写道，“不能在保管中有减少或损失（sbsque subtractionie seu amissionecustodire）”。后来，这一原则可能就逐渐从适用于由偷窃造成的损失，扩展至由损毁造成的损失。在西蒙斯诉达科内尔案（查理一世4年）中，货物被抢劫，而非偷窃，甚至很有可能实物根本就没有毁灭，援引此案是因为此案是依照索斯科特案予以判决的。在此案之前，索斯科特案的旧规则已经成为一种专断的先例了，人们只会依其形式遵循该规则，而几乎不考虑其真实用意。

The language of Coggs v. Bernard is, that “the law charges the person thus intrusted to carry goods as against all events but acts of God and the enemies of the king.” This was adopted by solemn decision in Lord Mansfield's time, and it is now settled that the common carrier “is liable for all losses which do not fall within the excepted cases.“ [6_90] That is to say, he has become an insurer to that extent, not only against the disappearance or destruction, but against all forms of damage to the goods except as excepted above.

柯吉斯诉伯纳德案的说法是，“除了天灾和国王的敌人之外，法律让受托运送货物的人承担防范一切事件的责任”。曼斯菲尔德勋爵时代严肃的判决中即采用了以上说法，现在已经确定下来，公共承运人“对一切不属于例外情况的丧失都应负有责任”。这就是说，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承保人，不仅是对货物的消失或损毁承保，还包括对除上述例外以外的货物的一切形式的损毁承保。

The process by which this came to pass has been traced above, but a few words may be added here. The Year Books, even in dealing with the destruction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conversion) of chattels in the hands of a bailee, always state his liability as based upon his fault, although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 language is used alio intuitu. [6_91] A jettison, in tempest, seems to have been a good plea for a factor in the time of Edward III.; [6_92] but that cannot be relied on for an analogy. The argument from the Marshal's case [6_93] is stronger. There it appears to have been thought that burning of the prison was as good an excuse for an escape as a release by alien enemies. This must refer to an accidental fire, and would seem to imply that he was not liable in that event, if not in fault. The writs in the Register against bailees to keep or carry goods, all have the general allegation of negligence, and so do the older precedents of declarations, so far as I have observed, whether stating the custom of the realm or not. [6_94] But a bailee was answerable for goods wrongfully taken from him, as an innkeeper was for goods stolen from his inn, irrespective of negligence. [6_95]

对于这一点得以实现的过程，上文已经进行了描述，不过我在这里还要再加上几句。各部《年鉴》，即使有关处理动产在受托人手中的毁损（有别于侵占），也都总是陈述受托人的责任是以其过错为基础的，尽管必须承认，这种说法的角度不同。在暴风雨中投弃货物，这对爱德华三世时期的代销商来说，似乎是一个有效的答辩；但却不能以此进行类推。王座法院典狱长一案中的论据更为有力。此案似乎认为，监狱失火与被敌国侨民释放一样，都是犯人逃跑的有效理由。监狱失火一定是指意外失火，这似乎意味着，在那种情况下，典狱长如果没有过错，就不需承担责任。《诉讼登记册》中收录的针对保管或运送货物的受托人的令状，都是有关于过失的一般性主张，就我所看到的较早的起诉状先例也都如此，无论其是否提及本王国的习惯

法。但是，受托人应对被从其处不当占有的货物承担责任，跟客栈老板要对从其客栈中被偷走的货物承担责任一样，与过失无关。

It is true that the Marshal's case speaks of his negligent keeping when the prisoners were released by rebels, (although that was far less likely to result from negligence, one would think, than a fire in the prison,) and that after Lord Coke's time negligence was alleged, although the goods had been lost by wrongful taking. So the writ against innkeepers is pro defectu hujusmodi hospitatorum. In these instances, neglect only means a failure de facto to keep safely. As was said at a much later date, “everything is a negligence in a carrier or hoyman that the law does not excuse.“ [6_96] The allegation is simply the usual allegation of actions on the case, and seems to have extended itself from the earlier declarations for damage, when case supplanted detinue and the use of the former action became universal. It can hardly have been immaterial to the case for which it was first introduced. But the short reason for disbelieving that there was any warrant in the old law for making the carrier an insurer against damage is, that there seem to be no early cases in which bailees were held to such a responsibility, and that it was not within the principle on which they were made answerable for a loss by theft.

的确，王座法院典狱长一案中提到了犯人被叛乱者释放时典狱长疏于看管的问题，（尽管人们认为相比较监狱失火而言，由过失导致囚犯逃跑的可能性要小很多），而且在柯克勋爵时代之后，人们开始宣称疏忽，即使货物是因不当占有而丧失的。因此，对客栈老板签发的令状是：“为旅馆主人应提供此种保护（pro defectu hujusmodi hospitatorum）”。在这些情况下，疏忽仅意味着事实上未能予以安全保管。很久之后，也有人这样说，“对承运人或重型货运驳船长来

说，法律不予原谅的每件事都是过失”。这一主张完全是间接侵害之诉中的正常主张，似乎是在间接侵害之诉取代请求返还动产之诉，且前者之使用相当普遍之后，从早期针对损失的起诉状中延伸出来的。对于最早引入该主张的案件来说，这一主张很重要。但是，人们并不相信古代法律能够保证承运人成为损害的承保人，理由很简单：似乎并不存在主张受托人承担这类责任的早期案例，它并不在使受托人对偷窃所致损失承担责任的那一原则的范围之内。

Having traced the process by which a common carrier has been made an insurer, it only remains to say a word upon the origin of the admitted exceptions from the risk assumed. It has been seen already how loss by the public enemy came to be mentioned by Chief Justice Holt. It is the old distinction taken in the Marshal's case [6_97] that there the bailee has no remedy over.

在追溯了公共承运人成为承保人的过程之后，现在只需对人们公认的假定风险的免责起源略作评论。我们已经看到，首席大法官霍尔特是如何提到由公敌导致的损失的。王座法院典狱长一案中所采取的古老的区分是受托人在此案中无法获得救济。

With regard to the act of God, it was a general principle, not peculiar to carriers nor to bailees, that a duty was discharged if an act of God made it impossible of performance. Lord Coke mentions the case of jettison from a Gravesend barge, [6_98] and another of a party bound to keep and maintain sea-walls from overflowing, as subject to the same limitation, [6_99] and a similar statement as to contracts in general will be found in the Year Books. [6_100] It is another form of the principle which has been laboriously reargued in our own day, that parties are excused from the performance of a

contract which has become impossible before breach from the perishing of the thing, or from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which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ntract, provided there was no warranty and no fault on the part of the contractor. Whether the act of God has now acquired a special meaning with regard to common carriers may be left for others to consider.

关于天灾，有一个一般性原则，而非承运人或受托人特有的原则，即如果天灾使某责任不可能被履行，该责任即可被免除。柯克勋爵提到过从一艘名为格雷夫森德号驳船上投弃货物的案例，和另一起当事人有责任保持和维护海堤，从而防止洪水泛滥的案例，这两起案件也都有同样的限制；《年鉴》中还会找到有关一般性合同的类似的说法。天灾其实是这一原则的另一种形式，即在合同被违反以前，由于货物已不复存在，或者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而该情况的持续存在则是合同的基础，就已不可能履行合同；此时，只要合同当事人对此没有保证或者过错，他就可被免除履行此合同的义务。我们现在已经对这一原则重新费力进行了讨论。至于天灾在公共承运人的问题上现在是否已获得了某种特定含义，就留给其他人去考虑吧。

It appears, from the foregoing evidence, that we cannot determine what classes of bailees are subject to the strict responsibility imposed on common carriers by referring to the Praetor's Edict and then consulting the lexicons under Nautae, Caupones, or Stabularii. The question of precedent is simply to what extent the old common law of bailment still survives. We can only answer it by enumerating the decisions in which the old law is applied; and we shall find it hard to bring them together under a general principle. The rule in Southcote's Case has been done away with for bailees in general: that is clear. But it is equally clear that

it has not maintained itself, even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public policy invented by Chief Justice Holt. It is not true to-day that all bailees for reward exercising a public calling are insurers. No such doctrine is applied to grain-elevators or deposit-vaults. [6_101]

从以上证据来看，我们似乎无法确定，有哪些类型的受托人受制于参考裁判官告示，后来又参照船主、车行主和旅店主等名词而加之于公共承运人身上的严格责任。与先例相关的问题不过是，有关寄托的旧有的普通法在多大程度上仍然继续适用。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列举出适用那些旧法的判决，而我们将会发现，很难把这些判例置于某一个一般性原则之下。索斯科特案中的规则已不再适用于一般性受托人：这一点非常清楚。但同样很清楚的是，即使在首席大法官霍尔特所提出的公共政策的限度内，该规则也不再适用。今天，所有从事公共性职业的有偿受托人已不再都是承保人。粮库或寄存品保管库不适用这样的原则。

How Lord Holt cam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bailees for reward and others has been shown above. It is more pertinent here to notice that his further qualification, exercising a public calling, was part of a protective system which has passed away. One adversely inclined might say that it was one of many signs that the law was administere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pper classes. It has been shown above that if a man was a common farrier he could be charged for negligence without an assumpsit. The same judge who threw out that intimation established in another case that he could be sued if he refused to shoe a horse on reasonable request. [6_102] Common carriers and common innkeepers were liable in like case, and Lord Holt stated the principle: “If a man takes upon him a public employment, he is bound to serve the public as far as the employment extends, and for refusal an action lies.“ [6_103] An

attempt to apply this doctrine generally at the present day would be thought monstrous. But it formed part of a consistent scheme for holding those who followed useful callings up to the mark. Another part was the liability of persons exercising a public employment for loss or damage, enhanced in cases of bailment by what remained of the rule in Southcote's Case. The scheme has given way to more liberal notions; but the disjecta membra still move.

上文已表明，霍尔特勋爵是如何开始将有偿受托人与其他受托人区分开来的。在此更应注意到其进一步的限定条件，即从事公共性职业，是一个保护性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一体系目前已经不复存在。持反对意见的人可能会说，这是证明法律的实施是为了上层阶级的利益诸多证据中的一种。上文已经指出，如果某人是一个公共蹄铁匠，即使不通过简式合约索赔诉讼，也可以过失对他提起指控。作出这一裁决的同一位法官在另一起案件中又表明，如果这个公共蹄铁匠拒绝给马钉掌这一合理的请求，也可对他提起诉讼。公共承运人和公共客栈老板承担责任的情况与此相类。霍尔特勋爵对此原则进行了说明："如果某人从事公共性职业，他就有义务在此职业所及的范围内为公众提供服务，如果他拒绝，就可对他提起诉讼"。今天，企图一般性地适用此原则会被认为是荒谬之举。但此原则却构成了一套连贯的条例的一部分，迫使那些从事实用行业的人达到胜任的标准。另一个部分则是从事公共性服务的人对丧失或损失所承担的责任，这一责任在寄托相关的案件中因为索斯科特案规则的影响而得以强化。这套条例已被一些更自由开放的观点所取代，但其残余的部分却仍然在起作用。

Lord Mansfield stated his views of public policy in terms not unlike those used by Chief Justice Holt in Coggs v. Bernard, but distinctly confines their application to common carriers. "But there is a further degree of responsibility by the custom of the realm, that

is, by the common law; a carrier is in the nature of an insurer…. To prevent litigation, collusion, and the necessity of going into circumstances impossible to be unravelled, the law presumes against the carrier, unless,” &c. [6_104]

曼斯菲尔德勋爵所陈述的有关公共政策的观点，与首席大法官霍尔特在柯吉斯诉伯纳德案中所采用的观点并无不同，只是将其适用范围明确地限定于公共承运人。“但是，依照王国的习惯法，也就是，依照普通法，还存在一个更高程度的责任；承运人本质上就是承保人，为防止民事诉讼、共谋、以及繁琐纠结的必然情况，法律推定由承运人承担责任。”

At the present day it is assumed that the principle is thus confined, and the discussion is transferred to the question who are common carriers. It is thus conceded, by implication, that Lord Holt's rule has been abandoned. But the trouble is, that with it disappear not only the general system which we have seen that Lord Holt entertained, but the special reasons repeated by Lord Mansfield. Those reasons apply to other bailees as well as to common carriers. Besides, hoymen and masters of ships were not originally held because they were common carriers, and they were all three treated as co-ordinate species, even in Coggs v. Bernard, where they were mentioned only as so many instances of bailees exercising a public calling. We do not get a new and single principle by simply giving a single name to all the cases to be accounted for. If there is a sound rule of public policy which ought to impose a special responsibility upon common carriers, as those words are now understood, and upon no others, it has never yet been stated.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considerations which apply to a particular class among those so designated,—for instance, to

railroads, who may have a private individual at their mercy, or exercise a power too vast for the common welfare,—we do not prove that the reasoning extends to a general ship or a public cab by calling all three common carriers.

今天，该原则已被认定仅限于这一范围，讨论的话题已转向哪些人属于公共承运人的问题。因此，这就是含蓄地承认霍尔特勋爵的规则已不再适用。但是，麻烦在于随着这一规则一起消失的，不仅是我们所看到的霍尔特勋爵感兴趣的那个一般性体系，还包括曼斯菲尔德勋爵重复使用的那些特定的推理。这些推理除了适用于公共承运人外，也适用于其他承运人。除此之外，重型货运驳船长和轮船长最初被判负有责任并非因为他们是公共承运人，重型货运驳船长、轮船长以及公共承运人这三类人被视为并列的类型，即使在柯吉斯诉伯纳德案中也是如此，其中只是将他们作为从事公共性职业受托人的诸多例子提出的。简单地赋予需要解释的全部案件某个单一的名称，我们不会得到单一的新原则。倘若真的存在某项合理的公共政策法规，可据此把某项特殊责任加于公共承运人（按照现在对这几个词的理解），而不是任何其他人身上，这样的规则迄今还从未有人提到过。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些考虑因素适用于公共承运人所特指的那些行业中的某一个具体的种类，比如说，适用于铁路——它可以让私人完全受其摆布，或行使对于公共福利来说过于巨大的权力——我们也不能证明，把以上三类人都称为公共承运人，上述推理就可扩展至普通的轮船或公共出租车。

If there is no common rule of policy, and common carriers remain a merely empirical exception from general doctrine, courts may well hesitate to exte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ose words. Furthermore, notions of public policy which would not leave parties free to make their own bargains are somewhat discredited in most departments of the law. [6_105] Hence it may perhaps be concluded

that, if any new case should arise, the degree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validity and interpretation of any contract of bailment that there may be, should stand open to argument on general principles, and that the matter has been set at large so far as early precedent is concerned.

如果不存在普遍的政策法规，公共承运人仍然只是一般法律原则的一个经验性的例外，那么，法院在扩展这些词的词义时就很有可能会有所迟疑。此外，那些不能让当事人自由进行交易的公共政策理念，在大多数部门法中多少都被证明是不可信的。因此，我们大概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出现任何新的案例，则可能存在的任何寄托合同相关的责任的程度、效力及解释，都应根据一般性原则来进行探讨；迄今所涉及的早期案例，基本都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

I have treated of the law of carriers at greater length than is proportionate, because it seems to me an interesting example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common law has grown up, and, especially, because it is an excellent illustration of the principles laid down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Lecture. I now proceed to the discussion for the sake of which an account of the law of bailment was introduced, and to which an understanding of that part of the law is a necessary preliminary.

我对承运人相关法律的研究非常详细，超过了其所应占的比例，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能够说明普通法发展方式的有趣例子，尤其是，它是本书第一讲末尾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典型例证。不过，我之所以引入对寄托法的解释，是为了转向对另一个部门法的讨论，为此理解寄托法是一个必要的铺垫。

[6_1].XXXI. 16.

[6_2]."Peterit enim rem suam petere [civiliter] ut adiratam per testimonium proborum hominum, et sic consequi rem suam quamvia furatam... Et non refert utrum res que ita subtracta fuit extiterit illius appellantis propria vel alterius, dum tamen de custodia sua." Bract., fol. 150 b, 151; Britton (Nich. ed.), I. 59, 60 [23 b], De Larcyns; cf. ib. 67 [26 b]; Fleta, fol. 5i, L. I. c. 38, Section 1.

[6_3].Y.B. 21 & 22 Ed. I. 466-468, noticed in North Amer. Rev., CXVIII. 421, n. (So Britton [26 b], "Si il puse averreer la perte.") This is not trover. The declaration in detinue per inventionem was called "un newfound Haliday" in Y.B. 33 Hen. VI. 26, 27; cf. 7 Hen. VI. 22, pl. 3; Isack v. Clarke, I Rolle, R. 126, 128.

[6_4].Y.B. 2 Ed. IV. 4, 5, pl. 9; 21 Hen. VII. 39, pl. 49; Bro. Trespass, pl. 216, 295.

[6_5].2 Wms. Saund. 47, n. 1. See above, p. 167.

[6_6].Notes to Saunders, Wilbraham v. Snow, note (h).

[6_7].Y.B. 11 Hen. IV. 23, 24. See, further, Y.B. 8 Ed. IV. 6, pl. 5; 9 Ed. IV. 34, pl. 9; 3 Hen. VII. 4, pl. 16; 20 Hen. VII. 1, pl. 1; 21 Hen. VII. 14 b, pl. 23; 13 Co. Rep. 69; 1 Roll. Abr. 4(I), pl. I; F. N. B. 86, n. a; supra, p. 167.

[6_8].Fitz. Abr. Barre, pl. 130; Y.B. 9 Ed. IV. 34, pl. 9; 12 Am. Law Rev. 694.

[6_9].2 Steph. Comm. (6th ed.), 83, cited Dicey, Parties, 353; 2 Bl. Comm. 453; 2 Kent, 585. As the bailee recovered the whole value of the goods, the old reason, that he was answerable over, has in some cases become a new rule, (seemingly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that the bailee is a trustee for the bailor as to the excess over his own damage. Cf. Lyle v. Barker, 5 Binn. 457, 460; 7 Cowen, 68l, n.; White v. Webb, 15 Conn. 302, 305; in the order cited. (Thence the new rule has been extended to insurance recovered by a bailee. 1 Hall, N. Y. 84, 91; 3 Kent's Comm. (12th ed.), 371, 376, n. 1 (a).) In this form it ceases to be a reason for allowing the action.

[6_10].Y.B. 48 Ed. III. 20, pl. 8; Bro. Trespass, pl. 67. Cf. 1 Britton (Nich. ed.), 67 [26 b]; Y.B. 6 Hen. VI1. 12, pl. 9; 12 Ed. IV. 13, pl. 9; 12 Am. Law Rev. 694.

[6_11].Y.B. 22 Ed. IV. 5, pl. 16.

[6_12].2 Rolle, Abr. 569, Trespass, 5. Cf. Y.B. 20 Hen. VII. 5, pl. 15; 21 Hen. VII. 39, pl. 49; Clayton, 135, pl. 243; 2 Wms. Saund. 47 e (3d ed.).

[6_13].Bro. Trespass, pl, 67 in marg.; cf. Ed. Liutpr. 131, cited supra, p. 166, n.

[6_14].In one instance, where, against the opinion of Brian, the bailor was allowed to sue for damage to the chattel by a stranger, the action seems to have been case. Y.B. 12 Ed. IV. 13, pl. 9; cf. the margin of the report.

[6_15].Gordon v. Harper, 7 T. R. 9; Lord v. Price, L. IL 9 Ex. 54; Muggridge v. Eveleth, 9 Met. 233. Cf. Clayton, 135, pl. 243.

[6_16].Nicolls v. Bastard, 2 C. M. & R. 659, 660; Manders v. Williams, 4 Exch. 339, 343, 344; Morgan v. Ide, 8 Cush. 420; Strong v. Adams, 30 Vt. 221, 223; Little v. Fosseft, 34 Me. 545.

[6_17].2 Camp. 464; cf. Mears v. London & South-Western Railway Co., 11 C.B. N.S. 849, 854.

[6_18].Addison, Torts (4th ed.), 364.

[6_19].Wms. Pers. Prop., 26 (5th ed.), 27 (7th ed.).

[6_20].Booth v. Wilson, I B. & Ald. 59; Y.B. 48 Ed. III. 20, pl. 8; 11 Hen. IV. 17, pl. 39; 11 Hen. IV. 23, 24, pl. 46 (Tre. "ou d'apprompter"); 21 Hen. VII. 14b, pl. 23; Godbolt, 173, pl. 239; Sutton v. Buck, 2 Taunt. 302, 309; Burton v. Hughes, 2 Bing. 173; Nicolls v. Bastard, 2 C. M. & R. 659, 660; Manders v. Williams, 4 Exch. 339, 343, 344; 2 Wms. Saund., note to Wilbraham v. Snow; 2 Kent, 585, 568, 574; Moran v. Portland S. P. Co., 35 Me. 55. See, further, Lecture VI. ad fin.

[6_21].Cf. Lord v. Price, L.R. 9 Ex. 54, 56, supra, p. 172.

[6_22].Supra, p. 167.

[6_23].Lib. X. c. 13; cf. I., c. 8.

[6_24]."Is qui rem commodatam accepit, ad ipsam restituendam tenetur, vel ejus precium, si forte incendio, ruins, naufragio, ant latronum, vel hostium incursu, consumpta fuerit vel deperdita, substracts, vel ablata." Fol. 99 a, b. This has been thought a corrupt text (Guterbock, Bracton, by Coxe, p. 175; 2 Twiss, Bract. Int.

xxviii.), but agrees with Glanvill, supra, and with Fleta, L. II. c. 56, Section 5.

[6_25].Bract., fol. 62 b, c. 28, Section 2; Fleta, L. II. e. 59, Section 4, fol. 128. Cf. Just. Inst. 3. 24, Section 5; ib. 15, Section 2.

[6_26].Y.B. 8 Ed. II. 275; Fitz. Detinue, pl. 59.

[6_27].2 Ld. Raym. 909.

[6_28].Y.B. 13 Ed. IV. 9, pl. 5. See Lecture VI.

[6_29].29 Ass. 163, pl. 28.

[6_30].Cf. Ratcliff v. Davis, Yelv. 178; Cro. Jac. 244; Noy, 137; 1 Bulstr. 29.

[6_31].Y.B. 33 Hen. VI. 1, pl. 3. This case is cited and largely relied on in Woodlife's Case, infra; Southcote v. Bennett, infra; Pickering v. Barkley, Style, 132 (24 Car. I., covenant on a charter-party); and Morse v. Slue, infra; in short, in all the leading cases on bailment.

[6_32].Cf. Abbreviatio Plaeitorum, p. 343, col. 2, rot. 87, 17 Ed. II.

[6_33].Y.B. 9 Ed. IV. 34, pl. 9; 2 Ed. IV. 15, pl. 7. It is proper to add, that in the latter case Littleton does not seem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ervants and bailees.

[6_34].Y.B. 9 Ed. IV, 40, pl. 22. So Brian, in 20 Ed. IV. 11, pl. 10, ad fin.

[6_35].Y.B. 10 Hen. VII. 25, 26, pl. 3.

[6_36].Cf. L. Baiw., XV. 5; Y.B. 33 Hen. VI. 1, pl. 3.

[6_37].Y.B. 6 Hen. VII. 12, pl. 9; Bro. Detinue, pl. 37; 10 Hen. VI. 21, pl. 69.

[6_38].Y.B. 3 Hen. VII. 4, pl. 16. Cf. 10 Hen. VI. 21, pl. 69.

[6_39].Y.B. 11 Hen. IV. 23, 24; 6 Hen. VII. 12, pl. 9.

[6_40].Cro. Eliz. 815; 4 Co. Rep. 83 b; Co. Lit. 89; 2 BI. Comm. 452.

[6_41].Savile, 133, 134. Cf. Bro. Accion sur le Case, pl. 103; Dyer, 161 a, b.

[6_42].Nugent v. Smith, 1 C.P. D. 19, Brett, J., at p. 28.

[6_43].Nugent v. Smith, 1 C.P. D. 423, Cockburn, C. J., at p. 428.

[6_44].Moore, 462; Owen, 57.

[6_45].Dial. 2, ch. 38, A.D. 1530.

[6_46].Keilway, 160, pl. 2 (2 Hen. VIII.); cf. ib. 77b (21 Hen. VII.).

[6_47].Y.B. 33 Hen. VI. 1, pl. 3.

[6_48].4 Co. Rep. 83 b; Cro. Eliz. 815.

[6_49].Keilway, 160, pl. 2.

[6_50].Y.B. 19 Hen. VI. 49, ad fin. Cf. Mulgrave v. Ogden, Cro. Eliz. 219; S.C., Owen, 141, 1 Leon. 224; with Isaack v. Clark, 2 Bulstr. 306, at p. 312, Coke, J.

[6_51].See Lecture VII.

[6_52].Paston, J., in Y.B. 19 Hen. VI. 49. See, also, Rogers v. Head, Cro. Jac. 262; Rich v. Kneeland, Cro. Jac. 330, which will be mentioned again. An innkeeper must be a common innkeeper, Y.B. 11 Hen. IV. 45. See further, 3 Bl. Comm. 165, where "the transition from status to contract" will be found to have taken place.

[6_53].F.N. B. 94 D; infra, p. 203.

[6_54].Y.B. 7 Hen. IV. 14; 12 Ed. IV. 13, pl. 9, 10; Dyer, 22 b.

[6_55].The process may be traced by reading, in the following order, Y.B. 2 Hen. VII. 11; Keilway, 77 b, ad fin. (21 Hen. VII.); ib. 160, pl. 2 (2 Hen. VIII.); Drake v. Royman, Savile, 133, 134 (36 Eliz.); Mosley v. Fosset, Moore, 543 (40 Eliz.); 1 Roll. Abr. 4, F, pl. 5; Rich v. Kneeland, Cro. Jac. 330 (11 Jac. I.).

[6_56].Cro. Jac. 262 (8 Jac. I.). Compare Maynard's argument in Williams v. Hide, Palmer, 548; Symons v. Darknoll, ib. 523, and other cases below; 1 Roll. Abr. 4, F, pl. 3. Mosley v, Fosset, Moore, 543 (40 Eliz.); an obscurely reported case, seems to have been assumpsit against an agistor, for a horse stolen while in his charge, and asserts obiter that "without such special assumpsit the action does not lie." This must

have reference to the form of the action, as the judges who decided Southcote's Case took part in the decision. See, further, Evans v. Yeoman, Clayton, 33.

[6_57].See Symons v. Darknoll, and the second count in Morse v. Slue infra. (The latter case shows the averment of negligence to have been mere form.) Cf. I Salk. 18, top.

[6_58].Supra, p. 179.

[6_59].Boson v. Sandford, Shower, 101; Coggs v. Bernard, infra.

[6_60].Symons v. Darknoll, infra.

[6_61].Reg. Brev. 92b, 95a, 98a, 100b, 104a; cf. Y.B. 19 Ed. II. 624; 30 Ed. III. 25, 26; 2 Hen. IV. 18, pl. 6; 22 Hen. VI. 21, pl. 38; 32 & 33 Ed. I., Int., xxxiii.; Brunner, Schwurgerichte, 177; id. Franzosische, Inhaberpapier, 9, n. 1.

[6_62].12 Co. Rep. 64.

[6_63].See, besides the following cases, the declaration in Chamberlain v. Cooke, 2 Ventris, 75 (1 W. & M.), and note especially the variations of statement in Morse v. Slue, set forth below, in the text.

[6_64].Hobart, 17; Cro. Jac. 330. See also George v. Wiburn, 1 Roll. Abr. 6, pl. 4 (A.D. 1638).

[6_65].The use which has been made of this case in later times shows the extreme difficulty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principles of substantive law and rules relating only to procedure, in the older books.

[6_66].Y.B. 22 Hen. VI. 21, pl. 38; supra, p. 188, n. 1.

[6_67].Palmer, 523.

[6_68].Palmer, 548.

[6_69].Aleyn, 93.

[6_70].1 Sid. 36.

[6_71].1 Sid. 244. Cf. Dalston v. Janson, 1 Ld. Raym. 58.

[6_72].2 Keb. 866; 3 id. 72, 112, 135; 2 Lev. 69; I Vent. 190, 238; 1 Mod. 85; Sir T. Raym. 220.

[6_73].2 Keb. 866. See 3 Keb. 74; 1 Mod. 85; Sir T. Raym. 220.

[6_74].2 Keb. 72.

[6_75].Y.B. 33 Hen. VI. 1; supra, p. 177.

[6_76].3 Keble, 73. This is the main point mentioned by Sir T. Raymond and Levinz.

[6_77].Cf. 1 Mod. 85.

[6_78].1 Ventris, 238, citing Southcote's Case in the margin. Cf. 3 Keble, 135.

[6_79].Aleyn, 93; supra, p. 191.

[6_80].See also 1 Hale, P.C. 512, 513.

[6_81].King v. Viscount Hertford, 2 Shower, 172, pl. 164; cf. Woodlife's Case, supra.

[6_82].Boson v. Sandford, 1 Shower, 101 (2 W. & M.). See above, pp. 183,185; below, p. 197. Modern illustrations of the doctrine will be found in Fleming v. Manchester, Sheffield, & Lincolnshire Railway Co., 4 Q.B.D. 81, and cases cited. In Boorman v. Brown, 3 Q.B.511, 526, the reader will find the primitive assumpsit, which was the inducement to a declaration in tort, interpreted as meaning contract in the modern sense. It will be seen directly that Lord Holt took a different view. Note the mode of dealing with the Marshal's case, 33 Hen; VI. 1, in Aleyn, 27.

[6_83].See Lovett v. Hobbs, 2 Shower, 127 (32 Car. II.); Chamberlain v. Cooke, 2 Ventris, 75 (1 W. & M.); Boson v. Sandford, 1 Shower, 101, citing Southcote's Case (2 W. & M.); Upshare v. Aidee, 1 Comyns, 25 (8 W. III.); Middleton v. Fowler, I Salk. 288 (10 W. III.).

[6_84].12 Mod. 472.

[6_85].2 Ld. Raym. 909.

[6_86].Powtuary v. Walton, 1 Roll. Abr. 10, pl. 5 (39 Eliz.). Cf. Keilway, 160.

[6_87].2 Ld. Raym. 919. See Lecture VII. How little Lord Holt meant to adopt the modern view, that delivery, being a detriment to the owner, was a consideration, may be further seen by examining the cases put and agreed to by him from the Year Books.

[6_88].2 Kent, 598; 1 C.P. D. 429.

[6_89].Palmer, 523. See too Keilway, 77 b, and 160, pl. 2, where the encroachment of case on detinue,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fusion in principle, may be pretty clearly seen taking place. But see p. 175, supra.

[6_90].2 Kent, 597; Forward v. Pittard, 1 T. R. 27.

[6_91].Cf. Y.B. 7 Hen. IV. 14; 2 Hen. VII. 11; Keilway, 77 b, 160, pl. 2, and other cases already cited.

[6_92].Y.B. 41 Ed. III. 3, pl. 8.

[6_93].Y.B. 33 Hen. YI. 1, pl. 3.

[6_94].Reg. Brev. 107 a, 108 a, 110 a, b; entries cited 1 T. R. 29.

[6_95].See above, pp. 167, 175 et seq.; 12 Am. Law Rev. 692, 693; Y.B. 42 Ed. III. 11, pl. 13; 42 Ass., pl. 17.

[6_96].1 Wilson, 282; cf. 2 Kent (12th ed.), 596, n. 1, b.

[6_97].Y.B. 33 Hen. VI. 1, pl. 3.

[6_98].Mouse's Case, 12 Co. Rep. 63.

[6_99].Bird v. Astcock, 2 Bulstr. 280; cf. Dyer, 33 a, pl. 10; Keighley's Case, 10 Co. Rep. 139 b, 140.

[6_100].Y.B. 40 Ed. III. 5, 6, pl. 11; see also Willams v. Hide, Palmer, 548; Shep. Touchst. 173.

[6_101].See Safe Delcosit Company of Pittsburgh v. Pollock, 85 Penn. 391.

[6_102].Paston, J., in Y.B. 21 Hen. VI. 55; Keilway, 50 a, pl. 4; Hardres, 163.

[6_103].Lane v. Cotton, 1 Ld. Raym. 646, 654; 1 Salk. 18; 12 Mod. 484.

[6_104].Forward v. Pittard, 1 T. R. 27, 83.

[6_105].Printing and Numerical Registering Co. v. Sampson, L.R. 19 Eq. 462, 465.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普通法 II

The Common Law

Oliver Wendell Holmes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普通法（下）

The Common Law II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LECTURE VI. POSSESSION. 第六讲　占有
- LECTURE VII. CONTRACT.—I. HISTORY. 第七讲　合同（一）——历史
- LECTURE VIII.CONTRACT.II. ELEMENTS. 第八讲　合同（二）——要件
- LECTURE IX. CONTRACT.—III. VOID AND VOIDABLE. 第九讲　合同（三）——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
- LECTURE X. SUCCESSIONS AFTER DEATH. 第十讲　死后继承
- LECTURE X. SUCCESSIONS INTER VIVOS 第十一讲　生者之间的继承
- LECTURE XI. SUCCESSIONS.—II. INTER VIVOS. 第十二讲　继承之二：生者之间的继承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LECTURE VI. POSSESSION.

第六讲　占有

Possession is a conception which is only less important than contract. But the interest attaching to the theory of possession does not stop with its practical importance in the body of English law. The theory has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the philosophers, and with them has become a corner-stone of more than one elaborate structure. It will be a service to sound thinking to show that a far more civilized system than the Roman is framed upon a plan which is irreconcilable with the a priori doctrines of Kant and Hegel. Those doctrines are worked out in careful correspondence with German views of Roman law. And most of the speculative jurists of Germany, from Savigny to Ihering, have been at once professors of Roman law,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d if not controlled by some form of Kantian or post-Kantian philosophy. Thus everything has combined to give a special bent to German speculation, which deprives it of its claim to universal authority.

占有这一概念在重要性上仅次于合同。但对占有理论的关注不仅仅在于它在英国法体系中的实际重要性。该理论也为哲学家所用，并成为多个复杂体系的基石。一个远比罗马法更文明的体系，其设计架构与康德和黑格尔的先验学说是格格不入的。表明这一点，将有益于正确的思考。先验学说是慎重地按德国人对罗马法的看法提出的。且大多数德国思辨法学家，从萨维尼到耶林，都曾经是罗马法教授，因此即便他们没有被某种形式的康德或后康德哲学所控制，也会深受其影响。因此，所有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德国思辨有了特别的倾向，也由此失去了成为普遍权威的资格。

Why is possession protected by the law, when the possessor is not also an owner? That is the general problem which has much exercised the German mind. Kant, it is well known, was deeply influenced in his opinions upon ethics and law by the speculations of Rousseau. Kant, Rousseau, and the Massachusetts Bill of Rights agree that all men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and one or the other branch of that declaration has afforded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y possession should be protected from that day to this. Kant and Hegel start from freedom.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Kant said, is the essence of man. It is an end in itself; it is that which needs no further explanation, which is absolutely to be respected, and which it is the very end and object of all government to realize and affirm. Possession is to be protected because a man by taking possession of an object has brought it within the sphere of his will. He has extended his personality into or over that object. As Hegel would have said, possession is the objective realization of free will. And by Kant's postulate, the will of any individual thus manifested is entitled to absolute respect from every other individual, and can only be overcome or set aside by the universal will, that is, by the state, acting through its organs, the courts.

为什么当占有者并非所有者时，占有还受到法律保护呢？这是个曾让德国人绞尽脑汁的普遍问题。众所周知，康德对于伦理与法律的看法深受卢梭思辨思想的影响。康德、卢梭及马萨诸塞的《权利法案》一致认为，所有人生来自由、平等，而该宣言的此条款或其他条款已然回答了为什么占有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都应受到保护的问题。康德和黑格尔从自由着手。康德说，意志的自由是人的本质。它本身就是目的，无需更多解释，理应受到绝对尊重，认识并确认这一点正是所有政府的目的和目标。占有应该受到保护，因为一个人通过占有一个客体，就会将其带入自己的意志范围内。他将自己的人格扩展至这

一客体之内或之上。黑格尔会说，占有是自由意志的客观实现。而根据康德的假定，这样表现出来的任何个人意志都应得到其他个体的绝对尊重，而且只有普遍意志（即国家，通过其机构——法院采取行动），才能超越或取代它。

Savigny did not follow Kant on this point. He said that every act of violence is unlawful, and seemed to consider protection of possession a branch of protection to the person. [1_1] But to this it was answered that possession was protected against disturbance by fraud as well as by force, and his view is discredited. Those who have been contented with humble grounds of expediency seem to have been few in number, and have recanted or are out of favor.

在这点上，萨维尼没有追随康德。他说，任何暴力行为都属非法，而且他似乎认为，保护占有是对人进行保护的一部分。但对此有人反驳说，我们要保护占有既不受暴力也不受欺诈的侵扰，因此推翻了萨维尼的观点。而那些满足于简单的利己论的人已经很少了，他们要么被遗弃，要么不受欢迎。

The majority have followed in the direction pointed out by Kant. Bruns, an admirable writer, expresses a characteristic yearning of the German mind, when he demands an internal juristic necessity drawn from the nature of possession itself, and therefore rejects empirical reasons. [1_2] He finds the necessity he seeks in the freedom of the human will, which the whole legal system does but recognize and carry out. Constraint of it is a wrong, which must be righted without regard to conformity of the will to law, and so on in a Kantian vein. [1_3] So Gans, a favorite disciple of Hegel, “The will is of itself a substantial thing to be protected, and this individual

will has only to yield to the higher common will. [1_4] “So Puchta, a great master, “The will which wills itself, that is, the recognition of its own personality, is to be protected.“ [1_5]

大部分人都遵循康德指出的方向。布伦斯是一位可敬的作者，他表达了对德国思维的典型渴望，他要求从占有自身的本质得出一种内在的法律必要性，因而排斥经验推理。他在人类意志的自由中找到了他所寻找的必要性，而整个法律体系只能对此予以承认并执行。对它进行约束是错误的，无论是否符合法律意志，都不能对其进行约束，如此等等，都与康德哲学一脉相承。因此，黑格尔的得意弟子冈斯说：“意志本身就是理应受到保护的重要事物，这种个人意志只屈从于更高的共同意志”。同样，大师普赫塔说：“自我驱使的意志，即对自身人格的认可，理应受到保护”。

The chief variation from this view is that of Windscheid, a writer now in vogue. He prefers the other branch of the declaration in the Bill of Rights. He thinks that the protection to possession stands on the same grounds as protection against injuria, that every one is the equal of every other in the state, and that no one shall raise himself over the other. [1_6] Ihering, to be sure, a man of genius, took an independent start, and said that possession is ownership on the defensive; and that, in favor of the owner, he who is exercising ownership in fact (i. e. the possessor) is freed from the necessity of proving title against one who is in an unlawful position. But to this it was well answered by Bruns, in his later work, that it assumes the title of disseisors to be generally worse than that of disseisees, which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and which probably is not true in fact. [1_7]

与该观点相左的一个主要观点来自当红法学家温德沙伊德。他支持《权利法案》宣言中的另一分支。他认为，保护占有与保护不受侵害的依据相同，即一国之中，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伊赫林无疑是位天才，其出发点与众不同。他说，占有是处于防御地位的所有权；要保护所有者，正在实际行使所有权的人（即占有者）没有必要向处于非法地位的人证明自己的权利。然而布伦斯在其后期著作中却对该观点进行了很好的反驳。他认为，伊赫林的观点是假定强占者的权利一般要比被强占者的权利弱，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情况就是如此，而且实际情况很可能并非如此。

It follows from the Kantian doctrine, that a man in possession is to be confirmed and maintained in it until he is put out by an action brought for the purpose. Perhaps another fact besides those which have been mentioned has influenced this reasoning, and that is the accurate division between possessory and petitory actions or defences in Continental procedure. [1_8] When a defendant in a possessory action is not allowed to set up title in himself, a theorist readily finds a mystical importance in possession.

依据康德学说，占有人应得到确认并保持其占有地位，直到他在为该目的提起的诉讼中败诉为止。也许除了上述事实外，另一事实也影响了该推理，即在大陆法系程序中，对回复占有之诉和确认所有权之诉或辩护的精确区分。当回复占有之诉中不允许被告将自己设立为所有权人时，理论家就会马上看到占有神秘的重要性。

But when does a man become entitled to this absolute protection? On the principle of Kant, it is not enough that he has the custody of a thing. A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sacredness of man's personality requires that the object should have been brought

within the sphere of that personality, that the free will should have unrestrainedly set itself into that object. There must be then an intent to appropriate it, that is, to make it part of one's self, or one's own.

然而一个人什么时候才有权享有这种绝对的保护呢？根据康德提出的原则，拥有物品保管权是不够的。基于人格的神圣性而进行保护，就要求客体应进入人格的范围内，且自由意志应能毫无限制地置入该客体中。因此，必须要有占有物品的意图，即使它成为自身或自己的一部分之意图。

Here the prevailing view of the Roman law comes in to fortify principle with precedent. We are told that, of the many who might have the actual charge or custody of a thing, the Roman law recognized as possessor only the owner, or one holding as owner and on his way to become one by lapse of time. In later days it made a few exceptions on practical grounds. But beyond the pledgee and the sequester (a receiver appointed by the court) these exceptions are unimportant and disputed. [1_9] Some of the Roman jurists state in terms that depositaries and borrowers have not possession of the things intrusted to them. [1_10] Whether the Germ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urces goes too far or not, it must be taken account of in the examination of German theories.

这里罗马法的普遍看法以先例强化了原则。我们被告知，罗马法中，在可能实际掌握或保管某物的众多人中，能够被承认为占有人的只有所有人，或如所有人一样持有该物，且随时间流逝将会成为所有人的人。后来，基于一些实际原因，罗马法又规定了一些例外。但除质权人和讼争物寄存人（由法庭指定的收受人）外，这些例外并不重

要，且存有争议。有些罗马法学家说，保管人和借用人对交托给他们的物品没有占有权。无论德国对这一法律渊源的阐释是否太过于极端，在考察德国法理时，都必须将其考虑在内。

Philosophy by denying possession to bailees in general cunningly adjusted itself to the Roman law, and thus put itself in a position to claim the authority of that law for the theory of which the mode of dealing with bailees was merely a corollary. Hence I say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show that a far more developed, more rational, and mightier body of law than the Roman, gives no sanction to either premise or conclusion as held by Kant and his successors.

哲学通过否认一般受托人的占有权，巧妙地使自己适应了罗马法的需要，并因此使自己处于能自称为占有法权威的位置上，因为对受托人的处理模式仅仅只是占有法理论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说，重要的是要表明，一个远比罗马法更发达、更理性、也更强大的法系，既不认可康德及其继承者所主张的前提，也不认可其结论。

In the first place, the English law has always had the good sense [1_11] to allow title to be set up in defence to a possessory action. In the assize of novel disseisin, whichwas a true possessory action, the defendant could always rely on his title. [1_12] Even when possession is taken or kept in a way which is punished by the criminal law, as in case of forcible entry and detainer, proof of title allows the defendant to retain it, and in many cases has been held an answer to an action of trespass. So in trespass for taking goods the defendant may set up title in himself. There might seem to be a trace of the distinction in the general rule, that the title cannot be

tried in trespass quare clausum. But this is an exception commonly pu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judgment cannot change the property, as trespass for chattels or trover can. [1_13] The rule that you cannot go into title in a possessory action presupposes great difficulty in the proof, the probatio diabolica of the Canon law, delays in the process, and importance of possession ad interim,—all of which mark a stage of society which has long been passed. In ninety-nine cases out of a hundred, it is about as easy and cheap to prove at least a prima facie title as it is to prove possession.

首先，英国法一直都很具合理性，允许在回复占有之诉的辩护中设立所有权。新侵占之诉是真正的回复占有之诉，其中，被告可以始终依赖其所有权。甚至当取得或保有占有的方式应当受到刑法制裁时，比如强行入侵并占有，被告凭借所有权证据也可以保留占有，而且在许多案例中，该证据还可用来在侵权之诉中进行答辩。因此，在因占有物品而引起的侵害之诉中，被告可以将自己设立为所有权人。在这一普遍规则中，似乎有一点区别，即在侵入他人土地之诉中，不能就所有权进行审理。但这是一个例外，一般基于以下依据，即判决不能改变所有权，而在动产侵占之诉中却可以。在回复占有之诉中不能获得所有权，这一规定意味着巨大的举证困难、教会法中“恶魔的证明”、诉讼程序的延迟、以及临时占有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是早已过去的一个社会阶段的标志。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案件中，证明至少有初步产权就像证明占有一样方便容易。

In the next place, and this was the importance of the last Lecture to this subject, the common law has always given the possessory remedies to all bailees without exception. The right to these remedies extends not only to pledgees, lessees, and those having a lien, who exclude their bailor, but to simple bailees, as they have been called, who have no interest in the chattels, no right

of detention as against the owner, and neither give nor receive a reward. [1_14]

其次（这也正是上一讲对这一主题的重要性所在），普通法总是无一例外地赋予所有受托人以占有权救济。获得这些救济权利的不仅包括除寄托人之外的质权人、承租人、以及拥有某种扣押权的人，而且包括所谓的简单受托人，顾名思义，这些人在动产上没有利益，没有对抗所有人的占有，也不提供或者收受报酬。

Modern German statutes have followed in the same path so far as to give the possessory remedies to tenants and some others. Bruns says, as the spirit of the Kantian theory required him to say, that this is a sacrifice of principle to convenience. [1_15] But I cannot see what is left of a principle which avows itself inconsistent with convenience and the actual course of legislation. The first call of a theory of law is that it should fit the facts. It must explain the observed course of legislation. And as it is pretty certain that men will make laws which seem to them convenient without troubling themselves very much what principles are encountered by their legislation, a principle which defies convenience is likely to wait some time before it finds itself permanently realized.

现代德国法规也遵循同样的途径，从而赋予承租人及其他一些人以占有权救济。布伦斯说（康德主义理论的精神要求他这么说），这是为便利而牺牲原则。不过，如果一项原则公开承认与便利及实际立法过程不一致，我看不出它还能剩下些什么。一项法律理论的第一要求就是符合事实。它必须解释人们观察到的立法过程。可以很肯定的是，人们会制定在他们看来很便利的法律，而不会费心去想他们的立法与什么原则相冲突，因此，一项公然挑战便利性的原则如果要得到

永久认可，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

It remains, then, to seek for some ground for the protection of possession outside the Bill of Rights or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hich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 larger scope given to the conception in modern law.

因此，我们仍需在《人权法案》或《独立宣言》之外为保护占有寻找某种依据，该依据应与现代法律中人们赋予这一概念的更广泛的意义相一致。

The courts have said but little on the subject. It was laid down in one case that it was an extension of the protection which the law throws around the person, and on that ground held that trespass quare clausum did not pass to an assignee in bankruptcy. [1_16] So it has been said, that to deny a bankrupt trover against strangers for goods coming to his possession after his bankruptcy would be “an invitation to all the world to scramble for the possession of them”; and reference was made to “grounds of policy and convenience.“ [1_17] I may also refer to the cases of capture, some of which will be cited again. In the Greenland whale-fishery, by the English custom, if the first striker lost his hold on the fish, and it was then killed by another, the first had no claim; but he had the whole if he kept fast to the whale until it was struck by the other, although it then broke from the first harpoon. By the custom in the Gallipagos,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rst striker had half the whale, although control of the line was lost. [1_18] Each of these customs has been sustained and acted on by the English courts, and Judge Lowell has decided in accordance with still a third, which gives the whale to the vessel

whose iron first remains in it, provided claim be made before cutting in. [1_19] The ground as put by Lord Mansfield is simply that, were it not for such customs, there must be a sort of warfare perpetually subsisting between the adventurers. [1_20] If courts adopt different rules on similar facts, according to the point at which men will fight in the several cases, it tends, so far as it goes, to shake an a priori theory of the matter.

法院很少谈及这一问题。在某一案例中，法院宣称这是对法律规定的人身保护的扩展，基于这一点，法院主张侵占他人土地之诉不转移到破产的受让人身上。因此法院说，针对破产人破产之后占有的财物，否认破产人有权对第三方提起动产侵占诉讼，就意味着“邀请全世界的人来争夺破产财物的占有权”；这是参考了“政策及便利性依据”。我可能还要提及捕鱼案，其中有些下文还会引用。在格陵兰岛捕鲸业中，依据英国惯例，如果第一个叉鱼的人没抓住鲸鱼，而另一个人把鱼杀死了，第一个人就没有权利得到鱼；但如果他一直牢牢抓住这头鲸，直到另一个人把鲸叉到，他还是能得到整头鲸，尽管此时鲸已经从他的鱼叉中挣脱。与此相反，根据加利帕戈斯岛的惯例，尽管第一个人没有控制住鲸，他也可以得到这头鲸的一半。这两种惯例在英格兰法庭上都得到过支持和适用，洛厄尔法官甚至还曾根据第三种惯例作出过判决，即只要在切割鲸鱼前提出要求，那么整条鲸鱼都可以判给第一个叉住鲸鱼的渔船。曼斯菲尔德勋爵提出的依据只是，如果没有这些惯例，那么捕鲸人之间就会永远有冲突。如果法院依据不同案件中的不同争议点对类似事实适用不同的规定，那么就目前情况而言，它就趋向于动摇这件事情的先验理论。

Those who see in the history of law the formal expre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will be apt to think that the proximate ground of law must be empirical, even when that ground is the fact that a certain ideal or theory of government is generally

entertained. Law, being a practical thing, must found itself on actual forces. It is quite enough, therefore, for the law, that man, by an instinct which he shares with the domestic dog, and of which the seal gives a most striking example, will not allow himself to be dispossessed, either by force or fraud, of what he holds, without trying to get it back again. [1_21] Philosophy may find a hundred reasons to justify the instinct, but it would be totally immaterial if it should condemn it and bid us surrender without a murmur. As long as the instinct remains, it will be more comfortable for the law to satisfy it in an orderly manner, than to leave people to themselves. If it should do otherwise, it would become a matter for pedagogues, wholly devoid of reality.

那些从法律史中看到社会发展的形式化表现方式的人往往会认为，法律最直接的依据一定是经验性的，即使该依据只是一个事实，即一般人都怀有某种理想政体或持有某种政体理论。法律作为一种实践性事物，必须建立在现实力量的基础上。因此，有下面这点对法律来说已经足够：人根据其与家犬共有的一种本能（海豹是这种本能的最显著的例子），如果不经过一番争夺，是不会任凭自己占有的东西被人以暴力或欺诈的方式夺走的。哲学或许能找出一百个理由证明这种本能的正当性，但如果哲学谴责它，并要求我们心甘情愿地放弃它，那么这样的哲学就毫无价值。只要这种本能存在，那么对法律来说，以有序的方式满足它，而不是让人们自行解决，会更合适。如果背道而驰，则法律就成了卖弄学问，与现实毫无关联。

I think we are now in a position to begin the analysis of possession. It will be instructive to say a word in the first place upon a preliminary question which has been debated with much zeal in Germany. Is possession a fact or a right? This question must be taken to mean, by possession and right, what the law means by

those words, and not something else which philosophers or moralists may mean by them; for as lawyers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either, except in a legal sense. If this had always been borne steadily in mind, the question would hardly have been asked.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分析占有了。为方便起见，首先就曾经在德国热烈讨论过的一个先决问题说几句。占有是一个事实还是一项权利？该问题必定是问，占有和权利这两个词在法律上是指什么，而不是哲学家或伦理学家可能指的什么别的东西；因为作为法律人士，除法律意义外，这二者跟我们毫无关系。如果人们一直牢记这一点，可能都不会提出这个问题。

A legal right is nothing but a permission to exercise certain natural powers, and upon certain conditions to obtain protection, restitution, or compensation by the aid of the public force. Just so far as the aid of the public force is given a man, he has a legal right, and this right is the same whether his claim is founded in righteousness or iniquity. Just so far as possession is protected, it is as much a source of legal rights as ownership is when it secures the same protection.

一项法律权利别无其他，就是得到许可，使用某些自然力量以及在某些条件下，借助公共力量，获得保护、归还或补偿。只要某人得到这种公共力量的帮助，他就拥有一项法律权利；而无论其主张是基于正义还是邪恶，该项权利都是相同的。只要占有受到保护，则在它获得与所有权同样的保护时，也同后者一样成为法律权利的来源。

Every right is a consequence attached by the law to one or

more facts which the law defines, and wherever the law gives any one special rights not shared by the body of the people, it does so on the ground that certain special facts, not true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are true of him. When a group of facts thus singled out by the law exists in the case of a given person, he is said to be entitled to the corresponding rights; meaning, thereby, that the law helps him to constrain his neighbors, or some of them, in a way in which it would not, if all the facts in question were not true of him. Hence, any word which denotes such a group of facts connotes the rights attached to it by way of legal consequences, and any word which denotes the rights attached to a group of facts connotes the group of facts in like manner.

每项权利都是法律附加给其所界定的一项或多项事实的一种后果，当法律将某些特殊权利赋予某人而排除其他人时，那是因为，某些特殊事实只对这人成立，对世上其他人则不成立。当法律如此挑选出来的一组事实对某一特定的人成立时，就可以说他有权享有相应的权利；即法律由此帮他约束其邻居，或其中某些人；如所有所涉事实对他不成立，则法律不会如此规定。因此，任何表示这样一组事实的词语都隐含着以法律后果的方式附加于该词之上的权利；同样，任何表示附加于一组事实之上的权利的词语也隐含着这组事实。

The word “possession” denotes such a group of facts. Hence, when we say of a man that he has possession, we affirm directly that all the facts of a certain group are true of him, and we convey indirectly or by implication that the law will give him the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Contract, or property, or any other substantive notion of the law, may be analyzed in the same way, and should be treated in the same order.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while possession denotes the facts and connotes the

consequence, property always, and contract with more uncertainty and oscillation, denote the consequence and connote the facts. When we say that a man owns a thing, we affirm directly that he has the benefit of the consequences attached to a certain group of facts, and, by implication, that the facts are true of him. The important thing to grasp is, that each of these legal compounds, possession, property, and contract, is to be analyzed into fact and right, antecedent and consequent, in like manner as every other. It is wholly immaterial that one element is accented by one word, and the other by the other two. We are not studying etymology, but law. There are always two things to be asked: first, what are the facts which make up the group in question; and then,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attached by the law to that group. The former generally offers the only difficulties.

“占有权”一词即表示这样一组事实。因此，当我们提到一个拥有占有权的人时，也就直接肯定了特定的一组事实对他全部成立，同时我们也间接或含蓄地传达了这个意思：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使他处于优势地位。合同、或所有权、或其他任何法律实体概念都可以这样分析，并应以相同的顺序进行处理。它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占有表示事实，隐含后果；而所有权和合同则表示后果而隐含事实，所有权一向如此，而合同则具有更多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当我们说某人拥有某物时，我们就直接肯定了他享有一系列事实相关后果所带来的好处，而且还暗含着这些事实对他全部成立。我们要理解的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法律复合体，即占有权、所有权以及合同，每种都要以相同方式分解为事实和权利，前提和后果。一个词强调一个因素，而另两个强调另一个因素，这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并非在研究词源学，而是在研究法律。这里始终有两件事情要问：第一，这里讨论的那组事实都有哪些？第二，在法律上，哪些后果与该组事实相连？一般来说，第一个问题是所有难点所在。

Hence, it is almost tautologous to say that the protection which the law attaches by way of consequence to possession, is as truly a right in a legal sense as those consequences which are attached to adverse holdingfor the period of prescription, or to a promise for value or under seal. If the statement is aided by dramatic reinforcement, I may add that possessory rights pass by descent or devise, as well as by conveyance, [1_22] and that they are taxed as property in some of the States. [1_23]

因此，以下说法几乎是同义重复：法律以法定后果的方式附加给占有权的保护，与那些附加于因时效而取得之相反占有的后果，或附加于有对价或盖印之许诺的后果一样，在法律意义上都是真正的权利。如果这一说法还需强有力的证据来佐证的话，我可以做个补充，即占有性权利可以被继承、遗赠或转让，而且有些州还要征收财产税。

We are now ready to analyze possession as understood by the common law.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facts which constitute it, it will be found best to study them at the moment when possession is first gained. For then they must all be present in the same way that both consideration and promise must be present at the moment of making a contract. But when we turn to the continuance of possessory rights, or, as is commonly said, the continuance of possession, it will be agreed by all schools that less than all the facts required to call those rights into being need continue presently true in order to keep them alive.

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普通法所理解的占有了。我们会发现，为找到构成占有之事实，最好从最初获得占有权时开始研究。因为当时所

有事实必定都存在，正如订立合同时对价和允诺必定都存在一样。但当我们讨论占有性权利之持续，或像通常所说占有之持续时，所有学派都会同意，最初构成占有权所需要的所有事实，在保持这些权利时不需要全部继续成立。

To gain possession, then, a man must stand in a certain physical relation to the object an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must have a certain intent. These relations and this intent are the facts of which we are in search.

因此，某人要取得占有权，必须与该客体及世上其他人之间有某种特定的物理关系，且必须具有某种特定意图。这些关系和这种意图就是我们要调查的事实。

The physical relation to others is simply a relation of manifested power coextensive with the intent, and will need to have but little said about it when the nature of the intent is settled. When I come to the latter, I shall not attempt a similar analysis to that which has been pursued with regard to intent as an element of liability. For the principles developed as to intent in that connection have no relation to the present subject, and any such analysis so far as it did not fail would be little more than a discussion of evidence. The intent inquired into here must be overtly manifested, perhaps, but all theories of the grounds on which possession is protected would seem to agree in leading to the requirement that it should be actual, subject, of course, to the necessary limits of legal investigation.

与他人的物理关系只是一种外显权力与意图共存的关系，且当意图的性质确定之后，再无需提及。我不会像别的分析那样试图将意图看作责任的一个要件来分析。因为有关那个方面的意图所制定的原则与我们当前的主题无关，且任何尚未失败的此类分析，也只是对证据的探讨而已。我们在此探究的意图或许必须是公开的、清晰表现出来的意图，但所有关于保护占有权的理论依据似乎都一致指向以下必要条件，即占有应为实际占有，且当然应受到必要法律调查的制约。

But, besides our power and intent as towards our fellow-men, there must be a certain degree of power over the object. If there were only one other man in the world, and he was safe under lock and key in jail, the person having the key would not possess the swallows that flew over the prison. This element is illustrated by cases of capture, although no doubt the point at which the line is drawn is affected by consideration of the degree of power obtained as against other people, as well as by that which has been gained over the object. The Roman and the common law agree that, in general, fresh pursuit of wild animals does not give the pursuer the rights of possession. Until escape has been made impossible by some means, another may step in and kill or catch and carry off the game if he can. Thus it has been held that an action does not lie against a person for killing and taking a fox which had been pursued by another, and was then actually in the view of the person who had originally found, started, and chased it. [1_24] The Court of Queen's Bench even went so far as to decide, notwithstanding a verdict the other way, that when fish were nearly surrounded by a seine, with an opening of seven fathoms between the ends, at which point boats were stationed to frighten them from escaping, they were not reduced to possession as against a stranger who rowed in through the opening and helped himself. [1_25] B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wer over the object which is sufficient for

possession, and that which is not, is clearly one of degree only, and the line may be drawn at different places at different times on grounds just referred to. Thus we are told that the legislature of New York enacted, in 1844, that any one who started and pursued deer in certain counties of that State should be deemed in possession of the game so long as he continued in fresh pursuit of it, [1_26] and to that extent modified the New York decisions just cited. So, while Justinian decided that a wild beast so badly wounded that it might easily be taken must be actually taken before it belongs to the captors, [1_27] Judge Lowell, with equal reason, has upheld the contrary custom of the American whalemen in the Arctic Ocean, mentioned above, which gives a whale to the vessel whose iron first remains in it, provided claim be made before cutting in. [1_28]

然而，除我们这种针对他人的权力和意图之外，必定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对客体的权力。即便世上只剩下另外一人，且被锁在监狱里出不来，拿钥匙的那人也不能占有飞过监狱上空的那些燕子。上述捕鲸案例已清楚说明了该要件，分界线应该划在哪里要考虑捕鲸者所获得的对抗其他人的权力之大小，同时还要考虑他所获得的对客体的权力之大小虽然这一点毫无疑问，罗马法和普通法一致认为，一般来讲对野生动物的紧追不舍不会赋予追赶者占有权。在他以某种方式使该动物无法逃脱之前，其他人只要有能力，都可以插手进来，杀死或抓住并带走该猎物。因此，法院曾判决某人胜诉，他杀死并带走了另一个人追赶过的狐狸，而且这只狐狸实际上还在首先发现、惊起并追赶它的人的视野之内。王座法庭甚至不顾陪审团作出的不同裁决，作出了如下判决：尽管渔民们已经用拖网把鱼基本围住，只在两端之间留下一个七英寻的开口，且在开口处还有几艘船停在那里吓鱼，不让它们逃走，但这些仍不足以使他们对抗一个从开口处划船进去并捕走了一些鱼的第三方，从而获得占有权。但是，足以构成占有，和不足以构成占有的对客体的权力，两者的区别显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可以根据刚才提到的依据，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划出分界线。因此，我

们看到，1844年纽约州立法规定，任何人如果在纽约州各县内惊起并追赶一只鹿，只要他一直穷追不舍，那么就应当认为他取得了对这只鹿的占有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刚才引用的纽约州的判决。因而，贾斯蒂尼安的判决是：即使一只野兽伤得很重，很容易就能抓住，但也要等真正把它抓住后才能归抓捕人所有；而洛厄尔法官却基于同样原因支持了上述北冰洋上美国捕鲸人的相反惯例，即将鲸鱼判给第一个控制住鱼的那艘船，只要他们在切鲸之前提出这一权利主张。

We may pass from the physical relation to the object with these few examples, because it cannot often come into considerat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living and wild things. And so we come to the intent, which is the really troublesome matter. It is just here that we find the German jurists unsatisfactory, for reasons which I have already explained. The best known theories have been framed as theories of the Germ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oman law,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me form of Kantian or post-Kantian philosophy. The type of Roman possession, according to German opinion, was that of an owner, or of one on his way to become owner. Following this out, it was said by Savigny, the only writer on the subject with whom English readers are generally acquainted, that the animus domini, or intent to deal with the thing as owner, is in general necessary to turn a mere physical detention into juridical possession. [1_29] We need not stop to inquire whether this modern form or the [Greek characters] (animus dominantis, animus dominandi) of Theophilus [1_30] and the Greek sources is more exact; for either excludes, as the civilians and canonists do, and as the German theories must, most bailees and termors from the list of possessors. [1_31]

我们可以用这几例结束对客体物理关系的分析，因为除涉及鲜活的野生物案件外，很少考虑这种关系。我们现在开始讨论意图，这才是真正棘手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德国法学家不能令人满意，原因我已经解释过。最著名的理论被认为是德国人在某种形式的康德或后康德哲学的影响下对罗马法理论的解释。根据德国人的观点，罗马法中占有的类型是所有者，或将要成为所有者的人之占有。在该问题上，萨维尼是英国读者普遍熟悉的唯一一位法学家，他将这一观点贯彻到底，认为“占有之意图”，即作为所有者处理该事物的意图，对于将一个单纯的物理留置变为依法占有通常是必需的。我们无需停下来调查到底是这种现代形式还是西奥菲勒斯法典和希腊渊源中的animus dominantis，animus dominandi（希腊语：占有的欲望）更准确，因为二者像民法学家和教会法学家一样，都将大部分受托人和定期租户排除在占有者之外，而德国法理也必定如此。

The effect of this exclusion as interpreted by the Kantian philosophy of law, has been to lead the German lawyers to consider the intent necessary to possession as primarily self-regarding. Their philosophy teaches them that a man's physical power over an object is protected because he has the will to make it his, and it has thus become a part of his very self,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his freedom. [1_32] The will of the possessor being thus conceived as self-regarding, the intent with which he must hold is pretty clear: he must hold for his own benefit. Furthermore, the self-regarding intent must go to the height of an intent to appropriate; for otherwise, it seems to be implied, the object would not truly be brought under the personality of the possessor.

康德主义法律哲学所解释的这种排除，使德国的法学家们认为，构成占有所必需的意图在本质上是利己的。他们的哲学教导他们，保护一个人对客体的物理权力，是因为他具有使之成为己有的意志，因

此该客体就成为其自身的一部分，即其自由的外在表现。因此，占有者的意志被认为是利己的，而他必定持有的意图也非常清楚，即他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而持有它。而且，该利己意图还必须达到据为己有的意图之高度，因为若非如此，似乎就意味着该客体不会真正进入占有者的人格范围。

The grounds for rejecting the criteria of the Roman law have been shown above. Let us begin afresh. Legal duties are logically antecedent to legal rights. What may be their relation to moral rights if there are any, and whether moral rights are not in like manner logically the offspring of moral duties, are questions which do not concern us here. These are for the philosopher, who approaches the law from without as part of a larger series of human manifestations. The business of the jurist is to make known the content of the law; that is, to work upon it from within, or logically, arranging and distributing it, in order, from its stemmum genus to its infima species, so far as practicable. Legal duties then come before legal rights. To put it more broadly, and avoid the word duty, which is open to objection, the direct working of the law is to limit freedom of action or choice on the part of a greater or less number of persons in certain specified ways; while the power of removing or enforcing this limitation which is generally confided to certain other private persons, or, in other words, a right corresponding to the burden, is not a necessary or universal correlative. Again, a large part of the advantages enjoyed by one who has a right are not created by the law. The law does not enable me to use or abuse this book which lies before me. That is a physical power which I have without the aid of the law. What the law does is simply to prevent other men to a greater or less extent from interfering with my use or abuse. And this analysis and example apply to the case of possession, as well as to ownership.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摒弃罗马法标准的理由。现在让我们重新开始讨论。在逻辑上，法律义务先于法律权利。他们与道德权利（如果还有的话）可能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及道德权利是否同样在逻辑上源于道德义务，这些都不是我们在此关心的问题。这些是哲学家要关心的问题，他们从外部研究法律，把它视为一系列更广泛的人类现象的一部分。而法学家的工作是让人们了解法律内容，即从内部处理它，或者说有逻辑地，从其最高层到最低层，依次对法律进行安排和分类，尽量使之适用。故法律义务先于法律权利。更宽泛地说（为了避开容易遭到反对的“义务”这个词），法律的直接作用就是以某些特定方式限制或多或少的一些人行动或选择的自由；而取消或执行这一限制的权力，或者换言之，一种与这种负担相对应的权利（一般被委托给某些其他的个人），却不是必需或普遍相关的。此外，拥有一项权利的人所享受的利益有很大一部分都不是法律创造的。法律没有让我具有使用或滥用放在我面前的这本书的能力。这是我无需借助法律就可拥有的一种物理权力。法律所做的仅仅是或多或少地阻止他人妨碍我使用或是滥用。这一分析和例证适用于占有的情况，同样也适用于所有权。

Such being the direct working of the law in the case of possession, one would think that the animus or intent most nearly parallel to its movement would be the intent of which we are in search. If what the law does is to exclude others from interfering with the object, it would seem that the intent which the law should require is an intent to exclude others. I believe that such an intent is all that the common law deems needful, and that on principle no more should be required.

如果在占有的情况下，法律直接作用就是如此，人们就会认为与其活动最为接近的意向或意图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占有之意图。如果法

律的工作就是排除他人对客体的干涉，则法律所要求的意图，似乎就是一种排除他人的意图。我认为，普通法认为有这样一种意图就已足够，原则上不再需要别的东西。

It may be asked whether this is not simply the animus domini looked at from the other side. If it were, it would nevertheless be better to look at the front of the shield than at the reverse. But it is not the same if we give to the animus domini the meaning which the Germans give it, and which denies possession to bailees in general. The intent to appropriate or deal with a thing as owner can hardly exist without an intent to exclude others, and something more; but the latter may very well be where there is no intent to hold as owner. A tenant for years intends to exclude all persons, including the owner, until the end of his term; yet he has not the animus domini in the sense explained. Still less has a bailee with a lien, who does not even mean to use, but only to detain the thing for payment. But, further, the common law protects a bailee against strangers, when it would not protect him against the owner, as in the case of a deposit or other bailment terminable at pleasure; and we may therefore say that the intent even to exclude need not be so extensive as would be implied in the animus domini. If a bailee intends to exclude strangers to the title, it is enough for possession under our law, although he is perfectly ready to give the thing up to its owner at any moment; while it is of the essence of the German view that the intent must not be relative, but an absolute, self-regarding intent to take the benefit of the thing. Again, if the motives or wishes, and even the intentions, most present to the mind of a possessor, were all self-regarding, it would not follow that the intent toward others was not the important thing in the analysis of the law. But, as we have seen, a depositary is a true possessor under the common law theory, although his intent is not self-

regarding, and he holds solel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owner.

也许有人会问，这不就是从相反角度来考察占有的意图吗？假如是这样，从正面来看这一盾牌可要比从反面来看好得多。但是，如果我们赋予“占有的意图”的含义是德国人赋予它的含义，而该含义通常排除受托人的占有权，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没有排除他人或他物的意图，则据为己有或以所有者身份处理物品的意图几乎不可能存在；但是，在不存在以所有者持有的意图时，排除他人的意图也完全可能存在。一个长期租户在其租赁到期之前有排除所有的人，包括所有者的意图，但他并没有上面所解释的那种占有的意图。对具有留置权的受托人而言，这种意图更小，他甚至不想使用它，只是扣留该物以得到支付。但更进一步说，普通法保护受托人对抗第三人，却并不保护他对抗所有者，如在无偿寄托或其他可以随时终止的寄托情况下。因此，我们可以说，甚至排除的意图都无需像“占有的意图”所暗示的那么广泛。如果受托人有把第三人排除在权利之外的意图，则依据我们的法律，这对占有就足够了，即使受托人随时准备将该物品送还所有者；然而，德国观点的本质却是，其意图一定不是相对的，而是一个要占有该物品利益的绝对的、利己的意图。而且，即使占有人头脑中出现的大多数动机或愿望甚至意图都是利己的，也不能表明，这种对于他人的意图在法律分析中不重要。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普通法理论下保管人为真正占有者，尽管其意图并非利己，而是完全为所有者的利益而持有。

There is a class of cases besides those of bailees and tenants, which will probably, although not necessarily, be decided one way or the other, as we adopt the test of an intent to exclude, or of the animus domini. Bridges v. Hawkesworth [1_33] will serve as a starting-point. There, a pocket-book was dropped on the floor of a shop by a customer, and picked up by another customer before the shopkeeper knew of it. Common-law judges and civilians would

agree that the finder got possession first, and so could keep it as against the shopkeeper. For the shopkeeper, not knowing of the thing, could not have the intent to appropriate it, and, having invited the public to his shop, he could not have the intent to exclude them from it. But suppose the pocket-book had been dropped in a private room, how should the case be decided? There can be no animus domini unless the thing is known of; but an inten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it may be contained in the larger inten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the place where it is, without any knowledge of the object's existence.

除受托人与长期租户的案例外，还有一类案例，如果我们分别采用排除意图的标准和占有的意图标准，则很可能（虽然并非完全如此）会得到不同的判决。布里奇斯诉霍克斯沃思案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在该案中，一位顾客将皮夹掉在了商店地板上，在店主知道此事之前，皮夹被另一位顾客捡了起来。无论普通法法官还是民法学家都会同意，发现皮夹的人首先占有了皮夹，故可保留皮夹而不交给店主。因为店主不知道有这件东西，故不可能有将其占为己有的意图，而且是他邀请大家进入自己商店的，所以也不可能有排除他人占有皮夹的意图。不过，假设该皮夹掉在一个私人房间里，那此案该如何判决呢？在房主知道有此皮夹前，他不可能有将其占为己有的意图；但在他根本不知有这件物品存在的情况下，他也会有将别人排除在其房间之外的更大的意图，而该意图则包含排除别人占有皮夹的意图。

In McAvoy v. Medina, [1_34] a pocket-book had been left upon a barber's table, and it was held that the barber had a better right than the finder. The opinion is rather obscure. It tak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ings voluntarily placed on a table and things dropped on the floor, and may possibly go on the ground that, when the owner

leaves a thing in that way, there is an implied request to the shopkeeper to guard it, which will give him a better right than one who actually finds it before him. This is rather strained, however, and the court perhaps thought that the barber had possession as soon as the customer left the shop. A little later, in a suit for a reward offered to the finder of a pocket-book, brought by one who discovered it where the owner had left it, on a desk for the use of customers in a bank outside the teller's counter, the same court said that this was not the finding of a lost article, and that “the occupants of the banking house, and not the plaintiff, were the proper depositaries of an article so left.“ [1_35] This language might seem to imply that the plaintiff was not the person who got possession first after the defendant, and that, although the floor of a shop may be likened to a street, the public are to be deemed excluded from the shop's desks, counters, and tables except for the specific use permitted. Perhaps, however, the case only decides that the pocket-book was not lost within the condition of the offer.

在麦卡沃伊诉梅迪纳案中，一个皮夹丢在了理发店的桌子上，法院认为，理发师的权利大于发现者的权利。判决意见书写得较为含混。它区分了自愿放在桌上的物品与掉到地板上的物品，随后其判决依据可能是，当所有者把物品遗忘在店里时，就隐含一种请店主保护其物品的要求，故店主也就比在他之前实际发现该皮夹的人有更大的权利。然而该说法较为牵强，或许法院认为顾客一离开理发店理发师就取得了占有权。没过多久，某人在银行柜台外面供顾客使用的桌子上发现一个皮夹，他提起诉讼，索要失主许诺给发现皮夹的人的报酬。同一法院认为，这不属于发现遗失物品的情况，“银行房屋占用人而非原告，才是此种遗失物品合适的保管人”。这一说法似乎表明，原告并非在被告之后首先获得占有的人，尽管商店的地板可能会被视为与大街相同，但商店的工作台桌、柜台以及桌子（除因特殊用途得到许可使用外），则被认为是排除公众的。然而，该案或许只是

判决该皮夹并非在失主提供报酬时提出的条件下丢失的。

I should not have thought it safe to draw any conclusion from wreck cases in England, which are mixed up with questions of prescription and other rights. But the precise point seems to have been adjudicated here. For it has been held that, if a stick of timber comes ashore on a man's land, he thereby acquires a “right of possession” as against an actual finder who enters for the purpose of removing it. [1_36] A right of possession is said to be enough for trespass; but the court seems to have meant possession by the phrase, inasmuch as Chief Justice Shaw states the question to be which of the parties had “the preferable claim, by mere naked possession, without other title,” and as there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any right of possession in the case unless there was actual possession.

我本应认为从英格兰失事船舶漂流货物案中得出的任何结论都不可靠，因为这些案件还混杂着时效与其他一些权利等问题。但这里判决的似乎正是这一点。因为法院认为，如果一段木材被水冲到某人的土地上，那么他就因此获得“占有权”，以对抗实际发现这段木材并进入其土地试图拿走该木材的人。人们认为占有的权利对侵权案件来说已经足够；但法院似乎是用占有权这个词来指占有，因为正如首席大法官肖所说，这个问题在于哪一方“没有其他的所有权凭证，而仅仅通过占有本身具有更大的权利主张”；而且除非存在实际占有，否则本案中似乎并不存在任何占有权。

In a criminal case, the property in iron taken from the bottom of a canal by a stranger was held well laid in the canal company, although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the company knew of it, or had

any lien upon it. [1_37]

在一起刑事案件中，第三方从运河底部取走了一些铁，尽管运河公司看来并不知道这些铁的存在，或者对其具有留置权，但法院还是判定运河公司拥有对这些铁的所有权。

The only intent concerning the thing discoverable in such instances is the general intent which the occupant of land has to exclude the public from the land, and thus, as a consequence, to exclude them from what is upon it.

在这些情况中，涉及被发现物的唯一意图就是土地占用人将公众排除在其土地之外的一般意图，故而也包括排除公众占有其土地上的物品的意图。

The Roman lawyers would probably have decided all these cases differently, although they cannot be supposed to have worked out the refined theories which have been built upon their remains. [1_38]

虽不能期望罗马法的法学家们在其理论基础上提出更精炼的理论，但他们在所有这些案件上很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判决。

I may here return to the case of goods in a chest delivered under lock and key, or in a bale, and the like. It is a rule of the criminal law, that, if a bailee of such a chest or bale wrongfully sells

the entire chest or bale, he does not commit larceny, but if he breaks bulk he does, because in the former case he does not, and in the latter he does, commit a trespass. [1_39] The reason sometimes offered is, that, by breaking bulk, the bailee determines the bailment, and that the goods at once revest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bailor. This is, perhaps, an unnecessary, as well as inadequate fiction. [1_40] The rule comes from the Year Books, and the theory of the Year Books was, that, although the chest was delivered to the bailee, the goods inside of it were not, and this theory was applied to civil as well as criminal cases. The bailor has the power and intent to exclude the bailee from the goods, and therefore may be said to be in possession of them as against the bailee. [1_41]

这里我回到运送锁于箱柜或大包及类似物品的货物的案例。刑法规定，如这种箱柜或大包之受托人误卖了整个箱柜或大包，不构成偷盗罪；但如果他打开这些箱包再卖掉，则犯了偷盗罪。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他没有构成侵害，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其行为构成了侵害罪。有时给出的原因是，受托人打开箱包时，就终止了这种财产寄托关系，货物则立刻重归寄托人占有。这或许是个并不恰当，也无必要的拟制。该规定来自《年鉴》，其理论是，箱柜虽已交付受托人，但其中的货物并没有。该理论在民法和刑事案件中都适用。寄托人既有权力又有意图排除受托人占有货物，因此可以说，他仍占有该货物，以对抗受托人。

On the other hand, a case in Rhode Island [1_42] is against the view here taken. A man bought a safe, and then, wishing to sell it again, sent it to the defendant, and gave him leave to keep his books in it until sold. The defendant found some bank-notes stuck in a crevice of the safe, which coming to the plaintiff's ears he demanded the safe and the money. The defendant sent back the

safe, but refused to give up the money, and the court sustained him in his refusal. I venture to think this decision wrong. Nor would my opinion be changed by assuming, what the report does not make perfectly clear, that the defendant received the safe as bailee, and not as servant or agent, and that his permission to use the safe was general. The argument of the court goes on the plaintiff's not being a finder.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he need be.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if the defendant had stolen the bills from the safe while it was in the owner's hands, the property could not have been laid in the safe-owner, [1_43] or that the latter could not have maintained trover for them if converted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Sir James Stephen seems to have drawn a similar conclusion from Cartwright v. Green and Merry v. Green; [1_44] but I believe that no warrant for it can be found in the cases, and still less for the reason suggested.

但是，罗得岛的一个案子却与我们此处采用的观点相反。某人买了一个保险箱，之后想再卖掉，故把它送到被告那里，并允许被告在卖出前将书放在里面。被告在该保险箱的夹缝里发现了一些纸币，原告听说以后，就要求其归还保险箱及钱。被告送回了保险箱，却拒绝归还那些钱，而法院也支持被告拒绝还钱的行为。我胆敢说该判决有误。报告写的不是特别清楚，但即使假定被告作为受托人，而非佣人或代理人收到保险箱，且原告允许被告使用保险箱是一般性许可，我的观点也不会改变。法院的论据是原告并非发现钱的人。问题是他是否需要成为发现钱的人。如保险箱仍在所有者手中，被告从保险箱中偷走这些纸币，则很难相信，法院会认为这些财产不属于保险箱所有者，或者，如果钱在这些情况下被非法挪用，所有者不能提起动产侵占诉讼。詹姆士·斯蒂芬爵士似乎也从卡特赖特诉格林与梅里诉格林案中得出相似结论，但我认为从这些案件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这一结论的依据，他们提出的理由则更不足为信。

It will be understood, however, that Durfee v. Jones is perfectly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 here maintained of the general nature of the necessary intent, and that it only touches the subordinate question, whether the intent to exclude must be directed to the specific thing, or may be even unconsciously included in a larger intent, as I am inclined to believe.

但由此可见，德菲诉琼斯案与此处所坚持的关于必要意图一般性质的观点完全一致，且它只触及次要问题，即排除之意图是否必须针对特定事物，还是可以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包含于某个更大意图中，我倾向于支持后者。

Thus far, nothing has been said with regard to the custody of servants. It is a well-known doctrine of the criminal law, that a servant who criminally converts property of his master intrusted to him and in his custody as servant, is guilty of theft, because he is deemed to have taken the property from his master's possession. This is equivalent to saying that a servant, having the custody of his master's property as servant, has not possession of that property, and it is so stated in the Year Books. [1_45]

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谈到佣人保管的问题。刑法中有一条广为人知的原则，即佣人如将主人委托给他并由其作为佣人保管的财产极其错误地非法挪用，则犯下了盗窃罪，因为他被认定为非法占有了由其主人占有的财产。也就是说，作为佣人保管其主人的财产时，佣人不拥有该财产的占有权，《年鉴》中也是这样表述的。

The anomalous distinction according to which, if the servant

receives the thing from another person for his master, the servant has the possession, and so cannot commit theft, [1_46] is made more rational by the old cases. For the distinction taken in them is, that, while the servant is in the house or with his master, the latter retains possession, but if he delivers his horse to his servant to ride to market, or gives him a bag to carry to London, then the thing is out of the master's possession and in the servant's. [1_47] In this more intelligible form, the rule would not now prevail. But one half of it, that a guest at a tavern has not possession of the plate with which he is served, is no doubt still law, for guests in general are likened to servants in their legal position. [1_48]

有一条反常的区分，根据这一区分，如佣人替其主人从他人那里接受了一件物品，则该佣人拥有占有权，因此不会犯有盗窃罪。这一区分因某些古老的案例而渐趋合理。因为这些案例中采取的区分为，佣人在房屋内或跟主人一起时，后者保留占有权；但当主人把马交给佣人骑到市场上，或交给他一个包让其带到伦敦时，这些物品就不再属于主人而属于佣人占有。如果以这种更为明智的方式处理，这一规定现在就不会流行了。但该规定的另一半无疑也是法律，即在酒馆吃饭的客人对其使用的盘子没有占有权，因为客人的法律地位通常被等同于佣人。

There are few English decisions, outside the criminal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a servant has possession. But the Year Books do not suggest any difference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and there is an almost tradition of courts and approved writers that he has not, in any case. A master has maintained trespass against a servant for converting cloth which he was employed to sell, [1_49] and the American cases go the full length of the old doctrine. It has often been remarked that a servant must be distinguished from a

bailee.

在刑事案件以外，几乎没有几起英国案例涉及佣人是否享有占有权这一问题。但《年鉴》并未区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且在法院与得到广泛认可的学者们中几乎存在这样一个传统，即佣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没有占有权。针对佣人挪用了主人让他出售的布匹，主人可提起侵害诉讼，美国的案例也完全遵循这一古老原则。经常有人评论说，必须把佣人和受托人区分开。

But it may be asked how the denial of possession to servants can be made to agree with the test proposed, and it will be said with truth that the servant has as much the intent to exclude the world at large as a borrower. The law of servants is unquestionably at variance with that test; and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ose who have built their theories upon the Roman law have been led by this fact, coupled with the Roman doctrine as to bailees in general, to seek the formula of reconciliation where they have. But, in truth, the exception with regard to servants stands on purely historical grounds. A servant is denied possession, not from any peculiarity of intent with regard to the things in his custody, either towards his master or other people, by which he is distinguished from a depositary, but simply as one of the incidents of his status. It is familiar that the status of a servant maintains many marks of the time when he was a slave. The liability of the master for his torts is one instance. The present is another. A slave's possession was his owner's possession on the practical ground of the owner's power over him, [1_50] and from the fact that the slave had no standing before the law. The notion that his personality was merged in that of his family head survived the era of emancipation.

但有人可能会问，如何让不承认佣人的占有权与前面提出的检验标准一致呢？有人会确切地指出，佣人同借用人相同，都有将他人排除在外的意图。毫无疑问，有关佣人的法律与前述标准有所不同，而且那些在罗马法基础上构建自己理论的人无疑也由这一事实引导，并借助罗马法有关一般受托人的原则，去寻找调和二者的方案。而事实上，关于佣人的这一例外纯粹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佣人没有占有权，并非因其对保管的物品之意图（无论对其主人还是其他人）跟保管人相比有什么特别，而仅仅是其身份的附带条件之一。佣人身份来自奴隶，因此仍带有很多奴隶时期的印记，这点人们都很熟悉。主人要为佣人的侵权行为负责就是一例。下面是另一例。根据主人对其奴隶拥有权力这一实际依据，及奴隶在法律面前没有身份这一事实，该奴隶的占有也即其主人的占有。虽然奴隶已经解放，但其人格与家族首脑融为一体这一观念仍然保留了下来。

I have shown in the first Lecture [1_51] that agency arose out of the earlier relation in the Roman law, through the extension pro hac vice to a freeman of conceptions derived from that source. The same is true, I think, of our own law,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which seems to have been largely under Roman influence. As late as Blackstone, agents appear under the general head of servants, and the first precedents cited for the peculiar law of agents were cases of master and servant. Blackstone's language is worth quoting: “There is yet a fourth species of servants, if they may be so called, being rather in a superior, a ministerial capacity; such as stewards, factors, and bailiffs: whom, however, the law considers as servants pro tempore, with regard to such of their acts as affect their master's or employer's property.“ [1_52]

我在第一讲已经提到，在罗马法中，由这一渊源而来的概念在某一特定场合扩展到自由人后，就形成早期的代理关系。我认为，我们

自己的法律也是这样，其后期发展似乎很大程度上受到罗马法的影响。迟至布莱克斯通时代，代理人仍在佣人的一般类别下出现，且特定代理法最早所引用的案例也都是主人和佣人的案例。布莱克斯通的说法值得在此引用："还有第四种佣人——如果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他们有很高的管理执行能力，比如管家、代理商、地主管家等，然而，当涉及他们影响到主人或雇主财产的行为时，法律则将他们视为临时佣人"。

It is very true that in modern times many of the effects of either relation—master and servant or principal and agent—may be accounted for as the result of acts done by the master himself. If a man tells another to make a contract in his name, or commands him to commit a tort, no special conception is needed to explain why he is held; although even in such cases, where the intermediate party was a freeman, the conclusion was not reached until the law had become somewhat mature. But, if the title Agency deserves to stand in the law at all, it must be because some peculiar consequences are attached to the fact of the relation. If the mere power to bind a principal to an authorized contract were all, we might as well have a chapter on ink and paper as on agents. But it is not all. Even in the domain of contract, we find the striking doctrine that an undisclosed principal has the rights as well as the obligations of a known contractor, that he can be sued, and, more remarkable, can sue on his agent's contract. The first precedent cited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a promise to an agent may be laid as a promise to the principal, is a case of master and servant. [1_53]

在现代，无论是主人和佣人还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它们的很多法律后果都可解释为主人本人所实施行为的后果，这一点千真万确。如果某人告诉另一人以他的名义去签订合同，或要求他去实施侵

权行为，那么不需要有特殊的概念来解释他为什么要承担责任，即使在中间方是自由人这样的案例中，也是直到法律比较成熟以后才得出这一结论的。但如“代理关系”这一名称值得在法律中占有一席之地，那必定是因为这一关系的事实附带着一些特殊的后果。如果我们要的仅仅是约束委托人执行某个经他授权的合约的效力，则除了有关代理人的章节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对墨和纸进行说明。但这并不是全部。即使在合同领域，我们也发现有这样引人注目的学说，即匿名委托人有已知订约人的权利和义务——他可以被起诉，而且，更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可以对由其代理人订立的合同提起诉讼。针对下述提议——对代理人的许诺可被视为对委托人的许诺——所引用的第一个先例也是一个主人和佣人的案例。

As my present object is only to show the meaning of the doctrine of identification in its bearing upon the theory of possession, it would be out of place to consider at any length how far that doctrine must be invoked to explain the liability of principals for their agents' torts, or whether a more reasonable rule governs other cases than that applied where the actor has a tolerably defined status as a servant. I allow myself a few words, because I shall not be able to return to the subject.

鉴于我此处的目的只是想表明身份识别学说的意义对占有理论的影响，故不适合用过多篇幅讨论应在多大程度上援引该学说来解释委托人对其代理人侵权行为的责任，或在行为人大致可被界定为佣人的其他案件中，是否有比适用规定更为合理的规定。但我还是想多说几句，因为之后我可能无法再回到这一问题上来。

If the liability of a master for the torts of his servant had hitherto been recognized by the courts as the decaying remnant of

an obsolete institution, it would not be surprising to find it confined to the cases settled by ancient precedent. But such has not been the fact. It has been extended to new relations by analogy. [1_54] It exists where the principal does not stand in the relation of paterfamilias to the actual wrong-doer. [1_55] A man may be held for another where the relation was of such a transitory nature as to exclude the conception of status, as for the negligence of another person's servant momentarily acting for the defendant, or of a neighbor helping him as a volunteer; [1_56] and, so far as known, no principal has ever escaped on the ground of the dignity of his agent's employment. [1_57] The courts habitually speak as if the same rules applied to brokers and other agents, as to servants properly so called. [1_58] Indeed, it has been laid down in terms, that the liability of employers is not confined to the case of servants, [1_59] although the usual cases are, of course, those of menial servants, and the like, who could not pay a large verdict.

如果主人为其佣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到目前为止已被法院认为是一种陈旧制度的腐朽残余，那么我们发现它仅局限于根据古老的先例作出判决的案例，就不该感到吃惊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做法已通过类推扩展至新的关系中。它存在于委托人并非实际违法者的家长的情况下。一个人在下面的情况中可能要对另一人承担责任：当两人关系是临时性的，以至排除了身份的概念时，如别人的佣人临时为他做事而出现过失，或邻居主动帮助他而出现过失时；而且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委托人曾因其代理人的职业高贵而免责。法院习惯性认为，那些适用于名副其实的佣人之规定同样适用于经纪人和其他代理人。确实，条款中也已规定，雇主的责任并不局限于佣人的情况，尽管常见案例当然都是家仆之类，他们不可能付得起大型陪审团裁断的费用。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peculiar doctrines of agency are anomalous, and form, as I believe, the vanishing point of the servile status, it may well happen that common sense will refuse to carry them out to their furthest applications. Such conflicts between tradition and the instinct of justice we may see upon the question of identifying a principal who knows the truth with an agent who makes a false representation, in order to make out a fraud, as in Cornfoot v. Fowke, [1_60] or upon that as to the liability of a principal for the frauds of his agent discussed in many English cases. [1_61] But, so long as the fiction which makes the root of a master's liability is left alive, it is as hopeless to reconcile the differences by logic as to square the circle.

另一方面，如果这些特有的代理关系学说不一致，且如我所认为的那样，形成附属性身份的消失点，则很可能发生常识会拒绝对它们进行最大程度的运用。这类传统与正义本能之间的冲突，我们可从以下问题中看到：为了调查清楚欺诈，我们把知道真相的委托人和做虚假陈述的代理人等同起来，如科恩福特诉福克案，或很多英国案例中讨论到的委托人为其代理人的欺诈承担责任的问题。但只要作为主人承担责任之基础的拟制存在，想用逻辑调和这种冲突就像化圆为方一样毫无希望。

In an article in the American Law Review [1_62] I referred to an expression of Godefroi with regard to agents; eadem est persona domini et procuratoris. [1_63] This notion of a fictitious unity of person has been pronounced a darkening of counsel in a recent useful work. [1_64] But it receives the sanction of Sir Henry Maine, [1_65] and I believe that it must stand as expressing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law, if, as I have tried to show, there is no adequate and complete explanation of the modern law, except by the survival

in practice of rules which lost their true meaning when the objects of them ceased to be slaves. There is no trouble in understanding what is meant by saying that a slave has no legal standing, but is absorbed in the family which his master represents before the law. The meaning seems equally clear when we say that a free servant, in his relations as such, is in many respects likened by the law to a slave (not, of course, to his own detriment as a freeman). The next step is simply that others not servants in a general sense may be treated as if servants in a particular connection. This is the progress of ideas as shown us by history; and this is what is meant by saying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 which justifies agency as a title of the law is the absorption pro hac vice of the agent's legal individuality in that of his principal.

我在《美国法律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戈德弗鲁瓦关于代理人的一句话：主人与代理人是一样的。最近有一本颇为有用的书宣称，这种关于人的拟制性统一的概念使得难题更加费解。但它却得到亨利·梅因爵士的赞同，我认为，如果除去那些在实践中还保留下来却已失去其真正意义（因其对象已不再是奴隶）的一些规定外，对现代法没有充分而完整的解释（正如我之前试图说明的那样）的话，那么由于它表达了法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可以存在。当提到奴隶没有法律地位，而是被并入在法律上由其主人代表的家庭时，要理解这句话的含义非常容易。而当我们说处于相似关系中的一个身份自由的佣人，在很多方面被法律视同奴隶（当然，不包括对其自由人身份造成损害）时，其含义似乎也同样清晰。下一步就是其他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佣人，他们在某一特定关系中也可当作佣人来对待。这就是历史给我们展现的观念演化过程，这也是下面说法的真正意义：使代理关系名正言顺成为法律之一部分的典型特征就是：在特定场合下，代理人的法律身份被并入其委托人的法律身份。

If this were carried out logically, it would follow that an agent constituted to hold possession in his principal's name would not be regarded as having the legal possession, or as entitled to trespass. But, after what has been said, no opinion can be expressed whether the law would go so far, unless it is shown by precedent. [1_66] The nature of the case will be observed. It is that of an agent constituted for the very point and purpose of possession. A bailee may be an agent for some other purpose. A free servant may be made a bailee. But the bailee holds in his own as we say, following the Roman idiom, and the servant or agent holding as such does not.

如按此逻辑推理下去，则结果应为；一个得到委托以其委托人的名义占有某物的代理人将被认为不具有合法占有权，或没有资格提起侵害诉讼。但以上讨论并未就法律是否会走这么远给出意见，除非先例能表明这一点。我们来考察案例的性质：为代理及占有目的而委托的代理人。受托人因为其他目的也可以成为代理人。一个身份自由的佣人也可以成为受托人。然而，依据罗马法惯用语，我们说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承担责任，而佣人或代理人却并非如此。

It would hardly be worth while, if space allowed, to search the books on this subject, because of the great confusion of language to be found in them. It has been said, for instance, in this connection, that a carrier is a servant; [1_67] while nothing can be clearer than that, while goods are in custody, they are in his possession. [1_68] So where goods remain in the custody of a vendor, appropriation to the contract and acceptance have been confounded with delivery. [1_69] Our law has adopted the Roman doctrine, [1_70] that there may be a delivery, that is, a change of possession, by a change in the character in which the vendor holds, but has not always imitated the caution of the civilians with regard to what amounts to such a

change. [1_71] Bailees are constantly spoken of as if they were agents to possess,—a confusion made easier by the fact that they generally are agents for other purposes. Those cases which attribute possession to a transferee of goods in the hands of a middleman, [1_72] without distinguishing whether the middleman holds in his own name or the buyer's, are generally right in the result, no doubt, but have added to the confusion of thought upon the subject.

即使篇幅允许，就这一问题去查找案例集也不值得，因为这些案例的用语非常混乱。例如，曾有法院就该问题称承运人是佣人；但事情再清楚不过：当货物由他保管时，就由他占有。因此，当货物仍由卖方保管时，依合同占用，以及接受就与交付混淆在一起。我们的法律采用了罗马法学说，规定卖方持有性质的改变可以构成交付，也即占有权的改变，但却没有在什么可以构成此种改变方面学习到罗马民法学家的谨慎小心。受托人一直被说成似乎是有占有目的之代理人，而他们通常也是其他目的的代理人这一事实使人们更容易混淆这一点。那些认定中间人手上的货物应归受让人占有，却并未区分中间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还是买方的名义持有货物的案件，一般在审判结果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却更加剧了这个问题思想上的混乱。

German writers are a little apt to value a theory of possession somewhat in proportion to the breadth of the distinction which it draws between juridical possession and actual detention;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taken here,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grounds for denying possession and the possessory remedies to servants and agents holding as such—if, indeed, the latter have not those remedies—are merely historical, and that the general theory can only take account of the denial as an anomaly. It will also be perceived that the ground on which servants and depositaries have been often likened to each other, namely, that they both hold for

the benefit of another and not for themselves, is wholly without influence on our law, which has always treated depositaries as having possession; and is not the true explanation of the Roman doctrine, which did not decide either case upon that ground, and which decided each for reasons different from those on which it decided the other.

德国法学家有点倾向于根据一种占有理论在司法占有和实际留置之间划出区分的大小来评价这种理论；但从这里采纳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拒绝给予佣人和负有佣人责任的代理人占有权和占有性救济（如果后者的确没有这种救济）的依据仅仅只是历史性的，且一般理论也只能将这种拒绝视为一种反常现象。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佣人与保管人经常被等同起来（即他们都是为他人利益而非自己利益而持有）的依据对我们的法律完全没有影响；我们的法律始终认为保管人拥有占有权，且这也并非对罗马法学说的正确解释，后者并未据此对这两类案件作出过判决，且两类案件的判决依据各不相同。

It will now be easy to deal with the question of power as to third persons. This is naturally a power coextensive with the intent. But we must bear in mind that the law deals only or mainly with manifested facts; and hence, when we speak of a power to exclude others, we mean no more than a power which so appears in its manifestation. A ruffian may be within equal reach and sight when a child picks up a pocket-book; but if he does nothing, the child has manifested the needful power as well as if it had been backed by a hundred policemen. Thus narrowed, it might be suggested that the manifestation of power is only important as a manifestation of intent. But the two things are distinct, and the former becomes decisive when there are two contemporaneous and conflicting intents. Thus, where two parties, neither having title, claimed a

crop of corn adversely to each other, and cultivated it alternately, and the plaintiff gathered and threw it in small piles in the same field, where it lay for a week, and then each party simultaneously began to carry it away, it was held the plaintiff had not gained possession. [1_73] But if the first interference of the defendant had been after the gathering into piles, the plaintiff would probably have recovered. [1_74] So where trustees who possessed of a schoolroomput in a schoolmaster, and he was afterwards dismissed, but the next day (June 30) re-entered by force; on the fourth of July he was required by notice to depart, and was not ejected until the eleventh; it was considered that the schoolmaster never got possession as against the trustees. [1_75]

现在就能轻松讨论有关第三方的权力问题了。这是自然一种与意图同畴的权力。但我们必须牢记，法律只考虑或主要考虑表现出来的事实；因此，我们在提到排除他人的权力时，也仅指表现的非常明显的权力而已。一个孩子和一个恶棍可能在同样距离内看到一个皮夹，这时，孩子把皮夹捡了起来，而恶棍什么也没做，那么这个孩子就表现出足够的权力，就像得到一百名警察的支持一样。这样缩小范围后，有人可能会说，这种权力的表现只有作为意图的表现时才是重要的。然而这两件事情是有区别的，当同时存在两种相互冲突的意图时，前者就成为决定性因素。因此，都没有所有权的双方当事人，对玉米作物主张彼此对立的权利并轮流耕种，原告将玉米收割后分成一些小堆堆在同一块地上，在那里放了一周后，双方同时开始运走这些玉米，法院判决，原告没有获得占有权。但如被告在原告将玉米收割成堆后就进行第一次妨害行为，则原告很可能就胜诉了。另一案件也是如此。一所小学堂的理事选举了一名校长，之后该校长被解职，但次日（6月30日）又强行进入该学堂；7月4日他接到通知要求其离开，但直到11日才受到驱逐。法院认为，该校长从未取得过占有权，不能对抗理事。

We are led, in this connection, to the subject of the continuance of the rights acquired by gaining possession. To gain possession, it has been seen, there must be certain physical relations, as explained, and a certain intent. It remains to be inquired, how far these facts must continue to be presently true of a person in order that he may keep the rights which follow from their presence. The prevailing view is that of Savigny. He thinks that there must be always the same animus as at the moment of acquisition, and a constant power to reproduce at will the original physical relations to the object. Everyone agrees tha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have always a present power over the thing, otherwise one could only possess what was under his hand. But it is a question whether we cannot dispense with even more. The facts which constitute possession are in their nature capable of continuing presently true for a lifetime. Hence there has arisen an ambiguity of language which has led to much confusion of thought. We use the word "possession," indifferently, to signify the presence of all the facts needful to gain it, and also the condition of him who, although some of them no longer exist, is still protected as if they did. Consequently it has been only too easy to treat the cessation of the facts as the loss of the right, as some German writers very nearly do. [1_76]

这一点将我们引到由取得占有权而获得的权利持续性问题上。如前所述，要取得占有权，必须具有前面解释过的一定的物理关系，以及一定的意图。还需探究的是，这些事实对一个人必须持续成立多久才能让他保留随这些事实的出现而形成的权利。一个盛行的观点是萨维尼的观点。他认为，必须始终存在一个与取得占有权时完全相同的意图，以及能够随时对客体产生最初那种物理关系的持续性权力。人人都同意，没有必要对该物品始终具有在场的权力，否则一个人唯一能占有的只有他手头的东西。但问题是，我们是否还需要甚至更多的

事实。构成占有的事实从其性质上说是能够终生存在的。由此产生了用语的含混，从而导致了很多思想上的混乱。我们不加区分地随意使用“占有”一词，既用它来表明存在取得占有所需的所有事实，也用它来表明尽管其中某些事实已不复存在，但却仍然有人得到事实存在时所能得到的保护这样一种情况。结果只会使得人们很容易将事实的消失等同于权利的丧失，有些德国法学家差不多就是这样认为的。

But it no more follows, from the single circumstance that certain facts must concur in order to create the rights incident to possession, that they must continue in order to keep those rights alive, than it does, from the necessity of a consideration and a promise to create a right ex contractu, that the consideration and promise must continue moving between the parties until the moment of performance. When certain facts have once been made manifest which confer a right, there is no general ground on which the law need hold the right at an end except the manifestation of some fact inconsistent with its continuance, the reasons for conferring the particular right have great weight in determining what facts shall be to be so. Cessation of the original physical relations to the object might be treated as such a fact; but it never has been, unless in times of more ungoverned violence than the present. On the same principle, it is only a question of tradition or policy whether a cessation of the power to reproduce the original physical relations shall affect the continuance of the rights. It does not stand on the same ground as a new possession adversely taken by another. We have adopted the Roman law as to animals ferae naturae, but the general tendency of our law is to favor appropriation. It abhors the absence of proprietary or possessory rights as a kind of vacuum. Accordingly, it has been expressly decided, where a man found logs afloat and moored them, but they again broke loose and floated away, and were found by another,

that the first finder retained the rights which sprung from his having taken possession, and that he could maintain trover against the second finder, who refused to give them up. [1_77]

但是，正如创立合同权利时必须有对价和允诺并不意味着对价和允诺在合同履行之前必须继续在双方之间存在一样，创立占有性权利时必须同时存在一定的事实这一情况也并不意味着为了保持这些权利，这些事实必须继续存在。当某些事实一经证实从而产生一项权利时，就不存在某种一般性依据使法律可以据此终结该权利，除非某个事实表明无法随之持续，而产生该特定权利的原因在决定哪些事实将无法持续方面具有重大影响。与客体最初物理关系的中止可以被视为此类事实；但除非所处的时代是比现在更加无序的暴政时代，否则也并非如此。依照同样原则，重新产生最初物理关系权力的中止是否影响到权利的持续也只是一个传统或政策的问题。这与被他人恶意占有的依据不同。关于野生动物我们采用了罗马法，但我们法律的一般倾向是赞成据为己有。它将所有权或占有权利的缺乏视为真空状态而对其深恶痛绝。因此，当某人发现一些原木漂在水上，他把它们固定住，但后来这些原木又松开漂走了，随后被另一个人发现。法院明确判定，第一个发现原木的人保留由他取得占有而产生的权利，故第二个发现者拒绝交出这些原木时，他可以对其提起动产侵占之诉。

Suppose that a finder of a purse of gold has left it in his country-house, which is lonely and slightly barred, and he is a hundred miles away, in prison. The only person within twenty miles is a thoroughly equipped burglar at his front door, who has seen the purse through a window, and who intends forthwith to enter and take it. The finder's power to reproduce his former physical relation to the gold is rather limited, yet I believe that no one would say that his possession was at an end until the burglar, by an overt act, had manifested his power and inten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the

purse.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e same which has been put with regard to the power to exclude at the moment of gaining possession. The law deals, for the most part, with overt acts and facts which can be known by the senses. So long as the burglar has not taken the purse, he has not manifested his intent; and until he breaks through the barrier which measures the present possessor's power of excluding him, he has not manifested his power. It may be observed further, that, according to the tests adopted in this Lecture, the owner of the house has a present possession in the strictest sense, because, although he has not the power which Savigny says is necessary, he has the present intent and power to exclude others.

假设某人捡到一小袋黄金，并把它放在自己偏僻、带点儿栅栏的乡下房子里，而他本人则远在一百英里之外的监狱里。方圆二十英里内只有一人，是个装备齐全的夜盗贼，他在这所房子的前门，从窗子里看到了这个钱包，并打算进入房子将它拿走。拾金者要重现与金子最初那种物理关系的力量是相当有限的，但我认为在该夜盗贼通过公然的行为表明其有将他人排除在钱袋之外的权力及意图之前，没有任何人会说拾金者的占有终止了。这里的理由与我们提出的取得占有时排他权力的理由相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处理的是可以通过感官感知的、公开的行为和事实。只要夜盗贼没有拿走钱袋，他就没有表现出其意图；在他冲破那些象征原占有者排他力量的栅栏之前，他并未表现出其权力。还可以更进一步指出，依据本讲采用的标准，该房屋所有者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也具有现实占有，因为，虽然他不具有萨维尼所说的必要权力，但他具有排除他人的现实的意图和权力。

It is conceivable that the common law should go so far as to deal with possession in the same way as a title, and should hold that, when it has once been acquired, rights are acquired which continue to prevail against all the world but one, until something

has happened sufficient to divest ownership.

不难想象普通法会走得很远，它会以处理所有权的同样方式来处理占有，而且会主张当占有一旦获得，其权利也即获得，并将持续存在，可以对抗除一人之外的整个世界，直到某种足以剥夺其所有权的事情发生为止。

The possession of rights, as it is called, has been a fighting-ground for centuries on the Continent. It is not uncommon for German writers to go so far as to maintain that there may be a true possession of obligations; this seeming to accord with a general view that possession and right are in theory coextensive terms; that the mastery of the will over an external object in general (be that object a thing or another will), when in accord with the general will, and consequently lawful, is called right, when merely de facto is possession. [1_78] Bearing in mind what was said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possession was a fact or right, it will be seen that such an antithesis between possession and right cannot be admitted as a legal distinction. The facts constituting possession generate rights as truly as do the facts which constitute ownership, although the rights of a mere possessor are less extensive than those of an owner.

所谓权利的占有，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大陆法系争论的焦点。德国法学者经常在该问题上走得很远，居然主张可以有对债务的真实占有；这似乎跟下面的一般观点相符合，即占有和权利在理论上是同畴术语；一般而言，意志对外部客体的掌控（无论该客体是一物品还是另一意志），当与普遍意志相符，因此合法时，就称作权利，但如仅是事实上的，则为占有。如果我们还记得曾经讨论过的，关于占有是事实还是权利这个问题的话，就可以看到，占有和权利之间这样一种

对立不能作为法律上的区分而得以承认。构成占有权的事实产生权利，与构成所有权的事实产生权利是同样正确的，尽管单纯占有者的权利没有所有者的权利那么广泛。

Conversely, rights spring from certain facts supposed to be true of the person entitled to such rights. Where these facts are of such a nature that they can be made successively true of different persons, as in the case of the occupation of land, the corresponding rights may be successively enjoyed. But when the facts are past and gone, such as the giving of a consideration and the receiving of a promise, there can be no claim to the resulting rights set up by any one except the party of whom the facts were originally true—in the case supposed, the original contractee,—because no one but the original contractee can fill the situation from which they spring.

反过来说，权利来自某些对享有这些权利的人成立的既定事实。如果这些事实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它们可以对不同的人相继成立，如在土地占用的情况中，相应权利可以被相继享有。但当这些事实已经过去时，如提出对价和接受允诺，则除最初具备这些事实的当事人（在假想的案件中是最初的受约人）外，任何人都不能主张享有由那些事实产生的权利，因为除最初的受约人之外，没有人能符合最初产生这些事实的情况。

It will probably be granted by English readers, that one of the essential constituent facts consists in a certain relation to a material object. But this object may be a slave, as well as a horse; [1_79] and conceptions originated in this way may be extended by a survival to free services. It is noticeable that even Bruns, in the application of his theory, does not seem to go beyond cases of status and those

where, in common language, land is bound for the services in question, as it is for rent. [1_80] Free services being so far treated like servile, even by our law, that the master has a right of property in them against all the world, it is only a question of degree where the line shall be drawn.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hold that, as one might be in possession of a slave without title, so one might have all the rights of an owner in free services rendered without contract. Perhaps there is something of that sort to be seen when a parent recovers for the seduction of a daughter over twenty-one, although there is no actual contract of service. [1_81] So,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rse of the canon law and in the early law of England, rents were regarded as so far a part of the realty as to be capable of possession and disseisin, and they could be recovered like land by all assize. [1_82]

英国读者很可能会同意，在基本的构成性事实中，有一项包含在与某一物理对象的特定关系中。但该对象可以是一个奴隶，也可以是一匹马，由这种方式产生的概念可能残留了下来，扩大到了自由服务关系中。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布伦斯在运用自己的理论时，似乎也没能超出关于身份的案例以及那些关于（通俗地说）土地被用于我们所讨论的自由服务的案例，比如用于租赁的案例。迄今为止，甚至我们的法律也把自由服务视作奴性服务，故主人对这些自由服务拥有可以对抗整个世界的财产权。至于两者之间的界限应划在哪里，只是程度问题而已。也许有人主张，正如一个人没有所有权也可能占有一个奴隶一样，一个人也可能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对自由服务享有所有者的全部权利。下面的案例也许多少是这种情况：家长在超过21岁的女儿被诱奸后索取赔偿，尽管并不存在实际的服务合同。因此，在教会法规的全部历史进程及早期英格兰法中，租金被视为不动产的一部分，能够被占有和侵占，也可以像土地一样通过审判获得赔偿。

But the most important case of the so-called possession of rights in our law, as in the Roman, occurs with regard to easements. An easement is capable of possession in a certain sense. A man may use land in a certain way, with the intent to exclude all others from using it in any way inconsistent with his own use, but no further. If this be true possession, however, it is a limited possession of land, not of a right, as others have shown. But where an easement has been actually created, whether by deed or prescription, although it is undoubtedly true that any possessor of the dominant estate would be protected in its enjoyment, it has not been so protected in the pas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easement was in itself an object of possession, but by the survival of precedents explained in a later Lecture. [1_83] Hence, to test the existence of a mere possession of this sort which the law will protect, we will take the case of a way used de facto for four years, but in which no easement has yet been acquired, and ask whether the possessor of the quasi dominant tenement would be protected in his use as against third persons. It is conceivable that he should be, but I believe that he would not. [1_84]

但在我们的法律中，像在罗马法中一样，所谓占有权利最重要的案例是关于地役权的。在某种意义上，地役权是能够被占有的。某人可以某种方式使用土地，并具有排除他人以不同方式使用该土地的意图，但仅限于此。然而正如其他人已经表明的，这即便是真正的占有，也仅是对土地的有限占有而并非对权利的占有。但是，如果地役权已实际产生，无论由契约还是时效产生，则毫无疑问，任何需役地占有人在享受权利方面都会受到保护，尽管过去保护这种权利并非因为地役权本身是一种占有对象，而是根据先例残留，这在后一讲中还会解释。因此，为检测法律保护这种纯粹占有的存在，我们来看以下案例：一条路已经实际使用了四年，但在此期间没有取得地役权，我们要问的是，这块类似需役地的占有人在使用时能否受到保护来对抗

第三人。可以想象，他应该受到保护，但我认为他得不到保护。

The chief objection to the doctrine seems to be, that there is almost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assertions that one man has a general power and intent to exclude the world from dealing with the land, and that another has the power to use it in a particular way, and to exclude the possessor from interfering with that.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two needs somewhat artificial reasoning. However, it should be borne in mind that the question in every case is not what was the actual power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but what was their manifested power. If the latter stood thus balanced, the law might recognize a kind of split possession. But if it does not recognize it until a right is acquired, then the protection of a disseisor in the use of an easement must still be explained by a reference to the facts mentioned in the Lecture referred to.

该学说的主要反对意见似乎是，以下两种主张几乎是对立的：其一，一个人具有排除整个世界干涉该土地的一般权力和意图；其二，另一个人有以某种特定方式使用该土地并排除占有人妨碍这种使用的权力。要调和二者需要一些人工推理。但我们应该记住，在每个案件中，问题并非所涉及当事人的实际权力是什么，而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权力是什么。如后者就这样保持平衡，则法律可承认一种分享性占有。但如果法律直到一项权利取得时才予以承认，那么对强占者使用地役权的保护则必须参考本讲与此相关的事实才能得到解释。

The consequences attached to possession are substantially those attached to ownership, subject to the question of the continuance of possessory rights which I have touched upon above. Even a wrongful possessor of a chattel may have full damages for its

conversion by a stranger to the title, or a return of the specific thing. [1_85]

附加于占有的后果，实质就是附加于所有权的后果，从属于我上面提到的占有权利的持续性问题。即便是一项动产的不当占有人也可以因第三人强占动产得到全额赔偿金，或特定事物的返还。

It has been supposed, to be sure, that a “special property” was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intain replevin [1_86] or trover. [1_87] But modern cases establish that possession is sufficient, and an examination of the sources of our law proves that special property did not mean anything more.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procedure for the recovery of chattels lost against one's will, described by Bracton, like its predecessor on the Continent, was based upon possession. Yet Bracton, in the very passage in which he expressly makes that statement, uses a phrase which, but for the explanation, would seem to import ownership,—“Poterit rem suam petere.“ [1_88] The writs of later days used the same language, and when it was objected, as it frequently was, to a suit by a bailee for a taking of bona et catalla sua,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for bona in custodia sua existentia, it was always answered that those in the Chancery would not frame a writ in that form. [1_89]

的确，人们认为，要提起返还原物之诉或动产侵占之诉，某种“特别财产权”是必要的。但现代案例却证实，占有已经足够，且对我们法律渊源的考察也证明，特别财产权并没有比占有更多的意思。我们已经表明，布拉克顿描述的要取回因违背某人意志而失去之动产的程序，同欧洲大陆的先例一样，是基于占有的。而布拉克顿就在他明确表明上述观点的同一段话内，使用了“Poterit rem suam

petere”这一词组，如果不是作了解释的话，该词组似乎就意味着所有权。后期令状使用同样的表述，但经常遭到反对，在受托人因货物和动产被拿走而提起的诉讼中，当该表述遭到反对，说应该是保管的货物被拿走的诉讼时，总是得到以下答复，即大法官法院不愿以那种方式拟定令状。

The substance of the matter was, that goods in a man's possession were his (sua),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writ. But it was very natural to attempt a formal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at formal word and the fact by saying that, although the plaintiff had not the general property in the chattels, yet he had a property as against strangers, [1_90] or a special property. This took place, and, curiously enough, in two of the earliest instances in which I have found the latter phrase used are cases of a depositary, [1_91] and a borrower. [1_92] Brooke says that a wrongful taker “has title against all but the true owner.“ [1_93] In this sense the special property was better described as a “possessory property,” as it was, in deciding that, in an indictment for larceny, the property could be laid in the bailee who suffered the trespass. [1_94]

该问题的实质在于，在令状的意义范围内，处于某人占有下的货物就属于他。但人们会很自然地尝试在这个形式化用语和事实之间达成一种形式上的和谐，他们表示，尽管原告不具有该动产的一般财产权，但他却享有对抗第三人的财产权，或“特别财产权”。这种尝试发生在最早期的两个案例中，奇怪的是，我发现使用“特别财产权”字样的这两个案件一个是关于保管人的，另一个是关于借用人的。布鲁克曾说，不当收取者“有对抗除真正所有者之外全部人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最好把“特别财产权”表述为“占有性财产权”，事实上，在一起控告偷窃案中，法庭判定财产权可以归遭受侵害的受托人所有。

I have explained the inversion by which a bailee's right of action against third persons was supposed to stand on his responsibility over, although in truth it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at responsibility, and arose simply from his possession. The step was short, from saying that bailees could sue because they were answerable over, [1_95] to saying that they had the property as against strangers, or a special property, because they were answerable over, [1_96] and that they could sue because they had a special property and were answerable over. [1_97] And thus the notion that special property meant something more than possession, and was a requisite to maintaining an action, got into the law.

我已解释过这种逆转，据此，受托人对第三方的诉讼权被认为基于他对占有对象的责任，尽管这种责任其实是基于该占有对象的，而且完全来源于其占有。从主张受托人由于担负责任而可以起诉，到认为他们负有责任而有对抗第三方的财产权（或特别财产权），而且由于他们有特别财产权且负有责任，因此可以起诉，这一步骤很短。特别财产权的含义不仅限于占有，而且成为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这一概念也由此载入法律。

The error was made easier by a different use of the phrase in a different connection. A bailee was in general liable for goods stolen from his custody, whether he had a lien or not. But the law was otherwise as to a pledgee, if he had kept the pledge with his own goods, and the two were stolen together. [1_98] This distinction was accounted for, at least in Lord Coke's time, by saying that the pledge was, in a sense, the pledgee's own, that he had a special property in it, and thus that the ordinary relation of bailment did not exist, or that the undertaking was only to keep as his own goods. [1_99] The same expression was used in discussing the

pledgee's right to assign the pledge.[^100] In this sense the term applied only to pledges, but its significance in a particular connection was easily carried over into the others in which it was used,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special property which was requisite to maintain the possessory actions was supposed to mean a qualified interest in the goods.

该表述在不同情况下用法不同，因此更容易犯错误。一般来说，无论受托人是否具有留置权，只要货物在他保管时被盗，他就要承担责任。然而在抵押权人的情况中，如果他将该抵押品与自己的货物放在一起，二者同时被盗，法律则有不同规定。这一区分至少在柯克勋爵时代得到解释，即在某种意义上，该抵押品属于抵押权人所有，他对其享有特别财产权，因此，普通的寄托关系不存在，或者说，他的任务就是把它当作自己的货物进行保管。在讨论抵押权人分配抵押品的权利时也用到了同样的表述。在这个意义上，该术语只适用于质押，但它在某一特定情况下的意义被轻易引入了使用该术语的其他情况中，结果是作为提起占有性诉讼前提的特别财产权又被认为意味着对该货物享有限制性利益。

With regard to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possession, it only remains to mention that the rules which have been laid down with regard to chattels also prevail with regard to land. For although the plaintiff in ejectment must recover on the strength of his own title as against a defendant in possession, it is now settled that prior possession is enough if the defendant stands on his possession alone.[101] Possession is of course sufficient for trespass.[102] And although the early remedy by assize was restricted to those who had a technical seisin, this was for reasons which do not affect the general theory.

至于占有的法律后果，只需再提一点，即关于动产的规定也逐渐适用于土地。因为尽管原告在收回地产之诉中必须凭借自己的所有权以对抗占有土地的被告来获得胜诉，但现在已经确定，如被告仅以占有为依据，则原告的先占就足够了。当然，占有对侵害之诉已经足够。尽管早期通过审判获得的救济仅局限于那些严格依照法律占有财产的人，但这是因为一些不会影响普遍理论的原因。

Before closing I must say a word concerning ownership and kindred conceptions. Following the order of analysis which has been pursued with regard to possession, the first question must be, what are the facts to which the rights called ownership are attached as a legal consequence? The most familiar mode of gaining ownership is by conveyance from the previous owner. But that presupposes ownership already existing, and the problem is to discover what calls it into being.

在结束本讲之前，我还要说一下所有权和一些同源概念。按我们分析占有时的顺序，第一个问题必然是作为一种法律后果，称作所有权的权利依附于哪些事实呢？获得所有权最为熟悉的形式是由前所有者转让而来。但该方式的先决条件是所有权已经存在，而这里的问题是要探究什么可以构成所有权。

One fact which has this effect is first possession. The captor of wild animals, or the taker of fish from the ocean, has not merely possession, but a title good against all the world. But the most common mode of getting an original and independent title is by certain proceedings, in court or out of it, adverse to all the world. At one extreme of these is the proceeding in rem of the admiralty, which conclusively disposes of the property in its power, and, when

it sells or condemns it, does not deal with this or that man's title, but gives a new title paramount to all previous interests, whatsoever they may be. The other and more familiar case is prescription, where a public adverse holding for a certain time has a similar effect. A title by prescription is not a presumed conveyance from this or that owner alone, it extinguishes all previous and inconsistent claims. The two coalesce in the ancient fine with proclamations where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 judgment and the lapse of a year and a day was to bar claims.[^103]

具有这种后果的一个事实是第一占有。捕到野生动物的人，或从海里抓到鱼的人，对其猎物不仅享有占有权，而且享有一项足以对抗整个世界的权利。但取得一项原始独立的权利最普遍的方式仍是在法庭上内外，通过某些可以对抗整个世界的程序来获得。其中一种极端程序是海事法院的对物诉讼程序，它能在其权力范围内对财产进行决定性处理，且在出售或没收财产时，处理的并非这人或那人的所有权，而是赋予它一项新的、高于此前所有利益（无论何种利益）的所有权。另一种我们更熟悉的情况是时效，公开对立地持有一段时间后就能取得所有权。由时效取得的所有权不是一种假定的由这个或那个所有者转让的权利，而是废除了以前所有与之冲突的权利主张。在古代转让诉讼中，这两者与公告（表明判决与“一年零一天”期满的合并后果）相结合可以阻止一切权利主张。

So rights analogous to those of ownership may be given by the legislature to persons of whom some other set of facts is true. For instance, a patentee, or one to whom the government has issued a certain instrument, and who in fact has made a patentable invention.

故与所有权类似的权利可由立法机构赋予那些适用另外一组事实的人，如专利权人，即得到政府颁发的正式文件并且事实上已创造出可以申请专利发明的人。

But what are the rights of ownership? They are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those incident to possession. Within the limits prescribed by policy, the owner is allowed to exercise his natural powers over the subject-matter uninterfered with, and is more or less protected in excluding other people from such interference. The owner is allowed to exclude all, and is accountable to no one. The possessor is allowed to exclude all but one, and is accountable to no one but him. The great body of questions which have made the subject of property so large and important are questions of conveyancing, not necessarily or generally dependent on ownership as distinguished from possession. They are questions of the effect of not having an independent and original title, but of coming in under a title already in existence, or of the modes in which an original title can be cut up among those who come in under it. These questions will be dealt with and explained where they belong, in the Lectures on Successions.

可所有权的权利到底有哪些呢？它们实质上跟那些附属于占有的权利相同。在政策规定的界限内，所有者可以不受干涉地行使其对标的物的自然权力，而且在排除他人干涉方面得到或多或少的保护。所有者可以排除一切人，且不对任何人承担责任。占有人可以排除一人之外的一切人，且不对除该人之外的任何人承担责任。使财产问题变得如此庞大而重要的那一大堆问题是转让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必然或普遍依赖有别于占有的所有权。这些问题不是拥有独立、初始所有权情况下所产生的后果，而是在拥有早已存在的所有权的情况下，或者一项初始所有权在拥有该所有权的人之间如何进行分割时所产生的后

果。这些问题属于继承问题，我会在讨论继承问题的几讲中进行讨论和解释。

[1_1].Possession, Section 6, Eng. tr., pp. 27, 28.

[1_6].Windscheid, Pand. Section 148, n. 6.

[1_7].Besitzklagen, 276, 279.

[1_8].Bruns, R. d. Besitzes, 499.

[1_9].Bruns, R. d. Besitzes, Section 2, pp. 5 et seq.; Puchta, Besitz, in Weiske, Rechtslex.; Windscheid, Pand. Section 154, pp. 461 et seq. (4th ed.).

[1_10].D.41.2.3, Section 20; 13.6.8 & 9. Cf. D. 41.1.9, Section 5.

[1_11].But see Ihering, Geist d. Rom. R., Section 62, French tr., IV. p. 51.

[1_12].Heusler thinks this merely a result of the English formalism and narrowness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suo in the writ (disseisivit de teuemento suo). Gewere, 429-432. But there was no such narrowness in dealing with catalla sua in trespass. See below, p. 242.

[1_13].See, further, Bracton, fol. 413; Y.B. 6 Hen. VII. 9, pl. 4.

[1_14].Infra, p. 243.

[1_15].R.d. Besitzes, 494.

[1_16].Rogers v. Spence, 13 M. & W. 579, 581.

[1_17].Webb v. Fox, 7 T. R. 391, 397.

[1_18].Fennings v. Lord Grenville, 1 Taunt. 241; Littledale v. Scaith, ib. 243, n. (a); cf. Hogarth v. Jackson, M. & M. 58; Skinner v. Chapman, ib. 59, n.

[1_19].Swift v. Gifford, 2 Lowell, 110.

[1_20].1 Taunt. 248.

[1_21].Cf. Wake, Evolution of Morality, Part I. ch. 4, pp. 296 et seq.

[1_22].Asher v. Whitlock, L.R. 1 Q.B.1.

[1_23].People v. Shearer, 30 Cal. 645.

[1_24].2 Kent's Comm. 349, citing Pierson v. Post, 3 Caines, (N. Y.) 175; Buster v. Newkirk, 20 Johnson, (N. Y.) 75.

[1_25].Young v. Hichens, 6 Q.B.606.

[1_26].2 Kent's Comm. 349, n. (d).

[1_27].Inst. 2. 1, Section 13.

[1_28].Swift v. Gifford, 2 Lowell, 110.

[1_29].Savigny, R. d. Besitzes, Section 21.

[1_30].II. 9, Section 4; III. 29, Section 2. Animus domini will be used here as shortly indicating the general nature of the intent required even by those who deny the fitness of the expression, and especially because Savigny's opinion is that which has been adopted by English writers.

[1_31].Cf. Bruns, R. d. Besitzes, 413, and ib. 469, 474, 493, 494, 505; Windscheid, Pand. Section 149, n. 5 (p. 447, 4th ed.); Puchta, Inst. Section 226.

[1_32].Supra, p. 207; 2 Puchta, Inst. Section 226 (5th ed.), pp. 545, 546.

[1_33].15 Jur. 1079; 21 L. J. Q.B.75; 7 Eng. L. & Eq. 424.

[1_34].11 Allen, 548.

[1_35].Kincaid v. Eaton, 98 Mass. 139.

[1_36].Barker v. Bates, 13 Pick. 255, 257, 261; Proctor v. Adams, 113 Mass. 376, 377; 1 Bl. Comm. 297, Sharsw. ed., n. 14. Cf. Blades v. Hiqgs, 13 C.B. N.S. 844, 847, 848, 850, 851; 11 H. L. C. 621; Smith v. Smith, Strange, 955.

[1_37].Reg. v. Rowe, Bell, C.C. 93.

[1_38].See, as to treasure hidden in another's land, D. 41. 2. 44, pr.; D. 10. 4. 15. Note the different opinions in D. 41.2. 3, Section 3.

[1_39].3 Inst. 107; 1 Hale, P.C. 504, 505; 2 Bishop, Crim. Law, Sections 834, 860 (6th ed.).

[1_40].Reg. v. Middleton, L.R. 2 C.C. 38, 55. Cf. Halliday v. Holgate, L.R. 3 Ex. 299, 302.

[1_41].Cf. Y.B. 8 Ed. II. 275; Fitzh. Abr. Detinue, ph 59; Y.B. 13 Ed. IV. 9, pl. 5; Keilway, 160, pl. 2; Merry v. Green, 7 M. & W. 623, 630. It may not be necessary to go quite so far, however, and these cases are not relied on as establishing the theory. For wrong explanations, see 2 East, P.C. 696.

[1_42].Durfee v. Jones, 11 R. I. 588.

[1_43].Reg. v. Rowe, Bell, C.C. 93, stated above.

[1_44].8 Ves. 405; 7 M. & W. 623; Stephen, Crim. Law, Art. 281, Ill. (4), p. 197. He says, "because [the owner of the safe] cannot be presumed to intend to act as the owner of it when he discovers it,"—a reason drawn from Savigny, but not fitted to the English law, as has been shown.

[1_45].Y.B. 13 Ed. IV. 9, 10, pl. 5; 21 Hen. VII. 14, pl. 21. Cf. 3 Hen. VII. 12, pl. 9; Steph. Crim. Law, Art. 297, and App., note xvii.

[1_46].Steph. Crtre. Law, Art. 297, and App., note xvii. p. 882. It may be doubted whether the old law would have sanctioned the rule in this form. F. N. B. 91 E; Y.B. 2 Ed. IV. 15, pl. 7.

[1_47].Y.B. 21 Hen. VII. 14, pl. 21; 13 Co. Rep. 69.

[1_48].They have been said to be a part of the family pro hac vice. Southcote v. Stanley, 1 H. & N. 247, 250. Cf. Y.B. 2 Hen. IV. 18, pl. 6.

[1_49].Moore, 248, pl. 392; S.C., Owen, 52; F. N. B. 91 E; 2 B1. Comm. 396; 1 H. Bl. 81, 84; 1 Chitty, Pl. 170 (1st ed.); Dicey, Parties, 358; 9 Mass. 104; 7 Cowen, 294; 3 S. & R. 20; 13 Iredell, 18; 6 Barb. 362, and cases cited. Some of the American cases have been denied, on the ground that the custodian was not a servant. Cf. Holiday v. Hicks, Cro. Eliz. 638, 661, 746; Drope v. Theyar, Popham, 178, 179.

[1_50].Bracton, fol. 6 a, Section 3, 12 a, 17 a, Cap. V. ad fin., 25 a, b, etc.; Pucbra, Inst. Section 228.

[1_51].See also 7 Am. Law Rev. 62 et seq.; 10 Am. Law Rev. 431; 2 Kent, Comm. (12th ed.), 260, n. 1.

[1_52].1 Comm. 427. Cf. Preface to Paley on Agency. Factors are always called servants in the old books, see, e. g., Woodlife's Case, Owen, 57; Holiday v. Hicks, Cro. Eliz. 638; Southcote's Case, 4 Co. Rep. 83 b, 84 a; Southern v. How, Cro. Jac. 468; St. 21 Jac. I., c. 16, Section 3; Morse v. Slue, 3 Keble, 72. As to bailiffs, see Bract. 26 b, "Reestituat domino, vel servienti," etc.; Y.B. 7 Hen. IV. 14, pl. 18.

[1_53].Paley, Agency, c. 4, Section 1, citing Godbolt, 360. See, further, F. N. B. 120, G; Fitzh. Abr. Dette, pl. 3; Y.B. 8 Ed. IV. 11, pl. 9. These rules seem to be somewhat modern even as to servants. The liability of a master for debts contracted by his servant is very narrowly limited in the earlier Year Books.

[1_54].I am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his extension has been large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Roman law. See Lecture I. p. 20, n. 1, and observe the part which the precedents as to fire (e. g., Y.B. 2 Hen. IV. 18, pl. 6) have played in shaping the modern doctrine of master and servant. Tuberville v. Stampe, I Ld. Raym. 264 (where Lord Holt's examples are from the Roman law); Brucker v. Fromont, 6 T. R. 659; M'Manus v. Crickett, 1 East, 106; Patten v. Rea, 2 C.B. N.S. 606. In Southern v. How, Popham, 143, Doctor and Student is referred to for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liability. Doctor and Student states Roman law. See, further, Boson v. Sandford, 1 Shower, 101, 102.

[1_55].Bac. Ahr. Master and Servant, K; Smith, Master and Servant (3d ed.), 260, n. (t).

[1_56].Clapp v. Kemp, 122 Mass. 481; Murray v. Currie, L.R. 6 C.P. 24, 28; Hill v. Morey, 26 Vt. 178.

[1_57].See, e.g., Patten v. Rea, 2 C.B. N.S. 606; Bolingbroke v. Swindon Local Board, L.R. 9 C.P. 575.

[1_58].Freeman v. Rosher, 13 Q.B.780, 785; Gauntlett v. King, 3 C. B. N.S. 59; Haseler v. Lemoyne, 28 L. J. C.P. 103; Collett v. Foster, 2 H. & N. 356; Barwick v. English Joint Stock Bank, L.R. 2 Ex. 259, 265, 266; Lucas v. Mason, L.R. 10 Ex. 251, 253, last paragraph; Mackay v. Commercial Bank of New Brunswick, L.R. 5 P.C. 394,

411, 412. So as to partners, 3 Kent's Comm. (12th ed.), 46, notes (d) & 1.

[1_59].Bush v. Steinman, 1 B. & P. 404, 409.

[1_60].6 M. & W. 358. Cf. Udell v. Atherton, 7 H. & N. 172, 184, for a comment like that in the text. Other grounds for the decision are immaterial here.

[1_61].Mackay v. Commercial Bank of New Brunswick, L.R. 5 P.C. 394; Barwick v. English Joint Stock Bank, L.R. 2 Ex. 259; Western Bank of Scotland v. Addie, L.R. 1 H. L. Sc. 145; 2 Kent (12th ed.), 616, n. 1; Swift v. Jewsbury, L.R. 9 Q.B.301, overruling S.C. sub nom. Swift v. Winterbotham, L.R. 8 Q.B.244; Weir v. Bell, 3 Ex. D. 238, 244. The objections which Baron Bramwell mentions (L.R. 9 Q.B.815) to holding one man liable for the frauds of another, are objections to the peculiar consequences attaching to the relation of master and servant in general, and have been urged in that more general form by the same learned judge. 12 Am. Law Rev. 197, 200; 2 H. & N. 856, 361. See 7 Am. Law Rev. 61, 62.

[1_62].7 Am. Law Rev. 63 (Oct. 1872).

[1_63].D.44. 2. 4, note 17, Elzevir ed.

[1_64].Hunter's Roman Law, 431.

[1_65].Ancient Hist. of Inst. 235.

[1_66].Cf. Gillett v. Ball, 9 Penn. St. 13; Craig v. Gilbreth, 47 Me. 416; Nickolson v. Knowles, 5 Maddock, 47; Williams v. Port, L.R. 12 Eq. 149; Adams v. Jones, 12 Ad. & El. 455; Bracton, fol. 28 b, 42 b, 43. And compare with the passage cited above from Blackstone: "Possider, cujus riomine possidetur, procurator alienae possessioni praestat ministerium." D. 41. 2. 18, pr.

[1_67].Ward v. Macaulay, 4 T. R. 489, 490. Cf. as to factors supra, p. 228.

[1_68].Berndtson v. Strang, L.R. 3 Ch. 588, 590.

[1_69].Blackburn, Sale, 33; Marvin v. Wallis, 6 El. & Bl. 726.

[1_70].D.41. 2. 18, pr. "Quod meo nomine possideo, possum alieno nomine possidere: nec enim muto mihi causam possessionis, sed desino possidere et alium possessorem ministerio meo facio. Nec idem est possidere et alieno nomine

possidere: nam possidet, cujus nomine possidetur, procurator alienae possessioni praestat ministerium." Thus showing that the vendor changed possession by holding in the name of the purchaser, as his agent to possess. Cf. Bracton, fol. 28 b.

[1_71].Windscheid, Pand. Section 155, n. 8 a; 2 Kent (12th ed.), 492, n. 1 (a). It should be kept in mind also that the Roman law denied possession to bailees.

[1_72].See, e. g., Farina v. Home, 16 M. & W. 119, 123.

[1_73].McGahey v. Moore, 3 Ired. (N. C.) 35.

[1_74].Reader v. Moody, 3 Jones, (N. C.) 372. Cf. Basset v. Maynard, Cro. Eliz. 819, 820.

[1_75].Browne v. Dawson, 12 A. & E. 624. Cf. D. 43. 16. 17; ib. 3, Section 9; D. 41. 2. 18, Section 3; Clayton, 147, pl. 268.

[1_76].Cf. Bruns, R. d. Besitzes, 503.

[1_77].Clark v. Maloney, 3 Harrington (Del.), 68. Bruns (R. d. Besitzes, 503, 507) comes to the same conclusion on practical grounds of convenience, although he utterly repudiates it on theory. I must refer to what I said above touching these conflicts between theory and convenience.

[1_78].Bruns, R. d. Besitzes, Section 57, p. 486. A learned writer of more ancient date asks why a doctor has not a possessory action if you cease to employ him, and answers: "Sentio actionem non tenere, sed sentio tantum, nec si vel morte mineris, possum dicere quare. Tu lector, si sapis, rationes decidendi suggere." Hommel, Rhaps., qu. 489, cited, Bruns, 407.

[1_79].Gardiner v. Thibodeau, 14 La. An. 732.

[1_80].Bruns, 483.

[1_81].2 Kent (12th ed.), 205, n. 1. Cf. Y.B. 21 Hen. VI. 8, 9, pl. 19; American note to Scott v. Shepherd, in 1 Sm. L. C. (Am. ed.).

[1_82].Britton (Nich. ed.), I. 277 (cf. Bract., fol. 164 b; Fleta, fol. 214; Glanv., Lib. XIII. c. 37); Littleton, Sections 237-240, 588, 589; 3 Bl. Comm. 170; 3 Cruise, Dig., tit. xxviii., Rents, ch. 2, Section 34.

[1_83].See Lecture XI.

[1_84].Cf. Stockport Water Works v. Potter, 3 H. & C. 300, 318. The language in the seventh English edition of 1 Sm. L. C., 300, is rather too broad. If the law should protect a possessor of land in the enjoyment of water coming to it, it would do so because the use of the water was regarded as a part of the enjoyment of that land, and would by no means imply that it would do the same in the case just put of a way over land of another.

[1_85].Jefferies v. Great Western Railway Co., 5 El. & B1. 802. Cf. Armory v. Delamirie, 1 Strange, 505, 1 Sm. L. C.

[1_86].Co. Lit. 145 b.

[1_87].2 Wms. Saund. 47 b, note 1, to Wilbraham v. Snow.

[1_88].Bract., fol. 150 b, 151; supra, p. 168; Y.B. 22 Ed. I. 466-468.

[1_89].Y.B. 48 Ed. III. 20; 11 Hen. IV. 17; 11 Hen. IV. 23, 24; 21 Hen. VII. 14. The meaning of sua is discussed in Y.B. 10 Ed. IV. 1, B, by Catesby. Compare Laband, Vermogensrechtlichen Klagen, 111; Heusler, Gewere, 492 et seq., correcting Bruns, R. d. Besitzes, 300 et seq.; Sohm, Proc. d. L. Sal., Section 6.

[1_90].Y.B. 11 Hen. IV. 17, pl. 39.

[1_91].Y.B. 21 Hen. VII. 14 b, pl. 23.

[1_92].Godbolt, 173, pl. 239. Cf. 11 Hen. IV. 17, pl. 39.

[1_93].Bro. Abr. Trespass, pl. 433, cit. Y.B. 13 Hen. VII. 10.

[1_94].Kelyng, 89. See, further, Buller, N. P. 33.

[1_95].Lecture V.; Y.B. 20 Hen. VII. 1, pl. 11.

[1_96].Y.B. 21 lien. VII. 14 b, pl. 23.

[1_97].1 Roll. Abr. 4, 5 (I), pl. 1. Cf. Arnold v. Jefferson, 1 Ld. Raym. 275.

[1_98].29 Ass., fol. 163, pl. 28.

[1_99].Southcote's Case, 4 Co. Rep. 83 b.

[1_100].Mores v. Conham, Owen, 123. Cf. Ratcliff v. Davis, I Bulstr. 29.

[1_101].Doe v. Dyball, Mood. & M. 346 and note; 2 Wms. Saund. 111, and later notes; I Ad. & El. 119; Asher v. Whitlock, L.R. 1 Q.B.1.

[1_102].Graham v. Peat, 1 East, 244.

[1_103].As to this period see Heusler, Gewere. Cf. Laveleye, Propriete, 166.

LECTURE VII. CONTRACT.—I. HISTORY.

第七讲　合同（一）——历史

The doctrine of contract has been so thoroughly remodelled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times, that there is less here than elsewhere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It has been so ably discussed that there is less room here than elsewhere for essentially new analysis. But a short account of the growth of modern doctrines, whether necessary or not, will at least be interesting, while an analysis of their main characteristics cannot be omitted, and may present some new features.

有关合同的学说已经进行了彻底改造以适应现代的需要，因此同其他领域相比，在该领域进行历史研究没有太大必要。而且，人们在这方面的讨论已经非常详尽，因此跟其他领域相比，作出重大创新性分析的空间相对也比较小。但不管有无必要，简短说明一下现代学说的发展历程至少还是很有趣的，其中主要特点分析不可忽略，可能还会揭示一些新特征。

It is popularly supposed that the oldest forms of contract known to our law are covenant and debt, and they are of early date, no doubt. But there are other contracts still in use which, although they have in some degree put on modern forms, at least suggest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y were not of equally early appearance.

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法律已知的最古老的合同形式是盖印合同和

债务。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早期的形式。但其他一些合同也仍在使用，尽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现代的形式，但至少暗示了一个问题，即它们是否也出现得同样早。

One of these, the promissory oath, is no longer the foundation of any rights in private law. It is used, but as mainly as a solemnity connected with entering upon a public office. The judge swears that he will execute justice according to law, the juryman that he will find his verdict according to law and the evidence, the newly adopted citizen that he will bear true faith and allegiance to the government of his choice.

其中一种——承诺宣誓——不再是私法权利的依据。但它还在使用，主要用作与就任公职相关的一种庄重仪式。法官宣誓说，他将依法施行正义；陪审员宣誓说，他将根据法律和证据作出裁决；新入籍的公民宣誓说，他将对自己选择的政府诚信忠诚。

But there is another contract which plays a more important part. It may, perhaps, sound paradoxical to mention the contract of suretyship. Suretyship, nowadays, is only an accessory obligation, which presupposes a principal undertaking, and which, so far as the nature of the contract goes, is just like any other. But, as has been pointed out by Laferriere, [2_1] and very likely by earlier writers, the surety of ancient law was the hostage, and the giving of hostages was by no means confined to international dealings.

不过还有另一种更重要的合同。提到保证合同，听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如今，保证合同关系只是一种从属性义务，它以主要承诺

为先决条件，且就合同性质而言，与其他合同完全相同。但正如莱菲利埃尔指出的——很可能还有更早的学者也指出过——古法律中的保证人是人质，而人质的使用绝对不仅局限于国际交易。

In the old metrical romance of Huon of Bordeaux, Huon, having killed the son of Charlemagne, is required by the Emperor to perform various seeming impossibilities as the price of forgiveness. Huon starts upon the task, leaving twelve of his knights as hostages. [2_2] He returns successful, but at first the Emperor is made to believe that his orders have been disobeyed. Thereupon Charlemagne cries out, “I summon hither the pledges for Huon. I will hang them, and they shall have no ransom.“ [2_3] So, when Huon is to fight a duel, by way of establishing the truth or falsehood of a charge against him, each party begins by producing some of his friends as hostages.

在古老的浪漫诗《波尔多的休恩》中，休恩杀死查理曼大帝的儿子后，查理曼要求他去完成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作为宽恕他的代价。休恩将其十二位骑士留下作为人质，就出发去完成任务了，最终凯旋而归；但起初查理曼受到蒙蔽，以为休恩违背了他的命令，于是大叫：“传休恩的保证人！我要绞死他们，赎金也不能救他们。”因此，休恩只好进行决斗，以此来证明对其指控不实，双方一开始都交出了自己的朋友作为人质。

When hostages are given for a duel which is to determine the truth or falsehood of an accusation, the transaction is very near to the giving of similar security in the trial of a cause in court. This was in fact the usual course of the Germanic procedure.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the earliest appearance of law was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private feuds between families or clans. But while a defendant who did not peaceably submi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might be put outside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so that any man might kill him at sight, there was at first no way of securing the indemnity to which the plaintiff was entitled unless the defendant chose to give such security. [2_4]

在为决定某一指控的真假进行决斗，并为此交出人质时，这种做法很接近在法院审理诉讼案中要提交的与之类似的担保人。事实上，这是日耳曼式诉讼程序中的常见做法。要记住，法律最早是作为家族或部落间私仇的替代品出现的。但如果被告没有和平地接受法院裁决，他将不受法律保护，因此任何人看见他都可以杀死他。尽管如此，最初却无法保证原告得到他有权获得的补偿，除非被告自愿提交这种担保。

English customs which have been preserved to us are somewhat more advanced, but one of the noticeable features in their procedure is the giving of security at every step. All lawyers will remember a trace of this in the fiction of John Doe and Richard Roe, the plaintiff's pledges to prosecute his action. But a more significant example is found in the rule repeated in many of the early laws, that a defendant accused of a wrong must either find security or go to prison. [2_5] This security was the hostage of earlier days, and later, when the actions for punishment and for redress wer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became the bail of the criminal law. The liability was still conceived in the same way as when the bail actually put his own body into the power of the party secured.

保留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英国习惯法多少要更发达一些，但其诉讼

程序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每一步都要提交担保。在当事人不知名，从而虚拟约翰·多伊和理查德·罗为当事人名的情况下，所有法学家都会记得这一点痕迹，即原告进行诉讼的保证。但在很多早期法律中反复用到的一条规定中还可以找到一个更重要的例子，即被指控实施不当行为的被告必须找一个担保人，否则就要去坐牢。这种担保人就是早期的人质。后来，在惩罚诉讼和赔偿诉讼分开后，就成为刑法中的保释保证人。这种责任的设定方式，与保释保证人将自己的身体实际置于其担保的当事人的控制下完全相同。

One of Charlemagne's additions to the Lex Salica speaks of a freeman who has committed himself to the power of another by way of surety. [2_6] The very phrase is copied in the English laws of Henry I. [2_7] We have seen what this meant in the story of Huon of Bordeaux. The Mirror of Justices [2_8] says that King Canute used to judge the mainprisors according as the principals when their principals not in judgment, but that King Henry I. confined Canute's rule to mainprisors who were consenting to the fact.

查理曼大帝对《萨利克法典》的其中一项增补就涉及到通过担保方式将自己置于另一人控制之下的自由人。亨利一世时期的英国法也使用了完全相同的说法。我们已在《波尔多的休恩》这个故事里看到了这是什么意思。《正义宝鉴》中说，卡努特大帝的习惯做法是，当被保释人不出庭时，就相应地将其保释人作为被保释人审判；而亨利一世则将卡努特的惯例局限于同意该事实的保释人。

As late as the reign of Edward III., Shard, an English judge, after stating the law as it still is, that bail are a prisoner's keepers, and shall be charged if he escapes, observes, that some say that the bail shall be hanged in his place. [2_9] This was the law in the

analogous case of a jailer. [2_10] The old notion is to be traced in the form still given by modern writers for the undertaking of bail for felony. They are bound “body for body,“ [2_11] and modern law-books find it necessary to state that this does not make them liable to the punishment of the principal offender if he does not appear, but only to a fine. [2_12] The contract also differed from our modern ideas in the mode of execution. It was simply a solemn admission of liability in the presence of the officer authorized to take it. The signature of the bail was not necessary, [2_13] and it was not requisite that the person bailed should bind himself as a party. [2_14]

迟至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一位英国法官沙德说明了现在仍然适用的法律，即保释人是囚犯的负责人，如果囚犯逃跑了，则保释人就将受到指控。之后他又指出，有些人说保释人应该代替囚犯被绞死。该法律也适用于类似监狱看守的案件。现代法学家仍然要求为重罪保释提交保释保证书，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古老观念的痕迹。他们通过“一命抵一命”的关系紧密相连，而现代法律著作发现有必要说明下面这一点：即使主犯不露面，保释人也不该承担主犯应受的惩罚，而只是承担罚款。该合同在执行方式上与我们现代的观念也有不同。保释人只要在得到授权的官员面前郑重表示承担责任就可以了。不需要保释人签名，也不要求被保释人应成为一方当事人。

But these peculiarities have been modified or done away with by statute, and I have dwelt upon the case, not so much as a special form of contract differing from all others as because the history of its origin shows one of the first appearances of contract in our law. It is to be traced to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faith in the honor of a hostage if the case calling for his surrender should arrive, and to the consequent relaxation of actual imprisonment. An illustration may be found in the parallel mode of dealing with the prisoner himself.

His bail, to whom his body is supposed to be delivered, has a right to seize him at any time and anywhere, but he is allowed to go at large until surrendered. It will be noticed that this form of contract, like debt as dealt with by the Roman law of the Twelve Tables, and for the same motive, although by a different process, looked to the body of the contracting party as the satisfaction.

但这些特点已由制定法修改或废除，我之所以详细讨论这个案例，并非因为它有别于所有其他案例的特别形式的合同，而是因为它的起源史显示，它是我们法律中最早出现的合同之一。其源头可追溯到，在要提交人质的案件中，尊重人质的信念逐渐增强，以致后来对人质的实际关押渐渐放松了。我们可以从对待囚犯本人的类似方式中找到解释。他的保释人，即其身体应该交付给的那人，有权随时随地抓捕他，但在他被交出之前，他都是自由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罗马《十二铜表法》中，这种合同形式与债务相同，而且出于同样动机，都将合同当事人一方的身体视为对合同的最后履行，尽管二者程序不同。

Debt is another and more popular candidate for the honors of priority. Since the time of Savigny,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contract both in Roman and German law has often been attributed to the case of a sale by some accident remaining incomplete. The question does not seem to be of great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For to explain how mankind first learned to promise, we must go to metaphysics, and find out how it ever came to frame a future tense. The nature of the particular promise which was first enforced in a given system can hardly lead to any truth of general importance. But the history of the action of debt is instructive, although in a humbler way.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i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nlightened rules which make up the law of contract

at the present time.

更多人认为债务是另一种最早出现的合同形式。自萨维尼时期以来，合同在罗马法和德国法中的最早出现都常常被归因于某种意外而尚未完成交易的情况。问题似乎并不在于其哲学重要性，因为要解释人类最初是如何学会允诺的，我们必须借助形而上学，来探寻它是如何构造出将来时态的。而在特定体系中首次得到执行的特定允诺的性质并不能导向任何具有普遍重要性的真理。但债务诉讼的历史尽管不是那么突出，却很有启发性。为了理解构成现代合同法的那些文明细则，有必要了解一些债务诉讼的历史。

In Glanvill's treatise the action of debt is found already to be one of the well-known remedies. But the law of those days was still in a somewhat primitive state, and it will easily be imagined that a form of action which goes back as far as that was not founded on any very delicate discriminations. It was, as I shall try to show directly, simply the general form in which any money claim was collected, except unliquidated claims for damages by force, for which there was established the equally general remedy of trespass.

在格兰维尔的专著中可以发现，债务诉讼已经成为人们很熟悉的救济方式之一。但那个时代的法律仍处于颇为原始的状态，因此很容易想象，可以追溯到如此久远年代的诉讼形式并非建立在非常精细的区分之上。下面我会尽量直接说明，当时的债务诉讼只是收回金钱权利主张的一般形式，但因暴力造成损害而未清算的赔偿金权利主张除外。对于后者，已经建立了同样的侵害诉讼的一般性救济形式。

It has been thought that the action was adopted from the then

more civilized procedure of the Roman law. A natural opinion, seeing that all the early English law-writers adopt their phraseology and classification from Rome. Still it seems much more probable that the action is of pure German descent. It has the features of the primitive procedure which is found upon the Continent, as described by Laband. [2_15]

人们曾认为这种诉讼是从当时更为文明的罗马法程序中吸收过来的。由于早期英国法学者们的术语和分类都是从罗马吸收而来，因此这是很自然的想法。但更大的可能性是这种诉讼具有纯粹的日耳曼血统。正如拉邦德所描述的，它带有在欧洲大陆发现的原始程序的特征。

The substance of the plaintiff's claim as set forth in the writ of debt is that the defendant owes him so much and wrongfully withholds it. It does not matter, for a claim framed like that, how the defendant's duty arises. It is not confined to contract. It is satisfied if there is a duty to pay on any ground. It states a mere conclusion of law, not the facts upon which that conclusion is based, and from which the liability arises. The old German complaint was, in like manner, “A owes me so much.”

在定额债务令状里提出的原告权利主张的实质是被告欠他若干钱，并且不当扣付这些钱。对于如此拟定的权利主张，被告的义务如何形成并不重要。它并不局限于合同，无论依据是什么，只要有支付义务就可以了。它陈述的仅仅只是一条法律结论，并非据以得出该结论并产生责任的那些事实。古老的日耳曼起诉状使用相同的方式，即，“甲欠我若干钱”。

It w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German procedure that the defendant could meet that complaint by answering, in an equally general form, that he did not owe the plaintiff. The plaintiff had to do more than simply allege a debt, if he would prevent the defendant from escaping in that way. In England, if the plaintiff had not something to show for his debt, the defendant's denial turned him out of court; and even if he had, he was liable to be defeated by the defendant's swearing with some of his friends to back him that he owed nothing. The chief reason why debt was supplanted for centuries by a later remedy, assumpsit, was the survival of this relic of early days.

日耳曼程序的特点是，被告可以用同样的一般形式针对该起诉状作出答辩，说他没有欠原告的钱。如原告要阻止被告以这种方式逃脱责任，那么他要做的不仅仅是宣称该债务的存在。在英格兰，如果原告拿不出物证来证明债权存在，那么只要被告否认，就能把原告赶出法庭；而且即使他有物证，只要被告发誓不欠他任何东西，并得到自己朋友的支持，则原告也会败诉。几百年来，债务之所以被后来的一种救济（简约之诉）所取代，主要就是因为这种早期遗俗的残留。

Finally, in England as in Germany, debt for the detention of money was the twin brother of the action brought for wrongfully withholding any other kind of chattel. The gist of the complaint in either case was the same.

最后，英格兰与德国相同，扣留金钱引起的债务诉讼与对其他任何动产的不当扣留引起的诉讼非常相似。这两种案件中起诉状的诉讼依据是相同的。

It seems strange that this crude product of the infancy of law should have any importance for us at the present time. Yet whenever we trace a leading doctrine of substantive law far enough back, we are very likely to find some forgotten circumstance of procedure at its source. Illustrations of this truth have been given already. The action of debt and the other actions of contract will furnish others. Debt throws most light upon the doctrine of consideration.

这个法律初始阶段的原始产物到现在对我们还有重要意义，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不过，我们无论何时追溯主要实体法律学说，只要追溯的年代足够久远，就很可能会在源头发现一些被遗忘的程序的相关情况。上文已就该点进行了例证。债务诉讼及其他合同诉讼将会提供其他例证。债务诉讼可以最清楚地阐明对价学说。

Our law does not enforce every promise which a man may make. Promises made as ninety-nine promises out of a hundred are, by word of mouth or simple writing, are not binding unless there is a consideration for them. That is, as it is commonly explained, unless the promisee has either conferred a benefit on the promisor, or incurred a detriment, as the inducement to the promise.

我们的法律不会强制执行人们所有的允诺。人们作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允诺，无论口头上还是简单书面形式上，除非存在对价，否则就不具约束力。也就是说，像通常解释的那样，除非作为立约诱因，受约人给允诺人带来某种好处，或者造成某种损害。

It has been thought that this rule was borrowed from Roman

law by the Chancery, and, after undergoing some modification there, passed into the common law.

人们认为这一规定是大法官法庭从罗马法中借来的，之后在大法官法庭经过一些修改，又载入了普通法。

But this account of the matter is at least questionable. So far as the use of words goes, I am not aware that consideration is distinctly called cause before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n the earlier reports it always appears as quid pro quo. Its first appearance, so far as I know, is in Fleta's account of the action of debt, [2_16] and although I am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Fleta's statement is not to be trusted, a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the cases in the Year Books will show, I think, that the doctrine was fully developed in debt before any mention of it in equity can be found. One of the earliest references to what a promisor was to have for his undertaking was in the action of assumpsit. [2_17] But the doctrine certainly did not originate there. The first mention of consider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equity which I have seen is in the form of quid pro quo, [2_18] and occurs after the requirement had been thoroughly established in debt. [2_19]

但这种解释至少是有疑问的。就所使用的词语来说，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之前，我从没看到过对价被明确地称为诉因；而在更早的判例汇编中，它一直以“交换条件”的字样出现。据我所知，它最早出现在弗莱塔对债务诉讼的记述中。尽管我倾向于认为弗莱塔的记述并不可信，但我认为，对《年鉴》中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案件做认真考察后可以表明，对价学说早在衡平法提到它之前就已经在债务诉讼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早提及允诺人作出允诺需具备什么条件的诉讼之一

就是简约之诉。可对价学说当然不是起源于此。据我所见，在衡平法中最早提及对价时也是用的“交换条件”，而且其是在该要求在债务诉讼中完全确立后才出现的。

The single fact that a consideration was never required for contracts under seal, unless Fleta is to be trusted against the great weight of nearly contemporaneous evidence, goes far to show that the rule cannot have originated on grounds of policy as a rule of substantive law. And conversely, the coincidence of the doctrine with a peculiar mode of procedure points very strongly to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peculiar requirement and the peculiar procedure were connected. It will throw light on the question to put together a few undisputed facts, and to consider what consequences naturally followed. It will therefore be desirable to examine the action of debt a little further. But it is only fair to admit, at the outset, that I offer the explanation which follows with great hesitation, and, I think, with a full appreciation of the objections which might be urged.

除非我们仅仅相信弗莱塔而不相信几乎与其同时代的大量证据，否则仅盖印合同从不要求对价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作为实体法律的一条规则，它不可能是依据政策形成的。反过来，对价学说与一种特有的程序模式同时出现，这强有力地指向了一种可能，即该特定要求和特有程序是有关联的。将一些不存在争议的事实放在一起，并考虑可以自然地得到什么结果，将会对这一问题大有帮助。因此有必要再进一步考察债务诉讼。不过在考察之初我必须承认，我对下面给出的解释很犹豫，同时也敬请大家指正。

It was observed a moment ago, that, in order to recover against

a defendant who denied his debt, the plaintiff had to show something for it; otherwise he was turned over to the limited jurisdiction of the spiritual tribunals. [2_20] This requirement did not mean evidence in the modern sense. It meant simply that he must maintain his cause in one of the ways then recognized by law. These were three, the duel, a writing, and witnesses. The duel need not be discussed, as it soon ceased to be used in debt, and has no bearing on what I have to say. Trial by writing and by witnesses, on the other hand, must both be carefully studied. It will be convenient to consider the latter first and to find out what these witnesses were.

刚才我讲过，在被告否认欠债的情况下，为了收回欠款，原告必须拿出一些证明；否则他就会被移交给教会法庭的专门管辖权处理。但该要求指的并非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证据。而只是指原告必须以当时法律承认的某种方式来支持其诉因。共有三种方式，即决斗、文书以及证人。决斗无需再讨论了，因为这种方式在债务诉讼中很快就废止了，且与我的讨论并无关系。但文书审判和证人审判则必须认真研究。先考虑后者比较方便。我们来看看这些证人都有哪些。

One thing we know at the start; they were not witnesses as we understand the term. They were not produced before a jury for examination and cross-examination, nor did their testimony depend for its effect on being believed by the court that heard it. Nowadays, a case is not decided by the evidence, but by a verdict, or a finding of facts, followed by a judgment. The oath of a witness has no effect unless it is believed. But in the time of Henry II. our trial by jury did not exist. When an oath was allowed to be sworn it had the same effect, whether it was believed or not. There was no provision for sifting it by a second body. In those cases where a trial

by witnesses was possible, if the party called on to go forward could find a certain number of men who were willing to swear in a certain form, there was an end of the matter.

一开始我们要了解，他们并非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证人。他们不站在陪审团面前接受询问和交互询问，他们证言的效力也不取决于法庭是否采信。今天，案件并非根据证据判决，而是根据陪审团的裁决，或者所认定的事实，再作出判决。证人的誓言只有在法庭采信后才有效力。但在亨利二世时代，并不存在像现在这样由陪审团进行的审判。无论誓言被采信与否，只要允许发誓，它就具有同等效力。当时没有规定要由第二人来详细审查它。在那些可能使用证人审判的案件里，如被传唤出庭的当事人能找到一定数量的人愿意以某种方式为他发誓，则该案就结了。

Now this seems like a more primitive way of establishing a debt than the production of the defendant's written acknowledgement, and it is material to discover its origin.

尽管这看来像是一种比让被告拿出书面承认更原始的方式来确定债务诉讼，但探究其起源非常重要。

The cases in which this mode of trial was used appear from the early books and reports to have been almost wholly confined to claims arising out of a sale or loan. And the question at once occurs, whether we are not upon traces of an institution which was already ancient when Glanvill wrote. For centuries before the Conquest Anglo-Saxon law [2_21] had required the election of a certain number of official witnesses, two or three of whom were to be called in to

every bargain of sale. The object for which these witnesses were established is not commonly supposed to have been the proof of debts. They go back to a time when theft and similar offences were the chief ground of litigation, and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y were appointed was to afford a means of deciding whether a person charged with having stolen property had come by it rightfully or not. A defendant could clear himself of the felony by their oath that he had bought or received the thing openly in the way appointed by law.

从早期的判例集和判例汇编中可以看到，使用这种审判方式的案件几乎全部局限于由买卖或借贷而产生的权利主张。问题随即产生，即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否只是在格兰维尔写作时期就已经成为古老制度的痕迹呢？因为在征服者威廉征服英国前的几百年间，盎格鲁—撒克逊法就已经要求选出一定数量的官方证明人，在每次买卖中都会传唤其中两三人到场。设立这些证人的目的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作为债务诉讼的证明。他们要回溯到当偷盗和类似的违法行为是民事诉讼主因的时代，指派证人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方式来判定，当某人被指控偷盗财产时，他是否是以正当方式取得该财产的。如果这些证人发誓说，他是通过购买或以法律指定的方式公开获得该财产的，则被告就可以洗清重罪的指控。

Having been present at the bargain, the witnesses were able to swear to what they had seen and heard, if any question arose between the parties. Accordingly, their use was not confined to disposing of a charge of felony. But that particular service identifies the transaction witnesses of the Saxon period. Now we know that the use of these witnesses did not at once disappear under Norman influence. They are found with their old function in the laws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2_22] The language of Glanvill seems to

prove that they were still known under Henry II. He says that, if a purchaser cannot summon in the man from whom he bought, to warrant the property to him and defend the suit, (for if he does, the peril is shifted to the seller,) then if the purchaser has sufficient proof of his having lawfully bought the thing, de legittimo marcatu suo, it will clear him of felony. But if he has not sufficient suit, he will be in danger. [2_23] This is the law of William over again. It follows that purchasers still used the transaction witnesses.

如当事人之间产生问题，由于交易时证人在场，他们能就自己的所见所闻发誓作证。因此，其作用并不限于洗清重罪指控。但这种特定服务等同于撒克逊时期的交易见证人。现在我们知道这些证人的使用并没有在诺曼人的影响下立刻消失。在征服者威廉的法律中，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发挥古老的作用；而格兰维尔的说法似乎也证明，在亨利二世时代，他们仍然为人所知。他说如果买主不能传唤卖主来保证财产已归他，并为该诉讼辩护，（因为如果他能传唤的话，风险就转移到卖主身上），那么如果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已合法购得该物，他就能够洗清重罪的罪名。但如果他没有足够的随行证明人，那么处境就很危险。这是对征服者威廉之法律的重复。由此可知买主仍然使用交易见证人。

But Glanvill also seems to admit the use of witness to establish debts. [2_24] As the transaction witnesses were formerly available for this purpose, I see no reason to doubt that they still were, and that he was speaking of them here also. [2_25] Moreover, for a long time after Henry II., whenever an action was brought for a debt of which there was no written evidence, the plaintiff, when asked what he had to show for it, always answered “good suit,” and tendered his witnesses, who were sometimes examined by the court. [2_26] I think it is not straining the evidence to infer that the “good suit” of the

later reports was the descendant of the Saxon transaction witnesses, as it has been shown that Glanvill's secta was. [2_27]

然而格兰维尔似乎也承认使用证人可以确立债务。由于交易见证人以前也用于该目的，因此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怀疑他们当时已经不是了；格兰维尔此处提到的也应该是指他们。而且在亨利二世之后很长时间，在任何没有书面证据的债务诉讼中，只要原告被问到有什么可以证明的东西，他总是回答“正直的随行证明人”，并提供其证人，法庭有时会对他们进行询问。我认为由这些证据推出下面这点应该不算勉强，即后来的判例汇编中之“正直的随行证明人”就是撒克逊时期交易见证人的派生物，就像格兰维尔提到的原告随行证明人一样。

Assuming this step in the argument to have been taken, it will be well to recall again for a moment the original nature of the witness oath. It was confined to facts within the witnesses' knowledge by sight and hearing. But as the purposes for which witnesses were provided only required their presence when property changed hands, the principal case in which they could be of service between the parties to a bargain was when a debt was claimed by reason of the delivery of property. The purpose did not extend to agreements which were executory on both sides, because there no question of theft could arise. And Glanvill shows that in his time the King's Court did not enforce such agreements. [2_28] Now, if the oath of the secta could only be used to establish a debt where the transaction witnesses could have sworn, it will be seen, readily enough, how an accident of procedure may have led to a most important rule of substantive law.

假设论证中的这一步已经迈出，那我们最好再来回忆一下证人誓言最初的性质。它只局限于证人通过所见所闻而了解的事实。但由于提供证人的目的只是要求他们在财产转手时在场，故证人能在买卖当事人之间提供服务的主要案件就是由于财产交付而产生的债务权利主张诉讼。该目的不包括双方还未履行的协议，因为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偷盗的问题；而格兰维尔也表明，在他那个时代，王室法庭是不会强制实施这种协议的。如果这种原告随行证明人的誓言只能用于确立交易见证人可能发誓证明的债务关系，那么就很容易明白，一种程序的偶然性如何导致了实体法中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定的产生。

The rule that witnesses could only swear to facts within their knowledge, coupled with the accident that these witnesses were not used in transactions which might create a debt, except for a particular fact, namely, the delivery of property, together with the further accident that this delivery was quid pro quo, was equivalent to the rule that, when a debt was proved by witnesses there must be quid pro quo. But these debts proved by witnesses, instead of by deed are what we call simple contract debts, and thus beginning with debt, and subsequently extending itself to other contracts, is established our peculiar and most important doctrine that every simple contract must have a consideration. This was never the law as to debts or contracts proved in the usual way by the defendant's seal, and the fact that it applied only to obligations which were formerly established by a procedure of limited use, goes far to show that the connection with procedure was not accidental.

证人只能就他们所了解的事实发誓，这一规定以及除财产交付这一特定事实外，这些证人并没有用于可能产生债务诉讼的交易中这一偶然性；再加上另一偶然性，即此种交付是等价交换；上述三者结合就相当于下面的规则：当债务关系被证人证明时，一定存在等价交

换。但这些由证人而非契据证明的债务关系就是我们所谓的简单合同债务；故从债务开始，之后延伸到其他合同中，就建立了我们特有且非常重要的学说，即每一简单合同中，都一定有对价。对于用被告封印这种普遍方式证明的债务或合同来说，这一点从来都不是法律；而它只适用于之前由有限使用的程序建立起来的义务关系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说明与诉讼程序的联系并非偶然。

The mode of proof soon changed, but as late as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we find a trace of this original connection. It is said, “But the common law requires that there should be a new cause (i. e. consideration), whereof the country may have intelligence or knowledge for the trial of it, if need be, so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Public-weal.“ [2_29] Lord Mansfield showed his intuition of the historical grounds of our law when he said, “I take it that the ancient notion about the want of consideration was for the sake of evidence only; for when it is reduced into writing, as in covenants, specialties, bonds, etc., there was no objection to the want of consideration.“ [2_30]

证据的形式很快改变了，但迟至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我们仍能发现这一原始联系的踪迹。有人说：“但普通法要求应该有一新的诉因（即对价），这样陪审团需要时就可以根据它得到审理案件需要的信息和知识，因此这对公众利益来说是必要的”。曼斯菲尔德勋爵表现出了其对于我们法律的历史依据的直觉，他说：“我认为，缺少对价这一古老观念只是出于证据的需要，因为假如简化成书面形式，就像在盖印合同、契约合同、保证协议等一样，就不存在对缺少对价的异议。”

If it should be objected that the preceding argument is

necessarily confined to debt, whereas the requirement of consideration applies equally to all simple contracts, the answer is, that in all probability the rule originated with debt, and spread from debt to other contracts.

如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上述论证只限于债务，而对价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所有简单合同，那么对此的回答是，该规则完全可能起源于债务，并从债务延伸至其他合同。

But, again, it may be asked whether there were no other contracts proved by witness except those which have been mentioned. Were there no contracts proved in that way to which the accidental consideration was wanting? To this also there is an easy answer. The contracts enforced by the civil courts, even as late as Henry II., were few and simple. The witness procedure was no doubt broad enough for all the contracts which were made in early times. Besides those of sale, loan, and the like, which have been mentioned, I find but tw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These were the warranties accompanying a sale and suretyship which was referred t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ecture. Of the former, warranty of title was rather regarded as an obligation raised by the law out of the relation of buyer and seller than as a contract. Other express warranties were matters within the knowledge of the transaction witnesses, and were sworn to by them in Saxon times. [2_31]

但有人也许还会问，除那些已提到的合同外，是否不存在其他由证人证明的合同了？就没有缺少偶然对价却由该种方式来证明的合同吗？对这一点的回答也很简单。即使迟至亨利二世时期，由民事法院强制执行的合同也几乎没有而且非常简单。无疑，这种证明人程序很

宽泛，对早期签订的所有合同形式都足够用。除前面提到的买卖、借贷及类似合同外，我还发现了另外两种合同义务关系，即伴随买卖的担保和本讲开始时提到的保证。就前者而言，所有权担保与其被视为一种合同，倒不如是法律从买卖双方关系中得出的一种义务关系。其他的明示担保则是交易见证人了解范围内的事情，在撒克逊时代由见证人发誓证明。

But in the Norman period warranty was very little heard of, except with regard to land, and then it was decided by the duel. It so wholly disappeared, except where it was embodied in a deed, that it can have had no influence upon the law of consideration. I shall therefore assume, without more detail, that it does not bear upon the case.

但在诺曼时代，除通过决斗解决针对土地的担保外，几乎没听过使用担保的情况。除在契据中有所体现，担保几乎完全消失，故它不可能对关于对价的法律有影响。因此我不再详细解释，而是直接假定它与我们的讨论无关。

Then as to the pledge or surety, he no longer paid with his body, unless in very exceptional cases, but his liability was translated into money, and enforced in an action of debt. This time-honored contract, like the other debts of Glanvill's time, could be established by witness without a writing, [2_32] and in this case there was not such a consideration, such a benefit to the promisor, as the law required when the doctrine was first enunciated. But this also is unimportant, because his liability on the oath of witness came to an end, as well as that of the warrantor, before the foundations were laid for the rule which I am seeking to explain. A writing soon came

to be required, as will be seen in a moment.

再来讨论人质或保证。除极例外的情况下，人质不再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偿还，但其责任转化为了金钱，且在债务诉讼中得到强制执行。这种历史悠久的合同，就像格兰维尔时期其他债务一样，可以不用文书，只用证人就可以确立；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该学说最初提出时法律所要求的这种对价，这种对允诺人的利益。但这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在我正试图解释的规则基础打好之前，人质对证人以及担保人的誓言所承担的责任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马上可以看到，审判中很快就有了文书证明的要求。

The result so far is, that the only action of contract in Glanvill's time was debt, that the only debts recovered without writing were those which have been described, and that the only one of these for which there was not quid pro quo ceased to be recoverable in that way by the reign of Edward III.

到目前为止，结果是在格兰维尔时代，唯一的合同诉讼就是债务诉讼；唯一不用文书就能获得赔偿的债务诉讼就是我们上面描述的那些；而其中唯一一个不存在交换条件的诉讼也在爱德华三世时期无法再以此种方式获得赔偿。

But great changes were beginning in the reign of Henry II. More various and complex contracts soon came to be enforced. It may be asked, why was not the scope of the witness oath enlarged, or, if any better proof were forthcoming, why was not the secta done away with, and other oral testimony admitted? In any event, what can the law of Henry II.'s time have to do with consideration,

which not heard of until centuries later?

但在亨利二世时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更多种类、更为复杂的合同很快开始强制执行。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证人誓言的范围没有扩大呢？或者，如果更好的证据即将出现，为什么没有废除原告随行证明人，而承认其他口头证词呢？无论如何，亨利二世时期的法律与对价能有什么关系呢，毕竟人们几百年之后才听说对价？

It is manifest that a witness oath, which disposes of a case by the simple fact that it is sworn, is not a satisfactory mode of proof. A written admission of debt produced in court, and sufficiently identified as issuing from the defendant, is obviously much better. The only weak point about a writing is the means of identifying it as the defendant's, and this difficulty disappeared as soon as the use of seals became common. This had more or less taken place in Glanvill's time, and then all that a party had to do was to produce the writing and satisfy the court by inspection that the impression on the wax fitted his opponent's seal. [2_33] The oath of the secta could always be successfully met by wager of law, [2_34] that is, by a counter oath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 with the same or double the number of fellow-swearers produced by the plaintiff. But a writing proved to be the defendant's could not be contradicted. [2_35] For if a man said he was bound, he was bound. There was no question of consideration, because there was as yet no such doctrine. He was equally bound if he acknowledged all obligation in any place having a record, such as the superior courts, by which his acknowledgment could be proved. Indeed, to this day some securities are taken simply by an oral admission before the clerk of a court noted by him in his papers. The advantage of the writing was not only that it furnished better proof in the old cases, but also

that it made it possible to enforce obligations for which there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no proof at all.

证人誓言通过发誓，通过这样简单的事实来了结一个案子，显然并非一种令人满意的证明模式。在法庭上出示对债务关系的书面承认，并能充分认定是被告签发的，显然要好得多。书面证明唯一的缺点是，缺乏认定其为被告签发的方法，而这一难点在普遍使用封印之后就消失了。这一情况大致发生在格兰维尔时期，此后，当事人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出示该书面证明，并通过验证蜂蜡上的印迹与对方的封印相吻合而使法庭采信。原告随行证明人的誓言总能被誓证裁决成功对抗，即由被告方用数量相同或两倍于原告方的证明人为被告作出相反誓言。但文书如被证明是被告的，则不能被驳倒。因为如果某人说过自己有某种义务，他就有某种义务。这里不存在对价问题，因为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学说。如果他在任何有记录的地方承认了自己的所有义务，该记录可以证明他承认过，如高级法院，那么他也同样负有义务。事实上，直到今天，有些书面证明只需在法院书记官面前作出口头承认并由后者记录在案就可以取得。书面证明的优势不仅在于它在古老案件中提供了更好的证明，而且它还使强制执行一些除此之外根本无法证明的义务成为可能。

What has been said sufficiently explains the preference of proof by writing to proof by the old-fashioned witness oath. But there were other equally good reasons why the latter should not be extended beyond its ancient limits. The transaction witnesses were losing their statutory and official character. Already in Glanvill's time the usual modes of proving a debt were by the duel or by writing. [2_36] A hundred years later Bracton shows that the secta had degenerated to the retainers and household of the party, and he says that their oath raises but a slight presumption. [2_37]

以上所述足以解释为什么书面证明比老式的证人誓言更有优先权。不过还有其他同样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后者不应被延用至其古老的范围之外。交易见证人逐渐失去了他们的法定及官方身份。在格兰维尔时期，证明债务关系的普遍方式已经是通过决斗或文书进行。一百年后，布拉克顿表明，原告的随行证明人已经退而成为当事人的委托律师和家人，他说，他们的誓言仅能引起些微推测而已。

Moreover, a new mode of trial was growing up, which, although it was not made use of in these cases [2_38] for a good while, must have tended to diminish the estimate set on the witness oath by contrast.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our trial by jury. It was at first an inquest of the neighbors most likely to know about a disputed matter of fact. They spoke from their own knowledge, but they were selected by an officer of the court instead of by the interested party, and were intended to be impartial. [2_39] Soon witnesses were summoned before them, not, as of old, to the case by their oath, but to aid the inquest to find a verdict by their testimony. With the advent of this enlightened procedure, the secta soon ceased to decide the case, and it may well be asked why it did not disappear and leave no traces.

而且，一种新型审理模式也在发展，尽管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在这些案件中使用，但作为对比，这种新模式也必然趋向于降低人们对证人誓言的评估。这就是我们的陪审团审判的开始。它起源于向很有可能了解争议事件事实的邻人询问。他们依据自己的了解做出回答，但他们由法院官员而非有关当事人选出，故被认为是不偏不倚的。很快证人被传唤到他们面前，但并非像过去那样通过其誓言了结案件，而是通过其证词协助调查，从而作出裁决。伴随这一文明程序的到来，原告的随行证明人很快就不用于裁决案件了，那么人们很可能会问，为什么它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nservatism of the English law, and the fact that, before deeds came in, the only debts for which there had been a remedy were debts proved by the transaction witnesses, it would not have been a surprise to find the tender of suit persisting in those cases. But there was another reason still more imperative. The defence in debt where there was no deed was by wager of law. [2_40] A section of Magna Charta was interpreted to prohibit a man's being put to his law on the plaintiff's own statement without good witness. [2_41] Hence, the statute required witness—that is, the secta—in every case of debt where the plaintiff did not rely upon a writing. Thus it happened that suit continued to be tendered in those cases where it had been of old, [2_42] and as the defendant, if he did not admit the debt in such cases, always waged his law, it was long before the inquest got much foothold.

考虑到英国法的保守性，及在契据出现前唯一可获得救济的债务诉讼是由交易见证人证明的那些债务这一事实，我们在发现那些案件仍然提供随行证明人时就不会太惊讶了。但还有另一更为迫切的原因。即在没有契据的债务诉讼辩护中使用誓证裁决。《大宪章》中的一条规定被解释为，禁止在没有正直证明人的情况下，仅凭原告自己的陈述就将某人置于诉讼中。因此，制定法在原告不依赖文书的每个债务案件中都要求有证人，即原告随行证明人。因而那些案件中就继续提供在古老案件中存在的随行证明人，而且如果被告不承认该债务，就总会使用誓证裁决。在陪审团稳固立足前的很长时间一直如此。

To establish a debt which arose merely by way of promise or acknowledgment, and for which there had formerly been no mode of trial provided, you must have a writing, the new form of proof

which introduced it into the law. The rule was laid down, “by parol the party is not obliged.“ [2_43] But the old debts were not conceived of as raised by a promise. [2_44] They were a “duty” springing from the plaintiff's receipt of property, a fact which could be seen and sworn to. In these cases the old law maintained and even extended itself a little by strict analogy.

要确立仅仅通过允诺或承认产生的债务关系，且之前并未规定审判方式，就必须有书面证明，这种新的证据形式将这种债务引入了法律。该规则规定：“当事人不受口头言词的约束。”但人们并不认为那些古老的债务关系是由允诺形成的。它们是一种“义务”，起源于原告接受财产这一能够看得见并对其发誓的事实。在这些案件中，过去的法律保留了下来，甚至通过严格的类推还略有延伸。

But the undertaking of a surety, in whatever form it was clothed, did not really arise out of any such fact. It had become of the same nature as other promises, and it was soon doubted whether it should not be proved by the same evidence. [2_45] By the reign of Edward III., it was settled that a deed was necessary, [2_46] except where the customs of particular cities had kept the old law in force. [2_47]

但保证的承诺，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确实并非来源于任何这样的事实。其性质已经与其他允诺相同，且人们很快就质疑，为什么不能以相同证据证明它。到爱德华三世时期，除个别城市的习惯法还实行原有法律外，其他都已确定，保证中需要有契据。

This reign may be taken as representing the time when the

divisions and rules of procedure were established which have lasted until the present day. It is therefore worth while to repeat and sum up the condition of the law at that time.

该时期可被认为代表了一个时代，沿用至今的程序的划分与规则在该时期得以确立。因此有必要重复并总结当时的法律状况。

It was still necessary that the secta should be tendered in every action of debt for which no writing was produced. For this, as well as for the other reasons which have been mentioned, the sphere of such actions was not materially enlarged beyond those cases which had formerly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witness-oath. As suretyship was no longer one of these, they became strictly limited to cases in which the debt arose from the receipt of a quid pro quo. Moreover there was no other action of contract which could be maintained without a writing. New species of contracts were now enforced by an action of covenant, but there a deed was always necessary. At the same time the secta had shrunk to a form, although it was still argued that its function was more important in contract than elsewhere. It could no longer be examined before the court. [2_48] It was a mere survival, and the transaction witness had ceased to be an institution. Hence, the necessity of tendering the witness oath did not fix the limit of debt upon simple contract except by tradition, and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find that the action was slightly extended by analogy from its scope in Glanvill's time.

在所有没有出示书面证明的债务诉讼中，仍有必要提交原告的随行证明人。正因如此，及上述其他原因，这些诉讼的范围并没有大幅超出那些以前由证人誓言确定的案件。由于保证已不在其中，所以它

们的范围就严格局限于由接收交换物而产生的债务诉讼。而且已不存在任何没有书面证明而得到支持的其他合同诉讼。当时新型合同都是由盖印合同之诉执行的，而这种诉讼中都需要契据。与此同时，原告的随行证明人已经退化为一种形式，尽管仍然有人争辩说，它在合同里的功能比在其他地方更重要。它已不能再在法庭上接受讯问。它成为一种纯粹的历史残余，而交易见证人也不再是一项制度。因此，提交证人誓言的必要性并未将债务诉讼限制在除由传统确定外的简单合同上，所以我们在格兰维尔时代发现该诉讼的范围通过类推还略有扩展就毫不奇怪了。

But debt remained substantially at the point which I have indicated, and no new action available for simple contracts was introduced for a century. In the mean time the inversion which I have explained took place, and what was an accident of procedure had become a doctrine of substantive law. The change was easy when the debts which could be enforced without deed all sprung from a benefit to the debtor.

但债务诉讼实质上仍停留在我上面指出的那一点上，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都没有引入可用于简单合同的新型诉讼方式；同时又发生了我已解释过的那种逆转，即原本只是程序中的偶然性变成了实体法律的一种学说。当所有由债务人得到某种利益而产生的债务没有契据也可以执行时，这种变化就很容易发生。

The influence of the Roman law, no doubt, aided in bringing about this result.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in the reign of Henry II. most simple contracts and debts for which there was not the evidence of deed or witness were left to be enforced by the ecclesiastical courts, so far as their jurisdiction extended. [2_49]

Perhaps it was this circumstance which led Glanvill and his successors to apply the terminology of the civilians to common-law debts. But whether he borrowed it from the ecclesiastical courts, or went directly to the fountain-head, certain it is that Glanvill makes use of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echnical language of the Corpus Juris throughout his tenth book.

无疑，罗马法的影响也推动了这一结果的形成。我们会记得，在亨利二世时代，大部分没有契据或证人的简单合同和债务都是留给管辖权扩大至此的教会法院来执行的。也许正是这种情形使格兰维尔及其后继者们将民法学术语应用到普通法的债务上。但无论他是从教会法院借用的还是直接到源头上去找的，可以确定的是，格兰维尔在其著作的第十卷中从头到尾都使用了《法律大全》中的分类和专业术语。

There were certain special contracts in the Roman system called real, which bound the contractor either to return a certain thing put into his hands by the contractee, as in a case of lease or loan, or to deliver other articles of the same kind, as when grain, oil, or money was lent. This class did not correspond, except in the most superficial way, with the common-law debts. But Glanvill adopted the nomenclature, and later writers began to draw conclusions from it. The author of Fleta, a writer by no means always intelligent in following and adopting his predecessors' use of the Roman law, [2_50] says that to raise a debt there must be not only a certain thing promised, but a certain thing promised in return. [2_51]

罗马体系中有一种叫做要物契约的特殊合同，它要求立约人或归

还由承约人交给他的某种东西（如在租借或借贷情况下），或交付同类的其他物品（如借出粮食、油或金钱时）。这类合同与普通法的债务一点都不相符，尽管粗略看起来二者相似。但格兰维尔却采用了这一术语，后来的学者也开始由此得出结论。《弗莱塔》的作者——一位在罗马法使用方面追随和继承其先辈并不总是很明智的学者——说，要形成债务关系，不仅要有某种允诺的事物，而且要有某种允诺返还的事物。

If Fleta had confined his statement to debts by simple contract, it might well have been suggested by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e law. But as he also required a writing and a seal, in addition to the matter given or promised in return, the doctrine laid down by him can hardly have prevailed at any time. It was probably nothing more than a slight vagary of reasoning based upon the Roman elements which he borrowed from Bracton.

如果《弗莱塔》用简单合同将其论述局限于债务的话，则很可能受到当时法律状况的启发。但由于除要求给予或允诺返还之物以外，他还要求文书和封印，所以他阐述的学说在任何时代都是行不通的。这很可能只是他基于从布拉克顿那里借来的罗马法元素作出的有些异想天开的推理。

It only remains to trace the gradual appearance of consideration in the decisions. A case of the reign of Edward III. [2_52] seem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 parol obligation founded on voluntary payments by the obligee and one founded on a payment at the obligor's request. It also speaks of the debt or “duty” in that case as arising by cause of payments. Somewhat similar language is used in the next reign. [2_53] So, in the twelfth year of Henry IV.,

[2_54] there is an approach to the thought: “If money is promised to a man for making a release, and he makes the release, he will have a good action of debt in the matter.” In the next reign [2_55] it was decided that, in such a case, the plaintiff could not recover without having executed the release, which is explained by the editor on the ground that ex nudo pacto non oritur actio. Bu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 is, that from Edward I. to Henry VI. we find no case where a debt was recovered, unless a consideration had in fact been received.

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追溯对价是如何在裁决中逐渐出现的。爱德华三世时期的一个案件似乎区分了基于债权人自愿支付的口头义务和基于债务人要求支付的口头义务。该案还提到此案中的债务或“义务”来自支付。在下一个朝代中也使用了大致相似的说法。因此，亨利四世十二年时的思想已经接近下述思想：“如果允诺给某人金钱使他转让，而他实施了转让，那么他对此就能提起一个有效的债务诉讼。”下一个朝代对这种案件的裁决是，原告没有实施该转让前，不能获得赔偿。该判例编辑的解释依据是，无对价之口头契约不得诉请履行。但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发现，从爱德华一世到亨利六世，在没有实际接受对价前，没有一个债务诉讼的案件获得过赔偿。

Another fact to be noticed is, that since Edward III. debts arising from a transaction without writing are said to arise from contract, as distinguished from debts arising from an obligation. [2_56] Hence, when consideration was required as such, it was required in contracts not under seal, whether debts or not. Under Henry VI. quid pro quo became a necessity in all such contracts. In the third year of that reign [2_57] it was objected to an action upon an assumpsit for not building a mill, that it was not shown what the defendant was to have for doing it. In the thirty-sixth year of the

same reign (A.D.1459), the doctrine appears full grown, and is assumed to be familiar. [2_58]

另一需要注意的事实是，自爱德华三世以来，由没有文书的交易产生的债务都被说成是产生于合同的，以与产生于债权债务关系的债务加以区分。因此，当这样要求对价时，在没有加盖封印的合同中也是这样要求的，无论它是否形成债务。在亨利六世时期，交换条件在所有这类合同中成为一个必备要件。亨利六世三年时，在一个由于没有修建磨坊而提起的简式合约中，被告反驳说，原告没有表明他修建磨坊后能得到什么。到亨利六世三十六年（公元1459年），对价学说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并为人所熟知。

The case turned upon a question which was debated for centuries before it was settled, whether debt would lie for a sum of money promised by the defendant to the plaintiff if he would marry the defendant's daughter. But whereas formerly the debate had been whether the promise was not so far incident to the marriage that it belonged exclusively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piritual courts, it now touched the purely mundane doubt whether the defendant had had quid pro quo.

在该案了结前，我们先转向一个争论了几百年的问题，即当被告允诺，如果原告娶其女儿，他就给原告一笔钱，这笔钱是否构成债务？以前对该问题的争论是，该允诺是否为婚姻的附属条件，因此它专属于教会法院司法管辖的范围，但现在则涉及到纯粹的世俗问题，即被告是否有交换条件？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the fact formerly sworn to by the

transaction witnesses was a benefit to the defendant, namely, a delivery of the things sold or the money lent to him. Such cases, also, offer the most obvious form of consideration. The natural question is, what the promisor was to have for his promise. [2_59] It is only by analysis that the supposed policy of the law is seen to be equally satisfied by a detriment incurred by the promisee. It therefore not unnaturally happened that the judges, when they first laid down the law that there must be quid pro quo, were slow to recognize a detriment to the contractee as satisfying the requirement which had been laid down. In the case which I have mentioned some of the judges were inclined to hold that getting rid of his daughter was a sufficient benefit to the defendant to make him a debtor for the money which he promised; and there was even some hint of the opinion, that marrying the lady was a consideration, because it was a detriment to the promisee. [2_60] But the other opinion prevailed, at least for a time, because the defendant had had nothing from the plaintiff to raise a debt. [2_61]

我们应该还记得，以前由交易见证人发誓证明的事实是被告是否获得利益，即，他是否得到了卖给他的东西或借给他的钱。这类案件也提供了最明显的对价形式。这样很自然产生的问题是，允诺者会为其允诺得到什么。只有通过分析才能看到，设想的法律政策同样可以适用于由受约人造成的损害。因此，很自然地，当法官们最初规定必须有交换条件的法律时，他们并未马上意识到满足他们规定的要求时给承约人带来的损害。在我上面提到的案件中，有些法官倾向于认为，对被告来说，将女儿嫁出去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因此足以使他成为其允诺金钱的债务人；这一裁决中甚至还有一点暗示，即娶这位女子就是对价，因为它对受约人是一种损害。但另一观点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占了上风，因为被告没有从原告那里得到任何可以形成债务的东西。

So it was held that a service rendered to a third person upon the defendant's request and promise of a reward would not be enough, [2_62] although not without strong opinions to the contrary, and for a time the precedents were settled. It became established law that an action of debt would only lie upon a consideration actually received by and enuring to the benefit of the debtor.

因此人们认为，在被告请求并允诺给予报酬的情况下提供给第三人的某种服务不足以构成债务，尽管对此不乏强有力的相反意见，但却一度被确立为先例。因此下面这点成为了确定的法律，即只有当对价被债务人实际接受并对其利益有利时，才存在债务诉讼。

It was, however, no peculiarity of either the action or contract of debt which led to this view, but the imperfectly developed theory of consideration prevailing between the reigns of Henry VI. and Elizabeth. The theory the same in assumpsit, [2_63] and in equity. [2_64] Wherever consideration was mentioned, it was always as quid pro quo, as what the contractor was to have for his contract.

然而，导致这一观点的，既不是这种债务诉讼也不是这种债务合同的特殊性，而是在亨利六世和伊丽莎白统治期间盛行的并未完全发展起来的对价理论造成的。简式合约和衡平法中的理论与此相同。只要提到对价，就总是指交换条件，总是指立约人要从其合同中得到什么。

Moreover, before consideration was ever heard of, debt was the time-honored remedy on every obligation to pay money enforced by law, except the liability to damages for a wrong. [2_65] It has been

shown already that a surety could be sued in debt until the time of Edward III. without a writing, yet a surety receives no benefit from the dealing with his principal. For instance, if a man sells corn to A, and B says, “I will pay if A does not,” the sale does B no good so far as appears by the terms of the bargain. For this reason, debt cannot now be maintained against a surety in such a case.

此外，人们在听说对价之前，除不当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外，债务诉讼一直是由法律执行的历史悠久的赔偿方式。前面已经表明，在爱德华三世之前，保证人可在没有文书的情况下被提起债务诉讼，尽管他并没有从其与被保证人的交易中获益。比如，若某人将玉米卖给甲，而乙说：“如果甲不付钱，就由我来付”。依据交易条款，乙从这笔买卖中得不到任何好处。由于这个原因，在这种案件中就不能对保证人提起债务诉讼。

It was not always so. It is not so to this day if there is an obligation under seal. In that case, it does not matter how the obligation arose, or whether there was any consideration for it or not. But a writing was a more general way of establishing a debt in Glanvill's time than witness, and it is absurd to determine the scope of the action by considering only a single class of debts enforced by it. Moreover, a writing for a long time was only another, although more conclusive, mode of pro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action was the same, however it was proved. This was a duty or “duity” [2_66] to the plaintiff, in other words, that money was due him, no matter how, as any one may see by reading the earlier Year Books. Hence it was, that debt lay equally upon a judgment, [2_67] which established such a duty by matter of record, or upon the defendant's admission recorded in like manner. [2_68]

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今天，如果存在盖印的义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义务关系如何产生，或是否存在对价，都不重要。但在格兰维尔时代，文书是一种比证人更为普遍的确立债务诉讼的方式；而仅凭这种诉讼所执行的单独一类债务来确定诉讼的范围则是荒唐的。况且，在很长时间内，文书尽管更具决定性，但也仅是另外一种证明方式而已。无论如何证明，这种诉讼的基础都是一样的。对原告来说这是一笔收入，即无论以何种方式，这笔钱都应该给他；任何人都能从早期的《年鉴》中看到这一点。因此，依据判决（该判决通过法庭记录确定这种义务）或依据以同样方式记录下来的被告的承认，债务都同样可以成立。

To sum up, the action of debt has passed through three stages. At first, it was the only remedy to recover money due, except when the liability was simply to pay damages for a wrongful act. It was closely akin to—indeed it was but a branch of—the action for any form of personal property which the defendant was bound by contract or otherwise to hand over to the plaintiff. [2_69] If there was a contract to pay money, the only question was how you could prove it. Any such contract, which could be proved by any of the means known to early law, constituted a debt. There was no theory of consideration, and therefore, of course, no limit to either the action or the contract based upon the nature of the consideration received.

总之，债务诉讼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它是获得应付欠款的唯一救济方式，但当该责任仅仅是要为不当行为支付损害赔偿金时除外。它与被告受合同或其他方式约束而应交付给原告的任何形式的动产诉讼非常类似，实际上，它仅是后者的一个分支。如果存在要支付一定金钱的合同，唯一的问题就是你怎样去证明它。任何这样的合同，只要能够以早期法律承认的任何形式证明，就构成债务。当时没

有对价理论，因此，无论是诉讼还是合同，只要以收到对价的性质为基础，当然也都没有限制。

The second stage was when the doctrine of consideration was introduced in its earlier form of a benefit to the promisor. This applied to all contracts not under seal while it prevailed, but it was established while debt was the only action for money payable by such contracts. The precedents are, for the most part, precedents in debt.

第二阶段是对价学说以其早期形式——允诺人可获得的利益——引入法律。当它盛行时可以适用于所有没有盖印的合同，但当它确立时，债务诉讼是唯一可以依据这种合同获得金钱补偿的诉讼方式。有关先例大部分都是关于债务诉讼的先例。

The third stage was reached when a larger view was taken of consideration, and it was expressed in terms of detriment to the promisee. This change was a change in substantive law, and logically it should have been applied throughout. But it arose in another and later form of action, under circumstances peculiarly connected with that action, as will be explained hereafter.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new doctrine prevailed in the new action, and the old in the old, and that what was really the anomaly of inconsistent theories carried out side by side disguised itself in the form of a limitation upon the action of debt. That action did not remain, as formerly, the remedy for all binding contracts to pay money, but, so far as parol contracts were concerned, could only be used where the consideration was a benefit actually received by the promisor. With regard to obligations arising in any other way, it has

remained unchanged.

对对价的认识比以前更宽泛，而且用承约人遭受损害的说法表述时，就到了第三阶段。这种改变是实体法的一个改变，从逻辑上讲，它应适用于所有诉讼。但它产生于另一更晚的诉讼形式，且在与该诉讼有特定关联的形势下产生，这一点我下面还会解释。结果是新学说在新的诉讼形式里占了上风，旧学说在旧式诉讼中是主导，而实际上由不一致的理论并行导致的不正常现象却以债务诉讼存在局限的形式被掩盖了。这种债务诉讼没有像以前那样，成为所有具有约束力的支付金钱合同的救济方式，而是——就口头合同而言——只能当对价作为允诺人实际收到的利益时使用。至于以其他任何方式产生的义务关系，它都保持不变。

I must now devote a few words to the effect upon our law of the other mode of proof which I have mentioned. I mean charters. A charter was simply a writing. As few could write, most people had to authenticate a document in some other way, for instance, by making their mark. This was, in fact, the universal practice in England until the introduction of Norman customs. [2_70] With them seals came in. But as late as Henry II. they were said by the Chief Justice of England to belong properly only to kings and to very great men. [2_71] I know no ground for thinking that an authentic charter had any less effect at that time when not under seal than when it was sealed. [2_72] It was only evidence either way, and is called so in many of the early cases. [2_73] It could be waived, and suit tendered in its place. [2_74] Its conclusive effect was due to the satisfactory nature of the evidence, not to the seal. [2_75]

现在我必须就上面提到的其他证明方式——契据，对我们法律所

产生的影响做一下说明。契据就是一种文书，由于当时几乎没有人会写字，大多数人只好用别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文件是真的，比如画押。事实上，在诺曼习惯法引入前，这一直是英格兰的普遍做法。诺曼人带来了封印。但迟至亨利二世时代，英格兰首席大法官还说，封印只属于国王及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当时一份真实契据没有盖印时其效力会比盖印之后弱。两种方式都仅是证据而已；早期的许多案例也正是这样称呼它的。而且也可以不用契据，代之以提供随行证明人。其决定性效力是由于它令人满意的证据性质，并非由于那个封印。

But when seals came into use they obviously made the evidence of the charter better, in so far as the seal was more difficult to forge than a stroke of the pen. Seals acquired such importance, that, for a time, a man was bound by his seal, although it was affixed without his consent. [2_76] At last a seal came to be required, in order that a charter should have its ancient effect. [2_77]

但当封印开始投入使用后，它显然提高了契据的证明效力，因为，比起用笔这么一划，封印则更难伪造。封印取得了重要地位，以至在一段时间里，一个人的封印就会使他负有责任，即使盖印时并未征得其同意。最后，如一份契据要产生以前那种效力，就要求必须加盖封印。

A covenant or contract under seal was no longer a promise well proved; it was a promise of a distinct nature, for which a distinct form of action came to be provided. [2_78] I have shown how the requirement of consideration became a rule of substantive law, and also why it never had any foothold in the domain of covenants. The exception of covenants from the requirement became a rule of

substantive law also. The man who had set his hand to a charter, from being bound because he had consented to be, and because there was a writing to prove it, [2_79] was now held by force of the seal and by deed alone as distinguished from all other writings. And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an inadequate theory, a seal was said to a consideration.

盖印合同，即加盖封印的合同不再是得到很好证明的允诺，而成为了具有独特性质的允诺，针对它也规定了一种独特的诉讼形式。前面我已说明对对价的要求是怎样成为实体法规则的，以及它为何从未在盖印合同领域中立足。盖印合同不在要求之内也成为实体法的一个规则。某人在契据上签了字，就从因为他已同意并有文书证明而负有责任，过渡到现在仅凭封印和契据（与其他所有文书不同）的效力而负有责任。为保持一个不完备理论的统一性，封印被说成包含对价的意思。

Nowadays, it is sometimes thought more philosophical to say that a covenant is a formal contract, which survives alongside of the ordinary consensual contract, just as happened in the Roman law. But this is not a very instructive way of putting it either. In one sense, everything is form which the law requires in order to make a promise binding over and above the mere expression of the promisor's will. Consideration is a form as much as a seal.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one form is of modern introduction, and has a foundation in good sense, or at least in with our common habits of thought, so that we do not notice it, whereas the other is a survival from an older condition of the law, and is less manifestly sensible, or less familiar. I may add,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latter consideration, the law of covenants is breaking down. In many States it is held that a mere scroll or flourish of the pen is a

sufficient seal. From this it is a short step to abolis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ealed and unsealed instruments altogether, and this has been done in some of the Western States.

现在，如果说盖印合同是一种正式合同，正如罗马法中曾经发生的一样，与普通的合意合同一起保留了下来，有时人们认为这种说法更合理。但这种说法也不是很有启发性。在某种意义上，为使允诺在允诺人意志的单纯表达外还具有约束力，法律提出了各种形式的要求。对价是一种具有与封印同样效力的形式，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前一种形式是在现代引入的，具有明智的基础，或至少处于我们通常的思维习惯范畴内，因此我们没有注意到它；而后一种则是过去的法律中保留下来的，让人不能那么明显感觉到，或者不那么熟悉。我还要补充一点，即在第二种考虑的影响下，有关盖印合同的法律正在走向消亡。美国很多州都认为，用笔一划或一挥就足以构成封印。这里离完全废除盖印与不盖印文件之间的区别只有一小步，而西部的一些州已经这样做了。

While covenants survive in a somewhat weak old age, and debt has disappeared, leaving a vaguely disturbing influence behind it, the whole modern law of contract has grown up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action of Assumpsit, which must now be explained.

盖印合同仅在不那么遥远的古代留存下来，债务诉讼也消失了，只隐约留下了些扰乱性影响，因而，整个现代合同法是通过简式合约发展起来的，这里必须要加以解释。

After the Norman Conquest all ordinary actions were begun by a writ issuing from the king, and ordering the defendant to be

summoned before the court to answer the plaintiff. These writs were issued as a matter of course, in the various well-known actions from which they took their names. There were writs of debt and of covenant; there were writs of trespass for forcible injuries to the plaintiff's person, or to property in his possession, and so on. But these writs were only issued for the actions which were known to the law, and without a writ the court had no authority to try a case. In the time of Edward I. there were but few of such actions. The cases in which you could recover money of another fell into a small number of groups, for each of which there was a particular form of suing and stating your claim.

诺曼征服后，所有普通诉讼都始于国王签发令状，命令传唤被告到庭对原告作出答辩。这些令状在各种众所周知的诉讼中作为例行公事签发，其名称也源于此。当时有债务诉讼令状和盖印合同令状，有针对暴力伤害原告人身的侵害之诉令状，或者侵犯原告占有之财产的侵犯之诉令状等等；但这些令状只针对法律涉及的诉讼签发，而没有令状，法庭就无权审理案件。在爱德华一世时期，诉讼只有很少的几种。要求别人归还金钱的案件分成了少数几类，且每种都有特定的起诉和陈述主张的形式。

These forms had ceased to be adequate. Thus there were many cases which did not exactly fall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a trespass, but for which it was proper that a remedy should be furnished. In order to furnish a remedy, the first thing to be done was to furnish a writ. Accordingly, the famous statute of 13 Edward I., c. 24, authorized the office from which the old writs issued to frame new ones in cases similar in principle to those for which writs were found, and requiring like remedy, but not exactly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writs already in use.

这些形式后来不够用了。因此，许多案件并不完全符合侵害之诉的定义，但又确实应该给它提供救济。为了提供救济，首先要做的是提供一个令状。因此，著名的制定法爱德华一世十三年第24号令授权签发旧令状的部门制定新的令状，用于原则上与可以找到令状的案件相似的案件，它们要求类似救济，但又不完全属于已有令状范围内的案件。

Thus writs of trespass on the case began to make their appearance; that is, writs stating a ground of complaint analogous to a trespass, but not quite amounting to a trespass as it had been sued for in the older precedents. To take an instance which is substantially one of the earliest cases, suppose that a man left a horse with a blacksmith to be shod, and he negligently drove a nail into the horse's foot. It might be that the owner of the horse could not have one of the old writs, because the horse was not in his possession when the damage was done. A strict trespass property could only be committed against the person in possession of it. It could not be committed by one who was in possession himself. [2_80] But as laming the horse was equally a wrong, whether the owner held the horse by the bridle or left it with the smith, and as the wrong was closely analogous to a trespass, although not one, the law gave the owner a writ of trespass on the case. [2_81]

间接侵害之诉的令状就这样开始出现，这种令状陈述的起诉依据与侵害之诉类似，但还没有达到过去先例中提起的侵害之诉。举一个基本上是最早的案例：假设某人将一匹马留在铁匠铺里钉掌，而铁匠因疏忽将一根钉子钉进了马掌。马主人可能无法得到一个已有令状，因为造成该损害时这匹马不在其占有之中。严格意义上的财产侵害只有在某人占有该财产时才能实施，而且也不能由占有人自己实施。但

由于无论是主人牵着缰绳控制着马还是把它留在铁匠那里，把马弄跛同样都是不当行为，且由于该不当行为与侵害非常类似（虽然不是侵害），故法律签发给马主人一份间接侵害之诉的令状。

An example like this raises no difficulty; it is as much an action of tort for a wrong as trespass itself. No contract was stated, and none was necessary on principle. But this does not belong to the class of cases to be considered, for the problem before us is to trace the origin of assumpsit, which is an action of contract. Assumpsit, however, began as an action of trespass on the case, and the thing to be discovered is how trespass on the case ever became available for a mere breach of agreement.

这种例子不会产生什么困难，正如侵害之诉本身，它就是一起针对不当行为的侵权诉讼。其中没有提到合同，而且原则上也根本不需要。但这不属于我们要考察的那类案件，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追溯简式合约的起源，而简式合约是一种合同诉讼。然而，简式合约是以间接侵害之诉开始的。我们要揭示的问题是，间接侵害之诉是怎样逐渐适用于单纯的违反协议行为的。

It will be well to examine some of the earliest cases in which an undertaking (assumpsit) was alleged. The first reported in the books is of the reign of Edward III. [2_82] The plaintiff alleged that the defendant undertook to carry the plaintiff's horse safely across the Humber, but surcharged the boat, by reason of which the horse perished. It was objected that the action should have been either covenant for breach of the agreement, or else trespass. But it was answered that the defendant committed a wrongful act when he surcharged the boat, and the objection was overruled. This case

again, although an undertaking was stated, hardly introduced a new principle. The force did not proceed directly from the defendant, to be sure, but it was brought to bear by the combination of his overloading and then pushing into the stream.

我们最好考察一下主张承诺（简式合约）的一些早期案例。判例集里记录的首个案例发生在爱德华三世时期。原告主张，被告承诺将原告的马安全运过亨伯河，但船却超载了，马也因此淹死了。被告抗议说，该诉讼应该要么是违反协议的盖印合同之诉，要么是侵害之诉。但原告答辩说，被告将船超载时实施了不当行为，因此被告的异议被驳回。同样，尽管该案提到了承诺，但几乎没有引入新的原则。的确，暴力并非由被告直接实施，但却是由他超载及推船入水的合并行为造成的。

The next case is of the same reign, and goes further. [2_83] The writ set forth that the defendant undertook to cure the plaintiff's horse of sickness (manucepit equum praedicti W. de infirmirate), and did his work so negligently that the horse died. This differs from the case of laming the horse with a nail in two respects. It does not charge any forcible act, nor indeed any act at all, but a mere omiss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states an undertaking, which the other did not. The defendant at once objected that this was an action for a breach of an undertaking, and that the plaintiff should have brought covenant. The plaintiff replied, that he could not do that without a deed, and that the action was for negligently causing the death of the horse; that is, for a tort, not for a breach of contract. Then, said the defendant, you might have had trespass. But the plaintiff answered that by saying that the horse was not killed by force, but died per def. de sa cure; and upon this argument the writ was adjudged good, Thorpe, J. saying that he had seen a

man indicted for killing a patient by want of care (default in curing), whom he had undertaken to cure.

下一案例发生在同一时期，而且走得更远。该令状指出，被告承诺为原告治好马的病（manucepit equum praedicti W. de infirmirate），但治病时由于疏忽导致马死亡。该案与用钉子将马致跛案有两方面的不同。它没有指控任何暴力行为，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行为，只是单纯的疏忽。另一方面，它提到了承诺，而上一起案件却没有。被告马上反驳说，这是一个违反承诺之诉，原告应提起盖印合同之诉。原告回答说，没有契据他无法提起这种诉讼，且这一诉讼针对的是由于被告疏忽致马死亡，即针对的是侵权行为，而非违反合同之行为。那么，被告说你应该提起侵害之诉。但原告答辩说，这匹马并非由于暴力致死，而是在治病过程中死的。基于这一论证，该令状被裁定为有效。索普大法官说他曾看到某人被指控承诺治好别人的病，结果由于懈怠（治疗上的疏忽）而致病人死亡。

Both these cases, it will be seen, were dealt with by the court as pure actions of tort, notwithstanding the allegation of an undertaking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 But it will also be seen that they are successively more remote from an ordinary case of trespass. In the case last stated, especially, the destroying force did not proceed from the defendant in any sense. And thus we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question, what possible analogy could have been found between a wrongful act producing harm, and a failure to act at all?

可以看到，在这两起案件中，尽管都有对被告承诺的主张，但法院却当作单纯的侵权诉讼来处理。但我们也能看出，这两起案件正一步一步偏离普通侵害之诉的案件。尤其在最后提到的案例中，从任何

方面来讲，致马死亡的力量都不是被告实施的。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即在导致伤害的不当行为与根本不作为之间可能找到什么类似之处呢？

Before I attempt to answer it, let me illustrate a little further by examples of somewhat later date. Suppose a man undertook to work upon another's house, and by his unskilfulness spoiled his employer's timbers; it would be like a trespass, although not one, and the employer would sue in trespass on the case. This was stated as clear law by one of the judges in the reign of Henry IV. [2_84] But suppose that, instead of directly spoiling the materials, the carpenter had simply left a hole in the roof through which the rain had come in and done the damage. The analogy to the previous case is marked, but we are a step farther away from trespass, because the force does not come from the defendant. Yet in this instance also the judges thought that trespass on the case would lie. [2_85] In the time of Henry IV. the action could not have been maintained for a simple refusal to build according to agreement; but it was suggested by the court, that, if the writ had mentioned “that the thing had been commenced and then by not done, it would have been otherwise.“ [2_86]

在试图回答该问题前，我再举几起后来发生的案例来做进一步说明。假设某人承诺为另一人修建房屋，但由于技术不熟练，毁坏了雇主的木料；这很像侵害（尽管不完全是），所以雇主可以间接侵害之诉起诉，亨利四世时期的一位法官曾说这是明确的法律。但假设情况是这样的：该木匠没有直接毁坏木料，只在房顶上留了一个洞，雨水从洞中漏进来造成了损害。这与前一案件有很明显的类似，但我们离侵害又更远了一步，因为破坏力量并非来自被告。但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同样认为可以提起间接侵害之诉。在亨利四世时期，如果仅仅是

拒绝按协议建造则不能提起诉讼；但法院认为，如果令状提到“某事已开始做了，后来没有做完，则是另一种情况。

I now recur to the question, what likeness could there have been between an omission and a trespass sufficient to warrant a writ of trespass on the case? In order to find an answer it is essential to notice that in all the earlier cases the omission occurred in the course of dealing with the plaintiff's person or property, and occasioned damage to the one or the other. In view of this fact, Thorpe's reference to indictments for killing a patient by want of care, and the later distinction between neglect before and after the task is commenced, are most pregnant. The former becomes still more suggestive when it is remembered that this is the first argument or analogy to be found upon the subject.

现在再回到刚才的问题：在不作为和足以对其签发间接侵害之诉的侵害之间能有什么相似之处呢？要找到答案，关键是要注意到在所有这些早期案例中，不作为都发生在与原告的人身或财产的接触过程中，并引起对人身或财产的损害。鉴于这一事实，索普法官提到的对由于懈怠而致病人死亡的起诉，以及后来对事情开始之前和之后疏忽的区分，就非常有启发性。如果我们记得前者是关于该问题所发现的第一个论证或类推的话，那它就更具启发性了。

The meaning of that analogy is plain. Although a man has a perfect right to stand by and see his neighbor's property destroyed, or, for the matter of that, to watch his neighbor perish for want of his help, yet if he once intermeddles he has no longer the same freedom. He cannot withdraw at will. To give a more specific example, if a surgeon from benevolence cuts the umbilical cord of a

newly-born child, he cannot stop there and watch the patient bleed to death. It would be murder wilfully to allow death to come to pass in that way, as much as if the intention had been entertained at the time of cutting the cord. It would not matter whether the wickedness began with the act, or with the subsequent omission.

这个类推的意义很清楚。尽管一个人完全有权看着邻居的财产被毁坏而袖手旁观，或看着邻居没有得到其帮助而死亡，但如果他一旦介入，他就不再有同样的自由，他不能随心所欲地退出。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如果某外科医生出于仁义而剪断一个新生儿的脐带，他不能就此停住，然后看着病人失血而死。如果以这种方式任其死亡，那就是谋杀，与他如果在剪断脐带时就怀有该意图相同。至于这种邪恶行为究竟是从实施该行动时开始还是从之后的不作为开始，都无关紧要。

The same reasoning applies to civil liability. A carpenter need not go to work upon another man's house at all, but if he accepts the other's confidence and intermeddles, he cannot stop at will and leave the roof open to the weather. So in the case of the farrier, when he had taken charge of the horse, he could not stop at the critical moment and leave the consequences to fortune. So, still more clearly, when the ferryman undertook to carry a horse across the Humber, although the water drowned the horse, his remote acts of overloading his boat and pushing it into the stream in that condition occasioned the loss, and he was answerable for it.

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民事责任。一个木匠根本不需要去帮另一人修建房屋，但如他接受别人的信任并介入其中，那他就不能随便停下，任由风雨毁坏屋顶。因此在马蹄铁匠案中，在他接管这匹马后，

他就不能在关键时刻停手，而听天由命。因此当渡船夫承诺将马运到亨伯河对岸时，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尽管是水淹死了马，但这一损失是由他超载船只并在超载情况下推船入水的间接行为造成的，所以他要对此承担责任。

In the foregoing cases the duty was independent of contract, or at least was so regarded by the judges who decided them, and stood on the general rules applied to human conduct even by the criminal law. The immediate occasion of the damage complained of may have been a mere omission letting in the operation of natural forces. But if you connect it, as it was connected in fact, with the previous dealings, you have a course of action and conduct which, taken as a whole, has caused or occasioned the harm.

在上述案件中，义务是独立于合同的，或至少裁决这些案件的法官们这样认为，其依据是适用于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规则，甚至是刑法规则。造成损害遭到起诉，而损害的直接起因可能只是不作为，听任自然力量的摆布。但如果把它与前面的活动联系起来（事实上也确实有联系），就会得到一个行动过程和行为，二者作为一个整体，导致或造成了该损害。

The objection may be urged, to be sure, that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step from holding a man liable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acts which he might have prevented, to making him answerable for not having interfered with the course of nature when he neither set it in motion nor opened the door for it to do harm, and that there is just that difference between making a hole in a roof and leaving it open, or cutting the cord and letting it bleed, on the one side, and the case of a farrier who receives a sick horse and omits

proper precautions, on the other. [2_87]

不可否认，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从认为某人应对其本可以阻止却未阻止的行为后果负责任，到让他对其没有进行干涉的自然过程（他既没有发动，也没有为损害的发生打开方便之门）负责任之间还有很大差别；而且一方面，在房顶上留个洞放着不管，或剪断脐带让它流血，另一方面，马医收下病马后没有采取恰当的预防措施；这两方面正存在上述两者之间的区别。

There seem to be two answers to this. First, it is not clear that such a distinction was adverted to by the court which decided the case which I have mentioned. It was alleged that the defendant performed his cure so negligently that the horse died. It might not have occurred to the judges that the defendant's conduct possibly went no further than the omission of a series of beneficial measures. It was probably assumed to have consisted of a combination of acts and neglects, which taken as a whole amounted to an improper dealing with the thing.

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两种答辩。首先，我上面提到的裁决该案件的法院有没有提及这样的区分并不清楚。原告提出，被告在医治病马时太疏忽而导致马死亡。法官们很可能没有想到，被告的行为可能只是没有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治疗的措施。他们很可能认为，其行为既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二者作为一个整体，就相当于对事情处理不当。

In the next place, it is doubtful whether the distinction is a sound one on practical grounds. It may well be that, so long as one

allows a trust to be reposed in him, he is bound to use such precautions as are known to him, although he has made no contract, and is at liberty to renounce the trust in any reasonable manner. This view derives some support from the issue on which the parties went to trial, which was that the defendant performed the cure as well as he knew how, without this, that the horse died for default of his care (cure?). [2_88]

第二，从实用角度看，这种区分是否合理也令人怀疑。事情很可能是这样：只要某人允许别人信任自己，他就有责任采取自己知道的所有预防措施来治疗，尽管他并未订立合同，且完全有以任何合理方式宣布放弃这一信任的自由。这一观点也可从当事人提起诉讼的系争点上得到一些支持，即被告知道怎样医治，以前也进行过医治，而由于没进行这种医治，导致马死于缺乏照料。

But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 allegation of an undertaking conveyed the idea of a promise, as well as that of an entering upon the business in hand. Indeed, the latter element is sufficiently conveyed, perhaps, without it. It may be asked, therefore, whether the promise did not count for something in raising a duty to act. So far as this involves the consequence that the action was in fact for the breach of a contract, the answer has been given already, and is sustained by too great a weight of authority to be doubted. [2_89] To bind the defendant by a contract, an instrument under seal was essential. As has been shown, already, even the ancient sphere of debt had been limited by this requirement, and in the time of Edward III. a deed was necessary even to bind a surety. It was so a fortiori to introduce a liability upon promises not enforced by the ancient law. Nevertheless, the suggestion was made at an early date, that an action on the case for damage by negligence, that is,

by an omission of proper precautions, alleging an undertaking by way of inducement, was in fact an action of contract.

但不可否认，承诺的主张表达了允诺及介入这件事情的意思。实际上，也许即使没有承诺的主张，后一要件也得到了充分表达。因此可能有人会问，允诺在产生行动的义务方面是否没有多大作用？只要这涉及到的后果是，该诉讼事实上是由违反合同而提起的，那么答案在上面已经给出，且得到极具分量的判例的支持，不可能再去怀疑它。要使被告受到合同约束，一份加盖封印的文契必不可少。如上所示，即使古老的债务诉讼范围也受到这一要求的限制，在爱德华三世时期，即使要约束证明人，也必须有契据。那么要引入基于允诺的责任（古代法不予执行）就更是如此。然而，这一建议曾在早期提出过，即由于疏忽和没有采取恰当的预防措施而导致的损害，并以诱因方式主张承诺提起的间接侵害之诉，实际是一种合同诉讼。

Five years after the action for negligence in curing a horse, which has been stated, an action was brought [2_90] in form against a surgeon, alleging that he undertook to cure the plaintiff's hand, and that by his negligence the hand was maimed. There was, however, this difference, that it was set forth that the plaintiff's hand had been wounded by one T.B. And hence it appeared that, however much the bad treatment may have aggravated matters, the maiming was properly attributable to T.B., and that the plaintiff had an action against him. This may have led the defendant to adopt the course he did, because he felt uncertain whether any action of tort would lie. He took issue on the undertaking, assuming that to be essential to the plaintiff's case, and then objected that the writ did not show the place of the undertaking, and hence was bad, because it did not show whence the inquest should be summoned to speak to that point. The writ was adjudged bad on that ground, which

seems as if the court sanctioned the defendant's view. Indeed, one of the judges called it an action of covenant, and said that “of necessity it was maintainable without specialty, because for so small a matter a man cannot always have a clerk at hand to write a deed” (pur faire especially). At the same time the earlier cases which have been mentioned were cited and relied on, and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ourt was not prepared to go beyond them, or to hold that the action could be maintained on its merits apart from the technical objection. In another connection it seems to have considered the ac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respass. [2_91]

在上述医治病马过失诉讼发生五年后，另一诉讼以同样形式起诉某外科医生，主张该医生承诺治疗原告的手，但由于其过失，导致原告的手残疾。不过，这里有一点不同，据其解释，原告的手之前被一个叫T. B. 的人弄伤了。如此看来，无论糟糕的治疗如何加重了伤势，致残的责任都应归T. B. ，原告应对T. B. 提起诉讼。这或许导致被告采取他后来的做法，因为他不能确定是否可以提起侵权之诉。他把系争点放在了承诺上，认为承诺对原告来说至关重要，然后反驳说，令状没有地方提到承诺，因此该令状无效，因为它没有写明在什么地方应传唤调查陪审团就这一点发表意见。该令状基于上述理由被判无效，这似乎表明法院认可了被告的观点。确实，有位法官曾将其称为盖印合同之诉，并说，“出于必要，没有盖印契据也可以支持盖印合同之诉，因为人们不可能总是为这么小的事情，随时带着书记员书写契据（pur faire especially）”。同时，前面提到的早期案例也被引用并被作为依据，显然，该法院并不准备超越它们，也不认为该诉讼可以因为它除技术性反驳之外的法律意义而得到支持；而在另一方面，法院似乎从侵害之诉的角度来考虑这种诉讼。

Whatever questions this case may suggest, the class of actions which alleged an undertaking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

continued to be dealt with as actions of tort for a long time after Edward III. The liability was limited to damage to person or property arising after the defendant had entered upon the employment. And it was mainly through reasoning drawn from the law of tort that it was afterwards extended, as will be seen.

无论该案件可能表明什么问题，在爱德华三世之后很长时间里，这类主张被告承诺的诉讼都继续被当作侵权诉讼来处理。责任也局限于被告开始从事该工作后对人身或财产造成的损害。这种责任后来主要通过由侵权法得出的推理得以扩展，我们下面还会看到这一点。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 it was probably still the law that the action would not lie for a simple failure to keep a promise. [2_92] But it had been several times suggested, as has been shown, that it would be otherwise if the omission or neglect occurred in the course of performance, and the defendant's conduct had been followed by physical damage. [2_93] This suggestion took its most striking form in the early years of Henry VI., when the case of the carpenter leaving a hole in the roof was put. [2_94] When the courts had got as far as this, it was easy to go one step farther, and to allow the same effect to an omission at any stage, followed by similar damage.

在亨利六世统治初期，法律很可能仍然不支持仅仅由于未能遵守允诺而提起的诉讼。但如上所述，法院已数次提出，如果不作为或过失发生在事情进行当中，且实际损害继被告行为之后发生，情况就不同了。这一建议在亨利六世早期以非常引人注目的方式表现出来，当时发生了木匠在屋顶留了个洞的案子。法院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么远，再向前走一步就很容易了，即对发生在任何阶段、之后又发生类似损

害的不作为，都认为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What is the difference in principle, it was asked, a few years later, [2_95] between the cases where it is admitted that the action will lie, and that of a smith who undertakes to shoe a horse and does not, by reason of which the horse goes lame,—or that of a lawyer, who undertakes to argue your case, and, after thus inducing you to rely upon him, neglects to be present, so that you lose it? It was said that in the earlier instances the duty was dependent on or accessory to the covenant, and that, if the action would lie on the accessory matter, it would lie on the principal. [2_96] It was held on demurrer that an action would lie for not procuring certain releases which the defendant had undertaken to get.

几年后有人问，在法院承认诉讼成立的那些案件和铁匠或律师案之间原则上有什么区别？某铁匠承诺为一匹马钉铁掌但没有钉，结果把马弄跛了；某律师承诺为你的案子辩护，并这样诱使你依赖他，随后又由于疏忽没有出庭，导致你输了官司。有人说，在这些早期案例中，义务依赖或附属于盖印合同，因此，如果诉讼可以靠这些附属事项成立，则它也能靠主要事项成立。有人在抗辩时主张，如被告未取得其试图获得的某种豁免文书就可以提起诉讼。

Five years later another case [2_97] came up, which was very like that of the farrier in the reign of Edward III. It was alleged that the defendant undertook to cure the plaintiff's horse, and applied medicine so negligently that the horse died. In this, as in the earlier case, the issue was taken on the assumpsit. And 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omission and an act was clearly stated, the declaration was held not to mean necessarily anything more than an omission,

and it was said that but for the undertaking the defendant would have owed no duty to act. Hence the allegation of the defendant's promise was material, and an issue could properly be taken on it.

五年后发生了另一起案子，与爱德华三世时期的那宗马医案十分类似。起诉状主张，被告承诺治疗原告的马，但由于用药疏忽导致马死亡。在该案中，与之前案件相同，系争点都在被告的承诺上。由于当时已清楚阐明不作为与行动之间的区别，因此法院认为该诉状主张的不过是不作为而已，并且认为假如没有承诺，被告没有任何采取行动的义务。因此，对被告允诺的指控有实质意义，完全可以将其作为系争点。

This decision distinctly separated from the mass of actions on the case a special class arising out of a promise as the source of the defendant's obligation, and it was only a matter of time for that class to become a new and distinct action of contract. Had this change taken place at once, the doctrine of consideration, which was first definitely enunciated about the same time, would no doubt have been applied, and a quid pro quo would have been required for the undertaking. [2_98] But the notion of tort was not at once abandoned. The law was laid dow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arlier decisions, and it was said that the action would not lie for a failure to keep a promise, but only for negligence after the defendant had entered upon his undertaking. [2_99]

这一裁决将一类特殊诉讼从大量间接侵害之诉中明确区分开来，这类诉讼是由被告的责任来源于其允诺而产生的，它们要成为一种全新的、独立的合同诉讼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假如这一改变立刻发生，

则在大概同时才首次得到明确阐述的对价学说无疑也会得到应用，而对承诺也会要求有交换条件。但侵权的概念并未马上丢弃。有关法律是在亨利七世初期依据早期裁决制定的，它规定，不能因为未能遵守允诺而提起诉讼，仅在被告已开始执行其承诺后出现过失时才能提起诉讼。

So far as the action did not exceed the true limits of tort, it was immaterial whether there was a consideration for the undertaking or not. But when the mistake was made of supposing that all cases, whether proper torts or not, in which an assumpsit was alleged, were equally founded on the promise, one of two erroneous conclusions was naturally thought to follow. Either no assumpsit needed any quid pro quo, [2_100] as there was clearly none in the older precedents, (they being cases of pure tort,) or else those precedents were wrong, and a quid pro quo should be alleged in every case. It was long recognized with more or less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e limit, that, in cases where the gist of the action was negligent damage to property, a consideration was not necessary. [2_101] And there are some traces of the notion that it was always superfluous, as late as Charles I.

只要该诉讼未超出侵权的真正范围，则对该承诺来讲，有无对价都不重要。但如错误地认为所有主张简式合约的案件，无论是否真正的侵权案件，都同样以允诺为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很自然就会得出下述两个错误结论之一。要么认为简约之诉都不需要交换条件，正如过去先例中不存在一样（它们是纯粹的侵权案件），要么认为那些先例都是错误的，每一案件都要主张交换条件。长期以来，人们对真正的界限多少有所了解，他们一致认为在诉讼要点是对财产造成过失性损害的案件中，对价不是必需的。但迟至查理一世时，还有这样一种观点的踪迹，即它总是多余的。

In a case of that reign, the defendant retained an attorney to act in a suit for a third person, and promised to pay him all his fees and expenses. The attorney rendered the service, and then brought debt. It was objected that debt did not lie, because there was no contract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the defendant had not any quid pro quo. The court adopted the argument, and said that there was no contract or consideration to ground this action, but that the plaintiff might have sued in assumpsit. [2_102]

在该时期的一个案件中，被告雇佣一位律师为第三人代理诉讼，并允诺支付他所有的费用和花销。该律师提供了服务，被告却没有付钱，因此律师提起债务之诉。被告反驳说债务之诉不成立，因为当事人之间没有合同，且被告也未得到任何交换物。法院采纳了被告的论证，指出该诉讼没有合同或对价的支持，但原告本可提出简式合约。

It was, perhaps, the lingering of this idea, and the often repeated notion that an assumpsit was not a contract, [2_103] to which was attributable a more enlarged theory of consideration than prevailed in debt. It was settled that assumpsit would lie for a mere omission or nonfeasance. The cases which have been mentioned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 were followed by others in the latter years of Henry VII., [2_104] and it was never again doubted. An action for such a cause was clearly for a breach of promise, as had been recognized from the time of Edward III. If so, a consideration was necessary. [2_105] Notwithstanding occasional vagaries, that also had been settled or taken for granted in many cases of Queen Elizabeth's time. But the bastard origin of the action which gave rise to the doubt how far any consideration at all was necessary, made it possible to hold considerations sufficient which had been in debt.

也许正因这种观点的持续，以及承诺并非合同这一经常被重复的观念导致了一个比债务之诉中盛行的对价理论更为宽泛的对价理论。法院已经确立，仅仅因不作为或失职就可提起简式合约。上面提到的亨利六世时期的那些案件在亨利七世晚期时的案件里得以遵循，后来从未被质疑过。由这种诉因提起的诉讼显然是针对违反允诺行为的，正如自爱德华三世以来人们所公认的那样。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价就是必需的。虽偶有例外，但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很多案件都是这样裁决或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但简式合约这种私生子似的产生方式使人们怀疑，对价究竟在多大范围内是必需的，这也使在债务之诉中的对价在简式合约中也是充分的这一主张成为可能。

Another circumstance may not have been without its influence. It would seem that, in the period when assumpsit was just growing into its full proportions, there was some little inclination to identify consideration with the Roman causa, taken in its broadest sense. The word “cause” was used for consider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Elizabeth, with reference to a covenant to stand seized to uses. [2_106] It was used in the same sense in the action of assumpsit. [2_107] In the last cited report, although the principal case only laid down a doctrine that would be followed to-day, there was also stated an anonymous case which was interpreted to mean that an executed consideration furnished upon request, but without any promise of any kind, would support a subsequent promise to pay for it. [2_108] Starting from this authority and the word “cause,” the conclusion was soon reached that there wa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a contract and an assumpsit; and that, whereas in contracts “everything which is requisite ought to concur and meet together, viz.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one side, and the sale or the promise on the other side,… to maintain an action upon an assumpsit, the same is not requisite, for it is sufficient if there be a moving cause

or consideration precedent; for which cause or consideration the promise was made.“ [2_109]

另一种情形可能也有所影响。在简式合约刚刚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人们似乎有些倾向于将对价等同于最广泛意义上的罗马法上的诉因。在伊丽莎白早期，涉及到支持用益占有的盖印合同时，就用“诉因”一词来指对价。简约之诉中也是这样使用的。在上面引用的判例汇编中，虽然主要案件只阐明了今天仍然遵循的一个学说，但也陈述了一个匿名案件，其含义可解释为，一个应要求提供的已实施对价，即使无任何形式的允诺，也可以支持随后作出的对其进行支付的允诺。从这一先例及“诉因”一词，我们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即合同与承诺有很大区别；在合同中，“所要求的每一样东西，即一方面是对价，另一方面是买卖或允诺，都应同时发生，并聚在一起，而要使基于承诺的起诉成立，则无同样要求，因为只要有一个动因或在先的对价就已足够，而允诺正是为该动因或对价作出的”。

Thus, where the defendant retained the plaintiff to be miller to his aunt at ten shillings a week, it was held that assumpsit would lie, because the service, though not beneficial to the defendant, was a charge or detriment to the plaintiff. [2_110] The old questions were reargued, and views which were very near prevailing in debt under Henry VI., prevailed in assumpsit under Elizabeth and James.

这样，被告以每周十先令的报酬聘用原告为其姑姑做碾磨工时，法院认为简式合约成立，因为虽然该服务没有带给被告好处，但对原告来说是一项负担或损害。老问题又引发了争论，亨利六世时期在债务之诉中几近盛行的观点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时期在简式合约中得以盛行。

A surety could be sued in assumpsit, although he had ceased to be liable in debt. [2_111] There was the same remedy on a promise in consideration that the plaintiff would marry the defendant's daughter. [2_112] The illusion that assumpsit thus extended did not mean contract, could not be kept up. In view of this admission and of the ancient precedents, the law oscillated for a time in the direction of reward as the true essence of consideration. [2_113] But the other view prevailed, and thus, in fact, made a change in the substantive law. A simple contract, to be recognized as binding by the courts of Henry VI., must have been based upon a benefit to the debtor; now a promise might be enforced in consideration of a detriment to the promisee. But in the true archaic spirit the doctrine was not separated or distinguished from the remedy which introduced it, and thus debt in modern times has presented the altered appearance of a duty limited to cases where the consideration was of a special sort.

尽管保证人已不在债务之诉中负责任，但在简式合约中仍可受到起诉。对原告迎娶被告女儿的对价中也存在同样的允诺救济。认为这样扩展后的承诺并非合同，这种幻想已不能继续下去。鉴于这种认可及那些古老先例，法律曾一度倾向认为报酬是对价的真正本质。但另一观点却得以盛行，从而实际导致了实体法的改变。亨利六世时期的法庭认为具有约束力的简单合同必定是基于对债务人的利益之上的，现在考虑到对受允诺人产生的损害，允诺可能会强制执行。但在真正的古代精神中，该学说并未与引入它的那种救济分开或区别开，因此，现代债务表现出的是一种经过修改的义务，该义务局限于特殊种类对价的案件。

The later fortunes of assumpsit can be briefly told. It introduced bilateral contracts, because a promise was a detriment,

and therefore a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for another promise. It supplanted debt, because the existence of the duty to pay was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for a promise to pay, or rather because, before a consideration was required, and as soon as assumpsit would lie for a nonfeasance, this action was used to avoid the defendant's wager of law. It vastly extended the number of actionable contracts, which had formerly been confined to debts and covenants, whereas nearly any promise could be sued in assumpsit; and it introduced a theory which has had great influence on modern law,—that all the liabilities of a bailee are founded on contract. [2_114] Whether the prominence which was thus given to contract as the foundation of legal rights and duties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similar prominence which it soon acquired in political speculation, it is beyond my province to inquire.

这里可以简单提一下简式合约后来的命运。它产生了双边合同，因为允诺是一种损害，因此对另一允诺来说即是充分的对价。它取代了债务之诉，因为支付义务的存在足以成为支付允诺的对价，或者更是因为，在要求有对价之前，且只要简式合约对渎职成立，该诉讼就被用于避免被告进行誓证裁决。它大大增加了可诉讼合同的数量，这些合同以前只局限于债务与盖印合同，而现在几乎任何允诺都能以简式合约起诉；它产生了一种对现代法律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即受托人的所有责任都是基于合同产生的。它因而给予合同以重要地位，使其成为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基础，至于这种重要地位与其在政治哲学中很快取得同样的重要地位是否相关，这已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

[2_1].2 Hist. du Droit Franc., pp. 146 et seq, 152.

[2_2].Anciens Poetes de la France, (Guessard,) p. 71.

[2_3].Page 283; cf. 284, cxviii, et seq., 44, lxix.

[2_4].Sohm, Proc. d. Lex. Sal., Sections 15, 23-25, tr. Thevenin, pp. 80, 105, 122.

[2_5].Essays in A. S. Law, p. 292.

[2_6].Cap. VIII., Merkel, p. 48.

[2_7].Cap. LXXXIX. Section 3, Essays in A. S. Law, p. 291.

[2_8].Chap. IV. Section 16.

[2_9].Fitzh. Abr. Mainprise, pl. 12 (H. 33 Ed. III.); Staundforde, P.C. 65.

[2_10].Abbr. Plac., p. 343, col 2, rot. 37, 17 Ed. II.

[2_11].Jacob, L. D., "Bail." Cf. I Bulstr. 45; .Hawkins, P.C., II. ch. 15, Section 83; Abbr. Plac., p. 343, col. 2, rot. 37, 17 Ed. II.

[2_12].Highmore, Bail, p. 199; Jacob, L. D., "Bail." Cf. 2 Laferriere, Hist. du Droit Franc., p. 148.

[2_13].Highmore, p. 195.

[2_14].Ibid., p. 200.

[2_15].Vermoegensrechtlichen Klagen.

[2_16].II. c. 60, Section 25. Glanvill's "justa debendi causa" (Lib. X. c. 4) seems remote from consideration.

[2_17].Y.B. 3 Hen. VI. 36.

[2_18].Y.B. 37 Hen. VI. 13, pl. 3.

[2_19].Y.B. 37 Hen. VI. 8, pl. 33.

[2_20].Glanv., Lib. X. c. 12; Bract, fol. 400b, Section 10; 22 Ass., pl. 70, fol. 101.

[2_21].Essays in A. S. Law, 187.

[2_22].I.45; III. 10.

[2_23].Lib. X. e. 17. Suit, secta, was the term applied to the persons whose oath the party tendered.

[2_24].Lib. X. c. 12 (Beames, p. 262); c. 8 & c. 5 (Beames, pp. 256, 251); cf. IV. c. 6, where witnesses are tendered de visu et auditu. Cf. Bract., 315 b, Section 6 Fleta, II. c. 63, Section10, p. 137. It was no doubt true, as Glanvill says, Lib. X. c. 17, that the usual mode of proof was by a writing or by duel, and that the King's Court did not generally give protection to private agreements made anywhere except in the Court of the King (Lib. X. c. 8). But it can hardly be that debts were never established by witness in his time, in view of the continuous evidence from Bracton onwards.

[2_25].But cf. Brunner, Schwurgerichte, 399. I do not go so far as to say that they were still a living institution. However that may be, tradition must at least have modelled itself on what had been the function of the former official body.

[2_26].Bract., fol. 315 b, Section 6; Britt. (Nich.) I. p. 162; Magna Charta, c. 38; Y.B. 21 Ed. I. 456; 7 Ed. II. 242; 18 Ed. II. 582; 3 Bl. Comm. 295, 344. Cf. 17 Ed. III. 48 b.

[2_27].Cf. Glanv., Lib. IV. c. 6.

[2_28].Lib. X. c. 18.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means no more than Glanvill's often repeated statement, that the King's Court did not, generally speaking, take cognizance of private agreements. The substantive law was, perhaps, still limited by traditions from the infancy of contract. See pp. 248, 251, 259, 260. The proposition in its broadest form may have been based on the inability to try such agreements in any way but those which have been specified. Cf. the requirement of aliam diracionationem and aliis probationibus, in Lib. X. c. 12. But cf. Ibid. with Essays in A. S. Law, pp. 189, 190.

[2_29].Sharington v. Strotton, Plowden, 298, at p. 302, M. 7 & 8 Eliz.

[2_30].Pillans v. Van Mierop, 3 Burrow, 1663, 1669.

[2_31].1 Thorpe, Anc. Laws, 181, Oaths, 7, 8.

[2_32].Glanv., Lib. X. c. 5 (Beames, p. 251); Y.B. 7 Ed. II. 242; Novae Narr. Dette-Vers plege, Rastell's Law Tracts, p. 253, D, 2 Finl. Reeves, 376.

[2_33].Glanv., Lib. X. c. 22 (Beames, p. 263); Bract., fol. 398 b, Section 1. The favorite proof by duel was also allowed, but this disappeared. When the inquest became general, the execution of the deed was tried, like any other fact, by that means.

[2_34].Bract., fol. 315 b, Section 6, 400 b; Coke, 2d Inst., 44, 45.

[2_35].Glanv., Lib. X. c. 12 (Beames, p. 263); Bract., fol. 100 b, Section 9.

[2_36].Glanv., Lib. X. c. 17 (Beames, p. 272).

[2_37].Bract., fol. 400 b, Section 9.

[2_38].Cf. Y.B. 20 Ed. I. 304, and 34 Ed. II., 150, 152; ib. 330, 332; 35 Ed. I. 546.

[2_39].Bract., fol. 400 b, Section 8.

[2_40].Cf. Y.B. 20 Ed. I. 304.

[2_41].Cap. 28; 32 & 33 Ed. I. 516; 18 Ed. II. 582; Fleta, II. c, 63, Section 9; Coke, 2d Inst., 44; 3 Bl. Comm. 344.

[2_42].Y.B. 18 Ed. II. 582; 17 Ed. III. 48 b, pl. 14.

[2_43].Y.B. 29 Ed. III. 25, 26; cf. 48 Ed. III. 6, pl. 11; Fleta, II. c. 60, Section 25; Glanvill, Lib. X. c. 12.

[2_44].Cf. Bro..Acc. sur le Case, pl. 5; S.C., 27 Hen. VIII. 24, 25, pl. 3.

[2_45].Y.B. 18 Ed. III. 13, pl. 7.

[2_46].Y.B. 44 Ed. III. 21, pl. 23.

[2_47].F.N. B. 122, I, in margin. Cf. F. N. B. 122 K; Y.B. 43 Ed. III. 11, pl. 1; S.C., Bro. Pledges, pl. 3; 9 Hen. V. 14, pl. 23.

[2_48].Y.B. 17 Ed. III. 48 b, pl. 14. Cf. Fortescue (Amos), 67, n.; 3 Bl. Comm. 295.

[2_49].For limit, see Constit. of Clarendon, c. 15; Glanv., Lib. X. c. 8, 12; Y.B. 22 Ass., pl. 70, fol. 101; 45 Ed. III. 24, pl. 30; 19 R. II., Fitzh. Abr. Dett, pl. 166; 37 Hen. VI. 8, pl. 18; 14 Ed. IV. 6, pl. 3; 15 Ed. IV. 32, pl. 14; 19 Ed. IV. 10, pl. 18; 20 Ed. IV. 3, pl. 17.

[2_50].See for an illustration 2 Kent's Comm. (12th ed.), 451, n. 1 (b).

[2_51].Repromittatur, but cf. pro servitio tuo vel pro homagio, Fleta, II. c. 60, Section 25.

[2_52].Y.B. 29 Ed. III. 25, 26. But cf. 48 Ed. III. 3, pl. 6.

[2_53].19 R. II., Fitzh. Abr. Dett, pl. 166.

[2_54].Y.B. 12 Hen. IV. 17, pl. 13, ad fin.

[2_55].Y.B. 9 Hen. V. 14, pl. 23.

[2_56].(Cf. 13 Ed. II. 403; 17 Ed. IIL 48, pl. 14; 29 Ed. III. 25, 26.) 41 Ed. III. 7, pl. 15; 46 Ed. III. 6, pl. 16; Fitzh. Abr. Dett, pl. 166.

[2_57].Y.B. 3 Hen, VI. 36, pl. 33.

[2_58].Y.B. 37 Hen. VI. 8, pl. 18.

[2_59].E.g., Rolfe in Y.B. 3 Hen. VI. 36, pl. 23.

[2_60].Y.B. 37 Hen. VI. 8, pl. 18. Cf. Bro. Feoffements al Uses, pl. 54; Plowden, 301.

[2_61].Y.B. 15 Ed. IV. 32, pl. 14; (S.C., 14 Ed. IV. 6, pl. 3;) 17 Ed. 4, pl. 4.

[2_62].Cf. Y.B. 37 Hen. VI. 8, pl. 18; 17 Ed. IV. 4, 5; Plowden, 305, 306.

[2_63].Y.B. 3 Hen. VI. 36, pl. 33.

[2_64].Y.B. 37 Hen. VI. 13.

[2_65].As to requirement of certain sum, cf. Y.B. 12 Ed. II. 375; Fleta, II. c. 60, Section 24.

[2_66].Y.B. 29 Ed. III. 25, 26; 40 Ed. III. 24, pl. 27; 43 Ed. II1. 2, pl. 5.

[2_67].Y.B. 43 Ed. III. 2, pl. 5; 46 Ed. III. 25, pl. 10; 50 Ed. III. 5, pl. 11.

[2_68].Cf. Glanv., Lib. X. c. 8; Fleta, II. c. 60, Section 25.

[2_69].Y.B. 35 Ed. I. 454; 12 Ed. II. 375.

[2_70].Ducange, "Sigilium"; Ingulph. 901.

[2_71].Big. Pl. Ang. Norm. 177.

[2_72].Big. Pl. Ant. Norm. 177; Bract., fol. 100 b, Section 9, "scriptura." But cf. Y.B. 30 Ed. I. 158; Fleta, II. c. 60, Section 25.

[2_73].Y.B. 33 Ed. I. 354, 356; 35 Ed. I. 455, top; 41 Ed. III. 7, pl. 15; 44 Ed. III. 21, pl. 23. Cf. 39 Hen. VI. 34, pl. 46.

[2_74].Y.B. 7 Ed. I. 242. Cf. 35 Ed. I. 452.

[2_75].Cf. Bract., fol. 100 b, Section 9.

[2_76].Cf. Glanv., Lib. X. c. 12; Dugdale, Antiq. Warwic. 673, cited Ducange, "Sigillum"; Bract., fol. 396 b, Section 3; I Britt. (Nich.)163, Section 17; Abbrev. Plac. 8 Joh., Berk. rot. 4, pp. 55, 56; ib. 19 Ed. I., Norf. & Surf. rot. 7, p. 284; ib. Index "Sigillum."

[2_77].Y.B. 30 Ed. I. 158; Fleta, II. c. 60, Section 25, p. 130.

[2_78].45 Ed. III. 24, pl. 30.

[2_79].Bract., fol. 100 b, Section 9.

[2_80].Cf. 5 Co. Rep. 13 b, 14 a, with 1 Roll. Rep. 126, 128; Y.B. 43 Ed. III 30, pl. 15.

[2_81].Y.B. 46 Ed. III. 19, pl. 19; S.C. Bro. Acc. sur le Case, pl. 22.

[2_82].Y.B. 22 Ass., pl. 4i, fol. 94.

[2_83].Y.B. 43 Ed. III. 33, pl. 38.

[2_84].Y.B. 11 Hen. IV. 33, pl. 60.

[2_85].Y.B. 3 Hen. VI. 36, pl. 33.

[2_86].Y.B. 2 Hen. IV. 3, pl. 9; 11 Hen. IV. 33, pl. 60. Cf. 3 Hen. VI. 36, 83.

[2_87].Cf. 19 Hen. VI. 49, pl. 5 ad fin., Newton, C. J.

[2_88].Cf. Y.B. 48 Ed. III. 6, pl. 11.

[2_89].Cases supra; Y.B. 2 Hen. IV. 3, pl. 9; 11 Hen. IV. 33. Cf. 3 Hen. VI. 36, pl. 33; 20 Hen. VI. 34, pl. 4; 2 Hen. VII. 11, pl. 9.

[2_90].Y.B. 48 Ed. III. 6, pl. 11. Cf. Fitzh. Abr. Acc. sur le case, pl. 37, 11 R. II; 14 Hen. VI. 18. But cf. 43 Ed. III. 33, pl. 38.

[2_91].Cf. Candish's reasons for allowing wager of law with Y.B. 32 & 33 Ed. I., Preface, p. xxxvi., citing the old rules of pleading printed at the end of the tract entitled, Modus tenendi unum Hundredum sire Curiam de Recordo, in Rastell's Law Tracts, p. 410, E, F, G.

[2_92].Y.B. 3 Hen. VI. 36, pl. 33.

[2_93].Y.B. 2 Hen. IV. 3, pl. 9; 11 Hen. IV. 33, pl. 60; 3 Hen. VI. 36, pl. 33.

[2_94].Cf. Y.B. 3 Hen. VI. 36, pl. 33.

[2_95].Y.B. 14 Hen. VI. 18, pl. 58.

[2_96].Ibid. Cf. 48 Ed. III 6, pl. 11.

[2_97].Y.B. 19 Hen. VI. 49, pl. 5. See, further, Y.B. 20 Hen. VI. 25, pl. 11.

[2_98].Cf. Y.B. 3 Hen. VI. 36, pl. 33.

[2_99].Y.B. 2 Hen. VII. 11, pl. 9. Cf. 20 Hen. VI. 34, pl. 4.

[2_100].Cf. Y.B. 14 Hen. VI. 18, pl. 58; 21 Hen. VII. 41, pl. 66, Fineux, C. J.

[2_101].Keilway, 160, pl. 2 (2 Hen. VIII.); Powtuary v. Walton, 1 Roll. Abr. 10, pl. 5 (39 Eliz.); Coggs v. Bernard, 2 Ld. Raym. 909 (2 Anne, A.D. 1703). Supra, p. 195.

[2_102].Sands v. Trevilian, Cro. Car. 193, 194 (Mich. 4 Car. I., A.D. 1629).

[2_103].Bro. Acc. sur le Case, pl. 5; S.C., Y.B. 27 Hen. VIII. 24, 25, pl. 3; Sidenham v. Worlington, 2 Leon. 224, A.D. 1585.

[2_104].Y.B. 21 Hen. VII. 30, pl. 5; ib. 41, pl. 66.

[2_105].Y.B. 3 Hen. VI. 36, pl. 33.

[2_106].Sharington v. Strotton, Plowden, 298 (Mich. 7 & 8 Eliz.); ib. 309, note on "the civil law."

[2_107].Hunt v. Bate, 3 Dyer, 272 a (10 Eliz., A.D. 1568).

[2_108].See Lecture VIII. Mr. Langdell, Contracts, Sections 92, 94, suggests the ingenious explanation for this doctrine, that it was then held that no promise could be implied in fact from the request. There may be evidence which I do not know, but the case cited (Bosden v. Thinne, Yelv. 40) for this statement was not decided until A.D. 1603, while the implication of Hunt v. Bate, supra, which was the authority followed by the cases to be explained, is all the other way.

[2_109].Sidenham v. Worlington, 2 Leon. 224, A.D. 1585.

[2_110].Read v. Baxter, 3 Dyer, 272 b, n. (26 & 27 Eliz.). Cf. Richards and Bartlet's Case, 1 Leon. 19 (26 Eliz.).

[2_111].Bro. Acc. sur le Case, pl. 5; S.C., Y.B. 27 Hen. VIII. 24, 25, pl. 3; 3 Dyer, 272, n.

[2_112].Marsh v. Rainsford, 3 Dyer, 272 b, n.; S.C., 2 Leon. 111, and Cro. Eliz. 59, sub. nom. Marsh v. Kavenford.

[2_113].Smith and Smith's Case, 3 Leon. 88, A.D. 1583; Riches and Briggs, Yelv. 4, A.D. 1601; Pickas v. Guile, Yelv. 128, A.D. 1608.

[2_114].Supra, p. 195. Lord Coke's caution not to rely on the abridgments is very

necessary to the proper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onsideration. The abridgments apply the doctrine to cases which make no mention of it, and which were decided before it was ever heard of.

LECTURE VIII.CONTRACT.II. ELEMENTS.

第八讲　合同（二）——要件

The general method to be pursued in the analysis of contract is the same as that already explained with regard to possession. Wherever the law gives special rights to one, or imposes special burdens on another, it does so on the ground that certain special facts are true of those individuals. In all such cases, therefore, there is a twofold task. First, to determine what the facts to which the special consequences are attached are; second, to ascertain the consequences. The first is the main field of legal argument. With regard to contracts the facts are not always the same. They may be that a certain person has signed, sealed, and delivered a writing of a certain purport. They may be that he has made an oral promise, and that the promisee has furnished him a consideration.

这里分析合同所用的一般方法与前面解释占有的方法相同。无论法律在何处将某些特定权利赋予某人，或将某些特定义务强加给另一人，其根据必定是某些特定事实对那些人成立。故所有此类案件都存在双重任务。首先，确定与这些特定后果相关联的事实；第二，确定这些后果。前者是法律论据研究的主要领域，对合同来说，这些事实并非总是相同的。他们可以是某人签字、盖印并交付具有特定意图的文书，也可以是某人作出一个口头允诺，而受允诺人为其提供一个对价。

The common element of all contracts might be said to be a promise, although even a promise was not necessary to a liability in

debt as formerly understood. But as it will not be possible to discuss covenants further, and as consideration formed the main topic of the last Lecture, I will take up that first. Furthermore, as there is a historical difference between consideration in debt and in assumpsit, I shall confine myself to the latter, which is the later and more philosophical form.

允诺可以说是所有合同中的共同要件，尽管对债务中的责任来讲，按以前的理解，即使允诺也不是必需的。但由于我们不可能再进一步讨论盖印合同，且上一讲主要讨论的是对价，所以我首先来讨论对价。而且，由于债务诉讼中的对价与简式合约中的对价存在某种历史性差异，所以我将把讨论限定在后者，它是出现得更晚也更合理的法律形式。

It is said that any benefit conferred by the promisee on the promisor, or any detriment incurred by the promisee, may be a consideration. It is also thought that every consideration may be reduced to a case of the latter sort, using the word “detriment” in a somewhat broad sense.

有人说，任何由受允诺人给予允诺人的利益，或任何由受允诺人遭受的损害都可以对价。人们还认为，如果在略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损害”一词，则每个对价都可被概括为后一种情况。

To illustrate the general doctrine, suppose that a man is desirous of having a cask of brandy carried from Boston to Cambridge, and that a truckman, either out of kindness or from some other motive, says that he will carry it, and it is delivered to

him accordingly. If he carelessly staves in the cask, there would perhaps be no need to allege that he undertook to carry it, and on principle, and according to the older cases, if an undertaking was alleged, no consideration for the assumpsit need be stated. [3_1] The ground of complaint in that case would be a wrong, irrespective of contract. But if the complaint was that he did not carry it as agreed, the plaintiff's difficulty would be that the truckman was not bound to do so unless there was a consideration for his promise. Suppose, therefore, that it was alleged that he promised to do so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delivery to him. Would this be a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The oldest cases, going on the notion of benefit to the promisor, said that it could not be, for it was a trouble, not a benefit. [3_2] Then take it from the side of detriment. The delivery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to the promisor's doing the kindness, and if he does it, the delivery, so far from being a detriment to the promisee, is a clear benefit to him.

为说明这一般规则，我们假设某人想找人将一桶白兰地从波士顿送到剑桥去，一位卡车司机，或许是出于好心，或许是出于别的动机，说愿意帮他运送，于是此人就将酒桶交给了这位卡车司机。如果卡车司机不小心弄破了酒桶，也许无需主张他承诺了运送该酒桶，从原则上说，且依据较早案例，即使主张承诺，也无需为简式合约陈述对价。本案中，起诉状依据应为不当行为，与合同无关。但如起诉状说，他未依约运送酒桶，则原告的困难将是，除非卡车司机的允诺有对价，否则他并无义务这样做。因此，假设原告主张，卡车司机允诺运送酒桶时，将把酒桶交付于他视为对价。那么该对价充分吗？最古老的案例依据对价是对允诺人的好处这一观点，认为这不可能是充分对价，因为这是麻烦而非好处。那么再从损害方面来考虑。交付是允诺人做这件好事的必要条件，如果他做了这件好事，则该交付对受允诺人来说非但不是损害，反而明显是好处。

But this argument is a fallacy. Clearly the delivery would be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to enable the owner to declare in assumpsit for the breach of those duties which arose, irrespective of contract, from the defendant's having undertaken to deal with the thing. [3_3] It would be a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for any promise not involving a dealing with the thing for its performance, for instance, to pay a thousand dollars. [3_4] And the law has not pronounced the consideration good or bad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promise founded upon it. The delivery is a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for any promise. [3_5]

但该论证是错误的。显然，交付可能构成充分对价，使得所有者在简式合约中提出，被告违反了由其承诺来做此事而产生（与合同无关）的那些义务。任何允诺，如果不涉及到为履行该允诺而处理所涉事物，比如支付一千美元，则交付都可能会构成该允诺的充分对价。而法律判断对价之好坏，并非依据建立在对价基础上的允诺之性质而作出。交付对任何允诺而言都是充分的对价。

The argument on the other side leaves out of sight the point of time at which the sufficiency of the consideration is to be determined. This is the moment when the consideration is furnished. At that moment the delivery of the cask is a detriment in the strictest sense. The owner of the cask has given up a present control over it, which he has a right to keep, and he has got in return, not a performance for which a delivery was necessary, but a mere promise of performance. The performance is still future. [3_6]

另一方的论证遗漏了时点的问题，要在哪个时点上确定对价的充分性呢？应该是提供对价的那一刻。在该时点，酒桶的交付构成最严

格意义上的损害。酒桶所有者放弃了其有权保有的对酒桶的现时控制权，作为交换，他所得到的并非以交付为必要条件的履行义务，而仅仅只是履行义务的允诺。履行义务仍然是将来的行为。

But it will be seen that, although the delivery may be a consideration, it will not necessarily be one. A promise to carry might be made and accepted 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it was mere matter of favor, without consideration, and not legally binding. In that case the detriment of delivery would be incurred by the promisee as before, but obviously it would be incurred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enabling the promisor to carry as agreed.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交付尽管可能是对价，但却未必一定是。送酒的司机允诺可以基于下面的理解作出并被接受，即这仅是一个纯粹的善意，并无对价，也无法律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交付对受允诺人的损害仍然如前所述，但显然，他遭受该损害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允诺人能依约把酒桶送到。

It appears to me that it has not always been sufficiently borne in mind that the same thing may be a consideration or not, as it is dealt with by the parties. The popular explanation of Coggs v. Bernard is, that the delivery was a consideration for a promise to carry the casks safely. I have given what I believe to be the true explanation, and that which I think Lord Holt had in view, in the fifth Lecture. [3_7] But whether that which I have offered be true or not, a serious objection to the one which is commonly accepted is that the declaration does not allege that the delivery was the consideration.

在我看来，人们不一定总是记得某件东西可以是对价，也可以不是，这要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柯吉斯诉伯纳德一案通行的解释是，交付是对安全运送酒桶这一允诺的对价。我在第五讲已经给出了我认为正确的解释，而且我认为霍尔特勋爵的看法也是这样。但无论我提出的解释对错与否，针对人们普遍接受的这个解释，一个很有力的反驳意见是起诉状中并未主张交付就是对价。

The same caution should be observed in construing the terms of an agreement. It is hard to see the propriety of erecting any detriment which an instrument may disclose or provide for, into a consideration, unless the parties have dealt with it on that footing. In many cases a promisee may incur a detriment without thereby furnishing a consideration. The detriment may be nothing but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performance of the promise, as where a man promises another to pay him five hundred dollars if he breaks his leg. [3_8]

在解释协议条款时也应该同样谨慎。我们很难看到以下做法的恰当性，即将文书可能公开或规定的损害设立为对价，除非当事人以此为基础来处理。很多情况下，受允诺人在没有提供对价时也会遭受损害。该损害可能只是该允诺履行前的一个条件，如某人允诺另一人如果他摔断腿就付给他五百美元。

The courts, however, have gone far towards obliterating this distinction. Acts which by a fair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would seem to have been contemplated as only the compliance with a condition, have been treated as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mise. [3_9] And so have counter promises in an agreement which expressly stated other matters as the consideration. [3_10] So it should be

mentioned, subject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re may not be a special explanation for the doctrine, that it is said that an assignment of a leasehold cannot be voluntary under the statute of 27 Elizabeth, c. 4, because the assignee comes into the obligations of the tenant. [3_11] Yet the assignee's incurring this detriment may not be contemplated as the inducement of the assignment, and in many cases only amounts to a deduction from the benefit conferred, as a right of way would be, especially if the only obligation is to pay rent, which issues out of the land in theory of law.

然而，法院的判决却大大倾向于取消这种区分。以恰当的言语来解释有些行为时，似乎应该只是符合某条件，但却被作为允诺的对价来对待。而明确规定其他东西为对价的协议中的反允诺也受到同样的对待。故应指出，受对价学说是否可能并无特殊解释这一问题的影响，法院认为，依据伊丽莎白二十七年第4号令，对租赁保有权的转让不可能为自愿，因为受让人继承了承租人的义务。然而受让人遭受该损害不能视为转让的诱因，许多情况下仅相当于从其已获利益中扣除的一部分而已，与通行权相同，尤其当受让人的唯一义务为付租金时，因为在法理上租金是土地的收益。

But although the courts may have sometimes gone a little far in their anxiety to sustain agreements, there can be no doubt of the principle which I have laid down, that the same thing may be a consideration or not, as it is dealt with by the parties.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how a thing must be dealt with, in order to make it a consideration.

不过，尽管法院有时可能急于维持协议而走得略远一些，但在我上面提出的原则上却并无疑问，即同一事物可能是对价也可能不是，

要视当事人的处理而定。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应如何处理事情才能使其成为对价呢？

It is said that consideration must not be confounded with motive. It is true that it must not be confounded with what may be the prevailing or chief motive in actual fact. A man may promise to paint a picture for five hundred dollars, while his chief motive may be a desire for fame. A consideration may be given and accepted, in fact,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a promise binding. But, nevertheless, it is the essence of a consideration, that, by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it is given and accepted as the motive or inducement of the promise. Conversely, the promise must be made and accepted as the conventional motive or inducement for furnishing the consideration. The root of the whole matter is the relation of reciprocal conventional inducement, each for the other, between consideration and promise.

有人说，对价不能跟动机混淆。对价确实不能与可能是实际事实中支配性的或主要的动机相混淆。某人或许允诺五百美元画一幅画，而其主要动机可能是想出名。事实上，对价可以仅仅出于使允诺具有约束力这一目的而被提出和接受。但尽管如此，依据协议条款，作为允诺的动机或诱因而被提出和接受却是对价的实质。反之，该允诺的作出和接受，也必须作为提供该对价的约定动机或诱因作出。整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对价和允诺相互之间是一种互惠约定性立约诱因的关系。

A good example of the former branch of the proposition is to be found in a Massachusetts case. The plaintiff refused to let certain wood be removed from his land by one who had made an oral

bargain and given his note for it, unless he received additional security. The purchaser and the plaintiff accordingly went to the defendant, and the defendant put his name upon the note. The plaintiff thereupon let the purchaser carry off the wood. But, according to the testimony, the defendant signed without knowing that the plaintiff was to alter his position in any way on the faith of the signature, and it was held that, if that story was believed, there was no consideration. [3_12]

对该命题的前半部分，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案子可以提供很好的例证。原告坚持，除非得到额外担保，否则拒绝某人从自己的土地上拿走木材，而后者已作出口头协议并写了证明书。于是，买主和原告一起去找被告，被告在证明书上签了字。因此原告让买主将木材运走了。但依据证词，被告签字时并不知原告会基于对他签字的信任而改变立场。法院认为，如该点被采信，则不存在对价。

An illustration of the other half of the rule is to be found in those cases where a reward is offered for doing something, which is afterwards done by a person acting in ignorance of the offer. In such a case the reward cannot be claimed, because the alleged consideration has not been furnished on the faith of the offer. The tendered promise has not induced the furnishing of the consideration. The promise cannot be set up as a conventional motive when it was not known until after the alleged consideration was performed. [3_13]

该规则的后半部分可用其他案例来说明，在这些案例中，有人悬赏请人做某事，但后来一个并不知道悬赏一事的人做了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后者不能要求得到该奖赏，因其主张的对价并非基于对奖

赏的信任而提供的。已经履行的允诺并非提供对价的诱因。直到所主张的对价得到履行后才知道的这个允诺不能被认定为约定动机。

Both side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sideration and promise, and the conventional nature of that relation, may be illustrated by the case of the cask. Suppose that the truckman is willing to carry the cask, and the owner to let him carry it, without any bargain, and that each knows the other's state of mind; but that the truckman, seeing his own advantage in the matter, says to the owner, “In consideration of your delivering me the cask, and letting me carry it, I promise to carry it,” and that the owner thereupon delivers it. I suppose that the promise would be binding. The promise is offered in terms as the inducement for the delivery, and the delivery is made in terms as the inducement for the promise. It may be very probable that the delivery would have been made without a promise, and that the promise would have been made in gratuitous form if it had not been accepted upon consideration; but this is only a guess after all. The delivery need not have been made unless the owner chose, and having been made as the term of a bargain, the promisor cannot set up what might have happened to destroy the effect of what did happen. It would seem therefore that the same transaction in substance and spirit might be voluntary or obligatory, according to the form of words which the parties choose to employ for the purpose of affecting the legal consequences.

对价与允诺之间关系的两个方面及其约定性质，都可通过酒桶案来说明。假设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卡车司机愿意运送该酒桶，酒桶所有者也愿意让他送，且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心理状况；但卡车司机在这件事中看到了自己的优势，故对所有者说：“鉴于你把酒桶交付给我，并让我带过去，我就允诺把它带过去”。于是所有者把酒桶

交给了他。我认为该允诺具有约束力。该允诺作为交付行为的诱因而作出，而交付又作为该允诺的诱因来实施。很可能的情况是，即使没有允诺，也会实施交付；而如该允诺并非在对价基础上被接受，则它就是以无偿形式作出的；但这毕竟只是猜测而已。除非所有者选择去做，否则他完全无需交付，在交付已经成为协议条件的情况下，允诺人不可能安排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来消除已发生事情的影响。因此似乎看起来实质上同一交易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强制性的，取决于当事人为影响法律后果而选择使用的措辞形式。

If the foregoing principles be accepted, they will be seen to explain a doctrine which has given the courts some trouble to establish. I mean the doctrine that an executed consideration will not sustain a subsequent promise. It has been said, to be sure, that such a consideration was sufficient if preceded by a request. But the objections to the view are plain. If the request was of such a nature, and so put, as reasonably to imply that the other person was to have a reward, there was an express promise, although not put in words, and that promise was mad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ideration was given, and not afterwards.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words did not warrant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service was to be paid for, the service was a gift, and a past gift can no more be a consideration than any other act of the promisee not induced by the promise.

如果上述原则得以接受，则可用于解释一个学说，而该学说的确立给法院带来了一些麻烦。我是指已履行的对价不能支持其后形成的允诺这一学说。确实，有人会说，如在该对价之前已有请求，那么它就是充分的。但反对该观点的理由也很清楚：如该请求具有这种性质，且其提出的方式合理地暗示另一人将得到报酬，那么虽然并未直接说出来，它也是一个明示允诺，且该允诺是在给出对价的同时作出

的，而非之后作出的；另一方面，如该措辞并未保证对方理解该服务要付报酬，则该服务为一种赠与，而过去的赠与不能再成为对价，与受允诺人作出的并非由允诺引起的其他行为相同。

The source of the error can be traced partially, at least, in history. Some suggestions touching the matter were made in the last Lecture. A few words should be added here. In the old cases of debt, where there was some question whether the plaintiff had showed enough to maintain his action, a “contract precedent” was spoken of several times as raising the duty. Thus, where a man had granted that he would be bound in one hundred shillings to pay his servant on a certain day for his services, and for payments made by the servant on his account, it was argued that there was no contract precedent, and that by parol the party was not obliged; and, further, that, so far as appeared, the payments were made by the servant out of his own head and at no request, from which no duty could commence. [3_14]

这一错误根源至少可以在历史中找到一部分。有些涉及该问题的看法，我在上一讲提到过，这里再补充几句。在追偿债务之诉的古老案例中，当对原告是否已拿出足够证据以支持其诉讼有疑问时，产生该义务的“先例合同”一词被提到数次。因此，在某人承认有责任为其佣人的服务在某天付给他一百先令，而其佣人代其支付了一笔钱的情况下，他争辩说，由于没有事先合同，当事人不受口头约定的约束，更进一步说，就当时情况而言，这一支付是佣人自己做主作出的，且没有人要求他去做，故不能从中产生义务。

So when debt was brought on a deed to pay the plaintiff ten marks, if he would take the defendant's daughter to wife, and it was

objected that the action should have been covenant, it was answered that the plaintiff had a contract precedent which gave him debt. [3_15]

因此，依据一份契据，如原告娶被告之女为妻，则被告将付给原告十马克，原告提起追偿债务之诉，而被告反对说该诉讼应为违反盖印合同请求赔偿损失之诉时，原告答辩说，他有事先合同，故可提起追偿债务之诉。

The first case in assumpsit [3_16] only meant to adopt this long familiar thought. A man went bail for his friend's servant, who had been arrested. Afterwards the master promised to indemnify the bail, and on his failure to do so was sued by him in assumpsit. It was held that there was no consideration wherefore the defendant should be charged unless the master had first promised to indemnify the plaintiff before the servant was bailed; “for the master did never make request to the plaintiff for his servant to do so much, but he did it of his own head.” This is perfectly plain sailing, and means no more than the case in the Year Books. The report, however, also states a case in which it was held that a subsequent promise, in consideration that the plaintiff at the special instance of the defendant had married the defendant's cousin, was binding, and that the marriage was “good cause… because [it] ensued the request of the defendant.” Whether this was intended to establish a general principle, or was decid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peculiar consideration of marriage, [3_17] it was soon interpreted in the broader sense, as was shown in the last Lecture. It was several times adjudged that a past and executed matter was a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for a promise at a later day, if only the matter relied on had been done or furnish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promisor. [3_18]

简式合约的首个案例只是想采纳这一早为人熟悉的观点。某人为其朋友被捕入狱的佣人做了保释，后来主人允诺偿还保释金，但没有偿还，因此提起简式合约。法院认为，除非主人在原告保释其佣人之前先允诺要偿还原告，否则就没有据以指控被告的对价，“因为主人从未请求原告为其佣人做这些，但他自作主张这样做了”。该观点顺理成章，且与《年鉴》中之案例的意思完全一致。然而判例汇编也记录了一个案子，其中法院认为，在原告应被告特别请求娶了其堂妹的对价中，一个事后允诺具有约束力，且该婚姻为“充分诉因……因其是应被告之请求而发生的”。无论该判决是要确立一个一般性原则，还是根据婚姻的特殊对价而作出的，它都很快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得到解释，正如上一讲所示。法院已经数次判决，一个过去已完成的事实对后来的允诺来说是充分对价，只要所依据的事实是应允诺人的请求去做的或提供的。

It is now time to analyze the nature of a promise, which is the second and most conspicuous element in a simple contract. The Indian Contract Act, 1872, Section 2, [3_19] says:

现在该分析允诺的性质了，它是简单合同里第二个最显著的要件。1872年的《印度合同法》第二条规定：

> “(a.) When one person signifies to another his willingness to do or to abstain from doing anything, with a view to obtaining the assent of that other to such act or abstinence, he is said to make a proposal;

“（1）当某人向另一人表示其愿意或不愿做某事，想要得到该另一人的同意去做或不做此事时，就可以说他提出了一个要约；

(b.) When the person to whom the proposal is made signifies his assent thereto, the proposal is said to be accepted. A proposal when accepted becomes a promise.”

（2）当该要约相对人对此表示同意时，就可以说该要约已被接受。一个要约被接受后就成为允诺。”

According to this definition the scope of promises is confined to conduct on the part of the promisor. If this only meant that the promisor alone must bear the legal burden which his promise may create, it would be true. But this is not the meaning. For the definition is of a promise, not of a legally binding promise. We are not seeking for the legal effects of a contract, but for the possible contents of a promise which the law may or may not enforce. We must therefore only consider the question what can possibly be promised in a legal sense, not what will be the secondary consequence of a promise binding, but not performed.

依据该定义，允诺的范围局限于允诺人一方的行为。假如这仅指允诺人必须单独承担其允诺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这就是正确的。但其实不然。因为它定义的仅是允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允诺。我们并非要探究合同的法律效力，而是要探究法律可以或不可强制执行

的可能的允诺内容。因此我们必须只考虑这一问题，即在法律意义上，什么是可能允诺的，而非考虑有约束力但并未履行的允诺其次要后果是什么。

An assurance that it shall rain tomorrow, [3_20] or that a third person shall paint a picture, may as well be a promise as one that the promisee shall receive from some source one hundred bales of cotton, or that the promisor will pay the promisee one hundred dollar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in the cases? It is only in the degree of power possessed by the promisor over the event. He has none in the first case. He has equally little legal authority to make a man paint a picture, although he may have larger means of persuasion. He probably will be able to make sure that the promisee has the cotton. Being a rich man, he is certain to be able to pay the one hundred dollars, except in the event of some most improbable accident.

诸如明天会下雨或第三人会画一幅画的保证，与受允诺人会从某处收到一百包棉花，或允诺人会付给受允人一百美元这种保证相同，都属于允诺。但这些情形有何区别呢？区别仅在于允诺人对事情所拥有的控制力程度。在第一种情况中他根本没有控制力，同样，他也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权威能让人画一幅画，尽管他可能有更多的说服手段。但他很可能可以确保受允诺人得到棉花。如果他是有钱人，则除某些极不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外，他也一定能够支付这一百美元。

But the law does not inquire, as a general thing, how fa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 assurance touching the future is within the power of the promisor. In the moral world it may be that the obligation of a promise is confined to what lies within reach of the

will of the promisor (except so far as the limit is unknown on one side, and misrepresented on the other). But unless some consideration of public policy intervenes, I take it that a man may bind himself at law that any future event shall happen. He can therefore promise it in a legal sense. It may be said that when a man covenants that it shall rain to-morrow, or that A shall paint a picture, he only says, in a short form, I will pay if it does not rain, or if A does not paint a picture. But that is not necessarily so. A promise could easily be framed which would be broken by the happening of fair weather, or by A not painting. A promise, then, is simply an accepted assurance that a certain event or state of things shall come to pass.

但一般说来，法律不会探究实现这种涉及未来的保证，在多大程度上在允诺人的能力范围之内。在道德领域内可能是，允诺责任被限定于允诺人意志能够达到的范围之内（一方不知该限定范围，另一方又未正确表达的情况除外）。但除非有某些公共政策的考虑，否则我认为，一个人可以就任何将要发生的事在法律上约束自己承担责任。因此他可以在法律意义上对其作出允诺。可以说，当某人立约说明天要下雨，或甲会画一幅画时，他只是以简短的形式说，如果明天不下雨或甲不画画，我就付给你钱，但并非一定会这样。如此轻易作出允诺，就会由于出现好天气或甲不画画而违反该允诺。那么，允诺就仅仅是一个得到接受的保证，保证某事或某事态会发生。

But if this be true, it has more important bearings than simply to enlarge the definition of the word promise. It concerns the theory of contract. The consequences of a binding promise at common law are not affected by the degree of power which the promisor possesses over the promised event. If the promised event does not come to pass, the plaintiff's property is sold to satisfy the damages,

within certain limits, which the promisee has suffered by the failure. The consequences are the same in kind whether the promise is that it shall rain, or that another man shall paint a picture, or that the promisor will deliver a bale of cotton.

但假设该点正确，则它就比简单的扩大“允诺”一词的定义有更重要的影响。它涉及到合同理论。普通法中具约束力之允诺的后果不受允诺人对允诺事件拥有控制力程度的影响。如允诺的事件并未发生，则在一定范围内，要变卖原告的财产来赔偿受允诺人因该事件未发生而遭受的损害。而无论允诺天要下雨，还是另一人要画一幅画，或是允诺人会交付一包棉花，其后果在性质上都是相同的。

If the legal consequence is the same in all cases, it seems proper that all contra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from the same legal point of view. In the case of a binding promise that it shall rain to-morrow, the immediate legal effect of what the promisor does is, that he takes the risk of the event, within certain defined limits, as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promisee. He does no more when he promises to deliver a bale of cotton.

如在所有情况下法律后果都相同，则似乎正确做法是应从同一法律角度来考虑所有的合同。在明天要下雨这一具有约束力的允诺案件中，允诺人行为的直接法律效力是，他在一定的界定范围内承担了自己与受允诺人之间在这件事上的风险。他允诺交付一包棉花时所承担的也不过如此。

If it be proper to state the common-law meaning of promise and contract in this way, it would have the advantage of freeing the

subject from the superfluous theory that contract is a qualified subjection of one will to another, a kind of limited slavery. It might be so regarded if the law compelled men to perform their contracts, or if it allowed promisees to exercise such compulsion. If, when a man promised to labor for another, the law made him do it, his relation to his promisee might be called a servitude ad hoc with some truth. But that is what the law never does. It never interferes until a promise has been broken, and therefore cannot possibly be performed according to its tenor. It is true that in some instances equity does what is called compelling specific performance. But, in the first place, I am speaking of the common law, and, in the next, this only means that equity compels the performance of certain elements of the total promise which are still capable of performance. For instance, take a promise to convey land within a certain time, a court of equity is not in the habit of interfering until the time has gone by, so that the promise cannot be performed as made. But if the conveyan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time, and the promisee prefers to have it late rather than never, the law may compel the performance of that. Not literally compel even in that case, however, but put the promisor in prison unless he will convey. This remedy is an exceptional one. The only universal consequence of a legally binding promise is, that the law makes the promisor pay damages if the promised event does not come to pass. In every case it leaves him free from interference until the time for fulfilment has gone by, and therefore free to break his contract if he chooses.

如以此种方式阐述允诺与合同在普通法里的意义恰当的话，则其优势在于可使该问题摆脱以下多余的理论，即合同是某意志对另一意志的有条件的顺从，一种受限的奴隶制度。假如法律强迫人们履行其合同，或允许受允诺人行使此种强迫，则的确可以这么认为。假如当某人允诺为另一人劳动时，法律就让他去做，则把他与受允诺人的关

系叫做一种临时奴役也有一定道理，但法律从不这样做。在违反允诺不能再按其原意履行前，法律不会干预。确实，在有些情况下，衡平法会行使我们所谓的“强制性特别履行”。但首先我讨论的是普通法；其次，这仅意味着衡平法强制履行整个允诺里仍旧可以履行的某些要素。比如，以允诺在某一时限内转让土地为例，衡平法庭的习惯是，在该时限已经过去，致使该允诺不能如约履行前，不会进行干涉。但假如该转让比该时限更重要，且受允诺人也认为晚些转让总比不转让好，则法律可能会强制履行它。然而，在该案中甚至并非仅仅字面意义上的强制，而是要把允诺人投进监狱，直到其愿意转让为止。当然，这种救济非常特殊。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允诺来说，唯一的普遍后果是，如允诺事件没有发生，法律就会使允诺人赔偿损害。无论何种情况下，在履行时限过去之前，法律都不会干预允诺人，也因此，只要他选择去做，他就可以自由地违反合同。

A more practical advantage in looking at a contract as the taking of a risk is to be found in the light which it throws upon the measure of damages. If a breach of contract were regarded in the same light as a tort, it would seem that if, in the course of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the promisor should be notified of any particular consequence which would result from its not being performed, he should be held liable for that consequence in the event of non-performance. Such a suggestion has been made. [3_21] But it has not been accepted as the law. On the contrary,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 of a very able judge, which seems to be generally followed, notice, even at the time of making the contract, of special circumstances out of which special damages would arise in case of breach, is not sufficient unless the assumption of that risk is to be taken as having fairly entered into the contract. [3_22] If a carrier should undertake to carry the machinery of a saw-mill from Liverpool to Vancouver's Island, and should fail to do so, he probably would not be held liable for the rate of hire of such

machinery during the necessary delay, although he might know that it could not be replaced without sending to England, unless he was fairly understood to accept “the contract with the special condition attached to it.“ [3_23]

将合同视为承担风险，其更实际的优势体现在它对损害衡量的启示。如果将违反合同视同于侵权行为，那么看来，如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允诺人被告知不履行合同将会导致的特定后果，那么倘若他不履行合同，就要被判为其后果负责。曾有人提出过这种建议。但并未作为法律得以接受。相反，据一位非常有能力的法官的意见（该意见似乎被普遍遵循），即使在订立合同时就告知违反合同会产生特定损害的特定情况，这种告知也是不充分的，除非对该风险的承担已经确认公平地写入了合同。如果一位承运人承诺将一家锯木厂的机器从利物浦运到温哥华岛，但却没有做到，虽然他可能知道如果不送到英格兰，机器就不能调换，但很可能不会裁决他为在必要延迟期内租用该机器的费用承担责任，除非可以公平地认定，他已经接受了“这个附有特定条件的合同”。

It is true that, when people make contracts, they usually contemplate the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the breach. The express language used does not generally go further than to define what will happen if the contract is fulfilled. A statutory requirement of a memorandum in writing would be satisfied by a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promise as made, because to require more would be to run counter to the ordinary habits of mankind, as well as because the statement that the effect of a contract is the assumption of the risk of a future event does not mean that there is a second subsidiary promise to assume that risk, but that the assumption follows as a consequence directly enforced by the law, without the promisor's co-operation. So parol evidence would be admissible, no doubt, to

enlarge or diminish the extent of the liability assumed for nonperformance, where it would be inadmissible to affect the scope of the promise.

确实，人们订立合同时，通常考虑的是履行而非违反。合同中使用的明确的用语，一般不会超出界定履行合同后所发生事实的范围。制定法对合同书面证明的要求可以用已作出允诺的书面声明来满足，因为如果提出更多要求就违反了人们平常的习惯，同时也因为该声明（即合同的效力是对未来事件风险的承担）并不意味着还有另一个附属允诺存在，而是意味着这种承担是无需允诺人的合作就可以直接由法律强制执行合同的一个后果。因此，口头证据无疑可被采信来扩大或缩小因不履行合同而承担的责任范围，但却不能被采信来影响允诺的范围。

But these concessions do not affect the view here taken. As the relation of contractor and contractee is voluntary, the consequences attaching to the relation must be voluntary. What the event contemplated by the promise is, or in other words what will amount to a breach of contract, is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 What consequences of the breach are assumed is more remotely, in like manner, a matter of construction, having regard to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contract is made. Knowledge of what is dependent upon performance is one of those circumstances. It is not necessarily conclusive, but it may have the effect of enlarging the risk assumed.

但这些让步并不影响这里持有的观点。由于订约人与承约人的关系是自愿的，因此附属于该关系的后果也一定是自愿的。允诺所假设的事件是什么，或换句话说，如何就算违反了合同，只是一个理解和

诠释的问题。同样，违反合同的哪些后果要承担责任是一个更间接的诠释问题，需要考虑订立合同时的情况。其中一种情况是了解什么依赖于合同的履行。它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但可能具有扩大所承担风险的效力。

The very office of construction is to work out, from what is expressly said and done, what would have been said with regard to events not definitely before the minds of the parties, if those events had been considered. The price paid in mercantile contracts generally excludes the construction that exceptional risks were intended to be assumed. The foregoing analysis is believed to show that the result which has been reached by the courts on grounds of practical good sense, falls in with the true theory of contract under the common law.

解释的作用正在于，从明确的言语和行为中找出，针对那些不一定出现在当事人脑海中的事件哪些应该是明确说出的，如果他们曾考虑过这些事件的话。购销合同中所付价款通常都排除计划承担异常风险这一解释。我认为，上述分析表明，法院依据实际常识得出的结论与普通法中正确的合同理论是一致的。

The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a promise has led me to analyze contract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contract somewhat in advance of their place. I must say a word more concerning the facts which constitute a promise. It is laid down, with theoretical truth, that, besides the assurance or offer on the one side, there must be an acceptance on the other. But I find it hard to think of a case where a simple contract fails to be made, which could not be accounted for on other grounds, generally by the want of relation between

assurance or offer and consideration as reciprocal inducements each of the other. Acceptance of an offer usually follows by mere implication from the furnishing of the consideration; and inasmuch as by our law an accepted offer, or promise, until the consideration is furnished, stands on no different footing from an offer not yet accepted, each being subject to revocation until that time, and each continuing until then unless it has expired or has been revoked, the question of acceptance is rarely of practical importance.

对允诺性质的讨论使我对合同及合同后果的分析提前了一点，我必须就构成允诺的事实再说几句。有人指出（理论上是正确的），除一方有保证或要约之外，还必须有另一方的接受。但我很难想出一个案例来证明，简单合同一般由于缺少保证或要约与对价（彼此互为诱因）的关系，而非其他原因不能订立。通常仅提供对价所隐含的意思就伴随着接受要约；由于依据我们的法律，一个被接受的要约或允诺，在提供对价前与未被接受的要约在地位上并无不同；在提供对价前，都可被撤回或继续，除非它已到期或已被撤回；因此接受问题几乎没有实际意义。

Assuming that the general nature of consideration and promise is understood, some questions peculiar to bilateral contracts remain to be considered. These concern the sufficiency of the consideration and the moment when the contract is made.

理解了对价和允诺的一般性质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些双方合同特有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对价的充分性及合同订立的时点。

A promise may be a consideration for a promise, although not

every promise for every other. It may be doubted whether a promise to make a gift of one hundred dollars would be supported by a promise to accept it. But in a case of mutual promises respectively to transfer and to accept unpaid shares in a railway company, it has been held that a binding contract was made. Here one party agrees to part with something which may prove valuable, and the other to assume a liability which may prove onerous. [3_24]

一个允诺可以是另一个允诺的对价，尽管并非每个允诺都是如此。我们可能会怀疑，一个赠与一百美元的允诺能否得到接受它的允诺的支持。但在一起案件中，双方分别允诺转让和接受一家铁路公司尚未付款的股份，法院认为，这样就订立了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合同。该案件中，一方当事人同意放弃也许会有价值的东西，而另一方也同意承担也许会很沉重的责任。

But now suppose that there is no element of uncertainty except in the minds of the parties. Take, for instance, a wager on a past horse-race. It has been thought that this would amount to an absolute promise on one side, and no promise at all on the other. [3_25] But this does not seem to me sound. Contracts are dealings between men, by which they make arrangements for the future. In making such arrangements the important thing is, not what is objectively true, but what the parties know. Any present fact which is unknown to the parties is just as uncertain for the purposes of making an arrangement at this moment, as any future fact. It is therefore a detriment to undertake to be ready to pay if the event turns out not to have been as expected. This seems to be the true explanation why forbearance to sue upon a claim believed the plaintiff to be good is a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although the claim was bad in fact, and known by the defendant to be bad. [3_26] Were

this view unsound, it would be hard to see how wagers on any future event, except a miracle, could be sustained. For if the happening or not happening of the event is subject to the law of causation, the only uncertainty about it is in our foresight, not in its happening.

但是，假设现在不存在任何不确定因素，只是双方当事人有点怀疑而已。以已经过去的一场赛马赌博合同为例。人们认为，这对一方来说意味着绝对的允诺，而对另一方来说却根本没有允诺。但在我看来，这是不正确的。合同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他们以此对未来作出安排。在做这些安排时，重要的并非在客观上什么是真的，而是双方当事人知道些什么。双方当事人不知道的任何现有事实，与将来事实一样，对在该时刻作出安排的目的来说都是不确定的。因此，承诺如果事情不像预料的那样发生就由他来赔偿，这就是一种损害。这似乎正确解释了为什么对原告认为正确的主张推迟行使提起诉讼的权利是一个充分对价，尽管该主张事实上并不正确，而且被告也知道这是错误的。如果该观点不正确，那就很难理解就未来事件而作出的赌博合同（除奇迹外）是怎样得到支持的。因为如果该事件发生或不发生遵循因果规律，则其唯一不确定的地方是我们的预见，而不是其是否发生。

The question when a contract is made arises for the most part with regard to bilateral contracts by letter, the doubt being whether the contract is complete at the moment when the return promise is put into the post, or at the moment when it is received. If convenience preponderates in favor of either view, that is a sufficient reason for its adoption. So far as merely logical grounds go, the most ingenious argument in favor of the later moment is Professor Langdell's. According to him the conclusion follow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consideration which makes the offer binding is

itself a promise. Every promise, he says, is an offer before it is a promise, and the essence of an offer is that it should be communicated. [3_27] But this reasoning seems unsound. When, as in the case supposed, the consideration for the return promise has been put into the power of the offeree and the return promise has been accepted in advance, there is not an instant, either in time or logic, when the return promise is an offer. It is a promise and a term of a binding contract as soon as it is anything. An offer is a revocable and unaccepted communication of willingness to promise. When an offer of a certain bilateral contract has been made, the same contract cannot be offered by the other side. The so-called offer would neither be revocable nor unaccepted. It would complete the contract as soon as made.

合同何时订立这一问题大部分情况下是在涉及通过书信订立双方合同时产生的，疑问在于，该合同完成的时点究竟是在回复允诺投递的时刻还是收到的时刻。如果便利原则压倒其他观点而胜出，则这本身就是采纳便利原则的充分理由。仅就纯粹的逻辑依据而言，支持后一时刻最巧妙的论证当属兰德尔教授提出的。根据他的论证，这一结论推导自以下事实：使要约具有约束力的对价，其本身就是一个允诺。他说，每个允诺在成为允诺之前都是一个要约，而要约的本质在于它应该得到传达。但这一推理似乎是有缺陷的。正如在假设情况中，当回复允诺的对价已处于受要约人的控制中，且该回复允诺已被提前接受，则无论在时间上还是逻辑上，都不存在一个回复允诺就是要约的瞬间。它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允诺与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合同条款。要约是一种可以撤回且尚未被接受的允诺意愿的传达。当某个双方合同的要约已经发出后，同一合同就不能再从另一方发出要约。这种所谓的要约既不能被撤回，也不能拒绝。一旦作出，合同就完成了。

If it be said that it is of the essence of a promise to be communicated, whether it goes through the stage of offer or not, meaning by communicated brought to the actual knowledge of the promisee, the law is believed to be otherwise. A covenant is binding when it is delivered and accepted, whether it is read or not. On the same principle, it is believed that, whenever the obligation is to be entered into by a tangible sign, as, in the case supposed, by letter containing the return promise, and the consideration for and assent to the promise are already given, the only question is when the tangible sign is sufficiently put into the power of the promisee. I cannot believe that, if the letter had been delivered to the promisee and was then snatched from his hands before he had read it, there would be no contract. [3_28] If I am right, it appears of little importance whether the post-office be regarded as agent or bailee for the offerer, or as a mere box to which he has access. The offeree, when he drops the letter containing the counter-promise into the letter-box, does an overt act, which by general understanding renounces control over the letter, and puts it into a third han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offerer, with liberty to the latter at any moment thereafter to take it.

如果说允诺的本质是要被传达，即无论它经不经过要约阶段，其意思都被传达给受允诺人使其实际知晓，而法律却并非如此。一个盖印合同无论读过与否，只要被交付并接受，就具有约束力。依据同样原则，可以认为无论何时只要义务由一个具体标志引入，如在前面假设的情况下，由装有回复允诺的信件所引入，且该允诺的对价和同意都已给出，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一具体标志何时被充分置于受允诺人的控制中。而如果这封信已交付给受允诺人，但他还没来得及读，信又被从他手中抢走了，我不相信此时合同没有成立。如果我的观点正确，则无论邮局被视为要约人的代理人还是受托人，或仅是他可以使用的一个邮筒，都无关紧要。当受要约人把装有反允诺的信件

投进邮筒时，他就实施了一个公开行为，根据一般理解，该行为即放弃对信的控制权，为了要约人的利益而将它置于第三方手中，并授予要约人在之后任何时候取走它的自由。

The principles governing revocation are wholly different. One to whom an offer is made has a right to assume that it remains open according to its terms until he has actual notice to the contrary. The effect of the communication must be destroyed by a counter communication. But the making of a contract does not depend on the state of the parties' minds, it depends on their overt acts. When the sign of the counter promise is a tangible object, the contract is completed when the dominion over that object changes.

而决定撤回要约的原则完全不同。要约针对人有权认为，在其得到实际的相反告知前，该要约，依据其条款，是开放的。传达的效果必须由一个反向传达来消除。但订立合同并不依赖当事人的心理状况，而是依赖他们的公开行为。如果反向允诺的标志是具体物体，则当对该物体的控制发生改变时，合同就完成了。

[3_1].Y.B. 46 Ed. III. 19, pl. 19; 19 Hen. VI. 49, pl. 5; Keilway, 160, pl. 2; Powtuary v. Walton, 1 Roll. Abr. 10, pl. 5; Coggs v. Bernaard, 2 Ld. Raym. 909.

[3_2].Riches and Briggs, Yelv. 4, A.D. 1601; Pickas v. Guile, Yelv. 128.

[3_3].Bainbridge v. Firmstone, 8 Ad. & El. 743, A.D. 1838.

[3_4].Wilkinson v. Oliveira, 1 Bing. N. C. 490, A.D. 1835; Haigh v. Brooks, 10 Ad. & El. 309; lb. 323; Hart v. Miles, 4 C.B. N.S. 371, A.D. 1858.

[3_5].Wheatley v. Low, Cro. Jac. 668, A.D. 1623. Cf. Byne and Playne's Case, 1 Leon. 220, 221 (32 & 33 Eliz.).

[3_6].Wilkinson v. Oliveira, 1 Bing. N. C. 490; Haigh v. Brooks, 10 Ad. & El.

309; Hart v. Miles, 4 C.B. N.S. 371; 6 Am. Law Rev. 47, Oct. 1871.

[3_7].Supra, pp. 196, 197. See also Lecture VII.

[3_8].Byles, J., in Shadwell v. Shadwell, 30 L. J. C.P. 145, 149.

[3_9].Shadwell v. Shadwell, ubi supra; Burr v. Wilcox, 13 Allen, 269, 272, 273.

[3_10].Thomas v. Thomas, 2 Q.B.851.

[3_11].Price v. Jenkins, 5 Ch. D. 619. Cf. Grabbe v. Moxey, 1 W. R. 226; Thomas v. Thomas, 2 Q.B.851; Monahan, Method of Law, 141 et seq.

[3_12].Ellis v. Clark, 110 Mass. 389.

[3_13].Fitch v. Snedaker, 38 N. Y. 248, criticising Williaws v. Carwardine, 4 Barn. & Ad. 621, where, however,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the plaintiff did not know of the offer of a reward, but merely that the jury found that she was in fact actuated by other motives, a finding wholly beside the mark.

[3_14].Y.B. 29 Ed. III. 25, 26.

[3_15].19 R. II., Fitzh. Abr. Dett, pl. 166.

[3_16].Hunt v. Bate, Dyer, 272, A.D. 1568.

[3_17].See Barker v. Halifax, Cro. Eliz. 741; S.C. 3 Dyer, 272 a, n. 32.

[3_18].Sidenham v. Worlington, 2 Leonard, 224; Bosden v. Thinne, Yelv. 40; Lampleigh v. Brathwait, Hobart, 105; Langdell, Cas. on Contr. (2d ed.), ch. 2, Section 11, Summary, Sections 90 et seq. See above, Lecture VII. p. 286.

[3_19].Pollock, Contr. (lst ed.), p. 6.

[3_20].Canham v. Barry, 15 C.B. 597, 619; Jones v. How, 9 C.B. 1, 9; Com. Dig. Condition, D. 2; I Roll. Abr. 420 (D), pl. 1; Y.B. 22 Ed. IV. 26, pl. 6.

[3_21].Gee v. Lancashire & Yorkshire Railway Co., 6 H. & N. 211, 218, Bramwell, B. Cf. Hydraulic Engineering Co. v. McHaffie, 4 Q.B.D. 670, 674, 676.

[3_22].British Columbia Saw-Mill Co. v. Nettleship, L.R. 3 C.P. 499, 509, Willes, J.; Horne v. Midland Railway Co., L.R. 7 C.P. 583, 591; S.C., L.R. 8 C.P. 131.

[3_23].British Columbia Saw-Mill Co. v. Nettleship, L.R. 3 C.P. 499, 509.

[3_24].Cheale v. Kenward, 3 DeG. & J. 27.

[3_25].Langdell, Contr., Sections 89, 28.

[3_26].Langdell, Contr., Section 57.

[3_27].Ibid., Sections 14, 15.

[3_28].But see Langdell, Contr., Sections 14, 15.

LECTURE IX. CONTRACT.—III. VOID AND VOIDABLE.

第九讲　合同（三）——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

The elements of fact necessary to call a contract into existence, and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a contract when formed, have been discussed. It remains to consider successively the cases in which a contract is said to be void, and those in which it is said to be voidable,—in which, that is, a contract fails to be made when it seems to have been, or, having been made, can be rescinded by one side or the other, and treated as if it had never been. I take up the former class of cases first.

我们已经讨论了订立合同必需的事实要件以及合同形成后的法律后果。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合同被视为无效与可撤销的情况，即合同似乎已订立却未能订立的情况，或合同已订立，但可由一方或另一方取消，从而视为从未订立的情况。我首先讨论前一种情况。

When a contract fails to be made, although the usual forms have been gone through with, the ground of failure is commonly said to be mistake, misrepresentation, or fraud. But I shall try to show that these are merely dramatic circumstances, and that the true ground is the absence of one or more of the primary elements, which have been shown, or are seen at once, to be necessary to the existence of a contract.

尽管一般立约形式已完成，但合同未能成功订立时，通常人们会

认为，订立失败的理据为错误、虚假陈述或欺诈。但我会尽力说明，这些仅为非常突出的情况，真正的理据是缺失一个或多个合同赖以存在所必需的基本要件，这些要件上文已经指出，接下来也会提及。

If a man goes through the form of making a contract with A through B as A's agent, and B is not in fact the agent of A, there is no contract, because there is only one party. The promise offered to A has not been accepted by him, and no consideration has moved from him. In such a case, although there is generally mistake on one side and fraud on the other, it is very clear that no special doctrine need be resorted to, because the primary elements of a contract explained in the last Lecture are not yet present.

如某人与作为甲代理人的乙完成了与甲订立合同的形式，而事实上乙并非甲的代理人，则合同不成立，因为只有一方当事人。向甲发出的允诺未得到甲的接受，甲也未给出对价。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通常是一方存在错误，而另一方存在欺诈，但很清楚没有必要求助于什么特别的学说，因为我们在上一讲中解释过的合同的基本要件还不具备。

Take next a different case. The defendant agreed to buy, and the plaintiff agreed to sell, a cargo of cotton, “to arrive ex Peerless from Bombay.” There were two such vessels sailing from Bombay, one in October, the other in December. The plaintiff meant the latter, the defendant the former. It was held that the defendant was not bound to accept the cotton. [4_1] It is commonly said that such a contract is void, because of mutual mistake as to the subject-matter, and because therefore the parties did not consent to the same thing. But this way of putting it seems to me misleading. The law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parties' minds. In contract, as elsewhere, it must go by externals, and judge parties by their conduct. If there had been but one “Peerless,” and the defendant had said “Peerless” by mistake, meaning “Peri,” he would have been bound. The true ground of the decision was not that each party meant a different thing from the other, as is implied by the explanation which has been mentioned, but that each said a different thing. The plaintiff offered one thing, the defendant expressed his assent to another.

下面来看另一不同案件。被告同意购买，原告同意出售“将从孟买通过皮尔利斯号船运到”的一船棉花。但有两艘这样的船从孟买开过来，一艘在十月，另一艘在十二月。原告指的是后者，而被告指的是前者。法院裁决被告没有接受这些棉花的义务。我们通常说，这种合同是无效合同，因为这是由对标的物的共同错误造成的，也因此因为当事人没有就同一事物达成一致。但我认为这种表述方式似乎有误导性，法律与当事人的实际心理状况没有任何关系。在合同中，与其他情况相同，法律必须依据外部因素，通过当事人的行为作出判断。假如只有一艘“皮尔利斯号”，而被告错误地将“佩里”说成了“皮尔利斯”，那他就有接受货物的义务。该裁决的真正依据并非像在前面提到的解释所暗示的那样，双方当事人所指的事物与对方不同，而是每人所说的事物不同。原告对一件事物发出要约，而被告却对另一事物表示了同意。

A proper name, when used in business or in pleading, [4_2] means one individual thing, and no other, as every one knows, and therefore one to whom such a name is used must find out at his peril what the object designated is. If there are no circumstances which make the use deceptive on either side, each is entitled to insist on the meaning favorable to him for the word as used by him,

and neither is entitled to insist on that meaning for the word as used by the other. So far from mistake having been the ground of decision, as mistake, its only bearing, as it seems to me, was to establish that neither party knew that he was understood by the other to use the word “Peerless” in the sense which the latter gave to it. In that event there would perhaps have been a binding contract, because, if a man uses a word to which he knows the other party attaches, and understands him to attach, a certain meaning, he may be held to that meaning, and not be allowed to give it any other. [4_3]

在用于商业或诉状中时，专有名词是指人人都知道的事物，而非别的事物，因此听到这样一个名词的人就必须自己负责查出这个名词所指对象。如果该词的用法不会使任何一方受骗，则双方都有权坚持使用该词时对他有利的意思，双方都无权坚持对方使用该词的意思。因此该案判决的依据远非错误，因为在我看来，错误的唯一含义是要表明，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对方是以自己所赋予“皮尔利斯”的意思来理解对方使用该词的意思的。在那种情况下，也许就会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合同，因为，如果某人使用某词时知道对方当事人给这个词附加了某个特定的意思，也理解他附加的这个意思，那他就有义务使用这个意思，不允许再赋予该词任何其他意思。

Next, suppose a case in which the offer and acceptance do not differ, and in which both parties have used the same words in the same sense. Suppose that A agreed to buy, and B agreed to sell, “these barrels of mackerel,” and that the barrels in question turn out to contain salt. There is mutual mistake as to the contents of the barrels, and no fraud on either side. I suppose the contract would be void. [4_4]

下面假设一种情形，其中要约与接受的事物相同，双方当事人使用的措词相同且所指意思相同。假设甲同意购买，乙同意出售“这几桶鲭鱼”，并假设后来发现涉案的几个桶里装的却是盐。这里双方就桶中的东西存在共同错误，任何一方都不存在欺诈。我认为，这个合同应该是无效合同。

It is commonly said that the failure of the contract in such a case is due to the fact of a difference in kind between the actual subject-matter and that to which the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 was directed. It is perhaps more instructive to say that the terms of the supposed contract, although seemingly consistent, were contradictory, in matters that went to the root of the bargain. For, by one of the essential terms,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agreement was the contents of certain barrels, and nothing else, and, by another equally important, it was mackerel, and nothing else; while, as a matter of fact, it could not be both, because the contents of the barrels were salt. As neither term could be left out without forcing on the parties a contract which they did not make, it follows that A cannot be required to accept, nor B to deliver either these barrels of salt, or other barrels of mackerel; and without omitting one term, the promise is meaningless.

人们普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合同订立失败是由实际标的物与当事人意图所指向的标的物之间存在类别的差异这一事实造成的。也许这样解释更有启发性：这个假设合同的条款尽管看似一致，但在涉及这笔交易的根本问题上却相互矛盾。因为，依据其中一条关键性条款，该协议的标的物是某些特定桶里的内容，而不是别的；但依据另一条同等重要的关键性条款，标的物是鲭鱼，而不是别的；但事实上，不可能同时是这两者，因为桶里装的是盐。由于不能忽略这两条中的任意一条，否则就会强加给当事人一份他们并未订立的合同，所

以结论是，无论是这几桶盐还是另外几桶鲭鱼，既不能要求甲接受，也不能要求乙交付；而如果不忽略其中一个条款，则该允诺毫无意义。

If there had been fraud on the seller's part, or if he had known what the barrels really contained, the buyer might have had a right to insist on delivery of the inferior article. Fraud would perhaps have made the contract valid at his option. Because, when a man qualifies sensible words with others which he knows, on secret grounds, are insensible when so applied, he may fairly be taken to authorize his promisee to insist on the possible part of his promise being performed, if the promisee is willing to forego the rest.

假如卖方存在欺诈，或假如他知道这些桶里实际装的是什么，则买方就有权坚持对方交付该劣质物品。欺诈或许会因为他的选择而使该合同生效。因为，如果某人用别的词来限定修饰有一定意义的词，而他私下知道这样使用时不合理，则可公平地认为，他已授权受允诺人坚持其允诺中可能的部分得到履行，如果受允诺人愿意放弃其余部分的话。

Take one more illustration like the last case. A policy of insurance is issued on a certain building described in the policy as a machine-shop. In fact the building is not a machine-shop, but an organ factory, which is a greater risk. The contract is void, not because of any misrepresentation, but, as before, because two of its essential terms are repugnant, and their union is insensible. [4_5]

再举一个与上面类似的例子来说明。保险公司签发了一张保单，

为某建筑物投保，其中该建筑被描述为一个机械车间。而事实上，该建筑并非机械车间而是一家元件工厂，相比车间有更大的风险。该合同无效，但并非因为有任何虚假陈述，而是像上面一样，因为其中两个关键性条款相互矛盾，故二者结合不合理。

Of course the principle of repugnancy last explained might be stretched to apply to any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different terms of a contract. It might be said, for instance, that if a piece of gold is sold as eighteen-carat gold, and it is in fact not so pure, or if a cow is sold as yielding an average of twelve quarts of milk a day, and in fact she yields only six quarts, there is no logical difference, according to the explanation which has just been offered, between those cases and that of the barrel of salt sold for mackerel. Yet those bargains would not be void. At the most, they would only be voidable, if the buyer chose to throw them up.

当然，以上解释的矛盾性原则可被扩展，以适用合同条款不一致的情况。比如，若一块黄金被当作十八克拉的黄金出售，而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纯；或者，如果一头奶牛被当作每天平均产十二夸脱奶的奶牛出售，而实际上它只能产六夸脱；可以说，依据上面给出的解释，这些案件和将盐作为鲭鱼出售的案件并无逻辑上的区别。然而这些交易并非无效，它们最多是可撤销的，条件是买方选择放弃交易。

The distinctions of the law are founded on experience, not on logic. It therefore does not make the dealings of men dependent on a mathematical accuracy. Whatever is promised, a man has a right to be paid for, if it is not given; but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 absence of some insignificant detail will authorize him to throw up the contract, still less that it will prevent the formation of a

contract, which is the matter now under consideration. The repugnant terms must both be very important—so important that the court thinks that, if either is omitted, the contract would be different in substance from that which the words of the parties seemed to express.

其法律上的区别是建立在经验，而非逻辑基础上的。因此，它没有使人们之间的交易依赖数学式的精确性。无论某人得到什么允诺，只要没有得到允诺的东西，他就有权得到赔偿；但这并非意味着，缺失某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就会使他拥有放弃该合同的权利，更不意味着会因此阻碍合同的成立，这正是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相互矛盾的两项条款必须都非常重要——重要到法院认为，假如忽略其中一个，则该合同与当事人的用语似乎要表达的那个合同就会有实质性不同。

A term which refers directly to an identification by the senses has always this degree of importance. If a promise is made to sell this cow, or this mackerel, to this man, whatever else may be stricken from the contract, it can never be enforced except touching this object and by this man. If this barrel of salt is fraudulently sold for a barrel of mackerel, the buyer may perhaps elect to take this barrel of salt if he chooses, but he cannot elect to take another barrel of mackerel. If the seller is introduced by the name B, and the buyer supposes him to be another person of the same name, and under that impression delivers his written promise to buy of B, the B to whom the writing is delivered is the contractee, if any one is, and, notwithstanding what has been said of the use of proper names, I should suppose a contract would be made. [4_6] For it is further to be said that, so far as by one of the terms of a contract the thing promised or the promisee is identified by sight and hearing, that term so far preponderates over all others that it is very

rare for the failure of any other element of description to prevent the making of a contract. [4_7] The most obvious of seeming exceptions is where the object is not in fact so identified, but only its covering or wrapper.

一项可直接由感官判断识别的条款永远具有这种重要性。如果允诺要卖给这人这头奶牛，或这条鲭鱼，则无论该合同可能去掉别的什么东西，如果不是关于这一物体，并由这人执行，则该合同永远不可能实施。如果出于欺诈，将这桶盐当作一桶鲭鱼出售，则买方也许可以选择接受这桶盐，但他不能选择要另一桶鲭鱼。如果合同中称卖方为乙，而买方以为他是另一位同名的人，并基于这一印象交付了要向乙购买的书面允诺，那么如果说有谁是受约人的话，则该书面允诺交付给的那个乙就是受约人；无论前面对专有名词的用法是如何阐述的，我都会认为，合同已经订立。因为，更进一步说，只要根据合同某一条款，被允诺物或受允诺人能够通过视觉与听觉加以识别的话，则该条款就远比其他所有条款都重要，因此由于未能描述其他任何要件从而阻碍合同成立的情况就非常罕见。最明显的貌似真实的例外是，实际上该对象并未通过感官得以识别，而识别的只是其遮盖物或包装。

Of course the performance of a promise may be made conditional on all the terms stipulated from the other side being complied with, but conditions attaching to performance can never come into consideration until a contract has been made, and so far the question has been touching the existence of a contract in the first instance.

当然履行允诺可以对方约定的所有条款都得以遵守为条件，但在合同订立前，不会考虑附加于履行的条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

的问题涉及的一直是最初合同的订立。

A different case may be suggested from any yet considered. Instead of a repugnancy between offer and assent which prevents an agreement, or between the terms of an agreement which makes it insensible on its face, there may be a like repugnancy between a term of the contract and a previous representation of fact which is not expressly made a part of the contract. The representation may have been the chief inducement and very foundation of the bargain. It may be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of the expressed terms, and yet the contract may have been reduced to writing in words which cannot fairly be construed to include it. A vendor may have stated that barrels filled with salt contain mackerel, but the contract may be only for the barrels and their contents. An applicant for insurance may have misstated facts essential to the risk, yet the policy may simply insure a certain building or a certain life. It may be asked whether these contracts are not void also.

还有一种情况与之前探讨过的都不一样。这种情况并非阻碍协议成立的要约与同意之间的矛盾，也并非使协议表面看来不合理的协议条款之间的矛盾，而是在合同的一项条款和之前对没有明确构成合同之一部分的事实的陈述之间可能会有类似的矛盾。该陈述可能是该交易的主要诱因和特定基础。它可能比任何明示条款更重要，但该合同用语可能已简化，很难合理地认为其中已经包括了该事实。卖方也许说过装满盐的桶里装着鲭鱼，但合同也许只写明了这些桶及其内容物。保险投保人也许就对风险至关重要的事实作出了虚假陈述，但保险单可能只是简单地为某一建筑物或某人的生命投保。有人可能会问，这些合同是否也无效呢？

There might conceivably be cases in which,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ature of the contract, the words used could be said to embody the representation as a term by construction. For instance, it might be said that the true and well-understood purport of a contract of insurance is not, as the words seem to say, to take the risk of any loss by fire or perils of the sea, however great the risk may be, but to take a risk of a certain magnitude, and no other, which risk has been calculated mathematically from the statements of the party insured. The extent of the risk taken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because the old forms and established usage are otherwise, but the meaning is perfectly understood.

可以想象会有这样的情况：考虑到合同的性质，通过解释可以说合同用语已经作为一项条款包括了该陈述。比如，一份保险合同被人正确理解的真正意义可以说并不像其用语看起来所说的那样，要承担一切由火灾或海事风险所引起的损失风险——无论该风险有多大，而是只承担一定数额的风险，该风险已从被保险当事人的陈述中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来，其他损失概不承担。但保险单中没有具体写明承担风险的范围，因为这种古老的形式与建立已久的惯例就是这样，但其意思却完全可以被人理解。

If this reasoning were adopted, there would be an equal repugnancy in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whether the nature of the risk was written in the policy or fixed by previous description. But, subject to possible exceptions of this kind, it would seem that a contract would be made, and that the most that could be claimed would be a right to rescind. Where parties having power to bind themselves do acts and use words which are fit to create an obligation, I take it that an obligation arises. If there is a mistake as to a fact not mentioned in the contract, it goes only to the motives

for making the contract. But a contract is not prevented from being made by the mere fact that one party would not have made it if he had known the truth. In what cases a mistake affecting motives is a ground for avoidance, does not concern this discussion, because the subject now under consideration is when a contract is made, and the question of avoiding or rescinding it presupposes that it has been made.

假如采用这一推理，则该合同条款中还会有同样的矛盾，无论该风险的性质是写在保险单上的还是根据之前描述所确定。然而，依据这类可能的例外，似乎可以认为合同已经订立，而且最多只能对它主张撤销的权利。如果当事人有能力允诺实施某些行为，且使用了适合产生义务的词语，我认为义务就产生了。即使存在合同中没有提到某一事实的错误，也只涉及订立合同的动机。但合同的订立不会受到下面事实的阻碍，即如一方当事人早知道真相，他就不会订立合同。而影响动机的错误在什么情况下会造成合同无效这一问题与我们的讨论无关，因为目前我们探究的问题是合同何时订立，而宣布合同无效或撤销合同这一问题本身就预先假定了合同已经订立。

I think that it may now be assumed that, when fraud, misrepresentation, or mistake is said to make a contract void, there is no new principle which comes in to set aside an otherwise perfect obligation, but that in every such case there is wanting one or more of the first elements which were explained in the foregoing Lecture. Either there is no second party, or the two parties say different things, or essential terms seemingly consistent are really inconsistent as used.

我想，现在也许可以认为，当人们说欺诈、虚假陈述或错误可使

合同无效时，并未引入新的原则以取消本来完全有效的义务，相反，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存在前一讲解释过的一个或多个基本要件的缺失：或者没有第二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事人所述为不同事物，或者看似一致的关键条款在实际使用时并不一致。

When a contract is said to be voidable, it is assumed that a contract has been made, but that it is subject to being unmade at the election of one party. This must be because of the breach of some condition attached to its existence either expressly or by implication.

当我们说合同可撤销时，是指合同已订立，但依据一方当事人的选择可以取消。这必须是因为或明确或含蓄地违反了合同存在所附带的某个条件。

If a condition is attached to the contract's coming into being, there is as yet no contract. Either party may withdraw, at will, until the condition is determined. There is no obligation, although there may be an offer or a promise, and hence there is no rel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which requires discussion here. But some conditions seemingly arising out of a contract already made are conditions of this sort. Such is always the case if the condition of a promise lies within the control of the promisor's own will. For instance, a promise to pay for clothes if made to the customer's satisfaction, has been held in Massachusetts to make the promisor his own final judge. [4_8] So interpreted, it appears to me to be no contract at all, until the promisor's satisfaction is expressed. His promise is only to pay if he sees fit, and such a promise cannot be made a contract because it cannot impose any obligation. [4_9] If the

promise were construed to mean that the clothes should be paid for provided they were such as ought to satisfy the promisor, [4_10] and thus to make the jury the arbiter, there would be a contract, because the promisor gives up control over the event, but it would be subject to a condition in the sense of the present analysis.

如合同之订立附带了某一个条件，则该合同还未订立。在该条件确定之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随意撤出。当事人之间虽可能有要约或允诺，但不存在义务，因此，也就不存在需要在此讨论的关系。但有些看似从已订立的合同中产生的条件也属于这类条件。某一允诺的条件在允诺人自己的意志控制下的情况，就是这样。比如，在马萨诸塞州一位顾客允诺，如果衣服做得使自己满意他就付款，法院认为该允诺使得允诺人成为他自己的最后仲裁者。如果这样理解，在我看来，在允诺人明确表达其满意之前，根本就没有合同。其允诺是如果他觉得合适才会付款，但由于这种允诺无法施加任何义务，故无法订立合同。如果将该允诺理解为，当这些衣服应该能使允诺人满意时他就应该付款，从而使陪审团成为仲裁者，则合同就会存在，因为允诺人放弃了对该事件的控制权，然而它还要受到我们现在分析的一个条件的制约。

The conditions which a contract may contain have been divided by theorists into conditions precedent and conditions subsequent. The distinction has even been pronounced of great importance.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if the course of pleading be taken as a test, it is so. In some cases, the plaintiff has to state that a condition has been performed in order to put the defendant to his answer; in others, it is left to the defendant to set up that a condition has been broken.

理论家们将合同可能包含的条件分为先决条件与后决条件。他们甚至宣称这一区分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承认，如将诉讼过程作为检验标准确实是这样。在有些案件中，原告为使被告作出答辩，不得不声明某一条件已经履行；在另一些案件中，则留给被告来确定是否违反了某一条件。

In one sense, all conditions are subsequent; in another, all are precedent. All are subsequent to the first stage of the obligation.[4_11] Take, for instance, the case of a promise to pay for work if done to the satisfaction of an architect. The condition is a clear case of what is called a condition precedent. There can be no duty to pay until the architect is satisfied. But there can be a contract before that moment, because the determination whether the promisor shall pay or not is no longer within his control. Hence the condition is subsequent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obligation.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条件都是后决条件；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所有条件又都是先决条件。所有条件都在义务的第一个阶段之后。例如，一位建筑师允诺如果他对某项工作满意就付款，这一条件是一个很明确的先决条件的例子。在建筑师满意之前，他没有付款的义务。但在那一刻之前还是可以有合同的，因为允诺人是否应该付款的决定已不受其控制，故该条件在义务存在之后。

On the other hand, every condition subsequent is precedent to the incidence of the burden of the law. If we look at the law as it would be regarded by one who had no scruples against doing anything which he could do without incurring legal consequences, it is obvious that the main consequence attached by the law to a contract is a greater or less possibility of having to pay money. The

only question from the purely legal point of view is whether the promisor will be compelled to pay. And the important moment is that at which that point is settled. All conditions are precedent to that.

另一方面，所有后决条件又都先于法律义务的发生。如果我们看待法律，像一个可以毫无顾忌地做任何不会招致法律后果的事情的人那样看待法律，那么很明显，法律附加于合同的主要后果就是一个或大或小的必须支付的可能性。单纯地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唯一的问题就是允诺人是否会被强制付款。重要的时刻就是那一点被确定的时刻。而所有条件都先于这一时刻。

But all conditions are precedent, not only in this extreme sense, but also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plaintiff's cause of action. As strong a case as can be put is that of a policy of insurance conditioned to be void if not sued upon within one year from a failure to pay as agreed. The condition does not come into play until a loss has occurred, the duty to pay has been neglected, and a cause of action has arisen. Nevertheless, it is precedent to the plaintiff's cause of action. When a man sues,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he has had a cause of action in the past, but whether he has one then. He does not have one then, unless the year is still running. If it were left for the defendant to set up the lapse of the year, that would be due to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 order of pleading does not require a plaintiff to meet all possible defences, and to set out a case unanswerable except by denial. The point at which the law calls on the defendant for an answer varies in different cases. Sometimes it would seem to be governed simply by convenience of proof, requiring the party who has the affirmative to plead and prove it. Sometimes there seems to be a reference to the usual course of

events, and matters belong to the defence because they are only exceptionally true.

但不仅在这种极端的意义上是这样，而且对原告诉因的存在来说，所有条件也都是先决条件。可以举出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情况，这就是保险单失效的条件，即在不按约定给付的一年内没有对其提起诉讼。在损失发生后，给付的义务被忽视，从而产生诉因之前，该条件都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它还是先于原告的诉因。当某人提起诉讼时，问题并不在于他过去是否有诉因，而在于当时是否有。而除非当年还未结束，否则他就没有诉因。假如让被告来确定这一年的流逝，则将归因于以下情形：诉讼辩论的程序并不要求原告回应被告所有可能的辩护，也不要求原告提出除否认之外无法辩驳的论据。法律要求被告作出答辩的争议点在不同案件中也各不相同。有时似乎仅受举证便利原则的支配，要求持肯定性陈述的当事人陈述并加以证明。有时又似乎会参考事件之正常进程与属于辩护的事项（因为它们只在例外情况下成立）。

The most logical distinction would be between conditions which must be satisfied before a promise can be broken, and those which, like the last, discharge the liability after a breach has occurred. [4_12] But this is of the slightest possible importance, and it may be doubted whether another case like the last could be found.

将那些允诺能被违反之前必须得到满足的条件，与那些像刚才一样在违约发生后可以免除责任的条件予以区分应该是最合乎逻辑的。但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可能非常小，而且人们可能会怀疑，还能否找到另一个与刚才同样的案例。

I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o mark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 stipulation which only has the effect of confining a promise to certain cases, and a condition properly so called. Every condition, it is true, has this effect upon the promise to which it is attached, so that, whatever the rule of pleading may be, [4_13] a promise is as truly kept and performed by doing nothing where the condition of the stipulated act has been broken, as it would have been by doing the act if the condition had been fulfilled. But if this were all, every clause in a contract which showed what the promisor did not promise would be a condition, and the word would be worse than useless.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 is quite different.

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只具有将允诺限于某些情况下的效力之条款，与名副其实的条件之间的区别。确实，每个条件都对其附着的允诺具有这种效力，因此无论诉讼答辩的规则是什么，在规定行为的条件被违反后什么都不做，与在该条件被满足后履行这一行为一样，都可以忠实地遵守和履行一个允诺。但如果这就是全部，则合同中表明允诺人没有允诺什么的每个条款都将是一个条件，因此这种文字比没用还糟糕，其典型特征非常不同。

A condition properly so called is an event, the happening of which authorizes the person in whose favor the condition is reserved to treat the contract as if it had not been made,—to avoid it, as is commonly said,—that is, to insist on both parties being restored to the position in which they stood before the contract was made. When a condition operates as such, it lets in an outside force to destroy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ings. For although its existence is due to consent of parties, its operation depends on the choice of one of them. When a condition is broken, the person entitled to insist on it may do so if he chooses; but he may, if he prefers, elect to keep

the contract on foot. He gets his right to avoid it from the agreement, but the avoidance comes from him.

一个名副其实的条件为一个事件，该事件的发生授权条件对其有利的一方，将该合同视为并未订立，即如通常所说，撤销该合同，也就是说，他可以坚持将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恢复到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当条件如此发挥作用时，它就容许一个外部力量来破坏事情的现状。因为，尽管其存在是因为双方当事人都同意，但它发挥作用却要依赖其中一方的选择。当某一条件被违反时，有权坚持它的人如果选择撤销，它就可以撤销；但如果他愿意，也可以选择保留该合同。他从协议中获得撤销合同的权利，但撤销与否则取决于他。

Hence it is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those stipulations which have this extreme effect from those which only interpret the extent of a promise, or define the events to which it applies. And as it has just been shown that a condition need not be insisted on as such, we must further distinguish between its operation by way of avoidance, which is peculiar to it, and its incidental working by way of interpretation and definition, in common with other clauses not conditions.

因此，把具有这种极端效力的条款与只解释允诺的范围，或只界定允诺适用事件的条款区分开来很重要。由于如前所示，并不需要如此坚持某一条件，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区分其通过撤销（此为其特有）的运作，与借助解释和界定的附带运作，后者与其他非条件条款相同。

This is best illustrated by taking a bilateral contract between A

and B, where A's undertaking is conditional on B's doing what he promises to do, and where, after A has got a certain distance in his task, B breaks his half of the bargain. For instance, A is employed as a clerk by B, and is wrongfully dismissed in the middle of a quarter. In favor of A, the contract is conditional on B's keeping his agreement to employ him. Whether A insists on the condition or not, he is not bound to do any more. [4_14] So far, the condition works simply by way of definition. It establishes that A has not promised to act in the case which has happened. But besides this, for which a condition was not necessary, A may take his choice between two courses. In the first place, he may elect to avoid the contract. In that case the parties stand as if no contract had been made, and A, having done work for B which was understood not to be gratuitous, and for which no rate of compensation has been fixed, can recover what the jury think his services were reasonably worth. The contract no longer determines the quid pro quo. But as an alternative course A may stand by the contract if he prefers to do so, and sue B for breaking it. In that case he can recover as part of his damages pay at the contract rate for what he had done, as well as compensation for his loss of opportunity to finish it. But the points which are material for the present discussion are, that these two remedie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4_15] one supposing the contract to be relied on, the other that it is set aside, but that A's stopping work and doing no more after B's breach is equally consistent with either choice, and has in fac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atter.

这一点可以通过甲、乙双方合同得到最好的说明，其中甲方的承诺以乙方做其允诺要做的事为条件，而当甲方履行了一定量的任务后，乙方违反了自己一方的条件。例如，甲方为乙方雇佣的职员，却不到一个季度就被不正当解雇了。对甲方有利的是，该合同是以乙方

遵守协议继续雇佣他为条件的。无论甲方是否坚持这一条件，他都没有再做更多工作的义务了。到目前为止，该条件仅通过界定发挥作用。它确定，甲方并未允诺在已发生的这种情况下采取行动。但除此之外（一个条件对此并非必要），甲方可有两种选择。首先，他可以选择撤销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处于似乎没有订立合同的状态，而大家都明白，甲方为乙方所做工作并非免费，且并未确定对其补偿的比例，故甲方可获得陪审团认为其服务合理价值的补偿。而不再由合同来确定交换条件。但作为另一种选择，甲方如果愿意，也可以坚持该合同，并起诉乙方违反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为其所做的工作获得以合同费率计算的部分损害赔偿，和因失去完成该服务的机会而应得的补偿。但对当前讨论至关重要的几点是，这两种救济方式是相互排斥的，其中一种假定可以依赖该合同，另一种则假定可以不理会合同，但甲在乙违约后停止工作不再做下去与任一选择都是一致的，而且事实上与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One word should be added to avoid misapprehension. When it is said that A has done all that he promised to do in the case which has happened, it is not meant that he is necessarily entitled to the same compensation as if he had done the larger amount of work. B's promise in the case supposed was to pay so much a quarter for services; and althoug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mise was the promise by A to perform them, the scope of it was limited to the case of their being performed in fact. Hence A could not simply wait till the end of his term, and then recover the full amount which he would have had if the employment had continued. Nor is he any more entitled to do so from the fact that it was B's fault that the services were not rendered. B's answer to any such claim is perfect. He is only liable upon a promise, and he in his turn only promised to pay in a case which has not happened. He did promise to employ, however, and for not doing that he is liable in damages.

为了避免误解，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当我们说甲在已发生的这种情况下已经做了其允诺的一切时，并非指他一定有权得到与他做了更多工作情况下可以得到的相同补偿。在该假设案例中，乙方的允诺是为一个季度的服务付这些钱；尽管该允诺的对价是甲方来履行这些服务的允诺，但其范围却限于这些服务实际履行的情况。因此甲方不能只是等到服务期结束，然后要求得到如果该雇佣关系继续下去他将会得到的全部数额。即使事实是由于乙的过错而使该服务没有得到提供，他也同样不能这样做。乙方对这种权利主张的答辩是有效的。他只对允诺承担责任，而他只允诺在并未发生的一种情况下给付。但他确实允诺了雇佣甲方，由于他没能做到，因此他负有赔偿损害的责任。

One or two more illustrations will be useful. A promises to deliver, and B promises to accept and pay for, certain goods at a certain time and place. When the time comes, neither party is on hand. Neither would be liable to an action, and, according to what has been said, each has done all that he promised to do in the event which has happened, to wit, nothing. It might be objected that, if A has done all that he is bound to do, he ought to be able to sue B, since performance or readiness to perform was all that was necessary to give him that right, and conversely the same might be said of B. On the other hand, considering either B or A as defendant, the same facts would be a complete defence. The puzzle is largely one of words.

再举一两个例子会更有帮助。甲方允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交付某货物，而乙方允诺接受该货物并付款。但到了约定时间双方却都没有到场，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不会受到起诉，而且依上所述，双方都已做了他们允诺在已发生的情况（即什么都没发生）下所要做的一切。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假如甲方已做了他该做的一切，那么他应该能够起

诉乙方，因为履行或准备履行的意愿足以赋予他这个权利，反过来，乙方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无论将甲方还是乙方视为被告，同样的事实也构成了有效的辩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字上的困惑。

A and B have, it is true, each performed all that they promised to do at the present stage, because they each only promised to act in the event of the other being ready and willing to act at the same time. But the readiness and willingness, although not necessary to the performance of either promise, and therefore not a duty, was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esent a case to which the promise of action on the other side would apply. Hence, although A and B have each performed their own promise, they have not performed the condition to their right of demanding more from the other side. The performance of that condition is purely optional until one side has brought i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ther's undertaking by performing it himself. But it is performance in the latter sense, that is, the satisfying of all conditions, as well as the keeping of his own promises, which is necessary to give A or B a right of action.

的确，甲方和乙方在目前阶段都履行了他们允诺要做的一切，因为他们都只允诺在对方已准备好，并愿意同时行动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但尽管这种“准备好并愿意”对两个允诺的履行来说都并非必要，因此并非一种义务，但对于为呈现一种对方允诺采取行动所适用的情形来说，却是必要的。因此，尽管甲乙双方各自履行了自己的允诺，但并未履行能使他们要求对方做更多事情的权利之条件。在一方通过履行该条件而使其进入对方承诺的范围之前，该条件的履行是纯粹非强制性的。但正是后一种意义上的履行，即满足所有条件并遵守自己的允诺，对赋予甲方或乙方提起诉讼的权利来说才是必需的。

Conditions may be created by the very words of a contract. Of such cases there is nothing to be said, for parties may agree to what they choose. But they may also be held to arise by construction, where no provision is made in terms for rescinding or avoiding the contract in any case. The nature of the conditions which the law thus reads in needs explanation. It may be said, in a general way, that they are directed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manifest grounds for making the bargain on the side of the rescinding party, 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its manifest objects. But that is not enough. Generally speaking, the disappointment must be caused by the wrong-doing of the person on the other side; and the most obvious cases of such wrong-doing are fraud and misrepresentation, or failure to perform his own part of the contract.

条件也可能通过合同用语本身创立。这类情况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当事人会同意他们自己的选择。但任何情况下，只要合同条款没有作出废止或撤销该合同的规定，法律就认为这些条件也可以通过合同解释产生。由法律如此解读的这些条件的性质，需要解释。一般情况下可以说，这些条件所指向的是对撤销合同方而言存在履行约定的明示依据，或者实现了明示的约定目标。但这还不够，一般来讲，撤销合同一方的失望一定是由对方不当行为引起的；这种不当行为中，最常见的情况是欺诈和虚假陈述，或未能履行合同中自己的义务。

Fraud and misrepresentation thus need to be considered once more in this connection. I take the latter first. In dealing with it the first question which arises is whether the representation is, or is not, part of the contract. If the contract is in writing and the representation is set out on the face of the paper, it may be material or immaterial, but the effect of its untruth will be determined on much the same principles as govern the failure to perform a

promise on the same side. If the contract is made by word of mouth, there may be a large latitude in connecting words of representation with later words of promise; but when they are determined to be a part of the contract , the same principles apply as if the whole were in writing.

因此需要就这一点再次考察欺诈和虚假陈述。先说虚假陈述。讨论它时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该陈述是不是合同的一部分？如果该合同是书面的，该陈述可以由文书的字面意义阐明，它可以是实质性的，也可以是非实质性的，但在确定虚假所产生的影响时，其所依据的原则，与同一方未履行允诺时所依据的原则相同。如该合同是口头订立的，则将该陈述用语与后来的允诺用语相联系时可能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但当它们一旦确立为合同的一部分，就适用与书面合同相同的原则。

The question now before us is the effect of a misrepresentation which leads to, but is not a part of, the contract. Suppose that the contract is in writing, but does not contain it, does such a previous misrepresentation authorize rescission in any case? And if so, does it in any case except where it goes to the height of fraud? The promisor might say, it does not matter to me whether you knew that your representation was false or not; the only thing I am concerned with is its truth. If it is untrue, I suffer equally whether you knew it to be so or not. But it has been shown, in an earlier Lecture, that the law does not go on the principle that a man is answerable for all the consequences of all his acts. An act is indifferent in itself. It receives its character from the concomitant facts known to the actor at the time. If a man states a thing reasonably believing that he is speaking from knowledge, it is contrary to the analogies of the law to throw the peril of the truth

upon him unless he agrees to assume that peril, and he did not do so in the case supposed, as the representation was not made part of the contract.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导致该合同订立却不属于该合同的虚假陈述的效力。假定该合同为书面合同，却未包含该虚假陈述，则无论何种情况，这种前面作出的虚假陈述能赋予撤销合同的权利吗？如果能，那么是除了到达欺诈的程度，任何别的情况下都能吗？允诺人也许会说，无论你是否知道自己的陈述是真是假对我都不重要；我唯一关心的是真相。假如它不真实，那么无论你知不知道，我都同样受到损害。但前一讲中已经表明，法律并不遵循一个人要为其所有行为的所有后果负责这一原则。一个行为本身是中性的。其特征来自行为人当时所知道的伴随事实。如某人陈述某事时合理地相信他是依据自己所知而说的，则将此事是否真实的风险加在他身上就与法律的类推相反，除非他同意承担该风险；而在刚才假设的情况中，他并未同意这么做，因为该陈述并未成为合同的一部分。

It is very different when there is fraud. Fraud may as well lead to the making of a contract by a statement outside the contract as by one contained in it. But the law would hold the contract not less conditional on good faith in one case than in the other.

当存在欺诈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通过合同内外的陈述，欺诈都可以导致合同订立。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法律都不会认为该合同是以诚意为条件的。

To illustrate, we may take a somewhat extreme case. A says to B, I have not opened these barrels myself, but they contain No. 1

mackerel: I paid so much for them to so and so, naming a well-known dealer. Afterwards A writes B, I will sell the barrels which you saw, and their contents, for so much; and B accepts. The barrels turn out to contain salt. I suppose the contract would be binding if the statements touching the contents were honest, and voidable if they were fraudulent.

我们可以举个有些极端的案例来说明。甲对乙说，我自己没打开过这些桶，但桶里装着最好的鲭鱼：我为买这些鱼付了某某多少钱，并说了一个很有名的商人的名字。后来甲写信给乙说，我要以多少钱的价格出售你看到的那些桶及其内容物；乙接受了。然而后来证明，这些桶里装的是盐。我认为，如果关于桶内容物的陈述是诚实的，该合同就有约束力；如果该陈述是欺诈性的，该合同就是可撤销的。

Fraudulent representations outside a contract can never, it would seem, go to anything except the motives for making it. If outside the contract, they cannot often affect its interpretation. A promise in certain words has a definite meaning, which the promisor is presumed to understand. If A says to B, I promise you to buy this barrel and its contents, his words designate a person and thing identified by the senses, and they signify nothing more. There is no repugnancy, and if that person is ready to deliver that thing, the purchaser cannot say that any term in the contract itself is not complied with. He may have been fraudulently induced to believe that B was another B, and that the barrel contained mackerel; but however much his belief on those points may have affected his willingness to make the promise, it would be somewhat extravagant to give his words a different meaning on that account. “You” means the person before the speaker, whatever his name, and “contents” applies to salt, as well as to mackerel.

看来，合同之外的欺诈性陈述除与订立合同的动机有关外，似乎没有别的作用。因为在合同之外，它们通常不能影响对合同的解释。用特定词语作出的允诺有着确定的含义，可以推定允诺人理解该含义。如果甲对乙说，我向你允诺买这个桶及其内容物，那么他的话就是指通过感官识别到的那个人和物，而不指别的东西。这里并不存在矛盾，如果那个人准备好交付该物，那么买方就不能说合同的某一条款未得到遵守。对方可能会欺诈性地诱使他相信，乙是另一个同名的人，或桶里装的是鲭鱼；但无论他对这些事情的相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作出允诺的意愿，要据此就赋予他的话以不同的含义都有些夸张。“你”指的就是说话人面前的这个人，无论他叫什么名字，而“内容物”既适用于盐，也适用于鲭鱼。

It is no doubt only by reason of a condition construed into the contract that fraud is a ground of rescission. Parties could agree, if they chose, that a contract should be binding without regard to truth or falsehood outside of it on either part.

无疑，正是仅仅由于通过解释而进入合同的一个条件，才使得欺诈成为撤销合同的依据。如果双方当事人愿意，他们就可以商定，无论合同之外任何一方之陈述真假，该合同都具有约束力。

But, as has been said before in these Lectures, although the law starts from the distinctions and uses the language of morality, it necessarily ends in external standards not dependent on the actual consciousness of the individual. So it has happened with fraud. If a man makes a representation, knowing facts which by the average standard of the community are sufficient to give him warning that it is probably untrue, and it is untrue, he is guilty of fraud in theory of

law whether he believes his statement or not. The courts of Massachusetts, at least, go much further. They seem to hold that any material statement made by a man as of his own knowledge, or in such a way as fairly to be understood as made of his own knowledge, is fraudulent if untrue, irrespective of the reasons he may have had for believing it and for believing that he knew it. [4_16] It is clear, therefore, that a representation may be morally innocent, and yet fraudulent in theory of law. Indeed, the Massachusetts rule seems to stop little short of the principle laid down by the English courts of equity, which has been criticised in an earlier Lecture, [4_17] since most positive affirmations of facts would at least warrant a jury in finding that they were reasonably understood to be made as of the party's own knowledge, and might therefore warrant a rescission if they turned out to be untrue. The moral phraseology has ceased to be apposite, and an external standard of responsibility has been reached. But the starting-point is nevertheless fraud, and except on the ground of fraud, as defined by law, I do not think that misrepresentations before the contract affect its validity, although they lead directly to its making. But neither the contract nor the implied condition calls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facts as to which the false representations were made. They call only for the absence of certain false representations. The condition is not that the promisee shall be a certain other B, or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barrel shall be mackerel, but that the promisee has not lied to him about material facts.

但正如前面几讲所说，尽管法律始于这些区分并使用道德用语，但它最终必然会采用不依赖于个体实际意识的外部标准。对欺诈也同样如此。如某人做陈述时，其了解的事实和社会一般标准足以提醒他该陈述很可能不真实，而该陈述也确实不真实，那么无论他相不相信自己的陈述，从法理上讲，他都犯有欺诈罪。至少，马萨诸塞州法院

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他们似乎主张，某人依据自己所知，或依据能被合理地理解为他自己所知，而作出的任何重要陈述，如果不是真实的，就构成欺诈，而不管其相信它并相信其知道它的理由是什么。因此很显然，一个陈述在道德上也许无罪，但在法理上却是欺诈。事实上，马萨诸塞州的规定似乎与我之前一讲中批评过的英国衡平法院确定的原则还有点差距，因为对于事实最为明确的确认，至少会要求陪审团查明，这些事实可以被合理理解为该当事人基于自己的知识而作出的陈述，因此如果后来证明它们并非真实，可能就会授权撤销合同。道德用语已经不再合适，于是达成了责任的外部标准。尽管如此，起点仍是欺诈，除了基于法律界定的欺诈，我认为合同之前的虚假陈述尽管直接导致合同订立，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有效性。但无论合同还是隐含条件都不要求虚假陈述提及的那些事实存在。它们只要求不存在某些虚假陈述。该条件并非受允诺人应该是某一另外的乙方，或桶内应为鲭鱼，而是受允诺人没有在实质性事实上撒谎。

Then the question arises, how do you determine what facts are material? As the facts are not required by the contract, the only way in which they can be material is that a belief in their being true is likely to have led to the making of the contract.

这样又产生了问题：如何确定哪些事实为实质性事实？由于合同并不要求这些事实，它们能够成为实质性事实的唯一方式是，如果相信其真实性可能会导致合同订立。

It is not then true, as it is sometimes said, that the law does not concern itself with the motives for making contracts. On the contrary, the whole scope of fraud outside the contract is the creation of false motives and the removal of true ones. And this consideration will afford a reasonable test of the cases in which

fraud will warrant rescission. It is said that a fraudulent representation must be material to have that effect. But how are we to decide whether it is material or not? If the above argument is correct, it must be by an appeal to ordinary experience to decide whether a belief that the fact was as represented would naturally have led to, or a contrary belief would naturally have prevented, the making of the contract.

由此可知，法律并不像有时所说的那样不关心合同订立的动机。相反，合同之外的欺诈，其全部用意就是编造虚假动机并排除真实动机。该考虑将要求对欺诈导致撤销合同成为必要的情况进行合理审查。有人说，欺诈性陈述要导致欺诈性后果，就必须是实质性的。但我们如何确定它是否是实质性的呢？如上述论证正确，则必须借助普通经验来确定，究竟是相信事实与陈述相符的信念已自然导致该合同订立，还是相反信念已自然阻止了该合同的订立。

If the belief would not naturally have had such an effect, either in general or under the known circumstances of the particular case, the fraud is immaterial. If a man is induced to contract with another by a fraudule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latter that he is a great-grandson of Thomas Jefferson, I do not suppose that the contract would be voidable unless the contractee knew that, for special reasons, his lie would tend to bring the contract about.

如果该信念不会自然导致这种效果，则无论在一般情况下还是在某一特定案例的已知条件下，该欺诈都是非实质性的。如某人受到引诱与另一人签订了合同，后者欺诈性地陈述说自己是托马斯·杰斐逊的曾孙，我认为该合同并非可撤销合同，除非该受约人——由于某些特殊原因——知道其谎言会导致合同订立。

The conditions or grounds for avoiding a contract which have been dealt with thus far are conditions concerning the conduct of the parties outside of the contract itself. Still confining myself to conditions arising by construction of law,—that is to say, not directly and in terms attached to a promise by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words in which it is expressed,—I now come to those which concern facts to which the contract does in some way refer.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探讨的导致合同撤销的条件或依据都涉及合同本身之外的当事人的行为。我仍局限于通过法律解释而产生的条件，即并非通过直接的、以表达允诺词语的字面意义而附加于允诺的条款而产生的条件。下面，我要讨论另一些条件，它们涉及到合同以某种方式提及的事实。

Such conditions may be found in contracts where the promise is only on one side. It has been said that where the contract is unilateral, and its language therefore is all that of the promisor, clauses in his favor will be construed as conditions more readily than the same words in a bilateral contract; indeed, that they must be so construed, because, if they do not create a condition, they do him no good, since ex hypothesi they are not promises by the other party. [4_18] How far this ingenious suggestion has had a practical effect on doctrine may perhaps be doubted.

这些条件可在仅包含单方允诺的合同中看到。有人曾经说，单方合同的措辞全部是允诺人的，因此对他有利的词句会比双方合同中同样的词句更易被解释为条件；事实上，它们也必须这样解释，因为如果它们不创立某种条件，则对允诺人并无益处，根据假设它们并非对

方当事人的允诺。人们可能不免质疑这一独创性建议对我们的学说有多少实际影响。

But it will be enough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general survey to deal with bilateral contracts, where there are undertakings on both sides, and where the condition implied in favor of one party is that the other shall make good what he on his part has undertaken.

但它对这里一般性探讨双方合同的目的而言已经足够了。双方合同中包含双方的承诺，其中隐含的对一方当事人有利的条件是，另一方将会履行自己的承诺。

The undertakings of a contract may be for the existence of a fact in the present or in the future. They can be promises only in the latter case; but in the former, they can be equally essential terms in the bargain.

合同中的承诺可能是为了现在或将来存在的某一事实。在后一种情况中，它们才能成为允诺；但在第一种情况下，它们可以成为交易中同等关键的条款。

Here again we come on the law of representations, but in a new phase. Being a part of the contract, it is always possible that their truth should make a condition of the contract wholly irrespective of any question of fraud. And it often is so in fact. It is not, however, every representation embodied in the words used on one side which will make a condition in favor of the other party.

Suppose A agrees to sell, and B agrees to buy, “A's seven-year-old sorrel horse Eclipse, now in the possession of B on trial,” and in fact the horse is chestnut-colored, not sorrel. I do not suppose that B could refuse to pay for the horse on that ground. If the law were so foolish as to aim at merely formal consistency, it might indeed be said that there was as absolute a repugnancy between the different terms of this contract as in the case of an agreement to sell certain barrels of mackerel, where the barrels turned out to contain salt. If this view were adopted, there would not be a contract subject to a condition, there would be no contract at all. But in truth there is a contract, and there is not even a condition. As has been said already, it is not every repugnancy that makes a contract void, and it is not every failure in the terms of the counter undertaking that makes it voidable. Here it plainly appears that the buyer knows exactly what he is going to get, and therefore that the mistake of color has no bearing on the bargain. [4_19]

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关于陈述的法律，只不过在一个新的方面。陈述作为合同的一部分，总会有这种可能性，即它们的真实性应构成该合同的一个条件，而完全不考虑任何欺诈问题。事实上也经常如此。然而，并非一方用词中包含的每一项陈述都会成为对另一方当事人有利的条件。假设甲方同意出售，乙方同意购买“甲方七岁的栗色马艾克利普斯，它目前由乙方占有试用”，但事实上，这匹马是栗红色，并非栗色。我认为乙方不能以此为由拒绝为这匹马付款。如果法律愚蠢到仅以形式上的一致性为目标，那么确实可以说，在该合同不同条款间存在绝对的矛盾，就像在出售几桶鲭鱼，而后来证实桶里装的是盐的协议中一样。假如采用这种观点，则不会存在取决于某一条件的合同，甚至根本不会有合同。但事实上存在合同，甚至并不存在条件。如前所述，并非所有矛盾都会使合同无效，也并非每一反承诺未做到就会使其被撤销。这里非常清楚，买方确切地知道他要买的是什么，因此该颜色错误对交易并无影响。

If, on the other hand, a contract contained a representation which was fraudulent, and which misled the party to whom it was made, the contract would be voidable on the same principles as if the representation had been made beforehand. But words of description in a contract are very frequently held to amount to what is sometimes called a warranty, irrespective of fraud. Whether they do so or not is a question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court on grounds of common sense, looking to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the importance in the transaction of the facts which the words convey, and so forth. But when words of description are determined to be a warranty, the meaning of the decision is not merely that the party using them binds himself to answer for their truth, but that their truth is a condition of the contract.

另一方面，如果合同包含某一欺诈性陈述，且误导了对方当事人，则依据与事前作出虚假陈述同样的原则，该合同是可撤销的。但人们经常将合同中的描述性文字视同他们有时所谓的担保，而无论有无欺诈。它们是否相当于担保将由法庭基于常识、考察用词的含义、及这些用词所传达的事实在交易中的重要性等来予以确定。但当描述性文字被确认为一项担保时，该裁决的含义并非仅仅意味着使用它们的当事人有义务为其真实性负责，而且意味着，其真实性构成该合同的一个条件。

For instance, in a leading case [4_20] the agreement was that the plaintiff's ship, then in the port of Amsterdam, should, with all possible despatch, proceed direct to Newport, England, and there load a cargo of coals for Hong Kong. At the date of the charter-party the vessel was not in Amsterdam, but she arrived there four days later. The plaintiff had noticed that the defendant considered time

important. It was held that the presence of the vessel in the port of Amsterdam at the date of the contract was a condition, the breach of which entitled the defendant to refuse to load, and to rescind the contract. If the view were adopted that a condition must be a future event, and that a promise purporting to be conditional on a past or present event is either absolute or no promise at all, it would follow that in this case the defendant had never made a promise. [4_21] He had only promised if circumstances existed which did not exist. I have already stated my objections to this way of looking at such cases, [4_22] and will only add that the courts, so far as I am aware, do not sanction it, and certainly did not in this instance.

例如，在某一首创判例中，双方的协议为原告当时停泊在阿姆斯特丹港的船应尽一切可能立即直接出发去英格兰纽波特港，在那里装一船煤运往香港。但在签订租船合同那天，该船并不在阿姆斯特丹，而是于四天后才到达那里。原告知悉，被告认为时间很重要。法院认为，该船在合同签订日在阿姆斯特丹港是一个条件，违反该条件使被告有权拒绝装船，并撤销该合同。如果采用下述观点，即条件必须是将来的事件，且旨在以过去或将来事件为条件的允诺或者是绝对的，或者是根本不存在的，则在该案中，被告从未作出过允诺。他仅就某些情况存在时作出了允诺，但这些情况并不存在。我已就以此种方式看待这种情况表示了反对意见，这里仅补充一点，即就我目前的理解而言，法院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本案当然也未支持。

There is another ground for holding the charter-party void and no contract, instead of regarding it as only voidable, which is equally against authority, which nevertheless I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answer wholly to my satisfaction. In the case put,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lessor of the vessel concerned the vessel itself, and therefore entered in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thing the lessee

agreed to take. I do not quite see why there is not as fatal a repugnancy between the different terms of this contract as was found in that for the sale of the barrels of salt described as containing mackerel. Why is the repugnancy between the two terms,—first, that the thing sold is the contents of these barrels, and, second, that it is mackerel—fatal to the existence of a contract? It is because each of those terms goes to the very root and essence of the contract, [4_23] —because to compel the buyer to take something answering to one, but not to the other requirement, would be holding him to do a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thing from what he promised, and because a promise to take one and the same thing answering to both requirements is therefore contradictory in a substantial matter. It has been seen that the law does not go on any merely logical ground, and does not hold that every slight repugnancy will make a contract even voidable. But,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repugnancy is between terms which are both essential, it is fatal to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contract. How then do we decide whether a given term is essential? Surely the best way of finding out is by seeing how the parties have dealt with it. For want of any expression on their part we may refer to the speech and dealings of every day, [4_24] and say that, if its absence would make the subject-matter a different thing, its presence is essential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agreement. But the parties may agree that anything, however trifling, shall be essential, as well as that anything, however important, shall not be; and if that essential is part of the contract description of a specific thing which is also identified by reference to the senses, how can there be a contract in its absence any more than if the thing is in popular speech different in kind from its description? The qualities that make sameness or difference of kind for the purposes of a contract are not determined by Agassiz or Darwin, or by the public at large, but by the will of the parties, which decides that for their purposes the characteristics insisted on

are such and such. [4_25] Now, if this be true, what evidence can there be that a certain requirement is essential, that without it the subject-matter will be different in kind from the description, better than that one party has required and the other given a warranty of its presence? Yet the contract description of the specific vessel as now in the port of Amsterdam, although held to be an implied warranty,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regarded as making the contract repugnant and void, but only as giving the defendant the option of avoiding it. [4_26] Even an express warranty of quality in sales does not have this effect, and in England, indeed, it does not allow the purchaser to rescind in case of breach. On this last point the law of Massachusetts is different.

还有一个依据可以裁定该租船合同无效，从而不存在合同，而不是仅将其视为可撤销的。该依据同样背离判例，但尽管如此，我也从未能够对其作出令我自己完全满意的解答。在上述案件中，船只出租人的陈述涉及船只本身，因此进入了承租人同意租用的物件之描述。我看不出该合同不同条款之间为何不存在致命的矛盾，就像出售几桶描述为装有鲭鱼而实际却是盐的合同条款中那样。这两项条款——首先，出售的物品是这些桶里的内容物；其次，该内容物为鲭鱼——之间的矛盾对合同之存在来说为何是致命的呢？这是因为每项条款都涉及该合同的根本和实质——因为要强迫买方接受符合一项，而不符合另一项要求的物品，就是要求他去做与其允诺的事情有实质性差别的事情；而且因为允诺接受同时符合两个要求的同一件事情在实质性事项上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已经看到，法律并非按纯粹的逻辑依据进行，且并不主张每个小矛盾都会使合同无效；但另一方面，当两项关键性条款之间存在矛盾时，对合同本身的存在就是致命的。那么我们如何确定一项给定条款是否是关键性的呢？诚然，确定这一点的最好方式就是考察当事人处理它的方式。由于缺少他们的明确表述，我们可以参考日常的言谈和交易，并可以说，如果缺少它会使得该标的物成为不同的东西，则具备它对该协议的存在来说就是关键性的。但当

事人可能会同意，无论多么琐碎的事都应是关键性的，或者，无论多重要的事都不是关键性的；如果关键性的东西是合同对某一特定事物之描述的组成部分，且可通过感官予以识别，那么，就像在通俗的言谈中该事物与其描述在类别上不同一样，如果缺少该关键性的东西怎么可能还存在合同呢？为订立合同之目的而用于区分相同或不同种类的属性并非由阿加西斯或达尔文，或全体大众来确定，而是双方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愿，为自己的目的而确定他们要坚持的特征是如此这般。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某一特定要求是关键性的，如果没有它，该标的物将在类别上不同于描述；而且比下面的证据更好，即一方当事人要求，而另一方当事人也担保其出现呢？然而，对在阿姆斯特丹港的这艘特定船只的合同描述，尽管被认为是默示担保，却似乎未被视为使该合同自相矛盾从而无效，而仅赋予被告选择撤销合同的权利。即使交易中对特征的明示担保都没有这个效果，而事实上，在英格兰它并不允许买方在违约时撤销合同。在最后这点上，马萨诸塞州的法律有所不同。

The explanation has been offered of the English doctrine with regard to sales, that, when the title has passed, the purchaser has already had some benefit from the contract, and therefore cannot wholly replace the seller in status quo, as must be done when a contract is rescinded. [4_27] This reasoning seems doubtful, even to show that the contract is not voidable, but has no bearing on the argument that it is void. For if the contract is void, the title does not pass.

我们已经解释了英国买卖合同的学说，即当所有权已转移时，买方已从合同中获得一些收益，因此不能像合同被撤销时必须要做的那样，完全取代卖方现在的状态。这一推理虽然看起来可疑，甚至表明该合同是不能撤销的，但它对这里合同无效的论证却并无影响。因为如果该合同无效，所有权就不转移。

It might be said that there is no repugnancy in the charterer's promise, because he only promises to load a certain ship, and that the words “now in the port of Amsterdam” are merely matter of history when the time for loading comes, and no part of the description of the vessel which he promised to load. But the moment those words are decided to be essential they become part of the description, and the promise is to load a certain vessel which is named the Martaban, and which was in the port of Amsterdam at the date of the contract. So interpreted, it is repugnant.

有人可能会说，在该船承租人的允诺中不存在矛盾，因为他仅允诺装载某船，而“现在阿姆斯特丹港”的文字在装载时间到来之时仅仅是历史问题，并非其允诺要装载之船描述的组成部分。然而在这些文字被确定为关键性的那一刻，它们就成为描述的一部分，而该允诺是装载名为“玛尔塔班”的一艘船，这艘船在订立租船合同的那天泊于阿姆斯特丹港。如此解释的话，就存在矛盾。

Probably the true solution is to be found in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At any rate, the fact is that the law has established three degrees in the effect of repugnancy. If one of the repugnant terms is wholly insignificant, it is simply disregarded, or at most will only found a claim for damages. The law would be loath to hold a contract void for repugnancy in present terms, when if the same terms were only promised a failure of one of them would not warrant a refusal to perform on the other side. If, on the other hand, both are of the extremest importance, so that to enforce the rest of the promise or bargain without one of them would not merely deprive one party of a stipulated incident, but would force a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bargain on him, the promise will be void.

There is an intermediate class of cases where it is left to the disappointed party to decide. But as the lines between the three are of this vague kind,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y have been differently drawn in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或许真正的解决办法会在实践中找到。无论如何，事实是，法律就矛盾的影响已确立了三种不同的程度。如矛盾条款中的某一项完全无关紧要，则只要不作考虑即可，或最多只是一项损害赔偿主张的依据而已。如只是允诺同样条款，则其中一项未履行不构成对方不履行的依据，这时，法律是不愿因现有条款中的矛盾而主张合同无效的。另一方面，如果两项条款都极其重要，故如果在缺少其中一项时强制执行其余允诺或交易，不仅将剥夺一方当事人约定的附属权利，而且会强加给他一个具有实质性不同的交易，此时，该允诺为无效允诺。还有一些处于中间类别的案件，留给失望的当事人来决定。但由于三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因此不同司法管辖区界定不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The examples which have been given of undertakings for a present state of facts have been confined to those touching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contract. Of course there is no such limit to the scope of their employment. A contract may warrant the existence of other facts as well, and examples of this kind probably might be found or imagined where it would be clear that the only effect of the warranty was to attach a condition to the contract, in favor of the other side, and where the question would be avoided whether there was not something more than a condition,—a repugnancy which prevented the formation of any contract at all. But the preceding illustrations are enough for the present purpose.

前面所举的对当前事态作出承诺的例子，一直局限于涉及合同标的物现有条件的那些承诺。当然它们的应用范围是没有这种限制的。一份合同可能会担保也存在其他事实，这种例子可以找到或想象出，其中担保的唯一效果显然就是要给合同附加一个有利于对方的条件，且其中还可回避这一问题，即除条件外，是否存在别的东西，即阻止任何合同形成的矛盾。不过上述例证对我们目前的讨论目的而言已经足够。

We may now pass from undertakings that certain facts are true at the time of making the contract, to undertakings that certain facts shall be true at some later time,that is, to promises properly so called. The question is when performance of the promise on one side is a condition to the obligation of the contract on the other. In practice, this question is apt to be treated as identical with another, which, as has been shown earlier, is a distinct point; namely, when performance on one side is a condition of the right to call for performance on the other. It is of course conceivable that a promise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case of performance of the things promised on the other side, and yet that a failure of the latter should not warrant a rescission of the contract. Wherever one party has already received a substantial benefit under a contract of a kind which cannot be restored, it is too late to rescind, however important a breach may be committed later by the other side. Yet he may be excused from going farther. Suppose a contract is made for a month's labor, ten dollars to be paid down, not to be recovered except in case of rescission for the laborer's fault, and thirty dollars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If the laborer should wrongfully stop work at the end of a fortnight, I do not suppose that the contract could be rescinded, and that the ten dollars could be recovered as money had and received; [4_28]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employer would not be bound to pay the thirty dollars, and of course he could sue for

damages on the contract. [4_29]

我们现在可以从讨论订立合同时某些事实为真的承诺，转到讨论某些事实在后来某个时间为真的承诺，即名副其实的允诺。这个问题在于，一方当事人对允诺的履行何时成为另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条件。在实践中，这一问题容易被等同于另一问题，即如前所示：区分点的问题；也就是说，一方的履行何时成为要求对方履行的权利条件。当然，可以设想，允诺应局限于对方允诺的事情得以履行的情况；然而，后者未能履行也不应赋予撤销该合同的权利。只要一方当事人已根据合同获得了实质性收益，而该收益属于一种无法恢复的收益，则无论对方此后可能会有多么严重的违约，要撤销合同都为时已晚。不过，他可以免于继续履行合同。假设制定了一个月的劳动订立合同，当场支付十美元（这些钱是不能收回的，由于劳动者的过错而撤销合同除外），到月末再付三十美元。如果劳动者在两周后出于非正当原因停止工作，我认为该合同已不能被撤销，而劳动者持有和接受的十美元也已不能收回；但另一方面，雇主也没有义务再支付这三十美元，当然他也可以根据合同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But, for the most part, a breach of promise which discharges the promisee from further performance on his side will also warrant rescission, so that no great harm is done by the popular confusion of the two questions. Where the promise to perform on one side is limited to the case of performance on the other, the contract is generally conditioned on it also. In what follows, I shall take up the cases which I wish to notice without stopping to consider whether the contract was in a strict sense conditioned on performance of the promise on one side, or whether the true construction was merely that the promise on the other side was limited to that event.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违反允诺行为除免除受允诺人继续履行其责任外，还可赋予撤销合同的权利，这样对这两个问题普遍存在的混淆就不会造成严重危害。在一方履行的允诺受限于另一方之履行的情况下，合同通常也以此为条件。下面要讨论几种情形，我希望讨论它们时不再考察究竟该合同在严格意义上是以一方之履行为条件的，还是正确的解释仅仅为，对方的允诺只局限于该事件。

Now, how do we settle whether such a condition exists? It is easy to err by seeking too eagerly for simplicity, and by striving too hard to reduce all cases to artificial presumptions, which are less obvious than the decisions which they are supposed to expla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whole matter is, after all, good sense, as the courts have often said. The law means to carry out the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 and, so far as they have not provided for the event which has happened, it has to say what they naturally would have intended if their minds had been turned to the point. It will be found that decisions based on the direct implications of the language used, and others based upon a remoter inference of what the parties must have meant, or would have said if they had spoken, shade into each other by imperceptible degrees.

那么，我们如何确定这种条件是否存在呢？过于急切地寻求简单化，过于努力地把所有案件都简化为人为推定（人为推定据说可以解释判决，但却没有判决那么显而易见），是很容易犯错误的。毕竟，整个问题的基石是理智，法院也常如是说。法律意在执行当事人的意图，而且，只要他们还未对已发生的事件作出规定，法律就必须决定，假如他们注意到该点时，他们自然而然的意图会是什么。人们会发现，有些裁决以当事人所使用措词的直接含义为依据，另一些则以当事人必定想做什么或会说什么，如果说的话，这些更为间接的推论为依据，这些裁决之间的变化非常细微，难以区分。

Mr. Langdell has called attention to a very important principle, and one which, no doubt, throws light on many decisions. [4_30] This is, that, where you have a bilateral contract, while the consideration of each promise is the counter promise, yet prima facie the payment for performance of one is performance of the othe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ther party is what each means to have in return for his own. If A promises a barrel of flour to B, and B promises him ten dollars for it, A means to have the ten dollars for his flour, and B means to have the flour for his ten dollars. If no time is set for either act, neither can call on the other to perform without being ready at the same time himself.

兰德尔先生提醒我们注意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这条原则无疑指导过很多裁决。这一原则是在双方合同中，虽然每个允诺的对价都是反允诺，但表面上对履行某一允诺进行的支付就是履行另一个允诺。每人履行自己的允诺后所换得的，就是对方当事人履行其允诺。如甲向乙允诺一桶面粉，而乙向甲允诺以十美元购买这桶面粉，甲的意思是用其面粉换得十美元，而乙的意思是用十美元换得这桶面粉。若并未确定双方行动的时间，则任一方在自己未准备好同时履行时，都不能要求对方履行。

But this principle of equivalency is not the only principle to be drawn even from the form of contract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ir subject-matter, and of course it is not offered as such in Mr. Langdell's work.

但这一等价原则并非在不考虑标的物的情况下，从合同形式中得出的唯一原则，当然兰德尔先生的著作中并未如此提及。

Another very clear one is found in contracts for the sale or lease of a thing, and the like. Here the qualities or characteristics which the owner promises that the thing furnished shall possess, go to describe the thing which the buyer promises to accept. If any of the promised traits are wanting in the thing tendered, the buyer may refuse to accept, not merely on the ground that he has not been offered the equivalent for keeping his promise, but also on the ground that he never promised to accept what is offered him. [4_31] It has been seen that, where the contract contains a statement touch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thing at an earlier time than the moment for its acceptance, the past condition may not always be held to enter in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thing to be accepted. But no such escape is possible here. Nevertheless there are limits to the right of refusal even in the present class of cases. If the thing promised is specific, the preponderance of that part of the description which identifies the object by reference to the senses is sometimes strikingly illustrated. One case has gone so far as to hold that performance of an executory contract to purchase a specific thing cannot be refused because it fails to come up to the warranted quality. [4_32]

另一条非常显著的原则，可在买卖或租赁某物之类的合同中发现。这里，所有者允诺要提供的某物应具有的属性或特点，就是描述买方允诺要接受的物品。如果提供物缺少任一允诺的特性，则买方可拒绝接受，其依据不仅在于对方没有遵守自己的允诺提供等价物，而且在于，他从未允诺接受实际提供给他的物品。我们已经看到，如果该合同包含的陈述涉及该物早些时候的状况，而非接受时刻的状况，则法院可能不会总是主张将过去状况纳入要接受物的描述中。但这里不可能适用这种免责。尽管如此，在目前这类案件中，对拒绝的权利也有限制。如果允诺物是特定的，则该描述中通过感官识别该物品的

那部分，其优势有时会得到显著说明。有一个案例走得更远，在一购买特定物品的待履行合同中，法院认为，不能因为该物没有达到保证的品质就拒绝履行合同。

Another principle of dependency to be drawn from the form of the contract itself is, that performance of the promise on one side may be manifestly intended to furnish the means for performing the promise on the other. If a tenant should promise to make repairs, and the landlord should promise to furnish him wood for the purpose, it is believed that at the present day, whatever may have been the old decisions, the tenant's duty to repair would be dependent upon the landlord's furnishing the material when required. [4_33]

从合同形式本身可以得出另一从属原则，即一方履行允诺可能有很明确的意图，要为对方提供履行允诺所需的手段。如果承租人允诺进行维修，而房主允诺为其维修提供木材，则可以认为，无论以前是如何裁决的，现在，承租人的维修义务是从属于房主在其提出要求时提供木料这一行为的。

Another case of a somewhat exceptional kind is where a party to a bilateral contract agrees to do certain things and to give security for his performance. Here it is manifest good-sense to hold giving the security a condition of performance on the other side, if it be possible. For the requirement of security shows that the party requiring it was not content to rely on the simple promise of the other side, which he would be compelled to do if he had to perform before the security was given, and thus the very object of requiring it would be defeated. [4_34]

另一类较为罕见的情况是，双方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同意做某事，并同意为此提供担保。这里显然可以合理地认为提供担保是另一方履行的条件，只要履行可行的话。因为要求担保的行为表明，要求担保的当事人不满足于单纯依赖对方的简单允诺，因为，如果在对方给出担保之前，他必须履行的话，他就只能被迫依赖对方的简单允诺，故其要求担保的目的本身就会落空。

This last case suggests what is very forcibly impressed on any one who studies the cases,—that, after all,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of decision is not any technical, or even any general principle of contracts, but a consider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particular transaction as a practical matter. A promises B to do a day's work for two dollars, and B promises A to pay two dollars for a day's work. There the two promises cannot be performed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k will take all day, the payment half a minute. How are you to decide which is to be done first, that is to say, which promise is dependent upon performance on the other side? It is only by reference to the habits of the community and to convenience. It is not enough to say that on 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cy a man is not presumed to intend to pay for a thing until he has it. The work is payment for the money, as much as the money for the work, and one must be paid in advance. The question is, why, if one man is not presumed to intend to pay money until he has money's worth, the other is presumed to intend to give money's worth before he has money. An answer cannot be obtained from any general theory. The fact that employers, as a class, can be trusted for wages more safely than the employed for their labor, that the employers have had the power and have been the law-makers, or other considerations, it matters not what, have determined that the work is to be done first. But the grounds of

decision are purely practical, and can never be elicited from grammar or from logic.

上一案例表明，任何研究这些案例的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印象：毕竟裁决中最重要的因素并非技术性的，甚至不是任何合同的一般原则，而是将特定交易作为现实问题从而对其性质予以考察。甲向乙允诺为其工作一天，报酬为两美元；乙向甲允诺为这一天的工作付给甲两美元。此处，这两个允诺无法同时履行。工作要干一整天，而支付只需半分钟。你该如何决定哪个先做呢？换言之，哪个允诺依赖于对方允诺的履行呢？这里只能参考社会习惯和便利原则。依据等价原则推定某人直到取得某物后才有支付的意图，这是不够的。工作是为了钱而付出代价，就好比钱是对工作所支付的报酬一样，而其中一个必须提前支付。这里的问题是，如果认为一方直到获得了与钱等值的服务才会有付钱的意图，那么为什么认为另一方在得到钱之前会有提供该服务的意图呢？从任何一般理论中都无法找到答案。事实是，比起雇员提供的劳动，人们更信任作为一个阶层的雇主提供的工资；雇主拥有权力，而且是立法者；或其他种种考虑（无论是什么），上述事实决定了要先工作。但裁决的依据纯粹是实用性的，不可能从文法或逻辑中得出。

A reference to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will be found to run all through the subject. Take another instance. The plaintiff declared on a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defendant that he would sell, and the defendant would buy, certain Donskoy wool, to be shipped by the plaintiff at Odessa, and delivered in England. Among the stipulations of the contract was one, that the names of the vessels should be declared as soon as the wools were shipped. The defence was, that the wool was bought, with the knowledge of both parties, for the purpose of reselling it in the course of the defendant's business; that it was an article of fluctuating value, and

not salable until the names of the vessels in which it was shipped should have been declared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but that the plaintiff did not declare the names of the vessels as agreed.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was given by one of the greatest technical lawyers that ever lived, Baron Parke; yet he did not dream of giving any technical or merely logical reason for the decision, but, after stating in the above words the facts which were deemed material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declaring the names of the vessels was a condition to the duty to accept, stated the ground of decision thus: "Looking at the nature of the contract, and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it to the object with which the contract was entered into with the knowledge of both parties, we think it was a condition precedent." [4_35]

在该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能发现法院基于实用的考虑。再举一个例子。原告称，依据其与被告的共同约定，他将出售某一批顿斯科伊羊毛，并由被告购买，由原告在敖德萨装船，运往英格兰交付。在合同条款中有一条规定，羊毛一旦装船，应该马上公布船的名字。被告的答辩是，双方当事人都知道这批羊毛是被告买来要在其生意中转售的，而这批羊毛属于价值上下波动的商品，在依据合同将装载船的名字公布前是无法销售的，但原告并未按约定公布船的名字。法院的裁决是由迄今最伟大的技术性法官之一帕克男爵作出的；而他也并未幻想为该裁决提供任何技术的或纯粹逻辑的理由。他用上述文字陈述了被认为对下面的问题而言是实质性的一些事实，即公布船只的名字是否构成接受羊毛之义务的条件。之后，他如此陈述裁决依据："考察该合同的性质，及其对合同目的（为双方当事人所知并构成合同的一部分）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4_1].Raffles v. Wichelhaus, 2 H. & C. 906. Cf. Kyle v. Kavanagh, 103 Mass. 356, 357.

[4_2].Cf. Cocker v. Crompton, 1 B. & C. 489.

[4_3].Smith v. Hughes, L.R. 6 Q.B.597.

[4_4].See Gardner v. Lane, 12 Allen, 39; S.C. 9 Allen, 492, 98 Mass. 517.

[4_5].Goddard v. Monitor Ins. Co., 108 Mass. 56.

[4_6].See Cundy v. Lindsay, 3 App. Cas. 459, 469. Cf. Reg. v. Middleton, L.R. 2 C.C. 38, 55 et seq., 62 et seq.; Reg. v. Davies, Dearsly, C.C. 640; Rex v. Mucklow, 1 Moody, O.C. 160; Reg. v. Jacobs, 12 Cox, 151.

[4_7]."Praesentia corporis tollit errorem nominis." Cf. Byles, J., in Way v. Hearne, 32 L. J. N.S.C.P. 34, 40. But cf. the conflicting opinions in Reg. v. Middleton, L.R. 2 C.C. 38, 45, 57. It would seem that a proper name or other identification of an object or person as specific may have the same effect as an actual identification by the senses, because it refers to such an identification, although in a less direct way.

[4_8].Brown v. Foster, 113 Mass. 136.

[4_9].Leake, Dig. Contr. 13, 14, 637; Hunt v. Livermore, 5 Pick. 395, 397; Langd. Contr. (2d ed.), Section 36.

[4_10].Leake, Dig. Contr. 638; Braunstein v. Accidental Death Ins. Co., 1 B. & S. 782.

[4_11].But cf. Langd. Contr. (2d ed.), Section 29.

[4_12].Langd. Contr. (2d ed.), Section 29.

[4_13].Bullen & Leake, Prec. of Plead. (3d ed.), 147, "Conditions Precedent."

[4_14].Cf. Cort v. Ambergate, Nottingham & Boston & Eastern Junction Railway Co., 17 Q.B.127.

[4_15].Goodman v. Pocock, 15 Q.B.576 (1850).

[4_16].Fisher v. Mellen, 103 Mass. 503.

[4_17].Supra, p. 136.

[4_18].Langd. Contr. (2d ed.), Section 33.

[4_19].See the explanation of Dimech v. Corlett, 12 Moo. P.C. 199, in Behn v. Burness, 3 B. & S. 751, 760.

[4_20].Behn v. Burness, 3 B. & S. 751.

[4_21].Langd. Contr. (2d ed.), Section 28, p. 1000.

[4_22].See Lecture VIII.

[4_23].Kennedy v. Panama, &c. Mail Co., L.R. 2 Q.B.580, 588; Lyon v. Bertram, 20 How. 149, 153. Cf. Windscheid, Pand., Section 76, nn. 6, 9.

[4_24].Windscheid, Pand., Section 76(4). See, generally, Ibid., nn. 6, 7; Section 78, pp. 206, 207; Section 82, pp. 216 et seq.

[4_25].Cr. Ihering, Geist d. Roem. Rechts, Section 48, III. p. 116 (Fr. transl.).

[4_26].See, however, the language of Crompton, J. in S.C., I B. & S. 877. Cf. Kent, Comm. (12th ed.), 479, n. 1, A (c).

[4_27].Behn v. Burness, 3 B. & S. 751, 755, 756.

[4_28].Cf. Anglo-Egyptian Navigation Co. v. Rennie, L.R. 10 C.P. 271.

[4_29].Ellen v. Topp, 6 Exch. 424.

[4_30].Contracts (2d Ed.), Section 106, and passim.

[4_31].Chanter v. Hopkins, 4 M. & W. 399, 404. Possibly Behn v. Burness, stated above, might have been dealt with in this way. The ship tendered was not a ship which had been in the port of Amsterdam at the date of the contract. It was therefore not such a ship as the contract called for.

[4_32].Heyworth v. Hutchinson, L.R. 2 Q.B.447, criticised in Benj. Sales (2d ed.), pp. 742 et seq.

[4_33].See Thomas v. Cadwallader, Willes, 496; Langd. Contr. (2d ed.), Sections 116, 140. This is put as a case of equivalence by Mr. Langdell (Contr., Section 116); but the above explanation is believed to be the true one. It will be noticed that this is hardly a true case of condition, but merely a limitation of the scope of the tenant's

promise. So a covenant to serve as apprentice in a trade, which the other party covenants to teach, can only be performed if the other will teach, and must therefore be limited to that event. Cf. Ellen v. Topp, 6 Exch. 424.

[4_34].Langdell, Contracts (2d ed.), Section 127. Cf. Roberts v. Brett, 11 H. L. C. 337.

[4_35].Graves v. Legg, 9 Exch. 709. Cf. Lang. Contr. (2d ed.), Section 33, p. 1004. Mr. Langdell says that a bought note, though part of a bilateral contract, is to be treated as unilateral, and that it may be presumed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contract relied on was that of a bought note, and thus a condition in favor of the defendant, who made it. I do not quite understand how this can be assumed when the declaration states a bilateral contract, and the question arose on demurrer to a plea, which also states that the plaintiff "was by the agreement bound to declare" the names. How remote the explanation is from the actual ground of decision will be seen.

LECTURE X. SUCCESSIONS AFTER DEATH.

第十讲　死后继承

In the Lecture on Possession, I tried to show that the notion of possessing a right as such was intrinsically absurd. All rights are consequences attached to filling some situation of fact. A right which may be acquired by possession differs from others simply in being attached to a situation of such a nature that it may be filled successively by different persons, or by any one without regard to the lawfulness of his doing so, as is the case where the situation consists in having a tangible object within one's power.

在“占有”一讲中，我试图指出占有某项权利这一概念本质上就是荒谬的。所有权利都是满足某些事实情形之后果。通过占有可以获得的权利与其他权利的区别就在于，此类权利所隶属的情形性质可由不同的人依序满足，或可由任何人获得，而不论这样做是否合法，正如某人权限内拥有某一有形物件之情形。

When a right of this sort is recognized by the law,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transferring it; or, more accurately,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different persons successively enjoying similar rights in respect of the subject-matter. If A, being the possessor of a horse or a field, gives up the possession to B, the rights which B acquires stand on the same ground as A's did before. The facts from which A's rights sprang have ceased to be true of A, and are now true of B. The consequences attached by the law to those facts now exist for B, as they did for A before. The situation of fact from which the

rights spring is continuing one, and any one who occupies it, no matter how, has the rights attached to it. But there is no possession possible of a contract. The fact that a consideration was given yesterday by A to B, and a promise received in return, cannot be laid hold of by X, and transferred from A to himself. The only thing can be transferred is the benefit or burden of the promise, and how can they be separated from the facts which gave rise to them? How, in short, can a man sue or be sued on a promise in which he had no part?

如果这种权利受到法律认可，转让就没有困难；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同的人就相关事宜依序享受相似权利不存在困难。假设甲方作为一匹马或者一块地的拥有者，把占有权让给乙方，乙方获得的权利与甲方之前享有的权利依据相同。甲方权利产生的事实现在已经终结，对甲方不再适用，现在适用于乙方。法律规定的这些事实之后果现在为乙方而存在，正如此前为甲方而存在一样。权利衍生的事实情形具有持续性，任何占有该情形者，不论以何种方式获得，都获得相关权利。然而，合同却不可能占有。昨日甲方给予乙方某一对价，并相应得到某承诺，这一事实，不能由丙方来负责，甲不能转让给他。唯一可转让的是因承诺产生的收益或者责任，如何把这些收益或责任与产生它们的事实分开？简言之，一个人怎么会因为一个与他无关的承诺起诉或者受到起诉呢？

Hitherto it has been assumed, in dealing with any special right or obligation, that the facts from which it sprung were true of the individual entitled or bound. But it often happens, especially in modern law, that a person acquires and is allowed to enforce a special right, although that facts which give rise to it are not true of him, or are true of him only in part. One of the chief problems of the law is to explain the machinery by which this result has been

brought to pass.

迄今为止，在处理任何特殊权利或义务时，假定前提是，其产生的条件对享有权利或者负有义务的个人成立。但是，尤其在现代法律中，经常是某人获得而且也得到允许执行某一特殊权利，然而该权利产生的事实对此人却不成立，或者只有部分成立。法律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于阐释这一结论如何得以通过的机制。

It will be observed that the problem is not coextensive with the whole field of rights. Some rights cannot be transferred by any device or contrivance; for instance, a man's right to bodily safety or reputation. Others again are incident to possession, and within the limits of that conception no other is necessary. As Savigny said, “Succession does not apply to possession by itself.“ [5_1]

我们会看到，这个问题不是与所有权利同等范畴。有些权利不可以任何方式方法转移，例如，人身安全或者名誉权；另外一些在占有范畴内，在该概念范围之内，不需其他概念。正如萨维尼所说：“继承不会自动适用于占有”。

But the notion of possession will carry us but a very little way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 theory of transfer. That theory depends very largely upon the notion of succession, to use the word just quoted from Savigny, and accordingly successions will be the subject of this and the following Lecture. I shall begin by explaining the theory of succession to persons deceased, and after that is done shall pass to the theory of transfer between living people, and shall consider whether any relation can b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two.

然而，占有这一概念几乎无益于我们理解现代转让理论。用刚刚引用的萨维尼的话来说，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继承概念，因此，继承是本讲和下一讲的主题。我将从阐释死后继承的理论开始，之后过渡到生者之间的继承理论，并考虑二者之间是否能建立某种关系。

The former is easily shown to be founded upon a fictitious identification between the deceased and his successor. And as a first step to the further discussion, as well as for its own sake, I shall briefly state the evidence touching the executor, the heir, and the devise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heory of our law with regard to the first of these, at least, scholars are agre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structure and position of the Roman family as it was in the infancy of Roman society.

显而易见，前者建立在死者与其继受人拟制的身份认同基础之上。作为继续讨论的第一步，也为其自身，我将首先简要陈述涉及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和不动产受遗赠人的相关证据。若要理解我们法律的理论，至少关于上述第一个词语，学者们一致认为，有必要考虑罗马社会早期家庭的结构和地位。

Continental jurists have long been collecting the evidence that, in the earlier periods of Roman and German law alike, the unit of society was the family. The Twelve Tables of Rome still recognize the interest of the inferior members of the family in the family property. Heirs are called sui heredes, that is, heirs of themselves or of their own property, as is explained by Gaius. [5_2] Paulus says that they are regarded as owners in a certain sense, even in the lifetime

of their father, and that after his death they do not so much receive an inheritance as obtain the full power of dealing with their property. [5_3]

长久以来，大陆法学家一直在收集证据证明在早期的罗马和日耳曼法律中，家庭都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仍然认可家庭中地位较低成员的财产利益。继承人被称为正统继承人，即正如盖厄斯所说，他们自己或他们自己财产的继承人。保罗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在他们父亲在世期间，他们也被视为财产所有者，父亲去世后，与其说他们接受继承，不如说他们获得了处理自己财产的全部权力。

Starting from this point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the succession of heirs to a deceased paterfamilias in the Roman system. If the family was the owner of the property administered by a paterfamilias, its rights remained unaffected by the death of its temporary head. The family continued, although the head died. And when, probably by a gradual change, [5_4] the paterfamilias came to be regarded as owner, instead of a simple manager of the family rights, the nature and continuity of those rights did not change with the title to them. The familia continued to the heirs as it was left by the ancestor. The heir succeeded not to the ownership of this or that thing separately, but to the total hereditas or headship of the family with certain rights of property as incident [5_5] and of course he took this headship, or right of representing the family interests, subject to the modifications effected by the last manager.

从这点出发，很容易理解罗马体系下的已故家长其继承人的继任问题。如果家庭是财产的所有者，其财产由家长来管理，这个暂时首

领的去世不会影响到家庭的权利。即使家长去世，家庭仍然延续。很可能逐渐地，家长慢慢被视为所有者，而不仅仅是家族权利的管理者，相关权利的性质和延续性没有因为他们拥有的头衔而发生变化。家长权按照被继承人所留下的状态延续给继承人。继承人不是分别继承这项或那项财产的所有权，而是继承家庭所有遗产或者家庭首领地位，并具有相关财产权利，当然，他继承了家长的地位，或者代表家庭利益的权利，须服从上任管理人进行的变动。

The aggregate of the ancestor's rights and duties, or, to use the technical phrase, the total persona sustained by him, was easily separated from his natural personality. For this persona was but the aggregate of what had formerly been family rights and duties, and was originally sustained by any individual only as the family head. Hence it was said to be continued by the inheritance, [5_6] and when the heir assumed it he had his action in respect of injuries previously committed. [5_7]

被继承人权利和义务的总和，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讲，他所持有的总体法律人格，很容易与自然人分开。这个法律人格只不过是先前家庭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体，最初只有作为家长的个人才能持有。因此可以说，这个身份通过继承得以继续，继承人承担该身份后，有权对以前所受侵害提起诉讼。

Thus the Roman heir came to be treated as identified with his ancestor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law. And thus it is clear how the impossible transfers which I seek to explain were accomplished in that instance. Rights to which B as B could show no title, he could readily maintain under the fiction that he was the same person as A, whose title was not denied.

因此，从法律角度出发，罗马继承人逐渐被认同为其被继承人对待。这样，我希望解释的不可能的财产转移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完成，就很清楚了。如果乙方无法证明他作为乙方拥有产权的权利，他可以通过他与甲方是同一个人、而甲方的产权仍然有效这一拟制很容易保持。

It is not necessary at this point to study family rights in the German tribes. For it is not disputed that the modern executor derives his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Roman heir. Wills also were borrowed from Rome, and were unknown to the Germans of Tacitus. [5_8] Administrators were a later imitation of executors, introduced by statute for cases where there was no will, or where, for any other reason, executors were wanting.

目前为止，没有必要研究日耳曼部落的家庭权利。因为现代遗嘱执行人的特性源于罗马继承人，这一点没有异议。遗嘱也从罗马法借用过来，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对此并不熟悉。成文法后来效仿遗嘱执行人，引入了遗嘱管理人的概念，用于无遗嘱或者由于任何其他原因缺乏遗嘱执行人的情形。

The executor has the legal title to the whole of the testator's personal estate, and, generally speaking, the power of alienation. Formerly he was entitled to the undistributed residue, not, it may fairly be conjectured, as legatee of those specific chattels, but because he represented the person of the testator, and therefore had all the rights which the testator would have had after distribution if alive. The residue is nowadays generally bequeathed by the will, but it is not even now regarded as a specific gift of the chattels

remaining undisposed of, and I cannot help thinking that this doctrine echoes that under which the executor took in former times.

遗嘱执行人拥有立嘱者全部个人财产的法律权利，以及总体上财产转让权力。可以合理猜测，之前他有资格享有未分配的剩余部分，不是以那些具体动产的受遗赠者身份，而是因为他代表立嘱者本人，因此如果在世，他可以拥有立遗嘱者财产分配之后的所有权利。如今，剩余财产一般通过遗嘱赠予，但是即使现在，人们仍不会把它当作未分配动产的具体赠与，我不禁联想这一法规模仿了早期有关遗嘱执行人的法规。

No such rule has governed residuary devises of real estate, which have always been held to be specific in England down to the present day. So that, if a devise of land should fail, that land would not be disposed of by the residuary clause, but would descend to the heir as if there had been no will.

对不动产的剩余遗赠不存在这样的规定，在英格兰直到现在，一直判定为视情况而定。这样，如果土地无法进行遗赠，该地不能使用剩余条款处理，而是应该转让给继承人，这与遗嘱不存在的情形相同。

Again, the appointment of an executor relates back to the date of the testator's death. The continuity of person is preserved by this fiction, as in Rome it was by personifying the inheritance ad interim.

另一方面，遗嘱执行人的任命可回溯至立嘱者离世的日期。该身份的持续性通过该拟制得以保留，正如罗马通过临时继承得以形象体现。

Enough has been said to show the likeness between our executor and the Roman heir. And bearing in mind what was said about the heres, it will easily be seen how it came to be said, as it often was in the old books, that the executor “represents the person of his testator.“ [5_9] The meaning of this feigned identity has been found in history, but the aid which it furnished in overcoming a technical difficulty must also be appreciated. If the executor represents the person of the testator, there is no longer any trouble in allowing him to sue or be sued on his testator's contracts. In the time of Edward III., when an action of covenant was brought against executors, Persay objected: “I never heard that one should have a writ of covenant against executors, nor against other person but the very one who made the covenant, for a man cannot oblige another person to a covenant by his deed except him who was party to the covenant.“ [5_10] But it is useless to object that the promise sued upon was made by A, the testator, not by B, the executor, when the law says that for this purpose B is A. Here then is one class of cases in which a transfer is accomplished by the help of a fiction, which shadows, as fictions so often do, the facts of an early stage of society, and which could hardly have been invented had these facts been otherwise.

我们对遗嘱执行人与罗马继承人之间的相似性已经有足够多的论述。记住我们关于继承人的讨论，这样很容易理解早期的判例集中为什么常说遗嘱执行人“代表立嘱人本人”。该假定身份的意义历史已有评价，但是它为解决专业困难所提供的支持也应该受到重视。若遗嘱

执行人代表立嘱人本人，许可他因其立嘱人的合同起诉别人或受到起诉，就不会再有问题。爱德华三世时期，当遗嘱执行人被提起盖印合同诉讼时，帕尔西反驳说："我从未听说某人可以获准得到违约赔偿令状，起诉遗嘱执行人，不起诉其他人而单单起诉盖印合同签订人，因为一个人不能依据地契迫使他人签订盖印合同，除非此人就是盖印合同签署方"。但是，反对起诉之承诺由立嘱者甲所做而非遗嘱执行人乙所做是无效的，因为法律规定这种情况下乙等同于甲。因此有一类案例中，转让是在拟制的支持下完成，拟制常常会这样，反映了社会早期阶段的事实，如果这些事实不是这样，几乎不可能制造出这样的事实假设。

Executors and administrators afford the chief, if not the only, example of universal succession in the English law. But although they succeed per universitatem, as has been explained, they do not succeed to all kinds of property. The personal estate goes to them, but land takes another course. All real estate not disposed of by will goes to the heir, and the rules of inheritance are quite distinct from those which govern the distribution of chattels. Accordingly, the question arises whether the English heir or successor to real estate presents the same analogies to the Roman heres as the executor.

遗嘱执行人和管理人提供了英国法系中普遍继承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例子。但是，尽管他们可以概括继承，如前所讲，他们不能继承全部种类的财产。动产由他们继承，但是土地则另有规定。遗嘱中没有分配的所有不动产归继承人，其继承法规与那些制约动产分配的法规有很大不同。这样问题就出现了：英国不动产的继承人或继受人与作为遗嘱执行人的罗马继承人是否可以进行同理类推？

The English heir is not a universal successor. Each and every

parcel of land descends as a separate and specific thing. Nevertheless, in his narrower sphere he unquestionably represents the person of his ancestor. Different opinions have been held as to whether the same thing was true in early German law. Dr. Laband says that it was; [5_11] Sohm takes the opposite view. [5_12] It is commonly supposed that family ownership, at least of land, came before that of individuals in the German tribes, and it has been shown how naturally representation followed from a similar state of things in Rome. But it is needless to consider whether our law on this subject is of German or Roman origin, as the principle of identification has clearly prevailed from the time of Glanvill to the present day. If it was not known to the Germans, it is plainly accounted for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Roman law. If there was anything of the sort in the Salic law, it was no doubt due to natural causes similar to those which gave rise to the principle at Rome. But in either event I cannot doubt that the modern doctrine has taken a good deal of its form, and perhaps some of its substance, from the mature system of the civilians, in whose language it was so long expressed. For the same reasons that have just been mentioned, it is also needless to weigh the evidence of the Anglo-Saxon sources, although it seems tolerably clear from several passages in the laws that there was some identification. [5_13]

英国的继承人不是概括继受人。每一块土地作为分开的、特定的财产进行继承。当然，在狭义范围上，他毫无疑问代表其被继承人本人。至于早期日耳曼法是否也是如此，人们所持观点不一。拉邦德博士认为是这样；而索姆则持相反观点。人们普遍认为，在日耳曼部族中家庭所有权，至少在土地的所有权方面，优先于个人所有权。我们已经看过，类似状况在罗马也自然而然造成了此种表现顺序。但是没有必要去考虑我们的法律在这个主题上是源于日耳曼还是罗马人，因为身份认同的法规自格兰维尔时代到现在显然一直盛行。如果说日耳

曼人对此还不了解，那么罗马法的影响则为此提供了清晰的解释。萨利克法中若有任何此类内容，毫无疑问其原因也会类似于罗马法规起源的自然原因。然而无论哪种情况，我都不会质疑，现代法规的很多形式方面，也许还有部分内容都来自于罗马法专家的成熟体系，并一直用其话语进行表述。虽然比较清楚，一些法案的批准认可了某些身份认同的存在，但是，基于同样上述理由，也没有必要再去衡量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证据。

As late as Bracton, two centuries after the Norman Conquest, the heir was not the successor to lands alone, but represented his ancestor in a much more general sense, as will be seen directly. The office of executor, in the sense of heir, was unknown to the Anglo-Saxons, [5_14] and even in Bracton's time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what it has since become. There is, therefore, no need to go back further than to the early Norman period, after the appointment of executors had become common, and the heir was more nearly what he is now.

诺曼征服两个世纪后，直到布拉克顿时期，继承人不仅仅是土地继受人，还在更广泛意义上代表其被继承人，这点我们将直接看到。继承人意义上的遗嘱执行人，其职责不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知，即使在布拉克顿时代，似乎也与后来不同。因此，没有必要追溯至诺曼早期以前，在诺曼早期指定遗嘱执行人已经成为常见事，继承人与其现在的含义更为接近。

When Glanvill wrote, a little more than a century after the Conquest, the heir was bound to warrant the reasonable gifts of his ancestor to the grantees and their heirs; [5_15] and if the effects of the ancestor were insufficient to pay his debts, the heir was bound

to make up the deficiency from his own property. [5_16] Neither Glanvill nor his Scotch imitator, the Regiam Majestatem, [5_17] limits the liability to the amount of property inherited from the same source. This mak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heir and ancestor as complete as that of the Roman law before such a limitation was introduced by Justinian. On the other hand, a century later, it distinctly appears from Bracton, [5_18] that the heir was only bound so far as property had descended to him, and in the early sources of the Continent, Norman as well as other, the same limitation appears. [5_19] The liabilities of the heir were probably shrinking. Britton and Fleta, the imitators of Bracton, and perhaps Bracton himself, say that an heir is not bound to pay his ancestor's debt, unless he be thereto especially bound by the deed of his ancestor. [5_20] The later law required that the heir should be mentioned if he was to be held.

诺曼征服以后一个世纪稍多一点，格兰维尔描述到，继承人有义务保证受让人及其继承者得到其被继承人的合理赠与；如果其被继承人个人财产不足以偿还其债务，该继承人有义务用自己的财产进行补偿。格兰维尔及其苏格兰的模仿者《国王之尊》，都没有把义务限定在源于同一处所继承财产的数额范围之内。在贾斯蒂尼安引入此类限定前，继承者和其被继承人之间的身份认同关系与罗马法中身份认同关系完全相同。另一方面，一个世纪后布拉克顿显然认为，继承人只能对他继承的财产负有责任，在大陆早期资料、诺曼法及其他法律中，也出现了同样的限定。继承者的责任很可能逐渐缩小了。布拉克顿的模仿者，布里顿和弗莱塔，可能也包括布拉克顿自己，认为除非继承人特别受到其被继承人契据的约束，否则他没有义务偿还其被继承人的债务。后期法律规定，若要继承人负有法律责任，必须提及此人。

But at all events the identification of heir and ancestor still approached the nature of a universal succession in the time of Bracton, as is shown by another statement of his. He asks if the testator can bequeath his rights of action, and answers, No, so far as concerns debts not proved and recovered in the testator's life. But actions of that sort belong to the heirs, and must be sued in the secular court; for before they are so recovered in the proper court, the executor cannot proceed for them in the ecclesiastical tribunal. [5_21]

但是无论如何，在布拉克顿时代，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身份认同关系，仍接近于概括继承的性质，这在他另外的陈述中也有提及。他问及立嘱人是否可以遗赠其诉讼权，回答说只要立嘱人在有生之年未能证明和索回债务，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此类诉讼权利属于继承人，而且必须在世俗法庭进行诉讼；因为在相应法庭胜诉前，遗嘱执行人不可在教会法庭提起诉讼。

This shows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worked both ways. The heir was liable for the debts due from his ancestor, and he could recover those which were due to him, until the executor took his place in the King's Courts, as well as in those of the Church. Within the limits just explained the heir was also bound to warrant property sold by his ancestor to the purchaser and his heirs. [5_22] It is not necessary, after this evidence that the modern heir began by representing his ancestor generally, to seek for expressions in later books, since his position has been limited. But just as we have seen that the executor is still said to represent the person of his testator, the heir was said to represent the person of his ancestor in the time of Edward I. [5_23] So, at a much later date, it was said that “the heir is in representation in point of taking by inheritance eadam persona

cum antecessore,“ [5_24] the same persona as his ancestor.

这表明认同关系两种方式都可进行。继承人承担着其被继承人的债务，也可以索回别人欠他的债务，这一直持续到遗嘱执行人在王座法庭以及教会法庭中取代了他的位置。在刚刚阐述的限定范围内，继承人也有义务担保其被继承人出售给以非继承方式取得不动产的人及其继承人的财产。现代继承人始于总体上代表其被继承人，有了这一证据就不必在后期判例集中寻找说法，因为他的身份已经受到限定。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在爱德华一世时期，人们仍然认为遗嘱执行人代表立嘱者本人，认为继承人代表其被继承人本人。所以迟些时候，人们认为“继承人从继承开始代表其被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具有同样的法律人格。

A great judge, who died but a few years ago, repeats language which would have been equally familiar to the lawyers of Edward or of James. Baron Parke, after laying down that in general a party is not required to make profert of an instrument to the possession of which he is not entitled, says that there is an exception “in the cases of heir and executor, who may plead a release to the ancestor or testator whom they respectively represent; so also with respect to several tortfeasors, for in all these cases there is a privity between the parties which constitutes an identity of person.“ [5_25]

几年前刚刚去世的一位伟大法官重复使用了爱德华或詹姆斯时代法官们都很熟悉的说法。帕克男爵规定，总体上，当事方不需要为他没有得到授权占有的财产出示文书，之后他指出也有例外情形，“包括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可以向他们各自代表的被继承人和立遗嘱人请求豁免；以及几个侵权行为者的情形，因为在所有这些情形中，组成身份认同的双方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益关系”。

But this is not all. The identity of person was carried farther still. If a man died leaving male children, and owning land in fee, it went to the oldest son alone; but, if he left only daughters, it descended to them all equally. In this case several individuals together continued the persona of their ancestor. But it was always laid down that they were but one heir. [5_26] For the purpose of working out this result, not only was one person identified with another, but several persons were reduced to one, that they might sustain a single persona.

但这不是全部。身份认同还更进一步。如果某人去世后留有男性后嗣并有世袭地产，只有长子有继承权；但是，如果他只有女性后嗣，所有人同等有份。在这种情况下，几个人共同继续代表他的被继承人法律人格。但是根据规定，任何时候，他们只是一个继承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不仅仅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身份等同，而是几个人身份削减为一个人，以便他们可以保持一个单一法律人格。

What was the persona? It was not the sum of all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ancestor. It has been seen that for many centuries his general status, the sum of all his rights and duties except those connected with real property, has been taken up by the executor or administrator. The persona continued by the heir was from an early day confined to real estate in its technical sense; that is, to property subject to feudal principles, as distinguished from chattels, which, as Blackstone tells us, [5_27] include whatever was not a feud.

法律人格到底是什么？它不是被继承人权利和义务的总和。我们看到，很多世纪以来，除了那些与不动产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其总体

身份，也就是权利和义务的总和，已有遗嘱执行人或管理人所接管。从早期开始，继承人所延续的法律人格仅限于专业意义上的不动产，也就是封地法规限定的财产，以区别于动产，也就是布拉克斯通所说的包括所有不是领地的财产。

But the heir's persona was not even the sum of all the ancestor's rights and duties in connection with real estate. It has been said already that every fee descends specifically, and not as incident to a larger universitas. This appears not so much from the fact that the rules of descent governing different parcels might be different, [5_28] so that the same person would not be heir to both, as from the very nature of feudal property. Under the feudal system in its vigor, the holding of land was only one incident of a complex personal relation. The land was forfeited for a failure to render the services for which it was granted; the service could be renounced for a breach of correlative duties on the part of the lord. [5_29] It rather seems tha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eudal period under Charlemagne, a man could only hold land of one lord. [5_30] Even when it had become common to hold of more than one, the strict personal relation was only modified so far as to save the tenant from having to perform inconsistent services. Glanvill and Bracton [5_31] tell us that a tenant holding of several lords was to do homage for each fee, but to reserve his allegiance for the lord of whom he held his chief estate; but that, if the different lords should make war upon each other, and the chief lord should command the tenant to obey him in person, the tenant ought to obey, saving the service due to the other lord for the fee held of him.

但是，继承人的法律人格尚不是与不动产相关的被继承人权利和义务的总和。前面已经提到，每块世袭土地都是特定继承，而不是作

为较大的法人团体的附带物。与其说这是因为不同地块，继承规则可能不同，因而同一个人无法成为两样东西的继承人，不如说这是由封地财产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封建制度鼎盛时期，土地的持有不过是复杂身份关系的一种附带权利。“如果未能完成相应的封建役务，土地就会被没收；如果领主违反了相应的责任，可以拒绝执行该役务。”在查理曼大帝统治的封建时代初期，似乎每人只能持有一位领主的土地。后来，虽然持有一个以上领主的土地渐为常见，这种严格的身份关系也只是稍有改变，以免除封臣履行相互矛盾义务之负担。格兰维尔和布莱克顿认为，持有几个领主封地的封臣，须为每块封地表示臣服，但对其主要地产的领主保持忠诚；然而，如果这些领主之间发生战争，主要领主出面命令该封臣服从于他，该封臣应该服从，除非该项役务属于他持有其封地的另外领主。

We see, then, that the tenant had a distinct persona or status in respect of each of the fees which he held. The rights and duties incident to one of them had no relation to the rights and duties incident to another. A succession to one had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ccession to another. Each succession was the assumption of a distinct personal relation, in which the successor was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terms of the relation in question.

这样，封臣对其所持有的每一块封地都有一个不同的法律人格或地位。一个身份所附带的权利义务与另外一个身份所附带的权利义务没有关系。对一个身份的继承与对另一个身份的继承毫不相关。每项继承承担了截然不同的身份关系，继受人的身份由所涉及的关系决定。

The persona which we are seeking to define is the estate. Every fee is a distinct persona, a distinct hereditas, or inheritance, as it

has been called since the time of Bracton. We have already seen that it may be sustained by more than one where there are several heirs, as well as by one, just as a corporation may have more or less members. But not only may it be divided lengthwise, so to speak, among persons interested in the same way at the same time: it may also be cut across into successive interests, to be enjoyed one after another. In technical language, it may be divided into a particular estate and remainders. But they are all parts of the same fee, and the same fiction still governs them. We read in an old case that “he in reversion and particular tenant are but one tenant.“ [5_32] This is only a statement of counsel, to be sure; but it is made to account for a doctrine which seems to need the explan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after the death of the tenant for life, he in reversion might have error or attaint on an erroneous judgment or false verdict given against the tenant for life. [5_33]

我们希望界定的法律人格涉及的是不动产权。每块封地都具有不同的法律人格，是不同的继承地，或者用布莱克顿时期以来的称谓，就是遗产。我们已经看到，它既可以由一个以上的继承人一起保持，也可以一个人承担，正如一个公司员工可多可少一样。但可以说，它不仅可横向在相关利益的人之间以同一方式、在同一时间内分割；还可纵向分割为连续的利益，一个接一个享有。“用专门术语解释，它可分为部分不动产权和剩余地产权。”但它们仍然全部是同一封地的部分，同一拟制仍然对其形成制约。我们读过一个早期案例，“拥有土地归复权的人和部分不动产权的封臣是同一个封臣”。诚然，这只是一个建议性的陈述，但是这一说法是为了解释某一需要说明的原则，大意是终生保有封臣死后，拥有土地归复权的人可能根据对终生保有封臣的错误判断或因误判决而错误起诉或者剥夺其权利。

To sum up the results so far, the heir of modern English law

gets his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from the law as it stood soon after the Conquest. At that time he was a universal successor in a very broad sense. Many of his functions as such were soon transferred to the executor. The heir's rights became confined to real estate, and his liabilities to those connected with real estate, and to obligations of his ancestor expressly binding him. The succession to each fee or feudal inheritance is distinct, not part of the sum of all the ancestor's rights regarded as one whole. But to this day the executor in his sphere, and the heir in his, represent the person of the deceased, and are treated as if they were one with him, for the purpose of settling thei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总结一下目前为止的结论，英国现代法律中的继承人，其突出特点来自诺曼征服不久就确立的法律。那时，他是一个非常宽泛意义上的概括继受人。他的很多此类职责不久就转移给了遗嘱执行人。继承人的权利就变成局限于不动产，其责任也变成仅限于与不动产相关以及被继承人明确限定其承担的义务。对每块世袭领地或封建遗产的继承都是独立的，而不是被继承人所有权利总和的一部分，这些权利被视为一个整体。但是时至今日，遗嘱执行人和继承人在各自范围内代表被继承人，为处理其权利与义务起见，人们对待他们就像他们是被继承人本人一样。

The bearing which this has upon the contracts of the deceased has been pointed out. But its influence is not confined to contract; it runs through everything. The most striking instance, however, is the acquisition of prescriptive rights. Take the case of a right of way. A right of way over a neighbor's land can only be acquired by grant, or by using it adversely for twenty years. A man uses a way for ten years, and dies. Then his heir uses it ten years. Has any right been acquired? If common sense alone is consulted, the answer must be

no. The ancestor did not get any right, because he did not use the way long enough. And just as little did the heir. How can it better the heir's title that another man had trespassed before him? Clearly, if four strangers to each other used the way for five years each, no right would be acquired by the last. But here comes in the fiction which has been so carefully explain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law it is not two persons who have used the way for ten years each, but one who has used it for twenty. The heir has the advantage of sustaining his ancestor's and the right is acquired.

前文已指出这一点对被继承人合同所产生的影响。但其影响不仅限于合同，而是渗透到各个方面。然而，最显著的例子是时效性权利的获得。举一个通行权的例子。在邻人土地上通行的权利只能通过许可获得，或者未经许可使用20年。某人使用某路通行权十年，然后去世了。他的继承人接着又用了十年，此人能获得任何权利吗？如果仅依据常识，答案一定是不能。被继承人没有得到任何权利，因为他使用该通行权的期限不够。其继承人也同样如此。另一个人在继承人之前的侵占如何能改善该继承人的拥有权呢？显然，如果四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每人使用该条道路五年，最后一个人无法获得任何权利。但是本案前面详细阐述的拟制却要起作用了。从法律角度看，这里不是两个人分别使用通行权十年，而是同一个人使用了二十年。该继承人拥有保持其被继承人身份的优势，因此取得了该权利。

[5_1].Recht des Besitzes, Section 11, p. 184, n. 1 (7th ed.), Eng. tr. 124, n. t.

[5_2].Inst. II. Section 157.

[5_3]."In suis heredibus evidentius apparet continuationem dominii eo rem perdueere, ut nulla videatur hereditas fuisse, quasi olim hi domini essent, qui etiam vivo patre quodammodo domini existimantur, unde etiam filius familias appellatur sicut pater familias, sola nota hae adiecta, per quam distinguitur genitor ab eo qui genitus sit. itaque post mortem patris non hereditatem percipere videntur, sed magis liberam bonorum administrationem consequuntur hac ex causa licet non sint heredes

instituti, domini sunt: nec obstat, quod licet eos exheredare, quod et occidere licebat." D. 28.2. 11. Cf. Plato, Laws, [Greek characters]

[5_4].Laveleye, Propriety, 24, 202, 205, 211, n. 1, 232; Norton, L.C. Hindu Law of Inheritance, p. 193.

[5_5].D.50. 16. 208.

[5_6].D.41. 1. 34. Cf. D. 41. 3. 40; Bract., fol. 8 a, 44 a.

[5_7].D.43. 24. 13, Section 5.

[5_8].Germania, c. 20.

[5_9].Littleton, Section 337; Co. Lit. 209, a, b; Y.B. 8 Ed. IV. 5, 6, pl. 1; Keilway, 44 a (17 Hen. VII.); Lord North v. Butts, Dyer, 139 b, 140 a, top; Overton v. Sydall, Popham, 120, 121; Boyer v. Rivet, 3 Bulstr. 317, 321; Bain v. Cooper, 1 Dowl. Pr. Cas. N. s. 11, 14.

[5_10].Y.B. 48 Ed. III. 2, pl. 4.

[5_11].Vermoegensrechtlichen Klagen, 88, 89.

[5_12].Proc. de la Lex Salica, tr. Thevenin, p. 72 and n. 1.

[5_13].Ethelred, II. 9; Cnut, II. 73; Essays in Ang. Sax. Law, pp. 221 et seq.

[5_14].1 Spence, Eq. 189, note, citing Hickes, Dissert. Epist., p. 57.

[5_15].Glanv., Lib. VII. c. 2 (Beames, p. 150).

[5_16].Ibid., c. 8 (Beames, p. 168).

[5_17].Reg. Maj., Lib. II. c. 39.

[5_18].Fol. 61 a.

[5_19].Sachsensp., II. 60, Section 2, cited in Essays in Ang. Sax. Law, p. 221; Grand Cust. de Norm., c. 88.

[5_20].Britt., fol. 64 b (Nich. ed. 163); Fleta, Lib. II. c. 62, Section 10. Cf. Bract., fol. 37 b, Section 10.

[5_21].Bracton, fol. 61 a, b. "Item quaero an testator legare possit actiones suas? Et verum est quod non, de debitis quae in vita testatoris convicta non fuerunt nec recognita, sed hujusmodi actiones competunt haeredibus. Cum antera convicta sint et recognita, tune sunt quasi in bonis testatoris, et competunt executoribus in foro ecclesiastico. Si autem competant haeredibus, ut praedictum est, in foro seculari debent terminari, quia antequam communicantur et in foro debito, non pertinet ad executores, ut in foro ecclesiastico convincantur."

[5_22].Bracton, fol. 62a.

[5_23].Y.B. 20 & 21 Ed. I. 232; cf. ib. 312.

[5_24].Oates v. Frith, Hob. 130. Cf. Y.B. 5 Hen. VII. 18, pl. 12; Popham, J., in Overton v. Sydall, Poph. 120, 121 (E. 39 El.); Boyer v. Rivet, 3 Bulstr. 317, 319-322; Brooker's Case, Godb. 376, 380 (P. 3 Car. I.).

[5_25].Bain v. Cooper, 1 Dowl. Pract. Cas. N. s. 11, 14. Cf. Y.B. 14 Hen. VIII. pl. 5, at fol. 10.

[5_26].Bract., fol. 66 b, 76 b, and passim; Y.B. 20 Ed. I. 226, 200; Littleton, Section 241. The same thing was said where there were several executors: "They are only in the place of one person." Y.B. 8 Ed. IV. 5,pl. 1.

[5_27].Comm. 385.

[5_28].Cf. Glanv., Lib. VII. c. 3; F. N. B. 21 L; Dyer, 4 b, 5 a.

[5_29].Cf. Bract., fol. 66 b 76 b .

[5_30].Charta Divis. Reg. Franc., Art. IX. & VIII. Cf. 3 Laferriere, Hist. du Droit Francais, 408, 409.

[5_31].Glanv., Lib. IX. c. 1 (Beames, pp. 218, 220); Bract., fol. 79 b.

[5_32].Brooker's Case, Godbolt, 376, 377, pl. 465.

[5_33].Dyer, 1 b. Cf. Bain v. Cooper, 1 Dowl. Pr. C. N. s. 11, 12.

LECTURE X. SUCCESSIONS INTER VIVOS

第十一讲　生者之间的继承

I now reach the most difficult and obscure part of the subject. It remains to be discovered whether the fiction of identity was extended to others besides the heir and executor. And if we find, as we do, that it went but little farther in express terms, the question will still arise whether the mode of thought and the conceptions made possible by the doctrine of inheritance have not silently modified the law as to dealings between the living. It seems demonstrable to me that their influence has been profound, and that,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theory of inheritance, it is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e theory of transfer inter vivos.

现在到了该议题中最晦涩难懂的部分。现在尚不明了拟制的身份认同是否扩展到了除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之外的其他人。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确也发现，这点在明文规定中并没有多大扩展，建立在继承法规基础上的思考模式和观念是否悄然改变涉及到生者之间交易的法律？这个问题仍然会出现。对我来说，似乎可以证明它们的影响极为深远，而且如果不理解继承理论，就不可能理解生者之间的转让理论。

The difficulty in dealing with the subject is to convince the sceptic that there is anything to explain. Nowadays, the notion that a right is valuable is almost identical with the notion that it may be turned into money by selling it. But it was not always so. Before you can sell a right, you must be able to make a sale thinkable in

legal terms. I put the case of the transfer of a con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ecture. I have just mentioned the case of gaining a right by prescription, when neither party has complied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twenty years' adverse use. In the latter instance, there is not even a right at the time of the transfer, but a mere fact of ten years' past trespassing. A way, until it becomes a right of way, is just as little susceptible of being held by a possessory title as a contract. If then a contract can be sold, if a buyer can add the time of his seller's adverse user to his own, what is the machinery by which the law works out the result?

处理该议题的难点在于让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相信有阐述的必要。如今，权利是有价值的这一概念几乎等同于权利可以通过出售变成金钱这一概念。但并非向来如此。在出售权利之前，你必须使之符合法律的逻辑。我在该讲开始时举过一个合同转让的案例。我刚刚提及了通过时效取得权利的案例，其中两方都不符合非法使用二十年的要求。在后者的情形中，转让时根本谈不上存在权利，而只是过去十年中侵占之事实。一条道路在成为通行权之前，几乎无法通过像合同一样占有性的权利而拥有。那么如果合同可以出售，如果买方可以把卖方非法使用的年限加给自己，那么法律赖以得出这一结论的机制是什么呢？

The most superficial acquaintance with any system of law in its earlier stages will show with what difficulty and by what slow degrees such machinery has been provided, and how the want of it has restricted the sphere of alienation. It is a great mistake to assume that it is a mere matter of common sense that the buyer steps into the shoes of the seller, according to our significant metaphor. Suppose that sales and other civil transfers had kept the form of warlike capture which it seems that they had in the infancy

of Roman law, [6_1] and which was at least partially retained in one instance, the acquisition of wives, after the transaction had, in fact, taken the more civilized shape of purchase. The notion that the buyer came in adversely to the seller would probably have accompanied the fiction of adverse taking, and he would have stood on his own position as founding a new title. Without the aid of conceptions derived from some other source, it would have been hard to work out a legal transfer of objects which did not admit of possession.

即使是对任何法律体系早期阶段有最肤浅的了解，都会看出，这一机制的建立是多么困难和多么程度缓慢，以及该机制的缺乏如何限制了财产转让的范围。如果按照我们提到的重要比喻，想当然地认为买方接替卖方的位置只是常识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假定出售及其他民事转让一直保持着类似战争俘获的形式，罗马法律早期似乎就是如此，在取得妻子的这个例子中，这种战争俘获的形式至少部分保留下来，虽然在实际办理中，人们采取了更为文明的购买形式。买方非法占有卖方的权利这一概念与非法占取的拟制同时存在，买方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建立新的所有权。若无其他渊源的法律概念之帮助，对不受认可占有的对象进行合法转让，恐怕很难。

A possible source of such other conceptions was to be found in family law. The principles of inheritance furnished a fiction and a mode of thought which at least might have been extended into other spheres. In order to prove that they were in fact so extended,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examine once more the law of Rome, as well as the remains of German and Anglo-Saxon customs.

其他此类概念的一个可能来源可在家庭法中找到。继承原则提供

了一种拟制和一种思维模式，至少可能也扩展到了其他领域。为证明它们的确扩展了，有必要再次研究罗马法以及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风俗之遗留。

I will take up first the German and Anglo-Saxon laws which are the ancestors of our own on one side of the house. For although what we get from those sources is not in the direct line of the argument, it lays a foundation for it by showing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fields.

我先从日耳曼法和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开始，这些是我们法律的宗源，支撑着法律大厦的一侧。因为虽然我们从这些渊源中所得与我们的论证没有直接关系，但通过阐明不同领域的发展过程，将为我们的论证打下基础。

The obvious analogy between purchaser and heir seems to have been used in the folk-laws, but mainly for another purpose than those which will have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English law. This was to enlarge the sphere of alienability.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there are many traces of family ownership in early German, as well as in early Roman law; and it would seem that the transfer of property which originally could not be given outside the family, was worked out through the form of making the grantee an heir.

以非继承方式取得不动产的人与继承人之间显然的类比似乎在民间法中使用，但主要是为了另一目的，而不是英国法需要考虑的原因。这一目的就是扩大财产可转让性的范围。我们会记得，在早期日耳曼法律及早期罗马法律中，保存了许多家庭所有权的记录；似乎最

初不能在家庭之外进行财产转移，后来通过使受让人成为继承人的形式得以实现。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points to this conclusion. Heres, as Beseler [6_2] and others have remarked, from meaning a successor to the property of a person deceased, was extended to the donee mortis causa, and even more broadly to grantees in general. Hereditare was used in like manner for the transfer of land. Hevin was quoted by Laferriere [6_3] as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 ancient usage was to say heriter for purchase, heritier for purchaser, and desheriter for sell.

语言的演变支持这个结论。根据伯斯拉和其他人的论述，概括继承人（heres）一词的含义从已故者财产的继受人，扩大为后来的临终受赠人（donee mortis causa），甚至更广泛地指一般受让人。转让土地时，继承（hereditare）一词也以类似方式使用。莱菲利埃尔引用海文的话提醒我们这个事实：按照古代的用法，heriter指通过非继承方式取得土地等不动产，heritier指通过非继承方式取得不动产的人，desheriter则指将财产所有权或占有权移转给他人以换取有价值的对价。

The texts of the Salic law give us incontrovertible evidence. A man might transfer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his property [6_4] by delivering possession of it to a trustee who, within twelve months, handed it over to the beneficiaries. [6_5] To those, the text reads, whom the donor has named heredes (quos heredes appellavit). Here then was a voluntary transfer of more or less property at pleasure to persons freely chosen, who were not necessarily universal successors, if they ever were, and who nevertheless took under the

name heredes. The word, which must have meant at first persons taking by descent, was extended to persons taking by purchase. [6_6] If the word became enlarged in meaning, it was probably because the thought which it conveyed was turned to new uses. The transaction seems to have fallen half-way between the institution of an heir and a sale. The later law of the Ripuarian Franks treats it more distinctly from the former point of view. It permits a man who has no sons to give all his property to whomsoever he chooses, whether relatives or strangers, as inheritance, either by way of adfathamire, as the Salic form was called, or by writing or delivery. [6_7]

萨利克法的文本也给了我们提供了无可争议的证据。某人可以将其全部或任一部分财产通过交付给受托人进行转让，受托人在十二个月之内，将其移交给受益人。萨利克法的文本写到，移交给赠与人称之为heredes（所选定的继承人）的继承者。这样就实现了或多或少的财产自愿转移、可以自主给随意挑选的人，这些人不一定是概括继受人，即使他们是，他们仍然以heredes的身份继承。该词最初应该是指通过家族关系取得财产的人，其意义后来扩展至通过购买取得财产的人。如果该词意义扩大了，很可能是由于它所表达的思想也有了新的用途。这种交易似乎处于继承人的指定和出售的中间地带。利普里安法兰克人的后期法律更清晰地从前者角度来对待这种转让。该法律允许无男性后裔的人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遗产，以萨利克法称之为象征转让的形式或者通过书面或交付形式，给予任何他选择的人，或是亲戚或是陌生人。

The Lombards had a similar transfer, in which the donee was not only called heres, but was made liable like an heir for the debts of the donor on receiving the property after the donor's death. [6_8] By the Salic law a man who could not pay the wergeld was allowed

to transfer formally his house-lot, and with it the liability. But the transfer was to the next of kin. [6_9]

伦巴底人也有类似的转让，其中，受赠人不仅被称为概括继承人（heres），而且与继承人一样，在赠与人死后接收其财产的同时要承担其相应债务。依照萨利克法，如果某人不能支付赎罪赔偿金，可以将其房屋份额正式转让，责任也随之转移。但是只能转让给最近的亲属。

The house-lot or family curtilage at first devolved strictly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family. Here again, at least in England, freedom of alienation seems to have grown up by gradually increased latitude in the choice of successors. If we may trust the order of development to be noticed in the early charters, which it is hard to believe accidental, although the charters are few, royal grants at first permitted an election of heirs among the kindred, and then extended it beyond them. In a deed of the year 679, the language is, “as it is granted so do you hold it and your posterity.” One a century later reads, “which let him always possess, and after his death leave to which of his heirs he will.” Another, “and after him with free power (of choice) leave to the man of his kin to whom he wishes to” (leave it). A somewhat earlier charter of 736 goes a step further: “So that as long as he lives he shall have the power of holding and possessing (and) of leaving it to whomsoever he chooses, either in his lifetime, or certainly after his death.”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th century the donee has power to leave the property to whomsoever he will, or, in still broader terms, to exchange or grant in his lifetime, and after his death to leave it to whom he chooses,—or to sell, exchange, and leave to whatsoever heir he chooses. [6_10] This choice of heirs recalls the quos heredes

appellavit of the Salic law just mentioned, and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language of a Norman charter of about the year 1190: “To W. and his heirs, to wit those whom he may constitute his heirs.“ [6_11]

房屋份额或者家族宅地最初严格限制在家庭内部转移。然而另一方面，至少英格兰是这样，转让自由似乎是通过继受人选择范围的逐渐扩大而发展的。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早期土地转让合同中的发展顺序，虽然早期土地转让合同很少，这种顺序不大可能是偶然的，王室特许最初允许在亲属中选取继承人，后来扩大到亲属范围之外。公元679年的一份契据中写道：“兹授权你及后代子孙持有”。一个世纪以后，一份契据如此写道：“他可终生拥有，死后留给他任意选择的继承人”。另外一份，“死后他可自由（选择）留给他希望的亲属（继承）”。更早些的一份公元736年的土地转让合同更进一步：“只要他在世，他将有权持有和占有（以及）可在他有生之年，或者理所当然在他死后，将其财产留给任何他选择的人”。在九世纪初，受赠人有权把财产留给任何他选择的人，或者，更宽泛地说，有权在其有生之年交换或转让其财产，死后留给他选的任意一个人，或者出售、交换和留给他任意选择的继承人。对继承人的选择使我们想到刚刚提及的萨利克法中所选定的继承人，也可与1190年诺曼时代土地转让合同的措辞相比较：“给W及其继承人，即给予他可能选定的继承人”。

A perfect example of a singular succession worked out by the fiction of kinship is to be found in the story of Burnt Njal, an Icelandic saga, which gives us a living picture of a society hardly more advanced than the Salian Franks, as we see them in the Lex Salica. A lawsuit was to be transferred by the proper plaintiff to another more versed in the laws, and better able to carry it on,—in fact, to an attorney. But a lawsuit was at that time the alternative of a feud, and both were the peculiar affair of the family concerned.

[6_12] Accordingly, when a suit for killing a member of the family was to be handed over to a stranger, the innovation had to be reconciled with the theory that such suit belonged only to the next of kin. Mord is to take upon himself Thorgeir's suit against Flosi for killing Helgi, and the form of transfer is described as follows.

通过亲属关系拟制促成单一继承的完美例子可在布朗特·尼亚的故事中找到，这是冰岛的一个传奇故事，故事中描述的社会生活状态大概不会比我们看到的《萨利克法》中的利普里安法兰克人生活更为发达。某诉讼案件由真正的原告交给另一个更精通法律的人，更能胜任将诉讼案件进行下去的人——事实上，交给了一个律师。但是在那时，诉讼是决斗的替代方式，两者都是相关家庭的特殊事务。因此，因某一家庭成员被杀而提请陌生人进行诉讼，这种新做法需与该类诉讼仅限于近亲的理论保持一致。莫德本人要承担桑格尔对弗洛斯的诉讼，指控弗洛斯杀死了黑尔吉，权利转让形式如下：

“Then Mord took Thorgeir by the hand and named two witnesses to bear witness, 'that Thorgeir Thofir's son hands me over a suit for manslaughter against Flosi Thord's son, to plead it for the slaying of Helgi Njal's son, with all those proofs which have to follow the suit. Thou handest over to me this suit to plead and to settle, and to enjoy all rights in it, as though I were the rightful next of kin. Thou handest it over to me by law; and I take it from thee by law.'” Afterwards, these witnesses came before the court, and bore witness to the transfer in like words: “He handed over to him then this suit, with all the proofs and proceedings which belonged to the suit, he handed it over to him to plead and to settle, and to make use of all rights, as though he were the rightful next of kin. Thorgeir handed it over lawfully, and Mord took it lawfully.” The suit went on, notwithstanding the change of hands, as if the next of kin were

plaintiff. This is shown by a further step in the proceedings. The defendant challenges two of the court, on the ground of their connection with Mord, the transferee, by blood and by baptism. But Mord replies that this is no good challenge; for “he challenged them not for their kinship to the true plaintiff, the next of kin, but for their kinship to him who pleaded the suit.” And the other side had to admit that Mord was right in his law.

“于是莫德握住桑格尔的手，指定了两名证人作证，‘桑格尔·索菲尔之子起诉弗洛斯·索德之子杀人，起诉他杀死了黑尔吉·尼亚之子，将该诉讼案件交由给我，所有相关该诉讼案件的证据也一并交给我。汝交由此案与我起诉解决，我享有全部权利，如我是最合适之近亲。汝确系依法移交此案与我；吾亦依法从汝处得之。’”之后，证人出庭以类似的话语作证该项权利转移：“他将该诉讼移交给他，并提供一切属于该诉讼之证据及记录，他交由他起诉解决，使用一切权利，仿佛他是最合适的近亲。桑格尔合法移交，莫德合法接手”。尽管转手，该诉讼仍继续进行，正如近亲就是原告一样。这从诉讼中的下一步也可看出。被告质疑法庭上的二人，依据是他们与被转让人莫德在血缘和教派宗系方面的关系。但是莫德回应说，这种质疑无效，因为“他质疑的不是他们与真正原告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近亲关系，而是他们与提起诉讼人的关系”。对方只好承认，莫德在法律推理上是正确的。

I now turn from the German to the Roman sources. These have the closest connection with the argument, because much of the doctrine to be found there has been transplanted unchanged into modern law.

我现在从日耳曼法转到罗马法渊源。这些与我们的论证联系最密

切，因为其中很多法规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现代法。

The early Roman law only recognized as relatives those who would have been members of the same patriarchal family, and under the same patriarchal authority, had the common ancestor survived. As wives passed into the families of their husbands, and lost all connection with that in which they were born, relationship through females was altogether excluded. The heir was one who traced his relationship to the deceased through males alone. With the advance of civilization this rule was changed. The praetor gave the benefits of the inheritance to the blood relations, although they were not heirs, and could not be admitted to the succession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law. [6_13] But the change was not brought about by repealing the old law, which still subsisted under the name of the jus civile. The new principle was accommodated to the old forms by a fiction. The blood relation could sue on the fiction that he was an heir, although he was not one in fact. [6_14]

早期罗马法中，只有同一父系家庭成员的人和同一父系管辖权下的人，且共同祖先尚存，才会被认定为亲属。妻子进入丈夫家庭后，就失去了与出生家庭的所有关系，通过女性而存在的关系全部排除。只有通过男性关系追溯到与被继承人存在亲属关系的人才能成为继承人。随着文明的进步，这一规则也随之改变。尽管存在血缘关系的亲属不是继承人，无法依据古法获得继承，古罗马的裁判官还是给予了他们财产继承之利益。但是这一变化不是通过废除旧的法律来实现的，旧的法律依然以市民法的名义存在。这一新规则通过拟制并入到了旧形式中。存在血缘关系的亲属可以借助他是继承人这一拟制而起诉，虽然事实上他不是继承人。

One the early forms of instituting an heir was a sale of the familia or headship of the family to the intended heir, with all its rights and duties. [6_15] This sale of the universitas was afterwards extended beyond the case of inheritance to that of bankruptcy, when it was desired to put the bankrupt's property into the hands of a trustee for distribution. This trustee also could make use of the fiction, and sue as if he had been the bankrupt's heir. [6_16] We are told by one of the great jurisconsults that in general universal successors stand in the place of heirs. [6_17]

指定继承人的早期方式之一是连同权利和义务一起把家庭的家长权或者首领地位出售给拟议的继承人。出售概括继承这一情况后来从财产继承这类情形扩展到破产情形，人们希望这样可以把破产者的财产由信托人进行分配。该托管人也可以利用拟制起诉，仿佛他是破产者的继承人一样。一位伟大的法学家告诉我们，一般来说概括继受人具有继承人的身份。

The Roman heir, with one or two exceptions, was always a universal successor; and the fiction of heirship, as such, could hardly be used with propriety except to enlarge the sphere of universal successions. So far as it extended, however, all the consequences attached to the original fiction of identity between heir and ancestor followed as of course.

除了一两个例外，罗马继承人都是概括继受人，上面对继承人身份的拟制，除了用于扩大概括继承的范围，其他用途几乎都不适用。然而，只要继承人的范围仍然扩展，附属于继承人和被继承人初始身份拟制的所有后果也随之而来。

To recur to the case of rights acquired by prescription, every universal successor could add the time of his predecessor's adverse use to his own in order to make out the right. There was no addition, legally speaking, but one continuous possession.

再来看看通过时效取得权利的那个案例，为了取得该权利，每个概括继受人都可以把他前任非法使用的时间加到自己的时间上面。从法律上讲，这不是增加占有，而是一个持续的占有。

The express fiction of inheritance perhaps stopped here. But when a similar joinder of times was allowed between a legatee or devisee (legatarius) and his testator, the same explanation was offered. It was said, that, when a specific thing was left to a person by will, so far as concerned having the benefit of the time during which the testator had been in possession for the purpose of acquiring a title, the legatee was in a certain sense quasi an heir. [6_18] Yet a legatarius was not a universal successor, and for most purposes stood in marked contrast with such successors. [6_19]

继承中的明确拟制，可能就到此终止了。但针对允许遗产动产受赠人或者不动产受遗赠人（遗产承受人）与其立嘱人进行类似的时间合并的情况，人们给出了同样的解释。人们认为，若一具体财产通过遗嘱留给某人，从获取所有权的角度，立嘱人占有该财产的时间之益处属于动产受赠人所有，就此而言，动产受赠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准继承人。然而遗产承受人并不是概括继受人，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他的身份与此类继受人形成鲜明对比。

Thus the strict law of inheritance had made the notion familiar

that one man might have the advantage of a position filled by another, although it was not filled, or was only partially filled, by himself; and the second fiction, by which the privileges of a legal heir in this respect as well as others had been extended to other persons, broke down the walls which might otherwise have confined those privileges to a single case. A new conception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law, and there was nothing to hinder its further application. As has been shown, it was applied in terms to a sale of the universitas for business purposes, and to at least one case where the succession was confined to a single specific thing. Why, then, might not every gift or sale be regarded as a succession, so far as to insure the same advantages?

因此，严格的继承法普及了这一概念，即某人尽管自己没有拥有某种身份，或者只有部分拥有，他可以享有另外一个人拥有身份之好处，第二个普及的拟制——借助于它，法律继承人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特权扩展至其他人——打破了将这些特权局限于单独一种情形的局面。这样法律中引入了一个新概念，而且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的进一步应用。如上所述，它应用于为商业目的而出售法人团体，应用于至少一种情形：即继承仅限于某一具体财产。那么，只要确保同样的好处，为什么不将所有赠予或出售视为一种继承呢？

The joinder of times to make out a title was soon allowed between buyer and seller, and I have no doubt, from the language always used by the Roman lawyers, that it was arrived at in the way I have suggested. A passage from Scaevola (B. C. 30) will furnish sufficient proof. Joinder of possessions, he says, that is, the right to add the time of one's predecessor's holding to one's own, clearly belongs to those who succeed to the place of others, whether by contract or by will: for heirs and those who are treated as holding

the place of successors are allowed to add their testator's possession to their own. Accordingly, if you sell me a slave I shall have the benefit of your holding. [6_20]

买方和卖方很快得到许可，为证明一种产权而进行时间合并，根据罗马法学家们一贯的说法，我毫不怀疑，这是以我刚才指出的方式实现的。斯凯沃拉（公元前30年）所描述的段落可以提供足够的证据。他说，占有合并，即将前任持有的时间加到自己身上的权利，不管是通过合同还是遗嘱，显然属于继任了他人位置的人，即继承人和那些被视作处于继受人位置的人，都可以把立遗嘱人的占有加为己有。因此，如果你卖给我一个奴隶，我将获得你对他持有的权益。

The joinder of times is given to those who succeed to the place of another. Ulpian cites a like phrase from a jurisconsult of the time of the Antonines,—“to whose place I have succeeded by inheritance, or purchase, or any other right.“ [6_21] Succedere in locum aliorum, like sustinere personam,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Roman lawyers for those continuations of one man's legal position by another of which the type was the succession of heir to ancestor. Suecedere alone is used in the sense of inherit, [6_22] and successio in that of “inheritance.“ [6_23] The succession par excellence was the inheritance;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scarcely any instance will be found in the Roman sources where “succession” does not convey that analogy, and indicate the partial assumption, at least, of a persona formerly sustained by another. It clearly does so in the passage before us.

时间合并赋予那些继承了他人位置的那些人。乌尔皮安引用安东尼时代一位法学家类似的话语——“通过继承、或非继承方式获得、

或其他任何权利方式，我继承了其位置”。代表一个人，与取代一个人的位置一样，是罗马法学家们所用的一个短语，用来表示一个人的法律地位由另一人延续，其类型是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suecedere这个词单用表示动词意义的继承，而successio作为名词意义的“继承”使用。典型继承就是遗产继承；而且人们认为罗马资料中几乎没有案例不是表达这一类推的“继承”，表明继承人至少部分承担另外一人原先保持的法律人格。我们以前通过的法案中显然就是这样。

But the succession which admits a joinder of times is not hereditary succession alone. In the passage which has been cited Scaevola says that it may be by contract or purchase, as well as by inheritance or will. It may be singular, as well as universal. The jurists often mention antithetically universal successions and those confined to a single specific thing. Ulpian says that a man succeeds to another's place, whether his succession be universal or to the single object. [6_24]

然而允许时间合并的继承并不只是世袭性继承。在前面引用的法案中，斯凯沃拉指出，它可通过合同或非继承方式获得不动产进行，也可通过遗产继承或遗嘱进行。它可以是单项继承，也可以是概括性继承。法理学家们常常把概括继承情形和那些限于某一特定财产的继承相提并论。乌尔皮安认为，不论某人的继承是概括继承还是某一物品继承，他都继承了某人的位置。

If further evidence were wanting for the present argument, it would be found in another expression of Ulpian's. He speaks of the benefit of joinder as derived from the persona of the grantor. “He to whom a thing is granted shall have the benefit of joinder from the persona of his grantor.“ [6_25] A benefit cannot be derived from a

persona except by sustaining it.

如果这种论证需要进一步证据，则可从乌尔皮安论著的其他说法中找到。他提及了源于让与人法律人格合并的好处。“获得某项财产赠与的人会因其让与人的法律人格获得合并之受益。”除非保持某种法律人格，否则不能获得某种利益。

It farther appears pretty plainly from Justinian's Institutes and the Digest, that the benefit was not extended to purchasers in all cases until a pretty late period. [6_26]

贾斯蒂尼安的《法学阶梯》和《学说汇纂》进一步清楚地说明，这一利益直到很晚时期才扩展至所有情况下通过非继承方式获得不动产的人。

Savigny very nearly expressed the truth when he said, somewhat broadly, that “every accessio, for whatever purpose, presupposes nothing else than a relation of juridical succession between the previous and present possessor. For succession does not apply to possession by itself.“ [6_27] And I may add, by way of further explanation, that every relation of juridical succession presupposes either an inheritance or a relation to which, so far as it extends, the analogies of the inheritance may be applied.

萨维尼有些宽泛的表述比较接近真相，他说：“所有附加权益，不论什么目的，只能以上任和现任占有者之间存在的法律继承关系为前提。因为继承不会自动适用于占有”。我想通过进一步解释来补充

说明，所有的法律继承关系，要么以遗产为前提，要么以某种关系为前提，该种继承关系可扩展至能够适用继承类推关系。

The way of thinking which led to the accessio or joinder of times is equally visible in other cases. The time during which a former owner did not use an easement was imputed to the person who had succeeded to his place. [6_28] The defence that the plaintiff had sold and delivered the thing in controversy was available not only to the purchaser, but to his heirs or to a second purchaser, even before delivery to him, against the successors of the seller, whether universal or only to the thing in question. [6_29] If one used a way wrongfully as against the predecessor in title, it was wrongful as against the successor, whether by inheritance, purchase, or any other right. [6_30] The formal oath of a party to an action was conclusive in favor of his successors, universal or singular. [6_31] Successors by purchase or gift had the benefit of agreements made with the vendor. [6_32] A multitude of general expressions show that for most purposes, whether of action or defence, the buyer stood in the shoes of the seller, to use the metaphor of our own law. [6_33] And wha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esult, which often might have been reached by other ways, the language and analogies are drawn throughout from the succession to the inheritance.

附加权益或者时间合并的形成思路在其他情形中也同样存在。上任所有者没有使用的地役权时间归于继承了其位置的人。原告业已将争议中的财产出售并交付，该种辩护不仅适用于通过非继承方式取得不动产的人，也适用于其继承人或其他通过非继承方式取得不动产的人，不论是概括继承还是相关财产继承，甚至在交付给原告之前，都可作为针对出售者继受人的有效辩护。如果某人未经前任所有人许可，不正当使用通行权，继受人不论是通过继承，购买或者任何其他

权利继承，也会被认定为不正当使用。不论是概括继承还是单一继承，诉讼方的正式誓言决定性地有利于其继受人。以购买或以赠与方式获得继任的人享有与卖方所签协议之利益。众多总括性的措辞表明，大多数情况下，不论是起诉还是辩护，用我们自己法律中常用的比喻来说，买方都取代了卖方的位置。比结果更重要的是，所用的措辞和类比都是从继承到遗赠整个过程中得出的，而结果则常常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

Thus understood, there could not have been a succession between a person dispossessed of a thing against his will and the wrongful possessor. Without the element of consent there is no room for the analogy just explained. Accordingly, it is laid down that there is no joinder of times when the possession is wrongful, [6_34] and the only enumerated means of succeeding in rem are by will, sale, gift, or some other right.

以此为前提，一个违背其意志被剥夺了财产的人和一个不正当占有者之间不可能存在继承关系。如果没有同意这一因素，就无法使用刚刚阐释的类推法。因此，法律规定，若占有不正当，时间合并就不存在，对物继承可列举出来的方式仅包括遗嘱、出售、赠予或其他权利。

The argument now returns to the English law, fortified with some general conclusions. It has been shown that in both the systems from whose union our law arose the rules governing conveyance, or the transfer of specific objects between living persons, were deeply affected by notions drawn from inheritance. It had been shown previously that in England the principles of inheritance applied directly to the singular succession of the heir to

a specific fee, as well as to the universal succession of the executor. It would be remarkable, considering their history, if the same principles had not affected other singular successions also. It will soon appear that they have. And not to be too careful about the order of proof, I will first take up the joinder of times in prescription, as that has just been so fully discussed. The English law of the subject is found on examination to be the same as the Roman in extent, reason, and expression. It is indeed largely copied from that source. For servitudes, such as rights of way, light, and the like, form the chief class of prescriptive rights, and our law of servitudes is mainly Roman. Prescriptions it is said, “are properly personal, and therefore are always alleged in the person of him who prescribes, viz. that he and all those whose estate he hath, &c.; therefore, a bishop or a parson may prescribe, for there is a perpetual estate, and a perpetual succession and the successor hath the very same estate which his predecessor had, for that continues, though the person alters, like the case of the ancestor and the heir.“ [6_35] So in a modern case, where by statute twenty years' dispossession extinguished the owner's title, the Court of Queen's Bench said that probably the right w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possessor “if the same person, or several persons, claiming one from the other by descent, will or conveyance, had been in possession for the twenty years.” “But, such twenty years' possession must be either by the same person, or several persons claiming one from the other, which is not the case here.“ [6_36]

现在，有了这些概括性结论的支持，我们再回到英国法的讨论。前面讲到，我们的法律是建立在两种体系的结合体之上，在这两种体系中，支配生者之间让与或转让具体物产的法则深受源于继承遗产的诸多概念的影响。前面已指出，在英格兰，继承原则既可直接适用于继承人对某一特定领地的单一继承，也适用于对遗产管理者的概括性

继承。考虑到其历史，如果这些相同的原则没有影响到其他单一继承，那将会非同寻常。很快我们会看到它们所产生的影响。我不想过分拘泥于证据的顺序，首先我想用时效权利中的时间合并来举例说明，这一点在前面刚刚充分讨论过。仔细研究会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法与罗马法在范围、推理和表达上是一致的。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英国法是从这一源头照搬的。因为地役权，包括诸如通行权、采光权和其他类似权利，构成了时效权利的主要类型，而我们地役权的法律主要是罗马法。有人说，时效权“是适于个人的，因此，始终要由因时效而取得权利的本人来索要，即他本人和他拥有地产的所有者等等；因而，一位主教或者教区牧师可要求时效权，因为，地产一直存在，继任一直存在，继任者拥有与他前任完全一样的地产，尽管人发生了变化，但地产权仍延续，就像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情形一般”。所以，在现代案例中，根据成文法，二十年没有占有某物，则此人丧失所有权，王座法庭指出：“如果同一人或者几个人，通过继承、遗嘱或者让与，一个接一个占有该物二十年”，权利应该转让给该占有人。“但是这个二十年占有必须或是同一个人，或是一个接一个宣称占有，而本案不符合这种情况。”

In a word, it is equally clear that the continuous possession of privies in title, or, in Roman phrase, successors, has all the effect of the continuous possession of one, and that such an effect is not attributed to the continuous possession of different persons who are not in the same chain of title. One who dispossesses another of land cannot add the time during which his disseisee has used a way to the period of his own use, while one who purchased can. [6_37]

简言之，同样清楚，在所有权上具有持续占有法律关系的人，或用罗马法的术语来说，几个继受人，如果持续占有，具有一个人持续占有的效力，而该效力对不在同一所有权链上的人而言，不能归于持续占有。剥夺他人土地的人不能把被剥夺人使用通行权的时间加到自

己使用的时间上，但是通过购买获得土地的人可以这么做。

The authorities which have been quoted make it plain that the English law proceeds on the same theory as the Roman. One who buys land of another gets the very same estate which his seller had. He is in of the same fee, or hereditas, which means, as I have shown, that he sustains the same persona. On the other hand, one who wrongfully dispossesses another—a disseisor—gets a different estate, is in of a new fee, although the land is the same; and much technical reasoning is based upon this doctrine.

上面所引用的这些法律先例表明，英国法与罗马法以同样的理论运作。购买他人土地者所得不动产与其出售人的不动产完全相同。他拥有同样的可继承地产权，或概括继承权，也就是说，他保持着同一法律人格，这点我在前面已阐明。另一方面，尽管土地仍是同一块，不当剥夺他人地产者，即强占者，得到不同的地产，获得一个新的可继承地产权。诸多专业推理都是建立在此规则的基础之上的。

In the matter of prescription, therefore, buyer and seller were identified, like heir and ancestor. But the question remained whether this identification bore fruit in other parts of the law also, or whether it was confined to one particular branch, where the Roman law was grafted upon the English stock.

因此，在时效权利中，买者和卖者的相互关系被认定为如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一般。但是，问题仍然存在：这种认定关系是否也在法律其他方面有所影响，还是它仅限于英国法与罗马法具有渊源的这一特定部分？

There can be no doubt which answer is most probable, but it cannot be proved without difficulty. As has been said, the heir ceased to be the general representative of his ancestor at an early date.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even he was identified came to be a matter of discussion. Common sense kept control over fiction here as elsewhere in the common law. But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in matters directly concerning the estate the identification of heir and ancestor has continued to the present day; and as an estate in fee simple has been shown to be a distinct persona, we should expect to find a similar identification of buyer and seller in this part of the law, if anywhere.

这两者中哪种答案更可能毋庸置疑，但这并不容易证明。如前所说，继承人在早期就已不再是其被继承人的总体代表。因此他身份认同的程度就成为了讨论的内容。在普通法中，在这一点和其他各处，常识制约着拟制。但是，毫无疑问，与不动产直接相关的事务中，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持续到今天；前面已经表明，因为非限嗣继承地产的地产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法律人格，所以如果可能，我们应该会在这部分法律中找到买卖双方的相似认同关系。

Where the land was devised by will, the analogy applied with peculiar ease. For although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principle between a devise of a piece of land by will and a conveyance of it by deed, the dramatic resemblance of a devisee to an heir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a grantee.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one of the Roman jurists said that a legatarius (legatee or devisee) was in a certain sense quasi heres. The English courts have occasionally used similar expressions. In a case where a testator owned a rent, and divided it by will among his sons, and then one of the sons brought

debt for his part, two of the judges, while admitting that the testator could not have divided the tenant's liability by a grant or deed in his lifetime, thought that it was otherwise with regard to a division by will. Their reasoning was that “the devise is quasi an act of law, which shall inure without attornment, and shall make a sufficient privity, and so it may well be apportioned by this means.“ [6_38] So it was said by Lord Ellenborough, in a case where a lessor and his heirs were entitled to terminate a lease on notice, that a devisee of the land as heres factus would be understood to have the same right. [6_39]

在土地通过遗嘱进行遗赠的情况下，该类推很容易就得到了适用。原因是，虽然由遗嘱遗赠和由契据转让一块土地，原则上没有区别，与受让人相比，不动产受遗赠人与继承人之间的相似性更为突出。人们会记得，一位罗马法学家曾说过，遗产承受人（动产受遗赠人或不动产受遗赠人）在一定意义上是准继承者。英国法院偶尔也使用了类似的表述。有一个案例，立嘱人持有一份地租，并以遗嘱方式将其分给几个儿子。此后，有一个儿子为他那份提起追债之诉。该案的两个法官虽然承认立遗嘱人生前不能通过让与或契约分割承租人的责任，但他们认为如果涉及到通过遗嘱进行的分割，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的推理是：“遗赠是一种准法律行为，它不需要经新领主认可就生效，它本身造就了一个充分的法律上的相互利益关系，因此，它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分配”。在一个出租人和其继承人获准事先通知终止租约的案件中，埃伦巴勒勋爵也是这么说，土地的受遗赠人作为事实继承者，被视为享有同等权利。

But wills of land were only exceptionally allowed by custom until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and as the main doctrines of conveyancing had been settled long before that time, we must look further back and to other sources for their explanation. We shall

find it in the history of warranty. This, and the modern law of covenants running with the land, will be treated in the next Lecture.

但是一直到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关于土地的遗嘱只有通过习俗才能许可。由于土地转让的主要法规远在此前很久就确立了，因此我们必须再向前追溯，通过其他源头来寻求原因，我们可以在担保的历史中找到它。这一点以及有关随土地转移盖印合同的现代法将在下一讲中讨论。

[6_1].In the American Law Review for October, 1872, VII. 49, 50, I mentioned one or two indications of this fact. But I have since had the satisfaction of finding it worked out with such detail and learning in Ihering's Geist des Roemischen Rechts, Sections 10, 48, that I cannot do better than refer to that work, only adding that for my purposes it is not necessary to go so far as Ihering, and that he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led to the conclusions which it is my object to establish. See, further, Clark, Early Roman Law, 109, 110; Laferriere, Hist. du Droit Frang., I. 114 et seq.; D. 1.5. 4, Section 3; Gaii Inst. IV. Section 16; ib. II. Section 69.

[6_2].Erbvertraege, I. 15 et seq.

[6_3].Hist. du Droit Franc., IV. 500.

[6_4]."Quantum dare voluerit aut totam furtunam eui voluerit dare . . . nec minus nec majus nisi quantum ei creditum est." Lex Sal. (Merkel), XLVI.

[6_5].Lex Sal. (Merkel), Cap. XLVI., De adfathamire; Sohm, Frank. Reichs—u. Gerichtsverfassung, 69.

[6_6].Beseler, Erbvertraege, I. 101, 102, 105.

[6_7]."Omnem facultatem suam.seu cuicunque libet de proximis vel extraneis, adoptare in hereditatem vel in adfatimi vel per scripturarum seriem seu per traditionem." L. Rib. Cap. L. (al. XLVIII.); cf. L. Thuring. XIII. So Capp. Rib. Section 7: "Qui filios non habuerit et aliurn quemlibet heredem facere sibi voluerit coram rege traditionem faclat."

[6_8].Ed. Roth., cap. 174, 157; cf. lb. 369, 388; Liutpr. III. 16 (al. 2), VI. 155 (al. 102). Cf. Beseler, Erbvertraege, I. 108 et seq., esp. 116-118. Compare the charter of A.D. 713, "Offero S. P. ecclesia quam mihi heredem constitui." (Mem. di Lucca V. b. No. 4.) Troya III. No. 394, cited Heusler, Gewere, 45, 46. Cf. ib. 484. This, no doubt, was due to Roman influence, but it recalls what Sir Henry Maine quotes from Elphinstone's History of India (I. 126), as to sale by a member of one of the village communities: "The purchaser steps exactly into his place, and takes up all his obligations." Ancient Law, ch. 8, pp. 263, 264.

[6_9].(Merkel) Cap. LVIII., De chrenecruda. Sohm, Frank. R. u. G. Verf., 117.

[6_10].A.D. 679: "Sicuti tibi donata est ira tene et posteri tui." Kemble, Cod. Dip., I. 21, No. xvi. Uhtred, A.D. 767: "Quam is semper possideat et post se cui voluerit heredum relinquat." Ib. I. 144, cxvxi. ("Cuilibet heredi voluerit relinquat" is very common in the later charters; ib. V. 155, MLXXXIL; lb. VI. 1, MCCXVIIL; it). 31, MCCXXX.; lb. 38, MCCXXXIV.; and passim. This may be broader than cui voluerit herealum.) Offa, A.D. 779: "Ut se viverite habe deat. et post se suoe propinquitatis homini cui ipse vo possidendum libera utens potestate relinquat." Ib. I. 164, 165, CXXXVII. Aethilbald, A.D. 736: "Ita ut quamdiu vixerit potestatem habeat tenendi ac possidendi cuicumque voluerit vel eo vivo vel certe post obitum suum relinquendi." Ib. I. 96, LXXX.; cf. ib. V. 53, MXIV. Cuthred of Kent, A.D. 805: "Cuicumque hominum voluerit in aeternam libertatem derelinquat." Ib. I. 232, CXC. "Ut habeat libertatem commutandi vel donandi in vita sua et post ejus obiturn teneat facultatem relinquendi cuicumque volueris." Ib. I. 233, 234, CXCI.; cf. ib. V. 70, MXXXI. Wiglaf of Mercia, Aug. 28, A.D. 831: "Seu vendendum ant commutandum i cuicumque ei herede placuerit dereliaquendum." Ib. I. 294, CCXXVII.

[6_11]."W. et heredibus suis, videlicet quos heredes constituerit." Memorials of Hexham, Surtees Soc. Pub., 1864, II. 88.

[6_12].Cf. Y.B. 27 Ass., fol. 135, pl. 25. Under the Welsh laws the champion in a cause decided by combat acquired the rights of the next of kin, the next of kin being the proper champion. Lea, Superstition and Force (3d Ed.), 165. Cf. ib. 161, n. 1; ib. 17.

[6_13].D.38. 8. 1, pr.

[6_14]."Cum is, qui ex edicto bonorum possessionem petiit, ficto se herede agit." Gaii Inst. IV. Section 34. Cf. Ulp. Fragm. XXVIII. Section 12; D. 37. 1. 2. So the fidei commissarius, who was a praetorian successor (D. 41. 4. 2, Section 19; 10. 2. 24), "in

similitudinem heredis consistit." Nov. 1. 1, Section 1. Cf. Just. Inst. 2. 24, pr., and then Gaius, II. Sections 251, 252.

[6_15].Gaii Inst. II. Sections 102 et seq. Cf. ib. Sections 252, 35.

[6_16].Gaii Inst. IV Section 35: "Similiter et bonorum emptor ficto se herede agit." Cf. ib. Sections 144, 145. Keller, Roemische Civilprocess, Section 85, III. But cf. Scheurl, Lehrb. der Inst., Section 218, p. 407 (6th ed.).

[6_17].Paulus in D. 50. 17. 128.

[6_18]."In re legata in accessione temporis quo testator possedit, legatarius quodammodo quasi heres est." D. 41. 3. 14, Section 1.

[6_19].D.41.1.62; 43. 3. 1, Section 6; Gaii Inst. II. Section 97; Just. Inst. 2. 10, Section 11.

[6_20]."[Accessiones possessionum] plane tribuuntur his qui in locum aliorum succedunt sive ex contractu sive voluntate: heredibus enum et his, qui successorum loco habentur, datur accessio testatoris. Itaque si mihi vendideris servum utar accesssione tua." D. 44.3.14, Sections 1, 2.

[6_21]."Ab eo . . . in cujus locum hereditate vel emptione aliove quo iure successi." D. 43. 19. 3, Section 2.

[6_22].D.50. 4. 1, Section 4. Cf. Cic. de Off. 3. 19. 76; Gaii Inst. IV. Section 34.

[6_23].C.2. 3. 21; C. 6. 16. 2; cf. D. 38. 8. 1, pr.

[6_24]."In locum successisse accipimus sive per universitatem sive in rem sit successum." D. 43. 3. 1, Section 13. Cf. D. 21.3.3, Section 1; D. 12.2.7&8;D. 39. 2. 24, Section 1.

[6_25].D.41.2. 13, Sections 1, 11. Other cases put by Ulpian may stand on a different fiction. After the termination of a precarium, for instance, fingitur fundus nunquam fuisse possessus ab ipso detentore. Gothofred, note 14 (Elz. ed.). But cf. Puchta, in Weiske, R. L., art. Besitz, p. 50, and D. 41.2.13, Section7.

[6_26].Inst. 2. 6, Sections 12, 13. Cf. D. 44. 3. 9. See, for a fuller statement, 11 Am. Law Rev. 644, 645.

[6_27].Recht des Besitzes, Section11 (7th ed.), p. 184, n. 1, Eng. tr. 124, n. t.

[6_28].Paulus, D. 8. 6. 18, Section 1. This seems to be written of a rural servitude (aqua) which was lost by mere disuse, without adverse user by the servient owner.

[6_29].Hermogenianus, D. 21. 3. 3; Exe. rei jud., D. 44. 2. 9, Section 2; ib. 28; ib. 11, Sections 3, 9; D. 10. 2. 25, Section 8; D. 46. 8. 16, Section I; Keller, Roem. Civilproc., Section 73. Cf. Bracton, fol. 24 b, Section 1 ad fin.

[6_30]."Recte a me via uti prohibetur et interdictum ei inutile est, quia a me videtur vi vel clam vel precario possidere, qui ab auctore meo vitiose possidet. nam et Pedius scribit, si vi aut clam aut precario ab co sit usus, in cuius locum hereditate vel emptione aliove quo lure suceessi, idem esse dicendum: cum enim successerit quis in locum eorum, aequum non est nos noceri hoc, quod adversus eum non nocuit, in cuius locum successimus." D. 43. 19. 3, Section 2. The variation actore, argued for by Savigny, is condemned by Mommsen, in his edition of the Digest,—it seems rightly.

[6_31].D.12. 2. 7 & 8.

[6_32].Ulpian, D. 39. 2. 24, Section1. Cf. D. 8. 5.7; D. 39. 2. 17, Section 3, n. 79 (Elzevir ed.); Paulus, D. 2. 14. 17, Section 5.

[6_33]."Cum quis in alii locum successerit non est aequum ei nocere hoc, quod adversus eum non nocuit, in cujus locum successit. Plerumque emptoris eadem causa esse debet circa petendum ac defendendum, quae fuit auctoris." Ulp. D. 50. 17. 156, Sections 2, 3. "Qui in ius dominiumve alterius succedit, iure ejus uti debet." Paulus, D. 50. 17. 177. "Non debeo melioris condieionis esse, quam auctor meus, a quo ius in me transit." Paulus, D. 50. 17. 175, Section 1. "Quod ipsis qui contraxerunt obstat, et successoribus eoturn obstabit." Ulp. D. 50. 17. 143. "Nemo plus iuris ad alium transferre potest, quam ipse haberet." Ulp. D. 50. 17. 54; Bract., fol. 31 b. Cf. Decret. Greg. Lib. II. Tit. XIII. c. 18, De rest. spoliat.: "Cum spoliatori quasi succedat in vitium." Bruns, R. d. Besitzes, p. 179. Windscheid, Pand., Section 162 a, n. 10.

[6_34]."Ne vitiosae quidam possessioni ulla potest accedere: sed nec vitiosa ei, quse vitiosa non est." D. 41. 2. 13, Section 13.

[6_35].Hill v. Ellard, 3 Salk. 279. Cf. Withers v. Iseham, Dyer, 70 a, 70 b, 71 a; Gateward's Case, 6 Co. Rep. 59b, 60b; Y.B. 20 & 21 Ed. I 426; 205; 12 Hen. IV. 7.

[6_36].Doe v. Barnard, 13 Q.B.945, 952, 953, per Cur., Patteson, J. Cf. Asher v. Whitlock, L.R. 1 Q.B.1, 3, 6, 7.

[6_37].See, further, Sawyer v. Kendall, 10 Cush. 241; 2 Bl. Comm. 263 et seq.; 3 Ch. Pl. 1119 (6th Am. ed.); 3 Kent, 444, 445; Angell, Limitations, ch. 31, Section 413. Of course if a right had already been acquired before the disseisin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would apply. If the right claimed is one of those which are regarded as incident to land, as explained in the following Lecture, the disseisor will have it. Jenk. Cent. 12, First Cent. Case 21.

[6_38].Ared v. Watkin, Cro. Eliz. 637; S.C., ib. 651. Cf. Y.B. 5 Hen. VII. 18, pl. 12; Dyer, 4 b, n. (4).

[6_39].Roe v. Hayley, 12 East, 464, 470 (1810).

LECTURE XI. SUCCESSIONS.—II. INTER VIVOS.

第十二讲　继承之二：生者之间的继承

The principal contracts known to the common law and suable in the King's Courts, a century after the Conquest, were suretyship and debt. The heir, as the general representative of his ancestor'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was liable for his debts, and was the proper person to sue for those which were due the estate. By the time of Edward III. this had changed. Debts had ceased to concern the heir except secondarily. The executor took his place both for collection and payment. It is said that even when the heir was bound he could not be sued except in case the executor had no assets. [7_1]

诺曼征服一个世纪后，普通法所涵盖并且可以在国王法庭提起诉讼的主要合同类型是保证关系合同和债务合同。继承人作为其被继承人权利和义务的总代表，有义务偿还其债务，也是对地产应得提起诉讼的合适人选。到爱德华三世时期，这一情况已发生了变化。除了间接方式，债务不再与继承人有关。遗嘱执行人取而代之，负责收款和支付事务。人们认为，即使该继承人具有法律义务，除非遗嘱执行人没有任何资产，否则不能起诉该继承人。

But there was another ancient obligation which had a different history. I refer to the warranty which arose upon the transfer of property. We should call it a contract, but it probably presented itself to the mind of Glanvill's predecessors simply as a duty or obligation attached by law to a transaction which was directed to a different point; just as the liability of a bailee, which is now treated

as arising from his undertaking, was originally raised by the law out of the position in which he stood toward third persons.

但是另外一项古老的义务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我指的是因财产转让产生的担保。我们应称之为合同，但在格兰维尔的前辈们心中，它可能只是作为法律规定的一种责任或义务呈现，用于另外情形下的交易；正如受托人的义务，现在被视作因其承诺而产生，最初却是依法根据他与第三方的关系而提出的。

After the Conquest we do not hear much of warranty, except in connection with land, and this fact will at once account for its having had a different history from debt. The obligation of warranty was to defend the title, and, if the defence failed, to give to the evicted owner other land of equal value. If an ancestor had conveyed lands with warranty, this obligation could not be fulfilled by his executor, but only by his heir, to whom his other lands had descended. Conversely as to the benefit of warranties made to a deceased grantee, his heir was the only person interested to enforce such warranties, because the land descended to him. Thus the heir continued to represent his ancestor in the latter'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y way of warranty, after the executor had relieved him of the debts, just as before that time he had represented his ancestor in all respects.

诺曼征服后，除了与土地相关的事务，我们很少听说担保，这一事实能即刻解释为什么它与债务合同的发展过程不同。担保的责任在于为所有权进行辩护，如果辩护失败，需给予被逐所有者等同价值的另外土地。如果被继承人转让地产时进行了担保，该义务不可由遗嘱执行人履行，而只能由其继承人履行，并且他还继承了被继承人的其

他土地。反过来，至于说担保给予已故受让人的权益，其继承人是唯一能够要求履行这些担保的相关人选，原因是他继承了该土地。这样，继承人在遗嘱执行人接替了其债务相关义务后，继续以担保的方式代表被继承人的权利和义务，正如他以前在所有方面均代表其被继承人一样。

If a man was sued for property which he had bought from another, the regular course of litigation was for the defendant to summon in his seller to take charge of the defence, and for him, in turn, to summon in his, if he had one, and so on until a party was reached in the chain of title who finally took the burden of the case upon himself. A contrast which was early stated between the Lombard and the Roman law existed equally between the Anglo-Saxon and the Roman. It was said that the Lombard presents his grantor, the Roman stands in his grantor's shoes,—Langobardus dat auctorem, Romanus stat loco auctoris. [7_2]

如果某人因为从他人处所购财产而受到起诉，正常的诉讼程序是，被告传唤其出售者负责辩护，而其出售者，如果有的话，再传唤出售给他的人，如此类推，直到最终在产权链一方不得不承担起该案的责任。前面提到的伦巴底法和罗马法之间的差别也同样存在于盎格鲁—撒克逊法和罗马法之间。人们说，伦巴底法会控告让与人，罗马法则站在让与人的立场上，即Langobardus dat auctorem, Romanus stat loco auctoris。

Suppose, now, that A gave land to B, and B conveyed over to C. If C was sued by D, claiming a better title, C practically got the benefit of A's warranty, [7_3] because, when he summoned B, B would summon A, and thus A would defend the case in the end. But

it might happen that between the time when B conveyed to C, and the time when the action was begun, B had died. If he left an heir, C might still be protected. But supposing B left no heir, C got no help from A, who in the other event would have defended his suit. This no doubt was the law in the Anglo-Saxon period, but it was manifestly unsatisfactory. We may conjecture, with a good deal of confidence, that a remedy would be found as soon as there was machinery to make it possible. This was furnished by the Roman law. According to that system, the buyer stood in the place of his seller, and a fusion of the Roman with the Anglo-Saxon rule was all that was needed.

现在，假定甲方把土地让与乙方，乙方把土地转让给丙方。假设丙方被丁方起诉，后者声称他有更正当的所有权，丙方实际上得到甲方所担保的利益，理由是，当丙方传唤乙方时，乙方会传唤甲方，这样，甲方最终为此案辩护。但是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乙方转给丙方之后，诉讼开始前这段时间，乙方去世了。如果他留下了继承人，丙方可能仍然受到保护。但是假设乙方没有留下继承人，丙方就无法从甲处获得帮助，而甲本应该为此案辩护。毫无疑问，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法规，但是很显然，这一法规仍差强人意。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地推测，只要存在使之可能的机制，弥补方案很快就能找到。而罗马法提供了这一机制。根据这一体系，购买者取代了出售者的位置，人们只需融合罗马法和盎格鲁—撒克逊法规。

Bracton, who modelled his book upon the writings of the mediaeval civilians, shows how this thought was used. He first puts the case of a conveyance with the usual clause binding the grantor and his heirs to warrant and defend the grantee and his heirs. He then goes on: “Again one may make his gift greater and make other persons quasi heirs [of his grantee], although, in fact, they are not

heirs, as when he says in the gift, to have and to hold to such a one and his heirs, or to whomsoever he shall choose to give or assign the said land, and I and my heirs will warrant to the said so and so, and his heirs, or to whomsoever he shall choose to give or assign the said land, and their heirs, against all persons. In which case if the grantee shall have given or assigned the land, and then have died without heirs, the [first] grantor and his heirs begin to hold the place of the first grantee and his heirs, and are in place of the first grantee's heir (pro herede) so far as concerns warranting to his assigns and their heirs according to the clause contained in the first grantor's charter, which would not be but for the mention of assigns in the first gift. But so long as the first grantee survives, or his heirs, they are held to warranty, and not the first grantor.“ [7_4]

仿效中世纪罗马民法专家论述而著书的布拉克顿揭示了这种思想是如何运用的。首先，他提到了一个财产转让的案例，根据惯例条款，让与人及其继承人有义务为受让人及其继承人做担保和辩护。他继续说道：“此外，某人可以增加其赠与，使其他人成为（其受让人的）准继承人，虽然实际上，正如他在赠与中所说，他们不是继承人，不可获得并持有该赠与，也不是他任意选择赠与或转让既定地产的人之继承人，我和我的继承人给予上述某某人及其继承人以担保，或者给予他任意选择赠与或者转让既定地产的人及其继承人以担保，而不予他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受让人已赠与或转让该土地，不久后去世了，没有留下继承人，（第一）让与人及其继承人开始依法拥有第一受让人及其继承人的位置并以第一受让人继承人（作为继承人）的身份，根据第一让与人的契据条款，就其受转让人及其继承人相关事宜进行担保，该契据条款仅为提及第一赠与中的受转让人而定。但是只要第一受让人或其继承人还在世，那么他们而不是第一让与人对担保负责”。

Here we see that, in order to entitle the assign to the benefit of the first grantor's warranty, assigns must be mentioned in the original grant and covenant. The scope of the ancient obligation was not extended without the warrantor's assent. But when it was extended, it was not by a contrivance like a modern letter of credit. Such a conception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in that stage of the law. By mentioning assigns the first grantor did not offer a covenant to any person who would thereafter purchase the land. If that had been the notion,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contract directly binding the first grantor to the assign, as soon as the land was sold, and thus there would have been two warranties arising from the same clause, —one to the first grantee, a second to the assign. But in fact the assign recovered on the original warranty to the first grantee. [7_5] He could only come on the first grantor after a failure of his immediate grantor's heirs. The first grantor by mentioning assigns simply enlarged the limits of his grantee's succession. The assign could vouch the first grantor only on the principles of succession. That is to say, he could only do so when, by the failure of the first grantee's blood, the first grantee's feudal relation to the first grantor, his persona, came to be sustained by the assign. [7_6]

这里我们看到，受转让人若要有资格得到第一让与人担保的利益，在最初的出让和盖印合同中必须有所提及。未经担保人同意，原有义务范围不得扩展。不过当原有义务范围有所扩展，它并非是通过诸如现代信用证这样的机制来实现的。在法律发展的那个阶段，这样的设想还不太可能。通过提及受转让人，第一让与人不能主动提出与任何其后可能购买该土地的人签订盖印合同。若是根据这样的概念，只要土地一出售，就应该会有一项合同，直接要求第一让与人对受转让人负有法律义务，而这样的话，同一条款就会出现两种担保：一个担保第一受让人，另一个担保受转让人。但事实上，受转让人根据第一受让人的原始担保获得补偿。只有在他的直接让与人无继承人时，

他才能继承第一让与人。通过提及受转让人，第一让与人就很轻易地扩大了其受让人的继承范围。该受转让人只有根据继承法规方可传第一让与人出庭作证。也就是说，只有第一受让人后继无人，第一受让人与第一让与人的领地关系，也就是其身份由该受转让人继承时，他才可以这么做。

This was not only carrying out the fiction with technical consistency, but was using it with good sense, as fictions generally have been used in the English law. Practically it made little difference whether the assign got the benefit of the first grantor's warranty mediately or immediately, if he got it. The trouble arose where he could not summon the mesne grantor, and the new right was given him for that case alone. Later, the assign did not have to wait for the failure of his immediate grantor's blood, but c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first grantor's warranty from the beginning. [7_7]

这不仅仅是从法律一致性的角度推进拟制，而且是合理地运用了该制度，英国法中的拟制通常使用的情形一直如此。实际上，如果受转让人得到了第一让与人所担保的利益，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得到，区别不大。但如果他无法传唤中间让与人，问题就出现了，而这项新权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出让给他。后来，受转让人不必等到其直接让与人无后代，而是从一开始就可以享有第一让与人的担保。

If it should be suggested that what has been said goes to show that the first grantor's duty to warrant arose from the assign's becoming his man and owing homage, the answer is that he was not bound unless he had mentioned assigns in his grant, homage or no homage. In this Bracton is confirmed by all the later authorities. [7_8]

如果有人提出，前面所述表明，第一让与人做出担保的义务源于受转让人是他的下属，以及对其臣服这一原因，对此的回答是无论是否表示臣服，除非他在让与中提及了受转让人，否则该让与人并无该义务。对此，布拉克顿的观点得到所有后来法律判决的认可。

Another rule on which there are vast stores of forgotten learning will show how exactly the fiction fell in with the earlier law. Only those who were privy in estate with the person to whom the warranty was originally given, could vouch the original warrantor. Looking back to the early procedure, it will be seen that of course only those in the same chain of title could even mediately get the benefit of a former owner's warranty. The ground on which a man was bound to warrant was that he had conveyed the property to the person who summoned him. Hence a man could summon no one but his grantor, and the successive vouchers came to an end when the last vouchee could not call on another from whom he had bought. Now when the process was abridged, no persons were made liable to summons who would not have been liable before. The present owner was allowed to vouch directly those who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indirectly bound to defend his title, but no others. Hence he could only summon those from whom his grantor derived his title. But this was equally well expressed in terms of the fiction employed. In order to vouch, the present owner must have the estate of the person to whom the warranty was made. As every lawyer knows, the estate does not mean the land. It means the status or persona in regard to that land formerly sustained by another. The same word was used in alleging a right by prescription, “that he and those whose estate he hath have for time whereof memory runneth not to the contrary,” &c.; and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the word corresponds to the same requirement of succession there.

另外一条保留了大量被人遗忘知识的法规会告诉我们，拟制究竟是如何与早期法律保持一致的。只有在地产权上与原始担保对象具有法律关系的人才能够传唤初始担保人出庭作证。追溯早期程序，我们会看到，当然只有那些处在同一产权链上的人才能够间接获得上任所有者担保的利益。某人受到担保约束的依据在于他把财产转让给了那个传唤他的人。因此，一个人只能传唤其让与人，当最后一位担保人不能再找到他的购买人时，持续的担保证明才会终止。后来，该过程得到简化，那些本不应负有责任的传唤人对传票不再负有责任。现任所有者可以直接传唤那些本应间接有责任保护其所有权的人，但不能传唤其他人。因此，他只能传唤那些授予其让与人所有权的那些人。但这一点，在所用的拟制中得到了同样恰当的表达。若要传唤某人出庭作证，现任所有者须拥有该担保对象的不动产。如每一位法学家所知，不动产并不等同于土地。它指的是他人从前持有的那块土地相关的地位或身份。该词也用于因时效而宣称拥有某权利的情形："他拥有该所有者地产已有一段时间，而大家对此并无异议等等"，我们会记得，该词与之前提到的继承的同样要求互相呼应。

To return to Bracton, it must be understood that the description of assigns as quasi heredes is not accidental. He describes them in that way whenever he has occasion to speak of them. He even pushes the reasoning drawn from the analogy of inheritance to extremes, and refers to it in countless passages. For instanc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of heirs some are true heirs and some quasi heirs, in place of heirs, &c.; true heirs by way of succession quasi heirs, &c. by the form of the gift; such as assigns," &c. [7_9]

再回到布拉克顿之前，我们必须明白，把受转让人描述为准继承人不是偶然的。他只要提及受转让人，就这样来描述他们。他甚至把继承类比中的推理推到极端，并在无数段落中提及它。例如："应当

注意的是，关于继承人，有些是真正的继承人，有些是准继承人和代继承人等等；真正的继承人通过继承产生，准继承人等等以赠与的形式产生；例如受转让人，”等等。

If it should be suggested that Bracton's language is only a piece of mediaeval scholasticism, there are several answers.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nearly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the right in question. This is shown by his citing authority for it as for something which might be disputed. He says, “And that warranty must be made to assigns according to the form of the gift is proved [by a case] in the circuit of W. de Ralegh, about the end of the roll,“&c. [7_10] It is not justifiable to assume that a contemporary explanation of a new rul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s appearance. Again, the fact is clear that the assign got the benefit of the warranty to the first grantee, not of a new one to himself, as has been shown, and Bracton's explanation of how this was worked out falls in with what has been seen of the course of the German and Anglo-Saxon law, and with the pervading thought of the Roman law. Finally,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assign should be in of the first grantee's estate has remained a requirement from that day to this. The fact that the same thing is required in the same words as in prescription goes far to show that the same technical thought has governed both.

如果有人说布拉克顿的说法只是中世纪经院派的某种观点，则对此有以下几种回应。首先，我们所讨论的权利第一次出现时，该词也几乎同时出现。从他针对可能有争议的问题引用判例予以佐证即可看到这一点。他说：“必须按赠与的形式给予受转让人担保，这点在巡回快结束时W·德·罗利巡回法庭的一个案件中得到证明”等等。假定对某新法规进行当代阐释与该法规的出现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不合理

的。的确，如前所述，事实很清楚，受转让人得到的是第一受让人所获担保的利益，不是给予他的新利益。关于这是如何产生的，布莱克顿的解释与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法律的发展进程一致，也与罗马法的普遍思想一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该受转让人须持有第一受让人的不动产，这一要求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未变。该要求与时效性权利的要求相同，措辞相同，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了二者受相同法律思想支配。

I have said, Glanvill's predecessors probably regarded warranty as an obligation incident to a conveyance, rather than as a contract. But when it became usual to insert the undertaking to warrant in a deed or charter of feoffment,it lost something of its former isolation as a duty standing by itself, and admitted of being generalized. It was a promise by deed, and a promise by deed was a covenant. [7_11] This was a covenant having peculiar consequences attached to it, no doubt. It differed also in the scope of its obligation from some other covenants, as will be shown hereafter. But still it was a covenant, and could sometimes be sued on as such. It was spoken of in the Year Books of Edward III. as a covenant which “falls in the blood,“ [7_12]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ose where the acquittance fell on the land, and not on the person. [7_13]

我已指出，格兰维尔的前辈们很可能把担保作为财产移交附带的义务，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合同。但是，后来在自由保有地让与的地契或土地转让合同中加入担保承诺的做法普及起来，担保不再像以前那样作为一种义务独立存在，其普遍意义得到了认可。它成为了地契中的许诺，而地契中的许诺是一种盖印合同。这种盖印合同无疑具有非常特别的后续影响。后面会提到，它与其他形式的盖印合同在义务范围方面也有所不同。但它仍是一种盖印合同，有时人们会因此进行起诉。爱德华三世时的《年鉴》认为该盖印合同“落到血缘关系上”，

区别于其他那些义务清偿落在土地而非人身上的那些盖印合同。

The importance of this circumstance lies in the working of the law of warranty upon other covenants which took its place. When the old actions for land gave way to more modern and speedier forms, warrantors were no longer vouched in to defend, and if a grantee was evicted, damages took the place of a grant of other land. The ancient warranty disappeared, and was replaced by the covenants which we still find in our deeds, including the covenants for seisin, for right to convey, against incumbrances, for quiet enjoyment, of warranty, and for further assurance. But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an assign could have the benefit of these covenants were derived from those which governed warranty, as any one may see by looking at the earlier decisions.

这种情形的重要性在于，对取代其位置的其他盖印合同，相关的担保法律是如何运作的。对土地的旧式诉讼让位于更现代快速的形式以后，担保人不必再接受传唤出庭答辩，如果某受让人被逐，损害赔偿金代替了另一土地的赠与。古代的担保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盖印合同，这些我们仍可以在地契中找到，包括依法拥有所有权、转让土地权利、不受任何财产留置权制约、安静享受、担保以及做出所有权没有瑕疵保证之盖印合同。但是某受转让人可以拥有这些盖印合同的收益，其依据原则源于那些支配担保的原则，如果考察早期的判决，所有人都会发现这一点。

For instance, the question, what was a sufficient assignment to give an assign the benefit of a covenant for quiet enjoyment, was argued and decided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old cases of warranty. [7_14]

例如，如何充分给予受转让人某盖印合同中所规定的安静享受之权益？这一问题就是根据先前的担保判例进行辩论和裁决的。

The assign, as in warranty, came in under the old covenant with the first covenantee, not by any new right of his own. Thus, in an action by an assign on a covenant for further assurance,the defendant set up a release by the original covenantee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suit.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assignee should have the benefit of the covenant. “They held, that although the breach was in the time of the assignee, yet if the release had been by the covenantee (who is a party to the deed, and from whom the plaintiff derives) before any breach, or before the suit commenced, it had been a good bar to the assignee from bringing this writ of covenant. But the breach of the covenant being in the time of the assignee, and the action brought by him, and so attached in his person, the covenantee cannot release this action wherein the assignee is interested.“ [7_15] The covenantee even after assignment remains the legal party to the contract. The assign comes in under him, and does not put an end to his control over it, until by breach and action a new right attaches in the assign's person, distinct from the rights derived from the persona of his grantor. Later, the assign got a more independent standing, as the original foundation of his rights sunk gradually out of sight, and a release after assignment became ineffectual, at least in the case of a covenant to pay rent. [7_16]

与担保中的情形一样，受转让人获得了相当于最初盖印合同的第一位受约人的权利，而非自己新获得的权利。这样，在一起诉讼中，受转让人根据盖印合同要求所有权的无瑕疵保证，诉讼开始后，被告

提交了一份原始合约人的让渡文书。法庭裁决该受转让人应该享有盖印合同规定的利益。“他们认为，虽然该违约发生在受转让人持有的时间内，但是如果该受约人（该契约的受约方，也就是原告的前任）在违约前或者案件开始前签署让渡文书，该受转让人根据该违约赔偿令状，有权利要求诉讼中止。但是如果受转让人持有时违约发生，而他起诉，与他相关，该盖印合同受约方不能免除该诉讼，因为涉及到受转让人的利益。”受约人即使在出让以后仍然是合同的合法当事方。受转让人在其之权利制约之下，未终止其控制权，除非因为违约和诉讼的情形，受转让者本人获得新权利，以区别于他从其让与人法律人格那里所获得的权利。后来，随着其权利的原始基础逐渐消失，让与之后的让渡文书不再有效，受转让人获得更独立的地位，至少在支付地租的盖印合同案例中是这样。

Only privies in estate with the original covenantee can have the benefit of covenants for title. It has been shown that a similar limitation of the benefits of the ancient warranty was required by its earlier history before the assign was allowed to sue, and that the fiction by which he got that right could not extend it beyond that limit. This analogy also was followed. For instance, a tenant in tail male made a lease for years with covenants of right to let and for quiet enjoyment, and then died without issue male. The lessee assigned the lease to the plaintiff. The latter was soon turned out, and thereupon brought an action upon the covenant against the executor of the lessor. It was held that he could not recover, because he was not privy in estate with the original covenantee. For the lease, which was the original covenantee's estate, was ended by the death of the lessor and termination of the estate tail out of which the lease was granted, before the form of assignment to the plaintiff. [7_17]

只有与原始契约签订方存在不动产方面法律关系的人，才能享受完全保证盖印合同之利益。我们已经证明，允许受转让人起诉之前，以往历史上也要求对早期的担保利益做出相似的限定，而且他获得权利所依据的拟制不能超出该限定范围。这种类比推理也得以沿用。例如，一位限定男嗣继承的承租人订立了一份长期租约，其中包括出租和享受安静之权的约定，后来他死了，没有留下男丁，其租户将该租约转让给了原告。后者很快被驱逐，于是根据该盖印合同对出租人的遗嘱执行人提起诉讼。法院裁决他不能获得赔偿，因为他与原始的受约方不存在不动产上的法律关系。因为该租赁物是原始受约人的不动产，随着该出租人的死亡和租约成立的地产限嗣继承地产权结束，该租约也随之结束，这发生在向原告以转租的形式转让租约之前。

The only point remaining to make the analogy between covenants for title and warranty complete was to require assigns to be mentioned in order to enable them to sue. In modern times, of course, such a requirement, if it should exist, would be purely formal, and would be of no importance except as an ear-mark by which to trace the history of a doctrine. It would aid our studies if we could say that wherever assigns are to get the benefit of a covenant as privies in estate with the covenantee, they must be mentioned in the covenant. Whether such a requirement does exist or not would be hard to tell from the decisions alone. It is commonly supposed not to. But the popular opinion on this trifling point springs from a failure to understand one of the great antinomies of the law, which must now be explained.

要使完全保证盖印合同和担保之间的类比推理成立，剩下唯一一点是要求提及受转让人，以使他们能够提起诉讼。当然，这一条件在现代即使存在，也纯粹只是形式上的，除了作为追溯某一法规历史的标记外，没有什么重要性了。如果我们可以说，不论何时，如果受转

让人与受约者因为不动产上的法律关系而要获得该盖印合同的益处，必须在盖印合同中提及他们，这会对我们的研究有利。单从判决结果很难看出这样的要求是否存在。人们一般认为此类要求并不存在。但对这个无关紧要的论点，其流行观点源于没有明白法律一个重要的自相矛盾之处，现在这一点必须予以阐释。

So far as we have gone, we have found that, wherever one party steps into the rights or obligations of another, without in turn filling the situation of fact of which those rights or obligations are the legal consequences, the substitution is explained by a fictitious identification of the two individuals,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analogy of the inheritance. This identification has been seen as it has been consciously worked out in the creation of the executor, whose entire status is governed by it. It has been seen still consciously applied in the narrower sphere of the heir. It has been found hidden at the roo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buyer and seller in two cases at least, prescription and warranty, when the history of that relation is opened to a sufficient depth.

如上所述，我们已经发现，不论何时若一方获得另外一方的权利或者义务，却不能相应满足以该权利或义务为法律后果的事实情形，其替代方案就由两个人之间的拟制身份认同来解释，这种拟制的身份认同源于继承中的类推。这种身份认同之前人们已经看到，正如人们有意利用该认同设立遗嘱执行人的情形，遗嘱执行人整个身份受其制约。如今，在狭义的继承人范围内，该种身份认同仍然得到有意识的运用。至少在时效性权利和担保两种情形下，这种身份认同隐藏在买卖双方关系的源头，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历史进行充分深入探究，人们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But although it would be more symmetrical if this analysis exhausted the subject, there is another class of cases in which the transfer of rights takes place upon a wholly different plan. In explaining the succession which is worked out between buyer and seller for the purpose of creating a prescriptive right, such as a right of way over neighboring land to the land bought and sold, it was shown that one who, instead of purchasing the land, had wrongfully possessed himself of it by force, would not be treated as a successor, and would get no benefit from the previous use of the way by his disseisee. But when the former possessor has already gained a right of way before he is turned out, a new principle comes into operation. If the owner of the land over which the way ran stopped it up, and was sued by the wrongful possessor, a defence on the ground that the disseisor had not succeeded to the former owner's rights would not prevail. The disseisor would be protected in his possession of the land against all but the rightful owner, and he would equally be protected in his use of the way. This rule of law does not stand on a succession between the wrongful possessor and the owner, which is out of the question. Neither can it be defended on the same ground as the protection to the occupation of the land itself. That ground is that the law defends possession against everything except a better title. But, as has been said before, the common law does not recognize possession of a way. A man who has used a way ten years without title cannot sue even a stranger for stopping it. He was a trespasser at the beginning, he is nothing but a trespasser still. There must exist a right against the servient owner before there is a right against anybody els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clear that a way is no more capable of possession because somebody else has a right to it, than if no one had.

虽然如果说该分析已经全部探讨这个问题会更平衡些，然而，还

有另外一类案例，其权利的转让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程序之上。买卖双方为了形成一项时效性权利（例如在买卖土地的相邻土地上的通行权）而进行的继承，在其解释中提到，若某人不是购买而是通过武力强占该地产，不能把此人视作继受人，他也不能拥有被强占者以前的通行之权益。但如果上任占有者在被逐之前就获得了通行权，新的法则开始生效。若该道路经过的土地所有者将该路堵塞，不当占有者因而提起诉讼，以侵占者未曾继承上任所有者的权利为依据进行辩护，不会胜诉。侵占者对该土地的所有权受到保护，除了原正当所有者，不受其他任何人侵扰，他对于该道路的使用权也同样得到保护。该法规并不是建立在不当占有者和其所有者继承关系的基础上，因为这根本不可能。辩护时也同样不能把保护土地本身占有作为依据。辩护所用的根据是，除非有更令人信服的所有权，法律保护土地本身占有权不受任何侵害。但是，前面已经提到，普通法并不认可对道路的占有。无所有权使用某条道路达十年之久的人，甚至不能因他人阻塞了该道路而对其提起诉讼。他从一开始就是个侵占者，现在也不过仍是个侵占者。首先必须存在一项对抗供役地所有者的权利，才能谈得上存在一项对抗所有其他人的权利。同时，很显然，对于一条道路即使某人对它拥有权利，也不比无人对它拥有权利更许可这种占有。

How comes it, then, that one who has neither title nor possession is so far favored? The answer is to be found, not in reasoning, but in a failure to reason. In the first Lecture of this course the thought with which we have to deal was shown in its theological stage, to borrow Comte's well-known phraseology, as where an axe was made the object of criminal process; and also in the metaphysical stage, where the language of personification alone survived, but survived to cause confusion of reasoning. The case put seems to be an illustration of the latter.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of easements was built up out of similes drawn from persons at a time when the noxoe deditio was still familiar; and then, as often happens, language reacted upon thought, so that conclusions were

drawn as to the rights themselves from the terms in which they happened to be expressed. When one estate was said to be enslaved to another, or a right of way was said to be a quality or incident of a neighboring piece of land, men's minds were not alert to see that these phrases were only so many personifying metaphors, which explained nothing unless the figure of speech was true.

那么，为什么一个既无所有权又无占有权的人受到如此偏爱呢？答案不在推理中，而是推理失败。本书的第一讲中即表明，我们需要讨论的思想还处于神学阶段，借用孔德著名的说法，处于一把斧子也会被确定为刑事程序的对象的阶段；还处于形而上学的阶段，只有拟人化的语言得以保留下来，但这种保留却导致了推理上的混乱。前面提到的情形似乎就是后者的一项例证。地役权的法律用语建立在明喻的基础上，这些明喻来自一个损害投偿原则为人们所熟知的时代；后来，正如常常发生地那样，语言与思想互相作用，因此有关权利自身的结论，来自于碰巧用来表达这些权利的术语。如果人们说，有一块不动产受另一块不动产之役使，或说通行权是相邻土地的特征或附属物，人们不会注意到，这些短语只是些拟人的比喻，除非比喻属实，否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Rogron deduced the negative nature of servitudes from the rule that the land owes the services, not the person,—Proedium non persona servit. For, said Rogron, the land alone being bound, it can only be bound passively. Austin called this an “absurd remark.“ [7_18] But the jurists from whom we have inherited our law of easements were contented with no better reasoning. Papinian himself wrote that servitudes cannot be partially extinguished, because they are due from lands, not persons. [7_19] Celsus thus decides the case which I took for my illustration: Even if possession of a dominant estate is acquired by forcibly ejecting the owner, the

way will be retained; since the estate is possessed in such quality and condition as it is when taken. [7_20] The commentator Godefroi tersely adds that there are two such conditions, slavery and freedom; and his antithesis is as old as Cicero. [7_21] So, in another passage, Celsus asks, what else are the rights attaching to land but qualities of that land? [7_22] So Justinian's Institutes speak of servitudes which inhere in buildings. [7_23] So Paulus speaks of such rights as being accessory to bodies. “And thus,” adds Godefroi, “rights may belong to inanimate things.“ [7_24] It easily followed from all this that a sale of the dominant estate carried existing easements, not because the buyer succeeded to the place of the seller, but because land is bound to land. [7_25]

罗格隆推论出地役权的消极性质，所根据的是土地而非个人应当负责地役债务这一法规——即Proedium non persona servit。因为，罗格隆说，若要土地本身负有义务，它只能被动承担责任。奥斯丁称此为“荒谬的说法”。但是，法学家们满足于此类的推理，而我们从他们那里继承了地役权法律。帕皮尼安本人写道，地役权不可能部分灭失，因为它是土地的应得权利，而非个人。塞尔苏斯据此判定了我用以举例说明的案件：即使通过武力驱逐所有者而占有某需役地，其通行权也会得以保留；因为对该不动产的占有应保持被夺取时一样的特点和状态。评注者戈德弗鲁瓦精辟地补充道，有两种类似的状态存在，即奴役和自由；他的这个对偶与西塞罗一样古老。因此，在另一篇文章中，塞尔苏斯问，除了土地的固有性质，还有什么其他权利附属于土地吗？因此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谈到了建筑物固有的地役权问题。因此保罗谈到了附属于物体的诸如此类的权利。“所以”，戈德弗鲁瓦补充说，“权利也可以属于无生命的东西。”据此很容易推理出，出售该需役地时，原有地役权也同时跟随出售，不是因为买者继承了卖者的位置，而是因为土地对土地的义务。

All these figures import that land is capable of having rights, as Austin recognizes. Indeed, he even says that the land “is erected into a legal or fictitious person, and is styled 'praedium dominans.'“ [7_26] But if this means anything more than to explain what is implied by the Roman metaphors, it goes too far. The dominant estate was never “erected into a legal person,” either by conscious fiction or as a result of primitive beliefs. [7_27] It could not sue or be sued, like a ship in the admiralty. It is not supposed that its possessor could maintain an action for an interference with an easement before his time, as an heir could for an injury to property of the hereditas jacens. If land had even been systematically treated as capable of acquiring rights, the time of a disseisee might have been added to that of the wrongful occupan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land, and not this or that individual, was gaining the easement, and that long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njoyment of the privilege and the land was sufficient, which has never been the law.

所有这些人都引进了土地可以拥有权利这一概念，正如奥斯丁指出的一样。的确，他甚至说土地“被塑造成一个合法的或者拟定的人，具有‘需役地’的特点”。但如果说这不仅意味着对罗马法比喻含义的解释，还有别的意义，就言过其实了。不管是通过有意拟制还是原始信念的结果，需役地从来就没有“被塑造成一个合法的人”。它不能发起诉讼或受到诉讼，正如海军的一艘战舰一样。其占有者不可因对他占有之前的地役权干涉事宜提起诉讼，正如一个继承人也不可因对其待继承财产的侵害而进行诉讼。假定土地系统地被视为能够获得权利，则土地被强占者的时间就有可能累加给那位非正当占有者，理由是获得地役权的是土地而不是这个或那个具体的人，这种特权的享用和该土地之间的长久联系就够了，但这没有形成法律。

All that can be said is, that the metaphors and similes

employed naturally led to the rule which has prevailed, and that, as this rule was just as good as any other, or at least was unobjectionable, it was drawn from the figures of speech without attracting attention, and before any one had seen that they were only figures, which proved nothing and justified no conclusion.

我们只能说，所用的暗喻和明喻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普遍接受的法规，而且由于该法规与任何其他法规同样有效，或者至少难以反驳，人们没有注意到它是从修辞用语得出，在人们发现这些用语只是些比喻之前，这些用语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也不能为任何结论提供依据。

As easements were said to belong to the dominant estate, it followed that whoever possessed the land had a right of the same degree over what was incidental to it. If the true meaning had been that a way or other easement admits of possession, and is taken possession of with the land to which it runs, and that its enjoyment is protected on the same grounds as possession in other cases, the thought could have been understood. But that was not the meaning of the Roman law, and, as has been shown, it is not the doctrine of ours. We must take it that easements have become an incident of land by an unconscious and unreasoned assumption that a piece of land can have rights. It need not be said that this is absurd, although the rules of law which are based upon it are not so.

因为人们认为地役权附属于需役地，顺势而推，任何占有土地的人，则拥有同等程度的土地所附属的权利。如果其真正的含义是通行权或者其他地役权允许占有，并与它所经过的土地同时受到占有，该享有得到保障的依据与其他的情形下的占有一样，则这种想法本可以得到理解。但这不是罗马法的含义，如上所述，这也不是我们的法律

规则。我们必须这样理解，由于某种不知不觉和非理性的假设，人们认为一块土地可以拥有权利，因而地役权成为土地的一种附带权利。这很荒谬，尽管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法规并不荒谬。

Absurd or not, the similes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s of the Roman law reappear in Bracton. He says, “The servitude by which land is subjected to [other] land, is made on the likeness of that by which man is made the slave of man.“ [7_28] “For rights belong to a free tenement, as well as tangible things. They may be called rights or liberties with regard to the tenements to which they are owed, but servitudes with regard to the tenements by which they are owed. One estate is free, the other subjected to slavery.“ [7_29] “[A servitude] may be called an arrangement by which house is subjected to house, farm to farm, holding to holding.“ [7_30] No passage has met my eye in which Bracton expressly decides that an easement goes with the dominant estate upon a disseisin, but what he says leaves little doubt that he followed the Roman law in this as in other things.

不管是否荒谬，这些明喻以及罗马法的原则在布拉克顿的著作中再次出现。他说，“某土地服务于其他土地的地役权，与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之奴隶类似”。“因为权利属于自由保有物，有形财产也是如此，对它们所属的保有物而言，它们可以被称为权利或自由，但是对它们所欠的保有物而言，他们被称为地役。一块不动产是自由的，而另一块则处于奴役地位。”“地役可以称为协议，通过它房屋隶属于房屋，农场隶属于农场，封地隶属于封地。”非法侵占是否引起地役权跟随需役地转移这个问题，我不曾发现布拉克顿对此有明确判断的论述，但是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与其他问题一样，他的观点延续了罗马法的传统。

The writ against a disseisor was for “so much land and its appurtenances,“ [7_31] which must mean that he who had the land even wrongfully had the appurtenances. So Bracton says an action is in rem “whether it is for the principal thing, or for a right which adheres to the thing, as when one sues for a right of way, since rights of this sort are all incorporeal things, and are quasi possessed and reside in bodies, and cannot be got or kept without the bodies in which they inhere, nor in any way had without the bodies to which they belong.“ [7_32] And again, “Since rights do not admit of delivery, but are transferred with the thing in which they are, that is, the bodily thing, he to whom they are transferred forthwith has a quasi possession of those rights as soon as he has the body in which they are.“ [7_33]

针对非法侵占者的令状支持“该项土地及其从属权利”，也就是说，即使非法获得该地的人也应拥有这些从属权利。因而布拉克顿说，一桩诉讼，“不论是为了主要财产，还是为了一项附属于该财产的某项权利，正如一个人因通行权而提起诉讼，因为这类权利都是无形财产，是准占有权，寄居于实体财产之中，如果不能获得权力所属之实体财产，则不能得到或保有该项权利，如果没有他们所属的实体财产，则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得该权利”。该诉讼属于对物诉讼。他还说，“因为权利不容许让渡，而是随它们所依附的财产，也就是实体财产转移，只要受让者在合理时间内获得了这些权利所依附的实体财产，受让者立刻就对这些权利具有准占有权”。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the later law, as has been said at the outset.

我们在开始就讲到，人们对晚期法律没有任何质疑。

We have thus traced two competing and mutually inconsistent principles into our law. On the one hand is the conception of succession or privity; on the other, that of rights inhering in a thing. Bracton seems to have vacillated a little from a feeling of the possibility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The benefit of a warranty was confined to those who, by the act and consent of the grantee, succeeded to his place. It did not pass to assigns unless assigns were mentioned. Bracton supposes grants of easements with or without mention of assigns, which looks as if he thought the difference might be material with regard to easements also. He further says, that if an easement be granted to A, his heirs and assigns, all such by the form of the grant are allowed the use in succession, and all others are wholly excluded. [7_34] But he is not speaking of what the rights of a disseisor would be as against one not having a better title, and he immediately adds that they are rights over a corporeal object belonging to a corporeal object.

这样，我们追溯了我们法律中相互矛盾且不一致的两个法律原则。一方面是继任或者法律利害关系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对某物所固有的权利概念。布拉克顿似乎感觉到二者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并因此有些犹豫不决。担保利益仅针对某些人，这些人根据法规和受让人的许可，继承了其位置。除非提及受转让人，否则该权益不能转让给受转让人。布拉克顿对地役权转让时提及或未提及受转让人的情况进行了推定，看起来他似乎认为这种区别对地役权而言可能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他又说，如果某项地役权被转让给甲、他的继承人和受转让人，所有这些人尽可依据转让的形式，获准依次继承该地役权的用益权，所有其他人被全部排除在外。但他并未提到，与那些不具备更有效所有权的人相比，侵占他人不动产的人具有哪些权利。他随后又补充说，它们是对有形对象的权利，从属于有形对象。

Although it may be doubted whether the mention of assigns was ever necessary to attach an easement to land, and although it is very certain that it did not remain so long, the difficulty referred to grew greater as time went on. It would have been easily disposed of if the only rights which could be annexed to land were easements, such as a right of way. It then might have been said that these were certain limited interests in land, less than ownership in extent, but like it in kind, and therefore properly transferred by the same means that ownership was. A right of way, it might have been argued, is not to be approach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ntract. It does not presuppose any promise on the part of the servient owner. His obligation, although more troublesome to him than to others, is the same as that of every one else. It is the purely negative duty not to obstruct or interfere with a right of property. [7_35]

尽管可以怀疑，是否有必要为使地役权附属于土地而提及受转让人，尽管毫无疑问这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但随着时间推移，所涉及的难题却越来越难以解决。如果土地只有地役权相关权利，比如像通行权，那么事情本也容易处理。若是这样，可以说这些是土地的某些有限利益，比所有权范围小，但是类别相似，因而可以按照与所有权相同的方式予以适当转让。通行权，可能有人会争论说，不应从合同的角度进行处理。从供役地所有者的角度，它并没有预设任何承诺。他的义务，虽然对他比对别人更棘手，其实与别人的义务相同。它是不妨碍或干涉财产权利的纯消极性义务。

But although the test of rights going with the land may have been something of that nature, this will not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cases without a good deal of explanation. For such rights might exist to active services which had to be performed by the person who held the servient estate. It strikes our ear strangely to hear a

right to services from an individual called a right of property as distinguished from contract. Still this will be found to have been the way in which such rights were regarded. Bracton argues that it is no wrong to the lord for the tenant to alienate land held by free and perfect gif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land is bound and charged with the services into whose hands soever it may come. “The lord is said to have a fee in the homage and services; and therefore no entry upon the land which does not disturb them injures him. [7_36] " It is the tenement which imposes the obligation of homage, [7_37] and the same thing is true of villein and other feudal services. [7_38]

然而，尽管与土地相伴权利的准则可能是这种性质，若不详细解释，就无法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情形。这样的主动地役权可能存在，持有供役地的人必须予以承担。若源于某个人的役务权利被称为财产权利，以区别于合同，我们听到这种说法，会感到奇怪。然而，我们会发现这就是过去人们看待此类权利的方式。布莱克顿争辩说，如果承租人让渡合法无偿赠与获得的地产，这对其领主而言并无不当之处，其依据是，不论在谁手里，土地承担着法律责任，承当役务。领主可以说具有臣服和役务的可继承权；因此，进入领主的领地，如不妨碍这些权利，就不侵犯领主的权益。施加臣服之义务的是该保有物，对农奴和其他封地役务而言也同样如此。

The law remained unchanged when feudal services took the form of rent. [7_39] Even in our modern terms for years rent is still treated as something issuing out of the leased premises, so that to this day, although, if you hire a whole house and it burns down, you have to pay without abatement, because you have the land out of which the rent issues, yet if you only hire a suite of rooms and they are burned, you pay rent no longer, because you no longer have the tenement out of which it comes. [7_40]

当封地役务以地租的形式出现后，法律并没有变化。即使用现在的话来说，多年来，地租一直被视作源于租赁地产的衍生物，所以直到如今，如果你把房屋整套租下，如果它被烧毁，你就必须照价赔偿，因为你拥有了地租衍生的土地，尽管如此，如果你只租了其中一个套间，遭遇了火灾，你不必再支付地租，因为你不再拥有该地租产生的保有物。

It is obvious that the foregoing reasoning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 disseisor of the tenant would be bound as much as the tenant himself, and this conclusion was adopted by the early law. The lord could require the services, [7_41] or collect the rent [7_42] of any one who had the land, because, as was said in language very like Bracton's, “the charge of the rent goes with the land.“ [7_43]

很明显，上面的推理会得出如下结论，即侵占承租者财产的人与承租人本人需承担同等责任，早期法律认可了这一结论。领主可以要求任何持有该地的人提供役务或者收取地租，因为，用酷似布拉克顿的话来说，“地租负担依附于地产”。

Then as to the right to the rent. Rent was treated in early law as a real right, of which a disseisin was possible, and for which a possessory action could be brought. If, as was very frequently the case, the leased land lay within a manor, the rent was parcel of the manor, [7_44] so that there was some ground for saying that one who was seised of the manor, that is, who possessed the lands occupied by the lord of the manor, and was recognized by the tenants as lord, had the rents as incident thereto. Thus Brian, Chief Justice of England under Henry VII., says, “If I am disseised of a manor, and

the tenants pay their rent to the disseisor, and then I re-enter, I shall not have the back rent of my tenants which they have paid to my disseisor, but the disseisor shall pay for all in trespass or assize.“ [7_45] This opinion was evidently founded on the notion that the rent was attached to the chief land like an easement. Sic fit ut debeantur rei a re. [7_46]

接下来讨论关于地租的权利。早期法律将地租视为一种物权，强占可能获得该权利，也可因该权利提起恢复占有诉讼。如果租赁地块位于某领主的领地内，情况常常是这样，地租是该领地的一部分，因此，这一说法是有些道理的，即依法占有该领地的人，即占有该领地领主土地的人，若承租人认可他为领主，他享有相应地租之收益。因此，亨利七世时期的英格兰首席大法官布莱恩说：“如果我的领地被强占，租户将地租付给侵占者，之后我又要回领地，我无法索回我的租户之前付给侵占者的地租，但是侵占者应在侵占诉讼或审判中赔偿我的所有损失”。显而易见，这一观点建立在地租同地役权一样依附于主要土地这一概念基础之上，操作起来就是以某一权利约束另一权利。

Different principles might have applied when the rent was not parcel of a manor, and was only part of the reversion; that is, part of the landlord's fee or estate out of which the lease was carved. If the lease and rent were merely internal divisions of that estate, the rent could not be claimed except by one who was privy to that estate. A disseisor would get a new and different fee, and would not have the estate of which the rent was part. And therefore it would seem that in such a case the tenant could refuse to pay him rent, and that payment to him would be no defence against the true owner. [7_47] Nevertheless, if the tenant recognized him, the disseisor would be protected as against persons who could not show a better

title. [7_48] Furthermore, the rent was so far annexed to the land that whoever came by the reversion lawfully could collect it, including the superior lord in case of escheat. [7_49] Yet escheat meant the extinction of the fee of which the lease and rent were parts, and although Bracton regarded the lord as coming in under the tenant's title pro herede, in privity, it was soon correctly settled that he did not, but came in paramount. This instance, therefore, comes very near that of a disseisor.

如果地租不是领地的一部分，而是土地归复权的一部分；也就是领主的封地或不动产的一部分，该租约由此而来，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适用不同的原则。如果租约和地租只是该不动产内的一部分，则除了与该地产存在法律利害关系的人，他人不得索取该地租。侵占者会获得新的、不同的可继承地产所有权，不能获得地租所在地的不动产权。因此，似乎在这种情况下，承租人可以拒绝支付地租给他，支付的租金也不能作为与真正所有者对簿公堂为之辩护。但是尽管如此，如果承租人认可他，侵占者会受到保护，免受其他不具更有效所有权人的侵扰。而且，地租一直附属于土地，不论是谁，包括在归复情形下的上一级领主，只要合法取得土地归复权，就可以收租。然而，土地复归意味着租约和地租所附的封地所有权的终结，尽管布拉克顿在法律利益关系中，把领主视为承租人所有权的继承者，但是不久法庭就正确地裁决不是如此，他是以最高权利者的形式出现。所以，这个例子非常类似于侵占他人地产者的情形。

Services and rent, then, were, and to some extent are still, dealt with by the law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roperty. They were things which could be owned and transferred like other property. They could be possessed even by wrong, and possessory remedies were given for them.

那时，役务和地租从财产的角度依法处理，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也依然如此。像其他财产一样，它们属于可拥有和转让之财产。人们甚至可以通过侵权占有它们，也可以得到占有损失补偿。

No such notion was applied to warranties, or to any right which was regarded whol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ntract. And when we turn to the history of those remedies for rent which sounded in contract, we find that they were so regarded. The actions of debt and covenant could not be maintained without privity. In the ninth year of Henry VI. [7_50] it was doubted whether an heir having the reversion by descent could have debt, and it was held that a grantee of the reversion, although he had the rent, could not have that remedy for it. A few years later, it was decided that the heir could maintain debt, [7_51] and in Henry VII.'s reign the remedy was extended to the devisee, [7_52] who, as has been remarked above, seemed more akin to the heir than a grantee, and was more easily likened to him. It was then logically necessary to give assigns the same action, and this followed. [7_53] The privity of contract followed the estate, so that the assignee of the reversion could sue the person then holding the term. [7_54] On like grounds he was afterwards allowed to maintain covenant. [7_55] But these actions have never lain for or against persons not privy in estate with the lessor and lessee respectively, because privity to the contract could never be worked out without succession to the title. [7_56]

这种概念未应用到担保中，也未应用到任何完全从合同角度衍生的权利中。如果我们追寻合同中提到的那些地租补偿的历史，我们发现，人们就是这样看待它们的。如果与当事方不存在法律上的利益关系，不能提起债务和盖印合同诉讼。亨利六世9年，有人怀疑通过继

承获得土地归复权的继承人，是否可以提起追债之诉，法院认为，享有土地归复权的受让人，虽然可以获得地租，但不能获得地租补偿。几年后，法庭裁决继承人可以提起债务诉讼，亨利七世统治时期，该补偿扩展至不动产受遗赠人，如前所述，该受遗赠人与继承人的血缘关系比受让人更近，更容易把二人联系到一起。根据这一逻辑，有必要给予受转让人同样的诉讼权利，后来的确如此。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跟随不动产转移，这样获得归复权的受转让人可以起诉当时持限期地产权的人。根据类似依据，他后来获准可以因盖印合同而提起诉讼。但是，无论是支持与该地产出租人不存在法定利益关系的人，还是反对那些与承租人不存在法定利益关系的人，从未有人提起过这些诉讼，因为若无对该权利之继承，与该合同的法定利益关系就无法得出。

However, all these niceties had no application to the old freehold rents of the feudal period, because the contractual remedies did not apply to them until the time of Queen Anne. [7_57] The freehold rent was just as much real estate as an acre of land, and it was sued for by the similar remedy of an assize, asking to be put back into possession.

然而，所有这些精确的规定却不适用于封地时代古老的自由保有地产的地租，因为直到安妮女王时代，对合同的补偿才适用于它们。这种自由保有地产的地租与一英亩田地一样属于不动产，可以进行诉讼，通过类似审判赔偿的方式，要求恢复对其占有。

The allowance of contractual remedies shows that rent and feudal services of that nature, although dealt with as things capable of possession, and looked at general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roperty rather than of contract, yet approach much nearer to the

nature of the latter than a mere duty not to interfere with a way. Other cases come nearer still. The sphere of prescription and custom in imposing active duties is large in early law. Sometimes the duty is incident to the ownership of certain land; sometimes the right is, and sometimes both are, as in the case of an easement. When the service was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 land, the fact that the burden, in popular language, fell upon one parcel, was of itself a reason for the benefit attaching to the other.

允许合同补偿表明，这类性质的地租和封建役务，尽管人们将其作为可拥有的财产进行处理，总的来说人们从财产而不是合同的角度考虑它们，然而，与不妨碍通行权那样简单的义务相比，它们更接近后者的性质。还有些类似的情形更为接近。早期法律中，规定积极义务的时效权和惯例范围很广。有时，义务附属于某土地的所有权；有时，权利附属于此，有时权利和义务同时附属于该所有权，例如地役权的情形。如果该地役是为另一土地之收益，用俗语来说，其责任落在一块地上，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该收益附属于另一块地的一个原因。

Instances of different kinds are these. A parson might be bound by custom to keep a bull and a boar for the use of his parish. [7_58] A right could be attached to a manor by prescription to have a convent sing in the manor chapel. [7_59] A right might be gained by like means to have certain land fenced by the owner of the neighboring lot. [7_60] Now, it may readily be conceded that even rights like the last two, when attached to land, were looked at as property, and were spoken of as the subject of grant. [7_61] It may be conceded that, in many cases where the statement sounds strange to modern ears, the obligation was regarded as falling on the land alone, and not on the person of the tenant. And it may be conjectured that this view arose naturally and reasonably from

there having been originally no remedy to compel performance of such services, except a distress executed on the servient land. [7_62] But any conjectured distinction between obligations for which the primitive remedy was distress alone, and others, if it ever existed, must soon have faded from view; and the line between those rights which can be deemed rights of property, and those which are mere contracts, is hard to see, after the last examples. A covenant to repair is commonly supposed to be a pure matter of contract.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duty to repair, and a duty to fence? The difficulty remains almost as great as ever of finding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the competing principles of transfer,—succession on the one side, and possession of dominant land on the other. If a right in the nature of an easement could be attached to land by prescription, it could equally be attached by grant. If it went with the land in one case, even into the hands of a disseisor, it must have gone with it in the other. No satisfactory distinction could be based on the mode of acquisition, [7_63] nor was any attempted. As the right was not confined to assigns, there was no need of mentioning assigns. [7_64] In modern times, at least, if not in early law, such rights can be created by covenant as well as by grant. [7_65]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ncient law that an action of covenant may be maintained upon an instrument of grant. [7_66] The result of all this was that not only a right created by covenant, but the action of covenant itself, might in such cases go to assigns, although not mentioned, at a time when such mention was essential to give them the benefit of a warranty. Logically, these premises led one step farther, and not only assigns not named, but disseisors, should have been allowed to maintain their action on the contract, as they had the right arising out of it. Indeed, if the plaintiff had a right which when obtained by grant would have entitled him to covenant, it was open to argument that he should be allowed the same action when he had the right by prescription, although, as has been seen

in the case of rent, it did not follow in practice from a man's having a right that he had the contractual remedies for it. [7_67] Covenant required a specialty, but prescription was said to be a sufficiently good specialty. [7_68] Where, then, was the line to be drawn between covenants that devolved only to successors, and those that went with the land?

下面是一些不同类型的事例。依照惯例，某牧师可能有责任供养一头公牛和一头猪供其教区使用。某领地可以因时效权例有权要求一个女修道院在其领地的教堂颂唱。通过类似方式，某人可以获得某项权利，令某块土地的相邻土地所有者为该地块筑上篱笆。现在，人们欣然承认，即使像上述最后提到的两项权利，如果附属于土地，就会被视作财产，提及时被称作转让对象。人们会承认，在很多案例中，对现代人而言，起诉书听起来奇怪，那时人们认为义务只是落在土地之上，而不是承租人身上。可以推测，这种观点自然合理的推论源于此：除了对该供役地土地执行的财物扣押，最初对强迫承担的此类役务没有补偿。但是，对仅以扣押财物作为原始补偿方法这种义务与其他义务而言，任何推测的二者之间的区分（如果还存在区分的话）一定很快就消失了；哪些权利可被视作财产权，哪些只是合同权利，在看过前面的例子后，很难看出来。一份修缮盖印合同通常被视作是一个纯粹的合同问题。修缮义务和修筑篱笆的义务区别何在？一方面是继承，另一方面是对需役地的占有，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转让法则，其分界线仍然与过去一样难以界定。如果地役权性质的权利可以通过时效权附加给土地，那通过转让也应该同样可以。如果它在一种情形下随着土地转移，甚至转移到侵占者手中，那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它也一定随之转移。任何以获取方式为基础的区分都不能令人满意，也从未有人尝试如此进行区分。由于该类权利不仅限于受转让人，因此没有必要提到受转让人。此类权利可以通过盖印合同以及转让产生，如果说早期法律不是如此，至少在当代是这样。另一方面，古法也规定，可就转让契据提起盖印合同诉讼。所有这些的结果就是，即使没有提及受转让人，不仅盖印合同产生的权利，而且盖印合同诉讼自身，在

这类情形下也可能归受转让人所有。在那个年代，要想获担保之益处，这种提及是至关重要的。从逻辑上推理，上述各点更进一步，不仅没有提及名字的受转让人，就是侵占者，也应允许他们根据合同进行诉讼，因为他们拥有从中衍生的权利。的确，如果原告享有某项权利，该权利经转让获得之后会使得原告获得盖印合同规定之权利，则有待证明的是，如果他有时效权，他也可以提起同样的诉讼，虽然，在地租一例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没有因为某人拥有某项权利就获得了合同所带来的补偿。盖印合同需要一份契据，但时效权可以说是充分有效的契据。那么只传给继受人的盖印合同，与随土地转移的盖印合同，二者之间的分界线在何处？

The difficulty becomes more striking upon further examination of the early law. For side by side with the personal warranty which has been discussed hitherto, there was another warranty which has not yet been mentioned by which particular land alone was bound. [7_69] The personal warranty bound only the warrantor and his heirs. As was said in a case of the time of Edward I., “no one can bind assigns to warranty, since warranty always extends to heirs who claim by succession and not by assignment.“ [7_70] But when particular land was bound, the warranty went with it, even into the hands of the King, because, as Bracton says, the thing goes with its burden to every one. [7_71] Fleta writes that every possessor will be held. [7_72] There cannot be a doubt that a disseisor would have been bound equally with one whose possession was lawful.

如果深入考察早期法律，这个难题愈发引人注目。与上述讨论的人格担保相并列，还有另外一种迄今尚未提到的担保，这种担保仅对特定土地具有约束力。人格担保仅对担保人及其继承人有约束力。正如爱德华一世时期的案例中所说：“无人能使受转让人负有担保义务，因为担保总是继承人以继承方式而不是转让方式得到”。然而，

如果特定土地负有法律义务，担保也随之转移，甚至会到国王手中，因为正如布莱克顿所说，财产跟随其义务可转移至任何人手里。弗莱塔写到，所有占有者都负有义务。毫无疑问，侵占者与合法占有者会受到同等的法律约束。

We are now ready for a case [7_73] decided under Edward III., which has been discussed from the time of Fitzherbert and Coke down to Lord St. Leonards and Mr. Rawle, which is still law, and is said to remain still unexplained. [7_74] It shows the judges hesitating between the two conceptions to which this Lecture has been devoted. If they are understood, I think the explanation will be clear.

我们现在准备讨论爱德华三世时期判决的一个案件，该案件从菲茨赫伯特和柯克时代一直讨论到圣伦纳兹法官和罗尔先生时代，仍是现行的法律，但据说一直没有得到阐释。该案表明了当事法官在本讲专门讨论的两个概念之间犹豫不决。若能理解这些概念，我想解释也就会一目了然。

Pakenham brought covenant as heir of the covenantee against a prior, for breach of a covenant made by the defendant's predecessor with the plaintiff's great-grandfather, that the prior and convent should sing every week in a chapel in his manor, for him and his servants. The defendant first pleaded that the plaintiff and his servants were not dwelling within the manor; but, not daring to rest his case on that, he pleaded that the plaintiff was not heir, but that his elder brother was. The plaintiff replied that he was tenant of the manor, and that his great-grandfather enfeoffed a stranger, who enfeoffed the plaintiff and his wife; and that thus the plaintiff was

tenant of the manor by purchase, and privy to the ancestor; and also that the services had been rendered for a time whereof the memory was not.

帕克南作为盖印合同受约方的继承人，根据盖印合同起诉一位小修道院的院长违背盖印合同。该盖印合同由被告的前任与原告的高祖父签订，规定该院长和修道院应每周在原告领地的教堂为他及其佣人颂唱。被告首先辩称原告及其佣人没有住在该领地内；但是，因为他不敢把这作为主要依据，他辩称原告不是继承人，他的哥哥才是。原告答辩说，他是该领地的承租人，其高祖父把领地转让给了第三方，而该第三方又转让给了原告及其妻子；因此，原告通过非继承方式成为该领地的承租人，与被继承人存在法律利益关系；而且这些役务履行了一段时间了，具体多久无法追忆。

It is evident from these pleadings that assigns were not mentioned in the covenant, and so it has always been taken. [7_75] It also appears that the plaintiff was trying to stand on two grounds: first, privity, as descendant and assign of the covenantee; second, that the service was attached to the manor by covenant or by prescription, and that he could maintain covenant as tenant of the manor, from whichever source the duty arose.

很显然，从这些辩词来看，盖印合同中没有提及受转让人，以后人们也是一直这样认为。此外，原告似乎试图依据两个理由：第一，法律关系，原告是作为受约人的后代和受让人；第二，根据盖印合同或时效权，该役务附属于领地，不管根据哪一条确定的役务，他都可以该领地承租人的身份提起盖印合同诉讼。

Finchden, J. puts the case of parceners making partition, and one covenanting with the other to acquit of suit. A purchaser has the advantage of the covenant. Belknap, for the defendants, agrees, but distinguishes. In that case the acquittance falls on the land, and not on the person. [7_76] (That is to say, such obligations follow the analogy of easements, and, as the burden falls on the quasi servient estate, the benefit goes with the dominant land to assigns, whether mentioned or not, and they are not consider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ntract at all. Warranty, on the other hand, is a contract pure and simple, and lies in the blood,—falls on the person, not on the land. [7_77])

芬奇登大法官认为本案涉及共同继承人进行分割，为免除诉讼，一方应与另一方订立盖印合同。通过非继承方式取得不动产的人享有该盖印合同的收益。代表被告的贝克纳普表示同意，但是作了区分。在上述情形下，义务免除应该落在土地而非人身之上。（也就是说，这样的义务类似于地役权，而且由于义务落在准供役地上，其收益也随着需役地转移至受转让人，不论是否提及到了他们，人们都绝对不会从合同的角度来考虑他们。另一方面，担保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合同，通过世袭沿袭——落在人身上而非土地上。）

Finchden: a fortiori in this case; for there the action was maintained because the plaintiff was tenant of the land from which the suit was due, and here he is tenant of the manor where the chapel is.

芬奇登大法官：在本案中更不容置疑；在此提起了诉讼，是因为原告是该诉讼所在土地的承租人，在此他是该教堂所在领地的承租人。

Wichingham, J. If the king grants warren to another who is tenant of the manor, he shall have warren, &c.; but the warren will not pass by the grant [of the manor], because the warren is not appendant to the manor. No more does it seem the services are here appendant to the manor.

维钦汉姆法官：如果国王将狩猎场赠予另外一人，而此人是领地承租人，则此人应拥有该狩猎场等等；但是该狩猎场不会因为该领地的赠与而转移，因为它不附属于该领地。同样地，该狩猎场的役务似乎也不属于该领地。

Thorpe, C. J., to Belknap: “There are some covenants on which no one shall have an action, but the party to the covenant, or his heir, and some covenants have inheritance in the land, so that whoever has the land by alienation, or in other manner, shall have action of covenant; [or, as it is stated in Fitzherbert's Abridgment, [7_78] the inhabitants of the land as well as every one who has the land, shall have the covenant;] and when you say he is not heir, he is privy of blood, and may be heir: [7_79] and also he is tenant of the land, and it is a thing which is annexed to the chapel, which is in the manor, and so annexed to the manor, and so he has said that the services have been rendered for all time whereofthere is memory, whence it is right this action should be maintained.” Belknap denied that the plaintiff counted on such a prescription; but Thorpe said he did, and we bear record of it, and the case was adjourned. [7_80]

首席大法官索普对贝克纳普说：“有些盖印合同只有盖印合同方

或其继承人方可提起诉讼；有些盖印合同继承权在土地，因而通过转让或其他方式获得土地的人都可以进行诉讼；或者如费茨赫伯特的《法律汇编》所说，该土地居住者及所有拥有该土地者，享有盖印合同规定之权利；你说他不是继承人，他有血缘上的法定利益关系，可能是继承人：而且他是该土地的承租人，它是与教堂相连之物，教堂又在领地内，所以他说自可追忆以来，这些役务是一直在履行，因此提起诉讼是正当的”。贝尔纳普否认原告以这样一个时效权来进行辩护；但是索普认为他这样做了，而且我们有证据，本案延期审理。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discussion followed the lines marked out by the pleading. One judge thought that the plaintiff was entitled to recover as tenant of the manor. The other puisne doubted, but agreed that the case must be discussed on the analogy of easements. The Chief Justice, after suggesting the possibility of sufficient privity on the ground that the plaintiff was privy in blood and might be heir, turns to the other argument as more promising, and evidently founds his opinion upon it. [7_81] It would almost seem that he considered a prescriptive right enough to support the action, and it is pretty clear that he thought that a disseisor would have had the same rights as the plaintiff.

我们将看到，这里的讨论是沿着诉答的方向展开的。一位法官认为，作为领地的承租人，原告有权获得赔偿。另外一名资历较浅的普通法官有所质疑，但也同意该案须按地役权类推进行讨论。首席大法官依据原告血缘上的法律关系和可能作为继承人这些理由，提出充分法律关系的可能性，之后他转向了另一个更充分的论据，而且显然将其观点建立在此之上。他似乎认为，时效权利就足以支持本诉讼，可以清楚看出，他认为一个侵占者应该与原告拥有同样的权利。

In the reign of Henry IV., another case [7_82] arose upon a covenant very like the last. But this time the facts were reversed. The plaintiff counted as heir, but did not allege that he was tenant of the manor. The defendant, not denying the plaintiff's descent, pleaded in substance that he was not tenant of the manor in his own right. The question raised by the pleadings, therefore, was whether the heir of the covenantee could sue without being tenant of the manor. If the covenant was to be approached from the side of contract, the heir was party to it as representing the covenantee. If,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treated as amounting to the grant of a service like an easement, it would naturally go with the manor if made to the lord of the manor. It seems to have been thought that such a covenant might go either way, according as it was made to the tenant of the manor or to a stranger. Markham, one of the judges, says: “In a writ of covenant one must be privy to the covenant if he would have a writ of covenant or aid by the covenant. But, peradventure, if the covenant had been made with the lord of the manor, who had inheritance in the manor, ou issint come determination poit estre fait, it would be otherwise,” which was admitted. [7_83] It was assumed that the covenant was not so made as to attach to the manor, and the court, observing that the service was rather spiritual than temporal, were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he heir could sue. [7_84] The defendant accordingly pleaded over and set up a release. It will be seen how fully this agrees with the former case.

在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另一个因盖印合同而引起的案例与上述案例非常相似，但是这次案情正好倒过来了。原告自述为继承人，但没有宣称他是该领地的承租人。被告没有否认原告的血统，但在实际诉答中辩称根据自身资格，原告不是该领地的承租人。因此，这些诉答引起的问题就是该受约人的继承人如果不是该领地承租人，是否可以

提起诉讼。如果从合同的角度分析该盖印合同，继承人代表受约人一方；另一方面，如果将其看作类似地役权之类的役务之转让，如果该合同是与领地的领主所签，就自然应当随领地转移。人们似乎一直认为，此类盖印合同，根据是与领地的承租人还是第三方所签署，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其中一位名叫马克汉姆的法官说："在违约赔偿令状中，若某人要得到该盖印合同诉状或支持，需要与该盖印合同存在法律关系。但是万一该盖印合同是与该领地领主所签，而该领主在领地有遗产，据此可以确定，将会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一说法得到认可。人们认为该盖印合同的签订不是为了使之依附于领地，法庭认为该役务是精神性的而非世俗性的，倾向于认为继承人可以提起诉讼。被告因此再答辩，并签署了放弃文书。我们会看到，这与前面的案例所述一致。

The distinction taken by Markham is stated very clearly in a case reported by Lord Coke. In the argument of Chudleigh's Case the line is drawn thus: "Always, the warranty as to voucher requires privity of estate to which it was annexed," (i.e. succession to the original covenantee,) "and the same law of a use…. But of things annexed to land, it is otherwise, as of commons, advowsons, and the like appendants or appurtenances. So a disseisor, abator, intruder, or the lord by escheat, &c., shall have them as things annexed to the land. So note a diversity between a use or warranty, and the like things annexed to the estate of the land in privity, and commons, advowsons, and other hereditaments annexed to the possession of the land." [7_85] And this, it seems to me, is the nearest approach which has ever been made to the truth.

马克汉姆所采取的区分，在柯克勋爵的报告中阐述得非常清楚。在查德利一案的辩论中是这样区分的："一直是这样，担保证明要求与它所附属之不动产有法律关系，"（即对原始受约人的继承）"用益

权也适用于这样的法律，但是附属于土地的财产中，像公用权，受俸律师推荐权之类的附属权益或附属物，却是另一回事。因而，侵占者、不动产非法拥有人、闯入者或通过土地复归产生的领主等等应该获得这些作为土地附属物的财产。因此，需要注意附属于具有法律关系不动产之下的用益权或担保之类财产和附属于对该土地占有之下的公用权、受俸牧师推荐权以及其他可继承财产权利等，具有多样性特点。”在我看来，这可能是历来最为接近于事实真相的路径。

Coke, in his *Commentary on Littleton* (385 a), tak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a warranty, which binds the party to yield lands in recompense, and a covenant annexed to the land, which is to yield but damages. If Lord Coke had mean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warranties and all covenants which in our loose modern sense are said to run with the land, this statement would be less satisfactory than the preceding.

柯克在其《利特尔顿评注》（385a）中，对要求当事人以让出土地作为赔偿的担保与附属于土地只能进行损害赔偿的盖印合同进行了区分。如果柯克勋爵本意是区分担保与所有那些我们宽松现代意义上随土地转移的契约，这种说法与前面的说法相比，更难令人满意。

A warranty was a covenant which sometimes yielded but damages, and a covenant in the old law sometimes yielded land. In looking at the early cases we are reminded of the still earlier German procedure, in which it did not matter whether the plaintiff's claim was founded on a right of property in a thing, or simply on a contract for it. [7_86] Covenant was brought for a freehold under Edward I., [7_87] and under Edward III. it seems that a mill could be abated by the same action, when maintained contrary to an

easement created by covenant. [7_88] But Lord Coke did not mean to lay down any sweeping doctrine, for his conclusion is, that “a covenant is in many cases extended further than the warrantie.” Furthermore, this statement, as Lord Coke meant it, is perfectly consistent with the other and more impor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warranties and rights in the nature of easements or covenants creating such rights. For Lord Coke's examples are confined to covenants of the latter sort, being in fact only the cases just stated from the Year Books.

担保是一种盖印合同，有时只能进行损害赔偿，而在古代法律中盖印合同有时会出让土地。对早期案例的考察，令我们回忆起更早期的日耳曼程序，根据该程序，原告的赔偿索取依据的是对某物财产的权利，还仅仅只是合同的规定，无关紧要。爱德华一世时期，可以根据盖印合同要求自由保有地产权。到爱德华三世时，若与因盖印合同产生的地役权相矛盾，似乎磨坊能以同样的诉讼停止工作。但是柯克勋爵不打算制定包罗一切的法规，因为他的结论是：“很多情况下，与担保相比，盖印合同涉及面更广”。而且根据柯克勋爵的意思，这种说法与另外也更重要的担保和某些权利的区分完全一致。这些权利指的是地役权性质的权利或由盖印合同所产生的权利。因为柯克勋爵的所举的例子仅限于后一类的盖印合同，实际上使用的也只是《年鉴》中的案例。

Later writers, however, have wholly forgotten the distinction in question, and accordingly it has failed to settle the disputed line between conflicting principles. Covenants which started from the analogy of warranties, and others to which was applied the language and reasoning of easements, have been confounded together under the title of covenants running with the land. The phrase “running with the land” is only appropriate to covenants

which pass like easements. But we can easily see how it came to be used more loosely.

然而，后来的作者完全忘记了上述讨论的区分，因而未能解决相互矛盾的法则之间的争议界线。始于类推担保的盖印合同，和其他应用地役权的术语及推理的盖印合同，这两者在随土地转移的盖印合同名下被混为一谈。“随土地转移”这一短语只适合于随地役权类转移的盖印合同，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它的使用后来变得越来越不精确。

It has already been shown that covenants for title, like warranties, went only to successors of the original covenantee. The technical expression for the rule was that they were annexed to the estate in privity. Nothing was easier than to overlook the technical use of the word “estate,” and to say that such covenants went with the land. This was done, and forthwith all distinctions became doubtful. It probably had been necessary to mention assigns in covenants for title, as it certainly had been to give them the benefit of the ancient warranty; [7_89] for this seems to have been the formal mark of those covenants which passed only to privies. But it was not necessary to mention assigns in order to attach easements and the like to land. Why should it be necessary for one covenant running with the land more than another? And if necessary for one, why not for all? [7_90] The necessity of such mention in modern times has been supposed to be governed by a fanciful rule of Lord Coke's. [7_91] On the other hand, the question is raised whether covenants which should pass irrespective of privity are not governed by the same rule which governs warranties.

我们已经看到，关于完全保证盖印合同，与担保一样，只能归属

原始受约人的继受人。对该规则的专业表达就是它们因法律上的关系附属于不动产。忽视“不动产”一词的专业用法，认为此类盖印合同随土地一同转移，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了。如果是这样，随后的所有区分就令人质疑了。在过去的完全保证盖印合同中可能有必要提及受转让人，因为他们的确被赋予了古代担保的权益；似乎这是盖印合同的正式标志，这些盖印合同只能转给存在法律利益关系的人。但是，为了把地役权和类似权利附属于土地而提及受转让人则没有必要。为什么一个盖印合同比另外一个更有必要随土地转移？如果其中一个有必要，为什么不是所有都必要？在现代需要提及受转让人，人们认为是由于柯克勋爵所提出的一条别出心裁的规定。另一方面，人们提出疑问：不考虑法律关系即可转移的盖印合同，是否就不受支配担保的同一法规约束？

These questions have not lost their importance. Covenants for title are in every deed, and other covenants are only less common, which, it remains to show, belong to the other class.

这些问题现在仍有其重要性。完全保证盖印合同出现在所有地契中，而另外一些盖印合同只是不那么常见，尚需证明这些盖印合同属于另一类。

Chief among these is the covenant to repair.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that an easement of fencing may be annexed to land, and it was then asked what was the difference in kind between a right to have another person build such structures, and a right to have him repair structures already built. Evidence is not wanting to show that the likeness was perceived. Only, as such covenants are rarely, if ever, made, except in leases, there is always privity to the original parties. For the lease could not, and the reversion would not be

likely to, go by disseisin.

这其中最主要的是维修盖印合同。前面讲到，修筑篱笆的地役权可以附属于土地，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令他人修建此类构造物的权利和让他维修已有构造物的权利，这二者在类别上有什么差异？不乏证据表明，人们已经发现了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只是，这类盖印合同即使存在也很少见，且最初约定方总是存在法律利益关系，租约的情形除外。因为租约不能被强占夺取，土地复归也不大可能这样。

The Dean of Windsor's Case decides that such a covenant binds an assignee of the term, although not named. It is reported in two books of the highest authority, one of the reporters being Lord Coke, the other Croke, who was also a judge. Croke gives the reason thus: “For a covenant which runs and rests with the land lies for or against the assignee at the common law, quia transit terra cum onere, although the assignees be not named in the covenant.“ [7_92] This is the reason which governed easements, and the very phrase which was used to account for all possessors being bound by a covenant binding a parcel of land to warranty. Coke says, “For such covenant which extends to the support of the thing demised is quodammodo appurtenant to it, and goes with it.” Again the language of easements. And to make this plainer, if need be, it is added, “If a man grants to one estoversto repair his house, it is appurtenant to his house.“ [7_93] Estovers for repair went with the land, like other rights of common, [7_94] which, as Lord Coke has told us, passed even to disseisors.

温莎教长案裁决，即使没有提及受转让人的名字，此类盖印合同对持有限期地产的受转让人有约束力。两本最为权威的判例集都汇报

了本案，一本由柯克勋爵所写，另一本由克洛克法官所写。克洛克给出如下理由："随土地转移和停留的盖印合同，即使没有在盖印合同中提及受转让人，土地上的负担永远追随土地，仍可依据普通法因受转让人或者对受转让人提起诉讼"。这也是管辖地役权的依据，正是该短语用来解释所有占有者受担保地块的盖印合同之约束。柯克说："此类盖印合同，扩展至遗赠地产之继承权，在某种程度上附属于它，并随之转移"。这仍然是地役权的用语。为了使之更明了，若有必要，又补充说："若某人给修缮其房屋的人所需物品，该物品是他房屋的附属物"。修缮房屋所需物品像其他共有权一样，随土地转让，正如柯克勋爵已经告诉过我们的，甚至转让给了侵占者。

In the next reign the converse proposition was decided, that an assignee of the reversion was entitled in like manner to the benefit of the covenant, because "it is a covenant which runs with the land." [7_95] The same law was applied, with still clearer reason, to a covenant to leave fifteen acres unploughed for pasture, which was held to bind an assignee not named, [7_96] and, it would seem, to a covenant to keep land properly manured. [7_97]

在下一任君主统治时期，人们又提出了相反的主张。土地归复权的受转让人有资格以类似方式获得盖印合同的权益，因为"此盖印合同随土地转移"。基于更明确的原因，同样的法律适用于某一盖印合同，根据该盖印合同，要留下十五亩地用作牧场，不得耕种，这对未明确提名的某受转让人也有约束力，看起来同样的法律也适用于规定保证土地肥沃的盖印合同。

If the analogy which led to this class of decisions were followed out, a disseisor could sue or be sued upon such covenants, if the other facts were of such a kind as to raise the question. There is

nothing but the novelty of the proposition which need prevent its being accepted. It has been mentioned above, that words of covenant may annex an easement to land, and that words of grant may import a covenant. It would be rather narrow to give a disseisor one remedy, and deny him another, where the right was one, and the same words made both the grant and the covenant. [7_98]

如果将得出此类判决的类推一直进行下去，那么在其他案情属于会导致疑问一类的情况下，侵占者也可因为此类盖印合同起诉或被起诉。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该主张缺乏新意，令其无法为人们所接受。上面已经提到，盖印合同的措辞可以将地役权加给土地，而转让措辞也可含有盖印合同之意。如果权利相同，转让和盖印合同所用的措辞相同，给予某侵占者一项补偿而拒绝给他另外一项，未免有些狭隘刻板了。

The language commonly used, however, throws doubt and darkness over this and every other question connected with the subject. It is a consequence, already referred to, of confounding covenants for title, and the class last discussed, under the name of covenants running with the land.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opinion there must be a privity of estate between the covenantor and covenantee in the latter class of cases in order to bind the assigns of the covenantor. Some have supposed this privity to be tenure; some, an interest of the covenantee in the land of the covenantor; and so on. [7_99] The first notion is false, the second misleading, and the proposition to which they are applied is unfounded. Privity of estate, as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covenants at common law, does not mean tenure or easement; it means succession to a title. [7_100] It is never necessary between covenantor and covenantee, or any

other persons, except between the present owner and the original covenantee. And on principle it is only necessary between them in those cases—such as warranties, and probably covenants for title—where, the covenants being regarded wholly from the side of contract, the benefit goes by way of succession, and not with the land.

然而，常用用语却对该主题相关的这个或所有其他问题制造了疑云，投下了阴影。前面提到，这就是以随土地转移盖印合同的名义，将完全保证盖印合同和上述提到的类型混为一谈所产生的后果。根据通常的看法，为了约束订约人的受转让人，在后者类型的例子中订约人和受约人必须存在不动产上的法律关系。有些人认为，这种法律关系就是保有权；有些人认为，它是受约人对订约人土地的持有利益等等。第一种观念是错误的，第二种观念会误导人，采纳这两种观念的法律主张是没有根据的。普通法的盖印合同中，不动产的法律关系并不是指保有权或地役权；它指的是对所有权的继承。除了现任所有者和最初的受约者之间，盖印合同订约者和受约者或者任何其他人之间从不需要这种关系。原则上，只有在诸如担保，还有可能是在完全保证盖印合同这类情形下才需要持有这种关系。在此类情形下，盖印合同完全从合同的角度来看待，其权益通过继承转移，而不是跟随土地转移。

If now it should be again asked, at the end of this long discussion, where the line is to be drawn between these two classes of covenants, the answer is necessarily vague in view of the authorities. The following propositions may be of some service.

经过这么长篇讨论，如果现在再问这两类盖印合同的界限在哪里，从判例来看，答案必然是模糊的。下面的主张可能有些用处：

A.With regard to covenants which go with the land:

A．关于随土地转移的盖印合同：

(1) Where either by tradition or good sense the burden of the obligation would be said, elliptically, to fall on the land of the covenantor, the creation of such a burden is in theory a grant or transfer of a partial interest in that land to the covenantee. As the right of property so created can be asserted against every possessor of the land, it would not be extravagant or absurd to allow it to be asserted by the action of covenant.

（1）如果根据惯例或者常识，简言之，应该说义务负担落在订约者的土地上，理论上这一负担的产生是将该土地的部分权益转让或转移给受约者。因为如此产生的财产权利不受任何土地占有者的侵害，允许通过盖印合同进行诉讼而要求该权利，也不算过分或荒唐。

(2) Where such a right is granted to the owner of a neighboring piece of land for the benefit of that land, the right will be attached to the land, and go with it into all hands. The action of covenant would be allowed to assigns not named, and it would not be absurd to give it to disseisors.

（2）如果为了相邻土地的权益而将此权利转让给其所有人，则该权利附属于这块土地，并随土地而转移至他人手中。未提名的受转让人也可以进行盖印合同诉讼，这种权利给予侵占者也并非不合理。

(3) There is one case of a service, the burden of which does not fall upon land even in theory, but the benefit of which might go at common law with land which it benefited. This is the case of singing and the like by a convent. It will be observed that the service, although not falling on land, is to be performed by a corporation permanently seated in the neighborhood. Similar cases are not likely to arise now.

（3）有一种役务情形，即使从理论上讲其义务也不落在土地上，但是根据普通法，其权益可以根据其所惠及的土地而转移。修道院颂唱以及类似情况就属于这种情形。我们注意到，这种役务虽然不是落在土地之上，但却是由永久坐落于该区域的一个组织来履行的。类似的情形现在不可能发生了。

B.With regard to covenants which go only with the estate in the land:

B．关于只随土地的不动产转移的盖印合同：

In general the benefit of covenants which cannot be likened to grants, and the burden of which does not fall on land, is confined to the covenantee and those who sustain his persona, namely, his executor or heir. In certain cases, of which the original and type was the ancient warranty, and of which the modern covenants for title are present examples, the sphere of succession was enlarged by the mention of assigns, and assigns are still allowed to represent the original covenantee for the purposes of that contract. But it is only

by way of succession that any other person than the party to the contract can sue upon it. Hence the plaintiff must always be privy in estate with the covenantee.

总的来说，不能与转让类比义务不落在土地上的那些盖印合同，其权益限于受约者以及那些承担其身份的人，即其遗嘱执行人或继承人。某些案例的起源和类型属于古代担保，现代的完全保证盖印合同即为其现存案例，在这些案例中，继承的范围因提及受转让人而扩大，且为相关合同目的起见，仍允许受转让人代表初始受约人。但是只有通过继承方式，合同方以外的其他人方可就其提起诉讼。所以，原告必须与受约人一直具有不动产上的法律关系。

C.It is impossible, however, to tell by general reasoning what rights will be held in English law to belong to the former class, or where the line will be drawn between the two. The authorities must be consulted as an arbitrary fact. Although it might sometimes seem that the test of the first was whether the service was of a nature capable of grant, so that if it rested purely in covenant it would not follow the land, [7_101] yet if this test were accepted, it has already been shown that, apart from tradition, some services which do follow the land could only be matter of covenant. The grant of light and air, a well-established easement, is called a covenant not to build on the servient land to the injury of the light, by Baron Parke. [7_102] And although this might be doubted, [7_103] it has been seen that at least one well-established easement, that of fencing,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a right granted out of the servient land with any more propriety than a hundred other services which would be only matter of contract if the law allowed them to be annexed to land in like manner. The duty to repair exists only by way of covenant, yet the reasoning of the leading cases is drawn from the law of

easement. On the other hand, a covenant by a lessee to build a wall upon the leased premises was held, in Spencer's Case, not to bind assigns unless mentioned; [7_104] but Lord Coke says that it would have bound them if it had purported to. The analogy of warranty makes its appearance, and throws a doubt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case. We can only say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is limited by custom, and by the rule that new and unusual burdens cannot be imposed on land.

C．然而，仍然无法笼统推理，英国法中的哪些权利会归属前者一类，或者二者的分界线何在。作为一种随机事实，我们必须参考判决先例。虽然有时看起来，第一类盖印合同的检验标准在于役务是否具有可转让性，因此若役务纯粹只依赖盖印合同，它不应随土地而转移，但是如果这种检验标准被认可的话，则如前所示，除惯例之外，有些的确随土地转移的役务可能只是盖印合同问题。根据帕克男爵的说法，地役权中已为大家接受的采光权和通风权的转让被称为盖印合同建立在对供役地光线不造成侵害的基础之上。虽然有人会质疑，但是我们看到，至少有一种大家接受的地役权，也就是修筑篱笆的权利，相比较其他上百种役务而言，是最适宜被视作随供役地转让的一种权利；这些役务，若法律许可它们以类似方式附属于土地，它们只是以合同方式存在。维修责任只能以盖印合同形式存在，但是相关指导性案例的推理是依据地役权的相关法律；另一方面，在斯潘塞案中，根据盖印合同规定，承租人要在所租地界上建一面墙，除非提到受转让人，否则受转让人不受约束；但是，柯克勋爵认为只要该盖印合同意如此，它就会对受转让人产生约束力。担保类推在此出现，使得这一案例的基本法则受到质疑。我们只能说法律的实施受到习俗的约束，也受以下规则之约束，即那些新的以及不寻常的义务不能强加于土地。

The general object of this Lecture is to discover the theory on

which a man is allowed to enjoy a special right when the facts out of which the right arises are not true of him. The transfer of easements presented itself as one case to be explained, and that has now been analyzed,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law has been traced. But the principle of such transfers is clearly anomalous, and does not affect the general doctrine of the law. The general doctrine is that which has been seen exemplified in prescription, warranty, and such covenants as followed the analogy mentioned. Another illustration which has not yet been is to be found in the law of uses.

本讲的总体目标是探索某种理论。根据该理论，如果某种权利产生的情形对某人而言与实际不符，他可以得到许可享受某一特殊权利。地役权转让作为一个需要阐释的事例出现，现在已经得到了分析，也对其法律影响溯源。但是此类转让的原则很显然超出常规，不影响法律的一般原则。一般原则就是我们以时效、担保以及据上述类比而行的盖印合同中所做的例证。另外未谈及的一项例证可以在用益权的法律中找到。

In old times a use was a chose in action,that is, was considered very near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ntract, and it had a similar history to that which has been traced in other cases. At first it was doubted whether proof of such a secret trust ought to be allowed, even as against the heir. [7_105] It was allowed, however, in the end, [7_106] and then the principle of succession was extended to the assign. But it never went further. Only those who were privies in estate with the original feoffee to uses, were bound by the use. “A disseisor was no more bound by the confidence reposed in his disseisee, than he was entitled to vouch his disseisee's warrantor.” In the time of Henry VIII. it was said that “where a use shall be, it is requisite that there be two things, sc. confidence, and privity, as I

say, if there be not privity or confidence, then there can be no use: and hence if the feoffees make a feoffment to one who has notice of the use, now the law will adjudge him seised to the first use, since there is sufficient privity between the first feoffor and him, for if he [i.e. the first feoflor] had warranted he [the last feoffee] should vouch as assign, which proves privity; and he is in in the per by the feoffees; but where one comes into the land in the post, as the lord by escheat or the disseisor, then the use is altered and changed, because privity is wanting.“ [7_107]

在古代，用益权是一种诉讼产。也就是说，人们是从近乎合同的角度来考虑它，其发展过程与我们在其他情形中所追溯的过程相类似。最初人们怀疑，是否许可接受此类秘密信托的证据，即使是针对继承人的证据。然而，最终这点得到许可，继承法则也延伸到受转让人，但是仅仅如此。只有那些在该土地上与原始不动产承受人有法律利益关系的人，才对用益权负有义务。侵占者所受其被侵占者信任的约束，就像他有资格传其被侵占者的担保人一样不大可能。在亨利八世时期，人们认为：“若提到用益权，同时需要两件东西，也就是信任和法律关系……正如我说，若无法律关系或信任存在，就无用益权：因此，若不动产所有者把封地给予一个已知晓该用益的人，法律就将裁定他拥有第一用益权，因为第一让与人与他之间有足分的法律关系。若他（即第一受让人）向他（最后受让人）保证后者应作为受转让人出庭作证，这就证明了法律关系；他处于不动产所有者权利继受地位；但是如果某人事后继承土地，例如通过土地复归权获得土地的领主或者侵占者，因为缺乏法律关系，那么该用益权就有改动和变化了”。

To this day it is said that a trust is annexed in privity to the person and to the estate [7_108] (which means to the persona). It is not regarded as issuing out of the land like a rent, so that while a

rent binds every one who has the land, no matter how, a disseisor is not bound by the trust. [7_109] The case of the lord taking by escheat has been doubted, [7_110] and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Bracton and later authors as to whether he comes in as quasi heres or as a stranger.

至今，我们可以说信托权附属于存在法律关系的个人和地产（所指的是个人的法律身份）。人们不认为信托权源于诸如地租的地产收益，因此，虽然不论如何，地租会约束所有持有土地的人，但是侵占者不受信托之约束。通过土地复归得回土地的领主案例一直受到质疑，我们需记住，此人是作为准继承人还是作为陌生人继承，布拉克顿和后来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Then as to the benefit of the use, we are told that the right to sue the subpoena descended indeed to the heir, on the ground of heres eadem persona cum antecessore, but that it was not assets. [7_111] The cestui que use was given power to sell by an early statute. [7_112] But with regard to trusts, Lord Coke tells us that in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all the judges in England held that a trust could not be assigned, “because it was a matter in privity between them, and was in the nature of a chose in action.“ [7_113] Uses and trusts were both devisable, however, from an early day, [7_114] and now trusts are as alienable as any form of property.

下面讨论用益权的收益问题。有人说，请求发出传票的权利的确传给了继承人，理由是继承人与被继承人有相同身份，但是该权利不是资产。根据一部早期成文法，保有地受益人有权出售用益权。但是关于信托权，柯克勋爵告诉我们，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所有英格兰法官都认为，信托权不可转让，“因为它关系到当事人之间法律

关系，具有诉讼产的性质”。然而从早期开始，用益权和信托权都可以遗赠，现在信托权与任何形式的财产一样，可以进行转让。

The history of early law everywhere shows that the difficulty of transferring a mere right was greatly felt when the situation of fact from which it sprung could not also be transferred.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fficulty is real. The fiction which made such a transfer conceivable has now been explained, and its history has been followed until it has been seen to become a general mode of thought. It is now a matter of course that the buyer stands in the shoes of the seller, or, in the language of an old law-book, [7_115] that “the assign is in a manner quasi successor to his assignor.” Whatever peculiarities of our law rest on that assumption may now be understood.

各地早期法律的历史证明，一项权利产生的事实的情形若不能同时转让，那么仅仅对该权利进行转让非常困难。通过分析也证明了这一困难的真实性。我们已经阐释了此类转让实现的拟制，也追踪了其发展历程，如今它已被视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现在，买方理所当然地取代了卖方的位置，或者用古代法律判例集的说法来说：“受转让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其让与人的准继受人”。无论我们的法律所立足的这一假定是多么奇特，现在也应该可以得到理解了。

[7_1].Boyer v. Rivet, 3 Bulstr. 317, 321.

[7_2].Essays in A. S. Law, 219.

[7_3]."Per medium," Bracton, fol. 37b, Section10 ad fin.

[7_4].Bract., fol. 17 b. Cf. Fleta, III. c. 14, Section 6.

[7_5].See, further, Middlemore v. Goodale, Cro. Car. 503, stated infra, p. 379.

[7_6].See also Bract., fol. 380 b, 381. "Et quod de haeredibus dicitur, idem dici poterit de assignatis.... Et quod assignatis fieri debet warrantia per modum donationis: probatur in itinere W. de Ralegh in Com. Warr. circa finem rotuli, et hoc maxime, si primus dominus capitalis, et primus feoffator, ceperit homagium et servitium assignati." Cf. Fleta, VI. Section 6; Moore, 93, pl. 230; Sheph. Touchst. 199, 200. As to the reason which led to the mention of assigns, cf. Bract., fol. 20 b, Section 1; 1 Britt. (Nich.), 223, 312.

[7_7].I do not stop to inquire whether this was due to the statute of Quia Emptores, by which the assign was made to hold directly of the first grantor, or whether some other explanation must be found. Cf. Bract., fol. 37 b; c. 14, Sections 6, 11; VI. c. 28, Section 4; 1 Britton (Nich.), 256, [100 b].

[7_8].Fleta, III. c. 14, Section 6, fol. 197; 1 Britton (Nich.), 223, 233, 244, 255, 312; Co. Lit. 384 b; Y.B. 20 Ed. I. 232; Abbr. Placit., fol. 308, 2d col., Dunelm, rot. 43; Y.B. 14 Hen. IV. 5, 6.

[7_9].Fol. 67 a; cf. 54 a.

[7_10].Fol. 381; supra, p. 874, n. 3.

[7_11].Cf. Pincombe v. Rudge, Hobart, 3; Bro. Warrantia Carte, pl. 8; S.C., Y.B. 2 Hen. IV. 14, pl. 5.

[7_12].Y.B. 50 Ed. III. 12b & 13.

[7_13].Y.B. 42 Ed. III. 3, pl. 14, per Belknap, arguendo.

[7_14].Noke v. Awder, Cro. Eliz. 373; S.C., ib. 436. Cf. Lewis v. Campbell, 8 Taunt. 715; S.C., 3 J. B. Moore, 35.

[7_15].Middlemore v. Goodale, Cro. Car. 503; S.C., ib. 505, Sir William Jones, 406.

[7_16].Harper v. Bird, T. Jones, 102 (Pasch. 30 Car. II.). These cases show an order of development parallel to the history of the assignment of other contracts not negotiable.

[7_17].Andrew v. Pearce, 4 Bos. & Pul. 158 (1805).

[7_18].Austin, Jurisprudence, II. p. 842 (3d ed.).

[7_19]."Quoniam non personae, sed praedia deberent, neque adquiri libertas neque remitti servitus per partem poterit." D. 8. 3. 34, pr.

[7_20]."Qui fundum alienum bona fide emit, itinere quod ei fundo debetur usus est: retinetur id ius itineris: atque etiam, si precario aut vi deiecto domino possidet: fundus enim qualiter se habens ita, cum in suo habitu possessus est, ius non deperit, neque refert, iuste nec ne possideat qui talem eum possidet." D. 8. 6. 12.

[7_21].Elzevir ed., n. 51, ad loc. cit.; Cicero de L. Agr. 3. 2. 9.

[7_22].D.50. 16, 86. Cf. Ulpian, D. 41. 1. 20, Section 1; D. 8. 3. 23, Section 2.

[7_23].Inst. 2. 3, Section 1.

[7_24].D.8. 1. 14, pr. Cf. Elzevir ed., n. 58, "Et sic jura accessiones ease possunt corporum."

[7_25]."Cum fundus fundo servit." D. 8. 4. 12. Cf. D. 8. 5. 20, Section 1; D. 41. 1. 20, Section 1.

[7_26].Jurisprudence, II. p. 847 (3d ed.).

[7_27].Cf. Windscheid, Pand., Section 57, n. 10 (4th ed.), p. 150.

[7_28].Fol. 10b, Section 3.

[7_29].Fol. 220b, Section 1.

[7_30].Fol. 221.

[7_31].Fol. 219a, b.

[7_32].Fol. 102a, b.

[7_33].Fol. 226 b, Section 13. All these passages assume that a right has been acquired and inheres in the land.

[7_34].Fol. 53 a; cf. 59 b, ad fin., 242 b.

[7_35]."Nihil praescribitur nisi quod possidetur," cited from Hale de Jur. Maris, p. 32, in Blundell v. Catterall, 5 B. & Ald. 268, 277.

[7_36].Bract., fol. 46b; cf. 17b, 18, 47 b, 48.

[7_37].Fol. 81, 81 b, 79 b, 80 b.

[7_38].Fol. 24 b, 26, 35 b, 86, 208 b, &c. Cf. F. N. B. 123, E; Laveleye, Propriete, 67, 68, 116.

[7_39].Abbr. Plac. 110; rot. 22, Devon. (Hen. III.).

[7_40].Stockwell v. Hunter, 11 Met. (Mass.) 448.

[7_41].Keilway, 130 b, pl. 104.

[7_42].Keilway, 113 a, pl. 45; Dyer, 2b.

[7_43].Keilway, 113a, pl. 45. Cf. Y.B. 33-35 Ed. I. 70; 45 Ed. III. 11, 12.

[7_44].Litt. Section 589.

[7_45].Keilway, 2 a, pl. 2 ad fin. (12 Hen. VII.). But cf. Y.B. 6 Hen. VII. 14, pl. 2 ad fin.

[7_46].4 Laferriere, Hist. du Droit. Franc. 442; Bracton, fol. 53a.

[7_47].Cf. Co. Lit. 322 b, et seq.; Y.B. 6 Hen. VII. 14, pl. 2 ad fin.

[7_48].Daintry v. Brocklehurst, 3 Exch. 207.

[7_49].Y.B. 5 Hen. VII. 18, pl. 12.

[7_50].Y.B. 9 Hen. VI. 16, pl. 7.

[7_51].Y.B. 14 Hen. VI. 26, pl. 77.

[7_52].Y.B. 5 Hen. VII. 18, pl. 12.

[7_53].Cf. Theloall, Dig. I. c. 21, pl. 9.

[7_54].Buskin v. Edmunds, Cro. Eliz. 636.

[7_55].Harper v. Bird, T. Jones, 102 (30 Car. II.).

[7_56].Bolles v. Nyseham, Dyer, 254 b; Porter v. Swetnam, Style, 406; S.C., ib. 431.

[7_57].3 Bl. Comm. 231, 232.

[7_58].Yielding v. Fay, Cro. Eliz. 569.

[7_59].Pakenham's Case, Y.B. 42 Ed. III. 3, pl. 14; Prior of Woburn's Case, 22 Hen. VI. 46, pl. 36; Williams's Case, 5 Co. Rep. 72 b, 73 a; Slipper v. Mason, Nelson's Lutwyche, 43, 45 (top).

[7_60].F.N. B. 127; Nowel v. Smith, Cro. Eliz. 709; Star v. Rookesby, 1 Salk. 335, 336; Lawrence v. Jenkins, L.R. 8 Q.B.274.

[7_61].Dyer, 24 a, pl. 149; F. N. B. 180 N.

[7_62].F.N. B. 128 D, E; Co. Lit. 96 b. It is assumed that, when an obligation is spoken of as falling upon the land, it is understood to be only a figure of speech. Of cours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re confined to human beings.

[7_63].Keilway, 145 b, 146, pl. 15; Sir Henry Nevil's Case, Plowd. 377, 381; Chudleigh's Case, 1 Co. Rep. 119 b, 122 b.

[7_64].F.N. B. 180 N.; Co. Lit. 385 a; Spencer's Case, 5 Co. Rep. 16 a, 17 b; Pakenham's Case, Y.B. 42 Ed. III. 3, pl. 14; Keilway, 145 b, 146, pl. 15; Comyns's Digest, Covenant (B, 3).

[7_65].Holms v. Seller, 3 Lev. 305; Rowbotham v. Wilson, 8 H. L. C. 348; Bronson v. Coffin, 108 Mass. 175, 180. Cf. Bro. Covenant, pl. 2.

[7_66].Y.B. 21 Ed. III. 2, pl. 5; F. N. B. 180 N.

[7_67].The action is case in the Prior of Woburn's Case, Y.B. 22 Hen. VI. 46, pl. 36. In F. N. B. 128 E, n. (a), it is said that a curia claudenda only lay upon a prescriptive right, and that if the duty to fence was by indenture the plaintiff was put to his writ of covenant. But see below, pp. 396, 400.

[7_68].Y.B. 32 & 33 Ed. I. 430.

[7_69].Y.B. 20 Ed. I. 360.

[7_70].Y.B. 32 & 33 Ed. I. 516.

[7_71]."Quia res cum homine [obviously a misprint for onere] transit ad quemcunque." Fol. 382, 382 b.

[7_72].Lib. VI. c. 23, Section 17.

[7_73].Pakenham's Case, Y.B. 42 Ed. III. 3, pl. 14.

[7_74].Sugd. V. & P. (14th ed.), 587; Rawle, Covenants for Title (4th ed.), p. 314. Cf. Vyvyan v. Arthur, 1 B. & C. 410; Sharp v. Waterhouse, 7 El. & Bl. 816, 823.

[7_75].Co. Lit. 385 a.

[7_76].Cf. Finchden as to rent in Y. B, 45 Ed. III. 11, 12.

[7_77].Cf. Y.B. 50 Ed. III. 12, 13, pl. 2.

[7_78].Covenant, pl. 17.

[7_79].There is a colon here in both editions of the Year Books,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a new argument.

[7_80].Pakenham's Case, Y.B. 42 Ed. III. 3, pl. 14.

[7_81].Bro. Covenant, pl. 5. Cf. Spencer's Case, 5 Co. Rep. 16 a, 17 b, 18 a.

[7_82].Horne's Case, Y.B. 2 Hen. IV. 6, pl. 25.

[7_83]."Quod conceditur." Cf. Spencer's Case, 5 Co. Rep. 16 a, 18 a.

[7_84].It was quite possible that two liabilities should exist side by side. Bro. Covenant, pl. 32; Brett v. Cumberland, Cro. Jac. 521, 523.

[7_85].1 Co. Rep. 122 b; S.C., sub nom. Dillon v. Fraine, Popham, 70, 71.

[7_86].Essays in Ang. Sax. Law, 248.

[7_87].Y.B. 22 Ed. I. 494, 496.

[7_88].Y.B. 4 Ed. III. 57, pl. 71; S.C., 7 Ed. III. 65, pl. 67.

[7_89].Bract., fol. 17 b, 37 b; Fleta, III. c. 14, Section 6; 1 Britton (Nich.), 223, 233, 244, 255, 312; Abbrev. Plac. p. 308, col 2, Dunelm, rot. 43 (33 I.); Y. B, 20 Ed. I. 232; Co. Lit. 384 b.

[7_90].Hyde v. Dean of Windsor, Cro. Eliz. 552.

[7_91].Spencer's Case, 5 Co. Rep. 16 a. Cf. Minshill v. Oakes, 2 H. & N. 793, 807.

[7_92].Hyde v. Dean of Windsor, Cro. Eliz. 552, 553; S.C., ib. 457. Cf. Bally v. Wells, 3 Wilson, 25, 29.

[7_93].Dean of Windsor's Case, 5 Co. Rep. 24 a; S.C., Moore, 399. Cf. Bro. Covenant, pl. 32. Cf. further, Conan v. Kemise, W. Jones, 245 (7 Car. I.).

[7_94].F.N. B. 181 N; Sir Henry Nevil's Case, Plowden, 377, 381.

[7_95].Ewre v. Strickland, Cro. Jac. 240. Cf. Brett v. Cumberland, 1 Roll R. 359, 360 "al comen ley"; S.C., Cro. Jac. 399, 521.

[7_96].Cockson v. Cock, Cro. Jac. 125.

[7_97].Sale v. Kitchingham, 10 Hod. 158 (E. 12 Anne).

[7_98].Supra, pp. 396, 398, 400. Cf., however, Lord Wensleydale, in Rowbotham v. Wilson, 8 H. L. C. 348, 362, and see above, p. 391, as to rents.

[7_99].4 Kent (12th ed.), 480, n. 1.

[7_100].It is used in a somewhat different sense is describ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a tenant for life or years and a reversioner. Privity between them follows as an accidental consequence of their being as one tenant, and sustaining a single persona between them.

[7_101].Rowbotham v. Wilson, 8 H. L. C. 348, 362 (Lord Wensleydale).

[7_102].Harbidge v. Warwick, 3 Exch. 552, 556.

[7_103].Rowbotham v. Wilson, 8 El. & Bl. 123, 143, 144.

[7_104].5 Co. Rep. 16, a.

[7_105].Y.B. 8 Ed. IV. 5, 6, pl. 1; 22 Ed. IV. 6, pl. 18. Cf. 5 Ed. IV. 7, pl. 16.

[7_106].Cf. Keilway, 42 b, 46 b; 2 Bl. Comm. 329.

[7_107].Y.B. 14 Hen. VIII. 6, pl. 5. Cf. Chudleigh's Case, 1 Co. Rep. 120a, 122 b; S.C., nom. Dillon v. Fraine, Popham, 70-72.

[7_108].Lewin, Trusts, Ch. I. (7th ed.), pp. 16, 15.

[7_109].4 Inst. 85; Gilb. Uses (Sugd.), 429, n. (6); Lewin, Trusts (7th ed.), pp. 15, 228.

[7_110].Burgess v. Wheate, 1 Eden, 177, 203, 246.

[7_111].Lewin, Trusts, Introd. (7th ed.), p. 3.

[7_112].1 Rich. III. c. 1. Cf. Rex v. Holland, Aleyn, 14, Maynard's arg.; Bro. Feoffements al Uses, pl. 44; Gilb. Uses, 26* (Sugd. ed., 50).

[7_113].4th Inst. 85; S.C., Dyer, 869, pl. 50; Jenk. Cent. 6, c. 30. Cf. Gilb. Uses, 198* (Sugd. ed. 399).

[7_114].Gilb. Uses, 35* (Sugd. ed. 70).

[7_115].Theloall's Dig., I. 16, pl. 1.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财富的分配

[美]约翰·贝茨·克拉克

JOHN BATES CLARK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 THEORY OF WAGES, INTEREST AND PROFIT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财富的分配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 Theory of Wages, Interest and Profits

约翰·贝茨·克拉克 著

张文英 译

目 录

- Chapter I Issues that depend on Distribution 第一章 分配的相关问题
- Chapter II The Place of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Traditional Divisions of Economics 第二章 分配在传统经济学各分支学科中的地位
- Chapter III The Place of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Natural Divisions of Economics 第三章 分配在经济学各自然分支学科中的地位
- Chapter IV The Basis of Distribution in Universal Economic Laws 第四章 一般经济规律中分配的基础
- Chapter V Actual Distribution the Resul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第五章 实际分配——社会组织的结果
- Chapter VI Effects of Social Progress 第六章 社会进步所产生的影响
- Chapter VII Wages in a Static State the Specific Product of Labor 第七章 静态社会状态下的工资——独特的劳动产品
- Chapter VIII How the Specific Product of Labor may be distinguished 第八章 如何区别劳动的具体产品
- Chapter IX Capital and Capital-Goods contrasted 第九章 资本与资本货物的区别
- Chapter X Kinds of Capital and of Capital-Goods 第十章 资本和资本货物的种类
- Chapter XI The Productivity of Social Labor Dependent on its Quantitative Relation to Capital 第十一章 社会劳动

生产率是由社会劳动和资本在数量上的关系决定的

- Chapter XII Final Productivity the Regulator of Both Wages and Interest[^1] 第十二章 工资和利息的调节者——最终生产率[^1]
- Chapter XIII The Products of Labor and Capital, as measured by the Formula of Rent 第十三章 按地租公式计量劳动和资本的产量
- Chapter XIV The Earnings of Industrial Groups 第十四章 各行各业的收入
- Chapter XV The Marginal Efficiency of Consumers' Wealth the Basis of Group Distribution 第十五章 消费者财富的边际效率——小组分配的基础
- Chapter XVI How the Marginal Efficiency of Consumers' Wealth is measured 第十六章 如何计量消费者财富的边际效率
- Chapter XVII How the Efficiency of Final Increments of Producers' Wealth is tested 第十七章 如何检验生产资料最终增量的效率
- Chapter XVIII The Growth of Capital by Qualitative Increments 第十八章 通过定性的增量实现资本增长
- Chapter XIX The Mode of apportioning Labor and Capital among the Industrial Groups 第十九章 产业群之间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模式
- Chapter XX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ynchronized by rightly Apportioned Capital 第二十章 资本分配合理，则生产与消费协调
- Chapter XXI The Theory of Economic Causation 第二十一章 经济因果关系理论
- Chapter XXII The Law of Economic Causation applied to the Products of Concrete Instruments 第二十二章 应用于

具体工具产品的经济因果关系规律
- Chapter XXIII The Relation of All Rents to Value and thus to Group Distribution 第二十三章 各种租金价值关系及团体分配关系
- Chapter XXIV The Unit for measuring Industrial Agents and their Products 第二十四章 衡量产业因素与其产品的单位
- Chapter XXV Static Standards in a Dynamic Society 第二十五章 动态社会的静态标准
- Chapter XXVI Proximate Static Standards 第二十六章 近似的静态标准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Chapter I Issues that depend on Distribution

第一章 分配的相关问题

For practical men, and hence for students, supreme importance attaches to one economic problem—tha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mong different claimants. Is there a natural law according to which the income of society is divided into wages, interest and profits? If so, what is that law? This is the problem which demands solution. [1_1]

对于务实的人来说，尤其是学生们，他们最重视一个经济问题——那就是不同索赔人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将社会收入分成工资、利息和利润，这有自然规律可以依据吗？如果有，那又是什么样的规律呢？这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2_1]

A majority of men live chiefly by labor; and for these men the resultant of all the economic forces takes the practical form of wages. Arts have been mastered, labor has been divided and subdivided, and machinery has been set working; and as the result of it all, that which comes to wage-earners is the pay that employers give to them. The amount of this pay fixes the degree of comfort that these men themselves can enjoy, and the amount of culture, health and well-being that they can insure to their children. Moreover, the affects of high or low wages upon the welfare of the working class are cumulative, as generations succeed each other. The money that a man earns may be thought of as potential well-being condensed into a material form; and if workers now get

enough of it to put them on a high plane of comfort, their descendants will probably reach a higher plane. It is, then, the nature of the law of wages which determines whether the continuous life of working humanity shall have a rising or a falling trend.

大多数人靠劳动来谋生，对于这些人来说经济因素引起的结果都是以工资这种切实可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工艺被熟练地掌握，劳动力被划分并且细化，机器在不停地运转，这一切导致的结果是，工薪阶层的工资是由雇主付给他们的。工资的数额决定着他们享有的舒适程度，而且也决定着他们确保儿女受教育、健康和福利的程度。此外，由于代代相传，工资的高低对工人阶层福利的影响也是与日俱增的。一个人的收入也许会被看作是浓缩成物质形式的个人潜在幸福；如果工人们现在得到足够多的收入，可以使他们在高度舒适的环境下生活，那么他们的子孙的生活或许将更舒适一些。由其可见，正是工资规律所具有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劳动者长期生活水平的升降趋势。

Wages are usually paid by one person to another. The amount thus paid is adjusted by bargain, and may seem to depend on the comparative power and the adroitness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tract; for commercial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art, practised by both employers and workmen according to their several abilities. There is, however, a market rate of wages; and this is, in the main, controlled by ulterior and positive forces. The so-called “higgling of the market,” in fact, affects the rate of pay for labor only in a local way and within narrow limits. The amount that workmen can generally, by any shrewdness or firmness, exact from employers is limited, as we shall show, by the productive power that resides in labor; and the forces that control the prevailing terms of wage contracts are those which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that productive

power. There is, in short, a deep acting natural law at work amid the confusing struggles of the labor market.

工资通常是由一个人付给另外一个人。工资支付的多少通常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这看起来似乎取决于双方的相对能力以及精明程度。因为商业策略是一门重要的艺术，是雇主和工人们根据各自的能力而实行的。然而，还有就是市场化的工资；这主要是由积极隐形的力量所控制的。事实上，所谓的“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仅以本地化的方式在较小的范围内影响劳动薪酬。一般来说，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凭借精明的头脑和坚定的态度，工人们向雇主索要的工资数额也是受劳动中所包含的生产力所限制的；而控制工资合同通行条款的那几种因素，则是决定生产力数量的那些因素。简而言之，在劳动力市场那种混乱的斗争中，存在着一条深奥而实用的自然规律。

The function of this natural law is to separate the gross earnings of society into three generic shares that are unlike in kind. It causes the whole annual gains of society to distribute themselves into three great sums—general wages, general interest and aggregate profits. [1_2] These are, respectively, the earnings of labor, the earnings of capital and the gains from a certain coördinating process that is performed by the employers of labor and users of capital. This purely coördinating work we shall call the entrepreneur's function, and the rewards for it we shall call profits. The function in itself includes no working and no owning of capital: it consists entirely in the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of efficient relations between the agents of production.

这一自然规律的功能就是将社会总收入分成三种不同类别的份额。这一规律可以使社会年度总收益分成三大总额——即工资总额、

利息总额和利润总额。[2_2] 这几项总额分别指劳动的收益、资本的收益和由劳动的雇主和资本的使用者完成的某种协调过程的收益。这类纯粹的协调工作，我们称作企业家的功能，而其享有的报酬，我们称作利润。企业家的功能本身并不包括对资本的运作和所有，它完全在于建立和维持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有效关系。

We have said that the pay which, with all the bargaining strategy that they call use, workmen get from employers is limited by the productive power that resides in labor itself, and that a study of the wage law must search for the influences that fix this productive power. We may now advance the more general thesis—later to be proved—that, where natural laws have their way, the share of income that attests to any productive function is gauged by the actual product of it. In other words, free competition tends to give to label what labor creates, to capitalists what capital creates, and to entrepreneurs what the coördinating function creates.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工人尽管可以采取多种讨价还价的策略，但他们从雇主那里得到的工资还是受劳动力自身的生产力所限制，因此，有关工资规律的研究，也就必须探究决定这种生产力的影响因素。现在我们要提出更为一般性的论点——后面再予以证明——自然规律都有其各自的运行方式，收入的份额证明了任何生产功能都是由实际的产品所决定的。换话句说，自由竞争往往给商标标注劳动创造了什么，可以回报给资本家资本创造了什么，可以让创业者了解协调功能创造了什么。

The entire study of distribution is, in this view, a study of specific production. It is an analysis of the wealth-creating operation, and a tracing to each of the three agencies that together

bring wealth into existence of the part which it separately contributes to the joint result. To each agent a distinguishable share in production, and to each a corresponding reward—such is the natural law of distribution. This thesis we have to prove; and more hinges on the truth of it than any introductory words can state. The right of society to exist in its present form, and the probability that it will contribute so to exist, are at stake. These facts lend to this problem of distribution its measureless importance.

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关分配的研究也就是对具体生产的研究。它是对创造财富的活动所做的一种分析，并逐一探讨了创造财富的生产的三个要素对最终财富产生的贡献。在生产中每一部分都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份额，并得到各自相应的回报——这正是分配的自然规律。这一论点，我们还要予以证明；更多呈现出的真理比任何说明性的文字更能陈述这一论点。社会的权利以其现有的形式存在，以及还会继续如此存在的可能性，岌岌可危。这些事实使分配这个问题具有了难以估量的重要性。

The welfare of the laboring classes depends on whether they get much or little; but their attitude toward other classes—and, therefore, the stability of the social state—depends chiefly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amount that they get, be it large or small, is what they produce. If they create a small amount of wealth and get the whole of it, they may not seek to revolutionize society; but if it were to appear that they produce an ample amount and get only a part of it, many of them would become revolutionists, and all would have the right to do so. The indictment that hangs over society is that of “exploiting labor.” “Workmen” it is said, “are regularly robbed of what they produce. This is done within the forms of law, and by the natural working of competition.” If this charge were

proved, every right-minded man should become a socialist; and his zeal in transforming the industrial system would then measure and express his sense of justice. If we are to test the charge, however, we must enter the realm of production. We must resolve the product of social industry into its component elements, in order to see whether the natural effect of competition is or is not to give to each producer the amount of wealth that he specifically brings into existence.

工人阶级的福利取决于他们收入的多少；但是他们对于其他阶级的态度——因此，社会状况的稳定程度——则主要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他们生产出的是多还是少，而他们得到的又是多还是少。如果他们创造了一小部分财富并全部回报给他们，这样他们不会想着去改革社会；但是如果他们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却只得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样很多人就会变成革命者，并且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充斥着社会的谴责之声是“剥削工人”。“工人”被认为是“被盗走劳动生产的人。而且这一切都是在法律形式内按照竞争的自然规律而实现的。”如果这一控诉证据确凿，那么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变成社会主义者，并且他们对于改善工业体系的热情将成为衡量和表达他们正义感的标尺。然而如果我们要检验这一控诉的话，我们就要进入生产领域。把社会各行各业的产品分解成它的组成要素，进而来检验自然竞争的效应是否使每个生产者都得到各自所创造的那部分财富。

In case it shall prove to be true that products and shares do thus coincide, we need further to know whether each of these separate incomes grows absolutely larger or smaller. We must ascertain whether evolution makes labor more productive, and therefore better paid, or less productive, and therefore worse paid. We need also to know whether it treats capital and the undertaking function, in these respects, well or ill. As evolution proceeds, do

owners of capital and users of capital become better off or worse off? Having first tested the honesty of the social state, by determining whether it gives to every man his own, we have next to test its beneficence, by ascertaining whether that which is his own is becoming greater or smaller. The right of the present social system to exist at all depends on its honesty; but the expediency of letting it develop in its own way depends entirely on its beneficence. We therefore need first to know whether we have the right to let natural economic forces work as they are doing; and we need next to know whether, on grounds of utility, it is wise to let them work thus.

如果每个生产者的产品和所占财富份额相符，我们还需进一步了解各项收入是绝对增大还是绝对减少。我们必须弄清楚发展是使工人生产率提高了因而工资上涨了，还是使工人生产率降低了因而工资下降了。我们还需要知道在这几方面发展是重视资本及以企业的作用，还是漠视资本以及企业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资本持有者和资本运作者境况是变好还是变坏了呢？我们已经根据社会是否将属于每一个人的那一部分财产归其所有来检验社会的公正状态，接着我们还要根据个人所有的那一部分财产是变得越来越多还是变得越来越小，来检验社会的福利状态。现行社会制度能否继续存在的权利归根结底取决于它的公正；但是，令其按自己的方式发展是否合适，则完全取决于它的福利。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知道，我们是否有权让经济因素那样自己发挥作用，其次我们要知道的，从实用的角度看，让其运作是否明智。

The whole income of the world is, of course, distributed among all the persons in the world; but the science of distribution does not directly determine what each person shall get. Personal sharing results from another kind of sharing: only the resolving of the total

income of society into wages, interest and profits, as distinct kinds of income, falls directly and entirely with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Each of these shares is unlike the others in kind, since it has a different origin. One comes from performing work, one from furnishing capital and one from coördinating these two agents. Nearly every man's income, furthermore, is more or less composite. Laborers own some capital, capitalists perform some labor, and entrepreneurs usually own capital and perform a kind of labor. To what extent a particular man's income is derived from one source or another, depends on a wider range of influences than our present study can include. We cannot inquire how much labor a capitalist naturally performs. What we wish to ascertain is solely what fixes the rate of wages, as such, and what fixes the rates of pure interest and of net profits, as such. When these rates are determined, a particular man's income depends on the amount and kind of work that he performs, the amount of capital that he furnishes, and the extent and kind of coördinating that he does. That which is beyond his control, and fixed by a general and purely economic law, i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roduct that labor and capital, in themselves, can create and ultimately get.

当然，整个世界创造的财富都分配给了世界上所有的人，但是分配这门科学并不是直接决定每一个人都将得到什么。个人财富的分配是另外一种分配方式的结果：只有将社会总财富分成工资、利息、和利润三种类型，作为有明显区别的几种收入类型，才能直接并完全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这每一类分配各不相同，因为各有各的起源。其中一类来源于执行工作，一类来源于提供资本，还有一类来源于协调这两种生产要素而得到的成效。另外，几乎每一个人的收入或多或少都是复合型的。工人们拥有一些资本，资本家也进行一些劳动，而企业家通常既拥有自己的资本又做一定的劳动。从某种程度来说，一个人的收入来自于这种或那种方式，这取决于比我们现在研究的还要宽

泛的因素。我们很难探究一个资本家究竟完成了多少劳动。我们需要弄清的只是什么决定了工资额之类的，和纯利息的利率和纯利润的利率都是由什么来决定的之类的问题。当这些利率被确定下来之后，一个人的收入就取决于他工作的数量和种类，取决于他拥有资本的多少，以及他所做的协调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和种类。这些并非是人们所能控制的，而是遵循了一定的纯粹的经济规律，这种产品就是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所能够创造的而且最终所能得到的。

We are, then, to seek only to discover the forces that fix the amounts of the three kinds of income. It is a striking fact, however, that, even though we thus restrict the inquiry, we do, if we are successful, settle the great personal issues that range men in hostile classes. By discovering the law that fixes the rates of wages, of interest and of pure profits, we decide whether the man, A, has a grievance against B. We have not, indeed, thus ascertained why one of them has only $500 a year, while the other has $50,000; but we have ascertained something about the two incomes that decides whether each of them rightfully belongs to the man who gets it. The two kinds of distribution, however, though thus closely related, must be kept distinct.

接下来，我们仅要力图发现决定这三类收入份额的那几种因素。然而，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即使我们的研究受到限制，但是如果我们成功了，我们就解决了把人们按敌对阶层分类的重大个人问题。通过揭示工资、利息和利润的利率规律我们能够决定A是否对B有不满情绪。尽管我们并没有弄清楚为什么有的人一年只能赚500美元，而有的人却一年能赚50,000美元；但是我们还是证实了有关这两种收入是否真正属于这两类人的问题。然而，尽管这两种分配方式紧密相连，但必须区别对待。

Personal distribution decides what is the income of particular men. It gives to A $500 a year, to B $50,000, to C $500,000, etc., regardless of the way in which any one income is obtained. What we call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decides how much is secured in a particular way. It makes the pay for a certain grade of labor $1.50 a day, regardless of who performs the labor. It makes the rate of interest five per cent, regardless of who gets i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kinds of distribution is marked and important, for the dividing lines that are drawn by one of them cut across those which are drawn by the other. Taking the income of a particular man, as a dividend, by a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you may separate it into wages, interest and profits; for this individual man may get something in each of these ways. Taking all wages, as such, as a dividend, you may, by a personal distribution, separate this gross amount into the pay that goes to each one of a myriad of different men.

个人分配决定了特定的人会有怎样的收入。有的人一年的收入是500美元，有的人是5000美元，有的人是50000美元等等，不论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收入是如何获得的。我们所说的按职能分配，则是决定了在某个具体的行业应获得多少。这种分配确保了每天付给某个阶级的工人工人1.5美元，无论劳动的工人是谁。它确保了5%的利息，无论谁得到了这个利息。这两种分配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也很重要，因为给其中一个人所划的界限会影响到给另一个人所划的界限。把某个人的收入看作是被除数，那么按职能分配，可以将这笔收入分成工资、利息和利润；因为这个人以每种方式都可能获得一些东西。像这样将所有工资都看作是被除数，那么根据个人分配，可以将这个总额分成每人都能得到的一份工资。

Profits, in the abstract, be it noted, are not under a moral

obligation to wages in the abstract; although the entrepreneur, who gets profits, may owe something to his workmen, who get the wages. Rights are always personal; and only a sentient being has claims, as only an intelligent being has duties. There is, then, no issue of right or wrong involved in the fact that wages, as such, fall from a dollar and a half a day to a dollar; but the taking of a half-dollar from the daily pay of each member of a force of men, and the adding of it to the gains of an employer, raises between the parties a critical issue of justice or injustice. The question is: Has the employer taken something that the laborer has produced? Exactly this issue is forever pending between industrial classes. Every day a definite amount is handed over by one class to another. Is this amount determined by a principle that humanity can approve and perpetuate? Does it treat men fairly? The issue is personal; but it settled by a knowledge of purely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需要强调的是，理论上，利润并不对抽象意义上的工资有道义上的责任，虽然获得了利润的企业家，或许就欠得到工资的工人们一些东西。权利往往是属于个人的，而且只有感觉灵敏的人才有权利，只有聪慧的人才有责任感。因此，工资从每天1.5美元降至每天1美元这一情况时，跟本就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但是从每个劳动工人日薪中扣下0.5美元，将其加到雇主的收入中，这就在双方之间提出了一个公正与否的重要问题。其问题在于：雇主占有工人生产的东西了吗？实际上正是这个问题在产业阶级之间始终悬而未决。每一天都有一定数量的日薪从一个阶级移交到另一个阶级。这个数额是由人类批准并且延续的原则决定的吗？这条原则公平吗？这个问题是个人问题；但它又是由完全按职能分配的一门学科予以解决的。

If each productive function is paid for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its product, then each man gets what he himself produces. If he

works, he gets what he creates by working; if he also provides capital, he gets what his capital produces; and if, further, he renders service by coördinating labor and capital, he gets the product that can be separately traced to that function. Only in one of these ways can a man produce anything. If he receives all that he brings into existence through any one of these three functions, he receives all that he creates at all. If wages, interest and profits, in themselves considered, are fixed according to a sound principle, then the different classes of men who combine their forces in industry have no grievances against each other. If functions are paid according to their products, men are also. Hence, while rights are personal, the issue of rights that is involved in distribution is settled by a functional study.

要是每一种生产职能都按其产品数量给予报酬的话，那么每个人所能得到的也就都取决于每人各自的产量了。如果一个人工作，他得到通过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如果他也提供资本，那么他还能从他的资本所生产的那部分中再获得一份；进一步讲，要是他协调了劳资关系，那么他还可以得到溯及那种职能单独的产品。只有按照这其中的一种方法，一个人才能生产出东西。如果他凭借这三个要素中的任意一种，获得了他所生产的一切，那么也就获得了他所创造的一切。如果工资、利息和利润本身来讲，其本身都是按某种合理的原则确定的话，那么，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就不会互相抱怨了。如果这职能都是按它们的产量给予报酬的话，人们也应该按其产量获得报酬。因此，尽管权利是属于个人的，但涉及分配的权利问题却是通过对职能的研究予以决定的。

We ought, indeed, go into a further and purely ethical inquiry. We might raise the question, whether a rule that gives to each man his product is, in the highest sense, just. Certain socialists have,

indeed, contended that such a rule cannot attain justice. Work according to ability and pay according to need, is a familiar formula, which expresses a certain ideal of equity in distribution. This rule would require the taking from some men of a part of their product, in order to bestow it on others who might be more necessitous. It would violate what is ordinarily regarded as a property right. The entire question whether this is just or not lies outside of our inquiry, for it is a matter of pure ethics. Before us, on the other hand, is a problem of economic fact. Does natural distribution identify men's products and their gains? Is that which we get and which the civil law enables us to keep really our own property by right of creation? Do our actual estates rest, from their very beginnings, on production?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深入进行纯粹道德的研究。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给予每个人最高层次意义上的产品这个规则是否公正。实际上，有些社会主义者声称这一规则不可能实现公正。各尽所能，按需付酬，这是人们表达在分配上某种理想状态的惯用说法。这种规则要求人们从其产量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满足其他更加需要的人们。不过，这样做会违背了人们通常所说的财产权。这个公正与否的问题，不在这个讨论范围之内，因为它是一个纯伦理学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着一个经济事实问题。自然分配就能确定出人们的产品及其收益了吗？我们所获得的和民法规定我们有权拥有的，真的就是我们凭创造而获得的财产吗？我们现有的实际财产，从一开始就取决于生产吗？

When a workman leaves the mill, carrying his pay in his pocket, the civil law guarantees to him what he thus takes away; but before he leaves the mill he is the rightful owner of a part of the wealth that the day's industry has brought forth. Does the economic

law which, in some way that he does not understand, determines what his pay shall be, make it to correspond with the amount of his portion of the day's product, or does it force him to leave some of his rightful share behind him? A plan of living that should force men to leave in their employers' hands anything that by right of creation is theirs, would be an institutional robbery—a legally established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n which property is supposed to rest.

工人带着他口袋里的工资离开工厂时，这是民法保证它这样带走的；但在离厂之前，他是所在行业当天创造的财富中的一部分的合法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他所不明白的经济规律能决定他的报酬，使其与他日常生产产品的数量相一致吗？还是这迫使他要舍弃一些他应得的工资？迫使人们将通过创造的权利而获得的理应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留给雇主是一种体制性的敲诈勒索行为——这是对财产权原则的一种违背。

The is the problem that we have to solve. It is an issue of pure fact. If the law on which property is supposed to rest—the rule, “to each what he creates”—actually works at the point where the possession of property begins, in the payments that are made in the mill, etc., for values there created, it remains for practical men so to perfect the industrial system, after its kind, that exceptions to this prevalent rule maybe less frequent and less considerable. We can deal otherwise with robberies that are not institutional; but it is evident that a society in which property is made to rest on the claim of a producer to what he creates must, as a general rule, vindicate that right at the point where titles originate—that is, in the payments that are made for labor. If it were to do otherwise, there would be 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 explosive

element which sooner or later would destroy it. For nothing, if not to protect property, does the state exist. Hence a state which should force a workman to leave behind him in the mill property that was his by right of creation, would fail at a critical point. A study of distribution settles this question, as to whether the modern state is true to its principle. Property is protected at the point of its origin, if actual wages are the whole product of labor, if interest is the product of capital, and if profit is the product of a coördinating act.

这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是纯粹的事实问题。如果财产理应分配这一规律—“谁创造归谁所有”这一规则——果真就在财产所有权归属开始之初发挥作用了，那么，在工厂所付的费用等，因其所创造的价值，会留给务实的人去完善行业制度，此种制度后，对流行规则的期待或许就不会那么频繁，要次要一些了。对于不是体制性的敲诈勒索，我们就得反其道而行之；不过显而易见，在社会中普遍认为财产权取决于生产者对其所创造的产量，一般来说，必然维护所有权的起源——也就是说对劳动的报酬所拥有的权利。否则，在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就会有一种爆发性因素，其迟早会毁了这一基础。要是不保护财产，就没有必要存在国家了。因此，一个国家要使迫使一个工人把凭借创造权本属于他的财产扣除并留给工厂，那么，它就会在某个关键时刻功亏一匮。有关分配的研究解决了现代国家是否适用这一原则的问题。如果实际工资是劳动的全部产品，如果利息是资本的产品，如果利润是某种协调行为的产品，那么，财产从一开始就会处于保护之下。

[1_1].By "wealth" is meant those sources of human welfare which the are material, transferable and limited in quantity. See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Philosophy of Wealth by the author of the present work.

[1_2].The rent of land is to be regarded—for reasons that will appear later—as merged with interest. This, however, involves an extension of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rent, rather than a denial of it.

[2_1].所谓“财富”，是指人类福利的来源，即能够转移的数量可计算的原材料。参看本书作者所著的《财富的哲学》的第一章。

[2_2].要考虑土地租金问题——后面将提到原因——在这里是与利息合并在一起的。不过，这是对传统地租理论的扩充，而非对该理论的否定。

Chapter II The Place of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Traditional Divisions of Economics

第二章 分配在传统经济学各分支学科中的地位

We have undertaken to solve a test problem of distribution—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division of the social income into wages, interest and profits is, in principle, honest. We have seen that this compels us to enter the realm of production, in order to find whether these incomes are earned. Is each of them specifically created by the agent that gets it? If it is, the entire science of distribution is nothing more than a science of the process of specific production. In any case, the relation of the wealth-creating process to the wealth-dividing process needs a most searching examination.

我们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分配中的问题——确定一下将社会收入分为工资、利息和利润这种分配方式从理论上讲是否合理。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判断社会收入是否各归其主，迫使我们进入到生产领域进行研究。我们想知道是否每个创造财富的元素都能得到属于各自的那部分收入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整个分配的科学就是一门具体生产过程的科学了。在任何情况下，财富的创造过程和财富的分配过程的关系都需要进行最仔细的研究。

The terms,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have been used to designate four divisions of economic science. These, however, are not distinct divisions; for one of them includes two of the others.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 as it is carried on by an organized society, is a process that

embraces within itself both exchange and distribution. This fact makes it necessary completely to rearrange economic theory, for purposes of study, and to divide it according to a new principle. The old landmarks of the science will not entirely disappear, for it will still be necessary to speak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tc., as processes that are going on, and that can be defined and understood. As divisions of the science, however, they will vanish; for the demarcations that have been made between them correspond to nothing in actual life. They are forced distinctions, made for the sake of resolving into smaller areas a field that is too large to be dealt with as a whole. As we throw them away, the economic field takes on an entirely new appearance, and it will soon be seen that this is its true and natural appearance. This field will still, however, have its divisions; and it is a striking fact that the study which shows how hopelessly blended are exchange,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has also the effect of revealing three divisions of economics that are natural and clear. We attain the true divisions, in fact, by perceiving why we may not use the old ones.

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些术语一直被用来区分经济学的四个分支学科。但是，这些学科并不是完全界限分明的学科；因为其中的一个学科还包含着另外两个学科。因为是由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进行的，财富的生产是一个本身就包括交换和分配的过程。为了研究起见，这一事实必须使得经济理论完全予以重新分类，并且是按照某种新的原则进行重新分类。经济学过去的标志并不会完全消失，因为它还很有必要对生产、分配等内容进行解说，成为可以被认可和被理解的过程。然而，作为这门科学的各分支学科，它们都会消失；因为在这些分支学科之间所确定的那些界线，在现实生活中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它们不得不进行区分，由于太大，无法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不得不分解成几个小的领域来进行研究。当我们丢掉这些划分时，经济领域就会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并且这是它真实和自然的面貌。然而，

在这一领域中仍然存在着各个分支。一个不争的事实告诉我们，经济学中的交换、分配和生产这三部分仍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对揭示自然而清晰的经济学三大分支有影响。事实上，通过感知了解为什么不能用旧的，才能得到真正的学科分支。

Production is the bringing of commodities into existence; and in any state except a primitive one it is accomplished by a division of labor. The producer is a specialist, selling one article, or a part of an article, and buying what he needs with the proceeds. Only society in its entirety is an all-around creator of goods. This is equivalent to saying that social production is now accomplished by means of exchanges. The passing of goods from man to man enables all society to make all goods; and the two expressions, “division of labor,” on the one hand, and “exchange,” on the other, merely describe in different ways the organized process of creating wealth, as contrasted with the method of isolated and independent production. Where a thing stays in one man's hands until it is finished and in use, production is not yet socialized. [2_1] Society in its entirety is the one producer of wealth. Exchange is, then, the socializing element in production. It is a characteristic part of the comprehensive process.

生产就是将商品问世。除了原始社会以外，在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生产都是通过分工完成的。生产者通常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懂得卖掉商品，或者卖掉商品的一部分，并且懂得购买他们生产中所需要的东西。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社会才是万能的商品制造者。也可以这样说，当今的社会生产是通过交换而实现的。商品由人到人的传递使得整个社会创造了所有的商品。当与单独、独立的生产对比时，一方面“劳动分工”，另一方面，“交换”这两种表达，当与单独、孤立的生产对比时，无非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描述了创造财富的有组

织的过程。商品直到完成并且投入到使用中，只要还在人们手里，生产就还没有被社会化。[3_1]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财富的生产者。而交换，则是生产中的社会化因素。这是这个综合过程中的一个典型部分。

The relation of man to Nature in the productive operation remains unchanged, however much society may be organized. The earth still gives matter, and man transforms it. The making of a steel tool in a modern shop is, in this respect, akin to the fashioning of a stone hatchet by a prehistoric man. What is new in social production is the relation of man to man. Interdependence has supplanted independence: a great organization has taken the place of a mass of unconnected producers. Specializing and exchanging have made this difference.

不论社会组织化程度多高，生产中人和自然的关系一直都没有改变。地球依然提供物质资源，人类将之加以改造。就这一点来看，现代车间里制造的钢质工具就像史前人类利用石料制作斧头一样。社会生产中新出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互依存已经取代了独立性：好的组织代替了大量没有联系的松散的生产者。生产专业化和商品交换促使了这种改变的发生。

Production by society as a whole, moreover, involves a fixing of values. If we part with our own products, something must decide how much we are to get in return for them. The ratios of exchange that a market establishes have, not unnaturally, been treated in that division of the science which is customarily entitled exchange. Is that, however, the proper place for them?

此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生产，还与固定的价值观念有关。如果我们卖掉自己的产品，我们就会考虑能从中得到多少收益。市场中所形成的不违反常情的交换比例，现在已按照惯例在交换那一科学分支中给予论述了。然而，在交换分支学科中对其进行论述是合适的吗？

There is a kind of distribution that does not fix the rates of wages and interest, but determines how much one industry, as a whole, including its laborers, its capitalists and its entrepreneurs, shall get, as compared with other industries. It determines whether one whole branch of business shall be more prosperous than another. This is an intermediate part of the general distributing operation. and it is accomplished by means of prices. When wheat, for example, is high in price, the farming industry is well paid, as compared with others; and when wheat is cheap, that industry is ill paid. If what we have in mind is the so-called “market price” of an article,—the immediate price of any given supply of an article,—this kind of value governs what we may call group distribution. If steel, for example, sells at a high rate, a large income goes to the group that produces it. This income distributes itself somewhere in the group; but how much of it laborers get, and how much capitalists and employers get, is a question that we do not now raise. This is determined by an ultimate distribution taking place within the groups. Group distribution is a preliminary division of the social income, and it deals with branches of industry in their entirety. The terms of this primary division of the social income depend on the prices of different kinds of goods. Farmers want wheat to be dear, as miners want ore to be dear, etc. Prices, then, fix the incomes of these groups.

有一类分配并不决定工资和利率，而是决定一个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它的工人、资本家和企业家在内，与其他行业相比，能得到多少。这一类分配决定整个商业分支是否会比另一个商业分支繁荣。这是一般分配程序中的一个中间部分，并伴随着各种价格而实现的。拿小麦来说，如果小麦的价格高，那么农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收入就会比较好，同样，如果小麦的价格低，农业的收入就会锐减。对于一件商品，我们记住的是它的所谓的“市场价格”——即商品在供给下的既时价格——这种价值控制着我们所谓的行业分配。例如，如果钢铁以高价售出，那么生产钢的行业就会有很高的收入。这些收入在行业中自行分配；但是，工人得到多少财富，资本家得到多少，雇主得到多少，这一问题我们暂不提出。这是由行业中的最终分配决定的。行业分配是社会收入的一种初步分配，它是用来解决行业内部的分工问题的。社会收入的最初分配取决于不同种类商品的价格。农民希望小麦价格高，矿工希望矿石价格高，如此等等。所以说价格决定了这些行业的收入。

The great income of all society—that which is to be distributed—really consists of concrete articles, all for some use, Most of them are goods for consumption; and they serve to stock retailers' shops, while waiting for purchasers. In some way this promiscuous stock of consumers' goods gets divided into shares, of which every man, whether he be a laborer or a capitalist, gets a part. There is no way in which the fixing of the terms of this division can be begun and completed after the goods are finished and exposed for sale. If, before the stock of goods was ready to be taken by consumers, nothing had been done to decide how much each laborer and each a capitalist might have, the distribution would have to be made according to some arbitrary rule and by some officer of the state. The terms of the division that is actually made, however, are fixed as the production of the goods goes on: the goods are really apportioned in the making.

整个社会的巨额收入——有待分配的——实际上都是由具有某种用途的具体商品构成的；其中大多数都是消费品；它们被储藏在零售商店中，等待着人们的购买。这个日杂消费品储备，要以某种方式分成几份儿，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他们都可以从中能够得到一部分。绝对没有商品已经生产完成并等到销售时才开始完成分配的这种情况。假如在商品被销售之前还无法决定每个劳动者和每个资本家能获得多少的话，那么，分配也就只能根据任意的规则来决定，并由某个国家官员来付诸实施了。但是，实际上的分配，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就已经被决定了：商品的确是在制造中就予以分配了。

The creation of such a general stock of commodities for use is a great synthesis, which goes on in a systematic way. One group of producers makes the article A, another group makes B, another C, etc. As A is sold, the sum that is paid for it is apportioned among the entire group that makes it; and as B is sold, the returns from this sale are divided, in the same way, among all who have helped to make this article. The prices of completed articles thus fix the incomes of groups in their entirety, These sub-groups are, in an equally exact way, divided into sub-groups. Thus it takes farmers, wool merchants, manufacturers, dyers, cloth merchants and tailors to make a coat. Each of these classes constitutes a sub-group; and each gets a share of the returns of the general group—a share in every case dependent on prices. If wool is dear, farmers thrive; and i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ice of wool and the price of cloth is large, manufacturers thrive. It is market values that fix the incomes of sub-groups, as well as those of groups.

这种备用商品存货的形式是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一个综合过程。一个行业的生产者生产了产品A，另一个行业的生产了B,还有的行业

生产了C，等等。如果售出商品A，那么所得的收入就会在全行业中进行分配；同样售出商品B所得到的回报会以同样的形式进行分配，参与生产商品B的人都会得到回报。商品完成时的价格决定了整个行业的收入，这些亚行业按照同样严格的方式被分成各次行业。这就使农场主，羊毛商，制造商，染料者，服装商和裁缝共同来完成一件大衣的制作。每一类都构成了一个亚行业；并且都从整个大行业中分得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回报——每一份回报都依赖于商品的价格。如果羊毛很贵，农场主就会赚很多钱；同时，如果羊毛的价格与大衣的价格差距很大，那么制造商就会赚很多钱。正是市场价格决定了各亚行业的收入，那些行业也是。

Neither of those price-adjusting operations, however, directly fixes wages and interest. This is the final and critical part of distribution. It takes place within the sub-groups, and it constitutes the third and final division that has to be made. The portions of income that fall to farmers, manufacturers, etc., as such, have to be further subdivided; for a share must be paid to every laborer and to every capitalist. This last division is not made, however, as the mere general divisions are made, by a mere sale of finished goods: finer and more difficult adjustments are involved. We need now to have clearly in mind the systematic way in which the division of the grand stock of usable goods proceeds, the manner in which it follows the stages of production and the part that the fixing of exchange values has in it. This distribution goes on in three distinct stages. There are to be made a division, a subdivision and a final subdivision of the social income. The first division fixes the income of industrial groups; the second fixes that of sub-groups, and the final division adjusts wages and interest within each of the innumerable sub-groups in the system. The shares of the groups and those of the sub-groups depend entirely on the prices of goods, and therefore the fixing of market values results in the adjustment of the

terms of group distribution,

然而，没有一种价格调整手段能够直接决定工资和利息。这是分配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它发生在各亚行业中，并构成了第三次分配和最终分配。分给农场主、制造商等的那几部分收入还要被进一步细分；因为每一个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必须得到一部分收入。然而，这最终分配就不继续进行了，因为上述种种常规分配，只不过是按照制成品销售量作出的分配而已：在这里，是包含了更为精细、难度加大的种种调节在内的。现在我们需要弄明白的是分配商品存货总量所采取的那种系统方法，每一个生产阶段的方式，以及他在决定交换价值中所起的作用。这一分配分三个不同的阶段进行。社会收入被分为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最终分配。第一次分配决定了各行业的收入，第二次分配决定了各亚行业的收入，最终分配对系统中各亚行业的工资和利息进行了调节。各行业和各亚行业的收入完全取决于商品的价格，因此，是市场价值对行业分配起到了调整性作用。

A''' A'' A' A

B’’’B’’B’B

Thus, let A''' represent some one completed product, any bread; and let A represent raw material, the standing wheat of which it is mode. A' may then represent the wheat as threshed and conveyed to the elevator of a milling company, A''' may represent it as it is ground into flour, and A''' may represent it baked into loaves. In like manner B, B', etc., represent another commodity—say, woollen clothing—in its several stages of advancement, and the series of C's represent still another commodity. All the A's constitute the product

of one general group; and the price of A''' fixes the size of its entire group income. The prices of B''' and C''' likewise fix the general incomes of the two groups that make them. Similar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ice of A'' and that of A''' fixes the income of the sub-group that transforms the one article into the other. In this case the difference is the gross income of the baking industry. In the same wa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ice of A' and that of A'' determines the income of the flouring industry, etc. The income of each sub-group in the whole series, then, depends directly on prices.

因此，让A’’’代表一种制成品，例如面包；让A代表原材料，例如小麦。A’即代表经脱粒后运往一家面粉公司仓库的小麦；A”代表磨成面粉的小麦，A’”则代表烤好的面包。依此类推，B和B'等代表的是另一种商品——比如说，毛料衣服——有待深加工的；而C又代表着一种商品。所有生产A’的部门构成了一个大的行业；而A'''的价格决定了整个行业的收入规模。B'''和C'''的价格决定了其所在两个行业的总收入。类似的，A''与A'''的价格之差，决定了把一种产品变成另一种产品的那个亚行业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此差价就是面包业的总收入，以同样的方式，A'与A''的差价决定了磨粉业的收入。由此可见，整个过程中每个亚行业的收入均直接取决于价格。

A philosophy that goes behind such market prices, however, brings us to what are called “natural” or “normal” prices. These are the values, expressed in terms of money, to which, in the long run, market values tend to conform. These normal values are also in another way, phenomena of distribution; for a certain force that operates within the sphere of group distribution establishes the normal standards to which market values tend to conform. We have just seen that market prices fix the incomes of the different groups,

as such, and so control distribution in its early stages. We have now to see that a deeper force, and one that also acts in distribution, controls normal prices. Market prices are the cause of group distribution; normal prices are the effect of a certain phenomenon of distribution. The adjustment of natural or normal prices is a part of the distributive process. The movements that make prices "natural" are, in fact, efforts on the part of different men to get their natural shares of income.

然而，这种市场价格背后的哲学使我们想到了所谓的"自然"价格或"正常"价格。这类价格是用货币来表示，从长远来看，市场价格往往会与这种价格趋于一致。换句话说，这些常态价值也是分配现象；这是因为有某种在按行业分配中起作用的因素，这种因素确立的正常标准往往会与市场价格趋于一致。我们刚刚探讨过，市场价格决定着各行业的财富收入，情况确实如此，而且还在分配的初级阶段控制着分配。我们发现还有一种更深刻的因素在分配中起作用并控制着正常价格。市场价格导致行业分配；正常价格是受分配的影响所产生的现象。对自然和正常价格的调节是分配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使价格"自然"的这些行为，事实上，影响着不同的人得到自然的那份收入。

Prices are at their natural level when labor and capital in one industry produce as much and get as much as they do in any other. Normal prices mean equalized wages and equalized interest. If the prices of wheat, wool, iron, lumber, etc., were such that no laborer and no capitalist could acquire an enlarged producing power by leaving the industry that creates one of these commodities, and betaking himself to one that makes another, the price of each of the commodities would be normal.

当劳动和资本在一个行业中的产量和回报与在另一行业中所得一样多时，价格也就处于自然水平了。正常价格是指等量工资和等量利益。如果小麦、羊毛、铁、木材等等的价格是这样的，只要离开生产某种商品的行业，而全身心投身于制造另一种产品，工人或资本家就得不到扩大的生产力，此时，这几种商品中每一种的价格，都会是正常的。

The familiar definition of natural price is: that which conforms to the cost of production. The economist has been in the habit of putting himself, in imagination, in the business man's position, and of considering the money that he pays out in producing an article as the cost and what he gets by selling the article as the return. The tendency of competition, according to this conception, is to bring the price down to the point at which the return equals the cost. This is, however, an individualistic and limited view of the law of normal prices. It presents that law as it appears to a man who is performing his one particular part of the social operation of creating wealth. The broad view, on the other hand, presents the law as it appears to a student who has all society within the range of his vision. It is, indeed, true that the normal price of each article is its cost. The cause of this, however, is not local in the industry; it is not anything that takes place within the one group that makes the commodity. The influence that brings, let us say, cotton cloth to a natural price is one that works throughout the productive system. A broadly social tendency it is, in fact, that makes any one price normal. The traditional statement of the law of normal price is not incorrect; but it is misleading, because it is partial and inadequate. It presents things from an entrepreneur's point of view, instead of from a social point of view.

人们熟悉的自然价格的定义是：与生产成本相一致。经济学家习惯将自己置于想象之中，站在商人的角度上，考虑生产一件商品所投入的成本和卖掉这个商品后的回报。按照这种设想，竞争的趋势就会使价格降至到收益与成本相等的程度。然而，这是对正常价格规律所持的一种个人主义和不全面的看法。这表明，该规律一出现，就会向创造财富的社会活动中某一特殊人群展示这一规律。从另一种宽泛的角度看，这一规律一出现就将其展示给一位学者，将整个社会都收入其视野之内。事实上，每个商品的一般价格正是生产它的成本。然而，引起这个的原因在行业中并不是局部的；这与发生在制造该商品的这个行业内的一切都无关。这种情况所带来的影响，正如我们所说，棉衣是通过生产系统而完成了自己的自然价格一样。事实上，广义的社会趋势就是使任何商品价格都趋于正常化。传统上关于价格规律的陈述并非不正确；但是因为它的片面性和不充分性，它有一定的误导性。它是以企业家的观点来诠释事物，而不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待问题。

It will be seen, when we make a fuller study of this subject, that a condition in which all things sell for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they have cost—including interest and wages of management, as elements of cost—is a state in which the gross gains of the different industrial groups are brought to pro rata equality, that is, to a condition in which the returns of all groups yield the same amounts per unit of capital and also the same amounts per unit of labor. Cost prices, then, are those that give equalized earnings.

当我们在充分研究这一课题之后，就会发现卖掉所有的商品是为了得到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成本——这其中包括管理所需的工资和利息，这也是成本的一部分——投入这样的一份金额，也就是把各行各业的利润总额按比例拉平，或者使各行业的单位生息资本等量于单位生息劳动。由此可见，成本价格等于收益价格。

It is comparative gains, and not the gains of any one group, that test prices, and determine whether they are normal. Thus, the present price of wheat is such as to afford a larger product per unit of capital than is afforded in some other industries; it is above the natural standard, and would be so even if wages and interest were locally so high that entrepreneurs got nothing above cost of production. If the result of this should be should be to draw men and capital from other occupations to the raising of this cereal, the operation would end by reducing to nothing the excess of gains that is now secured in this occupation. Prices would then be normal, provided that no other causes had meanwhile noted to disturb the equality of the earning power of labor and capital in the group system. It is because the prices then realized would afford to the different industrial groups equalized returns, that the prices themselves are to be called normal. The term really signifies that group distribution is in a natural state. Equal products everywhere per unit of labor and equal products per unit of capital—this is the condition that affords natural prices of goods. Incidentally, this condition gives what have been defined as cost prices.

检验并确定这种价格是否是正常的比较收益，而不是任何一个行业的收益。如果说，小麦现在的价格过高，以至于每一个单位的资本创造的收益高于其他行业；如果当地的工资和利息过高，以致于企业家在扣除生产成本之后将一无所获，那么就超出了自然水平，并且是相等的。如果这一结果将其他行业的劳动力和资本吸引过来种植这类小麦，那么这一行业的运作也会因剩余价值的降低而停止。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去干扰行业体系中的劳动力和资本收益能力相等的这种情况，价格将会趋于正常。这是因为实现的价格会导致各行业的生产部门的回报均等，这种价格通常被叫做正常价格。这个词表明了行业分配是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下进行的。任何地方都是单位劳动力产量相

等、单位资本产量相等——这是提供物品自然价格的前提条件。顺便提及的是，这一前提条件给出了成本价格的定义。

When, therefore, men have no further inducement to move from one group to another,—that is, when group distribution is natural,—prices are natural. This requires that labor and capital shall be so apportioned among the various industries that there is neither overproduction of one article nor underproduction of another. Society must, in short, so direct its productive energies as to make different goods in the right quantities. The production of each specific article must be normal in amount, in order that the prices of it may be normal. The influence that brings production to this natural state is the effort of laborers and capitalists to seize any special gain that maybe offered to them, by moving to any group in which the price of the product is high. This is clearly an operation in group distribution. Thus an influence that originates in distribution brings about a state of social production in which exchange values are normal. Where, then, within the four traditional divisions of economic science should the study of exchange value be located? The phenomenon itself is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exchange: the proximate cause of it is a state of production; the ultimate influence that controls it is an action of the forces of distribution.

因此，当人们再没有理由从这一行业转向另一行业，即当行业分配是自然形成时，价格才是自然的。这要求劳动力和资本在各行业中做相应分配，这样既不会出现生产过剩也不会有生产不足的现象。简而言之，社会必须这样指导生产力，以生产出各种数量适中的产品。各种具体物品的产量都必须处于正常水平，为了其价格可能归于正常。产量之所以达到这一自然状态，是因为工人和资本家离开原来的

行业，转向产品价格较高的行业来获取额外利益。这显然是行业分配的行为。这样，源于分配的影响，导致了社会生产状态中的交换价值趋于正常化。那么，在经济学四大传统分支学科中，交换价值研究应该属于哪一类呢？这一现象本身与交换有直接的关系:其近似原因是生产状态；支配它的最终影响则是分配诸因素的一种作用。

It is clear that the study of market value falls within the science of distribution. On the surface it is current market prices that control the distribution which takes place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r specific industries. These prices, however, are transient, and they fluctuate about certain more permanent standards. The tendency of group distribution to become normal—that is, to bring wages and interest to an approximate equality in different industries—draws prices toward the normal standard.

很明显，关于市场价值的研究属于分配科学。在表面上看，是当下的市场价格控制了发生在不同小组间或各行业间的分配。然而，这些价格都是瞬息万变的，并且是围绕着某几种更持久的标准来回波动的。行业分配趋于正常化——使各行各业的工资和利息都接近于相等——这种趋势使价格趋于正常化。

What, then, is left to be treated under the title, exchange? Only the actual passing of goods from hand to hand. This process results in ranging men in distinct groups, each of which has its part to play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production. Exchange fixes the form of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 Back of each finished article that the shops offer to us there is ranged a series of specialized producers, each of whom has taken his turn in putting a touch upon it. Intricate, indeed, is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for productive

purposes; but the principles that give shape to it are simple. They are the subjects of the theory of exchange, which is the theory of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 When we examine the system of groups of which society is composed, we shall perceive the full meaning of this statement. For the present, be it noted that exchanges divide and subdivide industry: they range its forces in groups and sub-groups, the functions of which are determined by natural law.

那么在交换的这个课题下还需要讨论什么呢？只剩下实际中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了。这一过程导致人们在不同的行业中进行角色分类，每一个行业都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交换决定着工业的组织形式。商店为我们提供的每一个商品背后，都有一系列的专业生产者，每一个人都依次参与了商品的制造。诚然，以生产为目的的社会组织是错综复杂的；但使之成形的那些原则却是简单的。这些原则是交换理论的研究对象，而交换理论则是工业社会的组织理论。当我们审视组成社会的行业系统时，我们就能对这一说法有更全面的理解。就现在来说，交换被认为是划分和细化了各行业：它在各行业和亚行业中组织生产力，而这些功能都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

It is, further, clear that all this disposing of the agents of production—this putting of some labor and capital here, and other labor and capital there—is a phenomenon of social production, a part of the social productive organization. It is a certain marshalling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placing them where they will do the most good. Production, in fact, embraces every economic operation except consumption. Exchange is merely the typical feature of production, as carried on by groups. Under this head we shall describe the group system of industry. We have seen that an influence which acts in distribution fixes the sizes of the groups and

the amount of goods that each shall create. In the way that we have just noted, it guards against the production of too much of one commodity and too little of another. This is also a part of the all-embracing process of social production.

更近一步来说，对各种生产要素所进行的一切安排——将一些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这一行业，将另外一些投入到另一行业——这是一种社会生产现象，也是社会生产组织的一部分。这是对生产力作出的某种安排，将生产力安排在能发挥最大效率之处。事实上，除消费外，生产包括一切经济活动。交换只是生产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在各行业中都有所表现。在这一问题下，我们还要描述行业的小组系统。我们已经发现作用在分配上的影响力，决定着各行业的规模和其生产的产品总量。如上所述，这能防止某种商品生产过剩，而另一种商品产量不足的情况发生。这也是所有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

There is another and an even more important kind of distribution that falls within production. The distribution which connects itself with values, and the study of which gives a science of value, is that which takes place between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their entirety. Thus, a high price for wheat makes the raising of that cereal a well-paid occupation, and puts a large sum into the possession of the group of laborers, capit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who jointly raise it. How much of this large return goes to laborers? Hew much goes to capitalists? How much remains in the hands of entrepreneurs? These, as we noted, are questions involving distribution of another kind. Within each industry there is this final division to be made. After the returns of each sub-group, taken as a whole, have been determined, this lump sum is to be apportioned among different claimants within it; and this is the final process in the distributing of the social income.

在生产中还有另一种更重要的分配形式。这种与价值紧密相连的分配，及给出科学价值的研究，在所有不同社会行业间产生。例如，小麦价格的提高使谷物业成为收益较好的行业，因此这一行业中的劳动力、资本家和企业家集体得以拥有巨额收入。那么劳动力能够得到多少回报呢？资本家又能够得到多少呢？企业家又能得到多少收益呢？正如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涉及到另外一种分配方式。在每一个行业中，都会有最后分工。作为一个整体，每一个亚行业的收益数额定下来时，这笔收入就会在对该报酬提出要求的人们之间进行分配；这就是社会收入分配的最后一个环节。

In the final division that takes place within the sub-groups—the division that separates the gross earnings of each of them into wages, interest and profits—a law of production rules. So far as natural laws are unperverted, labor tends to get, as its share, what it separately produces; and capital does the same. The laborer who has helped a farmer to raise wheat naturally gets the value of that part of the wheat crop which is separately due to his labor. This statement requires proof, and will receive it: but it must stand for the present, as a thesis to be established by a later study. What is now clear is that, if it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whole of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the whole of exchange, would be included within the organized process of producing wealth. Unravel the web of the social product, tracing each thread to its source, and you will have solved the problem of distribution. This is an analytical study. It traces backward, step by step, the synthesis by which, through the putting together of many different things, the great social dividend of usable goods is created. It first traces to each group its share in the creating of the grand total; then it traces the part of this that each sub-group has contributed: : and finally it attributes to labor and capital their several shares in the creating of the sub-

group product.

生产规律对各次行业的最终分配起着支配作用——每一亚行业的全部的收入被划分为工资、利息和利润。只要自然规律正常运作，劳动往往会把单独生产的那部分归于自己；资本也是这样的。帮助农民种植小麦的工人自然就会得到小麦产量中属于他劳动所得的那部分价值。这一说法还需要证实，它也将会被证实：但它必须体现现状，这一论点我们将在后面进行研究。现在已经明确的是，如果这一论点成立，整个分配和交换过程都将属于有组织的财富生产过程。要想解开社会产品这张大网，就要探索生产的每一项来源，并且还有解决分配问题。这是一种分析性的研究。这种追溯步步深入，通过将各种不同的事情放在一起，大量可用商品的社会总收入额也就形成了。这种研究，首先追溯各行业在创造社会总财富中所占的份额；然后追溯各亚行业所占的份额；最后追溯劳动力和资本在创造亚行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

We may, then, gather into the comprehensive science of production all the economic processes that go on in an organized or social way. There is, then, it appears, no separating of the processes that traditional theories have treated as distinct divisions of the science. Here, for example, working in a shoe shop, is a man who gets two dollars a day. Let us set before ourselves the problem of accounting for the amount of his wages. He is a part of a sub-group; and we have first to account for the way in which society has thrown itself into the systematic shape of groups and sub-groups, which exchange products with each other. We discuss the theory of exchange, in the narrow and accurate sense of the term, when we account for this group arrangement which is brought about for the sake of carrying on production in an organized way. In treating exchange, therefore, we are entering on the treatment of

production. What the man gets is a part of what his sub-group gets; and this is fixed by the law of group distribution—the law of market value. Market value, however, depends on the relative quantities of the different articles that are produced; and this is saying that it depends on comparative group production. We are, then, still within the more general science of production when we thus try to trace to its causes the income of the sub-group from which the shoemaker's wages are taken. When we have discovered the influences that act on the sub-group's income, we must see why the shoemaker's share of that income is two dollars a day. This will take us into a further study of specific production. We shall have to find out, first, whether the man's pay tends to equal what he separately produces; and, secondly, what fixes the amount that he is able to produce. This is the study of distribution in its final stage, but it is also a study of production. We have, then, studied in part each of the four traditional subjects except consumption, in investigating the causes of the two dollar wage for the shoemaker's labor; and yet we have been, all the while, within the subject of social production.

因此，我们我通过有组织的社会方式将经济过程中与生产有关的所有复杂科学集合在一起。于是，这些过程看似相互连贯，但是，在传统的理论中他们却被视为各不相同的科学分支。例如，一个人在鞋厂工作每天有2美元的收入。在这里，我们先把他的工资额做一下说明。他是此亚行业中的一员；我们首先要对社会中各行业和亚行业所做的系统安排进行说明，他们之间相互交换产品。当我们用有组织的方式来看待生产中的行业安排时，我们要用专业术语来狭义、准确地讨论交换理论。因此，在讨论交换时，我们也就开始了有关生产的讨论了。一个人所得是他所在的亚行业所得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是由行业分配规律也就是市场价值规律所决定的。然而，市场价值取决于生产出的不同商品的相对数量；也就是说这取决于相对行业生产。当我们尽力从制鞋工人工资的制定中追溯亚行业收入的起因，其实我们

还是停留在更一般的生产科学基础上了。当我们发现作用在亚行业收入中的影响力时，我们也就知道了为什么制鞋工人每天能够有2美元的收入。这就将我们引向对具体生产的深入研究。首先，我们要证实人们的收入是否与他们各自的生产相等；其次，我们要探究是什么决定了他们的产量。这是关于分配的最后一个阶段的研究，但同时也是对生产的研究。因此为了弄明白制鞋工人每天2美元报酬的原因，我们分别研究了除了消费外的传统经济学的四个课题中的没一个课题；然而，我们的研究一直都是在处在社会生产的理论研究之中。

Consumption alone remains an individualistic process. We produce our food coöperatively, but we eat it each one for himself. Society makes our clothing, builds our houses, etc.; but when we get our clothes, we wear them without assistance; and we dwell under our roofs in the same independent way. Society, however, reacts on our natures, and changes and multiplies our wants. A desire to associate with others, while consumption is going on, may even give a kind of collectivity to the process by which some products are used. Thus, we enjoy dining together; and we listen to music and addresses in assemblies, getting a part of our pleasure from the presence of others; but there is no coöperation in the consumption of goods that resembles what takes place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m. There is no obvious group system, and no coöperation of agents such as labor and capital. It is to the sensibilities of individuals that products address themselves; and therefore consumption is the individualistic part of social economy.

消费一直都是一种个性化的过程。我们共同生产了粮食，但我们还是各吃各的。社会为我们提供了衣服，住房等等；但是我们穿衣服并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在自己的房子里居住也同样是一种独立的行为。然而，社会反作用于我们的本性，改变并增加我们的需求。进行

消费时，与其他人一起对所使用的产品产生影响的愿望，甚至可能使消费某种产品成为一种集体性行为。因此，我们喜欢一起吃饭；我们一起去听音乐会和演讲等，从他人的参与中得到一部分属于自己的快乐；但在物品消费上，则又不存在与商品生产相似的那种合作消费。这里没有明显的行业系统，也没有诸如劳动和资本一类的生产要素的合作。产品着手解决的是个人的感情；因此，消费是社会经济的个人独特组成部分。

If we look, then, at the relations of man to man, we find that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re not on the same plane. One is a collective operation: it is nothing, if not organized. The other is an individualistic operation: it consists in the using by each man of what society, by its intricate system of production, has made for him. In an accurate sense, the one process is a par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other is not.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生产和消费不是处于同一水平上的。一个是集体行为：如果没有组织的过程，它将什么都不是。另一个则是个人化的行为：它包括每个人都在利用社会错综复杂的系统而产出的产品。更精确地说，一个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个则不是。

If we look at the relations of man to nature, we find that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re entirely coördinate,—that one of them is the reversal of the other. Man acts on nature in the one case, and nature acts on man in the other. Cultivate the earth till it gives you food, and you have produced a kind of wealth by acting on nature; but the food restores your wasted tissues and your lost energy by acting on you. Man making wealth and wealth making

man constitute the whole economic operation. Humanity takes the active and aggressive attitude in the former part of the process, and it takes the passive and recipient attitude in the latter part. In the simplest mode of living these two processes are the only ones that take place. A primitive man, living alone, would kill game and eat it; he would make clothing and wear it; he would build a hut and live in it: in short, he would act on nature and let nature react on him, and that would constitute the whole of his economy. He woul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exchange and distribution. This, indeed, is all that an economic society does, if we consider it only as a unit. It produces its food, its clothing, its shelter and its myriad of articles of comfort and luxury; and then it uses them. It produces them in an organized way, indeed, and it uses them in an unorganized way. Incidental to the making of them are the trading and sharing processes that are termed exchange and distribution; but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till exhaust the whole economy: there is no phenomenon of wealth that lies outside of them.

如果我们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生产和消费是完全协调的——其中一方就是另一方的倒逆转。一方面人类影响着自然，另一方面自然也影响着人类。通过耕作人们得到了食物，因而通过作用于自然我们得到了财富；同时食物补充了我们的肌体所需，恢复了我们的精力。人类制造财富，财富影响人类，这就构成了整个经济活动。在这一过程的前半部分，人类保持着积极而进攻的态势，但是在后半部人类则采取被动和愿意接受的态度。在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中，这是仅有的两个发生的过程。对于独自生活的原始人来说，他会狩猎并吃掉猎物；他会自己做衣服来穿；他会搭建巢穴供自己居住：简言之，他作用于自然，自然也做用于他，这就构成了的他的整个经济活动。他与交换和分配全然无关。实际上，假如我们就视之为一个单位的话，这就是一个经济社会所能做的。它生产了食物，制作衣物，建造住房和各种使生活舒适与奢华的商品；然后利用它们。事实上，社

会通过有组织的形式制造它们，但是却是以非组织的形式利用他们。伴随这一切的是交易和分配的过程；而生产和消费却使整个经济消耗殆尽：不存在超出这一切的财富现象。

These are the facts to be recognized in entering on the study of distribution. In carrying that study to completion we cannot get outside of the field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we cannot avoid including within our more limited field the subject of exchange. Value is the chief subject that has customarily been treated in the division of exchange; but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that of group distribution are one and the same.

这些都是一着手分配研究就必须认识到的事实。从着手这项研究到完成为止，社会生产这个领域我们不能忽略，交换这个有限的领域也不能避免。价值通常被看作是交换分支中的主要学科；但是价值的理论和按行业分配则是同一回事。

[2_1].An article is not finished, in the economic sense, till the retail merchant has found the customer whose needs it satisfies. The sale of completed articles is thus the terminal act of social production.

[3_1].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一件商品，直到零售商为其找到了买主，并且该商品满足了该买主的需求时，才能成为制成品。因此，制成品的销售是社会生产的终止。

Chapter III The Place of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Natural Divisions of Economics

第三章 分配在经济学各自然分支学科中的地位

There is, we may now note, a mode of dividing the field of economics that will enable us to study distribution without forgetting its relations to exchanges and to production. In social economics there are three distinct kinds of force working together. If we study them separately, we shall resolve economic science into three divisions, the boundaries of which have been drawn by nature. Man modifies matter by production, and matter modifies man through consumption. These processes do not require any organiz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men who impart and then receive impressions. All this could be accomplished by an isolated man, or by men living together for protection or for the mere pleasures of association, without any system of exchange of products. Let every one make his own goods and consume them, and an economic life of a certain kind is complete.

现在，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有一种划分经济领域的模式，这种模式能够使我们在不忘记分配与交换及分配与生产之间的关系的前提下，研究分配。在社会经济学领域，共有三种不同的因素在发挥着作用。如果分别研究这三种因素，就可以将经济学分成三个分支学科，且它们之间的界线还是自然划分的。人类通过生产改变物质，物质通过消费改变人类。这些过程不需要传递，然后接受观感的人的任何组织。这一切可以由孤立的人，或因保护或集体的单纯快乐而生活在一起的人们来完成，不需要任何产品交换系统。每个人都自给自足，这种经济生活就是完整的了。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such a life is that it establishes direct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dividual man and nature. Every man subdues for himself a part of his material environment; and he gets the direct service that this bit of nature, when thus subdued, can render.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re are no disguises thrown over the relation that workers sustain to the earth. Obvious dependence on nature, obvious independence of other men—such is the rule of every one's economic life. Out of materials furnished by the earth each producer creates his own income; and connected with this process there are no problems of distribution.

这样一种独特的生活，建立了人与自然间的直接关系。每个人都想开拓出属于自己的物质领域，进而得到直接性的服务。征服了自己的领域后，人的地位自然可以显现。在这种情形下，人类与地球之间的紧密关系显现无疑。人类明显依赖于自然，人与人之间又明显相互依赖，这就是每个人经济生活的规则。从地球得到原材料后，每个人都创造出自己的财富。一旦与此过程产生联系，在分配的问题上就不会出现难题。

Yet, in this mode of living, which puts every man face to face with nature, there is room for the action of all of the more fundamental laws of economics. Here, for example, is a hunter in a primeval forest, converting the flesh of animals into food and their skins into clothing and shelter. He is creating something that can be defined as wealth. It has the essential marks that analysis detects in the wealth that crowds the shops of the modern city. The man uses capital, and includes in his equipment both the fixed and the circulating varieties of it. His consumption has its laws; and the chief of them is the one that calls for variety in the things

consumed. He must not make and use too much of one kind of product and too little of another—he must guard against glutting some wants and letting others go unsatisfied, if the wealth that he creates is to do him much good.

然而，在这种人与自然面对面的生活模式下，所有更为基础的经济规律就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例如，有一个居住在原始森林里的狩猎者，他把动物的肉变成食物，把皮毛变成衣服。他所创造的可以称作财富。它具有分析检测中现代城市商店人群的财富的重要标记。这个人使用资本，而且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都投入到设备中。他的消费有其自身的规律；首要的一个规律就是对消费中各种东西的需求。他一定不能过多或过少的制造和使用某一种产品–如果他所创造的财富就是证明他做得有多好的标志，那他就要警惕某种产品供不应求或某种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发生。

There is, then, a distinct set of economic laws, the action of which is not dependent on organization. They are fundamental; and we now have to note that they are universal. They act in the economy of the most advanced state, as well as in that of the most primitive. Wealth has everywhere the same distinguishing marks. The producing and the consuming of it are always subject to the same general conditions. The first natural division of economic science should, therefore, present the universal laws of wealth: it should discuss the more general laws of production and all the laws of consumption.

于是就有了一套清晰的经济规律，此规律并不依靠任何组织发挥作用。这些规律是最基本最具有普遍性的。他们既在最优越的国家中起作用，也在最原始的国家中起过作用。无论在何处，财富都有同一

个区别性特征。某种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总是受制于同样一般性的条件。因此，经济学的第一个自然分支应体现财富的普遍规律：它应讨论更多一般性的生产规律以及所有的消费规律。

A second series of phenomena is traceable to a further set of forces which originate in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man. They are made to work wherever persons begin to exchange products; for this organizes society into groups or specific industries. Let some men produce food and others build huts, exchanging products with each other, and things happen that are not accounted for by the laws of that general economy in which this direct relations of man to nature are explained. Exchanges involve the determining of values; and these, as we have seen, fix the terms of group distribution.

第二系列的现象可追溯到另外一组因素，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在哪人们开始交换产品，这种关系就会起作用，因为这种关系将社会分为不同的部门或具体的行业。于是一些人专门生产食物，另一些人专门建造房屋，然后他们相互交换产品，此时就产生了特殊情况，而这种情况不是解释人与自然之间的那种一般规律所能阐述明白的。交换涉及到决定价值；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这些决定了部门分配的价值。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is further extended when, within each group or specific industry, there arise employers paying wages to the men who labor and interest to those who furnish capital. Distribution, in a broad definition of that term, results from such an organization of the wealth-creating powers. The division of economics that treats of it will first deal with group distribution,

which depends on exchanges, and then deal with that final distribution which takes place within each sub-group, fixing the wages, the interest and the profits that are there received. Broadly conceived, and made to include a description of the group system and its exchanges of products, the science of distribution embraces the social laws of economics. Such a science begins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group system of industry. It accounts for the terms on which the groups buy and sell from each other, and shows on what the income of each group in its entirety depends. It further shows what becomes of the income which in this way comes to a group as a whole. Laborers get some of it, capitalists get come, and entrepreneurs get the remainder—if there is one. In short, the distinctively social relations that are created when society as a whole becomes the producer, may be treated under the title, distribution. This term, however, cannot be used as the title of a scientific division, if this use of it carries with it the idea that what is treated under this title is not production and is not exchange. Distribution is a process which, in its completeness, includes exchange, but it falls within production. It is not expedient, therefore, to characterize the second natural division of economic science as the science of distribution; since the idea of distinctness from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attaches itself, in the public mind, to this term. It is best described as the division that treats of the social laws of economics, as distinct from the general laws. When we know what happens in consequence of the economic actions and reactions that are taking pla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e need further to know what takes place in consequence of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man.

在每个部门或具体行业中，雇主会给付出劳动力的工人支付工资，给筹集资本的人分发利益，这个时候，社会组织就进一步扩大

了。从广义的定义来说来说，分配产生于这样一个创造财富力量的组织。就此论述的经济学分支将首先处理由交换决定的行业分配问题，然后再处理每个亚行业中所得到的固定工资、利息和利润的最终分配问题。经过仔细构思，确定了包括集团系统及其产品交换的描述，分配学科包含了经济学的社会规律。此学科从对行业集团系统的描述入手。它为行业之间相互买卖的条款作出解释，并指出，作为一个整体，各行业的收入是由什么决定的。同时还指明在这种方式下某个行业全体成员所拥有的收入情况。工人得到一部分，资本家得到一部分，剩余则归企业家所有——如果有剩余。总之，当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充当生产者时，所产生的一些清晰易辨的规律就可以用分配来进行解释。然而这一术语不能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名称，要是这样用了就会暗含出另外一种意思，即此学科论述的既不是生产，也不是消费。分配是这样一个过程，就其所具有的完整性来说，是包括交换在内的，且这一交换属于生产的内部交换。因此把经济学的第二个分支学科命名为分配是不恰当的；因为在公众看来生产和交换是有差别的。最好把它描述为经济学规律的一个分支，以此来与一般规律区分开来。当我们知道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经济行为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就会进一步了解在这一结果中是什么在起作用。

It is conceivable that production might go on in an organized way without any change in the character of the operation. Men might conceivably produce to the end of time the same kinds of goods, and they might do it by the same processes. Their tools and materials might never change; and they might not alter, either for the better or for the worse, the amount of wealth that industry would yield. Social production can thus be thought of as static. In such a changeless mode of social industry, distribution, with all that it involves, would take place. Groups would exchange products, and each would be dependent on the value of its own goods for the amount of its collective income. The pri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e would determine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the price of ore would

fix that of miners. The gains of a group as a whole would be divided among the sub-groups composing it, and would then by a further operation be parted into wages, interest and profits.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当操作的性质不发生变化时，生产会继续有组织地进行下去。如此下去，人会以同种方式自始至终的生产同种商品。他们的工具和原材料或许从未改变；也因此，他们行业所生产的财富总值也不会变多或者变少。此时社会生产就被认为是停滞的了。但就算社会经济处于一种不变状态，分配还是会在其中发挥作用。行业之间进行产品交换，而且每一个行业会依赖其产品价值谋求集体收入总量。农产品的价格决定农场主的收入，同样，矿石的价格决定矿主的收入。整体收入会分配给各亚行业，各亚行业再以工资，利息，利润的形式发放给劳动者。

What are called “natural " standards of values and “natural” or normal rates of wages, interest and profits are, in reality, static rates. They are identical with those which would be realized, if a society were perfectly organized but were free from the disturbances that progress causes. Far more than classical economists were aware of is involved in a thorough-going study of what they called natural values.

我们平时所说的“自然”标准，或者说工资、利息和利润的“自然”或正常的利率，实际上就是静态利率。如果社会组织严密并且不受进步所带来的干扰影响，这种利率就与将实现的相一致。古典经济学家远没有意识到，被他们称作自然价值的研究是一门非常全面的学问。

Reduce society to a stationary state, let industry go on with entire freedom, make labor and capital absolutely mobile—as free to move from employment to employment as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in the theoretical world that figures in Ricardo's studies—and you will have a regime of natural values. These are the values about which rates are forever fluctuating in the shops of commercial cities. You will also have a regime of natural wages and interest; and these are the standards about which the rates of pay for labor and capital are always hovering in actual mills, fields, mines, etc. In this connection, the terms, natural, normal and static are synonymous. That division of economic science which presents natural standards of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ought consciously to take the shape of a theory of Social Economic Statics. Such a theory would treat of distribution as it would go on if there were taking place none of those grand disturbances—changes in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etc.—that are forever causing market quotations to vary from the natural standards that figure in classical economics.

把社会归结为一种稳定的状态，使各行各业一如既往地完全自由地存在，让劳动力和资本具有流动性——他们不仅在行业间流动，而且在与李嘉图的合乎情理的理论世界中也具有流动性——这样就会产生一种自然价值体系。这些是各商业城市商店一直波动不止的利率的价值。此外，还会有一种自然工资和利息的体制；这一体制是各个工厂、田地、矿山等的劳动力薪酬上下波动的标准。就这一点来说，自然的，正常的以及静态的这些术语都是同义词。经济学中描述价值工资和利息等标准的这一分支学科应该有意识地成社会静态经济学理论的形态。这种理论只有在生产方式等不发生重大改变时才会起作用——生产中的变化等——会永久影响到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然标准.

A static state, however, is imaginary. All natural societies are

dynamic; and those which we have principally to study are highly so. Heroically theoretical is the study that creates in imagination a static society. In the actual world unceasing changes thrust labor and capital, from time to time, out of one occupation and into another. In each industry they change, again and again,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the kinds and the quantities of the goods produced. Yet this does not invalidate the conclusions of a static theory; for static laws are nevertheless real laws. The forces that would work in a world that should be held in a fixed shape and made to act forever in a fixed manner still operate in the changing world of reality. We can always see them working in connection with other forces, but we have to imagine them working alone. We study them separately, in order that we may understand one part of what goes on in dynamic society. To do this we imagine a static society, thus making a heroic but necessary application of the isolating method.

然而，静态情况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切自然社会都是动态的；我们所要研究的那一部分也是如此。以往的理论就是在想象中创造了一个静态社会的研究。就现实世界来说，持续不断的变化，时时都在把劳动和资本从一种职业中推出，又推进到另一种职业中。在各行各业中，这种变化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生产方式并改变产品的种类和产量。然而，这并没有否定静态理论得出的结论；因为静态规律毕竟是现实的规律。这种存在于永远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形态和方式的世界中的因素，会像往常一样在新的世界中发挥作用。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它们和别的因素一起发挥作用,但我们又必须把它想象成一种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我们把它们分别加以研究，就是为了使我们能从中了解在动态社会中发生的变化。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构想一个静态社会，应用一种夸张而又必要的隔离法。

Only by reason of its omissions, however, is the imaginary and static state unlike the real and dynamic one. All the forces that would work in the unchanging world are not only working in the changeful one, but are even the dominant forces in it. They do not keep values exactly at the natural standards, but they keep them fluctuating about those standards; and they keep real wages and interest always comparatively near to the natural rates.

然而，由于疏忽的原因，构想的静态社会并不符合真实的动态社会。在不变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一切因素，不仅在变化着的世界中发挥作用而且还是主要作用。它不仅使价值准确地维持在原来的自然标准上，而且还是只围绕那些标准波动；同时它还使实际工资和利息始终相对接近于自然利率。

We have now described the boundaries of two of the natural divisions of economic science. The first treats of universal phenomena, and the second of static social phenomena. Starting with those laws of economics which act whether humanity is organized or not, we next study the forces that depend on organization but do not depend on progress.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forces of progress. To influences that would act if society were in a stationary state, we must add those which act only as society is thrown into a condition of movement and disturbance. This will give us a science of Social Economic Dynamics. It will bring the society that figures in our theory into a condition like that of the natural world. It will supply what a static theory openly and intentionally puts out of sight—namely, changes that alter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act on the very structure of society itself. A study of these changes is the content of the third natural division of economic science.

现在至此，我们已经说明了经济学两个分支学科的界限。第一个分支学科论述普遍现象，第二个分支学科论述静态社会现象。我们首先论述这些经济学规律，无论人们组织与否它们都会发挥作用，接着我们论述那些依赖人们组织但不依赖进步的那些因素。最后探讨下那些进步的因素。除了讨论社会处于静止状态时发挥作用的那几种因素外，我们还要研究社会陷入混乱和变动时才起作用的那些因素。这就使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学科——社会动态经济学。这个学科将使我们社会中的一些原理应用于自然界中。它将提供一种公开或有意图地淡出人们视线的静态理论——即改变生产方式和影响社会自身结构变化的理论。对这些变化的研究，是属于第三个自然经济学科分支的内容。

Wants are changing, and the kinds of wealth that are produced must change with them. New methodical processes are coming into use. Machines supplant hand labor, and efficient machines displace inferior ones. New motive powers are taken into service, and new raw materials are used. Population increases and migrates, taking with it some of the increase of its wealth. Large industries grow up and crowd small ones out of the field. The earth becomes crowded with life and wealth. None of these changes, however, serves to suppress the action of static forces; nor do all of them together do so. Not one jot nor one tittle shall fall from the law of natural values, or from that of natural rates of wages, interest and profits. A different set of forces is act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tatic one; and real values, wages, etc., are the resultant of the two kinds of force. In advancing to the study of dynamic phenomena our theory completes itself; and the effect is to make it fully interpret the world of fact. A theoretical dynamic world is exactly like the actual world, if the theory that constructs it is a valid and complete one. It has the elements of disturbance and of friction to which men of business point, as influences that invalidat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If the

study of it were carried to completion, it would furnish what has heretofore been lacking—namely, a science of economic friction and disturbance.

需求正在变化之中，因而需要生产的财富的种类也随之变化。新的机械生产方式即将被使用。机器取代手工劳动，高效率机器淘汰低效率机器。新的能源和原材料已投入使用。人口增长并且迁移，随之带走了部分新增财富。大型工业兴起，击垮小型工业。地球上充满了生命和财富。然而，这些变化并没有抑制静态因素发挥作用；也没有使共同发挥作用。无论自然价值规律还是自然工资规率、利率和利润率的规律，都没有受到影响。一组不同的因素正与静态因素相连接，共同发挥作用；实际价值和工资等就是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在着手动态现象研究时，我们的理论是自我完善的；而且此理论的结果可充分阐释我们的现实世界。如果其中的理论完整并行之有效，那么动态的理论世界与现实世界应是一样的。就好像一些商人受到过一些错误理论的影响一样，这个动态的理论世界也充满阻碍与摩擦。假如将此项研究进行到底，其所得成果必会填补一个空白——即经济摩擦与干扰学科。

So far as method is concerned, a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must use deduction, as did the theories of the Ricardian school. It must base itself on the conclusions of economic statics, which, as we have seen, are uncompromisingly theoretical. Yet realism is the striking trait of the dynamic theory. It includes in its field of view just the elements that have been needed to make a deductive economic science fully interpret the world of fact.

就方法论而言，像李嘉图学派的理论研究一样，这门动态经济学必须使用演绎法。他必须以高度理论化的动态经济学为基础。然而，

现实主义是动态理论的主要特征。动态领域就包含这样的特征，这种特征是演绎经济学全面阐释现实世界所必需的。

In the markets of all parts of the world where competition rules the standards about which prices fluctuate are set by static forces, and the fluctuations are accounted for by dynamic ones. Actual prices are now above the standards and now below them, as a pendulum is now on one side of an imaginary vertical line and now on the other. This vertical line coincides with the position that the pendulum would hold, if it we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tatic forces only. The oscillations are due to dynamic forces; and these can be measured, if we first know the nature of the static forces and the position to which, if they were acting alone, they would bring the pendulum. The oscillations of prices about the natural standards can be accounted for only by a like method of study. The same thing is true of natural wages and interest, and of the fluctuations about these standards that actual rates show. Static forces set the standards, and dynamic forces produce the variations.

在当今世界，价格是由静态因素还是动态因素支配，完全由竞争决定。因此，实际价格就像钟摆一样绕着假象的垂线左右不定，时左时右。如果只受静态因素影响，这条垂线在与钟摆静止不动的那个位置重合。摇摆不定是受动态因素影响；这些都可以被判断，如果我们了解静态因素的性质及其地位，如果它们单独发挥作用，它们会带来摇摆不定的状况。对于价格围绕自然工资上下波动的现象，只有采用某种类似研究方法时才能给予说明。自然工资，利息以及由实际利率所显示的这些标准的波动，都是大致相同的。静态因素决定标准，而动态因素则引起种种变化。

This, however, is not the largest effect of dynamic forces. We shall not have learne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them, when we have accounted for the deviations from natural rates that actual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show. We shall see that dynamic forces create new conditions in which static force work. In these new conditions natural values, etc., are not what they were in the former conditions. Thus, the price of cotton cloth that is entirely natural when this fabric is made by hand is far from natural when it is made by machinery. The normal price of cotton cloth fell in consequence of the inventions of Watt, Hargreave, Arkwright and Crompton. Before these men did their work, the price of the cloth was fluctuating about one natural standard; afterward it fluctuated about another. Similarly, the normal level of wages is rising and that of interest is falling, in consequence of far-reaching dynamic influences. At any one time there is one standard of value, wages and interest set by static forces, and at that time the temporary fluctuations of actual rates about those standards are due to dynamic causes. At a later time it will be found that the standards themselves have undergone a change; and these grander effect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that are attributable to dynamic forces. A theory of disturbance and variation is, indeed, included in the science of economic dynamic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is included in it is a theory of progress. The normal wealth of the world will be greater, and the natural level of wages will be far higher in the year 2000 than they are to-day, if the greater forces at economic dynamics continue to work.

然而这并非动态因素的最大影响。当我们在解释实际的价值、工资和利息偏离自然率时，我们并未深入研究这几者中隐藏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动态因素创造出了静态因素能发挥作用的新的条件。在这些新条件下，自然价值等就与原有条件下不同了。例

如，棉布的价格，当此织物为手工织物时,它是完全自然的；可一旦成为机织的时候，就远不是自然的了。棉布的正常价格因为瓦特、哈格里夫斯、阿克赖特以及克朗普顿等人的发明而降低了。在这些人的发明取得成功前，棉布价格围绕一个自然标准波动；而后，又围绕另一个自然标准波动。类似地，由于深远的动态因素的影响，工资的正常水平提高了，而利息水平则降低了。无论什么时候，都由静态因素决定价值、工资和利息标准，此时,实际利率围绕这些标准的波动是受动态因素影响的。不久就会发现，这些标准自身也经历某种变化，而比较大的变化都是受动态因素影响的。实际上，失调和变差理论包括在动态经济学之内；而且其中所包含的最重要的就是进步理论。如果经济动态学中有一些更大的因素继续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到了2000年，世界的正常财富数额就会比现在的还要大，而工资的水平也比现在要高。

We have now before us the boundaries of the three natural divisions of economic science. The first embraces the universal phenomena of wealth. If anything is true of the wealth-getting and the wealth-using process under every condi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material for this division. The second includes social economic statics, and tells what further happens, in connection with wealth, if society is organized, and if no change takes place in its form of organization or in its mode of action The third division includes social economic dynamics, and tells what still further happens, as regards the wealth and welfare of the community, by reason of the fact that society is changing in form and in modes of activity.

现在我们已界定了经济学的这三个分支学科。第一分支包括财富的普遍现象。在每个社会发展的条件下，任何关于财富获取和财富使用的真实过程，都是这个分支的主要内容。第二分支学科包括社会静

态经济学，主要指在财富方面，它告诉我们，如果社会被有序地组织，且组织形式或行为方式不会生变化时，那么进一步会发生什么变化。第三个分支学科则包括社会动态经济学，主要讲述当社会在形式和活动模式上都在改变时，社会财富和福利就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If we wish to note the relation that these three divisions bear to the four traditional ones, we shall see that the first division, treating of universal economic phenomena, includes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facts that are naturally put into an introductory division or Grundlegung. Yet this division may be made to include all needful discussion of consumption, since this is an individualistic operation, of which the fundamental laws are the same in all social conditions. The second division discusses value, which has been commonly treated under exchange, and natural or static wages and interest, which have been commonly treated under distribution. The third division is devoted to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on, which include changes in value and the whole of the dynamics of distribution. And, as changes in human wants constitute the dynamics of consumption, the effect of such changes enters as an element into the material with which this division deals. The three divisions here proposed are quite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though they are interdependent and consecutive. The second division takes among its data the facts and principles presented in the first; and the third begins by assuming all that is stated or assumed by the second. Of the four old divisions, three are hopelessly merged in each other; and none of the four accurately corresponds to either of the three divisions that we have called natural. [3_1]

如果我们想指出这三个分支学科与传统的四个学科的关系，我们还要深入探讨关于普遍经济现象的第一分支学科，它包括那些被自然

归类到引言分支学科中的概念和事实。然而这一分支也应涵盖所有有关消费的问题，因为这是个人的行为，在所有社会条件下基本规律都是一样的。第二个分支学科讨论价值，价值普遍被认为从属于交换，自然或静态工资和利息，又从属于分配。第三个分支学科主要论述生产的动态学，包括在价值和整个动态分配中的改变。而且，当人类需求变化构成消费的动力的时候，这种变化的结果也就被作为一个要素，纳入该分支学科的论述材料中。以上论述的这三个学科尽管相互联系但却各不相同。第二个分支学科采集了第一个分支学科所展现出的事实与原则；第三个分支从第二个分支展示及假设出的部分着手。就四个原始分支来讲，其中的三个都已无望彼此融合；而且，四个分支学科没有一个是精确到与我们所称的三个自然分支学科相对应的。[4_1]

It is already clear that the field for new investigation offered by economic dynamics is an indefinitely fruitful one. It would become still clearer that this the fact, if it were practicable here to describe, in a more detailed way, the particular problems that have to be solved in a theory of social economic progress. They include every possibility of gain that can come to humanity by economic change. They are essentially new problems, because the prevailing mode of economic study has not heretofore isolated them, brought them clearly into view and afforded the data for solving them. Not without its references to progress has been the theory that has founded itself on the old and baffling plan of a fourfold division of the whole science into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but it has at been in a posi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progress presents, for the reason that a knowledge of static law is universally needed as a preliminary to a knowledge of dynamic law. As is the case in mechanics, the forces of rest must be known before those of movement can be understood.

很明显，动态经济学所提供的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一个硕果累累的领域。要是在这里以某种更加详尽的方式说明用一种社会经济进步理论解决某些问题是可行的话，那么，事实会更加清晰。这些问题中包括有关经济变化将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后果。这些问题究其实质来说都是新颖的，因为用现在最流行的经济研究方式都尚未将它们离析出来，使他们清晰明了，更别说提供解决他们的数据资料。在这里并不是没有对原有的经济理论分支进行参考，它们分别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但是现在是站在解决问题的角度上，因为关于静止规律的研究与动态规律研究同样是迫切需要的。就像在力学道理中一样，但凡静止的力都必须在运动的力之前被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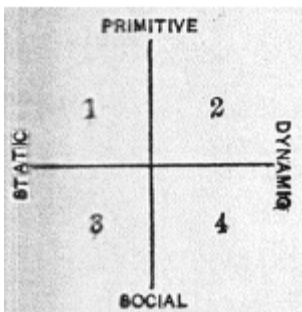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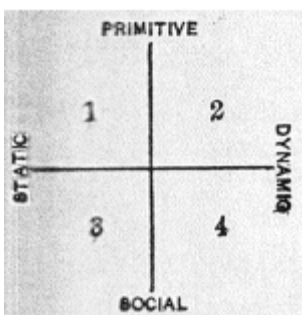

(Fig.1)

(图1)

Dividing a field by two intersecting lines makes four divisions instead of three. A treatment of every possible phase of economic life would require us to study field 1 of the accompanying diagram, or primitive economic statics, and then field 2, or primitive economic dynamics. If after this we were to enter the social territory, we should at once be in field 4, that of social economic dynamics, and should have passed by the indispensable division of social economic statics. As our entire purpose is to understand the laws of a dynamic social industry, we attain our end by covering only fields 1, 3 and 4.

按照两种相互交织的方式将一个学科中原有的四个学科分支划分为现在的三个学科分支。无论想了解哪个时期的经济生活，都要求我们借助附录中的表格和原始的经济静态学来学习第一领域和第二领域或原始经济动态学。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就将进入到社会领域，立刻转到关于社会经济动态学的第四相关领域，还有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经济静态学。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理解动态社会产业中的各项规律，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讨论第一第三和第四领域。

[3_1].If the term "statics of distribution" had been used and had been very broadly defined, it might have been made to coincide in its scope with the second of the three proposed divisions; but this would have involved attaching a broad meaning to the term, distribution, since it would thus have made it to cover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ve society into groups.

[4_1].如果分配静态学已经被作为一个术语广泛使用，那么它就会与第二个分支的研究范围相吻合。但是这就使该术语的含义更加宽泛了，它还包括分配，因为它包含将社会中的各个生产组织分成各种行业的活动。

Chapter IV The Basis of Distribution in Universal Economic Laws

第四章 一般经济规律中分配的基础

This work will first present the static laws of distribution—a subject that falls within the field that we have defined as belonging to the second of the three natural divisions of economic science. It will offer a pure theory of what may be called natural wages and interest. Statistical studies it will not make; and it will not discuss in detail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by which exchanges are effected. It will contain no treatment of money and banks, of taxation, or of political action that is taken for the purpose of influencing the terms of distribution.

本书首先提出的静态分配规律，是按照我们的定义，在经济科学三个自然分支学科中属第二个分支学科范围内的问题。在这里要提出一种堪称自然工资和利息的一种纯理论。本章不作统计研究，而且不详述影响交换的各种实际途径。货币和银行，税收或者旨在影响分配条件而采取的政治措施，也不加以讨论。

The laws of distribution, as broadly defined and made to include those of exchange, are the distinctively social laws of economics, since they account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into producing groups, and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each group into classes of laborers, capitalists and employers. They account also for the transactions of these groups and classes with each other. Static laws furnish the natural standards to which the incomes of

economic groups and those of laborers and capitalists within them tend to conform. Dynamic laws, on the other hand, account, first, for the variations of actual incomes from these natural standards; and, secondly, for the slow and steady change that, as time progresses, is taking place in the standards themselves.

按照广义的理解，包括交换规律在内的分配规律，特别是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规律。因为这些规律对社会组成的各种生产团体，以及各个生产团体中工人、资本家和雇主阶层的形成过程做出了阐释。这些规律同时也对生产团体和各个阶层相互之间进行交易的方式加以说明。静态规律为各经济团体的收入以及各团体内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提供了依据，以趋于统一的自然标准。反之，动态规律却首先对实际收入与上述自然标准呈现的变化程度进行阐释，其次又对那种缓慢和稳定的变化进行说明，这种变化随时间的推移而作用于它们自身。

Natural wages today are not what they will be a year hence. If society is evolving in a normal way, the standards of pay in the future will steadily rise. The actual rate of pay, as the evolution goes on, will pursue the rising theoretical standard, but will lag behind it in its upward movement. The rate at which the standard of pay rises and the influences that deter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actual pay of labor varies from it are typical subjects of a dynamic theory of distribution; and so far as this work discusses any of these subjects, it will enter the domain of the third natural division of pure economics. A theory of distribution, static and dynamic, would constitute the greater part, though not the whole,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divisions of a complete economic theory. The field of social economic dynamics, however, is the unexplored part of the general economic field. If present plans shall be realized, this work will in due time be followed by another, which will deal

with the distinctly dynamic laws. In the present work the "natural"—or, more accurately, the static—standards of wages, interest and profits will be presented; and dynamic movements will be described only in the most brief and general way, for the sake of making clear the fact that static laws dominate the activities of a real and dynamic society. Wages in the practical world, with all its radical changes and with all the friction that it offers to the action of pure law, actually hover about the static standards; and their variations from these are themselves subject to law. In particular,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that the primitive law which puts a man face to face with nature and makes him dependent on what he personally can make her yield to him is still, in essence, the law of the most complex economy.

当前的自然工资与一年后的自然工资是不同的。如果社会按照正常的轨迹向前发展，那么未来的工薪标准将会稳步提高。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工资的实际标准将会随着理论标准的上升而不断上升，但并不一致，它的增幅则会小于理论标准的提高幅度。工资标准上升的速率以及决定实际劳动薪酬偏离工资标准差异程度的影响，是某种动态分配理论所要讨论的典型主题；就本书来说所讨论的任何一个主题来讲，它都将进入理论经济学第三个自然分支学科的领域。包括静态分配理论和动态分配理论在内的整个分配理论，即使不会等同于某种完整的经济理论，但至少也会在其中的第二和第三分支中占绝大比例。不过，社会动态经济学这一领域还属于整个经济学领域的未开发区域。如果本书目前的计划能够如期完成，在适当的时候，本书会继之另一项专门讨论动态规律的研究。本书要阐述的是"自然的"——或者更精确地说是静态的——工资、利息和利润等标准；动态的变动旨在阐明某种真实动态的社会中的各行各业都受静态规律的支配之一逝世，不过，它只是以最简略、最一般的方式描述一下而已。在实际社会中，现实世界的工资尽管有急剧的变动，而且是与理论规律的作用相抵触的，可事实上，它还是围绕着静态标准上下波动

的；围绕这些标准变动的本身，就受这种规律支配。尤其要知道的是，使人和自然有了面对面的直接关系，并且使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能直接为自己生产产品的，实质上还是这种最复杂的经济规律。

If we were to assume, at the outset, that all of the universal truths of economics are known, we should pass completely over the first division of a general economic theory and begin with the second. Principles that in reality apply to all industrial life are thrown into prominence in elementary treatises, although these consciously aim to explain the economy of organized societies. Such treatises have never divided the theory of economics in the manner here proposed, and have never presented the universal truths of that science in a division by themselves, in a way that mark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and those facts and laws which depend on social organization. What they have done, however, in the way of presenting these truths, has made it possible to discuss the social laws of economics without rehearsing at the beginning many of the more general laws. We know what wealth is, what its varieties are, and what agencies act in the production of it. We have in mind definitions of labor and capital, and the usual distinction between fixed capital and that of the circulating kind. We are familiar with the so-called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by which land under tillage rewards labor and capital less and less bountifully, as more and more labor and capital are used on a given area. We know the essential laws of consumption. In short, we possess a body of truth which, although it has not been separated from truths of a distinctively social economy, makes it possible for us to study the social problems without an extended introduction to them. [4_1]

如果一开始我们假设经济学的普遍原理都是已知的，那么我们就

可以完全把一般经济理论的第一个分支完全撇开不谈，而直接开始第二个分支学科。实际上适用于一切工业寿命的原理，基础专著中都已经有详细论述，虽然这些专著都注重阐明有组织的社会经济。这些经济学著作，从来没有采用本书所建议采用的方式对经济学理论作过划分，而且也从未特别列出一种描述过该学科中的普遍真理，以说明这些普遍真理与依赖于社会组织的事实和规律是有区别的。然而，就这些真理而言，我们已经做了阐述，这就使我们在对经济学的社会规律讨论中，不必一开始就叙述很多更为一般的规律。我们已了解何谓财富，财富分几种，生产财富中起作用的因素有哪些。我们记住了劳动和资本的定义，以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一般区分。我们熟知所谓的报酬递减规律，按照这一规律，耕种赋予劳动和资本的报酬越来越少，而用于既定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和资本却越来越多。我们也熟悉了消费的基本规律。总而言之，我们掌握了一整套原理，这套原理虽然尚未与某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原理区别开来，但是有了这套原理，我们就能研究社会问题，而且无需有关这些问题的长篇大论。 [5_1]

Some general questions in economics, however, have not yet been treated in the way that furnishes the needed basis for the study of distributive problems. In these instances we shall be forced to make brief statements that would naturally fall in the introductory division of a general treatise on economics, if such a division were offered. On controverted points, moreover, we must take a definite position and assign grounds for doing so.

不过，对于若干种一般的经济学问题，迄今尚未以奠定分配问题研究基础的这样一种方式予以论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分支，我们只能作属于经济学分支的一般导言性叙述。此外，对于某些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必须持有明确的立场，并说明采取这种立场的原因。

It happens that in an earlier work the author of the present volume has presented some of the universal laws of wealth in a form that makes them harmonize with the theory here to be presented and constitute, in so far, an introduction to it. [4_2] The treatment that these laws there received was, however not complete. Moreover, the work was not prepared with a view to its serving as an adequate introduction to the present treatise. For such a purpose, what is especially needed is a sharply defined boundary line separating the field of universal economics from that of social economics. How much, then, is contained in the first of these fields?

碰巧，在早些时候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该书作者就以这种方式介绍过财富的某些普遍规律，而采用这种方式，就是旨在使这种规律和本书所要阐述的理论相一致，以作为这种理论的绪言。 [5_2] 不过，那本书对这些规律的叙述并不够全面。此外，当时写那本书时并未准备把它作为本书的一种适当的导言。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尤其要在一般经济学领域和社会经济学领域之间划一个鲜明的界限。那么，这几个领域中的第一个领域又包含哪些内容呢？

We have said that the universal laws of economics depend on relations of mankind to nature, while the social laws, as included in a theory of distribution, depend on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man. This generalization will guide us in defining the scope of the preliminary division of the general theory. We said that the essential laws of consumption and all those laws of production that act in the absence of exchanges are subjects for this introductory division of the general theory. What we need particularly to know is how much of what is contained in such a division of the subject has to be used in the second division. How far does a statement of universal laws of economics go in the direction of furnishing

premises for a theory of value and for a theory of wages and interest?

我们曾经指出，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社会规律既已纳入了分配理论，那它就势必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条普遍规律能够指导我们如何来确定一般理论中的首要分支的范围。我们说过，基本的消费规律以及在不存在交换的情况下起作用的所有生产规律，都属于一般理论这一导言分支的主题。我们尤其需要知道的是，论述该主题的这样一个分支学科中有多少内容是第二个分支学科所必须运用的。有关经济学普遍规律的阐述，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价值理论、工资和利息理论提供先决条件的？

It will be recalled that in our analysis the fixing of values is the same thing as the adjusting of the terms of group distribution, while the fixing of wages and interest is the making of the final division of incomes within the several sub-groups. Value, wages and interest [4_3] are, therefore, the distinctive subjects of the second of the proposed scientific divisions, since they are essentially social phenomena. The first division, on the contrary, must include nothing that depends on exchanges: it must put out of sight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nd whatever that entails. Under these limitations, does a theory of universal economics offer any materials for a study of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We shall see.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以前的分析中，价值的确定就等同于按产业群分配的条件的调整；而工资和利息的确定，则是在各产业群内将各项收入进行最后的分配。因此，价值、工资和利息 [5_3] 是我们提出的科学分支中第二分支所应当讨论的专题，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社会现象。相反的，凡是由交换所产生的问题，都不在第一分支学科讨

论范围内。社会的组织以及这种组织所需要的一切，也不在该分支学科的讨论范围内。在种种限制下，一般经济学理论能为价值、工资和利息的研究提供任何材料吗？我们继续研究。

Take away exchanges. In imagination sweep out of existence the industrial institutions of modern society. This is annihilating the most of what is known as civilization: it leaves the individual man face to face with nature, and under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a living by his efforts and her bounty. He must make his own goods and use them. He must begin with the rawest material and fashion goods to completion.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it is a short list of articles that a man can have. Rude must they be, and awkward must be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m. By some tests the man who should live without exchanges would be less civilized than are bees, ants, beavers and other animals whose production is organized; yet he would still lead an economic life. He would possess wealth, and some of it would be capital. His production and his consumption would be subject to laws.

先暂且不谈交换。假设我们抹煞掉想像存在的中现代社会产业制度。那么就会使堪称文明的大部分荡然无存，结果是让人们直接面对自然，并且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自然的恩赐来谋生。人们必须自产自用其所需的东西。人们必须始于采集最原始的材料，一直做到成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所能拥有的产品是寥寥无几的。所得的产品质量差且不说，制造的方法也势必令人感到尴尬。据检测，在没有交换条件下生活着的人，其开化程度还不如蜜蜂、蚂蚁、海狸等动物高，因为这些动物的物质生产是有组织地进行的，然而人们还是要过着一种节俭的生活。人们会拥有财富，而其中有的会是资本。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还要受规律的支配。

Since production acts on nature for no other purpose than that nature may react on the producer himself, the economy of every man resolves itself into a process by which he indirectly serves himself, using natural material as a means. This “means” is wealth.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ings, man serves man in any system of economy. In the primitive system the same man is server and the served, whereas in a social system one man serves another. Wealth is, nevertheless, always the means employed. The goods that an isolated man would make for himself are the concrete forms that his wealth would assume; and the attributes that would distinguish them are the same that in a commercial city mak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is wealth and what is not.

既然生产作用于自然，其原因无非是自然还作用于生产者本身而已。因此，每个人的经济都自然变成了一种以自然原材料为手段，来间接地为自己服务的过程。这种“手段”便是财富。无论在何种经济制度下，人类总是以物质做媒介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服务。在原始社会制度下，同一个人既是提供服务者，又是被服务者，而在另外的社会制度下，则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服务。然而，财富却总是借以提供服务的手段。单独一个人给自己制造出来的物品，就是他的财富所呈现的具体形式，而能使它们与其他物品有所区分的那种特性，在一个商业城市中，就使得何谓财富以及什么不是财富有所区别了。

In every stage of economic evolution wealth consists of useful material things; but their utility is of the kind that we may call specific. Each part of its supply has some importance attaching to it. Such goods are unlike air or salt water, of which any specific cubic yard might be removed without doing harm. If the goods are of such a kind that by adding to the supply of them you make some one better off, and by taking away any of them you make him

worse off, they are wealth. Outward material things that are appropriable and, in this specific way, useful, are economic goods. They are commodities, or concrete forms of wealth; and this description applies as perfectly to the canoe of a savage and its load of fish as it does to an Atlantic steamship and its rich and varied cargo.

在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中，财富都是由有用的物品构成的，而这些物品的效用就是我们所谓的特色的这一类东西。储备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有它的重要性。这类物品可不像空气或海水，不论排除多少立方码，都不至于造成什么危害。倘若一类物品的性质是这样的：即其储备一有增加，就会有人境况好起来；而储备一削减，就会有人每况愈下，这就叫财富。而且就具体方面来说，可供私用的，并对他是有用的外界的物质性产品，就是经济商品。它们是商品，或者说是财富的具体形式。这一描述即完全适用于一个野蛮人的独木舟和舟中所载的鱼，也完全适用于一艘航行在大西洋上的轮船和它所载的各种各样的货物。

If an article is useful to one man, it is usually so to another, and it is therefore in itself exchangeable. It will, in fact, probably be exchanged, if a social economy is established. It has the qualities that would induce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owner to make some sacrifice in order to get it. In considering how much it is best to give for it,—say, in the form of labor or of the product of labor,—such a person would apply the principle with which all readers are now familiar, under the title, “final utility.” As this term is usually defined, it means the degree of usefulness that the last of a series of similar articles possesses. Give to a man one unit of the article A, and then another and another, till he has ten of them. While each of the articles in the series may do him some good, the amount of the

benefit will steadily diminish, as the number of the articles grows larger, and the tenth one will benefit him least of all. In order to add to his stock of A, the man will never sacrifice more than what is, in his view, a fair offset for the benefit that he will get from the tenth and last unit of it. In order that an article may be wealth at all, each unit of the supply of it must, as we have seen, be of some importance to its owner. The law that we have just cited marks the last unit of the supply as the least important unit. This is one of the universal laws of economics.

如果某种物品对一个人有用，那么它往往对别人也有用。因此，就其本身而言，这种物品是可以交换的。事实上，如果某种社会经济制度已经形成，这件物品很可能和别的物品相交换。这件物品具有一种特性，它会诱使没有获得这件物品的人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来获得它。这个人在考虑要付出多少——比方说，以劳动或劳动产品的形式付出——来获得那个物品才合算时，就会应用读者所熟悉的“最终效用”的原则。按照这个术语通常的定义，它是指一系列同类物品中的最后一个单位所具有的有用程度。把物品A拿一件给一个人，然后一件一件加上去，直到他持有十件为止。虽然那一系列物品的每一件对他都有一些效用，但是随着物品数量增加，它的效用却随之递减，到了第十件，效用便是最少。那个人在添进A商品时，对这件商品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一定不会大于从他看来这种商品的第十件或最后一件所能带给他的效用。如上所述，我们已经知道，供给量中的每一单位产品，对于他的所有者有一定的效用，才能算是财富。我们刚才所引用的规律，把供给量的最后一个单位看作是重要性最小的单位。这就是经济学的普遍规律之一。

There is much to be said as to the completeness and the accuracy of this conception of the law of final utility, which modern theory puts at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value. We shall see what an

important change has to be made in it, if it is to be brought into conformity with facts. For the present, we may put it into the form of a hypothesis and use it provisionally. If men do in fact use a number of units of consumers' goods, all of a kind, and if the specific utility of these goods diminishes as they get more and more of them, then what they will give for any of them will be gauged by the specific utility of the last one. If these familiar premises of the modern theory of value correspond with the facts of life, the theory explains the prices of goods in a modern market: it is a true philosophy of a most important social phenomenon.

现代经济学把最终效用规律这个概念作为价值理论的基础，但是最终效用这个概念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们以后会注意到，为使这个规律和事实相符，就必须对它做某些重大修正。就目前而言，我们姑且把这个规律看作一种假设，暂时先应用它。倘若人们真的使用了很多件相同的消费品，而这种商品的具体效用随着人们持有越多而逐次递减，那么他们对所得商品中任何一个单位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一定要依最后一件的具体效用而定。这些大家所熟悉的现代价值论的前提，如果和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相符，那么这个理论就可以解释现代市场中商品的价格。这个价值理论是有关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的真实原理。

The line that separates universal economics from social economics runs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final utilit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at principle in a theory of value. The primitive economy that we have imagined cannot test final utilities in a market, for it has no exchanges. Can it not, then, test them at all, and does it not find it necessary to do so? We may easily see that it does this, and that the purpose is exactly like that for which organized society makes the same test. The principle of final utility

belongs in the first division of a theory of economics and has to be assumed in the second division.

一般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界限，存在于最终效用的原理和及其在价值理论中的应用之间。我们所想象的原始经济无法检测市场中的最终效用，因为原始经济是没有交换的。那么，原始经济是不是完全不能检测最终效用呢？有没有必要做这种检测呢？我们不难看到原始经济能够检测最终效用，而其检测目的和有组织的社会别无二致。最终效用原理属于经济学理论的第一个分支，而且是在第二个分支学科的基础之上。

There is always a gain in diversifying the articles that men consume. This is a principle of human nature that affords a universal law of consumption. The industry of the savage state cannot carry the diversifying process far, because it cannot produce many kinds of goods. A man who should try to make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articles entirely for himself would be a jack of all trades, and would be so poor in most of them that he would lose as a producer more than, through the diversity of the articles, he would gain as a consumer. Making a few things only, the savage can glut his desires for any one of them by an overproduction of it. The diminution in the utility of successive units of goods of one kind makes itself keenly felt, if he works too long in one occupation. If, then, he has so much meat on hand that more will be of little use to him, he may turn to hewing out canoes, fashioning bows and arrows, or building huts. Otherwise, he will do nothing; since the utility of a further unit of an overproduced kind of wealth will not be enough to keep him working.

人们消费品的多样化总是有好处的。这是赋予一般消费规律的一种人性化原理。原始状态下的产业不可能使这种多样化的生产进程深入进行下去，因为它不能生产多种产品。如果一个人要为自己制造许多不同种类的物品，他就会成为各行各业的一个仆人，而且多半会做的很差，以至于作为消费者，由于产品多样化的缘故，他所得到的好处，抵不过他作为消费者所付出的代价。未开化的人只制造几种物品，这些物品中无论哪一种，如果生产过多，他便会感到厌腻。如果他过于长久地制造某一种物品，他便会敏锐地感觉到那种物品的效用降低了。倘若他有了足够的肉产品，而对于自己几乎没有什么用处的话，那么他可能转而砍掉独木舟，或是制作手工弓箭或是盖小屋。否则，他就会一事无成。因为某一单位生产过剩的财富，是不足以维持他继续工作的。

The law of final utility fixes the point at which such a producer will stop creating one product and begin making another. A modern laborer, with money in his pocket, is supposed to consult the law of final utility in making purchases and to spend each dime where, in view of the supply of different things already on hand, it will do him the most good. The savage in our assumed case has, not dimes, but efforts to expend; and he directs the expenditure of them according to the same principle. When he has dulled the keenness of his desire for one thing, he makes another. While markets and prices are, therefore, modern phenomena, the study of which has no place in a division of the science devoted to universal truths, the law of final utility which directs the purchases that are made in a modern market also directs the production of the isolated man, and is a universal law of economics.

最终效用规律决定了上述生产者停止制造一种产品，而开始制造另一种产品的关键时刻。一个身上有钱的现代工人在采购时，照理应

当参照最终效用的规律来决定是否购买，考虑到各种商品供应在即，他的每一角钱要花在会给他带来最大好处的商品上。我们假想的那种情况下的未开化的人，他没有钱，而却有着可支出的劳动力，在付出劳动力时，他也按照同一原则决定是否付出劳动。一旦他对获得某种物品感到腻烦的时候，就会去做另一件事。因此，市场和物价固然是现代的现象，在经济学专门研究一般原则的那个分支中，并没有它的地位，但是支配着代市场购买行为的普遍真理，即最终效用规律，也支配着一个人的生产，而且这是经济学的一种普遍规律。

Draw the line, then, between a theory of exchange economy, or catallactics, and a primitive economy that treats of actions and reaction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n the one side of this line you will find markets, values and like phenomena; on the other side you will find those laws of consumption which govern values. In modern life these laws direct the social demand for different goods offered in the shops; but in primitive life they control the manner in which a man husbands his productive power and uses it where it will do him the most good. The law of final utility is common to both economies.

于是，在一种交换经济理论即交易经济学和研究人与自然所产生的作用与反作用的一种原始经济之间，这就划定了一条分界线。在分界线的一边可以看到市场、价值和类似的现象，而在线的另一边，可以看到支配价值的消费规律。在现代生活中，这些规律支配着商店提供的各种商品的社会需求；而在原始社会条件下，这些规律也支配着一个人如何节约地管理他的生产力，并把它用在会给他带来最大好处的方面。最终效用规律是两种经济制度所通用的。

This is not all. The picture of an isolated man turning his own

labor from making one thing, of which he now has a supply, to the making of a thing that has a higher final utility, illustrates a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 life which is in danger of being overlooked. Through the laws of value society, in its entirety, is doing exactly this. It is turning its collective energies from one direction to another,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final utility. Markets and values afford the mechanism for doing this. Think of society as an isolated being, turning its collective energy to the making of one thing till it has enough of it and then making another, and you have the fundamental fact. The science of an exchange economy must tell us how this change is made.

这并不是全部情况。一个独立的人，已经有了某一物品，就会把他自己的劳动转而制造另外一种最终效用较高的物品。这说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某种特点，但这种特点正处于被忽视的危险中。整个社会凭借价值规律所做的也正是这件事。整个社会依据最终效用规律，把它的集中生产能力从一个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市场和价值为这种转移提供了这样做的机制。把社会看成一个独立的人，它的整个生产能力首先用于生产一种物品，等到这种物品已经足够，然后才生产另一种物品，而你也就获得了一定的基本事实。交换经济科学使我们明白这一变化是如何产生的。

When we look solely at individuals in a modern state and see how they deal with each other, we lose sight of fundamental truths. The difficulty of seeing a forest, by reason of the trees, is small in comparison with the difficulty of getting a view of society, because of individuals and their intricate dealings. We must, therefore, take a broad view: we must not put ourselves in one man's place, and look at things solely through his eyes.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one fact—the fact that an oversupply of any one article in a market

means a social glut of a specific kind. In such a case, the effective demand for this article in society as a whole is more than met. Then it is that,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a falling price, society is warned to turn its energies to the making of something else; and its whole procedure is nothing more or less than doing what an isolated man would do, if he found his want of one commodity becoming satiated.

如果我们只注意处于现代状态的人，只注重他们如何打交道，我们便会忽略事实的本质。因为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便不容易看到森林；要看到社会，比看到森林还要困难，因为社会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开阔视野，绝不能仅以某一个人为参照系，而且完全通过他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市场上某一商品供过于求就意味着社会对这种商品已经感到乏味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就整个社会来说，这种物品的供应已经超过实际需要了。到了这个时候，通过降价机制，社会按照所示警告，把它的能力改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这整个过程，无非也就是和一个独处的人在感到他对某一物品的需求已得到满足时，所产生的劳动转移的过程完全一样。

If, then, we individualize society—if we make it to be in its entirety one isolated being, and if we give rein to that philosophy which treats a body of independent beings as one organism—we find it doing what a solitary man would do,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law of diminishing utility. Putting a price on each article in a market is the act of the collective organism in estimating the importance to itself of each of its own products. Theoretically, it takes the whole of society to make any one article rise or fall in price. The movement of labor and capital from an industry the product of which has fallen in price to one the product of which has

risen in price is also a social operation. It is the act of society in economizing its productive forces and turning them where they will do to itself the most good. The motives in this movement are individualistic, but the resultant is collective. Each man pursues his own interest; but, as the outcome of his activity, society acts as a solitary man would 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law of diminishing utility. The law itself is universal, and the statement of it belongs in the first division of economic theory; but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he law works in a society belongs in the second division.

要是我们把社会个体化，把整个社会看作一个独立的人，并且允许那种把一个独立的人当做一个有机体的哲学观点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社会由于受效用递减规律的影响而采取的行动，和一个单独的人在同样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完全一样。给市场上的每一件商品定出价格，这是集体机制为估量每一件产品对它自己的重要性而进行的工作。从理论上讲，要使每一种产品价格发生涨落的变化，需要动用全社会的力量。劳动和资本从一项产品价格下降的行业转移到另一项产品价格上升的行业，这也是一种社会的运行。这是社会节约使用生产力，并把生产力转移到能给它带来最大效益之处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动机虽然是个人主义的，但其结果却是集体主义的。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但作为其努力的结果，社会在效用递减规律的影响下，会像一个单独的人那样那样发挥作用。此规律本身具有普遍性，应归入经济学理论的第一个分支学科来叙述，而对此规律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机制，却又归于第二个分支学科来进行描述。

The deepest economic problems have reference to wages and interest. These incomes are fixed by that final distributing operation which takes place within each of the industrial groups. Let an employer sell his product, pay for his raw material and use the

money that he has left in paying wages and interest, and this final distribution is complete. Nothing of this kind, however, takes place in primitive life. Selling products and dividing the returns carry us to an advanced or social state. Where a man makes all his own goods, is there any trace of distribution in his economy? Of the separating of a collective income into shares there is certainly nothing; and yet the principle that in social economy governs the separation has as clear a field for its action under primitive conditions as it has under any other.

最深刻的经济问题是与工资和利息息息相关的。工资和利息这些收入是由在各产业团体中进行的最终分配来决定的。一个雇主销售他的产品，为原材料付费之后，用余下的钱来付工资和利息，这样最终分配就算完成了。但是在原始生活中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销售产品而后分享利润，这把我们引向了一种先进的或是有社会组织的状态。一个人一应所需均要自给自足，这种经济有没有分配的迹象呢？把集体收入分成若干份的分配方法在原始社会里固然是不存在的，然而，支配着社会经济的分配原则在原始状态下，正像在其他状态下一样，都明显地有它的活动场所。

Market value, then, is a social phenomenon; but the principle of final utility, by which values are fixed, is universal in its scope. So, too, the division of the income of an industrial group into wages and interest is a social phenomenon; but the principle that governs that division—the principle, namely, of specific productivity—is as dominant in primitive life as it is anywhere.

由此可见，市场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决定价值的最终效用原则，就其范围来讲，则具有普遍适用性。同样，把一个产业团体的

收入分为工资和利息，这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支配该分配的原则，即具体劳动生产率原理，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与在其他社会的生活中一样，起着支配作用。

The specific productivity of labor fixes wages—this is the thesis that is to be supported in this volume. Ascertain how large a product is to be attributed to a single unit of labor that is employed in raising wheat, making shoes, smelting iron, spinning cotton, etc., and you have the standard to which the pay of all labor tends to conform. In like manner does the specific productivity of capital fix the rate of interest. As certain how large a product is due to the presence of the single unit of capital in each industry, and you have the standard to which all interest tends to adjust itself.

具体劳动生产率决定工资的高低——这是本书所要证明的论点。如果确定了种植小麦、制鞋、炼铁、纺纱等所使用的一个单位的劳动，对于一种产品有多大的贡献，那么，便可以找到一切劳动力的薪酬调整所依据的标准。同样，资本的具体生产率决定利率的高低。如果确定了每一项产业中单个资本对于一种产品有多大的作用，那么，便可以掌握一切利息趋向于自我调节时所依据的标准。

This principle of specific productivity acts in all stages of economic life. It reveals itself, however, in one way when a man lives in isolation, and in a very different way when he lives in a commercial state. When labor and capital everywhere coöperate, there is, if we are discerning enough to see it, everywhere a definite product that can be attributed to a single unit of each of them. One hour of labor that a savage bestows on the making of a canoe creates a certain amount of wealth, and so does a unit of labor that

he gives to any other of his small list of occupations.

这种具体生产率的原理适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阶段。但是，当一个人离群索居的时候，它以一种形式出现，而当他在商业社会生活的时候，它又以另一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凡是劳动力和资本合作的地方，只要我们目光足够敏锐，便可以看到一个单位的劳动和资本对一种特定产品所作的贡献。一个野蛮人花在制造独木舟上的一小时的劳动，创造了一定数量的财富。同样，他所花费在其他工作中的一个单位的劳动，也会创造一定数量的财富。

A man living in solitude and making all his own goods, by the aid of his equipment of working instruments, has to form some conception of the productivity of a unit of labor. He may have an hour which is available for fishing or for working on a canoe that will make future fishing more productive. An hour may be devoted to gathering fruits or to fashioning a spade, for working the soil and thus making food in the future more abundant. In making a decision between two such uses of his time and effort he measures, in his own rude way, the productivity of a unit of capital and that of a unit of labor. The canoe and the spade stand for capital; and the hour that is spent in perfecting such an equipment adds one unit to the man's small fund of it. The hour that is spent in fishing or in fruit gathering adds a unit to the day's labor. Which, on the whole, is the more productive? The answer depends on a law that is the basis of distribution in a modern society, but the law itself is universal.

一个人单独地生活着，依靠他所有的工具来制造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必须对一个单位劳动的生产率有一定的概念。他或许有一小时

的时间可以用来捕鱼，或是用来制造独木舟，这样将会提高捕鱼的生产率。一小时的时间可以用于采摘果实，也可用于制造铲子，用铲子耕耘土地，将来就会得到更多的粮食。在选择这两种使用时间和精力的方法时，他也有自己原始的方法来计量一个单位劳动的生产率及一个单位资本的生产率。独木舟和铲子代表资本，花在制成这些配备上的一小时的时间，能在他的小额资本上增加一个单位。花在捕鱼或采摘果实上的一小时的时间，便会对他一天的劳动增加一个单位。总的来说，哪一种作法的生产效率会更高呢？答案要由现代社会分配基础的规律而定，但这个规律本身是普遍适用的。

As consumers' goods grow less and less useful, when a series of units of them are supplied, so producers' goods, or forms of capital, if they have to be used by one man, grow less and less productive. The last tool adds less to man's efficiency than do earlier tools. If capital be used in increasing quantity by a fixed working force, it is subject to a law of diminishing productivity. This law determines how much labor it is best to withdraw from the securing of what ministers directly to wants, for the sake of making an addition to the equipment of working instruments. The choice between casting a line from the shore to catch fish and work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anoe, like the choice between climbing a tree for wild fruit and working on a spade for future gardening, is determined by exactly the same principle that is at work in fixing the point at which the labor force of a civilized state shall be taken out of the shops that make goods for consumption and put into those that make tools, machines, etc. The principle of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everywhere determines how much capital it pays to accumulate. [4_4]

如果一种消费品一个个单位连续不断的供应，它的效用就会降

低，同样，生产者的用具或各种资本形式如果是由一个人使用，那么数量越多，生产率越低。最后一种工具对人所能增加的效用，比早些时候拥有的那些工具要低一些。假如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使用的资本数是递增的，那么，它就会受制于生产率的递减规律。这个规律决定了应当从制造直接满足需要的物品的过程中，抽出多少劳动力来从事增加工具配备的工作。选择要在岸边抛下钓鱼竿去捕鱼，还是要为了制造独木舟去做工，这和选择要爬上树去采摘野果，还是要为了将来从事园艺去制造铲子一样，实际上，二者都由一种原则来决定。这种原则决定了文明国家的劳动力在何种情况下，要从制造消费品的工厂抽出劳动力，并把其投入到用于制造工具、机器等的工厂的原则。无论在什么地方，劳动和资本的最终生产率原理都决定了要积蓄多少资本才是合算。[5_4]

What we have now to note is the fact that the diminishing productivity of labor, when it is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a fixed amount of capital,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This fact shows itself in any economy, primitive or social. The statement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 belongs in the first division of economic theory, while the application of it to a theory of natural wages in a social state belongs in the second division. It is this application that we have to make in the present volume.

我们现在必须指出一个事实，即在固定量资本的情况下使用劳动时，它的劳动生产率是递减的，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原始经济或是社会经济都出现了这种现象。说明这个一般原理是属于经济学理论的第一个分支，把这个原理应用到某种社会状态下的自然工资理论，便属于第二个分支学科的范围。在本书中，我们必须说明这种应用。

In like manner, in connection with capital, the line that divides the first division of economic theory from the second runs between the law of diminishing productivit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t. Supply capital in successive units to a fixed force of laborers, and everywhere you get, as a result, smaller and smaller additions to your output. This is a universal law, which vitally affects the conduct of men, even in a primitive wilderness, in deciding how large an equipment of capital it pays to create. In such a state there are no wages or interest to be paid, and no market rates of any kind to be determined; but the principle of final productivity reveals itself with entire clearness in the simplest economy. It is when this principle acts in such a way as to determine how many laborers and how much capital there shall be in one of the industries of a civilized state that it produces a social effect. This action of the general law is a fitting subject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economics; and here it becomes the basis of a theory of distribution.

至于资本，也是如此。经济学理论第一个分支和第二个分支的界限在于：第一个分支是说明生产率递减规律，而第二个分支是说明生产率递减规律的应用。给固定数量的劳动力连续提供几个单位的资本，结果是无论何处，产量的增加都会逐次递减。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它对人们的行为，乃至在原始荒野地区要投入多少资本储备才划算都有影响。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就没有什么必须支付的工资和利息，也没有什么市场利率可加以确定，但是最终生产力原理却在这项最简单的经济制度里，体现得非常明显。只有当这种规律起了决定文明国家中一个产业要有多少工人、多少资本的作用时，某种社会效益才会得以产生。一般规律的这种作用，是社会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恰当的论题；而在这里，它成了分配理论的基础。

Universal principles, then, and the social applications of them,

are the two contrasted things. There are no markets in a wilderness; yet the law of final utility, which governs markets, is there in action. There are no wages and interest to be paid in the economy of solitary life; yet the law of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and of capital is there, as everywhere, in action. These two principles are the ones that we take from the omitted first division of economic theory, as we enter on the second discussion, which deals with distribution. We tacitly assume all the familiar facts about the nature of wealth, and about the character of the economic process, as a subjugation of nature by man. For immediate use, moreover, we need a knowledge of three laws, of which the first is one that we may term the law of the varying efficiency of consumers' wealth, which is the basis of natural value; the second is the law of the varying efficiency of producers' wealth, which is the basis of natural interest; and the third is the law of the varying efficiency of labor, which is at the bottom of natural wages. These are among the universal truths of economic science.

由此可见，普遍原理和普遍原理在社会上的应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荒野无市场，然而，支配市场的最终效用规律却在那里发挥着作用。在孤身独处者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什么必须支付的工资和利息。然而，最终劳动生产率以及最终资本生产率的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普遍适用。这两种规律，之所以是从略而不提的经济学理论的第一个分支学科中提出，是因为我们要从讨论分配的第二部分开始的。不言而喻，我们认为财富的本质以及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特征的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并一概视若人类征服自然的一种结果。为目前的应用起见，我们还需要知道三种规律：第一种规律可以称作消费资料的效率变差规律，这是自然价值的基础；第二种规律是生产资料效率变差规律，它是自然利息的基础；第三种规律是劳动效率变差规律，这是自然工资的起源。上述这些规律都存在于经济科学的普遍真理中。

[4_1].The reader is referred to the English works of J. S. Mill, Henry Fawcett, Sidgwick and Marshall, to authoritative foreign treatises, and to such American works as those of F. A. Walker, Hadley and others, for able presentations of economic truths that are universal in their application, although these are not formally separated from those which are limited in their application to a social economy.

[4_2].See The Philosophy of Wealth.

[4_3].The reason for omitting to treat profits at this point will soon appear. See p. 70, also p. 78 et seq.

[4_4].Here the greatest of care has to be used in the definition of terms. We have said that the specific productivity of labor fixes wages; and this means that pay conforms to the amount of product that is specifically imputable to any one unit of labor in a working force. This implies that the products of the different units are equal. In like manner, the specific productivity of capital fixes interest. The earnings of a dollar are what the dollar creates; and this implies that in any one fund of capital, as it is described in terms of money, the products of all the different dollars are the same. Yet the law of diminishing productivity seems to require that the products of different units of labor and of capital should be unlike and that final units should be the least productive. Here is, apparently, a startling contradiction; but it will soon disappear. If terms be defined with care, final productivity and specific productivity mean the same thing. Only when the terms are so used is it correct to say that wages are fixed by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and interest by that of capital. Moreover, when the term productivity is otherwise defined, it leads to a theory of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f units of labor that stand early in a series continue to create more wealth than they get, labor is robbed. The theory that makes society honest and the one that makes it to be a system of organized plundering of labor are distinguished by the two unlike definitions of the term, final productivity. We must soon make clear the nature of these opposite views that may be stated in the same terms. We must separate the concept of final productivity that is identical with specific productivity from the one that is unlike it. This, however, is the work of a later chapter.

[5_1].请读者参阅约翰·穆勒、亨利·福西特、西奇威克和马歇尔的英文原著；具有权威性的外国专著以及诸如F.A.沃克、哈德利等人的美国国内的著作。参阅这些著作中对普遍适用的经济学原理的出色的叙述，虽然这些著作没有把这些原理和那些只适用于社会经济的原理正式区别开来。

[5_2].参看《财富的哲学》

[5_3].此刻未提及的利润的成因很快就会说明。参看本书第70页，第78页等。

[5_4].这里对各术语的定义务须极其严谨。我们已经指出劳动的具体生产率决定工资的高低。这意味着工资与产量相一致，而产量则可以具体归因于劳动力中任何一个单位的劳动。这就是说，各单位劳动的产量都是相等的。以类似的方式，具体资本生产率决定利息。一美元的收益就是这一美元所创造的，这就意味着在任何一笔资本基金中，正如上述所描述的，每一美元的产量都是相等的。然而，生产率递减规律却要求各不同单位的劳动和资本的产量应该是不相等的，而且最后几个单位的生产率是最低的。显而易见，这里存在着惊人的矛盾，不过这种矛盾很快就会消失。如果给这几个术语下的定义很严谨，最终生产率和具体生产率便拥有相同的意义。只有这些术语是这样使用的时候，再说劳动的最终生产率决定工资的高低，资本的最终生产率决定利息的高低，才是正确的。此外，如果把最终生产率作另一番定义，就会得出剥削劳动的理论。如果在一系列单位的劳动中，前面的各单位劳动继续创造出来的财富比已经所得到的还要多，那么，劳动就被掠夺了。使社会公正的理论和使社会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劫掠劳动的制度的理论，这两者会因为对最终生产率这一术语下的定义不同而有别。我们必须即刻弄清楚以相同术语所表述的这些相反观点的性质。我们必须把与具体生产率同义的最终生产率这一概念，与同它意义不同的一个概念区别开来。不过，这是本书下一章所要说明的问题。

Chapter V Actual Distribution the Resul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第五章 实际分配——社会组织的结果

Exchanges add much to the economy of primitive life, but they subtract nothing from the essential laws of it. Man must still tame the forces of nature and transform materials into commodities. The general laws of the wealth-creating and the consuming process are the same in all economics; and it is this persistence in civilized conditions of the laws that govern primitive life which makes it worth while to study that life at all. It is in such simple conditions that these laws act alone; and it is here, therefore, that they can be separately examined. It is not because the life of a Crusoe is of much importance that it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economic discussion: it is because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the economy of an isolated man are directed still guide the economy of a modern state.

交换丰富了原始的经济生活，但是丝毫无损于那些支配原始经济生活的基本规律的作用。人类仍然要控制并利用自然因素，把原料制成各种产品。财富的创造过程和消费过程的一般规律，在任何经济状况下都是一样的；正因为那些支配原始生活的规律的文明条件迄今一直都保持着，所以原始生活才值得研究。在这种简单的经济条件下，这些规律独自发生作用，因此，我们能够对这些规律分别地加以探讨。这种研究之所以纳入经济学的讨论范围，并不是因为鲁滨逊·克鲁索式的生活十分重要，而是因为支配单个的人的经济生活的那些规律仍然引导着一个现代国家的经济。

There are, it is true, new forces now in a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ld ones; and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make a separate study of these new forces. Catallactics, the term once suggested as a title for the whole of economic science, is an accurate name for that division of the science which treats of phenomena that are attributable to exchange only. It assumes, at the outset, the facts and principles that are common to all economics; and then proceeds to examine those which are peculiar to an exchange economy. The interchange of products disguises, but does not destroy, the dependence of the individual on nature. A laborer's income may seem to come to him as a payment from another man; but in essence it is still the response that nature makes to his own labor—it is his own virtual product.

诚然，在现代社会中起作用的力量，除了旧的力量以外还有新的力量；可是，我们对这些新的力量进行单独研究是完全有必要的。曾有人建议将交换经济作为整个经济科学的名称。把经济科学中专门叙述由于交换所引起的现象那一分支称为交换经济，是十分恰当的。它首先把一切经济状态所共有的事实和原理作为前提，然后对交换经济所特有的事实和原理进行探究。产品交换可以掩盖，但并不消除个人对自然的依赖。一个工人的收入看上去似乎是另一个人给他的报偿，但实质上仍然是自然对他的自己的劳动所回馈的报酬，就是说，这个收入实际上是他自己的产品。

A study of exchanges naturally notices at the outset the motive for resorting to them. This motive is the gain that is inherent in a division of labor. This principle, however, is only the reversal of one that we have referred to in connection with primitive life. We there saw tha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mployments by an isolated man involves a loss of productive power. Whoever thus does many

things, does them slowly and ill, and he is sure to have few and poor appliances for aiding him in the processes. Sinc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 man's productive action is a loss, specialization is a gain. Moreover, the farther the specializing is carried, the greater become the celerity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man's work.

研究交换问题,当然首先要注意到引起交换的动机。这种动机就在于分工所固有的收益。这种原理只是我们所提及的有关原始生活的那种原理的反面。在那里我们会注意到：孤身独处的一个人从事多种工作，便会导致生产力的损失。无论哪个人，如果制造很多东西，必定做的很慢很差，而在生产过程中，他所借助的工具一定很少很拙劣。生产工作多样化对一个人既然是有损失的，那么专业化便是有收益的。不但如此，专业化程度越高，人们的工作就越迅速越精确。

This principle of loss from doing many kinds of labor, and of gain from doing a few kinds, is one one applies to all economic states; but what is not universal is the opportunity for specializing that an exchange economy offers.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into producing groups and sub-groups makes it possible for a man to produce only one kind of product, or, in the end, only one minute fraction of a product, while still satisfying his omnivorous wants.

从事多种劳动就会带来损失，而只做几种劳动，便能得到利益——这种原理适用于一切经济状况；但交换经济所提供的实现专业化的机会却不具有普遍性。由于社会组成了产业团体和小产业团体，这使一个人虽然只能生产一种产品或是一种产品的一小部分，但是仍能满足他的各种需要。

Let us, then, withdraw from the persons who are making everything for themselves the single function of making shoes and assign it to a distinct class, who shall provide foot-wear for the community. This industry may not absorb their whole time and energy; but, so far as they are engaged in it, they constitute one industrial group. Assign, now, the making of clothing, the securing of meat, the raising of cereals, etc., each to its own separate group, and we have made the first and most general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for production. We have thus multiplied many fold the product that can be created, and we have also made the income of each group depend on the exchange value of its product. The market prices of goods fix the incomes of groups in their entirety; and, as we have already indicated and shall hereafter state in greater detail, the movements of men from groups in which returns are low to those in which they are higher has the effect of drawing the price of each article toward a natural standard. We have seen that normal prices are those which afford equal gains to the labor and the capital in different groups. Wherever normal prices rule, they indicate such an arrangement of the groups that a day's labor in one produces as much, and gets as much, as it does in another. When the adjustment is complete, the income of such a group, if it be reduced to value, is its own virtual product. The members of it may retain none of their own merchandise; but they get the “dollars,” or units of wealth, that they produce. This is a thesis for the theory of catallactics to establish.

有些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那么，我们现在把制鞋的工作从他们的工作中抽出来，交给某一群人去做，让他们供给整个社会的鞋子。这一行业未必会花费这群人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就从事这种生产来说，他们便构成了一个产业团体。同样的，把制衣服、保障肉类供应、种植粮食等工作分别交给各自的产业团体去做，那么首批、

且最普通的社会生产组织便形成了。这样，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增加了好几倍，而每一生产团体的成员的收入要由他们产品的交换价值来确定。商品的市场价格决定各个生产团体的总收入。人们从收益较低的生产团体转移到收益较高的生产团体，此举会使每种商品的价格接近于自然的标准，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以后还会更详尽地说明。我们已经知道，正常价格是保证各个生产团体的劳动和资本收益能够均等的。凡是正常价格所起支配作用之处，就表明各个产业团体有着这样一种安排，它使一个生产群体一天的劳动的生产和收入与另一个生产群体的相等。这种调节一旦完善，一个生产团体的收入折成价值，那就会是其本身的实质性产值了。各小组成员也许并不留存自己生产的产品，但他们却得到了“美元”，也即他们共同生产的财富单位。这就是交换经济理论所要确立的一个论点。

Now push the differentiating process further, and let the making of each completed article become the joint function of several sub-groups. Let some men raise cattle, others tan hides and others make shoes. Let the work of making clothing, food products, etc., also be subdivided. The gain that is inherent in specialization is increased. The income of each sub-group is now the value, not of a completed article, but of the one particular utility that it imparts to that article. It is a distinguishable something, indeed; but it is something that is merged and lost in an indivisible commodity. In kind, it is a quality imparted to the article; in value, it is a fraction of the article. A thesis that the theory of exchange economy has to establish is that such particular utilities, or sub-products, have their prices, and when these are normal, each sub-group gets, as an income, the value that it creates.

现在，再把这种有差别的过程进行进一步的分工，让每种产品的生产都由几个小生产团体合力为之。使一些人畜牧、一些人制皮革、

一些人做鞋。同时，也把制造衣服、食品生产等工作加以细分。这样，专业化所固有的利益就增加了。现在每一个小产业团体的收入，不是以某种成品的价值来计算，而是以这个小产业团体对这种商品所增加的特殊效用的价值来计算。这种效用，虽然本来是可以甄别出来的，但是由于它融入不可分的整件成品中，便看不见了。在性质上，它是赋予产品的一种质量；而就价值来说，它又是该商品的一部分。交换经济理论所要建立的一个论点是，这种特殊效用或是子产品都有它们的价格，如果价格是正常的，每一个小产业团体的收入就是它所创造出来的价值。

Now carry the differentiating process to completion. Within each sub-group there is labor to be performed, and there is capital to be furnished. The sub-group that turns leather into shoes must have its factories full of machines and men to run them. We will let a distinct class of persons furnish the factory with machines and with the raw material. The theory of catallactics has to prove that the income of the one class that labors and that of the other which furnishes capital is, in each case, its virtual product. If the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within the sub-groups are perfectly normal, the classes of which the sub-groups are made, as well as the sub-groups in their entirety, get their several products. Catallactics has to study the structure of such a society as this, has to trace the divisions and sub-divisions that it makes in the producing operation, and has to see how the law that tends to identify the income of each agent with its virtual product acts in spite of the complications that disguise it. This is a comprehensive study,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of the group system of production.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are to be accounted for; and the study that does this must analyze the entire producing operation.

现在，就把这一分工过程进一步完善。在每一个小产业团体内部，既有要完成的劳动，又有需要提供的资本。把皮革制成皮鞋的那个小产业团体，必须拥有自己的工厂，并为其配备足够多的机器和操作机器的工人。要让另一个阶层的人为工厂提供机器和原材料。交换经济学理论必须证明，从事劳动的某个阶层与提供资本的另一个阶层的收入，实际上都是它们各自所生产的产品。倘若发生于各个小产业团体内的调整完全正常，那么组成各个小产业团体的各个阶层以及整个小产业团体，都会得到它们各自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交换经济学必须研究这种社会结构，必须探究出社会在生产上所作分工、再分工的过程，必须注意使每个生产因素的收入和它实际上所生产的产量趋于一致的规律在社会中如何发生作用，尽管存在掩饰它的错综复杂的现象。这是对产业团体生产制的结构和功能进行的综合研究。价值、工资和利息必须予以说明；而要进行这项研究就要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分析。

Catallactics, as a whole, falls into two divisions, of which the first includes the static, and the second the dynamics of an exchange economy. Progress is mainly the result of the social relation. One function of economic society is that of growth. It is becoming larger and richer, and its structure is changing. As time passes, it uses more and better appliances for production. The individual members of it develop new wants, and the society uses its enlarging process to gratify them. The organism is perpetually gaining in efficiency, and this is promoting the individual members of it to higher planes of life. In the producing operation there is more and more intelligence used, for the forces of nature are better understood and there is a better coördination of all the participants. There is more bounty on the side of nature, since more forces are placed at man's disposal; and there is more efficiency in the industrial ranks themselves.

整体上交换经济学分为两个分支学科，第一个分支学科包括静态交换经济学，第二个分支学科包括动态交换经济学。取得的进展主要是由于社会关系的结果。经济社会的一种功能就是增长功能。经济社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富，它的结构也在变更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社会就会使用更多、更好的生产设备。经济社会的成员产生了许多新的欲望，社会则利用日益扩大的生产过程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效率不断地提高，这就促使社会成员的生活达到更高的水平。因为人们对自然的各种力量有了更多的认识，各生产者之间的协作程度更加密切，所以人们更多地使用智慧来从事生产工作。由于人们所能控制的力量增多，自然所给予人们的东西也就增多，而生产队伍本身的效率也提高了。

Five generic changes are going on, every one of which reacts on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 by changing the arrangements of that group system which it is the work of catallactics to study:—

有五种一般性的变化在不断地发生，其中无论哪一种变化都会作用于社会结构，因为它改变了交换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团体制度的安排。这五种变化是：

1.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2. Capital is increasing.
3. Methods of production are improving.
4. The forms of industrial establishments are changing: the less efficient shops, etc., are passing from the field, and the more efficient are surviving.
5. The wants of consumers are multiplying.

1. 人口不断增加；
2. 资本不断积累；
3. 生产方法不断改进；
4. 产业组织形式不断变化，低效率者归于淘汰，高效率者得以生存；
5. 消费者需求不断增长。

Every one of these changes acts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ducing organism, society, for it altars the relative sizes of the different industrial groups.

其中的每一种变化都作用于社会这个生产有机体，因为它改变了不同产业团体的相对规模。

C’’’C’’C’C

C’’’C’’C’C

Let us recur to the illustrative table that was used in an earlier chapter. There is one sub-group engaged in getting out of the earth the material that, when finished, will be the article A''' and in passing it in the form, A, to another set of workers. These impart to it the utility that changes it into A'. A third set of workers now puts its touch on it and carries it, by one point, nearer to completion. It becomes A'', and in that shape goes to the last sub-group to be finished. Here it becomes A''', a commodity ready for use, and seeks the individual who is in need of it. B is a second raw material; and

in the hands of a series of sub-groups of workers it becomes B', B" and B'". In the last of these shapes it also is a finished commodity. C, the third raw material, goes through its transmutations in a similar way and ripens into C'".

让我们再看看前一章所用过的说明性图表。有一个小产业团体从土地里采掘出一种原材料，这种原材料经加工就形成物品A’”，且以A的形式传给另一个小产业团体的工人。这些工人对其进行加工，把它变成A’。第三组工人对A’进行加工，使它更接近成品。A’变成A″形式以后，便送到最后一个小产业团体加工为成品。至此，它变成了A’”，一种可供使用的商品，且要寻找需求它的人了。B是第二种原材料，经过一系列小产业团体的工人的手，相继变成了B’,B’’和B’”。到了最后一种形式，它就是一种成品。第三种原材料C也以相似的方式经历了变化，最后成为C’”。

A may be the skins of live cattle on a western ranch; A' may be hides in a warehouse ready to be shipped to a tannery; A" may be tanned leather and A'", shoes. B'" may be woollen garments that, by passing through kindred transmutations, have grow out of the fleece of sheep into this completed condition. C'" may be bread that has been made out of growing wheat and has passed through all the distinct stages in the entire process. All persons in the series that, in the end, makes A'" constitute a producing group; while those at either A, A', A" or A'" constitute a sub-group. In like manner, all persons in the B'" series or in C'" series form a general group, which is composed of sub-groups.

假定A是美国西部牧场上活牲畜身上的皮，那么A’便是放在仓库内准备运到制革厂去的兽皮，A″是已经制好的皮革，A’”是鞋子。假

定B'''是毛衣，那么它是将羊身上的毛经过类似的加工才制成成品。假定C'''是面包，那么它是使小麦经历了整个加工过程的各个阶段才制成的。所有从事自A到A'''这一系列生产的人最终构成一个产业团体，而那些致力于A,A',A″或生产A'''的人分别构成小产业团体。同样的，从事B'''系列或C'''系列生产的人构成一个大产业团体，它由若干个小产业团体构成。

This represents the plan on which production goes on. With this illustration simplified to the last degree, not three products, but a countless number are in the retail shops, awaiting consumers. It is, moreover, not a uniform course of ripening, in which each has passed four stages, that has brought them into the finished state. A great variety of ripening processes is represented. Some articles go through many hands in the making, and some go through few. Some also contain many kinds of raw materials. These complications will be examined in due time. At present it suffices to note the effect that changes of the five kinds above referred to have on the form of this society. Each one of them takes men out of some sub-group, and puts them into others. The mere act of exchanging products carries with it, not only the fact of a general social organization, but a certainty of change and progress in that organization. It is thus impossible that any one of these five changes which characterize a dynamic economy should take place without producing an effect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As the simplest and most obvious result, the comparative sizes of the different groups must change, if any one of these dynamic movements is in progress. It is possible, therefore, to identify a dynamic social state as one in which there are labor and capital that are shifting their places in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thus making some of the sub-groups larger and others smaller. Some labor and some capital may be actually deserting certain sub-groups and betaking themselves to

others. Even if a sub-group is not actually losing equipment, it may be growing relatively smaller, by reason of new labor and capital that are adding themselves to other sub-groups.

这个例子说明了生产的过程。这个例子是简化了的，实际上在零售店里等待消费者惠顾的不只是三种，而是无数种。不但如此，各种商品并不是一律经过四个阶段的统一制成过程。商品的制成过程是多种多样的。某些商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易手多次，某些商品只经过几个人的手。此外，某些商品还含有许多原材料。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探讨。目前只要指出上述五种涉及社会形式变化所致的影响就够了。其中的任何一种变化都会从某些产业团体中抽出几个人，安排到别的产业团体去。单就交换商品这个行为来说，有这样一个事实：不但需要有一个一般的社会组织，而且要有一个变动的、发展的社会组织。由此可见，体现了动态经济特征的这五种变化，无论发生其中哪一种，都不可能不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如果这几种动态变化中的任何一种发生，最简单、最明显的结果是各个产业团体的相对规模必然改变。因此，动态社会可以说是这样一种形态：其中劳动和资本转变其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从而使得一些小产业团体规模扩大，另一些则会缩小。一些劳动和资本，实际上可能从某些小产业团体中流出而流入其他小产业团体。一个产业团体，即使实际上没有失去它原有的设备，但是由于其他产业小组增加了新的劳动和资本，相比之下它们是变小了。

Such quantitative changes in the groups are not the essence of a dynamic social state: more fundamental changes are taking place. Society changes its structure as a means of changing its producing function. It aims to produce goods in greater quantity and greater variety, and with more economy. It is moving upward in the scale of power to create and power to enjoy. Functional change, indeed, is the essence of dynamics. We avail ourselves of the changes that

take place in the sizes of sub-groups as the most available test of the presence of dynamic forces. If society begins to produce new kinds of goods, or more goods, or if it begins to use new processes, etc., it is bound to reveal the fact by rearranging, to some extent, its system of industrial groups and sub-groups. A''', for example, may take more men, and B''' fewer. A dynamic state may, therefore, be described as one in which changes 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re taking place and are acting on the structure of industrial society.

产业团体内这种量变并不是动态社会形态的本质，还有更基本的变化在进行着。社会改变其结构是借以改变其生产功能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更加经济地提高商品产量，增加商品品种。社会是在使创造能力和使用能力的衡量标准向上发展的。实际上，机能的变化才是动态的本质。各个小产业团体规模上所发生量的变化，最可以用来证明动态因素的存在。如果社会开始生产新品种的商品或更多数量的商品，亦或开始使用新的工艺流程等等，这些行动必定会表现在它对产业团体和小产业团体的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重新安排上面。例如，A'''可以多雇佣人，而B'''则少雇佣人。所以，动态可以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影响到产业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形态。

In the sense in which we use the term, then, social dynamics does not consist in mere activity, provided that it is not of a kind which changes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a physical sense, all action is dynamic; and industry is always action. A physically static industry is obviously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On every farm, men, tools, the chemical elements of the soil, and the light and heat of the sun are acting. In every mill, machines are going through their intricate movements and materials are growing into useful shapes. All this, however, resolves itself into an elementary kind of dynamics: it is action on the part of the men, tools and materials—the agents of

production. But if there is no change in the mode of the action, there is none of that grander progressive movement by which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 is altered. If no labor and no capital shifts its place from group to group in the industrial system, there is none of that type of movement which, in a special and higher sense, we here term dynamic. Till the ground forever with the same tools and get the same kinds of crop, work in the same mills with the same machines and materials—in short, change nothing in the mode of creating wealth—and you have a socially static industry. The producing organism then keeps its form intact.

那么，按我们使用这个术语的意义来讲，社会动态不仅仅在于活动，如果那种活动不会改变社会的结构，便不算是社会动态。从某种物理学意义来看，一切活动实际上都是动态的；产业总是在变动的过程中。物理学意义上的静态产业，就说法而论，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在每一个农场里，人、工具、土壤的化学元素和太阳的光热都处在运动变化中。在每一家工厂里，机器在做各种复杂的工作，原料变成各种各样有用的形态。不过，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成为一种基本的动态：就人、工具和原料等生产要素而言，这就是行动。但是，如果行为方式没有变化,就不会有改变社会结构的更巨大的渐进的活动。假如产业系统内产业团体与团体之间没有发生劳动和资本的移动，那就不会存在我们所说的具有独特的、深刻意义的动态活动。如果长久地以同样的工具耕地，收获同类的作物，用同样的机器和材料在工厂劳动。简而言之，如果丝毫没有改变创造财富的方式，那么这就是一种社会静态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有机体的结构是没有变动的。

A world with none of the physical activities of industry would, of course, be a dead world; but a state can be imagined in which the social organism should keep its shape intact and in which life should continue. Men might work and eat, they might be born and

die, in a world in which the form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hould show no change. As generations should succeed each other, the men of each would take up the trades of their fathers and transmit them to their children. As tools should be worn out, they would be replaced by others exactly like them. Changeless in its population, its local abodes, its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the forms of its wealth, such a society would live, indeed, but it would show no change in its organic form. Having life, but not growth, it would be what we identify as a static society.

当然，毫无物质性经济活动的世界就是一个呆滞的世界；但是，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一种形态，在其中，社会有机体的形式没有改变，而生活却继续着。在产业组织结构未呈现变化的社会里，人或许要工作，要吃饭，他们有生有死。由于一代代人相继继承，每个人都会承继其父辈的行业，而后再传给他们的后代。工具损坏了，他们就用另一种毫无差别的工具来替换它。人口、财富、住宅、生产方式和财富形式都没有变化的社会虽然还能生存，但它的有机形式则不会发生变化。这种社会虽然有生命，但是不能成长，它当属我们所说的静态社会。

This is an imaginary state, but it reveals facts of real life. There is, it is true, no society that is thus static. Even the Oriental world is merely less changeful than the Western. Countries can be found where progress is very slow, but it is nowhere altogether absent; and contact with progressive countries induces movement in the most unprogressive.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is certain to be increasingly dynamic. Why, then, do we wish to know the laws of an imaginary static state? Because the forces that act in such a state continue to act in a dynamic one. They are even the more powerful of the two sets of forces that there operate. We shall

soon see how the two kinds of force mingle in a modern state; and we shall see how unlike are their effects, and how essential it is that we should examine them separately. The study of the unreal static state is a heroic but indispensable use of the isolating method of study, that is adopted in every science where complex phenomena are analyzed. We are, then, studying the realities of the modern progressive state, when we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aginary static one.

这是一种虚构的状态，但它所揭示的是现实生活的事实。诚然，像如此静态的社会是不会存在的。即便是东方世界，也只不过是变化比西方世界那样少一些而已。进步很慢的国家可以找到，但是完全没有进步的国家则无处可觅；最落后的国家和进步国家互通，就会受到鼓励而活动起来。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无疑是不断增强活力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希望了解某种虚构的静态规律呢？这是因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发生作用的因素，在动态社会里还会继续发生作用。在动态社会中起作用的两种势力中，这些势力甚至是比较强的一种势力。我们不久就可以看到这两种因素在现代社会里是如何混合的，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这两种因素的不同影响，以及分别探讨这两种因素的必要性。就这种虚构的静态社会所做的研究工作，是对那种孤立的研究方法所作的一种大胆但又不可避免的运用，这种方法是每门学科分析复杂现象时都采用的。因此，我们研究虚构的静态社会的特性，就是研究现代进步社会的实际情况。

We have specified five kinds of change that constitute a dynamic condition. All of them are in progress in a modern society, and all are acting on its structural form. As population increases, the new laborers apportion themselves in an irregular way among the different groups and sub-groups into which the producing society is divided, and some of the sub-groups increase more

rapidly than others. As capital increases, there is the same irregularity in the apportionment of it; for some of the sub-groups get a disproportionate share of the new productive fund. A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should tell by what principle these apportionments are governed.

我们已经详列出构成动态状况的五种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在现代社会中进行着，并且影响着社会的结构形态。随着人口的增长，新的劳动者都在以不合常规的方式在以生产的社会划分而成的各个产业团体和小产业团体中自行分配，某些小产业团体人数的增长比别的小组要快。随着资本的增加，资本的分配同样也是不平均的，因为对某些小产业团体来说，从新的生产资金中所分摊到的资金比例是不相称的。动态经济理论应当说明这样分配所依据的原则。

Mechanical inventions, in particular, are obvious disturbers of the group relations. Much labor saving in one part of the system is, so far as it goes, the cause of a natural drifting of labor to other parts. New kinds of goods call for new industrial groups to make them, and these are created by taking men and capital from old ones. Thus, every one of the general changes that we have specified, as keeping society in a dynamic state, declares its presence by acting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Mere industry is the self-maintenance of society, while growth and change are further phenomena. It is as important to separate the two as it is in hydraulics to examine the properties of a particle of water in a tranquil pool, as distinct from the further properties that it acquires when it is projected into the pit in which a turbine wheel is turning. In dealing with the complex problems of an advancing economy, the key of success is the separate study of the static forces that constantly see within it.

显然，机器的发明特别会扰乱产业团体间的关系。仅就节省劳动来说，产业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节省了大量劳动，这些劳动自然地移到别的部分去。新种类的商品需要新的产业团体来生产，而新的产业团体是由原有各产业团体中抽出的人力和资本组建而成的。因此，我们所列举的使社会处于动态的五种变化中的任何一种，都以作用于社会结构的方式宣告了它的存在。产业本身只不过是社会用以维持自身生存的状态，而它的成长和变化才是深一层的现象。把两者区别开来是很重要的，正像水力学中考察池塘里静止不动的微量水的性质，这种性质，是和水在被注入有涡轮机转动的井内的水的性质是不同的。要成功地处理经济发展中各个复杂的问题，其关键在于对经济发展中起恒定作用的静态因素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Chapter VI Effects of Social Progress

第六章 社会进步所产生的影响

The changes that take place in a civilized society affect its entire collective life, and even the lives of its individual members. Every man in such a community acts and thinks differently, and comes in time to be a somewhat different being, in consequence of the share that he personally experiences of the effect of social economic dynamics.

文明社会中所发生的变化不仅影响社会的整个集体生活，甚至影响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生活。由于在文明社会中，每个人所受到的社会经济动态的影响不同，因而他们的行为和思想也不一样，结果就使得社会各个成员的情况多少有些差别。

We may keep in view, as the visible sign of this thoroughgoing transformation, the local shifting of labor and capital that dynamics involve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every such shifting of the work of production from group to group is an effort on the part of society to put itself into the new shape that static law at the time calls for. With population as it is at any moment, and with the other elements that determine the shape of society unchanged, there is a certain part of the working force that naturally belongs in each sub-group in the system. But with an accession of new workers, a new adjustment is called for; and labor will proceed to move toward the points at which, under the conditions created by the enlarged population, static forces alone would locate it. Capital must, to

some extent, move also. If the dynamic changes were not again to take place, the labor and the capital of society would find their new places and keep them. They would so locate themselves that each unit of labor would create as much wealth as any other.

动态变化所引起的劳动和资本的就地转移，可以算是社会彻底改变的显著标志，这一点我们不妨记住。我们必须重点注意的是，每一种生产作业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的转换就是社会为了自行呈现静态规律时所需要的新形式而进行的活动。无论什么时候，在人口和其他决定社会形式的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产业系统中每一个小产业团体都将有一定数目的劳动力。可是，如果增加了新的工人，就需要进行新的调整；劳动力便开始转移到一定的地点，这些地点可以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通过单纯的静态因素作用来使劳动力得以安置。资本也必须做某种程度的流动。假如动态变化不再发生，社会的劳动和资本就会流向新的地点并就地配置。如此配置的结果会是每一个单位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都和其他单位的劳动所创造的都相等了。

Mere competition tends to equalize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what we may call units of labor in different occupations, and it has the same levelling effect on capital. If it were allowed to work without obstruction, competition would reduce the earning power of all units of either of these agents to uniformity, by apportioning them, in a natural way, among the producing groups.

仅限于竞争就会使我们所说的各行各业的单位劳动的生产力均等化，而且竞争对资本也有相同效应的影响。假如任由竞争无阻碍地发挥作用，它就会把各个单位的劳动和资本自然地分配到各个生产团体中去，使各个单位的盈利能力趋于一致。

A skilled worker will, of course, always create more wealth than an unskilled one; for pers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will always count in determining their social powers as producers. A good instrument will also produce more than a poor one. Such a good instrument, however, represents more units of capital than does the poor one; and all that we have claimed for competition is a tendency to put the different units of capital where their earnings are equal. This, of itself, requires that the better instruments—embodying, as they do, greater amounts of capital—should earn the larger incomes. In like manner, a laborer of a high grade embodies in himself more units of labor than does an inferior one. Precisely what such a unit of labor is, we must in due time ascertain; but provisionally we may use the familiar term, unskilled labor, and treat the work performed by a man with no exceptional skill or endowment as constituting the unit of which we are speaking. A superior artisan, however, represents more than one such unit, and a successful business manager represents many of them.

当然，一个熟练工人所创造的财富，总会比一个非熟练工人所创造的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对于决定生产者的社会能力是很有影响的。一种优良的工具也会比一种低劣的工具生产更多的产品。不过，优良的工具所代表的资本单位数要比粗劣的工具所代表的资本单位数要多一些；而且我们就竞争所说的一切，无非就是倾向于把不同单位数量的资本投入到收益相同的地方去。这本质上就要求质优的工具——就如同它们实际上体现的大一些的资本额——获得的收入也应该多一些。同样道理，一个高级工人所体现的劳动单位就多于一个低级工人所体现的劳动单位。这样一个单位的劳动所体现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适时弄清；我们暂且可以用非熟练劳动这一大家所熟悉的术语，把一个没有特殊技能或天赋的人所做的工作当作构成我们所说的劳动单位。不过，一位优秀的技工所体现的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单位而已，而一位出色的企业管理人员更是体现很多单位的。

Labor and capital tend to acquire each a certain producing power that is uniform in the different groups and sub-groups; and it is movements caused by competition that cause this tendency. If we could think of dynamic influences as exerting themselves for a time and then completely ceasing to act, we should see society thrown out of one static adjustment and given time to assume another. If the dynamic influences were to act intermittently, with long intervals between their periods of activity, society would atta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erfect static adjustments, each of which would be unlike the one that preceded it. Thus, water in a quiet tank, to and from which there is no flow, is in a static condition. The pressure on each particle is uniform in all directions, and accordingly no particle is in motion. It is perfectly fluid, however, and the slightest excess of pressure in any one direction would make it change its place. Such perfect mobility without motion is the sign of a static state. Motion is prevented, not by friction, but by an equilibrium of the forces that press each particle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劳动和资本都有一种趋势，即各个产业团体和小产业团体中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趋于一致；这种趋势是由竞争所引起的变动而引发的。如果我们把动态因素的影响看作是尽一时之力而已，然后便完全不起作用，我们就可以看到社会脱离了某种静态调整，过了一段时间后又采取另一种静态调整。假如动态因素是周期性地起作用，而且有着加强活力的漫长间隔期，那么社会就将会出现一系列无尽的理想静态调整，并且每一次的静态调整都和前一次不一样。例如，水在一个平静的水池中，由于不存在流入和流出的水，因此其中的水处于静态。水槽里每一滴水所受到各个方向的压力是均等的，因此不会流动。不过，它又是能完全流动的，任何方向增加一些压力，哪怕再微小，都会使这一滴水改变位置。有着完全的活动性，而没有运动，这就是静态的标志。运动受阻，并不是因为受阻于摩擦，而是因为每一

滴水所受到的各个方向的压力恰好是处于均衡状态。

Open now the valve that lets water rush into the tank. The equilibrium is destroyed, and there is movement everywhere. The surface boils, and currents are created throughout the body of formerly quiet fluid. A dynamic force has added itself to the static ones that were formerly in action, but those static forces are not annulled: they continue to act without any diminution of their energy. Stop the inflow; and though, for a time, the waves and the currents continue, in the end they subside. There is now attained a new static adjustment of the different particles of water in the tank. Each is where the equalized pressure will hold it under the new conditions. Repeat the whole operation at intervals; and after each inflow there will be a movement that will relocate every particle of water in the tank. Afterward there will come a period of quiet, when the particles will be held in a static equilibrium.

现在就开启闸阀，让水涌入水池。均衡状态便被打破了，水池里的水全部活动起来。整个水面翻腾，而原先平静的流体现在产生了许多水流。某种动态的力自行与原本处于静态的力合为一体，但那些静态的力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力量丝毫未减的情况下继续起作用。中止水的流入，水池里虽然一度还有波涛和水流，但不久就停息了。现在水槽里的每一滴水得到了一种新的静态调整。在新的条件下，每一滴水都处于均等压力的位置。每隔一段时间重复整个操作；那么每一次当水流入水槽以后，里面的水就有了变动，每一滴水的位置也就有了新的安排。之后会出现一段静止期，每一滴水都会呈现一种静态均衡。

If we regard the individual laborer as the social molecule, there

is a force acting on him that is analogous to the pressure which acts on a particle of water. This is the acquisitive impulse—the desire to go where the largest earnings are to be had. If a man's earnings in his sub-group are the same that he could get elsewhere, the pressure on him is, as it were, equal in all directions; and he keeps his place. If the same thing is true of all other workers, society is in a condition of static equilibrium. The movements of labor from group to group, which are the visible signs of dynamic conditions, are then entirely wanting. But if there is an influx of popul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flow of water into the tank, there is a rearrangement of the social atoms. Some groups come to have relatively more laborers than they formerly had, and others come to have comparatively fewer. If the influx of population ceases and other disturbing causes are absent, a new static condition will ensue. The men will be in somewhat changed positions, in which the earnings of laborers of a given grade are again brought to an equality in the different sub-groups. There are, however, some dynamic influences that act more strikingly, as rearrangers of society, than a mere influx of population would do. Machines, for example, have been rapid transformers of the social organism; but, for illustrating the principle that we have in view, any one of the five dynamic changes above specified will serve, since each relocates the members of the industrial society. If, after such a change, the dynamic influences cease to act, the static ones place the members in natural positions and keep them there.

如果我们视每个工人为构成社会的分子，那么正像压力作用于水滴那样，有一种力量就会作用于工人。这种力量便是那种贪婪的念头——哪里可以获取最大的收入就到哪里去的欲望。如果一个人在小产业团体内所得的收入和他在其他地方所得的收入一样，那么我们可以说，他身上的压力在各个方面都是均等的，这样他便保持原来的位

置。如果其他工人也都是这样，那么社会就处在一种静态均衡的状况下。动态条件的明显标志，即劳动力从一个团体转移到另一个团体的现象，此时将不复存在。但是，如果有新的人口流入，正如新的水流入水池那样，那社会的原子就会有一种重新的安排。一些生产团体就有了相比以前更多的工人，而另外的团体则相对会少一些。假如人口停止流入，也不存在其他不稳定的因素，那么一种新的静态状况应时而生。各人所处的位置虽然多少有了变更，但是各个小产业团体内，一定阶层的工人所得的收入又一次均等了。可是，有一些动态因素对社会的重新安排所起的作用，相比于仅仅人口流入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例如，机器曾经是社会有机体的迅速促变者。不过，为了阐述我们这里所说的原理，上述五种动态变化中任何一种变化均可以，因为每一种这样的变化都重新配置了产业社会的各个成员。如果这种变化发生以后动态影响不再起作用，静态因素便把各个成员配置在自然地位置上，并让他们保持原位置不动。

Let us now vary the illustration, by assuming that the inflow of water is continuous. The static forces are in action, as before; but they do not succeed in placing each particle of the fluid in what would be, if the water were undisturbed, its natural place. They cause each particle to tend, at every instant, to move toward what would be at that instant its natural or static position, if the inflow were then to cease; but there is a perpetual variation between the actual position that the particle of water occupies and its static place. Moreover, its static position at one time differs from its static position at another time. The addition to the volume of water in the tank creates a change i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mere pressure, acting on the fluid material, has to do its work; and the locating of the particl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pressure, gives one result when the tank is half full and a different result when it is full.

我们现在改变一下上述例证，假定水是不断流入的。静态因素还是和从前一样在起作用，但如果水受到了干扰，静态因素就不可能使流体内的每一滴水都复归原处了。如果不再有水流入，那么静态因素就会使槽里的每一滴水时时刻刻地流到当时其所应处的自然或静态位置；但是在每一滴水所占的实际位置和静态位置之间存在着某种持久的变化。此外，水滴在一个时刻的静态位置还有别于它在另一时刻的静态位置。水池中水量的增加，使得压力对液体起作用的条件也改变了。一滴滴的水，在槽里有一半水的时候，受压力影响所占的位置，和当槽里充满水的时候所占的位置，是有区别的。

This corresponds to what is taking place in society. There the five great dynamic influences are all constantly at work. The static forces do their full work also; but the resultant of it all cannot be the shaping of the group system exactly as static law alone would shape it. At any one instant there is a particular place in the system which each man would take, if the disturbing influences were altogether to cease. At that instant the man is impelled toward the place, but he is not exactly there. Society throughout shows an approximation to the natural static arrangement of its members, but it can never exactly realize it. A perpetual divergence from the form into which the acquisitive impulse, acting on each man, would bring society, if it worked without let or hindrance, results from the continuous action of the dynamic forces.

这恰恰相当于社会上所发生的情况。社会上的五大动态影响是恒久起作用的。静态因素也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但结果却是两种因素共同起作用所形成的集体制度的形式，和由静态因素独自作用所形成的集体制度的形式，是不相同的。在任何一个时刻，要是干扰性影响完全停止，在集体制度中都会有每个人的一席之地。在那个时候，他被迫去那个地方了，但是事实上他并不在那里。整个社会对它的成员

所作的安排只能接近于自然的静态安排，但事实上它永无实现之时。如果让对每一个人起作用的贪婪的念头毫无阻碍地起作用，就会使社会呈现出某种和社会的实际形式不同的形式，这是由于动态因素不断发生作用的结果。

These general forces of change also cause the static shape of the society at one time to differ from its static shape at another time. A variation from a standard form is one effect of dynamic forces, and constant change in the standard form itself is another effect. A progressive society, as we have seen, has rising standards of wages, to which actual wages are always tending to conform. It also develops an endless series of ideal shapes, and strives to form itself after them. It approximates each of these shapes, but never exactly attains any one. The ideal model to which the group system is trying to conform at one time differs from the model to which it tends to conform at any other time. Society, in its growth, is pursuing the changes in its model, but it is perpetually behind time in the race.

这几种一般的变化因素也使社会某个时刻的静态形式有别于另一时期的静态形式。某种标准形式发生了形式的变化，这是动态因素作用的一种影响，标准形式自身的恒久变化是其另一种影响。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先进的社会总有不断提高的工资标准，而实际工资又总与这一标准趋于一致。这种社会还会逐渐开发出一系列无穷的理想形式，并且力求于仿效这些形式。它近似于其中的每一种形式，但从未真正达到过任何一种。集体制度在一个时期所尝试达成一致的理想模式和它在另一时期趋向于一致的模式是不相同的。社会在成长过程中总是随着理想模式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在竞争中，它的模式总是过时的。

For static science the task is set of finding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society at any one time. For dynamic science there remains the work of ascertaining the two effects of the forces of change: namely, the variation of the actual state of society, at any one time, from the static condition for that time; and, second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atic condition of society at one time and the static condition at another time.

就静态经济学而论，任务是发现社会在任一时期所处的自然状态。而就动态经济学而论，则是要确定导致变化的因素的两种效应：首先，社会在任一时期的实际形态和它在那一时期的静态不同；其次，社会在一个时期的静态和它在另一个时期的静态不同。

One can hardly assert too emphatically the dominance of the static forces in real and dynamic societies. For example, a square mile of the ocean during a storm is not in a static condition. To the man in a ship dynamic forces appear decidedly to predominate; and yet it is the effects of weight, pressure and fluidity—the static forces—that keep the vessel afloat. They do what, even from the sailor's point of view, is the more fundamental work. It is these static forces that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every blow that a wave strikes against the side of the ship; and it is these same forces that keep the waves from rising to abnormal heights and hold the general surface of the sea in a position that approximates its natural level. Projecting itself through the waves, in their most violent movement, there is an ideal surface to which, at a particular moment, weight, pressure and fluidity, acting unhindered on the water, would make its surface correspond. The actual surface undulates above and below this ideal surface, but always tends toward it. Similarly, projecting itself through the group system of a progressive state, there is an ideal

arrangement of the elements of society, to which the force of competition, acting on individual men, would make the society conform. The producing organism actually shapes itself about this model, and at no time does it vary greatly from it.

人们很难断定静态因素在现实动态社会的那种支配地位。例如，一平方英里的洋面，在暴风雨的时候当然不是处于静止的形态。对于在船上的人来说，动态因素占有决定性的主导地位；但船能够浮在水面上是受了重量、压力和流动性这些静态因素的影响。在海员看来，这些静态因素所起的作用是更为根本的。波浪冲击船侧，每一次冲击的影响是由这些静态因素来决定的；这些静态因素也使波浪不至于升至异常高度，并使海平面保持在接近于自然水平的位置。在波动得最猛烈的波浪中存在着一个理想的水面，在某一时刻，如果重量、压力和流动性能够势不可挡地作用于水，那么实际水平面就和理想海平面相符。实际的海平面则体现出此理想海平面呈现出忽高于它或忽低于它的起伏状况，但总是接近于理想的海平面。同样，在先进的集体制度中存在着一种社会各要素的理想安排，对个人起作用的竞争因素是会与这种安排相一致的。生产组织本身实际上是模仿这种形式组成的，并且和这种形式从来都没有太大差别。

Ricardian political economy has distinguished itself by bold deductions concerning the values of commodities, the rent of land and the wages of labor. There are, it affirms, “natural values,” to which the selling prices of different goods tend to conform, and to which they would accurately conform, if it were not for “disturbing influences.” There is also a “natural rent” of every piece of land; and, if there were no friction, the actual rent would equal it. Sweeping assumptions have been made, in order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that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had in mind. The “economic man” has been created, and has been made to pursue his

own interests remorselessly and intelligently. He knows what will increase his gains, and does it without hindrance. Mobility is his most marked characteristic. The slightest excess of pressure in one direction will cause him to change his place in the economic system. He drops one pursuit and takes up another without hesitation, and he encounters no obstacles in the transit. With such conditions given, prices, rents, wages and interest are supposed to be “natural.” The prices of goods are in these older theories said to be “natural,” when they equal the cost of producing them; and market prices are said to fluctuate about this standard.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因就商品价值、地租和劳动工资所作的大胆推论而倍受瞩目。它证实，各种商品价格都倾向于与之相一致的“自然价值”的说法是存在着的，假如没有“干扰性影响”，这种价格会与这种自然价值丝毫没有区别。每一片土地都有“自然租金”，如果不存在什么阻碍的话，实际租金便等于自然租金。为了创造古典经济学家所要求的条件，我们已经作出了总括性的假设。他们创造了“经济人”并使他毫无保留而又明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他知道什么会给他带来更多收入，而且无所顾忌地谋取利益。流动性是他最显著的特征。如果某一方面稍微有点不堪重负，他就会改变自己在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他将毫不犹豫地抛弃一种职业而去从事另一种职业，并在转换职业的道路上顺心顺意。有了如下的条件，价格、租金、工资和利息就被设想是“自然的”。这些早期理论认为，当商品价格等于生产成本的时候，便是“自然的”价格，而市场价格则会围绕这个标准变动。

The impression that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where it has thus been most successful, has made on practical minds is one of doctrinarianism. The world that is under analysis appears to have been created in the study and to be unreal. All the conclusions hinge on hypotheses which seem to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facts of

life. On the assumed premises, the conclusions are reasonable; but they seem inapplicable to any world but an imaginary one. In short, there appear to be so many disturbing influences at work that theoretical standards of value, rent, etc., cannot be realized. What the Ricardian theory unconsciously and imperfectly accomplished was the separation of static from dynamic forces. It was really studying a static world, but it studied that world with no complete idea of its nature. There was not in the minds of any of these early writers any conception of the two distinct sets of forces that are really acting together; and there could, therefore, be no systematic plan for studying them separately.

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在这方面成就卓著，但是它给实事求是的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教条主义。他们所分析的社会似乎是从研究中臆想出来的，而不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一切结论都取决于假设，而这些假设似乎和现实生活是不一致的。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这些结论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它们只适用于某种虚构的社会。总之，有鉴于干扰性因素的影响，价值、租金等等的理论标准也就无从实现了。李嘉图学派在无意中成功研究出一项不太完善的理论，那就是动态因素和静态因素的区分。该理论确实是研究某种静态社会的，但它并未将静态社会的本质研究透彻。在这些早期学者中，没有一个人想到过有两组性质不同的因素这一概念，而这两组因素实际上在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就不会有分别研究它们的系统化策略。

In reality, their “natural prices” were static prices. They were those to which an actual market would conform, if dynamic influences were wholly to cease. A heroic alteration of the mercantile world, a paralysis of one set of nerves, an absolute stoppage of one set of activities—this would bring markets into the so-called “natural” condition. Stop all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nd of

wealth, as well as all changes in the producing operation and in the character of its results, but let industry go on and perfect competition continue, and you bring the world into a state in which the standard theoretical prices will be the real ones. Also normal rates of wages and interest will be realized. Had the Ricardians recognized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trying to study a static world and then studied it consistently, they would have made even their own system more realistic. Boldly suppressing in imagination one set of actual forces, in order to study more easily another set, must result in reaching conclusions that are partial but are not necessarily unreal. If these early students had later done what they never tried to do, and had completed their system by separately examining the dynamic forces, they would have attained a complete and realistic science.

其实，他们提出的“自然价格”就是静态价格。这种价格指的是当动态因素完全中止作用时，现实的市场所要依据的价格。如果大胆地把商业社会改变一下，使一部分商业中枢陷于瘫痪状态，使一部分活动完全停下来，这样，市场就会处于所谓的“自然”状态。如果人口和财富停止增长，生产活动及其成果的性质的各种变化也停下来，而产业却持续发展，完善的竞争继续存在，那么该社会的理论工资标准将会成为实际工资标准。正常的工资率和利率均会得以实现。假如李嘉图学派认识到他们在尝试研究某种静态社会，并一直进行这种研究，那么他们所建立的理论体系便会更切合实际。如果凭借想像，大胆地抑制一组现实因素发挥作用，以便更容易地研究另一组现实因素的作用，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论，这种结论固然有失偏颇，但是未必就不切实际。如果这些早期的经济学者在研究静态因素以后，也对动态因素进行单独的研究，使他们的理论体系更加完整，那么他们就会建立一套完整而切实的科学理论。

A normal rate of interest early writers made no attempt to explain. They referred to demand and supply, a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interest is adjusted, but gave no reason why these forces fix the earnings of capital at any definable rate. So far as it went in the direction of attaining natural standards,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made an unconscious and incomplete presentation of the rates of interest that would prevail in a static society.

早期的学者们并没有打算对正常的利率作出说明。他们认为供求关系是利息赖以调节的机制，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因素因何能够根据任意一种限定利率确定资本收益的原因。就利率达到自然标准的趋势来说，古典经济学对静态社会所流行的利息标准作出了叙述，但叙述得既没有意识也不够完全。

The impression of unreality that is made by these studies is removed by completing them, on the same theoretical plan upon which they have been started. We must use assumptions boldly and advisedly, make labor and capital absolutely mobile, and let competition work in ideal perfection. We must, in imagination, sweep remorselessly from the field the whole set of influences that we have called dynamic. In doing this, we remove all of that friction which vitiates the action of pure economic laws; for friction of this kind goes entirely with dynamics, and there is none of it to the static state. If we make the force that draws a man toward one sub-group equal to that which draws him toward another,—that is, if we bring his earning power in different groups to uniformity,—the man remains in his place. Then, of course, there is none of the friction that a transfer from one sub-group to another encounters; and it is exactly this kind of friction that vitiates the so-called natural laws of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It is because labor and

capital cannot go from group to group, instantly and without obstruction or waste, that actual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always differ from the normal ones that have figured in pure theory.

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给我们一种不切实际的印象。如果我们按照他们开始研究时所提出的同一理论方案付诸实施，这种不切实际的印象就可以消除。我们必须胆大心细地使用假设，假定使劳动和资本具有绝对流动性，并且假定竞争能够在理想状况下圆满地进行。我们必须富于想像力，毫无保留地从该领域中将我们称之为动态因素的一系列因素全部清除。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排除了一切使纯经济规律失效的阻碍，因为诸如此类的阻碍只有在动态的情况下才存在，而在静态的情况下却没有。如果我们使吸引一个人到一个小产业团体去的力量和吸引他去另一个小产业团体去的力量相等，就是说，使他在各产业团体中的盈利能力相等，这个人就会留在原有的位置。这样，一个人从一个小产业团体转移到另一个小产业团体去就不会有什么阻碍。正是这种阻碍使古典经济学者的所谓自然规律失去效力。之所以实际的价值、工资和利息总是与纯理论中合理正常的同类概念有所出入。是因为劳动和资本不可能立即在畅行无阻和不致浪费的情况下，实现在产业团体间的流动。

Since, then, it is dynamic changes that call for such local transfers of the producing agents, and since it is the transfers that cause the friction, the static condition is free from this disturbing influence. We have proposed to reduce the economic world to this frictionless state. We shall, in imagination, stop every one of the five organic changes that are actually moving and relocating the economic agents. Unlike, indeed, to real life is the economy that results; but it is unlike it only through incompleteness. The forces that in the imaginary world continue to act, are acting in the world as it is. Work continues and instruments are used; and these are

substantial realities. Changes in the mode of working and in the forms of the instruments have been stopped; but the economy that is left is, so far as it goes, real. The standards of value, wages and interest that we get are those about which rates in the actual world are fluctuating.

生产要素的这种区际流动既然是由动态变化引起的，而这种流动又会产生阻碍，那么在静态情况下便没有这种干扰性影响。我们已建议把经济社会恢复成这种无阻碍状态。依据想像，我们要使那五种有机变化的每一种都停下来，它们事实上会使各种经济要素流动，并将其重新配置。实际上，这样形成的经济状态虽然和实际生活有所区别，但也仅仅是因为它不像现实生活那样完善而已。在理想社会中起持续性作用的因素在现实社会中依然起着作用。工作在继续，工具还在使用，这些都是现实的情况。虽然工作模式和工具形式的变化停止了，但遗留的经济制度就本身而言还是真实的。我们得到的价值、工资和利息的标准就是现实社会中利率围绕其而变动的那种标准。

We are next to try to make the economy that we are studying complete, as well as real. We are to give it the elements that are wanting, and make it, in its completeness, correspond accurately to the economy of the actual world. In the concluding part of our study we are to restore the dynamic forces that our earlier hypothesis removed and to note the special effects of their action. For the first time, we shall thus be able to understand and to measure these forces; for their effects will stand by themselves. We can make a science of the movement that is going on within the group system, and of the friction that it encounters. Whenever a theoretical world has been created, in which natural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prevail, that which has been banished is social economic dynamics. This ought not, however, to be treated as a

mere disturbing influence: it is an element that science, as such, must include in its calculations. If we put it out of sight, with no intention of restoring it, we get a result that is unreal, because it is seriously incomplete; but if we first remove the dynamic movement and then restore it, we create a science that fully interprets economic life.

接着，我们设法使我们所研究的经济既完整又现实。我们要把这种经济缺乏的要素补充齐全，而且还要使其就完整性而言，能与现实社会的经济别无二致。在这项研究的最后部分，我们回头来研究在先前的假设中所排除的动态因素，并着重指出这些动态因素作用所产生的特殊影响。这样我们也就首次能理解并衡量这些动态因素的作用，因为他们的影响会自行显现。我们可以创立一门科学，论述集体制度中所发生的变动以及变动受阻的情况。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创造的理论社会中自然价值、工资和利息占主导地位，那么，在这个社会里，社会的经济动态就会消弭于无形。可是，这种动态不应当只看做是干扰性影响，因为它是科学本身必须纳入其结论中的一种要素。我们如果对动态经济置之不理，无意恢复，所得到的结论便会不切实际，因为它极其不完全。但如果我们先排除动态变化然后将其恢复，我们就能创建一门能充分解释经济生活的科学了。

In the preliminary study that is made in this legitimate way, population and capital are treated as neither increasing nor diminishing. Under the hypothesis adopted, inventions are not made and processes of production do not change. None of those consolidations of labor and capital, which are so striking a feature of recent times, are forming. The kinds of goods created remain perpetually the same. In consequence of all this, labor and capital remain constant, and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are, in the classical sense, natural. In the world of the completed study, on the other

hand, population and wealth are increasing; processes and modes of organization are changing; new products are creating; and the flow of labor and capital from group to group, which is the outward sign of these changes, is going on. It is, in short, the real world that a completed hypothesis brings before us. Though theoretical throughout, the science thus makes itself real, by the completeness of its assumptions.

在以这种合乎逻辑的方式所作的初步研究中，人口和资本可以看作既不递增又不递减的。按照所采用的这种假设，发明未曾出现过，生产方法也从未变更。近年来劳动和资本的合并成为引人瞩目的焦点，而这些合并方式中的哪一种都没有形成。生产出来的商品种类总是一成不变。有鉴于此，劳动和资本保持不变，而价值、工资和利息，按传统意义上来讲，是自然的。但是，另一方面，在我们进行完善研究的领域中，人口和财富是递增的；组织过程和模式是不断变更的；新产品不断地制造出来；劳动和资本在行业与行业之间不断地流动，这种流动是上述各种变化的明显征兆。总之，这就是一种完整的假设展现给我们的真实世界。理论固然是贯穿始终的，但经济科学却是以其假设的完整性使本身更切合实际。

Economic dynamics has a striking relation to those recent historical economic studies which have been so attractive and fruitful. Progress is the fact that calls for such studies.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world, it is obvious, differs from the conditions of fifty years ago and from those of fifty years hence. Historical economics records and measures such differences, while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accounts for them. Historical economics will note and measure the gains that have been made by a hundred years of migration and mechanical invention, while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will refer these gains to their causes and furnish

a philosophy of economic evolution. As it shall become more and more nearly complete, this theory will, moreover, enable men to announce with increasing confidence the kinds of change that are to be expected in the future.

动态经济学与近年来的历史经济学研究有显著的关系。历史经济学的研究不但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而且卓有成果。进步就在于需要这种研究事实。显而易见，世界的现状既有别于五十年前，又有别于五十年后。历史经济学记载并衡量此类差别，而动态经济学理论则对这些差别作出解释。历史经济学记载和计算一百年来由于人口迁移和机械发明所得的利益，而动态经济学理论要研究获得这些收益的原因，并说明经济演变的某种原理。随着这种经济理论日臻完善，人们可以更有信心地宣告未来有望实现的各种变化。

Economic dynamics will, in its entirety, incorporate into itself historical economics. The changes that are going on in the world will in future be studied inductively, as well as deductively; and it is the inductive part of the work that falls to the historical economist. In the long run, it is this part that will need to absorb the most scientific labor. The static laws of economics ought, consequently, to be known at an early date. Dynamic laws will not be known so early; but whenever they shall be scientifically established, there will remain to be done the work of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particular influences that act on society. How great, for example, is the effect of a mechanical invention or of the settlement of a new country on the rate of wages? Such a question, if it can be answered at all, will demand a far more difficult kind of research than does the question whether migrations and inventions naturally raise wages or lower them.

作为一个整体，动态经济学会把历史经济学纳入自身的范畴。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将来要从归纳和演绎两方面来研究，而归纳的部分，正是由历史经济学家去研究的。从长远角度来看，正是这一部分需要经济学家花费最多的精力进行科学研究。因此，静态经济学规律理应早日广为人知。动态经济学规律则不必如此早的为人所知了；不过，这些规律无论何时予以科学证实，我们仍要做的工作便是衡量各种作用于社会的因素的影响。例如，机械发明的影响或是一个新国家的移民对工资率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此类问题即使能够回答，与回答移民和发明是自然提高还是降低工资这个问题相比，所需要进行的研究工作会困难得多。

It is within reason to suppose that, befo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shall have passed, men will know what kinds of results follow an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n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a new mode of organizing industry or the use of a new kind of consumers' wealth. What the pure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does, when it answers such a question, is in effect to make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change. It must go seriatim through the list of great movements that are transforming the face of the world, and ascertain the nature of the effect that each of them produces. It must analyze the process by which each effect is produced. Thus far the study does not involve calculations of quantity: there is in it no computation of the amount of each effect. Purely qualitative as the study is, however, it will open to the theoretical economist an inspiring vista for future advances in his science. Does the law ensure the survival of what is best? Is humanity gaining by the changes that are going on in industry? If gains predominate, do they accrue largely to the laborers? What net result to a working-man has followed from the fact that farmers have cast aside the reaping-hooks of their fathers, and are using harvesting-machines? What will happen to workers of the future, as cheap motive powers

shall be utilized, and as electric wires shall carry the power everywhere? What will be the effect of the automatic machines that will bring commodities out of non-existence at the cost of little effort beyond the touching of a button? How will the laborer fare as the world shall crowd itself with a dense population? What will befall him, if this teeming life is more than matched by the growth of productive wealth? If capitalists become inordinately rich, what will become of the class that is now poor? Will the ownership of capital ever be widely diffused? It is, in short, the direction that progress is taking that is the all-important question; and the laborer is the one whose fortunes, in the régime of progress, are of supreme consequence. Issues like th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must decide.

我想，在二十世纪还没有过去以前，人们会了解人口的增长、资本的扩充、产业组织的新模式或是新消费品的投入使用将产生什么结果；这样的想法是合情合理的。回答这样的问题时，动态经济学的纯理论所要做的就是对产生变化的现象进行定性分析。它必须逐一研究改变世界面貌的一系列重大动向，还要确定每一种动向所产生效应的性质。该理论必须分析每一种效应赖以产生的过程。至此，研究尚未涉及到数量的计算，即还没有对每一种效应的数量进行计算。虽然此类研究属于纯定性研究，不过这种研究会帮助理论经济学家开辟启发灵感的界域，从而促进他所从事科学的未来发展。该规律是否可以保证适者生存呢？人类是否可以从产业中的变动中获益呢？如果能得到利益，这些利益能否多半惠及工人呢？农民们将其父辈的镰刀丢到一边而使用收割机器，从该事实中我们能看出工人得到什么实际成果吗？随着廉价的动力行将得到利用，并将其通过电线传送到各地，那未来工人的前景会是怎样的呢？只要按下自动机器的电钮，就能以毫不费力的代价生产出不复存在的商品，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当世界到处都是密集的人口时，工人会面临怎样的境况呢？如果生产资料的增加无法满足密集人口的需要，人们的生计将会是怎样呢？假如资本

家暴富了，那么现在的劳苦阶级将会处于何种境地？资本的所有权会不会大为分散呢？总而言之，极其重要的问题，都在于进步所取的方向；在进步的社会制度里，工人的命运与其休戚相关。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动态经济学理论所必须解决的。

There will then remain a work of verification and of measurement. If improvements tend to raise wages, statistics should prove it; and they should measure the rate of the gain. The most laborious study that economists will ever have to undertake will consist of such a use of comparative statistics as shall measure the separate effects of different dynamic changes that in real life are acting together. Thus, we may ask: How much, in the way of extra wages, can at this date be imputed to the use of electric dynamos? With present means of information, this is an unanswerable question. The study of such problems can, moreover, never be completed, for they will forever present themselves in new forms. The mere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will enlarge by many fold the scope of political economy: it will lift theory to a new plane. The statement of the pure laws of economic change will open, as it were, the vestibule of the science of the future. It will afford an approach to a larger area. But the largest and most permanent work of the future must consist of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studies, directed by a full knowledge of economic law.

之后还会有实证和计量的工作。假如生产方法的改良能使工资提高，统计学就当证实这种改良的效果，而且还应计量利润率。经济学家还需要进行一些深入细致的研究，包括比较统计资料的应用，比如，衡量在实际生活中共同起作用的各种动态变化的各自影响。因此，我们要问：在额外工资中有多少可以归因于发电机的使用？仅靠现有的信息手段，这个问题是无法答复的。更何况，有关此类问题的

研究是永无止境的，因为这些问题将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出现。单是动态经济学理论就会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好几倍，并把该理论提升到新的阶段。叙述经济变化的纯粹规律可以说将开辟这门科学未来发展的途径。这一叙述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大的用武之地。但未来的最大也是最持久的工作，一定包括从历史和统计两方面进行研究，并且以全面的经济规律知识来作为指导。

Note.—The statement made in the foregoing chapter that a static state excludes true entrepreneurs' profits does not deny that a legal monopoly might secure to an entrepreneur a profit that would be as permanent as the law that should create it—and that too, in a social condition which, at first glance, might appear to be static. The agents, labor and capital, would be prevented from moving into the favored industry, though economic forces, if they had been left unhindered, would have caused them to move to it. This condition, however, is not a true static state, as it has here been defined. Such a genuine static state has been likened to that of a body of tranquil water, which is held motionless solely by an equilibrium of forces. It is not frozen into fixity; but as each particle is impelled in all directions by the same amounts of force, it retains a fixed position. There is a perfect fluidity, but no flow; and in like manner the industrial groups are in a truly static state when the industrial agents, labor and capital, show a perfect mobility, but no motion. A legal monopoly destroys at a certain point this mobility, and is to be treated as an element of obstruction or of friction that is so powerful as not merely to retard a movement that an economic force, if unhindered, would cause, but to prevent the movement altogether.

附注：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过，静态状况不包括企业家的纯利，

这句话并不否认合法的垄断可以担保资本家的利润。只要创造它的那种规律一直起作用，这种利润将会继续存在。即使在一种最初看来似乎是静态的社会条件下，情况也是如此。尽管经济因素在不受阻的情况下会使人力、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流入，但这些要素会因受阻而无法流入享有优惠的行业。可是，这种状况并不是此处所定义的真实静态状况。我们在上文用一片静水来比喻这种真实静态状况，这片静水之所以不动，完全是由于各种力达到了某种均衡的缘故。它并未凝结成固态，但由于每一滴水在各个方向的所受压力是均等的，因此，它也就保持一种特定的状态。有着绝对的流动性，但没有流动；同样，当劳动和资本等工业生产要素显示出绝对的流动性，但没有流动，那么各个产业团体就会以某种类似的方式处于真实的静态。一种合法的垄断在某种程度上会破坏这种流动性，所以我们视其为一种阻碍因素。但是由于这种阻碍因素具有很大的力量，不但会延缓经济因素在未受阻的情况下引发的流动，而且会从根本上阻止这种流动的产生。

Chapter VII Wages in a Static State the Specific Product of Labor

第七章 静态社会状态下的工资——独特的劳动产品

The value of a commodity might be called “natural,” if it resulted from the action of the native impulses of men. There are impulses that cause men to do other things than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in business; but competition is the activity that causes prices to be, in the customary sense of the term, natural. This process is, in reality, a rivalry in serving the public. The merchant who undersells his competitor is actually offering to the public a larger benefit than his rival offers for a given return. The motive is, of course, self-interest; and the action that results from it is a spontaneous and general effort to get wealth. One effect of it is, however, to insure to the public the utmost that the existing power of man can give in the way of efficient service; and another effect is to control the values of goods.

一种商品的价值如果是由人们的本能欲望所产生的，那就可以称之为“自然的”价值。有的欲望，除了促使人们参与相互间的商业竞争以外还促使人们另有所为。但竞争是使商品价格成为通常意义上的一种自然的活动。实际上，竞争的过程是竞相为公众提供服务的过程。以低于竞争对手所提出的价格出售商品的商人，给公众带来了更大的利益，这种利益比其竞争对手所给的回报还要高。当然，商人的这种动机是利己主义的，而且这种动机引起了人们自发性地普遍为获得财富而努力。不过，这种努力产生的其中一种影响是，它保证了人们的现有能力能够高效率地为社会做最大程度上的服务；另一种影响则是控制商品价格。

A natural price is a competitive price. It can be realized only where competition goes on in ideal perfection—and that is nowhere. It is approximated, however, wherever prices are neither adjusted by a government nor vitiated by a monopoly. If a commodity were produced in a public factory and sold at a rate arbitrarily fixed by the state, with a view to getting a revenue or to attaining some ulterior end, the mode of adjusting the price would be the antithesis of natural. If a private monopoly were created or fostered by the state, the price that it would put on its products would also vary from the natural standard. There is, in fact, always a trace of monopoly in the condition of an industry to which labor and capital tend to move, but cannot move with absolute freedom. Perfect mobility of the agents of production never exists; and hence prices are always varying, in greater or less degree, from the rates that the unhindered action of the competitive impulse in men would maintain.

自然价格就是竞争的价格。这种价格只有在竞争处于理想完美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这种情况根本是不存在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价格既不是由政府来调控，又不受垄断企业的损害，那个地方的价格便会接近于自然价格。假若一种商品由一家公营工厂生产，而卖价却由国家随意地确定，旨在获得某种收益或者是因为要达到某种别有用心的目的，那么这种调整价格的方式就会与自然的调节方式相反。如果国家就是要创设或促成某种私人的垄断，那么，给其产品所定的价格也必然和自然标准有所差异。事实上，劳动和资本会趋于向某种产业流动，在这种条件下，总会有垄断的痕迹，但又存在无法绝对自由实现流动的情况。生产要素从来就不具备完全的流动性，因此价格始终或多或少地偏离人们竞争促成的那种不受限制的行为所维持的价格标准。

As we have shown, the terms “natural” and “normal,” as used in economic literature, are other names for static. The assumption that removes all dynamic movement and all friction leaves prices normal. We shall see that this fact is in harmony with what we have just said—namely, that natural values are competitive values; for, if we stop all dynamic movement and also all friction, we enable competition to work in perfection. The standards of price that have figured in the older economic studies have been attained without any conscious reduction of society to the static condition; for, as we noted, the idea of separating the dynamic activities of society from the static ones did not occur to these writers. Their natural prices were attained by observing the tendency of actual markets to yield certain prices; and these standard rates they defined as those which would about repay to employers the outlay that they incurred in bringing the commodities into existence. It was a simple and preliminary study of natural or static price that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made, and it afforded an imperfect, rather than an incorrect, theory.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经济学文献中所用的“自然”和“正常”这两个名词都是静态的别名。假定所有的动态变化和阻碍都被排除，就会使价格趋于正常。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事实与刚才提到的——自然价值等同于竞争价值的说法正相符合，因为，假如我们使所有的动态变化和阻碍都停止，就可以使竞争完全起作用。在早期经济学研究中，所描述的价格标准已经实现，但其中并未有意识地因此而简化地设想社会处于静态状况；因为，正如我们所指出得，区别社会的动态活动和静态活动这一概念，并非出自这些学者的笔下。他们所提出的自然价格，是通过观察实际市场产生的某几种价格趋势而得出的。他们将其定义为这样一种价格：即按此价格标准，雇主们就会根据生产商品所需要的支出获得补偿。古典经济学家对自然价格或是静态价格所作的研究还在简单和初步的阶段，它给予我们一种不完整的、但却不是不

正确的理论。

Such prices would prevail in practice, if labor and capital were absolutely mobile. If men in one industry could instantly leave it and betake themselves to another, this latter industry could not be favored in the amount of its returns. If we could at this moment remove everything that hinders a steel maker from becoming a wagon maker, we should preclude all chance that one class, as a whole, should be better paid than the other. Static prices would be realized at any one time, if we merely annihilated economic friction. They would be realized in another way, if dynamic changes were stopped and if friction were allowed to continue. Thus, let there be henceforth no improvement in methods of production, and let population, wealth, etc., remain forever unchanged. There is, then, nothing that will make the standard level of prices next year at all different from that which now prevails. Actual prices are not now at the standard levels; but they are tending toward the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petition. Labor and capital are tending to move to the points where rewards are greatest, but this movement is obstructed by friction. With dynamic changes ended, this friction is slowly overcome. The transfers of labor and capital take place in spite of it. To stop the dynamic changes and wait for the transfers to take place is to bring industrial society slowly into the condition that static forces alone tend to impose on it. Henceforth the state will be an unchanging one. Once society has reached this shape, it will hold it forever. Each unit of labor and each unit of capital will remain forever in the group where it is, and prices will be unvarying.

如果劳动和资本具有绝对流动性，这种价格实际上就会流行。如

果某种行业里的人能够迅即离开该行业，而全身心投入到另一种行业中，那么他们在后一种行业中所得到的收益数额不可能比别的产业更优越。如果我们能排除一位钢铁制造商成为货车制造商的一切阻碍因素，那我们也就能够排除一个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时，获得高于另一个阶层的薪酬的一切机会。只要我们把经济阻碍清除，静态价格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实现。如果使动态变化停止下来，阻碍就会继续存在，此类价格就会另换别种方式得以实现。假定今后生产方法都没有改进，且人口、财富等等都一直保持不变。那么，明年价格的标准水平和现在所流行的标准水平相比，便会丝毫无变。现在，实际价格并不等同于标准水平，但在竞争的影响之下，它们会趋向于标准水平。劳动和资本朝着能获得最大报酬的地方流动，但是这种流动会受限于各种阻碍。随着动态变化的结束，这种阻碍会逐渐被克服。尽管存在着阻碍，劳动和资本的流动还是会发生。如果阻止动态变化，而等待流动的发生，这样，就会导致产业社会形成缓慢，进而使静态因素本身倾向于利用它的那种状态。这种状况以后将不再有什么变化。一旦社会达到这种状态，它就将持之以恒。每一个单位的劳动和资本就永远留在所在的行业，价格也就经久不变了。

Here, then, are two ways of conceiving a régime of static—or, in the Ricardian sense, natural—values. With dynamic changes in progress and friction absent, the standards of price change every day, but actual selling ratios conform every day to them: there is an endless succession of different actual prices, but there is never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ices that the market gives and those which theory calls for. With dynamic changes absent and friction continuing, the static or cost standard of price becomes an unchanging one; but actual values, which at the outset vary from the standard ones, require time to conform to them. In the end, they conform to them and remain thenceforth without change.

此处就有两种设想某种静态的——或按李嘉图学派的说法，也就是自然价值的——价值体系的方法。由于动态变化持续作用，而阻碍已经消除，因此价格标准每天都在变，但实际销售率却每天都与标准相一致；存在的一系列无穷的实际价格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市场所定的价格与理论要求的价格从来不存在任何差别。随着动态变化的消失，而阻碍继续存在，那么价格的静态标准（或成本标准）就成为不变的标准，不过在开始时偏离标准价值的实际价值则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和标准价值保持一致。实际价格和标准价格相符以后，实际价格便会始终保持不变。

It is best to assume that both the dynamic changes and the friction which always obstructs competition cease. Under this hypothesis, labor and capital can instantly go wherever gains are large; and this movement brings prices at once to what is now their static level. As there are hereafter to be none of the changes that alter that level, prices—both actual and normal—must hereafter remain unchanged. No variation of actual prices from perfect competitive prices; no change in ideal competitive prices themselves; no change in price-making conditions—this is the conception that creates a perfect static state. There is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but there is no motion. Here we may study static prices, pure and simple.

我们最好假设经常限制竞争的动态变化和阻碍都停止下来。按照这种假设，何处收入较大，劳动和资本便会流入到何处；这种流动就会立即使各项价格的水平降到与它们现有的静态水平相一致。由于此后再没有改变这种水平的各项变化，因此，价格——包括实际价格和正常价格在内——之后就必定会保持不变。没有实际价格偏离完全竞争价格的状况；也没有理想竞争价格自身的变化；更没有定价条件的变化——这就是我们所构思的完全静态的概念。劳动和资本具有流动

性，但流动并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研究纯粹和简单的静态价格。

It is well also to see whether a theoretically natural rate of wages can be established in a similar way. Looking at the transactions between employers and employed, can we see in them anything that causes wages to fluctuate about a standard which is more less akin to the natural prices of goods? We shall at once find that there is a similarity between what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distinguished as the market price of goods and the market rate of wages. Let us for the moment cease to look at standards of pay about which, through long intervals, wages fluctuate, and see how the rate for one short period is fixed. We shall find that it is fixed in a way akin to that in which the immediate selling prices of goods are determined. Later we shall find that, in both cases, the market rates fluctuate about permanent standards.

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能否以相似的方式确立一种理论上的自然工资率。只要注意一下劳资双方所进行的交易过程，我们是否能够看到类似商品的自然价格标准那样的，使工资围绕着它而变动的标准呢？我们立刻就可以发现，古典经济学家所区分的商品市场价格和市场工资率之间有相似之处。我们暂且不谈那种长期围绕其变动而显现的工资标准，我们现在来看看短期的工资率是如何确定的。我们可以注意到，确定工资率的方式和确定现行商品售价的方式有类似之处。接着我们就会明白，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市场汇率都是围绕着永久标准而变动的。

Let us use commercial terms, and speak of a “market for labor.” Let us keep in view what is called the action of demand and supply,

and say that they, in some way, put a price on men, as they do on commodities. There is much to be said as to the accuracy of such terms in this connection; but there is no great danger that by thus using the terms in a preliminary study we shall reach an incorrect result. We shall, in fact, be able in this way to establish a normal rate of pay for general labor, which will have a certain kinship to the normal standard of price with which we have long been familiar.

我们暂且使用“劳动力市场”这个商业术语。让我们记住何谓需求和供给行为，并指出需求与供给就像它们给商品定价一样，也以某种方式给劳动力定价。此类术语应用到劳动力上面是否准确，还是有待考证的；但在初步研究中，如此地使用这些术语并不会有使我们得出错误结论的危险。事实上，我们是可以以此方式对一般劳动确立一种正常的工资标准，它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熟悉的商品价格的正常标准有某些相似之处。

“The produce of labor,” said Adam Smith, “constitutes the natural recompense or wages of labor. In that original state of things which precedes both the appropriation of land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stock, the whole produce of labor belongs to the laborer. He has neither landlord nor master to share with him.” There follows in the same chapter the statement that modern industry has changed this natural condition, that wages are now paid out of employers' capital, and that they do not consist in the product of labor itself. It is, in Adam Smith's view, the presence of the landlord and the master that has made this radical change.

“劳动的产品，”亚当·斯密说，“构成了劳动的自然报酬或实物工

资。在占有土地和囤积存货前的原始状态下，全部劳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既没有地主与其分享，也没有雇主来与其瓜分劳动的成果”。继而他在同一章又指出，现代工业改变了这种自然状况，工资现在是以雇主的资本形式支付的，而且工资也不再属于劳动产品本身。在亚当·史密斯看来，导致这种根本变化的是地主和雇主的存在。

What we have claimed is that, in modern life as well as in primitive life, the identity of wages with the product of labor is, in a general and approximate way, maintained, and that this product furnishes the standard about which wages for short periods fluctuate. It is clear, indeed, that the whole product of industry does not go to the worker. If the entire joint product of labor and capital be what we have in mind, the men who furnish land, tools, buildings, materials, etc., get a share of it. If what we mean is the part of this total that is attributable to labor itself, it is not merely possible that the worker should get it all, but it is certain that he would get it all, if competition could do its work perfectly—that is, if the static standards of wages were realized. Moreover, it is the presence of the employer that helps to reveal what the product of labor is, and it is the action of employers that enables the laborers to get pay that approximates to that product.

我们强调的是，无论是在现代社会还是在原始社会，工资和劳动的产品大体上接近于保持一致，而劳动的产品还提供短时期内工资波动据以衡量的标准。很明显，整个行业的产品不完全归工人所有。如果劳动和资本的整个相关产品全都在我们考虑之中的话，那么提供土地、工具、房屋、原材料等等的人都要从这总产品中分到一部分。如果我们所指的是这一总量中可归因于劳动本身的那一部分的话，工人所获得的全部就不只是可能实现的了。而且，假如竞争可以顺利开展，即工资的静态标准能付诸实施的话，工人们就能理所当然地获得

其全部了。况且，雇主的存在能帮助我们揭示究竟何谓劳动的产品，雇主的行为能使工人所得的工资能够等同于那部分劳动产品。

If we are accurately to express what takes place in simple types of industry, we shall say, not that “the whole produce of labor goes to the laborer,” but that the whole produce of industry goes to the independent man who is both a laborer and a capitalist. Nowhere is actual economy so primitive that it uses absolutely no capital; and where there is any capital at all, a part of the product of industry is due to its presence. In the “original state of things,” it is nearly impossible for a man to say how much of his product is due to labor on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whole product of labor and the whole product of industry is, however, all-important; for industry involves the coöperation of labor and capital.

假如我们要准确地叙述简单类型的行业中发生的情况，我们应该说，不是“全部劳动的产品归工人所有”，而是整个行业的产品归属于既是工人又是资本家的那位独立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现实经济不会原始到绝对不利用资本的地步；但凡有资本的地方，该行业产品中必有一部分要归因于资本的存在。就“事物的原始状态”来讲，一个人几乎不可能说他所得的产品中，有多少仅可归因于自己的劳动。不过，劳动的全部产品和产业的全部产品之间的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有了产业就有劳动和资本的合作。

Let a man fish from a dugout, with the simplest line and hook that he can make. The fish that he will bring to the shore are the product of labor and capital. Effort aided by instruments has secured them. How much of the catch is due to the man, and how much to the canoe and the fishing tackle? Not for his life can the

man himself tell. Can he put the fish into two piles, and say, “This pile is due to my effort only, and that pile to my equipment?”

假如一个人用他自制的、最简易的钓鱼线和钓钩在独木舟上钓鱼。他所能钓上来的鱼便是劳动和资本的产品。他借助于工具，加上自己的努力，确保鱼能够上钩。他所钓到的鱼有多少是归因于自己的努力，又有多少归因于独木舟和渔具呢？这个问题他毕其一生都回答不出来。他能否把钓上来的鱼分成两堆，然后说：“这一堆完全是归因于自己的努力，那一堆是归因于我的装备”？

Every single fish is a joint product—indeed, every fin or scale of a fish is so; and the difficulty i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divide a single one of them into fractions due to the producing agencies. Hopelessly merged with the product of capital is the product of the labor of an independent producer. Instead of presenting the condition in which the wages of labor are readily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incomes, and identified as the “produce of labor,” such a primitive economy as actually exists is one in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what the produce of labor itself is.

每一条鱼都是连带的产品，甚至鱼身上的一鳍一鳞都是如此；难就难在要把一条鱼细分为几部分，并把各部分分别归因于各生产因素。独立生产者的劳动产品是无望和资本产品合并的。固然有这样一种情形，在其中，劳动的工资与其他收入不难区分，而且是确定为“劳动的产品”的，但也有诸如实际上的确存在的这样一种原始经济，在其中是无法说清楚劳动的产品究竟为何物的。

The illustration used by Adam Smith avoids this difficulty,

indeed, by assuming that there is no capital in the case and that, therefore, whatever is produced at all is created by labor. The state that is referred to “preceded the accumulation of stock.” If a man does, in fact, work without capital, as well as without a master, his wages will be what he creates. A physical law and not a social one will fix his pay. He will dig his wages literally out of the earth, fish them out of the sea, pursue and capture them in the hunting forest, etc., and he will not have to share them with any industrial partner. There are points in the industrial system where this condition, though it is not absolutely reached, is approximated; and Mr. Henry George has advanced an interesting theory which makes the gains of men who are in this condition set the standard of general wages. A squatter may, for example, till land for which no rent can be obtained, using no appliance that is more elaborate than a hoe or a spade. He may live in a dugout, and have only a few dollars' worth of salable property of any kind. While this state of things lasts, the man has not capital enough to complicate the problem of wages; and for the purpose of illustration he must not be allowed to own land. If he is the owner of his farm, like a homestead settl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lication arises which makes it impossible rightly to claim that his wages are the whole income that comes to him.

亚当·史密斯引用的例子，实际上是假设在那种状态下不存在资本，因此，无论何种产品均靠劳动创造，这一难题也就避免了。引证中提及的这种状态，指的是“先于存活积累”的状态。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在既没有资本，也没有雇主的情况下工作，那么他的工资便是他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他的工资便由自然规律决定，而不是由社会规律决定。他的工资差不多可以说是取之于土地的，取之于海洋的，或是从森林里追捕获得的，如此等等。而且，他还无需和任何合作伙伴均分收入。在产业体系里，有些地方虽然没有完全达到这种状态，但是

接近于这种状态。亨利·乔治先生提出了一种有趣的理论，即人们在这种状态下所得的收入可以作为总工资的标准。例如，擅自占地者可以耕种一块无需交付地租的土地，它所能使用的工具比一把锄头或是一把锹还要精巧。他也许住在地下室里，只有一点点价值数美元的适销资产。尽管这种情况仍在持续，这个人的资本还不足以使工资问题复杂化。为了说明起见，还不必让他拥有土地所有权。如果他像一个定居美国的农场主那样，田地是属于他的，一种复杂的情况便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的工资归因于他所得的全部收入，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Mr. George has rightly said that, so long as land is so abundant as to be had for the asking, a man who is willing to work in a shop may demand and get from his employer pay that is large enough to make good to him what he gives up by not taking up a farm. In the period in which a great belt of country has been in the process of settling, and during which agriculture has been the dominant industry, the standard of all wages has, without doubt, been the gains that free farms always bestow on the men who not only till them but own them. These gains, however, are composite. They are not by any means the product of labor only. The fact that he owns his land gives to the homestead settler an income that is a large addition to the one that his bare labor creates. The situation is transitional and anomalous; for the men in the shops get pay that corresponds, in a general way, to the incomes of men who are getting wages and a large additional amount. The rewards of the men to whom the government has given homesteads consist, not merely in what they can get by raising crops, but largely in what comes to them in the form of increments of value that, from year to year, attach themselves to the land itsel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income of the man who occupies a homestead, under American laws, consists at first in the so-called “unearned increment” of land

value. The farm is worth, perhaps, a dollar per acre when the man enter, his claim. It becomes worth five dollars an acre within a year or two, and ten dollars an acre very soon. It is for this reward that the man is willing to burrow under a hillside for a home, to clothe himself for a time in rags, to live on corn meal, etc. The direct product of his work takes the shape of turf turned over by the breaking plough or furrows cut by the cross plough. Very little of it is food and clothing. Mingled with wages is the larger element of gain that, with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shows itself in the ten dollars per acre that the man can soon get for the land itself.

乔治先生曾正确指出，只要土地充裕到任何人只要有要求即可获得时，一个愿意去工厂工作的人可以向他的雇主提出付薪要求，巨额的薪金足以补偿他因为不占用农场而所放弃的一切利益。在这个时期中，一大片国土正处于移民过程，而农业成为主导产业，一切工资的标准，毫无疑问，都是由农场始终给予不但耕种土地而且拥有它们的那些人的收益决定的。不过这些收益属于综合的收益。这种收益无论如何，不仅仅是劳动产品而已。定居下来的这个人拥有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这一事实，就使他获得了一笔收入，此收入是对除其劳动所得的收入以外的巨额补贴。这种局面具有过渡性和反常性，因为工厂里工人所得的工资，一般说来，总是跟那些既获得工资又获得额外补助的那些人的收入相近。那些由政府给予自耕田地的人所得的报酬，不仅在于他们通过耕种农作物获得的收入，而且多半在于他们每一年从土地自身附带的增值收入。按照美国法律规定，拥有自耕农地的人的收入中，首先存在于土地价值中的所谓“非劳动增值”。这个人对这块农地提出所有权要求时，他的农场每英亩也许值一美元。在一两年内，他的田地增值达每英亩五美元，而且会很快增加到每英亩十美元。正是为了这种报酬，这个人才愿意蛰居在山坡之下的家中，一时间，他穿着破衣烂衫，以玉米为主食，等等。他的直接劳动成果以草皮的形式体现，而这草皮，是经由破土犁翻地或交叉犁所挖的沟畦而形成的。他的劳动成果只有极少一点点是吃的和穿的。和他的工资混在一

起的，是一笔更大的收益，这笔收益已经显现，即随着人口的增长，他可以很快地从土地本身获得每英亩十美元的收入。

It is worth while to dwell long enough at this point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at a man who is endowed by the state with a gift of land is not one the product of whose hands can furnish a standard of wages. It has been said that wages in America have been made to conform to the amount that homestead settlers can make by availing themselves of the offer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ment is, on its face, not incorrect; but it is far from proving that wages conform to the earnings of unaided labor. If it be true, what it proves is that there has been a time when wages have equalled a large and composite gain, much of which comes from land. So long as a man can have a farm for the asking, he will not be willing to work in a mill or shop, except on conditions that afford a fair equivalent for a farmer's gains. During the transient interval in which an abundance of free land of good quality is to be had, the standard of pay in every employment within reach of that land maybe said to be fixed in the belt of newly occupied wilderness that men are beginning to tame. This condition causes wages to vary from the permanent standard rather than to conform to it. The settler gets more than the income that comes to him in the shape of crops. The rising value of land enters directly into his gains; and it enters directly into the pay of the artisans and others who are held in the mills and shops by pay that is approximately equal to settlers' gains. Land values thus diffuse themselves everywhere. To the right and to the left, through all trades and callings, they find their way. The carpenter, the blacksmith, the cook, the hostler, the clerk, and even the doctor and the lawyer, find their earnings made larger by the values that the planting of a community on vacant land imparts to that land itself. For a hundred years all American wages had

more or less of this element in them. They were sustained so as to conform, in an approximate way, not to what could be made by tilling no-rent land, but to what could be made by tilling and owning the land.

值得我们详细说明的是，一个由国家给予土地的人，他双手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并不能作为工资的标准。有人说过，美国的工资等于那些自耕地移民利用政府所给予的土地而创造出来的财富。这句话从表面看来不算错误，但并不能证明工资等于独立劳动的收入。即便所言属实，也只能证明有一个时期中，工资等于数额巨大的复合收入，而这收入的大部分是从土地得来的。如果一个人可以有农田，并且想要求就能获得的话，他就不愿意在一家工厂或商店工作，除非他在那里的收入相当于一名农民的收入。在可以获得大量优质空闲土地的这一短暂间隔期，土地可达范围内的各行各业的工资标准，可以说是在人们新占有的、并开始控制和加以利用的那片新拓展的荒地上所确立的。这种情况使工资随永久标准而变动，而不是与之相一致。定居下来的移民所得的收入，要多于以作物形式的收入。土地的增值直接归入到他的收益中；而且它还直接构成在工厂、商店里工作的技工和其他的人的工薪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所得的工资约等于定居下来的移民的收入。土地的价值就这样到处延伸。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各行各业里，都可以看到土地价值的痕迹。木匠、铁匠、厨师、车辆维修工、售货员、甚至医生和律师都感觉到由于在空地上建立了社会，使土地的价值提高，他们的收入便增加了。一百年来，所有美国人的工资，或多或少地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起作用。这个时期的工资，保持着接近于通过耕种土地并取得其所有权所能获得的收益，但不接近于耕种免租的土地所能获得的收益。

As the larger of these sources of a settler's income is removed, the gains of an empty-handed laborer working on a farm are confined to what he can extort from the soil in the shape of a crop.

Make the man a mere occupier of no-rent land, and not an owner of it, and he will get wages with no increment of land value attached to them. Farms that are worth anything cannot long be had for the asking. Of the fertile areas in America that were once considered boundless, not meet, remains unclaimed. A law of wages, if it, is to be permanently valid, must apply to this condition.

随着移民收入的来源中多数不再成为收入的来源，一个家徒四壁的人在农场工作所获得的收益，仅限于他从土地得到的呈作物收成形式的东西。假定他只是无租土地的战友者，而非其所有者，那么他只能得到不附加土地价值增量的工资而已。无论有多大价值的田地，是不能够在长时间内想要求便能获得的。美国的肥沃地区曾被认为是广袤无垠的，可是现在那里无人认领的土地已经很少了。工资规律要永久有效，就必须适用于这种情况。

It is possible to adhere steadfastly, as Mr. George has done, to the view that labor always tends to get what labor can create on such land as may be offering itself freely for use. In an advanced stat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only land that is thus offering is that which is too poor to command a rent; and the theory therefore claims that the permanent regulator of wages is the gain that labor can extort from marginal and rentless land. There is, however, an element of truth in the theory, even in this form, for the man with capital in land and other instruments will not have to share gains with any one. He will be in the same position as was Adam Smith's primeval worker, who labored “before the accumulation of stock,” and who had “neither landlord nor capitalist to share with him.” His gains will be all his own, and they will be entirely the product of labor. The theory that makes them set the standard of all wages has the great merit of pointing out a method by which the product

of bare work may be disentangled from all other products, and made to stand by itself and to be separately measured.

有人也许像乔治那样坚定不移地遵循下列观点，认为劳动所得的收入接近于劳动在无偿使用的土地上所能生产出来的东西。在产业高度先进的发达国家，只有低劣到无法缴纳地租的土地才可以无偿使用。因而理论断言，工资的永久标准是劳动从边际的和无租的土地所能得来的收入。不过，这个理论中也有一些道理，因为拥有土地和工具这些资本形式的人不必跟任何人共享利益。他会与亚当·史密斯笔下的原始工人经历相同的处境。原始工人的劳动“先于存货的积累”，那时也“没有跟他分享利益的地主或雇主”。他的收入全部归他自己所有，而这种收入完全是劳动产品。认为这种收入确立了一切工资标准的理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它指出了把纯劳力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其他一切产品区别开来的方法，使其可以单独存在并予以分别计量。

We are to try to prove that the product which is separately attributable to labor does set the standard of wages; but there is a grave difficulty in making tillers of valueless farms the ones whose returns thus regulate every one's pay. If the theory is advanced that the general wages of labor are permanently fixed by the gains that men can realize, by tilling no-rent ground, this theory must mean that the more occupiers of pieces of land that cannot be let for any appreciable rent are the men to whose gains the wages of every one conform. According to this, an artisan in any workshop in the country would have to keep his eye on the squatters' shanties and see what the occupants were earning, in order to know how much he could make his employer pay him. In its most reasonable form, this theory would mean that a worker in a Belgian mill must take about what a Belgian peasant of the same grade of ability gets by

cultivating the sandy waste that borders to the sea. It means that the watchmakers of Switzerland must accept pay that, with an allowance for differing personal power, tends to conform to the amount that their peasant countrymen can extort from patches of green among the crags. It means that, after all the free lands of America shall have been allotted to owners, wage-earners in the mills, shops, mines, etc.,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Pacific, will get, on the average, what a typical one of them could produce, if he were to build a hut on a piece of poor and untenanted ground, and proceed to till it by the sufferance of the proprietor. This is a theory of “squatter sovereignty” over the labor market. It puts the man in the shanty into a position that is so strategic as to enable him to dominate workmen of every class, to fix the amount of their wages, and so to control the level on which they live.

我们现在要来证明，单独由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确立工资的标准。但是，要是把耕种无价值的农田的人所得的收入作为制约每个人工资的标准，却有很大困难。如果有这样一种理论提出，即劳动的总工资长期由耕种免租土地所得的收入来决定，那么，该理论就必然意味着，没有可观地租就不能出租的土地的所有人，他们每个人的工资都与其收益相近。按照该理论，这个国家任何工厂的一名工匠，为了了解可以向雇主提出付给他们多少薪酬，就必须先密切留意定居者的矮棚屋，看一看各住户的收益如何。就其最合理的形式来讲，这个理论也就意味着，比利时一家工厂里一名工人所得的收入，大约相当于一个同等级别的比利时农民通过开垦海滨沙漠荒地所得的收入。也就是说，考虑到各自的能力有所区别，瑞士制表工人所得到的工资，相当于他们同国的农民通过耕种山岩中的一块块草地所获得的收入额。也就是说，在美国，所有的无偿土地都分配出去之后，大西洋到太平洋两岸之间各工厂、商店、矿山等地的工薪族所得的平均工资，就相当于于他们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前提是他在一块未被租出去的贫瘠土地上盖一幢小屋，并且在地主的允许下

来继续耕种这块土地。这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人民主权”理论。该理论把住在矮棚屋的人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以便他能够支配各阶层的工人，决定他们的工资额，而且还能控制他们的生活水平。

With all its absurdity, this theory does at least appeal to the principle that wages tend to equal what labor itself can produce. If the squatter has not capital enough to count as a producing agent, his entire crop can be attributed to his labor alone. Putting a man into such a position is one way of separating labor from capital, and of disentangling the product of labor from the product of capital. It seems to furnish a case in an advanced society, in which we may see what Adam Smith saw in primitive society—namely, labor getting the entire product of industry and sharing gains with no one. Yet the absurdity of making the occasional squatter dictate the amount of every laborer's pay, is patent on the face of the illustration.

此理论尽管荒诞，但至少它与工资和劳动本身生产的产品趋于一致的原则相符，还是具有吸引力的。假如这个擅自占地的人的资本不够成为生产因素，那么他的全部收成可以说完全归因于他的劳动。置人于如此境地，这是区分劳动和资本，以及劳动产品和资本产品的一种方法。这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步社会的实例，使我们能够看到亚当·斯密所谈及的原始社会里的情况，那就是，行业中生产的产品全部归劳动者所有而且是独享收益的。然而，听凭临时擅自占地者支配每位劳动者的薪酬数额这一荒谬之举，却是这个例子表面所体现出来的特征。

It is, however, desirable to seek for a no-rent territory to which it is not absurd to look for the standard that regulates general

wages. It must afford a larger field for labor than the worthless agricultural land affords, if the men who occupy it are to have a general wage-regulating power. Such an economic field is at hand. The workers who occupy it come into it empty-handed. They produce virtually without capital, and the whole of their own separate product is wages. They get the amount of this product as their pay, and all other workers have to take pay that is equal to it.

但是，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寻找一片免地租的地区，从那里能够理性地探索制约一般工资的标准。假如要使占有上述免租地区的人具有调节一般工资的能力，那就必须给劳动者们提供比无价值的农业用地更大的土地。这种有经济价值的土地近在眼前。占用这种土地的工人初来时是空手而来的。他们实际上是在没有资本的条件下从事生产工作的，其所有产品就是他们的工资。他们的产品数量是多少，所得的薪酬便是多少，而其他所有工人必须获得与其对等的薪酬。

Looking first at market values, rather than natural ones, we noted that there is a commercial principle which causes the final or marginal part of the supply of anything to be strategic in its action on the value of the whole supply. The value of the whole crop of wheat, for example, conforms to that of the marginal bushel of it. If there are marginal laborers, in the sense in which there are marginal quantities of wheat, cotton, iron, etc., then these final or marginal men are likewise in a strategic position; for their products set the standard of every one's wages.

我们姑且不谈自然价值，先谈市场价值，我们就能注意到一条商业原则，它使任何商品供给的最终或边际部分对其整体的供给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小麦总产量的价值和其边际产量的价值是相符

的。如果有边际的工人，其意义和边际产量的小麦、棉花、铁矿石等等相同，这些最后的或是边际的工人，同样是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的产品决定了其他每位工人的工资标准。

For the moment, we will adopt the mercantile conception of labor, as a thing to be sold in the market. It is a familiar commercial principle that the last increment of the supply of any commodity fixes the general price of it. A common mode of stating this principle is to assert that English quotations gauge the price of American wheat—that the farmers of the northwest must take for their entire supply of this grain what the surplus part of it brings when it is sent to Liverpool. [7_1] The statement that the price of our wheat is thus fixed in Liverpool expresses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need to be disputed as a commercial fact. The price of grain on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Atlantic is actually equal to the price on the eastern side, minus the cost of carrying and handling. It is so, because Europe is a receiving ground on which the whole surplus of American breadstuffs may be sold. If we add fifty million bushels to the exportable crop, Europe will receive it at a somewhat reduced price, and English quotations will indicate the amount of the reduction. A small local market could not be a general price regulator. Iceland or Labrador may import American wheat, but quotations from there have no commercial significance. All that such a region can possibly take makes no impression on the American supply; and if, by reason of some calamity, the unusable part of the wheat crop of this continent had to be put on such a market, it would soon become there an encumbrance to be gotten rid of, worth less than nothing. The utility of the final unit of the wheat raised in this country fixes the price of all of it; but even though that last unit were sold entirely abroad it would be widely scattered. Labrador would have a small part of it, and the price of

wheat there would correspond with the price of it elsewhere. Much effect in regulating the price elsewhere it could not have.

我们现在可以采用商业上的理念，把劳动看作是可以在市场销售的东西。任何商品最后一次增加的供应量，决定该商品的一般价格，这是众所周知的一条商业原则。阐述这一原则的一种通用方法是，坚持以英国的报价来规范美国小麦的价格，就是说，美国西北部农民全部小麦的卖价一定等于其中的剩余部分送到利物浦去所得到的实价。[8_1] 美国小麦的价格由利物浦决定的说法，作为商业事实来说是无可非议的。实际上，大西洋沿岸西部的谷物价格等于扣除运费和经营费用之后，东部的谷物价格。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欧洲是收货场，而美国全部剩余的谷物都在此销售。假如我们增加五千万蒲式耳的谷物出口量，欧洲就会以稍低的的价格买下它，我们从英国的行情就可以看出价格减少额。当地的小市场不可能是一般价格的调控者。冰岛或拉布拉多也许会进口美国小麦，但是那里的行情没有什么重大的商业意义。这样的地区所能做的一切，都不会对美国的小麦供给产生影响。假如不幸发生某些灾害，该大陆的小麦中用不了的部分也得投放到这样的市场去，那么，在那里这件事很快就会成为一个需要摆脱，没有任何价值的累赘。该国所种植的小麦的最终单位的效用，决定全部小麦的价格，但是，那最终部分即使完全在海外销售，也会广泛地分售到各个地区。拉布拉多也会有一小部分的小麦价格与其他地区的价格相同。调控其他地区的小麦价格对这里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In seeking an outlet for surplus labor,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for some economic field in which an indefinitely large amount of it may find employment. Such an outlet is, however, not furnished by the bits of no-rent land to which men may betake themselves. The popular mind has not failed to see that, as an outlet for surplus labor, agricultural land at the margin of cultivation is more like Iceland than like Liverpool in the illustration just given, for it

wholly lacks the capacity to receive any large overflow of the supply. Turn the whole overflow of the Belgian population upon the sands for a living, and calculate, if it is possible, how far below the starvation limit their earnings must, by a mathematical necessity, fall. The earnings of the men on the Belgian sands and on the American arid plains do, indeed, correspond with and, within limits, measure the general rate of wages; but this is because in the world as a whole there is a vast and indefinitely elastic market for surplus labor, of which the no-rent lands are certain to get only a microscopic portion. The final increment of the world's labor is the wage-fixing part, as the final unit of the supply of goods is the price-making part; but this unit scatters itself through and through the industries of the entire world. What it ran everywhere produce, is the standard for general wages.

在寻找剩余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必须寻找可以让大量劳动者获得就业机会的经济领域。不过，人们向往以求的免租土地，无法为剩余劳动者提供这样的一片领域。人们未能普遍地注意到，作为剩余劳动力市场来说，开垦到极限的农业用地，正像上述所说，与其说像利物浦，倒不如说像冰岛，因为冰岛完全缺乏能力来吸纳任何供给过剩的大量劳动力。把比利时的全部过剩人口都转向沙地谋生，那么如果可能的话，按照数学的必然性计算得出，他们的收入需要降到饥饿极限的程度。在比利时沙地的人所得的收入，和在美国不毛之地的人所得的收入，实际上是一致的，他们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计量一般工资率。但这是由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庞大而有无限伸缩性的剩余劳动力市场，其中免租土地只能吸收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全世界劳动力最后增加的部分是决定工资的部分，作为商品供应的最终单位决定价格的部分，但这种单位分布于全世界各行各业。这部分在各处所能产生的就是一般工资的标准。

We not only admit, but positively claim, that there is a marginal region where wages are adjusted. It furnishes a large outlet for labor; and what men are able to get in this larger marginal field sets the standard of wages. This field is to labor what, in practical thought, the European market is to wheat: it is a place in which any possible surplus of labor may be disposed of at some living rate. If we find such a market, we definit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law of wages.

我们不但承认，而且还明确断言存在着某种工资与之相适应的边际地区。这种边际区域提供了一片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在这种临界区域里人们所能获得的产品决定工资标准。这片区域和劳动力的关系，实际想来，就像欧洲市场和小麦的关系一样；这片区域能够以某种生活率，安排任何可能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如果我们能发现这样一片市场，我们就一定能解决工资规律的问题。

At the very outset, we can find a market of this kind that is large enough to receive a very considerable amount of labor. An unlimited amount it cannot receive, but it is an important outlet for labor, and it is a factor that needs to be considered in a theory of wages. Men virtually work empty-handed, and get all that they create elsewhere than on lands at the agricultural margin. The true margin of cultivation—more accurately, that of utilization—is not wholly or chiefly agricultural, but extends throughout the industrial system. There are productive instruments, other than land, that yield no rent to their owners, and may be had for the use of laborers for the asking. The workmen may not themselves be able to borrow them; but the interest of the men termed entrepreneurs insures that they will be put into service, and that men will be set at work in connection with them, whenever wages, including pay for

superintendence and for other labor, may thereby be secured. There is a margin of utilization in cotton-spinning, in iron-smelting, in shop-keeping, in transporting freight and passengers, and in every other possible occupation.

我们一开始就能找到此类市场，具有足够大的规模吸收相当多的一部分劳动力。它虽然不能吸纳无限量的劳动力，但它还是一片重要的劳动力市场，而且他是工资理论必须考虑到的一个因素。人们实际上是徒手劳动的，他们的收入是在其他地方所创造的，而不是在农业边际土地上。真正的耕作边际——确切些说是使用边际——不完全是农业或多半不是农业的，而是遍布于整个产业体系的临界部分。除土地以外，还有生产工具，这些工具对其所有者免于缴纳租金，而且只要劳动者需要使用的话就可以得到。工人自己也许不能借到这些工具，但是作为企业家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确保能将其投入使用；什么时候包括监督者和其他劳动者的工资可以有所保障，人们就在什么时候用这些工具开始工作。在棉纺业、炼铁业、商店经营、客货运输及其他行业里都有一个使用边际的问题。

A part of the marginal field for labor is furnished by the waste lands that are available for raising crops; but the part thus furnished is a nearly infinitesimal part of the whole field. A larger part is afforded by no-rent instruments of the other kinds; and still a larger part is created by putting the entire stock of rent-paying instruments into uses for which no extra rent is charged. There may be a thousand men in a modern and profitable mill; and out of the product that their labor and the mill itself create may be paid the rent of the mill. It may be that twenty more men might find places in this mill, and that their presence would result in a distinct addition to the daily product of it. It may be, also, that this entire extra product will go to the men as wages—that the owner of the

mill will make no claim on it. If so, these marginal men will get their whole products and will be in reality as free from the claims of masters on their earnings as though they were tilling waste land by the sufferance of the owner, or were running an abandoned mill in which some proprietor might tolerate their presence.

劳动力边际区域的一部分是由那些可以用来种植农作物的荒地提供的，不过这一部分的收益在整个区域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其他种类的免租工具提供了较大部分收益。再大一些的一部分收益，是通过把全部偿租工具投入使用，并免于另缴租金的方式而创造的。在利润颇丰的现代工厂中，员工是以千人计的，工厂的租金，是从工人的劳动产品和工厂自身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抽出一部分来支出的。倘若有二十多个工人在此工厂就职，由于他们的加入，就会致使工厂的日产量大大增加。另外，这部分增产品可能全部作为工资发放给这些员工，而厂主对这些增产品不会提出什么要求。如果是这样，这些边际工人的产品就完全归他们所有，厂主实际上也不会对其收入提出要求，这正如他们得到地主的允许去耕种荒地一样，或是去经营一家荒废的工厂，而某些业主会容许他们在此谋生。

Here, then, is a marginal fraction of the supply of labor; and it would seem that it is in a position to set the market rate of pay for all labor. Here, also, is a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ay of this marginal part of the laboring force and the product that can be specifically attributed to it. Does this product of marginal labor set the standard of wages, as the price of a final increment sets the general standard of value of commodities? If so, the law of wages would stand thus: (1) By a common mercantile rule, all men of a given degree of ability must take what marginal men of that same ability get. This principle fixes the market rate of wages. (2) Marginal men get what they produce. This principle governs wages

more remotely, by fixing a natural standard for them. In this formula we are, indeed, near to the law that we are seeking; but we have not yet reached it. The true law, when accurately stated, sounds much like the foregoing one; but between the two there is a vital difference. [7_2]

那么，这里所说的二十多名工人是劳动力的一个边际部分，此边际部分似乎可以对全部劳动力确立市场工薪额度。此外，在劳动力中，此临界部分的工资与可以具体归因于这一部分的产品之间有直接的联系。此边际劳动力的产品，能否像商品的最终增量对商品的价值确立一般标准那样，确立工资标准呢？如果可以的话，工资规律将是这样的：（1）按照商业章程，所有同程度能力的人获得的工资都必须和那些有同等能力的边际工人的收入相等。这一原则决定市场工薪额度。（2）边际工人所得的收入就是他们所生产的产品。此原则通过确立工资的自然标准，从而间接地调控工资。实际上，我们是用这一准则接近于我们正在探索的这一规律，然而还没有完全接近此规律。一旦能够精确地阐述，真正的原则和前述原则会很相似，只不过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8_2]

The substance of much of the ninth and tenth chapters of this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May, 1888, in monograph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on “Capital and its Earnings”; and a further part was published in the Yale Review for November, 1893, in an article on “The Genesis of Capital.”

本书第九、第十两章的大部分内容，最初以“资本及其收益”为题于1888年5月间刊发于美国经济学联合会论述的一部专著；还有一部分发表于1893年１１月间的《耶鲁评论》杂志上，见于“资本的起源”一文。

[7_1].This view may involve an imperfect conception of the law of value; for it is, of course, the final utility of that part of the wheat crop which remains at home that directly fixes the value of it here. England, however, represents the European market; and this, in its entirety, draws away enough of the American wheat crop to reduce appreciably the amount that has to be consumed here. The final utility of the part of the crop that is thus left at home is raised to such a level that it can be sold as advantageously here as in Europe.

[7_2].For an early publication of the substance of this chapter and of much of the following one, the reader as referred to a monograph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containing a paper on "The Possibility of a Scientific Law of Wages." The paper was presented at a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held in December, 1888, and was printed in March, 1889. One qualification of the statement made in that monograph is to be found at the end of the eighth chapter of the present work.

[8_1].这一观点会导致对价值规律的某种不完全看法。因为直接决定小麦价值的，当然还是还在国内那一部分小麦的最后效用。不过，英国代表着欧洲市场。美国小麦的输出足以明显减少美国国内的消费需求。因此，留在国内那一部分小麦的最后效用，便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乃至能够如同在欧洲一样，在国内销售得获利颇丰。

[8_2].欲知有关本章及下一章的基本内容的早期出版物，请读者参阅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的一部专著，内含一篇论述“科学的工资规律的潜在价值”的文章。该文是在此联合会于1888年12月召开的会议上发布的，后于1889年3月以书面形式发表。该文所作的那种说明性的先决条件，见本书第八章结尾。

Chapter VIII How the Specific Product of Labor may be distinguished

第八章 如何区别劳动的具体产品

In that static condition in which competition would produce its full effects and bring wages to a natural standard, the pay of labor, as has just been shown, would equal the product that could be separately traced to it. We have discovered a limited field in which whatever is produced is due to labor only; but we need to find one that is larger and more elastic. We have to look for an economic field to which many men may go, and in which they will be virtually rent-free and interest-free. They must be able to work unaided and also untaxed and to create a distinguishable product, all of which they will then get. A few men may, of course, till worthless land, and so make themselves free from landlords' and capitalists' claims. Many more may utilize instruments of other kinds that are too poor to afford a rent to their owners. A larger number still may get employment as additional workers in establishments that have good working appliances, and that pay no more for the use of them in consequenc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marginal men.

我们已经指出，在竞争充分发挥作用并使工资达到某种自然标准的那种静态条件下，劳动的工资等同于单纯由劳动生产的产品。我们已经找到一片有限的区域，在那里所生产的产品完全归因于劳动；但我们还需要寻找一片更大的、更富于弹性的区域。我们必须寻找一片经济区域，在此，许多人可以前去且谋生而实际上还会对他们免租免息。他们必须能够独立地工作，而且免租免税，以创造出某种可以辨

别且全部归他们所有的产品。当然，少数的人或许就得耕种无价值的土地，因此地主和资本家也就不会对他们提出什么要求了。比较多的人，或许会利用那些坏到不能对其物主出租的工具。更多的人，可能就会在具有优质设备的工厂里充当临时工，在这里，由于有这些边际工人，他们不付费就能够使用这些设备了。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because a man desires that the product of his industry shall not pay tribute to employers, he needs to take himself away from them. Working near to the man who tills a waste piece of land in an independent way, there may be another man who works on similar land for the owner of it, and gets as wages the value of what he raises. This man is as free from a master's exactions as is the squatter. A man may have, as Adam Smith has said, “neither landlord nor master to share with him,” though he work for a master. If he gives his employer no more in value than his employer gives to him, his product is intact, and it all comes to him as wages. It is in positions like these that most marginal laborers are found. They are not working in solitude, yet their products are distinguishable from all other products.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有的人在他所处的行业中，不希望将产品的一部分分给雇主，他就得离开他们。有一个人独自耕种一片荒地，在附近的土地上可能还有另一个人在一片类似的土地上为其雇主工作，他所得的工资就相当于所种植产品的价值。他就像是那种擅自占用土地的人那样，不必担心地主来逼交租金。正如亚当·史密斯所说，一个人尽管是为了雇主工作，但他“没有跟他均分收入的地主或雇主”。如果他提供给雇主的与雇主付给他的工资具有同等价值，那么他的产品便丝毫没有损失，并作为工资完全归他所有。大多数边际工人所处的状况都类似于此。他们虽然不是单独地工作，但他们的产品和其他产品还是有所区别的。

There are mills and furnaces so antiquated, so nearly worn out or so badly located that their owners get nothing from them; and yet they run, so long as superintendents can earn their salaries and ordinary workers their natural wages. There are machines that have outlived their usefulness to their owners, but still do their work and give the entire product that they help to create to the men who operate them. There are railroads and steamship lines that pay operating expenses only. There are stocks of merchandise so full of remnants and unstylish goods that it barely pays salesmen to handle them. Everywhere, in indefinite variety and extent, are no-rent instruments; and, if labor uses them it gets the entire product of the operation. Let the general rate of wages rise, and many of these instruments will be thrown out of use. Let the rate then fall, and the utilizing of them will be resumed. Let a migration relieve the pressure of population in one country, and overcrowd another; and in the former country no-rent instruments of every sort will be abandoned, while in the latter such as are idle will be put into active use.

有些工厂和熔炉过于陈旧或是几乎磨损，或是配置不佳，导致厂主从中一无所获；可是，只要负责人能获得薪水，普通工人能获得自然的工资，这些工厂和机器设备还会照旧运转下去。有的机器陈旧过时，对其所有者来说早已不再有用，可是这些机器依然运转，把他们所制造出来的全部产品给予操作此类设备的人员。有些铁路线和轮船航线所得的收入只能够支出营运费用。有的商品存货，也就尽是些边角剩料和过时滞销的产品，就连售货员处理它们的费用也不敷所需了。免租设备随处可见，种类既多范围又广；如果劳动时使用这些设备，过程中所得的全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如果一般工资标准上升，许多这样的工具就得弃之不用。如果一般工资标准下降，这些机器又会被加以利用。由于移民的缘故，一个国家缓解了人口过剩的压力，

但是另一个国家却承受了这个压力，那么，在前一个国家里，各种免租工具将弃之不用，而在后一个国家里，原来闲置的工具就都会又纷纷投入使用了。

That no-rent instruments are not few in number is made clear by the fact that every tool, machine, building, vehicle or other auxiliary of labor that wears out by use must, in the course of its deterioration, necessarily reach a point at which it yields no net gain to its owner. So long as an entrepreneur can keep such an instrument in his service, and gain anything whatever by so doing, he will keep it. When he loses something by its presence, he will abandon it. When he neither gains nor loses by the presence of the worn instrument,—that is, when the whole product gained by using it is required to pay for the labor that utilizes it,—the instrument is in the concluding or no-rent stage of its economic career. Everything that wears out in the using has such an old age period of service, preceding the moment of its abandonment; and the aggregate of things that at any one date are in this condition is enough to constitute a very large outfit of no-rent appliances, by which labor may be aided. The effect of an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f other things remained unchanged, would be to prolong the period of service of all such deteriorating capital goods. To make the existing stock of capital goods available for the larger number of men,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work the worn tool, the rickety engine, the unseaworthy ship, etc., somewhat longer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used under former conditions. When it is at the point of abandonment, however, the labor that uses it creates wages only.

下列事实能够清楚说明免租设备为数不少。每一种由于使用而逐渐损坏的工具、机器、建筑、车辆或其他劳动辅助器械，在磨损过程

中，一定会达到不再为其所有者产生纯收益的阶段。在企业家看来，只要这样的设备还可以留下来使用，而且还能使他有利可获，他便会将其留下。如果留下来使用会让他亏本，那他就会弃而不用。如果老化的设备既不能使他获利，又不会让他亏本，就是说，使用这些设备所得的全部产品，要用来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则此时，此设备也就处于其经济使用的终结阶段或是免租金阶段。任何由于使用而逐渐损耗的东西在被丢弃以前，总有一段老化服务期，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任何一段时期的这种东西都足以构成很大一套免租设备，劳动就借助这一套设备而得以进行。如果其他情况保持不变，那么人口增长就会导致延长诸如此类处于磨损状况中的资本货物的使用期。要使现有的资本货物能供给更多人使用，就必须使磨损的设备、不牢靠的发动机、不适于航海的船等等的使用时间。比处于以前那样使用的状况下的使用时间长一些。但是设备一旦接近报废时，使用这些设备的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就只能够充作工资。

The entire product that is created by utilizing the poorest instruments that are kept in action at all, goes to the men who work with them. The amount of this product corresponds with and expresses the rate of general wage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regulating that rate. The men who use such instruments are a part of the final increment of labor, the market price of which regulates the price of all labor. They are, however, not the whole of this final increment; for there are in the field other marginal men who are not using valueless instruments of any kind. A man may be free from all claims of capitalist and landlord, without restricting himself to the difficult process of using only worthless land and tools.

凡是利用质量最差的设备所制造的全部产品，都归属于使用这些设备的人。这种生产量与一般工资标准相一致，又能将其体现，这种

产品的数量还是调节这种工资标准的一种重要因素。使用这种工具的人是劳动力最终增量的组成部分之一，而这一增量的市价调控着所有劳动力的价格。不过，这些人不是这一最终增量的全部，因为在该领域，还有不使用任何一类无价值工具的其他边际人。一个人如果不想使自己仅限于使用无价值土地和工具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只得顺应资本家和地主的要求了。

If this were the only alternative open to an unemployed man, the wage law that our study is to reveal would be akin to that of Mr. George, which asserts that all wages depend on the product realized by tilling no-rent land. We should, however, have to offer one amendment to this formula, making it assert that all men must accept what any of them could produce, if they chose to utilize marginal land and other valueless instruments. The field that would thus be open to men seeking employment is, by one point, larger than the marginal territory that mere agriculture affords; but it does not comprise the whole field that is, in reality, open to them. We must consult facts to see where men may and do resort, when thus seeking employment.

如果这是一个失业者可以利用的唯一可供选择的东西，那么我们在研究中揭示的工资规律将类似于乔治先生所指出的那种情况。他认为，一切工资都取决于耕种免租土地所得的产品。不过我们要对这句话做一下修正，这就是，要是所有人都选用选用边际土地或其他没有价值的工具的话，那么他们就得接受他们任何一个人所生产的产品作为他们的收益。这样一来，可供求职者利用的领域就比仅由农业所提供的边际区域大一些；但是，这并不构成可供他们实际上利用的全部领域。至于他们求职时可能前往何处，还是实际上所到何处，我们必须事实求是地探讨。

Reverting to agriculture, we find an intensive, as well as an extensive, marginal field. For one man who finds work by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the tilled area into no-rent territory, there are a number who find it by a harder tillage of rent-paying lands. Whenever one waste farm is brought into use, new men are likely to be set at work on many good ones. Indeed, the overcrowding of the good lands comes first in time; for it is the diminished returns that the workers get, as they till more and more intensively these lands of high quality, that cause an overflow of the working force to inferior lands. Men are, then, crowded outward from the intensive centres of cultivation. The point at which it ceases to be profitable to add to the amount of labor spent on good land may be termed the intensive margin of cultivation. Such a field has received increment after increment of labor; but the time has come when a further force of workers can do better elsewhere.

再说到农业。我们发现一种既适于粗放经营又适于集约经营的边际土地。固然是有人从耕作区到免租地去找工作，但很多人还是靠辛勤耕种支付租金的土地谋生。每当一片废弃的农场再次投入使用，新来的人很可能就给安排到许多好的农场去工作。其实，优质土地终究是吸引劳动力最多的地方；导致一部分劳动力外流进入到劣质土地的原因，是因为优质土地耕得越来越密集，导致耕作的人所得的报酬越来越少。于是，人们就从集约化耕作的中心被挤向外围。向优质土地再增加劳动数量而不再盈利的地段，可以称为集约化耕作边际。这块良田已经容纳了一批接一批的劳动力，但如果劳动力再有增幅，就只能对别处有利了。

Thus, one man may plough a rocky field alone, but his ploughing is imperfect. For the best results a spade must here and there be used; and the man who uses it may be regarded as a

marginal man. Again, three men may plant a field; but their planting will be slow, and some parts of the land will not have the benefit of a long growing season. Four men, however, can plant the field more quickly, and thus give to the part that is last reached a longer time to mature its crop. In this case the fourth man is the marginal one; and the value of the whole additional produce that his presence causes may go to him as wages. Once more, three men may be able to reap a field; but four can do it more quickly, and so save the crop from some of the danger to which autumnal rain exposes it. Here, again, the fourth man is the marginal one, whose whole product is his wages. The value of the wheat that in a series of years is saved from destruction through his presence may be paid to him for his labor. There may be still another man who gleans behind the reapers, and gets just the value of his gleanings. Such an additional man often adds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planting process or the cultivating process. But if he created less and received less than he actually does, he would betake himself to inferior land.

由此可见，一个人可以耕种一片多岩石的土地，但是这种耕作并不尽如人意。为得到最佳效果，便需要到处用铲子铲地，而这个使用铲子的人就堪称边际人。再就是，三个人固然可以合种一块地，但他们的耕种总是不但缓慢，而且这块土地上有某些部分的庄稼无法从长时间的生长时期中受益。如果有四个人，田地就可以耕种得快一些，这就使最后种植的那部分作物的成熟时间会更长一些。在此例中，这第四个人便是边际人，因为他的存在，所生产出来的增收产品即可作为工资归他所有。又如，一片田地的收割工作有三个人就可完成，不过四个人的话能收割得更快，因而可以使庄稼避免秋雨突袭的危险。这里的第四个人就又是一个边际人，他的全部产品就归入于他的工资。因为有了他，小麦年年可以免受损失，这一部分小麦的产值便归他所有。也许在收割机后面跟着一个收集散落麦穗的人，他所得的收入只等于他所捡的麦穗价值。这样一个额外增加的人，常常使播种或

耕种工作更加完善。但是，如果与他的实际生产和实际所得相比，他生产的和获得的均较少，他便会离开贫瘠的土地。

It is by assuming perfectly free competition among employers that we are able to say that the man on the intensive margin of an agricultural force of laborers will get, as pay, the value of his product. When such a man offers himself to an employer, he is virtually offering an addition to the farmer's crop. If one farmer will not pay the market price of the additional produce, another will pay it, provided that competition does its work quite perfectly. Friction is, however, always an element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adjustments like this are not perfect in any society. Our sole present inquiry is, nevertheless, to determine the standard to which wages tend to conform—the standard to which they would conform in a frictionless society. Our answer is that wages conform to the product that is attributable to marginal labor.

假设雇主们之间有着完全自由的竞争，我们才能说，处于农业劳动力集约化耕作体系边际的人，可以得到他的产品的价值作为他的工资。当这种人为一个雇主效力的时候，他事实上就是为农场主提供增产增收的机会。在竞争顺利地开展的前提下，如果有的农场主不肯按市场价格支付这增收的部分，那就会有另一位农场主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可是，阻碍总是一个必须考虑到的因素，因为在任何社会里，此类调节总不是完善的。然而，我们所作的这一探究惟独在于确定工资趋向于符合的标准——也就是在无阻碍的社会里工资所要依据的标准。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工资要与完全由边际劳动力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相符。

We are also seeking to ascertain what such marginal labor is;

and in agriculture much of it consists in the final increment of labor employed in the intensive tillage of good land. Such labor demands of a farmer no appreciable increase in his investment of capital. He does not need to buy more land or to put more permanent improvements into land that he already owns. In many cases he does not need to add a single tool to his outfit. He has only to add this man, empty-handed as he is, to his laboring force. Any extra produce is attributable to the man's labor, and to that only; and perfect competition tends to give the value of this produce to the man as wages.

我们也在设法确定这样的边际劳动究竟是什么。在农业方面，大部分的边际劳动存在于优质土地集约耕种的劳动的最终增量部分。这种劳动并不需要农场主增加很多资本的投资额。他无需购置更多的土地，或是把更多改良措施应用于他已经拥有的土地上。在很多情况下，他也不需要为其全套工具添置任何一件。他就是想要在劳动力中增加这一个空手而来的人。所有的超额产量都是由这个人的劳动得来的，而且只是归因于其劳动而已；完全的竞争倾向于把超额产品的价值作为工资付给这个人。

Such an intensive margin of the field for labor is by no means confined to agriculture: it may be traced throughout the industrial system. Everywhere there is a line that it does not pay to pass in adding to the number of workers who are utilizing the really productive appliances of industry. Though a hundred men can sail a steamship, a hundred and five may sail it better. In that case, the five extra men are on the intensive margin of utilization of the steamship and are virtually rent-free. Whatever the ship itself must pay to its owners, was paid when it was run by the original crew. The last five men that are taken on board, therefore, create a

distinct product. They render the ship a more efficient carrier and put money into the owners' pockets; but they take this money out of the owners' pockets, when they draw wages. In mills, mines, shops, furnaces, etc., there is in this way often a chance to vary, within narrow limits, the number of men who are employed, without affecting the owners' incomes. If new men are thus taken, their whole product is given to them.

像这样使用劳动力的地区的集约化边际，并不限于农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都可以存在。增加使用那些真正有生产能力的工业设备的工人数量，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有一个界限，超越这个界限就不合算了。尽管一百个人就可以使一艘轮船扬帆启航了，但一百零五个人可以使它更顺利地行驶。要是这样，额外的五个人便处在轮船集约利用的边际上，因此，实际上是免付租金的。凡是使用该船本身应缴的轮船租金，在原先的全体船员驾驶时，已经交给船主了。因此，上了船的那最后五个人就创造了某种独特产品。他们提高了船的运输效率，并且把钱放入所有者的口袋，而当他们领取工资时，又把这笔钱从所有者口袋中取回了。在工厂、矿山、厂房、熔炉等地方，都常有这样的机会，在有限的范围内调整雇工的数目，又不影响其所有者的收入。假如雇用新成员，他们全部的产品都归他们所有。

There are, however, some points in the industrial system at which there is no elasticity in the number of workers who can be economically employed. A given machine often requires one man to run it, and no more. It is not, then, at every point in a great establishment that the working force can be enlarged or reduced without any change in the character of the outfit of capital goods. Yet in commerce there is often an appreciable elasticity in the amount of labor that can be employed in connection with a stock of salable merchandise. In manufacturing and in transporting, too, the

working force may often be varied perceptibly, with no change in the amount or in the character of the capital goods that are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it.

但在产业体系中的某些地方，在工人的人数上却没有伸缩的余地，这些工人雇用起来是很经济化的。一台机器往往只需要一个人操作，不会再有额外的人。由此可见，在一家大企业里，劳动力或者增加或者减少，而资本货物配备的性质并非无论何时都不变的。然而，在商业中，畅销的商品在劳动力使用的数量上，却有很大的伸缩性。在制造业和运输业中，劳动力也可以常常加以显著的调整，而与劳动力一起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或性质则保持不变。

Such changes must, of course, be kept within comparatively narrow limits. At one point in the industrial system it may be that five men can be added to a gang of a hundred, without requiring a change in the amount of capital employed and without requiring any change in the form of it. Elsewhere only one man in a hundred can, in this way, be added or subtracted. If, in each of the general groups into which society is organized for the purpose of production, as many men as one for every hundred can be added to the working force or taken from it, without necessitating any change in the outfit of tools, machines, materials, etc., that they use, this fact is sufficient to furnish a certain theoretical basis for a law of wages. Any one man in a force of a hundred may, then, leave his own employer without injuring or benefiting the employer; and if he offers his service to another and demands, as pay, what he will produce for him, he will neither benefit nor injure this second master, in case he gets employment from him. There is, it thus appears, what we may call a zone of indifference in the field of employment that each entrepreneur controls. Within this limit men

may go or come without affecting the employers' pockets. Motives other than pecuniary interest may cause employers to accept new men that are offered to them; and there is a chance for a limited amount of labor to flow freely from group to group in the industrial system. If competition works in ideal perfection, wherever these marginal workers go, they get their exact products as their pay; though, in fact, as competition works imperfectly, what the men get is merely an approximation to their products.

当然，这类改变的幅度仅限于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在产业体系中，有一个领域，五个人可增至多达一百人，而不必改变所利用的资本的数额和形式。在另外的领域，同样道理，如果资本的数额和形式没有改变，一百人中可增可减的也就一个人而已。假如在社会为生产而组织的的每个团体中，每一百名劳动者中都能增加或减少一名，而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机器、原料等等却不必有什么改变，那么，这个事实足以为工资规律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因此，一百名劳动者中的任何一个人，可以离开他的雇主，他的离开对雇主没有损失也没有利益；如果他向另一位雇主提供服务，并且要求以他为雇主所生产的产品作为工资，如果第二位雇主雇用了他，那么他对这个雇主也是既无损失也无利益的。由此可见，在每一位企业家所控制的就业领域中，都有一片我们所称的无差异地带。在这个范围内，人们来去自由，而不至于影响雇主的腰包。非金钱利益的动机可使雇主接受提供给他们的新人；而且还有机会使产业体系中有限数量的劳动力可以自由地在行业与行业之间流动。如果竞争在理想情况下能完全发挥作用，这些边际工人无论前往何处，他们所得到的工资确确实实都相当于他们的产品；但事实上竞争并未完全发挥作用，所以，这些人所得的工资也只是和它们的产品大致相当。

When any man leaves his employer, the test that determines how much he has been worth is applied by ascertaining how much

the employer loses in consequence of leaving his laboring force made, by one man, smaller. It may be that the identity of the particular man who goes is of no consequence. All that is important may be the fact that, somewhere in the mill, there are seven workmen in a gang that formerly had eight, or nineteen in a gang that had twenty. The man is, let us say, an average, unskilled workman; and he can change his occupation without that amount of waste and friction that is entailed when a man who has mastered a profitable specialty transfers himself from one group to another. One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is, How much does the former employer lose by the man's departure? Another question is, How much does the second employer gain by the man's presence?

任何一个工人离开他的雇主时，决定他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只要确定一下，在劳动力中少了一个人的情况下，雇主所遭到的损失究竟是多少即可。这个离职工人的特征是没有什么重要性的。重要的或许在于下列事实，在工厂的某部门，原来是八个工人一组，现在只剩下七个人一组，或者原来是二十个工人一组，现在只剩下十九个一组。我们说，这名离职工人是个普通的，无一技之长的工人，如果没有以下情况，他可以随意改换职业——即当一个掌握某项专业技能的人，从一个产业群转移到另一个产业群时，会使他人遭到损失和阻碍。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个人的离开，给前雇主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少？另一个问题是：第二个雇主因为有了他而获得的利益又是多少？

So far as the men in an employer's service are thus interchangeable,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o him which of them it is that leaves his service. If the man who departs has been doing some kind of work that is quite necessary in conducting the business, the employer has only to put in his place the man who has been doing

the work that is least needed. The work that is left undone in consequence of one man's departure is always of the marginal kind. The men in a mill arrange themselves in different classes, in the order that exp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work that they are doing. The first class does something that is indispensable, the second, something that is highly important but less so than that which is done by the first, etc. The last class does a kind of work that contributes least of all to the productiveness of the business. If a man belonging to the first class leaves his employment, the master has only to put into his place a man taken from the last class. It is the least needed work that will remain undone. The effective importance to his employer of any of these interchangeable men is measured by the absolute importance of the one that does the least necessary work.

如果雇主所雇用的工人可以互相替换，无论哪一个工人离职，对雇主来说，都毫无影响。如果离职人员所做的是事业经营上十分必要的工作，雇主就只得挑一个一直做无关紧要的事的人接替他。由于一个工人的离职而虚位以待的工作，往往是边际性的。在工厂的工人，则按照几个不同的等级自行安排，以示他们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第一级工人所做的是工厂里必不可少的工作，第二级工人所做工作固然很重要，但不像第一级工人那么重要。最后一级工人所做的工作几乎对企业谈不上什么贡献。假如属于第一级的有工人要离职，雇主就只得从最后一级抽出一个人取而代之。虚位以待的工作将是最不必要的工作。这些可以互换互补的工人中，任何一个人对其雇主的实际重要性，是以做最无必要工作的工人的绝对重要性来计量的。

Moreover, we shall find that, where men are not thus entirely interchangeable, something akin to this substitution of one for the other still takes place, when a superior man, performing an

important function, deserts his employment. That function does not go unperformed. Another man is set to doing what the departing man did; and the work that remains undone is, as before, work of the marginal kind. The substitutions that have to be made,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this result, do, it is true, entail a special loss on the employer; for the important kinds of work are not so well done as they were formerly. The extra loss thus occasioned measures the special value of the superior man whose departure caused the substitutions. All grades of labor are, however, really measured, in the end, by marginal standards; and the entire process of measurement can be understood when we shall have reached a later point in the study of the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此外，我们还会发现，即使在人们不能完全互相替换的地方，当一个承担重要职责的优秀人员擅离职守时，也会发生类似上面所说的取而代之的调动情况。那项职责不会任由其处于虚设状态。会有另一个人被安排去接替离职者的工作；这样空下来无人做的工作，跟上面所说的一样，是边际的工作。当然，为导致这种结果而进行的调动的确会使雇主遭受一种特殊的损失，因为重要的工作会做得不如以前那么好了。由此所引起的额外损失可以用来衡量那个优秀人员的特有价值，这样的人一旦离开就得有接替者才行。不过，实际上各层级的劳动归根到底是按照边际标准来衡量的；至于衡量的整个过程，等我们进一步研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时候便可以理解。

What we need now to note is that, so far as men are interchangeable, they are all alike in what we may call their effective productivity. One of them may actually be doing an indispensable work and another a work that is of slight importance; but it really diminishes the product of the establishment no more to take away the first man than it does to take away the second, for

the second man is sure to leave his own work and do the more essential thing formerly done by the first. What we may call the absolute productivity of a particular man is measured by the importance of the particular work that he is doing. Let the man desert his place, leaving undone the work that he has heretofore done, and the los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will thereby sustain measures the man's absolute productivity. What we have called a man's effective productivity is, then, measured by the loss that his employer suffers when the man departs, and when the employer rearranges his force so that the more necessary kinds of work are still done. The employer will put B into A's place, C into B's place, etc.; and the only work that goes undone is of the kind that is least necessary. If the men are quite interchangeable, the effective productivity of any one of them is equal to the absolute productivity of the final or marginal one, whose work can best be dispensed with. We shall find that all wages are naturally gauged by the effective, rather than the absolute, productivity of the men who get them. In so far as men can be freely substituted for each other, any man in a series of men is actually worth to his employer only as much as the last one in the series produces.

现在，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仅就人们具有可互换性这一点来说，他们在所谓有效生产率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个人也许是做必不可少的工作，而另一个也许是做微不足道的工作；但是第一个人的离职对企业产量的损失，并不比第二个人的离职所致的损失大，因为这第二个人固然的确是放下了他自己的工作，但他是接着去做原先由第一个人做的那种更具实质性的工作了。所谓的一个人的绝对生产率，是从他所做的指定工作的重要性来衡量的。如果他腾出了职位，而他从前所做的工作现在空下来没有人做，从企业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就可以计量那个人的绝对生产率。因此，我们所说的一个人的有效生产率，可以从在这个人离职时，雇主为了使更为必要的工作

照常进行，而对劳动力加以重新安排，因而遭受的损失来计量。雇主将用B取代A，用C取代B，如此类推；余下没有人来做的工作就是最没有必要的工作。假如人们都是可以互换的，那么任何一个人的有效生产率，便等于最后一个人或边际的人的绝对生产率，而这个边际的人的工作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工资是由得到工资的人的有效生产率而不是绝对生产率来自然调节的。仅就工人能够自由互相调换的这一点来说，在一批工人中，任何一个人对其雇主所具有的价值，只不过等于该批人中最后一个工人所完成的产值。

From an employer's point of view, the area within which he can set a few extra men working, without reducing their effective products, in amount, below those of men who are already in this marginal region, we have called the zone of indifference—on the ground that it is of no appreciable importance to him whether such men work or not. If he hires them, he will pay their products as wages, and will make nothing out of them. A small influence will determine whether an employer will hire such man or not. There is, of course, some friction to be overcome whenever a working force is enlarged or reduced. From a workman's point of view, this is evident. If I am a clerk out of employment, will you take me into your shop? Yes, if I can produce for you a bare tithe more than you will pay me in wages; no, if I can produce less. You may or may not take me, if I can add to your previous product exactly what I ask as wages. My labor will then lie within the zone of economic indifference, and humanity or other motives will determine your action. If I am in your employment, will you turn me off? Probably not, till the product that my labor adds to the other earnings of the shop falls short of my actual wages. If you have taken me into your shop at a time when business was unusually good, you doubtless realized, for the time, a small profit from my labor; and this sufficed to overcome the slight inertia that opposes an enlargement of a

laboring force. On the other hand, when you have once enrolled me among your men, inertia will work in my favor; for you will keep me till my presence involves a loss that is large enough to make you take the overt step of discharging me.

从雇主的角度来看，他可以在一定区域内额外安插几个人来工作，并且不会使他们的有效产量低于那些已经在边际区域内的工人的产量，我们把这样的区域称为无差别地带，所根据的理由是，这些人是否参加工作，对雇主并没有显著影响。雇主如果雇佣了他们，便要将他们的产品作为工资支付给他们，而且雇主并未从中获利。一点点的影响就可以使雇主决定要不要雇用这样的人。当然，无论什么时候，想要增减劳动力，就总得要克服一定的阻碍。从工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设想我是一个失业的店员，你会把我招进你的工厂吗？要是我能为你带来的利益稍多于你付给我的工资，你肯定会的；要是我不能的话，那你就不会招我进厂了。假使我对之前的产量所能增加的价值恰好等于我所要求的工资，你也许会聘用我，也许不会聘用我。由此可见，我的劳动就在经济无差别地带内，你是否聘用我，要由人道或其他动机来决定。如果我已经在你手下工作，你会解雇我吗？我给本厂的其他各项收益增加的产品，在不足以抵付我的实际工资之前，或许你是不会的。如果你在生意非常好的时候雇用了我，那么，毫无疑问，在那个时候，你会从我的劳动中获得一点利益，而这就足以克服你反对扩充劳动力的那么一点点惰性了。反之，如果你曾经招收我为工厂员工的一员，惰性的作用便会有利于我，因为你会把我留下来，直到因为雇用我而使你遭受了很大亏损，大到足以让你采取措施解雇我为止。

What we are seeking is, of course, the standard to which the pay of labor tends to conform; but inertia and friction are influences that, as we have asserted with all needed emphasis, have a place in all economic theories that aim to be complete. It is not, however, in

that part of the theoretical statement which aims to establish the natural standard of wages that we have to measure the effects of friction. Even though, in the adjustment of wages, there were very large disturbing influences to be encountered, yet, if competition caused the pay of labor to gravitate always toward the rate that is fixed by the product of the marginal part of the supply of labor, it would be enough for our present purpose to establish that fact; and this would be true, though friction and disturbance—the elements that are elsewhere to be studied—kept the actual rate of wages much farther from the theoretical standard than they do.

当然，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劳动工资所要依据的标准，但正如此前我们所强调过的，在旨在成为全面的一切经济理论中，惰性和阻碍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影响因素。不过，这一席之地并不在那一部分旨在确立工资自然标准理论的阐述中，而这类标准，则需要我们计量阻碍的影响。即使如此，在工资的调节中，会遇到大量导致失调的影响，然而，如果竞争能够使劳动工资永远趋于由边际劳动产品所决定的工资标准，那么就目前的意图来说，情况已经足以证实这个事实了；尽管阻碍和失调——我们在其他部分将要研究的两种因素——使实际工资标准与理论标准相差很多，但是这个事实是真实的。

The conclusions that we have now reached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Wages tend to equal the product of marginal labor; and that part of the working force which occupies a zone of indifference is thus marginal. The men who run no-rent machinery, or extort the last increment of product from better machinery, are within this field; and so are the men who till waste land, or give the final touches to the intensive tillage of good land. So, also, are the laborers who anywhere bring capital goods to the height of their efficiency, and so effect any of the final gleanings of the industrial

field. All these men create a certain amount of wealth. Competition tends to give them the whole of it; and it also tends to make other laborers accept what these men create and get. If the workmen within the zone of indifference constitute an appreciable force, and if they can be transferred freely from one position to another, it is clear that the effective product of any workman must be equal to the absolute product of a man who is within the marginal zone. Let any man desert an employer's working force and, however necessary that man's labor may be, the employer will lose only what some man in the marginal area is now producing. He will take this man, who is now doing some of the final gleaning work, and put him into the place where the more important labor is to be performed. By effective standards all men's labor is equally important, provided that the men are interchangeable. The friction that the interchange encounters is, again, an element for separate study. In the absence of friction, men who can be moved from place to place are of equal effective importance and get equal pay—that is the amount that the marginal workers produce.

我们至此得出的理论可以概述如下：工资与边际劳动的产品趋于一致，因此，占据无差别地带的那部分的劳动就是边际的劳动。操作免租机器的工人，或是从较好的机器上挣得仅剩的盈余产品的工人，都属于这个区域范围；耕种荒地的人，或是对优质土地进行精耕细作的人，也是如此。无论怎样，那些通过把资本货物的效率提到最高，而使商业收益最大化的工人，都是这个区域范围内的人。这些人都创造了一定数量的财富。竞争往往会使他们得到这一切，而且竞争还往往会使其他的工人接受这些人所创造的和获得的财富。如果无差别地带内的工人构成了一支相当大的力量，如果他们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那么，显而易见，任何一名工人的有效产量一定是等于一名边际区域里工人的绝对产量。假如任何一名工人离开雇主，不管他的劳动是多么有必要，雇主所损失的也只等于边际区域中

一个工人的产量。他最终将会录用现在做收集麦穗的人，并将其安置到需要完成更重要劳动的地方。假如人们之间可以互换，按实际标准说来，所有人的劳动都是同等重要的。互换时遇到的阻碍又是一个需要单独加以研究的因素。在无阻碍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区际流动，他们的实际重要性相等，而且所得到的工资也相等——即边际工人所生产的数量。

Another step may now be taken toward the attainment of a standard of general wages. The product that is created within one employer's zone of indifference tends to equal what is produced on the corresponding part of another employer's field. If the marginal machinery of some cloth-making firm is very poor,—consisting, perhaps, in antiquated and rickety looms in a remote mill in the country,—the men who use this machinery can produce only a little. If in a modern mill, elsewhere located, the marginal instruments are much better, the men who use them create more; and, under free competition, they tend to get more. Here, let us say, is a situation that calls for a transfer of men from one field to the other.

要达到一般工资标准，我们现在还可以采取另一步骤。一个雇主在无差别地带内所制造出来的产量，往往会等于另一个雇主在在相同条件下所制造的产量。如果某制衣企业的边际机器很差，——这些机器也许是又旧又不牢靠的织布机，而工厂又在该国的一个偏僻地方——那么使用这样的机器的人只能制造很少的产品。如果在其他地方的一个先进工厂里，边际器具会好得多，那么使用如此机器的人便能制造很多的产品，从而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效益。那么，让我们谈谈把工人们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的这一情况。

The old and worn machines will be abandoned, and the men who used them will go to the good mills, and will there utilize poorer instruments than, in these mills, have heretofore been used; or they will make less productive uses of the good instruments that there abound. In short, they will press the margin of employment downward to a less productive level; and this movement will tend to go on till, in one employer's mill, marginal labor creates and gets the same amount of wealth that it does in the mills of his competitors.

那些旧的、坏的机器将被淘汰，而从前操作这些机器的工人将进入更好的工厂，在那里他们或是使用那些从来没有过的更廉价的机器，亦或是低效率的去使用那些更好的工具。总之，他们要把就业边际降到生产力较低的水平；而且这种趋势将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在一个雇主的工厂里，其边际劳动创造并获得的财富数量，和其竞争者工厂里的边际劳动创造并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同。

This is saying that the acres of indifference in the several employers' fields, all taken together, constitute a zone of indifference running through the whole group, or branch of industry, to which the men belong. Any man within this zone may leave one employer and betake himself to another, and he will produce for the second the same amount of wealth that he created for the first. This entire zone is an area of uniform productivity for labor and of equal pay for labor, if competition works without friction. The static adjustment toward which industrial society is at each instant tending is one in which the marginal men in all establishments belonging to one group are uniformly productive and are paid at a uniform rate.

这就是说，分属几个雇主田地中的那些无差别地带，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贯穿所有行业或行业部门的、人们各归其所的无差别地带。在这个区域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离开一个雇主，而到另一个雇主那里去，他为第二个雇主所创造的财富数量，等同于他为第一个雇主所创造的财富数量。如果竞争得以正常地开展，那么这一整个区域就将成为一个劳动生产率相等、劳动工资相同的区域。任何时候，工业社会所趋向的静态安排是这样的：凡属于一个生产行业内各企业的边际工人，生产力是一致的，他们的工资标准也是一致的。

Again, there is a similar tendency to uniformity of productive power and of pay in the marginal areas in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industry. What is produced within the zone of indifference in one industrial group, tends to equal what is produced in the corresponding zone in another; and there is, in reality, a social zone of indifference that includes all the local areas. Thus, marginal labor in shoe manufacturing tends to be as productive and as well paid as is marginal labor in iron-smelting, in quarrying, in transporting, etc. If this were not so, there would be a steady flow of labor from the less productive to the more productive area. If in one occupation the marginal men create what is worth a dollar and a half a day, while elsewhere they create what is worth two dollars a day, the employers in this latter field are interested in hiring men entirely from that field in which the product and the pay are the lowest. This transfer of men from the one field to the other equalizes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men at the several margins of employment. In the one field men will relinquish the poorest instruments and the least productive uses of good ones. The effect of this, in the branch of industry from which the men go, is to make better instruments become the marginal ones; and it is also to make more profitable uses of good instruments become the final or no-rent uses. It increases the absolute product of the marginal labor, and that raises

the effective product of all labor. The result in the group to which men are going is the reverse of this. There the use of poorer and poorer instruments, and the making of less and less productive uses of good instruments, is the rule. There marginal labor is being forced into less and less productive fields. The inducement to move is withdrawn, and the movement ends when in farming, in cotton-spinning, in mining, in shoemaking, in cattle raising, etc., the final increments of labor are equally productive. Marginal social labor, in short, tends everywhere to be uniformly productive: labor of uniform personal quality is equally productive in all parts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The interchangeability of labor insures this. It is, therefore, all paid at the same rate; for the wages of a unit of labor anywhere in the working field tend to equal the product of a unit on the marginal part of it. The zone of indifference, then, extends through every group and sub-group into which industrial society is organized. The distinctive fact about it is, that it is everywhere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to an employer whether, within this area, he employs a man or not.

不但如此，在不同生产部门里，各边际区域的生产力和工资也趋于一致。一个产业群的无差别地带内的产量，和另一个在同一情况下的产量趋于一致；而且，实际上，还有一个包括当地各地区在内的社会无差别地带。这样，制鞋业的边际劳动的生产率和工资，就和冶铁业、采石业、运输业等产业的生产率和工资，趋于一致。否则，劳动力便会不断地从生产率较低的地区，流到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去。假如某一行业的工人一天创造1.5美元的财富，而在另一行业是一天2美元，那么后一行业的雇主便喜欢从生产率和工资最低的行业中去雇用其全部的工人。正是由于人们这样地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才使一些雇用边际的人们的生产力趋于相同了。在这一行业里，人们不再使用最差的工具，并且不再把好的工具用在收效最小的用途上。这对工人们所离开的产业部门的影响是，使更好的工具成为边际工

具，也使原来比较便利的好工具变成为落后的无人肯再使用的工具。这样便增加了边际劳动的绝对产量，从而提高了一切劳动的实际产量。但这对工人所进入的生产行业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在那里，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差，而使用好工具的收效也越来越低。于是，边际劳动被迫进入生产率越来越低的行业和部门。当耕作、纺纱、采矿、制鞋、畜牧等行业最后增加的劳动单位生产率都相等的时候，使工具流动的动机便不复存在，流动也就停止了。总之，社会边际劳动的生产率，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趋于一致，在产业系统各部分里，能力相同的劳动者的生产率都是相同的。劳动力可以互相替换保证了这一点可以实现。所以一切劳动者的工资标准是一致的；因为在劳动区域内，无论何处的单位劳动工资，和这个区域内边际部分的单位劳动产量趋于一致。因此，无差别地带扩延到了产业社会所组成的各产业群和亚产业群中。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一个雇主看来，在无差别区域内雇用或不雇用一个人，是无关紧要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The terms “zone,” “area” and “field,” are figurative expressions; and what they really signify is opportunity to labor. A fertile piece of land or a well-equipped shop offers to a certain number of men an opportunity to work in a highly productive way. This best opening for labor may be represented by the figure of a central circle in the universal field for employment. Additional men create less than did the original ones, because their opportunities are poorer; and this fact may be indicated by locating them, in imagination, on zones surrounding the central area. There is a series of such opportunities for labor, each of which is poorer than the preceding ones, and the last is the poorest of all. It is this most sterile of the fields, openings or opportunities for labor that we describe graphically as an outermost zone, within which men produce only their wages. This is the zone of indifference from an employer's point of view, because, if he sets men working within this area, he must give them all that they produce as wages. If one

employer offers to them less than, by their productive power, they are worth, another will offer more, provided competition is perfectly free and efficient. Theoretically, there is competition between employers for every workman whose presence in an establishment affords to the owner any profit over what he pays to him; and the competition stops only when this profit is annihilated.

“地带”、“区域”和“行业”这些名词都是比喻的说法，其真实含义是工作的机会。一块肥沃的土地或者一家设备精良的工厂，使一定数目的工人有了高效率工作的机会。如此之好的机会，可以在整个雇用区域的图表上，用一个中心圆表示出来。新增工人所创造的财富，比原有工人所创造的少，因为新增工人的机会不如原有工人那么好；而这一事实，可以根据想象，把新增工人安放在图表中心区的周围。在一系列这种劳动机会中，后一个机会总是不如前一个机会，而最后一个也是最差的一个。这种对工人说来是最差的机会或是收获最小的区域，我们在图表上用最外面的一个圈来表示，在这个圈内，工人们所生产的只够支付他们的工资。在一个雇主看来，这就是无差别地带。因为如果他把工人安置在这个区域内工作，他就要把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作为工资支付给他们。假如竞争充分地开展，如果一个雇主对工人所付的工资低于他们生产力的代价，那么别的雇主一定会支付较高工资来争取人才。从理论上来说，假若一个人能使一个工厂主除支付他的工资外，还能得到一些利润，那么雇主们必定争着要雇用他；这种竞争只有在利润不存在时，才会消失。

In this there is a parallelism of great importance between the natural value of goods and the natural wages of labor. It has been rightly asserted by early economists that the natural price of an article is one that yields only the cost of producing it, and this view is in harmony with common experience. Normal prices are no-profit prices. They afford wages for all the labor that is involved in

producing the goods, including the labor of superintending the mills, managing the finances, keeping the accounts, collecting the debts and doing all the work of directing the policy of the business. They afford, also, interest on all the capital that is used in the business, whether it is owned by the entrepreneur or borrowed from some one else. Beyond this there is no return, if prices stand exactly at their normal rate; and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entrepreneurs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in selling their goods, and so reduce prices to the no-net-profit level.

从这里可以看出，商品的自然价值和劳动的自然工资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早期的经济学家就曾经正确断言，某种物品的自然价格是只够抵偿其生产成本的价格，这种看法与日常经验是相吻合的。正常价格是没有利润的价格。正常价格提供了生产商品所需要的一切劳动的工资，包括工厂监督、财务管理、记账收账以及决定事业方针等劳动的工资。这种价格还得为企业所利用的一切资本提供利息，而不论这种资本是企业家自有的，还是向别人借来的。如果价格恰好是正常的，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收入；其之所以如此，是企业家们争着售出商品的结果，这就使价格降低到零利润的水平。

Prices, however, seldom remain long at the exact cost rates. There are fluctuations that carry them at one time above the rate, and then cause them to subside toward it. The no-profit level of price is thus normal; because it furnishes, not the rate at which things continue to sell, but the one toward which prices are forever gravitating, where competition is free. Wherever there is an entrepreneur's net profit, some article is, for the time being, selling for more than this normal price. The tendency of competition is to annihilate the profit; and that is the same thing as bringing actual prices to what, in accepted economic theory as well as in common

experience, is their “natural” level. The friction that this movement toward the natural level encounters is a subject for later study; but we already see that the pure profit of an entrepreneur could never exist, if it were not for this friction. If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could instantly take the level fixed by the bare cost of producing it, there would be nothing left for an entrepreneur, as such.

但是，价格不是长期保持着等于成本价格的水平。价格常有这样的波动，在某一时期内，它超出成本价格，随后回落到成本价格。因此，处于无利润水平的价格标准又是正常的，因为它提供的不是商品得以持续销售的价格，而是在自由竞争下的领域，商品价格所永远趋向的标准。只要企业家还有盈利之处，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某种商品的售价在一段时间内会比正常售价高。竞争倾向于消除利润；要使实际价格达到公认的经济学理论以及日常经验所说的“自然”标准，也是在于消除利润。价格向自然标准移动时所遇到的阻碍是我们以后研究的一个主题；但我们已经注意到，如果没有这种阻碍，企业家的纯利润就不会产生。如果每一件物品的价格都能立刻达到和净生产成本相符的标准，那么这样的企业家便会一无所获。

In employing marginal labor, competition, if it is free and efficient, has the same effect: it annihilates the profit that an employer might make on the last increment of labor that he hires. Employers have the same inducement to bid over each other for labor that will give them a net gain, as they have to bid under each other to secure a sale for goods that yield a profit. In the latter case, they run the prices down till no margin of gain is left for themselves; and in the former case they run the wages of the last increment of labor up, till no profit remains for them. The marginal wage rate is, then, naturally a no-net-profit rate; and it is employers' competition that tends to make it so. Here, again, there is friction to

be encountered; for competition does not do its work with accuracy. Hence there are now and then profits or losses connected with marginal labor. The no-profit pay for such labor is, however, natural,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cost prices of goods are natural: it is the rate toward whic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petition, the pay of marginal labor is everywhere tending.

在雇用边际劳动者时，如果竞争自由高效地进行，就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雇主在雇用最后增加的工人时所能得到的利润会被消除。雇主们都有同样的诱因，彼此为了能够给他们带来净收益的劳动力而竞相抬价，其动机正像他们必须竞相压价，以确保可以给他们带来利润的商品畅销一样。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是把价格往下压，直到不给自己留下赢利的余地；但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则是要抬高最后一种增量的劳动的工资，直到自己无利可图为止。由此可见，边际工资率自然是一种没有纯利润的工资率，正是由于雇主们的竞争，才会导致此种工资率的产生。这里也会遇到阻碍，因为竞争并非能够准确无误地发挥作用。因此，也就存在与边际劳动相联系的情况，有时会赢利，有时会亏损。然而，这种劳动的无利润工资是自然的；同样道理，商品的成本价也是自然的：在竞争的影响下，各地边际劳动的工资都趋向于这种工资率。

Furthermore, as all pay for marginal labor tends to adjust itself to the product of that labor, so the pay for all other labor tends to adjust itself to that of the marginal part of the supply. What a man on the zone of indifference is getting, another man must accept, if the employer can substitute the one for the other. This principle would afford a sufficient regulator of wages, if its zone of indifference, as it has been described, were the whole marginal field of employment of labor; but it is not. Besides utilizing worthless instruments and bringing out the latent possibilities of good ones—

that is, by enlarging the whole field of labor in the extensive and the intensive ways that have thus far been described—an addition to the working force may in still another way find employment in which it will create a distinct product and get the whole of it. It is, therefore, not fair to say that the product of labor on the zone of indifference is the sole and adequate standard to which the pay of all labor conforms. It is the product of labor on a still larger marginal field, of which this zone is only a part, that constitutes this standard.

此外，由于边际劳动的工资趋向于与边际劳动的产量相适应，因此，其他所有劳动者的工资也倾向于和该供给中边际部分的产量相适应。在无差别地带，如果雇主能够用一个人取代另一个人，那么，一个人得到多少工资，另一个人也只能接受。假若上面所描述的无差别地带是使用劳动力的整个边际领域，那么这一原则便会为工资提供一种充分的调节；可是，情况并非如此。除了利用无价值的工具和尽量发挥好工具的潜在可能性——也就是此处所描述的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来扩大整个劳动力区域——使劳动力有一定增加以外，或许还能用别的方式找到工作，按照这个方法，增加的工人会创造一种独特的产品而且获得其全部。因此，如果说无差别地带里，劳动的产品是一切工资所依据的唯一适用标准，这是不公平的。构成这一标准的，则是面积更大的边际区域里劳动的产品，无差别地带只是这个区域的一部分。

The opportunity for employment, which has been described by the term “zone of indifference,” consists in the liberty to use capital-goods, or concret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in ways that make them yield more than they already do. Taking the working equipment of the world as it stands, we may get somewhat more out of it, if we spend more labor in using it. This is a different thing

from getting more out of a given capital by a similar intensifying of labor. A mill with its machines as they stand can take more laborers than are now employed in it; but if the mill is worth a million dollars, that amount of capital is capable of employing a much larger number of marginal workers than the mill can use as it stands. The vast stock of working applianc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ossesses can enable more men to work than are now working; but sixty-five billion “dollars " not confined to these appliances, but free to invest themselves in any other things, could give openings to a much greater number of additional workmen. There is a rad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rgin of employment that is offered by a particular stock of capital-goods and the one that is offered by a given capital.

就业的机会，前文称作“无差别地带”，这种机会存在于一种自由中，可以使用资本货物或具体的生产工具，使得他们的生产量能比现在已经生产的多。以世界的工具为例，如果我们在工具的使用上多投入一些劳动力，我们可以得到的产品比现在更多。但是这和以某种类似增强劳动力的方式从一定数量的资本中获得产品，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家工厂，其机器数量不变，但能够接纳的工人会比现在已经雇用的更多；但假设该工厂价值100万美元，那这个资本数额能够雇用的边际工人，比这个工厂现在所雇用的要多得多。美国拥有的大量工具设备，能使比现在在职的人员更多的人实现就业；但是那650亿“美元”资金，如果不是只投在这些工具上，而是自由投资于其他方面，便能为更多的新增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一定数量的资本货物所提供的雇佣边际，和既定数量的资本所提供的雇佣边际，根本不同。

In many parts of the industrial field a few more men or a few less might be employ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mounts of capital that are there already in use, and without any change in the form of

that capital. Thus, leaving a farm, with its buildings, live stock, implements, etc., exactly as they are, you may add a man to the working force or withdraw one from it without affecting the employer's gains. This slight elasticity in the size of the laboring force that an industrial plant can receiv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but as an essential fact it is insignifican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elasticity in the size of the force that a given capital can receive. Though there are shops into which one or more men could be taken without loss, there are also shops that could not economically take another man. There are, again, machines that must be tended all day by one operator. There are farms, gardens, mines, sailing craft, etc., to which the bringing of one more workman would mean an excessive and uneconomical supply of labor; but there is no such limit to the number who can work with a fixed amount of capital, if the forms of it can be varied to suit the number of the men. If, whenever you added to the number of your workmen, you could instantly, and without waste, put your capital into any new shapes that you might select, you might double, quadruple or octuple your force of men without adding to the amount of your capital as a whole. If, therefore, capital is not limited in its forms, the labor that can use it is not limited in quantity.

在工业领域的很多部分，多雇几个或是少雇几个，与已经投入使用的资本数额有关，而且资本的形式还无须改变。例如，让一片农场中的房屋、牲畜、工具等等原封不动，你可以在劳动力中加一个人或裁一个人，这并不影响雇主的收入。一家企业工厂的劳动力规模上能够获得的这种细微伸缩性，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一个基本事实，它与某种既定的资本可以获得劳动力规模的伸缩性相比，却无关紧要。尽管有的商店可以多雇一个人或几个人而不致亏损，但是有的商店多雇一个人就不划算了。此外，有的机器必须整天由一名操作员来管理。有的农田、菜园、矿山、帆船等等，如果增雇一个工人，就意

味着劳动力供给的过剩和浪费；但是，如果可以变更资本的形式，以适应工人的数量，那么，一定数目的资本所能容纳的工人数量却是没有限度的。假若每当你在增加工人的时候，都能立即地、无浪费地把你的资本投入你会选择的任何一种新的形式中，那么，你就能把你的工人增加二倍、四倍或八倍，而不必增加现有的资金。因此，假若资本的形式不受限制，使用资本的劳动者数量便不受限制。

This fact makes it ultimately possible for a far greater quantity of labor to move from group to group in the industrial system than could so move if capital were frozen rigidly into a fixed set of forms. If this were the case, only men on the zone of indifference could be transferred without a disastrous amount of waste and disturbance. If there were two industries, each of which employed a hundred thousand men and a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worth of capital, it might be that one thousand men could move freely from one to the other without any gain or loss in productive power. If, however, it were desired to transfer ten thousand men or fifty thousand, this would be impracticable, so long as the forms of the capital in the two industries remained unchanged. Take half of the working men out of the one set of mills and put them into the other, and in the first set many machines will cease to run at all, while in the other mills men will be unable to do anything that in useful enough to make their company worth as much as their room. Yet a perfect mobility of labor is one of our primary hypotheses. Unless labor is thus mobile, it cannot be brought to an equality of earning power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a general or social rate of wages cannot be established. It is clear that in thinking, in a practical way, of the manner in which a general rate of pay is established, we tacitly recognize the unrestricted power that capital, as such, has to employ varying amounts of labor. Because the capital of each group has this power, the groups are brought to an

equilibrium, and their outputs are made normal. Because the capital of society, as a whole, has this power, labor, as a whole, always has,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an outlook for employment where its product will set the standard of its pay. An industrial society can, in some way, absorb any amount of labor. If capital is freely transmutable in form, labor becomes freely transferable and able to count on an indefinitely elastic field of employment. What a marginal unit of it can produce in this elastic field is the amount that can be specifically attributed to any unit.

与资本在一系列固定形式的情况下冻结时所能流动的数量相比，这一事实最终可能导致劳动者在产业系统里各团体之间的流动数量更多。倘若情况如此，只有在无差别地带内的劳动者才可以产生流动，而不至于产生灾难性的浪费和失调。假如有两种行业，分别都利用10万人和价值1亿美元的资本，此时，1000个工人可以从一个行业自由转移到另一个行业，而两个行业的生产力却毫无增减。但是，如果两个行业的资本形式仍旧不变，而想要调动1万或5万人，那是行不通的。假定从一批工厂里抽出半数的工人，并把他们安排在另一批工厂里，那么前一批的工厂里便会有许多机器不得不停工，而另一批工厂的工人又无事可做，而这些人原本是很有用的，足以使他们现在工厂的价值与他们原先工厂的价值一样大。然而，劳动力有完全的流动性，这是我们的主要假设之一。劳动力要不是这样流动，各行业的盈利能力便不能均等，而一般的或社会的工资率也无法确立。显而易见，当我们实事求是地考虑一般工资率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默认，就其本身而言，资本具有的无限能力来利用不同程度数量的劳动力。正因为每一个生产团体的资本都有这种能力，各生产团体才能处于均衡的状态，而它们的产量也变为正常。由于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时具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正常状态下，能够以产品决定其工资标准的就业机会，总是会受到全体劳动者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产业社会能吸纳任何数量的劳动力。如果资本在形式上是能自由变换的，那么，劳动力便能够自由流动，而且可以获得一片具有

无限伸缩性的雇用领域。在这片具有伸缩性的领域内，一个边际单位的劳动力所能够生产的数量，就可以单独归于任何劳动力单位所生产的数量。

Chapter IX Capital and Capital-Goods contrasted

第九章 资本与资本货物的区别

It is now possible to state, in an intelligible way, the main thesis of the theory of wages: The pay of labor in each, industry tends to conform, to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social labor employed in connection with a fixed amount of social capital, as such. That the full meaning of this statement may become clear it is necessary to present, in some fulness, the differences that science must recognize between “capital” and “capital-goods.”

现在，我们可以将工资理论的主要论点，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述如下：用一定数量的社会资本雇佣社会劳动，创造出边际产品，这就是各行各业劳动工资的趋势。要全面地弄清楚这句话的含义，就需要对科学上必须承认的“资本”与“资本货物”之间的区别加以详尽的叙述。

Capital consists of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nd these are always concrete and material. This fact is fundamental. In claiming for capital a material existence, we go beyond many classical economists, since we do not consider acquired abilities of workmen as a part of the fund of productive wealth. Man does not add to his capital, when he spends money in training or educating himself for a useful occupation. He gets something, indeed, that increases his productive power; and in getting it he is obliged to practise abstinence. He deprives himself of pleasure, in order that thereafter he may produce more than he otherwise could. There is, it must be

admitted, a certain similarity between the effects of money spent on a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those of money spent in buying a tool. In using the term, however, we shall be strict constructionists, and shall insist that capital is never a quality of man himself, which he uses for productive purposes.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is, as it were, one great tool in the hand of working humanity—the armature with which humanity subdues and transforms the resisting elements of nature.

资本是由具体的、客观存在的生产工具组成。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对于资本存在物质性的肯定，我们要在许多传统经济学家观点的基础上加以揣测，因为我们认为工人后天所获得的能力不能作为生产财富的一部分。一个人要是为了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而花钱接受培训或教育，这并不能增加他的资本。事实上，他使自己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但为此他必须实行节制。他不能贪图享乐，为的是将来能够生产出比以前更多的产品。不得不承认，投资获得技术教育与投资置办工具，其结果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然而，我们必须严格地使用资本这个词，并且还应坚持：资本决不是人类用于生产目的的一种要素。世界上的资本如同劳动人民手中强有力的工具——人类用以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武器。

The most distinctive single fact about what we have termed capital is the fact of permanence. It lasts; and it must last, if industry is to be successful. Trench upon it—destroy any of it, and you have suffered a disaster. Destroy all that you have of it, and you must begin empty-handed to earn a living, as best you can, by labor alone. Yet you must destroy capital-goods in order not to fail. Try to preserve capital-goods from destruction, and you bring on yourself the same disaster that you suffer when you allow a bit of capital to be destroyed. Stop the machines in your mill that they may not

wear out, wrap and box them in order that they may not rust out, and the productive action of your capital stops. What is more, the capital itself will also ultimately perish; for your machines will, in time, become so antiquated that it will be impracticable to use them.

资本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永久性。产业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确保资本的持续发展。如果资本被侵占，或遭受任何破坏，就会造成严重损失。若毁掉了所有的资本，你只能两手空空，尽其所能，仅靠自己的劳力为生了。然而，如果想避免失败，你必须毁坏资本货物。避免资本货物受损坏所带来的灾难不亚于部分资本流失所造成的灾难。将工厂中的机器停止运作以免磨损，将它们打包装箱以免生锈。如此一来，资本的生产能力也就中止了。更糟的是，资本本身最终也将难逃劫难，因为过段时间这些机器将变得过时陈旧而不能再投入到实际生产中。

Capital-goods, then, not only may go to destruction, but must be destroyed, if industry is to be successful; and they must do so, in order that capital may last. Seed-wheat must perish that wheat may abide. It is this idea of permanence that originally gave a name to the kind of wealth that is used for productive purposes, for it is the kind of wealth that is of such capital, or vital, importance that it must always be kept intact. It is, by its very name, contrasted with free income, which may be used up on one's living or on one's pleasure. Put your capital out at usury and you may safely spend what comes to you as the earning of it; but you may not safely spend the capital. The very policy, however, that preserves this essential element in industry is one that consigns to destruction nearly all the material instruments that embody it. The point of sharpest contrast between capital and most capital-goods is, indeed,

the permanence of the one, as compared with the perishability of the other. Land is the only kind of capital-goods that does not need to be destroyed, in order that the fund of wealth embodied in it may continue.

那么，产业若想取得成功，资本货物不但要毁坏，而且还必须毁坏。资本若想长久存在，资本货物也非毁不可。小麦种子必须腐烂破坏，才能长出小麦。正因为这个永久性的概念，才称生产上的财富为资本。因为这种财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保持它的完整性。就是因为这个名称，资本和自由所得收入才截然不同。自由所得可全部用于生计和娱乐消遣方面。把资本高利贷出，从中获得利润，你就可以放心地使用这些钱；但直接使用资本你就未必会安全无事了。然而，为保持产业中这一关键要素所采取的政策，就是要破坏几乎所有可以体现资本的物质工具。资本与大部分资本货物的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永久存在的；另一个是极易被损坏的。在资本货物中，唯有土地可以不遭受破坏，而能使所体现的财富持续下去。

Again, capital is perfectly mobile; but capital-goods are far from being so. It is possible to take a million dollars out of one industry and put them into another. Under favorable conditions, it is possible to do this without waste. It is, however, quite impossible to take bodily out of one industry the tools that belong to it and to put them into another. The capital that was once invested in the whale fishery of New England is now, to some extent, employed in cotton manufacturing; but the ships have not been used as cotton mills. As the vessels were worn out, the part of their earnings that might have been used to build more vessels was actually used to build mills. The nautical form of the capital perished; but the capital survived and, as it were, migrated from the one set of material bodies to the other. There is, indeed, no limit to the

ultimate power of capital, by changing its forms of embodiment, thus to change its place in the group-system of industry.

另外，资本具有绝对流动性，而资本货物则不然。从一个产业抽取一百万，再投放到另一个产业中，这是可行的。在有利的条件下，这样做可能不会造成任何损失。但是，把原属于某一行业的工具移置到其他行业，这样的可行性就非常小了。曾投放到新英格兰捕鲸行业的资金，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被用于棉纺织业了，但捕鲸船并没有改成棉纺织工厂。船只破损后，原打算用以建造更多船只的部分收入，实际上用来建造纺织厂了。原体现为船只形式的资本，已经化为乌有，而资本却依然存在。就如同材料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事实上，资本可以通过变换具体形式，来改变它在产业群体系中的地位，资本这样的能力是无穷的。

We now have the key to one scientific problem connected with productive wealth. Why do business men speak of capital in terms of money? Why, if you ask a merchant, “What is your capital?” will he answer, “It is the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that I have invested in my shop?” It is because what he means by the phrase, “a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is an abiding thing, which he had when he went into business and still has, unless his business has been unfortunate. Yet he is usually under no delusions as to the character of the things that embody his capital; and, in particular, he knows that these things do not consist in coins or in any other currency. He would be a poor merchant who should keep more than a minute part of his capital locked up in safes or bank vaults, or scattered through his shop in cash drawers. His productive wealth consists in merchandise, in fixtures, in claims against customers for merchandise sold and delivered, etc. Yet he instinctively and unconsciously thinks and speaks of it as money. He can keep his

“money,” and he can move it from one investment to another. A value, an abstract quantum of productive wealth, a permanent fund—that is what the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in our illustration really signify. A value, a quantum of wealth, or a fund—if one of these be thought of apart from the concrete things that embody it, it is an abstraction; but if it be thought of as actually embodied in concrete things, it is not an abstraction, but a material entity. The business man always thinks of his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as thus embodied, and he can tell readily enough what things embody it. He knows that his investment is concrete and material; and yet he instinctively thinks and speaks of it through the medium of an abstract expression.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关于生产财富的科学难题的答案。生意场上的人为什么用钱来表示资本呢？若问一个商人:“你的资本是什么？”为什么他的回答会是这样：“我的资本就是我投资在商店里的那十万美元”？就是因为他说了“十万美元”，指的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东西。而这件东西在他开始做生意时就已经有了，并延续至今，除非他不幸破产了。但是，他很清楚体现他资本的是什么东西，他尤其明白这些东西指的并不是硬币或其他的货币。一个商人将哪怕是一点点数目的资本，也要锁在保险箱里或是存进银行，或是散放在商店的抽屉里，那么他就是一个不会做生意的人。他的生产财富包括商品、固定设施、索赔商品出售并交付用户等等。然而，他仍然本能地并毫无意识地认为资本就是金钱。他可以保留“金钱”，也可以将钱以一种投资的方式转移到别处去。一种价值，一种不定数量的生产财富，或一种永久基金——上述的例子中所指的十万元就是这种东西。一种价值，一定数量的财富，或是一笔基金——如果脱离了能够体现它的具体物品，那么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将是抽象的概念；但把它看做具体实在的东西，那么它就不再是抽象的了，而是客观存在的。商人总是将那十万美元看做具体的东西，并能毫不犹豫地说出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他知道他的投资是具体的，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当他想到或说到资本

时，总是不由自主地使用抽象概念。

Guarding ourselves as carefully as we have done against the idea that capital ever lives in a disembodied state, we may safely use, for scientific purposes, the business man's formula. We may think of capital as a sum of productive wealth, invested in material things which are perpetually shifting—which come and go continually—although the fund abides. Capital thus lives, as it were, by transmigration, taking itself out of one set of bodies and putting itself into another, again and again. The more frequently it casts off one set of forms and takes on another,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the more actively business operations are proceeding, and the more vitality there is in the fund itself. The life of such a capital is not torpid, like the life of a reptile having a sluggish circulation: it is rather like the life of a highly organised animal that casts off and renews its tissues at short intervals. [9_1]

资本曾以某种脱离现实的形式存在的这一说法，我们需要引以为戒。但出于科学的目的，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商人的那套说辞。我们可以把资本看做一笔生产财富，不断有新的原材料投放其中，然而资金本身是永久存在的。如此说来，资本似乎是通过改变它的具体形式而存在，它不断地从一种形式变换为另一种形式，以如此循环往复的形式得以存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本的具体形式改变越快，生意就越活跃，资本的生命力也就越旺盛。这种资本的生命力不像机体更新缓慢的的爬行动物那样呆滞，而更像高等动物的生命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蜕变一次。 [10_1]

Such an abstract formula as this for describing a concrete thing is common in every sphere of thought. We have already used the

illustration of a water power. Power, in itself considered, is an abstraction, but power embodied in an endless succession of drops of falling water is not abstract, but eminently material and concrete. Life in itself is an abstraction, but life embodied in an endless succession of human beings is concrete. Productive power measured in units and expressed in terms of money is abstract; but when this power is embodied in an endless succession of capital-goods, it is concrete. We might designate capital, the permanent thing that we have described, as an endless succession of shifting goods always worth a certain amount. We mean exactly that, when we designate it as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permanently invested in a succession of perishable things.

诸如此类用抽象的公式来描述具体的东西的情况，在各个思想领域都是很常见的。我们曾以水力为例。单就力的本身来说，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但若对于连续不断滴下的水滴来说，就不再抽象了，而明显成了具体的东西。生命本身是一抽象的东西，但对于一代代人类的延续来说，就是具体的东西。用生产单位来计量并用金钱来表示的生产力是抽象的东西，但如果生产力体现在一系列接连不断的资本货物时，就是具体的东西。我们可以将资本（刚才所提及的永远存在的东西）叫做转移性货物，该类货物有一定的价值，并不断变换更新。若我们将资本看做是一笔“钱”，而这笔钱永远投放在一系列易损坏的东西中，那么我们就明确资本意思了。

It is because the idea of permanence is conveyed in the best and simplest way by this latter form of expression that, in this connection and in others, common thought adheres to it. It is a water power that the manufacturer buys, when he gets the right to have an endless series of particles of water flow through his flume. It is life that abides on the planet, as men come and men go. It is a

fund, a sum of active and productive wealth, that continues in industry, as successiv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live, as it were, their industrial lives and die. Here, as we have noted, there is one exception to be made: capital invested in land has no occasion to cast off its present body and take another. This part of the general productive fund can live, as we have seen, without transmigration, but it is the only part that can do so.

正是由于后种说法最好并最简明地阐述出永久的意思，所以在这个领域以及其他几个领域，都达成了共识。制造商购买的是水力，这样他就可以让连绵不断的水从水槽中流过了。人类有生有死，如此周而复始，而生命却不断延续。旧的生产工具在达到它的工业寿命后就被新生工具所取代，而基金，即一笔活跃的生产财富，在各行各业中得以延续。这里，正如我们所提到的，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投入到土地的资本无需以旧换新。正如我们所知，总的生产资金的这部分，在不更换其形式的情况下也可永存。但是仅限于这一部分生产资金。

It is inevitable that both capital and capital-goods should be subjects of economic study. There are problems concerning each of them that have to be solved; and this fact appears, in an unfortunate way, in all those treatises on political economy in which the single term, capital, is used to designate productive wealth. Invariably does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rm shift from capital, as we define it, to capital-goods, and vice versa. This twofold meaning of one important word has made endless trouble and confusion. Are wages, for example, paid out of capital? That they are so paid is the essence of the wages-fund doctrine, which was for a long period scarcely questioned. What is meant by the term capital in this connection? Is it the abiding fund of productive wealth? If it is, then the statement that was so long current must

mean that industry, as it proceeds, draws on this fund and reduces it. This vital element in business must, at least temporarily, dwindle; yet every one knows that it does not do so. Does the term capital, as thus used by early writers, really mean capital-goods? If so, their statement concerning it only asserts the fact that the real pay that a workman gets and shares with his family consists in goods taken from merchants' stocks. They have, it is true, been capital-goods heretofore, but they are consumers' goods now; and their places in the stock of capital-goods have been taken by other and similar commodities. There has been no reducing of capital, though there may have been a withdrawing and a replacing of the tissues of it. A statement that would have made these facts clear would have precluded logomachies and confusions without number; and a definition of terms that would have distinguished capital from capital-goods would have done this.

资本和资本货物都应必然成为经济研究的课题。这两者都存在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些政治经济著作中，仅仅用资本这一词来指代生产财富。而这个名词的用法又时常变换，有时指我们所说的资本，有时又指资本货物。一个重要的名词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必然会引起诸多麻烦和混淆。例如，工资是用资本所支付的吗？工资由资本支付，这是工资基金学说的本质，而这一学说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人质疑过。这里所说的资本，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生产财富的永久基金吗?如果指的是生产财富的永久基金，那么这一长期流行的说法就一定意味着在资本的发展过程中是要消耗基金并使其不断减少。这个生意场上至关重要的因素，至少暂时会减少。然而，大家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早期的经济学家在使用资本这一术语时，指的真是资本货物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主张的就是：工人得到的与家人一起共享的实际工资就是从商人存货的商品中得到的。这些商品曾经的确是资本货物，但现在变为消费资料了。并且他们在资本货物中所处的位置已被其他相似的商品所取代了。虽然可以提取或替换一

部分资本，但是资本却未曾减少丝毫。若澄清这些事实，就可避免争执和混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下大功夫将资本与资本货物的定义加以区分。

The early economists all defined capital as consisting in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such as tools, buildings, raw material, etc. By a confusion of thought they usually included, as one of the forms of capital, food for laborers—a typical kind of consumers' goods; but otherwise they made it clear that capital consists in tools, buildings, materials and other things that assist labor. Yet, having defined capital in this way, they were forced—as any one must be—to revert to the common conception of it as a fund describable in terms of money, when they enter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blem of interest; for five per cent of itself per annum is something that a building cannot earn, though the “money” invested in the building may do so.

早期的经济学家皆认为资本包括生产工具，如：工具、建筑、原材料等等。由于思想上的混淆，工人的食物（一种典型的消费资料）也被看做资本的一种。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认为资本存在于工具、房屋、材料和其他辅助劳动的物品中。然而，他们以这种方式给资本下了定义之后，到考虑利息的问题时，无论是谁都会再用到那个普遍的概念，把基金看做用钱来表示的东西。一所房屋在一年间不可能赚到它本身价值的5%，而投资到这所房屋的“钱”是可以赚到的。

What, then, is interest? Is it net a fraction of itself that a permanent fund of wealth annually earns? It is five dollars annually earned by a hundred dollars. It is usually expressed in percentages; and percentages imply that both the capital itself and its annual

earnings are described in units of value. Does a building, or an engine, or a ship literally earn in a year a fraction of itself? Does it emerg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larger by one twentieth than it was at the beginning? The capital that is embodied in the buildings, the engines and the ships of the world does enlarge itself in this way. It returns interest; but what the concrete instruments themselves earn is not interest, but rent.

那么，什么是利息呢？利息是一笔永久的财富基金自身每年所赚取的一部分吗？它是一百美元每年所赚得的五美元。利率通常是用百分数表示的，而百分数则表明资本本身和资本的年收入都可由价值单位表示。一所房屋、一部机器或是一艘船它们每年真的能赚到其本身价值的一部分吗？年末时它们是否比年初时增值了百分之五呢？体现在房屋、机器和船只上的资本的确是通过这种方式增值的。资本赚得利息，而具体的工具所赚得的不是利息，而是租金。

A popular and accurate use of the term rent makes it describe the amount that any concrete instrument earns. Thus, a building earns rent, as does the land on which it stands; and so, in fact, does every machine or bit of raw material that the building may contain. Rent, then, is a lump sum and not a percentage. Let anything for hire, and what ever you get for it will, in common usage, take the name rent. Whether the thing that is let be a farm, a house, a vehicle, a ship, a tool or any other concrete capital-good, it earns rent; while capital, as such, earns interest. Make an inventory of all the concret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that the world contains, including in the list every commodity that helps to produce other commodities and putting opposite the name of each article the sum that in a year it can earn for its owner. Add together all these sums, and the gross amount is the total income of the property-holding

class, as this income is reduced to the form of rent. Now take a different course. Make the same inventory of capital-goods as before, appending to the name of each article the value that it embodies. Add together these values, and the grand total will describe the permanent capital of the world. Find what part of itself this fund will earn in a year, and you have the rate of interest. Find how many dollars this fraction of the fund of capital amounts to, and what you have is the absolute amount of interest. It is, again, the entire income of the property-holding class; but this time it is in the form of interest, conceived as the product, not of perishable instruments, but of an abiding fund of invested wealth. In a use of terms which harmonizes with practical thought and which, as we undertake to prove, is entirely scientific, rent and interest describe the same income in two different ways. Rent is the aggregate of the lump sums earned by capital-goods; while interest is the fraction of itself that is earned by the permanent fund of capital.

租金这个术语通俗且准确的用法，是用它来描述具体工具所赚取的收入。例如，一间房屋挣得的是租金，这间房所占据的土地所赚得的也是租金，实际上，这间房屋里的所有机器和原材料所得的也都是租金。所以租金是一个总额，而不是百分数。无论出租什么东西，按照惯例来说，所得的收入都叫租金。不论出租出去的是一块土地、一间房屋、一辆车、一艘船还是其他具体的资本货物，所得的都叫租金。而资本的所得是利息。将世界上全部的生产工具列个清单，包括所有辅助生产其他商品的物件在内，并把每件物品在其另一面的对应名称的地方标记上该物件在一年内为其所有者赚得的钱的数额。然后将这些数额相加，所得的总数就是生产者以租金形式所获得的收入。现在换种计算方法。先将这些资本货物做个同样的列表，在每件物品的名称下标上其价值。把这些价值加在一起，所得的总额就是世界的永久资本。求出这笔资金在一年内所赚得的数值占它本身多少百分比，所得之数就是利息。再求出这部分资本基金等于多少美元，这就

是利息总数了。这个数目又是有产者的全部收入，但这次是通过利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作为所投资的永久资金的产物，而不是作为极易损坏的工具的产物。租金和利息的使用既切合实际思想，又如我们所证实的那样，完全符合科学规则，只不过它们就是描述同样收入的两种不同方法而已。租金是资本货物所赚得的收入的总值，而利息是永久资金所赚得的钱数占其自身的百分比。

It will be noticed that, in computing the rate of interest, we first ascertained the absolute amounts, or lump sums, earned by all the several instruments. In a sense, interest depends on rent: it is total rent, reduced to a percentage of total capital. In another and a deeper sense, rent is governed by interest: the amount that any one instrument earns depends on the number of such instruments that are in use.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ools of any one kind, and the earnings of each of them will grow smaller; diminish the number, and the earnings of each will grow larger. The number of each kind of instrument that is naturally brought into use depends on the law of interest. The capital in one kind of tool, machine, building, etc., is made to earn as large a percentage of itself as does the capital in another; and the number of each kind of capital-goods is so adjusted as to make it do so. This equalizing force determines the number of capital-goods of each kind; and this, again, governs the rents that they severally earn. If there are at work so many turning lathes that another one will not earn as large a fraction of its cost as will some other tool, the other tool is produced and set working, in preference to the lathe. Proximately, rent fixes interest. Given a certain number of capital-goods of each kind, and what they earn is the amount that, by an arithmetical reduction, is converted into interest. Fundamentally, interest governs rents. Given a certain permanent fund of capital, and it is put into such forms that the rent secured by one concrete form, or capital-good, is as large a

fraction of its value as is that secured by another. A fuller statement of the laws of rent and interest will later make this clear.

在计算利率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由各种工具所赚得的钱的绝对数值，即总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利息取决于租金，它是租金总数转化为相当于同等资本总数的百分比。再从另一个更深层的角度来说，租金由利息支配：各个工具能赚多少是由该种工具的使用数量来决定的。增加一种工具的数量，那么该种工具的平均收益就减少了。相反，减少其数量，每件工具的平均收益就增加了。所以投入使用的工具的数量是由利息规律所决定的。一种工具、机器、房屋等等所体现的资本要与其他工具所体现出的资本赚得一样多的利息。每种工具数量都如此做出调整，以达到上述要求。这种均等化之力决定了各种资本货物的数量，而此数值又决定各自能赚多少租金。假如正运作的旋床已经多到一定程度，再多加一台，所获得的租金占其成本的份额将低于其他工具，那么该种工具投入生产并使用。而旋床就不再使用了。大体来说，租金决定利息。假如有一定数量的各种资本货物，那么，通过计算，它们所赚得的就可以折合为利息了。从根本上说，利息支配租金。假如有一定数量的永久资本，那么，当它处在一个具体形式或以资本货物形式存在时，所赚得的租金与处于另一种形式时所得的租金价值的百分比一样。这一点在稍后详细讲解租金和利息的规律时，将会有明确说明。

Among those statements concerning capital which Mr. John Stuart Mill classed as fundamental is the assertion that it is all destined to destruction. Raw materials, he says, will transform themselves into finished goods and will then be used up, tools will wear out, buildings will go to decay, etc. Here is a naïve reversion to the original idea, expressed by the definitions of capital that were then current—the idea, namely, of capital-goods. These do perish; but the fundamental fact about capital—the fact that originally gave

it its name—is that it cannot perish except by disaster.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在对资本的描述中曾断言，资本将注定走向灭亡。他称，原材料会被加工成成品，而后会被用光，工具会耗损，房屋会陈旧坍塌等等。用以前比较流行的原始的资本定义去解释资本货物，这是一种天真的倒退表现。资本货物终将消耗殆尽，但资本之所以叫做资本是因为它永远不会毁灭，除非发生大灾难，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Another of Mr. Mill's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is, that capital originates in abstinence. In this assertion it is permanent capital that is referred to. Not a little care needs, however, to be used, if we are to have a clear idea of the function termed abstinence; for concerning it there are current many old confusions and some modern ones. We abstain from something when, as a man would say, we “save money.” We do, indeed, get something by abstaining; but what we abstain from i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get. That which we keep our hands off from—that which we put away from ourselves and do not consume—is not capital-goods: it is the consumers' goods, the articles for personal comfort, that we should have bought and used, if we had not saved our money. We do not abstain from using and destroying a machine or a building; we use them and wear them out. In getting them, however, we abstain from pleasures and articles that give pleasure. Abstinence is nothing more than electing to take our income in the form of wealth-creating goods, instead of in that of pleasure-giving goods. It is on these latter goods, which we elect not to take,—and which are, therefore, not produced for us,—that we practise abstinence. We let alone things that do not exist, though they would exist if we called for them.

穆勒先生的另一个基本主张就是资本出自节制。这里所指的是永久资本。然而，要对节制的功用有个清晰的概念，我们要十分注意这一点。因为关于这个问题，既有旧误解，又增新混淆。当不用某种东西时，有的人会说，我们是在“省钱”。事实上，我们的确是通过节制而有所得，但我们所弃用的东西与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在性质上截然不同。我们不去接触的东西（即弃之不用的或不会购买的东西)不是资本货物，而是消费品，即若不是为了省钱，而应该购买并使用的，可以改善个人生活舒适度的物品。我们并没有弃用或毁掉任何机器或是房屋，而是使用直至他们不可再用。然而，为了得到这些物品，我们则将所有娱乐和文艺项目拒于千里之外。节制不过是使收入以创造财富的商品形式存在，而不是以娱乐项目的商品形式存在。正是因为我们不会选择后者，因此，该种商品也就没有必要进行生产了。这样我们就履行了节制这一原则。虽然我们对不存在的东西置之不理，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它们就会被投入生产。

What we get by abstinence is true capital; and this means that the capital-goods which come to us are not merely for the replacing of other capital-goods that we are wearing out. They are new goods, embodying a net addition to our fund. In every case an instrument that is gained by genuine abstinence signifies that the man has more permanent capital than he had before. In due time this instrument will wear itself out; and it will be followed by another instrument. Virtually, though not literally, it will have created that other instrument; and the second instrument in the series, as well as all following ones, will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without further abstaining acts. When a loom in my cotton mill shall be discarded by reason of age and infirmity, I shall not be forced to replace it by trenching upon my income and denying myself goods that I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consume; for, in addition to the net income that the loom has earned for me, it has provided a sinking fund which

replaces itself without imposing on me any further burden. Not all the creating of capital-goods, then, calls for abstinence. The starting of an entirely new series of capital-goods does so; and the abstinence exhausts itself in calling the first one of the series into being, for the later ones are virtually made by the first one. This is saying that abstinence always calls a new bit of permanent capital into existence.

我们通过节制获得真正资本，也就是说我们要使用新的资本货物不仅仅是为了代替那些寿命将尽的旧的资本货物。还因为它们是新增货物，体现了资金的净增值。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通过实行真正的节制，而获得工具。也就是说此人比以前拥有更多的永久资本。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工具会自行耗尽，将有另一种新的工具取而代之。实际上，该工具会接二连三地生产出该系列的其他工具，而并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节制。这绝不是夸大其词。由于棉纺织厂的纺织机年久失修、存在缺陷，而将被淘汰。为了购置新机器，我无须缩减收入或节省我已习惯消费的物品，因为那部旧纺织机除了为我赚得了净收入外，它还提供了换置新机器的基金，而不会给我增加任何负担。因此，不是所有的资本货物都需要通过节制来创造。而创造完全新系列的商品货物才需节制，也只有这系列中的第一个需要通过节制创造，其后的资本货物都是由第一个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节制总是将永久资本一点一滴积攒起来。

In modern economic literature there is a disposition to divide continued production into periods, and to connect these periods with capital. Every bit of capital is, according to one form of analysis, supposed to thrust itself between the labor of produc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consumption. This, however, is, as we have seen, what capital-goods do. They separate labor, in time, from the enjoyment that will be afforded when the particular thing with

which labor is now engaged shall be fully ripe for use; while capital, on the contrary, synchronizes labor and its fruits. We may measure a period of production by the interval which a particular capital-good thrusts between labor and its fruits. This is measuring it by the lapse of time between two different subjective experiences—namely, the sacrifice from making a thing and the personal gain from using it. In another way, we may measure the period by the duration of the instrument itself; and, if it is a tool for aiding labor, we have to divide the life of it as we divide the life of a human being, into a period of growth and a period of maturity. There is a time when it is taking shape under the hands of workmen; and there is a later time when it is fulfilling its destiny by helping other workmen to produce.

在当代经济学著作中，往往把连续的生产过程分成不同阶段，并用资本将各个阶段连接起来。根据某种形式的分析方法，一点一滴的资本都应插在生产劳动和消费开端之间。但是，正如我们所知，插在两者之间的却是资本货物。人们通过劳动可以生产出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完全成熟可供使用时又可以给人们提供享受，然而资本货物将劳动和这种享受割裂开来。而资本正相反，它使劳动和劳动果实结合起来。我们可以通过测量一特定资本货物介入劳动和其果实之间的间隔，来计算生产周期。这也就是用两种不同的主观经验（即生产某物品所付出的代价和使用该物品所获得的个人收益）之间的时间间隔，来计算的。换一种方法，我们也可以用工具本身的寿命来计算生产周期。假如有一个可以辅助劳动的工具，我们需将它的寿命像人类的生命一样分为生长阶段和成熟阶段。首先该工具得通过工人之手逐渐成形，也就是生长阶段；然后该成形的工具需辅助其他工人生产创造，即成熟阶段。

Capital-goods follow one another in an endless succession, and

each one has its day. Capital, on the other hand, has no periods. It works incessantly; and there is no way of dividing its continuous life, except by using arbitrary divisions, such as days, months or years.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function of it that can make a basis for such a division as we can trace in the life of capital-goods. Capital, as such, does not originate, mature and then exhaust itself, giving place to other capital. Goods do this, but funds do not. No permanent capital ever ripens and begins to minister to direct wants: immaturity is of the nature of capital. Some raw materials, which are now capital-goods, do mature in this way; though in doing so they cross the division that separates producers' wealth from consumers' wealth; for when they are ripe and in use, they embody capital no longer.

资本货物循着另一条永无止境、生生不息的道路前进，每个都有一定的寿命。与此相反，资本却没有时间周期这种说法。资本毫无间断的进行自己的工作，除了用硬性的分期方法（例如：年、月、日）外，就没有其他方法能够将它延续不断的寿命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了。在资本的功能方面，除了资本货物，就没有能将其寿命分为不同阶段的根据了。因此，资本不分开端、成熟和消亡等阶段，亦没有让位于其他资本一说。资本货物才有这种情形，而基金却没有这种情况。永久资本从来没有成熟后再开始满足直接需求的情形，不成熟是资本的本质。某些已是资本货物的原材料，的确是这样成熟的。通过这种方式成熟，它们越过了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界限，因为等到成熟时期并投入使用时，它们就不再体现资本了。

In the reservoir that we have lately used as an illustration, every particle of water, separately considered, has its period of production. It enters the pond at one end and slowly flows through it; and here its function is to help in keeping the surface of the pond

at a certain level—to keep what is called the head of water, that drives the wheel, at a certain height. In the end, it passes quickly through the wheel pit, and in an instant its productive function is over. That particular water has thus reached the end of a period. On the other hand, a water power, as such, has no periods, unless we make them arbitrarily by shutting the gates and stopping the mill at a certain part of the day. If the power be used to drive dynamos that work day and night, there are not even such arbitrary periods traceable in its action: the power is perpetual.

在上面所提到的水槽的例子中，一滴滴的水要是单独考虑的话，就可以被分成各个生产阶段。每一滴水都从水池的一端缓缓流入水池，在这里，它的作用就是维持池水的水面在一特定高度——也就是维持所谓的推动水轮的水头的高度。最后，水滴很快地流入到水轮坑里，转眼之间，它的生产功能就结束了。这样这滴水也就到达了它生命周期的尽头。相反，水力就没有按时间分为不同阶段。除非我们每天选出某个特定时间段，人为地关上水闸或关掉发动机。如果用水力日夜不停地驱动发电机工作，那么这样任意地将其分为不同阶段也就不可能了：水力是永动的。

There has lately appeared in some discussions a use of the term “waiting,” as a synonym for abstinence; and the waiting that is referred to connects itself with the periods that define the life of particular capital-goods. It is as though, when a man abstained, he began making for himself some instrument of production that would have its day and would, in the end, exhaust itself in the operation of giving to him consumers' goods. It is as though the man measured the length of time that it would take for the instrument to run its course, and then weighed and counted the cost of waiting for his consumers' goods through such a period. It is as

though he could not have the consumers' goods till the period should be ended. After the instrument should have worn itself out, it would then be necessary to make a new one; and in doing this the man would again measure the period of its duration and would count the cost to himself of so much waiting. According to this view, if the periods were long, there would be a great deal of abstinence, or waiting, to be done in connection with a particular bit of capital; while if the periods were short, there would be comparatively little.

近来，在一些讨论中出现了“等候”一词，认为它是节制的同义词。而所指的等候，是和特定资本货物的整个生命的各个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人实行节制时，他会为自己制造一些生产工具，这些生产工具有一定的寿命，在给使用者提供消费资料的过程中，不断耗损，最终毁灭。似乎这个人要先计算出这个工具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然后估量出在这段时间里，等待消费资料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好像不到这个阶段结束，他便得不到消费资料。在这个工具完全用坏之后，这个人又必须制造新工具。在制造新工具时，他又得重新计算工具寿命长短，并计量出等待这么久所付出的代价。据此，若周期较长，要获得某项资本，就需要很多的节制或等待。若周期较短，所需要的节制或等待就相对少一些。

This resolving of abstinence into waiting for consumers' goods, through the economic lifetime of particular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would be reasonable, if consumers' goods actually came in that periodic way; but they do not. They come continuously; and they begin to come from the moment when the instrument begins to act at all. From the moment when a gallon of water flows into the upper end of a reservoir, the wheel at the lower end is made to move by the overflow that there takes place. It is wholly

unnecessary for the owner of the mill to watch the inflow, note the time of it and calculate how long it will be before the particular gallon of water that then flows in will reach the wheel pit. He is, in fact, relieved from the necessity of doing any waiting whateve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reer of that particular bit of capital-goo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iod he has no occasion whatever to look forward to the end of it, since nothing will happen at the end that is not happening at every moment. There is a perpetual shifting of the identity of the drops of water in the pond, and there is a perpetual working of the wheel; but, granting that the rate of the outflow is given, the time that it takes for the water to get through the pond signifies nothing.

如果消费资料果真是按周期生产出来的话，那么在个别生产工具的经济生命中，把节制当做对消费资料的等待，这是合乎情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消费资料是不间断地生产出来的，是从工具开始工作时就开始不断生产。当一加仑的水流入水库上端时，下面的水轮就会由于上面的水的冲力而转动。对于工厂所有者来说，他完全没有必要在一旁监督，不需要记下水什么时候流入，也不需要计算得多长时间这一加仑的水才能流入到轮坑。实际上，在这件资本货物的生产过程中，他不需要有任何等待。厂主无需在开始的时候就期待看到结果是什么样子，因为在此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其结果也就不可估量。池中的水不断更新，水轮也不停地转动，因为水向外流的速率是不变的，那么水要多长时间流入到池中也就无关紧要了。

A''' A'' A' A

C’’’C’’C’C

When the raw material, A, starts on its economic career, there is no occasion for calculating how long it will be before that particular material will become A''' and pass into the hands of consumers, to render the ultimate service for which it was designed. The moment that this A appears on the scene, some A''' has been released from the capitalist's hands and has entered the realm of consumption as an article of use. There has been an outflow of usable wealth. There is, then, no need of calculating at the outset the ripening time of A. The consumer has not to wait for it; and, even if the ripening were very remote, this fact would subject him to no inconvenience. It is an actual fact that the length of periods of production defined by the life of capital-goods is a matter of entire indifference, so far as the time at which consumers begin to get enjoyment out of the production is concerned. If a reservoir is large, it will take a certain gallon of water a long time to make its way through it; if the reservoir is small, it will get through more quickly, but it will do its work of moving the wheel, by causing an overflow, as soon in the one case as in the other.

没有必要在原材料A开始经济生产时，就计算要花多长时间它才能变成A，之后再流通到消费者手中，完成它预订的终极服务任务。当原料A出现的时候，就有一些A脱离资本家之手，并作为消费品进入消费领域。这就是有用财富的外流现象。那么，就没有必要在开始时就计算原料A成熟的时间。即使成熟期比较长，消费者也没有必要等待，因为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不便之处。实际上，消费者毫不关心由资本货物寿命界定的生产周期的长短，他们在意的是什么时候能从产品中获得利益。如果水库容量较大，那么一加仑的水就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从一端流到另一端；如果水库容量较小，流得也就较快。但是不论水库大小，它都是通过水的外流推动水轮转动的。

Let us, for another example, plant a forest of such slow-growing trees that it will take fifty years to bring one of them to the point of maturity, at which it will be ready for cutting. Let us arrange the trees in rows, and plant one row each year. During this part of the process there is waiting to be done; though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must wait for any return whatever. The young and growing trees have value; and this repays us for our labor, and does it promptly, as the labor proceeds. This return, however, comes in a form in which we cannot use it for consumption. We must at least wait for our firewood. After fifty years the cutting begins; and now all waiting is over. We may cut every year a row from the ripe end of the forest and plant a row at the opposite end. From this point on, the long period involved in the ripening of the trees loses its importance. The setting out of a new row of trees is now a very different thing from the planting of the original row fifty years ago; for in a sense the present planting yields firewood at once. It replaces the row that we now cut, and prevents this cutting from trenching at all on the capital represented by the forest; and it would have this effect if the trees required five hundred years for maturing instead of fifty, provided only that there were, in that case, five hundred rows in the forest. As tree planters, even in that case, we should have no more waiting to do than we should now have if we could sow acorns, and, by magic, cause them instantly to become five centuries old. The time that will be required for the ripening of the particular trees that we are now setting out has lost its importance, since we are not dependent on those particular trees. If the forest will yield us any other mature trees in equal number, it is enough; and it will do this so long as we keep unimpaired our permanent capital, in the shape of the forest; and the planting of the new row and the ripening of the older ones, as they take place each year, have the effect of thus preserving the forest. If the process goes on, it will continue to the end of time in

the same condition—as a forest arranged in graded rows of different degrees of maturity. So far as the industry that is spent on them is concerned, it is every year the same—planting one row, cutting one row, with no waiting for the newly planted trees to ripen. All the waiting that was done was involved in getting this bit of arboreal capital into the condition in which it should perform its function.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假如我们栽植一片树林，这些树生长很慢，得五十年才能砍伐。将这些树成排栽种，每年栽一排。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耐心等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会有所回报。这些逐年成长的小树也有其价值，在我们劳动的过程中，这个价值就不断地给予我们回报。然而，这种回报却不能当做消费品。必须得等五十年，我们才能有木材可烧。五十年后开始砍伐，我们也就无需再等了。每年都从成熟的一端砍下一排树，再在树林的另一端补栽上一排小树。如此一来，等待小树长大的漫长岁月也就毫无意义了。现在栽种一排小树与五十年前载种的第一排小树意义完全不同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种植林可以很快地提供木材了。它将我们砍下的那排及时补上，因此避免了因砍伐树木而损害森林所代表的资本。假如这些树木需要五百年而不是五十年才能长大，也只要种五百排树，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植树者所要等待的时间，不会比种下橡树种子并用魔法使它立刻长成五百岁的参天大树所要等待的时间长。我们栽的树要多长时间才能成材，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再仅仅依靠那几棵树了。只要这片树林能够长出同等数目的其他任何成熟树种就可以了。只要我们保护好以森林形式存在的永久资本不受损害，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每年砍下一排成材的树，再补栽一排小树，这对树林也同样起到了保护作用。如果这一行为继续下去，这片树林就会永久地保持这种状态——高低不等的树木一排排矗立在那里。就花费在栽种树木的劳动来说，年年相似——砍下一排成树，种上一排幼苗，不用等待新栽的小树长大。我们所要等待的就只是这点树木资本去发挥它的功用。

If the industry represented by the column of A's in our recent table, were of such a kind that it took fifty years for an A to become A''', and if, on the other hand, a B could become B''' in one year, the first industry, when once it should be in running order, would impose no more waiting upon any one than would the second. There would be daily a creation of a new A and a new B; and there would be daily a yielding up of an A''' and a B''' to consumption. It is, in short, the genesis of new capital that requires abstinence. The maintenance of it, the mere renewal of the wasting tissue of it, does not require abstinence. The duration of particular tissues has no effect on the amount of the abstaining. We have seen that the making of a new instrument, to take the place of an old one, imposes on the owner no such sacrifice as that involved in making the original one;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instrument virtually, though not literally, makes its own successor. The loom in the factory that is worn out and is about to be replaced has, during its career, earned its share of dividends for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mill and, besides this, has earned for them a sum that will buy a new loom. It is not necessary, therefore, to take the cost of the new loom out of the stockholders' incomes. That would impose on them the necessity for a genuine act of abstinence, and that only would do so. If the loom had not done what well-selected machines always do,—if it had not created a fund to replace itself,—then it might have been necessary to assess the stockholders for the cost of new machinery. That would have made them abstainers; for it would have caused them to trench upon their incomes and to forego some consumers' goods.

假如上表中A那行所代表的产业，要经过五十年才能使A变成A，又假设B只要一年就能转变成B'''，一旦前者产业能够正常运营，就不会有比后者产业所等待的时间更长的了。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A和新

的B投入生产，并且每天都有一个A'''和一个B'''流通到消费流域。总之，只有新资本的形成才需要节制。而维持资本或更新耗损的资本组织，都不需要节制。资本特定部分的寿命，对节制的数量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制造新工具来替换旧工具，工具所有者在制造其他工具时，都不会比制造第一个工具时所做出的牺牲大，原因就是之后的工具都可以由第一个工具生产出来，虽然这在形式上不易观察。工厂里的纺织机已经破坏陈旧，需要更新了。而这个纺织机在它整个工作过程中，为工厂的股东们赚得了股息，此外还为他们赚得换置新机器的资金。因此，购置新纺织机就没有必要从股东的收入中扣除一部分了。如果真要从他们收入中抽取一部分的话，就会逼迫他们实行节制了，而且是不得不那样做。如果纺织机做得没有那些经过精挑细选的机器好——如果它没有赚得购买新工具的基金——那么为了换置新工具，股东们就有必要每人摊派一些资金了。这就迫使他们实行节制，因为这将会缩减股东们的收入，并且他们要放弃一些消费品。

Abstinence, then, originates new capital: it diverts income in money from the expenditure that would secure goods for consumption to that which secures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This is the same thing as saying that abstinence consists in taking one's income in the form of producers' goods—electing to take draft horses instead of driving horses, trading vessels instead of steam yachts, factories instead of pleasure palaces, always as a part of the income of the men who do the abstaining. The effect of this is to put such a series of coördinated capital-goods as the trees, the gallons of water and the A's, etc., of our illustrations into working order. Once the abstaining is done, no further diverting of income is involved. The keeping up of the series of capital-goods is, in a sense, automatic. The mill, the ship, etc., virtually replace themselves as they are worn out; and these facts signify that, in a static condition, capital-goods would be created forever in limitless variety and number, but that no capital would be created. No net addition to

the fund of productive wealth could then be called into existence. This takes place wholly under dynamic conditions, and it is a typical and important part of what constitutes economic dynamics. Abstinence is the relinquishment, once for all, of a certain pleasure from consumption and the acquisition of a wholly new increment of capital. The particular enjoyment that the man might have had, if be had spent his money for consumers' goods, he will never have if he saves it. He has abandoned it forever; and, as an offset for it, he will get interest. In the absence of disaster, the new capital will create its outflowing product thenceforth forever.

这样一来，节制创造出新资本：节制将原本要花在消费品上的钱省下来，用来购买生产工具。这也就是说，节制就是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收入——比如我们选择可供拖重的马而非可供驾驶的马，选择货船而非游艇，选择建造工厂而非游乐宫，这样节省下来的始终都是实行节制的人的收入。这样做其结果就是，将存在于上述例子中的树木、一加仑水和A等中的资本货物置于可使用的状态。一旦完成节制，就不再需要将要花在消费品上的钱转移到购置工具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使一系列的资本货物维持在某种状态是自发的。实际上，工厂、船只等等一有破损就要更新。这些事实表明，在静态条件下，资本货物在种类和数量上可以无限制的生产下去。但却不可以创造资本。那么，生产财富基金的净增值也就不复存在了。只有在完全动态的条件下才有生产财富的净增，这也是构成动态经济的典型且重要的部分。节制就是彻底摒弃对消费品的享受，从而获得一种完全新的资本的增加。一个人花钱购买某种消费品，他从中可以获得某种享受。但如果他把钱省下来就得不到这种享受了。如果他永远地放弃了这种享受，作为补偿，他将得到利息。要是没有天灾人祸，这种新资本将永久地不断生产出产品。

It has been customary to regard abstinence as an “economic

merit” and to justify interest on the ground of it. In our view, such an argument is not necessary. If we reduce society to a static state and keep it so, every bit of capital that society owns will have inherent power to create wealth. If the men who own the capital keep it in their own hands, they will get the product of it; but if they loan the capital, they virtually sell the product of it, and they may ask for an equivalent, as they would do in making any other sale.

人们习惯上将节制看做“节俭美德”，并证明从中获利是正当的。依我们所见，这种争论是没有必要的。如果社会退化到静态，并长久维持这样，那么社会拥有的全部资本都将具有创造财富的内在力量。假如资本持有者将资本留在手中，他们就会得到资本创造出来的产品。但假如他们把资本贷出去，也就等于他们将资本产物卖了出去，那么也可像卖其他商品一样，要求得到等量的报酬。

To every one who has a larger income than is necessary to sustain life, is presented the option of taking, as part of his income, something that will give pleasure for a time and then utterly perish or, on the other hand, of taking something that will never in itself give any pleasure, but that to the end of time will create, every year, a quantity of other things that will do so. It is nature, and not human institutions, that offers this choice. It is not a government that says to a solitary hunter, “You may pursue game on foot and catch what you can of it, or you may make a bow and thus secure more.” It is the nature of the bow to add something to the hunter's product; and, moreover, it is the nature of it to add enough the product to enable him to take time to make another bow, when the first one is worn out, and still have more game for his own use than he could have had otherwise. The laws of matter, in short, make

capital productive. Being productive, it may make over its product to the owner directly or it may make it over to some one else, who will pay the owner for it. Paying interest is buying the product of capital, as paying wages is buying the product of labor. The power of capital to create the product is, then, the basis of interest.

对于每一个除了维持日常生活外还有结余的的人来说，他的收入可以有两种去路：一种是用来购买能享受一时而后就消失的物品；另一种就是购买不能提供任何享受的物品，但该物品每年却可以生产出相当数量可提供享受的东西。提供这样选择的是自然界，而非是人为制度。政府绝不会对孤独的猎人说："你可以徒步尽其所能追杀捕猎，也可以做一张弓，来捕获得更多。"弓箭的性能就是增加猎人的猎物，此外，还能使猎人的捕获品增多，这可以给猎人腾出时间制造新弓箭。当第一支弓用坏了，还会有可供使用的备用捕猎工具。总之，物质的规律使资本具有生产性。既然具有生产性，资本就可以将其产品直接转交给它的所有者，或者也可以转交给愿意支付这些产品的其他人。支付利息和购买资本产品是一回事，就如同付工资和购买劳动产品也是一回事。因此，确定利息的根据就是资本创造产品的能力。

The fact that the product of capital is salabl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furnishing a motive for abstinence. There will come times when the owner cannot use it. Men perish, but capital remains; and, though it may pass into the hands of young children or of others who cannot personally use it, the inheritors will still get the value of the product, if they loan the capital and thus sell the product to others. This reveals the motive for accumulating productive wealth. It is to get an income that will never cease; and it is, therefore, to get an income of which all but a minute part will go to others than the one whose abstinence has created the capital.

A fraction of itself the capital will earn every year; and, in the absence of disaster, it will do this to the end of time—infinitely longer, that is, than any man's life.

资本产品是可以出卖的，这一事实为节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总会有一天，资本所有者不能使用资本。人去了，而资本却还在。尽管他的子孙或其他人可以继承这笔资本，但他们不懂得如何使用。如果继承者将资本贷出去，用这种方法将产品卖出去，他们仍可从中享受这些产品的价值。这就揭示了积累生产财富的动机。也就是使收入永不终止。因此，想得到一种收入，这种收入只有一小部分属于实行节制并创造财富的人，其余部分都将归到其他人手中。资本每年都会挣得本身的一小部分，若没有遇到灾祸，它将永远这样——也就是说，将比人类的寿命还要长很多。

In assuming the static, condition of society, we assume also the absence of those disasters which would destroy capital; and we likewise assume a fixed amount of the capital itself and a fixed earning capacity. If this static condition continues, the rate of interest will stand forever at the rate current at the outset. This fixed condition cannot exist, however, unless the motive for saving something from men's incomes is not equal to the motive for spending it. In the static state there is no abstinence or creation of new capital; because, with the capital now on hand, men would lose more by foregoing pleasure and making their fund larger than they would gain by doing so. The whole subject of creating capital belongs, as has just been said, in the dynamic division of the science of economics. The process involves a perpetual comparison between present pleasures and an endless series of smaller pleasures, accruing mainly to the heirs of the man who abstains.

假设社会是静态的，也不存在能够彻底摧毁资本的灾害，同时还有一定数量的资本并且这些资本本身还有一定的收益能力。如果这种静止状态持续下去，那么利率起初是多少，以后也将是多少。然而，这种一成不变的状态是不存在的，除非积蓄一部收入的动机与花掉这部分收入的动机不相等。在静止状态下，就没有节制与新资本的创造。因为有这些资本在手，人们放弃享乐而增加基金，是得不偿失的。正如刚才所说的，资本创造的整个问题，属于经济科学的动态部分。这一过程需要人们权衡目前享受与许多无止境的较小享受之间的利弊，这些享受只要归于实行节制者的继承人。

A recent and brilliant theory [9_2] connects the rate of interest with the length of what is called the period of production, or with that interval which, as we have noted, thrusts itself between the labor and the concrete fruits of that particular labor, whenever a man makes an instrument of production. When the man begins to sharpen a stone for the making of a rude hatchet, one of these periods is said to begin; and when the tool has completely hacked itself to pieces, leaving no other result than firewood for the owner's comfort, the period is supposed to end. The longer the average period becomes, the smaller becomes the interest. In reality, however, there is a successor of this first hatchet to be considered. It is the virtual product of the first one; and it continues to embody the same bit of permanent capital that the first one embodied. The period of production of this capital is not bounded by the life of any one concrete instrument. If the first hatchet was made by labor, without any capital created still earlier, then the life of the unit of productive wealth has a beginning; but it has no end. Its existence is bounded on one side, but not on the other. When we create a bit of new capital, we start another endless period: we do not lengthen any period that has already begun. We may thus go on adding tool after tool to our equipment, till we create the complicated

mechanism with which society is now working; we may continue the process, and elaborate the mechanism without limit; but we shall have added not one day to the period that intervenes between the abstinence that created the first tool and the enjoyment that will mark the virtual end of its economic career or, rather, that will mark the end of the productive action of the true capital that the first crude tool represents. There is, in fact, no such end: with a single bit of permanent capital launched upon its economic career, the lifetime of the capital, in the static state, is endless.

最近提出了一个很出色的学说 [10_2] ，它将利率与所谓的生产周期长短连接起来，或与我们已提及的，当一个人制造生产工具时，在劳动与特定劳动的具体产物之间的时间间隙连接在一起。当人类将石头磨成粗糙的石斧时,这种所谓的生产周期就算开始了，而当这个石斧完全坏了，并为其所有者提供了取暖的木柴后，这个周期也就算结束了。平均生产周期越长，利息也就越低。然而，实际上我们必须考虑第一把石斧的继承者。它所指的是第一把石斧的产品，并且这些产品都继承了首把石斧所代表的永久资本。此种资本的生产周期不受任何具体工具寿命长短的制约。若第一把石斧是靠劳力创造出来的，并且此前并没有任何资本的创造，那么，这一单位的生产财富的寿命就只有开端，却没有结尾。也就是说它的存在只有一方界限，而另一方却毫无界限可言。当我们创造了新资本，就意味着另一个无止境的周期开始了，而我们却没有使已经开始的生产周期加长。在我们创造出现代社会用来进行正常工作的复杂装备之前，我们可以这样一件接一件地为设备增添工具。我们可以延续这个过程，并无限制地扩充此装备。但是，创造第一件工具时的节制，与以后的享受之间的间隔，不是一天两天的。而这种享受标志着这件工具的经济生命已经结束，或可以说第一件粗糙的工具所代表的真正资本的生产行为的结束。在静态社会里，一些永久资本从它的经济活动开始时起，就永远的存在下去。而事实上这种结果是不会发生的。

The one thing that we can do is to bring new bits of capital into existence and to start them on similar endless periods. After the hatchet we may make a spade; and it, in turn, will have furnished us with another spade by the time its work is done. We shall thus find that we have started a second endless series of capital-goods; and this is saying that we shall have doubled the amount of our contribution to the capital in permanent existence. It is, in short, possible to add to the units of capital that are to exist through the ages; but it is not possible to add to the ages through which capital exists.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创造新资本，并使之进入到类似的无止境的生产周期中去。制造了斧子之后我们可以再造把铲子，并且当这把铲子使坏破损之后，又会给我们提供另一把新铲子。如此一来，第二个无限的，一系列的资本货物也就开始创造了。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对永久存在的资本，要做出双倍的贡献。总之，要想增加长期存在的资本单位，这是可能的；但要增加资本的年限却是办不到的。

If we disregard the action of an instrument of production, in virtually creating its own successor, and say that the period of production connected with such an instrument commences when some one begins to make it and ends when the owner throws it away, then we have periods of finite length to deal with; but now we encounter the difficulty that adding to the length of such periods does not necessarily add to the amount of capital in existence. If it does not do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average length of the periods does not have the effect that the brilliant Austrian economist attributes to this lengthening; for it does not reduce the rate of interest. This might, indeed, be high when the periods were long, and low when they were short. It is, however, when the quantity of

permanent capital increases that interest falls. Many instruments that last a short time may embody as much capital as do a few that last a long time. If we were to substitute a dozen ferry-boats for a single bridge of solid masonry, we might have the same amount of capital that we had at the outset; and if all adjustments were quite natural, we should get the same rate of interest. Yet the periods of production—as defined, not by the lifetime of capital, but by that of particular capital-goods—would have grown appreciably shorter.

如果我们忽略生产工具实际上是自己生产其继承者这一事实，而非要说该工具的生产周期是以它本身创造之时为开端，并以所用者将之抛弃之时为结束，那么我们就得处理好有限的生产周期。但我们现在又面临一难题，那就是加长了生产周期，并不会使存在的资本数量增多。如果资本没有增多，那么将平均生产周期延长，就不会产生杰出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提出的延长效应，因为它并没有降低利率。事实上，利率较高时，生产周期就较长；而利率较低时，生产周期就较短。然而，在永久资本数量增加时，利息却下降了。许多工具可能使用寿命较短，但它们却不比寿命长的工具所包含的资本少。假如我们用十多只渡船来换一座结实的石桥，那么最后我们所得到的资本数目应该是一样的。并且在一切都安排得很自然的情况下，利率也是一样的。然而，生产周期（以个别资本货物的寿命长短为界限，而非以资本的寿命长短为界限）将会缩短很多。

Professor v. Böhm Bawerk's view is that short periods are highly productive, that longer periods are less so, and that every addition to the average length of the periods adds less to the products of industry than did the preceding additions. In our view, every addition to the quantity of permanent capital in existence adds less to the product of industry than did the preceding additions. In our view, also, the average length of such periods as

we are now considering might conceivably be made either longer or shorter, without affecting either the quantity of capital in existence or the rate of its earnings; for the period connected with the duration of capital itself cannot be lengthened. Here is a dilemma. If we measure productive periods by the duration of true capital, they are endless. If we measure them by the lifetimes of particular capital-goods, they may be lengthened or shortened without affecting the rate of interest. The deeper fact in the case is, that the periods which are measured by the duration of capital-goods have no significance as affecting the amount of waiting for the pleasures of consumption that a capitalist is supposed to do. Once the series of capital-goods is created and set working, there is no further waiting to be done. In its permanent static function, capital does not make any one wait, although in its origin it causes its creator and owner to begin a period of endless waiting. Abstinence, in short, means a perpetual surrender of something, and not a mere deferring of it. [9_3]

冯•庞巴维克教授认为，短暂的生产周期有较高的生产力，较长的生产周期，生产力反而下降。生产周期的平均期限每增加一次，产业所增加的产品就要比上次减少一些。在我们看来，永久资本每增加一次，产业的产量就会减少。此外，我们考虑到的生产周期的平均长度可以加长，或是缩短。而不影响存在资本的数量，也不会影响它的收益率。因为与资本本身连接在一起的时间是不能加长的。这是个左右为难的问题。若我们用真正资本的寿命来计量生产周期，那么这个时间将是无限长的。若我们用个别资本货物的寿命长短来计测生产周期的话，那么这个时间可长可短，而不会影响利率。其深层含义就是，以资本货物寿命来计测的生产周期，对资本家等候的能够提供享乐的消费品，在数量上没有什么重大变化。一系列的资本货物生产出来，并投入使用，就无需再等待什么了。尽管在资本创造的初期，令其创造者和所用者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期，但从资本的永久静止功能来说，

资本却没有再让人等待了。总而言之，节制意味着永久地放弃某东西，而不仅仅是延缓对它的使用。 [10_3]

Moreover, this waiting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creating of a new coördinated series of capital goods, like the forest trees, or the A's, the B's, and the C's of our more general illustration, is not a waiting for income. The capitalist, even here, gets his income every year; but he is forced to take it in the form of more capital. The forest, when it has reached the degree of maturity at which cutting begins, is worth more than fifty times the amount that has been spent on it each year. It is a bad investment if it is not then worth enough to pay interest on all the capital that has been sunk on it in the making. The owner has had to forego dividends, in the shape of firewood, and to take what, in the case of corporations, are rated as additions to a surplus of real capital. The capitalist who makes up his mind to secure such an instrument of production as a growing forest, a canal, a tunnel, or anything that takes time in the making, has to forego getting an income the form of consumers' goods, while the instrument is making. He does not, however, wait far his true income even during that time; and after that he does not wait for consumers' goods or far anything else. The instrument will, of itself, virtually create a new instrument to take its place when it is discarded: the series of capital-goods will be self-perpetuating. All the while it will yield a net income, in goods for consumption, to its owners; and this creation of income in this form will go on day by day, as the capital does its work. To-day's work will bring today's income, and to-morrow's will do the same.

并且,在创造一系列新的同样资本货物时（诸如森林或是上述例子中的A、B、C等企业），所需要的等待，并不是对收入的等待。即使

在这里，资本家每年也可以获得收入，但是他们被迫接受以更多资本形式存在的收入。当小树长到成熟阶段并可以开始砍伐时，它的价值就不止是每年花费在它上面的五十倍。要是砍伐时，它的价值还不足以偿付消耗在它上面的所有资本的利息，那么这将是很失败的投资。森林所有者不得不放弃以木柴作为股息，而要像股份公司一样，把所谓增加实物资本的形式作为股息。假如资本家决定要得到需要时间才能制造出来的工具，例如茂盛的树林、河道或地道等等，他就必须在工具还没制造完成之前，放弃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收入。然而，在这期间，他也不必等候其实际收入，之后它也不必等候消费品或其他任何东西。实际上，工具在被淘汰之前，自己会创造一个新工具来代替自己，这一系列的资本货物会自己维持自己的永久存在。它会为其所有者持续不断地产生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净收入，然而，这种形式的收入就像资本起作用那样，会日复一日地进行下去。今天的工作会带来今日的收入，明日的工作会带来明日的收入。

It is worthy of notice that, so far as the periods which are bounded by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particular instruments are concerned, a certain slow increase of their average length takes place, as capital increases, because this increase makes it desirable to substitute durable things for more perishable ones. Some marginal capital may substitute a steel bridge for a wooden one. But the duration of the series of steel bridges, which embodies the true capital, is no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wooden ones; and the duration of any one bridge in the series,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it replaces itself by special earnings, is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to the capitalist. Moreover, the lengthening of the average period is not in proportion to the increase of capital. On the quantity of this capital depends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final unit of it.

值得注意的是，就那些以个别工具创造之初为起始点，并以工具

破损不可用之时为终止点的生产周期来说，随着资本的增加，其平均期限也逐渐延长，因为资本的增加，使用比较耐用的东西比使用不耐用的东西更加合算。边际资本就可以用来建造钢桥而不是木桥。但是体现真正资本的钢桥的寿命，与木桥的寿命没什么不同。如果这座桥是用自己赚得的特殊收益建造的，那么对资本家来说这一系列桥的寿命长短并没有什么意义。此外，平均周期的延长，与资本的增加并不是等比进行的。最后单位资本的生产力是由资本数量决定的。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efinitions of rent and interest given in the foregoing chapter, see Chapters XIX and XXII.

在本章提到的租金和利息的定义，请参见第十九章和地二十二章。

[9_1].In a monograph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on "Capital and its Earnings," published in May, 1888, I called attention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capital-goods, and applied the term pure capital to the permanent fund of productive wealth. The word "pure" suggests freedom from some admixture, and the admixture that is excluded is a combination with concrete objects such as tools, etc. Yet it was not at all my intention to convey the idea that pure capital is something that can objectively exist without being in such a combination. It is, however, thought of in ways in which, in the concept itself, it has to be freed from the combination. "It lasts," as we say, and "it moves from industry to industry"; but the tools do not last, and they do not change their places as working implements. The fund, the "dollars," or the pure capital does these things. When one set of bodies perishes and another one replaces it, we say that capital continues, and yet it is only an abstraction that has literally a continuous existence. The concrete embodiments of the abstraction have only transient existences.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pure capital might be termed capital in the abstract, though it is never objectively an abstraction. It is value embodied in goods the identity of which is perpetually changing, so that any affirmation that may be made of the permanent fund applies to-day to one set of bodies, to-morrow to another, etc. Here is the kernel of the logical distinction. An affirmation that is made about capital goods involves retaining the idea of the identity of the goods. We say "all capital-goods perish," and we mean by it, not that

all matter belonging to the genus capital-goods perishes from the earth, but that the particular capital-goods that we identify in the affirmation do this. A literal description of what, in the monograph referred to, was called pure capital, and is here called capital, might term it a quantum of matter of the kind defined as producers' goods, measured in terms of value and hav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forever shifting its bodily identity. Nothing that is permanently true can be affirmed of the goods, as such: since the particular goods themselves do not abide. Such affirmations may be made only of the fund.

[9_2].See Professor v. Böhm-Bawerk's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9_3].The bringing of a new coördinated series of capital-goods into existence takes time. The original planting of the forest, in our illustration, involved waiting for fifty years before the cutting of the first row of trees could take place. This, however, is not the kind of waiting that is suppos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use of capital. If no new capital were ever to be created, the vast fund that now exists would do its work forever. Interest would still be created; and, if capital were loaned, interest would still be paid by one person to another. In this there would, of course, be no waiting that would be like that which the original maker of the forest had to do; and we have seen that this is the only waiting that i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10_1].我已经在1888年5月份在美国经济协会出版的“资本与资本收益”的专著中，提出了资本与资本货物之间的区别，并将纯粹资本这一术语应用于生产财富的永久基金中去。“纯粹”一词指没有夹杂的意思，就是指不夹杂具体的东西，例如工具等等。然而，我的本意并不是指，纯粹资本能脱离这些具体的东西而客观的存在。但是，从概念的本身看来，纯粹资本被认为从这些夹杂物中脱离出来的。正如我们所说，“资本是持续不断的，并且是从一个产业流转到另一个产业”，但是工具却不能永存，也不能随意改变在工作中的作用。但是，基金、“金钱”、或纯粹资本却可以。当一种物品消耗殆尽了，就会有另一个物品来代替它，我们就说资本仍存在着，但是只有抽象的东西才能持续存在着。抽象东西的具体形式，只有短暂性的存在。知道了这一点，纯粹资本就可以定义为抽象资本，尽管客观上它并不是抽象的。真实资本是体现在商品价值中的，而商品又是不断更新变换的，所以被认为是永久基金的，今天可能适用于一种形式，明天又适用于另一种形式了。这就是理论上区别的要点。对资本货物的认定，需要明确什么是货物。我们说，“所有的资本货物都消失殆尽了”，这里我们的意思不是说世上凡属于资本货物的东西都必将毁灭，而是我们认定的个别资本货物最终将毁灭。在上面提到的专著中，被称为纯粹资本的，而在此就被称为资本，而实际上可以称它为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可以用价值来计量，并且其性质是不断变换的。没有什么商品被证实是永久真实的，因为具体商品也不是永久存在的。就只有资金才可以说是永久的。

[10_2].见冯•庞巴维克教授著的《实证资本论》。

[10_3].要创造一系列同样的资本货物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在上述的例子中，初次种植树木时，需要等待五十年才能砍伐第一排树。然而，使用资本却不用这种等待。如果新资本没有创造出来，那么现存的巨额资金就会长期起作用。利息可以一直创造，并且如果资本向外贷出的话，利息就一直将是从一个人付给另一个人。这样看来，像最先种植树林的人所需的等待就没有必要了。并且我们也知道这也是整个过程中所需要的唯一的等待。

Chapter X Kinds of Capital and of Capital-Goods

第十章 资本和资本货物的种类

Capital has been classified as “fixed” and “circulating.” These terms properly describe two distinct parts of the permanent fund of true capital, rather than two kinds of capital-goods; and in proper thought and speech the totals are more frequently employed in this way. Thus, a merchant is said to have fifty thousand dollars in fixed capital and two hundred thousand in circulating. In scientific usage, however, these terms have been made to describe two varieties of capital-goods; and here again there has resulted some of that confusion which never fails to result where the two different conceptions that attach themselves to the term capital are used vaguely and interchangeably. It is particular kinds of instruments that, as economists have told us, are fixed capital, and certain other kinds that are circulating. Buildings, machinery and the like represent the former genus; and raw materials, unfinished goods, etc., the latter.

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两个名词与其说描述了两种不同的资本货物，倒不如说它恰当地描述了真正资本的永久基金的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在正式表达思想和发表演说时，这两个名词基本就是这样使用的。如此一来，假如一个商人有固定资本五万美元，那么他的周转资本就是二十万美元。但是，按照科学习惯，这些名辞通常表明两种不用的资本货物，然而在这里，它们成为使用资本的两种不同概念。这样虽然易于区分，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产生了混乱。正如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个别种类的工具是固定资本，而某些其它种类的工具则是流动资本。建筑物、机器等等代表前者，而原材料、

半成品则代表后者。

In a rude way, these terms describe the behavior of two different kinds of working instruments; and the scientific nomenclature has something to justify it. The plane that is in the cabinet-maker's hand may be fixed there, in that it does not need to leave the man and betake itself to another owner, in order to do its productive work. But the board that the carpenter is planing may have to change ownership, since the chances are large that the man is working on an article for another person. In this way it comes about that some of the working instruments seem to do what may be rudely described as circulating, and others do not. In reality, however, there is no true circulation in the case of any of these instruments. A table, when it has been finished in the cabinet shop, may go straight to the house of the man who is to use it and stay there. All the circulating that it will have done is thus reduced to a single movement from one proprietor to another. Capital-goods, in fact, with a single exception, do not truly circulate. The exception is money; for coins, bank-notes, etc., necessarily pass from hand to hand indefinitely in performing their functions. A commodity of any other sort circulates as little as it can. There is, indeed, a waste in having it pass from hand to hand: the more directly it can go from the man who makes it to the man who is to use it, the better it is for society. It may be necessary for it to pass through a few changes of ownership in the making—and rather more of such changes are likely to be required where industry is highly organized than where it is not so; but in a given stag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we have given methods of production. With the methods thus given, the less the article circulates the better.

粗略地说，这些名辞大体将两种不同工具的作用描述了出来，并且这些科学术语也可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木匠手中的刨子可以说是固定的，为了完成其生产功能，它无需更换主人。但是，木匠所刨的木板往往是要更换主人的。因为木匠通常是为别人工作的。这样，有一些工具似乎是进行流动性工作的，而其它的工具则不需要。然而，实际上这些工具中根本就没有进行真正流动性工作的。桌子在商店做好以后，可能就直接送到用户家中，并一直放在那里。这样，这张桌子的整个流动过程，就涉及到从卖方到买方的这一次转移。实际上，资本货物并没有真正的进行流动。但是这里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货币，因为硬币、钞票等为了执行其职能，必须不断地进行易手。而其他物品，则是尽可能地减少流动。货币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不断的易手的确是一种浪费。越是能直接从制造者手中转移到使用者手中，越是对社会有益。物品在制作过程中，也许需要经过几次易主——一般说来，产业的组织越复杂，对这种易主的需求量就越大。但在一定阶段的社会组织下，总有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有了这种既定的生产方式，物品流动得越少就越好。

Another distinction—one that was once used by Mr. John Stuart Mill and is still common in economic treatises—asserts that fixed capital, meaning fixed capital-goods, can be used many times; while circulating capital can be used only once. Thus, the carpenter, it is said, may often use his hammer for a while and then lay it aside. He may keep it day after day, year after year, and drive countless nails with it; but, on the other hand, when he has once nailed together the boards that are to make a chest for some customer, he will part with the boards in their new form and will never see them again. The materials are, then, said to be circulating capital, and the hammer, fixed capital.

另一种区别方法——曾经被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使用，同时也

是经济学著作中常用到的方法——主张固定资本（指固定的资本货物）可以多次使用，然而流动资本只能使用一次。如此说来，木匠的锤子，通常是使用一段时间，然后搁置一段时间。他可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随身带着这个锤子，并用它钉过无数的钉子。另一方面，为给顾客做柜子，而将木板钉在一起，这几块木板就永远都不能改变其形式了。因此，像木板那样的原材料叫做流动资本，而锤子就叫做固定资本。

This distinction is a vague one. What constitutes a “time”—as the term is above employed—in the using of a tool? It is obvious that a man can take a hammer, use it and then lay it aside as many times as he will; but he can treat raw materials in the same way. He can begin working on a board, cease and begin again. To have any value this definition should complete itself—as, in some forms of statement, it does—by saying that goods which constitute circulating capital cannot be used more than once without undergoing a change of character. Under the successive manipulations of the carpenter the rough board becomes, first, a smooth one, and then a part of a chest; while the plane and the hammer remain unchanged, except by unavoidable wear, however often they may he used. If we thus define the “time” that a capital-good is used by some change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condition of it, we shall have attained a measure of truth. The goods that embody fixed capital can, in fact, be used repeatedly without any change in their economic status, while those that embody circulating capital acquire a new economic status at every use. If we describe the character of this change of condition that such goods undergo, we shall make the essential and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one genus of capital-goods and the other.

这个区别比较含糊不清。在使用工具过程中，上面提到的“一次”指的是什么呢？一个人可以拿起锤子使用它，之后将它又放在一边，他可以随心所欲，愿意使多少次就使用多少次。并且他同样也可以这样使用原料。他可以加工一会木板，然后休息一会，之后再工作。如果要把这个定义变得有价值，就还得进一步充实，必须指出，凡构成流动资本的商品，使用的次数都不止一次，并且其性质也会发生改变。经过木匠的不断加工，首先粗糙的木板会变得光滑，然后它又会成为柜子的一部分,然而，刨子和锤子却未曾改变，只是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磨损，基本维持原状。这样，如果我们通过资本货物形态上的变化，去判断它们的使用次数，那么我们从中就可以得出真正的结果了。实际上，体现固定资本的物品可以使用多次，并且其经济地位不发生任何改变。但是那些体现流动资本的物品，每使用一次，其经济地位就会发生一次变化。假如我们解释清楚这些物品变化情况的特征，就可以弄清楚这两种资本货物的最主要且最显著的区别。

There are two opposite ways in which capital-goods aid production. Some things, like artisans' tools, help to fit for use the matter furnished by nature. They have an active, rather than a passive function to perform, for they impart utilities to other things. Machines that transform matter, vehicles that move it and buildings that protect it—all come in this category; and so do all appliances that, in the war between man and nature, range themselves on the side of man and help him to subjugate resisting elements to his use. These instruments constitute the active variety of concrete capital.

资本货物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去辅助生产。有一些东西，例如工匠手中的工具，可以帮助改变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从而使其适合人类的使用。这些东西的功效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因为它们将效用给予了其它东西。改变物质性质的机器、运送该物质的车辆与存放该物质的房屋，都属于这一类。此外还包括，那些在人类与自然的

斗争中，站在人类一方，并帮助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这些工具构成了主动类型的具体资本。

The materials on which implements work, on the other hand, are mechanically passive. They receive utilities, instead of imparting them; they undergo modification, and themselves modify nothing. In the contes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y range themselves on the side of nature and maintain a receptive attitude toward man and his active appliances. Cotton is thus passive, while the spindle is active; bar iron is passive, while the roll and the hammer are active; and thus throughout the field of industry the character of the process itself draws a line of demarkation between actively working instruments and passive materials—between man's weapons of offence and nature's subjects for defence, or her elements that are undergoing subjugation. The class of passive instruments includes not merely the crude matter with which industry begins, but the products that pass, in an unfinished state, from one working group to another. It includes not only ore, but iron, and not only wool, but yarn, cloth and even ready-made garments awaiting purchasers. It includes all the stocks of merchandise that, in the hands of dealers, are awaiting the minor utilities of form, place, etc., that are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ke them entirely ready for final consumption.

相反地，工具所加工的材料，是处于机械的被动地位。这些材料接受工具给予它们的功效，而不能向外给予功效，它们能够接受改造，但不能改造其他东西。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它们站在自然界一方，并对人类及人类所使用的工具，采取顺受的态度。棉花就是处于这样的被动地位，而纺锤则处于主动地位。铁条处于被动地位，而压路机和锤子则处于主动地位。如此一来，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生产过

程本身在主动的生产工具与被动的原材料之间划出一个界限——即在人类用来抵御自然的武器，与自然本身的防御材料或即将被征服的自然因素之间划定了界限。被动性的工具，不仅仅包括产业建立之初所需要的未加工原料，同时也包括从一个工作生产线转移到另一个生产线的半成品。不仅包括矿砂，还包括铁，不仅包括羊毛，还包括纺线、布匹甚至还包括待售的成品衣服。此外，它还包括商人手中的所有库存商品,而这些商品处于等待形式和地点等等的次要效用的状态。只有具备了这些次要效用，它们才能最终进入消费领域。

This distinction underlies the one usually made between so-called “fixed” and “circulating” capital. Instruments that have been rated as fixed capital—buildings, tools, etc.—have active industrial functions to perform; while those which have been rated as circulating capital have passive ones. Practical thought, however, does not usually apply the terms fixed and circulating to capital-goods, but applies them to different portions of the permanent fund of true capital; and here, again, common usage bears the test of careful analysis. Concrete things, as we have seen, do not circulate in any true sense. They go through a series of hands into the possession of users, and remain there. There is, however, something that truly circulates. True capital passes through an endless series of outward forms. We have called it a permanent fund, and it is so; but it perpetuates itself only by passing continually out of one body into another. It lives by transmigration; and its movement must be as perpetual as its life.

这个区别通常奠定了区分所谓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基础。被定义为固定资本的工具，例如建筑物、工具等，有主动的产业功效。而被定义为流动资本的工具则有被动的产业功效。然而不将资本货物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似乎更切合实际。而是将这两个名

辞运用到真正资本的永久基金的各个不同组织中。这里，普遍用法又一次经受住了仔细分析的考验。我们已了解，具体的东西从没有进行真正的流通。它们要经过许多人的手，最终转到用户手中，以后也就一直留在那里。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是真正流动的。真正资本的外在形式要经过无数次的变化。我们把它叫做永久基金，它的确也名副其实。但它只有不断地从一个人之手转移到另一个人之手，才能维持自己的永久存在。它是依靠这种转移易手而存在的，而且它的转移必须与其生命一样，不能间断。

It should be noted, and in current discussions of this subject has often been noted, that the raw materials which enter into a tool make a transition from one variety of concrete capital to the other. The hammer that goes from the hardware merchant's shop to the blacksmith's forge is said to become fixed capital, after having been circulating capital. What is clear is that it thus takes on an active economic function, after having had a passive one. It pounds hot iron and imparts utility to it. The steel that is a capital-good of the passive kind when it is in a bar becomes active when it is in a hammer. At any particular time it is easy to see on which side of the line a thing belongs, for its function distinguishes it—it is either imparting utilities or receiving them. We shall, then, always designate the two kinds of capital-goods, according to their functions, as active and passive.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工具的原材料，由一种具体资本转变为另一种具体资本。并且在现行的讨论中，也对这一点给予了重视。锤子从五金商店转到铁匠铺，可以说从原来的流动资本变成了固定资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经济作用原来是被动的，之后变成了主动的。用它来敲打烙红的铁，使铁产生了效用。处于钢棒状态的资本货物是被动的，但当它被做成锤子，就变成主动的了。无论什么时候，

从其功效出发，都很容易判断出一个东西属于哪一类，或是属于给予功效的一类，或是属于接受别的东西给予功效的一类。因此，资本货物的功效一直可以作为区分标准，分为两类：主动的资本货物与被动的资本货物。

Some idea of this distinction is probably present in the mind of nearly every one when, keeping the old nomenclature, he makes an effort to say what particular things are “fixed capital” and what things are “circulating capital.” Instinctively he selects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former an engine, a tool, a building or something else that is not getting ready to be worn, or eaten or otherwise consumed in the direct gratification of wants. The essential thing about such an article is that it will never “ripen.” It will never be like mature fruit, which is good for nothing but to delight a consumer's palate and replenish the wasting tissues of his body. Goods of the active kind never grow any riper in the performing of their functions. At the outset of their careers they are well removed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directly consumed, and they never get any nearer to it. They are always man's active auxiliaries in the onerous operation that he undertakes when he reduces the passive materials of nature to a serviceable condition. The mill will never be eaten, but it will always help a man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当一个人试图区分什么是“固定资本”，什么是“流动资本”时，尽管使用的是旧名辞，但在他心里，他可能会用上述的区别去进行衡量。他总是不由自主地选择机器、工具、建筑物或那些不是现成可以穿的、可以食用的或可以即刻消费掉以满足欲望的东西。这类东西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们将永远都是不能“成熟”的商品。它们永远不会像成熟的水果一样，除了能满足消费者的食欲和补充身体耗损外，不会再提供其他作用。主动类的物品在实现其功效的过程中，不能进

一步成熟。它们在发挥功效的过程中，就不可能进行直接消费，并且以后也不可能。它们通常作为人类的主动助手，帮助人类解决繁重的工作，将自然界中的被动资料转变成可用的。工厂不能被人食用，但它却能给人类提供一些食物。

The terms fixed and circulating, however, are not to be discarded, for there is an exact way to use them. We have said that they properly apply to two portions of the fund of permanent capital. There are, in fact, three parts of this general fund, each of which is unlike the others in the matter of circulation. There is one part of the fund of capital that is destined to circulate forever, as rapidly as its owners can make it circulate; there is another part that circulates as slowly as its owners can make it; and there is still another part that does not circulate at all. These two latter portions we may group under the term fixed capital, and call the first part circulating capital.

然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些名辞也不能废除，因为它们也有正确的使用方法。我们曾提到过，它们也就适用于永久资本基金的两个部分。而实际上，这个基本基金可以分三个部分，在流动情况下它们各有各的不同。其中有一部分资本基金注定是要永久流动的，并且其所有者能使之流动多快就要流动多快；而另一部分流动得要尽可能要慢些；还有一部分根本就不进行流动。后两个部分可被称作固定资本，而第一部分则被称为流动资本。

If a business man were to say, “I have a circulating capital of fifty thousand dollars,” he would mean that the fifty thousand dollars are in the shape of goods that he is interested in selling as quickly as he can—finished goods in his warehouse or unfinished

ones in his mill. He must put his particular touch on them, thus imparting to them a certain utility, and then make haste to be rid of them. When he is thus rid of them, the capital that they represented will have taken the shape of new goods like them. The oftener this capital shifts its forms, the better it is for the owner. The so-called “nimble sixpence” is profitable. If the man has a fixed capital of fifty thousand dollars, this sum is in forms in which it will stay as long as the man can keep it there. The sooner the shoes in the factory are finished and sold, the better; but the machines that are finishing them are not better for having to be quickly shifted. The “sixpences” that are in them do not gain by being nimble: it is the “slow shillings” that are here the best.

假如一个商人说：“我有五万美元的流动资本”，那么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这五万美元是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并期望尽早脱手出售出去——这些商品可能是储存在仓库的成品或在工厂中正在加工的半成品。他必须先修整一下这些商品，使它们具有某种功效，然后再迅速销售出去。当他将这些商品脱售后，这些商品所代表的资本，会以同样的方式体现在新的商品中。资本变换形式的速度越快，对资本所有者就越有利。这就是所谓的“薄利多销”，并且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如果这个人有五万美元的固定资本，那么这五万美元就是以某种形式存在的，并且他想要保留多久就保留多久。鞋厂的鞋做得越快，售出得越快，就越好。但对于制作鞋子的机器来说，就不是更换的越快越好了。投入在机器中的钱流通得快是没有好处的，而是流通得越慢越有利。

Of the fixed capital of fifty thousand dollars some is, perhaps, invested in land, and this will never wear out; some is in buildings, and these will wear out slowly; and some is in tools and machines, which will wear out more rapidly; but the essential fact about them

is, that it is not good for production to have them wear out at all. This sum of fifty thousand dollars may be forced to change many of its forms of investment; but the change is unwelcome to the owner, and he will put it off as long as he can. He must, however, come to it in the end. All capital, except the part that is invested in land, lives by transmigration. It must eventually cast off one set of bodies and put on others. Not even in a massive building will capital stay forever, since even this will perish by degrees. It may be replaced by degrees, so long as the structure is kept in repair; but even this involves a shifting of the substance of it, and ultimately it will be destroyed and replaced altogether. Capital, then, does some circulating, even when it is embodied in substantial and active tools of production. The thing that separates fixed capital from circulating, it thus appears, is not the absolute length of time that the fund stays in one set of bodies: it is the fact that, in the one case, the operation of circulating is productive, and the man causes the movement to go on as rapidly as be can; while in the other case the circulating is not productive, but wasteful. The fact that a mill wears out, and has to be reconstructed or altogether replaced, does not, of itself, contribute to production. It is not a welcome fact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owner of the mill, and he permits it to occur only so far as it is unavoidable. [10_1]

五万美元固定资本中的一部分可能是投资在土地中了，并且这部分资本永远不会耗损。还有一部分是投资在建筑上，这部分资本会慢慢损耗。又有一些是投资在工具和机器上，耗损得更快。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生产来说，任何的损耗都是很不利的。这五万美元可能不得不更换几种投资形式，但所有者并不喜欢这种变换，他总是想法设法拖延其形式的变换。然而，最后他还是得面对这样的结果。除了投资在土地中的资本外，其他的全部资本都是通过改变形式得以存在的。它的形式总是处于新旧更替中。即使是以建筑物形式存在的资

本，也不能永久保持不变。因为高楼大厦也不免会渐渐陈旧。只要经常加以修整，高楼大厦可以逐渐换新。即使如此，其内容也要有所更新，否则，最终也会彻底摧毁，需要重建。因此，即使资本是体现在具体的、主动的生产工具中，它也是要进行流通的。这样看来，区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并不是资金停留在某一形态的绝对时间长短，而是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流动是生产性的，并且人们尽可能地加快其流动。而另一方面，流动不具生产性，而是一种浪费。工厂破旧不堪，不能使用，所以必须修建或是重新建个全新的工厂。但这对生产来说，没有任何益处。根据工厂所有者的个人经验来看，这并不是什么乐观的情况，只有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他才会出此下策。[11_1]

We are now prepared to test the relation of capital of every kind, as well as of capital-goods of every kind, to wages. The separation of these two problems will save us from encountering difficulties that have often baffled inquirers and made absurdities plausible. In particular, we shall avoid all difficulty connected with either the wages-fund doctrine itself or any of the collateral fallacies that have attached themselves it.

现在，我们准备好检测各种资本与工资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资本货物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将这两个问题区分开，就不会再遇见使咨询者难堪并使谬论流传的状况了。尤其是，我们应该避免与工资基金学说本身有关，或与这个学说相关的谬论有关的难题。

Is there any capital that is simply a “fun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r”? Is it true, as Adam Smith said, and as a hundred others have repeated, that the natural way to originate capital is to heap up food enough to live on for a long period and then, during that

period, to make something useful, like a boat, a hut or a tool? Is stored food the original capital? By our test, capital, if it is in what can be called food at all, must be in food-stuff that is really a raw material of industry. Wheat is a capital-good of the passive kind, for it receives utilities; and so do flour in the grinding, bread in the kneading, meat in the baking, etc. If it is not raw materials, but food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term,—something which neither receives utilities itself nor imparts them to other commodities, and which has nothing further before it but to be eaten,—it is not capital at all. The traditional way of studying the subject of capital has put before the mind, as the first and most typical form of it, something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but to exhaust itself in satisfying consumers' wants. If such a thing is to be rated as a capital-good at all, this can only be by that curious and perverse conception of the laborer as an engine, and food as the fuel that keeps it running. Meat is as coal for this wealth-creating machine.

有没有什么资本仅仅是用以“维持劳动的基金”呢？真的如亚当•斯密斯及其追随者所提出的那样吗？创造资本最自然的方法就是储存可供长期生存所需的食物，然后，在这期间，去制作一些有用的东西，例如：船只、茅屋或是工具。所储藏的食物就是原始资本了吗？按我们的标准，必须是能够作为产业原材料的粮食，才能称之为资本。小麦是被动类型的资本货物，因为它是接受给予效用的。碾磨着的面、捏搓着的面包以及烤着的肉等等，都属于被动的资本货物。如果这些都不是原材料，而是纯粹的粮食——既不向外给予功效，也不接受其他东西给予的功效，除了能满足人们的食欲外，别无他用——那么这些都不是资本。研究资本问题的传统方式，就是将只要能满足消费者欲望的东西，看做是最重要的且最典型的资本。假如将这种东西叫做资本货物，那这只能是出于一些奇怪的想法，而将劳动力看做机器，将食物看做能维持机器运作的燃料。那么，肉类也就可以看成是这种创造财富机器的煤炭。

One obvious difficulty here is on the teleological side: What is the end of the whole economic process? We have said that it is utilization. It is the gratification that shows itself in the nervous sensations, and the higher sensibilities of the consumer. If, afterward, the consumer works, this labor is not to be considered as impelled by the food that he has eaten; it is induced by the further food that he will afterward obtain and eat, and by very much besides mere nutriment that he will otherwise enjoy. The food that is to follow labor is one of the lures to labor and, in that sense, is the cause of it. The food that precedes the work is, in any normal teleology, the cause of nothing except an effect in the person of the eater. With the eating, one economic cycle ends; for the activities that have fallen within that cycle have produced their consummate effect. When, with the opening of another day, more labor begins, it is the starting of a new cycle; and this will end, as the former one ended, when the man consumes the fruits of it.

在目的论方面有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难题：整个经济过程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曾说过，其目的是对物品的利用。这是通过消费者精神上和感觉上的满足体现出来的。此后，如果消费者开始工作了，可不要认为这是在他所吃的食物的驱使下才进行劳动的，而是为了将来能够获得并继续食用这种食物，以及为了得到除营养品以外的能够提供享受的东西。劳动所获得的食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劳动的诱因之一，也可说是劳动的原因。在所有正常的目的论中，劳动之前所吃的食物，除了对食用者补充了体力外，别无其他效用。吃过食物之后，经济循环过程也就随之结束了，因为该循环过程中的各个经济活动都已经产生了全部的效果。随着第二天的到来，会有更多的劳动要展开，这也就是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过程，当该过程的劳动果实被消费掉时，也就跟前一个循环过程一样，将走向其生命尽头。

This, however, is not the most conclusive reason why food, as such,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capital-good, or as a form of investment of any part of the permanent fund of capital. It may, indeed, be possible to carry through an entire study of economic science the conception of phenomena arranged in an abnormal order; and it may even be possible to do something in the way of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while one is working under the disadvantage of having his theories colored by an illogical teleology; but the conclusive object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no such store of food for laborers anywhere exists. The recurrence of the winter season makes it necessary, indeed, to store raw materials for food during the time when the earth does not produce them. The material so stored belongs to the passive variety of capital-goods: in other words, it embodies some of the circulating variety of permanent capital. It receives utilities until it is finally made into food proper and served on the table. Wheat gets “time utility” by being stored in the elevators until it is wanted for grinding; and its value is all the while increasing, as it is when it gets form utilities in the grinding, place utilities in the carrying and further form utilities in the baking.

然而，这不能有力地说明为什么这种食物不能被看做是一种资本货物，或是不能被看做是一部分永久资金的投资形式。而实际上，在整个经济学研究中提出反常秩序安排的现象概念是有望实现的。尽管一个人的理论被某种不合理的目的论的色彩而扭曲了，但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也是可也大有作为的。但是没有将粮食看作是资本货物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专门为劳动者贮存食物的地方。实际上，冬季年年有，这时候土地不能生产原料，所以在这时候，囤积一些这样的原料作为粮食，是很有必要的。这样贮存的原料则属于被动的资本货物，换言之，这些原料体现了永久资本的某些流通种类。它们不断接受别的东西给予的功效，直到被做成食物端上餐桌为止。

小麦在不需要磨成粉之前，是储存在仓库中的，所以就获得了“时间效用”。在此期间，小麦的价值一直增长着。在碾磨过程中获得了形式效用，在运送过程中获得了地点效用，在烘烤过程中获得了另一种形式效用。

Wherever there is intermittent production, a store is, of course, needed to insure continuous consumption. The tank that is pumped full once a day may discharge an unbroken stream during all the day; and in this way a store of such goods as are produced only at intervals may, in felicitous words suggested by President A. T. Hadley, “translate an intermittent flow of production into a continuous flow of consumption.” In a similar way, a store of such goods may be accumulated by a slow and continuous production, and may then be used up by one quick act of consumption. The reservoir may be filled by a constant trickling stream, and may empty itself once a day in a single rush through the flood-gate. Fireworks may be made during the year and used on the Fourth of July. Here a continuous flow of production is translated into an intermittent consumption; and many kinds of goods that are usable only during one part of the year illustrate this process.

当然，什么地方的生产是间断性的，什么地方就需要储藏品，来保证消费持续进行。水塔一天装满一次水，一整天可能会不停歇地放水。同样地，正如A.T.哈德莱校长提出的那样：间断地生产出来的商品，只要储存起来，也可以将断断续续的生产量转变成持续不断的消费量。同理，缓慢的、不间断的生产也可能积聚成这样的储藏商品，而后可能会因为一次急速消费而将其用光。存水池中的水可能是一滴一滴逐渐存满的，之后每天打开水门一次，这些存水可能就会猛冲一阵，全部流出。烟花可能全年都在进行研制，而在七月四日这一天全部燃放。这里持续不断的生产活动将被转化为间断性的消费过程，可

以用许多只在一年中的某个时节才有用处的商品来加以说明这个过程。

It is a store of a different kind to which the theory under consideration refers. Independently of any question as to whether production is continuous or intermittent, the view has been presented that capital is originally and typically a store to be drawn on for the sustaining of labor. With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going on steadily and at uniform rates from day to day, this feeding of men from a store must, as has been said, take place.

讨论中的理论所指的储藏，指的不是这种储藏。无论生产是持续不断的，还是间歇性的，资本都是用来维持劳动力最基本且最典型的储藏品。虽然生产和消费持续稳定的进行，而且每天都保持不变，也需要由储藏品来供养劳动者。这是之前我们曾说过的。

The storing that raw food-stuffs undergo, by reason of the periodicity of agriculture, is, in its nature, in sharp contrast with that different kind of storing which Adam Smith and many others have cited as a typical mode of originating capital. This supposed store is made distinctly for “laborers,” and it is made only by capitalists. The object of it is the using of the laborer as a piece of productive machinery. It is supposed to take place not at all because of the periodicity of the harvesting season, but because of the relation of capital to labor. Some one gets capital in the form of food, in order that he may feed a day laborer and thus obtain capital in some other form. The laborer is a transporter of capital-goods; and such a storing of food as this, if it were necessary at all, would be necessary even if the season were such that we could

plant wheat every day of the year and harvest some of it every day in the year. [10_2]

由于农业的季节性而储藏的粮食原料，其性质完全有别于亚当•史密斯等人所提出的，用来创造资本的典型储藏模式。这种假设的储藏形式，是单独为“劳动者”而设的，并且是仅由资本家办理的。其目的是将工人当做生产机器来使用。其原因与收获的季节性毫无关系，而是因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可以以粮食的形式获得资本，因此可以供养一个短工，从而获得其他形式的资本。所以劳动者就被看作是资本货物形式更换的媒介，即使全年都可以种麦子，并且每天还可以收获一部分，如果真的是在必要的情况下，这种粮食储备也是不得不进行的。 [11_2]

A''' A'' A' A

C’’’C’’C’C

Let A, again, be the raw material that will become successively A', A'' and A''', and in the last-named condition will be ready for consumers' use. Let the B's and the C's represent other articles in parallel stages of the producing process. There are men, both laborers and capitalists, who make the raw material, A; there are other men who transform A into A'; and each one of the transformations that follow is effected by one class of producers, with the needed tools, buildings and other appliances. There is a series of productive establishments, organized in a similar way, engaged in producing B and in transmuting it successively into B', B'' and B'''. There is a similar series of producers crea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material, C. Each group consists of laborers, capit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A''', B''' and C''' are goods in their final forms, quite ready for consumers' use; and this, in logical consistency, requires that they shall be at the very last point in their economic careers at which they are capital-goods at all. They are now in the retail shops waiting for purchasers. If they take one step more, they will cease to be capital-goods altogether and will become consumers' goods. Society, as the great producing organism, will have given them up, and individuals, as consumers, will have them. There is, then, no form of capital that is not an instrument in the hands of producing society. When the A''', the B''' and the C''' are taken by individuals, as such, they thus become consumers' wealth.

假设A仍是将要依次变换为A'、A''、A'''的原材料，而当其变为A'''时，就可供消费者使用了。又假设B列与C列分别代表在生产过程中平行阶段的其他物品。有些人，既包括劳动者也包括资本家，制造原料A，又有一些人将A转换成A'。而每一步的转换都是由特定行业的生产者，利用必要的工具、建筑物和其他器具来完成的。关于B的生产及其依次转变为B'、B''和B'''，将由一系列相似的生产机制来完成。同理，C的生产和转变会由其他的生产者来完成。而每一个行业都包括劳动者、资本家和企业家。A'''、B'''和C'''是商品的终极形式，可供消费者使用。按逻辑推断，这些商品还需要处于作为资本货物的经济生命中的最后阶段。而现在这些商品在零售店处于待售阶段。只要再进一步，它们就不再是资本货物，而将成为消费资料了。作为巨大生产组织的社会，将会放弃它们。而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将会接受它们。因此，世界上任何形式的资本，都将是社会生产的工具。而当A'''、B'''及C'''被个人购买到手中时，它们就变为消费资料了。

If we adhere to our static hypothesis, and suppose that the quantity of capital and the quantity of labor remain unchanged,

that the methods of industry remain the same, etc., all income must be regarded as ripened capital-goods of the passive variety. No one gets any income except what comes in the form of A''', B''' and C''', fully ripened; for taking capital-goods as a part of one's income would be merely adding to capital, and this would be a dynamic process. Things which up to the point at which they become income have been receiving utilities, and so have been embodiments of circulating capital, make up every one's returns. Where, then, is the independent and specially stored food-fund for laborers? Nowhere; the difficulty in recognizing it as a variety of capital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does not exist. The food, clothing and other income goods, for laborers as well as for other persons, consist in the ever-ripening A''', B''' and C'''. The material tissue of circulating capital wastes, as some of it ripens into income, but it is at the same time replenished by industry.

如果我们坚持静态假设，假设资本的数量和劳动数量保持不变，且产业方式也不发生变化，那么所有的收入都应被看成是成熟的被动性资本货物。除了完全成熟的A'''、B'''和C'''外，没有人能获得其他形式的收入。因为将资本货物看做收入的一部分仅仅只是增加了资本数量，并且这一过程是动态的。能够转变为收入的物品，在此之前一直接受别的东西给予的效用，因而体现着流动资本的东西组成了个人收益。那么，专为劳动者储备的粮食基金到底在哪里呢？根本就不存在。我们之所以不能将这种基金算作资本的一种，是因为该基金根本就不存在。对于劳动者和其他人来说，食物、衣服和其他形式商品的收入，完全是由不断成熟的A'''、B'''和C'''组成的。构成流动资本的物质，由于其中的一部分会转变为收入，所以会逐渐有所耗损，但是与此同时产业又将之补充起来。

It is most remarkable that the theory which assumes that goods

are somewhere stored for the use of laborers should not notice the fact that, if this were indeed true, there would have to be a similar storage of income goods for the use of capitalists. The capitalist who is helping to make the raw material, A, must have his daily income in the shape of A''', etc. He is making raw goods and using ripe ones every day; and his position is exactly analogous to that of the laborers who are working with him. Neither he nor they can eat, wear or otherwise use the crude stuff that they are getting out of the ground. Three distinct productive periods must elapse before this identical material will be usable, yet they must live in the interim. They must all, capitalists and laborers alike, have a supply of A''', B''', and C'''. Must it be stored for them, to supply their needs until their own raw stuff shall be ripened? We have answered that question. Of the instantly emerging A''', B''' and C''', a share goes instantly to the capitalists and the laborers at A. In neither case is any waiting necessary. The point that we are now insisting on is that, if a store were needed to supply the wants of the laborers in the sub-group that makes A, it would be needed, for precisely the same reason, to supply the wants of the capitalist at A. The static hypothesis that capital is not increasing means, as we have just said, that the whole net income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is used up daily in the form of consumers' goods. It means, also, that capital is not diminishing; and that, therefore, only the income of the capitalist, and not his permanent fund of productive wealth, is available to supply his wants. He has, indeed, an ultimate safeguard against starvation, which the laborer lacks; for by changing his plan of life he can use up his capital. But naturally he does not do this, and the static hypothesis requires that he shall not do it. In this condition, he needs a store of subsistence goods, if the laborers need one. For the reasons that have been fully stated, however, neither of them needs such a store.

最应值得注意的是：认为必须把货物储存在某处，以供劳动者日后使用的理论，竟没有注意到如果这个理论的确是正确的话，那么对于资本家来说，也应将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货物储存起来。协助制造原料A的资本家，必定每天都会从A'''等形式的商品中获得利润。他每天都制造一些原料商品，同时也消费一些成熟商品。他的地位与同他一起工作的劳动者没有什么差别。所有人都不可能将从土地中获得的原材料拿来直接吃、穿或是使用。这样的原材料要经过三个不同的生产阶段才可变为可用商品，然而在这期间，人们必须得正常进行生活。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必须得到一定数量的A'''、B'''和C'''的供应。在他们自己的原料成为成品之前，必须要储藏这些商品，以备不时之需吗？我们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在连续不断制造出来的A'''、B'''和C'''中，有一部分直接抽取出来，分给经营A的资本家和劳动者。他们都无需等待。现在我们所坚持的一点就是：如果将储藏的物品供给成产A的亚产业群，那么同样的道理，这些储藏品也要分给生产A的资本家一部分。资本永远不会增加的静态假说的意思是，资本阶级的净收入每天都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全部用掉，这和我们上面说的一样。同时它也意味着资本没有减少。因此，能够供应资本家需求的，只有他的收入，而生产财富的永久基金却不能。实际上，资本阶级拥有一条反饥饿防线，而工人阶级却没有。因为如果他们要改变生活方式，就得花掉全部资本。但是，他自然是不会这样做，并且根据静态假说，他也不应该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劳动者需要储备生活必需品，那么资本家也同样需要。可是，正如我们曾详尽阐述过的那样，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资本家都不需要进行这种储备。

Goods that are receiving utility, on the one hand, and goods that are imparting utility, on the other, exhaust the entire class of capital-goods. As they come and go in their endless succession, they perpetuate the entity to which is here given the distinctive name, capital.

一方面是接受别的东西给予效用的物品，另一方面是向外给予效用的物品，这将全部的资本货物种类都囊括在内了。由于这些货物不断新旧更替，使得这里所指的独立存在的资本得以长存。

If, however, we interpret all three terms as referring to kinds of wealth, and not to quantities, we encounter another difficulty that is equally fatal. Let us make the terms, wages, found in this connection, mean the kind of goods that laborers consume; and we now have, as the three varieties of capital-goods, raw materials, fixed capital (meaning activ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nd, finally, the commodities that laborers consume. The third kind of capital-goods, however, nowhere exists. Instrumental wealth is all included in the first two classes. Every bit of it is either in the category of activ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or in that of passive instruments; it is either among the tools that transform, or among bit matter that is in the transforming.

但是假如我们将这三个名辞解释为指的是财富的种类，而不是指数量，那么我们就要面临另一个同等严重的难题。我们试着把这里所用的工资当做劳动者消费的商品，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原材料、固定资本（指主动的生产工具）和劳动者所消费的商品作为三种资本货物。然而，上述的第三种资本货物并不存在。前两种资本货物就包括了全部具有形式的财富。一点一滴的财富不是存在于主动的生产工具中，就是存在于被动的生产工具中。它不是存在改造过的工具中，就是存在于处于改造中的物质中。

It is clear that Professor Cairnes could not have intended by the term wages fund to designate goods in retail shops; for many of these are destined for the use of other persons than laborers. If they

are neither raw materials nor fixed capital, they cannot not find a place anywhere in Professor Cairnes's classification; yet obviously they represent a part of the merchant's capital. A list of varieties of capital that was intended to include the whole of it, could not well omit those parts of the stocks of retail merchants that are designed to be sold to these men who are not laborers. If they are not raw materials, they are not forms of capital at all, according to Professor Cairnes's classification; and if they are raw materials, then the parts of the stocks that workmen will buy come in the same class, and should not be counted a second time as the “wages fund.”

很明显，凯恩斯教授本意并非是用工资基金这个名辞去指零售店中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中，很大一部分不是提供给劳动者使用的。如果一个物品既不是原材料，也不是固定资本，那么它就不能归到凯恩斯教授关于资本货物的分类中。但是，很显然它们代表的是商人的资本。列一个资本种类的清单，要将全部资本包括在内，就绝对不能漏掉零售商没打算卖给劳动者的那部分存货。根据凯恩斯教授的分类，如果不属于原材料，那么它根本就不是资本。如果是原材料，那么工人要买的那部分存货，也属于这一类，而不应该再将其算在工资基金内。

Retail stocks are, in fact, passive capital-goods, receiving utilities. Thus, the shoe that is in a box on a merchant's shelves has by no means acquired its full service-rendering power until a foot is found that it fits, and the fabric that lies in a roll upon the counter will not develop its full utility until a customer comes whose taste it shall accurately gratify. All goods that are waiting to be parcelled in proper quantities and delivered at customers' houses, are waiting to have producers' finishing touches put upon them—are consumers' goods in the making, like any other raw materials.

实际上，零售商品属于被动的资本货物，是要接受别的东西给予效用的。如此一来，放在零售商店架子上的鞋，被装在盒子中，只有当有人穿着合脚，将其买掉，它才算完全行使了服务职能。柜台上的布匹，要是顾客没有看中，那它就没有全部发挥出其效用。一切等待着以适当数量进行打包，再送货到顾客家中的商品，都是等待着生产者的最后一次加工——与其他原料一样，都属于生产过程中的消费资料。

An article by Professor S. N. Patten, 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 January, 1889, discusses admirably the case of food storing that is compelled by the intermittence of agriculture, and makes an acute study of the element, time, in connection with capital and its function.

1889年一月经济学季刊上内帕腾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巧妙地讨论了农业由于季节更替而进行储藏粮食的问题，并详尽地研究了影响因素、时间与资本及其功能之间的关系。

[10_1].The pure fund of capital may even stay longer in some kinds of passive capital-goods than it does in some active instruments. Emery, for example, is an active agent for polishing metals. While doing its work, it imparts utilities and does not receive them; but it does not last long, and the metal that it is polishing may continue for a much longer time in the condition of a passive instrument. Coal, too, is an active instrument: it is not in the mill for the purposes of receiving any additional utility, but is there for the purpose of helping workmen to impart utility. It transmutes itself into power, and saves muscle; but it perishes quickly. The essential fact is that it is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owner to have his emery-wheels last as long as they will, and to have his coal keep up a fire as long as it will. Capital may stay for an instant in steam, and for an hour in the fuel that generates it; but it also stays for weeks in unfinished products. It remains for years in machines, for decades in the buildings that house them, and forever in the land that the buildings now stand on. Fixed capital will always keep its forms as long as it can; while circulating

capital will change its forms as quickly as it can.

[10_2].Professor Cairnes, in his latter-day effort to galvanize the wages-fund doctrine into life, classified all capital as consisting in raw materials, fixed capital and the wages fund. If his terms be understood in the natural way, this classification involves adding together two qualities and one pure quantity in order to get a sum total. The wages fund is a quantitative fraction of all the capital in existence; while raw materials and fixed capital, in the sense in which Professor Cannes uses the terms, are material forms of it—are kinds of capital-goods.

[11_1].纯粹资本基金在某种被动的资本货物中，要比在某种主动的工具中，停留的时间要长些。例如，金属抛光用的磨砂就属于主动工具。当其工作的时候，它向外给予效用，而不接受别的东西给予它的效用。但它不耐久，而换做用被动工具抛光金属的话，该金属可能会存在得更久些。煤炭也属于主动工具。在工厂里的煤炭，其目的不在于接受别的东西给予的效用，而是为了帮助工人向外给予效用。煤炭燃烧自己产生能量，并节省了劳力，但是它很快就会消耗殆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从所有者的利益出发，轮状钢砂越耐用越好，煤炭烧得越久越好。资本在蒸汽机中只停留片刻，在发动机用的燃料中能停留一个小时，而在半成品中却能停留数周。在机器中可以停留几年，在放置机器的建筑物中又可以停留数十年，而在建筑物所处的土地中可以永久停留。固定资本总是尽可能保持其原形态，而流动资本则会尽快地改变其形式。

[11_2].凯恩斯教授在其晚年曾试图恢复工资基金学说，把全部资本分为原材料、固定资本和工资基金。如果我们用自然方式去理解这些名辞，这种分类就相当于将两个质量和一个纯粹数量相加，而得出一个总和。工资基金是现存所有资本的一小部分，而从凯斯恩教授使用这些名辞的意义上讲，原材料和固定资本则是资本的物质形式——两种不同的资本货物。

Chapter XI The Productivity of Social Labor Dependent on its Quantitative Relation to Capital

第十一章　社会劳动生产率是由社会劳动和资本在数量上的关系决定的

Throughout this work the thing described by the term, capital, will be what a business man understands by that word. It is a permanent fund of productive wealth, and is what is commonly meant by “money” invested in productive goods, the identity of which is forever changing. The articles that embody the fund are, like particles of water in a river, vanishing things; while the fund itself, like the river, is the abiding thing.

在本书中，做生意的人对资本一词的理解，就是该词的意思。资本是生产财富的永久基金，通常是投资在生产资料中的“金钱”，而生产资料的性质又常常变更。能够体现资金的物品，例如江河中一滴滴的水，是会干涸消失的。然而资金本身会像江河那样，永远长存。

It is a striking fact that labor also is a permanent force—a fund of human energy that never ceases to exist and to act. Men are as perishable as are capital-goods, but labor is as permanent as is capital. The problem of wages has to do with the continuous earning power that the imperishable agent, labor, possesses and will possess. The question is, What will labor create and get during this year, next year and all the following years? if the rate of wages is hereafter to rise, this means that labor will acquire, as the years pass by, an increasing power of production. The attention of

practical men is directed to the interests, the rights and the struggles, not of particular laborers, but of labor in its permanence.

劳动也属于永久的力量，这是很惊人的事实——是一种永不停息，作用不止的人类能量的储备。人类与资本货物一样是会消亡的，而劳动和资本却可以长存。工资问题与劳动这个永远存在的因素所具有的持续收益能力有关。问题是：今年，明年乃至以后的每一年，劳动究竟能创造或能获得什么呢？若今后的报酬率上调了，这就意味着劳动生产力会逐年增加。务实之人所注意到的直接就是永久存在的劳动的利益、权利和斗争，而不是个别劳动者的利益、权利和斗争。

This enduring agent is not an abstract or an immaterial thing any more than is capital. We do not view it as an action apart from an actor, for it consists of men in action. Moreover, the men, in their capacity of consumers, get the benefit of their work, and they have the privilege of deciding what forms their work shall take. Just as a capitalist determines what kinds of goods shall constitute his productive wealth, so the laborer decides into what kind of productive action he shall put his bodily and mental powers. He decides, that is, whether he will make of himself a farmer, a miner, a weaver or a printer. The man as a consumer is the owner of the man as a producer. He will put his powers into the particular kind of activity that, in his view, gives a promise of yielding the largest product.

和资本一样，劳动这个永久的因素，不是抽象的或非物质的东西。因为这个因素是由工作着的劳动者构成的，所以我们并没有将它看做是与劳动者毫无关系的行为。此外，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工作的人可以从工作中获得利益，还拥有选择工作形式的优先权。就像资本

家选择了能够使生产财富得以长久维持下去的商品种类，所以工人也决定他的体力劳动及脑力劳动应花在哪种生产行为上。即他可以决定是做农民、矿工或是纺织工，抑或是印刷工人。生产是以消费为前提的。一个人会将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他认为能够最高产的某种生产活动中。

As the generations come and go, the forms that labor takes steadily change. The conditions of the year 1800 demanded certain kinds of labor; those of 1900 demand different kinds. There are youthful laborers coming continually on to the industrial stage; and, when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time are akin to those of their fathers' time, they may learn their fathers' trades. Even then, however, they usually practise the trades in new ways; and where the conditions require it, they master wholly new acts. Labor, the permanent personal agent, is as changeful in its forms as is capital, the permanent material agent. As a worn-out instrument may be succeeded by one of a different kind, so may a retiring laborer be followed by one who will do a different kind of work. Men come and men go, but work continues forever. Because the men are changing, however, the kinds of work change also.

随着时代不断变迁，劳动形式也不断发生变化。在1800年需要某些种类的劳动，而到1900年就需要另一些种类的劳动了。年轻工人不断走上产业舞台，如果他们父辈的手艺至今还没过时，他们就可以向父辈学习这种手艺。然而，尽管他们所做的是他们父辈的手艺，但他们通常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演绎它。如果工作需要，他们会从事新的生产工作，这要求他们掌握全新的生产技术。劳动这个永久存在的个人因素，与资本这个永久存在的物质因素一样，其形式是不断变换的。例如，工具用坏了，就会换个不同种类的工具来代替它，所以工人退休后，会有从事不同种类工作的人来替换他的位置。新人换旧

人，但是工作却是永远继续进行的。然而正是由于人的不断变更，工作种类也会有所改变。

There are, then, two permanent entities combined in the industry of the world. The one is capital, or the wealth that continues forever by casting off and renewing material bodies—capital-goods. The other is labor, which continues in a similar way. It is represented to-day by one set of men, and tomorrow by another. Both of these permanent agents of production have an unlimited power of bodily transmutation: they are changing their embodiment every year and every day.

如此一来，在产业社会中，有两种永久存在的实物。一个是资本，即永久存在的财富，由于物质的形式——资本货物——的新旧更替，使得这种财富得以长存。另一种就是劳动，它也以类似的方式持续存在着。今天进行劳动的是一班人，明天可能就是另一班人了。这两种永久的生产因素，在形式变换方面的能力是无穷的。它们每年都会改变其表现形式，甚至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

What has here been termed economic dynamics compels both labor and capital to go through this change. With new wants to be gratified, men must make new kinds of consumers' wealth; and they must do this by working in ways and with instruments that are unlike the old. Mechanical inventions alter the forms of labor and of capital. The centralizing process that supplants many small shops by one great factory, and then gathers many such factories under one management, does the same thing. Labor, as such, never stops; but certain forms of it stop and are succeeded by others. Capital never goes out of existence, but certain forms of it perish and are followed

by others. These permanent producing agents are in endless self-transmutation.

动态经济使得劳动和资本不得不发生这样的变化。人类为了满足新的欲望，就必须创造新形式的消费品。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得采用新形式的工作方式以及使用新的生产工具。机械的发明改变了劳动和资本的形式。用一个大工厂来代替许多小工厂，然后将这些大工厂集中管理，这样的过程也改变了劳动和资本的形式。劳动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而当某种形式的劳动停止工作了，会有其他形式的劳动将其补充上。资本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而当某种形式的资本消灭了，也同样会有其他形式的资本将其补充。这些永久存在的生产因素本身的形式都是不断发生变化的。

What has already appeared, and what greatly concerns us at this point, is the fact that any increase or diminution in the amount of labor that is employed in connection with a given amount of capital causes that capital to change its forms. Where there is a capital of five hundred dollars for each worker, that fund is in one set of forms; and where there is a capital of a thousand dollars per man, it is in a different set. Now, the labor changes its forms in the same way. The men who are working with the smaller capital perform one set of acts, and those who have the greater capital in their hands perform another set. Arts are always practised in new and changed ways, when capital multiplies itself and takes the shape of costly and elaborate machinery. That the relative amounts of labor and capital should change, means that the forms of both should change: it means that each agent must fit itself to the other's requirements. Mutual adaptations are the rule, wherever the two agents are combined.

在资本数量一定的条件下，若劳动数量有所增减，就会引起资本在形式上的变化，这一点我们曾经提到过，现在对我们有更加重要的关系。如果每个工人有五百美元的资本，那么基金就呈现出一种形式；如果每个工人有一千美元的资本，基金就会呈现出另一种形式。如今，劳动也以同样的方式改变其形式。有较少资本的工人，所从事的是一种生产活动；而有较多资本的工人，所从事的又是另一种生产活动。如果资本种类增加，并且是以昂贵精密的仪器形式出现的，那么所采用的生产工艺就得更新、改变。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数量应该改变，意思是说这两者的形式应该有所变化，换言之，其中一者的变化应该以另一者的需求为前提。这是一个定律：无论是什么地方，只要这两个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们就需要相互适应。

We are now prepared to test the productive power that resides in the final increment of each of these permanent agents. With a force of a thousand men, working for decade after decade, with neither diminution nor increase, and with a capital of a million dollars, sustaining itself also without deduction or enlargement, how large is the product that a unit of labor will produce?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which furnishes the law of wages and interest, is: These incomes are fixed by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and of capital, as permanent agents of production.

现在我们准备测试一下每个永久因素，最后增加的生产力是什么样的情况。假如有一千名工人，工作了几十年，人数不发生变化，并且有一百万美元的资本，亦没有增减，那么每个单位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多少呢？答案就是：这些收入是由劳动和资本——这对永久的生产因素——的最终生产率决定的。这也就是工资和利息的规律。

There is a formula which has been used to explain the rent of land that we may well apply in a new way. We may have a simple illustration, by disregarding, for a moment, the existence of that auxiliary capital which labor needs in tilling the soil. We will suppose each worker to carry with him a simple tool, of which the cost is too small to represent any appreciable amount of wealth. Practically empty-handed, then, this labor applies itself to a piece of land, and creates an income in the shape of a crop. This reduction of the auxiliary capital to a practical zero, be it noted, affects no principle that we are studying; for the thing that we have to prove could be established perfectly well, if we used a more cumbersome illustration, by assuming that the workers were supplied with a complicated outfit of tools, seed, live stock, ate. The product that can be traced to the last unit of labor applied to land affords, however, the most available, because the most simple, illustr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这里有个公式解释了什么是地租，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运用该公式。先暂且忽略农民种地时所需的辅助资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每个农民都带一件简单的工具，并且这件工具的价格低至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农民也就适应了这种赤手空拳地劳作，并且创造了以农作物形式存在的收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将辅助资本降低至几乎为零的地步，对我们所研究的规律毫无帮助。因为假设农民用的都是较为复杂的工具、种子、牲畜等等，那么这样的例子就可以很好地证明我们研究的问题了。然而，在田地工作的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却可以更恰当地证明劳动的最终生产率规律，因为这是最简单的例子。

It is a static standard of wages that we are now seeking. The field and the working force are assumed to remain unchanged,

while methods and environment also remain constant. What permanent income are we,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o attribute to the final unit of labor? We apply the simplest test that can be made, when we take one man from the force and so dispose of the remaining men that no appreciable disarrangement of the industry results from this withdrawal. The field is still tilled in its entire area; but it is tilled less completely and the crop is, by a certain amount, reduced. On the other hand, we may add a man to the force and rearrange the company so that no misadjustment is occasioned by the addition. A more intensive cultivation of the field now results, and in consequence there is a definite enlargement of the product.

我们正在寻找的就是一种静态工资标准。假设土地和劳动力仍然保持不变，并且工作方法和工作环境也保持不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哪些永久收入是由最后单位的劳动所赚取的呢？我们采用个最简单的方法，从所有劳力中抽出一人，然后将其他人重新安排工作，使该产业得以继续进行，避免发生混乱状态。耕田面积仍然不变，并且继续被耕种着，只是耕种得没有以前完整，并且作物数量也减少了些。相反地，假如增加一个劳力，再重新安排工作，也使之不会因为增加一人而使产业失调。这样田地耕种状态会更好，也会使农产品数量有所增加。

The amount that is taken from the crop, when one cultivator is withdrawn from the force, measures the effective productivity of every laborer of like personal capacity.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ich of such laborers is selected for the test. The withdrawal of any one makes the force by one unit smaller; and what we wish to measure is the reduction of the crop that the taking of a unit from the working force occasions. No man can get more than his

presence adds to the product that the land and the labor could create without him.

劳力中减少了一个人，那么可以用减少的作物数量去判断能力相当的劳动者的实际生产力。可以随便从中抽取一个劳力，这对测试结果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假如一个人脱离了生产队伍，那么就减少了一个单位的生产力。我们所要计量的是：减少了一个劳动力后，作物收成量又降低了多少。这样，人们所能实现的产量，就不会多于有这个人参加生产时的产量。

It may be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kinds of work that different men do; and one man may do what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securing of any crop whatever, while another does what is of far less consequence. The man who drops seed cannot be dispensed with; but the one who gives to the land the final touches that prepare it to receive the seed can be spared with less loss. Yet the one laborer is of no more effective consequence than the other, so long as they are interchangeable. Let the seed sower depart, and the other man will be put in his place. The crop will be the same as it would have been, if the worker in the less important place had been the one to depart. In effect, the products of all men who are personally equal and interchangeable are alike. The product that can be attributed to any one, as due solely to his presence, is tested by taking him out of the force, rearranging the remaining workers and letting only the least important kind of work go unperformed.

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工作，有些人做的工作，可能对农作物的生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另一些人所做的工作，可能对作物的生长不会带来多大影响。缺少播种的人是不行的，而要是没有对田地进行

最后微小的变动，以便更好收割的那个人，却不会带来严重损失。然而，只要劳动者之间的工作可以相互替换，那么所有劳动者的实际重要性也就一样了。若播种的人离开了，那么会有其他人顶替他的位置。要是离开的工人所处的位置没那么重要的话，作物会像以前一样继续生长。实际上，只要工人能力相当，并且都可以胜任任何工作，那么所有人的生产量就基本相同。要测试某人的生产量，只要将该人从工作队伍中抽取出来，再把其他人的工作重新安排，把最无关紧要的工作空出来，这样就可以得出结果了。

Now, if we can assume, for a moment, that this territory is a state by itself, and that workers do not come to it from other industrial fields and do not go from it to others, the rate of wages is fixed by what one man on this isolated plantation is effectively worth. A man can claim, not what men are paid somewhere else, but what he virtually gives to his employer here. Onl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re wages fixed by the product that is attributable to a final unit of labor.

现在姑且假设一个地区自成一国，其他产业区域的工人不会到这里来，该区域的工人亦不会到别处去，那么报酬率就是通过该独立农场上个人的实际价值来计算的。这里工人的工资是要看他对雇主的贡献有多大，而不是以其他地区的工资情况为标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说明工资是由最后单位的劳动生产量决定的。

If the assumed reduction in the working force be permanent, so that the force forever continues smaller, the crop will amount to less, year by year, by reason of the reduction. A similar test might have been made by adding a unit of labor, instead of taking one away. In that case, if the addition be permanent and the force

always continues by one unit larger, the average crop will be greater. This enables us to measure the permanent income that is imputable to one unit of labor.

假如每年工人都以固定数量递减，以致工人队伍不断缩减，这样一来作物产量也会逐年减少。我们也可用一个相似的方法去测试，即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而不是减少一个单位的劳动。假如总是以固定数量的劳力逐步增加到工作队伍中，那么作物的平均产量就会上升。这就可以计量出一个单位劳动的永久收入是多少了。

It is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as thus measured, that fixes wages. This term, final, implies an order of succession: it signifies that there is a first, a second and a last unit of labor to be distinguished. By the common method of illustrating the law of value, there is a final unit of a kind of commodity consumed by one person. We give to him one article of a kind, then another and after a while, a last one; and we discover that they are less and less useful to him, as the series is carried toward completion. The last unit has less of utility than any of the others. By a law that Austrian studies have made familiar, the value of any article in this series of goods of one kind is fixed by the utility of the final one—final utility universally gauges value.

正是通过这样计算劳动的“最终”生产率，就可以得出工资是多少了。“最终”一词意味着劳动有先后顺序，也就是说劳动单位可以分为第一个、第二个和最后一个。按照阐述价值规律的一个普遍方法，个人消费的某种物品有一个最后单位。我们将一件物品提供给某人，接着又给一件，过一会，给他最后一件。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物品陆陆续续地提供给这个人，而物品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小。最后一件是

这些物品中功效最小的。按照奥地利经济学者研究出来的规律，在一系列物品中，任何一件物品的价值都是由最后一件物品的效用来决定的——通常情况下，最后效用决定价值。

This principle we have undertaken to apply to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different agents of production, and just now we are applying it to labor. We may, if we wish, arrange in a similar imaginary series workmen who are of like personal capacity and can be changed, the one for the other. We shall then introduce the men into the field one at a time, and see what product is virtually created by each of them. With one man in a field of a given size, a certain crop will, on the average, be secured. With two men, however, the crop will not be doubled; for the second worker will create less than the first one. This reduction in the productivity of successive units of labor, as they are set tilling a field of fixed extent, furnishes the basis for a general law.

我们已经着手将这个规律应用到不同生产因素的生产力中去，并且我们也刚刚将它应用到劳动方面上。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也可将能力相当并可以互换的工人，以相似的方式进行先后排序。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里，将这些工人一个一个地带到田地中，看看每个人实际生产的产品是多少。在固定面积的田地中，一个人的劳作就会平均收获一定数量的作物。然而，有两个人一起劳作，收成量而不会加倍，因为第二个工人比第一个工人的生产能力稍差些。在固定面积的田地中，陆续增加劳动单位，这些单位的生产力呈递减状态，这就是普遍规律的基础。

It is, of course, true that, if two men can combine their labors so as to assist each other in essential ways, such a diminution of

their specific productivity may not appear. Two men make possible a rudimentary organization of labor; and this is a new influence, of which a full study must take account. If we start with one man quite alone on a very large tract of land, he may work at a certain disadvantage; and a second man may so far remove this disadvantage as to insure more than a double crop. A third, a fourth and a fifth man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so hold somewhat in abeyance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that we have cited; but in the end the law would assert itself. When there are twenty men in the field, for example, the addition of a twenty-first will have no appreciable effect in improving the organization;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t will overcrowd and overwork the land. The mere effect of this crowding is what we now have to study. We may disregard the gain that would come in the earlier stages of the process,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of labor; for in a large force it is the last unit which fixes by its product the standard of wages; and what this unit does is not needed for the perfecting of the organization.

当然，如果这两个人能够齐心协力，并能以最有效的方式互帮互助，那么他们的实际生产力就不一定会降低。两个人就可以初步组成一个劳动组织，这是一种新的影响力，这需要我们仔细地研究。假如在一大块土地上，开始时只有一个人独自劳作，他可能会遇到某些不便之处。而再来一个人可能就会轻而易举地解除这种不便，并且作物产量会比两倍还多。再陆续增加人手，可能会使该劳动组织更加健全，这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上述提到的递减规律，但这条规律终究会显现出来的。例如，田地中有二十个人进行劳作，再增加一人，他对该劳动组织不会有多大作用，相反，由于他的加入，使得田地过于拥挤，并且土地可能也会被过度开垦。我们现在所需研究的，仅仅是这种因人力拥挤而造成的影响。我们暂且将劳动组织过程的前几个阶段所带来的成果忽略掉，因为在大型的劳动组织中，最后一个单位的劳

动产品决定了工资标准，而最后这个单位的工作对完善劳动组织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In studying the mere effect of crowding the land with laborers, it is better at first to disregard the gain that comes by organization. This gain we have to study by itself, in that division of the theory which is to be devoted to economic dynamics. Organization, like mechanical invention, simply improves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successive units of labor are applied. It is as though the new men brought better tools with them. If we are to isolate and measure the mere effects of overcrowding the land, we must, however, assume that this and all other conditions remain for the time being unaltered.

在单纯地研究由于工人过多造成土地拥挤的影响时，最好还是将劳动组织所带来的成果忽略不计。而我们将在专门讨论动态经济的那一部分中单独研究该成果。劳动组织就如同机械发明一样，只是通过将劳动单位陆续带到田地中，而使得工作条件得以改善。就好比是新来的工人带来了更好的工具。然而如果我们要单独估测仅仅由于人力过于拥挤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就必须使得劳动组织及其它所有条件都保持不变。

We will, then, assume that one man goes into a large field, then another and another, till in the end there are twenty. We will assume that their methods of tilling the soil remain unchanged, and we will disregard the enlarged power that,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growth of the force, they may derive from coöperation. The whole process of thus building up a working force is, of course, imaginary: it represents an unreal and one-sided process in economic

dynamics. Nowhere can we ever find such an experiment. A farmer would never actually place one man on two hundred acres of land, leave him there for a year and measure the crop; and then, putting an additional man there in the following year, measure the increase of the crop. He would certainly not continue such an experiment for twenty years and so make of his farm a laboratory where the economist might see, in complete operation,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from land under tillage. Having twenty men at work on the two hundred acres, the farmer would, indeed, ascertain in some experimental way how large a product is imputable to the twentieth one. He would test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and he would find that the product due to the twentieth man's presence is less than would be the product that one man would have called into existence, if he had entered the field when it was less crowded. This fact is amply attested by experience, is confirmed by deductive reasoning and is one of the undisputed truths of economic science. Land of a given area and quality yields less and less per man, as more and more men are set tilling it. The simplest and most natural mode of illustrating this law is to imagine the men placed in a field, one at a time, till there are twenty of them at work. Each of them is thus seen to add less to the crop than did his predecessor. The product that can be attributed to any one man grows steadily less, as the force is thus built up to its full complement; and the amount that is due to the twentieth man is least of all. If all men must accept as pay what this man produces, we have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f wages. [11_1]

假设工人一个接一个地到一大块土地上劳作，直到有了二十个人为止。再假设他们耕地的方式也不发生变化，在劳动队伍成长初期，从相互合作中能力得以扩大，这一点也忽略掉。这种建立劳动队伍的整个过程当然是虚构的，它属于动态经济中不真实、片面的过程。无

论在哪里，都不存在这种实验。实际劳动中，农场主不可能只用一个人去耕种二百亩的田地，还让他耕种一年，最后再计量他的收成。第二年再多增加一人，再测量这年的作物增加量。农场主当然不可能花二十年时间去做这个实验，他一定不肯把这片田地作为试验田，最终让经济学者能从整个过程中得出收成递减规律。实际上，如果在这二百亩的土地上有二十个工人劳作，那么农场主会根据自己的经验，估测出第二十个人的产量。他会测出劳动的最终生产率。最后他会发现，第二十个人的产量要比在人数稍少时加入的那个人的产量要低。这一事实可以从经验中得以充分证明，可以从演绎推断中得以证实。这是经济学中无可厚非的真理。在一块面积和土质固定的土地上，如果劳作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平均每个人的产量就越来越少。用以说明这个规律的最简单且最自然的方法，就是假想一次只让一个人到田地中，直到田地上有二十个人在工作为止。这样便可观察到后去的人都会比前一个人的产量低点。当劳动组织达到健全状态时，任何人的生产量都可能会逐渐减少。其中第二十个人的产量最低。假如所有人的工资都是由最后这个人的产量决定的，那么我们也就找到解决工资问题的方法了。[12_1]

In a static state the working force continues forever, without addition or diminution; and methods and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remain forever the same. The personnel of the force undergoes the change of identity that must occur as one man dies and another replaces him; but the laboring force, as such, suffers no change. The processes and the environment of the labor are fixed. There is no building up of the force from a small beginning, and no change in its per capita product. Yet the earnings of the men are fixed by the law of final productivity. This means, in reality, that every laborer gets what would be lost to the employer if any one man now in the force were to stop working. One way of measuring this final product of the labor, and at the same time presenting to the mind a principle that governs the amounts of it, is to imagine that the force

grows, unit by unit, to its present size. Each unit, when it adds itself to the force, is for the time being the final one; and it transiently sets the standard of pay. But when the last unit comes, its product becomes the permanent standard; as the force is not further enlarged, and the pay of the men is not again changed. The whole process is imaginary; but it illustrates two principles that together control the fortunes of laboring humanity, namely: (1) At any one time wages tend to equal the product of the final unit of labor; and (2) this product becomes smaller or larger as, other things remaining the same, the force becomes larger or smaller. The former principle is static, and governs wages in each period; while the latter is dynamic and, with other dynamic principles, controls the future of the laboring class. Mere growth of population, without further change, is an impoverishing influence.

在静态条件下，劳动队伍会永远持续下去，数量没有增减，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也将永远保持不变。劳动队伍中的人员性质会发生变化，这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一个人离开了，就得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他。然而，队伍的劳动力却没有发生改变。劳动过程与劳动环境都是固定的。根本就不存在从小的劳动队伍逐渐壮大成劳动组织的现象，劳动队伍中每个人的产量也不发生变化。然而每个人的收入都是由最终生产率规律决定的。实际上，这意味着每个人的收入，就与这个队伍中任何一人停止工作，给雇主带来的损失相等。设想该劳动队伍是通过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增加劳力而扩大到现在的规模的，这是估测劳动最终生产量的一种方法。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牢记支配生产量的规律。每增加一个新单位的劳力，就意味着这是此时的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力，而它决定了此时的工资标准。一旦最后一单位的劳力加入进来，该生产队伍的生产量也就固定了。因为该队伍不会再扩大了，每个人的工资也就不会再改变了。这一整个过程是虚构的，但它阐明了支配劳动者命运的两个规律：（1）无论何时，工资都等于最后劳动单位的产量。（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量随组织中人数的

增多而降低，或随人数的减少而增加。第一个规律是静态的，支配每一阶段的工资状况。而第二个规律是动态的，与其他的动态规律一起支配劳动阶级的命运。因为其他条件没改变，所以仅仅人口增加便是影响工人贫穷的因素。

How is it, now, that the product which is attributed to the last man fixes the pay of all the men? Here we must be careful to make the conditions of our illustration conform to the facts of life. A farmer hires his men in a general market, and pays a rate of wages that the market has in some way established. He then puts the men into his field until, by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the product of the final man has become so small that it yields wages only. The rate of pay, be it noted, is fixed in the main outside of this farm; and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on the farm is made to conform to this rate of pay.

最后一个人的产量是如何决定所有人的收入的呢？我们必须注意所举的例子中的情况要与实际生活相符。农场主在普通的劳力市场雇佣工人，并以该市场用某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工资标准，给工人支付工资。他把雇来的工人带到田地工作，用收成递减规律可以得知，最后一个工人的产量比较少，仅仅相当于工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该工资标准主要是根据农场外的标准而定的，而该农场上的最终劳动生产率要与该工资标准相符。

What if there were no outside market in which the rate of pay might be fixed? What if the farm were the whole industrial field? This supposition would amplify industry, so as to make it grotesquely unlike the actual world; but it would place in the clearest light the law of wages that is at work in the actual world. If

the farm were an isolated society, not selling its products and buying others, and not importing labor at a rate of pay that was fixed outside of its confines, then the rate of pay would be fixed within the farm itself, and by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the labor there employed.

要是外面没有可以用以借鉴决定工资标准的市场该怎么办呢？要是该农场是唯一的产业基地又该怎么办呢？这种假设过于夸大了产业作用，所以这就不像发生在实际社会中的，但这却将在实际社会中起作用的工资规律非常明确地阐述出来了。假如该农场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既不向外销售产品，也不向内购进商品，也没有按农场外的工资标准雇佣劳动，那么该农场的工资标准将会是由所雇佣劳动的最后生产率决定，并且这一工资标准在该农场内部将保持不变。

Let there, for example, be an island of the sea not reached by ships, and having a fixed amount of land and an unchanging population; and let it have no industry that needs to be considered except agriculture. We need no one to tell us that this state is imaginary and grotesquely unlike the world as it is. It is, nevertheless, like the world in this vital particular, that what is produced by the final man in such an isolated population sets the wages of all men there. The effective value of any man to his employer is what would be lost if he were to cease working. That amount—the effective product of any man in the force—sets the standard to which the pay of labor generally conforms. There is now no consulting an outside labor market—there is no importing into this community a rate of pay that in some way is fixed in an environing world. We have made the community on the island to be a world by itself, and have found that any such society gives to all laborers, as their natural toward, what the final laborer produces.

例如，海里有座岛，船只无法到达那里，该岛的土地面积固定，人口亦不发生变化，并且除了务农外，该岛上没有其他任何产业。我们都知道这种状态是假想的，并且和现实社会大不相同。然而，这种假想的社会与现实社会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在这个孤立的小岛上，最后一个人的生产力就是所有人的工资标准。任何人对雇主的实际价值就等于他停止工作后，给雇主带来的损失。这个损失量，就是劳动队伍中每个工人的实际生产量，这成为了一般劳动工资所依据的标准。在这里没有可以借鉴的外部劳动市场，没有将周围社会中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工资标准的情况带到这个社会来。我们已经假设这个岛自成一个社会，并且我们也发现了任何一个像这样的社会，它提供给所有工人的报酬都等于最后劳动者的产量。

We will next, to complete our illustration, make our plantation resemble the world in this essential respect, that it is a completely organized society. We will make it vast in extent and will cause the occupants of it to carry on, not agriculture only, but every industry. We will give to the community its complement of smiths, carpenters, weavers, shoemakers, mirrors, printers, etc. We will supply the needed capital and see that it takes the needed forms. We will make sure that each particular industry has its proper part of the whole social fund, and we will carefully retain the condition originally assumed—that the community is isolated from all others. It is a world in itself, and there is no other accessible world from which it can derive its standard of wage. What, then, fixes the rate of pay for labor? Clearly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as it is employ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otal fund of productive wealth in all the affiliated groups and sub-groups, or specific industries. The product created by a final unit of social labor sets the standard of wages.

为了使我们所举的例子完整，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使这个岛成为一个组织完整的社会。那么这个岛的面积就得足够大，并且岛上居民除了务农外，还要从事其他工作。我们假设这个岛上有铁匠、木匠、织布工、鞋匠、矿工、印刷工等等。还得提供必要的资本，并设法使资本以各种形式存在。此外，我们还得确保各行各业都能从这个社会基金中分得应有的部分，同时我们还应继续保持该社会与其他社会隔绝，使这个假定条件不变。它自成一个世界，而不与其他社会接触，也不借鉴其他社会的工资标准。那么劳动者的工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很显然，各行各业的劳动团体和个别产业，与生产财富的全部基金共同体现出来的劳动最终生产率，决定了工资标准。最后一单位的社会劳动力的产量将成为工资标准。

There is, in fact, no other standard to which pay can conform. When we were speaking of a farmer a who obtained his laborers from an environing region of shops, railroads, etc., we found that he would pay to his men what the shops, etc., pay; and he would employ so many of them that the last one set working on the limited piece of land in the farmer's possession would earn his wages only. Here the last man's product does not set the rate of wages, but simply conforms to the rate that is imported from without. In a society that is a world in itself, the rate of wages cannot be a borrowed one. The men cannot be lured into society from without and paid enough to induce them to come, since there is no without in the case. The men are in the society from the first, and must stay there; and all of them must be employed. Every one of them who offers himself to an employer has something to offer to that employer, since he can increase the output of goods in any establishment to which he may go. At some rate the employer will take him; and if competition is perfect, the rate will actually conform to the amount that the man's presence adds to the product of the mill, farm or shop in which he may be set working. If the

man gives to an employer more than he gets from him, an inducement is offered to other employers to take him at a better rate of pay. Men in other occupations are in the same strategic situation, and the wages of social labor equal the product of a composite final unit of it.

实际上，除了上述的工资标准以外，别无其他了。假如说，农场主在附近有商店、铁路等这样的环境中雇佣工人，那么他本应付给工人的工钱得和商店或铁路所付的工资一样。但他需要雇佣很多工人，在这块面积有限的土地上，最后一个被雇佣来的工人，赚得仅仅是工资而已。这里，最后一个人的产量并不是工资标准，而仅仅是与外界的工资标准相符。在这样自成一个世界的社会中，不可能沿用外界的工资标准。由于该社会没有与外界接触，所以就不可能提供高薪引诱外界人士来这里。这些人一开始就在这个社会中，所以就必须待在那里，每个人都会被雇佣。凡向雇主推荐自己的人，对雇主都会有一定作用，因为他到哪里工作，哪种产业的产量就会增多。雇主会以一定的工资标准来雇佣他。如果他的竞争力较强，那么该人的工资可能就会根据他在工厂、农场或商店的产量而定。假如这个工人给雇主创造的价值要大于他所得到的报酬，那么其他雇主可能就会用比较丰厚的工资来雇用他。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也都处于同样的地位，社会劳动的工资等于各种行业最后一个单位的产量的混合体。

How is this product to be measured? Take away one social unit of labor, and see what is lost by the withdrawal of it; or add one such unit, and see what is gained by the addition. In either case, it is possible to note the amount of product that is separately due to a unit of labor and to no other agent. Let us, then, withdraw what we have called a social unit of labor. This is a composite unit, consisting of some labor from every industrial group that the community contains. We will take away cultivators of the land,

smiths, carpenters, weavers, etc., in carefully adjusted proportions, causing a final unit of labor to vanish from every specific industry.

这样的产量应该如何计量呢？将一个单位的社会劳动从中抽取出来，看产量损失了多少；或者增加一个单位这样的劳动，再看看又多获得了多少收益。无论用哪种方法，我们都可以观察得到，产量只是取决于劳动单位这一要素，而不是取决于其他要素。那么，我们将所谓的一个单位的劳动抽出来。这是个复合的单位，是由社会各行各业的劳动组成的。我们必须严格按照适当比例从中抽取农民、铁匠、木匠、织布工等等，使得最后单位的劳动从各个产业中消失。

As we take away laborers, we leave the capital everywhere unchanged in amount; but we change the forms of it in every one of the industries, so as to make it accurately fit the needs of the slightly reduced working force. There must be, if our test is perfect, no disarrangements caused by the withdrawal of the unit of social capital. The whole of that capital must continue to be utilized; and, therefore, when the departing men throw down their tools, these must not be left on the ground, as representing so much wasted capital. If this were done, the departure of the men would mean, not only loss of the product of a unit of labor, but the further loss of so much of the products as was attributable to the tools that the men were using. The remaining men may have no need of the abandoned tools themselves, but they do need the capital that these implements embody. That we must save, and we do it by the transmuting process already described. The abandoned pick and shovel become, by a miracle of transmutation, an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of a horse and cart. There are fewer men digging; but they have as much capital as ever, and they have it in a form in which, with their reduced numbers, they can use it. Similarly, in the

mill there are abandoned machines, and the remaining workers cannot set them running. The capital that is in them can be utilized, however, if it will transform itself into an improvement in the machinery that the remaining workers use. Everywhere there are fewer instruments, but better ones; and the capital, as such, is not reduced by a jot or a tittle.

我们在抽取劳力时，保持了各处资本数量不变，而却将各个产业的资本形式改变了，而使它完全适应了由于劳力稍稍减少而带来的需求。假如我们的测试非常完美，那么这个单位的社会资本被抽出之后，也不会造成产业紊乱现象。全部资本仍旧发挥着作用，因此，当离开的人放下了工具，这些工具不可能就一直放在地上，任其变成废弃的资本。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工人的离开不仅意味着损失了一个单位的劳动生产量，还意味着损失了该工人使用的工具的生产量。剩下的工人不需要废弃掉的工具，他们需要的是这些工具所体现的资本。我们必须要节俭，我们可以按照曾描述的那样履行节制。被废弃的镐和铲经过奇迹般的改变，成为能改善马车质量的材料了。锄地的人变得少了，但它们所拥有的资本却和以前一样多。并且随着人数的减少，资本也是以一种可以被工人使用的形式存在的。同理，在工厂中也有被废弃不用的机器，其他工人无法发动该机器。然而，要是这些废旧机器可以被改造成可供其他工人使用的机器，那么这些机器所体现的资本就得以延续。无论在哪里，工具数量在减少，而质量却在提高，而资本却不会因为减少了一点工具而缺失。

This hypothesis it is that tests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a unit of empty-handed labor—that reveals the actual standard of wages. If a hundred men constitute the unit of social labor that we have described, and if their departure reduces the product of all industries by a total amount that can be stated as two hundred dollars, then that is the product that can be attributed solely to the

work of the hundred men. If they are typical men of equal working powers, two dollars a day make one man's natural wages.

这个假设测试了一个单位的赤手空拳的劳力的生产力，它显示了实际工资标准。假如上面我们提到的单位社会劳动是由一百个人组成的，而他们的离开会给各行各业都带来减产，共减产了二百美元，那么这二百美元便是这一百个工人的生产量。如果他们是典型的生产力相当的工人，那么每个人的工资自然是一天两美元。

How ultra-imaginary is such a test of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labor! How far beyond possibility is the actual creation of such to microcosmical society as our assumed plantation would constitute! It would, indeed, be impossible to apportion the labor rightly among all the different industries that, in a laboratory test of the wage law, would have to be represented, or to withdraw exactly the right number of men from each of the industries, when the final unit of social labor should be taken away. How nearly unthinkable is that essential part of the test, the prompt transmuting of the capital into the forms that the reduced working force would require!

这样测试劳动生产力是多么虚假啊！在实际生活中要创造像我们设想的那样的微型世界是多么不切实际啊!要像实验室里测试工资规律那样，将劳动适当地分配到各行各业中去，或从各行各业中抽取正好的人数，使得最后单位的社会劳动正好被抽出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测试的主体部分，也就是资本迅速转变为逐渐减少的劳力所需要的形式，这是多么难以想象的啊！

Yet all this is done in actual industry: the world daily accomplishes this miraculous thing, automatically and without observation. By forces that run through its economic system, it gives to each industry its due portion of the whole social capital. It puts that portion, in every case, into the forms that the men of the group require. Wherever men become scarcer or more abundant, it alters the forms of the capital to fit their needs. It makes an unconscious but real test of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for it reveals what the world would lose, if a unit of labor were to withdraw itself and if the capital were still to be fully utilized; and it makes the pay of labor conform to this standard. In this process is involved a permanent fund of social capital, a permanent force of social labor and an automatic adjustment of wages in each particular part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to conform to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as a whole.

然而这却在现实产业中得以实现了：世界每天都自动地、不被人察觉地做着这样奇迹般的事情。通过贯穿于经济系统的力量，每个产业都能从整个社会资本中分到应得的部分。并使这部分资本具有各行各业的工人所需要的形式。当人力短缺或过剩时，就会通过改变资本的形式来适应人们的需求。这个社会虽是无意识地进行着最终生产力的测试，但这却非常真实。因为它揭示出：如果抽取一个单位的劳动，而保持全部资本得以正常发挥功效，那么这个社会将会有何损失。它使得劳动工资与该标准保持一致。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社会资本的永久基金，社会劳动的永久动力以及与整个劳动的最终生产率相适应的产业系统中各个部门的工资自动调整。

NOTE.—If in this static study we could allow the eye to range forward and take in a view of the part of the field where changes are going on, we should see that the very formula that describes the

present natural standard of wages reveals one of the cardinal influences that cause this standard to rise. If capital becomes abundant, while the supply of labor remains stationary, the same effect is produced as if the supply of labor diminished, while that of capital remained unchanged. It is the reverse of the effect that comes front crowding an environment with workers, and it makes the efficiency of one man grow larger, instead of smaller. The richer the world is in capital, the richer the worker is in productive power. Into this region of thought we may not now go; but what we may properly note is that at every point in the period of growing wealth, labor will find its natural rate of pay fixed by the law that we have now before us. Fifty years hence wages will be higher than they are to-day; but they will be fixed by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in that later and more fruitful industrial state.

附注：假如在静态研究中，我们将视野放远，并将正发生着变化的那片田地尽收眼底，我们就会观察到，表述现行自然的工资标准的那个公式，揭示出使该工资标准上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如果资本充裕了，而劳动的供应仍旧保持不变，会与当劳动供应减少，而资本保持不变时所产生的效果一样。这与劳力过剩的情况下产生的影响是相反的，这会使工人的效率增加而非减小。这个社会的资本越充裕，工人的生产力就越旺盛。现在我们无需进入到这样的思想领域，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在财富增长的各个时期，劳动的自然工资标准是由摆在我们面前的工资规律来决定的。五十年后的工资会比现在的工资高，但是那时的工资却是由在更加多产的产业状态下的最终生产力决定的。

[11_1].The possibility that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growth of the laboring force, the diminution of the returns might be counteracted by improved combinations among the men, or by improved methods of tillage, needs to be considered, as do other dynamic influences, in a separate division of economic theory.

[12_1].在劳动队伍成长的初级阶段，由于劳动组织或耕种方式的改善，而导致了收成量递减。这如同其他动态影响因素一样，需在经济理论学中单独探讨。

Chapter XII Final Productivity the Regulator of Both Wages and Interest [12_1]

第十二章 工资和利息的调节者——最终生产率 [13_1]

Instead of the plantation in our late illustration, we will think at once of the world, with its innumerable industries and its complete outfit of agents and appliances. It is, of course, isolated, since neither products, workers nor instruments can migrate to it or from it; and the rate of wages that it affords must be determined entirely within itself.

现在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拥有无数产业并且设备齐全的社会，而不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孤岛上的那个农场。当然这个社会与世隔绝，这里的产品、工人以及工具等，都不能输入或输出。并且这里的工资标准必须完全是通过自己内部规定的。

We can now derive an advantage from the imaginary process of supplying the labor for this community, unit by unit, provided that we can do this without getting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action of the law of final productivity depends on it. This is only one way of illustrating the action of that law. The actual and practical test of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one unit of labor is made, if one unit only is taken out of a complete force and if the ensuing reduction of the product is noted. This test we have already applied. It is for the sake of having a more complete view of the action of the law of final productivity that we now build up a working force, unit by unit, leaving capital unchanged in amount, though changing in its forms

with the arrival of each new unit of labor. We will let a thousand workers constitute each increment of labor, and let farmers, carpenters, smiths, weavers, printers, etc., be represented in it in carefully adjusted proportions. Every occupation must have its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comparative number of them must be fixed according to a law that it will soon be our duty to study. All that we now need to know about this law is, that it so apportions labor among the different groups and sub-groups that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labor is brought to a certain uniformity is the various occupations. Common and adaptable labor is made to produce as in much in one sub-group as in another.

假设该社会的劳动力是通过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供应的，并且我们这样做不会引起人们将其误解为最终生产率规律是以它为基础的，那么这种假设能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多方便。这是解释最终生产率规律行为的唯一方式。如果我们从一个完整的劳动队伍中仅仅抽出一个单位的劳动，并测出由于减少一个单位劳动，而造成的的减产量。这样，我们就对一个单位的生产量进行了切合实际的测试了。这样的测试已经被应用了。现在我们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增加劳动，建立起劳动队伍，尽管由于新增加的劳动单位，而使资本形式改变了，但是我们也要保证资本的数量不变。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最终生产率规律的作用有个更加全面的认识。我们将一千名工人看做一个劳动单位，并且使其中的农民、木匠、铁匠、织布工、印刷工等等所占的比例适当。各行各业都要有代表，而这个人数的比例要根据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这个规律而定。关于这个规律我们现在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规律是怎么将劳动分配到不同的产业群以及亚产业群中去的，并使各个行业的劳动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一致。一般的、可以调度的劳动无论在哪个亚产业群中的生产量都应是一样的。

Give, now, to this isolated community a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worth of capital, and introduce gradually a corresponding force of workers. Put a thousand laborers into the rich environment that these conditions afford, and their product per capita will be enormous. Their work will be aided by capital to the extent of a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per man. This sum will take such forms as the workers can best use, and a profusion of the available tools, machines, materials, etc., will be at every laborer's hand. If we were to try to imagine the forms of productive wealth that such a condition would require, we should bring before the mind a picture of automatic machinery, of electrical motors and of power obtained from cataracts, tides and waves. We should see chemical wonders performed in the preparing of materials, the creating of soil and the like. We should place the worker in the position of a lordly director of natural forces so great and so varied that they would seem more like occult powers of the air than like tools of mundane trades. All this, however, is only a picture of what would be slowly and remotely approached, if capital were quietly to outgrow population and were to reveal its power of taking the forms that the needs of the relatively few workers would require. Something like this is the goal of natural economic tendencies.

现在，假如给这个孤立的社会提供一亿美元的资本，并且不断地输入固定人数的劳动力。在这样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充裕的环境中，先安置一千名劳动者，那么每个人的平均资本将是巨大的。每人十万美元的资本将会以各种形式协助每个人的工作。这笔资本将会以最适合工人使用的形式存在，每人手中都有多种可供使用的工具、机器、材料等等。假如我们设想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所需要的生产财富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呢,在我们的脑海中会出现自动机器、电子发动机或是将瀑布、潮汐和海浪转化为电能的景象。我们可以看到在合成材料、人造土壤方面出现的化学奇迹。我们将工人放在主宰地位来支配自然力量，这种自然力量是如此巨大和富于变化，它们不像人类社会生产的

工具而更像是天上神秘的力量。然而，只有当资本稳步增长，其速度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快，并且彰显其有能力将资本转移到可以适应较少工人所需要的形式中去，只有这时才会逐渐出现上述的景象，自然经济趋势的目标大概就是这样。

Add, now, a second thousand workers to the force; and, with the appliances at their service changed in form—as they must be—to adapt them to the uses of the larger number of men, the output per man will be smaller than before. This second increment of labor has at its disposal capital amounting to only half a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per man; and this it has taken from the men who were formerly using it. In using capital, the new force of workers goes share in share with the force that was already in the field. Where one of the original workers had an elaborate machine, he now has a cheaper and less efficient one; and the new workers by his side also have machines of the cheaper variety. This reduction in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strument that the original worker used mo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estimating how much the new worker can add to the product of industry. His presence has cheapened the instruments used by the first set of workers and has taken something from their efficiency. His own share of the original capital, as it is made over to him by the workers formerly in his immediate part of the field, consists also in the cheaper and less efficient instruments. For two reasons, therefore, he brings into existence less wealth than did one of the first division of laborers.

现在再向劳动组织中增加一千名工人，由于工具设备的形式必须加以改变，来适应更多工人使用，这样一来平均每人的产量将比以前少些。这又增加的一千名工人可供使用的资本平均每人五万美元，而这五万美元是从原来的一千人手中分得的。新增的工人与原来的工人

平分这部分资本。第一批工人原来使用较精密的机器，而现在只能使用价格较便宜，而且效能较低的机器了。对于新增加的这批工人，他们所使用的机器也是这种价格较低的这类。在估测新增工人对所在产业增加的产量是多少时，得考虑到原有工人所使用的工具的效能降低这一因素。由于新增工人，而使原有工人使用的工具变成价格较低廉的，同时工具的效能也就有所下降了。新来的工人从原有的工人手中分得原有资本的一部分，其中也包括价格较低、效能较差的工具。因此，由于这两个原因，新来的工人创造的财富要比原有工人创造得少。

All over the field the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has, as it were, stretched itself out to meet the needs of a double force of workers. Of some kinds of tools there are now twice as many as before; but they are all less costly and less efficient. Cheaper buildings and more of them, is the rule. Railroads have more curves and grades less durable bridges and, in general, less substantial plants. There are two sailing vessels, where there was formerly one steamer; and there are two wooden ships, where there was one of steel. The capital of the community, without changing in amount, has taken a form that is more extended than its earlier one—the instruments are everywhere multiplied and cheapened.

在这片生产区域，那一亿美元得使自己能够满足倍增的劳动力的需求。如今部分工具数量比以前增加了一倍，而价格和效能都有所下降。就好比，楼房多则价廉。总之，铁路多弯道和斜坡，而耐用的桥梁少，耐用的工厂也不多。从前有一艘轮船，现在变成两艘帆船了；从前有一艘钢船，现在变成两艘木船了。该社会的资本数量保持不变，但形式变得更加多样了，各处使用的工具种类变多，却都是价格较低的工具了。

We must be careful as to the arithmetic of the change. The product tha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is second increment of labor is, of course, not all that it creates by the aid of the capital that the earlier division of workers has surrendered to it; it is only what its presence adds to the product previously created. With a thousand workers using the whole capital, the product was four units of value; with two thousand, it is four plus; and the plus quantity, whatever it is, measures the product that is attributable to the second increment of labor only. There is a minus quantity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calculating the product that is attributable to the final unit of labor. If we take, first, all that it creates by the aid of the capital that is surrendered to it, and then deduct what is taken from the product of the earlier workers and their capital by reason of the share of capital that they surrender to the new workers, we shall have the net addition that the new workers make to the product of industry.

我们必须注意改变之后的计算方法。第二批工人利用从原有工人手中分得的资本去进行生产，所得的产品不能全部算作他们的产量，只有他们在原有产品基础上所增加的那部分才能算作是他们的产品。一千个工人使用全部资本的时候，产量是四个价值单位。而有两千个工人使用全部资本时，产量将超过四个价值单位，而这部分增加量恰好是第二批工人的产量。在计算最后一个单位劳动的生产量时，必须将减掉的数量计算在内。假如我们先算出第二批工人借助于第一批工人让出的那部分资本所生产的产品数量，然后再减去将原有资本分给第二批工人一部分后，原有工人产量的减少量，这个差值，就是第二批工人给产业产量带来的净增值。

With the vast capital utilized, the product that the new unit of labor adds to the product that could have been had without it will

be very great, though it will be less than was created by the first unit. Every man in the new working force produces enough to rival a fortunate gold hunter. Add increment after increment of labor, till the force is decupled; and the product that is due to the last of the addition is still great. Continue to add to the force till it numbers a hundred thousand, having still the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worth of capital, but in changed form. The workers are then about as well equipped as are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present day. The last increment of labor may be supposed to add to the product that the society would have realized without its aid about as much as a working force of the same size, in this country, could separately create, by adding itself to the force already employed.

新的单位的劳动，由于使用了大量的资本，尽管其产量不会像第一批工人的那么多，但它也会大大增加原有单位的生产量。在新的劳动队伍中，每个人的产量足以与幸运的黄金开采者相较量。逐渐增加劳力，直至劳动队伍壮大至原来的十倍，此时最后增加的劳动队伍的产量仍然很大。在保持原有一亿美元资本数量不变而形式改变的情况下，继续增加劳力，直到人数达到十万人为止。那么这时工人所配备的工具基本与现今美国工人所配备的工具一样好。在这样孤立的社会中，最后一批增加的工人的产量增加值，可能和美国一支数量相等的劳动队伍，单独生产时，给原有劳动队伍增加的产量一样多。

If, now, this hundredth increment of labor is the last one that the isolated society contains, we have the law of wages. We have set the population working till no reserve exists from which we can get more. The last composite unit of labor—the final division of a thousand men—has created its own distinguishable product. This is less than the product that was attributable to any of the earlier divisions; but, now that this section of the laboring force is in the

field, no division is effectively worth any more than is this one. If any earlier section of the working force were to demand more than the last one produces, the employer could discharge it and put into its place the last section of men. What he would lose by the departure of any body of a thousand men, is measured by the product that was brought into existence by the last body that was set working.

若这第一百批增加的工人就是这个孤立社会的最后一批劳力，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工资规律了。给每个人都分配工作，直至没有剩余劳力，也不会再有新增劳力。最后一个复合单位的劳动，即最后一批一千人，已创造出其特有的产品。他们生产的东西比以前任何一批工人生产的都少，但是这批工人一起加入劳动后，每一批工人的实际价值就都一样了。如果先前的任何一批工人所要求的工资，超过了最后一批工人的产量，那么雇主就可以将这批工人解雇，然后用最后那批工人来代替他们。无论哪批由一千名工人所组成的劳动队伍的离职，给雇主带来的损失，都可以用最后一批工人的产量来进行衡量。

Each unit of labor, then, is worth to its employer what the last unit produces. When the force is complete, no one body of a thousand men can withdraw without lessening the product of the whole society by the same amount that we have attributed to the one that we last set working. The effective value of any unit of labor is always what the whole society with all its capital produces, minus what it would produce if that unit were to be taken away. This sets the universal standard of pay. A unit of labor consists, in the supposed case, of a thousand men, and the product of it is the natural pay of a thousand men. If the men are equal, a thousandth part of this amount is the natural pay of any one of them.

因此，对于雇主来说，每个单位的劳动价值，都等于最后单位劳动的产量。在劳动队伍组织完整的情况下，任何一千人的离开，都会使整个社会的产量降低，而减少的那部分与最后一批工人的产量相等。每个单位劳动的实际价值通常就等于，整个社会利用全部资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减去那个劳动单位被抽取后其他劳动队伍的生产量。这就是工资的通用标准。假设一个单位的劳动就是一千人，而该单位的生产量就是这一千人的自然工资。假如这一千人的能力相当，那么自然工资的千分之一便是每个人的自然工资。

We are seeking, of course, a static standard of wages; but the process that gradually builds up a force of laborers from a thousand to a hundred thousand, and causes capital to modify its forms as the increase of the force goes on, is not a static process. It is a dynamic operation which brings the working force up to its static complement. From the time that the force is complete, however, we leave it unchanged: we let the static condition thus attained continue forever. The importance of going through the illustrative dynamic process, and making up the permanent force unit by unit, lies in the clear view that this gives of the product tha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final” unit.

我们当然是在寻找静态的工资标准，但是劳动队伍从一千人逐渐壮大到十万人，而资本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变换其形式，这就不是静态的过程。这是一种通过动态的增加使劳动队伍达到一个静态的满额状态。然而，等到劳动力额满时，就保持这种状态不变。也就是说，我们要让这种静止状态一直持续下去。阐述动态过程的重要性，以及说明通过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建立起的劳动队伍的重要性，就在于能够清楚地看出所谓的“最后”单位的产量。

Actually, no unit is last in time. The hundred thousand men, with the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worth of capital, work on year after year, and no one division of a thousand can be singled out as constituting the particular division whose product fixes wages. Any one such body of men is always worth to its employers what the final division would produce, if we were to set them working in such an order of succession as, for illustration, we have described. That the men will get this amount, is insured by employers' competition. The final division of a thousand men has in its hands a certain potential product, when it offers its service to employers. If one set of entrepreneurs will not give them the value of it, another will, provided that competition is perfect. With an ideally complete and free competitive system, each unit of labor can get exactly what a final unit produces. With an imperfect competition, it still tends to get that amount. The final product of labor sets a standard for the pay of labor; and actual wages tend toward it, with variations.

实际上，按时间来说，哪个单位都不是最后一个。拥有价值一亿美元资本的十万名工人，年复一年地工作，不可能从中单独抽出一千人，而认定这批工人的产量决定了工资。假如我们按上面例子中所说的那样，将工人一批一批地加入到劳动队伍中，那么任何一批工人给雇主带来的价值，总是等于最后一批工人的产量。雇主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工人的收入得和最后一批工人的产量相同。最后一批一千人向雇主请求工作时，他们此时拥有一定的潜在生产量。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要是一些企业家不肯按这个产量的价值付给他们工资，那么会有另外一些企业家愿意付这些钱去雇他们。在非常完善且自由竞争的体系下，每个劳动单位所得的工资，恰好等于最后一个单位的产量。若是在不完善的竞争中，工资也是趋于这一数值的。最后劳动生产量成为劳动工资的标准，而实际工资虽有一些变动，但还是倾向这个标准的。

We have noted the fact that an entrepreneur's net profit is an incentive to competition. Such a profit is mercantile, and means that employees are selling their products for more than they are paying out in wages and interest—that the price of the goods exceeds the cost of the elements that compose them. We noted the fact that “natural price,” as defined by economists, is really a wages-and-interest price; for it equals the sum of these two outlays. A profit-giving price exceeds that sum, but the competition that tends to annihilate the profit cuts it off at both ends. By bidding against each other in selling goods, employers make the prices smaller; and by bidding against each other in hiring labor and capital, they make wages and interest larger. There is a profit on labor, so long as the men in a working force are paid less than the final one produces; but competition tends to annihilate that profit and to make the pay of labor equal to the product of the final unit of it.

我们曾提到过，企业家的纯利润就是竞争的动因。这种利润是商业性的利润，意思是说，雇主销售产品的所得，比他付给工人的工资和利息要多，即商品的价格要超过商品的制造成本。我们也曾提到过，经济学家的“自然价格”这一定义，是关于工资和利息的价格，因为这个价格等于工资和利息的相加之和。一个能获利润的价格超过了这一数值，但趋向于消灭利润的竞争，却将这种利润给彻底消除了。由于雇主们争着出售商品，所以就得把价格降低了。又由于他们争着雇佣劳力和借用资本，所以就把工资和利息提高了。只要工人所得的工资比最后一个人的产量低，雇主从该劳动中就有利可图。但是竞争却倾向于消除这种利润，使得劳动所得工资与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产量相等。

As has again and again been said, we have constructed an ideal

society in which disturbing facts are omitted, and we have so far described none of the obstacles that pure law encounters in real life. We have made no estimate of the amount of deviations from the final productivity standard that the pay of workmen actually reveals. All such studies have a place in the dynamic division of our work. As real as gravitation is the force that draws the actual pay of men toward a standard that is set by the final productivity law. This law is universal and permanent: everywhere it will outlive the local and changeful influences that modify its operation. We are to get what we produce—such is the dominant rule of life; and what we are able to produce by means of labor, is determined by what a final unit of mere labor can add to the product that can be created without its aid. Final productivity governs wages. We may now summarize the conclusions that we have thus far reached, concerning the natural standard of wages, in the following series of propositions:—

正如我们反复说的那样，我们曾设想过一种理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扰乱事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过纯粹规律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障碍。我们也没有估测到工人实际的工资与最终生产率标准之间的差距到底是多大。这些研究在我们著作的动态部分都会提到。使工人实际工资趋向于最终生产率规律标准的力量，就如同万有引力定律一般。这个规律是普遍的、永久的。无论在哪里，在限制其作用的局部的、易变化的势力中，该规律是最长久的。我们付出多少就能收获多少——这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原则。然而通过劳力所能创造出来的产品量，是看在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力的帮助下，对原有单位生产量的增加量来决定的。最终生产率决定工资。现在，我们可以将关系到工资自然标准的结论，用以下一系列的定理方式进行表述：

(1) Labor, like commodities, is subject to a law of marginal

appraisal. The rate that the market puts on the final unit of the supply of each of them, it puts on the entire supply. As the last unit of consumers' goods is a price-making one, so the last unit of labor is the one that fixes wages.

（1）与商品一样，劳动力也是受边际估价规律所支配的。市场对最后一个单位所供应的产品估定的价格，也就是整个所有该种产品的价格了。正如根据最后一个单位的消费品来规定价格一样，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也就决定了工人的工资。

(2) The term final does not designate a particular unit that can be identified and separated from others. There is not, for example, in the elevato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 special lot of wheat that is in a strategic position and has a price-making power that other wheat does not possess. Any unit whatever of this commodity is final in the economic sense; in as much as, by its presence, it brings the supply to its present actual magnitude. Similarly, the final, marginal or last unit of labor does not consist of particular men. It is especially necessary to guard against the idea that the final men, whose products fix the general rate of wages, are those who would naturally be employed last, because they are the poorest. We have been careful to say that it is units of labor, as such, that are the basis of the law of wages; and a body of men must be of the average quality of ordinary laborers, if it is to constitute such a unit.

（2）最后这一术语，并不是指那些可以鉴别出来，易于与其他单位区分开来的个别单位。例如，在美国的谷仓中，处于关键位置，并有别于其他麦子，可以决定小麦价格的一定数量的小麦是根本不存在的。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任何单位的小麦都是最后的单位。由于该

单位的存在，使小麦的供应达到了现在的实际数目。同样，劳动的最后或边际单位，并不是由特定的人来组成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这样想：因为决定工资的最后一批工人的产量最低，所以应该最后雇用。正如上面所说，这种单位的劳力是工资规律的基础，这种说法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而要是组成这样的一个单位，要求必须是产量较为均衡的普通工人。

(3) In presenting the law of final utility, it is customary to arrange the units of a commodity in an imaginary series, to present them one at a time and to ascertain how important each one is to the consumer. Yet commodities never come to the market in such an order. The whole present supply of a commodity is offering in the market; but the price that it is bringing is fixed by the importance that would attach to the final unit, if the supply were offered in such a series of units.

(3)在阐述最终效用规律时，通常是把商品单位按想象中的次序进行排列，每次只出售一种商品，并确定每种商品对消费者的重要性。然而，商品却从没有按照这样的先后顺序出现在市面上。某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时，是以大批量的形式进行销售的。但该种商品的价格却是由在按先后次序供应商品时的最后一个单位商品的重要性决定的。

In like manner, we may find it useful, in presenting the law by which wages are fixed, to go through an imaginary operation of setting men at work, one man at a time or one company of men at a time, and thus to find what importance the market places on the last one. This reveals the operation of a law of diminishing productivity; and whether we take a single man or a body of men as the unit of labor, any unit can get, as pay, what the last one would

produce, if the force were set working in this way.

同理，在说明决定工资的规律时，我们设想每次只有一个工人或一队工人去工作，从而探明最后一个单位劳力对市场的重要性是怎样的。这就揭示出了生产力递减规律。无论我们是将一个人或是一群人作为一个劳动单位，只要劳动队伍是以这种方式投入到工作中的，每个单位劳动的工资都相当于最后一个单位的产量。

(4) The standard of wages thus attained is a static one. So long as the labor and the capital continue unchanged in amount, and produce the same things, by the same processes and under an unchanging form of organization, wages will continue at the rate that this test establishes. Setting men at work in succession is a bit of imaginary dynamics, but what it reveals is a static law.

（4）如此一来，工资标准就是静态的了。只要在劳力和资本数量一直保持不变，并且生产步骤与组织形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会生产出同样的产品来，而工资也会按照这个测试所建立起来的标准持续下去。让工人按先后顺序投入到工作中，表面看来有点像想象的动态，但是这却揭示出了静态的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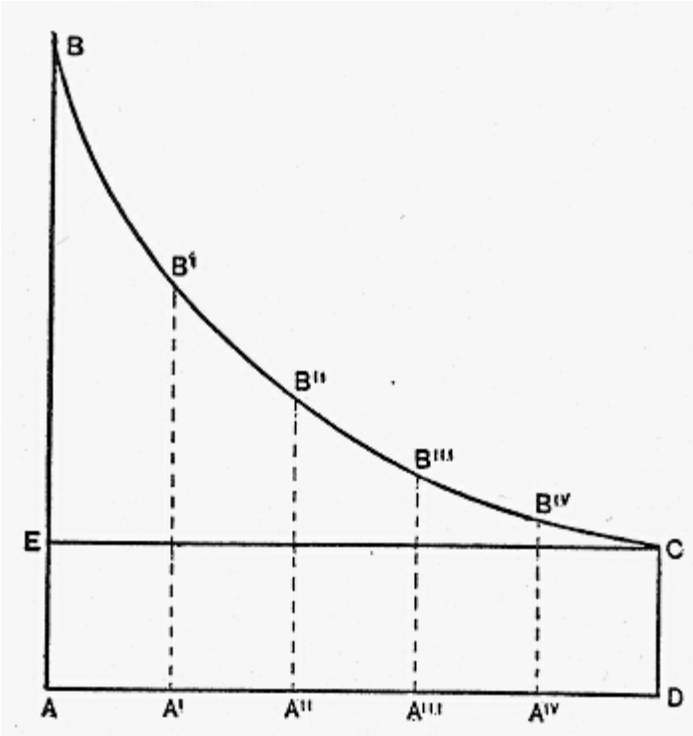
B
B'
B''
B'''
B''''
E
C
A
A'
A''
A'''
A''''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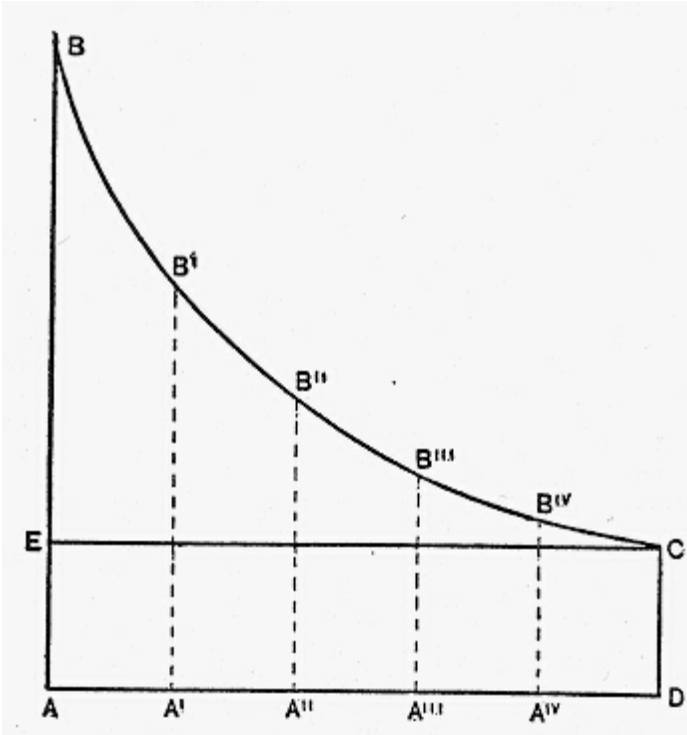

(Fig.2)

(图2)

Let the number of units of labor be measured,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along the line AD. Let them be set working in a series, in connection with a fixed amount of capital. The product of the first unit of labor, as aided by all the capital, is measured by the line AB. What the second unit of labor adds to this product is the amount expressed by A'B'. The third unit enlarges the output by the amount A"B", the next by A'''B''', the next by A''''B'''' and the last by DC. DC

measures the effective productivity of any unit of labor in the series and fixes the general rate of pay. If the first unit of labor claims more than the amount DC, employers will let it withdraw, and will substitute for it the last unit. What they lose by the withdrawal of any one unit in the entire force is the amount DC.

如下图所示，直线AD表示劳动单位的数量。这些劳动单位依次投入到工作中，并确保资本数量不变。第一个单位劳动用全部资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用直线AB来表示。而第二个单位劳动对原产量的增量用直线A'B'表示。第三个单位的劳动的增量用A"B"表示，依此类推，直至最后一个单位所增加的产量用直线DC表示。DC所示就是该系列中每个单位劳动的实际生产力，并决定了平均工资标准。要是第一单位的劳动所要求的工资超出了DC表示的数目，那么雇主就会将他们解雇，再去雇用最后单位的劳动。该劳动队伍中，任何单位的退出，给雇主带来的损失量都如线DC所示。

A fact of great importance now appears. We may revers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law, and by so doing get a law of interest. Let the labor be the element that is unchanged in amount, and let capital be the one that is supplied in a succession of increments.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将上面的工资规律反过来说，这样就得到了利息规律。假如劳动数量保持不变，而资本是按先后次序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增加起来的。

AB is now the product gained by using one increment of capital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hole working force. A'B' is the additional product that is created increment of capital. A"B" is the product of

the third increment and DC is the amount last. This amount, DC, fixes the rate of interest. No one of the series of units of capital can secure for its owner more than the last one produces. If the owner of the first increment asks more than this for the use of it, the entrepreneur will relinquish this bit of capital and will put the last unit in its place. What he will lose, in the way of product, is measured by the amount DC, the direct product of the final increment of capital. This expresses the effective product of every increment, since it is the amount that would be lost if any one of the series were withdrawn.

AB便是整个劳动队伍在使用一个单位的资本后，所得的产量。A'B'就是第二个单位的资本所增加的产量。A"B"是第三个单位资本的产量，同理DC就是最后一个单位资本的产量了。DC所示的数据决定了利率。这一系列资本单位中，所有者所得的利息不能超过最后一单位的产量。如果第一个增量的所有者所要求的利息，超过了最后一个单位的产量，那么企业家就不会再使用这个单位的资本，而是用最后一个单位来代替它。企业家在生产方面所受的损失可以由直线DC来计量，即通过资本最后增量的直接产品来计量。这就将每个单位的实际产量表示出来了，因为这个数量就是任何退出生产的单位所带来的产品损失量。

All that we have said about the change that must take place in the forms of capital, when the amount of it is fixed and the working force is increasing, applies here, where these conditions are reversed. The steady increase of the capital, if the amount of the labor be fixed, compels a similar change of forms. With one unit of capital and ten units of labor, the instruments will be simple and cheap. Hand tools will generally prevail; and buildings, roadways, bridges, vehicles, etc., will be of a makeshift kind, which will, at a

small cost for each instrument, enable the men in some way to work. With two units of capital, a better type of instruments begins to prevail. Every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the capital shows itself primarily in transmuting poor appliances into better ones. There are, indeed, more tools, and there is more raw material; but the striking fact is that all the tools, etc., are costlier and more efficient.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tenth unit of capital, the condition may be thought of as approximating that of our own country at the present day. There is much costly machinery, many durable buildings, a good supply of large ships, efficient railroads, etc.

我们曾说过资本数量保持不变，而工人队伍逐渐壮大，资本的形式就必须发生变化。而当将这些条件变成相反条件时也同样适用。假如工人数量固定不变，那么资本的稳步增长就显示了相似的形式上的变化。只有一个单位的资本和十个单位的劳力的话，工具将会是简单且廉价的。这样会普遍使用手工工具，而楼房、铁路、桥梁、车辆等等，将成为转型时期的替代品，每件工具的造价都非常低，只能勉强供工人工作使用。要是有两个单位的资本，工具质量就会变得稍好一些。资本一有增加，首要做的就是将质量差的工具换成稍好点的。实际上，资本增加后，工具和原材料都增多了。但很显而易见，工具的价格和性能也都提高了。资本增加到十个单位，那时的条件几近于美国现在的情况。这时就会有更贵重的机器、更坚固的楼房、更多的大轮船和效率更高的铁路，等等。

At the cost of what may be a tedious repetition, we have now described the series of changes that an increasing capital undergoes, because this is what is actually taking place. Capital is the element that is outgrowing labor. We may take the world that exists instead of an imaginary one, as our illustration. As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ctually goes on, it shows itself more and more in qualitative

changes of existing instruments. Society pulls down its barns and builds others, better as well as larger; it carries its mercantile buildings farther into the air, and makes them fireproof and durable; it substitutes steel ships for wooden ones and steamers for sailing craft; it takes the curves and grades out of its railroads, and makes bridges and viaducts of the kind that defies time and strain; it bores tunnels through mountain ranges to avoid climbing over them and cuts canals across isthmuses to shorten the voyages of ships. As capital grows very abundant, there are made longer tunnels and canals; and they have, as their purpose, the avoiding of climbs that are easier and voyages that are shorter than were those that were avoided by the earlier engineering works. They thus represent a greater outlay incurred for a smaller gain. Society also makes all its machinery as nearly automatic as it can, so that one laborer's guidance shall keep much machinery in successful motion. Everywhere there are taking place such adaptations of capital as fit a large amount of it to the needs of a relatively small amount of labor.

我们不厌其烦地说明着资本持续增加时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因为这些变换实际上都正在发生着。资本这一因素增长得比劳动这一因素快。我们可以用现有的社会作为例子，而不是用那种假想的社会。由于资本数量不断积累，积累得越多，原有工具的质量就越有体现。拆掉旧的谷仓，而建造更好更大的谷仓；把商业用房建造得高耸入云，并且还防火耐用；用钢船代替木船，用轮船来代替帆船；铁路的弯度和斜坡没了，并建造了经久耐用的桥梁和栈道；为了避免攀爬上坡的困难，所以在山脉间开凿了隧道，并开凿运河，横穿地峡，以缩短航程。随着资本越来越充裕，隧道和运河建造得也越来越长，就进一步避免了陡坡和航程长的难题。如此一来，上述工程的收益少，而支出多。社会也是尽最大可能提升机器的自动化性能，以便用一个工人就可以顺利掌控多个机器。无论在哪里，资本都会起着这种适应

性的作用，使大量资本能满足相对较少的劳力的需求。

The changes that have to be made in the forms of the capital, as the amount of it increases, reveal a reason for the decline in the rate of its earnings. The rudest hatchet that can be made may vastly increase the owner's power to get firewood. It may wear out in a year; but in that period it may save enough of time, t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devoted to a slow and painful mode of wood gathering, to enable the owner to make six new hatchets. Though he will probably not use the liberated time for this particular purpose, whatever he does secure by it represents an interest of five hundred per cent on the capital invested in this first and most productive tool. A second tool may liberate labor enough to replace itself only five times. The owner will actually replace it once, and will employ the time that could give him four duplicates of it in making other things for his own use; but the fruit of the spare time that the second tool makes available is now four hundred per cent of the cost of the tool, as computed in terms of unaided labor.

资本数量增加，其形式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这就是收益变少的原因。一把简陋的斧子，在所有者手中可能会发挥巨大的砍柴功能。一年后，这把斧子可能会有所破损，但在这一年时间里，这把斧子给它的所有者节省了足够的时间，去做六把新斧子。因为如果没有这把斧子，其所有者就得把时间慢慢地花在砍柴这样痛苦的工作中。尽管他省下来的时间，不一定会去制造新斧子，但无论他如何支配这些时间，他都会从投资到第一把且最具生产力的工具的资本中获得百分之五百的利息。第二件工具节省下来的劳动，可能也就够造五件新工具。但实际上，这个所有者也就做一件工具去替换旧的，而把做另外四件工具的时间省下来，去制造别的东西供自己使用。但对使用第二件工具所节省下来的时间加以利用，所得的劳动成果，按独立劳动

计算的话，它就等于第二件工具成本的百分之四百。

Tools are, of course, employed in the order of their productivity, so far as men judge their several powers of production correctly. It soon ceases to be possible to add to a working equipment anything that produces a multiple of its own cost in a year, and the interest on the final increment of capital becomes a fraction of that capital itself. This fraction steadily diminishes, as the productive fund grows larger, and as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of tools, etc., becomes one form of investment for the growing accumulatio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st of a rude and poor hatchet and that of a better one represents an increment of capital; but it has less power to reproduce itself, in amount, than had the investment that was made in the original tool.

只要人们能正确判断出各个工具的生产能力，这些工具当然就会按生产力大小而被先后使用。添置新设备，并要使该设备在一年内生产的价值与它本身的成本相等，这在一段时间内是可能办到的。而最后一次增加的资本的利息，只有该资本自身的一部分。在生产资金逐渐增多，并以工具质量的改善作为扩大资金的一种投资方式，那么上述的利息部分就会逐渐减少。简陋粗糙的斧子和质量较好的斧子的成本之间的差距，就是所增加资本的数额。但是增加资本的再生产量在数量上要比投在原有工具上的资本的再生产量少。

As accumulation proceeds, there are always made costlier machines, representing mo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 that comes from using them is a smaller fraction of their cost. The straightening of the curves in railroads is one of the ways in which capital may find investment. This may cost as much as the first making of the

corresponding parts of the road themselves; but it does not liberate as much labor, in proportion to its cost, as did the building of the old and crooked road. The boring of a long tunnel, to avoid a short climb over the mountains, does not result in as large earnings for the capital that is thus invested as did the making of a short tunnel to avoid a higher climb. Everywhere do the forms of the capital show differences in earning power; and the owners choose first the most productive forms, and later the less productive. To this fact is due the present low rate of interest. We are utilizing the opportunities for investment that stand late in the series and are low in the scale of productivity.

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总是要制造能体现更多资本的较贵重的机器。而用这些贵重的机器所造出来的产品，只等于机器产品的一部分。将铁路的弯道改成直线型，这就是一种投资方式。将弯道改成直道所用的费用，也许和起初建造的那条线路的费用相差无几，但是改成直道之后，所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按它与成本之间的比例来说，并没有像当初建造弯道时，所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多。为了避免攀爬一个短陡坡而开凿的长隧道所获的收益，并没有为了避免攀爬高山而修的短隧道所获的收益那样多。无论在哪里，资本的收益力都各不相同。资本所有者的首选是最高产的形式，而后才是生产力稍差点的形式。这就是目前利率较低的原因。这也就是说，在一系列投资机遇中，我们也会利用那些位置稍后，且生产力规模较低的机会。

We have said that no increment of capital can get for its owner more than the last increment produces. We may state this in another way by saying that no form of capital can claim and get for its owners in a year a larger fraction of its cost than the least productive form produces.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if the man who lends “money” for the procuring of a highly necessary tool

demands the whole amount that is secured through the use of it, the entrepreneur, who is the borrower, will refuse the money and will use, for the procuring of the tool which is so much needed, the money that formerly went into the tool that was last and least important on the list. In terms of more primitive life, if the man who performs the labor of making a very necessary tool demands the whole product that it creates, the entrepreneur will decline to utilize this tool-making labor and will divert to the making of the needed instrument that labor which has been used for the making of the least important part of his working equipment. Capital is, it thus appears, completely transmutable in form. Society can quit making one kind of instrument and make another. Capital-goods are, then, interchangeable; and while this is so, no increment of capital can ever secure for its owner more than the final increment produces.

我们曾提到过，任何单位的资本为其所有者所创造的收益不可能比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本创造得多。换句话说，任何形式的资本都不能使其所有者在一年时间里，所创造其本身价值的百分比，多于生产力最小的形式的资本所创造其本身的百分比。在当今情况下，如果把钱贷给别人去购买急需的工具，这个向外贷款的人要求，把用这个工具所创造的收益全部给他，那么借款的企业家就会拒绝使用这笔资金，而把花在最不重要的工具上的钱，用来购买那个急需使用的工具。就比较原始的生活而言，如果制造那种迫切需要的工具的工人，要求将使用该工具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全部给他，那么企业家一定不会使用这种劳动。而会将制造最不急需的设备的劳力抽取出来，让他们先来制造这个急需的工具。由此可见，资本的形式是完全可以变化的。社会可以停止制造一种工具，而去制造另一种工具。那么，资本货物就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只要是这样，那么就不存在这样的资本，它可以使其所有者所得收益多于最后一单位资本的产量。

It is, of course, true that labor also has to change its forms, as capital accumulates. The man who watches a complicated machine is going through a set of movements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executed by a man working with a hand tool. Every time that we change the form of the capital, we change, by that very fact, the character of the labor. Mutual adaptation in form is the general rule for these two producing agents. Change the merely quantitative ratio of one of them to the other, and you make it necessary to transform both of them in character. As with ten units of capital for ten units of labor there will be one grade of instruments and certain kinds of work perform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m, so with eleven units of capital for ten units of labor there will be somewhat different kinds of instruments, and different modes of working. This double transformation must, moreover, theoretically extend through the whole mass of capital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labor. Everywhere there are to be seen new and improved kinds of capital-goods and new modes of using them.

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劳动当然也是要改变其形式的。看守一部复杂机器的工人所做的工作，与使用手工工具的工人所做的工作有很大不同。每次在改变资本形式的时候，劳动的形式也随之改变了。这里有个一般性的原则：就是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因素，在形式上是相互适应的。只要将这两者的比例改变了，就得也改变这两者的性质。当十个单位的劳动有十个单位的资本时，就会有一定级别的工具和某种工作方式。假如十个单位的劳动有十一个单位的资本，那么生产工具的种类和生产方式就会与前者有所不同。并且，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双重的变化会扩展到整个资本和劳动过程当中。加以改良并全新的资本货物以及使用资本的新方式都到处可见。

With this qualification, we may represent the law of interest by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up, increment by increment, the fund of social capital and measuring the product produced by each unit of it. In this imaginary process we have revealed a true law of varying productivity. As we have said, the addition to the product caused by the last unit of capital fixes the rate of interest. Every unit of capital can secure for its owner what the last unit produces, and it can secure no more. The principle of final productivity, in short, acts in two ways, affording a theory of wages and of interest.

在这样的限定条件下，要说明利息规律，我们可以先说明，社会基金是通过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逐渐增加而建立起来的，并将每个单位的资本的产量计算出来。在这个假想的过程中，已揭露出不同生产力的真实规律。正如我们所说的，利率是由最后一个单位资本的产量增加量决定的。每个单位的资本为其所有者所创造的收益都和最后一个单位资本的产量相同，但也不会多于这个数值。总而言之，最终生产率规律在两个方面起作用，所以产生了工资理论和利息理论。

[12_1].The theory advanced in this chapter and the two following one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in two articles entitled, respectively, "Distribution as Determined by the Law of Rent" (April, 1891), and "A Universal Law of Economic Variation" (April, 1894).

[13_1].在本章和接下来的两章所提的理论，最先在经济季刊上发表过两篇论文，分别为“地租规律决定分配”（1891年4月）和“经济变化的普遍规律”（1894年4月）。

Chapter XIII The Products of Labor and Capital, as measured by the Formula of Rent

第十三章 按地租公式计量劳动和资本的产量

It has been customary to define rent as the income derived from land. In attempting to solve problems of distribution, furthermore, it has been customary to eliminate from the earnings of society the element of ground rent, and then to try to find principles that will account for the division of what remains. That ground rent is entirely unlike wages, interest or entrepreneurs' profit, has been the most prevalent theory. According to this view, the income from land is a differential gain fixed by a law of its own, which does not apply elsewhere. The rent of a particular piece of ground is measured by comparing its product with that which can be had from the poorest piece that is utiliz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ame amount of labor and capital. When, by this independent reckoning, the part of the income of society that is derived from land has been disposed of, it is thought that one step has been taken in the direction of solving the really difficult problems of distribution. Wages, interest and net profits, it is believed, can be accounted for the more readily when the product of land has been put out of sight.

人们习惯把地租定义为租用土地而获得的收入。而且，按照惯例，在试图解决分配问题时，首先要除去社会收益中地租部分，然后再设法找到能说明剩余部分分配的规律。地租与工资、利息或企业家的利润完全不同，它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理论。根据这一观点，土地的收益是一种差额所得，是由它自身的规律决定的，而这一规律仅适

用于此。计量某一片土地租金的做法是把它的产量与在最贫瘠土地上投入的等量劳动和等量资本所取得的产量进行比较来计算的。根据这种独立计算，当源于土地的那部分社会收益被分配时，人们就朝着真正解决分配难题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人们相信，一旦不考虑土地的产量，那么，解释工资、利息和纯利润就会更加容易。

It has become obvious, however, that wages are fixed by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the labor that is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a fixed amount of total capital; and in computing that total capital, we make confusion, if we do not take all kinds of capital-goods into account. It is the whole fund of productive wealth, in every form that such wealth takes, which constitutes the complex agency that coöperates with labor. When the amount of productive wealth in its entirety remains fixed and the quantify of labor increases,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that we have stated operates. The final unit of the agent, labor,—coöperating, as it does, with land and every other instrument,—produces less and less, as the units of labor become more numerous; and thus the standard of wages falls. When the increase in the working force ceases, the rate of wages remains fixed.

然而，工资显然是由最终劳动生产率决定，它与固定资本总额有关，因此，在计算资本总额时，假如不把各种资本货物一并加以考虑的话，我们会感到很困惑。与劳动共同起作用的要素，是呈多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的基金总额。一旦整体的生产资料总额保持不变，劳动人数有增无减，那我们所阐述过的收益递减规律也就起作用了。劳动力这种最终单位要素是与土地以及其他各类工具共同劳动，随着劳动单位数量的增多，产量也就越来越少，工资标准也随之降低了。当劳动力增长停滞时，工资率就固定不变了。

It may be alleged that the same result will be reached by assuming that capital in artificial forms remains fixed in amount, while the working force grows larger. Land, it may be claimed, is fixed in amount by nature; and, if we can measure the productive wealth that exists in the shape of buildings, tools, materials and the like, and keep that also unchanged in amount, we shall have the condition that we have described. The total amount of productive wealth will then be a fixed quantity; and we can let the labor increase, unit by unit, testing its final productivity as we have done.

假设各种人造形式的资本数额保持不变，而劳动力规模不断扩大，那一定会达到相同的结果。土地面积被认为是由自然决定的；假定我们可以计量出以建筑物、工具、原材料等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料，而且假定其数量不变，那么就有我们之前提过的情况。于是，生产资料的总额固定了，那我们就可以让劳动按单位依次增加，就像我们做的那样去检验劳动最终生产率。

This method of statement would tell the truth about the decline in the productivity of labor, but it would not assign that effect to its true cause. What the labor combines itself with is not merely the artificial capital: it is that and the land, as they are combined in one and make a general labor-aiding agency. As the working population has grown larger, some of it has betaken itself to hitherto rentless ground—the enlargement of the laboring force has pressed outward the margin of utilization of lan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of growth, moreover, new labor has constantly added itself to the force that has tilled good land. More and more intensively has land everywhere been cultivated and otherwise used. The artificial capital, as such, has received, as it were, only its own fraction of the increasing force of labor. It has aided the land, and together they

have received all of the new workers. Wages fall because such capital and land together cannot make the tenth unit of labor as productive as they made the first.

这种陈述方法固然可以把有关劳动生产率降低的事实讲清楚，但产生此结果的真正原因还是没有给予说明。与劳动相结合的不只是人造资本，而是人造资本再加上土地，它们合为一体，创造出了一种普遍的辅助劳动力。随着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其中有的人就利用一向免收租金的土地使得劳动力规模扩大，就把土地使用的范围扩大了。此外，在劳动力数量增加的同一时期，又陆续有新的工人加入优良土地的耕作，各处土地的耕作和利用方式的集约化程度都趋于提高。人造资本就其本身而论，仅得到了劳动力递增中的一部分而已。这部分劳动力促进了土地的开发利用，而两部分合在一起，就是新的劳动力。由于把这种资本和土地合在一起，两者便无法使第十个单位的劳动像第一个单位的劳动那样多产，所以工资便下降了。

It is, therefore, the whole economic environment of the growing population that has to be considered, if the cause of the decline in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is to be understood. Land and artificial goods are blended in an intimate mixture; and the last unit of labor produces what this whole composite agent enables it to produce. There are only two generic members in the combination by which the rate of wages is determined. Indeed, as we have noticed, the variations in the comparative amounts of these two agents, labor and all capital, determine both wages and interest.

因此，要理解劳动的最终生产率降低的原因，必须要考虑的就是人口不断增长的整体经济环境。土地和人工制品浑然一体，而最后一个劳动单位的产品就是整个复合生产要素能生产的东西。在复合生产

中，只有两个一般的工人决定工资率。实际上，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既决定工资又决定利息的是在总额上变化着的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和全部资本。

No controversy need arise over the question of mere nomencla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some term to designate the whole permanent fund of productive wealth, and the natural name for it is capital. [13_1]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have a term for all kinds of concrete goods in which this permanent fund consists; and we shall call these things, including land, capital-goods. As our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distribution proceeds, we shall hope to justify this nomenclature by its fruits. In any case,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it is the quantity of labor, on the one hand, and that of all productive wealth, on the other, that fix the natural or static standards of wages and interest.

单就术语这个问题来说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倒是有必要找到用来称呼全部生产资料永久基金的某个专有名词，而资本这一名称也就随之出现了。 [14_1] 包括该固定资金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具体货物，也都需要有一个专有名称才行；我们姑且就把包括土地在内的诸如此类的一切都称为资本货物。随着我们对分配收益过程的分析，我们希望其结果能证明这个术语表述的是正确的。无论如何，重要的是在于决定工资和利息的自然或者静态的标准，一方面是劳动的数量，另一方面则是所有生产资料的数量。

Ground rent we shall study as the earnings of one kind of capital-goods—as merely a part of interest. [13_2] We are now able to see that wages and interest, though they are determined by the law of final productivity, are also capable of being measured exactly as

ground rent has been measured. That is to say, the Ricardian formula, which describes what is earned by a piece of land, may be used to describe what is earned by the whole fund of social capital: all interest may be made to take the form of a differential gain, or a surplus. Again, the Ricardian formula may be employed to describe the earnings of the whole force of social labor; for wages, in their entirety, are a differential gain. It is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of economic facts that the income of all labor, on the one hand, and that of all capital, on the other, should be thus entirely akin to ground rent. They are the two generic rents, if by that term we mean differential products; and the earnings of land constitute a fraction of one of them.

地租，我们应当把它作为某种资本货物的收益——只是利息的一部分。 [14_2] 我们现在能够认识到，虽然工资和利息是由最终生产率规律决定的，但它们也能按照地租的计量方式予以准确计算。那就说明，描述土地收益的李嘉图公式，也可以用于表述整个社会资本基金的收益；一切利息都是以某种差额所得或盈余的形式体现。因此，李嘉图公式又可以说明整个社会劳动力的收益。至于工资，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一种差额所得：一方面它是所有劳动的收人，另一方面它是所有资本的收入。两者与地租完全相同，这是最显著的经济事实之一。它们是两种普通的租金，如果我们借用此术语那就指差额产量了；而土地的收益占其中的一小部分。

Let us now simplify the law of ground rent, by disregarding the auxiliary capital that, in advanced agricultural states, is applied in large quantities to land. Let the ground that we use as an illustration be worked by labor that is practically empty-handed. Every laborer brings with him a simple tool, but the interest on the capital that the tool represents is so small a part of what the man

earns in a year that it may be disregarded. We have, then, only two producing agents to deal with, and they are the land—which now embodies all the capital that needs to be considered—and labor. The neglect of auxiliary capital affects no principle that we are studying; for what we have to prove could be established as completely, though less clearly, if we made our illustration more complex by taking all kinds of capital into account. The differential gain of labor as applied unaided to fertile land, offers the clearest illustration of the different incomes that can be measured by the Ricardian formula. It is the type of all the rents. [13_3]

现在，我们先不考虑发达的农业国投在土地的大量辅助资本，以此来简化地租规律。以我们使用的土地为例，实际上它是由两手空空的工人耕种。每一个劳动者都带有一件简易工具，但是这件工具所体现的资本的利息，也就是这个人一年中所得的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因此，我们也就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尚需研究了，一个是被看作体现全部资本的土地，另一个就是劳动。忽略辅助资本不会影响我们正在研究的规律；如果我们把各种资本都考虑在内使例证更复杂一些，那么，我们所证实的规律虽然不精确但也可行。把劳动的差额所得单独应用于肥沃的土地上，这就为使用李嘉图公式计量不同收入提供了最清楚的证明。这是各类租金中典型的一类。 [14_3]

Labor, as thus applied to land, is subject to a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Put one man on a quarter section of land, containing prairie and forest, and he will get a rich return. Two laborers on the same ground will get less per man; three will get still less; and, if you enlarge the force to ten, it may be that the last man will get wages only. We must, however, be very careful to make sure of the reason why the tenth man gets only his wages. If the men are hired by the owner of the land at the prevalent rate of

wages,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the force has been enlarged till the last man produces only what is paid to him. In this case, as was said in the tenth chapter, wages fix the intensive margin of cultivation of this land. The rate that we must pay the men decides for us how many of them we can employ on our farm. If, however, our farm is isolated and the workers are a society by themselves, and if there are ten of them to be employed, we shall set them all working and pay to each of them much as the last one produces. Here it is the product of the marginal labor that fixes the rate of wages, as we noted in the chapter referred to; and here, also, the situation illustrates the true law of rent. [13_4]

劳动一旦用于土地上就立即受到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给一个人四分之一的土地，包含草原和森林，那他将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同一片土地上安排两个劳动者，．每个人所得收入就会比此前少了；安排三个人，所得还要少一些；而若增至十个人，那最后一个人可能得到的只是工资而已。然而，我们必须要把第十个人仅得到工资的原因仔细地弄明白。假如这些人都是以普通的工资率受雇于土地所有者，那么发生上述情况的原因就是这支劳动力的队伍在扩大，直到最后一个人的生产量仅够支付自己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在第十章中介绍的，工资决定这片田地的集约耕作范围。我们应支付这些人工资的比率，决定了我们的农场雇用人数。然而，假设我们的农场是单独的，而工人们组成了一个社会团体，倘若雇佣其中的十个人，那我们也就会安排他们一起工作，而支付给他们每个人的工资也就与最后一个人所能生产的产值一样多。这就是边际劳动的产物，它决定了工资率，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就提到了；这种情况也正说明了地租规律的真实性。 [14_4]

All the earlier men in the series create surplus products, over and above the amount created by the last man. They get only what

the last one produces, and the farmer-landlord gets the remainder. What goes to the owner of the land is the sum of a series of remainders that are made by taking, in each case, the product that is attributable to one of the earlier men as a minuend and the product that is imputable to the last man as a subtrahend.

这批人中先前那些工人创造的剩余产量都比最后那一个人的产量高很多。可他们所能获得的也仅限于最后一个人的产量，其余是全归农场主和地主所有了。土地所有者所得的是一系列剩余产量之和，而这些产量是分别取自作为被减数的先前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人的产量，以及作为减数的最后一个人的产量。

Call the product that the single worker creates, when he has the whole field to himself, P1st. Call the additional product that the second man is able to bring into existence P2d, etc.; call the enlargement in the output made by the last man P10th.

当一个工人在整片田地耕作时，他所创造的产量，这里称为P1。第二个人产出的附加产量称为P2，以此类推；把最后一个人产量的增加额称为P10。

P1st-P10th＝surplus created by the first worker. P2d-P10th＝surplus created by the second worker. P9th-P10th＝surplus created by the ninth worker.

P1 - P10 = 第一个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产量P2 - P10 = 第二个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产量P9 - P10 = 第九个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产量

If we complete the series of such subtractions and add the nine remainders, the sum of them all will be the rent of the piece of land. This is the amount that the owner can keep, from the total created by the different workers aided by the land.

假如我们把此类减法全部完成，并把9个差数相加，那么，所得之和就是这片土地的租金了。这也就等于所有工人用土地创造的产品总额，即土地所有者所获得的价值总额。

The sum of P1st + P2d + P3d, etc., to and including P10th, is the whole product of the field and the labor that is spent on it. It is the sum of all the minuends in the foregoing series, with the product of the final man added to it. 10 × P10th equals the total subtrahend; and the total rent of the field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amounts. It is, in other words, the whole product minus ten times the product of the tenth and last unit of labor.

P1十P2十P3一直加到P10所得到的总和就是这片土地以及用在这片土地上的劳动的总产量。把上述数字的所有被减数相加（含第十个人的产量）等于被减数之和。10xP10等于减数之和，地租总额等于这两个总数之差。换言之，地租就是生产总量与第10个人的产量（最后一个劳动单位产量）的十倍之差。

Let us, again, measure the number of laborers by the line AD, and the product of successive increments of labor by AB, A'B', etc. If we give to these lines an appreciable width, so that a series of them will fill the entire figure, ABCD, that area will measure the product

of all the labor and all the capital in our illustrative agricultural community. The capital is virtually all in the form of land; and we are now able to attribute to the land that part of the product which, in effect, it creates.

我们再用线段AD计量工人人数，用AB，A’B’来表示劳动连续增量的产量，以此类推。假如我们让这几条线有适当的宽度，用这一类的线段把ABCD图形填满，那么，该图的面积就能计量我们例证中用的农业社会的所有劳动和资本的产量了。资本实际上完全是以土地形式呈现的，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实际由土地创造的那一部分产量归因于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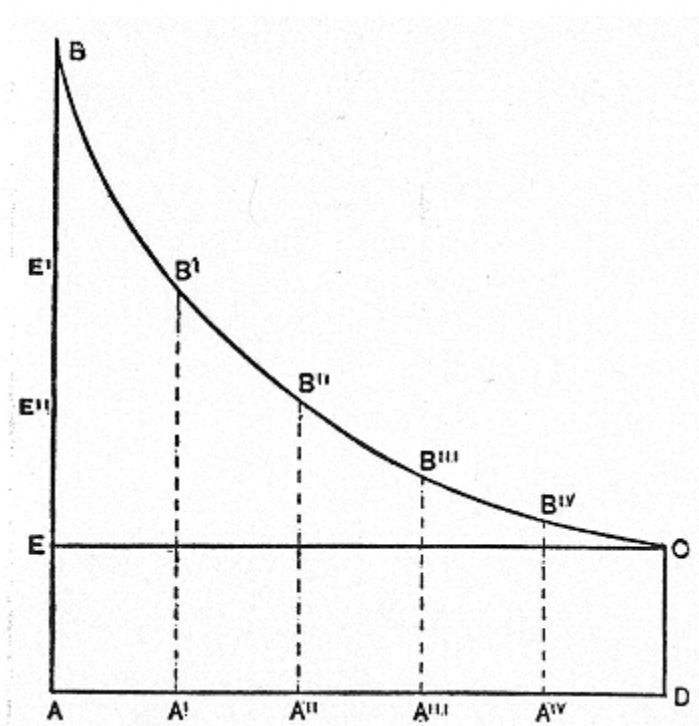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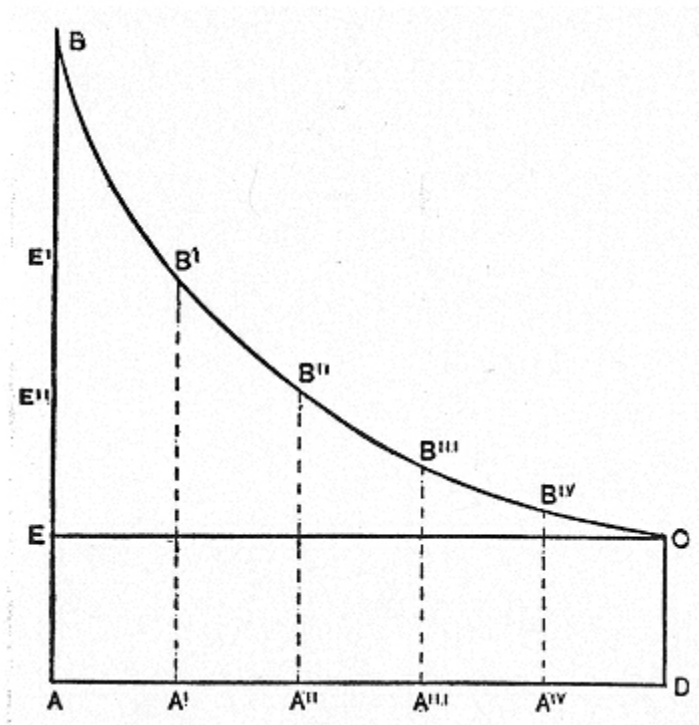

(Fig.3)

(图3)

The last unit of labor creates the amount of product that is expressed by DC; and, accordingly, each unit of labor is effectively worth just that amount to the employing farmer, and each unit gets that amount as its wages. AECD measures total wages, and EBC measures the entire rent of the land. This amount we have spoken of as composed of a series of surpluses, or differential products, and we have measured them in each case by subtracting from what we

have called the product of one of the earlier increments of labor the product of the last increment. AB minus DC gives such a surplus, and it is a part of the rent. It looks, at a careless view, as though land had the capacity to cut off and claim for itself a part of the product of labor—that is, the surplus part of the product of all the earlier increments of labor appears to be the rent of the land.

最后一个劳动单位创造的产量由线段DC来表示，因此，每一个劳动单位的有效价值恰好等于雇佣工人的总额，而且，每一个单位以工资的形式获得该数额。AECD计量工资总额，EBC计量地租总额。我们把它说成是由一系列余额或者差额产量构成的，在各种情况下，我们都是通过早时劳动增量中的一个人的产量与最后一个增量的产量之差来计算的。线段AB减去线段DC得出的一个余额就是地租的一部分。粗略地看，还以为土地有削减并自行获得部分劳动产量的能力，也就是之前劳动增量中的部分剩余产量，类似于地租。

In reality, this surplus is the fruit of the aid that the land affords, and is attributable to the land only. A correct conception of the nature of any rent makes it a concrete addition which one producing agent is able to make to the product that is attributable to another producing agent. Land makes its own addition to the product of each unit of labor except the last one. When there was available only a piece of land, with no labor to till it, the product was nil. When one unit of labor combined itself with the land, the product was AB; and in this form of statement we impute the whole product to the labor. [13_5] A second unit of labor now comes, unaided by capital, into the field and adds itself, empty-handed, to the working force. Whatever it produces, it brings into existence by adding to what the field yielded to one man's cultivation. The product thus created by an addition to labor, with no addition to

capital, is A'B'.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B and A'B', which is the line E'B, measures the surplus that a man can produce when he has the whole field to aid him above what he can create when he is unaided. The last man adds labor and no land to the productive combination; while the first man had land, and the addition that the land itself made to the bare product of labor constitutes the differential quantity which is the rent of the land. The science of rent is a science of economic causation, which traces products to their sources. The rent getter is a product creator.

实际上，这种剩余是土地提供的辅助成果，而且归于土地。正确了解任何一种租金的性质，就能使租金产生具体的增加额，而这种增加额是一种生产要素能给产品的增加额，而该产品源于另一种生产要素。除了最后一个劳动单位以外，土地对每个单位的产量都具有其增加额。当仅有一片土地可供利用时，若不投入劳动耕作，那么，所得产量即为零。仅一个劳动单位与土地结合一起时，产量是线段AB；按照这种说法，我们是把全部产量都归于劳动了。 [14_5] 对于第二个劳动单位，不借助任何资本进行田地耕作，除了增加了劳动到劳动力外别无其他。不论这个劳动单位的劳动产量是多少，它都使个人的耕地产量增加了。增加劳动而不增加资本所创造的产品是线段A'B’。线段AB与线段A’B’之差，即线段E'B，它计量的是一个人在借助整块田地生产时获取的产量超出在没有任何辅助时的产量的剩余部分。最后这个人给整个生产小组增加了劳动，但没有增加资本；而第一个人有土地，靠土地获取的仅有的劳动产量的增加额构成了差额数量，即地租。地租学是一门对产品穷源溯流的有关经济因果关系的科学。地租拥有者也是产品的创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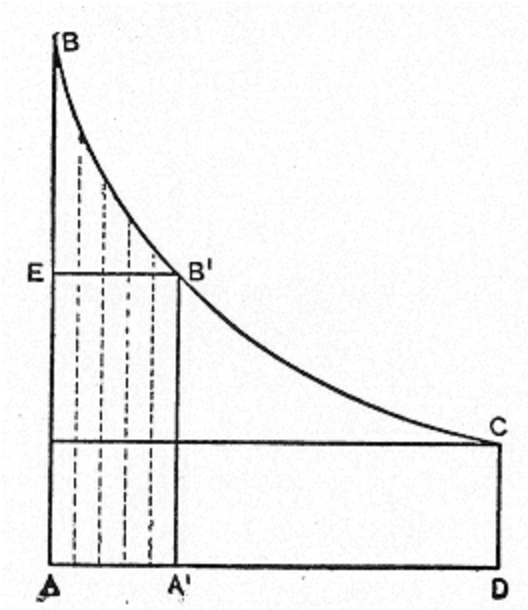
B
E
B'
C
A
A'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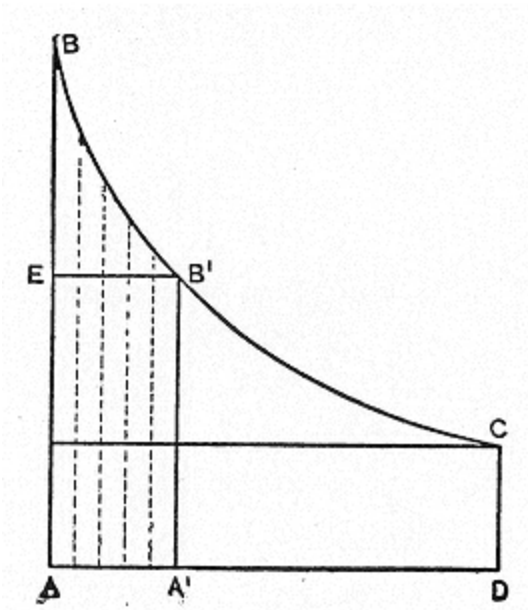
B
E
B'
C
A
A'
D

(Fig.4)

(图4)

The third man, also empty-handed, creates the amount A"B"; and E'B + E"E' measures the contribution that the land has thus far made to the joint product of land and labor. Extending the vertical lines and giving to them width enough to make them fill the area of the entire figure, we have AECD as the product of all the labor, when it is taken unit by unit and made to work virtually unaided. ABCD is what it creates as it is aided by the land, and EBC is the amount that the land contributes to the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This measu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duct of ten units of aided labor and ten units of unaided labor.

第三个人两手空空，他创造的总额是A”B”；E’B＋E”E’计量的是土地对其产量与劳动产量所做出的贡献。延长图中的各条垂线和水平线得到AECD，表示每个单位劳动单独创造的劳动产品量。ABCD是劳动借助土地所创造的，EBC则是土地与产品结合所共同创造的总额。它所计量的是10个辅助劳动单位的产量与10个单独劳动单位产量的差额。

We can now make the really important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returns, which fixes both marginal productivity and rent. This is the application that is actually making everywhere in the business world. The isolated farm, with its whole capital in land, is an illustration only; while the real field for labor, to which the farm corresponds, is the world, with its whole circle of

industries and its complex equipment of capital.

现在，我们能让收益递减规律得到真正重要的应用，这一规律决定了边际生产率和地租。实际上，商业领域到处都在应用这一原理。把单独农场的全部资本投入到土地上这种情形单纯是一种例证；而与农场相对应的真正的劳动领域是世界，它拥有整个产业圈及复杂的资本设备。

For a fixed area of land read, now, a fixed fund of permanent social capital. It is at this moment an exact sum; and it will, as it were, prolong the conditions of this moment, remaining at exactly its present size. The artificial instruments are, of course, perishing and renewing; but, if there is no need of changing the form of the capital, a worn-out instrument will be replaced by another that is exactly like it. A hoe will replace a hoe, and a ship will succeed a ship; and the new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will be exact duplicates of the old. This would be clear in a completely static condition. We are, however, to introduce labor, increment by increment, into this general field of industry; and this, of course, compels such a change in the forms of the capital as we have already described. The amount of the capital remaining fixed, the instruments become more numerous and cheaper, as the force of labor enlarges.

现在，对于一片面积固定的土地来说，这是一项固定的永久社会资本基金。此时确定了资金数额，而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且规模保持不变。当然，人造工具正在退化与更新；但是，若不需要改变资本的形式，那么，一种磨损了的工具就会被另一种一模一样的工具所取代。以锄替锄，以船换船，这些新的生产工具将成为旧的生产工具不

折不扣的复制品。在完全静态的情况下尤为明显。不过，我们是要把劳动增量逐渐引入到总的产业领域，所以，这会使我们口中的那类资本的形式发生改变。资本总额固定不变，而工具随着劳动力的规模扩大，其数量变得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廉价。

Labor, applied to the whole fund of capital, in land and all other instruments, is now subject to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The first unit produces the amount AB, the second produces the amount A'B', the third creates the quantity A"B" and the last the quantity DC. This last amount sets the rate of wages, and the area AECD measures the amount of wages. It leaves the amount expressed by the area EBC as the rent of the fund of social capital. All interest is thus a surplus, entirely akin to the rent of land, as that is expressed by the Ricardian formula: it is a concrete product, attributable to the agent that claims it as an income.

劳动用于土地上，其他工具用于全部资本基金中，那就要受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第一个单位产量为AB，第二个单位产量为A’B’，第三个单位产量为A”B”，最后一个单位产量为DC。这最后一个单位的产量决定工资率，而AECD的面积代表工资总额。该面积不包括EBC面积所表示的社会资本金额中的租金总额。由此可见，所有利息都是一种盈余，与地租完全属于一类，正如李嘉图公式中表达的：利息是将其归为某种收益的具体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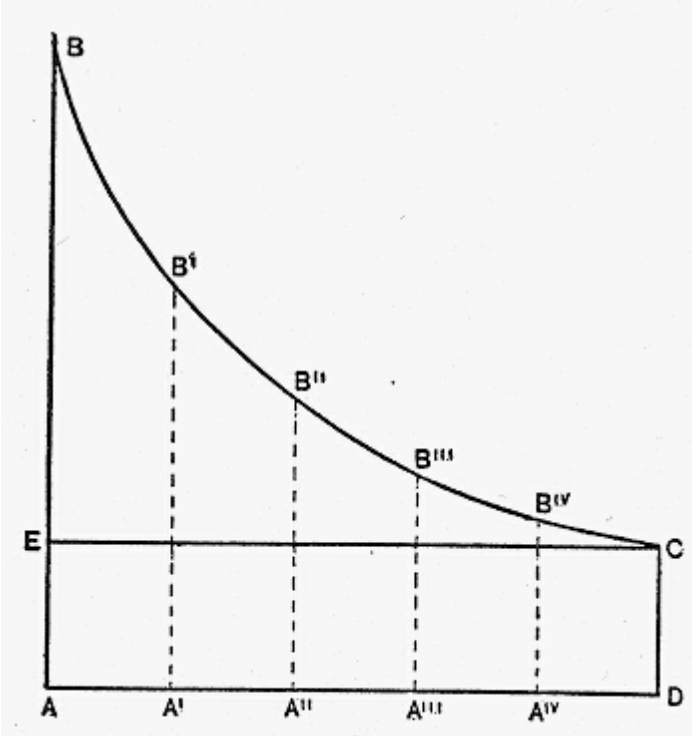
B
B'
B''
B'''
B''''
E
C
A
A'
A''
A'''
A''''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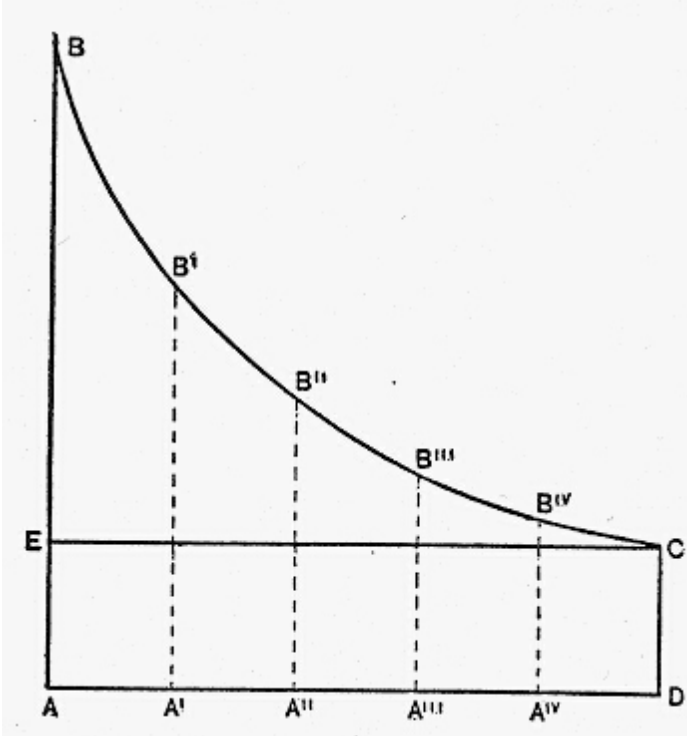

(Fig.5)

(图5)

This rent is, moreover, made up of a series of genuine differential gains. It is not like the rent of the farm, in our former illustration, which, as we found, really depends on the rate of wages that prevails elsewhere. The rent of the whole fund of social capital is the sum of a serie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ertain products and a final, or standard, product. True differentials lie between different products, and not between products and wages. The line DC, which

sets the rate of wages, expresses primarily the product of the last unit of labor. We have set all the men in the society working, we have measured the amount created by the last addition to the force, and we have measured the surplus that each earlier unit of labor creates above this amount. The surplus is, in each case, a true differential product; since it is not merely a remainder that is left after paying wages, but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one product and another. I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duct of aided labor and that of the labor that is virtually unaided, and the sum of all these differences is the rent of the social fund of capital.

此外，这种租金还由一系列真实的差额所得构成。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种租金与我们前面例证中提到的的农场租金不同，它真正依靠的是普遍流行的工资率。社会资本全部基金的租金，则是某些产品与最后一种或者标准的产品的一系列差额之和。真正的差额存在于各种不同产品之间，而不是存在于产品与工资之间。体现工资率的线段DC主要表示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产量。我们让社会上的所有人都工作，然后计量劳动力最后增加的那个人所创造的产量和此前每一个劳动单位所创造的高于此数额的盈余。在种种情况下，这种盈余都是一种真正的差额产量。因为它不仅是支付工资后留下的一种余额，而且还是一种产量与另一种产量之间的差额。该盈余是辅助劳动的产品产量与实际独立劳动的产品产量之间的差额，而这些差额之和就是社会资本基金的租金。

Reverse now the situation. Let labor be the fixed element and let social capital enlarge, changing its forms of course, in the enlarging.

现在反过来看。让劳动成为固定的要素，扩充社会资本，而且在

扩充中改变其形式。

ABCD is the total product. AB is the product of the first unit of capital, A'B' the product of the second, A"B" that of the third and DC that of the last. A unit of capital, adding itself with no new labor to the productive combination, enlarges the product by the amount DC. So much can be attributed to any unit of capital, separately considered. The effective importance of every one of the units of capital is the same. While capital-goods are not interchangeable, true capital is completely so; and all parts of it are, therefore, on a plane in their earning capacity. A merchant, a manufacturer or a farmer, if he can offer good security, can hire all the “money” that he needs at the rate that the least necessary sum which he invests in his business will earn for him. Does this imply an exploitation of the earlier units of capital? Does the borrower of these sums rob the lender?

ABCD是总产量。AB为第一个单位的资本产量，A’B’为第二个单位的资本产量，A’’B’’为第三个单位的资本产量，DC则是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本产量。一个资本单位在不给整体生产小组增加新的劳动的情况下，产量的增长数量是DC。这个增产部分是单独考虑的，任何一个单位的资本都会形成这样一个增产数额。每一个资本单位的有效性重要性都是相同的。尽管资本货物是不可互换的，然而，真实资本则是可以完全互换的。因此，真实资本的组成部分都处于相同的收益能力水平上。商人、制造商或是农场主，若能提供担保，那么，他们就能按照这样一种利率借到自己需要的“钱”，这种利率是确保他们以最少的钱投入到企业中，所得的产量可供其偿还借款。这是对先前单位资本剥削的暗示吗？是借方抢夺贷方的资本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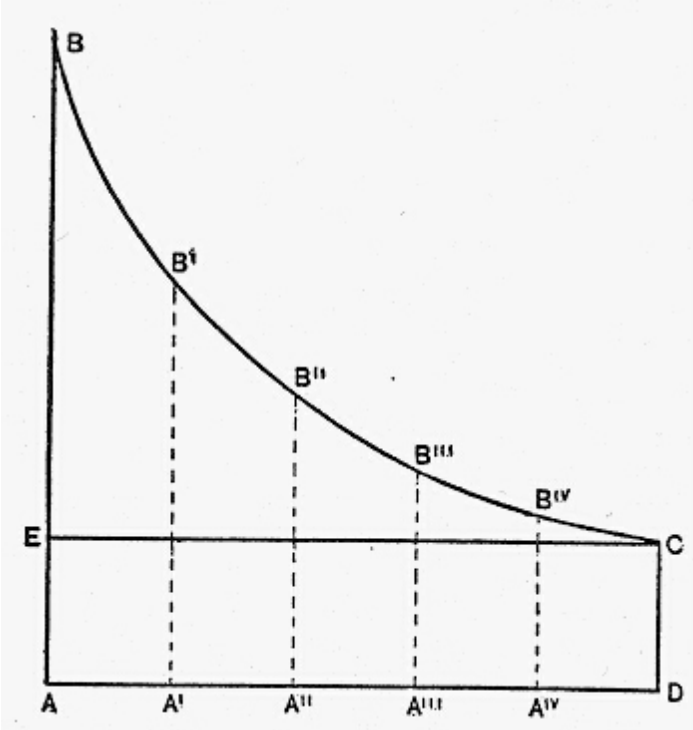
B
B'
B''
B'''
B''''
E
C
A
A'
A''
A'''
A''''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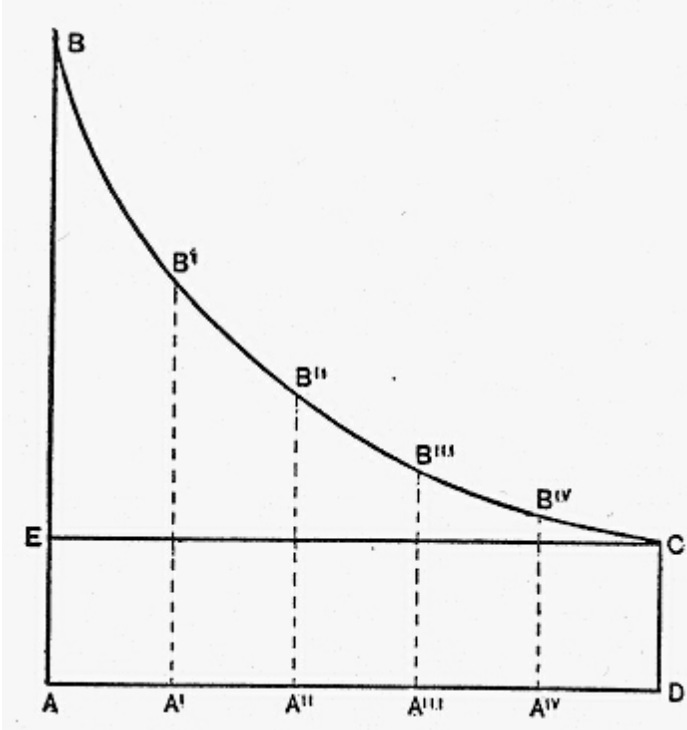

(Fig.6)

(图6)

If the final unit of capital produces the amount DC, it will get that amount as interest; and certainly no other unit can get any more. AECD will be the total amount of interest, and EBC will be a surplus; but it will be a surplus that is causally attributable to labor, and to labor on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duct that is solely due to capital and that which is due to capital and another agent in combination is the effect of the presence and the work of that other

agent.

假如最后一个资本单位的产量是DC，那么，该资本单位就能得到一定金额的利息，当然，也就不会再有其他单位能获得什么了。AECD即利息总额，而EBC是盈余，不过，这种归因于劳动的盈余是有根据的且只对劳动而言。仅归因于资本的产量与归因于资本加上另一生产要素的产量之间的差额，就是其他生产要素存在并起作用的结果。

If we were to apply the term rent to all such surpluses, we should say that EBC is the rent of the force of laborers that is at work in connection with capital. This amount is made up of a series of differential products. Apparently AB - DC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duct of the first unit of capital and that of the last, A'B' - DC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duct of the second unit of capital and that of the last, etc. The rent of the labor, if we use that expression, is the sum of the surplus products connected with the earlier units of capital but not attributable to them as a cause. The laborers seem to get a part of what the earlier units of capital produce; whereas, in reality, thi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capital and labor jointly produce and what capital alone contributes to the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EBC is, therefore, the amount that is imputable to labor only.

假如我们把所有盈余都用租金一词表示，那么，我们就得说EBC是工作上与资本连接的劳动力租金。这一数额由一系列差别产品构成。显然，AB-DC是首个资本单位的产量与最后一个资本单位的产量之间的差额，A’B’-DC是第二个资本单位与最后一个资本单位的产量之间的差额，以此类推。如果我们用劳动租金来表达与先前的单位资

本相连但又不受其决定的剩余产量总和。然而，工人表面上获得了前几个单位资本产量的部分产品，实际上，这是资本和劳动的共同产品与资本单独作用于整个产量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因此，EBC仅代表归因于劳动的产量。

One law governs wages and interest—the law of final productivity. By one mode of statement of the law (Fig. 1), we get wages as an amount directly determined by this principle: it is the area AECD of our diagram. Arithmetically stated, the earnings of all labor equal the product of the final unit of labor multiplied by the number of the units. In Fig. 1, in which wages are thus determined, interest is a surplus that is of the nature of rent. By another mode of stating the law (Fig. 2), we get interest as the amount that is positively fixed by the final productivity law, and wages are now the surplus that is akin to rent. These amounts together make up the whole static income of society.

决定工资和利息的规律——最终生产率。按照对此规律的一种表述方式（图13—4—1)，这一规律直接决定了我们所获工资数额：即图表中AECD的面积。算数上表述为，所有的劳动收益都等于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与单位总数的乘积。图13—4—1决定了工资数额，而利息是具有租金性质的盈余。如果换另一种模式来表述此规律（图13—4—2)，那我们就得到了由最终生产率规律直接决定的利息，而现在工资则是类似于租金的余额。这两个数额相加，就构成了社会静态收入总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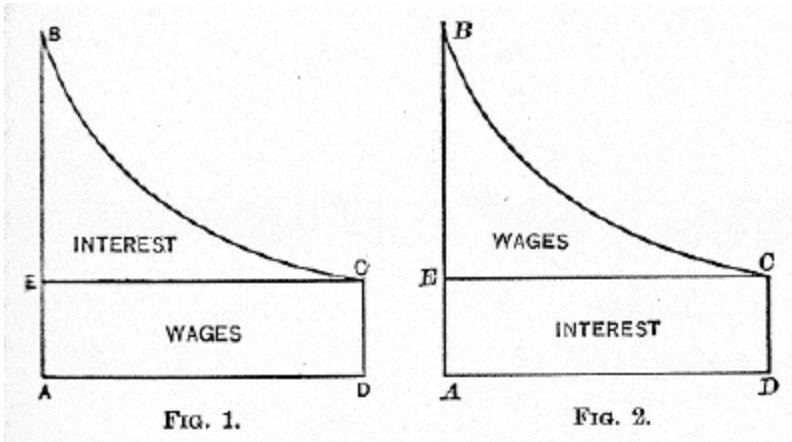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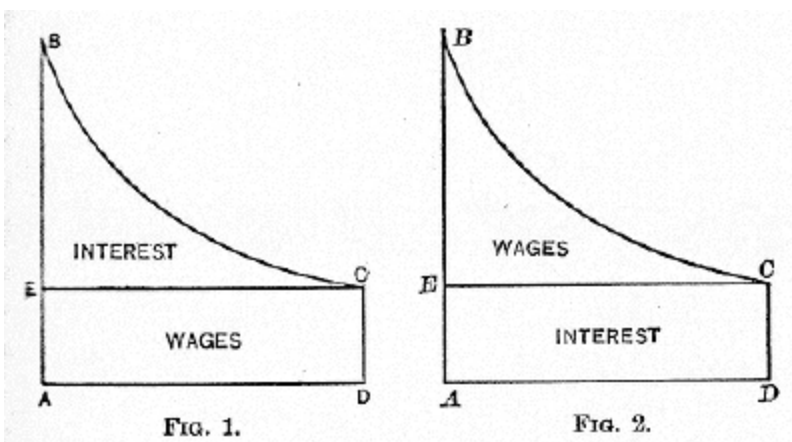

(Fig.7)

(图7)

Profit has no place in such static conditions. The two incomes that are permanent and independent of dynamic changes are the

products, respectively, of labor and of capital. Each of them is directly determined by the final productivity law, and each is also a remainder—a surplus or a differential quantity. In one use of terms, it is a rent made by subtracting the other income from the whole product of social industry.

这种静态收入不存在利润。既永久不变又与动态变化无关的两类收人，分别是劳动产品收入和资本产品收入。其中的每一类收入都由最终生产率规律直接决定，而且每一类又都是一个余数——要么是剩余量，要么是差别量。按照术语的一种用法，社会产业的全部产品减去其他收入所得之差，就是租金。

Does such a remainder ever go to the persons who naturally get it, merely because it is a remainder and is not claimed by others? In Fig. 1, where EBC, representing interest, is a surplus governed by the law of rent, does the capitalist get this amount merely because labor cannot get it? The whole product is ABCD, and labor can have only AECD. If there is no profit, capital must get the remainder. Do the capitalists, then, come into the possession of this income merely because it is thus left for them by the laborers?

只是因为这项余额没被他人占有，这种剩余就要归轻而易举获得它的人所有吗？在图13一4一1中，表示利息的EBC是由地租规律决定的一个余额，仅仅是因为劳动者没有得到它，资本家就可以得到它吗？整个产量为ABCD，而劳动者仅能获得AECD。假如不存在利润，资本必然是这种剩余。那么，资本家所得的收入仅是劳动工人留给他们的吗？

This point is of much consequence. The question at issue is nothing less than whether any static income is determined residually. Clearly it is never so determined. No static income is what it is merely because the deducting of another income from the social product leaves a certain remainder. Any income that is nothing but a remainder must go to the entrepreneur. Because EBC, in Fig. 1, is not claimed by labor, it is left in the hands of the entrepreneur. Thus far it is a residuum. It is, moreover, important that this amount should thus be left in the employer's hands, for by this means he is made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that the capitalist will claim; but there is in the mere fact that he has this sum nothing that makes it necessary for him to pay it to the capitalist. What the owners of capital can force entrepreneurs to pay them, is determined by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capital. Employers of capital must pay for the final increment of it just what that increment produces, and they most pay for all other increments at the same rate. If this necessity takes from them the whole amount, EBC, which labor leaves in their hands, then EBC goes to the capitalist. It does so, however, only because the capitalist can claim and get it, by the direct action of the final productivity law. What the capitalist can get under this principle is expressed by Fig. 2. AECD is here the amount of interest, as directly and positively fixed. This amount must pass, in any case, from the entrepreneurs to the capitalists.

这一问题很重要。那就是任何静态收入是否都是由剩余来决定的，显然不是。没有静态收入只因为它是从社会产品中扣除另一种收人所得的某种剩余。任何剩余收入必须归企业家所有。因为图13 - 4 - 1中的EBC不是由劳动创造，所以，它也就归企业家所有了。现在为止，它就是一项剩余。而且，重要的是，这一余额应归雇主所有，由此才能支付资本家所要求的利息。然而，单凭这一点，对他来说没有钱来支付资本家的利息是必然。资本所有者迫使企业家支付的利息

是由资本的最终生产率决定的。拥有资本的雇主必须为增加生产所得的最后增量支付利息，而且他们还得按同一利率支付其余增量的利息。假如这个必需支付的款项是企业家从劳动者劳动所得的余额EBC，那么，EBC也就全归资本家所有了。然而，之所以如此，仅是因为最终生产率规律的直接作用使得资本家可以对此提出要求并得到利息。按照这个规律，资本家所得如图13 - 4 - II所示。AECD这部分直接明确决定了利息总额。无论如何，这一总额必须从企业家手中转移给资本家。

The entrepreneur, then, after paying wages, as indicated by AECD in Fig. 1, has left in his hands EBC, out of which he can pay interest. What be must pay as interest, is AECD in Fig. 2. If the area EBC in Fig. 1 were larger than AECD in Fig. 2 there would be a remainder left for the entrepreneur. This would be a pure profit, the only kind of income that is ever residually determined.

由此可见，企必家在支付了如图13 - 4 - 1中AECD所示的工资后，手中剩下的EBC，超出的部分可用来支付利息。而他必须支付的利息如图13 - 4 - II中所示的AECD面积。如果图13 - 4 - 1中的EBC面积大于图13—4—2中AECD的面积，那余下的部分就归企业家所有。这就是纯利润，而且一直由余额决定的唯一一类收入。

It is clear, on the face of the facts, that the two static incomes—those, namely, of the laborer and of the capitalist—are paid to them by the entrepreneur, who receives and sells the product of their joint industry. In the cotton mill, it is the hirer of capital and of labor who puts the goods on the market and from the proceeds pays the workmen and the owners of capital. If he pays first to the capitalists what the final productivity law, as applied to capital,

calls for, he has a remainder out of which he must pay wages; and now it is the final productivity law that decides what he must pay as wages. If there is anything left on his hands after the two payments are made, it is a profit; and the terms profit and residual income are thus synonymous.

从这些事实的表面清楚地看到，这两类静态收入，即工人和资本家的所得收入，显然都是由企业家支付给他们的，企业家获得产品并把连锁产业的产品销售出去。在棉纺厂，资本与劳动的雇主把纺织品投放市场并以所得收人给工人和资本所有者付酬。假如雇主先给资本家支付应用于资本的最终生产率规律所要求的利息，余额就用来支付工资；而现在最终生产率规律决定了雇主要支付的工资数额。如果支付了这两笔款项后，资本家手中还有剩余，这个余额就是利润。因此，利润和剩余收入这两个术语是同义词。

This truth we may demonstrate by using our diagrams in a reversed order. In Fig. 2 AECD is interest, as directly determined, and EBC is the remainder, which is left in the entrepreneur's hands for the payment of wages. What the entrepreneur must pay to the workmen is AECD of Fig. 1. If that is less than ECD of Fig. 2, there is a residuum, or profit, for the entrepreneur. Static conditions, however, exclude such a profit by making these two areas equal.

我们可以逆向用图解来证实这一事实。在图13—4—II中，AECD面积可直接视为利息，EBC则是由企业家掌握以供支付工资的剩余部分。企业家必须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图13 - 4 - 1中AECD的部分，假如它小于图13—4—2中的ECD，那就是归企业家所有的剩余也称利润。但由于静态条件会使这两个图形面积相同也就排除了利润的存在。

We have, then, established the following propositions:—

于是，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 Wages and interest are both determined by the law of final productivity.

(l) 工资和利息都由最终生产率规律决定的。

(2) When, in an illustrative case, one of these incomes is so determined, the other appears to be a residuum.

(2) 如例证所示，当其中一项收入按这样决定时，另一项收人就是剩余部分。

(3) As a residuum, such an income would be left in the entrepreneurs' hands; but it is actually taken from them by a further action of the final productivity law.

(3) 作为一项剩余，这一收入当归企业家所有，不过，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还是因为在最终生产率规律的某种深化作用下取自企业家的。

(4)Entrepreneurs' profit and residual income are synonymous

terms. [13_6] The static conditions assumed in the present study preclude the existence of such entrepreneurs' gains.

(4）企业家的利润与剩余收人是同义词。 [14_6] 在目前研究中假定的静态状况排除了此类企业家利润的存在。

In our view, progress in methods of production makes both labor and capital more productive; and the fruits of progress are thus shared by the two agent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s of specific productivity that the progress gives to them. Labor, then, does net get the who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ormer product of industry and the present product. What we are trying to make clear is that, in a merely static adjustment of shares in distribution, both wages and interest must be determined directly, and not residually. After paying interest, the entrepreneur has wages left in his hands; but he is forced to pay it to labor because it is the product of labor. In making his bargain, the worker has the benefit of free competition. He is virtually selling his forthcoming product, and can resort to another employer, if the present one refuses to give him the full value of it. The capitalist, in making this contract for the payment of interest, is in the same way selling a product, and can exact the value of it. Without this power, neither laborers nor capitalists could get their shares from the entrepreneur's hands. For an early statement of the principles presented in this chapter, the reader is referred to an article by the present writer, 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 April, 1891, on “Distribution as Determined by a Law of Rent.”

我们认为生产方式的进步使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更高，而进步

的成果就是根据两种生产要素得到的份额由具体生产率程度决定。其实，劳动并没有取得之前劳动产品与现时产品之间的全部差额。我们试图说明的是，工资和利息分配中的份额只在静态调节中被直接决定，而不是由剩余额来决定。支付利息后，企业家手中留有工资，但他不得不支付劳动力，因为那是劳动产品。进行交易时，劳动者享有自由竞争的好处。劳动者实际上可以销售现成的产品，如果现雇主拒绝给他产品的全部价值，那么工人可以投靠另一个雇主。资本家就支付利息一事签订合同时，他是以同样的方式在销售其产品，而且可以获得其价值。没有这项权利，劳动者和资本家都难以从企业家那里获得其应得的份额。按照先前本章提及的对规律的阐述，读者可参阅著者1891年4月《经济学季刊》上的“地租规律决定的分配”一文。

[13_1].It will be seen that this is not calling land capital. When land is referred to, it will be called by its ordinary name. There is a constant necessity for referring to the total fund of permanent productive wealth that is embodied in land and in artificial instruments. When this is thought of, in practical life, as "money invested in business," it is designated by the term capital; and in this went it will be so called. The objection to calling land one variety of capital-goods vanishes, if it is admissible to call all productive wealth, "in the abstract," capital. Any objection that may arise to this usage is less serious than is the objection to using through a long discussion such a phrase as "permanent fund of productive wealth," or some equivalent and equally inconvenient expression. The nomenclature that we adopt guards not only against confounding land with this fund, but against confounding any other instrument, as concretely regarded, with it. In this, at least, it is a strict constructionist nomenclature.

[13_2].See Ch. XXII.

[13_3].These are (1) the rent of all capital, (2) that of all labor, (3) that of particular capital-goods, and (4) that of particular laborers.

[13_4].The law of rent, a commonly stated, has the defect that is illustrated by the former of these cases, where it is applied to the reward for labor. The farmer who figures in the current statement of the law hires his men at the wages that prevail in the various industries that are carried on about him; and, when he finds that men will not produce their wages, he quits enlarging his force. Each of the earlier men creates a surplus above his wages. When we are considering the rent of a limited

piece of land devoted to one use, the scientific way to calculate the rent is to use as the subtrahend wages, rather than the final product of labor; since it is wages that fix final product. If what we want is a genuine differential product, we must isolate our working society, count the laborers, set them all at work and let the last produce what he can. There will then be a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each of the earlier men produces and this final or standard product. This is, in each case, a true differential product. it is measured by comparing, not products created for the farmer and wages paid by him, but one product with another product.

[13_5].In the case of the first increment of labor, we might, by different dialectics, attribute the whole product to the land. Labor by itself creates nothing, and the addition of the land brings the whole product into existence. Again, by subdividing the one unit of labor into a series of smaller units, we might attribute the product partly to the labor and partly to the land. The product of the last fractional unit of labor would then set to standard to which wages, or the effective product of all fractional units of labor, would conform; and the figure that would express this fact would be the one in which AB' is the amount that is attributable to each fractional unit of labor, AA'B'E is the amount that is attributable to all the labor, and EB'B is the amount that is attributable to the land. It is when there is more than one unit of labor at work that it becomes clear how much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all the labor and how much to the land.

[13_6].The above theses appear sharply to contradict the theory of wages advanced by the late President Francis A. Walker, in which wages are called the residual share in distribution. It is an aid in removing causes of confusion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in giving to the theory of this eminent economist what is due to it, to notice the fact that his study was essentially a study of a subject in economic dynamics. If the total product of industry becomes larger than it has been, and if interest, rent and profit do not become any greater than they were, wages must absorb the whole increase. In this view, the residuum may be regarded as a remainder that is left when the former product of the whole industry is subtracted from the present product. Such a view of the power of labor to get all the increase that dynamic changes create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 that, in the merely static adjustment that takes place at all times, wages are determined directly by the law of final productivity, as are other shares of the total product. We might claim that the progress which makes industry, as a whole, more productive makes labor, separately considered, more so, but leaves the productivity of other agents unchanged. Laborers would then, in each static adjustment that takes place, force entrepreneurs to give them their product, just as capitalists would do. Statically, wages would be determined directly; while dynamically they would consist partly in

a residuum, made by deducting the former product of industry, as a whole, from the present prouduct.

[14_1].要知道这不称为土地资本。每当提及土地时，都会以其通用的名称称呼它。由土地和人造工具体现的永久生产资料的总资金是常需提及的。现实生活中把这（总资金）看作“用于商业投资的钱”时，我们用资本一词来称呼它；要是所有生产资料都可以“抽象地”成为资本的话，那么反对把土地作为一种资本货物的理由也就站不住脚了。可能引起反对这一用法的任何意见都不如以下的意见尖锐，即反对通过漫长的讨论后才使用诸如“生产资料的永久基金”这一类说法，或是某种类似或相同的不便表达方式。我们采用这个术语不只是要防止把土地与这一基金混为一谈，具体来讲，还要防止任何其他工具与之相混淆。就此而论，至少它绝对是一种建构主义术语。

[14_2].参见第二十二章

[14_3].这些分别是指（1）所有资本的租金，（2）所有劳动的租金，（3）特定资本货物的资金，（4）特定工人的租金

[14_4].地租规律，按通常的表述，像之前所说明的那样它指的是劳动的报酬。在这一规律通常表述中的农场主，是按照周围各行业同行的工资标准雇人的，而当他发现雇佣工人的产出不能抵补工资时，他就不再扩大劳动力规模了。先前雇佣的人中，每一个都能创造出超过其工资的剩余价值。我们在考虑一种用来核算一片有限的土地租金的方法，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租金当作工资使用，而不是劳动的最终产品，因为这一工资决定了最终生产。假如我们想要一种真正的差额产品的话，我们就必须让工作团队独立出来，然后计算工人人数，给他们全部安排工作，且让最后一个人竭尽所能生产。这样前面那些工人中每个人的产量，与最后一个人的产量或者说标准产量之间就会有一个差额。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都是一个真实的差别产量。对这一产量的计量，不是通过劳动者为农场主所创造的产量与农场主所支付的工资进行比较，而是通过一种产量与另一种产量比较得到的。

[14_5].就第一个劳动增量而言，我们可以辩证地将全部产量归因于土地。单凭劳动什么也创造不出来，但是加上土地这一要素，二者结合就会创造出整个产品。而如果我们把一个劳动单位再分成一系列更小的单位，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产品部分归因于劳动，部分归因于土地。最后一个劳动产品就会确定这样一个标准，即工资或者所有各劳动单位有效产品都会与之相一致的标准，而在表明这一事实的图中，AB’可归因于各单位劳动的产量，AA'B'E可归因全部劳动的产量，EB'B则是可归因于土地的产量。到底多少应归因于全部劳动，而多少又应归因于土地，只有在至少一个劳动单位起作用时，问题才会变得清晰。

[14_6].上述论点似是与已故弗朗西斯•沃克院长提出的工资理论相对立的，按照他的工资理论，工资称为分配中的剩余部分。实际上，解决论述陷于混淆的问题，并赋

予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这一理论应有的评价方面，工资是一种手段，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研究是有关动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题。假如工业产品总量比此前增加了，而利息、租金和利润却没有比以往高，那么，此时工资就必定会吸纳其全部的增长额。根据这一观点，把剩余看成是一个余数，即全行业现时的产品产量减以前的产品产量所得的差额。这种由劳动力创造出的动态增长额的观点与此观点相一致，只在静态调节一直存在时，工资是由最终生产率规律直接决定的，总产品中的其他份额也是这样决定的。总体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其他要素的生产率不变情况下，这种进步会分别使全行业生产率和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更高。于是，在每一次静态调节中，工人也会像资本家那样迫使企业家给他们产品。在静态条件下，工资被直接决定；而在动态条件下，部分工资存在在剩余中，总的来说，这是由现时的产值扣除以前的工业产值得到的差额。

Chapter XIV The Earnings of Industrial Groups

第十四章 各行各业的收入

We have not yet exhausted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principle that is at the basis of the familiar law of rent. It has been customary to apply it to the product of land; we have made it govern the product of all capital; and, in thus applying the principle, we have put out of sight particular instruments of industry and have treated capital in its entirety as a permanent agent of production. Interest, the product of this agent, can be translated into a form that is akin to rent. Capital constitutes a social fund; and, if economic law be not obstructed, the suitable amount of it is to be found in each one of the affiliated industries that constitute the producing organism, society. This apportioning of the social fund among the different industrial groups helps to fix the amount of goods that each group shall produce; and that, again, controls the value of the goods. Values, as we have seen, control the comparative earnings of different groups; for the one whose product is selling at a high price is getting a relatively large group income, and the one whose product is cheap is getting a small one. Values themselves are governed by the same all-embracing law that fixes rents, but it is that law in another sphere of action. We have to examine the special way in which this law acts in fixing values, which is the same thing as adjusting the comparative earnings of groups. Group distribution and that final distribution which fixes wages and interest are controlled by one law.

这种以人们所熟知的地租基础规律的适用性，我们至此尚未穷尽

其研究。此类规律，按惯例是应用于土地的产品中的；我们已经使之适用于所有资本的产品了；而且，在应用该规律时，我们不考虑特定产业的工具，而是把资本作为一个整体看成是永久的生产要素。此类要素的产品，即利息，可以转化为类似于租金的一种形式。资本，构成一种社会基金；而且要是经济规律继续发挥调节作用的话，那么，资本的适度数额就会见于构成生产的有机组织即社会的每一种附属产业中。社会基金在各产业中的这一分配，有助于确定各产业群生产的商品数额，而且还会有助于控制商品价值。价值，一如我们指出的那样，是控制各产业的相对收入的。因为，按高价销售商品的这个产业的收人会相对大一些，而产品廉价的产业群收入就会小一些。价值本身受决定租金的同一规律的调节，不过，那是在另一领域发挥作用的规律。我们不得不仔细观察，该规律在决定价值时发挥作用的特殊方式，而这与调节各产业相对收益是完全相同的。产业分配以及决定工资和利息的最终分配，是受同一规律支配的。

We have seen that the law which has been made the basis of the rent of land really governs the earnings of labor; and, in studying labor, we have ceased to think of particular men and have considered labor, in its entirety, as a permanent agent of industry. Work continues, though particular workers pass from the field and are replaced by others. Labor is a social agent of production; for, like capital, it has to apportion itself in certain quantities among the groups and sub-groups of which industrial society is composed; and a free play of economic forces decides how much labor each industry shall have. We presuppose this apportioning and locating of labor, when we speak of it, in its entirety, as a second generic agent of production, and one that is combined with capital in a proportion that determines the earnings of both of these producers. It is by the combination of all the labor of society with all the capital of society that the general rates of wages and interest are fixed; but the combination runs through all the groups, and a play

of forces that is simple in principle, though minutely detailed and complex in its practical working, tends to give to each occupation that men pursue a definite amount of the laboring force of society, as well as a definite part of the social capital. It is, again, by this apportioning process that group products, values, and group incomes are controlled. Each industry tends, under a perfectly free competition, to get that share of the social laboring force which will make its output of goods and its collective income, as derived from the sale of the goods, normal.

我们已经注意到，成为地租基础的那一规律，实际上是调节劳动的收入；在研究劳动时，我们没有专就具体的人详加研究，而是认为，就其整体而言，劳动是一种永久的生产要素。是有某些工人不再干田地的活，可有人接替他们了，因此，工作是未见中断的。劳动是一种社会生产要素，因为它跟资本一样，也是按一定数量在构成产业社会的产业群和亚产业群中加以分配的。是经济因素自由发挥作用的结果决定各行业究竟该配置多少劳动。作为一个整体，劳动既是一种另一类生产要素，也是一种按比例与资本结合在一起决定这两类生产者收益的要素，我们是以这种分配和配置为先决条件谈及这个要素的。一般工资率和一般利率，都是经由全社会的劳动和资本相结合才得以确定的，但这一结合贯穿所有产业，而且原则上简单但真的付诸实施又极其复杂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往往会使人们追求的每一种职业都获得明确数额的社会劳动力和资本价值。而这又是通过分配过程中控制各产业的产品、价值和收人来实现的。在完全自由的竞争条件下，各行各业都趋向于获得社会劳动力的份额，有了这一份额，各行各业由货物销售形成的货物产量和集体收人，就会趋于正常。

By a wonderful social mechanism these results are brought about. The production of the world is carried on by a network of affiliated groups or industries, which are so interdependent that a

change in any one of them carries a series of resulting changes through the whole complex system. It is this dependence of industrial occupations on each other that makes it possible to speak of labor and capital as having, in each case, a unity, a social character and a general rate of earnings.

凭借某种极好的社会机制，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全世界的生产都通过附属产业群或网络产业进行，它们相互依存，以致其中的任何一个产业群或产业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整个复杂的体系。而且，正是由于各行各业的这种相互依存，才可以在各种情况下把劳动和资本说成是具有某种整体性、社会性和一般收益率的。

We have already gone far enough to get a view of one very general law. So all-embracing, indeed, is it that it dominates economic life. Classical studies afforded a glimpse of the working of it, within a very limited field, by their study of the so-called diminishing returns from agriculture. As they pointed out, labor and capital, when applied to land in a series of increments or “doses,” produce less and less per dose.

至此，我们可以客观的就某一规律提出看法。实际上，这一规律内容复杂多样，以至于它决定着经济生活。但古典研究却因它们对农业在有限的领域对报酬递规律作了简单的探索后又终止了。正如古典研究所指出的，劳动和资本一旦以一系列增量或是“份额”应用于土地，那么，按份额平均计算，其产量是越来越小了。

Modern studies of value afford a glimpse of the action of this principle in a wholly different sphere. They show that doses of

consumers' goods, given in a series to the same persons, have less and less utility per dose. The final utility theory of value rests on the same principle as does the theory of diminishing returns from agriculture; and this principle has a far wider range of new applications. One law, therefore, governs economic life, and theories old and new contain partial expressions of it. The theory of value rests upon one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rent on another. As this law may be traced in consumption, where the “final increment” of a particular article is less useful than earlier increments, so it is observable also in production, where the final increment of an industrial agent is less fruitful than earlier ones. As value depends on final utility, so shares in distribution depend on final productivity. Thus, interest is fixed by the product of the final increment of capital, and wages are determined by the product of the final increment of labor. The value of good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two agents, labor and capital, on the other hand, depend on the same general law. It is value, however, that controls group incomes in their entirety; and it is the action of this law in the sphere of consumption that ultimately fixes values. Opposite in kind, indeed, ar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Nature spends itself upon man in the one process, and man spends himself upon nature in the other. Yet the same law governs the results realized in each at these cases. It may be called a law of variation of economic results; and, if it were stated in its entirety, it would give unexpected unity and completeness to the science of economics. It would explain at the same time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Consumption is a process that yields subjective returns, which are measured in the sensibilities of men and are the ultimate objects of the production itself. The immediate objects of production, on the other hand, are the material things that affect the consumer's sensibilities. These things are objective, but they are valued only for what they do for man. Man acting on man through

matter—such is the whole economic process. How much can be gained by the whole of it? is the practical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The gain depends on the benefit that a product will afford to a man when he gets it, and also on the number of products which he can get. This, however, is merely saying that it depends on the utility of the goods, and on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agents that create them. It depends, then, on the two variations that are governed by this law.

现代价值研究则只是提了一下该规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作用。这些研究表明，同一人所得的一系列消费品按份儿平均计算，效用是越来越少的。效用的最终价值理论和农业报酬递减理论，都是依据同一规律提出的，而这一原理，具有更广泛得新应用领域。因此，规律适用于经济生活，而理论，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包含对经济生活的部分体现。价值理论是以这一一般规律的某种应用为依据的；地租理论则是以另一种应用为依据。由于这一规律可以溯及消费，而消费是某种物品的“最后增量”是不如其前的几个增量有用的，因此，就生产而论，我们也就可以注意到，某种工业要素的最后增量不如其前几个增量富有成效了。由于价值取决于最终效用，因此分配上的份额也就取决于最终生产率了。由此可见，利息是由最后一个资本增量的产量决定的，而工资则是由最后一个劳动增量的产量决定的。一方面是商品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它们的生产率均取决于同一一般规律。不过，价值控制了一个整体的产业群的收，而最终决定价值的则是该规律在消费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在本质上，消费和生产是绝然相反的。在其中的一个过程中，是自然对人类倾其所有，而在其中的另一过程中，则是人类对自然倾其所有。然而，这同一规律也依然适用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况。这堪称经济效果变差规律；而且，要是就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表述的话，那么，该规律是能使经济科学地达成出乎意料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该规律还同时对价值、工资和利息做出了解释。消费是一种主观报酬的过程，该报酬按人们的敏感度加以计量，它是生产的最终目的。而生产的直接目的却相反，它是影响消费者敏感度的要素，这些物质是客观上存在的，但

它们所以具有价值是由人类赋予的。人通过物质作用于人，这就是整个经济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们可从中获知多少？这是需要回答的实际问题。人们的所得取决于人们获得某种产品时，该产品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同时，还取决于人们所能得到的产品数额。不过，这只是说这种收益取决于货物的效用，同时也取决于创造效用的各种要素的生产率。于是，人们的所得便取决于受此规律调节的那两种变量了。

Final utility itself has been studied in a way too narrowly limited. In the case that is usually cited, one commodity is taken and, in imagination, is given in increasing quantity to one consumer. The successive units of it then do less and less for him. Bread given to a man in a succession of slices nourishes, and pleases, but ultimately gluts him. The nth slice, if he must eat it, is worth nothing to him, and the following slices less than nothing. Coats of one kind bestowed on a man, one after another, soon lose their power to benefit him. The fourth may be of so little use that a tramp can have it for the asking. Duplicate copies of the same book or of the same picture encumber the shelves and walls, and their room is better than their presence. Very abrupt, in short, is the descent of the “utility curve” which, in graphic representation, expresses the lessening services that successive units of things of exactly the same kind are capable of rendering.

对于最终效用本身，我们已以某种限制过窄的方法加以研究了。即以通常引用的情况来说，某种商品是经消费者看中后才接受，然后按想像以数量递增的方式为消费者所获得的。而消费者所获得的连续几个单位的消费品合乎他的需求程度，确是一个比一个低了。一连串地给一个人很多片面包，虽然营养营养他也满意，但最终还是使他生厌了。要是他还得吃的话，第n片面包，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而随后的那几片面包，对他来说还不如没有。一连串赠送给别人一套又一套

外套，很快外套就会失去了它的价值。第四套，或许已是没什么用处了，以至于一个流浪者只需要求一下就可得到它。同一部书或同一幅画，一部又一部、一幅又一幅地塞满书架或挂满墙，人们的房间还就不如没有书和没有画的好。总之，非常令人意外的是“效用曲线”的下降，而图示中所表明的只是同一类接续几个单位消费品能够提供的逐渐减少服务而已。

Vary the articles in kind, and you have a different result. Change the weight, the color and the cut of the successive coats, and the man will be glad to have more than four of them. Give him books that differ from each other, and he may strain the storage capacity of his house to accommodate them. By changing the quality of the articles offered you appeal to different wants; and so long as there are in mall's sentient nature wants still to be satisfied, there is do reason why he should cease to accept what you offer. If two coats are alike in all respects but weight, the thicker garment satisfies just one want that is not satisfied by the other. It will be purchased, perhaps, for the sake of that single utility. Clothing in general, not confined to garments of any kind, shows a utility curve descending gradually. Food in general diminishes in utility far less abruptly than does a single article, like bread. Duplicate nothing; to potatoes add bread, then meat, pastry, fruit and the refined products of the French cuisine, and you will find the diminution of the utility of successive increments far less rapid than is the diminution of the utility of any one thing. Where we thus vary the quality of the second increment of an article offered to a consumer, we virtually offer him a different article, which renders a new and distinct service.

改变商品的性质就会达到某种不同的效果。改变那几套外套的重

量、颜色以及款式，那么，这个人就会乐意要四套，甚至更多。如供他挑选的书是各种各样的，那他的贮存空间就会被其购买的书籍占得满满的。改变一下这些物品的质量，定会使你有产生各种欲望的冲动，而且只要人们的欲望尚需得到满足，那他就没有理由不接受你所提供的。假如两身外套除重量外其余各方面皆相同，那么，厚一些的服装所能满足的也就是另一种所未能满足的。只是为了该服装这一效用的目的，他或许就得买下它了。不管是哪一种服装，一般都显示出逐渐下降的一条效用曲线。一般食品其效用的递减速度远不如面包一类单种物品那么快，与之是无法相比的。土豆加面包，再加肉，加油酥点心、水果和法国菜的精制品，你就会发现接续几个物品增量的效用的递减，远不如任何一种物品的效用的减少得快。但凡我们是如此改变着供消费者享用的某种物品的第二个增量的质量的，那我们实际上是给他提供了一件不同的物品，而这一物品是用来提供某种新而独特的服务的。

The theory of value has not taken due account of the abruptness in the decline in the utility of an article, when successive units of it, wholly uniform in quality, are offered to one consumer. The gently descending utility curves of the ordinary graphic representations tell what is true of a genus of articles rather than of a single one; [14_1] and a correction, therefore, needs to be made in the theory of value.

价值理论没有适当考虑到下述情况，即向消费者接续提供几个单位的某种同一质量的物品时，其效用是急剧递减的。正常图示的那种缓慢递减效用，它说明的是对一类物品适用，而不是对某一种物品适用。 [15_1] 因此，是给价值理论提出某种纠正的时候了。

This is not the only correction that needs to be made; for we

have undertaken to generalize the law that is at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value. In reality, it is all-comprehensive. The first generalization to be made consists in applying the law, not to single article, but to consumers' wealth in all its forms. The richer a man becomes, the less can his wealth do for him. Not only a series of goods that are all alike, but a succession of units of wealth itself, with no such limitation on its forms, becomes less and less useful per unit. Give to a man not coats, but “dollars,” one after another, and the utility of the last will still be less than that of any other. The early dollars feed, clothe and shelter the man, but the last one finds it hard to do anything for him. A dollar, as thus used, means command of a quantity of consumers' wealth indeterminate in its form; and wealth, as such, loses its specific utility, if you give it, unit after unit, to a single consumer. To apply the law of diminishing utility only to series of similar goods is to get only one of the facts that are at the basis of the law of value; but to apply it to the largest genus of usable goods that can be made—that is, to consumers' wealth in general—is to take a scientific step in advance. The more wealth, then, that a man has for personal use, the less is its value per unit to him.

这还不是需要做出的唯一纠正。因为我们这是要概括作为价值理论基础的规律。实际上，这一规律内容复杂多样。需要做出的第一个纠正，就是该规律是应用于各种形式的消费资料，而不是应用于单个物品。人们越是富有，财富给他们带来的效用就越少。单位效用越来越少的不只是均一系列的货物，还有形式不限的接续几个单位的财富本身。给予人的不是外套，而是“美元”，一个接一个地给，最后一个单位的美元的效用就会比此前的任何一个都要少。前几个单位的美元供人们吃穿住，但最后一个单位的美元则对人们是几乎毫无益处可言了。用一美元表示对一定数量中间形式的消费资料的需求；而财富如果是一个单位接一个单位地给某个消费者了，那么，就失去了具体

效。应用此效用递减规律于一系列类似的货物中，则仅能得出以价值规律基础的事实中的一个而已，但如果把它应用于能生产出来的最大一类消费资料时，则是向前迈进了科学的一步。由此可见，一个人拥有的供自己使用的消费资料越多，对他而言其效用价值就越少。

Very many and very diverse, it should be observed, are the articles that constitute the last increment of general wealth that a consumer devotes to his personal use. In the consumption of any person for a year, for example, an article or two for food may constitute the first or most necessary element. Plain clothing may constitute the second. Rude shelter, an improvement in the food, and some fuel for heat and light may compose the third. Every later element, however, will include qualitative changes in the articles already possessed; for the man wants, not only more things, but better ones. He improves and diversifies the material that he uses, and the later increments of his year's stipend of consumers' wealth take on a very heterogeneous character.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everal increments of wealth consumed is of scientific importance. In the statements that are current, it is said that the final increments of different commodities purchased for consumption at the same cost are, with certain allowances, of the same utility to the purchaser. With the last hundred dollars of the year's income, the man in the illustration, will buy some particular things that he did not have before, and he will add quantitatively to his supply of things of which he has already had a certain amount. If each distinct article on the list costs a dollar, they are all supposed to be of equal utility; but their degrees of utility are, in fact, very unequal. If the modern theory of value, as it is commonly stated, were literally true, most articles of high quality would sell for three times as much as they actually bring. It is well, at this point in the discussion, to make the needed correction of the law of value;

inasmuch as group incomes depend on that law, and inasmuch as the distinction on which the correction rests is of cardinal importance in connection with wages and interest. When we undertake the more detailed study of the productivity of final investments of capital, we shall find that success depends on keeping constantly in view this essential distinction.

应该注意到，消费者自己使用的商品构成了一般消费资料的最后一个增量，这种商品有很多且各种各样。例如，在任何人一年的消费中，一两种食品就可以构成第一或最必需的要素。普通衣服可能构成第二要素。简陋住处，稍加改善的食品，以及供热采光的某种燃料，它们可能构成第三要素。但是，后面这几个要素包括已有商品的质量变化在内，因为人们所需要的商品不仅量要多，而且质量还要好。他把需要用的原料加以改进，使之多样化，消费资料中的这后一个增量，具有很大异质性。这几个消费资料增量的组合方式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就目前的阐述来说，以相同价格买来消费的各种不同商品的最后一个增量，对于购买者来说，它们具有相同效用，不过，当然是打了一定折扣了。例如，某人要用他年收入中的最后一百美元来买之前没有的某种特殊的东西，而且还要添加点质量高一点的东西。假如他的单子上的每一种独特商品均花费一美元，那它们就会被视为效用相同，但事实上，其效用程度可是大相径庭的。如果通常所述的现代价值理论确实正确无误的话，那么，大多数高质量商品，其销售所得就会是实际所得的三倍。此时，价值规律恰好是必需纠正的一点。因为产业群的收人取决于该规律；因为这一纠正所依的特征对工资和利息有着最重要的意义。当我们着手研究资本最后投人的生产率时，我们会发现成功取决于专注此本质特征。

In careful statements of the law of value, allowance is made for the fact that, as an income grows larger, there is not a continuous quantitative increase in the consumption of all the articles that are

early secured. Some articles for consumption are never duplicated at all; and others which are duplicated have, after one unit has been supplied, a comparatively slight utility. Thus, one watch may be nearly indispensable while a second would be of very little use. Another correction of the current form of statement of this law is of much more importance. What is the final increment of wealth consumed? It is not complete articles, as such: it is almost entirely composed of utilities of articles. These can be mentally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qualities that compose the entire articles, but the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m. A man's final increment of consumers' wealth consists mainly in certain elementary qualities that help to constitute the articles that he uses. It is a literal fact that one can scarcely find on the dining-table of a rich man a single article that, in its entirety, enters into the final increment of wealth that he consumes; yet some component element of almost everything there found does so. Something in the meat, the prepared vegetables, the pastry, etc., is bought with the man's final dollars and constitutes his final increment of food.

在价值规律的精心表述中是考虑到下列事实的，即当收入越积越多时，早获得的物品的消费不可能出现数量上的连续不断的增加。有的消费品是从不重复购买和消费的，而有的商品在重复购买会，其效用就相对小多了。例如，一块手表或许就够了，而第二块手表就几乎没什么用处了。对这一规律的准确表述比纠正过的就重要多了。什么是消费资料的最后一个增量？它不是完整无缺的商品：几乎是由商品全部效用构成。可在心理上，这些商品总还是有别于构成全部商品的其他特征的，但又是与它们不能绝然分开的。一个人的消费资料的最后增量，主要由某些基本要素构成，而这些要素有助于构成他所用的那些物品。在一个富豪的餐桌上，只有构成其消费最后增量的一种食品的情况少见。在那儿，该有的几乎都有。各种肉制品，备好的蔬菜，，各式烘烤糕点等等，都是用这个人的最后几个美元购买的，这

几个美元构成了他食品消费中的最后一个增量。

In pure theory, the statement of the vital fact of consumption should be this: Every article that a man buys for personal use contains a composite of elements, some one of which enters into his final increment of consumers' wealth. What a man does, as his means increase, is, before anything else, to demand new qualities in the articles that he uses. Often he does not add at all to their number; but he causes them to be made of finer material or to be larger or handsomer. He adds to his wealth for consumption, not new things, but new utilities; and these are mainly attached to things of the kinds formerly consumed. As he cannot literally buy a cheap article and afterward improve it, he buys the improved article at a single purchase. The literal effect of spending his last dollar consists in the substituting of a good article for the cheap one, with which he would fave contented himself if his available means had been smaller.

在纯理论中，有关消费这一重要事实应该如此表述：人们购买的每一种物品都含有某种组合的要素，其中有的要素就构成他最终消费资料的最后一个增量。随着一个人收入的增加，他首先就是要求他所用的物品都具有新的质量，然后才顾及其他。所用物品，他常常根本就不增加件数，但他会买优质原料制成的或是更精美一些的物品。他的消费资料所增加的不是新的产品，而是新的效用，而这多半属于原来所消费的那些物品。既然他不可能完完全全地购买廉价物品，然后再下功夫使之精益求精，于是他就直接购买精品。花费他最后这一美元的实际效果就在于以优质产品替代廉价产品。因此，一旦他可支配的收入真的是少了一些的时候，他或许也就心满意足了。

Shelter, for example, is one of the prime necessities of life, and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rich man's mansion that satisfies this primary need. His present house may be the last house that he builds, and in point of time the whole of it is final; but, in its entirety, it is not included within the final increment of his consumers' wealth. The element of simple shelter that the building contains represents one of the earliest increments. Some of the dollars that he has spent are paid for shelter, some for comforts and conveniences, and some for the final elegances that the owner adds to his list of consumers' goods. It is these last elements of cost in the dwelling that, in this man's case, constitute the final increment of wealth consumed. The same thing is true of simpler articles. As the man sits at his breakfast table, he recognizes, if he thinks, that the very chop on his plate, by virtue of its different utilities, spans the entire range of his consumption, from the first increment to the last. It contains nourishment which is bought with what is logically the man's first dollar. It also has qualities that are imparted to it at great cost. Skilled and expensive culinary labor has done much for it; and it would not be precisely what it is, if it were not for the last dollars that are expended in securing an accomplished cook. Simple as this article is, it contains, in effect, a composite of quality, some of which enter into the final increment of wealth consumed, while others distribute themselves through the series of increments to the very last. If he can isolate one of these qualitative elements, he can locate it in the series. But the chop, as a whole, is bought with a sum of which some part enters into such increment of the “money” that the man spends on his own gratification.

例如，住处是首要的生活必需品之一，因此，富人豪宅总是要满足这一基本需求的。他现有的住宅或许是他所造的最后一套住宅，因此，就时间而言，这整套住宅就是属于最后的住宅，不过，就其整体

而言，他的消费资料的最后一个增量并不包括整个住宅在内。该住宅所包含的这一要素，代表着最早几个增量中的一个。他所花费的美元当中，有些纯系为购买该住处所花的，有的是旨在获取舒适方便，有的则是旨在使住房考究精美，此系房主给其消费品单子上所增加的几项。就这个人而言，构成所享用的消费资料的这最后增量，正是这套住宅成本中的那最后几个要素的成本。对简单一些的物品来说，也可作如此概括。该人用早餐时会认识到，他盘中的那块排骨，实际上就是借助于其各种不同的效用构成其消费的整个一系列的，从第一个增量及至最后一个增量都包括了。按逻辑来说，它包含着以这个人第一个美元购买的营养；它还具有花大价钱而赋予它的质量。精湛且价值不菲的烹调技艺使它大为增色，要不是在一位厨艺炉火纯青的厨子身上花费最后那些美元的话，那么这早餐也就不会就如此豪华了。如这一简单商品，实际上，它是集各种质量之大成，其中有的就构成了消费资料的最后一个增量，而另外的则广存于一系列的增量及至那最后的一个增量之中了。假如他能从这些质量要素中给抽离出一个来，那他就会把整个增量置于这整个系列之中。但作为一个整体，那块排骨是以一笔款项购买的，在那笔款项中，其中一部分构成了这个人用于满足他自己的那笔“钱”的增量。

It is clear that what is called a “final” unit of consumers' wealth is not the one secured last in point of time. In the case of the house in our illustratio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increments of consumers' wealth were bought at the same time, and so were all intermediate increments. This, moreover, is the usual rule. Even if we were actually to dole out to a man, unit by unit, the money that he is to spend on himself in a year, and let him try to buy the supplies for the year in the order of their importance, he could not do it. Let him have, for example, a yearly income of ten thousand dollars. Give him this amount, in a series of sums of a thousand dollars each, and let him try to buy with the first thousand dollars what is actually the first increment of consumers' wealth for a man on a ten

thousand dollar income. With the second of the units of income, let him try to buy what is actually the second increment of consumers' wealth for a man in his status; and with the last thousand dollars let him try to buy what is the true final increment of consumers' wealth for such a man. How could he do it? With the first unit of income he would have to buy the cheapest food; and with later increments he would be obliged to transmute such material into that which is of finer quality. But he does not, in fact, try to accomplish this impossibility. Knowing the extent of his income, he buys the fine food in one purchase. That which, in logic and not in time, constitutes the first increment of consumers' goods is that economic element, or utility, in goods consumed which in some form would have been secured if the man had had only one unit of income at his disposal. A man does not, with the first unit of his income, build a shanty, and with later units transmute it successively into a house, a mansion and a palace: he builds the palace at one operation. Somewhere within it there is what, in an economic sense, is equivalent to a shanty; for there is in it, above all else, a power to afford some shelter to its occupants; and this single utility, merged and lost in the great structure, constitutes an early unit of consumers' goods. Logically, this unit stands near the head of the list, since it precedes most others in importance. In time, however, it accompanies other utilities that stand late in the list. Some quality in the house and similar qualities in the other goods that the man uses constitute the logically final increment of his goods for consumption. A mass of utilities—the group of logically last and finest qualities imparted to articles used for consumption—constitutes the true final increment of the wealth that he consumes. This is an obvious and practical fact, and it demands—what we shall soon consider—a somewhat radical amendment of the theory of value.

显然，所谓“最后”一个单位的消费资料，就时间而言，并非是最后所获得的那一个单位的消费资料。就我们举例中的住宅来说，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消费资料的增量是同时购买的，所有中间增量也都是如此，这也是普遍的规律。即使我们实际上是要一个单位接一个单位地把他在一年内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发给他，且要他设法按物品的重要性购买一年中所需要的东西，他也不会这样做的。例如，假定他年收入为1万美元，他把这笔钱以1000美元作为一个单位提供给他，且让他以头一个1000美元为一个有1万美元收入的人购买消费品的第一个增量；接着，让他以第二个单位的收人为一个与他地位相同的人购买消费品的第二个增量；再以最后1000美元让他为这个人设法购买消费品的最后一个增量。他怎样才能做到呢？有了第一个单位的收人，他就得买最廉价的食品；他再以之后的几个增量来加工这些原料以提高质量。但事实上，他不可能勉为其难。由于自知收入多寡，，他一次购买了精细食品。按逻辑而不是按时间来说，构成消费品的第一个增量的是经济要素或是消费品的效用，而此类消费品，要是这个人仅有一个单位的收人供其使用的话，那就非得在某种形式上有保证才行。一个人不能以其第一个单位的收人建造一幢简陋小屋，也不能再用以后几个单位的收人依次将其变成一间住宅或一座大楼或者一处豪宅。他造一座豪宅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在其内部某处，存在着与经济学意义上相同的东西。首先，就是有给其享用者提供某种住处的能力；其次，渐渐消失于此宏大建筑的这一效用，构成早一些的一个单位的消费品。按照逻辑，这个单位在名单之始，因为它在重要性上超过其余大多数。不过，最终它完成了名单后面的效用。住宅的某种质量以及人们使用的其他货物的类似质量，按逻辑构成其消费品最后的增量。很多效用—给予所用消费品的逻辑上的、最后的、最好的那个行业质量—构成他的消费资料的真正的最后一个增量。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它要求—我们马上就要考虑的是—对价值理论的某种彻底修正。

Men add to their consumers' wealth, then, more by improving the grade of the goods that they use than by multiplying them. They infuse wealth, as it were, into their goods. They give to these goods

new service-rendering powers, and cause articles that in their cheapest forms embody one unit each of consumers' wealth to take a form in which they embody two, three or ten such units.

因此，人们在增加消费资料的情况下，与使之增加一倍的情况相比，更多的还是提升他们所用货物的品级。可以说，他们是把财富加到他们的货物之中了。他们使那些货物具有了提供新的服务的能力，而且还使最廉价的那些商品，体现了每一种消费资料都取的一种形式，即它们体现的是两个、三个或是十个此类单位的消费品。

Capital increases in the same way. [14_2] New units are added to producers' wealth more by improving capital-goods than by multiplying them. We infuse new wealth into the instruments in our hands by imparting to them new productive powers. We substitute a better tool for the one that we have been using, and i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ools that constitutes a final increment of capital.

资本以同样方式在增加。 [15_2] 生产资料的新的单位的增加，多以提高资本货物的质量的方式来进行，而非增加其单位数。我们提高所用的工具价值，就是赋予它们以新的生产能力，如此而已。我们以一种好一些的工具替代我们正在用着的旧工具，而构成最后一个资本增量的，就是这两种工具的差别。

The conclusions so far reached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至此，我们所能概括出以下结论：

(1) Wealth, as such, whether it be used for consumption or for production, may be arranged in a series of increments,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would be selected by a user, if they were purchased one at a time.

(l) 财富本身，不论用于消费，还是用于生产，在使用者一次就购买一个增量的情况下，都可以按照该使用者据以选择的顺次，以一系列增量的形式加以排列。

(2) This series is imaginary, since it is impossible to separate and buy singly these increments.

(2) 该系列是虚构的，因为无法逐个分开购买这些增量。

(3) The several increments of consumers' wealth, on the one hand, and of producers' wealth, en the other, consist rather of elements in goods than of goods in their entirety.

(3) 一方面，消费资料的几个增量，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几个增量，与其说是构成货物的要素，倒不如说是构成作为一个整体的货物。

(4) The utility of the final increment of consumers' wealth

grows smaller, as the number of the increments in the series increases.

(4) 最后一个消费资料的增量的效用随着该系列增量个数的递增而递减。

(5)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last unit of producers' wealth in a series grows less, as the number of units increases.

(5) 一个系列中最后一个单位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率随着单位个数的递增而递减。

Two further assertions that we now have to prove are: (1) Market values are fixed entirely by the utility of the final increments of consumers' wealth, as we have just defined them, and not, as a rule, by the utility of entire articles. (2) Interest is fixed by the productivity of final increments of capital, as we have just defined them, and not by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taken in their entirety. The usefulness of the final commodity of a given kind seldom fixes the values of such commodities;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final instrument of a given kind seldom fixes the rate of interest. [14_3]

我们现在必须证明的另外两点是：(1)市场价值完全由我们刚才所定义的消费资料的最后一个增量的效用来决定，它一般不是由所有商品的效用来决定的；(2)利息由我们所定义的资本最后几个增量的生产率来决定，而不是由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工具增量的生产率来决定。

一定类别的最后那个单位商品的有用性很少决定此类商品的价值，某一类的最终增量的生产率也很少决定利率。 [15_3]

[14_1].These curves tell, also, what may be true of raw material that is capable of being put into many kinds of finished goods. Oak lumber offered for sale, foot after foot, may have a utility that diminishes quite gradually; for it can be wrought into tables, chairs, mantels, bookcases, doors, etc. But if, on the other band, its use were confined to the making of dining-tables of one pattern, the utility of the lumber itself would soon be slight. Raw materials, however, are not consumers' goods and should not figure at all to this part of the study. They have productivity, but none of the utility of which we are speaking.

[14_2].See Ch. XVII.

[14_3].The law of variation that we have stated in this chapter is so comprehensive that, in another mode of action, it fixes wages. The pay of labor is governed by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as such, and not merely by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a final or marginal laborer. We can add to the supply of labor by making workmen more efficient, as well as by making them more numerous. Educating and training men adds new increments to the supply of human productive energy. We can arrange increments of labor, as such, in a series, in the order of their importance, and define the successive increments in the same analytical way in which we have defined the increments of consumers' wealth and those of producers' wealth. In the series of increments of labor, as thus defined, there is traceable the law of diminishing productivity; and it is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the final increment of labor, thus defined, that in reality governs the rate of wages.

[15_1].这几条曲线还表明，对可投人多种成品的原料也是适用的。可供销售的栋木，其效用会有所减少，但那是逐步减少的。因为可以用它制桌子、椅子、壁炉架、书架、门等等；但反之，若其用途仅限于做某种形式的餐桌，那么，这种木材的效用也就很小了。不过，原材料并非消费品，因此，根本不应将它列人此项研究中。原材料具有生产力，但是我们一点也没有谈及其效用问题。

[15_2].见第十七章

[15_3].本章所阐述的变差规律，它无所不包，以至于按照另一种作用方式来说，这一规律决定工资。劳动的工资由劳动的最终生产率决定，而不只是由一个最后或边际劳动者的生产力决定。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工人的效率，也可以通过增加工人的人数，来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对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给人类的生产能力，注入了新的

增量。我们可以按各劳动增量重要性的顺序给其排成一个系列，并以定义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增量同样的分析方法，给这些连续的增量下定义。就这一系列劳动增量的定义来说，有可追溯的生产率递减规律实际上是决定工资率的，它正是所谓的劳动的最后一个增量的那种生产力。

Chapter XV The Marginal Efficiency of Consumers' Wealth the Basis of Group Distribution

第十五章 消费者财富的边际效率——小组分配的基础

Very practical is the correction that has to be made in the accepted theory of value. If we were to to through the shops of a city, selecting at random articles of high quality and learning the prices at which they are actually sold, we might multiply all these prices by ten, without bringing them up to the figures at which, according to the final utility theory as it is usually stated, these goods ought to sell. If this theory in its uncorrected form were true, a man would pay five hundred dollars or more for an overcoat for which he actually gives fifty, and a thousand dollars for a watch for which he actually pays a hundred. A very rich man would give ten million dollars for a dwelling instead of one million, etc. The final utility theory of value, when it is thus applied to commodities in their entirety, gives results that are grotesquely at variance with the values that the market establishes. It exaggerates the prices of all goods, except the poorest and cheapest.

对公认的价值理论必须作出切合实际的纠正。假如我们走遍一个城市的各家商店，任意挑选几种优质产品并记住这些商品实际销售的价格的话，那我们或许就得把所有这些商品价格都乘以10，不过即使如此，这些商品的价格也还是没有达到最终效用理论通常所描述的那种货物可以销售到的价格。假如该理论未更正之前的形式是正确的，那么，一个人实付50美元买到的一件外套，很可能至少得付500美元；他实付100美元买到的一块手表，很可能得付1000美元。一套住宅，富翁会出价1000万美元，而非100万美元等等。一旦把应用这种

规律全的部商品视为整体，这个价值的最终效用理论得出的结果，就会是与市场所确立的价值不一致的，而且相差程度很高。这个理论会使除质量最劣、价格最低的货物以外的所有货物的价格都大幅度提高。

Here we record a charge of some gravity against a modern theory. We assert that the so-called Austrian teachings concerning value rest on a perfectly sound principle,—that, namely, of final utility,—but that the mode of applying this principle needs to be changed. It is final increments of wealth in commodities, and not, as a rule, commodities in their entirety, that furnish those test measures of utility to which market values conform.

这里，我们记录的是反对现代理论的批判。我们坚持认为，所谓的奥地利价值学说是以一种完全正确的原理，即最终效用原理，为依据的，但是应用该原理的那种方式则需加以改变。给那些市场价值与之相一致的效用提供检验尺度的，是呈商品形式财富的那几个最终增量，而不是一般说来的全部商品。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st commodity of a given kind that a man buys for his own consumption, and the last addition that he makes to the consumers' wealth that he uses, is a very real one. As we have seen, the man adds the last increment to the wealth that is embodied in his wardrobe, when he replaces a coat that cost forty-five dollars with one that costs fifty. The last five dollars that are spent on the coat are represented by some quality that this garment possesses. It is a final utility in the coat; but the garment in its entirety is far from being a final utility, even though it be the last one of its class that the owner procures. It is only what the man

pays the last five dollars for that acts directly in adjusting the value of the coat; and what he gives the forty-five dollars for consists of elements that get their value in another way, and a way that is not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this action.

一个人购买自用的最后某种商品，与消费者财富的最后增量，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我们所注意到的是，消费者在以价格为50美元的一件外套代替价格为45美元的外套时，它体现的是全部服装的财富增加到最后的这个增量。在这外套上所花费的这最后5美元，是该服装所具有的某种质量的集中体现。这5美元是该外套的某种最终效用，尽管这件外套可能是该所有者获得的该类物品的最后一件，但这件服装就其整体而言，则远不只这一种最终效用。在外套价值调节方面，只是这个人为此件服装所支付的最后5美元而已；而他在45美元上之所为，则构成了以另一种方式获得其价值的要素，而这种方式与此行为并无直接联系。

In a few cases, however, commodities in their entirety are final units of consumers' wealth. There are some goods that cater to no wants except the last and least intense ones that a consumer satisfies. In these cases, the entire articles figure directly in the adjustment of values. But in most cases there are elements in the goods that do not figure directly in the adjustment of values; and these elements often constitute almost the whole of the goods. Very analytical is the test that the actual market applies to the goods that are offered for sale. Very subtle is its process of resolving goods into their economic elements, and of putting an appraisal on each of the separate utilities that compose them.

不过，在少数几种情况下，全部商品就是最后几个单位的消费者

财富。确有某些货物除了满足消费者欲望之外，其余且不能满足的。在这些情况下，整个商品都直接算人价值的调整额中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货物确有若干要素并不直接算在价值调整额中，它们通常都构成整个商品。是对实际市场用于代售商品的检验的一种分析。非常微妙的地方在于其变货物为其经济要素的过程，以及对构成要素的每一种效用的评价过程。

Here we forecast the correction that has to be made in the theory of value, fo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inal commodities and final units of wealth in commodities is equally important in the theory of wages and interest. The earnings of all capital, in fact, are gauged by the product of the final increment of capital; and this final increment consists, not mainly of entir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but of elements in these instruments.

让我们预测一下对价值理论做出的修改，因为最终商品与商品最终单位的财富区分，在工资和利息理论中是同样重要的。事实上，一切资本的收益都是以最终资本增量的产量来计量的；而此最终的增量，主要并不是由全部生产工具构成，而是由这些工具的各种要素构成。

Wages and interest are the chief subjects of our present studies; but they depend on a general law of economic variation which, in another application, adjusts also the market values of goods. In all the applications of this law,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inal goods and final wealth-elements in goods is of primary consequence. The so-called Austrian theory of value—with which our readers are assumed to be familiar—gives a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the commercial fact that the more goods of a kind there are to be sold,

the lower must be the price, in order that all may be purchased. As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said, the price must be reduced, in order that men who have not as yet bought goods of this kind may take some of them, and also in order that those who have already bought some may take more. For this result the Austrian theory accounts. It furnishes the philosophy of the adjustment of what may be called, in the case of each kind of goods, the consumers' purchase limit. It tells why a man who has bought three units of the commodity A, when the price of it was a dollar, buys four units and no more, when the price falls to ninety cents. The purchaser, it shows, simply obeys the rule of getting the largest obtainable utility for each dime that he spends. [15_1]

工资和利息是我们这里所作的研究的主题；但工资和利息又是取决于经济变异的一般规律的，这一规律还可以用来调节货物的市场价值。在此规律的所有应用中，最终货物与货物最终财富要素的区别极其重要。所谓奥地利价值理论——读者谅必熟知— - 为下列商业事实奠定了心理学基础，即为力求尽数销出，待售的某种货物的量越大，价格就越低。正如古典经济学家所言的，为求尚未购买商品的购买者，以及为求已买了该商品的购买者多买一些，就必须降低该货物的售价。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为此结果做出了说明，就各种商品而论，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堪称消费者采购极限的调节哲学基础。它告诉人们，价格为1美元时买了3个单位商品A的一个人，价格降至90美分时只买4个单位。该理论证实，采购者遵循这一规律，只是使每花１０美分都能获得最大效用。 [16_1]

Single articles that are exactly alike grow, as is usually said, less and less important to a user, as he comes to have more and more of them. The commodity A may be the most necessary thing that the man uses; and the first unit of it, if indispensable to his life,

has an indefinitely great utility. A second unit of this article will be much less needed, and it may be that a first unit of the commodity B will now be preferred. We may for convenience define, as a unit of each kind of goods whatsoever, what is offered in the market for a dime. The man will buy, with the dimes that he can spend each day, a series of things that arrange themselves in the order of their importance to him; and the law that determines what he will actually buy is that of the diminishing utility of the successive units.

一般来说，随着拥有的商品一天比一天多，某类相同的商品，对于一个使用者来说是越来越不重要的。商品A或许是这个人最不可或缺的；这种商品的第一个单位要是于其生活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它就会有无限大的效用。此物的第二个单位，对使用者来说，必要性少多了，此时，他要的是商品B的第二个单位了。为方便起见，不论何种货物，每一种的一个单位，我们不妨就都把它定义为市场以10美分所提供的东西。这个人会以一天他所能花费的以10美分为一个单位的钱数去购买一系列按重要次序来说对他重要的东西。确定实际上他买些什么东西的规律，就是接续几个单位的效用递减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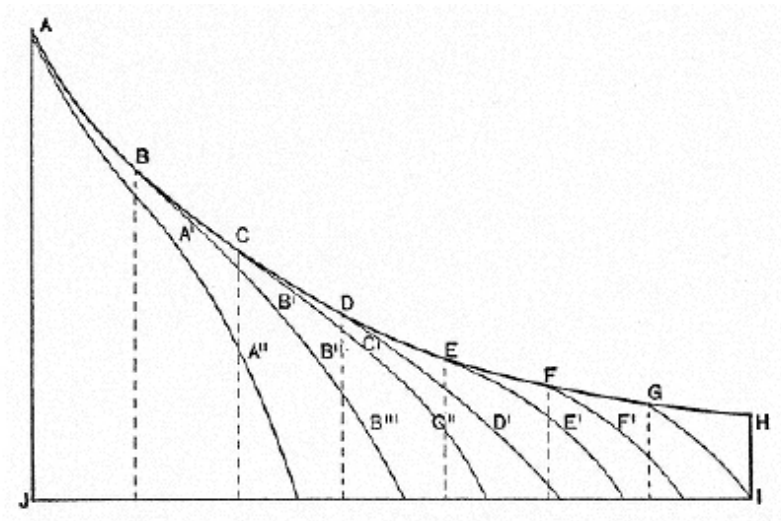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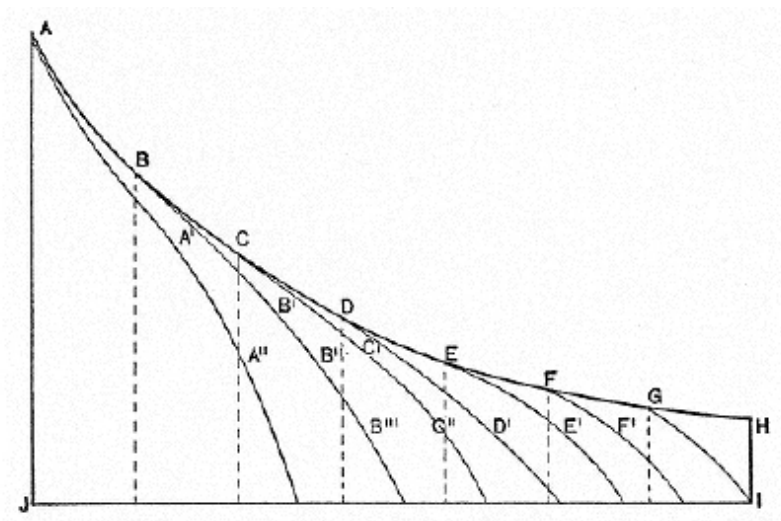

(Fig.8)

如图15—1

Let A, B, C, etc., represent different kinds of consumers' goods; and let the utility, to the same consumer, of a dime's worth of each of them be measured by the vertical distance of the letter that represents it from the line JI. The first unit of A has a utility amounting to AJ, and the first of H has a utility of HI; while B, C, D, etc., have the utilities that are severally measured by vertical lines descending from them to the line JI. A, B, C, etc., are first increments of the several commodities; while A', B', C', etc., are second increments of the same kind of goods; and A" B", C", are third increments. In like manner, we may designate fourth and fifth increments, etc.

如图15—1，令A、B、C等等分别代表各种不同的消费品，令其中价值10美分的每一种消费品对应刚才所说的同一人的效用，以代表他的那个字母与线段Jl的垂直距离予以计量。第一个单位的A具有的效用等于AJ，第一个单位的H具有的效用等于Hl，而B、C、D等等分别都具有从它们各自的点至线段JI的垂线计量的效用。A、B、C等等是这几种商品的第一批增量，而A’、B’、C’等等则为如上商品的第二批增量，A”、B”、C”则为第三批增量。以次类推，我们可以标明第四批、第五批增量，以此类推。

We will say that the man arranges in a series the dimes that he can spend in a day, and buys with the first dime what is of most importance to him; with the second dime that which stands next in the order of importance; and so on, till with his last dimes he buys things that are needed least of all. The first increment of his day's purchase of consumers' wealth is, then, one dime's worth of the article A. The second unit is B. As a return for the next dime to be spent, there are two articles offering themselves which have equal

degrees of utility. They are C and a second unit of A, here designated as A'. The man will spend two dimes and get these two articles. D and B' are next in importance, and they have equal utilities. The man's fifth and sixth dimes will get them. With the seventh dime he buys C', or a second unit of the article C; and with the eighth, ninth and tenth dimes he buys E, B" and A". When he reaches H, he finds that that article and B"', C", D', E' and F are on a par in importance to him, and he spends his last six dimes on these things. In all, he has spent twenty-one dimes and has exhausted the free income of a day.

我们要指出，这个人以系列的形式安排他一天所可能花费的若干个10美分。以第一个10美分购买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商品；以第二个10美分购买就重要性居第二位的商品；以此类推，直至他以最后那10美分购买最不急用的商品。因此，他一天中消费资料购买量中的第一个增量是一个价值10美分的商品A，第二个单位是价值商品B的一个10美分。作为对花费的下一个10美分的回报，呈现有两种效用程度相同的商品，它们是C以及第二个单位的商品A,这里用A’表示。这个人要花两个10美分买这两种商品。D和B’是重要性居第二位的，它们的效用相同。这个人要以第五、六两个10美分买下它们。他再以第七个10美分买C’或第二个单位的C。他再以第八、九和十个10美分别买E、B”和A”。当他看到H时，他认为该商品与B”’、C”、D’、E’和F’相比，就其重要性而言对他是一样的，因此，这些东西，他以最后六个10美分全买了。总的一算，他共计花了21个10美分，他一天的工资全花光了。

The last increments of each commodity that this man buys are price-making increments. The sale of them is secured by bringing the price down to such a point that nothing else that the man can buy with the money has for him a higher degree of utility. In other

words, the lowering of the price of the article brings this increment of it within the man's purchasing limit and within the purchasing limit of other men who are in the same economic condition. If the price were higher, no one of these men would take what is now his final increment. If the whole supply needs to be sold, the price must be reduced to the point thus defined. If, for example, in our diagram, the article H were costlier than it is, the article I would be preferred to it by all of this class of purchasers. As it is, the increment of H indicated in the diagram is sold; and the price that insures this sale is also the price of all other units of this commodity.

此人所购买的每一种商品的最后增量，都是决定价格的增量。它们的销售量到此已定，因为把价格降至这样一种程度，这个人以其所有的钱再也买不到效用程度再高一些的东西了。换句话说，商品价格的降低使这种商品的增量处于这个人的购买极限内和他人的购买极限内，而这些人是处于同样的经济状况下的。假如商品价格提高了，那他们当中谁也买不下属于他们现在的最后一个增量。假如都必须卖掉全部的供给量，那价格就得降到如此界定的程度。例如，在上述图15－I中，如果商品H比现在的要昂贵一些的话，那该阶层的购买者就都会宁愿购买商品I。但事实上，图中所示的H的增量是巨大的，确保此笔生意的价格也就是该商品其余所有单位的价格。

Final increments, then, are commercially strategic. Their utilities count in price making; while the excess of utility in the earlier increments does not, in this connection, have any influence. In fixing the prices of these things the great usefulness of the earlier units of A and B counts for nothing. These units would be purchased, even though the prices were higher than they are; and there is, therefore, no need that the venders should bring the price

of A and B to the present level, in order to insure the sale of these highly serviceable units of them. This is saying that, in the case of each kind of goods, all increments except the last one give net gains to the purchasers. They insure to them what has been called “consumers' rent” The utility of final increments to the men who buy them, however, gives no surplus benefit, since it is fully offset by the cost of them. What the man sacrifices in order to get them is worth to him as much as they are. The extra utility of the earlier increments, on the other hand, is uncompensated. It is a differential amount of personal benefit, or an amount of good that is done to the consumers by certain units of a commodity, in excess of the benefit conferred by the last unit.

由此可见，最终增量是具有商业上的战略意义。它的效用在定价时是计入在内的；前几个增量的过多的效用，在这一方面则不具有任何影响。在就这些东西定价时，A和B的早先几个单位没有价值，即使价格再高一些，这些单位也还是会卖出去的。因此，即使卖主未使其价格提高至当前的水平，而A和B这几个极其耐用的单位，也照样畅销。这就是说，就各种货物而言，除最后一个增量外，所有增量都会使购买者获得纯收益，它们确保购买者获得称作消费者租金一类的东西。不过，对于购买它们的人来说，这些最后增量的效用却不产生任何剩余价值。因为，这种效用完全被其成本所抵消了。这个人为获得这些最后增量而牺牲的是相当于这些增量的价值；反之，早一些的几个增量的额外效用，则未获得补偿。此额外效用等于个人利益的一个差额，或者说，某种商品的某几个单位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超过最后一个单位所带来的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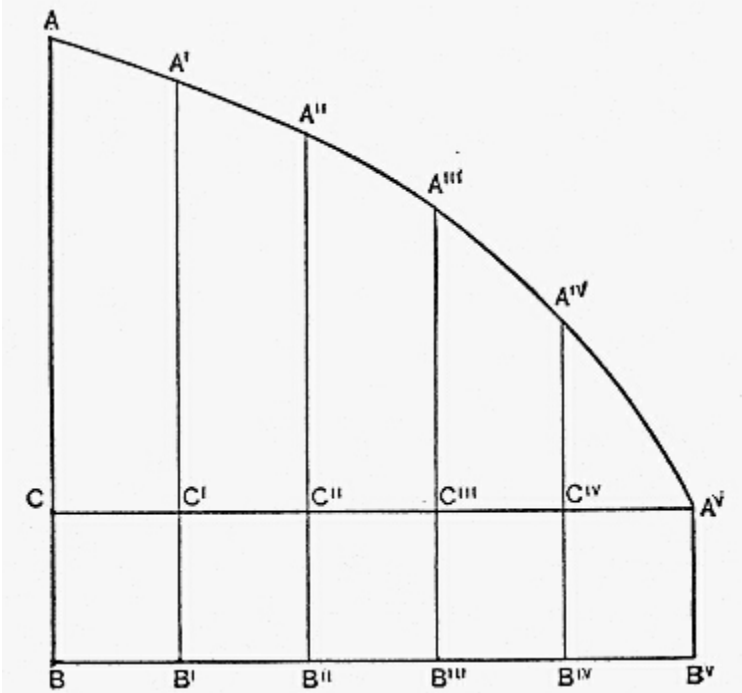
A
A'
A''
A'''
A''''
A'''''
C
C'
C''
C'''
C''''
B
B'
B''
B'''
B''''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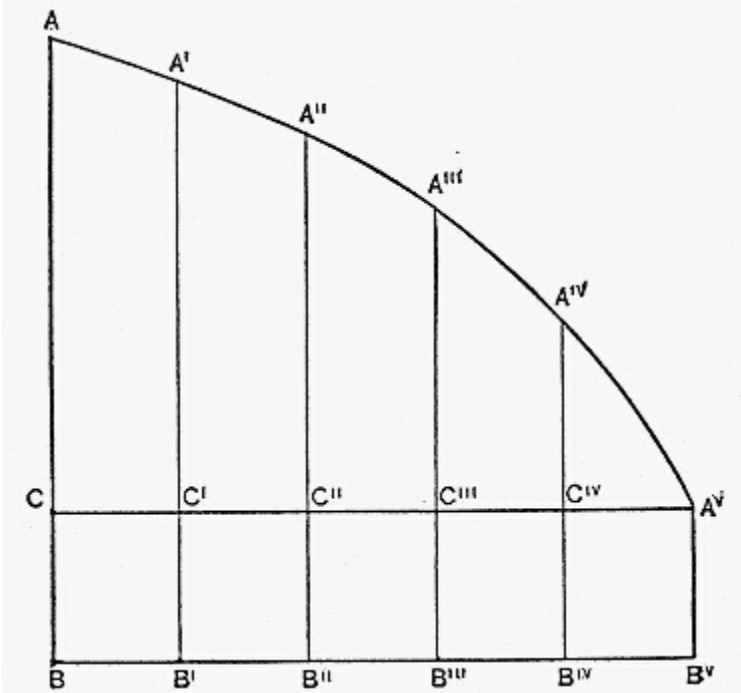

(Fig.9)

如图15—2

If, for example, the utility of successive increments of A declines along the curve AAv, and if AB measures the utility of the fast increment, A'B' that of the second, and AvBv that of the last, the differential benefit conferred on consumers by the earlier increment of this article is measured by AC + A'C' + A"C" + A'"C'" + AIVCIV. If we suppose that the lines are contiguous, having width to fill an area, then the area CAAv measures the whole of what been called the consumer's rent, derived from the article A by one purchaser.

Such consumers' rent, differential benefit or uncompensated utility cannot enter into the adjusting of prices. This is a principle that everywhere holds true.

假如A中接续几个增量的效用沿曲线AAv降低了，假如AB是计量第一个增量的效用的，A'B’是计量第二个增量的效用的，A”’B”’是最后一个增量，那么，该商品早一些的几个增量给予消费者的差额，就由AC＋A'C'＋A”C”十A”’C”’,＋A”’C”’予以计量。若我们假设这些线段是同步移动的，具有填满一个面积的宽度，那么，面积CAAv就是计量整个消费者租金的，而这些租金源自某个购买者的商品。这样一种差额或无补偿效用的消费者租金，不构成价格调节的一部分。这是普遍适用的一条规律。

Final increments of different goods, then, are supposed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for the favor of purchasers—with the result that final utilities secured at equal expense are equal; that the earlier utilities in the series are unequal to each other, and are always greater than the final ones; and that the amount of this excess has no effect on prices.

由此可见，各种不同货物的最后一个增量是都假定彼此互相竞争以取悦购买者的结果，按同等费用获得的最终效用是相同的；该系列中商品早一些的效用彼此不相等，且总大于最后几个，此差额对价格无影响。

What if even the final increments themselves do not always count in the adjusting of market values? Careful statements of the law have already shown that this is sometimes the case. There may,

indeed, be a lar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tility of the first increment of a commodity and that of the second, and the utility curve for such an article may show a series of considerable gaps. It is not a continuous downward curve, but a series of points more or less widely separated. The points in the diagram on page 222 that are marked by the letters A', A", B', and B", etc., constitute such a series. In cases of this kind, the last increment of a commodity that a particular man gets may not figure in the adjustment of values. He would pay more for it rather than go without it. The last units of many articles that the consumer buys have a degree of usefulness to him that exceeds the utility of the really marginal things that he buys for the same price. The prices of A and G might go up considerably before he would cease to buy these articles; and the prices might go far down without inducing him to buy more. The articles B"', C", D', E', and F' in this diagram are really in the strategic or price-making positions. If you raise the price of any one of these, the consumers of this class will cease to buy it, and will take another article in place of it.

就连这最后几个增量也并不总是算人市场价值的调节，这是为什么呢？有关这一规律的客观论断指出情况有时就是如此。实际上，某种商品第一增量的效用与第二增量的效用，可能就有很大差别，而且，这样一种商品的效用曲线，可能就显示出一系列相当大的差别。该曲线不是持续向下倾斜的曲线，而是一系列或多或少间隔很大的点。第222页图15—1中分别用A’、A’’，B’和B’’等等字母标明的点，就构成这样的一个系列。就这类情况来说，某个人得到的某种商品的最后一个增量也许并不计算在内。为了获得这一增量，他或许会多支付一些，而不会盲目行事。消费者购买的很多商品的最后几个单位，对他而言，都有超过他按同一价格所购买的商品的真正边际效用价值。A和G的价格未等他停止购买这些商品或许就大幅上涨了；当然，也有价格大跌而并没有诱使他多买的商品。图15 - 1中的B’’’、C’’仰、

D’、E'和F’等等商品，的确是处于战略或定价地位的，你要是给其中任何一种商品提价，则该阶层的消费者干脆就都会拒购，而以购买另一种商品取代它。

In seeking for the reason why the article A is sold at the price that it actually commands, we must, of course, find the reason why some part of the supply will remain unsold at a price that is in the least degree higher. With this adjustment the men whose consumption is represented in the diagram on page 222 have no connection. There are, however, other men in whose cases an increment of A is a part of the true final increment of consumers' wealth. To them this commodity is on a plane, in usefulness, with other things that are bought with their final units of available income. If you raise the price, those men will cease to buy some of A; and then some of this product will remain unsold. Thus far we have stated, in outline, the accepted theory of value, and have added nothing that is not already contained in careful presentations of it. The discontinuity of successive units of some commodities, as they are arranged in a series joined by a utility curve, is a part of this theory. In this there is enough to show that, if we understand the philosophy of value, we must take all society into view as the purchaser of things. If you raise the price of an article, you will find, somewhere in the consumption of the public, a point where purchases of this article will cease. The action of raising the price singles out the particular men, in the strategic position, whose action fixes the value of this commodity for all other men. They are the social price makers for this commodity.

当然，在给商品A为什么就按某种合适的价格出售找原因时，我们要弄清楚该商品的某一部分，即使按照丝毫不比上述价格高的价格

出售，为什么还是会销售不出去的原因。消费第222页图15 - 1中所示商品的那些人与这样的调整无关。不过，也有人的消费中，A的一个增量，却是消费这些商品的最后一个增量的一部分。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些商品就其有用性来说，是与其以最后单位的可用收入购买的其他商品处于同一水平的。要是你提价了，那些人可就不会再买A了，这样，此类商品有的可能就滞销了。至此，简要地说，我们已经说明了公认的价值理论，而有关该理论的严谨描述中已有的内容之外没有做任何补充。某几种商品没有用一条效用曲线逐个连接起来的排列组合的情况，是该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假如我们理解价值原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得把整个社会作为货物购买者纳人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某种商品，你要是提价了，那你就会发现，在某个地方的公众消费中，没有人再购买该商品了。提价的行动过程，使处于战略地位的某些人，凭其行为就能决定该商品的价值，而另外的人则言听计从。他们是这种商品的社会定价者。

It is not enough, however, to say that this principle merely introduces a refinement of the theory of value, as that theory stood before the discontinuity of successive units in the utility curve of a particular article was recognized. It is not final commodities, but final units of wealth, that figure in the adjustments of values, and articles in their entirety are seldom final units of wealth in any consumer's scale. Search through the whole of society, and you will probably not find a man in whose estimates the commodity C is a final or price-making utility. There are, as we have seen, a few cases in which whole articles are included in the last social unit of consumers' wealth, and the utility of these things is a factor in price making. As, in most cases, only one element in an article is a part of this test increment of consumers' wealth, only that element is a factor in price making. There is no class in all society to whom the last unit of C does not afford a surplus of utility. If C is a house, it affords shelter; but it also caters to the more luxurious wants. In the

house, merged with other qualities,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s a true final utility. This quality acts on prices, and the other utilities that the house contains do not.

不过，说这一规律只不过介绍了对价值理论的某种精妙阐释而已，这还不够。因为该理论是在某种货物的效用曲线接续几个单位失去连续性获得确认之前提出来的。在价值的调整中计算的是最终几个单位的财富，而不是那些最终的商品；作为一个整体，那些产品很少属于任何一个消费者层级的最终几个单位的财富。仔细观察整个社会，你很可能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在他的估价单中，商品C是一种最终的或是定价的效用。正如我们所提到过的，所有的商品均纳人了最后一个社会单位的消费资料范围，而这些商品的效用又是一个定价因素，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因为就大多数情况来说，某种商品就只有一个要素是这种消费资料增量标准的一个部分，而且只有那个要素才是一个定价因素。最后一个单位的C为整个社会的所有阶层提供某种剩余效用。如果C为一幢房子的话，那它提供的是住处，然而，它还能满足更为舒适的需求。就这幢房子来说，与其他特性合为一体的是某种真正最终效用，对这个很正起作用的价值特性，而不包含该幢房子的其他效用。

What is essential in a theory of value that shall account for prices, as they actually exist, is contained in the following propositions. We state them here, because something akin to what they assert is true of capital, and is essential in a theory of distribution that shall account for the rtales of wages and interest that actually prevail. The universal law of economic variation must be stated with accuracy, if it is to account for either values, wages or interest.

在对实际存在的价格做出说明的某种价值理论中，其实质就包含在下列几个论点中。我们之所以在此加以说明，就是因为类似于这几个论点所断言的对资本适用，而且在一种会对实际通行的工资率和利率作出说明的分配理论中，它们是最基本的。要说明价值、工资或利息，经济变异的普遍规律就必须予以严谨阐述。

(1) It is the final increment of consumers' wealth, as such, and of that only, that figures in the adjustment of values.

(l) 计算在价值调节内的是消费者财富的最后一个增量，而且也就是这一个增量而已。

(2) Commodities in their entirety are seldom included in the final or price-making increments of consumers' wealth.

(2) 作为一个整体，商品很少包括在消费资料最后的或者定价的增量内。

(3) A commodity for consumers' use is a service-rendering thing, and is valued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service that, at certain test points in social consumption, it is able to render.

(3) 供消费者使用的某种商品，就是一种提供服务的商品，而且是依据在社会消费的某些试销点该商品所能提供的服务数量予以定价的。

(4) Most commodities render several different kinds of service at the same time. A thing of this kind is to be regarded as a bundle of distinct utilities, tied together by being embodied in a common material object.

(4）大多数商品都同时提供几种不同的服务。属于此类的某种服务，就被看成是所有共同此类物品所体现的一个独特效用。

(5) The tests of the actual market measure these utilities separately, and the value of the article results from all the measurements.

(5）实际市场的多次测试分别计量这些效用，而该商品的价值就由这一切计量所产生。

(6) Only one of the utilities that constitute a commodity is a part of one man's marginal unit of consumers' wealth. The other utilities in the thing are intra-marginal. They are higher utilities and do not, in the case of this consumer, have an influence in fixing the price of the article.

(6）构成某种商品的各种效用中，只有某种效用是某个人消费资料的边际单位的一部分，其他各种效用实际上都属于是边缘性质的。它们是高一些的效用，就消费者而言，与决定该商品的价格没有影响。

(7) Only as the final utility principle is applied separately to each of the utilities or service-rendering powers in goods can it account for the values that goods have in the actual market.

(7）只有作为分别适用于货物的每一种效用或每一种提供服务的能力的这样一种最终效用规律，才能对商品在实际市场所具有的价值做出解释。

If the principle of final utility be applied to entire articles, it will give values that are, in most cases, many fold greater than are the actual values that the dealings of the market establish. If, on the other hand, it be applied to value elements in goods, it will give results that the market will confirm. Here we are bringing theory into harmony with life. The modern theory of value analyzes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that lies back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market—that is, it traces the phenomena of the market to their causes, in the mental operations of those who buy goods. In every market there are measuring operations going on, and the things measured are personal benefits. If a commodity has embodied in itself the power to render several distinct kinds of service,—if it is a composite thing, having a number of distinct utilities,—there is no escaping the fact that true valuation must find a way to appraise each of these qualities by itself.

假如要把最终效用原理应用于全部商品的话，那么，就大多数情况来说，该原理给出的价值就会比由市场交易所确立的实际价值大好多倍；反之，要是把这个原理用于货物的各种价值要素，那就会产生市场上证实的那种结果。这里，我们的理论就与现实生活相符了。现代价值理论是分析市场现象背后的心理过程，也就是说，它是由市场

现象追溯起因，也就是追溯购买商品者心理活动的原因。在每一个市场，都有计量活动在进行着，而所计量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某种商品自身就存在提供独特服务的能力——如果它是一种具有很多独特效用的综合商品，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个事实，即凡是货真价实的评价都是对商品能力的评价。

If we were not to push the analysis of this process to the end, we should do well to adhere to the older and more simple theory of value, and to keep altogether clear of the psychology of market dealings. Mr. John Stuart Mill has told us that, if the tentative price of an article is too high to insure the sale of the whole supply, the price is lowered till new purchasers take some of the goods and old purchasers take more than they formerly did. This statement is, in any view, a correct one; and unless we want to understand the mental operations that determine the action of consumers and bring their purchases to a stop at certain definite points, it is enough. But if we do wish to understand that operation, we must find how each utility in that composite thing, an average commodity, is actually measured, and how the measurement controls the market. We shall, therefore, now examine the manner in which utilities, as such, are tested in commercial dealings. Only thus is it possible to perceive how values and the group shares that depend on them are actually adjusted.

假如我们不想把对这个过程所作的这种分析进行到底的话，那么，我们就得坚持老一些、简单一些的价值理论，彻底回避市场交易的心理特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就曾告诉我们说，假如某种货物的试销价格高到了保证不了全部商品都可以售出，那么，价格就得降低，直至有新的购买者出现，而老的购买者又会买的更多。这样的说法，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都言之成理；而且，除非我们想了解确定

消费者行为的心理活动，并使其购买止于某个明确的程度，否则这就足够了。但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弄懂那种活动，我们就必须设法弄清楚那种复合的东西，即一种普通商品的每一种效用实际上是如何加以计量的，以及那种计量又是如何控制市场的。因此，我们就要检查一下效用本身在商业交易中受检验的方式，只有这样才可能找到价值以及由价值的产业份额实际上是如何加以调节的。

[15_1].The money that the man spends really represents some sacrifice on his own part; and a full statement of the theory of value would take us into a psychological region whenever we speak of cost, as it does whenever we speak of utility. Cost is, in the last analysis, pain inflicted, just as utility is pleasure conferred. So far in the study we do not now need to go. It is enough, for present purposes, that the man, as a result of his sacrifices, has dimes to spend and is studying how to make the most of them.

[16_1].人们所花的钱，实际上是产品成本代价；价值理论的一种详细的说法，当把我们引入一个心理学领域，在这个领域，只要我们一说起成本，仿佛我们也就说起效用似的。说到底，成本无非也就是招致的痛苦，就像效用，是由别人给予的令人偷快的事。就这里所作的研究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再深入一步。对目前的目的来说，这个人由于付出了成本代价，因此，他只剩少量的钱来支配，他得研究如何购买其余的大部分商品。

Chapter XVI How the Marginal Efficiency of Consumers' Wealth is measured

第十六章 如何计量消费者财富的边际效率

The simplest condition in which the law of value could act would be a state in which each article in the stock of consumers' goods was able to render one kind of service, and that only, to the man who used it. Let us, then, at first assume that this is the fact, and later let us modify the assumption,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ifferent kinds of service that a commodity can actually render.

价值规律所依存的最简单的条件就是消费品存货中的能给其使用者提供某种服务。因此，我们先假定这就是事实，等适当的时候我们再完善这一假设，即把一种商品实际上所能提供的各种不同的服务完全考虑在内。

It is a psychological fact that a person cannot receive, at any given time, more than one service of a particular kind. If at this moment you can confer on him one particular benefit, you cannot, at the same moment, confer on him a second benefit that is the exact duplicate of the first. There is a difficulty encountered, in appealing to a consumer with two services that are quite alike, which is akin to the physical difficulty that is experienced if one tries to make two material objects occupy the same space at the same time. Two utilities that are absolutely alike need, as it were, to get access to the same spot on the consumer's sensorium; and they cannot do it at once. There is no enjoying two absolutely

similar pleasures together. They must come in turns, if they are to be enjoyed at all.

在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可能同时接受一种以上的服务，这是一种心理事实。假如此刻你能使一个人获得某种利益，但你不可能在同一时刻使他获得与第一种同样的第二种利益。让消费者对完全相同的两种服务产生浓厚兴趣的难度，就像尝试让两个物体同时占用相同空间所遇到的难度一样。两种完全相同的效用，在某种程度上，要与消费者感官系统处在同一环境，然而不会立刻实现。共同感受两种完全相似的喜悦乐事的情况不存在。要让人们乐在其中，这两种乐事就得相继出现。

If any commodity were able to render only one service, then, for use within a particular period of time, a first unit of it would have a positive utility and a second unit would have a negative one. Any unit after the first would be in the way, and the possessor would take some trouble to get rid of it. Having a coat of a certain kind, he would have no immediate use for another made of the same goods and cut in the same pattern. If he possessed such a coat and had to use it at once, if at all, and if there were no secondary use that he could make of it, any tramp might have it for the asking.

如果任何一种商品只能提供一种服务，那么，在特定的时期使用，第一个服务单位具有某种正效用，第二个服务单位具有某种负效用。第一个单位后的任何一个单位，就会都是近在咫尺，因此，拥有者就得设法消除这种过近的空间距离。拥有一款外套，如果再有一件衣料完全相同裁剪也是一样的，那他就会把这件挂在衣柜里。要是他真拥有这样一件外套，而且还非得立即穿上不可，且再绞尽脑汁也绝

对想不出第二条使用途径了，那么，任何一个流浪汉只需向他要求一下便就能获得这件外套了。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re is no utility curve for this commodity. The line that expresses the usefulness of successive units of it will show an abrupt drop from a point that indicates a plus quantity to a point that indicates a minus one. Let positive utilities be measured upward from the line GH, and let negative utilities, usually called disutilities, be measured downward from that line. The line descending from A to the line GH measures the amount of service rendered to a consumer by one unit of the commodity A, and the line ascending from A' to the line GH measures the disutility of a second increment of it. In like manner, the lines from B, C, D, E and F measure the usefulness of the first increments of these things; and those ascending from B', C', D', E' and F' measure the disutility of the second increments. The curve that descends through A, B, C, D, E and F is the only utility curve that the case affords. It describes the diminishing amounts of different utilities arranged in a series. The line from each of these letters to the horizontal line GH measures the importance of each single service, which is the only one of its kind that the man is receiving.

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商品就没有效用曲线。如图16—1，表示该商品接续几个单位效用的这条线，就将显示从一个正量的点突降至一个负量的点。假定正效用以线段GH自下而上予以计量，而通常称作无效应的负效用则以该线自上而下予以计量。自A向线段GH下行的那条线，计量一个单位商品A向某个消费者提供的服务数量，而自A’向线段GH上行的那条线段，则计量上述商品第二个增量的负效用。以同样的方式，自B、C、D、E和F等点下行各线，都是计量这些商品的

第一个增量的效用的；自B’、C’、D’、E‘和F‘上行各线，则都计量其第二个增量的负效用的。穿越A、B、C、D、E和F的那条下行曲线，为此例的唯一效用曲线，它描述的是不同系列分类的效用递减数量。从这些字母的每行起，直至水平线GH的那条线是计量各项服务的重要性，这是人们所能获得的唯一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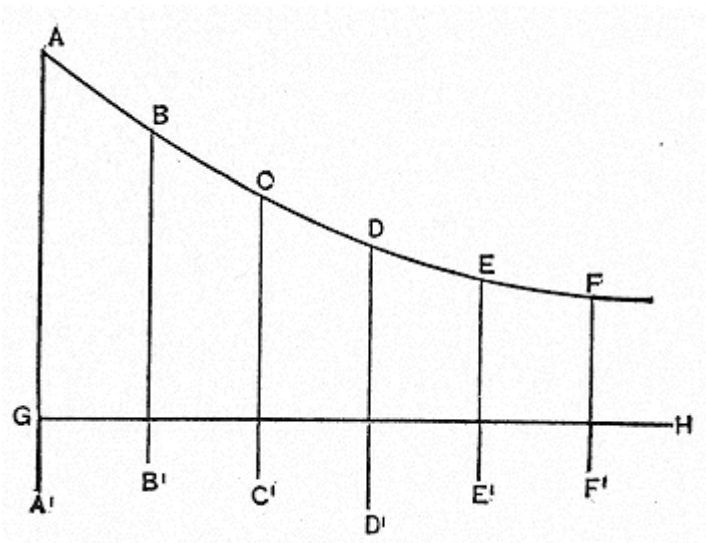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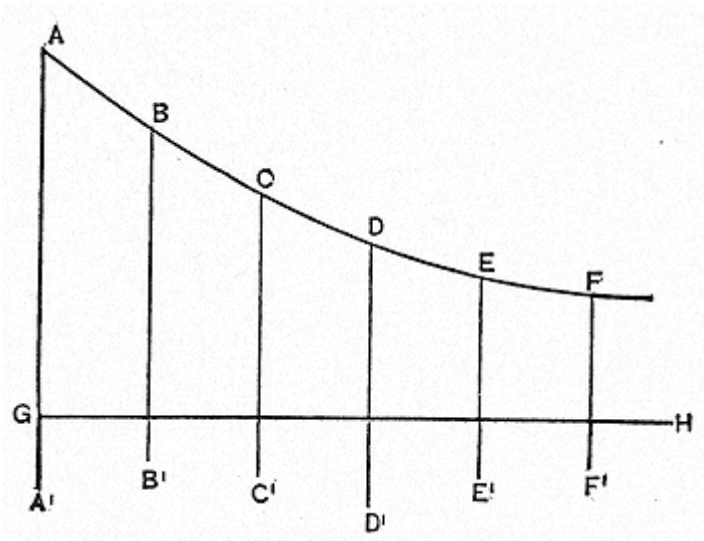

(Fig.10)

图16 - 1

Here we have the primary law of value. Of a series of utilities that are exactly alike, the first is measured by a positive quantity and all following ones by negative quantities. These negative quantities, moreover, grow larger as the number of similar utilities is multiplied: a second superfluous A is somewhat more in the way than is a first one, and a third is a still more annoying incumbrance. The same is true of successive B's, C's, etc.

这里，我们要说一说基本价值规律了。在一系列的相同的效用中，第一种效用按照正量计量，其余则都按照负量计量。而且，随着

相似效用的倍增，这些负效用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一个人现有第二个不必要的A，与第一个相比，已经是够令人心烦的了；第三个，那更是属于一种令人生厌的累赘了；连续出现B、C等情况也都是如此。

We may, however, often get secondary services out of goods, by devoting them to uses so distinct from the services which they primarily render that we can use two similar commodities at once. The case of the rolls of bread cited by Professor von Böhm-Bawerk [16_1] is an instance of this kind. Some of the bread is there used as food for the man who possesses it, and the remainder serves to feed his dog. There we obviate the psychological difficulty which arises from the impossibility of rendering two services to the same consumer at the same time by introducing a second sentient being, a four-footed consumer, for whose welfare the man is concerned.

然而，我们还是常可以从货物中获得某种从属的服务的，那就是把同类商品用于别的用途，同类产品的别种用途与商品首次提供的用途有如此差别，以至于我们感觉是在用两种相似的商品。冯·庞巴维克教授所说的面包卷一例 [17_1] 就是这类中的一个例子。有面包卷的人们把其中一些当作食品用，多余的用来喂狗。通过对关乎人类幸福的第二类有知觉力的生物——四足的消费者的介绍，我们也就避免了同时给同一消费者提供两种服务的心理难题。

We can usually get secondary services from goods, by ceasing to limit the time in which they must be rendered. One might, for example, have furnishings, decorations, equipage, etc., at a city residence and similar things at a country house. The owner would then use the two sets of commodities in turn, the real utility of one set consisting in saving the cost of transportation of the other set. In

all cases like this, the second unit of the commodity is virtually a different thing from the first one. It may be commercially the same article, but it is a different consumers' good. It appeals to a different want, and may be of some use to the person who is already enjoying the first unit of the commodity.

通常我们可以从货物中获得第二类服务，条件是不限定交货时间。例如，购置的如果是城市住宅，那人们便可以获得成套家庭用具、装饰、装潢等服务；如果购置的是乡间住宅，情况也相似。于是，所有者就都可以使用两类商品了，一类的实际效用存在于另一类运费的节约部分。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商品的第二个单位实际上是有别于第一个单位的。第二个单位的商品，就其商业意义来说，可以是同一种商品，但它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的消费品。它满足不同人的心理需求，对已享用该商品第一个单位的人来说或许有某种用处。

If we assume that our commodity renders only one service, we do not vitiate the principle on which value is based, and we make a gain in simplicity of statement. In making such an assumption, we put out of view the subsidiary services that a thing can often render—we forget that the roll of Professor von Böhm-Bawerk's illustration can feed the dog, as well as the man. This is separating, in a bodily way, the utilities that the market actually appraises separately. The primary fact about such isolated utilities is that we can use only one of them at a time, for a second one is worth less than nothing. The figure on page 232, then, shows what goods have a part in fixing market prices—namely, those only which are indicated by the letter F of the diagram. Each article, let us say, costs a dollar. Since all of them except F afford consumers' surpluses, or “rents,” they are not on the margin of consumption, and you may ask somewhat more than you do for any of them

without losing this customer; but if you raise the price of the last thing that is within his purchase limit, he will stop buying it. A, B, C, D and E are not, in this man's case, price-making articles.

即使我们假设任何商品仅提供一种服务，那我们也没有使价值基础的规律失去说服力。在作这种假设时，我们不考虑某种物品常常提供的辅助服务——我们不再把冯·庞巴维克教授所举的例子中那种既可以喂狗又可供人吃的面包卷放在心上。这是把整体市场上的物品的效用分门别类地予以分析了。有关这样一种独立效用的主要事实是我们一次仅用一次，待到第二次使用，这种物品便没有什么效用价值了。于是，第232页的图是用于证实有哪几种货物在决定市场价格上有作用的——也就是图中标有字母F的商品。假定每一种商品的成本都是1美元，既然除F外其余都是提供消费者剩余或是“租金”的，那么，它们也就都不在消费品范围之内了，而你完全可以要求比过去任何时候的任何一种商品价格都高，而且还不至于失去这一顾客；但如果你提高在其购买范围内那最后一样东西的价格的话，那他就会不买它了。A、B、C、D和E对这个人的情况来说，并非是定价的商品。

How, then, do these commodities get their market value? Somewhere in society there obviously must be a point at which the sale of these things will stop, if the price becomes higher than it is. There are, in fact, a number of such points. There are men in whose scale of consumption E, for example, is a marginal article. The price of E is made to be what it is, in order that these men may buy it, for their purchases are needed to carry off the supply of it. There are, again, other men to whom D is a marginal commodity; and there are those to whom, respectively, C, B and A are marginal. For each commodity, separately considered, there is a group of purchasers who will cease to buy the article, if it becomes more costly; and this group of men is, therefore, the social price-making class for this

commodity. It is to insure the patronage of this class that the makers of the article put the price where it is.

那么，这些商品怎样实现市场价值呢？如果价格提高了，那么很明显这些商品在社会上的销售必然在某处某个时刻停止。事实上，此类时刻就有很多。例如，在消费层级E上人们消费的是一种边际商品，这样决定E的价格是以人们会购买它为前提的。因为要使这种商品的供给成功地销售出去，他们的购买可是不可或缺的。又有一些人，D、C、B、A对他们来说分别是一种边际商品。关于D、C、B和A的情况，如果分别加以考虑，那就得有这么一批购买者，如果涨价了，这些商品他们就不会购买，因此，这批人就是这种商品的社会定价阶层。该商品的制造商必须合理地定价，就是旨在确保这个阶层的光顾。

Now tie these articles together, in different combinations, and sell the entire bundles. Let one combination contain all the utilities; let another contain A, B, C, D and E; let a third contain A, B, C and D; let a fourth contain A, B and C; and let a fifth contain A and B. Let A stand alone and be separately procurable. How is the law of value affected by this bunching process? Does the selling of A, B, C, D and E in the same bundle with F give to these things any power over prices that they did not have before? Not at all. F is still the sole price maker, in the case of the men who buy it. The man whose scale of consumption already contained all the articles, to and including F, will buy them all, as he did before; and of them all only F will, by the amount of its utility, act in adjusting values.

现在，按照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把这些商品结合在一起作捆绑式销售，让种种组合包含所有效用；让另一个组合包含A、B、C、D和

E；再让第三个组合包含A、B、C和D；让第四个组合包含A、B和C；令第五个组合包含A和B。设A为独立的效用，因而可以单独购买。价值规律是怎样受捆绑式销售的影响的呢？把A、B、C、D和E与F捆绑在一起销售，就使这些商品具有了原先没有的影响价格的能力了吗？根本没有。F，就购买它的那些人来说，仍然是唯一定价者。消费层级已经包括从A直至F的这个人，他会一如既往地一切全买；其中，唯F是按其所具有的效用总量起到调节价值的作用。

If F becomes dearer, this purchaser will not buy the bundle of goods containing it: be will buy only the bundle that contains the other articles, and E will now be the thing procured by his marginal purchase. All the men in his economic status will do this; and the demand for the combinations of goods terminating with E will be quickened, while that for the bundles which have F, in addition to these things, will be slackened. Production will adapt itself to the changed demand. More combinations without F and fewer with F will be the result. The net effect is precisely what it would have been, if each article had been sold by itself. A rise in the price of F has caused the men with whom F was a marginal article to cease buying it. A return of the price of F to its former level would cause them to resume their purchases of it. The price of F, in fact, adapts itself to the utility that this article has in the want scale of this class of men.

如果F昂贵一些了，那么，这一购买者就不会购买包括F在内的那些货物了；他要买的，也就是包含其他各种商品的商品了；而E，现在则成了他的一种边际采购商品了。同他经济地位相同的所有人都会如此。对到E为止的所有的货物组合的需求都会变得更加活跃，而对包括这一切以及F在内的那些捆绑式组合产品的需求就会变得愈来愈少。生产会自行调节以适应需求的变化，结果就会是不包括F在内的

组合越来越多，而包括F在内的组合越来越少。最终结果也就正好是各种商品都能单独得以销售的这样一种状况。F涨价导致以F成为边际产品的人们不再购买它。F价格的回落则使人们重新开始购买它。事实上，F的价格对效用有适应性，该商品是该消费阶层急需的商品。

The price of E is regulated in a similar manner, but the regulating is accomplished by a different set of purchasers. There is a class of men to whom E is the marginal article; and a rise in the price of it would cause the members of this class to stop buying it. They do this in the way already described, by ceasing to take the bundles of goods containing E and taking instead those having D as the least needed or marginal article. Restore the former price of E, and this class of consumers will renew their habit of purchasing the combination containing it. This class, then, is the one whose estimate sets the market value of E. Another class of men similarly do the price making for D, since this is their marginal commodity. For each article, in short, one class of persons is in the strategic position, at the point in the economic society where values are determined. The estimates that members of this class may make of the utilities of other articles have no direct influence on values. [16_2]

E的价格以类似方式加以调节，不过，这一调节是由另外的一批购买者完成的。有这样一个阶层的人，E对他们来说是边际商品，它一涨价，这个阶层的人就会因此而立即持币观望。他们的做法是停购含E的货物，取而代之的是购买含最不需要或边际产品D在内的那些商品。E的价格恢复，这个阶层的消费者就会像以前一样，重新购买含E的产品组合了。由此可见，这个阶层是以自己的估计来决定E的市场价值的一个阶层。另一个阶层的人与此相似，是为D定价的一个阶层，因为D是他们的边际产品。总之，对于每一种商品来说，都会有一个明确的阶层，他们处于决定价值的经济社会之中的战略位置。不

过，这个阶层的人就他种商品的效用所作的估计，是不会对价值产生直接影响的。[17_2]

Now we are ready to see how values are in reality adjusted. Every article, except one of the poorest and simplest kind, is a composite of different utilities, and can render various unlike kinds of service at once. It is only for the sake of these services that it is wanted or bought. Utilities, as we have said and as we cannot say too emphatically, are all that the market takes account of in fixing values. Commercial dealing has its way of measuring the importance of each specific service that an article can render, and of fixing the value of it so as to make it express these measures. In every such commodity there is a marginal utility, and this is the only one that counts in fixing the price of it. Every commodity, except the poorest and cheapest that can be made, is, in effect, such a bundle of service-rendering elements as we have just described. The marginal element in the bundle has a direct influence on prices, but the other elements have none.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价值实际上是怎样决定的。除质量最低、最简单的商品以外，每一种商品都是各种不同效用的一种合成物，而且都可以立即提供各种各样不同的服务。其所以为人们所需要或购买，就因为有这种种服务。效用，正如我们所说的，而且正如我们不能有失偏颇地说的，都是在决定价值时市场必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商业交易自有其衡量一种商品所能提供的各种服务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的方法，来使之能表达出这些计量的结果。诸如此类的商品中，每一种都有某种边际效用，而且这是决定该商品价格时计人的唯一效用。除质量最低、最廉价者外，可以生产的每一种商品，实际上都是像我们所描述的一样，是捆绑式地结合在一起提供服务的要素。这种捆绑式结合中的边际要素对价格有直接影响，但另外的要素则没有此类影响。

For example, let A, B, C, D, E and F represent, not separate articles, of which each can render one service, but separate utilities in one article of a high grade. There are six different things that this article can do for a man who uses it; and, as the services are dissimilar, they can be rendered at the same time. A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utilities, or service-rendering powers, and F is the least important. F is, then, for the time the only price maker. If this article, with all these qualities, becomes more costly, buyers will cease to take the article which has that quality and will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the one that is of the next lower grade. They will, in other words, cease to buy a bundle of utilities including all from A to F and will buy instead the bundle that includes the list ending with E. The demand for the utility, F, is thus slackened, and the price of that particular value element tends to fall.

例如，假设A、B、C、D、E和F各种不同的商品，其中的每一种都能提供某种服务，它们的效用有高低之分。这种商品可为使用者提供的六种不同的服务；由于这些服务各不相同，因此，它们是可以同时提供的。A是这些效用中或是提供服务的能力中最重要的一种，F则是最次要的一种。因此，F暂时是唯一定价者。要是具有全部效用的这种商品价格提高了，则购买者就不会再购买那种商品了，而选用档次低一级的产品。换句话说，他们会不再购买包括A至F在内的一切效用，而是购买包括从A到E的所有商品在内的全部效用。对效用F的需求因而减少了，而这种特殊价值要素的价格也就随着下降了。

That this is no bit of pure imagination, may be seen by examining the workings of the market for any kind of goods of high quality. Our illustration is, in fact, far from making our theoretical statement actually as subtle as is the working of demand and supply

in the commercial world. Unerringly does this process single out the value elements in goods and adjust prices, in all cases, by appraisal of the marginal element in them.

这决非纯属想像，只要考察一下任何一类优质货物市场的运行情况即可明白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所举的实例不是在理论上的说明，而是像商业领域商品供求的运行一样那么精妙。找出货物中的价值要素并进行价格调整，就商品中的边际要素做出评价，这个过程也就准确地完成了。

Here, for example, is a canoe that a man keeps, for his recreation, in a lake in the wilderness. It is a composite article; and, if we were to analyze it into the elements that give it value, we should find that, for all economic purposes, it virtually consists in a series of utilities. This series of economic qualities, named in the order of their importance, would stand somewhat as follows:—

例如，一个在荒野湖中供人消遣的一只小划子，它是一种复合型的商品；而且，要是我们要把它分成使之具有价值的若干要素也就会发现，就一切经济目的来说，实际上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一系列的效用。此一系列经济效用，按其重要性顺次命名，大致如下：

(1) Power to keep a man afloat. A dead tree would have this quality.

(l) 使人飘浮的能力。一棵枯死的树就具有这一性质。

(2) Power to carry a man across stretches of deep water. A smooth log could render this service.

(2）载人渡过整片深水区的能力。一根平滑的原木能提供这种服务。

(3) Power to keep an occupant dry and comfortable, and to carry his effects. A dugout would do this.

(3）这种使人们都保持不沾水并舒舒服服，而且感到不虚此行的能力。一只小划子就能做到。

(4) Power to move swiftly and to ride waves safely. A well-made sailing canoe would do this.

(4）迅速易地且安全破浪航进的能力。一只精工巧制的小划子就能胜任此事。

(5) Power to gratify the owner's taste. A gracefully shaped vessel, with appropriate colors and fittings, does this.

(5）满足所有者喜好的能力。造型优雅、色泽亮丽、设备齐全的一艘轮船堪当此任。

Here are five distinct services that the sailing canoe renders, and of them all the first is the most important. A means of floating is what the man absolutely needs, if he is to entrust himself at all to the waters. The capacity to sustain the man on the surface of the lake is, then, the primary utility of the canoe. If the man embarks on the water at all, there is no limit to the “subjective value” that he would assign to this quality in the thing that he uses to sustain him. Though this thing were only a dead tree rolled into the water, the one utility that it has is greater than is any other utility that the best canoe can possess. Nothing whatever in the finished and graceful craft is as important to the owner as that element in it which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equivalent of a floating tree. The quality that is next in importance is power to move, and this a smooth log possesses. The third is the increased commodiousness afforded by the dugout, the next is the speed possessed by the well-shaped canoe with its sail, and the last is the elegance of the handsomely shaped and decorated vessel.

这里所讲的是一只小划子提供的各不相同的五类服务，其中的第一项是最重要。人们在水中要想安全，某种飘浮工具就绝不可少。因此，支撑人在湖面上而不至于沉人水中的那种能力，就是这只小划子的首要效用。若他从事水上工作，那么，他一定会赋予他的工具效用无限的“主观价值”了。尽管这一工具也就是水中的一棵枯树而已，可它具有的这一效用则是比最好的小划子所能具有的任何其他效用都还要大。在所有者看来，就此精致优美的飘浮物来说，再没有堪与一根飘浮的枯树相比的东西了。第二重要的性质这根平滑的原木的移动能力。再者，这个小划子还有的宽畅的舒适度、优美的造型、较快的速度以及内饰装磺精美的考究程度。

Figuratively speaking, in a very good canoe there are a dead

tree, a log, a dugout, a convenient sailing boat and an elegant one; for the qualities of all these things are massed in the one craft that a sportsman actually procures. We need, however, to see clearly that only the last of these qualities is, in the economic sense, a final utility and that the whole boat cannot be such. The boat in its entirety includes utilities of every grade. For them all the owner may have given seventy-five dollars; but he would, perhaps, have given a thousand, if he had paid what would measure the individual importance of the various utilities. The power of the canoe to keep him afloat would be worth five hundred dollars to him, if he could not have it for less. The power to move to and fro would be worth three hundred. Carrying power counts for one hundred dollars, speed of movement for seventy-five and decoration for twenty-five. These sums represent what he would give, if he had to do so, for the various utilities in this commodity. If this man were the marginal purchaser of this whole commodity, a thousand dollars would then be the price of it.

比方说，相比一只很好的小划子，有一棵枯树、一根原木、一只独木舟、一艘方便且考究的帆船，这一切的特质都集中体现在一名运动员实际上所获得的那一条小船上。不过，我们必须铭记，就经济学的意义来说，这些特质中，只有最后那一种才是最终效用，而不可能是整艘船。就其整体而言，该船包括各种等级的效用。它的所有者为所有这些效用很可能要支付75美元；但若按各种效用各自所具有的重要性来说，他或许要支付1000美元。小划子使他在水面上飘浮的那种能力，就他而言，至少也值得为之付出500美元。使人们得以乘木筏往返的这一能力应当值300美元。运载能力算100美元，航速75美元，装饰25美元。这些金额是他为这种商品各式各样的效用所支付的。要是此人就是这一商品的边际购买者，那么，他要付出1000美元。

The last quality that the boat possesses is a final utility in the true sense. If the decoration of this vessel cost thirty dollars, the fisherman would buy a less ornate canoe. The demand for decorated vessels would thus be reduced, and the demand for vessels of the less ornate type would be increased. More canoes of the inferior kind would be made, and there would be fewer of the superior kind. The net result would be a reduction in the output of that product which consists in utility number five in the series. As many canoes would be made as before, but they would be without the special decoration that constitutes the final utility in the canoes of the highest quality. In canoes costing seventy-five dollars, this utility is clearly the only one the measure of which is a gauge of price.

这只小划子所具有的最后一种特质是它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最终效用。若这只小划子的装饰价值是30美元的话，那么，一个渔夫就会买装饰略差点的小划子。对装饰华丽的小划子的需求随之便会减少，而对装饰简陋的小划子的需求增加。于是就会多生产质量较差独的木舟，而少生产质量优良的独木舟。最终结果是，那种产品量下降的产品在产品系列中属于效用居第五位的产品。小划子产量还会和以前一样，但这些小划子中，不会有构成最终效用的那种独特装饰的、质量最佳的一类小划子。在价值75美元的小划子中，这种效用显然是唯一的价格标准。

How, then, do the other utilities in the boat get their market valuation? There is a class of persons to whom the fourth utility in the canoe, its speed, is the final one. They buy boats of the fourth grade instead of those of the fifth, doing without the decorations. The amount that these men spend, in order to insure a boat that will sail by some points faster than another would do, yields to them, in pleasure, a result that is worth just what it costs. The

floating power of the boat and its other intra-marginal qualities are, however, worth to them more than they cost—they yield a “consumers' rent,” or a gain that exceeds the gain that can be had by a marginal purchase. To this class of men, therefore, only the fourth utility in the canoe is a price-making one. In consequence of the demand of this class of persons, this utility may bring twenty dollars in the market.

那么，此类小木筏的其他效用又怎样获得市场定价呢？有这么一个阶层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小伐子的第四效用，速度是最终效用。他们购买额是未作任何装饰第四等级的而非的第五等级的小划子。为确保获得航速高一点的小划子，这些人的花费程度决定快乐程度，而这是投入与产出正好相等的一种结果。不过，小划子的飘浮能力以及其他边缘的特质其产出比成本高，因而也就产生了某种“消费者租金”，也就是大于某种最低限度购买所得的一项收益。因此，对于这个阶层的人来说，只有小划子的第四种效用才是一种定价的效用。由于存在这个阶层的人的需求，因而该效用在市场会价值20美元。

There is, likewise, a class of persons to whom the third utility in this composite article is marginal; and these men are the consumers whose demand sets the market value of this third utility. They sacrifice speed, contenting themselves with comfort; and their demand may make this utility worth fifteen dollars. There is, again, a class of buyers who fix the price of the second utility—say, at ten dollars—and another of those who fix the price of the first utility—say, at five dollars. If there are five distinct services rendered by such a pleasure craft as we have selected for illustration, it takes five distinct classes of persons to fix the value of it in the market. The law of final utility works as it would if each service-rendering

power possessed by the boat were a distinct article.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the different utilities are different articles tied in bundles, some of which contain all five of the articles, some four, some three, etc. To no one consumer are all these virtually different things final utilities. A bundle, as a whole, is never a final unit of any one's consumers' wealth; but each element in it is a final utility to some class, and it is that class only whose mental estimate of it fixes its price. There are, then, five prices in the canoe. Expressing the values of the five different services which the canoe renders, they are, respectively, twenty-five, twenty, fifteen, ten and five dollars. The entire canoe, then, brings seventy-five dollars in the market.

同样，还有一个阶层的人，对他们来说，该复合式产品的第三种效用是不重要的；而这第三种效用的市场价值是由他们的需求所决定的。他们享受舒适，因此，速度就无暇顾及了；他们的需求有可能使此第三效用定价为15美元。还有一个阶层的购买者，他们把第二种效用的价格定为——比方说10美元；再有一个阶层把第一效用的价格确定为——比方说5美元。假如有某种娱乐业——这些娱乐业，是我们选择的例子——提供了五种各具特色的服务的话，那就得有五个独特阶层的人，来确定其市场价值。最终效用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仿佛是这小木筏所拥有的每一种提供服务的能力都成了某种独特的产品。对于所有意图和所有目的来说，各种不同的效用都是呈捆绑式地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有的五种效用全包含在内，也有包含四种、三种的，等等。没有一个消费者会把所有各不相同的商品视为最终效用。作为一价整体结合而成的一批产品，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消费资料的最终一个单位，但其中的每一个要素，则都是某个阶层的最终效用；而且决定最终效用的价格的也就是该阶层的心理估价。因此，该小木筏也就有五种价格。把小划子提供的五种各不相同的服务的价值一一表述出来，它们分别就是25美元、20美元、15美元、10美元和5美元。可见，整个小划子的市场价是75美元。

Make watches dearer than they are, and the man who pays a hundred dollars for a watch will not go without one. He will buy one that formerly sold for ninety dollars, and will forego something in the way of ornamentation. Another class will take the grade that lately sold for eighty dollars, and will forego something in the way of accuracy. Each class will give up, not watches, but something in watches. A certain class that formerly bought dollar watches will, however, give them up altogether, since there is no cheaper pocket timepiece to be had. To these men the lowest grade of watches, taken in their entirety, may be rated as final utilities. Their demand fixes the price of watches of this first and lowest grade.

如果把手表的价格定得比实际价格高一些的话，那么，原本要花100美元买手表的人现在决不会空手而归，也即他会买一只原售价90美元的手表，而且还会放弃属于装饰品一类的东西。另一个阶层会购买原售价为80美元的这一档次的手表，而且放弃精确性一类特质的要素。各个阶层都不会放弃手表，而是放弃手表中的某种要素。然而，原购买1美元一只的手表的某个阶层就会不买这些表，因为再不会有比这种表更便宜的了。对于这些人来说，作为一个整体，那最低档次的手表可以列为最终效用。这些人的需求既决定最高级手表的价格，又决定最低级手表的价格。

Although this statement may seem to take us into a region of theoretical subtlety, there is no doubt of the substantial fact that the market acts in this analytical way, and that the commerce of the world takes a character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is action. Over the whole world the mills would be turning out different goods from those that they are now making, ships and railway cars would have different contents from those that they now contain, shops would

everywhere have different goods in their windows and on their shelves and counters, if the law of final utility, as applied to goods in their entirety, determined the values of the goods. If we could make the theory of value, as it is commonly stated, rule actual markets, we should radically change the prices of all kinds of goods; and in doing this we should change the quantity of goods of each kind that is produced and used—we should effect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world. Goods of fine quality would then be, as a rule, many times dearer than they are.

虽然这样说似乎会把我们引向一个理论上的微妙领域，但毫无疑问，还是有大量事实表明，市场就是以这种分析方法起着作用，且在商业世界中扮演着一种角色，而这一角色就是这一作用的结果。要是应用于各种商品的最终效用规律决定其价值的情形的话，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工厂都会生产出各种和现在不一样的货物，轮船和铁路车辆都会有和现在不一样的容量，各地的商店的橱窗、货架和柜台上，都会有形形色色的商品陈列。假如我们能够使价值理论就像通常所表述的那样支配实际市场一样，那我们就应该彻底改变各种商品的价格；而且，实施这一改变时，我们还得改变生产和使用的各种货物的产量——我们应该实现世界经济生活的一种彻底转变。一般说来，此时精品的价格就会比它们现在的价格高好几倍。

If we were here undertaking to present at length the theory of value, we should lay great stress on the fact that value is a social phenomenon. Things sell, indeed, according to their final utilities; but it is their final utilities to society. In the social body as a whole, every utility in a costly article is somewhere in the position of a final utility. The shanty that, in an earlier illustration, we found was virtually contained in the palace, is a final utility to some members of society; and it is their valuation that fixes the market rate which

that element in the palace commands. This quality in the palace we may call the first of the value elements that compose it. It is the lowest and cheapest of the economic constituents that compose the royal dwelling, and may be had for a hundred dolla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hanty and a cottage may be regarded as the second value element; and this also has its marginal purchasers. If it were possible to make the shanty and then to transform it into a cottage, the two value elements would be produced at different times. What is actually done, however, is to build the cottage instead of building the shanty; and the second class of purchasers gauge by their demand the value of this substitution. It is in this way that a distinct class of buyers has the fixing of the actual price of each value element that enters into a palatial dwelling. If there are ten grades of watches, and if, therefore, it takes ten classes of purchasers to fix the value of a watch of the highest grade, each of these classes may be regarded as the social valuers and appraisers of the particular value element that, in the consumption of its members, is a final utility. In general, then, when fine articles—composite things, bundles of distinct elements—are offered to society, the great composite consumer, each element has somewhere in the social organism the effect of fixing a part of the total value. In no other way can the article, as a whole, get a valuation. To no individual are all its utilities final. [16_3]

要是在此我们是试图详细描述价值理论的话，那么，我们就得特别强调指出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事实。实际上，各种产品都是根据最终效用价值得以出售的，但是，这指的是它们对社会而言的最终效用。就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来说，某种昂贵商品的各种效用都处于某种最终效用的地位。我们认为，在前面所举的关于王宫中简陋小屋的例子中，对某些社会成员来说，就是一种最终效用；决定王宫的那个基本组成部分所控制的市场价格，正是那些社会成员所作的估价。

王宫的这一显赫社会地位，我们不妨称之为构成该地位众多要素中的第一个。构成王室住宅的，则是那些经济组成部分中最低廉的部分，这些部分或许用100美元就可以买到。该简陋小屋与一座独幢小楼的区别可以看成是第二个价值要素；而且，它也有其边际购买者。假如先盖简陋小屋然后再改成独幢小楼行得通的话，那么，这两个价值要素就会在不同时间产生了。但是，实际上做的是盖了单幢小楼，而非简陋小屋；第二阶层的买主，按其需求估计了这一替代品的价值。这一独特阶层的买主，则以此方式决定构成一个宫殿式住宅的每一个价值要素的实际价格。如果手表分为十个等级的话，那么，要是由十个阶层的买主决定最高级手表的价值，那么，这些阶层中的每一个层次都可以看成是特定价值要素的社会估价人和鉴定人。这个价值要素，在其成员的消费中，就是一种最终效用。因此，一般说来，当复合物，即捆绑式独特要素这样的精品提供给社会时，也即提供给这大批消费者时，每一个要素都在社会有机体某处有决定社会价值一部分的作用。这种商品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别的办法得到定价，它的效用对谁也不是最终的。 [17_3]

If the prices of the boats rise, the man who is about to purchase an outfit of them has the alternative of getting on with one less than he had intended to procure, or keeping the proposed number intact and somewhat reducing the quality of all. If he had intended to buy five boats, for use on five different bodies of water, he may content himself with four; and, in lieu of the fifth, he may submit to the inconvenience of carrying one of the others occasionally to the lake where the fifth would have been kept. If this is a smaller sacrifice than is involved in reducing the quality of (say) three of the less important boats, it is conceivable that we have here an exceptional case, in which an entire marginal article of a high grade figures as a price-making increment of consumers' wealth. The man may buy no boats but those of the quality that he had intended to buy before the price was raised, but he may take fewer of them. The utility of

the final one, consisting solely in its power to save to the owner the trouble of having a boat transported, will furnish a gauge for the price that this man will pay for all boats of this kind. It is the fortuitous fact that the article has secondary uses which makes this mode of adjusting the price of it possible.

假如这些船都涨价了，那么，正准备买下全套船只的那个人，就有这样一种两者择一的选择，即按原计划买下全套船只，或者只购买其中的一部分。假如购船者原打算买五条船，在五种不同的水域中使用，那么他现在也许买四条就够了，而且对于偶尔用这四条船中的一条代替第五条船在其适用的湖中使用所带来的不便，也可以接受。如果减少三条次要船只数量相比，这只是较小的牺牲的话，那么有一种例外的情况，即全部的高级边际商品作为消费资料的定价增量来计算，也是可能的。除了涨价前他已经打算购买的船只外，购船者可能不再购买别的船了，然而他也可能会少买两条。最后一条船的效用就是是其所有者有一条船作为交通工具，而这种效用会提供一个定价标准，是这个人买下所有这种种类的船。也有一种偶然的情况，就是这一商品的次要用途使他自身具有了这种调价的模式。

The line of conduct that the owner of these boats is here supposed to pursue is, be it noted, not the line that consumers usually pursue. In a vast majority of cases, a rise in the price of goods of a particular kind throws, not entire goods, but marginal qualities in goods out of use. Even in the case—not over-frequent—of the man who is about to buy several exactly similar boats, the chances are ten to one that a rise in price would cause him to forego something in the quality of one or more of them. If he does this,—if he takes cheaper boats for the less important uses,—the principle that we have stated applies.

假定这些小船所有者在这里会遵循某种处理方式，诚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不是消费者习以为常的那样一种。就绝大多数的情形来说，某种货物的涨价，势必使质量差的边际货物而非全部货物不再有人使用。即使就准备买几艘非常相似的小船的人——并非太频繁——这种情形，涨价导致他废弃其中一艘或若干艘有质量问题的小船的可能性为十分之一。假如他这样做了，假如他误以为价廉船只就是低质量船只的话，那么我们所阐述的规律就适用了。

Goods of the very poorest grade may, indeed, be marginal in their entirety. If there is no cheaper kind to which one may resort, he must take this grade or nothing. Even then he will doubtless seek for some article, of a somewhat different kind, that will serve as a partial substitute for what he foregoes and, when he does this, the effect is much the same as if a still poorer grade of the article that is foregone had existed.

实际上，质量等级最低的货物，就其整体而言，就可能是边际商品。如果有人要买的商品再没有比它价格还低的了，那他要么就买这种商品，要么就什么都不买了。即使此时，他也还会果断地寻找颇有些不同的某种商品，以此种商品当他废弃了的船只的代用品；如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其结果仿佛也就是被丢弃了的质量等级还要低的那种商品还是存在的。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most articles deteriorate in the using, so that the only way to keep ones self supplied with perfect or nearly perfect goods of this kind is to get new ones often. Wear a coat a few weeks only before discarding it, and be equally liberal with the remainder of your wardrobe, and you will always be clothed in garments that are stylish and free from traces wear. You must,

however, buy many coats, etc., in order to do it; and, by thus increasing the quantity of such garments, you real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ose that you use. This, indeed, is the sole object of the increase. Quantity in goods for consumption may thus really insure quality. It is only the last and least utility that has gone out of a coat that has been used for a short season; and it is only for the sake of restoring that marginal utility float the man buys another. The principle that we have stated operates here.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consumers' wealth always mean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nsumption, for new qualities are thus added, in an all-around way, to the things that every one uses. There is a social increment of utilities—a vast and composite addition to the service-rendering qualities of things—that appears at every step in the increasing wealth of the world. Those are the strategic elements which rule the market. The measure of them fixes values. The men who, in each case, do the measuring are the agents of society controlling their respective parts of the whole market for consumers' wealth.

在这里要强调，大多数商品都是在使用过程中磨损的，因而要想使自备的储存货物具有此类完好或近乎完好无损的唯一办法，就是勤快一点和多买些新的。一件外套穿几个星期就丢弃，你还有其他的，你的着装也还是相当得体大方的，你一身的着装也还是相当时尚的，一点也不显得陈旧过时。不过，为做到这一点，你就得多买几套衣服，就为着达到上述所说；而且，由于此类着装件数多了，你也就真的提高了你一身服装的质量了。实际上，这是增加件数的唯一目的。消费品数量一多，质量也就得以确保了。这只是穿了一个短季的外套的最后的、也是最少的效用；而且，也就是为了恢复那边际效用，这个人才又买了一件。我们所阐述的那条规律在这里起作用了。增加消费者财富数量意味着消费质量的提高，因为新的质量让人们所使用的一切都不同了。一种社会的效用增量——给产品提供服务的质量一种巨大而又复杂的增量——这一增量，出现于增加世界财富的每一个阶

段。这些是控制市场的战略要素。这些要素的计量决定价值。在各种情况下，做这种计量工作的人都是控制整个消费者财富市场中各部分的社会要素。

[16_1].See The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by Professor von Böhm-Bawerk, page 146.

[16_2].A full study of value would, of course, notice many things that we here omit. One of them is, that a rise in the price of any article in the list would cause purchasers of the class first mentioned, if their incomes in money remained unchanged, to cease buying F. The demand for the marginal goods of each of the classes of purchasers is thus checked, wherever goods that are not marginal became dearer. Moreover, when a rise in price, either of F or of one of the other things, throws F out of the purchasing list, some article—say, G—may take its place. There is in this, however, nothing that calls for a modification of what we here affirm—namely, that each class of purchasers has its marginal article, that the utility of that article to them has a direct influence in the adjusting of the price of it, and that the utility to these persons of other things has no direct influence on values.

[16_3].A point of much consequence is the fact that many articles have secondary uses, besides those for which they are primarily intended; and so more than one such article may be useful—but for different purposes—to a consumer at one time. The roll, in Professor Böhm-Bawerk's illustration, already cited, can be used to feed a dog as well as a man; and, if we regard the dog, not as a consumer, but as a commodity for his owner's consumption, the roll that appeases the dog's hunger is put to a distinct and subordinate use. Again, the sportsman whose hunting lodge is on one of the Adirondack lakes may keep boats on several other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saving the trouble involved in carrying boats from place to place. None of these boats, of course, except the least useful of them, can, in its entirety, be a marginal and price-making commodity. If the owner, for economy, relinquishes any of his boats, it will be this marginal one; and he will give for no one of them more than the marginal one is worth to him. Does that change the principle that we have just stated, that values rest on marginal utilities in goods rather than on goods in their entirety? Let us see.

[17_1].参看冯·庞巴维克教授所著的《实证资本理论》，第146页。

[17_2].当然，对价值的全面研究应当涉及我们在这里省略了的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价目表中任何一种商品的涨价，都会使首先提及的那个阶层的购买者一旦收

人不变就拒购F。只要原本并非边际货物的商品一有涨价，各阶层购买者对边际货物的需求就会受到抑制。此外，一旦涨价，则不论是F还是另外任何一种商品，都会从采购单上给抹去；而另一种，比方说G,就会取而代之。不过，就此而论，无须对我们这里所证实的加以修改，这就是，各阶层的购买者都有各自的边际商品，对他们而言，那种商品的效用在调节该商品的价格上有直接影响，而该效用对其他商品的卖主，则对价值不产生直接影响。

[17_3].很重要的一点是，很多商品除买主首先关注的用处外，还有第二位的用处，因此，这样的商品其用处就不只是一种，对消费者而言，因购买目的有多种，因而所要买的商品会有满足不同目的的用处。庞巴维克教授例子的面包卷，就可用作人的食品也可以喂狗；而且，假如我们不把狗看作一个消费者，而是视其为他的主人的某种消费品，那么，缓解狗饥饿的面包卷，就是起某种不同的居于第二位作用的东西了。再比方说，爱好打猎等户外运动的人，其暂住的地方位于阿迪朗达克诸湖之中的一个湖上，那他就可能把他的一些小船停靠在另外几个湖上，而其唯一目的就在于免除易地带船之辛劳。当然，这些小船中，除其中用处最小者外，作为一个整体，其余没有一艘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边际的决定价格的商品。假如为节约起见，所有者欲废弃其中的任何一艘小船的话，那么，这废弃的一艘就是边际商品了；而且，他只会把这一艘废弃给某个购买它的边际人，对他来说，这是值得的。这改变了我们刚才阐述了的那种规律，即价值取决于商品的边际效用而不是取决于全部货物了吗？让我们来看看究竟。

Chapter XVII How the Efficiency of Final Increments of Producers' Wealth is tested

第十七章 如何检验生产资料最终增量的效率

We are now ready to apply to the fixing of wages and interest the principle which we may term that of analytical valuation. Everywhere does the market have a marvellous power of resolving concrete things into their elements, and of measuring separately the efficiency of each element. Consumers' wealth and producers' wealth alike it treats in this way. If we are to understand its procedure in fixing prices, we must seek out and identify not, as a rule, certain whole commodities, but certain elements in commodities; and so, if we are to understand the adjusting of interest, we must find in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in a like way, certain elements that are in a strategic position and control the gains of all capital.

现在我们可用分析性估价规律来决定工资和利息。在任何地方，市场都具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即把具体的东西分解成组成要素以及分别计量每一种要素的效率。该规律以同一方式对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作了论述。如果我们要弄懂该规律决定价格的过程，那么，我们要找出并确定的也就是商品的某几种要素而已，而并不是某几种整体的商品。因此，假如要弄懂如何调节利息，我们就得采用类似方法，从生产工具中找到处于主导地位和控制全部资本收益的某几种要素。

The earning power of capital is fixed by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final increment of it; and this final increment of capital does not, as

a rule, consist of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in their entirety. It consists of elements in such instruments. Just as we add to our consumers' wealth by procuring for personal use better articles than those which we have been using, so we add to our producers' wealth by procuring better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When, for a machine that has worn itself out, we substitute one that is by a single point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costly, we are adding a final increment to our capital. It is final increments of capital, as such,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which fixes the rate of interest. As entrepreneurs, we must pay for any capital that we hire what a final increment of it will produce; and that is what we and others can get, as a net addition to our products, by making our buildings by one degree larger or more substantial, our machines by one degree more rapid or more nearly automatic, our engines or our water-wheels by one degree more powerful, our raw materials by one grade finer, etc.

资本的盈利能力是由资本的最终增量的生产率决定的。而一般来说，资本的最终增量并不是由整体的生产工具构成，它是构成此类工具的要素。正像我们获得优质的商品来增加消费一样，我们获得优质的生产资料也是通过优质工具达到的。当一种机器磨损时，我们就用效率和成本都较高的机器取而代之，此时，资本就增加了一个最终增量。决定利率的是资本的那几种最终增量的生产力本身。作为企业家，我们所用的任何资本都得报之以资本的一个最终增量所能生产的产量；而这最终一个增量所能生产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和其他人通过提升大厦的档次与真实性，使我们的机器运转速度提高一些或是使之更接近于自动化，使我们的发动机或水车功率高些，使我们的原材料品级提高一些等等。

We have seen that in a limited number of cases final

increments of consumers' wealth consist of goods in their entirety. When, for example, we procure the plainest and cheapest article of its kind that is anywhere made, as an addition to our stock of goods for personal use, the whole article is a part of our final unit of consumers' wealth. In such a case, the article, as a whole, helps to set the standard price for all goods of exactly that kind. Nobody gives for a duplicate of this final article in our supply of consumers' goods more than we give for this one. So there are cases in which entir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re final increments of producers' wealth; and in these cases what these instruments produce, in their entirety, helps to set the standard of interest. If there is a hammer, a shovel or a cart, so poor and cheap that one of a lower grade cannot anywhere be found, then we add a final increment to our capital, whenever we procure one of these instruments.

我们已经看到在有限的条件下，消费者财富的最终几个增量，都是由整体的商品构成。例如，我们获得作为个人用的货物存货的某种增加量，也即处处都在生产的诸如此类最平常、最廉价的商品时，这整个产品也就是最终单位的消费资源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货物，作为一个整体的，有助于决定它的标准价格。没有人会比我们出更多的钱，买同类产品。因此，也就有了这样的情况，即全部生产工具都是生产资料的最终几个增量；而且，在这些情况下，就其整体而言，这些工具所生产的也就都有助于决定利息标准了。假如有一把锤子、一把铁锹或是一辆小车，它们都是如此质低价廉，以至于无论何处都找不到还有比这些品级更低的同类工具了，于是，我们随意买来了其中的一种，我们也就给的资本增加了一个最终增量。

These cases, however, play only a small part in the general adjustment of interest; for the enriching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shows itself by a steady upward trend in the grade of its capital-

goods. Better things of every kind come to constitute the world's working equipment: buildings are taller, ships are faster, engines are more economical, railroads are straighter and more nearly level, locomotives are more powerful, trains are longer, etc. It is what we gain, in the form of more products, by making these perfecting changes that determines what we can afford to pay for the last capital that we hire. Society as a whole pays for all its capital what these last productive elements in goods are worth to it.

不过，在对部分利息调整中，这些情况只是起着很小的作用。因为，这个日益富裕的工业世界，其资本货物档次不断升级的趋势正在显露出来，制造世界上设备日益精良的工具层出不穷：越来越宏伟高大的建筑物拔地而起，船泊航速加快了，发动机性能更趋精良了，铁路线更直了，铺设铁轨的地面近乎平坦了，引擎更节能了，火车车厢节数多了等等。决定我们能否支付得起利用这种最终资本的费用的是借助种种精益求精的变化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多的产品我们终能获得多少。全社会所能支付的，也就是它与货物中最后这几个生产要素等值的全部资本。

This truth is not affected by the fact that, as the wealth of society increases, capital-goods become more numerous, as well as better. It is true, indeed, that we are building more engin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we are building better ones; but the new ones are mainly of a grade so high that, in their entirety, they cannot be treated as final increments of producers' wealth. Here, for instance, is a new locomotive. It has not been secured by the railroad that owns it to take the place of one worn out, but is an additional engine, made necessary by an enlarged traffic. Is it a final increment of capital? Not unless that engine would be dispensed with, in case any reduction of the capital of the road were

necessary. The actual fact is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new engine is determined by that of the roadbed, the rails, the bridges, the cars, etc., with which it is used; for it would be uneconomical to combine one poor engine with an equipment of good cars, good rails, etc. This complementarity of producers' goods must always be considered; since a poor machine introduced into an equipment of good ones has the effect of taking something from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the other parts of the equipment. The good cars, etc., cannot develop their full wealth-creating power, if they have to coöperate with a poor engine. With a given number of cars, there needs to be a proportionate number of engines; and for the best results the entire equipment of cars, engines, track, freight houses, etc., is maintained at a uniform standard of quality. In a commercial form of statement, therefore, the “money” which is spent in bringing the equipment to the point of perfection that it has reached represents the final increment of capital “invested” in the railroad.

这一事实并不因为下列事实而受到影响，这就是，随着社会日益富足，资本货物不仅质量提高了，而且品种也越来越多样化了。的确，我们不只是在造更多的机车，而且同时还在造更好的机车；但是，多半新机车是属于高精尖类，就其整体而言，是不能视之为生产资料的最终增量的。例如，这里有一台新的机车，铁路公司没打算用它来替换一台已经损耗了的机车，而是作为新增的一台机车，满足扩大了的运输量需求。它是一个最终资本增量吗？不是。除非该机车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否则，万一削减该铁路的资本是必需之举，那可就耽误大事了。事实上，新机车的质量是由铁路路基、铁轨、桥梁、车厢等等的质量决定的，机车是有赖于这些才能使用的；把劣质机车与优质车厢、铁轨等等结合起来使用不经济。一定要记住生产资料之间的这种互补性，因为把一种劣质机器加入某种优质设备之中，势必有减损该设备另外组成部分生产能力的情形。优质车厢等其他设备要是

只得与劣质机车配套的话，那就发挥不了它们充分的创造财富的能力。有既定数量的轿车，那就得有成比例数量的引擎；而且，要达到最佳效果，车厢、机车、轨道、货栈等等整套设备，还必须都按统一质量标准予以维修保养。因此，用商业性的说法，那就是“货币”所代表的是投资于铁路的那部分资本的最后一个增量，这货币就花在使此全套设备都达到它曾经达到过的那种尽善尽美的程度上了。

In a more scientific view, money is a means of moving real capital from hand to hand, and there must somewhere exist capital-goods that embody capital. The cars, engines, tracks, buildings, etc., are these goods. They embody the whole capital of the railroad; but when we try to find and identify the part of it that is “final” and interest-determining, we cannot single out such parts of the equipment as particular cars, engines, etc. We must try to find what is the final productive element in the whole equipment, and in each of the instruments that constitute it. What outlay would the company forego if, in the building and equipping of a railroad, it found that its real capital—its concrete and material outfit of instruments for carrying passengers and merchandise—must be made smaller than its original plans had called for? If it proceeded in a natural way, it would slightly reduce in quality nearly everything in its proposed outfit. It would forego putting the final perfecting touches to cars, engines, roadbed, buildings, etc. It might relinquish a few instruments altogether, but these would be things of the poorest and cheapest kinds.

按照某种更科学的观点来说，货币是实物资本借以易手的一种工具，而且总会在某处存在有包含资本的资本货物。车厢、机车、轨道、建筑物等等，就都是这样的资本货物，它们包含铁路的全部资本；但是，如果我们试图找出并确定全部资本中“最后的”和决定利息

的那一部分资本，我们可就挑不出诸如具体的车厢、机车等等设备一类的组成部分了。我们必须设法找到全套设备中以及构成全套设备各种工具中的那种最终生产要素。在修建一条铁路并对它进行设备配备时，假如发现这一条铁路的实物资本，也就是它的载客、运货两用的具体的和物质性的全套设备，都必须改变成比原方案计划的要少一些的话，那么，铁路公司会削减哪一项支出呢？假如听其自然，拟议中的支出要达到的一切的质量，就都会有所下降，铁路公司就会放弃对车厢、机车、铁路路基、建筑物等等作最后的完善化试验；铁路公司还可能丢弃几类工具。不过，这些工具自是价廉质低的。

There are, of course, facts to be considered which, in a practical case, would modify this policy. If the railroad in the illustration were a connecting link in a great system, it would have to carry the cars of other railroads, and it would have to make its gauge broad enough, its rails heavy enough and its bridges strong enough to do this. This case, however, confirms, instead of contradicting, the general fact which we are stating—namely, that it is uneconomical to reduce, in a disproportionate way, one part of the equipment of an industry. The small road is, in this case, not a complete industrial plant. The larger system, of which it is an integral part, is the complete industrial establishment that has to be considered. If the great system, as a whole, were to reduce its capital, and if it had the power to reduce it by cheapening things as well as by reducing the number of them, it would prefer to make the equipment of every part of the entire system poorer, and so preserve the coöperating power of all the constituent parts, rather than to leave most of the system untouched and take out parts of the equipment of some railroad that is only one link in the system.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we are seeking to identify the final increment of the capital of a complete industrial establishment; and, in the case of a railroad system, that is not the fraction of the great

plant that happens to belong to one small corporation. The system must be considered in its entirety.

当然，有些事实还得加以考虑。在实际情况下，有些事实会改变上述做法。如果上述例子中的铁路是铁路网整体中的一条连接线的话，那它就得承载其他铁路上不同车厢的机车，它因此就得加宽其轨距，加宽其铁轨，加固其桥梁，以期满足上述需要。不过，这种情况倒是确实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成比例地削减某行业的部分设备是浪费。既然是这样的话，那该小型铁路公司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工业企业了。只有大一些的系统，把它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才是一个考虑周全的完整的工业企业。假如这个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要削减资本，假如它有权通过降低某种设备价格，而且还要减少它们的数目来达到目的话，那么它宁可使整个系统各部分的设备降低质量来维持合作能力，而不是与系统的大部分相关，进而使某种铁路设备撤出其一部分。必须记住，我们这是在设法确定一个完整工业企业的资本的那个最终增量，而且就铁路系统而言，这个增量不是碰巧属于一个小公司的一项大型设备的一部分，而是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的。

Moreover, if, when the road was about to be built, the owners found themselves able to use a larger capital than they had expected to use, would they lay the same track and procure the same rolling stock that they had planned, with some extra cars or engines? Would they build depots of this form and quality that the first projects called for, merely adding a building or two to the list? It is clear that, in adding a few things outright to their equipment, they would improve many things—that they would add everywhere what we have called productive elements.

此外，假如这条铁路修建在即，所有者发现自己能使用比原先预

期还要大的资本，那他会在除了铺设同样轨道，以及按原计划采购全部车辆之外，增加部分外车厢或机车吗？他会在按原方案所规定的类型和质量建造火车站的基础上，只给工程目录增加一两幢建筑物吗？显然，用现金给其设备增添机能，这会使很多方面改观的，它随时随地增加生产要素。

The final increment of the capital of this railroad corporation is, in reality, a difference between two kinds of plants for carrying goods and passengers. One of these is the railroad as it stands, with all its equipment brought up to the highest pitch of perfection that is possible with the present resources. The other is the road built and equipped as it would have been if the resources had been by one degree less. A difference in all-around quality between an actual and a possible railroad—is, in reality, the final increment of capital now used by the actual corporation. The product of that last unit of capital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the road actually earns and what it would have earned if it had been made by one degree poorer.

这家铁路公司的资本的最终增量，实际上是两类客货运输设备价格之间的一个差额。就此情形来说，其中之一是铁路连同其全部设备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这根据其现有资源来说是能做到的。再就是，造铁路以及铁路相应设备的安装配套等相关事宜，如果资源达不到原有的水平，其结果会怎样这是可想而知的。一条现实中的铁路，与一条拟建的铁路，其全面质量的差别，实际上也就是现公司所用了的最后一个资本的增量。这最后一个单位资本的产量，也就是铁路实际所挣得的收益与铁路质量降低了以后所能挣得的收益之间的差额。

It is clear that this final increment of the capital of this industry is not one that can be physically taken out of it, as it could be if it consisted of a few locomotives or a few cars that could be sold to another company. [17_1] It is in the plant to remain. It runs through the whole tissue of the complex instrumentality that engineers, trainmen, superintendents, et,., make use of in the carrying of goods and persons. If we wished to make a good test of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this particular bit of capital, we should have to invoke a magic that would at once shrink the whole plant into inferiority.

该行业最后资本的增量显然不是可以从该行业中说除去就可以全然除去的，这可不像几台机车或几节车厢组成的资本增量那样简单，说卖就可以卖给另一家公司。 [18_1] 问题就在于，这套设备存在于由工程师、乘务员、铁路运营段段长等组成的进行客货运输的复杂部门和组织之中。

In a long period we might make such a practical test. We might let the plant deteriorate, letting the engines become worn and weak, the passenger cars shabby, the buildings dilapidated, etc. If, in the interim, the other circumstances that affect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a railroad remained absolutely unchanged, we might compare the earning power of the plant before it had deteriorated with its earning power afterward. Two difficulties are, however, encountered in the making of such a test. First, the other circumstances that affect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capital do not remain unchanged. Secondly, the qualities that wear and tear take out of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re not the same qualities that would have been left out of them if, in making them, it had been decided to “invest less capital in them”—that is, to make them by one degree less costly and efficient. No one is ever willing to waste

a part of his fortune by making in cold blood such a laboratory experiment for testing the productivity of capital; yet actual experience enables employers to form such judgments as to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final units of capital.

我们可以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进行这样的实际检测，即可以听凭设备磨损，任由机车磨损易坏，客车年久失修，建筑物坍塌等等情况发生。假如其中影响某条铁路的生产力的其他情况不变，那我们即可就该设备磨损前的盈利能力与其后面的盈利能力加以比较。然而检测中遇到两个困难：一是影响资本盈利能力的其他情况是可变的；二是除去生产工具的那种损耗的质量与下述这种质量不是同一回事，即后者在制造生产工具时就已决定“给它们少投资”—使其成本和效率都降低—这原本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谁也不会去蓄意制造检测资本生产能力的这样一种实验设备来给自己找麻烦，然而，现已取得的实践经验，还是能使雇主形成对有关最终单位资本生产能力的一种判断的。

Could not an entrepreneur, however, test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his final increment of capital, as embodied chiefly in the final qualitative element in his working equipment, by reducing the quality of one thing at a time? Here, let us suppose, are two machines side by side, and alike except i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have suffered the effects of wear: one is new and perfect, and the other is old and worn. Cannot the owner form a true conclusion as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productive powers? Here, again, are two machines, both new, of which one is costlier and better than the other. Cannot the entrepreneur tell how much one exceeds the other in its earning capacity? If he can make such a test as this at all, why cannot he make it in connection with all parts of his equipment? He can take his plant and outfit by sections, and find,

in the case of each section of it, how much he would gain by making it better or how much he would lose by making it worse.

难道企业家就不能采取一次性降低某种用品的质量的方式，检测他那主要体现于工作设备最终质量要素内的最终资本增量的生产能力吗？现在我们假设同时购置两台机器，它们除受磨损程度有别外其他都相同：一台新，另一台旧。它们的生产能力有无差别，所有者难道就得不出一种正确的结论吗？再假设这里有两台机器，它们都是新的，不过，其中一台比另一台价格更高，质量也更好。企业家难道就无法告诉我们，就其盈利能力来说，一台机器比另一台强多少吗？假如做这种检验，那他为什么就不能就其设备的各部分都作一下检测呢？他可以逐个部分地了解一下他的设备和全套工具，并就其每一部分都得出结论，即在每一部分质量都更好的情况下，他能得到多少，而每一部分质量都差一些的情况下，他又会损失多少。

The difficulty to be encountered in making such an experiment consists in the deranging effect that a reduction of the quality of a single instrument may have on the general plant. This effect could, however, be made small, by taking great care in making the change. Moreover, in making experiments of this kind, an owner could avoid all the more serious deranging effects that would follow if he took bodily from the equipment some instrument that is needed to make the whole an efficient complement of capital goods. He does not even need to let the machine that he is testing wear out to such an extent as greatly to mar the efficiency of anything else. If the test is to be made by buying and using a machine of an inferior grade, the owner does not need to make it so greatly inferior that the other machinery will not work well in connection with it. Little by little, a man could undoubtedly test in this way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the first increment of his capital. Though his calculations would be

difficult and liable to error, he could form some opin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arning power of a part of his capital, as it is embodied in one set of instruments, and the earning power that it would have if it were by one point better or by one point worse.

作此类实验会遇到的困难，在于某一种工具的质量的降低可能给成套设备造成的扰乱性影响。不过，只要小心谨慎，就可以降低这种风险。此外，进行此类试验，如果所有者亲自从设备上拿下某种工具——这工具是使这整个成为资本货物有效配件所必不可少的——就可以避免造成更加严重的扰乱性影响。他甚至都不必使他在检测的机器损耗到会降低其余一切的效率的程度。假如该检测要以购买并使用某种劣质机器的这种方式进行，那它的所有者就不必使该机器质次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另外的机械无法与之正常运转。毫无疑问，一个人能逐渐地以这种方式检测他的最终资本增量的生产能力。尽管他会难以做出估计，而且可能估计错了，但他能够就下列两种效率的差别提出看法：他的部分资本体现于一套工具上的盈利能力，与这套工具或好一点或差一点情况下的盈利能力的差别。

Some such tests are, beyond doubt, constantly making. Men must form business judgments as to the exact grades of instruments of every kind that will “pay the best” in their several places. As the equipment of a mill and the mill itself wear out, the owner has constantly to decide what grade of instruments he shall procure to replace the discarded parts of his outfit. He must know—approximately, at least—how large is the difference in productive power between a tool of one grade and a tool that is above it or below it in the scale of quality. This is a part, and a vitally necessary part, of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by which society puts its productive fund into the most judicious shapes. Conscious mental estimates are constantly being made of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such final increments of capital. It is not, however, this conscious measuring which makes it certain that the instruments which are either too cheap or too costly will be discarded, and that those of the right kind will be retained.

毫无疑间，诸如此类的检验是经常做的。人们必须就每一种工具在其几个适当的场合就其“生利最多”的确切等级形成商业判断。随着一个工厂的设备及其自身逐渐老化，工厂主就得不断进行决策，如他得购买何种等级的工具以替代他那全套工具中废弃了的部分。他必须了解——至少是大致了解——在质量等级上，某个等级的某种工具与等级高于或低于这种等级的某种工具之间的生产能力差别到底有多大。这是复杂过程的一个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社会就是明智地凭借这个过程使其生产基金得以具体化了。对这种最终资本增量的生产能力要不断做出有意识的心理估价。不过，弄清楚太廉价和太昂贵的工具都要予以废弃，而恰好的那一类则予以保留，这需要有意识的计量。

Competition makes the test in another and an inexorable way. It causes establishments that are so equipped as to get out of their capital the utmost service that it is capable of yielding to survive, and incapable ones to fail. If, in a certain mill, every machine, every tool and every other working appliance is so judiciously selected that the final productive element in each yields, as net income (let us say) five per cent of its cost, and if that is the prevalent rate of interest on loans, the owner of this mill is, in so far, in a condition to stand competition. The rate of interest on capital that he borrows will, moreover, be five per cent, if that is what the final increment of capital in properly equipped establishments generally yields. This is saying that a man's outfit of capital-goods must be so selected and so combined that the final productive element in each part of it

shall yield the same rate of interest that is yielded by the final element in the outfit of capital-goods used by competitors. Competition acts as a leveller, by reducing the earning power of the final increments of different men's capital to equality. This it does by putting out of the field the competitor whose last increment of capital—consisting in the final productive element in his various capital-goods—creates less than the standard amount of product. With the final unit of capital generally earning five per cent, interest is at that rate. With interest at five per cent, the borrower whose last unit of capital earns only four must take each year the one per cent that is needed to make up the deficit out of his capital. This is a procedure that cannot be long continued; for the man most change the forms of his capital and bring the fund up to the prevalent standard in its earning power, or he must go to the wall.

竞争以另一种稳妥的方式做检验。竞争会让其生存下去，反之，竞争会使其消亡。以至于可以从其中资本中获取绝大部分的服务。假如在某个工厂，其每一台机器、每一种工具都能如此明智审慎地选择，以至于最终生产要素作为纯收入均能占（姑且说）其成本的百分之五，如果那就是普遍通行的贷款利率的话，则厂主就会处于经得起竞争的状况。此外，假如那就是设备精良的企业产生的最终资本增量的话，那么他借贷资本的利率是百分之五。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全套资本设备必须如此选择和组合，则其各部分的最终生产要素才能产生同一利率，而这一利率就是竞争者所用全套资本货物最终要素所产生的同一利率。竞争通过减少不同人的资本的最终增量的盈利能力起到了使之趋于相同水平的作用。这是通过排除最终资本存量——构成其各种资本货物最终生产要素——创造了低于标准的产量。有了这通常挣得的百分之五的最终资本单位，利息就取那种利率了。以百分之五的利息，其最终一个单位资本仅挣百分之四的借款人，就必须每年都弥补其资本赤字所需的百分之一。这是不能持久的一种模式，因为此人必须改变其资本的形式，并使此基金处于其收益能力上通行的标

准，否则他的生意就失败了。

We are here making assertions that will bear a more extended examination than it has thus far been possible to make. We affirm that interest is fixed by the earning power of the final increment of social capital; that that increment consists mainly of qualities of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rather than of instruments in their entirety; that competition acts as a leveller, causing the earning power of such final productive elements in capital-goods to tend toward a certain normal level; and that any kind of instruments in which this element earns less than the standard amount must be thrown out of use.

这里，我们才能断言这样能经得起更大的考验。我们证实，利息是由最终社会资本增量的盈利能力来决定的；该增量主要由生产工具的质量，而不是整个工具构成的；竞争起到了校平机的作用，它导致资本货物的最终生产要素的盈利能力均趋向于某种正常水平；生产要素所挣的小于该标准数额的所有工具都会被弃之不用。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statements there are cautions to be observed; and one of them connects itself with the assertion that, as capital increases, the new parts of the fund embody themselves in new qualities imparted to goods. It is here assumed that labor remains unchanged in amount, and that it is a per capita enlargement of capital which forces entrepreneurs to procure better and better working instruments. Indeed, with workmen doubled in number and with capital doubled in amount, there would not need to be the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of the capital-goods of which we have spoken. If we could give to the new men exactly the same

outfit of working appliances that the former workers possessed, the capital would be doubled in a more or less natural way. There would, it is true, be a difficulty in doing this, owing to the relation of land to other capital-goods. We could duplicate every part of the outfit except the land; and, because we could not duplicate the land, we should still be obliged, in enlarging the capital, to make changes in the quality of the goods that embody it. What we desire now to make clear is, that our assertions concerning the natural way in which capital increases have reference to an increase that is not accompanied by a parallel enlargement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With ten units of capital in the hands of ten men, that fund is in certain concrete shapes; while with twenty units of it in the hands of ten men, it takes different shapes. The improvements in the instruments, much more than such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hem as may also take place, embody and measure the new capital. The final increment of capital is mainly, though not wholly, qualitative.

在对这些说法所作的解释中，有须加评述之处，其中之一与下列断言有关，即随着资本的增加，构成基金的那些新的部分就自行体现于货物所赋予的新性质中。正是在这里，我们要假定劳动数量维持不变，而迫使企业家获得越来越好的工具的，正是资本的这种人均占有量的扩大。实际上，倍增工人，再倍增资本数量，资本货物也就没有必要提高质量了，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假如我们会给新来的工人与原有工人所拥有的一样的全套工具，那资本或多或少地就会加倍。诚然，由于土地与其他资本货物的关系，这样做起来会有困难，但除土地外，这全套工具的各部分我们都可使之倍增；而且，由于我们无法倍增土地，我们这就不得不在扩大资本的同时，使体现它的那些货物的质量作些改变。我们现在需要弄清楚的是，我们有关资本增加的自然方式的断言，与一种增加有关，但他并不是随着劳动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在十个人手中有十个单位的资本的情况下，该资本是呈某种

具体形式的；而如果十人手中有二十个单位的资本，则资本就呈不同形式了。工具的改善远多于工具数量的增加，这些改善体现于并计量了新的资本。资本的最终增量，尽管不都是，但多半是体现在质量上的。

If this is so, it is clear how far from being true is the conception of capital as existing, in bodily shape,—a stack of concrete instruments,—in the midst of competing entrepreneurs, and as ready in that shape to be drawn to this one or to that one, according as the one or the other offers the most for it. Capital is, in just this way, the subject of competition; but capital-goods are not. The capital that is competed for does not consist in instruments—concrete, visible, movable and ready for any one of a dozen different uses: there is no stock of capital-goods that has such adaptability that all entrepreneurs are anxious to get shares of it. Yet there is a universal competition for capital, and the effect of it is to fix the rate of interest. Any entrepreneur in the entire system of social industry is a possible demander for any capital existing in the system. If he can make more with it than the present holder of it can make, his natural course is to bid higher for it than the present holder will bid and thus to secure it. No capital, as such, is fastened to one user or to one place in the system. Yet the goods that embody the capital are as fettered in their movements as the capital itself is free. A's tools are often useless to B. If we were to take one of them bodily out of A's shop and put it into B's, we should render to B no service. We should injure A's operation, and benefit no one else. A furnace is valuable to a smelter, but not to a cotton spinner; a ship is useful to a carrier, but not to a miner, etc. There is, in short, only a very limited competition for capital-goods between employers in different kinds of business.

假如情况如此，那么，在竞争的企业家中，以一堆具体的工具形式，按照哪个企业家报价高就被哪个企业家所吸引而存在的资本概念，是远不正确的。资本就是以这种方式成了竞争的对象，但资本货物则不然。成为竞争对象的资本不存在于工具之中——具体的、可见的、流动性的和可投人十几种用途的工具；不存在于具有企业家都急于获得其份额的这样一种适应性的资本货物存量之中。不过，资本也普遍存在着竞争，而且竞争的结果是决定利率。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家，都可能是该体系所存在的任何资本的需求者。假如某个企业家能以该资本生产出比该资本的现持有人还要多的产量，那他的自然做法就是出价高于现持有人的索价，借此获得它。在经济体系内，没有什么资本是受控于某个使用者或某个地方。然而，体现该资本的货物就像资本自身是自由的那样，在其流动中是受控制的。A的工具对B往往无用。假如我们要从A的商店完全买走用品，把它投入B的商店中，那我们不会给B带来任何服务，这会使A的业务受损，谁也得不到好处。一座熔炉对一个冶炼厂有价值，但对棉纺纱工则毫无价值；一艘船对运输公司的人员有用，但对矿工等人无用。总之，在各种不同工商企业的雇主间，资本货物仅存在极有限的竞争。

If tools of trade are not very mobilem what is to be said about productive elements in the tools? Can we take out of the smelter's blast-furnace the last of the qualities that give it efficiency, and impart this quality to the spinner's mules? Can we speak the magical word that will reduce the quality of the furnace and improve that of the mules? This is exactly what would need to be done if the smelter were to surrender the final increment of his capital and the spinner were to get it.

假如贸易工具流动性不是很高，那工具的生产要素又从何谈起？我们把冶炼厂的鼓风炉，即使把高效率和高质量的最后一个要素都取消，把它给了使用走锭纺纱机的纺纱工，这样行吗？这可能会降低鼓

风炉的质量而提高走锭纺纱机的质量吗？是否那冶炼厂要把最终资本增量交出，而纺纱工就恰好得到它？

Here it seems expedient to enumerate some of the facts that are to be reconciled with each other if a final-productivity theory of interest is valid:—

如果利息的最终生产率理论是正确的话，那这里列举能使之相互一致的部分事实是正当其时。

(1) Interest generally conforms to the earnings of the final increment of social capital.

(l) 利息一般与社会资本最终增量一致。

(2) This increment consists mainly of qualities in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rather than of instruments in their entirety.

(2) 此增量主要由生产工具的质量而非整个生产工具构成。

(3) Instruments are limited in the range of their productive action, and are often useless in any kinds of business other than those for which they were designed.

(3）工具的生产行为种类有限，除专为之设计的企业外，任何类型企业在这点上都有限。

(4) Qualities in instruments are, of course, not literally transferable to other instruments.

(4）当然，工具的质量确实不是可以转移到其他工具之中的。

(5) The final increment of the capital of each kind of business consists in an element that is literally tied to that business.

(5）每一种企业的最终资本增量都存在于与该企业联系一起的某种要素之中。

(6) Capital is absolutely mobile: it can go anywhere. It can leave any business and betake itself to any other; and it is therefore the object of a competition that is universal. Any single unit of capital is desirable for use in any productive process that is going on; and it is by the general competition for it that the rate of interest is fixed.

(6）资本的绝对流动性到处存在。可以离开任何一家企业而进人到另外任何一家企业中去，因此，它成了某种普遍的竞争对象。对于任何一个进行中的生产过程来说，使用任何一个单位的资本都是可取的；利率正是由对资本的全面竞争决定的。

We have said, moreover, that the capital which is the object of this universal competition does not exist, antecedently to the bidding for it, in any bodily shape in which the men can see it and carry it to their several shops. There is nowhere a central heap or stock of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waiting to render service to some one. Such stocks of merchandise as those which are in shops are already in use, doing their productive work. There is no accumulation of food, clothing, houses and other subsistence goods, waiting to be doled out to laborers, in order that the laborers may make capital goods and so, virtually but not literally, transmute the subsistence goods into capital-goods. We have noted the several reasons why this entire feed-and-work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capital is untenable, and we have seen that the chief of them is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stock of subsistence goods anywhere accumulated and capable of being used in that way. [17_2] Competition for capital is, therefore, not a competition for capital-goods that already exist.

此外，我们说过，资本这一普遍竞争的对象并非先于索价，而是以人们看得见并运载至商店中的任何一种实物形式进行。根本不存在一大堆或一大批生产工具存量等待着给某个人提供服务，就像各商店的商品存货是随时可用的情况一样。根本没有食品、服装、房子和其他各种生活用品的积累等待着发放给工人，以期工人制造出资本货物，进而把生活用品转变为资本货物。我们已经指出了几条原因，来说明资本起源于饮食以及劳动的整个理论何以站不住脚的，而且我们还意识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任何地方都没有生活用品的存货积累，而且即使有，存货也无法利用起来。 [18_2] 因此，对资本的竞争，并非是对业已存在的资本货物的竞争。

The most comprehensive of the paradoxes concerning capital and interest is, that the competition for capital, which is constant

and universal, is an all-around struggle to get concrete things that are about to be. The capital of society has no existence till it is in the shapes in which entrepreneurs use it. Till it is raw materials and tools for the manufacturer, merchandise for the retailer, vehicles for the carrier, etc., capital has no existence at all. Of the hundred billion dollars' worth of capital-good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actically all will be in use as instruments fitted for certain purposes and actually doing the things for which they are fitted.

涉及资本和利息的悖论，最全面的首推对资本的永恒而又普遍的竞争，这是一种为全面获取具体的东西的竞争，这些东西是即将出现的。社会的资本是直至它呈现供企业家使用的那种形式时才存在的。在原料和工具尚未供给制造商、商品尚未供给零售商、车辆尚未供给运输公司等使用之前，资本根本就不存在。美国价值1000亿美元的资本货物，实际上都是将它们作为满足某种目的的工具加以使用的，而且实际上它们也发挥着适于它们发挥的作用。

When the entrepreneur bids in the market for an extra unit of capital, he is asking for something the presence of which in his business means a readjustment of his plant. He is virtually saying: “I offer five per cent a year for a certain amount of productive wealth that cannot come to me, except as I change the shape of the plant I am using. I must make that plant better; and the improvement that I propose to make in it will constitute the new unit of my working capital. Moreover, whoever surrenders to me a unit of capital must do it by a similar change. He must make his business equipment worse.”

当企业家在市场上出价以争取再获额外一个单位的资本时，他这

是在要求某种东西，有了这种东西，对他的企业来说，就意味着他的设备得以重新调整了。实际上，他这是在说："为获某种数额的生产资料，实际上我是每年都支付百分之五的利息的，可这还是徒劳之举，除非我改变我使用中的设备。而如若如此，那我打算对设备所作的改进，就即将构成这新的一个单位的流动资本。此外，无论谁让与我一个单位的资本，那都必须采用同种类似的改变，即他会使其设备质量越来越差。"

Bidding for capital, then, is bidding for something which does not antecedently exist and which, when it exists, will consist mainly in a change of quality of working equipments. When we offer interest for capital, [17_3] we virtually ask for the power to transmute our shops and tools. This transmutation is possible, because the things that are about to be, and for which we are bidding when we offer to borrow "money" for the enlarging of our business, are wanted for the replacing of things that are about to cease to be. In the place of a tool that is worn out and on the point of being discarded, we may put a new one of superior quality. In this condition lies the possibility of adding a new capital element to our plant, without adding a new tool in its entirety. When we tender interest for the loan of new capital, we offer something for the power to substitute new tools containing a certain complement of capital elements for old ones containing fewer of such elements. Machines of grade number one are in demand at many points, because machines of grade number two are about to be discarded; and new productive powers are thus everywhere adding themselves to the social stock of capital-goods.

因此，出价竞争资本，也就是出价竞争事先并不存在的、而一旦存在了就多半在于工具质量的某种变化。我们出利息获得资本时，

[18_3] 实际上我们这是在要求获得一种权利，以这种权利来改变我们的工厂和工具的性质。这种质变是可能实现的，因为行将出现的那种种情况，以及我们要借“钱”以此扩大我们的企业时，我们所公开表明的就是要实施革新。在放置破旧工具之处，在行将废弃旧工具之时，我们可以代之以一种新的工具，而且是优质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给我们的设备增加的一种新的资本要素而不是一种全新工具的可能性。我们新资本的贷款付利息时，其实是在提供某种东西，以换取含有某种资本要素配件的新工具替换此类要素含量少的旧工具的这一权利。一等品的机器在很多方面都是需求量大的，而二等品是淘汰在即了。因此，新的生产能力处处都在不断促进社会资本货物存量的增长。

Not one of the employers who is making such a change as this is making it for the sake of applying a scientific test to a final increment of capital and of registering the rate of its productivity; yet, as the many changes are actually made, the test is applied, and the rate of productivity of final units of capital is registered. What the man finds he has gained, when he has infused a new capital element into his plant, becomes a guide for himself, at least, in bidding for further capital, since it tells him how much he can pay for it. Similar experiences tell other employers what they can afford to offer; and, when new capital is to be had, the men whose experiences reveal the fact that new capital elements will yield large returns will bid for and get the new capital, rather than any employers whose tests have proved that new capital elements are worth less to them. All such tests take time, but social evolution has time enough at its disposal. Slowly, but surely, it comes to be known what value elements are worth the most to each employer, and also what employers can, on the basis of the amounts that the best capital elements will in their hands earn, overbid others in the competition for loans and thus get such new capital as may be

offering. Slowly and surely, the whole capital of society disposes itself in the way in which it can produce the most. It leaves the men in whose hands it creates the smaller products and goes to those who can make it create the larger ones; and in a perfect static adjustment it would attain a state of locally equalized productivity, as well as one of maximum total productivity.

在进行此类变革的雇主中，没有一个雇主是旨在对某种最终资本要素进行某种科学检验和记录其生产率的；不过，待到这一类的很多变革实实在在付诸实施之时，这种检验也就可以应用上了，最终单位资本的生产率就可以记录在案了。某雇主在把某种新的资本要素注入其设备时，他认为他得到了的至少在争取更多的资本这一点上就成为了他的指南了，因为它告诉他付出才多少能获得它。类似的经验还告诉另外的雇主，他们为求有所需要付出多少为宜；而且，一旦有了新的资本，亲身体会新的资本要素产生更大回报事实的这个人，就将出价竞买，而且还将获得新资本。所有这些检验都要花费时间，但社会的演变有足够的任由其支配的时间。慢慢地且又是确定无疑的是，每一个雇主都会根据由他们掌握的最好资本要素所能获得的收益，判断何种价值要素是最有价值的。慢慢地，且又是确定无疑地，社会的全部资本以其所能的最大产出方式尽数做出了安排，这就使资本从产量低的那些的人手里转移到产量高的人手里。因此，经过某种完美的静态调整，社会不仅达到了总产率最高的一种状态，而且还达到了各地全产率均衡的一种状态。

There is, as we have seen, a zone of indifference for labor. There is a limited marginal region, within which a few men may be taken out of one employment and put into another, with no appreciable change in the character of the capital that is, in either case, used. This fact has much importance in the practical adjustment of wages. There is, in connection with capital also, a

fact that is rudely parallel to this. A few instruments are usable is different industries. We may take a hammer from one shop and put it into another; and we may do the same in the case of a number of things, without causing a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the work that is done or in the character of the remaining equipment. There is, then, something resembling a zone of indifference for capital.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确有某种劳动无差别地带，即范围有限的某种边际区域。在这个边际区域内，有的人可能就给排除出某一职业，改行投身另一职业，但资本的性质都没有明显改变。这一事实于工资的实质性调整意义重大。还有一个与资本有关但又是与上述事实大致相似的事实，即少数工具在各行各业都适用。我们可以从一个商店内拿出一把锤子，而后又把它放进另一个商店；另外很多物品我们都可以照做不误，而且都不会引起所做工作性质的改变或是其余设备的特性的变化。由此可见，是存在某种类似资本无差别的地带的。

These zones, however, are not the whole marginal fields in which wages and interest are adjusted. Those fields are much larger. Wages tend to conform to the product that an additional unit of labor can create anywhere in the industrial system, provided the entrepreneurs will make an advantageous place for it, by changing the shapes of their plants and equipments. Interest tends to conform to the product that an extra unit of capital can nearly everywhere create, by embodying itself in an advantageous change in the outfit of capital-goods. When these more general dispositions of capital have been made, the product of capital on the zone of indifference becomes an available indicator of its productive power in the more general marginal field.

不过，这些地带并非全是工资和利息得以调节的整个边际地带。领域更大了。假如企业家借助改变其厂房设备的形状进而对它做出有利安排的话，工资趋向于与那个增加的一个单位的劳动可在该行业体系中任何地方创造的产量一样多。利息，通过体现于资本货物全套设备的某种有利变化，通过近于在任何地方都能创造的产量，趋向于一个额外的资本单位。当这些资本的配置已完成时，无差别地带的资本的产量即成为更大边际地带生产能力的指标。

From the first, we have remembered that capital is material. It exists only in goods that can be seen, touched and handled; and yet it now appears that final increments of capital cannot be thus manipulated. We cannot, in any literal and physical way, take out of a machine such a final capital element as we have just defined, leaving the rest of the machine intact. There is no mechanical process that can take out of a tool of the first grade that which makes it better than one of the second grade and even preserve for use the element that is thus withdrawn. Increments of capital may be arranged in an imaginary series, in the of order of their productive efficiency, so that the final unit is the least efficient one; but it is utterly impossible to take the working plant of any employer and separate it bodily into such increments. Assorting the different machines into classes would not do this, and taking them to pieces certainly would not do it. If we let them all wear out and then replace them with inferior appliances, using what is saved by the buying of inferior tools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ome other general plant, we indirectly separate the final increment of the capital from the other increments; yet, when the process is completed, we still have that increment inseparably tied to others in a new combination. All the increments, taken together, constitute a stock of capital-goods, or appliances of trade, that can be handled bodily; but increments of capital, separately viewed, are

abstractions, for they are mainly nothing but qualities of material things. We are, in fact, in a realm of such abstractions, when we reason about the productivity of successive “doses” of capital applied to a farm, a mine or a manufacturing plant. By reducing capital, for purposes of study, to a series of increments, we are able to analyze a concrete thing into qualities; but, while these together may constitute the thing, separately they have only an ideal existence.

从一开始我们就说，资本是物质性的。它仅存在于可见、可触及可搬运的货物之中。然而，现在看起来，资本的最终增量是可操纵的。无论是按照字面理解还是根据物质形态来看，我们都无法从一台机器中取出除去我们刚才定义的一种最终的资本要素，且又使该机器的其余部分保持原样。根本就没有什么机械方法可以取出一等的工具，而且还能使这一工具比二等的工具还要好，甚至可以使那种要素留下作为备用。资本的各个增量可以根据其生产效率的顺次，以一种虚构的系列予以分类，结果，最后一个单位是效率最低的一个单位；但是，从任何雇主的工厂取出的这一工具，还整体把它分成这样几个增量，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把各种不同机器分成几类，这不会达到这个目的；把这些机器拆开，当然也不行。假如就任由它们损坏，而后以购买另外某种低质量的成套设备代替它们，用省下来的钱来提高其他普通设备的质量，我们这就间接从其他增量中分离出了最终资本增量；当然，在此过程完结之时，我们还是有与某种新组合中其他增量分不开的那个增量；所有的增量合在一起，这就构成了资本货物的存量，也即可以整体处理的贸易工具。不过，单独看来，资本增量就是抽象概念，因为它们多半是物的质量。事实上，当我们就应用于一个农场、一个矿山或一个制造厂的接续几个“份额”的资本作推论时，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抽象概念领域。为了研究方便起见，通过把资本概括为一系列增量，我们这就能把一种具体的东西分析为不同质量的。不过，尽管这些合在一起可以构成某种东西，可一旦分开，也就只是有一种理想的存在而已了。

It is, therefore, blended increments of capital that are embodied in capital-goods; and the phrase “literally separated increments of capital” would involve a contradiction, for any literal separation mould mean the ruining of the capital-goods and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capital. [17_4] Increments of capital-goods may, how ever, exist separately. Having built one ship, we can build another and another, till we have a fleet; but each ship will span the whole range of our increments of capital, if these be arranged in the order of their productive power, and will contain some part of every increment of our capital, from the first to the last. We can, of course, move the ships literally and bodily; but we cannot move the final increment of the capital, in the economic sense, from group to group, except by the method of gradually replacing the ships of the fleet with poorer ones and raising the grade of capital-goods elsewhere.

因此，一说资本货物所体现的是混合而成的资本增量，和“真正分离的资本增量”就会引起矛盾。因为任何真正的分离都意味着资本货物的损毁和资本的毁灭。 [18_4] 然而，资本货物的增量也许会分开存在的。既然一艘船我们说造就造好了，那我们也就能造一艘又一艘德川，直至我们有了一支船队；不过，假如这些增量按其生产能力的次序予以分类，那么，每一艘船都将包含整个一系列的资本增量，而且都将包含从第一个增量到最后一个增量为止的所有资本增量在内。当然，我们是可以真正地整体地销售我们的船只的，但无法就经济意义上来说对单个行业的船只进行逐个销售，除非采用以质次的船只代替船队的船只，且提高他处资本货物品级的方法。

In spite of all this, it is possible—and, indeed, absolutely necessary—to measure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the final increments

of true capital. The entrepreneur who cannot successfully do this will be eliminated from business. In the hypothesis of a static state, in which competition works with ideal perfection, the whole field is possessed by men who have made the tests successfully and have so developed the power to use the agents of production with the maximum of efficiency.

尽管谈了这一切，可是计量真实资本最终增量的生产能力，是确实且绝对必要的。在这一点上做不到的企业家就将被淘汰出局。按照竞争理想完美起作用的静态状况的假设，这整个领域都将属于这样的人，即他们是出色地做了这些检验，而且是逐渐获得了以极高效率利用生产要素能力的人。

In saying that competition tests the productivity of final capital elements, by driving out of business the men in whose plants these elements earn less than a normal amount, we do not deny that the survivors, who fix the rate of interest, must have ways of ascertaining what the final capital elements in their own plants earn for them. By comparisons of various kinds they manage to ascertain what those elements produce, and this knowledge is the basis of the offers that they earn make for loans.

再说竞争是通过裁员——裁减所在企业这些要素所挣少于正常数额的那些人——检验最终几个资本要素的生产率时，我们并不否认决定利率的那些竞争当中的幸存者，必有办法弄清他们各自的工厂那几个最终资本要素为他们挣得了多少。通过各种比较，他们设法弄清了这些要素的生产量，且这个知识就是他们可以提出贷款申请的基础。

[17_1].If one part of a symmetrical equipment for carrying on an industry were

taken away bodily, this would have such a deranging effect on the remaining parts that it would reduce their own separate power of production. Removing all the locomotives from railroad would, of course, paralyze all the cars, the tracks, the freight-houses, etc.; and removing even one of them might, in a smaller degree, have the same effect, Reducing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equipment by one degree would, however, have no such effect. This method of taking out a increment of capital takes from the product of the whole industry only what is attributable to that one unit. It does not reduce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the remaining units.

[17_2].See Ch. X.

[17_3].It is employing new labor without new capital that makes capital-goods more numerous. Extra men can go into a business in which the capital is not enlarged, but they can do this advantageously only where tools are cheapened and multiplied.

[17_4].In the case of some of the very cheapest tools that are used, an exception to this rule is to be made. They constitute first increments of capital. It is the later increments tha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combinations.

[18_1].假如在一个行业经营的一种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儿给撤走了，那么，这对剩下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就会有这样一种致乱的影响，即这种影响会使这两个部分的生产能力都降低。当然，从一条铁路中撤走所有机车，会使所有车厢、轨道、货栈等等一概陷于瘫痪；而且哪怕是撤走其中的一半，在更低的程度上也会有这种影响。不过，降低整套设备的质量就不会产生这种影响。撤走一个资本增量的这种方法，是从全行业产品中选取归因于一个单位的另一种产品，但并没有降低剩下的那些单位产品的生产能力。

[18_2].参看第10章。

[18_3].使资本货物更多的，是在不投入资本的情况下雇用更多的新工人。额外的工人可以从事不增加资本的某种职业，但他们只有在工具廉价而且倍增了的行业才能有利可图。

[18_4].就在用的部分最廉价的工具来说，要指出这个规律有一个例外，即这些工具构成资本的第一价增量，不能从组合中分离出的是后来的那几个增量。

Chapter XVIII The Growth of Capital by Qualitative Increments

第十八章 通过定性的增量实现资本增长

The outline of the law of interest and wages has now been filled in by the addition of some important details. The diagram that has already been used presents the law of interest in its simplest form; and it is now clear that the capital which increases along the line AD is a permanent fund, consisting of in instruments every one of which, except land, perishes but virtually creates a successor to keep the series unimpaired. The increments that come to the fund, as the line AD lengthens, are mainly new qualities infused into the capital-goods already in the working outfit. If we were to try the experiment of making a capital grow from a small beginning to the size which, in view of the amount of labor that was to use it, it was naturally to take, we should need to have a magical power of transforming and improving every instrument of production; and we should have to exercise this power with every addition that we might make to the productive fund. At a touch, nearly everything that labor uses would then become by one grade better;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ld grade of everything-in-the-stock and the new grade of this miscellaneous aggregate would constitute the new increment of true capital. It is composite in the highest degree, and it is mainly an aggregation of new qualities imparted to old things. We have next to see by what mechanism this is done. In the group system of production, we shall see, lies the alchemy that accomplishes this difficult thing.

目前在利息和工资的规律中增加了几个重要细节。此前利息规律中应用的图解是其最简单的形式；而现在能很明显地看出，沿AD线递增的资本是一种长久性的投资，它由各种手段构成，除了投资土地以外的任何一种都易腐，但实际上它们又都创造出了防御受损的继任者。投资随着AD线的延长而增长，主要取决于在工作设备中给资本商品赋予了新的品质。如果我们要尝试进行从小规模到一定规模的资本增长的试验，那么就自然需要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去改革和提高每一种生产手段；同时也必须运用这种能增加有效投资的力量。一接触，几乎所有的生产力都可以提高一个等级；原有等级的存货与新等级的累计总数的差异将构成实物资本的新增值。那是最高程度的一种复合物，主要是对原有存货赋予新的品质的一个聚集体。接下来我们了解下它的机制。生产的产业群系统是完成这个艰难程序的关键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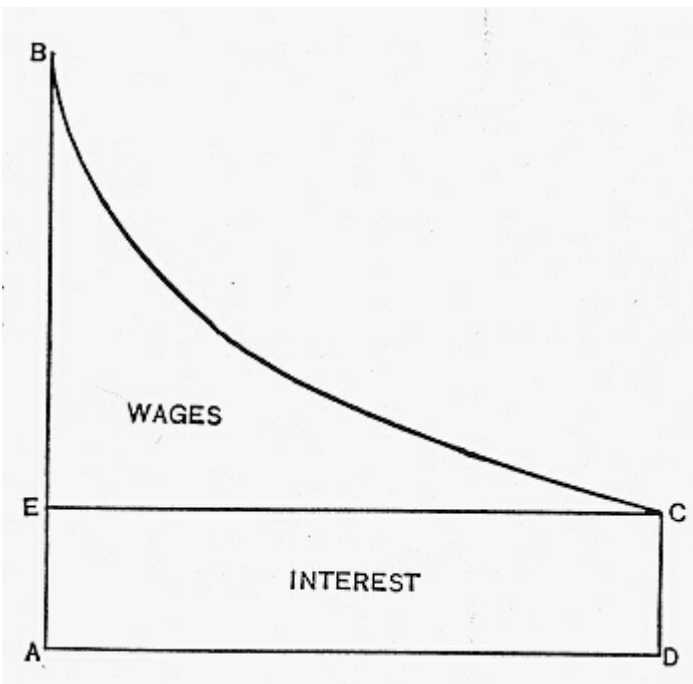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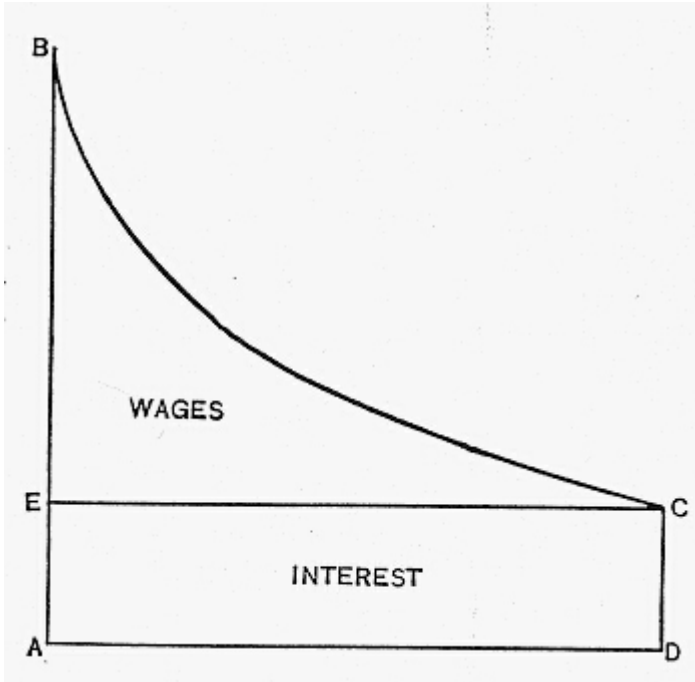

(Fig.11)

(图11)

The new capital, as thus composed, is under a very composite control. It is all, indeed, the property of the social organism; but this means that a certain foreordained part of it is in the hands of each entrepreneur in the system. A social law governs this apportionment; and, if the law could work without friction or disturbance, it would make the apportionment unerringly. If, under such conditions, a million dollars' worth of capital were injected into the working fund of an entire society, a definite fraction of this

amount would go to every sub-group in it; and a law that it is possible to trace would determine how large each of these fractional amounts should be. Interest, under such conditions, would conform to the product of this widely distributed increment of true capital, consisting mainly in qualities newly infused into old appliances. Before us, then, is the further problem of tracing the manner in which society, by no conscious act but by what is clearly a collective or social act, makes this apportionment, assigning to each group and to each sub-group its determinate share of the whole fund of capital, as well as of each new increment that adds itself to the fund.

新的资本，正如它的构成一样，受到非常繁复的控制。事实上，它完全是社会有机体的财产；这意味着它的某些原有的部分是掌握在这个系统中的每一个企业家手中的。社会规律管制着这个分配任务；如果这一规律在没有摩擦或分歧的情况下能发挥作用，那么就能使分配无误。在这样的条件下，将一百万美元投入到一个完整的社会的投资中，这个总额的一部分就会进入其产业子群；一条可以遵循的规律是它可以决定每个产业子群的数量应该是多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利息的增长将与被广泛分配的实物资本的增量保持一致，包括原有的用具在质量上的改进。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下一个问题是凭借无意识的行为或明确的集体或社会行为去分摊，将资本中所有投资分配给每一个产业及其产业子群以确定的份额，并将每一份新增资本添加到投资中去分配。

The same law that apportions the capital among the sub-groups apportions the whole laboring force among them, and thus gives to each specific industry a certain share of the whole number of workers. The increments of labor are social, and are apportioned among the groups and sub-groups by an unconscious act of society.

These increments are not mainly qualitative, for a working force is not to be thought of as gradually built up by making a given set of men more efficient. Improving men does, indeed, add to the laboring power of society; but the addition to labor that economics has first to deal with comes from an increase of population. The chief qualitative transformations that the enlargement of the working force occasions are still in the capital-goods; but they are opposite in character to those which take place when labor is fixed in amount and capital increases. Enlarging population, with a fixed quantity of capital, means, as we have seen, an increasing quantity and a deteriorating quality of capital-goods. With two men working where one worked before, there are, perhaps, twice as many tools as before, each costing a half of what a tool for the same purpose formerly cost. Quantitative increments are, in this case, adding themselves to the working force, while qualitative elements are leaving the capital-goods, and quantitative additions to the stock are making and are keeping the true capital intact.

在产业子群中分配资本的规律也分配整个劳动力，因此也给予每一个特定的产业中所有工作者一定份额。劳动力的增加是遍布全社会的，在产业群及其产业子群中是通过社会的无意识行为分配的。这些增长不仅仅是质量上的增长，因为劳动力不是建立在一群效率较高的工人之上的。事实上，提高人的素质就是增加了社会劳动力；而经济学首先要处理的劳动力的增加来自于增长的人口。由劳动力市场扩大引起的质量转变在资本货物中是无效的；但当劳动力的数量是固定的情况下，资本货物与资本增量是相反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资本数量固定的情况下，增加人数意味着资本货物数量增长而质量却下降了。两个人做以前一个人做的工作，可能需要最初工具的二倍，每一份工具所花费的成本是最初相同工具的成本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增加了，而资本货物质量却降低了，库存量的增加使实物资本完整无损。

With thes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erms of the general law in mind, let us see, first, how qualitative additions to capital are actually made and, later, how capital apportions itself among the sub-group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capital-goods are improved is the same as that by which they perpetuate their kind. We noted that each perishable instrument of production virtually creates a successor for itself. The table that represents the group system of production reveals how this is done and also how, as true capital grows larger, the goods that embody it become better.

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个一般规律是如何解释的，最早的说法是，资本增量实际上是如何取得增长的，而后又解释为，资本在各产业子群之间是如何分配的。改进资本货物的机制与延续资本货物保持性质不变所运用的机制是一致的。我们发现生产中每一种易腐的工具几乎都为自身创造了一个继承者。代表生产的产业群系统的这个表格，揭示了这是如何做到的。因为实物资本增长的不断扩大，货物也相应的变得更好。

Let us, then, complete the table representing groups and sub-groups, in an extremely simple form but in a way that will completely reveal the law by which the apportionment of labor and capital is affected.

接下来让我们完成这个代表产业群及产业子群的表格，我们要以一种极其简单的形式，却能完全地将劳动力和资本的分配共受影响的规律揭示出来。

A''' A'' A' A

B’’’B’’B’B

The A's in the table now represent an article of prime necessity in process of completion. Let us say that A''' is food ready to be eaten, and that A is the rawest material that enters into it. Possibly A may be standing wheat, A' threshed and winnowed wheat stored in the granary, A'' flour and A''' bread. B may represent the material for clothing, in the shape of wool on sheep's backs; B' may be wool washed, sorted and stored in the warehouse; B'' may be cloth and B''' clothing. The C's may represent, successively, forest trees, saw-logs, lumber and houses. Severely simple, indeed, would be the wants of a society that should content itself with this list of articles. It is, perhaps, heroic theorizing that creates such a society, even in imagination; but what we said before, about the creating of an imaginary static society, holds true here. We are putting a myriad of facts for the moment out of sight, in order that we may isolate and clearly understand certain other facts. The law that would apportion the labor and capital of a very simple society is, as we shall see, the one that actually apportions them in the most complex society that anywhere exists.

表格中A系列目前代表完成过程中必需品的一项。我们来说明一下，A'''是准备食用的食物，而且是加入的最原始的原料。如果A是种植的小麦，那么A'就是打谷之后精选出来存到谷仓里的小麦，A''就是面粉，A'''就是面包。B可以表示做衣服的原料，如羊背上的羊毛，则B'可以是清洗过、分过类并且在仓库里储存的羊毛；B''可以是布料；B'''可以是衣服。相继地，C系列可以表示森林的树木、锯下来的木

头、木材和房子。事实上非常简单，一个社会的需求应该满足于这一系列的条款。也许是英雄理论学说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实际上是幻想的社会，不过我们以前说过的有关虚构的静态社会的创建在此是可行的。我们一直忽视此刻种种因素，以至于我们可以单独清楚地理解其它因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简单社会中劳动力和资本的分配规律，实际上是在最复杂社会中随时可见的。

In every one of these sub-groups there is labor and capital; and, as we have seen, the material tissues of the capital—the concrete things that compose it—are in a perpetual process of destruction and renewal. How are the destroying and the renewing effected? The stock of passive goods wastes, whenever an A''', a B''' or a C''' is withdrawn for use; and it is replenished by the industry that continually goes on in all the sub-groups. So much we have already seen. The stock of active capital-goods—the tools, machines, buildings, etc.—wastes by wearing out and by falling into natural decay. How is this stock replenished? There is, obviously, no power in the group of A's directly to restore the active capital-goods that are used up in making A''', for the whole power of this group exhausts itself in making A'''.

在每一个亚产业群中都有劳动力和资本；并如我们所见，资本的物质成分即购成它的具体事物，是处于不断损坏和不断更新的长期过程中的。这种损坏和更新是如何造成的呢？无论何时取出A'''、B'''或者C'''使用，都是在消耗无息货物的库存，而这发生在整个产业中并在所有亚产业群中频繁的进行着。现在我们已经明白这么多了。有息资本货物的库存，如工具，机器，建筑物等，由于磨损及自然腐蚀而消耗着。那么这一库存是如何重新完整的呢？很明显，A'产业群里没有能力恢复生产A'''时用掉的有息资本商品，因为这一产业群的全部能力在生产A'''时已经耗尽了。

Somewhere, however, there is another group, which we may represent by a series of H's. Its function is to make tools, machines, etc. In our highly simplified table, we will let this group of H's replenish all the waste of tissue that fixed capital suffers in the whole series of groups. H, H', H" and H'" now represent the materials that go into activ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nd they represent them in four stages of advancement. H is the rawest material that goes into tools, etc., while H'" is the assortment of instruments ready to be used. This succession is kept up, as in the case of the other groups: every evening finished H'" 's are taken away, and every day the stock of H'" 's is replenished by the transmuting of H" into H'", H' into H" and H into H', and by the creating of a new H. Forever intact is the series of H's, and this means that the true capital in the instrument-making group remains unchanged in amount.

然而，在某处存在另一个产业群，我们可以用H系列表示。它的功能是制造工具，机器等。在这个极其简化的表格里，我们让H系列这个产业群来补充整个产业群里固定资本承受的全部损耗。现在用H、H'、H"和H'"代表参与生产的有息工具原料，表示生产过程的四个阶段。H是工具中的最初原材料等等，而H'"是已准备好待用的工具种类。和其它产业群的情况一样，这一连续体这样维持着：每晚将完成的H'"系列带走，每天H'"的库存中充满着H向H`，H'向H"及H"向H'"的转变，以创造出一个新的H。永远完整的是H系列，这意味着，在制造工具的产业群中，真实资本数量是保持不变的。

Where do the H'" 's go, and what do they bring to the man in the H group? They go everywhere throughout the system replacing instruments that are worn out. Some of them go to A, some to B',

some to C'', etc. Some of them go back into the different sub-groups of the H series itself, to replenish the stock of instruments that are worn out in the making of instruments. The income which comes to the men in the sub-group H''' must, it is clear, come in the form of A''', B''' and C'''. The men in the last group in the table cannot eat the looms, the threshing-machines, the flouring mills, etc., that they are themselves making; but they must eat the bread represented by A'''. They can not wear their machines or dwell in mills; but they must have clothing and dwelling-houses. These they must get by taking some part of the product of the first three groups.

H'''系列去哪了呢？它们在H产业群中带给雇工什么了呢？它们在整个系统中一直起着取代磨损的工具的作用。它们中的一些进入A，一些进入B'，一些进入C''等等。一些返回到H系列本身中不同的产业群中，补充制造工具过程中磨损的工具的库存。清楚的是，在亚产业群H``中雇员得到的收入一定是以A'''、B'''和C'''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表格中最后一个产业群的雇员不能吃他们自己制造的织布机，打谷机，磨面机等等，他们必须吃用A'''来表示的面包。他们不能穿机器，住磨坊，必须有衣服和居住的房子。而要获得这些，他们必须参与前三个产业群中的某部分生产。

What is the source of that part of consumers' wealth which goes to supply the wants of makers of instruments? Is it gained by taxing the other groups? Does it come out of other men's wages? Is it, in truth, produced by labor or by capital in the former groups? Here we must be careful; for here, if anywhere in the analysis, there is a temptation to say that labor is creating “capital,” by feeding the men who make the capital. The laborers in the A group are certainly working for the laborers in the H group, and getting capital-goods as a return for it. Ye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food for

the men in the H group is no part of the net product of any of the men or of any of the tools in the A group. It is, however, a part of the gross product of the tools in these groups. Every instrument that is worth having creates a product that makes good its own wear and tear, besides the further product that is a dividend for its owner. The cloth that a loom weaves, to make good the waste that it undergoes itself in the weaving, is what it passes over to the H''' group. The men of H''' are virtually eating flouring machinery, since they are eating the flour that the mill makes in wearing itself out, but they are eating only that part of the flour which is reserved to make good this waste.

消费者满足工具制造者的需求的那部分财富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其它产业群的税收吗？还是来源于其他雇员的工资？还是由先前产业群的劳动力和资本生产的？在此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因为任何有关这个分析，都有一个倾向于这样的说法：劳动力创造了“资本”，而养活着制造资本的雇员。A产业群的劳动者必定一直为H产业群的劳动者工作着，将获得的资本货物作为报酬。然而，事实上，H产业群的雇员的食物并不是A产业群的雇员或工具中的净产品部分。而是这些产业群中工具的总产品的一部分。每一件有价值的工具都创造出一种为弥补自己的磨损产品，同时为雇主创造了一种股息产品。为弥补纺织过程中织布机的损耗，将织出的布料转移到H'''产业群。实际上，H'''组的雇员是在吃磨面机，因为他们一直在吃磨面机通过自身损耗而磨出的面粉，不过他们吃的只是为了弥补损耗而保留的面粉的一部分。

There are, then, quantities of A''', B''' and C''' that are regularly making their way to the H''' group. If they constituted deductions from the wages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men in the first three groups, the makers of H''' would be pensioners of the men in the other

groups. In fact, however, the men in H''' make their own income goods, in an indirect way, just as the men in the first three groups make their own active capital-goods, also in an indirect way. The men in H''' are not pensioners, but self-sustaining men, eating their own wages and interest. In concrete form, their incomes consist in goods that are of the kinds that support other men and that come from the same sources. The A''', B''' and C''' groups make the things that maintain the men in H'''; but the quantitative part of these products that goes to the men in H''' is solely that special amount that is produced by the machines, etc., in the first three groups for the replacing of the worn parts of the plant. In quantity, it is entirely distinct from the product of labor; and it is equally distinct from the net product of true capital, as such.

接下来，A'''、B'''和C'''的数量就有规律地转移到H'''产业群。如果按前三个产业群雇员的工资和利息推断，那么H'''的制造者就是其它产业群中领取抚恤金的雇员。然而实际上，H'''产业群的雇员使他们自己的收入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变成货物，如前三个产业群的雇员一样，也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使他们自己的有息资本成为货物。H'''产业群的雇员没有抚恤金，但是他们凭借自己的工资和利息自给自足。在具体情况下,他们的收入包含在很多种货物里，这些货物供养着其他雇员且有着相同的来源。产业群A'''、B'''和C'''制造着供养H'''中雇员的货物；但是这些货物的数量仅仅是用机器生产的特定数额，是取代前三组工厂中损耗的部分。在数量上，与劳动产量完全不同，与实物资本净产量也不同。

The men of the first three groups, then, in maintaining the men in H''', do not tax themselves in any way. The first task that is imposed upon a tool is to create wealth enough to buy another like itself, when it shall be worn out. This is a part of the gross product

of the instrument, but it is no part of the net product of the capital in the instrument. Only where an endless succession of instruments does more than to maintain itself—only where such a series of capital-goods creates a net surplus for its owner—is capital, as such, productive.

此外，前三个产业群的雇员在供养H'''中雇员的同时，没有以任何方式加重他们的负担。强加在一件工具上的首要任务是，当这件工具将损耗殆尽时，要创造出足够多的财富可以去买另一件像它一样的工具。这是这件工具的总产量的一部分，却不是其资本的净产量。只有工具不断的延长使用寿命，即只有资本货物为它的拥有者创造出净剩余，资本才是富有生产性的。

We have noted the fact that capital tends to be everywhere equally productive. It is true capital, however, that is so, not capital-goods. The net product from an endless succession of working instruments in the sub-group A tends to be as great as that of an endless series of working instruments in the group C'', or as that of one in B''' or elsewhere. This tendency requires that every instrument which is anywhere used shall, under a normal adjustment, create a product just large enough to pay for a duplicate of itself, besides yielding to the man who uses it a net annual income that is the same fraction of the cost of the instrument as is the income yielded by other capital-goods. This is the literal and concrete fact that is involved in the law of uniform interest.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地方的资本都是富有生产性的。然而，这是在说实物资本，而不是在说资本货物。亚产业群A

中因连续使用的操作工具生产出的净产量倾向于与C"产业群中的，B'"产业群中或者其他产业群中的都一样多。这种倾向要求使用的每一件工具，在适当的调试下，都可以创造出一种产量，这种产量除给予使用这种工具的工人的净年收入，也就是这种工具成本部分，或者说是其它资本货物产出的收入以外，刚好产出足以补偿这种工具实现自我倍增所付出的代价。这是统一的利息规律中直接而又具体的事实。

The instruments of the H'" kind that are scattered through the general groups, A, B and C are thus besides providing for their own successors, paying uniform interest. Every one earns a sinking fund during its lifetime, and the goods that constitute this sinking fund maintain the men in H'"; but entirely distinct from this fund is the interest on the true capital embodied in the instruments, which tends, under static law, to be uniform in rate. The goods that feed the men in H'" are the material forms into which, in a figurative sense, the tissue of the fixed capital has converted itself; while the goods that feed the men in A'", B'" and C'" are the true product of the labor and the capital in these groups.

遍布于A、B和C一般产业群的H'"类工具，除了为自己的接续者做准备外，还得支付统一的利息。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会赚得一种偿债基金，构成这一基金的货物供养着H``中的人；但完全有别于这一基金的是，体现在工具中的实物资本的利息，在静态规律下的，其比率倾向于一成不变。供养着H'"中工人的货物可以比作是固定资本成分自身转换而成的物质形式；而供养A'"、B'"和C'"中工人的货物是这些群体中劳动和资本的实物产量。

Active capital-goods, or the tissues of fixed capital, are, then, self-maintaining; and, over and above this, true capital maintains its

owners. [18_1] What this capital bestows on its owners they can afford to use up, without at any point impair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series of capital-goods that is to embody the permanent capital.

由此可见，流动资本货物，或固定资本成分，都是自给自足的；综上所述，是实物资本供养着它的拥有者。 [19_1] 这一资本，在不削弱代表着永久资本的资本货物的完整性情况下，给予它的拥有者们有能力支付使用的部分。

More capital, as has been shown, means better capital-goods; and we can now see how they are secured. In terms of our table, this improvement signifies that the H group becomes larger and that, in this way, a larger amount of productive energy is available for replenishing the tissues of fixed capital, as they perish in the using. Either more tools or better ones can now be made; but the conditions require that, in the main, it shall be better ones. The fixed number of workers in the A, B and C groups get improved appliances, and they turn out more of the A''', the B''' and the C''' than they formerly did. The improved tools maintain themselves, as the original ones did; and the special surplus of consumers' goods that goes to the H group is sufficient to maintain that group in an enlarged state.

正如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资本越多就意味着资本货物越好；我们现在弄清楚资本货物是如何被保证的。从图表看，这种改进意味着H产业群变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生产力可用来补充使用时消耗掉的固定资本部分。目前，制造出的工具可以更多或更好，但一般情况下，这需要更加优越的条件。A、B和C产业群中固定数量的员工获得了改进的工具，制造出了比以前A'''、B'''和C'''中更多的产品。改进

的工具像原始的工具那样维持着自身运行；另外，进入H产业群的消费品的特定剩余量足够供养规模扩大后的那个产业群。

An incidental result of the existence of more capital is higher wages and a larger grand total of interest. This signifies a greater output of A''', B''' and C'''; but it involves an improved quality of these consumers' goods, rather than a greater number of them. The studies that we have made of the law of value make this clear. Consumers' wealth, like producers', enlarges itself mainly by qualitative increments; and it follow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B, C and A''', B''', C''' becomes greater than it was. Each transmutation that takes place in a raw material that is “refining” under the workers' manipulations becomes a more decided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inished product is a finer and better thing than an equally ripe product formerly was. This is possible without any addition to the number of laborers in the A, B and C groups, by virtue of the increased power that more capital—that is, better capital-goods—gives to them.

一个附加结果就是存在的资本越多，工资就越高，利息总量就越大。这意味着A'''，B'''和C'''的产出较多；但它导致这些消费品质量提高了，而非数量增多了。我们关于价值规律的研究已将这点弄清楚了。消费者的财富，就如生产者的财富一样，主要是通过质量的提高来扩大自身规模，同时也导致A，B，C和A'''，B'''，C'''之间的差异增大了。工人加工处理的原材料每一次发生的变化，都是一次更加明确的变革，并且其成品比以前同样时期的成品更好。由于有更多的资本，也就是说更优质的资本货物，给予其更多的劳动能力，所以A、B和C产业群中劳动者的数量，是可能不做任何增加的。

How the original enlargement of the capital is caused is a question of economic dynamics. It may even seem that we have been outside of the strict limits of a static science, whenever we have traced the process of increasing the social capital. Throughout this volume, however, we have allowed ourselves to observe changes that directly bring about static adjustments. We have followed the growth of capital from a small beginning to a natural size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placing by itself the product of the final unit of the capital. The fund is used by a complex society composed of groups and sub-groups, the sum total of the fund is fixed, and the growth of it to its existing size is an imaginary and illustrative process. The illustration, however, is the more valuable when it respects the facts of life and keeps before the mind so much of the action of groups and sub-groups as suffices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by which, first, the material tissues of each kind of capital can be maintained and, secondly, the grade of each kind of capital goods can be improved. What is a mere substitution, when a new and improved tool is put into the place of an old one, becomes a transformation, when the permanent series of such tools is viewed in its entirety. Here permanent capital transforms itself for the better,—leaves inferior bodies and enters better ones,—when the amount of it increases, while the laboring force remains unchanged. But it transforms itself for the worse, when it remains unchanged in amount, while labor increases. Both transformations are effected by the agency of the branches of industry that in our simplified table are designated as the H group.

如何使资本发生原始扩大是一个经济动态学问题。无论何时追溯社会资本增加过程，似乎都是静态科学严格限制以外的。然而，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允许自己观察直接由静态调节引起的变化。我们仅仅出于定位资本自身产出的最终资本单元的产量目的，追随着资本从小

规模到常规规模的增长。一个复杂社会运用的基金包含产业群和亚产业群，这一基金的总数是固定的，它增长到现存规模是一个虚构的解说过程。但是，当这种解说涉及生活方面，并且凌驾于思维之上，和产业群及亚产业群的行为一致，足以揭示这一原理的时候，它就会更有价值，因为通过这一原理，首先，每一种资本的物质结构可能维持不变，其次，每一种资本货物的级别可能有所提高。当一个新的改进过的工具放到一个旧工具的位置时，它就仅仅是一个替换品而已，而当这种一系列工具源源不断的参与到整个过程时，它就是一次转变。在此，当永久资本数量增加，劳动力保持不变时，其转变得就越好，也就是说，舍弃劣质的部分而投入更好的部分。但是，当其数量保持不变，劳动力增加时，它转变得就越差。这两种转变是由产业分支机构造成的，在我们的简表中，这里的产业分支特指H产业群。

Saying this is not falling into the old error, which has been criticized in an early chapter of this work, of calling a store of food for laborers the primary form of capital. In the view here advanced, (1) there is no such store in existence, (2) the goods of the A''', B''' and C''' type cease instantly to be capital-goods when they are devoted to consumption, and (3) they are not “food for laborers,” but income goods for all laborers and capitalists. Further, the way in which they keep the tissues of capital intact is by substituting themselves for capital-goods that laborers and capitalists have already created and that constitute their incomes in the original forms which those incomes take. Products of the type A''', B''' and C''', as they go through the sub-group system to be used, merely transmute incomes already existing into available forms. The A that is created in the lowest sub-group is entirely income to that group; for it is not a constituent part of its capital or of the series that that sub-group must keep intact in its own hands. It represents the amount that this lowest sub-group can afford to spend on its living. In a static state this group will spend the whole amount. To society,

these goods, as they are passed on to the A' sub-group, are a constituent part of capital; since society cannot afford to trench on the amount embodied in the complete series of A, A', etc. Society can, however, speed the A''' that has just emerged from the last steps in the series. This it does by substituting the A''' for the unfinished goods that, to the men who now have them, are income in amount but not income in a usable form. In the forms in which they first exist these incomes keep social capital intact.

这样说并非就是陷入了这本书的前面章节中批判的旧错误中，过去曾把劳动者库存食物叫做资本的原始形式。这个观点提出了三个问题：（1）目前没有这样的库存；（2）当它们致力于消费品时，A'''、B'''和C'''类的货物马上就不再是资本商品；（3）它们不是“劳动者的食物”而是所有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收入货物。进一步说，它们是通过劳动者和资本家已经创造的及构成他们原始形式收入的资本货物，来取代自身的方式，而维持资本结构完整性的。A'''、B'''和C'''类的产品，进入亚产业群系统被利用，仅仅将现存的收入转换成可利用的形式。在最低层的亚产业群中创造出来的A全部是那个产业群的收入，因为它不是其资本或者其亚产业群自身维持完整性的组成成分。它代表这个最低层产业群能维持其生计的数额。在一个静态情况下，这个产业群将花费所有的数额。对于社会来说，当这些货物传递给亚产业群A'时，它们就是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社会不能侵害体现于A、A'等完整系列中的数额。然而，社会可以加快这个系列中最后阶段才出现的A'''的运作。通过用未完成的货物取代A'''，对于目前拥有它们的工人来说，这只是数额的收入而不非可利用形式的收入。这些收入起初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而维持着社会资本的完整。

[18_1].In the foregoing discussion, the statement has been made that capital-goods, virtually though not literally, make their own successors and thus keep capital unimpaired. Active instruments do this by creating a special income for the group that replaces them. Passive instruments, or raw materials, such as the A, A' and A'' of our table, do it by becoming, in the end, consumers' goods for the men in this series

of sub-groups, whose activity keeps the series of A's, etc., intact. The active instruments perish in the using, but the passive ones do not perish while being used as capital-goods. During this process, they receive accretions of value and lose nothing. Only when they cease to be capital-goods and begin to serve consumers do they begin to go to destruction. It is when they are ready for consumption that they are ready to replace themselves by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 men in the lower sub-groups to replenish the tissue of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19_1].在前面的讨论里，是这样陈述的：资本货物，实际上而非表面上，制造他们自己的接续者，并以这种方法保持资本不受削弱。流动工具是通过创造一种特定的收入来实现这个过程的，这种收入是产业群用来取代这些工具的。固定工具或原料，如表格中的A、A'和A"，通过最终变成供养这些亚产业群系列中工人的消费品而实现这个过程，这些工人的行为维持着A`s等一系列产业群的完整性。流动工具在使用过程中损耗，而固定工具在使用过程中作为资本货物并不损耗。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获得价值增长且没有损耗。只有当它们不再是资本货物却还为消费者服务时，它们才开始进入损耗阶段。当它们做好被消耗的准备时，它们就将尽可能使亚产业群的工人填补这一流动资本的部分，来取代它们自身。

Chapter XIX The Mode of apportioning Labor and Capital among the Industrial Groups

第十九章 产业群之间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模式

We are now prepared to state the law by which the entire capital of society at each point in its growth apportions itself, in certain natural quantities, among the different groups and sub-groups. That conception of social capital which we have carried through our entire study implies such an apportionment as this; for capital does not set as a completely socialized agent unless society, in some way, controls it all and disposes it so as to secure the best results. This requires that an economic force shall put into each sub-group in the system a definite and normal fraction of all the capital that society possesses, round as physical force levels the surface of a pond by putting into each part of it a definite fraction of all the water that it contains.

现在我们将制定一则规律，社会全部资本增长的每一阶段，在一定的常规数量内，不同产业群和亚产业群之间，都要依据这一规律进行分配。我们在整个研究中贯穿始终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就意味着这样一种分配；因为只有社会以某种方式完全控制并且安排资本才可保证最好结果，否则资本不会作为一个完全社会化的生产要素发挥作用。这就需要运用某种经济力量将社会拥有的所有资本中一定常规的量放入这个系统的每个亚产业群中，就像自然力将池塘里的水面变平是通过将其所需的水的一定量放入其中的每一部分。

It is clear that there is a normal apportionment. In the static

state, there must be a given number of units of capital at A, a given number at A', a given number at B, and so on throughout the system. What is it that makes these numbers normal? We have said that, in a general way, the apportionment is normal, when both labor and capital are uniformly productive at all the different points within the system—that is, when a unit of labor produces as much in one sub-group as it does in another, and when a unit of capital has everywhere the same producing power. Labor moves to and fro, seeking the points where it can produce and get the most wealth. What capital may get at the different points is not an influence that appeals to labor, for wages only are what labor is seeking. Capital, likewise, moves to and fro in the group system, seeking out the points where it can get the most interest. So far as motives are concerned, each of these agents is independent of the other.

这很明显是存在一种常规分配。在这种静态情况下，A、A'、B等整个系统中一定存在既定单元数的资本。是什么使这些单元数呈现常规的呢？如前所述，总的来说，当该系统内各处的劳动和资本都同样多产时，也就是说，当单位劳动在一个亚产业群中和另一个亚产业群中产出一样多时，另外，任何一处的单位资本，生产力都相同的时，这种分配就是常规的。劳动往复流动，寻找可以生产及获得最大财富的地方。资本在各处所获得的并不能成为吸引劳动的因素，因为劳动追寻的只是工资而已。同样地，资本在产业群系统中也往复流动，寻求能够获得最大利息的地方。就动机而言，这几个要素都是独立存在的。

Yet neither of these agents can move without affecting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the other. If any labor departs from the sub-group A', the capital that remains there will lose something of its own productive power—will produce per unit fewer goods than

before. As yet we say nothing about values, although they constitute a second element that must soon be considered.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is: How much power has a unit of labor, on the one hand, or a unit of capital, on the other, to create goods? If labor departs from one group, the power of capital to create commodities is there reduced; and there is, to this extent, an influence that tends to make capital move also. As a matter of fact, neither of these producing agents can move from group to group without exerting an influence that tends to make the other agent also move. The action of these influences in actual life is highly complex, because different industries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very detailed and complex ways; yet the principle that governs the movement is in its nature simpl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at share of the whole capital of society is the normal amount for the group A to possess, or what is the natural amount for B or for C. When an abnormal amount of capital is found at one of these points, an influence that is not hard to detect sets itself at work to move capital to or from it, as the case may require.

然而，没有一个要素的流动不会影响另一个的生产力。如果某一个劳工离开亚产业群A'，那么原有的资本将会失去一部分生产力，单位产量货物将降低。我们尚未谈及价值标准，虽然它们只构成了一个次要因素，马上就会被考虑的。首先要考虑的是：一方面，一个劳动单元拥有多大创造货物的能力；另一方面，一个资本单元拥有多大创造货物的能力？如果劳动离开产业群，那么资本创造产品的能力就会降低，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资本流动。事实上，这两个生产要素中没有一个，在产业群间流动，能在不影响另一个要素流动的情况下进行。现实生活中这些效应行为非常复杂，因为各产业结构以微妙且复杂的方式互相关联着，不过控制流动的规律在本质上是简单的。不难理解，A产业群中拥有的常规数量占社会总资本份额的多少，或者说，B产业群或C产业群中常规数量的份额多少。当这些点之中任一处

有反常规数量时，不难发现一种效用会根据情况需要，自行发挥作用，使资本或流入该处或从该处流出。

Capital is moved from group to group by the same agency which brings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in its quality. Both kinds of changes involve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H group. If there is an instrument in the A group that is not to be replaced, and if it has earned its sinking fund by creating enough of A''' to pay for the replacement of it, then this A''' goes to pay for another instrument that is capable of being used in (say) the B group. The men in the H group make, for example, a tool that will help to make clothing, instead of one that would have helped to create food. The entrepreneurs at A thus relinquish a certain quantity of capital, and the entrepreneurs at B receive it.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his transfer is effected we have just traced, for the self-replacing fund created by one instrument has been used to pay men for making an instrument of another kind. There are, of course, cases in which tools may be taken bodily out of one industry and put into another; but there are few in which this can be done without some waste of capital. The regular method of moving capital, without wasting any of it, is the one that we have just described. Together with this moving of fixed capital, there are, of course, local changes in the amounts of raw materials used, and these are equivalent to moving circulating capital.

资本因一种要素而引起质量变化，也因这种要素从一个产业群流动到另一个产业群。这两种改变都与H产业群的干预有关。假如A产业群中有一种工具不予以更换，并且它已经创造出足够多的A'''，赚得了重置费用的偿债基金，那么这个A'''就可以支付在B产业群中使用的另外一种工具了。例如，H产业群中的雇员制造出有助于制作衣服的

一种工具，来取代以前有助于制造食物的工具。那么，A的企业家就交出一定量的资本，归B的企业家所有。这种转移是通过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机制实现的，因为由一种工具创造出的重置基金，花费到制造另一种工具上了。当然，有些情况下，工具全部从一个工厂中撤出而投放到另一个工厂中，不过几乎没有不造成资本浪费的。使资本流动而又没有任何浪费的常规方法就是我们刚刚描述的那种方法。当然了，与固定资本流动一起发生的还有部分所用的原料数量的改变，而这些变化是与运行的流动资本一致的。

It is to be noted that labor is moved in the same way. Men can be taken out of one industry and put into another more easily than can material instruments, since they are more adaptable; and yet the cases are few in which a workman can change his occupation with absolutely no waste of productive energy. If he has learned to work at one occupation, it requires some time to enable him to work at another equally well. Old workmen in highly skilled occupations can, as a rule, never develop in a new employment the facility which they have possessed in the old one. The regular way of moving labor without wasting any of it is to let the son of a workman learn a trade that is unlike his father's. The permanent force of social labor maintains its own tissue in a way that is quite analogous to the way in which social capital does so. Besides earning a living for themselves, men must rear successors who will take their places in the working series. The moving of labor from group to group means, then, that the successors of certain laborers do new kinds of work. Labor, as a permanent force, may be said to be perfectly mobile; and yet the transfers, if they do not reduce the amount of the force, must be made without actually changing the places of the men.

需要强调的是，劳动也以相同的方式流动。雇员从一个工厂撤出进入到另一工厂，比物质工具容易，因为他们适应性更强一些，然而，一个工人改变职业而完全不浪费生产力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即使已经学会了从事一种职业，如若要胜任另一种职业，同样也需要一定时间。一般来说，高技能类职业的老员工在新的职业上，从来都不会拥有在原职业中所掌握的技能。劳动实现流动而又不被浪费的常规方式，是让工人的儿子学会一种与其父亲不同的职业。社会劳动力的永续力维持自身结构的方式，类似于社会资本维持自身的方式。工人们除了挣得生计外，还必须培养接续人，以在这个工作系列中接替他们。那么，劳动从一个产业群到另一个产业群的流动，意味着一定的工人接续者从事着种种新职业。劳动，作为一种永续力，可以说是完全流动的；但是如果想不减少劳动力的数量，这些转移就必须避免改变工人们的职业。

Being, then, quite sure that it is perfectly possible to move both labor and capital without sacrificing any part of either of them, we may put before our minds a society that fulfils the condition of the static slate. The elements are perfectly fluid, but they do not flow. The condition is like that of a pond, where the dropping of a pebble into the water would ultimately move every particle of it, and yet not one particle stirs. The static group system is one in which a slight disturbance would cause many transfers of labor and capital from group to group, and yet not a single transfer takes place. There is, in other words, a perfectly normal amount of labor and of capital in every group and sub-group in the series. How did it get there? It is equalized pressure that brought the surface of the pond to a level; and it is equalized inducement that produces the static adjustment of labor and capital in the group system.

不过，由于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劳动和资本不牺牲其中任何一

方就实现流动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符合这种静态条件的社会。各种要素都是完全流动的，但却不见它们流动。这种情况颇像一个池塘，一颗卵石落入水中，每一滴水都改变了原来的位置，但却不见一滴水移动。静态产业群系统是这样的一个系统，一点小的干扰都可引起劳动和资本在各产业群中的转移，却没有发生一个单独的转移。换句话说，这个系列的每个产业群及其亚产业群中都有常规数量的劳动和资本。它又是怎么获得那些劳动和资本的呢？致使池塘表面呈现水平面的是均等化压力；同样，使产业群系统中劳动和资本呈现静态调整的是均等化引力。

We have described, in an earlier chapter, the law that controls the apportionment of labor and capital among all the groups, and have called it the universal law of economic variation. It acts in consumption; and when it operates upon a fixed number of persons, it causes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consumers' wealth to have less and less specific utility. That law thus regulates values; for goods bring smaller prices, the more there are of them. The law acts also in production, causing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one industrial agent, when it is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a fixed amount of another agent, to have per unit less and less productive power. Labor, for example, in connection with a fixed amount of capital, produces fewer and fewer goods per unit, the more there is of it. The law has to act in both these ways, in order to apportion labor and capital, in natural amounts, throughout the industrial system. The general law that, on the one side, fixes values and, on the other side, fixes power to produce goods thus has a twofold effect; and the outcome of it all is that a unit of labor tends, under perfect competition, to have as large a power to produce value in one part of the system as it has in another. A unit of capital shows the same tendency.

在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经讲述过控制劳动和资本在各产业群间的分配规律，并称之为经济变化普遍规律。该规律在消费领域中见效了，应用于固定数量的人群中时，就导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财富的特定效用日渐减少。该规律就是这样调节价值的；货物量越多,价格就越低。该规律在生产领域也有效，当一个数量不断增加的生产要素与一个数量固定的要素一起使用时，就会导致该生产要素的单位生产力越来越少。例如，当劳动与数量固定的资本一起使用时，应用的资本越多，其生产的单位货物就越少。在整个产业系统中，就自然总额来说，为了分配劳动和资本，该规律必须发挥双重作用。这个一般规律，一方面决定着价值，另一方面决定着生产货物的能力，因而具有双重作用；它的全部成果就是，在最激烈的竞争下，在这个系统中单位劳动的一个产业群产生价值的能力和另一个产业群的一样大。单位资本拥有同一趋势。

Let us apportion labor and capital somewhat at random throughout the group system. In some places we shall have more of both agents than a static adjustment calls for, and in some places we shall have less of both. In some sub-groups we shall have more of one agent and less of another than a normal adjustment would give. If the proportions of labor and capital within a group are normal, and if there is an excess of both of these agents within the sub-group, the effect will show itself simply in the low price of the product of the industry. The respective products of labor and of capital, as these products are measured in kind, will be normal. Each agent creates the right amount of goods within the group.

让我们在整个系统中稍随意地分配劳动和资本。在有些地方，我们分配的这两种生产要素比静态调节需求多；在有些地方，分配的比需求的少。在某些亚产业群中，与正常的调节给予的相比，我们可以将一种要素分配多些，而另一种分配少些。如果在一个产业群中劳动

和资本的比例是标准的，假使其亚产业群中这两种要素都超标的话，那么这个产业产品的价格就会低廉。劳动和资本各自的产品将会是常规的，因为它们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计量的。每一种生产要素都在其产业群内创造出恰当数量的货物。

Wher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too much of one agent and too little of another, a unit of the agent that is present in excessive quantity will create fewer goods than it should, and a unit of the agent that is present in deficient quantity will create more goods than it should. It is possible,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at the price of the goods may still be normal; since, whatever their respective productiveness, the two agents together may produce a normal quantity of the goods. In apportioning labor and capital amoung different employments, we can seldom secure to a group, as a whole, the exact amount of productive power that static law calls for; and we can still less hope to secure for the labor and the capital that go to each sub-group the right amounts of specific power to create goods in kind. Nearly every sub-group will, then, produce either too much or too little of its commodity; and the price of its product will be either too low or too high. In nearly every sub-group there will be too much labor, as compared with the amount of capital, or too little. The specific power of one of these agents to create goods will be larger, and that of the other will be smaller, than static law require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re will be movements in many directions; as there would be in a pond, if water were in some way put into different parts of it in an equally haphazard way. Nevertheless, the principle that governs such currents of water as would result is simple, though the currents themselves may be too complex for tracing; and the same thing is true of the movements of labor and capital. Labor and capital move from separate impulses, since each agent seeks its own interest, and

not the interest of the other. The motives of their movements are independent; but their movements are interdependent, since neither of them can move without changing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the other. As the result of all this, each one goes where it can produce the most. Whenever one is placed in such a position that any movement would diminish its productive power, it is under an inducement to stay where it is. Such an agent, however, may enjoy for the moment a productive power that is abnormally great; and, if that is the case, it is bound to lose this excess of productivity by reason of the movements of other agents. We shall see how this occurs.

另一方面，在一种生产要素过多而另一种生产要素过少的地方，数量过多的那种要素的一个单位将创造出比本该创造出的货物少，数量过少的那种要素的一个单位将创造出比本该创造出的货物多。在这些情况下，这些货物的价格仍保持正常是有可能的；因为无论它们各自的生产力怎样，这两种生产要素在一起时仍可以生产出正常数量的货物。总的来说，我们在各行业间分配劳动和资本，却几乎不能保证一个产业群对于静态规律需求的恰当数量的生产力；对于保证每一个亚产业群中的劳动和资本恰好创造出特定劳动所能创造出的货物数量，我们所抱的希望就更小了。此外，每一个亚产业群生产的产品不是过多就是过少，而产品的价格不是过高就是过低。几乎每一个亚产业群中的劳动，与自有资本额相比，均不是太多就是太少。与静态规律需求的特定生产力相比，这些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创造货物的特定生产力将会太大，而另一种的将会太小。在这样的环境下，将会发生朝很多方向的流动；就像给一个池塘蓄水，水同样会以一种随意的方式注入池塘各处。不过，尽管追踪水流本身很复杂，控制水流所产生的规律是简单的，同样，劳动和资本的流动也是如此。劳动和资本由单一的推力而引起流动，因为这两种要素寻求自己各自的利益，而非对方的利益。它们各自流动的动机是独立的，但它们的流动又是互相依存的，因为这两种要素中任何一种的流动一定改变另一种的生产力。

这就致使每一种要素流向各自的产量最高处。每当一种生产要素流到使其生产力减少的地方时，它就会受到一种引诱力而停在此处。然而，此刻这种要素可能有极高的生产率，如果情况如此，那么由于其它各要素的流动，势必会失去这过高的生产率。让我们看看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Let us, at first, confine our attention to movements between the general groups, whose incomes are clearly derived from the sale of completed products. When the price of A''', for example, is high, the whole group that makes it is well off; and when the price falls, this body as a whole becomes worse off. This change affects the product and the income of the group as a whole; but there is another change that affects the product and the pay of labor within the group; and that, as we have seen, is a diminution in the amount of this labor or an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the capital that is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it. In general, the returns obtainable by an agent of production depend, first, on the relation of the group in which it works to other groups and, secondly, on the relation of this agent to other agents within its own group. The agent that has the largest productive power of all is in a group the total output of which is abnormally small; and, further, this agent is present in the group in an unnaturally small quantity. Labor would have its largest wealth-creating power, if it were employed in making an article of which the demand exceeded the supply, so that the value of the article should be great, and if it were working in shops in which capital was over-abundant, so that the part of the product that could be traced to a unit of labor itself would be large. A single workman might virtually make, in a year, many pairs of shoes, because of the profusion of instruments placed in his hands; and yet the price of the shoes might be high, because of a shortage in the total supply. Here is the condition of all abnormally large productivity for this

kind of labor.

首先，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一般产业群间的流动上，各产业群的收入显然来自于成品的销售。例如，当A'''的价格高时，生产这种产品的整个产业群都是富有的；而当价格跌落时，整个产业群就会陷入困境。这种变化影响着该产业群整体的产量和收入，但影响产业群内产量和劳动工薪的还有另一种变化，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即这一劳动数量的减少或与这一劳动连在一起的资本数量的增加。总的来说，一种生产要素可获得的收益，首先取决于该要素在其发挥作用的产业群与其它产业群的关系；其次取决于该要素与其发挥作用的产业群内其它要素间的关系。生产力最大的那种要素所处的产业群总产量非常的小，甚至可以说，该要素所处的产业群产量极其的小。如果制造供不应求的产品，使其价值大，另外，如果运行的资本过多，使得单位劳动生产的产品多，那么劳动就会有最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一个工人因为拥有大量的工具，一年之内可能制造出许多双鞋，但却会因为鞋的总供应量短缺，其价格可能提高。这就是这种劳动的生产率极高的情况所在。

It is clear that labor would rush to such a point from groups where opposite conditions existed. This influx would have two effects. It would first reduce the specific power of labor to create goods; for, as soon as there were more laborers in the shops,—supposing that the capital were adapted, in form, to the needs of the larger number of workmen,—a particular worker would be able to make a smaller number of them than he could make when labor was scarcer. Moreover, the influx of labor would mean a greater sum total of these goods for sale, and the price would fall. The goods attributable to a unit of labor would, then, already have been reduced in quantity; and they would now also be reduced in price. The specific product of the labor, as counted in value, would thus

be reduced in two ways. Each man would produce fewer goods than he did before, and each unit of the goods would sell for less.

劳动显然就会从条件相反的产业群涌向这样的产业群。这一涌动将产生两种效应。首先，劳动创造货物的特定能力将减少；因为假设资本在形式上适应了更多数量劳动的需求，一旦工厂里工人多了，某个特定的工人所生产的货物的数量就会少于劳动短缺时这个人所能生产的货物。其次，劳动的涌入将意味着供销售的货物总量增加，价格跌落。归因于单位劳动的货物数量已经减少，而现在它们的价格也将减少。按价值计算，这一劳动的特定产品将在两个方面上减少。每个工人生产的货物将比原来少，单位货物的销售将不如从前。

What, now, is the effect of such an influx of labor on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capital in this group? In one way it reduces it, while in another way it increases it; and it may end by leaving it not greatly changed. The more labor there is in the group, the greater is the specific power of capital there to produce goods. In this respect, capital steadily gains by the influx of labor. On the other hand, this influx means the enlargement of the total output of the industry, and a reduced price for its product. Here the capital loses. While there are more goods, the origin of which is traceable to a unit of capital, these goods sell for less than they previously sold for. Capital loses by the fall of the price of its product, though it gains in the quantity of its own specific product, as measured in kind.

目前，劳动的流入将对这一产业群的资本生产力有什么影响呢？一种情况，使资本减少了；另一种情况，使资本增加了；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不增减资本数量。这一产业群中劳动越多，用来生产货物的资

本的特定生产力就越大。就这方面来说，资本将会因为劳动的流入而稳步增加。从另一方面来说，劳动的流入意味着这一产业总产量增加，产品价格跌落。这种情况下，资本就亏损了。尽管货物增产了，但归因于单位资本，这些货物销售的价格就比从前少了。虽然资本按性质计量的特定产品数量增加了，但却由于其产品价格降低而亏损了。

It may be that, after the influx of labor, the capital of this sub-group is slightly more or slightly less productive than it is in other industries. The variation from the normal productivity will, however, probably be far less than it was in the case of labor. The original hypothesis assumed that capital was abundant in the group and also that the price of its product was high, by reason of a small total output. Under these original conditions, a unit of capital would produce few goods; but, as the price of the goods would be high, possibly the power of a unit of capital to produce value might not be very abnormal. When the new labor came into the group, the power of the capital to create value might not greatly change, for it would be diminished by one influence and increased by another. The enlarging power to create goods might, therefore, allow a unit of capital, in the end, to create about as much value as it did at the outset.

也许在劳动流入之后，这一亚产业群的资本生产力与其他产业相比，或高些或低些。然而，在劳动的情况下，与正常生产率相比，可能比以前的少很多。原来假定产业群中资本充足，产品却因总产量少而价格高。在这些原有条件下，单位资本将生产出极少的商品；不过，由于货物的价格很高，资本单元生产价值的能力或许不那么异常。当新的劳动流入产业群时，创造价值的资本能力未必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它会因某种因素减少，也会因某种因素增加。因此，创造货

物的能力增加，可能使单位资本最终创造的价值与起初时的一样多。

The power of labor to create value would, then, have been lessened by two influences working together, since a unit of it would create fewer goods, while the goods would bring smaller prices. The specific power of capital to create value would, on the other hand, have been reduced in one way and raised in another. If, as we have said might be the case, the value-producing power of capital, after the transfer of labor had been completed, were either more or less than it was elsewhere, there would be a slight movement of capital to or from this group. This movement would quickly make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this capital about normal. If capital were flowing into the sub-group, this movement would reduce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capital in the two ways that we have described—by diminishing its power to create goods, and by bringing down the price of the goods. It would, however, have very little effect on labor; for, while it would slightly increase the total output of goods and would reduce the price of them, it would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goods specifically traceable to labor.

另外，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受两种影响共同作用而减少，因为单位劳动创造的货物越少，而货物的价格就越低。反之，资本创造价值的特定生产力在一方面减少了，在另一方面增加了。如果情况正如我们所说的，劳动完成转移之后，资本生产价值的能力和以前任何地方相比不是高就是低，那么将会有资本流入或流出这一产业群。这种流动将很快就会使其资本的生产力正常。如果资本流入其亚产业群，那么这种流动将以我们提到过的那两种方式减少资本的生产力，即减少创造货物的能力，以及降低货物的价格。不过，这对劳动所产生的影响极小；因为只有它稍稍增加货物的总产量并降低其价格时，才会增加指定归因于劳动的货物数量。

It is clear that movements of this kind have the power to correct disproportions in the quantities of labor and capital existing within the groups. We selected for study an industry in which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labor was at its maximum—where labor produced much in goods and goods were high in price. Such a group exercises the largest attractive power over labor. The group from which labor would be most strongly repelled would be the one in which these conditions were exactly reversed—one, namely, in which there should be much labor relatively to capital, a large aggregate of goods produced and a low price for the goods. Here one man would produce few goods, and the goods would be cheap; so that the men would be under the greatest inducement to move away.

显然这种流动有能力调整产业群内存在的劳动和资本数量的不均衡。我们为研究选择了劳动生产力达到最大值的一项产业，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的货物量多且价格高。这样的一个产业群对劳动有着极其大吸引力。劳动强烈排斥的那种产业群恰恰是与这些条件相反的产业群，在此种群体里劳动相对于资本来说比较多，而且货物总产量很多且价格低廉。在此产业群中，一个劳工生产的货物很少且廉价，因此人们往往受到离开的诱惑极大。

In noting the manner in which a disturbed pond of water acquires a level surface, we do no harm by supposing that the identical water of the highest wave flows into and fills the deepest trough. So, in the case of the disturbed sub-groups, we may suppose that labor rushes from the point where it has the smallest productive power to the point where it has the greatest. If, for local reasons, some of this particular labor stops on the way, it does not

fail to cause an equal amount of labor to move to the point where the great deficiency existed; and the effect is the same as though the identical men in the group where the labor had the smallest productive power made their way directly to the group where it had the largest.

在指出扰乱的水面又变水平的方式时，我们可以假设水面的波浪最高处的水波流入了最低处。因此，在扰乱的亚产业群中，我们就可以假设劳动从生产力最低点涌入最高点。如果这种特定的劳动因为部分原因停滞在半路，那么就不能使同等数量的劳动流入到其短缺之处；另外其效果是这样的，同样的劳工在劳动力最小的产业群直接进入劳动力最大的产业群。

In the group from which the labor moves the effects are, of course, exactly the opposite of those which are seen in the group to which it goes. We said that at first the group where labor was in excess created a large output of goods and got low prices for them.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a single unit of labor was low, however, because it produced few goods and because the goods did not sell well. With every unit of labor that departs from this group, the remaining labor becomes more productive of goods and the goods sell better. The labor thus gains doubly in its specific power to produce value. The capital in this group loses power to produce goods, but the goods gain in value; and, although these influences may not accurately offset each other in quantity, and some small movement of capital to or from the sub-group may still take place, the amount of this movement, as compared with the movement of the labor, is slight. The changes that take place in this sub-group are, in short, the antithesis of those which take place in the group that we first described.

当然，在劳动流出的产业群与我们见到的流入的产业群中的效果恰好相反。我们曾讲过，起初劳动过多的产业群创造大量的货物却获得低廉的价格。然而，一个劳动单元的劳动力低，是由于生产的货物很少再加上不畅销。随着一个个劳动单元离开该产业群，剩下的劳动生产力就提高了，而且货物也畅销了。因此，劳动创造价值的特定能力从两个方面获得提高。在该产业群里资本丧失了生产货物的能力，但货物获得了价值；另外，虽然这些影响在数量方面不能完全的互相抵消，但资本的小流入或流出还是可能发生的，与劳动的流动相比，资本的流动数量是微不足道的。总之，该亚产业群内发生的变化是我们之前描述的产业群内发生的变化的对照。

Two influences, then, determine the specific productive power of labor and of capital in a group. One of them is the price of the product, and that depends on the total amount of it. Another is the fraction of the product that is attributable to a unit of labor or to a unit of capital, and this depends on the relative amounts of labor and capital within the group. Where one agent—say, labor—is in excess, the two influences work together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it; while, in the case of the other agent, capital, the two influences work in opposite ways.

由此可见，有两种因素决定一个产业群内劳动和资本的特定生产力。一种因素是产品的价格，它取决于产品的总产量。另一种因素是归因于单位劳动和单位资本的那部分产品，它取决于产业群内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数量。当一种要素过量时，比如劳动，这两种因素就一起发挥作用以减少其数量；而当另一种要素过量时，比如资本，这两种因素就以截然相反的方式发挥作用。

Three possible conditions render an agent comparatively unproductive in the group where it is located: (1) It may have a low power to create goods, while the goods are of normal value; (2) it may have a normal power to create goods, while the goods are abnormally cheap; or (3) it may have a low power to produce goods, while the goods have a low value. The first condition is corrected by a change in the relative quantities of the labor and the capital in the group, leaving the gloss output of goods unchanged. If labor is the agent that is poorly paid, some labor may move out of this group and some capital may come into it. The second condition is corrected by a change is the absolute quantity of goods produced, leaving the relative amounts of labor and capital essentially unchanged. Both labor and capital may move out of the group, and the price of the product may rise. The third condition is corrected by changing the proportionate amounts of labor and of capital, and also the total amount of goods produced. If labor is the poorly paid agent, some of it may migrate from this industry to others, while no capital migrates to it. The whole output of this industry will then be smaller, the price of it will be higher, and the contributory share of a unit of labor,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a unit of capital, will be larger.

有三种可能的情况会使产业群中的某种生产要素的生产力相对减弱：（1）创造货物的能力低，而商品的价值正常；（2）生产商品的能力正常，而商品廉价；（3）生产商品的能力低，而商品的价值也低。第一种情况可由产业群内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数量变化制止，而使其总产量不变。假设劳动是报酬低的生产要素，那么某些劳动就可能流出该产业群，而某些资本可能流入。第二种情况可由生产的商品绝对数量的变化制止，而使其劳动和资本相对数量本质上不变。劳动和资本可能流出该产业群，从而使产品的价格提升。第三种情况可通过劳动和资本的比例量的变化以及生产的商品总量制止。如果劳动是报

酬低的生产要素，那么某些就会从这一产业转移到其它产业，但却没有资本的移入。这一产业的总产量将越来越少，价格将越来越高，与单位资本相比，单位劳动的贡献性将更大。

Three opposite conditions make an agent exceptionally productive: (1) It may have a large power to create goods, while the goods are of normal value; (2) it may have a normal power to create goods, while the goods are abnormally dear; or (3) it may have an exceptionally large power to create goods, while the goods are unnaturally dear. Movements the reverse of those just described correct these conditions. Whenever the price of goods is normal, while one agent is abnormally productive, the other agent must necessarily be abnormally unproductive. The one agent will, therefore, move to the group and the other will move from it at the same time. One influence tends to raise the price of the goods, while the other tends to lower it. These influences in time neutralize each other, and the only effective change is in the specific powers of each of the agents to produce goods. This is the adjustment that the conditions required, and it ends by making both of the agents normally productive. Where the value of the goods needs to be changed, with no change in the relative powers of labor and of capital to produce goods, the adjustment is effected by an influx or an efflux of labor and capital moving together. Where value and comparative productivity have both to be changed, in order to bring the value-creating power of labor and of capital to a natural level, the adjustment is effected by the process that we described at the outset. One agent is moved out of or into the group by two forces which work together, while the other agent is affected by two forces that work against each other. If the two forces work concurrently in the case of labor, the sum of them expresses the amount of force that is impelling labor to or from the group. If the

two work against each other in the case of capita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measures the resultant force that acts on that element.

有三种截然相反的情况会使某种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异常的高：（1）创造货物的能力大，而货物的价格正常；（2）创造货物的能力正常，而货物极其昂贵；（3）创造货物的能力异常的大，而货物反常的贵。那些正相反情况所描述的流动制止着这些情况。当货物价格正常，一种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异常高时，另一种要素的生产力必定极其的低。因此，前一种生产要素流入该产业群时，另一种则流出。一种因素趋向于提高货物价格，另一种则相反。这两种因素最终互相抵消，而唯一有效的改变在于这两种要素中每一种生产货物的特定能力。这种调节是这些情况需求的，以使这两种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正常。在货物价值需要调节之处，不必改变劳动和资本生产货物的相对能力，这种调节就可以通过劳动和资本共同流入或流出而实现。在价值和相对生产率都需要调节之处，为使劳动和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调节到正常水平，可以通过我们在开始时描述的过程来完成。一种生产要素流入或流出产业群，需要两种力共同发挥作用；而另一种生产要素却需要两种力互相对抗来实现。如果这两种力在劳动方面共同发挥作用，那么二力之和就是驱使劳动流入或流出该产业群的合力。如果这两种力在资本方面互相对抗，那么二力的差异就是由那个要素所发挥的合力计量的。

If we were actually to apportion labor and capital at haphazard among the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re would be a few of them into which both labor and capital would flow, in quantities that would be about uniform; there would be a few industries from which labor and capital would flow, in about uniform proportions; and there would be a few into which only one agent would go, and others from which only one agent would go. A great majority of the

industries would require some compounding of these adjustments—would demand that one agent should go to them or from them in large quantities, while the other should go from them or to them in small quantities. Every movement that would thus take place would be brought about through the action of the universal law of variation that we have described. The greater the amount of one agent that coöperates with the other, the smaller is the power of a unit of it to create goods; while the greater the amount of goods produced, the smaller is their value. Agents that are perfectly mobile would quickly reach a state of uniform productivity in all industries, by the action of these influences.

若我们在不同的产业之间肆意的分配劳动和资本，则劳动和资本会以一致的数量流入某些产业，而它们也会以一致的数量流出某些产业；在一些产业中，有只有一种生产要素流入，也有只有一种要素流出的情况。绝大多数产业都需要这些调节组合在一起，它们需要一种生产要素大量的流入或流出，另外一种要素的少量的流入或流出。因此所发生的每一种流动，都是根据我们已经描述的经济变差普遍规律的作用导致的。与另一种生产要素合作的一种要素的数量越大，则其单位数量生产货物的能力就越低；而生产出的货物量越大，则它们的价值就越小。在这些因素作用下，完全流动的要素在所有产业中很快就达到在一种均衡的生产率状态。

We have spoken of the movement of labor and capital as though it were spontaneous, and as though labor, for example, went of its own accord from a place where its productive power was small to a place where that power was greater. But it is, in reality, entrepreneurs who do the moving, and it is competition that makes them do it. Our theoretical assumption makes the competition of one employer with another active and certain; and unerring,

therefore, are the transfers of labor and capital that result from the competition. In every group in which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labor is slight, low wages only can be paid; and labor can be lured away from this group by the offer of the slightest advance over the rate that it gets. In our ideal hypothesis, there is no friction to be overcome: five cents a day of extra wages will take labor out of one employment and into another, and a tenth of one per cent in interest will move capital.

我们提到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时，仿佛它是自发的，仿佛劳动自发的从生产力低的地方流向生产力高的地方。然而，事实上，这种流动是企业家运作的，而竞争使企业家运作流动。我们的理论假说是一个雇主与其他雇主之间是主动的且必然的竞争，因而，这种竞争导致的劳动和资本的转移就是可靠的。在每一个劳动生产力小的群体里，支付的工资是低的；只要被提供比目前稍多一些的工资，劳工就可能离开这个产业群。在我们理想化了的假设中，没有需要克服的摩擦力，也就是说，日工资增加五美分就可使劳工更换职业，千分之一的利息就可使资本流动。

In the industry where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labor is great, the actual pay that the men are getting depends, however, on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labor, not in that group, but in society as a whole. There is a general rate of wages; and employers in this group can have laborers for what it costs to get them out of the other groups, in which their productive power is smaller. By doing this they can make a profit. For an interval they can hol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y of labor in the general market and its earning power in the industry into which they bring it. This is, however, a vanishing difference; for, as competition does its work, it slips through the employers' fingers. The eagerness of different

employers to get a part of this profit makes them strive to anticipate their competitors in enlarging their working forces; and the enlargement goes on till the local product of labor is equal to its pay, and there is no further profit to be gained from this source.

不过，在劳动生产力高的产业，工人获得的实际工资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而不是那个产业群本身的劳动生产力。有一种一般工资比率，在这个产业群的雇主能拥有另一个生产力较低的产业群里的劳工。这样做，雇主就可以获得利润。在一段间隔期内，工人能享有一般市场的劳动工资与他们带给这个产业的收益能力之间的差额。不过，这是一种即将消亡的差额；因为竞争的存在，这种差额将从雇主的指缝间溜走。不同的雇主想获得这一利润的急切性，促使他们争取参与竞争，扩大劳动力规模，直至部分劳动产量等于工薪，从而没有更多的利润可获。

The movements of capital are brought about in the same way, by the action of entrepreneurs. Competition does it all; profit is the universal lure that makes the competition work;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whole movement is a no-profit state. As the movement proceeds, each bit of entrepreneurs' gain dwindles to nothing. A static state offers no inducement to further movement; and that is saying that it offers no profits, for profits are always an inducement to such movements. [19_1] When, therefore, we say that the productivity of labor is high in one industry, and that other labor flows into it, what we mean is that the entrepreneurs in that sub-group are getting the benefit of the high productivity. They are making a profit; and the competition of other entrepreneurs moves the labor into this sub-group, till labor produces here no more than it gets—that is, till profit is annihilated.

资本的流动是以同样的方式由企业家的行为引起的。所有这些都是竞争所致，而利润是引起竞争的普遍诱因，整个流动的最终目的是到达一个没有利润的状态。随着流动的继续，企业家利润的每一部分都将渐渐化为乌有。静态状况没有诱发进一步流动，也就是说静态状况下没有利润，因为利润总是诱发流动。 [20_1] 因而，我们说，一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且有其他劳动流入其中，就意味着其亚产业群的企业家将获得高生产率的利润。他们一直在谋取利润，其他企业家的竞争使劳动流入这一亚产业群，直至这里的劳动所产不多于所得，也就是说，利润不复存在。

Any unbalanced state of the group system gives profits to some one. Too much labor here and too little there, or any other of the unnatural conditions that we have just described, means that somewhere labor creates more than, for the moment, it gets. Its pay is fixed by its general or social productivity, but here and there its productive power is above this general standard. The profit that is here to be had is the lure to the movement that adjusts the local productivity of the labor to the general standard. [19_2]

产业群系统里任何不均衡的状态都会使个人获利。这里劳动过多而那里劳动又过少，又或者我们之前描述过的任何一种其它反常的情况，都意味着某处劳动创造的利润要比他们获得的多。劳动的报酬由一般生产率或社会生产率决定，但无论在哪里，劳动生产率总是高于这个一般标准。这里所获得的利润是致使部分劳动生产率调节到一般标准的流动的诱因。 [20_2]

The adjustment that determines how many units of capital are to be used in one general group, in connection with a given number of units of labor, is not the only one that has to be made, since

every sub-group needs to get its normal share of the labor and the capital of the general group to which it belongs. This secondary adjustment is made by the same play of forces that makes the more general apportionment between the groups in their entirety. In every completed commodity there is a distinct element that constitutes the specific product of each of the sub-groups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making of it. The product of the A' sub-group is, indeed, merged and lost in the finished article, A'''; but it is a definable element in that completed article. I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and A'. A itself is the product of the lowest sub-group in this series; and the product of the second sub-group is the utility that it imparts to A in converting it into A'. So the specific product of the A'' sub-group is, not the article A'' in its entirety, but the single utility which, when imparted to A', converts it into A''.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specific products of the different sub-groups, we may apply to them the whole statement that has been made concerning the more general groups. The term sub-group may, in fact, be substituted for the term group in the entire foregoing argument. [19_3]

决定多少个资本单元与已定的劳动单元共同作用于一个一般产业群，这并非是必须要做的唯一的一种调节，因为每一个亚产业群都需要从其一般群体中获得劳动和资本的常规份额。另一种调节由同样的作用力实现，完成了作为整体的产业群间的比较一般的分配。每一种成品中都有一个构成各亚产业群中特定产品的独特要素，而这些亚产业群促进了这种产品的生产。事实上，亚产业群A'的产品融入并消失于成品A'''中，但它却是那个成品中的一个确定性要素。这就是A和A'之间的差异。A本身是这个系列中最底层亚产业群的产品；第二层亚产业群的产品有一种效用，这种效用是该产品转化成A'时给予A的。因此，亚产业群A''的特定产品不是整个A''的产品，而是一种独特的效用，当这种效用给予A'时，其将产品转入到A''中。随着对各亚产

业群特定产品属性的了解，我们就可以将其应用于有关比较一般的亚产业群的整个陈述中了。实际上，在前面的内容里，亚产业群这一术语可以用术语亚产业群代替。 [20_3]

In movements that take place within one general group a certain steadying effect is secured by the necessity of preserving a uniform flow of the passive capital-goods that are ripening into the completed products. A nice adjustment of the raw material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advancement is always needed. There is a relation to be maintained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A and the quantity of A', and between that and the quantity of A", etc. For every A'" that leaves the series in a day, one A" must become A'" in a day; also one A' must become A", one A must become A', and one new A must be created. This does not imply that there are necessarily in the series as many A's as there are A' 's, as many A' 's as there are A" 's, etc. On the contrary, unless it takes the same number of hours to prepare an A as it does for that A to become A', the number of units of these different passive goods that are constantly to be found in the series will be unequal. If it takes ten days to make an A and twenty days to convert an A into an A', then a uniformity of rate in the general onflow requires that there shall be constantly in the stock twice as many A' 's as A's. Let there be ten A's in the stock, with a new one added every day; and let one that has had ten days of ripening be passed on to the A' group. Here it requires twenty days for further ripening, before it can be passed on to the A" group. If there are twenty A' 's constantly on hand, one of then, can be passed on every day, in the shape of A', to the following group; but, if there are only ten of them taking one away daily must mean taking it away in an unripened state.

在一般产业群发生的流动，其稳定因素由转变成成品的无息资本货物保持一致流动的必要性来确保。对不同生产阶段的原材料始终需要微调。A中产品数量与A'中产品数量要有某种关系来维持，其与A"中产品数量也是一样，如此等等。对于离开该系列一天的A'"来说，一个A"就必须在一天之内转变成A'"；一个A'也必须转变成A"，一个A必须转变成A'，必须生产出一个新的A。这并不意味着该系列中有的A'和A一样多，A"和A'一样多，等等。相反，除非生产一个A和A转变成A'所使用的时间相同，否则，该系列中一直维持的不同无息货物单位数就不相同。如果生产一个A需要十天，而一个A转变成A'需要二十天，那么一般流速的均匀性要求A的库存是A'的两倍。设库存十个A，每天增加一个新的A；同时让十天才能转化成一个A的单元转移到A'产业群里。这就需要二十天才能进一步成熟转移如A"产业群中。如果一直有二十个A'，每天都能转移一个A'给下面的产业群；但如果只有十个A，每天取走一个就意味着未成品之前就被取走了。

If, for example, trees in the forest require twenty years to fit them for cutting, and if one row is planted and one row is cut every year, there must be twenty rows in the forest. The same amount of cutting could be done from a forest consisting of ten rows, if the trees ripened in ton years; and even a single row would do, if the maturing took only one year. Again, along the course of a river which is flowing steadily, the same amount of water passes each point in a minute; but, where the movement of the water is rapid, the stream may be narrow and shallow; while, where the flow is slow, it has to be broad and deep to give a uniform flow. Accordingly, it is clear that, if converting A into A' takes ten weeks and converting A' into A" takes twenty weeks, there must be twice as many units undergoing manipulation in the A" group as there are in the A' group, in order to give a constant product.

例如，假设森林中的树需要长二十年才能适合砍伐，如果每年种一排再伐一排，那么这个森林就必须有二十排树。保持同一采伐量，要是树木十年就成林了，那么种十排就行；要是一年就能成林，那么种一排就行。此外，在水流稳定的河道，等量河水流经各处都只需一分钟；但在水流湍急的地方，只有河道窄又浅，而在水流慢的地方，只有河道宽又深，二者才能保持一致的流速。相应地，如果A转化成A'需花费十周，A'转化成A"需花费二十周，则A`中的单元就应是A"的两倍，才能有相同的产量。

The very existence of circulating capital, or of that which is in the form of passive capital-goods, is, in the strictest logic, the result solely of the time that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atter require. If we could conceive of them as instantaneous, there would be none of this capital; if, the moment that a raw element in nature were touched by a worker, it passed through all the steps of its ripening and emerged as a finished produc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find passive capital-goods on hand. If the ripening, without being instantaneous, were very rapid, there would be few of such goods. But with slow ripening there are many.

流动资本或无息资本货物形式的流动资本的存在，在严格意义上讲，仅仅是物质转变所需时间的结果。如果我们把这些转变看成是瞬时完成的，那就根本没有这种资本了；实际存在的一种原料一旦被工人接触，如果经历变成成品的所有阶段，那么就不会立即看到无息资本货物的。如果转变即使不是瞬时或很快的话，那么这类货物就会很少。但转变很慢的话，这类商品就会很多。

Economy, then, in the use of capital requires that there shall be an accurate adjustment of the relative quantities of passive capital-

goods in the different groups of each series; and this adjustment is primarily determined by the comparative rapidity with which the ripening process takes place in the different sub-groups. When the correlation is complete, all the labor and capital of each entire group exactly replenishes the waste of tissue of circulating capital that takes place when a finished article—say, an A'''—passes out of the hands of organized society and goes to some individual to be used up. There is then no industry wasted in making things to be stored, for there is just enough of the A'' trade to replace the A''' that is taken for consumption.

因此，在资本的使用上，经济要求每个系列不同产业群中无息资本货物相对数量的调节精确，这种调节主要由不同亚产业群转变速度相对快慢决定。当这种关联完整时，各产业群的劳动和资本恰好弥补了流动资本的损耗，这种损耗是在成品，比如一个A'''，从有序的产业群中流出，进入某个即将用光的个体时发生的。于是在制造库存商品时就没有浪费的产业了，因为恰好有足够的A''来取代消费掉的A'''。

This concerns only the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circulating capital in the different sub-groups of one general group, but there must be at every point a similarly nice adjustment of fixed capital to circulating capital. It is uneconomical to whittle two blocks of wood at a time with one knife, and it is equally bad to use two knives at a time whittling one block.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circulating capital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a given amount of fixed capital, and the former variety will create a smaller and smaller product per unit. Having plenty of tools to work with and no material to work on, the product is nothing. With very little material and a profusion of tools, the material is worked up very quickly; but the gross amount transformed in a year is small. Every part of this little stock of raw

material is, under such conditions, of great consequence. Restate the stock by one-tenth, and you take much from the daily product of the industry, as a whole; add a tenth to the stock, and you add much to the output. The specific productivity of a small amount of circulating capital thus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a large amount of fixed capital is very great. It is possible, evidently, that a shop may have on hand too little raw material to give adequate scope to its machinery; and then the machines produce too little, while the materials produce relatively too much.

这里涉及的只有一个一般产业群不同亚产业群中不同数量的流动资本，而固定资本到流动资本在各处都是可微调。一次用一把刀削两块木头是不经济之举，同样，用两把刀削一块木头也是不当的。增加与既定数量的固定资本一起使用的流动资本的数量，则流动资本单位产量越来越少。有大量用于生产的工具但没有可加工的材料，那么产量为零。在原料极少而工具充足的情况下，原料很快被用完，一年加工成形的总产量还是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这点库存原料的每一部分就都非常重要了。从库存取出十分之一，总的来说，就从这一产业日产量中获得很多；库存增加十分之一，就增加很多产量。因此，与大量固定资本一起使用的少量流动资本就有着很高的特定生产率。显然有这种可能，即工厂现有原料太少，以致机器没有足够的发挥空间，那么机器生产的产品太少，而原料生产的相对太多。

The product of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per unit grows smaller, as the quantity of it is increased. At first, it is as though there were one log waiting to be squared into timber by the axes of a dozen workmen, who work at a great disadvantage for lack of free play for their tools. A second log, drawing off six workmen with their tools, would effect a very large increase of the product. Though the six men cannot hew one log into shape quite as rapidly as can twelve,

they can do it nearly as rapidly; and so the advent of the second unit of raw material, the second log, may very nearly double the product of the entire industry. This increase in the output represents an enormous proportion—several thousand per cent a year—of the amount of capital embodied in one log.

流动资本每单位产量随着流动资本数量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少。起初，好像是有一根原木等着十二个工人用斧子削成正方形，但由于工人未能充分发挥工具的作用，工作起来非常不利。再拿一根原木，撤出六个工人及其工具，则产量大大增加。虽然六个工人削原木不能像十二个人那么快，但也差不多，因此，第二根原木的出现使整个产业的产量几乎增加了一倍。这一产量的增加，代表着一根原木所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巨大比例，即每年百分之数千。

In this condition, any increase of general capital, if it is to have its best effect, must take the shape of enlarging the quantity of passive capital-goods in use. Doubling the amount of them the second time will vastly increase the general product; though, in the nature of the case, it is not likely to increase it as much as did the former doubling. The active tools now have much freer play; but, if we continue increasing the raw materials, there will certainly come a time when a further increase of them will do less in the way of enlarging the product than will some enlargement or improvement of the active tools. This means that capital embodied in passive goods, on the one hand, and that embodied in active goods, on the other hand, will have reached an equality in their specific productivity. A unit of circulating capital will then be worth as much to the entrepreneur as a unit of fixed capital. No more material in the left hand than can be profitably manipulated by the tool in the right hand, and no more tools in the right hand than can

work advantageously on the stuff that is held in the left—these are the principles of adjustment. The organized worker, society, follows the common-sense rule that a man would follow in fixing the amounts of the two kinds of capital; but, in the case of society, this means a delicate and elaborate adjustment through all the minutest details of the production of every article. Ore and mining machinery, wool and the mills that are to manufacture it, logs and the saws that are to cut them—all must be proportioned in quantity; and these are only a few simple and crude cases of a coördination, the minute and delicate detail, of which we cannot stop to indicate, which runs through every occupation that men pursue. In the different sub-groups of each series,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in the shape of material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advancement, must be present in certain well-adjusted proportions; and the fixed capital must also maintain a certain relation to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Crowding the shops at A' with tools and stinting those at A", would obviously be uneconomical. But within the general groups these apportionments are easily made.

在这种情况下，总资本的任何增长，如果达到最佳效果，就一定会扩大使用的无息资本货物的数量。第二次倍增这一数额将极大增加总产量，虽然这次本质上不可能像前一次增幅那么大。这些生息的工具现在有更大发挥作用的空间，但如果我们持续增加原材料的话，那么就其增产幅度而言，一定不如增加或改进生息工具的大。这意味着，一方面体现在无息货物的资本与另一方面体现在生息货物的资本，其特定生产率大小相等。于是，对于企业家来说，单位流动资本与单位固定资本等值。一边的原料不再被另一边的工具有利可图的使用了，同时，另一边的工具也不再有利可图的加工材料了，这就是调节规律。有序的工人和社会会遵循这项一般规律，即一个工人将追求两种资本数额固定，而就一个社会来说，却意味着贯穿每个产品生产过程所有最微妙细节的调节。矿石及采矿机器，羊毛及羊毛加工厂，

原木及锯原木的锯——它们在量上必须成比例；这些只是有一定关联的几个简单纯粹的实例，在这种关联中，我们不得不指出贯穿于工人们所追求职位的微小细节。每个系列不同亚产业群中，流动资本处于各转变阶段原料形态，呈现出适当的调节比例，另外，固定资本必须与流动资本保持一定关系。A'商店里堆满工具，而A"却只存放很有限数量，这显然很不经济。但在一般产业群里，这些分配就很容易达成。

Land is one of the active goods, and it must be adjusted in quantity to the other goods of the same general class. There must not be in any industry so much land that it cannot be advantageously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uildings, tools and machines that are there combined with it. Grant, for example, that in the production of A in our table there is much l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other capital-goods, while in the sub-group at A' there is comparatively little. The specific productivity of land itself will then be larger in A than it is in A', and there will be an inducement to use less land in the creating of A and more in the transmuting of A into A'.

土地是生息货物之一，在数量上必须进行调节以适应同一类型产业群中其它货物。无论哪个行业，都没有很多土地，因为其与场地、工具和机器合并在一起，不能被充分利用。例如，表格中，A的生产过程与其它资本货物比，占有更多土地，而亚产业群中，A'占有的相对就少。因此，就土地自身的特定生产率来说，A中的比A'中的大，同时，有一种诱因使制造A时使用较少的土地，而A转换成A'时使用较多。

The natural and accurate expression for the method by which

land apportions itself among different groups and sub-groups of the economic system is, that land shifts itself freely from point to point in the system, until it attains equalized productivity. The meaning of this term, equalized productivity, will require special attention, when we reach the point at which we shall study the rent of land. [19_4] It does not mean that one acre is as productive as another, or that one man will produce as much as another, for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likewise differences between acres. Ye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a unit of land, just as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a unit of labor. As the apportionment of labor throughout the groups and sub-groups of industrial society gives a uniform productivity per unit, so the apportionment of land gives uniform productivity per unit of land. We shall see in time just what this means, in the way of the adjustment of land to various other producing agents. What we wish now to note is, that land is economically mobile. It is the exception to the rule that capital-goods, as such, cannot be taken out of one industry and put freely into others. Capital, as we have seen, is absolutely mobile, while capital-goods are usually not so. Land, however, is mobile; and what we have been saying about it shows that it cannot develop its full productive power, unless it moves freely from industry to industry till exactly the right quantity of it is found in each one. There is not the full and normal amount of permanent capital in the form of this capital-good, land, so long as one industrial group has more and another has less than it ought to have. The starting-point in a really scientific study of land and its rent looks upon this agent of production as a universal producer, and thus as helping to create every kind of commodity. It looks upon the land as apportioning itself, by a nice adjustment, among all the sub-groups in industrial society. Unscientific is that limited view which, in the study of rent, holds within the field of vision only so much land as, in some mysterious fashion, is given over to creating one particular kind of

product. The rent of land is not the result of the price of wheat: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power of land to create wealth in a myriad of different forms.

对土地在经济系统各产业群及亚产业群中自身分配方式，正常且精确的表达出来就是，在该系统土地随意转移自身，直至达到均衡生产率状态。待我们研究地租时，均衡生产率这一术语的含义，会倍受关注。 [20_4] 均衡并不是指，一英亩土地与另一亩土地的生产率相同，或者说一个工人的产量和另一个人的产量相同，因为人和人之间有差异，同样土地与土地之间也有差异。然而，正如有单位劳动的说法，也确有单位土地的说法。如在各产业社会产业群及亚产业群中每单位劳动的生产率都是均衡分配的，每单位土地的生产率的分配也是均衡的。我们来看看土地对于其它各种生产要素的调节方式最终有什么意义。现在我们要指出，土地在经济方面是流动的。资本货物不能像那样脱离某一产业而随意进入其它产业，这个规律是一个例外。如我们所知的，资本是具有绝对流动性的，而资本货物则通常不具有。不过，土地是具有流动性的，并且我们一直认为，除非土地在各产业间流动直至在每一行业中都到达恰当数量，否则不能充分发挥其生产力。只要有一个产业群拥有的土地比本该拥有的多，而另一个拥有的比本该拥有的少，那么就不存在资本货物形式充足且正常的永续资本。有关土地和租金的真正科学研究的起点，是把这种生产要素看作一个普通的生产者，以利于创造每一类商品。这一起点是通过微调，使土地在产业群中各亚产业群之间自行分配。不科学之处是那种局限的观点，即在地租的研究中，认为只有视野内的那些土地以某种神秘形式创造一种特殊的产品。地租不只是小麦价格，它是土地以许多不同形式创造财富的能力。

The general law of varying productivity that we described in an earlier chapter determines, first, how much circulating capital shall be combined with a given amount of fixed capital. With the amount

of fixed capital given, more and more units of the circulating kind will produce less and less per unit; while, with the amount of circulating capital given, more and more units of the fixed kind will produce less and less per unit. This law operates in so apportioning the whole amount of capital, as between the fixed and the circulating kinds, that a unit of one is as productive as a unit of the other. Within the fixed capital, too, an adjustment has to be made. Land is one form of such capital; for it contains a portion of the entire fund that is embodied in active instruments and operates to impart utilities rather than to receive them. This part of the fund is subject to the law of varying returns. If you combine more and more land with a given amount of fixed capital in other forms, you get less and less product per unit of land. If you combine more and more fixed capital in other forms with a given amount of land, you get less product per unit of the other capital. These two principles, if they have their full effect, result in combining everywhere the right relative quantities of land and of fixed capital in other concrete shapes.

前面一章中描述过生产率变差一般规律决定了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多少流动资本可以和给定数量固定资本相结合。在固定资本数量给定的情况下，流动资本单元越多，单位产量就越少；而流动资本数量给定的情况下，固定资本单元越多，单位产量就越少。其次，这则规律决定了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资本总额是如何分配的，即两种资本的单位生产率相同。固定资本内部也需要做一定的调整。土地就是这种资本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包含体现在生息工具上的整个基金的一部分，起着给予效用而不是接受效用的作用。这部分基金受报酬变差规律支配。要是用越来越多的土地和其它形式的既定数量的固定资本相结合，那么每单位土地所得的产量会越来越少。要是用越来越多其它形式的固定资本和既定数量的土地相结合，那么单位其它资本获得的产品会越来越少。这两条规律要是发挥全部作用了，就会导

致恰好相对数量的土地和恰好相对数量其它形式的固定资本的结合，而到处都是这种恰好的情况。

When we study the whole amount of capital in one industry, as compared with the whole amount in another, we have on our hands an elaborate adjustment that introduces considerations of value. What any one kind of business produces, depends on the price of its product. The law of varying productivity, to which we have just referred, does not, however, primarily involve questions of value. In considering it,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e power of different kinds of capital to produce goods, as such. With a certain total amount of capital in one industry, that total amount has to be apportioned among the different kinds according to a law of productivity. Too much fixed capital, combined with a given amount of circulating capital, means that the power of a unit of fixed capital to produce goods is less per unit than it should be. If a shoe manufacturer, for example, has made such a misadjustment of his working funds, he is getting fewer shoes in a year than he might get, and he can increase the output by correcting the error. The law of varying productivity, in all its applications, means primarily that, if we put one productive agent in increasing quantities into combination with another, the increasing agent will produce, in commodity, a smaller and smaller product per unit. If, then, within any particular sub-group—say, A'—we add land, unit by unit, the land will produce less and less per acre in the way of concrete things. Thus far no consider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goods is introduced.

我们采取与另一种产业资本总额比较的方法研究一种产业资本总额时，掌握了一种精密的调节方法，它将价值考虑其中。任何一种企业产出的价值都取决于其价格。不过，我们刚才提到的生产率变差规

律并非主要与价值有关。考虑该规律时，我们涉及的是各资本生产货物的能力，仅此而已。某一产业有一定的资本总额后，那一总额必须根据生产率的某一规律在各不同产业之间进行分配。过多固定资本与给定数量流动资本相结合，意味着单位固定资本生产货物的能力不如正常情况下的生产力低。假如一个制鞋商对其运作基金作了这样的错误调节，那么他一年的鞋产量就没有本该获得的多，但是他可以纠正这一错误以提高产量。生产率变差规律的所有应用中，主要意义在于，若将某种生产要素以递增数量与另一种相结合使用，则递增数量的那种要素单位产量会越来越少。因此，若在任何特定的亚产业群中，如A'，逐步增加土地单元，则这块土地每英亩的产量就会越来越少。目前为止，还未谈及货物价值。

We said, however, that land apportions itself among the different groups and sub-groups, until it is as productive in one as it is in the other. It has to be moved freely from sub-group to sub-group until this equality is attained, and the same is true of artificial capital and of labor. When we are study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hings within a sub-group, the only thing that we have to note is, what part of the sub-group's product—estimating the product only in kind—is imputable to each agent. An entrepreneur in the shoemaking business, for instance, has occasion to know, first, how many more cases of shoes he can make in a year if, without changing his capital in quantity, he gets a few more men in his mill. Again, he has occasion to know how many more shoes he can make in a year, by adding a few thousand dollars to his general capital. Also he needs to know whether he can the better increase his product, counting the product always in shoes, by using more fixed and no more circulating capital, or vice versa. When the fixed capital is to be increased, he needs to know whether he will turn out more shoes in a year, if he uses more land without enlarging his buildings, machinery, etc., than he will if he keeps his

present area of ground and enlarges his mill. Within the sub-groups, or specific industries, productive agents have to be coördinated with each other—the quantity of each kind has to be determined; and the first thing that determines this coördination is the specific power of each agent to produce goods.

不过我们曾指出，土地在各产业群及其亚产业群间自行分配，直至各产业群或各亚产业群中的生产率相等。和土地一样，人造资本和劳动也在各产业群中自由流动以达到生产力相等。我们研究亚产业群内这些要素的结合时，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该亚产业群产量中哪一部分——仅以实物估算的产量——可归因于哪一要素。例如，一个制鞋业的企业家有必要知道：首先，在不改变资本数量情况下，增加工人数量后，一年内能多制造多少双鞋。其次，增加几千美元的总资本后，一年内能多制造出多少双鞋。他也有必要知道，若增加固定资本，减少流动资本，或者反之，再计算鞋的产量，则其产量是否大些。增加固定资本情况下，扩大土地面积而不增加厂房和机器与土地面积不变增加厂房相比，每年是否能生产更多的鞋。在各亚产业群或特定产业内，生产要素必须互相协调一致，每种要素的数量必须是确定的，决定这种协调的首要条件是每种要素生产货物的特定能力。

In the end, the whole social supply of the several productive agents has to be apportioned among the different industries, so that the right quantity of each one of them may enter into each sub-group. Into this adjustment, moreover, value enters; for the value of the shoes that are attributable to a final unit of land helps to determine how much land shall be used in the shoe-business. The power of each agent to produce a commodity is one factor and the value of the commodity is another factor; while the working of the two together determines how much of each agent there shall be in each sub-group. Each general agent of social industry is, in short,

subject to a law of uniform final productivity—measuring products in value, and not merely in kind—in all the different uses to which it is put.

最后，社会提供的这几种生产要素总量必须在各产业间进行分配，以使得每个亚产业群获得每种要素的适当数量。此外，价值参与了这个调节；因为可归因于最后一单元土地的鞋的价值，有助于鞋业决定应该使用多少土地。每种要素生产商品的能力是一个因素，商品的价值是另一个因素，而这两个因素一起发挥作用决定了各亚产业群中每种要素的数量。总而言之，产业群中每一种一般要素在其投入各处的不同用途都受均衡最终生产率规律——以价值来计算产品，不只是以实物计算——的支配。

[19_1].It is clear that one group cannot keep its profit-making position in the system, if entrepreneurs who are making no such net gains are at liberty to enter it. May not all entrepreneurs be making the same a rate of net profits, and making them at the same time? May there not be a condition of equal and universal profit? Clearly not; for this would be a universal invitation to capitalists to become entrepreneurs and, is, such, to bid against each other for labor and capital till the profit should everywhere vanish, by being made over to laborers and capitalists in the shape of additions to wages and interest. The pay of each of these agents, therefore, under perfectly free competition, is bound to stand at the productivity level.

[19_2].A difficulty may seem to arise from the fast that a particular entrepreneur, in changing the amount of labor or capital in his establishment, is not greatly affected by a slight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product that may result from his action. A concurrent increase in the capital of a whole sub-group would lower the value of its product, but an increase wade by one employer might not do this in any appreciable degree. It might chance that the entire capital of a sub-group would be normal in amount, and that some employers would have too little and others too much. An employer who had too little capital, in proportion to the labor that he employed, would not be deterred from keeping all his men and hiring more capital by the fact that he would make his product cheaper and one who had too much capital and too little labor might not be deterred by the same consideration from imaging all his capital and hiring more men. If this happened often, the whole sub-

group would suffer from lowered prices and would reduce its labor and capital in an all-around way. It is clear, however, that it would not happen; with prices normal, the man with a relative excess of labor would find his marginal labor not earning its pay, and would discharge some part of his force; and the man with an excess of capital would, for a similar reason, part with some of that. The labor discharged by the first employer should, in theory, go to the second; and the capital released by the second employer should go to the first. Such adjustments within a sub-group are more easily and surely made than are adjustments between the different groups and sub-groups. The practical fact is that each sub-group attains, by experiment, a knowledge of the normal ratio of labor to capital which in its own specific industry will give the best results. This ratio then tends to remain more or less fixed. Enlargements and reductions of output are afterward made by increasing or reducing labor and capital together, and the motive for the increase or diminution is the state of prices. When the produce of the sub-group is dear, its facilities for production and its operative force are enlarged together.

[19_3].The movements of labor and capital to or from one sub-group are not necessarily from or to another in the same series. There is nothing to prevent labor or capital moving from A' to B" or to C'"; and, if it does so, it is under the twofold influence of price- and goods-producing power that has been described in the foregoing pages.

[19_4].See Ch. XXII.

[20_1].很显然，如果允许没有净利润可获的企业家参与某个产业群，那么这个系统中的这个产业群就不能一直获利了。难道并非全部企业家同时获得利润，并且获得的净利润率都相同吗？难道没有利润相等或通用的情况吗？当然没有，因为这是资本家成为企业家的一种诱因，企业家们增加劳工和资本家的工资和利息，互相竞标劳动和资本直到各处利润都归零。因而，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每一种要素的开销都会停滞于生产率水平上。

[20_2].在一个特定的企业家改变企业中劳动或资本数量后，产品价值会有微小的变化，这对企业家的影响不是很大，但这却会引发一个难题。一个完整的亚产业群中资本的同步增长会降低产品价值，然而在任何可评估的程度上，雇主的增长都不会降低产品价值。有这种可能：一个亚产业群的所有资本数量正常，雇主过少，其它要素过多。拥有与雇佣劳动成比例的资本过少的雇主，会通过降低产品价格，来保留住所有员工并租用更多资本；根据同样的想法，拥有过多资本过少劳动的雇主，会保留所有资本并租用更多员工。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那么整个亚产业群就得降低价格，并减少各处的劳动和资本。不过，很明显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价格正常，劳动相对超额的雇主将找出没收益的边际劳动，然后撤出一部分劳动，同理，资本相对超额

的雇主将撤出一部分资本。理论上来说，第一位雇主撤出的劳动应该去第二位雇主那里，第二位雇主撤出的资本应该去第一位雇主那里。在一个亚产业群内进行这样的调节，比在不同的产业群和亚产业群间，更容易也更可靠。经过试验，实际情况为，每个亚产业群都掌握了劳动到资本的正常比率分配，即在其自身特定产业里成绩最好的比率。于是，这一比率差不多趋向于保持固定值。产量的增多或减少由后来劳动和资本两者的增多或减少造成的，这种增加或减少的动机是价格状况。当亚产业群的产品昂贵时，则生产设备与有效生产率一起扩大。

[20_3].劳动和资本流入或流出某一亚产业群不必从同一系列其它亚产业群中流出或流入。没有事物阻止劳动或资本从A'流出进入B"或C"'；如果有事物阻止，那么它是在生产价格能力和生产货物能力双重影响下发生的，这在前几页中已描述过。

[20_4].见第二十二章。

Chapter XX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ynchronized by rightly Apportioned Capital

第二十章 资本分配合理，则生产与消费协调

The law of final productivity that the familiar diagram presents is not yet translated into concrete and literal terms. We know that, when the agent which is increasing along the line AD is capital, it is the productive fund of true capital, rather than the mere number of capital-goods, which is thus increasing; also, that the increments are mainly qualitative improvements of the general stock; also, that at any point in the growth of the fund, it is all apportioned among the sub-groups according to a certain law; and, finally, that the forms of it, in each sub-group, are determined by an equally nice adjustment and by the action of the same law. There are further general statements, suggested by the same figure, that need to be expanded into detailed and literal descriptions of the phenomena of business life. CD, for instance, measures the rate of interest on capital, and AECD expresses the total amount of this income. In a static adjustment of society, no one is “saving money” and adding to his capital; and therefore the whole income of capitalists, as a class, comes to them in the shape of goods that are ripe for consumption. These are goods of the type of A''', B''' and C''' of the table that we have often used to illustrate the system of groups and sub-groups and the made of producing wealth of different kinds. Capitalists in all the different sub-groups get a uniform rate of income,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everal capitals, and get it in a uniformly ripened state; yet capitalists in the sub-groups, A, B, C—and, indeed, in all the sub-groups except those in the uppermost tier in the table—are producing things today that will not themselves be

ready to use for some time to come. Weeks or months may elapse before the capitalists in A can use any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are at this moment working on. But during the interim they must live. May they not, therefore, have to borrow commodities from capitalists at A'''? May not the element, time, make trouble, disturb the simple action of the law that the diagram expresses, and make it necessary for capitalists in the lower sub-groups to get advances from men in the upper ones and to pay for these advances? May not such payments disturb the equality of the earnings of capital at different points in the system?

这个常见的图表表述的最终生产率规律，目前尚未转换成具体的文字条款。我们知道，首先，当沿AD线增长的要素为资本时，那么它就是实物资本的生产基金，而不只是就这样增长的资本货物；其次，这些增量中主要是总库存的质量改进了；再次，资金的任何增长时刻，在各亚产业群中的分配都是依据一定规律的；最后，在每个亚产业群中，这种要素的形式由同等程度的微调及同一规律决定。如同一图所示，有一些概括性陈述还需进一步扩充为关于企业生存现象详细的文字描述。例如，CD是用来计量资本利息率的，而AECD是用来表示这一收入总额的。在社会的静态调节中，没有人会“存钱”去增加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作为一个阶层，其整体收入都是以适于消费的货物形式获得的。这些就是图表中A'''、B'''和C'''种类的货物，我们总是用这个图表说明产业群及其亚产业群系统以及生产各种不同财富的方式。所有亚产业群中资本家拥有与其资本成比例的统一收入率，而且这一收入率是在成品情况下获得的；但是，在亚产业群A、B、C中的资本家，实际上除了图表中最上层亚产业群以外所有亚产业群的资本家，都在生产现今一段时间内不准备使用的产品。还未等A中的资本家使用上此时生产的产品，数周或数月可能就过去了。但在这期间，他们必须生存。于是，他们就必须要从A'''中的资本家那里借商品吗？难道时间这个要素制造了烦恼，扰乱了图表所示简单的规律，使低层亚产业群的资本家不得不向高层资本家的产品提前预定并付款

吗？难道这种付费方式不会扰乱这个系统中各处资本收益的均衡性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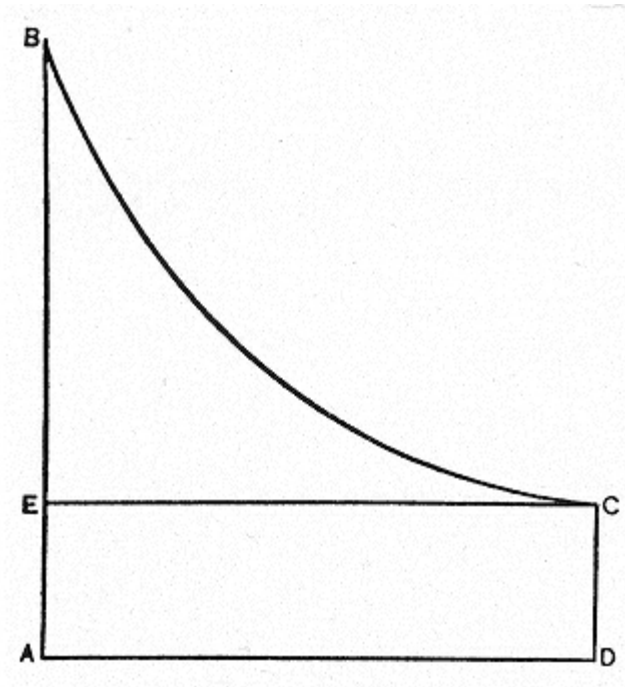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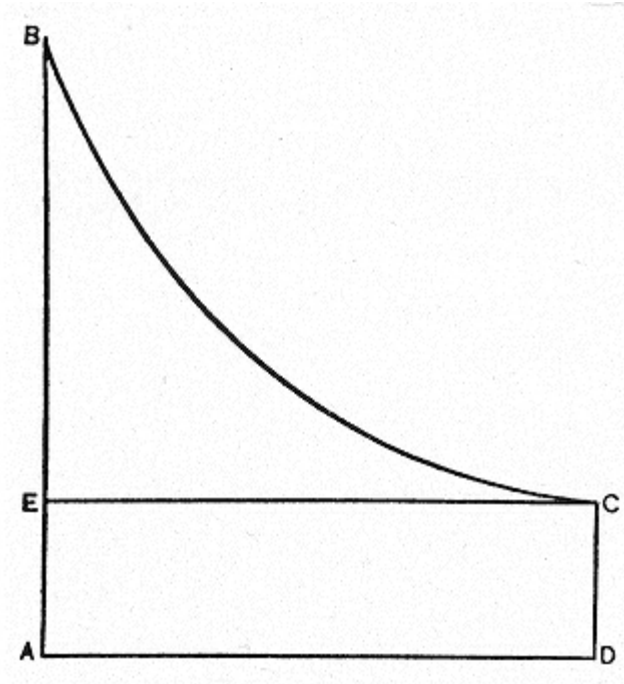

(Fig.12)

(图12)

The same question aris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laborers in the different sub-groups. Those at A''', B''' and C''' are making finished goods; and, if they can divide their gross products with the capitalists in their several industries and carry away from their mills their own shares of the joint output, they have only to exchange with each other, in order that each may at once get his income in the forms in which he needs it. Laborers at A, B and C, however, are apparently not in so favorable a position. May not they have to get

and pay for advances from the workmen in the uppermost tier of sub-groups, just as the capitalists in the lower tiers seem obliged to get them from the capitalists in the uppermost tier?

各不同亚产业群的劳工中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A'''、B'''和C'''的劳工生产成品，如果他们能与资本家共同分享几个产业的总产品，并从工厂中获得属于他们的份额，则他们只能互相交换，以使得每个人都有可能立即得到合乎他们需要的收入。不过，A、B和C中劳工所处的位置显然不是那么有利。难道他们必须从亚产业群高层的劳工那里获得预供产品并预付款，就如低层的资本家似乎只得从高层资本家那里获得预供产品那样吗？

The whole question, whether goods are advanced by one class of persons to another, in order to tide that other class over an interval of waiting, clearly has reference, not to the relation of capitalists in general to laborers in general, but to the relation of certain sub-groups to other sub-groups in the producing series. It is the sub-group A''' that must advance the stock of the article A''' to all the sub-groups that are below it in the series, if any advances at all are needed; but does it actually make any advances? If this term be used in any true sense, it must mean that a stock of passive capital-goods is drawn upon at one date and replenished at a later date, and that it stands reduced in size during the interval. Nothing of this kind, however, takes place. The stocks of A''', B''' and C''' are drawn upon and replenished simultaneously, like water in a full pipe, with an inflow at one end and an outflow at the other.

总的问题是，货物是否通过一个层级向另一个层级预定，以使另一个层级顺利度过等待的间隔期，这一问题很显然不是指一般的资本

家与一般的劳工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生产系列中某些亚产业群与其它亚产业群间的关系。如果需要预供商品的话，那么亚产业群A'''就必须给这一系列中所有下层的亚产业群提供其库存；但实际上该子群预供商品了吗？如果预供资本一词所使用的意义正确，那么它一定意味着无息资本货物库存在某一天被用完，而在接下来的一天又被补足，它代表在此间隔期库存减少了。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A'''、B'''和C'''的库存用完立即又补足，就像一根管子里的水，一端流入而另一端流出。

Let us try the experiment in a simple and practical way, and see whether advances of this kind are necessary, either by capitalists to laborers or by one sub-group to another. Here are three households needing water for daily use. Two have capital to use, while the third has only labor. One establishes a pumping plant which raises the water to a high level; the second furnishes a settling tank and a filter, which, as it were, “ripens” the water, or makes it fit for use; and the third family, having labor only to put into the combination, does the pumping for all. The tanks are full, pumping is going on and the outflow of pure water is continuous. Does the man who furnished the settling tank advance water to the man who furnished the pump and to the other man who is using it? He gives to them to-day, it is true, water that is in a more advanced state than the water they are pumping to-day, but he does not deplete his tank in doing it. A true advance would require that he should drain his tank and let it fill again, but this he does not do. The apparent storage of water is only a means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t: the man imparts a utility to the water, but he does not change the quantity of it.

我们来做个简单可行试验，看看这种预供商品，无论是资本家提

供给劳工还是一个亚产业群提供给另一个亚产业群，可否有必要。这里有三户人，每天都需用水。其中两家有资本可用，而第三家只有劳动。第一家建了一个用泵抽水的设备，将水提到高位；第二家安装了一个沉淀槽和一个过滤器，水经“沉淀过滤”便可饮用；第三家只有劳动，只好为三家抽水。这些容器是满的，抽水泵一直在抽水，纯净水在源源不断地流出。安装沉淀槽的那个人给安装泵和抽水的人预先提供水了吗？他今天提供给他们的水，实际上，比他们用泵抽的水形式更先进，但却没有用尽他水槽的水。真正的预供要求他用干水槽的水，然后再充满，但这种情况却不是。表面上水的存储只是提高水质的一种手段：这个人赋予水某种效用，但没有改变水的数量。

Intermittent production, with constant use, of course, demands storage. Where production is, for natural reasons, periodic, as in the case of agriculture, a special store is obviously needed. If the pumping, in our illustration, could not take place except in the early morning,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have a reservoir of pure water, in addition to the settling tank. This kind of storage, however, raises questions entirely apart from the problems that arise from the mere relations of labor to capital, or from those of sub-groups to sub-groups. Where production is constant, there are laborers to be provided for, and there are whole sub-groups that of themselves produce only raw materials. These all get finished products for use, and that without imposing on any one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a true advance.

生产是周期性的，而使用不间断，当然就需要储存。就如农业，由于自然原因，生产呈周期性，存储就显得非常必要。如果我们例子中的水泵只有在早上的时候才能抽水，那么就有必要准备一个存储纯净水的存储器以及沉淀槽。然而，这种存储带来的问题，完全脱离了劳动到资本或亚产业群到亚产业群间关系所带来的问题。生产一直在

继续的地方，就需要为其储备劳工，还需要整个产业群生产原料。这些群体获得了可使用的成品，但它们不会强迫任何一个人必须生产一种真正的预供产品。

Does the amount of A''' on hand at any one time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rate of wages? [20_1] The form of wages it affects in a certain way. If the demand for this kind of finished goods were to be, not continuous and uniform, but intermittent and irregular, workers might chance at some time to exhaust the stock of it. In that case, they would have to take their pay in some other form. In a static condition, this could occur only in consequence of the changing seasons. The production of winter clothing, for instance, might go on through the year; and there would then be, at the beginning of a cold season, a stock of it large enough to meet the demand arising at that time.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n intermittent demand, the A''' would be taken for use as fast as it ripened, and no faster. With the sub-groups properly balanced, the A''' would be brought to completion as fast as would the A'', the A' and the A. There would be no accumulation at any part of the line. If more of A were made than could in the same time be converted into A', there would ensue a glut of A, a falling of the price of it, and a quick transfer of labor and capital to the other sub-groups. Static law thus keeps the sub-groups balanced in point of size and productive power, keeps the passive capital-goods in a continuous flow and makes every one's pay depend on the rate of the flow. Passive capital-goods are, however, never a fund, in the normal sense of the term. They are not kept in storage, except as irregular demands require this. It is on the rapidity of the flow of ripening commodities that income depends. It is all a question of velocity—of the quantity of A''' that ripens in a given time. [20_2]

A'''产品数额，任何时候都与工资率有一定关系吗？ [21_1] 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工资形式。若是对这种成品的需求不是连续、均衡的，而是间断、无规律的，则劳工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处于库存被清空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得不领取其它形式的工薪。静态条件下，这种情况只有季节变换时才会发生。比如，冬季服装可能在一整年内的时间都在生产，于是，冬季来临时，就有大量的库存来满足其需求。在没有间断需求的情况下，A'''产品被使用的速度与制成成品的速度相同，不会比使用速度快。由于各亚产业群均衡，A'''被用完的速度将和A''、A'及A的速度相同。在此系列中的任何部分都将不会有累积物。若同一时间内A中制成的产品比转变成A'的产品多，那就会有大量的A堆积，随之而来的就是A的价格跌落，劳动和资本迅速转移到其他亚产业群中。静态规律就这样使各亚产业群在规模和生产力上保持平衡的，使无息资本货物保持流动，并使每个工人的工薪取决于其流速。不过，无息资本货物，在其正常意义上来讲，从来就不是一种基金。它们没有库存，除非某种非常规需求要求存储。收入取决于制成成品的速度。这一切都是速率问题，即在既定时间内制成成品A'''的数量问题。 [21_2]

Capital, apportioned in the ways that have just been traced, is a requisite of synchronize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Labor and time are the only absolute requisites of production not thus qualified. If the existence of the natural world and of human wants and powers be assumed, man has only to work and to wait in order to create wealth. But, with capital already on hand and rightly coördinated, labor and its fruits become synchronous. Coördinated capital is, then, a requisite of that production which is instantly followed by a ripened and consumable income. By means of a permanent fund of capital, adjusted in the ways in which the play of forces that has just been described would arrange it, men in all the sub-groups may produce at the same time and consume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consumption of all of them may closely

accompany their production.

以刚才描述的方式分配的资本是协调生产和消费的必要条件。因此，劳动和时间是生产的唯一必要条件，这种说法是不合适的。如果自然世界及人类欲望和权利的存在只是假设的话，那么人类为了创造财富只有工作。但是，在手头有适当的整合资本的情况下，劳动就会和其成果同步产生。于是，整合资本是一种立即产生成品及可消费收入生产的必要条件。依据刚描述的各力分配的方式调节的一种永续资本基金，各亚产业群的劳工可以一边生产一边消费，消费紧随生产。

In the natural sense of the term, then, the universal requisite of production is effort; but the production that comes by effort only is certain to cover a period of time. It separates by an interval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ductive operation from the enjoyment of the first fruits of it. If the man is collecting tree trunks for a raft, it will be some time before he can float on it across the stream; and if he is making a hut, in the same primitive way, it will be still longer before he can get shelter within it. [20_3] It is, however, practically certain that the man will not build a hut in this simple way. He can do better by first making a rude hatchet; and this making of the hatchet is the “round-about” method of making goods, of which Professor von Böhm-Bawerk has spoken, as the typical fact in capitalistic production. By spending some time in making a tool and more time in using it, a man can get a larger and better house in a month than be could have secured by working empty-handed for the same time. The tool adds to his product; and indirectly, therefore, the time spent in making it does so.

由此可见，生产的基本必要条件在自然意义上是努力，但是仅通

过努力所得的产品只能维持一定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通过间隔期，将生产程序的开始从首批成果分离出来。如果一个人要采集树木做木筏，那么得花费一段时间他才能乘木筏渡河；如果他采取同样的方式去建一个木屋，那么得花费更长的时间他才能用它来遮风挡雨。[21_3] 然而实际生活中这个人不会采取这么愚笨的方式去建造木屋。他能做得更好些，先制作一把简陋的斧子；斧子的制造是制造货物的“迂回”的方法，庞巴维克教授提到过这种方法，它是资本家生产的典型方法。通过花一定时间制造工具，花更多时间使用工具，这个人能在同样一个月的时间建造起更大更好的房子。工具增加到他的成果里了，因而，制造工具的时间也间接地增加到他的成果里了。

Tools are productive, but time is the condition of getting tools—this is the simple and literal fact. The round-about or time-consuming mode of using labor insures efficient capital-goods. Granting that time be used for this purpose, we may say that “time is productive”; but we must be careful to keep in view the fact that it is the tools secured by time which do the producing.

工具是有生产力的，但时间是获得工具的条件——这是简单明了的事实。利用劳动的迂回或耗时的方法确保了资本货物的效率。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把用在此目的上的时间说成“时间是有生产力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一事实，工具是由生产它的时间获得的。

When the hatchet has worn itself completely out, and the fruits of using it are before the man in the large dwelling, he may look backward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cess, when he faced nature empty-handed, and say: “Labor has done it all. Work and waiting have given me my goods.” The working and the waiting have, indeed, insured the hatchet, as an incidental result of this way of

working. Production that plans to put its fruits into the future will create capital-goods as an immediate effect, but labor and time are enough to make the ultimate effect certain. Let the man work intelligently through an interval of time, and the production of consumers' wealth is sure. The thing, then, that is ultimately essential for production is labor. But if time is to intervene between the labor and the enjoyment of its fruits, the work may be first spent on capital-goods, which are a requisite of an accelerated rate of production. What they insure is an added quantity of product. They are not, however, a requisite of production, as a process, for wealth may be created without them.

当这把斧子破损无用时，它所创造的成果则摆在了这所大房子里的这个人面前，当他回首这个过程的开始以及徒手面对大自然时，不禁会说："劳动创造了一切。工作和等待给予了我所需要的。"实际上，工作和等待使斧子成为这种工作方式的附带成果。计划把成果投入未来的生产，创造资本货物的效果将立竿见影，不过劳动和时间足以确保最终成果。如果这个人在间隔期仍明智地工作，那么消费者生产财富是无疑的了。因此，就生产而言，最终必不可少的还是劳动。但若时间介入劳动和劳动成果之间，那么首先花费在资本货物上的可能就是劳动，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必要条件。它们能确保劳动产品数量增加。然而，作为一个过程，它们却不是生产的必要条件，因为没有它们，也可能创造财富。

What, on the other hand, are the requisites of that production which does not put its fruits into the future? What must be given, in order that effort and the emerging of the product of effort may be simultaneous? When a savage contents himself with gathering sticks by hand and throwing them into his fire, he consumes very little time on each armful of wood; and an industry conducted on this

plan is conceivable; yet even in this case the wood that is in transit from the forest to the fire is not warming the man. The labor and the enjoyment are not quite synchronous. It would seem that working with any elaborate outfit of instruments must put the bringing together of work and enjoyment out of the question. Capital-goods would seem to be retarders of enjoyment; though, when the enjoyment comes, it is clear that they have increased the amount of it. If this is their effect, it is certain that enjoyments will always be so retarded. Working without tools is physically possible but practically impossible.

从另一个角度讲，没有把成果投入到未来的那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为使努力劳动和劳动成果同时出现，必须付出什么呢？当一个野人满足于用手捡树枝然后将其投入火中时，他花费在每捆木柴的时间很少；根据此计划运行的产业是可能的，然而即使如此，木柴在从森林运送到火堆的过程也没有给他取暖。劳动和享受不是那么同步。似乎无论用任何精巧完备的工具劳动，都不可能将劳动和享受同步进行。资本货物似乎推迟了享受成果，虽然享受成果到来时，数量明显增加了。如果这就是享受成果效用的话，那么这种享受成果就注定总是推迟的。没有工具的劳动在体力上是有可能做到的，但实际情况上是不可能的。

Men can do it, but they certainly will not: they will invariably make the instruments that aid later work. The first tool that is made separates work from its fruits—makes the men wait for what they want, and every added tool means more waiting. Every addition in days of labor to the cost of a tool extends the interval of time that thrusts itself before the enjoyment that is to come. The mass of raw material and enginery by which a modern society produces is the enormous wedge that civilization has driven between labor and

products. It is solidified time, or the material result of waiting on a vast scale. It is the visible testimony to the fact that some one's labor for present fruits began far back in the past.

就算人们能做到，他们也一定不会那么做的，他们会先制造工具，然后再借助工具工作。制造的第一件工具是劳动与成果分割开——使人们推迟他们所需要的成果，并且每增加一件工具就意味着多一分等待。花费在一件工具上的劳动每增加一天，距离享受成果的时间间隔段就越长。现代社会制造了大量的原料和机器，这是文明进入劳动和产品之间的巨大契机。这是固化时间或大范围等待的物质结果。这一事实的明显证据是，某人为当前成果所付出的劳动在过去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Capital-goods imply waiting for the fruits of labor. Capital, on the contrary, implies the direct opposite of this: it is the means of avoiding all waiting. It is the remover of time intervals—the absolute synchronizer of labor and its fruits. It is the means of putting civilized man in a position which, so far as time is concerned, is akin to that in which the rude forester stood, when he broke off limbs of dead trees and laid them on his fire. The very appliances which, in their extent and complexity, seem in one view to mean endless waiting, in another view mean no waiting at all but the instantaneous appearance of the final fruits of every bit of labor that is put forth.

资本货物意味着对劳动成果的等待。资本则与之相反，它意味着这一点的对立面，是避免所有等待的方式。它消除时间间隔，使劳动和成果完全同步进行。就时间而言，它是使文明人与野蛮森林人所处位置类似的方式，即折断枯树枝放火上。所用器具，就其范围和复杂

性来说，按某种观念，意指无穷的等待；按另一种观念，则指无需等待，只不过所投入的每一点劳动都会立即显现最终成果。

What, now, are the requisites of production in which time intervals do not figure? Labor, capital and organization. Grant these, and the fruits of today's effort appear to-day, in the shape of the myriad things that civilized men need. Society is an organism. Let it work as an organism, with the proper instruments in its hands, and out of every day's labor will come in their completed shapes the consumers' goods that civilized life will at once use. Given collective labor and not individual labor, and you may put out of view all those separations of work from its fruits that appear when we take a different look at the world as it is. Into the shops go workers, and out of the shops come goods. The work and the outcoming of the goods are synchronous.

那么，现在什么是没有时间间隔的生产的必要条件呢？劳动、资本还是组织？承认今天努力的成果，也就是承认文明人需要那种东西的形式。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作为一个有机体运作，拥有着适量地工具。文明生活目前所使用的完整消费品，就出自人们每天的劳动。鉴于是集体劳动而非个人劳动，就可以在我们世界观不同时，不考虑劳动与成果的一切分离。劳工进入商店，货物走出商店。劳动和货物的成果是同步产生的。

This synchronization—this bringing together in time of work of every kind, and the complete ripening of its virtual product—is the function of what we have termed capital, in distinction from capital-goods. Watch a bit of capital-goods—say, a lump of iron ore just broken off from the bed of similar mineral in the Mesaba range.

It will make its way to the ships, traverse the Great Lakes, reach a smelting furnace, and become, first, a piece of steel and, later, a knife blade. There is a long interval between the beginning of its career as a capital-good and the beginning of its service as an article of consumption. But watch the entire capital of the steel-making and the cutlery-making industries, and you will see this period vanish. There is always ore in the mine and in the ships, and steel in the furnaces and in the mills. If society is in a static condition, there is always the same amount of it in each department of the extended industry. As some is withdrawn from each department, more takes its place; and a fixed amount of “ripening” metal maintains a continuous existence. As labor goes on in the department farthest removed from the cutlery shop,—as the picks break off lumps of ore in the mine,—knives ready for use emerge from these shops; and the essential fact is that some of these knives are the virtual, though not the literal, product of the work that is done in the mine. All this results from the maintenance of a fund of permanent capital.

这种同步性——将每种劳动和实际产品制成成品的时间放到一起——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的功能，有别于资本货物。且看资本货物，例如一块铁矿石从梅萨比山脉的某处矿床上掉落下来。用船带它穿越五大湖，送往一座冶炼厂，一开始它变成了钢，而后变成了一个刀片。在开始资本商品事业与开始可以作为消费品进行服务之间，有一个漫长的间隔期。但是，且看制钢与制刀具行业的整个资本，你就会发现，这个间隔期消失了。矿山里、船上总会有矿石，炼钢厂、制造厂总会有钢。如果社会处于静态情况下，那么这个大产业的每个部门总会有同样数量的钢。从任何部门取走一些，就会有更多的来取代它们；固定数量的“成品”金属维持着生产的继续。劳动在离刀具店很远的部门进行着，比如，从矿石堆挖凿矿石，才使刀具出现在商店里；一个基本事实是：这些刀具中的一些虽然表面上不是在矿山里制造

的，但本质上是在矿山里所进行劳动的成果。所有这些都源自对永续资本基金的持有。

Let us take the simplest of illustrations. The water that is now flowing into the reservoir of a mill is a good in the raw state. It will take its turn in moving the machinery of the mills, but some time will elapse before it does this. The drops that are at this instant entering the upper end of the pond will require time for their passage to the wheel pit. It takes many days for one of them, which is now in its raw state near the inlet, to “ripen” into motion imparted to a turbine wheel. The drops, separately regarded, have periods of production, but the pond as a whole has no such periods. The water that at this moment flows into one end of the pond causes an overflow from the other end, and the overflow moves the wheel. There is an instantaneous result from the coming of the “unripe” water, and this is assured by the full reservoir. It is this permanent quantity of hydraulic capital that enables the water which to-day is far from the wheel virtually to move the wheel. Forget all about the identity of particular drops of water and the time that each one will take in traversing the pond, and what you see is an inflow which at once causes an outflow that moves the wheel. Capital in the shape of a pond full of water—of which the constituent drops, indeed, are forever changing—synchronizes the flow from the inlet and the moving of the wheel.

让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流入工厂中蓄水池的水是一种最初的商品。水将推动工厂中机器运转，但在机器能运转之前，就已经花费了一些时间。同时，蓄水池上面的水滴需要一定的时间进入涡轮洞。入水口附近的每一滴水，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带动”涡轮机齿轮运动。将这些水滴分开来看，它们是有着一定的生产周期的，但作为

一个整体，池塘就没有这种周期性。此时，流入池塘一端的水从另一端流出，流出的水带动涡轮运动。水从“不动”到流动是一个瞬间动作，而这得有装满水的蓄水池做保障。一定数量的水利资本使实际远离涡轮的水带动涡轮运转。不考虑水滴以及每一滴水流经池塘所用时间特性，你会发现流入后立即流出从而使涡轮运转。资本以蓄满水的池塘形式——实际上，其中的水滴时刻在变化着——使入水口水流流速和涡轮的转速保持一致。

Again, let a forest twenty acres in extent suffice to furnish fire-wood for a family. A tree will mature in twenty years; and the forest must be kept intact, in point of size and maturity, or the supply of wood will fail. Each year we plant a row of trees along one side of the forest, and cut a row from the other. The planting and the cutting are, in a way, simultaneous. We do not burn to-day the tree that we plant today; but we do burn a tree, the consuming of which is made practicable by to-day's planting. The tree that is just set is, then, an enabling cause of the consuming of one that is twenty years old. To plant a sapling and wait for it to mature would be a slow way to make a fire; but to plant one and, by means of this planting and the maturing of the forest, to get at once another tree for use, is a quick way to make a fire. The forest is a synchronizer of labor and its virtual fruit. The fact that is of practical consequence is, that if we have once secured the permanent forest, we need do no waiting for fuel. The identity of the tree that we burn is of no consequence. To plant one and to burn another, which is at once made available in consequence of the planting of the former, is to annihilate the interval that would have existed, had it been necessary to depend on one particular tree. The key to success in the effort to make today's work yield to-day's fuel is the surrender of the identity of the thing that we are now working on and that of the thing we at once use.

再举一个例子，使二十英亩的一片森林为一户人家提供木柴。一棵树二十年才能成林；这片森林必须成林并完好无损，否则就不能提供足够的木柴。每年我们都在林子的一边种一排树，而在另一边伐一排。在某种程度上讲，种和伐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今天不烧今天种的树，但我们确实烧了一棵树，因为我们今天种树了，所以我们对这棵树的消费是行得通的。由此可见，刚刚中的那棵树是消费那颗长了二十年树木的一个行得通的原因。种植一棵树苗并等它成林做木柴，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如果种植一棵树并等它成林的同时，伐另一棵树做木柴，将会是一个快速的过程。这片森林中的劳动和实际成果同步进行着。切实可行的事实是，假设我们以前就有这个永续的森林，那么我们就不必等待燃料了。我们燃烧的树木的特性无关紧要。由于种了前一棵树的结果，我们可以一边种一棵树一边烧另外一棵，这就消除了只依靠一棵树的等待间隔期。要使今天的工作产出今天的燃料所付出的努力得以实现的关键是，放弃我们正从事以及正使用的事物的特征。

If, as consumers, we were so made that only the particular thing which is beginning to take shape under our hands to-day could satisfy our wants, then the wants of the present would have to go unsatisfied. There would be an interval of painful waiting between industry and its fruits. Again, if industry were conducted on such a plan that the work that to-day begins to fashion a bit of raw material had no influence in causing a finished article at once to emerge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line of operations, then also we should have to wait. As it is, we wait not at all. It is, in practice, immaterial to us whether we consume one thing or another that is exactly like it. Our plan of working enables the labor that is done on a raw article to cause a finished one to come into our possession. In the hydraulic illustrations, the full pond is the condition that causes water at the inlet virtually to move the machinery of the

mill. The full pipes furnish the condition that causes water among the remote hills virtually to satisfy the wants of the people of the city. In the case of the forest, the fixed number of trees maintained i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maturity is the condition that enables the planting of a sapling to furnish fuel. Capital it is, in each case, that does the synchronizing work. This is a cardinal function of this social agent of production.

作为消费者，如果我们的欲望在几种特定的消费品上得到满足，那么当时的欲望会逐渐地得不到满足。在行业与其成果间有一个令人痛苦的等待期。另外，如果行业实施这样一种计划，今天开始改变一点原料，不会立刻影响到生产线另一端产出的成品，那么要想看到成品是否会受到影响，我们就不得不等待一段时间。事实上，我们根本无需等待。实际上，我们消费的是一种事物还是与之类似的其他事物，对我们来说，都无关紧要。我们劳作的目的是使加工的原料转变成成品,从而成为我们的财产。在这个水利学例子中，蓄水池蓄满水是入口处的水推动制造厂机器运转的条件。充满水的输水管管道使城市人们对远处山脉水的需求提供了条件。在森林的例子中，不同生长阶段的指定数量树木是种植一棵树苗去提供燃料的条件。在每一个例子中，都是资本在其中发挥着协调的作用。这是这个社会生产要素的一个主要作用。

On the ranches of Montana cattle are breeding, among the forests of Pennsylvania hides are tanning, in the mills of Brockton shoes are finishing; and, if the series of goods in all stages of advancement is only kept intact, the cow-boy may have to-day the shoes that he virtually creates by his efforts. This result is attainable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a complete stock of capital-goods. We must have growing cattle, hides, tanned leather, partly made shoes and finished shoes, all maintained in a constant quantity, in order

that a certain number of shoes may each day be taken for use. With sheep in the pastures, wool in the mills, cloth in the tailoring shops, and ready-made garments on the retailers' counters, the labor of the people can, as it were, instantaneously clothe the people. With a series of capital-goods of the right kinds once established, the work of to-day yields its result to-day in the shape of completed clothes.

蒙大拿州牧场饲养着牛，宾夕法尼亚州森林兽皮可用鞣酸做成皮革，布罗克顿工厂生产鞋；如果加工这些货物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保持完整，那么牧童就可以自己制造鞋。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结果，是因为有完整的资本货物库存。我们必须养牛，有兽皮，已鞣制的皮革，半成品鞋和成品鞋，所有这些都应保持一定数量，才可以每天都有一定量的鞋产出。牧场里有羊，工厂里有羊毛，裁剪店里有布料，零售商柜台上有成品的服装，可以说，有了人们的劳动，瞬间就有衣服穿了。一旦有了品种齐全的一系列资本货物，那么今天劳动今天就能生产出成品服装。

A

A”

Let the letters in the above horizontal line represent such a series of goods in various stages of combination. A is the raw material, A' is that material somewhat transformed, A" is the same material farther advanced toward completion and A'" is the completed article ready for consumption. Thus stands the series at the beginning of a working day.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series stands thus:—

令上述字母分别代表各生产阶段的一系列货物。A代表原料，A'代表经加工的原料，A'代表更接近成品的原料，A'''代表可供消费的成品。这个系列表示一个工作日的开始。这个工作日结束的系列这样表示：

A

A”

The A' here is the A of the former series, which has been advanced to its present state by ten hours of industry; and at the same time a new A has been created, as is shown by the letter in parenthesis that is now prefixed to the series. A'' is the A' of the former series, which has also been advanced toward completion. A''' is the earlier A'', which has now been made ready for final use. The A''' in the parenthesis represents the former A''', which has been taken away to be distributed among all the workers and the capitalists whose agency had made the consuming of it practicable.

这里的A'是前面系列里的A，通过十小时的工作进展到目前状态；正如这个系列前面括号里的字母，一个新的A就生产出来了。A''是前面系列里的A'，也是向成品转化的产品。A'''是原来的A''，现在已经转化为成品备用。括号中的A'''代表原来的A'''，已被使其成为消费品的劳工及资本家分配了。

There is enough of this A''' to satisfy the claims of all the

workers and all the capitalists in the series; and each of them gets his share, and gets it without waiting. All have been applying their powers to the stock of capital-goods, in order to keep the series of goods intact. The withdrawal of the A''' is called for by the wants of all of them, and it is foreordained to take place. In itself alone, it would have made an inroad on the stock of capital-goods—an inroad that had to be neutralized. A''' must never be lacking, and the industry insures that it never shall be. The creation of a new A and the ripening of each of the remaining articles of the former series leaves, at the end of the day, a new series that is the exact duplicate of the former one. At the opening of the second day of industry, there are the same conditions that exis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day. A is waiting to be made into an A', A' is waiting to be made into an A'', A'' is waiting to be made into an A''' and A'' is ready to be taken for consumption. At each point in the series there is a distinct set of men ready to make the needed transformation, and all these groups will now act again. Each will do its appointed work, and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day all will again receive their pay.

A'''的数量足以满足这个系列中所有劳工和资本家的要求，他们无需等待，就获得了各自的份额。他们每个人都为资本货物库存尽一份力，以保持货物系列完整无损。A'''撤出这个系列是他们的欲望所为，这也是注定发生的。就A'''本身而言，它将减少资本货物的库存，这种减少必须予以抵消。A'''从来不会缺少，这一行业确保其不会缺少。一个新A的创造以及之前系列的剩余部分的转变，在这一天结束时变成了一个新系列，这个新系列正是之前系列的倍增。这个行业第二天开始时的情况和第一天开始时一样。A等待变成A'，A'等待变成A''，A''等待变成A'''，A'''就可供消费使用了。这些系列的每一处都有一批人准备做一些必要的转变，现在这些产业群又都行动起来了。每一个群体做指定的工作，在其第二天结束时领取薪水。

This is a picture of organized industry. All the farms, railroads, mills and shops of the world are doing exactly what we have described, and doing it on a vast scale. What stands for A''' in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is a vast mass of consumers' goods of every kind that humanity uses. It is all in process of creation, by the method that our simple illustration describes. Each finished article has its series of uncompleted articles of its own kind behind it. When one such thing is taken for use, another replaces it. Coats are bought from the retailers, and other coats come from the workshops to take their places. Cloth goes to the workshops; wool goes to the mills; sheep are growing up on the Western ranges and yielding their fleeces to the shearers. Bread comes from the bakeries for this evening's rise, and other bread replaces it. Flour comes from the mills; wheat from the elevators, and ultimately from the soil. Everywhere there is the series of capital-goods in various stages of advancement. Everywhere industry is applied to this stock of goods, to ripen it, thus making good the waste of its tissues which results from the withdrawal of the consumers' goods and keeping the series intact.

这是一个安排有序的行业写照。世界上所有农场、铁路、工厂和商店都如我们描述的那样运行，而且还是大规模地运行。在世界经济中，A'''代表人类使用的各种消费品。它们都处于生产阶段，而且采用的是我们的例子中描述的方法。每件成品的背后都有其一系列的半成品。每当一件成品被消费使用，就会有另一件来取而代之。零售商的衣服卖出去，那么车间的衣服就会补充它们的位置。布匹进入车间；羊毛进入工厂；羊在西部牧场成长，生产羊毛供剪毛工人使用消费。面包店的面包供晚餐食用了，那么就有其他的面包补充它的位置。面粉来自磨面厂，小麦来自粮囤，它们归根结底是来自于土地。生产的各个阶段都有资本货物。到处都有拥有货物库存的行业，库存使这个

行业成熟，从而弥补消费品回收导致的浪费，并保持这个系列完整。

For the immediate creation of wealth for consumption, then, there is needed: (1) A series of consumers' goods in various stages of advancement; (2) workers and tools at each point along the line; (3) simultaneous work. Out of this organization comes onsumers' wealth, yet the supply of producers' wealth never fails. The men keep the stock of capital-goods from failing. The permanent stock of shifting apital-goods—the true capital—keeps the men from waiting. [20_4]

由此可见，为能立刻创造出满足消费需求的财富，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处于各生产阶段的一系列消费品；（2）这条生产线上每一处的劳工和工具；（3）同步劳动。消费者的财富来自于这个结构，而生产者的财富供应从未中断过。劳工维持着资本货物的库存，使其从未短缺。替换性资本货物的永久库存——实物资本——使人们免于等待。 [21_4]

[20_1].For an early discussion of this subject see Chapters vii and viii of The Philosophy of Wealth, by the author of the present work.

[20_2].The amount of A''' which ripens in a given time is the product of quantity and since the quantity of unfinished goods on han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ate at which each piece moves toward completion, determines the gross amount completed within a given period. In so far as the quantity of unfinished goods varies directly as the number of units of labor and of capital that are at work on them, the quantity of income goods per unit of labor and of capital depends on mere velocity of movement. The gross quantities of wages and interest are the products of the two factors, quantity and speed of flow; but the rates depend mainly on speed. How quickly can an A be made and transformed into all A'''? This is the chief question to be asked, in this connection, if what we want is the rate of wages and that of interest.

[20_3].An unfinished raft is wealth, though it is not yet a consumers' good. It is a capital-good. The first log that is put into position for the making of the raft is a bit of wealth of this kind. It follows that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beginnings of wealth effort without time is all that is requisite. We have, however, been careful to keep in view finished goods, in condition to render their services to the men who make them. For securing these, an amount of time that is at least appreciable is requisite. Yet one cannot work on raw material through any period of time without having a bit of capital-goods in his hands undergoing n manipulation. The full statement, therefore, is that, with only man and nature in existence at the outset, production is initiated by labor only, and the simplest kind of capital-goods is brought at once into existence. Further effort, extending through time, insures consumers' goods, but not without manipulating the materials that are in the interim capital-goods. Capital is requisite for the creation of wealth in the forms in which it can satisfy direct wants.

[20_4].For an earlier statement of these principles see an article on "The Genesis of Capital" in the Yale Review for November, 1893.

[21_1].有关之前的讨论，请参看《财富哲学》的第七章和第八章，作者同本书。

[21_2].在给定时间内A'''转化成成品的量就是产量，因为手头的半成品数量，与每部分转化为成品的速率有关，决定着给定时期内的成品总量。半成品数量随其劳动和资本的数量而变化，而每单位劳动和资本所得货物的数量取决于周转的速率。工资和利息总量受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和流动速度影响，但其比率主要取决于流动速度。多久能生产出一个A，又得多久能使其转化成A'''呢？我们想要的是工资和利息的比率吗？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21_3].一个半成品的木筏虽然还不是消费品，但却是一种财富。它是一种资本商品。第一根用来制造木筏的原木就是这类财富。在创造财富的开始，没有时间的情况下，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在成品为工人服务时，我们密切地关注着它们。为确保这些，花费大量的时间是必要的。然而一个人在一点资本货物也没有的情况下，任何时期都不能加工原料。因此，总的来说就是，起初在只有人和自然的条件下，产品只由劳动创造，后来，最简单的资本货物种类开始出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的努力保证了消费品，然而这些却不是在没有临时资本货物的情况下进行的。资本是创造财富的必需品，它能满足人们最直接的需求。

[21_4].上述规律见于1983年11月版耶鲁大学时报中“资本的起源”。

Chapter XXI The Theory of Economic Causation

第二十一章 经济因果关系理论

If a society is static and capital is not increasing, both wages and interest consist in goods of the type A''', B''' and C''' of the illustrative table. They come into existence in a steady flow that is synchronous with the productive action of labor and capital in all the sub-groups, and they go simultaneously to the men in all of these groups for consumption.

如果社会保持静态不变，资本也不增长，那么工资和利息就存在于表格中A'''、B'''和C'''这类货物中。它们与各亚产业群中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情况同步，以一种持续流动形式存在，同时供这些亚产业群员工消费。

It is capital, as such, which earns the interest that is embodied in these goods; and the earnings of it are made to be uniform—that is, they are made to secure as much of A''', B''' and C''' to the men in A as they do to the men at A''', at B''' or elsewhere. The products of labor are, in a like way, uniform. Is it certain that capital, as a whole, gets exactly what it produces? Obviously, what the last unit of capital gets is what it produces, and that is what every other unit must take; but is there not a chance that the earlier units may be exploited? The same question arises in connection with labor: The last unit of labor gets its product, it may be admitted; but do the earlier ones get their full product? Does the income of the whole body of laborers tend at all, under natural law, to equal what they

produce? Is there not an exploitation of all early increments of labor, if the law of final productivity works in perfection?

正如此，资本赚得的利息是体现在这些货物中的，同时资本的收益是与之一致的，也就是说，确保将A'''、B'''和C'''中货物分给A的员工与分给A'''、B'''或者其它产业群员工的一样多。劳动产品也以类似的方式均衡着。整体上，资本获得的就一定是它所生产出来的吗？很显然，资本最后一个单位所获得是它所生产的，也是其它单位资本所得；不过，之前的那些资本没有受到剥削吗？就劳动来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最后一个劳动单位获得它的产量，这是公认的；但是之前的那些劳动也获得它们的产量了吗？自然规律下，全部工人的收入同他们产出的一样多吗？若最终生产率规律完全发挥作用的话，之前劳动所有的增长就没有受到剥削吗？

With this question in view, let us revert to the familiar graphic statement of the law of final productivity.

带着这个问题，回顾一下最终生产率规律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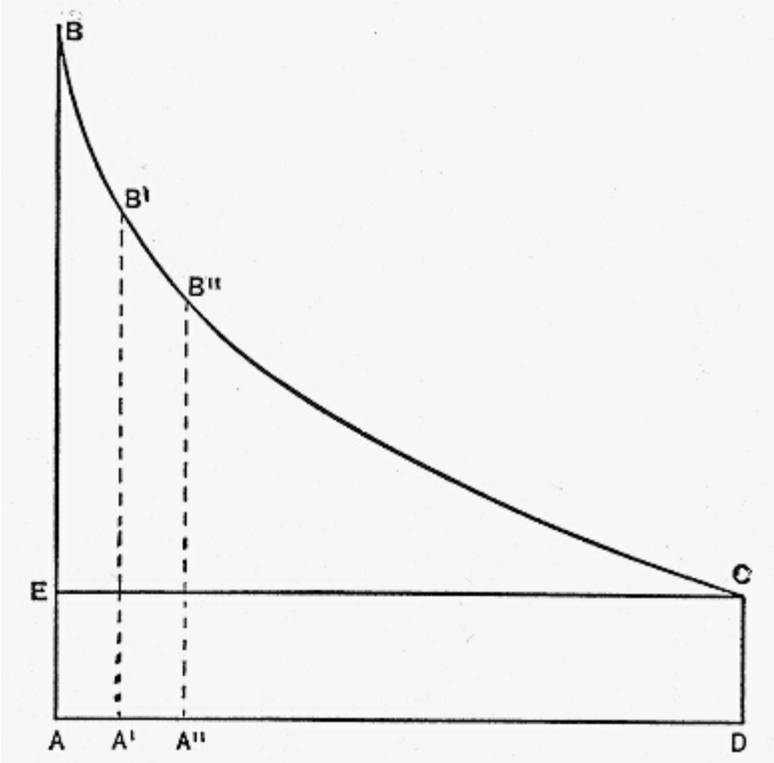
B
B'
B''
C
E
A
A'
A''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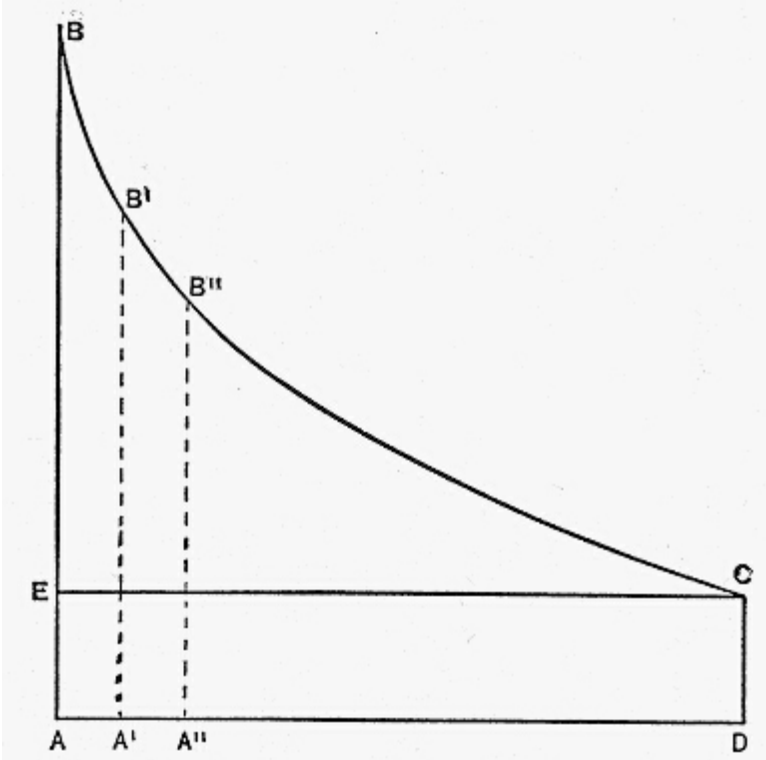

(Fig.13)

(图13)

Letting the amount of capital remain fixed and causing the amount of labor to be measured by the line AD, we will go through the imaginary process of supplying this labor, unit by unit. The first unit, then, so long as it remains alone, has a vast amount of capital to coöperate with it. For simplicity, let us say that each unit of labor is a tenth of the whole force and that, while the first unit is alone, it

has a profusion of appliances, all of the costliest grade, to coöperate with it. It is, in fact, aided by ten times the amount of capital that a single unit will, in the end, lave to aid it. If we are to think of an actual society in which labor is thus, as it were, over-saturated with capital, we shall have to imagine costly materials, buildings of the most solid and enduring kind, motive power in abundance, and automatic machinery of a degree of costliness and perfection that is far from having been attained as yet, even in the departments of industry in which invention has done its best. With all that machinery to aid it, the product of the one unit of labor will be enormous.

资本总量不变，用AD线计量劳动数量，整个过程中，我们按单位来增加所提供的劳动。那么，只要第一个劳动单位单独存在着，就会有大量资本与之合作。为简洁起见，假设每个劳动单位是整个劳动力的十分之一，不过第一个单位是单独的，有大量的最昂贵工具与之配合。事实上，这个单独的单位最终将会得到十倍数量资本的援助。设想实际社会中劳动是这样的话，那资本可真谓是过分饱和了，这使我们不得不想到昂贵的原料、最坚固耐用的厂房、强大的动力以及昂贵精密度高的自动化机器，这些设备的高昂及精密度远远高于一流水平产业部门的。在这些机器的帮助下，这一单位劳动的产量自然就会非常庞大。

In our figure, we measure the amount of a unit of labor by distance along the line AD, and indicate one unit by a tenth of this line, or the distance AA'. We may measure the amount of the product of the first unit of labor by the area of the figure ABB'A'. This area measures the amount of wealth that is called into existence by one unit of social labor, assisted by a nearly inconceivable profus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wealth measured

by this area consists in consumers' goods of every kind, destined for the use of a whole population.

图中，我们通过沿AD线的距离计量单位劳动的数量，并用这条线的十分之一或者AA'的距离表示一单位劳动。用图形ABB'A'的面积计量第一个单位劳动产量数额。这个面积计量的财富总量，是在大量社会资本援助下，由社会劳动一个单位创造的；同时这个面积所计量的财富存在于每一种消费品中，被整个人群使用。

Let us now add a second unit of labor, the quantity A'A", measuring the quantity that it produces by the area A'B'B"A". Here we must be careful. The quantity that this second increment of labor produces is, as we have said, measured by the area of this second figure. This statement may easily bear an interpretation that will make the entire theory lead to an erroneous conclusion—to one, in fact, which is the direct opposite of the truth. With a certain interpretation, the statement that the second increment of labor produces less than the first may lead to the inference that,—so long as all are paid at the same rate,—nearly all labor is robbed of a part of what it produces, and that too by the action of competitive law. This is a natural inference from the law of final productivity, when it is left incomplete. If one man produces the value of a dollar and a half a day, while another produces the value of a dollar, and if each gets a dollar, there is a clear case of exploitation of labor. [21_1]

现在我们增加一个资本单位，即AA'的数量，用A'B'B"A"的面积来计量。在此我们必须注意。这第二个增加的劳动单位产量，如我们所述，由第二个图形的面积计量。这种陈述很容易将整个理论归为一个错误的结论，其在事实上与真理完全相反。在这种解释下，第二个增

加的劳动产出比第一个少的说法可能推出，即只要以相同的费率支付，那么几乎所有的劳动产品都被剥夺了，这也是由竞争规律导致的。这是最终生产率规律不完备时得出的正常结论。如果一人一天产值为1.5美元，而另一个人为1美元，如果此时每人都获得1美元的报酬，那么这种情况显然就是劳动剥削。[22_1]

The surrender of a share of capital by the first division of the working force is the important fact here to be considered. With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increment of labor, tools are multiplied; but they are so cheapened that all of them together embody only the original amount of capital. How do we estimate the specific product of the new increment of labor? The essential fact is that the new working force and the old one share alike in the use of the whole capital, and with its aid they now create equal amounts of product. The earlier men have relinquished a half of the capital that they formerly had; and in making this surrender, these men of the earlier division have reduced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their industry, by the amount that the extra share of capital formerly imparted to it. This reduction measures the amount of product that is attributable to the relinquished capital. Of prime importance is this fact that the product which is now attributable to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working force, with its tools and other appliances, has now become smaller than it formerly was, solely by reason of the capital that has been taken from it. The excess of its former product over its present one is not attributable to labor; and no exploiting of labor takes place, though each of the two units now receives less than the first one formerly received.

劳动力首次分工导致一部分资本出让，是此处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随着劳动的第二次增加，工具倍增了；但这些工具是如此的廉

价，以至于它们所有的加在一起只体现了初始资本总额。我们如何估计劳动新增量的特定产量呢？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新劳动力和原有劳动力一样分享整个资本，并且在资本的援助下，它们目前创造的总产量一样。过去的劳工出让他们一半的原有资本；出让时，早期分工的那些员工，依据额外资本份额先前给予该产业的数量，减少了此产业的生产能力。这一减少计量了产量的数额可归因于这个出让资本。最重要的还是下面这个事实，即目前可归因于第一部分劳动力及其工具和其它设备的产量，仅仅因为有资本从这里抽走了，就比以前少了。原先的产量超过现有产量并不能归因于劳动；虽然这两个单位获得的都比原先第一个单位获得的少，但是却没有剥削劳动的情况。

Two facts are now clear; and we may state them briefly in two proposition which include a whole theory of economic causation—a theory that tells to what agency each fraction of a composite social product is to be traced.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the first division of workers created by the use of the whole capital and what they now create is an amount that is solely attributable to the extra capital which they formerly had. (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one increment of labor produced, when it used the whole of the capital, and what two increments are now producing, by the aid of that same amount of capital, is attributable solely to the second increment of labor. We have, in this way, tested the specific productivity of a certain amount of capital, and we have also tested the specific productivity of one unit of labor.

现在讲清了两个事实，我们可以将其简要地阐述为两个论点，这两个论点包括整个经济因果关系，讲述了一个复合的社会产品中各部分都归因于哪一种要素。（1）第一批工人用所有资本创造的产品和他们现在创造的产品之间的差异，只可归因于他们之前所拥有的额外资本的数量。（2）一个劳动增量用总资本生产的产品和两个增量在

同等资本总量下所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差异，只可归因于第二个劳动增量。根据这种方式，我们既检验了一定数量资本的特定生产率，也检验了单位劳动的特定生产率。

It is with the latter test that we are immediately concerned; and what we have been careful to guard against is the notion that, at any one time,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ducts of different units of labor, as such. Each of them, with its share of the capital, produces one-half of the whole present output of the industry; but a half of the present output is less than was the whole output, when only one man was working with the aid of the entire capital. This reduction measures the product of one-half of the capital, as used by one unit of labor. On the other hand, the whole product, now that the two units of labor are working, is greater than was the whole product with one working; and this addition to the product is due solely to an accession of labor. The amount of the addition measures the product of that labor and of all labor under the present changed conditions.

我们需要密切注意的是后一种检验；我们一直小心的是这个概念，即在任何一个时刻，这样的不同劳动单位的产量都有所不同。其中每一个单位劳动，在其所占资本份额下，生产的产量为该行业当前的总产量的一半，这一半少于只有一个雇员在所有资本援助下所生产的总量。这个减少的量计量着一单位劳动所用资本的一半的产量。另一方面，既然是两个单位劳动的总产量，就会比一个单位劳动的总产量多，而这产量的增加仅仅是因为劳动的增加。劳动增加的量计量着那种劳动以及当前状况改变的所有劳动的产量。

If C stands for the amount of capital that is used in the industry

and if L stands for one unit of lab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duct of C+L and that of (C+2L)/2 is the amount that is attributable to one-half of the capita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duct of C+2L and that of C+L is the amount that is attributable to a unit of labor. In the first of these formulas, the minuend is what one man can produce with the whole capital, and the subtrahend is what one man can produce with a half of the capital. In the second formula, the minuend is what two men can produce with the whole capital, and the subtrahend is what one man can produce with the whole of it.

假设C代表这一产业资本总量，L代表一单位劳动，那么C+L的产量和（C+2L）/2的产量之间的差额就是归因于资本总量一半的量。C+2L的产量和C+L的产量之间的差额是归因于一单位劳动的量。在第一个公式中，被减数就是一个员工用总资本生产的产量，而减数就是一个员工用一半的资本生产的产量。在第二个公式中，被减数是两个员工用总资本生产的产量，而减数是一个员工用总资本生产的产量。

In the following diagram the amount of capital is not represented, but it remains fixed. The product that is imputable to one-half of the capital is the area ABB'A', minus one-half of the area ABB"A". The product that is traceable solely to one unit of labor is the area A'B'B"A", and this is now the amount that is specifically attributable to either of the two units. It will be seen that here there is no unnatural cramping of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the second man—there is no limitation of his produce to the gleanings of any field, agricultural or other. Each man gets what one unit of labor, under fair conditions, creates; while capital gets what is imputable to it.

下面这个图表中，资本数额没有标出，它是固定不变的。归因于一半资本的产量是ABB'A'的面积，即ABB"A"面积的一半。仅归因于单位劳动的产量是A'B'B"A"的面积，而这就是指定归因于这两个单位中任何一个单位的产量。由此可见，第二个员工的生产力丝毫不存在非常规的限制，他的产品也不受农业或其它方面的限制。每个员工获得的是单位劳动在公平的条件下所创造的产量，而资本获得的是归因于资本的那部分产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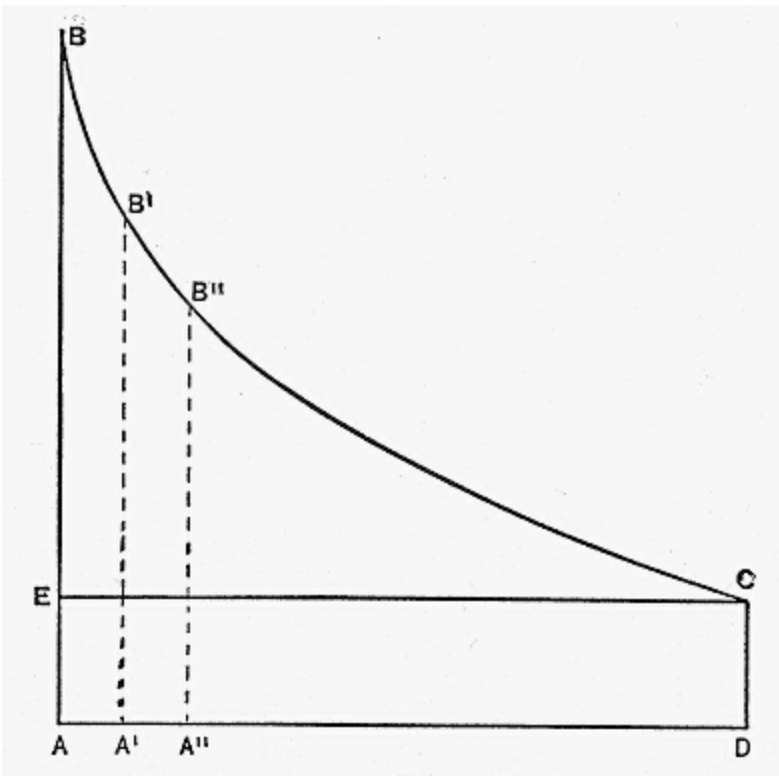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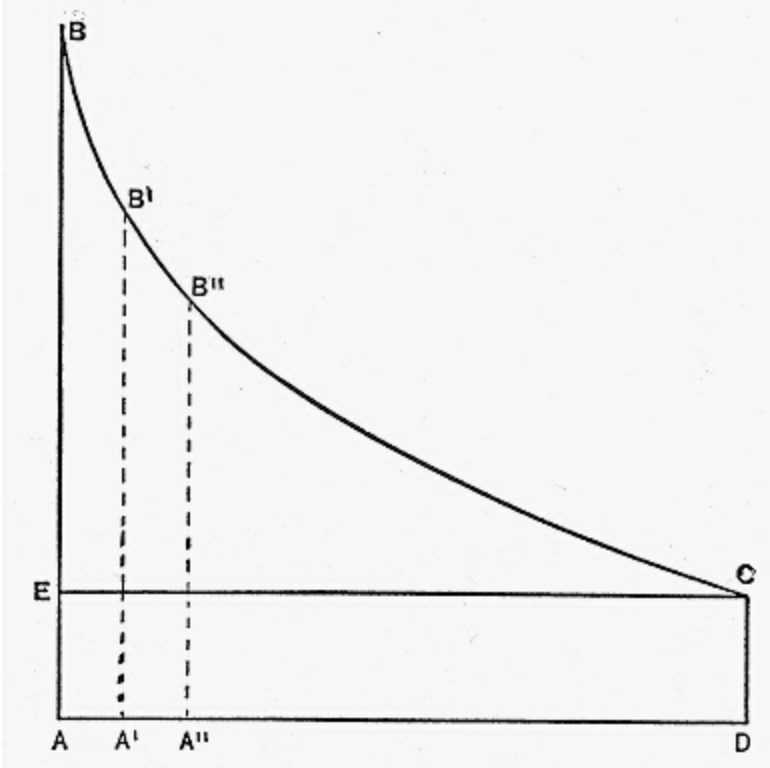

(Fig.14)

(图14)

Let us now revert to our graphic statement of the law of specific productivity. Keeping the original capital intact, and changing only its forms, let us add a third unit of labor to the force. The product of it is the area A"B"B'"A'" in the figure on the following page; and, if we continue to make similar additions to the force till it is complete, the product of the last unit of labor will be the area

AixBixCD. This is the standard of wages. It is the specific product of any one unit of labor, at the time when there are ten units of it. All that we have said about the product of the second man, when he was the last one, applies here.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tenth man there were nine in the field; and they were utilizing the whole of the capital, having it, of course, in forms adapted to the use of that number of workers. Each produced an amount that is measured by the rectangle the sides of which are AviiiAix and AixBix. All of them together produced the amount that is expressed by the area AEiBixAix. A narrow strip between the lines EF and EiBix measu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nine men of themselves produce at the time when they are work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hole of the capital and what the nine men produce when they are working in connection with nine-tenths of the capital; for it is fair to consider that, when ten men are using the whole of the fund, each of them virtually uses a tenth of it. The area AEFAix represents nine-tenths of the product that is specifically attributable to the whole working force when it has the entire capital coöperating with it, and of course adding its own further share to the joint product. The area EE'BixF represents, not the entire addition that a certain amount of capital makes to the output of the industry, but only the addition that an increment of capital makes to that part of the output of the industry as a whole which is separately attributable to labor.

现在，我们重新来看特定生产率规律的示意图。不破坏原始资本，只改变它的形式，然后再给生产力增加第三个单位的劳动。该单位的产量就是下页图形中的A"B"B"'A"'的面积；如果我们继续用类似的方式增加劳动单位，直到劳动力充足，那么最后一单位劳动的产量将是AixBixCD的面积。这就是工资标准。有十个劳动单位时，它就是其中任何一个劳动单位的特定产量。我们就第二个员工作为最后一个劳动单位时的产量，在这里也适用。在第十个人前面有九个人在田地

里，这九个人把全部资本都投资使用了，在形式上这当然也适用于这么多数量的员工。每个工人的产量由边AviiiAix和边AixBix组成的长方形面积计量。所有工人的产量由AEiBixAix的面积表示。线段EF和线段EiBix组成的一窄条面积，计量着那九个人用总资本生产的产量和那九个人用十分之九的资本生产的产量之间的差额；这样考虑是公平的，因为十个人在使用总资本，那么人均使用资本的量就为十分之一。AEFAix的面积代表着指定归因于拥有总资本的所有劳动力产量的十分之九，当然进一步增加了其在合作中产量的份额。EE'BixF的面积代表的不是某个数额的资本对这个行业产量的整个增加额，而是资本的一个增量对该行业作为整体，可单独归因于劳动的那部分产量的增加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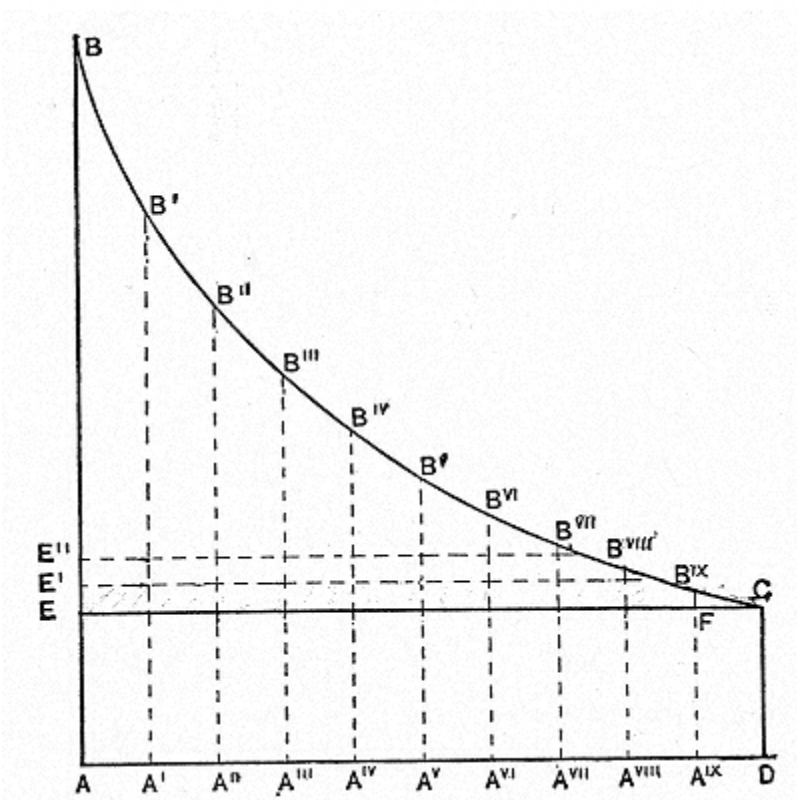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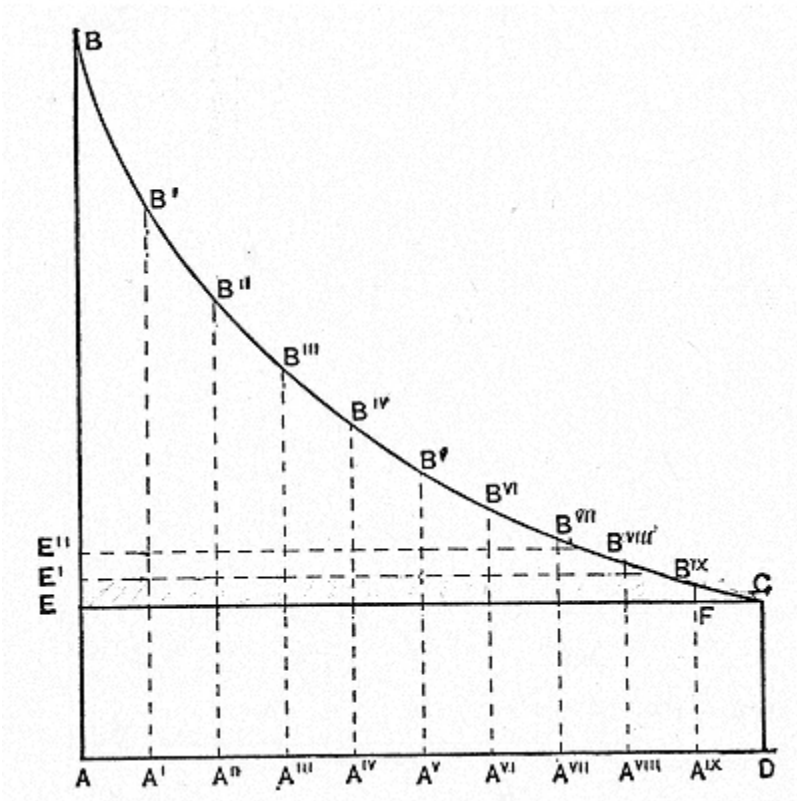

(Fig.15)

(图15)

So, when there were eight men at work, each one produced the amount of AviiBviiBviiiAviii; and all of them together produced the amount AEiiBviiiAviii. A second narrow strip, between the horizontal lines EiiBviii and EiBix, measu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eight men of themselves produce when they have all of the capital coöperating with them and what they produce after they have shared the capital with the ninth man. They give him one-ninth of the entire capital, and the strip between EiiBviii and EiBix, therefore, measures what the eight men lose in their own productive power by this surrender. In like manner, when the working force is enlarged from seven to eight, there is a surrender of one-eighth of the entire capital and a reduction in the distinctive product of the labor of the seven men ensues. Every per capita reduction of the productive fund takes something from the amount that is specifically traceable to the labor of each man. [21_2]

由此可见，有八个人工作时，其中每个人生产的量为AviiBviiBviiiAviii；他们合在一起的量为AEiiBviiiAviii。在水平线EiiBviii和EiBix间的第二个窄条面积，计量着这八个人用所有资本生产的量与有第九个人与他们分享这些资本后所生产的量的差额。他们将总资本的九分之一分给这第九个人，因而，EiiBviii和EiBix间的面积计量着他们的出让使他们失去的生产力。按照这样的方式，劳动力由七人增至八人时，资本总额中就有八分之一出让，而七人的劳动产量就减少了。人均生产资金减少一点，指定归因于每个人的劳动的那个数额就减少了。 [22_2]

Knowing that the area AixBixCD, in Fig. 1 below, measures the product of the final unit of labor, we may be sure that no unit in the working force produces less than this amount. Brief statements of the law of final productivity may raise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earlier units of labor in the series do not produce more than does the last one; but that they produce as much as does this one cannot be doubted. AECD, then, is the smallest amount that can be trailed to labor as the cause of its existence.

因为知道图1中AixBixCD的面积计量着最后一个劳动单位的产量，所以就可以确信没有任何一个劳动力的产量会少于这个数额。最终生产率规律的概述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个系列中的前几个劳动单位产量是否不多于最后一个单位；还是它们的产量一定一样多。因此，AECD是归因于劳动存在原因的最小数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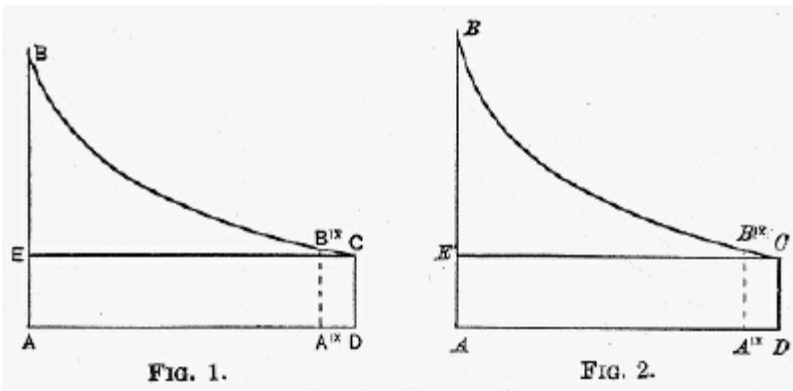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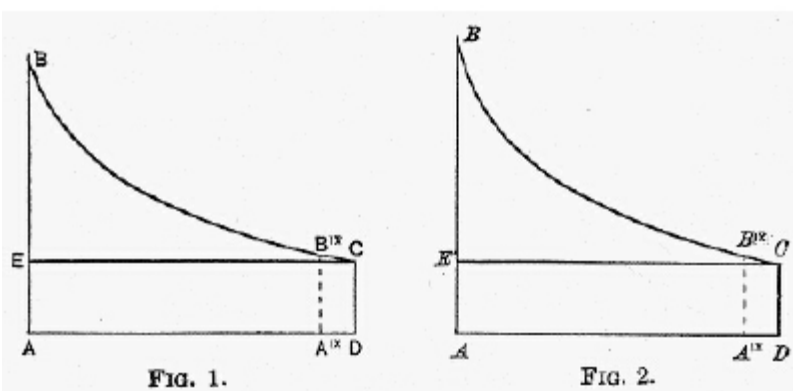

(Fig.16)

(图16)

In Fig. 2, let the line AD measure capital instead of labor, let the amount of labor be a fixed quantity, and let the product of successive units of capital decline along the curve BC.AixBixCD is, then, the product that the last unit of capital brings into existence. No other unit of capital produces any less; and the area AECD is the least tha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entire ten units of capital.

在图2中，假设线段AD计量的是资本而非劳动，劳动数额固定，连续的资本单元沿着曲线BC递减，那么，AixBixCD就是最后一个资本单元生产的产量。不会再有任何一个资本单元的产量比这个更少的了，AECD的面积为可归因于全部十个资本单元的最小产量。

Now, in Fig. 1, EBC is all that is left of the entire product that is not produced by labor. If AECD, of the second figure, is as large as EBC, of the first, this amount, EBC, is the product of capital; since the rectangle AECD is certainly the product of capital. We know that, by our hypothesis of perfect competition and a complete static adjustment, there is no profit realized by the entrepreneur, as such; and the figure ABCD cannot contain more than wages and interest. The amount EBC is, therefore, not larger than is AECD of the second, and all of EBC is the product of capital.

现在，在图1中，EBC是非劳动所产的产量之外的产量。如果第二个图中的AECD和第一个图中EBC的面积一样大，则这一数额EBC就是资本产量；因为长方形AECD一定是资本的产量。我们知道，按照完全竞争及完全静态调节的假设，企业家是不会有利润可图的；图形

ABCD也就只包括工资和利息。因此，EBC的量不比第二个图AECD中的量大，并且EBC的总量就是资本产量。

Again, EBC is shown, in the same way, to be the product of labor. It is not larger than AECD, of Fig. 1. The static hypothesis prevents the entire figure ABCD from containing more than wages and interest. There is, then, no area in it representing entrepreneur's profit; and EBC, which equals AECD of Fig. 1, is the product of labor solely, since the rectangle AECD measures the least amount that can be ascribed to labor.

EBC再一次以相同的方式证实了它就是劳动产量。它不比图1中的AECD大。这个静态假设使ABCD整个图形只包含工资和利息。因此，其中没有区域代表企业家的利润；既然长方形AECD计量着归因于劳动的最小数额，那么，与图1中AECD面积相等的EBC就只是劳动产量了。

As we have, throughout this study, kept constantly before our eyes the fact that, whenever one man comes into the force, the capital changes its forms and adapts itself to the number of men who are to use it, so we have to keep as constantly in mind the fact that the modes of labor itself have to change in a parallel way. A working force may be built up, unit by unit, so that the enlargement of the force seems to be quantitative; but the change in labor, abstractly regarded, is mainly qualitative. More effort is expended, as the force enlarges; but it shows itself, not so much in doing things that were formerly left entirely undone, as it does in doing nearly everything in a more perfect manner. If the work is agricultural, the ground will be more evenly fertilized, the seed

more uniformly distributed, etc. This is one type of change that labor, as a process, undergoes when workers become more numerous. Another type of change is that which is caused by the altered character of the tools and other appliances that a laborer has to use, as the force becomes larger, while the amount of the capital remains the same. Every change in the instruments with which men work changes the mechanical movements in which work consists. Labor, however, is capable of being measured in units, as though it were homogeneous; and there is a practical method of measuring the product of all of it.

在整个研究中我们始终坚持这一事实，劳动力每增加一个人，资本就改变其自身形式以适应劳动人数，同样我们也应记住这一事实，劳动本身应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变化。一组劳动力可由逐个单位逐一建立起来，它的扩大几乎是量上的；可是抽象意义上来讲，劳动的变化主要是质上的。随着劳动力规模的扩大，所付出的努力就得更多；然而，人们之前没做的工作不如他们用更完美的方式做的工作多。如果这份工作是农业上的，那么土地施肥就得均匀，种子播种就得疏密一致，等等。这是工人增多时，劳动作为一种过程就得经历的一种改变。另一种改变是劳动力规模扩大，资本数量保持不变情况下，由工人所使用的工具或其它器具特征的改变所引起的变化。工人所用工具的每一种变化都会改变工人工作所需的力学运转。然而，劳动虽是匀质的，但还是能够用单元计量的；另外还有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计量所有劳动产量。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in an early chapter, we described a zone of indifference, within which an employer can take a very few more men, at the rate of wages that he is now paying, without sustaining a loss. In a great establishment, there is often such a limited elasticity in the size of the working force. If the

establishment were a great farm, an extra man might somewhere be employed without being forced to do any gleaning in which he would produce perceptibly less than other men. This man's product would, as we have said, express the rate of wages. Men on the zone of indifference are also an aid in adjusting wages. Our whole study requires that a man on this zone in one industry shall be as productive as a man on the similar zone in another industry. It requires, in fact, that there shall be a comprehensive zone of indifference extending through the whole industrial field, and that labor on all parts of this social zone shall be uniformly productive. It is now doubly clear that labor on all parts of the industrial field has the same degree of productivity that it has on the marginal zone.

在前面章节里我们提到过一个无差别地带，即在这个地带里，雇主可以按现行工资率雇用更多的员工，而又不至于亏损。在大企业中，诸如此类劳动力规模中常有这样有限的灵活性。如果这个企业是一个大农场，多雇用一个人也是可以的，但不强迫其做不重要的工作，以免使得其感觉上比别人生产的少。正如我们说的，这个员工的产量表示的是工资率。在无差别地带的员工也帮助了对工资的调节。我们整个研究都要求，某个行业中在这个地带的人与其他行业中相似地带的人生产力一样。事实上，这是要求有一个综合的无差别地带遍布于整个行业领域，并且这个产业群地带各组成部分的生产力一致。现在非常清楚的是，这一产业领域的各部分劳动生产力和边际地带的生产力一致。

The practical usefulness of this zone lies in its influence in facilitating competition. A single unit of labor, in seeking employment, always has alternatives open to it. A young man who has not mastered a particular craft has many employments open to

him, and can count on getting about what he is worth, anywhere on this social zone; and one who, after learning one trade, has to take up another may often get a new employment on some new part of this comprehensive area. An entrepreneur who is entering a sub-group, as a competitor of the men who are already there, can gather a force of workers for his mill by withdrawing men from this large social area of indifference—from which they may be taken without causing disturbances, either within any sub-group or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different sub-groups. The scientific importance of this zone, however, depends on the test that it affords of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all labor. If only the adjustments which have lately been described have already taken place, and if labor and capital are now apportioned in a nicely accurate way among the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product realized from labor on this zone has become an indicator of the product that may be attributed to labor everywhere.

无差别地带的实际作用就是对促进竞争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个单一的劳动单位在求职中总是有可选择的机会。未精通某一技术的年轻人，有很多就业机会，并有望在这个产业群区域展现其才能；学会了某一行业之后还想另谋职业的人，可在该综合区域的一个新领域谋得一份新职业。加入一个亚产业群的一个企业家，成为了该亚产业群原有员工的竞争者，虽然他从这个大型无差别地带中为工厂招集了大量员工，但无论在其亚产业群内部还是在各亚产业群之间，都没有引起任何扰乱。不过，无差别地带的科学重要性取决于它对所有劳动生产力的检验。如果先前描述的调节已经发生，劳动和资本正以非常精确的方式在各子群中分配，那么在无差别地带的劳动产量就成了可归因于任何地方的劳动的产量了。

It is a startling fact that the statements of Von Thünen did not

lead directly to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f wages and interest. With such a brilliant beginning of a true theory before them, why should economists still account for the rate of wages, by saying that it depends on the amount of capital that is foreordained to be divided among laborers in the form of wages? Why, also, should they account for the rate of interest merely by saying that it depends on demand and supply? It is doubtless true that Von Thünen himself attached far less importance to his final-productivity formula than he did to that entirely different formula by which, in his view, the socially desirable and rightful rate of wages is expressed; yet it would seem that his state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final productivity should have put investigators on the right track.

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冯杜能的这些理论并没有直接提出工资和利息问题的解决方案。一个真正的理论有着如此良好的开端，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还说工资率取决于劳工间工资形式预先分得的资本数量呢？他们为什么还只说利息率取决于供需呢？毋庸置疑的是，相对于最终生产率公式而言，冯杜能更重视一种完全不同的公式，即用令人满意的恰当的工资率表示的公式，然而他对最终生产率规律的陈述似乎已经应用实践调查了。

The explanation is to be found in the incompleteness of Von Thünen's actual theory. It was left in a shape in which it not only fails to reveal the most important fact about wages and interest, but seems actually to contradict it. This fact is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erfectly free competition, the pay of all labor tends to equal the product of all labor, and that interest on all capital mark to conform to the product of all capital.

这种解释在冯杜能实际理论未完成时就已经形成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不仅不能说明工资和利息的最重要事实，而且实际上好像也与那个事实相冲突。完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这一事实就是，所有劳动的工资倾向于与所有劳动产量相等，而所有资本的利息与所有资本的产量一致。

Von Thünen's theory of wages is apparently a theory of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his illustration, there is a certain force of laborers working on a farm and a man is now added to the force. His presence enables the farmer to glean his fields more closely. As Von Thünen suggested, he can now gather a smaller grade of potatoes than it was formerly profitable to gather; and if the new man is taken in the harvesting season, his product is embodied in the addition that, in such ways as this, is made to the crop. This man, however, produces distinctly less than the men who are before him in the order of the series; and their pay is scaled down to his product. There are expressions in Von Thünen's discussion which seem to imply that, in his own view, the law of final productivity is a law of exploitation of labor. There are also indications that his theory of the final productivity of capital involved a similar exploitation of the earlier units of capital.

冯杜能的工资理论表面上就是劳动剥削理论。在他的解说中，有一组劳工在一个农场中工作，而有一个人新加入这个组织中。这个新加入的工人使农民土地工作密度更大。正如冯杜能指出的，这个人现在收集的马铃薯比原来有利可图时收集的少；如果这个人在收获的季节加入，那么他的产量体现在增加的庄稼上。不过，这个人生产的远远少于这个系列中原有员工生产的，而原有员工的工资却按他的产量比例减少了。在冯杜能的讨论中，隐含着这样的表达法，即最终生产率规则就是劳动剥削规律。也有这样的说明，他理论中资本最终生产

率与之前的资本单元利用有关。

What is first needed, it order to make Von Thünen's statement cover a principle that is of cardinal importance in connection with wages, is a theory of what has been called “imputation,” or of what, in the foregoing chapter, has been called economic causation. At any one time, all units of labor tend to be equally productive. There is, then, no class of workers who are degraded and virtually robbed,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of others who produce less than they do and who set the standard of their pay. The excess of pay that the men on the illustrative farm formerly got is attributable to the greater product that they formerly created and that is solely due to the excess of capital which they had in the earlier period. The theory needs to trace to capital, and not to labor, that extra product which an overplus of capital insures to the men who, in the assumed case, are made to come early in the series. It needs, also, in studying the products that are attributable to a series of units of capital, to use the same discrimination and to show that the earlier units of this agent are not exploited.

为使冯杜能的理论中包含与工资关系重要的规律，首先需要一种称作“归因”的理论或者称作前几章中说的“经济因果关系”理论。劳动的所有单位在任何一个时刻，生产力都趋向于相等。出于产量更少以及决定工薪标准的工人的压迫，那些劳动能力退化甚至被剥夺的工人没有等级之分。上述例子中农场中工人以前所得的过高的薪水，可归因于他们以前所创造的过多产品，以及他们在前一阶段所获得的过多的资本。该理论溯及资本而非劳动，也就是说，在假设的情况下，那额外的产量是由于资本过量而使得该群体很早就有员工工作。此外，研究可归因于一系列资本单位的产量时，要同等对待其他单位，确保该要素的前几单位没有受到剥削。

As between a theory which asserts that every unit of labor naturally tends to get, as its pay, its entire product and one which says that the great mass of laborers are, by competition, regularly robbed of a part of their product, the difference is radical; and yet these theories may use identical language, in telling how the pay of all labor is directly determined. Both may apply to labor the commercial principle of final valuation and say, in effect, that there cannot be two prices of the same article in the same market—that what the last unit labor brings, all labor brings; and that the last unit brings what it produces. If it produces less than do other units, these others are sufferers by their connection with it, for they lose a part of their products. If, however, all units under present conditions produce the same amount, there is no robbery involved in fixing the pay of all by the product of the final one. Von Thünen's theory is a f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but it needs to become, in addition, a specific productivity theory, which makes the pay of each unit of labor conform to its own specific product.

一种理论主张每一个劳动单位将它的全部产品作为它的薪水，另一种则主张大部分劳动者因为竞争，其一部分产品被剥削了，这两种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在讲述所有劳动薪水是如何确定的时，这两种理论可能采用相同的观点。两种理论都将最终评估的商业规律应用于劳动，并说明，在实际上，统一市场的同一种产品不能有两种价格，只要最后一个单位劳动导致价格变动，其他所有劳动都会导致其变动，也就是说最后一个劳动单位决定劳动产量。如果最后一个劳动单位的产量少于其它劳动单位，那么其它的劳动单位就受它的牵连，而失去一部分产品。不过，要是处于目前状况下的所有单位生产的数量都相同，那么按照最终单位产量决定所有劳动的报酬的说法，也就不存在剥削了。冯杜能的理论固然是一种最终生产率理论，但它也是一种特定生产率理论，以使每单位劳动的薪酬与其特定产量一

致。

A theory that is to explain the adjustment of wages and interest needs to make clear what is the mature of that “last dose” of capital, on the product of which interest depends; and this involves discriminating between capital and capital-goods. Particularly, also, does the study need to enforce its scope, so as to include, not one industry merely, but the whole system of groups and sub-groups that make an economic society. The final increment of labor, the product of which fixes wages, is a social increment, some of which is found in every sub-group in the series; and the same thing is true of the final increment of capital. The law of value is active in making these apportionments, and it needs to be included as a part of the theory of distribu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With Von Thünen's work before us, no one else can claim as his own the application to labor and to capital of the principle of final valuation and the basing of valuation on productivity. A prospector in a mining country may, indeed, independently discover and re-occupy an abandoned claim; and this is all that one would do who should re-discover the single principle of final valuation of labor and capital and should stop where Von Thünen stopped. Going farther and discovering laws that tend to bring the products of different units of labor at any one time to a equality, to bring the products of different units of capital to an equality, and to make wages equal to the entire product of labor and interest equal to the whole product of capital—this is attaining the essential truth in the theory of wages and interest; since it establishes the fact that natural law, so far as it has it way, excludes all spoliation. Such further study reveals the fact that what are apparently surplus parts of the products of early increments of labor are really products of capital. This result is gained by following the line of study in which Van

Thünen took the initial steps; and it may, perhaps, give so much of a title to the final result as a miner secures when he strikes a new vein of metal by using, as an entrance way, an abandoned shaft that had led only to a deposit of ore of a different kind. As Von Thünen did not suspect, the natural law of wages gives a result that would satisfy his own requirement, as being desirable and morally justifiable.

用于解释工资和利息调节的理论应该说明哪一个资本单位是“最后一个单位”，哪一份利息决定产量，这就涉及资本和资本货物之间的区别。另外，这一研究还需要扩大范围，以便不仅仅包括一项产业，还包括构成一个经济社会的整个系统的产业群和亚产业群。劳动的最后一个增量——其产品决定工资——是产业群的增量，其中有的位于该系列的每个亚产业群中；资本的最后一个增量也是这样的。价值规律对这些分配起着作用，因此，有必要将价值规律作为某种社会现象中分配理论的一部分。有了冯杜能的著作，没有谁能说是他自己把最终评价规律及基于生产力的评估应用于劳动和资本的。一个矿业国家的采矿者，实际上是可以独自探测并再次占有一个废弃的所有权，而这竟然是再次发现劳动和资本的最终评价的唯一规律，其止于冯杜能所至之处。深入研究并发现一些趋向于使任何时期的个单位劳动产量相同、各单位资本的产量均等、使劳动和利息的所有产量等于资本总产量的规律；这就是工资和利息理论的实质，它建立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规律至今都是排除一切剥削。这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这一事实：劳动早期增量的产品中过量的那部分实际上是资本的产品。这一结果是从冯杜能研究中的前几个阶段获得的，这可能使最终结果获得很多标题，就像一个矿工发现的一条新矿脉，其实就是曾经废弃的原有不同矿石和矿床的矿井。正如冯杜能确信的那样，自然工资规律得出了这样一种令人满意而且符合道德标准的结果，这正符合了他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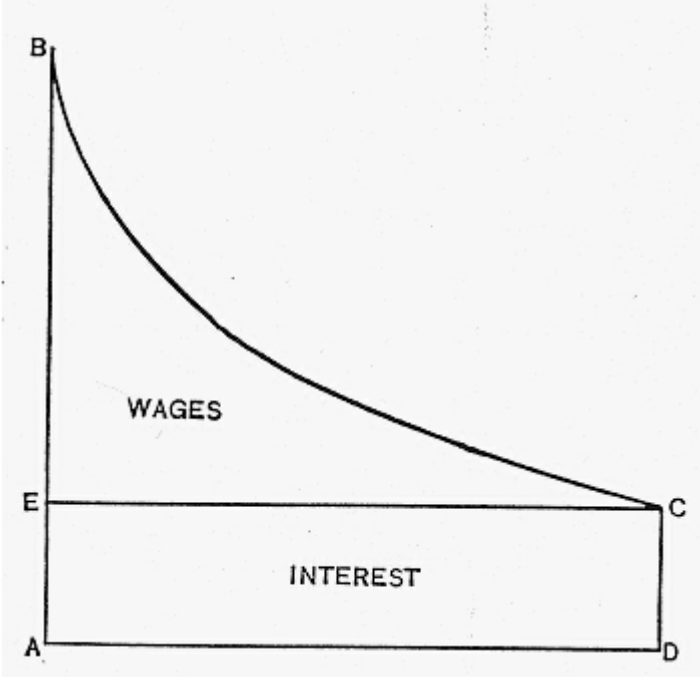
B
WAGES
E
C
INTEREST
A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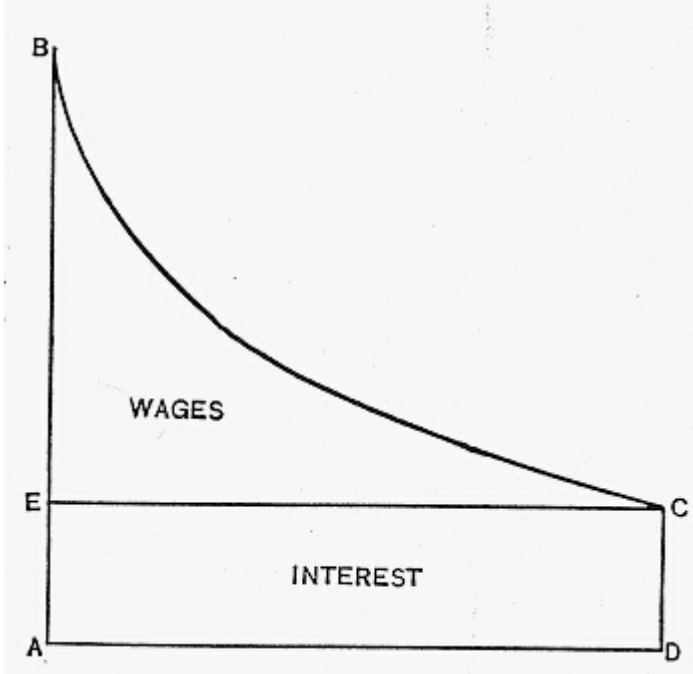

(Fig.17)

(图17)

[21_1].The most brilliant of early German economists, Von Thünen, offered a theory that applied a final productivity test to both labor and capital, and made wages and interest depend on the result. In his work, Der isolirte Staat, he said that, when new men are taken into an industry,—the tilling of a farm, for example,—they produce less than did the men who were earlier employed. What the farmer gets by means of the labor of the last man, is what he pays for the work of every man. Von Thünen also asserted that a final unit of capital, tested in the same way, shows a similar reduction in its productive power, and that the product of the unit last applied sets the standard of interest.

[21_2].In all the foregoing graphic representation there is a slight mathematical inaccurac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upper boundary of the figure is made to be a

curve with a continuous downward trend. Strictly, the whole figure should have been made of rectangles, and the upper boundary should have been the tops of the contiguous rectangles. With ten units of capital one man produces the amount that is expressed by the first rectangle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while, after he has relinquished one-half of the capital to the second man, he produces only the amount indicated by the smaller rectangle on the right of the figu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areas, or the space above the dotted line in the larger rectangle expresses the product of five units of capital in the hands of one man. If we continued thus to build up the figure, we should avoid the small inaccuracies just referred to; but we should have a somewhat cumbersome mode of description to contend with, when we should describe the figure by letters.

[22_1].德国早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一种理论，将最终生产率测试应用到劳动和资本中，让这个测试结果决定工资和利息。在他的专著《孤立国》中讲到，当有新的员工加入到一个工厂或者一个农场的耕作时，他们的产量就比原有的员工生产的产量少。这个新员工以最后一名员工劳动的方式所获得的就是他为每一个员工的工作所支付的。冯杜能也提出，以相同方式测试的最后一个资本单位的生产能力也减少了，并且这个最后单位产量决定了利息的标准。

[22_2].在前面的图示，有一点点不精确的地方，即图的上边界是绘成看上去像一条呈不断下降趋势的曲线。严格地说，全图应该是长方形的，而上边界应该是连接长方形的顶端的。以十个单位的资本为一个人生产的数量，并用下图中的第一个长方形表示，而在他把资本的一半让给第二个人后，他就仅生产了由右边那个小长方形所示的数量了。这两个长方形的面积之差，也即达长方形内虚线上方的空间，表示的是一个人拥有的五个资本单位的产量。因此我们要是继续如此逐步绘图，就能够避免刚才提及的不精确之处，但如果我们用字母来描述这个图形，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不精确之处。

Chapter XXII The Law of Economic Causation applied to the Products of Concrete Instruments

第二十二章 应用于具体工具产品的经济因果关系规律

As capital always consists in goods, it should be possible to account for the whole earnings of it by tracing the amount that is specifically created by each productive instrument. Studies of capital proper should be confirmed at every point by parallel studies of capital-goods, and they can be. There is a simple way of showing the causal connection between all-capital and all-interest, by showing the detailed connection between each piece of capital-goods and its concrete product, or rent.

因为资本总是存在于货物中，所以通过研究每一种生产工具指定创造的产品数量来说明资本总收益，是有可能的。有关资本本身的研究，也应如资本货物的研究那样获得充分的证实，并且这也是能够证实的。要说明总资本和总利息之间的因果关系，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即用每一份资本货物和它的具体产量或租金之间的具体关系来说明。

In the classical idea of rent there is something which is contrary to popular notions on the subject In practical life, almost any concrete instrument of production may become a rent earner; and the thing that is most frequently spoken of as securing this kind of income is a building. One may, for example, “rent” an office, an apartment, a dwelling, a warehouse, etc. Although the hiring of any one of these involves hiring a certain quantity of land, that quantity is frequently minute and is not prominent in the minds of the

parties to the transaction. In popular usage, the term rent also designates the earnings of many things to which no land is attached in the letting: one may, for example, “rent” a ship, a carriage, a horse, a tool, or any other of a hundred concrete things.

租金的传统概念中有着与流行概念相反的地方。在实际生活中，几乎任何具体的生产工具都可能赚得租金，获得这类收入情况最多的是建筑物。例如，一个人可以“租用”一间办公室、一座公寓、一所住宅、一间仓库等等。虽然租用其中任何一座建筑物，都势必要租用一定的土地，但土地的量都是非常少的，在交易双方心中微不足道。“租金”这一术语在流行用法中也是指土地不参与物品出租时的收益，比如一个人可以租用一艘船、一辆马车、一匹马、一件工具或者其它一百种具体物品。

This use of terms in popular speech rests in reality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capital-goods. Interest is the fraction of itself that permanent capital earns; and the capital in the case, while it is certainly not thought of as a disembodied abstraction, is nevertheless regarded as permanent wealth, the concrete and changing forms of which are left entirely out of sight. Interest is not a fraction of buildings, ships, horses, etc.: it is a fraction of the permanent fund that an endless series of such shifting things embodies.

这些术语在流行语中的用法，实际上是基于资本与资本货物的差别之上的。利息就是永续资本所获收益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虽然不被看成是某种脱离现实的抽象概念，但被看成是永续的财富，且不考虑它那各种变化的具体形式。利息不是建筑物、轮船、马匹等的一部分，而是由此类变化的事物所体现的无穷系列的永续基金

的一部分。

With rent, on the contrary, it is the concrete forms that come into prominence. Every instrument that helps to constitute the permanent fund of capital earns, during its active existence, a certain definite quantity of wealth, which can be measured in a lump sum. The axe may earn two dollars; the spade, four dollars; the boat, fifty dollars; the building, a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etc. In all this there is no idea of a percentage connected with these earnings. We can, however, reduce that part of the gross product of an instrument which is really a net income to a percentage of the value of the instrument. If we do this, we shall have reduced the rent, with a certain deduction, to the form of interest. If we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gross earnings of the instrument and the net earnings, by deducting from the gross earnings the amount that is necessary to replace the instrument when it is worn cut, the net earnings can be treated as interest on the value of the instrument. If we follow the usage of the market, we shall, then, use the term rent to include the whole gross earnings. Thus, the rent of a house is what the tenant pays for it. But, if the landlord keeps the house in repair and replaces it when it is worn out, merely from what the tenant pays, he must set aside a sinking fund for that purpose; and only what is left will become an available income. [22_1] If we make this calculation in the case of every instrument in use, we shall have the net earnings of all the capital-goods that exist, and we can reduce this amount to the form of interest,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amount of the capital that the goods embody. We can, for this purpose, get the net income of the instruments in dollars, estimate the aggregate value of the instruments in dollars, get the ratio between the two quantities and, stating the ratio in a decimal fraction, have the rate of interest—the percentage of itself that

capital earns in a given time. If, on the other hand, we simply make a list of all the instruments that are in use,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ir value, and compute the lump sums that they can earn in a given time, we shall have the gross earnings of the instruments in the form of an aggregate rent. This rent, however, includes a sinking fund that offsets the wear which causes deterioration of the whole mass of instruments during this time. In dynamic conditions land usually increases in value, while in a static state it does not. But even in a static state most things deteriorate by use. If we deduct the sinking fund thus made necessary from the gross rent, we have what we may term net rent, or the part of the gross rent that is really income. This is what the owners of the instruments can use with impunity for personal consumption.

租金，则与之相反，它是引人注目的具体形式。每一种有助于组成资本永续基金的工具，在其生息期间，都能够赚得一定数量的财富，这财富又可以计量为一个总额。一把斧头可以赚得两美元，一把铁锹四美元，一艘小船五十美元，一座建筑物一万美元等等。这些事物与其收益都没有百分比关系。不过，我们可以将一种工具的总产值中净收入那部分换算成该工具价值的百分率。按照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将租金作一定的扣除后转换成利息形式。如果我们要区分工具总收益与净收益，可以从总收益中扣除工具破损后重置的费用，则该净收益可以看成是此工具价值的利息。按照市场惯例，租金这一术语包括整个总收益。因此，一栋房子的租金就是承租人支付的款额。但是，如果房主从承租人所付租金中拿出一部分维修房子或者重建，那么他就必须为此留出一定的偿还基金，而且只有留出来的那部分才是可用收入。[23_1] 我们将使用中的每一件工具作这样的计算，就可以得到总资本货物的净收益；通过将此项收益额与货物所体现的资本额比较，我们就可以将其换算成利息形式。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能获得这些工具以美元计量的净收入，估计出用美元计量这些工具的净收入，并得出这两个数额小数形式的比率，进而获得利率——在既定时

间内资本所得的百分率。反之，如果我们只列出所有使用工具的清单，而不提及其价值，估算出在既定时间内赚得的总收益，我们就可以获得以总租金形式存在的工具总收益。不过，此租金包括了一种抵补在这期间内整批工具损耗的偿债基金。在动态条件下，土地通常都是增值的，而在静态条件下，它却不增值。但是即使在静态条件下，大部分物品还是由于使用而有损耗的。假如我们从总租金中非得扣除偿债基金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净租金，或者叫做总租金中的真正收入。这就是工具所有者可以放心用于个人消费的那部分收入。

Net rent is, then, nothing more than interest regarded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it is an aggregate of lump sums, each of which represents the net earnings of some instrument. It is identical in amount with interest, and it becomes interest the moment that we reduce it to a frac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instruments that earn it. In a static state,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net rent and interest lies in the manner of computing them. State how many dollars all capital-goods of every kind earn, above the cost of repairing and replacing them, and you have told what is the net rent of all capital-goods. It is the same as the whole amount of interest, but you translate it into a rate of interest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value of the capital-goods.

由此可见，净租金也就是从另一种角度看的利息而已，它是某种工具净收益的总额。它与利息数额相等，当我们将净租金换算成赚得它的工具价值的一部分时，它就成为了利息。在静态情况下，净租金与利息之间的唯一差别在于计算它们的方式。扣除工具维修及重置的费用，去表述每一种资本货物赚得多少美元，就知道所有资本货物的净租金了。它和利息总额相同，但与资本货物的价值相比较后，就将它转换成利率了。

We shall regard the product of permanent capital as interest, the gross product of all capital-goods as gross rent, and this same amount, less the cost of replacing the goods, as net rent. Herein we are following practical usage in the choice of terms, and we are expressing a distinction that business men make between rent and rent-producers, on the one hand, and interest and interest-producers, on the other.

我们可以将永续资本的产量看作利息，所有资本货物总产量看作总租金，再用同样的数额减去重置货物的费用可看作净租金。于此，在术语的选择上，我们遵循了实用性原则，一方面，阐述了企业家对租金和租金成因所作的区分，另一方面，阐述了企业家对利息和利息成因所作的区分。

Science has proposed a different distinction between rent and interest. It has tried to confine the former term to the product of land,—and that, too, without taking account of changes in the value of land,—defining it as what a tenant pays to his landlord for the use of the “original and indestructible” properties of the soil. This usage probably would never have grown up, if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had originated in America, where land has always been a commercial article, and where the man who buys a piece of it reckons whether he can get as good interest on his investment in that form as he can in any other. It is, then, obviously very important to know whether the usage that is prevalent in ordinary life is not, after all, really more accurate, and hence more scientific.

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区分租金与利息。这种方法

试图将租金这一术语束缚到土地这一产品上，即不考虑土地价值的变化，将租金定义为承租人因使用土地这一“原始的且不可毁灭的”资产而支付给房主的费用。要是政治经济学起源于美国，那么这种方法可能永无普及之日，因为在美国，土地一直是一种商品，任何一个购置土地的人，都会估算一下他现行的投资方式和其它的投资方式相比，能否获得同样多的利息。因此，要弄清楚这种普遍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为更精确更科学的方法，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The two distinctions that are usually cited as differentiating land and other instruments are: (1) The quantity of land is absolutely fixed, while instruments may be multiplied; and (2) the earnings of land consist in differential quantities, obtained by comparing the yield of good land with that of poor. “The rent of a piece of land,” says the definition, in effect, “is what it produces, minus the product of the poorest land in use that is tilled or otherwise utiliz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ame amount of labor and capital.” The rigidly fixed amount of land, then,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differential way of reckoning the product of it, on the other, are the facts on which science has based its practice of treating this agent as unlike capital and as distinct from it as an economic agent.

区分土地和其它工具通常有两种方法：（1）土地的数量绝对固定不变，而工具可以倍增；（2）土地的收益存在差异，即肥沃土地与贫瘠土地的产出不同。“一块土地的租金，”按定义来说，实际上就是，“指该土地的产值减去耕种用或者投入等量劳动和资本后用作他种用途的最贫瘠土地的产值所得之差。”因此，一方面是土地数量严格固定，另一方面是计算土地产值的方法不同，基于这两方面事实，政治经济学才认定这个要素不同于资本，即使作为一种经济要素它也是有别于资本的。

Let us see how much, in a static study, these distinctions amount to. That capital, in the aggregate, should be fixed in amount, is one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static state. This assumption, moreover, expresses what is true at any one moment in a dynamic state. The gross amount of capital in the world cannot be instantly changed, and the rate of interest at this moment is based on the gross amount existing at this moment. If dynamic changes were not to occur, the present amount would be the permanent one, and all capital could be treated, like land, as a fixed quantity. The idea that land is fixed in amount, and that capital can be increased at will and to any extent, is really based on an error which one encounters in economic discussions with wearisome frequency. It is true, indeed, that if one particular kind of instrument is highly productive, we can multiply the number of such things at will; and we shall, in fact, multiply it till we reduce the earnings of these goods. We thus bring the returns of the capital that is invested in them down to the rate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general earnings of social capital. The value of the instrument appears to be fixed by its cost, while the number of instruments of this kind is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earnings. A piece of land, on the other hand, earns an amount that the Ricardian formula measures; and the value of the land is the capitalization of the earnings. Land, of course, has no cost value, since it is furnished by nature. In this view, it looks as if, in the case of land, quantity were fixed, earnings fixed and value conformed to earnings. It looks as though, in the case of capital-goods, quantity were variable, value were variable and earnings were brought into a relation to the value by a change of quantity.

我们来看看在一项静态研究中，此类差别究竟有多少。总体上来讲，资本的数量是固定的，这是静态的条件之一。此外，该假设表述

了在动态条件中任何一个时刻下什么是真实的。全世界的资本总额不可能瞬间就变化，同时此刻的利率是基于此刻现有的总额的。要是不发生动态变化，那么现有数额就将是永久不变的，并且所有资本可以像土地那样被看成是有固定数量的。土地数量固定、资本随意增长且幅度不限，这一想法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谬论基础上的，这种谬论在经济学的讨论中已经屡见不鲜了。的确，要是有某种工具生产力极高，我们就可以随意倍增此类工具；实际上，我们可以一直倍增这种工具，直至我们需要减少这些货物的收益之时。由此可见，我们将投入到这些工具的资本的收益减少到与社会资本总收益一致的比率。工具的价值看上去是由成本决定的，而数量则是根据收益变化。另外，一块土地的收益量就是李嘉图公式计量的数额，这块土地的价值就是这些收益的资本化。当然，土地没有成本价，因为它是由自然界提供的。据此种观点，就土地而言，就好似数量固定，收益固定，价值又与收益一致。就资本货物而言，好似数量可变，价值可变，收益则因数量的变化而与价值相关联。

Let us look again and more carefully. What we are really comparing is land in general and capital in one particular form. In the terms of our table, we are noting the quantity of all land, as an all-around agent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that of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a particular sub-group. In one case we are taking a social view, and in the other a local view. This is a method that has been adopted in many other connections—and never without confusion.

让我们再仔细回顾一下。我们真正比较的是一般形式的土地和某种特定形式的资本。就我们的表格来说，我们提到了所有土地的数量，土地是社会产品中一种适于各种用途的要素，同时我们也提到了某一特定亚产业群中所利用资本的数量。在一种情况中我们采取社会观点，而在另一种情况中采取局部观点。这种方法在其它很多场合中

都使用过，而且从来就没有不被混淆的情况。

Let us, then, rather compare all land with all other capital-goods: let us take all society into the field of view. In every group and sub-group there is land, and in every one there is capital in the form of artificial instruments. Neither the one agent nor the other can be increased in the aggregate at will. At any one time, the amount of artificial capital in existence is as fixed as is the amount of land. Within any short time it is impossible to increase the general fund of artificial capital enough to make a perceptible difference in the conditions of social industry. At any one time we have to deal with a definite quantity of land, in combination with a definite amount of capital in artificial forms. Moreove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and and other capital-goods, based on the notion that land cannot be increased and that other things can be, has obviously no validity in a static study; for the static assumption itself precludes all increase of capital.

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将所有土地与其它所有资本货物做比较，我们将整个社会纳入到这种观点。每一个产业群和亚产业群中都有土地和以人造工具形式存在的资本。这两种要素没有一种在总量上能随意增加。任何时刻，现存的人造资本数量和土地数量都是固定的。增加人造资本总基金量，以期能在社会产业中形成可觉察到的影响，这在任何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做到的。与一定量人造资本相比，任何时刻，我们都必须使土地数量确定。此外，如果是基于土地不能增加而其它事物可以增加这一概念的话，那么土地和其它资本货物之间的区别在静态的研究中显然是无效的，因为静态假说本身是将资本的一切增加排除在外。

Let us see where, if ever, the distinction holds good: let us take a limited view, confining ourselves to a particular sub-group. Is it true, even here, that land cannot be increased, and that capital in other forms can be? The distinction has as little application here as it has in the general view. We can, of course, move more land into this sub-group by taking it out of others. Land is, in the economic sense, mobile; since we can cease to use land for one kind of product and devote it to another.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can increase the amount of capital in artificial forms—we can take capital out of one industry and put it into another. In the particular sub-group on which we are concentrating attention, we can have more tools and machines, if we want them. If we are looking at the shoe manufacturing business, we can have as many stitching machines, pegging machines, etc., as we wish; but we can have them quickly only by diverting capital from other forms of investment. In a static condition of society, however, we never shall do this, for an economic influence prevents it.

如果这个区别有效的话，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哪里有效，让我们采取局限的观点，将自己局限到一个特定的亚产业群。即使在此，土地还是不能增加吗？而其它形式的资本还是能增加吗？这里的区别与采用普遍观点的一样，都没有什么实用性。当然，我们能够将更多的土地从其它亚产业群中移出，而移入这个亚产业群中。在经济学层面来说，土地是具有流动性的；因为我们可以使某种产品的用地终止，而将其用于其它产品。同样地，我们可以增加人造资本的数额，即从一种产业中取出资本，将其放入另一种产业中。在我们关注的这个特定亚产业群中，如果我们想拥有更多的工具和机器，我们就能够拥有。假如我们关注某个制鞋企业，那么我们想给这个企业多少台缝、纫等机器就给多少台；但是如果我们想立即拥有这些机器，就必须将其它形式的投入资本转移过来。不过在静态的社会环境下，我们从来不会这么做，因为经济因素阻止我们这么做。

Is there a limit on the amount of land that, consistently with economic laws, we can use in this industry, and no limit on the capital that we can thus consistently put there? Is there an economic consideration that virtually says: “For the best results you must have exactly so much land in this business, while the amount of capital that you may have is an uncertain and variable amount? On the contrary, the quantity of land is fixed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as is the quantity of capital in other shapes. Land is mobile; artificial capital is mobile; and the law of variation that we have described in an earlier chapter determines exactly how much land there shall be in each sub-group, and exactly how much capital in other forms there shall be. [22_2] Put in too much land, and the product of the land, estimated in goods, is reduced, the value of the gods is reduced, and these two influences act concurrently to make you take out the excess. Put in too much capital in other forms, and the same thing happens. The unit of capital then produces too few goods, and goods of too small value. Hence the excess vanishes.

对投资于这个产业的符合经济规律的土地数量有限制，而资本却没有限制？“为获得最好结果，在这个行业你确实必须拥有大量的土地，而你拥有的资本的量却可以是不确定的、可变的量”，经济学上实际是这么说的吧？与之相反，固定土地数量的方式实际上与其它形式的资本数量固定的方式是一样的。土地具有流动性，人造资本也具有流动性；每个亚产业群中应该有多少土地以及多少其它形式的资本由我们在前几章提到的变差规律决定。 [23_2] 如果投入过多土地，那么从货物角度估算的话，土地的产量减少了，货物价值降低了，而这两种因素若同时产生，就会使你撤出土地中过多的那部分。如果投入过多其它形式资本的话，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即资本单位产量太少，货物价值太低。于是，过量部分就会消失。

The result of the action of this law is that there is, in every sub-group, a normal amount of land and also a normal amount of capital in other forms. If you change either amount, you change it for the worse; for, when you apportion either your land or your other capital badly, you get a smaller income. One peculiarity of land is here to be notic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fact that artificial capital has no special adaptation to any particular industry. It changes its outward forms freely, as it goes out of one industry and into another. There is nothing about its form that ties it permanently to one occupation. Some forms of capital, indeed, are very durable; and when capital is invested in them, it cannot easily be taken out. Not all the capital can be withdrawn from such an investment without a great deal of delay, for it is there to stay till the instrument wears out. In general, however, there are enough kinds of capital-goods in every industry that are quickly perishable, requiring frequent renewal, to make it possible to change the form of the capital quickly and without much waste.

这个规律会使每个亚产业群中的土地及其它形式资本的数量正常。改变任何一个的数量，都会使这个亚产业群变糟；因为无论是土地还是其它形式的资本，如果分配不当，收入就会减少。在此要注意土地的一个特性，它与人造资本不对任何特定产业有特定适应性这一事实有关联。土地的这种特性可以自由的改变其外在形式，因为它可以从一种产业中退出而进入另一种产业。不存在与某一种产业永久联结在一起的形式。实际上，有些形式的资本是非常持久的，而且，资本投入其中，就不容易撤出。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从这种投资中撤出，都不会有很久的拖延期，因为它得一直滞留到工具破损。不过，一般来说，每种产业中都有许多资本货物很快破损，需要频繁更新，使之有可能迅速改变资本形式而不造成浪费。

Land, on the other hand, has to be moved bodily, when it is moved at all. It is possible to change the form of improvements connected with it, though doing this too quickly involves a waste; but the land itself has to be transferred from group to group as it is. We cannot wait for one kind of land to perish and for a different kind of land to take its place. The process by which we can move capital without waste, if we take time enough to do it, is not available in the case of the indestructible elements in the soil. When we move land from sub-group to sub-group, we take it, with all its qualities as they are, from one to the other. Land has, moreover, its special adaptations, and it never develops its full productive power unless those adaptations are respected. Land that is good for grazing or for forestry is not equally good for wheat cultivation, land that is good for market gardening is not equally good for building sites, and land that is good for building sites for one purpose is not equally good for building sites for another purpose.

另一方面，要从根本上转换土地的归属，就必须从整体上转换。要改变与之相关联的改进方式是有可能的，虽然运作过快会导致浪费，但土地本身必须经由产业群间的转换。我们不能等到一类土地遭破坏，再用另一类去取代它。如果用充足的时间去运作，就土壤中破坏不了的要素而言，资本在转移过程中不可能不发生浪费。土地从一个亚产业群中转入另一个亚产业群中时，它的所有特性都转移过去了。此外，土地有其特定的适应性，除非它的适应性得到了很好利用，否则不会发挥全部的生产能力。有些土地对于放牧或植树造林适宜，却未必适合种植小麦；有些对于市场园艺适宜，却未必适合建筑；有些对于用做某一目的的建筑适宜，却未必适合用做其它目的的建筑。

This fact makes it necessary to modify the law that apportions

land among the different sub-groups. That land which has a special adaptation for one use may be devoted definitely to that use, with no moral possibility of taking it out of it. If it is necessary to reduce the quantity of land thus employed, that which should be taken out of this department of business is land that is less preëminently adapted to it. There is, for example, some land so well adapted for grazing and so ill adapted for tillage that taking it out of the former use and putting it into the latter would be a pure wast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marginal land that is adapted to either use. In making the adjustment of quantity between the two industries, we respect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land that has marked adaptations and move only that which can be used indifferently for either purpose. Some land, too, is so supremely well adapted to be used in building sites for mercantile structures that we can never think of using it for anything else. There is, however, marginal land that is as well adapted for mercantile uses as it is for residence uses; and when we reduce the amount of land that is devoted to the one purpose and increase the amount devoted to another, we do it by transferring some of this indifferent land.

这一事实说明，更改各亚产业群间土地分配的规律是有必要的。就特别适合某种用途的土地而言，它就应该投入那种用途中，若将其撤出那种用途，是不合乎道义的。要是有必要减少该用途的土地，那么从该商业部门撤出的土地一般就是不怎么适合该用途的那块。比如，有些土地适合放牧而不适合耕作，如果将其从放牧中撤出而投入耕作，则纯属是一种浪费之举。此外，存在许多边际土地适合任何一种用途。在调节两种产业数量时，我们要重视有明显适应性的土地，仅转换用于任何一种用途都没有差别的土地。也有这样的情况，用于建筑的土地极其适合商业建筑，以致于我们从没有想过将其用做其它用途。不过，有些边际土地既适合商业用途也适合住宅用；当我们减少用于某一用途的土地数量，而增加另一用途的数量时，我们转换的

是这种无差别土地。

We shall see, when we get our ultimate measure of value,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a unit of true capital in the form of land. [22_3] For economic purposes, land is to be measured, not by the acre or by the square foot, but by units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 Thus, there may be much capital concentrated in a small piece of land in the heart of New York City, while there may be very little of it in a whole township in the Rocky Mountains. But the law that apportions land among different sub-groups so locates it that every unit of it—that is, every unit of the capital that it embodies—goes where it will do the most good. Land that is supremely well adapted to one use and ill adapted to another represents many units of capital in the one use and few in the other. Suppose, now, that it were necessary to take some land out of the former of these employments and to put it into the latter. Should we think of taking land that, in its present employment, represents ten units of capital and put it where it will represent only one no unit? That would be suicidal. We shall, in fact, transfer some of the land which represents one unit of capital where it is and will represent the same amount in the place where we are to put it. That is, we shall try to move land from sub-group to sub-group without rudely destroying the productive power that depends on its adaptations. Land that is worth more per foot or per acre where it is than it can ever be worth in any other sub-group, will stay where it is. Land that can be moved without any such waste as we have described will be moved freely, till an adjustment is reached which gives two results: (1) Land, as a whole, will be so placed as to develop its maximum productive power—which is equivalent to saying that it will embody the largest number of units of capital that it is capable of embodying. (2) All units of capital in land will, of course, be

uniformly productive.

我们会发现，当获得价值最终计量尺度时，就会有以土地形式表现的实物资本单位。[23_3] 从经济层面来讲，土地不是按英亩或平方英尺计量的，而是以生产效率的单位数计量的。由此可见，纽约市中心的一小块土地可能具有大量的资本，而落基山区整个镇区的土地具有的资本可能很少。不过在各亚产业群间分配土地的规律是这样的，即每一个单位的土地——土地所体现的每一个资本单位——都投入到它能发挥最大效用之处。极其适用于一种用途而不适用于另一种用途的土地，表示其投入到一种用途的资本单位很多，而另一种的很少。现在，假设必须要从之前一种用途中撤出一些土地，用来投入到后一种用途。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将目前利用的体现十个单位资本的那块土地改为只体现一个单位资本的另一种利用呢？那将会是自取灭亡。事实上，我们可以转换代表一个资本单位的土地中的一部分土地，并使代表同一数额的资本投资于此。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各亚产业群中转移土地，且不会随意破坏决定其适应性的生产能力。目前该亚产业群值得拥有的土地比任何其他子群的都该多一英尺或一英亩，并保持不变。之前我们描述过在不浪费的情况下转移的土地要想随意转换，就需可以得到以下两种成果的调节：（1）土地在整体上将置配发挥最大生产力——也就是说，它将体现出它所能体现的最多资本单位。（2）当然，土地上的所有资本单位的生产力都相同。

With this reservation about the kinds of land that will be chosen, to be taken out of one use and put into another, the principle that locates land among the different sub-groups is identical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locates capital in other forms among them. Capital, in all forms, is brought to a uniformity of productive power per unit: capital, as a whole, is brought to its highest efficiency. Mislocating capital of any kind is reducing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fund. Locating capital of all kind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apportionment that we have outlined gives to the whole of it the largest possible power to produce. In a static hypothesis, we assume that this adjustment is made and kept—that the quantity of land and of other capital in each sub-group is fixed.

留下入选的土地，从一种利用中取出放入另一种中，在各亚产业群中分配土地的规律与分配其它形式资本的规律相同。各种形式的单位资本都有相同的生产力，即资本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它最大的生产效率。任何一种资本的误置都会减少基金的总效率。依据我们概述的分配规律分配的各种资本，会发挥其最大的生产能力。在静态假说中，我们假设作了这样的调节——每个亚产业群中的土地数量和其它形式的资本数量都是固定的。

We now have to see that the earning power of land and that of the other forms of capital are determined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Here we take issue with the second claim of the classical economist concerning land—namely, that its earnings consist only of surpluses, or differential quantities, while the earnings of capital are determined otherwise. We shall find that two things are true: (1) The earnings of every kind of capital-goods can be brought into the form of surpluses, or differential quantities; and land is not unique in this particular. (2) The returns that capital of any kind can secure for its owner are determined directly and not residually. The positive power of each bit of land to create wealth fixes the rent of it, just as the positive power of each unit of capital to create wealth fixes the interest on it. The entrepreneur who hires land does not make over the rent to the landlord because, after paying other claims, he has a certain remainder in his possession. That fact would never compel him to part with the remainder. He pays over this remainder, indeed; but he does it because each bit of land has a

positive power to produce, and the landlord can make the tenant pay the value of the specific product of it. If this particular sub entrepreneur will not pay for a piece of land what it produces, another will. Competition forces the user of any productive agent to give to the owner of it the amount that it brings into existence. What it earns for its owner is determined directly, not residually.

现在我们必须明白，土地和它种形式资本的收益能力都是由相同的方式决定的。在此我们质疑传统经济学家关于土地的第二种见解，即土地的收益仅在于剩余或者级差数额，而资本的收益则不然。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件事情是正确的：（1）每一种资本货物的收益都可以取自剩余或级差数额，而在这一点上来说，土地并不是唯一无二的。（2）任何一种资本为其所有者赚得的收益都是直接确定的，而非由剩余额决定。每一块土地创造财富的实际能力决定着它的租金，正如每单位资本创造财富的实际能力决定着它的利息一样。租用土地的企业家没有将租金移交给房主，因为在支付其它索赔后，他还有归他所有的一定的余额。这一事实使他永远不会与这一余额分开。他确实是支付了这一余额，但他这样做是因为每一块土地都有实际的生产能力，房主可以让承租人对该土地上特定产品价值进行支付。如果这位企业家没有为这块土地支付，就会有另一位企业家这样做。竞争迫使每种生产要素的使用者支付给所有者用以生存的数额。这种要素为所有者赚得的利益就是直接确定的，而非由剩余量决定。

There are in use lands of every grade, and there are in use artificial instruments of every grade. The lowest grade of every instrument produces nothing, and is a no-rent article. Higher grades of every instrument, land included, produce something; and, if there is any advantage in calculating the amount of that something by saying that it is a product of the good instrument minus the product of the poorest one, that calculation will always yield a correct

result, since the product of the poorest one is nothing.

有各种等级的土地投入使用，也有各种等级的人造工具投入使用。每类等级最低的工具什么也不能生产，因此它是一种免租商品。每类等级较高的工具，包括土地在内，都能生产出某些产品；如果说通过质优工具的产量减去最差工具的产量，来计算这些产品的数量的任何优势的话，那么所得结果总会是正确的，因为最差工具的产量为零。

This method of calculation reduces the rent of everything to a differential quantity; but whether there is any significance in the fact that it is such a differential quantity or not, depends on how the margin of utilization is located. What is it that fixes the grade of the poorest instrument in use, and determines that all poorer ones shall be neglected or abandoned? We shall see that there is a single principle which locates this margin everywhere—which determines how poor a grade of land it will pay to cultivate, how poor instruments it will pay to use and how poor a quality of laborers it will be profitable to employ. The product of any productive agent is, in fact, just what it can add to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 and labor. If the groups are in a normal condition, these marginal earnings are uniform in all of them and are the standards of social wages and interest. The product of any specific agent is what it can add to the product of the labor and the capital that work with it, when these products are thus computed on a marginal basis.

这种计算方法将每件工具的租金减少到级差数额，但这样的级差数额是否有意义，还取决于如何确定使用边际。是什么决定质量最差工具的级别的呢？是什么决定所有较差工具应被忽视或被废弃的呢？

我们将会看到有这样一个简单的规律限定着这个边际地带，它决定着开垦什么等级的土地划算，使用什么质量的工具合算，以及雇佣什么素质的员工有利可图。事实上，任何生产要素的产量，都是它对资本和劳动边际产量的增量。如果这些产业群都处于正常状况，那么其中的边际收益都会是相同的，并且会是和社会工资和利息的标准一致。任何一种特定要素的产量，当其按边际原则计算时，都是劳动和与之协作的资本的产量的增额。

For measuring a unit of labor we need a standard, and we shall soon get it. Provisionally we may use, as a unit, a day's labor of a man of average quality. The term “average quality,” it may be admitted, requires and will soon receive definition. Capital, also, has to be measured in units; and we may provisionally take, as a unit, whatever improvement can be made in the working equipment of any group by a certain number of days' labor of the standard or average kind. Additional labor put into the shops that mak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will have the effect of turning out either more tools or better ones. In one case, they make a quantitative addition to the capital-goods; in the other case, they make a qualitative addition; but in any case they make an addition, and we now need to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this increase of productive wealth, which is due solely to the labor of a certain number of men working for a given time, can be treated as a unit of capital.

计量单位劳动需要有一个标准，我们很快就会获得这一标准。我们可以暂时用具有普通素质的一个人一天的劳动作为一个单位。“普通素质”这一术语也许是公认的，所以需要并很快就会有一个定义。资本也必须按单位计量，我们可以暂时用任何产业群中的工作设备，按一定天数标准或普通劳动所能实现的改进，作为一个单位。投入车间制作生产工具的额外劳动，有生产更多更好工具的作用。就一种情

况而言，劳动使资本货物在量上增加了；就另一种情况而言，劳动使资本货物在质上提高了；但无论哪种情况，劳动都导致了增量和增值，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承认这一事实，即可以将仅由一定数量的员工在既定时间内的劳动所生产的财富增量，看做一个资本单位。

From the studies that we have already made, we know that such units of labor and such units of capital create definite amounts of produce. The product of a marginal unit is obviously a definable thing; for if labor, in any combination in which it finds itself, produces less than the marginal amount, it will get out of the combination. Also, if a unit of capital anywhere produces less than its marginal product, it will disentangle itself from the combination that has handicapped it, and will bestow itself at a point where it will be marginal capital and will get its normal return.

根据我们已经做的研究，我们知道这些单位的劳动和这些单位的资本创造了确定数量的产品。一个边际单位的产量显然是可确定的，因为任何一个组合中的劳动如果发现自己生产的产量少于边际产量，那么它就会离开这个组合。同样，如果一个单位的资本无论在何处所生产的少于边际产量，那么它就会自行摆脱阻碍它的组合，直至达到边际资本产量从而获得正常报酬。

Now we are ready to locate the margin of utilization, not alone of land, but of all other instruments. There is land so poor that it adds nothing to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the labor and the capital that are combined with it. If it were one grade poorer, it would yield less than this amount, and the labor and the capital would withdraw from it and would seek to locate themselves elsewhere on the margin of employment, where they could make normal

earnings. This land is the poorest that can be used, without in some degree wasting the other agents. A better grade of land, however, adds something to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and capital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it; and this addition is the true product of this land—the rent of the land. It is the gross product of the lend, minus the wages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labor and the capital that work on it.

现在我们不仅可以定位土地的使用边际，也可以定位所有其它工具的使用边际。有些土地非常贫瘠，不能增加与之组合的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如果土地等级再低一些，那么它的产量会比边际产品还少，同时劳动和资本会撤出这一组合，去寻找能够获得正常收益之处。这种土地是可被利用的土地中质量最差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没有浪费劳动和资本这两种要素。然而，级别高一点的土地，增加了与之组合的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增加的量就是这块土地的实物产量，即这块土地的租金。它等于这块土地的总产量减去从事这块土地的劳动和资本的工资和利息。

It seems, then, that wages and interest, rather than the product of the poorest land in use, tilled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labor and capital, constitute the standard by which the product of land is to be measured. The fact is that wages and interest locate the margin. They determine how poor a grade of land it will pay to utilize. We follow the gradations of land downward till we get a piece that adds nothing to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and capital, which is the same as saying that a piece produces nothing more than wages and interest. There we stop. We thus extend the margin of utilization of land just to the point at which wages and interest are afforded. The term “gross product of marginal land, tilled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labor and capital” is a cumbersome expression for “the wages and the interest of that amount of labor and capital.” [22_4]

由此可见，是工资和利息构成了计量土地产量的标准，而非一定数额的劳动和资本耕种的质量最差的土地产量构成的。事实上，是工资和利息决定了这个边际。并决定着应该利用哪个等级的土地。随着土地级别的下降，我们最终获得一块对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没有任何增值的土地，这也就是说，这块土地除了工资和利息以外，什么也没有生产。我们停到那里。于是我们将土地使用边际仅扩大至支付的工资和利息为止。“一定数额的劳动和资本耕种的边际土地总产量”这一说法是“一定数额的劳动和资本的工资和利息”的复杂说法。 [23_4]

The rent of anything else is, in like manner, its true product. It is what society would not have without it. If the labor and the auxiliary capital that are used on an antiquated ship, a worn-out machine or an old building can be just as well used elsewhere, by becoming marginal labor and capital, society gains nothing by using these things; and their product—that is, their rent—is nil. These instruments have lost their combining power, or their capacity to enter into a combination with labor and capital in a way that adds something to the independent product of these agents.

任何事物的租金都以相似的方式表示着其实物产量。没有它，社会就一无所有。如果投入到一艘旧船、一台破机器或一座古建筑上的劳动和辅助资本，同样也可以投入别处，那么一旦其成为边际劳动和资本，社会就一无所获，并且这些东西的产量——租金——为零。这些设备已经失去了组合的能力，或者说失去了通过与劳动和资本组合，以某种方式使这些要素的独立产量有所增加的能力。

It is clear that we can always measure the rent of a good instrument of any kind, by comparing the product of it with that of

an instrument that is at the point of abandonment. The rent is always the net product, minus nothing; and the poorest instrument is the one that produces nothing. There is, however, no value in this periphrase; and there is some danger in using it. It is simpler to say: The rent of any instrument is its net product. This, the only product that is imputable to it, is what it can add to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the agents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it. This formula removes the danger that comes from supposing that the extension of the margin of utilization is the cause of an increase of rent. The truth is, that it is the increase of rent which extends the margin.

显而易见，通过与一种废弃工具的租金量相比，我们总是能够计量出一种质优工具的租金。这种质优工具的租金就是净产量减去零，因为质量最差的那种工具产量为零。不过这种解释毫无价值可言，还存在一定的隐患。简而言之：任何一种工具的租金都是它的净产量。这个唯一的产量就是归因于与之合作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这个公式排除了会有这样一种假设的隐患，即使用边际的扩大是租金增长的原因。事实是租金的增长扩大了使用边际。

In pure theory one might even measure wages in the concrete way in which we are measuring the product of instruments; for he might apply the rent formula to men of different personal qualities. There are to be found workers with so little power to create wealth that it does not pay to intrust any capital to their hands. Rather than give to them a bit of land, with the tools and seeds needed for cultivation, it would be expedient to add the land to the holdings of some efficient producer, who already has an adequate amount of it. There the piece would be a marginal increment of land, adding itself to the other productive agents in the entrepreneur's hands, and it would make a net addition to his output of produce. This net

addition would be the product normally imputable to the land. It would be a larger product than the land could create in the hands of the inefficient worker. Auxiliary capital, too, cannot profitably be left in inefficient hands. It is better to withdraw it and make marginal capital of it elsewhere. This application would afford the four types of rent to which attention was called in the thirteenth chapter. [22_5] We applied the principle which is familiar in connection with land first to capital in its entirety and then to the social force of labor in its entirety; and we thus obtained a general law of interest and wages. We then applied this principle concretely to particular capital-goods, and in a like way we may apply it to particular men.

在纯理论中，具体计量工资的方式就是计量工具产量的方式，因为可以将地租公式应用于具有不同素质的工人。有这样一些工人，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极其低下，以致交托给他们的任何资本都不能获得收益。与其给他们一些土地以及耕种所需的工具和种子，倒不如给已经拥有大量土地的高效生产者增加一些土地。那块土地的边际土地增加了，企业家手中的其它生产要素也就增加了，而其产品产量也就净增了。此净增产量正常情况下是归因于土地的。它比用低效工人在这块土地能够创造的产量高。另外，辅助资本在低效工人的手中也无利可图。所以还是将其撤出转而投入它处做边际资本。这种做法将会有四种类型的租金，见本书第十三章。 [23_5] 将通常应用于土地的这一规律首先应用于资本，然后应用于整个社会劳动力，由此得出利息和工资的普遍规律。然后把此规律具体应用于特定的资本货物，同样还可应用于特定的人。

There are, in fact, few no-rent men in actual employment; and the reason for this is clear, since work involves a sacrifice, and it does not pay to incur the sacrifice unless the earnings be a positive

quantity. In those times and places in which child labor has been employed, with little regard for the welfare of the victims, labor that was not at the no-rent point, but very near it, has been pressed into service. But, where the sacrifice entailed by labor is, in some way, neutralized by a benefit that work confers, labor which creates literally nothing may sometimes be employed. Lunatics or prisoners may be kept at work, in order that they may secure fresh air and exercise, even though the amount of capital that they use, if it were withdrawn from their hands and turned into marginal capital, would produce as much as it does when it is used by them. In such a case the product imputable to their labor is nil.

事实上，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免租的工人，原因很明显，有工作就要付出，要想不为付出开销，除非有一定数量的收益额。在那些雇佣童工而不给与其福利的年代和地方，虽然不是免租，但接近于免租，人们的劳动已经受到压榨。但凡劳动所需的付出，在某种程度上都由劳动所得的收益抵消，因此完全没有生产能力的人也可能受雇用。精神病人或者犯人也可以保持工作，以致能够获得新鲜空气并得到锻炼，即使他们所用的资本额转变为边际资本，其产量也依旧那么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劳动的产量就为零。

The existence of any no-rent labor enables us to make the rent formula general and to apply it to every concrete agent of production. Men, land and capital-goods of other kinds produce something that can be measured by this formula. The product of any one of them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is created by the aid of it and what the same coöperating agents that are now combined with it could produce, if they were relegated to the position of marginal agents of their several kinds. This is one way of saying that the product of any agent is what it creates as a net

income; and we can deduct the product created by the poorest agent of the kind,—which is nothing,—if we wish to do so. The product of any agent is, in short, what it contributes to the total output of industry; and the reduction of such a product to a differential sum is useless, since finding what any agent adds to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other agents combined with it is all that is necessary.

任何免租劳动的存在都使租金公式更普及，并将其应用于每一种具体的生产要素中。工人、土地及它种形式的资本货物，都生产了可由该公式计量的产品。其中任何一种产品的产量，都等于其自身创造的产量与同它组合的其它边际要素所生产产量的差额。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要素的产量都是其作为一种净收入创造出来的；我们可以扣除最次的要素所生产的产量——这个产量为零——要是我们想这样做的话。简而言之，任何一种要素的产量都是它对该行业总产量所做的贡献；这一产量减少到级差数额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找到了每种要素致使其它一切有必要与之组合的要素的边际产量的增加量。

The location of the several margins of utilization is effected by one comprehensive law. Entrepreneurs stop using anything, when they find that it adds nothing to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other agents. Independently of all considerations of humanity, they would, from mere self-interest, stop employing the labor of a child or of a disabled person, if his work added nothing to the interest of the capital that they would have to put into his hands. They would likewise throw any instrument out of use, when it lost its combining power—its capacity to add to the independent product imputable to laborers and to other instruments combined with it. The margins of utilization of men, of tools, of land, etc., are all fixed in the same way; and they all advance and recede according to one universal

law. While this advance and this recession are subjects of study under economic dynamics, we may note now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law that locates them at any one time. All depends on the quantities of the several agents that are brought together. If capital of all kinds, including land, were very abundant,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employ very poor grades of labor. The abundant capital would mean a high rate of wages; and this might render unnecessary the work of children, invalids, cripples and aged persons. Abundant capital would, however, lead to the employment of such able-bodied persons as might formerly have been excluded from employment, because they were below the grade of intelligence or skill that, under the former conditions, was requisite. For such workers, increasing abundance of capital would extend the margin of employment.

许多使用边际的位置受一条普遍规律影响。企业家发现某种要素不能增加其它要素的边际产量时，就不再使用它了。如果童工或残疾工人不能增加资本的利息，那么不考虑人道主义，而仅出于一己之利的话，企业家就不再会雇佣这些人了。同样，当工具失去了组合能力，不能使与之结合的劳工及其他工具生产的单独产品增加时，就会被废弃扔掉。劳工、工具、土地等的使用边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决定的，都是根据一条普遍的规律予以前移或后推的。尽管这一前移或后推都是经济力学的研究对象，但我们还是要指出决定边际位置规律的普适性。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这几种合在一起的要素的数量。如果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要素都很充足的话，雇佣素质差一些的工人也没问题。资本充足表明工资比率高，这就可能使童工、伤残者及年迈者成为冗员。不过，有充足的资本就可以雇佣那些以前因为智力或技能低下而没有受到雇用的体力好的人。对于这样的劳工来说，增加资本的量就会扩大就业边际。

Again, an abundance of labor would, so far as it went, insure the employment of poor lands, poor tools, poor buildings, etc. In practice, this would mean that perishable instruments would have a long lifetime. We should repair the old ship and sail it a year or two longer than we should if labor were scarcer; and we should likewise prolong the use of the worn tool, the rickety machine, etc. In a static state, there is in use a constant quantity of perishable tools of every kind. If a machine steadily deteriorates from the time it is made, and if we make one every year and use it for six years, we have six such machines in constant use. But if we use each one for seven years, we have seven in constant use. Much labor calls for a great number of instruments, and one way to get them is to use each one for a longer time. when the world is crowded with people, the margin of utilization of all capital goods is pressed far outward —just as, in familiar theories, is the margin of cultivation of land.

另外，劳动的充裕将确保贫瘠的土地、质差的工具以及建筑等都被利用起来。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易损坏工具的寿命将变长。一旦劳动力稀缺，我们就得修理旧船、破损的工具及机器等等，使其增加一两年的使用年限，同样，我们也应该延长破损工具、摇晃的机器等等的使用期限。在一种静态状况下，总有一定量的易腐工具在使用着。假设一种机器从制成之日起日渐消损，如果每年生产一件，每件能够使用六年，那么就会有六件这样的机器处于不停的使用中。如果每件使用七年，就会有七件这样的机器处于不停的使用中。有些劳动需要大量的工具，而获得这些工具的一个办法就是延长每件的使用期限。世界人口剧增时，所有资本货物的使用边际大大扩展了，就如我们所熟悉的土地耕种边际理论一样。

Nothing is really labor, in the economic sense, that consists in the effort of laborers who are below the marginal grade; and

nothing is really capital that consists in instruments of any kind—land, tools, buildings, etc.—that are at or beyond the point of abandonment. True labor is always productive, though there may be unproductive effort. In the same way, true capital is always productive, though there are land and tools that are too poor to create anything. In the case of laborers, therefore, the marginal line separates persons who represent true labor from persons who do not; and in the case of instruments, the marginal line separates those that embody true capital from those that do not.

按照经济学层面来讲，凡是在边际等级之下的劳动者的劳动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凡是应当废弃不用或超出废弃年限的设备——如土地、工具、建筑等——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可能存在徒劳的努力，但真正的劳动往往是有生产力的。同样，有些土地和工具质量很差，不能创造出任何物品，但是实物资本总是有生产力的。因此，就劳动者而言，边际线将实物劳动和非实物劳动分开；就工具而言，边际线将实物资本与非实物的资本分开。

Let us revert to what is certainty a general and defensible formula for rent. It is net product. It is what any instrument can add to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and capital. It is what the industrial world would lose outright, if that instrument were taken away. The advance of the margin of utilization is a circumstance that accompanies and reveals an increase in the productive power, and in the consequent rent, of an agent of production. Nothing can make a good piece of land produce more than it now does that will not also make the poorest piece in use produce something more. Whatever does this will also have the affect of making a still poorer piece—which formerly produced a minus quantity, if it was used at all, since it handicapped the agents combined with it—produce

something. This piece of land, by virtue of a change of conditions. ceases to be a drag on labor and to auxiliary capital, and is promoted to the position of no-rent land. Land that is still poorer, and that, if used at all, would have inflicted a still greater loss on the agents that combined themselves with it, now inflicts a smaller loss on them. It is promoted from the position of land that is by two degrees below the marginal grade to land that is but one degree below it. In short, an all-around increase of rent has taken place: land of every sort has acquired an increased productive power or a smaller destructive power. Land that produced something now produces more; land that produced nothing now produces something; land that destroyed a small amount now neither destroys nor produces anything; lands that would have destroyed larger quantities, if they had been used, under the new conditions destroy less. An all-around infusion of productive power into land carries with it an extension of the margin of utilization. We utilize all grades to the zero line, and that is now below the former line.

我们提到租金的公式是普遍而又合理的。租金是净产量。它是任何一种工具使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量的增加量。如果没有工具，整个工业领域将会失去任何租金。使用边际的扩大，伴随并揭示着某种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及相应的租金增加了。既不存在能使一块优质土地产量增加的因素，也不存在能使一块劣质土地产出产品的因素。但凡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会得出这样一种结果，即劣质土地因阻碍与之合作的生产要素，以前负生产，而现在也能够生产出一些产品来。这块土地由于条件变化了，不再阻碍劳动和辅助资本发挥作用了，而且还成为了免租地了。利用这块贫瘠的土地，使原来与之合作的那些要素造成较大的损失，而现在损失小了。土地从边际等级之下两个级别的地方上升到边际之下一个级别的地方。总之，租金发生了全面的增加，也就是说，每类土地的生产力都增加了，破坏力减少了。在新的条件下，有生产力的土地生产的更多了；没有生产力的土地能够生产

出产品了；有一点破坏力的土地现在既不破坏也不生产了；破坏力大的土地破坏力减小了。生产力全部注入土地，扩大了土地的使用边际。我们利用直到零线的各个等级的土地，现在的零线位于之前的下面。

In saying that the rates of wages and of interest locate the margin of land, we do not overlook the fact that the product of labor on marginal land enters in a minute degree into the determination of wages and interest. This point has been fully discussed in an earlier chapter. In the main, wages are what a unit of labor can produce by adding itself to all the other labor and to the great mass of capital, including instruments of all kinds and land of all grades, that are already in use.

在说到工资率和利率确定土地边际时，我们并没有忽略这一事实，即边际土地的劳动产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工资和利息。这一点已经在前面的一章中讨论过了。一般来说，工资就是单位劳动通过与所有其它劳动及资本（也包括各种工具和各个等级土地）合作后，所能生产的数额。

[22_1].Where a building stands on land that is increasing in value, a crude kind of book-keeping treats the increased value of the land as an offset for the diminished value of the building, and therefore reserves no sinking fund from the earnings of the building for the replacement of the structure when it shall be worn out. The whole rent that the tenant pays is, in that case, not very inaccurately regarded as the rent of land and building.

[22_2].See pp. 297-299. [Chapter 19, par. XIX.35-XIX.37—Ed.]

[22_3].See Ch. XXIV.

[22_4].This is not the only objection to using the old expression. A more serious

objection lies in the possible implication that, if we were to extend the margin, we should necessarily increase rent, and should do it by virtue of the extension. A forced or blundering retention of the margin, however, would not add to rent. The location of the margin is not the cause of rent. The power of land to add something to wages and interest is that cause, and wages and interest are the true subtrahend to be used in determining rent.

[22_5].See note on page 192.

[23_1].但凡一座建筑物矗立于一块正在增值的土地的地方，就会有一个简略的账单记下这块土地的增值数额，并用以抵消建筑的贬值数额；另外，从建筑的收益额中留出非偿债基金，用以该建筑破损后重置新的建筑。在这种情况下，承租人所付的租金并没有被误看作是土地和建筑区的租金。

[23_2].见297-299页。第十九章35-37节

[23_3].参见本书第二十四章。

[23_4].这并不只是反对使用老式表达法。反对的意见是有这种的可能性，即要想扩大边际，必然会增加租金，要以边际的扩大来实现租金的增加。可是，强制或粗笨的滞留边际并不会增加租金。边际的位置并不是租金导致的。使工资和利息增值的土地生产力才是其成因，而在确定租金时，工资和利息是其减数。

[23_5].见192页注解。

Chapter XXIII The Relation of All Rents to Value and thus to Group Distribution

第二十三章 各种租金价值关系及团体分配关系

One detail of great importance remains to be supplied in the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wages and interest. This is a unit for measuring wealth in all its forms. Both wages and interest change when the quantity of capital changes, and a unit is needed for so measuring capital as to give a result that is an absolute sum. Such a unit will soon be supplied. It is best, however, before leaving the subject of rents and beginning the quest for an ultimate unit of value, that we should make sure that no embarrassment has been created by resolving all wages and interest into surpluses that are of the nature of rents. It has, for example, been a current belief that "rent is not an element in value" and that interest is such an element. In discovering that rent and interest are, in substance, identical, though they are differently viewed and computed, it would seem that we have found either that interest is not, or that rent is, an element in determining value. The fact is, that rent is universally an element in the determining of values and prices. Moreover, as values have an influence that controls group distribution, whatever controls them governs that general division of the social income that takes place between the different specific industries, or groups.

关于工资和利息理论概述，需要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这是衡量各种财富的单位。当资金的数量改变时，工资和利息也随着改变，因此，就需要有一种单位用于计量资本，从而得出一个绝对数

额。这样一个单位会在下面提出。然而在搁置租金问题并开始研究价值基本单位之前，我们最好还得明确，不会因为把工资和利息都分解成具有租金性质的剩余而使人感觉到很拮据。例如，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观点“租金并非价值要素”，而利息才是价值要素。尽管人们对租金和利益的观察角度和计算方式不同，但是租金和利益在实质上是相同的，我们似乎发现如果利息不是决定价值的因素，那么租金就是决定价值的因素。事实上，租金是决定价值和价格的普遍因素。此外，由于价值对团体分配的控制产生影响，无论是什么支配价值，在各行各业或团体之间的社会收入总分配必然也受其支配。

We have noticed the nice apportionment of labor and capital among the different sub-groups which is necessary in order that values may be normal. There must be in each sub-group, not only the exact amount of capital that unhindered competition would put there, but also the exact amount of every kind of capital that competition would put there, or else values are in a disturbed and abnormal state. There must be the right amounts of fixed capital and of circulating capital, and there must be the right amount of land as compared with fixed capital in other forms. If you take out of one occupation a quantity of land that perfectly free competition would naturally place there and put it into another occupation, you cause to be created less of one product, and more of another, than the perfect action of natural law calls for. Exactly the same thing is true of every agent of production. When competition has its way, it puts a certain amount of each agent into each sub-group; and you cannot make the amount less or more without making the quantity of the product smaller or greater, and the price of it greater or smaller, than a perfect action of natural law requires. Wherever the quantity of a product is unnatural, the value of it is also unnatural.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劳动力和资金在不同小团体中的合理分配，这对价值符合正常标准是必要的。各个小团体不仅必须有竞争配置的资本数额，而且还得有自由竞争配置的各种数额，否则，价值就会处于某种混乱的、反常的状态。必须要有合适数量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并且土地数量和其他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比例应适当。要是自由竞争导致一定数量的土地从某一行业中退出而进入到另一个行业，就会导致与自然规律的完全作用所要求的相比，某种产品产量增长或降低。就每一种生产要素而论，情况也莫不如此。当出现竞争的时候，在每个小团体中都会存在一定数量的生产因素；其数量的多与少，取决于产品数量和价格的过大或过小，而不是自然规律所要求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产品的数量是反常的，它的价值亦是反常的。

It appears, then, that the amount of a productive agent that is at work in a sub-group is an element determining the value of the product. The amounts of all kinds of natural agents that are present in any sub-group are, likewise, the regular determinants of value. They are such, because of the amounts of different goods that they create; for the product of every one of the agents enters into the supply of the goods that is put on the market.

那么很显然，在小团体中起作用的某种生产要素的数量是决定产品价值的要素。存在于小团体的所有种类的自然因素的数量同样也是经常决定价值的因素。由于所生产的各种商品的数量，每一个产品要素的产品都成为供应市场的商品。

This product of an agent, concretely regarded, is the rent of it. Thus, the rent of the tool in the shoe factory is essentially the number of pairs of shoes the existence of which can be traced to the tool. Similarly, the rent of a square rod of land utilized by the shoe

factory is essentially the number of pairs of shoes the creation of which is referable to that amount of land. Regard the land as marginal, contract the area occupied by the shoe factory just enough to take out a square rod of it, leave the other capital unchanged in amount—although changed in shape, because of the contracted area—and you find that you produce a certain number of shoes the less every year. The reduction of the output due to the withdrawal of the land, or the addition that would be due to the restoration of it, is the rent of the land. The real rent of land, as of everything else, consists in goods that the land virtually creates; and these enter into the supply of such goods and help to determine their value. Rent is primarily to be regarded as a product traceable to a concrete agent, or as a distinguishable part of supply. The rent of land, then, as the concrete product imputable to land, is emphatically an element in determining value. The rents of all the agents of production constitute, when society is in a natural static condition, the entire supply of goods; and the supply that is furnished by any one of them—or, in other words, the concrete rent of it—is, of course, one of the value-determining elements.

这一要素的产出，具体地说，就是此要素的租金。因此，鞋厂工具的租金基本上是与现有产出的鞋子数目相对应。同样地，鞋厂所占用的一平方杆土地面积的租金，本质上说来，和这片土地上所产出的鞋子的数量是相关的。我们将这块土地视为边际土地，将被鞋厂所占用的土地面积缩小为只剩下一平方杆，剩余的土地面积的资本在数量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在形状上却发生了改变。由于缩小的这块土地，你会发现生产出的鞋子的数量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收回土地导致鞋子数量减产，或复原土地促使鞋子数量的增产，那就是租金。像其他事情一样，真正的地租涵盖在该土地上实际上所产出的货物。这些货物用于供给，并且帮助决定它们的自身价值。通常将租金视为源于具体因素的商品，或是供应的商品中可识别的部分。于是我们能看

出，地租作为土地产生出来的具体产品，显然是一种能够决定价值的要素。当社会处于一种自然静态状况时，所有生产要素的租金构成了各种货物的整体供应；并且其中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供给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它的具体租金，当然就是价值决定因素之一。

So far as values are merely relative, it is the apportionment of the producing agents among the different sub-groups that determines them. Moving any one of the agents from sub-group to sub-group changes values; and, as we have said, putting a perfectly normal amount of each agent into each sub-group makes relative values normal. There is a sense, however, in which values are not merely reciprocal; for it is possible to get an absolute unit of value, by means of which we can add all values and get a sum total. If article A is worth a half of article B, and a third of article C, this fact enables us to state the value of any one in terms of the other two; but it does not enable us to get the sum total of the value of all three. Reciprocal comparisons yield no sums. If, however, the values of A, B and C can be measured in something that is distinct from them all, we can get the sum of the values of these three things.

价值是完全相对的，因而，价值由不同小团体中生产要素的配置来决定。将任何要素从一个小团体转移到另一个小团体，都会引起价值改变；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把一定数量的各要素投放到各小团体中，这会使相对价值处于正常状态。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价值并不是完全相对的，因为我们可能获得一个绝对价值单位，从而把所有价值加在一起得到总和。如果货物A的价值是B货物的一半，或是C货物的三分之一，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其他两种货物的价值估计出任何一个货物的价值；但这无法使我们得出这三种货物的价值总和。相互比较得不出总价值但是，如果货物A、B、C三者的价值可用与其不相

同的事物来判断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得出这三者的价值总和。

Now, it is possible to get such a sum total of values; and, whenever we get it, we shall find that rent is an element in determining it. Rent is product, as we have said; and the sum of all the products of the different agents that are at work, measured in terms of an absolute unit of value, gives the total of all values produced. Every agent must create just what it does, or the sum of values created will be different from what it is. Suppress or diminish the productive action of an agent—or reduce the rent of it—and you reduce the sum of values created. Disturb the natural apportionment of the producing agents among the sub-groups, and you somewhat reduce their aggregate productivity—that is, reduce the sum of values that they create, if values be measured in absolute units.

现在，得出价值总和是很有可能的；并且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得出总和，我们都会发现，地租是决定价值总和的要素。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地租就是产品；如果按照某种价值的绝对单位计量，生产工作中的不同生产要素的产品总和会得出所有生产价值的总和。每种生产要素都会有所收获，否则创造出的价值总和将会在实际上有所偏差。抑制或者缩减一种要素的生产作用，或者减少该要素的地租的话，你将会使创造出的价值总量下降。干扰各小团体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然分配，这就会导致减少它们的生产率总量——也就是说，如果价值是以绝对单位予以计量的话，这将会减少它们所创造的价值总和。

Rent, then, is an element in determining, not only relative values, but the sum of values created. It is all this, because it is itself identical with supply. The rent of the land in a particular

industry is the part of the supply of the product of that industry which is traceable to the land. The rent of all land used in production is that part of the supply of commodities in general that is traceable to land. Rent and imputed supply, or partial supply traced to one agent, are synonymous terms; and comparative supply fixes relative values, while total supply fixes total values.

由此可见，地租不仅是决定相对价值的一个因素，而且还是决定所创造价值总和的一个因素。这一切，都是因为其本身和供应是一致的。特定行业的土地租金就是该行业产品供应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是由土地生产所得。用于生产的土地的租金是一般产品供应量中由土地生产的那一部分。租金与估算的供应，或者溯及一种要素的部分供应，它们都是同义关系；而相对供应决定相对价值，总供应决定总价值。

“Rent is not an element in price”—such is the classical statement on the subject. It even expresses a view that is now prevalent. The expression itself however, is vague. It seems to mean that the fact of rent plays no part in the adjustment of values, and that things would exchange for one another in exactly the ratios in which they now do, if there were no such thing as rent. But, if one defines rent as product imputable to a concrete agent, the impossibility of maintaining such a claim becomes apparent. Even if one were to restrict the term rent to the product created by land, the claim that it is not an element in adjusting market values would be absurd; for it would amount to saying that a certain part of the output of every kind of goods has no effect on their market value. The “price” referred to in the formula is, of course, the market value expressed in units of currency.

“租金不是价格的要素”——这是古典学派就此观点的陈述。这甚至传达出时下比较流行的观点。然而表达本身含义却很模糊。似乎租金在价值调整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即便没有租金，各种产品也会根据现有的交换比率进行交换。但是，如果要把租金视为可归因为一个具体因素的产品的话，那么，显然这一主张不成立。即使我们把租金这一词语仅限于应用在土地的生产量方面，租金不是调整市场价值的要素的论调是十分错误的，因为这几乎等于说一种商品中的某一部分，对于这个产品的市场价值没有影响。当然，在这个公式中“价格”是指用货币单位表示的市场价值。

What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have really tried to prove is that, so far as price is concerned, it is of no consequence who gets rent. Their argument merely establishes the fact that the destination of rent, as an income or share in distribution, is of no importance in affecting prices. The proof that is given is essentially the following: Of the supply of such an article as wheat, some part comes from no-rent land. The demand for this cereal has brought this land into utilization, by raising the price to the point at which it can profitably be cultivated. At this price a certain definite quantity of wheat is wanted, but it cannot be had without resorting to this land of lowest quality. The price, therefore, conforms to the cost of production on this area. The crop that is here secured is conceived of as in a sense the “most expensive” part of the supply of wheat, or the part that is raised at “the greatest disadvantage.” Whether, from an entrepreneur's point of view, a bushel of wheat procured by using labor and auxiliary capital on no-rent land is really created at a greater disadvantage and is more costly than a bushel that is raised on good land, is a problem that is worthy of further attention; and we will return to it. We shall find that to the entrepreneur the cost of all the different bushels is uniform, and that it is equal to the price, if static law works perfectly. What we

now have to note is that the cost of wheat raised on no-rent land, as well as that of other wheat, does certainly equal and express the normal price of this cereal.

古典经济学家试图证明，就价格而言，谁得到租金都无所谓。他们的讨论仅仅建立在下列事实上，即作为分配中的收入或份额的租金，它的目的对价格没用什么重要影响。所提供的证据实质上就是小麦一类的供应，有些是来源于免租地。对于小麦的需求使这块土地得到利用，通过抬高麦的价格使得种植小麦有利可获。在这个价格点上，需要的一定数量的小麦，但这就要利用最差的土地。因此，价格与这块地上生产的成本相等。这块土地所得的农作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麦供应中最贵的一部分，或是在“最不利的”条件下种植的部分。从企业家的观点来看，利用劳动力和无地租辅助资本获得的一蒲式耳小麦，这要比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中出来一蒲式耳的小麦成本还要高，条件要不利些。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高度关注的问题，对此我们还会再谈。我们会发现，对于企业家来说，所有不同蒲式耳的成本是相同的，并且如果静态规律完全起作用的话，成本和价格相等。现在我们必须注意到，免租地里种植的小麦和其他土地里的小麦的成本，确实等同于小麦的正常价格。

If the proprietor of superior land were to say, “I will take no rent for it,” this would not make wheat cheaper. The supply would not be changed; for the same quantity would be raised, the marginal amount raised on the no-rent land would be needed and would be bought at the former price, and all other parts of the supply would command the same rate. The farmers who use the good tract of land would still be able to sell their wheat at the price that they now get for it, and they would add the remitted rent to their own gains. This condition, however, leaves rent in existence, and not reduced in the slightest degree in amount. It leaves it,

indeed, in the hands of the farmers instead of in those of the landlords; but the price of wheat is not affected by this transfer. What the argument really establishes is the fact that it makes no difference, so far as price is concerned, whether landlords or farmers pocket the income called rent—the money received for that part of the wheat crop that is traceable to land.

如果肥沃土地的持有者说："这块地我不收租金，"，然而这句话并不能让小麦的价格下降。供应同样也不会改变。因为小麦种植量不会改变，免租地上种植所产的边际数量仍然有人出旧价购买，而所有其他部分的小麦也仍然得到同样价格。使用这片肥沃土地的农场主们仍然能以现在的价格出售小麦，而且他们还会把他们免除的租金作为到他们的收入的一部分。然而，这种情况下，租金仍然会存在，数量上一也一点儿都不会减少。事实上，应该把租金留给农民，而不是把它留给地主，但是这种转换对小麦的价格并没有什么影响。该论点实际上证明了：就价格而论，无论是地主或农民获得所谓地租的收入，也就是从所收割的小麦由于土地所生产出来的收入，都无关紧要了。

The argument may be carried farther. The farmers may say, "We will not keep the rent, but will pass it on to our laborers. We will divide it, in a pro rata way, among all who work on the farms." This, again, will not make wheat cheaper; for the marginal quantity of it will still be needed and will be paid for at a rate that makes good the cost of getting it. Therefore, whether landlords, farmers or laborers absorb rent, the rent will exist, so long as land adds its quota to the supply; and the price will be constant.

这个论点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农场主会说："我们不会留下地租了，但是会把地租留给我的工人们。我们会按照比例把地租平均分配

给在农场干活的人。”这仍然不会使小麦变得廉价；因为小麦的边际产量需求量仍然很大，并且以一定价格卖出收回成本。因此，不论是农场主，农场主还是劳动者收取地租，只要土地有助于供应量增加，地租就会一直存在，而且价格也会持久不变。

We may go still further with the argument. The laborers may decline to take the premium in wages which the farmers offer to give to them. In their beneficence, they may resolve to give it to the public. Even this will not affect the price of the wheat supply, as a whole. If the farmers sell the wheat and give the money that would represent rent to the laborers, the only way in which these men can give it to the public will be by some eccentric and arbitrary plan of distribution. The wheat will still have been sold at the regular rate. If, however, the rent is made over to the workers in kind, and if they are determined not to keep it, they will have to devise a method of giving away that part of the supply. Whatever is sold will, despite all these complications, bring the former price.

我们可以就此论点做进一步的讨论。劳动者们可能会谢绝农场主承诺提供给他们的工资以外的奖金。以他们的善行，工人们会决定将这个奖金补贴给公众。即使劳动者们这么做，甚至也不会影响小麦整体的供应价格。如果农场主将小麦出售，并且将作为付给地主的租金的钱支付给劳动者，劳动者会把它们分给公众，以某种异于寻常的、任意的分配方案。所出售的小麦仍然保持原有价格。然而，如果地租以实物形式交给劳动者，要是他们绝不会接受，他们就不得不设法放分发那一部分实务供给，尽管情况复杂，无论销售什么，农场主都会有价格可循的。

This whole argument concerns, not the existence of rent, but

the disposition of it as an income. Not one of the hypotheses that have here been made, following the line of the classical argument, annihilates the element, rent: the product attributable to land still exists. There is a definite number of bushels of wheat somewhere in the granaries that has been brought into existence by the agency of good land. This wheat is, in reality, the rent of the land; and some one has the value of it as an income. The fact that one person rather than another has this income is not anything that affects values, and this is all that the traditional argument proves. It establishes the fact that the European system of landlord and tenant leaves values where they would be, if the land were the property of the cultivators or of the nation as a whole. Under either of these conditions, rent would exist; and it would constitute an element in supply that would affect value. [23_1]

总体说来，与这个论点有关的不是存在地租这一点，而是地租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如何处理。根据经典的论述我们所作出的假设没有一条能够消除租金这一要素。源于土地的生产出的商品产量仍然存在。谷仓里存放着一定数量由较好的土地所生产出来的小麦。实际上，这些小麦就是这块土地的租金；有的人懂将其价值作为收入。不论是谁得到这一收入的事实对价值没有任何影响，这也是传统观点一直试图证明的。这证实了以下的事实，在土地属于耕种者或是国家所有的情况下，欧洲土地佃户制使得土地保持同样的价值。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地租会存在；它会是供应量的一个要素，并且对价值产生影响。[24_1]

It is a striking fact—but one hitherto much neglected—that similar conclusions apply to the product of every other agent. The principle of rent may be applied, as we have seen, to the concrete products of all artificial capital-goods, and even to those of

workmen. In the same inaccurate sense in which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rent of land is not an element in price, the rents of tools, etc., and those of men themselves, or interest and wages, are not elements in price.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o gets these amounts. Price remains the same, whether we take one of them away from the persons who now get it and bestow it on others, or leave it where it is. We can repeat, word for word, the argument concerning the rent of land, making it apply to the rent of men or to that of artificial instruments, and it will be as true in the one case as in the other. The differential product of artificial instruments of superior quality still constitutes the interest on the capital that they embody, and the differential product of men of superior quality constitutes wages.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结论可应用到所有要素的产物上，而这一点常常忽略了。如我们所见，地租的原则可以应用到所有人为的资本货物的产品上，甚至可用于工人生产处的产品上。如果认为地租，工具租金，工人或者利息和工资等都不是价格的要素，这种观点也不对。至于谁得到这些租金，都无关紧要。无论我们把租金从现在持有者转赠给他人，或是留在持有者手中，价格保持不变。关于地租的观点我们可以一字不变的套用到工人和人为工具的租金上，而且这在无论何种情况都适用。人为工具所生产的质量上乘的不同级别的产品构成了其所体现的资本的利息；而由工人生产的质量上乘的不同级别的产品则构成了工资。

Artificial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re virtually loaned for hire, when the capitalist loans “money” with which to buy them or have them made. What goes to the capitalist is really the earnings of the instruments; but it goes in the form of an annual fraction of the money that he has advanced; and it is thought of in this form,

and termed interest rather than rent. If the capitalist says, “I will take none of this interest,” the earnings of the instruments simply remain in the in hands of the entrepreneur. The price of the products is unaffected. Some of these products, as we have seen, are created by the use of no-rent instruments; and the price is sufficient to justify the use of these instruments. At that price the public demands a certain quantity; and this cannot be secured without using the no-rent instruments, except in ways that are even more costly. The quantity will be secured and the no-rent instruments will be used. With that quantity of product in the market, the price will justify the using of these instruments. The entrepreneur will now keep the rent that the capitalist makes over to him, but the value of the goods produced will not be changed.

当资本家贷“钱”给人们购买或制造人为工具时，实际上是在出租这些工具。资本家的收入实际上是工具所赚取的收入，以每年以小部分钱的方式赚取，在这种方式下，称为利息而非租金。如果一个资本家说“这种利息我分文不取”，那么那些工具的收益也都归他所有。产品的价格仍没有受到影响。如我们所见，一些商品是由免租工具所生产出来，价格足以证明适用这些工具是合理的。按照那种价格，公众就会购买一定数量的产品；而如果不使用免租金工具，则要通过付出高额成本的方法。使用了免租金工具，数量就有了保障。市场有了这种数量的产品，价格也就会证明使用这些工具的正确性。企业家此时会保留资本家转让给他的租金，但是生产的货物的价值仍未改变。

The entrepreneur may refuse to keep the gain and may pass it on to his workmen; but it exists still, as the rent of concret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or—what is the same thing—as the interest on the capital that is in them. This second transfer produces no more effect on price than did the first. The value of the goods is

still enough to justify using the marginal instruments. If the workmen in certain factories were to refuse to receive this rent, it might be passed on to the purchasers of the particular goods that were made in these establishments, in the shape of a discount from the market value of these goods; but the price of similar goods would remain the same as before. The rent of the good tools, etc., used in these factories,—or the interest on the capital in them,—would still be in existence; but the purchasers of the particular goods made by this capital would have it.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ether capitalists, entrepreneurs, laborers or favored customers get this interest: prices are not affected by transfers of it from one class to another. In reality, the existence of the interest, or the rent of the capital-goods, is of importance. It is a part of the supply of the goods; and, like every other part of the supply, it is a regular determinant of price.

企业家不愿保留收入所得，而会转送给工人们，然而这些收入仍会用作具体的生产工具的租金，或是用作工具中的资本利息。第二次转让价格产生的影响不会强于第一次。货物的价值还是足以证明使用边际工具是明智之举。若某些工厂的劳动者拒收这一租金，那就可以采用这些货物按原价价打折的形式以转让给这些企业产品的购买者，不过，这种货物的价格则仍保持不变。这些工厂使用的优质工具的租金等等，或者其中所含的资本利息还会存在，不过，以此资本生产的某些货物的采购商应当拥有它。无论是资本家、企业家、地主、工人还是受到优待的顾客都会得到这个利息；价格不会因接受利息的人的阶级的不同而受到影响。实际上，利息或者是资本货物的租金的存在非常重要。它是货物供给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跟供给的另外的组成部分一样，它也是价格决定的经常的一个因素。

Exactly the same principles apply to labor and wages. There are

a few no-rent laborers at work, though they are not numerous; and what they create is really an infinitesimal part of the supply of goods. If they were more numerous than they are,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point to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supply of any one kind of goods and say that this part had been created entirely by capital in the hands of no-rent men—capital working at the "greatest disadvantage." The public needs this part of the supply and is willing to buy it at the rate at which it pays to produce it by entrusting capital to these marginal workers. In such hands, the capital creates less than it creates elsewhere, and the entrepreneur has to pay for the capital; so that, in terms of interest, this part of the supply of the product is the "costliest" part, since the entrepreneur must use more capital in order to bring a given number of goods into existence by the aid of poor labor than he would use with good labor. Five thousand dollars entrusted to a no-rent man may create no more than would five hundred entrusted to an average worker. The cost of all parts of the supply is, however, uniform. The cost of what is produced by hiring capital, paying interest on it and entrusting it to no-rent men, resolves itself wholly into interest, while that of most parts of the supply consists partly of wages; but the amount of the cost of the several parts is the same, and the value of all parts is equal.

同一原则也适用于劳动力和工资。有一些免租金劳动者的在工作，但是人数不多；而他们所创造的产品仅仅是供给货物中非常少的一部分。如果这些人的人数比现在的人数多的话，那就可以表明，任何一种货物中的大部分货物是在无租人手中，也就是说，这是在最不利条件下进行工作的资本所造成的。公众需要这一部分供给，且愿意按照把资本交给边际工人来生产时所要付出的价格来购买这部分商品。与在其它地方的产量相比，在这些人手中的资本所产生的产量比较少，因此企业家要付出代价来适用此本。因此，就利息来说，这部

分产品，可以说是“最昂贵”的部分，因为企业家适用低级工人生产的成本要高于适用高级工人生产的成本。将5000美元给一个无租金的劳动者可以创造的产品产量，并不比给一个一般劳动者5000美元所能创造的多。不过各部分供给的成本是一样的。付出利息从而借入资本，并且把这资本交给无租的工人使用，它所生产的物品的成本，完全是利息，但其中大部分产品的成本是由一部分工资组成。但是各部分的成本是相同的，个部分的价值也是一样的。

The consideration of such conditions, artificial though they be, under which owners of capital-goods of any kind should refuse to accept the incomes from them, reveals the generic fact that the ownership of an income is not, but that the existence of it is, a determinant of price. Exactly this can, however, be shown to be true of wages. In the same sense in which the interest on artificial capital and the rent of land are not elements in price, wages have no effect on price. If good workers were to relinquish their claims against their employers and work for nothing, the price of the goods would still conform to their marginal utility. It would, incidentally, equal the cost of creating them by means of the labor of no-rent workers, even if the entrepreneurs should pocket the relinquished wages, or should pass them on to capitalists, as a premium on interest, or to favored customers, as a discount on the market value of goods. But wages would exist in any of these cases, even if the wage-earners did not get them; and prices would be the same as though distribution had not been tampered with.

考虑到资本所有者拒绝接受货物出售后提供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都是假设，但是它揭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不论谁占有收入都不会决定价格，但收入的存在却是一个决定价格的要素。不过，这对工资来说也是如此。在人为资本和地租利息并非是价格的要素这同

一意义上，工资对价格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优秀的劳动者放弃雇主给的工资，且工作一无所求，那么产品的价格还会和边际效用一致。顺便提一下，此时，价格就由依靠免租劳动者劳动创造的这些产品的成本来决定，即使企业家控制了那工人放弃了的资本，或作为超额利息把它们转给资本家，或作为货物市场的折扣转让给消费者。但无论何种情况下，工资都还会存在，尽管受雇佣的劳动者并没有得到，价格还会像分配未受到扰乱时一样。

This hypothesis has an unnatural sound, for there are very few no-rent laborers in the field. Men who produce nothing, get nothing; and the cases are rare in which such persons work at all. They work only where the sacrifice that labor entails is, in some way, offset by a personal benefit; and this is the same as saying that they work only where labor entails no real sacrifice. Yet the proposition, that what has been claimed concerning rent is equally true of wages, is perfectly sound. If there is any sense in which land is not an element in price, then in the same sense wages are not an element. The important kernel of truth in both of these statements is the insistence upon the fact that the identity of the persons who receive these incomes is immaterial as affecting prices. It is not true, however,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ese rewards is thus unimportant. On the contrary, rent of land, rent of concrete instruments and rent of men are all components of the supply of goods—that is, are price determiners.

这一假设有一点不自然，因为这个假设行业中的免租劳动者很少。什么也不生产，什么也得不到的人们居然还工作，这样的例子很罕见。他们只有当劳动能够得到个人利益时才会工作，也就是说只有在劳动且没有损失的时去工作。然而已经谈到的关于租金的观点都适用于工资。要是土地不是一个价格要素这有意义的话，那么，在同一

意义上，工资也不是一个价格要素。这两种说法的核心在于坚持这样的事实：谁得到这些收入，对价格没有影响。不过，这些报酬的存在却又无关紧要。正相反，地租、具体工作的租金和人的租金，都是货物供给的要素，也都是价格的决定因素。

If wages are not an element in price, then rent is not so; and this is an absurdity. Wages, as a whole, are the rent of social labor as a whole; and the wages of laborers in a group are the rent of the labor in that group. We may here cease to treat as rent producers laborers in the concrete or men of different grades of producing ability. We may now bring into view a permanent force of labor, as such, measured in units. The no-rent laborer embodies not a single unit of labor; and though he can put forth effort, he cannot himself produce anything. But the man of the highest grade, the very high-rent laborer, represents many units of labor in the abstract, for he has the power to create a large product. Measuring the working force in units, we may get from the formula that expresses the law of interest a surplus, or differential amount, which is the rent of pure labor, as such.

如果工资不是价格的一个要素，那么，地租也就不是了。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全部的工资是全部社会劳动整体的租金；一个团体的劳动者的工资，是该团体整体劳动的租金。这里，我们不再把具体的劳动者视为租金的生产者或者是具有各种生产能力的人。我们现在即可观察以单位计量的那种永久的劳动力。无租金工人不能体现一个单位的劳动；他固然可以做些工作，但是他一个人什么也生产不了。但是本领强的或是租金高的工人可能代表许多单位的抽象劳动，因为他有生产大量产品的能力。按单位计量劳动力，我们可以从说明利息规律的那个公式中得到一个剩余数量或者说一个差额，这个数量就是纯粹劳动的租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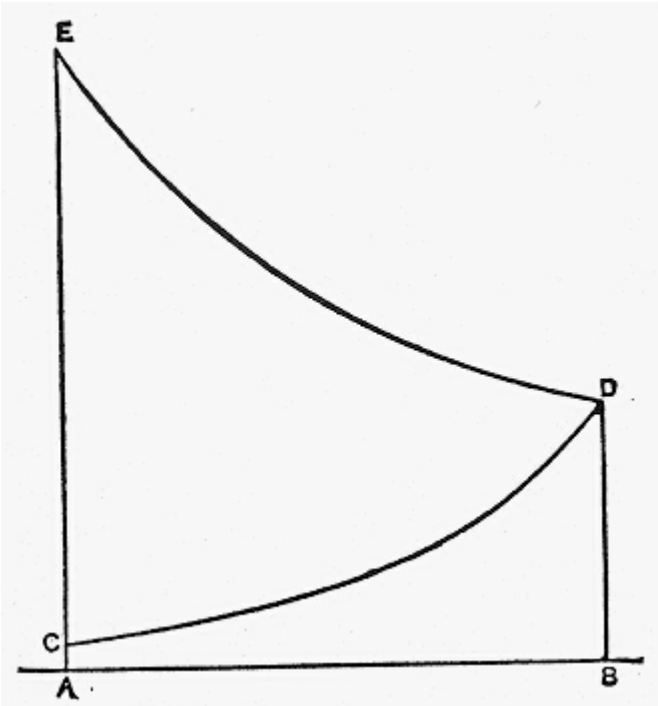
E
D
C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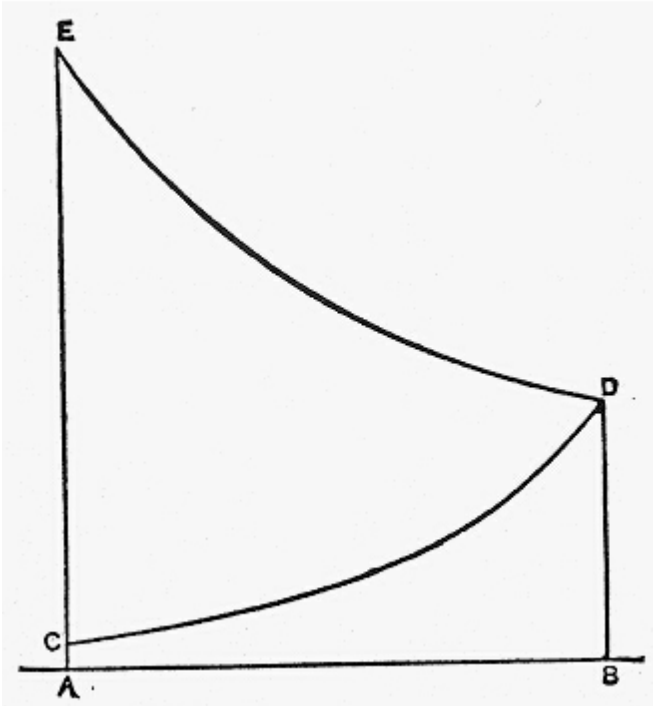

(Fig.18)

(图18)

Let us assume that the number of units of labor is fixed, that capital increases unit by unit, that the amount of capital is measured along the line AD, and that the productivity of successive units of it declines along the curve BC. AECD is, then, interest and EBC is the surplus, or the rent of labor.

我们来假设劳动单位数量固定，而资本则是逐个单位地增加，资

本的数额按线段AD计量，而他每个单位的生产率则沿BC曲线下降。由此可见，AECD是利息，EBC是剩余价值或者是劳动的租金。

In this view, the last unit of the supply of the product is the one that is created by the final unit of capital, unaided by labor. In our former study, we noticed the virtual isolation of this final unit and of its product. Add a unit of capital and you get a certain net addition to the output of goods, and that without any change in the laboring force. Take away a unit of capital and you make a net deduction from the product, and that, too, without any change in the laboring force. The addition that you make in the one case and the deduction that you make in the other are the products of the units of capital that you respectively add and subtract. If you neither add nor subtract any capital, but leave the amount as it is, there is in the output of the industry a certain final or marginal amount that is entirely due to the presence of the final unit of capitalism—an amount in the production of which labor does not coöperate.

按照这种看法，该产品的最后一个单位的供给没有借助劳动，它是由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本所创造的。在我们早先的研究中，我们提到了最后一个单位以及其产品实际上是分离的。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就得到货物产出的量的净增值，而且这还是在劳动力不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实现的。撤去一个单位的资本就会导致某种产品的产出数量减少，而劳动力并不发生任何改变。一般情况下人们实现的单位产品的增加或减少，都是人们分别增减资本单位的结果。若任何资本既不增也不减，就让资本数量保持原数。那么，在产业的产量中，一定有一个完全由于最后单位资本所生产出来的产量，没有劳动的合作而生产出来的产量。

Now, if the traditional reasoning about land and its products has validity, the same kind of reasoning is valid here. The price of the goods must be sufficiently high to enable the entrepreneur to create a certain marginal portion of them by the use of this final unit of capital, unaided by labor. The fact that the earlier units of capital—aided, as they are, by labor—produce "at better advantage" does not affect the price, since that equals the cost of the marginal unit of the supply, which is traceable to the marginal unit of capital. If we can conceive such a thing as an entire working force refusing to accept wages, while continuing to work, then we must accep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ntrepreneurs will pocket the gain. They will, obviously, be under no necessity for passing it over to the public; since, by the action of the law of value, they can always get from the public a price that equals the cost of that marginal unit of the product into which labor does not enter. If the entrepreneurs choose to dispose of this gain by making it over to capitalists, the effect on price will be nil; and nothing short of presenting it to the public as a gratuity, by arbitrarily and unnecessarily throwing off something from the price of the whole supply, will cause the price to change. In short, total wages, or the rent of the whole force of social labor, bears the same relation to price as does the rent of land.

现在，假如有关土地及其产品的传统推理是正确的，那么相同的推理在这里也是正确的。货物的价格必须高到能够让企业家仅凭借这使用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本，而不是用劳动，就能创造出这一产品的边际部分。一如实际情况所示，借助于劳动，凭前几个单位的资本，以“较有利优势”下进行生产并不影响价格。因为那等于供给的边际单位的成本，而这个成本可溯及边际单位的资本。假如我们把诸如这样一种情况设想为拒领工资但是又继续工作的这样一支完整的劳动力队伍的话，那么，我们就得接受企业家把收益作为己有的这一结论。显

然，他们是无须把这部分收益转交公众的，既然按照价值规律的作用，他们可以从公众那里得到一个价格，而该价格又等于产品边际单位的成本。这里，价值与劳动无关。如果企业家决定把这笔收益转让给资本家，那么对价格的影响就是微不足道的；而如果就任意的、全无必要的削减总供给当中的某种因素，并作为某一种礼物转交给公众，那这就会引起价格的波动。总之，总工资或者整个社会劳动力的租金同地租一样，都与价格有关。

Real wages are the goods that labor itself, apart from capital, produces. These goods, like those which land produces, are a component in the supply of the goods and an element in price, although the question who gets them has no bearing on price. If real wages, or the distinct product of labor, were to grow smaller, the absolute value created in a year would become less, and the relative values of different commodities would be affected. A reduc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that labor makes to the output of different kinds of goods would, however, affect the supplies of the several kinds of goods unequally; since labor creates a certain part of the supply of (say) woollen cloth and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supply of steel. A horizontal shrinkage of wages, or of the product of labor, would cause the output of woollen cloth and of steel to contract unequally and would thus affect their relative values.

实际工资是除资本以外劳动所生产的物品。像土地所生产的产品一样，这些货物是整个货物供给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价格的一个要素，虽然谁得到他们这个问题与价格无关。如果实际工资或者劳动的独特产品变得越来越少，那么，人们一年中所创造的绝对价值就会随之变得越来越少，而且不同货物的相对价值也受影响。不过，劳动对各种不同货物的产量所做的贡献呈递减状态，这就会影响其他不同货物的供给。因为，例如，劳动创造棉布和劳动创造钢铁相比两者生产的部

分不同。。但如果工资水平降低或劳动产品量减少，这就会引起棉布、钢铁不同程度的减产，从而引起其相对价值。

Rent is always product—that is, the part of the total product that can be traced to a distinguishable agent of production. The statement that product is not an element in value is, then, obviously an absurdity; just as the assertion that any component element in product is not an element in value is an absurdity. We have just seen that a general shrinkage of the product of labor would reduce the product of different kinds of goods unevenly; for, since labor enters into the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unequal proportions, this would change relative values. For a similar reason, a shrinkage in the product of artificial capital would also have this effect. This capital enters in unlike proportions into the production of different kinds of goods; and if the whole product of it were to become less, the comparative quantities of different commodities in the market would be changed. Even the gross amount of every rent is an element in relative value; and the rent that is realized from any agent of production in a particular sub-group—or, in other words, the contribution that this agent makes to the product of the sub-group—is obviously an element in adjusting relative values. In this respect the rents of land, of artificial capital and of laborers are all alike. It would be absurd to assert, broadly and vaguely, that wages are not an element in price; and it is equally fallacious to say, in the same vague and sweeping way, that the rent of land is not such an element. These propositions are all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one principle. Rent is product; product controls values; the existence of any part of any product is important, as fixing the price of the product. But the question who gets this product is not thus important; and the destination of rent as an income is not, in this direct way, a factor in value.

租金总是产品——总产品中可溯及的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产品不是价值的一个要素一说显然是一种谬论，这正像断言产品的任何一个组成要素都不是价值的一个要素一样都是荒诞不经的。我们刚才指出，劳动的产品的某种全面缩减会使得各种不同产品的产量参差不齐的缩减。因为，既然劳动在各种不同的产业中所占的比例不同，因此，这些产品的相对价值就会自动改变。由于一个类似的原因，人为资本产品的缩减也会产生这种影响。这种资本在各种不同产品的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各种各样的，要是资本的产品量渐减少，则市场上各种货物的相对数量也就会改变。就连各种租金的总额也是相对价值的一个要素。某个小团体中的任何一个生产要素实现的租金，或者换句话说，该要素对该小团体的产品所做的贡献，显然是调节相对价值的一个要素。就这一点而论，地租、人工资本的租金以及劳动者的租金都是一样的。工资不是价格的一个要素，是如此笼统和含糊的结论是滑稽可笑的；而以同样含糊、同样总概括性的语言说地租不是这样的一个要素，这也同样让人啼笑皆非。这些论点都是一种规律的多种具体应用。地租是产品，产品控制价值，产品的任何一个部分的存在都决定该产品的价格，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谁获此产品的问题，却并非如此重要。地租作为一种收入的形式，它不是价值的直接要素。

The idea that different parts of a product can be created by an entrepreneur at greater or less advantage to himself, or at greater or less cost, is fallacious. It is entrepreneur's cost that figur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ermanent or “natural” adjustment of values: in a static state all things tend, in the long run, to sell for what they cost the entrepreneur. [23_2] To him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ether he hires one agent or another, or the two together; since he gets the same results for the same outlay in all cases. When he uses good land and gets a given amount of produce with very little labor, he is employing much of the first agent and relatively little of the second;

but he is virtually buying the product of the land at its market value, and he is buying the product of labor also at its value. Hiring an agent is buying the product of the agent, and the values of all parts of the same product are uniform. When the entrepreneur uses the poorest land and pays nothing for it, he is employing one real-paying agent instead of two; but he gets the produce at the same price per unit, neither more nor less. In a perfectly static state, in the case of any one commodity, cost is as uniform as is price.

一种产品的各组成部分，均可以由某个企业家按照自己带来的利益或是花费成本的多与少创造出来，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资本家的成本在连接永久调整和“自然”调整之间处于重要位置，在静态社会中，一切商品的价格总是接近企业家的成本。 [24_2] 对于企业家而言，他雇用这种要素还是另外一种，或者是两者都雇佣，这都在大体上没有关系。当他利用好的土地和用少量工人制造出一定数量产品时，他是在利用第一个要素，而用到相对少量的第二要素。他实际上是一土地的市场价值购入土地产品，同样也按职场价值购入劳动的产品。雇用一种要素等于购进该要素的产品，而同一产品的各部分价值都是同样的。当企业家用最贫瘠的土地隐而不必为之付出任何代价，他这是在雇用一种需要补偿的租金的要素，而并非两种要素;不过，这是按照相同的既不高也不低的单价获得此产品的。在一种完全静态的条件下，成本与价格一样，都是均一的。

The rent of any agent comes into existence in the hands of the entrepreneur, and it consists in the goods that the agent produces. The selling of the goods puts the rent into the form of money, but it is still in the entrepreneur's possession. When he pays this rent to the owner of the productive agent, rent becomes to the entrepreneur a cost. In a static state, all the entrepreneur's costs consist in such rent claims made on him by laborers and capitalists.

As rents created in the shop are products, and as rents received by owners of productive agents are incomes, so rents paid by entrepreneurs are costs. All rents are, at the proper stage of their existence, thus paid by entrepreneurs; and at this stage rents and costs are synonymous. Costs are then determinants of value. The broader statement is that rents are products, originally and fundamentally; that the quantities of products fix values; and that values, as thus fixed, influence the income that each specific industry, taken as a whole, can get. [23_3]

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租金都是在企业家掌握之下产生的，而且都是该生产要素所生产的货物组成部分。这些货物一经销售，租金固然是货币了，但还是归企业家所有。企业家像该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支付租金时，该租金就等于该企业家成本。在静态状况下，企业家的成本都是劳动者和资本家对他索取的租金。在工厂创造的租金是产品，而生产要素所有者收取的则是收入。所以，企业家所支付的租金就是成本。所有的租金都是企业家在租金产生后的适当时期支付的；而且正是在此阶段，成本和租金是同义词。于是，成本决定价值的要素。广泛的来说，究起源而论，租金本质上就是产品，决定价值的是产品的数量；而这样决定了的价值，影响每个产业所得的收入。 [24_3]

Note.—For the earliest statement of the theory advanced in this chapter the reader is referred to an extended supplementary net, in a monograph on The Possibility of a Scientific Law of Wages,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March, 1889. At the same date there appeared, in Professor Wieser's work on Natural Value (Chapter XII), an argument maintaining that the part of rent that is not differential, but general, is an element in price making; while even the differential portion may be such an element, provided the land that earns this income is devoted to

“secondary or derivative” uses. In Professor Marshall's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Book V, Chapter VIII), it is shown that, by reason of the competition of different agricultural uses of land with each other, the amount of land devoted to a particular crop may be limited, the supply of that kind of produce may be reduced and the price may be influenced by this limitation of the supply. The reader will see that in the argument presented in the present work the contention is made that all rents, even though they may be reduced to differential quantities, are essentially contributions to the supply of goods and elements in the determining of values, and also that all the rents that have been enumerated are, in this respect, on a parity.

注解：对本章所提出的这个理论做最早的阐述，读者可以参阅美国经济联合会于1889年3月出版的一本专题论著《科学的工资规律的可能性》。在同一时期，维塞尔教授的著作《自然价值论》（第十二章）似是有一个论点断言这个论点人为凡是租金的普通部分，而不是差异部分，都是决定价格的要素。只要赚得这个收入的土地是放在“次等的或从属的”用途，甚至差异的部分也可能是这种要素。在马歇尔教授中的《经济学规律》（第五卷，第八章）中，由于存在各种不同的农业土地利用上的相互竞争，而专供某种作物利用的土地数量或许有限，因此那种产品的供给数量也会随之减少，而价格或许会受供给的这一限制因素的影响。读者会意识到，按本书所提的论点，所有地租尽管已转换成级差地租了，但实际上它还是会对货物的供给有一定的贡献，同时也是决定价值的要素。另外，上述已经列举过的所有租金，就这一点而言，所有都是相同的，而且经过计量所有的地租也都是相等的。

In a work on the Theory of Wages, by Mr. Herbert M. Thompson, published in 1892, the view is maintained that rents “in

the aggregate" are elements that enter into the expenses of production, as do wages, profits, and interest considered as aggregates, and that "the analogy which subsists between land and other agents of production is a very close one." This theory has a near kinship with the one here advanced.

赫伯特M汤普森先生1892年出版的《工资理论》一书中所持的论点是，租金的总额像工资、利润和利息一样，同样是生产成本的要素。并且指出"在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该理论与这里提到的理论是相似的。

In Part III, Chapter IV, of his work on Principles of Social Economics, Mr. George Gunton criticises on quite different grounds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the relation of rent to prices.

乔治哥顿先生在所著的《社会经济学原理》的第三部分第四章中，根据完全不同的理由，对地租与价格的关系的那种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In connection with all early discussions of rent, and particularly with that of Ricardo, it is to be recalled that at the time when they appear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tatics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subject was not consciously drawn by any one. The impulse to study rent came from a dynamic fact—namely, the increasing density of popul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cost of food products that is traceable to the action of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in agriculture. It was to be expected that a writer of that period, in presenting the standard to which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 single

year rent tends to conform—which is a static subject—would be led to make incursions into dynamic territory. These are wholly admissible, when they are made for the purpose of showing how a static adjustment is brought about. We explain the forces that keep the surface of a pool of water level by showing what movements would bring the surface to the level, if the waters were injected into the pool in irregular fashion and in a way to make the surface originally uneven. References like this to dynamic economic forces are needed in explaining the adjustments of the industrial groups and of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and they are equally in order in explaining ground rent, when that is singled out as a special and unique product. It is to be recalled, however, that the mode of treatment that merges statics and dynamics, without making a consciou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must result in giving a formula for measuring rent that, if it were applied without amendment in dynamic conditions, would give a result either larger or smaller than the actual returns that accrue from the use of land. When society is in the midst of the disturbances that inventions, migration, and a comprehensive reorganization of the business world create, what is actually gained by the use of a piece of land often contains theoretical static rent, with an element of entrepreneur's profit added or a loss deducted. It is prospective profit that lures entrepreneurs to the occupation of wholly new areas of ground, and a rigorous application of an economic test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determine how much of the composite gain is true rent. Moreover, the conditions afforded by such a dynamic state make the Ricardian formula, which gives a correct measure of rent in a static state, inadequate for making each a separation of the composite income and isolating rent from all admixtures. For the scientific isolating and measuring of rent in a dynamic society, we need, first, a formula that is akin to the one used by Ricardo and, secondly, a further formula that will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rent that the Ricardian formula directly affords and a different rent, strictly static, toward which actual rent is tending. The discussion of the dynamics of rent must, however, be reserved for a later volume.

在差不多所有早期的有关地租的讨论、尤其是与李嘉图进行的讨论方面,可以想起来的是，这些讨论出现时，没有一个人是有意识的对该主题的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做出区分。研究地租这种突然的愿望源自于一种动态的事实——人口的递增密度和可归因于农业报酬递减规律所导致的食品成本的递增。那个时候一位学者提出的在一年的时间内地租趋向于与之一致的一种标准——一个静态论题——当会被引向动态领域。这些，当它是为表明某种静态调整如何引起时，它是完全可取的。当我们在解释那些水平面保持平坦的力量的时候，指出当水不规则地注入池中，使水面变得高低不平的状态，这时是由什么力量来使水面变为平坦。像这样将动态经济力量引入，来解释产业团体、价值、工资和利息的调整时都非常的需要，而当地租被单独作为一个特殊产品讨论时，情形也相同。不过要记住，静态和动态兼顾的那种论述方式，如果不对两者做出有意识的区别的话，那么，这将导致计量低阻的公式在不加修改情况下就应用于动态条件，那其所得的结果就势必不是大于就是小于得自土地利用的实际收益了。当社会处于发明、人口迁移及工商界全面改组引起的混乱的时候，利用某片土地实际上得到的收入，常常包含理论上的静态的地租，即包含企业家的利润或亏损。吸引企业家投身新领域的是预期利润，经济测试的严格应用，则是指在确定综合收益中有多少是纯粹地租。此外，这样一种动态状况所提供的条件，使李嘉图理论中的那个公式不适用于分析综合所得的利益，以及从一切混合利益中分离出来的地租。为使某种动态社会条件下的地租得以实现科学的分离和计量，我们首先就需要类似于李嘉图的那样一种公式；其次还得要有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应该是能解释李嘉图公式直接导出的那种理论地租，以一种不同的严格静态的实际地租有趋于一致的可能性的地租之间的差别的。不过，有关地租动态的这种讨论，就留在另一部著作来讨论吧。

[23_1].The hypothesis that comes nearest to annihilating rent is one that makes all land free, and allows laborers and capitalists to resort to all parts of it at their pleasure. Thus, if ten men wished to cultivate an acre of very productive land, they might de it; and if an eleventh man chose to add himself to their number, he would be admitted. Such an arrangement would be practically impossible; and, in mere theory, the effect of it would be to reduce rent, by causing an unnatural crowding of good land, and to scatter, what rent remained in a pro rata fashion among laborers and capitalists. It would, incidentally, cause the relative amounts of goods produced to vary from the present relative amounts; and so it would affect comparative prices. It would also reduce the absolute quantity of value produced.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subject, see an article on Marshall's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in th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for March, 1891.

[23_2].Final utility is, of course, the determinant of value; but, by changes in the comparative amounts of different articles, those which have equal costs, in the sense here defined, come to have equal final utilities and market values.

[23_3].Total rent is total supply and is one determinant of value. Value is the determinant of group distribution; but, as we have seen, group distribution tends to adjust itself so as to annihilate profits and insure uniformity in wages and interest. The tendency of labor and capital to uniformity of productive power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of these facts.

[24_1].最容易免除租金的一个假说就是使所有土地都是免租金的，并允许劳动者和资本家利用他们所喜欢的土地的那一部分赚钱。假如十个人想要一块多产的土地去种植，他们可能会同意这个想法；如果第十一个人选择加入进来，他也会被吸纳进去。这种安排几乎是不可能的；仅仅是理论上来说，这件事情使得好地拥挤不堪从而减少地租，并且，分散剩下的土地保留在劳动者核资本家手中。顺便说一句，导致已经生产了的相对数量的产品不同于现在生产的相对数量的产品；所以，这会影响相对价格。这将会减少生产价值的绝对数量。"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请参阅1891年3月的《政治科学季刊》中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24_2].当然，最后的效用就是价值的决定因素；但是，通过改变不同物品的相对数量，那些产品拥有相同的成本会有相同的最终效用和市场价值。成本便是按照这个定义来说的。

[24_3].总地租就是总供应量还是价值的一个决定因素。价值就是团体分配的决定因素；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产业群分配趋于进行自身调整，以至消除利润，并确保工资和利息的统一。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趋于一致的事实，这是最基本的事实。

Chapter XXIV The Unit for measuring Industrial Agents and their Products

第二十四章 衡量产业因素与其产品的单位

We are ready for the supplying of the last detail that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ke the statement of the law of wages and interest intelligible. There is before us the picture of social labor coöperating with social capital. Both ar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and their earnings are fixed by the productivity of their final units. The labor in the case is a permanent force, and the capital is a permanent fund. Each exists in an endless succession of concrete forms, which change whenever the quantity of either agent changes. Particular increments of capital consist in distinguishable elements in concrete instruments, rather than in particular instruments in their entirety. Both capital and labor have to be apportioned, by a nice adjustment, among all the groups and sub-groups of society, if either value, wages or interest is to be normal. Every separate increment of labor and capital has to be apportioned in the same way and by the same play of forces. Wages, then, conform to the product of the final increment of social labor and interest to the product of the final increment of social capital. Both of these incomes may be translated into the form of rents of concrete producers; and these, like all products, are elements in determining values.

为使工资和利息规律明白易懂，我们提出最后一个但又十分必要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社会劳动与资本相互合作的景象。这两者都受到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各自的收益都取决于最后一个单位的生产

力。这里所指的的劳动是一种永久要素，而资本则是一种永久的资金。两者都是一连续不断的具体形式而存在，而不论哪一个生产要素的数量发生变化，则这具体形式也会改变。资本的特有增量包含在可辨别的具体工具的因素之中，而不是在工具整体当中。资本和劳动通过某种细致的调节在社会范围内的各个团体和小团体中得以分配，而前提是价值、工资和利息都正常的情况下。劳动和资本各自的每一个增量，都必须按照同样的方式借助同一势力作用加以分配。这样，工资与社会劳动的最终产品增量便会相一致，而利息与社会资本的最终增量也会相一致。这两种收益都可以转换为具体生产者的租金形式，而且工资和利息跟所有的产品都一样是决定价值的因素。

This statement will be complete enough to reveal all the general and essential facts of distribution, when we know how we may measure labor, capital and their products. But we need, evidently, a universally usable measure of values.

照此说法，只要懂得如何计量劳动和资本及其产品，那么，这一论述足以揭露分配的一般事实与主要事实。但是，我们显然还得有普遍适用的价值计量尺度才行。

In the statement of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as applied to capital, it was said that the successive units of capital produce less and less. Provisionally, the “doses” of capital are measured in terms of money; [24_1] but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exactly what the money ultimately represents. When, in our illustration, it is assumed that the capital of a society increases from ten thousand dollars to a million, does this mean, at bottom, that the capital comes to represent a hundred times as much labor as it did before or a hundred times as much personal sacrifice? If it means either of

these things,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find some way in which to express a measurement of labor or of sacrifice.

在应用于资本的报酬递减规律这一说法中，每个单位的资本产量依次递减。暂时不妨就依据货币计量资本，[25_1] 不过，货币最终体现什么最终还得予以确切了解。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假设一个社会的资本由一万美元增至一百万美元时，这是指资本所体现的是较过去的劳动相比多了一百倍呢，还是个人所付出的代价较过去相比多了一百倍呢？如果两者均体现了，那也还得设法寻找衡量劳动与代价的方法。

Moreover, when what we are measuring is social capital and the social product, it is clear that we must have some unit that will give us absolute sums. In a way, the capital of a group might be measured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capital of another group; but this process would never give us the total capital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system. So, also, might the product of one group be compared with the product of another; but that would yield no sum total of products. Interest is a ratio between the sum of the products of all the separate capitals and the sum of the capitals themselves. For these purposes,—and for more than it is now necessary to enumerate,—a universal unit for measuring economic values is necessary, if the law of final productivity is to have scientific exactness.

另外，如果我们既计量社会资本又计量社会生产量，那么，显然还取得一个能求得绝对数目的单位。从某一点看，一个团体的资本的衡量，可以通过与另一个团体的资本相比较得到，但是这一过程无法得出整个产业系统的总资本。同样，衡量一个团体的生产量就要和另

一个团体的生产量相比较，但这也无法得出生产量的总数。利息是所有个别资本的产品量的总额与资本本身的总数的比率。考虑到这种情况以及比现在例举的更多用途，要使最终生产率的规律具有科学精确性，那么急需能够衡量经济价值的一般单位。

The entire study of wealth is, indeed, meaningless unless there be a unit for measuring it; for the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are quantitative. How great is the wealth of a nation? Such inquiries demand that the thing which is studied shall be measured in units of some kind and that the result shall be stated as an absolute amount. Mere reciprocal comparisons give no sums. The commodity A may be regularly exchanged in the market for B, and the two together for C; but that fact gives us no intimation as to the total value of the three. Ratios of exchange alone afford no answer to the economist's chief inquiries.

如果财富没有一个衡量的单位，那么所有的财富研究都毫无意义，因为完全是数量方面的问题。一个国家的财富有多少？如此询问的回答，就需要在研究中有一个衡量的单位，从而才能得到一个绝对数值作为研究结果。仅作相互比较得不出总额。货物A一般在市场上与货物B交换，两者相加又可以与货物C进行交换，但这一事实无法是我们获得三者的总价值。单凭交换比率得不出经济学家想要的那种答案。

The actual wealth of a community consists in heterogeneous things. If they are ever added together, it must be because there is some one element present in all of them and this element is absolutely measured. Thus, unlike things can be weighed and their total weight can be stated in a sum, because they all gravitate

toward the earth and exert a force on whatever resists their movement. A unit of weight may, therefore, be applied successively to many such apparently unlike things, in order to measure one element common to all of them. In like manner, there is one element that is common to all the diverse things that appear in the inventory of social wealth. In every commodity there is a power of a certain kind which can be measured.

一个社会的实际财富由耕种各样的物品构成。如果这些物品能加在一起，那也必然是由于各种物品都包含有一个共同的要素，而该要素是可以衡量的。例如，不同的东西可以称重量，而其总重量可以用一个总数予以表述，因为它们都受地心引力吸引，且对阻碍其运动的一切都施加一种力。因此，不同的物品可以用一个重量单位，来衡量它们中所具有的同一的要素。无独有偶，社会财富存货总值中，也有一个为一切不同物品所共有的要素。就是每一个货物都有可以衡量的因素。

Amounts of wealth are usually stated in money: thus, we say a man is “worth a million dollars.” This, however, does not mean merely that he could sell all he has for a million of our bulky silver coins. The thought in the minds of the men who use money as a standard of value runs forward to the power that resides in the coins. They will buy goods or they will set men working. There resides in each one of them a certain amount of influence on human well-being. The rich man in the illustration wields a power of this kind, and it is a million times as great as that which resides in one of the coins. The intuitions that are at the basis of this popular mode of speech are nearer to absolute truth than much of economic analysis. They discern a power of things over men, lay hold of an available unit of that power, apply it to the diverse goods and state

the measurement in a sum. [24_2]

财富总量通常是以货币加以表述的。例如，我们说某人的财富是一百万美元。这并不只是说他可以按百万银币的高价出售他所拥有的一切。这些以货币作为价值标准的人，心中所想的都是银币中所含有的力量。这些银币可以用于购物或者雇人干活。每一枚银币对人类的幸福都有一定的影响。上述例子中的那位富豪就是重权在握，而这一力量之大，正好等于每一枚银币所具有的力量的一百万倍。与很多经济分析相比，这些通俗说法所根据的直觉较接近真理。他们发现物品对人的控制，并把这种力量的单位用于不同物品，并用一个总数来表明衡量结果。 [25_2]

Effective utility is the name by which this potency of goods will here be designated. It is the power that a particular unit of a commodity has to change the status of its possessor and to promote him in the scale of well-being. Give to a man a barrel of flour and you make him by so much better off. You do not save him from starvation, though he may live for a time on the food that you furnish. If you had not given him the flour, he would have got it by some sacrifice; and what you have done is, in effect, to save him from the sacrifice. This effect measures the value of the flour. Take away a barrel of flour that the man now has, estimate the real detriment that he suffers, and you measure the effective utility in another way. He must have food and will get it by a sacrifice of some kind. He may not fully replace the loss of the flour; for he may live on maize, and in that case the utility of the barrel of flour is gauged by the cost of the maize and the unsatisfied want of a better quality of food.

我们现在把物品的这种力量叫做实际效用。这种力量就是一种物品的某一个单位所具有的改变其所有者的地位，进而提升他的幸福。给一个人一桶面粉就会使他的生活宽裕多了。虽然没有救助他使他免于挨饿，但是他可以靠人们给的事物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如果人们没有给他这些面粉，那他只要付出一定代价，面粉他还是会有的；而实际上人们所做的就是使他免于付出代价。这一结果衡量了面粉的价值。拿走这个人现在所拥有的一桶面粉，再估计一下他遭受的损失，我们这是再换种方式衡量实际效用。他一定要得到事物，而且在付出代价后他会得到。他未必能完全弥补失去的那一桶面粉，尽管它可以靠玉米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那桶面粉的效用就得按玉米的成本以及未得满足的程度予以衡量。

It will appear that this power of substituting one thing for another, in repairing the injury caused by the loss of that other thing, plays a very comprehensive part in determining values. In the case of many articles the substitute resorted to is quite different in kind from the thing that it replaces. Having parted with one means of well-being, the man proceeds, as best he can, to make himself as well off generally as he was before. If he is to gauge the real importance to himself of a particular saddle horse, he may, perhaps, do it by ascertaining how many hours he must work in order to get enough in the way of boats, guns or a tennis outfit, etc., to afford as much pleasure, as he can get from the horse. The mental process in the case is, first, a balancing of one pleasure as against another and, secondly, a measuring of the substituted pleasure by its cost. By the two operations the owner of the horse determines how much it is effectively worth to him. The final measure in the case is one of pain; for the ultimate injury that is done to a man by depriving him of any one means of pleasure, resolves itself into putting him under the necessity of enduring a certain amount of personal sacrifice in the effort to secure something that will effectually replace it.

在弥补有另一种东西的丧失所带来的损害上，以一种东西代替另一种东西的这种能力，在决定价值上发挥着某种非常广泛的作用，这一点就会变得明显起来。就多种物品来说，所采用的那种替代产品，在本质上，都是有别与他所代替的那种物品的。某种享受已经丧失，那么人们也就只得尽力使自己过上与过去一样的生活。要判定有那么一匹马对某人来说有多重要。他或许就得弄清楚他必须工作多少个小时，才能凭借船、枪或网球用品等等，使他从中得到的快乐与他因有这匹马而得到的快乐一样多。此例中的心理过程，首先是对一种乐趣与另一种乐趣加以权衡的过程；其次则是按成本计量被代替了的那种乐趣。通过这两个心里作用，马的所有者才能确定这匹马对他来说实际价值是多少。此例中的最后衡量的是付出的代价，因为夺去一个人的享受，使他受到最终的伤害，他才会付出一定的代价，谋取一种享受，代替失去了的那种享受。

It is this process, in which men are continually engaged, of determining how important it is to have one thing by ascertaining how much it will cost to get a very different thing, that reveals on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a study of effective utility. Men pursue happiness in the generic, and the form in which it may come is secondary. The measurement of well-being, thus regarded in the abstract, is an occult but dominant fact in exchanges. A man may have a monopoly of one means of promoting happiness, yet he cannot set his own price for his wares. That is fixed by the cost entailed on the community by the effort to secure, by any means whatever, an equal quantity of happiness. With many possible ladders to Elysium, the toll for the use of one is limited. Effective utility, whatever be its form, is measured in the market in a purely quantitative way.

就是在这样一个人们不断经历的过程中，人们通过确认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付出的代价，来衡量一个物品的重要性。从而揭示了研究实际效用的特殊意义。人们追逐的是一般幸福，而体现幸福的那种形式倒其次。对抽象意义上的幸福的衡量，是人们交往中神秘的但又重要的事实。有的人或许独自拥有某种增进幸福的方法，但他就连他想购买的货物也无从给定一个价格。为了得到同等的享受所要付出的代价，其决定价格，而不是所用到的方法。尽管到达乐园的方法可能有很多，但是获得方法的代价是有限的。实际效用，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是以纯粹量化的方法在市场上进行衡量。

It is measured by society, as a whole; and in this li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hrase, “measure of effective social utility,” which, in earlier studies by the present writer, has been used as a synonym of value. It was on the word “social” that emphasis was laid. The price of a thing gauges its importance, not to one man, but to all men, as organical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 efficient serving power of an article varies in the case of different individual users, but to society as a whole it is constant. A civilized man is a specialist. He produces unit after unit of one kind of product and hands them over to society. Into the mysteries of distinctly social psychology, therefore, the measuring process that gauges value must be traced. Essentially simple in nature is the operation—simpler even than the act of the man who decides how important a horse is to himself by seeing how long he must work to get a boat and a tennis outfit.

实际效用是由整个社会进行衡量。“实际社会效用的衡量”这一说法的重要性，本书作者在过去的研究中就该词曾作为价值的同义词使用过。这里要强调的是“社会的”一词。某种东西的价格衡量其重要性不是对因于一个人，而是对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的人。

一种物品有效的服务能力，在使用者看来，是因人而异的，但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说，则始终如一。文明人是专家。某种产品他逐个单位生产，然后交给社会。因此，判定价值的衡量过程必须从独特的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追寻。总而言之，简单的是交易——这比确定一匹马对自己来说有多重要的单个人的行为还要简单，他只要弄清楚他必须工作多久，一艘船或网球用品需要工作多久才能买得起一匹马。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now necessary to give definiteness of meaning to the word “social.”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a unit of social improvement or detriment. It happens, however, that the detriment is more available for measuring purposes than is the improvement; and so the final unit of value is the sacrifice entailed by a quantity of distinctly social labor. Society, in short, sets value upon a thing by ascertaining how much work is necessary to replace it or to get an equivalent for it.

就这一点而言，“社会的”这个词的意思现在必须给予限定了。有一个单位对社会改善或损害进行衡量。社会损失的衡量比社会改善的衡量更有价值，因此，最终单位的价值是一定量各不相同的社会所付出的成本代价。总之，社会决定某种东西的价值。通过做多少工作才能取代它或获得与之等值的某种东西。

In its simplest form, division of labor means that one kind of commodity is carried to completion by one man. He is a specialist, to the extent of being a maker of entire shoes, or clocks, or tables. Working on raw material taken from nature, he hands it over to the community in condition for final use. But the differentiating of labor has, of course, gone far beyond the point where any man begins the making of a thing and completes it. Most work is now

done by highly complex groups, and the individual's function is limited to a minute but distinguishable part of the operation. The principle that we are studying is, however, not affected by this fact; and we may gain clearness by first examining a society of a more primitive type, in which it may be assumed that whole articles are made by individual workers. As such goods leave the maker's hands day after day, in a continuous supply, they seek purchasers. No one man will take many, but society will take them all. We may even assume, without vitiating the principle to be studied, that every man in the community takes at least one. That each class of goods is made in great numbers by one man and consumed singly by many men, is the essential thing to be noted.

就其最简单的形式来说，分工意就是某种产品的生产从开始到结束就有一个人来完成。这样来说，这个制作一双鞋、一座钟或者是一张桌子的生产者就是一位专家。取自自然界的原料经过他的加工随即变成成品形式，然后把它交付给社会供最终消费者使用。不过，劳动的分工化当然是远胜于一个人独自完成一个产品。现在大多数工作都是有高度复杂的团体完成了，每个人的工作都仅限于很窄的范围内但又可辨别出来。不过，我们正在研究的原则不受这一事实影响，而是我们还要考察一种更为原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任何一个产品都可以认均由有一人制成。这些物品一天一天离开生产这只手呈源源不断供给的事态时，他们必须有购买者。尽管单个人一次不会买很多，但社会会按照数量收购。我们甚至假定，社会的每一份成员都至少会购买一件，也会影响所研究的原则。每一类货物都有一个人大量制作，然后又逐个单个地为很多人所消费，这是必须指出的重要事实。

It is the users of an article who can best gauge the well-being that it gives them, and they make the estimate continually. Shall I buy this article? Will the paying for it trench on my income and

make me go without something that is of greater importance? Is this article or some other of equal cost the more desirable? Such comparisons of services rendered by different articles are going on in the minds of the many consumers who constitute the purchasing public. These comparisons alone give us only rude ratios, not sums; and the ratios are different in the case of all the different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If each man could measure the usefulness of an article by the effort that it costs him to get it, and if he could attain a fixed unit of effort, he could state the utility of a number of different articles in a sum total. Similarly, if all society acts in reality as one man, it makes such measurements of all commodities, and the trouble arising from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many measurers disappears. A market secures this result, for society acts as a unit—like an individual buyer.

能最好判别一种物品给予使用者的那种满足的是使用着自己吗，他们是连续对物品使用的满足作出估计的人。我要买这个物品吗？为了买它，我要付出我的收入，甚至使我无法买更重要的东西吗？这个货物与另一个相比成本相同，哪个更需吗？各种物品提供的效用上的此类比较，在很多消费者心中都不时的进行着，他们这就构成了购买公众。仅是此类比较，我们从中得到的粗略比率而已，而不是总数，比率随着人群不同而异。如果每个人都通过付出的代价来衡量一件物品，假定他能达到固定单位，那么，他就能以一个总额说明多种不同货物的效用。类似地，如果全社会实际上都像一个人那样起作用，且对所有货物都做这样的计量，那么许多衡量物品的人的麻烦也会不存在。有市场的存在确保这一结果不至于出现的危险，因为社会作为一个单位而起作用，就像单个买主那样。

In measuring well-being human sensibility is under a limitation which is akin to that under which the eye finds itself in measuring

light. It is possible to pronounce two lights equal; but it is not possible to tell, by the mere effect on the eye, how much brighter one light is than another. It is possible to say that two pleasures are equal, but not to say that one is just twice as great as the other. It is, however, practicable to determine when a pain and a pleasure offset each other; and if we can compare many kinds of pleasure with one kind of pain, we can, as a result, both compare pleasures with each other and obtain a sum total of many different ones. If a man knows that he would walk a mile for one gratification, and that he would do this twice over for another, he has the means of knowing that the good afforded by the second is twice as great as that afforded by the first, and that the gain insured by the two together is an offset for three walks of a mile each. Something like this society does, but it does not do it thus crudely.

衡量幸福时，人们的敏感性是有限的，就像眼睛测度光的强弱时能力是有限的一样。说两种光相同，这可能做到，然而，仅靠光对眼睛的作用，这就无法分辨一种光比一种光强多少。说两种愉快相同，这可以做到，然而，无法说出一种喜悦是另一种的两倍。但是，要是我们可以拿多种愉快与一种痛可抵消，那么，两者相互比较以后就可获得多种不同愉快的一个总数。假如一个人知道为了获得一种满足他可以步行上一英里，而且可以再步行两次，他了解第二次不行所带来的好处是第一次的两倍那么多，而这两次所得的好处，是对每次一英里共步行三次的辛劳的补偿。类似这样的事是社会所做的，不过，它没有做得如此不成熟。

At the beginning of an attempt to measure wealth by labor, whatever be the method adopted, there presents itself the difficulty that wealth is created by work aided by instruments. There is capital in the case, and this is the fruit of a sacrifice termed

abstinence. None of our material comforts are brought into existence merely by the unaided efforts of laborers. This difficulty may be surmounted by taking marginal labor as the test of cost. Let the capital of an establishment remain exactly as large as it is, but introduce a small supply of extra labor, and whatever of product is created by the addition is virtually due to labor only. A part of the supply of every article that is put upon the market may be said to be traceable to the presence of a final increment of work. Take a man or two out of each of the shops that produce this article, leaving the capital unchanged, and this increment of the product will cease to be created. Restore the men, but make no other change, and this marginal part of the product will reappear. This virtually unaided labor is the only kind that can measure values. Attempts to use labor standards have come short of success, because of their failure to isolate from capital the labor to which products are due. As earlier chapters of this book have shown, the product of marginal work is the virtual product of all work; and this fact enables us to disentangle all labor from the capital it uses, and to find what part of the entire product of the industry is distinctly traceable to it.

设法衡量劳动创造的财富之初，不论采用什么方法，都表明有工作借助工具创造财富这一难题。而资本乃成为节制的代价。物质享受无一仅由劳动者徒手促成。这一困难，就以边际劳动作为检验成本的标准即可化解。假设一家企业的资本规模不变，而劳动的供给稍增，那么，此时不论增产多少，实际上都可归因于劳动在起作用。投放市场的每一种产品的供给量中，都有一部分可以说成是可溯及工作的最后一个增量的。生产此种产品的每一个工厂都减少了一两个人，而资本依旧，此时，产品就不会再出现增量了。劳动者回到工厂，其余一切依旧，此时，就会重新出现产品的边际部分。这个实际上徒手工作的劳动者就是可衡量价值的唯一要素。适用劳动标准的种种尝试所以

很少有成功的，就由于这种标准未能资本中剥离出劳动，而产品是应归因于劳动的。有此事实，边际劳动的生产量实际上是所有劳动的生产量。我们就能够分清所有劳动以及劳动所用的资本，且发现该行业全部产品中有哪一部分可归因于资本。

Work, moreover, consists of concrete acts of men; and these are as unlike in themselves as are the miscellaneous articles that are to be measured by them. Can we make one sum of the labor involved in cutting wood, in playing violins, in setting type, etc.? Adding the unlike acts that constitute social labor is, it appears, as difficult as adding the products that constitute social wealth. There is need of a pervasive element in the actions, and one that can be measured. Such an element can be found; for, as utility is common to all commodities, so personal sacrifice is common to all varieties of labor. There is service rendered to man, on the one hand, and there is burden imposed upon him, on the other. Social self-service—the act of mankind ministering to its own needs—constitutes the whole economic process. Man works on nature to make it useful, and experiences a painful reaction in his own person during the process. Improved nature then works on man, the consumer, and has a counterbalancing and favorable action upon him. If we can find the point at which the unfavorable reaction exactly counterbalances and measures the favorable one, we can then estimate pleasure in terms of pain.

此外，工作有人们的具体行为构成，而这些行为本身就像他们要予以衡量的各种产品那样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能就参与伐木、拉小提琴、排字等的劳动得出一个总数吗？给构成社会劳动的各不相同的行为加总，似是无异于给构成财富值各种产品加总一样，都是难以做到的。构成劳动的具体行为中需有某种普遍的因素，而且是可以衡量

的。这样一个因素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就像效用对所有货物都通用一样，个人的牺牲也对各种劳动都是通用的。一方面，人人都获得服务，另一方面人人又都因此而承受负担。社会自助——人类满足自己需要的行为——构成整个经济过程。人类作用于自然使之有用，且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劳动的痛苦。经改造的自然反过来有作用于人类即消费者，且于消费者产生某种补偿性的和有利的作用。那么，如果我们能使得代价和享受相等，并且可以衡量享受的程度，那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就可以来衡量享受。

Work becomes more costly to the man who performs it, as the hours of the day succeed each other. The burden of it is at first light, but becomes heavy. Burdensome to a nearly insupportable degree it becomes in the afternoon or evening hours of the really struggling members of the “submerged tenth” of society, while it is lighter at the end of the day's work of higher grade. In all cases, however, it is the later hours that burden the laborer and test his willingness to continue in the shop. He may work for two hours with pleasure, for four with cheerfulness, for eight with submission, and for ten with incipient rebellion.

随着每天一小时接一小时地转瞬即逝，这对工人而言，要工作就要付出高代价。工作负担一开始是轻的，但后来就慢慢变得沉重了。社会的“陷于贫困的十分之一”的那些人，他们到了下午或者晚上，其工作制疲劳度达到了几乎难以承受的程度，而级别高一些的工人则相对会轻松一些。不过，无论如何，决定劳动者是否继续愿意延长工作日是一天工作中的最后几个小时。他可能心情愉快地工作两个小时，也可能四个小时还没有疲倦感，八个小时尚有些勉强，而到十个小时劳动者就要反抗了。

The actual number of hours spent in labor in a highly organized society is, of course, not left wholly to the choice of the individual. When working in companies, there is an advantage in beginning and ending together. The principle that determines the length of the normal working day operates, however, in spite of this fact; and it may be revealed by a study of simpler conditions. We will, then, for the moment forget that gangs of men are tied to the steam whistle.

当然，在一种组织化程度高的社会，花在劳动上的十几小时数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当大家在一起工作，可以一起开始工作，一起结束工作。不过，尽管有这个事实，决定正常工作日长度的原则还是起作用的；而且，有关还要简单化的条件的一项研究或许就能揭示这一点。因此，我们暂且不谈听命于汽笛来决定工作时间的劳动者的酸甜苦辣。

An isolated worker is the user of his own products, and he naturally works each day till it does not pay to work longer. Additional product might be gained by prolonging the toil, but the advantage of having it could not compensate for the sacrifice of making it. The man is already tired, and he feels the confinement of his occupation. He wants both rest and freedom. Nature is luring him from the shop, and the comforts of his home are calling to him. His normal work-day ends when these calls have their way, and this occurs at the mordent when the gains and the losses of production are equal.

某个劳动者他是自己的产品的使用者，因此，他自然是每天要工作到不付酬的哪个时点为止的。延长时间自然能得多一点产品，但得

到的那点产品的好处无法补偿产生该产品时付出的艰辛。此时，人已经疲乏，他感到那份工作的沉重负担。他需要休息，想摆脱负担。他想要离开工厂，回到舒服的家中。他正常的工作日结束，当报酬等于所付出的代价时，他会停下自己的工作。

The gains that are due to the successive hours of labor diminish from the first onward, and the last product the man secures is the least useful of all. If he can work but one hour, he will create that of which the type is food, the life-sustaining things for daily use. If he adds a second hour, it will be spent in getting what still rates as a necessity. With more time available, he will add comforts to his list; and he may end with a positive luxury. In any case, it is the least of his gains for which he works last and hardest. Left to himself and nature, he must work during a part of the day to sustain life and he must refrain from working during a part of it for the same reason. Between the point of no-work, at which he would starve, and that of nothing-but-work, at which he would die from exhaustion, there is the point of balanced gain and loss. If he stops just there, the net gain from labor is at its greatest.

归因于连续几个小时的劳动的收益，从一开始起就是一直递减，而人们获得的最后一个产品乃是所有产品中效用最小的产品。如果他再延长工作一小时，他就会生产出食品一类的产品，这些产品是维持生命的日用品。要是他在延长工作一小时，这个小时就是专门生产必需品的了。要是再有时间，他就要给他生产的那些产品增加令人舒服的一类因素了。他最后生产的当然是奢侈品了，而且是无可怀疑的奢侈品。无论如何，这是他收益中贡献最小的一种产品，是他最后而且也是下苦功夫最多的一类产品。从维持生命及健康出发，他每天还必须工作一段时间以维持生活，同时，还必须留出一定时间以供休息。在他没有工作的饥饿至死就与他整天工作会死于精疲力竭之间有一个

平衡点，而在这个平衡点上，他所付出的代价和所得的收益正好相等。假如在这里他停止工作了，那他的劳动的净收益就处于最高点了。

In determining whether it will pay to prolong work for an eleventh hour during each day of the year, the man goes through that balancing of one pleasure against another and that balancing of each pleasure against fatiguing work to which attention has been called. For the final hours of all days in a year the man will get a miscellaneous list of pleasures, and will decide whether the sum total of them offsets the sacrifice of almost three hundred final hours of labor. This is a difficult decision, but the man will make it; and in doing so, he will get a unit of final utility in terms of equivalent pain. We pursue no farther the analysis of the method by which, in the individual mind, it is decided whether it will pay to work eleven hours a day. We are safe in assuming that the man arrives at a judgment on this point. What we now wish to know is how society arrives at this judgment. Individual psychology is not a subject of our investigations; but the manner in which a psychological process in the individual gives a social result is distinctly included in our field of study.

在决定一年中把工作时间延长为每天十一个小时是否划算时，这位劳动者总是对一种愉快和另一种愉快进行比较，并且把享受和工作的劳累相权衡。就全年每一天最后的几个工作小时来说，这位劳动者会得到各种各样的一串的令人愉快的事，他还要考虑这种种令人心旷神怡的事结合在一起，是否就补偿得了他工作三百多个小时所付出的代价。这是一种困难的抉择，但他要作这一抉择。他这样做时会得到从等量痛苦方面来说得到最后一个效用单位。我们不继续分析采用个人内心的想法的方法，决定一天工作十一个小时是否划算。我们现在

假设这个人会得出正确的判断。下一步我们还想知道社会是怎么判断的。个人的心理不是是这一研究的主题，但其中的心理过程如何导致某种社会结果，这显然也是我们的研究领域。

If the duration of a working-day is measured on a horizontal line, and the gains and the sacrifices entailed by it are measured by vertical distances from that line, we may make a simple figure that represents the facts concerning a free and isolated laborer.

假如以一条水平线计量一个工作日的长度，而该工作日必须达到的所获得的利益与所付出的代价进行衡量，我们可以画一个简单的图，用于表示自由的和孤立的工人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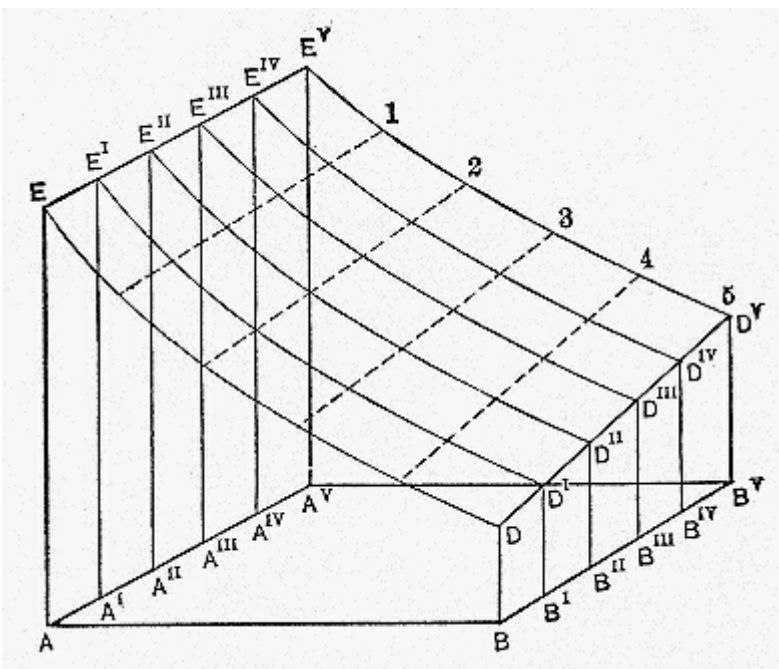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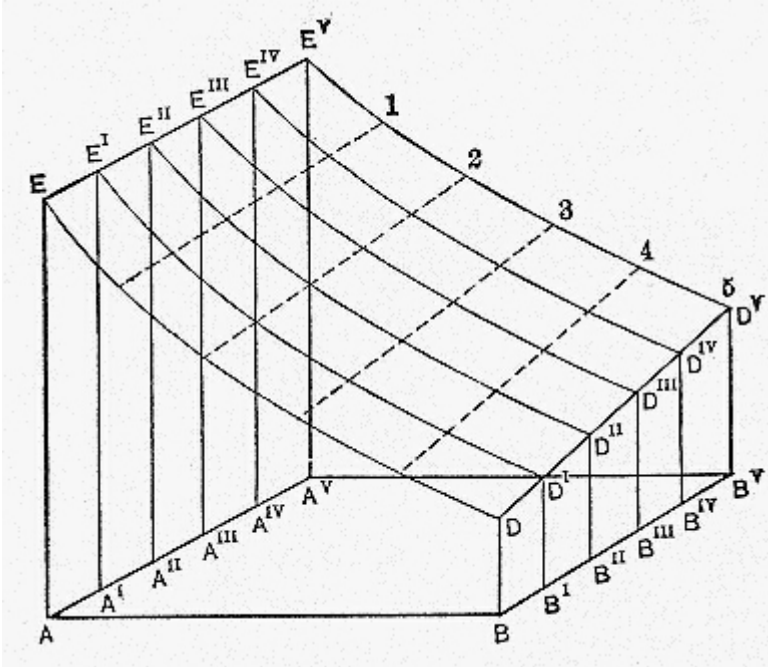

(Fig.19)

(图19)

AB is the length of the day, while AC is the pain of the earliest labor, and BD that of the last. AE represents the gain secured by the first product, and BD that of the last. BD is, in fact, two coinciding lines, of which one measures the burden of the final labor, and the other the gain of the final consumption. The area ACDB measures the total sacrifice involved in the day's labor; AEDB, the total gain; and CED, a surplus gain, representing the net benefit of a day of industry. All gains below the line CD are exactly offset by costs.

AB为工作日长度，AC是最早劳动付出的代价，BD是最后劳动付出的代价。AE是第一件产品所获得的收益，BD是最后一件产品所获得收益。事实上，BD是两条线重合在一起的线，其中的一条计量最终劳动付出的代价，另一条则代表最终消费的收益。ACDB的面积计量当天劳动付出的总代价，AEDB的面积计量总收益，CED计量剩余收益，即该行业一天的净利。CD线以下的一切的收益总额权为成本所抵消。

The man that we are studying is a society by himself: he makes things and he alone uses them. The line BD is his unit of value, which measures the effective utility of everything that he makes. Though AE may measure the absolute benefit conferred by the loaf that satisfies hunger, the real importance of having that loaf is far less. If this necessary article were taken away, the man would devote a final hour to bread-making, and would go without the article otherwise secured by that final increment of work. Destroy his day's supply of food, and what he goes without will be luxuries naturally secured by the terminal period of labor. BD measures the utility of those luxuries, and it measures therefore the effective service rendered by the supply of necessaries that are produced in an equal period of work. Any article on the line between E and D will have a true importance measured by BD; since, if it were lost, there would be diverted to the replacing of it some work that would otherwise secure an article having an importance measured by that line. As it is of no more real consequence to the man to keep one of these articles than it is to keep any other, BD measures the subjective value of each of them.

我们所在研究的这个人其本身就是个社会：产品自产自用。bd是他的价值单位，衡量它所生产的一切的实际效用。尽管AE可以计量充

饥用的面包所提供的绝对利益，但那片面包的实际重要性却并没有这么大。如果这个必需品被拿走了，那这个人就得专用最后一个小时烤面包了，进而放弃因这一个小时的工作所能生产的其他产品。如果中断当天的食品供应，他自然就会放弃以最后一个小时的劳动生产的奢侈品。BD计量的是那些奢侈品的效用，因而他也计量必需品供给所提供的有效服务。这种必需品是在一个相同的时间内生产的。ED线上的任何物品都有BD线计量的实际重要性，因为，要不是以这种方式计量，那也就得以另一种具有同样功能的重要性的物品取而代之。由于不存在这些物品与另外一些物品和这更具重要性的这一问题，因此，BD所计量的也就是这些物品中的任何一种物品的主观价值而已。

Of a society regarded as a unit the same is true. It produces for itself, and the burden of its final labor measures the utility of its final products, which is the same as the effective utility of any of its products created by the same expenditure of working time. Take away the articles that the society gains by the labor of a morning hour,—the necessary food, clothing and shelter that it absolutely must have,—and to make good the loss it will divert the work performed at the approach of evening,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produced the final luxuries on its list of goods. To society the net importance of the different grades of commodities is equal: take away one variety entire, and terminal labor will be made to replace it. The things otherwise produced by that final labor will be the ones really lost, and their utility is measured by the burden entailed in the creating of them.

把社会当做一个单位也会是这样。它生产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且最终劳动的付出则衡量其最终产品的效用，这一效用与该社会以工作时间的同样花费所创造的任何一种产品的实际效用完全相同。如果拿走由早晨一个小时的劳动所创造的归社会所得的那些物品——社会

绝对必需的衣食住等类物品——以及补偿社会晚几个小时工作所付出的代价，而这个时间社会原本是生产奢侈品的。对社会而言，各种不同等级的货物的绝对重要性都是相同的，即拿走整个一类货物，就得以最终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取代之。而那最终劳动原本所生产的东西就会成为实际上所失去的产品，可它们的效用却是按照创造这些东西时所付出的代价计量的。

If we arrange, as on the opposite page, a series of descending curves to represent the lessening absolute utility of the things consumed by a society, we shall get a representation of a social unit of value—a quantity that measures wealth in all its forms. We now have a descending curve for each member of society. The goods indicated by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several curves, between EEv and the dotted line designated by the figure 1, are the most essential things used by society. They are to be treated as the product of the first period of the social working day, and the absolute service that they render to society is measured approximately by lines falling from EEv, etc., to the line AAv. These goods will differ in the case of different consumers; but, taken collectively, they may be treated as a social complement of goods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We will term them complement number one, including the society's necessaries of life. Complements numbers two, three, four and five also are designated in the figure. The variety of the goods represented increases as the complements succeed each other; and that of number five, containing the luxuries, is very diverse. What is true of the isolated man is likewise true here. The effective utility of the different complements is uniform and is measured by the lines from DDv to the line BBv. Destroy any one of them, except the last, and society will replace it and go without the last. The burden entailed is, in short, always that of the final period of labor.

假如我们像第310页那样排列一系列递减曲线，借以体现一个社会消费品递减的绝对效用的话，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社会价值单位——衡量各种形式的财富的一个数量——的一种表示法。我们现在有一条适用于每位社会成员的递减曲线了。在EE与表一的各虚线之间的几条曲线的截线上所示的货物，为社会所用的最基本的物品。这些物品要视为社会工作日的最初工作时间的产品，而他们向社会提供的绝对服务，则由从EE等线下垂至AA的各条线近似地加以衡量。就各类不同的消费者来说，这些货物都是各不相同的，但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消费品则可视为社会最重要的货物补充。我们当称之为第一号互补物，包括社会的生活必需品在内。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和第五号等互补物也在图中给以标明了。所示货物种类，随着互补物不断增加而增加；其中的第五号物品含奢侈品，极其多样。对单个人适用的，在这里也同样适用。各种不同互补物的实际效用都一样，而且都由从线段DD至线段BB的各条垂线衡量。除最后一种互补物之外，损毁其中的任何一种物品，社会都会以另一种物品取代它，继而导致放弃最后一种互补物。总而言之，必须付出的代价始终是最后那个劳动时间付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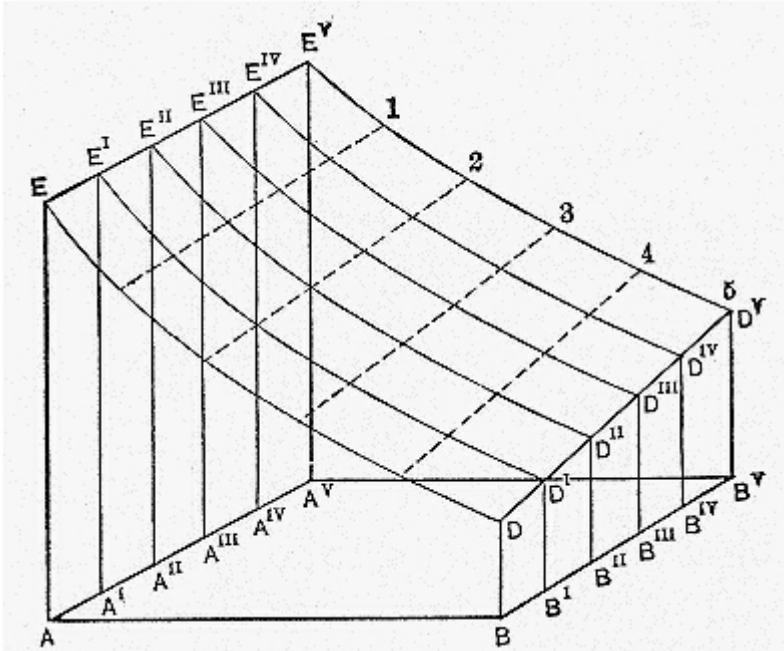
E
E^I
E^II
E^III
E^IV
E^V
1
2
3
4
5
D^V
D^IV
D^III
D^II
D^I
D
A^V
A^IV
A^III
A^II
A^I
A
B
B^I
B^II
B^III
B^IV
B^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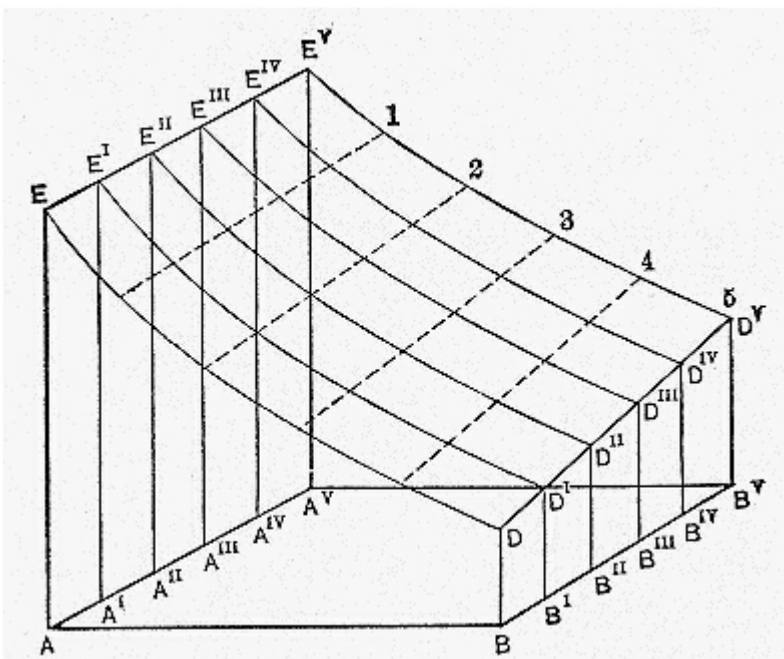
E
E^I
E^II
E^III
E^IV
E^V
1
2
3
4
5
D^V
D^IV
D^III
D^II
D^I
D
A^V
A^IV
A^III
A^II
A^I
A
B
B^I
B^II
B^III
B^IV
B^V

(Fig.20)

(图20)

If we make the lines BD, B'D', etc., numerous and contiguous, so that they fill the area BDDvBv, this area becomes the measure of the absolute utility of the last social complement of goods consumed. It is the measure also of the effective utility of each one of the earlier complements and, still further, of the disutility of the labor that produces the final complement. It thus represents a social aggregate of sacrifice, and this is the unit that is most available for measuring all values. Everything that is produced by one hour of social labor, whether that labor be performed early in the day or late, possesses an effective social utility that equals the absolute utility of the final complement of goods consumed; and this, again, is counterpoised and measured by the sacrifice which all society undergoes in the labor of its final hour.

假如我们使BD和B'D'等线段为数很多，且都很相近，以至于他们填满BDDvBv这一面积，那么，该面积也就成了社会所消费的最后一种互补物的绝对效用。而且，它还是最初每一种互补物的实际效用；再进一步，它还是生产出的那最后一个互补物的劳动的负效用。因此，它代表了社会付出的总代价，对于计量的所有价值来说，这就是最有用的那个单位。一个小时的社会劳动所生产的一切，不论那种劳动是在某一天早晨还是在晚间完成的，都具有某种社会效用，这等于社会所消费的最后一种货物互补物的绝对效用，也等于整个社会在最后一个小时的劳动中所付出的代价，且是以这个代价来计量的。

Single things are, however, in our illustration, produced by individuals and consumed by society in its entirety. The relations of man and society must, then, be studied. As applied to social complements of goods, the law is simple enough; since it is society as a whole that makes and uses them. A complement of the kind referred to comes from all men and goes to all men. The social organism gets each complement by labor, and measures the importance of it by the labor of creating the final complement. Collective labor secures and measures collective gain.

在我们的举例中，单个物品由个人制作，同时由整个社会来消费。因此，人与社会的关系必须予以研究。正如应用于社会货物互补物的情况，规律其实还是十分简单，因为他终归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所生产和使用的。这里谈及的此类互补物来自于人的需求又满足于人的需求。社会有机体通过劳动而得到各种互补物，且以那创造出的最后一个互补物的劳动衡量其重要性。集体的劳动确保并衡量集体的所得。

We noticed that the different complements of goods are of unequal absolute utility, since they minister to wants of varied degrees of intensity. Bread and the other necessaries of life are absolutely more important than jewelry and other luxuries; but in effective utility the complements are all on a par, since, if any one of them were destroyed, the result would be to make the community go without the last. In like manner, the periods of labor are of unequal degrees of absolute burdensomeness, since the last hour is the most wearying and irksome; yet they are all on a par in effective burdensomeness, as will appear from a similar test. As we gauged the virtual importance of a thing to its owner by supposing that it were taken away and seeing how much worse off the man

would thus become, so we may now estimate the virtual sacrifice involved in the labor of a particular hour by making it unnecessary and seeing how much better off the man would then be. If you supply by a gift the product that an isolated man usually makes in the first and easiest working hour of the day, you thereby save him the necessity of working through the last and hardest hour. You shorten the day by one hour, in supplying the product of any equal period; and the deduction is, of course, made at the latter end, where sacrifice is at its greatest. Similarly, if we could make nature supply gratuitously any one of the successive complements of goods that enter into the consumption of society, the effect would be to shorten the social working day by the omission of the most wearying and irksome period. The effective disutility of all labor is, it thus appears, gauged by the absolute disutility of the concluding work of the day.

我们曾经注意到，货物的各种不同的互补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绝对效用，其原因出于这些互补物均能满足各种程度不同的欲望。面包等生活必须品绝对要比珠宝等奢侈品重要得多，但就其效用说，这些互补物又都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若其中的任何一种物品遭到了损毁，社会就势必连最后一组物品也会予以放弃。以类似方式，劳动期限中的绝对代价是不相等的，因为这最后一个小时是最令人厌烦和令人恼恨的；不过，就显著令人烦恼而论，它们又都处于同一水平。正如我们是通过假设某种东西将要失去，并看看那起所有者的生活会糟糕到何种程度，以此来估计某种东西对于其所有者的实质上的重要性，现在我们也就可以通过使某个小时的劳动显得毫无必要，再看看这个人这样一来，他的身体会有多大程度的恢复，来估计某个小时的劳动所涉及的实质上付出的代价。要是把单个人通常在第一个工时也就是最容易的工作时间所生产的产品送给这个人，那他就不必非工作到最后那个最难熬的时刻。送给这个人经过一个小时的劳动生产的产品，就相当于为他缩短了一个小时的劳动，这当然也是那最难熬的一

个小时。类似地，构成社会消费连续出现的几种货物互补物种，加入我们能做到让自然无偿供给其中的任何一种，则影响所及，其结果也就会是消除了那最令人困乏和最令热厌倦的工作日。由此看来，一切劳动中都存在着明显的负效用，都是以当天收尾工作中的绝对无效用衡量的。

It follows that, in the case of an isolated man, we may measure the subjective value of goods by the mere duration of the work that creates them. All goods made in an hour are equal in effective utility and all hours of labor are of equal effective disutility. Destroy the product of an hour's work, and you injure the man by a fixed amount; make any hour's work unnecessary, by making nature freely supply what is produced in that period, and you benefit the man by a fixed amount. Unit of product and unit of labor are alike represented by the line BD of the diagram. The product of two hours' work will always be of just twice as much subjective value as is the product of one.

可见，就单个人来说，我们可以用创造货物的那种劳动的纯粹绝对持续时间来计量各种货物的主观价值。一个小时内生产的所有产品的效用都相同，而各个小时的劳动又都有相同的显著的负效用。损毁一个小时劳动的产品，就会使某个人受到一定数量的损失；反之，若是自然界免费提供给某个人一个小时的劳动产品，是某个人任何一个小时的劳动成为不必要之举，则这个人就会得到一定数额的利益。如果产品的单位和劳动的单位都由图中的线段BD体现。那么，两个小时的劳动产品，其主观价值会是仅劳动一个小时所得产品的主观价值的两倍。

In the case of society as a whole, the values of different

complements of social goods are, in like manner, measured by the mere duration of the collective labor that creates them. The effective sacrifice entailed by labor varies directly as its duration, and the effective utility of products creat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day varies in the same way. The unit of utility and of disutility is the area BDDvBv. In the subjective valuations of society, as an organic whole, the product of two hours' labor is always worth just twice as much as is the product of one. Mere labor time is an accurate gauge of the values of different complements of goods.

就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各种不同的社会产品互补物的价值都是以同样方式、以创造这些货物的集体劳动的持续时间予以计量的。劳动所付出的实际代价，直接随着劳动时间变化。当天不同时间所创造的产品的效用，也以同样方式计量。假设效用和负效用的单位是面积BDDvBv。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按照社会的主管评价，两个小时的劳动的产品按价值计，它就是一个小时的劳动产品的两倍。仅仅劳动时间可以衡量不同货物的价值。

Is it also an adequate gauge of the values of different articles that enter into the complement? Here we introduce a complication. Neither the pain nor the duration of labor will now serve our purpose.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valuation of a complement, in its entirety, is the fact that the same collective personage creates and uses the whole of it. But when a man creates an article and makes it over to society, the condition changes; for he experiences the burden of the production and society gets the benefit. The final disutility of his labor then stands in no connection with the final utility of society's goods. Though the social organism, as a whole, will work till what it gets offsets what it suffers, will a man also work till what society gets from him offsets what he suffers?

Obviously, when the enjoying falls to one party and the suffering to another, there is no offsetting in the case. There is, therefore, no equivalent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disutility of such work and the utility of its product.

但仅仅劳动时间是对各种不同互补物的价值标准？这里我们要引入一种复杂情况。无论劳动的持续期间是否痛苦，这回我们来说一概不适用。计量一种互补物的价值特点，就其整体而言，是下列事实，即集体生产和集体适用整个互补物。不过当一个人创造一种物品且转让给社会时，情况就变了。因为他付出了生产的代价，而社会得到的是利益。他劳动的最终负效用与社会货物的最终效用不再有关系。尽管社会机体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会发挥作用的，直至它得到的抵消了它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否会有人一直在劳动，直至社会从他那儿所得到的也抵消了他所付出的呢？显然，一旦一方享受着另一方遭受损失，得到与失去就无法相抵。因此，这类劳动的负效用与其产品的效用之间没有形成某种同等效用。

Yet there is an equivalent between the man's sacrifices and his own enjoyments. The pain that he undergoes in making his own product is a payment for other men's products, for it is the personal cost of what he gets. In like manner, the pain that all other men suffer in making products for him represents the cost to them of what they get from him. Between cost and gain there is still an equivalent, and it will furnish us a unit for appraising specific commodities.

但是，实际上，人们劳动付出的艰辛与起自己的享受之间有某种同等效用。人们在生产自己产品中付出的艰辛是对他人产品的一种报偿，因为他所得到的也是别人的付出。同样，另外所有的人为他生产

产品时付出的艰辛，代表的是他们从他这儿得到的某种东西的成本。成本与收益之间还有一个同等效用，而这一同等效用将提供一个单位的与我们加以评价的各种具体货物。

If A makes the article W, B makes X, C makes Y and D makes Z, and if each gets and uses some part of each product, we have a miniature society in which the relations are clear. A sells to B, C and D; and the effective social utility of W is measured by the pain undergone by B, C and D in creating, in the final period of the day, articles in exchange for it. If money is used in the transactions, and if the price of W and that of X are equal, it is because the last unit of the supply of each commodity, as it is made over to the miniature society for consumption, imparts to the society as a whole a uniform addition to its enjoyments. That addition is in each case measured by the pain of working through the final period of the day in order to get it. Price is, then, an indication of the social cost of acquisition of different commodities.

假如A生产产品W，B生产产品X，C生产产品Y,D生产产品Z，而且假如每个人都得到并使用每一种产品的某个部分，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微型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各种关系都是一清二楚的。A向B、C和D销售产品；W的社会效用，则以B、C和D在当天最后一个小时创造的用于交换它的产品所付出的艰辛予以计量。假如货币用于交易，再假如W的价格和X的价格相同，则由于这两种货物的供给量中的最后一个单位提供给该微型社会义工消费时，就作为其享受的整个统一增加物。该增加物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由当天最后一个小时为得到它而付出的劳动艰辛所计量。由此可见，价格是各种货物社会购置成本的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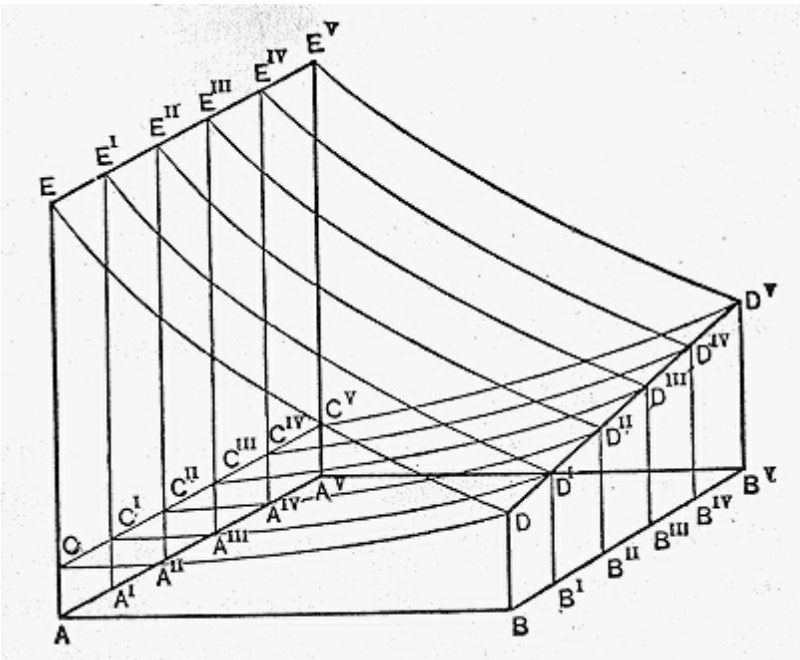
E
E^I
E^II
E^III
E^IV
E^V
D^V
D^IV
D^III
D^II
D^I
D
B^V
B^IV
B^III
B^II
B^I
B
C
C^I
C^II
C^III
C^IV
C^V
A^IV–A^V
A^III
A^II
A^I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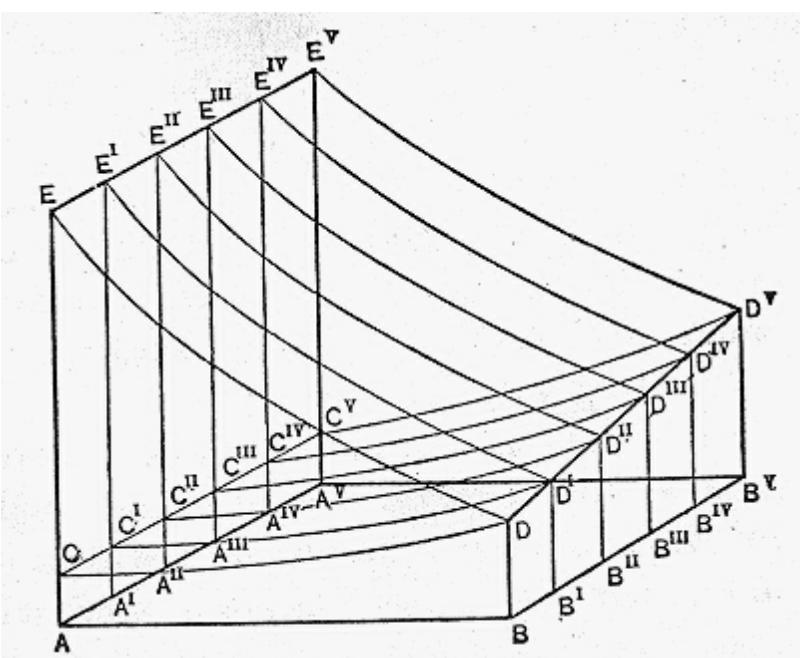
E
E^I
E^II
E^III
E^IV
E^V
D^V
D^IV
D^III
D^II
D^I
D
B^V
B^IV
B^III
B^II
B^I
B
C
C^I
C^II
C^III
C^IV
C^V
A^IV–A^V
A^III
A^II
A^I
A

(Fig.21)

(图21)

Back of the figure ABCDE, which represents the sacrifice, the gain and the surplus of benefit realized by one laborer in a working day, let us place a series of similar figures, setting forth the same facts for each member of our miniature society.

在体现一个劳动者一个工作日付出的劳动代价、收益和剩余利益的图ABCDE背面，让我们安排一系列类似的图用以阐明上述微型社会每个成员的系列情形。

The curves ascending from C, C', C'', C''', Civ and Cv represent the increased cost entailed by the labor of successive hours in the case of all the men. The curves descending from E, E', etc., show the lessening gains afforded by different increments of things consumed. D, D', D'', etc., are points of equilibrium of gain and loss; and the lines descending from D, D', D'', etc., to B, B', B'', etc., measure sacrifice entailed on all society by its final period of labor.

从C、C1、C2、C3、C4和C5上渐次升高的各条曲线，代表所有人连续几个小时劳动必须付出的递增的成本。而E、E1上等渐次降低的曲线，则表明所消费的不同增量物品所提供的递减收益。D、D1、D2等为盈亏均衡点；从D、D1、D2等渐次降低至B、B1、B2等的各线，计量社会最后一个劳动时间所付出的成本。

If the figures were multiplied in number and were so drawn that the lines of one should be contiguous to the similar lines of the other, then the course of the ascending curved surface that follows the lines CD, C'D', etc., would indicate the increased costliness of the work of all society, as the hours of labor in a day succeed each other; and that of the descending surface ED, E'D', etc., would represent the diminishing utility of all things consumed. The volume between these curved surfaces and the vertical plane CCvEEv would measure the total surplus realized by society as a whole in consequence of its work. The area of the vertical plane BDDvBv expresses the pain suffered by society as a whole in the final period of daily labor, and this is this ultimate unit of value. So far as the selling price of a thing corresponds with labor of any kind, it corresponds with the terminal labor that society, the consumer, puts forth in order to get it. If it is as anxious to have more of one product as it is to have more of another, it will be as willing to add a minute to the length of its day in order to obtain the one as it will in order to get the other. By laws that are now wholly familiar, the two things will sell for the same price; and this price is the gauge of the uniform cost, in the labor at the end of successive days,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the two things entails on society.

如果这种图的数量倍增，且图中的各线类似且相邻，那么，继CD、C1D1等各线的递升曲面就表明，随着一天的工时一个小时以一个小时的过去，全社会工作付出的递增成本；而递减曲面ED、E1D1等，就代表一切消费品的递减效用。这些曲面与垂直平面CCvEEv之间的体积，就衡量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因其一起工作而实现的总盈余。垂直平面BDDvBv的面积，表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每天最后一个小时工作所付出的艰辛的代价，而且，这就是最后一个单位的价值。只要

某物的售价与任何一种劳动的付出相符，那么，这一售价就与该社会即消费者为得到他而付出的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相符。如果某人对一种产品于对另一种产品的所得是同样迫切的话，那么，为得到这种产品，他情愿一天多劳动一分钟，这就像是他为得另一种产品而情愿对劳动一分钟一样。按照都已熟悉的各种规律，这两种物品都将按照统一价格销售，而这一价格就是为获得这两种物品在每天最后的劳动时间里社会所付出的统一成本。

The value of a thing, then, is the measure of the effective service that it renders to society as a whole. This service is estimated subjectively. The standard for measuring it is the sacrifice, in final periods of labor, entailed on society in acquiring it. By establishing an equality between the gratification conferred on itself by articles different in kind and the element pain, which is here homogeneous, society is able to compare the quantities of gratification in the different cases with each other. The price of things corresponds to the pain of acquisition, of which the unit is the sacrifice entailed on society by the work of the final period in each of a series of days; and the sacrifice involved in the collective labor of one such final period is like that which is imposed by another.

因此，某种物品的价值也就是该物品给予整个社会的有效服务的计量尺度。这种服务的价格是主观估定的。据以估计该服务的价格的标准，是获得这种服务而是社会在每天最后的劳动时间里付出的代价。通过建立不同种类的产品所能满足的需求以及生产他们时所付出的代价，社会就能把各种不同情况下产品满足需求作出比较。该物品的价格就是获得该物品所付出的代价，而该代价的单位，就是社会在每天的最后最后一个劳动时间内付出的代价；这样一个最后时间的集体劳动付出的代价，与另一个最后时间内集体劳动所付出的代价，都

是一样的。

The burden of labor entailed on a man in the making of an article has no fixed relation to its market value. The product of one hour's work of an eminent lawyer, an artist or a business manager may sell for as much as that of a month's work of an engine stoker, a seamstress or a stone-breaker. Here and there are “prisoners of poverty,” putting life itself into products of which a wagon-load can literally be bought for a prima donna's song. Wherever there is exceptional personal power or position, giving to any producer the advantage of a monopoly, there is a divergence between cost and value, if by these terms we mean the cost to the producer and the value in the market. Compare, for example, the labor involved in maintaining telephones with the rates demanded for the use of them. Yet of monopolized products, as of others, our rule holds good: they sell according to the disutility of the terminal social labor expended in order to acquire them. Differences in wealth between different producers cause the costs of different units of the supply of a given commodity to vary, so that not all correspond to the market value. The rich worker stops producing early, while the sacrifice entailed is still small; but his product sells as well as if it cost much more sacrifice. [24_3]

生产某种物品的过程中，某个人付出的劳动代价与这种物品劳动的市场价值没有固定关系。杰出律师、艺术家或企业家等一个小时的劳动产品，其价值量可以等于火车头司炉工、女裁缝或碎石工一个月劳动产品的价值量。一个“贫困的犯人”倾其一生生产货物，一位红歌星只要一首歌，就可以得到许多这样的东西。但凡存在例外个人的权利与地位，从而是任何生产者都由垄断之优势之处，那就都会有成本与价值之间的差异。我们这是在说，成本是生产者的成本，而价值则

是指市场价值。例如，是比较一下，电话维修劳动和电话收取的费用。不过，就垄断产品来说，它与另外的产品一样，我们的规律也适用。这种产品是按照为获得他们而花费的最后一个单位的社会劳动的负效用来销售的。不同生产者的财富差别导致一定产品的各供给单位的成本各异，进而导致并非所有成本都与市场价值相一致。富裕的劳动者早就休工且付出的劳动艰辛小，但他的产品的售价却与花费较多劳动的产品不差分毫。[25_3]

If we say that the prices of goods correspond with the amount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labor that creates them, we say what is equivalent to the above proposition. The efficiency that figures in the case is power and willingness to produce a given effect, and the willingness is as essential as the power. The man of great capacity who is too rich to put forth much effort is not an efficient laborer. Moreover, the effect that gaug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worker is the amount of wealth that he creates, and this must be measured by the units that we have just attained. Efficiency in a worker is, in reality, power to draw out labor on the part of society. It is capacity to offer that for which society will work in return. Hence goods must sell at rates that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quantity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work which creates them.

如果我们说的是货物的价格与生产货物的劳动数量和效率一致的话，那么，我们所讲的也就与上述论点不谋而合。此例中出现的这种效率，是产生既定结果的能力和意愿，而意愿与能力这两者同样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虽才能出众，但是如果好逸恶劳，就不是一个工作效率高的人。此外，衡量这位劳动者的产生效率的标准是他所创造的财富数量，而这财富数量必须用我们刚才获得的单位加以计量。一个劳动者的效率实际上也就是促使了社会进行劳动的能力，是这种能力促使社会为提供物品而发挥作用。使社会为要得到这些东西而愿意

工作的力量。因此，货物就必须按照这样一种价格销售，即这种价格与生产这些货物的劳动数量和效率相一致。

There is, then, a way in which we can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every worker; and by comparing the measurements we can see how much one laborer excels another. A, the weaver, and B, the carpenter, are working on such unlike products that, even though we may know how much the one contributes toward the making of a piece of cloth and how much the other contributes toward the building of a house, we still have trouble in comparing directly the quantities of these dissimilar products and thus gauging the comparative efficiency of the two workers. Running through the unlike products is the one common element, power to give social gratification; and the amount of this gratification is measured by the amount of social labor that it induces. Every worker's personal power registers itself in the quantity of this composite labor that he is able to draw out. If A, by working for a year, can induce society to work two minutes, and if B, in the same way, can induce it to work three minutes, the former is only two-thirds as efficient as the latter. The labor of each one of a thousand men working in as many different trades may thus be measured, and the amounts given by the different measurements may be added, compared and averaged. If we regard the thousand workers as constituting a complete industrial society, an average worker is one who can induce the whole body, in return for all of his own labor, to work for him for a thousandth part of every day.

于是，我们也就有了一种衡量每个劳动者效率的方法，而且通过比较各种计量所得的结果，我们也就能看出一个劳动者比另一个劳动者的生产率高多少。织布工A和木匠B都从事不同的产品的生产，这些

产品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因此，尽管我们了解一位织布工在织一匹布上有多大贡献，而另一位木匠再盖一幢房子上有多大贡献，可这些不同产品的数量我们仍不能直接比较，而两个人的相对效率也就不能判断了。不过，由于这些不同产品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共同因素，即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因而这一满足社会需求的量，由所需的社会劳动的总量予以计量。每一个劳动者的个人能力都体现与总体劳动的数量之中。假如A工作一年能使社会为他工作两分钟，而B是社会为他工作三分钟，那么，前者的效率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二。从事多种行业的一千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可以这样加以计量，计量的不用的结果经过比较和平均，就可以给加总了。如果我们这一千劳动者能构成一种能够完整的产业社会，那么，一个普通劳动者也就能使社会每天为他劳动千分之一个时间。

Three things can be measured fir terms of this ultimate standard of value—namely, consumers' wealth, capital and labor. Goods for consumption induce social labor and are valuable in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of it that they severally draw out. Capital creates consumers' wealth and thus indirectly induces social labor. The capital itself can be measured by means of this social labor which, through its product, it induces. The work of an individual creates consumers' wealth, draws out social labor and records the degree of its own efficiency by the amount of such labor it gets control of. Though our study has taken us into a region of abstractions, it has not taken us out of the world of reality; for every artisan who is plying his trade actually possesses the power over society that has here been analyzed, and so do the tools in the artisans' hands and the finished products on the merchants' shelves. Induced social labor gauges the power of all of them. [24_4]

有三种东西即消费资料、资本和劳动可以依据这一最后价值标准

予以计量。消费品不仅导致社会劳动，而且其价值是与消费品分别引起的社会劳动的总量成比例的。资本创造消费资料，因而也间接地导致了社会劳动。资本本身可用社会劳动加以衡量，这部分社会劳动是资本以其产品引起的。一个人劳动生产了消费资料，进而导致社会劳动，并以这个人的劳动数量体现效率的高低。尽管因为这项研究我们进入了一个抽象领域，但它并没有是我们脱离现实世界。因为恪尽职守的每一个手艺人实际上都有支配和控制社会的能力，手艺人手中的工具和商人货架上的制成品也是如此。他们的力量，完全由被他们所吸引的社会劳动来衡量。[25_4]

There are questions of some subtlety to be answered before the theory of the ultimate unit of value can be made complete. One of them has reference to the indirect way in which the labor of an individual producer makes itself felt as a power throughout society. He may be making something that is consumed by a limited part of society; and yet he is able to induce, in return for his special product, labor that is literally social, since it enlists every member of society on a certain pro rata proportion. He can cause every one to work for the nth part of his working day. It would be a simplification that would amount to inaccuracy to say that he can make them all work for any fixed period of time, such as a minute; for each person who contributes to the social labor that gauges values of all kinds must contribute an accurately adjusted share of his own labor, and a minute would be a larger fraction of one man's, day than of another's. It is accurate enough for our purpose, however, to say that the social labor is made up of a fixed fraction of a day's labor of every individual. In ways direct and indirect one producer can draw out the composite labor that is thus defined.

最后一个单位的价值理论要能自圆其说，那就得回答几个颇有些

微妙之处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如何通过间接方式，使个体生产者可以感受到作为社会的力量。他或许是在制造的东西由有限的一部分社会所消费；然而，作为对他的特殊产品的交换，他又能吸引真正的全社会的劳动，因为这种劳动赢得每一个社会成员某种比例的支持。他能使每一个人都以其工作日的一部分参与工作，能使人们都以某种固定的时间比方说一分钟作为投入工作的时间。诚然，他可以使所有人在固定时间里为他工作，比如一分钟，这是一种简单化，也是一种不准确的说法。不过，每个人对社会劳动的贡献只能占他劳动的一部分。一分钟，对一个人来说或许多了些，对另一个人来说或许又少了点。不过，按目前的情况来说，社会劳动由每个人一天劳动中的固定时间一点点构成，这已经是相当精确的了。不论是间接地还是直接地，一个生产者终归都引出如此界定的混合的劳动。

If, for a simple illustration, we assume that twenty men constitute an isolated society, and if we cause the first of them to make something which is directly consumed by only five of the others, there are fourteen whose labor he can draw out only through a series of intermediate exchanges; and the principle that governs these exchang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 the first producer, can directly induce labor on the part of B, C, D, E and F. In order that he may cause G to labor, he must offer to him some product created by one of the men for whom he works directly. By performing additional labor for B, getting a second share of B's product and presenting it to G, A may insure work on G's part; and in similar ways he may cause all the others to labor. There may be men in the society who do not consume any of the products made by B, C, D, E and F, the men for whom A produces directly; and A's connection with them may be still more indirect. It may be necessary that A should work still further for B, giving a bit of B's special product to G and some of G's product to H, in order to induce the last-named member of the little society to work. By a

chain of connection that is mainly indirect, one worker is always able to exercise over all workers that power which we have described.

为了简要说明，假如我们假设由二十个人构成一个孤立的社会，且假设我们就让其中的第一个人生产产品以供其余五个人直接消费，那就会有十四个人的劳动可供第一个人进行一系列的中间交换。支配这些交换的规律及其重要是自不待言了。A是第一个生产者，可以直接吸引B、C、D、E、F等人的劳动。为了使G甘于劳动，A就必须给G某种产品，这一产品是他直接为之工作的人中的一个所生产的。通过帮助B多做些工作，他得到了B的产品的第二份，并把它给了G，于是，A可以确保由G来完成工作；而且，以类似的方式，他都可以让其他所有人都投身于劳动。这个社会上或许就有人既不消费B、C、D、E和F所生产的产品，他们是A为之直接生产消费产品的，这样，A与他们的关系或许就更间接了。A还应该进一步为B工作，从B的特种产品中取出一点给G，又G的产品中取出一点给H，借以吸引该微型社会最后一位成员也投身工作。凭借一系列间接地联系，一个劳动者就总能对所有劳动者都施加我们曾说过的那种影响力。

The important point in this connection is the nature of the influences that act on the individuals who furnish this chain of connection. These influences are psychological. A motive is presented to B by something that A does for him, and it is the character of this motive that needs carefully to be noted. Something in A's product is a final utility to B. In the goods produced by A there is an element that enters into the final and least important increment of the wealth that B consumer; and yet this final consumption on B's part is important enough for him to cause him to work in the final period of his day, when the service is most burdensome. As has been shown, it is the consumption which is

least important which offsets the work that entails the most sacrifice. When B's product is given to A and passed on to G, there is in it an element that is a final utility to G and causes him to do work which offsets and measures the benefit that he gets. By a chain of connection, every link in which is made by a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an individual, the first worker in the society reaches and influences all the others. A offers a marginal gratification to B and gets from him a marginal sacrifice; and when, in turn, A gives some of B's product to G, there is the same balancing of inducements and the same result.

在关系中有一个重点，在于提供一系列关系的个人的影响的性质。这些影响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心理方面的。通过A对B所付出的劳动，B确立了一种动机，需要细心记住的正式这个动机的性质。A的产品中的某种东西对B而言是一种最终效用。在A所生产的物品中，这个因素构成了B所消费的财富中的最后一个最不重要增量的部分。不过就B而言，这一最终消费是重要到足以让他在他一天中最后这一时间都还要继续工作，虽然应付出的劳动是难以承受的。如前所述，和付出最大代价的工作相抵的是最不重要的消费。当B的产品给了A，后来又给了G时，其中就有了对G而言是某种最终效用的一个因素，并使他还得工作，而这种工作，不补偿还衡量他得到的利益。通过一系列的联系——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由某个人的某种主观经验构成——该社会的第一个劳动者购买其他人生产的产品并影响其余所有人。A给了B边际需要，而从B得到了边际代价；而当A把B的产品给了G时，那种相至抵消的现象又产生了，且产生了相同的结果。

Importance attaches to these facts, because they enable us to avoid a difficulty that has been fatal to a certain labor measure of value. If we say that the value of an article corresponds to the amount of labor “of average quality” that has been expended in

producing it, we must find a way to average different kinds of labor; and we can do this only by means of the values of the products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labor create. These values, in turn, we are obliged to measure by average labor, and we thus find ourselves reasoning in a circle. A commodity is, however, actually measured for value on the basis of the social service that it renders. By means of the chain of purely subjective connections that have here been described, it can diffuse benefits throughout society. At every point in the connection an individual receives a marginal pleasure and subjects himself to a marginal sacrifice. All society, in the end, incurs a marginal sacrifice that measures the value of this kind of goods. The individual labor which made the commodity is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social labor that is induced by it and that measures its value, and in this way individual labor performed in making an article corresponds with and expresses the value of it; but the value of a commodity is not derived from the labor that is back of it in the making. It is derived from the social service that is before us her the using. The value of the labor of making the article is derivative. It comes through the product of the labor, from the social effect that the product will produce.

这些事实的重要性在于能使我们避免一种困难，而这种困难是某种劳动价值尺度曾经无法加以避免的。如果我们说一种物品的价值与“平均质量”的劳动量相一致的话，那么，各种不同的劳动我们就得设法加以平均；而这只有用各种不同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才能做到。反过来，这些价值我们又不得不采用平均劳动加以衡量，结果也就发现我们只是在做徒劳的循环推理罢了。不过，一种货物实际上是依据他所提供的社会服务衡量其价值的。依靠那一系列这里做了描述的纯粹主观联系，利益也就得以扩散至全社会了。在此联系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某个人都获得某种边际愉悦，并付出了自己的边际代价。最终，整个社会都会付出边际代价从而可用于衡量货品价值。生产货物

的个别劳动，按经济学的思想，相当于由这种劳动引起并衡量这种劳动价值的社会劳动，也即生产一种物品时所付出的个别劳动符合它的价值。但是，一种货物的价值并非由生产时在其背后的那种劳动所产生的，他有社会服务而来，这种服务尚待我们去完成。生产该物品的价值是派生的。它经由劳动的产品以及产生的社会效益形成。

The definitions of the static state that have been given in the earlier chapters of this book have not in any way depended on the definition of a unit of labor that has just been offered. Society is static, if labor and capital are able to move from group to group, even though they do not do so because the inducement is lacking. This implies merely that men do not change their occupations and that the young workers who enter any group merely fill the places of the old workers who withdraw from it.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individual laborers should be tested in a way that would measure in any kind of scientific units the work that they perform. A young man who is about to choose an occupation may embody many units of labor or only a few; but the essence of the static state is that, within the range of employments for which his capacities fit him, he should be as strongly impelled in one direction as another. If,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description of the static state, we speak provisionally of units of labor, the idea that the expression is intended to convey is that of a certain power to produce merely physical results. When a man is digging in a trench, he may be thought of, in rude way, as embodying a unit of labor, if he throws out in a day an average amount of earth. When the man is in a textile mill, he may similarly be thought of as embodying a unit of labor, if his presence causes the production of so much of the fabric there made as to mark him as an average worker. Values and units of values do not enter into such a measurement.

本书前几章提出的静态的定义，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取决于刚刚提供的单位劳动的定义。社会就处于静态状态，即使它们由于缺乏诱因而不发生流动情况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人们职业一般定下来后便不会随意改变，而加入任何一个团体的年轻劳动者，只不过补了老劳动者的空缺而已。劳动者的工作绩效如何，未必都得以任何一种科学单位给予以衡量。即将要选择某种职业的年轻人可能体现多个单位或少数几个单位的劳动，但静态本质是指在他的职业范围内所要求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会拼命以求的。假如在此静态的描述方面我们临时性地谈及劳动的单位数的话，那这一表达旨在传递的意思也只是生产物品某种能力而已。当一个人在挖沟时，人们或许粗鲁地认为，如果他有一天挖出平均数量的土，那他这就体现出了一个单位劳动了。他是棉布厂劳动者，要是他织的布能达到普通劳动者水平的话，那么，人们就会类似地认为，它体现了一个单位劳动。价值以及价值的单位并不构成这样一种衡量。

It is now possible, however, to use the true unit of labor in defining the static state; but this affords a new definition of it. The amount of labor that is potentially in a man is measured by the social labor that he can induce when all workers, as well as all capital, are apportioned among the groups in a normal or static way. If there is a misadjustment of the agents of production, these agents produce different amounts and nearly always smaller amounts than they would in a static state. The actual work that a man then does counts as fewer units of labor than there are potentially in him. The static state can, then, be identified as the one in which every man's actual work represents his potential working power, as measured in scientific units.

现在我们可以用真正劳动单位在界定的静态状况，不过，有给关静态提供一个新定义。一个人潜在的劳动量是所有劳动者和资本以正

常或静止的方式在各团体间分配是按社会劳动衡量的。如果存在生产要素失调的情况，那么这些要素的产量就会不同，而且总是与这些要素出于某种静态状况下的产两相比较小一些。因此，一人所做的实际工作比之他潜在所能做的来，劳动单位就是少了一些。因此，静静态可被认为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在此状态下，每个人的实际工作都体现潜劳动能力以科学单位衡量。

Some part of the output of every kind of goods is traceable to capital, and thus to the sacrifice termed abstinence; and the personal sacrifice entailed by abstinence may be measured in terms of that which is entailed by labor. On this point the study of Professor F. H. Giddings, 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 January, 1890, is valuable. Since, however, the creating of a bit of capital secures an endless income, the social labor that the act of abstinence really draws out is also endless. By saving a thousand dollars now, I secure a power to serve society in a minute degree and to draw a return service from society forever. But there is not a calcula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esent cost of the abstaining, a measured by its equivalent in social labor, and the value of the earnings of the capital (say) fifty years hence, as measured in terms of social labor of that date. A full study of this point would detain us too long.

各种物品中的某一部分均可溯及资本，因而也就是溯及成为节约的那种成本代价；节约所致的个人付出的代价可以按照劳动的强度和长度加以衡量。吉丁斯教授在《经济学季刊》1890年1月发表的研究论点所谈的很有价值。不过，既然创造一点点资本就确保了永久收入，那么由于节约所生产的社会劳动也是永久性的。现在节省一千美元，就能确保以微小程度服务于社会以及从社会获取回报的一种那个能力，但在按其社会劳动的相当份额计量的节制的现成本，与五十年

按当时社会劳动计量的资本收益的价值之间，并无某种可以计算的逻辑关系。对此问题详尽研究起来会费事极多。

[24_1].It is clear that the product of capital cannot, in such connections as these, be the basis of the measurement of capital. If we say that whatever produces a unit of consumers' wealth is a unit of capital, we assert nothing by adding that, at any one time, all units of capital are equally productive. On the other hand, when we say that a series of units of capital show diminishing returns, while still measuring the units by their products, we assert what is a self-contradiction.

[24_2].The substance of this chapter was published in the Yale Review for November, 1892, and, as thus published, was a continuation of an article that was printed in the New Englander in 1881. In that earlier study the power residing in all economic goods was termed "effective utility." The entity thus defined is closely identified with the "final" or "marginal" utility of Professor Jevons and the Austrian economists whose researches were then unknown to me. The manner of approaching the law of value differed from that adopted by the European economists, and led to a certain distinctive view of the nature of that law. According to this view value is always subjective and social. It gauges the power of things over society in its entirety.

[24_3].In the figure, this fact is rudely expressed by the fact that the line BD is, barter than the line BvDv. The lines representing costs between these two would not, however, actually lengthen at a perfectly uniform rate and thus make the line DD straight.

[24_4].On page 343 [Chapter XXII, par. XXII.17—Ed.]it has been stated that there is "a unit for measuring true capital in the form of land." This measurement is made by gauging productive efficiency of each piece of land in terms of the social labor that, as a producing agent, it calls out.

[25_1].很明显，在这些联系中，资本的产品不能作为衡量成本的标准。如果我们说，无论生产消费者财富的单位是一个单位的资本，通过补充这些我们也不能断定什么，在任何一个时间，资本的单位是相同多产的。另一方面，当我们说一系列的资本单位呈现收益递减，同时仍然在用它们的产品取测量这些单位，我们可断言这就是自相矛盾。

[25_2].本章的内容发表在1892年11月的《耶鲁评论》上，并且，这个文章的发表，是1881年《新英格兰人》一篇文章的延续。在较早期研究中，存在于所有经济货

物中的力量被称为“实际效用”。这样定义的整体与杰文森教授的“最终”或“边际”工具是密切一致的，然而，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研究我们还不得而知。接近价值规律的方式同欧洲经济学家所采纳的观点不同，并且，导致该规律本质的一个特别不同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价值一直很主观性并且很社会化。它是衡量整个社会的物品的力量。

[25_3].在这个图中，现象被BD线段大概地表现出来，比BvDv线段表现更彻底。然而，代表成本的这两条线段之间不会真的在同样的比例延长，并且，这样会使线段DD变成一条直线。

[25_4].在343页上【第二十二章中第17段】写着“以土地形式衡量资本的单位。”这种计量方法是用作为生产要素的社会劳动来衡量土地的生产效率。

Chapter XXV Static Standards in a Dynamic Society

第二十五章 动态社会的静态标准

If this study were to be absolutely restricted to the field of social economic statics, as sharply defined, it should stop at this point; for in going farther it enters on the field of economic dynamics. We have seen that the second natural divis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which is devoted to social economic statics includes phenomena that are due to exchanges—to the fact that society acts as an organism in producing wealth. That division, however, includes nothing that is due to continuing evolution in the organism. When we state those facts concerning distribution which are due merely to the organized method of creating wealth, we have told all that we can, while keeping strictly within the limits of this part of the science; for we have presented in their entirety the static laws of distribution, as they would act in the absence of organic change and of the friction and the disturbance that it causes. [25_1]

如果按照严格的定义这项研究绝对仅限于社会静态经济学这个领域的话，那么，至此该项研究就该结束了，因为在深入下去，那就得着手研究动态经济学。我们已经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社会静态经济学研究的第二个自然分支学科，其研究所及，林林总总的现象概莫能外，而他们又都可归因于交换，也即可归因于社会扮演生产财富这一有机组织的角色这一事实。不过，这种有机组织不断演变所引起的情形，则不在这个分支学科研究的范围之内。我们讲述与分配有关的事实时——这些事实仅可归因于创造财富的那种有组织的方法——是严

格按照该分支学科的研究范围，竭尽所能悉数讲述了的；对于静态分配规律作为一个整体，就他们在不发生根本变化，以及不存在这种变化引起的摩擦和失调的情况下所引起的作用，做了描述。[26_1]

We now have before us a picture of a static industrial world—not a dead world, but one filled with living and acting men. It produces and consumes wealth; but the kinds of wealth that it creates and uses, and the quantities that it creates of all the various kinds, remain unchanged. Its methods and its tools are unvarying, and there is no change in the amount or in the character of the labor and the capital that do the producing work. This society acts and lives, but does so in a changeless manner. It is divided, for productive purposes, into groups and sub-groups, and there is no change in the size of any of them. This absence of any flow of labor or of capital from one group to another is the sure outward sign of the static condition.

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静态产业世界的写照，它不是一个静止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生气、发挥着作用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即生产财富又消费财富，但该世界所创造和使用的财富种类，以及它所创造的各种财富的数量，都始终保持不变。它采用的方法和使用的工具从不加以改变，而且投入生产活动的劳动而后资本，无论是总量还是特性，都始终依然如故。这种社会起着作用，也运转着，但所取得方式则绝无变化。为生产起见，该社会是分成了团体和小团体，其中没有一个团体就规模来说曾发生过变化的。这里的劳动和资本都不存在产业群间的流动，这是静态状况毋庸置疑的外在标志。

Values are here “natural” in the Ricardian sense, for everything sells at its “cost of production” and no entrepreneur makes a profit.

The cost of producing a given thing is uniform in all the different establishments that make it. Wages and interest also are natural, in the same sense; for workmen everywhere get what their work alone produces and capitalists get what capital alone produces. Moreover, the product of labor per unit is uniform throughout the whole system of groups and sub-groups, so that a man can gain nothing by passing from one group to another.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capital is also everywhere the same. Isolate the static forces—shield society absolutely from the influence of change and disturbance—and it takes this shape.

在这里，从李嘉图学说的意义上说，价值是“自然的”，因为一切都是按照其“生产成本”销售的，而且还不存在企业家从中谋利的情况。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在各个不相同的企业中都是相同的。在同一意义上，工资和利息也都是自然的。各地劳动者都得到仅凭他们的劳动而产生的产品，资本家则得到与资本相等的产品。此外，在整个团体和小团体的体系内，单位劳动的产品够一成不变，只有这样，一个劳动者从一个团体转到另外一个时，其所得才会一点不差。资本的生产力到处都是相同。孤立地论述静态因素，也就是把社会隔绝起来，使之不受变化和骚乱的影响，于是社会就呈现出这种状态了。

This picture is, of course, completely imaginary. A static society is an impossible one; for the forces that bring men together in the social state have in themselves the power to make society change its form and its mode of action. In reality, the social structure grows and improves daily, and will do so to the end of time; and it is this growth that makes the social condition tolerable and opens before it inspiring possibilities.

当然，这幅图景是纯属想象的产物。此静态社会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社会；是人们都在某种社会状态下聚集在一起的那几种因素，本身就具有改变社会存在形式及其行为方式的能力。实际上，社会组织每天都在形成和完善之中，而且会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这是由于这一点，社会还能继续下去，还有令人鼓舞的前景。

Five general changes are, as we said at the outset, continually going on: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capital is increasing, industrial methods are changing, the modes of organizing labor and capital for productive purposes are changing, human wants are multiplying and refining. Every one of these changes, moreover, results from a perfectly normal cause, and it is wholly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 that they should all go on together. A changeless society would, in this view, be unnatural; for it would bear little resemblance to the society that nature really calls for.

正如一开始我们就指出的，五大变化都在继续着：人口与日俱增；资本有增无减；生产方法日新月异；用于生产的劳动和资本的组织方式推陈出新；人的欲望不但多样化而且还精细化了。此外，这些变化中的每一种又都是某种非常正常的原因所引起的，而且就是这几种变化应该相继发生这一点，它是完全与自然一致的。按照这种观点，某种一成不变的社会是不合乎自然规律的，因为这种社会与自然真正需要的那种社会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Values also are forever altering, and the alteration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normal tendencies. Similarly, the rate of wages is rising and the rate of interest is falling, and these changes are natural. Profits in a particular sub-group, or in a particular establishment within a sub-group, are continually appearing and

then slowly vanishing; and this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of profits is entirely in accordance with forces of nature. Everything that is keeping society out of that condition which we have described as static is natural, in a broad sense, since it is in harmony with sociological laws and results from a influences that are inherent in men and in their environment. Yet we have called static standards of value, wages and interest, in a certain narrower sense, natural standards; and we have been right in so doing.

价值也是变化不止的，而且这种变化符合正常趋势。类似地，工资率之上升和利率之下降，这些情况也都是自然的。某个小团体或其中的一个企业的利润不断产生，然后又慢慢消失；利润的这种产生和消失，是完全与自然因素相一致的。只要是扰乱社会静态状况的，从广义上来说，都是自然的。因为这一切不只是与社会学规律协调一致，而且还是人类及其环境内在的影响所产生的。然而，在某种狭义的意义上，我们又是把静态的价值、工资和利息，称为自然标准；可这样做，我们又是正确的。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urely static state, in fact, deals with realities. It is imaginary only by its omissions; for it present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forces that act in the real, dynamic world. The influences that bring about the group adjustment that we have just described, and all that it involves, are not imaginary: they are as real as anything on earth. They are always acting in the midst of the most violent disturbances that dynamic forces produce. As an illustration we have used the sea. A static ocean is imaginary, for there never was such a thing; but there has never bee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ormiest seas, when the dominant forces that controlled them were not those which, if left entirely alone, would reduce their waters to a static condition. Gravity, fluidity, pressure,

and nothing else, would have the effect of making the sea level and motionless. With all the movements that winds and tides produce, these influences are still the dominant ones. The ocean does not leave its bed, and the depth of it does not greatly change. The surface, considering its size, shows only trifling irregularities. If we take only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ocean, we are tempted to say that a static philosophy of it is sufficient and that we may treat waves and currents as minor aberrations due to “disturbing influences.”

对纯粹静态的那种状况所作的描述，讨论的实际上就是现实。只有略而不提现实社会的某种状况，那才会是虚构的社会。因为这种描述所显示的，就是在这个真实的动态世界中起作用的那几种因素中的一个。导致我们刚才描述的团体调整的那几种影响，以及这种描述所涉及的一切，都不是虚构的：它们都是与地球上存在的一切同样真实。在各种动态因素导致的最急剧的混乱中，它们始终起着作用。我们曾经以海洋做例子来详加说明。假如我们说静止的汪洋大海，就是一种虚构，因为汪洋大海何尝有过静止的片刻。即便在暴风骤雨频生、危害最强的海洋历史上，也从未有过静止的时刻，也会把海洋变为静态的势力所控制。地心吸引力、流动性、压力等都会产生使汪洋大海呈现出平静的影响。就风和潮汐导致之流动来说，上述这些影响还是主导因素。海洋并没有改变它的位置，海的深度并没有大的变化。考虑到其规模，表面所显示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不规则性而已。假如我们只是俯视海洋，那我们并不想说海的某种静止哲学就是充分的，我们可以把波涛和潮流看做是由于那种“干扰性影响”而发生的较小的异常变化。

Such a physical science would, however, never serve its purpose. Changes must be accounted for, even though a body may keep a form that approximates the static one. A social science that should not deal with evolution would likewise be entirely

unsatisfying, since change and movement are in the highest degree important. The forces of change, however, can never be understood without first having a knowledge of the forces of rest. Without a knowledge of the action of fluidity and pressure, one could never comprehend the effect of wind upon the ocean; and without a knowledge of the shape to which competition alone would reduce society one could never understand the action of the changes that we have termed dynamic.

不过，这样一种自然科学绝对不会达不到目的。即使是保留近似静态的一种状态，我们也会发现它的变化。如果社会科学不研究进化和演变，那同样也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世界上的一切在没有比变化和运动更重要的了。不过，不首先懂得静止的因素，那就别想动得变的因素；不了解流动性和压力的作用，风之于海洋的影响也就永无了解之日了。不了解流动性和压力的作用，风之于海洋的影响也就永无了解之日了；不了解仅凭竞争即可使之成型的社会，人们就永远理解不了我们已称作动态的种种变化作用。

The static state which has here been pictured is the one toward which society is at every instant tend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petition. The static system of groups and sub-groups should, then, be thought of as an ideal arrangement, projecting itself through the disturbed and changing group system of actual society just as the imaginary level surface of the sea projects itself through the waves. We need, above all things, to see the static society as it is. It is not a monstrosity unconnected with the real world: it is a shape and a mode of action that the real world carries within it. That we may grasp the essential reality of it, we must describe, at least in outline, the movements that are going on and show how static forces are related to them; for, unless it be seen that these

forces are really working, we shall encounter the accusation that our whole science is a sublimation of theory. What we have to see is how static laws operate in a dynamic state. How do the standards of value, wages and interest—which, in the Ricardian sense, are natural—make themselves effective, in the midst of such violent movements as are going on? This we must know, if we are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static theory.

这里所述的静态状况，是社会在竞争的影响下任何时候都趋于呈现的一种状况。因此，这种团体和小团体的静态体系是应该视若某种理想安排的，而这种安排，就像此前那种想象的海平面是从澎湃的波涛中产生的那样，是借助于显示的社会那种受了干扰的变化着的团体体系中产生的。首先，我们要注意按照现况看静态社会。静态社会不是与现实世界毫无关联的某种荒谬世界，它是附着在现实世界的某种有条理的安排和一种行为方式。但凡我们要理解这种社会的实质性情况，我们就得至少提纲挈领地描述这种社会发生中的那些变化，而且说明静态因素是如何与那些变动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除非真的是这些因素起着作用了，否则，我们就会遭到指责，说我们的整个科学是纯粹的理论。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静态规律如何在动态状况下起作用。价值、工资和利息的标准等——按照李嘉图学说所指出的，都是自然的——在发生着剧烈变动中，他们是如何产生预期结果的。如果要懂得静态理论的重要性，这就是我们必须知道的。

Every one of the five dynamic changes above specified disturbs the static adjustment of society: after any one of them, static law sets itself at work to produce a new adjustment. In actual life it cannot complete this rearranging work before a new disturbance occurs; and so the actual state of society is alway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state to which static forces alone are tending to bring it. An endless series of changes of a single kind would cause

value, wages and interest forever to differ from static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What the world actually experiences, however, is a perpetual series of each one of the five typical changes, going on together: population is continually increasing, capital is growing, methods of production are perpetually improving, a great centralization of industry is going on, and wants are forever increasing in number and variety.

上述一一列举的五种动态变化中，每一种都扰乱社会的静态调整。仿照其中的任何一种，静态规律都力图引起一种新的调整。在现实生活中，先于某种干扰而重新进行调整，这是做不到的。因此，实际的社会状态总有些不同于静态因素促成的那种社会状态。另外，无穷系列独此一种的变化，就会导致价值、工资和利息的永远有别于静态的价值、工资和利息。不过，是加上，世界所经历的是永久系列和在一起的五种有代表性变化中的一种：人口持续增长，资本有增无减，生产方法持久完善，产业大规模聚集，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和品种永远递增。

By the aid of static theory, we can begin to make dynamic studies; and the first step is to examine each one of these changes separately, in order to see, first, how it causes actual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to differ from static standards and, secondly, how it causes the standards themselves to change. It remains for dynamic theory to show what happens when all these changes go on together. To this end we must ascertain what is the grand resultant of five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change, all of which are continually in progress. Obviously, from all these changes two general results must follow: first,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will differ from the static standards; secondly, the static standards themselves will always be changing. The ultimate fruit of a dynamic theory is an

ability to account for the direction and the rate of these changes.

借助于静态理论，我们可以动态研究了。第一个步骤是分别研究这些变化以弄明白：（一）每一种变化是如何引起实际价值、工资和利息有别于静态标准的；（二）每一种变化又是如何引起标准自身变化的。至于这些变化一起发生时又会产生怎么的情况，那就留待动态理论予以说明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确定五种不同的，持续的社会变化。显而易见，鉴于这一切变化，两大结果必然相继产生。首先，价值、工资和利息都将有别于静态标准；其次，静态标准自身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一种动态理论的最终成果就是一种能力，凭借这一能力就可以就这些变化的方向和速率作出解释。

Our study, therefore, should reveal—in no detail, indeed, but in the most general way—what is the effect of each of the five changes that have been called dynamic. It should show how each of them, separately considered, takes society out of the static condition, and what kind of changes it produces; and it should also show, in the same brief way, how these five changes affect society, when they are all in progress together. In fact, they largely neutralize one another, so far as group arrangements are concerned, and cause the actual form of society to hover much nearer to the theoretical static form than would be possible if these influences worked separately. Values, wages, interest and profits are much nearer to what they would b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petition alone than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have them if there were fewer disturbing forces working.

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揭示——实际上，不必详尽，而是最总括地——称为动态的这五种变化中的每一种的影响是怎样的。该研究应该说明，这五种变化中的每一种是如何使社会排除静态状况的，以及

每一种变化又产生了什么结果。这种研究还应该简略地表明，这五种变化共同进行时，它们是怎样影响社会的。事实上，就团体调整而言，他们多半是相互抵消的，因而与这些影响分别发挥作用的情况，与所可能发生的情况相比，它们会使社会的实际状况与理论静态近似多了。价值、工资、利息和利润，比起作用的干扰因素少一些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与处于完全竞争影响之下所能达到的，就近似多了。

Variations from the static standards are not the only things to be accounted for. They are a part of what economic dynamics has to investigate but they are a relatively small part. The whole science of economic friction, which accounts for the variations of actual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from certain natural standards, is a smaller science than that which accounts for changes in the standards themselves. Every one of the great dynamic changes alters those static values and changes those static rates of wages and interest toward which actual rates are tending. The kind of dynamic change that is most useful for the illustration of this point is brought about by an improvement in the methods of production. Thus, an invention makes it possible to produce something more cheaply. It first gives a profit to entrepreneurs and then, in the way that we have described, adds something to wages and interest. This is equivalent to a creation of new wealth. It has made a definite addition to the income of society, and from the moment when the improved method has been put into operation the static standard of wages has been higher. The rate toward which the pay of labor is now tending is not what it was before the invention was applied, but it is a new and higher rate. Wages now tend to equal what labor can now produce, and this is more than it could formerly produce. When the full fruits of this invention shall have diffused themselves throughout society, the earnings of labor will equal the new standard rate.

变化的静态标准的程度，不是要给予解释的唯一情况。这一变化程度固然属于动态经济学必须研究的一个部分，但这是相对小的一个部分。整个论述经济阻力的科学，即对实际价值、工资和利息偏离某种自然标准的程度作出解释的科学，是一门比对标准本身的变化作出解释的科学的次要的科学。几大动态变化中的每一大变化都改变那些静态价值，而且改变实际工资率和利率趋向于实现的那些静态费率。最有助说明此观点的这个例证的动态变化，现已由生产工具的某种进步所引起了。例如，一项发明就使生产某种东西的成本降低了。这种发明首先是企业家从中获得利润，然后以我们做了说明的那种方式，是工资和利润都有所增加。这就相当于创造了新的财富。自从先进的生产方式投入生产那一时刻起，静态工资标准就已较过去高，社会收入显著增加。现在行将实现的劳动工薪率，不是发明付诸应用前的那种工薪率，而是一种新而更高的工薪率。现在，工资是行将与劳动现在所能产生的相等了，比以前所能产生的多了。当此发明的全部成果广泛应用于社会时，劳动的收益就将等于新的标准工资。

Let another invention be made that also effects an economy in production. It also creates a profit; and this profit, like the first, is an elusive sum, which entrepreneurs grasp but cannot hold. This sum, like the former one, slips in time through their fingers and bestows itself on all members of society. At the moment when the second invention is applied, then, there is a new and still higher standard established for actual wages; and they will pursue that standard till they reach it, though before they do so a still remoter and higher standard will be before them.

且让再有新的发明得以实现，而且是也会有利于生产的。那么，它就会创造利润；这一利润与前一利润一样，也是令人大惑不解的一个数额，企业家以为是利润，但是无法拥有。这个数额跟前一个一

样，最终错过机会，为社会全体成员所有了。第二个发明付诸应用时，又为实际工资确定了一种新而高的标准，而实际工资将追求该标准直至达到标准，尽管过些时候，在其达到该标准前，还将推出更高的标准。

If improvements in production occurred only at intervals long enough to allow a complete diffusion of the fruits of one improvement before another one should be made, the results would be simple. At a given time, one static standard for wages would be established; and, by the influence of competition, the actual pay of labor would be made to conform to it. Then another, and a higher, static standard would be established; and during the following interval wages would slowly be brought up to that level. Then a still higher standard would result from some further invention, and actual wages would pursue and overtake that one. There would, in short, be a succession of static standards for wages, each of which would be somewhat higher than the former one; and the actual rate would move upward, overtaking first one of the standards, then another, and then another. At distant intervals, but only temporarily, would the actual and the static rate coincide.

假如生产的进步每隔一定时期才发生的，而且这一间隔期还相当长，足以使某种进步的成果广泛应用于社会，而后才有可能完成另一项进步，那么，这种成果就是简单的。每隔一定时期总会有一项竞体工资表准得以确定，而且因为有竞争的影响，劳动的实际工薪与标准相符了。于是，新的意向更高的静态标准得以确定了。在这一间隔期内，工资缓慢地到达那一规定的水平。接着，某种新的发明取得成功，再高一些的工资标准推出，实际工资达到而且超过那一标准。总之，会有一系列的静态工资标准相继推出，每一项标准都高于前一项；而实际工资率也渐次提高，且每一次的提高幅度都将高于前一

次。在更远的间隔期内，会短暂地出现实际工资率和静态工资率相一致的情况。

If, instead of occurring at intervals considerably separated, the improvements in industrial methods were continually taking place,—if one followed another so closely that, when the second occurred, the fruits of the first were only beginning to make their impression on the earnings of labor,—then, as a result, we should have the standard of wages moving continuously upward and actual wages steadily pursuing the standard rate in its upward movement, but always remaining by a certain interval behind it.

假如生产方法的改进不是每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进行的，而是持续进行的，它们紧密到这样的程度，乃至第二次发生时，第一次的成果才刚刚开始对劳动的收益产生作用，那么，其结果就将使工资标准不断提高，而实际工资也紧紧追逐不断提高的标准工资率。不过，又总是因有某种间隔期而保持不变的工资率的。

This process represents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industry. Improvements are, in fact, occurring so rapidly as to tread upon one another's heels. They take place in all the different groups and sub-groups of which society is composed, and every one of them does its minute part toward pushing upward the standard of pay for all labor. Obediently to the laws of competition, the actual rate of pay responds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improvement and moves in pursuit of the rising standard. But it never reaches that standard: at no one instant of time is the pay of labor what it will be, when the full effects of improvements that have recently been made shall have taken their final shape, as an addition to the earnings of laborers

and capitalists. In every single instant there is a static standard—and this is the point that is now of importance for us—which is defined by the principles that we have described. Select that society which is fullest of life and of economic disturbances, the most enterprising of societies, and you will find that it is subjected to the most revolutionary changes. On any particular day we can say that static law governs that society, establishing for workers a rate of pay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actual rate; though, after an interval that dynamic principles can account for, the actual rate will reach it. The society is thus dominated by static law; for the standard of pay for labor at this moment is what the actual pay would be, if we were to stop all dynamic changes and let the fruits of the changes that have thus far been made convert themselves into additions to wages and interest. Dynamic science studies the variation of the present actual rates from the static standards and the interval that it will take to make them coincide with those present normal rates. It studies the velocity of the upward moving standard of wages and that of the pursuing rate of actual wages, as well as the rapidity of the downward moving normal rate of interest and that of the pursuing actual rate.

这个过程，就各行各业的现实状况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实际上，生产方法的改进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一次与另一次接踵而至。这种改进发生在构成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团体和小团体中，其中的每一个团体或小团体在推动和提高所有劳动的工薪上，都起着各自微小的作用。即恪守竞争规律，实际工薪率与生产方法改进相呼应，不失时机地追逐节节提高的工资标准。不过，工资率从来都未曾达到过那一工资标准。作为劳动者和资本家收益的部分增量，近年来实现的生产工具改进的全部影响在其呈现最终结果时，劳动的工薪在任何一个时刻都不知究竟会怎样。时刻都有某种静态标准——而这，就是现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核心问题——就由上述原则说明的标准。选择到

处充满生机和经济混乱的社会以及最富于想象力的社会，你就会发现，这种社会在经受着革命的变化。在任何具体的一天，我们都可以说，静态规律适用于那样一种社会，它为劳动者确定了高于实际工薪率的一种工薪率，尽管在经过静态规律能给作出解释的一个间隔期后，实际工薪率就会达到那种工薪率。由此可见，社会是由静态规律所支配的。因为，这时工资标准是所有动态变化停止，并变化的结果转化为工资和利润的增加使应有的实际工资。动态经济学是研究当前工资率和利率偏离静态标准的程度，以及使之与现行的正常费率相一致的那个间隔期的。它还研究工资标准上调的速度、追求现行工资率的速度，以及正常利率下降和追求实际利率下降的速度。

We have frequently used the sea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static and the dynamic aspects of industrial life, and it will again serve our purpose here. There is, then, an ideal surface of the ocean, perfectly level, which projects itself through the actual waves. Stop the winds, letting the waves subside and the troughs between them become filled, and the sea will take an actual surface that will conform to this imaginary one. This is like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 dynamic movements of society were to stop and allow competition to do its work, in diffusing profits and making earnings normal. If, however, there were at work some force that continually raised the static surface of the water, so that a calm occurring to-morrow would bring the water to a level that would be higher than that which would result from a calm to-day, the case would resemble that of the world of industry.

我们常以海洋为例来说明产业状况的静态和动态方面状况，它在这里还适用。于是，有一种理想的海洋洋面，它是完全平的，只因波涛而起伏。止住了风，使波涛归于平静，使波谷填平，海洋便呈现出实际的水平面，他与想象的水平面相一致。这就如要是社会的动态变

动得以阻止，因而使竞争得以发挥作用那样，利润得以扩散，收益归于正常。不过，要是有某种因素起作用了，继续使静态的水平面提高了，因而平静的次日就会导致水平面高于由平静的今天所呈现的水平面，这是一种类似于产业领域的情况。

The improvements that are going on make additions to the whole income of the world. They disturb existing static adjustments, indeed, and in this respect they act like winds that toss up waves; but they do more than this, for they raise the entire height of the future sea, waves and all. For this also we can present a marine illustration. Pile somewhere on the surface of the sea a mountain of water and then let it subside, sending its great waves in rings that widen till they reach the outermost parts of the ocean. This makes disturbances, of course, for it takes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out of that level and motionless state in which static law may be supposed to have left it; but it adds new water to the ocean and, when the surface shall again be quiet, it will be somewhat higher than it was before. Such a single mountain of water, piled somewhere upon the smooth sea, illustrates what happens, whenever a single improvement in production is so made that static law is left alone to dispose of the fruits of it. The addition to the wealth of society is like the addition to the waters of the sea, for the improvement has made the real earnings of men vary from the theoretical rate and has raised that theoretical rate itself. Such waves, piled upon the ocean at such intervals that each one would subside before its successor appeared, would act like those improvements which come at considerable intervals. Each wave would disturb the existing surface of the sea and make the new surface higher than was the former one.

继续着的各种生产方法的改进，使世界的整个收入都有所增长。这种改进，实际上是扰乱了现行的静态调整的。在这一点上，它们所起的作用就像是推波助澜的风，但是所起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因为风还会是未来整个海平面、波涛以及一切的水平高度提高了。就此，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个海上发现的例子以为佐证。海平面某处有一座山隆起了，如果令它沉没的话，则势必激起汹澎湃的巨大波涛，进而扩大至抵达大洋最远处地彼岸。这当然是弄浪滔天了，因为它打破了原以为静态规律维持的那种风平浪静的洋面水况。而且波浪滔天所致，是海洋增加了新的水，使那个原以为会再度寂静下来的海平面涨高。这样隆起于平静之海某处的一座海中之山，正例证了一旦生产工具的某一种进步，如果是全凭静态规律处理其成果的话，那么，将来所发生的情况就会如此。社会财富的增加就像海水的增加一样，因为生产工具的进不会使每实际个人的收入有别于理论工资率，且还使理论工资率自身也提高了。起伏的海浪的作用就想每隔很久才相继出现的产业改良，每一次的波涛都会搅乱原先的海平面，而且又都使海平面升高。

Now, let the mountains of new water come in such quick succession that, just as one is beginning to subside, another makes its appearance. Let them be scattered all over the ocean, so that the ring-like waves, as they move outward, intersect one another in every direction. At every instant the waters are trying to conform to some static level, but at no two successive moments are they trying to conform to the same level; for they are pursuing an ideal and level surface that is continuously rising. Now we have the figure of what is occurring in society—the figure that describes the movement of wages, which move ever upward, hovering always about a static standard but never for two successive moments about the same standard.

现在，假设新的洋面内的山是如此接连不断涌现，乃至一座山刚刚下沉，另一座山有隆起了。假设这些山都是散布于整个大洋的，因此，环状波浪待其往前涌动时，它们在四面八方就都相互交织在一起了。海洋面地水每每一时刻都试着与某种静止的水平相一致，但绝不在两个连续的瞬间欲与同一水平相一致，因为这些水在追逐某种理想的平坦的水面。然而，水面又是不断升高到理想的水平。现在，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动与上述海平面状况相同，我们可以以此来说明工资变动的概念，也即工资总是上涨的，他围绕着某种静态标准上下波动，但他不会在两个连续时期围绕同一静态标准上下波动。

These changes themselves and their effects are all subjects for economic dynamics. Static science recognizes one natural standard of wages for one time; but static laws, pure and simple, as they work in an actual and dynamic society, never give the same rate at different dates, but rather an endless succession of static rates. Dynamic forces create conditions in which there must be one static rate of pay to-day, a higher one to-morrow, and a third and still higher one the day following.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fact about the action of static law in the world as it is.

这些变化本身及其影响都是动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静态经济学是一段时期只认可一种自然工资标准的纯粹而又简明的静态规律，正如它们在某种实际而又动态的社会中起作用一样，从不给不同时日规定统一工资率，而是规定连续一连串的静态工资率。动态因素创造出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是今天规定一种静态工资率，第三天，还有第三天以后等等的每一天，都规定一天高于前一天的静态工资率。这就是静态规律所起的作用的基本事实。

Dynamic science deals with profits in their original state, as

normally created by improvements in industry, in the proceeds of which the entrepreneurs have a share; while static science deals with them in their later and permanent state, as they are transmuted into increments of wages and interest. How some employer is now getting rich, dynamic science can tell us; but how it is that wage-earners are getting benefits from improvements of an earlier day, static science tells us. Profit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are larger when they become additions to wages and interest than they were when they existed in their initial shape, as entrepreneurs' gains. When they slip out of the employer's hands, they grow. In the diffusing they become greater in the aggregate. The competitive law that gives them over in the end to laborers and capitalists thus gives more to these classes than it takes away from entrepreneurs. The whole output of industry is at its maximum when the agents, labor and capital, are apportioned among the groups in a perfectly normal way; and that is when they have moved to the groups where profits have existed, till these gains have vanished and wages and interest have absorbed the whole social income.

动态经济学论述的是原始状态的利润，这种利润是经济进步的正常结果，其中的一部分归企业家所有；静态经济学论述的则是此后成永久状态，即变成工资和利息增量的利润。动态经济学要告诉我们，某雇主怎么变得越来越富有了；而劳动者怎么因某些行业的状况有所改善而得到了利益，这则是静态经济学所要告诉我们的。重要的是，利润在作为工资和利息的某种增量时，与其存在于其最初形式即企业主利润时相比，利润额要大。利润再不为雇主所控制时会增长。而它们扩散时，会作为一个总体变得更大。最终把利润留给劳动者和资本家的竞争规律，导致给这些阶层的与从企业家那里取走的相比，还要多一些。整当劳动和资本在各个团体间分摊得完全恰当的时候，也就是劳动和资本不断移入能够获得利润的团体，直到利润完全消失，而全部社会的收入却被工资和利息吸收时，产业的总产量就达到了最高

值。

The interval between actual wages and the static standard is the result of friction; for, if competition worked without let or hindrance, pure business profit would be annihilated as fast as it could be created—entrepreneurs, as such, could never get and keep any income. The annihilation would consist in converting profit into another type of income and making it larger in the operation of conversion. Dynamic theory has to account for the whole of that friction on which entrepreneurs' shares depend; while static law determines what wages will be, when the friction shall have been completely overcome, and what they would be at this instant, if friction were immediately to vanish.

实际工资和静态标准之间的间隔期，这是阻力的结果。因为，加入竞争没有受阻且不存在障碍的话，那么，纯粹的商业利润就会丧失殆尽——企业家本人绝不可能得到并保持任何收入。上述丧失殆尽的商业利润，是指变利润为另一种收入，且使这一收入在此转换中变得更大一些。动态理论必须对决定企业家所占份额的整个阻碍作出解释，而静态规律则是决定，一旦这种阻碍将给予彻底克服时工资会是多少，以及假如阻碍及消除时工资又当是多少。

Dynamic theory reveals a caus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nterval of which we have been speaking and the rate at which wages are increasing. Were it not for that interval, entrepreneurs, as such, would get nothing, however much they might add to the world's productive power. They would have no incentive in self-interest to make any improvements, and it is clear that additions which are difficult and costly would be in danger of not being

made. Profit is the lure that insures improvement, and improvement is the source of permanent additions to wages. To secure progress, this lure must be sufficient to make men overcome obstructions and take risk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ctual pay of labor and the rate toward which, at a particular date, it tends, measures the incentive that is offered to the men who make progress possible. Because to-day laborers are not getting the fruit of the improvement that was made yesterday, employers can make something; and because they can make something transiently for themselves, they make permanent additions to wages.

动态理论解释的是前以提及的那种间隔期与工资递增率之间的某种因果关系。要不是存在间隔期的话，不论他们给世界的生产力增加多少，则企业家就会一无所获。这样，他们就会对任何精益求精之举都无动于衷了，而既困难又耗资的提高产量的举措，显然会处于无人问津的危险境地。利润是确保工具等得以改进的动机，而生产工具等得以高精尖化，则是工资持久有增无减的动力之源。为确保工具的改进，这一动机必须充分到足以能使人们克服障碍并敢于冒险。实际工资所趋向的标准不同，可以衡量改良者将得到多少报酬去从事改良。由于今天劳动者们得不到昨天工具改进的成果，雇主们才可以得到收入；由于雇主们可暂时得到收入，因此，他们也就可以是工资不断得到提高。

Dynamic theory has to show how great is the interval that insures the maximum rate of progress—how much entrepreneurs need, in the way of profit, in order to make them do all that they can do to keep wages moving upward. This subject is intricate, as are all subjects in dynamics; but very simple is that static theory which shows that, however great may be the profits, wage-earners will in the end get the lion's share. The vast sums that to-day are

accruing to the rich, who do the marshalling of the industrial line, are bound, under static law, to add themselves with an increase to wages and interest. They add themselves, moreover, chiefly to wages. By the time that they have done this, indeed, gains from new sources will be accruing to the captains of industry, so that there will always be profits. But this gain will not long be obtained from any one source; for, if we can identify the profits of to-day, we shall have something that static law will claim as its own and will by to-morrow, as it were, make over mainly to laborers and to the owners of the tools of work. Dynamic forces, then, account to-day for the existence of an income that static forces will begin to dispose of to-morrow.

动态理论必须证实确工资与静态标准要有多大的举例，才能确保最大的进步，就是要说明企业家要得到多大的利润才愿意尽其所能维持工资上涨。这个问题就像动态经济学中的所有问题一样，也是错综复杂的；但非常简单的是，静态理论所能证实的是，不管利润究竟有多大，可最终劳动者所能得到的也就是适当的份儿而已。今天做着产业领域管理工作的富人所得的巨额财富，按照静态规律来说，一定是与工资和利息的增长相加而成的。他们所得的财富主要是加在工资上。实际上，在他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来自新的来源地收益就会给企业的老板带来好处，因而就总有利润。不过，这利润难以持久，因为加入我们得了今天的利润，那我们就会得到静态规律下的利润，而明天就可以把他的多半转让给劳动者和工具所有者了。因此，动态因素是为静态因素明天将开始转让的一种收入的存在作出解释的。

The velocity with which all standards move is a subject for the latter part of the theory of distribution. Velocities, directions of movement, obstructions, intervals—with these dynamics must deal, and with none of them has static theory, as such, anything to do. It

does deal, however, with near goals. It tells what the rate of wages would shortly be, if evolution were to cease. Static forces, then, are of vital importance in the midst of all manner of social changes. For study here we have singled out one alone of the typical dynamic changes—that, namely, which takes place in methods of production; and we have examined the effect of it on one of the shares in distribution, namely, wages. But each one of the other four dynamic changes similarly transforms society and changes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所有标准实现改变的速度都是分配理论的后部分的主题。速度、改变的方向、障碍、间隔期——这一切，都是动态经济学必须论述的，而静态理论则与之毫无关系。不过，静态理论还是论述近期目标的。它表明，如果演变停止在即的话，那很快就会有何种工资率。由此可见，它在各种的社会变化方式中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这里的研究方便起见，我们只是从那几种有代表性的动态变化中挑选出了一种，即发生于生产方法中的一种。我们以研究了生产方法的改变对分配的各部分之一即工资的影响。不过，其他四种动态的变化，每一种都相似地改变了社会，改变了价值、工资和利息。

It is clear that static law is entirely operative under dynamic conditions. Not one jot nor one tittle is taken from its full efficiency by inventions, by new organizations, by growth of population, etc. Let there be, for example, an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is increase shall occur in such a way that every group and every sub-group will naturally and without any further adjustment have its normal share of new laborers. The increase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is likely to be in some degree localized. One geographical locality will have more of it than another has; and in the geographical locality where the population is densest it is

impossible that all the different sub-groups in the industrial system shall be equally well represented. If the newcomers drift to a section where (say) textile manufacturing is a specialty, these industries will get more than their share of the new labor.

显而易见，静态规律是完全在动态条件下起作用的。静态规律的效率，丝毫不是因为各种发明、新的组织、人口增长等的影响。例如，就算是人口增长了。但这一增长也绝不会以每个团体和每个小团体自然地而不存在任何调整的形式得到正常数额的新劳动者。劳动人口的这一增长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局部的。这一增长，一个地区会比另一个多一些，而且，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人口的增长上，产业体系中各种不同的小团体都是不可能均分的。假如新劳动者纷纷流入纺织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就会得到比其他行业多一些的新劳动者。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 diffusion of the local excess of population will take place. As all industry uses land, such a local excess of inhabitants may be treated as an overcrowding of land, even though the occupations that flourish in the more densely populated region are not mainly agricultural. One of the permanent static laws which we have presented in the foregoing chapters now calls for what we have treated as a reapportionment of land among the sub-groups. Literally, it results in a certain dispersion of labor and capital over the large area that is at their disposal. Rent is at its maximum, as we have seen, only when land is in a certain combination with labor and with capital; and each section of the land must have a certain normal share of each of the other productive agents combined with it. But this condition is impossible, where an undu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originally locates itself in some one place. Static law must, then, make a local

diffusion of the excess. An influence that will cause the overplus of population to move is the tendency that it has to diffuse itself among different groups and sub-groups; for in the crowded neighborhood these are unevenly represented, and to reach them in natural proportions the labor must migrate. There is a definite number of men who are, as it were, due to the shoe-making trade, and a certain other number who are due to iron smelting, etc. Every occupation, under static law, has its claim on a certain definite proportion of the new laborers who are coming on the scene, and it will get them by such a diffusion. The mere crowding of land itself is a further influence that acts in the same way.

在这些情况下，当地多余人口地某种流动就会发生。由于产业必占用土地，因此，当地居民的这一过剩就可能导致土地过于拥挤，尽管人口还要稠密的这个地区欣欣向荣，却不是以农业为主。我们在前几章已经描述过的持久的静态规律之一，此时，是要求我们视若在个小团体的某种土地再分配。的确，该规律是导致劳动和资本在大面积的任其利用的土地上分散。正如我们指出的，地租是只有土地与劳动和资本呈某种组合的时候才达到其极大值；而且，该土地的每一份，都得由他种生产要素中的每一种与之组合。不过，如果某些地方人口聚集过多，这种情形就不可能出现。因此，静态规律必然是过剩人口扩散开。使过剩人口移动的影响，就是这些人口分流道各团体和小团体中的趋势。由于在人口拥挤的区域，团体和小团体中人口分布不均匀，为了均与起见，工人们需要移动。有一个明显的人数，可以用来说明某些人应归属制鞋业，而另外的某些人则应归属于炼铁业。按照静态规律，每一种职业都有权要求这些新劳动者占有某种明确的比例，而且会经由此类扩散进而获得此比例的新劳动者。土地的密集利用其本身，也是以同样方式起作用产生一种影响。

If the influx of population occurred all at once and then

stopped, there would be a time when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would all be unnatural, in the sense of deviating from static standards. Then they would slowly approach those standards and would ultimately reach them. So long as an undue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is in any one sub-group, values cannot be natural in the static sense. Moreover, while the groups are out of balance, the whole amount of wealth produced is somewhat less than it normally should be, and neither wages nor interest is at the static maximum. The influence, then, that apportions the new working force among the different sub-groups readjusts values by raising some and lowering others. In the second place, it steadily raises both wages and interest, by causing both labor and capital to produce in the aggregate more than they did before.

假如人口的涌入，无论开始还是结束，都带有某些突发性质的话，那么，就价值、工资和利息偏离静态标准的意义来说，就都会呈一时之反常性。然后，它们会缓慢地接近那些标准，而最终达到那些标准。只要有任何一个小团体的人口比例存在不恰当的情况，在静态意义上，价值就断无正常的可能。此外，当各产业群失去平衡时，生产的财富总量就不会有情况正常时那么多了，因此，不论工资还是利息，就都不是处于某种静态最高水平的了。因此，在各种不同团体分配来的新劳动者，其影响所及，也就是对价值作出重新调节，有的价值给升高，有的降低。另外，这一影响还使劳动和资本所形成的产量都比过去高了，工资和利息而也得以不断提高。

A second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lso more or less localized, would cause another disturbance and another re-adjustment like that we have just described; and a long series of such enlargements of population would, so far as this one influence goes, cause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first to deviate from the static standards, then

slowly to conform to them and then to deviate from them again.

人口的第二次增长或多或少还是仅限于局部地区的，会造成一如前述的另一种干扰和另一种重新调节；另外，一系列的人口增长，就这一影响来说，会导致价值、工资劳动，首先是偏离静态标准，而后则缓慢地符合静态标准，继而又偏离静态标准。

When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is not intermittent, but continuous, the effect is to cause a perpetual deviation from the normal standards. Some groups and sub-groups are, so to say, the receiving ground for the new laborers and pass them on to the other sub-groups in which they are to stay permanently. The receiving ground is necessarily overcrowded; and, though there may come a time when it parts with laborers as rapidly as it gets them, something of the effect of the original overcrowding continues forever. This single dynamic influenc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causes the values of things produced by the groups and sub-groups to which the labor comes earliest to be unduly low—meaning by "unduly" that they are lower than the rates at which a static adjustment would fix them. It also causes the values of other things to be, in the same special sense, unduly high.

如果人口增长不是断断续的而是持续不断地话，则其结果就会引起偏离正常标准的现象，而且是长期偏离正常标准。有的团体和小团体，可以说是新劳动者的接收站，然后再把他们转交给他们要久留的小团体。这种接收站势必呈一时之人满为患的现象；而且，尽管这种接收站终有一天会与接收的那些劳动者很快分配的，然而，一开始那种过度拥挤的影响却是经年累月的。人口增长独此一项动态的影响，就会使各团体和个小团体的产品的价值变得分外地低，而所谓“分外

地”，就是意指那些产品的价值比某种静态调节会给它们确定的价格还要低一些。这一影响使他种物品在同一特殊意义上的价值分外地高。

What we have said about the increase of labor is equally true of the increase of capital. We could, indeed, substitute the term “capital” for “labor” in the entire foregoing statement and so make it describe what occurs by reason of the fact that the fund of productive wealth is enlarging. The influx of capital must, in the same way, be at first somewhat localized. It is not possible that it should originally appear in each of the different sub-groups or in each of the localities in exactly the proportion in which static law will finally place it, and for this reason capital must move. There must be the recombination of land and of auxiliary capital that the law of rent requires; and until static law has in these ways asserted itself values will not be natural. In the interim, the sub-groups that are the receiving grounds for the new capital will turn out an excess of products, receiving lower prices for them.

我们有关劳动的增加和资本的增加所讲的是同样的。实际上，在前面整个阐述中，我们都可以用“资本”代替“劳动”，而且就用它们来说明生产资料储备的扩大这一事实所出现的情况。同样，资本的流入也必须首先是局部的。资本的流入起初就不应该置于各不同的团体中的每一个小团体或每一个地方，开始时决不能正如静态规律最后所安排的比例而增加。就应为这个原因，资本就必须具有流动性。土地与配套资本必须重组，同时这也是地租规律所需要求的。而且，只要静态规律在这几个方面为得体现，价值就才会是自然的了。在此过渡期间，接受新资本用地的各个小团体都将生产出过剩的产品，因此，价格势必降低。

An intermittent growth of capital might cause values to be abnormal, then normal and then abnormal again; but a continuous growth of capital will keep values in some small degree perpetually abnormal, in the special and narrow sense of the term, for it will cause them always to differ from the static standards. In the finer and truer sense, it is natural that they should thus differ from these standards; since it is entirely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 that capital should steadily increase and that the increase of it should be in a measure localized. The values which in a dynamic society are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and thus, in the higher sense of the term, natural—are the values that deviate from the static standard by a natural interval. The localized increase of capital, like that of labor, keeps general wages and interest by a real, though slight, interval below the static standards. The lower actual rates are in a true sense natural, if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and the standard rates is a normal one.

资本间断性增长会导致价值反常，而后趋于正常，继而再度反常；但是，资本持续增长，狭义上来说，会使价值在一定程度持久不正常，因为这种增长将使价值有别于静态标准下的价值。在严格和精确的意义上来说，价值应有别于这些标准，这才称得上是自然的，以为基本的不断增加具有地方性，这都符合自然。动态社会中与自然一致的价值——该词在更高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即使是自然——是偏离静态标准的一个自然间隔期的价值。资本在局部的增加就像劳动的增加一样，也使一般工资和利息低于静态标准下的一个实际而又短暂的间隔期。低一些的实际费率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费率，要是这种费率与标准费率的差距是一种正常差距的话。

Let us now apply these principles to the third dynamic change which we have noticed—that resulting from inventions or

improvements in method. The effect of this change on value is much less steady than is that of an increase of population or of capital. Inventions appear now here, now there and now elsewhere. They lower the price first of one thing and then of another; and, from the moment when the labor-saving machine begins to work in producing a particular article, there is a new static standard of value for that article and for all others. When the machine shall have produced its full effects, more of the goods produced by it will be constantly offered for sale and the price of them will be lower. From the outset this lower price is the static or, in the narrow sense, the natural price. At first the actual price is higher than this, but it tends gradually to conform to it.

现在，我们再把这些规律应用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第三种动态变化中，即源于发明或方法的改进的那种变化。此种变化对价值的影响，与人口增长或则本增加的变化相比，它不稳定多了。发明有时候会发生在这里，有时候又会发生在那里，有时候又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发明总是先降低一种物品的价格，然后又降低另一种物品的价格；而且，从那节省劳动的机器开始发挥作用及生产某种物品的那个时刻起，就有了该种物品和其他物品的一种新的静态价值标准。当这种机器满负荷运载且产生的效果已到极限时，它所生产的物品就越来越多地提供待售，这样，其价格就要下降了。从此开始，该低价就是静态价格或者狭义的正常价格了。一开始，实际价格高于此价，但终于逐渐与它相一致。

If inventions were confined to one group and if they occurred intermittently, the standard value of the product of that group would first go down with a sudden drop, then it would remain stationary awhile and then, as the result of the next improvement, it would drop again. If the standard continued stationary long

enough, actual value might fall to the static level and remain there for a while. Static value dropping and coming to a halt, actual value gradually falling but at intervals overtaking the descending standard—such is the condition of an industry in which inventions are made, as it were, by fits and starts.

如果发明仅限于一个产业群，如果发明是呈周期性的，那么，该产业群的产品的标准价值就会先是走低突降，然后再接着维持稳定片刻，继而由于接着的一次改进，价格会再度下降。假如该标准继续稳定足够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实际价值就可能降至某种静态水平，且维持一段时间不变。静态价值下降了一段时间，接着又稳定，实际价值逐渐下跌，但有时与下跌的标准持平，这就是在突然出现新发明的情况下产业的情况。

If improvements go on continuously in one industry and in no others, the actual value of the goods there produced is always pursuing a standard of value that is steadily descending. Both values are falling, but there is an interval between them; and, if the interval is a normal one, the actual value may be said to be natural in the true sense of being in conformity with nature. The dynamic standard of value is a moving one; and actual value is as natural law would have it, when it mov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and remains at the proper interval behind this standard value. Whenever the value of only one thing thus descends, that of every other thing rises. The products of the groups in which there are no labor-saving inventions are, so far as this influence goes, always rising in value; and, moreover, they are always pursuing a rising standard that keeps ahead of them. If the improvements are altogether localized in A''' of our tabular group system, then the values of B''', C''' and D''' are not at any one moment as high as they

will be when the output of A''' shall become larger. Static law requires that the output of A''' shall thus become larger. An uninterrupted succession of labor-saving inventions in the sub-group A''' causes the actual value of A''' to pursue a descending standard, but never to overtake it, and it causes the values of B''', C''' and D''' to pursue ascending standards, but never to overtake them.

如果该标准继续稳定足够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实际价值就可能降至某种静态水平，且维持一段时间不变。两个价值都在下降，但又保持间隔。如果这个距离正常，实际价值也自然，就符合自然。价值的动态标准总是变化；实际价值恰如自然规律也向同意方向变化，并在这个标准后和它维持恰当距离，因此实际价值就符合静态规律要求的价值。每当只有一钟物品的价值如此递减之时，另外的每一种物品的价值都是在提高。没有节省劳动的发明的各团体的产品，只要有这种影响，价值就总是在提高的；而且，这些产品还总是追逐并超过它们的某种提高了的标准。假如这些改进都集中于我们列成表格的A'''团体体系的话，那么，B'''、C'''和D'''的价值，在任何时刻，都不可能有A'''的产量大时的那么高。静态规律要求A'''的产量增大。小团体A'''的某种连续不断、一连串节省劳动的发明，导致A'''的实际价值追逐某种递减标准但有绝不超过它，而这一标准又导致B'''、C'''和D'''的价值追逐递减标准但又绝不超过它。

The creation of a new want also has a very disturbing effect in the group systems, if it requires an absolutely new product to gratify it. It then calls for the creation of a new producing group and the attraction of labor and capital from old groups. As a rule, however, the changes in the wants of the consuming public call for qualitative changes in products that are already made, rather than for wholly new products. Every such change, too, has its own effect on value, wages and interest. A new want calls for a new static

adjustment of all values, and with that there is required a new adjustment of wages and of interest. A continuous series of new wants brings about a continuous change in the standards of value, wages and interest; and the actual market is in perpetual agitation, due to its perpetual effort to conform to the shifting demands. As a rule, the new want somewhat lowers the values of products that satisfy old wants.

一种新要求要是它一出现就需有某种绝对新产品予以满足的话，则这在团体体系内就会导致一种很大的干扰性作用。因此，就得组建新的生产团体，而且还得从原有团体那里引入劳动和资本。不过，通常来说，消费者欲望的改变所导致要求已经制造的产品而非新的产品的质量有一个变化。这种变化对价值、工资和利息也都有影响。每一个新的要求需要价值的静态调整，而这就得对工资和利息做出新的静态调整。连续一系列的新的要求导致了价值、工资和利息的标准的持续不断的改变。而实际市场则由持久努力以符合变化中的需求，因而也就处于长期震动之中了。一般而论，这种新的要求是颇有些降低满足原来要求的产品的价值。

Dynamic influences largely neutralize each other, so far as apportionment of labor and capital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group system is concerned; and a fundamental fact about them is that, coming together as they do, they actually keep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comparatively near to their static standards. They cause a perpetual shifting of value, a continuous rise of wages and a continuous fall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they cause the actual pay for labor and for capital to differ from theoretical static rates far less than they would if the dynamic influences were less active and numerous. We are confronted, therefore, by the striking fact that, for the accuracy of its working in a world of reality, static law is

dependent on dynamic influences. If a fluid, for example, is viscous, the surface of it does not readily subside to a perfectly level plane, but it does so far more readily if it is agitated at many points at once. Again, a measure of wheat may have an irregular surface while the measure rests on the floor, but it will take a level surface if you shake it. Similarly, static law has to encounter friction, which makes actual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slow in conforming to theoretical standards; but agitation helps to overcome the friction. The standards themselves change the less, because different dynamic movements neutralize each other.

就产业群体系各部分中的劳动和资本的分配而言，动态影响多是相互抵消的；而有关它们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既然他们是一个整体，则自然它们也就使价值、工资和利息相对接近于静态标准了。它们引起了价值的一种永续的转移、工资的持续提高和利率的不断降低；它们还引起劳动和资本的实际薪酬有别于理论静态费率，而其差别程度，如果动态影响不是那么活跃和频繁的话，则就会小一些。因此，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为求在同一现实世界中实现其作用的准确性，静态规律是取决于动态影响的。例如，一种液体如果是粘稠的，则其表面就不易成为平坦的平面，但是，要是同时多角度摇动它，情况就不同了。还有，小麦放在地上可能有不规则的表面，你摇晃它，它就会呈现平坦的表面。类似地，静态规律也得遭遇阻碍，于是使实际的价值、工资和利息与理论标准不相一致；不过，扰乱的结果有助于克服这种阻碍。标准自身变化减少，因为各种不同动态流动彼此抵消了。

If the increase of labor were localized and if it were confined to a place in which only the group A in our table were represented, it would have very disturbing effects and would keep values, wages and interest far removed from static standards. But this increase in

the working population takes place, in fact, in B, C, D, etc., and in all the sub-groups within each of them. Comparatively little relocating of labor is therefore required: it is relatively easy for the new men to put themselves where pure static law would place them. If population were increasing in this general and diffused way and if capital were not increasing, there would be a steady fall of general wages and a steady rise of interest; but, in fact, capital also is growing in amount. It is even growing more rapidly in quantity than is population, and the growth of it neutralizes the depressing influence on wages that increase of population by itself would have. There is, indeed, an actual disturbance of wages and interest caused by the excess of the new capital in amount, as compared with the new labor; for it is only by reason of the fact that one of these economic agents increases faster than the other that distribution is affected. The disturbance that is due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rates of growth is far less than would be the disturbance occasioned by an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one of the agents alone.

假如劳动的增加是局部发生的且仅限于一个地方，如仅仅在我们表中的团体A中有体现，则这一增加就会有非常大的干扰性影响，而且会使价值、工资和利息偏离静态标准。但事实上，劳动人口的增长在B、C、D等以及其中的每一个小团体中都工人增长。因此，工人只要进行稍微调整，因为新来者置身于静态规律中相对容易。若是人口就在以这种一般而又扩散的方式在递增，而资本则不增长，那么。一般工资就会稳降，利息则稳升；但事实上，资本也在数量上增加了。资本在数量上的增加甚至比人口的增长还快，因此，它的增长就抵消了人口增长对工资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新的资本过剩引起工资和利息的扰乱。因为影响分配唯一的原因，就是经济因素比另一个经济因素增加得快。。由于两个因素的不同的增加引起的变动，比只有一个因素增加引起的变动要小得多。

If improvements in production were confined to a single group or sub-group, they would have very disruptive effects; but they occur in all the sub-groups of the system, and with some approach to continuity. If the constant multiplying of the output of A''' stood alone, it would call for a perpetual fall of the relative value of it, as well as for constant readjustment of wages and interest. But, as improvements occur also in the B, C, and D groups, the adjustments of value that have to be made are relatively small. While the rate of wages rises more rapidly when improvements are numerous, the pay of laborers conforms much more closely to the static standard where improvements are numerous and well diffused than it would if the improvements were localized. Clearly, where the output of A''', B''', C''' and H''' were all growing larger together, there would be less necessity that men and capital should go from one group to another than there would be if the output of one were increasing, while that of the others remained fixed. Widely diffused improvements, then, help to keep society near to the shape that static law calls for.

假如生产改进只在某一个团体或小团体，那么，这种进步会是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影响的；但这些进步发生于所有的小团体，而且还是以某种方法得以持续的。如果A'''的产量恒定的倍增保持不变的话，那么，它的相对价值永续下降，以及工资和利息的恒定在调整。但是，因为有B、C和D等团体也调整了，因此，必须完成的价值调整就相对小了。尽管工资率提高了，但劳动者所得的工薪却与静态标准相一致——在那里,提高幅度大，扩散也好——与此类提高是局部性的相比较而言。显然，A'''、B'''、C'''和H'''等产量增长幅度都大，与下列情况相比，人与资本从一个产业群转入另一个产业群的必要性就小一些了。不像那时候，其中一个的产量在增加，而另外的却是保持不变。由此可见，广泛的进步是有助于使社会接近于静态规律所要求的状况的。

The same generalization is true of the changes that take place in consumption. If new wants are numerous and of many kinds, they shift labor far less violently from group to group, and disturb values far less, than would the appearance of a single new want. If society should begin to produce and to use only one entirely new commodity, the fact would call for a quick moving of capital and labor from point to point; but, since there is, in fact, a constant refining of wants and a corresponding constant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the shifting that is called for is far less violent. Labor and capital can remain in the mills that now employ them, but they must produce higher and higher grades of goods.

同一概括也适用于消费上发生的变化。新的要求对而且是多种多样的，那么，与只有某一种新的要求的情况相比，这些要求导致劳动从一个团体到另一个团体的转移就少得多，妨碍价值的程度也低得多。假如社会竟开始仅生产和消费一种全新的货物，则这一情况当要求资本和劳动尽快实现点到点之间的流动；不过，既然有要求不断提升，再加产品质量相应地不断提高，此种转移的强烈程度是远不如前的。劳动和资本可以还是就置于现在在利用它们的那些工厂里，但它们的产品则必须不断升级。

It is the growth of new wants that in this way neutralizes the effect of all the product-multiplying influences that go on. A glut of consumers' goods would come forthwith, if expanding desires did not make a new market for the output of the mills. The want of commodities which are unlike any that have formerly been produced does at times make its appearance; but the demand for improvements and refinements in the qualities of goods that are already consumed is the constant fact, and this opens a very general market. Nearly everything that a man uses can be improved in

quality; and, as a rule, the improved articles can be made by the same men who now produce them. It follows, therefore, that, with more and more refined wants developing, productive energy sets itself at work throughout the great system and enlarges the output of every group, by making goods finer rather than more numerous. This causes no disastrous transfers of labor and capital from one part of the system to another and it produces no general glut.

从这一点上看，使所有倍增产量的持续不断地影响由新的要求抵消。如果扩张的要求并没有形成工厂产品的市场，则消费品的供过于求情况就会出现。虽然要求空前未有的物品的欲望，有时会出现，但对已经消费过的产品的质量的提高与精化的要求是一个永恒的事实，而这就开辟了一个大市场。一个人所用的差不多的一切物品的质量都可以提高，而且，一般来说，质量提高了的物品可以由现在生产它们的同样一些人生产出来。由此可见，随着越来越精细化的要求的形成，整个产业系统会用其所有生产力进行生产，从而扩大一切团体的产量，但主要提高质量而不是增加数量。这绝对不会导致劳动和资本由该体系的一部分向另一部分的灾难性转移，因而不是至于导致供过于求的。

The multiplying and the refining of wants—or, in other words, the dynamics of consumption—furnish the elastic market that is needed. If this movement merely keeps pace with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on, grave evils are averted and, in the main, the economic world goes on peacefully in the way of larger and larger production. As the dynamic movements are not entirely steady, symmetrical and mutually compensatory, there are some irregular transfers of labor and capital from group to group; ye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noticeable some comparatively steady currents of labor and capital. These agents are regularly flowing in certain directions.

Thus,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n itself, would cause labor and capital to flow steadily downward in the sub-group system. Under its influence alone, man and equipment would have to increase in a disproportionate way in the agricultural sub-groups and in the mining sub-groups, both of which produce what we have defined as elementary utilities.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would call for more food and more raw material, and the effort to get these things out of the earth would reveal the action of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It would take a larger and larger fraction of the population to feed the whole of it. Wages, as we know, would have to fall; and this means that laborers would be forced to take their pay in the shape of cheaper and coarser goods. Form utilities would have to be leas amply represented in the general product of industry, and elementary utilities would predominate in the consumption of the world. Moreover, as it is the lowest sub-groups that create these elementary utilities, labor and capital would move thither.

要求的多样化和精细化，或者换句话说，消费的动态提供了所需的产品的弹性市场。假如这种动向与生产的动态保持同步的话，则大的提供灾祸是不至于发生的，而且经济领域就产量不断提高这一点而言，基本上始终平静然而又持续充满获利的。由于动态的变动并非是完全持续稳定的、均衡的和彼此互补的，因此，劳动和资本的团体间的某种不规则流动也就出现了。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又还是有劳动和资本规则的流动，且相对稳定。这些要素在朝着某些方向正常地流动着。由此可见，人口增长本身就会导致劳动和资本在小团体体系内稳定地向层级低部分流动。独此一项影响，即可使人和设备不成比例地在农业小团体和矿业小团体增加起来，这两类小团体都是生产我们称之为原始效用。人口增长遂对食品的和原材料构成更大的需求，而为此致力于从地球上获取这些产品的结果，也就揭示了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供养着整个人口，这就需要有全人口中越来越多比例的人投入相关行业以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正如我们所知，工资必降无

疑；而这又意味着，劳动者所得的工薪有不得不取质次、价廉的货物的形式。常用产业品体现的形态效用少了，而基本效用则在世界消费中占绝大比重。此外，劳动和资本也就流向这些小团体。

The increase of the amount of social capital, however, neutralizes this effect. Though it reduces the rate of interest, it enlarges the gross amount of it and thus increases the incomes of the members of that class whose consumption has already reached the level of comfort and luxury. This, of itself, calls for more form utility; for it induces a refining and improving of products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it causes the multiplying of them. Moreover, the increase of capital raises the rate of wages, and this means qualitative improvements in the goods that workmen consume. As the upper sub-groups create form utilities, the growth of capital, considered apart from other influences, moves labor and capital from the sub-groups that are at the bottom of the series to those which are higher.

不过，社会资本数量的增加还是把这种效应给抵消了。尽管这一增加致使利率降低了，但它还是扩大了利息总额，因此，消费已达舒适奢侈水平的那个阶层的成员的收入增加了。这一收入增加本身就要求有更多形态的效用。因为与引起产品倍增的情况相比，它更大程度地导致了产品精品化、高价化。此外，资本增加的结果提高了利率，而这又意味着劳动者的消费品质优化了。随着层级高的小团体造了形态效用，则若不考虑其他影响，资本的增长就必然使劳动和资本从层级低的小团体流向层级高的小团体。

Improvement in method, or the gaining of new productive power by the industrial world, if it acted merely as a labor-saving

influence, would cause labor and capital to move downward in the series of sub-groups, from A''' toward A, from B''' toward B, etc. This, however, is because the field for such improvements is rather in the upper sub-groups than in the lower one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was, for a time, invented and applied very rapidly; but, unless chemistry shall come in some striking way to the aid of agriculture, it will probably be other parts of the field that will, in the long run, show the greatest improvements. If no other effect is to be expected from a machine than that less labor will be used in the industry that adopts it, then the progress of invention will, of course, cause labor to mass itself in those industries in which labor saving takes place the more slowly and on the smaller scale.

产业领域方法的改进，或者说新的生产力的获得，要是仅限于生产某种节约劳动的影响的话，那么，它就会导致劳动和资本在小团体系列中从A'''到A、从B'''到B等的移动。不过，这是因为这样一种改善的领域是存在与层次高的小团体而非层次低的。农业机械曾经发明和应用都很迅速，但除非化学已惊人的方式援助农业，否则，从长远来看，显示出最大改善的或许还是该领域的其他部分。假如从某种机器中获得的除可用于采用该机器的行业外而在别无效用了，那么，发明的进步当然就会导致劳动集中于节省劳动的技术应用得很慢而且规模小的那些行业了。

The full effect of such an influence as that of mechanical improvements may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We may first assume that there is no new product created and no multiplying of former products. The output of A''', B''', C''', etc., are to remain as they are, however rapidly invention proceeds. Improvements in machines and methods now occur, but they mass themselves in the upper sub-groups of the different series. If all the labor that was formerly in

A''', A'', B''', B'', etc., remains there, it can be employed for only a short period in each day. In that case its earnings will be small. But the earnings of laborers in A will be much larger, and competition will transfer a portion of the labor from A''' and A'' to A. This will bring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labor in the upper sub-groups and that of labor in the lower sub-groups to an equality, and the ultimate effect of all this will be that the working day will be shortened in every industry.

诸如机械改善一类影响的全部效应可描述如下：我们首先假设，现在是即无新产品创造又无原有产品倍增。A'''、B'''、C'''等的产量，不论发明进展有多迅速，都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不变。机械和生产方法的进步现在出现了，但它们都集聚于各系列层级高的小团体中。如果A'''、A''、B'''、B''等中的劳动还是原地不动，那么，每天也就只有一个短短的时间可资利用。情况如此，其收益必小无疑。但在A中的劳动者的收益会大得多，因而竞争会使部分劳动从A'''和A''转移至A。这就将是层级高的小团体的劳动生产力和层级低的小团体的劳动生产力等同起来，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将是各行业的工作日都缩短了。

Now let the improvement in method act, not as a labor saver, but as a product multiplier, and the effect is the reverse of this. The labor in A''' and A'' may, for the most part, remain there and give rein to its new productive power. Enlarged production, however, means raising the qualitative grades of goods more than it multiplies them in number. Less productive energy is required at A, where raw materials are created, and more at A', A'' and A''', where the fashioning of the materials is done. There is, in short, a relatively smaller amount of elementary utility represented in the consump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re is a comparatively larger amount of form utility.

现在，且让方法上的改进不是作为节省劳动的办法发挥作用，而是作为增加产量的办法发挥作用，这样，其结果就会反过来。就绝大部分来说，在A'"和A"的劳动还在原处，为其新的生产力松绑。不过，扩大生产就意味着优质产品不是使其产量倍增。生产原料的A需要的生产力少一些，加工原料的A'、A"和A需要的生产力大一些。总之，在社会的消费中，原始效用数额相对较小，而形态效用数额则相对较大。

A certain amount of improvement in method does, in fact, take place in the lowest sub-groups, where the crudest materials are produced; and it has the effect of moving labor upward in the series to the sub-groups that produce finer utilities. This happens because of the comparatively rigid and inelastic character of the demand for these crude products and the highly elastic character of the demand for form utilities. Our more luxurious living shows itself in the care with which we fashion things, and not in the mere multiplying of the number of them, with the result that our consumption of raw materials does not increase as rapidly as our consumption of wealth in its finer forms. On the whole, therefore, the flow of labor and capital is continually upward in the sub-group series; for it can find outlets for its new power only in this way.

事实上，在生产粗糙的物品的低级别小团体中，有一些生产方法进行改良。这样工人就在较精巧的小团体中工作。这样是因为对这些粗制品的需求缺乏弹性，而对形态效用的需求则富有弹性。我们更奢华的生活还显示出我们精心生产的状况，我们并不只是倍增人数而已，其结果就是，我们原材料的消费并没有如我们更精细生产的财富消费得那么快。因此，总体说来，劳动和资本的流动走向上层小团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其新的生产力的出路。

Organization has in these respects the same effect as improvement in method. As a practical fact, it takes place in the upper sub-groups, rather than in the lowest ones. It is not in farming that the great consolidations are going on. If organization acted merely as a labor saver, and not as a product multiplier, it would cause labor and capital to mass themselves in mining and agriculture; for men who were thrown out of employment in mills would be forced to betake themselves largely to farming and kindred occupations. Acting as it does, however, and multiplying products, it compels the making of finer grades of them and moves the productive agents forever upward in the series.

随着方法的改进，在这些方面，组织有同样的影响。作为一个实例，它发生与层次高的小团体中，而不是发生于层次低那些中。大规模的合并并没有发生在农业领域。假如组织所起的作用仅限于节省劳动而已，而非产量增数，那么，这就会导致劳动和资本集聚于矿业和农业的现象，因为工厂的失业者会不得不多半投身于农业和类似行业。不过，有鉴于组织所起的这种作用，再加倍增加产量，它就会强使精细类产品大批量生产，且使生产要素永远向层次高的亚产业群流动。

In discussing the effect of the two great product-multiplying influences, industrial method and organization, we have tacitly introduced the fifth and last of the dynamic influences that we are considering—namely, the multiplying of wants. It is because the want of form utilities is indefinitely expansive, while that of elementary utilities is relatively inexpansive, that we have, as the resultant of all changes, the steady upward movement of labor and of capital in the sub-group series. Moreover, some general groups

create products which, with all the qualitative refinements that can be imparted to them, satisfy less elastic demands than do some other products. With the steady upward flow of labor and of capital in the sub-group series, there is also a flow from those groups which cater to less elastic demands toward those which cater to more elastic ones.

讨论两大类产品产量倍增的影响、产业方法和组织，我们不言而喻地介绍了我们讨论中的第五种也即最有一种影响，即要求倍增。由于对形势效用的要求无限扩大，对原始效用的要求相对无以扩张，各种变动的结果是劳动和资本的稳定地向层级高的小团体流动。此外，有的大团体创造了新产品，这种新产品比之于其它产品，具有明显的质量上的升华，但不及其他物品那样有伸缩性。劳动和资本不断地从级别低的小团体向级别高的小团体移动，他们同事也从满足比较固定的需求的小团体向满足较有伸缩性的需求的小团体移动。

These steady and stream-like movements would not, of themselves, have disturbing and disruptive effects; and they would not impose any hardship on labor or cause any waste of capital. It is the irregular movements that do this. The labor saving that is effected at some single point in the system changes the location of labor. Inventions are not made and applied simultaneously in A''', B''', C''', etc.; but, unless they are, there must be movements of labor from one of the sub-groups to others and back again. On the whole, an efficient machine is to some extent a labor expeller. If it is introduced at A''', it will cause an enlarged output of the product, A'''; but the amount of this increased output that the market will take will not be enough to keep all of the original laborers at work there. It will, however, create a new demand for them elsewhere; so that machinery can never be rightly treated as a labor expeller, if

the whole field of industry is kept in view. The invention that is made and applied at A''' does not displace labor from the entire upper range of sub-groups. In A''', B''' and C''', taken together, there is probably as much labor as ever; but the machine at A''' creates a need of comparatively more men at B''' and C''' and of comparatively fewer at A'''. When, in turn, an invention is made at B''', the movement will be away from that point to A''' and C'''. In irregular ways, therefore, must labor move to and fro within the range of sub-groups that are on the same horizontal level. While the general and slow current of labor is upward within the whole group system, there are irregular and sudden movements to the right and the left of each range of coördinate sub-groups; and it is these that cause hardship for laborers.

这些稳定和流水线式的流动，自身不会产生干扰性的破坏性影响，而且它们也不会给劳动强加任何困难或是导致资本的任何浪费。导致这种结果的是那些不规则的流动。小团体体系中某一点上产生的劳动的节约，即可起到改变劳动的配置的作用。各种发明并非在A'''、B'''、C'''等中同时完成并付诸应用的，但是，除非它们就是同时完成并付诸应用的，否则就必有劳动从个，而后有如此回流。总体说来，某种高效率的机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裁员机。假如这种机器被引入了A'''，那它就会导致产品A'''增产，不过，市场会接受的这部分增加的产量，将不足以使原有劳动者继续在原处工作。不过，那种机器要是留在整个产业领域，那就绝不可视为裁员机。在A'''中完成并付诸应用的那种发明并没有替代整个高层级亚产业群的劳动。将A'''、B'''和C'''结合在一起，劳动或许还是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一样多。不过，在A'''中的那一机器，创造了对在B'''和C'''而言相对还要多的劳动者的需求，创造了对A'''而言是相对少的劳动者的需要。反过来，如果一项发明是在B'''中完成的，则流动就会使反向的，也即从B'''到A'''和C'''了。因此，按照不规则的方式看问题，劳动必须在该系列中的同等层次的亚产业群内部往复流动。尽管总的说来，劳动是在整个产业群体系内

向层级高的团体缓慢流动的，但也有潮同等级的小团体不规则突然流动的。

It is only in the most hasty and the most general way that we can now speak of these dynamic movements. They form a part of the subject of the concluding division of economic theory. There are, indeed, in progress some movements of capital that we cannot even notice. We must, however, give attention to two essential facts: (1) There is a steady upward movement of labor and capital in the group series; and (2) there are irregular and disturbing movements taking place within each range of coördinate sub-groups.

对于这些动态流动，我们也就只能泛泛而论了。它们是经济理论最后一个分支的主题。确有某些经济资本的流动正在进行中，但我们竟至于没有提及。不过，我们必须估计两项基本事实：（1）团体系列中有劳动和资本稳定地向层级高的团体流动；和（2）有发生于各层级小团体内的不规则的、混乱的流动。

It would appear, if we were to go one step farther into the dynamic part of our study, that, so far as improvements are well diffused within a range of sub-groups, they neutralize each other's disturbing effects. Whenever inventions at A''', B''' and C''' come nearly together, they remove the necessity for transferring much labor to new positions. It would also appear that the steady upward flow of labor reduces the violence of the horizontal movements that have to take place. As new labor is always entering the uppermost range of sub-groups, it may be that no men will have to leave A''' and go to B''', even though a new machine is introduced at A'''. The

enlarging of the force at B''' may be effected by turning to that point some of the labor that is flowing upward from the lower sub-groups.

看来，要是我们再就此项研究的动态部分做进一步分析的话，那么，就所实现的劳动技术的改进在一系列小团体内的高效应用来说，这种种改进也就抵消了相互之间的干扰性影响。每当在A'''、B'''和C'''中的发明几乎同时实现时，工人便不要有大规模的移动。而且，劳动工人稳定地向层级高的团体流动，可以降低不得不发生的横向流动的强烈程度。由于新的劳动势必进入层级最高的小团体，因此，即使在A'''中引进一种新机器，但还是有可能有人离开A'''前往B'''。劳动力规模在B'''的扩大，或许是因有部分从层级低的小团体向层级高的流动所引起的。

Still further, it would appear, if we were to continue this study, that movements of capital take much of the violence away from the movements of labor that are entailed by inventions. Not toward greater and greater hardships for the working class, but toward smaller hardships and larger gains is the world tending, as the result of economic dynamics.

另外，若这一研究还要继续深入下去的话，则资本的流动看起来就会使发明所引起的流动量大为减少。作为经济动态的结果，世界性的趋势会是，劳动者阶级面临的不是苦难越来越多，而是苦难越来越少和收益越来越多。

All this would become clear, if it were possible to pursue the study into the dynamic region. We have now before us, however,

the problem of defining static standards of value, wages and interest, in a state in which all five of the grand dynamic movements are going on together. At each instant there is a certain definite adjustment of labor and of capital in the sub-group system that static forces, of themselves, would make. Static law calls for a certain exact amount of labor and a certain amount of capital at A', B", C", etc., respectively. This static adjustment, if it could be made in a moment, would insure at once the amount of output of each kind of goods that is “natural” under the conditions that exist at this moment; and it would thus make the values of all products natural. Likewise, it would insure natural wages, or the rates of pay that would everywhere conform to the product of labor. It would adjust interest on the same plan, making it everywhere coincide with the product of capital. It would reduce pure profits everywhere to zero. These things would entire if, at any one moment, dynamic changes and all friction were to cease.

要是继续研究这个动态领域可行的话，那么，这一切就都会变得清楚起来。不过，现在我们面临的是界定在五大动态流动中共同发生着的这种状态下的价值、工资和利息的某种静态标准问题。在每一瞬间，静态因素自身都会对小团体内的劳动和资本作出某种明确的调节。静态规律要求A'、B"、C"等分别都有某种确切的劳动和资本。这种静态调节要是能立即完成话，那么就能立刻确保每一种产品的产量在此刻存在的条件下都是“自然的”。因此，这种调节也就是使所有的价值都趋于正常了。同样，这种调节还能确保在各处都会有与劳动产量相一致的工资率或者工薪率。这种调节还会按照统一方案调节利息，是利息到处与资本的产量相一致。使各处的利润都降至零。假如在任何一个时刻动态变化以及各种阻碍都停止了，那么，这类情况就会接着发生。

This is, of course, a recapitulation. We have already had the picture of the perfect static adjustment before us; but we have not had before us the fact that some static adjustments require much time, while others require only a little, and that there are a number of different standards which figure in the natural adjustment of wages and of interest. Within a single year the pay of labor may gravitate rapidly toward a certain standard, while that standard may for a decade, or even a century, slowly gravitate toward a remoter standard.

当然，这是一种简明扼要的重述。在前面，我们已经有了完全静态调节的图景，不过，还没有看到与此同样的事实。有的静态调节需要很长时间，有的只需一点点时间，有多种不同的标准。这些标准把工资和利息的自然调节也计算在内了。在一年内，劳动工薪可以很快地接近于某种标准，而该标准有可能是十年甚至一个世纪有缓慢地接近于另一种遥远的标准。

The moving of labor and capital to the sub-groups in which static forces would put them involves some local migration of workingmen and even of capitalists. A certain number of them may have to change their residences,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encounters friction and requires time. The assimilation of methods may, however, go on more rapidly. It may be that, when one entrepreneur has hit upon a new and successful way of producing something, his competitors can get possession of it within a few years; although, by reason of patents, they may not do this for a longer period. In general, however, transfers of labor from place to place go on comparatively slowly and those of capital go on more rapidly; while the abandoning of poor methods of production and the placing of all competitors in one business on a plane of high

efficiency is sometimes a quick process and sometimes a slow one.

劳动和资本流入各小团体，在这些小团体中，静态因素甚至还会使某些劳动者和资本家卷入地方性的迁徙。在这些劳动者和资本家中，有的因为迁移遇到了阻力，因而还需要时间。不过，新方法的推广或须进行得快一些。情况或许是，当一个企业家忽然发现一种新而成功的生茶某种东西的方法，他的竞争者或许在几年内也能掌握它，虽然由于专利，他们不可能长期这样做。但是，一般说来，劳动从一个地方转移至另一地方进行得会相对慢，而资本则会很快就转移。对于相互竞争的竞争者来说，放弃低效生产方法和获得高效生产方法是个快慢不定的过程。

One way of defining the static standard toward which, at each moment, a dynamic society is tending, is to suppose that all dynamic influences should cease at once, while static laws continue to operate for an indefinite time. On this plan, we should have to wait, before realizing the static condition, long enough to allow the slowest adjustments that are in progress to be carried through quite to completion. If it takes fifty years to locate labor geographically in the way that static law calls for, even though it requires only five years to unify the methods of production that are in vogue, we must wait fifty years for the complete realization of the static state. We should thus b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thods of production to a standstill now, instead of forty-five years hence. If we stopped all dynamic changes in the year 1900 and waited until 1950 for population to locate itself in a natural way, the methods of production in the sub-group that we took for illustration would be brought to uniformity in 1905 and these processes would then continue in use without further modification for forty-five years longer.

界定动态社会时刻趋向静态标准的一种方法，是假设一切动态影响均应立即止住，而静态规律则还要继续发挥作用，而且是无限期的发挥作用。就此方案来说，在静态条件得以实现前，我们理应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以期进行之中的最缓慢的调节也能相当顺利地奏效。要是照静态规律所要求的以五十年的时间实现劳动力的空间上配置的话，那么，纵令只需五年就能统一现在流行的各种生产方法，我们也还得等上四十五年才能完全实现那种静态状态。由此可见，我们就应该让新的生产方法停止发展，而不是在四十五年之后才让它停下来。如果我们于1900年使一切动态变化动停下来，而等到1950年才能自然地使人口自行配置，那么，我们作为例子加以说明的按小团体进行的生产方法，1905年才会达成一致，因而会继续采用，而不必再有四十五年进一步的改进。

This is one scientific way of defining the state toward which at this moment society is tend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tatic forces and of no others. It would be reached, if we were to paralyze the dynamic forces all at once and wait long enough for the slowest static adjustments to be made. The state toward which society is now tending, at the outset of the long period, is one that cannot be completely reached until the slowest adjustment that static law calls for has had time to complete itself. In our illustration, that adjustment is the movement of population; and, as this movement requires fifty years, natural values, natural wages and natural interest are not realized within less than that long period. They will come when population is rightly distributed, and not earlier.

这是界定此刻仅受静态因素影响的社会的状态的一种科学方法。要是我们立刻制止一切动态因素，并且为使最缓慢的静态调节得以完成而等待足够长的时间的话，则这种状态是会达到的。社会现在正趋

于达到的这种状态，在该漫长的时期开始之时，是这样一种那个状态，即他只有待静态规律之所需最缓慢的那种调整有时间自行完成之时才会彻底完成。在我们这个例子中，那种调整是人口的流动；而且，由于这一人口流动非有五十年不可才能完成，因此，自然价值、自然工资和自然利息等是都需要以上漫长时间才能实现调整的。它们是只有在人口得以合理配置时，而非早一些时候所能实现的。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tatic forces, and of these only, society is actually tending toward this remote adjustment; and, if all friction could be removed, it would at once attain it. Friction, however, has this effect; it allows quick-acting dynamic movements to occur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in the long period that is required for a slow acting static adjustment. In the fifty years that may be needed to move a mass of population from the densely peopled East to the sparsely settled West, hundreds of machines may be invented and values may in each case be adjusted at the level that each machine at once requires. We must, therefore, recognize standards of value, etc., that differ from the ultimate standards.

在静态因素而且只是在这些静态因素的影响下，社会才会趋于这一未来的调整；而且，要是一切障碍都可排除的话，那么，社会的这一调整即可完成。不过，阻碍有这种作用，即它是迅速起作用的动态流动得以在一种缓慢起作用的静态调整所需的漫长时间内不断发生。在大量人口从人口密集的东部地区迁移至人烟稀少的西部地区所需的五十年内，数以千计的及其将会发明出来，它们的价值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按照每一台机器需要的水平得以调整。因此，我们必须认识有别于最终价值的标准。

[25_1].If present plans are realized, the dynamic laws of distribution will be stated in a later work; and, if that were now ready for publication, the present one

would end here.

[26_1].如果现在的方案是可实现的，动态规律的分配将会在之后出版的一本书里陈述出来；如果那本书可以出版，这本书到这里就结束了。

Chapter XXVI Proximate Static Standards

第二十六章 近似的静态标准

If,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petition, labor can go exactly to the points where it is wanted in a period of fifty years, if capital can do the same in twenty-five years and if the best method of producing some article can come into general use in ten years,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stop all dynamic changes and to wait through the full fifty years' period, in order that either value, wages or interest shall be reduced absolutely to the rate at which static law alone would fix it. It may be, however, that the fifty years' period that labor occupies in adjusting itself within the group system is made necessary by the obstacles that are in the way of migrating from one geographical locality to another. It may, for instance, be easy for the son of a miner to become a machinist, instead of following in his father's footsteps; and if many young men do this, there is an exodus of labor from the mining sub-group and an influx of labor into the machinist's trade. Where, however, the change carries men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it is a slow and costly process. Within the limits of a single small country, labor may be able to dispose itself in the way that static law requires within ten years and capital may do so within a shorter time. Even these local adjustments, with others that can always be made quickly, suffice to bring value, wages and interest within the small country to certain quasi-static levels. They approximate the levels that would be reached, if we were rigorously to repress dynamic changes within the one small territory and were to let static forces there continue to work.

假如在竞争的影响下，在五十年之内，凡是有需要之处，都不缺乏劳动力；假如为期二十五年间，资本的流向也始终都与需求相一致；假如某种产品的最好的生产方法十年后就变成通用；如果这样，则有必要将一切动态变化停止下来，以使价值、工资或利息都符合静态规律所决定的标准，而这需要整整五十年的时间去做调整。也有一种可能，劳动力在团体系统内部自行调节所占用的这五十年时间，是因为存在地理位置的迁移障碍而受到影响。例如，一位矿工的儿子成为一名机械师，而不是子承父业，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如果很多年轻人都是如此，那就会出现大量劳动者离开矿工的小团体进而流入机械师的行业的情况。不过，如果在工作上的这种改行有可能导致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这将会是一个缓慢而付出代价的过程了。在一个小国家范围内，劳动力或许能够按照静态规律所要求的那样，在十年内就能安排得妥当，而资本要想做到这一点，所需的时间将会更短。就是这些地区性的调整，以及总能一蹴而就的其他调整，就足以使这个小国范围内的价值、工资和利息达到半静态水平。要是我们严格严格控制小区域内的动态变化，而且任凭静态力量继续在发挥作用，到那时，会接近半静态的水平的。

When population surges in a wave of migration from Ireland, Germany and Italy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vement is a part of the generic operation of giving to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a natural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n a study that has the world in its purview, this migration is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statics. It is as though there were too much water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surplus were bringing the sea, as a whole, to an equilibrium by rushing into the Atlantic. In the Atlantic, however, the movement is highly dynamic. The whole surface is rising and the whole body of the water is full of violent currents. An influx of men from Asia into America would be one of the movements that would tend to br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the entire world to an equilibrium; but in America, separately

considered, it would constitute a great and typical dynamic change.

在爱尔兰、德国和意大利移民美国的浪潮中，人口激增时，这一流动即促成了全世界人口的自然而普通的流动。在一项涵盖整个世界的研究中，这种移民行动应当成为静态经济学研究的领域。这种移动就好像印度洋拥有的水过多了，而过多的部分通过涌进大西洋，进而使全球海洋的水势分配得到一种平衡。但在大西洋，这种移动是不断发生动态变化的。整个海平面在提高，而整个水体都充满汹涌的潮流。人们从亚洲涌进美洲，趋向于通过人口的分配达到世界人口分布均衡的移动；但仅就美洲而言，这种移动将构成一种巨大而又典型的动态变化。

The same thing is true of many other movements. When Asia shall copy the mills and the machines of America, the act will be a part of the operation of unifying the industrial processes of the world. This process tends to bring about an equilibrium in the industry of the world; and it is, in this view, a static process. In Asia itself, nevertheless, it is an eminently dynamic process; for it is much as though inventions were there rapidly going on in every mechanical field. The reaction that America would experience, in turn, would be highly dynamic in America. Something of this kind is, without doubt, before the people of these two contrasted regions. That which is a static adjustment within the world as a whole may create a dynamic movement within a limited part of the world.

另外很多变动的情形也都是如此。亚洲如果要效仿美国的工厂和机器时，此举将是统一世界产业化进程工作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往往会促使世界产业分布均衡，而且照此看法，这是一种静态过程。然而，在亚洲，这却是一种极富动态性的过程。就好像机械在各自领域

内有新发明一样。而美洲做出的反应则也会是动态的。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情况，这两个差别显著的地区的人们都会亲眼目睹的。这种变化在世界范围内是属于静态调整的，而在某些地区或许就会导致动态变化。

We are, however, immediately concerned with natural standards of wages and interest within limited parts of the world: we wish to know what now fixes the rate about which wages fluctu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England or in Italy. This problem it is possible to solve. There is a rate of wages that would be realized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f dynamic changes within that area were at once to cease and if competition were there to work without any obstructions. This rate would differ from the one that would be realized, if the whole world were brought into a static equilibrium. Not till labor and capital are distributed over the world in such a way that there is nowhere any reason for migrating—not till methods of production are, in a way, unified on a world-wide scale, and not till consumers' wants are normal, can the rate of pay for laboring humanity as a whole be natural. After reducing one country only to a static condition, this universal adjustment still remains to be made. The rate of wages that is realized in the one country differs by a certain interval from the ultimate standard, even though it is fixed at a certain proximate static level.

不过，我们急于关注的是在世界有些地区内工资和利息的自然标准。我们希望能知道美国、英国或意大利等国家工资据以波动的工资率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个问题是有望被解决的。有一种工资标准在美国是可望实现的，条件是该地区内的动态变化立即停止，而竞争则无障碍地进行。这个标准有别于整个世界都达到静态均衡时的标准。除非世界上的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合理不再产生流动——除非生产

的方法以某种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统一，除非消费者的欲望都回归正常，否则，劳动者整体工资率是不会趋于正常的。当一个国家达到静态状况后，这个普遍的调整依然要继续进行。一个国家已经实现了的工资标准还是有别于最终标准的，尽管它接近静态水平。

It is possible to study the activities of a limited part of the world by themselves, without being unscientific. Throughout our study we have, indeed, spoken of society without assigning to it any territorial limits. We have tacitly assumed that competition extends through it and that such an influence as a mechanical invention originating in any part of this organism will produce effects in every other part. Does this organism include all humanity? In a sense, it does; for, unless there is a country that, with all its people, could sink beneath the sea without producing economic changes in other countries, there is none that is outside of the world organism with which the economist must ultimately deal. It would be more than heroic theorizing, however,—for it would be unnatural theorizing,—that should assume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bound in so close an organization that there is, even in theory, only one rate of wages, one rate of interest and one standard of value for each commodity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it.

研究世界某一部分活动，是可以在科学背景下完成的。实际上，在我们的整个研究中，我们提到了社会，但并没有给社会设定任何地域限定。我们是不言而喻地假定竞争是存在于任何领域的，也假定不管开始于社会的哪个部分的机械发明所产生的影响，都会对其他的部分产生作用。这个社会有机体也包括所有的人吗？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的。除非有这样一个国家连同它的人民能都做到沉入海底而不至于引起其他国家的经济变化。否则，就绝不会有一个国家超出世界这个有机体的范围。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有机体是经济学家必须加以论述

的。不过，那就不只是一种冒险性的推理。因为，那回事一种反常的理论推测，而这种推论是以假定整个世界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组织，以至于就理论上而言，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工资标准、一种利率和一种价值标准适用于这个组织的每一种商品。

The relation that different parts of the earth sustain to each other furnishes the most difficult and the most fruitful study with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In view of what Europe and America are doing and are about to do in Asia, this study is as important to the practical man as it is fascinating to the theorist. Already does economic society include the whole world; for trade already unites its parts, so that a change in one part is felt in some degree in every other. Yet there are demarcations to be recognized within this great area. One general boundary is drawn about the civilized nations that constitute the economic centre of the world. Within the area included by this line, economic influences are active—each part is sensitive to influences that originate in other parts. Here there is a strong tendency toward uniform values and toward uniform rates of wages and interest. Across the general boundary, on the other hand, such influences act in a comparatively feeble way. In the inner and the outer areas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values and in the rates of wages and of interest.

世界关于上各地区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是经济动态理论的最困难、最富有成果的研究。考虑到欧洲和美国正在做的研究以及将在亚洲要做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对实践中的人与对理论家之吸引力同等重要。经济社会已经包括整个世界了。这是因为贸易把世界各地区都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一个地区的变化使另外几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影响。不过，在这个大区内，尚须确认分界线。一条重要的分界线是以各文明国家为中心划的，这些国家构成了世界经济的中心。按

此分界线所定的区域内，经济影响是非常活跃的——对源于其他各个组成部分的影响，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能做出快速反应。有鉴于此，在这个区域中，有朝着设定均一价值以及均一工资水平和均一利率的强烈趋势了。反之，跨出这一重要的分界线，这样的影响就相对微弱地起作用了。在此分界限内外的各地区，无论价值还是工资率和利率，均有巨大差别。

It is possible to study the economy of this civilized centre of the world, as a unit, and still to proceed on a scientific plan. Europe, America and whatever other continents and islands are in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m constitute this centre, which may be treated as a complete society, with an environing world acting on it. This central society trades with the outer zone, and it sends labor and capital thither. Whether it will or not, it gradually instructs the people of the outlying zone in industrial method. For business purposes it is, in this way, assimilating belt after belt of the outer zone to itself—that is, the civilized economic society is absorbing parts of the uncivilized and loosely bound area. Ultimately all will have been absorbed; and, if we can now establish economic principles that work within the centre, our theory will in the end apply to the world as a whole.

把这个世界文明中心的经济作为一个单位，进而制定一项科学计划，这是可行的。欧洲、美洲和其他各大陆与岛屿，它们紧密联系一起，构成这个中心；它的周围环绕着的对它起着作用的世界，因此，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处于中心的这个社会，与外围地区建立贸易联系，并从那里引进劳动和资本。不论具体进展会怎样，但这个中心一定会把生产方法逐渐传授给外围各地区。由于着眼于商业利益，因而该中心以这种方式一个接一个地带同外围地区。也就是说，这个文明经济社会逐渐地同化未开化的、联系松散的外围地区。最

终，这个外围地区都被同化了。如果我们现在就能提出并在该中心内部实施的经济规律的话，那么，我们的理论最终就会适用于整个世界了。

Let us, then, limit our studies to this economic centre.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importation of goods into it is to be regarded as equivalent to producing them in an indirect way; and this process is naturally resorted to, when it costs less than the production of them in a direct way. All that the people of the centre get, in the way of consumers' goods, we may, then, consider that the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produce.

既然如此，我们就把我们的研究仅限于这个经济中心。在这样一些条件下，给该中心输入的货物也就可以看成是该社会间接生产物品了，而且，如果采用这个方法比直接生产这些物品成本要低的话，那么，这个方法自然也就能得到采用并被推广。就消费品而言，该中心社会的人们所得到的，都可以看成是直接生产的或是间接生产的。

Laborers come into the area; but this is to be regarded as an influence that quickens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which would, in any case, take place. When laborers go out of this area, the movement retards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The moving of capital out of the region or into it is to be regarded as merely changing the natural rate of increase of capital. If a new method of production is ever borrowed from people in the outer zone, the effect in the centre is the same as if it were there invented.

劳动者来到该地区，这可看成是加速人口增长的一种形势，而人

口增长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会发生的。劳动者离开该地区，这种流动是阻碍人口增长的。资本流出还是流入该地区，也就是改变资本的自然增加率而已。如果某种生产方法是从外围地区的人们哪里借用的话，则该生产方法在该中心的影响可看做是在该中心发明的，其效果是一样的。

In attaining now a static standard of wages and interest for the centre itself, we assume, first, that labor and capital there remain fixed in amount. This cuts off 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as well as the natural increase in the population. We assume that methods of production remain unchanged, and this cuts off any copying of foreign arts. We assume, too, that other economic elements remain unchanged, that competition goes on with no hindrances and that, within the area that we have in view, static rates of wages and interest are realized. In addition to repressing wholly new dynamic influences, we have stopped impulses that are communicated by the outer region to the central zone. We saw that, in fact, certain unifying movements in the world, as a whole, are bringing it all toward a static equilibrium; and we also saw that such movements, in their effect on a limited region, are equivalent to dynamic changes. These we have cut off, as we have cut off new dynamic changes; and the effect is to produce a local static state, which gives the standard of wages and interest toward which local rates are practically tending.

现在，这个中心社会自身要达到工资和利息的某一静态标准，我们首先要假定，劳动和资本数量保持不变。这就停止了人口的出入境迁移和自然增长。其次，我们假定生产方法不变，因为这就阻断了对外界技术的模仿。再次，我们假定其他经济要素保持不变，竞争无障碍进行，这样，在区域内我们就最终实现静态工资率和利息标准。除

抑制新的动态影响外，我们还抑制住了经由外围区域向中心区域传递的作用。事实上，我们还注意到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某些统一流动正在使中心社会的一切都趋于静态均衡的状态；而且我们还看到，这样的流动就其与一个有限的地区的影响来说，它等于动态变化。我们抑制住过去的影响，就像现在抑制住新的动态变化一样；而这些影响是形成地方性的静态状况。它赋予了当地工资、利率趋于正在形成的工资标准和利息标准。

The wages that are thus made generally to rule in the civilized heart of the business world contain an element that we may designate as quasi-profit. In this there is something akin to profits, entrepreneurs' gains, which we identified as an income that will soon slip from entrepreneurs and assume the form of an addition to wages and interest. This income, thus transferred to laborers, will early raise wages in the central area; but the barrier that separates this region from the outer zone will long retard the effect that in the end it will produce on wages there. Perfect and world-wide competition would give to laborers in China benefits from the invention of shoe-making machinery that now accrue to those in America; but, since such perfect and general competition does not exist, the gain that is on its way to the labor of the world pauses long in the hands of the laborers of the civilized part of it. This premium which appears in the pay of laborers of Europe and America,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men of Asia and Africa, is quasi-profit: it is a gain from a dynamic source only partially diffused. Friction prevents the men of the outer world from sharing it now, although in the remote future static forces, act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will give it to them.

如此一来，终于在商业文明中心起支配作用的工资包含有一个成

分，我们不妨称之为准利润。就此而论，是由某种颇有点类似于利润的东西的，即企业家利润，而这种利润是这样一种收入，它不久就会与企业家失之交臂的，并呈现工资和利息的补充形式。这个收入转入劳动者手中之后，不久就会使该中心区的工资得到提高，不过，但该中心区域与外围区域隔离的障碍，将长期阻碍那里的工资所产生的影响。完全世界性竞争和普遍竞争会使中国劳动者获得因发明制鞋机而产生的利益，这种利益一直由美国劳动者所得。不过，既然这样一种完全的和普遍的竞争并不存在，因此，全世界的劳动者都渴望得到这种利益，就长期保留在世界这一文明地区的劳动者手中了。欧美劳动者的工薪中出现的这一补贴，与亚洲和非洲劳动者的那一部分相比，就是准利润了：它源自局部动态所产生的利润。虽然在遥远的未来，但是由于存在摩擦，阻碍外围地区的人们得到这一利润，但在全世界发挥作用的静态力量，将来人们还是会分享这种利润。

Mere advantage in point of time thus gives an advantage in point of wages and interest. It is the leaders in the adoption of fruitful methods of creating goods who get profits; while imitators, who straggle into line long after an invention has been made, may barely save their wages and interest. Men who labor in a region that leads in inventions may enjoy forever the quasi-profits that inventions give; for some fruit of each improvement may escape from the hands of the entrepreneurs who adopt it early and, becoming wages for the men who there labor, may continue long in this shape. The Golconda of the future, the region of limitless wealth, is to be the region where the greatest dynamic influences originate. A lead in the race that all humanity is running is to determine the comparative wealth of countries and of continents. Wealth is to abide with the swifter runners.

就从时间的利益而言，就赋予了工资和利息的优势。获得利润的

人来自在创造货物的的过程中采用富有成果的方法，而仿冒者虽说在一项发明诞生以后很久也使用了该项发明，但他们也许只能节省一点工资和利息而已。在发明上处于领先地位地区工作的领导生产者们，他们能永远享有发明所提供的准利润，而最早采用原有产品更新换代技术的企业家，则无缘获得每一种产品更新换代后的成果。未来财富乐园，这个蕴藏着无限财富的地区，将会成为产生最大动态影响的地区。只要获得全人类正在进行着的某种领先地位的竞争，就决定各个国家和各个大陆的相对财富竞争。财富与领先的赛跑者同在。

Tidal waves cause large areas of the sea to rise higher than the general static level of it, and they cause other large areas to fall below that level. Thus, the line AB represents the static level of the entire ocean. The double curve AC represents the surface as it is elevated here and depressed there by a tidal wave. The wavy line AD represents the upper surface of the tidal swell, as it is thrown into local waves by the wind. At any one instant the actual surface is here above and there below the normal surface of the tidal wave itself. Now, giving to this figure an economic meaning, let AB represent the ultimate static level of wages in the entire world. Let all dynamic influences definitely cease, leaving a world-wide competition in free play, and AB will represent the general rate of pay for labor. But, in fact, increased power of production, with that friction which prevents the fruits of it from being shared equally by all mankind, has caused the pay of civilized laborers to conform, in a general way, to the rate described by the upper part of the curve AC and that of the uncivilized laborers to take the level indicated by the lower part of it. And local influences within the civilized area have caused wages here and there to vary from the standard indicated by the upper part of AC, so that the pay of men in different parts of Europe and America conforms to the varying levels described by the line AD. At one point the rate is above the

general standard that prevails in the economic centre of the world and at another point it is below that level.

潮汐波导致海洋大面积水平面高于静止时的水平面，同时又引起其他大面积水平面低于该水平面。由图26-1可知，线段AB代表整个海洋的静止水平面。双曲线AC则代表潮汐波所致此升彼降的水平面。波状线AD代表的是浪潮的高水面，就是风浪的浪波高度。在任何一个瞬间，实际海平面都有可能或高或低于潮汐波本身。现在，且赋予该图某种经济含义，就假设该线段AB代表全世界最终的工资静态水平。假设动态影响都终止了，而世界范围的竞争却还是继续着，则此时，线段AB就代表劳动的一半工资率。不过，事实上，增加的生产力已经导致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工薪，总的说来，与曲线AC上半部分所示的工资率和未开化劳动者所取的由AC曲线下半部分所示的工资率相一致了。该文明地区的影响已经导致各地工资不同于曲线AC上颁布所示的标准，结果，欧美各地区的男性的工薪与线段AD所示的各种工资水平相一致了。在某一点上，工资率高于在世界经济中心通行的一般标准，而在另一点，它又低于上述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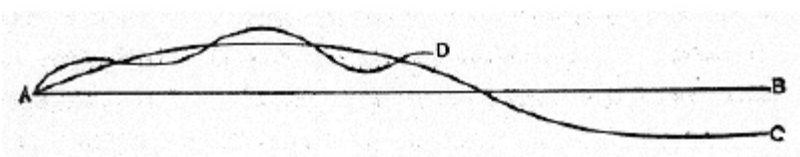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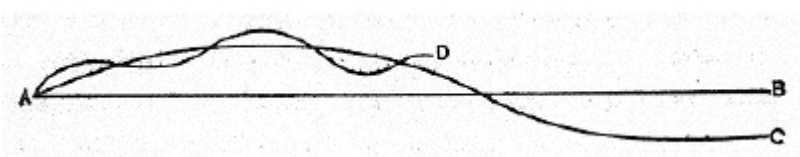

(Fig.22)

(图22)

There is, then, an ultimate static standard of wages for the whole world, a quasi-static standard for the civilized part of the world, and a local and quasi-static level of wages for every part of that civilized section. The pay of a man in any particular part of Europe or America tend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petition, to conform to this local and quasi-static rate. Also, very slowly and through long periods this standard rate itself tends toward the ultimate static standard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于是，整个世界有了一种工资的最终静态标准，世界文明地区也有了一种静态标准，而闻名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也都有了一种地方性的准静态工资标准。在欧美的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劳动者的工薪在竞争的影响下，都趋向于同地方性的准静态工薪率相一致。就整个世界而论，这种标准工资率都是趋向于采用最终静态标准的。

It will never, however, reach that ultimate standard. Here the hydraulic illustration, in its present shape, fails. The tidal wave is made by withdrawing water from one part of the sea and carrying it to another part; and, if the attracting influence were removed, the level of the whole would become uniform. The greater productivity of labor in the civilized part of the world is not, on the other hand, secured by any deduction from the productivity of labor elsewhere: it is the result of new increments of product that are conjured out of non-existence by civilization itself. As we said in an earlier chapter,

the wave that represents the superior productivity of the advanced region must be made by pouring new water on a part of the surface of the ocean and by checking the flow of that water to other parts.

不过，那种最终静态标准是永无实现之日的。这里与水有关的这个实例，就其现状来说，不适用了。潮汐波其实来自海洋的另一个部分，进而再把这水又输往海洋的另一个部分，进而再把这水输往海洋的另一个部分而形成的；而且，如果这种具有吸引力的影响被排除了，则整个海洋的水平高度就会变成完全一致了。反之，世界文明地区的高劳动生产率不是依靠降低他处的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这是产品新的增量的结果。这些增量是有文明自身从不存在之中想象出来的。正如我们在面前的一章中所说的，代表先进地区超长生产率的这一浪潮，必须通过给海洋表面的另一部分提供新的水以及通过阻止那些水流入其他部分形成。

Imagine dams extending from Labrador to Greenland, from Greenland to Norway and from Africa to the nearest point of South America. They would enclose a vast area of the northern Atlantic Ocean; and, if water were to gather within this reservoir, the surface of it could be held at a higher level than that of the outlying seas. This illustration shows the true relation of wages in the civilized states to those in the uncivilized ones, for the superior level may be permanent. Even if the dam were imperfect, so that the water slowly flowed into the outer sea and tended to raise the level of it till it coincided with the falling level within the barrier, new water might enter so much more rapidly as to maintain or increas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level there. So dynamic influences, calling new produce into existence in the advanced countries of the world, may preserve or may even increase the superiority in productive power that labor there enjoys, as compared with other

labor.

设想一下从拉布拉多延伸到格陵兰，再从格陵兰延伸到挪威，以及从非洲延伸到南美洲的最近点的各个大坝吧。这些大坝会从四面八方把北大西洋的巨大水域围起来。如果把水汇集于这个水库内的话，则其水平高度之比于外海的要更高。这个例子说明了文明国家的工资与未开化国家的工资的真实关系，因为高水平面可以是永久的。即使那些大坝围得并非严丝合缝，因而有水缓缓流入外海，且往往会使水平面齐高了，但是，新的水流入就会更快得多，乃至就能维持或者提高坝内的水平面的最高度了。使世界各先进国家出现新产品的如此动态影响，可以保存甚至或增加那里的劳动与其他劳动相比的更大的生产力的优势。

Dynamic gains, endlessly recurring, sustain the quasi-static rate of wages in favored parts of the world. It is primarily with this superior standard, and with the numerous local standards that compose it, that for practical reasons theory should deal. The men of America need to know what fixes the rate of pay for labor in America, as those of Massachusetts need to know what fixes the local rate there. This dominant influence is in every place the product that is there traceable to labor only. It is the rate which would there be realized, if in that locality dynamic influences were to cease and static forces were to operate alone. The specific product of labor in that locality is disentangled from the distinct product of capital in the way that has been fully described in the foregoing chapters of this book.

周期性反复出现的动态收益支撑着世界收回地区的准静态工资率。处于讲求实际的理由，理论应该阐述的首推这个等级更高一些的

标准，以及成为其组成部分的很多当地标准。就像马萨诸塞州人需要了解由什么决定当地工薪率一样，美国人也要了解美国劳动工薪率是有什么决定的。这个主要的影响无论在何处都仅仅溯及劳动这一类产品。要是在那个地方动态影响会停止，而静态力量会孤立起作用的话，那么，会得以实现的将是那种工资率了。那个地方的劳动产品是某种独特资本的产品以在本书前面各章充分描述过的那种方式中派生出来的。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world, as a whole, and its various parts presents no real difficulty in a theory of distribution. There are proximate standards of wages and there are ultimate ones; and the local pay of labor may tend quickly toward the proximate standard and always remain near it, while this standard itself tends slowly toward the ultimate one. What is true of wages is equally true of interest and other elements. One difficulty in the way of the theory is, however, more serious. To many persons any theory based on competition may seem to have somewhat of the character of theoretical romance. Will not competition itself soon be a thing of the past? There are forming on every side trusts and other consolidations of capital that threaten to extinguish competition and to introduce a régime of monopoly within much of the business field. Have we, then, completed the theory of competitive distribution, only to find that the fact on which the whole of it is predicated has ceased to be? If, when competition was at its best, theories of natural values, natural wages and natural interest seemed to have a character of unreality, what is to be said of them when competition appears to be a vanishing element?

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与其各地区地关系，再分配理论中并没有显示出什么大的难题。工资有近似的标准，还有最重的标准；各地的劳动

工薪可能很快趋向于近似标准，而且使用维持这一标准，而这一标准本身又缓慢趋向于最终标准。这对工资来说是准确的，对利息和其他要素来说也就都是正确的。不过，就理论而言，有一个困难要严重一些。对很多人来说，以竞争为基础的任何一种理论看来好像都是具有某种理论浪漫性的。竞争本身很快就会变成过去的事吗？现在，各方都在组建托拉斯以及其他的资本合并，这预示着竞争之窒息、商业领域垄断体制之确立。如果果真如此，那我们岂不终结了竞争分配理论，而唯发现该理论据以作出预测的事实不复如此了吗？假如适值竞争处于全盛时期，自然价值理论、自然工资理论和自然利息理论等似都具有某种不切实际性了，担当竞争似是成了某种消失着的因素时，上述一切又当如何解释？

It remains for economic dynamics to show that competition is an inextinguishable force. The consolidations of the present period change the mode of its action, but they do not destroy it; and therefore they in no wise invalidate a theory that assumes the existence of it. At no point have we minimized the obstacles that static forces encounter. Everywhere in life are there variations from results that static theory alone calls for. Dynamic theory, if it were quite complete, would give results from which, in actual life, there would be no variation; for it is a part of the function of this division of the science to account for every element of friction, as well as for every change and movement that actual life shows. Among the lesser tasks that it will set for itself is that of reducing to clear formulas the principles which govern trusts, labor unions and other consolidations. It will deal with protective tariffs, which modify values; immigration laws, which affect wages; and currency laws, which influence movements of capital and rates of interest. It will undertake a larger work, when it tries to reduce to law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of capital, and a still larger one, when it shall try to determine the conditions that govern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methods of production change and become more fruitful.

竞争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力量，这是有待动态经济学予以证实的。目前这个时期，竞争的强化使竞争的作用方式改变了，但是，这种强化并没有消除竞争。因此，动态经济学绝不会使一种假定竞争存在的理论丧失价值。无论何时，我们也无望使静态力遇到的障碍减至最小。静态理论独此要求的结果的变化随处可见.如果它属完整的理论，则动态理论就会告知不会有偏离现实生活的变化。因为预示结果是该学科分支的功能的一部分，该分支既要对每个摩擦因素都作出解释，又要对实际生活显示的每一种变化和变动都有做出说明。在该理论将要提出的他竟自行解决的任务中，有一项是把支配垄断企业、工会和其他联合体地种种规律归纳为明白易懂的以惯用语的。该理论经论述包括改变价值的保护性关税、影响工资的迁移规律以及影响资本流动与利率的货币规律。一旦试图归纳出入人口增长和资本增长的规律，而且更进一步地尝试决定控制各种生产方法赖以变成更富有成效的各种条件时，该理论即可大有作为。

Movement is the general subject of dynamic economies. The direction and the velocity of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world are always what it seeks to account for. In studying wages it will deal with an actual rise in the rate; in studying interest, with a fall in the rate and an increase in the gross amount; in studying profits, with the alternate appearing and vanishing of this element of gain. Conditions of local and of world-wide prosperity are other subjects for it; and among the conditioning causes of prosperity are political policie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here is, indeed, in mundane affairs little of importance for humanity that does not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division of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变化是动态经济学的总的主题。经济领域变化的方向和速度始终是该学科寻求作出解释的对象。研究工资要阐明工资的实际升降；研究利息要阐明利率之降和利息总额之增；研究利润要阐明该利润各要素的此消彼长。各地和全世界得以繁荣的条件是该学科的另外的主题；在繁荣得以实现的条件性因素中，有各国和国际的政治方针等。实际上，世俗事务中，有对于人类而言几无重要性可说的东西，而它们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一分支研究的范围。

But the task of developing this branch of science is so large that the execution of it will occupy generations of workers. As limitless as any other scientific field is the domain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though early results may be modest, the value of any of them will be great enough to reward the hardest labor, while the unreached areas that will open before the explorer's eye, at every step in advance, will lure him to work that for difficulty and for fruitfulness will surpass any which has thus far been undertaken. Yet, whatever movements the dynamic division of economic science may discover and explain, static laws will never cease to be dominant. All real knowledge of the laws of movement depends upon an adequate knowledge of the laws of rest.

不过，发展这门学科的任务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没有数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是无望完成的。与其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一样，动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那一穷尽的，而且，先前的研究成果或许并不太多，而且，取得其中任何一种的价值又都弥足珍贵，是足以酬偿最辛勤的劳动；探索者每向前一步，展现在他眼前的未尽的领域就都会吸引他知难而进，获取超过至今已或成就的累累硕果。然而，任何变动，经济学的这个动态分支都总能予以发现和予以解释，而静态规律也从来未曾不是占支配地位的。有关任何运动规律的一切真知灼见也将都取决于精通静态规律。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国富论

Wealth of Nations

【英】亚当·斯密

Adam Smi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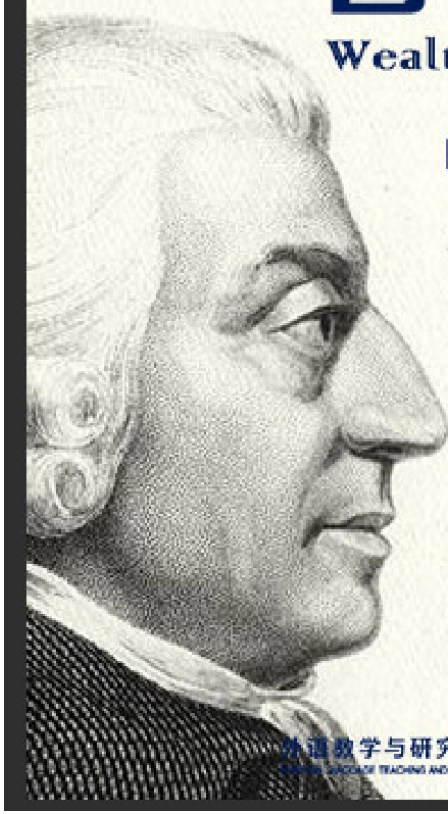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国富论（英汉对照）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亚当·斯密 著

王雨涵 译

目 录

- Introduction and Plan of the Work 导论及全书设计
- Book I Of the Causes of Improvement is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and of the Order According to Which its Produce is Naturally Distributed Among the Different Ranks of the People 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逐渐提高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同阶层间自由分配的顺序
- Book II. Of the Nature, Accumulation, and Employment of Stock 第二篇、论资本的性质及其积累和用途
- BOOK III Of the Different Progress of Opulence in Different Nations 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不同的富裕进程
- Book IV Of Systems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 Book V Of the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Introduction and Plan of the Work

导论及全书设计

The annual labour of every nation is the fund which originally supplies it with all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which it annually consumes, and which consist always either in the immediate produce of that labour, or in what is purchased with that produce from other nations.

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这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有些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有些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买进来的物品。

According therefore, as this produce, or what is purchased with it, bears a greater or smaller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are to consume it, the nation will be better or worse supplied with all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for which it has occasion.

这类产物或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买进来的物品，与消费这些物品的人数，或成较大的比例，或成较小的比例，所以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所有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比例的大小。

But this proportion must in every nation be regulated by two different circumstances；first by the skill, dexterity, and judgment with which its labour is generally applied; and, secondly, by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are employed in useful labour, and that of those who are not so employed. Whatever be the soil, climate, or extent of territory of any particular nation, the abundance or scantiness of its annual supply must, in that particular situation, depend upon those two circumstances.

但是，无论对哪一国而言，这一比例都要受下面两种情况的制约：首先是这个国家的劳动力在总体上掌握的劳动技能、劳动的熟练程度以及思维判断力；其次是从事有用劳动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人数的比例。不论一个国家土壤肥沃程度、气候条件和国土面积如何，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

The abundance or scantiness of this supply, too, seems to depend more upon the former of those two circumstances than upon the latter. Among the savage nations of hunters and fishers, every individual who is able to work, is more or less employed in useful labour, and endeavours to provide, as well as he can,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for himself, and such of his family or tribe as are either too old, or too young, or too infirm to go a-hunting and fishing. Such nations, however, are so miserably poor, that, from mere want, they are frequently reduced, or, at least, think themselves reduced, to the necessity sometimes of directly destroying, and sometimes of abandoning their infants, their old people, and those afflicted with lingering diseases, to perish with hunger, or to be devoured by wild beasts. Among civilised and thriving nations, on the contrary, though a great number of people do not labour at all, many of whom consume the produce of ten times, frequently of a hundred times more labour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who work; yet the produce of the whole labour of the society is so great, that all are often abundantly

supplied; and a workman, even of the lowest and poorest order, if he is frugal and industrious, may enjoy a greater share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than it is possible for any savage to acquire.

此外，一国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似乎更多地取决于第一种情况，而不是第二种情况。在未开化的渔猎国家，所有能够劳动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竭尽全力为自己和家人以及族人中因老幼病弱而不能渔猎的人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但是，他们是那么贫穷，以致常常迫不得已，或至少觉得迫不得已，要杀害他们中的老人、婴儿以及长期患病的亲人，或者遗弃这些人，任其饿死或被野兽吃掉。与此相反，在文明繁荣的国家里，有很多人完全不从事劳动，但他们所消费的劳动产品，却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多出十倍甚至百倍。不过由于社会全部劳动产品数量丰富，因此通常所有人都能得到充分供给，就连处于社会最底层、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他勤勉节俭，就能比未开化的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The causes of this improvement, in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and the order, according to which its produce is naturally distributed among the different ranks and conditions of men in the society, make the subject of the First Book of this Inquiry.

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是什么？劳动产品按照怎样的顺序自然而然地分配给社会各阶层？这是本书第一篇的主题。

Whatever be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skill, dexterity, and judgment with which labour is applied in any nation, the abundance or scantiness of its annual supply must depend,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that state, upon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are annually employed in useful labour, and that of those who are not so employed. The number of useful and productive labourers, it will hereafter appear, is everywhere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f capital stock which is employed in setting them to work, and to the particular way in which it is so employed. The Second Book, therefore, treats of the nature of capital stock, of the manner in which it is gradually accumulated, and of the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labour which it puts into mo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it is employed.

一个国家无论其劳动力掌握何种技能、劳动的熟练程度和思维判断力怎样，假使这三者保持不变，那么该国民每年供给情况的好坏必将取决于每年从事有用劳动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员比例。本书的后面章节将会提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从事有用劳动的生产性劳动者数量，都与推动劳动者工作所投入的资本数量，以及资本的特定用途成比例。因此，本书的第二篇将讨论资本的性质，资本逐渐积累的方式，以及因为资本用途不同导致推动的劳动者数量不同等问题。

Nations tolerably well advanced as to skill, dexterity, and judgment,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bour, have followed very different plans in the general conduct or direction of it; and those plans have not all been equally favourable to the greatness of its produce. The policy of some nations has given extraordinary encouragement to the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that of others to the industry of towns. Scarce any nation has dealt equally and impartially with every sort of industry. Since the down-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policy of Europe has been more favourable to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the industry of towns, than to agriculture, the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seem to have introduced

and established this policy are explained in the Third Book.

在有些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技巧，劳动的熟练程度以及思维判断力都具有相当高水平，但这些国家对于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却采取极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虽然都有利于劳动产品的增加，但程度和倾向性却不完全相同。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而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却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对所有产业不偏不倚，让他们均衡发展。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欧洲各国所制定的政策都有利于工业，制造业和商业等城市产业的发展，而农村的产业，即农业的发展常常处于不利地位。本书第三篇将会介绍，究竟是什么情况导致欧洲各国采用和规定了这种政策。

Though those different plans were, perhaps, first introduced by the private interests and prejudices of particular orders of men, without any regard to, or foresight of, their consequences upon the general welfare of the society; yet they have given occasion to very different 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which some magnify the importance of that industry which is carried on in towns, others of that which is carried on in the country. Those theories have had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not only upon the opinions of men of learning, but upon the public conduct of princes and sovereign states. I have endeavoured, in the Fourth Book, to explain, as fully and distinctly as I can, those different theories, and the principal effects which they have produced in different ages and nations.

这些计划的实行，最初也许是因为特殊阶层想要维护自身利益，或持有某种偏见，他们不去考虑这些计划将给社会全体福利带来何种影响，也没有此类远见卓识。但是，这些计划却导致了诸多不同派别的经济学说的出现。有人认为城市产业重要，有人认为农村产业重

要。这些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观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对君主和主权国家的公共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本书的第四篇，我将竭尽所能，详细而明确地解释这些不同派别的学说，并说明它们在各时代和各国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To explain in what has consisted the revenue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or what has been the nature of those funds, which, in different ages and nations, have supplied their annual consumption, is the object of these four first books. The fifth and last book treats of the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In this book I have endeavoured to show; first, what are the necessary expences of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which of those expences ought to be defrayed by the general contribu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which of them, by that of some particular part only, or of some particular members of it: secondly, what are the different methods in which the whole society may be made to contribute towards defraying the expences incumbent on the whole society, and what are the principal advantages and inconveniencies of each of those methods; and, thirdly and lastly, what are the reasons and causes which have induced almost all modern governments to mortgage some part of this revenue, or to contract debts, and what have been the effects of those debts upon the real wealth,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society.

总之，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以及在不同时代，各个国家供应国民每年消费的财富，究竟是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将讨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要努力说明以下各点：第一，君主或国家的必要支出是什么，其中，哪些支出应该由全社会缴纳的赋税来支付，哪些应该由社会某特殊阶层或成员缴纳的特殊赋税来支付；第二，将全社会所有纳税人

的赋税募集起来支付整个社会费用的不同方法有哪些，这些方法各有什么利弊；第三，究竟什么原因使近代几乎所有政府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发行债券，而这种债券对于真实财富，即对于土地和社会劳动力每年创造的产品有什么影响。

Book I Of the Causes of Improvement is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and of the Order According to Which its Produce is Naturally Distributed Among the Different Ranks of the People

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逐渐提高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同阶层间自由分配的顺序

Chapter I.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第一章、论分工

The greatest improvement in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kill, dexterity, and judgment; with which it is anywhere directed, or applied, seem to have been the effect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良，以及劳动在其指向或得到应用的各领域所表现出的技能、熟练性以及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The effect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the general business of society, will be more easily understood, by considering in what manner it operates in some particular manufactures. It is commonly supposed to be carried furthest in some very trifling ones; not perhaps that it really is carried further in them than in others of more importance: but in those trifling manufactures which are destined to supply the small wants of but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the whole number of workmen must necessarily be small; and those employed in every different branch of the work can often be collected into the same workhouse, and placed at once under the

view of the spectator.

首先我们先来分析某些制造业的分工状况，以便读者更容易理解分工在社会一般事务中所产生的结果。人们一般认为，某些微不足道的制造业分工最为完备。事实上，这些不甚重要的制造业的分工，并不比重要的制造业更为周密。但是，由于前者只需供给少数人小量的需求，其雇佣的工人数量必然不多，从事不同部门工作的工人往往可集中在同一工厂内，因此观察者能一览无遗。

In those great manufactures, on the contrary, which are destined to supply the great wants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every different branch of the work employs so great a number of workmen,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collect them all into the same workhouse. We can seldom see more, at one time, than those employed in one single branch. Though in such manufactures, therefore, the work may really be divided into a much greater number of parts, than in those of a more trifling nature, the division is not near so obvious, and has accordingly been much less observed.

相反，大的制造业因需要供给大多数人的大量需求，因此每个工作部门都需要雇佣大量的工人，要把这么多工人都集中在同一个工厂内工作，似乎不太可能。我们通常一次只能看见一个部门雇佣的工人。因此，虽然在这种大的制造业中，工作被分配给了许许多多不同的部门，但这种分工不像小制造业那么明显，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

To take an example, therefore, from a very trifling manufacture; but one in which the division of labour has been very

often taken notice of, the trade of the pin-maker; a workman not educated to this business (which the division of labour has rendered a distinct trade), nor acquainted with the use of the machinery employed in it (to the invention of which the same division of labour has probably given occasion), could scarce, perhaps, with his utmost industry, make one pin in a day, and certainly could not make twenty. But in the way in which this business is now carried on, not only the whole work is a peculiar trade, but it is divided into a number of branches, of which the greater part are likewise peculiar trades. One man draws out the wire, another straights it, a third cuts it, a fourth points it, a fifth grinds it at the top for receiving the head; to make the head requires two or three distinct operations; to put it on is a peculiar business, to whiten the pins is another; it is even a trade by itself to put them into the paper; and the important business of making a pin is, in this manner, divided into about eighteen distinct operations, which, in some manufactories, are all performed by distinct hands, though in others the same man will sometimes perform two or three of them. I have seen a small manufactory of this kind where ten men only were employed, and where some of them consequently performed two or three distinct operations. But though they were very poor, and therefore but indifferently accommodated with the necessary machinery, they could, when they exerted themselves, make among them about twelve pounds of pins in a day. There are in a pound upwards of four thousand pins of a middling size. Those ten persons, therefore, could make among them upwards of forty-eight thousand pins in a day. Each person, therefore, making a tenth part of forty-eight thousand pins, might be considered as making four thousand eight hundred pins in a day. But if they had all wrought separately and independently, and without any of them having been educated to this peculiar business, they certainly could not each of them have made twenty, perhaps not one pin in a day; that is,

certainly, not the two hundred and fortieth, perhaps not the four thousand eight hundredth part of what they are at present capable of performing, in consequence of a proper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of their different operations.

举例来说，扣针业可谓极微小的制造业，但它的分工却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工人，如果没有受过这门职业（分工使扣针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相应的培训，又不知怎样使用制针的机器（这种机器的发明，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即使他竭尽全力地工作，恐怕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更不可能了。但按照该行业现在的运作方式，不但整个制针工作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又分成若干部门，其中大部分部门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人抽出铁线，一人把线拉直，一人把线切断，一人把线削尖，再一人打磨线头，装上针头。而要做针头，则需要两三种不同的工序。装针头、涂白，甚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制针这一职业就被分成了18种不同的工序。在有些工厂，每道工序由不同的工人操作。当然，有的工厂有时也会让一个工人操作两三道工序。我就见过这样一个小工厂，只雇佣10个工人，因此有的工人就要操作两三道工序。虽然工人们都很穷，必要的机械设备也很简陋，但如果他们努力工作，一天能生产出12磅针。每磅中等型号针大约4000枚，因此这10个工人每天就可成针4.8万枚，相当于每人每天成针4800枚。但如果这些工人各自分开独立工作，且均未接受过该职业的培训，那么他们绝对不可能一天制造20枚针，甚至一枚针都制造不出来。换句话说，现在的劳动分工和各工序相互合作使工人得以大批制针，倘若没有这一工作模式，工人们一天恐怕不能制成现有数量的1/240，甚至这数量的1/4800也不及。

In every other art and manufacture, the effect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are similar to what they are in this very trifling one; though, in many of them, the labour can neither be so much

subdivided, nor reduced to so great a simplicity of operation. The division of labour, however, so far as it can be introduced, occasions, in every art, a proportionable increase of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The separation of different trades and employments from one another, seems to have taken place in consequence of this advantage. This separation, too, is generally carried furthest in those countries which enjoy the highest degree of industry and improvement; what is the work of one man in a rude state of society, being generally that of several in an improved one. In every improved society, the farmer is generally nothing but a farmer; the manufacturer, nothing but a manufacturer. The labour, too, which is necessary to produce any one complete manufacture, is almost always divided among a great number of hands. How many different trades are employed in each branch of the linen and woollen manufactures, from the growers of the flax and the wool, to the bleachers and smoothers of the linen, or to the dyers and dressers of the cloth! The nature of agriculture, indeed, does not admit of so many subdivisions of labour, nor of so complete a separation of one business from another, as manufactures. It is impossible to separate so entirely, the business of the grazier from that of the corn-farmer, as the trade of the carpenter is commonly separated from that of the smith. The spinner is almost always a distinct person from the weaver; but the ploughman, the harrower, the sower of the seed, and the reaper of the corn, are often the same. The occasions for those different sorts of labour returning with the different seasons of the year, it is impossible that one man should be constantly employed in any one of them. This impossibility of making so complete and entire a separation of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labour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is perhaps the reason wh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in this art, does not always keep pace with their improvement in manufactures. The most opulent nations, indeed,

generally excel all their neighbours in agriculture as well as in manufactures; but they are commonly more distinguished by their superiority in the latter than in the former. Their lands are in general better cultivated, and having more labour and expence bestowed upon them, produce more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and natural fertility of the ground. But this superiority of produce is seldom much more than in proportion to the superiority of labour and expence. In agriculture, the labour of the rich country is not always much more productive than that of the poor; or, at least, it is never so much more productive, as it commonly is in manufactures. The corn of the rich country, therefore, will not always, in the same degree of goodness, come cheaper to market than that of the poor. The corn of Poland, in the same degree of goodness, is as cheap as that of France, notwithstanding the superior opulence and improvement of the latter country. The corn of France is, in the corn provinces, fully as good, and in most years nearly about the same price with the corn of England, though, in opulence and improvement, France is perhaps inferior to England. The corn-lands of England, however, are better cultivated than those of France, and the corn-lands of France are said to be much better cultivated than those of Poland. But though the poor country, notwithstanding the inferiority of its cultivation, can, in some measure, rival the rich in the cheapness and goodness of its corn, it can pretend to no such competition in its manufactures; at least if those manufactures suit the soil, climate, and situation of the rich country. The silks of France are better and cheaper than those of England, because the silk manufacture, at least under the present high dutie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raw silk, does not so well suit the climate of England as that of France. But the hardware and the coarse woollens of England are beyond all comparison superior to those of France, and much cheaper too in the same degree of goodness. In Poland there are said to be scarce any manufactures of

any kind, a few of those coarser household manufactures excepted, without which no country can well subsist.

其他任何工艺和制造业，虽未必有如此精细的分工，或操作不致如此简单，但分工的效果却和微小的制针业是相似的。所有可以分工的工艺，一经分工，便能相应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各种行业彼此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通常，在产业最发达，劳动生产力改善程度最高的国家，行业的分工最为彻底。在未开化的社会里，一个人常常要独自承担进步社会中几个人共同完成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农民常常只顾务农，工人只负责生产。生产任何一件成品所必要的劳动，也常常由很多工人共同完成。从亚麻及羊毛的生产，到麻布的漂白和烫平，或是呢绒的染色和上色，麻织业和毛织业生产的各个部门要使用多少种工艺啊！农业由于其性质和制造业不同，不能如制造业那般精细分工，各项工作也不能如制造业那般各自分立。木匠与铁匠的工作，通常是绝对分开的，但畜牧者与种稻者的业务，却不能像前者那样完全分开。纺布和织布，常常由两人完成，但锄耕、耙犁、播种和收割工作，却常由一人兼做。随着季节的更替，农业的各种工作循环交替，一个人不可能只从事一种工作。所以，不能进行完全彻底的分工，大概就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总是落后于制造业的原因。富国常常有着所有邻国都无法比拟的发达的农业和制造业，但其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常常大于在农业方面的优势。富国的土地通常耕耘得更好，投在土地上的劳动与资金也比较多，考虑到土地面积与肥沃程度，生产出来的生产物也较多；但是，富国在农业产量上的优势，却很少同其在土地上投入的大量劳动和资金相匹配。在农业方面，富国劳动生产力未必都比穷国劳动生产力大得多，至少不会出现制造业领域那么大的差异。因此，如果质量相同，富国的谷物在市场上的售价，未必都比穷国低廉。虽然波兰的富裕程度和劳动生产力改善程度远不及法国，但波兰谷物的价格，与同等质量的法国谷物同样低廉。法国的富裕程度和劳动生产力改善程度可能不及英格兰，但法国产谷各省出产的谷物，在质量上和英格兰谷物一样好，而且在大多数年头，两者的价格也相差不大。但是，英格兰的谷地耕种得比法国

好，而法国的谷地，据说耕种得比波兰好得多。尽管穷国在耕作上处于劣势，但其谷物物美价廉，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富国竞争。但是，穷国在制造业上不能和富国竞争，至少当富国能够为制造业提供适合的土壤、气候和地理位置时，穷国不能和富国竞争。拿丝绸业来说，法国的气候同英格兰气候相比，更适合原丝的生产，因此法国的丝绸同英格兰丝绸相比，可谓物更美，价更廉。至少在当今对原丝进口征收高额关税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但英格兰的铁器和粗毛织物，却远胜于法国，而且同样质量的英格兰货比法国货更便宜。据说在波兰，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生存必不可少的粗糙家庭制造业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制造业。

This great increase of the quantity of work which, in consequenc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same number of people are capable of performing, is owing to thre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first, to the increase of dexterity in every particular workman; secondly, to the saving of the time which is commonly lost in passing from one species of work to another; and lastly, to the invention of a great number of machines which facilitate and abridge labour, and enable one man to do the work of many.

有了分工，同等数量工人的工作量便大幅度提升，这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每位工人的熟练度因分工而增加；第二，工人原来因为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所耗费的大量时间，往往因分工而得到减少；第三，方便和简化劳动的机器得以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Firs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exterity of the workman necessarily increases the quantity of the work he can perform;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by reducing every man's business to some

one simple operation, and by making this operation the sole employment of his life, necessarily increases very much the dexterity of the workman. A common smith, who, though accustomed to handle the hammer, has never been used to make nails, if upon some particular occasion he is obliged to attempt it, will scarce, I am assured, be able to make above two or three hundred nails in a day, and those too very bad ones. A smith who has been accustomed to make nails, but whose sole or principal business has not been that of a nailer, can seldom with his utmost diligence make more than eight hundred or a thousand nails in a day. I have seen several boys under twenty years of age who had never exercised any other trade but that of making nails, and who, when they exerted themselves, could make, each of them, upwards of two thousand three hundred nails in a day. The making of a nail, however, is by no means one of the simplest operations. The same person blows the bellows, stirs or mends the fire as there is occasion, heats the iron, and forges every part of the nail: in forging the head too he is obliged to change his tools. The different operations into which the making of a pin, or of a metal button, is subdivided, are all of them much simpler, and the dexterity of the person, of whose life it has been the sole business to perform them, is usually much greater.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some of the operations of those manufactures are performed, exceeds what the human hand could, by those who had never seen them, be supposed capable of acquiring.

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必然将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而分工由于将工人的工作简化为某种简单操作，而又使其终生从事这一操作，因此自然能提高工人的熟练程度。普通的铁匠或许惯于打制铁钉，但却从未有过制钉的经历，倘若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这位铁匠必须制钉，我敢保证，他一天至多只能做出二三百枚针来，而且质

量可能不佳。但就算有位铁匠惯于制钉，若不以制钉为主业或专业，那么他就算竭尽全力，一天制造的钉子也不会超过800枚或1000枚。我曾见过几个以制钉为专业、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倘若努力工作，每人每天能制造两千三百多枚钉子。但是，打制铁钉绝不是最简单的操作。同一位工人，既要拉动鼓风炉，又要搅动或添加火力，在打制钉头时还得调换工具。相比之下，制扣针和制金属纽扣涉及的各项操作要简单得多，那些终生只以其中某项操作为业的人，对此操作的熟练程度通常也高得多。因此，在此类制造业中，某些操作的速度之快，超乎想象。你若非亲眼所见，绝不会相信，人手竟能快到如此程度。

Secondly, the advantage which is gained by saving the time commonly lost in passing from one sort of work to another, is much greater than we should at first view be apt to imagine it. It is impossible to pass very quickly from one kind of work to another; that is carried on in a different place, and with quite different tools. A country weaver, who cultivates a small farm, must lose a good deal of time in passing from his loom to the field, and from the field to his loom. When the two trades can be carried on in the same workhouse, the loss of time is no doubt much less. It is even in this case, however, very considerable. A man commonly saunters a little in turning his hand from one sort of employment to another. When he first begins the new work he is seldom very keen and hearty; his mind, as they say, does not go to it, and for some time he rather trifles than applies to good purpose. The habit of sauntering and of indolent careless application, which is naturally, or rather necessarily acquired by every country workman who is obliged to change his work and his tools every half hour, and to apply his hand in twenty different ways almost every day of his life, renders him almost always slothful and lazy, and incapable of any vigorous application even on the most pressing occasions. Independent,

therefore, of his deficiency in point of dexterity, this cause alone must always reduce considerably the quantity of work which he is capable of performing.

第二，工人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浪费的时间因分工而得以减少，由此带来的好处，比我们乍一看所想象的大得多。一个工人不可能从一种工作飞快地转到另一种工作，尤其当另一种工作需要在别的地方进行，而且要求工人使用截然不同的工具时。对于一位既有可以耕作的小农场，又有纺织机的农民来说，由纺织机到耕地，再从耕地到纺织机，一定会耗费他不少时间。倘若两种工作能在同一场所进行，那么耗费的时间无疑将大大降低。但即使这样，损失的时间还是很多。人们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时，常常不能马上适应。人们在开始一种新工作时，很难全神贯注、精神饱满，正如他们自己所言，总感觉有点儿心不在焉。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宁愿闲混也不愿努力工作。农民每半小时就要换一份工作和劳动工具，在其一生中几乎每天都要从事20种不同种类的工作。这几乎自然，或者必然使他们养成了散漫和漫不经心的习惯。这种习惯使他们变得惰性很大，即使在紧要场合也无法全神贯注。所以，不考虑熟练度方面的欠缺，单就这些习惯也一定会使他们的工作量大大减少。

Thirdly, and lastly, everybody must be sensible how much labour is facilitated and abridg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proper machinery. It is unnecessary to give any example. I shall only observe, therefore, that the invention of all those machines by which labour is so much facilitated and abridged, seems to have been originally owing to the division of labour. Men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discover easier and readier methods of attaining any object, when the whole attention of their minds is directed towards that single object, than when it is dissipated among a great variety of things. But in consequenc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whole of

every man's attention comes naturally to be directed towards some one very simple object. It is naturally to be expected, therefore, that some one or other of those who are employed in each particular branch of labour should soon find out easier and readier methods of performing their own particular work, wherever the nature of it admits of such improvement. A great part of the machines made use of in those manufactures in which labour is most subdivided, were originally the inventions of common workmen, who, being each of them employed in some very simple operation, naturally turned their thoughts towards finding out easier and readier methods of performing it. Whoever has been much accustomed to visit such manufactures, must frequently have been shewn very pretty machines, which were the inventions of such workmen, in order to facilitate and quicken their own particular part of the work. In the first fire-engines, a boy was constantly employed to open and shut alternately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boiler and the cylinder, according as the piston either ascended or descended. One of those boys, who loved to play with his companions, observed that, by tying a string from the handle of the valve which opened this communication, to another part of the machine, the valve would open and shut without his assistance, and leave him at liberty to divert himself with his play-fellows. One of the greatest improvement that has been made upon this machine, since it was first invented, was in this manner the discovery of a boy who wanted to save his own labour.

第三，众所周知，利用适当的机器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劳动速度、节省劳力，在此我就没必要举例了。因此，我只想说的一点是：所有这些机器的发明，起初似乎也是分工的结果。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件事，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上时，往往能发现更简单、更便捷的方法来达到目标。分工使每个人很自然地将注意力倾注到某件很

简单的事情上。所以只要工作性质允许人们改良工作方法，那么每个部门的劳动者中，肯定有人能很快发现一些简单便捷的工作方法来完成他们的本职工作。在分工最为精细的制造业中，那些投入使用的大部分机器，起初都是普通工人发明的。他们各自从事某种极为简单的操作，工作过程中自然而然想要找出简单便捷的工作方法。如果你常去制造厂参观，就会发现很多非常小的机械，这些机械都是普通工人为了更方便、更快捷地完成自己那部分工作而发明出来的。最初的蒸汽机在运作时，常需要雇佣一个儿童，按活塞的升降，交替打开或关闭汽锅与汽筒间的通道。有一个贪玩的小孩发现，如果将开闭通路的活门的把手和机械的另一部分用绳系在一起，活门就可自行开关，他便可以分心和小伙伴们玩耍了。这个自蒸汽机发明以来所接受的最大改良之一，就这样被一个偷懒的小男孩发现了。

All the improvements in machinery, however, have by no means been the inventions of those who had occasion to use the machines. Many improvements have been made by the ingenuity of the makers of the machines, when to make them became the business of a peculiar trade; and some by that of those who are called philosophers or men of speculation, whose trade it is not to do any thing, but to observe every thing; and who, upon that account, are often capable of combining together the powers of the most distant and dissimilar objects. In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philosophy or speculation becomes, like every other employment, the principal or sole trade and occupation of a particular class of citizens. Like every other employment too, it is subdivided into a great number of different branches, each of which affords occupation to a peculiar tribe or class of philosophers; and this subdivision of employment in philosophy, as well as in every other business, improves dexterity, and saves time. Each individual becomes more expert in his own peculiar branch, more work is done upon the whole, and the quantity of science i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by it.

然而，并非一切机械的改良都是由机械使用者发明的。当制造机械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有许多改良，是机械制造者发挥聪明才智实现的；还有一些改良来自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智慧。这些人什么也不做，唯一的工作就是观察世间万物，所以他们常常能够将看似最不相关、极不相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的进步，哲学家或思想家也像其他职业一样，成为某一群体的行业和职业。而且这些职业也像其他职业那样，细分为许多不同的分支，每个部门为某一特定的哲学家群体提供职业。这种哲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分工，提高了人们的熟练度，并节省了时间。每个人都成为各自分支的专家，不仅使总体工作量增加，而且大大充实了学科领域内的内容。

It is the great multiplication of the productions of all the different arts, in consequenc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which occasions, in a well-governed society, that universal opulence which extends itself to the lowest ranks of the people. Every workman has a great quantity of his own work to dispose of beyond what he himself has occasion for; and every other workman being exactly in the same situation, he is enabled to exchange a great quantity of his own goods for a great quantity,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for the price of a great quantity of theirs. He supplies them abundantly with what they have occasion for, and they accommodate him as amply with what he has occasion for, and a general plenty diffuses itself through all the different ranks of the society.

由于分工，各行各业的产量成倍增长，在治理有方的社会中，普遍富裕终于到达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各劳动者通过自身劳动所生产的

产品，不仅可以供应自身的需求，还能节余大量的产品以供出售；其他的工人也是如此，各个人都能用自己生产的大量产品，换取其他工人的大量产品，或是等价物。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大量供应；他所需的物品，别人也能大量供应。于是，社会各阶层实现普遍富裕。

Observe the accommodation of the most common artificer or day-labourer in a civilised and thriving country, and you will perceive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of whose industry a part, though but a small part, has been employed in procuring him this accommodation, exceeds all computation. The woollen coat, for example, which covers the day-labourer, as coarse and rough as it may appear, is the produce of the joint labour of a great multitude of workmen. The shepherd, the sorter of the wool, the wool-comber or carder, the dyer, the scribbler, the spinner, the weaver, the fuller, the dresser, with many others, must all join their different arts in order to complete even this homely production. How many merchants and carriers, besides, must have been employed in transporting the materials from some of those workmen to others who often live in a very distant part of the country! How much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in particular, how many ship-builders, sailors, sail-makers, rope-makers, must have been employed in order to bring together the different drugs made use of by the dyer, which often come from the remotest corners of the world! What a variety of labour too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duce the tools of the meanest of those workmen! To say nothing of such complicated machines as the ship of the sailor, the mill of the fuller, or even the loom of the weaver, let us consider only what a variety of labour is requisite in order to form that very simple machine, the shears with which the shepherd clips the wool. The miner, the builder of the furnace for smelting the ore, the feller of the timber, the burner of the charcoal to be made use of in the smelting-house, the brick-

maker, the brick-layer, the workmen who attend the furnace, the mill-wright, the forger, the smith, must all of them join their different arts in order to produce them. Were we to examine, in the same manner,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his dress and household furniture, the coarse linen shirt which he wears next his skin, the shoeswhich cover his feet, the bed which he lies on, and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which compose it, the kitchen-grate at which he prepares his victuals, the coals which he makes use of for that purpose, dug from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and brought to him perhaps by a long sea and a long landcarriage, all the other utensils of his kitchen, all the furniture of his table, the knives and forks, the earthen or pewter plates upon which he serves up and divides his victuals, the different hands employed in preparing his bread and his beer, the glass window which lets in the heat and the light, and keeps out the wind and the rain, with all the knowledge and art requisite for preparing that beautiful and happy invention, without which these northern parts of the world could scarce have afforded a very comfortable habitation, together with the tools of all the different workmen employed in producing those different conveniencies; if we examine, I say, all these things, and consider what a variety of labour is employed about each of them, we shall be sensible that without the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of many thousands, the very meanest person in a civilised country could not be provided, even according to what we very falsely imagine, the easy and simple manner in which he is commonly accommodated. Compared, indeed, with the more extravagant luxury of the great, his accommodation must no doubt appear extremely simple and easy; and yet it may be true, perhaps, that the accommodation of an European prince does not always so much exceed that of an industrious and frugal peasant, as the accommodation of the latter exceeds that of many an African king, the absolute master of the lives and liberties of ten thousand naked savages.

看一看文明而繁荣的国家里最普通的技工或日工的日用品，你就会发现，每一件日用品都凝聚了许许多多工人的劳动，数量几乎数不胜数，虽然每个工人只从事一小部分的工作。以日工所穿的毛外套举例，虽然粗劣，却是许许多多工人共同劳动的产物。牧羊工、拣羊毛工、梳羊毛工、染工、粗梳工、纺工、织工、漂白工、裁缝工，以及其他许多人，必须将各自的手艺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这件极为普通的日用品。工人们住的地方常常相距甚远，要把制衣的材料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得需要多少商人和运输工具啊！染工所需要的各种染料，常常产自世界各个遥远的地方，要把这些染料送到染工的手中，得需要多少行业，尤其是商业和航运业的参与啊！这得需要雇佣多少造船工、水手、制帆工和制绳工啊！要把这些最普通的工人使用的工具生产出来，需要多少种类的劳动啊！暂且不提水手用的船，漂洗工用的磨，纺织工用的纺织机等复杂的机器，单看牧羊人剪羊毛时所用的剪刀这一极其简单的用具，就凝结了多少种类的劳动啊！采矿工、熔铁炉制造工、伐木工、熔铁厂所用焦炭的烧炭工、制砖工、泥水匠、锅炉工、磨坊设计者及机器制造者、锻工，铁匠等等，所有人必须把各自不同的工艺结合起来，才能把这把剪刀生产出来。同样，我们再看一看牧羊人的外套和家具，如他贴身穿的粗麻衬衣，脚踩的鞋子，睡觉用的床以及组成床的各种部件，做饭时用的炉子，从地下挖掘，可能要依靠长长的水路、陆路运输才送到他手里供他做饭的煤炭，厨房中一切其他用具，餐桌上的所有用具，如刀叉、用来盛饭菜或将饭菜分别盛放的陶制和锡镴制的器皿，为他准备面包和啤酒供他享用的各种工人，为他接收光热、抵御风雨的玻璃窗（要知道，创造玻璃窗这一令人幸福的伟大发明得需要多少种不同的知识和技艺，而倘若没有这玻璃窗，北部的一些国家可能没法给人们提供舒适的住所了），以及这些生活便利品的生产者们所用的各种各样的工具。我认为，如果我们好好看看这些用品，想一想每件用品里凝聚了多少种不同的劳动，我们就会明白，没有成千上万人的互相帮助和通力合作，哪怕是文明国家里最普通的人，也无法得到在我们的认知里看似简单、不难获得的生活用品（这种认知是非常错误的）。的确，和富豪们的奢侈豪华相比，普通人的生活用品似乎太过简陋。不过，在欧

洲，王子的生活用品却不一定总是比勤勉朴素的农民好得多。但是，欧洲农民的生活用品却比许许多多非洲国王要豪华得多，要知道，非洲国王可是数以万计赤裸的野蛮人生命与自由的绝对主宰啊！

Chapter II. Of the Principle Which Gives Occasion to the Division of Labour

第二章、论分工的缘由

This division of labour, from which so many advantages are derived, is not originally the effect of any human wisdom, which foresees and intends that general opulence to which it gives occasion. It is the necessary, though very slow and gradual, consequence of a certain propensity in human nature which has in view no such extensive utility; the propensity to 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 one thing for another.

尽管人类的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希望实现普遍富裕，但为我们带来诸多好处的分工却并不是人类主动发挥智慧的结果。它是人类本性中某种无意识倾向的必然结果，虽然这一结果的产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以货易货。

Whether this propensity be one of those original principles in human nature, of which no further account can be given; or whether, as seems more probable, it be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the faculties of reason and speech, it belongs not to our present subject to enquire. It is common to all men, and to be found in no other race of animals, which seem to know neither this nor any

other species of contracts. Two greyhounds, in running down the same hare, have sometimes the appearance of acting in some sort of concert. Each turns her towards his companion, or endeavours to intercept her when his companion turns her towards himself. This, however, is not the effect of any contract, but of the accidental concurrence of their passions in the same object at that particular time. Nobody ever saw a dog make a fair and deliberate exchange of one bone for another with another dog. Nobody ever saw one animal by its gestures and natural cries signify to another, this is mine, that yours; I am willing to give this for that. When an animal wants to obtain something either of a man or of another animal, it has no other means of persuasion but to gain the favour of those whose service it requires. A puppy fawns upon its dam, and a spaniel endeavours by a thousand attractions to engage the attention of its master who is at dinner, when it wants to be fed by him. Man sometimes uses the same arts with his brethren, and when he has no other means of engaging them to act according to his inclinations, endeavours by every servile and fawning attention to obtain their good will. He has not time, however, to do this upon every occasion. In civilised society he stands at all times in need of the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of great multitudes, while his whole life is scarce sufficient to gain the friendship of a few persons. In almost every other race of animals each individual, when it is grown up to maturity, is entirely independent, and in its natural state has occasion for the assistance of no other living creature. But man has almost constant occasion for the help of his brethren, and it is in vain for him to expect it from their benevolence only. He will be more likely to prevail if he can interest their self-love in his favour, and show them that it is for their own advantage to do for him what he requires of them. Whoever offers to another a bargain of any kind, proposes to do this. Give me that which I want, and you shall have this which you want, is the meaning of every such

offer; and it is in this manner that we obtain from one another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ose good offices which we stand in need of. 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 We address ourselves, not to their humanity but to their self-love, and never talk to them of our own necessities but of their advantages. Nobody but a beggar chuses to depend chiefly upon the benevolence of his fellow-citizens. Even a beggar does not depend upon it entirely. The charity of well-disposed people, indeed, supplies him with the whole fund of his subsistence. But though this principle ultimately provides him with all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which he has occasion for, it neither does nor can provide him with them as he has occasion for them.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occasional wants is suppli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ose of other people, by treaty, by barter, and by purchase. With the money which one man gives him he purchases food. The old clothes which another bestows upon him he exchanges for other old clothes which suit him better, or for lodging, or for food, or for money, with which he can buy either food, clothes, or lodging, as he has occasion.

至于这种倾向是不是我们无法进一步解释的人性的本能之一，或者似乎更有可能的是，是不是理智和言语这两种才能的必然结果，不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内容。这是人类普遍拥有且特有的倾向，目前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动物有这种倾向。动物们似乎不知道这种交换契约或其他的任何契约。两只猎犬追赶同一只兔子，有时似乎是在协同合作。每只猎犬都把兔子往同伴那边撵，或是在同伴把兔子撵到自己这边来时奋力拦截。但是，这种协同合作，并不是契约的结果，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两只猎犬对同一目标恰巧产生了同样的欲望而已。我们从未见过两只狗会主动公平地交换骨头，也从未见过哪只动物，以某种姿势或自然的叫声，向另一只动物示意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我的东西换你的东西。如果一个动物想从人类或别的动

物那里获得某物，除了博得对方的欢心外，没有其他的说服手段。小狗要想让母狗喂它，会尽力讨母狗的欢心。西班牙猎犬要想吃食，会摆出千般娇态，来唤起饭桌上主人的注意。我们人类有时会对同胞采用同样的手段。当一个人发现没有其他办法让别人按照他的意愿行事时，他就会使出浑身解数，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以博取他人的善意。不过，他没有时间每次都这样做。在文明社会中，一个人总需要大量的合作和帮助，但究其一生，似乎也很难交到几个真心朋友。而除人以外的其他任何动物，一旦成年，便完全独立，在自然状态下是不需要任何生物的帮助的。但是人几乎总是需要同伴的帮助，单凭他人的善意来获得这种帮助肯定是行不通的。他如果能好好利用人们的利己心理，让同伴觉得为他做事自己也能得到好处，那么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不论要做何种交易，总是会这样说：给我我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是每一项交易的含义所在。正是依靠这种方式，我们得到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东西。我们能够获得晚餐，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心怀善意，而是因为这些人关心自己的利益。我们不祈求唤起他们的善心，而是努力激起他们的利己心理。我们从不说出我们的需要，而是谈论他们能获得的好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乞丐，没有人会全部依赖别人的善意谋生。就是乞丐，也不会完全依赖别人的善意过活。诚然，有着菩萨心肠的富人会给乞丐提供谋生的所有资金。虽然这最终能为乞丐提供生活所需的所有物品，但没有、也不可能随时随地为乞丐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的大部分日常需要和其他人一样，也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而得到满足的。比如说，别人施舍了他一些钱，他可以拿去买食物。别人给他的旧衣服，他可以拿去换更合身的衣服，或换住所、换食物、换钱。而有了钱，他又可以换需要的食物、衣服和住所了。

As it is by treaty, by barter, and by purchase, that we obtain from one another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mutual good offices which we stand in need of, so it is this same trucking disposition which originally gives occasion to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a tribe of hunters or shepherds a particular person makes bows and arrows,

for example, with more readiness and dexterity than any other. He frequently exchanges them for cattle or for venison with his companions; and he finds at last that he can in this manner get more cattle and venison, than if he himself went to the field to catch them. From a regard to his own interest, therefore, the making of bows and arrows grows to be his chief business, and he becomes a sort of armourer. Another excels in making the frames and covers of their little huts or moveable houses. He is accustomed to be of use in this way to his neighbours, who reward him in the same manner with cattle and with venison, till at last he finds it his interest to dedicate himself entirely to this employment, and to become a sort of house-carpenter. In the same manner a third becomes a smith or a brazier; a fourth a tanner or dresser of hides or skins,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 clothing of savages. And thus the certainty of being able to exchange all that surplus part of the produce of his own labour, which is over and above his own consumption, for such parts of the produce of other men's labour as he may have occasion for, encourages every man to apply himself to a particular occupation, and to cultivate and bring to perfection whatever talent or genius he may possess for that particular species of business.

正如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我们彼此获得了需要的大部分物品，而最初分工的产生，也是人类这种互通有无的意愿的结果。例如，在狩猎或游牧民族中，比方说，有个擅长制作弓箭的人，干活迅速、手法熟练，为他人所不及。他不断用自己制造的弓箭交换同伴手中的牲畜或鹿肉，最终他发现，他用这种方式获得的牲畜或鹿肉，比自己亲自打猎获得的还要多。于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打算，他逐渐以造箭为主业，于是他成了制造武器的人。还有一个人，擅长建造小茅房或移动房屋的框架和屋顶，于是常常被左邻右舍请去帮忙，邻居们也用牲畜或鹿肉作为报酬，于是他最终发现，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

作中对自己有利，于是他成了一个建筑木匠。同样，第三个人成了铁匠或铜匠，第四个人成了处理毛皮或皮革的硝皮匠或制革人（毛皮或皮革是野蛮人的主要衣料）。因此，每个人在自己劳动之后获得的产品，都能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后换取别人以同种方式剩余的产品。这种确定性鼓励每个人全身心投入到一种工作中去，并培养和完善他们可能具备的在这一领域的天赋。

The difference of natural talents in different men is, in reality, much less than we are aware of; and the very different genius which appears to distinguish men of different professions, when grown up to maturity, is not upon many occasions so much the cause, as the effect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st dissimilar characters, between a philosopher and a common street porter, for example, seems to arise not so much from nature, as from habit, custom, and education. When they came into the world, and for the first six or eight years of their existence, they were perhaps very much alike, and neither their parents nor playfellows could perceive any remarkable difference. About that age, or soon after, they come to be employed in very different occupations. The difference of talents comes then to be taken notice of, and widens by degrees, till at last the vanity of the philosopher is willing to acknowledge scarce any resemblance. But without the disposition to 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 every man must have procured to himself every necessary and conveniency of life which he wanted. All must have had the same duties to perform, and the same work to do, and there could have been no such difference of employment as could alone give occasion to any great difference of talents.

事实上，人类在天赋上的差异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在很多

情况下，成年后人们在不同领域表现出了不同的才能，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两个性格迥异的人之间的差异，比如哲学家和街头搬运工之间的差异，似乎并不是本性导致，而是他们受到不同的习惯、风俗和教育影响的结果。从出生到六岁或八岁以前，这两个人的性格可能非常像，就算是父母和朋友，也看不出两人有任何显著的差别。大概从这个年纪开始，或者随后不久，他们将从事迥然不同的职业，之后他们在才能方面的差距才会逐渐显现并且增大，直到最后，哲学家的虚荣心使其不愿意承认他和搬运工有任何相似的地方。但是，如果人类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那么每个人就必须亲自生产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有人都要履行同样的职责，做同样的工作，那么工作的差异也就不存在了，而由此导致的任何才能的差异也便不复存在。

As it is this disposition which forms that difference of talents, so remarkable among men of different professions, so it is this same disposition which renders that difference useful. Many tribes of animals acknowledged to be all of the same species, derive from nature a much more remarkable distinction of genius, than what, antecedent to custom and education, appears to take place among men. By nature a philosopher is not in genius and disposition half so different from a street porter, as a mastiff is from a greyhound, or a greyhound from a spaniel, or this last from a shepherd's dog. Those different tribes of animals, however, though all of the same species, are of scarce any use to one another. The strength of the mastiff is not, in the least, supported either by the swiftness of the greyhound, or by the sagacity of the spaniel, or by the docility of the shepherd's dog. The effects of those different geniuses and talents, for want of the power or disposition to barter and exchange, cannot be brought into a common stock, and do not in the least contribute to the better accommodation and conveniency of the species. Each animal is still obliged to support and defend itself,

separately and independently, and derives no sort of advantage from that variety of talents with which nature has distinguished its fellows. Among men, on the contrary, the most dissimilar geniuses are of use to one another; the different produces of their respective talents, by the general disposition to 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 being brought, as it were, into a common stock, where every man may purchase whatever part of the produce of other men's talents he has occasion for.

正是这种交换的倾向，使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拥有了截然不同的才能，而也是因为这种交换的倾向，人们才能的差异才变得又用。许多被认为同种但不同族的动物，天生就有着迥然不同的天赋，而这种天赋的差别，比人类先天的（受到教育和习俗影响之前）差别要大得多。就天赋和秉性来说，哲学家与街头搬运工的差异，比起猛犬与猎狗的差异，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长耳狗与牧羊犬的差异，要小得多。但是，这些不同族的动物们，虽然同属一个物种，却不懂得相互利用。猛犬力气大，但猎犬的迅速，长耳狗的敏捷，或是牧羊犬的温顺却没给它带来任何帮助。它们由于缺乏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能力和倾向，因此不能把这些不同的资质和才能变成共同的资源，该物种的动物们也就无法生活得更好、更便利。每个动物仍然各自分立，不得不自给自足，自我保卫。大自然给了它们各种各样的才能，使他们彼此变得不同，但它们却没能从中获得一丁点好处。相反，人类的情况就不同了，即使是完全不搭边儿的才能也能彼此利用。人类通过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普遍倾向，把发挥不同才能生产出的产品聚集在一起，使之成为共同的资源，如此一来，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购买自己所需的别人生产的物品。

Chapter III. That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第三章、论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

As it is the power of exchanging that gives occasion to the division of labour, so the extent of this division must always be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at power, or, in other words,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When the market is very small, no person can have any encouragement to dedicate himself entirely to one employment, for want of the power to exchange all that surplus part of the produce of his own labour, which is over and above his own consumption, for such parts of the produce of other men's labour as he has occasion for.

分工来源于交易能力，因此分工的程度总是受到交易能力的限制，换言之，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如果市场过小，人们就会缺乏动力，不愿意终生从事一项工作。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用自己劳动生产的、满足自己所需后剩余的产品，去交换自己所需的、别人同样剩余的产品。

There are some sorts of industry, even of the lowest kind, which can be carried on nowhere but in a great town. A porter, for example, can find employment and subsistence in no other place. A village is by much too narrow a sphere for him; even an ordinary markettown is scarce large enough to afford him constant occupation. In the lone houses and very small villages which are scattered about in so desert a country as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every farmer must be butcher, baker and brewer for his own family. In such situations we can scarce expect to find even a smith, a carpenter, or a mason, within less than twenty miles of another of the same trade. The scattered families that live at eight or ten miles distance from the nearest of them, must learn to perform

themselves a great number of little pieces of work, for which, in more populous countries, they would call in the assistance of those workmen. Country workmen are almost everywhere obliged to apply themselves to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industry that have so much affinity to one another as to be employed about the same sort of materials. A country carpenter deals in every sort of work that is made of wood: a country smith in every sort of work that is made of iron. The former is not only a carpenter, but a joiner, a cabinetmaker, and even a carver in wood, as well as a wheelwright, a ploughwright, a cart and wagonmaker. The employments of the latter are still more various. It is impossible there should be such a trade as even that of a nailer in the remote and inland parts of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Such a workman at the rate of a thousand nails a day, and three hundred working days in the year, will make three hundred thousand nails in the year. But in such a situation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dispose of one thousand, that is, of one day's work in the year.

有些行业，即使是最低级的那种，也只能在大的城镇经营。举例来说，搬运工只有在大的城镇才能找到工作，维持生活。小村庄对他来说市场实在太小，普通的集镇也不够大，不能持续得为他提供工作。苏格兰高地的乡村异常荒凉，零星散布着几个小型村落，或孤零零的房子。在这里，每个农民都不得不身兼数职，在家里不仅要充当屠夫，还要当面点师乃至酿酒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在二十英里内找到两个铁匠、木匠或石匠。这些分散的住户们，离得最近的有八到十英里远，但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做许多杂活。而在人口众多的乡村，他们一定会请专门的工人来做这些杂活。乡村工人，无论生活在哪个乡村，几乎必须学会做隶属于同一行业的所有不同工作，而这些工作由于性质极为相似，往往使用相同的材料。乡村木匠要做一切木制的物品；铁匠要做一切铁制的物品。乡村木匠不仅是木匠，也是细工木、家具制造者，甚至还是雕木工、车轮制造者、耕犁制造者、手

推车和四轮运货马车制造者。铁匠的工作更是多种多样。在苏格兰高地的偏远和内陆地区，即使是制钉人这样的行业也很难维持。因为虽然他一天能制1000枚钉子，按一年300天工作日算，一年能制30万枚钉子，但在那里，一年也卖不了1000枚钉子，也就是连他一日的工作量都卖不出去。

As by means of water-carriage a more extensive market is opened to every sort of industry than what land-carriage alone can afford it, so it is upon the sea-coast, and along the banks of navigable rivers, that industry of every kind naturally begins to subdivide and improve itself, and it is frequently not till a long time after that those improvements extend themselves to the inland parts of the country. A broad-wheeled waggon, attended by two men, and drawn by eight horses, in about six weeks' time carries and brings back between London and Edinburgh near four ton weight of goods. In about the same time a ship navigated by six or eight men, and sailing between the ports of London and Leith, frequently carries and brings back two hundred ton weight of goods. Six or eight men, therefore, by the help of water-carriage, can carry and bring back in the same time the same quantity of goods between London and Edinburgh, as fifty broad-wheeled waggons, attended by a hundred men, and drawn by four hundred horses. Upon two hundred tons of goods, therefore, carried by the cheapest land-carriage from London to Edinburgh, there must be charged the maintenance of a hundred men for three weeks, and both the maintenance, and, what is nearly equal to the maintenance, the wear and tear of four hundred horses as well as of fifty great waggons. Whereas, upon the same quantity of goods carried by water, there is to be charged only the maintenance of six or eight men, and the wear and tear of a ship of two hundred tons burthen, together with the value of the superior risk, or the difference of the insurance between land and water-

carriage. Were there no oth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ose two places, therefore, but by land-carriage, as no goods could be transported from the one to the other, except such whose price was very considerable in proportion to their weight, they could carry on but a small part of that commerce which at present subsists between them, and consequently could give but a small part of that encouragement which they at present mutually afford to each other's industry. There could be little or no commerce of any kind between the distant parts of the world. What goods could bear the expence of land-carriage between London and Calcutta? Or if there were any so precious as to be able to support this expence, with what safety could they be transported through the territories of so many barbarous nations? Those two cities, however, at present carry on a very considerable commerce with each other, and by mutually affording a market, give a good deal of encouragement to each other's industry.

水运的发展使各行业都拥有了比单一陆运时代更为广阔的市场，因此海岸和运河沿岸的各产业便自然而然得到细分和改良。而这种改良往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逐渐普及到内地。由两人驾驶、八匹马拉动的大轮马车，在六周左右的时间内，只能携带4吨重的货物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往返。然而，由6人或8人驾驶的轮船，在同样的时间里，却常常可以携带200吨重货物往返于伦敦和利斯之间。因此，借助水运，原本需要100人、400匹马和50辆大轮马车运输的货物，现在6人或8人即可运送完毕。因此，就算是用最便宜的陆运手段，要把200吨货物由伦敦运往爱丁堡，也得负担100个人3个星期的生活费和400匹马50辆大轮马车的维护费，以及和维护费几乎相等的其他消耗。但是，若由水运，则只需要付6人或8人的生活费，载重200吨货船的损耗费，以及保险费的差额，即水运保险费与陆运保险费之间的差额。因此，假定在伦敦与爱丁堡之间，除了陆运，没有其他交通方式，那么除了那些重量不大而价格很高的货物外，两地间无法运输其

他的商品。两地间商业往来，便只能为现在的一小部分，而两地对彼此产业的刺激作用，也只有现在的一小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相距甚远的两个地区间将很少，甚至不能进行商业往来。毕竟，从伦敦到加尔各答的陆上运费会很高，什么货物能负担得起呢？就算有这种珍贵无比、能够承担运费的货物，要用什么样的运输方式才能使货物安全通过两地间那么多野蛮民族的领土呢？然而今天，两个城市间有大量的商业往来，相互提供市场，并对彼此的产业发展给予了极大的鼓励。

Since such, therefore, are the advantages of water-carriage, it is natural that the first improvements of art and industry should be made where this conveniency opens the whole world for a market to the produce of every sort of labour, and that they should always be much later in extending themselves into the inland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inland parts of the country can for a long time have no other market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goods, but the country which lies round about them, and separates them from the sea-coast, and the great navigable rivers. The extent of their market, therefore, must for a long time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riches and populousness of that country, and consequently their improvement must always be posterior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at country. In our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the plantations have constantly followed either the sea-coast or the banks of the navigable rivers, and have scarce anywhere extended themselves to any considerable distance from both.

因此，既然水运能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工艺和产业的改良自然最先发生在方便水运发展的地方。这些地方能够为所有劳动产品提供面向世界的广阔市场。而这种改良总要在很久后才能普及到内地。一个国家的内陆地区，由于被其他国家包围，因此无法接触海岸和大的运

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内陆地区的大部分商品只能销往这些国家，找不到其他市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商品所拥有市场的大小，必定和邻国的富裕程度与人口数量成比例。结果便是，只有邻国的市场实现了改良，这些内陆地区的市场才能得到改进。在我国的北美殖民地，种植园全部位于海岸和大运河沿岸，很少扩展到距这些地方很远的地方。

The nations that, according to the best authenticated history, appear to have been first civilised, were those that dwelt round the coast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at sea, by far the greatest inlet that is known in the world, having no tides, nor consequently any waves except such as are caused by the wind only, was, by the smoothness of its surface, as well as by the multitude of its islands, and the proximity of its neighbouring shores, extremely favourable to the infant navigation of the world; when, from their ignorance of the compass, men were afraid to quit the view of the coast, and from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art of shipbuilding, to abandon themselves to the boisterous waves of the ocean. To pass beyond the pillars of Hercules, that is, to sail out of the Straits of Gibraltar, was,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g considered as a most wonderful and dangerous exploit of navig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even the Phoenicians and Carthaginians, the most skilful navigators and ship-builders of those old times, attempted it, and they were for a long time the only nations that did attempt it.

据最可靠的史料记载，开化最早的国家是那些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地中海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内海，既没有潮汐，也没有波涛，刮风引起的波浪除外；地中海海面平滑，岛屿众多，四周的海岸彼此间相距很近；在指南针尚未发明、造船术尚不完善的年代，人类不敢远离海岸，直面波涛汹涌的大海，当时的地中海无疑最适合早期航海。在

古代，驶过赫拉克勒斯之柱，换句话说，驶出直布罗陀海峡，一直被认为是最伟大，也是最危险的航行。就连当时航海和造船工艺最为娴熟的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也是过了好久才敢尝试。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是唯一的两个敢做这种尝试的民族。

Of all the countries on the coast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Egypt seems to have been the first in which either agriculture or manufactures were cultivated and improved to any considerable degree. Upper Egypt extends itself nowhere above a few miles from the Nile, and in Lower Egypt that great river breaks itself into many different canals, which,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little art, seem to have afforded a communication by water-carriage, not only between all the great towns, but between all the considerable villages, and even to many farmhouses in the country; nearly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Rhine and the Maas do in Holland at present. The extent and easiness of this inland navigation was probably one of the principal causes of the early improvement of Egypt.

在地中海沿岸各国中，农业或制造业最早得到开发和改进的，似乎要数埃及。尼罗河自北部流入埃及，距埃及最北端仅数英里，此后一路向南，纵贯整个埃及。在埃及南部，尼罗河分成众多支流，只需辅以少量人工技术，便可实现水运交通，如此不仅能够将大城镇连接起来，就连大村庄之间也实现了贯通，甚至还能抵达许多小小的农舍。尼罗河所提供的这种便利，与当今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和马斯河几乎一模一样。这种广泛而便捷的内陆航行大概是埃及早期取得进步的主要原因。

The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seem likewise to have been of very great antiquity in the provinces of

Bengal, in the East Indies, and in some of the ea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though the great extent of this antiquity is not authenticated by any histories of whose authority we,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re well assured. In Bengal the Ganges and several other great rivers form a great number of navigable canals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Nile does in Egypt. In the Ea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too, several great rivers form, by their different branches, a multitude of canals, and by communicating with one another afford an inland navigation much more extensive than that either of the Nile or the Ganges, or perhaps than both of them put together. It is remarkable that neither the ancient Egyptians, nor the Indians, nor the Chinese, encouraged foreign commerce, but seem all to have derived their great opulence from this inland navigation.

在东印度群岛的孟加拉国各省，以及中国东部的某些省份，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良似乎也是由来已久，虽然欧洲国家目前尚未找到足够信服的史料证明其悠久的历史。在孟加拉国，恒河及其他几大河流就像埃及的尼罗河一样，提供了众多可航行的河道。在中国东部的省份，几条大河也分出了许多支流，形成众多水道，彼此交错，使得内陆的航行更加广泛。航道之广泛，是尼罗河、恒河甚至二者加在一起都望尘莫及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古埃及人、古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不鼓励对外贸易，他们似乎都是从这种内陆航行中获取大量财富的。

All the inland parts of Africa, and all that part of Asia which lies any considerable way north of the Euxine and Caspian seas, the ancient Scythia, the modern Tartary and Siberia, seem in all ages of the world to have been in the same barbarous and uncivilised state in which we find them at present. The Sea of Tartary is the frozen ocean which admits of no navigation, and though some of the

greatest rivers in the world run through that country, they are at too great a distance from one another to carry commerce 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it. There are in Africa none of those great inlets, such as the Baltic and Adriatic seas in Europe, the Mediterranean and Euxine seas in both Europe and Asia, and the gulfs of Arabia, Persia, India, Bengal, and Siam, in Asia, to carry maritime commerce into the interior parts of that great continent: and the great rivers of Africa are at too great a distance from one another to give occasion to any considerable inland navigation. The commerce besides which any nation can carry on by means of a river which does not break itself into any great number of branches or canals, and which runs into another territory before it reaches the sea, can never be very considerable; because it is always in the power of the nations who possess that other territory to obstruc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upper country and the sea. The navigation of the Danube is of very little use to the different states of Bavaria, Austria and Hungary, in comparison of what it would be if any of them possessed the whole of its course till it falls into the Black Sea.

无论时代如何进步，整个非洲内陆，距黑海和里海北部十分遥远的亚洲内陆，古塞西亚，即今日的鞑靼地方和西伯利亚，似乎都永远处于今日那般野蛮和未开化的状态。鞑靼地方的海是无法航行的冰冻海洋，虽然也有几条举世闻名的大河流过鞑靼地方，但彼此间相距甚远，鞑靼地方大部分地区仍无法进行贸易和交通。像欧洲的波罗的海与亚得里亚海、欧亚大陆的地中海与黑海、亚洲的阿拉伯湾、波斯湾、印度湾、孟加拉湾和暹罗湾这样大的内海，非洲是都没有的，而境内的大河又相距实在太远，因此不能开展较大规模的内陆航行。此外，即使某一国境内有河流穿过，能够用来开展贸易，倘若河流没有分出众多支流或河道，或是河流必须流经另一国才能入海，那么该国贸易不可能很发达，因为该国能否与海洋连通，总要取决于下游国是

否加以阻止。以多瑙河为例，其航运对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各国几乎没多大用处。但是，倘若三国中任何一国独占该河注入黑海前的整个流域，那么情况将大大不同。

Chapter IV. Of the Origin and Use of Money

第四章、论货币的起源及其效用

When the division of labour has been once thoroughly established, it is but a very small part of a man's wants which the produce of his own labour can supply. He supplies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m by exchanging that surplus part of the produce of his own labour, which is over and above his own consumption, for such parts of the produce of other men's labour as he has occasion for. Every man thus lives by exchanging, or becomes in some measure a merchant, and the society itself grows to be what is properly a commercial society.

分工一旦完全确立，那么一个人自己劳动所得的产品，将只能满足其需要的极小部分。他需将自己劳动所得、满足自己所需后剩余的产品和自己需要的、他人劳动所得的剩余产品进行交换才能满足自己大部分的需要。于是，所有人都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商人，而社会本身也逐渐成为商业社会。

But when the division of labour first began to take place, this power of exchanging must frequently have been very much clogged and embarrassed in its operations. One man, we shall suppose, has more of a certain commodity than he himself has occasion for, while another has less. The former consequently would be glad to

dispose of, and the latter to purchase, a part of this superfluity. But if this latter should chance to have nothing that the former stands in need of, no exchange can be made between them. The butcher has more meat in his shop than he himself can consume, and the brewer and the baker would each of them be willing to purchase a part of it. But they have nothing to offer in exchange, except the different product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trades, and the butcher is already provided with all the bread and beer which he has immediate occasion for. No exchange can, in this case, be made between them. He cannot be their merchant, nor they his customers; and they are all of them thus mutually less serviceable to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avoid the inconveniency of such situations, every prudent man in every period of society, after the first establishment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must naturally have endeavoured to manage his affairs in such a manner, as to have at all times by him, besides the peculiar produce of his own industry, a certain quantity of some one commodity or other, such as he imagined few people would be likely to refuse in exchange for the produce of their industry.

但是在分工初期，这种交换能力在实际操作中一定常常碰到行不通或尴尬的情况。比如说，甲大量持有某种商品，自己消费不了，而乙持有的却不够用。这时，甲一定愿意出售，乙也一定愿意买甲手中的一部分剩余商品；但假设乙手中恰巧没有甲需要的商品，那么两者间的交易，必然不能实现。再比如，屠夫的店里有很多肉，自己消费不了，酿酒师和面包师当然都愿意买走一部分，但倘若他们除了自己生产的产品，再拿不出别的物品进行交易，而屠夫手里已经有一些面包和啤酒，足以满足当下所需，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换也不可能发生。屠夫不能成为酿酒师和面包师的卖家，酿酒师和面包师也不能成为屠夫的顾客。他们彼此间不能相互服务。在分工初期，为了避免这种不便，每个时代凡是谨慎的人都会这样处理他的事务，即手中除了持有自己劳动所得的产品外，还要时时刻刻保存一定数量的其他产品，而

且这种产品在他看来，一定是拿去和别人交易不会被拒绝的产品。

Many different commodities, it is probable, were successively both thought of and employed for this purpose. In the rude ages of society, cattle are said to have been the common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nd, though they must have been a most inconvenient one, yet in old times we find things were frequently valu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cattle which had been given in exchange for them. The armour of Diomede, says Homer, cost only nine oxen; but that of Glaucus cost a hundred oxen. Salt is said to be the common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nd exchanges in Abyssinia; a species of shells in some parts of the coast of India; dried cod at Newfoundland; tobacco in Virginia; sugar in some of our West India colonies; hides or dressed leather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and there is at this day a village in Scotland where it is not uncommon, I am told, for a workman to carry nails instead of money to the baker's shop or the alehouse.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可能先后想到并使用过许多不同的产品。在未开化的社会，据说人们曾用牲畜作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虽然牲畜一定是最不方便的媒介，但我们却发现在古代，人们常常用交换所需的牲畜数量来衡量物品的价值。荷马曾说道，代奥米德的铠甲，仅值9头牛，而格罗卡斯的铠甲，却值100头牛。据说阿比西尼亚以盐作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印度沿海某些地区以某种贝壳作为通用媒介，纽芬兰用干鳕鱼，弗吉尼亚用烟草，我国西印度殖民地用砂糖，还有一些国家用兽皮或鞣皮。直到今天，我听说苏格兰的一个小乡村用铁钉而不是金钱作媒介，购买麦酒和面包。

In all countries, however, men seem at last to have been

determined by irresistible reasons to give the preference, for this employment, to metals above every other commodity. Metals can not only be kept with as little loss as any other commodity, scarce any thing being less perishable than they are, but they can likewise, without any loss, be divided into any number of parts, as by fusion those parts can easily be reunited again; a quality which no other equally durable commodities possess, and which more than any other quality renders them fit to be the instruments of commerce and circulation. The man who wanted to buy salt, for example, and had nothing but cattle to give in exchange for it, must have been obliged to buy salt to the value of a whole ox, or a whole sheep, at a time. He could seldom buy less than this, because what he was to give for it could seldom be divided without loss; and if he had a mind to buy more, he must, for the same reasons, have been obliged to buy double or triple the quantity, the value, to wit, of two or three oxen, or of two or three sheep. If, on the contrary, instead of sheep or oxen, he had metals to give in exchange for it, he could easily proportion the quantity of the metal to the precise quantity of the commodity which he had immediate occasion for.

然而，不论在哪个国家，人们最终似乎都出于某些不可抗拒的原因，选择金属作为媒介，而不是其他任何商品。金属在保存的过程中不仅具有其他商品不易损耗的特点，而且比其他任何商品都经久耐用。此外，金属还能任意分割而不受丝毫损失，分割的小块也很容易熔合起来。这个特点是其他同样耐用的商品所不具备的，而也是这一特性，使金属成为商业流通的媒介。举例来说，假设一个人要买盐，但手里没有其他商品，只能拿牲畜进行交易，那么他一次必须得买值一整头牛，或一整只羊的量。他的购买不能少于这个量，因为用于交易的牲畜不可能不受损失地分割。如果他想买更多的盐，那么同样因为这个原因，他只能买之前数量的两倍或三倍，也就是价值相当于两到三头牛或两到三只羊的量。但是，如果他用金属，而不是牲畜做交

易，那么他只要根据当时所需的商品数量，按比例分割一定数量的金属，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问题。

Different metals have been made use of by different nations for this purpose. Iron was the common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mong the ancient Spartans; copper among the ancient Romans; and gold and silver among all rich and commercial nations.

不同国家用来做交易的金属不尽相同。古斯巴达人用铁，古罗马人用铜，而所有富裕的商业国都用金银作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

Those metals seem originally to have been made use of for this purpose in rude bars, without any stamp or coinage. Thus we are told by Pliny, upon the authority of Timaeus, an ancient historian, that, till the time of Servius Tullius, the Romans had no coined money, but made use of unstamped bars of copper, to purchase whatever they had occasion for. These bars, therefore, performed at this time the function of money.

最初用作交易的金属，似乎都是粗糙的金属条，上面没有任何印记，也不铸型。普林尼引用古代历史学家提麦奥斯的话说，直到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时代，罗马人还没有铸币制度，只能使用没有任何印记的铜条购买所需的商品。也就是说，这些粗糙的金属条在当时发挥着货币的作用。

The use of metals in this rude state was attended with two very considerable inconveniencies; first, with the trouble of weighing;

and, secondly, with that of assaying them. In the precious metals, where a small difference in the quantity makes a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value, even the business of weighing, with proper exactness, requires at least very accurate weights and scales. The weighing of gold in particular is an operation of some nicety. In the coarser metals, indeed, where a small error would be of little consequence, less accuracy would, no doubt, be necessary. Yet we should find it excessively troublesome, if every time a poor man had occasion either to buy or sell a farthing's worth of goods, he was obliged to weigh the farthing. The operation of assaying is still more difficult, still more tedious, and, unless a part of the metal is fairly melted in the crucible, with proper dissolvents, any conclusion that can be drawn from it, is extremely uncertain. Before the institution of coined money, however, unless they went through this tedious and difficult operation, people must always have been liable to the grossest frauds and impositions, and instead of a pound weight of pure silver, or pure copper, might receive in exchange for their goods, an adulterated composition of the coarsest and cheapest materials, which had, however, in their outward appearance, been made to resemble those metals. To prevent such abuses, to facilitate exchanges, and thereby to encourage all sorts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it has been found necessary, in all countries that have made any considerable advances towards improvement, to affix a public stamp upon certain quantities of such particular metals, as were in those countries commonly made use of to purchase goods. Hence the origin of coined money, and of those public offices called mints; institutions exactly of the same nature with those of the aulnagers and stamp-masters of woollen and linen cloth. All of them are equally meant to ascertain, by means of a public stamp, the quantity and uniform goodness of those different commodities when brought to market.

使用粗糙金属条进行交易会带来两个特别大的麻烦：第一是称量的麻烦；第二是含量测定的麻烦。贵金属即使在分量上只有微小的差异，也会导致价值上很大的不同。因此，要想准确称量这类金属，得有非常精确的砝码和天平才行。金的称量尤其是一项精细的操作。贱金属由于称量上的微小失误不会造成很大的后果，因此确实不需要精确的称量。但倘若有一个穷人，每次只买卖一法寻的货物，每次都得称一法寻的重量，这确实太麻烦了。对金属的含量进行测量就更困难、更繁琐了。必须得把金属的一部分放在坩埚里，加入适当的熔剂，使其完全熔化才能进行检验，否则任何检验结果都极不可靠。但是，在铸币制度建立以前，如果不进行这个又困难又繁琐的检验，人们很容易受到极大的欺骗。比如说，人们售卖手中的商品时，本来也许应得到一磅纯银或纯铜，但实际到手的东西，尽管外表和纯银、纯铜非常相似，却掺杂了最粗糙、最便宜的金属。所以，为了避免这种造假行为，促进交易，从而鼓励各种产业和商业发展，文明国家都认为有必要在本国民众购买货物常常使用的一定量的特定金属上，加盖官印。于是铸币制度以及造币厂等公务部门由此产生。这些机构的性质和毛织品检验机构完全相同，都是通过加盖官印，以确定流入市场的是足量的、优质的产品。

The first public stamps of this kind that were affixed to the current metals, seem in many cases to have been intended to ascertain, what it was both most difficult and most important to ascertain, the goodness or fineness of the metal, and to have resembled the sterling mark which is at present affixed to plate and bars of silver, or the Spanish mark which is sometimes affixed to ingots of gold, and which being struck only upon one side of the piece, and not covering the whole surface, ascertains the fineness, but not the weight of the metal. Abraham weighs to Ephron the four hundred shekels of silver which he had agreed to pay for the field of Machpelah. They are said, however, to be the current money of the merchant, and yet are received by weight and not by tale,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gots of gold and bars of silver are at present. The revenues of the ancient Saxon kings of England are said to have been paid, not in money but in kind, that is, in victuals and provisions of all sorts. William the Conqueror introduced the custom of paying them in money. This money, however, was, for a long time, received at the exchequer, by weight and not by tale.

起初，在这些流通的金属上加盖官印，通常似乎是为了确定金属的品质或纯度，这是金属最难确定，也是最重要的性质。这些官印，有的很像现在银盘或银条上的纯度标记，还有一些像有时加盖在西班牙金块上的标记。这些金块上的标记通常只加盖在金属的一面，而不是覆盖金属的所有面，它所确定的，只是金属的纯度，不是金属的重量。亚伯拉罕为了得到麦克派拉田地，曾秤400谢克尔的银给埃夫龙。据说当时的商人们用银子作为流通货币。但当时货币的流通不是按个数算，而是按重量算，和今天金块银条的流通一样。在古英格兰撒克逊国王时代，据说人们用各种各样的食物和饮料，而不是用货币支付税款。征服者威廉开创了以货币支付税款的习俗。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向国库缴纳的货币是按重量而不是按个数计算的。

The inconveniency and difficulty of weighing those metals with exactness gave occasion to the institution of coins, of which the stamp, covering entirely both sides of the piece and sometimes the edges too, was supposed to ascertain not only the fineness, but the weight of the metal. Such coins, therefore, were received by tale as at present, without the trouble of weighing.

准确称量这些金属的重量是一件很麻烦、很困难的事情。这就导致了铸币制度的产生。人们不仅将官印加盖在金属的两面，有时还加盖在它的边缘。这时官印不仅仅用来确定金属的纯度，还要确定它的

重量。因此，这样的铸币在流通时便如现在这般以个数计，省去了称重的麻烦。

The denominations of those coins seem originally to have expressed the weight or quantity of metal contained in them. In the time of Servius Tullius, who first coined money at Rome, the Roman As or Pondo contained a Roman pound of good copper. It was divid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our Troyes pound, into twelve ounces, each of which contained a real ounce of good copper. The English pound sterling, in the time of Edward I. , contained a pound, Tower weight, of silver, of a known fineness. The Tower pound seems to have been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Roman pound, and something less than the Troyes pound. This last was not introduced into the mint of England till the 18th of Henry VIII. The French livre contained in the time of Charlemagne a pound, Troyes weight, of silver of a known fineness. The fair of Troyes in Champaign was at that time frequented by all the nations of Europe, and the weights and measures of so famous a market were generally known and esteemed. The Scots money pound contained, from the time of Alexander the First to that of Robert Bruce, a pound of silver of the same weight and fineness with the English pound sterling. English, French, and Scots pennies, too, contained all of them originally a real pennyweight of silver, the twentieth part of an ounce, and the two-hundred-and-fortieth part of a pound. The shilling too seems originally to have been the denomination of a weight. *When wheat is at twelve shillings the quarter* , says an ancient statute of Henry III. *,then wastel bread of a farthing shall weigh eleven shillings and fourpence* . The proportion, however, between the shilling and either the penny on the one hand, or the pound on the other, seems not to have been so constant and uniform as that between the penny and the pound. During the first

race of the kings of France, the French sou or shilling appears upon different occasions to have contained five, twelve, twenty, and forty pennies. Among the ancient Saxons a shilling appears at one time to have contained only five pennies, and it is not improbable that it may have been as variable among them as among their neighbours, the ancient Franks. From the time of Charlemagne among the French, and from that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among the English,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pound, the shilling, and the penny, seems to have been uniformly the same as at present, though the value of each has been very different. For in every country of the world, I believe, the avarice and injustice of princes and sovereign states, abusing the confidence of their subjects, have by degrees diminished the real quantity of metal, which had been originally contained in their coins. The Roman As, in the latter ages of theRepublic, was reduced to the twenty-fourth part of its original value, and, instead of weighing a pound, came to weigh only half an ounce. The English pound and penny contain at present about a third only; the Scots pound and penny about a thirty-sixth; and the French pound and penny about a sixty-sixth part of their original value. By means of those operations the princes and sovereign states which performed them were enabled, in appearance, to pay their debts and to fulfil their engagements with a smaller quantity of silver than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requisite. It was indeed in appearance only; for their creditors were really defrauded of a part of what was due to them. All other debtors in the state were allowed the same privilege, and might pay with the same nominal sum of the new and debased coin whatever they had borrowed in the old. Such operations, therefore, have always proved favourable to the debtor, and ruinous to the creditor, and have sometimes produced a greater and more universal revolution in the fortunes of private persons, than could have been occasioned by a very great public calamity.

起初，人们给这些铸币起不同的名字，似乎为了表现铸币所含金属重量或数量的不同。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最先在罗马铸币，当时罗马币阿斯（AS）或庞多（Pondo）含有一罗马磅的纯铜。阿斯或庞多，就像我们的特鲁瓦磅那样，分为12盎司，每盎司含有一盎司纯铜。在爱德华一世时期，一英镑含有纯银一陶尔磅。一陶尔磅似乎比一罗马磅多一些，比一特鲁瓦磅少一些。直到亨利八世十八年，特鲁瓦磅才为英格兰造币厂采用。在查理曼大帝时代，法币里弗赫含纯银一特鲁瓦磅。法国香槟省的特鲁瓦市集曾经名声赫赫，频繁为欧洲各国人民所光顾，因此人们都熟悉并尊重这个市场的称重结果和衡量手段。自亚历山大一世至布鲁斯时代，苏格兰币1镑和英币1镑一样，都含有同重量同纯度的银一磅。英格兰、法兰西和苏格兰的货币一便士，最初确实含有一便士的银，相当于一盎司的1/20，或一磅的1/240。先令最初似乎也是一个重量单位。亨利三世时期的一个古老的法律规定：若以小麦每夸特12先令计，则一法新的上等小麦面包须重12先令4便士。不过，先令对便士或对磅的比例，似乎不像便士对磅的比例那么稳定。在法兰西前几位国王统治时期，法国的苏或先令有时含5便士，有时含12便士，有时含20甚至40便士。对于古撒克逊人来说，1先令有时似乎只含5便士，含量的变动与其邻国人即古代法兰克人的情况大抵类似。法国自查理曼大帝时代以来，英格兰自征服者威廉时代以来，镑、先令或便士的价值虽然发生较大变动，但彼此间的兑换比例却和今天一样。我相信，任何国家的君主和国家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背弃臣民的信任，逐渐减少铸币中最初所含的金属分量。在罗马共和国后期，罗马的阿斯价值减到原价的1/24，含量也由最初的一磅减到现在的只含半盎司。英格兰的镑和便士如今的价值大约只为起初的1/3，苏格兰的镑和便士大约只为起初的1/36，法国的镑和便士大约只为起初的1/66。通过这些办法，君主和国家就能用更少量的银，表面上偿还债务，履行契约。这些确实只是表面文章而已，因为债权人实际上被剥夺了一部分应收账款。政府允许国内所有债务人享有同等特权，即用数量上等值的，但实际上贬值的新货币偿还过去所欠的任何账款。所以，这种做法常常对债务人有利，对债权人不利。有的时候，这种做法对个人财产造成的影响，比造成巨大破

坏的公共灾难还要大得多、普遍得多。

It is in this manner that money has become in all civilised nations the universal instrument of commerce, by the intervention of which goods of all kinds are bought and sold, or exchanged for one another.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货币成为各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个媒介，所有的商品都能进行买卖和交换。

What are the rules which men naturally observe in exchanging them either for money or for one another, I shall now proceed to examine. These rules determine what may be called the relative or exchangeable value of goods.

我现在要讨论的，是人们在用货币交换货物或货物交换货物时所遵循的法则是什么。这些法则决定所谓的商品的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

The word VALUE, it is to be observed, has two different meanings, and sometimes expresses the utility of some particular object, and sometimes the power of purchasing other goods which the possession of that object conveys. The one may be called “value in use” ; the other, “value in exchange.” The things which have the greatest value in use have frequently little or no value in exchange; and, on the contrary, those which have the greatest value in exchange have frequently little or no value in use. Nothing is more

useful than water: but it will purchase scarce any thing; scarce any thing can be had in exchange for it. A diamond, on the contrary, has scarce any value in use; but a very great quantity of other goods may frequently be had in exchange for it.

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它有时表示某一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该种物品而获得的对其他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交换价值很小，或者根本没有交换价值。相反，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使用价值很小，或者根本没有使用价值。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用水不能买任何东西，也几乎无法用水换来任何东西。相反，钻石虽然几乎没有使用价值，但却需要用大量的货物才能与之交换。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principles which regulate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commodities, I shall endeavour to shew:

为了探讨支配商品交换价值的原则，我将努力说明以下三点：

First, what is the real measure of this exchangeable value; or, wherein consists the real price of all commodities.

第一，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什么，或者说，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究竟是什么；

Secondly, what are the different parts of which this real price is

composed or made up.

第二，这个真实价格由哪几部分组成；

And, lastly, what are th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which sometimes raise some or all of these different parts of price above, and sometimes sink them below their natural or ordinary rate; or, what are the causes which sometimes hinder the market price, that is, the actual price of commodities, from coinciding exactly with what may be called their natural price.

第三，什么情况下真实价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什么情况下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或者说，导致商品市场价格或实际价格有时不能与其自然价格恰巧一致的原因是什么？

I shall endeavour to explain, as fully and distinctly as I can, those three subjects in the three following chapters, for which I must very earnestly entreat both the patience and attention of the reader: his patience in order to examine a detail which may perhaps in some places appear unnecessarily tedious; and his atten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at may, perhaps, after the fullest explication which I am capable of giving of it, appear still in some degree obscure. I am always willing to run some hazard of being tedious in order to be sure that I am perspicuous; and after taking the utmost pains that I can to be perspicuous, some obscurity may still appear to remain upon a subject in its own nature extremely abstracted.

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将尽可能详尽而清楚地对这三个问题加以解释。为此，我诚恳地希望读者保持耐心和注意力。唯有保持耐心才能思考有些地方看起来似乎过于繁冗的细节；唯有保持注意力才能理解那些即使我尽力解释清楚但还是有些模糊的概念。我总是甘愿冒着繁冗的风险，以确保我表达得清楚明白。但一些问题由于极其抽象，即使我绞尽脑汁，力图表明观点，恐怕还是有些晦涩难懂。

Chapter V. Of the Real and Nominal Price of Commodities, or of Their Price in Labour, and Their Price in Money

第五章、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论用劳动表示的商品价格与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格

Every man is rich or poor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in which he can afford to enjoy the necessaries, conveniencies, and amusements of human life. But after the division of labour has once thoroughly taken place, it is but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se with which a man's own labour can supply him.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m he must derive from the labour of other people, and he must be rich or poor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y of that labour which he can command, or which he can afford to purchase. The value of any commodity, therefore, to the person who possesses it, and who means not to use or consume it himself, but to exchange it for other commodities, is equal to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it enables him to purchase or command. Labour, therefore, is the real measure of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all commodities.

一个人是富有还是贫穷，要根据他所能享受得起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等级而定。但是一旦分工完全确立以后，一个人自己劳动只能供应上述所需物品极小的一部分，而大部分物品需要依靠

他人劳动来获得。所以，一个人是富有还是贫穷，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即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他人的劳动。倘若一个人占有某种商品，但自己不想使用或消费，愿意拿来交换他物，那么对他说来，该商品的价值等于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数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The real price of every thing, what every thing really costs to the man who wants to acquire it, is the toil and trouble of acquiring it. What every thing is really worth to the man who has acquired it, and who wants to dispose of it or exchange it for something else, is the toil and trouble which it can save to himself, and which it can impose upon other people. What is bought with money, or with goods is purchased by labour, as much as what we acquire by the toil of our own body. That money or those goods indeed save us this toil. They contain the value of a certain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we exchange for what is supposed at the time to contain the value of an equal quantity. Labour was the first price, the original purchase-money that was paid for all things. It was not by gold or by silver, but by labour, that all the wealth of the world was originally purchased; and its value, to those who possess it, and who want to exchange it for some new productions, is precisely equal to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it can enable them to purchase or command.

任何商品的真实价格，即人类想要得到它所需付出的实际代价，是为了获得它所需付出的辛苦和烦恼。而对于已经得到某件商品的人来说，倘若他想将商品卖掉，或是用来交换其他商品，那么他所拥有商品的真正价值，等于他能为自己节省的并转嫁到别人身上去的辛苦和烦恼。用货币购买到的，或是用货物交换得到的商品，都是用劳动购买的商品，就像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取得一样。这些货币或货物，使

我们能够免除某些劳动。它们含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价值，我们能够用这些货币或货物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包含同等数量劳动价值的物品。劳动是第一性价格，即购买所有商品的最初价格。最初世间所有财富都是用劳动购买的，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财富交换新产品的人来说，财富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

Wealth, as Mr. Hobbes says, is power. But the person who either acquires, or succeeds to a great fortune, does not necessarily acquire or succeed to any political power, either civil or military. His fortune may, perhaps, afford him the means of acquiring both, but the mere possession of that fortune does not necessarily convey to him either. The power which that possession immediately and directly conveys to him, is the power of purchasing; a certain command over all the labour, or over all the produce of labour which is then in the market. His fortune is greater or less, precisely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this power; or to the quantity either of other men's labour, or, what is the same thing, of the produce of other men's labour, which it enables him to purchase or command.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every thing must always be precisely equal to the extent of this power which it conveys to its owner.

托马斯·霍布斯曾说：财富就是权力。但获得或继承大量财产的人，未必就能获得或继承任何政治权力，无论是民政权力还是军政权力。他的财产，也许可以提供他一种获得民政或军政权力的手段，但仅仅拥有财产未必就能给他这些权力。财产直接给他的权力是购买力，即对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各种劳动产品的支配权。一个人财产的多少与这种支配权的大小精确地成比例，换句话说，一个人财产的多少与他所能购买或支配的他人劳动数量或他人劳动所得产品数量精确地成比例。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一定精确地等于这种商品赋予其

所有者的劳动支配权。

But though labour be the real measure of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all commodities, it is not that by which their value is commonly estimated.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ascertain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wo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labour. The time spent in two different sorts of work will not always alone determine this proportion.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hardship endured, and of ingenuity exercised, must likewise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ere may be more labour in an hour's hard work than in two hours' easy business; or in an hour's application to a trade which it cost ten years' labour to learn, than in a month's industry at an ordinary and obvious employment. But it is not easy to find any accurate measure either of hardship or ingenuity. In exchanging, indeed, the different productions of different sorts of labour for one another, some allowance is commonly made for both. It is adjusted, however, not by any accurate measure, but by the higgling and bargaining of the market, according to that sort of rough equality which, though not exact, is sufficient for carrying on the business of common life.

虽然说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一切商品的价值却通常不是用劳动来衡量的。确定两种不同劳动数量的比例往往很困难。仅仅依靠两种不同工作所需花费的时间，往往不能确定这一比例的大小。不同的困难程度和不同的技巧要求都要加以考虑。在一个小时内，与难度低的工作相比，难度高的工作需要更大的工作量；付出10年的劳动才能学会的工作，哪怕只做一小时，可能也比一个月的普通工作所包含的劳动数量大。但是，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尺度来衡量工作的难度和精巧度。诚然，在对不同劳动所生产的不同产品进行交换时，通常都会考虑到不同工作的难度和精巧度，但这不是按任何精

确的尺度来作调整，而是通过市场上议价来作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这样做虽然不是很准确，但对日常买卖也足够了。

Every commodity, besides, is more frequently exchanged for, and thereby compared with, other commodities than with labour. It is more natural, therefore, to estimate its exchangeable value by the quantity of some other commodity than by that of the labour which it can purchase. The greater part of people, too, understand better what is meant by a quantity of a particular commodity, than by a quantity of labour. The one is a plain palpable object; the other an abstract notion, which, though it can be made sufficiently intelligible, is not altogether so natural and obvious.

此外，人们频繁地用商品来交换商品，而不是交换劳动，从而使得商品只能和商品进行比较，而不是和劳动进行比较。因此，人们常常很自然地用其他商品的数量，而不是其他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数量来衡量某一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且，说到某一商品的数量，人们大都容易理解，说到某一劳动数量，人们就会感到糊涂。商品的数量看得见、摸得着，而劳动数量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虽然有办法让人们充分理解，但终究不是那么明显、那么自然。

But when barter ceases, and money has become the common instrument of commerce, every particular commodity is more frequently exchanged for money than for any other commodity. The butcher seldom carries his beef or his mutton to the baker, or the brewer, in order to exchange them for bread or for beer; but he carries them to the market, where he exchanges them for money, and afterwards exchanges that money for bread and for beer. The quantity of money which he gets for them regulates, too, the

quantity of bread and beer which he can afterwards purchase. It is more natural and obvious to him, therefore, to estimate their value by the quantity of money, the commodity for which he immediately exchanges them, than by that of bread and beer, the commodities for which he can exchange them only by the intervention of another commodity; and rather to say that his butcher's meat is worth threepence or fourpence apound, than that it is worth three or four pounds of bread, or three or four quarts of small beer. Hence it comes to pass, that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every commodity is more frequently estimated by the quantity of money, than by the quantity either of labour or of any other commodity which can be had in exchange for it.

但是，当物物交换停止、货币成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时，商品就常常与货币交换，而不是和其他商品交换。屠夫如果需要面包或啤酒，不会把牛肉或羊肉直接拿到面包师或酿酒师那里去交换，而是先把牛肉或羊肉拿到市场上去换取货币，然后再用货币换取面包或啤酒。他售卖牛羊肉所得的货币数量，决定他后来所能购买的面包数量和啤酒数量。因此很显然，屠夫自然更多地用牛羊肉直接换来的货币数量来估算牛羊肉的价值，而不是用通过货币间接换来的面包和啤酒的数量来估算牛羊肉的价值。而且说每磅肉值3便士或4便士也比说每磅肉值3斤面包或4斤面包，或值3夸脱啤酒或4夸脱啤酒要合适得多。所以，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常常按照货币数量，而不是该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数量或其他商品数量来计算。

Gold and silver, however, like every other commodity, vary in their value, are sometimes cheaper and sometimes dearer, sometimes of easier and sometimes of more difficult purchase.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any particular quantity of them can purchase or command, or the quantity of other goods which it will

exchange for, depends always upon the fertility or barrenness of the mines which happen to be known about the time when such exchanges are made. The discovery of the abundant mines of America reduce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in Europe to about a third of what it had been before. As it cost less labour to bring those metals from the mine to the market, so when they were brought thither they could purchase or command less labour; and this revolution in their value, though perhaps the greatest, is by no means the only one of which history gives some account. But as a measure of quantity, such as the natural foot, fathom, or handful, which is continually varying in its own quantity, can never be an accurate measure of the quantity of other things; so a commodity which is itself continually varying in its own value, can never be an accurate measure of the value of other commodities. Equal quantities of labour, at all times and places, may be said to be of equal value to the labourer. In his ordinary state of health, strength and spirits; in the ordinary degree of his skill and dexterity, he must always lay down the same portion of his ease, his liberty, and his happiness. The price which he pays must always be the same, whatever may be the quantity of goods which he receives in return for it. Of these, indeed, it may sometimes purchase a greater and sometimes a smaller quantity; but it is their value which varies, not that of the labour which purchases them. At all times and places that is dear which it is difficult to come at, or which it costs much labour to acquire; and that cheap which is to be had easily, or with very little labour. Labour alone, therefore, never varying in its own value, is alone the ultimate and real standard by which the value of all commodities can at all times and places be estimated and compared. It is their real price; money is their nominal price only.

但是，金银就像其他商品一样，价值时高时低，购买也时难时易。一定数量的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或所能交换的其他商品的数量，往往取决于交换行为发生时已发现的金银矿山出产量的大小。16世纪美洲富饶的金银矿山的发现，使欧洲金银的价值几乎降低为原价的1/3。由于将这些金属从矿山开采出来并运送到市场上所需的劳动力减少了，因此在市场上金银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也相应减少。这也许是金银价值最大的一次波动，但绝不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波动。但是我们知道，本身数量不断变动的尺度，如一步的长度、伸开双臂的宽度或一手所握物品数量，绝不能作为衡量其他物品数量的精确尺度；同样，自身价值不断变动的商品也绝不是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精确尺度。但是，劳动却当别论。一定数量的劳动，无论何时何地，对于劳动者来说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假使一个劳动者的健康、体力和精神处于正常状态，劳动技巧和熟练程度也处于平均水平，那么在劳动时，他就必然牺牲和其他人同等数量的安乐、自由与幸福。他所购买的商品不论多少，总是等于他所付出的代价。诚然，他的劳动购买的商品数量，虽然有时多，有时少，但这是商品价值的变动，不是购买商品的劳动价值变动。不论何时何地，凡是难以购得的商品，或是获取时需付出大量劳动的商品，价格必然昂贵。凡是容易购得的商品，或是获取时只需付出少量劳动的商品，价格必然低廉。所以，只有本身价值绝不变动的劳动，才是随时随地可以用来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终和真实标准。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

But though equal quantities of labour are always of equal value to the labourer, yet to the person who employs him they appear sometimes to be of greater and sometimes of smaller value. He purchases them sometimes with a greater and sometimes with a smaller quantity of goods, and to him the price of labour seems to vary like that of all other things. It appears to him dear in the one case, and cheap in the other. In reality, however, it is the goods which are cheap in the one case, and dear in the other.

但是，虽然对于劳动者，等量劳动具有等量价值，但在雇佣劳动者的人看来，劳动的价值却时高时低。雇主购买劳动，有时需用多量的货物，有时只需用少量的货物。因此在他看来，劳动价格似乎与其他一切物品一样，常常是变化的。以多量货物购得的劳动价格昂贵，以少量货物购得的劳动价格低廉。但事实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价格时而昂贵时而低廉的是货物，不是劳动。

In this popular sense, therefore, labour, like commodities, may be said to have a real and a nominal price. Its real price may be said to consist in the quantity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which are given for it; its nominal price, in the quantity of money. The labourer is rich or poor, is well or ill rewarded, in proportion to the real, not to the nominal price of his labour.

按照大众的说法，劳动也像其他商品一样可以说有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是劳动所创造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所谓名义价格，就是劳动所能交换的一定数量的货币。劳动者是贫是富，劳动所获得的报酬是多是少，不是与其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与其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eal and the nominal price of commodities and labour, is not a matter of mere speculation, but may sometimes be of considerable use in practice. The same real price is always of the same value; but on account of the variations in the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the same nominal price is sometimes of very different values. When a landed estate, therefore, is sold with a reservation of a perpetual rent, if it is intended that this rent should always be of the same value, it is of importance to the family

in whose favour it is reserved, that it should not consist in a particular sum of money. Its value would in this case be liable to variations of two different kinds; first, to those which arise from the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are contained at different times in coin of the same denomination; and, secondly, to those which arise from the different values of equal quantities of gold and silver at different times.

商品与劳动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存在区别，这不仅仅是纯理论问题，有时在实践上也有大的用处。真实价格相同的商品，价值往往相同；名义价格相同的商品，其价值却往往因金银的价值变动而产生极大的差异。因此，如果一个人要以永久租佃为条件而售卖地产，假设他要使地租的价值永远不变，就不能把地租定为一定数量的货币，因为一定数量的货币的价值很可能因两种因素而发生变动：第一，由于同一名称铸币在不同时代所含金银分量不同而产生变动；第二，由于同一分量金银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价值而产生变动。

Princes and sovereign states have frequently fancied that they had a temporary interest to diminish the quantity of pure metal contained in their coins; but they seldom have fancied that they had any to augment it. The quantity of metal contained in the coins, I believe of all nations, has, accordingly, been almost continually diminishing, and hardly ever augmenting. Such variations, therefore, tend almost always to diminish the value of a money rent.

君主和主权国家往往认为，减少铸币内纯金属的含量能让他们获得短期利益。但他们很少认为，增加铸币内纯金属的含量对自己有利。我相信，无论在哪个国家，铸币内纯金属的含量都在不断减少，

而从未增加。因此，这种变动常使货币地租的价值降低。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es of America diminished the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in Europe. This diminution, it is commonly supposed, though I apprehend without any certain proof, is still going on gradually, and is likely to continue to do so for a long time. Upon this supposition, therefore, such variations are more likely to diminish; than to augment the value of a money rent, even though it should be stipulated to be paid, not in such a quantity of coined money of such a denomination (in so many pounds sterling, for example), but in so many ounceseither of pure silver, or of silver of a certain standard.

美洲矿山发现之后，欧洲金银得到贬值。人们普遍认为，金银的价值还会逐渐下降，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可能继续下降（不过我认为这种说法没有切实的依据）。所以，按照这种逻辑，就算地租不规定为若干镑铸币，而规定为纯银或某种成色的若干盎司白银，这种变动多半会降低而不是增加货币地租的价值。

The rents which have been reserved in corn have preserved their value much better than those which have been reserved in money, even where the denomination of the coin has not been altered. By the 18th of Elizabeth it was enacted that a third of the rent of all college leases should be reserved in corn, to be paid, either in kind, or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rices at the nearest public market. The money arising from this corn rent, though originally but a third of the whole, is in the present times, according to Dr. Blackstone, commonly near double of what arises from the other two-thirds. The old money rents of colleges must,

according to this account, have sunk almost to a fourth part of their ancient value; or are worth little more than a fourth part of the corn which they were formerly worth. But since the reign of Philip and Mary the denomination of the English coin has undergone little or no alteration, and the same number of pounds, shillings and pence have contained very nearly the same quantity of pure silver. This degradation, therefore, in the value of the money rents of colleges, has arisen altogether from the degradation in the value of silver.

谷物地租比货币地租更能保持地租的价值，即使在铸币价值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也是如此。伊丽莎白第十八年颁布的法律规定，国内各学院的地租的1/3要用谷物进行支付，要么以货代款，要么按照当时最近市场上的谷价折合成货币支付。由谷物折合货币的部分，原本只占全部地租的1/3，但到现在，按照布莱克斯通博士的计算，却已接近剩余2/3地租的两倍。依此算来，各学院当初的货币地租，一定已经几乎减到原来价值的1/4，或者说不超过其原来所值谷物的1/4了。但是，自菲利普和玛丽统治时期起，英格兰铸币的面额很少变动，或几乎没有变动。同一数量的镑、先令或便士中纯银的含量几乎相同。由此可见，各学院货币地租价值的下降完全是白银的价值下降的结果。

When the degradation in the value of silver is combined with the diminution of the quantity of it contained in the coin of the same denomination, the loss is frequently still greater. In Scotland, where the denomination of the coin has undergone much greater alterations than it ever did in England, and in France, where it has undergone still greater than it ever did in Scotland, some ancient rents, originally of considerable value, have in this manner been reduced almost to nothing.

倘若白银的价值下降，同一面额的铸币内纯银的含量又同时减少，那么货币地租的损失就会更大。在苏格兰，铸币面额所发生的变化比英格兰大得多，而法国铸币面额所发生的变化又比苏格兰大得多。所以，一些古老的地租，原来曾有很高的价值，现在却几乎一文不值。

Equal quantities of labour will at distant times be purchased more nearly with equal quantities of corn, the subsistence of the labourer, than with equal quantities of gold and silver, or perhaps of any other commodity. Equal quantities of corn, therefore, will, at distant times, be more nearly of the same real value, or enable the possessor to purchase or command more nearly the same quantity of the labour of other people. They will do this, I say, more nearly than equal quantities of almost any other commodity; for even equal quantities of corn will not do it exactly. The subsistence of the labourer, or the real price of labour, as I shall endeavour to show hereafter, is very different upon different occasions; more liberal in a society advancing to opulence, than in one that is standing still; and in one that is standing still, than in one that is going backwards. Every other commodity, however, will at any particular time purchase a greater or smaller quantity of labour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f subsistence which it can purchase at that time. A rent therefore reserved in corn is liable only to the variations in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a certain quantity of corn can purchase. But a rent reserved in any other commodity is liable, not only to the variations in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any particular quantity of corn can purchase, but to the variations in the quantity of corn which can be purchased by any particular quantity of that commodity.

在相隔很久的时间里，若要购买等量的劳动，人们所需的谷物（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数量几乎相同。但若以金银或其他商品去购买，那么数量则会发生很大变化。所以，在相隔很久的一段时间里，等量的谷物更可能保持几乎相同的真实价值，换句话说，谷物持有者更可能以等量谷物购买或支配他人几乎等量的劳动。我只说，等量谷物和等量其他商品相比，更可能购买或支配等量劳动，因为即使是等量谷物在相隔很久的时间里也不可能购买或支配绝对相等数量的劳动。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即劳动的真实价格，在不同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后面我会进行阐述。劳动者所享有的生活资料，在走向富裕的社会比在停滞不前的社会要多一些，在停滞不前的社会又比在走向衰落的社会要多一些。然而其他任何商品，在任何时间，无论所能购买的劳动数量是多是少，总是和在那段时间里该商品所能购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成比例。所以，谷物地租只会随着一定数量的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数量的变动而变化。但以其他任何商品计算的地租，不但要受一定数量的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数量变动的影响，同时还要受一定数量的此种商品所能购买的谷物数量变动的影响。

Though the real value of a corn rent, it is to be observed, however, varies much less from century to century than that of a money rent, it varies much more from year to year.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as I shall endeavour to show hereafter, does not fluctuate from year to year with the money price of corn, but seems to be everywhere accommodated, not to the temporary or occasional, but to the average or ordinary price of that necessary of life. The average or ordinary price of corn again is regulated, as I shall likewise endeavour to show hereafter, by the value of silver, by the richness or barrenness of the mines which supply the market with that metal, or by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must be employed, and consequently of corn which must be consumed, in order to bring any particular quantity of silver from the mine to the market. But the value of silver, though it sometimes varies greatly

from century to century, seldom varies much from year to year, but frequently continues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for half a century or a century together. The ordinary or average money price of corn, therefore, may, during so long a period, continue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too, and along with it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provided, at least, the society continues, in other respects, in the same or nearly in the same condition. In the meantime the temporary and occasional price of corn may frequently be double, one year, of what it had been the year before, or fluctuate, for example, from fiveandtwenty to fifty shillings the quarter. But when corn is at the latter price, not only the nominal, but the real value of a corn rent will be double of what it is when at the former, or will command double the quantity either of labour or of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commodities;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and along with it that of most other things, continuing the same during all these fluctuations.

我们要留心的一点是，虽然在一个世纪的跨度里，谷物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动比货币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动少得多，但仅就一年的跨度来说，谷物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动却比货币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动多得多。正如我在后面所要阐述的，劳动的货币价格，似乎并不随着每一年谷物货币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它似乎从不和谷物的暂时或偶然价格相适应，而是和这一生活必需品的平均或普通价格相适应。正如我在后面的章节将要说明的那样，谷物的平均价格或普通价格要受到白银的价值的支配，受到为市场供应白银的银矿山出产额大小的支配，受到将白银从矿区运到市场所需投入的劳动数量的支配，因而也受到在运送过程中劳动力所需消费的谷物数量的支配。在一个世纪的跨度内，虽然白银的价值有时会有大的变动，但就一年的跨度来说，白银的价值却很少有很大变动，在50年或100年内，价值往往保持不变或几乎保持不变。因此，同样50年或100年内，谷物的平均或普通货币价格也可能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那么只要社会在其他方面保持不变或几乎

不变，那劳动的货币价格也将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不过，在这段时间里，谷物的暂时或偶然价格却常常在今年比去年高一倍，或发生波动，比如今年每夸特25先令，明年涨至50先令。但是，当谷物涨至每夸特50先令时，不仅谷物地租的名义价值上升，而且其真实价值也比以前高一倍，或者说等量谷物地租所支配的劳动数量或购买的其他商品数量比以前大一倍，但在这些变动中，劳动和大多数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均保持不变。

Labour, therefore, it appears evidently, is the only universal, as well as the only accurate measure of value, or the only standard by which we can compare the values of different commodities at all times and at all places. We cannot estimate, it is allowed, the real value of different commodities from century to century by the quantities of silver which were given for them. We cannot estimate it from year to year by the quantities of corn. By the quantities of labour we can, with the greatest accuracy, estimate it both from century to century and from year to year. From century to century, corn is a better measure than silver, because, from century to century, equal quantities of corn will command the same quantity of labour more nearly than equal quantities of silver. From year to year, on the contrary, silver is a better measure than corn, because equal quantities of it will more nearly command the same quantity of labour.

由此可明显看出，只有劳动才是衡量价值唯一普遍和精确的尺度，换句话说，劳动是我们能够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就一个世纪的跨度来说，我们不能用一种购买商品所需的白银数量来估定这商品的真实价值；就一年的跨度来说，我们不能换取一种商品所需的谷物数量来估定商品的真实价值。但无论在一年的跨度里还是在一个世纪的跨度里，我们都用一种商品所能换

得的劳动数量，来精确地估定该商品的真实价值。就一个世纪的跨度来说，谷物比白银更适合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因为这么长的时间里，等量谷物比等量白银更可能支配等量的劳动。反之，在一年的跨度里，以白银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又比谷物要更合适，因为在一年的时间里，等量的白银比等量谷物更可能支配等量劳动。

But though in establishing perpetual rents, or even in letting very long leases, it may be of us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real and nominal price; it is of none in buying and selling, the more common and ordinary transactions of human life.

但是，虽然区分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对制定永久地租或缔结长期租约或许有用，但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买卖却毫无用处。

At the same time and place the real and the nominal price of all commodities are exactly in proportion to one another. The more or less money you get for any commodity, in the London market, for example, the more or less labour it will at that time and place enable you to purchase or command. At the same time and place, therefore, money is the exact measure of the real exchangeable value of all commodities. It is so,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and place only.

在同一时间和地点，一切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都保持着精确的比例。例如，在伦敦市场上，无论你售卖哪种商品，你得到的货币越多，那么在那个时间，你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就越多，你得到的货币越少，你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就越少。所以，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货币是一切商品的真实交换价值的精确尺度。但是同一时

间和同一地点才是如此。

Though at distant places, there is no regular proportion between the real and the money price of commodities, yet the merchant who carries goods from the one to the other has nothing to consider but their money price, 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silver for which he buys them, and that for which he is likely to sell them. Half an ounce of silver at Canton in China may command a greater quantity both of labour and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than an ounce at London. A commodity, therefore, which sells for half an ounce of silver at Canton may there be really dearer, of more real importance to the man who possesses it there, than a commodity which sells for an ounce at London is to the man who possesses it at London. If a London merchant, however, can buy at Canton for half an ounce of silver, a commodity which he can afterwards sell at London for an ounce, he gains a hundred per cent by the bargain, just as much as if an ounce of silver was at London exactly of the same value as at Canton. It is of no importance to him that half an ounce of silver at Canton would have given him the command of more labour and of a greater quantity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than an ounce can do at London. An ounce at London will always give him the command of double the quantity of all these, which half an ounce could have done there, and this is precisely what he wants.

尽管在相隔很远的两个地方，商品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间没有固定的比例，但往来两地售卖货物的商人却只考虑商品的货币价格，或者说他只考虑购买商品所用的白银数量和售卖商品可换得的白银数量之间的差额。在中国广州，半盎司白银所能支配的劳动数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数量，比伦敦一盎司白银所能支配的也许还要大。所

以，在广州以半盎司出售的商品，对于广州该商品持有者而言更重要、更贵重，而相比之下，在伦敦以一盎司出售的商品对于伦敦该商品持有者而言，反倒不及广州半盎司的商品那么贵重和重要。不过，如果伦敦商人能在广州以半盎司白银购买某一商品，随后在伦敦以一盎司白银的价格售卖，那么在这趟买卖中他就获得了百分百的利益。通过这样的交易，一盎司白银的价值在广州和伦敦好像完全一样了。至于广州半盎司白银比伦敦一盎司白银能够支配更多劳动或购买更多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对这个商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真正关心的是，在伦敦，一盎司白银使他能够支配的劳动数量和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数量，总是半盎司白银的两倍。

As it is the nominal or money price of goods, therefore, which finally determines the prudence or imprudence of all purchases and sales, and thereby regulates almost the whole business of common life in which price is concerned, we cannot wonder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so much more attended to than the real price.

因此，最终决定一切买卖行为得当与否的是商品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而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涉及价格的业务也都受商品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支配，所以，人们更多关注商品名义价格而非真实价格，也就不足为奇了。

In such a work as this, however, it may sometimes be of us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t real values of a particular commodity at different times and places, or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power over the labour of other people which it may, upon different occasions, have given to those who possessed it. We must in this case compare, not so much the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silver for which it was commonly sold, as the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labour which those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silver could have purchased. But the current prices of labour at distant times and places can scarce ever be known with any degree of exactness. Those of corn, though they have in few places been regularly recorded, are in general better known and have been more frequently taken notice of by historians and other writers. We must generally, therefore, content ourselves with them, not as being always exactly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the current prices of labour, but as being the nearest approximation which can commonly be had to that proportion. I shall hereafter have occasion to make several comparisons of this kind.

但是笔者认为在本书中，有时仍然有必要比较某种商品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不同真实价值，换句话说，比较某种商品在不同时期能够提供给其所有者支配他人劳动的能力大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要比较的，与其说是出售某种商品通常可得的不同白银数量，不如说是不同白银数量所能购买的劳动数量的不同。但是，如果时间或距离相隔甚远，那么我们常常难以准确了解劳动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的价钱如何。谷物的价格，虽然很少有地方正式记录，但人们一般知道得比较清楚，历史学家和其他作家们也常常更加注意谷物的价格。所以，我们常常用谷物价格来作比较，但并不是因为谷物价格和劳动价格总是保持固定的比例，而是因为二者之间的比例总是大致相同。我在后面还要作几次这种比较。

In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commercial nations have found it convenient to coin several different metals into money; gold for larger payments, silver for purchases of moderate value, and copper, or some other coarse metal, for those of still smaller consideration. They have always, however, considered one of those metals as more peculiarly the measure of value than any of the other two; and this preference seems generally to have been given

to the metal which they happened first to make use of as the instrument of commerce. Having once begun to use it as their standard, which they must have done when they had no other money, they have generally continued to do so even when the necessity was not the same.

随着产业的进步，商业国发现将不同金属铸成货币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大额交易用黄金，中等价值的交易用白银，小额交易用铜或其他贱金属。人们往往认为，在这三种金属中，有一种比另外两种更加适合作为价值尺度。而他们所选择的，似乎都是最先用作商业媒介的金属。当人们没有其他货币可用时，就已把它用作本位，因此即使后来可供使用的货币种类增加，人们仍然继续使用这种金属作为价值尺度。

The Romans are said to have had nothing but copper money till within five years before the first Punic war, when they first began to coin silver. Copper, therefore, appears to have continued always the measure of value in that republic. At Rome all accounts appear to have been kept, and the value of all estates to have been computed, either in *Asses* or in *Sestertii* . The *As* was always the denomination of a copper coin. The word *Sestertius* signifies two *Asses* and a half. Though the *Sestertius* , therefore, was originally a silver coin, its value was estimated in copper. At Rome, one who owed a great deal of money, was said to have a great deal of other people's copper.

据说，在第一次迦太基战争之前的五年间，罗马人才开始铸造白银。在这之前，罗马只有铜币。所以，罗马共和国似乎一直以铜币作为价值尺度。罗马所有的账簿，所有的财产价值，都以若干阿斯或若

干赛斯特斯计算。阿斯是一种铜币名称。而赛斯特斯表示2.5阿斯，所以虽然最初赛斯特斯是一种白银，但其价值常常以铜币计算。所以在罗马，如果一个人欠别人很多钱，人们常常说他借了别人很多铜。

The northern nations who established themselves upon the ruins of the Roman Empire, seem to have had silver money from the first beginning of their settlements, and not to have known either gold or copper coins for several ages thereafter. There were silver coins in England in the time of the Saxons; but there was little gold coined till the time of Edward III. nor any copper till that of James I. of Great Britain. In England, therefore,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I believe, in all other modern nations of Europe, all accounts are kept, and the value of all goods and of all estates is generally computed in silver: and when we mean to express the amount of a person's fortune, we seldom mention the number of guineas, but the number of pounds sterling which we suppose would be given for it.

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北方各国，似乎定居之初就使用白银，在此后的若干年代，人们并不知道黄金和铜币的存在。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只有白银，直到爱德华三世时代才出现少许黄金，在詹姆斯一世以后，才有铜币。所以，在英格兰，一切簿账以及一切货物与财产的价值都用白银计算。我相信在所有现代欧洲国家，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是用白银来计算一切商品的价值。当我们想要说明一个人的财产数量时，我们不说它值多少几尼，而说它值多少英镑。

Originally, in all countries, I believe, a legal tender of payment could be made only in the coin of that metal, which was peculiarly considered as the standard or measure of value. In England, gold was not considered as a legal tender for a long time after it was

coined into money.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values of gold and silver money was not fixed by any public law or proclamation; but was left to be settled by the market. If a debtor offered payment in gold, the creditor might either reject such payment altogether, or accept of it at such a valuation of the gold as he and his debtor could agree upon. Copper is not at present a legal tender except in the change of the smaller silver coins. In this state of thing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etal which was the standard, and that which was not the standard, was something more than a nominal distinction.

我相信最初在所有国家，只有被看作价值标准或尺度的特定的金属铸币才是可以用来支付的法定货币。在英格兰，黄金在铸币后很久还没能成为法定货币。黄金和白银价值的比例，不靠法律或公告规定，而是完全取决于市场。所以，如果一个债务人想用黄金还债，债权人可以拒绝，或者按照双方同意的黄金的价值来计算债务。铜在今天，除了可以用作小额白银的零钱外，已经不是法定货币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本位金属与非本位金属的区别，已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区别了。

In process of time, and as people became gradually more familiar with the use of the different metals in coin, and consequently better acquainted with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values, it has in most countries, I believe, been found convenient to ascertain this proportion, and to declare by a public law that a guinea, for example, of such a weight and fineness, should exchange for one-and-twenty shillings, or be a legal tender for a debt of that amount. In this state of things, and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any one regulated proportion of this ki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etal which is the standard, and that which

is not the standard, becomes little more than a nominal distinction.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习惯同时使用不同金属的铸币，因而比以往更熟悉各种铸币价值的比例。我相信此时，大多数国家都发现把这一比例确定下来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便利，于是颁布法律规定，比如说有怎样纯度和重量的几尼，应该兑换21先令，或者说21先令的债款，可以用几尼作为法定货币偿付。在这种情况下，在法定比例继续有效期间内，本位金属与非本位金属的区别，基本只是名义上的区别了。

In consequence of any change, however, in this regulated proportion, this distinction becomes, or at least seems to become, something more than nominal again. If the regulated value of a guinea, for example, was either reduced to twenty, or raised to two-and-twenty shillings, all accounts being kept and almost all obligations for debt being expressed in silver money, the greater part of payments could in either case be made with the same quantity of silver money as before; but would require very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gold money; a greater in the one case, and a smaller in the other. Silver would appear to be more invariable in its value than gold. Silver would appear to measure the value of gold, and gold would not appear to measure the value of silver. The value of gold would seem to depend upon the quantity of silver which it would exchange for; and the value of silver would not seem to depend upon the quantity of gold which it would exchange for. This difference, however, would be altogether owing to the custom of keeping accounts, and of expressing the amount of all great and small sums rather in silver than in gold money. One of Mr. Drummond's notes for five-and-twenty or fifty guineas would, after an alteration of this kind, be still payable with five-and-twenty or

fifty guineas in the same manner as before. It would, after such an alteration, be payable with the same quantity of gold as before, but with very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silver. In the payment of such a note, gold would appear to be more invariable in its value than silver. Gold would appear to measure the value of silver, and silver would not appear to measure the value of gold. If the custom of keeping accounts, and of expressing promissorynotes and other obligations for money in this manner, should ever become general, gold, and not silver, w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metal which was peculiarly the standard or measure of value.

不过，当法定比例发生变动时，本位金属与非本位金属的区别又不只是或者至少似乎不只是名义上的区别了。例如，如果黄金1几尼的法定价值发生变化，如降至20先令，或升至22先令，那么一切以白银计算的账目和大部分债务，依然可以和以前一样，用同等数量的白银支付。但是，倘若用黄金支付，那么在黄金的数量上就会有很大的差别。在1几尼低于20先令时，所需黄金多一些，在1几尼高于21先令时，所需黄金少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白银的价值似乎比黄金的价值更稳定、更不易变动。这时，白银似乎能够衡量黄金的价值，但黄金却不能衡量白银的价值。黄金的价值，似乎取决于黄金所能交换的白银的数量，而白银的价值，似乎并不取决于白银所能交换的黄金的数量。但这种差异，全都是人们记账的习惯导致的，即无论大小数额，都用白银而不是黄金计算。例如，一张面值25几尼或50几尼的德拉蒙期票，在法定比例发生变动以后，仍旧可以像之前那样用同等数额的黄金偿还。但是，如果用白银支付，那么所需白银的数量随着法定比例的变动则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兑换这种期票时，黄金的价值比白银的价值更恒定。这时，又好像可以用黄金衡量白银的价值，而不能用白银衡量黄金的价值了。所以，如果人们在记账时，或者契约、债券上的数额全部用黄金来表示，那么黄金就会被看作价值标准或价值尺度的金属，而不是白银。

In reality,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any one regulated proportion between the respective values of the different metals in coin, the value of the most precious metal regulates the value of the whole coin. Twelve copper pence contain half a pound, avoirdupois, of copper, of not the best quality, which, before it is coined, is seldom worth sevenpence in silver. But as by the regulation twelve such pence are ordered to exchange for a shilling, they are in the market considered as worth a shilling, and a shilling can at any time be had for them. Even before the lat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of Great Britain, the gold, that part of it at least which circulated in London and its neighbourhood, was in general less degraded below its standard weight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ilver. One-and-twenty worn and defaced shillings, however, were considered as equivalent to a guinea, which perhaps, indeed, was worn and defaced too, but seldom so much so. The late regulations have brought the gold coin as near perhaps to its standard weight as it is possible to bring the current coin of any nation; and the order, to receive no gold at the public offices but by weight, is likely to preserve it so, as long as that order is enforced. The silver coin still continues in the same worn and degraded state as before th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In the market, however, one-and-twenty shillings of this degraded silver coin are still considered as worth a guinea of this excellent gold coin.

事实上，不同金属铸币的不同价值间，无论保持何种法定比例，只要在该比例有效的时间内，最昂贵的金属的价值总是支配着一切铸币的价值。例如，12枚铜便士，以常衡（16盎司为1磅）计，含0.5磅的铜。但这半磅铜的质量不是很好，因此在铸成铜币以前可能不值7个白银便士。但是，由于法律规定，12枚铜便士可以兑换1先令，于是在市场上这些铜便士便被认为值1先令，并可随时换成1先令。甚至在大不列颠最近一次金币改革以前，黄金，至少在伦敦及其附近流通

的黄金，同大部分白银相比，一般很少跌落到其标准重量以下。然而，磨损的白银21先令仍被认为等值于1几尼的黄金，而几尼尽管也有磨损，却不像白银那样严重。最近出台的法律或许使黄金也像别的国家的通用铸币那样尽量接近于标准重量。英格兰规定所有公务部门只按重量接受黄金，只要这一命令继续执行下去，就可能使黄金的标准重量保持不变。白银目前仍像金币改革以前那样，处于磨损剥蚀的状态。但是在市场上，磨损了的白银21先令，仍被认为等值于1几尼优良的黄金。

Th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has evidently raised the value of the silver coin which can be exchanged for it.

黄金的这次改革显然抬高了能和黄金兑换的白银的价值。

In the English mint a pound weight of gold is coined into forty-four guineas and a half, which, at one-and-twenty shillings the guinea, is equal to forty-six pounds fourteen shillings and sixpence. An ounce of such gold coin, therefore, is worth *3l. 17s. 10 ½d.* in silver. In England no duty or seignorage is paid upon the coinage, and he who carries a pound weight or an ounce weight of standard gold bullion to the mint, gets back a pound weight or an ounce weight of gold in coin, without any deduction. Three pounds seventeen shillings and tenpence halfpenny an ounce, therefore, is said to be the mint price of gold in England, or the quantity of gold coin which the mint gives in return for standard gold bullion.

在英格兰造币厂，1磅重的黄金可以铸成44.5几尼，按1几尼为21先令计算，就等于46镑14先令6便士。所以，1盎司重的黄金，等于3

镑17先令10.5便士白银。英格兰不征收铸币税，将一磅重或一盎司重的标准金块送往造币厂，可取回一磅重或一盎司重的铸币，重量不会有丝毫减少。所以，每盎司3镑17先令10.5便士，就成为英格兰黄金的造币厂价格，也就是造币厂交换标准金块所付给的黄金数量。

Before th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the price of standard gold bullion in the market had for many years been upwards of *3l. 18s.* sometimes *3l. 19s.* and very frequently*4l.* an ounce; that sum, it is probable, in the worn and degraded gold coin, seldom containing more than an ounce of standard gold. Since th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the market price of standard gold bullion seldom exceeds *3l. 17s. 7d.* an ounce. Before th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the market price was always more or less above the mint price. Since that reformation, the market price has been constantly below the mint price. But that market price is the same whether it is paid in gold or in silver coin. The lat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therefore, has raised not only the value of the gold coin, but likewise that of the silver coin in proportion to gold bullion, and probably, too, in proportion to all other commodities; though the pric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commodities being influenced by so many other causes, the rise in the value either of gold or silver coin in proportion to them, may not be so distinct and sensible.

在金币改革前，市场上标准金块的价格，好多年都在每盎司3镑18先令以上，有时是每盎司3镑19先令，更多的时候是每盎司4镑。但在当时磨损的4镑的金币里，很少包含一盎司以上的标准黄金。金币改革以后，每盎司标准金块的市场价格很少超过3镑17先令7便士。改革前，其市场价格总是或多或少地超过造币厂的价格。改革后，市场价格一直低于造币厂的价格。但不论是以金币还是以银币支付，这一市场价格总是一样的。所以，最近金币的改革，不仅提高了金币的

价值，而且也提高了银币和金块乃至和一切其他商品对比的价值。但是，因为大部分其他商品的价格，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和这些商品相比，金币或银币的价值上升得不像它们那么显著。

In the English mint a pound weight of standard silver bullion is coined into sixty-two shillings, containing, in the same manner, a pound weight of standard silver. Five shillings and twopence an ounce, therefore, is said to be the mint price of silver in England, or the quantity of silver coin which the mint gives in return for standard silver bullion. Before th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the market price of standard silver bullion was, upon different occasions, five shillings and fourpence, five shillings and fivepence, five shillings and sixpence, five shillings and sevenpence, and very often five shillings and eightpence an ounce. Five shillings and sevenpence, however, seems to have been the most common price. Since th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the market price of standard silver bullion has fallen occasionally to five shillings and threepence, five shillings and fourpence, and five shillings and fivepence an ounce, which last price it has scarce ever exceeded. Though the market price of silver bullion has fallen considerably since th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it has not fallen so low as the mint price.

在英格兰造币厂，1磅标准银块可铸成62先令，同样包含1磅重的标准白银。所以，1盎司合5先令2便士就是英格兰白银的造币厂价格，也就是造币厂交换标准银块所支付的银币数量。在金币改革以前，1盎司标准银块的市场价格时而是5先令4便士，时而是5先令5便士，时而是5先令6便士，时而是5先令7便士，时而是5先令8便士。不过，多数情况下是5先令7便士。金币改革以后，1盎司标准银块的市场价格降到5先令3便士，5先令4便士或5先令5便士，很少超过5先

令5便士。但是，银块的市场价格，虽因金币改革而减低了许多，但始终没有降到像造币厂那么低的价格。

In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metals in the English coin, as copper is rated very much above its real value, so silver is rated somewhat below it. In the market of Europe, in the French coin and in the Dutch coin, an ounce of fine gold exchanges for about fourteen ounces of fine silver. In the English coin, it exchanges for about fifteen ounces, that is, for more silver than it is worth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estimation of Europe. But as the price of copper in bars is not, even in England, raised by the high price of copper in English coin, so the price of silver in bullion is not sunk by the low rate of silver in English coin. Silver in bullion still preserves its proper proportion to gold;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copper in bars preserves its proper proportion to silver.

就英格兰铸币中所包含不同金属的比例来说，由于铜的估价远远超过它的真实价值，因而白银的估价便略低于它的真实价值。对于欧洲市场的法国和荷兰的铸币来说，纯金1盎司大约兑换纯银14盎司。就英格兰的铸币来说，纯金1盎司却能兑换纯银约15盎司，也就是说，按照欧洲普遍的算法，纯金1盎司所值的白银要多一些。然而，即使在英格兰，就像铜块的价格并没有因英格兰铸币中铜的价格过高而增高，银块价格也没有因英格兰铸币中白银的价格过低而下落。银块与黄金仍保持着适当的比例。出于同样的原因，铜块与白银也是如此。

Upon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lver coin in the reign of William III. the price of silver bullion still continued to be somewhat above the mint price. Mr. Locke imputed this high price to the permission

of exporting silver bullion, and to the prohibition of exporting silver coin. This permission of exporting, he said, rendered the demand for silver bullion greater than the demand for silver coin. But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want silver coin for the common uses of buying and selling at home, is surely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those who want silver bullion either for the use of exportation or for any other use. There subsists at present a like permission of exporting gold bullion, and a like prohibition of exporting gold coin; and yet the price of gold bullion has fallen below the mint price. But in the English coin silver was then, in the same manner as now, under-rated in proportion to gold; and the gold coin (which at that time too was not supposed to require any reformation) regulated then, as well as now, the real value of the whole coin. As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lver coin did not then reduce the price of silver bullion to the mint price, it is not very probable that a like reformation will do so now.

威廉三世统治期间，银币改革后，银块的价格仍然略高于造币厂的价格。洛克认为，银块之所以价高，是允许输出银块而禁止输出银币导致的。他说，允许银块输出使得国内对银块的需求大于对白银的需求。但是，因在国内进行买卖而需要银块的人有很多，数量必然比为出口或为其他目的而需要银块的人多得多。现在同样允许输出金块、禁止输出金币，而金块价格却落到造币厂价格之下。那时就像现在一样，铸币所需的白银对黄金的比价被低估了。那时的金币（当时也被认为没有必要改革）像现在一样，支配着一切铸币的真实价值。既然曾经银币的改革，不能使银块价格降低到造币厂价格以下，那么现在，类似的改革也很可能做不到这一点。

Were the silver coin brought back as near to its standard weight as the gold, a guinea, it is probable, would,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proportion, exchange for more silver in coin than it would purchase in bullion. The silver coin containing its full standard weight, there would in this case be a profit in melting it down, in order, first, to sell the bullion for gold coin and afterwards to exchange this gold coin for silver coin, to be melted down in the same manner. Some alteration in the present proportion seems to be the only method of preventing this inconveniency.

假若银币能够像金币那样，做到和标准重量大致相同，那么按照现在的比例，1几尼金币所能换得的银币，就可能要多于它所能购买的银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含有十足标准重量的银币熔成银块，再用银块兑换金币，然后用金币换取银币，就能获利。要防止此类问题出现，唯一的方法似乎只能是改变当前的金银比价。

The inconveniency perhaps would be less if silver was rated in the coin as much above its proper proportion to gold as it is at present rated below it; provided it was at the same time enacted that silver should not be a legal tender for more than the change of a guinea; in the same manner as copper is not a legal tender for more than the change of a shilling. No creditor could in this case be cheated in consequence of the high valuation of silver in coin; as no creditor can at present be cheated in consequence of the high valuation of copper. The bankers only would suffer by this regulation. When a run comes upon them they sometimes endeavour to gain time by paying in sixpence, and they would be precluded by this regulation from this discreditable method of evading immediate payment. They would be obliged in consequence to keep at all times in their coffers a greater quantity of cash than at present; and though this might no doubt be a considerable inconveniency to them, it would at the same time be a

considerable security to their creditors.

如果让铸币中白银的估价高于白银与黄金的适当比例（目前这一估价低于白银与黄金的比例），同时规定白银除了可以兑换几尼外，不得充当法定货币（就像铜除了可以兑换先令外，不能充当法定货币一样），那么上述问题或许可以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铸币中白银的估价高绝不会让任何债权人蒙受损失，正如现在铸币中铜的估价高，不会使债权人蒙受损失一样。这一规定只会使银行家们吃亏。当他们的银行遭遇挤兑时，他们有时用最小的六便士银币来支付款项，以此拖延时间。但这一规定却使他们不能再使用这种不光彩的方法来逃避即时支付。结果便是，他们不得不随时在金柜中储存比现在数量更多的现金。虽然这对银行家们来说相当不便，但却能很好地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Three pounds seventeen shillings and tenpence halfpenny (the mint price of gold) certainly does not contain, even in our present excellent gold coin, more than an ounce of standard gold, and it may be thought, therefore, should not purchase more standard bullion. But gold in coin is more convenient than gold in bullion, and though, in England, the coinage is free, yet the gold which is carried in bullion to the mint, can seldom be returned in coin to the owner till after a delay of several weeks. In the present hurry of the mint, it could not be returned till after a delay of several months. This delay is equivalent to a small duty, and renders gold in coin somewhat more valuable than an equal quantity of gold in bullion. If in the English coin silver was rated according to its proper proportion to gold, the price of silver bullion would probably fall below the mint price even without any reformation of the silver coin; the value even of the present worn and defaced silver coin being regulated by the value of the excellent gold coin for which it

can be changed.

即使就如今最好的金币来说，3镑17先令10.5便士（黄金的造币厂价格）也必然无法含有一盎司以上的标准金。因此，有人认为，这数额不应当能购买更多的标准金块。但是，金币使用起来比金块更方便，而且，虽然说在英格兰铸造货币是免费的，但将金块送到造币厂后，往往要等几星期才能换回铸币。现在造币厂工作繁忙，要等到几个月后才能取回铸币。时间上的拖延相当于收取了小额的铸币税，并使金币的价值略高于同等数量的金块的价值。所以，在英格兰的铸币中，白银若能按照其对黄金的适当比例定值，那么，就算不对银币进行改革，也能使银块价格降到造币厂价格以下，甚至现在磨损了的银币价值也会受银币所能兑换的优良金币价值的支配。

A small seignorage or duty upon the coinage of both gold and silver would probably increase still more the superiority of those metals in coin above an equal quantity of either of them in bullion. The coinage would in this case increase the value of the metal coined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this small duty;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the fashion increases the value of plate in proportion to the price of that fashion. The superiority of coin above bullion would prevent the melting down of the coin, and would discourage its exportation. If upon any public exigency it should become necessary to export the coin, the greater part of it would soon return again of its own accord. Abroad it could sell only for its weight in bullion. At home it would buy more than that weight. There would be a profit, therefore, in bringing it home again. In France a seignorage of about eight per cent is imposed upon the coinage, and the French coin, when exported, is said to return home again of its own accord.

对铸造金银币征收小额铸币税，或许会使铸币中金银的价值高出同等数量的金块银块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铸币会按小额税的比例增加所铸金属的价值，就像把金银制成器皿时会按照制造费的多少增加金银器皿的价值一样。铸币价值高于金银块，这不仅可阻止人们将铸币熔化，还可以阻止出口铸币。就算由于公共的某种迫切需要而必须输出货币，大部分货币不久后也会流回国内。在国外，铸币只能以金属块的重量为指标进行出售，而在国内可以购买物品的价值却超过其重量的价值。因此，将输出的货币带回国内是有利可图的。法国对铸币征收8%的铸币税。据说，法国的货币在出口后都能自然而然地回到本国来。

The occasional fluctuations in the market price of gold and silver bullion arise from the same causes as the like fluctuations in that of all other commodities. The frequent loss of those metals from various accidents by sea and by land, the continual waste of them in gilding and plating, in lace and embroidery, in the wear and tear of coin, and in that of plate; require, in all countries which possess no mines of their own, a continual importation, in order to repair this loss and this waste. The merchant importers, like all other merchants, we may believe, endeavour, as well as they can, to suit their occasional importations to what, they judge, is likely to be the immediate demand. With all their attention, however, they sometimes overdo the business, and sometimes underdo it. When they import more bullion than is wanted, rather than incur the risk and trouble of exporting it again, they are sometimes willing to sell a part of it for something less than the ordinary or average price. Whe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import less than is wanted, they get something more than this price. But when, under all those occasional fluctuations, the market price either of gold or silver bullion continues for several years together steadily and constantly, either more or less above, or more or less below the mint price, we

may be assured that this steady and constant, either superiority or inferiority of price, is the effect of something in the state of the coin, which, at that time, renders a certain quantity of coin either of more value or of less value than the precise quantity of bullion which it ought to contain. The constancy and steadiness of the effect, supposes a proportionable constancy and steadiness in the cause.

金银条块市场价格有时会发生变动，其原因也和所有其他商品市场价格发生变动一样。在海陆运输途中碰到意外事件时，在镀金和镶边的过程中，在铸币的流通过程中，在制作金属器皿的过程中，金属常常会蒙受损失。所以，那些自己没有矿山的国家，都需要不断进口金银，以弥补此类损失和消耗。我相信，金银进口商也像其他商人一样，竭尽全力使自己不定期的金银进口符合自己对当时需求的判断。但是，无论他们考虑得如何周到，有时还是会出现进口太多，有时进口太少的情况。假如他们进口的金银条块多于需求，他们情愿以略低于一般水平的价格在国内销售一部分，也不愿冒险或费一番周折将多余的再输出去。反之，如果他们进口的金属条块少于需求，他们就能得到比这个价格更高的利润。但是，尽管有这种偶然变动，如果金银条块的市场价格能在好几年内一直保持稳定的状态，略高或略低于造币厂价格，我们可以肯定，这种情况一定是受到了铸币本身的某种情况影响，从而使得一定数量铸币的价值在这几年内高于或低于铸币中应含有的金银条块的数量。这种影响的稳定和持续，与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的稳定和持续是成比例的。

The money of any particular country is, at any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more or less an accurate measure of value according as the current coin is more or less exactly agreeable to its standard, or contains more or less exactly the precise quantity of pure gold or pure silver which it ought to contain. If in England, for example,

forty-four guineas and a half contained exactly a pound weight of standard gold, or eleven ounces of fine gold and one ounce of alloy, the gold coin of England would be as accurate a measure of the actual value of goods at any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as the nature of the thing would admit. But if, by rubbing and wearing, forty-four guineas and a half generally contain less than a pound weight of standard gold; the diminution, however, being greater in some pieces than in others; the measure of value comes to be liable to the same sort of uncertainty to which all other weights and measures are commonly exposed. As it rarely happens that these are exactly agreeable to their standard, the merchant adjusts the price of his goods, as well as he can, not to what those weights and measures ought to be, but to what, upon an average, he finds by experience they actually are. In consequence of a like disorder in the coin, the price of goods comes, in the same manner, to be adjusted, not to the quantity of pure gold or silver which the coin ought to contain, but to that which, upon an average, it is found by experience, it actually does contain.

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是价值的准确尺度，要看通用的铸币是否准确地以它为本位；换句话说，要看铸币是否准确地包含它所应包含的纯金或纯银的精确数量。例如，在英格兰，如果44.5几尼恰好含有1磅的标准金，即纯金11盎司和合金1盎司，那么英格兰的金币在任何特定时间和地点在本质上都是商品实际价值的正确尺度。倘若这44.5几尼，所包含的标准金重量因磨损消耗而少于1磅，而且磨损的程度又不尽相同，那么这种价值尺度就会像其他各种度量衡一样，多少会不准确。由于几乎没有完全符合标准的度量衡，所以商人们在调整商品价格时，总是尽可能不按照应当有的度量衡标准，而按照自己在经验中发现的平均数来调整。由于铸币中也出现这种混乱，因此商品价格也不是按铸币中应当含有的纯金或纯银的数量来调整，而是按照商人以经验觉察到的铸币实际含量来作调

整。

By the money-price of goods, it is to be observed, I understand always the quantity of pure gold or silver for which they are sold, without any regard to the denomination of the coin. Six shillings and eightpence, for example, in the time of Edward I. , I consider as the same money-price with a pound sterling in the present times; because it contained, as nearly as we can judge, the same quantity of pure silver.

需要指出的是，我所说的商品货币价格，指的是商品出售所得的纯金或纯银的数量，与铸币名称无关。例如，在我看来，爱德华一世时代6先令8便士的货币价格，和今天1镑的货币价格，应该是相同的。因为根据我们的判断，二者包含同样数量的纯银。

Chapter VI. Of th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Price of Commodities

第六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In that early and rude state of society which precedes both the accumulation of stock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land,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quantities of labour necessary for acquiring different objects seems to be the only circumstance which can afford any rule for exchanging them for one another. If among a nation of hunters, for example, it usually costs twice the labour to kill a beaver which it does to kill a deer, one beaver should naturally exchange for or be worth two deer. It is natural that what is usually the produce of two days' or two hours'labour, should be worth double of what is usually the produce of one day's or one hour's labour.

在早期的野蛮社会，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数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和依据。例如，假设在以狩猎为生的国家中，捕杀一头海狸所需要的劳动往往是捕杀一头鹿所需劳动力的两倍，那么，一头海狸一头就能交换两头鹿，或者说值两头鹿。所以，两天的劳动所得，其价值通常是一天劳动所得的两倍，两个小时的劳动所得，其价值自然是一个小时劳动所得的两倍。

If the one species of labour should be more severe than the other, some allowance will naturally be made for this superior hardship; and the produce of one hour's labour in the one way may frequently exchange for that of two hours' labour in the other.

如果一种劳动比另一种劳动更为艰苦，那么对于这种辛苦自然要给予一定的补贴。因此，一个小时的更为艰苦的劳动所得，往往可以交换两个小时艰苦程度较低的劳动所得。

Or if the one species of labour requires an uncommon degree of dexterity and ingenuity, the esteem which men have for such talents, will naturally give a value to their produce, superior to what would be due to the time employed about it. Such talents can seldom be acquired but in consequence of long application, and the superior value of their produce may frequently be no more than a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for the time and labour which must be spent in acquiring them. In the advanced state of society, allowances of this kind, for superior hardship and superior skill, are commonly made in the wages of labour; and something of the same kind must probably have taken place in its earliest and rudest

period.

或者说，如果某种劳动需要劳动者具有超乎寻常的熟练程度和技巧，那么人们通常对拥有这种技能的人比较尊重，于是自然对他的劳动所得给予超过他劳动时间所应得的价值。要想获得这种技能，常常需要经过多年的艰苦实践，因此对于这些人的劳动所得给予较高的价值，只不过是对劳动者获得这些技能所耗费的劳动与时间以合理的报酬。在进步的社会，人们通常以劳动工资的形式对特别艰苦的工作和需要很高技能的工作给予补贴。早期的野蛮社会可能就有过此类做法。

In this state of things, the whole produce of labour belongs to the labourer; and the quantity of labour commonly employed in acquiring or producing any commodity, is the only circumstance which can regulate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it ought commonly to purchase, command, or exchange for.

在这种情况下，全部劳动所得都属于劳动者自己。一种商品通常可以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只由获得或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数量来决定。

As soon as stock has accumulated in the hands of particular persons, some of them will naturally employ it in setting to work industrious people, whom they will supply with materials and subsistence, in order to make a profit by the sale of their work, or by what their labour adds to the value of the materials. In exchanging the complete manufacture either for money, for labour, or for other goods, over and above what may be sufficient to pay

the price of the materials, and the wages of the workmen, something must be given for the profits of the undertaker of the work who hazards his stock in this adventure. The value which the workmen add to the materials, therefore, resolves itself in this case into two parts, of which the one pays their wages, the other the profits of their employer upon the whole stock of materials and wages which he advanced. He could have no interest to employ them, unless he expected from the sale of their work something more than what was sufficient to replace his stock to him; and he could have no interest to employ a great stock rather than a small one, unless his profits were to bear some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his stock.

资本一旦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后，他们当中自然就会有一些人，运用手中的资本，推动勤劳的人们去工作，为这些人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通过售卖这些人的劳动产品，或者通过这些人的劳动使原材料价值增值的方式，获取利润。在用这些人的劳动产品交换货币、劳动或其他产品时，所得收入除了足够支付原材料的价格和生产者的劳动工资外，还须剩余一部分作为利润给予投入资本的企业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就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支付劳动者自己的工资，另一部分是雇主因提前预支原材料和工资所投入的全部资本的利润。除非雇主认为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经过售卖之后的所得，能多于他提前预支的资本，否则他是不会再对雇佣工人感兴趣的。而且，如果雇主所得的利润不能和他预支的资本额保持某种比例，他也不会再有兴趣进行大的投资，只会进行小额投资。

The profits of stock, it may perhaps be thought, are only a different name for the wages of a particular sort of labour, the labour of inspection and direction. They are, however, altogether

different, are regulated by quite different principles, and bear no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the hardship, or the ingenuity of this supposed labour of inspection and direction. They are regulated altogether by the value of the stock employed, and are greater or smaller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this stock. Let us suppose, for example, that in some particular place, where the common annual profits of manufacturing stock are ten per cen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manufactures, in each of which twenty workmen are employed at the rate of fifteen pounds a year each, or at the expence of three hundred a year in each manufactory. Let us suppose, too, that the coarse materials annually wrought up in the one cost only seven hundred pounds, while the finer materials in the other cost seven thousand. The capital annually employed in the one will in this case amount only to one thousand pounds; whereas that employed in the other will amount to seven thousand three hundred pounds. At the rate of ten per cent, therefore, the undertaker of the one will expect a yearly profit of about one hundred pounds only; while that of the other will expect about seven hundred and thirty pounds. But though their profits are so very different, their labour of inspection and direction may be either altogether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In many great works, almost the whole labour of this kind is committed to some principal clerk. His wages properly express the value of this labour of inspection and direction. Though in settling them some regard is had commonly, not only to his labour and skill, but to the trust which is reposed in him, yet they never bear any regular proportion to the capital of which he oversees the management; and the owner of this capital, though he is thus discharged of almost all labour, still expects that his profits should bear a regular proportion to his capital. In the price of commodities, therefore, the profits of stock constitute a component part altogether different from the wages of labour, and regulated by quite different principles.

也许可以这样想，资本的利润只是某种特定工作所得工资的别名罢了，或者说，只不过是雇主监督和指挥劳动者所得的工资而已。但利润与工资是截然不同的，它们受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的支配，而且资本的利润同雇主监督指挥劳动者劳动的数量、强度与技巧不成比例。利润完全是受雇主投入资本的价值支配的，它的多少与投入资本的大小成一定比例。假设在某个地方，制造业资本的普通年利润为10%。在该地有这样两个不同的制造厂，各雇佣劳动者20人，工资每人每年均为15镑，即每年两制造厂均需支付工资300镑。假设其中一家制造厂每年所加工的粗糙原料只值700镑，另一家制造厂所加工的精细原料值7,000镑。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制造厂所使用的资金只有1,000英镑，而第二家的为7,300英镑。在年利润为10%的情况下，第一家制造厂预期的利润不过100镑而已，而第二家制造厂的企业家每年却预期得到730镑的利润。虽然两个企业家所得利润相差巨大，他们对劳动的监督指挥却没有大的差别，甚至完全一样。在许多大工厂里，这种工作几乎全由某个重要职员来做。这个职员的工资，恰当表示了监督指挥这一特别劳动的价值。在决定该重要职员的工资时，通常不仅要考虑他的劳动和技巧，而且还要考虑他所担负的责任。但是，职员的工资和他所管理监督的资本却并不保持一定的比例。而这资本所有者，虽然通过这种方式几乎不用付出任何劳动，却希望其利润与其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所以，在商品价格中，资本利润成为一个与劳动工资截然不同的组成部分，而且受全然不同的原则支配。

In this state of things, the whole produce of labour does not always belong to the labourer. He must in most cases share it with the owner of the stock which employs him. Neither is the quantity of labour commonly employed in acquiring or producing any commodity, the only circumstance which can regulate the quantity which it ought commonly to purchase, command or exchange for. An additional quantity, it is evident, must be due for the profits of the stock which advanced the wages and furnished the materials of

that labour.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全部所得未必都属于劳动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劳动者要与雇佣他的资本所有者共享劳动成果。通常取得或生产任何一种商品所需投入的劳动数量，并不能单独决定这种商品一般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动数量。很明显，还需考虑另一个因素，那就是雇主对取得或生产商品的劳动者所垫付的工资以及给劳动者提供材料资本所得的利润。

As soon as the land of any country has all become private property, the landlords, like all other men, love to reap where they never sowed, and demand a rent even for its natural produce. The wood of the forest, the grass of the field, and all the natural fruits of the earth, which, when land was in common, cost the labourer only the trouble of gathering them, come, even to him, to have an additional price fixed upon them. He must then pay for the licence to gather them; and must give up to the landlord a portion of what his labour either collects or produces. This portion,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the price of this portion, constitutes the rent of land, and in the pric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commodities makes a third component part.

一个国家的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连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想收取地租。森林里的木材，田野里的青草，大地上所有的自然果实，在土地公有的阶段，只需劳动者花些力气去采摘，但现在劳动者除了要出力外，还需付出额外的代价。劳动者必须支付一定费用，才能获得采摘的许可，而且他还必须将一部分劳动所得交给土地所有者。这一部分所得，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价格，便构成了土地的地租。这是大多数商

品价格的第三个组成部分。

The real value of all the different component parts of price, it must be observed, is measured by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they can, each of them, purchase or command. Labour measures the value not only of that part of price which resolves itself into labour, but of that which resolves itself into rent, and of that which resolves itself into profit.

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商品价格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其各自的真实价值是由各自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数量来衡量的。而购买或支配的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构成劳动的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还衡量价格中构成地租和利润的那两部分的价值。

In every society the price of every commodity finally resolves itself into some one or other, or all of those three parts; and in every improved society, all the three enter more or less, as component parts, into the price of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commodities.

在所有社会中，商品价格最终都要分解成为这三个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或是全部。在所有进步的社会，这三个部分都或多或少地成为大多数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In the price of corn, for example, one part pays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another pays the wages or maintenance of the labourers and labouring cattle employed in producing it, and the third pays

the profit of the farmer. These three parts seem either immediately or ultimately to make up the whole price of corn. A fourth part, it may perhaps be thought, is necessary for replacing the stock of the farmer, or for compensating the wear and tear of his labouring cattle, and other instruments of husbandry. But it must be considered that the price of any instrument of husbandry, such as a labouring horse, is itself made up of the same three parts; the rent of the land upon which he is reared, the labour of tending and rearing him, and the profits of the farmer who advances both the rent of this land, and the wages of this labour. Though the price of the corn, therefore, may pay the price as well a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horse, the whole price still resolves itself either immediately or ultimately into the same three parts of rent, labour, and profit.

例如，在谷物价格中，一部分用来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一部分用来支付劳动者的工资、生活费用以及生产中所使用的牲畜的费用，第三部分用来支付农场主的利润。这三个部分，要么直接构成谷物的全部价格，要么最终构成谷物的全部价格。也许有人认为，还应该有第四部分，用来偿还农场主的资本，即用来支付农场主对于牲畜或农具的消耗。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任何农业用具的价格，比如用作生产的马，本身就由上述那三个部分构成：用来饲养马的土地的地租，饲养或照料马所需劳动的工资，再加上农场主垫付地租和工资资本应得的利润。因此，虽然谷物价格的一部分用来支付马的价格和维持费，但全部价格直接或最终仍由地租、劳动及利润这三部分组成。

In the price of flour or meal, we must add to the price of the corn, the profits of the miller, and the wages of his servants; in the price of the bread, the profits of the baker, and the wages of his servants; and in the price of both, the labour of transporting the

corn from the house of the farmer to that of the miller, and from that of the miller to that of the baker, together with the profits of those who advance the wages of that labour.

就面粉价格来说，我们必须将谷物价格与磨坊主的利润及其雇员的工资加在一起。就面包价格说，我们必须加上面包师的利润及其雇员的工资。但将谷物从农场主家中运送到磨坊厂，将面粉从磨坊厂运送到面包师手中，又需要一定的劳动。这种劳动的工资，和垫付这种劳动工资所应得的利润，也必须加到这两种商品的价格内。

The price of flax resolves itself into the same three parts as that of corn. In the price of linen we must add to this price the wages of the flax-dresser, of the spinner, of the weaver, of the bleacher, etc. , together with the profits of their respective employers.

同谷物价格一样，亚麻价格也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在亚麻的价格中，我们必须把理麻工、纺工、织工、漂白工的工资，与他们各自雇主因垫付资本所应得的利润加起来。

As any particular commodity comes to be more manufactured, that part of the price which resolves itself into wages and profit, comes to be greater in proportion to that which resolves itself into rent. In the progress of the manufacture, not only the number of profits increase, but every subsequent profit is greater than the foregoing; because the capital from which it is derived must always be greater. The capital which employs the weavers, for example, must be greater than that which employs the spinners; because it not only replaces that capital with its profits, but pays, besides, the

wages of the weavers; and the profits must always bear some proportion to the capital.

任何一种商品，其制作工序越接近尾声，价格中工资和利润所占的比例，就比地租所占的比例越大。随着制造项目的进行，涉及利润的项目越来越多，而且后一阶段的制造者，总能比前一阶段的制造者得到更多的利润。这是因为后一阶段的制造者总要比前一阶段的制造者投入更多的资本。例如，雇佣织工的资本，必须大于雇佣纺工的资本。因为，雇佣织工的资本，除了要支付雇佣纺工的资本及利润，还要支付织工的工资。再者，利润与资本一定总保持着一定的比例。

In the most improved societies, however, there are always a few commodities of which the price resolves itself into two parts only, the wages of labour, and the profits of stock; and a still smaller number in which it consists altogether in the wages of labour. In the price of sea-fish, for example, one part pays the labour of the fishermen, and the other the profits of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the fishery. Rent very seldom makes any part of it, though it does sometimes, as I shall shew hereafter. It is otherwise, at least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in river fisheries. A salmon fishery pays a rent, and rent, though it cannot well be called the rent of land, makes a part of the price of a salmon as well as wages and profit. In some parts of Scotland a few poor people make a trade of gathering, along the sea-shore, those little variegated stones commonly known by the name of Scotch Pebbles. The price which is paid to them by the stone-cutter is altogether the wages of their labour; neither rent nor profit makes any part of it.

然而，即使是在最进步的社会里，也存在少数商品，其价格只由

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两个部分构成。还有更少数的商品，价格仅由劳动工资构成。例如，海鱼的价格，通常只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用来支付渔夫的劳动，另一部分用来支付捕鱼业所投资本的利润。虽然有时这类价格中，还有一部分用来支付地租，但并不普遍。我在以后的章节中会对此特别说明。内河渔业的情况完全不同，至少对于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是这样的。鲑鱼业要支付租金，虽然这一租金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被称为土地地租，但与工资和利润一样，是鲑鱼价格的组成部分。在苏格兰某些地方，一些穷人在海岸边收集色彩斑斓的小石头，这种小石头通常叫做苏格兰玛瑙。雕石业者付给这些穷人的价格，只是他们的劳动工资，既不包括地租，也不包括资本利润。

But the whole price of any commodity must still finally resolve itself into some one or other, or all of those three parts; as whatever part of it remains after paying the rent of the land, and the price of the whole labour employed in raising, manufacturing, and bringing it to market, must necessarily be profit to somebody.

无论是哪种商品，其全部价格最终一定由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一个部分构成。在商品价格中，除去土地的地租以及商品生产、制造和运往市场所需要的全部劳动的价格外，剩余的部分一定是某个人的利润。

As the price or exchangeable value of every particular commodity, taken separately, resolves itself into some one or other, or all of those three parts; so that of all the commodities which compose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bour of every country, taken complexly, must resolve itself into the same three parts, and be parcelled out among different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either as the wages of their labour, the profits of their stock, or the rent of

their land. The whole of what is annually either collected or produced by the labour of every society,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the whole price of it, is in this manner originally distributed among some of its different members. Wages, profit, and rent, are the three original sources of all revenue as well as of all exchangeable value. All other revenue is ultimately derived from some one or other of these.

就每一件商品而言，其价格或交换价值，都由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一部分构成。每个国家所有的商品构成其全部劳动年产物，而所有商品的价格，一定都由三个部分构成，而且这三个部分以劳动工资、土地地租或资本利润的形式在国内不同居民间分配。在每一个社会中，每年劳动所采集或生产的全部物品，或者说这些物品的全部价格，起初就是以这种方式在社会不同成员间进行分配。工资、利润和地租，是所有收入和所有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最初来源。所有其他收入最终都来自这三个来源中的一种。

Whoever derives his revenue from a fund which is his own, must draw it either from his labour, from his stock, or from his land. The revenue derived from labour is called wages. That derived from stock, by the person who manages or employs it, is called profit. That derived from it by the person who does not employ it himself, but lends it to another, is called the interest or the use of money. It is the compensation which the borrower pays to the lender, for the profit which he has an opportunity of making by the use of the money. Part of that profit naturally belongs to the borrower, who runs the risk and takes the trouble of employing it; and part to the lender, who affords him the opportunity of making this profit. The interest of money is always a derivative revenue, which, if it is not paid from the profit which is made by the use of

the money, must be paid from some other source of revenue, unless perhaps the borrower is a spendthrift, who contracts a second debt in order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first. The revenue which proceeds altogether from land, is called rent, and belongs to the landlord. The revenue of the farmer is derived partly from his labour, and partly from his stock. To him, land is only the instrument which enables him to earn the wages of this labour, and to make the profits of this stock. All taxes, and all the revenue which is founded upon them, all salaries, pensions, and annuities of every kind, are ultimately derived from some one or other of those three original sources of revenue, and are paid either immediately or mediately from the wages of labour, the profits of stock, or the rent of land.

任何一个人，如果从自己的资金中获得收入，那么他的收入要么来自他的劳动，要么来自他的资本或土地。由劳动获得的收入叫工资，由经营或使用资本获得的收入叫利润。将资本转借他人，由此获得的收入，叫货币的利息或佣金。这是借款人付给贷款人的一种补偿，因为借款人通过使用贷款人的钱获得了一定的利润。这种利润一部分当然属于借款人，因为他承担了使用资本的风险和麻烦，另一部分则属于贷款人，因为正是因为他，借款人才有机会获取利润。利息总是一种派生的收入，支付利息所用的款项，如果不是来自借款人通过使用借款而得到的利润，那么一定来自他其他的某种收入，除非借款人挥霍无度，靠举借新债来偿还旧债的利息。完全来自土地的收入，被称为地租，它属于土地所有者。农场主的收入，一部分来自他的劳动，另一部分来自他的资本。对于农场主来说，土地只不过是他赚取劳动工资和获得资本利润的工具。所有的赋税，以及所有源自赋税的收入，所有俸金、养老金和各种年金，最终都来自于这三种原始收入来源中的一种，并且直接或间接地以劳动工资、资本利润或土地地租的方式支付。

When those three different sorts of revenue belong to different persons, they are readily distinguished; but when they belong to the same they are sometimes confounded with one another, at least in common language.

当这三种不同的收入属于不同的人时，我们很容易区分它们，但当它们属于同一个人时，有时就会互相混淆，至少按通俗的说法是这样的。

A gentleman who farms a part of his own estate, after paying the expence of cultivation, should gain both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and the profit of the farmer. He is apt to denominate, however, his whole gain, profit, and thus confounds rent with profit, at least in common language. The greater part of our North American and West Indian planters are in this situation. They farm,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their own estates, and accordingly we seldom hear of the rent of a plantation, but frequently of its profit.

如果某一位乡村绅士在自己的一部分土地上耕作，那么他在支付了耕作费用后，应该既获得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又获得农场主的利润。但他往往把自己的全部所得笼统地叫做利润，这样他就混淆了地租和利润，至少按通俗的说法是这样的。我国在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大部分种植园主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大部分人在自己的土地耕种，所以我们常听他们说种植园的利润，却很少听他们说种植园的地租。

Common farmers seldom employ any overseer to direct the general operations of the farm. They generally, too, work a good deal with their own hands, as ploughmen, harrowers, etc. What

remains of the crop after paying the rent, therefore, should not only replace to them their stock employed in cultivation, together with its ordinary profits, but pay them the wages which are due to them, both as labourers and overseers. Whatever remains, however, after paying the rent and keeping up the stock, is called profit. But wages evidently make a part of it. The farmer, by saving these wages, must necessarily gain them. Wages, therefore, are in this case confounded with profit.

普通的农场主很少雇佣监工来指导农场的总体工作。他们常常亲自做很多工作，如犁田、耙地等等。所以，谷物的销售所得，除了支付地租外，剩余的部分不仅仅要支付耕种过程中使用的资本和资本利润，而且还要支付他们自己作为劳动者和监工所应得的工资。但是，农场主却把收回资本和支付地租以后剩余的所有部分，统称为利润。这利润显然有一部分是由工资构成的。农场主由于自己劳作而节省了这部分工资，必然要在谷物销售所得中获得这部分工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将工资和利润混淆了。

An independent manufacturer, who has stock enough both to purchase materials, and to maintain himself till he can carry his work to market, should gain both the wages of a journeyman who works under a master, and the profit which that master makes by the sale of the journeyman's work. His whole gains, however, are commonly called profit, and wages are, in this case too, confounded with profit.

假使一个独立的制造者，在将商品运送至市场之前，拥有足够的资本来购买原材料并维持生活，那么，他所获得的收入应该包括两项：一是像在老板手下工作的工人一样领取的工资，二是作为老板销

售工人（就是他自己）的劳动产品所获得的利润。但人们通常将他这两项收入，也统称为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和利润也混为一谈了。

A gardener who cultivates his own garden with his own hands, unites in his own person the three different characters of landlord, farmer, and labourer. His produce, therefore, should pay him the rent of the first, the profit of the second, and the wages of the third. The whole, however, is commonly considered as the earnings of his labour. Both rent and profit are, in this case, confounded with wages.

一个亲自经营自己花园的花匠，往往身兼三职：土地所有者、农场主和劳动者。所以，他的产品应该首先支付他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然后支付他作为农场主的利润，最后支付他作为劳动者的工资。但通常人们却把他的全部收入看作他作为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和利润，又和工资混淆了。

As in a civilised country there are but few commodities of which the exchangeable value arises from labour only, rent and profit contributing largely to that of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m, so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bour will always be sufficient to purchase or command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labour than what was employed in raising, preparing, and bringing that produce to market. If the society were annually to employ all the labour which it can annually purchase, as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ould increase greatly every year, so the produce of every succeeding year would be of vastly greater value than that of the foregoing. But there is no country in which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is employed in

maintaining the industrious. The idle everywhere consume a great part of it; an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roportions in which it is annually divided between those two different orders of people, its ordinary or average value must either annually increase, or diminish, or continue the same from one year to another.

在文明的过度内，很少有商品的交换价值仅由劳动产生，大部分商品的交换价值主要来自利润和地租，所以，社会全部劳动年产物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总是远远超过这些年产物生产、制造乃至运送市场所需要的劳动数量。假设这个国家每年都能够运用其当年购买的所有劳动，那么，劳动数量将年年增加，且增加的幅度很大，而后一年的就会比前一年的产品具有更大的价值。但是，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全部年产物并不都用来维持勤劳的阶层。无论在哪个国家，每年都有大部分生产物由那些有闲阶层消费。根据年产物在这两个阶层中的分配比例不同，一国年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要么逐年增加，要么逐年减少，要么保持不变。

Chapter VII. Of the Natural and Market Price of Commodities

第七章、论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

There is in every society or neighbourhood an ordinary or average rate both of wages and profit in every different employment of labour and stock. This rate is naturally regulated, as I shall show hereafter, partly by the general circumstances of the society, their riches or poverty, their advancing, stationary, or declining condition; and partly by the particular nature of each employment.

在每一个社会及其附近的区域，无论劳动和资本如何投入使用，工资和利润都有一个普通率或平均率。我在后面将会讲到，这种比率，自然而然地受到两种因素的调节，一是社会的一般状况，即贫富状况，进步、退步或停滞状况，二是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特殊性质。

There is likewise in every society or neighbourhood an ordinary or average rate of rent, which is regulated too, as I shall show hereafter, partly by the general circumstances of the society or neighbourhood in which the land is situated, and partly by the natural or improved fertility of the land.

同样，在每一个社会及其附近的区域，地租也有一个普通率或平均率。我在后面将会讲到，这种比率，也受到两种因素的调节，一是土地所在的社会及其附近的区域的一般状况，二是土地的天然肥沃与人工改良的状况。

These ordinary or average rates may be called the natural rates of wages, profit, and rent, at the time and place in which they commonly prevail.

这些普通率或平均率，可以被叫做当时当地通行的工资、利润或地租的自然率。

When the price of any commodity is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what is sufficient to pay the rent of the land, the wages of the labour, and the profits of the stock employed in raising, preparing,

and bringing it to market,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al rates, the commodity is then sold for what may be called its natural price.

如果某种商品的价格，按照自然率的计算，不多不少恰好能够支付地租、劳动的工资，以及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将这商品运送到市场所投入资本的利润，那么这商品就是按照它的自然价格出售的。

The commodity is then sold precisely for what it is worth, or for what it really costs the person who brings it to market; for though in common language what is called the prime cost of any commodity does not comprehend the profit of the person who is to sell it again, yet if he sells it at a price which does not allow him the ordinary rate of profit in his neighbourhood, he is evidently a loser by the trade; since by employing his stock in some other way he might have made that profit. His profit, besides, is his revenue, the proper fund of his subsistence. As, while he is preparing and bringing the goods to market, he advances to his workmen their wages, or their subsistence; so he advances to himself, in the same manner, his own subsistence, which is generally suitable to the profit which he may reasonably expect from the sale of his goods. Unless they yield him this profit, therefore, they do not repay him what they may very properly be said to have really cost him.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售卖的价格正好等于它的价值，或者说，正好等于出售这商品的人所付出的实际成本。虽然按照通俗的说法，商品的原始成本，并不包括商人将商品再次售出所应获得的利润，但倘若商人不按照当地一般利润率的价格把这商品卖掉，那么显然他这生意是失败的。因为如果他以其他方式使用资本，也许可以获得这笔利润。此外，他的利润就是他的收入，是他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商人

在制造和运输商品到市场的过程中，要垫付劳动者的工资或生活资料，也要垫付他自己的生活资料。他自己的生活资料，与他通过售卖商品预期得到的利润大体相同。因此，如果通过售卖商品他不能获得利润，那也就是说，他并没有通过售卖商品收回实际成本。

Though the price, therefore, which leaves him this profit, is not always the lowest at which a dealer may sometimes sell his goods, it is the lowest at which he is likely to sell them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at least where there is perfect liberty, or where he may change his trade as often as he pleases.

因此，能使商人获得这种利润的价格，虽然并不总是商人售卖货物的最低价格，但却是商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愿意出售其货物的最低价格，至少如果交易的地方有绝对的交易自由，或者说商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改变其交易，那么情况就是如上面所述这样的。

The actual price at which any commodity is commonly sold is called its market price. It may either be above, or below, or exactly the same with its natural price.

通常来说，任何商品出售时的实际价格，就是它的市场价格。这个价格有时高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和它的自然价格完全相同。

The market price of every particular commodity is regulated by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which is actually brought to market, and the demand of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ay the natural

price of the commodity, or the whole value of the rent, labour, and profit, which must be paid in order to bring it thither. Such people may be called the effectual demanders, and their demand the effectual demand; since it may be sufficient to effectuate the bringing of the commodity to market.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absolute demand. A very poor man may be said in some sense to have a demand for a coach and six; he might like to have it; but his demand is not an effectual demand, as the commodity can never be brought to market in order to satisfy it.

实际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与人们（这些人愿意支付商品的自然价格，或者说愿意支付商品在售出前必须支付的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对该商品的需求间总是存在一个比例。每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都受到这一比例的支配。这些人可称为有效需求者，而他们的需求，可称为有效需求。商品正是因为这种需求得以进入市场，但这种需求与绝对需求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穷人也许对一辆六马拉的大马车有需求，他也许很想得到这辆马车，但他这种需求并不是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马车绝不会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而被带到市场上销售。

When the quantity of any commodity which is brought to market falls short of the effectual demand, all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ay the whole value of the rent, wages, and profit, which must be paid in order to bring it thither, cannot be supplied with the quantity which they want. Rather than want it altogether, some of them will be willing to give more. A competition will immediately begin among them, and the market price will rise more or less above the natural price, according as either the greatness of the deficiency, or the wealth and wanton luxury of the competitors, happen to animate more or less the eagerness of the competition.

Among competitors of equal wealth and luxury the same deficiency will generally occasion a more or less eager competition, according as the acquisition of the commodity happens to be of more or less importance to them. Hence the exorbitant price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during the blockade of a town or in a famine.

当进入市场的任何商品的数量少于商品的有效需求时，那些愿意支付在商品出售前就必须支付的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们所需数量的供给。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就此罢休，宁愿支付更高的价格。于是需求者间就发生了竞争。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或多或少地高于自然价格。价格能高出多少，取决于商品短缺数量的多少以及竞争者的经济实力和奢侈程度所引起的竞争激烈程度的大小。但对于富有和奢侈程度相同的竞争者来说，商品相同的短缺程度所能引起的竞争程度的大小，要看这商品对购买者的重要性的大小。所以，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异常昂贵通常发生在城市受到封锁或人们遭遇灾荒之时。

When the quantity brought to market exceeds the effectual demand, it cannot be all sold to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ay the whole value of the rent, wages and profit, which must be paid in order to bring it thither. Some part must be sold to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ay less, and the low price which they give for it must reduce the price of the whole. The market price will sink more or less below the natural price, according as the greatness of the excess increases more or less the competition of the sellers, or according as it happens to be more or less important to them to get immediately rid of the commodity. The same excess in the importation of perishable, will occasion a much greater competition than in that of durable commodities; in the importation of oranges, for example, than in that of old iron.

反之，如果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多于商品的有效需求，这种商品就不能全部卖给那些愿支付商品出售前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一部分商品必须卖给出价较低的人。而这些人所出的低价，一定会拉低商品的总体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便或多或少地低于自然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下降多少，要看商品超出需求的部分能在多大程度上加剧卖方间的竞争，或者说，把商品尽快卖出去对卖方到底有多重要。举例来说，假使商品超出需求的数量相同，进口过多易腐烂的商品会比进口过多耐用品引起的竞争更加激烈。例如，进口过多的柑橘就比进口过多的旧式铁器更能引起卖方的竞争。

When the quantity brought to market is just sufficient to supply the effectual demand, and no more, the market price naturally comes to be either exactly, or as nearly as can be judged of, the same with the natural price. The whole quantity upon hand can be disposed of for this price, and cannot be disposed of for more. The competition of the different dealers obliges them all to accept of this price, but does not oblige them to accept of less.

如果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不多不少，恰好能够供给它的有效需求，那么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和自然价格完全相等，或大致相等。市场上的全部商品都能以自然价格出售，但不能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商人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都得接受这个价格，但无法使他们接受更低的价格。

The quantity of every commodity brought to market naturally suits itself to the effectual demand. It is the interest of all those who employ their land, labour, or stock, in bringing any commodity to

market, that the quantity never should exceed the effectual demand; and it is the interest of all other people that it never should fall short of that demand.

所有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会自动适应商品的有效需求。如果商品数量不超过有效需求，这对所有使用土地、劳动或资本将商品送到市场的商人有利；如果商品数量不少于有效需求，则对其他人有利。

If at any time it exceeds the effectual demand, some of the component parts of its price must be paid below their natural rate. If it is rent, the interest of the landlords will immediately prompt them to withdraw a part of their land; and if it is wages or profit, the interest of the labourers in the one case, and of their employers in the other, will prompt them to withdraw a part of their labour or stock from this employment. The quantity brought to market will soon be no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supply the effectual demand.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its price will rise to their natural rate, and the whole price to its natural price.

无论在什么时候，市场上的商品数量一旦超过它的有效需求，商品价格的某些组成部分则一定以低于自然率的价格成交。如果低于自然率的是地租，土地所有者出于对利益的考虑，就会立刻撤回一部分土地。如果低于自然率的是工资或利润，劳动者或雇主出于对利益的考虑，也会撤回一部分运用在这方面的劳动或资本。于是，过不了多久，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就会恰好满足它的有效需求，价格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将升至它们的自然率，商品的整体价格也将上升，恰好等同于自然价格。

If, on the contrary, the quantity brought to market should at any time fall short of the effectual demand, some of the component parts of its price must rise above their natural rate. If it is rent, the interest of all other landlords will naturally prompt them to prepare more land for the raising of this commodity; if it is wages or profit, the interest of all other labourers and dealers will soon prompt them to employ more labour and stock in preparing and bringing it to market. The quantity brought thither will soon be sufficient to supply the effectual demand.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its price will soon sink to their natural rate, and the whole price to its natural price.

反之，如果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不够供应它的有效需求，那么商品价格的某些组成部分就一定会高于自然率。如果高于自然率的是地租，那么土地所有者出于对利益的考虑，自然会投入更多的土地来生产这种商品。如果高于自然率的是工资或利润，那么劳动者或商人出于对利益的考虑，也会马上投入更多的劳动或资本，多制造一些商品使其流入市场。于是，过不了多久，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就能充分满足它的有效需求，价格的所有组成部分就会下降至它们的自然率，商品的整体价格也将下降，恰好等同于自然价格。

The natural price, therefore, is, as it were, the central price, to which the prices of all commodities are continually gravitating. Different accidents may sometimes keep them suspended a good deal above it, and sometimes force them down even somewhat below it. But whatever may be the obstacles which hinder them from settling in this centre of repose and continuance, they are constantly tending towards it.

因此，商品的自然价格是中心价格，所有商品价格都不断向它靠拢。各种意外事件有时会使商品价格高于这个中心价格，有时会迫使商品价格低于这个中心价格，但是，尽管这些障碍使商品价格不能固定在这个静止和持续的中心价格上，商品的价格却总是朝着这个中心价格靠拢。

The whole quantity of industry annually employed in order to bring any commodity to market, naturally suits itself in this manner to the effectual demand. It naturally aims at bringing always that precise quantity thither which may be sufficient to supply, and no more than supply, that demand.

每年使各种商品上市所使用的全部劳动数量，也会按照这种方式自行适应各自的有效需求。目的自然是始终确保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足够适应市场的需求，而不是超过市场的需求。

But in some employments the same quantity of industry will in different years produce very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commodities; while in others it will produce always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The same number of labourers in husbandry will, in different years, produce very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corn, wine, oil, hops, etc. But the same number of spinners and weavers will every year produce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quantity of linen and woollen cloth. It is only the average produce of the one species of industry which can be suited in any respect to the effectual demand; and as its actual produce is frequently much greater and frequently much less than its average produce, the quantity of the commodities brought to market will sometimes exceed a good deal, and sometimes fall short a good deal of the effectual demand. Even

though that demand therefore should continue always the same, their market price will be liable to great fluctuations, will sometimes fall a good deal below, and sometimes rise a good deal above their natural price. In the other species of industry, the produce of equal quantities of labour being always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it can be more exactly suited to the effectual demand. While that demand continues the same, therefore, the market price of the commodities is likely to do so too, and to be either altogether, or as nearly as can be judged of, the same with the natural price. That the price of linen and woollen cloth is liable neither to such frequent nor to such great variations as the price of corn, every man's experience will inform him. The price of the one species of commodities varies only with the variations in the demand: that of the other varies, not only with the variations in the demand, but with the much greater and more frequent variations in the quantity of what is brought to market in order to supply that demand.

但是，对于一些行业，在不同的年份里，相同的劳动数量生产的商品数量却截然不同。而在其他行业里，商品数量却总是相同或几乎相同。举例来说，对于农业，不同的年份，相同数量的劳动者所产出的谷物、葡萄酒、油、啤酒花等商品数量就截然不同。但对于纺织行业，不同的年份里，相同数量的纺织工所产出的麻布和呢绒数量，却总是相同或几乎相同。因此，就前一种行业来说，只有行业的平均产量才能在各个方面适应市场的有效需求。但是，由于一种行业的实际产量有时比平均产量大得多，有时比平均产量小得多，所以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有时大大超过其有效需求，有时严重短缺于有效需求。所以，即使商品的有效需求始终不变，商品的市场价格依然可能有巨大的变动，有时比自然价格高得多，有时又比自然价格低得多。但就后一种行业说，由于相同数量的劳动生产的商品数量总是相同或大致相同，所以，商品数量能更正确地适合适应其有效需求。当有效需求

保持不变时，商品市场价格也保持不变，和自然价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每个人凭经验就知道，麻布和呢绒的价格，不像谷价变动得那么频繁，也没有谷价那样大的变动。这是因为，麻布和呢绒的价格只随需求的变动而变动，而谷物的价格，不仅随需求的变动而变动，还随着为供应需求而上市的商品数量的更巨大和更频繁的变动而变动。

The occasional and temporary fluctuations in the market price of any commodity fall chiefly upon those parts of its price which resolve themselves into wages and profit. That part which resolves itself into rent is less affected by them. A rent certain in money is not in the least affected by them either in its rate or in its value. A rent which consists either in a certain proportion or in a certain quantity of the rude produce, is no doubt affected in its yearly value by all the occasional and temporary fluctuations in the market price of that rude produce; but it is seldom affected by them in its yearly rate. In settling the terms of the lease, the landlord and farmer endeavour, according to their best judgment, to adjust that rate, not to the temporary and occasional, but to the average and ordinary price of the produce.

任何商品市场价格的偶然和暂时的变动，主要对市场价格中工资和利润这两个组成部分发生影响，对地租部分影响不大。用货币支付的地租，无论是价值还是比率，都不会受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用未加工的生产物按一定比例或一定数量支付的地租，由于未加工生产物的市场价格具有偶然和暂时的变动，因此无疑会对地租每年的价值产生影响，但对地租每年的比率则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商定租约的条件时，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们都竭尽全力，希望做出最正确的判断，根据生产物的平均和一般价格，而不是暂时和偶然的价格，调整地租的比率。

Such fluctuations affect both the value and the rate either of wages or of profit, according as the market happens to be either over-stocked or under-stocked with commodities or with labour; with work done, or with work to be done. A public mourning raises the price of black cloth (with which the market is almost always under-stocked upon such occasions) and augments the profits of the merchants who possess any considerable quantity of it. It has no effect upon the wages of the weavers. The market is under-stocked with commodities, not with labour; with work done, not with work to be done. It raises the wages of journeymen taylors. The market is here understocked with labour. There is an effectual demand for more labour, for more work to be done than can be had. It sinks the price of coloured silks and cloths, and thereby reduces the profits of the merchants who have any considerable quantity of them upon hand. It sinks, too, the wages of the workmen employed in preparing such commodities, for which all demand is stopped for six months, perhaps for a twelvemonth. The market is here over-stocked both with commodities and with labour.

市场价格这种偶然和暂时的变动对于工资或利润的价值和比率发生怎样的影响，要根据当时市场上商品或劳动积存过多还是过少而定，或者说，要根据当时市场上已完成工作或未完成工作是过多还是过少而定。国丧常常引起黑布价格的上升（这种场合，市场上的黑布几乎总是供应不足），持有大量黑布的商人因此获得更高的利润，但织布工人的工资却丝毫不受影响。因为此时市场上供应不足的是商品，不是劳动，换句话说，供应不足的是已完成的工作，而不是未完成的工作。但是，国丧虽然不能影响纺织工的工资，却会提高裁缝的工资。因为此时，市场上供应不足的是劳动，市场对更多的劳动，对完成更多的工作有着有效的需求。国丧会降低彩色丝绸和棉布的价格，因而降低持有大量彩色丝绸和棉布的商人的利润，以及制造这些商品的工人的工资。因为此时，市场对于彩色丝绸和棉布的需求会暂

停半年或一年。于是，市场上的这类商品与劳动都是供大于求。

But though the market price of every particular commodity is in this manner continually gravitating, if one may say so, towards the natural price, yet sometimes particular accidents, sometimes natural causes, and sometimes particular regulations of police, may, in many commodities, keep up the market price, for a long time together, a good deal above the natural price.

也许有人会说，市场价格就是以这种方式不断降低，向自然价格靠拢。虽然如此，但有许多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由于某个意外事件，有时由于自然原因，有时又由于政策的特殊规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大大超过其自然价格。

When by an increase in the effectual demand, the market price of some particular commodity happens to rise a good deal above the natural price, those who employ their stocks in supplying that market are generally careful to conceal this change. If it was commonly known, their great profit would tempt so many new rivals to employ their stocks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 effectual demand being fully supplied, the market price would soon be reduced to the natural price, and perhaps for some time even below it. If the market is at a great distance from the residence of those who supply it, they may sometimes be able to keep the secret for several years together, and may so long enjoy their extraordinary profits without any new rivals. Secrets of this kind, however,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can seldom be long kept; and the extraordinary profit can last very little longer than they are kept.

当某一商品的市场价格因有效需求增加而比自然价格高得多时，那些投入资本、供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商人就会小心翼翼地隐瞒这种变化。因为如果这种变化为大众所知的话，许多新的竞争者就会因为巨额利润而以同样的方式投入资本。结果便是，有效需求完全得到满足，商品的市场价格不久就降低到自然价格，也许在一段时间里还会降低到自然价格之下。如果市场离供应商很远，他们有时能一连几年保守住秘密，从而在这几年里没有新的竞争者，独享巨额利润。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很少有人能长期保守这一秘密，而秘密一旦泄露，巨额利润也便随之消失。

Secrets in manufactures are capable of being longer kept than secrets in trade. A dyer who has found the means of producing a particular colour with materials which cost only half the price of those commonly made use of, may, with good management, enjoy the advantage of his discovery as long as he lives, and even leave it as a legacy to his posterity. His extraordinary gains arise from the high price which is paid for his private labour. They properly consist in the high wages of that labour. But as they are repeated upon every part of his stock, and as their whole amount bears, upon that account, a regular proportion to it, they are commonly considered as extra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制造业中的秘密，和商业秘密相比，能保守得更长久些。比如说，如果一个染工在生产某种颜色时，发现使用某一种染料能比使用普通染料节省一半的钱，那么只要他妥善经营，他就能终生独享这一发现给他带来的利益，甚至能把它传给子孙后代。这种巨额利润来自人们付给他个人劳动的高价，所以可以说是他个人劳动的高工资。但是由于他每投入一部分资本，就能得到这种巨额利润，他的利润总额因而与资本总额保持一定的比例，因此，人们通常都不说他得到的是劳动的高工资，而说其是资本的巨额利润。

Such enhancements of the market price are evidently the effects of particular accidents, of which, however, the operation may sometimes last for many years together.

这样提高的市场价格，显然是个别事件的结果，不过它的作用有时能持续好多年。

Some natural productions require such a singularity of soil and situation that all the land in a great country, which is fit for producing them, may not be sufficient to supply the effectual demand. The whole quantity brought to market, therefore, may be disposed of to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give more than what is sufficient to pay the rent of the land which produced them, together with the wages of the labour, and the profits of the stock which were employed in preparing and bringing them to market,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al rates. Such commodities may continue for whole centuries together to be sold at this high price; and that part of it which resolves itself into the rent of land is in this case the part which is generally paid above its natural rate. The rent of the land which affords such singular and esteemed productions, like the rent of some vineyards in France of a peculiarly happy soil and situation, bears no regular proportion to the rent of other equally fertile and equally well-cultivated land in its neighbourhood. The wages of the labour and the profits of the stock employed in bringing such commodities to market, on the contrary, are seldom out of their natural proportion to those of the other employments of labour and stock in their neighbourhood.

有些自然产物的生长，对土壤与位置有特殊需求，所以一个大国中适合这些产物生长的土地即使全被使用，恐怕也不足以满足有效需求。因此，进入市场的全部产品有可能售给那些愿意支付高价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支付的价格超过按自然率计算的，生产商品的土地的地租、劳动工资，以及所投资本的利润三者之和。这种以高价出售的情况可能维持几个世纪。在这种情况下，地租部分一般按高于自然率的方式支付。生产这类珍贵产物的土地的地租，例如土壤肥沃、位置优越的法国珍贵葡萄园的地租，和其邻近的同等肥沃和同样精耕细作的其他土地的地租，通常并没有保持一定的比例。与之相反的是，使这种商品能够上市所使用的劳动工资和所投入的资本利润，和邻近地区的其他行业所使用的劳动工资及所投入的资本利润，却往往保有自然的比例，并且很少超过这一比例。

Such enhancements of the market price are evidently the effect of natural causes which may hinder the effectual demand from ever being fully supplied, and which may continue, therefore, to operate for ever.

这样提高的市场价格，显然是自然原因的结果，这种原因使有效需求永远不能得到充分的供给，而且这种作用可能会永远继续下去。

A monopoly granted either to an individual or to a trading company has the same effect as a secret in trade or manufactures. The monopolists, by keeping the market constantly under-stocked, by never fully supplying the effectual demand, sell their commodities much above the natural price, and raise their emoluments, whether they consist in wages or profit, greatly above their natural rate.

授予给个人或商业公司的垄断权，与商业或制造业中保守秘密的效果相同。垄断者使市场上的商品常常供应不足，从而使有效需求永远不能得到充分的供给。这样，他们就能将商品以大大超过自然价格的市场价格出售，而他们得到的工资或利润，都大大超过其自然率。

The price of monopoly is upon every occasion the highest which can be got. The natural price, or the price of free competition, on the contrary, is the lowest which can be taken, not upon every occasion indeed, but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altogether. The one is upon every occasion the highest which can be squeezed out of the buyers, or which, it is supposed, they will consent to give; the other is the lowest which the sellers can commonly afford to take,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tinue their business.

在任何情况下，垄断价格都是卖家能够在买家身上榨取的最高价格。相反，自然价格或自由竞争的价格，虽说不是在各个时期，但在长期内，却是可能有的最低价格。一个是卖家在各种情况下能从买家身上榨取的最高价格，或者说卖家认为买家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另一种则是即卖家一般能接受的、使其能够继续营业的最低价格。

The exclusive privileges of corporations, statutes of apprenticeship, and all those laws which restrain, in particular employments, the competition to a smaller number than might otherwise go into them, have the same tendency, though in a less degree. They are a sort of enlarged monopolies, and may frequently, for ages together, and in whole classes of employments, keep up the market price of particular commodities above the natural price, and maintain both the wages of the labour and the profits of the stock

employed about them somewhat above their natural rate.

同业公会的专属特权、学徒法规，以及对某些行业内竞争人数加以限制的各种法律（法律规定的竞争人数甚至比可能加入该行业的人数还要少），虽然在程度上不及垄断，但与垄断具有相同的效果。它们是一种升级版的垄断，往往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整个行业内，使某些商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其自然价格，并使生产这些商品所使用的劳动的工资和所投入的资本的利润稍稍超过其自然率。

Such enhancements of the market price may last as long as the regulations of police which give occasion to them.

这样提高的市场价格，显然是政策的特殊规定的结果。只要政策继续有效，偏高的市场价格就会继续存在。

The market price of any particular commodity, though it may continue long above, can seldom continue long below, its natural price. Whatever part of it was paid below the natural rate, the persons whose interest it affected would immediately feel the loss, and would immediately withdraw either so much land, or so much labour, or so much stock, from being employed about it, that the quantity brought to market would soon be no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supply the effectual demand. Its market price, therefore, would soon rise to the natural price. This at least would be the case where there was perfect liberty.

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商品的市场价格可能高于其自然价

格，但却不可能一直低于其自然价格。价格中无论哪个组成部分低于自然率，利益受到影响的人都会立刻感觉到这种损失，并且马上撤回生产商品使用的一部分土地、劳动或资本，从而使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很快只能满足有效需求。因此，商品的市场价格不久便会升到自然价格的水平。至少在交易完全自由的地方情况是这样。

The same statutes of apprenticeship and other corporation laws indeed, which, when a manufacture is in prosperity, enable the workman to raise his wages a good deal above their natural rate, sometimes oblige him, when it decays, to let them down a good deal below it. As in the one case they exclude many people from his employment, so in the other they exclude him from many employments. The effect of such regulations, however, is not near so durable in sinking the workman's wages below, as in raising them above their natural rate. Their operation in the one way may endure for many centuries, but in the other it can last no longer than the lives of some of the workmen who were bred to the business in the time of its prosperity. When they are gone,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are afterwards educated to the trade will naturally suit itself to the effectual demand. The police must be as violent as that of Indostan or ancient Egypt (where every man was bound by a principle of religion to follow the occupation of his father, and was supposed to commit the most horrid sacrilege if he changed it for another), which can in any particular employment, and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together, sink either the wages of labour or the profits of stock below their natural rate.

虽然在制造业繁荣时，学徒法规和同业公会法规，能把工人工资提高到大大超过自然率以上，但一旦制造业衰落，这些法规能使工人工资大大降落到自然率以下。这是因为，这些法规，在制造业繁荣

时，阻碍他人进入这些行业，在制造业衰落时，又阻碍从业者改行从事其他行业。不过，这些法规，对提高工人的工资所起的作用可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对降低工人的工资所起的作用却难以维持很长时间。在制造业繁荣时，在这些法规的影响下，工人工资提高的情况可持续好几个世纪。但制造业衰落时，在那些在产业繁荣时受过职业训练的工人死去的时候，这些法规使工人工资降低的情况便不会再持续。这是因为这些工人去世后，接受这一行业教育的工人数量，会自动适应有效需求。倘若想要使劳动工资或资本利润一连几代都落在自然率以下，那么一定要执行很严厉的监管，比如印度斯坦或古埃及那样的监管（在那里，宗教教义规定，每个人必须子承父业，否则就是犯了严重的亵渎神灵之罪）。

This is all that I think necessary to be observed at present concerning the deviations, whether occasional or permanent, of the market price of commodities from the natural price.

关于商品的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的偏离，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我想我现在需要说的，就是如上这些。

The natural price itself varies with the natural rate of each of its component parts, of wages, profit, and rent; and in every society this rate varies according to their circumstances, according to their riches or poverty, their advancing, stationary, or declining condition. I shall, in the four following chapters, endeavour to explain, as fully and distinctly as I can, the causes of those different variations.

自然价格本身，会随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些组成部分的自然率的

变动而变动。在每一个社会里，这种自然率都会随社会情况而变动，即随着社会的贫富，进步、停滞或退步而变动。在以下四章里，我将竭尽全力，尽可能详细明确地解释这些变动的原因。

First, I shall endeavour to explain what are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naturally determine the rate of wages, and in what manner those circumstances are affected by the riches or poverty, by the advancing, stationary, or declining state of the society.

第一，我将试图说明，哪些情况自然而然地决定工资率，而这些情况，又以何种方式受到社会的贫富，进步、停滞或退步的影响。

Secondly, I shall endeavour to showwhat are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naturally determine the rate of profit, and in what manner, too, those circumstances are affected by the like variations in the state of the society.

第二，我将试图说明，哪些情况自然而然地决定利润率，而这些情况，又以何种方式受到上述社会状况变动的影响。

Though pecuniary wages and profit are very different in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labour and stock; yet a certain proportion seems commonly to take place between both the pecuniary wages in all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labour, and the pecuniary profits in all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stock. This proportion, it will appear hereafter, depends partly upon the nature of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and partly upon the different laws and policy of the

society in which they are carried on. But though in many respects dependent upon the laws and policy, this proportion seems to be little affected by the riches or poverty of that society; by its advancing, stationary, or declining condition; but to remain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in all those different states. I shall, in the third place, endeavour to explain all th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which regulate this proportion.

第三，虽然劳动和资本在不同用途时所产生的货币工资与货币利润截然不同，但是不同用途的劳动所产生的货币工资和不同用途的资本所产生的货币利润，似乎都有一定的比例。这种比例，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提到，部分取决于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性质，部分取决于实施这一比例所在社会的不同法律和政策。不过，虽然这种比例在许多方面受法律和政策的支配，但似乎很少受到社会贫富，进步、停滞或退步等状况的影响。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一比例都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

In the fourth and last place, I shall endeavour to showwhat are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regulate the rent of land, and which either raise or lower the real price of all the different substances which it produces.

第四，我将试图说明，哪些情况支配土地地租，以及哪些情况会提高或降低一切土地生产物的真实价格。

Chapter VIII. Of the Wages of Labour

第八章、论劳动工资

The produce of labour constitutes the natural recompence or wages of labour.

劳动产品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

In that original state of things, which precedes both the appropriation of land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stock, the whole produce of labour belongs to the labourer. He has neither landlord nor master to share with him.

在事情都处于原始状态时，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尚未发生，劳动的全部产品为劳动者所有。既没有土地所有者，也没有雇主来分享他的劳动所得。

Had this state continued, the wages of labour would have augmented with all those improvements in its productive powers, to which the division of labour gives occasion. All things would gradually have become cheaper. They would have been produced by a smaller quantity of labour; and as the commodities produced by equal quantities of labour would naturally in this state of things be exchanged for one another, they would have been purchased likewise with the produce of a smaller quantity.

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随着分工的出现，劳动生产力改良，劳动工资也将随之增加。所有商品的价格将越来越低廉，因为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数量将会变少。在这种状态下，由于等量劳动所生产的各种商品间可以自然而然地互相交换，所以，较少劳动生产的商

品间也可以进行交换。

But though all things would have become cheaper in reality, in appearance many things might have become dearer than before, or have been exchanged for a greater quantity of other goods. Let us suppose, for example, that in the greater part of employments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had been improved to tenfold, or that a day's labour could produce ten times the quantity of work which it had done originally; but that in a particular employment they had been improved only to double, or that a day's labour could produce only twice the quantity of work which it had done before. In exchanging the produce of a day's labour in the greater part of employments, for that of a day's labour in this particular one, ten times the original quantity of work in them would purchase only twice the original quantity in it. Any particular quantity in it, therefore, a pound weight, for example, would appear to be five times dearer than before. In reality, however, it would be twice as cheap. Though it required five times the quantity of other goods to purchase it, it would require only half the quantity of labour either to purchase or to produce it. The acquisition, therefore, would be twice as easy as before.

但是，尽管所有商品实际上比原来便宜，但从表面上看，很多商品可能比以前贵一些，或者说同等数量的这些商品能够交换更多数量的其他商品。例如，假设在大多数行业中，劳动生产力增加至10倍，即如今一天的劳动数量能够生产出相当于最初10天所能生产的数量总和，而在某一特定行业中，劳动生产力却只增加至2倍，即如今一天的劳动数量只能生产出相当于最初两天所能生产的数量总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大多数行业中一天的劳动所得，去交换特定行业中一天的劳动所得，那么前者以原工作量的10倍，只能购入后者原工作量

的2倍。因此，任何数量的特定行业中的商品，例如一磅的重量，就似乎是原来的5倍。但实际上，它却比以前便宜了一半。购买这一磅商品需要的其他的商品数量虽然是以前的5倍，但生产或购买这一磅商品所需的劳动数量却仅为过去的1/2。所以，现在获得这种商品比以前容易了2倍。

But this original state of things, in which the labourer enjoyed the whole produce of his own labour, could not last beyond the first introduction of the appropriation of land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stock. It was at an end, therefore, long before the most considerable improvements were made in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and it would be to no purpose to trace farther what might have been its effects upon the recompence or wages of labour.

在事情都处于原始状态时，劳动者独享自己劳动所得的全部劳动产品，直到开始出现土地私有和资本累积时，这种情况就无法继续下去了。所以，在对劳动生产力进行显著改善前，这种原始状态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至于此种状态对劳动报酬或劳动工资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没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下去了。

As soon as land becomes private property, the landlord demands a share of almost all the produce which the labourer can either raise, or collect from it. His rent makes the first deduction from the produce of the labour which is employed upon land.

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就会要求劳动者将几乎所有产品都分给他一定份额，不论是劳动者生产的还是采集的。因此，劳动者自己通过耕种土地而得到的产品被扣除的第一个名目，就是地

租。

It seldom happens that the person who tills the ground has wherewithal to maintain himself till he reaps the harvest. His maintenance is generally advanced to him from the stock of a master, the farmer who employs him, and who would have no interest to employ him, unless he was to share in the produce of his labour, or unless his stock was to be replaced to him with a profit. This profit makes a second deduction from the produce of the labour which is employed upon land.

耕种土地的劳动者在庄稼收割以前，很少有生产资料能够维持其生活。他们的生活费通常是由雇佣他们的农场主用自己的资本垫付。除非农场主能够分享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或者说，除非他投入的资本能够产生一定利润，否则农场主就不愿雇佣劳动者。因此，利润是在耕种土地的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中扣除的第二个名目。

The produce of almost all other labour is liable to the like deduction of profit. In all arts and manufacture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workmen stands in need of a master to advance them the materials of their work, and their wages and maintenance till it be completed. He shares in the produce of their labour, or in the value which it adds to the materials upon which it is bestowed; and in this share consists his profit.

其实，扣除利润的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农业劳动所得中，在其他所有劳动所得中都是如此。在一切手工业和制造业中，大部分工人在工作完成以前，都需要雇主为他们垫付原材料、工资与生活费。雇

主分享他们的劳动所得，或者说，分享他们给原材料增加的价值，而雇主分享的这一份额便是他的利润。

It sometimes happens, indeed, that a single independent workman has stock sufficient both to purchase the materials of his work, and to maintain himself till it be completed. He is both master and workman, and enjoys the whole produce of his own labour, or the whole value which it adds to the materials upon which it is bestowed. It includes what are usually two distinct revenues, belonging to two distinct persons, the profits of stock, and the wages of labour.

诚然，在有些时候，一个独立工作的工人，也有足够的资本自行购买原材料，并维持自己生活，一直到工作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他即是雇主，又是工人，享有自己劳动的全部所得，即享有劳动为原材料增加的全部价值。因此，他同时获得了通常属于两个不同身份的人的两种不同收入，即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

Such cases, however, are not very frequent, and in every part of Europe, twenty workmen serve under a master for one that is independent; and the wages of labour are everywhere understood to be, what they usually are, when the labourer is one person, and the owner of the stock which employs him another.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在欧洲各地，在老板手下工作的工人有20个，对应的自己独立工作的工人才有一个。而且，在任何地方，人们所理解的劳动工资都是，劳动者为一人，而雇佣他的资本所有者为另一人（不考虑二者合二为一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劳动

的工资。

What are the common wages of labour, depends everywhere upon the contract usually made between those two parties, whose interests are by no means the same. The workmen desire to get as much, the masters to give as little as possible. The former are disposed to combine in order to raise, the latter in order to lower the wages of labour.

在任何地方，通常所说的劳动工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签订的合同，而这两方的利益完全不同。工人希望得到的工资越多越好，雇主希望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越少越好。工人们倾向于为提高工资而联合起来，雇主们却倾向于为减低工资而联合起来。

It is not, however, difficult to foresee which of the two parties must, upon all ordinary occasions, have the advantage in the dispute, and force the other into a compliance with their terms. The masters, being fewer in number, can combine much more easily; and the law, besides, authorises, or at least does not prohibit their combinations, while it prohibits those of the workmen. We have no acts of parliament against combining to lower the price of work; but many against combining to raise it. In all such disputes the masters can hold out much longer. A landlord, a farmer, a master manufacturer, or merchant, though they did not employ a single workman, could generally live a year or two upon the stocks which they have already acquired. Many workmen could not subsist a week, few could subsist a month, and scarce any a year without employment. In the long-run the workman may be as necessary to his master as his master is to him, but the necessity is not so

immediate.

但是，不难预料，在一般情况下，争议双方哪一方占据有利地位，哪一方能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雇主的人数较少，更容易联合起来。此外，法律和政府部门，虽然不赞成雇主们的做法，但至少不会禁止他们联合起来。但法律却禁止工人们联合起来。我们的议会通过了很多法案，禁止工人们为提高工资联合起来，却没有一条法案，禁止雇主们为降低工人工资而联合起来。在所有的此类争议中，雇主往往比工人坚持得更长久。土地所有者、农场主、制造业者或商人，即使一个工人也不雇佣，也能靠手中的资本维持一两年生活，而工人一旦失业，很多人连一周都不能维持不下去，很少有人能维持一个月，几乎没有人能维持一年。从长远的角度看，工人对雇主非常重要，正如雇主对工人非常重要一样，但工人对雇主的重要性并没有那样迫切。

We rarely hear, it has been said, of the combinations of masters, though frequently of those of workmen. But whoever imagines, upon this account, that masters rarely combine, is as ignorant of the world as of the subject. Masters are always and everywhere in a sort of tacit, but constant and uniform combination, not to raise the wages of labour above their actual rate. To violate this combination is everywhere a most unpopular action, and a sort of reproach to a master among his neighbours and equals. We seldom, indeed, hear of this combination, because it is the usual, and one may say, the natural state of things which nobody ever hears of. Masters, too, sometimes enter into particular combinations to sink the wages of labour even below this rate. These are always conducted with the utmost silence and secrecy, till the moment of execution, and when the workmen yield, as they sometimes do, without resistance, though severely felt by them,

they are never heard of by other people. Such combinations, however, are frequently resisted by a contrary defensive combination of the workmen; who sometimes too, without any provocation of this kind, combine of their own accord to raise the price of their labour. Their usual pretences are, sometimes the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sometimes the great profit which their masters make by their work. But whether their combinations be offensive or defensive, they are always abundantly heard of. In order to bring the point to a speedy decision, they have always recourse to the loudest clamour, and sometimes to the most shocking violence and outrage. They are desperate, and act with the folly and extravagance of desperate men, who must either starve, or frighten their masters into an immediate compliance with their demands. The masters upon these occasions are just as clamorous upon the other side, and never cease to call aloud for the assistance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and the rigorous execution of those laws which have been enacted with so much severity against the combinations of servants, labourers, and journeymen. The workmen, accordingly, very seldom derive any advantage from the violence of those tumultuous combinations, which, partly from the interposition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partly from the superior steadiness of the masters, partly from the necessity whic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workmen are under of submitting for the sake of present subsistence, generally end in nothing, but the punishment or ruin of the ringleaders.

虽然我们经常听到工人们联合起来，却很少听到雇主们联合起来。但是，如果谁要是因此以为雇主们很少联合起来，那就是既不懂世故，又不明真相了。雇主们为了将劳动工资保持在实际工资率以下，随时随地都以一种秘而不宣、团结一致的方式联合起来。无论在何地，破坏这种联合都是最不受欢迎的行为，会被邻居和同业者谴

责。我们确实很少听过这种联合，因为这种联合是一种没有人知道的、普通的，或者说自然的状态。此外，雇主们为了把劳动工资降低到实际工资率以下，有时也组织特殊的联合。这种联合，总是尽可能悄悄地、秘密地进行，直到最终采取行动。而此时，工人们有时会毫不抵抗地屈服，虽然他们也会感到切肤之痛，但是没有人会听到他们的声音。不过，工人们常常也组织对抗性和防御性的联合行动，以抵制雇主们的秘密联合行为。而且，有时没有这类刺激，工人们也会为了提高工资水平自动联合起来。他们联合起来的理由，有时是食物价格太贵，有时是雇主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得的利润太过巨大。无论工人组织的联合行动是防御性的或是攻击性的，总是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为了使问题得到迅速解决，他们往往狂呼呐喊，有时甚至诉诸骇人听闻的暴力。此时的工人们是绝望的，只能放纵自己的行为。如果不想饿死，就得胁迫雇主立即答应他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雇主也同样对工人们大呼大叫，不停地向地方执法机构高声呼救，要求执行那些为禁止佣工、工人和工匠们联合起来而通过的十分严厉的法律。因此，工人们很少能从这种喧嚣联合的暴动中得到利益。这些联合行动，部分因为地方执法机构干涉，部分因为雇主坚持得更为持久，部分因为大多数工人为了眼前的生计不得不屈服，往往以领头人受到惩罚或处死而告终。

But though in disputes with their workmen, masters must generally have the advantage, there is, however, a certain rate below which it seems impossible to reduce,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the ordinary wages even of the lowest species of labour.

不过，在争议中，虽然雇主常常处于有利地位，但由于劳动工资有特定的比率，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似乎也不能降到这一比率之下。

A man must always live by his work, and his wages must at least be sufficient to maintain him. They must even upon most occasions be somewhat more; otherwise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him to bring up a family, and the race of such workmen could not last beyond the first generation. Mr. Cantillon seems, upon this account, to suppose that the lowest species of common labourers must everywhere earn at least double their own maintenance, in order that one with another they may be enabled to bring up two children; the labour of the wife, on account of her necessary attendance on the children, being supposed no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provide for herself. But one half the children born, it is computed, die before the age of manhood. The poorest labourers,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is account, must, one with another, attempt to rear at least four children, in order that two may have an equal chance of living to that age. But the necessary maintenance of four children, it is supposed, may be nearly equal to that of one man. The labour of an able-bodied slave, the same author adds, is computed to be worth double his maintenance; and that of the meanest labourer, he thinks, cannot be worth less than that of an able-bodied slave. Thus far at least seems certain, that, in order to bring up a family, the labour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together must, even in the lowest species of common labour, be able to earn something more than what is precisely necessary for their own maintenance; but in what proportion, whether in that abovementioned, or in any other, I shall not take upon me to determine.

一个人总要靠工作来维持生活，他的工资至少必须足够维持他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还得更高一些，否则劳动者就不能养家糊口、传宗接代了。康蒂永似乎因此推测，无论在何地，最低级的普通劳动者，赚得的工资至少必须是自身所需生活费的两倍，这样才能

养活两个孩子。而他的妻子，由于要照顾孩子，因此其劳动所得，只够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根据计算，常常有一半的孩子在成年以前就会死去。因此，按照这种计算，最贫穷的劳动者至少想养4个孩子，以便能有两个孩子活到成人年龄。但康蒂永认为，4个孩子必要的生活费用，基本和一个成年人的生活费大体相等了。他还讲到，一个强壮的奴隶的劳动价值，是其生活费的两倍，一个最低级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不可能低于一个强壮的奴隶的劳动价值。因此，似乎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为了养家糊口，即使最低级普通劳动者夫妇二人的劳动所得，也必须能稍稍超过维持他俩自身生活所需要的费用。但是，是按什么比例，上述的比例还是其他的比例，我就不太确定了。

There are certain circumstances, however, which sometimes give the labourers an advantage, and enable them to raise their wages considerably above this rate; evidently the lowest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common humanity.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劳动者也会处于有利地位，并能够将工资提高到大大超过这个劳动工资比率的水平。很明显，这个比率只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水平。

When in any country the demand for those who live by wages, labourers, journeymen, servants of every kind, is continually increasing; when every year furnishes employment for a greater number than had been employed the year before, the workmen have no occasion to combine in order to raise their wages. The scarcity of hands occasions a competition among masters, who bid against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get workmen, and thus voluntarily break through the natural combination of masters not to raise wages.

不论哪个国家，如果对工人、工匠和佣工等那些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需求不断增加，如果每一年提供的就业机会都比前一年多，工人们就没有必要为提高工资而联合起来。工人的数量如果不够，雇主们之间自然会展开竞争，竞相出高价雇佣工人，从而自动打破雇主间为防止工资提高而自然建立起来的联合。

The demand for those who live by wages, it is evident, cannot increase but in proportion to the increase of the funds which are destined for the payment of wages. These funds are of two kinds; first, the revenue which is over and above w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secondly, the stock which is over and above w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employment of their masters.

很明显，随着预定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的增加，对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也必定成比例地增加。这种资金分为两种：第一，超过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费的收入；第二，超过雇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资本。

When the landlord, annuitant, or monied man, has a greater revenue than what he judges sufficient to maintain his own family, he employs either the whole or a part of the surplus in maintaining one or more menial servants. Increase this surplus, and he will naturally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hose servants.

如果土地所有者、年金领取人、有钱人认为自己的收入除养家糊口外还有剩余，他们一定会把余额的全部或一部分，用来雇佣一个或多个家仆。如果余额增加了，他们雇佣的家仆自然也随之而增加。

When an independent workman, such as a weaver or shoemaker, has got more stock than what is sufficient to purchase the materials of his own work, and to maintain himself till he can dispose of it, he naturally employs one or more journeymen with the surplus, in order to make a profit by their work. Increase this surplus, and he will naturally increase the number of his journeymen.

如果独立工作的劳动者（如织工、鞋匠）所拥有的资本，除了购买自己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并维持他在货品出售以前的生活外，还有剩余，他自然也会用这余额雇佣一个或多个帮工，以便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取利润。如果余额增加，他雇佣的帮工人数自然也随之而增加。

The demand for those who live by wages, therefore, necessarily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revenue and stock of every country, and cannot possibly increase without it. The increase of revenue and stock is the increase of national wealth. The demand for those who live by wages, therefore, naturally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national wealth, and cannot possibly increase without it.

因此，对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还必须随着一个国家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收入和资本没有增加，对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绝不会增加。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自然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如果国民财富不增加，对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绝不会增加。

It is not the actual greatness of national wealth, but its continual increase, which occasions a rise in the wages of labour. It is not, accordingly, in the richest countries, but in the most thriving, or in those which are growing rich the fastest, that the wages of labour are highest. England is certainly, in the present times, a much richer country than any part of North America. The wages of labour, however, are much higher in North America than in any part of England. In the province of New York, common labourers earn three shillings and sixpence currency, equal to two shillings sterling, a day; shipcarpenters, ten shillings and sixpence currency, with a pint of rum worth sixpence sterling, equal in all to six shillings and sixpence sterling; housecarpenters and bricklayers, eight shillings currency, equal to four shillings and sixpence sterling; journeymen taylors, five shillings currency, equal to about two shillings and ten pence sterling. These prices are all above the London price; and wages are said to be as high in the other colonies as in New York.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is everywhere in North America much lower than in England. A dearth has never been known there. In the worst seasons, they have always had a sufficiency for themselves, though less for exportation. If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therefore, be higher than it is anywhere in the mothercountry, its real price, the real command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which it conveys to the labourer, must be higher in a still greater proportion.

然而，使劳动工资增加的，不是巨额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往往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而是在最繁荣，或发展最快的国家出现。今天的英格兰肯定比北美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富有，但是北美各地的劳动工资却比英格兰任何一个地方的劳动工资都要高。在纽约地区，普通工人每天的工资为美币3先令6便士，合英币2先令；造船木匠为美币10先令6便士，外加值英

币6便士的糖酒1品脱，总共合英币6先令6便士；泥水匠及建筑木匠为美币8先令，合英币4先令6便士；裁缝帮工为美币5先令，合英币2先令10便士。这些劳动者的工资都高于伦敦的劳动工资。据说，在其他的殖民地，劳动者的工资也和纽约一样高。在北美各地，食物的价都比英格兰低得多。北美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即便是在收成很差的年份里，他们也有足够的食物供应自己的生活，只是出口数量减少了而已。所以，如果殖民地劳动的货币价格比母国各地都要高，那么劳动的真实价格，即给予劳动者的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实际支配能力，也一定相应地比母国更高。

But though North America is not yet so rich as England, it is much more thriving, and advancing with much greater rapidity to the further acquisition of riches. The most decisive mark of the prosperity of any country is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its inhabita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most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they are not supposed to double in less than five hundred years.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North America,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y double in twenty or five-and-twenty years. Nor in the present times is this increase principally owing to the continual importation of new inhabitants, but to the great multiplication of the species. Those who live to old age, it is said, frequently see there from fifty to a hundred, and sometimes many more, descendants from their own body. Labour is there so well rewarded that a numerous family of children, instead of being a burthen, is a source of opulence and prosperity to the parents. The labour of each child, before it can leave their house, is computed to be worth a hundred pounds clear gain to them. A young widow with four or five young children, who, among the middling or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in Europe, would have so little chance for a second husband, is there frequently courted as a sort of fortune. The value of children is the greatest of all encouragements to marriage. We cannot, therefore,

wonder that the people in North America should generally marry very young. Notwithstanding the great increase occasioned by such early marriages, there is a continual complaint of the scarcity of hands in North America. The demand for labourers, the funds destined for maintaining them, increase, it seems, still faster than they can find labourers to employ.

虽然北美没有英格兰那样富有，但却比英格兰更繁荣，增加财富的速度也比英格兰快得多。任何一个国家的繁荣最具决定意义的标志，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英格兰以及欧洲大多数其他国家，在大约五百年内，居民人数只增加了不到一倍，但在北美英属各殖民地，在20年或25年内，居民人数就增加了一倍。目前，人口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新居民不断移入，而是本地人口迅速繁衍。据说，当地长寿者往往能亲眼看到50到100个直系子孙，甚至更多。由于那里的劳动报酬丰厚，因此子女众多不但不会成为家庭的负担，反而是家庭繁荣富裕的源泉。根据计算，在离开父母以前，每个子女的劳动能给家庭带来100英镑的净收入。在欧洲中等及下等阶层的人民间，一个有四五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很少有再婚的机会，但是在北美，这样的寡妇常常被看作一种财富而频频受到追求。孩子的价值，是人们追求婚姻的最大动力。所以，北美人早婚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但是，尽管早婚使人口数量大大增加，北美人民却仍不断诉苦、抱怨劳动者的数量不足。对劳动者需求的增加，和预定用于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的增加，似乎比劳动供给的增加快得多。

Though the wealth of a country should be very great, yet if it has been long stationary, we must not expect to find the wages of labour very high in it.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 payment of wages, the revenue and stock of its inhabitants, may be of the greatest extent; but if they have continued for several centuries of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of the same extent, the number of labourers

employed every year could easily supply, and even more than supply, the number wanted the following year. There could seldom be any scarcity of hands, nor could the masters be obliged to bid against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get them. The hands, on the contrary, would, in this case, naturally multiply beyond their employment. There would be a constant scarcity of employment, and the labourers would be obliged to bid against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get it. If in such a country the wages of labour had ever been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maintain the labourer, and to enable him to bring up a family, the competition of the labourers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masters would soon reduce them to this lowest rat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common humanity. China has been long one of the richest, that is, one of the most fertile, best cultivated, most industrious, and most populous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 seems, however, to have been long stationary. Marco Polo, who visited it more than five hundred years ago, describes its cultivation, industry, and populousness, almost in the same terms in which they are described by travellers in the present times. It had perhaps, even long before his time, acquired that full complement of riches which the nature of its laws and institutions permits it to acquire. The accounts of all travellers, inconsistent in many other respects, agree in the low wages of labour, and in the difficulty which a labourer finds in bringing up a family in China. If by digging the ground a whole day he can get what will purchase a small quantity of rice in the evening, he is contented. The condition of artificers is, if possible, still worse. Instead of waiting indolently in their work-houses, for the calls of their customers, as in Europe, they are continually running about the streets with the tools of their respective trades, offering their service, and as it were begging employment. The poverty of the lower ranks of people in China far surpasses that of the most beggarly nations in Europe.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Canton many hundred, it is commonly said, many

thousand families have no habitation on the land, but live constantly in little fishingboats upon the rivers and canals. The subsistence which they find there is so scanty that they are eager to fish up the nastiest garbage thrown overboard from any European ship. Any carrion, the carcase of a dead dog or cat, for example, though half putrid and stinking, is as welcome to them as the most wholesome food to the people of other countries.

一个国家可能拥有巨额的现有财富，但倘若其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我们绝不可能期望那里的劳动工资会很高。预定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换句话说，居民的收入和资本，也许数额巨大。但这数额如果在几个世纪都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那么每年需要雇佣的劳动者的人数就很容易得到供应，甚至还会有剩余，剩余的人数可能足够供应下一年所需的劳动者数量。这样，社会上几乎不会出现人手短缺的现象，雇主们也不会为了获得劳动者而相互竞争，抬高价钱。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数量会自然超过需要雇佣的人数。人们常常感到就业机会不够，于是劳动者为了获得工作，不得不相互竞争，争相降价。在这样一个国家，倘若劳动者以前的工资，本来足够养家糊口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此时，劳动者间的相互竞争和雇主们对利益的考虑，就会使劳动工资降到符合一般人道主义标准的最低工资。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就是说，是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中国的发展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当今旅行家关于中国土地耕作、工业以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访问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就已经取得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最巨额的财富。各旅行家的报告，在很多方面虽然互相矛盾，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劳动者难以养家糊口。中国农民在田地里整日劳作，到晚上所得的钱如果够买少量的稻米，他就觉得心满意足了。技工的状况可能更糟。在欧洲，技工们总是悠闲自在地待在工坊里，等候顾客上门；在中国，技工们却随身携带工具，走街串巷，叫卖自己的服务，乞求工作。中国下层人民

的贫困状况，远远超过欧洲最贫困国家人民的贫困状况。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人家，在陆地上没有房屋，长期生活在河面的小渔船中。他们常常感到缺衣少食，因此他们极度渴望从河里捞到，哪怕是欧洲船只抛弃的最肮脏的垃圾。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狗，即使一半已经腐烂发臭，他们也一样喜欢，就像欧洲国家的人们喜欢卫生的食品一样。

China, however, though it may perhaps stand still, does not seem to go backwards. Its towns are no-where deserted by their inhabitants. The lands which had once been cultivated are no-where neglected.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annual labour must therefore continue to be performed, and the funds destined for maintaining it must not, consequently, be sensibly diminished. The lowest class of labourers, therefore, notwithstanding their scanty subsistence, must some way or another make shift to continue their race so far as to keep up their usual numbers.

不过，中国的发展虽然处于停滞状态，但似乎并没有倒退。中国的城市没有一个被居民遗弃，而土地一旦被耕作，就绝不会荒芜。每年土地上的劳动必须完成得和之前同样多，或几乎差不多。因此，预定用于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也必定不会明显减少。所以，最底层的劳动者，虽然生活资料十分匮乏，但总能想方设法维持下去，使其阶层保持着原有的人数。

But it would be otherwise in a country where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bour were sensibly decaying. Every year the demand for servants and labourers would, in all the different classes of employments, be less than it had been the year before. Many who had been bred in the superior classes, not being

able to find employment in their own business, would be glad to seek it in the lowest. The lowest class being not only overstocked with its own workmen, but with the overflowings of all the other classes, the competition for employment would be so great in it, as to reduce the wages of labour to the most miserable and scanty subsistence of the labourer. Many would not be able to find employment even upon these hard terms, but would either starve, or be driven to seek a subsistence either by begging, or by the perpetration perhaps of the greatest enormities. Want, famine, and mortality would immediately prevail in that class, and from thence extend themselves to all the superior classes, till the number of inhabitants in the country was reduced to what could easily be maintained by the revenue and stock which remained in it, and which had escaped either the tyranny or calamity which had destroyed the rest. This perhaps is nearly the present state of Bengal, and of some other of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Indies. In a fertile country which had before been much depopulated, where subsistence, consequently, should not be very difficult, and where, notwithstanding, three or four hundred thousand people die of hunger in one year, we may be assured that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labouring poor are fast decay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enius of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which protects and governs North America, and that of the mercantile company which oppresses and domineers in the East Indies, cannot perhaps be better illustrated than by the different state of those countries.

但在有的国家，预定用于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显著减少。在这样的国家里，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每年各类不同的职业所需要的雇工和劳动者，都比前一年少。许多上等阶层的人，不能找到上等工作，也乐意在最下等的职业中找工作。因此，在最下等职业中，不仅最底层

的劳动者数量供应过剩，许多其他阶层的人还纷纷涌入。结果便是，职业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劳动工资降到最可怜的地步，劳动者只能勉强度日。而且，即使许多人愿意忍受这些苛刻的条件，还是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要么饿死，要么沦为乞丐，或干穷凶极恶的勾当以取得生活资料。很快，食物匮乏、饥饿和死亡等灾祸就会在最底层的劳动者间扩散，并逐渐波及所有上等阶层。苛政和灾难摧毁了大量的收入和资本，而国民人数也将最终减少到剩余的收入和资本可以轻易维持的人数。在孟加拉国及东印度的一些其他英属殖民地，现在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如果一个国家土地肥沃，人口又因某些原因大大减少，因而取得生活资料并不十分困难，但是每年仍有三四十万人饿死，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那是因为该国预定用于支付贫困的劳动者的生活资金正在迅速减少。通过北美和东印度国家的不同现状，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说明，保护和治理北美的英国宪法，和压迫与统治东印度的商业公司的宪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The liberal reward of labour, therefore, as it is the necessary effect, so it is the natural symptom of increasing national wealth. The scanty maintenance of the labouring poor,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natural symptom that things are at a stand, and their starving condition that they are going fast backwards.

所以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又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征兆。贫困的劳动者无法获得充足的生活费，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征兆，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兆。

In Great Britain the wages of labour seem, in the present times, to be evidently more than what is precisely necessary to enable the labourer to bring up a family. In order to satisfy ourselves upon this point it will not be necessary to enter into any tedious or doubtful

calculation of what may be the lowest sum upon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do this. There are many plain symptoms that the wages of labour are no-where in this country regulated by this lowest rat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common humanity.

现在，大不列颠的劳动工资，似乎显然超过了劳动者养家糊口所需的数额。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必做繁琐和不确切的计算，来推测劳动者至少需要多少工资才能养家糊口。有很多明显的迹象可以说明，大不列颠各地的劳动工资，都不是以符合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为准则的。

First, in almost every part of Great Britain there is a distinction, even in the lowest species of labour, between summer and winter wages. Summer wages are always highest. But on account of the extraordinary expence of fuel, the maintenance of a family is most expensive in winter. Wages, therefore, being highest when this expence is lowest, it seems evident that they are not regulated by what is necessary for this expence; but by the quantity and supposed value of the work. A labourer, it may be said indeed, ought to save part of his summer wages in order to defray his winter expence; and that through the whole year they do not exceed wha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his family through the whole year. A slave, however, or one absolutely dependent on us for immediate subsistence, would not be treated in this manner. His daily subsistence would be proportioned to his daily necessities.

第一，在大不列颠几乎所有地方，即使是最低级的劳动，其夏季工资与冬季工资也有区别。夏季的工资总是最高。但在冬季，由于燃料开支巨大，因此冬季家庭的生活费最高。生活费最低时，工资反而

最高，因此很明显，劳动工资并不受维持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费用的支配，而受工作的数量以及人们赋予工作的价值的支配。也许有人会说，劳动者应该把夏季工资的一部分储存起来，支付冬季的开支，这样，劳动者一年的工资就不会超过他一年中养家糊口所需要的数额。然而，对于奴隶或绝对倚仗他人生活的人来说，所得到的待遇却不是这样。他的日常生活资料，都是按照他的日常需要，按比例分配给他的。

Secondly, the wages of labour do not in Great Britain fluctuate with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These vary everywhere from year to year, frequently from month to month. But in many places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remains uniformly the same sometimes for half a century together. If in these places, therefore, the labouring poor can maintain their families in dear years, they must be at their ease in times of moderate plenty, and in affluence in those of extraordinary cheapness. The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during these ten years past has not in many parts of the kingdom been accompanied with any sensible rise in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It has, indeed, in some, owing probably more to the increase of the demand for labour than to that of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第二，大不列颠的劳动工资，不随食物价格的变动而变动。无论在何地，每一年的食物价格都不一样，而且每一月的食物价格常常也不一样。但在许多地方，劳动的货币价格，有时却持续半个世纪不变。因此，在这些地方，贫困的劳动者如果能在食物最昂贵的时期养家糊口，那么，在食物价格适中而供给又很充足的时期，一定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在食物异常低廉的时期，一定能够过上优裕的生活。在过去的10年中，大不列颠的许多地方食物昂贵，但劳动的货币价格并未跟着显著提高。的确，在有些地方，劳动的货币价格提高了，但那更多是因为劳动的需求增加了，而不是因为食物昂贵。

Thirdly, as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varies more from year to year than the wages of labour, so, on the other hand, the wages of labour vary more from place to place than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The prices of bread and butcher's meat are generally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ese and most other things which are sold by retail, the way in which the labouring poor buy all things, are generally fully as cheap or cheaper in great towns than in the remoter parts of the country, for reasons which I shall have occasion to explain hereafter. But the wages of labour in a great town and its neighbourhood are frequently a fourth or a fifth part, twenty or five-and-twenty per cent higher than at a few miles distance. Eighteen pence a day may be reckoned the common price of labour in London and its neighbourhood. At a few miles distance it falls to fourteen and fifteen pence. Ten pence may be reckoned its price in Edinburgh and its neighbourhood. At a few miles distance it falls to eight pence, the usual price of common labour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ow country of Scotland, where it varies a good deal less than in England. Such a difference of prices, which it seems is not always sufficient to transport a man from one parish to another, would necessarily occasion so great a transportation of the most bulky commodities, not only from one parish to another, but from one end of the kingdom, almost from one end of the world to the other, as would soon reduce them more nearly to a level. After all that has been said of the levity and inconstancy of human nature, it appears evidently from experience that a man is of all sorts of luggage the most difficult to be transported. If the labouring poor, therefore, can maintain their families in those parts of the kingdom where the price of labour is lowest, they must be in affluence where it is highest.

第三，就不同年份而言，食物价格的变动，大于劳动工资的变动，而就不同地方而言，劳动工资的变动，却大于食物价格的变动。在大不列颠几乎所有地方，面包和肉类的价格基本相同或大致相同。这两种商品以及其他大多数零售商品（贫困的劳动者以零售的方式购买一切商品），在大城市和在偏远地方购买通常一样便宜，或者，大城市购买更便宜些，其中的原因我将在后面的章节解释说明。但大城市与其附近地区的劳动工资，往往比数英里以外地方的劳动工资，高出1/5或1/4，即高出20%或25%。伦敦及其附近地区，劳动的普通价格是每天18便士。在距伦敦数英里以外的地区，劳动的普通价格就降低到14便士或15便士。在爱丁堡及其附近地区，劳动的普通价格是每天10便士，在距爱丁堡数英里以外的地区，劳动的普通价格就降低到8便士。在苏格兰低地一带大部分地方，8便士是普通劳动的普通价格，那里劳动价格的变动比英格兰少得多。劳动价格上的差异，虽然未必能够驱使一个人从一个教区搬到另一个教区去，但商品价格上的差异，却必然会使许多体积巨大的商品，从一教区运到另一教区，从国内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甚至从世界的一个角落运到另一个角落，不久商品的价格就会降到大体相同的水平上。虽然人们常说，人性见异思迁，不能始终如一，但经验表明，人类显然又是最安土重迁的。贫困的劳动者，在大不列颠劳动价格最低的地方，要是能够养家糊口，那么在大不列颠劳动价格最高的地方，就一定能过上优裕的生活。

Fourthly, the variations in the price of labour not only do not correspond either in place or time with those in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but they are frequently quite opposite.

第四，劳动价格的变动，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地点上，不但不与食物价格的变动一致，而且往往与食物价格的变动相反。

Grain, the food of the common people, is dearer in Scotland than in England, whence Scotland receives almost every year very large supplies. But English corn must be sold dearer in Scotland, the country to which it is brought, than in England, the country from which it comes; and in proportion to its quality it cannot be sold dearer in Scotland than the Scotch corn that comes to the same market in competition with it. The quality of grain depends chiefly upon the quantity of flour or meal which it yields at the mill, and in this respect English grain is so much superior to the Scotch, that, though often dearer in appearance, or in proportion to the measure of its bulk, it is generally cheaper in reality, or in proportion to its quality, or even to the measure of its weight. The price of labour, on the contrary, is dearer in England than in Scotland. If the labouring poor, therefore, can maintain their families in the one pa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ey must be in affluence in the other. Oatmeal indeed supplies the common people in Scotland with the greatest and the best part of their food, which is in general much inferior to that of their neighbours of the same rank in England. This difference, however, in the mode of their subsistence is not the cause, but the effect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wages; though, by a strange misapprehension, I have frequently heard it represented as the cause. It is not because one man keeps a coach while his neighbour walks a-foot, that the one is rich and the other poor; but because the one is rich he keeps a coach, and because the other is poor he walks a-foot.

谷物是普通人的食物，苏格兰谷物的价格比英格兰高，苏格兰几乎每年都从英格兰进口大量的谷物。英格兰谷物卖到苏格兰后，在苏格兰售卖的价格必然高于在英格兰售卖的价格，但它的价格不会高于和它竞争的同质量的苏格兰本地谷物的价格。谷物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它在磨坊可磨得的粉量。就这一点说，英格兰谷物质量远胜于苏格兰

谷物，所以，尽管从外表或从体积看，英格兰谷物的价格高于苏格兰谷物的价格，但实际上就品质或重量而言，英格兰谷物却比苏格兰谷物便宜得多。但是，苏格兰的劳动价格却比英格兰低。因此，贫困的劳动者，如果能在联合王国的苏格兰地区养家糊口，那么在联合王国的英格兰地区，就一定能过上优裕的生活。现在，燕麦片是苏格兰普通民众的主食，也是他们最好的食物，但这和英格兰处于同一阶层的人民的主食相比，却要差很多。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不是两地人民工资差异的原因，而是两地人民工资差异的结果，只是我常常听到人们有一种奇怪的误解，认为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是两地人民工资差异的原因。一个人富有而邻居贫穷，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出门坐马车，而邻居步行，而是因为他富有才备得起马车，邻居贫穷才不得不步行。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last century, taking one year with another, grain was dearer in both par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an during that of the present. This is a matter of fact which cannot now admit of any reasonable doubt; and the proof of it is, if possible, still more decisive with regard to Scotland than with regard to England. It is in Scotland supported by the evidence of the public files, annual valuations made upon oath,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markets, of all the different sorts of grain in every different county of Scotland. If such direct proof could require any collateral evidence to confirm it, I would observe that this has likewise been the case in France, and probably in most other parts of Europe. With regard to France there is the clearest proof. But though it is certain that in both par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grain was somewhat dearer in the last century than in the present, it is equally certain that labour was much cheaper. If the labouring poor, therefore, could bring up their families then, they must be much more at their ease now. In the last century, the most usual day-wages of common labour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Scotland were sixpence in summer and fivepence in winter. Three shillings

aweek, the same price very nearly, still continues to be paid in some parts of the Highlands and Western Islands.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ow country the most usual wages of common labour are now eightpence aday;tenpence, sometimes a shilling about Edinburgh, in the counties which border upon England, probably on account of that neighbourhood, and in a few other places where there has lately been a considerable rise in the demand for labour, about Glasgow, Carron, Ayr-shire,, etc. In England the improvements of agriculture,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began much earlier than in Scotland. The demand for labour, and consequently its price, must necessarily have increased with those improvements. In the last century, accordingly, as well as in the present, the wages of labour were higher in England than in Scotland. They have risen, too, considerably since that time, though, on account of the greater variety of wages paid there in different places,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ascertain how much. In 1614, the pay of a foot soldier was the same as in the present times, eight pence a day. When it was first established it would naturally be regulated by the usual wages of common labourers, the rank of people from which foot soldiers are commonly drawn. LordChief Justice Hales, who wrote in the time of Charles II. computes the necessary expence of a labourer's family, consisting of six persons, the father and mother, two children able to do something, and two not able, at ten shillings a week, or twenty-six pounds a year. If they cannot earn this by their labour, they must make it up, he supposes, either by begging or stealing. He appears to have enquired very carefully into this subject. In 1688, Mr. Gregory King, whose skill in political arithmetic is so much extolled by Doctor Davenant, computed the ordinary income of labourers and out-servants to be fifteen pounds a year to a family, which he supposed to consist, one with another, of three and a half persons. His calculation, therefore, though different in appearance, corresponds

very nearly at bottom with that of Judge Hales. Both suppose the weekly expence of such families to be about twentypence ahead. Both the pecuniary income and expence of such families have increased considerably since that time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kingdom; in some places more, and in some less; though perhaps scarce anywhere so much as some exaggerated accounts of the present wages of labour have lately represented them to the public. The price of labour, it must be observed, cannot be ascertained very accurately anywhere, different prices being often paid at the same place and for the same sort of labour, not onl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abilities of the workmen, but according to the easiness or hardness of the masters. Where wages are not regulated by law, all that we can pretend to determine is what are the most usual; and experience seems to show that law can never regulate them properly, though it has often pretended to do so.

上个世纪时，联合王国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谷物价格都比这个世纪要高。现在，这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果要证明这一点，苏格兰的证据可能比英格兰更为明确一些。因为在苏格兰，谷物的价格可以通过公共档案来证明。苏格兰每年按照市场的实际情况，通过宣誓，对各县谷物的价格加以评估。如果这种直接证据还需要间接证据作为旁证的话，那么我说，法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关于法国的情况，我们有最明确的证据。但是，在联合王国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上世纪谷物的价格比本世纪略高，这一点虽然毋庸置疑，但两地上世纪劳动的价格，却比本世纪低得多，这一点同样毋庸置疑。因此，贫困的劳动者，如果能在上个世纪养家糊口，那么在本世纪，他的生活一定会舒适得多。在上个世纪，在苏格兰大多数地方，普通劳动的最普通日工资，夏天为6便士，冬天为5便士。在苏格兰高地及西部各岛的一些地方，工资还是一星期3先令或大约3先令。现在，在苏格兰低地大部分地区，普通劳动的最普通工资，一天为8便士。在爱丁堡附近地区，在邻近英格兰因而可能受英

格兰影响的苏格兰各郡，在劳动需求最近已大大增加的格拉斯哥、卡伦和艾尔郡等地区附近，普通劳动的最普通工资一天为10便士，有时是1先令。英格兰比苏格兰更早对农业、商业和制造业进行了改进。对劳动的需求以及劳动的价格，必然随着这些改良而增加。因此，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英格兰的劳动工资高于苏格兰。而且自那时起，英格兰的劳动工资已大大增加，但由于在英格兰不同的地区，工资的差别比较大，所以，要确定英格兰工资究竟增长了多少，比苏格兰要困难。1614年，一个步兵一天的饷银和现在一样，同为8便士。当初规定这个数目时，一定是以普通劳动者普通工资为标准的，因为步兵大都来自这个阶层。查理二世时代，据高等法院院长黑尔斯推算，六口之家（父亲母亲，略能做些劳动的子女二人，完全不会劳动的子女二人）的花费，一星期为10先令，即一年需要26镑。他认为，如果他们不能靠劳动赚得这个数额，那么他们就得靠乞讨或盗窃来获得。黑尔斯似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仔细的研究。格雷戈里·金在政治算数方面的技能，是戴夫南特博士极为赞赏的。前者曾在1688年推算，劳动者及不住宿佣工的普通收入，以一个家庭平均由三个半人组成来算，为每个家庭每年15镑。虽然从表面上看，金的计算，似乎与黑尔斯的计算有些出入，但实际上，二者的结果却大体相同。他们都认为，这种家庭一星期的花费为每人约20便士。从那时起，在联合王国的大多数地方，这种家庭的货币收入与货币支出都已大大增加，不过有的地方增加得多些，有的地方增加得少些，而增加的数额并没有像最近公布的关于如今劳动工资增高的报告所说的那么夸张。必须指出的是，在任何地方，都很难精确地确定劳动的价格。这是因为，即使是同一地方的同一种劳动，由于劳动者的能力不同、雇主的慷慨程度不同，支付的价格也常常不同。在工资没有被法律明确规定的地方，我们能够确定的，只是劳动最普通的工资。而且，经验似乎表明，法律尽管常常试图对工资进行规定，但实际上，却从未对工资作出适当的规定。

The real recompence of labour, the real quantity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which it can procure to the

labourer, ha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increased perhaps in a still greater proportion than its money price. Not only grain has become somewhat cheaper, but many other things, from which the industrious poor derive an agreeable and wholesome variety of food, have become a great deal cheaper. Potatoes, for example, do not at present,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kingdom, cost half the price which they used to do thirty or forty years ago. The same thing may be said of turnips, carrots, cabbages; things which were formerly never raised but by the spade, but which are now commonly raised by the plough. All sort of garden stuff, too, has become cheape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apples and even of the onions, consumed in Great Britain was in the last century imported from Flanders. The great improvements in the coarser manufactures of both linen and woollen cloth furnish the labourers with cheaper and better clothing; and those in the manufactures of the coarser metals, with cheaper and better instruments of trade, as well as with many agreeable and convenient pieces of household furniture. Soap, salt, candles, leather, and fermented liquors, have, indeed, become a good deal dearer; chiefly from the taxes which have been laid upon them. The quantity of these, however, which the labouring poor areunder any necessity of consuming, is so very small,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ir price does not compensate the diminution in that of so many other things. The common complaint that luxury extends itself even to the lowest ranks of the people, and that the labouring poor will not now be contented with the same food, clothing, and lodging which satisfied them in former times, may convince us that it is not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only, but its real recompence, which has augmented.

在本世纪，劳动的真实报酬，即劳动使劳动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

和便利品的真实数量得以增加，而且其增加的比例可能大于劳动货币价格的增加。不仅谷物的价格比从前稍微便宜些，而且对于贫困的劳动者来说很多可口又健康的食物的价格，都大大降低了。例如现在，在联合王国的大部分地区，马铃薯的价格连三四十年前的一半都不到。从前用锄头小面积种植、如今用犁大面积种植的红萝卜、胡萝卜和卷心菜等食物，也和马铃薯一样便宜。各种蔬果也都更加便宜。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英格兰消费的大部分苹果和洋葱，都是从弗兰德进口的。亚麻和呢绒粗工业得到极大的改良，劳动者因此能够买到质量更好、价格更低廉的衣服。贱金属制造业得到极大的改良，劳动者不仅能够买到价格更低、质量更好的劳动用具，而且能够买到很多方便实用的家具用品。诚然，肥皂、食盐、蜡烛、皮革以及发酵酒的价格大大提高，这主要由对他们征税导致，但是，贫困的劳动者对这些商品的消费数量极其有限。尽管这一小部分商品价格变得昂贵，却能因其他多数商品价格下降而得到抵消。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这样抱怨，奢侈之风甚至已经波及下等阶层的人民了，连贫困的劳动者现在对以前的衣食住条件也不感到满足了。这使我们确信，不仅劳动的货币价格增加了，劳动的真实价格也增大了。

Is this improvement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lower ranks of the people to be regarded as an advantage or as an inconveniency to the society? The answer seems at first sight abundantly plain. Servants, labourers, and workmen of different kinds, make up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every great political society. But what improves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greater part can never be regarded as an inconveniency to the whole. No society can surely be flourishing and happy, of which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members are poor and miserable. It is but equity, besides, that they who feed, clothe and lodge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should have such a share of the produce of their own labour as to be themselves tolerably well fed, clothed and lodged.

下层阶层生活状况的改善，到底对社会有利还是不利呢？乍一看，答案似乎极为明了。在所有大的政治社会中，各种佣人、劳动者和工人都是最大的部分。社会最大部分的成员生活状况的改善，绝不能看作对社会全体成员不利。当一个社会中有大部分成员陷入贫困悲惨状态时，这个社会绝不可能真正繁荣和幸福。此外，只有那些为整个社会提供衣食住的人，能够从自己的劳动所得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获得较好的衣食住条件，才算得上公平。

Poverty, though it no doubt discourages, does not always prevent, marriage. It seems even to be favourable to generation. A half-starved Highland woman frequently bears more than twenty children, while a pampered fine lady is often incapable of bearing any, and is generally exhausted by two or three. Barrenness, so frequent among women of fashion, is very rare among those of inferior station. Luxury in the fair sex, while it inflames perhaps the passion for enjoyment, seems always to weaken, and frequently to destroy altogether, the powers of generation.

贫困无疑会使人们不想结婚，但未必总能阻止人们不结婚。贫困甚至还有利于人们繁衍后代。在苏格兰高地地区，一个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常常能生二十名以上的子女，而娇生惯养的上等社会妇女，却常常不能生育，或者说顶多生两三个子女。不孕症，虽然在上层社会的妇女间较为常见，但在下层社会的妇女间却很少见。女性的奢侈生活，虽然会刺激享乐的欲望，似乎往往也会削弱，甚至常常彻底破坏生育能力。

But poverty, though it does not prevent the generation, is extremely unfavourable to the rearing of children. The tender plant is produced, but in so cold a soil, and so severe a climate, soon

withers and dies. It is not uncommon, I have been frequently told, in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for a mother who has borne twenty children not to have two alive. Several officers of great experience have assured me, that so far from recruiting their regiment, they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supply it with drums and fifes from all the soldiers' children that were born in it. A greater number of fine children, however, is seldom seen anywhere than about a barrack of soldiers. Very few of them, it seems, arrive at the age of thirteen or fourteen. In some places one half the children born die before they are four years of age; in many places before they are seven; and in almost all places before they are nine or ten. This great mortality, however, will everywhere be found chiefly among the children of the common people, who cannot afford to tend them with the same care as those of better station. Though their marriages are generally more fruitful than those of people of fashion, a smaller proportion of their children arrive at maturity. In foundling hospitals, and among the children brought up by parish charities, the mortality is still greater than among those of the common people.

贫困虽然不能阻止人们生育，但对抚养子女却是极为不利的。幼嫩的树苗生长出来了，但在寒冷的土壤和严酷的气候中，不久就会枯萎、死亡。我常常听人说，在苏格兰高地，某位母亲生了20个孩子而活下来的还不到2个。几个富有经验的军官曾经告诉我说，士兵在部队内生的全部儿童，远远不够补充本部队的士兵人数，甚至无法为他们的部队提供足够的吹鼓手。但是，在军营附近却能看到很多可爱的孩子，数量比其他地方多。这些孩子很少能长到十三四岁。在有些地方，出生的孩子有一半不满4岁就死去了。在许多地方，出生的孩子有一半不满7岁就死去了。在几乎所有地方，出生的孩子有一半不满9岁或10岁就死去了。然而，无论在何地，如此高的死亡率都只发生在普通家庭。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像家庭条件好的上等家庭那样照料孩子。一般地说，虽然下等家庭结婚后生的孩子比上等家庭的多，但他

们的后代却很少能活到成年。与普通人家的孩子相比，育婴堂及教区慈善会收养的孩子，死亡率更高。

Every species of animals naturally multiplies in proportion to the means of their subsistence, and no species can ever multiply beyond it. But in civilised society it is only among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that the scantiness of subsistence can set limits to the further multiplication of the human species; and it can do so in no other way than by destroying a great part of the children which their fruitful marriages produce.

每一种动物都自然而然地根据其生活资料按比例进行繁殖。没有一种动物超过这个比例进行繁殖。然而，在文明社会，只有在下等人中间，才会出现因生活资料不够而限制人类进一步繁殖的现象。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除了杀死他们婚姻中所生的大部分子女外，别无他法。

The liberal reward of labour, by enabling them to provide better for their children, and consequently to bring up a greater number, naturally tends to widen and extend those limits. It deserves to be remarked, too, that it necessarily does this as nearly as possible in the proportion which the demand for labour requires. If this demand is continually increasing, the reward of labour must necessarily encourage in such a manner the marriage and multiplication of labourers, as may enable them to supply that continually increasing demand by a continually increasing population. If the reward should at any time be less than what was requisite for this purpose, the deficiency of hands would soon raise it; and if it should at any time be more, their excessive

multiplication would soon lower it to this necessary rate. The market would be so much under-stocked with labour in the one case, and so much over-tocked in the other, as would soon force back its price to that proper rate which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society required. It is in this manner that the demand for men, like that for any other commodity, necessarily regulates the production of men; quickens it when it goes on too slowly, and stops it when it advances too fast. It is this demand which regulates and determines the state of propagation in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in North America, in Europe, and in China; which renders it rapidly progressive in the first, slow and gradual in the second, and altogether stationary in the last.

丰厚的劳动报酬能够使劳动者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从而使他们养活更多的孩子，这样一定会放宽上述生育限制。应该指出的是，上述生育限制放宽的程度，也一定尽可能和对劳动需求的程度保持相同的比例。如果这种劳动需求继续增加，劳动报酬必然会鼓励劳动者结婚和生育，劳动者将使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从而满足不断增加的劳动需求。如果在某一时期，劳动报酬不够鼓励人们生育，那么人手短缺不久就会抬高劳动报酬。如果在某一时期，劳动报酬过分鼓励人们生育，那么人口的过度繁殖不久就使劳动的报酬下降到相应的水平。在前一种情况下，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出现不足，在后一种情况下，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又如此过剩，这两种情况都迫使劳动价格不久又回到社会所需要的适当水平上。因此，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对人口的需求就像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必然支配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太慢时加以促进，人口增长太快时加以抑制。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在北美、欧洲，还是在中国，正是这种需求支配和决定人口增长的状态。在北美，这种需求是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在欧洲，这种需求是人口缓慢而逐渐增加的原因，在中国，这种需求是人口不增不减的原因。

The wear and tear of a slave, it has been said, is at the expence of his master; but that of a free servant is at his own expence. The wear and tear of the latter, however, is, in reality, as much at the expence of his master as that of the former. The wages paid to journeymen and servants of every kind must be such as may enable them, one with another, to continue the race of journeymen and servants, according as the increasing, diminishing, or stationary demand of the society may happen to require. But though the wear and tear of a free servant be equally at the expence of his master, it generally costs him much less than that of a slave. The fund destined for replacing or repairing, if I may say so, the wear and tear of the slave, is commonly managed by a negligent master or careless overseer. That destined for performing the same office with regard to the free man, is managed by the free man himself. The disorders which generally prevail in the economy of the rich, naturally introduce themselves in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former: the strict frugality and parsimonious attention of the poor as naturally establish themselves in that of the latter. Under such different management, the same purpose must require very different degrees of expence to execute it. It appears, accordingly,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ll ages and nations, I believe, that the work done by freemen comes cheaper in the end than that performed by slaves. It is found to do so even at Boston, NewYork, and Philadelphia, where the wages of common labour are so very high.

据说，一个奴隶的损耗，是由其雇主来承担的，而一个自由佣工的损耗，则是由佣工自己来承担。但事实是，自由佣工的损耗，与奴隶的损耗一样，都是由雇主来承担的。支付给各种工匠和佣工的工资，都必须使他们能够按照社会对他们需求的增加、减少或不增不减等情况，维持他们的人数。不过，自由佣工的损耗，虽然同样由雇主来承担，但与奴隶的损耗比较，雇主所受的损失更少。预定用于补充

或修补奴隶损耗的资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通常都是由漠不关心的雇主或疏忽大意的监工管理。但预定用于修补自由佣工损耗的资金，却由自由佣工自己管理。富人家杂乱无章的理财通常也会在前一种情况中有所体现，而穷人家的节俭朴素和精打细算也会在后一种情况中得到贯彻。在这样不同的管理模式下，尽管出于相同的目的，所需的费用却常常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从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经验来看，我相信，自由人所完成的工作最终比奴隶完成后的工作更加低廉。即使是在普通劳动工资很高的波士顿、纽约和费城，情况也是如此。

The liberal reward of labour, therefore, as it is the effect of increasing wealth, so it is the cause of increasing population. To complain of it, is to lament over the necessaryeffectand cause of the greatest public prosperity.

所以，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丰厚的劳动报酬发出怨言，就是对最大公共繁荣的必然因果关系发出悲叹。

It deserves to be remarked, perhaps, that it is in the progressive state, while the society is advancing to the further acquisition, rather than when it has acquired its full complement of riches, that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or,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seems to be the happiest and the most comfortable. It is hard in the stationary, and miserable in the declining state. The progressive state is in reality the cheerful and the hearty state to all the different orders of the society. The stationary is dull; the declining melancholy.

也许应该指出的是，贫困的劳动者，即社会大多数人，生活得最幸福、最安乐的时候，不是在社会达到极度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当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时，贫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非常艰难；当社会处于退步状态时，贫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非常悲惨。事实上，进步的社会状态对社会各阶层来说是快乐旺盛的状态，停滞的社会状态对社会各阶层来说是呆滞乏味的状态，而退步的社会状态对社会各阶层来说则是悲惨的状态。

The liberal reward of labour, as it encourages the propagation, so it increases the industry of the common people. The wages of labour are the encouragement of industry, which, like every other human quality, improves in proportion to the encouragement it receives. A plentiful subsistence increases the bodily strength of the labourer, and the comfortable hope of bettering his condition, and of ending his days perhaps in ease and plenty, animates him to exert that strength to the utmost. Where wages are high, accordingly, we shall always find the workmen more active, diligent, and expeditious, than where they are low; in England, for example, than in Scotland;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great towns, than in remote country places. Some workmen, indeed, when they can earn in four days what will maintain them through the week, will be idle the other three. This, however, is by no means the case with the greater part. Workmen, on the contrary, when they are liberally paid by the piece, are very apt to over-work themselves, and to ruin their health and constitution in a few years. A carpenter in London, and in some other places, is not supposed to last in his utmost vigour above eight years. Something of the same kind happens in many other trades, in which the workmen are paid by the piece; as they generally are in manufactures, and even in country labour, wherever wages are higher than ordinary. Almost every class of artificers is subject to some peculiar infirmity

occasioned by excessive application to their peculiar species of work. Ramuzzini, an eminent Italian physician, has written a particular book concerning such diseases. We do not reckon our soldiers the most industrious set of people among us. Yet when soldiers have been employed in some particular sorts of work, and liberally paid by the piece, their officers have frequently been obliged to stipulate with the undertaker,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earn above a certain sum every day, according to the rate at which they were paid. Till this stipulation was made, mutual emulation and the desire of greater gain, frequently prompted them to over-work themselves, and to hurt their health by excessive labour. Excessive application during four days of the week, is frequently the real cause of the idleness of the other three, so much and so loudly complained of. Great labour, either of mind or body, continued for several days together, is in most men naturally followed by a great desire of relaxation, which, if not restrained by force or by some strong necessity, is almost irresistible. It is the call of nature, which requires to be relieved by some indulgence, sometimes of ease only, but sometimes, too, of dissipation and diversion. If it is not complied with, the consequences are often dangerous, and sometimes fatal, and such as almost always, sooner or later, bring on the peculiar infirmity of the trade. If masters would always listen to the dictates of reason and humanity, they have frequently occasion rather to moderate, than to animate the application of many of their workmen. It will be found, I believe, in every sort of trade, that the man who works so moderately, as to be able to work constantly, not only preserves his health the longest, but, in the course of the year, executes the greatest quantity of work.

丰厚的劳动报酬，鼓励普通人民繁衍后代，也鼓励他们勤奋工

作。劳动工资是对劳动者勤奋工作的奖励。勤奋就像人类其他品质一样，越受奖励就越勤奋。丰富的生活资料，能够增强劳动者的体力，给予劳动者改善生活状况、一辈子丰衣足食的希望，这样就能促使他们尽最大努力好好工作。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工资高的地方的劳动者，总是比工资低的地方的劳动者更加活泼、勤奋和敏捷。例如，英格兰的劳动者就比苏格兰的劳动者强，大城市附近的劳动者就比偏远农村的劳动者强。诚然，如果有些工人能在四天的时间内就挣够足以维持一星期的生活资料，那么剩余的时间可能就无所事事，不再工作了。但对大多数工人来说，情况却不是这样。当工资按计件计算时，许多工人会劳动过度，往往没几年就把身体搞垮了。据说，在伦敦及其他一些地方，精力旺盛的木匠的工作时间不超过8年。在工资按件计算的许多其他行业，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在制造业，甚至在工资比一般工资高的农业劳动中，情况也是如此。几乎所有工匠，都在从事各自的工作中，因操劳过度而患上某种职业病。意大利著名医生拉马齐尼，曾专门著书介绍这类疾病。我们往往觉得，士兵并不是最勤劳的人，但在士兵们因从事某种特殊工作而按件获得工资时，他们的军官就常常不得不和这些士兵们约定，他们每天所得的报酬按他们的报酬率，不得超过一定数额。在作出这一约定之前，士兵们常常相互竞争，渴望得到更高的报酬，因而操劳过度，损害身体健康。人们常常高声抱怨，他们之所以在一周的最后三天无所事事，不愿工作，是因为在一周的前四天过度操劳。大多数人在一连数天进行紧张的脑力或体力劳动之后，自然会强烈地渴望休息。这种欲望，除非人们受到强迫或有某种强烈的需要，否则几乎是压制不住的。人类的天性要求，在经过紧张的劳动之后，必须要恣意放纵，以放松身心，有时只是悠闲自在一会，有时却要娱乐和消遣。如果这个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后果常常是很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早晚会让人们患上职业病。如果雇主总是愿意听从理性及人道主义的指挥，就不应该总是鼓励劳动者努力工作，应当鼓励他们适度地工作。我相信，人们会发现，不管在哪个行业，一个适度工作的人，总是能够继续不断地工作，这样他不仅能在最长的时间内保持身体健康，而且在一年中完成的工作量也最大。

In cheap years, it is pretended, workmen are generally more idle, and in dear ones more industrious than ordinary. A plentiful subsistence, therefore, it has been concluded, relaxes, and a scanty one quickens their industry. That a little more plenty than ordinary may render some workmen idle, cannot well be doubted; but that it should have this effect upon the greater part, or that men in general should work better when they are ill fed than when they are well fed, when they are disheartened than when they are in good spirits, when they are frequently sick than when they are generally in good health, seems not very probable. Years of dearth, it is to be observed, are generally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years of sickness and mortality, which cannot fail to diminish the produce of their industry.

有人说，在物价低廉的年份，劳动者常常比平常懒惰，在物价高昂的年份，劳动者常常比平常勤奋。他们由此得到结论：当生活资料丰富时，劳动者工作起来会比较散漫；当生活资料不足时，劳动者工作起来会比较勤奋。生活资料比平常略微丰富，可能会使一部分工人偷懒，这种说法是毋庸置疑的，但对大多数工人却不适用。或者说，人们在营养不良时，比营养充足时工作更好，在情绪消沉时，比兴致勃勃时工作更好，在生病时，比身体健康时工作更好，这种说法似乎是不太可靠的。应该指出的是，通常在闹饥荒的年份，普通人常常患病或死亡，而疾病和死亡，一定会减少他们的劳动产量。

In years of plenty, servants frequently leave their masters, and trust their subsistence to what they can make by their own industry. But the same cheapness of provisions, by increasing the fund which is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servants, encourages masters, farmers especially, to employ a greater number. Farmers upon such occasions expect more profit from their corn by maintaining a few

more labouring servants, than by selling it at a low price in the market. The demand for servants increases, while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offer to supply that demand diminishes. The price of labour, therefore, frequently rises in cheap years.

在物质丰富的年份，佣工们常常离开雇主，靠自己的勤奋工作谋生。但食物价格的低廉，使得雇主们预定用于支付佣工生活费的资金也相应增多，这鼓励雇主，尤其是农场主，雇佣更多的佣工。因为在这段时间，农场主希望多雇佣几个佣工能让他从谷物中获得更高的利润，而不是把谷物拿到市场上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对佣工的需求增加，而满足这需求的人数却减少。因此在物价低廉的年份，劳动价格往往上升。

In years of scarcity, the difficulty and uncertainty of subsistence make all such people eager to return to service. But the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by diminishing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servants, disposes masters rather to diminish than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hose they have. In dear years, too, poor independent workmen frequently consume the little stocks with which they had used to supply themselves with the materials of their work, and are obliged to become journeymen for subsistence. More people want employment than can easily get it; many are willing to take it upon lower terms than ordinary, and the wages of both servants and journeymen frequently sink in dear years.

在物质匮乏的年份，人们取得生活资料非常困难，且常常无法得到保障，此时佣工们迫切希望回到雇主那里去干活。但食品价格昂贵，雇主们预定用于支付佣工生活费的资金相应减少，因此雇主们更愿意减少而不是增加现有的佣工数量。况且，在物价高昂的年份，贫

穷的独立劳动者也不得不把以前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少量资本全部拿出来消费，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变为工匠。更多的人想要找到工作，但工作岗位少，许多人于是为了获得工作，愿意接受比平常低的工作条件。所以在物价昂贵的年份，佣工和工匠的工资往往下降。

Masters of all sorts, therefore, frequently make better bargains with their servants in dear than in cheap years, and find them more humble and dependent in the former than in the latter. They naturally, therefore, commend the former as more favourable to industry. Landlords and farmers, besides, two of the largest classes of masters, have another reason for being pleased with dear years. The rents of the one and the profits of the other depend very much upon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Nothing can be more absurd, however, than to imagine that men in general should work less when they work for themselves, than when they work for other people. A poor independent workman will generally be more industrious than even a journeyman who works by the piece. The one enjoys the whole produce of his own industry; the other shares it with his master. The one, in his separate independent state, is less liable to the temptations of bad company, which in large manufactories so frequently ruin the morals of the other. The superiority of the independent workman over those servants who are hired by the month or by the year, and whose wages and maintenance are the same whether they do much or do little, is likely to be still greater. Cheap years tend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workmen to journeymen and servants of all kinds, and dear years to diminish it.

因此，各类雇主，在物价高昂的年份，往往比在物价低廉的年份，更能从佣工身上获得好处。而且雇主们觉得，劳动者在物价高昂

的年份，比在物价低廉的年份更加听话和服从。所以雇主们自然认为，物价高昂的年份对他们的产业更有利。此外，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这两个最大的雇主人群，之所以喜欢物价高昂的年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和农场主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粮食的价格。但是，要说普通人在为自己工作时，工作较少，而在为他人工作时，工作较多，这种说法再荒谬不过了。贫穷的独立劳动者工作起来，一般都比按件计算工资的工匠更加勤奋，因为独立的劳动者能够独享自己劳动的全部所得，而工匠则必须与雇主分享自己的劳动所得。独立的劳动者，由于与他人分离，因此不会受到不良同伴的引诱，而在大的制造厂，这些不良同伴常常使人道德沦丧。工资以年或月计的雇工，不论做多做少，都得到同样的工资和津贴，因此独立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比这些工匠要高得多。在物价高昂的年份，独立劳动者对各种帮工和佣工的比例常常增加，而在物价低廉的年份，这一比例则常常降低。

A French author of great knowledge and ingenuity, Mr. Messance, receiver of the tailles in the election of St. Etienne, endeavours to show that the poor do more work in cheap than in dear years, by comparing the quantity and value of the goods made upon those different occasions in three different manufactures; one of coarse woollens carried on at Elbeuf; one of linen, and another of silk, both which extend through the whole generality of Rouen. It appears from his account, which is copied from the registers of the public offices, that the quantity and value of the goods made in all those three manufactureshas generally been greater in cheap than in dear years; and that it has always been greatest in the cheapest, and least in the dearest years. All the three seem to be stationary manufactures, or which, though their produce may vary somewhat from year to year, are upon the whole neither going backwards nor forwards.

麦桑斯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法国作家，在圣·埃蒂安选举时任税收官。他曾经将埃尔伯夫地区的粗毛制造业与鲁昂地区的麻纺织业和丝织业产品这三种制造业产品，在物价低与物价高时的产量及价值拿来比较，以便说明穷人在物价低廉时比物价高昂时能做更多的工作。根据他从官署登记簿抄下来的报告，这三种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和价值，在物价低时一般都比物价高时大。在物价最低的年份，产品的产量与价值往往最大，而在物价最高的年份，产品的产量与价值往往最小。这三种制造业似乎都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说，这三种制造业每年的产品虽有不同，但总体而言，三者既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

The manufacture of linen in Scotland, and that of coarse woollens in the West Riding of Yorkshire, are growing manufactures, of which the produce is generally, though with some variations, increasing both in quantity and value. Upon examining, however, the accounts which have been published of their annual produce,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observe that its variations have had any sensible connection with the dearness or cheapness of the seasons. In 1740, a year of great scarcity, both manufactures, indeed, appear to have declined very considerably. But in 1756, another year of great scarcity, the Scotch manufacture made more than ordinary advances. The Yorkshire manufacture, indeed, declined, and its produce did not rise to what it had been in 1755 till 1766, after the repeal of the American Stamp Act. In that and the following year it greatly exceeded what it had ever been before, and it has continued to advance ever since.

苏格兰的麻纺织业，和约克郡西区的粗毛纺织业，是两个正在发展中的纺织制造业。虽然每年的产品略有变化，但产品的产量和价值大体上都在增高。不过，我曾经对这两个制造业曾经公布的年产额记录做过研究，结果发现年产额的变动并没有与各时期的物价高低有明

显的关系。确实，在物质严重不足的1740年，这两个制造业的产量都有很大的下降，但同样是在物质严重不足的1756年，苏格兰的麻纺织业却比往年有了更大的发展。同年，约克郡的粗毛纺织业产量却下降了，其产量，直到1766年美洲印花税法废除以后，才恢复到1755年的水平。在1766年和1767年，约克郡粗毛纺织业的产量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而且从那时起产量不断增加。

The produce of all great manufactures for distant sale must necessarily depend, not so much upon the dearness or cheapness of the seasons in the countries where they are carried on, as upo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affect the demand in the countries where they are consumed; upon peace or war, upon the prosperity or declension of other rival manufactures, and upon the good or bad humour of their principal customers. A great part of the extraordinary work, besides, which is probably done in cheap years, never enters the public registers of manufactures. The menservants who leave their masters become independent labourers. The women return to their parents, and commonly spin in order to make clothes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Even the independent workmen do not always work for public sale, but are employed by some of their neighbours in manufactures for family use. The produce of their labour, therefore, frequently makes no figure in those public registers of which the records are sometimes published with so much parade, and from which our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would often vainly pretend to announce the prosperity or declension of the greatest empires.

所有向远方销售产品的大制造业的产量，与其说取决于产地各年物价的高低，不如说取决于影响消费国产品需求的诸多情况，取决于和平或战争，取决于其他竞争制造业的繁荣或是衰落，取决于产品的

主流顾客消费心情的好坏。此外，在物价低廉时期生产的大量产品，也许有很大一部分并未登记在制造业的公开记录上。男佣工在离开他们的雇主后，成为独立劳动者。女佣工则回到父母身边，通常是纺纱，给自己和家人做衣服。就连独立劳动者也未必都自己劳动并将产品出售给大众，他们被一些邻居请去制造家庭用品。所以，他们的劳动产品，常常没有登记在公开记录上。这些记录，有时过于夸大，而我们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却常常根据这种记录，宣称大帝国是如何兴盛或衰落。

Though the variations in the price of labour not only do not always correspond with those in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but are frequently quite opposite, we must not, upon this account, imagine that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has no influence upon that of labour.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is necessarily regulated by two circumstances; the demand for labour, and the price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The demand for labour, according as it happens to be increasing, stationary, or declining, or to require an increasing, stationary, or declining population, determines the quantity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which must be given to the labourer; and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is determined by what is requisite for purchasing this quantity. Though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therefore, is sometimes high where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is low, it would be still higher, the demand continuing the same, if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was high.

虽然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一定总是和食物价格的变动一致，而且常常和食物价格的变动完全相反，但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食物价格对于劳动价格没有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一定受到两种情况的支配：首先，受到劳动需求的支配；其次，受到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价格的支配。对劳动的需求，在增加、不变或减少时，换句话说，在人

口增加、减少或者不变时，决定必须给予劳动者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则取决于购买这数量所需要的金额。所以，虽然在食物价格低廉的地方，劳动的货币价格有时很高，但在食物价格昂贵而劳动需求保持不变的地方，劳动的货币价格却更高。

It is because the demand for labour increases in years of sudden and extraordinary plenty, and diminishes in those of sudden and extraordinary scarcity, that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sometimes rises in the one, and sinks in the other.

在物质突然极为丰富的年份里，对劳动的需求往往增长，在物质突然极为匮乏的年份里，对劳动的需求往往下降，因此劳动的货币价格时而上升，时而下降。

In a year of sudden and extraordinary plenty, there are funds in the hands of many of the employers of industry, sufficient to maintain and employ a greater number of industrious people than had been employed the year before; and this extraordinary number cannot always be had. Those masters, therefore, who want more workmen, bid against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get them, which sometimes raises both the real and the money price of their labour.

在物质突然极为丰富的年份里，许多雇主手中持有大量的资金，足够维持和雇佣更多勤劳的劳动者（多于他们前一年雇佣的劳动者数量），但雇主们未必能雇佣到这么多的劳动者，于是，想要雇佣更多劳动者的雇主间就会相互竞争。这样，有的时候劳动的货币价格和真实价格就被抬高起来。

The contrary of this happens in a year of sudden and extraordinary scarcity. The funds destined for employing industry are less than they had been the year befor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eople are thrown out of employment, who bid against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get it, which sometimes lowers both the real and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In 1740, a year of extraordinary scarcity, many people were willing to work for bare subsistence. In the succeeding years of plenty, it was more difficult to get labourers and servants.

在物质突然极度匮乏的年份里，情况正好相反。雇主手中预定用于雇佣劳动者的资金比前一年要少，于是很多人便会失业，他们为了获得工作相互竞争，这样，有的时候劳动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就会下降。1740年时，物质极度匮乏，许多人只要能勉强糊口就愿工作。在此后的几年，物质又变得极为丰富，雇主们雇佣劳动者和佣工就比较困难了。

The scarcity of a dear year, by diminishing the demand for labour, tends to lower its price, as the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tends to raise it. The plenty of a cheap year, on the contrary, by increasing the demand, tends to raise the price of labour, as the cheapness of provisions tends to lower it. In the ordinary variations of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those two opposite causes seem to counterbalance one another, which is probably in part the reason why the wages of labour are everywhere so much more steady and permanent than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食物的高价往往会提高劳动的价格，但在物质匮乏、物价昂贵的年份，由于劳动需求减少了，因而会降低劳动的价格。相反，食物的

高价会降低劳动的价格，但在物质丰富、物价低廉的年份，由于劳动需求增加，会抬高劳动价格。在食物价格只有一般的变动时，这两种对立原因似乎会互相抵消。这也许是无论在何地，劳动工资都比食物价格更加稳定、更加持久的一部分原因。

The increase in the wages of labour necessari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many commodities, by increasing that part of it which resolves itself into wages, and so far tends to diminish their consump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ame cause, however, which raises the wages of labour, the increase of stock, tends to increase its productive powers, and to make a smaller quantity of labour produce a greater quantity of work. The owner of the stock which employs a great number of labourers, necessarily endeavours, for his own advantage, to make such a proper divi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that they may be enabled to produce the greatest quantity of work possible. For the same reason, he endeavours to supply them with the best machinery which either he or they can think of. What takes place among the labourers in a particular workhouse, takes place, for the same reason, among those of a great society. The greater their number, the more they naturally divide themselves into different classes and subdivisions of employment. More heads are occupied in inventing the most proper machinery for executing the work of each, and it is, therefore, more likely to be invented. There are many commodities, therefore, which, in consequence of these improvements, come to be produced by so much less labour than before, that the increase of its price is more than compensated by the diminution of its quantity.

劳动工资增加之后，由于价格中工资这一组成部分增高了，因此

必然会抬高许多商品的价格，从而减少国内外对这些商品的消费。但是，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劳动的工资，也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较少量的劳动能够生产较大量的产品。雇佣大量劳动者的资本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一定会竭尽全力恰当分配他们的业务，使他们能够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同样出于这个目的，他力图向工人提供他和工人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机器。而且由于这个目的，在某一个工厂内劳动者间发生的事情，也在整个社会的劳动者间发生。劳动者的人数越多，他们的分工当然就越精密，他们越可能划分为不同的职业和工种。就拿发明最适合各种工作使用的各种机器这件事来说，因为有更多的人参与了进来，因此这种机器更容易发明出来。这些改良的机器使得生产许多商品所需的劳动要比以前少得多。这样，劳动价格的提高就会因劳动数量的减少而抵消掉一部分。

Chapter IX. Of the Profits of Stock

第九章、论资本利润

The rise and fall in the profits of stock depend upon the same causes with the rise and fall in the wages of labour, the increasing or declining state of the wealth of the society; but those causes affect the one and the other very differently.

资本利润的增加或减少的决定因素，与劳动工资的增加或减少的决定因素相同，即社会财富的增加或减少，但社会财富状态对两者的影响却大不相同。

The increase of stock, which raises wages, tends to lower profit. When the stocks of many rich merchants are turned into the same trade, their mutual competition naturally tends to lower its profit;

and when there is a like increase of stock in all the different trades carried on in the same society, the same competition must produce the same effect in them all.

资本的增加，一方面提高了工资，一方面又降低了利润。当许多富商都将资本投入到同一个行业中时，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自然会降低资本的利润。在同一个社会，如果各个行业的资本都增加了，那么相同的竞争一定会对所有行业产生相同的结果。

It is not easy,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to ascertain what are the average wages of labour even in a particular place, and at a particular time. We can, even in this case, seldom determine more than what are the most usual wages. But even this can seldom be done with regard to the profits of stock. Profit is so very fluctuating, that the person who carries on a particular trade cannot always tell you himself what is the average of his annual profit. It is affected, not only by every variation of price in the commodities which he deals in, but by the good or bad fortune both of his rivals and of his customers, and by a thousand other accidents to which goods when carried either by sea or by land, or even when stored in a warehouse, are liable. It varies, therefore, not only from year to year, but from day to day, and almost from hour to hour. To ascertain what is the average profit of all the different trades carried on in a great kingdom, must be much more difficult; and to judge of what it may have been formerly, or in remote periods of time, with any degree of precision, must be altogether impossible.

前面已经讲过，即使要确定某一特定地点和时间的劳动的平均工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确定的，只能是

最普通的工资。但就资本利润来说，就连最普通的利润，我们也很难确定。利润变动非常频繁，即使是从事某个特定行业的人，也未必能够告诉你，他的年平均利润是多少。他的利润，不但要受他所出售的那些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而且竞争者和顾客财务状况好坏，以及商品在海上或陆地运输中甚至是在仓库储藏时可能遭遇的许许多多意外事故都对其有影响。所以，利润不仅年年变化，而且日日变化，甚至时时刻刻都在变化。要确定一个大国经营的所有不同行业的平均利润一定更加困难。要想相当准确地判断以前或距今很远的时间里的平均利润，则完全不可能实现。

But though it may be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with any degree of precision, what are or were the average profits of stock, either in the present or in ancient times, some notion may be formed of them from the interest of money. It may be laid down as a maxim, that wherever a great deal can be made by the use of money, a great deal will commonly be given for the use of it; and that wherever little can be made by it, less will commonly be given for it. According, therefore, as the usual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varies in any country, we may be assured that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must vary with it, must sink as it sinks, and rise as it rises. The progress of interest, therefore, may lead us to form some notion of the progress of profit.

不过，我们虽然不能相当准确地确定以前或古代的资本平均利润，但我们可以通过货币的利息略知一二。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凡是通过使用货币赚了很多钱的地方，使用货币时支付的利息通常较多；凡是使用货币赚钱较少的地方，使用货币时支付的利息通常也较少。因此我们可以确定，任何一个国家资本的一般利润，一定随着市场上一般利率的变动而变动。利率下降，利润一定随之下降；利率上升，利润一定随之上升。所以，通过观察利息的变动情况，我们可以

对利润的变动情况略知一二。

By the 37th of Henry VIII. all interest above ten per centwas declared unlawful. More, it seems, had sometimes been taken before that. In the reign of Edward VI. religious zeal prohibited all interest. This prohibition, however, like all others of the same kind, is said to have produced no effect, and probably rather increased than diminished the evil of usury. The statute of Henry VIII. was revived by the 13th of Elizabeth, cap. 8. and ten per cent continued to be the legal rate of interest till the 21st of James I. when it was restricted to eight per cent. It was reduced to six per centsoon after the Restoration, and by the 12th of Queen Anne, to five per cent. All these different statutory regulations seem to have been made with great propriety. They seem to have followed, and not to have gone before, the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or the rate at which people of good credit usually borrowed. Since the time of Queen Anne, five per sent seems to have been rather above than below the market rate. Before the late war, the government borrowed at three per cent; and people of good credit in the capital, and in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kingdom, at three and ahalf, four, and four and ahalf per cent.

亨利八世第三十七年颁布法令宣布，所有超过10%的利率都是不合法的。由此可见，在此之前，利率有时超过了10%。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宗教的狂热禁止各种形式的利息。但据说这一禁令，和所有其他性质相同的禁令一样，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而高利贷的危害，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于是，由于伊丽莎白女王第十三年的法令第八条的规定，亨利八世的法令又产生效力了。此后直到詹姆斯一世第二十一年，法定利率一直是10%，之后才被限定为8%。复辟后不久，利率又降低为6%。安妮女王第十二年，利率再次下降，减至

5%。所有这些法律的规定似乎都极其恰当。它们都是跟随市场利率的变化而变化，即它们都是在具有良好信用的人通常的借款利率变动之后作出的，并不是走在前头。自安妮女王时代以来，5%的利率，似乎高于而不是低于市场利率。在最近一次战争以前，政府曾按3%的利率借款，而在首都以及王国的其他许多地方，有良好信用的人则按3.5%、4%、4.5%的利率借款。

Since the time of Henry VIII, the wealth and revenue of the country have been continually advancing, and, in the course of their progress, their pace seems rather to have been gradually accelerated than retarded. They seem not only to have been going on, but to have been going on faster and faster. The wages of labour have been continually increasing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nd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trade and manufactures the profits of stock have been diminishing.

自亨利八世时代以来，我国的财富与收入似乎都在不断增加，而且这个过程中，增加的速度似乎在加快，而不是变慢。财富和收入不仅在增加，而且增加得越来越快。在同一时期，劳动工资也在不断增加，但对于大部分行业里的商业和制造业，资本利润却在不断减少。

It generally requires a greater stock to carry on any sort of trade in a great town than in a country village. The great stocks employed in every branch of trade, and the number of rich competitors, generally reduce the rate of profit in the former below what it is in the latter. But the wages of labour are generally higher in a great town than in a country village. In a thriving town the people who have great stocks to employ, frequently cannot get the number of workmen they want, and therefore bid against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get as many as they can, which raises the wages of labour, and lowers the profits of stock. In the remote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re is frequently not stock sufficient to employ all the people, who therefore bid against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get employment, which lowers the wages of labour and raises the profits of stock.

在大城市经营一种行业，往往比乡村需要更多的资本。在城市中经营一种行业，往往需要更加庞大的资本，拥有更多的竞争者，因此城市资本利润率一般低于农村资本利润率。但是，城市的劳动工资，一般都比农村高。在繁荣的大城市，拥有大量生产资本的人，常常不能雇佣到足够数量的劳动者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为了雇到尽可能多的劳动者，他们之间相互竞争，从而提高了劳动工资，降低了资本利润。但在偏远的乡村地区，资本常常不足，无法雇佣所有劳动者，所以人们为了获得工作会相互竞争，于是降低了劳动工资，提高了资本的利润。

In Scotland, though the legal rate of interest is the same as in England, the market rate is rather higher. People of the best credit there seldom borrow under five per cent. Even private bankers in Edinburgh give four per centupon their promissorynotes, of which payment, either in whole or in part may be demanded at pleasure. Private bankers in London give no interest for the money which is deposited with them. There are few trades which cannot be carried on with a smaller stock in Scotland than in England. The common rate of profit, therefore, must be somewhat greater. The wages of labour,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are lower in Scotland than in England. The country, too, is not only much poorer, but the steps by which it advances to a better condition, for it is evidently advancing, seem to be much slower and more tardy.

在苏格兰，虽然法定利率与英格兰相同，市场利率却比英格兰要高。在苏格兰，就算信用良好的人，也很少能以低于5%的利率借款。即使是爱丁堡的私立银行家开出的能够随时兑现全部或一部分的期票，也是4%的利息。伦敦的私人银行家对存款不支付任何利息。在苏格兰，不管经营什么行业，所需要的资本几乎都比英格兰少。所以苏格兰普通利润率比英格兰高些。前面已经说过，苏格兰的劳动工资比英格兰低一些。此外，苏格兰不仅比英格兰穷得多，它发展的速度也比英格兰慢得多，尽管它明显是在发展。

The legal rate of interest in France has not,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been always regulated by the market rate. In 1720 interest was reduced from the twentieth to the fiftieth penny, or from five to two per cent. In 1724 it was raised to the thirtieth penny, or to 3 1/3per cent. In 1725 it was again raised to the twentieth penny, or to five per cent. In 1766,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Mr. Laverdy, it was reduced to the twenty-fifth penny, or to four per cent. The Abbe Terray raised it afterwards to the old rate of five per cent. The supposed purpose of many of those violent reductions of interest was to prepare the way for reducing that of the public debts; a purpose which has sometimes been executed. France is perhaps in the present times not so rich a country as England; and though the legal rate of interest has in France frequently been lower than in England, the market rate has generally been higher; for there, as in other countries, they have several very safe and easy methods of evading the law. The profits of trade, I have been assured by British merchants who had traded in both countries, are higher in France than in England; and it is no doubt upon this account that many British subjects chuse rather to employ their capitals in a country where trade is in disgrace, than in one where it is highly respected. The wages of labour are lower

in France than in England. When you go from Scotland to England, the difference which you may remark between the dress and countenance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the one country and in the other, sufficiently indicates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condition. The contrast is still greater when you return from France. France, though no doubt a richer country than Scotland, seems not to be going forward so fast. It is a common and even a popular opinion in the country that it is going backwards; an opinion which, I apprehend, is illfounded even with regard to France, but which nobody can possibly entertain with regard to Scotland, who sees the country now, and who saw it twenty or thirty years ago.

在本世纪，法国法定利率并不总受到市场利率的支配。1720年，法定利率由1/20便士降到1/50便士，即由5%降到2%。1724年，法定利率提到1/30便士，即提到3.3%。1725年，法定利率再次提到1/20便士，即提到5%。1766年，拉弗迪执政，法定利率又减到1/25便士，即4%。此后，神父泰雷执政，法定利率又恢复到原来的5%。一般认为，这样多次大幅度降低法定利率的目的，是在为降低公债利率做准备，有时确实能够实现这个目的。也许现在的法国并没有英格兰那么富有。虽然法国的法定利率一般比英格兰低，但其市场利率却通常比英格兰高。这是和其他国家一样，法国人发现了规避法律的方法，既安全也容易操作。有一些在英法两国都做过生意的英格兰商人对我说，法国的商业利润比英格兰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英格兰人不想把资本投在重商的英格兰，却愿投在轻商的法国。法国的劳动工资比英格兰低。如果你从苏格兰到英格兰去，你可能会发现两地普通人民的服装和面色存在差异，这一点足以表明他们的生活状况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你从法国回到英格兰，这种差别就更加明显了。法国比苏格兰富裕，尽管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法国的发展速度似乎并不是很快。国内普遍认为法国在退步，但是我认为，这种看法，即便对于法国来说，也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二三十年前曾到苏格兰参观，而现在又到那边参观，他绝对不会认为苏格兰在退步。

The province of Holland, on the other h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its territory and the number of its people, is a richer country than England. The government there borrows at two per cent, and private people of good credit at three. The wages of labour are said to be higher in Holland than in England, and the Dutch, it is well known, trade upon lower profits than any people in Europe. The trade of Holland, it has been pretended by some people, is decaying, and it may perhaps be true that some particular branches of it are so. But these symptoms seem to indicate sufficiently that there is no general decay. When profit diminishes, merchants are very apt to complain that trade decays; though the diminution of profit is the natural effect of its prosperity, or of a greater stock being employed in it than before. During the late war the Dutch gained the whole carrying trade of France, of which they still retain a very large share. The great property which they possess both in the French and English funds, about forty millions, it is said, in the latter (in which I suspect, however,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exaggeration); the great sums which they lend to private people in countries where the rate of interest is higher than in their own, are circumstances which no doubt demonstrate the redundancy of their stock, or that it has increased beyond what they can employ with tolerable profit in the proper business of their own country: but they do not demonstrate that that business has decreased. As the capital of a private man, though acquired by a particular trade, may increase beyond what he can employ in it, and yet that trade continue to increase too; so may likewise the capital of a great nation.

另一方面，就领土面积与人口的比例说，荷兰比英格兰更加富有。荷兰政府按2%的利率借款，而信用良好的人按3%的利率借款。

据说，荷兰的劳动工资比英格兰高，而且众所周知，荷兰人从事商业赚取的利润，比欧洲任何国家的商人都要低。有些人说，现在荷兰的商业正在退步。或许某些部门的商业情况确实如此。但上面所说的征兆似乎足以表明，该国商业并没有在整体上处于退步状态。当利润减少时，商人们常常抱怨说商业退步了，但是利润减少，却恰恰是商业繁荣的自然结果，或是商业中所投资本比以前更多的自然结果。在最近的一次英法战争中，荷兰人乘机获得了法国全部的运输业务，而且直到现在，法国曾经很大一部分的运输业仍在荷兰手里。荷兰持有法国和英格兰的大部分国债，据说，光持有英格兰的国债，就达到了大约4,000万镑（但我认为这个数额被过分夸大了）。此外，荷兰人还在比本国利率高的国家向私人借贷巨额资金。这些情况无疑都表明他们的资本是过剩的，或者说，他们的资本已增加到一定程度，除了用于本国进行适当生产、产生适当的利润外，还有大量资本盈余，但这并不表示荷兰的商业正在退步。就像一个人的私人资本，虽然是在经营某个行业中获得，但可能增加到这个行业无法全部用完的程度，不过这一行业仍然继续发展。大国的资本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In our North American and West Indian colonies, not only the wages of labour, but the interest of money, and consequently the profits of stock, are higher than in England. In the different colonies; both the legal and the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run from six to eight per cent. High wages of labour and high profits of stock, however, are things, perhaps, which scarce ever go together, except in the peculiar circumstances of new colonies. A new colony must always for some time be more under-stocked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its territory, and more under-peopled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its stock,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countries. They have more land than they have stock to cultivate. What they have, therefore, is applied to the cultivation only of what is most fertile and most favourably situated, the land near the seashore, and along the banks of navigable rivers. Such land, too, is frequently

purchased at a price below the value even of its natural produce. Stock employed in the purchase and improvement of such lands must yield a very large profit, and consequently afford to pay a very large interest. Its rapid accumulation in so profitable an employment enables the planter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his hands faster than he can find them in a new settlement. Those whom he can find, therefore, are very liberally rewarded. As the colony increases, the profits of stock gradually diminish. When the most fertile and best situated lands have been all occupied, less profit can be made by the cultivation of what is inferior both in soil and situation, and less interest can be afforded for the stock which is so employed. In the greater part of our colonies, accordingly, both the legal and the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have been considerably reduc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As riches, improvement, and population have increased, interest has declined. The wages of labour do not sink with the profits of stock. The demand for labour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stock whatever be its profits; and after these are diminished, stock may not only continue to increase, but to increase much faster than before. It is with industrious nations who are advancing in the acquisition of riches, as with industrious individuals. A great stock, though with small profits, generally increases faster than a small stock with great profits. Money, says the proverb, makes money. When you have got a little, it is often easy to get more. The great difficulty is to get that littl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ncrease of stock and that of industry, or of the demand for useful labour, has partly been explained already, but will be explained more fully hereafter in treating of the accumulation of stock.

在我国北美及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无论是劳动工资，还是货币利息，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利润，都比英格兰高。各殖民地的法定利

率和市场利率，是6%到8%。虽然高额的劳动工资和高额的资本利润在其他地方很难同时存在，但在新殖民地，特殊情况却可能导致二者同时出现。新殖民地和大多数国家相比，一定有一段时期，就领土面积来说，资本供应不足，就资本数量来说，人口供应不足。他们拥有大面积的土地，已经超过他们的资本所能耕作的数量，于是，他们只把资本投在土质最肥沃、位置最适宜的土地上，即投在海岸和通航河流沿岸的土地上。此外，这等土地的常常是按低于其自然生产物的价值购置的。用来投资购买并改良这等土地的资本，一定会产生极大的利润，因而能够支付高额的利息。这样使用资本带来的利润非常丰厚，通过这种方式，资本得以迅速积累，种植园主雇佣的工人数量增加，很快新殖民地就会出现工人供应不足的情况。因此，在新殖民地雇到的工人，很可能得到非常丰厚的报酬。但是，随着殖民地的扩大，资本利润逐渐减少。土质最肥沃和位置最好的土地全部被占有后，耕作土质不太好、位置较差的土地所得的利润比较少，而用在土地上的资本，也只能提供较低的利息。因此，在本世纪中，我国殖民地的大部分地区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都大大减低。随着财富和人口增长，随着各个行业的改良，利息下降了。劳动工资却不随着资本利润的下降而下降。不论资本利润如何，对劳动的需求总是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资本利润下降后，资本不仅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得更快。勤劳的个人就是以这种方式获得财富的，勤劳的国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向前发展的。大资本虽然资本利润低，但同利润高的小资本相比，通常增加得更快。俗话说，钱能生钱。当你有了少量的钱后，就很容易获得更多的钱。最困难的是获得最初这笔少量的钱。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对资本增长和劳动增长，即资本增长和对有用劳动需求的增长两者间的关系，作了部分的说明，在后面讨论资本积累时，我将对此进行更加详尽的说明。

The acquisition of new territory, or of new branches of trade, may sometimes raise the profits of stock, and with them the interest of money, even in a country which is fast advancing in the acquisition of riches. The stock of the country not being sufficient

for the whole accession of business, which such acquisitions present to the different people among whom it is divided, is applied to those particular branches only which afford the greatest profit. Part of what had before been employed in other trades, is necessarily withdrawn from them, and turned into some of the new and more profitable ones. In all those old trades, therefore, the competition comes to be less than before. The market comes to be less fully supplied with many different sorts of goods. Their price necessarily rises more or less, and yields a greater profit to those who deal in them, who can, therefore, afford to borrow at a higher interest. For some time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late war, not only private people of the best credit, but some of the greatest companies in London, commonly borrowed at five per cent, who before that had not been used to pay more than four, and four and a half per cent. The great accession both of territory and trade, by our acquisitions in North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will sufficiently account for this, without supposing any diminution in the capital stock of the society. So great an accession of new business to be carried on by the old stock, must necessarily have diminished the quantity employed in a great number of particular branches, in which the competition being less, the profits must have been greater. I shall hereafter have occasion to mention the reasons which dispose me to believe that the capital stock of Great Britain was not diminished even by the enormous expence of the late war.

获得新的领土或是开展新的行业，即使是在财富正迅速增加的国家，也会提高资本的利润，从而增加货币的利息。新领土的获得和新行业的开展给这个国家的国民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业务，但是由于国家的资本有限，不够应付这全部业务，所以只能把资本投在能产生最大利润的那些行业上。以前投在其他行业上的资本，也一定会撤回来一部分，转投到能够产生更大利润的新行业上。所以，在那些旧的行

业，竞争便没有以前那么激烈，而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供应和以前相比也减少了。商品的供应减少了，商品价格一定或多或少有所提升，这将给售卖此类商品的人提供更大的利润，因而他们能以比从前高的利率借款。在最近一次战争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不仅信用好的个人，就连伦敦一些最大的公司，一般都能按5%的利率借款。而他们在战前所交付的利率不超过4%或4.5%。无需假定我国的资本存量有任何减少，我国占领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后，领土与商业大大增长，这个事实就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旧资本所要经营的业务增加得那么多，必然会使投入在很多其他行业的资本数量减少，结果便是，在这些行业中，竞争不像从前那么激烈，利润一定会增加。我相信，尽管在最近一次战争中，英格兰开支巨大，但大不列颠的资本存量并未减少，而至于其中的原因，我在以后的章节中会加以说明。

The diminution of the capital stock of the society, or of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industry, however, as it lowers the wages of labour, so it raises the profits of stock, and consequently the interest of money. By the wages of labour being lowered, the owners of what stock remains in the society can bring their goods at less expence to market than before, and less stock being employed in supplying the market than before, they can sell them dearer. Their goods cost them less, and they get more for them. Their profits, therefore, being augmented at both ends, can well afford a large interest. The great fortunes so suddenly and so easily acquired in Bengal and the other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Indies, may satisfy us that, as the wages of labour are very low, so the profits of stock are very high in those ruined countries. The interest of money is proportionably so. In Bengal, money is frequently lent to the farmers at forty, fifty, and sixty per cent and the succeeding crop is mortgaged for the payment. As the profits which can afford such an interest must eat up almost the whole rent of the landlord, so such enormous usury must in its turn eat up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profits. Before 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a usury of the same kind seems to have been common in the provinces, under the ruinous administration of their proconsuls. The virtuous Brutus lent money in Cyprus at eight-and-forty per sent as we learn from the letters of Cicero.

但是，社会资本存量减少，或者说预定用来维持劳动者的资金减少，由于使劳动工资降低，因而能够提高资本利润，进而提高货币利息。由于劳动工资降低，社会上剩有资本的持有者，要想将商品送往市场，所需的花费也比以前少。由于他们将商品送往市场所用的资本减少了，他们就可以按比以前更高的价格出售商品。出售商品的成本比以前低，出售商品赚取的钱比以前高，因此，他们的利润就从两方面增加，他们因而能够支付很高的利息。在孟加拉国及东印度群岛其他英属殖民地，获取巨大财富非常迅速和容易，由此可证明，在这些被毁灭的国家里，由于劳动工资非常低，因此资本利润非常高。这些地区的货币利息也相应很高。在孟加拉国，农场主常常按40%、50%或60%的利率借款，并以下一次的收获物作为抵押。由于能够支付这种高利息的利润，必然会吞噬土地所有者几乎所有的地租，因此这样的高利贷，也必然吞噬掉很大一部分利润。罗马共和国灭亡以前，各省在总督毁灭性的管理下，似乎出现了很多这样的高利贷。西塞罗的信件告诉我们，道德高尚的布鲁图也曾在塞浦路斯岛以48%的利息放款。

In a country which had acquired that full complement of riches which the nature of its soil and climate, and its situation with respect to other countries, allowed it to acquire; which could, therefore, advance no further, and which was not going backwards, both the wages of labour and the profits of stock would probably be very low. In a country fully peopled in proportion to what either its territory could maintain or its stock employ, the competition for

employment would necessarily be so great as to reduce the wages of labour to what was barely sufficient to keep up the number of labourers, and, the country being already fully peopled, that number could never be augmented. In a country fully stocked in proportion to all the business it had to transact, as great a quantity of stock would be employed in every particular branch as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trade would admit. The competition, therefore, would everywhere be as great, and consequently the ordinary profit as low as possible.

当一个国家所获得的财富足够多，已达到它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以及它同其他国家的地理关系所允许获得的最大限度时，这个国家就不可能继续向前发展，但也没有退步，那么此时，它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也许都非常低。一个国家的人口如果已经饱和，已经完全达到其领土所能维持或其资本所可雇佣的最大限度，那么此时，劳动者就业的竞争一定非常激烈，从而使得劳动工资下降，仅够维持现有的劳动者人数。而且由于该国人口已经饱和，劳动者的数量也不可能继续增加。如果就国内各种必须经营的行业所需要的资本而言，一个国家的资本已经饱和，那么各个行业所使用的资本，将全部达到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允许使用的最大限度。这样，无论在何地，竞争的激烈程度都达到顶峰，无可再高，而普通利润也低到谷底，无可再低。

But perhaps no country has ever yet arrived at this degree of opulence. China seems to have been long stationary, and had probably long ago acquired that full complement of riche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nature of its laws and institutions. But this complement may be much inferior to what, with other laws and institutions, the nature of its soil, climate, and situation might admit of. A country which neglects or despises foreign commerce, and which admits the vessels of foreign nations into one or two of

its ports only, cannot transact the same quantity of business which it might do with different laws and institutions. In a country too, where, though the rich or the owners of large capitals enjoy a good deal of security, the poor or the owners of small capitals, enjoy scarce any, but are liable, under the pretence of justice, to be pillaged and plundered at any time by the inferior mandarins, the quantity of stock employed in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business transacted within it, can never be equal to what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at business might admit. In every different branch, the oppression of the poor must establish the monopoly of the rich, who, by engrossing the whole trade to themselves, will be able to make very large profits. Twelve per cent accordingly is said to be the common interest of money in China, and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must be sufficient to afford this large interest.

但是，也许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达到如此富裕的程度。中国的发展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其财富也许在很久以前就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最大限度，但是倘若在其他法律制度的规范下，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财富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在一个忽视或鄙视对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只进入一两个港口的国家，无法经营在其他的法律制度规范下允许经营的那么多交易。同样，在一个富人或大资本家享有极大安全感，穷人或小资本家不但没有安全感，而且随时有可能被下级官吏以执行法律为接口强加掠夺的国家，所有不同行业所投入的资本，都不可能达到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在每一种行业里，对穷人的压迫必然使富人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通过将行业的全部经营所得据为己有，获得巨额的利润。所以，据说在中国，普通的货币利率是12%，而资本的普通利润一定要足够高，才能支付这样高的利息。

A defect in the law may sometimes raise the rate of interest

considerably above what the condition of the country, as to wealth or poverty, would require. When the law does not enforce the performance of contracts, it puts all borrowers nearly upon the same footing with bankrupts or people of doubtful credit in better regulated countries. The uncertainty of recovering his money makes the lender exact the same usurious interest which is usually required from bankrupts. Among the barbarous nations who over-run the western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performance of contracts was left for many ages to the faith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he courts of justice of their kings seldom intermeddled in it. The high rate of interest which took place in those ancient times may perhaps be partly accounted for from this cause.

一国法律上的缺陷会使其利率增高，有时可能大大超过它的贫富状况所需要的水平。如果该国的法律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么借款人就将和法制国家中破产者或信用不好者处于差不多相同的地位。贷款人由于没有把握，不能确定一定可以收回贷款，就会向破产者索取借款时所需支付的高额利息。在侵略罗马帝国西部各地区的未开化民族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契约能否得到履行只凭当事者的信用，他们王朝的法官很少过问此事。这恐怕也是当时利率那么高的一部分原因。

When the law prohibits interest altogether, it does not prevent it. Many people must borrow, and nobody will lend without such a consideration for the use of their money as is suitable, not only to what can be made by the use of it, but to the difficulty and danger of evading the law. The high rate of interest among all Mahometan nations is accounted for by Mr. Montesquieu, not from their poverty, but partly from this, and partly from the difficulty of recovering the money.

当一国法律完全禁止收取利息时，它并不能阻止人们收取利息。许多人必须借款，而贷款人，不仅要考虑贷出的货币使用是否恰当，能使自己获得多少报酬，还要考虑所得回报是否值得自己克服各种困难，冒险规避法律。孟德斯鸠曾说过，所有伊斯兰教国家的利率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他们贫穷，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法律禁止收取利息，部分是因为贷款很难收回。

The lowest ordinary rate of profit must always be something more than what is 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the occasional losses to which every employment of stock is exposed. It is this surplus only which is neat or clear profit. What is called gross profit comprehends frequently, not only this surplus, but what is retained for compensating such extraordinary losses. The interest which the borrower can afford to pay is in proportion to the clear profit only.

最低的普通利润率，不仅要足够补偿每一种投资可能遭受的意外损失，还必须要有剩余。只有这剩余的部分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我们通常所说的毛利润，不仅包含这一剩余部分，还包含为补偿可能的意外损失而保留的部分。借款人能够支付的利息，只与净利润成比例。

The lowest ordinary rate of interest must, in the same manner, be something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the occasional losses to which lending, even with tolerable prudence, is exposed. Were it notmore, charity or friendship could be the only motives for lending.

即使是非常谨慎的贷款，也有遭遇意外损失的风险。所以，最低的普通利率和最低的普通利润率一样，不仅要足够补偿每一种投资可能遭受的意外损失，还必须要有剩余。如果没有剩余，那么贷款的唯一动机，就只能是搞慈善或维持友谊了。

In a country which had acquired its full complement of riches, where in every particular branch of business there was the greatest quantity of stock that could be employed in it, as the ordinary rate of clear profit would be very small, so that usual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which could be afforded out of it, would be so low as to render it impossible for any but the very wealthiest people to live upon the interest of their money. All people of small or middling fortunes would be obliged to superintend themselves the employment of their own stocks. It would be necessary that almost every man should be a man of business, or engage in some sort of trade. The province of Holland seems to be approaching near to this state. It is there unfashionable not to be a man of business. Necessity makes it usual for almost every man to be so, and custom everywhere regulates fashion. As it is ridiculous not to dress, so is it, in some measure, not to be employed, like other people. As a man of a civil profession seems awkward in a camp or a garrison, and is even in some danger of being despised there, so does an idle man among men of business.

在一个已经达到极度富裕的国家，每一行业可以使用的资本都已达到最大限度。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净利润率很低，因而净利润所能负担的普通市场利率也很低。这样，除了非常富有的人外，任何人都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中小资产阶级都不得不自行监督自己资本的用途。几乎所有人都得成为商人，或必须从事某种经营。荷兰的状况就和这种情况相似。在荷兰，一个人如果不是商人，那么他就显得

有点格格不入。正是社会的这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商人已经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无论在哪里，习俗都支配着时尚。就如不像别人那样穿着打扮会招来嘲笑，不像别人那样从事某种经营也会招来嘲笑。文人在部队或兵营中会不自在，甚至可能被人瞧不起，整天无所事事的人在商人中间也是如此。

The highest ordinary rate of profit may be such as, in the pric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commodities, eats up the whole of what should go to the rent of the land, and leaves only what is sufficient to pay the labour of preparing and bringing them to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lowest rate at which labour can anywhere be paid, the bare subsistence of the labourer. The workman must always have been fed in some way or other while he was about the work; but the landlord may not always have been paid. The profits of the trade which the serva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carry on in Bengal may not perhaps be very far from this rate.

最高的普通利润率，可能会吞噬掉绝大多数的商品价格中，应当归作地租的那一组成部分，从而使商品价格中仅剩下足够支付商品生产及上市所需的最低劳动工资，即按照任何地方劳动的最低支付比率支付的，仅够维持劳动者生存的工资。工人在工作时，总要设法养活自己，但土地所有者却不总是得到报酬。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在孟加拉国进行贸易所得的利润，与这个最高普通利润率恐怕相差不是太远。

The proportion which the usual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ought to bear to the ordinary rate of clear profit, necessarily varies as profit rises or falls. Double interest is in Great Britain reckoned, what the merchants call a good, moderate, reasonable profit; terms which I apprehend mean no more than a common and usual profit. In a

country where the ordinary rate of clear profit is eight or ten per cent, it may be reasonable that one half of it should go to interest, wherever business is carried on with borrowed money. The stock is at the risk of the borrower, who, as it were, insures it to the lender; and four or five per cent may,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rades, be both a sufficient profit upon the risk of this insurance, and a sufficient recompence for the trouble of employing the stock. But the proportion between interest and clear profit might not be the same in countries where the ordinary rate of profit was either a good deal lower, or a good deal higher. If it were a good deal lower, one half of it perhapscould not be afforded for interest; and more might be afforded if it were a good deal higher.

通常市场利率对普通净利润率所应有的比例，必然随着利润的升降而变动。在大不列颠，商人们认为，良好的、适中的、合理的利润应该是利息的两倍。我想，这种利润应该就是指普通的、一般的利润。在普通净利润率为8%或10%的国家，如果一个人要靠借款来从事经营，那么拿他所得利润的一半支付利息，也许是合理的。资本的风险由借款人承担，就像借款人给贷款人的保险。在大多数行业中，4%或5%的利润率，既足以承担这种风险的保险，又可以为不辞辛苦运用这笔资产的人提供足够的补偿。但是，在普通利润率极低或极高的国家，利息和净利润的比例可能就会不一样。利润率极低时，利润的一半或许不够支付利息，利润率极高时，可能还要拿出更多的利润支付利息。

In countries which are fast advancing to riches, the low rate of profit may, in the price of many commodities, compensate the high wages of labour, and enable those countries to sell as cheap as their less thriving neighbours, among whom the wages of labour may be lower.

在财富迅速增长的国家，较低的利润率可以补偿很多商品价格中较高的劳动工资，这样这些国家就能像那些不是特别繁荣，劳动工资较低的邻国一样，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商品。

In reality high profits tend much more to raise the price of work than high wages. If in the linen manufacture, for example, the wages of the different working people, the flax-dressers, the spinners, the weavers, etc. should, all of them, be advanced two pencea day;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heighten the price of a piece of linen only by a number of two pence equal to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had been employed about it, multiplied by the number of days during which they had been so employed. That part of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y which resolved itself into wages would, through all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manufacture, rise only in arithmetical proportion to this rise of wages. But if the profits of all the different employers of those working people should be raised five per cent that part of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y which resolved itself into profit would, through all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manufacture, rise in geometrical proportion to this rise of profit. The employer of the flax-dressers would in selling his flax require an additional five per cent upon the whole value of the materials and wages which he advanced to his workmen. The employer of the spinners would require an additional five per cent both upon the advanced price of the flax and upon the wages of the spinners. And the employer of the weavers would require a like five per cent both upon the advanced price of the linenyarn and upon the wages of the weavers. In raising the price of commodities the rise of wages operates in the same manner as simple interest does in the accumulation of debt. The rise of profit operates like compound interest. Our merchants and master-manufacturers complain much

of the bad effects of high wages in raising the price, and thereby lessening the sale of their good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y say nothing concerning the bad effects of high profits. They are silent with regard to the pernicious effects of their own gains. They complain only of those of other people.

实际上，高利润比高工资更容易抬高商品的价格。例如，在麻纺织业中，各类劳动者，如理麻工、纺麻工、织麻工等的工资，如果每天各提高2便士，那么一匹麻布的价格所必须提高的数额，就等于生产这匹麻布所雇佣的工人数量，乘以生产这匹麻布的工作天数，再乘以2便士。在制造的各个阶段中，商品价格中属于工资的那一部分按算术级数依次增加。但倘若雇佣这些工人的所有雇主的利润都提高5%，那么商品价格中属于利润的那一部分，就会在制造的各个阶段按几何级数依次增加。就是说，理麻工的雇主在卖原麻时，除了要求收回他垫付原材料和工人工资的全部价值外，还要加上5%的利润率。同样，纺工的雇主，也要求收回他垫付的麻料成本和纺工工资的全部价值，另外再加上5%的利润率。织工的雇主也同样要求另外加上5%的利润率。所以，提高工资对商品价格抬高的作用，就像单利对债务累积的作用一样。而提高利润对商品价格抬高的作用，却像复利对债务累积的作用一样。我国商人和制造业者，常常抱怨高工资的恶劣影响，认为高工资抬高了商品价格，从而减少了他们的商品在国内外的销量，但对于高利润的恶果，他们却只字不谈。对于自己得利而产生的恶果，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只对他人得利产生的恶果大发牢骚。

Chapter X. Of Wages and Profit in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Labour and Stock

第十章、论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

The whole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labour and stock must, in the same neighbourhood, be either perfectly equal or continually tending to equality. If in the same neighbourhood, there was any employment evidently either more or less advantageous than the rest, so many people would crowd into it in the one case, and so many would desert it in the other, that its advantages would soon return to the level of other employments. This at least would be the case in a society where things were left to follow their natural course, where there was perfect liberty, and where every man was perfectly free both to choose what occupation he thought proper, and to change it as often as he thought proper. Every man's interest would prompt him to seek the advantageous, and to shun the disadvantageous employment.

劳动和资本因用途不同各有利弊，但总的说来，在同一个地方，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利弊要么完全相等，要么不断趋于相等。如果在同一个地方，某一用途明显比其他用途更有利，那么很多人就会蜂拥而入，反之，人们会纷纷离去，选择其他用途。如此这般，这种用途所带来的利益，很快就和其他用途一样多了。至少，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万事万物自然发展，拥有绝对的自由，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自己认为适合的职业，并能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更换，那么情况便是上述这样的。每个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一定会寻找最有利的用途，避开最不利的用途。

Pecuniary wages and profit, indeed, are everywhere in Europe extremely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labour and stock. But this difference arises partly from certain circumstances in the employments themselves, which, either really, or at least in the imaginations of men, make up for a small

pecuniary gain in some, and counterbalance a great one in others and partly from the policy of Europe, which nowhere leaves things at perfect liberty.

在欧洲各地，随着劳动和资本的用途不同，货币工资与货币利润确实也大不相同。这些不同，部分由各种用途本身的某些情况导致，这些情况，实际上，或者至少在人们的想象中，补偿了某些用途中微薄的货币利益，抵消了某些用途中丰厚的货币利益；部分由不允许事物完全自由发展的欧洲政策导致。

The particular consideration of those circumstances and of that policy will divide this Chapter into two parts.

为了分别讨论各种用途本身的种种情况和欧洲政策，我把本章分为两节。

Part I. Inequalities arising from the Nature of the Employments themselves

第一节、用途本身的性质导致的不平等

The five following are the principal circumstances which, so far as I have been able to observe, make up for a small pecuniary gain in some employments, andcounter-balancea great one in others. First, the agreeableness or disagreeableness of the employments themselves; secondly, the easiness and cheapness, or the difficulty and expence of learning them; thirdly, the constancy or inconstancy of employment in them; fourthly, the small or great trust which

must be reposed in those who exercise them; and fifthly, the probability or improbability of success in them.

就我所能观察到的，有以下五种主要情况，对某些货币收益较低的职业给予补偿，对另一些货币收益较低的职业加以抵消：第一，职业本身令人愉快还是令人不愉快；第二，职业学习容易还是困难，学费低廉还是高昂；第三，工作稳定还是不稳定；第四，工作所承担的责任是重还是轻；第五，在职业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

First, the wages of labour vary with the ease or hardship, the cleanliness or dirtiness, the honourableness or dishonourableness of the employment. Thus in most places, take the year round, a journeyman taylor earns less than a journeyman weaver. His work is much easier. A journeyman weaver earns less than a journeyman smith. His work is not always easier, but it is much cleanlier. A journeyman blacksmith, though an artificer, seldom earns so much in twelve hours as a collier, who is only a labourer, does in eight. His work is not quite so dirty, is less dangerous, and is carried on in day-light, and above ground. Honour makes a great part of the reward of all honourable professions. In point of pecuniary gain, all things considered, they are generally under-recompensed, as I shall endeavour to show by and by. Disgrace has the contrary effect. The trade of a butcher is a brutal and an odious business; but it is in most places more profitable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common trades. The most detestable of all employments, that of public executioner, is,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f work done, better paid than any common trade whatever.

第一，劳动工资因职业的难易、干净或肮脏、体面或卑贱而不

同。比如说，在大多数地方，按一年计算，缝纫工的工资比织麻工少，这是因为缝纫工的工作更容易。织麻工的工资比铁匠少，这是因为织麻工的工作更干净。铁匠虽然是技工，但工作12小时赚的钱，却常常比不上普通煤矿工工作8小时的报酬，这是因为铁匠的工作没有煤矿工的工作那么肮脏危险，而且他是在地面上、在阳光下工作的。对于所有体面的工作来说，体面构成了报酬的很大一部分。就货币收益而言，考虑到各种因素，这种职业的报酬一般都相当低。我将在后面说明这一点。反之。对于卑贱的职业来说，情况刚好相反。屠夫这份工作既残忍又招人厌恶，但在很多地方，这份工作比大部分普通工作更加有利可图。死刑执行者这份工作是最令人厌恶的，但是与其工作量相比，死刑执行者的报酬比任何普通职业都要多。

Hunting and fishing, the most important employments of mankind in the rude state of society, become in its advanced state their most agreeable amusements, and they pursue for pleasure what they once followed from necessity. In the advanced state of society, therefore, they are all very poor people who follow as a trade, what other people pursue as a pastime. Fishermen have been so since the time of Theocritus. A poacher is everywhere a very poor man in Great Britain. In countries where the rigour of the law suffers no poachers, the licensed hunter is not in a much better condition. The natural taste for those employments makes more people follow them than can live comfortably by them, and the produce of their labour, in proportion to its quantity, comes always too cheap to market to afford any thing but the most scanty subsistence to the labourers.

在未开化的社会中，狩猎和捕鱼被看作人类最重要的职业，但在进步的社会，这两种职业却变成了最令人愉悦的消遣方式。过去人们由于生活所需而渔猎，如今人们却为了消遣娱乐而渔猎。所以在进步

的社会，那些把别人的消遣当作职业的人，都是非常穷的人。自忒奥克里托斯时代以来，渔夫们就非常贫穷。在大不列颠的所有地区，擅自进入他人领地的偷猎者都是非常贫穷的人。在法律严格禁止偷猎行为的国家中，那些有执照的狩猎者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许多人从事这些职业是因为他们感兴趣，不是因为这些职业能让他们过上优越的生活，而他们劳动所得的售价，和其劳动数量相比，总是太过低廉，这些劳动者只能买得起极其有限的生活资料，过着最贫苦的生活。

Disagreeableness and disgrace affect the profits of stock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wages of labour. The keeper of an inn or tavern, who is never master of his own house, and who is exposed to the brutality of every drunkard, exercises neither a very agreeable nor a very creditable business. But there is scarce any common trade in which a small stock yields so great a profit.

工作如果不愉快或不体面，就像影响劳动工资一样，也会影响资本利润。小客栈或酒馆的老板从来不是店铺的主人，他们常常遭到醉汉们的粗鲁对待，他们的工作既不令人愉快，也不体面。但很少能有哪个普通行业能像他们这样，以很少的资本得到很大的利润。

Secondly, the wages of labour vary with the easiness and cheapness, or the difficulty and expence, of learning the business.

第二，劳动工资因职业学习的难易、学费的多寡而不同。

When any expensive machine is erected, the extraordinary work to be performed by it before it is worn out, it must be

expected, will replace the capital laid out upon it, with at least the ordinary profits. A man educated at the expence of much labour and time to any of those employments which require extraordinary dexterity and skill, may be compared to one of those expensive machines. The work which he learns to perform, it must be expected, over and above the usual wages of common labour, will replace to him the whole expence of his education, with at least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an equally valuable capital. It must do this, too, in a reasonable time, regard being had to the very uncertain duration of human life, in the same manner as to the more certain duration of the machine.

在安装任何昂贵的机器时，人们都一定希望，在机器损坏以前，能从它所完成的某种工作中收回花在机器上的资本，并且至少获得普通利润。一份工作，如果需要花费很多努力和时间才能学会，并且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程度，那么可以说这份工作就相当于一台昂贵的机器。学会这种职业的人在工作的时候一定希望，自己除了能够获得普通劳动的普通工资外，还能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获得和学费同等价值的资本的普通利润。而且，鉴于人的寿命长短非常不确定，他必须在适当的时间内就收回学费和普通利润，就像拥有确定寿命的机器必须在适当的时间内收回成本并取得利润一样。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ages of skilled labour and those of common labour, is founded upon this principle.

技能劳动所获得的工资和普通劳动所获得的工资之间存在差异，就是基于这个原理。

The policy of Europe considers the labour of all mechanics,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as skilled labour; and that of all country labourers as common labour. It seems to suppose that of the former to be of a more nice and delicate nature than that of the latter. It is so perhaps in some cases; but in the greater part it is quite otherwise, as I shall endeavour to shew by and by.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urope, therefore, in order to qualify any person for exercising the one species of labour, impose the necessity of an apprenticeship, though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rigour in different places. They leave the other free and open to every body.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the apprenticeship, the whole labour of the apprentice belongs to his master. In the meantime he must, in many cases, be maintained by his parents or relations, and in almost all cases must be clothed by them. Some money, too, is commonly given to the master for teaching him his trade. They who cannot give money, give time, or become bound for more than the usual number of years; a consideration which, though it is not always advantageous to the master, on account of the usual idleness of apprentices, is always disadvantageous to the apprentice. In country labour, on the contrary, the labourer, while he is employed about the easier, learns the more difficult parts of his business, and his own labour maintains him through all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his employment. It is reasonable, therefore, that in Europe the wages of mechanics,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should be somewhat higher than those of common labourers. They are so accordingly, and their superior gains make them in most places be considered as a superior rank of people. This superiority, however, is generally very small; the daily or weekly earnings of journeymen in the more common sorts of manufactures, such as those of plain linen and woollen cloth, computed at an average, are, in most places, very little more than the daywages of common labourers. Their employment, indeed, is more steady and uniform, and the

superiority of their earnings, taking the whole year together, may be somewhat greater. It seems evidently, however, to be no greater than what is 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the superior expence of their education.

欧洲政策规定，机械师、技工和制造业者的劳动是技能劳动，而所有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是普通劳动。这种政策似乎认为，前者的劳动比后者的劳动在性质上更精细、更巧妙。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是这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却不是这样的，这一点我在下面将逐一说明。所以，欧洲各国的法律习俗，虽然在严格程度上各有不同，但都规定，一个人要想获得从事技能劳动的资格，必须先做学徒。但是对于农业劳动，人人都可自由参加，没有限制，不用学习。一个人在做学徒期间，他的全部劳动都归师傅所有。在很多情况下，学徒的生活费，甚至衣服都要由父母或亲戚提供。按照惯例，学徒还须付给师傅一些钱作为学费。出不起学费的学徒就要出时间，换句话说，做学徒的年限比一般人要长。由于学徒常常比较懒惰，因此这种考量并不总是对师傅有利，但是对学徒一定是不利的。农村劳动恰恰相反，劳动者往往在从事简单的工作时，就学会了他所从事的行业中比较难的工作。在工作的各个阶段，他都能用自己的劳动维持自己的生活。因此，按道理说，欧洲各国的机械师、技工和制造业者的工资，应该稍稍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较高的收入使他们在很多地方显得高人一等。但是，这种优越感常常很有限。在一些普通的制造业，如单色亚麻布和呢绒制造业中，工人的平均日工资或周工资只是略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平均日工资或周工资。诚然，他们的工作比较稳定，工作内容比较单一，因此就一年来说，他们的收入也许多一些。但是，很明显的是，这笔收入仅够补偿他们接受职业教育时所花的巨额资金，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剩余了。

Education in the ingenious arts and in the liberal professions, is still more tedious and expensive. The pecuniary recompence,

therefore, of painters and sculptors, of lawyers and physicians, ought to be much more liberal; and it is so accordingly.

精巧艺术和自由职业的教育更加冗长乏味，花费也更加高昂。因此，画家和雕刻家、律师和医生的货币报酬应该更加丰厚，事实上确实如此。

The profits of stock seem to be very little affected by the easiness or difficulty of learning the trade in which it is employed. All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stock is commonly employed in great towns seem, in reality, to be almost equally easy and equally difficult to learn. One branch either of foreign or domestic trade, cannot well be a much more intricate business than another.

但资本利润，似乎很少受到使用资本的那一行业学习难易的影响。事实上，在大城市，通常运用资本的各种不同方式，就学习的难易程度来说，似乎完全一样。一个部门的工作，无论属于对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不会比同行业另一部门的工作困难得多。

Thirdly, the wages of labour in different occupations vary with the constancy or inconstancy of employment.

第三，劳动工资因工作稳定或不稳定而不同。

Employment is much more constant in some trades than in others. In the greater part of manufactures, a journeyman may be

pretty sure of employment almost every day in the year that he is able to work. A mason or bricklayer, on the contrary, can work neither in hard frost nor in foul weather, and his employment at all other times depends upon the occasional calls of his customers. He is liable, in consequence, to be frequently without any. What he earns, therefore, while he is employed, must not only maintain him while he is idle, but make him some compensation for those anxious and desponding moments which the thought of so precarious a situation must sometimes occasion. Where the computed earning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manufacturers, accordingly, are nearly upon a level with the daywages of common labourers, those of masons and bricklayers are generally from onehalf more to double those wages. Where common labourers earn four and five shillings a week, masons and bricklayers frequently earn seven and eight; where the former earn six, the latter often earn nine and ten, and where the former earn nine and ten, as in London, the latter commonly earn fifteen and eighteen. No species of skilled labour, however, seems more easy to learn than that of masons and bricklayers. Chairmen in London, during the summer season, are said sometimes to be employed as bricklayers. The high wages of those workmen, therefore, are not so much the recompence of their skill, as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inconstancy of their employment.

有些行业的工作比其他行业更稳定。在大部分制造业中，一个技工，只要自己能够工作，一年中几乎每天都有工作。相反，泥瓦匠或砖匠在严寒或恶劣的天气时，往往无事可干。而且，即使是在天气好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工作也要取决于顾客的临时需要，因此他们常常没有工作。所以，他们在工作时的劳动所得，不仅要足够维持他们无活可做时的生计，而且还要补偿他们因为担心找不到工作而不时的焦虑和沮丧。所以，在大部分制造业中，工人的劳动所得算起来和普通

劳动者的日工资几乎相等，但泥瓦匠和砖匠的劳动所得却几乎是普通劳动工资的1.5倍甚至2倍。如果普通劳动者的周工资是4先令或5先令，那么泥瓦匠和砖匠的周工资常常是7先令或8先令。如果前者是6先令，那么后者常常是9先令或10先令。如果前者是9先令或10先令（像在伦敦那样），那么后者常常是15到18先令。但在所有技能劳动中，泥瓦匠和砖匠的劳动似乎是最容易学习的。据说在伦敦，夏天时，轿夫有时会被雇佣做砖匠的工作。所以，泥瓦匠和砖匠这类劳动者的高工资，与其说是对他们技能的报酬，不如说是对他们工作不稳定的补偿。

A housecarpenter seems to exercise rather a nicer and more ingenious trade than a mason. In most places, however, for it is not universally so, his day-wages are somewhat lower. His employment, though it depends much, does not depend so entirely upon the occasional calls of his customers; and it is not liable to be interrupted by the weather.

和泥瓦匠的工作相比，建筑木匠所从事的工作似乎更细致，更需要技巧。但在许多地方（虽然不是在所有地方），建筑木匠的日工资却略低于泥瓦匠的日工资。这是因为建筑木匠有没有工作，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取决于顾客的临时需要，但并不像泥瓦匠那样完全取决于顾客的临时需要，而且也不怎么受天气的影响。

When the trades which generally afford constant employment, happen in a particular place not to do so, the wages of the workmen always rise a good deal above their ordinary proportion to those of common labour. In London almost all journeymen artificers are liable to be called upon and dismissed by their masters from day to day, and from week to week, in the same manner as day-labourers

in other places. The lowest order of artificers, journeymen tayors, accordingly, earnthere halfacrown a day, though eighteen pence may be reckoned the wages of common labour. In small towns and country villages, the wages of journeymen taylors frequently scarce equal those of common labour; but in London they are often many weeks without employment,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summer.

如果某个地方的某个行业不能像其他地方一样提供某种固定工作，那么从事这种工作的工人的工资一定会上升，大大超过它和普通劳动工资的正常比例。在伦敦，所有下层技工都像其他地方的日工一样，按天或按星期被他们的雇主雇佣。因此，虽然普通劳动工资为18便士，但伦敦最下层的技工，即裁缝，一天就能赚得半克朗。在小城市及乡村地区，裁缝的工资常常低于普通劳动工资，但在伦敦，尤其是在夏天，裁缝常常好几星期都无事可做。

When the inconstancy of employment is combined with the hardship, disagreeableness, and dirtiness of the work, it sometimes raises the wages of the most common labour above those of the most skilful artificers. A collier working by the piece is supposed, at Newcastle, to earn commonly about double, and in many parts of Scotland about three times the wages of common labour. His high wages arise altogether from the hardship, disagreeableness, and dirtiness of his work. His employment may, upon most occasions, be as constant as he pleases. The coal-heavers in London exercise a trade which in hardship, dirtiness, and disagreeableness, almost equals that of colliers; and from the unavoidable irregularity in the arrivals of coal-ships, the employmen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is necessarily very inconstant. If colliers, therefore, commonly earn double and triple the wages of common labour, it ought not to seem unreasonable that coal-heavers should sometimes earn four and five

times those wages. In the enquiry made into their condition a few years ago, it was found that; at the rate at which they were then paid, they could earn from six to ten shillings a day. Six shillings are about four times the wages of common labour in London, and in every particular trade, the lowest common earnings may always be considered as those of the far greater number. How extravagant soever those earnings may appear, if they were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all the disagreeable circumstances of the business, there would soon be so great a number of competitors as, in a trade which has no exclusive privilege, would quickly reduce them to a lower rate.

如果一种工作，既不稳定，又很艰苦，不仅不干净，还令人不愉快，那么，这种工作即使是最普通的劳动，工人的工资有时也会超过最熟练技工的工资。在纽卡斯尔，按件计酬的煤矿工的工资一般是普通劳动工资的2倍，在苏格兰许多地方，一般是普通劳动工资的3倍。煤矿工的工资之所以高，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既艰苦，又不干净，且令人不愉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煤矿工愿意，他们总是有工作可做。伦敦运煤工的工作和煤矿工的工作相比，几乎一样艰苦、不干净和令人不快。但是，由于运煤船的到达时间总是没有规律，这一点无法避免，因此大部分运煤工的工作一定是很不固定的。如果煤矿工的工资通常是普通劳动工资的2倍或3倍的话，那么，运煤工人的工资有时是普通劳动工资的4倍或5倍，似乎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根据几年前对运煤工情况的调查，人们发现，按照当时的工资率，运煤工日工资为6先令到10先令。就6先令的日工资来说，这个数目大概是伦敦普通劳动工资的4倍。不论在哪种职业中，最低的普通收入往往可以看作从事这一职业大多数人的收入。不管这种收入是否丰厚，如果在补偿了这一职业上所有令人不愉快的情况后还有剩余，那么只要这个职业没有排他特权，不久就会有大量竞争者涌入这个职业，很快该职业的工资率就会降下来。

The constancy or inconstancy of employment cannot affect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in any particular trade. Whether the stock is or is not constantly employed depends, not upon the trade, but the trader.

在任何行业中，资本的使用固定与否，不会影响资本的普通利润。资本的使用是否固定并不取决于行业，而取决于经营这一行业的人。

Fourthly, the wages of labour vary according to the small or great trust which must be reposed in the workmen.

第四，劳动工资因劳动者所须负担的责任的大小而不同。

The wages of goldsmiths and jewellers are everywhere superior to those of many other workmen, not only of equal, but of much superior ingenuity, on account of the precious materials with which they are intrusted.

在各个地方，金匠和珠宝的工资，不仅比需要同样技巧的许多其他劳动者高，而且比需要更大技巧的许多其他劳动者高，这是因为付托给他们的材料非常贵重。

We trust our health to the physician; our fortune and sometimes our life and reputation to the lawyer and attorney. Such confidence could not safely be reposed in people of a very mean or

low condition. Their reward must be such, therefore, as may give them that rank in the society which so important a trust requires. The long time and the great expence which must be laid out in their education, when combined with this circumstance, necessarily enhance still further the price of their labour.

我们把身体的健康托付给医生，把财产，有时甚至把生命和名誉托付给律师或代理律师。这样的事情倘若托付给非常平庸或地位卑微的人，绝对不保险。所以这些行业的从业人所得到的报酬，必须与这样重大的信任要求他们拥有的社会地位相匹配。他们的社会地位，加上他们接受职业教育所必须花费的大量时间和巨额费用，一定会使他们的劳动价格进一步提高。

When a person employs only his own stock in trade, there is no trust; and the credit which he may get from other people, depends, not upon the nature of his trade, but upon their opinion of his fortune, probity, and prudence. The different rates of profit, therefore, in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trade, cannot arise from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trust reposed in the traders.

如果一个人仅仅使用自己的资本经营生意，那么就不存在信任问题。他从别人那里取得的信用，并不取决于他所经营的行业的性质，而取决于别人对他的财产、正直和谨慎态度的看法。因此，各行业不同部门的利润率不同，并不是由于各行业经营者得到的信任不同导致。

Fifthly, the wages of labour in different employments vary according to the probability or improbability of success in them.

第五，劳动工资因在职业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大小而不同。

The probability that any particular person shall ever be qualified for the employment to which he is educated, is ver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occupations. In the greater part of mechanic trades, success is almost certain; but very uncertain in the liberal professions. Put your son apprentice to a shoemaker, there is little doubt of his learning to make a pair of shoes; but send him to study the law, it is at least twenty to one if ever he makes such proficiency as will enable him to live by the business. In a perfectly fair lottery, those who draw the prizes ought to gain all that is lost by those who draw the blanks. In a profession where twenty fail for one that succeeds, that one ought to gain all that should have been gained by the unsuccessful twenty. The counsellor at law who, perhaps, at near forty years of age, begins to make something by his profession, ought to receive the retribution, not only of his own so tedious and expensive education, but of that of more than twenty others who are never likely to make any thing by it. How extravagant soever the fees of counsellors at law may sometimes appear, their real retribution is never equal to this. Compute in any particular place, what is likely to be annually gained, and what is likely to be annually spent, by all the different workmen in any common trade, such as that of shoemakers or weavers, and you will find that the former sum will generally exceed the latter. But make the same computation with regard to all the counsellors and students of law, in all the different inns of court, and you will find that their annual gains bear but a very small proportion to their annual expence, even though you rate the former as high, and the latter as low, as can well be done. The lottery of the law, therefore, is very far from being a perfectly fair lottery; and that, as well as

many other liberal and honourable professions, are, in point of pecuniary gain, evidently under-recompenced.

任何人，在接受了某种职业教育后能否取得就业资格，随职业的不同而大不相同。在大部分机械职业中，成功的几率几乎100%，但在自由职业中，成功的几率却难以确定。例如，把孩子送到鞋匠铺当学徒，孩子无疑能学会制鞋的技术，但倘若送孩子去学法律，那么孩子精通法律并能以此为生的可能性至多只有1/20。在完全公平的博彩中，中奖者应该得到未中奖者所失去的全部金额。在一个有20人失败而只有1人能取得成功的职业中，成功的这个人，应该享有失败的20人应该得到却未能得到的全部收入。所以，一位律师，如果要到将近四十岁才能从职业中获得收益，那么他的劳动所得，不仅应该足以补偿他自己为接受职业教育所投入的大量时间和巨额费用，而且要足以补偿那些虽接受过同样的职业教育，却无法从律师这一行业收获分文的二十多人的教育时间与费用。尽管律师收取的费用有时看起来非常高，但他的真正报酬却永远达不到这个数目。无论在何地，如果你算一算任意一个普通行业中所有工种的工人，比如说的鞋匠或织麻工，可能的年收入和可能的年支出，你就会知道，他们的总收入常常高于总支出。如果你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各律师及各法学协会见习律师的支出与收入，你就会知道，就算你尽力把他们的年收入算得高些，把他们的年支出算得低些，他们的年收入也只占年支出极小的一部分。所以，法律业的博彩，绝不是完全公平的博彩。法律业和其他许多自由职业以及体面的职业一样，所得的报酬显然是低于支出的。

Those professions keep their level, however, with other occupations, and, notwithstanding these discouragements, all the most generous and liberal spirits are eager to crowd into them. Two different causes contribute to recommend them. First, the desire of the reputation which attends upon superior excellence in any of them; and, secondly, the natural confidence which every man has

more or less, not only in his own abilities, but in his own good fortune.

但是，尽管有上述种种令人沮丧的情况，这些职业还是能和其他职业保持相同的水准，所有慷慨大方、不存偏见的精英们依然渴望涌入这些职业。他们受到鼓舞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对于名誉的渴望。只要他们能在这些行业的任意一个中取得显著成就，他们就可以获得极大的声望。第二，对自己的才能以及好运气充满自信。这是所有人天生都或多或少拥有的品质。

To excel in any profession, in which but few arrive at mediocrity, is the most decisive mark of what is called genius or superior talents. The public admiration which attends upon such distinguished abilities, makes always a part of their reward; a greater or smaller in proportion as it is higher or lower in degree. It makes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at reward in the profession of physic; a still greater perhaps in that of law; in poetry and philosophy it makes almost the whole.

如果一个人能在只有少数人可以达到中等水平的职业里出类拔萃，那么这一定表明，这个人就是天才或拥有卓越才能的人。公众对这种卓越才能的赞赏，总是构成他收入的一部分。这部分收入的多少，要看公众对其欣赏程度的大小。对医生而言，这部分收入占他全部收入的大部分，对律师而言，所占的比例更大，对诗人或哲学家而言，这部分收入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收入。

There are some very agreeable and beautiful talents of which the possession commands a certain sort of admiration; but of which

the exercise for the sake of gain is considered, whether from reason or prejudice, as a sort of public prostitution. The pecuniary recompence, therefore, of those who exercise them in this manner, must be sufficient, not only to pay for the time, labour, and expence of acquiring the talents, but for the discredit which attends the employment of them as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The exorbitant rewards of players, opera-singers, opera-dancers, etc. are founded upon those two principles; the rarity and beauty of the talents, and the discredit of employing them in this manner. It seems absurd at first sight that we should despise their persons, and yet reward their talents with the most profuse liberality. While we do the one, however, we must of necessity do the other. Should the public opinion or prejudice ever alter with regard to such occupations, their pecuniary recompence would quickly diminish. More people would apply to them, and the competition would quickly reduce the price of their labour. Such talents, though far from being common, are by no means so rare as is imagined. Many people possess them in great perfection, who disdain to make this use of them; and many more are capable of acquiring them, if any thing could be made honourably by them.

在这个世界上有几种才能非常迷人且令人愉快，其拥有者总是能够得到某种赞赏，但倘若他用这才能来谋利，那么世人就会认为他出卖色相，不论这一看法是出于理性还是偏见。因此，用这种才能谋利的人所得到的报酬，不仅必须补偿他获得这种才能所花的时间、劳动和费用，而且必须补偿他用这种才能谋生时所受到的侮辱。演员、歌手以及舞者等之所以能获得相当高的报酬，就是由于这两个原则：一，才能的美妙，以及拥有这种才能的人的稀缺；二，用这种才能谋利所受到的侮辱。一方面，我们鄙视这些人的人格，另一方面，我们又对他们的才能给予非常丰厚的报酬，乍一看，这似乎很不合理，但实际上，正因为我们鄙视他们的人格，所以才必须给予他们的才能丰

厚的报酬。如果人们对这些职业的态度或偏见发生改变的话，那么他们的货币报酬很快就会减少。因为会有更多的人想从事这些职业，他们彼此间的竞争会使这种劳动的价格迅速降低。这些才能虽然不是普通的才能，但也绝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稀有。很多人不仅拥有这类才能，而且还是行家里手，不过不屑于依靠这些才能谋生。倘若靠这种才能谋生不会招致鄙视的话，更多的人将能够习得这些才能。

The over-weening conceit which the greater part of men have of their own abilities, is an ancient evil remarked by the philosophers and moralists of all ages. Their absurd presumption in their own good fortune has been less taken notice of. It is, however, if possible, still more universal. There is no man living who, when in tolerable health and spirits, has not some share of it. The chance of gain is by every man more or less over-valued, and the chance of loss is by most men under-valued, and by scarce any man, who is in tolerable health and spirits, valued more than it is worth.

历代哲学家和道德家一致认为，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才能总是太过自负，这是人类由来已久的通病。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世人常常对自己的好运有着相当荒谬的推测。但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好运估计过高，比对自己的才能的高估还要普遍。任何一个人，只要身体和精神还算健康，便会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自己未来一定交好运。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高估了得利的可能性，而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低估了损失的可能性。身体和精神还算健康的人很少高估损失的可能性。

That the chance of gain is naturally over-valued, we may learn from the universal success of lotteries. The world neither ever saw, nor ever will see, a perfectly fair lottery; or one in which the whole

gain compensated the whole loss; because the undertaker could make nothing by it. In the state lotteries the tickets are really not worth the price which is paid by the original subscribers, and yet commonly sell in the market for twenty, thirty, and sometimes forty per cent advance. The vain hope of gaining some of the great prizes is the sole cause of this demand. The soberest people scarce look upon it as a folly to pay a small sum for the chance of gaining ten or twenty thousand pounds; though they know that even that small sum is perhaps twenty or thirty per cent more than the chance is worth. In a lottery in which no prize exceeded twenty pounds, though in other respects it approached much nearer to a perfectly fair one than the common state lotteries, there would not be the same demand for tickets.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chance for some of the great prizes, some people purchase several tickets, and others, small shares in a still greater number. There is not, however, a more certain proposition in mathematics, than that the more tickets you adventure upon, the more likely you are to be a loser. Adventure upon all the tickets in the lottery, and you lose for certain; and 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your tickets the nearer you approach to this certainty.

博彩这一行业在各地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人们自然而然地高估自己得利的机会。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未来也绝不会出现，完全公平的彩票，即绝不会有全部所得可以抵偿全部损失的彩票，因为倘若这样，经营彩票的人就一无所得了。就国家经营的彩票来说，彩票实际上并不值购买者所支付的价钱，但是在市场上，彩票常常以超过实际价值20%、30%甚至40%的价格售卖。人们之所以产生购买彩票这种需求，唯一的原因就是想中大彩的痴心妄想。一个头脑最清醒的人，清楚地知道购买彩票所支付的小额资金的实际价值比中彩机会的实际价值也许要高20%或30%，但也不认为，以小额资金换得1万镑甚至2万镑的中彩机会是愚蠢的。奖金不超过20

磅的彩票，即使在其他方面比普通国营彩票更接近绝对公平，但买这种彩票的人估计也不会太多。为了增加中大奖的机会，有的人同时购买好几张彩票，有的人购买更多的小面额彩票。但是，你冒险购买的彩票越多，你希望落空的可能性越大，这是数学上再确定不过的定则。如果你冒险购买全部彩票，那么你肯定会亏损。你购买的彩票数量越多，希望落空的可能性越大。

That the chance of loss is frequently under-valued, and scarce ever valued more than it is worth, we may learn from a very moderate profit of insurers. In order to make insurance, either from fire or sea-risk, a trade at all, the common premium must be 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the common losses, to pay the expence of management, and to afford such a profit as might have been drawn from an equal capital employed in any common trade. The person who pays no more than this, evidently pays no more than the real value of the risk, or the lowest price at which he can reasonably expect to insure it. But though many people have made a little money by insurance, very few have made a great fortune; and from this consideration alone, it seems evident enough, that the ordinary balance of profit and loss is not more advantageous in this, than in other common trades by which so many people make fortunes. Moderate, however, as the premium of insurance commonly is, many people despise the risk too much to care to pay it. Taking the whole kingdom at an average, nineteen houses in twenty, or rather, perhaps, ninety-nine in a hundred, are not insured from fire. Sea risk is more alarming to the greater part of people, and the proportion of ships insured to those not insured is much greater. Many sail, however, at all seasons, and even in time of war, without any insurance. This may sometimes perhaps be done without any imprudence. When a great company, or even a great merchant, has twenty or thirty ships at sea, they may, as it were, insure one

another. The premium saved upon them all, may more than compensate such losses as they are likely to meet with in the common course of chances. The neglect of insurance upon shipping, however, in the same manner as upon houses, is, in most cases, the effect of no such nice calculation, but of mere thoughtless rashness and presumptuous contempt of the risk.

从保险人微薄的利润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往往过于低估自己损失的可能性，很少有人高估损失的可能性。要想把火险或海险当作一种事业经营，那么所收的普通保险费必须足以补偿一般的损失，支付经营的费用，并且还要提供一定的利润，数额应等于同等资本用于一般经营所能取得的利润。只支付这么多保险费的人，显然只支付了风险的真实价值，换句话说，只支付了他想要防范风险的最低价格。虽然很多人通过做保险业务获得了微薄的利润，但很少有人靠它发大财。单从这一点就可以发现，很明显，通常得利与损失相抵的情况在保险这一行业没多大优势，不如使许多人发财的其他行业。但是，虽然保险费通常都很低廉，许多人却轻视风险，不愿支付保险费。就全英格兰的房屋来看，平均每20户人家中就有19户，甚至每100户人家中就有99户没有保火险。很多人认为海上的风险，比火灾更可怕，所以，投保船只与未投保船只的比例和房屋的投保比例相比，要大得多。但无论在什么季节，甚至在战争期间，仍有很多船只不买保险。这种情况有时并非是管理者轻率导致。当一个大公司甚至一个大商人有二三十只船同时航行在海面时，这些船之间可以相互保护，抵御风险，由此节约下来的保险费，也许足够补偿一般情况下船只可能遭受的损失，并且还有剩余。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船只不保海险、房屋不保火险，并不是这种精密计算的结果，完全是人们粗心大意和藐视风险的结果。

The contempt of risk and the presumptuous hope of success, are in no period of life more active than at the age at which young

people choose their professions. How little the fear of misfortune is then capable of balancing the hope of good luck, appears still more evidently in the readiness of the common people to enlist as soldiers, or to go to sea, than in the eagerness of those of better fashion to enter into what are called the liberal professions.

在人的一生中，选择职业的青年时期最容易让人藐视风险，对成功给予厚望。在这段时期，人们对不幸的恐惧几乎微不足道，完全抵不过对幸运的希望。这一点从时髦青年渴望从事所谓的自由职业就可以看出。普通青年大都乐意参加陆军或海军，也更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What a common soldier may lose is obvious enough. Without regarding the danger, however, young volunteers never enlist so readily as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war; and though they have scarce any chance of preferment, they figure to themselves, in their youthful fancies, a thousand occasions of acquiring honour and distinction which never occur. These romantic hopes make the whole price of their blood. Their pay is less than that of common labourers, and in actual service their fatigues are much greater.

普通士兵可能丧失什么，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战争开始时，青年志愿兵们仍然不顾危险，踊跃应征入伍。虽然他们几乎没有升迁的机会，但却幻想了许许多多可以获得荣誉和名声的机会，虽然这些机会永远不会出现。这些虚无的希望就是他们流血牺牲的全部价格。他们的报酬比普通劳动者低，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比普通劳动者要辛苦得多。

The lottery of the sea is not altogether so disadvantageous as that of the army. The son of a creditable labourer or artificer may frequently go to sea with his father's consent; but if he enlists as a soldier, it is always without it. Other people see some chance of his making something by the one trade: nobody but himself sees any of his making anything by the other. The great admiral is less the object of public admiration than the great general, and the highest success in the sea service promises a less brilliant fortune and reputation than equal success in the land. The same difference runs through all the inferior degrees of preferment in both. By the rules of precedency a captain in the navy ranks with a colonel in the army; but he does not rank with him in the common estimation. As the great prizes in the lottery are less, the smaller ones must be more numerous. Common sailors, therefore, more frequently get some fortune and preferment than common soldiers; and the hope of those prizes is what principally recommends the trade. Though their skill and dexterity are much superior to that of almost any artificers, and though their whole life is one continual scene of hardship and danger, yet for all this dexterity and skill, for all those hardships and dangers, while they remain in the condition of common sailors, they receive scarce any other recompence but the pleasure of exercising the one and of surmounting the other. Their wages are not greater than those of common labourers at the port which regulates the rate of seamen's wages. As they are continually going from port to port, the monthly pay of those who sail from all the different ports of Great Britain, is more nearly upon a level than that of any other workmen in those different places; and the rate of the port to and from which the greatest number sail, that is the port of London, regulates that of all the rest. At London the wage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different classes of workmen are about double those of the same classes at Edinburgh. But the sailors who sail from the port of London seldom earn above three or four shillings a

month more than those who sail from the port of Leith, and the difference is frequently not so great. In time of peace, and in the merchant service, the London price is from a guinea to about seven-and-twenty shillings the calendar month. A common labourer in London, at the rate of nine or ten shillings a week, may earn in the calendar month from forty to five-and-forty shillings. The sailor, indeed, over and above his pay, is supplied with provisions. Their value, however, may not perhaps always exce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s pay and that of the common labourer; and though it sometimes should, the excess will not be clear gain to the sailor, because he cannot share it with his wife and family, whom he must maintain out of his wages at home.

总的来说，当海军这个彩票并不像当陆军那个彩票那么不利。声誉良好的劳动者或技工的儿子如果想当海军，父亲往往会同意。但是，如果他要当陆军，却总要瞒着他的父亲。当海军，别人也会看到有几分成功的机会，但当陆军，除了他自己，谁都不会认为有成功的机会。海军上将并不像陆军上将那样，能够获得那么多民众的崇拜。在海军服役所能取得的最大的成功，虽然能够得到名利，但和在陆军服役时取得同样的成功所获得的名利相比，则要逊色得多。在两种兵种中，所有的下级职位间都存在这种差别。根据等级的规定，海军上校与陆军上校处于同一级别。但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前者却比不上后者。由于在彩票中大奖较少，所以小奖一定很多。因此，普通水兵和普通陆军相比，往往更常得到一些好处和晋升的机会，而获得这些小奖的希望，就是一般人愿意当水兵的主要原因。虽然普通水兵的娴熟技巧比几乎所有技工的娴熟技巧都强得多，虽然他们一生中都在不断地和困难与危险搏斗，但是，只要他们一天还是水兵，他们除了在运用自己娴熟的技巧克服困难与危险时能够得到点儿快乐外，几乎没得到其他报酬。他们的工资，并不大于在港口工作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这些人的工资决定着水兵的工资率）。由于水兵们不断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因此，从大不列颠各港口出航的水兵们每月的工资

几乎相同，而各港口其他劳动者的工资却不太一样。而且，由于伦敦港水兵出入最多，因此伦敦的水兵工资率便决定着其他港口的水兵工资率。在伦敦，绝大多数不同工种工人的工资约是爱丁堡同一工种工人的两倍。但从伦敦港出航的水手，其月工资并不比从利斯港出航的水手高多少，三四先令都算很大的差额了，而且这样的情况极其罕见。在和平时期的商业航运中，伦敦水手的月工资为21先令到大约27先令。但是伦敦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按每周9先令或10先令计算，每月可得40先令甚至45先令。诚然，水手除了工资外，还有食物供给。但食物的价值却未必超过他的工资和普通劳动者工资间的差额。即使有时超过了这差额，这也不能算是水手的净收益，因为水手不能和家人分享这些食物，他必须用工资来养活家人。

The dangers and hair-breadth escapes of a life of adventures, instead of disheartening young people, seem frequently to recommend a trade to them. A tender mother, among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is often afraid to send her son to school at a seaport town, lest the sight of the ships and the conversation and adventures of the sailors should entice him to go to sea. The distant prospect of hazards, from which we can hope to extricate ourselves by courage and address, is not disagreeable to us, and does not raise the wages of labour in any employment. It is otherwise with those in which courage and address can be of no avail. In trades which are known to be very unwholesome, the wages of labour are always remarkably high. Unwholesomeness is a species of disagreeableness, and its effects upon the wages of labour are to be ranked under that general head.

危险和九死一生的冒险，不仅不会打消青年人的热情，似乎常常促使他们去选择这类职业。一个来自下等阶层的慈祥的母亲，常常不愿把儿子送到海港城市上学，因为她害怕儿子看到海船，听到水手的

谈话和冒险事迹后，会被引诱参加海军。在遥远的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并不使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可以发挥勇敢和机智保护自己，因此这类工作危险的性质并不会提高其劳动工资。但在勇敢和机智都不起作用的职业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工作环境非常肮脏，劳动工资总是特别丰厚。肮脏常常令人感到不愉快，因此它对劳动工资产生的影响应当归到工作令人愉快还是不愉快那一部分加以讨论。

In all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stock, the ordinary rate of profit varies more or less with the certainty or uncertainty of the returns. These are in general less uncertain in the inland than in the foreign trade, and in some branches of foreign trade than in others; in the trade to North America, for example, than in that to Jamaica. The ordinary rate of profit always rises more or less with the risk. It does not, however, seem to rise in proportion to it, or so as to compensate it completely. Bankruptcies are most frequent in the most hazardous trades. The most hazardous of all trades, that of a smuggler, though when the adventure succeeds it is likewise the most profitable, is the infallible road to bankruptcy. The presumptuous hope of success seems to act here as upon all other occasions, and to entice so many adventurers into those hazardous trades, that their competition reduces theprofit below what is 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the risk. To compensate it completely, the common returns ought, over and above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not only to make up for all occasional losses, but to afford a surplus profit to the adventurers of the same nature with the profit of insurers. But if the common returns were sufficient for all this, bankruptcies would not be more frequent in these than in other trades.

在资本的各种用途中，普通利润率或多或少随着收益的确定性而

不同。一般来说，国内贸易的收益比对外贸易更确定，而对外贸易一些部门的收益又比另一些部门要确定一些。例如，对北美贸易的收益比对牙买加贸易的收益更确定。普通利润率总是随着风险的增高而或多或少有所上升，但利润率的程度和风险的程度似乎不成比例。换句话说，升高的利润并不一定能完全补偿风险。在最危险职业的职业中，破产是最常见的事。偷运应该是所有行业中最危险的了。倘若冒险成功，固然能得到丰厚的利润，但偷运者最终还是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人们出于对成功的奢望干起偷运的行当，在其他职业中，无数的冒险家们也是出于对成功的奢望，纷纷投身各种危险生意，他们彼此间激烈竞争，最终利润一低再低，直至无法补偿风险。要想使风险完全得到补偿，资本的普通收益减去普通利润外，不仅应该弥补所有偶然的损失，还应为冒险家提供一定利润（这一利润和保险家的利润性质相同）。但是，如果资本的普通收益足够支付这一切的话，那么这些行业的破产现象就不会那么常见了。

Of the five circumstances, therefore, which vary the wages of labour, two only affect the profits of stock; the agreeableness or disagreeableness of the business, and the risk or security with which it is attended. In point of agreeableness or disagreeableness, there is little or no difference in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stock; but a great deal in those of labour; and the ordinary profit of stock, though it rises with the risk, does not always seem to rise in proportion to it. It should follow from all this, that, in the same society or neighbourhood, the average and ordinary rates of profit in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stock should be more nearly upon a level than the pecuniary wages of the different sorts of labour. They are so according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arnings of a common labourer and those of a well employed lawyer or physician, is evidently much greater than that between the ordinary profits in any two different branches of trade. The apparent difference, besides, in the profits of different trades, is

generally a deception arising from our not always distinguishing what ought to be considered as wages, from what ought to be considered as profit.

因此，共有五种情况会对劳动工资产生影响，但其中只有两种情况会影响到资本利润，即工作令人愉快与否，安全与否。绝大部分的资本用途给人带来的愉悦感都相差不远，或者完全相同，但不同的劳动用途给人带来的愉悦感却差别巨大。而且，资本的普通利润，虽然随着风险程度的升高而增高，但普通利润增高的程度却未必总和风险的程度成比例。由此可见，在同一社会或地方，资本不同用途的平均或普通利润率，比不同劳动的货币工资更接近于一个水平。事实也确实如此。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和生意兴隆的律师与医生的工资间存在差异，任何两种行业的普通利润也存在差异，但工资上的差异明显比利润上的差异大得多。此外，不同行业利润表面上的差别常常具有欺骗性，因为我们有时分不清那部分应该算作工资，哪部分应该算作利润。

Apothecaries profit is become a bye-word, denoting something uncommonly extravagant. This great apparent profit, however, is frequently no more than the reasonable wages of labour. The skill of an apothecary is a much nicer and more delicate matter than that of any artificer whatever; and the trust which is reposed in him is of much greater importance. He is the physician of the poor in all cases, and of the rich when the distress or danger is not very great. His reward, therefore, ought to be suitable to his skill and his trust, and it arises generally from the price at which he sells his drugs. But the whole drugs which the best employed apothecary, in a large market town, will sell in a year, may not perhaps cost him above thirty or forty pounds. Though he should sell them, therefore, for three or four hundred, or at a thousand per cent profit, this may

frequently be no more than the reasonable wages of his labour charged, in the only way in which he can charge them, upon the price of his drug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apparent profit is real wages disguised in the garb of profit.

“药剂师的利润”这个词语，已经成为“大量的某种东西”的代名词。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巨额利润，往往只是合理的劳动工资而已。药剂师的技能比其他所有技工要精巧得多。他担负的责任也要重得多。自始至终他都是穷人的医生，当富人只是生了小病、没那么痛苦、健康也没受到大的威胁时，他也是富人的医生。所以，药剂师的报酬应该和他的技能与他担负的责任相匹配，这通常是包含在药品的价格中的。但是，在大商业城市，生意最兴隆的药剂师每年售卖全部药品的成本，可能还不到三四十磅。因此，虽然他所售药品的价格竟然高达三四百镑，换句话说，虽然他的药品以十倍的利润出售，但通常来说，这利润也许只是他的合理工资而已。而把合理工资加在药品价格上是他能够获得工资的唯一方法。他的绝大部分表面利润都是披着利润外衣的真实工资。

In a small seaport town, a little grocer will make forty or fifty per cent upon a stock of a single hundred pounds, while a considerable wholesale merchant in the same place will scarce make eight or ten per cent upon a stock of ten thousand. The trade of the grocer may be necessary for the conveniency of the inhabitants, and the narrowness of the market may not admit the employment of a larger capital in the business. The man, however, must not only live by his trade, but live by it suitably to the qualifications which it requires. Besides possessing a little capital, he must be able to read, write, and account, and must be a tolerable judge too of, perhaps, fifty or sixty different sorts of goods, their prices, qualities, and the markets where they are to be had

cheapest. He must have all the knowledge, in short, that is necessary for a great merchant, which nothing hinders him from becoming but the want of a sufficient capital. Thirty or forty pounds a year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too great a recompence for the labour of a person so accomplished. Deduct this from the seemingly great profits of his capital, and little more will remain, perhaps, than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apparent profit is, in this case too, real wages.

在小的海港城市，小杂货商人仅投入100镑资本就可获得40％或50％的利润，而同一地方的大批发商人，即使投入1万镑的资本也很少能够获得8％或10％的利润。杂货商的行业能大大方便当地人的生活，因此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而狭小的市场可能不允许将更大的资本投在这个行业上。但是，小杂货商人不仅要靠杂货铺维持生活，而且必须要有经营杂货铺需要的相关资格。他除了要拥有小额资本外，必须要能读，能写，能算，而且还要能较准确地判断五六十种商品的价格与品质，以及能够以最低价格购买这些商品的市场。简而言之，杂货商人必须具备大商人所需具备的全部知识。他之所以不能成为大商人，只是因为他没有充足的资本。对于具有这种才能的人来说，每年赚三四十镑的劳动报酬并不算过分。表面上看，他的资本利润似乎很高。但从中扣除上述报酬后，那么剩余的恐怕只不过是资本的普通利润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杂货商的大部分表面利润也不过是他的真实工资而已。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pparent profit of the retail and that of the wholesale trade, is much less in the capital than in small towns and country villages. Where ten thousand pounds can be employed in the grocery trade, the wages of the grocer's labour make but a very trifling addition to the real profits of so great a stock. The apparent profits of the wealthy retailer, therefore, are

there more nearly upon a level with those of the wholesale merchant. It is upon this account that goods sold by retail are generally as cheap and frequently much cheaper in the capital than in small towns and country villages. Grocery goods, for example, are generally much cheaper; bread and butcher's meat frequently as cheap. It costs no more to bring grocery goods to the great town than to the country village; but it costs a great deal more to bring corn and cattle, a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must be brought from a much greater distance. The prime cost of grocery goods, therefore, being the same in both places, they are cheapest where the least profit is charged upon them. The prime cost of bread and butcher's meat is greater in the great town than in the country village; and though the profit is less, therefore, they are not always cheaper there, but often equally cheap. In such articles as bread and butcher's meat, the same cause, which diminishes apparent profit, increases prime cost.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by giving employment to greater stocks, diminishes apparent profit; but by requiring supplies from a greater distance, it increases prime cost. This diminution of the one and increase of the other seem, in most cases, nearly to counter-balance one another, which is probably the reason that, though the prices of corn and cattle are commonly ver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kingdom, those of bread and butcher's meat are generally very nearly the same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it.

零售商表面上的利润与批发商的存在一定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在大城市比在小城镇和乡村要小得多。在零售业允许投资1万镑的地方，零售商的劳动工资对于这巨额资本的真实利润而言，只不过是极小的一部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富裕零售商表面上的利润与批发商表面上的利润几乎处于同一水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城市里的零售商品通常和小城镇及乡村一样便宜，而且常常比小城镇和乡村还

要便宜得多。例如，通常大城市里杂货的价格比小城镇和乡村要低廉得多，面包与肉类往往一样便宜。把杂货运到大城市所需的费用并不比运到小城镇或是乡村多，但把谷物和牲畜运到大城市的花费就大得多，因为大部分的谷物和牲畜都要从非常远的地方运来。在大城市和农村，杂货的原始成本是一样的，所以附加利润最少的地方，杂货的价格就最低廉。面包和肉类的原始成本，大城市比农村高，所以，虽然大城市在这类商品中附加的利润较低，但商品的售价并不总是比农村便宜，常常和农村低廉的售价相同。就面包和肉类这些商品来说，表面利润减少和原始成本增加的原因是一样的。市场范围扩大后，一方面由于需要较大资本，因此降低了表面利润，另一方面由于所需货品必须从更远地方运过来，因此增加了商品的原始成本。在很多情况下，商品表面利润的减少与原始成本的增加几乎可以互相抵消。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王国的不同地区，虽然谷物与牲畜的价格有很大差别，但面包及肉类的价格通常来说却几乎相同。

Though the profits of stock both in the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are generally less in the capital than in small towns and country villages, yet great fortunes are frequently acquired from small beginnings in the former, and scarce ever in the latter. In small towns and country villages, on account of the narrowness of the market, trade cannot always be extended as stock extends. In such places, therefore, though the rate of a particular person's profits may be very high, the sum or amount of them can never be very great, nor consequently that of his annual accumulation. In great towns, on the contrary, trade can be extended as stock increases, and the credit of a frugal and thriving man increases much faster than his stock. His trade is extended in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of both, and the sum or amount of his profits is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his trade, and his annual accumulation in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of his profits. It seldom happens, however, that great fortunes are made even in great towns by any

one regular, established, and well-known branch of business, but in consequence of a long life of industry, frugality, and attention. Sudden fortunes, indeed, are sometimes made in such places by what is called the trade of speculation. The speculative merchant exercises no one regular, established, or well-known branch of business. He is a corn merchant this year, and a wine merchant the next, and a sugar, tobacco, or tea merchant the year after. He enters into every trade when he foresees that it is likely to be more than commonly profitable, and he quits it when he foresees that its profits are likely to return to the level of other trades. His profits and losses, therefore, can bear no regular proportion to those of any one established and well-known branch of business. A bold adventurer may sometimes acquire a considerable fortune by two or three successful speculations; but is just as likely to lose one by two or three unsuccessful ones. This trade can be carried on nowhere but in great towns. It is only in places of the most extensive commerce and correspondence that the intelligence requisite for it can be had.

虽然在大城市，零售商及批发商的资本利润通常比小城镇和乡村小，但在大城市，人们常常以少量资本起步就可发大财，但在小城镇和乡村却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小城镇和乡村的市场范围相对狭小，营业并不总能随着资本的增加而扩大，所以，在小城镇和乡村，虽然某个商人的利润率可能很高，但他的利润总额却不是很大，因此他每年累积的资本也不会很多。反之，在大城市，营业规模能随资本的增加而扩大，而一个商人，如若勤俭节约，且生意兴隆，那么他的信用也会迅速增加，且增加得比其资本快得多。这样，该商人的营业规模就随他的信用和资本两个方面的增加而扩大，商人的利润总额随营业的扩大而增加，商人每年累积的资本随利润总额的增加而增大。但是，即使在大城市，人们也很少通过传统的，稳定的且众所周知的行业发大财，大部分人主要靠终生的勤勉、节约和谨慎经营发大财。诚然，

在大城市中，常常有人因从事所谓的投机生意而突然致富，但投机商人所经营的，并不是传统的、稳定的且众所周知的业务。他可能今年卖谷物，明年卖酒，后年又卖砂糖、烟草或茶。但不论哪个行业，只要他预见到在这一行业所获得的利润能够超过普通利润，那么他就会马上加入，而一旦他预见到这一行业的利润将要下降到和其他行业相等，他就会马上离开。因此，他的利润和损失，不能和其他任何传统的、稳定的且众所周知的行业的利润与损失保持固定比例。大胆的冒险者有时也许通过两三次成功的投机买卖就可以发大财，有时也许由于两三次失败的投机买卖就损失大量财产。这种投机生意只能在大城市进行，在其他地方都不行，这是因为经营投机生意需要情报，而只有在商业最繁荣、通讯最发达的地方才能获得这种情报。

The five circumstances above mentioned, though they occasion considerable inequalities in the wages of labour and profits of stock, occasion none in the whole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real or imaginary, of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either. The nature of those circumstances is such that they make up for a small pecuniary gain in some, and counter-balance a great one in others.

无论劳动和资本如何使用，每一种用途都有利有弊，（有些利弊是真实的，有些只是人们想象的），上述五种情况虽然使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出现很大差异，但对劳动和资本因用途不同产生的利弊却没有什么影响，不同用途的利弊大致相同。这五种情况的性质使某些得利较少的用途得到补偿，并使某些得利较多的用途的巨额利润得到抵消。

In order, however, that this equality may take place in the whole of their advantages or disadvantages, three things are requisite even where there is the most perfect freedom. First, the

employments must be well known and long established in the neighbourhood; secondly, they must be in their ordinary, or what may be called their natural state; and, thirdly, they must be the sole or principal employments of those who occupy them.

但是，要使劳动和资本的各种用途中所有的利弊在总体上趋于平等，那么即使在最自由的地方，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这些用途一定是某一地区众所周知且长期稳定存在的；第二，这些用途必须处于普通状态，或者说自然状态；第三，这些用途必须是使用者唯一或主要的用途。

First, this equality can take place only in those employments which are well known, and have been long established in the neighbourhood.

第一，只有这些用途在某一地区众所周知且长期稳定存在时，它的利弊才会在总体上趋于平等。

Where all other circumstances are equal, wages are generally higher in new than in old trades. When a projector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new manufacture, he must at first entice his workmen from other employments by higher wages than they can either earn in their own trades, or than the nature of his work would otherwise require, and a considerable time must pass away before he can venture to reduce them to the common level. Manufactures for which the demand arises altogether from fashion and fancy, are continually changing, and seldom last long enough to be considered as old established manufactures. Those, on the contrary, for which

the demand arises chiefly from use or necessity, are less liable to change, and the same form or fabric may continue in demand for whole centuries together. The wages of labour, therefore, are likely to be higher in manufactures of the former, than in those of the latter kind. Birmingham deals chiefly in manufactures of the former kind; Sheffield in those of the latter; and the wages of labour in those two different places, are said to be suitable to this difference in the nature of their manufactures.

如果在一个地方，所有其他情况都相同，那么新行业的工资一般都高于旧行业。当一个设计师尝试开办一个新的制造业时，他起初必须要用较高的工资把工人从其他行业吸引过来。这个工资不仅要高于工人原来的工资，还要高于本行业应有的工资，而必须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敢把工资降到一般水平。对于有些制造业来说，人们对其产品的需求完全是为了赶时髦或出于一时爱好，这些制造业总是不断变化，很少能维持长久，因此不算老牌制造业。相反，对于有些制造业来说，人们对其产品的需求主要由于产品有用，或者是生活必需品，这些制造业不像上述制造业那么容易变动，同样的需求形式和结构常可维持数世纪不变。所以，前一类制造业的劳动工资和后一类制造业相比，可能高一些。伯明翰的大多数制造业属于前一类，谢菲尔德的大多数制造业属于后一类。据说在这两个地方，劳动工资的不同和他们各自制造业性质的不同十分匹配。

The establishment of any new manufacture, of any new branch of commerce, or of any new practice in agriculture, is always a speculation, from which the projector promises himself extraordinary profits. These profits sometimes are very great, and sometimes, more frequently, perhaps, they are quite otherwise; but in general they bear no regular proportion to those of other old trades in the neighbourhood. If the project succeeds, they are

commonly at first very high. When the trade or practice becomes thoroughly established and well known, the competition reduces them to the level of other trades.

进行任何一种新的制造业、商业或农业经营，总的来说都是一种投机，设计者希望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这种利润有时确实很大，但有时也许很小。不过一般说来，这种新行业的利润和当地及附近地区旧行业的利润往往不能保持固定的比例。如果投机成功，那么起初利润通常是非常高的，但当这一行业或做法开始变得稳定且众所周知时，竞争就会加剧，该行业利润将降到和其他行业相同的水平。

Secondly, this equality in the whole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labour and stock, can take place only in the ordinary, or what may be called the natural state of those employments.

第二，只在当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处在普通状态（自然状态）时，其利弊才会在总体上趋于平等。

The demand for almost every different species of labour is sometimes greater and sometimes less than usual. In the one case the advantages of the employment rise above, in the other they fall below the common level. The demand for country labour is greater at hay-time and harvest, than dur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 and wages rise with the demand. In time of war, when forty or fifty thousand sailors are forced from the merchant service into that of the king, the demand for sailors to merchant ships necessarily rises with their scarcity, and their wages upon such occasions commonly

rise from a guinea and seven-and-twenty-shillings, to forty shillings and three pounds a month. In a decaying manufacture, on the contrary, many workmen, rather than quit their old trade, are contented with smaller wages than would otherwise be suitable to the nature of their employment.

人们几乎对所有劳动的需求都在发生变化，有时大一些，有时小一些。当人们对某种劳动的需求上升时，使用这种劳动能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当人们对这种劳动的需求下降时，使用这种劳动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将降低到普通水平以下。在锄草期和收获期，人们对农村劳动的需求超过一年中的大部分时期，农村劳动的工资也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升高。在战争期间，当四五万海员被迫离开商船为国王服务时，人们对商船海员的需求必然由于海员短缺而增加，此时海员的工资常常由每月21先令至27先令上升到40先令至60先令。但是在日趋衰落的制造业中，情况却恰恰相反，许多劳动者不愿离开原来的职业，宁愿接受较少的工资，而这工资和他们工作的性质并不匹配。

The profits of stock vary with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ies in which it is employed. As the price of any commodity rises above the ordinary or average rate, the profits of at least some part of the stock that is employed in bringing it to market, rise above their proper level, and as it falls they sink below it. All commodities are more or less liable to variations of price, but some are much more so than others. In all commodities which are produced by human industry, the quantity of industry annually employed is necessarily regulated by the annual demand, in such a manner that the average annual produce may, as nearly as possible, be equal to the average annual consumption. In some employments,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the same quantity of industry will always produce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quantity of commodities. In the linen

or woollen manufactures, for example, the same number of hands will annually work up very nearly the same quantity of linen and woollen cloth. The variations in the market price of such commodities, therefore, can arise only from some accidental variation in the demand. A public mourning raises the price of black cloth. But as the demand for most sorts of plain linen and woollen cloth is pretty uniform, so is likewise the price. But there are other employments in which the same quantity of industry will not always produce the same quantity of commodities. The same quantity of industry, for example, will, in different years, produce very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corn, wine, hops, sugar, tobacco, etc. The price of such commodities, therefore, varies not only with the variations of demand, but with the much greater and more frequent variations of quantity, and is consequently extremely fluctuating. But the profit of some of the dealers must necessarily fluctuate with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ies. The operations of the speculative merchant are principally employed about such commodities. He endeavours to buy them up when he foresees that their price is likely to rise, and to sell them when it is likely to fall.

资本的利润随使用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当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至普通或平均率以上时，为了将这种商品送往市场而使用的资本中至少有一部分，其利润上升到正常水平之上；当商品价格下降至普通或平均率以下时，这部分资本利润也降到正常水平之下。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动，但有些商品的价格变动得比其他商品大得多。对于所有由人类劳动生产的商品而言，每年所使用的劳动数量一定受到每年对这种劳动需求的影响，从而使每年的平均产量尽可能和每年平均消费量相等。前面已经说过，在有些行业中，相同数量的劳动总能生产出相同数量或几乎相同数量的商品。例如在麻纺织业或呢绒纺织业中，相同数量的劳动者每年生产出的麻布或呢绒数量几乎相同。所以，这类商品的市场价格如果变动，

唯一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对这类商品的需求发生偶然变动。国丧使黑布的价格升高，但由于人们对大多数素色麻布和呢绒的需求几乎没有变动，所以素色麻布和呢绒的价格也几乎没有变动。但在有些行业中，相同数量的劳动却未必总能生产出相同数量的商品。例如，就谷物、葡萄酒、啤酒花、砂糖、烟草等商品来说，相同数量的劳动每年生产的商品数量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类商品的价格不仅随需求的变动而变动，而且随商品数量更大和更频繁的变动而变动，因此这类商品价格的变动是非常大的。但是，经营此类商品的一些商人的利润，一定随着此类商品价格的变动而变动。投机商人经营的，主要就是这类商品。当他们预见某种商品的价格可能上升时，就会大量买进；当他预见到商品的价格可能下降时，就会尽力卖出。

Thirdly, this equality in the whole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labour and stock, can take place only in such as are the sole or principal employments of those who occupy them.

第三，只有当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是使用者的唯一或主要用途时，其利弊才会在总体上趋于平等。

When a person derives his subsistence from one employment, which does not occupy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time, in the intervals of his leisure he is often willing to work at another for less wages than would otherwise suit the nature of the employment.

当一个人靠某种职业谋生，而这职业只占据他一小部分时间时，他往往愿意在闲暇时间从事另一种职业，虽然这种职业的工资较低，和工作性质并不相配，他也欣然接受。

There still subsists in many parts of Scotland a set of people called Cotters or Cottagers, though they were more frequent some years ago than they are now. They are a sort of out-servants of the landlords and farmers. The usual reward which they receive from their masters is a house, a small garden for potherbs, as much grass as will feed a cow, and, perhaps, an acre or two of bad arable land. When their master has occasion for their labour, he gives them, besides, two pecks of oatmeal a week, worth about sixteen pence sterling. During a great part of the year he has little or no occasion for their labour,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own little possession is not sufficient to occupy the time which is left at their own disposal. When such occupiers were more numerous than they are at present, they are said to have been willing to give their spare time for a very small recompence to anybody, and to have wrought for less wages than other labourers. In ancient times they seem to have been common all over Europe. In countries ill cultivated and worse inhabited, the greater part of landlords and farmers could not otherwise provide themselves with the extraordinary number of hands, which country labour requires at certain seasons. The daily or weekly recompence which such labourers occasionally received from their masters, was evidently not the whole price of their labour. Their small tenement made a considerable part of it. This daily or weekly recompence, however, seems to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the whole of it, by many writers who have collected the prices of labour and provisions in ancient times, and who have taken pleasure in representing both as wonderfully low.

在苏格兰许多地方，至今还有一种职业叫做农场雇工，不过现在这些人没有几年前那么常见了。他们是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的外佣工。他们从雇主那里得到的报酬通常是一间住宅，一块菜园，足够喂

一头奶牛的青草，再加上一两英亩不太好的耕地。当雇主偶尔需要他们的劳动时，每周也许还会给他们2配克价值约为16便士的燕麦片。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雇主很少需要或根本不需要他们的劳动，而且耕种这一小块土地也占用不了他们能够自己支配的全部时间。所以，在这些农场雇工数量比现在多的时候，据说他们在闲暇时间愿意为任何人工作，即使对方的报酬极少也不在乎，而且他们要求的工资常常比其他劳动者低。在古代，欧洲各地随处可见这种农场雇工。在土地耕作不良并且人口稀少的国家，某些季节需要大量人手从事田间劳作，大部分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正是由于雇佣了农场雇工，才解决了对劳动者的大量需求。这些农场雇工偶尔从雇主那里得到的日报酬或周报酬显然不是他们劳动的全部价格。他们在雇主那里租来的小块土地构成了他们劳动全部价格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很多学者在搜集古代劳动和食物价格时，似乎把农场雇工偶然得到的日报酬或周报酬看作他们劳动的全部价格，于是高兴地宣称古代的劳动和食物价格都超乎寻常地低。

The produce of such labour comes frequently cheaper to market than would otherwise be suitable to its nature. Stockings in many parts of Scotland are knit much cheaper than they can anywhere be wrought upon the loom. They are the work of servants and labourers, who derive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ir subsistence from some other employment. More than a thousand pair of Shetland stockings are annually imported into Leith, of which the price is from five pence to seven pence a pair. At Lerwick, the small capital of the Shetland Islands, ten pence a day, I have been assured, is a common price of common labour. In the same islands they knit worsted stockings to the value of a guinea a pair and upwards.

这类劳动产品常常以低于应有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在苏格兰很

多地方，编织袜子的价格比任何地方用织机织成的袜子的价格要便宜得多。这是因为编织这种袜子的佣工和劳动者从其他职业获得了主要的生活资料。每年从设得兰运到利斯的袜子优千余双，每双价格为5便士到7便士。我听说，在设得兰群岛的小首府勒威克，普通劳动的普通价格为每天10便士。在这些岛屿上，工人编织的毛袜一双值1几尼以上。

The spinning of linen yarn is carried on in Scotland nearly in the same way as the knitting of stockings, by servants who are chiefly hired for other purposes. They earn but a very scanty subsistence, who endeavours to get their whole livelihood by either of those trades. In most parts of Scotland she is a good spinner who can earn twenty pence a week.

在苏格兰，纺织亚麻线的工作和编织袜子的工作一样，也是工人们的副业，工人们主要以其他职业谋生。尽管纺麻工和织袜工都努力工作，希望能通过这类工作赚取全部生活资料，但他们实际从中只得到极其微薄的生活费。在苏格兰，一星期能赚得20便士的女纺麻工，就算是很有本事的纺麻工。

In opulent countries the market is generally so extensive, that any one trade is sufficient to employ the whole labour and stock of those who occupy it. Instances of people's living by one employ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deriving some little advantage from another, occur chiefly in poor countries. The following instance, however, of something of the same kind is to be found in the capital of a very rich one. There is no city in Europe, I believe, in which house-rent is dearer than in London, and yet I know no capital in which a furnished apartment can be hired so cheap.

Lodging is not only much cheaper in London than in Paris; it is much cheaper than in Edinburgh of the same degree of goodness; and what may seem extraordinary, the dearness of house-rent is the cause of the cheapness of lodging. The dearness of house-rent in London arises, not only from those causes which render it dear in all great capitals, the dearness of labour, the dearness of all the materials of building, which must generally be brought from a great distance, and above all the dearness of ground-rent, every landlord acting the part of a monopolist, and frequently exacting a higher rent for a single acre of bad land in a town, than can be had for a hundred of the best in the country; but it arises in part from the peculiar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which oblige every master of a family to hire a whole house from top to bottom. A dwelling-house in England means everything that is contained under the same roof. In France, Scotland, and many other parts of Europe, it frequently means no more than a single story. A tradesman in London is obliged to hire a whole house in that part of the town where his customers live. His shop is upon the ground-floor, and he and his family sleep in the garret; and he endeavours to pay a part of his house-rent by letting the two middle stories to lodgers. He expects to maintain his family by his trade, and not by his lodgers. Whereas, at Paris and Edinburgh, the people who let lodgings have commonly no other means of subsistence; and the price of the lodging must pay, not only the rent of the house, but the whole expence of the family.

在富裕的国家，市场范围通常相当广阔，投入各行各业的全部劳动和资本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穷国的百姓才会以一种工作谋生，同时又从其他工作中获得微薄的收入。下面我要说的例子和上述情况有些相似，但却发生在一个很富裕国家的首都。我相信在整个欧洲，如果租一整套房子，伦敦的房租算是最高的

了。但是我也相信，在整个欧洲，也只有在伦敦才能租到一间既配有家具，房租又相对低廉的公寓。在伦敦分租房子不仅比巴黎要便宜得多，而且就同等质量的房屋来说，也比爱丁堡便宜得多。人们也许会感到惊奇，租一整套房屋租金高昂竟是分租房子租金低廉的原因。大城市房租的高昂都是由于以下几种原因：劳动价格昂贵，建筑材料昂贵（一般从较远地方运来），尤其是地租昂贵（所有的土地所有者都是垄断者，他们对城镇一英亩的坏土地所收的地租，都要比乡村100英亩最好的土地所收的地租还要高）。伦敦房租高昂，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伦敦人民特有的风俗和习惯：伦敦家庭如果租房子，一定要把从顶层到底层的整栋房子全部租下来。在法兰西、苏格兰以及欧洲其他地方，住宅常常只意味着建筑物的一层，而在英格兰，住宅意味着同一屋顶下的所有房间。伦敦商人必须要在顾客所在的城市租一整栋房屋。他把底层作为自己的店铺，顶楼作为他自己和家人休息的地方，中间两层分租给其他人，以收回一部分房租。他希望靠经营店铺维持自己的家庭生活，并不希望靠分租的租金来养活家庭。而在巴黎和爱丁堡，把房屋分租给房客的人通常没有其他谋生的手段，因此，分租所得的租金不仅要支付房屋的全部租金，而且要支付家庭全部的生活费。

Part II. Inequalities occasioned by the Policy of Europe

第二节、欧洲政策导致的不平等

Such are the inequalities in the whole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labour and stock, which the defect of any of the three requisites abovementioned must occasion, even where there is the most perfect liberty. But the policy of Europe, by not leaving things at perfect liberty, occasions other inequalities of much greater importance.

由此可见，即使在拥有绝对自由的地方，只要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一个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利弊就一定不会平等。但是，由于欧洲政策不允许事物绝对自由地发展，因此还造成了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不平等的现象。

It does this chiefly in the three following ways. First, by restraining the competition in some employments to a smaller number than would otherwise be disposed to enter into them; secondly, by increasing it in others beyond what it naturally would be; and, thirdly, by obstructing the free circulation of labour and stock, both from employment to employment and from place to place.

欧洲政策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造成这种不平等的：第一，限制某些行业中的竞争人数，使其人数少于不加限制时可能进入这一行业的人数；第二，增加某些行业中的竞争人数，使其超过自然状态下这一行业内的竞争人数；第三，阻止劳动和资本自由流通，不允许他们从一种行业转移到另一种行业，或者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First, the policy of Europe occasions a very important inequality in the whole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labour and stock, by restraining the competition in some employments to a smaller number than might otherwise be disposed to enter into them.

第一，欧洲的政策，由于限制某些行业中的竞争人数，使其人数少于不加限制时可能进入这一行业的人数，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不同用

途的利弊产生了很大的不平等。

The exclusive privileges of corporations are the principal means it makes use of for this purpose.

同业公会的排外特权是欧洲政策限制某些行业内竞争人数的主要手段。

The exclusive privilege of an incorporated trade necessarily restrains the competition, in the town where it is established, to those who are free of the trade. To have served an apprenticeship in the town, under a master properly qualified, is commonly the necessary requisite for obtaining this freedom. The bye-laws of the corporation regulate sometimes the number of apprentices which any master is allowed to have, and almost always the number of years which each apprentice is obliged to serve. The intention of both regulations is to restrain the competition to a much smaller number than might otherwise be disposed to enter into the trade. The limitation of the number of apprentices restrains it directly. A long term of apprenticeship restrains it more indirectly, but as effectually, by increasing the expence of education.

一个行业如果拥有同业公会的排他特权，那么一定会限制其所在的城市中该行业的竞争人数，只允许那些拥有经营本行业自由的人相互竞争。而获得某行业经营自由的必要条件，通常是给当地有资格的师傅做学徒。同业公会有时限定每位师傅带的学徒人数，而且常常规定每个学徒必须做满的学习年限。同业公会这些规定的目的，在于限制该行业中的竞争人数，使其人数少于不加限制时可能进入这一行业

的人数。限制每位师傅带的学徒人数可以直接限制竞争，而规定比较长的学徒年限，由于增加了学习费用，从而间接限制了竞争。两个方法同样有效。

In Sheffield no master cutler can have more than one apprentice at a time, by a bye-law of the corporation. In Norfolk and Norwich no master weaver can have more than two apprentices, under pain of forfeiting five pounds a month to the king. No master hatter can have more than two apprentices anywhere in England, or in the English plantations, under pain of forfeiting five pounds a month, half to the king, and half to him who shall sue in any court of record. Both these regulations, though they have been confirmed by a public law of the kingdom, are evidently dictated by the same corporation spirit which enacted the bye-law of Sheffield. The silk weavers in London had scarce been incorporated a year when they enacted a bye-law, restraining any master from having more than two apprentices at a time. It required a particular Act of Parliament to rescind this bye-law.

同业公会规定，谢菲尔德的刀匠师傅一次只能带一个徒弟。诺福克及诺里奇的织匠师傅一次带的徒弟不能超过两人，违者每月向国王缴纳5英镑的罚款。在英格兰及英属各殖民地，帽匠师傅一次带的徒弟也不能超过两人，违者每月罚款5英镑，一半交给在法庭投诉的人。英格兰和英属殖民地的这些规定，虽然得到了联合王国一项公法的确认，但显然是按照为谢菲尔德制定规则的同业公会的精神制定的。在伦敦丝织业，同业公会成立不到一年，就规定每位师傅一次带的徒弟不得超过两人。直到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这个规定才被撤销。

Seven years seem anciently to have been, all over Europe, the usual term established for the duration of apprenticeships in the greater part of incorporated trades. All such incorporations were anciently called universities, which indeed is the proper Latin name for any incorporation whatever. The university of smiths, the university of taylors,etc. are expressions which we commonly meet with in the old charters of ancient towns. When those particular incorporations which are now peculiarly called universities were first established, the term of years which it was necessary to study, in order to obtain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appears evidently to have been copied from the terms of apprenticeship in common trades, of which the incorporations were much more ancient. As to have wrought seven years under a master properly qualified, was necessary, in order to intitle any person to become a master, and to have himself apprenticed in a common trade; so to have studied seven years under a master properly qualified, was necessary to entitle him to become a master, teacher, or doctor (words anciently synonymous) in the liberal arts, and to have scholars or apprentices (words likewise originally synonymous) to study under him.

过去，欧洲大部分有同业公会组织的行业，似乎都把学徒期限定为7年。所有这些同业公会在过去被称为“大学”，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拉丁名字，适合各种工业组织。在古代城市的古老宪章中，常常可以见到铁匠大学，裁缝大学这样的字眼。现在被叫做“大学”的这些组织在成立之初，也对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所必需的学习年限做了规定，这种规定明显是模仿一般行业中同业公会规定的学徒年限。就像在一般行业中，任何人都得给有资格的师傅做7年的学徒，才能成为师傅并带学徒，同样，在大学，一个人也要给有资格的师傅做7年的学徒，才能成为大师、教师或学者（这三个词语在过去是同义词），而且才能收学生或学徒（这两个词语在古代也是同义词）。

By the 5th of Elizabeth, commonly called the Statute of Apprenticeship, it was enacted, that no person should for the future exercise any trade, craft, or mystery at that time exercised in England, unless he had previously served to it an apprenticeship of seven years at least; and what before had been the bye-law of many particular corporations, became in England the general and public law of all trades carried on in market towns. For though the words of the statute are very general, and seem plainly to include the whole kingdom, by interpretation its operation has been limited to market towns, it having been held that in country villages a person may exercise several different trades, though he has not served a seven years' apprenticeship to each, they being necessary for the conveniency of the inhabitants,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frequently not being sufficient to supply each with a particular set of hands.

伊丽莎白第五年颁布了一项学徒法令，法令规定，自此之后，无论何人，必须至少做满七年学徒，否则不得从事当时英格兰所有的手艺、工艺或技艺。于是诸多同业公会曾经制定的规则，现在变成英格兰各行各业遵循的普遍和公共法则。虽然该法令的用词十分笼统，似乎涵盖了整个王国，但根据解释，其效力仅限于城镇。在乡村，一个人可能从未做过7年学徒，但他可以同时从事很多种不同行业。农村的人口数量有限，常常不能为所有行业提供足够的人手，于是为了方便村民的生活，上述一群人的存在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By a stri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s, too, the operation of this statute has been limited to those trades which were established in England before the 5th of Elizabeth, and has never been extended to such as have been introduced since that time. This limitation has given occasion to several distinctions which, considered as rules of

police, appear as foolish as can well be imagined. It has been adjudged, for example, that a coachmaker can neither himself make nor employ journeymen to make his coach-wheels, but must buy them of a master wheel-wright; this latter trade having been exercised in England before the 5th of Elizabeth. But a wheelwright, though he has never served an apprenticeship to a coachmaker, may either himself make or employ journeymen to make coaches; the trade of a coachmaker not being within the statute, because not exercised in England at the time when it was made. The manufactures of Manchester, Birmingham, and Wolverhampton, are many of them, upon this account, not within the statute, not having been exercised in England before the 5th of Elizabeth.

此外，根据法令用语严格的解释，该法令的效力仅限于伊丽莎白第五年以前在英格兰建立起来的行业，并不涉及在此之后新建立的行业。该法令的这种局限使得一些行业遭到了区别对待，而对这些行业区别对待竟然成为一种政策规定，实在是愚蠢之极。例如，车轮制造业是伊丽莎白第五年以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行业，因此根据规定，马车制造匠（由于没有在车轮制造匠门下做过门徒）不能自己制造车轮，也不能雇佣别人制造车轮，只能向车轮匠购买。但是由于马车制造业是学徒法令颁布以后才在英格兰建立起来的行业，不受该法令的限制，因此车轮匠即使没有在马车制造匠门下做过学徒，也可以自己制造或雇佣工人制造马车。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伍尔弗汉普顿等地，就有很多制造业是伊丽莎白五年以后才在英格兰建立起来的，这些制造业也是出于同样的缘故，不受学徒法令的限制。

In France, the duration of apprenticeships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towns and in different trades. In Paris, five years is the term required in a great number; but before any person can be qualified to exercise the trade as a master, he must, in many of

them, serve five years more as a journeyman. During this latter term he is called the companionof his master, and the term itself is called his companionship.

在法国，不同城市和不同行业规定的学徒年限是不一样的。在巴黎，虽然大多数行业都把学徒年限规定为5年，但如果一个人想在某一行业取得师傅资格，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要再做5年的帮工。在这5年期间，他被称为师傅的伙伴，而这5年的时间被称为他的伙伴期。

In Scotland there is no general law which regulates universally the duration of apprenticeships. The term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rporations. Where it is long, a part of it may generally be redeemed by paying a small fine. In most towns, too, a very small fine is sufficient to purchase the freedom of any corporation. The weavers of linen and hempen cloth, the principal manufactures of the country, as well as all other artificers subservient to them, wheel-makers, reel-makers, etc. may exercise their trades in any town corporate without paying any fine. In all towns corporate all persons are free to sell butcher's meat upon any lawful day of the week. Three years in Scotland is a common term of apprenticeship, even in some very nice trades; and in general I know of no country in Europe in which corporation laws are so little oppressive.

在苏格兰，法律没有对学徒年限作统一规定。各同业公会对学徒年限有自己的规定。有些同业公会规定的年限较长，此时一般可通过缴纳少量金额来缩短期限。此外，在大多数城市，只要缴纳少量金额，就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哪个同业公会。亚麻布和大麻布（苏格兰主要制造业）的织麻工，以及其附属的其他各种技工，如车轮制造师、

纺车制造师等，不用缴纳任何罚款，就可以在任何自治市从事本行业。在各自治城市，所有人都可以在一周的法定时间内自由从事屠夫的工作，即出售肉类。苏格兰的学徒年限一般为3年，即使在那些对技巧要求非常精细的行业也是如此。据我所知，一般说来，苏格兰同业公会的规则在整个欧洲应该是最宽松的了。

The property which every man has in his own labour, as it is the original foundation of all other property, so it is the most sacred and inviolable. The patrimony of a poor man lies in the strength and dexterity of his hands; and to hinder him from employing this strength and dexterity in what manner he thinks proper without injury to his neighbour, is a plain violation of this most sacred property. It is a manifest encroachment upon the just liberty both of the workman, and of those who might be disposed to employ him. As it hinders the one from working at what he thinks proper, so it hinders the others from employing whom they think proper. To judge whether he is fit to be employed, may surely be trusted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employers whose interest it so much concerns. The affected anxiety of the law-giver lest they should employ an improper person, is evidently as impertinent as it is oppressive.

劳动所有权作为其他一切所有权的原始基础，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与技巧。他能够通过自认为适当而又不伤害邻居的方式使用他的体力与技巧，如果对此加以阻止，显然是对他最神圣的劳动财产的侵犯。这样做不但侵犯了这位工人的正当自由，而且还侵犯了可能雇佣这位工人的雇主的正当自由。这样做一方面妨碍了工人从事自己认为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妨碍了雇主雇佣合适的工人。一个工人到底适不适合雇佣，当然要由和此事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雇主自行定夺。法律制定者假装担心雇主雇不到合适的工人而出面干涉，显然是既霸道又无礼的。

The institution of long apprenticeships can give no security that insufficient workmanship shall not frequently be exposed to public sale. When this is done it is generally the effect of fraud, and not of inability; and the longest apprenticeship can give no security against fraud. Quite different regulations are necessary to prevent this abuse. The sterling mark upon plate, and the stamps upon linen and woollen cloth, givethe purchaser much greater security than any statute of apprenticeship. He generally looks at these, but never thinks it worth while to inquire whether the workman had served a seven years' apprenticeship.

规定较长的学徒期限并不能保证市场上不会出现不合格的制造品。当市场上出现这类次品时，常常不是由于工人能力差，而是欺诈的结果。哪怕是学徒年限最长的地方，也不能保证工人没有欺诈行为。所以，为了防止出现这种问题，需要制定一种完全不同的法规。金属器皿上刻有纯度记号，麻布和呢绒上印有检记，比学徒法令更能让购买者放心。购买者一般只看记号或检印，至于制造货物的工人是否做过7年学徒，他们常常认为是没有必要询问的。

The institution of long apprenticeships has no tendency to form young people to industry. A journeyman who works by the piece is likely to be industrious, because he derives a benefit from every exertion of his industry. An apprentice is likely to be idle, and almost always is so, because he has no immediate interest to be otherwise. In the inferior employments, the sweets of labour consist altogether in the recompence of labour. They who are soonest in a condition to enjoy the sweets of it, are likely soonest to conceive a relish for it, and to acquire the early habit of industry. A young man naturally conceives an aversion to labour, when for a long time he

receives no benefit from it. The boys who are put out apprentices from public charities are generally bound for more than the usual number of years, and they generally turn out very idle and worthless.

规定较长的学徒年限也无助于培养年轻人的勤劳习惯。按件计资的劳动者可能是最勤奋的，因为他每努力一分，都能从中得到好处。而学徒几乎总是偷懒，因为勤奋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在低级职业中，劳动的乐趣完全在于获得劳动报酬。谁能最快享受到劳动的乐趣（即最快获得劳动报酬），谁就能最快对劳动感兴趣，也就能最早养成勤劳的习惯。如果一个年轻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从劳动中获得任何好处，那么他自然会讨厌劳动。公共慈善团体送去做学徒的儿童，其学徒年限一般比普通人的年限长，结果就是，这些人多数都变得非常懒惰，一无是处。

Apprenticeships were altogether unknown to the ancients. The reciprocal duties of master and apprentice make a considerable article in every modern code. The Roman law is perfectly silent with regard to them. I know no Greek or Latin word (I might venture, I believe, to assert that there is none) which expresses the idea we now annex to the word *Apprentice* , a servant bound to work at a particular trade for the benefit of a master, during a term of years, upon condition that the master shall teach him that trade.

古代没有学徒制度。虽然每一部现代法典都用相当的篇幅详细介绍师傅和学徒间的各种相互义务，但是《罗马法》却对这种义务只字不提。我们现在所说的“学徒”这个词语，指的是在某段时间内，师傅教会徒弟从事某种职业，而作为回报，徒弟为师傅的利益免费工作。无论在希腊语中还是在拉丁语中，我都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表达这个

概念（我相信，或许可以大胆猜测，在这两个语言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字眼）。

Long apprenticeships are altogether unnecessary. The arts, which are much superior to common trades, such as those of making clocks and watches, contain no such mystery as to require a long course of instruction. The first invention of such beautiful machines, indeed, and even that of some of the instruments employed in making them, must, no doubt, have been the work of deep thought and long time, and may justly be considered as among the happiest efforts of human ingenuity. But when both have been fairly invented and are well understood, to explain to any young man, in the completest manner, how to apply the instruments and how to construct the machines, cannot well require more than the lessons of a few weeks: perhaps those of a few days might be sufficient. In the common mechanic trades, those of a few days might certainly be sufficient. The dexterity of hand, indeed, even in common trades, cannot be acquired without much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But a young man would practise with much more diligence and attention, if from the beginning he wrought as a journeyman, being paid in proportion to the little work which he could execute, and paying in his turn for the materials which he might sometimes spoil through awkwardness and inexperience. His education would generally in this way be more effectual, and always less tedious and expensive. The master, indeed, would be a loser. He would lose all the wages of the apprentice, which he now saves, for seven years together. In the end, perhaps, the apprentice himself would be a loser. In a trade so easily learnt he would have more competitors, and his wages, when he came to be a compleat workman, would be much less than at present. The same increase of competition would reduce the profits of the masters as well as the

wages of the workmen. The trades, the crafts, the mysteries, would all be losers. But the public would be a gainer, the work of all artificers coming in this way much cheaper to market.

规定较长的学徒年限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比普通手艺高超得多的技艺，比如说钟表制造，也并没有什么秘诀，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教授。诚然，为了把这些美妙的机器发明出来，甚至把用来制造这些机器的一些工具发明出来，发明者一定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深刻思考。这些发明确确实实堪称人类智慧最可喜的成果。但是，这些机器和工具一旦被发明出来，其运作原理一旦被完全理解，那么，要向年轻人详细讲解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这些机器的制造程序，大概只需要几星期的时间，甚至几天的时间。在一般的机械工业中，讲授几天的时间也就够了。诚然，即使在普通的行业中，一个人也必须经过大量的实践和体验才能熟练工作。但是，如果一开始就让一个年轻人做帮工，根据他所做的少量工作对他给予适当的报酬，并且当他因技术不精或经验不足损坏材料时，要求他做出相应赔偿，那么他在工作时就会更加勤奋，更加仔细。他通过这种方式学习行业知识通常更有效，而且过程更有趣，花费也相对更少。诚然，在这种情况下，师傅将会遭受损失。因为倘若按照这种想法，师傅须向学徒提供7年的工资，而他本无须支付这份工资。最终学徒本身可能也会遭受损失。因为如果该行业的知识这么容易学会，那么学徒将遇到更多的竞争者，于是，当他离开师傅，成为真正的工人时，他的工资将比现在少得多。激烈的竞争不仅会降低工人的工资，也会降低师傅的利润。无论是行业本身，还是行业内的技艺、秘诀，都会遭受损失。但公众却会从中获利，因为这样一来，市场上所有技工的制造品都会便宜许多。

It is to prevent this reduction of price, and consequently of wages and profit, by restraining that free competition which would most certainly occasion it, that all corporations,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corporation law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erect a

corporation, no other authority in ancient times was requisite in many parts of Europe, but that of the town corporate in which it was established. In England, indeed, a charter from the king was likewise necessary. But this prerogative of the crown seems to have been reserved rather for extorting money from the subject, than for the defence of the common liberty against such oppressive monopolies. Upon paying a fine to the king, the charter seems generally to have been readily granted; and when any particular class of artificers or traders thought proper to act as a corporation without a charter, such adulterine guilds, as they were called, were not always disfranchised upon that account, but obliged to fine annually to the king for permission to exercise their usurped privileges. The immediate inspection of all corporations, and of the bye-laws which they might think proper to enact for their own government, belonged to the town corporate in which they were established; and whatever discipline was exercised over them,proceeded commonly, not from the king, but from that greater incorporation of which those subordinate ones were only parts or members.

正是为了防止自由竞争造成这样的价格下降，防止工资和利润进一步下降，人们才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同业公会，这些公会的大部分规定也是出于相同目的而设立的。在古代欧洲的大多数地方，人们若想要成立同业公会，只需取得公会所在地的自治城市的许可即可。在英格兰，人们还须取得国王的特许状。不过，国王之所以保留这种特权，似乎不是为了防止这些压迫性的垄断组织侵犯大众自由，而是为了向臣民榨取钱财。通常来说，只要向国王缴纳一定的金额，似乎很容易获得这种特许状。任何一类技工或商人，假使不认同经国王特许而设立同业公会，那么他们的同业公会将被人视为不正当组织。尽管如此，这些同业公会却并不总是因此而解散，只要向国王缴纳一定的罚金，公会便可行使被强行剥夺的权利。同业公会所在的自治市对一

切同业公会，以及这些同业公会制定的、认为有利于其自我管理的规则具有直接监督权。因此无论这些同业公会被要求遵守哪些规定，通常都不是国王的命令，而是他们所在的自治市这个更大的同业组织的命令。对于这个更大的同业组织而言，这些附属的同业公会只是它的一部分或是它的成员。

The government of towns corporate was altogether in the hands of traders and artificers, and it was the manifest interest of every particular class of them, to prevent the market from being over-stocked, as they commonly express it, with their own particular species of industry, which is in reality to keep it always under-stocked. Each class was eager to establish regulations proper for this purpose, and, provided it was allowed to do so, was willing to consent that every other class should do the same. In consequence of such regulations, indeed, each class was obliged to buy the goods they had occasion for from every other within the town, somewhat dearer than they otherwise might have done. But in recompence, they were enabled to sell their own just as much dearer; so that so far it was as broad as long, as they say; and in the dealings of the different classes within the town with one another, none of them were losers by these regulations. But in their dealings with the country they were all great gainers; and in these latter dealings consists the whole trade which supports and enriches every town.

自治城市的统治权完全掌握在商人和技工手中。对于他们每个阶层来说，防止通常所说的各自行业的产品在市场上存货过多，实际上就是使他们各自行业的产品在市场上常常存货不足，这样做显然是符合他们各自利益的。每个阶层都迫切希望制定合适的规则以达到这个目的，而且只要自己得到允许，他们也乐于统一同意所有其他阶层都

制定规则。诚然，有了这些规则，每个阶层都要以略高于平常的价格向他人购买所需商品，但作为补偿，他们自己的商品也能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这样一来就像他们说的那样，进出相抵，没有区别。在同一城市各个阶层的相互交易过程中，没有哪个阶层因为这个规则而蒙受损失。但他们与农村交易时，却能获得巨额利益。维持各城市并使各城市富裕的，正是这种交易。

Every town draws its whole subsistence, and all the materials of its industry, from the country. It pays for these chiefly in two ways: first, by sending back to the country a part of those materials wrought up and manufactured; in which case their price is augmented by the wages of the workmen, and the profits of their masters or immediate employers; secondly, by sending to it a part both of the rude and manufactured produce, either of other countries, or of distant parts of the same country, imported into the town; in which case, too, the original price of those goods is augmented by the wages of the carriers or sailors, and by the profits of the merchants who employ them. In what is gained upon the first of those two branches of commerce,consists the advantage which the town makes by its manufactures; in what is gained upon the second, the advantage of its inland and foreign trade. The wages of the workmen, and the profits of their different employers, make up the whole of what is gained upon both. Whatever regulations, therefore, tend to increase those wages and profits beyond what they otherwise would be, tend to enable the town to purchase, with a smaller quantity of its labour, the produce of a greater quantity of the labour of the country. They give the traders and artificers in the town an advantage over the landlords, farmers, and labourers in the country, and break down that natural equality which would otherwise take place in the commerce which is carried on between them.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bour of the society is

annually divided between those two different sets of people. By means of those regulations a greater share of it is given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own than would otherwise fall to them; and a less to those of the country.

任何城市的生活资料与工业原料都要靠农村供给。城市主要通过两种方法支付这些资料与原料：第一，把原料中的一部分进行加工，制成成品后送还农村，这样，这部分原料的价格因附加了工人的劳动工资以及老板或直接雇主的利益而增高。第二，把从外国进口或从国内遥远的地方运到城市的粗制品或精制品的一部分送往农村，这样，这些商品的价格因附加了水陆运输中工人和海员的工资以及雇佣他们的商人的利润而增高。这是城市的两种商业模式。在第一种商业模式中，城市靠自己的制造业获取利益；在第二种商业模式中，城市靠它的对内及对外贸易获取利益。工人的工资以及各种雇主的利润，构成了这两种商业模式的全部收益。所以，无论制定何种规则，只要使这些工资和利润比以前有所增加，那么城市就可以用较少量的劳动，购买较多量的农村劳动产品。在这种规则的管理下，城市商人和技工比农村的土地所有者、农场主及农业劳动者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城市与农村贸易间应有的自然平等被打破。社会劳动的全部年产品每年都在这两部分人中间分配。由于有了这些规则，城市居民享受的份额比应得的大，农村居民享受的份额比应得的小。

The price which the town really pays for the provisions and materials annually imported into it, is the quantity of manufactures and other goods annually exported from it. The dearer the latter are sold, the cheaper the former are bought. The industry of the town becomes more, and that of the country less advantageous.

城市对每年由农村输入的食品和原料所给付的代价，实际上等于

它每年输往农村的制造品及其他物品的数量。输出品的卖价愈高，输入品的买价便愈低。城市产业就更为有利，而农村产业就更为不利。

That the industry which is carried on in towns is, everywhere in Europe, more advantageous than that which is carried on in the country, without entering into any very nice computations, we may satisfy ourselves by one very simple and obvious observation. In every country of Europe we find, at least, a hundred people who have acquired great fortunes from small beginnings by trade and manufactures, the industry which properly belongs to towns, for one who has done so by that which properly belongs to the country, the raising of rude produce by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land. Industry, therefore, must be better rewarded, the wages of labour and the profits of stock must evidently be greater in the one situation than in the other. But stock and labour naturally seek the most advantageous employment. They naturally, therefore, resort as much as they can to the town, and desert the country.

在欧洲任何地方，城市产业总是比农村产业更为有利。为证明这一点，我们无需进行周密计算，略加观察下面这个明显的现象就可一目了然。在欧洲各国，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起初以小本经营，从事商业和制造业这类城市特有的行业并最终赚得盆满钵满的，至少有100人，而从事改良和耕作土地以生产天然产物这种农村产业并最终赚的盆满钵的，却只有1人。所以，和农村产业相比，城市产业的报酬一定更加丰厚，城市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一定明显更高。但是，劳动和资本寻找最有利的用途，这是事物的自然规律，因此它们自然要尽量离开农村，汇入城市。

The inhabitants of a town, being collected into one place, can

easily combine together. The most insignificant trades carried on in towns have accordingly, in some place or other, been incorporated; and even where they have never been incorporated, yet the corporation spirit, the jealousy of strangers, the aversion to take apprentices, or to communicate the secret of their trade, generally prevail in them, and often teach them, by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agreements, to prevent that free competition which they cannot prohibit by bye-laws. The trades which employ but a small number of hands, run most easily into such combinations. Half a dozen wool-combers, perhaps, are necessary to keep a thousand spinners and weavers at work. By combining not to take apprentices they can not only engross the employment, but reduce the whole manufacture into a sort of slavery to themselves, and raise the price of their labour much above what is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ir work.

城市居民住在同一个地方，因此容易联合起来。在城市里，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业，在某些地方也有同业公会。即使有些地方没有设立同业公会，人们也都有同业公会的精神，换句话说，他们猜忌外乡人，不愿意收学徒，不愿意把行业秘密告诉他人。这种精神往往教导他们通过自愿联合或签署协定的方式，阻止自由竞争的出现（同业公会制定的规则往往无法彻底阻止此类竞争）。只有少数人从事的行业最容易形成这种联合。比如，五六个梳毛工就可同时供应1000个纺麻工和织麻工工作所需的毛纱。如果这些梳毛工彼此联合起来，不收学徒，那么他们不仅能垄断这种工艺，而且还使整个羊毛制造业成为他们的奴隶，使他们劳动的价格大大超过按照其工作性质所应有的工资。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dispersed in distant places, cannot easily combine together. They have not only never been incorporated, but the corporation spirit never has prevailed among

them. No apprenticeship has ever been thought necessary to qualify for husbandry, the great trade of the country. After what are called the fine arts, and the liberal professions, however, there is perhaps no trade which requires so great a variety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he innumerable volumes which have been written upon it in all languagesmay satisfy us, that, among the wisest and most learned nations, it has never been regarded as a matter very easily understood. And from all those volumes we shall in vain attempt to collect that knowledge of its various and complicated operations, which is commonly possessed even by the common farmer; how contemptuously soever the very contemptible authors of some of them may sometimes affect to speak of him. There is scarce any common mechanic trade, on the contrary, of which all the operations may not be as completely and distinctly explained in a pamphlet of a very few pages, as it is possible for words illustrated by figures to explain them. In the history of the arts, now publishing by the 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 several of them are actually explained in this manner. The direction of operations, besides, which must be varied with every change of the weather, as well as with many other accidents, requires much more judgment and discretion, than that of those which are always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农村居民居住较分散，彼此距离较远，不容易联合起来。他们不仅从未设立过同业公会，而且也从未受过这种公会精神的熏陶。农村人认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事农业劳动（务农是农村最大的行业），他们从未想过要想务农还要先做几年学徒才能取得资格。但是事实是，农业就像美术和自由职业一样，需要很多复杂的知识和经验。各国用不同文字著成的关于农业的书籍可谓数不胜数，这表明，即使在那些最有智慧、最有学识的国家，人们也都觉得农业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许多普通农民熟练掌握的农业操作，实际上十分复杂，甚至在

书中都难觅踪迹。然而有些书的作者在谈到农民时，表现出了何等的鄙视啊！与农业相反，在任何普通的机械行业中，只需薄薄几页的小册子，或是几张插图就可对所有操作做出详尽明了的解释。实际上，在现在法国科学院发行的工艺史中，某些工艺就是用这种方式进行说明的。此外，农业操作总是随着天气的变化以及很多意外事故而有所不同，因此和介绍那些一成不变或几乎一成不变的操作相比，介绍农业操作需要进行更多的判断和思考。

Not only the art of the farmer,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operations of husbandry, but many inferior branches of country labour, require much more skill and experience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mechanic trades. The man who works upon brass and iron, works with instruments and upon materials of which the temper is always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But the man who ploughs the ground with a team of horses or oxen, works with instruments of which the health, strength, and temper, are very different upon different occasions. The condition of the materials which he works upon, too, is as variable as that of the instruments which he works with, and both require to be managed with much judgment and discretion. The common ploughman, though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pattern of stupidity and ignorance, is seldom defective in this judgment and discretion. He is less accustomed, indeed, to social intercourse than the mechanic who lives in a town. His voice and language are more uncouth and more difficult to be understood by those who are not used to them. His understanding, however, being accustomed to consider a greater variety of objects, is generally much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other, whose whole attention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is commonly occupied in performing one or two very simple operations. How much the lower ranks of people in the country are really superior to those of the town, is well known to every man whom either business or curiosity has led to converse

much with both. In China and Indostan accordingly both the rank and the wages of country labourers are said to be superior to thos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They would probably be so everywhere, if corporation laws and the corporation spirit did not prevent it.

农民通过劳动掌握的复杂技术是农业操作的普遍方法，这需要大量经验的积累以及很高的熟练程度，此外，农村中很多低级劳动对经验与熟练程度的要求也很高，远远超过大部分机械行业的要求。加工铜铁的工人，其使用的工具和材料的性质总是相同或几乎相同。但是使用几匹马或几头牛犁地的农民，在劳动的过程中却要用到很多种工具，每一种工具的完好程度，工作性质以及操作时需要的力气都不相同。就像他用的工具常常不同，他劳动的对象也总是发生变化，这些都需要他运用很大的判断力和思辨力来处理。普通庄稼汉，虽然常常被人们认为既愚蠢又无知，但却几乎都有这种判断力和思辨力。诚然，他不像住在城市的机械工人那样习惯社交，他的声音和语言比较粗鲁，听不惯他们说话的人很难理解。但他习惯于考虑各种各样的事物，他的理解力通常比那些从早到晚、注意力只集中到一两项简单操作的人要强得多。任何一个人，只要因工作关系或者为好奇心所驱使，曾和农村下层人民与城市下层人民有过较多的接触，就会发现，农村下层人民比城市下层人民要优秀得多。据说，在中国和印度，农村劳动者的地位与工资，都比大多数技工和制造业者高。如果不是同业公会的规则及其精神从中作梗，世界各地方也许都和中国、印度斯坦一样。

The superiority which the industry of the towns has everywhere in Europe over that of the country, is not altogether owing to corporations and corporation laws. It is supported by many other regulations. The high duties upon foreign manufactures and upon all goods imported by alien merchants, all tend to the

same purpose. Corporation laws enable the inhabitants of towns to raise their prices, without fearing to be undersold by the free competition of their own countrymen. Those other regulations secure them equally against that of foreigners. The enhancement of price occasioned by both is everywhere finally paid by the landlords, farmers, and labourers of the country, who have seldom op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monopolies. They have commonly neither inclination nor fitness to enter into combinations; and the clamour and sophistry of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easily persuade them that the private interest of a part, and of a subordinate part of the society, is the general interest of the whole.

不过，在欧洲各地，城市产业比农村产业更优越，并不完全是同业公会和公会法规的结果。还有其他很多法规使城市产业处于优越地位。比如同样出于这一目的，人们对外国制造品和外国商人输入的一切商品都征收高额的进口税。同业公会的各种法规使城市居民能够抬高他们的商品价格，不用担心国民间的自由竞争会降低商品价格。对外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使城市居民不怕外人的竞争。这两种法规使商品价格增高，而不论在何处，这增高的部分最终都要由农村的土地所有者、农场主和劳动者负担。他们对于这种垄断现象几乎从未反抗。他们既不想也不适合联合，商人和制造业者的鼓吹和诡辩很容易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且处于从属地位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是整个社会的利益。

In Great Britain the superiority of the industry of the towns over that of the country, seems to have been greater formerly than in the present times. The wages of country labour approach nearer to those of manufacturing labour, and the profits of stock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to those of trading and manufacturing stock, than

they are said to have done in the last century, or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This change may be regarded as the necessary, though very late consequence of the extraordinary encouragement given to the industry of the towns. The stock accumulated in them comes in time to be so great that it can no longer be employed with the ancient profit in that species of industry which is peculiar to them. That industry has its limits like every other; and the increase of stock; by increasing the competition, necessarily reduces the profit. The lowering of profit in the town forces out stock to the country, where, by creating a new demand for country labour, it necessarily raises its wages. It then spreads itself, if I may say so, over the face of the land, and by being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is in part restored to the country, at the expence of which, in a great measure, it had originally been accumulated in the town. That everywhere in Europe the greatest improvements of the country have been owing to such overflowings of the stock originally accumulated in the towns, I shall endeavour to show hereafter;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demonstrate, that though some countries have by this course attained 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opulence, it is in itself necessarily slow, uncertain, liable to be disturbed and interrupted by innumerable accidents, and in every respect contrary to the order of nature and of reason. The interests, prejudices, laws and customs which have given occasion to it, I shall endeavour to explain as fully and distinctly as I can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books of this Inquiry.

一直以来，大不列颠的城市产业对农村产业都处于优越地位，在过去，城市产业的优势更加明显。现在农村劳动工资更接近于制造业劳动工资，农业资本利润更接近于贸易和制造业的资本利润，但在上个世纪或本世纪初期，二者的差距却非常大。这种变化，虽然出现如此之晚，却是以前过分奖励城市产业的必然结果。城市产业在过去的

发展中已然累积了巨额的资本，若把这些资本全用在城市产业上，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获得丰厚的利润了。城市所特有的产业与其他所有的产业一样，也有一定的限度，随着资本增加，竞争更加激烈，势必将降低资本利润。城市利润一旦降低，资本一定会流向农村，这样就对农村劳动产生了新的需求，从而必然提高农村劳动工资。资本就这样扩散到农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些资本的大部分，原本靠牺牲农村的利益在城市累积，现在又通过在农业方面的使用，部分资本又流回农村。在当今的欧洲各国，农村所经历的种种巨大改良，都是城市累积的资本流回农村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加以说明，同时我还将论证，虽然有些国家在资本回流的过程中获得了巨额财富，但这过程本身是极其缓慢、极不确定、极易遭到数不胜数的意外事故的阻挠，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违反事物自然、理性的顺序的。在本书的第三篇和第四篇，我将尽可能详尽明了地说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利益、偏见、法规以及习俗。

People of the same trade seldom meet together, even for merriment and diversion, but the conversation ends in a conspiracy against the public, or in some contrivance to raise prices. It is impossible indeed to prevent such meetings, by any law which either could be executed, or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But though the law cannot hinder people of the same trade from sometimes assembling together, it ought to do nothing to facilitate such assemblies, much less to render them necessary.

从事同一行业的人很少聚会，哪怕是娱乐或消遣时，人们也很少找同行人一起。但是同行人一旦聚在一起，他们谈话的结果不外乎两个，不是阴谋对付公众，就是策划抬高价格。诚然，这样的集会是很难用法律加以制止的，因为此类法律往往难以执行，或者与自由和正义的思想冲突。虽然法律不能制止同行人有时集合起来，但法律也不应该促使这种集合，更不能让这种集合变成必不可少的东西。

A regulation which obliges all those of the same trade in a particular town to enter their names and places of abode in a public register, facilitates such assemblies. It connects individuals who might never otherwise be known to one another, and gives every man of the trade a direction where to find every other man of it.

规定同一城镇内同一行业的所有人都把姓名和住所登记在公共登记簿上，就会促使同行人集合起来。因为这样做不仅把本来也许互不相识的人联系起来，还使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同一行业内的其他任何人。

A regulation which enables those of the same trade to tax themselves in order to provide for their poor, their sick, their widows and orphans, by giving them a common interest to manage, renders such assemblies necessary.

规定同一行业的人为行业内的穷人、病人、孤儿以及寡妇捐钱，由于使他们处理一个共同的利益问题，从而使这种集合变得必不可少。

An incorporation not only renders them necessary, but makes the act of the majority binding upon the whole. In a free trade an effectual combination cannot be established but by the unanimous consent of every single trader, and it cannot last longer than every single trader continues of the same mind. The majority of a corporation can enact a bye-law with proper penalties, which will limit the competition more effectually and more durably than any

voluntary combination whatever.

同业公会不仅使这种集合必不可少，而且使多数通过的决议案对全体有拘束力。在自由行业中，如果不能获得从业者的一致同意，是不可能成立有效联合的，而且就算成立了联合，倘若有一人改变了主意，联合也无法继续下去。但是同业公会就不一样了，它能够通过多数人的决议制定规则，并附有适当的惩罚条款，这比任何自愿联合都能更加有效、更加持久地限制竞争。

The pretence that corporations are necessary for the better government of the trade, is without any foundation. The real and effectual discipline which is exercised over a workman, is not that of his corporation, but that of his customers. It is the fear of losing their employment which restrains his frauds and corrects his negligence. An exclusive corporation necessarily weakens the force of this discipline. A particular set of workmen must then be employed, let them behave well or ill. It is upon this account that in many large incorporated towns no tolerable workmen are to be found, even in some of the most necessary trades. If you would have your work tolerably executed, it must be done in the suburbs, where the workmen having no exclusive privilege, have nothing but their character to depend upon, and you must then smuggle it into the town as well as you can.

有人认为，同业公会对于更好地行业管理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一个工人所受到的真正、有效的监督，并不来自他所属的同业公会，而是来自他的顾客。工人之所以不敢欺诈懈怠，是出于对失业的恐惧。同业公会的排他特权必然会削弱这种监督力量。工人的数量是有限的，不论好坏，雇主们都得雇佣。所以在许多有同业公

会的城市中，甚至在一些最关键的行业里，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人。如果你希望得到还算像样的产品，就必须得去郊区，那里的工人没有排外特权，只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但是产品一旦做完后，你还得尽可能隐秘地将其运回城市。

It is in this manner that the policy of Europe, by restraining the competition in some employments to a smaller number than would otherwise be disposed to enter into them, occasions a very important inequality in the whole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labour and stock.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欧洲的政策限制了某些行业中的竞争人数，使其少于不加限制时可能进入这一行业的人数，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利弊产生很大的不平等。

Secondly, the policy of Europe, by increasing the competition in some employments beyond what it naturally would be, occasions another inequality of an opposite kind in the whole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labour and stock.

第二，欧洲的政策增加了某些行业中的竞争人数，使其超过自然状态下这一行业内的竞争人数，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利弊产生很大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常常和上述情况相反。

It has been considered as of so much importance that a proper number of young people should be educated for certain professions,

that, sometimes the public, and sometimes the piety of private founders have established many pensions, scholarships, exhibitions, bursaries, etc. for this purpose, which draw many more people into those trades than could otherwise pretend to follow them. In all Christian countries, I believe, the educa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churchmen is paid for in this manner. Very few of them are educated altogether at their own expence. The long, tedious, and expensive education, therefore, of those who are, will not always procure them a suitable reward, the church being crowded with people who, in order to get employment, are willing to accept of a much smaller recompence than what such an education would otherwise have entitled them to; and in this manner the competition of the poor takes away the reward of the rich. It would be indecent, no doubt, to compare either a curate or a chaplain with a journeyman in any common trade. The pay of a curate or chaplain, however, may very properly be considered as of the same nature with the wages of a journeyman. They are, all three, paid for their work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which they may happen to make with their respective superiors. Till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five merks, containing about as much silver as ten pounds of our present money, was in England the usual pay of a curate or stipendiary parish priest, as we find it regulated by the decrees of several different national councils. At the same period four pence a day, containing the same quantity of silver as a shilling of our present money, was declared to be the pay of a master mason, and three pence a day, equal to nine pence of our present money, that of a journeyman mason. The wages of both these labourers, therefore, supposing them to have been constantly employed, were much superior to those of the curate. The wages of the master mason, supposing him to have been without employment one third of the year, would have fully equalled them. By the 12th of Queen Anne, c. 12, it is declared,

人们认为，确保一定数量的年轻人接受某些行业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于是公共团体或是热诚的私人捐助基金建立者，设置了很多补贴、助学金、奖学金、贫困学生津贴等等，这使得很多本来无意进入这些行业的人也跟风加入这一行业。我相信，在所有基督教国家，大部分神职人员的教育费用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支付的，很少有人完全自费接受教育。那些自费接受教育的神职人员，尽管花了大价钱，用了更长的时间接受枯燥乏味的教育，但并不一定能获得相应的报酬，因为教会一点也不缺愿意以很低的报酬接受工作的人。这样，穷人的竞争夺走了富人应得的奖赏。毫无疑问，把教区牧师助理或教堂牧师同一般行业的帮工进行比较，未免有失体统，但教区牧师助理或教堂牧师工资的性质和帮工工资的性质确实相差无几。这三种人都按照他们和各自上司所订签订的契约获取工作报酬。我们发现，根据几次全国宗教会议所公布的规定，英格兰教区牧师助理的薪水直到14世纪中叶还是5马克，其白银含量和现在10镑货币的白银含量大致相同。在同一时期，泥瓦师傅的工资是每天4便士，白银含量和现在的1先令大致相同，泥瓦帮工的工资是每天3便士，白银含量和现在的9便士大致相同。所以这两种劳动者，如果能经常找到活儿的话，那么其劳动工资就比教区牧师助理要高得多。假设泥瓦师傅一年中有2/3的时间都有工作，那么其所得工资就和教区牧师助理的工资相等。安妮女王第十二年第12号法令宣布：

“That whereas for want of sufficient maintenance and encouragement to curates, the cures have in several places been meanly supplied, the bishop is, therefore, empowered to appoint by writing under his hand and seal a sufficient certain stipend or allowance, not exceeding fifty and not less than twenty pounds a year.”

“牧师助理缺乏足够的生活费用和工作动力，有些地方对其给养

极不充分。兹特授权各主教亲自签字盖章，发放足够的生活费用或津贴，每年不得超过50镑，也不得少于20镑。”

Forty pounds a year is reckoned at present very good pay for a curate, and notwithstanding this Act of Parliament, there are many curacies under twenty pounds a year. There are journeymen shoemakers in London who earn forty pounds a year, and there is scarce an industrious workman of any kind in that metropolis who does not earn more than twenty. This last sum indeed does not exceed what is frequently earned by common labourers in many country parishes. Whenever the law has attempted to regulate the wages of workmen, it has always been rather to lower them than to raise them. But the law has upon many occasions attempted to raise the wages of curates, and for the dignity of the church, to oblige the rectors of parishes to give them more than the wretched maintenance which they themselves might be willing to accept of. And in both cases the law seems to have been equally ineffectual, and has never either been able to raise the wages of curates, or to sink those of labourers to the degree that was intended; because it has never been able to hinder either the one from being willing to accept of less than the legal allowance, on account of the indigence of their situation and the multitude of their competitors; or the other from receiving more, on account of the contrary competition of those who expected to derive either profit or pleasure from employing them.

现在，每年40镑的报酬对教区牧师助理来说就已经非常丰厚了。尽管上述法令规定年薪不得少于20磅，但还是有很多教区牧师助理，年薪都少于20磅。伦敦有的制鞋佣工每年能赚40镑，在这个大城市里，任何行业的从业者，只要勤奋肯干，每年几乎都能赚20磅以上。

而许多农村教区普通劳动者一年所得的数额，却常常不到20镑。无论何时，当法律企图规定工资时，其目的总是希望减低工资，而不是提高工资。但是法律曾经好多次企图抬高教区牧师助理的工资，并为保持教会的尊严，命令教区长给教区牧师助理更高的报酬，超过他们以前勉强愿意接受的极微薄的生活费。无论出于哪种目的，法律似乎都毫无效果。法律既没有把教区牧师助理的工资提高到它要提高的程度，也没把劳动者的工资降低到它要降低的程度。法律无法阻止牧师助理甘心接受比法定报酬更低的工资，因为他们生活贫穷，却面临激烈的竞争；法律无法阻止工人获得比法定报酬更高的工资，因为雇主为取得利润或取乐，常常在雇佣工人时相互竞争。

The great benefices and other ecclesiastical dignities support the honour of the church, notwithstanding the mean circumstances of some of its inferior members. The respect paid to the profession too makes some compensation even to them for the meanness of their pecuniary recompence. In England, and in all Roman Catholic countries, the lottery of the church is in reality much more advantageous than is necessary. The example of the churches of Scotland, of Geneva, and of several other Protestant churches, may satisfy us, that in so creditable a profession, in which education is so easily procured, the hopes of much more moderate benefices will draw a sufficient number of learned, decent, and respectable men into holy orders.

虽然教会的一些下级职员境况很差，但其神职人员和其他显要人物却能维持教会的尊严。而且，人们对神职人员的尊敬，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们微薄报酬的一种补偿。在英格兰及所有罗马天主教国家，教会这一彩票所带来的利益比实际多得多。想想苏格兰教会、日内瓦教会以及一些其他新教教会，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这个有那么大声誉、教育机会又那么容易获得的职业，获得更多圣俸的希望足以吸引

许多学识渊博、正派体面、受人尊敬的人来从事这一职业了。

In professions in which there are no benefices, such as law and physic, if an equal proportion of people were educated at the public expence, the competition would soon be so great as to sink very much their pecuniary reward. It might then not be worth any man's while to educate his son to either of those professions at his own expence. They would be entirely abandoned to such as had been educated by those public charities, whose numbers and necessities would oblige them in general to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a very miserable recompence, to the entire degradation of the now respectable professions of law and physic.

对于没有圣俸的职业，比如说律师和医师这类职业来说，如果也能向神职教育一样，给同样多的人提供公费教育，那么这些职业内的竞争，很快就会非常激烈，从而使他们的货币报酬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没必要自费让孩子接受这两种职业教育了。这些职业将完全被那些靠公共慈善团体资助的人占据。他们人数众多，而且贫穷，因此常常获得极微薄的报酬就会感到满足。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律师和医师这些职业就不会受到现在这样的尊重了。

That unprosperous race of men commonly called men of letters, are pretty much in the situation which lawyers and physicians probably would be in upon the foregoing supposition. In every part of Europ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have been educated for the church, but have been hindered by different reasons from entering into holy orders. They have generally, therefore, been educated at the public expence, and their numbers are everywhere so great as commonly to reduce the price of their labour to a very paltry

recompence.

通常叫做文人的那些不得志的人，现在正处在律师和医师在上述假设下可能有的不良境况中。在欧洲各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为教会培养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圣职。所以，他们通常是靠公费接受教育的，全国各地都有很多这样的人，因此他们的劳动价格常常极其低微。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the art of printing, the only employment by which a man of letters could make anything by his talents, was that of a public or privateteacher, or by communicating to other people the curious and useful knowledge which he had acquired himself: and this is still surely a more honourable, a more useful, and in general even a more profitable employment than that other of writing for a bookseller, to which the art of printing has given occasion. The time and study, the genius, knowledge, and application requisite to qualify an eminent teacher of the sciences, are at least equal to w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greatest practitioners in law and physic. But the usual reward of the eminent teacher bears no proportion to that of the lawyer or physician; because the trade of the one is crowded with indigent people who have been brought up to it at the public expence; whereas those of the other two are incumbered with very few who have not been educated at their own. The usual recompence, however, of public and private teachers, small as it may appear, would undoubtedly be less than it is, if the competition of those yet more indigent men of letters who write for bread was not taken out of the market.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the art of printing, a scholar and a beggar seem to have been terms very nearly synonymous. The different governors of the universities before that time appear to have often granted licences

to their scholars to beg.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一个文人要想靠他的才能获取报酬，唯一的职业就是做公共或私人教师，换句话说，就是把自己学到的有趣的、有用的知识传授给他人。自印刷术发明以后，一部分文人以为出版商写作谋生。公共或私人教师的职业明显比为出版商写作更受人尊敬，更有用处，而且通常说来，甚至更有利可图。一个人要成为出色的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做研究，需要极高的天资、渊博的知识以及刻苦的努力，总之至少必须具备著名律师和医师所需要具备的相同的素质。然而，出色教师的一般报酬却比不上律师和医师所得的报酬，因为教师这个行业挤满了靠公费接受教育的穷人，而律师和医师的职业则由自费接受教育的少数人担任。但是，现在公共和私人教师的一般报酬，虽然看起来比较少，但是如果那些为了面包而写作的更贫困的文人没有被赶出市场，而是也加入竞争的话，那么这些教师的报酬无疑比现在还要低。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学者和乞丐几乎是同义词。当时各个学校的校长们似乎经常给学生办理乞讨特许证。

In ancient times, before any charities of this kind had been established for the education of indigent people to the learned professions, the rewards of eminent teachers appear to have been much more considerable. Isocrates, in what is called his discourse against the sophists, reproaches the teachers of his own times with inconsistency. “They make the most magnificent promises to their scholars,” says he, “and undertake to teach to be wise, to be happy, and to be just, and in return for so important a service they stipulate the paltry reward of four or five minae. They who teach wisdom,” continues he, “ought certainly to be wise themselves; but if any man wereto sell such a bargain for such a price, he would be convicted of the most evident folly.” He certainly does not mean here to exaggerate the reward, and we may be assured that it was

not less than he represents it. Four minae were equal to thirteen pounds six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five minae to sixteen pounds thirteen shillings and four pence. Something not less than the largest of those two sums, therefore, must at that time have been usually paid to the most eminent teachers at Athens. Isocrates himself demanded ten minae, or thirty-three pounds six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from each scholar. When he taught at Athens, he is said to have had a hundred scholars. I understand this to be the number whom he taught at one time, or who attended what we would call one course of lectures, a number which will not appear extraordinary from so great a city to so famous a teacher, who taught, too, what was at that time the most fashionable of all sciences, rhetoric. He must have made, therefore, by each course of lectures, a thousand minae, or 3,333*l.* 6*s.* 8*d.* A thousand minae, accordingly, is said by Plutarch in another place, to have been his Didactron, or usual price of teaching. Many other eminent teachers in those times appear to have acquired great fortunes. Gorgias made a present to the temple of Delphi of his own statue in solid gold. We must not, I presume, suppose that it was as large as the life. His way of living, as well as that of Hippias and Protagoras, two other eminent teachers of those times, is represented by Plato as splendid even to ostentation. Plato himself is said to have lived with a good deal of magnificence. Aristotle, after having been tutor to Alexander, and most munificently rewarded, as it is universally agreed, both by him and his father Philip, thought it worth while, notwithstanding, to return to Athens, in order to resume the teaching of his school. Teachers of the sciences were probably in those times less common than they came to be in an age or two afterwards, when the competition had probably somewhat reduced both the price of their labour and the admiration for their persons. The most eminent of them, however, appear always to have enjoyed a degree of consideration much superior to any of the like

profession in the present times. The Athenians sent Carneades the Academic, and Diogenes the Stoic, upon a solemn embassy to Rome; and though their city had then declined from its former grandeur, it was still an independent and considerable republic. Carneades, too, was a Babylonian by birth, and as there never was a people more jealous of admitting foreigners to public offices than the Athenians, their consideration for him must have been very great.

在古代，在任何这类以帮助穷人接受教育而进入学术行业为目的的慈善组织建立起来以前，出色教师的报酬似乎比上面说的要高得多。苏格拉底在所谓他和诡辩学派的对话中，曾谴责同时代的教师们言行不一。他说："他们对学生做出华丽的诺言，说要把他们培养成有智慧、幸福和公正的人，但是对于这么重要的服务，他们却只收四五迈纳的报酬。"他还说："传授智慧的人，自己一定是非常智慧的。但是，不管是谁，以如此低的价格，出售如此高质量的产品，都一定会被认为是相当愚蠢的。"苏格拉底在这里肯定没有夸大当时教师的报酬，而且我们可以相信，当时教师的报酬也一定不比他说的少。4迈纳相当于现在的13镑6先令8便士，5迈纳相当于现在的16镑13先令4便士。在雅典，当时最优秀教师的一般报酬一定不少于5迈纳。苏格拉底本人向每位学生收取10迈纳，即33镑6先令8便士。据说他在雅典讲学时，一共有100个学生。我认为这是他一次讲学的学生人数，即我们所说的一门课程的学生人数。雅典的城市这么大，苏格拉底又是这么出色的教师，而他所教的课程又是当时那么流行的修辞学，因此100个学生并不算多。所以，他每讲完一门课程就能获得1,000迈纳，即3,333镑6先令8便士。普卢塔克曾在别的地方说过，他平常的讲课费也是1,000迈纳。当时许多出色的教师似乎都有大量的财产。高尔吉亚曾用纯金打制一尊自己的金像，送给德尔菲寺院。当然，我想他的这个金像不可能和本人一样大。在柏拉图看来，高尔吉亚的生活方式和当时其他两位有名的教师希庇亚斯和普罗泰哥拉的生活方式一样，都相当富裕，甚至接近奢侈。据说柏拉图的生活也很阔绰。大多数人都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当了亚历山大王子的导师后，从王子及

其父亲腓力那里获得了相当丰厚的报酬。但亚里士多德却以为，回到雅典重新在学校讲课更有价值。那个时候的教师也许没有此后数十年那么多。此后数十年，竞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师的劳动价格，以及世人对他们的尊敬程度。但最出色的教师享受的报酬和尊敬依然非常高，远远超过今天的任何一位教师。雅典市民曾派遣学院派大师卡涅阿德斯及斯多葛学派大师第欧根尼作为庄严的使者出使罗马。虽然彼时的雅典已从昔日的辉煌中衰落，但仍是一个独立的、重要的共和国。此外，卡涅阿德斯是巴比伦人。雅典人估计是世界上最嫉妒外人充当公职的民族了吧，但他们派遣卡涅阿德斯充当雅典的世界，由此可见他们对这位大师有多么尊重！

This inequality is upon the whole, perhaps, rather advantageous than hurtful to the public. It may somewhat degrade the profession of a public teacher; but the cheapness of literary education is surely an advantage which greatly overbalances this trifling inconveniency. The public, too, might derive still greater benefit from it, if the constitution of those schools and colleges, in which education is carried on, was more reasonable than it is at present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从整体上来说，教师付出和回报的不平等对大众而言却是利多害少的。虽然公职教师的地位因此稍稍降低，但文科教育的低廉却能带来诸多好处，从而抵消了公职教师地位降低的消极影响。如果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学校和学院的组织能比现在更加合理，那么公众从中获得的好处就会更大。

Thirdly, the policy of Europe, by obstructing the free circulation of labour and stock both from employment to employment, and from place to place, occasions in some cases a

very inconvenient inequality in the whole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ir different employments.

第三，欧洲的政策，阻止劳动和资本自由流通，不允许他们从一种行业转移到另一种行业，或者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利弊，有时候出现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平等。

The Statute of Apprenticeship obstructs the free circulation of labour from one employment to another, even in the same place. The exclusive privileges of corporations obstruct it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even in the same employment.

学徒法令阻止劳动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自由流通，甚至在同一个地方情况也是如此；同业公会的排外特权阻止劳动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自由流通，甚至在同一个行业内情况也是如此。

It frequently happens that while high wages are given to the workmen in one manufacture, those in another are obliged to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bare subsistence. The one is in an advancing state, and has, therefore, a continual demand for new hands: the other is in a declining state, and the super abundance of hands is continually increasing. Those two manufactures may sometimes be in the same town, and sometimes in the same neighbourhood, without being able to lend the least assistance to one another. The Statute of Apprenticeship may oppose it in the one case, and both that and an exclusive corporation in the other. In many different manufactures, however, the operations are so much

alike, that the workmen could easily change trades with one another, if those absurd laws did not hinder them. The arts of weaving plain linen and plain silk, for example, are almost entirely the same. That of weaving plain woollen is somewhat different; but the difference is so insignificant, that either a linen or a silk weaver might become a tolerable workman in a very few days. If any of those three capital manufactures, therefore, were decaying, the workmen might find a resource in one of the other two which was in a more prosperous condition; and their wages would neither rise too high in the thriving, nor sink too low in the decaying manufacture. The linen manufacture indeed is, in England, by a particular statute, open to everybody; but as it is not much cultivated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ountry, it can afford no general resource to the workmen of other decaying manufactures, who, wherever the Statute of Apprenticeship takes place,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either to come upon the parish, or to work as common labourers, for which, by their habits, they are much worse qualified than for any sort of manufacture that bears any resemblance to their own. They generally, therefore, choose to come upon the parish.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从事一种制造业的劳动者获得很高的工资，而从事另一种制造业的劳动者却不得不甘心接受最低的生活费。高工资的制造业处在进步状态，不断需要新的劳动者，而低工资的制造业处在衰退状态，现有的劳动数量已经过剩，却仍在不断增多。这两种制造业有时可能同处一个城市，有时可能同处一个地区，但彼此间却丝毫不能互相帮助。当两种制造业同处一个城市时，学徒法令会阻止两者相互协助；当两种制造业同处一个地区时，学徒法令以及同业公会的排他特权会阻止两者相互协助。但是，在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制造业中，操作非常相似，假如没有这样不合理的法规从中作梗的话，劳动者是很容易从一个职业转到另一个职业的。例如，素麻

布的技术和素丝绸的纺织技术几乎完全相同，素呢绒的纺织技术虽然略有不同，但差别也不是很大。因此，织麻工或织丝工在短短几日内就可学会呢绒的纺织技术。因此，倘若这三种主要制造业中的任一制造业衰退，该制造业的劳动者就可改行，转向其他两种繁荣的制造业，而他们的工资在繁荣的制造业中不会太高，在衰退的制造业中也不会太低。诚然，由于特别法令的颁布，今天的英格兰已经将其麻布制造业对外开放，人人都可自由从事这一行业，但是由于这一制造业在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所以只能给从事衰退制造业的劳动者提供很有限的就业机会。在实施学徒法令的地方，从事衰退制造业的劳动者别无他法，只好请求教区救济，或作为普通劳动者工作。不过，他们已经养成了一定的职业习惯，因此更适合在与衰退制造业类似的制造业中工作，不太适合做普通劳动者。所以，他们通常更愿意向教区求助。

Whatever obstructs the free circulation of labour from one employment to another, obstructs that of stock likewise; the quantity of stock which can be employed in any branch of business depending very much upon that of the labour which can be employed in it. Corporation laws, however, give less obstruction to the free circulation of stock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than to that of labour. It is everywhere much easier for a wealthy merchant to obtain the privilege of trading in a town corporate, than for a poor artificer to obtain that of working in it.

凡是阻止劳动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自由流动的因素，也同样阻止资本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自由流动。因为在任何行业里，所能使用的资本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行业所能使用的劳动数量。同业公会的法规虽然既能阻止资本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自由流动，也能阻止劳动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自由流动，但法规对资本的阻碍程度要小很多。不论在何地，富商在自治城市中获得经商权，

比穷技工获得工作的权利要容易得多。

The obstruction which corporation laws give to the free circulation of labour is common, I believe, to every part of Europe. That which is given to it by the Poor Laws is, so far as I know, peculiar to England. It consists in the difficulty which a poor man finds in obtaining a settlement, or even in being allowed to exercise his industry in any parish but that to which he belongs. It is the labour of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only of which the free circulation is obstructed by corporation laws. The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settlements obstructs even that of common labour. It may be worth while to give some account of the rise, progress, and present state of this disorder, the greatest perhaps of any in the police of England.

我相信，在欧洲各地，同业公会的法规都在阻止劳动自由流动。但据我所知，除了同业公会，只有英格兰又颁布了济贫法，阻止劳动自由流动。自从济贫法颁布以来，穷人只能在所属的教区内获得居住权和从事本行的权利，要想在其他教区获得这些权利简直难上加难。同业公会只能阻止技工和制造业者的自由流动。而难以获得居住权会阻碍一般劳动者进行自由流动。或许这是英格兰治安管理中最大的混乱，我也许在这里需要对它的起源、发展及现状作些说明。

When by the destruction of monasteries the poor had been deprived of the charity of those religious houses, after some other ineffectual attempts for their relief, it was enacted by the 43rd of Elizabeth, c. 2, that every parish should be bound to provide for its own poor; and that overseers of the poor should be annually appointed, who, with the churchwardens, should raise, by a parish

rate, competent sums for this purpose.

英格兰的穷人一向要靠修道院施舍，修道院损毁后，穷人便得不到宗教机构的帮助了。虽然后来人们对穷人进行了几次救济，但都没有什么效果。伊丽莎白女王四十三年颁布第2号法令，规定各教区有义务救济自己教区内的穷人，并规定每年任命一名管理人，这名管理人需要同教会执事一起，通过教区税征收足够救济穷人的钱款。

By this statute the necessity of providing for their own poor was indispensably imposed upon every parish. Who were to be considered as the poor of each parish, became, therefore, a question of some importance. This question, after some variation, was at last determined by the 13th and 14th of Charles II. when it was enacted, that forty days' undisturbed residence should gain any person a settlement in any parish; but that within that time it should be lawful for two justices of the peace, upon complaint made by the churchwardens or overseers of the poor, to remove any new inhabitant to the parish where he was last legally settled; unless he either rented a tenement of ten pounds a year, or could give such security for the discharge of the parish where he was then living, as those justices should judge sufficient.

根据这项法令，各教区都不得不供养区内的穷人。但什么人应该被看作教区内的穷人呢？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一定时间内答案略有不同，直到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及十四年颁布法令，答案才最终确定下来。该法令规定，不论是谁，只要在某教区持续住过40天，就能够获得该教区的户籍。但在这40天的时间内，两个治安推事可以根据教会执事或穷人管理人的陈诉，把新居民遣回他最后合法居住处所在的教区，除非新居民租用了年租金为10镑的住房，或能向

治安推事提供令其满意的保证金，担保自己放弃原教区的户籍。

Some frauds, it is said, were committed in consequence of this statute; parish officers sometimes bribing their own poor to go clandestinely to another parish and by keeping themselves concealed for forty days to gain a settlement there, to the discharge of that to which they properly belonged. It was enacted, therefore, by the 1st of James II. that the forty days' undisturbed residence of any person necessary to gain a settlement, should be accounted only from the time of his delivering notice in writing, of the place of his abode and the number of his family, to one of the churchwardens or overseers of the parish where he came to dwell.

据说，这种法令曾导致一些欺诈行为。教区职员有时贿赂辖区内的穷人秘密潜入其他教区，并在那里秘密居住40天，获得户簿，从而放弃原属教区的户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詹姆斯三世第一年作出以下的规定：不论何人，如果想要获得新教区的户籍，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当地教会执事或穷人管理人报告他的新住址及家庭人数，而他在新教区的40天不间断的居住时间也从报告这一天开始算起。

But parish officers, it seems, were not always more honest with regard to their own, than they had been with regard to other parishes, and sometimes connived at such intrusions, receiving the notice, and taking no proper steps in consequence of it. As every person in a parish, therefore, was supposed to have an interest to prevent as much as possible their being burdened by such intruders, it was further enacted by the 3rd of William III. that the forty days' residence should be accounted only from the publication of such notice in writing on Sunday in the church, immediately after divine

service.

但是，教区职员对自己教区的居民未必比对其他教区的居民更加诚实。有时他们会默许外部人员闯入教区，并且在接受了书面报告后不采取任何适当的安置措施。由于教区各居民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都希望尽可能阻止外来闯入者，因此到了威廉三世第三年，又作出了以下的规定：居民在新教区持续居住的40天的起始时间，只从教堂星期日做完礼拜公布了书面报告后算起。

“After all,” says Doctor Burn, “this kind of settlement, by continuing forty days after publication of notice in writing, is very seldom obtained; and the design of the acts is not so much for gaining of settlements, as for the avoiding of them by persons coming into a parish clandestinely: for the giving of notice is only putting a force upon the parish to remove. But if a person's situation is such, that it is doubtful whether he is actually removeable or not, he shall by giving of notice compel the parish either to allow him a settlement uncontested, by suffering him to continue forty days; or, by removing him, to try the right.”

伯恩博士说：“书面报告公布后，继续居住40日并取得户籍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该法令的目的，不在于使人取得户籍，而在于避免偷偷进入新教区的人取得户籍，因为提交报告只是给教区施加压力，迫使外来者迁回原教区而已。但是，如果新教区不确定能否让某个人迁回原教区时，那么教区在这个人上交报告后，只能在以下两种解决方案中选择一种：第一，容许允许他继续居住40日，无可争辩地给他户籍；第二，尝试行使权力，看能否让他离开。”

This statute, therefore, rendered it almost impracticable for a poor man to gain a new settlement in the old way, by forty days' inhabitancy. But that it might not appear to preclude altogether the common people of one parish from ever establishing themselves with security in another, it appointed four other ways by which a settlement might be gained without any notice delivered or published. The first was, by being taxed to parish rates and paying them; the second, by being elected into an annual parish office, and serving in it a year; the third, by serving an apprenticeship in the parish; the fourth, by being hired into service there for a year, and continuing in the same service during the whole of it.

因此，由于这种法令，穷人几乎不可能按照老办法，持续居住40天获得新户籍。因此，为了让一个教区的普通居民，不至于因为这项法令而不能在另一个教区安家立业，法律又提供了以下四种方法，不必提交或公布任何公告就能取得户籍：-，缴纳教区规定的税款；二，当选一年任期的教区职员，且任期满一年；三，在教区当学徒；四，在教区被雇佣一年，并在这一年内一直做同一项工作。

Nobody can gain a settlement by either of the two first ways, but by the public deed of the whole parish, who are too well aware of the consequences to adopt any new-comer who has nothing but his labour to support him, either by taxing him to parish rates, or by electing him into a parish office.

但是除非教区全体人民采取共同行动，否则没有人能通过前两种方式取得户籍，因为教区人民都清楚地知道，外来人员只能靠劳动养活自己，而把这样的人按照收税或选为教区职员等办法收容进来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No married man can well gain any settlement in either of the two last ways. An apprentice is scarce ever married; and it is expressly enacted, that no married servant shall gain any settlement by being hired for a year. The principal effect of introducing settlement by service, has been to put out in a great measure the old fashion of hiring for a year, which before had been so customary in England, that even at this day, if no particular term is agreed upon, the law intends that every servant is hired for a year. But masters are not always willing to give their servants a settlement by hiring them in this manner; and servants are not always willing to be so hired, because as every last settlement discharges all the foregoing, they might thereby lose their original settlement in the places of their nativity, the habitation of their parents and relations.

已经结婚的人也不能按后两个办法取得户籍。学徒很少是已婚，而法令又明文规定，已经结婚的佣工不能因雇佣一年而取得户籍。因此，通过雇佣给予户籍这个办法的主要结果，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英格兰以一年为雇佣期的老习惯。这个习惯在昔日的英格兰相当流行，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如果没有商定具体期限，法律就会把雇佣期定为一年。但是，雇主们未必都愿意因雇佣佣工一年，便给他户籍，而佣工们也未必都愿意因被雇一年而取得新户籍，因为新的户籍会取消从前的户籍，他们可能因此失去他们出生地的户籍，也就是他们父母和亲戚居住地的户籍。

No independent workman, it is evident, whether labourer or artificer, is likely to gain any new settlement either by apprenticeship or by service. When such a person, therefore, carried his industry to a new parish, he was liable to be removed, how

healthy and industrious soever, at the caprice of any churchwarden or overseer, unless he either rented a tenement of ten pounds a year, a thing impossible for one who has nothing but his labour to live by; or could give such security for the discharge of the parish as two justices of the peace should judge sufficient. What security they shall require, indeed, is left altogether to their discretion; but they cannot well require less than thirty pounds, it having been enactedthat the purchase even of a freehold estate of less than thirty pounds' value, shall not gain any person a settlement, as not being sufficient for the discharge of the parish. But this is a security which scarce any man who lives by labour can give; and much greater security is frequently demanded.

显然，一个独立的工人，不论是普通劳动者还是技工，都不能通过做学徒或被雇的方式获得新的户籍。因此，当他带着他的技能进入新教区时，无论他如何健康，如何勤奋，除非他能租一个年租金10镑的房子（这对于除劳动外一无所有的人来说，是无法办到的），或能向治安推事缴纳推事们满意的保证金，保证放弃原属教区的户籍，否则教会执事或穷人管理人就能随时要求他离开。当然，保证金数量完全由治安推事自行决定，但他们所要求的数额不可能少于30镑。法律规定，凡是购买世袭不动产价值少于30磅的人，不能在新教区取得户籍，因为30磅的保证金太少，不能作为放弃原户籍的担保。但是，哪怕是30磅的保证金，靠劳动为生的人也很难拿得出来，更何况实际要求的保证金金额往往比这数额大得多。

In order to restore in some measure that free circulation of labour which those different statutes had almost entirely taken away, the invention of certificates was fallen upon. By the 8th and 9th of William III. it was enactedthat if any person should bring a certificate from the parish where he was last legally settled,

subscribed by the churchwardens and overseers of the poor, and allowed by two justices of the peace, that every other parish should be obliged to receive him; that he should not be removeable merely upon account of his being likely to become chargeable, but only upon his becoming actually chargeable, and that then the parish which granted the certificate should be obliged to pay the expence both of his maintenance and of his removal. And in order to give the most perfect security to the parish where such certificated man should come to reside, it was further enacted by the same statute, that he should gain no settlement there by any means whatever, except either by renting a tenement of ten pounds a year, or by serving upon his own account in an annual parish office for one whole year; and consequently neither by notice, nor by service, nor by apprenticeship, nor by paying parish rates. By the 12th of Queen Anne, too, stat. IC. 18. it was further enacted, that neither the servants nor apprentices of such certificated man should gain any settlement in the parish where he resided under such certificate.

就这样，上述诸法令几乎完全剥夺了劳动的自由流动。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这种自由流动，人们发明了证书。威廉三世第八年及第九年的法令规定，不论是谁，如果持有最后合法居住的教区发给的证书，由该区教会执事和穷人管理人签名，两位治安推事批准，那么任何教区都有义务收留他，他所移居的教区，不能因为他可能被起诉就命令他离开，只有当他真正被起诉时才能命令他离开，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发给他证书的教区有义务偿还他的生活费和遣散费。为了确保持有这种证书的人在所要居住的教区能拥有绝对的安全，这一法令还规定：这一类人要想获得户籍，唯一的方式只有租一间年租金10镑的房屋，或免费为教区工作满一年，其他方式如上交报告书、被雇、做学徒或缴纳教区税对他来说都不适用。此外，安妮女王第十二年法令第1号第十八条进一步规定，倘若佣工的雇主或学徒的师傅持有某教区的户籍，那么佣工或学徒就不能取得那个教区的户籍。

How far this invention has restored that free circulation of labour which the preceding statutes had almost entirely taken away, we may learn from the following very judicious observation of Doctor Burn.

这个证书的发明在多大程度上恢复了被上述各法令几乎完全剥夺的劳动的自由流动，我们从伯恩博士以下明智的言论中可以略知一二。

“It is obvious,” says he, “that there are divers good reasons for requiring certificates with persons coming to settle in any place; namely, that persons residing under them can gain no settlement, neither by apprenticeship, nor by service, nor by giving notice, nor by paying parish rates; that they can settle neither apprentices nor servants; that if they become chargeable, it is certainly known whither to remove them, and the parish shall be paid for the removal, and for their maintenance in the meantime; and that if they fall sick, and cannot be removed, the parish which gave the certificate must maintain them: none of all which can be without a certificate. Which reasons will hold proportionably for parishes not granting certificates in ordinary cases; for it is far more than an equal chance, but that they will have the certificated persons again, and in a worse condition.”

伯恩博士说：“很明显，教区有很多理由要求外来者交出证书。持证书在新教区居住的人，不能通过做学徒、被雇、上交报告书或缴纳税款等方式获得户籍。持证书者的学徒和雇工不能获得户籍。如果他们被起诉，教区肯定知道要向哪里遣返他们，而教区所垫付的遣返

费和遣返期间这些人的生活费都可以得到补偿。如果他们生病了，不能被遣返，那么发证的教区必须负担他们的生活费。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要有证书。但也就是这些原因，使得教区一般不愿意发放证书。领证书的人非常有可能被遣返，而当他们返回发证书的教区时，情况常常比以前还要糟糕。”

The moral of this observation seems to be, that certificates ought always to be required by the parish where any poor man comes to reside, and that they ought very seldom to be granted by that which he proposes to leave.

伯恩博士的话似乎意味着，穷人迁入的教区应该总是要求迁入者上交证书，而穷人要迁出的教区应该尽可能少给居民发证书。

“There is somewhat of hardship in this matter of certificates,” says the same very intelligent author, in his *History of the Poor Laws* , “by putting it in the power of a parish officer, to imprison a man as it were for life; however inconvenient it may be for him to continue at that place where he has had the misfortune to acquire what is called a settlement, or whatever advantage he may propose to himself by living elsewhere.”

这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在自己的著作《济贫法史》中又说：“发证书这件事情造成了某种困难的局面。它似乎赋予了教区职员这样的权力，可以把穷人终身幽禁起来，不管穷人在不幸获得所谓户籍的地方继续住下去是多么不方便，而他要移居的新教区又能给他带来多少好处。”

Though a certificate carries along with it no testimonial of good behaviour, and certifies nothing but that the person belongs to the parish to which he really does belong, it is altogether discretionary in the parish officers either to grant or to refuse it. A mandamus was once moved for, says Doctor Burn, to compel the churchwardens and overseers to sign a certificate; but the court of King's Bench rejected the motion as a very strange attempt.

虽然证书并不能证明领证者品行是否良好，而且只能证明领证者属于哪一教区，但证书的发放与否全由教区职员自由定夺。据伯恩博士说，曾经有人向高等法院建议，命令教会执事及穷人管理人签发证书，但高等法院认为这个建议相当奇怪，便把它拒绝了。

The very unequal price of labour which we frequently find in England in places at no great distance from one another, is probably owing to the obstruction which the law of settlements gives to a poor man who would carry his industry from one parish to another without a certificate. A single man, indeed, who is healthy and industrious, may sometimes reside by sufferance without one; but a man with a wife and family who should attempt to do so, would in most parishes be sure of being removed, and if the single man should afterwards marry, he would generally be removed likewise. The scarcity of hands in one parish, therefore, cannot always be relieved by their super abundance in another, as it is constantly in Scotland, and, I believe, in all other countries where there is no difficulty of settlement. In such countries, though wages may sometimes rise a little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a great town, or wherever else there is an extraordinary demand for labour, and sink gradually as the distance from such places increases, till they fall back to the common rate of the country; yet we never meet with

those sudden and unaccountable differences in the wages of neighbouring places which we sometimes find in England, where it is often more difficult for a poor man to pass the artificial boundary of a parish, than an arm of the sea or a ridge of high mountains, natural boundaries which sometimes separate very distinctly different rates of wages in other countries.

我们常常发现，在英格兰境内，相距不远的各地方的劳动价格极不平等，这也许是英格兰的居住法导致的，根据该法令规定，没有证书的穷人不能到其他地方劳动。诚然，一个单身汉，如果身体健康、工作勤奋，那么即使没有证书，有时也能因教会偶尔的宽容而在新教区居住下来，但倘若一个人已经娶妻生子，也没有证书，那么大多数教区都会命令他离开。同样，如果上面所说的单身汉后来结婚，也会被新教区驱逐。因此，在英格兰，劳动力过剩的教区常常无法补救劳动力不足的教区。在苏格兰以及我相信没有户籍障碍的国家，情况往往不同。在这些国家，虽然在大城市附近或在对劳动有特别需求的地方，工资有时会高一些，但是离这种地方越远，工资就越低，并最终下降到这个国家工普通工资水平。这些国家从未出现过我们有时在英格兰看到的情形，即两个相邻地区的工资突然间莫名其妙地出现很大的差别。在英格兰，穷人要穿越教区这个人为的界限，往往比穿越海湾或山脉的自然界限要困难得多，在被自然界限分隔的两个国家中，工资率常常千差万别。

To remove a man who has committed no misdemeanour from the parish where he chooses to reside, is an evident violation of natural liberty and justice. The common people of England, however, so jealous of their liberty, but like the common people of most other countries never rightly understanding wherein it consists, have now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ogether suffered themselves to be exposed to this oppression without a remedy.

Though men of reflection, too, have sometimes complained of the law of settlements as a public grievance; yet it has never been the object of any general popular clamour, such as that against general warrants, an abusive practice undoubtedly, but such a one as was not likely to occasion any general oppression. There is scarce a poor man in England of forty years of age, I will venture to say, who has not in some part of his life felt himself most cruelly oppressed by this ill-contrived law of settlements.

一个人如果连小罪都没有犯过，却被强迫迁出他想要居住的教区，显然是侵害天赋的自由与正义的。英格兰的普通民众虽然非常羡慕自由，但也像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普通民众一样，从来不曾知道自由真正的意义，并且已经默默忍受这种户籍压迫长达一个多世纪，期间从未想过任何解决办法。虽然有时有思想的人也会说，居住法给大众带来了苦难，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像反对搜查票那样，高声反对这一法令。搜查票无疑也是一种过分的做法，但它对人们的压迫远没有搜查票那么普遍。我敢断言，如今40岁左右的英格兰穷人，几乎个个都曾受过这种荒谬的居住法的残酷压迫。

I shall conclude this long chapter with observing, that though anciently it was usual to rate wages, first by general laws extending over the whole kingdom, and afterwards by particular orders of the justices of peace in every particular county, both these practices have now gone entirely into disuse.

我将用下面的话来结束这冗长的一章。过去，人们在规定劳动工资时，常常先参照全国性的普通法律，然后参照各郡治安推事的特殊命令，但是现在，这两种办法都已经被废弃了。

“By the experience of above four hundred years,” says Doctor Burn, “it seems time to lay aside all endeavours to bring under strict regulations, what in its own nature seems incapable of minute limitation: for if all persons in the same kind of work were to receive equal wages, there would be no emulation, and no room left for industry or ingenuity.”

“四百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些东西由于性质不同，无法进行仔细限定。是时候停止对这些事物施加苛刻的规定了。如果从事同一行业的工人都领着相同的工资，那么一切竞争都会不复存在，勤奋或聪慧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Particular Acts of Parliament, however, still attempt sometimes to regulate wages in particular trades and in particular places. Thus the 8th of George III. prohibits under heavy penalties all master taylors in London, and five miles round it, from giving, and their workmen from accepting, more than two shillings and sevenpence halfpenny a day, except in the case of a general mourning. Whenever the legislature attempts to regul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sters and their workmen, its counsellors are always the masters. When the regulation, therefore, is in favour of the workmen, it is always just and equitable; but it is sometimes otherwise when in favour of the masters. Thus the law which obliges the masters in several different trades to pay their workmen in money and not in goods, is quite just and equitable. It imposes no real hardship upon the masters. It only obliges them to pay that value in money, which they pretended to pay, but did not always really pay, in goods. This law is in favour of the workmen; but the 8th of George III. is in favour of the masters. When masters combine together in order to reduce the wages of their workmen, they

commonly enter into a private bond or agreement, not to give more than a certain wage under a certain penalty. Were the workmen to enter into a contrary combination of the same kind, not to accept of a certain wage under a certain penalty, the law would punish them very severely; and if it dealt impartially, it would treat the masters in the same manner. But the 8th of George III. enforces by law that very regulation which masters sometimes attempt to establish by such combinations. The complaint of the workmen, that it puts the ablest and most industrious upon the same footing with an ordinary workman, seems perfectly well founded.

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有个别法案企图规定个别行业和个别地方的工资。乔治三世第八年的法令规定，除非在国丧期间，伦敦及其附近5英里以内的所有裁缝师傅，每天向雇工支付的工资不得超过2先令7便士，而雇工也不得接受此金额以上的工资，违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每当立法机关试图在雇主与工人存在争议的问题上做出规定时，总是以雇主为顾问。所以，当规定对工人有利时，总是正当而公平的，但对雇主有利时，却往往是不正当不公平的。例如，有些法律规定，某些行业的雇主必须用货币，不能用货物支付工人工资，这种法律是完全正当而公平的，它没有给雇主造成任何实际上的困难，只是要求雇主们用货币支付工资。虽然雇主们确实常常想用货物支付工资，但实际上他们很少这样做。这种法律当然对工人有利，但乔治三世第八年的法令却对雇主有利。当雇主们企图联合起来，以降低劳动工资时，他们常常建立秘密的同盟关系或签署协定，约定不会支付工人一定数目以上的工资，违者将受到一定的处罚。劳动者有时也会成立联合起来，对抗雇主的做法，约定不会接受一定数目以下的工资，违者同样会受到一定的处罚。但是法律常常对工人做出严厉的惩罚（却从不惩罚雇主）。如果法律是公平的，那么就应该用对待工人的方式对待雇主。雇主们有时会联合起来，企图建立某项有利于他们的规定，乔治三世第八年的法令却加强了这种规定。工人们常常抱怨这项法令，说它把最有能力、最勤奋的工人和普通工人同样看待，这种

抱怨似乎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In ancient times, too, it was usual to attempt to regulate the profits of merchants and other dealers, by rating the price both of provisions and other goods. The assize of bread is, so far as I know, the only remnant of this ancient usage. Where there is an exclusive corporation, it may perhaps be proper to regulate the price of the first necessary of life. But where there is none, the competition will regulate it much better than any assize. The method of fixing the assize of bread established by the 31st of George II. could not be put in practice in Scotland, on account of a defect in the law; its execution depending upon the office of clerk of the market, which does not exist there. This defect was not remedied till the 3rd of George III. The want of an assize occasioned no sensible inconvenienc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one in the few places where it has yet taken place, has produced no sensible advantage.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towns of Scotland, however, there is an incorporation of bakers who claim exclusive privileges, though they are not very strictly guarded.

古代的时候，人们常常通过规定食物和其他商品的价格，来规定商人的利润。据我所知，面包的法定价格是这种古老习惯留下的唯一的痕迹。在有排外性的同业公会的地方，规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似乎是调节商人利润的一种恰当的做法。但是在没有同业公会的地方，竞争对调节利润的作用比法定价格要大得多。乔治二世第三十一年的法律为面包规定了法定价格，这一规定需要靠市场管理员执行，但是由于法律上的缺陷，当时的苏格兰没有市场管理员，因此该规定在苏格兰行不通。直到乔治三世第三年，法律上的这个缺陷才得到矫正。从前未制定法定价格的时候，苏格兰人民并没有感到多大的不便，在现在施行法定价格的地方，苏格兰人民也没获得多大的利益。但是，苏

格兰的大多数城市都有面包师的同业公会，他们声称具有排他特权，但这种排他特权并没有得到十分严格的保护。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rates both of wages and profit in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labour and stock, seems not to be much affected, as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by the riches or poverty, the advancing, stationary, or declining state of the society. Such revolutions in the public welfare, though they affect the general rates both of wages and profit, must in the end affect them equally in all different employments.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m, therefore, must remain the same, and cannot well be altered, at least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by any such revolutions.

前面已经说过，不同用途的劳动和资本的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比例，似乎不大受所属社会的贫与富，进步、停滞、退步状态的影响。公共福利上这种重大变革，虽然会影响一般工资率和利润率，但终究对所有不同用途都有相同的影响。因此，不同用途上的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比例一定保持不变，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因上述变化而有所改变。

Chapter XI. Of the Rent of Land

第十一章、论地租

Rent, considered as the price paid for the use of land, is naturally the highest which the tenant can afford to pay in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land. In adjusting the terms of the lease, the landlord endeavours to leave him no greater share of the produce than what is sufficient to keep up the stock from which he

furnishes the seed, pays the labour, and purchases and maintains the cattle and other instruments of husbandry, together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farming stock in the neighbourhood. This is evidently the smallest share with which the tenant can content himself without being a loser, and the landlord seldom means to leave him any more. Whatever part of the produce, or, what is the same thing, whatever part of its price, is over and above this share, he naturally endeavours to reserve to himself as the rent of his land, which is evidently the highest the tenant can afford to pay in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land. Sometimes, indeed, the liberality, more frequently the ignorance, of the landlord, makes him accept of somewhat less than this portion; and sometimes too, though more rarely, the ignorance of the tenant makes him undertake to pay somewhat more, or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somewhat less, than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farming stock in the neighbourhood. This portion, however, may still be considered as the natural rent of land, or the rent for which it is naturally meant that land should for the most part be let.

地租是租地人使用土地支付的价格，通常是租地人根据土地实际情况支付的最高价格。在确定租约条款时，土地所有者总是设法减少租地人的土地产品份额，使其获得有限的农业资本，仅够用来购买种子、获取劳动工资、购置和维持耕畜及其他农具，以及获得当地农业资本的普通利润。这一数额显然是租地人在不亏本的条件下愿意接受的最小份额，而土地所有者也绝不会给他更多的东西。如果租地人的土地产品份额超过了上述份额，或者说租地人的土地产品份额所值的价钱超过了上述份额所值的价钱，那么无论超出多少，土地所有者都自然都会设法把超出额以地租的形式据为己有。因此，地租显然是租地人根据土地实际情况所能支付的最高金额。诚然，有时土地所有者由于慷慨，更多是由于无知，会接受比这一数额略低的地租；同样，有时租地人也由于无知（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会支付比这一数额

略高的地租，即心甘情愿接受比当地农业资本普通利润略低的利润。但是，我们仍将这一数额看作土地的自然地租，即土地所有者出租大部分土地应得的地租。

The rent of land, it may be thought, is frequently no more than a reasonable profit or interest for the stock laid out by the landlord upon its improvement. This, no doubt, may be partly the case upon some occasions; for it can scarce ever be more than partly the case. The landlord demands a rent even for unimproved land, and the supposed interest or profit upon the expence of improvement is generally an addition to this original rent. Those improvements, besides, are not always made by the stock of the landlord, but sometimes by that of the tenant. When the lease comes to be renewed, however, the landlord commonly demands the same augmentation of rent, as if they had been all made by his own.

也许有人认为，土地的地租只是土地所有者为改良土地而投入的资本所产生的合理利润或利息。无疑，部分情况是这样的，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这样而已。即使对于未改良的土地，土地所有者也要收取地租，而所谓改良土地所投入资本产生的利息或利润，通常只是原有地租的附加额。而且改良土地所用的资本，未必总是来自土地所有者，有时也来自租地人。不过，在续订租约时，土地所有者常常要求增加地租，好像改良土地的资本是由他提供的似的。

He sometimes demands rent for what is altogether incapable of human improvement. Kelp is a species of sea-weed, which, when burnt, yields an alkaline salt, useful for making glass, soap, and for several other purposes. It grows in several parts of Great Britain, particularly in Scotland, upon such rocks only as lie within the high

water mark, which are twice every day covered with the sea, and of which the produce, therefore, was never augmented by human industry. The landlord, however, whose estate is bounded by a kelp shore of this kind, demands a rent for it as much as for his corn fields.

有时，土地所有者对于根本不能进行人工改良的土地也要求地租。举例来说，巨藻是一种海草，燃烧后可产生一种碱盐，能够用来制造玻璃、肥皂或用作其他用途。巨藻生长在大不列颠的几个地区，尤其是苏格兰位于高水位线以下的岩石上。每天这些岩石会被海水淹没两次，因此，即使人们勤奋工作，岩石上的海藻数量也不会增加。但是，生产这种海藻的海岸所围成的土地，有时归某个土地所有者所有，而该土地所有者对于这块土地，往往也要求和谷地一样的地租。

The sea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islands of Shetland is more than commonly abundant in fish, which make a great part of the subsistence of their inhabitants. But in order to profit by the produce of the water, they must have a habitation upon the neighbouring land.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is in proportion, not to what the farmer can make by the land, but to what he can make both by the land and by the water. It is partly paid in sea-fish; and one of the very few instances in which rent makes a part of the price of that commodity, is to be found in that country.

设得兰群岛附近的海域盛产鱼类，这些鱼类构成了当地居民的绝大部分生活资料。但是，要想从这种水产品中获利，居民们不得不在邻近的陆地找到居住地。因此，邻近陆地的土地所有者所收的地租，并不和农民在土地上所获的收益成比例，而是和农民由土地和海上这两个地方所获的收益成比例。这种地租一部分可以用鱼类来支付。地

租很少构成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设得兰群岛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The rent of land, therefore, considered as the price paid for the use of the land, is naturally a monopoly price. It is not at all proportioned to what the landlord may have laid out up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and, or to what he can afford to take; but to what the farmer can afford to give.

地租作为人们使用土地所支付的价格，自然是一种垄断价格。它完全不和土地所有者为改良土地可能投入的资本成比例，也完全不和土地所有者所能收取的数额成比例，而是和租地人所能支付的数额成比例。

Such parts only of the produce of land can commonly be brought to market of which the ordinary price is sufficient to replace the stock which must be employed in bringing them thither, together with its ordinary profits. If the ordinary price is more than this, the surplus part of it will naturally go to the rent of the land. If it is not more, though the commodity may be brought to market, it can afford no rent to the landlord. Whether the price is, or is not more, depends upon the demand.

能够拿到市场去售卖的那部分土地生产物，其普通价格通常足够补偿产品上市前所需要垫付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如果普通价格超过这个数额，那么剩余部分自然归作土地地租。如果普通价格未超过这个数额，那么虽然产品仍然能够拿到市场去售卖，但不能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价格是否高于这个数额取决于市场需求的大小。

There are some parts of the produce of land for which the demand must always be such as to afford a greater price than what is sufficient to bring them to market; and there are others for which it either may or may not be such as to afford this greater price. The former must always afford a rent to the landlord. The latter sometimes may, and sometimes may no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在所有的土地产品中，人们总是对一部分产品的需求非常高，因此这部分产品在市场售卖的价格总是超过足以使它们进入市场的产品价格；人们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则不同，其结果便是，产品售价有时超过，有时却不超过足以进入市场的产品价格。当人们对产品的需求总是非常高时，土地所有者总能获得地租，否则，根据不同的情况，土地所有者有时能获得地租，有时不能获得地租。

Rent, it is to be observed, therefore, enters into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rice of commodities in a different way from wages and profit. High or low wages and profit, are the causes of high or low price; high or low rent is the effect of it. It is because high or low wages and profit must be paid, in order to bring a particular commodity to market, that its price is high or low. But it is because its price is high or low; a great deal more, or very little more, or no more, than what is sufficient to pay those wages and profit, that it affords a high rent, or a low rent, or no rent at all.

所以应当注意，地租构成商品价格的方式和工资与利润是不同的。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商品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却是商品价格高低的结果。正是因为商品上市所需支付的工资和利润有高有低，商品的价格才会有高有低。而正是由于商品价格有高有低，

有时大大超过工资和利润，有时稍稍超过工资和利润，有时仅够支付工资和利润，该商品才有时提供高地租，有时提供低地租，有时不能提供地租。

The particular consideration, first, of those parts of the produce of land which always afford some rent; secondly, of those which sometimes may and sometimes may not afford rent; and, thirdly, of the variations which,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improvement, naturally take place, in the relative value of those two different sorts of rude produce, when compared both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manufactured commodities, will divide this chapter into three parts.

本章分为以下三节，我将专门讨论：第一，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第二，有时能提供有时不能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第三，这两种天然产品彼此互相比较或和制造品比较时，在不同的改良阶段，自然出现的相对价值的变动。

Part I. Of the Produce of Land which always affords Rent

第一节、论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

As men, like all other animals, naturally multiply in proportion to the means of their subsistence, food is always, more or less, in demand. It can always purchase or command a greater or smaller quantity of labour, and somebody can always be found who is willing to do something in order to obtain it. The quantity of labour, indeed, which it can purchase, is not always equal to what it could maintain, if managed in the most economical manner, on

account of the high wages which are sometimes given to labour. But it can always purchase such a quantity of labour as it can maintain, according to the rate at which that sort of labour is commonly maintained in the neighbourhood.

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人类的繁衍自然也和其生活资料成一定的比例。所以，人类对于食物总是有着或多或少的需求。食物总能购买或支配或多或少的劳动。为了获得食物，总是有人愿意从事劳动。诚然，由于有时人们给予劳动高额的工资，因此食物实际可以购买的劳动数量，并不一定等于食物以最经济的方式可以维持的劳动数量。但是，食物所能维持的劳动数量在一个地方常常有一个比例，而食物也总能购买到按照这个比例所能维持的劳动数量。

But land, in almost any situation, produces a greater quantity of food than what is sufficient to maintain all the labour necessary for bringing it to market, in the most liberal way in which that labour is ever maintained. The surplus, too, is always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replace the stock which employed that labour, together with its profits. Something, therefore, always remains for a rent to the landlord.

但是，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土地所生产的食物数量总是非常多，除了足够维持食物上市所需的劳动外，还有剩余。而剩余的部分不仅足够补偿资本所有者雇佣劳动所垫付的资本及其利润，还能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

The most desert moors in Norway and Scotland produce some sort of pasture for cattle, of which the milk and the increase are

always more than sufficient, not only to maintain all the labour necessary for tending them, and to pay the ordinary profit to the farmer or owner of the herd or flock; but to afford some small rent to the landlord. The rent increases in proportion to the goodness of the pasture. The same extent of ground not only maintains a greater number of cattle, but as they are brought within a smaller compass, less labour becomes requisite to tend them, and to collect their produce. The landlord gains both ways; by the increase of the produce, and by the diminution of the labour which must be maintained out of it.

挪威及苏格兰最为荒凉的旷野能生产一种可以用来饲养牲畜的牧草。牲畜分泌的乳汁以及繁殖的后代，除了足够维持饲养牲畜所需要的一切劳动、支付农民或畜群所有人的普通利润外，还能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少量的地租。牧场条件越优良，地租就越高。同样大小的优良土地和劣质土地相比，不仅能维持更多的牲畜，而且由于把牲畜聚集在较小的地区，饲养牲畜、采集乳汁等工作需要的劳动也相对较少。这样，一方面产品数量增加，另一方面产品所需维持的劳动数量减少，土地所有者就从这两方面得到了利益。

The rent of land not only varies with its fertility, whatever be its produce, but with its situation, whatever be its fertility. Land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a town gives a greater rent than land equally fertile in a distant part of the country. Though it may cost no more labour to cultivate the one than the other, it must always cost more to bring the produce of the distant land to market. A greater quantity of labour, therefore, must be maintained out of it; and the surplus, from which are drawn both the profit of the farmer and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must be diminished. But in remote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rate of profit, as has already been shown, is generally

higher than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a large town. A smaller proportion of this diminished surplus, therefore, must belong to the landlord.

无论土地产品如何，土地地租总是随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而不同；无论土地的肥沃程度如何，土地地租总是随着土地位置的不同而不同。假使两块土地肥沃程度相同，那么城市附近的土地总是比偏远地区的土地能提供更多的地租。虽然耕作这两块土地所需的劳动数量相同，但要把偏远地区的产品运到市场，一定需要更多的劳动数量。因此，偏远地方的产品就必须维持较大数量的劳动，那么剩余的产品，即支付农场主利润和土地所有者地租的那部分产品一定会减少。但是，就像前面所说，偏远地方的利润率通常比城市附近地区高，因此在这已经减少的剩余产品中，属于土地所有者的那部分产品一定更少。

Good roads, canals, and navigable rivers, by diminishing the expence of carriage, put the remote parts of the country more nearly upon a level with those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town. They are upon that account the greatest of all improvements. They encourage the cultivation of the remote, which must always be the most extensive circle of the country. They are advantageous to the town, by breaking down the monopoly of the country in its neighbourhood. They are advantageous ev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untry. Though they introduce some rival commodities into the old market, they open many new markets to its produce. Monopoly, besides, is a great enemy to good management, which can never be universally established but in consequence of that free and universal competition which forces everybody to have recourse to it for the sake of self-defence. It is not more than fifty years ago, that some of the countie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London petitioned the

Parliament against the extension of the turnpike roads into the remoter counties. Those remoter counties, they pretended, from the cheapness of labour, would be able to sell their grass and corn cheaper in the London market than themselves, and would thereby reduce their rents, and ruin their cultivation. Their rents, however, have risen, and their cultivation has been improved since that time.

路况好的道路、运河或可通航的河流，由于减少了运输费用，使偏远地方与城市附近地区更接近于同一水平。因此，在所有的改良中，交通改良最有实效。交通的便利不仅能促进偏远地区（通常一定是乡村最广阔的地区）的开发，而且能够打破城市附近乡村的垄断，因而也对城市有利。城市附近的乡村甚至也能因此受益。交通改良后，虽然一方面会有很多竞争性商品进入旧市场，但另一方面，旧市场的很多商品也能找到许多新的市场。此外，垄断是良好经营的大敌。只有鼓励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每个人才可能出于自卫采用良好的经营方法，良好经营才可能得到普遍的确立。大约五十年前，伦敦附近的一些郡曾向议会请愿，反对将征收通行税的道路扩展到偏远的郡县。他们声称，偏远的郡县由于劳动价格低廉，能够以低于附近郡县的价格在伦敦市场售卖它们的牧草和谷物，因而会降低伦敦附近郡县的地租，破坏他们的耕作。不过，从那时起，他们的地租已经增高，他们的耕作也已得到改良。

A corn field of moderate fertility produces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food for man, than the best pasture of equal extent. Though its cultivation requires much more labour, yet the surplus which remains after replacing the seed and maintaining all that labour, is likewise much greater. If a pound of butcher'smeat, therefore, was never supposed to be worth more than a pound of bread, this greater surplus would everywhere be of greater value, and constitute a greater fund both for the profit of the farmer and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It seems to have done so universally in the rude beginnings of agriculture.

中等肥沃程度的谷田与同等大小的上等牧场相比，为人类生产的食物数量要多得多。虽然耕作谷田需要的劳动数量比经营牧场多得多，但在支付了种子的费用以及维持所有劳动费用后，常常能剩余许多食物。所以，如果人们从来不认为一磅肉的价值大于一磅面包的话，那么上述更多的剩余产物在任何地方都具有较大的价值，构成了为农场主提供利润、为土地所有者提高地租的较大资金。在农业发展初期，情况似乎普遍如此。

But the relative values of those two different species of food, bread and butcher's meat, are very different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agriculture. In its rude beginnings, the unimproved wilds, which then occupy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country, are all abandoned to cattle. There is more butcher's meat than bread, and bread, therefore, is the food for which there is the greatest competition, and which consequently brings the greatest price. At Buenos Ayres, we are told by Ulloa, four reals, one-and-twenty pence halfpenny sterling, was, forty or fifty years ago, the ordinary price of an ox, chosen from a herd of two or three hundred. He says nothing of the price of bread, probably because he found nothing remarkable about it. An ox there, he says, costs little more than the labour of catching him. But corn can nowhere be raised without a great deal of labour, and in a country which lies upon the river Plate, at that time the direct road from Europe to the silver mines of Potosi,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could not be very cheap. It is otherwise when cultivation is extended ove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ountry. There is then more bread than butcher's meat. The competition changes its direction, and the price of butcher's meat becomes greater than the

price of bread.

但是在农业发展的不同时期，面包与肉类的相对价值却大不相同。在农业发展初期，国内绝大部分未经改良的土地都用来饲养牲畜。肉类比面包多，因而人们对面包的竞争非常激烈，面包的价格就非常高。据乌略亚说，四五十年以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头牛的普通价格为4里尔，合英币21.5便士，而且购买者可以在二三百头的牛群中随意选择。乌略亚没有提及面包的价格，可能是他觉得面包价格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地方。他又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头牛的价格几乎和捕获它所需花费的劳动相等。但无论在哪里，种植谷物都需要很大的劳动数量。阿根廷位于普拉塔河的流域上，当时的普拉塔河是连接欧洲和波托西银矿的直接通路，因此在这样一个国家，劳动的货币价格不会特别低廉。但当耕作推广到阿根廷大部分地区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面包比肉类多，人们对肉类的竞争变得激烈，肉类价格变得比面包高。

By the extension besides of cultivation, the unimproved wilds become insufficient to supply the demand for butcher's meat. A great part of the cultivated lands must be employed in rearing and fattening cattle, of which the price, therefore, must be sufficient to pay, not only the labour necessary for tending them, but the rent which the landlord and the profit which the farmer could have drawn from such land employed in tillage. The cattle bred upon the most uncultivated moors, when brought to the same market, are, in proportion to their weight or goodness, sold at the same price as those which are reared upon the most improved land. The proprietors of those moors profit by it, and raise the rent of their l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price of their cattle. It is not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that in many parts of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butcher's meat was as cheap or cheaper than even bread made of

oat meal. The union opened the market of England to the highland cattle. Their ordinary price is at present about three times greater th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and the rents of many highland estates have been tripled and quadrupled in the same time. In almost every part of Great Britain a pound of the best butcher's meat is, in the present times, generally worth more than two pounds of the best white bread; and in plentiful years it is sometimes worth three or four pounds.

由于大量的土地用于耕作，未经改良的田野无法供应人们对肉类的需求，因此，人们不得不把许多耕地用来饲养牲畜。所以牲畜的价格，不但要足够维持饲养牲畜所需的劳动，而且要足够支付土地用作耕地时土地所有者所能获得的地租和农场主所能获得的利润。但是，毫无改良的荒野上饲养的牲畜，与得到最大改良的土地上饲养的牲畜，在被送往同一个市场时，根据重量和品质，常常以同样的价格出售。荒野所有者往往从中获利，因为他们可以根据牲畜的价格，同比例增加土地的地租。不到一个世纪以前，在苏格兰高地许多地方，肉类价格和燕麦面包的价格相等，甚至比燕麦面包的价格还要低廉。后来，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苏格兰高地的牲畜开始进入英格兰市场。现在，苏格兰高地肉类的普通价格大约是本世纪初的三倍，同时高地许多土地的地租增加至本世纪初的三四倍。今天，在大不列颠几乎任何地区，一磅最上等的鲜肉大概值2磅以上最上等的白面包，而在谷物丰收的年份，1磅最上等的鲜肉有时值3磅甚至4磅最上等的白面包。

It is thus that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the rent and profit of unimproved pasture come to be regulated in some measure by the rent and profit of what is improved, and these again by the rent and profit of corn. Corn is an annual crop. Butcher's meat, a crop which requires four or five years to grow. As an acre of land,

therefore, will produce a much smaller quantity of the one species of food than of the other, the inferiority of the quantity must be compensated by the superiority of the price. If it was more than compensated, more corn land would be turned into pasture; and if it was not compensated, part of what was in pasture would be brought back into corn.

所以，在改良的过程中，未经改良的牧场的地租与利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已改良的牧场的地租与利润的支配，而已改良的牧场的地租与利润，又受到谷田的地租与利润的支配。人们一年就可收获一次谷物，但要花四五年的时间才能收获一次鲜肉。因此，在一亩同样的土地上，鲜肉的产量比谷物少得多，因此鲜肉必须以较高的价格出售，才能补偿其较低的产量。如果补偿过多，鲜肉的价格过于昂贵，那么就会有更多的谷田改为牧场；如果补偿不足，鲜肉的价格不能令人满意，那么一部分牧场必然会被改为谷田。

This equality, however, between the rent and profit of grass and those of corn; of the land of which the immediate produce is food for cattle, and of that of which the immediate produce is food for men; must be understood to take place only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improved lands of a great country. In some particular local situations it is quite otherwise, and the rent and profit of grass are much superior to what can be made by corn.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在大部分土地都已得到改良的国家，才会发生牧草和谷物在地租和利润上的均等，也才会发生直接生产牲畜食物的土地和直接生产人类食物的土地在地租和利润上的均等。在有些地方，情况却完全不同，牧场的地租和利润比耕地的地租和利润高得多。

Thu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a great town, the demand for milk and for forage to horses, frequently contribute, together with the high price of butcher's meat, to raise the value of grass above what may be called its natural proportion to that of corn. This local advantage, it is evident, cannot be communicated to the lands at a distance.

因此，在大城市附近，人们对奶产品和马料的需求，加上鲜肉的高价，使牧草价格大大增高，超过它对谷物价格的自然比例。显然，这种地方性利益绝不会扩展到偏远地区。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have sometimes rendered some countries so populous, that the whole territory, like the land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a great town, has not been sufficient to produce both the grass and the corn necessary for the subsistence of their inhabitants. Their lands, therefore, have been principally employed in the production of grass, the more bulky commodity, and which cannot be so easily brought from a great distance; and corn, the food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has been chiefly import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有些国家由于特殊情况，人口众多，国家的所有土地就像大城市附近地区一样，不能生产足够的牧草及谷物以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因此，在这些国家，土地主要用来生产容积较大、不容易从远方运来的牧草，而人民所吃的谷物则主要从国外进口。

Holland is at present in this situation, and a considerable part

of ancient Italy seems to have been so during the prosperity of the Romans. To feed well, old Cato said, as we are told by Cicero, was the first and most profitable th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a private estate; to feed tolerably well, the second; and to feed ill, the third. To plough, he ranked only in the fourth place of profit and advantage. Tillage, indeed, in that part of ancient Italy which lay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Rome, must have been very much discouraged by the distributions of corn which were frequently made to the people, either gratuitously, or at a very low price. This corn was brought from the conquered provinces, of which several, instead of taxes, were obliged to furnish a tenth part of their produce at a stated price, about sixpence a peck, to the republic. The low price at which this corn was distributed to the people, must necessarily have sunk the price of what could be brought to the Roman market from Latium, or the ancient territory of Rome, and must have discouraged its cultivation in that country.

现在的荷兰就是这种情况。在古罗马的繁荣时期，古代时期的意大利把大部分土地用来生产牧草。据西塞罗说，老加图曾说过："在经营私有土地时，把牧草种好是头等也是最有利可图的事情；如果牧草种得还可以，利润和利益就占第二位；如果种得不好，利润和利益就占第三位。"在他看来，农耕的利润和利益占第四位。在古代意大利的罗马附近，谷物常常被免费或以极低的价格分配给人民，结果大大阻碍了这一地区的耕作。这些谷物来自被征服的省份。在这些被征服的省份中，有的省份不纳税，但必须将自己产品的1/10，以法定价格6便士/配克卖给共和国。共和国再把这部分谷物以极低的价格分配给人民，这样必然会降低从罗马旧领土运往罗马市场的谷物的价格，从而阻碍该国谷物耕作的发展。

In an open country too, of which the principal produce is corn,

a well-enclosed piece of grass will frequently rent higher than any corn field in its neighbourhood. It is convenient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attle employed i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orn, and its high rent is, in this case, not so properly paid from the value of its own produce, as from that of the corn lands which are cultivated by means of it. It is likely to fall, if ever the neighbouring lands are completely enclosed. The present high rent of enclosed land in Scotland seems owing to the scarcity of enclosure, and will probably last no longer than that scarcity. The advantage of enclosure is greater for pasture than for corn. It saves the labour of guarding the cattle, which feed better, too, when they are not liable to be disturbed by their keeper or his dog.

此外，在以谷物为主要产物的疆域辽阔的国家，四周围有栅栏的草地的地租常常比附近任何谷田的地租都要高。围有栅栏的草地更适合饲养耕种土地所用的牲畜，在这种情况下，草地的高地租不是由青草来支付的，而是由草地饲养的牲畜所耕种的土地的价值来支付的。如果邻近地区全被栅栏围起来，圈地的地租可能会下降。在现在的苏格兰，似乎就是因为圈地太少，所以圈地地租才会如此高昂。圈地一旦增加，估计其地租就会下降。圈地给草地带来的好处比谷物多。在圈地中，看守牲畜所需的劳动减少，牲畜没有了看护人及狗的打扰，会吃得更好。

But where there is no local advantage of this kind, the rent and profit of corn, or whatever else is the common vegetable food of the people, must naturally regulate, upon the land which is fit for producing it, the rent and profit of pasture.

但在没有这种地方性利益的地方，草地的地租和利润，自然不免

要受到适合耕种谷物或其他植物（此处特指那些能成为人类普通食物的植物）的土地的地租和利润的支配。

The use of the artificial grasses, of turnips, carrots, cabbages, and the other expedients which have been fallen upon to make an equal quantity of land feed a greater number of cattle than when in natural grass, should somewhat reduce, it might be expected, the superiority which, in an improved country, the price of butcher's meat naturally has over that of bread. It seems accordingly to have done so; and there is some reason for believing that, at least in the London market, the price of butcher's meat in proportion to the price of bread, is a good deal lower in the present times than it wa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在同等面积的土地上，天然牧草能够饲养的牲畜比较少，而芜青、胡萝卜、包菜等人工牧草，或靠其他已经用过的方法能够饲养的牲畜比较多。考虑到在进步国家中，鲜肉的价格一直高于面包的价格，使用人工牧草或者其他已经用过的方法或许可以稍微缓解鲜肉与面包价格的落差。而且，事实上似乎确实如此。至少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伦敦市场上鲜肉与面包的相对价格，比上个世纪初要低得多。

In the appendix to *The Life of Prince Henry* , Doctor Birch has given us an account of the prices of butcher's meat as commonly paid by that prince. It is there said that the four quarters of an ox weighing six hundred pounds usually cost him nine pounds ten shillings, or thereabouts; that is, thirty-one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per hundred pounds weight. Prince Henry died on the 6th of November 1612, in the nineteenth year of his age.

伯奇博士在他所著的《亨利亲王传》的附录中，记述了亲王日常支付鲜肉的价格。一头重600磅的牛通常只花费这位亲王9镑10先令，即每100磅31先令8便士。亨利亲王卒于1612年11月6日，时年19岁。

In March 1764, there was a parliamentary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at that time. It was then, among other proof to the same purpose, given in evidence by a Virginia merchant, that in March 1763, he had victualled his ships for twenty-four or twenty-five shillings the hundred weight of beef, which he considered as the ordinary price; whereas, in that dear year, he had paid twenty-seven shillings for the same weight and sort. This high price in 1764 is, however, four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cheaper than the ordinary price paid by Prince Henry; and it is the best beef only, it must be observed, which is fit to be salted for those distant voyages.

1764年3月，议会曾调查当时食物价格高昂的原因。在当时搜集的诸多证据中，一个弗吉尼亚商人提供了这样的证词：他曾于1763年3月为他的船只备办食物，当时每100磅牛肉的价格是24-25先令，他认为这是普通价格，然而在1764年，物价上涨，同等质量、同等重量的牛肉，价格却变成了27先令。但是，即使是1764年牛肉的价格涨到了这么高，却还是比亨利亲王所支付的日常价格低了4先令8便士。要知道，商人为远道航海而购买的牛肉通常是腌制的牛肉，而只有最好的牛肉才能拿来腌制。

The price paid by Prince Henry amounts to 3 4/5*d.* per pound weight of the whole carcase, coarse and choice pieces taken

together; and at that rate the choice pieces could not have been sold by retail for less than 4½*d.* or 5*d.* the pound.

亨利亲王所支付的价格相当于每磅3.8便士，这是整个牛身、上等肉和下等肉合在一起的平均价格。根据这个价格，当时上等肉的零售价格，每磅不可能低于4.5便士或5便士。

In the parliamentary inquiry in 1764, the witnesses stated the price of the choice pieces of the best beef to be to the consumer 4*d.* and 4¼*d.* the pound; and the coarse pieces in general to be from seven farthings to 2½*d.* and 2¾*d.* ;and this they said was in general one half-penny dearer than the same sort of pieces had usually been sold in the month of March. But even this high price is still a good deal cheaper than what we can well suppose the ordinary retail price to have been in the time of Prince Henry.

在1764年的议会调查中，作证人都说，当时上等牛肉的上等肉块的零售价格为每磅4便士到4.25便士，而上等牛肉的下等肉块的价格，每磅1.75便士到2.5和2.75便士。他们说，这种价格和三月的普通市价相比，通常每磅约高0.5便士。但是，即使当时酒肉的价格这样高，和亨利亲王时代的牛肉的普通零售价相比，仍然低得多。

During the twelve first years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best wheat at the Windsor market was 1*l.* 18*s.* 3 1/6*d.* the quarter of nine Winchester bushels.

上个世纪的第一个12年间，温莎市场的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为每

夸特（合9温彻斯特蒲式耳）1镑18先令3又1/6便士。

But in the twelve years preceding 1764, including that year,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same measure of the best wheat at the same market was 2 *l.* 1*s.* 9½*d.*

然而，在1764年之前的12年间（包括1764年），同一市场上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为每夸特2镑1先令9.5便士。

In the twelve first years of the last century, therefore, wheat appears to have been a good deal cheaper, and butcher's meat a good deal dearer, than in the twelve years preceding 1764, including that year.

因此，上个世纪的第一个12年间的小麦价格，比1764年之前的12年间（包括1764年在内）的小麦价格要低得多，而鲜肉价格却高得多。

In all great countrie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ultivated lands are employed in producing either food for men or food for cattle. The rent and profit of these regulate the rent and profit of all other cultivated land. If any particular produce afforded less, the land would soon be turned into corn or pasture; and if any afforded more, some part of the lands in corn or pasture would soon be turned to that produce.

在所有大国里，大部分耕地都用来生产人类的食物或牲畜的食物。这些土地的地租和利润支配其余所有耕地的地租和利润。如果任何生产物所支付的地租和利润相对较少，那么耕种这种生产物的土地很快就会被改作谷田或牧场，反之，如果生产物支付的地租和利润相对较多，那么很快部分谷田或牧场就会被用来生产这些特殊的产物。

Those productions, indeed, which require either a greater original expence of improvement, or a greater annual expence of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fit the land for them, appear commonly to afford, the one a greater rent, the other a greater profit than corn or pasture. This superiority, however, will seldom be found to amount to more than a reasonable interest or compensation for this superior expence.

确实如此，为了使土地适用于这些特定的产品，要么需要更多的原始改良支出，要么需要更多的耕作支出，与谷物或者牧草相比，这些产品能为改良支出提供更多的地租，而为耕作支出提供更多的利润。不过，很少能发现这种较高收入超过交稿支出的合理利息或补偿。

In a hop garden, a fruit garden, a kitchen garden, both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and the profit of the farmer, are generally greater than in a corn or grass field. But to bring the ground into this condition requires more expence. Hence a greater rent becomes due to the landlord. It requires too a more attentive and skilful management. Hence a greater profit becomes due to the farmer. The crop too, at least in the hop and fruit garden, is more precarious. Its price, therefore, besides compensating all occasional losses, must afford something like the profit of insurance. The

circumstances of gardeners, generally mean, and always moderate, may satisfy us that their great ingenuity is not commonly over-recompenced. Their delightful art is practised by so many rich people for amusement, that little advantage is to be made by those who practise it for profit; because the persons who should naturally be their best customers, supply themselves with all their most precious productions.

就种植啤酒花、果树和蔬菜的土地说，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和农场主的利润，一般比谷田或草地大。但是，为了使土地适合种植啤酒花、果树和蔬菜，需要更大的支出，因此土地所有者能够获得更高的地租。此外，这种土地需要更精心、更专业的管理，因此农场主应该获得更高的利润。况且，这些作物的收成，至少啤酒花和水果的收成很不稳定，所以，这些产品的价格除补偿所有意外损失外，还必须提供类似保险利润的东西。种植园主的生活状况常常很普通，处于中等水平，这使我们相信，他们熟稔的技能并没有得到超额的回报。许多有钱的人，本来应该是种植园主最好的顾客，现在却为了自娱自乐主动从事种植园主的工作，自己种植最珍贵的种植园产品，所以，靠种植园谋生的人常常得不到很大的收益。

The advantage which the landlord derives from such improvements seems at no time to have been greater than what was 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the original expence of making them. In the ancient husbandry, after the vineyard, a well-watered kitchen garden seems to have been the part of the farm which was supposed to yield the most valuable produce. But Democritus, who wrote upon husbandry abou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and who was regarded by the ancients as one of the fathers of the art, thought they did not act wisely who enclosed a kitchen garden. The profit, he said, would not compensate the expence of a stone wall; and

bricks (he meant, I suppose, bricks baked in the sun) mouldered with the rain, and the winter storm, and required continual repairs. Columella, who reports this judgment of Democritus, does not controvert it, but proposes a very frugal method of enclosing with a hedge of bramblesand briars, which, he says, he had found by experience to be both a lasting and an impenetrable fence; but which, it seems, was not commonly known in the time of Democritus. Palladius adopts the opinion of Columella, which had before been recommended by Varro. In the judgment of those ancient improvers, the produce of a kitchen garden had, it seems, been little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pay the extraordinary culture and the expence of watering; for in countries so near the sun, it was thought proper, in those times as in the present, to have the command of a stream of water, which could be conducted to every bed in the garden.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a kitchen garden is not at present supposed to deserve a better enclosure than that recommended by Columella. In Great Britain, and some other northern countries, the finer fruits cannot be brought to perfection but by the assistance of a wall. Their price, therefore, in such countries, must be sufficient to pay the expence of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what they cannot be had without. The fruit-wall frequently surrounds the kitchen garden, which thus enjoys the benefit of an enclosure which its own produce could seldom pay for.

土地所有者从这种改良中所获得的好处，似乎仅够补偿改良所花的费用。在古代农业中，除葡萄园外，灌溉充足的菜园似乎是农场中能生产最有价值产物的地方了。德谟克利特曾被古人称作农业技术之父，两千年前他写过关于农业方面的著述。他认为，把菜园四周用围墙围起来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菜园的利润不能补偿石墙的费用，而砖块（我想他指的是太阳晒干的砖）一经过雨水和风暴的侵蚀，就

需要不断修补。科卢梅拉在提到德谟克利特上述的观点时，并没有反驳，但提出了一个非常省钱的办法，用黑莓木和欧石南作篱笆把菜园围起来。他说，根据他的经验，这样的栅栏既持久又不易穿过，然而在德谟克利特时代，这个做法似乎并未普及开来。帕拉弟乌斯经过瓦罗的推荐，采纳了科卢梅拉的意见。离太阳较近的国家，无论是在彼时还是现在都认为，应该掌握一定的水源，并将水引入园中的每个苗床，因此这些国家需要支出较高的灌溉费用。根据上述古代农业改良者的意见，彼时菜园生产物的价值似乎在补偿了特殊栽培和浇水的费用后，所剩无几。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现在人们都认为，按照科卢梅拉提倡的方法，把菜园用篱笆围起来就可以了。在大不列颠和其他北方国家，只有用围墙把果园围起来，才能收获优良的水果。所以在这些国家，优良水果的价格必须足够支付生产上所必不可少的围墙建筑费和围墙维护费。果树围墙常常围着蔬菜园，因此能获得被围墙圈起来的好处。

That the vineyard, when properly planted and brought to perfection, was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the farm, seems to have been an undoubted maxim in the ancient agriculture, as it is in the modern through all the wine countries. But whether it was advantageous to plant a new vineyard, was a matter of dispute among the ancient Italian husbandmen, as we learn from Columella. He decides, like a true lover of all curious cultivation, in favour of the vineyard, and endeavours to show, by a comparison of the profit and expence, that it was a most advantageous improvement. Such comparisons, however, between the profit and expence of new projects, are commonly very fallacious; and in nothing more so than in agriculture. Had the gain actually made by such plantations been commonly as great as he imagined it might have been, there could have been no dispute about it. The same point is frequently at this day a matter of controversy in the wine countries. Their writers on agriculture, indeed, the lovers and promoters of high cultivation,

seem generally disposed to decide with Columella in favour of the vineyard. In France the anxiety of the proprietors of the old vineyards to prevent the planting of any new ones, seems to favour their opinion, and to indicate a consciousness in those who must have the experience, that this species of cultivation is at present in that country more profitable than any other. It seem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o indicate another opinion, that this superior profit can last no longer than the laws which at present restrain the free cultivation of the vine. In 1731, they obtained an order of council, prohibiting both the planting of new vineyards, and the renewal of those old ones, of which the cultivation had been interrupted for two years, without a particular permission from the king, to be granted only in consequence of an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ndant of the province, certifying that he had examined the land, and that it was incapable of any other culture. The pretence of this order was the scarcity of corn and pasture, and the super abundance of wine. But had this super abundance been real, it would, without any order of council, have effectually prevented the plantation of new vineyards, by reducing the profits of this species of cultivation below their natural proportion to those of corn and pasture. With regard to the supposed scarcity of corn occasioned by the multiplication of vineyards, corn is nowhere in France more carefully cultivated than in the wine provinces, where the land is fit for producing it; as in Burgundy, Guienne, and the Upper Languedoc. The numerous hands employed in the one species of cultivation necessarily encourage the other, by affording a ready market for its produce. To diminish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are capable of paying for it, is surely a most unpromising expedient for encouraging the cultivation of corn. It is like the policy which would promote agriculture by discouraging manufactures.

适当种植和完善管理的葡萄园，是农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似乎是农业上毋庸置疑的真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所有葡萄酒产国都承认这个真理。但据科卢梅拉说，种植新葡萄园是否有利，对于古代意大利各农场主来说，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科卢梅拉和所有喜欢稀奇植物的真正爱好者一样，赞同种植新葡萄园，并通过比较利润与支出力图证明，种植新葡萄园是一种最有利的农业改良。然而，这种新产业计划中利润与费用的比较通常是很不可靠的，农业中尤其如此。如果种植葡萄园所得的实际利益真像科卢梅拉想象的那么大，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引起人们的争论了。直到现在，在葡萄酒产国中，人们对于种植新葡萄园是否有利这个问题仍然争执不下。这些国家的农业专家，即高级耕作的爱好者和推广者，和科卢梅拉一样，都赞同种植新葡萄园。法国旧葡萄园所有者阻止种植新葡萄园的焦急心情，似乎印证了农业专家的想法，同时可以看出，有经验的葡萄园种植者都觉得现在在法国种植葡萄，比栽种其他任何植物都更有利可图。但是，同时似乎也表示，从另一方面看来，葡萄园的高额利润受益于当前仍然有效的、限制葡萄自由种植的法律，倘若没有这法律的庇护，这种高额利润就无法持续下去。1731年，旧葡萄园所有者接到这样的命令：凡未经国王特许，禁止种植新葡萄园，或续种辍耕两年及以上的旧葡萄园。要想得到国王的特许，必须先找州长查验，证明土地除了种植葡萄外，不适合其他任何耕作。据说，当时发布这条命令的借口是，市场上谷物和牧草供应不足，而葡萄酒却供应过剩。但是，倘若葡萄酒供应过剩是事实的话，那么葡萄园的利润就会降落到它与牧场和谷田的利润的自然比例之下，那么无需上述命令就能有效阻止新葡萄园的种植。至于所谓的葡萄园种植增多导致谷物供应不足，我们知道，在法国，生产葡萄酒的各省的土地非常适合生产谷物，在这些省，谷物耕种得比其他各省更精细，在勃艮第和吉耶讷是如此，在上郎格多克也是如此。一种耕作事业（如葡萄园种植）雇佣很多劳动者，必然给另一种耕作事业（如谷物种植）的产品提供不错的市场，从而鼓励另一种耕作事业（如谷物种植）的发展。减少谷物的消费者（葡萄园雇佣的劳动者是谷物的消费者），无疑是最不利于鼓励谷物耕作的方法。这方法就像靠遏制制造业来促进农业的政策一样。

The rent and profit of those productions, therefore, which require either a greater original expence of improvement in order to fit the land for them, or a greater annual expence of cultivation, though often much superior to those of corn and pasture, yet when they do no more than compensate such extraordinary expence, are in reality regulated by the rent and profit of those common crops.

因此，人们最初总是需要花费较多的土地改良支出，才能使土地适合生产某些特殊的生产物，或者花费较多的年耕作支出，才能生产这些生产物。这些生产物的地租和利润，虽然常常大大超过谷物或牧草的地租和利润，但当地租和利润的超额仅够补偿超额的支出时，那么这种生产物地租和利润，实际上仍受普通作物的地租和利润的支配。

It sometimes happens, indeed, that the quantity of land which can be fitted for some particular produce, is too small to supply the effectual demand. The whole produce can be disposed of to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give somewhat more than what is sufficient to pay the whole rent, wages and profit necessary for raising and bringing it to market,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al rates, or according to the rates at which they are paid in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cultivated land. The surplus part of the price which remains after defraying the whole expence of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may commonly, in this case, and in this case only, bear no regular proportion to the like surplus in corn or pasture, but may exceed it in almost any degree;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is excess naturally goes to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诚然，有时适合种植某种特殊生产物的土地面积过小，不够供应

其有效需求。那么此时，全部生产部可能就会卖给那些愿意出高价的人。他们支付的价格，一般略高于普通价格，即稍稍高于按照地租、工资和利润的自然率，或按照大部分其他耕地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计算的，买家必须支付的，产品生产和进入市场所需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生产物的价格中除去土地改良和耕作的全部费用后，剩余的部分和谷物或牧草价格的同样剩余的部分不保持普通的比例，而且几乎可以超过谷物和牧草价格的剩余部分，超过多少几乎没有限制。超额的大部分自然归入土地所有者的地租。

The usual and natural proportion, for example, between the rent and profit of wine and those of corn and pasture, must be understood to take place only with regard to those vineyards which produce nothing but good common wine, such as can be raised almost anywhere, upon any light, gravelly, or sandy soil, and which has nothing to recommend it but its strength and wholesomeness. It is with such vineyards only that the common land of the country can be brought into competition; for with those of a peculiar quality it is evident that it cannot.

我们必须知道，葡萄酒的地租和利润，与谷物、牧草的地租和利润之间的普通和自然比例，只有在生产优良普通葡萄酒的葡萄园才会有。这种优良的普通葡萄酒只要在松软沙砾或沙子土壤上都能生产，而且除了烈度和有益健康外，无足称道。国内普通土地只能和这种普通葡萄园竞争，和优良品质的葡萄园显然是无法竞争的。

The vine is more affected by the difference of soils than any other fruit tree. From some it derives a flavour which no culture or management can equal, it is supposed, upon any other. This flavour,

real or imaginary, is sometimes peculiar to the produce of a few vineyards; sometimes it extends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a small district, and sometimes through a considerable part of a large province. The whole quantity of such wines that is brought to market falls short of the effectual demand, or the demand of those who would be willing to pay the whole rent, profit and wages necessary for preparing and bringing them thither, according to the ordinary rate, or according to the rate at which they are paid in common vineyards. The whole quantity, therefore, can be disposed of to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ay more, which necessarily raises theprice above that of common wine. The difference is greater or less, according as the fashionableness and scarcity of the wine render the competition of the buyers more or less eager. Whatever it be, the greater part of it goes to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For though such vineyards are in general more carefully cultivated than most others, the high price of the wine seems to be, not so much the effect, as the cause of this careful cultivation. In so valuable a produce the loss occasioned by negligence is so great as to force even the most careless to attention. A small part of this high price, therefore, is sufficient to pay the wages of the extraordinary labour bestowed upon their cultivation, and the profits of the extraordinary stock which puts that labour into motion.

在所有果树中，葡萄树最容易受到土壤差异的影响。人们认为，一种特殊土壤上栽培的葡萄树所具有的特殊美味，绝不是在另一种土壤上用任何栽培手段或是管理方法能够做到的。这种美味，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有时仅为几个葡萄园的产物所特有，有时扩大到某个小地区的绝大部分葡萄园所共有，有时又为某个大省中大部分葡萄园所共有。进入市场的这种葡萄酒的全部数量不够供应有效需求，即不够供应这些人的需求；他们愿意支付按照一般地租、工资和利润率计算的，或按照上述葡萄园所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计算的，生

产和运输这种葡萄酒所必须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因此，这种葡萄酒的全部产量可以卖给愿意支付高价的人，这必然会使其价格超过普通葡萄酒的价格。这两种价格相差多少，取决于这种葡萄酒的流行性与稀缺性所能激起的购买者竞争的激烈程度的大小。但无论两种价格相差多少，差额的大部分都归入土地所有者的地租。虽然通常人们在栽培这种葡萄园时，往往比栽培其他葡萄园更为精细，但葡萄酒的高价似乎是精细栽培的原因，不是精细栽培的结果。在生产这种高价生产物时，疏忽造成的损失非常大，所以，即使最粗心的人也不得不多加留意。因此，这种葡萄酒高价的一小部分，就足够支付生产上额外劳动的工资和额外资本的利润。

The sugar colonies possessed by the European nations in the West Indies, may be compared to those precious vineyards. Their whole produce falls short of the effectual demand of Europe, and can be disposed of to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give more than what is sufficient to pay the whole rent, profit and wages necessary for preparing and bringing it to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rate at which they are commonly paid by any other produce. In Cochin-China the finest white sugar commonly sells for three piasters the quintal, about thirteen shillings and sixpence of our money, as we are told by Mr. Poivre, a very careful observer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at country. What is there called the quintal weighs from a hundred and fifty to two hundred Paris pounds, or a hundred and seventy-five Paris pounds at a medium, which reduces the price of the hundredweight English to about eight shillings sterling, not a fourth part of what is commonly paid for the brown or muskavada sugars imported from our colonies, and not a sixth part of what is paid for the finest white suga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ultivated lands in Cochin-China are employed in producing corn and rice, the food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The respective prices of corn, rice, and sugar, are there probably in the natural proportion, or in that which

naturally takes place in the different crop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cultivated land, and which recompences the landlord and farmer, as nearly as can be computed, according to what is usually the original expence of improvement and the annual expence of cultivation. But in our sugar colonies the price of sugar bears no such proportion to that of the produce of a rice or corn field either in Europe or in America. It is commonly said, that a sugar planter expects that the rum and the molasses should defray the whole expence of his cultivation, and that his sugar should be all clear profit. If this be true, for I pretend not to affirm it, it is as if a corn farmer expected to defray the expence of his cultivation with the chaff and the straw, and that the grain should be all clear profit. We see frequently societies of merchants in London and other trading towns, purchase waste lands in our sugar colonies, which they expect to improve and cultivate with profit by means of factors and agents; notwithstanding the great distance and the uncertain returns, from the def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those countries. Nobody will attempt to improve and cultivate in the same manner the most fertile lands of Scotland, Ireland, or the corn provinces of North America, though from the more exact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these countries, more regular returns might be expected.

欧洲各国在西印度占有的产糖殖民地，可与这种优良的葡萄园相比较。产糖殖民地的全部蔗糖产量不能满足欧洲人的有效需求，所以，全部的蔗糖产量只能卖给愿意出高价的人，即价格超过按其他任何产品通常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计算的，蔗糖生产和上市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普瓦夫尔曾对交趾支那的农业进行过仔细的研究，据他说，交趾支那最上等精制白糖的价格通常是每英担3皮阿斯特，合英币13先令6便士。交趾支那的重量单位英担，合150到200巴黎磅，平均合175巴黎磅。以英担计算，每100磅约8先令。

交趾支那最上等精制白糖的价格还不到我们从殖民地输入的红糖或粗砂糖通常价格的1/4，不到我们从殖民地输入的最上等精制白糖的1/6。交趾支那的大部分耕地都用来生产谷物和大米，这是那里大部分国民的食物。在那里，谷物、大米和蔗糖的价格间可能具有自然的比例，即大部分耕地上不同生产物的价格间自然而然地成比例，使各土地所有者和各农场主，都得到尽可能按照通常的土地最初改良费用和生产物每年耕作费用计算的报酬。但我国产糖殖民地的蔗糖价格，对欧美稻田或谷田的生产物价格，却没有这样的比例。人们通常认为，甘蔗种植者都希望朗姆酒和糖蜜两种产品能够补偿所有的种植费用，而全部的蔗糖应是纯利润。我不敢肯定这种说法是否真实，假设这确是事实，那么甘蔗种植者的想法就和谷物耕作者一样，后者常常希望用麦糠和麦秆支付所有耕作费用，而以全部谷粒作为纯利润。我们常常看到伦敦及其他商业城市的商人团体购买我国产糖殖民地的荒地，托代办人或代理人从事改良和耕作。虽然距离遥远，殖民地的司法行政机构又不健全，无法保障他们的确定收入，他们仍希望从中获取利润。而在苏格兰、爱尔兰或北美产谷各地的最肥沃土地上，没有人想用同一种方法来改良和耕作，虽然这些地方有着完善的司法行政机构，人们也许有望得到比较正常的回报。

In Virginia and Maryland, the cultivation of tobacco is preferred, as more profitable, to that of corn. Tobacco might be cultivated with advantage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but in almost every part of Europe it has become a principal subject of taxation, and to collect a tax from every different farm in the country where this plant might happen to be cultivated,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it has been supposed, than to levy one upon its importation at the custom-house. The cultivation of tobacco has upon this account been most absurdly prohibited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which necessarily gives a sort of monopoly to the countries where it is allowed; and as Virginia and Maryland produce the greatest quantity of it, they share largely, though with

some competitors, in the advantage of this monopoly. The cultivation of tobacco, however, seems not to be so advantageous as that of sugar. I have never even heard of any tobacco plantation that was improved and cultivated by the capital of merchants who resided in Great Britain, and our tobacco colonies send us home no such wealthy planters as we see frequently arrive from our sugar islands. Though from the preference given in those coloni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tobacco above that of corn, it would appear that the effectual demand of Europe for tobacco is not completely supplied, it probably is more nearly so than that for sugar; and though the present price of tobacco is probably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pay the whole rent, wages and profit necessary for preparing and bringing it to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rate at which they are commonly paid in corn land; it must not be so much more as the present price of sugar. Our tobacco planters, accordingly, have shown the same fear of the super abundance of tobacco, which the proprietors of the old vineyards in France have of the super abundance of wine. By act of assembly they have restrained its cultivation to six thousand plants, supposed to yield a thousand weight of tobacco, for every negro between sixteen and sixty years of age. Such a negro, over and above this quantity of tobacco, can manage, they reckon, four acres of Indian corn. To prevent the market from being overstocked too, they have sometimes, in plentiful years, we are told by Dr. Douglas, (I suspect he has been ill informed) burnt a certain quantity of tobacco for every negro,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Dutch are said to do of spices. If such violent methods are necessary to keep up the present price of tobacco, the superior advantage of its culture over that of corn, if it still has any, will not probably be of long continuance.

在北美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人们认为种植烟草更有利可图，所

以更愿种烟草，不愿种谷物。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种植烟草也许可以获得利益，但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把烟草作为课税的主要对象。欧洲各国的人们还认为，向种植烟草的各个农场收税比海关向进口烟草征税更困难。于是欧洲大部分地区便颁布了这么一个荒谬的规定，禁止种植烟草。这样，允许种植烟草的国家便可以垄断市场。由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烟草生产量最大，所以它们虽然遇到一些竞争者，却享受了这种垄断大部分的好处。但是，种植烟草似乎不像栽种甘蔗那么有利。我从未听说过，居住大不列颠的商人投资改良和种植烟草园。我从未听说过，从烟草殖民地归国的种植园主像从产糖殖民地归国的同胞那样富贾四方。尽管从殖民地人民喜欢种植烟草，不愿意种植谷物这一事实看来，欧洲对烟草的有效需求似乎并未全部得到供给，但市场上烟草的供给似乎比砂糖的供给更接近于有效需求。尽管现在烟草的价格也许超过了按谷田一般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计算的烟草生产和上市所必须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资与利润，但超过的部分一定小于现在糖价的超额。因此，我国殖民地的烟草种植者，像法国旧葡萄园所有者担心葡萄酒生产过剩一样，也害怕烟草生产过剩。于是，通过议会法令，他们对烟草种植加以限制，即年龄在16岁到60岁之间的黑奴，每人只能种植烟草6000本（他们认为6000本可产烟1000磅）。他们认为，这样一位黑奴，除了生产6000本的烟草外，还能种植4英亩玉米。道格拉斯博士告诉我们（我怀疑他的消息不准），他们为了防止市场上烟草供给过剩，有时会在丰年把每个黑奴生产的烟草烧掉一些，就像荷兰人把他们生产的香料烧掉一些一样。如果必须用这种过激的方法才能维持现在的烟草价格，那么，种植烟草对于种植谷物的优势即使存在，恐怕也持续不了很久。

It is in this manner that the rent of the cultivated land, of which the produce is human food, regulates the ren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cultivated land. No particular produce can long afford less; because the land would immediately be turned to another use. And if any particular produce commonly affords more, it is because the quantity of land which can be fitted for it is too small to supply

the effectual demand.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生产人类粮食的耕地的地租支配着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任何特殊生产物所提供的地租都不能长久低于大部分耕地的地租，因为倘若真的如此，种植特殊生产物的土地很快将被转为他用。倘若任何特殊生产物所提供的地租通常高于大部分耕地的地租，那是因为适合种植该生产物的土地过少，不能供应其有效需求。

In Europe corn is the principal produce of land which serves immediately for human food. Except in particular situations, therefore, the rent of corn land regulates in Europe that of all other cultivated land. Britain need envy neither the vineyards of France nor the olive plantations of Italy. Except in particular situations, the value of these is regulated by that of corn, in which the fertility of Britain is not much inferior to that of either of those two countries.

在欧洲，谷物是直接供应人类粮食的主要生产物。所以，除了在特殊情况下，欧洲谷田的地租通常支配着所有其他耕地的地租。英格兰既无需羡慕法国的葡萄园，也无需羡慕意大利的橄榄园。因为除了在特殊情况下，葡萄与橄榄的价值也要由谷物的价值来规定，而在生产谷物方面，英格兰的土地同样肥沃，并不和法国和意大利的土地有很大差别。

If in any country the common and favourite vegetable food of the people should be drawn from a plant of which the most common land, with the same or nearly the same culture, produced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than the most fertile does of corn,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or the surplus quantity of food which would remain to

him, after paying the labour and replacing the stock of the farmer together with its ordinary profits, would necessarily be much greater. Whatever was the rate at which labour was commonly maintained in that country, this greater surplus could always maintain a greater quantity of it, and consequently enable the landlord to purchase or command a greater quantity of it. The real value of his rent, his real power and authority, his command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with which the labour of other people could supply him, would necessarily be much greater.

如果在任何一个国家，人们通常爱吃的植物性食物来自其他植物而非谷物，并且以和谷田相同或几乎相同的方式耕作，那么这个国家最普通的土地所能生产的这种植物数量比最肥沃的谷田所能生产的谷物数量多得多，那么，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在支付了劳动工资、偿付了农场主资本及其普通利润后所剩余的食物数量，一定大得多。不论这国家维持劳动的普通工资是怎样，这些更多的剩余食物总能维持更多的劳动，土地所有者因此就能购买或支配更多的劳动数量。他的地租的真实价值，他的权力和权威，他所能支配的他人劳动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一定大得多。

A rice field produces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food than the most fertile corn field. Two crops in the year from thirty to sixty bushels each, are said to be the ordinary produce of an acre. Though its cultivation, therefore, requires more labour, a much greater surplus remains after maintaining all that labour. In those rice countries, therefore, where rice is the common and favourite vegetable food of the people, and where the cultivators are chiefly maintained with it, a greater share of this greater surplus should belong to the landlord than in corn countries. In Carolina, where the planters, as in other British colonies, are generally both farmers

and landlords, and where rent consequently is confounded with profit, the cultivation of rice is found to be more profitable than that of corn, though their fields produce only one crop in the year, and though, from the prevalence of the customs of Europe, rice is not there the common and favourite vegetable food of the people.

稻田生产的食物数量，比最肥沃的谷田生产的食物数量大得多。据说，每英亩稻田通常每年能够收获两次，每次产量为30到60蒲式耳。虽然耕种稻田通常需要更多的劳动，但稻田的产量在维持了所有劳动后，剩余也多得多。因此，在那些普遍爱吃稻米，而耕作者也主要靠稻米维持生活的产米国家，土地所有者从稻米更大的剩余中所得的，比产谷国的土地所有者从谷物的剩余中所得的要更多。在卡罗来纳，像在其他英属殖民地一样，耕作者常常即是农场主又是土地所有者，因此，地租与利润经常混淆。虽然当地稻田每年只收获一次，而且当地人民和欧洲人民的习惯一样，都认为大米不是他们最常见和最喜欢的植物性食物，但他们都认为耕种稻田比耕种谷田更为有利可图。

A good rice field is a bog at all seasons, and at one season a bog covered with water. It is unfit either for corn, or pasture, or vineyard, or, indeed, for any other vegetable produce that is very useful to men; and the lands which are fit for those purposes, are not fit for rice. Even in the rice countries, therefore, the rent of rice lands cannot regulate the rent of the other cultivated land which can never be turned to that produce.

良好的稻田一年四季都是沼泽地，而且有一个季节还会被水覆盖。这样的土地不适合种植谷物、牧草或葡萄，事实上除了种稻外，不适合种植其他任何对人类有用的植物性食物。而适合种植对人类有

用的植物性食物的土地也不适合种稻。所以，即使在产稻国家，稻田的地租也不能规定其他无法改种水稻的耕地的地租。

The food produced by a field of potatoes is not inferior in quantity to that produced by a field of rice, and much superior to what is produced by a field of wheat. Twelve thousand weight of potatoes from an acre of land is not a greater produce than two thousand weight of wheat. The food or solid nourishment, indeed, which can be drawn from each of those two plants, is not altogether in proportion to their weight, on account of the watery nature of potatoes. Allowing, however, half the weight of this root to go to water, a very large allowance, such an acre of potatoes will still produce six thousand weight of solid nourishment, three times the quantity produced by the acre of wheat. An acre of potatoes is cultivated with less expence than an acre of wheat; the fallow, which generally precedes the sowing of wheat, more than compensating the hoeing and other extraordinary culture which is always given to potatoes. Should this root ever become in any part of Europe, like rice in some rice countries, the common and favourite vegetable food of the people, so as to occupy the same proportion of the lands in tillage which wheat and other sorts of grain for human food do at present, the same quantity of cultivated land would maintain a much greater number of people, and the labourers being generally fed with potatoes, a greater surplus would remain after replacing all the stock and maintaining all the labour employed in cultivation. A greater share of this surplus too would belong to the landlord. Population would increase, and rents would rise much beyond what they are at present.

马铃薯地的产量不逊于稻田的产量，比麦田的产量也要大得多。

一英亩地生产12000磅马铃薯，和一英亩地生产2000磅小麦相比，并不算高产。诚然，由于马铃薯水分多，从这两种植物中分别获得的食物或固体营养物和植物各自的重量不成比例。但是，即使我们把马铃薯重量的一半看作水分扣除出去（这是很大的扣除），每英亩地的马铃薯仍然能够提供6000磅的固体营养物，仍然是每英亩麦田所产数量的3倍。况且，每英亩马铃薯的耕作支出比每英亩麦田的耕作支出少，而播种小麦前常常要休耕，所费就超过马铃薯种植过程中产生的锄草及其他额外耕作费用。所以，如果将来马铃薯成为欧洲某地人民普遍爱吃的食物，就像米是产米国家人民普遍爱吃的食物那样，从而使得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在所有耕地中所占的比例，等于现在小麦及其他人类食用谷物的种植面积在所有耕地中所占的比例，那么同一面积的耕地养活的人民一定比现在多得多。而且，如果劳动者一般都以马铃薯为食物，那么马铃薯的产量在补偿了耕作过程中投入的所有资本、且维持了耕作过程中的所有劳动后，会有比小麦和其他人类食用谷物更大的剩余。剩余的大部分也将归入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人口会增长，地租也会比现在高得多。

The land which is fit for potatoes, is fit for almost every other useful vegetable. If they occupied the same proportion of cultivated land which corn does at present, they would regulate, in the same manner, the ren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cultivated land.

适合种植马铃薯的土地几乎适合种植其他任何有用的植物。假设马铃薯耕种面积在全部耕地中所占比例，和现在谷田在全部耕地中所占的比例相同，那么马铃薯耕地的地租就会像现在谷田地租那样，规定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

In some parts of Lancashire it is pretended, I have been told, that bread of oatmeal is a heartier food for labouring people than

wheaten bread, and I have frequently heard the same doctrine held in Scotland. I am, however, somewhat doubtful of the truth of it. The common people in Scotland, who are fed with oatmeal, are in general neither so strong nor so handsome as the same rank of people in England, who are fed with wheaten bread. They neither work, so well nor look so well; and as there is not the sa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ople of fashion in the two countries, experience would seem to show, that the food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Scotland is not so suitable to the human constitution as that of their neighbours of the same rank in England. But it seems to be otherwise with potatoes. The chairmen, porters, and coal-heavers in London, and those unfortunate women who live by prostitution, the strongest men and the most beautiful women perhaps in the British dominions, are said to b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from the lowest rank of people in Ireland, who are generally fed with this root. No food can afford a more decisive proof of its nourishing quality, or of its being peculiarly suitable to the health of the human constitution.

我听说，在兰开夏郡某些地方，有这样的说法：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吃燕麦面包比吃小麦面包更抗饿。我听说苏格兰也有同样的说法。我对这种传闻的真实性有些怀疑。通常来说，吃燕麦面包的苏格兰普通人民和吃小麦面包的同一阶层的英格兰人民相比，既没有英格兰人民那么强壮，也没有英格兰人民那么俊美。他们既不像英格兰人那样工作出色，也不像英格兰人那样健康。由于两地上层人民中间没有这种差别，经验似乎表明，苏格兰普通人民的食物不像英格兰普通人民的食物那样适合人类的体质。但马铃薯的情况似乎完全不同。伦敦的轿夫、脚夫和煤炭挑夫，以及靠卖淫为生的失足妇女（也许是英格兰领土上最强壮的男人和最漂亮的女人了），据说其中大部分来自通常以马铃薯为食物的爱尔兰最底层人民。马铃薯比任何食物都能提供更明确的证据，证明它具有营养价值，或者特别适合人类体质。

It is difficult to preserve potatoes through the year, and impossible to store them like corn, for two or three years together. The fear of not being able to sell them before they rot, discourages their cultivation, and is, perhaps, the chief obstacle to their ever becoming in any great country, like bread, the principal vegetable food of all the different ranks of the people.

马铃薯很难保存一年，也不可能像谷物那样贮藏两三年。人们常常害怕不能在马铃薯腐烂前把它们卖掉，于是便不想种植马铃薯，而在任何大国，马铃薯之所以不能像面包那样，成为各阶层人民的主要植物性食物，可能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Part II. Of the Produce of Land which sometimes does, and sometimes does not, afford Rent

第二节、论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Human food seems to be the only produce of land which always and necessarily affords some rent to the landlord. Other sorts of produce sometimes may and sometimes may no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在所有土地生产物中，似乎只有人类食物总是并且必须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其他生产物根据情况不同，有时提供地租，有时不提供地租。

After food, clothing and lodging are the two great wants of

mankind.

衣服和住宅是人类除了食物之外的另外两大需要。

Land in its original rude state can afford the materials of clothing and lodging to a much greater number of people than it can feed. In its improved state it can sometimes feed a greater number of people than it can supply with those materials; at least in the way in which they require them, and are willing to pay for them. In the one state, therefore, there is always a super abundance of those materials, which are frequently, upon that account, of little or no value. In the other there is often a scarcity, which necessarily augments their value. In the one state a great part of them is thrown away as useless, and the price of what is used is considered as equal only to the labour and expence of fitting it for use, and can, therefore, afford no rent to the landlord. In the other they are all made use of, and there is frequently a demand for more than can be had. Somebody is always willing to give more for every part of them than what is sufficient to pay the expence of bringing them to market. Their price, therefore, can always afford some rent to the landlord.

原始自然状态下的土地既能提供制衣材料和建房材料，也能提供食物，但制衣材料和建房材料所能供给的人数比食物能养活的人数要多。进步状态的土地则恰恰相反，有时食物养活的人数比制衣材料和建房材料所能供给的人数要少，至少当人们都需要衣服建房材料，并且都愿意为此支付价钱时确实如此。所以，当土地处于原始的自然状态时，制衣材料和建房材料总是供应过剩，因此价值不大，甚至完全没有价值。当土地处于进步状态时，制衣材料和建房材料总是供应不

足，因此其价值增大。当土地处于原始自然状态时，大部分制衣材料和建房材料因为用处而被人们抛弃，而使用的那部分制衣材料和建房材料的价格，可以说只等于改造这些材料使其适合人类使用所花费的劳动和支出，因此，自然不能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当土地处于原始自然状态时，制衣材料和建房材料通常全被使用，而且往往供不应求。因此，无论多少的制衣材料和建房材料，都有人愿意以高价，即超过其生产和上市所需费用的价格来购买。所以此时，制衣材料和建房材料的价格总能为土地所有者提供一定的地租。

The skins of the larger animals were the original materials of clothing. Among nations of hunters and shepherds, therefore, whose food consists chiefly in the flesh of those animals, every man, by providing himself with food, provides himself with the materials of more clothing than he can wear. If there was no foreign commerc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would be thrown away as things of no value. This was probably the case among the hunting nations of North America, before their country was discovered by the Europeans, with whom they now exchange their surplus peltry, for blankets, fire-arms, and brandy, which gives it some value. In the present commercial state of the known world, the most barbarous nations, I believe, among whom land property is established, have some foreign commerce of this kind, and find among their wealthier neighbours such a demand for all the materials of clothing, which their land produces, and which can neither be wrought up nor consumed at home, as raises their price above what it costs to send them to those wealthier neighbours. It affords, therefore, some rent to the landlord. Whe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highland cattle were consumed on their own hills, the exportation of their hides made the most considerable article of the commerce of that country, and what they were exchanged for afforded some addition to the rent of the highland estates. The wool of England, which in old times could

neither be consumed nor wrought up at home, found a market in the then wealthier and more industrious country of Flanders, and its price afforded something to the rent of the land which produced it. In countries not better cultivated than England was then, or than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are now, and which had no foreign commerce, the materials of clothing would evidently be so super abundant, that a great part of them would be thrown away as useless, and no part could afford any rent to the landlord.

较大动物的皮毛是制作衣服的最初材料。所以，对于那些主要以动物肉为主要食物的狩猎民族和牧畜民族来说，每个人在获取食物时，也就能获得较多的制衣材料。如果没有对外贸易，那么多余的皮毛就会被看作没有价值的东西而被抛弃。北美狩猎民族在被欧洲人发现以前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现在，他们用过剩的毛皮和欧洲人交换毛毡、火器和白兰地酒，这样他们剩余的皮毛就具有了一定的价值。我相信，在已知世界现有的通商状态下，即使是最不开化的民族，只要已经建立土地私有制，就有一定的这种对外贸易，就会发现较富裕的邻国对他们国内土地生产、但不能在国内加工或消费的制衣材料有需求，这种材料的价格因而升高，超过将其运往邻国销售所需的成本。于是，这种材料的价格就为土地所有者提供了一定的地租。举例来说，当苏格兰高地的大部分牲畜都留在高地，由本地区人民消费时，出口兽皮就成了该地贸易最主要的项目，换回的其他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地土地的地租。以前，英格兰羊毛在本地既不能消费又无法加工，但在当时更富裕、更勤劳的弗兰德国家找到了市场，羊毛的售价也为其产地提供了一定地租。在耕作状态不比当时的英格兰和现在的苏格兰高地更为进步，又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制衣材料显然会过剩，大部分将因为无用而被抛弃，于是不能给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

The materials of lodging cannot always be transported to so

great a distance as those of clothing, and do not so readily become an object of foreign commerce. When they are super abundant in the country which produces them, it frequently happens, even in the present commercial state of the world, that they are of no value to the landlord. A good stone quarry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London would afford a considerable rent. In many parts of Scotland and Wales it affords none. Barren timber for building is of great value in a populous and well-cultivated country, and the land which produces it affords a considerable rent. But in many parts of North America the landlord would be much obliged to anybody who would carry away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large trees. In some parts of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the bark is the only part of the wood which, for want of roads and water-carriage, can be sent to market. The timber is left to rot upon the ground. When the materials of lodging are so super abundant, the part made use of is worth only the labour and expence of fitting it for that use. It affords no rent to the landlord, who generally grants the use of it to whoever takes the trouble of asking it. The demand of wealthier nations, however, sometimes enables him to get a rent for it. The paving of the streets of London has enabled the owners of some barren rocks on the coast of Scotland to draw a rent from what never afforded any before. The woods of Norway and of the coasts of the Baltic, find a market in many parts of Great Britain which they could not find at home, and thereby afford some rent to their proprietors.

建房材料不能总是像制衣材料那样运往远方，因而，也不像制衣材料那样容易成为对外贸易的对象。在建房材料生产过剩的国家，即使在今天商业状态下，这些过剩材料也常常对土地所有者毫无价值。在伦敦附近，一个不错的采石场能提供相当大的地租，而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许多地方，采石场却不提高任何地租。在人口稠密、耕作发达的国家，建筑用木材有着极高的价值，其产地能提供相当大的地租。

但在北美许多地方，土地所有者不仅得不到地租，如果有人愿意把他的大部分大树砍下运走，他还会非常感谢。在苏格兰高地有些地方，由于缺少水陆运输，所以只有树皮能够进入市场，木材则被扔在地上，任其腐烂。当建房材料过剩时，实际上被使用的那部分材料，仅够支付加工时所需的劳动和费用。木材并不对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谁不怕麻烦开口请求，想要使用这些材料，土地所有者都会欣然应允。但是当附近的富裕民族对建房材料有需求时，这些材料有时就能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例如，苏格兰海岸一些光秃岩石的所有者以前从未从这些岩石中获得地租，但是后来随着伦敦街道铺设路面，岩石开始为所有者提高一些地租。又如，挪威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树木在本国找不到市场，但在大不列颠的许多地方却找到了销路，因而为其所有者提供了一些地租。

Countries are populous, not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m their produce can clothe and lodge, but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those whom it can feed. When food is provided, it is easy to find the necessary clothing and lodging. But though these are at hand, it may often be difficult to find food. In some parts even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what is called A House, may be built by one day's labour of one man. The simplest species of clothing, the skins of animals, requires somewhat more labour to dress and prepare them for use. They do not, however, require a great deal. Among savage and barbarous nations, a hundredth or little more than a hundredth part of the labour of the whole year, will be sufficient to provide them with such clothing and lodging as satisfy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eople. All the other ninety-nine parts are frequently no more than enough to provide them with food.

一国人口众多，不是和该国衣服建房材料所能供给的人数成比例，而和该国食物所能供给的人数成比例。当食物得到供给时，人们

很容易找到必要的衣服和住宅。但是，有了衣服和住宅，人们却可能常常难以找到食物。即使在大不列颠的某些地区，所谓的住宅只需一个人花一天的功夫就可建成。最简单的衣服即动物皮毛，需要略多的劳动进行加工处理，但也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对于野蛮或未开化的民族来说，获得这种衣服和住宅所需花费的劳动仅占全年劳动的1%，剩余99%的劳动都用来获取食物，所获食物还往往仅勉强够用。

But when by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land the labour of one family can provide food for two, the labour of half the society becomes sufficient to provide food for the whole. The other half, therefore, or at leas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can be employed in providing other things, or in satisfying the other wants and fancies of mankind. Clothing and lodging, household furniture, and what is called Equipage, are the principal object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wants and fancies. The rich man consumes no more food than his poor neighbour. In quality it may be very different, and to select and prepare it may require more labour and art; but in quantity it is very nearly the same. But compare the spacious palace and great wardrobe of the one, with the hovel and the few rags of the other, and you will be sensible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clothing, lodging, and household furniture, is almost as great in quantity as it is in quality. The desire of food is limited in every man by the narrow capacity of the human stomach; but the desire of the conveniencies and ornaments of building, dress, equipage, and household furniture, seems to have no limit or certain boundary. Those, therefore, who have the command of more food than they themselves can consume, are always willing to exchange the surplus, or, what is the same thing, the price of it, for gratifications of this other kind. What is over and above satisfying the limited desire, is given for the amusement of those desires which cannot be satisfied, but seem to be altogether endless. The

poor, in order to obtain food, exert themselves to gratify those fancies of the rich, and to obtain it more certainly, they vie with one another in the cheapness and perfection of their work. The number of workmen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ing quantity of food, or with the growing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e lands; and as the nature of their business admits of the utmost subdivisions of labour, the quantity of materials which they can work up, increases in a much greater proportion than their numbers. Hence arises a demand for every sort of material which human invention can employ, either usefully or ornamentally, in building, dress, equipage, or household furniture; for the fossils and minerals contained in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the precious metals, and the precious stones.

但当土地改良和耕作使一个家庭的劳动能为两个家庭提供食物时，社会一半的劳动便足以供应全社会的食物。所以剩下的一半劳动，至少剩下的大部分劳动，就能用来生产其他产品，即用来满足人类其他的需要和爱好。这些需要和爱好大部分指的是衣服、住宅、家具，以及所谓的四轮马车。富人消费的食物并不比他贫困的邻居消费的多。虽然从质量来看，二者的食物或许大不相同，富人的食物在选择和烹饪方面可能需要更多的劳动和技术，但是二者消费的食物数量却几乎相同。但是，当我们把富人豪华的宅邸以及巨大的衣橱和穷人简陋的房屋以及破衣烂衫作对比时就会发现，两者无论是在质量方面还是在数量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人们对食物的欲望，因为胃的容量而受到限制，但是对住宅、衣服、家具以及四轮马车的欲望，却似乎无穷无尽。所以，当一个人有大量食物、自己又消费不了时，总是愿意用剩余食物或其价钱来交换其他东西，以满足自己的其他欲望。满足了有限欲望后的剩余的物品，被用来满足那些无法满足、而且似乎永无止境的欲望。穷人为了获得食物，常常卖力工作，以满足富人的这种爱好。为了更有把握获得食物，穷人们常常互相竞争，使其工作愈加完美，价格却愈加低廉。工人数量随这食物数量的增加而

增加，换句话说，随着土地改良和耕作的进步而增加。由于工人们工作的性质允许最大限度的分工，所以他们能够加工的原料的数量，比他们的人数增加的要多得多。因此，人们才对人类发明可能用到的各种原料有了需求，无论是实用性原料还是装饰性原料，无论是建筑、衣服、四轮马车还是家具制造方面的原料，除此之外，人们对地下的化石、矿产、贵金属和宝石也产生了需求。

Food is in this manner, not only the original source of rent, but every other part of the produce of land which afterwards affords rent, derives that part of its value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owers of labour in producing food by means of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land.

这样，食物不仅成为地租的原始来源，对于后来提供地租的那部分土地生产物来说，其相当于地租那部分价值也来自于生产食物的劳动生产力的改进（劳动生产力这样的改进是土地改良和耕作的结果）。

Those other parts of the produce of land, however, which afterwards afford rent, do not afford it always. Even in improved and cultivated countries, the demand for them is not always such as to afford a greater price than what is sufficient to pay the labour, and replace, together with its ordinary profits, the stock which must be employed in bringing them to market. Whether it is or is not such, depends upo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但是，那些后来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并不总能提供地租。即使在土地已经得到改良并耕作的国家，人们对这类土地生产物的需求也

并不总是很高，这些土地生产物的价格在支付了工资，偿还了资本并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后，也常常所剩无几。这类土地生产物能否提供地租要视情况而定。

Whether a coal-mine, for example, can afford any rent, depends partly upon its fertility, and partly upon its situation.

例如，煤矿能否提供地租，部分要看它的富饶程度，部分要看它的地理位置。

A mine of any kind may be said to be either fertile or barren according as the quantity of mineral which can be brought from it by a certain quantity of labour, is greater or less than what can be brought by an equal quantity from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mines of the same kind.

任何一座矿山富饶程度的高地，都取决于一定数量的劳动能从这矿山中开采出的矿物数量，即要看这数量是多于还是少于等量劳动从大部分其地同类矿山中所能开采的矿物数量。

Some coal-mines advantageously situated, cannot be wrought on account of their barrenness. The produce does not pay the expence. They can afford neither profit nor rent.

有些煤矿虽然位置便利，但由于过于贫瘠无法开采。其生产物不能支付开支。这样的煤矿既不能提供利润，也不能提供地租。

There are some of which the produce is barely sufficient to pay the labour, and replace, together with its ordinary profits, the stock employed in working them. They afford some profit to the undertaker of the work, but no rent to the landlord. They can be wrought advantageously by nobody but the landlord, who being himself undertaker of the work, gets the ordinary profit of the capital which he employs in it. Many coal-mines in Scotland are wrought in this manner, and can be wrought in no other. The landlord will allow nobody else to work them without paying some rent, and nobody can afford to pay any.

有些煤矿的生产物仅够支付劳动工资，偿还开采时所投资本及其普通利润。这种煤矿能为开采者提供若干利润，却不能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所以，对于这类煤矿来说，只有土地所有者自己开采才能得到资本的普通利润，其他人开采都无法得利。苏格兰的很多煤矿就由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别人无法经营。如果不支付地租，土地所有者不许任何人开采，但是无论谁来开采，都支付不起地租。

Other coal-mines in the same country sufficiently fertile, cannot be wrought on account of their situation. A quantity of mineral sufficient to defray the expence of working, could be brought from the mine by the ordinary, or even less than the ordinary quantity of labour; but in an inland country, thinly inhabited, and without either good roads or water-carriage, this quantity could not be sold.

苏格兰还有一些煤矿相当富饶，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不好无法开采。虽然用一般甚至更少数量的劳动就可开采出足够的矿物，足以支

付开采过程中的全部开支，但是人口稀少、缺乏良好的水陆运输的内陆国家也无法卖出这么多的矿物。

Coals are a less agreeable fuel than wood: they are said, too, to be less wholesome. The expence of coals, therefore, at the place where they are consumed, must generally be somewhat less than that of wood.

煤炭作为一种燃料，不像木材那么令人满意，据说也不太卫生。所以在消费煤炭的地方，购买煤炭的开支通常在一定程度上低于购买木材的开支。

The price of wood again varies with the state of agriculture, nearly in the same manner, and exactly for the same reason, as the price of cattle. In its rude beginnings the greater part of every country is covered with wood, which is then a mere incumbrance of no value to the landlord, who would gladly give it to anybody for the cutting. As agriculture advances, the woods are partly cleared by the progress of tillage, and partly go to decay in consequence of the increased number of cattle. These, though they do not increase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corn, which is altogether the acquisition of human industry, yet multiply under the care and protection of men; who store up in the season of plenty what may maintain them in that of scarcity, who through the whole year furnish them with a greater quantity of food than uncultivated nature provides for them, and who by destroying and extirpating their enemies, secure them in the free enjoyment of all that she provides. Numerous herds of cattle, when allowed to wander through the woods, though they do not destroy the old trees, hinder any young ones from coming up,

so that in the course of a century or two the whole forest goes to ruin. The scarcity of wood then raises its price. It affords a good rent, and the landlord sometimes finds that he can scarce employ his best lands more advantageously than in growing barren timber, of which the greatness of the profit often compensates the lateness of the returns. This seems in the present times to be nearly the state of things in several parts of Great Britain, where the profit of planting is found to be equal to that of either corn or pasture. The advantage which the landlord derives from planting, can nowhere exceed, at least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the rent which these could afford him; and in an inland country which is highly cultivated, it will frequently not fall much short of this rent. Upon the sea-coast of a well-improved country, indeed, if coals can conveniently be had for fuel, it may sometimes be cheaper to bring barren timber for building from less cultivated foreign countries, than to raise it at home. In the new town of Edinburgh, built within these few years, there is not, perhaps, a single stick of Scotch timber.

木柴的价格也像牲畜的价格一样，随着农业状态的变动而变动，其变动的原因也和牲畜价格变动的原因完全相同。在农业处于原始状态时，各国的大部分土地上都生长着树木。在当时土地所有者眼中，这些树木都是毫无价值的障碍物，不管谁要砍伐，土地所有者们都相当欢喜。随着农业的发展，那些树木一部分因人类扩大耕地面积而被砍去，一部分因人类饲养的牲畜数量增加而遭到破坏。牲畜数量增加的比例，虽然不同于由人类勤劳而获得的谷物增加的比例，但在人类的注意和保护下，牲畜也繁殖起来。人类在丰收的季节储备足够的饲料，以便在饲料短缺的季节喂养牲畜。这样，人类在全年中提供给牲畜的食物比未耕作的土地提供的食物还要多。人类还消灭牲畜的敌人，使牲畜能安心自由地享受大自然给予的所有食物。许许多多的牲畜在森林中四处游逛，虽然不会伤害老树，但却阻碍了幼树生长。结

果便是，整个森林在一两个世纪后全部毁灭。木材供应不足抬高了木柴的价格，使得木材能够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可观的地租。土地所有者有时觉得，在最好的土地上种植木材给他带来的利润比任何其他用途带来的利润都要大，而丰厚的利润往往能够抵消迟到的回报。在现在大不列颠的很多地方，情况似乎都是如此。在这些地方，人们认为种树的利润和种植谷物或牧草的利润相等。无论在何地，土地所有者通过种树获得的利益，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超过谷田或牧场的地租。不过，在耕作高度发达的内陆国家，种树获得的利益常常并不比谷田或牧场的地租少太多。在一个已进行极大改良的国家的海岸，如果人们能很容易获得煤炭作为燃料，那么从耕作比较落后的国家进口建筑用木材，有时可能比在本国自己生产更便宜。爱丁堡是最近几年新建起来的一座城市，或许那里的木材没有一根是苏格兰产的。

Whatever may be the price of wood, if that of coals is such that the expence of a coalfire is nearly equal to that of a wood one, we may be assured, that at that place, and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price of coals is as high as it can be. It seems to be so in some of the inland parts of England, particularly in Oxfordshire, where it is usual, even in the fires of the common people, to mix coals and wood together, and where the difference in the expence of those two sorts of fuel cannot, therefore, be very great.

无论木柴的价格如何，如果一个地方烧煤炭的费用和烧木柴的费用几乎相等，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该地的煤炭价格将达到最高的水平。在英格兰内地的某些地方，尤其是牛津郡，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即使是普通人的火炉中，也常常混有木柴和煤炭，因此这两种燃料的价格不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Coals, in the coal countries, are everywhere much below this

highest price. If they were not, they could not bear the expence of a distant carriage, either by land or by water. A small quantity only could be sold, and the coal masters and coal proprietors find it more for their interest to sell a great quantity at a price somewhat above the lowest, than a small quantity at the highest. The most fertile coal-mine, too, regulates the price of coals at all the other mines in its neighbourhood. Both the proprietor and the undertaker of the work find, the one that he can get a greater rent, the other that he can get a greater profit, by somewhat underselling all their neighbours. Their neighbours are soon obliged to sell at the same price, though they cannot so well afford it, and though it always diminishes, and sometimes takes away altogether both their rent and their profit. Some works are abandoned altogether; others can afford no rent, and can be wrought only by the proprietor.

在产煤的国家，任何地方的煤炭价格都大大低于这个最高的价格。否则，煤炭就担负不起长途水路或陆路运输的费用。如果按最高的价格售卖，常常只能卖掉一小部分煤炭。与此同时，煤矿开采者和煤矿主发现，按略高于最低价的价格售卖，他们却能卖掉大量的煤炭。两相比较，他们认为低价售卖能获得更多的利益。最富饶的煤矿支配着附近所有煤矿的煤炭价格。最富饶煤矿的所有者和开采者发现，以略低于附近煤矿的价格出售煤炭，他们煤矿所有者就能获得更高的地租，煤矿开采者就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尽管附近的煤矿不太负担得起这样的低价，尽管这样的低价总是减少，甚至完全剥夺附近煤矿的地租和利润，但这些煤矿不久也不得不以同样的价格出售煤炭。于是一部分煤矿只好停止开采，另一部分煤矿因不能提供地租而只能由所有者自己开采。

The lowest price at which coals can be sold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is, like that of all other commodities, the price

which is barely sufficient to replace, together with its ordinary profits, the stock which must be employed in bringing them to market. At a coal-mine for which the landlord can get no rent, but which he must either work himself or let it alone altogether, the price of coals must generally be nearly about this price.

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煤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能够持续售卖的最低价格，就是仅够补偿煤炭上市所需资本及其普通利润的价格。对于那些无法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因而只能由土地所有者自己开采否则只能闲置的煤矿来说，其煤炭价格一定和这个最低价格大致相同。

Rent, even where coals afford one, has generally a smaller share in their price than in that of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rude produce of land. The rent of an estate above ground, commonly amounts to what is supposed to be a third of the gross produce; and it is generally a rent certain and independent of the occasional variations in the crop. In coal-mines a fifth of the gross produce is a very great rent; a tenth the common rent, and it is seldom a rent certain, but depends upon the occasional variations in the produce. These are so great, that in a country where thirty years'purchase is considered as a moderate price for the property of a landed estate, ten years' purchase is regarded as a good price for that of a coal-mine.

即使在煤炭提供地租的地方，地租在煤炭价格中所占的比例也通常比地租在其他大多数土地天然产物的价格中所占的比例要小。地面以上的土地地租，通常等于总生产额的1/3。这个比例常常是确定的，不受收成上偶然变化的影响。地面以下的煤矿的地租，有时占总生产额的1/5，此时煤矿地租非常高，有时占总生产额的1/10，此时

的煤矿地租只是普通地租。煤矿地租极不确定，要看煤炭生产额的偶然变化而定。这种偶然变化非常大，以至于在有些国家，以30年为期购买田产常被看作田产产权的普通价格，而以10年为期购买煤矿却被看作是煤矿产权的高价。

The value of a coal-mine to the proprietor frequently dependsas much upon its situation as upon its fertility. That of a metallic mine depends more upon its fertility, and less upon its situation. The coarse, and still more the precious metals, when separated from the ore, are so valuable that they can generally bear the expence of a very long land, and of the most distant sea carriage. Their market is not confined to the countrie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mine, but extends to the whole world. The copper of Japan makes an article of commerce in Europe; the iron of Spain in that of Chili and Peru. The silver of Peru finds its way, not only to Europe, but from Europe to China.

对煤矿所有者说，煤矿的价值不仅取决于煤矿的富饶程度，也同样取决于煤矿的地理位置。而金属矿山的价值更多取决于它的富饶程度，较少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粗金属，尤其是贵金属，从矿石中分离出来后，具有极高的价值，通常都能负担得起长途陆运甚至更远距离水运的费用。这些金属的市场并不仅限于矿山附近的国家，而是遍及全世界。例如，日本的铜在欧洲找到了市场，西班牙的铁在智利和秘鲁找到了市场，秘鲁的银不仅在欧洲找到了市场，而且通过欧洲，也销往了中国。

The price of coals in Westmoreland or Shropshire can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ir price at Newcastle; and their price in the Lionnois can have none at all. The productions of such distant coal-

mines can never be brought into competition with one another. But the productions of the most distant metallic mines frequently may, and in fact commonly are. The price, therefore, of the coarse, and still more that of the precious metals, at the most fertile mines in the world, must necessarily more or less affect their price at every other in it. The price of copper in Japan must have some influence upon its price at the copper mines in Europe. The price of silver in Peru, or the quantity either of labour or of other goods which it will purchase there, must have some influence on its price, not only at the silver mines of Europe, but at those of China. After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es of Peru, the silver mines of Europe we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abandoned. The value of silver was so much reduced that their produce could no longer pay the expence of working them, or replace, with a profit, the food, clothes, lodging and other necessaries which were consumed in that operation. This was the case, too, with the mines of Cuba and St. Domingo, and even with the ancient mines of Peru, after the discovery of those of Potosi.

威斯特摩兰或什罗普郡的煤炭价格对纽卡斯尔的煤炭价格没有多大影响，利奥诺尔的煤炭价格对纽卡斯尔的煤炭价格更是毫无影响。这些煤矿产品之间绝不会互相竞争。但距离很远的金属矿产品间却常常会发生竞争，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因此，世界最富饶矿藏的粗金属价格，尤其是贵金属价格，必然或多或少地影响其他矿山的金属价格。日本铜的价格一定会影响欧洲铜矿出产的铜的价格。秘鲁白银的价格，换句话说，秘鲁白银在当地所能购买的劳动数量或商品数量，不仅会影响欧洲银矿的白银价格，而且还会影响中国银矿的白银价格。秘鲁银矿被发现以后，欧洲大部分银矿都被废弃了，因为白银的价值大幅下降，银矿产品不能支付开采费用，或者说，银矿产品在偿还开采时所消费的食物、衣服、住宅和其他必需品后，不能提供合适的利润。波托西银矿被发现后，古巴及圣多明各的矿山，乃至秘鲁

的旧矿山，也同欧洲大部分银矿一样，被逐渐废弃了。

The price of every metal at every mine, therefore, being regulated in some measure by its price at the most fertile mine in the world that is actually wrought, it can at the greater part of mines do very little more than pay the expence of working, and can seldom afford a very high rent of the landlord. Rent, accordingly, seems at the greater part of mines to have but a small share in the price of the coarse, and a still smaller in that of the precious metals. Labour and profit make up the greater part of both.

所以，各矿山所产的各种金属的价格，都一定程度上受世界上实际开采的、最富饶的矿山的价格支配，所以大部分矿山所产的金属价格仅够支付开采的费用，无法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很高的地租。对于大多数矿山来说，地租似乎仅占贱金属价格的一小部分份额，在贵金属价格中所占的份额更小。劳动与利润构成了这两种金属价格的大部分。

A sixth part of the gross produce may be reckoned the average rent of the tin mines of Cornwall, the most fertile that are known in the world, as we are told by the Rev. Mr. Borlace, vice-warden of the stannaries. Some, he says, afford more, and some do not afford so much. A sixth part of the gross produce is the rent, too, of several very fertile lead mines in Scotland.

康沃尔锡矿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富饶的锡矿，据该锡矿区副监督博莱斯说，锡矿的平均地租占总产量的比例高达1/6。他同时还说，有些矿山的地租超过1/6，有些不及1/6。苏格兰许多富饶的铅矿的地

租，也占总产量的1/6。

In the silver mines of Peru, we are told by Frezier and Ulloa, the proprietor frequently exacts no other acknowledgement from the undertaker of the mine, but that he will grind the ore at his mill, paying him the ordinary multure or price of grinding. Till 1736, indeed, the tax of the King of Spain amounted to one-fifth of the standard silver, which till then might be considered as the real ren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ilver mines of Peru, the richest which have been known in the world. If there had been no tax, this fifth would naturally have belonged to the landlord, and many mines might have been wrought which could not then be wrought, because they could not afford this tax. The tax of the Duke of Cornwall upon tin is supposed to amount to more than five per cent or one-twentieth part of the value; and whatever may be his proportion, it would naturally, too, belong to the proprietor of the mine, if tin was duty free. But if you add one-twentieth to one-sixth, you will find that the whole average rent of the tin mines of Cornwall, wasto the whole average rent of the silver mines of Peru, as thirteen to twelve. But the silver mines of Peru are not now able to pay even this low rent, and the tax upon silver was, in 1736, reduced from one-fifth to one-tenth. Even this tax upon silver, too, gives more temptation to smuggling than the tax of one-twentieth upon tin; and smuggling must be much easier in the precious than in the bulky commodity. The tax of the King of Spain accordingly is said to be very ill paid, and that of the Duke of Cornwall very well. Rent, therefore, it is probable, makes a greater part of the price of tin at the most fertile tin mines, than it does of silver at the most fertile silver mines in the world. After replacing the stock employed in working those different mines, together with its ordinary profits, the residue which remains to the proprietor, is greater, it seems in

the coarse, than in the precious metal.

根据弗雷齐耶和乌略亚的说法，在秘鲁银矿，开采者常常只需保证在矿主设立的磨场中研磨矿石，并向矿主支付一般的使用费或研磨费，就可以得到矿主的开采许可。的确，直到1736年，西班牙国王对这些银矿征收的税额才增长到标准银的1/5，在那时这个数额大概被看作大部分秘鲁银矿——当时世界上最富饶银矿——的真实地租。如果不对银矿征税，那么这1/5自然属于土地所有者，当时许多由于负担不起这种课税而没有开采的矿山也许就可以开采了。康沃尔公爵征收的锡税，据说是锡金属价值的5%以上，即1/20以上。如果锡是免税的，那么这个比例无论是1/20或是多少，自然都属于矿山所有者。如果将1/20与上面所说的1/6相加，我们就可以发现，康沃尔锡矿的全部平均地租对秘鲁银矿的全部平均地租的比例是13：12。但是，现在的秘鲁银矿连如此低廉的地租也负担不起，1736年，银税也由原来的1/5减到1/10。银税虽然如此之低，但和1/20的锡税相比，依然更能引诱人们做走私的生意，更何况走私贵重的物品比走私体积大的物品要容易得多。因此据说，西班牙国王所得的税收非常少，而康沃尔公爵所得的税收却非常多。因此，地租在世界上最富饶的锡矿所产锡的价格中所占的比重，可能比在世界上最富饶的银矿所产银的价格中所占的比重要大。贱金属在偿还了开采矿产所使用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后，留给矿主的剩余部分似乎比贵金属要多。

Neither are the profits of the undertakers of silver mines commonly very great in Peru. The same most respectable and wellinformed authors acquaint us, that when any person undertakes to work a new mine in Peru, he is universally looked upon as a man destined to bankruptcy and ruin, and is upon that account shunned and avoided by everybody. Mining, it seems, is considered there in the same light as here, as a lottery, in which the prizes do not compensate the blanks, though the greatness of some tempts many

adventurers to throw away their fortunes in such unprosperous projects.

秘鲁银矿开采者的利润通常也不是很高。弗雷齐耶和乌略亚这两位作家最受敬重，消息也最为灵通。根据他们的说法，在大多数秘鲁人眼里，任何打算在秘鲁开采新银矿的人都注定要倾家荡产，走向毁灭，因此人们都避开这些人。由此看来，秘鲁的采矿业似乎和英国的采矿业一样，都被看作彩票，所中的奖还不够弥补所投的钱，但还是有大批冒险家在大奖的诱惑下，在这个不景气的行业中散尽家财。

As the sovereign, however, derives a considerable part of his revenue from the produce of silver mines, the law in Peru gives every possible encouragement to the discovery and working of new ones. Whoever discovers a new mine, is entitled to measure off two hundred and forty-six feet in length, according to what he supposes to be the direction of the vein, and half as much in breadth. He becomes proprietor of this portion of the mine, and can work it without paying any acknowledgement to the landlord. The interest of the Duke of Cornwall has given occasion to a regulation nearly of the same kind in that ancient duchy. In waste and unenclosed lands any person who discovers a tin mine, may mark out its limits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is called bounding a mine. The bounder becomes the real proprietor of the mine, and may either work it himself, or give it in lease to another,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owner of the land, to whom, however, a very small acknowledgement must be paid upon working it. In both regulations the sacred rights of private property are sacrificed to the supposed interests of public revenue.

但是，由于秘鲁国王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银矿产品，所以秘鲁法律尽量奖励新矿的发现和开采。无论是谁发现了新矿，都可以按照他认为的矿脉的方向，划出一块246英尺长、123英尺宽的矿区，并归他所有，由他自行开采，无需支付土地所有者地租。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康沃尔公爵也在那个古老的公国制订了类似的规定。凡是在荒野或没有圈起来的土地上发现锡矿的人，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划定界限，这叫做矿山定界。定界者就是矿区实际所有者，可自行开采，或租与他人开采，无需土地所有者的许可，只需在开采时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微薄的报酬。在上述两种规定中，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都由于所谓的公共收入的利益而被侵犯了。

The same encouragement is given in Peru to the discovery and working of new gold mines; and in gold the king's tax amounts only to a twentieth part of the standard metal. It was once a fifth, and afterwards a tenth, as in silver; but it was found that the work could not bear even the lowest of these two taxes. If it is rare, however, say the same authors, Frezier and Ulloa, to find a person who has made his fortune by a silver, it is still much rarer to find one who has done so by a gold mine. This twentieth part seems to be the whole rent which is paid by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gold mines in Chili and Peru. Gold, too, is much more liable to be smuggled than even silver; not only on account of the superior value of the metal in proportion to its bulk, but on account of the peculiar way in which nature produces it. Silver is very seldom found virgin, but, like most other metals, is generally mineralized with some other body, from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separate it in such quantities as will pay for the expence, but by a very laborious and tedious operation, which cannot well be carried on but in workhouses erected for the purpose, and therefore exposed to the inspection of the king's officers. Gold, on the contrary, is almost always found virgin. It is sometimes found in pieces of some bulk; and even when

mixed in small and almost insensible particles with sand, earth, and other extraneous bodies, it can be separated from them by a very short and simple operation, which can be carried on in any private house by anybody who is possessed of a small quantity of mercury. If the king's tax, therefore, is but ill paid upon silver, it is likely to be much worse paid upon gold; and rent must make a much smaller part of the price of gold, than even of that of silver.

秘鲁对于新金矿的发现与开采同样给予鼓励，国王对黄金的课税仅为标准金的1/20。原来的金税和银税一样，由1/5降到1/10，然而后来发现，采矿业连1/10的赋税也负担不起。上述两位作家弗雷齐耶和乌略亚曾说，如果说靠银矿发财已属罕见的话，那么靠金矿发财就更加罕见了。1/20似乎是智利、秘鲁的大部分金矿所支付的全部地租。走私黄金甚至比走私白银更具诱惑，这不仅是由于黄金相对于其体积价值更高，而且还由于自然界生产黄金的特殊方式。白银，和大多数其他金属一样，在被发现时很少是纯银，一般都掺杂其他的矿物，从这杂质中分离出来的少量白银几乎不能补偿开支，更何况要把白银分离出来须经过极其困难、极其繁琐的操作，而这种操作只有在专门设立的厂坊才能进行，从而必须在国王和官吏的监督之下才能进行。黄金的情况恰恰相反。黄金在被发现时几乎都是纯金，有时甚至是相当大的金块，即使是微小的、几乎察觉不到的小金粒，掺杂在沙、土及其他外附属物中，也只需要非常简短的操作就可将其从这些杂质中分离出来。不论是谁，只要持有少量水银，就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进行这种操作。所以，如果国王从白银中获得的税收很少的话，那么他从黄金中获得的税收可能要更少。地租在黄金的价格中所占的份额一定比它在白银的价格中所占的份额小得多。

The lowest price at which the precious metals can be sold, or the smallest quantity of other goods for which they can be exchanged during any considerable time, is regulated by the same

principles which fix the lowest ordinary price of all other goods. The stock which must commonly be employed, the food, the clothes and lodging which must commonly be consumed in bringing them from the mine to the market, determine it. It must at least be sufficient to replace that stock,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s.

贵金属能够售出的最低价格，或者说，贵金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能交换的其他商品的最少数量，要受到一定原则的支配，这些原则同样支配着除贵金属以外的所有其他商品的最低普通价格。决定贵金属最低价格的，是通常需要投入的资本，即将贵金属从矿区开采出来运往市场的过程中通常所需消费的衣服、食物和住宿费用。贵金属的最低价格必须足够偿还所投入资本并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

Their highest price, however, seems not to be necessarily determined by anything but the actual scarcity or plenty of those metals themselves. It is not determined by that of any other commodity,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price of coals is by that of wood, beyond which no scarcity can ever raise it. Increase the scarcity of gold to a certain degree, and the smallest bit of it may become more precious than a diamond, and exchange for a greater quantity of other goods.

但贵金属的最高价格似乎不由任何其他商品的最高价格决定，而只取决于贵金属本身实际数量的多少。与之类似的是煤炭，煤炭的价格只由木柴的价格决定，只有木材供应不足时煤炭的价格才会上涨，其他商品的稀缺对煤炭价格没有任何影响。如果黄金的稀缺到了一定程度，那么最小的一块金可能比一颗钻石还昂贵，并且可以交换更大数量的其他商品。

The demand for those metals arises partly from their utility, and partly from their beauty. If you except iron, they are more useful than, perhaps, any other metal. As they are less liable to rust and impurity, they can more easily be kept clean; and the utensils either of the table or the kitchen are often upon that account more agreeable when made of them. A silver boiler is more cleanly than a lead, copper, or tin one; and the same quality would render a gold boiler still better than a silver one. Their principal merit, however, arises from their beauty, which renders them peculiarly fit for the ornaments of dress and furniture. No paint or dye can give so splendid a colour as gilding. The merit of their beauty is greatly enhanced by their scarcity. With the greater part of rich people, the chief enjoyment of riches consists in the parade of riches, which in their eyes is never so complete as when they appear to possess those decisive marks of opulence which nobody can possess but themselves. In their eyes the merit of an object which is in any degree either useful or beautiful, is greatly enhanced by its scarcity, or by the great labour which it requires to collect any considerable quantity of it, a labour which nobody can afford to pay but themselves. Such objects they are willing to purchase at a higher price than things much more beautiful and useful, but more common. These qualities of utility, beauty, and scarcity, are the original foundation of the high price of those metals, or of the great quantity of other goods for which they can everywhere be exchanged. This value was antecedent to and independent of their being employed as coin, and was the quality which fitted them for that employment. That employment, however, by occasioning a new demand, and by diminishing the quantity which could be employed in any other way, may have afterwards contributed to keep up or increase their value.

人们对贵金属的需求，部分是由于它们的实用性，部分是由于它们的美观。贵金属可能比除了铁以外的任何其他金属都有用。贵金属不易生锈，不易掺杂质，容易保持清洁，因此，用贵金属制成的就餐用具及厨房用具更受人欢迎。银锅比铝锅、铜锅或锡锅更清洁，金锅又比银锅清洁。不过，贵金属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们的美观，这使它们特别适合做衣服和家具的装饰品。任何颜料或染料都不能提供像镀金那么灿烂的色彩。贵金属的这种美观又因贵金属的稀少而大大加重。对于大多数富人来说，富有的主要乐趣在于炫耀财富，当自己拥有绝无仅有的象征富有的标志时，炫耀才算达到了顶点。在他们看来，凡是有几分用处或是美观的物品，都会因数量稀少而大大增加其价值，换句话说，由于收集相当数量的这种物品需要很大的劳动数量，因而该物品的价值大大增加。通常这么大的劳动数量只有富人才能支付得起。他们愿意出高价，即比那些美丽得多、有用得多、但比较普通的物品的价格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这种物品。实用性、美观和稀少这些特质，使贵金属的价格变得高昂，即无论在何处都能换得很大数量的其他商品的根本原因。贵金属的这种高价值在它们被用作铸币以前就已存在，与用作铸币无关，且恰恰是这种高价值才使它们适合用作铸币。不过，将贵金属用作铸币后，自然引起了对贵金属新的需求，从而减少了能被用于其他用途的贵金属数量，这在此后或许帮助保持或增加了贵金属的价值。

The demand for the precious stones arises altogether from their beauty. They are of no use, but as ornaments; and the merit of their beauty is greatly enhanced by their scarcity, or by the difficulty and expence of getting them from the mine. Wages and profit accordingly make up, upon most occasions, almost the whole of their high price. Rent comes in but for a very small share; frequently for no share; and the most fertile mines only afford any considerable rent. When Tavernier, a jeweller, visited the diamond mines of Golconda and Visiapour, he was informed that the sovereign of the country, for whose benefit they were wrought, had

ordered all of them to be shut up, except those which yielded the largest and finest stones. The others, it seems, were to the proprietor not worth the working.

人们对宝石的需求完全出于它的美观。宝石除了可以用作装饰品外，没有其他用处。宝石的美观由于宝石数量的稀少（即由于开采困难和高额的开采费用）而大大增加。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和利润几乎构成宝石高价的全部。地租在宝石价格中只占极小部分的份额，通常不占份额，只有最富饶的矿山才能提供较多的地租。宝石商塔弗尼埃考察戈尔康达和维沙波尔两地的钻石矿时听说，这些矿山是为了国王的利益而开采的，而国王已命令，除了那些生产最大和最美钻石的矿山外，其余所有矿山一律关闭。对于矿主来说，其他矿山似乎都不值得开采。

As the price both of the precious metals and of the precious stones is regulated all over the world by their price at the most fertile mine in it, the rent which a mine of either can afford to its proprietor is in proportion, not to its absolute, but to what may be called its relative fertility, or to its superiority over other mines of the same kind. If new mines were discovered as much superior to those of Potosi as they were superior to those of Europe, the value of silver might be so much degraded as to render even the mines of Potosi not worth the working. Before the discovery of the Spanish West Indies, the most fertile mines in Europe may have afforded as great a rent to their proprietor as the richest mines in Peru do at present. Though the quantity of silver was much less, it might have exchanged for an equal quantity of other goods, and the proprietor's share might have enabled him to purchase or command an equal quantity either of labour or of commodities. The value both of the produce and of the rent, the real revenue which they afforded both

to the public and to the proprietor, might have been the same.

由于在世界各地，贵金属和宝石的价格都受世界上最富饶矿山的矿产价格的支配，所以贵金属或宝石矿山能够为矿主提供的地租，并不与矿山的绝对富饶程度成比例，而和矿山的相对富饶程度成比例，换句话说，和它对同类其他矿山的优越程度成比例。假使人们发现了新矿山，而这些新矿山对波托西矿山的优越程度，就像波托西矿山对于欧洲矿山的优越程度一样，那么白银的价值就会下降很多，甚至连波托西矿山都失去开采的价值。在西班牙属西印度群岛被发现以前，欧洲最富饶的矿山为矿主提供的地租，和现在秘鲁最富饶的矿山为其矿主提供的地租一样多。虽然当时白银的数量比今天少得多，但却可能交换到与今天数量相同的其他货物，而矿主所得份额，即地租所能换得的劳动数量或商品数量，也可能与今天相等。生产物和地租的价值，换句话说，生产物和地租给公众与矿主提供的实际收入，无论是彼时还是今天，可能完全相同。

The most abundant mines either of the precious metals or of the precious stones could add little to the wealth of the world. A produce of which the value is principally derived from its scarcity, is necessarily degraded by its abundance. A service of plate, and the other frivolous ornaments of dress, and furniture, could be purchased for a smaller quantity of labour, or for a smaller quantity of commodities; and in this would consist the sole advantage which the world could derive from that abundance.

拥有最富饶的贵金属或宝石的矿山都不能增加世界的财富。价值主要来自稀缺性的产品，一旦产品的数量变得丰富，价值必然降低，此时，要想购买金银餐具以及其他衣服家具的奢华装饰品，只需较少的劳动数量或商品数量即可。这可能是世人能够从贵金属或宝石丰富

的供给中所能获得的唯一的好处了。

It is otherwise in estates above ground. The value both of their produce and of their rent i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absolute, and not to their relative fertility. The land which produces a certain quantity of food, clothes, and lodging, can always feed, clothe, and lodge a certain number of people; and whatever may be the proportion of the landlord, it will always give him a proportionable command of the labour of those people, and of the commodities with which that labour can supply him. The value of the most barren lands is not diminished by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most fertile. On the contrary, it is generally increased by it. The great number of people maintained by the fertile lands affords a market to many parts of the produce of the barren, which they could never have found among those whom their own produce could maintain.

对于地面上的地产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土地生产物和地租的价值并不与土壤的相对肥沃程度成比例，而与土壤的绝对肥沃程度成比例。生产一定数量衣服、食物和住宅的土地，总是能为一定数量的人提供衣服、食物和住宅，而且，无论土地所有者获得多大比例的地租，他总能靠这地租支配相应比例的劳动，并支配这劳动所能提供给他的相应数量的商品。最贫瘠的土地不仅不会因为附近最肥沃的土地而降低价值，反而常常因为邻近最肥沃的土地而增加价值。肥沃土地养活的众多人口为贫瘠土地的许多产物提供了市场，而贫瘠土地自己产物所能维持的人口是绝对找不到这种市场的。

Whatever increases the fertility of land in producing food, increases not only the value of the lands upon which the improvement is bestowed, but contributes likewise to increase that

of many other lands, by creating a new demand for their produce. That abundance of food, of which, in consequence of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many people have the disposal beyond what they themselves can consume, is the great cause of the demand both for the precious metals and the precious stones, as well as for every other conveniency and ornament of dress, lodging, household furniture, and equipage. Food not only constitutes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 riches of the world, but it is the abundance of food which gives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ir value to many other sorts of riches. The poor inhabitants of Cuba and St. Domingo, when they were first discovered by the Spaniards, used to wear little bits of gold as ornaments in their hair and other parts of their dress. They seemed to value them as we would do any little pebbles of somewhat more than ordinary beauty, and to consider them as just worth the picking up, but not worth the refusing to anybody who asked them. They gave them to their new guests at the first request, without seeming to think that they had made them any very valuable present. They were astonished to observe the rage of the Spaniards to obtain them; and had no notion that there could anywhere be a country in which many people had the disposal of so great a superfluity of food, so scanty always among themselves, that for a very small quantity of those glittering baubles they would willingly give as much as might maintain a whole family for many years. Could they have been made to understand this, the passion of the Spaniards would not have surprised them.

无论采用何种办法，在改善土壤肥沃程度、增加食物产量的同时，不仅增加了被改良土地的价值，而且为许多其他土地的产物创造了新的需求，从而使这些土地的价值也增加了。土地改良使得食物供应充足，许多人都有自己消费不了的食物，因而对贵金属和宝石有了需求，对衣服、住宅、家具和四轮马车等其他生活便利品和装饰品也

有了需求。食物不仅构成世界财富的主要部分，而且正是食物的丰富才赋予了许多其他种类财富主要价值。当西班牙人初次发现古巴和圣多明各时，这里的穷苦人民常常以小金块作为头饰和衣服上的装饰。这些金块在他们眼中的价值，似乎就和漂亮的鹅卵石在我们眼中的价值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金块仅值得弯腰拾取，倘若有人索要，不值得他们拒绝别人。新客到来，第一次开口请求，他们就痛快地把黄金送给客人，似乎并不认为赠送了什么贵重的礼物。西班牙人对于黄金的狂热程度让他们惊讶。他们没有想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国家，它的许多人民有那么多消费不完的食物（他们的食物却总是那么缺乏），愿意用足够供养全家好几年的食物，来交换数量不多的发亮的小玩意儿。如果他们能够理解个中缘由，就不会对西班牙人对的黄金的狂热感到那么惊讶了。

Part III. Of the Variations in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respective Values of that Sort of Produce which always affords Rent, and of that which sometimes does and sometimes does not afford Rent

第三节、论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与间或提供生产物二者价值比例的变动

The increasing abundance of food, in consequence of increasing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must necessarily increase the demand for every part of the produce of land which is not food, and which can be applied either to use or to ornament. In the whol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it might therefore be expected, there should be only one variation in the comparative values of those two different sorts of produce. The value of that sort which sometimes does and sometimes does not afford rent, should constantly rise in proportion to that which always affords some rent. As art and industry advance, the materials of clothing and lodging, the useful fossils and minerals of the earth, the precious metals and the precious

stones should gradually come to be more and more in demand, should gradually exchange for a greater and a greater quantity of food, or in other words, should gradually become dearer and dearer. This accordingly has been the case with most of these things upon most occasions, and would have been the case with all of them upon all occasions, if particular accidents had not upon some occasions increased the supply of some of them in a still greater proportion than the demand.

随着土地的日益改良和耕作，食物供给日益丰富，这必然会增加对除食物外的一切具有实用性或装饰性的土地生产物的需求。所以，在改良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预见，这两种土地生产物的相对价值只有一种变动，换句话说，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和间或提供生产物的价值比例总在不断增长。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人们对制衣材料、建房材料、地下有用化石和矿物以及贵金属和宝石的需求逐渐增加，这些物品能够换得的食物数量逐渐增多，也就是说，他们的价格逐渐增高。在大多数场合，大多数物品的情况都是如此。如果不是在某些场合，某个特殊事件使这些物品中的某些物品的供给大大增加，超过其有效需求的话，那么在所有场合，所有这些物品的情况都是如此。

The value of a free-stone quarry, for example, will necessarily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ing improvement and 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 round about it; especially if it should be the only one in the neighbourhood. But the value of a silver mine, even though there should not be another within a thousand miles of it, will not necessarily increas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it is situated. The market for the produce of a free-stone quarry can seldom extend more than a few miles round about it, and the demand must generally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improvement and population of that small district. But the market for the produce of a

silver mine may extend over the whole known world. Unless the world in general, therefore, be advancing in improvement and population, the demand for silver might not be at all increased by the improvement even of a large country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mine. Even though the world in general were improving, yet, if, in the course of its improvement, new mines should be discovered, much more fertile than any which had been known before, though the demand for silver would necessarily increase, yet the supply might increase in so much a greater proportion, that the real price of that metal might gradually fall; that is, any given quantity, a pound weight of it, for example, might gradually purchase or command a smaller and a smaller quantity of labour, or exchange for a smaller and a smaller quantity of corn,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 subsistence of the labourer.

例如，毛石采石场的价值一定随着所在地区的日益改良和人口的日益增加而提高，尤其当这采石场是附近唯一的矿藏时。然而银矿场的价值，即使在方圆1000英里内没有第二个，也不一定会随着所在地区的改良而提高。毛石采石场的产物的市场很少扩展到方圆数英里以外，人们其需求通常与采石场所在的小区域的改良与人口数量成比例。银矿产品的市场却可扩展到已知的整个世界。所以，除非全世界都改良，各地方人口都增加，否则即使银矿场附近某一大片区域得到改良，人们对白银的需求也不会增加。即使全世界都进行了改良，倘若在这改良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比已知的任何矿山都要富饶的新矿山，那么尽管白银的需求一定会增加，白银的供给将会增加更多，所以银的真实价格可能逐渐下降，也就是说，任何数量的白银，比如说一磅，所能支配或所能购买的劳动数量，或者说所能换得的劳动者主要生活资料即谷物的数量，可能会逐渐减少。

The great market for silver is the commercial and civilised part

of the world.

白银的巨大市场存在于世界上的商业地区和文明地区。

If by the general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the demand of this market should increas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supply did not increase in the same proportion, the value of silver would gradually rise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corn. Any given quantity of silver would exchange for a greater and a greater quantity of corn; or, in other words, the average money price of corn would gradually become cheaper and cheaper.

如果随着改良的发展，这个市场对白银的需求增加，而白银的供给却没有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同比例增加，那么，白银的价值相对于谷物的价值会逐渐增高，即一定数量的白银所能换得的谷物数量将逐渐增加，或者说，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将逐渐下降。

If, on the contrary, the supply by some accident should increase for many years together in a greater proportion than the demand, that metal would gradually become cheaper and cheaper; or, in other words, the average money price of corn would, in spite of all improvements, gradually become dearer and dearer.

相反，如果由于某个意外事件，白银的供给在好多年内都比需求增加的比例更大，那么白银的价格就会逐渐低廉。换句话说，尽管人们进行了各种改良，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也会逐渐增高。

But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supply of the metal should increase nearly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the demand, it would continue to purchase or exchange for nearly the same quantity of corn, and the average money price of corn would, in spite of all improvements, continue very nearly the same.

但是，如果白银的供给和其需求几乎按同一比例增加，那么白银就能继续购买或交换和以往几乎相同数量的谷物。尽管人们进行了各种改良，谷物却继续保持着几乎相同的平均货币价格。

These three seem to exhaust all the possible combinations of events which can happen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an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four centuries preceding the present, if we may judge by what has happened both in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each of those thre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seemto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European market, and nearly in the same order, too, in which I have here set them down.

这三者假设似乎包括了在改良进程中可能发生事件的所有可能的组合。如果我们以法国和英国发生的事实来作判断，那么在前四个世纪中，这三种不同的组合似乎都在欧洲市场上发生过，其顺序似乎也和我上面陈述的顺序相同。

Digression concerning the Variations in the Value of Silver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Four last Centuries

前四个世纪中白银的价值的变动

FIRST PERIOD

第一阶段

In 1350, and for some time before,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wheat in England seems not to have been estimated lower than four ounces of silver, Tower weight, equal to about twenty shillings of our present money. From this price it seems to have fallen gradually to two ounces of silver, equal to about ten shillings of our present money, the price at which we find it estimat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at which it seems to have continued to be estimated till about 1570.

在1350年及此前数年间，每夸特英格兰小麦的平均价格估计不低于陶衡4盎司白银，合现在的英币20先令，此后，这个价格似乎逐渐下降到2盎司，约合现在的英币10先令。我们发现在16世纪初期，小麦的价格就被估算为每夸特10先令，这个价格似乎直到1570年一直没有变。

In 1350, being the 25th of Edward III, was enacted what is called, The Statute of Labourers. In the preamble it complains much of the insolence of servants, who endeavoured to raise their wages upon their masters. It therefore ordains, that all servants and labourers should for the future be contented with the same wages and liveries (liveries in those times signified, not only clothes, but provisions) which they had been accustomed to receive in the 20th year of the king, and the four preceding years; that upon this

account their livery wheat should nowhere be estimated higher than ten pence a bushel, and that it should always be in the option of the master to deliver them either the wheat or the money. Ten pence a bushel, therefore, had in the 25th of Edward III, been reckoned a very moderate price of wheat, since it required a particular statute to oblige servants to accept of it in exchange for their usual livery of provisions; and it had been reckoned a reasonable price ten years before that, or in the 16th year of the king, the term to which the statute refers. But in the 16th year of Edward III, ten pence contained about half an ounce of silver, Tower weight, and was nearly equal to halfacrown of our present money. Four ounces of silver, Tower weight, therefore, equal to six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of the money of those times, and to near twenty shillings of that of the present, must have been reckoned a moderate price for the quarter of eight bushels.

1350年，即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颁布了所谓的《劳工法》。在该法的序文，立法者们抱怨佣工傲慢无礼，指责他们不应要求雇主增加工资。所以，该法规规定：所有佣工和劳动者，此后应心甘情愿接受他们在爱德华三世第二十年及此前的四年里通常领得的工资和配给（这种配给，在当时不仅意味着衣服，也意味着食物），因此，他们所得的配给中的小麦，无论在何地，估价都不应高于每蒲式耳10便士，而且，雇主始终有权利向他们支付货币或是小麦。由于需要颁布《劳工法》才能迫使佣工接受每蒲式耳10便士的小麦价格，并按这个价格换得平时配给中的食物，因此可见这个价格在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被看成是极其低廉的。这个价格在10年前，即《劳工法》所提及的爱德华三世第十六年，被看作是合理的价格。但在爱德华三世第十六年，10便士大约包含陶衡半盎司白银，约合现在的英币半克朗。所以，陶衡4盎司白银，相当于爱德华三世第十六年的6先令8便士，而约合今天的20先令，这在当时一定被认为是每夸特8蒲式耳小麦的普通价格。

This statute is surely a better evidence of what was reckoned in those times a moderate price of grain, than the prices of some particular years which have generally been recorded by historians and other writers on account of their extraordinary dearness or cheapness, and from which,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form any judgment concerning what may have been the ordinary price. There are, besides, other reasons for believing tha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for some time before, the common price of wheat was not less than four ounces of silver the quarter, and that of other grain in proportion.

至于当时人们心目中谷物的适中价格，《劳工法》所提供的证明，无疑比历史学家及其他著述家所记录的某些年份的谷价好得多，因为历史学家和著述家门常常侧重记录异常高昂或异常低廉的谷价，所以很难依此判断当时谷物的普通价格。此外，还有其他理由使我们相信，在14世纪初及此前数年，小麦的普通价格不低于每夸特4盎司白银，其他谷物的价格可依次类推。

In 1309, Ralph de Born, prior of St. Augustine's, Canterbury, gave a feast upon his installation-day, of which William Thorn has preserved, not only the bill of fare, but the prices of many particulars. In that feast were consumed, first, fifty-three quarters of wheat, which cost nineteen pounds, or seven shillings and two pence a quarter, equal to about one-and-twenty shillings and six pence of our present money; secondly, fifty-eight quarters of malt, which cost seventeen pounds ten shillings, or six shillings a quarter, equal to about eighteen shillings of our present money; thirdly, twenty quarters of oats, which cost four pounds, or four shillings a quarter, equal to about twelve shillings of our present money. The

prices of malt and oats seem here to be higher than their ordinary proportion to the price of wheat.

1309年，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长拉尔夫·德博恩就任时曾举办一次宴会。威廉·索恩不仅保存了此次宴会的菜单，而且还记录了许多食物的价格。这次宴会共消费：一，53夸特小麦，价值19镑，即每夸特6先令2便士，约合现在的英币21先令2便士；二，56夸特麦芽，价值17镑10先令，即每夸特6先令，约合现在的英币18先令；三，20夸特燕麦，价值4镑，即每夸特4先令，约合现在的英币12先令。此时麦芽和燕麦价格似乎高于它们相对于小麦的一般比例。

These prices are not recorded on account of their extraordinary dearness or cheapness, but are mentioned accidentally as the prices actually paid for large quantities of grain consumed at a feast which was famous for its magnificence.

这些谷物的价格并不是人们因为谷价异常高昂或异常低廉而有意记载的，只是威廉·索恩对这次大规模宴会所消费的大量谷物实际价格的偶然记载。

In 1262, being the 51st of Henry III. was revived an ancient statute called*The Assize of Bread and Ale* , which, the king says in the preamble, had been made in the times of his progenitors sometime kings of England. It is probably, therefore, as old at least as the time of his grandfather Henry II. and may have been as old as the Conquest. It regulates the price of bread according as the prices of wheat may happen to be, from one shilling to twenty shillings the quarter of the money of those times. But statutes of this kind are

generally presumed to provide with equal care for all deviations from the middle price, for those below it as well as for those above it. Ten shillings, therefore, containing six ounces of silver, Tower weight, and equal to about thirty shillings of our present money, must, upon this supposition, have been reckoned the middle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wheat when this statute was first enacted, and must have continued to be so in the 51st of Henry III. We cannot therefore be very wrongin supposing that the middle price was not less than one-third of the highest price at which this statute regulates the price of bread, or than six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of the money of those times, containing four ounces of silver, Tower weight.

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即1262年，恢复了一项名为《面包和麦酒法定价格》的古代法令。亨利三世在序文中说，此法令系其祖先即以前的英格兰国王制定。由此推断，此法令至少是亨利二世时代制定的，或者可能是诺曼征服时代制定的。这项法令按照当时的小麦价格规定面包价格，即每夸特1先令到20先令的价格。但是人们通常都假定，这类法令在制定过程中除了考虑中等价格外，同样也会考虑到偏离中等价格的情况，即高于或低于中等价格的情况。所以在这种假设下，当时的10先令（含有陶衡6盎司白银，约合现在的英币30先令）在《面包和麦酒法定价格》这项法令制定之初，一定被看作每夸特小麦的普通价格，而且，直到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还被认为是每夸特小麦的普通价格。因此，我们假定中等价格不低于该法令规定的面包最高价格的1/3，换句话说，不低于当时货币的6先令8便士（含有陶衡4盎司白银），是不会错太多的。

From these different facts, therefore, we seem to have some reason to conclude, that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for a considerable time before, the average or ordinary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wheat was not supposed to be less than four ounces of silver, Tower weight.

因此，根据这些事实，我们似乎有理由得出结论：在14世纪中期及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每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或普通价格大概不会低于陶衡4盎司白银。

From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ourteenth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hat was reckoned the reasonable and moderate, that is the ordinary or average price of wheat, seems to have sunk gradually to about one-half of this price; so as at last to have fallen to about two ounces of silver, Tower weight, equal to about ten shillings of our present money. It continued to be estimated at this price till about 1570.

从大约14世纪中期至16世纪初，人们认为的小麦合理和适中的价格，即小麦的普通或平均价格，似乎已经逐渐减为上述价格的一半，最后降到大约陶衡2盎司白银，约合现在的英币10先令。一直到1570年，这个价格仍然保持不变。

In the household book of Henry, the fifth Earl of Northumberland, drawn up in 1512,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estimations of wheat. In one of them it is computed at six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the quarter, in the other at five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only. In 1512, six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contained only two ounces of silver,Tower weight, and were equal to about ten shillings of our present money.

1512年诺森伯兰五世伯爵亨利的家务记录对于小麦有两种不同的估价：第一种估价是每夸特小麦6先令8便士；第二种估价是每夸特仅值5先令8便士。在1512年，6先令8便士仅含有陶衡2盎司白银，约合现在的英币10先令。

From the 25th of Edward III,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Elizabeth, during the space of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six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it appears from several different statutes, had continued to be considered as what is called the moderate and reasonable, that is the ordinary or average price of wheat. The quantity of silver, however, contained in that nominal sum wa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period, continually diminishing, in consequence of some alterations which were made in the coin. But the increase of the value of silver had, it seems, so far compensated the diminution of the quantity of it contained in the same nominal sum, that the legislature did not think it worth while to attend to this circumstance.

在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到伊丽莎白在位初期这二百余年的时间中，从许多法令来看，6先令8便士似乎一直被看成小麦的合理或适中价格，即小麦的普通价格或平均价格。然而，在这段时间内，由于白银发生了一些变革，导致6先令8便士中所含的白银数量不断减少。不过，白银的价值的增加足以补偿该金额中白银数量的减少。所以，立法机构认为该金额所含的白银数量减少这种情况不值一提。

Thus in 1436 it was enacted, that wheat might be exported without a licence when the price was so low as six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and in 1463 it was enacted, that no wheat should be imported if the price was not above six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the

quarter. The legislature had imagined, that when the price was so low, there could be no inconveniency in exportation, but that when it rose higher, it became prudent to allow of importation. Six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therefore, containing about the same quantity of silver as thirteen shillings and four pence of our present money (one third part less than the same nominal sum contained in the time of Edward III), had in those times been considered as what is called the moderate and reasonable price of wheat.

1436年，立法机构规定，如果小麦价格下降至每夸特6先令8便士，那么小麦商人无需许可就可出口小麦。1463年立法机构又规定，如果每夸特小麦的价格未超过6先令8便士，那么就禁止小麦进口。在立法机构看来，小麦价格为每夸特6先令8便士这么低时，出口小麦并不会带来任何不便，但若小麦价格增高，那么允许小麦进口就是明智的做法。因此，6先令8便士（所含白银数量和现在13先令4便士所包含的白银数量相同，该数量和爱德华三世时代相同金额所含的白银数量相比，已减少1/3）在当时被看作小麦的所谓适中和合理的价格。

In 1554, by the 1st and 2nd of Philip and Mary; and in 1558, by the 1st of Elizabeth, the exportation of wheat was in the same manner prohibited, whenever the price of the quarter should exceed six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which did not then contain two penny worth more silver than the same nominal sum does at present. But it had soon been found that to restrain the exportation of wheat till the price was so very low, was, in reality, to prohibit it altogether. In 1562, therefore, by the 5th of Elizabeth, the exportation of wheat was allowed from certain ports whenever the price of the quarter should not exceed ten shillings, containing nearly the same quantity of silver as the like nominal sum does at present. This price had at this time, therefore, been considered as what is called the moderate

and reasonable price of wheat. It agrees nearly with the estimation of the Northumberland book in 1512.

1554年腓力国王和玛利女王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法令，以及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第一年的法令，同样规定，只要每夸特小麦的价格超过6先令8便士，就禁止小麦出口。当时6先令8便士所含的白银数量虽然比现在6先令8便士所含有的白银数量多，但多出的白银价值不超过2便士。但不久人们就发现，谷物出口的限定价格定的如此之低，实际上相当于永远禁止小麦出口。于是，在伊丽莎白第五年，即1562年，法令又规定只要每夸特小麦价格不超过10先令，就可随时在指定的港口出口。当时的10先令所含有的白银数量和现在10先令所含有的白银数量几乎相等。所以，每夸特10先令的价格在当时被认为是小麦的所谓合理和适中的价格，这和1512年诺森伯兰五世伯爵亨利的家务记录中估计的价格大致相符。

That in France the average price of grain was, in the same manner, much lower in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and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an in the two centuries preceding, has been observed both by Mr. Duprè de St. Maur, and by the elegant author of the Essay on the police of grain. Its pric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had probably sunk in the same manner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杜普雷·德圣莫尔以及讨论谷物政策的那篇论文的作家都谈到，法国的情况和上述情形差不多。法国谷物的平均价格，在15世纪末及16世纪初，比过去两世纪低廉得多。在同一时期，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谷物价格可能同样下降了。

This rise in the value of silver,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corn, may either have been owing altogether to the increase of the demand for that metal, in consequence of increasing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the supply in the meantime continuing the same as before; or, the demand continuing the same as before, it may have been owing altogether to the gradual diminution of the supply;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ines which were then known in the world, being much exhausted, and consequently the expence of working them much increased; or it may have been owing partly to the one and partly to the other of those two circumstances. In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and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ies,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was approaching towards a more settled form of government than it had enjoyed for several ages before. The increase of security would naturally increase industry and improvement; and the demand for the precious metals, as well as for every other luxury and ornament, would naturally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riches. A greater annual produce would require a greater quantity of coin to circulate it; and a greater number of rich people would require a greater quantity of plate and other ornaments of silver. It is natural to suppose, too,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ines which then supplied the European market with silver, might be a good deal exhausted, and have become more expensive in the working. They had been wrought many of them from the time of the Romans.

白银相对于谷物价值的升高，也许完全是因为供给继续不变而需求随改良和耕作的进步而增加；也许完全是因为，需求继续不变而供给逐渐减少，当时世界上已知的大部分银矿都已面临枯竭，因此开采费用大大增加；也许部分由于前一种原因，部分由于后一种原因。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局都比前几个世纪稳定。安全感的增强自然使产业发展和改良程度增高。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

对贵金属以及其他所有装饰品和奢侈品的需求自然也随之增加。年产物增多，要流通这些年产物便需要有更多的铸币。富人增多，就需要有更多的银制器皿及其他银制装饰品。此外，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当时为欧洲市场供应白银的大部分银矿可能都面临严重枯竭，开采费用更高。毕竟多数银矿都是从古罗马时代起就开采的。

It has been the opinion, however,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who have written upon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in ancient times, that, from the Conquest, perhaps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ill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es of America, the value of silver was continually diminishing. This opinion they seem to have been led into, partly by the observations which they had occasion to make upon the prices both of corn and of some other parts of the rude produce of land; and partly by the popular notion, that as the quantity of silver naturally increases in every country with the increase of wealth, so its value diminishes as its quantity increases.

论述古代商品价格的大部分作家都认为，自诺曼征服时代起，或者可能从朱利乌斯·恺撒入侵时代起，直到美洲各矿山被发现为止，白银的价值都在不断减少。我想，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谷物和其他土地天然生产物所作的观察，另一部分是由于一种通俗的观点，即白银的数量在每个国家随财富的增加而自然而然地增加时，其价值一定随着白银数量的增加而自然而然地下降。

In their observations upon the prices of corn, thre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seem frequently to have misled them.

在观察谷物价格时，以下三种情况似乎常常误导他们：

First, in ancient times almost all rents were paid in kind; in a certain quantity of corn, cattle, poultry, etc. It sometimes happened, however, that the landlord would stipulate, that he should be at liberty to demand of the tenant, either the annual payment in kind, or a certain sum of money instead of it. The price at which the payment in kind was in this manner exchanged for a certain sum of money, is in Scotland called the conversion price. As the option is always in the landlord to take either the substance or the pric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afety of the tenant, that the conversion price should rather be below than above the average market price. In many places, accordingly, it is not much above one-half of this price.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Scotland this custom still continues with regard to poultry, and in some places with regard to cattle. It might probably have continued to take place, too, with regard to corn, had not the institution of the public fiars put an end to it. These are annual valuations, according to the judgment of an assize, of the average price of all the different sorts of grain, and of all the different qualities of each,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market price in every different county. This institution rendered it sufficiently safe for the tenant, and much more convenient for the landlord, to convert, as they call it, the corn rent, rather at what should happen to be the price of the fiars of each year, than at any certain fixed price. But the writers who have collected the prices of corn in ancient times, seem frequently to have mistaken what is called in Scotland the conversion price for the actual market price. Fleetwood acknowledges, upon one occasion, that he had made this mistake. As he wrote his book, however,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he does not think proper to make this acknowledgment till after transcribing this conversion price fifteen times. The price is eight shillings the quarter of wheat. This sum in 1423, the year at which he begins with it, contained the same quantity of silver as sixteen

shillings of our present money. But in 1562, the year at which he ends with it, it contained no more than the same nominal sum does at present.

第一，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地租都是用实物支付的，即一定数量的谷物、家禽、牲畜等。但是土地所有者有时候规定，他可以随意要求佃户以实物支付年地租，或以一定金额的货币代替实物支付年地租。在苏格兰，人们把这种以一定金额的货币代替实物支付的价格称为换算价格。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物还是要货币的选择权总是在土地所有者手中，所以，出于对佃户安全的考虑，换算价格必须比平均市场价格低，而不是比平均市场价格高。因此，在许多地方，这种换算价格仅比平均市场价格的一半稍稍高一些。在苏格兰大部分地区，直到今天，家禽还沿用这种换算方法，在有些地区，牲畜还沿用这种换算方法。若不是公定谷价制度废除了这种换算办法，谷物恐怕至今还会沿用这种办法。所谓公定谷价，就是根据谷价公定委员会作出的判断，每年按照各省谷物的实际市场价格，对不同种类谷物的平均价格，以及对同一种类不同质量的谷物的平均价格作估算。根据这一制度，在换算谷物地租时，人们须遵照当年的公定谷价而不是任何定价，所以，佃户的利益能得到充分的保障，而土地所有者也觉得方便很多。但收集古代谷物价格的学者们常常把苏格兰所谓的换算价格，误认为是实际的市场价格。弗利特伍德有一次曾承认自己犯过此类错误。但是他在著述时，出于某种特殊的目的，一直觉得不太适合承认这个错误，直到把这种换算价格误用了15次后才敢承认。这一换算价格是每夸特小麦8先令。在他开始著书的第一年即1423年，当时8先令所含的白银数量和今天英币16先令所含的白银数量相同，但在他著书的最后一年即1562年，当时8先令所含的白银数量和现在8先令所含的白银数量相同。

Secondly, they have been misled by the slovenly manner in which some ancient statutes of assize had been sometimes

transcribed by lazy copiers; and sometimes perhaps actually composed by the legislature.

第二，古代某些规定法定价格的法令，有时是懒惰的抄写员潦草地抄写的，有时是立法机构草率地制定的，因而对这些学者造成误导。

The ancient statutes of assize seem to have begun always with determining what ought to be the price of bread and ale when the price of wheat and barley were at the lowest, and to have proceeded gradually to determine what it ought to be, according as the prices of those two sorts of grain should gradually rise above this lowest price. But the transcribers of those statutes seem frequently to have thought it sufficient, to copy the regulation as far as the three or four first and lowest prices; saving in this manner their own labour, and judging, I suppose, that this was enough to show what proportion ought to be observed in all higher prices.

古代规定法定价格的法令，似乎总是在一开始规定，当小麦和大麦的价格最低时，面包和麦酒的价格应是多少，接着规定，当小麦和大麦的价格超过这个最低价格时，面包和麦酒的价格应是多少。但是，这些法令的抄写员似乎常常以为，抄写最开始的三四个最低价格就足够了。这样不仅能节省劳动，而且我想在他们看来，这样做也足以表明所有更高的价格应按什么比例增加。

Thus in the Assize of Bread and Ale, of the 51st of Henry III, the price of bread was regulat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rices of wheat, from one shilling to twenty shillings the quarter, of the

money of those times. But in the manuscripts from which all the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e statutes, preceding that of Mr. Ruffhead, were printed, the copiers had never transcribed this regulation beyond the price of twelve shillings. Several writers, therefore, being misled by this faulty transcription, very naturally concluded that the middle price, or six shillings the quarter, equal to about eighteen shillings of our present money, was the ordinary or average price of wheat at that time.

例如，在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关于面包、麦酒的法定价格的法令中，面包的价格就是按照每夸特小麦以当时的货币1先令到20先令的不同价格规定的。然而起初，在各种版本的法令汇编所依据的诸多抄本中，抄写员都只抄写了上述法令中12先令以下的价格，这种不完全的统计直到拉夫黑德的法令汇编出版才得以更正。因此，被这些不完全抄本误导的一些学者自然而然地认为，每夸特6先令的普通价格，即约合现在的英币18先令的普通价格，是当时小麦的一般价格或平均价格。

In the Statute of Tumbrel and Pillory, enacted nearly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price of ale is regulated according to every sixpence rise in the price of barley, from two shillings to four shillings the quarter. That four shillings, however, was not considered as the highest price to which barley might frequently rise in those times, and that these prices were only given as an example of the proportion which ought to be observed in all other prices, whether higher or lower, we may infer from the last words of the statute:“et sic deinceps crescetur vel diminuetur per sex denarios.” The expression is very slovenly, but the meaning is plain enough: “That the price of ale is in this manner to be increased or diminished according to every sixpence rise or fall in the price of barley.”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is statute the legislature itself seems to have been as negligent as the copiers were in the transcription of the other.

在几乎同时制定的关于囚车和枷的法令中，麦酒的价格按照每夸特以2-4先令不等的价格每上升6便士调整一次。但是，这4先令的价格并不是当时大麦常常达到的最高价格，而这些价格只是作为例子，来说明较高或较低的价格应按照这个比例相应增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该法令的最后一句推断出来（et sic deincepscrescetur vel diminuetur per sex denarios）。这句话虽然不够精确，但意思却很明了："这样，麦酒的价格应随大麦的价格每上升或下降6便士而增减。"立法机构在制定这项法令时，似乎和上述法令的抄写员，即关于面包、麦酒法定价格的法令的抄写员一样疏忽大意。

In an ancient manuscript of the Regiam Majestatem, an old Scotch law book, there is a statute of assize, in which the price of bread is regulated according to all the different prices of wheat, from ten pence to three shillings the Scotch boll, equal to about half an English quarter. Three shillings Scotch, at the time when this assize is supposed to have been enacted, were equal to about nine shillings sterling of our present money. Mr. Ruddimanseemsto conclude from this, that three shillings was the highest price to which wheat ever rose in those times, and that ten pence, a shilling, or at most two shillings, were the ordinary prices. Upon consulting the manuscript, however, it appears evidently, that all these prices are only set down as examples of the proportion which ought to be observed between the respective prices of wheat and bread. The last words of the statute are: reliqua judicabis secundum proescripta habendo respectum ad pretium bladi. "You shall judge of the remaining cases according to what is above written having a respect to the price of corn."

在苏格兰古老的法律书《王位的尊严》的一个古抄本中，有一项关于法定价格的法律。在该法律中，面包的价格是根据小麦的所有不同价格调整的，小麦的价格从每苏格兰波尔（约合英格兰0.5夸特）10便士到3先令不等。在该法律制定时期，苏格兰3便士约合现在的英币9先令。拉迪曼似乎由此得出结论，3先令是当时小麦曾达到的最高价格，10便士、1先令，至多2先令，则是小麦的普通价格。但是，查看了抄本后就会明白，那些价格只是作为例子来说明小麦价格和面包价格所遵循的比例。该法律的最后一句话是："reliquajudicabis secundum proescriptahabendorespectum ad pretiumbladi"，意为："按照上面所提到的谷物价格判断其他情况的价格"。

Thirdly, they seem to have been misled too by the very low price at which wheat was sometimes sold in very ancient times; and to have imagined, that as its lowest price was then much lower than in later times, its ordinary price must likewise have been much lower. They might have found, however, that in those ancient times, its highest price was fully as much above, as its lowest price was below anything that had ever been known in later times. Thus in 1270, Fleetwood gives us two prices of the quarter of wheat. The one is four pounds sixteen shillings of the money of those times, equal to fourteen pounds eight shillings of that of the present; the other is six pounds eight shillings, equal to nineteen pounds four shillings of our present money. No price can be found in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or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hich approaches to the extravagance of these. The price of corn, though at all times liable to variation, varies most in those turbulent and disorderly societies, in which the interruption of all commerce and communication hinders the plenty of one part of the country from relieving the scarcity of another. In the disorderly state of England under the Plantagenets, who governed it from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twelfth, till towards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one district might be in plenty, while another at no great distance, by having its crop destroyed either by some accident of the seasons, or by the incursion of some neighbouring baron, might be suffering all the horrors of a famine; and yet if the lands of some hostile lord were interposed between them, the one might not be able to give the least assistance to the other. Under the vigorous administration of the Tudors, who governed England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fifteenth, and through the who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no baron was powerful enough to dare to disturb the public security.

第三，在远古时期，小麦有时以极低的价格售卖，这也对学者们造成一种误导，以为当时小麦的最低价格，既然比后来小麦的最低价格低得多，那么当时小麦的普通价格，也一定比后来小麦的普通价格低得多。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或许发现，远古时期小麦的最高价格也比后来小麦的任何已知价格都高得多，正如其最低价格比后来的最低价格低得多一样。例如在1270年，弗利特伍德提到每夸特的小麦有两种价格：第一种是当时的货币4镑16先令，合现在的英币14镑8先令；第二种是当时的货币6镑8先令，合现在的英币19镑4先令。在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找不到任何价格接近如此高昂的价格。虽然谷物的价格在各个时期都容易变动，但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变动得更大，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商业和交通都被中断，国内一个地区谷物的富饶不能救济另一个地区谷物的贫乏。从12世纪中期到15世纪末，金雀花王朝统治下的英格兰处于混乱状态，一个地区的谷物可能很充足，但相距不太远的另一个地区却可能由于季节灾害或邻近贵族的入侵而导致庄稼被毁，使民众陷入饥荒的痛苦之中。如果某个敌对贵族的领地恰好在这两地区中间，那么拥有富饶谷物的地区就无法对谷物贫乏的地区施以援手。然而，在15世纪后半叶和16世纪，在都铎王朝强有力的统治下，没有一个贵族强大到敢去扰乱公共安全。

The reader will find at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ll the prices of wheatwhich have been collected by Fleetwood from 1202 to 1597, both inclusive, reduced to the money of the present times, and digested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ime, into seven divisions of twelve years each. At the end of each division, too, he will find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twelve years of which it consists. In that long period of time, Fleetwood has been able to collect the prices of no more than eighty years, so that four years are wanting to make out the last twelve years. I have added, therefore, from the accounts of Eton College, the prices of 1598, 1599, 1600, and 1601. It is the only addition which I have made. The reader will see,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till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average price of each twelve years grows gradually lower and lower; and tha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it begins to rise again. The prices, indeed, which Fleetwood has been able to collect, seem to have been those chiefly which were remarkable for extraordinary dearness or cheapness; and I do not pretend that any very certain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from them. So far, however, as they prove anything at all, they confirm the account which I have been endeavouring to give. Fleetwood himself, however, seems, with most other writers, to have believed, that during all this period the value of silver, in consequence of its increasing abundance, was continually diminishing. The prices of corn which he himself has collected, certainly do not agree with this opinion. They agree perfectly with that of Mr. Duprè de St. Maur, and with that which I have been endeavouring to explain. Bishop Fleetwood and Mr. Duprè de St. Maur are the two authors who seem to have collected, with the greatest diligence and fidelity, the prices of things in ancient times. It is somewhat curious that, though their opinions are so very different, their facts, so far as they relate to the price of corn at least, should coincide so very exactly.

读者在本章末尾将看到弗利特伍德搜集的，从1202年到1597年（包括这两年在内）的所有小麦价格，他把这些价格换算为现在的货币，并按照时间顺序分为7期，每12年为一期。在每期的末尾，可以找到该期12年间的平均价格。由于从1202到1597年这个时间间隔如此之长，弗利特伍德只能搜集到80年的小麦价格，最后一期还差4年的小麦价格没有找到。因此我根据伊顿学院的记载补充了1598年、1599年、1600年及1601年的小麦价格。我只补充了这4年的价格。从这些数据中读者可以看到，从13世纪初一直到16世纪中期以后，每12年的平均价格都在逐渐下降，到16世纪末期又逐渐上升。弗利特伍德所搜集的价格，似乎主要是那些引人注目的过高价格或过低价格，所以，我不敢说从他这些价格中能得出任何相当肯定的结论。但是，如果这些价格能证明什么的话，那么它们证明了我一直在努力阐明的观点。但是，弗利特伍德本人似乎和大多数其他学者一样，都相信在这段时间里，白银的价值由于白银产量的日益丰富而不断降低。他所搜集的谷物价格肯定和他的观点不能吻合，这些谷物价格和杜普雷·德圣莫尔的观点，以及我努力阐述的观点却完全一致。弗利特伍德和德圣莫尔这两位作家，似乎都孜孜不倦地、诚诚恳恳地搜集古代的各种物价。令人有些好奇的是，他们两人的观点虽然如此不同，但两人搜集的事实，至少就谷物价格说，却精准地吻合。

It is not, however, so much from the low price of corn, as from that of some other parts of the rude produce of land, that the most judicious writers have inferred the great value of silver in those very ancient times. Corn, it has been said, being a sort of manufacture, was, in those rude ages, much dearer in proportion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commodities; it is meant, I suppose,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unmanufactured commodities; such as cattle, poultry, game of all kinds, etc. That in those times of poverty and barbarism these were proportionably much cheaper than corn, is undoubtedly true. But this cheapness was not the effect of the high value of silver, but of the low value of those commodities. It

was not because silver would in such times purchase or represent a greater quantity of labour, but becausesuch commodities would purchase or represent a much smaller quantity than in times of more opulence and improvement. Silver must certainly be cheaper in Spanish America than in Europe; in the country where it is produced, than in the country to which it is brought, at the expence of a long carriage both by land and by sea, of a freight and an insurance. One-and-twenty pence halfpenny sterling, however, we are told by Ulloa, was, not many years ago, at Buenos Ayres, the price of an ox chosen from a herd of three or four hundred. Sixteen shillings sterling, we are told by Mr. Byron, was the price of a good horse in the capital of Chili. In a country naturally fertile, but of which the far greater part is altogether uncultivated, cattle, poultry, game of all kinds, etc. , as they can be acquired with a very small quantity of labour, so they will purchase or command but a very small quantity. The low money price for which they may be sold, is no proof that the real value of silver is there very high, but that the real value of those commodities is very low.

然而，最有见识的学者推断出远古时期白银的价值很高，并不是谷物的低廉价格，而是其他许多土地天然生产物的低廉价格。据说，谷物是一种制造品，在未开化时代比其他大部分商品都贵得多。我想，这里的“大部分商品”指的是家禽、牲畜和猎物那一类非制造品。这些物品在贫困和野蛮时代无疑比谷物低廉得多。但这些物品低廉的价格不是白银价值过高的结果，而是这些物品本身价值低的结果；不是因为白银在那个时代所能购入或代表的劳动数量比在富裕和进步时代购入或代表的劳动数量更多，而是因为这些物品在那个时代所能购入或代表的劳动数量比在富裕和进步时代购入或代表的劳动数量少得多。白银价格在西班牙属美洲肯定比在欧洲更低廉，在白银生产国必然比白银进口国低廉，因为进口国要承担长途海路运输的运费和保险费。但是乌略亚却告诉我们，不久前，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

斯，仅需21.5便士就可随意从400头牛中挑一头牛买走。拜伦告诉我们，在智利首都，一匹好马的价格为英币16先令。在土壤肥沃而大部分土地又全未耕作的国家，家禽、牲畜和猎物只需用极少量劳动就可获得，因此它们也只能购买或支配极少量的劳动。这些商品只能以低廉的货币价格出售，并不能证明那里白银的真实价值很高，只能证明那里这些商品的真实价值很低。

Labour, it must always be remembered, and not any particular commodity or set of commodities, is the real measure of the value both of silver and of all other commodities.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白银及所有其他商品价值的真正尺度，不是任何一个商品或任何一类商品，而是劳动。

But in countries almost waste, or but thinly inhabited, cattle, poultry, game of all kinds, etc. , as they are the spontaneous productions of nature, so she frequently produces them in much greater quantities than the consumption of the inhabitants requires. In such a state of things the supply commonly exceeds the demand. In different states of society, in different stages of improvement, therefore, such commodities will represent, or be equivalent to, very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labour.

在土地几乎荒芜或人口稀少的国家，家禽、牲畜和各种猎物都是自然界的天然产物，因此数量常常比居民所能消费的数量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常常超过需求。所以，在不同的社会状态，在不同的改良阶段，这些商品代表或等于的劳动数量就有很大的不同。

In every state of society, in every stage of improvement, corn is the production of human industry. But the average produce of every sort of industry is always suited, more or less exactly, to the average consumption; the average supply to the average demand. In every different stage of improvement, besides, the raising of equal quantities of corn in the same soil and climate, will, at an average, require nearly equal quantities of labour;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the price of nearly equal quantities; the continual increase of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in an improvingstate of cultivation being more or less counter balanced by the continually increasing price of cattle, the principal instruments of agriculture. Upon all these accounts, therefore, we may rest assured, that equal quantities of corn will, in every state of society, in every stage of improvement, more nearly represent, or be equivalent to, equal quantities of labour, than equal quantities of any other part of the rude produce of land. Corn, accordingly,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is, in all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wealth and improvement, a more accurate measure of value than any other commodity or set of commodities. In all those different stages, therefore, we can judge better of the real value of silver by comparing it with corn, than by comparing it with any other commodity, or set of commodities.

无论社会处于什么社会，处于何种改良阶段，谷物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各种劳动的平均产量总是大体上和其平均消费量相适应，也就是说，平均供给总是大体上和其平均需求相适应。而且，无论处于何种改良阶段，在同一土壤和气候中，生产同一数量的谷物平均需要花费的劳动数量都几乎相同，或者说，需要支付的价格几乎相同。这是因为，在耕作改良的状态下，虽然劳动生产力不断增加，但却或多或少因牲畜（一种主要农具）价格的不断增加而抵消。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可以肯定：无论在什么社会状态下，无论处于何种改良阶段

中，同等数量谷物，和同等数量的其他土地天然生产物相比，总是能更近似地代表或交换同等数量的劳动。所以我们在前面说过，在财富和改良的不同阶段中，谷物是比任何一个或一类商品都更准确的价值尺度。因此，在上述不同阶段，我们将白银与谷物进行比较，比将白银与任何一个或一类商品比较都更能准确地判断白银的真实价值。

Corn, besides, or whatever else is the common and favourite vegetable food of the people, constitutes, in every civilised country,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 subsistence of the labourer. In consequence of the extension of agriculture, the land of every country produces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vegetable than of animal food, and the labourer everywhere lives chiefly upon the wholesome food that is cheapest and most abundant. Butcher's meat, except in the most thriving countries, or where labour is most highly rewarded, makes but an insignificant part of his subsistence; poultry makes a still smaller part of it, and game no part of it. In France, and even in Scotland, where labour is somewhat better rewarded than in France, the labouring poor seldom eat butcher's meat, except upon holidays, and other extraordinary occasions.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therefore, depends much more upon the average money price of corn, the subsistence of the labourer, than upon that of butcher's meat, or of any other part of the rude produce of land. The real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therefore, the real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they can purchase or command, depends much more upon the quantity of corn which they can purchase or command, than upon that of butcher's meat, or any other part of the rude produce of land.

此外，在所有文明国家，谷物或其他人们普遍喜爱的植物性食物都是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主要部分。由于农业的推广，各国土地所生产

的植物性食物比动物性食物多得多。世界各地的劳动者都以最便宜、最富饶的卫生食物作为主要生活资料。除了最繁荣的国家，或劳动报酬特别昂贵的国家，鲜肉在劳动者生活资料中仅占极小部分，家禽所占部分更小，猎物不占任何部分。在法国，甚至在劳动报酬略高于法国的苏格兰，贫穷的劳动者除了在过节或是其他特殊场合能吃到肉外，在其他时候很少能吃到肉。因此，劳动的货币价格更多地取决于劳动者的主要生活资料，即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而不是取决于鲜肉或是其他土地天然生产物的平均货币价格。所以，金银的真实价值，换句话说，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真实的劳动数量，更多地取决于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谷物数量，而不是取决于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鲜肉数量或任何其他土地天然生产物的数量。

Such slight observations, however, upon the prices either of corn or of other commodities, would not probably have misled so many intelligent authors, had they not been influenced, at the same time, by the popular notion, that as the quantity of silver naturally increases in every country with the increase of wealth, so its value diminishes as its quantity increases. This notion, however, seems to be altogether groundless.

不过，虽然上述对谷物或其他商品价格的观察相当粗略，但也不能误导如此多聪明的学者，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同时还受到了下面这种通行观念的影响，即由于各国的白银数量随着财富的增加而自然增加，白银的价值随白银数量的增加而自然减少。但这种观点似乎毫无根据。

The quantit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may increase in any country from two different causes; either, first, from the increased abundance of the mines which supply it; or, secondly, from the

increased wealth of the people, from the increased produce of their annual labour. The first of these causes is no doubt necessarily connected with the diminu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but the second is not.

在任何一个国家，贵金属数量的增加可能由于两种不同的原因：第一，供给贵金属的矿山更富饶；第二，人民的财富增加了，即劳动年产物增加了。第一种原因无疑一定与贵金属价值的下降有关，但第二种原因却与贵金属价值的下降无关。

When more abundant mines are discovered, a greater quantit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s brought to market, and the quantity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for which they must be exchanged being the same as before, equal quantities of the metals must be exchanged for smaller quantities of commodities. So far, therefore, as the increase of the quantit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n any country arises from the increased abundance of the mines, it is necessarily connected with some diminution of their value.

当更富饶的矿山被发现时，就会有更多数量的贵金属进入市场。如果必须用贵金属交换才能获得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和以前一样，即保持不变，那么同等数量的贵金属所能换得的商品数量一定比以前少。所以，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贵金属数量的增加是因为供给贵金属的矿山更富饶，那么贵金属的价值一定有所下降。

When, on the contrary, the wealth of any country increases, when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bour becomes gradually greater and greater, a greater quantity of coin becomes necessary in order

to circulate a greater quantity of commodities; and the people, as they can afford it, as they have more commodities to give for it, will naturally purchase a greater and a greater quantity of plate. The quantity of their coin will increase from necessity; the quantity of their plate from vanity and ostentation, or from the same reason that the quantity of fine statues, pictures, and of every other luxury and curiosity, is likely to increase among them. But as statuaries and painters are not likely to be worse rewarded in times of wealth and prosperity, than in times of poverty and depression, so gold and silver are not likely to be worse paid for.

相反，当任何国家的财富增加时，换句话说，当任何国家劳动年产物逐渐增多时，更多商品的流通就需要有更多的铸币，而人民，由于有了购买能力，由于有了更多的商品进行交换，自然会购买越来越多的金银器皿。人民手中的铸币数量因为生活需要而增加，人民手中的金银器皿数量因为追求虚荣和浮华而增加，而精巧雕像、绘画及其他各种奢侈品和珍奇品的数量也可能因为人们追求虚荣和浮华而增加。但是，雕刻家和画家在富裕和繁荣的时代所获得的报酬不可能比贫困和萧条的时代所获得的报酬低，由此类推，金银在富裕和繁荣时代的价格不可能比贫困和萧条时代的价格低。

The price of gold and silver, when the accidental discovery of more abundant mines does not keep it down, as it naturally rises with the wealth of every country, so, whatever be the state of the mines, it is at all times naturally higher in a rich than in a poor country. Gold and silver, like all other commodities, naturally seek the market where the best price is given for them, and the best price is commonly given for every thing in the country which can best afford it. Labour, it must be remembered, is the ultimate price which is paid for everything, and in countries where labour is

equally well regarded,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will be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the subsistence of the labourer. But gold and silver will naturally exchange for a greater quantity of subsistence in a rich than in a poor country, in a country which abounds with subsistence, than in one which is but indifferently supplied with it. If the two countries are at a great distance, the difference may be very great; because though the metals naturally fly from the worse to the better market, yet it may be difficult to transport them in such quantities as to bring their price nearly to a level in both. If the countries are near, the difference will be smaller, and may sometimes be scarce perceptible; because in this case the transportation will be easy. China is a much richer country than any part of Europe,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ice of subsistence in China and in Europe is very great. Rice in China is much cheaper than wheat is anywhere in Europe. England is a much richer country than Scotland; b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ney-price of corn in those two countries is much smaller, and is but just perceptible.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r measure, Scotch corn generally appears to be a good deal cheaper than English; but in proportion to its quality, it is certainly somewhat dearer. Scotland receives almost every year very large supplies from England, and every commodity must commonly be somewhat dearer in the country to which it is brought than in that from which it comes. English corn, therefore, must be dearer in Scotland than in England, and yet in proportion to its quality, or to the quantity and goodness of the flour or meal which can be made from it, it cannot commonly be sold higher there than the Scotch corn which comes to market in competition with it.

当偶然发现的更富饶的矿山并没有使金银的价格下降时，由于各国的金银价格随着财富的增长而自然上升，那么，无论矿山的富饶程

度如何，富国金银的价格自然总是比穷国金银的价格高。金银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总是自动寻找出价最高的市场，而最有能力负担所有商品的国家通常对任何商品都出价最高。我们必须记住，劳动是人们对所有商品支付的最终价格。在劳动同样得到良好报酬的国家，劳动的货币价格总是与劳动者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成比例。然而，金银在富国自然比在穷国能交换更多的生活资料，换句话说，金银在生活资料供应充足的国家自然比在生活资料供应一般的国家能交换更多的生活资料。如果这两个国家相距甚远，那么这种差额也许很大，因为金银虽然能够自然地由坏市场快速流入好市场，但遥远的距离使得人们很难输送大量的金银，使两国的金银价格接近同一水平。如果这两个国家离得很近，那么由于金银运输起来比较容易，上述差额会比较小，甚至难以察觉。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裕得多，中国和欧洲生活资料的价格也相差甚远。中国的大米比欧洲各地的小麦都便宜得多。英格兰同样比苏格兰富裕得多，但两地间谷物价格的差异却小得多，仅能勉强看出些许差别。就数量来说，苏格兰的谷物似乎通常比英格兰的谷物便宜得多，但是就品质来说，苏格兰的谷物却肯定比英格兰的谷物要昂贵一些。苏格兰几乎每年都从英格兰输入大量谷物，而无论哪种商品，在输入国的价格总是比输出国的价格高一些。因此，英格兰谷物在苏格兰的价格一定比在英格兰本地高。但是，就品质，即就谷物所能制成的面粉或膳食的品质和质量来说，英格兰的谷物通常没有比同样进入市场和它竞争的、苏格兰本地产的谷物的价格高。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in China and in Europe, is still greater than that between the money price of subsistence; because the real recompence of labour is higher in Europe than in China,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being in an improving state, while China seems to be standing still.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is lower in Scotland than in England, because the real recompence of labour is much lower; Scotland, though advancing to greater wealth, advances much more slowly than

England. The frequency of emigration from Scotland, and the rarity of it from England, sufficiently prove that the demand for labour is very different in the two countries.

中国和欧洲两地的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间存在巨大差异，两地的劳动的货币价格间存在的差异甚至更大。这是因为欧洲大部分地区处于改良进步状态，而中国似乎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在欧洲，劳动的真实报酬比在中国高。由于在苏格兰，劳动的真实报酬比英格兰要低得多，因此苏格兰劳动的货币价格也比英格兰低。这是因为，尽管苏格兰也在不断进步，不断积累财富，但其速度没有英格兰快。苏格兰人民频繁移居国外，而英格兰人民却很少迁移，这足以证明两地的劳动需求有很大的差别。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real recompence of labour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t must be remembered, is naturally regulated, not by their actual wealth or poverty, but by their advancing, stationary, or declining condition.

我们必须记住，不同国家间劳动真实间报酬的比例，不受各国实际贫富程度的自然支配，而受各国进步、停滞或退步状态的自然支配。

Gold and silver, as they are naturally of the greatest value among the richest, so they are naturally of the least value among the poorest nations. Among savages, the poorest of all nations, they are of scarce any value.

在最富裕的国家，金银自然具有最大的价值，在最贫困的国家，金银自然只有最小的价值。在最贫穷的野蛮国家，金银几乎没有价值。

In great towns corn is always dearer than in remote parts of the country. This, however, is the effect, not of the real cheapness of silver, but of the real dearness of corn. It does not cost less labour to bring silver to the great town than to the remote parts of the country; but it costs a great deal more to bring corn.

大城市的谷物总是比偏远地区昂贵。但大城市谷物的昂贵并不是白银价格实际低廉的结果，而是谷物价格实际高昂的结果。把白银运往大城市需要的劳动数量并不比运往偏远地区少，而把谷物运往大城市却需要比运往偏远地区多得多的劳动数量。

In some very rich and commercial countries, such as Holland and the territory of Genoa, corn is dear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it is dear in great towns. They do not produce enough to maintain their inhabitants. They are rich in the industry and skill of their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in every sort of machinery which can facilitate and abridge labour; in shipping, and in all the other instruments and means of carriage and commerce: but they are poor in corn, which, as it must be brought to them from distant countries, must, by an addition to its price, pay for the carriage from those countries. It does not cost less labour to bring silver to Amsterdam than toDantzic; but it costs a great deal more to bring corn. The real cost of silver must be nearly the same in both places; but that of corn must be very different. Diminish the real opulence either of Holland or of the territory of Genoa, while the number of their

inhabitants remains the same: diminish their power of supplying themselves from distant countries; and the price of corn, instead of sinking with that diminution in the quantity of their silver, which must necessarily accompany this declension either as its cause or as its effect, will rise to the price of a famine. When we are in want of necessaries we must part with all superfluities, of which the value, as it rises in times of opulence and prosperity, so it sinks in times of poverty and distress. It is otherwise with necessaries. Their real price,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they can purchase or command, rises in times of poverty and distress, and sinks in times of opulence and prosperity, which are always times of great abundance; for they could not otherwise be times of opulence and prosperity. Corn is a necessary, silver is only a superfluity.

在一些非常富裕的商业国，如荷兰和热那亚地区，谷物价格高昂的原因与大城市谷物价格高昂的原因相同。这两个地方生产的谷物不足以维持自己的居民。虽然它们的技术工人和制造工人都非常勤勉，工作非常熟练，虽然它们拥有大量的可以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各种机器，虽然它们拥有充足的运输船舶以及其他所有的运输工具，掌握所有的商业手段，但是它们缺乏谷物，它们必须从遥远的国家进口自己需要的谷物，所以这两个地方的谷物价格必须加上把谷物从其他国家运来的运输费用。把白银运往阿姆斯特丹需要的劳动数量并不比运往但泽少，但把谷物运往阿姆斯特丹需要的劳动数量却比运往但泽要多得多。在这两地，白银的真实成本一定几乎相同，但谷物的真实成本一定大不相同。现在假定荷兰或热那亚的人口数量不变，而两地的真实富裕程度却降低了，即两地从遥远国家输入谷物的能力降低了，那么伴随这种衰退而来的必然是白银数量的减少，这种数量的减少有可能是衰退的原因，也有可能是衰退的结果。此时谷物的价格不但不会随白银数量的减少而下降，反而会上升到发生饥荒时的价格。当我们缺少必需品时，必须放弃所有非必需品。非必需品的价值于是在贫穷和萧条时期下降，在富裕和繁荣时期上升。必需品的情况恰恰相

反。必需品的真实价格，即必需品能够支配或购买的劳动数量，在贫穷和萧条时期上升，在富裕和繁荣时期下降。富裕和繁荣时期总是谷物非常丰富的时期，否则就不能称作富裕和繁荣时期。谷物是必需品，而白银是非必需品。

Whatever, therefore, may have been the increase in the quantit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which,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middle of the fourteenth and that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rose from the increase of wealth and improvement, it could have no tendency to diminish their value either in Great Britain, or in any other part of Europe. If those who have collected the prices of things in ancient times, therefore, had, during this period, no reason to infer the diminution of the value of silver, from any observations which they had made upon the prices either of corn or of other commodities, they had still less reason to infer it from any supposed increase of wealth and improvement.

因此，在14世纪中期到16世纪中期这段时间里，无论随着财富和改良的增长，贵金属的数量增长了多少，在大不列颠或欧洲任何其他国家，贵金属的价值都没有减少的倾向。所以，如果搜集古代物价的学者们没有理由根据他们对谷物或其他物品价格所作的任何观察，推断这个时期里白银的价值降低了，那么他们就更没有理由，根据想象中财富和改良的增长来推断这期间白银的价值降低了。

SECOND PERIOD

第二阶段

But how various soever may have been the opinions of the learned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value of silver during this first period, they are unanimous concerning it during the second.

但是不论学者们对于第一阶段中白银价值的变动抱有多么不同的观点，他们对于第二阶段白银价值变动却抱有相同的观点。

From about 1570 to about 1640, during a period of about seventy years, the variation in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value of silver and that of corn, held a quite opposite course. Silver sunk in its real value, or would exchange for a smaller quantity of labour than before; and corn rose in its nominal price, and instead of being commonly sold for about two ounces of silver the quarter, or about ten shillings of our present money, came to be sold for six and eight ounces of silver the quarter, or about thirty and forty shillings of our present money.

从大约1570年到大约1640年，在这差不多70年的时间里，白银价值和谷物价值的比例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变动。在这期间，白银的真实价值下降了，换句话说，白银所能换得的劳动数量比以前少了；谷物的名义价格上升了，以前谷物的售价是每夸特2盎司白银，约合现在的英币10先令，这段期间谷物的售价是每夸特6至8盎司白银，约合现在的英币30先令或40先令。

The discovery of the abundant mines of America, seems to have been the sole cause of this diminution in the value of silver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corn. It is accounted for accordingly in the same manner by everybody; and there never has been any dispute

either about the fact, or about the cause of it.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was, during this period, advancing in industry and improvement, and the demand for silver must consequently have been increasing. But the increase of the supply had, it seems, so far exceeded that of the demand, that the value of that metal sunk considerably.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es of America, it is to be observed, does not seem to have had any very sensible effect upon the prices of things in England till after 1570; though even the mines of Potosi had been discovered more than twenty years before.

美洲富饶银矿的发现，似乎是这段时期白银相对谷物价值降低的唯一原因。每个人都这样解释，从来没有人对白银的相对价值降低这一事实，或是这一事实发生的原因有过任何争论。在这段时期，欧洲大部分地区在产业和改良上方面都向前发展，因此对白银的需求必然增加。但是，此时白银供给的增加大大超过了需求的增加，所以，白银的价值大大下降。应当注意的是，尽管此前20多年就已发现波托西银矿，但这类美洲银矿的发现似乎直到1570年后才对英格兰的物价产生显著影响。

From 1595 to 1620, both inclusive,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nine bushels of the best wheat at Windsor market, appears from the accounts of Eton College, to have been 2*l.* 1*s.* 6*d.* 9/13. From which sum, neglecting the fraction, and deducting a ninth, or 4*s.* 7*d.* 1/3, the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eight bushels comes out to have been 1*l.* 16*s.* 10*d.* 2/3. And from this sum, neglecting likewise the fraction, and deducting a ninth, or 4*s.* 1*d.* 1/9,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ice of the best wheat and that of the middle wheat, the price of the middle wheat comes out to have been about 1*l.* 12*s.* 8*d.* 8/9, or about six ounces and one-third of an ounce of silver.

据伊顿学院记载，从1595年到1620年（包括这两年在内），温莎市场上每夸特9蒲式耳最好的小麦的平均价格为2镑1先令6又9/13便士。根据这个数额，不计分数，减去剩余数额的1/9，即减去4先令7又1/3便士，那么每夸特8蒲式耳的最好的小麦价格为1镑16先令10又2/3便士。同样根据这个数额，不计分数，再减去余下金额的1/9，即4先令1又1/9便士（这是最好小麦与中等小麦的价格之差），那么中等小麦价格约为1镑12先令8又3/9便士，约合白银6又1/3盎司。

From 1621 to 1636, both inclusive,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same measure of the best wheat at the same market,appears, from the same accounts, to have been 2*l.* 10*s.* ; from which making the like deductions as in the foregoing case,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eight bushels of middle wheat comes out to have been 1*l.* 19*s.* 6*d.* or about seven ounces and two-thirds of an ounce of silver.

根据同一记录，从1621年到1636年，同一市场上同量最好小麦的平均价格约为2镑10先令。根据这个数额，按照上述方法扣除，那么每夸特8蒲式耳的中等小麦的平均价格为1镑19先令6便士，约合白银7又1/3盎司。

THIRD PERIOD

第三阶段

Between 1630 and 1640, or about 1636, the effec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es of America in reducing the value of silver,

appears to have been completed, and the value of that metal seems never to have sunk lower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corn than it was about that time. It seems to have risen somewhat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and it had probably begun to do so even some 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e last.

从1630年到1640年，或到1636年，美洲矿山的发现对白银价值下降的影响似乎已经停止，彼时白银对谷物的价值比例达到最低值，此后白银对谷物的价值比例再也没有降到如此之低。到了本世纪，白银的价值似乎略有上升，不过这个现象或许在上个世纪末的某段时间就已出现。

From 1637 to 1700, both inclusive, being the sixty-four last years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nine bushels of the best wheat at Windsor market, appears, from the same accounts, to have been 2*l.* 11*s.* 0*d.* 1/3; which is only 1*s.* 0*d.* 1/3 dearer than it had been during the sixteen years before. But in the course of these sixty-four years there happened two events which must have produced a much greater scarcity of corn than what the course of the seasons would otherwise have occasioned, and which, therefore, without supposing any further reduction in the value of silver, will much more than account for this very small enhancement of price.

根据上述记录，从1637年到17OO年，即上个世纪的最后64年间，温莎市场上每夸特9蒲式耳最好小麦的平均价格似乎为2镑11先令1/3便士。这个平均价格比16年前的平均价格仅高1先令1/3便士。但在这60年间发生了两个事件，导致当时的谷物短缺严重，已经远远超过收成不好所能造成的短缺程度。无需假设白银价值有任何进一步的

下跌，这两个事件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在这段时间谷物价格会稍稍上涨。

The first of these events was the civil war, which, by discouraging tillage and interrupting commerce, must have raised the price of corn much above what the course of the seasons would otherwise have occasioned. It must have had this effect more or less at all the different markets in the kingdom, but particularly at those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London, which require to be supplied from the greatest distance. In 1648, accordingly, the price of the best wheat at Windsor market, appears, from the same accounts, to have been 4*l.* 5*s.* and in 1649 to have been 4*l.* the quarter of nine bushels. The excess of those two years above 2*l.* 10*s.*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sixteen years preceding 1637) is 3*l.* 5*s.* ; which divided among the sixty-four last years of the last century, will alone very nearly account for that small enhancement of price which seems to have taken place in them. These, however, though the highest, are by no means the only high prices which seem to have been occasioned by the civil wars.

第一个事件是内乱。内乱抑制了耕作，阻碍了商业，因此必然使谷物价格飞涨，远远超过当时谷物收成不好可能造成的高价。内乱必然或多或少地对大不列颠的所有市场都造成影响，尤其是那些只能从偏远地方得到谷物供应的伦敦附近市场。因此，根据上述记录，1648年温莎市场上每夸特9蒲式耳的最好小麦的价格为4镑5先令，1649年为4镑。这两年谷物的价格比2镑10先令（1637年以前16年的平均价格）高3镑5先令。将这个差额分摊到上世纪后64年中，那么足以说明当时谷价为什么稍微上涨。这两年的谷物价格虽然是最高价格，但这绝不是内乱引起的唯一的高价。

The second event was the bounty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granted in 1688. The bounty, it has been thought by many people, by encouraging tillage, may, in a long course of years, have occasioned a greater abundance, and consequently a greater cheapness of corn in the home-market, than w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taken place there. How far the bounty could produce this effect at any time, I shall examine hereafter; I shall only observe at present, thatbetween 1688 and 1700, it had no time to produce any such effect. During this short period its only effect must have been, by encouraging the exportation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every year, and thereby hindering the abundance of one year from compensating the scarcity of another, to raise the price in the home-market. The scarcity which prevailed in England from 1693 to 1699, both inclusive, though no doubt principally owing to the badness of the seasons, and, therefore, extending through a considerable part of Europe, must have been somewhat enhanced by the bounty. In 1699, accordingly, the further exportation of corn was prohibited for nine months.

第二个事件是1688年为谷物出口颁发奖金。许多人认为，由于这种奖金促进耕作，在长期内似乎会增加谷物的产量，从而使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更加低廉。至于奖金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谷物产量，降低谷物价格，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现在我要说的是，在1688年到1700年间，奖金并未对谷物的产量和价格产生这种影响。在这个较短的时期，奖金产生的唯一效果是，因为奖励每年剩余谷物的出口，丰收年谷物的丰富无法补偿歉收年谷物的短缺，因而抬高了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从1693年到1699年间（包括这两年），英格兰普遍出现谷物短缺现象，虽然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年成不好，并因而扩大到欧洲大部分国家，但奖金的颁发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英格兰谷物短缺的程度。所以在1699年，曾有9个月的时间是禁止谷物出口的。

There was a third event which occurred in the course of the same period, and which, though it could not occasion any scarcity of corn, nor, perhaps, any augmentation in the real quantity of silver which was usually paid for it, must necessarily have occasioned some augmentation in the nominal sum. This event was the great debasementof the silver coin, by clipping and wearing. This evil had begun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and had gone on continually increasing till 1695; at which time, as we may learn from Mr. Lowndes, the current silver coin was, at an average, near five-and-twenty per sent below its standard value. But the nominal sum which constitutes the marketprice of every commodity is necessarily regulated, not so much by the quantity of silver, which,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ught to be contained in it, as by that which, it is found by experience, actually is contained in it. This nominal sum, therefore, is necessarily higher when the coin is much debasedby clipping and wearing, than when near to its standard value.

在同一时期还发生了第三个事件，这件事虽然不会造成谷物短缺，也不会增加通常用于支付谷物的实际的白银数量，但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谷物价格的名义数额。这个事件就是由于银币的削剪和磨损而造成的银币价值大大下跌。这种恶劣行为始于查理二世时代，此后不断加剧直到1695年。据朗兹的叙述，1695年通用的白银价值比其标准价值平均约低25%。但是，构成所有商品市场价格的名义金额，与其说受标准银币应该含有的白银数量的支配，不如说受银币实际含有的白银数量的支配。所以，当银币因削减和磨损而大幅贬值时，其名义金额必然比银币接近标准价值时要高。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he silver coin has not at any time been more below its standard weight than it is at present.

But though very much defaced, its value has been kept up by that of the gold coin for which it is exchanged. For though before the late recoinage, the gold coin was a good deal defaced too, it was less so than the silver. In 1695, on the contrary, the value of the silver coin was not kept up by the gold coin; a guinea then commonly exchanging for thirty shillings of the worn and clipt silver. Before the late recoinage of the gold, the price of silver bullion was seldom higher than five shillings and seven pence an ounce, which is but five pence above the mint price. But in 1695, the common price of silver bullion was six shillings and five pence an ounce, which is fifteen pence above the mint price. Even before the late recoinage of the gold, therefore, the coin, gold and silver together, when compared with silver bullion, was not supposed to be more than eight per cent below its standard value. In 1695, on the contrary, it had been supposed to be near five-and-twenty per cent below that value. Bu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hat is, immediately after the great recoinage in King William's tim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urrent silver coin must have been still nearer to its standard weight than it is at present.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oo, there has been no great public calamity, such as the civil war, which could either discourage tillage, or interrupt the interior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And though the bounty which has taken place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this century, must always raise the price of corn somewhat higher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be in the actual state of tillage; yet as, in the course of this century, the bounty has had full time to produce all the good effects commonly imputed to it, to encourage tillage, and thereby to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corn in the home market, it may, upon the principles of a system which I shall explain and examine hereafter, be supposed to have done something to lower the price of that commodity the one way, as well as to raise it the other. It is by many people supposed to have done more. In the sixty-four

firstyears of the present century accordingly,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nine bushels of the best wheat at Windsor market, appears, by the accounts of Eton College, to have been 2*l.* 0*s.* 6*d.* 19/32, which is about ten shillings and sixpence, or more than five-and-twenty per cent, cheaperthan it had been during the sixty-four last years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about nine shillings and six pence cheaper than it had been during the sixteen years preceding 1636, when the discovery of the abundant mines of America may be supposed to have produced its full effect; and about one shilling cheaper than it had been in the twenty-six years preceding 1620, before that discovery can well be supposed to have produced its full effect. According to this account, the average price of middle wheat, during these sixty-four first years of the present century, comes out to have been about thirty-two shillings the quarter of eight bushels.

在本世纪，银币低于其标准重量从未像现在这么严重。不过，虽然银币磨损严重，但其价值却因能够与金币兑换而为黄金价值维持住了。尽管在最近的金币重铸以前，金币也磨损严重，但没有白银磨损得那么厉害。相反，1695年的白银价值没有得到金币的维持，当时的1几尼金币通常可兑换30先令磨损的银币。在最近的金币重铸以前，每盎司银块价格很少超过5先令7便士，这个价格只比造币厂价格高5便士。但1695年，每盎司银块的普通价格却是6先令5便士，超过造币厂价格15便士。所以，即使在最近的金币重铸以前，金银两种铸币和银块比较，低于标准价值的比例不超过8%。相反，据说1695年的铸币低于其标准价值25%。但是，在本世纪初，即在威廉国王进行大重铸之后，大部分通用银币一定比今天的银币更接近其标准重量。在本世纪，并没有出现像内乱那样抑制耕作、阻碍商业的大规模的公共灾难。虽然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实行的奖金制度抬高了谷物价格，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当时的实际耕作情况可能引起的谷物价格，但是在这么长的时期，这种奖金制度有足够的时间产生人们通常期待的所有积极影响，即促进耕作，从而增加国内市场上的谷物数量。根据我

在后面将要探讨的一种学说原理，可以假定，这种奖金制度一方面虽然抬高了谷物价格，但在另一方面也对降低谷物价格发挥了某种作用。许多人还认为奖金降低谷物价格的程度比提高谷物价格的程度要大。所以，根据伊顿学院的记载，在本世纪最初的64年间，温莎市场上每夸特9蒲式耳的最好小麦的平均价格为2镑6又19/32便士。这个价格比上个世纪最后64年间的平均价格约低10先令8便士，即低25%以上，比1636年以前的16年间（那时候美洲富饶银矿的发现可以认为已经充分发挥了影响）的平均价格约低9先令6便士，比1620年以前的26年间（那时候美洲富饶银矿的发现尚未充分发挥影响）的平均价格约低1先令。根据上述记载，在本世纪最初64年中，每夸特8蒲式耳中等小麦的平均价格约为32先令。

The value of silver, therefore, seems to have risen somewhat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corn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and it had probably begun to do so even some 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e last.

由此可知，在本世纪，白银价值相对于谷物价值似乎略有上升，但这种上升的情况可能在上个世纪结束以前的一段时间就已经开始。

In 1687, the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nine bushels of the best wheat at Windsor market was 1*l.* 5*s.* 2*d.* the lowest price at which it had ever been from 1595.

1687年，温莎市场上每夸特9蒲式耳最好小麦的价格为1镑5先令2便士。这个价格是1595年以来的最低价格。

In 1688, Mr. Gregory King, a man famous for his knowledge in matters of this kind, estimated the average price of wheat in years of moderate plenty to be to the grower 3*s.* 6*d.* the bushel, or eight-and-twenty shillings the quarter. The grower's price I understand to be the same with what is sometimes called the contract price, or the price at which a farmer contracts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years to deliver a certain quantity of corn to a dealer. As a contract of this kind saves the farmer the expence and trouble of marketing, the contract price is generally lower than what is supposed to be the average market price. Mr. King had judged eight-and-twenty shillings the quarter to be at that time the ordinary contract price in years of moderate plenty. Before the scarcity occasioned by the late extraordinary course of bad seasons, it was, I have been assured, the ordinary contract price in all common years.

1688年，该领域的知名学者格雷戈里·金推算，在普通丰收的年份，小麦的平均生产者价格是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即每夸特28先令。我所理解的生产者价格有时又称为契约价格，即农民签订契约，规定在一定的年份里供给商人一定数量谷物时所订立的价格。由于这契约使农民节省了营销的费用和麻烦，所以，契约价格通常比一般认为的平均市场价格低。格雷戈里·金认为，在普通丰收年份，当时的普通契约价格为每夸特28先令。据我所知，在最近一次年成特别不好造成谷物短缺情况以前，每夸特28先令确实是所有普通年份的普通契约价格。

In 1688 was granted the parliamentary bounty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The country gentlemen, who then composed a still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e legislature than they do at present, had felt that the money price of corn was falling. The bounty was an expedient to raise it artificially to the high price at which it had

frequently been sold in the times of Charles I. and II. It was to take place, therefore, till wheat was so high as forty-eight shillings the quarter; that is twenty shillings, or 5/7ths dearer than Mr. King had in that very year estimated the grower's price to be in times of moderate plenty. If his calculations deserve any part of the reputation which they have obtained very universally, eight-and-forty shillings the quarter was a price which, without some such expedient as the bounty, could not at that time be expected, except in years of extraordinary scarcity. But the government of King William was not then fully settled. It was in no condition to refuse anything to the country gentlemen, from whom it was at that very time soliciting the first establishment of the annual land-tax.

1688年，议会设置奖金，奖励谷物出口。当时的乡间绅士在立法机构中占据的席数比现在多，他们觉得谷物的货币价格在逐渐下降。奖金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希望能人为地将谷物价格抬高到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时代的高价，所以必须持续发放出口奖金，直到谷物价格涨到每夸特48先令。这个价格，与格雷戈里·金在同年推断的普通年份的生产者价格相比，约高20先令，即约高5/7。如果格雷戈里·金的计算确实配得上人们的普遍赞许，那么，除了极其歉收的年份，只有借助奖金这种人为手段才能将谷物价格抬高到每夸特48先令，除此之外再无他法。但是，当时威廉国王的政府尚未完全巩固，正在恳求乡间绅士制定年土地税，因此无法拒绝乡间绅士的任何要求。

The value of silver, therefore,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corn, had probably risen somewhat before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it seems to have continued to do so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resent; though the necessary operation of the bounty must have hindered that rise from being so sensible as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in the actual state of tillage.

由此可见，在上个世纪结束以前，白银相对于谷物的价值大概就已经略微上升，并且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继续上升，虽然奖金的必然作用使其不能按照当时的实际耕作情形显著上升。

In plentiful years the bounty, by occasioning an extraordinary exportation, necessarily raises the price of corn above what it otherwise would be in those years. To encourage tillage, by keeping up the price of corn even in the most plentiful years, was the avowed end of the institution.

在丰收的年份，奖金由于促进谷物出口，必然会使谷物的价格抬高到那些年应有的水平之上。奖金制度最明显的目的，就是通过提高包括最丰收年份的谷物价格，从而奖励耕作。

In years of great scarcity, indeed, the bounty has generally been suspended. It must, however, have had some effect evenupon the prices of many of those years. By the extraordinary exportation which it occasions in years of plenty, it must frequently hinder the plenty of one year from compensating the scarcity of another.

不过，在谷物严重歉收的年份里，议会通常会停发奖金。但是，即使在许多严重歉收的年份里，谷物价格仍然受到奖金制度的影响。奖金制度，由于鼓励在丰收的年份里将谷物出口，因此也就常常导致丰收的年份里谷物的充足无法弥补歉收的年份里谷物的短缺。

Both in years of plenty and in years of scarcity, therefore, the

bounty raises the price of corn above what it naturally would be in the actual state of tillage. If, during the sixty-four first years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herefore, the average price has been lower than during the sixty-four last years of the last century, it must, in the same state of tillage, have been much more so, had it not been for this operation of the bounty.

总之，无论是在丰收的年份还是在歉收的年份，奖金总是将谷物价格抬高到按照实际耕作情况应有的价格之上。因此，假使本世纪最初64年的谷物平均价格，比上个世纪最后64年的谷物平均价格低，那么，在同一耕作状态下，要是没有奖金的作用，一定还会低得多。

But without the bounty, it may be said, the state of tillage would not have been the same. What may have been the effects of this institution upon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ry, I shall endeavour to explain hereafter, when I come to treat particularly of bounties. I shall only observe at present, that this rise in the value of silver,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corn, has not been peculiar to England. It has been observed to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nd nearly in the same proportion too, by three very faithful, diligent, and laborious collectors of the prices of corn, Mr. Duprè de St. Maur, Mr. Messance, and the author of the Essay on the police of grain. But in France, till 1764, the exportation of grain was by law prohibited; and it is somewhat difficult to suppose, that nearly the same diminution of price which took place in one country, notwithstanding this prohibition, should in another be owing to the extraordinary encouragement given to exportation.

但是，也许有人说，如果没有奖金，耕作状态也许就不同了。关

于奖金制度对于一国农业究竟能有何种影响，我将在后面专门讨论奖金的时候加以说明。现在我只想说，白银价值相对于谷物价值有所提高并不是英格兰特有的现象。三位忠实、勤奋、辛苦的谷价研究者杜普雷·德圣莫尔、麦桑斯和一位有关谷物政策论文的作者注意到，在同一时期的法国，白银价值相对于谷物价值也提高了，且提高的比例和英格兰几乎相同。但法国在1764年以前曾禁止谷物出口。很难想象，一个国家谷物价格的下降是由于禁止谷物出口，而另一个国家谷物价格几乎同等程度的下降却是由于奖励谷物出口。

It would be more proper, perhaps, to consider this variation in the average money price of corn as the effect rather of some gradual rise in the real value of silver in the European market, than of any fall in the real average value of corn. Corn,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is at distant periods of time a more accurate measure of value than either silver, or perhaps any other commodity. When, after the discovery of the abundant mines of America, corn rose to three and four times its former money price, this change was universally ascribed, not to any rise in the real value of corn, but to a fall in the real value of silver. If during the sixty-four first years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herefore, the average money price of corn has fallen somewhat below what it had been dur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ast century, we should in the same manner impute this change, not to any fall in the real value of corn, but to some rise in the real value of silver in the European market.

谷物平均货币价格的这种变动，与其说是谷物真实平均价值下降的结果，也许倒不如说是欧洲市场上白银的真实价值逐渐上升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谷物都将是比白银或任何其他商品更加准确的价值尺度。美洲富饶矿山被相继发现后，谷物的货币价格增加至以前的3-4倍。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变动的

原因是白银的真实价格下降，而不是谷物真实价值上升。所以，本世纪头64年间的谷物平均价格比上个世纪大部分年份的谷物平均价格略低，我们应该同样将这种变动归因于白银的真实价值上升，而不是谷物的真实价值下降。

The high price of corn during these ten or twelve years past, indeed, has occasioned a suspicionthat the real value of silver still continues to fall in the European market. This high price of corn, however, seems evidently to have been the effect of the extraordinary unfavourableness of the seasons, and ought therefore to be regarded, not as a permanent, but as a transitory and occasional event. The seasons for these ten or twelve years past have been unfavourable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and the disorders of Poland have very much increased the scarcity in all those countries, which, in dear years, used to be supplied from that market. So long a course of bad seasons, though not a very common event, is by no means a singular one; and whoever has enquired much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prices of corn in former times, will be at no loss to recollect several other examples of the same kind. Ten years of extraordinary scarcity, besides, are not more wonderful than ten years of extraordinary plenty. The low price of corn from 1741 to 1750, both inclusive, may very well be set in opposition to its high price during these last eight or ten years. From 1741 to 1750,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nine bushels of the best wheat at Windsor market, it appears from the accounts of Eton College, was only 1*l.* 13*s.* 9*d.* 4/5, which is nearly 6*s.* 3*d.* below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sixty-four first years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eight bushels of middle wheat, comes out, according to this account, to have been, during these ten years, only 1*l.* 6*s.* 8*d* .

过去10年乃至12年间高昂的谷价确实曾使人怀疑，即欧洲市场上白银的真实价值是否还会继续下降。但这种高昂的谷价明显是年成不好的结果，因此只能看作暂时的偶然事件，而不是永久事件。在最近10年乃至12年间，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年成都不好，这些国家本来在谷价高昂的年份还可以从波兰得到谷物供应，但在这段时期，波兰国内的动乱无疑使这些国家的谷物短缺情况更加严重。如此长期的年成不好虽然并不常见，但也绝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件。曾任何对谷物价格的历史做过深入研究的人都不难举出其他类似的例子。此外，异常歉收的10年并不比异常丰收的十年更罕见。1741年到1750年（包括这两年在内）低廉的谷价与最近八年乃至10年间高昂的谷价形成鲜明的对比。据伊顾学院记载，1741年到1750年间，温莎市场上每夸特9蒲式耳的最好小麦的平均价格仅为1镑13先令9又4/5便士，这比本世纪头64年间的平均价格约低6先令3便士。由此可以推断，在这10年间，每夸特8蒲式耳中等小麦的平均价格仅为1镑6先令8便士。

Between 1741 and 1750, however, the bounty must have hindered the price of corn from falling so low in the home market as it naturally would have done. During these ten years the quantity of all sorts of grain exported, it appears from the custom-house books, amounted to no less than eight millions twenty-nine thousand one hundred and fifty-six quarters one bushel. The bounty paid for this amounted to 1,514,962*l.* 17*s.* 4*d.* ½. In 1749 accordingly, Mr. Pelham, at that time Prime Minister, observed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that for the three yearspreceding, a very extraordinary sum had been paid as bounty for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He had good reason to make this observation, and in the following year he might have had still better. In that single year the bounty paid amounted to no less than 324,176*l.* 10*s.* 6*d.* It is unnecessary to observe how much this forced exportation must have raised the price of corn above what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in the home market.

但是，在1741年与1750年间，议会对谷物出口给予奖金鼓励，这一定阻碍了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下降到自然应有的较低水平。据海关统计，这10年间各种谷物的出口数量竟不少于8,029,156夸特一蒲式耳，为此支付的奖金达1,514,962镑17先令4.5便士。因此在1749年，时任首相佩勒姆对下议院说道，过去3年间，政府支付了巨大金额作为谷物出口奖金。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说，下一年他更有理由这样说，因为仅下一年，政府支付的奖金数额就不少于324,176镑16先令6便士。至于这种强制性的出口能在多大程度上使国内市场上的谷价超过没有奖金时应有的价格，已经无需多言。

At the end of the accounts annexed to this chapter the reader will find the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ose ten years separated from the rest. He will find there, too, the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preceding ten years, of which the average is likewise below, though not so much below, the general average of the sixty-four first years of the century. The year 1740, however, was a year of extraordinary scarcity. These twenty years preceding 1750, may very well be set in opposition to the twenty preceding 1770. As the former were a good deal below the general average of the century, notwithstanding the intervention of one or two dear years; so the latter have been a good deal above it, notwithstanding the intervention of one or two cheap ones, of 1759, for example. If the former have not been as much below the general average, as the latter have been above it, we ought probably to impute it to the bounty. The change has evidently been too sudden to be ascribed to any change in the value of silver, which is always slow and gradual. The suddenness of the effect can be accounted for only by a cause which can operate suddenly, the accidental variation of the seasons.

在本章附录的统计表的末尾，读者可以看到单独列出的这10年的统计。此外，还可以看到这10年的单独统计。这前10年的谷物平均价格虽然同样低于本世纪头64年的总平均值，但低得不多。但1740年是异常歉收的年份。1750年以前的20年间的谷物价格和1770年以前的20年间的谷物价格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1750年以前的20年间，虽然也曾出现一两年谷价高昂的情况，但这段期间谷物的平均价格显然比本世纪的总平均值低得多，在1770年以前的20年间，虽然也曾出现一两年谷价低廉的情况（例如1759年），但这段期间谷物的平均价格显然比总平均值高得多。如果在1750年以前的20年间谷物的平均价格低于总平均值的程度，不如在1770年以前的20年间谷物的平均价格超过总平均值的程度，我们也许应将其归因于奖金制度。谷价的变动显然太突然，我们无法将其归因于缓慢、渐进的白银价值的变动。这个结果如此突然，只能用一种能够突然起作用的原因来解释，那就是年成的偶然变化。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in Great Britain has, indeed, risen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his, however, seems to be the effect, not so much of any diminution in the value of silver in the European market, as of an increase in the demand for labour in Great Britain, arising from the great, and almost universal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In France, a country not altogether so prosperous,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has,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been observed to sink gradually with the average money price of corn. Both in the last century and in the present, the day-wages of common labour are there said to have been pretty uniformly about the twentieth part of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septier of wheat, a measure which contains a little more than four Winchester bushels. In Great Britain the real recompence of labour, it has already been shown, the real quantities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which are given to the labourer, has increased considerably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he rise in its

money price seems to have been the effect, not of any diminution of the value of silver in the general market of Europe, but of a rise in the real price of labour in the particular market of Great Britain, owing to the peculiarly happy circumstances of the country.

在本世纪，大不列颠的劳动货币价格确实上升了。但劳动货币价格的上升不是欧洲市场上白银的价值降低的结果，而是大不列颠因普遍的繁荣而对劳动的需求增加的结果。法国无论在何时都不曾达到如此繁荣，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该国劳动的货币价格随着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逐渐下降。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据说法国普通劳动的日工资几乎始终等于一塞蒂埃（约为4温切斯特蒲式耳）小麦的平均价格的1/20。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本世纪，大不列颠劳动的实际报酬，即给予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实际数量已大幅增长。大不列颠劳动货币价格的上涨，似乎不是由于欧洲市场上白银价值的总体跌落，而是由于大不列颠国内特有的良好的发展环境，使得该国市场上劳动的真实价格上涨。

For some time after the first discovery of America, silver would continue to sell at its former, or not much below its former price. The profits of mining would for some time be very great, and much above their natural rate. Those who imported that metal into Europe, however, would soon find that the whole annual importation could not be disposed of at this high price. Silver would gradually exchange for a smaller and a smaller quantity of goods. Its price would sink gradually lower and lower till it fell to its natural price; or to what was just sufficient to pay,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al rates, the wages of the labour, the profits of the stock, and the rent of the land, which must be paid in order to bring it from the mine to the market.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ilver mines of Peru, the tax of the King of Spain, amounting to a tenthof the

gross produce, eats up,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the whole rent of the land. This tax was originally a half; it soon afterwards fell to a third, then to a fifth, and at last to a tenth, at which rate it still continues.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ilver mines of Peru, this, it seems, is all that remains, after replacing the stock of the undertaker of the work, together with its ordinary profits; and it seems to be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se profits, which were once very high, are now as low as they can well be, consistently with carrying on the works.

在发现美洲后的一段时期，欧洲市场上的白银仍然以原价或不比原价低太多的价格售卖。因此在这段时间内，采矿业的利润非常可观，远远超过自然利润率。但此后不久，将白银进口到欧洲售卖的商人渐渐发现，他们全年的进口量不能全部以上述的高价售出。白银能够交换的货物数量逐渐减少。白银的价格逐渐下降，直至自然水平，换句话说，白银的价格下降到仅够支付按照自然率计算的、白银上市前必须支付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润以及土地地租。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西班牙国王向秘鲁大部分银矿征收的赋税——约占银矿总产量的1/10——吞噬了全部的土地地租。该赋税最初为银矿总产量的一半，不久降低至总产量的1/3，接着又降低至总产量的1/5，最后降到总产量的1/10，此后这个税率一直持续到现在。在秘鲁的大部分银矿中，这占总产量1/10的赋税似乎就是银矿开采者的资本得到补偿、普通利润得到支付后剩下的全部金额了。人们似乎普遍承认，银矿开采者的利润曾经一度非常高，但现在却下降到仅能维持他继续开采的水平了。

The tax of the King of Spain was reduced to a fifth part of the registered silver in 1504, one-and-forty years before 1545, the date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es of Potosi. In the course of ninety years, or before 1636, these mines, the most fertile in all America,

had time sufficient to produce their full effect, or to reduce the value of silver in the European market as low as it could well fall, while it continued to pay this tax to the King of Spain. Ninety yearsis time sufficient to reduce any commodity, of which there is no monopoly, to its natural price, or to the lowest price at which, while it pays a particular tax, it can continue to be sold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together.

在1504年，即1545年波托西银矿发现之前41年，西班牙国王对于秘鲁银矿征收的赋税降低至登记白银的1/5。在九十年中，即在1636年以前，这些对西班牙国王纳税的美洲最富饶的矿山，有足够的时间充分发挥影响，使欧洲市场上的白银价值降低到无法再低的程度。90年的时间足够使任何没有垄断的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水平，或者说降低到缴纳某种赋税后仍然能够长期销售的最低价格。

The price of silver in the European market might perhaps have fallen still lower, and it might have become necessary either to reduce the tax upon it, not only to one tenth, as in 1736, but to one twentieth,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at upon gold, or to give up work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American mines which are now wrought.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the demand for silver, or the gradual enlargement of the market for the produce of the silver mines of America, is probably the cause which has prevented this from happening, and which has not only kept up the value of silver in the European market, but has perhaps even raised it somewhat higher than it was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欧洲市场上的白银价格也许本可以降得更低，税率也许不仅要像1736年那样减少至1/10，而且要像金税一样减少至1/20，或者说现

在仍在开采的美洲大部分矿山或许不得不关闭。这些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对于白银的需求正在逐渐增加，即美洲银矿产品的市场正在逐渐扩大，这不仅使欧洲市场上的白银价值得以维持，而且还把白银价值抬高到稍稍超过上个世纪中期的水平。

Since the first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market for the produce of its silver mines has been growing gradually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自从美洲被发现以来，美洲银矿产品的市场一直在不断扩大。

First, the market of Europe has become gradually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Since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has been much improved. England, Holland, France, and Germany; even Sweden, Denmark, and Russia, have all advanced considerably both in agriculture and in manufactures. Italy seems not to have gone backwards. The fall of Italy preceded the conquest of Peru. Since that time it seems rather to have recovered a little. Spain and Portugal, indeed, are supposed to have gone backwards. Portugal, however, is but a very small part of Europe, and the declension of Spain is not, perhaps, so great as is commonly imagin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Spain was a very poor country, even in comparison with France, which has been so much improved since that time. It was the well-known remark of the Emperor Charles V. who had travelled so frequently through both countries, thateverything abounded in France, but that everything was wanting in Spain. The increasing produce of the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of Europe must necessarily have required a gradual increase in the quantity of silver coin to circulate

it;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wealthy individuals must have required the like increase in the quantity of their plate and other ornaments of silver.

第一，欧洲市场已逐渐扩大。自从美洲被发现以来，欧洲大部分已有很大改良。英格兰、荷兰、法国、德国，甚至是瑞典、丹麦和俄罗斯，都在农业和制造业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意大利似乎也没有退步。意大利的衰落似乎是在征服秘鲁之前，自征服秘鲁后便渐有起色。人们确实都认为西班牙和葡萄牙退步了。但是葡萄牙只占欧洲的极小部分，而西班牙的衰落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在16世纪初期，西班牙即使和法国相比，也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法国自那时起已有很大改良。所以，常常在这两国游历的法国国王查理五世曾有这样一句名言：法国所有东西都丰富，西班牙所有东西都短缺。欧洲农业和制造业的产品数量增加，其流通需要的白银数量必然逐渐增加。富人的数量增加，银制器皿和白银饰品的数量也必然逐渐增加。

Secondly, America is itself a new market for the produce of its own silver mines; and as its advances in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population, are much more rapid than those of the most thriving countries in Europe, its demand must increase much more rapidly. The English colonies are altogether a new market, which partly for coin and partly for plate, requires a continually augmenting supply of silver through a great continent where there never was any demand before. The greater part, too, of the Spanish and Portuguese colonies are altogether new markets. New Granada, the Yucatan, Paraguay, and the Brazils were, before discovered by the Europeans, inhabited by savage nations, who had neither arts nor agriculture.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both has now been introduced into all of them. Even Mexico and Peru, though they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altogether new markets, are certainly much more

extensive ones than they ever were before. After all the wonderful tales which have been published concerning the splendid state of those countries in ancient times, whoever reads, with any degree of sober judgment, the history of their first discovery and conquest, will evidently discern that, in arts,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their inhabitants were much more ignorant than the Tartars of the Ukraine are at present. Even the Peruvians, the more civilised nation of the two, though they made use of gold and silver as ornaments, had no coined money of any kind. Their whole commerce was carried on by barter, and there was accordingly scarce any division of labour among them. Those who cultivated the ground were obliged to build their own houses, to make their own household furniture, their own clothes, shoes, and instruments of agriculture. The few artificers among them are said to have been all maintained by the sovereign, the nobles, and the priests, and were probably their servants or slaves. All the ancient arts of Mexico and Peru have never furnished one single manufacture to Europe. The Spanish armies, though they scarce ever exceeded five hundred men, and frequently did not amount to half that number, found almost everywhere great difficulty in procuring subsistence. The famines which they are said to have occasioned almost wherever they went, in countries too which at the same time are represented as very populous and wellcultivated,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 that the story of this populousness and high cultivation is in a great measure fabulous. The Spanish colonies are under a government in many respects less favourable to agriculture, improvement and population, than that of the English colonies. They seem, however, to be advancing in all these much more rapidly than any country in Europe. In a fertile soil and happy climate, the great abundance and cheapness of land, a circumstance common to all new colonies, is, it seems, so great an advantage as to compensate many defects in civil government. Frezier, who visited Peru in 1713, represents Lima as

containing between twenty-five and twenty-eight thousand inhabitants. Ulloa, who resided in the same country between 1740 and 1746, represents it as containing more than fifty thousand.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accounts of the populousness of several other principal towns in Chili and Peru is nearly the same; and as there seems to be no reason to doubt of the good information of either, it marks an increase which is scarce inferior to that of the English colonies. America, therefore, is a new market for the produce of its own silver mines, of which the demand must increase much more rapidly than that of the most thriving country in Europe.

第二，美洲本身就是美洲银矿产品的新市场。美洲在农业、工业以及人口的进步比欧洲最繁荣的国家都快得多，因此美洲对白银的需求增加得也一定快得多。英属各殖民地全部为银矿产品提供了新的市场。这些殖民地以前对白银没有任何需求，现在对于白银的需求却逐渐上升，这些白银一部分用来铸币，一部分用来制造器皿。大部分西班牙属殖民地和葡萄牙属殖民地也全部为银矿产品提供了新的市场。新格拉纳达地区、墨西哥尤卡坦省、巴拉圭、巴西等地在未被欧洲人发现以前，住着的都是野蛮民族，既不知工艺也不懂农业。但是现在，大部分工艺和农业都已被引入这些地区。甚至是墨西哥和秘鲁，虽然不能全部视为新市场，但确实是比以前大得多的市场。虽然关于这两国辉煌历史的宏伟叙述不胜枚举，但是只要头脑稍微清醒的人，在阅读了这两国被发现和被征服的那段历史后就会看出，这两国居民当时在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比今天乌克兰的鞑靼地方的人民更无知。即使是两个国家中比较进步的秘鲁人也只知道用金银作装饰品，不知道把金银铸成货币。在那段时期，两国的商业完全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所以几乎没有劳动分工。耕地的人不得不自己建造房屋，制造家具、衣服、鞋子以及农具等。他们中仅有的几位工匠据说都是君主、贵族和僧侣供养的，实际上恐怕就是这些人的仆役或奴隶。据说墨西哥和秘鲁所有的古代工艺从未向欧洲市场提供过任何制造品。西班牙的军队不超过500人，甚至常常不到250人，但却几乎总是觉

得难以获得食物。据说这些军人无论走到何处，几乎都能遇到饥荒，即使途经那些被描述为人口极度稠密、耕作极度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这个事实足以证明，记述这些国家人口稠密、耕作发达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构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政府在许多方面不像英格兰对殖民地的政府那样有利于农业发展、技术改良和人口的增长，但西班牙殖民地在这些方面却比欧洲任何国家都进步得快，原因是西班牙殖民地土壤肥沃、气候宜人，土地广阔并且低廉。这是所有新殖民地共同的优点，足以补偿政府的许多缺点。弗雷齐埃曾于1713年参观秘鲁，他说，利马市人口约为2.5万人到2.8万人。但在1740年到1746年间，居住此地的乌略亚却说，利马市人口超过了5万。两位学者对于智利和秘鲁其他许多主要城市的人口也进行了计算，两人计算结果的差异也和上述几乎相同。由于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两人信息的准确性，因此从这些计算结果的差异可以看出，这些国家人口的增长并不逊于英属殖民地。总之，这些都表明美洲本身便是其银矿产品的新市场。美洲对于白银的需求的增加，一定比欧洲最繁荣的国家还要快得多。

Thirdly, the East Indies is another market for the produce of the silver mines of America, and a market which, from the time of the first discovery of those mines, has been continually taking off a greater and a greater quantity of silver. Since that time, the direct trade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East Indies, which is carried on by means of the Acapulco ships, has been continually augmenting, and the indirect intercourse by the way of Europe has been augmenting in a still greater proportion.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Portuguese were the only European nation who carried on any regular trade to the East Indies. In the last years of that century the Dutch began to encroach upon this monopoly, and in a few years expelled them from their principal settlements in India. Dur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ast century those two nations divided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East India trade between them; the trade of the Dutch continually augmenting in a still greater proportion than

that of the Portuguese declined. The English and French carried on some trade with India in the last century, but it has been greatly augmented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The East India trade of the Swedes and Danes began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Even the Muscovites now trade regularly with China by a sort of caravans which go overland through Siberia and Tartary to Pekin. The East India trade of all these nations, if we except that of the French, which the last war had well nigh annihilated, has been almost continually augmenting. The increasing consumption of East India goods in Europe is, it seems, so great, as to afford a gradual increase of employment to them all. Tea, for example, was a drug very little used in Europe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At present the value of the tea annually imported by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for the use of their own countrymen, amounts to more than a million and a half a year; and even this is not enough; a great deal more being constantly smuggled into the country from the ports of Holland, from Gothenburg, in Sweden, and from the coast of France too, as long as the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 was in prosperity. The consumption of the porcelain of China, of the spiceries of the Moluccas, of the piece goods of Bengal, and of innumerable other articles, has increased very nearly in a like proportion. The tonnage accordingly of all the European shipping employed in the East India trade, at any one time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was not, perhap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before the late reduction of their shipping.

第三，东印度是美洲银矿产品的另一个市场。自美洲矿山被发现以来，这个市场吸收的白银数量逐渐增加。从那时起，美洲和东印度之间通过阿卡普尔科船舶进行的直接贸易持续增长，经由欧洲进行的间接贸易增加得尤其多。16世纪，欧洲民族中只有葡萄牙人与东印度进行正规贸易。但到了16世纪末，荷兰人开始打破这种垄断，在短短

几年间就把葡萄牙人从他们在印度的主要居留地赶走。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印度的大部分贸易都被这两个国家垄断，葡萄牙人的贸易份额逐渐减少，荷兰人的贸易份额却不断增长，且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葡萄牙的贸易份额下降的速度。英格兰人和法国人在上个世纪开始与印度进行贸易，到了本世纪，两国与印度的贸易大幅增长。瑞典人和丹麦人的东印度贸易开始于本世纪。俄罗斯人最近也组织所谓的商队，途经西伯利亚和鞑靼地方，到达北京与中国进行常规贸易。总之，除了法国的东印度贸易因最近一次战争而被毁灭外，其余的这些国家的东印度贸易几乎都在持续增长。欧洲消费的东印度商品数量似乎增长得非常快，使得这些商品的应用范围也逐渐扩大。例如，在16世纪中期以前，茶在欧洲仅被看作一种药物，很少使用。然而现在，英属东印度公司每年进口供本国国民饮用的茶总计达150万磅，但这还不能满足需要，还得从荷兰各港和瑞典的戈滕堡不断秘密进口茶叶。在法属东印度公司的繁荣时代，茶叶也常常经由法国海岸秘密进口到英国。此外，英国对于中国的瓷器，马鲁古群岛的香料，孟加拉国的布匹，以及其他无数商品的消费数量也几乎以同样的比例增加。虽然英属东印度公司最近削减了其用于东印度贸易的船舶数量，但在此之前，在上个世纪的任何时候，该公司用于东印度贸易的船舶数量（以吨计）恐怕并不比整个欧洲用于东印度公司的船舶数量少多少。

But in the East Indies, particularly in China and Indostan, the valu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when the Europeans first began to trade to those countries, was much higher than in Europe; and it still continues to be so. In rice countries, which generally yield two, sometimes three crops in the year, each of them more plentiful than any common crop of corn, the abundance of food must be much greater than in any corn country of equal extent. Such countries are accordingly much more populous. In them too the rich, having a greater super abundance of food to dispose of beyond what they themselves can consume, have the means of purchasing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the labour of other people. The retinue of a grandee in China or Indostan accordingly is, by all accounts, much more numerous and splendid than that of the richest subjects in Europe. The same super abundance of food, of which they have the disposal, enables them to give a greater quantity of it for all those singular and rare productions which nature furnishes but in very small quantities; such as the precious metals and the precious stones, the great objects of the competition of the rich. Though the mines, therefore, which supplied the Indian market had been as abundant as those which supplied the European, such commodities would naturally exchange for a greater quantity of food in India than in Europe. But the mines which supplied the Indian market with the precious metals seem to have been a good deal less abundant, and those which supplied it with the precious stones a good deal more so, than the mines which supplied the European. The precious metals, therefore, would naturally exchange in India for somewhat a greater quantity of the precious stones, and for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foodthan in Europe. The money price of diamonds, the greatest of all superfluities, would be somewhat lower, and that of food, the first of all necessaries, a great deal lower in the one country than in the other. But the real price of labour, the real quantity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which is given to the labourer,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is lower both in China and Indostan, the two great markets of India, than it is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The wages of the labourer will there purchase a smaller quantity of food; and as the money price of food is much lower in India than in Europe,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is there lower upon a double account; upon account both of the small quantity of food which it will purchase, and of the low price of that food. But in countries of equal art and industry, the money pric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manufactures will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and in manufacturing art and industry, China and

Indostan, though inferior, seem not to be much inferior to any part of Europe. The money pric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manufactures, therefore, will naturally be much lower in those great empires than it is anywhere in Europe.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too the expence of land-carriage increases very much both the real and nominal price of most manufactures. It costs more labour, and therefore more money, to bring first the materials, and afterwards the complete manufacture to market. In China and Indostan the extent and variety of inland navigations save the greater part of this labour, and consequently of this money, and thereby reduce still lower both the real and the nominal pric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manufactures. Upon all these accounts, the precious metals are a commodity which it always has been, and still continues to be, extremely advantageous to carry from Europe to India. There is scarce any commodity which brings a better price there; or which,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f labour and commodities which it costs in Europe, will purchase or command a greater quantity of labour and commodities in India. It is more advantageous too to carry silver thither than gold; because in China,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other markets of India, the proportion between fine silver and fine gold is but as ten, or at most as twelve, to one; whereas in Europe it is as fourteen or fifteen to one. In China,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other markets of India, ten, or at most twelve, ounces of silver will purchase an ounce of gold; in Europe it requires from fourteen to fifteen ounces. In the cargoes, therefor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an ships which sail to India, silver has generally been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articles. It is the most valuable article in the Acapulco ships which sail to Manilla. The silver of the new continent seems in this manner to be one of the principal commoditiesby which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two extremities of the old one is carried on, and it is by means of it, in a great measure, that those distant parts of the world are connected with

one another.

但当欧洲国家首次和东印度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斯坦开展贸易时，东印度国家的贵金属价值比欧洲高得多，现在也是如此。东印度国家多为产米国，那里的稻田每年能收获两次甚至三次，每次的收获量都比谷物的一般收成多，所以产米国的食物比任何同等面积的产麦国都要丰富，产米国的人口因此也多得多。此外，这些国家的富人拥有的食物数量，在满足了富人自己的消费所需后，还有大量的剩余可供售卖，因而可以购买更多的他人劳动。因此，无论根据何种记载，中国和印度斯坦的达官贵人们拥有的随从数量都比欧洲最富有的人要多得多。同时，也正因为达官贵人们拥有大量的剩余食物，他们才有能力支付较大数量的食物，来换取那些产量极少的珍稀产物，比如富人们竞相追求的贵金属和宝石。所以，即使供应印度市场的银矿和供应欧洲市场的银矿同样富饶，银矿产品在印度换得的食物一定更多。但是，向印度市场供应贵金属的矿山似乎远不如向欧洲市场供应贵金属的矿山那么富饶，而向印度市场供应宝石的矿山却比向欧洲市场供应宝石的矿山要富饶得多，因此，贵金属在印度自然比在欧洲能换得略多的宝石，并且比在欧洲能换得多得多的食物。在印度，像钻石这样最受欢迎的非必需品的货币价格比在欧洲略低，而像粮食这样最重要的必需品的货币价格则比欧洲低得多。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劳动的真实价格，即劳动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数量，在印度的两个大市场中国和印度斯坦，比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都要低，因此，印度劳动者的工资只能购买较少量的食物，加上印度食物的货币价格又比欧洲低得多，因此印度劳动的货币价格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就加倍低廉：一方面劳动者的工资只能购买少量的食物，另一方面食物的价格又十分便宜。但在工艺和勤劳程度相同的国家，大部分制造品的货币价格都与其劳动的货币价格成比例。在制造工艺和工人的勤劳方面，虽然中国和印度斯坦不及欧洲各国，但差距似乎也不是很大。这两个国家的劳动的货币价格是那么低廉，因此它们大部分制造品的货币价格自然也大大低于欧洲各国。此外，欧洲大部分国家依靠陆运方式运送货物。先把原料由产地运往工厂，再将工厂加工完成的

制造品运往市场，这期间须消耗大量的劳动，因此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从而增加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相反，在中国和印度斯坦，由于内地河港纵横，货物常常通过水运方式运输，节省了大量劳动，运费也比欧洲的陆运运输要低，因此这两地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和欧洲相比就降得更低。综上所述，将贵金属从欧洲运往印度，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一件非常有利可图的事情。在印度，再也没有比贵金属卖价更高的商品了，或者说，在欧洲花费同等数量的劳动生产的，或者说花费同等数量的商品交换得来的所有商品中，贵金属比其他任何商品在印度购买到或支配到的劳动和商品都要多。把白银运往印度比把黄金运往印度更加有利可图，因为在中国和印度其他大部分市场，纯银与纯金的比率通常为10：1，至多也不会超过12：1。在欧洲，这一比例则为14：1或15：1。在中国和印度其他大部分市场，虽然10盎司或至多12盎司的白银便可购买黄金1盎司，但在欧洲，却需要14盎司甚至15盎司的白银才能购买黄金1盎司。因此，对于开往印度的所有欧洲船舶来说，白银通常是最有价值的运输品。对于开往马尼拉的阿卡普尔科船舶来说，白银也是最有价值的运输品。新大陆的白银实际就是以这种方式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正是通过白银买卖，世界各地相隔遥远的地方才得以联系起来。

In order to supply so very widely extended a market, the quantity of silver annually brought from the mines must not only be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at continual increase both of coin and of plate which is required in all thriving countries; but to repair that continual waste and consumption of silver which takes place in all countries where that metal is used.

为了供给如此广大的市场，每年从各矿山开采出来的白银数量，不但要足够供应所有繁荣国家对铸币和器皿不断增长的需求，还必须足够弥补所有使用白银的国家对白银器皿的浪费和磨损。

The continual consumpt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n coin by wearing, and in plate both by wearing and cleaning, is very sensible; and in commodities of which the use is so very widely extended, would alone require a very great annual supply. The consumption of those metals in some particular manufactures, though it may not perhaps be greater upon the whole than this gradual consumption, is, however, much more sensible, as it is much more rapid. In the manufactures of Birmingham alone,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annually employed in gilding and plating, and thereby disqualified from ever afterwards appearing in the shape of those metals, is said to amount to more than fifty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We may from thence form some notion how great must be the annual consumption in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either in manufactures of the same kind with those of Birmingham, or in laces, embroideries, gold and silver stuffs, the gilding of books, furniture, etc. A considerable quantity, too, must be annually lost in transporting those metal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both by sea and by land.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of Asia, besides, the almost universal custom of concealing treasures in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of which the knowledge frequently dies with the person who makes the concealment, must occasion the loss of a still greater quantity.

由于铸币的磨损，以及器皿的磨损和清洗，贵金属消耗极大。仅就那些由贵金属制成的、被广泛使用的商品来说，贵金属的消耗就是极大的，每年都需要极大数量的供给才能满足。某些制造品消耗的贵金属总量，虽然不如上述过程逐渐消耗的贵金属数量多，但由于消耗的速度更快，因而更加明显。单就伯明翰的某些制造品来说，每年镀金和包金所使用的金银数量据说就已达到英币5万镑，而这5万镑金银，一旦用来镀金银或包金银，就再也不可能恢复原状。我们从这里

或许可以多少了解到，世界各地在与伯明翰这些制造品相类似的制造品上，或在镶边、彩饰、金银器及图书和家具的烫金等方面，每年消费的金银数量是多么巨大。而且每年将金银从一个地方运往另一个地方，在海陆途中失去的分量也一定不在少数。此外，亚洲各国几乎都有在地下埋藏宝物的习俗，埋藏者一旦去世，埋藏地点常常无人知晓。这种习俗也一定会增加金银损失的数量。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imported at both Cadiz and Lisbon (including not only what comes under register, but what may be supposed to be smuggled) amounts, according to the best accounts, to about six millions sterling a year.

根据极可靠的记载，在加的斯及里斯本进口的金银数量（包括官方登记的和人们怀疑走私的数量），每年约值600万镑。

According to Mr. Meggensthe annual importat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nto Spain, at an average of six years, viz. from 1748 to 1753, both inclusive; and into Portugal, at an average of seven years, viz. from 1747 to 1753, both inclusive, amounted in silver to 1,101,107 pounds weight; and in gold to 49,940 pounds weight. The silver, at sixty-two shillings the pound Troy, amounts to 3,413,431*l.* 10*s* . sterling. The gold, at forty-four guineas and a half the pound Troy, amounts to 2,333,446*l.* 14*s.* sterling. Both together amount to 5,746,878*l.* 4*s.* sterling. The account of what was imported under register, he assures us is exact. He gives us the detail of the particular places from which the gold and silver were brought, and of the particular quantity of each metal, which, according to the register, each of them afforded. He makes an allowance, too, for the quantity of each metal which he supposes

may have been smuggled. The great experience of this judicious merchant renders his opinion of considerable weight.

据麦根斯说，西班牙在1748年到1753年（包括这两年在内）这6年间平均每年进口的贵金属数量，以及葡萄牙在1747年到1753年（包括这两年在内）这7年间平均每年进口的白银数量为1,101,107磅，黄金的数量为49,940磅。白银按金衡磅值62先令，总计值3,413,431镑10先令。黄金按金衡磅值44.5几尼，总计值2,333,446镑14先令。金银总共价值5,746,878镑4先令。麦根斯认为这些关于金银的进口的数字登记无误。他根据登记簿详细叙述了黄金和白银从何处进口，以及这些地方各自出口的金银数量。他还估计了他认为可能走私的金银数量。这位头脑精明的商人拥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他的意见很有分量。

According to the eloquent and, sometimes, well-informed author of the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opeans in the two Indies* , the annual importation of registered gold and silver into Spain, at an average of eleven years; viz. from 1754 to 1764, both inclusive, amounted to 13,984,185¾ piastres of ten reals. On account of what may have been smuggled, however, the whole annual importation, he supposes, may have amounted to seventeen millions of piastres; which, at 4*s.* 6*d.* the piastre, is equal to 3,825,000*l.* sterling. He gives the detail, too, of the particular places from which the gold and silver were brought, and of the particular quantities of each metal which, according to the register, each of them afforded. He informs us, too, that if we were to judge of the quantity of gold annually imported from the Brazils into Lisbon by the amount of the tax paid to the King of Portugal, which it seems is one-fifth of the standard metal, we might value it at eighteen millions of cruzadoes, or forty-five millions of French

livres, equal to about two millions sterling. On account of what may have been smuggled, however, we may safely, he says, add to this sum an eighth more, or 250,000*l.* sterling, so that the whole will amount to 2,250,000*l.* sterling. According to this account, therefore, the whole annual importat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nto both Spain and Portugal, amounts to about 6,075,000*l.* sterling.

《欧洲人在东西印度创业的哲学史和政治史》一书的作者以能言善辩和见多识广而闻名。根据他的说法，从1754年到1764年（包括这两年在内），西班牙每年登记进口的金银数量，总计达13,984,185又3/5皮阿斯特（一皮阿斯特等于十里亚尔白银）。如果加上走私的金银数量，每年进口的金银总量恐怕不少于1,700万皮阿斯特。按1皮阿斯特值4先令6便士计算，每年进口的金银总量等于英币3,825,000镑。这位作者还详细列举了这些金银从何处进口，以及根据登记各地出口的金银数量。据他报告，每年由巴西出口到里斯本的黄金数量，如果按照向葡萄牙国王缴纳的税额判断（税率似乎是标准金属的1/5），总共价值约为葡币1,800万克鲁查多，即法币4,500万里弗赫，约合英币200万镑。不过，考虑到走私的那部分金银，他说，我们可以更保险一点，在这个登记进口的数额上再加上1/8，即加上25万镑，这样总价值便为225万镑。根据这种计算，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每年进口的贵金属总额达到6,075,000镑。

Several other very well authenticated, though manuscript, accounts, I have been assured, agree, in making this whole annual importation amount at an average to about six millions sterling, sometimes a little more, sometimes a little less.

此外，我还曾查阅许多其他权威的记载，尽管只是手稿，这些记载都估计每年进口总额约为600万镑左右，有时多些，有时少些。

The annual importat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nto Cadiz and Lisbon, indeed, is not equal to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of the mines of America. Some part is sent annually by the Acapulco ships to Manilla; some part is employed in the contraband trade which the Spanish colonies carry on with those of other European nations; and some part, no doubt, remains in the country. The mines of America, besides, are by no means the only gold and silver mines in the world. They are, however, by far the most abundant. The produce of all the other mines which are known, is insignificant, it is acknowledg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irs; and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ir produce, it is likewise acknowledged, is annually imported into Cadiz and Lisbon. But the consumption of Birmingham alone, at the rate of fifty thousand pounds a year, is equal to the hundred-and-twentieth part of this annual importation at the rate of six millions a year. The whole annual consumption of gold and silver, therefore, in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where those metals are used, may perhaps be nearly equal to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The remainder may be no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supply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all thriving countries. It may even have fallen so far short of this demand as somewhat to raise the price of those metals in the European market.

的确，加的斯和里斯本每年进口的贵金属数量并不是美洲各矿山的全部年产量。这些矿山的全部年产量中有一部分通常由阿卡普尔科船舶运往马尼拉，有一部分在西班牙殖民地和其他欧洲各国殖民地之间进行秘密买卖，还有一部分无疑要留在原产地。此外，美洲矿山虽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金银矿山，但却是世界上最富饶的矿山。人们普遍认为，现在已发现的各矿山的产量和美洲矿山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人们也普遍认为，每年美洲矿山的大部分产品都出口到了加的斯和里斯本两地。但是，单是伯明翰一年消费的矿山产品，以5万镑

计，就已相当于每年600万镑进口额的1/120。因此，世界上所有使用金银的国家每年消费的金银总额，也许与全年的金银产量几乎相等。即使有剩余，所剩金额可能也只足够供应所有繁荣国家持续增加的需求，有时甚至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从而使欧洲市场上的金银价格略微上涨。

The quantity of brass and iron annually brought from the mine to the market is out of all proportion greater than that of gold and silver. We do not, however, upon this account, imagine that those coarse metals are likely to multiply beyond the demand, or to become gradually cheaper and cheaper. Why should we imagine that the precious metals are likely to do so? The coarse metals, indeed, though harder, are put to much harder uses, and, as they are of less value, less care is employed in their preservation. The precious metals, however, are not necessarily immortal any more than they, but are liable, too, to be lost, wasted, and consumed in a great variety of ways.

每年矿山向市场提供的铜和铁的数量之多，决非金银所能比拟，但我们绝不会因此认为这些贱金属的供给会大大超过需求，或者说，这些贱金属的价格会越来越低廉。那么，我们为什么就认为贵金属会有这种倾向呢？虽然贱金属确实更坚固，但其用途也比贵金属的用途要容易磨损得多，而且由于贱金属价值较低，人们对其保存也不像对贵金属那么留心。但是，贵金属并不一定就比贱金属保存得更长久。贵金属也常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丢失、损毁和消耗。

The price of all metals, though liable to slow and gradual variations, varies less from year to year than that of almost any other part of the rude produce of land; and the pric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s even less liable to sudden variations than that of the coarse ones. The durableness of metals is the foundation of this extraordinary steadiness of price. The corn which was brought to market last year, will be all or almost all consumed long before the end of this year. But some part of the iron which was brought from the mine two or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may be still in use, and perhaps some part of the gold which was brought from it two or three thousand years ago. The different masses of corn which in different years must supply the consumption of the world, will always be nearly in proportion to the respective produce of those different years. But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masses of iron which may be in use in two different years, will be very little affected by any accidental difference in the produce of the iron mines of those two years; and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masses of gold will be still less affected by any such difference in the produce of the gold mines. Though the produc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metallic mines, therefore, varies, perhaps, still more from year to year than tha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cornfields, those variations have not the same effect upon the price of the one species of commodities, as upon that of the other.

所有金属的价格虽然都会逐渐而缓慢地变动，但与其他土地天然生产物的价格比较，金属价格逐年的变动比较小。贵金属与贱金属比较，其价格更少有突然的变动。金属价格不易变动的原因就在于金属的耐久性。去年上市的谷物，在今年年终前很久就会被全部或几乎全部消费掉，但两三百年前从矿山开采出来的铁，其中一部分可能还在使用，两三千年前从矿山开采出来的金，有一部分也可能还在使用。每年世界消费的谷物数量与每年生产的谷物数量几乎总是成比例出现。但两个年份所使用的铁的数量的比例，却很少受到这两年铁矿产量偶然差异的影响。两个年份所使用的黄金数量间的比例，更不会受金矿产量变动的影响。所以，虽然和大部分谷田逐年的产量相比，大

部分金属矿山逐年的产量也许有更大的变动，但这种产量的变动对这两种不同生产物的价格却有着不同的影响。

Variations in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respective Values of Gold and Silver

黄金和白银价值比例的变动

Before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es of America, the value of fine gold to fine silver was regulated in the different mints of Europe, between the proportions of one to ten and one to twelve; that is, an ounce of fine gold was supposed to be worth from ten to twelve ounces of fine silver.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it came to be regulated, between the proportions of one to fourteen and one to fifteen; that is, an ounce of fine gold came to be supposed worth between fourteen and fifteen ounces of fine silver. Gold rose in its nominal value, or in the quantity of silver which was given for it. Both metals sunk in their real value, or in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they could purchase; but silver sunk more than gold. Though both the gold and silver mines of America exceeded in fertility all those which had ever been known before, the fertility of the silver mines had, it seems, been proportionably still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gold ones.

美洲矿山被发现以前，欧洲各造币厂规定，纯金对纯银的价值比例为1：10到1：12，即1盎司纯金被认为值10盎司至12盎司纯银。到上个世纪中期，纯金对纯银的价值比例改为1：14到1：15，即1盎司纯金被认为值14盎司至15盎司纯银。这样，黄金的名义价值增大了，

换句话说，黄金能够交换的白银数量增多了。黄金和白银两种金属的真实价值，换句话说，黄金和白银所能购买的劳动数量，虽然都下降了，但白银比黄金下降得更多。美洲金矿和银矿比此前已知的所有矿山都要富饶，但银矿似乎比金矿更富饶。

The great quantities of silver carried annually from Europe to India, have, in some of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gradually reduced the value of that metal in proportion to gold. In the mint of Calcutta, an ounce of fine gold is supposed to be worth fifteen ounces of fine silver,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Europe. It is in the mint perhaps rated too high for the value which it bears in the market of Bengal. In China, the proportion of gold to silver still continues as one to ten, or one to twelve. In Japan, it is said to be as one to eight.

每年从欧洲运往印度的白银数量很大，这使一部分英属殖民地的白银和黄金的价值比例逐渐下降。加尔各答的造币厂与欧洲一样，认为1盎司纯金值15盎司纯银。但是，该造币厂金银间的这种价值比例和黄金在孟加拉国市场上的价值相比，似乎有些太高了。在中国，黄金和白银的价值比例仍然是1：10或1：12，据说在日本是1:8。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quantities of gold and silver annually imported into Europe, according to Mr. Meggens's account, is as one to twenty-two nearly; that is, for one ounce of gold there are imported a little more than twenty-two ounces of silver. The great quantity of silver sent annually to the East Indies, reduces, he supposes, the quantities of those metals which remain in Europe to the proportion of one to fourteen or fifteen, the proportion of their values.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ir values, he seems to think,

must necessarily be the same as that between their quantities, and would therefore be as one to twenty-two, were it not for this greater exportation of silver.

根据麦根斯的计算，欧洲每年进口的金银数量的比例将近1：22，即每进口1盎司黄金，就会进口22盎司白银。但是，白银在进口到欧洲后，还会有一部分被转运到东印度，因此他认为，留在欧洲的金银数量的比例约与金银价值比例相同，即1：14或1：15。他似乎以为，金银价值的比例必然等于金银数量的比例。所以，在他看来，如果不是有大量白银被转运到东印度，金银价值的比例应该为1：22。

But the ordinary proportion between the respective values of two commoditie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as that between the quantities of them which are commonly in the market. The price of an ox, reckoned at ten guineas, is about threescore times the price of a lamb, reckoned at 3*s.* 6*d.* It would be absurd, however, to infer from thence, that there are commonly in the market threescore lambs for one ox: and it would be just as absurd to infer, because an ounce of gold will commonly purchase from fourteen to fifteen ounces of silver, that there are commonly in the market only fourteen or fifteen ounces of silver for one ounce of gold.

但两种商品价值的一般比例，并不一定等于两商品在市场上普通存量的比例。一头牛的价格约为10几尼，一头羊的价格约为 3 先令6便士，牛的价格约为羊的价格的60倍。但是，由此推断市场上有1头牛，通常就会有60头羊是相当荒谬的。仅仅根据通常1盎司的黄金可以购买14至15盎司的白银的事实，就推断通常市场上有1盎司黄金，就会有14至15盎司白银，同样也是相当荒唐可笑的。

The quantity of silver commonly in the market, it is probable, is much greater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gold, than the value of a certain quantity of gold is to that of an equal quantity of silver. The whole quantity of a cheap commodity brought to market, is commonly not only greater, but of greater value, than the whole quantity of a dear one. The whole quantity of bread annually brought to market, is not only greater, but of greater value than the whole quantity of butcher's meat; the whole quantity of butcher's meat, than the whole quantity of poultry; and the whole quantity of poultry, than the whole quantity of wild fowl. There are so many more purchasers for the cheap than for the dear commodity, that, not only a greater quantity of it, but a greater value can commonly be disposed of. The whole quantity, therefore, of the cheap commodity must commonly be greater in proportion to the whole quantity of the dear one, than the value of a certain quantity of the dear one, is to the value of an equal quantity of the cheap one. When we compare the precious metals with one another, silver is a cheap, and gold a dear commodity. We ought naturally to expect, therefore, that there should always be in the market, not only a greater quantity, but a greater value of silver than of gold. Let any man, who has a little of both, compare his own silver with his gold plate, and he will probably find, that, not only the quantity, but the value of the former greatly exceeds that of the latter. Many people, besides, have a good deal of silver who have no gold plate, which, even with those who have it, is generally confined to watch cases, snuff-boxes, and such like trinkets, of which the whole amount is seldom of great value. In the British coin, indeed, the value of the gold preponderates greatly, but it is not so in that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coin of some countries the value of the two metals is nearly equal. In the Scotch coin, before the union with England, the gold preponderated very little, though it did somewhat, as it appears by

the accounts of the mint. In the coin of many countries the silver preponderates. In France, the largest sums are commonly paid in that metal, and it is there difficult to get more gold than what is necessary to carry about in your pocket. The superior value, however, of the silver plate above that of the gold, which takes place in all countries, will much more than compensate the preponderancy of the gold coin above the silver, which takes place only in some countries.

通常市场上白银数量和黄金数量的比例，比一定数量的黄金和同等数量的白银的价值比例要大得多。市场上的廉价商品与市场上的昂贵商品相比，不仅数量更多，而且价值更大。每年送入市场的所有面包，和送入市场的所有鲜肉相比，不仅数量更多，而且价值更大；送入市场的所有鲜肉，和所有家禽相比，不仅数量更多，而且价值更大；送入市场的所有家禽和所有野禽相比，不仅数量更多，而且价格更大。廉价商品的顾客通常比昂贵商品的顾客多得多，因此廉价商品不仅售出的数量更多，而且售出的价值更大。因此，廉价商品数量和昂贵商品数量的比例，通常一定大于一定数量的廉价商品和同等数量的昂贵商品的价值比例。在所有贵金属中，白银是廉价商品，黄金是昂贵商品。因此，我们自然可以这样估计，市场上的白银和黄金相比，不仅数量更多，而且价值更大。任何一个持有少量金银器皿的人，只要把自己的白银器皿和黄金器皿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自己持有的白银器皿无论是数量还是价值都大于黄金器皿。而且许多人持有大量白银器皿，却没有黄金器皿，就算是有，也不过是类似于表壳、鼻烟盒之类的小玩意儿，总价值不大。的确，在英格兰铸币中，金币的价值就远大于银币的价值，但其他国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有些国家的铸币中，金币的价值和银币的价值几乎相等。据造币厂统计，苏格兰在与英格兰合并以前，其金币的价值虽略多于银币，但相差也并不多。在其他许多国家的铸币中，银币的价值大于金币的价值。在法国，所有的大额款项一般都用银币支付，金币仅以口袋中的少量零钱的形式存在。在所有国家，白银器皿的价值都一定大于黄金器皿的价

值，这足可以补偿少数国家中金币价值大于银币价值的情况。

Though, in one sense of the word, silver always has been, and probably always will be, much cheaper than gold; yet in another sense, gold may, perhaps,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Spanishmarket, be said to be somewhat cheaper than silver. A commodity may be said to be dear or cheap, not only according to the absolute greatness or smallness of its usual price, but according as that price is more or less above the lowest for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bring it to market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together. This lowest price is that which barely replaces, with a moderate profit, the stock which must be employed in bringing the commodity thither. It is the price which affords nothing to the landlord, of which rent makes not any component part, but which resolves itself altogether into wages and profit. But,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Spanishmarket, gold is certainly somewhat nearer to this lowest price than silver. The tax of the King of Spain upon gold is only one-twentieth part of the standard metal, or five per cent; whereas his tax upon silver amounts to one-tenth part of it, or to ten per cent. In these taxes too,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consists the whole ren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gold and silver mines of Spanish America; and that upon gold is still worse paid than that upon silver. The profits of the undertakers of gold mines too, as they more rarely make a fortune, must, in general, be still more moderate than those of the undertakers of silver mines. The price of Spanish gold, therefore, as it affords both less rent and less profit, must, in the Spanishmarket, be somewhat nearer to the lowest price for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bring it thither, than the price of Spanish silver. When all expences are computed, the whole quantity of the one metal, it would seem, cannot, in the Spanish market, be disposed of so advantageously as the whole quantity of the other. The tax, indeed, of the King of

Portugalupon the gold of the Brazils, is the same with the ancient taxof the King of Spain upon the silver of Mexico and Peru; or one-fifth part of the standard metal. It may, therefore, be uncertain whether to the general market of Europe the whole mass of American gold comes at a pricenearer to the lowest for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bring it thither, than the whole mass of American silver.

尽管一方面，白银无论在过去、现在甚至可能将来，都比黄金低廉得多。但是另一方面，就西班牙当前的市场状况来说，黄金也许比白银略微低廉。一种商品，不仅可以根据其平常价格的绝对大小，来看它是昂贵的还是低廉的，还可以根据其价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过该商品长时期供应市场可能的最低价格，来看它是昂贵的还是低廉的。所谓的最低价格，指的是仅仅足够补偿商品上市所必需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的价格，也就是对土地所有者不能提供地租、全部由工资及利润二者构成的价格。在西班牙当前的市场状况下，黄金确实比白银更接近这个最低价格。西班牙对黄金的课税仅为标准金的1/20，或5%，对白银的课税则为1/10或10%。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赋税构成了西班牙在美洲大部分金银矿山的全部地租。国王通过黄金获得的税收比白银还要低。开采金矿发财的人数比开采银矿发财的人数还要少，由此可见，金矿的利润通常一定低于银矿。因此，西班牙市场上黄金价格，由于只提供较少的地租和利润，所以一定比白银价格更接近可能出售的最低价格了。如果把所有费用都计算在内，西班牙市场上出售的全部黄金所得的利润，似乎将低于出售全部白银所得的利润。但是，葡萄牙对巴西的黄金征收的税额，与西班牙过去对墨西哥和秘鲁的白银征收的税额，同为标准金属的1/5。因此，对于欧洲市场总体而言，美洲的全部黄金是否比美洲的全部白银更接近可能将其送入市场的最低价格，就很难说了。

The price of diamonds and other precious stones may, perhaps, be still nearer to the lowest price at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bring

them to market, than even the price of gold.

钻石和其他宝石的价格恐怕比黄金的价格更接近可能出售的最低价格。

Though it is not very probable, that any part of a tax which is not only imposed upon one of the most proper subjects of taxation, a mere luxury and superfluity, but which affords so very important a revenue, as the tax upon silver, will ever be given up as long as it is possible to pay it; yet the same impossibility of paying it, which in 1736 made it necessary to reduce it from one-fifth to one-tenth, may in time make it necessary to reduce it still further; in the same manner as it made it necessary to reduce the tax upon gold to one-twentieth. That the silver mines of Spanish America, like all other mines, become gradually more expensive in the working, on account of the greater depths at which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n the works, and of the greater expence of drawing out the water and of supplying them with fresh air at those depths, is acknowledged by everybody who has enquired into the state of those mines.

政府常常对最适合征收赋税的物品，比如奢侈品和非必需品，征收一定税额。这些税收，比如银税，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源泉。所以，对于这种课税来说，只要还有征收的可能，政府就绝对不会放弃。但在1736年，由于人民无力纳税，政府将银税由1/5降至1/10，也许有一天，银税会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得不再次降低，正如金税不得不降至1/20那样。西班牙在美洲的银也像其他矿山一样，由于开采较以前深入，排出矿山深处的积水以及为矿山深处供应新鲜空气的费用较大，因此开采费用逐渐增大。所有曾经研究过这些矿山的人都承认这一事实。

These causes, which are equivalent to a growing scarcity of silver (for a commodity may be said to grow scarcer when it becomes more difficult and expensive to collect a certain quantity of it), must, in time, produce one or other of the three following events. The increase of the expence must either, first, be compensated altogether by a proportionable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the metal; or, secondly, it must be compensated altogether by a proportionable diminution of the tax upon silver; or, thirdly, it must be compensated partly by the one, and partly by the other of those two expedients. This third event is very possible. As gold rose in its price in proportion to silver, notwithstanding a great diminution of the tax upon gold; so silver might rise in its price in proportion to labour and commodities, notwithstanding an equal diminution of the tax upon silver.

这些因素意味着白银的数量将日趋短缺（因为当获得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变得更加困难，需要的费用更高时，就可以说这种商品在日趋短缺），假以时日一定会造成以下三种结果：第一，开采费用的增加一定会由于白银价格成比例的增加而得到补偿；第二，开采费用的增加一定会由于银税成比例的减少而得到补偿；第三，开采费用的增加一定会一部分由于白银价格成比例的增加，一部分由于银税成比例的减少而得到补偿。第三种结果最可能发生。正如尽管金税大幅降低，但金价相对于银价仍然上升一样，银税尽管大幅降低，银价相对于劳动和其他商品而言，也可能仍然上升。

Such successive reductions of the tax, however, though they may not prevent altogether, must certainly retard, more or less, the rise of the value of silver in the European market. In consequence of such reductions, many mines may be wrought which could not be

wrought before, because they could not afford to pay the old tax; and the quantity of silver annually brought to market must always be somewhat greater, and, therefore, the value of any given quantity somewhat less,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In consequence of the reduction in 1736, the value of silver in the European market, though it may not at this day be lower than before that reduction, is, probably, at least ten per cent lower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had the Court of Spain continued to exact the old tax.

但是，银税的连续降低，虽然不能完全阻止，但至少会或多或少推迟欧洲市场上白银价值的上升。由于减税，以前因无力支付税款而停止开采的矿山，现在也许会继续开采。这样，每年上市的白银数量一定会略高一些，一定数量的白银价值也一定略低。自1736年西班牙降低银税以来，欧洲市场上的白银价值，虽然现在可能并不比减税前低，但可能比西班牙如果继续征税会造成的白银价值至少低10%。

That, notwithstanding this reduction, the value of silver ha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begun to rise somewhat in the European market, the facts and arguments which have been alleged above, dispose me to believe, or more properly to suspect and conjecture; for the best opinion which I can form upon this subject scarce, perhaps, deserves the name of belief. The rise, indeed, supposing there has been any, has hithertobeen so very small, that after all that has been said, it may, perhaps, appear to many people uncertain, not only whether this event has actually taken place; but whether the contrary may not have taken place, or whether the value of silver may not still continue to fall in the European market.

上述种种事实和议论使我相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我猜想和推测，虽然白银的赋税降低，但在本世纪的欧洲市场上，白银的价值却略有上升。我之所以说猜想和推测，是因为虽然我已竭尽全力，但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可能仍然不够权威。的确，假定白银的价值确实有所上升，到目前为止上升的程度也相当有限。所以虽然说了这么多，恐怕还有许多人不仅对白银的价值实际是否上升尚有怀疑，而且对相反现象是否没有发生，即今天欧洲市场上的白银价值是否不会继续下降，仍然拿不定主意。

It must be observed, however, that whatever may be the supposed annual im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there must be a certain period, at which the annual consumption of those metals will be equal to that annual importation. Their consumption must increase as their mass increases, or rather in a much greater proportion. As their mass increases, their value diminishes. They are more used, and less cared for, and their consumption consequently increases in a greater proportion than their mass. After a certain period, therefore, the annual consumption of those metals must, in this manner, become equal to their annual importation, provided that importation is not continually increasing; which, in the present times, is not supposed to be the case.

不过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我们认为的金银的年进口量是多少，一定会有一个时期，金银的年消费量和年进口量相等。随着金银的进口量增多，其消费量也一定随之增多，或者更确切地说，消费量以更大的比例增多。随着金银的进口量增多，其价值一定因此而减少。人们对金银使用得越多，就越不在乎它们，因此金银的消费量常常相对于它们的数量增加得快得多。所以，在金银的年进口量不继续增加的前提下，一段时间后，金银的年消费量一定与其进口量趋于一

致。但是今天，金银的年进口量仍在继续增加。

If, when the annual consumption has become equal to the annual importation, the annual importation should gradually diminish, the annual consumption, may, for some time, exceed the annual importation. The mass of those metals may gradually and insensibly diminish, and their value gradually and insensibly rise, till the annual importation becoming again stationary, the annual consumption will gradually and insensibly accommodate itself to what that annual importation can maintain.

如果在金银的年消费量和年进口量相等后，逐渐减少金银的年进口量，那么在一段时间内，金银的年消费量也许会超过年进口量。于是，金银的总量可能逐渐不知不觉地减少，金银的价值逐渐不知不觉地上升，直到年进口量再次稳定为止。这时，金银年消费量会逐渐不知不觉地自我调整，以适应年进口量所能维持的水平。

Grounds of the Suspicion that the Value of Silver still continues to decrease

怀疑白银的价值仍在继续下降的根据

The increase of the wealth of Europe, and the popular notion that, as the quantit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naturally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wealth, so their value diminishes as their quantity increases, may, perhaps, dispose many people to believe that their value still continues to fall in the European market; and the still

gradually increasing price of many parts of the rude produce of land mayconfirm them still further in this opinion.

有一种通行的说法认为，贵金属的数量常常随一国财富的增加而自然增加，因此贵金属的价值也随着数量的增加而下降。这种说法可能使很多人相信，随着当今欧洲财富的日益增加，欧洲市场上的金银价值目前仍在下降；而许多土地天然生产物的价格还在继续上升，也许使他们更加确信这种观点。

That that increase inthe quantit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which arises in any countryfrom the increase of wealth, has no tendency to diminish their value, I have endeavoured to show already. Gold and silver naturally resort to a rich country,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all sorts of luxuries and curiosities resort to it; not because they are cheaper there than in poorer countries, but because they are dearer, or because a better price is given for them. It is the superiority of price which attracts them, and as soon as that superiority ceases, they necessarily cease to go thither.

我已经在前面努力解释过，任何一个国家的贵金属数量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而自然增加后，并不会因此降低贵金属的价值。就像各种奢侈品和珍奇品流向富国一样，金银也由于同一原因自然流向富国。这不是因为这些商品在富国比在穷国低廉，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在富国比在穷国昂贵，即在富国能够得到更好的价格。优越的价格吸引着这些物品向富国聚集，这种优越性一旦消失，这种流动一定停止。

If you except corn and such other vegetables as are raised altogether by human industry, that all other sorts of rude produce,

cattle, poultry, game of all kinds, the useful fossils and minerals of the earth, etc. naturally grow dearer as the society advances in wealth and improvement, I have endeavoured to show already. Though such commodities, therefore, come to exchange for a greater quantity of silver than before, it will not from thence follow that silver has become really cheaper, or will purchase less labour than before, but that such commodities have become really dearer, or will purchase more labour than before. It is not their nominal price only, but their real price which rises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The rise of their nominal price is the effect, not of any degradation of the value of silver, but of the rise in their real price.

我同样在前面努力解释过，除了谷物和其他全靠人类勤劳生产的各种植物外，所有其他的土地天然生产物，如牲畜、家禽、各种猎物、地下有用的化石和矿物等，都随社会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而自然变得更贵。所以，尽管这些商品能够换得的白银数量比以前多，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白银变得更便宜了，或者说白银能够购买的劳动数量比以前少了。我们只能说这些物品变得更贵了，换句话说，这些物品能够购买的劳动数量比以前多了。随着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这些商品不仅名义价格上升，而且真实价格也上升了。这些商品名义价格的上升并不是白银价值下降的结果，是商品的真实价格上升的结果。

Different Effects of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upon the real price of three different Sorts of rude Produce

改良进程对三种天然生产物的不同影响

These different sorts of rude produce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classes. The first comprehends those which it is scarce in the power of human industry to multiply at all. The second, those which it can multiply in proportion to the demand. The third, those in which the efficacy of industry is either limited or uncertain. In the progress of wealth and improvement, the real price of the first may rise to any degree of extravagance, and seems not to be limited by any certain boundary. That of the second, though it may rise greatly, has, however, a certain boundary beyond which it cannot well pass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together. That of the third, though its natural tendency is to rise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yet in the same degree of improvement it may sometimes happen even to fall, sometimes to continue the same, and sometimes to rise more or less, according as different accidents render the efforts of human industry, in multiplying this sort of rude produce, more or less successful.

天然生产物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类无论如何努力也不能使其数量增加的生产物；第二类是人类能够努力使其数量随需求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的那些生产物；第三类是人类的努力只能产生对其数量产生有限影响或不确定影响的生产物。第一类生产物的真实价格可以随着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而无限制地上升。第二类生产物的真实价格虽然也可能大幅提高，但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便不能长久维持。第三类生产物的真实价格虽然在改良的进程中自然提高，但在改良程度相同时，生产物的真实价格有时反而下降，有时保持不变，有时或多或少地提高，具体结果要看在各种意外事件发生时，人类增加这类生产物的努力能够取得多大的效果。

FIRST SORT

第一类

The first sort of rude produce of which the price rises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is that which it is scarce in the power of human industry to multiply at all. It consists in those things which nature produces only in certain quantities, and which being of a very perishable nature, it is impossible to accumulate together the produce of many different seasons. Such are the greater part of rare and singular birds and fishes, many different sorts of game, almost all wild-fowl, all birds of passage in particular, as well as many other things. When wealth and the luxury which accompanies it increase, the demand for these is likely to increase with them, and no effort of human industry may be able to increase the supply much beyond what it was before this increase of the demand. The quantity of such commodities, therefore, remaining the same, or nearly the same, while the competition to purchase them is continually increasing, their price may rise to any degree of extravagance, and seems not to be limited by any certain boundary. If woodcocks should become so fashionable as to sell for twenty guineas a piece, no effort of human industry coul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hose brought to market, much beyond what it is at present. The high price paid by the Romans, in the time of their greatest grandeur, for rare birds and fishes, may in this manner easily be accounted for. These prices were not the effects of the low value of silver in those times, but of the high value of such rarities and curiosities as human industry could not multiply at pleasure. The real value of silver was higher at Rome, for some time before and after the fall of the republic, than it is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at present. Three sestertii, equal to about sixpence sterling, was the price which the republic paid for the modius or peck of the tithe wheat of Sicily. This price, however, was probably

below the average market price, the obligation to deliver their wheat at this rate being considered as a tax upon the Sicilian farmers. When the Romans, therefore, had occasion to order more corn than the tithe of wheat amounted to, they were bound by capitulation to pay for the surplus at the rate of four sestertii, or eight pence sterling, the peck; and this had probably been reckoned the moderate and reasonable, that is, the ordinary or average contract price of those times; it is equal to about one-and-twenty shillings the quarter. Eight-and-twenty shillings the quarter was, before the late years of scarcity, the ordinary contract price of English wheat, which in quality is inferior to the Sicilian, and generally sells for a lower price in the European market. The value of silver, therefore, in those ancient times, must have been to its value in the present, as three to four inversely, that is, three ounces of silver would then have purchased the same quantity of labour and commodities which four ounces will do at present. When we read in Pliny, therefore, that Seiusbought a white nightingale, as a present for the Empress Agrippina, at the price of six thousand sestertii, equal to about fifty pounds of our present money; and that Asinius Celerpurchased a surmullet at the price of eight thousand sestertii, equal to about sixty-six pounds thirteen shillings and four pence of our present money; the extravagance of those prices, how much soever it may surprise us, is apt, notwithstanding, to appear to us about one-third less than it really was. Their real price, the quantity of labour and subsistence which was given away for them, was about one-third more than their nominal price is apt to express to us in the present times. Seius gave for the nightingale the command of a quantity of labour and subsistence equal to what 66*l.* 13*s.* 4*d.* would purchase in the present times; and Asinius Celer gave for the surmullet the command of a quantity equal to what 88*l.* 17*s.* 9*d.* 1/3 would purchase. What occasioned the extravagance of those high prices was, not so much the abundance

of silver, as the abundance of labour and subsistence, of which those Romans had the disposal, beyond what was necessary for their own use. The quantity of silver, of which they had the disposal, was a good deal less than what the command of the same quantity of labour and subsistence would have procured to them in the present times.

第一类天然生产物的价格在改良的进程中不断增加，人类无论如何努力也不能使这类生产物的数量增加。自然界生产的这类生产物数量有限，它们的性质又非常容易腐败，想把很多季节生产的这类产物收集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大部分珍奇稀少的鸟类、鱼类，各种不同种类的猎物，几乎所有野禽，尤其是候鸟等，都属于此类。随着财富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奢侈程度的增加，人们对这些产物的需求也可能增加，但无论人类如何努力，都无法使其供应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所以这类生产物的数量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随着购买者的竞争日趋激烈，生产物的价格似乎无限制地上升。例如山鹬，即使成为时尚品，价格上升到20几尼一只，人类也不能通过努力使其上市的数量大大增加。这也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在古罗马鼎盛时代，罗马人愿意为珍贵的鱼类和鸟类支付极高的价格。这种高价并不是当时白银价值低的结果，而是人类不能随意增加的这些珍稀动物的本身价值上升的结果。在罗马共和国衰落前后，罗马的白银的真实价值比今天欧洲大部分国家都高。罗马共和国对西西里的什一税小麦，每一莫迪斯或一配克支付3赛斯特斯，约合英币6便士。但是这个价格很可能低于平均市场价格，西西里农民有义务按这个价格上交他们的小麦，因为这被认为是对他们的课税。所以，如果罗马人需要从西西里购买比什一税小麦更多的谷物，他们就必须按照契约，对于超过的数量每一配克支付4赛斯特斯，约合英币8便士。这个价格可能在当时被认为是适当的、合理的价格，也就是当时的平均的或普通的契约价格，约相当于每夸特21先令。英格兰小麦的品质不如西西里小麦，在欧洲市场上售价也常常比西西里小麦低廉。但在最近的歉收年份以前，英格兰小麦的普通契约价格却为每夸特28先令。因此，古代白银与现在白银的价

值比例一定为4：3，即古代3盎司的白银和现在4盎司的白银能购买相同数量的劳动或商品。据历史学家普林尼记载，塞伊阿斯曾花费6,000赛斯特斯（合今天的英币50镑）购买一只白夜莺，献给女王阿格丽派娜；阿西尼厄斯·塞勒曾花费8,000赛斯特斯（合今天的英币66镑13先令4便士）购买一尾红鱼。无论这种高昂的价格如何令人吃惊，但在我们看来，似乎依然比真实价格少了1/3。这两种商品的真实价格，换句话说，这两种商品所能交换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数量，比其名义价格在今天所代表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数量约多1/3。这也就是说，塞伊阿斯当初为一只白夜莺所支付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数量，等于现在66镑13先令4便士才能购得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数量；阿西尼厄斯·塞勒当初为一尾红鱼所支付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数量，等于现在88镑17先令9又1/3便士才得购得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数量。造成这种高昂价格的原因，与其说是罗马人的白银数量丰富，造成白银价值低廉，倒不如说是罗马人剩余的劳动和剩余的生活资料过于丰富，导致珍奇商品的购买者增多。当时罗马人所持有的白银数量，比他们所拥有的同等数量的劳动和生活资料在今天所能换得的白银数量要少得多。

SECOND SORT

第二类

The second sort of rude produce of which the price rises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is that which human industry can multiply in proportion to the demand. It consists in those useful plants and animals which, in uncultivated countries, nature produces with such profuse abundance, that they are of little or no value, and which, as cultivation advances, are therefore forced to give place to some more profitable produce. During a long period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the quantity of these is continually diminishing,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demand for them is continually increasing. Their real value, therefore, the real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they will purchase or command, gradually rises, till at last it gets so high as to render them as profitable a produce as anything else which human industry can raise upon the most fertile and best cultivated land. When it has got so high it cannot well go higher. If it did, more land and more industry would soon be employed to increase their quantity.

第二类天然生产物的价格同样在改良的过程中不断增加，但人类能够努力使其数量随需求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各种有用的动植物都属于此类。当土地未开垦时，自然界生产的这类生产物数量丰富，因此生产物的价值很小或毫无价值；随着耕作的进步，这些生产物被迫让出空间，给那些能提高更多利润的产物。在长期的改良进程中，第二类生产物的数量日益减少，人们对它们的需求却持续增加。于是，这类生产物的真实价值，换句话说，这类生产物所能购买或支配的真实的劳动数量逐渐增加，最终，这类生产物提供的利润和人类努力在土壤最肥沃、耕作最完善的土地上生产的任何商品提供的利润相同。但是，这类生产物的真实价值一旦达到这种高度，就不能再增高了。因为如果超过这个高度，马上就会有更多的土地和劳动用来生产这类产物，从而使其数量增加。

When the price of cattle, for example, rises so high that it is as profitable to cultivate land in order to raise food for them, as in order to raise food for man, it cannot well go higher. If it did, more corn land would soon be turned into pasture. The extension of tillage, by diminishing the quantity of wild pasture, diminishes the quantity of butcher's meat which the country naturally produces without labour or cultivation, and b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have either corn,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the price of corn, to give in exchange for it, increases the demand. The price of butcher's meat, therefore, and consequently of cattle, must gradually rise till it gets so high, that it becomes as profitable to employ the most fertile and best cultivated lands in raising food for them as in raising corn. But it must always be late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before tillage can be so far extended as to raise the price of cattle to this height; and till it has got to this height, if the country is advancing at all, their price must be continually rising. There are, perhaps, some parts of Europe in which the price of cattle has not yet got to this height. It had not got to this height in any part of Scotland before the union. Had the Scotch cattle been always confined to the market of Scotland, in a country in which the quantity of land,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no other purpose but the feeding of cattle, is so great in proportion to what can be applied to other purposes, it is scarce possible, perhaps, that their price could ever have risen so high as to render it profitable to cultivate land for the sake of feeding them. In England, the price of cattle,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seem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London, to have got to this height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but it was much later probably before it got to it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remoter counties; in some of which, perhaps, it may scarce yet have got to it. Of all the different substances, however, which compose this second sort of rude produce, cattle is, perhaps, that of which the price,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first rises to this height.

例如，当牲畜的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使人们觉得耕种土地以生产牲畜所食的牧草，和耕种土地以生产人类所食的谷物，能够提供相同的利润，那么牲畜的价格就不能再进一步上涨了，因为如果继续上涨，马上就会有更多的谷田转为牧场。耕地面积的扩大，一方面通过

减少天然牧场，减少了在没有人类劳动或耕作的情况下自然生产的鲜肉数量，另一方面通过增加持有谷物的人数，或增加持有谷物价格（能够用来交换鲜肉的谷物价格）的人数，增加了人们对鲜肉的需求。于是鲜肉的价格，以及随后的牲畜价格一定逐渐上涨，直到人们觉得，用土壤最肥沃、耕作最完善的土地生产牲畜所食的牧草，和生产人类所食的谷物能够提供相同的利润。但一定要到改良进程的后期，耕作面积才能扩大到如此程度，使牲畜价格抬高到这种程度。只要国家在发展，牲畜的价格就会提高，直到提高到这种程度。在今天欧洲的某些地区，恐怕牲畜的价格还未达到这个高度。苏格兰在与英格兰合并以前，苏格兰任何地区的牲畜价格都未达到这个高度。苏格兰的大部分土地都只适合生产牲畜所食的牧草，不适合用作其他用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格兰的牲畜只用于供应本地市场，那么那里牲畜的价格恐怕不可能很高，把土地用来生产牧草恐怕不会提供多少利润。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虽然伦敦附近的英格兰牲畜的价格似乎在上个世纪初期就达到了这种高度，但大部分较偏远各郡的牲畜价格大概很久之后才达到这种高度。也许至今还有少数郡的牲畜价格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但是，在第二类天然生产物中，牲畜也许是第一个在改良的进程中使价格达到这种高度的生产物。

Till the price of cattle, indeed, has got to this height, it seems scarce possible that the greater part, even of those lands which are capable of the highest cultivation, can be completely cultivated. In all farms too distant from any town to carry manure from it, that is, in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ose of every extensive country, the quantity of well-cultivated land must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f manure which the farm itself produces; and this again must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stock of cattle which are maintained upon it. The land is manured either by pasturing the cattle upon it, or by feeding them in the stable, and from thence carrying out their dung to it. But unless the price of the cattle be sufficient to pay both the rent and profit of cultivated land, the farmer cannot afford to

pasture them upon it; and he can still less afford to feed them in the stable. It is with the produce of improved and cultivated land only, that cattle can be fed in the stable; because to collect the scanty and scattered produce of waste and unimproved lands would require too much labour and be too expensive. If the price of the cattle, therefore, is not sufficient to pay for the produce of improved and cultivated land, when they are allowed to pasture it, that price will be still less sufficient to pay for that produce when it must be collected with a good deal of additional labour, and brought into the stable to them.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refore, no more cattle can, with profit, be fed in the stable than what are necessary for tillage. But these can never afford manure enough for keeping constantly in good condition, all the lands which they are capable of cultivating. What they afford being insufficient for the whole farm, will naturally be reserved for the lands to which it can be most advantageously or conveniently applied; the most fertile, or those, perhap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farmyard. These, therefore, will be kept constantly in good condition and fit for tillage. The rest will,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be allowed to lie waste, producing scarce anything but some miserable pasture, just sufficient to keep alive a few straggling, half-starved cattle; the farm, though much understocked in proportion to what would be necessary for its complete cultivation, being very frequently overstocked in proportion to its actual produce. A portion of this waste land, however, after having been pastured in this wretched manner for six or seven years together, may be ploughed up, when it will yield, perhaps, a poor crop or two of bad oats, or of some other coarse grain, and then, being entirely exhausted, it must be rested and pastured again as before, and another portion ploughed up to be in the same manner exhausted and rested again in its turn. Such accordingly was the general system of management all over the low country of Scotland before the union. The lands which were

kept constantly well manured and in good condition, seldom exceeded a third or a fourth part of the whole farm, and sometimes did not amount to a fifth or a sixth part of it. The rest were never manured, but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m was in its turn, notwithstanding, regularly cultivated and exhausted. Under this system of management, it is evident, even that part of the lands of Scotland which is capable of good cultivation, could produce but little in comparison of what it may be capable of producing. But how disadvantageous soever this system may appear, yet before the union the low price of cattle seems to have rendered it almost unavoidable. If, notwithstanding a great rise in their price, it still continues to prevail through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country, it is owing, in many places, no doubt, to ignorance and attachment to old customs, but in most places to the unavoidable obstructions which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opposes to the immediate or speedy establishment of a better system: first, to the poverty of the tenants, to their not having yet had time to acquire a stock of cattle sufficient to cultivate their lands more completely, the same rise of price which would render it advantageous for them to maintain a greater stock, rendering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acquire it; and, secondly, to their not having yet had time to put their lands in condition to maintain this greater stock properly, supposing they were capable of acquiring it. The increase of stock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are two events which must go hand in hand, and of which the one can nowhere much outrun the other. Without some increase of stock, there can be scarce any improvement of land, but there can be no considerable increase of stock but in consequence of a considerable improvement of land; because otherwise the land could not maintain it. These natural obstruct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etter system, cannot be removed but by a long course of frugality and industry; and half a century or a century more, perhaps, must pass away before the old system,

which is wearing out gradually, can be completely abolished through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Of all the commercialadvantages, however, which Scotland has derived from the union with England, this rise in the price of cattle is, perhaps, the greatest. It has not only raised the value of all highland estates, but it has, perhaps, been the principal cause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ow country.

在牲畜价格尚未达到这种高度以前，即使是适合深耕细作的土地，大部分也一定不能完全耕作。在幅员辽阔的国家，常有大部分农场位于偏远地区，不能从城镇获得所需的肥料，因此，耕作优良的土地数量一定和农场自己能够生产的肥料数量成比例。而农场自己生产的肥料数量，又一定和农场所能维持的牲畜数量成比例。为土地施加肥料的方式不外乎有两种：第一种，在土地上放牧；第二种，圈养牲畜，将牲畜的粪便运往土地。如果牲畜的价格不够支付耕地的地租和利润，农民就不愿在土地上放牧，更不愿圈养牲畜。只有靠已经改良并耕种的土地生产的牧草才能圈养牲畜，因为收集未经改良的、荒芜的土地上的少量零星牧草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且代价昂贵。因此，如果牲畜的价格已不够支付在已经改良并且耕种的土地上放牧时该地所产牧草的价格，那么一定更不够支付需要大量额外劳动才能收集起来供圈养牲畜使用的牧草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圈养少量为耕作所需的牲畜才能带来些许利益，倘若多养，绝不会提供更多的利益。但如果只圈养耕作所必需的牲畜，这些牲畜产生的肥料必然不能使所有的可耕土保持良好的耕作状态。这些肥料既然不能满足整个农场所需，自然会被用于能产生最大利益，或者最方便施肥的土地，即最肥沃的土地，或是位于农舍附近的土地。于是在整个农场中，常常保持良好耕作状态的就只有一小部分土地，而其余大部分土地则任其荒芜，只能生产少量贫瘠的牧草，养活少量闲放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牲畜。这样，农场所养的牲畜数量，虽然比土地完全耕种所需的牲畜数量少得多，但从土地实际生产的牧草数量来看，牲畜数量又常常过剩。但是，荒芜的一部分土地在这样继续放牧六七年后，可能得到开

垦，也许可产出一两季粗劣的燕麦或其他粗劣的谷类，此后地力耗尽，又必须回到以前的休耕放牧状态。于是人们接着开垦其他部分的荒芜土地，这些徒弟在产出一两季粗劣的谷物后，也会地力耗尽，回到休耕的状态。苏格兰在与英格兰合并以前，低地一带的土地大都以这种方式经营。当时能够不断靠肥料而维持良好耕作状态的土地，常常仅占全部农田的1/3甚至1/4，有时甚至不到1/5和1/6。其余土地全部没有肥料可施，但是这些土地中的一部分按上述方式交替耕种，交替休耕。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很明显，即使是苏格兰能够得到良好耕种的那部分土地，其产量和其生产力相比也低得多。这种经营方式当然是不利的，但苏格兰在和英格兰合并以前，由于牲畜过于低廉，似乎不得不采取这种不利的经营方式。此后，即使牲畜的价格大幅上涨，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依然采用这种经营方式，这在一些地方无疑是人们的愚昧和拘泥于旧习导致的结果，但在大多数地方是由于事物自然的发展进程不允许人们立即或迅速地建立新的经营方式，这种阻碍不可避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佃户贫困，尚未有足够的时间来获得足够的牲畜，使他们能更完全地耕作土地。虽然牲畜价格的提高有利于他们饲养更多的牲畜，但也同样令他们难以购买牲畜。第二，即使佃户有能力购买牲畜，也没有时间改良他们的土地，使其处于良好的状态，适合维持更多的牲畜。牲畜的增加和土地的改良必须同时进行，不能分先后。牲畜没有增加，土地便无法改良；土地若不能大大改良，牲畜就不会显著增加，因为未经改良的土地无法维持增加的牲畜数量。建立新的经营方式所面临的这些自然障碍，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和节俭才能铲除。现在，旧的经营方式虽然在逐渐衰落，但恐怕还要经过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在苏格兰各地全部废除。苏格兰在与英格兰合并中所得到的所有商业利益中牲畜的价格上涨也许是最大的利益。牲畜价格的上涨不仅提高了高地一带地产的价值，同时也许是低地得到改良的主要原因。

In all new colonies the great quantity of waste land, which can for many years be applied to no other purpose but the feeding of cattle, soon renders them extremely abundant, and in everything

great cheapness is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great abundance. Though all the cattle of the European colonies in America were originally carried from Europe, they soon multiplied so much there, and became of so little value, that even horses were allowed to run wild in the woods without any owner thinking it worth while to claim them. It must be a long time after the first establishment of such colonies, before it can become profitable to feed cattle upon the produce of cultivated land. The same causes, therefore, the want of manure, and the disproportion between the stock employed in cultivation, and the land which it is destined to cultivate, are likely to introduce there a system of husbandry not unlike that which still continues to take place in so many parts of Scotland. Mr. Kalm, the Swedish traveller, when he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husbandry of some of the English colonies in North America, as he found it in 1749, observes, accordingly, that he can with difficulty discover there the character of the English nation, so well skilled in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agriculture. They make scarce any manure for their corn fields, he says; but when one piece of ground has been exhausted by continual cropping, they clear and cultivate another piece of fresh land; and when that is exhausted, proceed to a third. Their cattle are allowed to wander through the woods and other uncultivated grounds, where they are half-starved; having long ago extirpated almost all the annual grasses by cropping them too early in the spring, before they had time to form their flowers, or to shed their seeds. The annual grasses were, it seems, the best natural grasses in that part of North America; and when the Europeans first settled there, they used to grow very thick, and to rise three or four feet high. A piece of ground which, when he wrote, could not maintain one cow, would in former times, he was assured, have maintained four, each of which would have given four times the quantity of milk which that one was capable of giving. The poorness of the pasture had, in his opinion, occasioned the

degradation of their cattle, which degenerated sensibly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They were probably not unlike that stunted breed which was common all over Scotland thirty or forty years ago, and which is now so much mended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ow country, not so much by a change of the breed, though that expedient has been employed in some places, as by a more plentiful method of feeding them.

所有新殖民地都有大量荒芜的土地。这些荒芜的土地除了饲养牲畜外，不能用作其他用途，所以牲畜数量不久便变得极多。任何极多的东西价格一定极低。虽然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的所有牲畜最初都是从欧洲运来的，但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在本地大量繁殖，其价值因此变得极低，即使马匹在森林中乱跑，人们也认为不值得去认领。这些殖民地被建立起来后，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能使得开辟土地，利用土地生产的牧草饲养牲畜成为有利可图的事。因此，由于缺乏肥料，以及用于耕种的牲畜与需要耕种的土地之间的比例失衡，这些新殖民地的农业经营方式很可能与今天苏格兰大部分地方仍然采用的农业经营方式如出一辙。瑞典旅行家卡尔姆曾叙述他于1749年在某些英属北美殖民地所见到的农业状况，他说，在那里很难找出英格兰民族的特性，即对农业的各个方面都精通的特性。他又说，当地人民很少给自己的谷田施肥。当一块土地因连续收获而地力耗尽时，他们就开垦新的土地，等到第二块土地的地力又耗尽后，他们再开垦第三块土地。他们任由自己的牲畜在森林或未开垦的荒地间游荡，处于半饥饿的状态。每年的牧草由于被牲畜啃食得过早，往往等不到开花结果，散播种子就全部灭绝了。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每年生长的牧草似乎是最好的天然牧草。欧洲人刚在此地定居时，这种牧草曾经非常茂盛，高达三四英尺。卡尔姆明确指出，在他写游记时，某块土地可能无法养活一头母牛，但在过去一定可以养活四头母牛，而且过去每头母牛的产奶量是他写书时的4倍。在卡尔姆看来，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牲畜一代一代明显退化的原因就是牧草的缺乏，牲畜看起来与三四十年前在苏格兰各地常见的矮小牲畜没什么区别。今天苏格兰低地的大部分矮小

牲畜都已得到极大的改良，与其说是由于改变了畜种（虽然有些地方使用了这种方法），不如说是由于饲料更加丰富。

Though it is late, therefore,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before cattle can bring such a price as to render it profitable to cultivate land for the sake of feeding them; yet of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which compose this second sort of rude produce, they are perhaps the first which bring this price; because till they bring it, it seems impossible that improvement can be brought near even to that degree of perfection to which it has arrived in many parts of Europe.

因此，虽然要等到改良进程的后期，牲畜的价格才能提高到使开垦土地饲养牲畜变得有利可图，但在这第二类天然生产物中，牲畜可能是第一个达到这种高价的生产物。因为如果牲畜没有提高到这种价格，那么改良似乎不可能发展到接近今天欧洲许多地方已达到的完善状况。

As cattle are among the first, so perhaps venison is among the last parts of this sort of rude produce which bring this price. The price of venison in Great Britain, how extravagant soever it may appear, is not near 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the expence of a deer park, as is well known to all those who have had any experience in the feeding of deer. If it was otherwise, the feeding of deer would soon become an article of common farming;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feeding of those small birds called Turdi was among the ancient Romans. Varro and Columella assure us that it was a most profitable article. The fattening of ortolans, birds of passage which arrive lean in the country, is said to be so in some parts of France. If

venison continues in fashion, and the wealth and luxury of Great Britain increase as they have done for some time past, its price may very probably rise still higher than it is at present.

在第二类天然生产物中，最先达到这种高价的是牲畜，最后达到这种高价的是鹿肉。虽然大不列颠的鹿肉价格看起来似乎很高，但这高价远不够补偿鹿园的开支，凡是具有养鹿经验的人对此都一清二楚。若非如此，鹿就会像古罗马人普遍饲养的叫做特蒂的小鸟一样，不久就成为农场主普遍饲养的动物了。瓦罗和科路美拉告诉我们，饲养特蒂是最有利可图的农事了。蒿雀是一种候鸟，飞到法国时很瘦，据说在法国有些地方，把它养肥能够获得极为丰厚的利润。总之，如果鹿肉继续流行，大不列颠的财富与奢侈程度又像过去某段时期一样增长，那么鹿肉价格可能会比今天还要贵。

Between that period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which brings to its height the price of so necessary an article as cattle, and that which brings to it the price of such a superfluity as venison, there is a very long interval, in the course of which many other sorts of rude produce gradually arrive at their highest price, some sooner and some later,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在改良的进程中，从牲畜这种必需品达到最高价，到鹿肉这种非必需品达到最高价，中间要经过漫长的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许多其他种类的天然生产物也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或早或晚地逐渐达到其最高价格。

Thus in every farm the offals of the barn and stables will maintain a certain number of poultry. These, as they are fed with

what would otherwise be lost, are a mere save-all; and as they cost the farmer scarce anything, so he can afford to sell them for very little. Almost all that he gets is pure gain, and their price can scarce be so low as to discourage him from feeding this number. But in countries ill cultivated, and, therefore, but thinly inhabited, the poultry, which are thus raised without expence, are often fully sufficient to supply the whole demand. In this state of things, therefore, they are often as cheap as butcher's meat, or any other sort of animal food. But the whole quantity of poultry, which the farm in this manner produces without expence, must always be much smaller than the whole quantity of butcher's meat which is reared upon it; and in times of wealth and luxury what is rare, with only nearly equal merit, is always preferred to what is common. As wealth and luxury increase, therefore, in consequence of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the price of poultry gradually rises above that of butcher's meat, till at last it gets so high that it becomes profitable to cultivate land for the sake of feeding them. When it has got to this height, it cannot well go higher. If it did, more land would soon be turned to this purpose. In several provinces of France, the feeding of poultry is considered as a very important article in rural economy, and sufficiently profitable to encourage the farmer to raise a considerable quantity of Indian corn and buck-wheat for this purpose. A middling farmer will there sometimes have four hundred fowls in his yard. The feeding of poultry seems scarce yet to be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a matter of so much importance in England. They are certainly, however, dearer in England than in France, as England receives considerable supplies from France.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the period at which every particular sort of animal food is dearest, must naturally be that which immediately precedes the general practice of cultivating land for the sake of raising it. For some time before this practice becomes general, the scarcity must necessarily raise the

price. After it has become general, new methods of feeding are commonly fallen upon, which enable the farmer to raise upon the same quantity of ground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that particular sort of animal food. The plenty not only obliges him to sell cheaper, but in consequence of these improvements he can afford to sell cheaper; for if he could not afford it, the plenty would not be of long continuance. It has been probably in this manner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clover, turnips, carrots, cabbages, etc. has contributed to sink the common price of butcher's meat in the London market somewhat below what it was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这样，所有的农场都能靠谷仓和畜舍的废物养活一定数量的家禽。这些家禽由本来要扔掉的东西饲养，是一种废物利用，几乎不用农场主支付任何费用，所以通常能够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农场主由此获得的几乎是纯利润，家禽的价格也不会低到使他们不愿饲养。在耕作粗放、人口稀少的国家，这样免费饲养的家禽常常足够供应一国全部的需求，因此，这种家禽常常与鲜肉以及其他一切动物食品同样低廉。不过农场按照这种免费的方法获得的家禽总数一定比农场饲养的牲畜所产出的鲜肉总数少得多。在富裕和奢侈的时代，效用相同的两种产物，数量较少的常常比数量较多的更受欢迎。因此，随着耕作的改进，财富和奢侈程度的增加，家禽的价格逐渐超过鲜肉的价格，最终使得开辟土地饲养家禽成为有利可图的一件事。家禽价格一旦达到这种高度，就不能继续上升，否则用于其他用途的土地一定会被改用来饲养家禽。在法国的很多省，饲养家禽一直被看作农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产业，其利润足以鼓励农民为饲养家禽而种植大量的玉米和荞麦。中等农场主有时甚至在自家院子饲养400多只家禽。英格兰对于饲养家禽，似乎不像法国那样重视。但是，家禽在英格兰一定比在法国贵，因为英格兰每年要从法国进口大量家禽。在改良的进程中，当任何一种动物食品达到最高价格时，随之而来的一定是人们为了饲养这种动物而广泛耕种土地。在这种做法尚未普遍以前，这种动物一定

由于数量短缺而变得昂贵，而在这种做法变得普遍之后，通常会有新的饲养方法出现，使农场主能靠同等面积的土地获得比以前多得多的动物食品。动物食品的数量增多，农场主不仅必须降价销售，而且由于上述改良也能够接受降价销售；如果农场主无力承担这种降价销售，这种动物食品的大量供应必不能持久。也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伦敦市场引进了首蓿、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商品后，使得鲜肉的普通价格比上个世纪初期略有下降。

The hog, that finds his food among ordure, and greedily devours many things rejected by every other useful animal, is, like poultry, originally kept as a save-all. As long as the number of such animals, which can thus be reared at little or no expence, is fully sufficient to supply the demand, this sort of butcher's meat comes to market at a much lower price than any other. But when the demand rises beyond what this quantity can supply, when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raise food on purpose for feeding and fattening hogs, in the same manner as for feeding and fattening other cattle, the price necessarily rises, and becomes proportionably either higher or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butcher's meat, according as the natur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state of its agriculture, happen to render the feeding of hogs more or less expensive than that of other cattle. In France, according to Mr. Buffon, the price of pork is nearly equal to that of beef. In most parts of Great Britain it is at present somewhat higher.

猪是一种贪食的动物，不仅食粪，而且食用其他所有饲养动物拒绝食用的很多东西。因此，起初猪和家禽一样，是用废物饲养的。只要以极少的费用甚至无需费用就可饲养能充分满足需求的数量，猪肉的市场价格就一定比其他鲜肉低廉得多。但是，如果人们对猪肉的需求超过这个数量所能满足的程度，换句话说，如果饲养猪和饲养其他

牲畜一样，有必要为其生产饲料，那么猪的价格一定会因此变得昂贵。各国的自然状态和农业状态不同，导致养猪比养其他牲畜所花费用有时更多，有时更少，如果养猪比养牲畜所需费用更多，那么猪肉的价格将按照一定比例比其他鲜肉昂贵，如果更少，那么猪肉的价格将按照一定比例比其他鲜肉的价格低廉。据布冯说，法国的猪肉价格几乎和牛肉价格相同。大不列颠许多地方的猪肉价格都比牛肉的价格还高些。

The great rise in the price both of hogs and poultry has in Great Britain been frequently imputed to the diminution of the number of cottagers and other small occupiers of land; an event which has in every part of Europe been the immediate forerunner of improvement and better cultivation, but which at the same time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raise the price of those articles, both somewhat sooner and somewhat faster than it would otherwise have risen. As the poorest family can often maintain a cat or a dog, without any expence; so the poorest occupiers of land can commonly maintain a few poultry, or a sow and a few pigs, at very little. The little offals of their own table, their whey, skimmed milk, and buttermilk, supply those animals with a part of their food, and they find the rest in the neighbouring fields without doing any sensible damage to anybody. By diminishing the number of those small occupiers, therefore, the quantity of this sort of provisions which is thus produced at little or no expence, must certainly have been a good deal diminished, and their price must consequently have been raised both sooner and faster than it would otherwise have risen. Sooner or later, however,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it must at any rate have risen to the utmost height to which it is capable of rising; or to the price which pays the labour and expence of cultivating the land which furnishes them with food as well as these are paid upo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cultivated

land.

现在，大不列颠的猪和家禽的价格大幅上涨，人们常常将其归因于佃农和其他小土地占有者人数减少了。这些人数减少后，欧洲的任何地区都会紧接着出现技术改良和耕作进步，同时，这些人数减少又会使猪和家禽的价格更早更快变得昂贵。正如一个最贫穷的家庭往往无需任何费用就能养活一只猫或一只狗，一个最贫穷的农场主也同样能以极少的费用养活几只家禽或一头母猪及几头小猪。他们桌子上的残羹剩饭、乳浆、乳渣是这些家禽的一部分食物，而其余的食物则需要家禽在附近的田野中自由寻找，只要家禽们不对别人造成明显损失即可。减少小土地占有者的人数，必然会使这些花费极少或无需花费就可饲养的动物的数量大大减少，同时，这些动物的价格也一定会比小土地占有者人数尚未减少时提高得更快。但是，在改良的过程中，这种动物的价格迟早会达到可能有的最高限度，即迟早会达到这样高的价格，以致能够偿付为这些动物提供饲料的土地在耕作的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动和费用，就像其他土地生产物能够偿付其他大部分土地在耕作的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动和费用一样。

The business of the dairy, like the feeding of hogs and poultry, is originally carried on as a save-all. The cattle necessarily kept upon the farm, produce more milk than either the rearing of their own young, or the consumption of the farmer's family requires; and they produce most at one particular season. But of all the productions of land, milk is perhaps the most perishable. In the warm season, when it is most abundant, it will scarce keep four-and-twenty hours. The farmer, by making it into fresh butter, stores a small part of it for a week: by making it into salt butter, for a year: and by making it into cheese, he stores a much greater part of it for several years. Part of all these is reserved for the use of his own family. The rest goes to market, in order to find the best price

which is to be had, and which can scarce be so low as to discourage him from sending thither whatever is over and above the use of his own family. If it is very low, indeed, he will be likely to manage his dairy in a very slovenly and dirty manner, and will scarce perhaps think it worth while to have a particular room or building on purpose for it, but will suffer the business to be carried on amidst the smoke, filth, and nastiness of his own kitchen; as was the case of almost all the farmers' dairies in Scotland thirty or forty years ago, and as is the case of many of them still. The same causes which gradually raise the price of butcher's meat, the increase of the demand, and, in consequence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untry, the diminution of the quantity which can be fed at little or no expence, raise, in the same manner, that of the produce of the dairy, of which the price naturally connects with that of butcher's meat, or with the expence of feeding cattle. The increase of price pays for more labour, care, and cleanliness. The dairy becomes more worthy of the farmer's attention, and the quality of its produce gradually improves. The price at last gets so high that it becomes worth while to employ some of the most fertile and best cultivated lands in feeding cattle merely for the purpose of the dairy; and when it has got to this height, it cannot well go higher. If it did, more land would soon be turned to this purpose. It seems to have got to this height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ngland, where much good land is commonly employed in this manner. If you except the neighbourhood of a few considerable towns, it seems not yet to have got to this height anywhere in Scotland, where common farmers seldom employ much good land in raising food for cattle merely for the purpose of the dairy. The price of the produce, though it has risen very considerably within these few years, is probably still too low to admit of it. The inferiority of the quality, inde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produce of English dairies, is fully equal to that of the price. But this inferiority of quality is,

perhaps, rather the effect of this lowness of price than the cause of it. Though the quality was much better, the greater part of what is brought to market could not, I apprehend, in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of the country, be disposed of at a much better price; and the present price, it is probable, would not pay the expen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necessary for producing a much better quality.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ngland, notwithstanding the superiority of price, the dairy is not reckoned a more profitable employment of land than the raising of corn, or the fattening of cattle, the two great objects of agriculture.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Scotland, therefore, it cannot yet be even so profitable.

奶酪业最初也像饲养猪和家禽一样，是为了废物利用。农场中必须维持的一定数量的耕牛生产的牛奶，常常超过喂养小牛和农场主家庭消费所需的数量，而在某个特定季节耕牛的产奶数量最多。但是，在所有的土地天然生产物中，牛奶是最容易腐败的。在产奶最多的温暖季节，牛奶很少能保存一天。于是，农场主把一部分牛奶制成新鲜黄油，可以保存一周；一部分制成加盐黄油，可以保存一年；大部分制成奶酪，可以保存多年。农场主通常把所有这些产品的一部分留下来供自己使用。人们将其余的牛奶全部运往市场，希望卖个好价钱，通常这些产品的价格不会太低，不会出现使农场主不愿把剩余的产品运到市场的情况。如果这些产品的市场价格确实太低，农场主经营奶酪业时可能就不太积极，制奶酪的过程也不够整洁，农场主可能还会觉得没有必要专门设置一个房间或房屋，只在自己烟熏火燎、脏乱不堪的厨房中制作奶酪就可以了。实际上，三四十年前，苏格兰所有农场主制造奶酪的情形就是如此，即使在今天，依然有许多农场主以这种方式制作奶酪。人们对鲜肉需求的增加，以及国家改良导致的花费极少或无需花费就可饲养的牲畜数量的减少，使得鲜肉的价格逐渐昂贵，这两个原因也同样提高了奶酪产品的价格。奶酪产品的价格自然与鲜肉的价格和饲养家畜的费用相关联。奶酪产品的价格增高，就能够支付更多的劳动，促使农场主制奶酪时更细心，更注意清洁。奶酪

业更值得农场主去关注，奶酪产品的质量就逐渐提高。奶酪产品的价格最终提高到值得用最肥沃、最精耕细作的土地生产奶酪业所需的牲畜的饲料。但是，奶酪产品的价格一旦达到这个高度，就不能进一步上升了，否则马上就会有更多的土地被用来生产奶酪业所需的牲畜的饲料。英格兰大部分地方的奶酪价格似乎都已经达到了这个最高限度，所以这里有许多良田被用来生产奶酪业所需的牲畜的饲料。在苏格兰，除了大城市附近的一些地区外，其余各地的奶酪产品价格似乎都没有达到这个最高的限度，所以，普通农场主很少用良田生产奶酪业所需的牲畜的饲料。在最近几年间，虽然奶酪的价格确实已大幅提高，但可能提高的程度不够，还不足以鼓励农场主用良田来生产牲畜的饲料。苏格兰奶酪的品质一般都不如英格兰，二者质量的差距与价格的差距完全相当。但是，品质的低劣并不是价格低廉的原因，而是价格低廉的结果。我认为，即使苏格兰奶酪的品质大幅提高，在苏格兰的现状下，大部分上市的奶酪也无法卖到高得多的价格。生产品质优良的奶酪必然需要较多的土地和劳动方面的支出，现在苏格兰奶酪的价格恐怕不够补偿这种费用。在英格兰的许多地方，虽然奶酪的价格较高，但与生产谷物和饲养家畜这两种主要的农业项目相比，人们仍不将奶酪业这种土地利用途径看作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在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奶酪业提供的利益就更低了。

The lands of no country, it is evident, can ever be completely cultivated and improved, till once the price of every produce, which human industry is obliged to raise upon them, has got so high as to pay for the expence of complet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do this, the price of each particular produce must be sufficient, first, to pay the rent of good corn land, as it is that which regulates the ren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cultivated land; and, secondly, to pay the labour and expence of the farmer as well as they are commonly paid upon good cornland; or, in other words, to replace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s the stock which he employs about it. This rise in the price of each particular produce, must evidently

be previous to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e land which is destined for raising it. Gain is the end of all improvement, and nothing could deserve that name of which loss was to be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 But loss must be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improving land for the sake of a produce of which the price could never bring back the expence. If the complet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e country be, as it most certainly is, the greatest of all public advantages, this rise in the price of all those different sorts of rude produce, instead of being considered as a public calamity, ought to be regarded as the necessary forerunner and attendant of the greatest of all public advantages.

很明显，无论在哪个国家，必须依靠人力生产的所有土地产品的价格，如果不足以补偿土地的改良费用和耕作费用，那么该国的土地绝不会完全用来耕作，也绝不会得到完全的改良。要使全国土地完全用于耕种，完全得到改良，各种土地产品的价格，第一，必须足够支付良好谷田的地租，因为这种地租支配着大部分其他耕地的地租；第二，必须足够支付农场主所付的劳动和费用，使农场主得到良田通常提供的一样好的报酬，换句话说，这个价格一定能让农场主取回资本，并获得资本的普通利润。各种土地产品价格的上涨，显然一定发生在生产各种生产物的土地得到改良和耕作之前。一切改良的目的都是获利，如果改良的必然结果是损失，那么就不能称之为改良。但如果改良土地是为了生产那种价格永远无法补偿支出的产品，那么，改良的结果就必然是损失。因此，如果把一国土地的完全改良与耕作看作所有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么所有土地天然生产物价格的上涨就不能被看作公共灾难，而应被视为最大的公共利益的必然先驱和伴随物。

This rise, too, in the nominal or money-price of all those different sorts of rude produce has been the effect, not of any

degradation in the value of silver, but of a rise in their real price. They have become worth, not only a greater quantity of silver, but a greater quantity of labour and subsistence than before. As it costs a greater quantity of labour and subsistence to bring them to market, so when they are brought thither, they represent or are equivalent to a greater quantity.

所有土地天然生产物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的上涨，并非白银价值下降的结果，而是这些生产物自身真实价格上涨的结果。这些生产物不仅值得交换比以前更多的白银，而且值得交换比以前更多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由于将这些生产物送入市场需要花费更多的劳动和生活资料，因此上市之后，它们就代表更多的劳动和生活资料，或者说，在价值上等于更多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价值。

THIRD SORT

第三类

The third and last sort of rude produce, of which the price naturally rises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is that in which the efficacy of human industry, in augmenting the quantity, is either limited or uncertain. Though the real price of this sort of rude produce, therefore, naturally tends to rise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yet, according as different accidents happen to render the efforts of human industry more or less successful in augmenting the quantity, it may happen sometimes even to fall, sometimes to continue the same in very different periods of improvement, and sometimes to rise more or less in the same period.

第三类即最后一类天然生产物的价格，在改良的进程中自然上涨，人类的努力只能对其数量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或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虽然这类天然生产物的真实价格在改良的进程中有自然上升的趋势，但由于各种意外事件发生时，人类增加这类生产物的努力能够取得的效果不同，这类生产物的真实价格有时甚至会下降，有时在不同的改良阶段保持不变，有时在同一改良阶段或多或少地上升。

There are some sorts of rude produce which nature has rendered a kind of appendages to other sorts; so that the quantity of the one which any country can afford, is necessarily limited by that of the other. The quantity of wool or of raw hides, for example, which any country can afford, is necessarily limited by the number of great and small cattle that are kept in it. The state of its improvement, and the nature of its agriculture, again necessarily determine this number.

某些天然生产物由于自身的性质，是其他生产物的附属品，因此一国所能提供的这类天然生产物的数量，必然受该国所能提供的其他生产物数量的支配。例如，一国所能提供的羊毛或皮革的数量，必然受该国所能维持的大小牲畜数量的支配；一国所能维持的大小牲畜的数量，又必然受该国的改良状况和农业性质的支配。

The same causes, which,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gradually raise the price of butcher's meat, should have the same effect, it may be thought, upon the prices of wool and raw hides, and raise them, too, nearly in the same proportion. It probably would be so, if in the rude beginnings of improvement the market for the latter commodities was confined within as narrow bounds as

that for the former. But the extent of their respective markets is commonly extremely different.

也许有人会说，在改进的进程中，使鲜肉价格逐渐提高的原因同样也会使羊毛和皮革的价格提高，而且价格提高的比例几乎相同。如果在改良的初期，羊毛和皮革的市场也像鲜肉的市场那样，同样局限于狭窄的范围，那么上面所说也许会成为事实。但是，这两者的市场范围通常是极不相同的。

The market for butcher's meat is almost everywhere confined to the country which produces it. Ireland, and some part of British America indeed, carry on a considerable trade in salt provisions; but they are, I believe, the only countries in the commercial world which do so, or which export to other countries any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ir butcher's meat.

鲜肉的市场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受限于生产鲜肉的国家。诚然，英属美洲的某地和爱尔兰间进行着大规模的腌制食品贸易，但据我所知，在今天商业世界中，只有这两地从事这种贸易，换句话说，只有这两个地方把本国的大部分鲜肉出口至国外。

The market for wool and raw hides, on the contrary, is in the rude beginnings of improvement very seldom confined to the country which produces them. They can easily be transported to distant countries, wool without any preparation, and raw hides with very little: and as they are the materials of many manufactures, the industry of other countries may occasion a demand for them, though that of the country which produces them might not occasion

any.

相反，羊毛和皮革市场即使在改良初期也很少受限于生产国。羊毛不需任何加工，生皮只需略微加工，就可很容易地送往遥远的国家。因为这些产物是很多制造品的原料，所以，即使生产国的产业对它们没有需求，其他国家的产业也可能对它们有需求。

In countries ill cultivated, and therefore but thinly inhabited, the price of the wool and the hide bears always a much greater proportion to that of the whole beast, than in countries where, improvement and population being further advanced, there is more demand for butcher's meat. Mr. Hume observes, that in the Saxon times, the fleece was estimated at two-fifths of the value of the whole sheep, and that this was much above the proportion of its present estimation. In some provinces of Spain, I have been assured, the sheep is frequently killed merely for the sake of the fleece and the tallow. The carcase is often left to rot upon the ground, or to be devoured by beasts and birds of prey. If this sometimes happens even in Spain, it happens almost constantly in Chili, at Buenos Ayres, and in many other parts of Spanish America, where the horned cattle are almost constantly killed merely for the sake of the hide and the tallow. This, too, used to happen almost constantly in Hispaniola, while it was infested by the Buccaneers, and before the settlement, improvement, and populousness of the French plantations (which now extend round the coast of almost the whole western half of the island) had given some value to the cattle of the Spaniards, who still continue to possess, not only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oast, but the whole inland and mountainous part of the country.

在耕作粗放、人口稀少的国家，毛皮的价格在整只牲畜的全部价格中所占的比例，总是远远大于在耕作较好、人口较多因而对鲜肉有较大需求的国家中所占的比例。据休谟观察，在撒克逊时代，羊毛价格约占整只羊价格的2/5，这大大高于现在羊毛价格在整只羊的价格中所占的大致比例。我一直确信，在西班牙的某些省内，杀羊常常只是为了得到羊脂和羊毛，羊肉常常被扔在地上任其腐烂，或让食肉鸟兽吃掉。如果这种现象有时会在西班牙发生，那么在智利，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西班牙属美洲的其他许多地方，几乎会是习以为常的现象了。在这些地方，宰杀有角牲畜常常只是为了得到兽皮和兽脂。当伊斯帕尼奥拉岛时常遭受海盗侵扰，而法国人的种植园（现几乎已延伸到该岛的全部西海岸）的安定、改良和人口情况，尚未赋予该岛西班牙人的牲畜某些价值之前，生活在该岛的人也经常只为了获得兽皮和兽脂而捕杀牲畜。现在西班牙不仅继续占有该岛的东海岸，而且占有该岛的全部内陆地区和山区。

Though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and population, the price of the whole beast necessarily rises, yet the price of the carcase is likely to be much more affected by this rise than that of the wool and the hide. The market for the carcase, being in the rude state of society confined always to the country which produces it, must necessarily be extended in proportion to the improvement and population of that country. But the market for the wool and the hides even of a barbarous country often extending to the whole commercial world, it can very seldom be enlarged in the same proportion. The state of the whole commercial world can seldom be much affect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any particular country; and the market for such commodities may remain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after such improvements, as before. It should, however, in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rather upon the whole be somewhat extended in consequence of them. If the manufactures, especially, of which those commodities are the materials, should

ever come to flourish in the country, the market, though it might not be much enlarged, would at least be brought much nearer to the place of growth than before; and the price of those materials might at least be increased by what had usually been the expence of transporting them to distant countries. Though it might not rise therefore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that of butcher's meat, it ought naturally to rise somewhat, and it ought certainly not to fall.

尽管在改良和人口增长的进程中，整只牲畜的价格必然会上涨，但这种价格的上涨对兽肉价格的影响，比对兽毛和兽皮价格的影响大得多。兽肉的市场在社会的原始状态下，总是局限于生产国境内，所以必定随国家的改良、人口的增长而成比例扩大。但兽毛和兽皮等产物，即使产自野蛮国家，也常常远销整个商业世界，其市场很少能因一国的改良和人口的增长而成比例地扩大。整个世界的商业状态很少因一国的改良而受到显著的影响，所以这类商品的市场在国家改良、人口增长后，可能仍与以前完全相同或几乎相同。不过根据事物的自然发展进程，这类商品的市场也会随着改良而略有扩大。尤其是，如果以这类商品为原料的制造业在这类商品的生产国日益兴旺，那么这类商品的市场即使不扩大太多，至少也会比以前更接近其生产国。那么这种原料的价格至少会因为节省了以前运往遥远国家的费用而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兽毛和兽皮价格即使不能与兽肉价格按同一比例提高，也自然会略有上升，但绝不会下降。

In England, however, notwithstanding the flourishing state of its woollen manufacture, the price of English wool has fallen very considerably since the time of Edward III. There are many authentic records which demonstrate that during the reign of that prince (towards the middl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or about 1339) what was reckoned the moderate and reasonable price of the tod or twenty-eight pounds of English wool was not less than ten shillings

of the money of those times, containing, at the rate of twenty pence the ounce, six ounces of silver Tower weight, equal to about thirty shillings of our present money. In the present times, one-and-twenty shillings the tod may be reckoned a good price for very good English wool. The money-price of wool, therefore, in the time of Edward III, was to its money-price in the present times as ten to seven. The superiority of its real price was still greater. At the rate of six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the quarter, ten shillings was in those ancient times the price of twelve bushels of wheat. At the rate of twenty-eight shillings the quarter, one-and-twenty shillings is in the present times the price of six bushels only.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real prices of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therefore, is as twelve to six, or as two to one. In those ancient times a tod of wool would have purchased twice the quantity of subsistence which it will purchase at present; and consequently twice the quantity of labour, if the real recompence of labour had been the same in both periods.

但是，虽然英格兰的毛纺业十分发达，羊毛价格自爱德华三世以来却已大幅下降。据许多可靠的记录，在爱德华三世时代（14世纪中期或1339年左右），每托德英格兰羊毛（即28磅）公认的适当及合理的价格不少于当时的货币10先令。当时货币的10先令含有陶衡6盎司白银，以每盎司合20便士计算，约合现在的英币30先令。现在每托德21先令被看作是最优良的苏格兰羊毛能卖得的好价钱。因此，爱德华三世时代羊毛的货币价格与现在羊毛的货币价格之间的比例是10：7。至于羊毛的真实价格，则爱德华三世时代的优势更大。按每夸特小麦价格为6先令8便士计算，爱德华三世时代的10先令可购买小麦12蒲式耳。按每夸特小麦价格为28先令计算，现在的21先令只能购买小麦6蒲式耳。因此，爱德华三世时代羊毛的真实价格与现在羊毛的真实价格之间的比例是12：6，即2：1。这就是说，爱德华三世时代一托德羊毛所能购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是现在的两倍。假设在这两

个时代，劳动的真实报酬相等，那么爱德华三世时代一托德羊毛所能购买的劳动数量也是现在的两倍。

This degradation both in the real and nominal value of wool, c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in consequence of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It has accordingly been the effect of violence and artifice: first, of the absolute prohibition of exporting wool from England; secondly, of the permission of importing it from Spainduty free; thirdly, of the prohibition of exporting it from Ireland to any other country but England. In consequence of these regulations, the market for English wool, instead of being somewhat extended in consequence of the improvement of England, has been confined to the home market, where the wool of several other countriesis allowed to come into competition with it, and where that of Ireland is forced into competition with it. As the woollen manufactures, too, of Ireland are fully as much discouraged as is consistent with justice and fair dealing, the Irish can work up but a small part of their own wool at home, and are, therefore, obliged to send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it to Great Britain, the only market they are allowed.

羊毛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的下降，绝不是事物的自然发展进程的结果，而是暴力和人为的结果。第一，是绝对禁止英格兰出口羊毛的结果；第二，是准许从西班牙免税进口羊毛的结果；第三，是只允许爱尔兰羊毛出口至英格兰，而不得出口至其他国家的结果。由于这些规定，英格兰羊毛的市场就局限于国内，没有随着社会的改良而有所扩大。英格兰市场允许其他国家的羊毛与英格兰本地的羊毛竞争，而爱尔兰羊毛则是被迫加入这种竞争。此外，由于爱尔兰毛纺业同样完全遭受这种不公平、不正当的对待和抑制，爱尔兰人在国内只能加工一小部分自产羊毛，不得不把其大部分羊毛出口至英格兰，这是容

许他们出售羊毛的唯一市场。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find any such authentic records concerning the price of raw hides in ancient times. Wool was commonly paid as a subsidy to the king, and its valuation in that subsidy ascertains, at least in some degree, what was its ordinary price. But this seems not to have been the case with raw hides. Fleetwood, however, from an account in 1425, between the prior of Burcester Oxford and one of his canons, gives us their price, at least as it was stated, upon that particular occasion, viz. five ox hides at twelve shillings; five cow hides at seven shillings and three pence; thirty-six sheep skins of two years old at nine shillings; sixteen calves skins at two shillings. In 1425, twelve shillings contained about the same quantity of silver as four-and-twenty shillings of our present money. An ox hide, therefore, was in this account valued at the same quantity of silver as 4*s.* 4/5ths of our present money. Its nominal price was a good deal lower than at present. But at the rate of six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the quarter, twelve shillings would in those times have purchased fourteen bushels and four-fifths of a bushel of wheat, which, at three and six pence the bushel, would in the present times cost 51*s.* 4*d.* An ox hide, therefore, would in those times have purchased as much corn as ten shillings and three pence would purchase at present. Its real value was equal to ten shillings and three pence of our present money. In those ancient times, when the cattle were half starved dur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winter, we cannot suppose that they were of a very large size. An ox hide which weighs four stone of sixteen pounds avoirdupois, is not in the present times reckoned a bad one; and in those ancient times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reckoned a very good one. But at halfacrown the stone, which at this moment (February 1773) I understand to be the common price, such a hide would at present cost only ten

shillings. Though its nominal price, therefore, is higher in the present than it was in those ancient times, its real price, the real quantity of subsistence which it will purchase or command, is rather somewhat lower. The price of cow hides, as stated in the above account, is nearly in the common proportion to that of ox hides. That of sheep skins is a good deal above it. They had probably been sold with the wool. That of calves skins, on the contrary, is greatly below it. In countries where the price of cattle is very low, the calves, which are not intended to be reared in order to keep up the stock, are generally killed very young; as was the case in Scotland twenty or thirty years ago. It saves the milk, which their price would not pay for. Their skins, therefore, are commonly good for little.

我未能找到关于古代生皮价格的可靠记录。羊毛通常是作为给国王的贡品而进献的，根据它作为贡品的估值，至少可以确定当时羊毛的普通价格。生皮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不过，弗利特伍德曾根据1425年牛津伯塞斯特修道院副院长与该院某牧师之间的账单告诉我们，5张公牛皮的价格是12先令，5张母牛皮的价格是7先令3便士，36张两岁羊皮的价格是9先令，16张小牛皮的价格是2先令。在1425年时，12先令所含的白银数量约和今天英币24先令所含的白银数量相同。因此，根据这张账单，每张公牛皮的价格折合成白银数量，就等于今天的英币4又4/5先令。它的名义价格大大低于现在。但按每夸特6先令8便士计算，当时的12先令能够购买小麦18又4/5蒲式耳。而现在按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计算，同等数量的小麦却要花费31先令4便士。因此，当时一张公牛皮所能购买的小麦数量，现在需要花费10先令3便士才能购买，即当时一张公牛皮的真实价值等于现在的英币10先令3便士。在古代，牲畜在冬季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半饥饿状态，因此我们不能假定其体型肥大。重量4石即常衡16磅一张的公牛皮，在今天被看作中等牛皮，但在古代可能被看作上等牛皮。据我所知，每石0.5克朗是现在（1773年2月）牛皮的普通价格，按照这个价格，

这张重4石的牛皮仅值现在的英币10先令。因此，尽管现在公牛皮的名义价格比过去高，但其真实价格，即所能购买或支配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却比过去低。根据上述账单，母牛皮价格常常与公牛皮价格保持普通的比例，羊皮的价格则大大超过这个普通比例。也许羊皮是和羊毛一起卖掉的。相反，小牛皮价格大大低于这普通比例。在牲畜价格非常低廉的国家中，除了那些为了延续兽群而饲养的小牛，其他的小牛在幼时就会被杀掉。二三十年前的苏格兰就是如此。小牛的价格通常不够偿还它所消费的牛奶价格，所以宰杀小牛可节省牛奶。因此，小牛皮的价格通常很低。

The price of raw hides is a good deal lower at present than it was a few years ago; owing probably to the taking off the duty upon sealskins, and to the allowing, for a limited time, the importation of raw hides from Ireland and from the plantations duty free, which was done in 1769. Take the whol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at an average, their real price has probably been somewhat higher than it was in those ancient times. The nature of the commodity renders it not quite so proper for being transported to distant markets as wool. It suffers more by keeping. A salted hide is reckoned inferior to a fresh one, and sells for a lower price. This circumstance must necessarily have some tendency to sink the price of raw hides produced in a country which does not manufacture them, but is obliged to export them; and comparatively to raise that of those produced in a country which does manufacture them. It must have some tendency to sink their price in a barbarous, and to raise it in an improved and manufacturing country. It must have had some tendency, therefore, to sink it in ancient, and to raise it in modern times. Our tanners, besides, have not been quite so successful as our clothiers, in convincing the wisdom of the nation, that the safety of the commonwealth depends upon the prosperity of their particular manufacture. They have accordingly been much less favoured. The

exportation of raw hides has, indeed, been prohibited, and declared a nuisance; but their importation from foreign countries has been subjected to a duty; and though this duty has been taken off from those of Ireland and the plantations (for the limited time of five years only), yet Ireland has not been confined to the market of Great Britain for the sale of its surplus hides, or of those which are not manufactured at home. The hides of common cattle have but within these few years been put among the enumerated commodities which the plantations can send nowhere but to the mother country; neither has the commerce of Ireland been in this case oppressed hitherto,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manufactures of Great Britain.

生皮的价格现在大大低于数年前。这也许是因为对海豹皮征收的关税被取消了，以及在1769年又允许在限定的时间内从爱尔兰和其他殖民地免税进口生皮。不过，就本世纪的平均价格来看，生皮的真实价格大概比古代略高。生皮由于自身的性质，不像羊毛那样适合运往远方市场，在保存过程中所受的损害也比羊毛大。腌制生皮的品质不如新鲜的生皮，其售价更低。这种情况一定会使生皮在不能自己加工，只能出口的生产国的价格下降，相应提高生皮在能够自己加工的生产国的价格。生皮在野蛮国家必然有下降的趋势，在进步的工业国必然有上升的趋势，在古代必然有下降的趋势，在现代必然有上升的趋势。此外，英格兰的制革业并不能像毛织业那样，使国家的贤人志士相信这种制造业的繁荣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因而制革业很少像毛织业那样受到很多的优待。生皮的出口确实被禁止了，且被视为有害的行为，但由海外进口的生皮却要交税。虽然从爱尔兰和各殖民地进口的生皮已被取消关税（仅5年），但是，爱尔兰的剩余生皮，即爱尔兰本国不能加工的生皮，其市场却并不仅限于大不列颠。而各殖民地普通牲畜的生皮，几年前才被列入到只许在宗主国售卖、不得向他国出口的商品项目中。在这一方面，迄今爱尔兰的商业也未曾像羊毛商业那样，为了要维持大不列颠制造业而受到抑制。

Whatever regulations tend to sink the price either of wool or of raw hides below what it naturally would be, must, in an improved and cultivated country, have some tendency to raise the price of butcher's meat. The price both of the great and small cattle, which are fed on improved and cultivated land, must be sufficient to pay the rent which the landlord, and the profit which the farmer has reason to expect from improved and cultivated land. If it is not, they will soon cease to feed them. Whatever part of this price, therefore, is not paid by the wool and the hide, must be paid by the carcase. The less there is paid for the one, the more must be paid for the other. In what manner this price is to be divided upon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east, is indifferent to the landlords and farmers, provided it is all paid to them. In an improved and cultivated country, therefore, their interest as landlords and farmers cannot be much affected by such regulations, though their interest as consumers may, by the rise in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It would be quite otherwise, however, in an unimproved and uncultivated country, whe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ands could be applied to no other purpose but the feeding of cattle, and where the wool and the hide made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 value of those cattle. Their interest as landlords and farmers would in this case be very deeply affected by such regulations, and their interest as consumers very little. The fall in the price of the wool and the hide, would not in this case raise the price of the carcase; becaus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ands of the country being applicable to no other purpose but the feeding of cattle, the same number would still continue to be fed. The same quantity of butcher's meat would still come to market. The demand for it would be no greater than before. Its price, therefore, would be the same as before. The whole price of cattle would fall, and along with it both the rent and the profit of all those lands of which cattle was the principal produce, that i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ands of the country. The perpetual prohibition of the exportation of wool, which is commonly, but very falsely, ascribed to Edward III, would, in the then circumstances of the country, have been the most destructive regulation which could well have been thought of. It would not only have reduced the actual valu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ands of the kingdom, but by reducing the pric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pecies of small cattle, it would have retarded very much its subsequent improvement.

在已改良并耕作的国家，不论何种规定，如果旨在降低兽毛价格或兽皮价格，使其低于自然应有的水平，就一定有提高兽肉价格的倾向。农民在改良并耕作的土地上饲养的牲畜，其价格必须足够支付土地所有者有理由从改良的耕地上期望获得的地租，以及支付农场主有理由从改良的耕地上期望获得的利润，否则他们不久将不再饲养这些牲畜。因此在这个价格中，兽毛和兽皮没有支付的那部分无论多少，都要由兽肉来支付。兽毛和兽皮支付的少，兽肉支付的就要多；兽毛和兽皮支付的多，兽肉支付的就少。土地所有者只要获取地租，农场主只要获取利润，至于毛、皮、肉的价格在一头牲畜的全部价格中所占的比例如何，他们并不关心。由此看来，在改良和耕作的国家，尽管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受到肉价上涨的影响很大，但却绝不会因这类规定而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在未经改良和耕作的国家，情况却完全相反。在这些国家，大部分土地都用来饲养牲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用途。兽毛和兽皮构成牲畜价格的主要部分，兽肉只占极少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的利益就会因上述规定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但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受到的影响确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毛、皮价格的下降并不会导致肉价上升。因为该国大部分土地除了饲养牲畜外没有其他用途，所以即使毛、皮的价格下降，人们也只好继续饲养相同数量的牲畜。相同数量的鲜肉仍会被送入市场，人们对鲜肉的需求不会比以前大，因此鲜肉的价格和以前相同。肉价保持不变，毛价却下降了，因此整个牲畜的价格下降，以牲畜为主要产物的所有土地（即该国大部分土地）的地

租和利润也因而下降。因此，永久禁止羊毛出口的规定（这种规定通常被认为是爱德华三世制定的，实则不然）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是最有破坏性的规定。这个规定的实行不仅降低了国家大部分土地的真实价值，而且降低了一种最重要的小牲畜的价格，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推迟了土地随后的改良。

The wool of Scotland fell very considerably in its price in consequence of the union with England, by which it was excluded from the great market of Europe, and confined to the narrow one of Great Britain. The valu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ands in the southern counties of Scotland, which are chiefly a sheep country, would have been very deeply affected by this event, had not the rise in the price of butcher's meat fully compensated the fall in the price of wool.

苏格兰自从与英格兰合并后，其羊毛价格大幅下降，因为苏格兰羊毛自合并时起便被排除在欧洲大市场之外，只能局限在大不列颠这个狭小的小市场之中。如果不是鲜肉价格的上升充分补偿了羊毛价格的下降，苏格兰南部各郡主要用于牧羊业的大部分土地的价值一定会受到这次合并极大的影响。

As the efficacy of human industry, in increasing the quantity either of wool or of raw hides, is limited, so far as it depends upon the produce of the country where it is exerted; so it is uncertain so far as it depends upon the produce of other countries. It so far depends, not so much upon the quantity which they produce, as upon that which they do not manufacture; and upon the restraints which they may or may not think proper to impose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this sort of rude produce. These circumstances, as

they are altogether independent of domestic industry, so they necessarily render the efficacy of its efforts more or less uncertain. In multiplying this sort of rude produce, therefore, the efficacy of human industry is not only limited, but uncertain.

在增加羊毛或生皮的数量方面，一方面由于受到本国所产羊毛或生皮数量的影响，人类的努力能够产生的效果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其他国家所产羊毛或生皮数量的影响，人类的努力能够产生的效果并不确定。人类的努力能产生多大的效果，与其说取决于其他国家生产的羊毛和生皮的数量，倒不如说取决于其他国家不能自行加工的羊毛和生皮的数量，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认为应对这类天然生产物的出口加以限制。这些情况都与本国人民的努力毫不相干，因此人类在这方面的努力所产生的效果不仅受到限制，而且是不确定的。

In multiplying another very important sort of rude produce, the quantity of fish that is brought to market, it is likewise both limited and uncertain. It is limited by the local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by the proximity or distance of its different provinces from the sea, by the number of its lakes and rivers, and by what may be called the fertility or barrenness of those seas, lakes and rivers, as to this sort of rude produce. As population increases, as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grows greater and greater, there come to be more buyers of fish, and those buyers, too, have a greater quantity and variety of other goods, or, what is the same thing, the price of a greater quantity and variety of other goods, to buy with. But it will generally be impossible to supply the great and extended market without employing a quantity of labour greater than in proportion to what had been requisite for supplying the narrow and confined one. A market which, from requiring only one thousand, comes to require annually ten thousand tons of fish, can

seldom be supplied without employing more than ten times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had before been sufficient to supply it. The fish must generally be sought for at a greater distance, larger vessels must be employed, and more expensive machinery of every kind made use of. The real price of this commodity, therefore, naturally rises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It has accordingly done so, I believe, more or less in every country.

在增加另一种极其重要的天然生产物即鱼的上市数量时，人类努力所产生的效果也是有限的或者不确定的。它一定受到当地地理位置的限制，受到距离海洋的远近、内地江河的多少、这些河海中这类天然生产物丰富与否等等因素的限制。当人口增多、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增多时，鱼的购买者也一定增多，这些购买者也拥有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其他货物，换句话说，拥有能够用来买鱼的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其他货物的价格。但是，要供应这扩大了的市场，所投入的劳动数量如果不增多到超过市场扩大的比例，那就不能满足这扩大了的需要。例如，原来每年只需要1000吨鱼的市场，如扩大到需要1万吨鱼，那么，为供应这个市场而增加的劳动数量必须超过10倍才能满足这种扩大了的需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鱼类一般要从较远的地方运来，必须要用更大的渔船，更贵的捕鱼工具。因此，这种商品的真实价格在改良的进程中自然会上涨。我相信在每个国家，鱼价都或多或少地上升了。

Though the success of a particular day's fishing may be a very uncertain matter, yet, the local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being supposed, the general efficacy of industry in bringing a certain quantity of fish to market, taking the course of a year, or of several years together, it may perhaps be thought, is certain enough; and it, no doubt, is so. As it depends more, however, upon the local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than upon the state of its wealth and

industry; as upon this account it ma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be the same in very different periods of improvement, and very different in the same period;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state of improvement is uncertain, and it is of this sort of uncertainty that I am here speaking.

虽然一天捕鱼的数量非常难以确定，但假定一国的当地情况不变，就一年或几年来说，人类努力所产生的一般效果，即人类通常努力能将多少数量的鱼送往市场是相当确定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但是，由于人类努力所产生的效果更多地取决于一国的当地情况，较少取决于一国财富的多少和人民努力程度的大小，所以，两个国家即使处于极其不同的改良阶段，人类在渔业上努力所产生的效果也可能基本相同；即使处于相同的改良阶段，人类努力所产生的效果也可能大不相同。人类努力的效果与改良状态的关系是很不确定的。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性。

In increasing the quantity of the different minerals and metals which are drawn from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that of the more precious ones particularly, the efficacy of human industry seems not to be limited, but to be altogether uncertain.

在增加从地下开采出的各种矿物和金属，尤其是比较昂贵的贵金属的数量时，人类努力所产生的效果虽然似乎不受限制，但却完全无法确定。

The quantit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which is to be found in any country is not limited by anything in its local situation, such as the fertility or barrenness of its own mines. Those metals frequently

abound in countries which possess no mines. Their quantity in every particular country seems to depend upon two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first, upon its power of purchasing, upon the state of its industry, upon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in consequence of which it can afford to employ a greater or a smaller quantity of labour and subsistence in bringing or purchasing such superfluities as gold and silver, either from its own mines or from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secondly, upon the fertility or barrenness of the mines which may happen at any particular time to supply the commercial world with those metals. The quantity of those metals in the countries most remote from the mines, must be more or less affected by this fertility or barrenness, on account of the easy and cheap transportation of those metals, of their small bulk and great value. Their quantity in China and Indostan must have been more or less affected by the abundance of the mines of America.

任何国家拥有贵金属的数量，并不受该国任何当地情况，如矿山的富饶或贫瘠程度的限制。没有矿山的国家常常往拥有大量的贵金属。无论什么国家，其所拥有的贵金属数量似乎取决于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取决于该国的购买力，取决于其产业状态，取决于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因为这些因素决定着该国能用多少劳动和生活资料开采本国矿山的金银或购买他国矿山的金银等非必需品；第二，取决于在一定时间内向商业世界供应金银的矿山的富饶或贫瘠程度。由于金银运输起来比较容易，运费低廉，而且体积小、价值大，所以，即使是离矿山很远的国家，其金银数量必然也或多或少要受这些金银矿山富饶或贫瘠程度的影响。中国和印度斯坦的金银数量曾经久或多或少受到美洲各富饶矿山的影响。

So far as their quantity in any particular country depends upon

the former of those two circumstances (the power of purchasing), their real price, like that of all other luxuries and superfluities, is likely to rise with the wealth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ountry, and to fall with its poverty and depression. Countries which have a great quantity of labour and subsistence to spare, can afford to purchase any particular quantity of those metals at the expence of a greater quantity of labour and subsistence, than countries which have less to spare.

就一国的金银数量取决于上述第一种情况（该国的购买力）来说，金银的真实价格和其他所有奢侈品、非必需品的真实价格一样，很可能随该国财富的增加和改良的发展而上升，随该国的贫困和衰退而下降。这是因为，持有大量剩余劳动和生活资料的国家，和只持有少量剩余劳动和生活资料的国家相比，能够花费更多的劳动和生活资料去购买任何数量的贵金属。

So far as their quantity in any particular country depends upon the latter of those two circumstances (the fertility or barrenness of the mines which happen to supply the commercial world) their real price, the real quantity of labour and subsistence which they will purchase or exchange for, will, no doubt, sink more or less in proportion to the fertility, and rise in proportion to the barrenness, of those mines.

就一国的金银数量取决于第二种情况（在一定时间内向商业世界供应金银的矿山的富饶或贫瘠程度）来说，金银的真实价格，换句话说，金银所能购买或交换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数量，一定会随着矿山的富饶程度而或多或少地下降，随着矿山的贫瘠程度而或多或少地上升。

The fertility or barrenness of the mines, however, which may happen at any particular time to supply the commercial world, is a circumstance which, it is evident, may have no sort of connection with the state of industry in a particular country. It seems even to have no very necessary connection with that of the world in general. As arts and commerce, indeed, gradually spread themselves over a greater and a greater part of the earth, the search for new mines, being extended over a wider surface, may have somewhat a better chance for being successful, than when confined within narrower bounds. The discovery of new mines, however, as the old ones come to be gradually exhausted, is a matter of the greatest uncertainty, and such as no human skill or industry can ensure. All indications, it is acknowledged, are doubtful, and the actual discovery and successful working of a new mine can alone ascertain the reality of its value, or even of its existence. In this search there seem to be no certain limits either to the possible success, or to the possible disappointment of human industry. In the course of a century or two, it is possible that new mines may be discovered more fertile than any that have ever yet been known; and it is just equally possible that the most fertile mine then known may be more barren than any that was wrought before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es of America. Whether the one or the other of those two events may happen to take place, is of very little importance to the real wealth and prosperity of the world, to the real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mankind. Its nominal value,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by which this annual produce could be expressed or represented, would, no doubt, be very different; but its real value, the real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it could purchase or command, would be precisely the same. A shilling might in the one case represent no more labour than a penny does at present; and a penny in the other might represent as much as a shilling does now.

But in the one case he who had a shilling in his pocket, would be no richer than he who has a penny at present; and in the other he who had a penny would be just as rich as he who has a shilling now. The cheapness and abundance of gold and silver plate, would be the sole advantage which the world could derive from the one event, and the dearness and scarcity of those trifling superfluities the only inconveniency it could suffer from the other.

但很明显，在一定的时间内向商业世界供应金银的矿山的富饶或贫瘠程度，与一国的产业状态似乎没有关系，而且似乎与世界整体的产业状态也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的确，当技术和商业逐渐传播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时，人们对新矿山的寻找也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那么发现新矿山的机会一定比在狭窄地区找到的机会大一些。但在旧矿山逐渐枯竭时，能否发现新矿山是一件非常没有把握的事情，绝非人类的技巧和努力所能保证。只有新矿山被实际发现和成功开采后，才能确定新矿山的价值，甚至才能确定新矿山的存在，否则其他一切迹象都不可靠，这是世所公认的。在寻找新矿山的时候，人类的努力成功或不成功的可能性似乎都没有一定的限度。在今后的一两个世纪中，也许能发现比现在已知的矿山更为富饶的新矿山，而到了那个时候，现在最富饶的矿山将比美洲各矿山发现以前开采的任何矿山还要贫瘠。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无论哪一种情况，对于世界的真实财富和繁荣，换句话说，对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真实价值都是无关重要的。这些年产物的名义价值，换句话说，表示或代表这些年产物的金银的数量，无疑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些年产物的真实价值，换句话说，这些年产物所能购买或支配的真实的劳动数量，却完全一样。在第一种情况下，1先令代表的劳动数量可能不会超过今天1便士所能代表的劳动数量。在第二种情况下，1便士代表的劳动数量可能与今天1先令代表的劳动数量一样多。但在第一种情况下，持有1先令的人并不比今天持有1便士的人富有，在第二种情况下，持有1便士的人也并不比今天持有1先令的人贫穷。人类在第一种情况下享受到的唯一利益就是金银器皿的低廉和丰富，人类在第二种情况下蒙受

的唯一不利就是这些不重要的非必需品的昂贵与稀少。

Conclusion of the Digression concerning the Variations in the Value of Silver

关于白银的价值变动的结论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writers who have collected the money prices of things in ancient times, seem to have considered the low moneyprice of corn, and of goods in general, or, in other words, the high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as a proof, not only of the scarcity of those metals, but of the poverty and barbarism of the country at the time when it took place. This notion is connected with the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which represents national wealth as consisting in the abundance, and national poverty in the scarcity, of gold and silver; a system which I shall endeavour to explain and examine at great length in the fourth book of this enquiry. I shall only observe at present, that the high valu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can be no proof of the poverty or barbarism of any particular country at the time when it took place. It is a proof only of the barrenness of the mines which happened at that time to supply the commercial world. A poor country, as it cannot afford to buy more, so it can as little afford to pay dearer for gold and silver than a rich one; and the value of those metals, therefore, is not likely to be higher in the former than in the latter. In China, a country much richer than any part of Europe, the valu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s much higher than in any part of Europe. As the wealth of Europe, indeed, has increased greatly since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es of America, so the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has gradually diminished. This

diminution of their value, however, has not been owing to the increase of the real wealth of Europ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but to the accidental discovery of more abundant mines than any that were known before. The increase of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in Europe, and the increase of its manufactures and agriculture, are two events which, though they have happened nearly about the same time, yet have arisen from very different causes, and have scarce any natural connection with one another. The one has arisen from a mere accident, in which neither prudence nor policy either had or could have any share. The other from the fall of the feudal system, an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overnment which afforded to industry the only encouragement which it requires, some tolerable security that it shall enjoy the fruits of its own labour. Poland, where the feudal system still continues to take place, is at this day as beggarly a country as it was before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money price of corn, however, has risen; the real valu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has fallen in Poland,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other parts of Europe. Their quantity, therefore, must have increased there as in other places, and nearly in the same proportion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This increase of the quantity of those metals, however, has not, it seems, increased that annual produce, has neither improved the manufactures and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ry, nor mended the circumstances of its inhabitants. Spain and Portugal, the countries which possess the mines, are, after Poland, perhaps, the two most beggarly countries in Europe. The valu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however, must be lower in Spain and Portugal than in any other part of Europe; as they come from those countries to all other parts of Europe, loaded, not only with a freight and an insurance, but with the expence of smuggling, their exportation being either prohibited, or subjected to a duty. In proportion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therefore,

their quantity must be greater in those countries than in any other part of Europe. Those countries, however, are poorer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Though the feudal system has been abolished in Spain and Portugal, it has not been succeeded by a much better.

搜集古代商品货币价格的大多数学者似乎都认为，谷物和一般物品的货币价格低廉，换句话说，金银的价值高昂，不仅能够证明一国当时拥有的金银数量稀缺，而且能够证明该国当时处于野蛮和贫穷状态。这种观念和那种“一国富裕就是金银的富足、一国贫穷就是金银的稀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分不开的。我将在本书第四篇对这种经济学体系作详细的说明，在这里我只想陈述以下事实，即金银价值的昂贵只能证明向商业世界供给金银的各矿山处于贫瘠的状态，但并不能说明这个国家就是贫穷与野蛮的。穷国不能像富国那样购买大量的金银，也不能对金银支付那么高的价格。所以金银的价值在穷国绝不会比在富国更高。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都要富得多，但贵金属的价值在中国却比在欧洲各国都要高得多。诚然，自美洲矿山发现以来，欧洲的财富已大幅增加，同时金银的价值也逐渐下降，但这种价值的下降并不是欧洲的真实财富增加的结果，或者说欧洲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增加的结果，而是人们偶然发现比已知的任何矿山都要富饶的新矿山的结果。虽然欧洲金银数量的增加与其制造业和农业的发达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期，但两者的原因却极为不同，彼此间也没有任何自然的联系。金银数量的增加起因于偶然事件，与任何思虑和政策都无关，而且任何思虑和政策也对此无能为力。制造业和农业之所以发达，原因在于封建制度的灭亡和新政府的成立。新政府给予了制造业和农业这两个产业需要的唯一鼓励，即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人能够享受各人劳动的果实。波兰至今仍存在封建制度，和美洲发现以前差不多一样贫穷。然而波兰也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谷物的货币价格升高了，金银的真实价值下降了。由此可见在波兰，贵金属的数量也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增加了，增加的数量，就其相对于该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比例来说，也和其他国家几乎相同。但是，这种贵金属数量

的增加，似乎并没有增加该国的年产物，没有改良该国的制造业和农业，更没有改善该国居民的境况。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在美洲拥有许多矿山，但它们恐怕是欧洲各国中仅次于波兰的两个最贫穷的国家了。不过，贵金属的价值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却一定比欧洲其他国家要低，这是因为，贵金属是从这两个国家运往欧洲各地的，因此欧洲其他地方的贵金属价格不仅要附加运费和保险费，而且由于这两国的金银出口或被禁止或需缴纳重税，还要承担走私的费用。所以，就其相对于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比例来说，贵金属的数量在这两国一定比在欧洲其他国家要多，但这两个国家却比欧洲其他国家贫穷，虽然它们已经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新建立的并非是更好的制度。

As the low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therefore, is no proof of the wealth and flourishing state of the country where it takes place; so neither is their high value, or the low money price either of goods in general, or of corn in particular, any proof of its poverty and barbarism.

正如金银价值的下降并不能证明一国的富裕和繁荣，金银价值的上升，换句话说，谷物和一般物品货币价格的下降，也不能证明一国的贫困和野蛮。

But though the low money price either of goods in general, or of corn in particular, be no proof of the poverty or barbarism of the times, the low money price of some particular sorts of goods, such as cattle, poultry, game of all kinds, etc.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corn, is a most decisive one. It clearly demonstrates, first, their great abundance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corn, and consequently the great extent of the land which they occupied in proportion to what was occupied by corn; and, secondly, the low value of this land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corn land, and consequently the uncultivated and unimproved state of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lands of the country. It clear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stock and 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 did not bear the same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its territory, which they commonly do in civilised countries, and that society was at that time, and in that country, but in its infancy. From the high or low money price either of goods in general, or of corn in particular, we can infer only that the mines which at that time happened to supply the commercial world with gold and silver, were fertile or barren, not that the country was rich or poor. But from the high or low money price of some sorts of goods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others, we can infer, with a degree of probability that approaches almost to certainty, that it was rich or poor,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its lands were improved or unimproved, and that it was either in a more or less barbarous state, or in a more or less civilised one.

但是，虽然一般物品尤其是谷物货币价格的低廉，并不能证明一国的贫困和野蛮，但牲畜、家禽和各种猎物等物品的货币价格与谷物的货币价格的比例低这个事实却足以证明一国的贫困和野蛮。这类物品货币价格的低廉明显证明了以下两个事实：第一，这类物品的数量比谷物更丰富，因此它们占有的土地面积比谷物占有的土地面积大；第二，这里物品占有的土地价值比谷物占有的土地价值低廉，因此该国大部分土地尚未改良和耕作。这两个事实可以证明，该国的资本和人口相对于其领土面积的比例，与文明国家的一般比例不同，因此该国的社会正处于初级阶段。总之，根据一般物品尤其是谷物的货币价格的高低，我们只能判断出当时向商业世界供应金银的各矿山的富饶和贫瘠程度，绝不能判断出该国的贫富。但是根据某类货物的货币价格与其他货物的货币价格比例的高低，我们却可以几乎完全准确地推断出一国是富裕还是贫困的，该国的大部分土地是否已得到改良，该国的社会状态是接近野蛮还是接近文明。

Any rise in the money price of goods which proceeded altogether from the degradation of the value of silver, would affect all sorts of goods equally, and raise their price universally a third, or a fourth, or a fifth part higher, according as silver happened to lose a third, or a fourth, or a fifth part of its former value. But the rise in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which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so much reasoning and conversation, does not affect all sorts of provisions equally. Taking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at an average, the price of corn, it is acknowledged, even by those who account for this rise by the degradation of the value of silver, has risen much less than that of some other sorts of provisions. The rise in the price of those other sorts of provisions, therefore, cannot be owing altogether to the degradation of the value of silver. Some other causes must be taken into the account, and those which have been above assigned, will, perhaps, without having recourse to the supposed degradation of the value of silver, sufficiently explain this rise in those particular sorts of provisions of which the price has actually risen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corn.

完全由于白银价值的下降而造成的物品货币价格的上涨，对所有物品的影响几乎相同，即白银的价值若减少1/3、1/4或1/5，所有物品的货币价格也将相应地普遍抬高1/3、1/4或1/5。但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食物价格的上涨对各种食物价格的影响却不尽相同。就本世纪的平均水平来看，人们普遍认为，即使是那些将谷物价格的上升归因于白银价值下降的人也承认，谷物价格的上涨大大低于其他食物价格的上涨。由此可知，我们绝不能将谷物价格的上涨完全归因于白银价值的下降，还必须考虑其他原因。上面提出的那些原因也许已足够说明（无须假设白银的价值下降），为什么这些食物价格的上涨其实是与谷物同比例上涨的。

As to the price of corn itself, it has, during the sixty-four first years of the present century, and before the late extraordinary course of bad seasons, been somewhat lower than it was during the sixty-four last years of the preceding century. This fact is attested, not only by the accounts of Windsor market, but by the public fiars of all the different counties of Scotland, and by the accounts of several different markets in France, which have been collected with great diligence and fidelity by Mr. Messanceand by Mr. Duprè de St. Maur. The evidence is more complete than could well have been expected in a matter which is naturally so very difficult to be ascertained.

在本世纪的前64年间，以及最近的异常歉收的时期以前，谷物的价格较上个世纪后64年略低。英格兰温莎市场的价格表，苏格兰各郡的公定谷价表，以及法国麦桑斯和杜普雷·德圣莫尔辛苦搜集的法国许多市场的账簿都可以证明这个事实。这件事情本来很难证明，但现在看来证据比我们期望的还要充分。

As to the high price of corn during these last ten or twelve years, it can be sufficiently accounted for from the badness of the seasons, without supposing any degradation in the value of silver.

至于最近10年或12年间高昂的谷物价格，年成不好这个理由就足以解释，无须假定白银的价值有任何下降。

The opinion, therefore, that silver is continually sinking in its value, seems not to be founded upon any good observations, either upon the prices of corn, or upon those of other provisions.

因此，认为白银的价值在不断下降的这种观点似乎没有以任何准确的观察为基础，既没有对谷物价格进行观察，也没有对其他食物价格进行观察。

The same quantity of silver, it may, perhaps, be said, will in the present times, even according to the account which has been here given, purchase a much smaller quantity of several sorts of provisions than it would have done during some part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to ascertain whether this change be owing to a rise in the value of those goods, or to a fall in the value of silver, is only to establish a vain and useless distinction, which can be of no sort of service to the man who has only a certain quantity of silver to go to market with, or a certain fixed revenue in money. I certainly do not pretend that the knowledge of this distinction will enable him to buy cheaper. It may not, however, upon that account be altogether useless.

或许有人会说，即使根据上面的描述，同等数量的白银在今天所能购得的某种食物数量，也比上个世纪所能购得的该种食物数量少得多。他们还认为，区分这个变化究竟是由于食物价值的上涨还是由于白银价值的下降是徒劳无用的，这对一个只携带一定数量的白银去做买卖或只有固定数量的货币收入的人来说并无帮助。我当然不敢说，掌握这种区分能够帮助这些人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货物，但绝不能因此就说这种区分全无用处。

It may be of some use to the public by affording an easy proof of the prosperous condition of the country. If the rise in the price of some sorts of provisions be owing altogether to a fall in the value of

silver, it is owing to a circumstance from which nothing can be inferred but the fertility of the American mines. The real wealth of the country,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may, notwithstanding this circumstance, be either gradually declining, as in Portugal and Poland; or gradually advancing, as in most other parts of Europe. But if this rise in the price of some sorts of provisions be owing to a rise in the real value of the land which produces them, to its increased fertility; or, in consequence of more extended improvement and good cultivation, to its having been rendered fit for producing corn; it is owing to a circumstance which indicates in the clearest manner the prosperous and advancing state of the country. The land constitutes by far the greatest,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most durable part of the wealth of every extensive country. It may surely be of some use, or, at least, it may give some satisfaction to the public, to have so decisive a proof of the increasing value of by far the greatest,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most durable part of its wealth.

这种区分可以很容易得证明一国的繁荣程度，这也许对大众有些用处。如果某种食物价格的上升完全是由于白银价值的下降，那么由此只能推断出美洲的银矿十分富饶，不能得出其他推断。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的真实财富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就会逐渐下降，像葡萄牙和波兰那样，或者逐渐增加，像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那样。但如果这些食物价格的上升是由于生产该食物的土地的真实价值的增大，即由于该土地变得更肥沃，或者是由于广泛的改良和更好的耕作使土地更适合生产谷物，那我们由此可以断定，该国正处于繁荣和进步的状态。土地构成所有大国的财富中最大、最重要也是最持久的那一部分。上述的那种区分既然能够提供决定性证据，证明国家财富中最大、最重要以及最持久的那部分的价值是否上升，那么对公众无疑是有一些用处的，起码能使公众感到些许满足。

It may, too, be of some use to the public in regulating the pecuniary reward of some of its inferior servants. If this rise in the price of some sorts of provisions be owing to a fall in the value of silver, their pecuniary reward, provided it was not too large before, ought certainly to be augmented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this fall. If it is not augmented, their real recompence will evidently be so much diminished. But if this rise of price is owing to the increased value, in consequence of the improved fertility of the land which produces such provisions, it becomes a much nicer matter to judge either in what proportion any pecuniary reward ought to be augmented, or whether it ought to be augmented at all. The extension of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as it necessarily raises more or less, in proportion to the price of corn, that of every sort of animal food, so it as necessarily lowers that of, I believe, every sort of vegetable food. It raises the price of animal food; because a great part of the land which produces it, being rendered fit for producing corn, must afford to the landlord and farmer the rent and profit of cornland. It lowers the price of vegetable food; because, by increasing the fertility of the land, it increases its abundance. The improvements of agriculture, too, introduce many sorts of vegetable food, which, requiring less land and not more labour than corn, come much cheaper to market. Such are potatoes and maize, or what is called Indian corn, the two most important improvements which the agriculture of Europe, perhaps, which Europe itself, has received from the great extension of its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Many sorts of vegetable food, besides, which in the rude state of agriculture are confined to the kitchen-garden, and raised only by the spade, come in its improved state to be introduced into common fields, and to be raised by the plough: such as turnips, carrots, cabbages, etc. If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therefore, the real price of one species of food necessarily rises, that of another as necessarily falls, and it becomes a matter of more nicety to judge

how far the rise in the one may be compensated by the fall in the other. When the real price of butcher's meat has once got to its height (which, with regard to every sort, except, perhaps, that of hogs flesh, it seems to have done through a great part of England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any rise which can afterwards happen in that of any other sort of animal food, cannot much affec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poor through a great part of England cannot surely be so much distressed by any rise in the price of poultry, fish, wild-fowl, or venison, as they must be relieved by the fall in that of potatoes.

不但如此，这种区分在规定某些低级雇工的货币报酬时，对公众可能也有些用处。若某种食物价格的上升是由于白银价值的下降，那么如果这些低级雇工的货币报酬从前不是太高，肯定按照白银价值下降的比例增加，反之，低级雇工们的真实报酬将按照白银价值下降的同一比例减少。但如果食物价格的上涨是由于生产它们的土地变得更肥沃使得土地价值提高，那么，他们的货币报酬要按什么比例提高，或者是否提高，就很难判断了。既然改良和耕作的扩大一定会使所有动物性食物与谷物的价格比例或多或少地提高，那么我相信，也一定会使所有植物性食物与谷物的价格比例或多或少地下降。它之所以能使动物性食物的价格上涨，是因为既然生产动物性食物的大部分土地已适合生产谷物，那么就得对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提供谷田的地租和利润。它之所以一定能使植物性食物的价格下降，是因为由于土地变得更肥沃，植物性食物的产量一定更加丰富。而且，农业的改良还会使许多植物性食物能以更低廉的价格（因为这些植物性食物所需土地与劳动比谷物少）上市。马铃薯和玉米，即所谓的印度玉米，都属于此类。这两者的改良可能是欧洲农业，或者说欧洲本身由于通商以及航海大发展而得到的最重要的改良。此外，当农业处于原始状态时，许多植物性食物仅能在菜园中用锄来栽种。农业得到改进后，这些植物就开始在一般农场内使用犁来栽种。芜青、胡萝卜和卷心菜等都属于此类。因此，在改良的进程中，如果一种食物的真实价格必然上

升，另一种食物的真实价格必然下降，那么就更难判定前一种食物价格的上涨会在多大程度上被后一种食物价格的下降抵消。鲜肉的价格一旦升到最高限度（除猪肉外，英格兰大部分地方的所有鲜肉似乎都在一个世纪前就达到了最高价格），此后其他动物性食物的价格无论如何上述，对一般下层人民的境况也不会产生大的影响。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穷人的境况，肯定不会因家禽、鱼类、野禽或鹿肉价格的上升而受到太大的困扰，因为马铃薯价格的下降能够给予他们一定的安慰。

In the present season of scarcity the high price of corn no doubt distresses the poor. But in times of moderate plenty, when corn is at its ordinary or average price, the natural rise in the price of any other sort of rude produce cannot much affect them. They suffer more, perhaps, by the artificial rise which has been occasioned by taxes in the price of some manufactured commodities; as of salt, soap, leather, candles, malt, beer, and ale, etc.

在当前歉收的年份，高昂的谷价无疑会使穷人受到困扰。但在一般的丰收年份，谷物按照普通价格或平均价格出售，其他天然生产物价格的自然上升不会对穷人造成太大的困扰。食盐、肥皂、皮革、麦芽、麦酒等制造品的价格因课税而人为地上涨，也许会给穷人造成一定的困扰。

Effects of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upon the real Price of Manufactures

改良的进程对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

It is the natural effect of improvement, however, to diminish gradually the real price of almost all manufactures. That of the manufacturing workmanship diminishes, perhaps, in all of them without exception. In consequence of better machinery, of greater dexterity, and of a more proper divi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ork, all of which are the natural effects of improvement, a much smaller quantity of labour becomes requisite for executing any particular piece of work; and though, in consequence of the flourishing circumstances of the society, the real price of labour should rise very considerably, yet the great diminution of the quantity will generally much more than compensate the greatest rise which can happen in the price.

但是，改良会自然而然地逐渐降低所有制造品的真实价格。随着改良，几乎所有制造品的价格都会无一例外地逐渐降低。更好的机器，更熟练的操作，更妥当的分工，这些都是改良的自然结果，都使任何工作所需的劳动数量大大减少。诚然，随着社会日益繁荣，劳动的真实价格一定大幅提高，但劳动数量的大大减少一定足以补偿劳动价格的任何上涨。

There are, indeed, a few manufactures, in which the necessary rise in the real price of the rude materials will more than compensate all the advantages which improvement can introduce into the execution of the work. In carpenters' and joiners' work, and in the coarser sort of cabinet work, the necessary rise in the real price of barren timber, in consequence of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will more than compensate all the advantages which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best machinery, the greatest dexterity, and the most proper divi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ork.

诚然，对于少数制造品来说，改良为其生产过程带来的所有好处，还不足以抵消其生产原料真实价格的提高。在普通木匠和细工木匠的工作中，在制作家具的粗活中，最好的机器，最熟练的操作，以及最妥当的分工能够带来的所有好处，恐怕还抵不过木材的真实价格由于土地改良而必然引起的上涨。

But in all cases in which the real price of the rude materials either does not rise at all, or does not rise very much, that of the manufactured commodity sinks very considerably.

但是，在原料的真实价格根本没有增长或增长十分有限的所有场合，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一定会大大下降。

This diminution of price has,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and preceding century, been most remarkable in those manufactures of which the materials are the coarser metals. A better movement of a watch, than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could have been bought for twenty pounds, may now perhaps be had for twenty shillings. In the work of cutlers and locksmiths, in all the toyswhich are made of the coarser metals, and in all those goods which are commonly known by the name of Birmingham and Sheffield ware, there has bee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 very great reduction of price, though not altogether so great as in watch-work. It has, however, been sufficient to astonish the workmen of every other part of Europe, who in many cases acknowledge that they can produce no work of equal goodness for double, or even for triple the price. There are perhaps no manufactures in which the division of labour can be carried further, or in which the machinery employed admits of a greater variety of improvements, than those

of which the materials are the coarser metals.

在本世纪和上世纪，价格下降最显著的要属那些以贱金属为原料的制造品了。一个质量较好的手表机芯，在上个世纪中期需要20镑才能买到，现在也许20先令就能买到。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刀匠和铁匠的产品，各种用粗金属制成的玩具，以及以伯明翰制造和谢菲尔德制造命名的所有商品，其价格下降的程度虽然没有手表制品那么大，但也足以使欧洲其他地方的工人感到震惊了。他们在许多场合都承认，即使以2-3倍的价格，他们也生产不出同样优良的产品了。也许没有什么制造品能比以贱金属为原料的制造品进行更精细的分工，或允许机器进行更大的改良了。

In the clothing manufacture there ha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been no such sensible reduction of price. The price of superfine cloth, I have been assured, on the contrary, has, within these five-and-twenty or thirty years, risen somewhat in proportion to its quality; owing, it was said, to a considerable rise in the price of the material, which consists altogether of Spanish wool. That of the Yorkshire cloth, which is made altogether of English wool, is said inde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o have fallen a good deal in proportion to its quality. Quality, however, is so very disputable a matter, that I look upon all information of this kind as somewhat uncertain. In the clothing manufacture,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nearly the same now as it was a century ago, and the machinery employed is not very different. There may, however, have been some small improvements in both, which may have occasioned some reduction of price.

在本世纪和上世纪，毛织业的制造品却没有出现这样显著的降

价。相反，据我所知，在最近的25年或30年里，最上等毛织物的相对于其质量还略有上涨。据说，这是因为这类毛织物的原料，即西班牙羊毛的价格大幅上涨。据说完全由英格兰羊毛制成的约克郡毛织物的价格，在本世纪相对于其质量已大幅下降。但是质量的好坏是一件非常有争议的事情，所以我对一切有关商品质量的说法都持某种怀疑态度。在毛织业中，现在的分工状况与一个世纪以前几乎一样，使用的机器也没有大的变化，但分工和机器可能都有小的改良，因此毛织物的价格略微下降。

Butthe reduction will appear much more sensible and undeniable, if we compare the price of this manufacture in the present times with what it was in a much remoter perio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hen the labour was probably much less subdivided, and the machinery employed much more imperfect than it is at present.

但是，如果我们把毛织业产品现在的价格和更远的15世纪末的价格（当时毛织业的分工很可能远没有现在精细，所用机器很可能远没有现在完善）比较，就会发现毛织业产品的价格下降得非常显著，而且不可否认。

In 1487, being the 4th of Henry VII. it was enacted, that “whosoever shall sell by retail a broad yard of the finest scarlet grained, or of other grained cloth of the finest making, above sixteen shillings, shall forfeit forty shillings for every yard so sold. “Sixteen shillings, therefore, containing about the same quantity of silver as four-and-twenty shillings of our present money, was, at that time, reckoned not an unreasonable price for a yard of the finest cloth; and as this is a sumptuary law, such cloth, it is

probable, had usually been sold somewhat dearer. A guinea may be reckoned the highest price in the present times. Even though the quality of the cloths, therefore, should be supposed equal, and that of the present times is most probably much superior, yet, even upon this supposition, the money price of the finest cloth appears to have been considerably reduced since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But its real price has been much more reduced. Six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was then, and long afterwards, reckoned the average price of a quarter of wheat. Sixteen shillings, therefore, was the price of two quarters and more than three bushels of wheat. Valuing a quarter of wheat in the present times at eight-and-twenty shillings, the real price of a yard of fine cloth must, in those times, have been equal to at least three pounds six shillings and sixpence of our present money. The man who bought it must have parted with the command of a quantity of labour and subsistence equal to what that sum would purchase in the present times.

1487年，即亨利七世第四年，曾颁布以下法令："最上等赤呢或最上等花呢每码的零售价格不得超过16先令，违者每码处罚金40先令"。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16先令（所含白银数量和今天的英币24先令大约相等）被看作是上等呢的合理单位价格了。当时颁布该法令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奢侈行为，由此可见当时上等呢的普通售价一定高于16先令/每码。现在1几尼/每码就算这种上等呢的最高价格了。这样说来，即使假定质量相同（实际上今天最上等呢的质量可能比当时好得多），最上等呢的货币价格自15世纪末以来也已经大幅下降，其真实价格下降的幅度更大。在当时和随后很久，6先令8便士都被看作每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所以16先令就是2夸特3蒲式耳多小麦的价格。如果现在小麦的价格按每夸特28先令计算，那么当时每码最上等呢的真实价格，至少等于现在的英币3镑6先令6便士。当时购买最上等呢的人，必须每码支付今天的3镑6先令6便士所能支配的劳动数量和生活资料的数量。

The reduction in the real price of the coarse manufacture, though considerable, has not been so great as in that of the fine.

粗呢的真实价格虽然也明显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没有上等呢那么大。

In 1463, being the 3rd of Edward IV. it was enacted, that “no servant in husbandry, nor common labourer, nor servant to any artificer inhabiting out of a city or burgh, shall use or wear in their clothing any cloth above two shillings the broad yard.” In the 3rd of Edward IV. two shillings contained very nearly the same quantity of silver as four of our present money. But the Yorkshire cloth which is now sold at four shillings the yard,is probably much superior to any that was then made for the wearing of the very poorest order of common servants. Even the money price of their clothing, therefore, may,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lity, be somewhat cheaper in the present than it was in those ancient times. The real price is certainly a good deal cheaper. Ten pence was then reckoned what is called the moderate and reasonable price of a bushel of wheat. Two shillings, therefore, was the price of two bushels and near two pecks of wheat, which in the present times, at three shillings and sixpence the bushel, would be worth eight shillings and nine pence. For a yard of this cloth the poor servant must have parted with the power of purchasing a quantity of subsistence equal to what eight shillings and nine pence would purchase in the present times. This is a sumptuary law too, restraining the luxury and extravagance of the poor. Their clothing, therefore, had commonly been much more expensive.

1463年即爱德华四世第三年，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凡农业佣工、普通劳动者以及住在城镇外的所有工匠雇佣的佣工，都不得使用或穿着每码2先令以上的呢绒。当时的2先令含有的白银数量和今天的英币4先令含有的白银数量大致相同，但是，现在每码值4先令的约克呢恐怕比当时最贫困的普通佣工使用的粗呢质量要好得多。所以，即使是这些人所穿衣物的货币价格，比例于其品质，在现在也比当时略低，衣物的真实价格肯定比当时更低。每蒲式耳10便士的小麦价格在当时被看作合理的价格。所以，2先令就是当时约2蒲式耳2配克小麦的合理价格。按每蒲式耳合3先令6便士计算，现在2蒲式耳2配克的小麦值8先令9便士。当时的贫困佣工每购买一码这种粗呢所需付出的生活资料的数量，相当于今天的8先令9便士所能购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但是，该法令的颁布也是为了限制穷人的奢侈行为和浪费行为，由此可见，当时穷人的普通穿着比现在昂贵得多。

The same order of people are, by the same law, prohibited from wearing hose, of which the price should exceed fourteen pence the pair, equal to about eight-and-twenty pence of our present money. But fourteen pence was in those times the price of a bushel and near two pecks of wheat, which, in the present times, at three and sixpence the bushel, would cost five shillings and three pence. We should in the present times consider this as a very high price for a pair of stockings to a servant of the poorest and lowest order. He must, however, in those times have paid what was really equivalent to this price for them.

该法令还规定，禁止最普通的佣工使用和穿着每双价格超过14便士（约等于今天的英币20便士）的长袜。当时的14便士大约是1蒲式耳2配克小麦的价格。按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计算，现在1蒲式耳2配克的小麦值5先令3便士。在今天看来，我们会觉得一双长袜5先令3便士的价格对最穷困和最底层的佣工来说是极高的价格，但在当时，这

些佣工们必须对长袜支付这个数目的价格。

In the time of Edward IV. the art of knitting stockings was probably not known in any part of Europe. Their hose were made of common cloth, which may have been one of the causes of their dearness. The first person that wore stockings in England is said to have been Queen Elizabeth. She received them as a present from the Spanish ambassador.

在爱德华四世时代，欧洲任何地区可能都不知道编织长袜的技术。当时人们穿的长袜都是用普通布匹制成的，这也许长袜价格昂贵的原因。据说英格兰最先穿长袜的人是女王伊丽莎白，她的长袜是西班牙大使赠送的。

Both in the coarse and in the fine woollen manufacture, the machinery employed was much more imperfect in those ancient, than it is in the present times. It has since received three very capital improvements, besides, probably, many smaller ones of which it may be difficult to ascertain either the number or the importance. The three capital improvements are: first, the exchange of the rock and spindle for the spinning-wheel, which, with the same quantity of labour, will perform more than double the quantity of work. Secondly, the use of several very ingenious machines which facilitate and abridge in a still greater proportion the winding of the worsted and woollen yarn, or the proper arrangement of the warp and woof before they are put into the loom; an operation which, previous to the invention of those machines, must have been extremely tedious and troublesome. Thirdly, the employment of the fulling mill for thickening the cloth,

instead of treading it in water. Neither wind nor water mills of any kind were known in England so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nor, so far as I know, in any other part of Europe north of the Alps. They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Italy some time before.

在粗毛织业和细毛织业中，过去所使用的机器也不如现在这样完善。这些机器近数百年来曾得到三次大的改良，此外还有多次小的改良（小改良的次数和重要性现在很难确定）。三次大的改良如下：第一，以纺条和纺锤代替纺轮，从而使得同等数量的劳动能够完成两倍以上的工作。第二，使用多种巧妙的机器，大大便利和简化绒线及毛线的卷绕，或经纬线在上机前的妥善安排，在这些巧妙的机器尚未发明时，这种工作一定极其单调、麻烦。第三，使用漂布机来浆洗呢绒，代替以往在水中踩踏呢绒使布密致的方法。在16世纪初期，英格兰各地还未使用任何种类的水车和风车，据我所知，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各国也不知道。几年前它们被引入意大利。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se circumstances may, perhaps, in some measure explain to us why the real price both of the coarse and of the fine manufacture, was so much higher in those ancient, than it is in the present times. It cost a greater quantity of labour to bring the goods to market. When they were brought thither, therefore, they must have purchased or exchanged for the price of a greater quantity.

这些情况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古代的粗呢和细呢比现在昂贵。在古代，将这些货物送入市场需要花费更多的劳动，因此货物上市后，就必须交换或购买更多数量的劳动价格。

The coarse manufacture probably was, in those ancient times, carried on in England, in the same manner as it always has been in countries where arts and manufactures are in their infancy. It was probably a household manufacture, in which every different part of the work was occasionally performed by all the different members of almost every private family; but so as to be their work only when they had nothing else to do, and not to be the principal business from which any of them derive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subsistence. The work which is performed in this manner,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comes always much cheaper to market than that which is the principal or sole fund of the workman's subsistence. The fine manufacture, on the other hand, was not in those times carried on in England, but in the rich and commercial country of Flanders; and it was probably conducted then, in the same manner as now, by people who derived the whole, or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ir subsistence from it. It was, besides, a foreign manufacture, and must have paid some duty, the ancient custom of tonnage and poundage at least, to the king. This duty, indeed, would not probably be very great. It was not then the policy of Europe to restrain, by high duties,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manufactures, but rather to encourage it, in order that merchants might be enabled to supply, at as easy a rate as possible, the great men with the conveniencies and luxuries which they wanted, and which the industry of their own country could not afford them.

古代英格兰粗毛织业的经营方式，可能与今天工艺和制造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国家常用的经营方式相同。它可能是一种家庭制造业，工作的各个部分差不多由每个家庭的每个成员不定期地完成。但家庭成员通常只在没有其他工作可做时才做这种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他们大部分生活资料的来源。我在前面已经说明，劳动者当作副业生产的产品，其价格总比作为劳动者生活资料主要或唯一来源的产品的价格

低得多。细毛织业在古代并不由英格兰经营，而是富裕的商业国弗兰德经营。在当时的弗兰德，从事细毛织业的从工作中获得全部或大部分的生活资料，细毛织业的经营方式大概和现在相同。此外，当时的弗兰德制品对于英格兰来说是一种外国制造品，必须向英格兰国王缴纳若干赋税，至少也得缴纳古老的关税，即吨税和磅税。当然，这些赋税可能都不是很高。当时欧洲国家的政策不是通过设置高额关税以限制进口外国商品，而是鼓励外国商品的进口，从而使得商人能够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向人们供应他们需要而本国却无力提供的便利品和奢侈品。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se circumstances may perhaps in some measure explain to us why, in those ancient times, the real price of the coarse manufacture was,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the fine, so much lower than in the present times.

这些情况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粗毛织品的真实价格，与细毛织品的真实价格的比例，在古代远远低于今天。

CONCLUSION OF THE CHAPTER

本章的结论

I shall conclude this very long chapter with observingthat every improvement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society tend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raise the real rent of land, to increase the real wealth of the landlord, his power of purchasing the labour, or the produce of the labour of other people.

我将以下面的论述结束这冗长的一章：一切社会状况的改良都直接或间接使土地的真实地租上升，使土地所有者的真实财富增大，使土地所有者对他人的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更大的购买力。

The extension of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tends to raise it directly. The landlord's share of the produce necessarily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roduce.

改良及耕作的扩大可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土地所有者所得的生产物份额，必然随生产物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That rise in the real price of those parts of the rude produce of land, which is first the effect of extended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and afterwards the cause of their being still further extended, the rise in the price of cattle, for example, tends too to raise the rent of land directly, and in a still greater proportion. The real value of the landlord's share, his real command of the labour of other people, not only rises with the real value of the produce, but the proportion of his share to the whole produce rises with it. That produce, after the rise in its real price, requires no more labour to collect it than before. A smaller proportion of it will, therefore, be sufficient to replace,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 the stock which employs that labour.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it must, consequently, belong to the landlord.

在土地天然生产物的真实价格中，地租那一部分的提高最初是土地改良和耕作扩大的结果，此后又是促进土地进一步改良和耕作进一

步扩大的原因。例如，牲畜价格的提高会直接而且以更大比例提高土地地租。土地所有者所占份额的真实价值，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支配他人劳动的实际能力，会随土地产品真实价值的提高而增大，而土地所有者在全部生产物中所占的份额也会随着土地产品真实价值的提高而增大。这种生产物在其真实价值提高以后，并不需要使用比以前多的劳动数量来取得它。因此，在土地全部生产物中，只需一小部分就足以补偿雇佣劳动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剩下的大部分生产物都归土地所有者所有。

All those improvements in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which tend directly to reduce the real price of manufactures, tend indirectly to raise the real rent of land. The landlord exchanges that part of his rude produce, which is over and above his own consumption,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the price of that part of it, for manufactured produce. Whatever reduces the real price of the latter, raises that of the former. An equal quantity of the former becomes thereby equivalent to a greater quantity of the latter; and the landlord is enabled to purchase a greater quantity of the conveniencies, ornaments, or luxuries, which he has occasion for.

劳动生产力的各种改良可能直接导致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下降，也可能间接导致土地的真实地租上升。土地所有者常常把他消费不了的天然生产物（或者说那部分生产物的价格）拿去交换制造品。凡是降低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的事物，都一定会提高天然生产物的真实价格，因为同等数量的天然生产物此时可以交换更多的制造品。土地所有者便能购买更多的他所需要的便利品、装饰品和奢侈品。

Every increase in the real wealth of the society, every increase

in the quantity of useful labour employed within it, tends indirectly to raise the real rent of land.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this labour naturally goes to the land. A greater number of men and cattle are employed in its cultivation, the produc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tock which is thus employed in raising it, and the rent increases with the produce.

社会真实财富的增加和社会雇佣的有用的劳动数量的增加，都会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这种增加的劳动数量自然按照一定比例流向土地。更多的人和牲畜从事土地耕作，土地生产物于是随着用于生产它的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而地租又随着生产物的增加而增加。

The contrary circumstances, the neglect of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the fall in the real price of any part of the rude produce of land, the rise in the real price of manufactures from the decay of manufacturing art and industry, the declension of the real wealth of the society, all tend, on the other hand, to lower the real rent of land, to reduce the real wealth of the landlord, to diminish his power of purchasing either the labour, or the produce of the labour of other people.

相反的情况则是，忽视耕作和改良，土地天然生产物的真实价格中任何组成部分的价格下降，制造技术的退步和产业衰退导致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上升，以及社会真实财富减少等等，这些情况都将降低土地的真实地租，减少土地所有者的真实财富，降低土地所有者对于他人劳动或劳动产品的购买力。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every

country,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the whole price of that annual produce, naturally divides itself,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into three parts; the rent of land, the wages of labour, and the profits of stock; and constitutes a revenue to three different orders of people; to those who live by rent, to those who live by wages, and to those who live by profit. These are the three great, original and constituent orders of every civilised society, from whose revenue that of every other order is ultimately derived.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任何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也就是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不同阶层人民的收入：以地租为生的人、以工资为生人和以利润为生的人。这三个阶层是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重要的基本阶层。所有其他阶层的收入归根结底都来自这三大阶层的收入。

The interest of the first of those three great orders, it appears from what has been just now said, is strictly and inseparably connected with the general interest of the society. Whatever either promotes or obstructs the one, necessarily promotes or obstructs the other. When the public deliberates concerning any regulation of commerce or police, the proprietors of land never can mislead it, with a view to promote the interest of their own particular order; at least, if they have any tolerable knowledge of that interest. They are, indeed, too often defective in this tolerable knowledge. They are the only one of the three orders whose revenue costs them neither labour nor care, but comes to them, as it were, of its own accord, and independent of any plan or project of their own. That indolence, which is the natural effect of the ease and security of their situation, renders them too often, not only ignorant, but

incapable of that application of mind which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foresee and understand the consequences of any public regulation.

由此可见，在这三大阶层中，第一个阶层即土地所有者阶层的利益和社会的一般利益密切相关。凡是促进或阻碍社会一般利益的，一定会促进或阻碍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土地所有者在参与公众对于商业规定和政策规定的讨论时，出于对本阶层利益的考虑，绝不会起误导作用，至少当他们对本阶层利益有一定了解时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徒弟所有者们常常对本阶层利益缺乏了解。他们是上述三个阶层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不费力不费心，更用不着任何计划与打算，就可以自然获得收入。这一阶层的安逸和稳定使他们自然变得懒惰。懒惰不仅常常使他们无知，而且使他们不会思考，不知道如何预测和了解任何公共规定的后果。

The interest of the second order, that of those who live by wages, is as strictly connected with the interest of the society as that of the first. The wages of the labourer, it has already been shown, are never so high as when the demand for labour is continually rising, or when the quantity employed is every year increasing considerably. When this real wealth of the society becomes stationary, his wages are soon reduced to what is barely enough to enable him to bring up a family, or to continue the race of labourers. When the society declines, they fall even below this. The order of proprietors may, perhaps, gain more by the prosperity of the society, than that of labourers: but there is no order that suffers so cruelly from its decline. But though the interest of the labourer is strictly connected with that of the society, he is incapable either of comprehending that interest, or of understanding its connection with his own. His condition leaves him no time to receive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and his education

and habits are commonly such as to render him unfit to judge even though he was fully informed. In the public deliberations, therefore, his voice is little heard and less regarded, except upon some particular occasions, when his clamour is animated, set on and supported by his employers, not for his, but their own particular purposes.

第二个阶层即靠工资为生的阶层的利益，同样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当对劳动的需求不断增加或当雇佣的劳动数量逐年大幅增加时，劳动者的工资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社会的真实财富不增不减时，劳动者的工资马上就会下降，仅够劳动者养家糊口，或者维持从事某种劳动的劳动者数量。当社会衰落时，劳动者工资甚至会降低到这一水平以下。劳动者在繁荣社会中不能享受土地所有者这一阶层那样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会中却要忍受任何阶层体验不到的痛苦。但是，虽然劳动者的利益和社会的一般利益密切相关，劳动者却能理解何为社会一般利益，更不能理解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劳动者的状况使他们没有时间接受必要的消息，即使有此时间，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养成的习惯也使他们无法对任何消息作出适当的判断。因此，在公众讨论时，劳动者几乎很少发声，就算发了声也很少受到重视，除非某些特殊的场合，雇主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会鼓动、激起并支持劳动者慷慨发言。

His employers constitute the third order, that of those who live by profit. It is the stock that is employed for the sake of profit, which puts into motio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useful labour of every society. The plans and projects of the employers of stock regulate and direct all the most important operations of labour, and profit is the end proposed by all those plans and projects. But the rate of profit does not, like rent and wages, rise with the prosperity,

and fall with the declension of the society. On the contrary, it is naturally low in rich, and high in poor countries, and it is always highest in the countries which are going fastest to ruin. The interest of this third order, therefore, has not the same connection with the general interest of the society as that of the other two. Merchants and master manufacturers are, in this order, the two classes of people who commonly employ the largest capitals, and who by their wealth draw to themselves the greatest share of the public consideration. As during their whole lives they are engaged in plans and projects, they have frequently more acuteness of understanding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country gentlemen. As their thoughts, however, are commonly exercised rather about the interest of their own particular branch of business, than about that of the society, their judgment, even when given with the greatest candour (which it has not been upon every occasion) is much more to be depended upon with regard to the former of those two objects, than with regard to the latter. Their superiority over the country gentleman is, not so much in their knowledge of the public interest, as in their having a better knowledge of their own interest than he has of his. It is by this superior knowledge of their own interest that they have frequently imposed upon his generosity, and persuaded him to give up both his own interest and that of the public, from a very simple but honest conviction, that their interest, and not his, was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The interest of the dealers, however, in any particular branch of trade or manufactures, is always in some respects different from, and even opposite to, that of the public. To widen the market and to narrow the competition, is always the interest of the dealers. To widen the market may frequently be agreeable enough to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but to narrow the competition must always be against it, and can serve only to enable the dealers, by raising their profits above what they naturally would be, to levy, for their own benefit, an absurd tax upon the rest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The proposal of any new law or regulation of commerce which comes from this order, ought always to be listened to with great precaution, and ought never to be adopted till after having been long and carefully examined, not only with the most scrupulous, but with the most suspicious attention. It comes from an order of men, whose interest is never exactly the same with that of the public, who have generally an interest to deceive and even to oppress the public, and who accordingly have, upon many occasions, both deceived and oppressed it.

第三个阶层是劳动者的雇主即靠利润为生的人。正是为追求利润而使用的资本推动了社会大部分有用的劳动。资本使用者的规划和设计，规定并指导着所有最重要的劳动操作。但他们所有的规划和设计都以利润为目标。利润率和地租与工资不同，并不随社会的繁荣而上升，也不随社会的衰退而下降。相反，利润率在富国自然低，在穷国自然高，而在迅速走向灭亡的国家最高。因此，这一阶层的利益与社会一般利益的关系和其他两个阶层不同。在这一阶层中，商人和制造业者这两类人通常使用的资本数量最大，由于他们最富裕，因此最为社会所重视。他们一生都从事规划与设计，因此自然比大部分的乡间绅士具有更敏锐的理解力。但是，因为他们通常思考的都是自己某项业务的利益，而不为社会的一般利益，所以，他们的判断即使是以最大限度的公正作出的（事实并不总是如此），也更多地取决于对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很少取决于对于社会一般利益的考虑。他们比乡间绅士高明，并非是由于他们比乡间绅士更理解公共利益，而是由于他们比乡间绅士更理解自身的特殊利益。正是由于他们更理解自身利益，因此常常利用乡间绅士的慷慨，劝说乡间绅士放弃自己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使这些人相信自身的利益不是公共利益，而他们的利益才是公共利益。其实，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某些方面总是与公共利益不同，有时甚至与公共利益相反。扩大市场和缩小竞争始终是商人的利益，但是扩大市场虽然常常符合公共利益，缩小竞争却总是违背公众利益，这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到自然应有的水

平之上，从而帮助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向其余同胞征收一种荒谬的赋税。因此，对于这一阶层所提出的任何新的商业法规，都应该谨慎地聆听。必须要细致入微、抱着怀疑的态度长期调研后才可采用。因为这一阶层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共利益完全一致的，他们常常欺骗，甚至压迫公众，在很多情况下，公众确实也常常被他们欺骗和压迫。

Supporting Table for Chapter XI

第十一章的表格

Years XII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Wheat each Year.	Average of the different Prices of the same Year.	The average Price of each Year in Money of the present Times.
	£ s. d.	£ s. d.	£ s. d.
1202	— 12 —	— — —	1 16 —
1205	{ — 12 — / — 13 4 }	— 13 5	2 — 3
	— 15 —		
1223	— 12 —	— — —	— 16 —
1237	— 3 4	— — —	— 10 —
1243	— 2 —	— — —	— 6 —
1244	— 2 —	— — —	— 6 —
1246	— 16 —	— — —	2 8 —
1247	— 13 4	— — —	2 — —
1257	1 4 —	— — —	3 12 —
1258	{ 1 — — / — 15 — }	— 17 —	2 11 —
	— 16 —		
1270	{ 4 16 — }	5 12 —	16 16 —
	6 8 —		
1286	{ — 2 8 }	— 9 4	1 8 —
	— 16 —		
		Total,	35 9 3
		Average Price,	2 19 1¼

年份 （共 12 年）	各年每夸特 小麦价格	同年小麦 不同价格的平均值	换算为现在货币后 各年的平均价格
	镑 先令 便士	镑 先令 便士	镑 先令 便士
1202	— 12 —	— — —	1 16 —
1205	— 12 — — 13 4 — 15 —	— 13 5	2 — 3
1223	— 12 —	— — —	— 16 —
1237	— 3 4	— — —	— 10 —
1243	— 2 —	— — —	— 6 —
1244	— 2 —	— — —	— 6 —
1246	— 16 —	— — —	2 8 —
1247	— 13 4	— — —	2 — —
1257	1 4 —	— — —	3 12 —
1258	1 — — — 15 — — 16 —	— 17 —	2 11 —
1270	4 16 — 6 8 —	5 12 —	16 16 —
1286	— 2 8 — 16 —	— 9 4	1 8 —
		合计	35 9 3
		平均价格	2 19 1¼

Years XII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Wheat each Year.	Average of the different Prices of the same Year.	The average Price of each Year in Money of the present Times.
	£ s. d.	£ s. d.	£ s. d.
1287	— 3 4	— — —	— 10 —
1288	— — 8 — 1 — — 1 4 — 1 6 — 1 8 — 2 — — 3 4 — 9 4	— 3 -¼	— 9 -¼
1289	12 — — — 6 — — 2 — — 10 8 1 — —	— 10 1 2/4	— 10 4 2/4
1290	— 16 —	— — —	2 8 —
1294	— 16 —	— — —	2 8 —
1302	— 4 —	— — —	— 12 —
1309	— 7 2	— — —	1 1 6
1315	1 — —	— — —	3 — —
1316	1 — — 1 10 — 1 12 — 2 — —	1 10 6	4 11 6
1317	2 4 — — 14 — 2 13 — 4 — — — 6 8	1 19 6	5 18 6
1336	— 2 —	— — —	— 6 —
1338	— 3 4	— — —	— 10 —
		Total,	23 4 11¼
		Average Price,	1 18 8

年份 （共 12 年）	各年每夸特 小麦价格	同年小麦 不同价格的平均值	换算为现在货币后 各年的平均价格
	镑 先令 便士	镑 先令 便士	镑 先令 便士
1287	— 3 4	— — —	— 10 —
1288	— — 8 — 1 — — 1 4 — 1 6 — 1 8 — 2 — — 3 4	— 3 -¼	— 9 -¼
1289	— 9 4 12 — — — 6 — — 2 — — 10 8 1 — —	— 10 12/4	— 10 42/4
1290	— 16 —	— — —	2 8 —
1294	— 16 —	— — —	2 8 —
1302	— 4 —	— — —	— 12 —
1309	— 7 2	— — —	1 1 6
1315	1 — —	— — —	3 — —
1316	1 — — 1 10 — 1 12 — 2 — —	1 10 6	4 11 6
1317	2 4 — — 14 — 2 13 — 4 — — — 6 8	1 19 6	5 18 6
1336	— 2 —	— — —	— 6 —
1338	— 3 4	— — —	— 10 —
		合计	23 4 11¼
		平均价格	1 18 8

Years XII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Wheat each Year.	Average of the different Prices of the same Year.	The average Price of each Year in Money of the present Times.
	£ s. d.	£ s. d.	£ s. d.
1339	— 9 —	— — —	1 7 —
1349	— 2 —	— — —	— 5 2
1359	1 6 8	— — —	3 2 2
1361	— 2 —	— — —	— 4 8
1363	— 15 —	— — —	1 15 —
1369	{ 1 — — } 1 4 —	1 2 —	2 9 4
1379	— 4 —	— — —	— 9 4
1387	— 2 —	— — —	— 4 8
1390	{ — 13 4 — 14 — } — 16 —	— 14 5	1 13 7
1401	— 16 —	— — —	1 17 4
1407	{ — 4 4¼ } — 3 4	— 3 10	— 8 11
1416	— 16 —	— — —	1 12 —
		Total,	15 9 4
		Average Price,	1 5 9 1/3

年份 （共 12 年）	各年每夸特 小麦价格	同年小麦 不同价格的平均值	换算为现在货币后 各年的平均价格
	镑 先令 便士	镑 先令 便士	镑 先令 便士
1339	— 9 —	— — —	1 7 —
1349	— 2 —	— — —	— 5 2
1359	1 6 8	— — —	3 2 2
1361	— 2 —	— — —	— 4 8
1363	— 15 —	— — —	1 15 —
1369	{ 1 — — } 1 4 —	1 2 —	2 9 4
1379	— 4 —	— — —	— 9 4
1387	— 2 —	— — —	— 4 8
1390	{ — 13 4 — 14 — }	— 14 5	1 13 7
1401	— 16 —	— — —	1 17 4
1407	— 16 —	— 3 10	— 8 11
	{ — 4 4¼ }		
1416	— 3 4 — 16 —	— — —	1 12 —
		合计	15 9 4
		平均价格	1 5 91/3

Years XII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Wheat each Year.	Average of the different Prices of the same Year.	The average Price of each Year in Money of the present Times.
	£ s. d.	£ s. d.	£ s. d.
1423	— 8 —	— — —	— 16 —
1425	— 4 —	— — —	— 8 —
1434	1 6 8	— — —	2 13 4
1435	— 5 4	— — —	— 10 8
1439	{ 1 — — } 1 6 8	1 3 4	2 6 8
1440	1 4 —	— — —	2 8 —
1444	{ — 4 4 } — 4 —	— 4 2	— 8 4
1445	— 4 6	— — —	— 9 —
1447	— 8 —	— — —	— 16 —
1448	— 6 8	— — —	— 13 4
1449	— 5 —	— — —	— 10 —
1451	— 8 —	— — —	— 16 —
		Total,	12 15 4
		Average Price,	1 1 3½

年份 （共 12 年）	各年每夸特 小麦价格	同年小麦 不同价格的平均值	换算为现在货币后 各年的平均价格
	镑 先令 便士	镑 先令 便士	镑 先令 便士
1423	— 8 —	— — —	— 16 —
1425	— 4 —	— — —	— 8 —
1434	1 6 8	— — —	2 13 4
1435	— 5 4	— — —	— 10 8
1439	{ 1 — — } 1 6 8	1 3 4	2 6 8
1440	1 4 —	— — —	2 8 —
1444	{ — 4 4 } — 4 —	— 4 2	— 8 4
1445	— 4 6	— — —	— 9 —
1447	— 8 —	— — —	— 16 —
1448	— 6 8	— — —	— 13 4
1449	— 5 —	— — —	— 10 —
1451	— 8 —	— — —	— 16 —
		合计	12 15 4
		平均价格	1 1 3½

Years XII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Wheat each Year.	Average of the different Prices of the same Year.	The average Price of each Year in Money of the present Times.
	£ s. d.	£ s. d.	£ s. d.
1453	— 5 4	— — —	— 10 8
1455	— 1 2	— — —	— 2 4
1457	— 7 8	— — —	— 15 4
1459	— 5 —	— — —	— 10 —
1460	— 8 —	— — —	— 16 —
1463	{ — 2 — }	— 1 10	— 3 8
	— 1 8		
1464	— 6 8	— — —	— 10 —
1486	1 4 —	— — —	1 17 —
1491	— 14 8	— — —	1 2 —
1494	— 4 —	— — —	— 6 —
1495	— 3 4	— — —	— 5 —
1497	1 — —	— — —	1 11 —
		Total,	8 9 —
		Average Price,	— 14 1

年份 （共 12 年）	各年每夸特 小麦价格	同年小麦 不同价格的平均值	换算为现在货币后 各年的平均价格
	镑 先令 便士	镑 先令 便士	镑 先令 便士
1453	— 5 4	— — —	— 10 8
1455	— 1 2	— — —	— 2 4
1457	— 7 8	— — —	— 15 4
1459	— 5 —	— — —	— 10 —
1460	— 8 —	— — —	— 16 —
1463	{ — 2 — } — 1 8	— 1 10	— 3 8
1464	— 6 8	— — —	— 10 —
1486	1 4 —	— — —	1 17 —
1491	— 14 8	— — —	1 2 —
1494	— 4 —	— — —	— 6 —
1495	— 3 4	— — —	— 5 —
1497	1 — —	— — —	1 11 —
		合计	8 9 —
		平均价格	— 14 1

Years XII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Wheat each Year.	Average of the different Prices of the same Year.	The average Price of each Year in Money of the present Times.
	£ s. d.	£ s. d.	£ s. d.
1499	— 4 —	— — —	— 6 —
1504	— 5 8	— — —	— 8 6
1521	1 — —	— — —	1 10 —
1551	— 8 —	— — —	— 2 —
1553	— 8 —	— — —	— 8 —
1554	— 8 —	— — —	— 8 —
1555	— 8 —	— — —	— 8 —
1556	— 8 —	— — —	— 8 —
1557	— 4 — — 5 — — 8 — 2 13 4	— 17 8½	— 17 8½
1558	— 8 —	— — —	— 8 —
1559	— 8 —	— — —	— 8 —
1560	— 8 —	— — —	— 8 —
		Total,	6 0 2½
		Average Price,	— 10 0 5/12

年份 （共 12 年）	各年每夸特 小麦价格	同年小麦 不同价格的平均值	换算为现在货币后 各年的平均价格
	镑 先令 便士	镑 先令 便士	镑 先令 便士
1499	— 4 —	— — —	— 6 —
1504	— 5 8	— — —	— 8 6
1521	1 — —	— — —	1 10 —
1551	— 8 —	— — —	— 2 —
1553	— 8 —	— — —	— 8 —
1554	— 8 —	— — —	— 8 —
1555	— 8 —	— — —	— 8 —
1556	— 8 —	— — —	— 8 —
1557	{ — 4 — — 5 — — 8 — } 2 13 4	— 17 8½	— 17 8½
1558	— 8 —	— — —	— 8 —
1559	— 8 —	— — —	— 8 —
1560	— 8 —	— — —	— 8 —
		合计	6 0 2½
		平均价格	— 10 05/12

Years XII	Price of the Quarter of Wheat each Year.	Average of the different Prices of the same Year.	The average Price of each Year in Money of the present Times.
	£ s. d.	£ s. d.	£ s. d.
1561	— 8 —	— — —	— — —
1562	— 8 —	— — —	— — —
1574	{ 2 16 — }	2 — —	2 — —
	1 4 —		
1587	3 4 —	— — —	— — —
1594	2 16 —	— — —	— — —
1595	2 13 —	— — —	— — —
1596	4 — —	— — —	— — —
1597	{ 5 4 — }	4 12 —	4 12 —
	4 — —		
1598	2 16 8	— — —	— — —
1599	1 19 2	— — —	— — —
1600	1 17 8	— — —	— — —
1601	1 14 10	— — —	— — —
		Total,	28 9 4
		Average Price,	2 7 5 1/3

年份 （共 12 年）	各年每夸特 小麦价格	同年小麦 不同价格的平均值	换算为现在货币后 各年的平均价格
	镑 先令 便士	镑 先令 便士	镑 先令 便士
1561	— 8 —	— — —	— — —
1562	— 8 —	— — —	— — —
1574	{ 2 16 — } 1 4 —	2 — —	2 — —
1587	3 4 —	— — —	— — —
1594	2 16 —	— — —	— — —
1595	2 13 —	— — —	— — —
1596	4 — —	— — —	— — —
1597	{ 5 4 — } 4 — —	4 12 —	4 12 —
1598	2 16 8	— — —	— — —
1599	1 19 2	— — —	— — —
1600	1 17 8	— — —	— — —
1601	1 14 10	— — —	— — —
		合计	28 9 4
		平均价格	2 7 51/3

Prices of the Quarter of nine Bushels of the best or highest priced Wheat at Windsor Market, on Lady-Day and Michaelmas, from 1595 to 1764, both inclusive; the Price of each Year being the medium between the highest Prices of those Two Market Days.

Years,		£	s.	d.
1595,	—	2	0	0
1596,	—	2	8	0
1597,	—	3	9	6
1598,	—	2	16	8
1599,	—	1	19	2
1600,	—	1	17	8
1601,	—	1	14	10
1602,	—	1	9	4
1603,	—	1	15	4
1604,	—	1	10	8
1605,	—	1	15	10
1606,	—	1	13	0
1607	—	1	16	8
1608,	—	2	16	8
1609,	—	2	10	0
1610,	—	1	15	10
1611,	—	1	18	8
1612,	—	2	2	4
1613,	—	2	8	8
1614,	—	2	1	8½
1615,	—	1	18	8
1616,	—	2	0	4
1617,	—	2	8	8
1618,	—	2	6	8
1619,	—	1	15	4
1620,	—	1	10	4
	26)	54	0	6½
		2	1	6 9/13

Years,		£	s.	d.
1621,	—	1	10	4
1622,	—	2	18	8
1623,	—	2	12	0
1624,	—	2	8	0
1625,	—	2	12	0
1626,	—	2	9	4
1627,	—	1	16	0
1628,	—	1	8	0
1629,	—	2	2	0
1630,	—	2	15	8
1631,	—	3	8	0
1632,	—	2	13	4
1633,	—	2	18	0
1634,	—	2	16	0
1635,	—	2	16	0
1636,	—	2	16	8
	16)	40	0	0
		2	10	0

温莎市场 1595-1764 年（包括这两年在内）圣母领报节和米迦勒节每夸特 9 蒲式耳的最佳或最贵小麦的价格，每年两个节日期间小麦日最高价格的平均值

年份		镑	先令	便士	年份		镑	先令	便士
1595,	—	2	0	0	1621,	—	1	10	4
1596,	—	2	8	0	1622,	—	2	18	8
1597,	—	3	9	6	1623,	—	2	12	0
1598,	—	2	16	8	1624,	—	2	8	0
1599,	—	1	19	2	1625,	—	2	12	0
1600,	—	1	17	8	1626,	—	2	9	4
1601,	—	1	14	10	1627,	—	1	16	0
1602,	—	1	9	4	1628,	—	1	8	0
1603,	—	1	15	4	1629,	—	2	2	0
1604,	—	1	10	8	1630,	—	2	15	8
1605,	—	1	15	10	1631,	—	3	8	0
1606,	—	1	13	0	1632,	—	2	13	4
1607	—	1	16	8	1633,	—	2	18	0
1608,	—	2	16	8	1634,	—	2	16	0
1609,	—	2	10	0	1635,	—	2	16	0
1610,	—	1	15	10	1636,	—	2	16	8
1611,	—	1	18	8					
1612,	—	2	2	4		16）	40	0	0
1613,	—	2	8	8					
1614,	—	2	1	8½			2	10	0
1615,	—	1	18	8					
1616,	—	2	0	4					
1617,	—	2	8	8					
1618,	—	2	6	8					
1619,	—	1	15	4					
1620,	—	1	10	4					
	26）	54	0	6½					
		2	1	69/13					

Years,	Wheat per quarter. £	s.	d.
1637, —	2	13	0
1638, —	2	17	4
1639, —	2	4	10
1640, —	2	4	8
1641, —	2	8	0
1642,	0	0	0
1643,	0	0	0
1644,	0	0	0
1645,	0	0	0
Wanting in the account. The year 1646 supplied by bishop Fleetwood.			
1646, —	2	8	0
1647, —	3	13	8
1648, —	4	5	0
1649, —	4	0	0
1650, —	3	16	8
1651, —	3	13	4
1652, —	2	9	6
1653, —	1	15	6
1654, —	1	6	0
1655, —	1	13	4
1656, —	2	3	0
1657, —	2	6	8
1658, —	3	5	0
1659, —	3	6	0
1660, —	2	16	6
1661, —	3	10	0
1662, —	3	14	0
1663, —	2	17	0
1664, —	2	0	6
1665, —	2	9	4
1666, —	1	16	0
1667, —	1	16	0
1668, —	2	0	0
1669, —	2	4	4
1670, —	2	1	8
Carry over,	79	14	10

Years,	Wheat per quarter. £	s.	d.
Brought over,	79	14	10
1671, —	2	2	0
1672, —	2	1	0
1673, —	2	6	8
1674, —	3	8	8
1675, —	3	4	8
1676, —	1	18	0
1677, —	2	2	0
1678, —	2	19	0
1679, —	3	0	0
1680, —	2	5	0
1681, —	2	6	8
1682, —	2	4	0
1683, —	2	0	0
1684, —	2	4	0
1685, —	2	6	8
1686, —	1	14	0
1687, —	1	5	2
1688, —	2	6	0
1689, —	1	10	0
1690, —	1	14	8
1691, —	1	14	0
1692, —	2	6	8
1693, —	3	7	8
1694, —	3	4	0
1695, —	2	13	0
1696, —	3	11	0
1697, —	3	0	0
1698, —	3	8	4
1699, —	3	4	0
1700, —	2	0	0
1663, —	2	17	0
1664, —	2	0	6
1665, —	2	9	4
1666, —	1	16	0
1667, —	1	16	0
1668, —	2	0	0
1669, —	2	4	4
1670, —	2	1	8
60)	153	1	8
	2	11	0½

年份	每夸特小麦. 镑	先令	便士
1637, —	2	13	0
1638, —	2	17	4
1639, —	2	4	10
1640, —	2	4	8
1641, —	2	8	0
1642,	0	0	0
1643,	0	0	0
1644,	0	0	0
1645,	0	0	0
1646年数据缺失，由弗利特伍德提			
1646, —	2	8	0
1647, —	3	13	8
1648, —	4	5	0
1649, —	4	0	0
1650, —	3	16	8
1651, —	3	13	4
1652, —	2	9	6
1653, —	1	15	6
1654, —	1	6	0
1655, —	1	13	4
1656, —	2	3	0
1657, —	2	6	8
1658, —	3	5	0
1659, —	3	6	0
1660, —	2	16	6
1661, —	3	10	0
1662, —	3	14	0
1663, —	2	17	0
1664, —	2	0	6
1665, —	2	9	4
1666, —	1	16	0
1667, —	1	16	0
1668, —	2	0	0
1669, —	2	4	4
1670, —	2	1	8
转下	79	14	10

年份	每夸特小麦 镑	先令	便士
接上	79	14	10
1671, —	2	2	0
1672, —	2	1	0
1673, —	2	6	8
1674, —	3	8	8
1675, —	3	4	8
1676, —	1	18	0
1677, —	2	2	0
1678, —	2	19	0
1679, —	3	0	0
1680, —	2	5	0
1681, —	2	6	8
1682, —	2	4	0
1683, —	2	0	0
1684, —	2	4	0
1685, —	2	6	8
1686, —	1	14	0
1687, —	1	5	2
1688, —	2	6	0
1689, —	1	10	0
1690, —	1	14	8
1691, —	1	14	0
1692, —	2	6	8
1693, —	3	7	8
1694, —	3	4	0
1695, —	2	13	0
1696, —	3	11	0
1697, —	3	0	0
1698, —	3	8	4
1699, —	3	4	0
1700, —	2	0	0
1663, —	2	17	0
1664, —	2	0	6
1665, —	2	9	4
1666, —	1	16	0
1667, —	1	16	0
1668, —	2	0	0
1669, —	2	4	4
1670, —	2	1	8
60）	153	1	8
	2	11	0½

	Wheat per quarter.				Wheat per quarter.			
Years,	£	s.	d.	Years,	£	s.	d.	
				Brought over,	69	8	8	
1701, —	1	17	8	1734, —	1	18	10	
1702, —	1	9	6	1735, —	2	3	0	
1703, —	1	16	0	1736, —	2	0	4	
1704, —	2	6	6	1737, —	1	18	0	
1705, —	1	10	0	1738, —	1	15	6	
1706, —	1	6	0	1739, —	1	18	6	
1707, —	1	8	6	1740, —	2	10	8	
1708, —	2	1	6	1741, —	2	6	8	
1709, —	3	18	6	1742, —	1	14	0	
1710, —	3	18	0	1743, —	1	4	10	
1711, —	2	14	0	1744, —	1	4	10	
1712, —	2	6	4	1745, —	1	7	6	
1713, —	2	11	0	1746, —	1	19	0	
1714, —	2	10	4	1747, —	1	14	10	
1715, —	2	3	0	1748, —	1	17	0	
1716, —	2	8	0	1749, —	1	17	0	
1717, —	2	5	8					
1718, —	1	18	10	1750, —	1	12	6	
1719, —	1	15	0	1751, —	1	18	6	
1720, —	1	17	0	1752, —	2	1	10	
1721, —	1	17	6	1753, —	2	4	8	
1722, —	1	16	0	1754, —	1	14	8	
1723, —	1	14	8	1755, —	1	13	10	
1724, —	1	17	0	1756, —	2	5	3	
1725, —	2	8	6	1757, —	3	0	0	
1726, —	2	6	0	1758, —	2	10	0	
1727, —	2	2	0	1759, —	1	19	10	
1728, —	2	14	6	1760, —	1	16	6	
1729, —	2	6	10	1761, —	1	10	3	
1730, —	1	16	6	1762, —	1	19	0	
1731, —	1	12	10	1763, —	2	0	9	
1732, —	1	6	8	1764, —	2	6	9	
1733, —	1	8	4					
				64)	129	13	6	
Carry over,	69	8	8					
					2	0	6 19/32	

年份	每夸特小麦			年份	每夸特小麦		
	镑	先令	便士		镑	先令	便士
				接上	69	8	8
1701, —	1	17	8	1734, —	1	18	10
1702, —	1	9	6	1735, —	2	3	0
1703, —	1	16	0	1736, —	2	0	4
1704, —	2	6	6	1737, —	1	18	0
1705, —	1	10	0	1738, —	1	15	6
1706, —	1	6	0	1739, —	1	18	6
1707, —	1	8	6	1740, —	2	10	8
1708, —	2	1	6	1741, —	2	6	8
1709, —	3	18	6	1742, —	1	14	0
1710, —	3	18	0	1743, —	1	4	10
1711, —	2	14	0	1744, —	1	4	10
1712, —	2	6	4	1745, —	1	7	6
1713, —	2	11	0	1746, —	1	19	0
1714, —	2	10	4	1747, —	1	14	10
1715, —	2	3	0	1748, —	1	17	0
1716, —	2	8	0	1749, —	1	17	0
1717, —	2	5	8	1750, —	1	12	6
1718, —	1	18	10	1751, —	1	18	6
1719, —	1	15	0	1752, —	2	1	10
1720, —	1	17	0	1753, —	2	4	8
1721, —	1	17	6	1754, —	1	14	8
1722, —	1	16	0	1755, —	1	13	10
1723, —	1	14	8	1756, —	2	5	3
1724, —	1	17	0	1757, —	3	0	0
1725, —	2	8	6	1758, —	2	10	0
1726, —	2	6	0	1759, —	1	19	10
1727, —	2	2	0	1760, —	1	16	6
1728, —	2	14	6	1761, —	1	10	3
1729, —	2	6	10	1762, —	1	19	0
1730, —	1	16	6	1763, —	2	0	9
1731, —	1	12	10	1764, —	2	6	9
1732, —	1	6	8				
1733, —	1	8	4	64）	129	13	6
转下	69	8	8		2	0	619/32

Years,		Wheat per quarter. £	s.	d.
1731,	—	1	12	10
1732,	—	1	6	8
1733,	—	1	8	4
1734,	—	I	18	10
1735,	—	2	3	0
1736,	—	2	0	4
1737,	—	1	18	0
1738,	—	1	15	6
1739,	—	1	18	6
1740,	—	2	10	8
	10)	18	12	8
		1	17	3 1/5

Years,		Wheat per quarter. £	s.	d.
1741,	—	2	6	8
1742,	—	1	14	0
1743,	—	1	4	10
1744,	—	1	4	10
1745,	—	1	7	6
1746,	—	1	19	0
1747,	—	1	14	10
1748,	—	1	17	0
1749,	—	1	17	0
1750,	—	1	12	6
	10)	16	18	2
		1	13	9 4/5

每夸特小麦					每夸特小麦				
年份		镑	先令	便士	年份		镑	先令	便士
1731,	—	1	12	10	1741,	—	2	6	8
1732,	—	1	6	8	1742,	—	1	14	0
1733,	—	1	8	4	1743,	—	1	4	10
1734,	—	I	18	10	1744,	—	1	4	10
1735,	—	2	3	0	1745,	—	1	7	6
1736,	—	2	0	4	1746,	—	1	19	0
1737,	—	1	18	0	1747,	—	1	14	10
1738,	—	1	15	6	1748,	—	1	17	0
1739,	—	1	18	6	1749,	—	1	17	0
1740,	—	2	10	8	1750,	—	1	12	6
	10）	18	12	8		10）	16	18	2
		1	17	31/5			1	13	94/5

Book II. Of the Nature, Accumulation, and Employment of Stock

第二篇、论资本的性质及其积累和用途

Introduction

序论

In that rude state of society in which there is no division of labour, in which exchanges are seldom made, and in which every man provides everything for himself,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any stock should be accumulated or stored up beforehand in order to carry on the business of the society. Every man endeavours to supply by his own industry his own occasional wants as they occur. When he is hungry, he goes to the forest to hunt; when his coat is worn out, he clothes himself with the skin of the first large animal he kills: and when his hut begins to go to ruin, he repairs it, as well as he can, with the trees and the turf that are nearest it.

处于原始状态下的社会，没有分工，人们很少与他人交换物品，每个人都需要自给自足，所以根本无须为了社会事业而储存资本。为了能随时满足自身的需要，所有人都要努力依靠自己的劳动：饿了就去森林打猎；衣服穿破了，就剥兽皮制作新衣；房屋要倒塌了，就在附近伐取树枝草皮，竭尽全力加以修葺。

But when the division of labour has once been thoroughly introduced, the produce of a man's own labour can supply but a very small part of his occasional wants.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m are supplied by the produce of other men's labour, which he

purchases with the produce, or, what is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price of the produce of his own. But this purchase cannot be made till such time as the produce of his own labour has not only been completed, but sold. A stock of goods of different kinds, therefore, must be stored up somewhere sufficient to maintain him, and to supply him with the materials and tools of his work till such time, at least, as both these events can be brought about. A weaver cannot apply himself entirely to his peculiar business, unless there is beforehand stored up somewhere, either in his own possession or in that of some other person, a stock sufficient to maintain him, and to supply him with the materials and tools of his work, till he has not only completed, but sold his web. This accumulation must, evidently, be previous to his applying his industry for so long a time to such a peculiar business.

完全实行分工后，一人的劳动产品只能满足自己很小一部分随时发生的需要，而其他大部分需要，必得依赖他人的劳动产品来供给。人们只能利用自己的产品或自己产品的价格购买所需的产品。在购买前，一定要先制成自己劳动的产品，继而将其售出，而要做到这两点，必须先找个地方储存足以维持自己生计的货物，并生产所需的材料、制作所需的工具。例如，如果织匠在未制成并售出其织物前，自己或他人手中没有足以维持他生计的积蓄，也没有人提供给他材料和工具，他就无法织出东西。显然，织匠必须在从事这一工作前就完成这种积累。

As the accumulation of stock must,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be previous to the division of labour, so labour can be more and more subdivided in proportion only as stock is previously more and more accumulated. The quantity of materials which the same number of people can work up, increases in a great proportion as labour comes

to be more and more subdivided; and as the operations of each workman are gradually reduced to a greater degree of simplicity, a variety of new machines come to be invented for facilitating and abridging those operations. As the division of labour advanc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give constant employment to an equal number of workmen, an equal stock of provisions, and a greater stock of materials and tools than what would have been necessary in a ruder state of things, must be accumulated beforehand. But the number of workmen in every branch of business generally increases with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that branch, or rather it is the increase of their number which enables them to class and subdivide themselves in this manner.

从事物的本质来看，分工以前必须积累资本。事先积累的资本越多，就越能按比例细分工作；而分工越细，同样多的工人就能按更大比例增加所能加工的材料。随着每个工人的操作日益简化，人们可以发明各种新机器让操作更加简单快捷。所以，在分工取得了进步的条件下，如果要保证同等数量的雇佣工人可以工作，就必须预先储备和分工没有改善时同等数量的食物；但需要预先储备的材料和工具，却多于分工没有取得进步时所需要的。更何况，一种行业分工越细，其工人总数通常会越多；确切地说，工人总数的增加，使得分工越来越细。

As the accumulation of stock is previously necessary for carrying on this great improvement in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so that accumulation naturally leads to this improvement. The person who employs his stock in maintaining labour, necessarily wishes to employ it in such a manner as to produce as great a quantity of work as possible. He endeavours, therefore, both to make among his workmen the most proper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and to furnish them with the best machines which he can either invent or afford to purchase. His abilities in both these respects are generally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his stock, or to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m it can employ. The quantity of industry, therefore, not only increases in every countr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tock which employs it, but, in consequence of that increase, the same quantity of industry produces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work.

由于预先积累资本是大力发展劳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所以这种积累自然会带来这种发展。利用资本维持劳动的人，当然希望其投资方法能尽可能多地生产产品。所以，他必须尽力恰当地分配工人的职务，且在自己有能力发明或购买的前提下，努力确保配置的机器是最好的。但在这两方面，他的能力往往取决于其资本多少以及他能雇多少工人。所以，无论在哪个国家，随着产业资本的增加，产业的数量也随之增加。此外，由于产业资本及数量增加了，同样数量的产业也能产生数量更多的劳动。

Such are in general the effects of the increase of stock upon industry and its productive powers.

这就是资本增加后对产业及其生产力的总影响。

In the following book I have endeavoured to explain the nature of stock, the effects of its accumulation into capitals of different kinds, and the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those capitals. This book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In the first chapter, I have endeavoured to show what are the different parts or branches into

which the stock, either of an individual, or of a great society, naturally divides itself. In the second, I have endeavoured to explain the nature and operation of money considered as a particular branch of the general stock of the society. The stock which is accumulated into a capital, may either be employed by the person to whom it belongs, or it may be lent to some other person.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chapters, I have endeavoured to examine the manner in which it operates in both these situations. The fifth and last chapter treats of the different effects which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capital immediately produce upon the quantity both of national industry, and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land and labour.

本篇中我想要阐述：资本的性质如何，资本积累对各种资本会产生何种影响；当资本用途不同时，会产生何种影响？本篇总共有五章。众所周知，个人或社会的资本自然会分成几个部门，第一章我会阐述这些部门是什么。货币被视为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特殊部门，第二章我要谈谈货币的性质和作用。积累的资本，可以由所有者使用，也可以借与他人使用，所以我要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讨论这两种情况。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我要讨论资本的不同用途为国民产业量及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带来的直接影响。

Chapter I. Of the Division of Stock

第一章、论资本的划分

When the stock which a man possesses is no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maintain him for a few days or a few weeks, he seldom thinks of deriving any revenue from it. He consumes it as sparingly as he can, and endeavours by his labour to acquire something

which may supply its place before it be consumed altogether. His revenue is, in this case, derived from his labour only. This is the stat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abouring poor in all countries.

如果一个人所有的资本仅能维持其数日或数周的生活，他几乎不会从这笔资本中获取收入，而是谨慎地消费这笔资本，并且希望能依靠自身的劳动获得一些东西以备用光这笔资本后的不时之需。这种情况下，他是完全依靠劳动来获得收入的。各国大部分贫困的劳动者都是这样生活的。

But when he possesses stock sufficient to maintain him for months or years, he naturally endeavours to derive a revenue from the greater part of it; reserving only so much for his immediate consumption as may maintain him till this revenue begins to come in. His whole stock, therefore, is distinguished into two parts. That part which, he expects, is to afford him this revenue, is called his capital. The other is that which supplies his immediate consumption; and which consists either, first, in that portion of his whole stock which was originally reserved for this purpose; or, secondly, in his revenue, from whatever source derived, as it gradually comes in; or, thirdly, in such things as had been purchased by either of these in former years, and which are not yet entirely consumed; such as a stock of clothes, household furniture, and the like. In one, or other, or all of these three articles, consists the stock which men commonly reserve for their own immediate consumption.

如果他所有的资本足以维持他数月或数年的生计，他自然希望能从这笔资本中拿出一大部分为自己提供收入；剩下适量一部分资本可

用于未获得收入前的消费，进而维持生计。这样一来，他的全部资本就分成了两部分。他希望从中获得收入的一部分，称为资本。而另一部分用于自己当前的消费，其中包含：第一，事先为当前消费储备的那部分资本；第二，无论何种来源，自己逐渐获得的收入；第三，以前利用前两种资本购买后至今仍没有用完的物品，如衣服、家具等等。为当前消费而保留的资本，或包含以上三项中的一项，或其中两项，或全部三项。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a capital may be employed so as to yield a revenue or profit to its employer.

可以利用两种方法使用为投资者创造收入或利润的资本。

First, it may be employed in raising, manufacturing, or purchasing goods, and selling them again with a profit.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this manner yields no revenue or profit to its employer, while it either remains in his possession, or continues in the same shape. The goods of the merchant yield him no revenue or profit till he sells them for money, and the money yields him as little till it is again exchanged for goods. His capital is continually going from him in one shape, and returning to him in another, and it is only by means of such circulation, or successive exchanges, that it can yield him any profit. Such capitals, therefore, may very properly be called circulating capitals.

第一，可利用资本生产、制造或购买产品，然后将其售出以获取利润。这样的资本为所有者持有或保持原状时，不能为投资者带来收入或利润。商人的货物在尚未售出、换得货币之前，不会为他带来收

入或利润；还没有重新用于交换货物的货币亦是如此。商人的资本持续以一种形态流出商人手中，又以另一种形态流入商人手中；而只有依靠这种流通，这种持续交换，才能获取利润。因此，我们将这类资本称为流动资本。

Secondly, it may be employ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in the purchase of useful machines and instruments of trade, or in suchlike things as yield a revenue or profit without changing masters, or circulating any further. Such capitals, therefore, may very properly be called fixed capitals.

第二，可利用资本改良土地，购买对所从事的行业实用的机器和工具，或购买保持所有者不变或无须进一步流通就可获得收入或利润的东西。我们将这类资本称为固定资本。

Different occupations require very different proportions between the fixed and circulating capitals employed in them.

不同的职业要求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大不相同。

The capital of a merchant, for example, is altogether a circulating capital. He has occasion for no machines or instruments of trade, unless his shop, or warehouse, be considered as such.

举例来说，商人的资本全部属于流动资本，因为除非把店铺或仓库视为机器或工具，否则他根本不需要使用任何机器或工具。

Some part of the capital of every master artificer or manufacturer must be fixed in the instruments of his trade. This part, however, is very small in some, and very great in others. A master tailor requires no other instruments of trade but a parcel of needles. Those of the master shoemaker are a little, though but a very little, more expensive. Those of the weaver rise a good deal above those of the shoemaker.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capital of all such master artificers, however, is circulated, either in the wages of their workmen, or in the price of their materials, and repaid with a profit by the price of the work.

手工业者和制造者的部分资本必须固定在工具上。不过，这部分资本的多少因行业而异，有的小，有的大。裁缝只需要一包针，不需要其他工具。制鞋者的工具价值高，但数量有限。与制鞋者相比，织布者的工具更为昂贵。但是，大部分手工业者的资本是流动的：一开始因支付工人工资或原材料价格从手工业者手中流出，接下来又因产品价格流入手工业者手中，流入资本还包括利润。

In other works a much greater fixed capital is required. In a great iron-work, for example, the furnace for melting the ore, the forge, the slitt-mill, are instruments of trade which cannot be erected without a very great expence. In coal-works and mines of every kind, the machinery necessary both for drawing out the water and for other purposes is frequently still more expensive.

而其他行业对固定资本的需求更高。例如，一个大型制铁厂要设置熔铁炉、建造锻冶场和截铁场，必定要投入极大的资本。如果考虑到开采煤矿使用的排水机及其他机器，投入会更多。

That part of the capital of the farmer which is employed in the instruments of agriculture is a fixed, that which is employed in the wages and maintenance of his labouring servants, is a circulating capital. He makes a profit of the one by keeping it in his own possession, and of the other by parting with it. The price or value of his labouring cattle is a fixed capital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at of the instruments of husbandry. Their maintenance is a circulating capital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at of the labouring servants. The farmer makes his profit by keeping the labouring cattle, and by parting with their maintenance. Both the pric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attle which are brought in and fattened, not for labour, but for sale, are a circulating capital. The farmer makes his profit by parting with them. A flock of sheep or a herd of cattle that, in a breeding country, is bought in, neither for labour, nor for sale, but in order to make a profit by their wool, by their milk, and by their increase, is a fixed capital. The profit is made by keeping them. Their maintenance is a circulating capital. The profit is made by parting with it; and it comes back with both its own profit and the profit upon the whole price of the cattle, in the price of the wool, the milk, and the increase. The whole value of the seed, too, is properly a fixed capital. Though it goes backwards and forwards between the ground and the granary, it never changes masters, and therefore does not properly circulate. The farmer makes his profit, not by its sale, but by its increase.

对农场主而言，购买农具的资本属于固定资本，而留住工人与支付工资的资本属于流动资本。他通过保留固定资本并支付流动资本而得到利润。与农具相同，耕畜的价格或价值也可被称为固定资本；与留住工人的花费相同，饲养牲畜的费用，也可被称为流动资本。农场主可以通过饲养耕畜或支付饲养牲畜的费用而获取利润。不为耕种，

只为售卖而购买及饲养牲畜的费用应归为流动资本。通过售卖牲畜，农场主可以获得利润。在饲养牲畜的国家，购买牛羊，不是为了耕种或售卖，而是为了从羊毛、牛奶及育种中获取利润，这类资本属于固定资本；而获得利润的方法就是饲养这些牲畜。留住这些牲畜的花费属于流动资本，获得利润的方法在于支付留住这些牲畜的费用。这些利润体现在留住这些牲畜本身带来的利润以及羊毛价格、牛奶价格和繁种价格上。种子的全部价值，也属于固定资本。虽然种子在土地与谷仓之间往返，但它从未更换主人，因此，它没有真正流动过。农场主并不是通过售卖种子，而是通过利用种子生产的产品来获取利润。

The general stock of any country or society is the same with that of all its inhabitants or members, and therefore naturally divides itself into the same three portions, each of which has a distinct function or office.

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总资本，就是全部居民的资本，所以，资本可以按照其各自的不同功用，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The first is that portion which is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and of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 is, that it affords no revenue or profit. It consists in the stock of food, clothes, household furniture, etc. which have been purchased by their proper consumers, but which are not yet entirely consumed. The whole stock of mere dwelling-houses too, subsisting at any one time in the country, make a part of this first portion. The stock that is laid out in a house, if it is to be the dwelling house of the proprietor, ceases from that moment to serve in the function of a capital, or to afford any revenue to its owner. A dwelling house, as such, contributes nothing to the revenue of its inhabitant; and though it is, no doubt,

extremely useful to him, it is as his clothes and household furniture are useful to him, which, however, makes a part of his expence, and not of his revenue. If it is to be let to a tenant for rent, as the house itself can produce nothing, the tenant must always pay the rent out of some other revenue which he derives either from labour, or stock, or land. Though a house, therefore, may yield a revenue to its proprietor, and thereby serve in the function of a capital to him, it cannot yield any to the public, nor serve in the function of a capital to it, and the revenue of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can never be in the smallest degree increased by it. Clothes, and household furniture, in the same manner, sometimes yield a revenue, and thereby serve in the function of a capital to particular persons. In countries where masquerades are common, it is a trade to let out masquerade dresses for a night. Upholsterers frequently let furniture by the month or by the year. Undertakers let the furniture of funerals by the day and by the week. Many people let furnished houses, and get a rent, not only for the use of the house, but for that of the furniture. The revenue, however, which is derived from such things must always be ultimately drawn from some other source of revenue. Of all parts of the stock, either of an individual, or of a society,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what is laid out in houses is most slowly consumed. A stock of clothes may last several years: a stock of furniture half a century or a century: but a stock of houses, well built and properly taken care of, may last many centuries. Though the period of their total consumption, however, is more distant, they are still as really a stock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as either clothes or household furniture.

第一部分用于目前的消费，它不提供收入或利润。消费者已购买、但还未消费完的食品、衣服、家具等属于这一类资本。仅具有居住功能的房屋，也属于此类资本。如果购买的房屋由其所有者自己居

住，那么，从那时刻起，购买房屋的资本就失去了资本的作用，即房屋无法提供房主任何收入。房屋虽然像衣服、家具一样，对他也很有用，但也像衣服、家具一样，无法提供给他任何收入。它只能构成费用的一部分，而不能构成收入。将房屋出租供他人居住，虽然能获得租金，但房屋本身不能生产任何东西。为了支付租金，租户需要依靠劳动、资本或土地所得的收入。所以，对于户主本人而言，房屋因能为他提供收入而具有资本的作用，但因其无法为社会公众提供收入，也根本无法增加全体人民的收入，所以不具有资本的作用。同理，衣服和家具，有时也因能提供收入而对个别人具有资本的作用。例如，在流行举办化装舞会的国家，出租化装舞会的服装已成为一种行业。家具商人常常按月或按年出租家具；殡仪馆往往按日、按星期出租葬仪品。也有一些人会出租装修好的房屋，租金不仅包括房租，还包括家具的租金。总之，租借这种情况随处可见。但说到底，出租某种物品而获得的收入总是源于其他收入的来源。我们还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无论是从个人角度来看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在可供目前消费的各种资本中，在房屋上投入的资本消费最慢。一件衣服可穿几年，一件家具可使用50年或100年，但一座坚固、细心爱护的房屋，一用就是好几百年。虽然房屋消耗得最慢，但它和衣服、家具一样，仍是可供目前消费的资本。

The second of the three portions into which the general stock of the society divides itself, is the fixed capital, of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 is, that it affords a revenue or profit without circulating or changing masters. It consists chiefly of the four following articles:

第二部分是固定资本：它可以在不流通、不更换所有者的条件下就能提供收入或利润。这部分资本主要包括四项：

First, of all useful machines and instruments of trade which facilitate and abridge labour;

第一，一切为劳动提供便利和节省劳动的机器与工具。

Secondly, of all those profitable buildings which are the means of procuring a revenue, not only to their proprietor who lets them for a rent, but to the person who possesses them and pays that rent for them; such as shops, warehouses, workhouses, farmhouses, with all their necessary buildings; stables, granaries, etc. These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mere dwelling houses. They are a sort of instruments of trade, and may be considered in the same light;

第二，一切可获得利润的建筑物，不仅可以为出租房屋的房主提供收入，还可以为缴纳租金的人提供收入，如商店、仓库、工场、农屋、马厩、谷仓等。这类建筑物与住房迥异。它们是或许也应该被视为交易的一种手段。

Thirdly, of the improvements of land, of what has been profitably laid out in clearing, draining, enclosing, manuring, and reducing it into the condition most proper for tillage and culture. An improved farm may very justly be regarded in the same light as those useful machines which facilitate and abridge labour, and by means of which an equal circulating capital can afford a much greater revenue to its employer. An improved farm is equally advantageous and more durable than any of those machines, frequently requiring no other repairs than the most profitable application of the farmer's capital employed in cultivating it;

第三，通过开垦、排水、围墙、施肥等有利方法改良土地，使其适宜耕作。改良后的农场如同那些有用的机器，可以为劳动提供便利并节省劳动。这样一来，等量的流动资本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收入。一个改良后的农场与那些机器一样有利且比那些机器更耐用。除了将资本投于耕作外，农场主无须对土地进行任何修缮。

Fourthly, of the acquired and useful abilities of all the inhabitants or members of the society. The acquisition of such talents, by the maintenance of the acquirer during his education, study, or apprenticeship, always costs a real expence, which is a capital fixed and realized, as it were, in his person. Those talents, as they make a part of his fortune, so do they likewise of that of the society to which he belongs. The improved dexterity of a workman may be considered in the same light as a machine or instrument of trade which facilitates and abridges labour, and which, though it costs a certain expence, repays that expence with a profit.

第四，社会上一切居民和成员所获得的有用才能。通过接受教育、进行学习或做一名学徒所获得的才能总要支付一笔可观的费用。而这种花费仿佛已实现并固定在学习者身上。由于这些才能已构成他财产的一部分，所以也属于学习者所属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可能将一名工人改进的熟练程度视为与机器或便利并节省劳动的工具一样的资本。虽然我们要为学习支付一定的费用，但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利润，进而让这些费用得到偿还。

The third and last of the three portions into which the general stock of the society naturally divides itself, is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of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 is, that it affords a revenue only by

circulating or changing masters. It is composed likewise of four parts:

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是流动资本：它依靠流通、更换所有者来提供收入。它也包括四项：

First, of the money by means of which all the other three are circulated and distributed to their proper consumers:

第一，其他三项通过货币进行流通并分配给合适的消费者。

Secondly, of the stock of provisions which are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butcher, the grazier, the farmer, the corn-merchant, the brewer, etc. and from the sale of which they expect to derive a profit:

第二，屠夫、牧畜家、农场主、谷商、酿酒商等人所有拥有的食品，他们希望通过出售这种食品获得利润。

Thirdly, of the materials, whether altogether rude, or more or less manufactured, of clothes, furniture, and building, which are not yet made up into any of those three shapes, but which remain in the hands of the growers, the manufacturers, the mercers and drapers, the timber merchants, the carpenters and joiners, the brickmakers, etc.

第三，耕作者、制造者、布商、木材商、木匠、瓦匠等人持有的衣服、家具、房屋等的材料。这些材料，无论是纯原料还是半加工的材料，只要是尚未做好的衣服、家具或房屋，都属于这一类。

Fourthly, and lastly, of the work which is made up and completed, but which is still in the hands of the merchant or manufacturer, and not yet disposed of or distributed to the proper consumers; such as the finished work which we frequently find ready-made in the shops of the smith, the cabinet-maker, the goldsmith, the jeweller, the china-merchant, etc.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consists in this manner, of the provisions, materials, and finished work of all kinds that are in the hands of their respective dealers, and of the money that is necessary for circula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m to those who are finally to use or to consume them.

第四点，那些已经完成，但仍在商人或制造者手中，尚未出售或分配给合适消费者的物品。例如在锻冶店、木器店、金店、珠宝店、瓷器店及其他店铺柜台上陈列的成品。这种形式的流动资本包含商家手里的各种食品、材料、成品及货币。食品、材料、成品的流通和分配离不开货币。没有货币，最后使用或消费这些产品的人就无法持有它们。

Of these four parts, three—provisions, materials, and finished work—are, either annually, or in a longer or shorter period, regularly withdrawn from it, and placed either in the fixed capital or in the stock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这四项中，包括食品、材料、成品在内的三项通常在一年内，或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会由流动资本变成固定资本，或变为可供当前消费的资本。

Every fixed capital is both originally derived from, and requires to be continually supported by a circulating capital. All useful machines and instruments of trade are originally derived from a circulating capital, which furnishes the materials of which they are mad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workmen who make them. They require, too, a capital of the same kind to keep them in constant repair.

所有的固定资本需要由流动资本转化且由流动资本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补充。所有实用的营业工具和机器都来源于流动资本。流动资本可以提供制造机器的材料，支付维护机器的工人工资。此外，我们时常还需要依靠流动资本来维修机器。

No fixed capital can yield any revenue but by means of a circulating capital. The most useful machines and instruments of trade will produce nothing without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which affords the materials they are employed up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workmen who employ them. Land, however improved, will yield no revenue without a circulating capital, which maintains the labourers who cultivate and collect its produce.

固定资本如果缺少流动资本的补给就无法提供任何收入。流动资本可以提供工作材料及工人赖以生存的食品。就算那些机器和工具再有用，如果没有流动资本，也不可能生产任何东西。不管经过怎样的

改良，如果没有流动资本，土地也无法提供收入。那些持续耕作和收获的工人，也必须有流动资本。

To maintain and augment the stock which may be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is the sole end and purpose both of the fixed and circulating capitals. It is this stock which feeds, clothes, and lodges the people. Their riches or poverty depends upon the abundant or sparing supplies which those two capitals can afford to the stock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无论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都只有一个目的，且这一目的是相同的，即增加而不是减少可供目前消费的资本。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依赖这种资本。这两种资本所能提供的这项资本的多寡能决定人民的贫富。

So great a part of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being continually withdrawn from it, in order to be placed in the other two branches of the general stock of the society; it must in its turn require continual supplies, without which it would soon cease to exist. These supplies are principally drawn from three sources, the produce of land, of mines, and of fisheries. These afford continual supplies of provisions and materials, of which part is afterwards wrought up into finished work, and by which are replaced the provisions, materials, and finished work continually withdrawn from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From mines, too, is drawn what is necessary for maintaining and augmenting that part of it which consists in money. For though,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this part is not, like the other three, necessarily withdrawn from it, in order to be placed in the other two branches of the general stock

of the society, it must, however, like all other things, be wasted and worn out at last, and sometimes, too, be either lost or sent abroad, and must, therefore, require continual, though, no doubt, much smaller supplies.

我们要不断地将大部分流动资本用于补充社会上固定资本和可供目前消费的资本，因此，也要不断补充流动资本，使其不至于消耗殆尽。对流动资本的补充主要有三个来源：土地产品、矿山产品、渔业产品，它们可以不断地提供食料和材料。加工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得到产品成品。多亏了这种供给，我们才能补充用于提供食料、材料和成品的流动资本。同时，铸造货币所需的金属必须从矿山采取以源源不断地供给、补充货币的原材料。通常，虽然我们不必将货币这种流动资本用于补充固定资本或目前的消费，但货币与其他东西一样，不可避免地会磨损和输送至国外，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不断补充货币，只不过补充的量要少得多。

Land, mines, and fisheries, require all both a fixed and a circulating capital to cultivate them; and their produce replaces with a profit, not only those capitals, but all the others in the society. Thus the farmer annually replaces to the manufacturer the provisions which he had consumed and the materials which be had wrought up the year before; and the manufacturer replaces to the farmer the finished work which he had wasted and worn out in the same time. This is the real exchange that is annually made between those two orders of people, though it seldom happens that the rude produce of the one and the manufactured produce of the other, are directly bartered for one another; because it seldom happens that the farmer sells his corn and his cattle, his flax and his wool, to the very same person of whom he chooses to purchase the clothes, furniture, and instruments of trade which he wants. He sells,

therefore, his rude produce for money, with which he can purchase, wherever it is to be had, the manufactured produce he has occasion for. Land even replaces, in part at least, the capitals with which fisheries and mines are cultivated. It is the produce of land which draws the fish from the waters; and it is the produce of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which extracts the minerals from its bowels.

我们需要利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来管理经营土地、矿山和渔业；其生产的产品，不仅要偿还投入的资本，带来利润；还要偿还其他社会上的资本，并带来利润。农民每年都要补充制造者所消耗的食料和材料；而制造者每年要补充农民所消费的工业品。虽然这两个阶级很少直接交换制造品和农产品，但他们每年确实是这样进行交换的。众所周知，农民拥有谷物、牲畜、亚麻、羊毛，而他们需要的是衣服、家具和工具。但是购买谷物、牲畜、亚麻、羊毛的人，不一定就是卖衣服、家具和工具的人。所以农民首先要利用手中的产品换取货币，继而他就可以利用货币购买所需要的制造品。而土地也可以补充部分经营渔业和矿业的资本，包括捕鱼，挖矿，都要用到地面上的生产物。

The produce of land, mines, and fisheries, when their natural fertility is equal, is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and proper application of the capitals employed about them. When the capitals are equal and equally well applied, it i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natural fertility.

如果土地、矿山和渔业在自然中的资源同样丰富，那么它们的产量就与投资多少和资金利用的好坏成比例。在资本相等且投资方法合适的情况下，它们的产量与其在自然中的丰富程度成比例。

In all countries where there is tolerable security, every man of common understanding will endeavour to employ whatever stock he can command in procuring either present enjoyment or future profit. If it is employed in procuring present enjoyment, it is a stock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If it is employed in procuring future profit, it must procure this profit either staying with him, or by going from him. In the one case it is fixed, in the other it is a circulating capital. A man must be perfectly crazy who, where there is tolerable security, does not employ all the stock which he commands, whether be his own or borrowed of other people, in some one or other of those three ways.

在人民生活安定的国家，所有有常识的人都希望将可供使用的资本用于眼下的享乐或未来利润的获取。用于眼下享乐的资本只是供给当前的消费；而用于获取未来利润的资本则是将资本保留在手中或将资本花出去。前者属于固定资本，后者则属于流动资本。如果一个人在能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的情况下，不将其能支配的所有资本（包括其自己持有的或从他人手中借贷的）用于其中一项用途，这样的人肯定是疯了。

In those unfortunate countries, indeed, where men are continually afraid of the violence of their superiors, they frequently bury and conceal a great part of their stock, in order to have it always at hand to carry with them to some place of safety, in case of their being threatened with any of those disasters to which they consider themselves as at all times exposed. This is said to be a common practice in Turkey, in Indostan, and, I believe, in most other governments of Asia. It seems to have been a common practice among our ancestors during the violence of the feudal government. Treasure-trove was in those times considered as no

contemptible part of the revenue of the greatest sovereigns in Europe. It consisted in such treasure as was found concealed in the earth, and to which no particular person could prove any right. This was regarded in those times as so important an object, that it was always considered as belonging to the sovereign, and neither to the finder nor to the proprietor of the land, unless the right to it had been conveyed to the latter by an express clause in his charter. It was put upon the same footing with gold and silver mines, which, without a special clause in the charter, were never supposed to be comprehended in the general grant of the lands, though mines of lead, copper, tin, and coal were as things of smaller consequence.

在那些统治者残暴的不幸国家，人民无法保障其财产安全，那么，他们会将大部分资本藏起来以确保在灾难当头时，能随时携其前往安全的地方。听说，这种情况在土耳其、印度，甚至在其他亚洲各国，都时常发生。在我国似乎也有过封建君主暴虐的时代。欧洲各大国君主当时一项巨大的收入来源就是发掘的宝物。只要是埋藏在地下且归属者已无从查证的物品，一律为国王所有。除非国王特令恩准，否则这些宝物既不属于发现者，也不属于土地所有者。当时，人们极其重视这种宝藏。此外，在当时，金银矿产也不得随意开采。除非有明令特许，否则金银矿产均不包含在普通土地所有权之内。但由于铅、铜、锡、煤等各种矿山相较而言并不重要，所以可由人民随意开采。

Chapter II. Of Money Considered as a particular Branch of the General Stock of the Society, or of the Expence of Maintaining the National Capital

第二章、论作为部分社会总资本或作为维持国民资本费用的货币

It has been shown in the first book, that the pric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commodities resolves itself into three parts, of which one pays the wages of the labour, another the profits of the stock, and a third the rent of the land which had been employed in producing and bringing them to market: that there are, indeed, some commodities of which the price is made up of two of those parts only, the wages of labour, and the profits of stock: and a very few in which it consists altogether in one, the wages of labour: but that the price of every commodity necessarily resolves itself into some one, or other, or all of these three parts; every part of it which goes neither to rent nor to wages, being necessarily profit to somebody.

我曾在第一篇中指出：因为商品在生产和上市的过程中，都利用了劳动、资本与土地，所以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可以划分为三部分：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土地租金。事实上，也有一些商品的价格仅由两部分组成，即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甚至有极少商品的价格只由劳动工资这一部分构成。但不管怎样，商品价格始终属于上述三部分中的一个甚至是全部：如果不归为地租，也不归为工资，那么它必归为利润。

Since this is the case, it has been observed, with regard to every particular commodity, taken separately, it must be so with regard to all the commodities which compose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every country, taken complexly. The whole price or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at annual produce must resolve itself into the same three parts, and be parcelled out among the different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either as the wages of their labour, the profits of their stock, or the rent of their land.

据观察，这些特殊商品分别阐述，情况已是如此。而总的来看，所有构成全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的商品也是如此。在第一篇，我曾说过：一个国家必将年产品的总价格或总交换价值划分为三个部分之后，再分配给国内人民，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土地租金。

But though the whol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every country is thus divided among and constitutes a revenue to its different inhabitants, yet as in the rent of a private estate we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gross rent and the net rent, so may we likewise in the revenue of all the inhabitants of a great country.

虽然我们将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全部价值按此种方式分配给居民并将此作为居民的收入，但是，正如私有土地的租金可以分为总地租和纯地租一样，国民收入也可分为总收入和纯收入。

The gross rent of a private estate comprehends whatever is paid by the farmer; the net rent, what remains free to the landlord, after deducting the expence of management, of repairs, and all other necessary charges; or what, without hurting his estate, he can afford to place in his stock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or to spend upon his table, equipage, the ornaments of his house and furniture, his private enjoyments and amusements. His real wealth is in proportion, not to his gross, but to his net rent.

私有土地的总地租，包括农场主的全部花销；纯地租是减去管理、修葺等必要费用后，剩余的总地租中可供土地所有者支配的部分。也就是说，纯地租指在不影响其财产的条件下可供土地所有者当

前消费的资本，或是可用于个人享乐，如：购买衣服、食品、装修住宅的资本。土地所有者实际获得的财富，取决于纯地租的多少，而不取决于总地租的多少。

The gross revenue of all the inhabitants of a great country comprehends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of their land and labour; the net revenue, what remains free to them after deducting the expence of maintaining—first, their fixed, and, secondly, their circulating capital; or what, without encroaching upon their capital, they can place in their stock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or spend upon their subsistence, conveniencies, and amusements. Their real wealth, too, is in proportion, not to their gross, but to their net revenue.

作为一个大国，其国民的总收入包括他们利用土地和劳动在一年生产的所有产品。如果从总收入中减去保留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费用，剩下可供居民自由支配的资本就是纯收入。也就是说，纯收入是可供居民支配的资本，前提是它不侵蚀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留待目前消费，也可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娱乐产品等。国民真实财富的多少，取决于其纯收入的多少，而不取决于其总收入的多少。

The whole expence of maintaining the fixed capital must evidently be excluded from the net revenue of the society. Neither the materials necessary for supporting their useful machines and instruments of trade, their profitable buildings, etc., nor the produce of the labour necessary for fashioning those materials into the proper form, can ever make any part of it. The price of that labour may indeed make a part of it; as the workmen so employed may place the whole value of their wages in their stock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But in other sorts of labour, both the price and the produce go to this stock, the price to that of the workmen, the produce to that of other people, whose subsistence, conveniences, and amusements, are augmented by the labour of those workmen.

显然，我们绝不能将补充固定资本的费用归为社会纯收入。机器只有等到修理后方能使用；营业工具也只有等到修理后才能使用；房屋只有等到修缮后方能获取利润。用于此类修缮的材料，以及加工这些材料后制成成品所需的劳动产品，都不能归为纯收入。当然，由于从事这类劳动的工人可能会将其工资的全部价值用于目前消费的资本，所以我们可能会将这类劳动的价格归为部分社会纯收入。但对于其他劳动种类而言，我们不仅应将劳动价格归为这类资本，还应把劳动的产品归为这种资本。如果将劳动价格归为可供工人当前消费的资本，那么劳动的产品就会成为可供他人当前消费的资本。工人的劳动为他人创造更多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产品。

The intention of the fixed capital is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or to enable the same number of labourers to perform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work. In a farm where all the necessary buildings, fences, drains, communications, etc. are in the most perfect good order, the same number of labourers and labouring cattle will raise a much greater produce than in one of equal extent and equally good ground, but not furnished with equal conveniencies. In manufactures the same number of hands, assisted with the best machinery, will work up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goods than with more imperfect instruments of trade. The expence which is properly laid out upon a fixed capital of any kind, is always repaid with great profit, and increases the annual produce by a much greater value than that of the support which such

improvements require. This support, however, still requires a certain portion of that produce. A certain quantity of materials, and the labour of a certain number of workmen, both of which might have been immediately employed to augment the food, clothing and lodging, the subsistence and conveniencies of the society, are thus diverted to another employment, highly advantageous indeed, but still different from this one. It is upon this account that all such improvements in mechanics, as enable the same number of workmen to perform an equal quantity of work, with cheaper and simpler machinery than had been usual before, are always regarded as advantageous to every society. A certain quantity of materials, and the labour of a certain number of workmen, which had before been employed in supporting a more complex and expensive machinery, can afterwards be applied to augment the quantity of work which that or any other machinery is useful only for performing. The undertaker of some great manufactory who employs a thousand a year in the maintenance of his machinery, if he can reduce this expence to five hundred will naturally employ the other five hundred in purchasing an additional quantity of materials to be wrought up by an additional number of workmen. The quantity of that work, therefore, which his machinery was useful only for performing, will naturally be augmented, and with it all the advantage and conveniency which the society can derive from that work.

固定资本旨在增加劳动生产力，即在保证工人数量不变的条件下，让他们完成更多的工作。在农场面积相等、土地肥瘠程度相等、劳动人数相等且饲养牲畜数目相等的条件下，拥有齐全的设备、必要的建筑物、围墙、水沟和道路的农场与没有这些设备的农场相比，生产的产品必然也会更多。而在雇佣等量工人的条件下，拥有最精良机器设备的厂坊也一定会比设备不完备的厂坊生产量多。任何费用，只

要能恰当地用于固定资本，就一定能很快获取大额利润，而且因此而提升的年产品价值会远远大于维持这类改良物的花费。但我们要花费部分年产品的资本方能支付这种维持费。这样一来，原先直接用来增加食品、衣料、住所及各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材料和劳动力的一部分就要改变其用途。它们虽然改变了用途，但新用途可以带来许多好处。因此，改良机械学的确是社会给予我们的福利：它让相同数目的工人，使用廉价且操作简单的机器进行等量的工作。在过去，修理那些昂贵且复杂的机器要消耗大量的材料与人力。如今改良后的机器可以节省一定数量的材料和人力，并依靠机器增加产品的数量。例如，大型制造厂厂主原来每年需要花费1,000镑修理机器，现在，如果他现在能将修理费减少至500镑，多出的500镑可以用来购买更多的材料，雇佣更多的工人来进行加工。如此一来，产品的数量自然增加。产品增加后，这种产品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

The expence of maintaining the fixed capital in a great country may very properly be compared to that of repairs in a private estate. The expence of repairs may frequently be necessary for supporting the produce of the estate, and consequently both the gross and the net rent of the landlord. When by a more proper direction, however, it can be diminished without occasioning any diminution of produce, the gross rent remains at least the same as before, and the net rent is necessarily augmented.

固定资本在一个大国的保养费，可与私有土地的修理费相媲美。为了保养土地产品，维持土地所有者的总地租和纯地租，都少不了修理费。但如果采取了适宜的措施，在保证不减少产品量的前提下减少修理费，那么，至少可以确保总地租不减，但纯地租一定会增加。

But though the whole expence of maintaining the fixed capital

is thus necessarily excluded from the net revenue of the society, it is not the same case with that of maintaining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Of the four parts of which this latter capital is composed—money, provisions, materials, and finished work—the three last,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are regularly withdrawn from it, and placed either in the fixed capital of the society, or in their stock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Whatever portion of those consumable goods is employed in maintaining the former, goes all to the latter, and makes a part of the net revenue of the society. The maintenance of those three parts of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therefore, withdraws no portion of the annual produce from the net revenue of the society, besides what is necessary for maintaining the fixed capital.

虽然我们不能将固定资本的保养费归为社会纯收入，但包括货币、食料、材料、成品四部分在内的流动资本，其维持费却不能与此相提并论。我曾经说过，后三部分通常出于流动资本，且用作社会中的固定资本或供当前消费的资本。只要消费品不转化为固定资本，它就可以用作供当前消费的资本，成为部分社会纯收入。所以，维持这三部分的流动资本，只是在维持固定资本罢了，因为并没从社会纯收入中抽出任何年产品。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of a society is in this respec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n individual. That of an individual is totally excluded from making any part of his net revenue, which must consist altogether in his profits. But though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of every individual makes a part of that of the society to which he belongs, it is not upon that account totally excluded from making a part likewise of their net revenue. Though the whole goods in a merchant's shop must by no means be placed in his own stock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they may in that of other people, who, from a revenue derived from other funds, may regularly replace their value to him, together with its profits, without occasioning any diminution either of his capital or of theirs.

照此看来，社会流动资本与个人流动资本存在差异：个人流动资本不能归为个人的纯收入；个人的纯收入应全部由其所获利润构成。虽然社会流动资本由每个人的流动资本构成，但绝对不能因此说社会流动资本不属于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虽然商店内的存货不是商人留给自己在当前消费的资本，但可以是留给他人以供当前消费的资本。他人可经常利用其他财富渠道获得的收入偿还商人货物的价值，并偿付商人的利润。这样一来，商人不会亏损资本，而且享用商人商品的人也不会亏损资本。

Money, therefore, is the only part of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of a society, of which the maintenance can occasion any diminution in their net revenue.

因此，只有维持部分社会流动资本，即货币时会减少社会纯收入。

The fixed capital, and that part of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which consists in money, so far as they affect the revenue of the society, bear a very great resemblance to one another.

虽然货币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但它和固定资本对社会收入的影

响却很相似。

First, as those machines and instruments of trade, etc. require a certain expence, first to erect them, and afterwards to support them, both which expences, though they make a part of the gross, are deductions from the net revenue of the society; so the stock of money which circulates in any country must require a certain expence, first to collect it, and afterwards to support it, both which expences, though they make a part of the gross, are, in the same manner, deductions from the net revenue of the society. A certain quantity of very valuable materials, gold and silver, and of very curious labour, instead of augmenting the stock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the subsistence, conveniencies, and amusements of individuals, is employed in supporting that great but expensive instrument of commerce, by means of which every individual in the society has his subsistence, conveniencies, and amusements regularly distributed to him in their proper proportions.

第一，制造、维护工作时使用的机器和工具需要一笔费用。虽然这笔费用属于部分社会总收入，但它是从社会纯收入中扣除后得到的。货币也是如此，货币流通的时候需要一笔费用进行积累和支撑，，这种费用虽然属于部分社会总收入，但也是从社会纯收入中扣除后得到的。在商业上，货币可谓意义重大：只有持有货币，才能按适当比例将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产品分配给每个人。虽说如此，货币也是非常昂贵的工具。如果要维持这种昂贵的工具，必须要花费大量极有价值的材料，即金银和一定量极精细的劳动，使其不能用来增加可供当前消费的资本。

Secondly, as the machines and instruments of a trade, etc. , which compose the fixed capital either of an individual or of a society, make no part either of the gross or of the net revenue of either; so money, by means of which the whole revenue of the society is regularly distributed among all its different members, makes itself no part of that revenue. The great wheel of circulation is altogether different from the goods which are circulated by means of it. The revenue of the society consists altogether in those goods, and not in the wheel which circulates them. In computing either the gross or the net revenue of any society, we must always, from their whole annual circulation of money and goods, deduct the whole value of the money, of which not a single farthing can ever make any part of either.

第二，构成个人或社会的固定资本的机器和工具，都不算是总收入或纯收入的一部分。货币也是如此，社会的总收入需要依赖货币定期分配给社会各成员，但货币并不属于社会的部分收入，只是货物借以流通的手段，这与通过货币进行流通的货物大不相同。只有货物能构成社会收入，流通货物的手段则不可以。在计算社会总收入或纯收入时，我们必须从全年流通的货币与货物中将货币的价值减去，一分也不能留。

It is the ambiguity of language only which can make this proposition appear either doubtful or paradoxical. When properly explained and understood, it is almost self-evident.

由于言辞模糊不清，这样的议论不免让人心生疑问。如果能做恰当地解释与理解，自然就能明白。

When we talk of any particular sum of money, we sometimes mean nothing but the metal pieces of which it is composed; and sometimes we include in our meaning some obscure reference to the goods which can be had in exchange for it, or to the power of purchasing which the possession of it conveys. Thus when we say that the circulating money of England has been computed at eighteen millions, we mean only to express the amount of the metal pieces, which some writers have computed, or rather have supposed to circulate in that country. But when we say that a man is worth fifty or a hundred pounds a year, we mean commonly to express not only the amount of the metal pieces which are annually paid to him, but the value of the goods which he can annually purchase or consume. We mean commonly to ascertain what is or ought to be his way of living, or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in which he can with propriety indulge himself.

我们谈到一定数额的货币时，有时仅指货币所含的金属，有时又暗指这些货币能交换的货物，即可以利用这些货币获得的购买力。例如，当我们说英格兰的通货达1,800万镑时，我们意在表明：在某人经过计算或设想后估算的英格兰现在流通的金块数量。但如果说某人年收入达50镑或100镑时，我们通常不仅指的是他每年可收入囊中的金块数，而且也指他每年可以购买或消费的货物的价值。通常这可以揭示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以及这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质量如何。

When, by any particular sum of money, we mean not only to express the amount of the metal pieces of which it is composed, but to include in its signification some obscure reference to the goods which can be had in exchange for them, the wealth or revenue

which it in this case denotes, is equal only to one of the two values which are thus intimated somewhat ambiguously by the same word, and to the latter more properly than to the former, to the money's worth more properly than to the money.

我们谈到一定数额的货币时，不仅指货币所含的金属，还暗指这些货币能交换的货物。在这种情况下，绝不能让这些货币所代表的财富或收入同时等于这两种价值，只能等于二者之一。与其说等于前者，不如说等于后者；与其说等于货币，不如说等于货币价值。

Thus if a guinea be the weekly pension of a particular person, he can in the course of the week purchase with it a certain quantity of subsistence, conveniencies, and amusements. In proportion as this quantity is great or small, so are his real riches, his real weekly revenue. His weekly revenue is certainly not equal both to the guinea, and to what can be purchased with it, but only to one or other of those two equal values; and to the latter more properly than to the former, to the guinea's worth rather than to the guinea.

比方说某人每周都要领1几尼的养老金，那么过一周后，他就能用这1几尼购买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了。他每周的真实所得，也就是他的真实财富，和他能购买的产品数量多少成比例。但他每周的收入不可能既等于1几尼，又与这1几尼所能购买的货物相等，只能与二者之一相等。事实上，与其说等于前者，不如说等于后者；与其说等于这1几尼，不如说等于这1几尼的价值。

If the pension of such a person was paid to him, not in gold, but in a weekly bill for a guinea, his revenue surely would not so

properly consist in the piece of paper, as in what he could get for it. A guinea may be considered as a bill for a certain quantity of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upon all the tradesmen in the neighbourhood. The revenue of the person to whom it is paid, does not so properly consist in the piece of gold, as in what he can get for it, or in what he can exchange it for. If it could be exchanged for nothing, it would, like a bill upon a bankrupt, be of no more value than the most useless piece of paper.

如果不以金币支付这人的养老金，而是每星期给他一张写有1几尼的票据，那么显而易见，与其说他的收入是这一张纸，不如说他的收入是拿这张纸所换得的物品。同样，1几尼也可视为一张票据。只要持有这张票据，就可以向附近各商家交换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与其说是金块构成了获取这些物品的人的收入，不如说他因为手中持有几尼才能换取所需货物。如果这些钱无法换取物品，那它的价值，就如同为破产者开具的票据，也是毫无价值的。

Though the weekly or yearly revenue of all the different inhabitants of any country, in the same manner, may be, and in reality frequently is paid to them in money, their real riches, however, the real weekly or yearly revenue of all of them taken together, must always be great or small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f consumable goods which they can all of them purchase with this money. The whole revenue of all of them taken together is evidently not equal to both the money and the consumable goods; but only to one or other of those two values, and to the latter more properly than to the former.

虽然一个国家的全体居民每周或每年的收入可以且事实上也是由

货币支付的，但这些居民真正拥有多少财富，即他们每周或每年所拥有的真实收入，总是与所有人用货币所能购买的消费品的多少成比例。如此看来，很明显，这些居民的全部收入不可能既与货币相等，又与他们购买的消费品相等，只能与其中之一相等。与其说与前者相等，不如说与后者相等。

Though we frequently, therefore, express a person's revenue by the metal pieces which are annually paid to him, it is because the amount of those pieces regulates the extent of his power of purchasing, or the value of the goods which he can annually afford to consume. We still consider his revenue as consisting in this power of purchasing or consuming, and not in the pieces which convey it.

我们之所以习惯用一个人每年领取的金块数来代表这个人的收入，是因为金块数可以决定他的购买力，也就是说，可以决定他每年所能购买的消费品的价值。我们仍然认为，正是这种购买力或消费力构成了他的收入，而不是代表购买力或消费力的金块。

But if this is sufficiently evident even with regard to an individual, it is still more so with regard to a society. The amount of the metal pieces which are annually paid to an individual, is often precisely equal to his revenue, and is upon that account the shortest and best expression of its value. But the amount of the metal pieces which circulate in a society can never be equal to the revenue of all its members. As the same guinea which pays the weekly pension of one man to-day, may pay that of another to-morrow, and that of a third the day thereafter, the amount of the metal pieces which annually circulate in any country must always be of much less value

than the whole money pensions annually paid with them. But the power of purchasing, orthe goods which can successively be bought with the whole of those money pensions as they are successively paid, must always be precisely of the same value with those pensions; as must likewise be the revenue of the different persons to whom they are paid. That revenue, therefore, cannot consist in those metal pieces, of which the amount is so much inferior to its value, but in the power of purchasing, in the goods which can successively be bought with them as they circulate from hand to hand.

如果说从个人角度而言事实已经很清楚了，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情况更加明了。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每年领取的金块数恰好等于他的收入；也就是说，他所领取的金块数，是能表示他收入的价值的最简单方式。但社会上流通的金块数不可能等于社会全体人员的收入。今天付给甲1几尼作为其养老金，明日同1几尼可付给乙，作为乙的养老金，后日同1几尼又可以付给丙，作为丙的养老金。在世界各地，与年年支付的养老金相比，年年流通着的金块数的价值要小得多。但与所有的养老金相比，购买力，即利用所得到的全都养老金陆续购买的全部货物却总具有相同的价值；同理，所有领取养老金的人的收入一定与全部的养老金价值相同。金块并不会构成社会收入；将所有的金块加在一起，其数量远小于它的价值。是购买力，即每个人利用手中流通的金块陆续购买的货物才真正构成了社会收入。

Money, therefore, the great wheel of circulation, the great instrument of commerce, like all other instruments of trade, though it makes a part and a very valuable part of the capital, makes no part of the revenue of the society to which it belongs; and though the metal pieces of which it is composed, in the course of their annual circulation, distribute to every man the revenue which

properly belongs to him, they make themselves no part of that revenue.

货币是流通的巨轮，也是商业上的重要工具。与其他所有职业使用的工具一样，货币也是资本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价值很高的一部分，但它并没有构成社会收入。当然，将收入分配给那些应得到这些收入的人依靠的是货币内金块的流通，但这种金块不会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

Thirdly, and lastly, the machines and instruments of trade, etc. which compose the fixed capital, bear this further resemblance to that part of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which consists in money; that as every saving in the expence of erecting and supporting those machines, which does not diminish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is an improvement of the net revenue of the society, so every saving in the expence of collecting and supporting that part of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which consists in money, is an improvement of exactly the same kind.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机器和工具这些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与由货币构成的流动资本还有那么一点相似。如果不减少劳动生产力，那么节省下来的用于建造和维修机器的费用可以增加社会的纯收入。节省的这些用于收集、维持货币这部分流动资本的费用同样也可以增加社会纯收入。

It is sufficiently obvious, and it has partly, too, been explained already, in what manner every saving in the expence of supporting the fixed capital is an improvement of the net revenue of the

society. The whole capital of the undertaker of every work is necessarily divided between his fixed and his circulating capital. While his whole capital remains the same, the smaller the one part, the greater must necessarily be the other. It is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which furnishes the materials and wages of labour, and puts industry into motion. Every saving, therefore, in the expence of maintaining the fixed capital, which does not diminish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must increase the fund which puts industry into motion, and consequently the annual produce of land and labour, the real revenue of every society.

为什么节省了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就可以增加社会纯收入呢？这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而且我们也曾给出部分解释。企业家的全部资本一定会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资本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两者一定会此消彼长：其中一部分越少，另一部分就越大。流动资本负责供给材料，支付工资，促进产业发展。因此，如果不减少劳动生产力，节省下来的固定资本维持费就一定可以增加促进产业发展的资本，进而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

The substitution of paper in the room of gold and silver money, replaces a very expensive instrument of commerce with one much less costly, and sometimes equally convenient. Circulation comes to be carried on by a new wheel, which it costs less both to erect and to maintain than the old one. But in what manner this operation is performed, and in what manner it tends to increase either the gross or the net revenue of the society, is not altogether so obvious, and may therefore require some further explication.

用纸作为货币材料来代替金银，可以说是利用一种低廉的商业工

具代替一种昂贵的商业工具。但两者有时都能为人们提供几乎相等的便利。自从纸币出现后，流通界就相当于使用了一种新轮子，相较于旧轮子，纸币的创建费和维持费要少得多。但人们还不是很清楚它如何作为流通的轮子以增加社会的总收入或纯收入。所以，我们还需要作进一步说明。

There are several different sorts of paper money; but the circulating notes of banks and bankers are the species which is best known, and which seems best adapted for this purpose.

纸币的种类很多，其中最普遍且最实用的莫过于银行的流通券。

When the people of any particular country have such confidence in the fortune, probity, and prudence of a particular banker, as to believe that he is always ready to pay upon demand such of his promissory notes as are likely to be at any time presented to him; those notes come to have the same currency as gold and silver money, from the confidence that such money can at any time be had for them.

如果一国人民信任某银行家，认为他拥有雄厚的资本，为人诚实可靠，待人接物谨慎细心，也就是说，人们相信他随时都有能力兑换现金，那么，他发行的钞票就能在社会通用，作用与黄金白银相当。

A particular banker lends among his customers his own promissory notes, to the extent, we shall suppose, of a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As those notes serve all the purposes of money,

his debtors pay him the same interest as if he had lent them so much money. This interest is the source of his gain. Though some of those notes are continually coming back upon him for payment, part of them continue to circulate for months and years together. Though he has generally in circulation, therefore, notes to the extent of a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twenty thousand pounds in gold and silver may frequently be a sufficient provision for answering occasional demands. By this operation, therefore, twenty thousand pounds in gold and silver perform all the functions which a hundred thousand could otherwise have performed. The same exchanges may be made, the same quantity of consumable goods may be circulated and distributed to their proper consumers, by means of his promissory notes, to the value of a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as by an equal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money. Eighty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and silver, therefore, can, in this manner, be spared from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if different operations of the same kind should, at the same time, be carried on by many different banks and bankers, the whole circulation may thus be conducted with a fifth part only of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requisite.

假设某银行家借给顾客10万镑期票。既然这种期票与货币作用相同，债务人理应像借用货币一样偿付利息。而银行家就通过债务人偿付的利息获取利润。当然，期票一经发出就会有一部分可以不断得到兑现，但总会有部分期票仍在社会流通。因此，虽然银行家发出的期票是10万镑，但总会有2万镑金银足以应对不时之需。这样一来，如果发行这种期票，就可以让2万镑金银收到与10万镑金银相同的作用。利用这10万镑期票与利用10万镑金银相同，都可以交换、周转并分配相同数目的消费品。这样算起来，在国内流通的过程中，一共可以节省8万镑金银。加入国内各银行都按照同样的办法经营，那么，与没有期票时相比，流通国内货物所需的金银就减少了4/5。

Let us suppose, for example, that the whole circulating money of some particular country amounted, at a particular time, to one million sterling, that sum being then sufficient for circulating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of their land and labour. Let us suppose, too, that some time thereafter, different banks and bankers issued promissory notes, payable to the bearer, to the extent of one million, reserving in their different coffers two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for answering occasional demands. There would remain, therefore, in circulation, eight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in gold and silver, and a million of bank notes, or eighteen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of paper and money together. But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had before required only one million to circulate and distribute it to its proper consumers, and that annual produce cannot be immediately augmented by those operations of banking. One million, therefore, will be sufficient to circulate it after them. The goods to be bought and sold being precisely the same as before, the same quantity of money will be sufficient for buying and selling them. The channel of circulation, if I may be allowed such an expression, will remain precisely the same as before. One million we have supposed sufficient to fill that channel. Whatever, therefore, is poured into it beyond this sum cannot run in it, but must overflow. One million eight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are poured into it. Eight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therefore, must overflow, that sum being over and above what can be employed i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But though this sum cannot be employed at home, it is too valuable to be allowed to lie idle. It will, therefore, be sent abroad, in order to seek that profitable employment which it cannot find at home. But the paper cannot go abroad; because at a distance from the banks which issue it, and from the country in which payment of it can be exacted by law, it will not be received in common payments.

Gold and silver, therefore, to the amount of eight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will be sent abroad, and the channel of home circulation will remain filled with a million of paper, instead of the million of those metals which filled it before.

假设说，在某一时代某个国家的通货总计100万镑，足以在国内流通全部年产品。我们再来做个假设，后来由于建立了越来越多的银行，发行兑现的期票为100万镑，而另有20万镑保存在金柜内以备不时之需。这样一来，一共有80万镑金银和100万镑期票，总共180万镑在流通。但原来在国内，流通、周转和分配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只需要100万镑；而现在，银行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增加国内年产品。因此，自从设立银行以来，100万镑足够用于流通国内年产品。等待出售和购买的货物数量不变，那么用于买卖的货币量也可以保持不变。我们流通的渠道（如果如此称呼合适的话）也必然完全不变。100万镑足以保障流通的进行。现在，我们已投入了180万镑，多出的80万镑一定会溢出，因为现在无法容纳这一数额的货币在国内流通。但是，如果将这些国内不能容纳的货币抛在一边不用，自然会给我们带来损失。因此，我们一定要将它送往国外，让它得以利用。然而，由于国外距离发行我国纸币的银行太远，距离可以利用法律的力量强制其兑现的国家也很远，所以我们无法将纸币运往国外。这样一来，能在国外通用并能送往国外的纸币一定是80万镑金银。以前，我们用100万镑金银充满了国内流通的渠道，现在，改为100万镑纸币。

But though so great a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is thus sent abroad, we must not imagine that it is sent abroad for nothing, or that its proprietors make a present of it to foreign nations. They will exchange it for foreign goods of some kind or another, in order to supply the consumption either of some other foreign country or of their own.

当然，我们将大量金银送往国外肯定不会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也绝不是将其送给外国人当礼物的。这些金银的外流，一定可以为我们换回一些外国产品以供本国人消费，或出售给他国的人民消费。

If they employ it in purchasing goods in one foreign country in order to supply the consumption of another, or in what is called the carrying trade, whatever profit they make will be an addition to the net revenue of their own country. It is like a new fund, created for carrying on a new trade; domestic business being now transacted by paper, and the gold and silver being converted into a fund for this new trade.

如果甲国人民运送金银，他们现在可以利用这笔可观的金银从乙国购买货物，满足两国人民的消费。他们所从事的被称为贩运贸易。通过这种贸易，甲国可以增加其纯收入。因此，如同新建立的基金一样，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巨额金银创办新事业。现在，纸币运营着国内事业，而转移过来的金银就能够作为这种新事业的基金。

If they employ it in purchasing foreign goods for home consumption, they may either, first, purchase such goods as are likely to be consumed by idle people who produce nothing, such as foreign wines, foreign silks, etc. ; or, secondly, they may purchase an additional stock of materials, tools, and provisions, in order to maintain and employ an additional number of industrious people, who reproduce, with a profit, the value of their annual consumption.

如果利用这笔数目可观的金银购买国外的产品，以此满足本国消

费，那么，购买的产品可能是：第一，有闲阶级消费的产品，如国外的葡萄酒和绸缎等；第二，可用于维持和雇佣更多勤劳人民的材料、工具和食料等，再由这些人生产出他们每年消费的价值，并产生利润。

So far as it is employed in the first way, it promotes prodigality, increases expence and consumption without increasing production, or establishing any permanent fund for supporting that expence, and is in every respect hurtful to the society.

第一类购买方法只会助长奢侈之风，增加人民消费，而无法增加生产，也无法增加维持这项消费的固定资本。无论哪一点，对社会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So far as it is employed in the second way, it promotes industry; and though it increases the consumption of the society, it provides a permanent fund for supporting that consumption, the people who consume reproducing, with a profit, the whole value of their annual consumption. The gross revenue of the society,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ir land and labour, is increased by the whole value which the labour of those workmen adds to the materials upon which they are employed; and their net revenue by what remains of this value, after deducting what is necessary for supporting the tools and instruments of their trade.

而第二种购买方法，虽然会增加社会消费，但可以鼓励人们发扬勤劳精神，而且还能增加维持这项消费的固定资本。消费者会生产处每年消费的价值，并增加额外利润。而社会上的总收入，即土地和劳

动的年产品，一定能增加，且增加量等于工人在加工材料上增加的所有价值。而社会纯收入也一定会增加，其增加量等于工人在加工材料上增加的所有价值减去这些工人使用工具所消耗的维持费的价值。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being forced abroad by those operations of banking, is employed in purchasing foreign goods for home consumption, is and must be employed in purchasing those of this second kind, seems not only probable but almost unavoidable. Though some particular men may sometimes increase their expence very considerably though their revenue does not increase at all, we may be assured that no class or order of men ever does so; because, though the principles of common prudence do not always govern the conduct of every individual, they always influence that of the majority of every class or order. But the revenue of idle people, considered as a class or order, cannot, in the smallest degree, be increased by those operations of banking. Their expence in general, therefore, cannot be much increased by them, though that of a few individuals among them may, and in reality sometimes is. The demand of idle people, therefore, for foreign goods being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as before,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money, which being forced abroad by those operations of banking, is employed in purchasing foreign goods for home consumption, is likely to be employed in purchasing those for their use. The greater part of it will naturally be destined for the employment of industry, and not for the maintenance of idleness.

那些因银行而送往国外的大部分金银，都用于购买在本国消费的国外产品，而且一定会购买第二类货物。这不仅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而且还是无可避免的。虽然一些人的收入没有增加，他们也会大肆挥霍手中的资本。不过我们可以说一个阶级不会所有人都这样做。我们

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可以谨慎行事，但至少，总会有一个阶级，其中大多数人都不奢侈不浪费，且总能谨慎行事。那些有闲阶级的收入，既不能由于银行而增加半分，除少数特例外，其整个阶级的费用也不能由于银行的作用而增加毫厘。有闲阶级仍然需要或可能需要购买国外产品。只有极小一部分为购买国外产品以供本国消费的送往国外的货币是用来购买满足这类人需要的产品。因为其中大部分货币是用来发展实业，而不是用来奖励不务正业的。

When we compute the quantity of industry which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of any society can employ, we must always have regard to those parts of it only which consist in provisions, materials, and finished work: the other, which consists in money, and which serves only to circulate those three, must always be deducted. In order to put industry into motion, three things are requisite; materials to work upon, tools to work with, and the wages or recompence for the sake of which the work is done. Money is neither a material to work upon, nor a tool to work with; and though the wages of the workman are commonly paid to him in money, his real revenue, like that of all other men, consists, not in money, but in the money's worth; not in the metal pieces, but in what can be got for them.

如果要计算社会流动资本能带来多少劳动数量时，我们必须要铭记：在计算社会流动资本时，仅可计入食料、材料、成品三项。而必须减去那些用以实现这三项的流通、由货币构成的部分。我们需要依靠材料、工具和工资推动产业发展。材料是工作的对象，工具是工作的方式，工资是工作的目的。货币不是工作的材料，也不是工作的工具；虽然我们一般用货币支付工人的工资，但真正构成他们收入的不是货币或金块，而是货币的价值，换言之，是利用金块能换得的货物。

The quantity of industry which any capital can employ must, evidently, be equal to the number of workmen whom it can supply with materials, tools, and a maintenance suitable to the nature of the work. Money may be requisite for purchasing the materials and tools of the work, as well a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workmen. But the quantity of industry which the whole capital can employ is certainly not equal both to the money which purchases, and to the materials, tools, and maintenance, which are purchased with it; but only to one or other of those two values, and to the latter more properly than to the former.

显而易见，用一定数量的资本能雇佣的劳动数量与用这些资本雇佣的工人数量相等，我们将材料、工具以及与工作性质相符的维持费提供给这些工人。当然，我们必须要使用货币购买材料、工具、维持工人，但毫无疑问，使用全部这些资本能雇佣的劳动数量，不能既等于用以购买的货币，也不能等于用其购买的材料、工具和食料。两者只能是等于其中一个，与其说等于前者，不如说等于后者。

When paper is substituted in the room of gold and silver money, the quantity of the materials, tools, and maintenance, which the whole circulating capital can supply, may be increased by the whole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used to be employed in purchasing them. The whole value of the great wheel of circ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is added to the goods which are circu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means of it. The operation, in some measure, resembles that of the undertaker of some great work, who, in consequence of some improvement in mechanics, takes down his old machinery, and add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ts price and that of the new to his circulating capital, to the fund from which he

furnishes materials and wages to his workmen.

如果用纸币代替金银，那么一定可以按照被替代的金银的全部价值，增加由全部流动资本所提供的材料、食料和工具。现在，我们将全部流动和分配的价值加在本来依靠其流通的货物价值上。这个过程就如同某个大工厂厂主所面临的情况：由于工厂改良了机器，他将旧机器弃置不用，把新旧机器的价格差与流动资本加在一起，即增加购买材料、支付工资的资本。

What is the proportion which the circulating money of any country bears to the whol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circulated by means of it, it is, perhaps,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It has been computed by different authors at a fifth, at a tenth, at a twentieth, and at a thirtieth part of that value. But how small soever the proportion which the circulating money may bear to the whol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as but a part, and frequently but a small part, of that produce, is ever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industry, it must always bear a very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to that part. When, therefore, by the substitution of paper, the gold and silver necessary for circulation is reduced to, perhaps, a fifth part of the former quantity, if the value of only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other four-fifths be added to the funds which are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industry, it must make a very considerable addition to the quantity of that industry, and, consequently, to th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land and labour.

我们也许不能够确定一国流通的货币相对于依靠货币流通的年产品的全部价值而言，保持着何种比例。有人说是1:5，也有人说是1:10，1:20，1:30。但是，无论货币与年产品全部价值的比例多么

小，往往只有一小部分年产品用于维持产业的基金，但货币与这一部分年产品的比例并不小。如果用纸币代替金银，那么大约可以使用于流通的金银数量减少4/5。如果将这4/5的大部分加在维持产业的基金中，那么必然能使产业的数量大大增加，进而大大提高加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的价值。

An operation of this kind has, within these five-and-twenty or thirty years, been performed in Scotland, by the erection of new banking companies in almost every considerable town, and even in some country villages. The effects of it have been precisely those above described. The business of the country is almost entirely carried on by means of the paper of those different banking companies, with which purchases and payments of kinds are commonly made. Silver very seldom appears except in the change of a twenty shillings bank note, and gold still seldomer. But though the conduct of all those different companies has not been unexceptionable, and has accordingly required an act of Parliament to regulate it, the country, notwithstanding, has evidently derived great benefit from their trade. I have heard it asserted, that the trade of the city of Glasgow doubled in about fifteen years after the first erection of the banks there; and that the trade of Scotland has more than quadrupled since the first erection of the two public banks at Edinburgh, of which the one, called the Bank of Scotland, was established by act of Parliament in 1695; the other, called the Royal Bank, by royal charter in 1727. Whether the trade, either of Scotland in general, or the city of Glasgow in particular, has really increased in so great a proportion, during so short a period, I do not pretend to know. If either of them has increased in this proportion, it seems to be an effect too great to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sole operation of this cause. That the trade and industry of Scotland, however, have increased very considerably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hat the banks have contributed a good deal to this increase, cannot be doubted.

近25至30年来，此类操作在几乎所有苏格兰的大城市中比比皆是，很多银行纷纷设立起来，甚至有时连穷乡僻壤也有很多银行。这样做的效果恰如上面所描述的。国内商业几乎完全依靠纸币运营，所有的购买和支付行为也都依靠纸币完成。除了需要兑换20先令的钞票外，人们很少见到白银在流通，黄金就更少了。虽然各种银行良莠不齐，这使得议院有必要进行立法制裁，但国家的确因设立了银行而获益良多。我听说：自从设立银行以来，格拉斯哥在15年间，商业规模已增长一倍。自从在爱丁堡成立两个公立银行，即1693年国会立法设立的苏格兰银行及1727年国王敕令设立的皇家银行以来，苏格兰的商业规模增长了三倍多。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苏格兰和格拉斯哥的商业是否真的取得了这样的增长，对此我不敢妄下定论。如果苏格兰或格拉斯哥真的有如此大规模的发展，那么我们好像不能将其商业取得的飞跃式进展全部归功于银行的设立，这其中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但我们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工商业大有增长，且银行的设立无疑是其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The value of the silver money which circulated in Scotland before the union, in 1707, and which, immediately after it, was brought into the Bank of Scotland in order to be recoined, amounted to 411,117*l.* 10*s.* 9*d.* sterling. No account has been got of the gold coin; but it appears from the ancient accounts of the mint of Scotland, that the value of the gold annually coined somewhat exceeded that of the silver. There were a good many people, too, upon this occasion, who, from a diffidence of repayment, did not bring their silver into the Bank of Scotland: and there was, besides, some English coin which was not called in. The whole value of the gold and silver, therefore, which circulated in Scotland before the

union, cannot be estimated at less than a million sterling. It seems to have constituted almost the whole circulation of that country; for though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ank of Scotland, which had then no rival, was considerable, it seems to have made but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whole. In the present times the whole circulation of Scotland cannot be estimated at less than two millions, of which that part which consists in gold and silver most probably does not amount to half a million. But though the circulating gold and silver of Scotland have suffered so great a diminution during this period, its real riches and prosperity do not appear to have suffered any. Its agriculture, manufactures, and trade, on the contrary,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have evidently been augmented.

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合并前在苏格兰流通而在合并后不久由苏格兰银行重新铸造的银币，其价值总计达411,117镑10先令9便士。金币的价值现已无从考证。但根据苏格兰造币厂在其旧账簿的记录，每年铸造的金币价值似乎略高于银币。当时，很多人担心一旦苏格兰银行收入银币，他们就不能再拥有这些银币了，所以很多人没有将银币存到苏格兰银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英格兰铸币也没有存到苏格兰银行，且仍在流通中。所以，苏格兰在与英格兰合并以前，国内流通的金币和银币的价值总计不少于100万镑。这相当于当时苏格兰的所有通货，虽然当时没有银行与苏格兰银行竞争，它可以发行大量钞票，但这些钞票仅占全部通货的极小部分。估计现在苏格兰的全部通货不少于200万镑，但金币和银币的总价值却很可能已不到50万镑。但是，虽然现在苏格兰流通的金银已大大减少，但苏格兰真正的财富与兴旺程度却丝毫未减。相反，显而易见的是：农工商各行业迅猛发展，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也只增不减。

It is chiefly by discounting bills of exchange, that is, by advancing money upon them before they are due,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banks and bankers issue their promissory notes. They deduct always, upon whatever sum they advance, the legal interest till the bill shall become due. The payment of the bill, when it becomes due, replaces to the bank the value of what had been advanced, together with a clear profit of the interest. The banker who advances to the merchant whose bill he discounts, not gold and silver, but his own promissory notes, has the advantage of being able to discount to a greater amount, by the whole value of his promissory notes, which he finds by experience are commonly in circulation. He is thereby enabled to make his clear gain of interest on so much a larger sum.

银行主要通过贴现汇票发行钞票，也就是说，垫付货币以购买未满期的汇票。不用等到期满，就可持汇票前往银行预贷现金。而银行从全部贷额中扣除贷款人到期应缴的利息。到期后，可通过偿还银行预贷出去的价值兑付汇票，此外，还能获取纯利润，即利息。银行以其发行的钞票而不是以金银支付贴现汇票。在能力所及范围内，银行家可根据经验，尽量将钞票垫付出去，所以，他能增加贴现的汇票金额，这样一来，他所获得纯利润（利息）当然也会增加。

The commerce of Scotland, which at present is not very great, was still more inconsiderable when the two first banking companies were established, and those companies would have had but little trade had they confined their business to the discounting of bills of exchange. They invented, therefore, another method of issuing their promissory notes; by granting what they called cash accounts, that is by giving credit to the extent of a certain sum (two or three thousand pounds, for example) to any individual who could procure two persons of undoubted credit and good landed estate to become surety for him, that whatever money should be advanced to him,

within the sum for which the credit had been given, should be repaid upon demand, together with the legal interest. Credits of this kind are, I believe, commonly granted by banks and bankers in all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But the easy terms upon which the Scotch banking companies accept of repayment are, so far as I know, peculiar to them, and have, perhaps, been the principal cause, both of the great trade of those companies and of the benefit which the country has received from it.

时至今日，苏格兰的商业不是很繁荣，在上面提到的两银行创立时更是如此。如果这两家银行只经营贴现汇票，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倒闭。所以，它们想出了发行信用券这种方法，即现金结算法。任何人只要能找到两个有信用且拥有地产的人为其担保，并在银行要求偿还时保证全额偿还借款，附加法定利息，就可向银行借贷一定金额的款项，如2,000镑或3,000镑。我相信，世界各地都在使用这种贷款方法。但根据我的了解，各家苏格兰银行提出来的还款条件都比较简单，这或许是他们的银行兴旺发达、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

Whoever has a credit of this kind with one of those companies, and borrows a thousand pounds upon it, for example, may repay this sum piecemeal, by twenty and thirty pounds at a time, the company discounting a proportionable part of the interest of the great sum from the day on which each of those small sums is paid in till the whole be in this manner repaid. All merchants, therefore, and almost all men of business, find it convenient to keep such cash accounts with them, and are thereby interested to promote the trade of those companies, by readily receiving their notes in all payments, and by encouraging all those with whom they have any influence to do the same. The banks, when their customers apply to them for money, generally advance it to them in their own

promissory notes. These the merchants pay away to the manufacturers for goods, the manufacturers to the farmers for materials and provisions, the farmers to their landlords for rent, the landlords repay them to the merchants for the conveniencies and luxuries with which they supply them, and the merchants again return them to the banks in order to balance their cash accounts, or to replace what they may have borrowed of them; and thus almost the whole money business of the country is transacted by means of them. Hence the great trade of those companies.

在苏格兰，只要借款人具备以上信用条件并按照上述方式从银行借款，如1,000镑，就能选择分期还款，一次还款最低数额为二三十镑。银行从每次收款的日期算起，至偿清借款的日期止，计算每次收回的数额，并在全部利息中减少相应数额的利息。商人、实业家都认为这种现金账户很便利，因此愿意促进银行的这种业务，不仅在所有的支付形式中选择钞票，还劝熟人也接受这种支付形式。如果顾客向银行借贷货币，银行基本上会以其发行的钞票支付。如果商人欲购买制造者的产品，他会使用钞票；而制造者欲购买农场主的食料和材料时，也会使用钞票。相似地，农场主支付土地所有者地租时，以钞票支付；而土地所有者购买各种便利品和奢侈品时，也会付给商人钞票，最后再由商人把钞票还给银行以偿还借款。由此看来，所有金钱往来，都要使用钞票。这样，自然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

By means of those cash accounts every merchant can, without imprudence, carry on a greater trade than he otherwise could do. If there are two merchants, one in London and the other in Edinburgh, who employ equal stocks in the same branch of trade, the Edinburgh merchant can, without imprudence, carry on a greater trade and give employment to a greater number of people than the London merchant. The London merchant must always keep

by him a considerable sum of money, either in his own coffers, or in those of his banker, who gives him no interest for it, in order to answer the demands continually coming upon him for payment of the goods which he purchases upon credit. Let the ordinary amount of this sum be supposed five hundred pounds. The value of the goods in his warehouse must always be less by five hundred pounds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had he not been obliged to keep such a sum unemployed. Let us suppose that he generally disposes of his whole stock upon hand, or of goods to the value of his whole stock upon hand, once in the year. By being obliged to keep so great a sum unemployed, he must sell in a year five hundred pounds worth less goods than he might otherwise have done. His annual profits must be less by all that he could have made by the sale of five hundred pounds worth more goods;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employed in preparing his goods for the market must be less by all those that five hundred pounds more stock could have employed. The merchant in Edinburgh, on the other hand, keeps no money unemployed for answering such occasional demands. When they actually come upon him, he satisfies them from his cash account with the bank, and gradually replaces the sum borrowed with the money or paper which comes in from the occasional sales of his goods. With the same stock, therefore, he can, without imprudence, have at all times in his warehouse a larger quantity of goods than the London merchant; and can thereby both make a greater profit himself, and give constant employment to a greater number of industrious people who prepare those goods for the market. Hence the great benefit which the country has derived from this trade.

商人们可以利用现金结算法安全无忧地扩大经营规模。假设有两个商人，一人在伦敦，一人在爱丁堡，他们经营着相同的产业，且投入的资本也相等。由于爱丁堡商人使用了现金结算法，所以能安全地

扩大其产业规模，雇佣更多的员工。而伦敦商人并没有使用现金结算法，所有往往要将大额的货币存在自己或银行的金柜内（当然，这样做并没有利息），以便应付之前使用贷款赊购货物后，货主们接二连三的讨要货款的要求。如果商人必须经常在手中持有500镑应急货币，不作日常流通，仅备上述不时之需，那么仓库内货物的价值必将减少500镑。假设商人手中的存货每年脱售一次，或者说商人每年卖出的商品价值与其手中全部货物的价值相等，那么，由于他总要常常保有这500镑的应急货币，因此与无需时时持有应急货币的情况相比，商人脱售货物的价值必然减少500镑。在这种情况下，与他能多卖500镑商品相比，他每年获取的利润必然减少；与他能够将500镑的应急货币作为资本投入使用相比，他为使商品上市而雇佣的工人数量也必然减少。而爱丁堡商人就没有必要手中保有货币以应对不时之需，因为他可以利用现金结算法从银行借钱来应付紧急的需要。之后他可以凭借售卖赚取的货币或纸币，慢慢偿还银行借款。在资本量相等的情况下，他可以比伦敦商人更安全地储备更多的商品。因此，他能获取更多的利润，进而为那些专为市场供应货物的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遇。整个国家也会因此获利。

The facility of discounting bills of exchange it may be thought indeed, gives the English merchants a conveniency equivalent to the cash accounts of the Scotch merchants. But the Scotch merchants, it must be remembered, can discount their bills of exchange as easily as the English merchants; and have, besides, the additional conveniency of their cash accounts.

虽然英格兰商人通过英格兰银行的贴现汇票得到的便利，相当于现金结算法下苏格兰商人获得的便利，但必须注意的是，苏格兰商人也可以像英格兰商人那样向银行贴现汇票。此外，苏格兰银行除了贴现期票，还实行现金结算法，所以能给予商人的便利更多。

The whole paper money of every kind which can easily circulate in any country never can exceed the value of the gold and silver, of which it supplies the place, or which (the commerce being supposed the same) would circulate there, if there was no paper money. If twenty shilling notes, for example, are the lowest paper money current in Scotland, the whole of that currency which can easily circulate there cannot exceed the sum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would be necessary for transacting the annual exchanges of twenty shillings value and upwards usually transacted within that country. Should the circulating paper at any time exceed that sum, as the excess could neither be sent abroad nor be employed i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it must immediately return upon the banks to be exchanged for gold and silver. Many people would immediately perceive that they had more of this paper than was necessary for transacting their business at home, and as they could not send it abroad, they would immediately demand payment of it from the banks. When this superfluous paper was converted into gold and silver, they could easily find a use for it by sending it abroad; but they could find none while it remained in the shape of paper. There would immediately, therefore, be a run upon the banks to the whole extent of this superfluous paper, and, if they showed any difficulty or backwardness in payment, to a much greater extent; the alarm which this would occasion necessarily increasing the run.

在任何一个国家，自由流通于本国的各种纸币的全部金额，绝不可能比纸币所替代的金银价值，或该国没有纸币时曾流通的金银价值（假设两种情况的商业状态相同）还要高。例如，假设在苏格兰流通的纸币中，最低面额为20先令，那么，在苏格兰各地自由流通的纸币，其总额绝不可能超过国内规定的、每年从事价值20先令及以上的交易所需的金银数额。如果超过了这个限额，那么过剩的通货，既不

能在国内流通，也无法送往国外流通，这些通货就会马上流回银行以兑换金银。人们一拿到钞票，就会觉得其手中的钞票已超过国内交易的需求。既然无法将纸币送往国外，他们就会马上将纸币拿到银行，要求兑现。因为，钞票过剩时，将其兑换为金银并送往国外就大有用处。而如果钞票还是钞票，它便一点用处也没有。因此，人们很快便会争先恐后地将全部过剩的钞票都拿到银行去兑现，倘若此时银行遇到任何兑现困难或延缓兑现日期，且情况比平常更加严重，那么由此引起的惊恐一定会使人们兑现的要求更强烈。

Over and above the expences which are common to every branch of trade; such as the expence of house-rent, the wages of servants, clerks, accountants, etc. ; the expencespeculiar to a bank consist chiefly in two articles: first, in the expence of keeping at all times in its coffers, for answering the occasional demands of the holders of its notes, a large sum of money, of which it loses the interest; and, secondly, in the expence of replenishing those coffers as fast as they are emptied by answering such occasional demands.

无论经营何种企业，都离不开各种费用，包括房租、雇佣佣工、办事员、会计等的工资。银行的特别费用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时常需要在银行金柜内储存的、无利息的大额货币，以备应对无法持票兑现的不时之需。第二类，补充应对不时之需的金柜，防止其枯竭。

A banking company, which issues more paper than can be employed i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of which the excess is continually returning upon them for payment, ought to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they keep at all times in their coffers, not only in proportion to this excessive increase of their

circulation, but in a much greater proportion; their notes returning upon them much faster than in proportion to the excess of their quantity. Such a company, therefore, ought to increase the first article of their expence, not only in proportion to this forced increase of their business, but in a much greater proportion.

如果银行发行的纸币超过了国内流通的需要，不能流通的纸币不断要求兑现，那么，我们不仅要按照纸币过剩的比例增加银行的金柜中时常储存的金银，而且还要增加更大比例的金银。因为纸币流回银行的速度比扩大纸币发行额更快，因此，不仅要按照纸币过剩的比例增加银行的第一类特别费用，而且还要扩大这一增加的比例。另外，如果银行发行了过多的纸币，银行本应让其金柜更充实，但与谨慎发行的情况相比，金柜并非充实，而是会更快走向枯竭，并且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努力以大量补充金柜。

The coffers of such a company too, though they ought to be filled much fuller, yet must empty themselves much faster than if their business was confined within more reasonable bounds, and must require, not only a more violent, but a more constant and uninterrupted exertion of expence in order to replenish them. The coin too, which is thus continually drawn in such large quantities from their coffers, cannot be employed i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It comes in place of a paper which is over and above what can be employed in that circulation, and is therefore over and above what can be employed in it too. But as that coin will not be allowed to lie idle, it must, in one shape or another, be sent abroad, in order to find that profitable employment which it cannot find at home; and this continual ex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by enhancing the difficulty, must necessarily enhance still further the expence of the bank, in finding new gold and silver in order to

replenish those coffers, which empty themselves so very rapidly. Such a company, therefore, must, in proportion to this forced increase of their business, increase the second article of their expence still more than the first.

从金柜流出的大量铸币也无法在国内流通，因为这种铸币是为兑换超额纸币流出的，所以无法在本国流通。一般来说，在国内无用的铸币不会被弃置不用，而是会以某种形态送往国外，以其他有利可图的方式使用。由于金柜枯竭得很快，因此银行需要不断寻找新的金银以补充金柜。如果不断输出金银，银行补充金柜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所需的费用必然会增高。因此，这样的银行必然会因不得已增加了兑现而增加银行的第二类特别费用，且增加幅度多于第一类。

Let us suppose that all the paper of a particular bank, which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can easily absorb and employ, amounts exactly to forty thousand pounds; and that for answering occasional demands, this bank is obliged to keep at all times in its coffers ten thousand pounds in gold and silver. Should this bank attempt to circulate forty-four thousand pounds, the four thousand pounds which are over and above what the circulation can easily absorb and employ, will return upon it almost as fast as they are issued. For answering occasional demands, therefore, this bank ought to keep at all times in its coffers, not eleven thousand pounds only, but fourteen thousand pounds. It will thus gain nothing by the interest of the four thousand pounds excessive circulation; and it will lose the whole expence of continually collecting four thousand pounds in gold and silver, which will be continually going out of its coffers as fast as they are brought into them.

假设某银行发行4万镑纸币时，数额恰好等于国内容易吸收和使用的流通量，为应对不时之需，常常要在银行金柜储备一万镑金银。如果该银行试图发行44,000镑金银，那么超出社会易吸收和使用的这4,000镑将一边发出，一边流回。为应对不时之需，银行金柜应该不仅储存11,000镑金银，而是14,000镑金银。这样一来，过剩的四千镑纸币将无法获取任何利润，而且，不仅没有利润，还会造成损失：该银行要支付收集4,000镑金银的费用，当收入这些金银后，又要立刻将其发行出去。

Had every particular banking company always understood and attended to its own particular interest, the circulation never could have been overstocked with paper money. But every particular banking company has not always understood or attended to its own particular interest, and the circulation has frequently been overstocked with paper money.

如果全部的银行都能理解且关注自身利益，那么纸币就不会在流通的过程中过剩。遗憾的是，未必所有的银行都能理解并关注自身利益。这样一来，就会常常发生在流通过程中过剩的现象。

By issuing too great a quantity of paper, of which the excess was continually returning, in order to be exchanged for gold and silver, the Bank of England was for many years together obliged to coin gold to the extent of between eight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and a million a year; or at an average, about eight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pounds. For this great coinage the bank (in consequence of the worn and degraded state into which the gold coin had fallen a few years ago) was frequently obliged to purchase gold bullion at the high price of four pounds an ounce, which it soon after issued in

coin at 3*l.* 17*s.* 10½*d.* an ounce, losing in this manner between two and a half and three per cent upon the coinage of so very large a sum. Though the bank therefore paid no seignorage, though the government was properly at the expence of the coinage, this liberality of government did not prevent altogether the expence of the bank.

由于纸币发行量太大，过剩的纸币不断流回以兑换金银。多年来，英格兰银行每年都必须要铸造80万镑至100万镑（平均85万镑）的黄金。几年前，黄金因为磨损严重而变得极其低劣。如果银行铸造黄金，必须以每盎司四镑的价格买进金块，而待到黄金铸成，每盎司金币的价值仅为3镑17先令10.5便士，损失达2.5%-3%。由于铸造的黄金量很大，造成的损失自然不小。虽然银行无须支付铸币税，且由政府承担所有铸造黄金的费用，但银行仍免不了损失。

The Scotch banks, in consequence of an excess of the same kind, were all obliged to employ constantly agents at London to collect money for them, at an expence which was seldom below one and a half or two per cent. This money was sent down by the waggon, and insured by the carriers at an additional expence of three quarters per cent or fifteen shillings on the hundred pounds. Those agents were not always able to replenish the coffers of their employers so fast as they were emptied. In this case the resource of the banks was to draw upon their correspondents in London bills of exchange to the extent of the sum which they wanted. When those correspondents afterwards drew upon them for the payment of this sum, together with the interest and a commission, some of those banks, from the distress into which their excessive circulation had thrown them, had sometimes no other means of satisfying this draught but by drawing a second set of bills either upon the same,

or upon some other correspondents in London; and the same sum, or rather bills for the same sum, would in this manner make sometimes more than two or three journeys, the debtor, bank, paying always the interest and commission upon the whole accumulated sum. Even those Scotch banks which never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by their extreme imprudence, were sometimes obliged to employ this ruinous resource.

同样，苏格兰银行也常常因纸币发行量过多，必须委托伦敦代理人替他们收集货币，代理人收取的费用很少低于1.5%或2%。通常他们会用马车将收集的货币运送来，所需的保险费为每100镑15先令，即0.75%。然而，由于金柜枯竭速度过快，所以通常情况下，代理人收集的货币无法及时补充本银行的金柜。这样一来，为了筹集所需的款项，苏格兰银行必须向与其有贸易往来的伦敦各大银行开发汇票。等到了还款日期，伦敦银行向它们开发汇票索要借款以及利息和佣金时，一些苏格兰银行由于仍未从发行过剩造成的消极影响中恢复过来，因此无法应付，所以它们会向原债权人或伦敦其他与其有来往的银行开具第二批汇票。有时，同一金额，更确切地说，同一金额的汇票，会往返于伦敦爱丁堡间达两三次以上。债务银行必须支付这样积累的借款所产生的所有利息和佣金。即使是那些从来不会为了追求利益而过于冒险的苏格兰银行，有时也不得已采用这种自取灭亡的方法。

The gold coin which was paid out either by the Bank of England, or by the Scotch banks, in exchange for that part of their paper which was over and above what could be employed i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being likewise over and above what could be employed in that circulation, was sometimes sent abroad in the shape of coin, sometimes melted down and sent abroad in the shape of bullion, and sometimes melted down and sold to the Bank

of England at the high price of four pounds an ounce. It was the newest, the heaviest, and the best pieces only which were carefully picked out of the whole coin, and either sent abroad or melted down. At home, and while they remainedin the shape of coin, those heavy pieces were of no more value than the light. But they were of more value abroad, or when melted down into bullion, at home. The Bank of England, notwithstanding their great annual coinage, found to their astonishment that there was every year the same scarcity of coin as there had been the year before; and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great quantity of good and new coin which was every year issued from the bank, the state of the coin, instead of growing better and better, became every year worse and worse. Every year they found themselves under the necessity of coining nearly the same quantity of gold as they had coined the year before, and from the continual rise in the price of gold bullion, in consequence of the continual wearing and clipping of the coin, the expence of this great annual coinage became every year greater and greater. The Bank of England, it is to be observed, by supplying its own coffers with coin, is indirectly obliged to supply the whole kingdom, into which coin is continually flowing from those coffers in a great variety of ways. Whatever coin therefore was wanted to support this excessive circulation both of Scotch and English paper money, whatever vacuities this excessive circulation occasioned in the necessary coin of the kingdom, the Bank of England was obliged to supply them. The Scotch banks, no doubt, paid all of them very dearly for their own imprudence and inattention. But the Bank of England paid very dearly, not only for its own imprudence, but for the much greater imprudence of almost all the Scotch banks.

英格兰银行或苏格兰银行因兑换过剩纸币而付出的金币也一定会过剩，无法在本国全部流通。最终，这些金币可能会以铸币的形式送

往国外，也可能会熔成金块后送往国外。熔成金块后，可以每盎司四镑的价格出售给英格兰银行。在全部金币中，能够输往国外或熔成金块的那部分金币往往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最新、最重、最好的金币。这是因为在国内，只要金币保持其铸币的形态不变，无论轻重，价值都相同。然而在国外，金币越重其价值就越大，在国内被熔化、以金块的形态存在的黄金也是如此，越重其价值就越大。因此，虽然英格兰银行每年都鼓励铸造大量新币，但等到了年终仍难免倍感吃惊：今年缺少的铸币数与去年大体相当。此外，尽管英格兰银行每年发行多种又新又好的铸币，但我们发现，铸币的形状一天不及一天，一点也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虽然今年铸的新币数已够多了，但又感觉明年仍有必要再铸同样多的新币。由于铸币常常磨损，所以金块价格居高不下，且逐年升高。而每年造币的费用也自然逐年增加。根据人们的观察，英格兰银行通过将铸币直接提供给本银行的金柜的方式，间接将铸币提供给全国。英格兰银行金柜内的铸币流向全国各地的方式多种多样。英格兰银行需要供给所有用以支持英格兰、苏格兰过剩纸币的铸币以及所有因纸币过剩而缺乏的国内必需的铸币。毋庸置疑，由于不谨慎，各大苏格兰银行吃了不少亏。不过，英格兰银行吃的亏更多，因为不仅英格兰银行自身的不谨慎会令其吃亏，而且几乎所有苏格兰银行更加不谨慎的行为也会让英格兰银行吃亏。

The overtrading of some bold projectors in both par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was the original cause of this excessive circulation of paper money.

通常情况下，那些大胆的英格兰计划家对自己的资力自视过高，所经营的产业已超过自身能力范围。事实上，英格兰纸币过剩的起因即源于此。

What a bank can with propriety advance to a merchant or

undertaker of any kind, is not either the whole capital with which he trades, or even any considerable part of that capital; but that part of it only which he would otherwise be obliged to keep by him unemployed, and in ready money for answering occasional demands. If the paper money which the bank advances never exceeds this value, it can never exceed the value of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would necessarily circulate in the country if there was no paper money; it can never exceed the quantity which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can easily absorb and employ.

从事任何行业的商人或企业家，其运营资本既不适合全部向银行借贷，也不适合大部分向银行借贷。当然，商人或企业家可以向银行借贷以应对不时之需，免得只存钱却不用，但他只有这部分资本适合向银行借贷。如果银行贷出的纸币不超过这个数额，那么也一定不会超过倘若无纸币流通时国内所需的金银数额，贷出的纸币数量绝不会过剩，绝不会超过国内容易吸收和使用的流通量。

When a bank discounts to a merchant a real bill of exchange drawn by a real creditor upon a real debtor, and which, as soon as it becomes due, is really paid by that debtor, it only advances to him a part of the value which he would otherwise be obliged to keep by him unemployed and in ready money for answering occasional demands. The payment of the bill, when it becomes due, replaces to the bank the value of what it had advanced, together with the interest. The coffers of the bank, so far as its dealings are confined to such customers, resemble a water pond, from which, though a stream is continually running out, yet another is continually running in, fully equal to that which runs out; so that, without any further care or attention, the pond keeps always equally, or very near equally full. Little or no expence can ever be

necessary for replenishing the coffers of such a bank.

如果银行给商人贴现汇票，该汇票由真实债权人向真实债务人开具，到期时后者会立即兑付，那么，银行只垫付商人能够以现钱保留以备不时之需的这部分价值。也就是说，这种汇票，一到期就会兑付，所以，银行一定可以收回垫付出的价值加利息。如果银行仅限于与这类顾客交易，那么，就好比一个水池一样，虽然银行的金柜有不断流出的水，但也有不断流入的水且流出与流入的量相等。所以，金柜常常可以像水池一样被充满，或接近充满，无需时时留意。对银行金柜的这种补充，并不需要甚至完全不需要多少费用。

A merchant, without overtrading, may frequently have occasion for a sum of ready money, even when he has no bills to discount. When a bank, besides discounting his bills, advances him likewise upon such occasions such sums upon his cash account, and accepts of a piecemeal repayment as the money comes in from the occasional sale of his goods, upon the easy terms of the banking companies of Scotland; it dispenses him entirely from the necessity of keeping any part of his stock by him unemployed and in ready money for answering occasional demands. When such demands actually come upon him, he can answer them sufficiently from his cash account. The bank, however, in dealing with such customers, ought to observe with great attention, whether in the course of some short period (of four, five, six, or eight months for example) the sum of the repayments which it commonly receives from them is, or is not, fully equal to that of the advances which it commonly makes to them. If, within the course of such short periods, the sum of the repayments from certain customers is, upon most occasions, fully equal to that of the advances, it may safely continue to deal with such customers. Though the stream which is in this case

continually running out from its coffers may be very large, that which is continually running into them must be at least equally large; so that without any further care or attention those coffers are likely to be always equally or very near equally full; and scarce ever to require any extraordinary expence to replenish them. If, on the contrary, the sum of the repayments from certain other customers falls commonly very much short of the advances which it makes to them, it cannot with any safety continue to deal with such customers, at least if they continue to deal with it in this manner. The stream which is in this case continually running out from its coffers is necessarily much larger than that which is continually running in; so that, unless they are replenished by some great and continual effort of expence, those coffers must soon be exhausted altogether.

一个不曾过度经营的商人经常会渴求现金，即使并没有期票要求银行贴现。如果银行除了给他的汇票贴现，还愿意在他需要金钱时，利用条件简易的现金结算法，贷给他货币，并且允许他在慢慢售出存货后，陆续偿还银行贷款，商人就可以从中寻得便利，无需时常储备应对不时之需的款项了。因为如果他真的有需要时，他利用现金结算法就可以充分应对。然而，银行应该留意这种顾客，看其在短期内（如：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或八个月）能否从这种顾客手中收回与贷给他们相等的总额。如果在短期内，银行的收入大多等于贷出，就可放心地与这种顾客继续来往。在这样的来往过程中，金柜会有大量流出与流入；因此，即使不处处留意，也一样可将金柜充满，或几乎充满，用不了多少花费就可以补充这样的金柜。相反，如果顾客通常情况下无法偿还与贷出等量的数额，银行就无法放心与他继续来往，至少不能与他按照此种方式来往。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金柜的流出必将远远大于其流入。除非不断付出巨大努力，付一笔可观的费用补充金柜，否则金柜就易枯竭。

The banking companies of Scotland, accordingly, were for a long time very careful to require frequent and regular repayments from all their customers, and did not care to deal with any person, whatever might be his fortune or credit, who did not make, what they called, frequent and regular operations with them. By this attention, besides saving almost entirely the extraordinary expence of replenishing their coffers, they gained two other very considerable advantages.

所以，在长期内，各大苏格兰银行会极其谨慎地要求所有顾客定期还付贷款。若顾客无法这样做，那么，无论他有多少财产或多大的信用，都不可能从银行贷一分钱。由于此种谨慎，除了几乎不必花费额外一笔费用来补充金柜外，银行还能获得其他两种巨大利益。

First, by this attention they were enabled to make some tolerable judgment concerning the thriving or declining circumstances of their debtors, without being obliged to look out for any other evidence besides what their own books afforded them; men being for the most part either regular or irregular in their repayments, according as their circumstances are either thriving or declining. A private man who lends out his money to perhaps half a dozen or a dozen of debtors, may, either by himself or his agents, observe and inquire both constantly and carefully into the conduct and situation of each of them. But a banking company, which lends money to perhaps five hundred different people, and of which the attention is continually occupied by objects of a very different kind, can have no regula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conduct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its debtors beyond what its own books afford it. In requiring frequent and regular repayments from all their customers, the banking companies of Scotland had

probably this advantage in view.

第一，银行由于谨慎，除了自己的账簿，不用再去搜集其他能准确判断债务人情况的证据。债务人能否正常还款，大多取决于他业务的盛衰。私人放债，少则几家债户，多则不超过数十家。因此，债权人自己或其经理人便可时时监控、探查债务人的行为和经济状况。可是，银行放债则不同，其债户少说也有数百家，此外它还要留心很多其他事宜。因此，除了自己账簿所提供的资料外，银行还需时常关注与大部分债务人境况和行为相关的报道。之所以各大苏格兰银行要求债务人必须经常还付款项或许也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

Secondly, by this attention they secured themselves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issuing more paper money than what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could easily absorb and employ. When they observed that within moderate periods of time the repayments of a particular customer were upon most occasions fully equal to the advances which they had made to him, they might be assured that the paper money which they had advanced to him had not at any time exceeded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he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obliged to keep by him for answering occasional demands; and that, consequently, the paper money, which they had circulated by his means, had not at any time exceeded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would have circulated in the country had there been no paper money. The frequency, regularity, and amount of his repayments would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 that the amount of their advances had at no time exceeded that part of his capital which he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obliged to keep by him unemployed and in ready money for answering occasional demands; that is, for the purpose of keeping the rest of his capital in constant employment. It is this part of his capital only which,

within moderate periods of time, is continually returning to every dealer in the shape of money, whether paper or coin, and continually going from him in the same shape. If the advances of the bank had commonly exceeded this part of his capital, the ordinary amount of his repayments could not, within moderate periods of time, have equalled the ordinary amount of its advances. The stream which, by means of his dealings, was continually running into the coffers of the bank, could not have been equal to the stream which, by means of the same dealings, was continually running out. The advances of the bank paper, by exceeding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had there been no such advances, he would have been obliged to keep by him for answering occasional demands, might soon come to exceed the whol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the commerce being supposed the same) would have circulated in the country had there been no paper money; and consequently to exceed the quantity which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could easily absorb and employ; and the excess of this paper money would immediately have returned upon the bank in order to be exchanged for gold and silver. This second advantage, though equally real, was not perhaps so well understood by all the different banking companies of Scotland as the first.

第二，银行由于谨慎，不会发行过剩的、社会不易吸收和使用的流通量。在一定期间内，如果顾客还付的数额近乎与银行贷出的数额相等，那就证明他在无银行借贷的情况下为应对不时之需必须存留的金银数与通过银行借贷的纸币数额几乎相等，进而说明银行发行的纸币额，也没有超过在无纸币的情况下国内应流通的金银数。频繁的还付行为，固定的还付期限以及还付款项的数额都能够表明：银行贷出的数额并没有超过顾客在无借贷时必须以现金形式保留以应对不时之需的那一部分资本，即并没有超过顾客在无借贷时所必须以现金形式保留、让他可继续使用的剩余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一部分顾

客的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不断以铸币或纸币这两种货币形态不时收入、付出。如果银行的借贷超过了这部分资本，那么在一定期间内，顾客一定不能还付与借贷相等的数额。银行的金柜流入一定不及其流出。由于超过了无纸币发行时顾客所须保有以应对不时之需的金银数，发行的纸币也立即超过了无纸币发行时金银在国内流通的数量，进而会立即超过无纸币发行时国内所易吸收和使用的金银流通数量。过剩的纸币会立即拿回银行兑现。与第一种利益相比，这第二种利益也一样实在。但各大苏格兰银行却似乎并不是十分了解这种利益。

When, partly by the conveniency of discounting bills, and partly by that of cash accounts, the creditable traders of any country can be dispensed from the necessity of keeping any part of their stock by them unemployed and in ready money for answering occasional demands, they can reasonably expect no farther assistance from banks and bankers, who, when they have gone thus far, cannot, consistently with their own interest and safety, go farther. A bank cannot, consistently with its own interest, advance to a trader the whole or eve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with which he trades; because, though that capital is continually returning to him in the shape of money, and going from him in the same shape, yet the whole of the returns is too distant from the whole of the outgoings, and the sum of his repayments could not equal the sum of its advances within such moderate periods of time as suit the conveniency of a bank. Still less, could a bank afford to advance him any considerable part of his fixed capital; of the capital which the undertaker of an iron forge, for example, employs in erecting his forge and smelting-house, his workhouses and warehouses, the dwelling-houses of his workmen, etc. ; of the capital which the undertaker of a mine employs in sinking his shafts, in erecting engines for drawing out the water, in

making roads and waggon-ways, etc. ; of the capital which the person who undertakes to improve land employs in clearing, draining, enclosing, manuring, and ploughing waste and uncultivated fields, in building farm-houses, with all their necessary appendages of stables, granaries, etc. The returns of the fixed capital are in almost all cases much s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and such expences, even when laid out with the greatest prudence and judgment, very seldom return to the undertaker till after a period of many years, a period by far too distant to suit the conveniency of a bank. Traders and other undertakers may, no doubt, with great propriety, carry on a very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ir projects with borrowed money. In justice to their creditors, however, their own capital ought, in this case, to be sufficient to ensure, if I may say so, the capital of those creditors; or to render it extremely improbable that those creditors should incur any loss, even though the success of the project should fall very much short of the expectation of the projectors. Even with this precaution too, the money which is borrowed, and which it is meant should not be repaid till after a period of several years, ought not to be borrowed of a bank, but ought to be borrowed upon bond or mortgage of such private people as propose to live upon the interest of their money without taking the trouble themselves to employ the capital, and who are upon that account willing to lend that capital to such people of good credit as are likely to keep it for several years. A bank, indeed, which lends its money without the expence of stamped paper, or of attorneys' fees for drawing bonds and mortgages, and which accepts of repayment upon the easy terms of the banking companies of Scotland, would, no doubt, be a very convenient creditor to such traders and undertakers. But such traders and undertakers would, surely, be most inconvenient debtors to such a bank.

银行已尽力利用贴现汇票法和现金结算法为国内有信用的商人提供保障，使他们无需储备滞留资本以应对不时之需，因此国内商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指望银行了。为银行自身的利益与安全计，它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为银行本身的利益计，商人的流动资本也不能全部贷自银行，大部分资本也不行。因为虽然商人的流动资本仍以货币的形式时而流出时而流入，但当他将流动资本全部收入时，还要等很久才能将其全部付出。所以，为了银行的利益，要在短期内使还付的数额等于贷出的数额是不可能的。至于商人的固定资本，就更不应该大部分贷自银行了。例如，制铁商建立铁厂、铁炉、工场、仓库、工人住宅等的资本，或开矿家挖坑掘井、排积水、建道路车轨的资本，或土地改良家开垦荒地、排积水、筑围墙、建农舍、厩舍、谷仓等必要建筑物的资本，都不宜大部分向银行贷款。收回固定资本要比收回流动资本慢得多。即使投入固定资本的方法很得当，但其一经投入，也要经过数年才能收回。而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收回借款固然对银行不利。当然，企业家可以合理利用其借入的资本完成他的大部分规划，但是，为了确保债权人不吃亏，作为债务人的企业家应持有充分资本，保证债权人资本的安全，而且能保证即使债务人的企业规划失败，也不致使债权人蒙受损失。然而，即使如此，如果顾客几年内都不能还清借款，那么他最好不要向银行贷款。他可以向那些以吃利息为生的私人借贷，并拿相应物品作抵押：因为这些人不愿为企业投资，但想要把钱提供给有信用的人，所以即使借款人数年不还借款也可以。不取抵押品，无需印花费、律师费，就将货币贷给他人，且提出的偿还条件又像苏格兰银行那样简单，这样的债权人对于商人企业家而言可谓是最方便的。但是，对于银行而言，诸如此类的商人是最不方便的债务人。

It is now more than five-and-twenty years since the paper money issued by the different banking companies of Scotland was fully equal, or rather was somewhat more than fully equal, to what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could easily absorb and employ. Those companies, therefore, had so long ago given all the assistance

to the traders and other undertakers of Scotland which it is possible for banks and bankers, consistently with their own interest, to give. They had even done somewhat more. They had overtraded a little, and had brought upon themselves that loss, or at least that diminution of profit, which in this particular business never fails to attend the smallest degree of overtrading. Those traders and other undertakers, having got so much assistance from banks and bankers, wished to get still more. The banks, they seem to have thought, could extend their credits to whatever sum might be wanted, without incurring any other expence besides that of a few reams of paper. They complained of the contracted views and dastardly spirit of the directors of those banks, which did not, they said, extend their credits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trade of the country; meaning, no doubt, by the extension of that trade the extension of their own projects beyond what they could carry on, either with their own capital, or with what they had credit to borrow of private people in the usual way of bond or mortgage. The banks, they seem to have thought, were in honour bound to supply the deficiency, and to provide them with all the capital which they wanted to trade with. The banks, however, were of a different opinion, and upon their refusing to extend their credits, some of those traders had recourse to an expedient which, for a time, served their purpose, though at a much greater expence, yet as effectually as the utmost extension of bank credits could have done. This expedient was no other than the well-known shift of drawing and redrawing; the shift to which unfortunate traders have sometimes recourse when they are upon the brink of bankruptcy. The practice of raising money in this manner had been long known in England, an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late war, when the high profits of trade afforded a great temptation to overtrading, is said to have carried on to a very great extent. From England it was brought into Scotland, where, in proportion to the very limited commerce, and

to the very moderat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it was soon carried on to a much greater extent than it ever had been in England.

苏格兰各银行发行的纸币至少也十足地等于国内所易吸收和使用的流通数额，这一情况迄今为止已持续25年了。银行已为苏格兰的各种事业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从银行自身利益来看，它们只能做到这么多。事实上，它们的经营已稍微过度。银行由于这种过度的经营已经吃亏了，至少，利润减少了。在借贷业务中，银行的经营规模只要稍微过度，难免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遗憾的是，商人和企业家为了追求利益，还觉得银行做得远远不够，他们以为银行可任意推广其信用业务，因为银行这样做除了花费几张纸的费用外，无需增添其他费用。他们抱怨银行理事们眼界狭小，还说银行信用业务应该扩充到与国内各种事业的扩充相当。显而易见，他们所谓的事业推广是指把事业推广到超过其个人资本足以经营的范围或超过其利用抵押品向私人借贷的资本足以经营的范围。在他们看来，银行有义务为其提供短缺的资本。他们认为，银行应当给予他们所有希望得到的资本。但银行却持有不同的意见。当银行拒绝信用推广时，一些企业家想出了一个方法，在一段时期内，虽然花费更多，但这个方法对他们看似很适用，且其有效性与极力推广银行信用别无二致。这个方法就是循环划汇。那些深陷不幸且濒临破产的商人通常会使用这个方法。在英格兰，通过这种方法获得资本的做法久已有之。听说，由于在上次战争期间，商人营业利润极大，因此他们通常还未计算过自己的资本就开始过分推广其事业。于是，这种循环划汇的方法就盛行起来。此后，这种方法又从英格兰传入苏格兰。苏格兰的商业有限，其资本固然也很有限，因此这种方法传入苏格兰后，更为流行。

The practice of drawing and redrawing is so well known to all men of business that it may perhaps be thought unnecessary to give an account of it. But as this book may come into the hands of many people who are not men of business, and as the effects of this

practice upon the banking trade are not perhaps generally understood even by men of business themselves, I shall endeavour to explain it as distinctly as I can.

普通的实业家都明白这种循环划汇方法。但本书的读者们并不一定都是实业家，而且，即使是普通的实业家也似乎不是十分了解这种方法对银行会产生何种影响，所以，我会尽力作以简单明了的说明。

The customs of merchants, which were established when the barbarous laws of Europe did not enforce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contracts, and which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two last centuries have been adopted into the laws of all European nations, have given such extraordinary privileges to bills of exchange that money is more readily advanced upon them than upon any other species of obligation,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made payable within so short a period as two or three months after their date. If, when the bill becomes due, the acceptor does not pay it as soon as it is presented, he becomes from that moment a bankrupt. The bill is protested, and returns upon the drawer, who, if he does not immediately pay it, becomes likewise a bankrupt. If, before it came to the person who presents it to the acceptor for payment, it had passed through the hands of several other persons, who had successively advanced to one another the contents of it either in money or goods, and who to express that each of them had in his turn received those contents, had all of them in their order endorsed, that is, written their names upon the back of the bill; each endorser becomes in his turn liable to the owner of the bill for those contents, and, if he fails to pay, he becomes too from that moment a bankrupt. Though the drawer, acceptor, and endorsers of the bill should, all of them, be persons of doubtful credit; yet still the shortness of the date gives some

security to the owner of the bill. Though all of them may be very likely to become bankrupts, it is a chance if they all become so in so short a time. The house is crazy, says a weary traveller to himself, and will not stand very long; but it is a chance if it falls to-night, and I will venture, therefore, to sleep in it to-night.

商人们在欧洲野蛮法律还未强制其履行契约时就养成一种习惯：赋予汇票特权，使得以汇票（尤其是定期不超过两三个月的汇票）借款比以其他证据借款都易成功。汇票到期，如果承兑人不能立即偿付，就会马上破产。因此，如果汇票被拒付，马上会回到出票人手中，如果出票人也未按期付款，也会破产。如果汇票在未到期前，以购买产品或借款等形式辗转流通，经过数人之手，这些人纷纷在汇票背面署名，这些人就要负责承兑这汇票，如果汇票到了自己手中，无法立即照付，也要马上破产。近二百年来，欧洲各国法律已采纳这种惯例。即使无法确保出票人，承兑人，背书人的信用，但因汇票期限很短，对持票人也可视为一种保障；虽然他们都面临破产的风险，但在如此短的期间内，他们不一定都会破产。就好比房子已经有所倾斜，已无法维持太久时间了，难道它今晚就会倒塌吗，并不一定，我可以冒险住一晚——这是倦行者的心事，正好比喻汇票持有人的心理。

The trader A in Edinburgh, we shall suppose, draws a bill upon B in London, payable two months after date. In reality B in London owes nothing to A in Edinburgh; but he agrees to accept of A's bill, upon condition that before the term of payment he shall redraw upon A in Edinburgh for the same sum, together with the interest and a commission, another bill, payable likewise two months after date. B accordingly,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first two months, redraws this bill upon A in Edinburgh; who again,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second two months, draws a second bill upon B in

London, payable likewise two months after date; and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third two months, B in London redraws upon A in Edinburgh another bill, payable also two months after date. This practice has sometimes gone on, not only for several months, but for several years together, the bill always returning upon A in Edinburgh, with the accumulated interest and commission of all the former bills. The interest was five per cent in the year, and the commission was never less than one half per cent on each draft. This commission being repeated more than six times in the year, whatever money A might raise by this expedient must necessarily have, cost him something more than eight per cent in the year, and sometimes a great deal more; when either the price of the commission happened to rise, or when he was obliged to pay compound interest upon the interest and commission of former bills. This practice was called raising money by circulation.

如果一位爱丁堡商人甲，向一位伦敦商人乙，开具为期两个月的汇票，需要乙付款。实际上，伦敦商人乙并不欠爱丁堡商人甲任何钱。他愿承兑甲的汇票是因为两方协商的条件：在未到付款期限前，乙也可向甲开具一张为期两个月的等额汇票，附加利息和佣钱。因此，未满两个月限期前，乙向甲开具一张汇票，甲又在这张汇票期满前，再向乙开具第二张汇票。在第二张汇票期满前，乙再向甲开具两个月的汇票。如此循环可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最终，甲手中持有乙向其开具的全部汇票以及上述循环中积累的利息和佣钱。利率为每年5%，佣钱每次至少0.5%。如果每年有六次这样的来往，佣钱就要增加五倍，所以如果甲靠这种方法筹钱，每年至少要支付8%以上的费用。如果佣钱飞涨，或者要对以前汇票的利息和佣钱支付复利，那么，利上加利，所需支付的费用会更多。这就是所谓的循环借款。

In a country where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in the greater

part of mercantile projects are supposed to run between six and ten per cent, it must have been a very fortunate speculation of which the returns could not only repay the enormous expence at which the money was thus borrowed for carrying it on; but afford, besides, a good surplus profit to the projector. Many vast and extensive projects, however, were undertaken, and for several years carried on without any other fund to support them besides what was raised at this enormous expence. The projectors, no doubt, had in their golden dreams the most distinct vision of this great profit. Upon their awaking, however, either at the end of their projects, or when they were no longer able to carry them on, they very seldom, I believe, had the good fortune to find it.

据了解，大部分国内商业投资所获得的利润一般在6%至10%之间。如果通过上述方法借得货币的企业，除了还付所借的一大笔费用，还能产生很多额外利润，那么这将是一种非常幸运的投机。然而，近来有许多规模宏大的计划，除了依靠此方法、支付巨额费用才获得资本以外没有其他的资本。毋庸置疑，在黄金梦中，这些企划家看到了巨额利润。然而，我相信，当他们的企业倒闭了，或当他们已无力继续经营时，他们便会从梦中惊醒，而一旦梦醒，没有几个企业运气好到能实现其黄金梦。

The bills A in Edinburgh drew upon B in London, he regularly discounted two months before they were due with some bank or banker in Edinburgh; and the bills which B in London redrew upon A in Edinburgh, he as regularly discounted either with the Bank of England, or with some other bankers in London. Whatever was advanced upon such circulating bills, was, in Edinburgh, advanced in the paper of the Scotch banks, and in London, when they were discounte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in the paper of that bank.

Though the bills upon which this paper had been advanced were all of them repaid in their turn as soon as they became due; yet the value which had been really advanced upon the first bill, was never really returned to the banks which advanced it; because, before each bill became due, another bill was always drawn to somewhat a greater amount than the bill which was soon to be paid; and the discounting of this other bill was essentially necessary towards the payment of that which was soon to be due. This payment, therefore, was altogether fictitious. The stream, which, by means of those circulating bills of exchange, had once been made to run out from the coffers of the banks, was never replaced by any stream which really run into them.

爱丁堡的甲商人经常在到期前两个月向爱丁堡银行贴现其为伦敦的乙商人开具的汇票。随后伦敦的乙商人也经常向英格兰银行或伦敦的其他银行贴现其向甲开具的汇票。银行多以钞票贴现这些循环汇票。在爱丁堡，是用苏格兰银行的钞票贴现循环汇票；在伦敦，是用英格兰银行的钞票贴现循环汇票。虽然到期贴现的汇票都可以兑付，但贴现第一张汇票所付出的价值永远无法归还贴现它的银行：在第一张汇票即将到期时，又开出了数额更大的第二张汇票。如果不开具第二张汇票，就不可能兑付第一张汇票。因此，说兑付第一张汇票只是名义上的兑付。在这种循环汇票的流转中，银行金柜发生流出后，一直没有能补充这项流出的流入。

The paper which was issued upon those circulating bills of exchange, amounted, upon many occasions, to the whole fund destined for carrying on some vast and extensive project of agriculture, commerce, or manufactures; and not merely to that part of it which, had there been no paper money, the projector would have been obliged to keep by him, unemployed and in ready

money for answering occasional demands. The greater part of this paper was, consequently, over and above the value of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would have circulated in the country, had there been no paper money. It was over and above, therefore, what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could easily absorb and employ, and upon that account, immediately returned upon the banks in order to be exchanged for gold and silver, which they were to find as they could. It was a capital which those projectors had very artfully contrived to draw from those banks, not only without their knowledge or deliberate consent, but for some time, perhaps, without their having the most distant suspicion that they had really advanced it.

银行因贴现这些循环汇票而发行的纸币数额不仅限于在无纸币时，企业家必须以现金形式保留在手中以备不时之需的资金数目，而是通常与实行大规模农业、工业或商业规划使用的全部资金相当。因此，社会不能容纳大部分由银行发行的这种纸币，它们超过了无纸币情况下在国内流通的金银的价值。过剩的纸币立即会流入银行以兑换金银（银行必须竭尽全力寻求这些金银）。这些过剩的纸币就是规划家们利用巧妙的方法从银行寻得的资本。但银行并不了解也没有经过慎重考虑，甚至，在很长时间内，银行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曾将这些资本借贷给他们。

When two people, who are continually drawing and redrawing upon one another, discount their bills always with the same banker, he must immediately discover what they are about, and see clearly that they are trading, not with any capital of their own, but with the capital which he advances to them. But this discovery is not altogether so easy when they discount their bills sometimes with one banker, and sometimes with another, and when the same two

persons do not constantly draw and redraw upon one another, but occasionally run the round of a great circle of projectors, who find it for their interest to assist one another in this method of raising money, and to render it, upon that account, as difficult as possi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 real and fictitious bill of exchange; between a bill drawn by a real creditor upon a real debtor, and a bill for which there was properly no real creditor but the bank which discounted it, nor any real debtor but the projector who made use of the money. When a banker had even made this discovery, he might sometimes make it too late, and might find that he had already discounted the bills of those projectors to so great an extent that, by refusing to discount any more, he would necessarily make them all bankrupts, and thus, by ruining them, might perhaps ruin himself. For his own interest and safety, therefore, he might find it necessary, in this very perilous situation, to go on for some time, endeavouring, however, to withdraw gradually, and upon that account making every day greater and greater difficulties about discounting, in order to force those projectors by degrees to have recourse, either to other bankers, or to other methods of raising money; so that he himself might, as soon as possible, get out of the circle. The difficulties, accordingly, which the Bank of England, which the principal bankers in London, and which even the more prudent Scotch banks began, after a certain time, and when all of them had already gone too far, to make about discounting, not only alarmed, but enraged in the highest degree those projectors. Their own distress, of which this prudent and necessary reserve of the banks was, no doubt, the immediate occasion, they called the distress of the country; and this distress of the country, they said, was altogether owing to the ignorance, pusillanimity, and bad conduct of the banks, which did not give a sufficiently liberal aid to the spirited undertakings of those who exerted themselves in order to beautify, improve, and enrich the country. It was the duty of the

banks, they seemed to think, to lend for as long a time, and to as great an extent as they might wish to borrow. The banks, however, by refusing in this manner to give more credit to those to whom they had already given a great deal too much, took the only method by which it was now possible to save either their own credit or the public credit of the country.

假设有甲乙二人，彼此开具循环期票，并向同一银行贴现。当然，银行很快就能觉察到他们的举动，而且意识到虽然他们在营业但却无资本，他们手中的资本全是银行借贷给他们的。然而，如果他们时而在这家，时而在那家贴现，而不固定在一家贴现，而且两人不是总向彼此开具汇票，而是通过多个为利益牵引的规划家互帮互助，最后由某个规划家向他们开具汇票，那么，我们很难辨别哪一张是真实汇票，哪一张是伪造的汇票，也很难了解究竟是有真实债务人和债权人的汇票，还是除了贴现汇票的银行外别无真实债权人、除了获取货币的规划家外别无真实债务人的循环汇票。就算最终银行意识到了这点，恐怕也为时已晚，因为它们已经贴现了不少这样的汇票了。如果在这时不再为他们贴现，一定会让他们全部破产，继而可能会使银行也破产。出于对自身利益与安全的考虑，银行或许只能在这危险处境中再冒险继续贴现以期慢慢收回贷款，或者提出更为严格的贴现条件，强制他们逐渐转向其他人或其他银行，让自己快点摆脱这个圈套。然而，当陷入这个圈套过深的英格兰银行，伦敦主要银行及较为谨慎的各大苏格兰银行开始提出较苛刻的贴现条件时，这些计划家不免开始惊慌，甚至恼羞成怒。毫无疑问，他们对于银行谨慎提出的必要防备措施十分苦恼，但他们竟然将自己的苦恼称为全国的苦恼。据他们所言，正是由于银行见识鄙陋，措施不当才造成了全国的苦恼；虽然他们想尽力让国家富强，但银行却不愿出手相助。他们似乎认为银行有义务按照他们希望的借款期限和借款利息贷款给他们。然而实事求是地说，银行挽回自己的信用和国家公共信用的唯一方法，就是拒绝继续提供信用给那些借款过多的人。

In the midst of this clamour and distress, a new bankwas established in Scotland for the express purpose of relieving the distress of the country. The design was generous; but the execution was imprudent, and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distress which it meant to relieve were not, perhaps, well understood. This bank was more liberal than any other had ever been, both in granting cash accounts, and in discounting bills of exchange. With regard to the latter, it seems to have made scarce any distinction between real and circulating bills, but to have discounted all equally. It was the avowed principle of this bank to advance, upon any reasonable security, the whole capital which was to be employed in thoseimprovements of which the returns are the most slow and distant, such as the improvements of land. To promote such improvements was even said to be the chief of the public-spirited purposes for which it was instituted. By its liberality in granting cash accounts, and in discounting bills of exchange, it, no doubt, issued great quantities of its bank notes. But those bank notes be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over and above what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could easily absorb and employ, returned upon it, in order to be exchanged for gold and silver as fast as they were issued. Its coffers were never well filled. The capital which had been subscribed to this bank at two different subscriptions, amounted to one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pounds, of which eighty per cent only was paid up. This sum ought to have been paid in at several different instalments. A great part of the proprietors, when they paid in their first instalment, opened a cash account with the bank; and the directors, thinking themselves obliged to treat their own proprietors with the same liberality with which they treated all other men, allowed many of them to borrow upon this cash account what they paid in upon all their subsequent instalments. Such payments, therefore, only put into one coffer what had the moment before been taken out of another. But had the coffers of this bank

been filled ever so well, its excessive circulation must have emptied them faster than they could have been replenished by any other expedient but the ruinous one of drawing upon London, and when the bill became due, paying it, together with interest and commission, by another draft upon the same place. Its coffers having been filled so very ill, it is said to have been driven to this resource within a very few months after it began to do business. The estates of the proprietors of this bank were worth several millions, and by their subscription to the original bond or contract of the bank, were really pledged for answering all its engagements. By means of the great credit which so great a pledge necessarily gave it, it was, notwithstanding its too liberal conduct, enabled to carry on business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When it was obliged to stop, it had in the circulation about two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in bank notes.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circulation of those notes which were continually returning upon it as fast they were issued, it had been constantly in the practice of drawing bills of exchange upon London, of which the number and value were continually increasing, and, when it stopped, amounted to upwards of six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This bank, therefore, had, in little more than the course of two years, advanced to different people upwards of eight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at five per cent. Upon the two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which it circulated in bank notes, this five per cent might, perhaps, be considered as clear gain, without any other deduction besides the expence of management. But upon upwards of six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for which it was continually drawing bills of exchange upon London, it was paying, in the way of interest and commission, upwards of eight per cent, and was consequently losing more than three per cent upon more than three-fourths of all its dealings.

如果在这种喧扰和困窘中，苏格兰开设了一家宣言以救国为己任的新银行。虽然它的动机很好，但采取的措施并不恰当，而且它好像不是很明白自己试图解决的难题的性质与原因是什么。无论按照现金结算法，还是以贴现汇票来说，这家银行的借贷都比其他银行范围广。拿贴现汇票来说，这家银行几乎不看汇票是真实汇票还是循环汇票，均予以贴现。这家银行曾明确表明其宗旨：只要有一定保证，即使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偿还的资本（如土地改良所使用的资本），也可以全部向银行借贷。它甚至还说，银行设立的一个爱国目标就是促进土地改良。银行如果采取宽大的现金结算及期票贴现政策，一定要发行大量钞票，而社会不易吸收和使用的过剩的钞票，自然会被拿回银行兑换金银。原本银行的金柜就不大充实。虽然它称从两次募股中筹到16万镑的资本，但实际到手的不过80%，而且是分期缴纳。第一次缴入股款后，大部分股东就开始以现金结算法向银行贷款。银行理事们认为股东应当享有与其他人一样宽大的借款待遇，所以，大部分股东在第一次缴入股款后，在后来缴入的几乎全是在现金结算法下的借款。如此一来，他们后来只不过是从银行某一金柜提取某些款项后再放入银行的另一金柜，如此就算交股。因此，即使银行金柜原本是充满的，但过度的发行一定会让其很快枯竭，只能向伦敦银行开具汇票，期满时再次开具，加上利息佣钱的数目，用以兑付前一张汇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能及时补充金柜的方法。原本该银行的金柜就不是很充实，听说，它经营不出几个月，就不得不采取这个方法。所幸的是，各股东的田产都高于数百万镑，所以他们在认购股份时就相当于把所有的田产拿给银行作担保，有了如此充实的保证足以充当银行坚实的信用后盾，因此，即使在贷借政策如此宽大的条件下，银行仍能营业两年多。到不得不倒闭时，其发行的纸币已近20万镑。由于要支持这些随着发行而收回的纸币的流通，这家银行多次向各大伦敦银行开具汇票。日积月累，等到银行不得不倒闭时为止，汇票已达到六十万镑以上的价值。而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该银行借出的款项也达八十万镑以上，收取利息5%。或许我们可将对20万镑以纸币形式借出的款项收取的5%的利息视为纯利，因为除了管理费，没有扣除其他费用。但向伦敦开具汇票借来的六十多万镑，利息佣钱却在8%以上。因此，对比之下，银行所借出的所有金额中，有3/4以上要亏3%

以上的利息。

The operations of this bank seem to have produced effects quite opposite to those which were intended by the particular persons who planned and directed it. They seem to have intended to support the spirited undertakings, for as such they considered them, which were at that time carrying on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at the same time, by drawing the whole banking business to themselves, to supplant all the other Scotch banks, particularly those established in Edinburgh, whose backwardness in discounting bills of exchange had given some offence. This bank, no doubt, gave some temporary relief to those projectors, and enabled them to carry on their projects for about two years longer than they could otherwise have done. But it thereby only enabled them to get so much deeper into debt, so that, when ruin came, it fell so much the heavier both upon them and upon their creditors. The operations of this bank, therefore, instead of relieving, in reality aggravated in the long-run the distress which those projectors had brought both upon themselves and upon their country. It would have been much better for themselves, their creditors, and their country, ha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been obliged to stop two years sooner than they actually did. The temporary relief, however, which this bank afforded to those projectors, proved a real and permanent relief to the other Scotch banks. All the dealers in circulating bills of exchange, which those other banks had become so backward in discounting, had recourse to this new bank, where they were received with open arms. Those other banks, therefore, were enabled to get very easily out of that fatal circle, from which they could not otherwise have disengaged themselves without incurring a considerable loss, and perhaps too even some degree of discredit.

似乎该银行经营产生的结果与其创办人的本意相反。他们似乎旨在支持那些他们认为国内有勇敢进取精神的企业，同时把苏格兰其他各银行，尤其是在贴现方面过于怯懦的设立于爱丁堡的各家银行排挤掉，进而垄断整个银行业。毫无疑问，这家银行曾经为规划家们提供了暂时的救济，让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硬拖了两年左右。但最终，却只能让他们深陷债务泥潭，因此面临倒闭时，他们遭受的损失更严重，而他们债权人的损失也更严重。也就是说，对于这些规划家们给自己及国家带来的长期困难，这家银行非但没有提供救济，反而使之越陷越深。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他们的债权人也为了国家的利益考虑，他们不如提早两年停止大部分营业。然而，该银行提供给各规划家的临时救济，最终却为其他苏格兰银行提供了永久救济。这家新银行在其他苏格兰银行不肯贴现循环汇票时，却欢迎那些开具循环汇票的人。多亏了这家新银行，其他各银行轻易脱离了困境，否则这些银行根本不可能摆脱这困境，从而一定会遭受巨大损失，甚至还会使其名誉在一定程度上受损。

In the long-run, therefore, the operations of this bank increased the real distress of the country which it meant to relieve; and effectually relieved from a very great distress those rivals whom it meant to supplant.

因此，虽然这银行的经营加剧了它欲减除的国家灾难，却使其希望排挤掉的其他与其竞争的银行摆脱了困境。

At the first setting out of this bank, it was the opinion of some people that how fast soever its coffers might be emptied, it might easily replenish them by raising money upon the securities of those to whom it had advanced its paper. Experience, I believe, soon

convinced them that this method of raising money was by much too slow to answer their purpose; and that coffers which originally were so ill filled, and which emptied themselves so very fast, could be replenished by no other expedient but the ruinous one of drawing bills upon London, and when they became due, paying them by other drafts upon the same place with accumulated interest and commission. But though they had been able by this method to raise money as fast as they wanted it, yet, instead of making a profit, they must have suffered a loss by every such operation; so that in the long-run they must have ruined themselves as a mercantile company, though, perhaps, not so soon as by the more expensive practice of drawing and redrawing. They could still have made nothing by the interest of the paper, which, being over and above what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could absorb and employ, returned upon them, in order to be exchanged for gold and silver, as fast as they issued it; and for the payment of which they were themselves continually obliged to borrow money. On the contrary, the whole expence of this borrowing, of employing agents to look out for people who had money to lend, of negotiating with those people, and of drawing the proper bond or assignment, must have fallen upon them, and have been so much clear loss upon the balance of their accounts. The project of replenishing their coffers in this manner may be compared to that of a man who had a water-pond from which a stream was continually running out, and into which no stream was continually running, but who proposed to keep it always equally full by employing a number of people to go continually with buckets to a well at some miles distance in order to bring water to replenish it.

一些人在初创这家银行时认为，虽然银行金柜易枯竭，但前来借贷纸币的人都拿来了担保品，以此可以轻易获取资本来补充金柜。然

而，不久后，经验证明：这种筹款方法，犹如远水解不了近火。如此不充实且易枯竭的金柜，除了最终向伦敦各银行开具一张汇票，期满时再开具一张汇票，以此累积越来越多的利息外，根本别无他法。就算使用这种方法，能让它立即借到所需款项，可是结果不仅无利可图，还要遭受一次次的损失，即使走向灭亡的速度没有像采取费用高昂的筹款方法那么快，但终使得一家营利的银行一败涂地。银行仍无法从发行的纸币的利息中获取利润，因为超过国内流通领域所能吸收和使用的纸币一定会随着发行不断被收回以兑换金银，而银行为了兑换金银，必须不断借贷，且要承担借债费用、打听谁有钱出借、和有钱人磋商、写债券、立契约等全部费用。显而易见，这种流出与流入对银行只有损而无益。就好像让人拿水桶到远处井里取水以补充只有水流出却没有水流入的水池一样，用这方法补充金柜也注定要失败。

But though this operation had proved not only practicable but profitable to the bank as a mercantile company, yet the country could have derived no benefit from it; but, on the contrary, must have suffered a very considerable loss by it. This operation could not augment in the smallest degree the quantity of money to be lent. It could only have erected this bank into a sort of general loan office for the whole country. Those who wanted to borrow must have applied to this bank instead of applying to the private persons who had lent it their money. But a bank which lends money perhaps to five hundred different people, the greater part of whom its directors can know very little about, is not likely to be more judicious in the choice of its debtors than a private person who lends out his money among a few people whom he knows, and in whose sober and frugal conduct he thinks he has good reason to confide. The debtors of such a bank as that whose conduct I have been giving some account of were likely,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to be chimerical projectors, the drawers and re-drawers of circulating bills of exchange, who would employ the money in

extravagant undertakings, which, with all the assistance that could be given them, they would probably never be able to complete, and which, if they should be completed, would never repay the expence which they had really cost, would never afford a fund capable of maintaining a quantity of labour equal to that which had been employed about them. The sober and frugal debtors of private persons, on the contrar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employ the money borrowed in sober undertakings which were proportioned to their capitals, and which, though they might have less of the grand and the marvellous, would have more of the solid and the profitable, which would repay with a large profit whatever had been laid out upon them, and which would thus afford a fund capable of maintaining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labour than that which had been employed about them. The success of this operation, therefore, without increasing in the smallest degree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would only have transferred a great part of it from prudent and profitable to imprudent and unprofitable undertakings.

虽然这种方法对银行这样的营利机构适用且有利，但对于国家却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它无法使国内贷出的货币量增加，只能让这家银行承担全国的借贷，成为全国总贷借机关。没有人会向有钱出借的私人借款，转而都来向这个银行借。如果是私人借贷，债户一般不过数人，多则数十人，债权人十分了解债务人是否谨慎、诚实，所以有充分选择的余地。但与银行来往的，一般要数百家，而且银行理事对大多数债户的情况都不了解，自然无从选择。因此，相比较而言，在贷款方面，银行自然不如私家审慎。实际上，原本大部分与这样一家银行来往的就是充满幻想的规划家，即那些不断开具循环汇票的出票人。他们把资金投在那些奢侈浪费的事业上，而即使得到所有可能的帮助，这些事业也难以完成。而且，就算这些事业能获得成功，也无法偿还其付出的费用，无力提供充足的资金以维持其雇佣的劳动力。

相反，如果私人借贷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可能那些诚实朴素的私人债务人，经常利用借入的资本来经营与其资本总数相称的事业。或许这些事业没有那么宏大或惊人，但它们更稳定，更易获利，所以必然能偿还投入资本并获取巨额利润，也必然能提供一笔足以雇佣更多劳动力的资金。因此，就算新银行成功实施了其计划，也完全不能使国内资本增多，只能将大部分资本投入到不谨慎且无利可得的事业中，而不会投入到谨慎有利的事业上。

That the industry of Scotland languished for want of money to employ it was the opinion of the famous Mr. Law. By establishing a bank of a particular kind, which he seems to have imagined might issue paper to the amount of the whole value of all the lands in the country, he proposed to remedy this want of money. The Parliament of Scotland, when he first proposed his project, did not think proper to adopt it. It was afterwards adopted, with some variations, by the Duke of Orleans, at that time Regent of France. The idea of the possibility of multiplying paper to almost any extent was the real foundation of what is called the Mississippi scheme, the most extravagant project both of banking and stock-jobbing that, perhaps, the world ever saw. The different operations of this scheme are explained so fully, so clearly, and with so much order and distinctness, by Mr. du Verney, in his Examination of the Political Reflections upon Commerce and Finances of Mr. du Tot, that I shall not give any account of them. The principles upon which it was founded are explained by Mr. Law himself, in a discourse concerning money and trade, which he published in Scotland when he first proposed his project. The splendid but visionary ideas which are set forth in that and some other works upon the same principles still continue to make an impression upon many people, and have, perhaps, in part, contributed to that excess of banking which has of late been complained of both in Scotland

and in other places.

知名的约翰·劳认为苏格兰产业之所以难以繁荣是因为缺少可供经营的货币。他提议设立一个特殊的银行，让其发行的纸币等于全国土地的总价值。他认为这是一个解决货币短缺的好办法。起初，苏格兰议会觉得他的这个计划不可采纳。后来法国摄政王奥林斯公爵略微改动他的原计划就加以实行了。随意增加纸币数额是密西西比计划的真实依据。就银行业和买卖股票生意而言，这个计划空前狂妄。迪韦尔内在其《对林托 < 关于商业与财政的政治观察 > 一书的评论》中，曾对该计划的内容加以详述，在此笔者就不赘述了。约翰·劳所著关于货币与贸易的一篇论文（在最初提出这个计划时，他就在苏格兰发表了此篇论文）中也阐述了该计划依据的原理。时至今日，许多人仍对这篇论文及其他依据同一原理写成的著作中提出的宏伟却空幻的理论印象深刻。近期被指责营业毫无节制的苏格兰及其他各银行估计也是受到该理论的影响。

The Bank of England is the greatest bank of circulation in Europe. It was incorporated, in pursuance of an act of Parliament, by a charter under the Great Seal, dated the 27th of July, 1694. It at that time advanced to government the sum of one million two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for an annuity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or for 96,000*l.* a year interest, at the rate of eight per cent, and 4000*l.* a year for the expence of management. The credit of the new government, established by the Revolution, we may believe, must have been very low, when it was obliged to borrow at so high an interest.

作为欧洲最大的银行，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7月27日由国会决议并颁布敕令而设立。当时它一共借给政府120万镑，每年向政府支取

十万镑，并将其中96,000千镑作为利息（年利率8%），4,000镑作为管理费。利息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在革命后，新成立的政府信用很低。

In 1697 the bank was allowed to enlarge its capital stock by an engraftment of 1,001,171*l.* 10*s.* Its whole capital stock therefore, amounted at this time to 2,201,171*l.* 10*s.* This engraftment is said to have been for the support of public credit. In 1696, tallies had been at forty, and fifty, and sixty per cent discount, and bank notes at twenty per cent. During the great recoinage of the silver, which was going on at this time, the bank had thought proper to discontinue the payment of its notes, which necessarily occasioned their discredit.

1697年，银行增加了1,001,171镑10先令的资本。这时它共有二百201,171镑10先令的资本。据说，此次该银行增加资本是为了维持国家信用。1696年，国库库券要打四成、五成或六成折扣，银行纸币要打两成折扣。此时，银行正在重铸大量白银，并认为最好暂停兑换纸币，但这样做肯定会影响银行的信用。

In pursuance of the 7th Anne, c. vii. the bank advanced and paid into the exchequer the sum of 400,000*l.* ; making in all the sum of 1,600,000*l.* which it had advanced upon its original annuity of 96,000*l.* interest and 4000*l.* forexpence of management. In 1708, therefore, the credit of government was as good as that of private persons, since it could borrow at six per cent interest the common legal and market rate of those times. In pursuance of the same act, the bank cancelled exchequer bills to the amount of 1,775,027*l.* 17*s.* 10½*d.* at six per cent interest, and was at the same time

allowed to take in subscriptions for doubling its capital. In 1708, therefore, the capital of the bank amounted to 4,402,343*l.* ;and it had advanced to government the sum of 3,375,027*l.* 17*s.* 10½*d.*

安妮女王第七年第7号法令要求银行贷款40万镑给国库。再加上银行原来贷款给政府的120万镑，一共贷款给政府的钱总计达到了160万镑。因此，1708年，由于政府能以6%的利率从银行贷款，而6%是当时市场上的普通利率，因此政府的信用就已和私人的信用相同。根据这一法令，银行还购买了价值1,775,027镑17先令10.5便士、利息为六厘的财政部证券，这使银行的资本又增加了一倍。因此，在1708年，银行的资本为4,402,343镑，共计贷给政府3,375,027镑17先令10.5便士。

By a call of fifteen per cent in 1709, there was paid in and made stock 656,204*l.* 1*s.* 9*d.* ; and by another of ten per cent in 1710, 501,448*l.* 12*s.* 11*d.* In consequence of those two calls, therefore, the bank capital amounted to 5,559,995*l.* 14*s.* 8*d.*

1709年，英格兰银行以10.5%的比例收到了656,204镑1先令9便士股款。1710年，又按照10%的比例收到了501,448镑12先令11便士股款。结果，银行的资本总计5,559,995镑14先令8便士。

In pursuance of the 3rd George I. c. 8, the bank delivered up two millions of exchequer bills to be cancelled. It had at this time, therefore, advanced to government 17*s.* 10*d.* In pursuance of the 8th George 1, c. 21, the bank purchased of the South Sea Company stock to the amount of 14,000,000; and in 1722, in consequence of the subscriptions which it had taken in for enabling it to make this

purchase, its capital stock was increased by 3,400,000*l.* At this time, therefore, the bank had advanced to the public 9,375,027*l.* 17*s.* 10½*d.* ; and its capital stock amounted only to 8,959,995*l.* 14*s.* 8*d.* It was upon this occasion that the sum which the bank had advanced to the public, and for which it received interest, began first to exceed its capital stock, or the sum for which it paid a dividend to the proprietors of bank stock; or, in other words, that the bank began to have an undivided capital, over and above its divided one. It has continued to have an undivided capital of the same kind ever since. In 1746, the bank had, upon different occasions, advanced to the public 11,686,800*l.* and its divided capital had been raised by different calls and subscriptions to 10,780,000*l.* The state of those two sums has continued to be the same ever since. In pursuance of the 4th of George III. c. 25, the bank agreed to pay to government for the renewal of its charter 110,000*l.* without interest or repayment. This sum, therefore, did not increase either of those two other sums.

乔治一世第三年第8号法令让英格兰银行又得到了财政部200万镑证券，因此，按此时计算，银行共计贷给政府5,375,027镑17先令10便士。根据乔治一世第八年第21号法令，银行要购买南海公司价值400万镑的股票，所以必须再多募集340万镑资本。这时银行总计贷给政府9,375,027镑17先令10.5便士。但其全部资本也只有8,959,995镑14先令8便士。相较而言，银行贷给政府的有息贷款多于为股东分的红利。换句话说，银行已有不分红利且多于红利的资本。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依然存在。1746年，银行前后共借贷给政府11,686,800镑，而银行募集的分红资本为10,780,000镑。直到今天，这两个数目仍保持不变。为了延续银行营业执照，依照乔治三世第四年第二十法令，银行答应付给政府11万镑，且不向政府索要利息，这样一来，既不会使银行贷出额增加，也不会使银行的资本额增加。

The dividend of the bank has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variations in the rate of the interest which it has, at different times, received for the money it had advanced to the public, as well as according to other circumstances. This rate of interest has gradually been reduced from eight to three per cent. For some years past the bank dividend has been at five and a half per cent.

根据不同时期对政府贷款利息的高低及其他情况，银行的红利时高时低。银行的贷款利率已由8%逐渐减至3%。银行在过去几年间，红利常为5.5%。。

The stabilit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s equal to tha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ll that it has advanced to the public must be lost before its creditors can sustain any loss. No other banking company in England can be established by act of Parliament, or can consist of more than six members. It acts, not only as an ordinary bank, but as a great engine of state. It receives and pay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annuities which are due to the creditors of the public, it circulates exchequer bills, and it advances to government the annual amount of the land and malt taxes, which are frequently not paid up till some years thereafter. In those different operations, its duty to the public may sometimes have obliged it, without any fault of its directors, to overstock the circulation with paper money. It likewise discounts merchants' bills, and has, upon several different occasions, supported the credit of the principal houses, not only of England, but of Hamburg and Holland. Upon one occasion, in 1763, it is said to have advanced for this purpose, in one week, about 1,600,000*l.* , a great part of it in bullion. I do not, however, pretend to warrant either the greatness of the sum, or the shortness of the time. Upon other occasions, this great company has been reduced to

the necessity of paying in sixpences.

如果英政府稳定，英格兰银行也会保持稳定。如果借给政府的金额没有损失，银行债权人亦不致也不会有损失。根据议会决议，英格兰无法设立第二个银行，英格兰股东数也无法超过6人。因此，英格兰银行已成为一个国家大机关，普通银行无法与之相比。英格兰银行每年要收付大部分的公债利息，而财政部证券要经由该银行流通，通常还要垫付土地税、麦芽税等。纳税人经常拖欠这些税款，逾期好几年也不到国库缴纳。这样一来，出于对国家的职责，那些主管人员即使觉察到这一点，银行也难免会发行过量纸币。此外，银行还为商人贴现汇票。不仅英格兰，包括汉堡、荷兰等的巨商会向它寻求借款。听说在1763年，英格兰银行曾在一周内贷款近160万镑，且大部分还是金块。我不敢妄加推断是否贷款数额如此庞大，且是否是在如此短的期间内贷的款。但有时英格兰银行的确会被迫以6便士的白银来支付各种费用。

It is not by augmenting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but by rendering a greater part of that capital active and productive than would otherwise be so, that the most judicious operations of banking can increase the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That part of his capital which a dealer is obliged to keep by him unemployed, and in ready money, for answering occasional demands, is so much dead stock, which, so long as it remains in this situation, produces nothing either to him or to his country. The judicious operations of banking enable him to convert this dead stock into active and productive stock; into materials to work upon, into tools to work with, and into provisions and subsistence to work for; into stock which produces something both to himselfand to his country. The gold and silver money which circulates in any country, and by means of which the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is annually

circulated and distributed to the proper consumers, is,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ready money of the dealer, all dead stock. It is a very valuable part of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which produces nothing to the country. The judicious operations of banking, by substituting paper in the room of a great part of this gold and silver, enables the country to convert a great part of this dead stock into active and productive stock; into stock which produces something to the country. The gold and silver money which circulates in any country may very properly be compared to a highway, which, while it circulates and carries to market all the grass and corn of the country, produces itself not a single pile of either. The judicious operations of banking, by providing, if I may be allowed so violent a metaphor, a sort of waggon-way through the air, enable the country to convert, as it were, a great part of its highways into good pastures and corn-fields, and thereby to increase very considerably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The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however,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ough they may be somewhat augmented, cannot be altogether so secure when they are thus, as it were, suspended upon the Daedalian wings of paper money as when they travel about upon the solid ground of gold and silver. Over and above the accidents to which they are exposed from the unskillfulness of the conductors of this paper money, they are liable to several others, from which no prudence or skill of those conductors can guard them.

谨慎经营银行业，可促进一国产业发展。但想要促进产业发展，关键在于使大部分本来无用的资本有用，使大部分无法获利的资本生利，而不在于使一国资本增加。如果商人必须储备应对不时之需的滞财，那么这既对商人自己无利，也对其国家无利。谨慎经营银行业可将这种呆滞资本转变为活资本，换句话说，转变为工作所需的材料、工具和食品，这样既有利于己，又有利于国。在任何国家，土地和劳

动产品年年分配给真正的消费者时都离不开国内流通的金银，这些金银就像商人手中的现钱一样，也是呆滞资本。虽然在一国资本中，这种呆滞资本也极有价值，但无法为国家提供任何产品。谨慎经营银行业，以纸币代替大部分金银，让国家能把大部分这类呆滞资本转化为灵活且有利于本国的资本。在任何国家，国内流通的黄金白银都好比通衢大道。虽然通衢大道本身不产稻麦，却能使稻麦转运到国内各市场。谨慎经营银行业，以纸币代金银，做一个夸张的比喻，就好像凌空驾轨，使国家能够将昔日多数的通衢大道化作良好的牧场和稻田，这就使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大大增加。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国内工商业虽然在这种设施下略有增进，但和脚踩金银铺成的实地相比，悬于纸币的飞翼上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不能熟练管理纸币，后果就自然不用说了；即使能慎重管理纸币，估计仍会发生难以避免的灾祸。

An unsuccessful war, for example, in which the enemy got possession of the capital, and consequently of that treasure which supported the credit of the paper money, would occasion a much greater confusion in a country where the whole circulation was carried on by paper, than in one where the greater part of it was carried on by gold and silver. The usual instrument of commerce having lost its value, no exchanges could be made but either by barter or upon credit. All taxes having been usually paid in paper money, the prince would not have wherewithal either to pay his troops, or to furnish his magazines; and the state of the country would be much more irretrievable than if the greater part of its circulation had consisted in gold and silver. A prince, anxious to maintain his dominions at all times in the state in which he can most easily defend them, ought, upon this account, to guard, not only against that excessive multiplication of paper money which ruins the very banks which issue it; but even against that multiplication of it which enables them to fill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with it.

例如，战争失利，敌军攻占首都，那么维护纸币信用的仓库也会身陷敌人之手。这种情况下，全靠纸币在国内进行流通的国家与依靠大部分金银进行流通的国家相比会面临更多困难。除了物物交换与赊欠外，通常的交易手段都已行不通。由于通常以纸币缴纳所有赋税，君主因此就无法支付军饷以充实武库。此种情况下，相比大部分使用金银的国家，使用纸币的国家更难恢复原状。所以，如果一国之君想随时将其领土保持在易于防守的状态，既要防止纸币发行过剩（纸币发行过剩会使银行破产），还要设法控制银行发行的纸币不在国内大量流通。

The circulation of every country may be considered as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branches: the circulation of the dealers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circulation between the dealers and the consumers. Though the same pieces of money, whether paper or metal, may be employed sometimes in the one circulation and sometimes in the other, yet as both are constantly going on at the same time, each requires a certain stock of money of one kind or another to carry it on. The value of the goods circulated between the different dealers, never can exceed the value of those circulated between the dealers and the consumers; whatever is bought by the dealers, being ultimately destined to be sold to the consumers. The circulation between the dealers, as it is carried on by wholesale, requires generally a pretty large sum for every particular transaction. That between the dealers and the consumers, on the contrary, as it is generally carried on by retail, frequently requires but very small ones, a shilling, or even a halfpenny, being often sufficient. But small sums circulate much faster than large ones. A shilling changes masters more frequently than a guinea, and a halfpenny more frequently than a shilling. Though the annual purchases of all the consumers, therefore, are at least equal in value

to those of all the dealers, they can generally be transacted with a much smaller quantity of money; the same pieces, by a more rapid circulation, serving as the instrument of many more purchases of the one kind than of the other.

国内货物的流通主要有两种用途：（一）商人间的流通；（二）商人与消费者间的流通。同一货币，无论是以一张纸币还是以一枚现金形式出现，都有可能会用于前一种流通，也可能会用于后一种流通，但这两种流通不能同时进行，所以，这时就需要一定数量的货币来经营。商人间流通的货物价值不能多于商人和消费者间流通的货物价值。商人购买的所有产品最终只能出售给消费者。商人间常通过批发进行交易，所以每次进行交易时都要有大量货币。而商人和消费者间主要通过零售进行交易，所以每次进行交易时有少量货币（如1先令甚至是半便士）就够了。由于少量的货币比大量货币流通得快：1先令就比1几尼流通得快，半便士又比1先令流通得快。所以，虽然全部消费者所购买的价值按年计算应大于或等于全部商人所购买的价值，但每年消费者购买所需的货币量却少得多。由于流通速度较快，作为消费者将货币作为购买手段的次数要比商人将同一枚货币作为购买手段的次数多得多。

Paper money may be so regulated as either to confine itself very much to the circul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dealers, or to extend itself likewise to a great part of that between the dealers and the consumers. Where no bank notes are circulated under ten pounds value, as in London, paper money confines itself very much to the circulation between the dealers. When a ten pound bank note comes into the hands of a consumer, he is generally obliged to change it at the first shop where he has occasion to purchase five shillings' worth of goods, so that it often returns into the hands of a dealer before the consumer has spent the fortieth part of the money.

Where bank notes are issued for so small sums as twenty shillings, as in Scotland, paper money extends itself to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circulation between dealers and consumers. Before the Act of Parliament, which put a stop to the circulation of ten and five shilling notes, it filled a still greater part of that circulation. In the currencies of North America, paper was commonly issued for so small a sum as a shilling, and filled almost the whole of that circulation. In some paper currencies of Yorkshire, it was issued even for so small a sum as a sixpence.

我们可以管理纸币，或使其只流通于商人之间，或推广其流通范围，而商人与消费者间所进行的大部分交易，也要使用纸币。如果像在伦敦一样，没有10镑以下的钞票面额，那么，纸币一定只限于商人间的流通。如果消费者得到一张十镑的钞票，那么，即使所购买的产品仅值5先令，在第一次买东西的时候也必须兑换这张钞票。因此，消费者把这张钞票花掉1/40前，商人早就拿到钞票了。苏格兰各银行发行了20先令的钞票，在这种情况下，纸币自然能够推广其流通范围，从而可以被大量用于商人与消费者间的交易。议会决议禁止使用10先令和5先令的钞票前，消费者通常会使用小额纸币购物。在北美洲，银行竟然常常发行1先令的纸币，而消费者也几乎全部使用钞票购物。而在约克郡，有些纸币仅值6便士，具体情况在这里就不用说明了。

Where the issuing of bank notes for such very small sums is allowed and commonly practised, many mean people are both enabled and encouraged to become bankers. A person whose promissory note for five pounds, or even for twenty shillings, would be rejected by everybody, will get it to be received without scruple when it is issued for so small a sum as a sixpence. But the frequent bankruptcies to which such beggarly bankers must be liable may

occasion a very considerable inconveniency, and sometimes even a very great calamity to many poor people who had received their notes in payment.

如果发行这样的小额纸币得到准许并能在全国普遍实践，那么就相当于鼓励更多普通人去开银行，并支持他们成为银行家。普通人所发出的5镑甚至1镑的期票，大家会拒绝不用；但他发出的六便士期票，大家却不会拒绝。这些乞丐般的银行家当然很容易破产，从而可能会给接受他们钞票的穷人造成很大的困难，有时甚至带来极大的灾难。

It were better, perhaps, that no bank notes were issued in any part of the kingdom for a smaller sum than five pounds. Paper money would then, probably, confine itself, in every part of the kingdom, to the circul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dealers, as much as it does at present in London, where no bank notes are issued under ten pounds value; five pounds being, in most parts of the kingdom, a sum which, though it will purchase, little more than half the quantity of goods, is as much considered, and is as seldom spent all at once, as ten pounds are amidst the profuse expence of London.

或许将英格兰各地银行发行钞票的最低面额限为5镑是个好方法。因为这样一来，各地大部分银行发行的钞票只能像在伦敦一样流通于商人间。伦敦银行所发行的钞票面额最低为10镑。虽然5镑仅能购买价值为10镑一半的货物，但是英格兰其他各地的人们对5镑的重视程度不低于奢华的伦敦人对10镑的重视程度，而且就像伦敦人很少一次购物就花费10镑一样，他们购物一次也很少花得了5镑。

Where paper money, it is to be observed, is pretty much confined to the circulation between dealers and dealers, as at London, there is always plenty of gold and silver. Where it extends itself to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circulation between dealers and consumers, as in Scotland, and still more in North America, it banishes gold and silver almost entirely from the country; almost all the ordinary transactions of its interior commerce being thus carried on by paper. The suppression of ten and five shilling bank notes somewhat relieved the scarcity of gold and silver in Scotland; and the suppression of twenty shilling notes would probably relieve it still more. Those metals are said to have become more abundant in America since the suppression of some of their paper currencies. They are said, likewise, to have been more abundant before the institution of those currencies.

如果纸币像在伦敦那样，主要在商人间流通，那么市面上就不会缺乏金银了。如果纸币像在苏格兰尤其是像在北美洲那样，将其流通推广到大部分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中，那么所有金银都会被驱逐，代之以纸币进行各种国内交易。苏格兰严禁发行10先令和5先令的钞票，这一举措曾稍微缓解了市面上金银缺乏的局面；如果再严禁发行20先令的钞票，应该效果会更加明显。据说，自从美洲禁止发行若干纸币以来，金银变得更多了。在尚未发行纸币前，听说美洲的金银更多。

Though paper money should be pretty much confined to the circulation between dealers and dealers, yet banks and bankers might still be able to give nearly the same assistance to the industry and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as they had done when paper money filled almost the whole circulation. The ready money which a dealer is obliged to keep by him, for answering occasional demands, is

destined altogether for the circulation between himself and other dealers of whom he buys goods. He has no occasion to keep any by him for the circulation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consumers, who are his customers, and who bring ready money to him, instead of taking any from him. Though no paper money, therefore, was allowed to be issued but for such sums as would confine it pretty much to the circulation between dealers and dealers, yet, partly by discounting real bills of exchange, and partly by lending upon cash accounts, banks and bankers might still be able to relieve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dealers from the necessity of keeping any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ir stock by them, unemployed and in ready money, for answering occasional demands. They might still be able to give the utmost assistance which banks and bankers can, with propriety, give to traders of every kind.

虽然纸币的流通主要应限于商人之间，但即使如此，银行仍能为国内工商业提供同样的帮助，就像纸币几乎占全部通货时的情况一样。因为原本商人为应对不时之需而必须储备的滞财只应在商人之间流通。商人没有必要在其与消费者的交易中储存滞财：商人在此类交易中只有钱流进，而没有钱流出。因此，虽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额有限，仅够在商人之间流通，但通过贴现真实汇票及现金结算的方法，银行仍然能够使大部分商人不必存储很多现金以应对不时之需。所以，银行依然能够尽其所能为各种商人作出最大的贡献。

To restrain private people, it may be said, from receiving in payment the promissory notes of a banker, for any sum whether great or small, when they themselves are willing to receive them, or to restrain a banker from issuing such notes, when all his neighbours are willing to accept of them, is a manifest violation of that natural liberty which it is the proper business of law not to

infringe, but to support. Such regulations may, no doubt, be considered as in some respects a violation of natural liberty. But those exertions of the natural liberty of a few individuals, which might endanger the security of the whole society, are, and ought to be, restrained by the laws of all governments, of the most free as well as of the most despotical. The obligation of building party wall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communication of fire, is a violation of natural liberty exactly of the same kind with the regulations of the banking trade which are here proposed.

或许有人会说，无论银行钞票数额多大，只要私人愿意，就应将其视为允许接受的范围内。实际上，政府禁止接受数额大的钞票甚至取缔其发行乃侵犯自由，是法律不应准许的。因为法律不允许妨碍天然的自由，主张支持天然的自由。从某种角度来看，政府的做法就是在危害天然的自由。这些危害全社会安全的、少数人的天然自由，都要受到且应该受到一切政府的法律制裁，无论政府是最民主的还是最专制的。法律强迫人民建筑隔墙以预防火灾蔓延，这种对天然的自由的侵犯和我们这里所说的以法律限制银行活动没有区别。

A paper money consisting in bank notes, issued by people of undoubted credit, payable upon demand without any condition, and in fact always readily paid as soon as presented, is, in every respect, equal in value to gold and silver money; since gold and silver money can at any time be had for it. Whatever is either bought or sold for such paper must necessarily be bought or sold as cheap as it could have been for gold and silver.

如果由银行钞票构成的纸币由信用可靠的人发行，且可以无条件地随时兑现，那么无论从哪方面说，由于它随时可以兑换金银，故其

价值就等于黄金白银。只要使用此类纸币进行买卖，所有货物的价格肯定与使用金银买卖一样便宜。

The increase of paper money, it has been said, by augmenting the quantity, and consequently diminishing the value of the whole currency, necessarily augments the money price of commodities. But as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is taken from the currency, is always equal to the quantity of paper which is added to it, paper money does not necessarily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the whole currenc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ime, provisions never were cheaper in Scotland than in 1759, though, from the circulation of ten and five shilling bank notes, there was then more paper money in the country than at present.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in Scotland and that in England is the same now as before the great multiplication of banking companies in Scotland. Corn is, upon most occasions, fully as cheap in England as in France; though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paper money in England, and scarce any in France. In 1751 and in 1752, when Mr. Hume published his Political Discourses, and soon after the great multiplication of paper money in Scotland, there was a very sensible rise in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owing, probably, to the badness of the seasons, and not to the multiplication of paper money.

有些人认为，由于发行了更多的纸币增加了通货总量，进而降低了通货价值，因此，商品的货币价格一定能提高。但是，这种说法不一定可信，因为增加了多少纸币就会有相应数量的金银改作他用，所以，纸币的增加不一定就能使通货总量增加。从上世纪初截止到现在，1759年苏格兰的粮食价格最便宜。但因为那时发行了10先令、5先令的银行钞票，所以纸币比今天多得多。现在苏格兰设立了更多银

行，可是如今苏格兰粮食价格与英格兰粮食价格之比却与之前相当。英格兰的纸币已经增加了，法兰西的纸币已经减少了，但两国的谷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同样便宜。1751年至1752年休谟发表了《政治论文集》，在此期间以及在苏格兰增加纸币的发行后，粮食价格都明显高涨，至于原因，与其说是纸币发行量的增加，不如说是天时不好。

It would be otherwise, indeed, with a paper money consisting in promissory notes, of which the immediate payment depended, in any respect, either upon the good will of those who issued them, or upon a condition which the holder of the notes might not always have it in his power to fulfil; or of which the payment was not exigible till after a certain number of years, and which in the meantime bore no interest. Such a paper money would, no doubt, fall more or less below the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according as the difficulty or uncertainty of obtaining immediate payment was supposed to be greater or less; or according to the greater or less distance of time at which payment was exigible.

如果想要立即兑现构成纸币的钞券，还必须取决于发行人的诚意，或持券人可能没有能力兑现的某种条件，或者要经过多年方能兑现，而且不算利息，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当然，按照马上兑现的难度或不可靠性的大小或兑现期限的长短，这样的纸币会低于金银的价值。

Some years ago the different banking companies of Scotland were in the practice of inserting into their bank notes, what they called an Optional Clause, by which they promised payment to the bearer, either as soon as the note should be presented, or, in the option of the directors, six months after such presentment, together

with the legal interest for the said six months. The directors of some of those banks sometimes took advantage of this optional clause, and sometimes threatened those who demanded gold and silver in exchange for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their notes that they Would take advantage of it, unless such demanders would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a part of what they demanded. The promissory notes of those banking companies constituted at that time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currency of Scotland, which this uncertainty of payment necessarily degraded below the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money.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this abuse (which prevailed chiefly in 1762, 1763, and 1764), while the exchange between London and Carlisle was at par, that between London and Dumfries would sometimes be four per cent against Dumfries, though this town is not thirty miles distant from Carlisle. But at Carlisle, bills were paid in gold and silver; whereas at Dumfries they were paid in Scotch bank notes, and the uncertainty of getting those bank notes exchanged for gold and silver coin had thus degraded them four per cent below the value of that coin. The same Act of Parliament which suppressed ten and five shilling bank notes suppressed likewise this optional clause, and thereby restored the exchange between England and Scotland to its natural rate, or to what the course of trade and remittances might happen to make it.

苏格兰各大银行在几年前常常会在发行的钞票上加印选择权条款。此条款规定，凡持票要求兑现者，或见票立即兑现，或见票六月后兑现，但必须增付六个月由银行理事决定的法定利息。某些银行的理事会利用这个条款，或威胁持大量钞票寻求兑现的人只兑现其中一部分，否则就利用这一条款。在那时，几乎大部分的苏格兰通货都是这些银行的钞券。其能否兑现还是个问题，所以它的价值自然会低于金银。在这种弊病尚未清除期间（尤其是1762年、1763年和1764年），卡莱尔对伦敦实行平价汇兑，虽然达弗里斯与卡莱尔相距不足

三十英里，但其往往贴水4%实现对伦敦的汇兑。显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卡莱尔以金银兑付汇票，而达弗里斯以苏格兰银行钞票兑付汇票。由于用钞票兑换现金不保险，所以和铸币相比，价值就降低了4%。此后，当议会发布禁令，禁止发行5先令、10先令钞票，还规定钞票不得附加选择权条款时，英格兰才恢复了以自然汇率（与贸易和汇兑情况相一致的汇率）对苏格兰的汇兑。

In the paper currencies of Yorkshire, the payment of so small a sum as a sixpence sometimes depended up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holder of the note should bring the change of a guinea to the person who issued it; a condition which the holders of such notes might frequently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fulfil, and which must have degraded this currency below the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money. An Act of Parliament accordingly declared all such clauses unlawful, and suppress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Scotland, all promissory notes, payable to the bearer, under twenty shillings value.

约克郡的纸币最小面额竟低至6便士，但持票人要兑现，必须按规定存票至1几尼。而持票人很难满足这个条件。因此，其价值也会低于金银的价值。此后，国会认为这项规定不合法，决议将其废止，甚至还像苏格兰一样，禁止发行低于20先令的钞券。

The paper currencies of North America consisted, not in bank notes payable to the bearer on demand, but in government paper, of which the payment was not exigible till several years after it was issued; and though the colony governments paid no interest to the holders of this paper, they declared it to be, and in fact rendered it, a legal tender of payment for the full value for which it was issued.

But allowing the colony security to be perfectly good, a hundred pounds payable fifteen years hence, for example, in a country where interest at six per cent, is worth little more than forty pounds ready money. To oblige a creditor, therefore, to accept of this as full payment for a debt of a hundred pounds actually paid down in ready money was an act of such violent injustice as has scarce, perhaps, been attemp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any other country which pretended to be free. It bears the evident marks of having originally been, what the honest and downright Doctor Douglas assures us it was, a scheme of fraudulent debtors to cheat their creditors. The government of Pennsylvania, indeed, pretended, upon their first emission of paper money, in 1722, to render their paper of equal value with gold and silver by enacting penalties against all those who made any difference in the price of their goods when they sold them for a colony paper, and when they sold them for gold and silver; a regulation equally tyrannical, but much less effectual than that which it was meant to support. A positive law may render a shilling a legal tender for guinea, because it may direct the courts of justice to discharge the debtor who has made that tender. But no positive law can oblige a person who sells goods, and who is at liberty to sell or not to sell as he pleases, to accept of a shilling as equivalent to a guinea in the price of them. Notwithstanding any regulation of this kind, it appeared by the course of exchange with Great Britain, that a hundred pounds sterling was occasionally considered as equivalent, in some of the colonies, to a hundred and thirty pounds, and in others to so great a sum as eleven hundred pounds currency; this difference in the value arising from the difference in the quantity of paper emitted in the different colonies, and in the distance and probability of the term of its final discharge and redemption.

北美洲纸币不是由银行发行的，故而也无法随时兑现。由政府发行的北美洲纸币，如果非经数年，不能兑现。虽然殖民地政府不支付持票人任何利息，但曾宣告纸币为法定货币，必须按照面额价值偿还债务。然而，就算殖民地政府很稳固，但要花15年才能在利息为6厘的地方支付的100镑钞票，其价值在殖民地政府也仅相当于40镑现金。因此，如果强制债权人将一百镑纸币作为偿还其所有的100镑现金债务很不公平，估计所有宣称自由的政府都没有试行过这种方法。显然，正如诚实且坦率的道格拉斯博士所言，这就是不诚实的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欺骗。宾夕法尼亚政府于1772年首次发行纸币，称纸币与金银价值相等，禁止人们使用纸币出售产品时索要高于使用金银出售产品的价格。该法令的专横程度与宾夕法尼亚政府原本支持的法令没有什么两样，但远没有原法令有效。依照法律，1先令可以等于1几尼，因为法律可以在债务人拿出1先令前让法庭解除其义务。然而，是否出售货物则是卖者的自由。法律无法强制卖者将1先令视为1几尼。因此，英格兰有时可以使一百镑等于130镑完成对一些殖民地的汇兑，而有时却可以使100镑可以等于1,100镑完成对另一些殖民地的汇兑。因此即使有这样的法令也没有什么效果，如果试着探究其中原因，就会知道价值之所以如此悬殊是因为各殖民地发行的纸币额差值很大。此外，纸币的兑现期限有长有短，而兑现的可能性也多少存在差异。

No law, therefore, could be more equitable than the Act of Parliament, so unjustly complained of in the colonies, which declared that no paper currency to be emitted there in time coming should be a legal tender of payment.

因此，议会决议最好不要将殖民地后发行的纸币定为法币。如此公平的一项决议，为什么竟引发了各殖民地的不满？

Pennsylvania was always more moderate in its emissions of paper money than any other of our colonies. Its paper currency, accordingly, is said never to have sunk below the value of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was current in the colony before the first emission of its paper money. Before that emission, the colony had raised the denomination of its coin, and had, by act of assembly, ordered five shillings sterling to pass in the colony for six and threepence, and afterwards for six and eightpence. A pound colony currency, therefore, even when that currency was gold and silver, was more than thirty per cent below the value of a pound sterling, and when that currency was turned into paper it was seldom much more than thirty per cent below that value. The pretence for raising the denomination of the coin, was to prevent the ex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by making equal quantities of those metals pass for greater sums in the colony than they did in the mother country. It was found, however, that the price of all goods from the mother country rose exactly in proportion as they raised the denomination of their coin, so that their gold and silver were exported as fast as ever.

宾夕法尼亚政府比我国其他殖民地政府更慎重对待纸币的发行。听说，宾夕法尼亚的纸币价值从未低于未发行纸币前的金银的价值。然而，宾夕法尼亚在第一次发行纸币前，就已提高了殖民地铸币的单位名称，而且议会决议，可以将殖民地境内流通的英格兰5先令铸币视为6先令3便士，后来又提高至6先令8便士。因此，即使殖民地以金银为通货，1镑金银的价值也比1镑英币的价值减少了30%以上；而以纸币为通货时，1镑纸币的价值很少比1镑英币的价值低30%。如此提高铸币的单位名称的目的在于，让殖民地的等量金银能够被当作更大的数目使用，从而避免金银流出。然而，殖民地铸币的单位名称提高后，从母国运来的货物价格也按照一定比例有所增加，这样一来，金银还和以前一样快速流出。

The paper of each colony being received in the payment of the provincial taxes, for the full value for which it had been issued, it necessarily derived from this use some additional value over and above what it would have had from the real or supposed distance of the term of its final discharge and redemption. This additional value was greater or less, according as the quantity of paper issued was more or less above what could be employed in the payment of the taxes of the particular colony which issued it. It was in all the colonies very much above what could be employed in this manner.

殖民地的纸币允许人民按其面额缴纳本州各种赋税。因此，就算纸币真的或被认为要在很久以后才兑现，也一定可以增加其价值。然而这种增加的价值取决于本州发行的纸币额超过本州缴纳赋税所使用的纸币额多少。根据我们的调查，各州的纸币额都远高于本州缴纳赋税所使用的纸币额。

A prince, who should enact that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his taxes should be paid in a paper money of a certain kind might thereby give a certain value to this paper money, even though the term of its final discharge and redemption should depend altogether upon the will of the prince. If the bank which issued this paper was careful to keep the quantity of it always somewhat below what could easily be employed in this manner, the demand for it might be such as to make it even bear a premium, or sell for somewhat more in the market than the quantity of gold or silver currency for which it was issued. Some people account in this manner for what is called the Agio of the bank of Amsterdam, or for the superiority of bank money over current money; though this bank money, as they pretend, cannot be taken out of the bank at the will of the

owner. The greater part of foreign bills of exchange must be paid in bank money, that is, by a transfer in the books of the bank; and the directors of the bank, they allege, are careful to keep the whole quantity of bank money always below what this use occasions a demand for. It is upon this account, they say, that bank money sells for a premium, or bears an agio of four or five per cent above the same nominal sum of the gold and silver currency of the country. This account of the bank of Amsterdam, however, it will appear hereafter, is in a great measure chimerical.

如果一国君主规定有一部分赋税一定要用纸币缴纳，那么，就算由国王决定纸币的兑现日期，也肯定能使纸币价格提高。如果发行纸币的银行根据纳税所需，常常使发行的纸币额不足以应对纳税人的需求，那么纸币的价值就会比其面值高，抑或说，在市场上使用纸币购买的金银会比其面额高。然而，某些人就利用这一点说明所谓阿姆斯特丹银行纸币的升水，即说明为何它的价值会比通用货币高，虽然按照他们的说法，这种纸币不能凭所有者的意志随便拿出银行外去。他们说，必须使用银行纸币兑付大部分国外汇票。换句话说，必须在银行账簿上转账；该银行理事常常故意使银行的纸币额难以应付这种用途。他们表示，这就是为什么通常阿姆斯特丹银行的纸币要高出金银价值4%甚至5%的原因。然而，我们会在后文看到，这种说法不是很正确。

A paper currency which falls below the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coin does not thereby sink the value of those metals, or occasion equal quantities of themto exchange for a smaller quantity of goods of any other kind.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and that of goods of any other kind depends in all cases not upon the nature or quantity of any particular paper money, which may be current in any particular country, but upon the richness or

poverty of the mines, which happen at any particular time to supply the great market of the commercial world with those metals. It depends upon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bring a certain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to market, and that which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bring thither a certain quantity of any other sort of goods.

虽然纸币的价值可能会低于金币和银币的价值，但金银的价值不会因纸币价值的降低而降低，也不会减少其他使用金银换得的产品的数量。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金银的价值对其他产品价值的比例均不由国内通用纸币的性质与数量决定，而是由当时供给商业世界大市场的金银矿藏的富饶或贫瘠程度决定。换句话说，是由一定数量金银上市所需要的劳动数量与同等数量其他产品上市所需要的劳动数量之比决定的。

If bankers are restrained from issuing any circulating bank notes, or notes payable to the bearer, for less than a certain sum, and if they are subjected to the obligation of an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payment of such bank notes as soon as presented, their trade may, with safety to the public, be rendered in all other respects perfectly free. The late multiplication of banking companies in both par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 event by which many people have been much alarmed, instead of diminishing, increases the security of the public. It obliges all of them to be more circumspect in their conduct, and, by not extending their currency beyond its due proportion to their cash, to guard themselves against those malicious runs which the rivalship of so many competitors is always ready to bring upon them. It restrains the circulation of each particular company within a narrower circle, and reduces their circulating notes to a smaller number. By dividing the whole

circulation into a greater number of parts, the failure of any one company, an accident which, in the course of things, must sometimes happen, becomes of less consequence to the public. This free competition, too, obliges all bankers to be more liberal in their dealings with their customers, lest their rivals should carry them away. In general, if any branch of trade, or any division of labour, be advantageous to the public, the freer and more general the competition, it will always be the more so.

如果银行限制对钞票的发行且可以随时兑现钞票，就不会妨害社会安全，这样一来，也可以自由经营银行的其他产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地，近年来，许多银行纷纷设立起来，许多人深感担忧。但银行的设立不仅对社会无害，反而提高了社会安全。银行一多，竞争者就会增加。所以，为了提防同业的恶意排挤，必须谨慎经营各家银行，而其发行的纸币也一定要与现金额保持适当比例。银行间的竞争限制各银行的纸币在小范围内流通，从而减少了各银行正在流通的纸币。所有纸币分布在更多不同区域流通，因此，对于公众而言，一个银行的失败（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情况一定时有发生），影响一定不大。此外，银行在这种自由竞争下要放宽对顾客的营业条件，否则只能被同业挤兑。总结来说，如果一种事业对社会有益，就应当赋予其自由发展的机会。要想让其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就应该让竞争更加自由，更加普遍。

Chapter III. Of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or of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

第三章、论资本积累及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There is one sort of labour which adds to the value of the subject upon which it is bestowed: there is another which has no

such effect. The former, as it produces a value, may be called productive; the latter, unproductive labour. Thus the labour of a manufacturer adds, generally, to the value of the materials which he works upon, that of his own maintenance, and of his master's profit. The labour of a menial servant, on the contrary, adds to the value of nothing. Though the manufacturer has his wages advanced to him by his master, he, in reality, costs him no expence, the value of those wages being generally restored, together with a profit, in the improved value of the subject upon which his labour is bestowed. But the maintenance of a menial servant never is restored. A man grows rich by employing a multitude of manufacturers: he grows poor by maintaining a multitude of menial servants. The labour of the latter, however, has its value, and deserves its reward as well as that of the former. But the labour of the manufacturer fixes and realizes itself in some particular subject or vendible commodity, which lasts for some time at least after that labour is past. It is, as it were, a certain quantity of labour stocked and stored up to be employed, if necessary, upon some other occasion. That subject, or what is the same thing, the price of that subject, can afterwards, if necessary, put into motion a quantity of labour equal to that which had originally produced it. The labour of the menial servant, on the contrary, does not fix or realize itself in any particular subject or vendible commodity. His services generally perish in the very instant of their performance, and seldom leave any trace or value behind them for which an equal quantity of service could afterwards be procured.

有一种劳动如果作用在某物品上可以使该物品价值增加；而另一种劳动却不可以。由于前一种劳动可生产价值，故将其称为生产性劳动；而后一种劳动不可生产价值，故将其称为非生产性劳动。通常制造业工人的劳动会将维持工人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提供雇主利润的

价值增加到工人制造的原材料上。而家仆的劳动却无法使价值增加。虽然雇主负责垫付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但事实上这不会花费雇主的一分钱，因为制造业工人将其劳动作用到物品上，增加了物品的价值，这样一来，工资的价值可以得到补偿，且还可以获取利润。但家仆的维持费却无法收回。我们可以通过雇佣更许多工人致富，而供养许多家仆却会致贫。正如工人的劳动，家仆的劳动也有其自身价值，所以理应拿到工资。然而，我们可以将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固定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中，并在这些商品中对其加以利用，使其历经一段时间，不会随生随灭。这样做好像是先贮存一部分劳动，然后在必要时将其取出使用。今后，那种物品或那种物品的价格，在必要时还可用以雇佣劳动力，而这与原来生产该物品时投下的劳动力数量相等。相反，我们不将家仆的劳动固定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也不在这些商品中对其加以利用。由于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所以我们难以将其价值保存起来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所用。

The labour of some of the most respectable orders in the society is, like that of menial servants, unproductive of any value, and does not fix or realize itself in any permanent subject; or vendible commodity, which endures after that labour is past, and for which an equal quantity of labour could afterwards be procured. The sovereign, for example, with all the officers both of justice and war who serve under him, the whole army and navy, are unproductive labourers. They are the servants of the public, and are maintained by a part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industry of other people. Their service, how honourable, how useful, or how necessary soever, produces nothing for which an equal quantity of service can afterwards be procured. The protection, security, and defence of the commonwealth, the effect of their labour this year will not purchase its protection, security, and defence for the year to come. In the same class must be ranked, some both of the gravest and most important, and some of the most frivolous professions:

churchmen, lawyers, physicians, men of letters of all kinds; players, buffoons, musicians, opera-singers, opera-dancers, etc. The labour of the meanest of these has a certain value, regulated by the very same principles which regulate that of every other sort of labour; and that of the n oblest and most useful, 50 produces nothing which could afterwards purchase or procure an equal quantity of labour. Like the declamation of the actor, the harangue of the orator, or the tune of the musician, the work of all of them perishes in the very instant of its production.

在某些社会，上等阶级的劳动也不生产价值，无法固定在耐久或可卖商品上，也不在这些商品中对其加以利用，此外，我们也不能将其保藏起来用于在未来雇佣等量劳动，这和家仆的劳动一样。比如说，无论是君主还是其官吏和海陆军，都不生产产品。他们是人民的公仆，用他人劳动生产的部分年产品来维持其生计。无论他们的职务怎样高贵，怎样有用，怎样必要，其结果都是随生随灭，无法储备起来用于他日获得相同的职务。为了治理并保卫国家，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今年的业绩无法买到明年的业绩，今年的安全也买不到明年的安全。在这其中涉及各种职业，有些既尊贵又重要，如：牧师、律师、医师、文人；有些却是最不重要的，如：演员、歌手、舞蹈家等。在这类职业中，即使是最低级的职业，也具有价值。用以支配该类劳动价值的原则与支配其他劳动价值的原则相同。但这其中就算是最尊贵的职业，也无法进行生产用以在未来购买等量劳动。诸如演员的对白，雄辩家的演讲，音乐家的歌唱等，这一类人的职业都是随生随灭的。

Both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ers, and those who do not labour at all, are all equally maintained by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This produce, how great soever, can never be infinite, but must have certain limits.

According, therefore, as a smaller or greater proportion of it is in any one year employed in maintaining unproductive hands, the more in the one case and the less in the other will remain for the productive, and the next year's produce will be greater or smaller accordingly;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if we except the spontaneous productions of the earth, being the effect of productive labour.

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和不劳动者都依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维持生计。即使生产的产品很多，也不能说这些产品是无穷多的，它们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的人越多，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人就越少。这样一来，转年生产的产品势必会减少。相反，维持非生产性劳动的人越少，那么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人越多，这样一来，转年生产的产品势必会增多。所有年产品（土地天然生产的物品除外）都是通过生产性劳动生产的。

Though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every country is, no doubt, ultimately destined for supplying the consumption of its inhabitants, and for procuring a revenue to them, yet when it first comes either from the ground, or from the hands of the productive labourers, it naturally divides itself into two parts. One of them, and frequently the largest, is, in the first place, destined for replacing a capital, or for renewing the provisions, materials, and finished work, which had been withdrawn from a capital; the other for constituting a revenue either to the owner of this capital, as the profit of his stock, or to some other person, as the rent of his land. Thus, of the produce of land, one part replaces the capital of the farmer; the other pays his profit and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and thus constitutes a revenue both to the owner of this capital, as the profits of his stock; and to

some other person, as the rent of his land. Of the produce of a great manufactory, in the same manner, one part, and that always the largest, replaces the capital of the undertaker of the work; the other pays his profit, and thus constitutes a revenue to the owner of this capital.

当然，无论在哪个国家，我们都要利用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供给国内居民消费，提供国内居民收入，但无论是土地还是生产性劳动者生产的年产品都会自然分为两部分：通常最多的一部分用于补偿资本，补充从资本取出的食物、材料和制成品；另一部分，可以以利润形式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也可以以地租形式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一部分土地产品用于补充农场主的资本，另一部分土地产品则用于支付利润，并将其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支付地租，并将其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通常在大工厂的生产品中，最多的部分常常用来补充厂商的资本，另一部分则用于支付利润，并将其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

That part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any country which replaces a capital never is immediately employed to maintain any but productive hands. It pays the wages of productive labour only. That which is immediately destined for constituting a revenue, either as profit or as rent, may maintain indifferently either productive or unproductive hands.

我们从来不会立即使用补偿资本的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而是将其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那些最初用作利润或地租收入的年产品，则可能既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也可能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

Whatever part of his stock a man employs as a capital, he always expects is to be replaced to him with a profit. He employs it, therefore, in maintaining productive bands only; and after having served in the function of a capital to him, it constitutes a revenue to them. Whenever he employs any part of it in maintaining unproductive hands of any kind, that part is, from that moment, withdrawn from his capital, and placed in his stock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所有将部分资本视为资本投下的人都希望收回资本并获取利润。所以，他只将这部分资本用以雇佣生产性劳动者。首先，这项资本为其所有者提供资本，继而又为生产性劳动者提供收入。从如此使用这项资本时起，他用以供给非生产性劳动者的那部分资本就从他的资本中撤了出来，归为他直接消费的资本。

Unproductive labourers, and those who do not labour at all, are all maintained by revenue; either, first, by that part of the annual produce which is originally destined for constituting a revenue to some particular persons, either as the rent of land or as the profits of stock; or, secondly, by that part which, though originally destined for replacing a capital and for maintaining productive labourers only, yet when it comes into their hands whatever part of it is over and above their necessary subsistence may be employed in maintaining indifferently either productive or unproductive hands. Thus, not only the great landlord or the rich merchant, but even the common workman, if his wages are considerable, may maintain a menial servant; or he may sometimes go to a play or a puppetshow, and so contribute his share towards maintaining one set of unproductive labourers; or he may pay some taxes, and thus help to maintain another set, more honourable and useful indeed, but

equally unproductive. No part of the annual produce, however, which had been originally destined to replace a capital, is ever directed towards maintaining unproductive hands till after it has put into motion its full complement of productive labour, or all that it could put into motion in the way in which it was employed. The workman must have earned his wages by work done before he can employ any part of them in this manner. That part, too, is generally but a small one. It is his spare revenue only, of which productive labourers have seldom a great deal. They generally have some, however; and in the payment of taxes the greatness of their number may compensate, in some measure, the smallness of their contribution. The rent of land and the profits of stock are everywhere, therefore, the principal sources from which unproductive hands derive their subsistence. These are the two sorts of revenue of which the owners have generally most to spare. They might both maintain indifferently either productive or unproductive hands. They seem, however, to have some predilection for the latter. The expence of a great lord feeds generally more idle than industrious people. The rich merchant, though with his capital he maintains industrious people only, yet by his expence, that is, by the employment of his revenue, he feeds commonly the very same sort as the great lord.

无论是非生产性劳动者，还是不劳动者，都必须依靠收入供给。我们可将这里的收入分为两项：一，部分年产品最初就被视为某些人的地租或利润收入；二，还有部分最初用以补偿资本和雇佣生产性劳动者的年产品，但获得这些年产品的人除了用这些收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计外，通常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比如，土地所有者和富商，甚至是普通工人，常常在获得丰厚工资的情况下雇佣家仆或看回木偶戏以此就算拿出部分收入供给非生产性劳动者了。此外，他可能还要缴纳一些税。虽然他所供给的人要更尊贵，但那些

人也是不生产的。按照一般情况，在没有雇佣足够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者并鼓励他们工作前，还不至于挪用原本用于补充资本的年产品来供给非生产性劳动者。而尚未工作并获得工资前，劳动者绝不会想要利用部分工资来供给非生产性劳动者。况且，通常那部分工资不会很多，只是他节省下来的部分收入。而不管怎样，生产性劳动者也不会节省太多收入，但毕竟他们总会节省一些。从赋税角度来看，由于处于生产性劳动者这一阶级的人很多，因此，虽然他们每个人所缴纳的税有限，但这一阶级加在一起缴纳的税额却很可观。无论在何处，地租和利润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赖以维持生计的主要资源。这两种收入的节省方法最简单。其所有者既可以利用这两种收入雇佣生产性劳动者，也可以雇佣非生产性劳动者。然而，总的来说，他们好像很喜欢将其用于雇佣非生产性劳动者。通常大领主用于供养游手好闲的人所花的费用较多，而用于供养勤劳人民所花的费用较少。虽然富商的资本只用于雇佣勤劳的人民，但他大部分的收入也像大领主一样，用来供养那些非生产性劳动者。

The proportion, therefore, between the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hands, depends very much in every country upon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at part of the annual produce, which, as soon as it comes either from the ground or from the hands of the productive labourers, is destined for replacing a capital, and that which is destined for constituting a revenue, either as rent or as profit. This proportion is very different in rich from what it is in poor countries.

我们曾谈到，土地或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年产品后，将有一部分年产品作为补偿资本的基金，另一部分年产品作为地租或利润的收入。现在，我们还知道，无论在哪个国家，生生产性劳动者与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比例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上述两部分年产品的比例。而这个比例，在穷国和富国又极不相同。

Thus, at present, in the opulent countries of Europe, a very large, frequently the largest portion of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is destined for replacing the capital of the rich and independent farmer; the other for paying his profits and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But anciently, during the prevalency of the feudal government, a very small portion of the produce was sufficient to replace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cultivation. It consisted commonly in a few wretched cattle, maintained altogether by the spontaneous produce of uncultivated land, and which might, therefore, be considered as a part of that spontaneous produce. It generally, too, belonged to the landlord, and was by him advanced to the occupiers of the land. All the rest of the produce properly belonged to him too, either as rent for his land, or as profit upon this paltry capital. The occupiers of land were generally bondmen, whose persons and effects were equally his property. Those who were not bondmen were tenants at will, and though the rent which they paid was often nominally little more than a quit-rent, it really amounted to the whole produce of the land. Their lord could at all times command their labour in peace and their service in war. Though they lived at a distance from his house, they were equally dependent upon him as his retainers who lived in it. But the whole produce of the land undoubtedly belongs to him who can dispose of the labour and service of all those whom it maintains.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Europe, the share of the landlord seldom exceeds a third, sometimes not a fourth part of the whole produce of the land. The rent of land, however, in all the improved parts of the country, has been tripled and quadrupled since those ancient times; and this third or fourth part of the annual produce is, it seems, three or four times greater than the whole had been before.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rent, though it increases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diminishes in proportion to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如今，欧洲各个富国通常会利用大部分土地产品来弥补独立且富有的农场主的资本，并利用剩余的土地产品支付农场主的利润与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但在过去，封建政府到处可见，极小部分的年产品就足以补偿耕作资本，因为那时几头老牛老马就是耕作的资本，而它们的食物就是荒地上的天然产品，因此，也可把它们看作部分天然产品。一般而言，这些牲畜也属于土地所有者，并由他们租借给土地耕作者。剩余的土地产品作为土地的地租，或没有什么价值的资本的利润也归属于土地所有者。大部分耕者都是土地所有者的奴仆，他们的家当也归土地所有者所有。非奴仆的耕者可以随意退租，而且虽然在名义上，他们所缴纳的地租和免役租一样，但是实际上，他们所缴纳的地租仍然与全部土地产品相等。在和平年间，土地所有者可随时征用这些耕者劳役；在战争年间，这些耕者必须去服兵役。虽然他们的住所与土地所有者的住所相距较远，但他们是土地所有者的所有物，与土地所有者的家奴没有什么区别。既然土地所有者的劳役必须听从其支配，那么所有的土地产品自然也归属于土地所有者。但如今，欧洲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地租占所有土地产品的比例很少大于1/3，甚至有时要小于1/4。但大部分改良土地的地租，却已相当于过去的3倍或4倍；如果抽取1/3或1/4现在的年生产品，可能就相当于过去全部的年产品的3倍或4倍了。随着农业的进步，虽然地租每天都在增长，但其与土地产品之比却是每天在减少。

In the opulent countries of Europe, great capitals are at present employed in trade and manufactures. In the ancient state, the little trade that was stirring, and the few homely and coarse manufactures that were carried on, required but very small capitals. These, however, must have yielded very large profits. The rate of interest was nowhere less than ten per cent, and their profits must have been sufficient to afford this great interest. At present the rate of interest, in the improved parts of Europe, is nowhere higher than six per cent, and in some of the most improved it is so low as four,

three, and two per cent. Though that part of the revenue of the inhabitants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profits of stock is always much greater in rich than in poor countries, it is because the stock is much greater: in proportion to the stock the profits are generally much less.

对于各大欧洲富国而言，他们现在将大量资本都用于商业和制造业。虽然在过去，贸易很少，制造业不发达，需要的资本固然很少，但是它们一定可以提供很高的利润。在过去，利率很少低于10%。这足以证明他们的利润可以提供如此多的利息。现在，很少有欧洲进步的国家能达到6%以上的利率；有时最进步国家的利率甚至会低至4%、3%或2%。由于与穷国相比，富国拥有的资本要多得多，所以富国居民因资本利润所获得的收入也比穷国多得多。但通常富国的利润与资本比例比穷国要小得多。

That part of the annual produce, therefore, which, as soon as it comes either from the ground or from the hands of the productive labourers, is destined for replacing a capital, is not only much greater in rich than in poor countries, but bears a much greater proportion to that which is immediately destined for constituting a revenue either as rent or as profit.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roductive labour are not only much greater in the former than in the latter, but bear a much greater proportion to those which, though they may be employed to maintain either productive or unproductive hands, have generally a predilection for the latter.

与穷国相比，富国不仅用来补充资本的那部分年产品，即由土地和生产性劳动者生产的一部分年产品数量更多，而且其直接归为地租

和利润的那部分年产品在全部年产品中所占比例也大得多。此外，富国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自然比穷国多得多。我们曾说过，除了将一部分国内的年产品作为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外，其余的年产品既可以用于雇佣生产性劳动，也可以用于雇佣非生产性劳动，但通常用于雇佣非生产性劳动。富国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在年产品中所占比例也比穷国大得多。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ose different funds necessarily determines in every country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inhabitants as to industry or idleness. We are more industrious than our forefathers, because, in the present times,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industry are much greater in proportion to those which are likely to be employed in the maintenance of idleness, than they were two or three centuries ago. Our ancestors were idle for want of a sufficient encouragement to industry. It is better, says the proverb, to play for nothing, than to work for nothing. In mercantile and manufacturing towns, where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are chiefly maintained by the employment of capital, they are in general industrious, sober, and thriving; as in many English, and in most Dutch towns. In those towns which are principally supported by the constant or occasional residence of a court, and in which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are chiefly maintained by the spending of revenue, they are in general idle, dissolute, and poor; as at Rome, Versailles, Compeigne, and Fontainbleau. If you except Rouen and Bourdeaux, there is little trade or industry in any of the parliament towns of France; and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being chiefly maintained by the expence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urts of justice, and of those who come to plead before them, are in general idle and poor. The great trade of Rouen and Bourdeaux seems to be altogether the effect of their situation. Rouen is necessarily the entrepot of almost all the goods which are brought either from

foreign countries, or from the maritime provinces of France, for the consumption of the great city of Paris. Bourdeaux is, in the same manner, the entrepot of the wines which grow upon the banks of the Garronne, and of the rivers which run into it, one of the richest win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which seems to produce the wine fittest for exportation, or best suited to the taste of foreign nations. Such advantageous situations necessarily attract a great capital by the great employment which they afford it; and the employment of this capital is the cause of the industry of those two cities. In the other parliament towns of France, very little more capital seems to be employed than what is necessary for supplying their own consumption; that is, little more than the smallest capital which can be employed in them. The same thing may be said of Paris, Madrid, and Vienna. Of those three cities, Paris is by far the most industrious, but Paris itself is the principal market of all the manufactures established at Paris, and its own consumption is the principal object of all the trade which it carries on. London, Lisbon, and Copenhagen, are, perhaps, the only three cities in Europe, which are both the constant residence of a court, and can at the same time be considered as trading cities, or as cities which trade not only for their own consumption, but for that of other cities and countries. The situation of all the three is extremely advantageous, and naturally fits them to be the entrepots of a great part of the goods destined for the consumption of distant places. In a city where a great revenue is spent, to employ with advantage a capital for any other purpose than for supplying the consumption of that city, is probably more difficult than in one in which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have no other maintenance but what they derive from the employment of such a capital. The idlenes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eople who are maintained by the expence of revenue, corrupts, it is probable, the industry of those who ought to be maintained by the employment of capital, and renders it less

advantageous to employ a capital there than in other places. There was little trade or industry in Edinburgh before the Union. When the Scotch parliament was no longer to be assembled in it, when it ceased to be the necessary residence of the principal nobility and gentry of Scotland, it became a city of some trade and industry. It still continues, however, to be the residence of the principal courts of justice in Scotland, of the boards of customs and excise, etc. A considerable revenue, therefore, still continues to be spent in it. In trade and industry, it is much inferior to Glasgow, of which the inhabitants are chiefly maintained by the employment of capital. The inhabitants of a large village, it has sometimes been observed, after having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manufactures, have become idle and poor, in consequence of a great lord's having taken up his residence in their neighbourhood.

任何一国人民的普遍性格，勤劳或怠惰，都必然取决于这两种基金所占的比重。相比二三百年前，当今用于维持勤劳的基金所占比重大大高于可能会滋生怠惰的基金，因此我们比祖先更为勤劳。因未受到对勤劳的充分鼓励，我们的祖先较为怠惰。有言道：与其劳动而无所收获，不如不抱乐趣而嬉戏。在下等居民主要以资本运用为生的商业与制造业城市中，这些居民普遍勤劳、朴素、生气勃勃，在许多英国城市及大部分荷兰城市即如此。而在作为君主长期或临时驻地并以此为养的城市，下等居民主要靠花费收入维持生活，他们则普遍怠惰、堕落、贫穷，在罗马、凡尔赛、贡比涅、枫丹白露，便是这样。除鲁昂和布尔多以外，法国任一议会城市的贸易和工业均微不足道。法院成员及前来向他们申诉的人在这些城市消费，其下等居民主要靠这些消费供养，因此，他们普遍怠惰、贫穷。鲁昂和布尔多两市贸易发达的原因似乎完全在于其地理位置。货物运往巴黎以供消费，无论运输自国外还是法国沿海各省，鲁昂必然是这些货物的集散地。同样，布尔多是加龙河及其支流沿岸所产葡萄酒的集散地、世界最盛产葡萄酒的地区之一，该地生产的葡萄酒似乎最适合出口，即最符合外

国人口味。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必然会因其提供绝佳的资本运用机会而吸引大量资本。资本得以运用，则成就了这两个城市的工业。而法国其他议会城市运用的资本都仅仅满足本市的必要消费，似乎极少运用更多资本，即这些城市运用的资本极少多于所能达到的最低额度。巴黎、马德里和维也纳同样如此。迄今，这三座城市当中，巴黎最为勤劳。但建立在巴黎的全部工厂，都以巴黎本市为主要销售市场；巴黎所运行全部贸易的主要对象即本市消费。既为君主的长期驻地，又同时可称为贸易城市，或称其贸易不仅针对本市消费，而同样针对外地和外国消费的城市，在欧洲或许仅伦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三市。三座城市地理位置都极为有利，自然适合成为大部分供远处消费物品的集散地。在收入消费量大的城市，除供应本市消费以外，若为满足任何其他目的，则有利地运用资本，将比在下等居民仅依靠资本运用获利而维持生计的城市更为困难。靠花费收入维持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很可能是他们的怠惰使得一些本该勤劳的人变得堕落，使得在此处运用资本比在他处更为不利。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前，爱丁堡的贸易与工业规模甚小。随着议会的迁移，爱丁堡不再一定是皇家贵族的驻地，这座城市才发展了一些贸易和工业。但爱丁堡依然是最高法院、海关与税务机关等机构的驻地，因此，这里依然消费大量的收入。因此，在贸易与工业方面，爱丁堡远不及格拉斯哥，而格拉斯哥居民正是靠资本运用而维持生计。有时我们可以发现，某大型村庄虽然大大发展了制造业，但由于王公贵族驻于附近，其居民仍然变得怠惰和贫穷。

The propor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revenue, therefore, seems everywhere to regulate the propor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idleness. Wherever capital predominates, industry prevails; wherever revenue, idleness. Every increase or diminution of capital, therefore, naturally tends to increase or diminish the real quantity of industry, the number of productive hands, and consequently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the real wealth and revenue of all its inhabitants.

因此，似乎在任何地方，资本与收入的比例都支配勤劳与怠惰的比例。资本占优之地，勤劳之风盛行；收入居上之处，怠惰之气滋生。因此，资本的增减，自然往往会使实际的勤劳人数和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发生增减，并由此影响一国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的可交换价值、真实财富以及全国人民的收入发生增减。

Capitals are increased by parsimony, and diminished by prodigality and misconduct.

资本因节俭而增加，因浪费与挥霍而减少。

Whatever a person saves from his revenue he adds to his capital, and either employs it himself in maintaining an additional number of productive hands, or enables some other person to do so, by lending it to him for an interest, that is, for a share of the profits. As the capital of an individual can be increased only by what he saves from his annual revenue or his annual gains, so the capital of a society, which is the same with that of all the individuals who compose it, can be increased only in the same manner.

收入即增加资本，节省收入，无论用于自己投资以雇用更多生产性劳动者，还是通过借予他人而收取利息，使他人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目的都是获取利润。由于个人的资本只能通过节省年收入或年收益而增加，那么，既然社会由全体个人构成，则社会的资本，也只能通过同样的方式而增加。

Parsimony, and not industry, is the immediate cause of the increase of capital. Industry, indeed, provides the subject which parsimony accumulates; but whatever industry might acquire, if parsimony did not save and store up, the capital would never be the greater.

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非勤劳。的确，节俭所蓄之物要靠勤劳而得，但无论以勤劳得到何物，若不通过节俭储存、积累，资本则永远无法增加。

Parsimony, by increasing the fund which is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roductive hands, tend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hose hands whose labour adds to the value of the subject upon winch it is bestowed. It tends, therefore, to increase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It puts into motion an additional quantity of industry, which gives an additional value to the annual produce.

有指定的基金，用以维护生产性劳动者，节俭可以增加此基金。因此，节俭往往可使生产性劳动者人数上升。他们为产品付出劳动，增加产品的价值，因此，节俭往往可以增加国家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的交换价值。节俭可增加劳动量，劳动量增加，使年生产物的价值增长。

What is annually saved, is as regularly consumed as what is annually spent, and nearly in the same time too: but it is consumed by a different set of people. That portion of his revenue which a rich man annually spends, is, in most cases, consumed by idle

guests and menial servants, who leave nothing behind them in return for their consumption. That portion which he annually saves, as, for the sake of the profit, it is immediately employed as a capital, is consumed in the same manner, and nearly in the same time too, but by a different set of people: by labourers, manufacturers, and artificers, who reproduce, with a profit, the value of their annual consumption. His revenue, we shall suppose, is paid him in money. Had he spent the whole, the food, clothing, and lodging, which the whole could have purchased, would have been distributed among the former set of people. By saving a part of it, as that part is, for the sake of the profit, immediately employed as a capital, either by himself or by some other person, the food, clothing, and lodging, which may be purchased with it, are necessarily reserved for the latter. The consumption is the same, but the consumers are different.

每年的积蓄常常被消费，同花费一样，且几乎同时被消费，但消费人群不同。多数情况下，富人每年花费的一部分收入，消费于招待怠惰的客人和供养家仆，这些人什么也不留下，不图回报富人的花费。而富人有部分年积蓄是为了赚取利益，这部分积蓄直接运用为资本，以同样方式又几乎同时被人消费，但消费人群不同：劳动者、制造者和工匠。他们则会再生产每年消费的价值，并产生利润。我们假设富人的收入以货币支付，若花费全部收入，购买食品、衣服和住所，所购之物就分配给了前一群人。若节省一部分收入，直接运用为资本以赚取利润，则无论亲自投用还是借予他人投用，由这部分收入购买的食品、衣服和住所，就必然保留给后一群人。同样是消费，但消费人群不同。

By what a frugal man annually saves, he not only affords maintenance to an additional number of productive hands, for that

of the ensuing year, but like the founder of a public work-house he establishes, as it were, a perpetual fun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an equal number in all times to come. The perpetual allotment and destination of this fund, indeed, is not always guarded by any positive law, by any trust-right or deed of mortmain. It is always guarded, however, by a very powerful principle, the plain and evident interest of every individual to whom any share of it shall ever belong. No part of it can ever afterwards be employed to maintain any but productive hands, without an evident loss to the person who thus perverts it from its proper destination.

通过每年节省的收入，节俭者不仅可以维持更多生产性劳动者，以保证来年的收入；还能如同公共工厂的创办者，设立一种永久基金，以在未来任何时候，均可维持同样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当然，该基金如何长远分配、作何之用，无法永远得到任何实在法、任何信托契约或永久契约的保护。但是，有一个十分有力的原则可以对其加以保护，即享有基金的每一个人必然涉及直白而明显的利害关系。因此该基金的任何部分都不可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偏离适当用途而滥用该基金的人必将蒙受明显损失。

The prodigal perverts it in this manner: By not confining his expence within his income, he encroaches upon his capital. Like him who perverts the revenues of some pious foundation to profane purposes, he pays the wages of idleness with those funds which the frugality of his forefathers had, as it were, consecrated to the maintenance of industry. By diminishing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 employment of productive labour, he necessarily diminishes, so far as it depends upon him, the quantity of that labour which adds a value to the subject upon which it is bestowed, and, consequently, th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whole

country, the real wealth and revenue of its inhabitants. If the prodigality of some were not compensated by the frugality of others, the conduct of every prodigal, by feeding the idle with the bread of the industrious, would tend not only to beggar himself, but to impoverish his country.

奢侈者即如此滥用：不量入为出，以致资本损失。如同将作为基金的收入由敬神挪用为渎神之人，奢侈者挪用祖先节省下来以期维持勤劳的资金，反而为怠惰者发放薪酬。只要他还能够决定生产性劳动者的雇用，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减少，可增加产品价值的劳动量就会减少。因而，全国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价值也随之减少，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亦会减少。若某些人的奢侈不能为他人的节俭所补偿，奢侈者的所作所为，即以勤劳者的面包供养怠惰者，不仅可能使其自身陷入贫穷，更可能使他的国家陷入匮乏。

Though the expence of the prodigal should be altogether in home made, and no part of it in foreign commodities, its effect upon the productive funds of the society would still be the same. Every year there would still be a certain quantity of food and clothing, which ought to have maintained productive, employed in maintaining unproductive hands. Every year, therefore, there would still be some diminution in w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th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即使奢侈者的消费全部应由国内生产，毫无外国商品，奢侈者消费对社会的生产基金的影响仍然不会改变。每年，都会有一定量的食品和衣服，本应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却被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因此，每年一国土地与劳动生产物的价值，常常会低于在相反情况下应有的价值。

This expence, it may be said, indeed, not being in foreign goods, and not occasioning any ex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the same quantity of money would remain in the country as before. But if the quantity of food and clothing which were thus consumed by unproductive, had been distributed among productive hands, they would have reproduced, together with a profit, the full value of their consumption. The same quantity of money would, in this case, equally have remained in the country, and there would, besides, have been a reproduction of an equal value of consumable goods. There would have been two values instead of one.

有人可能会说，的确，这种消费并不用于外国商品，未致金银输出，国内货币量与以往相当。但若这些食品和衣服未被非生产劳动者消费，而分配于生产性劳动者，后者则不仅可以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还可以产生利润。此时，等量的货币仍然留在国内，除此之外，还再生产了一个等价值的消费品，即产生两份价值，而非一份价值。

The same quantity of money, besides, can not long remain in any country in which th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diminishes. The sole use of money is to circulate consumable goods. By means of it, provisions, materials, and finished work, are bought and sold, and distributed to their proper consumers. The quantity of money, therefore, which can be annually employed in any country, must be determined by the value of the consumable goods annually circulated within it. These must consist, either in the immediate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itself, or in something which had been purchased with some part of that produce. Their value, therefore, must diminish as the value of that produce

diminishes, and along with it the quantity of money which can be employed in circulating them. But the money which, by this annual diminution of produce, is annually thrown out of domestic circulation, will not be allowed to lie idle. The interest of whatever possesses it requires that it should be employed; but having no employment at home, it will, in spite of all laws and prohibitions, be sent abroad, and employed in purchasing consumable goods, which may be of some use at home. Its annual exportation will, in this manner, continue for some time to add something to the annual consumption of the country beyond the value of its own annual produce. What in the days of its prosperity had been saved from that annual produce, and employed in purchasing gold and silver, will contribute, for some little time, to support its consumption in adversity. The ex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is, in this case, not the cause, but the effect of its declension, and may even, for some little time, alleviate the misery of that declension.

此外，任何年生产物价值有所降低的国家都不能保留等量的货币。货币的唯一用途使消费品流通。通过货币，食品、原料与成品实现交易，并由适当的消费者分配。因此，任一国家每年流通的货币量，必然取决于每年国内流通消费品的价值。这些消费品既包括本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生产物，又包括以部分生产物购得的产品。因此，本国生产物价值减少，每年国内流通消费品的价值也必然减少，结果导致货币量减少，而货币正为商品流通所需。但因当年生产物减少而流出国内流通环节的货币不应搁置不用。无论何人持有货币，必然希望获取利润，因此要求货币得到运用。但这些货币在国内没有用途，不顾法律与禁令也要流入国外，购买可能在国内有某种用途的消费品。如此，货币每年的流出会持续一段时间，以扩大本国年消费量，使其超出本国年生产物的价值。在货币繁荣时期，从年生产物中节省的部分和用于购买金银的部分，可在逆境中支持该国一段时间的消费。此时，金银的输出不是货币衰退的原因，而是其结果，甚至，金

银输出还可能暂时缓解货币衰退的困境。

The quantity of money, on the contrary, must in every country naturally increase as th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increases. The value of the consumable goods annually circulated within the society being greater, will require a greater quantity of money to circulate them. A part of the increased produce, therefore, will naturally be employed in purchasing, wherever it is to be had, the additional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necessary for circulating the rest. The increase of those metals will, in this case, be the effect, not the cause, of the public prosperity. Gold and silver are purchased everywhere in the same manner. The food, clothing, and lodging, the revenue and maintenance, of all those whose labour or stock is employed in bringing them from the mine to the market, is the price paid for them in Peru as well as in England. The country which has this price to pay, will never belong without the quantity of those metals which it has occasion for; and no country will ever long retain a quantity which it has no occasion for.

相反，在每个国家，年生产物价值增加，货币量自然随之增加。每年流通在国内的消费品价值增加，就需要更大的货币量实现其流通。因此，部分价值增加的生产物，无论在保有该生产物的任何地方，自然将用于购买额外的金银，以流通剩余生产物。此时，金银的增加是社会繁荣的结果，而非其原因，金银的购买方式在任何地方都相同。将劳动或资本投入将金银从矿山运往市场的人，其衣食住所、收入与供养即支付于他们的报酬，在秘鲁如此，英格兰亦如此。付得起报酬的国家，永远不会缺乏金银，因其有此条件；而无此条件的国家，无法长期留存等量的金银。

Whatever, therefore, we may imagine the real wealth and revenue of a country to consist in, whether in th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as plain reason seems to dictate, or in the quantit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which circulate within it, as vulgar prejudices suppose; in either view of the matter, every prodigal appears to be a public enemy, and every frugal man a public benefactor.

因此，无论从清楚的原因出发，称国家真实财富与收入由其劳动和土地的年生产物价值而构成，还是根据庸俗的偏见，称真实财富与收入，由国内流通的贵金属量构成；依二者观点，奢侈者似乎都是社会公敌，节俭者则是社会的恩主。

The effects of misconduct are often the same as those of prodigality. Every injudicious and unsuccessful project in agriculture, mines, fisheries, trade, or manufactures, tends in the same manner to diminish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roductive labour. In every such project, though the capital is consumed by productive hands only, yet as, by the injudicious manner in which they are employed, they do not reproduce the full value of their consumption, there must always be some diminution in w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the productive funds of the society.

妄为与奢侈，往往结果相同。无论农业、矿业、渔业、商业、制造业，任何不当并不成功的项目，往往会缩减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在这些项目中，资本仅消费于生产性劳动者，但由于雇用方式不当，他们无法再生产全部消费的价值。与相反情况相比，如此难免缩减社会的生产性基金。

It can seldom happen, indeed, that the circumstances of a great nation can be much affected either by the prodigality or misconduct of individuals; the profusion or imprudence of some being always more than compensated by the frugality and good conduct of others.

诚然，无论个人是奢侈还是妄为，都无法对大国的情况产生太大影响。他人的节俭与妥当，大大补偿了部分人的奢侈与妄为。

With regard to profusion, the principle which prompts to expence is the passion for present enjoyment; which, though sometimes violent and very difficult to be restrained, is in general only momentary and occasional. But the principle which prompts to save, is the desire of bettering our condition; a desire which, though generally calm and dispassionate, comes with us from the womb, and never leaves us till we go into the grave. In the whole interval which separates those two moments, there is scarce, perhaps, a single instance, in which any man is so perfectly and completely satisfied with his situation, as to be without any wish of alteration or improvement of any kind. An augmentation of fortune is the means by which the greater part of men propose and wish to better their condition. It is the means the most vulgar and the most obvious; and the most likely way of augmenting their fortune, is to save and accumulate some part of what they acquire, either regularly and annually, or upon some extraordinary occasion. Though the principle of expence, therefore, prevails in almost all men upon some occasions, and in some men upon almost all occasions; yet in the greater part of men, taking the whole course of their life at an average, the principle of frugality seems not only to

predominate, but to predominate very greatly.

关于奢侈，人有一种本能促使花费，即当下享乐的欲望。这种欲望虽然有时甚为强烈，很难抑制，但通常只是暂时与偶然的。但激励人们节俭的，是改善自身状况的渴望。这种渴望虽然通常是冷静与平静的，但从出生直到去世，始终伴随我们。在这两个时刻之间的时期，可能在一生中，几乎无人会对现状有一刻完全的满足而不思改变或任何方面的改进。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并期望改善境况，其方式即积累财富，这亦是最普通最明显的方式。而积累财富最合适的方式，就是在日常收入、年收入或特殊收入中，节省并储蓄一部分。因此，虽然几乎所有人都时有浪费的本能，一些人几乎时时有此欲望。但就更多人而言，论其一生平均看来，则节俭的本能，不仅更为强烈，更大大占据主导。

With regard to misconduct, the number of prudent and successful undertakings is everywhere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injudicious and unsuccessful ones. After all our complaints of the frequency of bankruptcies, the unhappy men who fall into this misfortune, make but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whole number engaged in trade, and all other sorts of business; not much more, perhaps, than one in a thousand. Bankruptcy is, perhaps, the greatest and most humiliating calamity which can befal an innocent man. The greater part of men, therefore, are sufficiently careful to avoid it. Some, indeed, do not avoid it; as some do not avoid the gallows.

谈及妄为，无论何地，慎重和成功的事业总是多于不当和不成功的事业。虽然破产常有发生，失意者遭此厄运，我们也对此抱怨，但在经营交易及各项生意的所有人当中，这只是极小部分，也许不多于

千分之一。也许破产是一个无辜的人所经历最大的、极难堪的灾祸。因此，更多的人足够谨慎，能够免遭破产，也的确有人未能避免，如同有人未能免受绞刑一般。

Great nations are never impoverished by private, though they sometimes are by public prodigality and misconduct. The whole, or almost the whole public revenue is, in most countries, employed in maintaining unproductive hands. Such are the people who compose a numerous and splendid court, a great ecclesiastical establishment, great fleets and armies, who in time of peace produce nothing, and in time of war acquire nothing which can compensate the expence of maintaining them, even while the war lasts. Such people, as they themselves produce nothing, are all maintained by the produce of other men's labour. When multiplied, therefore, to an unnecessary number, they may in a particular year consume so great a share of this produce, as not to leave a sufficiency for maintaining the productive labourers, who should reproduce it next year. The next year's produce, therefore, will be less than that of the foregoing; and if the same disorder should continue, that of the third year will be still less than that of the second. Those unproductive hands who should be maintained by a part only of the spare revenue of the people, may consume so great a share of their whole revenue, and thereby oblige so great a number to encroach upon their capitals, upon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roductive labour, that all the frugality and good conduct of individuals may not be able to compensate the waste and degradation of produce occasioned by this violent and forced encroachment.

大国永远不会因个人而贫穷，但公众的奢侈和妄为，却有时使其陷入贫困。在大多数国家中，公众全部或几乎全部的收入都用以维持

非生产者。此类人包括庞大辉煌宫廷的成员、建立教会的人，又如庞大舰队及军队成员，和平时期无所生产，战时所得又不足以补偿维持经费，即便战争持续。此类人，因本身无所生产，均由他人劳动所得而维持。因此，若这类人数量增至不必要的程度，便可在某一年内大大消耗他人劳动所得，导致没有足够剩余能够维持可在次年再生产的生产性劳动者。由此，次年的再生产难及这一年。若此种混乱继续，第三年的再生产，又将不及第二年。非生产者仅仅应该以人民的部分收入而维持，却可能消费了人民全部收入如此之大的一部分，迫使如此之多的人民侵蚀他们的资本，以及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以致此种猛烈的、被迫的侵蚀，使个人的节俭与妥当可能无法补偿生产物的浪费和破坏。

This frugality and good conduct, however, is, upon most occasions, it appears from experience, 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not only the private prodigality and misconduct of individuals, but the public extravagance of government. The uniform, constant, and uninterrupted effort of every man to better his condition, the principle from which public and national, as well as private opulence is originally derived,is frequently powerful enough to maintain the natural progress of things towards improvement, in spite both of the extravagance of government, and of the greatest errors of administration. Like the unknown principle of animal life, it frequently restores health and vigour to the constitution, in spite not only of the disease, but of the absurd prescriptions of the doctor.

然而，据经验而视，在多数情况下，节俭与妥当却似乎不仅可以补偿个人的私人奢侈与妄为，还可以补偿政府的浪费。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而做出一致的、长期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的最初来源。尽管政府有所浪费，政事可出现重大失

误，这种努力也常常足够有力，能够维持事物向上发展的自然进程。正如未知的动物生存法则，尽管疾病难免，且有庸医滥开处方，但这种力量常常可以使身体恢复健康与生气。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any nation can be increased in its value by no other means, but by increasing either the number of its productive labourers, or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those labourers who had before been employed. The number of its productive labourers, it is evident, can never be much increased, but in consequence of an increase of capital, or of the funds destined for maintaining them.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the same number of labourers cannot be increased, but in consequence either of some addition and improvement to those machines and instruments which facilitate and abridge labour, or of more proper divi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In either case, an additional capital is almost always required. It is by means of an additional capital only, that the undertaker of any work can either provide his workmen with better machinery, or make a more proper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among them. When the work to be done consists of a number of parts, to keep every man constantly employed in one way, requires a much greater capital than where every man is occasionally employed in every different part of the work. When we compare, therefore, the state of a nation at two different periods, and find that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is evidently greater at the latter than at the former, that its lands are better cultivated, its manufactures more numerous and more flourishing, and its trade more extensive; we may be assured that its capital must have increased during the interval between those two periods, and that more must have been added to it by the good conduct of some, than had been taken from it either by the private misconduct of others, or by the public extravagance of

government. But we shall find this to have been the case of almost all nations, in all tolerably quiet and peaceable times, even of those who have not enjoyed the most prudent and parsimonious governments. To form a right judgment of it, indeed, we must compare the state of the country at periods somewhat distant from one another. The progress is frequently so gradual, that, at near periods, the improvement is not only not sensible, but, from the declension either of certain branches of industry, or of certain districts of the country, things which sometimes happen, though the country in general is in great prosperity, there frequently arises a suspicion, that the riches and industry of the whole are decaying.

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的价值别无他法，或增加生产性劳动者人数，或提高这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显然，只有通过增加资本和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才能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只有通过增加或改良那些促进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设备，或改进雇用划分与分配，才能使相同数量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得到提高。无论如何，几乎永远有必要增加资本。从事任何工艺的雇主为工人提供更精良的机器，或改善雇用工人的分配，只能通过增加资本。若需要完成的工作分为许多部分，为使每名工人的雇用方式不变，会相比由每名工人不时从事各种不同工作，需要更多资本。因此，若我们比较同一国不同时期的国情，发现其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显然后代多于前代，即土地耕作情况提高，制造业更为庞大和繁荣，商业更为广泛，我们即可断定，该国的资本在这两个时代之间必然有所增加。资本增加，说明部分人节俭与妥当所积累的资本必然多于另一部分人妄为和政府浪费所消耗的资本。我们会发现此情此景存在于几乎所有国家，在颇为平静而和平的年代，即使政府并不慎重、节俭，同样如此。的确，为了资本变化形成正确的判断，我们应比较该国两个距离较远的时期。进步常常需要逐渐达成，比较过近的时代，不仅进步表现得不明显，而且有时，即使国家大体上颇为繁荣，但因该国某种产业或某一地区的衰落，我们仍会常常怀疑，全国的财富与产业是否都

在退步。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England, for example, is certainly much greater than it was a little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at the restoration of Charles II. Though at present few people, I believe, doubt of this, yet during this period five years have seldom passed away, in which some book or pamphlet has not been published, written, too, with such abilities as to gain some authority with the public, and pretending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 was fast declining; that the country was depopulated, agriculture neglected, manufactures decaying, and trade undone. Nor have these publications been all party pamphlets, the wretched offspring of falsehood and venality. Many of them have been written by very candid and very intelligent people, who wrote nothing but what they believed, and for no other reason but because they believed it.

例如，相比一个世纪前查理二世复辟时，现在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无疑大大增多。我认为，即使目前怀疑英国年生产物是否增加的人不多，但在这一期间内，几乎不到5年，就会出现并未出版但能使公众信服的书或小册子，装作论证英格兰的国民财富锐减、人口减少，农业遭否、工业退步、商业不景气。这类刊物并不全是党派的手册，不全是谎言和腐败的恶劣产物。其中有许多是极公正、极聪明的作者所作，他们只写自己相信的事，也正因他们相信，才写出来。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England, again, was certainly much greater at the Restoration than we can suppose it to have been about a hundred years before, at the accession of

Elizabeth. At this period, too, we have all reason to believe, the country was much more advanced in improvement, than it had been about a century before,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dissensions between the houses of York and Lancaster. Even then it was, probably, in a better condition than it had been at the Norman conquest: and at the Norman conquest, than during the confusion of the Saxon heptarchy. Even at this early period, it was certainly a more improved country than at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when its inhabitants were nearly in the same state with the savages in North America.

同样，同更早100年前伊丽莎白即位时比较，我们推断查理二世复辟时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同样无疑大大增多。我们大有理由相信，同更早一个世纪前约克与兰克斯特王室之争时代末期比较，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年生产物亦大大增多，情况甚至可能好于诺曼征服时代，撒克逊七国时代局面混乱，诺曼征服时代又好于该时代。甚至，撒克逊七国时代这一较早时期，相比朱利乌斯·凯撒侵略时代，国情又有所改善。在凯撒侵略时代，居民境况无异于北美野蛮人。

In each of those periods, however, there was not only much private and public profusion, many expensive and unnecessary wars, great perversion of the annual produce from maintaining productive to maintain unproductive hands; but sometimes, in the confusion of civil discord, such absolute waste and destruction of stock, as might be supposed, not only to retard, as it certainly did, the natural accumulation of riches, but to have left the country,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poorer than at the beginning. Thus, in the happiest and most fortunate period of them all, that which has passed since the Restoration, how many disorders and misfortunes

have occurred, which, could they have been foreseen, not only the impoverishment, but the total ruin of the country would have been expected from them? The fire and the plague of London, the two Dutch wars, the disorders of the revolution, the war in Ireland, the four expensive French wars of 1688, 1701, 1742, and 1756, together with the two rebellions of 1715 and 1745. In the course of the four French wars, the nation has contracted more than £145,000,000 of debt, over and above all the other extraordinary annual expence which they occasioned; so that the whole cannot be computed at less than £200,000,000. So great a shar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has, since the Revolution, been employed upon different occasions, in maintaining an extraordinary number of unproductive hands. But had not those wars given this particular direction to so large a capital, the greater part of it would naturally have been employed in maintaining productive hands, whose labour would have replaced, with a profit, the whole value of their consumption. Th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would have been considerably increased by it every year, and every years increase would have augmented still more that of the following year. More houses would have been built, more lands would have been improved, and those which had been improved before would have been better cultivated; more manufactures would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those 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before would have been more extended; and to what height the real wealth and revenue of the country might by this time have been raised, it is not perhaps very easy even to imagine.

然而在上述每一时期，不仅私人及公众都有所浪费，许多不必要的战争同样消耗巨大；许多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年生产物遭到挪用，反而维持非生产者。但有时，民事纷争产生混乱，造成巨大浪

费，资本遭到破坏。可能有人认为，事实亦是如此，这样的混乱不仅会阻碍财富的自然蓄累，还会在该时期的后期将国家置于比初期更贫困的境地。因此，查理二世复辟后的时期境况最佳、最富裕。但此时又发生了多少混乱与不幸？若能够预见，即可知国家不仅仅会陷入贫困，更可能陷入坍塌的境地——伦敦火灾与瘟疫、两次英荷战争、革命之乱、爱尔兰战争，以及1688年、1701年、1742年和1756年四次耗费巨大的英法战争，再加上1715年和1745年的两次叛乱。四次英法战争期间，英国负债至少1亿4500万英镑，再加上战争所导致的全部额外的年消耗，共计至少2亿镑。自革命以来，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维持人数众多的非生产者。倘若战争未曾带来如此巨大的资金消耗，则自然会有一大部分用于雇用生产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会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并产生利润，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价值必将逐年大大增加，每一年的增加也会促进次年的增加；国家将建造更多房屋，进一步耕作此前已改良的土地，进一步建设制造业，并扩大现存制造业；而或许，国家真实财富与收入将提升至何种高度则难以想象。

But though the profusion of government must undoubtedly have retarded the natural progress of England towards wealth and improvement,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stop it.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is undoubtedly much greater at present than it was either at the Restoration or at the Revolution. The capital, therefore, annually employed in cultivating this land, and in maintaining this labour, must likewise be much greater.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exactions of government, this capital has been silently and gradually accumulated by the private frugality and good conduct of individuals, by their universal, continual, and uninterrupted effort to better their own condition. It is this effort, protected by law, and allowed by liberty to exert itself in the manner that is most advantageous, which has maintained the progress of England towards opulence and improvement in almost

all former times, and which, it is to be hoped, will do so in all future times. England, however, as it has never been blessed with a very parsimonious government, so parsimony has at no time been the characteristic virtue of its inhabitants. It is the highest impertinence and presumption, therefore, in kings and ministers to pretend to watch over the economy of private people, and to restrain their expence, either by sumptuary laws, or by prohibiting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luxuries. They are themselves always, and without any exception, the greatest spendthrifts in the society. Let them look well after their own expence, and they may safely trust private people with theirs. If their own extravagance does not ruin the state, that of the subject never will.

无疑，英格兰财富与进步的自然发展进程遭到了政府浪费的阻碍，但这并不能终止其发展进程。无论同复辟时代还是革命时代相比，当今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无疑大大增多，且每年用以耕作土地、维持劳动的资本，同样大大增多。虽然其中有政府的强征，资本仍因个人节俭与妥当而悄然逐渐积累，他们一致地、持续地、坚定地努力改善自身境况。他们的努力受法律保护，自由使其可以以最有利的方式发挥。这样的努力，维持了英格兰在几乎全部过去时代向富有与进步发展的自然进程，而且未来任何时候同样有望继续。然而，英格兰从未有幸拥有非常节俭的政府，所以节俭亦从未成为其居民的天性。因此，英格兰历代国王和大臣佯作监视私人经济、限制其消费，而颁布禁令、禁止进口外国奢侈品，极为失当与放肆，本身就始终是社会中最挥霍无度的人，无一例外。他们理应关注自己的花费，完全可以信任人民自主消费。倘若他们的奢侈都不会毁掉国家，臣民的消费则更不会。

As frugality increases, and prodigality diminishes, the public capital, so the conduct of those whose expence just equals their

revenue, without either accumulating or encroaching, neither increases nor diminishes it. Some modes of expence, however, seem to contribute more to the growth of public opulence than others.

公共资本，节俭使其增加，奢侈使其减少，那些收入相当于花费者的行为，不积累、不消耗资本，则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公共资本。然而，似乎有一些花费方式比其他方式更加促进国富的增长。

The revenue of an individual may be spent, either in things which are consumed immediately, and in which one day's expence can neither alleviate nor support that of another; or it may be spent in things mere durable, which can therefore be accumulated, and in which every day's expence may, as he chooses, either alleviate, or support and heighten, the effect of that of the following day. A man of fortune, for example, may either spend his revenue in a profuse and sumptuous table, and in maintaining a great number of menial servants, and a multitude of dogs and horses; or, contenting himself with a frugal table, and few attendants, he may lay out the greater part of it in adorning his house or his country villa, in useful or ornamental buildings, in useful or ornamental furniture, in collecting books, statues, pictures; or in things more frivolous, jewels, baubles, ingenious trinkets of different kinds; or, what is most trifling of all, in amassing a great wardrobe of fine clothes, like the favourite and minister of a great prince who died a few years ago. Were two men of equal fortune to spend their revenue, the one chiefly in the one way, the other in the other,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person whose expence had been chiefly in durable commodities, would be continually increasing, every day's expence contributing something to support and heighten the effect of that of the following day; that of the other, on the contrary,

would be no greater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than at the beginning. The former too would,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be the richer man of the two. He would have a stock of goods of some kind or other, which, though it might not be worth all that it cost, would always be worth something. No trace or vestige of the expence of the latter would remain, and the effects of ten or twenty years' profusion would be as completely annihilated as if they had never existed.

个人的收入可能用于购买直接消费的物品或仅购买耐久品。对前者的每日消费无法减轻或支持他日的消费；后者则可日益积累，人们可以选择，使每日消费减轻或支持、增强来日消费的效果。例如，富人可能将收入花费于购置豪华奢侈的桌子、雇用大量家仆、大量饲养犬马；亦可能满足于简朴的桌子、少量随从，但可能花费更多资金装饰房屋或乡间别墅，兴建实用或装饰性建筑、家具，收藏书籍、雕塑和画作；或置办更乏意义之物，如珠宝、小玩物和各类精巧饰品；或者，即最微不足道的部分，积压一大柜子的盛装——这些衣服就像逝世数年之君主的宠臣。若两位财力相当的富人同时花费收入，其中一位主要用于第一种用途，另一位用于第二种用途，则主要购买耐久品的那位富人，生活会愈发富丽堂皇，其每日消费促使来日消费的效果得到支持与加强；而另一位则相反，其消费后期与初期生活无法改善。最终，前者将更为富有，会持有某类或他类物品的存货，即便这些货物的价值未必大于购买所耗，但永远仍有一定的价值。而后者的消费则毫无痕迹与剩余，奢侈10年、20年最终的结果只会完全一无所剩，仿佛这些物品从未存在一般。

As the one mode of expence is more favourable than the other to the opulence of an individual, so is it likewise to that of a nation. The houses, the furniture, the clothing of the rich, in a little time, become useful to the inferior and middling ranks of people. They are able to purchase them when their superiors grow weary of

them; and the general accommodation of the whole people is thus gradually improved, when this mode of expence becomes universal among men of fortune. In countries which have long been rich, you will frequently find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in possession both of houses and furniture perfectly good and entire, but of which neither the one could have been built, nor the other have been made for their use. What was formerly a seat of the family of Seymour, is now an inn upon the Bath road. The marriage-bed of James I. of Great Britain, which his queen brought with her from Denmark, as a present fit for a sovereign to make to a sovereign, was, a few years ago, the ornament of an alehouse at Dunfermline. In some ancient cities, which either have been long stationary, or have gone somewhat to decay, you will sometimes scarce find a single house which could have been built for its present inhabitants. If you go into those houses, too, you will frequently find many excellent, though antiquated pieces of furniture, which are still very fit for use, and which could as little have been made for them. Noble palaces, magnificent villas, great collections of books, statues, pictures, and other curiosities, are frequently both an ornament and an honour, not only to the neighbourhood, but to the whole country to which they belong. Versailles is an ornament and an honour to France, Stowe and Wilton to England. Italy still continues to command some sort of veneration, by the number of monuments of this kind which it possesses, though the wealth which produced them has decayed, and though the genius which planned them seems to be extinguished, perhaps from not having the same employment.

第一种消费方式较另一种更有利于个人富裕，同样，对一国之财富亦是如此。富人的房屋、家具和衣服，即刻即可有助于下等、中等人民。中、下等人民可以购买上层阶级厌烦了的物品，若富人普遍采

取这样的消费方式，则全体人民的普遍生活就将因此逐渐改善。在已长期富裕久的国家，虽然下等人民不能独立建造房屋，房屋亦不为他们所建，但常常会看到他们拥有精美完整的房子和家具。现位于巴斯路的客栈曾经是西摩的一处府邸，詹姆士一世的皇后从丹麦带来的婚床是两国联姻的礼物，几年前，已经陈列在邓弗姆林的酒店。一些古城，有些长期留存，有些多少经历了衰退，有时可在这些地方发现，很少有房屋是现住居民有能力建造的。走进这些房屋，还常可发现许多古老而精美的家具，仍然可以使用，同样不是为这些居民打造的。贵族宫殿、奢华别墅和书籍、雕像、画作收藏以及其他奇珍异宝，常常既是一种装饰，又是一种荣耀，这种荣耀不仅在于邻里之间，更在于他们所属的整个国家。凡尔赛宫是法兰西的装饰和荣耀，斯托和威尔顿对于英格兰亦是如此。意大利仍赢得各种尊敬，因其拥有大量此类遗迹，即使创造它们的财富难及往日、规划它们的天才似乎不再出现，可能是因为天才已没有同样的用武之地了吧。

The expence, too, which is laid out in durable commodities, is favourable not only to accumulation, but to frugality. If a person should at any time exceed in it, he can easily reform without exposing himself to the censure of the public. To reduce very much the number of his servants, to reform his table from great profusion to great frugality, to lay down his equipage after he has once set it up, are changes which cannot escape the observation of his neighbours, and which are supposed to imply some acknowledgment of preceding bad conduct. Few, therefore, of those who have once been so unfortunate as to launch out too far into this sort of expence, have afterwards the courage to reform, till ruin and bankruptcy oblige them. But if a person has, at any time, been at too great an expence in building, in furniture, in books, or pictures, no imprudence can be inferred from his changing his conduct. These are things in which further expence is frequently rendered unnecessary by former expence; and when a person stops

short, he appears to do so, not because he has exceeded his fortune, but because he has satisfied his fancy.

消费于耐久品不仅更有利于蓄积，还有利于节俭。若某人购买耐久品而花费过多，他也可以轻易改变，无需将自己暴露于世人的指责之下。若大幅减少仆从，将陈列改奢华为简朴，放弃曾经购置的用品，则定会被邻居察觉，认为此举即承认自己之前存在不当。因此，曾经在此方面花费过大的人，很少有勇气改变，直到迫于破产压力。而若某人曾经大量花费于建造房屋、购置家具、收藏书籍或画作，他改变消费方式就不会受到草率的质疑。这类物品因此前已经有所花费，后续消费通常因此而不必要；此人不再消费，看起来并非因为财力不济，而是爱好已经得到满足。

The expence, besides, that is laid out in durable commodities, gives maintenance, commonly, to a greater number of people than that which is employed in the most profuse hospitality. Of two or three hundred weight of provisions, which may sometimes be served up at a great festival, one half, perhaps, is thrown to the dunghill, and there is always a great deal wasted and abused. But if the expence of this entertainment had been employed in setting to work masons, carpenters, upholsterers, mechanics, etc. a quantity of provisions of equal value would have been distributed among a still greater number of people, who would have bought them in pennyworths and pound weights, and not have lost or thrown away a single ounce of them. In the one way, besides, this expence maintains productive, in the other unproductive hands. In the one way, therefore, it increases, in the other it does not increase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此外，相比用于慷慨款待的消费，耐久品的消费通常可供养更多人。有时供庆祝重大节日之用的两三百斤的食物，也许一半都倒入了粪堆，常常造成巨量浪费、滥用。用于欢庆却如此浪费，倘若用于雇用石匠、木匠、装潢工、工匠等，价值相当的大量事物便可分配予更多人，人们将以便士和英镑这样的金额逐渐购买食物，因此一盘司的食物都不会被浪费丢弃。此外，一方面，此类消费可维持生产性劳动者，提高国家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则维持非生产者，是以无法提高国家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的交换价值。

I would not, however, by all this, be understood to mean, that the one species of expence always betokens a more liberal or generous spirit than the other. When a man of fortune spends his revenue chiefly in hospitality, he shares the greater part of it with his friends and companions; but when he employs it in purchasing such durable commodities, he often spends the whole upon his own person, and gives nothing to any body without an equivalent. The latter species of expence, therefore, especially when directed towards frivolous objects, the little ornaments of dress and furniture, jewels, trinkets, gew-gaws, frequently indicates, not only a trifling, but a base and selfish disposition. All that I mean is, that the one sort of expence, as it always occasions some accumulation of valuable commodities, as it is more favourable to private frugality, and, consequently, to the increase of the public capital, and as it maintains productive rather than unproductive hands, conduces more than the other to the growth of public opulence.

然而，我并非认为一种消费方式永远都比另一种更能体现自由慷慨的精神，请勿如此理解。若一位富人主要将收入用于款待，就是将大部分收入同朋友和同伴分享；但若购买耐久品，则只是惠及自身，绝不平等地分享予他人。因此，后一种消费方式，尤其是购买衣物饰

品、家具、珠宝、小饰品、华而不实之物等意义甚小的物件，常常不仅会体现一个人的轻浮，还会暴露他卑鄙、自私的性格。我只是认为，由于可以促进有价值商品的积累，消费于耐久品有利于私人的节俭，并由此促进公共资本的增加。由于维持生产者，不维持非生产者，此种方式较另一种方式更有利于国富的增长。

Chapter IV. Of Stock Lent at Interest

第四章、论有息借贷的资本与财产

The stock which is lent at interest is always considered as a capital by the lender. He expects that in due time it is to be restored to him, and that, in the mean time, the borrower is to pay him a certain annual rent for the use of it. The borrower may use it either as a capital, or as a stock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If he uses it as a capital, he employs it in the maintenance of productive labourers, who reproduce the value, with a profit. He can, in this case, both restore the capital, and pay the interest, without alienating or encroaching upon any other source of revenue. If he uses it as a stock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he acts the part of a prodigal, and dissipates, i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idle, what was destined for the support of the industrious. He can, in this case, neither restore the capital nor pay the interest, without either alienating or encroaching upon some other source of revenue, such as the property or the rent of land.

借出方常常将有息借贷的资本与财产视为一种资本，希望到期时及时收回，借出期间，借入方因借用资本，需支付一定数额的年租金。借入方可将其作为资本或供直接消费的财产而使用。若用作资本，即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再生产价值，产生利润。这种

情况下，借入方既要归还资本，又要支付利息，同时不转让或减损任何其他的收入来源。若用作直接消费的财产，借入方就会有所浪费，将本该用于维系勤劳的资金转向滋生怠惰。此时，若仍不转让或减损地产或地租等其他的收入来源，他就无法归还资本并支付利息。

The stock which is lent at interest is, no doubt, occasionally employed in both these ways, but in the former much more frequently than in the latter. The man who borrows in order to spend will soon be ruined, and he who lends to him will generally have occasion to repent of his folly. To borrow or to lend for such a purpose, therefore, is, in all cases, where gross usury is out of the question,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 of both parties; and though it no doubt happens sometimes, that people do both the one and the other, yet, from the regard that all men have for their own interest, we may be assured, that it cannot happen so very frequently as we are sometimes apt to imagine. Ask any rich man of common prudence, to which of the two sorts of people he has lent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stock, to those who he thinks will employ it profitably, or to those who will spend it idly, and he will laugh at you for proposing the question. Even among borrowers, therefore, not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most famous for frugality, the number of the frugal and industrious surpasses considerably that of the prodigal and idle.

无疑，有时，有息借贷的资本与财产同时以上述方式运用，只是用于前者更多，后者较少。为花费而借贷者将很快没落，他的债主通常将会为借钱而追悔莫及。因此，暂不谈恶劣的高利贷者，而以此目的借贷，在任何时候，都不符合双方利益。不可否认，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人们也都会有借贷双方的经历，但人都会为自己谋利，因此不妨确信，此情此景未必如我们通常想象地那般频繁。若问：将大部

分财产借给用于谋利的人，或借给懒散花费的人，选择哪种？但凡懂得基本节俭的富人，都会对此嗤之以鼻。因此，即便借入方不是世界闻名的节俭者，他们中的节俭者、勤劳者方也比奢侈者、怠惰者更占多数。

The only people to whom stock is commonly lent, without their being expected to make any very profitable use of it, are country gentlemen, who borrow upon mortgage. Even they scarce ever borrow merely to spend. What they borrow, one may say, is commonly spent before they borrow it. They have generally consumed so great a quantity of goods, advanced to them upon credit by shop-keepers and tradesmen, that they find it necessary to borrow at interest, in order to pay the debt. The capital borrowed replaces the capitals of those shop-keepers and tradesmen which the country gentlemen could not have replaced from the rents of their estates. It is not properly borrowed in order to be spent, but in order to replace a capital which had been spent before.

通常，只有乡绅借贷财产而不期创造利润，他们以抵押借贷，但并非只是为了消费。有人会说，他们所借的财产通常在未借之前就以消费掉了。整体来看，他们向店主赊账为数巨大，使其需要付利息还账。乡绅仅靠地租不足以归还店主的资本，因此借贷资本，以归还店主。这时他并非为消费而借贷，而是为了归还此前已消耗的资本。

Almost all loans at interest are made in money, either of paper, or of gold and silver; but what the borrower really wants, and what the lender readily supplies him with, is not the money, but the money's worth, or the goods which it can purchase. If he wants it as a stock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it is those goods only which he

can place in that stock. If he wants it as a capital for employing industry, it is from those goods only that the industrious can be furnished with the tools, materials, and maintenance necessary for carrying on their work. By means of the loan, the lender, as it were, assigns to the borrower his right to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to be employed as the borrower pleases.

几乎所有有利息的贷款都以货币进行，纸币或金银均可。但事实上借入方想要的，同时也是借出方所供给的，并不是货币，而是货币的价值，即货币能够购买的物品。若他希望货币成为供其直接消费的财产，财产便只包括购买的物品。若他希望借贷以雇用劳动者，劳动者劳动所必需的工具、材料与维护则只能从购买的物品中获得。如同以往，借出方通过贷款，将一部分国家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的使用权转让借款人，由后者任意使用。

The quantity of stock, therefore, or, as it is commonly expressed, of money, which can be lent at interest in any country, is not regulated by the value of the money, whether paper or coin, which serves as the instrument of the different loans made in that country, but by the value of that part of the annual produce, which, as soon as it comes either from the ground, or from the hands of the productive labourers, is destined, not only for replacing a capital, but such a capital as the owner does not care to be at the trouble of employing himself. As such capitals are commonly lent out and paid back in money, they constitute what is called the monied interest. It is distinct, not only from the landed, but from the trading and manufacturing interests, as in these last the owners themselves employ their own capitals. Even in the monied interest, however, the money is, as it were, but the deed of assignment, which conveys

from one hand to another those capitals which the owners do not care to employ themselves. Those capitals may be greater, in almost any proportion, than the amount of the money which serves as the instrument of their conveyance; the same pieces of money successively serving for many different loans, as well as for many different purchases. A, for example, lends to W £1000, with which W immediately purchases of B £1000 worth of goods. B having no occasion for the money himself, lends the identical pieces to X, with which X immediately purchases of C another £1000 worth of goods. C, in the same manner,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lends them to Y, who again purchases goods with them of D. In this manner, the same pieces, either of coin or of paper, may, in the course of a few days, serve as the Instrument of three different loans, and of three different purchases, each of which is, in value, equal to the whole amount of those pieces. What the three monied men, A, B, and C, assigned to the three borrowers, W, X, and Y, is the power of making those purchases. In this power consist both the value and the use of the loans. The stock lent by the three monied men is equal to the value of the goods which can be purchased with it, and is three time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money with which the purchases are made. Those loans, however, may be all perfectly well secured, the goods purchased by the different debtors being so employed as, in due time, to bring back, with a profit, an equal value either of coin or of paper. And as the same pieces of money can thus serve as the instrument of different loans to three, or, for the same reason, to thirty times their value, so they may likewise successively serve as the instrument of repayment.

因此，资本与财产的数量，或按通俗说法称之为存款，可在任何国家有息借贷，无论是纸币还是硬币，都是一国的借贷物，适用于各种借贷，不受货币价值所限，却受年生产物的部分价值所限。这部分

年生产物从土地中生长或由生产性劳动者制造后，就注定成为资本，但其拥有者不想因亲自运用资本而劳烦。由于这种资本通常以货币的形式借或还，就产生了金钱利益。商业与制造业者运用自己的资本，因此，这种金钱利益不仅不同于土地利益，还不同于商业与制造业利益。然而，即使就金钱利益而言，货币也只是一种转让契约，即从无意自己运用资本的拥有者手中将资本让予他人，这些资本比作为转让手段的货币多得多。同样的货币，可连续充当不同的贷款，亦可进行不同的购买。举个例子，甲借丁1,000镑，丁立即向乙购买价值1,000镑的物品。乙因自身对钱无甚用途，便将这笔钱借予戊，戊当即用这些钱向丙购买价值1000镑的物品。丙出于同样原因，以同样方式将钱借予己，己又向丁购买物品。如此一来，无论这些货币是硬币还是纸币，可以说在这短短几天内，就成为了三次不同借贷、不同买卖的手段，且每一次成交的价值都等于这些货币的总额。甲、乙和丙三位持钱者向丁、戊、己三位出借货币，其转让的是购买力。这种购买力包括物品价值，及对贷款的使用。三位持钱者借出的财产价值等同于它能够购买的物品价值，比实际购买所用货币的价值大3倍。然而，若不同借入方购买的物品能够在期限内发挥与贷款相当的价值，无论硬币还是纸币，并能够及时有利偿还，则贷款即可全部得到妥善保障。而且，由于这笔钱可作为不同贷款的手段，可相当于其价值的3倍，或出于同样原因，甚至可能相当于其价值的30倍，因此，同样可以紧接着用作偿还手段。

A capital lent at interest may, in this manner, be considered as an assignment, from the lender to the borrower, of a certain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e annual produce, upon condition that the burrower in return shall,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the loan, annually assign to the lender a small portion, called the interest; and, at the end of it, a portion equally considerable with that which had originally been assigned to him, called the repayment. Though money, either coin or paper, serves generally as the deed of assignment, both to the smaller and to the more considerable

portion, it is itself altogether different from what is assigned by it.

因此，人们认为有息借贷的资本由借出方借予借入方，转让一大部分的年生产物，以借入方有偿为条件，即在借贷期间，借入方每年向借出方支付一小部分年生产物，称为利息；借贷期结束时，借入方以与原转让物价值相当的部分交还借出方，称作偿还。虽然货币通常作为转让的契约，但无论硬币还是纸币，无论转让小部分还是大部分，它本身即不同于经由它转让之物。

In proportion as that share of the annual produce which, as soon as it comes either from the ground, or from the hands of the productive labourers, is destined for replacing a capital, increases in any country, what is called the monied interest naturally increases with it. The increase of those particular capitals from which the owners wish to derive a revenue, without being at the trouble of employing them themselves, naturally accompanies the general increase of capitals; or, in other words, as stock increases, the quantity of stock to be lent at interest grows gradually greater and greater.

若从土地中生长或由生产性劳动者制造后即指定偿还资本这部分年生产物增加，则在任何国家，所谓的金钱利益自然随之加重。资本拥有者希望利用资本获取收入，同时又不亲自运用而烦扰，若这部分特殊的资本增加，总资本亦会增加。或者说，总的资本与财产增加，有息借贷的资本与财产同样会逐渐越来越多。

As the quantity of stock to be lent at interest increases, the interest, or the price which must be paid for the use of that stock,

necessarily diminishes, not only from those general causes which make the market price of things commonly diminish as their quantity increases, but from other causes which are peculiar to this particular case. As capitals increase in any country, the profits which can be made by employing them necessarily diminish. It becomes gradually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find within the country a profitable method of employing any new capital. There arises, in consequence, a 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 capitals, the owner of one endeavouring to get possession of that employment which is occupied by another; but, upon most occasions, he can hope to justle that other out of this employment by no other means but by dealing upon more reasonable terms. He must not only sell what he deals in somewhat cheaper, but, in order to get it to sell, he must sometimes, too, buy it dearer. The demand for productive labour, by the increase of the funds which are destined for maintaining it, grows every day greater and greater. Labourers easily find employment; but the owners of capitals find it difficult to get labourers to employ. Their competition raises the wages of labour, and sinks the profits of stock. But when the profits which can be made by the use of a capital are in this manner diminished, as it were, at both ends, the price which can be paid for the use of it, that is, the rate of interest, must necessarily be diminished with them.

利息是使用资本与财产所需支付的代价，若有息借贷的资本与财产增加，利息则必然降低。许多普遍因素导致市场价格随物品数量增加而降低，利息降低不仅出于这些原因，还出于特殊情况的特殊原因。在任何国家，若资本增加，则运用资本可获取的利润必然减少。在国内，适合任何新资本的可盈利方法，越来越难找到，以此导致不同资本间出现了竞争，资本所有者不遗余力侵占对方的资本。但在多数情况下，只有通过将交易条款设定得更为合理，才能挤掉对手。他

不仅必须便宜出售，而且，为了顺利卖出，有时还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买入。随着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增加，对生产性劳动的需求同样会逐日扩大。劳动者找到雇用机会容易，但资本所有者却很难雇用到劳动者。劳动者报酬因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竞争而提高，资本与财产的利润同样因此降低。但是，若使用资本而获取的利润同样因此降低，可以说，对于双方来说，使用它须付的代价，即利息，同样必然会随之降低。

Mr Locke, Mr Lawe, and Mr Montesquieu, as well as many other writers, seem to have imagined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in consequence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panish West Indies, was the real cause of the lowering of the rate of interest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Those metals, they say, having become of less value themselves, the use of any particular portion of them necessarily became of less value too, and, consequently, the price which could be paid for it. This notion, which at first sight seems so plausible, has been so fully exposed by Mr Hume, that it is, perhaps, unnecessary to say any thing more about it. The following very short and plain argument, however, may serve to explain more distinctly the fallacy which seems to have misled those gentlemen.

许多作家，包括洛克先生、劳先生和孟德斯鸠先生，都曾以为，西属西印度群岛的发现使得金银增加，即欧洲大部分地区利息率低的真实原因。他们称，金银本身的价值降低，无论使用多少，该部分价值必然降低，导致购买它们的价格同样降低。该观点初看较为合理，但休谟先生充分揭露了这个观点，这里也许无需赘述。但接下来，会对此有简洁明了的讨论，可更明确地解释这一谬误如何误导了这几位先生。

Before the discovery of the Spanish West Indies, ten per cent. seems to have been the common rate of interest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It has since that tim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unk to six, five, four, and three per cent. Let us suppose, that in every particular country the value of silver has sunk precisely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that in those countries, for example, where interest has been reduced from ten to five per cent. the same quantity of silver can now purchase just half the quantity of goods which it could have purchased before. This supposition will not, I believe, be found anywhere agreeable to the truth; but it is the most favourable to the opinion which we are going to examine; and, even upon this supposition, it is utterly impossible that the lowering of the value of silver could have the smallest tendency to lower the rate of interest. If £100 are in those countries now of no more value than £50 were then, £10 must now be of no more value than £5 were then. Whatever were the causes which lowered the value of the capital, the same must necessarily have lowered that of the interest, and exactly in the same proportion.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value of the capital and that of the interest must have remained the same, though the rate had never been altered. By altering the rate, on the contrary,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ose two values is necessarily altered. If £100 now are worth no more than £50 were then, £5 now can be worth no more than £2:10s. were then. By reducing the rate of interest, therefore, from ten to five per cent. we give for the use of a capital,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equal to one half of its former value, an interest which is equal to one fourth only of the value of the former interest.

西属西印度群岛尚未发现时，欧洲大部分地区普遍的利息率约为10%。但就是从该群岛发现开始，各国普遍利息率降至6%、5%、4%，甚至3%。假设在任一国家，银的价值下降程度恰好与利息率的

下降程度相等，于是，在这些国家，如有地区利息率由10%下降至5%，那么此时在这些地区，相同的银只能购买相当于过去一半的物品。我认为该假设永远与事实不符，但它却极力佐证我们将要探究的这种观点。同时，即便从该假设出发，银价值的下降也绝无可能使利息率降低。若此时100镑的价值在这些国家最多仅相当于以往的50镑，10镑的价值就仅相当于5镑。无论削减资金价值的原因是什么，都必将以相同程度削减利息的价值。利息率从未变化，资金价值与利息价值之间的比例必然未变；相反，若利息率改变，二者之间的比例则必然变化。若100镑价值仅相当于以往50镑，则如今5镑价值仅相当于2镑10先令。因此，通过将利息率由10%降至5%，资本价值将相当于以往的一半，使用资本，其利息价值就仅相当于以往利息的1/4。

An increase in the quantity of silver, while that of the commodities circulated by means of it remained the same, could have no other effect than to diminish the value of that metal. The nominal value of all sorts of goods would be greater, but their real value would be precisely the same as before. They would be exchanged for a greater number of pieces of silver; but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they could comm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m they could maintain and employ, would be precisely the same.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would be the same, though a greater number of pieces might be requisite for conveying any equal portion of it from one hand to another. The deeds of assignment, like the conveyances of a verbose attorney, would be more cumbersome; but the thing assigned would be precisely the same as before, and could produce only the same effects. The funds for maintaining productive labour being the same, the demand for it would be the same. Its price or wages, therefore, though nominally greater, would really be the same. They would be paid in a greater number of pieces of silver, but they would purchase only the same quantity

of goods. The profits of stock would be the same, both nominally and really. The wages of labour are commonly computed by the quantity of silver which is paid to the labourer. When that is increased, therefore, his wages appear to be increased, though they may sometimes be no greater than before. But the profits of stock are not computed by the number of pieces of silver with which they are paid, but by the proportion which those pieces bear to the whole capital employed. Thus, in a particular country, 5s. a-week are said to be the common wages of labour, and ten per cent. the common profits of stock; but the whol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being the same as before,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capitals of individuals into which it was divided would likewise be the same. They would all trade with the sam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common propor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profit, therefore, would be the same, and consequently the common interest of money; what can commonly be given for the use of money being necessarily regulated by what can commonly be made by the use of it.

银量增加，但通过银流通的商品数保持不变，无非只会使银的价值降低，各类商品票面价值上涨，实际价值却丝毫未变。这些商品支配的劳动量、维持和雇用的劳动者人数丝毫未变，只是可交易更多的银；国家资本不变，只是将同等资本转让易手所需的银量会增加。转让契约变得更加冗长，就像啰嗦的律师一样，但所转让的物品却较以往丝毫未变，使用效果亦不曾改变；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未变，对劳动的需求亦不变。因此，劳动的价格，即劳动者的工资，虽然在账面上提高了，但实际上未曾改变。支付予他们的银量更多，但只能购买同等数量的商品。无论账面还是实际，资本与财产产生的利润同样不变。通常，劳动报酬以支付给劳动者的银量计算，因此，若支付的银量增加，则看起来报酬上涨了，但有时候，其所得未必比以往更多。但资本与财产产生的利润不以支付的银量计算，而是以支付的银

量与投入的总资本比例计算。如此，称某国家劳动的普遍报酬为周薪5先令，相当于资本与财产普遍利润的10%；但每个个人分享总资本，国内总资本不变，这些个人所持资本之间的对比关系则同样不变，交易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同样不变。因此，资本与利润的普遍比例仍将不变，使得货币的普遍利息同样不变；使用货币的通常能获得什么，必取决于使用货币通常能产生什么。

Any increase in the quantity of commodities annually circulated within the country, while that of the money which circulated them remained the same, would, on the contrary, produce many other important effects, besides that of raising the value of the money.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though it might nominally be the same, would really be augmented. It might continue to be expressed by the same quantity of money, but it would command a greater quantity of labour. The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which it could maintain and employ would be increased, and consequently the demand for that labour. Its wages would naturally rise with the demand, and yet might appear to sink. They might be paid with a smaller quantity of money, but that smaller quantity might purchase a greater quantity of goods than a greater had done before. The profits of stock would be diminished, both really and in appearance. The whol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being augmente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capitals of which it was composed would naturally be augmented along with it. The owners of those particular capitals would be obliged to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a smaller proportion of the produce of that labour which their respective capitals employed. The interest of money, keeping pace always with the profits of stock, might, in this manner, be greatly diminished, though the value of money, or the quantity of goods which any particular sum could purchase, was greatly augmented.

相反，若国内每年流通的货币量不变，流通的商品量增加，除货币价值将会提高外，还可产生许多其他重要影响。即国家资本账面上虽未改变，实际上却会增加。资本可能仍由等量的货币计算，却可支配更多劳动量。其维持和雇用的生产性劳动将会增加，使得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劳动报酬自然会随需求增加而上涨，即使表面上可能看起来是在下降。劳动者所得货币量可能更少，但此时更少的钱可能却可比以往购得更多物品。但无论实际上还是账面上，资本与财产的利润都会缩减。个人资本构成国家总资本，国内总资本增加，个人资本间的竞争必会加剧。这些个人资本的所有者各自运用资本，他们将被迫满足于更少的劳动产量。虽然货币价值或一定量的货币可购买的商品量大大增加，但由于货币的利息常常同步于资本的利润，其同样可能大大缩减。

In some countries the interest of money has been prohibited by law. But as something can everywhere be made by the use of money, something ought everywhere to be paid for the use of it. This regulation, instead of preventing, has been found from experience to increase the evil of usury. The debtor being obliged to pay, not only for the use of the money, but for the risk which his creditor runs by accepting a compensation for that use, he is obliged, if one may say so, to insure his creditor from the penalties of usury.

部分国家立法禁止货币产生利息，但鉴于资本无论在何地使用都会产生利润，所以任何地方都应当为资本的使用支付报酬。经验表明，此类规定不会遏止高利剥削的罪恶，而只会使其加剧。债务人必须支付报酬，不只因为对货币的使用，而且因为债权人借出资本所承担的风险，必须对其有所补偿，即债务人必须确保债权人不因高利剥削遭到惩罚而蒙受损失。

In countries where interest is permitted, the law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extortion of usury, generally fixes the highest rate which can be taken without incurring a penalty. This rate ought always to be somewhat above the lowest market price, or the price which is commonly paid for the use of money by those who can give the most undoubted security. If this legal rate should be fixed below the lowest market rate, the effects of this fixation must be nearly the same as those of a total prohibition of interest. The creditor will not lend his money for less than the use of it is worth, and the debtor must pay him for the risk which he runs by accepting the full value of that use. If it is fixed precisely at the lowest market price, it ruins, with honest people who respect the laws of their country, the credit of all those who cannot give the very best security, and obliges them to have recourse to exorbitant usurers. In a country such as Great Britain, where money is lent to government at three per cent. and to private people, upon good security, at four and four and a-half, the present legal rate, five per cent. is perhaps as proper as any.

允许货币产生利息的国家为防止高利敲诈，大多立法规定最高利息率，即在一定范围内可免受惩罚。通常，该利息率应多少高于最低市场利息水平，即能够提供最可靠担保者借用货币而付的利息。若设定该合法利息率低于最低市场利息率，则其结果无异于全面禁止利息。若债权人获得的报酬少于资金的使用价值，他不会借出这笔钱，债务人必须为债权人承担的风险支付报酬，接受货币使用的全部价值。若将该合法利息率恰好设定为最低市场利息率，鉴于有遵守国家法律的诚实者存在，无法提供可靠担保者的信用就会毁于一旦，被迫只得依靠高利贷者。在英国这样的国家，贷给政府的货币利息率为3%，贷给有可靠担保的个人，利息率为4%或4.5%，因此如今将合法利息率设定为5%，也许就是最合适的。

The legal rate, it is to be observed, though it ought to be somewhat above, ought not to be much above the lowest market rate. If the legal rate of interest in Great Britain, for example, was fixed so high as eight or ten per cen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oney which was to be lent, would be lent to prodigals and projectors, who alone would be willing to give this high interest. Sober people, who will give for the use of money no more than a part of what they are likely to make by the use of it, would not venture into the competition. A great part of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would thus be kept out of the hands which were most likely to make a profitable and advantageous use of it, and thrown into those which were most likely to waste and destroy it. Where the legal rate of interest, on the contrary, is fixed but a very little above the lowest market rate, sober people are universally preferred, as borrowers, to prodigals and projectors. The person who lends money gets nearly as much interest from the former as he dares to take from the latter, and his money is much safer in the hands of the one set of people than in those of the other. A great part of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is thus thrown into the hands in which it is most likely to be employed with advantage.

要知道，虽然合法利息率应略高于最低市场利息率，但不宜过高。例如，若大不列颠将法定利息率设定为8%或10%，则会有更多货币借予浪费者与投机者，只有这类人愿意支付如此高的利息。普通人通过使用货币获取利润，只能通过该利润的一部分支付报酬，因此不会冒险与其竞争。大部分的国家资本会远离诚实者，落到浪费者手里，而前者使用货币很可能产生利润，有利使用，后者则会浪费并毁掉它。相反，若合法利息率仅仅稍高于最低市场利息率一点点，则人们更倾向于借给诚实者，而非浪费者和投机者。因为借予二者所获的利息基本相当，借予前者，资金更为安全。大部分国家资本掌握在诚

实者手中，大多有利地使用。

No law can reduce the common rate of interest below the lowest ordinary market rate at the time when that law is made. Notwithstanding the edict of 1766, by which the French king attempted to reduce the rate of interest from five to four per cent. money continued to be lent in France at five per cent. the law being evaded in several different ways.

立法时，绝无可能将普通利息率设定得低于当时最低普通市场利息率。1766年，法国国王曾试图将利息率由5%降低至4%，但该法令因各种方式遭到逃避，国内货币借贷的利息率仍为5%。

The ordinary market price of land, it is to be observed, depends everywhere upon the ordinary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The person who has a capital from which he wishes to derive a revenue, without taking the trouble to employ it himself, deliberates whether he should buy land with it, or lend it out at interest. The superior security of land, together with some other advantages which almost everywhere attend upon this species of property, will generally dispose him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a smaller revenue from land, than what he might have by lending out his money at interest. These advantages are 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a certain difference of revenue; but they will compensate a certain difference only; and if the rent of land should fall short of the interest of money by a greater difference, nobody would buy land, which would soon reduce its ordinary price. On the contrary, if the advantages should much more than compensate the difference, everybody would buy land, which again would soon raise its ordinary price. When

interest was at ten per cent. land was commonly sold for ten or twelve years purchase. As interest sunk to six, five, and four per cent. the price of land rose to twenty, five-and-twenty, and thirty years purchase. The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is higher in France than in England, and the common price of land is lower. In England it commonly sells at thirty, in France at twenty years purchase.

要知道，无论何地，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都取决于普通市场利息率。持有资本但不想亲自烦劳而使用却想获取收入的人，会仔细权衡用该资本购买土地，还是有息借贷。土地是极为可靠的，无论何地，土地这种财产都还有很多其他的收益，因此虽然有息借贷可能收取更多，但这样的人仍大多愿意购买土地。这些额外收益足以补偿收入的差额，但补偿程度同样有限。若地租大大低于货币的利息，则无人愿意购买土地，土地的普通价格必将下跌。相反，若这些收益大大高于补偿差额所需，任何人都将购买土地，使土地普通价格上涨。若利息率为10%，土地出售年限常为10年或12年；若利息率降低为6%、5%甚至4%时，土地出售年限就会提高至20年、25年，甚至30年。法国的市场利息率高于英国，土地普通价格低于英格兰。英格兰土地出售年限通常为30年，而法国为20年。

Chapter V. Of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Capitals

第五章、论资本的不同用法

Though all capitals are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roductive labour only, yet the quantity of that labour which equal capitals are capable of putting into motion, varies extremely according to the diversity of their employment; as does likewise the value which that employment adds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虽然任何资本都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但投入同等资本的生产性劳动量随用途不同而极为不同；类似地，运用资本为国家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增加的价值亦不同。

A capital may be employed in four different ways; either, first, in procuring the rude produce annually required for the use and consumption of the society; or, secondly, in manufacturing and preparing that rude produce for immediate use and consumption; or, thirdly in transporting either the rude or manufactured produce from the places where they abound to those where they are wanted; or, lastly, in dividing particular portions of either into such small parcels as suit the occasional demands of those who want them. In the first way are employed the capitals of all those who undertake improvement or cultivation of lands, mines, or fisheries; in the second, those of all master manufacturers; in the third, those of all wholesale merchants; and in the fourth, those of all retailers. It is difficult to conceive that a capital should be employed in any way which may not be classed under some one or other of those four.

资本可有四种用法：第一，获取供社会每年使用和消费的原生产物；第二，制造原生产物，用于直接使用和消费；第三，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富余处运往需求之处；最后，将一定量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分配为较小的部分以供不时之需。第一种使用农业者、矿业家、渔业家的资本；第二种使用主要制造商的资本；第三种使用批发商人的资本；第四种使用零售商的资本。除这四种用法外，很难想到还有其他运用资本的方法，这四种涵盖了所有运用资本的方法。

Each of those four methods of employing a capital is essentially

necessary, either to the existence or extension of the other three, or to the general conveniency of the society.

这四种资本运用方法的任何一种都不可或缺，既与其他三种相互依存、相互延伸，又对全社会的便捷至关重要。

Unless a capital was employed in furnishing rude produce to a certain degree of abundance, neither manufactures nor trade of any kind could exist.

若非有资本得以运用，提供足够量的原生产物，否则制造业和商业都难以生存。

Unless a capital was employed in manufacturing that part of the rude produce which requires a good deal of preparation before it can be fit for use and consumption, it either would never be produced, because there could be no demand for it; or if it was produced spontaneously, it would be of no value in exchange, and could add nothing to the wealth of the society.

原生产物需要充分准备，才能适合使用或消费。若非有资本用于制造这部分原生产物，就失去了对它的需求，这种原生产物将永不生产；但若原生产物自然生长，就不具有交换价值，无法增加社会财富。

Unless a capital was employed in transporting either the rude

or manufactured produce from the places where it abounds to those where it is wanted, no more of either could be produced than was necessary for the consumption of the neighbourhood. The capital of the merchant exchanges the surplus produce of one place for that of another, and thus encourages the industry, and increases the enjoyments of both.

若非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富余处运往需求处，其生产量不会多于周边地区的必要消费量。商人的资本实现了两地剩余产品的交换，促进产业发展，使两地更能够各取所需。

Unless a capital was employed in breaking and dividing certain portions either of the rude or manufactured produce into such small parcels as suit the occasional demands of those who want them, every man would be obliged to purchase a greater quantity of the goods he wanted than his immediate occasions required. If there was no such trade as a butcher, for example, every man would be obliged to purchase a whole ox or a whole sheep at a time. This would generally be inconvenient to the rich, and much more so to the poor. If a poor workman was obliged to purchase a month's or six months' provisions at a time, a great part of the stock which he employs as a capital in the instruments of his trade, or in the furniture of his shop, and which yields him a revenue, he would be forced to place in that part of his stock which is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and which yields him no revenue. Nothing can be more convenient for such a person than to be able to purchase his subsistence from day to day, or even from hour to hour, as he wants it. He is thereby enabled to employ almost his whole stock as a capital. He is thus enabled to furnish work to a greater value; and the profit which he makes by it in this way much

more than compensates the additional price which the profit of the retailer imposes upon the goods. The prejudices of some political writers against shopkeepers and tradesmen are altogether without foundation. So far is it from being necessary either to tax them, or to restrict their numbers, that they can never be multiplied so as to hurt the public, though they may so as to hurt one another. The quantity of grocery goods, for example, which can be sold in a particular town, is limited by the demand of that town and its neighbourhood. The capital, therefore, which can be employed in the grocery trade, cannot exceed what is sufficient to purchase that quantity. If this capital is divided between two different grocers, their competition will tend to make both of them sell cheaper than if it were in the hands of one only; and if it were divided among twenty, their competition would be just so much the greater, and the chance of their combining together, in order to raise the price, just so much the less. Their competition might, perhaps, ruin some of themselves; but to take care of this, is the business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and it may safely be trusted to their discretion. It can never hurt either the consumer or the producer; on the contrary, it must tend to make the retailers both sell cheaper and buy dearer, than if the whole trade was monopolized by one or two persons. Some of them, perhaps, may sometimes decoy a weak customer to buy what he has no occasion for. This evil, however, is of too little importance to deserve the public attention, nor would it necessarily be prevented by restricting their numbers. It is not the multitude of alehouses, to give the must suspicious example, that occasions a general disposition to drunkenness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but that disposition, arising from other causes, necessarily gives employment to a multitude of alehouses.

若非有资本用于将一定量的原生产物和制造品分配为小部分，以

供需求者不时之需，则所有人都不得不比当前需求购买更多的商品。比方说，若没有屠夫经营生意，每人都只得一次性购买一头牛或一只羊。对富人来说，这往往甚为不便，对贫民则更为不便。贫穷的劳动者不得不一次性购买1或6个月的食物，将财产的很大一部分运用为资本，购买经营手段，或为其店铺供货，使其取得收入，但他不得不将收入纳入供当前消费的财产，这部分财产就无法再次产生收入。若有人在需要生活资料时，逐日购买，甚至按小时购买，那么此类人才是最便利的。如此，他即可把几乎全部财产运用为资本。由此他即可扩大投资的价值，如此所得的利润将不仅弥补零售商因取得利润而对货物价格的提升，甚至还有剩余。有些政治作家对老板或店主的偏见完全没有依据，虽然他们也许互有竞争，但由于需要对其征税及限定其数量，他们不可能发展到伤害公众的地步。例如，某称市及其周边地区对杂货的需求不高，销量有限，因此，用于杂货生意的资本不会超过该销量所值的金额。若该资本分与两方杂货商经营，则他们之间的竞争往往会使会使双方都降低售价，低于独营价格。若分与20位商人，则竞争会更为激烈，他们就不太可能联合起来抬高价格。竞争也许会使其中一些人破产，但这是他们自己经营生意应该关心的事，他们会慎重考虑，相信竞争。竞争永远既不会伤害消费者，又不会伤害生产商。相反，相比一或两人独自经营时，竞争往往会使零售商贵买而贱卖。零售商中也许会有部分人诱导不明就里的顾客购买不需要的商品，但是此种乱象尚不值得公众太关注，更没必要通过限制零售商数量去防止此类现象发生。有一例值得探讨，虽然酒馆为数众多，但大众的饮酒之风并非由此导致，而有其他原因；但正因此风盛行，才必然导致大量酒馆出现。

The persons whose capitals are employed in any of those four ways, are themselves productive labourers. Their labour, when properly directed, fixes and realizes itself in the subject or vendible commodity upon which it is bestowed, and generally adds to its price the value at least of their own maintenance and consumption. The profits of the farmer, of the manufacturer, of the merchant, and

retailer, are all drawn from the price of the goods which the two first produce, and the two last buy and sell. Equal capitals, however, employed in each of those four different ways, will immediately put into motion very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productive labour; and augment, too, in very different proportions, th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society to which they belong.

这四种方式的投资者自身就是生产性劳动者。劳动施加于劳动对象或可销售的商品，若正确引导他们的劳动，即可在此上固定并实现劳动价值，通常至少能够提高价格，不少于维持其自身生存和消费的价值。农场主、制造业者、批发商、零售商，前二者生产，后二者购买及出售，其利润都源于商品价格。但是四种用法的资本虽相当，运用资本直接实现的各类生产性劳动量却有很大差异，社会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价值的增长比例同样具有很大差异。

The capital of the retailer replaces, together with its profits, that of the merchant of whom he purchases goods, and thereby enables him to continue his business. The retailer himself is the only productive labourer whom it immediately employs. In his profit consists the whole value which its employment adds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society.

零售商向批发商购买货物，其资本补偿批发商资本，并提供利润，使后者能够继续经营。零售商本身就属于生产性劳动者，直接雇用自己。零售商的利润，包含了资本对社会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所增加的全部价值。

The capital of the wholesale merchant replaces, together with their profits, the capital's of the farmers and manufacturers of whom he purchases the rude and manufactured produce which he deals in, and thereby enables them to continue their respective trades. It is by this service chiefly that he contributes indirectly to support the productive labour of the society, and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 its annual produce. His capital employs, too, the sailors and carriers who transport his good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and it augments the price of those goods by the value, not only of his profits, but of their wages. This is all the productive labour which it immediately puts into motion, and all the value which it immediately adds to the annual produce. Its operation in both these respects is a good deal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capital of the retailer.

批发商向农场主购买原生产物、向制造业者购买制造品，所用的资本补偿农场主和制造业者的资本，并提供利润，使其能够各自继续经营。主要通过这种活动，批发商间接维持了社会的生产性劳动，增加了社会年生产物价值。批发商的资本同样雇用了水手及搬运工，将其货物由一地运往他地。因此资本对货物价格的增加，不仅包括批发商自身利润的价值，还包括水手及搬运工报酬的价值。这些就是资本直接实现的全部生产性劳动、对年生产物价值的全部增加。但在每个方面，批发商资本的运作相比零售商资本，都具有更大作用。

Part of the capital of the master manufacturer is employed as a fixed capital in the instruments of his trade, and replaces, together with its profits, that of some other artificer of whom he purchases them. Part of his circulating capital is employed in purchasing materials, and replaces, with their profits, the capitals of the farmers and miners of whom he purchases them. But a great part of it is always, either annually, or in a much shorter period,

distributed among the different workmen whom he employs. It augments the value of those materials by their wages, and by their masters' profits upon the whole stock of wages, materials, and instruments of trade employed in the business. It puts immediately into motion, therefore,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and adds a much greater value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society, than an equal capital in the hands of any wholesale merchant.

在制造业者的资本中，有一部分用作固定资本，投资于经营手段，补偿其他制造者的资本，向其购买，并提供利润。另一部分则是流动资本，用以购买材料，补偿农场主和矿商资本，向其购买，并提供利润。但其中的大部分，分配给所雇用的工人，一年一次，或周期更短。因此，资本使材料价值增加，包括雇佣工人的报酬，以及雇主在全部报酬、材料和经营手段中所需要收取的利润。因此，相比批发商所持的等量资本，制造业者的资本能够直接实现更大的生产性劳动量，同样，对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增加了更多的价值。

No equal capital puts into motion a greater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than that of the farmer. Not only his labouring servants, but his labouring cattle, are productive labourers. In agriculture, too, Nature labours along with man; and though her labour costs no expence, its produce has its value, as well as that of the most expensive workmen. The most important operations of agriculture seem intended, not so much to increase, though they do that too, as to direct the fertility of Nature towards the production of the plants most profitable to man. A field overgrown with briars and brambles, may frequently produce as great a quantity of vegetables as the best cultivated vineyard or corn field. Planting and tillage frequently regulate more than they animate the active

fertility of Nature; and after all their labour, a great part of the work always remains to be done by her. The labourers and labouring cattle, therefore,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not only occasion, like the workmen in manufactures, the reproduction of a value equal to their own consumption, or to the capital which employs them, together with its owner's profits, but of a much greater value. Over and above the capital of the farmer, and all its profits, they regularly occasion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This rent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produce of those powers of Nature, the use of which the landlord lends to the farmer. It is greater or smaller, according to the supposed extent of those powers, or, in other words, according to the supposed natural or improved fertility of the land. It is the work of Nature which remains, after deducting or compensating every thing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the work of man. It is seldom less than a fourth, and frequently more than a third, of the whole produce. No equal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employed in manufactures, can ever occasion so great reproduction. In them Nature does nothing; man does all; and the reproduction must always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strength of the agents that occasion it.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therefore, not only puts into motion a greater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than any equal capital employed in manufactures; but in proportion, too, to the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which it employs, it adds a much greater value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to the real wealth and revenue of its inhabitants. Of all the ways in which a capital can be employed, it is by far the most advantageous to society.

等量资本，无任何一种能够比农场主资本可实现更多的生产性劳动。不仅他的工人，就连牲畜也是生产性劳动者。在农业中，大自然与人一起劳动；自然的劳动虽没有成本，但却和最昂贵的工人一样，

其生产物有价值。虽然农业经营最重要的部分的确提高了自然的生产力，但相比提高自然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将自然生产力加以引导，使其生产利润最高的作物。满布荆棘的耕地通常可与最佳耕作的葡萄园或麦田生产同样多的作物。相比激发自然活跃的生产力，耕作活动与耕地更多地支配自然生产力，除劳动外，有大量工作须靠自然完成。因此，雇用于农业的工人与牲畜，不仅同制造业工人一样，实现了自身所消费价值的再生产，或再生产雇用他们的资本，并为雇主创造利润，创造了更大价值。除农场主资本及利润外，工人与牲畜通常还要再生产地主收取的地租。可称该地租为自然力的产物，由地主借予农业者使用。地租或大或小，都取决于自然力的估计范围，或称取决于估计的土地自然生产力或所提高生产力。扣除或抵消人类的全部劳动，便只剩自然的结果。自然的结果在全部生产物中通常多于1/3，几乎从不少于1/4。规模如此之大的再生产在各类制造业中永远难以以等量的生产性劳动实现。在制造业中，自然不起作用，全部由人进行；再生产的规模一定由实现再生产的生产人员力量而定。因此，同用于制造业的等量资本相比，用于农业的资本不仅能够实现更大的生产性劳动量，且与其雇用的生产性劳动成比例，对国家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价值以及该国居民真实财富与收入都大大增加。如今，在各种资本用法中，用于农业对社会最为有利。

The capitals employed in the agriculture and in the retail trade of any society, must always reside within that society. Their employment is confined almost to a precise spot, to the farm, and to the shop of the retailer. They must generally, too, though there are some exceptions to this, belong to resident members of the society.

任何社会，用于农业和零售交易的资本定会留在该社会范围之内。使用它们会限制在特定地点，如农场、零售商店。同时，它们通常属于该社会范围内的居民，但不排除例外。

The capital of a wholesale merchant, on the contrary, seems to have no fixed or necessary residence anywhere, but may wander about from place to place, according as it can either buy cheap or sell dear.

相反，批发商人的资本却似乎不固定或一定限于某地，鉴于他们可以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其资本就可能在各地间流通。

The capital of the manufacturer must, no doubt, reside where the manufacture is carried on; but where this shall be, is not always necessarily determined. It may frequently be at a great distance, both from the place where the materials grow, and from that where the complete manufacture is consumed. Lyons is very distant, both from the places which afford the materials of its manufactures, and from those which consume them. The people of fashion in Sicily are clothed in silks made in other countries, from the materials which their own produces. Part of the wool of Spain is manufactured in Great Britain, and some part of that cloth is afterwards sent back to Spain.

无疑，制造业者的资本须固定在制造场所，但不必总是固定其位置。很多时候，该场所不仅远离材料产地，还远离成品消费地。里昂制造业材料的供应地距离很远，离产品消费地同样很远。西西里岛的时尚人群穿着他国制造的丝绸，其原材料却由西西里本地生产。部分西班牙羊毛运往英国制造，但制成后有部分运回西班牙。

Whether the merchant whose capital exports the surplus produce of any society, be a native or a foreigner, is of very little

importance. If he is a foreigner, the number of their productive labourers is necessarily less than if he had been a native, by one man only; and the value of their annual produce, by the profits of that one man. The sailors or carriers whom he employs, may still belong indifferently either to his country, or to their country, or to some third country, in the same manner as if he had been a native. The capital of a foreigner gives a value to their surplus produce equally with that of a native, by exchanging it for something for which there is a demand at home. It as effectually replaces the capital of the person who produces that surplus, and as effectually enables him to continue his business, the service by which the capital of a wholesale merchant chiefly contributes to support the productive labour, and to augment th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society to which he belongs.

无论资本源于本国还是外国商人，都无妨于投资任何国家的剩余生产物出口。若是外国商人，雇佣的生产性劳动者必然比若他是本国商人要少，但只少一人；年生产物价值也必然更少，但只少一个人的利润。无论该商人是否本国人，无妨与他是否雇用本国的水手和搬运工，本国商人亦可雇用外国水手和搬运工。通过交换剩余生产物与国内所需之物，外国商人的资本赋予剩余生产物的价值等同于本国资本赋予的价值。资本有效地偿还了剩余生产物生产者的资本，使他继续经营，因经营而产生服务，此即批发商人资本的主要贡献，维持生产性劳动，增加该国年生产物价值。

It is of more consequence that the capital of the manufacturer should reside within the country. It necessarily puts into motion a greater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and adds a greater value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society. It may, however, be very useful to the country, though it should not reside

within it. The capitals of the British manufacturers who work up the flax and hemp annually imported from the coasts of the Baltic, are surely very useful to the countries which produce them. Those materials are a part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ose countries, which, unless it was annually exchanged for something which is in demand here, would be of no value, and would soon cease to be produced. The merchants who export it, replace the capitals of the people who produce it, and thereby encourage them to continue the production; and the British manufacturers replace the capitals of those merchants.

更重要的是，制造业者的资本应该保留于国，如此便可产生更多的生产性劳动，以及增加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价值。但是，境外制造业者资本同样有利于国内。英国的制造者每年从波罗的海沿岸进口亚麻，所投入的资本即有利于生产国。这些原材料是生产国的部分剩余生产物，除非每年交换所需货物，否则便失去价值而随即停产。出口商补偿生产者资本，以此促使他们继续生产，英国的制造者则补偿了出口商资本。

A particular country, in the same manner as a particular person, may frequently not have capital sufficient both to improve and cultivate all its lands, to manufacture and prepare their whole rude produce for immediate use and consumption, and to transport the surplus part either of the rude or manufactured produce to those distant markets, where it can be exchanged for something for which there is a demand at home. The inhabitants of many different parts of Great Britain have not capital sufficient to improve and cultivate all their lands. The wool of the southern counties of Scotland is, a great part of it, after a long land carriage through very bad roads, manufactured in Yorkshire, for want of a capital to

manufacture it at home. There are many little manufacturing towns in Great Britain, of which the inhabitants have not capital sufficient to transport the produce of their own industry to those distant markets where there is demand and consumption for it. If there are any merchants among them, they are, properly, only the agents of wealthier merchants who reside in some of the great commercial cities.

某个国家，如同某人一般，可能常常面临资本不充足，无法改良、耕种土地，亦无法使全部原生产物得以加工，以供直接消费或使用，无法将剩余的原生产物及制造品运往远处市场，交换本国所需之物。大不列颠许多不同地区的居民就缺乏足够资本，无法改良和耕种他们全部的土地。苏格兰南部占其中一大部分，因资本不足，羊毛无法在当地加工，只得从该地陆运，运往约克郡加工，途中路况很差。英国有许多小工业城市，其人民没有足够资本把产品运到需要它们的远方市场去销售。他们中，纵使有个把商人，亦只好说是大富商的经理人。这种大富商，往往住在比较大的商业城市里。

When the capital of any country is not sufficient for all those three purposes, in proportion as a greater share of it is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the greater will be the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which it puts into motion within the country; as will likewise be the value which its employment adds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society. After agriculture,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manufactures puts into motion the greatest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and adds the greatest value to the annual produce. That which is employed in the trade of exportation has the least effect of any of the three.

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若不足以满足全部这三种用途，则用于农业上的部分越大，产生的国内生产性劳动就越多，同样地，就使社会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增加更多价值。最能够产生生产性劳动和年生产物价值的，用于制造业的资本仅次于用于农业的资本，而用于出口贸易的资本，在以上三者中收效最小。

The country, indeed, which has not capital sufficient for all those three purposes, has not arrived at that degree of opulence for which it seems naturally destined. To attempt, however, prematurely, and with an insufficient capital, to do all the three, is certainly not the shortest way for a society, no more than it would be for an individual, to acquire a sufficient one. The capital of all the individuals of a nation has its limits,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at of a single individual, and is capable of executing only certain purposes. The capital of all the individuals of a nation is increas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at of a single individual, by their continually accumulating and adding to it whatever they save out of their revenue. It is likely to increase the fastest, therefore, when it is employed in the way that affords the greatest revenue to all the inhabitants or the country, as they will thus be enabled to make the greatest savings. But the revenue of all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is necessarily in proportion to th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ir land and labour.

的确，若一个国家的资本不足以满足这三种用途，其自然发展就尚未达到最理想的富裕程度。然而，在不成熟的时机企图以不充足的资本从事这三种用途，都不是社会积累充足资本的最佳捷径，对于个人而言同样不是。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资本必然有限，个人的资本同样如此，仅可满足某些方面。个人的资本，靠不断积累收入当中一切节省的部分而增加，全体国民资本同样以此增加。因此，能够为全体

国民提供最多收入的资本用途，可使全体国民最大程度地积累财富，使得国民资本以最快速度增长。但是，国内全体居民的收入，必然与他们的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成比例变化。

It has been the principal cause of the rapid progress of our American colonies towards wealth and greatness, that almost their whole capitals have hitherto been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They have no manufactures, those household and coarser manufactures excepted, which necessarily accompany 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e, and which are the work of the women and children in every private family. The greater part, both of the exportation and coasting trade of America, is carried on by the capitals of merchants who reside in Great Britain. Even the stores and warehouses from which goods are retailed in some provinces, particularly in Virginia and Maryland, belong many of them to merchants who reside in the mother country, and afford one of the few instances of the retail trade of a society being carried on by the capitals of those who are not resident members of it. Were the Americans, either by combination, or by any other sort of violence, to stop the importation of European manufactures, and, by thus giving a monopoly to such of their own countrymen as could manufacture the like goods, divert any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ir capital into this employment, they would retard, instead of accelerating, the further increase in the value of their annual produce, and would obstruct, instead of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their country towards real wealth and greatness. This would be still more the case, were they to attempt, in the same manner, to monopolize to themselves their whole exportation trade.

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几乎所有的资本都用于农业，此为殖民地迅

速积累财富、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只有家庭制造业和粗制造业，每个家庭的妇女儿童都可从事，其必随农业的进步而发展。美洲大部分出口贸易和沿海贸易则由英国境内的商人经营，特别是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等部分省份，甚至于从事零售的店铺和仓库都为居住在其祖国境内的商人所有，虽然社会上的零售生意不由本地商人投资经营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此即其中一例。若美洲商人联合或仰仗暴力而阻止欧洲制造品的进口，使能够制造这些商品的本地商人享有垄断，从而使任何可观的资本都转移到该事业，他们将阻碍年生产物价值的进一步增长，不会使其加速增长；将阻碍国家积累财富、发展壮大，不会对其有所促进。同样，若他们试图垄断全部出口贸易，情况则会更加严重。

The course of human prosperity, indeed, seems scarce ever to have been of so long continuance as to unable any great country to acquire capital sufficient for all those three purposes; unless, perhaps, we give credit to the wonderful accounts of the wealth and cultivation of China, of those of ancient Egypt, and of the ancient state of Indostan. Even those three countries, the wealthiest, according to all accounts, that ever were in the world, are chiefly renowned for their superiority in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They do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eminent for foreign trade. The ancient Egyptians had a superstitious antipathy to the sea; a superstition nearly of the same kind prevails among the Indians; and the Chinese have never excelled in foreign commerc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all those three countries seems to have been always exported by foreigners, who gave in exchange for it something else, for which they found a demand there, frequently gold and silver.

的确，任何一个大国积累足够的资本以满足这三种用途，其过程

之漫长，似乎人类的繁荣进程尚不及；我们也许会相信关于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富裕和农业大发展的记载，此是例外。根据全部记载，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上最为富裕，但即使是它们，也只是主要知名于发达的农业和制造业，其国外贸易似乎并不突出。古埃及人对大海有一种迷信的敬畏心理，印度人也如此，而中国的对外贸易始终未曾繁盛。三国大部分的剩余生产物似乎都是经外国人之手出口，交换他们发现这里所需之物，通常，就是金银。

It is thus that the same capital will in any country put into motion a greater or smaller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and add a greater or smaller value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roportions in which it is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manufactures, and wholesale trade. The difference, too, is very grea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orts of wholesale trade in which any part of it is employed.

因此，相同的资本在任何一国用于农业、工业、批发贸易的比例不同，所产生的劳动量、增加的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的价值就不同。同样，用于批发贸易的不同部分，产生的影响就大为不同。

All wholesale trade, all buying in order to sell again by wholesale, maybe reduced to three different sorts: the home trade,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and the carrying trade. The home trade is employed in purchasing in one part of the same country, and selling in another, the produce of the industry of that country. It comprehends both the inland and the coasting trade.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is employed in purchasing foreign goods for home consumption. The carrying trade is employed in transacting the commerce of foreign countries, or in carrying the surplus

produce of one to another.

所有的批发贸易都以批发购入，再由批发卖出，可分为三类，即国内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以及转口贸易。国内贸易包括内陆贸易和沿海贸易，即从国内某地够买本国工业生产的产品，销往国内另外一地。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即购买外国商品，以供国内消费。转口贸易，则是进行于外国之间的贸易，即将某国的剩余生产物运往他国交易。

The capital which is employed in purchasing in one part of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sell in another, the produce of the industry of that country, generally replaces, by every such operation, two distinct capitals, that had both been employed in the agriculture or manufactures of that country, and thereby enables them to continue that employment. When it sends out from the residence of the merchant a certain value of commodities, it generally brings hack in return at least an equal value of other commodities. When both are the produce of domestic industry, it necessarily replaces, by every such operation, two distinct capitals, which had both been employed in Supporting productive labour, and thereby enables them to continue that support. The capital which sends Scotch manufactures to London, and brings back English corn and manufactures to Edinburgh, necessarily replaces, by every such operation, two British capitals, which had both been employed in the agriculture or manufactures of Great Britain.

从国内某地够买本国产业生产的产品，销往国内另外一地，此时资本通过每次运作，通常可以补偿两份不同的资本，即用于本国农业或制造业的资本，以此使得本国农业和制造业得以维系。通过运用资

本从商人所在之处运出一定价值的商品，通常，交换而得的另一种商品价值至少等同。若交换双方都是本国产业的生产物，则每次运作必然可以补偿两份不同资本，即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使其可以继续维持。资本将苏格兰制造品运往伦敦，交换英格兰谷物和制造品，运回爱丁堡，每次运作必然可以补偿两份英国资本，即用于制造业或农业的资本。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purchasing foreign goods for home consumption, when this purchase is made with the produce of domestic industry, replaces, too, by every such operation, two distinct capitals; but one of them only is employed in supporting domestic industry. The capital which sends British goods to Portugal, and brings back Portuguese goods to Great Britain, replaces, by every such operation, only one British capital. The other is a Portuguese one. Though the returns, therefore,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should be as quick as those of the home trade,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it will give but one half of the encouragement to the industry or productive labour of the country.

若购买外国商品以供国内消费，但购买的是国内产业生产的产品，则用于购买的资本每次运作，同样可以补偿两份不同的资本，但其中只有一份维持本国产业。将英国商品运往葡萄牙，换回葡萄牙商品运回英国，则该资本每次运作只补偿一份英国资本，另一份则是葡萄牙资本。因此，消费品国外贸易可与国内贸易同样快速地获取回报，该资本只维持本国产业或生产性劳动的一半。

But the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are very seldom so quick as those of the home trade. The returns of the home trade generally come in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sometimes three or four times in the year. The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seldom come in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sometimes not till after two or three years. A capital, therefore, employed in the home trade, will sometimes make twelve operations, or be sent out and returned twelve times, before a capital employed in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has made one. If the capitals are equal, therefore, the one will give four-and-twenty times more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o the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than the other.

但是，消费品国外贸易可与国内贸易同样快速地获取回报，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国内贸易的回报，通常在本年底实现，有时一年内回报3或4次。消费品国外贸易每年回报一次都很少见，有时甚至还需要2或3年。因此，用于国内贸易的资本，有时需运作12次，即支出亦收回12次，而用于消费品国外贸易的资本仅运作一次。因此，若两份资本等同，则国内贸易的资本对于本国产业可实现24倍于另一种资本的鼓励与支持。

The foreign goods for home consumption may sometimes be purchased, not with the produce of domestic industry but with some other foreign goods. These last, however, must have been purchased, either immediately with the produce of domestic industry, or with something else that had been purchased with it; for, the case of war and conquest excepted, foreign goods can never be acquired, but in exchange for something that had been produced at home, either immediately, or after two or more different exchanges. The effects, therefore, of a capital employed in such a round-abou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are, in every respect, the same as those of one employed in the most direct trade of the same kind, except that the final returns are likely to be still more distant,

as they must depend upon the returns of two or three distinct foreign trades. If the hemp and flax of Riga are purchased with the tobacco of Virginia, which had been purchased with British manufactures, the merchant must wait for the returns of two distinct foreign trades, before he can employ the same capital in repurchasing a like quantity of British manufactures. If the tobacco of Virginia had been purchased, not with British manufactures, but with the sugar and rum of Jamaica, which had been purchased with those manufactures, he must wait for the returns of three. If those two or three distinct foreign trades should happen to be carried on by two or three distinct merchants, of whom the second buys the goods imported by the first, and the third buys those imported by the second, in order to export them again, each merchant, indeed, will, in this case, receive the returns of his own capital more quickly; but the final returns of the whole capital employed in the trade will be just as slow as ever. Whether the whole capital employed in such a round about trade belong to one merchant or to three, can make no difference with regard to the country, though it may with regard to the particular merchants. Three times a greater capital must in both cases be employed, in order to exchange a certain value of British manufactures for a certain quantity of flax and hemp, than would have been necessary, had the manufactures and the flax and hemp been directly exchanged for one another. The whole capital employed, therefore, in such a round-abou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will generally give less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o the productive labour of the country, than an equal capital employed in a more direct trade of the same kind.

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商品，有时不以本国产业的产品购买，而以其他国家的产品购买。然而，其他国家的产品或直接由本国产业的产品

购买，或由它以经购得的产品再次换购，因为，除战争与征服外，外国商品只得以本国产品换购，或直接购买，或经两次或三次交换而购得。因此，经过这样几轮交换的消费品国外贸易，其资本在任何方面，同用于消费品最直接国外贸易的资本比较，收效都相当，原因在于须经过两次或三次不同对外贸易。若实现最后的收入回报尚需更多时日，则属例外。若弗吉尼亚的烟草由英国制造品购得，之后再换购里加的亚麻，即必须通过2次对外贸易，资本才能够返回商人所有，以购买等量的英国制造品。若弗吉尼亚烟草不以英国制造品购买，而以牙买加砂糖购买，则后者由英国制造品购买，须通过3次对外贸易，收回资本后，商人才可以用同等资本购买等量的英国制造品。若不同商人着手这两次或三次不同对外贸易，则第一位商人进口的商品由第二位买入并输出，第二位买入的商品由第三位买入并输出，则各位商人资本的确较快地收回了资本。然而，最终收回用于贸易的全部资本，相比以往，仍十分迟缓。这种间接贸易中投入的资本，无论为一或三位商人所有，即便对某位商人有影响，但对国家来说没什么区别。无论资本为几人所有，相比英国制造品和亚麻直接交换，间接地用一定价值的英国制造品购买一定量的亚麻，需消耗3倍的资本。因此，同更为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相比，用于消费品间接国外贸易的资本，即便资本量相当，但通常只能对该国生产性劳动所起到更少的鼓励与支持。

Whatever be the foreign commodity with which the foreign goods for home consumption are purchased, it can occasion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either in the nature of the trade, or in the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which it can give to the productive labour of the country from which it is carried on. If they are purchased with the gold of Brazil, for example, or with the silver of Peru, this gold and silver, like the tobacco of Virginia, must have been purchased with something that either was the produce of the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or that had been purchased with something else that was so. So far, therefore, as the productive labour of the

country is concerned,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which is carried on by means of gold and silver, has all the advantages and all the inconveniencies of any other equally round-abou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and will replace, just as fast, or just as slow, the capital which is immediately employed in supporting that productive labour. It seems even to have one advantage over any other equally round-about foreign trade. The transportation of those metal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on account of their small bulk and great value, is less expensive than that of almost any other foreign goods of equal value. Their freight is much less, and their insurance not greater; and no goods, besides, are less liable to suffer by the carriage. An equal quantity of foreign goods, therefore, may frequently be purchased with a smaller quantity of the produce of domestic industry, by the intervention of gold and silver, than by that of any other foreign goods. The demand of the country may frequently, in this manner, be supplied more completely, and at a smaller expence, than in any other. Whether, by the continual exportation of those metals, a trade of this kind is likely to impoverish the country from which it is carried on in any other way, I shall have occasion to examine at great length hereafter.

无论购买何种外国商品以供国内消费，都不对贸易的性质和对本国生产性劳动提供的鼓励与支持产生任何本质的区别。若以巴西的金和秘鲁的银购买这些商品，则这些金银正如弗吉尼亚烟草，必然要以某本国产业的产物或由本国产物购得的某种商品来购买。因此，就本国生产性劳动而言，消费品国外贸易通过金银进行，与任何其他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一样，既有优点，又有不便。虽然或快或慢，但消费品国外贸易会补偿直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消费品的国外贸易通过金银进行，甚至似乎还有一大优点。金银体积小而价值高，因此，相比同等价值的其他货物，运输费用更低而保险费未必更高；此外，金银在运输过程中更不易于损坏。因此，以金银购买，相比以其

他外国商品购买，购买等量外国商品，常常只需支付较少的本国商品；相比之下，以其他外国货物购买，不如以金银购买，更能够供给国内的需求、花费更少。不断输出金银购买外国货物，以供本国之需，是否会使国家陷入贫困，讨论该问题要在后面占用非常大的篇幅。

That part of the capital of any country which is employed in the carrying trade, is altogether withdrawn from supporting the productive labour of that particular country, to support that of some foreign countries. Though it may replace, by every operation, two distinct capitals, yet neither of them belongs to that particular country. The capital of the Dutch merchant, which carries the corn of Poland to Portugal, and brings back the fruits and wines of Portugal to Poland, replaces by every such operation two capitals, neither of which had been employed in supporting the productive labour of Holland; but one of them in supporting that of Poland, and the other that of Portugal. The profits only return regularly to Holland, and constitute the whole addition which this trade necessarily makes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at country. When, indeed, the carrying trade of any particular country is carried on with the ships and sailors of that country, that part of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it which pays the freight is distributed among, and puts into motion, a certain number of productive labourers of that country. Almost all nations that have had any considerable share of the carrying trade have, in fact, carried it on in this manner. The trade itself has probably derived its name from it, the people of such countries being the carriers to other countries. It does not, however, seem essential to the nature of the trade that it should be so. A Dutch merchant may, for example, employ his capital in transacting the commerce of Poland and Portugal, by carrying part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 one to

the other, not in Dutch, but in British bottoms. It maybe presumed, that he actually does so upon some particular occasions. It is upon this account, however, that the carrying trade has been supposed peculiarly advantageous to such a country as Great Britain, of which the defence and security depend upon the number of its sailors and shipping. But the same capital may employ as many sailors and shipping, either in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or even in the home trade, when carried on by coasting vessels, as it could in the carrying trade. The number of sailors and shipping which any particular capital can employ, does not depend upon the nature of the trade, but partly upon the bulk of the good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value, and partly upon the distance of the ports between which they are to be carried; chiefly upon the former of those two circumstances. The coal trade from Newcastle to London, for example, employs more shipping than all the carrying trade of England, though the ports are at no great distance. To force, therefore, by extraordinary encouragements, a larger share of the capital of any country into the carrying trade, than what would naturally go to it, will not always necessarily increase the shipping of that country.

用于转口贸易的资本都从本国支出，不维持本国的生产性劳动，反而维持外国的生产性劳动。虽然进行一次转口贸易可偿还两份不同资本，但这两份资本都不属于本国。若荷兰商人投入资本，将谷物从波兰运往葡萄牙，再将葡萄牙水果和葡萄酒运往波兰，则的确补偿了两份资本，但都未曾维持荷兰的生产性劳动。其中一份是维持了波兰的生产性劳动，另一份维持葡萄牙的生产性劳动。仅仅是荷兰商人的利润流入了荷兰，荷兰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的增加也仅限于这些利润。的确，若转口贸易雇用本国的船只与水手，则用以支付运费的资本，推动了本国的生产性劳动、雇用本国的生产性劳动者。事实上，在转口贸易旺盛的国家，几乎所有的转口贸易都这样进行。或许“转

口贸易”这个词即因此而得，对于外国人来说，这些国家的人民通常就是运输者，即便运输所需的船只与水手未必属于本国。例如，荷兰商人经营波兰与葡萄牙之间的转口贸易，未必动用荷兰船只，英国船只亦可胜任，某些时候，可以说的确如此。正因此，人们认为转口贸易特别有利于英国这样的国家，船只与水手数量决定了英国的国防与安全。然而，若必要的运输由近海航船完成，则在消费品的国外贸易甚至于国内贸易中，等量的资本可雇用等量的船只与水手。一定数量的资本雇用多少船只与水手，不由贸易性质决定，而部分由货物体积与价值的比例，部分由运输海港间的距离决定。二者中，货物体积与价值的比例更具影响。纽卡斯尔与伦敦之间的海港虽然距离不远，但其间的煤炭贸易甚至比英格兰全部转口贸易雇用的船只与水手更多。因此，非常值得商榷的是，特殊的奖励迫使一国资本偏离自然发展而大部分转入转口贸易，能否就此促进国家的航运业。

The capital, therefore, employed in the home trade of any country, will generally give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o a greater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in that country, and increase the value of its annual produce, more than an equal capital employed in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and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this latter trade has, in both these respects, a still greater advantage over an equal capital employed in the carrying trade. The riches, and so far as power depends upon riches, the power of every country must always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value of its annual produce, the fund from which all taxes must ultimately be paid. But the great object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very country, is to increase the riches and power of that country. It ought, therefore, to give no preference nor superior encouragement to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above the home trade, nor to the carrying trade above either of the other two. It ought neither to force nor to allure into either of those two channels a greater share of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than what would naturally flow into them of its own

accord.

因此，相比用于消费品国外贸易的等量资本，通常，用于国内贸易的资本可维持与鼓励更多的本国生产性劳动，使本国年生产物价值增加更多。但用于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同用于转口贸易上的等量资本相比，在这两方面都具有更重要的优点。财富决定力量，一国国力必与其年生产物价值，即全部税收最终必然支付的资金息息相关。但是，每一国家政治经济学的宏大目标都是促进富裕、增强国力，因此，与其鼓励消费品国外贸易，不如鼓励国内贸易；与其鼓励转口贸易，不如鼓励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或国内贸易。既不应强迫也不应诱导大部分国家资本背离自然发展，转而流入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或转口贸易。

Each of those different branches of trade, however, is not only advantageous, but necessary and unavoidable, when the course of things, without any constraint or violence, naturally introduces it.

然而，若这三种贸易自然发展，未收限制与压迫，则这三者就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

When the produce of any particular branch of industry exceeds what the demand of the country requires, the surplus must be sent abroad, and exchanged for something for which there is a demand at home. Without such exportation, a part of the productive labour of the country must cease, and the value of its annual produce diminish. The land and labour of Great Britain produce generally more corn, woollens, and hardware, than the demand of the home market requires. The surplus part of them, therefore, must be sent

abroad, and exchanged for something for which there is a demand at home. It is only by means of such exportation, that this surplus can acquired value 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the labour and expence of producing it.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sea-coast, and the banks of all navigable rivers, are advantageous situations for industry, only because they facilitate the exportation and exchange of such surplus produce for something else which is more in demand there.

若某产业分支的产品超出本国的需要，则剩余部分必将运往国外，换取国内所需之物。若不进行这种输出，则国内必有部分生产性劳动陷入停滞，从而使国内年生产物价值降低。英国土地及劳动生产的谷物、毛织品和五金器具通常超出国内之需。因此，剩余的部分须送往国外，以交换英国所需之物。若不进行这种输出，则剩余部分的价值将不足以补偿生产所耗的劳动与费用。海岸线周边地区以及所有通航河流河岸地区对发展产业十分有利，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有利于剩余产物输出，以换取本地所需之物。

When the foreign goods which are thus purchased with the surplus produce of domestic industry exceed the demand of the home market, the surplus part of them must be sent abroad again, and exchanged for something more in demand at home. About 96,000 hogsheads of tobacco are annually purchased in Virginia and Maryland with a part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British industry. But the demand of Great Britain does not require, perhaps, more than 14,000. If the remaining 82,000, therefore, could not be sent abroad, and exchanged for something more in demand at home, the importation of them must cease immediately, and with it the productive labour of all those inhabitants of Great Britain who are at present employed in preparing the goods with which these 82,000 hogsheads are annually purchased. Those goods, which are

part of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Great Britain, having no market at home, and being deprived of that which they had abroad, must cease to be produced. The most round-abou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therefore, may, upon some occasions, be as necessary for supporting the productive labour of the country, and the value of its annual produce, as the most direct.

若以本国剩余产物购得了多于国内市场所需的外国商品，则其剩余部分必须运往国外，以再次交换国内所需的其他商品。每年，英国输出一部分剩余产物，在弗吉尼亚、马里兰购买烟草约9.6万桶，然而，也许英国每年所需仅仅不多于1.4万桶。因此，若不能将剩余的8.2万桶运往国外，以交换国内所需，则这8.2万桶的输入就会立即陷入停滞。每年为购买这8.2万桶而制造的商品，国内本不需要如此之多，而如今输出受阻，这些商品则必将停产，受雇于制造这些商品的英国人也将失业。因此，最为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与最为直接的一样，对维持本国生产性劳动与年生产物价值来说，都是必要的。

When the capital stock of any country is increased to such a degree that it cannot be all employed in supplying the consumption, and supporting the productive labour of that particular country, the surplus part of it naturally disgorges itself into the carrying trade, and is employed in performing the same offices to other countries. The carrying trade is the natural effect and symptom of great national wealth; but it does not seem to be the natural cause of it. Those statesmen who have been disposed to favour it with particular encouragement, seem to have mistaken the effect and symptom for the cause. Holl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the land and the number of it's inhabitants, by far the richest country in Europe, has accordingly the greatest share of the carrying trade of Europe. England, perhaps the second richest country of Europe, is

likewise supposed to have a considerable share in it; though what commonly passes for the carrying trade of England will frequently, perhaps, be found to be no more than a round-abou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Such are, in a great measure, the trades which carry the goods of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and of America to the different European markets. Those goods are generally purchased, either immediately with the produce of British industry, or with something else which had been purchased with that produce, and the final returns of those trades are generally used or consumed in Great Britain. The trade which is carried on in British bottoms between the different ports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some trade of the same kind carried on by British merchants between the different ports of India, make, perhaps, the principal branches of what is properly the carrying trade of Great Britain.

若任一国家的资本与财产数目无法尽数供给本国消费、维持生产性劳动，则其剩余部分自然会流入转口贸易以供给他国消费、维持生产性劳动。转口贸易是国民大财富的自然结果与象征，但似乎并非其自然原因。有意赞成，并特别鼓励转口贸易的政治家，似乎将结果与象征物视为了原因。相对于土地面积和居民人数而言，荷兰是欧洲之首富，因此，荷兰占有欧洲转口贸易的部分最大。英格兰则也许仅次于荷兰，同样占有大量的转口贸易。但通常，英格兰的转口贸易通常被误认，事实上只不过是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我们的贸易，即将东方、西印度和美洲的商品运往欧洲各市场的贸易，大多即属于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或以英国产品，或以英国产品换购而得的商品购买这些商品，此种贸易最后购入的商品，多数消费或使用于英国。大不列颠真正的转口贸易，可能只有由英国运船进行的地中海各港间贸易，以及由英国商人经营的印度沿海各港之间的贸易。

The extent of the home trade, and of the capital which can be

employed in it, is necessarily limited by the value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all those distant places within the country which have occasion to exchange their respective productions with one another; that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by the value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of what can be purchased with it; that of the carrying trade, by the value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s possible extent, therefore, is in a manner infinite in comparison of that of the other two, and is capable of absorbing the greatest capitals.

各地互相交换剩余生产物，国内贸易的范围以及用于国内贸易上的资本量，必受国内远方各地剩余生产物价值所限；消费品国外贸易的范围，必受全国剩余生产物价值这些剩余生产物可购商品价值所限；转口贸易的范围，必受世界各国剩余生产物的价值所限。因此，相比其他二种贸易，转口贸易可能触及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无限的，最能够吸引资本。

The consideration of his own private profit is the sole motive which determines the owner of any capital to employ it either in agriculture, in manufactures, or in some particular branch of the wholesale or retail trade. The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productive labour which it may put into motion, and the different values which it may add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society, according as it is employed in one or other of those different ways, never enter into his thoughts. In countries, therefore, where agriculture is the most profitable of all employments, and farming and improving the most direct roads to a splendid fortune, the capitals of individuals will naturally be employed in the manner most advantageous to the whole society. The profits of agriculture, however, seem to have no superiority

over those of other employments in any part of Europe. Projectors, indeed, in every corner of it, have, within these few years, amused the public with most magnificent accounts of the profits to be made by the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land. Without entering into any particular discussion of their calculations, a very simple observation may satisfy us that the result of them must be false. We see, every day, the most splendid fortunes, that have been acquired in the course of a single life, by trade and manufactures, frequently from a very small capital, sometimes from no capital. A single instance of such a fortune, acquired by agriculture in the same time, and from such a capital, has not, perhaps, occurred in Europe,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In all the great countries of Europe, however, much good land still remains uncultivated;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what is cultivated, is far from being improved to the degree of which it is capable. Agriculture, therefore, is almost everywhere capable of absorbing a much greater capital than has ever yet been employed in it. What circumstances in the policy of Europe have given the trades which are carried on in towns so great an advantage over that which is carried on in the country, that private persons frequently find it more for their advantage to employ their capitals in the most distant carrying trades of Asia and America than in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e most fertile fields in their own neighbourhood, I shall endeavour to explain at full length in the two following books.

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因是出于私人利润的考虑，即决定将资本用于农业、工业，或批发贸易或零售贸易的某些分支。而如何投资可推动最多的生产性劳动、增加最多的社会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价值，则难以提前预料。因此，个人的资本，在农业利润最高、最易于通过耕作积累财富的国家，自然会用于对社会最有利的用途。但在欧洲，投资农业并非一定较投资其他用途获得更高利润。的确，这几年来，

欧洲各地有许多人制定计划，大力推崇农业耕作的利润，但是，甚至无需对他们的估值进行仔细的讨论，只需稍作观察，即可发现其结论完全错误。我们常能够发现这样的例子，起初资本很少，甚至没有资本，但数十年从事制造业或经商却为经营者赚取了巨额财富。然而，本世纪以来，在欧洲甚至难以发现一个这样以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致富的例子。在欧洲的所有大国中，仍有许多尚未耕作的优良土地；更多土地已经耕作，但改良仍未达到应该的程度。因此，如今，相比已经投入的资本，任何地方的农业都还可以吸收更多资本。欧洲各国的政策，使得城市经营产业的利润远超乡村，使个人总能发现投资于极远处的亚洲和美洲转口贸易，比投资改良与耕作自身周边最肥沃土地更有利可图。我将在下一篇努力详细地展开讨论。

BOOK III Of the DifferentProgress of Opulence in DifferentNations

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不同的富裕进程

Chapter I. Of the Natural Progress ofOpulence

第一章、论自然富裕进程

The great commerce of every civilised society is that carried on betwee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own and those of the country. It consists in the exchange of rude for manufactured produce, either immediately, or by the intervention of money, or of some sort of paper which represents money. The country supplies the town with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and the materials of manufacture. The town repays this supply, by sending back a part of the manufactured produce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The town, in which there neither is nor can be any reproduction of substances, may very properly be said to gain its whole wealth and subsistence from the country. We must not, however, upon this account, imagine that the gain of the town is the loss of the country. The gains of both are mutual and reciprocal,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in this, as in all other cases, advantageous to all the different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various occupations into which it is subdivided.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purchase of the town a greater quantity of manufactured goods with the produce of a much smaller quantity of their own labour, than they must have employed had they attempted to prepare them themselves. The town affords a market for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 country, or what is over and above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ultivators; and it is there that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exchange it for something else which is in demand among them. The greater the number and

revenue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own, the more extensive is the market which it affords to thos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more extensive that market, it is always the more advantageous to a great number. The corn which grows within a mile of the town, sells there for the same price with that which comes from twenty miles distance. But the price of the latter must, generally, not only pay the expence of raising it and bringing it to market, but afford, too,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agriculture to the farmer. The proprietors and cultivators of the country, therefore, which lie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town, over and above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agriculture, gain, in the price of what they sell, the whole value of the carriage of the like produce that is brought from more distant parts; and they save, besides, the whole value of this carriage in the price of what they buy. Compare the cultivation of the land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any considerable town, with that of those which lie at some distance from it, and you will easily satisfy yourself how much the country is benefited by the commerce of the town. Among all the absurd speculations that have been propagated concerning the balance of trade, it has never been pretended that either the country loses by its commerce with the town, or the town by that with the country which maintains it.

在任何文明社会中，大型商业都在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之间进行。大型商业包初级产品与成品的直接交换，或经由货币或某种代替货币的票据交换。乡村向城市供给生活资料及制造材料，城市将一部分成品回报予乡村居民。完全可以说，不再生产且不能再生产物质的城市，全部财富和生活资料都取自乡村。但是，我们不得据此就妄断城市之得即乡村之失，二者是互惠的，得失是相互的。此处的分工同其他情况的分工一样，可细分为不同职位，对从事各种职位的不同人都是有益的。乡村居民可以自己较少的劳动生产物购买更多的制造品，所以与其亲身劳动，自己制造，不如购买。城市是乡村剩余产

物，即农民维持生计以外剩余产品的市场，农民在城市中交换他们所需的其他物品。在城市中，居民越多，其收入越多，乡村剩余产物的市场越广阔，就有利于更多人民。距离城市1英里以内生产的谷物，与距城市20英里生产的谷物，售价一样。但通常，后者的售价不仅要补偿其生产及上市所费，还要为农场主提供从事农业的普通利润。因此，城市周边地区的农场主和耕作者，不仅可在谷物售价中收获从事农业的普通利润，还可收获从远处运来而出售的谷物运费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在所购之物的价格中节省了运费的全部价值。不妨比较城市周边各乡村和远离城市各乡村的土地耕作，便可轻易发现城市商业如何利于乡村。城市商业对乡村有维持作用，即使所有宣传贸易差额的各种荒谬论断，亦从未妄称乡村与城市通商对城市或乡村有任何损失。

As subsistence i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prior to conveniency and luxury, so the industry which procures the former, must necessarily be prior to that which ministers to the latter. The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ountry, therefore, which affords subsistence, must, necessarily, be prior to the increase of the town, which furnishes only the means of conveniency and luxury. It is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 country only, or what is over and above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ultivators, that constitutes the subsistence of the town, which can therefore increase on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urplus produce. The town, indeed, may not always derive its whole subsistence from the country in its neighbourhood, or even from the territory to which it belongs, but from very distant countries; and this, though it forms no exception from the general rule, has occasioned considerable variations in the progress of opulence in different ages and nations.

就事物的本质来看，生活资料优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生

产前者的产业同样必然优先于生产后者的产业。乡村土地耕种及改良提供生活资料，城市的发展仅提供奢侈品和便利品，因此前者必然优先于后者。乡村居民须先维持自己生存，后以剩余产物维持城市居民。因此，只有增加乡村剩余产物才能够发展城市。但是，城市的生活资料未必靠周边的乡村供给，甚至未必靠国内的乡村，可从远处运至。所以，虽然相对于一般原则而言，这并不例外，但却使得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家，在其富裕的过程中出现了差异。

That order of things which necessity imposes, in general, though not in every particular country, is in every particular country promoted by the natural inclinations of man. If human institutions had never thwarted those natural inclinations, the towns could nowhere have increased beyond what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e territory in which they were situated could support; till such time, at least, as the whole of that territory was completely cultivated and improved. Upon equal, or nearly equal profits, most men will choose to employ their capitals, rather in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land, than either in manufactures or in foreign trade. The man who employs his capital in land, has it more under his view and command; and his fortune is much less liable to accidents than that of the trader, who is obliged frequently to commit it, not only to the winds and the waves, but to the more uncertain elements of human folly and injustice, by giving great credits, in distant countries, to men with whose character and situation he can seldom be thoroughly acquainted. The capital of the landlord, on the contrary, which is fix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his land, seems to be as well secured as the nature of human affairs can admit of. The beauty of the country, besides, the pleasure of a country life, the tranquillity of mind which it promises, and, wherever the injustice of human laws does not disturb it, the independency which it really affords, have charms that, more or

less, attract everybody; and as to cultivate the ground was the original destination of man, so, in every stage of his existence, he seems to retain a predilection for this primitive employment.

乡村优先于城市，这一情况在大多数国家都因需求而造成。但放眼所有国家，人类的天性同样是促成因素。人类制定的制度并不压抑自身的天性，乡村耕作和改良程度所能支持的城市的发展程度有限，一国境内土地尚未完全耕作与改良前，决不能超过此限度。若投资改良与开垦土地的利润与投资制造业及国外贸易的利润完全或几乎相等，则多数人必定倾向于前者。投资人自己可更直接地跟踪投于土地的资本，他的财产相比商人，更不易遭逢意外。而商人的财产不仅必须经常承担巨大风险，而且，由于在远方国家，商人无法完全掌握当地人的性格与境况，常常必须接受当地人赊账，所以就要承担更不确定的风险，即人类的蠢行与不正义。相反，地主的资本却固定于土地改良，似乎与人类事务本质可能达到的，同样有所保障。此外，乡村风景美、生活愉快、居民心神宁静，乡村事实上提供了一种独立性，无论何地，只需独立性不受到人类法律的扰乱，就多少对每个人都有吸引力。耕作土地是人类的原始目标，是原始的事业，所以，在人类生存的每一阶段，人类似乎都保有对耕作土地的偏好。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some artificers, indeed, the cultivation of land cannot be carried on, but with great inconveniency and continual interruption. Smiths, carpenters, wheelwrights and ploughwrights, masons and bricklayers, tanners, shoemakers, and tailors, are people whose service the farmer has frequent occasion for. Such artificers, too, stand occasionally in need of the assistance of one another; and as their residence is not, like that of the farmer, necessarily tied down to a precise spot, they naturally settle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one another, and thus form a small town or village. The butcher, the brewer, and the baker,

soon join them, together with many other artificers and retailers, necessary or useful for supplying their occasional wants, and who contribute still further to augment the tow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own, and those of the country, are mutually the servants of one another. The town is a continual fair or market, to whic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resort, in order to exchange their rude for manufactured produce. It is this commerce which supplie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own, both with the materials of their work, and the means of their subsistence. The quantity of the finished work which they sell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necessarily regulates the quantity of the materials and provisions which they buy. Neither their employment nor subsistence, therefore, can augment, but in proportion to the augmentation of the demand from the country for finished work; and this demand can augment only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sion of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Had human institutions, therefore, never disturbed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the progressive wealth and increase of the towns would, in every political society, be consequential, 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e territory of country.

诚然，没有工匠的协助，土地耕作多有不便，时作时息，难以进行。锻工、木匠、轮匠、犁匠、泥水匠、砖匠、皮革匠、鞋匠和缝匠的服务都常为农民所需。由于这些工匠一方面需要互助，另一方面不必如农民那样有精确的地址，因此他们自然地聚居在某一地，从而形成一种小城镇或小村落。很快，屠户、酒家和面包师加入，还包括许多供给临时之需的其他工匠及零售商，即供给对于他们是必要或有用的，使得城镇进一步发展壮大。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互相服务，城镇是乡村居民将原生产物运往，并在此交换制造品的持续的市集或市场。通过此种交换，城市居民获取生产材料及生活资料，而他们购买的材料及食品的数量，取决于他们售与乡村居民的成品数量。因此，

材料及食品须与乡村居民对成品需求的增长成比例增加，该需求又须与耕作及改良事业的发展成比例增长。因此，若人类制定的制度不使事物偏离自然发展，则无论在任何政治社会中，城市财富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大都是乡村耕作及改良深入的结果，且与乡村耕作及改良的发展的深入成比例增长。

In our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where uncultivated land is still to be had upon easy terms, no manufactures for distant sale have ever yet been established in any of their towns. When an artificer has acquired a little more stock than is necessary for carrying on his own business in supplying the neighbouring country, he does not, in North America, attempt to establish with it a manufacture for more distant sale, but employs it in the purchase and improvement of uncultivated land. From artificer he becomes planter; and neither the large wages nor the easy subsistence which that country affords to artificers, can bribe him rather to work for other people than for himself. He feels that an artificer is the servant of his customers, from whom he derives his subsistence; but that a planter who cultivates his own land, and derives his necessary subsistence from the labour of his own family, is really a master, and independent of all the world.

英属北美殖民地土地未经开垦，易于购买，在这里的城镇中，尚未出现销往远处的制造业。在北美洲，若工匠为了供给周边国家而经营，且获得的资本超出他经营之需，则他不会试图开办工厂以销往远方，而会以剩余财产购买或改良未开垦的土地，由工匠转为农场主。虽然当地工匠报酬高，生活安逸，但不足以使他满足于为他人工作，他仍希望为自己工作。他认为工匠是顾客的仆役，生活须依靠顾客；但耕作自己的土地，并从自己家庭的劳动中获取生存资料的农场主，才独立于全世界，做自己真正的主宰。

In countries, on the contrary, where there is either no uncultivated land, or none that can be had upon easy terms, every artificer who has acquired more stock than he can employ in the occasional jobs of the neighbourhood, endeavours to prepare work for more distant sale. The smith erects some sort of iron, the weaver some sort of linen or woollen manufactory. Those different manufactures come, in process of time, to be gradually subdivided, and thereby improved and refined in a great variety of ways, which may easily be conceived, and which it is therefore unnecessary to explain any farther.

与此相反，在没有未开垦土地，或土地不易购得的国家，若工匠所获的资本已无法全部用于周边地区临时之需，则他会利用剩余的财产扩大经营，准备售往远方。锻工会建立钢铁厂，织工会建立麻织厂或毛织厂。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制造业将逐渐分工，并以多种方式提高与改进，这易于得到认同，因此无需赘述。

In seeking for employment to a capital, manufactures are, upon equal or nearly equal profits, naturally preferred to foreign commerce,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agriculture is naturally preferred to manufactures. As the capital of the landlord or farmer is more secure than that of the manufacturer, so the capital of the manufacturer, being at all times more within his view and command, is more secure than that of the foreign merchant. In every period, indeed, of every society, the surplus part both of the rude and manufactured produce, or that for which there is no demand at home, must be sent abroad, in order to be exchanged for something for which there is some demand at home. But whether the capital which carries this surplus produce abroad be a foreign or

a domestic one, is of very little importance. If the society has not acquired sufficient capital, both to cultivate all its lands, and to manufacture in the completest manner the whole of its rude produce, there is even a considerable advantage that the rude produce should be exported by a foreign capital, in order that the whole stock of the society may be employed in more useful purposes. The: wealth of ancient Egypt, that of China and Indostan,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 that a nation may attain a very high degree of opulence, th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its exportation trade be carried on by foreigners. The progress of our North American and West Indian colonies, would have been much less rapid, had no capital but what belonged to themselves been employed in exporting their surplus produce.

在利润完全或几乎相等时，在制造业与国外贸易中选择资本用途，自然更倾向于制造业。正如农业与制造业中倾向于农业，两处原因相同。同制造商资本相比，地主或农场主的资本更安全。同样，同国外贸易资本相比，制造商因可随时跟踪资本，其资本更为安全。的确，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剩余的原生产物及制造品，或称国内不需要的原生产物及制造品，都必须运往外国，以交换国内所需的其他商品。但将剩余生产物运往外国的资本，或为本国所有，或为外国所有，都不甚重要。若本国的资本不足以支持同时耕作全部土地和完全制造全部原生产物，则由外国资本将本国剩余原生产物运往外国，同样对本国十分有利。因为，外国资本的利用使得全部本国资本可用于更有利的用途。中国、印度、古埃及的富裕充分证明，即使大部分本国的出口贸易由外国人经营，但该国国民仍可实现极高的富裕程度。英属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殖民地，若在输出剩余生产物时只有本地资本，没有外国资本，则两地的发展会大大减慢。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therefo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apital of every growing society is, first, directed to agriculture, afterwards to manufactures, and, last of all, to foreign commerce. This order of things is so very natural, that in every society that had any territory, it has always, I believe, been in some degree observed. Some of their lands must have been cultivated before any considerable towns could be established, and some sort of coarse industry of the manufacturing kind must have been carried on in those towns, before they could well think of employing themselves in foreign commerce.

因此，就事物的本质而言，发展中社会的资本，大部分用于农业，其次用于工业，最后用于国外贸易。该顺序极为自然，我认为，在所有拥有领土的国家，无论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资本都以此顺序运用。只有开垦土地，才能大量建立城市；只有城市发展了制造业中一些粗糙的产业，才有人愿意投身于国外贸易。

But though this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must have taken place in some degree in every such society, it has, in all the modern states of Europe, been in many respects entirely inverted. The foreign commerce of some of their cities has introduced all their finer manufactures, or such as were fit for distant sale; and manufactures and foreign commerce together have given birth to the principal improvements of agriculture.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which the nature of their original government introduced, and which remained after that government was greatly altered, necessarily forced them into this unnatural and retrograde order.

虽然该自然顺序在所有发展中的社会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但在如今的欧洲各国，该顺序从许多方面来看却完全相反。这些国家

的精制造业或适合售往远方的制造业，多由许多城市的国外贸易促进。制造业和国外贸易，同样促进了农业的主要改良。这些国家最初的政府使其形成了风俗习惯，政府改旗易帜后，风俗习惯仍然保留，正是这些风俗习惯，必然会造成这种违背自然的退化顺序。

Chapter II. Of the Discouragement ofAgriculture in the AncientState ofEurope, After The Fall of the RomanEmpire

第二章、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所受到的阻抑

When the German and Scythian nations overran the western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confusions which followed so great a revolution lasted for several centuries. The rapine and violence which the barbarians exercised against the ancient inhabitants, interrupted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towns and the country. The towns were deserted, and the country was left uncultivated; and the western provinces of Europe, which had enjoyed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opulence under the Roman empire, sunk into the lowest state of poverty and barbarism.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those confusions, the chiefs and principal leaders of those nations acquired, or usurped to themselve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ands of those countries. A great part of them was uncultivated; but no part of them, whether cultivated or uncultivated, was left without a proprietor. All of them were engrossed, and the greater part by a few great proprietors.

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亚民族占领罗马帝国西部地区，当时的变革如此之大，紧随变革产生了混乱，持续了数个世纪。野蛮民族对当地原居民加以掠夺和迫害，使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贸易陷入中断。城市变成废墟，乡村土地无法得到耕作。西欧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富裕程度很

高，因变革而一落千丈，极为贫困和野蛮。这些民族的首领因不断的战乱，篡夺了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土地，将土地据为己有。虽然大部分土地都未经开垦，但无论已开垦或未开垦，几乎没有无主的土地。所有土地都已有主，其中大部分由少数的大地主吞并。

This original engrossing of uncultivated lands, though a great, might have been but a transitory evil. They might soon have been divided again, and broke into small parcels, either by succession or by alienation. The law of primogeniture hindered them from being divided by succession; the introduction of entails prevented their being broke into small parcels by alienation.

虽然最初吞并未开垦土地甚为有害，但也可能只是暂时的。通过继承或分割，这些土地可能很快就会再次被拆分成小块。但长子承继法使得土地不可因承继而拆分，限嗣继承的施行则使土地不可因分割而拆分。

When land, like moveables, is considered as the means only of subsistence and enjoyment, the natural law of succession divides it, like them, among all the children of the family; of all of whom the subsistence and enjoyment may be supposed equally dear to the father. This natural law of succession, accordingly, took place among the Romans who made no more distinction between elder and younger,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in the inheritance of lands, than we do in the distribution of moveables. But when land was considered as the means, not of subsistence merely, but of power and protection, it was thought better that it should descend undivided to one. In those disorderly times, every great landlord was a sort of petty prince. His tenants were his subjects. He was

their judge, and in some respects their legislator in peace and their leader in war. He made war according to his own discretion, frequently against his neighbours, and sometimes against his sovereign. The security of a landed estate, therefore, the protection which its owner could afford to those who dwelt on it, depended upon its greatness. To divide it was to ruin it, and to expose every part of it to be oppressed and swallowed up by the incursions of its neighbours. The law of primogeniture, therefore, came to take place, not immediately indeed, but in process of time, in the succession of landed estates,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it has generally taken place in that of monarchies, though not always at their first institution. That the power, and consequently the security of the monarchy, may not be weakened by division, it must descend entire to one of the children. To which of them so important a preference shall be given, must be determined by some general rule, founded not upon the doubtful distinctions of personal merit, but upon some plain and evident difference which can admit of no dispute. Among the children of the same family there can be no indisputable difference but that of sex, and that of age. The male sex is universally preferred to the female; and when all other things are equal, the elder everywhere takes place of the younger. Hence the origin of the right of primogeniture, and of what is called lineal succession.

父辈同样关心每一位后代的生活与享乐，若仅将土地视为获取生活资料与享乐的手段，即如动产，则自然承继法会将土地像动产那样，分发与家庭所有后代。罗马人施行自然承继，无论长幼男女，都可承继土地，无异于我们如今动产的继承。然而，若不仅将土地视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而有关权力及保障，则人们认为仅由一人继承而不分与众人更为妥当。动荡时期，每位大地主也是一种小贵族，地主的佃户即从属，地主是佃户的裁决者，和平时期为其立法，战争时

期为其领导。地主根据自己的判断发动战争，可对邻国，有时对本国主权作战。因此，地产的大小，决定了它的安全以及对其居住者的保障。拆分地产即破坏地产，即使各拆分的部分都易受强大邻国的侵占与吞并。因此，根据当时的形势，关于地产承继，长子承继法虽并未立即，但也逐渐盛行，并且，出于同样缘由，通常君主国由长子一人承继，即便最初施行长子继承时不无例外。出于君主国权力，以及权力引发的君主国的安全，也不适合拆分土地，而应使其掌握在某位后代一人手中，令其单独继承。具体选择哪位后代极其重要，个人价值多有争议，因此必须慎重建立普遍规则，按某种清楚而无可争论的标准来选择——只有性别与年龄可以作为区分标准，毫无争议地选择一个家庭中的某位后代。大体来看，男性优于女性，若其他全部条件相当，则年长者优于年幼者，如此便产生了长子承继权，从而亦产生了所谓的直系继承。

Laws frequently continue in force long after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first gave occasion to them, and which could alone render them reasonable, are no more.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Europe, the proprietor of a single acre of land is as perfectly secure in his possession as the proprietor of 100,000. The right of primogeniture, however, still continues to be respected; and as of all institutions it is the fittest to support the pride of family distinctions, it is still likely to endure for many centuries. In every other respect, nothing can be more contrary to the real interest of a numerous family, than a right which, in order to enrich one, beggars all the rest of the children.

法律的延续有赖于最初成立时的环境，并且，只有这种环境，可使该法律保持合理。当今，在欧洲仅拥有一英亩土地的小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与拥有10万亩地的大地主同样有所保障，然而，长子承继权同样受到保护；并且，在各种制度中，长子继承最适合维护家庭区别

与其他家庭的高贵，很有可能继续保持几个世纪。但在其他任何方面，由于长子承继权使得一位后代富裕，却使其他后代陷入贫困，最不符合一个大家庭的真正利益。

Entails are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of the law of primogeniture. They were introduced to preserve a certain lineal succession, of which the law of primogeniture first gave the idea, and to hinder any part of the original estate from being carried out of the proposed line, either by gift, or device, or alienation; either by the folly, or by the misfortune of any of its successive owners. They were altogether unknown to the Romans. Neither their substitutions, nor fidei commisses, bear any resemblance to entails, though some French lawyers have thought proper to dress the modern institution in the language and garb of those ancient ones.

限嗣继承是长子继承的自然结果。长子继承引发直系继承，而施行限嗣继承，即在于维护直系继承，并防止因后代愚笨或遭逢不幸而使部分遗产以赠与、转让或割让名义落于外人之手，罗马人全然不懂。虽然法国的一些法学家主张将现今制度效仿罗马古制度，但罗马的预备继承和遗嘱信托都与限嗣继承毫无关系。

When great landed estates were a sort of principalities, entails might not be unreasonable. Like what are called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some monarchies, they might frequently hinder the security of thousands from being endangered by the caprice or extravagance of one man. But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Europe, when small as well as great estates derive their security from the laws of their country, nothing can be more completely absurd. They are founded upon the most absurd of all suppositions, the supposition that every

successive generation of men have not an equal right to the earth, and to all that it possesses; but that the property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should be restrained and regulated according to the fancy of those who died, perhaps five hundred years ago. Entails, however, are still respected,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In those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which noble birth is a necessary qualification for the enjoyment either of civil or military honours. Entails are thought necessary for maintaining this exclusive privilege of the nobility to the great offices and honours of their country; and that order having usurped one unjust advantage over the rest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lest their poverty should render it ridiculous, it is thought reasonable that they should have another.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indeed, is said to abhor perpetuities, and they are accordingly more restricted there than in any other European monarchy; though even England is not altogether without them. In Scotland, more than one fifth, perhaps more than one third part of the whole lands in the country, are at present supposed to be under strict entail.

若当时大片土地属公侯所有，则限嗣继承或许并无不可。如同一些所谓君主国的根本法律，限嗣继承可使许多人免于只因仅仅一人的奢侈或妄为而遭受威胁。但是，当今欧洲各国的大小地产同受国家法律保护，因此，限嗣继承法则毫无合理性可言，因为限嗣继承根据的是一种极为谬误的假设，即假设人类的每一代对土地及财产不具有平等的权利，现今这一代人的所有权可受到500年前先祖设想的限制与控制。现今，欧洲多地仍实行限嗣继承；特别是在一些地方，贵族血统仍是享有民事或军事荣誉的必要资格。贵族认为限嗣继承保持一种排外的特权，使其担任重要官位、享有国家荣誉。贵族阶级占有了一种不正当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国民之上，同时又担心因贫困而遭到耻笑，而贪图另外不正当的利益。却实，英国的习惯法排斥限嗣继承的永久排外性，因此，虽然英格兰的限嗣继承未完全废除，但同欧洲其

他君主国相比，限嗣继承在英国较为受限。苏格兰有至少1/5，或许1/3的土地仍严格施行限嗣继承。

Great tracts of uncultivated land were in this manner not only engrossed by particular families, but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being divided again was as much as possible precluded for ever. It seldom happens, however, that a great proprietor is a great improver. In the disorderly times which gave birth to those barbarous institutions, the great proprietor was sufficiently employed in defending his own territories, or in extending his jurisdiction and authority over those of his neighbours. He had no leisure to attend to the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land. When the establishment of law and order afforded him this leisure, he often wanted the inclination, and almost always the requisite abilities. If the expence of his house and person either equalled or exceeded his revenue, as it did very frequently, he had no stock to employ in this manner. If he was an economist, he generally found it more profitable to employ his annual savings in new purchases than in the improvement of his old estate. To improve land with profit, like all other commercial projects, requires an exact attention to small savings and small gains, of which a man born to a great fortune, even though naturally frugal, is very seldom capable. The situation of such a person naturally disposes him to attend rather to ornament, which pleases his fancy, than to profit, for which he has so little occasion. The elegance of his dress, of his equipage, of his house and household furniture, are objects which, from his infancy, he has been accustomed to have some anxiety about. The turn of mind which this habit naturally forms, follows him when he comes to think of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He embellishes, perhaps, four or five hundred acre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his house, at ten times the expence which the land is worth after all his

improvements; and finds, that if he was to improve his whole estate in the same manner, and he has little taste for any other, he would be a bankrupt before he had finished the tenth part of it. There still remain, in both par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some great estates which have continued, without interrup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same family since the times of feudal anarchy. Compare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ose estates with the possessions of the small proprietors in their neighbourhood, and you will require no other argument to convince you how unfavourable such extensive property is to improvement.

如此，大片未开垦土地不仅被少数贵族家庭吞并，失去再次分割的可能。然而大地主通常不能够改良土地，在限嗣继承这种野蛮制度产生的动荡时期，大地主几乎全部顾及防御自己的领土或扩大对邻国的管辖权与支配权，无暇顾及开垦和改良土地。随着法律建立、动荡结束，他们即便有精力，也通常无暇耕作土地，并且几乎没有必要的财力。若他居所与生活所耗超出或恰好等于收入，则缺乏耕作土地的资本，这极为常见。若他是经济学家，则会感到与其以一整年的积蓄改良旧土地，还不如购买新土地。改良土地正如制定商业计划，只有精确注意细微的利润和收入，才能盈利，但出身拥有较多财富者即使天性节俭，也同样难以如此。这类人境况良好，自幼注重衣着优雅、装扮得体、居所优越、陈列丰富，自然更注意依爱好装扮自己，不必计较利润。习惯决定心理，在改良土地时，他仍难消除这种心理，也许会大兴土木，装饰居所附近的四五百亩土地，相比改良后的土地价值，这些花费要高10倍，最终他才会发现，若他依次改良全部土地，即使没有用于其他爱好，则也会改良完成1/10前就耗尽所有财产。自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以来，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一些大地产继续为少数人所有，至今未曾变动。若比较这些大地产与周边的小地产，就无需其他论证，即可知道大地产对于土地改良是多么地不利。

If little improvement was to be expected from such great proprietors, still less was to be hoped for from those who occupied the land under them. In the ancient state of Europe, the occupiers of land were all tenants at will. They were all, or almost all, slaves, but their slavery was of a milder kind than that known among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or even in our West Indian colonies. They were supposed to belong more directly to the land than to their master. They could, therefore, be sold with it, but not separately. They could marry, provided it was with the consent of their master; and he could not afterwards dissolve the marriage by selling the man and wife to different persons. If he maimed or murdered any of them, he was liable to some penalty, though generally but to a small one. They were not, however, capable of acquiring property. Whatever they acquired was acquired to their master, and he could take it from them at pleasure. Whatever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could be carried on by means of such slaves, was properly carried on by their master. It was at his expence. The seed, the cattle, and the instruments of husbandry, were all his. It was for his benefit. Such slaves could acquire nothing but their daily maintenance. It was properly the proprietor himself, therefore, that in this case occupied his own lands, and cultivated them by his own bondmen. This species of slavery still subsists in Russia, Poland, Hungary, Bohemia, Moravia, and other parts of Germany. It is only in the 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provinces of Europe that it has gradually been abolished altogether.

若这样的大地主，都不能指望对土地有丝毫改良，则占有土地更少者就更无望。在欧洲旧状态下，耕作者都是无契约佃农，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奴隶，只是所受的奴役较古希腊、罗马，甚至西印度殖民地更轻。与其说他们从属于人，不如说从属于土地，因此，他们无法单独出卖，但可以和土地一并出卖。若主人同意，他们还可以结婚，

但主人无权将夫妻任一方卖与他人，拆散这份婚姻。若主人残害甚至杀害他们中的任一人，就要面临惩罚，但通常只是小的惩罚，且奴隶无权积蓄财产。无论他们获得什么，都属于其主，其主可予取予求。因此，奴隶对土地进行的耕作和改良，实际上都属于其主，并由主人承担费用，且种子、牲畜、农具，以及改良所获利润，都属于主人，奴隶除维持生活所需，得不到任何东西。如此，完全可以说土地由地主占有、由奴隶耕作。在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以及德国其他地区，至今仍然存在这种奴隶，仅仅是欧洲西部及西南部地区已逐渐完全废除。

But if great improvements are seldom to be expected from great proprietors, they are least of all to be expected when they employ slaves for their workmen. The experience of all ages and nations, I believe, demonstrates that the work done by slaves, though it appears to cost only their maintenance, is in the end the dearest of any. A person who can acquire no property can have no other interest but to eat as much and to labour as little as possible. Whatever work he does beyond what is sufficient to purchase his own maintenance, can be squeezed out of him by violence only, and not by any interest of his own. In ancient Italy, how much the cultivation of corn degenerated, how unprofitable it became to the master, when it fell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slaves, is remarked both by Pliny and Columella. In the time of Aristotle, it had not been much better in ancient Greece. Speaking of the ideal republic described in the laws of Plato, to maintain 5000 idle men (the number of warriors supposed necessary for its defence), together with their women and servants, would require, he says, a territory of boundless extent and fertility, like the plains of Babylon.

然而，大地主进行大的改良无望，则使用奴隶耕作而实现大的改

良更无望。我认为，各时代、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虽然表面上看，奴隶付出劳动，花费的只是维持他们生活的费用，但最终，奴隶劳动是花费最大的。一个人，若丝毫无法积累财产，则必然希望多食而少劳，工作只求维持生活，欲使榨取更多劳动，只能通过强迫，无法以其自身利益诱导。普利尼和科卢梅拉都曾论道，古时意大利在奴隶制度下，谷物耕种极不发达，奴隶主人无法获利。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古希腊，谷物耕种同样进步甚微。因此，针对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认为，欲供养五千懒惰者，即当时认为维护理想国所必备的勇士，包括其妻子和仆人，则必须有巴比伦平原那样极为广阔、肥沃的土地才可实现。

The pride of man makes him love to domineer, and nothing mortifies him so much as to be obliged to condescend to persuade his inferiors. Wherever the law allows it, and the nature of the work can afford it, therefore, he will generally prefer the service of slaves to that of freemen. The planting of sugar and tobacco can afford the expence of slave cultivation. The raising of corn, it seems, in the present times, cannot. In the English colonies, of which the principal produce is corn,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work is done by freemen. The late resolution of the Quakers in Pennsylvania, to set at liberty all their negro slaves, may satisfy us that their number cannot be very great. Had they made any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ir property, such a resolution could never have been agreed to. In our sugar colonies., on the contrary, the whole work is done by slaves, and in our tobacco colonies a very great part of it. The profits of a sugar plantation in any of our West Indian colonies, are generally much greater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cultivation that is known either in Europe or America; and the profits of a tobacco plantation, though inferior to those of sugar, are superior to those of corn, as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Both can afford the expence of slave cultivation but sugar can afford it still better than tobacco. The

number of negros, accordingly, is much greater,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whites, in our sugar than in our tobacco colonies.

人的自豪，使其以压人一等为荣，而以被迫屈就于较其下等者为耻。因此，若法律与工作性质均允许，则人一定在奴隶与自由人之间选择奴隶。种植蔗糖与烟草可提供费用，雇用奴隶耕作，而耕种谷物似乎目前尚不可如此。英国殖民地主要产物为谷物，此处大部分工作由自由人承担。近期，宾夕法尼亚教友会教徒议决释放黑奴，这一事实表明，此地黑奴数量并不在多数，因为若奴隶在他们的财产中占据较大部分，则该决议绝不会通过。但是，在以蔗糖为主要产物的英国殖民地，奴隶承担全部工作，以烟草为主要产物的英国殖民地，也由奴隶承担大部分工作。纵观欧、美，西印度殖民地种植甘蔗的利润颇为丰厚，几乎超过任何作物的耕种。虽然种植烟草利润不比甘蔗，但仍比谷物更高。种植烟草和甘蔗都能提供雇用奴隶耕作的费用，只是，种植甘蔗比烟草提供得更多。因此，在种植甘蔗的殖民地，相比种植烟草的殖民地，黑奴数量比白人数量更大。

To the slave cultivators of ancient times gradually succeeded a species of farmers, known at present in France by the name of metayers. They are called in Latin Coloni Partiarii. They have been so long in disuse in England, that at present I know no English name for them. The proprietor furnished them with the seed, cattle, and instruments of husbandry, the whole stock, in short, necessary for cultivating the farm. The produce was divided equally between the proprietor and the farmer, after setting aside what was judged necessary for keeping up the stock, which was restored to the proprietor, when the farmer either quitted or was turned out of the farm.

继古时奴隶耕作者之后，逐渐出现了一种农民，如今法国称之为“对分佃农”。拉丁文称这种农民为分益隶农，但在英格兰早已废止，因此无法得知英文如何称谓。在分益隶农制度下，地主供应种子、牲畜、农具，即耕作所需的全部资本。这种资本，须在农民离开或被逐时归还地主，生产物则须保留一部分，即维持原资本必要所需，剩余部分由地主和农民均分。

Land occupied by such tenants is properly cultivated at the expence of the proprietors, as much as that occupied by slaves. There is, however, one very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Such tenants, being freemen, are capable of acquiring property; and having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they have a plain interest that the whole produce should be as great as possible, in order that their own proportion may be so. A slave, on the contrary, who can acquire nothing but his maintenance, consults his own ease, by making the land produce as little as possible over and above that maintenance. It is probable that it was partly upon account of this advantage, and partly upon account of the encroachments which the sovereigns, always jealous of the great lords, gradually encouraged their villains to make upon their authority, and which seem, at least, to have been such as rendered this species of servitude altogether inconvenient, that tenure in villanage gradually wore out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The time and manner, however, in which so important a revolution was brought about, is one of the most obscure points in modern history. The church of Rome claims great merit in it; and it is certain, that so early as the twelfth century, Alexander III. published a bull for the general emancipation of slaves. It seems, however, to have been rather a pious exhortation, than a law to which exact obedience was required from the faithful. Slavery continued to take place almost universally for several centuries afterwards, till it was

gradually abolished by the joint operation of the two interests above mentioned; that of the proprietor on the one hand, and that of the sovereign on the other. A villain, enfranchised, and at the same time allowed to continue in possession of the land, having no stock of his own, could cultivate it only by means of what the landlord advanced to him, and must therefore have been what the French call a metayer.

可以说，对分佃农耕作土地的费用由地主承担，与奴隶耕作相同。但是，二者之间有一点根本不同，即对分佃农是自由人，能够获得财产及享有一定比例的土地生产物，总生产数量越大，可享有的部分越大。因此，显然，生产得越多，对分佃农的利益就越大。相反，奴隶无望占有财产，只希望维生，则只贪图自身的轻松，不期望土地生产物多于自己维生所需。也许这就是对分佃农对地主有利的部分原因，此外，由于君主对大地主心存芥蒂，鼓动农民反抗其权力，使人们感到奴隶耕作是不利的，因此欧洲大部分奴隶耕作渐渐消失。在近代历史中，如此之大的变革，何时发生、如何发生，是最难以考察的事件之一。罗马教会常常宣称它对于废除奴隶有功，但无疑，早在12世纪的亚历山大三世时代，他就宣布奴隶的大解放，但这似乎只是个好心的劝告，违反者并不受罚，因此后来奴隶制仍然保持了数个世纪。后来，因上述两种利益，即地主与君主利益的影响，才逐渐废除奴隶制。一个赋予了自身权利，同时允许继续拥有土地，但没有自己资本的奴隶，只有借用地主的资本，才能耕作土地。因此，他必然成为如今法国所称的对分佃农。

It could never, however, be the interest even of this last species of cultivators, to lay out, in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land, any part of the little stock which they might save from their own share of the produce; because the landlord, who laid out nothing, was to get one half of whatever it produced. The tithe, which is but

a tenth of the produce, is found to be a very great hindrance to improvement. A tax, therefore, which amounted to one half, must have been an effectual bar to it. It might be the interest of a metayer to make the land produce as much as could be brought out of it by means of the stock furnished by the proprietor; but it could never be his interest to mix any part of his own with it. In France, where five parts out of six of the whole kingdom are said to be still occupied by this species of cultivators, the proprietors complain, that their metayers take every opportunity of employing their master's cattle rather in carriage than in cultivation; because, in the one case, they get the whole profits to themselves, in the other they share them with their landlord. This species of tenants still subsists in some parts of Scotland. They are called steel-bow tenants. Those ancient English tenants, who are said by Chief-Baron Gilbert and Dr Blackstone to have been rather bailiffs of the landlord than farmers, properly so called, were probably of the same kind.

对分佃农是最后一类耕作者，然而，土地仍无法得到大的改良。对分佃农占有的部分仍然不多，其中能够节省的同样有限，因为地主仍然可以毫不花费，便占有一半的土地生产物。对分佃农决不愿用这有限的节余来改良土地。教会的什一税仅仅是生产物的1/10，就已经证明极大地阻碍了土地改良。因此，若税相当于生产物的一半，则一定会成为土地改良的障碍。对分佃农当然希望凭借地主供给的资本从土地中尽量多地生产，但他们绝不希望将自身资本与地主资本混合。据说，法国有5/6的土地仍由对分佃农耕作。地主抱怨他们的对分佃农总是抓住每个机会将其主人的牲畜用来运输，而非耕作，因为运输的全部利润归他们自己所有，耕作的利润则要与地主分享。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仍然存在着这种佃农，称为“从属于地主的佃户”。大贵族吉尔伯特和布莱克斯通博士曾说，与其称这些英格兰古代佃农为农民，不如称之为地主的从属，这种佃农可能就是属于此类。

To this species of tenantry succeeded, though by very slow degrees, farmers, properly so called, who cultivated the land with their own stock, paying a rent certain to the landlord. When such farmers have a lease for a term of years, they may sometimes find it for their interest to lay out part of their capital in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farm; because they may sometimes expect to recover it, with a large profit,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lease. The possession, even of such farmers, however, was long extremely precarious, and still is so in many parts of Europe. They could,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ir term, be legally ousted of their leases by a new purchaser; in England, even, by the fictitious action of a common recovery. If they were turned out illegally by the violence of their master, the action by which they obtained redress was extremely imperfect. It did not always reinstate them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land, but gave them damages, which never amounted to a real loss. Even in England, the country, perhaps of Europe, where the yeomanry has always been most respected, it was not till about the 14th of Henry VII. that the action of ejectment was invented, by which the tenant recovers, not damages only, but possession, and in which his claim is not necessarily concluded by the uncertain decision of a single assize. This action has been found so effectual a remedy, that, in the modern practice, when the landlord has occasion to sue for the possession of the land, he seldom makes use of the actions which properly belong to him as a landlord, the writ of right or the writ of entry, but sues in the name of his tenant, by the writ of ejectment. In England, therefore the security of the tenant is equal to that of the proprietor. In England, besides, a lease for life of forty shillings a-year value is a freehold, and entitles the lessee to a vote for a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as a great part of the yeomanry have freeholds of this kind, the whole order becomes respectable to their landlords, on account of the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which this gives them.

There is, I believe, nowhere in Europe, except in England, any instance of the tenant building upon the land of which he had no lease, and trusting that the honour of his landlord would take no advantage of so important an improvement. Those laws and customs, so favourable to the yeomanry, have perhaps contributed more to the present grandeur of England, than all their boasted regulations of commerce taken together.

对分佃农之后出现的农民，可称之为农民，他们用自己的资本耕作土地，只是需要向地主缴纳一定的地租。这种农民租借土地都有一定年限的租期，他们有时觉得投入部分资本改良土地符合自己的利益，希望在租期到期前可以收回投入的资本，并赚取较高利润。但是，即便这种农民对土地的占有，很长世间依赖都极为危险，直至今日，欧洲多地仍然如此。即使租期未满，若土地更换主人，同样可以驱逐农民而不违法。在英格兰，甚至要按照普遍退租收回租地，这是虚假的行为。一旦地主违法使用暴力来驱逐农民，则没有一套完整的诉讼章程，供农民利用，索取赔偿。农民未必可以取回原来占有的土地，通常只能赔偿损失，且往往赔偿少于损失。英格兰也许是欧洲最尊重自耕农的一个国家，但即使是英格兰，直到亨利七世14年，才颁布了改佃诉讼法，规定佃农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收回租借权，但这种诉讼不必由单单一项法令就了结，因为其决议不太可靠。该法令极为有效，因此在当今施行，若地主因土地占有权而起诉，常常不以地主的名义按权利令及收回被侵占的土地令而起诉，而以他佃农的名义，以退佃状起诉。因此，在英格兰，地主安全即佃户安全。此外，英格兰规定每年交纳40先令以上租金的终身租地权就是终身保有的不动产，承租人享有选举国会议员的权利，大部分自耕农都有终身保有的不动产，政治上充分尊重他们，因此地主更不敢对其小觑。我认为，除英格兰外，欧洲没有任何地方的佃农在不立租地契约便在土地上兴造建筑，同时相信他们的地主不会侵占他们的利益。这种法律和风俗有利于农民，也许对现代英格兰的光荣多有贡献，贡献大于为商业设立的各种夸大规定。

The law which secures the longest leases against successors of every kind, is, so far as I know, peculiar to Great Britain. It was introduced into Scotland so early as 1449, by a law of James II. Its beneficial influence, however, has been much obstructed by entails; the heirs of entail being generally restrained from letting leases for any long term of years, frequently for more than one year. A late act of parliament has, in this respect, somewhat slackened their fetters, though they are still by much too strait. In Scotland, besides, as no leasehold gives a vote for a member of parliament, the yeomanry are upon this account less respectable to their landlords than in England.

据我所知，能够保障租期最长，使得租期免受各种承继人妨碍的法律，是英国特有的。早在1449年，詹姆士二世就将这种法律传入苏格兰，但当时通常不允许限嗣继承的财产承继人以一年以上的租期出租土地。因此，该项法律的范围未以最大限度扩大。虽然国会近期立法进行补救，但无奈这些限制根深蒂固，并且，在苏格兰，承租人没有选举议员的权利，因此不如英格兰耕农般受地主尊重。

In other parts of Europe, after it was found convenient to secure tenants both against heirs and purchasers, the term of their security was still limited to a very short period; in France, for example, to nine years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lease. It has in that country, indeed, been lately extended to twenty-seven, a period still too short to encourage the tenant to make the most important improvements. The proprietors of land were anciently the legislators of every part of Europe. The laws relating to land, therefore, were all calculated for what they supposed the interest of the proprietor. It was for his interest, they had imagined, that no

lease granted by any of his predecessors should hinder him from enjoying, during a long term of years, the full value of his land. Avarice and injustice are always short-sighted, and they did not foresee how much this regulation must obstruct improvement, and thereby hurt, in the long-run, the real interest of the landlord.

虽然欧洲的其他地方同样保护佃农权利，防止其受土地承继人和购买者损害，但保障期限很短。例如，法国最初规定租期为9年，近期才延长为27年。但27年的期限仍然不足，不足以鼓励佃农进行最重要的改良。在欧洲，古代各地的地主都是立法者，土地法的订立都出于他们为地主设想的利益。他们认为，因为长期出租便无法充分体现土地价值，因此出于地主利益，祖先不应长期出租土地。他们贪婪并且不公正，永远是目光短浅的，未曾预见这种规定必将妨碍土地的改良，最后又必将损害他们自己的真正利益。

The farmers, too, besides paying the rent, were anciently, it was supposed, bound to perform a great number of services to the landlord, which were seldom either specified in the lease, or regulated by any precise rule, but by the use and wont of the manor or barony. These services, therefore, being almost entirely arbitrary, subjected the tenant to many vexations. In Scotland the abolition of all services not precisely stipulated in the lease, has, in the course of a few years, very much altered for the better the condition of the yeomanry of that country.

据推测，古代农民除需向地主缴纳租金之外，还要提供大量劳役。这种劳役，既不为租地契约明确规定，也不受任何明确规定的支配，全部依庄主或领主的需要而定。这种劳役几乎全然任意，使佃农深受其苦。苏格兰废除了一切无规定劳役，国内农民的境况不出几年

就大大改善。

The public services to which the yeomanry were bound, were not less arbitrary than the private ones. To make and maintain the high roads, a servitude which still subsists, I believe, everywhere, though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oppress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as not the only one. When the king's troops, when his household, or his officers of any kind, passed through any part of the country, the yeomanry were bound to provide them with horses, carriages, and provisions, at a price regulated by the purveyor. Great Britain is, I believe, the only monarchy in Europe where the oppression of purveyance has been entirely abolished. It still subsists in France and Germany.

自耕农遭受的私役如此随意，公役则变本加厉。我认为，维护公路的劳役在各地仍然存在，但不同国家对农民的压迫程度不等，但绝不是仅此一例。国王的军队或任何官员经过该国任一地方时，当地农民必须为其提供车马粮食。虽能够换取一定代价，但价格都由征发官决定。我相信，欧洲各君主国，只有英国完全废除了食物征发的压迫，而在法国和德国，至今尚存。

The public taxes, to which they were subject, were as irregular and oppressive as the services The ancient lords, though extremely unwilling to grant, themselves, any pecuniary aid to their sovereign, easily allowed him to tallage, as they called it, their tenants, and had not knowledge enough to foresee how much this must, in the end, affect their own revenue. The taille, as it still subsists in France. may serve as an example of those ancient tallages. It is a tax upon the supposed profits of the farmer, which they estimate by the

stock that he has upon the farm. It is his interest, therefore, to appear to have as little as possible, and consequently to employ as little as possible in its cultivation, and none in its improvement. Should any stock happen to accumulate in the hands of a French farmer, the taille is almost equal to a prohibition of its ever being employed upon the land. This tax, besides, is supposed to dishonour whatever is subject to it, and to degrade him below, not only the rank of a gentleman, but that of a burgher; and whatever rents the lands of another becomes subject to it. No gentleman, nor even any burgher, who has stock, will submit to this degradation. This tax, therefore, not only hinders the stock which accumulates upon the land from being employed in its improvement, but drives away all other stock from it. The ancient tenths and fifteenths, so usual in England in former times, seem, so far as they affected the land, to have been taxes of the same nature with the taille.

农民所负的公共税，相比劳役，同样其没有规则、甚为随意。虽然古代贵族不愿以金钱资助君主，但也毫不犹豫地任凭君主对佃农征收贡税。他们未曾料到，征收这种繁重的贡税最终必将严重影响他们自身收入。如今，法国仍然征收贡税，此即古代君主征收贡税的一个表现。假定农民有利润，贡税就是针对农民利润而征收的税，根据农民投用于土地的资本而评估。因此，农民为保护自身利益会尽可能表现得贫穷，则导致用于耕作的资本必将减至最少；而改良土地的资本，最好减少殆尽。即使法国农民积蓄了资本，同样不愿用于土地改良，因需要缴纳贡税。事实上，贡税几乎无异于禁止农民将积蓄投资于土地。此外，有人认为贡税会使任何要尽数缴纳此项税的人降低身份，不仅不能与乡绅平起平坐，甚至要低于普通市民。但是，土地的承租人必须要完整地缴纳贡税，绅士，甚至有一定财产的市民都不会忍受身份的降低。因此，施行贡税不仅使因土地而蓄积的资本，甚至是一切资本，都无法用以改良。英格兰曾经征收十分之一税和十五分之一税，就其对土地的影响而言，二者似乎与贡税性质相同。

Under all these discouragements, little improvement could be expected from the occupiers of land. That order of people, with all the liberty and security which law can give, must always improve under great disadvantage. The farmer, compared with the proprietor, is as a merchant who trades with burrowed money, compared with one who trades with his own. The stock of both may improve; but that of the one, with only equal good conduct, must always improve more slowly than that of the other, on account of the large share of the profits which is consumed by the interest of the loan. The lands cultivated by the farmer must, in the same manner, with only equal good conduct, be improved more slowly than those cultivated by the proprietor, on account of the large share of the produce which is consumed in the rent, and which, had the farmer been proprietor, he might have employed in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land. The station of a farmer, besides, is, from the nature of things, inferior to that of a proprietor.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the yeomanry are regarded as an inferior rank of people, even to the better sort of tradesmen and mechanics, and in all parts of Europe to the great merchants and master manufacturers. It can seldom happen, therefore, that a man of any considerable stock should quit the superior, in order to place himself in an inferior station. Even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Europe, therefore, little stock is likely to go from any other profess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in the way of farming. More does perhaps in Great Britain than in any other country, though even there the great stocks which are in some places employed in farming, have generally been acquired by fanning, the trade, perhaps, in which, of all others, stock is commonly acquired most slowly. After small proprietors, however, rich and great farmers are in every country the principal improvers. There are more such, perhaps, in England than in any other European monarchy. In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s of Holland, and of Berne in Switzerland, the farmers are said to be not inferior to those of England.

这些政策打消农民积极性，因此无法指望土地占有者来改良土地。尽管该阶级人民由法律赋予自由与保障，但进行土地改良却极为不利。农民之于地主，正如贷款经商者之于利用自身资本的经商者。无论贷款经商还是亲自经商，的确，只需同样慎重经营，就可以使财产增长。但是，由于贷款者的大部分利润应偿还利息，因此这些人的财富增长必然更为缓慢。同样，即使佃农一样慎重，对土地进行改良，也同样比地主更为缓慢，因为在农民大部分生产物需缴纳地租，地主却可利用这部分生产物进一步进行改良。此外，农民的地位无疑本身就要低于地主。欧洲还有大部分地方视农民为下等人，其地位甚至低于商人和技师，而放眼全欧洲，农民地位则普遍低于大商人和大制造商。因此，没有任何拥有大量财产的人会舍弃优越的地位而将自己置于下等阶级。甚至如今，欧洲人都很少会放弃将资本用于其他用途转而用于农业以改良土地。或许，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有更多资本用于农业而改良土地，但即使是英国，一些地方用于农业的大量资本，多数本身即获取自农业，而同其他用途相比，从农业中积累财富是最为缓慢的。但在所有国家，除小地主之外，土地改良的主要力量就是富农和大型农场主。在欧洲君主国中，这在英格兰最为显著。据说在荷兰共和政府及瑞士伯尔尼共和政府管辖境内，其农民的地位不逊于英格兰。

The ancient policy of Europe was, over and above all this, unfavourable to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land, whether carried on by the proprietor or by the farmer; first, by the general prohibition of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without a special licence, which seems to have been a very universal regulation; and, secondly, by the restraints which were laid upon the inland commerce, not only of corn, but of almost every other part of the

produce of the farm, by the absurd laws against engrossers, regraters, and forestallers, and by the privileges of fairs and markets.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in what manner the prohibition of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together with some encouragement given to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corn, obstructed the cultivation of ancient Italy, naturally the most fertile country in Europe, and at that time the seat of the greatest empire in the world. To what degree such restraints upon the inland commerce of this commodity, joined to the general prohibition of exportation, must have discouraged the cultivation of countries less fertile, and less favourably circumstanced, it is not, perhaps, very easy to imagine.

除上文所述之外，无论改良和耕作土地的是地主还是农民，欧洲古代的政策还有其他不利于土地的改良与耕作之处：第一、各地规定，谷物未经特许一律禁止输出；第二、政策限制谷物甚至全部其他农产品内地贸易，实行荒谬的法令，禁止包买、转卖和垄断，并为集市和市场设定特权。已经看到，古意大利土地自然是欧洲最为肥沃的土地，又是当时世界最大帝国的腹地，但由于禁止谷物输出、鼓励外国谷物进口，其土地耕作受到诸多阻碍。而土地不如古意大利般肥沃、地理位置逊色一些的国家，其土地耕作会因同样原因而遭到何种程度的阻碍，就也许不是那么容易想象了。

Chapter III.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Cities and Towns, After the Fall ofthe Roman Empire

第三章、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The inhabitants of cities and towns were, aft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not more favoured than those of the country. They

consisted, indeed, of a very different order of people from the first inhabitants of the ancient republics of Greece and Italy. These last were composed chiefly of the proprietors of lands, among whom the public territory was originally divided, and who found it convenient to build their house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one another, and to surround them with a wall, for the sake of common defence. Aft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on the contrary, the proprietors of land seem generally to have lived in fortified castles on their own estates, and in the midst of their own tenants and dependants. The towns were chiefly inhabited by tradesmen and mechanics, who seem, in those days, to have been of servile, or very nearly of servile condition. The privileges which we find granted by ancient charters to the inhabitants of some of the principal towns in Europe, sufficiently show what they were before those grants. The people to whom it is granted as a privilege, that they might give away their own daughters in marriag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ir lord, that upon their death their own children, and not their lord, should succeed to their goods, and that they might dispose of their own effects by will, must, before those grants, have been either altogether, or very nearly, in the same state of villanage with the occupiers of land in the country.

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居民并不比乡村居民境况更好。但的确，当时城市居民大大不同于古希腊共和国、意大利共和国居民。两个古代共和国居民多数是地主，他们将公有地分为己有，发现在互相邻近建造房屋甚为便利，并设立围墙，以便共同防御。相反，罗马帝国崩溃后，似乎大多地主居住在各自领地的防御性城堡中，即与佃农及从属一同居住。而城市居民以商人和工匠为主，其处境相同于或接近于奴隶。古时各宪章的颁布使得欧洲各大城市居民具有了一定的权利，这充分展现了居民未取得这些权利前，是怎样生活的。这些宪章使城市居民可以自由地出嫁女儿，无需经过领主同意；死后的财物可由子

孙继承，而不经领主之手；居民可立遗嘱，分配财产。赋予这种权利充分证明，没有这些权利前，城市居民与乡村耕作者几乎并无两样甚至完全相同，都属于被奴役的地位。

They seem, indeed, to have been a very poor, mean set of people, who seemed to travel about with their goods from place to place, and from fair to fair, like the hawkers and pedlars of the present times. In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Europe then,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several of the Tartar governments of Asia at present, taxes used to be levied upon the persons and goods of travellers, when they passed through certain manors, when they went over certain bridges, when they carried about their goods from place to place in a fair, when they erected in it a booth or stall to sell them in. These different taxes were known in England by the names of passage, pontage, lastage, and stallage. Sometimes the king, sometimes a great lord, who had, it seems, upon some occasions, authority to do this, would grant to particular traders, to such particularly as lived in their own demesnes, a general exemption from such taxes. Such traders, though in other respects of servile, or very nearly of servile condition, were upon this account called free traders. They, in return, usually paid to their protector a sort of annual poll-tax. In those days protection was seldom granted without a valuable consideration, and this tax might perhaps be considered as compensation for what their patrons might lose by their exemption from other taxes. At first, both those poll-taxes and those exemptions seem to have been altogether personal, and to have affected only particular individuals, during either their lives, or the pleasure of their protectors. In the very imperfect accounts which have been published from Doomsday-book, of several of the towns of England, mention is frequently made, sometimes of the tax which particular burghers paid, each of

them, either to the king, or to some other great lord, for this sort of protection, and sometimes of the general amount only of all those taxes.

的确，这些人看起来非常贫困，他们带着货物徘徊于各地、各集市，就像如今沿街叫卖的小贩，是下等人。当时，欧洲各国如同当今亚洲的鞑靼政府，常在这些旅行者路过某些庄园、桥梁或各地集市，并摆设摊位叫卖时，向他们本人及其货物征税。这些不同的税目在英格兰为人所知，即过界税、过桥税、仓储税和摆摊税。有时，国王和某些情况下拥有权力的大领主会特许某些商人免除各项赋税，特别是居住于他们领地内的商人。因此，虽然这些商人在其他方面与奴隶没有区别，或极为相似，但仍称之为自由商人。然而，为了回报国王或领主的保护，他们通常每年缴纳一定的人头税。当时，若不是缴纳了丰厚的税款，则很难得到保护。国王或领主为保护他们而舍弃其他税收，因此不妨将该人头税视为他们对国王或领主的补偿。最初，该人头税及其他免税都只针对个人，仅适用于特定的个人，期限或为其一生，或由保护者决定。据英格兰人口土地清册对一些城市的不完全记载，常有某位市民向国王或大领主缴纳一定的人头税，以求为这种保护；有时只记录这些人纳税的总和。

But how servile soever may have been originally the condi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owns, it appears evidently, that they arrived at liberty and independency much earlier than the occupiers of land in the country. That part of the king's revenue which arose from such poll-taxes in any particular town, used commonly to be let in farm, during a term of years, for a rent certain, sometimes to the sheriff of the county, and sometimes to other persons. The burghers themselves frequently got credit enough to be admitted to farm the revenues of this sort winch arose out of their own town, they becoming jointly and severally answerable for the whole rent.

To let a farm in this manner, was quite agreeable to the usual economy of, I believe, the sovereigns of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Europe, who used frequently to let whole manors to all the tenants of those manors, they becoming jointly and severally answerable for the whole rent; but in return being allowed to collect it in their own way, and to pay it into the king's exchequer by the hands of their own bailiff, and being thus altogether freed from the insolence of the king's officers; a circumstance in those days regarded a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但无论最初城市居民境况如何低贱，他们仍然比乡村耕作者更早获得自由和独立。城市居民的人头税是国王收入的一部分，这部分收入的比例数额大多由国王制定，并派给城市官员，有时派给其他人征收，并设一定年限。但市民往往可以取得足够的信用，允许由自身征收所在城市的产生税，联合在一起，对全部税分别负责。我认为，这种税收方式十分适合欧洲各国王通常的经济，他们过去常常另庄园的全体佃农包办庄园的全部税收，令他们联合，对全部税收分别负责。这种方式同样有利于佃农，他们可以自己的方式征税，并经执行者之手将税款上交给国王的国库，免受国王钦点官员的傲慢，当时，此情是极为重要的。

At first, the farm of the town was probably let to the burghers, in the same manner as it had been to other farmers, for a term of years only. In process of time, however, it seems to have become the general practice to grant it to them in fee, that is forever, reserving a rent certain, never afterwards to be augmented. The payment having thus become perpetual, the exemptions, in return, for which it was made, naturally became perpetual too. Those exemptions, therefore, ceased to be personal, and could not afterwards be considered as belonging to individuals, as individuals,

but as burghers of a particular burgh, which, upon this account, was called a free burgh,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they had been called free burghers or free traders.

最初，正如农民包办庄园的税，市民同样包办本市的税，只不过有年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大多数情况下都转变为税费，期限永久，额度固定不变，永不增长。缴纳此种税款可免除其他税，此种税的期限变为永久，同时就永久免除了其他税。因此，其他税的免除便不仅限于单独一人，即不再适用于个别人，而适用于特定城市内的全部居民。因此，这座城市就成为了所谓自由市，出于同样的原因，市民则成为所谓的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

Along with this grant, the important privileges, above mentioned, that they might give away their own daughters in marriage, that their children should succeed to them, and that they might dispose of their own effects by will, were generally bestowed upon the burghers of the town to whom it was given. Whether such privileges had before been usually granted, along with the freedom of trade, to particular burghers, as individuals, I know not. I reckon it not improbable that they were, though I cannot produce any direct evidence of it. But however this may have been, the principal attributes of villanage and slavery being thus taken away from them, they now at least became really free, in our present sense of the word freedom.

上文提到了多种重要权利，即自由嫁女的权利、子女承继的权利与立遗嘱的权利。这些权利，通常与这种免税权一并赋予某市市民。我不清楚这些权利通常是否也与贸易自由权一同赋予作为个人的个别市民。我承认这不无可能，但我拿不出任何直接的证据。然而无论事

实是否如此，他们都已解除了隶农及奴隶制度的主要属性。至少，按我们现在对自由一词的理解，他们的确自由了。

Nor was this all. They were generally at the same time erected into a commonalty or corporation, with the privilege of having magistrates and a town-council of their own, of making bye-laws for their own government, of building walls for their own defence, and of reducing all their inhabitants under a sort of military discipline, by obliging them to watch and ward; that is, as anciently understood, to guard and defend those walls against all attacks and surprises, by night as well as by day. In England they were generally exempted from suit to the hundred and county courts: and all such pleas as should arise among them, the pleas of the crown excepted, were left to the decision of their own magistrates. In other countries, much greater and more extensive jurisdictions were frequently granted to them.

这还不是全部。他们通常组成一种大众团体或自治机构，有权选举地方行政官，设立自己的市议会，颁布自己的政府法规，建筑城墙以自卫，以军纪使居民习惯，并令其义务巡视与守卫，即像古时所理解的那样，保护和防御这些城墙，应对攻击与意外，日夜守护。在英格兰，他们一般可免受邑法官及县法官的限制：除公诉外，他们的所有诉讼，都可由他们自己的市长裁决。在其他各国，他们的裁决权更高、更为广泛。

It might, probably, be necessary to grant to such towns as were admitted to farm their own revenues, some sort of compulsive jurisdiction to oblige their own citizens to make payment. In those disorderly times, it might have been extremely inconvenient to have

left them to seek this sort of justice from any other tribunal. But it must seem extraordinary, that the sovereigns of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Europe should have exchanged in this manner for a rent certain, never more to be augmented, that branch of their revenue, which was, perhaps, of all others, the most likely to be improved by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without either expence or attention of their own; and that they should, besides, have in this manner voluntarily erected a sort of independent republics in the heart of their own dominions.

或许市民包办税务的城市必然需要赋予某种裁决权，强迫市民义务纳税。在国家遭遇动荡时期，若这些城市向其他法庭请求裁决必然是极困难的。然而，欧洲各国君主如此以该部分税收交换这种固定的、不会增加的租税，原因在于，在所有的税收中，这种税收会自然增长，无需人们花费金钱和精力。此外，君主们还自发地在领土中心建立一种独立的共和国。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is,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in those days, the sovereign of perhaps no country in Europe was able to protect, through the whole extent of his dominions, the weaker part of his subjects from the oppression of the great lords. Those whom the law could not protect, and who were not strong enough to defend themselves, were obliged either to have recourse to the protection of some great lord, and in order to obtain it, to become either his slaves or vassals; or to enter into a league of mutual defence for the common protection of one another. The inhabitants of cities and burghs, considered as single individuals, had no power to defend themselves; but by entering into a league of mutual defence with their neighbours, they were capable of making no contemptible resistance. The lords despised the burghers, whom

they considered not only as a different order, but as a parcel of emancipated slaves, almost of a different species from themselves. The wealth of the burghers never failed to provoke their envy and indignation, and they plundered them upon every occasion without mercy or remorse. The burghers naturally hated and feared the lords. The king hated and feared them too; but though, perhaps, he might despise, he had no reason either to hate or fear the burghers. Mutual interest, therefore, disposed them to support the king, and the king to support them against the lords. They were the enemies of his enemies, and it was his interest to render them as secure and independent of those enemies as he could. By granting them magistrates of their own, the privilege of making bye-laws for their own government, that of building walls for their own defence, and that of reducing all their inhabitants under a sort of military discipline, he gave them all the means of security and independency of the barons which it was in his power to bestow. With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some regular government of this kind, without some authority to compel their inhabitants to act according to some certain plan or system, no voluntary league of mutual defence could either have afforded them any permanent security, or have enabled them to give the king any considerable support. By granting them the farm of their own town in fee, he took away from those whom he wished to have for his friends, and, if one may say so, for his allies, all ground of jealousy and suspicion, that he was ever afterwards to oppress them, either by raising the farm-rent of their town, or by granting it to some other farmer.

为理解这些，须知道在当时动荡之下，或许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君主能够保护国内更为弱小的属民，使其不受大领主压迫。这些属民既不受法律保护又无力自卫，只有投靠某大领主，成为他的奴隶或仆从以寻求庇护，或者联合以共同防卫，互相保护。单独的城市居民是

无力自卫的个人，但与邻人结成防御同盟，就会形成不可轻视的防御力。领主常常轻视市民，认为市民的身份低于自己，且市民是被释放的奴隶，甚至认为他们的族类与自己不同。因此，领主常常嫉妒和愤怒于市民的富裕，一旦有机会就毫不手软地压迫他们；市民自然憎恨或畏惧领主，国王对领主亦是如此。而虽然国王同样轻视市民，但不互相憎恨与畏惧，因此他们具有相互的利益，使得国王与市民结成同盟而共同对抗领主。对于国王来说，市民是敌人的敌人，因此国王为了自身利益，尽可能使市民的地位更加稳固，使他们无需依靠领主这种敌人。国王赋予市民推选市长，制订法规，建造城墙以自卫，从事军事训练的权力。如此，国王尽可能地发挥了他的权力，赋予市民一切的独立安全手段，使市民无需依靠领主。但是，若他们的自由同盟为他们提供永久的安全，就能对国王提供强有力的支援，欲如此，就必然需要正规的政府以及能够迫使居民服从的权威。而国王将市税永久包办给市民，即说明他愿与市民结为盟友，打消他们的嫉妒和疑虑，不会再压迫他们，会提高城市税额或再将税包办给他人。

The princes who lived upon the worst terms with their barons, seem accordingly to have been the most liberal in grants of this kind to their burghs. King John of England, for example, appears to have been a most munificent benefactor to his towns. Philip I. of France lost all authority over his barons. Towards the end of his reign, his son Lewis, known afterwards by the name of Lewis the Fat, consulted, according to Father Daniel, with the bishops of the royal demesnes, concerning the most proper means of restraining the violence of the great lords. Their advice consisted of two different proposals. One was to erect a new order of jurisdiction, by establishing magistrates and a town-council in every considerable town of his demesnes. The other was to form a new militia, by making the inhabitants of those towns,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ir own magistrates, march out upon proper occasions to the assistance of the king. It is from this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French

antiquarians, that we are to date the institution of the magistrates and councils of cities in France. It was during the unprosperous reigns of the princes of the house of Suabia,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free towns of Germany received the first grants of their privileges, and that the famous Hanseatic league first became formidable.

对领主最为忌恨的国王，通常给市民最为自由的宽赦。例如英格兰国王约翰，对市民最为宽容；法国腓力一世完全失去了对领主的权威，在其统治末期，神父丹尼尔说，其子路易，即后来所称的肥路易，与皇家领地的各位主教，谋划打压领主暴行最适当的办法。主教们提出了两种提议：一、建立新的管理体系，国王领土范围内的各大城市，均设立市长和市议会；二、城市居民组建新的平民军队，听命于市长，在适当的情况下派出，支援国王。据法国各考古学家称，正是在此时，法国建立了市长和市议会制度，德国大部分的自由市是在苏阿比亚王并不昌盛的统治之时，才得到这些特权；著名的汉萨同盟，开始崭露头角。

The militia of the cities seems, in those times, not to have been inferior to that of the country; and as they could be more readily assembled upon any sudden occasion, they frequently had the advantage in their disputes with the neighbouring lords. In countries such as Italy or Switzerland, in which, on account either of their distance from the principal seat of government, of the natural strength of the country itself, or of some other reason, the sovereign came to lose the whole of his authority; the cities generally became independent republics, and conquered all the nobility in their neighbourhood; obliging them to pull down their castles in the country, and to live, like other peaceable inhabitants, in the city. This is the short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Berne, as well

as of several other cities in Switzerland. If you except Venice, for of that city the history is somewhat different, it is the history of all the considerable Italian republics, of which so great a number arose and perished between the end of the twelf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城市平民军的力量不低于乡村平民军，且需要时更易于集合，因此在与当地领主的斗争中，城市平民军通常占有优势。意大利、瑞士等国的各城市，或许由于离都城很远，或由于本身自然力量强大，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他们丝毫不受该国君主权力的控制，多数逐渐成为了独立的民主社会，并且征服了当地贵族，迫使他们拆毁建于乡村的城堡，勒令他们与其他和平的居民一样，前往城市居住。伯尔尼共和国及瑞士其他一些城市历史虽短，但情况与此相似。12世纪末至16世纪初，除威尼斯外，意大利所有大量时兴时衰的大型共和国，其历史同样如此。

In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 and England, where the authority of the sovereign, though frequently very low, never was destroyed altogether, the cities had no opportunity of becoming entirely independent. They became, however, so considerable, that the sovereign could impose no tax upon them, besides the stated farm-rent of the town, without their own consent. They were, therefore, called upon to send deputies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states of the kingdom, where they might join with the clergy and the barons in granting, upon urgent occasions, some extraordinary aid to the king. Being generally, too, more favourable to his power, their deputies seem sometimes to have been employed by him as a counterbalance in those assemblies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great lords. Hence the origin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burghs in the states-general of all great monarchies in Europe.

虽然法国和英格兰的君主权力总是非常低微，但也从未彻底消失，因此，城市没有机会可以获得完全的独立。然而，随着市民势力的不断壮大，除已经施行的市税外，国王的一切赋税都必须征求市民的同意才能够施行。若有急需，国王则诏告全国各城市，令其派遣代表参加国会，这些代表可与牧师和贵族共同决议是否向国王提供特别的经济援助。由于多数市民代表支持国王，国王有时会利用他们来针对议会内的大领主权力进行反抗，这就是市民代表参加欧洲各大君主国的国会的由来。

Order and good government, and along with them the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individuals, were in this manner established in cities, at a time when the occupiers of land in the country, were exposed to every sort of violence. But men in this defenceless state naturally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their necessary subsistence; because, to acquire more, might only tempt the injustice of their oppressors. On the contrary, when they are secure of enjoying the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they naturally exert it to better their condition, and to acquire not only the necessaries, but the conveniencies and elegancies of life. That industry, therefore, which aims at something more than necessary subsistence, was established in cities long before it was commonly practised by the occupiers of land in the country. If, in the hands of a poor cultivator, oppressed with the servitude of villanage, some little stock should accumulate, he would naturally conceal it with great care from his master, to whom it would otherwise have belonged, and take the first opportunity of running away to a town. The law was at that time so indulgent to the inhabitants of towns, and so desirous of diminish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lords over those of the country, that if he could conceal himself there from the pursuit of his lord for a year, he was free for ever. Whatever stock, therefore,

accumulated in the hands of the industrious part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naturally took refuge in cities, as the only sanctuaries in which it could be secure to the person that acquired it.

在各个城市中，如此便确立了秩序，建立了好的政府，确保了个人的自由和安全。但当时，乡村的耕作者仍然遭受贵族的各种恶行。他们无力自卫，因此自然仅满足于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而积累财富只会招致更为苛刻的剥削。相反，若能够亲自享受自身的劳动成果，人们自然就会努力劳动，以改善自身境况，即不仅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而且还要在生活中享受便利和娱乐。因此，一些产业生产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产品，相比在乡村，这些产业在城市的建设中出现得更早。贫困的农民作为奴隶受到领主的压迫剥削，哪怕积蓄一点的财富都会小心地掩藏，以防领主发现并夺为己有，一旦抓住机会就逃往城市。此外，当时的法律对市民如此宽容，同时力求削弱领主对农民的权力。若农民逃往城市后，一年之内不被领主找到，就可以永远保有自由。因此，乡村中勤劳的居民一旦有了继续，自然就会逃往城市——唯一安全的避难所。

The inhabitants of a city, it is true, must always ultimately derive their subsistence, and the whole materials and means of their industry, from the country. But those of a city, situated near either the sea-coast or the banks of a navigable river, are not necessarily confined to derive them from the country in their neighbourhood. They have a much wider range, and may draw them from the most remote corners of the world, either in exchange for the manufactured produce of their own industry, or by performing the office of carriers between distant countries, and exchanging the produce of one for that of another. A city might, in this manner, grow up to great wealth and splendour, while not only the country

in its neighbourhood, but all those to which it traded, were in poverty and wretchedness. Each of those countries, perhaps, taken singly, could afford it but a small part, either of its subsistence or of its employment; but all of them taken together, could afford it both a great subsistence and a great employment. There were, however, within the narrow circle of the commerce of those times, some countries that were opulent and industrious. Such was the Greek empire as long as it subsisted, and that of the Saracens during the reigns of the Abassides. Such, too, was Egypt till it was conquered by the Turks, some part of the coast of Barbary, and all those provinces of Spain which were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Moors.

根本上看，城市居民的食品、原材料以及生产手段都取自乡村，事实的确是这样。但近海岸或沿通航河岸的城市居民并不一定仅从周边的乡村获取这些，有更大范围的来源供他们获取。他们或只以自身产业的制造品进行交换，或经营远方国家之间的转口贸易，即以某国产物交换另一国产物，最终从远方获取他们所需的各种商品。若一座城市周边乡村以及与其通商的乡村都非常贫困、境况惨淡，这座城市仍然可以不断向富裕与繁荣发展。单独来看，也许每座乡村对城市提供的食品与雇佣机会都是有限的；但全面来看，这些乡村整体所提供的却很可观。但是在商业范围仍极为有限时，有些国家就已经很富裕，其产业就已经很发达了，例如，希腊帝国灭亡前时期，亚巴西德治下的撒拉逊帝国、土耳其人征服之前的埃及、柏柏里海岸部分地区以及摩尔人治下的西班牙各省。

The cities of Italy seem to have been the first in Europe which were raised by commerce to any considerable degree of opulence. Italy lay in the centre of what was at that time the improved and civilised part of the world. The crusades, too, though, by the great waste of stock and destruction of inhabitants which they

occasioned, they must necessarily have retarded the progres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were extremely favourable to that of some Italian cities. The great armies which marched from all parts to the conquest of the Holy Land, gave extraordinary encouragement to the shipping of Venice, Genoa, and Pisa, sometimes in transporting them thither, and always in supplying them with provisions. They were the commissaries, if one may say so, of those armies; and the most destructive frenzy that ever befell the European nations, was a source of opulence to those republics.

在欧洲，最早似乎只有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因商业而达到较高的富裕程度。当时的意大利，位于世界的文明和进步地区的中心。虽然十字军使许多资本与财产遭到破坏，伤害了许多居民，阻碍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发展，但却大大促进了意大利部分城市的发展。其军队旨在争夺圣地，从各地出发，常常由此进行食品供给，有时从这些地方往对岸运输，因此极大促进了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各市航海业的发展，不妨说这些地方就是军队的供给地。十字军使得欧洲其他各国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但却成为了这些共和国财富的来源。

The inhabitants of trading cities, by importing the improved manufactures and expensive luxuries of richer countries, afforded some food to the vanity of the great proprietors, who eagerly purchased them with great quantities of the rude produce of their own lands. The commerce of a great part of Europe in those times, accordingly, consisted chiefly in the exchange of their own rude, for the manufactured produce of more civilised nations. Thus the wool of England used to be exchanged for the wines of France, and the fine cloths of Flanders,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corn in Poland is at this day, exchanged for the wines and brandies of France, and for the silks and velvets of France and Italy.

商业城市的居民往往将制造品和奢侈品运往富裕的国家，满足富人的虚荣心，而富人则非常愿意用自己土地生产的原产物作为交换。因此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商业主要都是以本国原产物购买更为文明国家的制造品。英格兰常以羊毛购买法国的葡萄酒以及佛兰德的呢绒，同样，波兰常常以谷物购买法国的葡萄酒、白兰地酒，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丝绸和丝绒。

A taste for the finer and more improved manufactures was, in this manner, introduced by foreign commerce into countries where no such works were carried on. But when this taste became so general as to occasion a considerable demand, the merchants, in order to save the expence of carriage, naturally endeavoured to establish some manufactures of the same kind in their own country. Hence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manufactures for distant sale, that seem to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western provinces of Europe, aft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通过国外贸易，更多没有精制造业的国家就拥有了对更加精良制造品的嗜好。但这种嗜好一旦在国内广泛产生就会带动庞大的需求，商人自然会想到在国内建立相同的制造业，以免付运费。这就是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各地区为销往远方而建立制造业的由来。

No large country, it must be observed, ever did or could subsist without some sort of manufactures being carried on in it; and when it is said of any such country that it has no manufactures, it must always be understood of the finer and more improved, or of such as are fit for distant sale. In every large country both the clothing and household furniture or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people, are the

produce of their own industry. This is even more universally the case in those poor countries which are commonly said to have no manufactures, than in those rich ones that are said to abound in them. In the latter you will generally find, both in the clothes and household furniture of the lowest rank of people, a much greater proportion of foreign productions than in the former.

必须知道，世界上从未存在完全没有制造业的大国，且决无可能。我说过有些大国没有制造业，但只是说没有更为精良、先进的制造业或适合销往远方的制造业。大国中，大部分居民的衣服以及家具都是本国产业的产物。一般在所谓没有制造业的贫穷国家，这种情况特别常见，但是在一般所谓制造业发达的富裕国家，反而并不常见。相比贫穷国家，反而是富裕国家下等人民更大部分的衣服和家具是外国产物。

Those manufactures which are fit for distant sale, seem to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wo different ways.

适合销往远方的制造业，可能以两种不同方式引入不同国家。

Sometimes they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the manner above mentioned, by the violent operation, if one may say so, of the stocks of particular merchants and undertakers, who established them in imitation of some foreign manufactures of the same kind. Such manufactures, therefore, are the offspring of foreign commerce; and such seem to have been the ancient manufactures of silks, velvets, and brocades, which flourished in Lucca during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y were banished from thence by the tyranny of one of

Machiavel's heros, Castruccio Castracani. In 1310, nine hundred families were driven out of Lucca, of whom thirty-one retired to Venice, and offered to introduce there the silk manufacture. Their offer was accepted, many privileges were conferred upon them, and they began the manufacture with three hundred workmen. Such, too, seem to have been the manufactures of fine cloths that anciently flourished in Flanders, and which were introduced into Englan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Elizabeth, and such are the present silk manufactures of Lyons and Spitalfields. Manufactures introduced in this manner are generally employed upon foreign materials, being imitations of foreign manufactures. When the Venetian manufacture was first established, the materials were all brought from Sicily and the Levant. The more ancient manufacture of Lucca was likewise carried on with foreign materials. The cultivation of mulberry trees, and the breeding of silk-worms, seem not to have been common in the northern parts of Italy before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ose arts were not introduced into France till the reign of Charles IX. The manufactures of Flanders were carried on chiefly with Spanish and English wool. Spanish wool was the material, not of the first woollen manufacture of England, but of the first that was fit for distant sale. More than one half the materials of the Lyons manufacture is at this day foreign silk; when it was first established, the whole, or very nearly the whole, was so. No part of the materials of the Spitalfields manufacture is ever likely to be the produce of England. The seat of such manufactures, as they are generally introduced by the scheme and project of a few individuals, is sometimes established in a maritime city, and sometimes in an inland town, according as their interest, judgment, or caprice, happen to determine.

第一种，正如上文所述商人和企业家的那种投资方式，有时他们

效仿某种外国的制造业，如果可以说，就是直来直往。因此，以这种方式引入的制造业是与外国通商的结果，13世纪盛行于卢卡地区的绸、绒、缎制造业，就是如此引入的。后来，马基亚韦利的英雄之一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施行暴政，驱逐了这类制造业。1310年有900个制造业家族被逐出卢卡，其中31家来到了威尼斯，将绸业引入这里。当地接受他们的请求并赋予他们多项特权，以此开办绸业，最初只雇用300名工人。呢绒业古代已在佛兰德盛行，到伊丽莎白时代才传入英格兰，它与现位于里昂及斯毕塔菲尔德的绸业似乎都是这样引入的。如此引入的制造业在于效仿外国，因此大部分都使用外国的材料。在威尼斯制造业最初产生时，全部材料都运输自西西里及黎凡特。卢卡的制造业历史更为久远，材料同样运输自国外。16世纪以前，意大利北部人似乎还不甚了解如何种植桑树与饲养蚕虫。种植桑树与饲养蚕虫的技术在查理九世统治时期才传入法国。佛兰德制造业所使用的羊毛主要运输自西班牙和英格兰。虽然英格兰毛织物最初使用的不是西班牙羊毛，但适合销往远方的毛织业最初使用的材料却是西班牙羊毛。如今里昂制造业大多使用的丝是外国丝，在里昂制造业最初建立时，就全部或几乎全部使用外国丝，而通常，斯毕塔菲尔德制造业使的材料基本都不是产自英国的。大部分此类制造业都是按少数人的计划而开办，因此，其地址有时选为沿海城市，有时选为内陆城市，具体则根据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判断和想法而定。

At other times, manufactures for distant sale grow up naturally, and as it were of their own accord, by the gradual refinement of those household and coarser manufactures which must at all times be carried on even in the poorest and rudest countries. Such manufactures are generally employed upon the materials which the country produces, and they seem frequently to have been first refined and improved In such inland countries as were not, indeed, at a very great, but at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from the sea-coast, and sometimes even from all water carriage. An inland country, naturally fertile and easily cultivated, produces a great surplus of

provisions beyond what is necessary for maintaining the cultivators; and on account of the expence of land carriage, and inconveniency of river navigation, it may frequently be difficult to send this surplus abroad. Abundance, therefore, renders provisions cheap, and encourages a great number of workmen to settle in the neighbourhood, who find that their industry can there procure them more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ies of life than in other places. They work up the materials of manufacture which the land produces, and exchange their finished work, or, what is the same thing, the price of it, for more materials and provisions. They give a new value to the surplus part of the rude produce, by saving the expence of carrying it to the water-side, or to some distant market; and they furnish the cultivators with something in exchange for it that is either useful or agreeable to them, upon easier terms than they could have obtained it before. The cultivators get a better price for their surplus produce, and can purchase cheaper other conveniencies which they have occasion for. They are thus both encouraged and enabled to increase this surplus produce by a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better cultivation of the land; and as the fertility of she land had given birth to the manufacture, so the progress of the manufacture reacts upon the land, and increases still further it's fertility. The manufacturers first supply the neighbourhood, and afterwards, as their work improves and refines, more distant markets. For though neither the rude produce, nor even the coarse manufacture, could, without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support the expence of a considerable land-carriage, the refined and improved manufacture easily may. In a small bulk it frequently contains the price of a great quantity of rude produce. A piece of fine cloth, for example which weighs only eighty pounds, contains in it the price, not only of eighty pounds weight of wool, but sometimes of several thousand weight of cor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different working people, and of their immediate employers.

The corn which could with difficulty have been carried abroad in its own shape, is in this manner virtually exported in that of the complete manufacture, and may easily be sent to the remotest corners of the world. In this manner have grown up naturally, and, as it were, of their own accord, the manufactures of Leeds, Halifax, Sheffield, Birmingham, and Wolverhampton. Such manufactures are the offspring of agriculture.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Europe, their extension and improvement have generally been posterior to those which were the offspring of foreign commerce. England was noted for the manufacture of fine cloths made of Spanish wool, more than a century before any of those which now flourish in the places above mentioned were fit for foreign sale. The extens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se last could not take place but in consequence of the extension and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e, the last and greatest effect of foreign commerce, and of the manufactures immediately introduced by it, and which I shall now proceed to explain.

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通常也有家用品制造业和粗制造业。有时，适合销往远方的制造业都是由这两种制造业依发展趋势自然逐渐改良而形成的。由这两种制造业逐渐改良而形成的制造业，基本使用本国生产的材料；最初，这些材料往往加工于离海岸很远的内陆地区，有时甚至是离通航水路很远的内陆地区。土壤肥沃的内陆地区易于耕作，生产物除维持耕作者生活必需之外还有剩余。因陆运费用高，航运不方便，剩余生产物不易运往外地。因此，收获丰富使得粮食价格低，吸引工人定居在周边地区。工人们发现，他们在此处劳动，可比在其他地方可获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他们使用本地生产的材料，加工以制造成品，即以成品价格换取更多的材料和食品。从内地到沿河、沿海地区或更远的市场会产生运输费用，他们如此便节省了运输费，使得原生产物的剩余部分增加了新的价值。如此，工人即可以更为简单的条件，提供给耕作者产品，以换取对他们有用或适合

他们的产品。耕作者可以提高剩余生产物更高的价格，也可以低价购买所需的其他便利品，鼓励了农民耕作，并使农民有能力进一步改良土地，于是增加剩余产量。土地肥沃使制造业产生，而制造业发展又提高土地生产力。最初，制造业仅供应本地，后来，产品得到改良，更为精致，由于原生产物甚至粗制造品陆运运往远方费用较高，难以负担，精制造品却不会面临这种困难，于是改良后的产品供应远方市场。精制造品体积虽小，却包括原生产物的较高的价值。例如，虽然一匹精制呢绒重量仅80磅，但其包含的价格却不仅相当于80磅羊毛，且有时，相当于几千磅谷物，即各类工人及其直接雇主生活资料的价格。若将等价的谷物以其本来形态运往国外必然极为困难，但若以精制品运输则即便是最远的角落，同样易于运往。利兹、哈利法克斯、谢菲尔德、伯明翰、伍尔弗汉普顿等地的制造业就是以此方式自然发展的。这种制造业是农业的结果，在欧洲现代史中，这种制造业的推广与改进通常迟于那些由对外贸易促成的制造业。在上述各地中，有些制造业如今甚为繁荣，这些地方的产品适合售往国外以前至少一个世纪，英格兰就有以西班牙羊毛为原料的精制呢绒业，因此而闻名。若没有农业的发展，这些制造业就不会推广与改进，而国外贸易直接引入了制造业，其最近和最大的结果就是农业的推广与改进，我将在下文继续说明。

Chapter IV. How the Commerce of TownsContribu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Country

第四章、城市商业对乡村改良的贡献

The increase and riches of commercial and manufacturing towns contributed to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e countries to which they belonged, in three different ways:

商业与制造业城市的增加与富裕可促进从属乡村的改良与土地耕

作，有以下三种途径：

First, by affording a great and ready market for the rude produce of the country, they gave encouragement to its cultivation and further improvement. This benefit was not even confined to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were situated, but extended more or less to all those with which they had any dealings. To all of them they afforded a market for some part either of their rude or manufactured produce, and, consequently, gave some encouragement to the industry and improvement of all. Their own country, however, on account of its neighbourhood, necessarily derived the greatest benefit from this market. Its rude produce being charged with less carriage, the traders could pay the growers a better price for it, and yet afford it as cheap to the consumers as that of more distant countries.

首先，为乡村原生产物提供广阔而便利的市场，从而促进乡村进一步改进与土地的耕作。不仅城市周边乡村可以受此裨益，与城市通商的任何乡村都能够得到好处，城市这些乡村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提供市场，促进其产业发展与改进。当然，距城市最近的乡村受到的益处最大。运输原生产物费用较低，因此，商人可向生产者支付更高的价格，但相比更远的乡村的消费者，购买价格却同样低廉。

Secondly, the wealth acquired by the inhabitants of cities was frequently employed in purchasing such lands as were to be sold, of which a great part would frequently be uncultivated. Merchants are commonly ambitious of becoming country gentlemen, and, when they do, they are generally the best of all improvers. A merchant is accustomed to employ his money chiefly in profitable projects;

whereas a mere country gentleman is accustomed to employ it chiefly in expence. The one often sees his money go from him, and return to him again with a profit; the other, when once he parts with it, very seldom expects to see any more of it. Those different habits naturally affect their temper and disposition in every sort of business. The merchant is commonly a bold, a country gentleman a timid undertaker. The one is not afraid to lay out at once a large capital upon the improvement of his land, when he has a probable prospect of raising the value of it in proportion to the expence; the other, if he has any capital, which is not always the case, seldom ventures to employ it in this manner. If he improves at all, it is commonly not with a capital, but with what he can save out or his annual revenue. Whoever has had the fortune to live in a mercantile town, situated in an unimproved country, must have frequently observed how much more spirited the operations of merchants were in this way, than those of mere country gentlemen. The habits, besides, of order, economy, and attention, to which mercantile business naturally forms a merchant, render him much fitter to execute, with profit and success, any project of improvement.

其次，城市居民通常用获得财富购买待售的土地，通常，这些土地很大一部分是未开垦的土地。商人们都渴望成为乡绅，且若他们成为乡绅，往往最适合改良土地。商人不同于乡绅，乡绅习惯于奢侈，习惯花费，而商人却为盈利而投资经营，就希望将钱投出后，在收回的时候产生一些利润。这两种不同的习惯，必然使他们在经营任何生意时具有不同的脾气和性格。作为经营者，商人通常是勇敢的，乡绅通常是胆怯的。若商人认为大量投资改良土地有望按照费用的比例增加资本价值，则他会毫不犹豫。但很少有乡绅有资本，即使有资本也很少有人敢于以这种方式投资。若他的确进行了改良，但通常并不是利用资本，而是利用从年收入中节省的部分。假如居住在周边乡村土地大多未经开垦的商业城市中，就会发现商人以此方式投资比乡绅大

大活跃。此外，商人因经商养成了秩序、节省和谨慎等习惯，使得他们更适合进行任何土地改良，有望获利与成功。

Thirdly, and lastly,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gradually introduced order and good government, and with them the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individuals, among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who had before lived almost in a continual state of war with their neighbours, and of servile dependency upon their superiors. This, though it has been the least observed, is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ir effects. Mr Hume is the only writer who, so far as I know, has hitherto taken notice of it.

第三，乡村居民始终处于与其邻人争斗和对上级的奴役状态，但商业与制造业的发达使他们逐渐建立了秩序、好的政府，保障了个人的安全和自由。这是商业与制造业最重要的影响，但人们并未注意。据我所知，注意到这种影响的著作家迄今仅休谟先生一人。

In a country which has neither foreign commerce nor any of the finer manufactures, a great proprietor, having nothing for which he can exchang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roduce of his lands which is over and above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ultivators, consumes the whole in rustic hospitality at home. If this surplus produce is sufficient to maintain a hundred or a thousand men, he can make use of it in no other way than by maintaining a hundred or a thousand men. He is at all times, therefore, surrounded with a multitude of retainers and dependants, who, having no equivalent to give in return for their maintenance, but being fed entirely by his bounty, must obey him,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soldiers must obey the prince who pays them. Before the extension of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in Europe, the hospitality of the rich and the great, from the sovereign down to the smallest baron, exceeded every thing which, in the present times, we can easily form a notion of Westminster-hall was the dining-room of William Rufus, and might frequently, perhaps, not be too large for his company. It was reckoned a piece of magnificence in Thomas Becket, that he strewed the floor of his hall with clean hay or rushes in the season, in order that the knights and squires, who could not get seats, might not spoil their fine clothes when they sat down on the floor to eat their dinner. The great Earl of Warwick is said to have entertained every day, at his different manors, 30,000 people; and though the number here may have been exaggerated, it must, however, have been very great to admit of such exaggeration. A hospitality nearly of the same kind was exercised not many years ago in many different parts of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It seems to be common in all nations to whom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are little known. I have seen, says Doctor Pocock, an Arabian chief dine in the streets of a town where he had come to sell his cattle, and invite all passengers, even common beggars, to sit down with him and partake of his banquet.

在既没有国外贸易又没有精制造业的乡村，在维持耕作者所需之外，剩余的大部分土地生产物无法交换，所以大地主便可随意花费，款待客人，以乡村的方式。若剩余的生产物足以供养100人，就会用来供养100人，若足以供养1000人，就用来供养1000人。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用途。因此，地主身侧常有大量的仆人和从属，依赖他的供养，不支付任何等价的物品作为报纸，只是单纯地服从，如同士兵服从国王一样。在欧洲商业与制造业扩张以前，从君主到小领主的各种富人和大人物，招待客人极为奢侈，甚至超出我们今日的想象，正如威斯敏斯特大厅是威廉·鲁弗斯的餐厅，但相比其招待宾客人数之多，餐厅并不显大。托马斯·贝克特在大厅的地上铺上当季清洁的干草，以免那些没有座位的骑士和乡绅席地而坐用餐而弄脏他们精细的衣服。

据说，沃里克伯爵在他不同的庄园每日要招待多达3万名宾客，虽然这可能有些夸张，但的确近乎如此。在不久的几年前，如此之大的待客规模在苏格兰高地的许多地区仍有发生，甚至连商业与制造业欠发达的民族似乎都同样如此。波科克博士曾说他见过一位阿拉伯族长在城市中售卖牲畜时，在大街上即邀请所有路人，即使是普通的乞丐，落座参加他的宴席。

The occupiers of land were in every respect as dependent upon the great proprietor as his retainers. Even such of them as were not in a state of villanage, were tenants at will, who paid a rent in no respect equivalent to the subsistence which the land afforded them. A crown, half a crown, a sheep, a lamb, was some years ago, in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a common rent for lands which maintained a family. In some places it is so at this day; nor will money at present purchase a greater quantity of commodities there than in other places. In a country where the surplus produce of a large estate must be consumed upon the estate itself, it will frequently be more convenient for the proprietor, that part of it be consumed at a distance from his own house, provided they who consume it are as dependent upon him as either his retainers or his menial servants. He is thereby saved from the embarrassment of either too large a company, or too large a family. A tenant at will, who possesses land sufficient to maintain his family for little more than a quit-rent, is as dependent upon the proprietor as any servant or retainer whatever, and must obey him with as little reserve. Such a proprietor, as he feeds his servants and retainers at his own house, so he feeds his tenants at their houses. The subsistence of both is derived from his bounty, and its continuance depends upon his good pleasure.

土地耕作者在所有方面都依赖于大领主，就像他的仆人。即使他们不是仆人，也是无契约佃农。无论在任何方面，这些土地耕作者缴纳的地租，其价值都无法与土地所产出的生活资料相提并论。几年前，苏格兰高地地区，足以供养全家生活的土地，通常只缴纳1克朗、半克朗的地租，或只是一只羊或小羊，一些地方如今仍然如此，且如今这些地方的货币，并不能比其他地方的货币购买更多商品。若一座乡村中，大庄园生产的剩余生产物须由本庄园自身消费，则在这座乡村内，若消费剩余生产物的人同地主的仆从或奴婢一样，听他命令，则在与他自身居所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消费，对于地主来说，更为便利。因为如此，地主就不必为仆从过多、家庭过大而感到烦恼。若无契约佃农支付的地租仅稍高于免役税，便能够拥有足够的土地，以维持家庭，则他就从属于地主，相当于地主的仆人和随从。必须几乎毫无保留地服从地主。此类地主在佃农家里供养他们，无异于在自家供养仆人和随从。佃农和仆人的生活资料都由主人提供，而持续多久则依地主的喜怒。

Upon the authority which the great proprietors necessarily had, in such a state of things, over their tenants and retainers, was founded the power of the ancient barons. They necessarily became the judges in peace, and the leaders in war, of all who dwelt upon their estates. They could maintain order, and execute the law,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demesnes, because each of them could there turn the whole force of all the inhabitants against the injustice of anyone. No other person had sufficient authority to do this. The king, in particular, had not. In those ancient times, he was little more than the greatest proprietor in his dominions, to whom, for the sake of common defence against their common enemies, the other great proprietors paid certain respects. To have enforced payment of a small debt within the lands of a great proprietor, where all the inhabitants were armed, and accustomed to stand by one another, would have cost the king, had he attempted it by his

own authority, almost the same effort as to extinguish a civil war. He was, therefore, obliged to aband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ountry, to those who were capable of administering it;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to leave the command of the country militia to those whom that militia would obey.

既如此，大地主对其佃农和仆人必然有一种权威，人们发现这种权威成就了古代贵族的权力。和平时期，他们必然是领地内居民的裁决者，在战争时期则是他们的领导者。他们有权统领领地内居民，以对抗任何不法者，在领地内维持治安、执行法律。其他任何人都无此权力，即便是国王。古代，国王只是领地内最大的地主，只有在联手抵抗共同的敌人是，才会给予其他领主一定的尊敬。大领主领地内人民的债务很小，若国王靠自身权力强制他们偿还，则这些居民一旦联合起来进行武装，则欲消灭他们，国王将几乎消耗摆平一次内战所需的军力。因此，国王只得放弃大部分乡村的司法权，移交给有能力执行者，同样，将统率乡村民军的权力移交给乡民能够服从的人。

It is a mistake to imagine that those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s took their origin from the feudal law. Not only the highest jurisdictions, both civil and criminal, but the power of levying troops, of coining money, and even that of making bye-law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ir own people, were all rights possessed allodially by the great proprietors of land, several centuries before even the name of the feudal law was known in Europe. The authority and jurisdiction of the Saxon lords in England appear to have been as great before the Conquest as that of any of the Norman lords after it. But the feudal law is not supposed to have become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till after the Conquest. That the most extensive authority and jurisdictions were possessed by the great lords in France allodially, long before the feudal law was introduced into

that country, is a matter of fact that admits of no doubt. That authority, and those jurisdictions, all necessarily flowed from the state of property and manners just now described. Without remounting to the remote antiquities of either the French or English monarchies, we may find, in much later times, many proofs that such effects must always flow from such causes. It is not thirty years ago since Mr Cameron of Lochiel, a gentleman of Lochaber in Scotland, without any legal warrant whatever, not being what was then called a lord of regality, nor even a tenant in chief, but a vassal of the Duke of Argyll, and with out being so much as a justice of peace, used, notwithstanding, to exercise the highest criminal jurisdictions over his own people. He is said to have done so with great equity, though without any of the formalities of justice; and it is not improbable that the state of that part of the country at that time made it necessary for him to assume this authority,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public peace. That gentleman, whose rent never exceeded £500 a-year, carried, in 1745, 800 of his own people into the rebellion with him.

认为这些地方性的裁决权起源于封建法律，是错误的。在欧洲甚至连封建法律这个名称都未出现前数百年，不仅无论民事还是刑事的最高裁决权，还有征兵权、铸币权甚至为当地人民政府制定细则的权力，就已经为大地主所掌握。在诺曼征服以前，萨克逊地主们掌握的统治权与裁决权不在征服后诺曼地主们所掌握之下。但不能认为封建法律直到征服后才成为英格兰的习惯法。在法国，地主极为广阔的统治权与裁决权大大先于封建法律而出现，这一事实必须承认，无可置疑。无疑，这种权力会因上述财产规定及与惯例而产生。暂不考虑遥远古代的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君主国，即使在更晚的时代，同样可以发现许多证据，证明该原因必将导致该结果的发生。距今不足30年前，在苏格兰的洛哈伯地区有位绅士，名叫卡梅伦，他不是贵族地主，甚至算不上大佃农，仅仅是阿盖尔公爵的一位从属；既无合法授权，又

不是治安法官，却能够对他从属的人们行使最高的刑事裁决。但是据说，虽然他不经过正式的形式裁决，却极为公正。或许当时，当地的状况使得他必须行使该权力，以维持公共治安。这位绅士每年得到的租金不足500镑，却于1745年率领治下800人民发动了起义。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feudal law, so far from extending, may be regarded as an attempt to moderate, the authority of the great allodial lords. It established a regular subordination, accompanied with a long train of services and duties, from the king down to the smallest proprietor. During the minority of the proprietor, the rent, together with the management of his lands, fell into the hands of his immediate superior; and, consequently, those of all great proprietors into the hands of the king, who was charged with the maintenance and education of the pupil, and who, from his authority as guardian, was supposed to have a right of disposing of him in marriage, provided it was in a manner not unsuitable to his rank. But though this institution necessarily tended to strengthen the authority of the king, and to weaken that of the great proprietors, it could not do either sufficiently for establishing order and good government among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because it could not alter sufficiently that state of property and manners from which the disorders arose.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still continued to be, as before, too weak in the head, and too strong in the inferior members; and the excessive strength of the inferior members was the cause of the weakness of the head. After the institution of feudal subordination, the king was as incapable of restraining the violence of the great lords as before. They still continued to make war according to their own discretion, almost continually upon one another, and very frequently upon the king; and the open country still continued to be a scene of violence, rapine, and disorder.

实行封建法律目的并非在于扩大封建大领主的权力，而仅仅是使其缓和。封建法律制定极为森严的等急，各尽职责与义务，从国王到最低级的领主。领主尚未成年期间，其土地的地租和土地的管理权都由其直接的上级代为掌管。这使得此间的地租和管理权最终属于国王，而国王有责任保护与教育他们，并作为监护者为他们安排婚事，但结婚对象须与他们身份相当。然而，虽然封建法律最初旨在巩固国王权力而削弱大领主权力，但由于未能彻底改变混乱导致的财产规定及与惯例，仍不足以产生好的政府，未为乡村居民建立良好的秩序。政府的权力依旧不够，贵族的权力则太大，后者正是前者的原因。虽然确立了封建等级，但国王仍不能使大领主彻底臣服，他们依旧骄横，甚至互相之间始终任意地发动战争，甚至经常对国王开战。广大乡村仍继续充斥着暴力、劫掠与动乱。

But what all the violence of the feudal institutions could never have effected, the silent and insensible operation of foreign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gradually brought about. These gradually furnished the great proprietors with something for which they could exchange the whole surplus produce of their lands, and which they could consume themselves, without sharing it either with tenants or retainers. All for ourselves, and nothing for other people, seems, in every age of the world, to have been the vile maxim of the masters of mankind. As soon, therefore, as they could find a method of consuming the whole value of their rents themselves, they had no disposition to share them with any other persons. For a pair of diamond buckles, perhaps, or for something as frivolous and useless, they exchanged the maintenance, or, what is the same thing, the price of the maintenance of 1000 men for a year, and with it the whole weight and authority which it could give them. The buckles, however, were to be all their own, and no other human creature was to have any share of them; whereas, in

the more ancient method of expence, they must have shared with at least 1000 people. With the judges that were to determine the preference, this difference was perfectly decisive; and thus, for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 most childish, the meanest, and the most sordid of all vanities they gradually bartered their whole power and authority.

然而，许多事情靠封建制度的强制难以实现，但国外商业和制造业却可在不知不觉中使其逐渐实现。国外商业与制造业的兴起逐渐使得大领主可利用土地全部剩余生产物，交换其他产品，且不需要将换得的产品与佃农和仆人分享，完全供自身消费。似乎世界各时代的全部领主都遵循一种可鄙的准则，即自己是全人类的主人。因此，他们一旦发现了方法，可由自己消费所收地租的全部价值，就再也不愿分享予他人，宁愿将足以维持1000人一年生活的食物或其等价物品购买一对金刚石纽扣或其他同样无甚用途与意义的物品，致使他们丧失权威，因为提供这些食物可为他们带来权威。按之前的方式消费，他至少要与1000人分享，而金刚石纽扣则是独享的，区别显而易见。至于决定选择哪头，则需要进行判断，为满足极为幼稚与吝啬与卑鄙的虚荣心，他们逐渐完全舍弃了权威。

In a country where there is no foreign commerce, nor any of the finer manufactures, a man of £10,000 a-year cannot well employ his revenue in any other way than in maintaining, perhaps, 1000 families, who are all of them necessarily at his command.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Europe, a man of £10,000 a-year can spend his whole revenue, and he generally does so, without directly maintaining twenty people, or being able to command more than ten footmen, not worth the commanding. Indirectly, perhaps, he maintains as great, or even a greater number of people, than he could have done by the ancient method of expence. For though the

quantity of precious productions for which he exchanges his whole revenue be very small, the number of workmen employed in collecting and preparing it must necessarily have been very great. Its great price generally arises from the wages of their labour, and the profits of all their immediate employers. By paying that price, he indirectly pays all those wages and profits, and thus indirectly contributes to the maintenance of all the workmen and their employers. He generally contributes, however, but a very small proportion to that of each; to a very few, perhaps, not a tenth, to many not a hundredth, and to some not a thousandth, or even a ten thousandth part of their whole annual maintenance. Though he contributes, therefore,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m all, they are all more or less independent of him, because generally they can all be maintained without him.

在既没有国外贸易又没有精制造业的国家，若有人年收入为1万镑，则他或许只得以供养1000个家庭，令他们为其听命，没有其他消费方式。但当今欧洲年有收入达1万镑者，却可消费全部收入而不必直接供养20人或直接命令那些十多位没有任命价值的人，事实通常正是如此。或许，相比按从前的方式雇用的人，如今间接维持的人数相同。或许以全部收入仅购买了少许珍贵物品，但雇用的工人却必然更多，以收集或制造这些珍贵物品。基本上，珍贵物品价格之高都由于工人报酬或其直接雇主的利润高。直接支付物品的价格，就等于间接地支付了全部报酬与利润，从而间接维持了这些工人及其雇主生活。然而，他大体上只帮助了每个人年生活资料的极小部分，也许只够1/10，甚至对许多人来说只有1/100，甚至1/1000、1/10000。因此，虽然他的确帮助了他们所有人维持生活，但他们对他的依赖有多又少，因为总体而言，没有他的帮助，他们也能够生存。

When the great proprietors of land spend their rents in

maintaining their tenants and retainers, each of them maintains entirely all his own tenants and all his own retainers. But when they spend them in maintaining tradesmen and artificers, they may, all of them taken together, perhaps maintain as great, or, on account of the waste which attends rustic hospitality, a greater number of people than before. Each of them, however, taken singly, contributes often but a very small share to the maintenance of any individual of this greater number. Each tradesman or artificer derives his subsistence from the employment, not of one, but of a hundred or a thousand different customers. Though in some measure obliged to them all, therefore, he is not absolutely dependent upon any one of them.

若大地主们靠地租维持佃农和从属们的生活，则每位地主都是独立维持各自佃农和从属的全部生活。但是，若他们靠地租维持商人和工匠时，则或许他们联合在一起所供养的人数同从前一样，这是将乡村式的待客方式所造成的浪费计算在内的。然而，若单独考虑每位地主，则他们供养的人如此之多，折算起来则对其没人的供养微乎其微。每位商人或工匠的生活费都非来自一位顾客，而是来自上百、上千位不同顾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要靠每位地主来供养，但也并非只能依赖于其中任何一位地主来维持生活。

The personal expence of the great proprietors having in this manner gradually increased, it was impossible that the number of their retainers should not as gradually diminish, till they were at last dismissed altogether. The same cause gradually led them to dismiss the unnecessary part of their tenants. Farms were enlarged, and the occupiers of land, notwithstanding the complaints of depopulation, reduced to the number necessary for cultivating it, according to the imperfect state of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in

those times. By the removal of the unnecessary mouths, and by exacting from the farmer the full value of the farm, a greater surplus, or, what is the same thing, the price of a greater surplus, was obtained for the proprietor, which the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soon furnished him with a method of spending upon his own person, in the same manner as he had done the rest. The cause continuing to operate, he was desirous to raise his rents above what his lands, in the actual state of their improvement, could afford. His tenants could agree to this upon one condition only, that they should be secured in their possession for such a term of years as might give them time to recover, with profit, whatever they should lay not in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land. The expensive vanity of the landlord made him willing to accept of this condition; and hence the origin of long leases.

如此，大地主的个人消费逐渐增多了，因此他就必须渐渐削减或裁掉所供养的从属。出于相同原因，也要逐步裁掉不必要的佃农。既然农场扩大了，同时地主不顾被裁掉者的抱怨，虽然当时耕作与改良情况欠佳，仍裁剪人数，达到所能达到的最低人数。地主裁掉了不必要的从属，并从佃农手中榨取农场生产的全部价值，他就得到了更多的剩余，即提高了剩余生产物的价格，而商人和制造业者使他找到了消费方式，他就可以自己消费，正如此前消费剩余一样。个人消费增加，又使地主们对地租更加渴望，希望地租超出现有改良状态下的土地所能生产的价值。如此就需要进一步改良土地，只有使租地期限足够长，使佃农足以收回增加的费用及利润，他们才会同意地主增加地租。地主们为虚荣要花费巨大，只好接受佃农的境况，这就是长期租地权的由来。

Even a tenant at will, who pays the full value of the land, is not altogether dependent upon the landlord. The pecuniary advantages

which they receive from one another are mutual and equal, and such a tenant will expose neither his life nor his fortune in the service of the proprietor. But if he has a lease for along term of years, he is altogether independent; and his landlord must not expect from him even the most trifling service, beyond what is either expressly stipulated in the lease, or imposed upon him by the common and known law of the country.

即使耕作土地的无契约佃农将土地生产的全部价值都支付给了地主，他也并非完全从属于地主，他们金钱利益是相互和平等的。无契约佃农为地主服务，但绝不会牺牲生命与财产。租期延长后，佃农就几乎独立了，除租约规定或参照习惯法，地主无法指望他们提供更多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服务。

The tenants having in this manner become independent, and the retainers being dismissed, the great proprietors were no longer capable of interrupting the regular execution of justice, or of disturbing the peace of the country. Having sold their birth-right, not like Esau, for a mess of pottage in time of hunger and necessity, but, in the wantonness of plenty, for trinkets and baubles, fitter to be the playthings of children than the serious pursuits of men, they became as insignificant as any substantial burgher or tradesmen in a city. A regular government was established in the country as well as in the city, nobody having sufficient power to disturb its operations in the one, any more than in the other.

如此，大地主使佃农实现独立，又裁剪了从属，就无法再干涉法律的正常的执行，无法再扰乱乡村的安定。他们已经出卖了与生俱来的权力，当然出卖权力并非如同埃绍，是出于应对饥饿与必需品，他

们只是为了填满腰包，为了得到小饰品和小物件这种适合儿童玩耍而不适合严肃的人所应追求的东西。因此，他们就变得平庸，如同城市中富有的市民或商人一般。于是，城市吉祥村都设立了规则的政府，无人有能力扰乱城市及乡村的秩序。

It does not, perhaps, relate to the present subject, but I cannot help remarking it, that very old families, such as have possessed some considerable estate from father to son for many successive generations, are very rare in commercial countries. In countries which have little commerce, on the contrary, such as Wales, or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they are very common. The Arabian histories seem to be all full of genealogies; and there is a history written by a Tartar Khan,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several European languages, and which contains scarce any thing else; a proof that ancient families are very common among those nations. In countries where a rich man can spend his revenue in no other way than by maintaining as many people as it can maintain, he is apt to run out, and his benevolence, it seems, is seldom so violent as to attempt to maintain more than he can afford. But where he can spend the greatest revenue upon his own person, he frequently has no bounds to his expence, because he frequently has no bounds to his vanity, or to his affection for his own person. In commercial countries, therefore, riches, in spite of the most violent regulations of law to prevent their dissipation, very seldom remain long in the same family. Among simple nations, on the contrary, they frequently do, without any regulations of law; for among nations of shepherds, such as the Tartars and Arabs, the consumable nature of their property necessarily renders all such regulations impossible.

有一点或许与目前讨论的话题无关，但我还是要提及。即在商业

国家，极少出现古老世家的大宗地产由父辈传与子辈，再传与后代的现象。相反，在商业不发达的威尔士、苏格兰高地等地区，则极为常见。阿拉伯的历史似乎充满各大世家，有一位鞑靼可汗曾著成了一部历史，并译为多种欧洲语言，几乎全部关于世家的存在的证据，证明世家在这些国家极为常见。在有些国家，富人的收入仅用于供养尽可能多的人，他往往倾尽所有，有极大的善举，甚至希望供养比他有能力供养的更多的人。但在那些收入最大部分由个人消费的国家，富人就往往无限度地挥霍，因为人的虚荣心是无限的，永远无法满足。因此，即使商业国有极为严格的法律禁止浪费，但能够长期保持富裕的家庭同样屈指可数；而在商业不发达的国家，即使没有这样的法律，能够长期保持富裕的家庭却很多。鞑靼和阿拉伯等游牧民族的财产消费不便，因此就没有必要制定这样的法律规定。

A revolution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to the public happiness, was in this manner brought about by two different orders of people, who had not the least intention to serve the public. To gratify the most childish vanity was the sole motive of the great proprietors. The merchants and artificers, much less ridiculous, acted merely from a view to their own interest, and in pursuit of their own pedlar principle of turning a penny wherever a penny was to be got. Neither of them had either knowledge or foresight of that great revolution which the folly of the one, and the industry of the other, was gradually bringing about.

如此，两个完全不关心公众的阶级却引发了对于公众福祉极为重要的革命。大地主的唯一目的在于满足最幼稚的虚荣心，而商人和工匠，虽不如地主那般荒唐，却也只关心自身利益，只是遵从他们小贩式的准则，追求尽量赚钱。大地主与商人和工匠对此革命既无所知，又无预见，但却是大地主之愚与商人和工匠的勤劳，逐渐催生了这次革命。

It was thus, that,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the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of cities, instead of being the effect, have been the cause and occasion of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e country.

因此欧洲大部分地区城市的商业与制造业是促使乡村土地改良与耕作的原因，而非其结果。

This order, however, being contrary to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is necessarily both slow and uncertain. Compare the slow progress of those European countries of which the wealth depends very much upon their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with the rapid advances of our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of which the wealth is founded altogether in agriculture.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the number of inhabitants is not supposed to double in less than five hundred years. In several of our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it is found to double in twenty or five-and-twenty years. In Europe, the law of primogeniture, and perpetuities of different kinds, prevent the division of great estates, and thereby hinder the multiplication of small proprietors. A small proprietor, however, who knows every part of his little territory, views it with all the affection which property, especially small property, naturally inspires, and who upon that account takes pleasure, not only in cultivating, but in adorning it, is generally of all improvers the most industrious, the most intelligent, and the most successful. The same regulations, besides, keep so much land out of the market, that there are always more capitals to buy than there is land to sell, so that what is sold always sells at a monopoly price. The rent never pays the interest of the purchase-money, and is, besides, burdened

with repairs and other occasional charges, to which the interest of money is not liable. To purchase land, is, everywhere in Europe, a most unprofitable employment of a small capital. For the sake of the superior security, indeed, a man of moderate circumstances, when he retires from business, will sometimes choose to lay out his little capital in land. A man of profession, too whose revenue is derived from another source often loves to secure his savings in the same way. But a young man, who, instead of applying to trade or to some profession, should employ a capital of two or three thousand pounds in the purchase and cultivation of a small piece of land, might indeed expect to live very happily and very independently, but must bid adieu for ever to all hope of either great fortune or great illustration, which, by a different employment of his stock, he might have had the same chance of acquiring with other people. Such a person, too, though he cannot aspire at being a proprietor, will often disdain to be a farmer. The small quantity of land, therefore, which is brought to market, and the high price of what is brought thither, prevents a great number of capitals from being employed in its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taken that direction. In North America, on the contrary, fifty or sixty pounds is often found a sufficient stock to begin a plantation with. The purchase and improvement of uncultivated land is there the most profitable employment of the smallest as well as of the greatest capitals, and the most direct road to all the fortune and illustration which can be required in that country. Such land, indeed, is in North America to be had almost for nothing, or at a price much below the value of the natural produce; a thing impossible in Europe, or indeed in any country where all lands have long been private property. If landed estates, however, were divided equally among all the children, upon the death of any proprietor who left a numerous family, the estate would generally be sold. So much land would come to market, that

it could no longer sell at a monopoly price. The free rent of the land would go no nearer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purchase-money, and a small capital might be employed in purchasing land as profitable as in any other way.

但是这种秩序是不符合事物自然发展的，因此必然是迟缓的、不确定的。那些国家财富有赖于商业和制造业的欧洲各国发展缓慢，而有赖于农业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发展迅速，不妨将二者比较一下。近500年内，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居民数增加幅度都未达一倍，而英属北美殖民地部分地区的居民数量在20年或25年内就增加了一倍。欧洲长子承继法和各种永久所有权使得大地产无法分割，小地主数量因此无法增加。小地主土地有限，是小地产，他对土地的每个部分都如数家珍，乐于开垦并改良土地，在各类改良者中，小地主通常是最勤劳、智慧与成功的。此外，长子承继法和永久所有权将许多土地隔绝于市场之外，因此可用于购买土地的资本常常多于待售的土地，使得土地常以垄断的价格出售。地租往往不足以支付购买所付资金的利息，还要算上修补以及其他不时之需所消耗的费用。因此在欧洲任何地方，将小额资本用于购买土地最无利可图。为了资金更加安全，一些境况一般的商人不再经商，有时会以小额资本购买土地，还有从其他来源获取收入的职业者同样喜欢投资于土地，以保障积蓄的安全。但是，年轻人若不经商或从事某种职业，而以2000、3000镑购买并耕作一小块土地，的确也有望快乐而独立地生活，但就不能指望成为大富翁或出名而为人所经常提及；投资于其他用途，则有望如此。而且，虽然这些年轻人不期望成为地主，但也基本不愿做农民。如此一来，可购买的土地少，价格高，使得许多本可用于改良及耕作土地的资本未用于这种用途。相反，在北美洲，购买与耕作未开垦的土地，对于大额资本和小额资本来说都是最有利的投资用途，五六十镑的资本就足以建立一座农场，是最直接的致富与出名方式。在这里，几乎不需任何代价就可获得土地，即使付出代价，这代价也大大小于土地自然生产物的价值，在欧洲就绝无可能如此，在土地早已成为私有财产的任何国家更无可能。但是，在任何地主去世时，留下一个大家庭，若他

留下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各位后代，则这些土地基本就要被出售。这就使更多土地进入市场，土地就不再以垄断价格出售。土地的自由地租将接近于购地资金的利息，以小额资本购买土地可与其他用途同样有利可图。

England, on account of the natural fertility of the soil, of the great extent of the sea-coast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of the many navigable rivers which run through it, and afford the conveniency of water carriage to some of the most inland parts of it, is perhaps as well fitted by nature as any large country in Europe to be the seat of foreign commerce, of manufactures for distant sale, and of all the improvements which these can occasi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Elizabeth, too, the English legislature has been peculiarly attentive to the interest of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and in reality there is no country in Europe, Holland itself not excepted, of which the law is, upon the whole, more favourable to this sort of industry.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have accordingly been continually advancing during all this period. The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ountry has, no doubt, been gradually advancing too; but it seems to have followed slowly, and at a distance, the more rapid progress of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ountry must probably have been cultivated before the reign of Elizabeth; and a very great part of it still remains uncultivated,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far greater part much inferior to what it might be, The law of England, however, favours agriculture, not only indirectly, by the protection of commerce, but by several direct encouragements. Except in times of scarcity,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is not only free, but encouraged by a bounty. In times of moderate plenty,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corn is loaded with duties that amount to a prohibition. The importation of live cattle, except from

Ireland, is prohibited at all times; and it is but of late that it was permitted from thence. Those who cultivate the land, therefore, have a monopoly against their countrymen for the two greatest and most important articles of land produce, bread and butcher's meat. These encouragements, although at bottom, perhaps, as I shall endeavour to show hereafter, altogether illusory,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 at least the good intention of the legislature to favour agriculture. But what is of much more importance than all of them, the yeomanry of England are rendered as secure, as independent, and as respectable, as law can make them. No country, therefore, which the right of primogeniture takes place, which pays tithes, and where perpetuities, though contrary to the spirit of the law, are admitted in some cases, can give more encouragement to agriculture than England. Such, however, notwithstanding, is the state of its cultivation. What would it have been, had the law given no direct encouragement to agriculture besides what arises indirectly from the progress of commerce, and had left the yeomanry in the same condition as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of Europe? It is now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Elizabeth, a period as long as the course of human prosperity usually endures.

英格兰天然土壤肥沃，且就全国面积比例来看，海岸线很长，又布满通航河流，使大部分内陆地区都享受水运的便利，因此英格兰与欧洲任何大国相比，自然条件使其同样适合国外贸易，制造业适合售往远方，适合上述所有这些能够促进的改良。而且，自伊丽莎白在位初期，英国立法都特别注意商业与制造业的利益。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大体上如此有利于商业与制造业，即使是荷兰亦不例外。因此，英国的商业与制造业就是在这一时期内不断发展起来的，且乡村土地的耕作与改良无疑同样不断发展，只是其发展似乎较为缓慢，不及商业与制造业那般。或许，早在伊丽莎白时代以前，大部分

土地就已经得到了耕作，只是仍有很大部分尚未耕作，而已耕作土地的耕作状况大多差强人意，但英格兰的法律保护商业，因此间接促进了农业，此外还对农业有直接的鼓励措施。除欠丰收时期外，谷物出口不仅免税，还有奖金鼓励；而在收获一般的时期，进口外国谷物需缴纳关税，税额相当于禁止进口。且法律禁止一切活牲畜的进口，除非是进口自爱尔兰，而且，允许从爱尔兰进口也只是近期才开始的。面包与屠夫经营的肉类是两种最多、最重要的土地生产物，因此事实上土地耕作者独享这种生产物。在文末我将尽量指出，这种鼓励措施可能全部都是虚无缥缈的，但从其中足以看出，英国立法者的意图是好的，即鼓励农业发展。但更为重要的是，英格兰法律是可敬的，因为它尽力使国内农民享有保障与独立。因此，在长子承继仍然存在、什一税继续征收、与法律精神相悖的永久所有权仍然存在的国家中，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英格兰是最鼓励农业发展的国家。然而即使如此，英格兰的耕作的情况仍然不乐观。商业发展间接促进农业，除此之外，若农业未受法律的直接促进，任凭自耕农的处境与大部分欧洲其他国家相同，则农业又会怎样？伊丽莎白即位迄今已200余年，如此之长的时期几乎等于人类繁荣通常所能持续的最长时间了。

France seems to have had a considerable share of foreign commerce, near a century before England was distinguished as a commercial country. The marine of France was considerable, according to the notions of the times, before the expedition of Charles VIII. to Naples. The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France, however, is, upon the whole, inferior to that of England. The law of the country has never given the same direct encouragement to agriculture.

距英格兰成为大商业国约100年前，法国的对外贸易很可观。依当时人们所见，法国的航海业似乎在查理八世远征那不勒斯以前就已经颇为可观。但整体来看，法国土地的耕作与改良状况不及英格兰，

法国的法律从未对农业有过直接的促进。

The foreign commerce of Spain and Portual to the other parts of Europe, though chiefly carried on in foreign ships, is very considerable. That to their colonies is carried on in their own, and is much greater, on account of the great riches and extent of those colonies. But it has never introduced any considerable manufactures for distant sale into either of those countries,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both still remains uncultivated. The foreign commerce of Portugal is of older standing than that of any great country in Europe, except Italy.

虽然西班牙与葡萄牙对欧洲其他地区的国外贸易大多由外国运船进行运输，但其规模依然可观。西班牙与葡萄牙对其殖民地的国外贸易则由本国运船运输，由于其殖民地富饶而广阔，因此其规模更加可观。然而，两国国外贸易规模如此之大，并未使国内出现任何适合销往远方的大型制造业，甚至两国都有大部分土地未经耕作。除意大利之外，葡萄牙的国外贸易历史比任何欧洲大国都更为久远。

Italy is the only great country of Europe which seems to have been cultivated and improved in every part, by means of foreign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for distant sale. Before the invasion of Charles VIII., Italy, according to Guicciardini, was cultivated not less in the most mountainous and barren parts of the country, than in the plainest and most fertile. The advantageous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great number of independent status which at that time subsisted in it, probably contributed not a little to this general cultivation. It is not impossible, too, notwithstanding this general expression of one of the most judicious and reserved of modern

historians, that Italy was not at that time better cultivated than England is at present.

意大利是欧洲唯一一个通过国外贸易以及适合销往远地的制造业使得全部土地得到耕作与改良的国家。据圭恰迪尼说，在查理八世入侵以前，意大利不仅最平坦最肥沃的土地得到了耕种，且最多山最贫瘠的乡村地区同样得以耕种。该国地理位置优越，国内存在大量独立小国，对于土地整体的耕作贡献不可忽视。然而，虽然这位明智且保守的近代历史家如此评价，但若称当时意大利的土地耕作状况不逊于今日的英格兰，则并非全无可能。

The capital, however, that is acquired to any country by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is always a very precarious and uncertain possession, till some part of it has been secured and realized in the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ts lands. A merchant, it has been said very properly,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itizen of any particular country. It is in a great measure indifferent to him from what place he carries on his trade; and a very trifling disgust will make him remove his capital, and, together with it, all the industry which it supports,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No part of it can be said to belong to any particular country, till it has been spread, as it were, over the face of that country, either in buildings, or in the lasting improvement of lands. No vestige now remains of the great wealth said to have been possessed by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Hanse Towns, except in the obscure histories of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It is even uncertain where some of them were situated, or to what towns in Europe the Latin names given to some of them belong. But though the misfortunes of Italy, in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and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ies, greatly diminished the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of

the cities of Lombardy and Tuscany, those countries still continue to be among the most populous and best cultivated in Europe. The civil wars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government which succeeded them, chased away the great commerce of Antwerp, Ghent, and Bruges. But Flanders still continues to be one of the richest, best cultivated, and most populous provinces of Europe. The ordinary revolutions of war and government easily dry up the sources of that wealth which arises from commerce only. That which arises from the more solid improvements of agriculture is much more durable, and cannot be destroyed but by those more violent convulsions occasioned by the depredations of hostile and barbarous nations continued for a century or two together; such as those that happened for some time before and aft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ern provinces of Europe.

然而，任何国家通过商业与制造业获得的资本总是非常危险和不稳定的，除非其中某部分已通过投资于土地耕作与改良，得到了保障和使用。完全可以说，商人不一定必须是某特定国家的公民，对于他来说，在任何地方经营都无关紧要；若他们对某国感到哪怕极为轻微的厌恶，都可以将资本转移到另一国家。资本转移了，所投资的产业也必将随之转移至他国。没有任何一部分资本，在转化为建筑或永久改良土地永久以前，就断言它属于某国。据说汉萨同盟诸城大部分都拥有巨额财富，但除13世纪、14世纪模糊的历史外，似乎至今丝毫不剩。甚至无法确定其中某些城市究竟坐落在何处，有些拉丁文名称究竟属于欧洲的哪些城市也无从考证。但是，虽然15世纪末16世纪初意大利所遭遇的不幸使得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各城市的商业和制造业大大衰落，但至今，这些地方仍然不失为欧洲人口密度最大、土地耕作状况最佳之处。佛兰德内战过后，西班牙统治接替，使得安特卫普、根特以及布鲁日的大商业不复当初。但至今，佛兰德仍然是欧洲财富最多、人口最密集、耕作状况最佳之地。战争与统治政权通常引起的变革，易于耗尽仅由商业产生的财富来源。农业改良更为可靠，由其产

生的财富来源则更为长久，轻易不会被破坏，除非受到更为激烈的动乱，如受到敌对的野蛮民族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劫掠，如罗马帝国崩溃前后西欧地区的动乱。

Book IV Of Systems of PoliticalEconomy

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Introduction

序论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ed as a branch of the science of a statesman or legislator, proposes two distinct objects; first, to provide a plentiful revenue or subsistence for the people, or, more properly, to enable them to provide such a revenue or subsistence for themselves; and, secondly, to supply the state or commonwealth with a revenue sufficient for the public services. It proposes to enrich both the people and the sovereign.

人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政治或立法科学的一个分支，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向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活资料，或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够实现收入或生活资料的自给自足；第二，向国家或团体提供足够的收入，以保障公共服务。它提出，要同时使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

The different progress of opulence in different ages and nations, has given occasion to two different system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regard to enriching the people. The one may be called the system of commerce, the other that of agriculture. I shall endeavour to explain both as fully and distinctly as I can, and shall begin with the system of commerce. It is the modern system, and is best understood in our own country and in our own times.

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富裕进程不同，关于如何促使人民富裕，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则重商主义，二则重农主义。我会尽力将二者完整透彻地进行解释。重商主义是新的经济体系，结合当今时代和英国国情，就最易于理解，我们从它开始谈起。

Chapter I.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Commercialor Mercantile System

第一章、论重商主义的原理

That wealth consists in money, or in gold and silver, is a popular notion which naturally arises from the double function of money, as the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nd as the measure of value. In consequence of its being the instrument of commerce, when we have money we can more readily obtain whatever else we have occasion for, than by means of any other commodity. The great affair, we always find, is to get money. When that is obtained,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making any subsequent purchase. In consequence of its being the measure of value, we estimate that of all other commodities by the quantity of money which they will exchange for. We say of a rich man, that he is worth a great deal, and of a poor man, that he is worth very little money. A frugal man, or a man eager to be rich, is said to love money; and a careless, a generous, or a profuse man, is said to be indifferent about it. To grow rich is to get money; and wealth and money, in short, are, in common language, considered as in every respect synonymous.

有一种备受认可的观点，因货币具有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双重功能而自然产生，即财富由货币构成，或称由金银构成。由于货币是流通手段，使用货币就比用任何其他商品更能够轻而易举地购买需要的

物品。我们常常发现，赚取货币是非常重要的要事，因为得到了货币，随后便可轻而易举地购买；由于货币是价值尺度，我们便根据任何其他商品所能换得的货币量来对其估价。我们称价值相当于大量货币的人为富人，价值相当于很少货币的人为穷人。人称节俭者或好富者为爱财，大手大脚、大方或奢侈者为漠视钱财。想成为富人就要赚钱，总之，通俗说来，人们认为财富与货币在任何层面都是同义的。

A rich country, in the same manner as a rich man, is supposed to be a country abounding in money; and to heap up gold and silver in any country is supposed to be the readiest way to enrich it. For some time after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first inquiry of the Spaniards, when they arrived upon any unknown coast, used to be, if there was any gold or silver to be found in the neighbourhood? By the information which they received, they judged whether it was worth while to make a settlement there, or if the country was worth the conquering. Plano Carpino, a monk sent ambassador from the king of France to one of the sons of the famous Gengis Khan, says, that the Tartars used frequently to ask him, if there was plenty of sheep and oxen in the kingdom of France? Their inquiry had the same object with that of the Spaniards. They wanted to know if the country was rich enough to be worth the conquering. Among the Tartars, as among all other nations of shepherds, who are generally ignorant of the use of money, cattle are the instruments of commerce and the measures of value. Wealth,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m, consisted in cattle, as, according to the Spaniards, it consisted in gold and silver. Of the two, the Tartar notion, perhaps, was the nearest to the truth.

人们认为，同富人一样，富国同样拥有大量货币；在任何国家，积累金银是通向富裕最快捷的捷径。美洲发现后的一段时期，西班牙

人每到一个未知的海岸，往往都开口就问附近是否发现了金银，并根据得到的消息判断该处是否值得定居、值得征服。普拉诺·卡尔比诺是一位僧人，曾受法兰西国王特遣，面见著名的成吉思汗的一位王子，他说鞑靼人只是经常问他法兰西王国的牛羊是不是很多——他们这么问同西班牙人目的相同，想知道那个国家是否足够富裕而值得征服。放牧民族普遍不知道货币的使用，鞑靼人和其他全部放牧民族一样，牲畜就是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因此，他们认为财富由牲畜构成，而西班牙人则认为财富由金银构成。或许，鞑靼人的观点是二者当中最接近事实的一个。

Mr Locke remarks a distinction between money and other moveable goods. All other moveable goods, he says, are of so consumable a nature, that the wealth which consists in them cannot be much depended on; and a nation which abounds in them one year may, without any exportation, but merely by their own waste and extravagance, be in great want of them the next. Money, on the contrary, is a steady friend, which, though it may travel about from hand to hand, yet if it can be kept from going out of the country, is not very liable to be wasted and consumed. Gold and silver, therefore, are, according to him, the must solid and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moveable wealth of a nation; and to multiply those metals ought, he thinks, upon that account, to be the great object of its political economy.

洛克先生指出了货币与其他动产之间的区别。他说，其他各种动产本质上即难免消耗，其中包含的财富就难言可靠；而富有动产的国家，即使毫无输出，但仅凭浪费与铺张，第二年就可能陷入动产的匮乏。然而，货币却是稳定的朋友，虽会不断易手，但只要不流出国内，就不会轻易浪费和消耗。因此，他认为金银是国家可移动财富中最可靠与稳定的部分，是以，国家政治经济的重要目标应为积累金

银。

Others admit, that if a nation could be separated from all the world, it would be of no consequence how much or how little money circulated in it. The consumable goods, which were circulated by means of this money, would only be exchanged for a greater or a smaller number of pieces; but the real wealth or poverty of the country, they allow, would depend altogether upon the abundance or scarcity of those consumable goods. But it is otherwise, they think, with countries which have connections with foreign nations, and which are obliged to carry on foreign wars, and to maintain fleets and armies in distant countries. This, they say, cannot be done, but by sending abroad money to pay them with; and a nation cannot send much money abroad, unless it has a good deal at home. Every such nation, therefore, must endeavour, in time of peace, to accumulate gold and silver, that when occasion requires, it may have wherewithal to carry on foreign wars.

另有人认为，若有一国脱离了全世界，则国内流通的货币或多或少都无关紧要，仅仅是通过货币而流通的消费品能够换取的货币数额会随之变化；他们认为该国实际上的贫富，完全由消费品的盈缺决定。但他们认为这不符合那些与外国有联系、有时被迫对外作战，并在远处他国维持海、陆军的国家。他们称，除非送出货币以维持军饷，则无法做到；而除非国内有大量货币，则不可能向国外输送太多货币。因此，但凡这样的国家，都须在和平时期尽量累积金银，一旦形势危急，才能有足够的资金应对对外战争。

In consequence of those popular notions, all the different nations of Europe have studied, though to little purpose, every

possible means of accumulating gold and silver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Spain and Portugal, the proprietors of the principal mines which supply Europe with those metals, have either prohibited their exportation under the severest penalties, or subjected it to a considerable duty. The like prohibition seems anciently to have made a part of the policy of most other European nations. It is even to be found, where we should least of all expect to find it, in some old Scotch acts of Parliament, which forbid, under heavy penalties, the carrying gold or silver forth of the kingdom. The like policy anciently took place both in France and England.

受这些备受认可的观点影响，即使收效甚微，但欧洲各国仍都探寻了办法，尽一切可能在本国累积金银。西葡两国占有向欧洲供给金银的主要矿藏，曾推行最严苛的惩罚措施或繁重的关税，禁止金银输出。此前，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似乎采取了同样的禁令，纳入其政策。出乎意料的是，一些古苏格兰议会法案同样曾以重刑禁止金银输出王国；类似的政策，同样出现在了彼时的法兰西和英格兰。

When those countries became commercial, the merchants found this prohibition, upon many occasions, extremely inconvenient. They could frequently buy more advantageously with gold and silver, than with any other commodity, the foreign goods which they wanted, either to import into their own, or to carry to some other foreign country. They remonstrated, therefore, against this prohibition as hurtful to trade.

但当国家商业化后，该禁令使商人在很多情况下都极为不便。从外国购入所需物品，或输入本国，或运往他国，用金银购买，更为便利。因此，他们认为这种禁令对商业造成了伤害，并对其进行抗议。

They represented, first, that the ex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in order to purchase foreign goods, did not always diminish the quantity of those metals in the kingdom; that, on the contrary, it might frequently increase the quantity; because, if the consumption of foreign goods was not thereby increased in the country, those goods might be re-exported to foreign countries, and being there sold for a large profit, might bring back much more treasure than was originally sent out to purchase them. Mr Mun compares this operation of foreign trade to the seed-time and harvest of agriculture. “If we only behold,” says he, “the actions of the husbandman in the seed time, when he casteth away much good corn into the ground, we shall account him rather a madman than a husbandman. But when we consider his labours in the harvest, which is the end of his endeavours, we shall find the worth and plentiful increase of his actions.”

首先，他们主张，为购买外国商品而输出金银未必会使王国内的金银减少，相反还会常常使国内的金银增加；因为，若该国外国商品消费额不增加，这些商品就可以再次出口国外，并在国外以高利润出售，相比最初为购买而输出的金银，就可能赚回更多。托马斯·孟先生将这种国外贸易操作比作农业的播种和收获。他说：“若只关注到农夫在播种期将很多优质的谷物撒入地中，则定会将他视为疯子而非农夫。但他努力的目的死收获，考虑到他收获时所付出的劳动，就会发现他这些行为很有价值，是收获颇丰的。”

They represented, secondly, that this prohibition could not hinder the ex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on account of the smallness of their bulk in proportion to their value, could easily be smuggled abroad. That this exportation could only be prevented by

a proper attention to what they called the balance of trade. That when the country exported to a greater value than it imported, a balance became due to it from foreign nations, which was necessarily paid to it in gold and silver, and thereby increased the quantity of those metals in the kingdom. But that when it imported to a greater value than it exported, a contrary balance became due to foreign nations, which was necessarily paid to them in the same manner, and thereby diminished that quantity: that in this case, to prohibit the exportation of those metals, could not prevent it, but only, by making it more dangerous, render it more expensive: that the exchange was thereby turned more against the country which owed the balance, than it otherwise might have been; the merchant who purchased a bill upon the foreign country being obliged to pay the banker who sold it, not only for the natural risk, trouble, and expence of sending the money thither, but for the extraordinary risk arising from the prohibition; but that the more the exchange was against any country, the more the balance of trade became necessarily against it; the money of that country becoming necessarily of so much less value,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the country to which the balance was due. That if the exchange between England and Holland, for example, was five per cent. against England, it would require 105 ounces of silver in England to purchase a bill for 100 ounces of silver in Holland: that 105 ounces of silver in England, therefore, would be worth only 100 ounces of silver in Holland, and would purchase only a proportionable quantity of Dutch goods; but that 100 ounces of silver in Holland, on the contrary, would be worth 105 ounces in England, and would purchase a proportionable quantity of English goods; that the English goods which were sold to Holland would be sold so much cheaper, and the Dutch goods which were sold to England so much dearer, by the difference of the exchange: that the one would draw so much less Dutch money to England, and the other so much more

English money to Holland, as this difference amounted to: and that the balance of trade, therefore, would necessarily be so much more against England, and would require a greater balance of gold and silver to be exported to Holland.

其次，金银体积小，与其价值不成比例，很容易便可走私出境，因此禁令无法阻止金银输出。他们认为阻止金银输出只有通过适当关注他们所谓的贸易差额。若一国输出的价值大于输入的价值，就形成了差额，外国须以金银补偿差额，该国金银量因此增加。反之，该国须以金银补偿外国的差额，因此减少国内金银量。此时禁止金银输出，非但不能阻止，反会使其更为危险、耗资更大，即比起相反的情况，汇兑将更不利于有逆差的国家；从外国银行购买汇票的商人被迫为其付出代价，不仅要承担运送货币的天然风险、烦扰与费用，还要承担禁令导致的额外风险。任一国家，汇兑对其越不利，贸易差额必然也将更加不利。同顺差国家相比，逆差国家货币的价值必然更低。例如，若英、荷两国间的汇兑有5%不利于英国，英国就需要以105盎司的银向荷兰兑取100盎司的银，因此105盎司英国银价值等于100盎司的荷兰银，同样只能购买等量的荷兰商品。反之，若100盎司荷兰银相当于105盎司英国银，则可购买等量的英国商品。这种汇兑差，导致售往荷兰的英国商品价格如此降低，而售往英国的荷兰商品价格却又升高。流向英国的荷兰货币将更少，流向荷兰的英国货币会更多。因此，贸易差额对英国必然更加不利，还需要将更多金银输往荷兰。

Those arguments were partly solid and partly sophistical. They were solid, so far as they asserted that the ex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in trade might frequently be advantageous to the country. They were solid, too, in asserting that no prohibition could prevent their exportation, when private people found any advantage in exporting them. But they were sophistical, in supposing, that either

to preserve or to augment the quantity of those metals required more th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than to preserve or to augment the quantity of any other useful commodities, which the freedom of trade, without any such attention, never fails to supply in the proper quantity. They were sophistical, too, perhaps, in asserting that the high price of exchange necessarily increased what they called the unfavourable balance of trade, or occasioned the exportation of a greater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That high price, indeed, was extremely disadvantageous to the merchants who had any money to pay in foreign countries. They paid so much dearer for the bills which their bankers granted them upon those countries. But though the risk arising from the prohibition might occasion some extraordinary expence to the bankers, it would not necessarily carry any more money out of the country. This expence would generally be all laid out in the country, in smuggling the money out of it, and could seldom occasion the exportation of a single sixpence beyond the precise sum drawn for. The high price of exchange, too, would naturally dispose the merchants to endeavour to make their exports nearly balance their imports,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have this high exchange to pay upon as small a sum as possible. The high price of exchange, besides, must necessarily have operated as a tax, in raising the price of foreign goods, and thereby diminishing their consumption. It would tend, therefore, not to increase, but to diminish, what they called the unfavourable balance of trade, and consequently the ex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这些观点部分合理，部分诡辩。认为贸易中的金银输出常常对某个国家有利，是合理的观点；认为若金银输出对个人有利，则禁令无法阻止金银输出，同样合理。但他们同样有强词夺理之处，声称保持或增加金银，相比保持或增加其他有用的商品量，更加需要政府关注。然而，即使不需要政府关注，贸易的自由同样能够确保适量供

应。此外，可能同样强词夺理的是，认为汇兑价格高，必会使他们所称的不利贸易差额提高，或致使更大量的金银输出。汇兑价格高的确极不利于需向外国付账的商人，银行在这些国家间为他们开具汇票，他们需为银行汇票付更多的钱。但是，虽然禁令会导致风险，可能使得需要向银行支付额外费用，但未必会使更多货币流出国外。通常，走私时在国内就已支付了这些费用，相比精确计算的总金额，不会使哪怕额外的六便士输出国外。汇兑价格高自然使得商人尽力使输入和输出达到平衡，以使高汇兑的支付额尽可能小。此外，由于高价汇兑使外国商品价格提高，从而缩减外国商品消费，其实际影响必如征税一般。因此，高价汇兑往往不会使所谓的贸易逆差额增加，而会使其减少，进而导致金银的输出量减少。

Such as they were, however, those arguments convinced the people to whom they were addressed. They were addressed by merchants to parliaments and to the councils of princes, to nobles, and to country gentlemen; by those who were supposed to understand trade, to those who were conscious to them selves that they knew nothing about the matter. That foreign trade enriched the country, experience demonstrated to the nobles and country gentlemen, as well as to the merchants; but how, or in what manner, none of them well knew. The merchants knew perfectly in what manner it enriched themselves, it was their business to know it. But to know in what manner it enriched the country, was no part of their business. The subject never came into their consideration, but when they had occasion to apply to their country for some change in the laws relating to foreign trade. It then became necessary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foreign trade,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those effects were obstructed by the laws as they then stood. To the judges who were to decide the business, it appeared a most satisfactory account of the matter, when they were told that foreign trade brought money into the

country, but that the laws in question hindered it from bringing so much as it otherwise would do. Those arguments, therefore, produced the wished-for effect. The prohibition of exporting gold and silver was, in France and England, confined to the coin of those respective countries. The exportation of foreign coin and of bullion was made free. In Holland, and in some other places, this liberty was extended even to the coin of the country. Th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was turned away from guarding against the ex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to watch over the balance of trade, as the only cause which could occasion any augmentation or diminution of those metals. From one fruitless care, it was turned away to another care much more intricate, much more embarrassing, and just equally fruitless. The title of Mun's book, England 's Treasure in Foreign Trade, became a fundamental maxim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not of England only, but of all other commercial countries. The inland or home trade,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trade in which an equal capital affords the greatest revenue, and creates the greatest employment to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was considered as subsidiary only to foreign trade. It neither brought money into the country, it was said, nor carried any out of it. The country, therefore, could never become either richer or poorer by means of it, except so far as its prosperity or decay might indirectly influence the state of foreign trade.

然而尽管如此，那些观点却能够使听众信服。商人们持此观点，向议会、君主会议、贵族和乡绅们陈述；在人们看来对贸易十分了解的人持此观点，向自知对此问题一窍不通的人陈述。根据经验，贵族和乡绅都知道，国外贸易可以富国，商人也一样，但具体方式如何却无人知晓。商人完全知道国外贸易以何种方式使他们自己富裕，这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国外贸易如何富国，则不是他们的必修课。对此他们从不考虑，除非向国家申请修改有关国外贸易的法律，

此时他们有必要谈及国外贸易的益处，以及以他们观点，法律如何阻碍了这种有利的方式。裁决者决定此事，若商人告诉他们，国外贸易使货币流入国内，但相比不存在相关法律，该法律却使流入的货币更少，则裁决者也会觉得有道理。由此可见，此类观点的效果达到了预期。法兰西和英格兰的金银输出禁令仅仅针对于各自国内的铸币，而不限制外国铸币和金条的输出。在荷兰及其他一些地方，甚至对本国铸币也不加限制。政府转移了注意力，将贸易差额看作导致金银增减的唯一原因，减轻对金银输出的限制，转而监管贸易差额。前种监管无果，政府却转而进行另一种更为复杂、困难但却同样无果的监管。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准则，不仅对于英格兰，对于其他一切商业国家亦如此。最重要的是，内地贸易或国内贸易，即以等量资本提供最大收入，同时为该国人民提供最多劳动机会的贸易，却仅被视为国外贸易的附属。有人说，国内贸易既不能使货币流入国内，亦不能流出，因此，除非国外贸易状况可受国内贸易盛衰的间接影响，则国内贸易无法影响该国的贫富状况。

A country that has no mines of its own, must undoubtedly draw its gold and silver from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same manner as one that has no vineyards of its own must draw its wines. It does not seem necessary, however, that th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should be more turned towards the one than towards the other object. A country that has wherewithal to buy wine, will always get the wine which it has occasion for; and a country that has wherewithal to buy gold and silver, will never be in want of those metals. They are to be bought for a certain price, like all other commodities; and as they are the price of all other commodities, so all other commodities are the price of those metals. We trust, with perfect security, that the freedom of trade, without any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will always supply us with the wine which we have occasion for; and we may trust, with equal security, that it will

always supply us with all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we can afford to purchase or to employ, either in circulating our commodities or in other uses.

自身没有金银矿的国家，无疑须从国外引进金银；同样，没有葡萄园的国家，须从国外引进葡萄酒。然而，政府似乎不必比其他物品更多关注某一物品。一国需要葡萄酒，只需财力充足，即可购得；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绝不会缺少金银。如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金银须以一定的价格购买；而且，由于金银是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所以其他所有商品也是金银的价格。完全不妨相信贸易具有自由，无需政府监管，定会提供所需的葡萄酒；同样可以相信，自由贸易总会依我们购买或运用所需而提供金银，满足流通商品及其他需要。

The quantity of every commodity which human industry can either purchase or produce, naturally regulates itself in every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effectual demand, or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of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ay the whole rent, labour, and profits, which must be paid in order to prepare and bring it to market. But no commodities regulate themselves more easily or more exactly, according to this effectual demand, than gold and silver; because, on account of the small bulk and great value of those metals, no commodities can be more easily transported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from the places where they are cheap, to those where they are dear; from the places where they exceed, to those where they fall short of this effectual demand. If there were in England, for example, an effectual demand for an additional quantity of gold, a packet-boat could bring from Lisbon, or from wherever else it was to be had, fifty tons of gold, which could be coined into more than five millions of guineas. But if there were an effectual demand for grain to the same value, to import it would

require, at five guineas a-ton, a million of tons of shipping, or a thousand ships of a thousand tons each. The navy of England would not be sufficient.

人类通过勤劳购买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量，自然会在每个国家自行调节，其调节依据即有效需求，即按照愿意支付全部地租、劳动与利润者的需求，而这类支付目的在于使商品准备上市。但按有效需求调节，没有任何其他商品能够比金银更为便捷准确；因为，金银体积小而价值高，最便于从一处运往他处，从价低处运往价高处，从有效需求过剩之处运往有效需求不足之处。例如，若额外的黄金为英格兰有效需求所需，则可能有一艘定期邮船从里斯本或其他地方运来50吨黄金，这些黄金至少可铸成500万几尼。但若等价的谷物为有效需求所需，则按一吨谷物5几尼计算，需要载重100万吨的运船或1000艘每艘载重1000吨的运船，英格兰海军都不足以运完。

When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imported into any country exceeds the effectual demand, no vigilance of government can prevent their exportation. All the sanguinary laws of Spain and Portugal are not able to keep their gold and silver at home. The continual importations from Peru and Brazil exceed the effectual demand of those countries, and sink the price of those metals there below that in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If, on the contrary, in any particular country, their quantity fell short of the effectual demand, so as to raise their price above that of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the government would have no occasion to take any pains to import them. If it were even to take pains to prevent their importation, it would not be able to effectuate it. Those metals, when the Spartans had got wherewithal to purchase them, broke through all the barriers which the laws of Lycurgus opposed to their entrance into Lacedaemon. All the sanguinary laws of the customs are not able to

prevent the importation of the teas of the Dutch and Gottenburg East India companies; because somewhat cheaper than those of the British company. A pound of tea, however, is about a hundred times the bulk of one of the highest prices, sixteen shillings, that is commonly paid for it in silver, and more than two thousand times the bulk of the same price in gold, and, consequently, just so many times more difficult to smuggle.

任何一国输入的金银若超过有效需求，则政府无论如何警惕都无法阻止金银输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严苛法律无法阻止金银流出，而秘鲁和巴西不断地输入，超出了两国有效需求，使两国的金银价格下降，低于邻国。相反，若某国金银量不足以满足有效需求，则会使金银价格上涨，高于邻国，政府无需为金银输入而劳烦。即便政府担此痛苦，禁止金银输入，也同样难以奏效。斯巴达人财力足以购买金银，即使莱克格斯的法律阻碍金银输入古斯巴达，但仍未能阻止。所有严苛的海关法都无法阻止荷兰和戈滕堡东印度公司将茶叶输入英国，因为这些茶叶比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更为廉价。但是，茶叶价格通常以银计算，以磅为单位，最高价格为16先令，因此一磅茶叶的体积约16先令体积的100倍，若以金币计算，则至少2000倍。由此，茶叶走私的困难亦成倍增加。

It is partly owing to the easy trans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from the places where they abound to those where they are wanted, that the price of those metals does not fluctuate continually, like tha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commodities, which are hindered by their bulk from shifting their situation, when the market happens to be either over or under-stocked with them. The price of those metals, indeed, is not altogether exempted from variation; but the changes to which it is liable are generally slow, gradual, and uniform. In Europe, for example, it is supposed, without much

foundation, perhaps, that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and preceding century, they have been constantly, but gradually, sinking in their value, on account of the continual importations from the Spanish West Indies. But to make any sudden change in the price of gold and silver, so as to raise or lower at once, sensibly and remarkably, the money price of all other commodities, requires such a revolution in commerce as that occasioned by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许多货物因体积不便，无法轻易由充足地运往到需求地，但金银的运输却很容易。部分出于该原因，金银的价格并不持续波动，不像其他更多货物的价格那样，在过剩或不足时持续波动。当然，金银的价格并非一成不变，只是价格变动大抵缓慢、逐渐而统一。例如，即使没有充足的根据，也许也会有人认为，本世纪和上世纪，金银不断由西属西印度输入欧洲，其价值不断逐渐下跌。金银价格突然改变会使其他所有货物的货币价格立即显著涨跌。但金银价格不会突然改变，除非发生商业革命，就像美洲的发现所引发的那样。

If, not withstanding all this, gold and silver should at any time fall short in a country which has wherewithal to purchase them, there are more expedients for supplying their place, than that of almost any other commodity. If the materials of manufacture are wanted, industry must stop. If provisions are wanted, the people must starve. But if money is wanted, barter will supply its place, though with a good deal of inconveniency. Buying and selling upon credit, and the different dealers compensating their credits with one another, once a-month, or once a-year, will supply it with less inconveniency. A well-regulated paper-money will supply it not only without any inconveniency, but, in some cases, with some advantages. Upon every account, therefore, th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never was so unnecessarily employed, as when directed to watch over the preservation or increase of the quantity of money in any country.

尽管如此，一个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任何时候缺乏金银而准备购买，都比购买几乎其他任何商品更为便利。若制造业原料缺乏，工业就必将停滞；若食物短缺，人民必将挨饿；但若货币不足，则可以物物交换弥补，虽然会存在诸多不便。此外还可赊账交易，不同交易方可互相抵账，可按月或年结算，大大降低不便。适当调节纸币不仅可以满足供应而不存在任何不便，还能够在一些时候起到有利作用。因此，无论用何种方式，任一国政府过度监管都不必要，不必有意保持或增加国内货币量。

No complaint, however, is more common than that of a scarcity of money. Money, like wine, must always be scarce with those who have neither wherewithal to buy it, nor credit to borrow it. Those who have either, will seldom be in want either of the money, or of the wine which they have occasion for. This complaint, however, of the scarcity of money, is not always confined to improvident spendthrifts. It is sometimes general through a whole mercantile town and the country in its neighbourhood. Over-trading is the common cause of it. Sober men, whose projects have been disproportioned to their capitals, are as likely to have neither wherewithal to buy money, nor credit to borrow it, as prodigals, whose expence has been disproportioned to their revenue. Before their projects can be brought to bear, their stock is gone, and their credit with it. They run about everywhere to borrow money, and everybody tells them that they have none to lend. Even such general complaints of the scarcity of money do not always prove that the usual number of gold and silver pieces are not circulating

in the country, but that many people want those pieces who have nothing to give for them. When the profits of trade happen to be greater than ordinary over-trading becomes a general error, both among great and small dealers. They do not always send more money abroad than usual, but they buy upon credit,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 unusual quantity of goods, which they send to some distant market, in hopes that the returns will come in before the demand for payment. The demand comes before the returns, and they have nothing at hand with which they can either purchase money or give solid security for borrowing. It is not any scarcity of gold and silver, but the difficulty which such people find in borrowing, and which their creditor find in getting payment, that occasions the general complaint of the scarcity of money.

然而，人们常常抱怨缺少货币，这再平常不过。货币如同葡萄酒一样，通常只有既没有购买财力，又没有借贷信用的人才会缺乏。既有财力又有信用的人都极少会缺乏他们所需要的货币或葡萄酒。然而，抱怨货币稀少的人也未必一定是缺乏远虑挥霍者。有时在整个商业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人们都可能普遍感到货币稀少，一般原因就在于过度交易。若不依照资本情况制定经营计划，有节制者也会如那些不会量入为出的浪费者一样，既没有财力以购买货币，也没有信用以借贷。他们的资本会在实现计划之前就消耗殆尽，于是其信用也会垮塌，他们到处借贷，却在任何人那里都只能得到无资可借的答复。即使人们广泛地抱怨货币稀少，但这也并不一定就能说明国内流通的金银数量失常，只能说明许多人希望得到金银，只不过是财力不足罢了。若贸易利润恰高于平时，则无论大小商人都容易犯过度交易的错误。他们支付的货币未必一定多于平时，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赊账以购入较平时更多的物品，并运往远方市场，企图在付款之前就收回投入。若未能在此之前收回，他们购买货币的财力就不足，也没有实际的担保品可以实现借贷。人们普遍抱怨货币稀少，原因不在于金银稀少，而在于借贷难度大以及债权人为防收不回债务而不肯出借。

It would be too ridiculous to go about seriously to prove, that wealth does not consist in money, or in gold and silver; but in what money purchases, and is valuable only for purchasing. Money, no doubt, makes always a part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but it has already been shown that it generally makes but a small part, and always the most unprofitable part of it.

若一定要严肃地证明财富并非由货币或金银构成，而由货币所购买的物品构成，并且货币只有在购买物品时才具有价值，就只能得到荒唐的结果。无疑，货币总是国民资本的一部分；但上文已经表示，货币通常只是国民资本的一小部分，并且，总是最无利可图的一部分。

It is not because wealth consists more essentially in money than in goods, that the merchant finds it generally more easy to buy goods with money, than to buy money with goods; but because money is the known and established instrument of commerce, for which every thing is readily given in exchange, but which is not always with equal readiness to be got in exchange for every thing. The greater part of goods, besides, are more perishable than money, and he may frequently sustain a much greater loss by keeping them. When his goods are upon hand, too, he is more liable to such demands for money as he may not be able to answer, than when he has got their price in his coffers. Over and above all this, his profit arises more directly from selling than from buying; and he is, upon all these accounts, generally much more anxious to exchange his goods for money than his money for goods. But though a particular merchant, with abundance of goods in his warehouse, may sometimes be ruined by not being able to sell them in time, a nation

or country is not liable to the same accident, The whole capital of a merchant frequently consists in perishable goods destined for purchasing money. But it is but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a country, which can ever be destined for purchasing gold and silver from their neighbours. The far greater part is circulated and consumed among themselves; and even of the surplus which is sent abroad, the greater part is generally destined for the purchase of other foreign goods. Though gold and silver, therefore, could not be had in exchange for the goods destined to purchase them, the nation would not be ruined. It might, indeed, suffer some loss and inconveniency, and be forced upon some of those expedients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supplying the place of money.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however, would be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as usual; because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consumable capital would be employed in maintaining it. And though goods do not always draw money so readily as money draws goods, in the long-run they draw it more necessarily than even it draws them. Goods can serve many other purposes besides purchasing money, but money can serve no other purpose besides purchasing goods. Money, therefore, necessarily runs after goods, but goods do not always or necessarily run after money. The man who buys, does not always mean to sell again, but frequently to use or to consume; whereas he who sells always means to buy again. The one may frequently have done the whole, but the other can never have done more than the one half of his business. It is not for its own sake that men desire money, but for the sake of what they can purchase with it.

商人普遍发现，以货币购买物品容易，以物品购买货币则难。原因并不在于，货币而非物品是构成财富的更主要的部分，而在于已知

并且已经确定货币是交易手段，易于同一切物品进行交换，只是不太容易获取交换物品的货币罢了。此外，大部分的物品都比货币更易于磨损，保存物品往往要承担更大的损失。对货币需求的变化令人难以应付，商人手中持有货物，不如将等价的货币存入金库，以更易于应对货币需求的变化。此外，相比购买货物，他更多的利润直接来源于出售货物，因此商人通常更急于以货物交换货币，而不急于以货币交换货物。但是，若仓库中的大量货物不能及时售出，就可能导致某商人破产，但国家或某地不会轻易遭此横祸。因为商人的全部资本往往由易损的、指定换取货币的货物构成，而国家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中只有极少部分是指定用以从邻国购买金银的，其中极大部分都是在国内流通和消费的，甚至大部分运往国外的剩余生产物都是要购买其他外国商品的。因此，即使不能售出指定以购买金银的那部分货物以换取金银，也不足以导致国家破产。的确，这部分货物可能遭受某些损失，造成许多不便，同时还可能被迫采取某种方式，即提供替代货币所必需的权宜之计。然而，其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却与平常完全或几乎一致，因为它有这些可消费的资本，可维持自身。以货物交换货币未必一定如以货币交换货物那般容易，从长远看来，前者却比后者更为必要。除购买货币之外，货物还可以满足许多其他用途，但货币却只能购买货物。因此，货币必然紧随货物，而货物却并非一定紧随货币。购买货物的人往往只希望自己消费或使用，并不总是有意再次出售货物，但出售货物的人却总希望再次购买。通常，前者购买货物就是全部，而后者出售货物最多只算一半。人们渴望得到货币并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货币所能购买的物品。

Consumable commodities, it is said, are soon destroyed; whereas gold and silver are of a more durable nature, and were it not for this continual exportation, might be accumulated for ages together, to the incredible augmentation of the real wealth of the country. Nothing, therefore, it is pretended, can be more disadvantageous to any country, than the trade which consists in the exchange of such lasting for such perishable commodities. We

do not, however, reckon that trade disadvantageous, which consists in the exchange of the hardware of England for the wines of France, and yet hardware is a very durable commodity, and were it not for this continual exportation, might too be accumulated for ages together, to the incredible augmentation of the pots and pans of the country. But it readily occurs, that the number of such utensils is in every country necessarily limited by the use which there is for them; that it would be absurd to have more pots and pans than were necessary for cooking the victuals usually consumed there; and that, if the quantity of victuals were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ots and pans would readily increase along with it; a part of the increased quantity of victuals being employed in purchasing them, or in maintaining an additional number of workmen whose business it was to make them. It should as readily occur, that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is, in every country, limited by the use which there is for those metals; that their use consists in circulating commodities, as coin, and in affording a species of household furniture, as plate; that the quantity of coin in every country is regulated by the value of the commodities which are to be circulated by it; increase that value, and immediately a part of it will be sent abroad to purchase, wherever it is to be had, the additional quantity of coin requisite for circulating them: that the quantity of plate is regulated by the number and wealth of those private families who choose to indulge themselves in that sort of magnificence; increase the number and wealth of such families, and a part of this increased wealth will most probably be employed in purchasing, wherever it is to be found, an additional quantity of plate; that to attempt to increase the wealth of any country, either by introducing or by detaining in it an unnecessary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is as absurd as it would be to attempt to increase the good cheer of private families, by obliging them to keep an unnecessary number of kitchen utensils. As the expence of

purchasing those unnecessary utensils would diminish, instead of increasing, either the quantity or goodness of the family provisions; so the expence of purchasing an unnecessary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must, in every country, as necessarily diminish the wealth which feeds, clothes, and lodges, which maintains and employs the people. Gold and silver, whether in the shape of coin or of plate, are utensils, it must be remembered, as much as the furniture of the kitchen. Increase the use of them, increase the consumable commodities which are to be circulated, managed, and prepared by means of them, and you will infallibly increase the quantity; but if you attempt by extraordinary means to increase the quantity, you will as infallibly diminish the use, and even the quantity too, which in those metals can never be greater than what the use requires. Were they ever to be accumulated beyond this quantity, their transportation is so easy, and the loss which attends their lying idle and unemployed so great, that no law could prevent their being immediately sent out of the country.

据说，消费品不久即可毁损，而金银则具有更耐久的特性，只要不继续输出，就可在一段时间内累积起来，对国家的真实财富产生难以置信的增长。因此，有人说以耐久品交换易于毁损的商品是最不利于国家的贸易。但英国的铁器也是极为耐久的商品，若不继续输出，也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累积，使国内锅具产生难以置信的增多，而若以英国的铁器交换法国的葡萄酒，人们却不认为这是不利的贸易。显然，任一国家此类器具的数量必然要受实际用途的限制，且在任一国家，锅具通常都只是烹饪在本地消费的食物，不必要地加锅具，真是荒谬。但若食物增多，则相应地，锅具数量就易于增加，只需以增加的食物的一部分来购买锅具，或增加经营锅具制造的铁匠即可。同样，显然任一国家的金银量都受它们实际用途的限制，或用于铸币以流通，或制成器皿充当家具。商品靠铸币而流通，任何国家的铸币量都取决于国内这些商品的价值；若商品的价值提高，就立即有部分商

品运往有铸币的外国，以购买铸币，满足使商品流通所必须增加的铸币量；金银器皿的数量则取决于国内私人家族的数量与其财富，若这些家族沉迷于富丽堂皇，则若他们的数量与财富增加，增加的财富就很可能运往有器皿之处，以购买所需要购置的器皿。欲通过购置多于所需的厨房用具，以使这些家族更加快乐，与某国家输入或保存多于所需的金银，以增加国家财富，都是荒谬的。消费购买不必要的用具，只会减少家庭食品的数量，降低其质量，而不会使其增加与提高；同样，购买不必要的金银，也必然会使用于维持人民生活的食品、衣服和居所的财富减少。必须知道，无论金银铸成铸币还是器皿，它们都和厨房用具一样，都只是器具。若增加金银的使用以及可通过金银流通、管理和制造的消费品，就一定会增加金银数量；但是，由于金银数量必将受其使用的限制，若试图用非常规手段增加金银的数量，就必将减少它们的使用，甚至减少其数量。若金银的积累超出所需的数量，由于金银易于运输，同时闲置会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失，则任何法律都无法阻止金银立即向国外输出。

It is not always necessary to accumulate gold and silver, in order to enable a country to carry on foreign wars, and to maintain fleets and armies in distant countries. Fleets and armies are maintained, not with gold and silver, but with consumable goods. The nation which, from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domestic industry, from the annual revenue arising out of its lands, and labour, and consumable stock, has wherewithal to purchase those consumable goods in distant countries, can maintain foreign wars there.

若一国进行对外战争，维持遣往远方国家的海军与陆军，则积累金银不是必需的，因为维持军队的不是金银而是消费品。国内产业的年生产物，或说本国土地、劳动和可消费资本的年收入都是在远方国家购买消费品的手段。拥有此种手段的国家，才能维持对远方国家作战。

A nation may purchase the pay and provisions of an army in a distant country three different ways; by sending abroad either, first, some part of its accumulated gold and silver; or, secondly, some part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manufactures; or, last of all, some part of its annual rude produce.

某国家购买遣往远方军队的军资以及粮食，可通过三种方式：第一、将积累的金银某些部分运往国外；第二、将制造业的年生产物某些部分运往国外；第三、将年原生产物的某些部分运往国外。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can properly be considered as accumulated, or stored up in any country, may be distinguish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 the circulating money; secondly, the plate of private families; and, last of all, the money which may have been collected by many years parsimony, and laid up in the treasury of the prince.

可以认为，可将任何国家积累或贮存的金银分为三部分：第一、流通的货币；第二、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第三、因多年的节俭而积累起来并储存于君主国库的货币。

It can seldom happen that much can be spared from the circulating money of the country; because in that there can seldom be much redundancy. The value of goods annually bought and sold in any country requires a certain quantity of money to circulate and distribute them to their proper consumers, and can give employment to no more. The channel of circulation necessarily

draws to itself a sum sufficient to fill it, and never admits any more. Something, however, is generally withdrawn from this channel in the case of foreign war. By the great number of people who are maintained abroad, fewer are maintained at home. Fewer goods are circulated there, and less money becomes necessary to circulate them. An extraordinary quantity of paper money of some sort or other, too, such as exchequer notes, navy bills, and bank bills, in England, is generally issued upon such occasions, and, by supplying the place of circulating gold and silver, gives an opportunity of sending a greater quantity of it abroad. All this, however, could afford but a poor resource for maintaining a foreign war, of great expence, and several years duration.

一国流通的货币中，几乎不会有金银能够从中节省出来，因为不会有太多剩余。任何国家每年交易的商品价值都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足以使货物流通，并分配给真正的消费者，但该数量不可超出必要量。流通渠道必然吸引足够的货币支持流通，但不会吸引流通所需之外的更多货币。但在对外进行战争时，就通常从流通渠道中抽取一些货币。因要将许许多多人遣往国外，在国内维持生活的人就大大减少。国内流通的货物减少，必然使得流通货物所必需的货币减少。此时，英国会发行大量纸币，如英格兰财政部证券、海军部证券和银行证券，代替流通的金银，这使得国家得以将大额金银运往国外。但是，对外战争消耗巨大，且持续时间长达数年，仅靠这些方式提供的资源真是少得可怜。

The melting down of the plate of private families has, upon every occasion, been found a still more insignificant one. The French,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war, did not derive so much advantage from this expedient as to compensate the loss of the fashion.

无论在任何时候，熔解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更没什么意义。法国在上次战争初期曾采用此法，但以此所获的利益尚不及铸造的损失。

The accumulated treasures of the prince have in former times afforded a much greater and more lasting resource. In the present times, if you except the king of Prussia, to accumulate treasure seems to be no part of the policy of European princes.

从前，君主积累的财富可提供一种更多且更持久的资源。而如今除普鲁士国王之外，欧洲似乎已没有一位君主将积累财富纳为政策。

The funds which maintained the foreign wars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he most expensive perhaps which history records, seem to have had little dependency upon the exportation either of the circulating money, or of the plate of private families, or of the treasure of the prince. The last French war cost Great Britain upwards of £90,000,000, including not only the £75,000,000 of new debt that was contracted, but the additional 2s. in the pound land-tax, and what was annually borrowed of the sinking fund. 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is expence were laid out in distant countries; in Germany, Portugal, America, in the ports of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The kings of England had no accumulated treasure. We never heard of any extraordinary quantity of plate being melted down. The circulating gold and silver of the country had not been supposed to exceed £18,000,000. Since the late recoinage of the gold, however, it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a good deal under-rated. Let us suppose,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most exaggerated computation which I remember to have either

seen or heard of, that, gold and silver together, it amounted to £30,000,000. Had the war been carried on by means of our money, the whole of it must, even according to this computation, have been sent out and returned again, at least twice in a period of between six and seven years. Should this be supposed, it would afford the most decisive argument, to demonstrate how unnecessary it is for government to watch over the preservation of money, since, upon this supposition, the whole money of the country must have gone from it, and returned to it again, two different times in so short a period, without any body's knowing any thing of the matter. The channel of circulation, however, never appeared more empty than usual during any part of this period. Few people wanted money who had wherewithal to pay for it. The profits of foreign trade, indeed, were greater than usual during the whole war, but especially towards the end of it. This occasioned, what it always occasions, a general over-trading in all the ports of Great Britain; and this again occasioned the usual complaint of the scarcity of money, which always follows over-trading. Many people wanted it, who had neither wherewithal to buy it, nor credit to borrow it; and because the debtors found it difficult to borrow, the creditors found it difficult to get payment. Gold and silver, however, were generally to be had for their value, by those who had that value to give for them.

本世纪数次对外战争或许是历史上耗费最大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资金似乎很少依靠流通货币、私人家庭金银器皿或国库财富的输出而维持。上一次与法国的战争消耗了英国至少9000万镑，不仅包括7500万镑新债务、每镑加收2先令的土地税，还包括每年从偿债基金中借用的资金。这项费用中有2/3以上用于远方他国，即德国、葡萄牙、美国、地中海各港口以及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英格兰国王没有积累财富，但我们也从未听说熔解了大量的金银器皿。据推断，当时

国内流通的金银不超过1800万镑，但自上一次金币重铸以来，人们才相信这一数额被大大低估了。因此，按照我印象中最夸大的计算，不妨假定英国金银总额达3000万镑。即使是根据这样的计算，若靠英国的货币维持战争，则6、7年间也必然会将这一数额运出运入至少两个来回。若如此假设，就能提供极为果断的论证，说明政府毫无监管货币留存的必要。根据假设，该国全部货币必然在如此的短期内的两个不同时间实现往返，无人察觉。然而，在此期间，流通渠道没有任何时候显得比平时更为空虚。有财力购买货币的人，很少会缺少它。在整个战争时期，尤其是末段，对外贸易的利润的确高于平时。在英国的全部港口，这往往会引起，也的确引起了普遍的过度交易。过度交易又导致人们不满于货币的稀少，这种不满常紧随过度交易而出现。许多人既没有购买的财力，又没有借贷的信用，且债务人认为借贷难度大，债权人认为贷款难以收回，因此许多人都缺少货币。但是，有人却拥有可以换取金银的价值，这些人通常都能以此价值来换取金银。

The enormous expence of the late war, therefore, must have been chiefly defrayed, not by the ex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but by that of British commodities of some kind or other. When the government, or those who acted under them, contracted with a merchant for a remittance to some foreign country, he would naturally endeavour to pay his foreign correspondent, upon whom he granted a bill, by sending abroad rather commodities than gold and silver. If the commodities of Great Britain were not in demand in that country, he would endeavour to send them to some other country in which he could purchase a bill upon that country. The transportation of commodities, when properly suited to the market, is always attended with a considerable profit; whereas that of gold and silver is scarce ever attended with any. When those metals are sent abroad in order to purchase foreign commodities, the merchant's profit arises, not from the purchase, but from the sale of

the returns. But when they are sent abroad merely to pay a debt, he gets no returns, and consequently no profit. He naturally, therefore, exerts his invention to find out a way of paying his foreign debts, rather by the exportation of commodities, than by that of gold and silver. The great quantity of British goods, export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late war, without bringing back any returns, is accordingly remarked by the author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Nation*.

因此，上一次战争耗费巨大，支付所费，必然主要依靠某种或多种英国商品的出口，而不是金银的输出。政府或政府官员同商人签订契约汇款至国外，则该商人自然会努力偿还他已签订期票的驻外官员，会将商品运出国外，而不运金银。若该国家不需要英国商品，商人就会尽力将商品运往他国，在他国购买期票以偿还之前那个国家的欠款。将商品运往合适的市场必能获取可观的利润，但运输金银却很难获利。当金银运往国外以购买外国商品时，商人所获得的利润并非从购买商品中获得，而是从运回本国商品的出售中获得。若他将金银运往国外仅仅是为了偿债，就无法获得能够运回的商品，以致无利可图。因此他自然会绞尽脑汁，找到偿还外国债务的办法，即倾向于通过商品出口来偿还，而不依靠金银的输出。《英国现状》作者指出，上次战争期间英国出口了大量商品，至今没有任何商品运回。

Besides the three sorts of gold and silver above mentioned, there is in all great commercial countries a good deal of bullion alternately imported and exported, for the purposes of foreign trade. This bullion, as it circulates among different commercial countries,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national coin circulates in every country,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money of the great mercantile republic. The national coin receives its movement and direction from the commodities circulated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each particular country; the money in the mercantile republic, from those circulated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Both are employed in facilitating exchanges, the one between different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the other between those of different nations. Part of this money of the great mercantile republic may have been, and probably was, employed in carrying on the late war. In time of a general war, it is natural to suppose that a movement and direction should be impressed upon it, different from what it usually follows in profound peace, that it should circulate more about the seat of the war, and be more employed in purchasing there, and in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the pay and provisions of the different armies. But whatever part of this money of the mercantile republic Great Britain may have annually employed in this manner, it must have been annually purchased, either with British commodities, or with something else that had been purchased with them; which still brings us back to commodities,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as the ultimate resources which enabled us to carry on the war. It is natural, indeed, to suppose, that so great an annual expence must have been defrayed from a great annual produce. The expence of 1761, for example, amounted to more than £19,000,000. No accumulation could have supported so great an annual profusion. There is no annual produce, even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could have supported it. The whole gold and silver annually imported into both Spain and Portugal, according to the best accounts, does not commonly much exceed £6,000,000 sterling, which, in some years, would scarce have paid four months expence of the late war.

除上述三种金银外，在全部商业大国中，还有大量金银块交替输入和输出，以满足国外贸易。如同国家铸币在国内流通一样，这种金银块在各商业国之间流通，可以将它视为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国家

铸币的流动及流动方向取决于每个国家境内流通的商品，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的流动及流动方向则取决于各商业国之间流通的商品。国家铸币和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都是用以促进交换的，前者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个人之间，后者用于不同国家的不同个人之间。或许，维持上一次战争可能使用了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的一部分。在一场全面战争期间，人们自然会认为货币的流动与流动方向不同于和平时期，货币在战场周边地区更多地流通，双方军队所需的军饷和粮食都要向战场周边及邻近的国家购买。无论英国每年以此方式购买了多少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的确每年都购买了，或以英国商品购买，或以英国商品购买的其他物品购买。因此，根本上仍只有商品和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才是维持战争的基本资源。自然可以认为，每年如此巨额的费用都是由巨额的年生产物支付的。例如，1761年的战争耗费至少1900万镑，没有任何积累的金银能够维持每年如此巨额的费用。即使是金银的年生产物，同样无法维持如此巨额的消费。根据最可靠的统计，通常，西班牙和葡萄牙每年输入的金银不会大大超过600万镑，某些年份的输入额尚不足以支付上次战争四个月的费用。

The commodities most proper for being transported to distant countries, in order to purchase there either the pay and provisions of an army, or some part of the money of the mercantile republic to be employed in purchasing them, seem to be the finer and more improved manufactures; such as contain a great value in a small bulk, and can therefore be exported to a great distance at little expence. A country whose industry produces a great annual surplus of such manufactures, which are usually exported to foreign countries, may carry on for many years a very expensive foreign war, without either exporting any considerabl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or even having any such quantity to export.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annual surplus of its manufactures must, indeed, in this case, be exported without bringing back any returns to the country, though it does to the merchant; the government purchasing of the

merchant his bills upon foreign countries, in order to purchase there the pay and provisions of an army. Some part of this surplus, however, may still continue to bring back a return. The manufacturers during; the war will have a double demand upon them, and be called upon first to work up goods to be sent abroad, for paying the bills drawn upon foreign countries for the pay and provisions of the army: and, secondly, to work up such as are necessary for purchasing the common returns that had usually been consumed in the country. In the midst of the most destructive foreign war, therefore, the greater part of manufactures may frequently flourish greatly; and, on the contrary, they may decline on the return of peace. They may flourish amidst the ruin of their country, and begin to decay upon the return of its prosperity. The different state of many different branches of the British manufactures during the late war, and for some time after the peace, may serve as an illustration of what has been just now said.

遣往远方国家军队的军饷和粮食也要在远方购买，购买这些物资或购买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以购买物资就要出口一定量的商品。更为精致与改良的制造品，似乎是最适合向远方国家出口的商品，此类商品体积小而价值高，耗费不高便可运往远方国家。若一个国家的产业每年生产的制造品有大量剩余，并将剩余产品输往国外，则即使该国不输出大量金银，甚至根本没有如此大量的金银输出，也同样有能力将一场耗费巨大的对外战争维持数年。的确，该国每年很大部分的剩余制造品都必须为战争而输出，由于政府向商人购买外国期票，以便在外国购买军队军饷和粮食，因此，该输出虽然可为商人创造利润，却无法为国家创造任何利润。但还是有一部分剩余制造品的输出可创造利润。战争期间对制造品的需求加倍，原因有二。第一，由于为购买军队的军饷和食粮而支付已和外国签订的期票，就会首先要求制造品运往国外；第二，仍需向外国购买已经消费掉的运回的外国货物，就要求制造品运往国外。因此，在破坏性最大的对外战争中，大部分

制造业往往会大为繁荣；相反，在恢复和平时往往却会衰落。制造业可能在国家衰败时繁荣，却在国家恢复繁荣时衰落。英国制造业的许多不同分支，在上次战争期间与停战和平后的一段时期的状况都不同，此可佐证我的上述内容。

No foreign war, of great expence or duration, could conveniently be carried on by the exportation of the rude produce of the soil. The expence of sending such a quantity of it into a foreign country as might purchase the pay and provisions of an army would be too great. Few countries, too, produce much more rude produce than what is sufficient for the subsistence of their own inhabitants. To send abroad any great quantity of it, therefore, would be to send abroad a part of the necessary subsistence of the people. It is otherwise with the exportation of manufacture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people employed in them is kept at home, and only the surplus part of their work is exported. Mr Hume frequently takes notice of the inability of the ancient kings of England to carry on, without interruption, any foreign war of long duration. The English in those days had nothing wherewithal to purchase the pay and provisions of their armies in foreign countries, but either the rude produce of the soil, of which no considerable part could be spared from the home consumption, or a few manufactures of the coarsest kind, of which, as well as of the rude produce, the transportation was too expensive. This inability did not arise from the want of money, but of the finer and more improved manufactures. Buying and selling was transacted by means of money in England then as well as now. The quantity of circulating money must have borne the same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and value of purchases and sales usually transacted at that time, which it does to those transacted at present; or, rather, it must have borne a greater proportion, because there was then no paper, which now

occupies a great part of the employment of gold and silver. Among nations to whom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are little known, the sovereign, upon extraordinary occasions, can seldom draw any considerable aid from his subjects, for reasons which shall be explained hereafter. It is in such countries, therefore, that he generally endeavours to accumulate a treasure, as the only resource against such emergencies. Independent of this necessity, he is, in such a situation, naturally disposed to the parsimony requisite for accumulation. In that simple state, the expence even of a sovereign is not directed by the vanity which delights in the gaudy finery of a court, but is employed in bounty to his tenants, and hospitality to his retainers. But bounty and hospitality very seldom lead to extravagance; though vanity almost always does. Every Tartar chief, accordingly, has a treasure. The treasures of Mazepa, chief of the Cossacks in the Ukraine, the famous ally of Charles XII., are said to have been very great. The French kings of the Merovingian race had all treasures. When they divided their kingdom among their different children, they divided their treasures too. The Saxon princes, and the first kings after the Conquest, seem likewise to have accumulated treasures. The first exploit of every new reign was commonly to seize the treasure of the preceding king, as the most essential measure for securing the succession. The sovereigns of improved and commercial countries are not under the same necessity of accumulating treasures, because they can generally draw from their subjects extraordinary aids upon extraordinary occasions. They are likewise less disposed to do so. They naturally, perhaps necessarily, follow the mode of the times; and their expence comes to be regulated by the same extravagant vanity which directs that of all the other great proprietors in their dominions. The insignificant pageantry of their court becomes every day more brilliant; and the expence of it not only prevents accumulation, but frequently encroaches upon the funds destined

for more necessary expences. What Dercyllidas said of the court of Persia, may be applied to that of several European princes, that he saw there much splendour, but little strength, and many servants, but few soldiers.

靠土地原生产物输出无法轻易地维持耗费巨大、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将大量原生产物运往外国以购买军队的军饷和粮食耗费过高，而且除去维持国内居民生活所需之外，几乎没有国家生产的原生产物还能有任何大量的剩余。因此，将大量原生产物输往外国，实际上相当于剥夺了居民一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而输出制造品却不同，所雇用制造业工人的生计仍在国内维持，只有其生产产品的剩余部分将被输出。休谟先生多次发现，古时英国国王没有长期不断进行对外战争的能力。当时英国无法从国内消费中大量节省原生产物，原生产物和粗制造品的运输又耗费巨大，除土地原生产物和少量最粗糙的制造品，没有其他物品可以购买遣往远方军队的军饷和食粮。不能长期不断作战的原因，并不在于缺少货币，而在于缺少更为精制与改良的制造品。当时，英格兰同今日一样，以货币为手段进行交易，货币流通量对通常进行的买卖次数和价值的比例也必然与今日相同，或更具体地说，即必大于今日。因为，当时尚没有纸币，而现在，纸币却已经代替了大部分金银。在商业和制造业不知名的国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其君主很难从属民处得到任何可观的援助，理由将在下文加以解释。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君主为防意外事件发生，都只得尽力积累财富，作为应对事件的财力来源。抛却其必要性不谈，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也自然倾向于节俭，因节俭为积累所必需。有虚荣心就会将宫廷装点得富丽堂皇，而在简朴的状态下，甚至君主的消费也不受虚荣心影响，而消费于奖励佃户、款待属臣。但奖励与款待极少会导致浪费，而虚荣心却几乎必会导致浪费。因此，每位鞑靼酋长积累了财宝，据说查理十二世著名的同盟者乌克兰哥萨克酋长马泽帕就拥有大量财宝；梅罗文加王朝的法国国王都拥有财宝，其将土地分封与后代时，同样向他们分发财宝；撒克逊君主以及诺曼征服后最初的几位国王似乎同样曾经积累过财宝。每个新政权为自身谋取的第一份利益

通常就是夺取上一位国王的财宝，将它作为确保继承权最重要的手段。商业发达国家的君主却不同，没有积累财宝的必要，也更不倾向于这样做，因为特殊事件发生时，这些君主通常都能得到属民的特别援助。他们自然地，或许也是必然地，跟从时代的消费模式，同领土内各大地主一样，其消费受支于奢侈的虚荣心。宫廷中毫无意义的装饰日渐华丽，耗费巨大，不仅妨碍财富积累，且往往侵蚀那些指定用于更必要支出的基金。得西利达关于波斯宫廷所说的内容，同样可适用于欧洲的一些君主。他在那里看不到多少力量，没有多少军人；只能看到许多华丽之物，仆人却是众多。

The im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is not the principal, much less the sole benefit, which a nation derives from its foreign trade. Between whatever places foreign trade is carried on, they all of them derive two distinct benefits from it. It carries out that surplus part of the produce of their land and labour for which there is no demand among them, and brings back in return for it something else for which there is a demand. It gives a value to their superfluities, by exchanging them for something else, which may satisfy a part of their wants and increase their enjoyments. By means of it, the narrowness of the home market does not hinder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any particular branch of art or manufacture from being carried to the highest perfection. By opening a more extensive market for whatever part of the produce of their labour may exceed the home consumption, it encourages them to improve its productive power, and to augment its annual produce to the utmost, and thereby to increase the real revenue and wealth of the society. These great and important services foreign trade is continually occupied in performing to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between which it is carried on. They all derive great benefit from it, though that in which the merchant resides generally derives the greatest, as he is generally more employed in supplying the wants,

and carrying out the superfluities of his own, than of any other particular country. To import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may be wanted into the countries which have no mines, is, no doubt a part of the business of foreign commerce. It is, however, a most insignificant part of it. A country which carried on foreign trade merely upon this account, could scarce have occasion to freight a ship in a century.

金银的输入不是一个国家从国外贸易中取得的主要利益，更不是唯一利益。无论在任何两地之间进行国外贸易，全都可从中获得两种不同的利益，即输出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的剩余部分，交换各自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过以这些物品的剩余再次交换其他物品，满足各自部分的需要，并增进享乐，赋予剩余物品价值。通过如此，任何工艺或制造业各分支的分工就会发展到最完善的程度，不受国内市场的局限。由于为超出国内消费需要的这部分劳动成果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就鼓励各国改进生产力，最大限度增加年生产物，以实现社会真实财富与收入的增长。在互相之间进行对外贸易的全部不同国家，以上这些伟大而关键的目标都不断地由对外贸易来实现。通常，经营国外贸易的商人总是更多关注供应本国人民的需要和本国的剩余产品的出口，而很少关注供应他国人民的需要和剩余产品出口。两种国家都能从对外贸易中获益，但商人所在的国家通常收益最大。无疑，对外贸易业务的一部分，就是将金银输入没有金银矿，却需要金银的国家。但这是意义最小的一部分，仅仅为此而经营国外贸易的国家，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都难以有机会赚够一船的金银。

It is not by the im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that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has enriched Europe. By the abundance of the American mines, those metals have become cheaper. A service of plate can now be purchased for about a third part of the corn, or a third part of the labour, which it would have cost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With the same annual expence of labour and commodities, Europe can annually purchase about three times the quantity of plate which it could have purchased at that time. But when a commodity comes to be sold for a third part of what bad been its usual price, not only those who purchased it before can purchase three times their former quantity, but it is brought down to the level of a much greater number of purchasers, perhaps to more than ten, perhaps to more than twenty times the former number. So that there may be in Europe at present, not only more than three times, but more than twenty or thirty times the quantity of plate which would have been in it, even in its present state of improvement, had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mines never been made. So far Europe has, no doubt, gained a real conveniency, though surely a very trifling one. The cheapness of gold and silver renders those metals rather less fit for the purposes of money than they were before. In order to make the same purchases, we must load ourselves with a greater quantity of them, and carry about a shilling in our pocket, where a groat would have done b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say which is most trifling, this inconveniency, or the opposite conveniency.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could have made any very essential change in the state of Europe.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however, certainly made a most essential one. By opening a new and inexhaustible market to all the commodities of Europe, it gave occasion to new divisions of labour and improvements of art, which in the narrow circle of the ancient commerce could never have taken place, for want of a market to take of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produce.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were improved, and its produce increased in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Europe, and together with it the real revenue and wealth of the inhabitants. The commodities of Europe were almost all new to America, and many of those of America were new to Europe. A new set of exchanges, therefore, began to take place, which had never been thought of before, and which should

naturally have proved as advantageous to the new, as it certainly did to the old continent. The savage injustice of the Europeans rendered an event, which ought to have been beneficial to all, ruinous and destructive to several of those unfortunate countries.

由于美洲金银矿丰富，使得金银价格降低，因此美洲的发现虽使得欧洲更为富裕，原因却并不在于金银的输入。如今购买金银器皿所需付出的谷物或劳动，大约相当于15世纪的1/3。欧洲每年付出等量的劳动和商品，即可购买约3倍于15世纪的金银器皿。但是，若某种商品的价格跌落到平时价格的1/3，则不仅本有财力的购买者可以购买3倍的商品，许多本没有财力者，也可以购买3倍；而或许此时有财力购买金银器皿者增加到了平时的10倍，或许20倍。因此，假设尚未发现美洲金银矿，或就算在目前的进步状态下，欧洲现有的金银器皿，可能比在此等假设下的金银器皿多达3倍，甚至可能20倍乃至30倍。迄今，虽然微不足道，但欧洲也无疑切实获取了便利。金银价格下跌，使金银不再如过去那样适合作为货币。实现同样的用途须携带更多金银，做同样的事，过去口袋只需携带4便士硬币，如今则需要1先令。很难断言这种便利与不便，何者更微不足道，但二者本来都不会使欧洲的状况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然而，美洲的发现的确使得欧洲的状况大为改变，因其为欧洲各路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使得欧洲可以就此进行新的分工，提高工艺。在旧时商业流通范围窄，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迫使产品离开时，这些都绝不会发生。劳动的生产力提高，欧洲各国产品增加，同时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增加。对于美洲来说，欧洲商品近乎新奇，美洲商品之于欧洲同样如此。因此，就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想的新交换，自然对旧大陆、新大陆同样有利。由于欧洲人野蛮而不公地制造事件，一件本该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的事，却对一些不幸的国家造成了破坏与摧毁。

The discovery of a passage to the East Indies by the Cape of Good Hope, which happened much about the same time, opened

perhaps a still more extensive range to foreign commerce, than even that of America, notwithstanding the greater distance. There were but two nations in America, in any respect, superior to the savages, and these were destroyed almost as soon as discovered. The rest were mere savages. But the empires of China, Indostan, Japan, as well as several others in the East Indies, without having richer mines of gold or silver, were, in every other respect, much richer, better cultivated, and more advanced in all arts and manufactures, than either Mexico or Peru, even though we should credit, what plainly deserves no credit, the exaggerated accounts of the Spanish writers concerning the ancient state of those empires. But rich and civilised nations can always exchange to a much greater value with one another, than with savages and barbarians. Europe, however, has hitherto derived much less advantage from its commerce with the East Indies, than from that with America. The Portuguese monopolized the East India trade to themselves for about a century; and it was only indirectly, and through them, that the other nations of Europe could either send out or receive any goods from that country. When the Dutch,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began to encroach upon them, they vested their whole East India commerce in an exclusive company. The English, French, Swedes, and Danes, have all followed their example; so that no great nation of Europe has ever yet had the benefit of a free commerce to the East Indies. No other reason need be assigned why it has never been so advantageous as the trade to America, which, between almost every nation of Europe and its own colonies, is free to all its subjects. The exclusive privileges of those East India companies, their great riches, the great favour and protection which these have procured them from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have excited much envy against them. This envy has frequently represented their trade as altogether pernicious, on account of the great quantities of silver which it every year exports from the countries from which it

is carried on. The parties concerned have replied, that their trade by this continual exportation of silver, might indeed tend to impoverish Europe in general, but not the particular country from which it was carried on; because, by the exportation of a part of the returns to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it annually brought home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that metal than it carried out. Both the objection and the reply are founded in the popular notion which I have been just now examining. It is therefore unnecessary to say any thing further about either. By the annual exportation of silver to the East Indies, plate is probably somewhat dearer in Europe than it otherwise might have been; and coined silver probably purchases a larger quantity both of labour and commodities. The former of these two effects is a very small loss, the latter a very small advantage; both too insignificant to deserve any part of the public attention. The trade to the East Indies, by opening a market to the commodities of Europe, or, what comes nearly to the same thing, to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is purchased with those commodities, must necessarily tend to increase the annual production of European commodities, and consequently the real wealth and revenue of Europe. That it has hitherto increased them so little, is probably owing to the restraints which it everywhere labours under.

几乎同时，人们发现了由好望角至东印度的航道，开辟了新的贸易市场，虽然该市场距离更为遥远，但或许比美洲市场更为广阔。当时的美洲，只有两个民族，在任何方面都比野蛮人优越，但这两个民族刚刚发现不久就遭到了毁灭，余下的民族都只是野蛮民族。但是，虽然中国、印度斯坦和日本以及东印度等几个帝国没有更为丰富的金银矿，但在其他任何方面，都要比墨西哥或秘鲁更为富裕，土地耕种情况更佳，全部的工艺和制造业都更先进；这些我们必须承认，即使相信西班牙作家关于这些帝国历史情况的夸大记载，何况他们的记载

显然不值得一信。富裕且文明的国家之间交易的价值总是大大高于这些国家与野蛮人、未开化人之间的交易。然而，欧洲与东印度通商所获的利益，往往比与美洲通商的利益更少。葡萄牙人对东印度贸易的垄断几乎长达一个世纪，其他欧洲国家，无论将任何货物运往东印度还是从东印度购进，都只能间接经过葡萄牙人之手。上世纪初叶，荷兰人开始入侵东印度，将东印度的全部商业授权给一家公司垄断。此后，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和丹麦人效仿此法，因此，欧洲没有任何大国曾从东印度自由贸易中获取任何利益。东印度贸易不及美洲贸易有利，只因美洲贸易是几乎每个欧洲国家对所属殖民地的贸易，可由任何殖民地居民自由经营。而东印度公司具有排他的特权、大量的财富，以及因财富而从各自政府那里得到的优惠和保护，已激起许多嫉恨。这种嫉恨将他们的贸易置于完全有害的境地，经营这种贸易的国家每年都要输出大量白银。据有关方回应，由于不断输出白银，他们的贸易通常的确可能会陷欧洲于贫困，但进行贸易的具体国家却不会如此，因为通过将部分购回的商品出口至欧洲其他国家，本国进行此类贸易每年赚回的白银远多于输出的白银。适才我一直在探讨那种广为接受的观点，包含了反对人士与辩论人士的观点，因此不必赘述。每年都有白银输往东印度，因此，欧洲的银器可能就会比没有白银输入东印度时更贵，银币可能即购买更多的劳动和商品。这两种结果的前者所受损失较小，后者所得利益较小，二者都微不足道，不不足以引起公众的关注。东印度贸易为欧洲商品开辟了新市场，类似地，为以这些商品购买的金银开辟了新市场，这必会使欧洲商品的年产量呈现增长趋势，由此，便使欧洲实际财富和收入有所增长。但至今增幅依然较小，原因或许就在于劳动处处受限。

I thought it necessary, though at the hazard of being tedious, to examine at full length this popular notion, that wealth consists in money or in gold and silver. Money, in common language, as I have already observed, frequently signifies wealth; and this ambiguity of expression has rendered this popular notion so familiar to us, that even they who are convinced of its absurdity, are very apt to forget

their own principles, and, in the course of their reasonings, to take it for granted as a certain and undeniable truth. Some of the best English writers upon commerce set out with observing, that the wealth of a country consists, not in its gold and silver only, but in its lands, houses, and consumable goods of all different kind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reasonings, however, the lands, houses, and consumable goods, seem to slip out of their memory; and the strain of their argument frequently supposes that all wealth consists in gold and silver, and that to multiply those metals is the great object of national industry and commerce.

我认为即使冒冗长的风险，也有必要详细讨论“财富由货币或金银构成”这种广为接受的观点。我已提到，按通常的话说，货币即财富；这种模糊的表达使这种观点深入我们的印象，甚至确信该说法错误的人，都总是会忽略原则，在做推理的过程中，将该观点视为确定且无可否认的真理。英国有数位就商业而著的顶尖作家开篇就指出，国家财富不仅在于金银，且由该国土地、房屋和各类消费品构成。然而他们在推理过程中似乎忽略了土地、房屋和消费品，论点往往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一切财富由金银构成，国家商业与制造业的最高目标就是增加金银。

The two principles being established, however, that wealth consisted in gold and silver, and that those metals could be brought into a country which had no mines, only by the balance of trade, or by exporting to a greater value than it imported; it necessarily became the great o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to diminish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goods for home consumption, and to increas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exportation of the produce of domestic industry. Its two great engines for enriching the country, therefore, were restraints upon importation, and

encouragement to exportation.

但是，有两个原则，一则财富由金银构成，二则没有金银矿的国家，只得通过贸易差额输入金银，即使输出价值大于输入价值。若建立了这两个原则，则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目标就必然成为尽量减少进口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商品，同时尽量提高国内产业产品的出口。因此，使国家富裕的两大动力，即限制输入和鼓励输出。

The restraints upon importation were of two kinds.

对输入的限制有两种。

First, restraint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such foreign goods for home consumption as could be produced at home, from whatever country they were imported.

第一，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商品，若能由本国生产，则无论从任何国家进口，都予以限制。

Secondly, restraint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goods of almost all kinds, from those particular countries with which the balance of trade was supposed to be disadvantageous.

第二，若认为与某国的贸易差额不利于本国，则在与该国的贸易中，限制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口。

Those different restraints consisted sometimes in high duties, and sometimes in absolute prohibitions.

这些不同的限制有时通过征收高关税，有时通过绝对禁止。

Exportation was encouraged sometimes by drawbacks, sometimes by bounties, sometimes by advantageous treaties of commerce with foreign states, and sometimes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colonies in distant countries.

鼓励输出，有时通过退税，有时通过奖金，有时同其他国家签订有利的通商条约，有时通过在远方国家建立殖民地。

Drawbacks were given upon two different occasions. When the home manufactures were subject to any duty or excise, either the whole or a part of it was frequently drawn back upon their exportation; and when foreign goods liable to a duty were imported, in order to be exported again, either the whole or a part of this duty was sometimes given back upon such exportation.

退税出现于两种不同情况。已经缴纳关税或国内货物税的国内制造品，通常在出口将全部或部分税款退还；进口时已经完税的外国商品，再输出时将全部或部分税款退还。

Bounties were given for the encouragement, either of some

beginning manufactures, or of such sorts of industry of other kinds as were supposed to deserve particular favour.

发放奖金以鼓励新兴的制造业发展，或奖励那些人们认为应受特殊照顾的其他此类行业。

By advantageous treaties of commerce, particular privileges were procured in some foreign state for the goods and merchants of the country, beyond what were granted to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通过有利的通商条约，在某些外国给予本国商品或商人一些特权，外国本国的商品及商人都无法享受。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colonies in distant countries, not only particular privileges, but a monopoly was frequently procured for the goods and merchants of the country which established them.

在远方国家建立殖民地，使殖民地所属国的商品和商人享有一些特权，且通常令他们占有垄断。

The two sorts of restraints upon importation above mentioned, together with these four encouragements to exportation, constitute the six principal means by which the commercial system proposes to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in any country, by turning the balance of trade in its favour. I shall consider each of them in a particular chapter, and, without taking much farther

notice of their supposed tendency to bring money into the country, I shall examine chiefly what are likely to be the effects of each of them upon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industry. According as they tend either to increase or diminish the value of this annual produce, they must evidently tend either to increase or diminish the real wealth and revenue of the country.

上述这两种对输入的限制，以及四种对出口的鼓励，是重商主义倡导的，通过逆转贸易差额为有利，使国内金银增加的六种主要手段。下文各章节将分别详述这六种手段。有人推测，这六种手段有一种会将货币输入国内的倾向，我不会过多关注这种推测，而主要探讨每一种手段可能会对国家产业的年生产物产生何种影响。这些手段会使年生产物价值增加或减少，因此，显然也必会使国家的实际财富和收入增加或减少。

Chapter II. Of Restraints Upon Importationfrom Foreign Countries of Such Goodsas Can Be Produced at Home

第二章、论限制从国外进口国内可生产的商品

By restraining, either by high duties, or by absolute prohibitions, the importation of such good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s can be produced at home, the monopoly of the home market is more or less secured to the domestic industry employed in producing them. Thus the prohibition of importing either live cattle or salt provision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secures to the graziers of Great Britain the monopoly of the home market for butcher's meat. The high dutie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corn, which, in times of moderate plenty, amount to a prohibition, give a like advantage to the growers of that commodity. The prohibition of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woollen is equally favourable to the woollen manufacturers. The silk manufacture, though altogether employed upon foreign materials, has lately obtained the same advantage. The linen manufacture has not yet obtained it, but is making great strides towards it. Many other sorts of manufactures have, in the same manner obtained in Great Britain, either altogether, or very nearly, a monopoly against their countrymen. The variety of goods, of which the importation into Great Britain is prohibited, either absolutely, or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greatly exceeds what can easily be suspected by those who are not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laws of the customs.

国内可以生产的商品，若通过高关税限制或完全禁止从国外进口，则国内从事这些商品生产的产业总归可以保证对国内市场的垄断。据此看来，禁止从国外进口活牛及腌制食品使得英国畜牧业者保障了国内肉类市场的垄断地位。在丰收量适中的时期，对谷物征收高关税与禁止进口一并给予了该商品种植者许多益处，禁止外国毛纺品进口同样有利于毛纺业。虽然丝绸业使用的都是外国材料，但近期也赚取了同等利益，亚麻制造业则尚未赚取，但也向实现获利迈进了一大步。在英国，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制造业，以同样方式，或完全或几乎完全，取得了对抗同胞的垄断。英国绝对禁止或在某些情况下禁止输入的商品种类之繁杂，大大超出对关税法不熟悉者的想象。

That this monopoly of the home market frequently gives great encouragement to that particular species of industry which enjoys it, and frequently turns towards that employment a greater share of both the labour and stock of the society than would otherwise have gone to it, cannot be doubted. But whether it tends either to increase the general industry of the society, or to give it the most advantageous direction, is not, perhaps, altogether so evident.

此对国内市场的垄断，通常会极大地促进享有它的各类特定产业，且相比没有垄断时，无疑会使更多社会劳动和资本转向该产业。但这到底会不会促进社会的全部产业发展，将全部产业引入最有利的方向，或许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The general industry of the society can never exceed what the capital of the society can employ. As the number of workmen that can be kept in employment by any particular person must bear a certain proportion to his capital, so the number of those that can be continually employed by all the members of a great society must bear a certain proportion to the whole capital of the society, and never can exceed that proportion. No regulation of commerce can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industry in any society beyond what its capital can maintain. It can only divert a part of it into a direction into which it might not otherwise have gone; and it is by no means certain that this artificial direction is likely to be more advantageous to the society, than that into which it would have gone of its own accord.

社会的全部产业绝不会超过社会资本可维持的程度。任何个人可雇用的工人数必同其资本有确定的比例，同样，大社会的全体社会成员可持续雇用的工人数，同样绝不会超过社会全部资本与之的比例。任何商业条例都不能使任何社会产业的增加超过资本可维持的程度，只能使本不会用于某方向的部分产业转而用于该方向，且无法确定这个人为改动的方向是否会比自然发展趋势更有利于社会。

Every individual is continually exerting himself to find out the most advantageous employment for whatever capital he can

command. It is his own advantage, indeed, and not that of the society, which he has in view. But the study of his own advantage naturally, or rather necessarily, leads him to prefer that employment which is most advantageous to the society.

每位个人，都不断努力为可支配的任何资本寻找最有利的用途。的确，他看到的，只是个人利益，不是社会利益。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思考，自然会或必然会促使他选择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First, every individual endeavours to employ his capital as near home as he can, and consequently as much as he can in the support of domestic industry, provided always that he can thereby obtain the ordinary, or not a great deal less than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首先，每位个人都会努力将资本用于尽可能接近家乡的地方，因此，他们都尽力投入资本以维持本国产业，如此，他总是能够获取资本的普通利润，即使比普通利润少，亦少得不多。

Thus, upon equal, or nearly equal profits, every wholesale merchant naturally prefers the home trade to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and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to the carrying trade. In the home trade, his capital is never so long out of his sight as it frequently is in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He can know better the character and situation of the persons whom he trusts; and if he should happen to be deceived, he knows better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from which he must seek redress. In the carrying trade, the capital of the merchant is, as it were, divided between two

foreign countries, and no part of it is ever necessarily brought home, or placed under his own immediate view and command. The capital which an Amsterdam merchant employs in carrying corn from Koningsberg to Lisbon, and fruit and wine from Lisbon to Koningsberg, must generally be the one half of it at Koningsberg, and the other half at Lisbon. No part of it need ever come to Amsterdam. The natural residence of such a merchant should either be at Koningsberg or Lisbon; and it can only be some very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which can make him prefer the residence of Amsterdam. The uneasiness, however, which he feels at being separated so far from his capital, generally determines him to bring part both of the Koningsberg goods which he destines for the market of Lisbon, and of the Lisbon goods which he destines for that of Koningsberg, to Amsterdam; and though this necessarily subjects him to a double charge of loading and unloading as well as to the payment of some duties and customs, yet, for the sake of having some part of his capital always under his own view and command, he willingly submits to this extraordinary charge; and it is in this manner that every country which has any considerable share of the carrying trade, becomes always the emporium, or general market, for the goods of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whose trade it carries on. The merchant, in order to save a second loading and unloading, endeavours always to sell in the home market, as much of the goods of all those different countries as he can; and thus, so far as he can, to convert his carrying trade into a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A merchant, in the same manner, who is engaged in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when he collects goods for foreign markets, will always be glad, upon equal or nearly equal profits, to sell as great a part of them at home as he can. He saves himself the risk and trouble of exportation, when, so far as he can, he thus converts his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into a home trade. Home is in this manner the centre, if I may say so, round

which the capitals of the inhabitants of every country are continually circulating, and towards which they are always tending, though, by particular causes, they may sometimes be driven off and repelled from it towards more distant employments. But a capital employed in the home trade, it has already been shown, necessarily puts into motion a greater quantity of domestic industry, and gives revenue and employment to a greater number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than an equal capital employed in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and one employed in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has the same advantage over an equal capital employed in the carrying trade. Upon equal, or only nearly equal profits, therefore, every individual naturally inclines to employ his capital in the manner in which it is likely to afford the greatest support to domestic industry, and to give revenue and employment to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eople of his own country.

因此，若经营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利润完全或几乎相等，则每位批发商人自然都更愿意从事国内贸易，即使从事消费品的国外贸易，也不愿进行转口贸易。投资于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则通常难以跟踪资本，投资于国内贸易则不然，因为商人可更深入地掌握所信托者的人品和地位，即使偶然受骗，也会清楚该根据何种本国的法律以寻求赔偿。在转口贸易中，可称商人的资本分散于两个外国，不必将资本的任何部分带回国，却同样没有任何部分由他亲自跟踪与支配。例如，阿姆斯特丹商人将谷物从哥尼斯堡运往里斯本，从里斯本运水果和葡萄酒至哥尼斯堡，则通常，他需要将一半的资本投资于哥尼斯堡，另一半于里斯本。任何部分的资本都没有必要投用于阿姆斯特丹。此类的商人除极特殊情况之外，不会住在阿姆斯特丹，自然会住在哥尼斯堡或里斯本。然而，由于距资本如此之远，他会感到不安，往往会不惜双重的装配费用、纳税和支付关税等特殊费用，将本该运往里斯本的哥尼斯堡货物和该运往哥尼斯堡的部分里斯本货物运往阿姆斯特丹，以亲自跟踪与支配一些部分的资本。如此，每个具有一定份额转

口贸易的国家，就经常作为与其通商各国货物的中心市场或总市场。为将第二次装配的费用节省下来，商人总会尽力在本国市场内出售不同家国的商品，从而尽可能变转口贸易为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同样，经营消费品国外贸易的商人，当收集货物准备运往外国市场时，一定愿意以完全或几乎均等的利润尽可能在国内出售一大部分货物。若他如此将消费品国外贸易转变为国内贸易，就避免了出口的风险和麻烦。如果可以这么说，照此看来，国内总是每个国家居民资本的中心，资本不围绕这个中心流通，并常常流向这个中心。虽然有时出于特殊原因，这些资本会被迫流出该中心，在更遥远的地方使用。但我已经提到，同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等量资本相比，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必然能够推动更多的国内产业出现，为国内更多居民提供收入和劳动机会。用于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同投在转口贸易上的等量资本相比，也有同样的优点。因此，在利润完全或几乎均等时，每位个人自然会运用资本，最大限度地支持国内产业，尽可能使本国居民取得收入和劳动机会。

Secondly, every individual who employs his capital in the support of domestic industry, necessarily endeavours so to direct that industry, that its produce may be of the greatest possible value.

其次，每位个人投资以支持国内产业，就必然会尽力引导该产业，尽可能提高其生产物的价值。

The produce of industry is what it adds to the subject or materials upon which it is employed. In proportion as the value of this produce is great or small, so will likewise be the profits of the employer. But it is only for the sake of profit that any man employs a capital in the support of industry; and he will always, therefore, endeavour to employ it in the support of that industry of which the

produce is likely to be of the greatest value, or to exchange for the greatest quantity either of money or of other goods.

劳动对象或施加劳动的原材料，通过劳动增加部分，就是劳动的结果。因此，雇主利润的大小与生产物价值大小有关。但是，投资支持某产业的人都以谋利为唯一目标，自然就会尽力促使资本所支持产业的生产物具有最大价值，即交换最多货币或其他物品。

But the annual revenue of every society is always precisely equal to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of its industry, or rather is precisely the same thing with that exchangeable value. As every individual, therefore, endeavours as much as he can, both to employ his capital in the support of domestic industry, and so to direct that industry that its produce maybe of the greatest value; every individual necessarily labours to render the annual revenue of the society as great as he can. He generally, indeed, neither intends to promote the public interest, nor knows how much he is promoting it. By preferring the support of domestic to that of foreign industry,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security; and by directing that industry in such a manner as its produce may be of the greatest value,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gain; and he is in this, as in many other cases,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promote an end which was no part of his intention. Nor is it always the worse for the society that it was no part of it. By pursuing his own interest, he frequently promotes that of the society more effectually than when he really intends to promote it. I have never known much good done by those who affected to trade for the public good. It is an affectation, indeed, not very common among merchants, and very few words need be employed in dissuading them from it.

但每个社会的年收入，总是完全等于其产业全部年生产物的交换价值，或者更可以说，社会年收入恰恰就是这种交换价值。因此，由于每位个人都尽力使其资本支持国内产业、尽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价值最大化，就必然要尽力使社会年收入尽可能提高。的确，个人通常都既无意提高公共利益，又不知道自己实际促进了多少，且更倾向于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只关心自身安全；他如此管理产业，旨在最大化其生产物价值，同样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此时，同许多其他情况一样，他受一种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尽力向并非他本意的目的前进。而非出本意而行事并不一定会对社会更加有害。追求自身利益，往往会使个人比真正出于本意时更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利益。我从不知道，那些佯装为了公众的福祉而经营的人，事实上做了多少有益的事。的确，这种佯装在商人中间并不常见，无需说得太多去劝阻。

What is the species of domestic industry which his capital can employ, and of which the produce is likely to be of the greatest value, every individual, it is evident, can in his local situation judge much better than any statesman or lawgiver can do for him. The statesman, who should attempt to direct private people in what manner they ought to employ their capitals, would not only load himself with a most unnecessary attention, but assume an authority which could safely be trusted, not only to no single person, but to no council or senate whatever, and which would nowhere be so dangerous as in the hands of a man who had folly and presumption enough to fancy himself fit to exercise it.

将资本用于哪种国内产业可以使生产物价值最大化，对于这一问题，显然个人的判断会比政治家或立法者更为准确，因为他会根据自己在当地的境况判断。政治家试图指导私人应运用资本，就不仅是自

寻烦恼，花费最不必要的注意力，而且是篡用一种权力，这种权利无法安全地委托给任何个人和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将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妄用的人，极为危险。

To give the monopoly of the home market to the produce of domestic industry, in any particular art or manufacture, is in some measure to direct private people in what manner they ought to employ their capitals, and must in almost all cases be either a useless or a hurtful regulation. If the produce of domestic can be brought there as cheap as that of foreign industry, the regulation is evidently useless. If it cannot, it must generally be hurtful. It is the maxim of every prudent master of a family, never to attempt to make at home what it will cost him more to make than to buy. The tailor does not attempt to make his own shoes, but buys them of the shoemaker. The shoemaker does not attempt to make his own clothes, but employs a tailor. The farmer attempts to make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but employs those different artificers. All of them find it for their interest to employ their whole industry in a way in which they have some advantage over their neighbours, and to purchase with a part of its produce, or, what is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price of a part of it, whatever else they have occasion for.

使国内产业中任何特定工艺或制造业的生产物垄断国内市场，即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个人运用资本，这种规定必定毫无效果，甚至有害，几乎无一例外。若本国产业的生产物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产业的生产物同样廉价，显然这种规定就毫无效果。若不是同样廉价，则通常这种规定必然有害。每位精明的一家之主都会遵循一个原则，即若在家中生产的成本高于购买价格，则绝对不会在家中生产。裁缝会试图自己制鞋，而向鞋匠购买；鞋匠不会自己制衣，而会雇用裁缝；农民既不制衣，又不制鞋，则会雇用不同的工匠。他们都发现，为赚取

自身利益，应将全部劳动集中与优于周边众人的生产方式，并以部分劳动生产物或同等物品，加上一部分的劳动价格，购买所需的其他任何物品。

What is prudence in the conduct of every private family, can scarce be folly In that of a great kingdom. If a foreign country can supply us with a commodity cheaper than we ourselves can make it, better buy it of them with some part of the produce of our own industry, employed in a way in which we have some advantage. The general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being always in proportion to the capital which employs it, will not thereby be diminished, no more than that of the abovementioned artificers; but only left to find out the way in which it can be employed with the greatest advantage. It is certainly not employed to the greatest advantage, when it is thus directed towards an object which it can buy cheaper than it can make. The value of its annual produce is certainly more or less diminished, when it is thus turned away from producing commodities evidently of more value than the commodity which it is directed to produce. According to the supposition, that commodity could be purchas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cheaper than it can be made at home; it could therefore have been purchased with a part only of the commodities, or, what is the same thing, with a part only of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ies, which the industry employed by an equal capital would have produced at home, had it been left to follow its natural course. The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therefore, is thus turned away from a more to a less advantageous employment; and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its annual produce, instead of being increased, according to the intention of the lawgiver, must necessarily be diminished by every such regulation.

每个私人家庭行为中的精明之举，在大国行为中也极少就是荒唐的。若外国供应的制造商品价格，比我们自己制造的价格更便宜，就最好利用我们自身产业具有优势的方式生产商品的一部分向外国购买。国家的总劳动必然同维持它的产业资本成比例，绝不会因此减少，与上述工匠的劳动无异，不会减少，只是要寻找最有利的用途。有些商品购买成本低于亲自制造的成本，若付出劳动生产这些商品，就一定不是最有利的用途。若如此，劳动就没有用于生产显然比这些商品价值更高的商品，就一定或多或少降低其年生产物价值。据假设，向外国购买这种商品所花费的成本，低于国内制造的成本。因此，若任交易自然发展，即仅以等量资本雇用劳动，则以国内生产的部分商品或其部分价格，即可购买该商品。因此，这种规定，无一例外，都会将国家的劳动由有利用途引向更不利的用途；该国年生产物的交换价值，也不仅不会随立法者意志而增长，反而必将减少。

By means of such regulations, indeed, a particular manufacture may sometimes be acquired sooner than it could have been otherwise, and after a certain time may be made at home as cheap, or cheaper, than in the foreign country. But though the industry of the society may be thus carried with advantage into a particular channel sooner than it could have been otherwise, it will by no means follow that the sum-total, either of its industry, or of its revenue, can ever be augmented by any such regulation. The industry of the society can augment only in proportion as its capital augments, and its capital can augment only in proportion to what can be gradually saved out of its revenue. But the immediate effect of every such regulation is to diminish its revenue; and what diminishes its revenue is certainly not very likely to augment its capital faster than it would have augmented of its own accord, had both capital and industry been left to find out their natural employments.

的确，有时这种规定会使某制造业相比无此规定时更快地建立，一段时间后，便可在国内以同样成本或更低廉的成本制造商品。但虽然社会劳动因这种规定可更快有利地用于某种用途，但社会劳动和收入总额却都不能因此增长。社会劳动只能与社会资本的成比例增长，而社会资本的增加，仅取决于该社会可逐渐在收入中的节省。但是，上述每种规定都会直接导致社会收入减少，其中减少社会收入的部分，必不会使社会资本快速增加，若任凭资本和劳动自然寻找其用途，则社会资本才会快速增加。

Though, for want of such regulations, the society should never acquire the proposed manufacture, it would not upon that account necessarily be the poorer in anyone period of its duration. In every period of its duration its whole capital and industry might still have been employed, though upon different objects, in the manner that was most advantageous at the time. In every period its revenue might have been the greatest which its capital could afford, and both capital and revenue might have been augmented with the greatest possible rapidity.

虽然若缺少此类规定，则某种制造业无法在该社会中建立，但社会在任何发展时期内，却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在这社会发展的每一时期内，虽然社会全部资本与劳动使用的对象不同，但仍可能用于当时最有利的用途。每一时期内，其收入可能已经是资本可提供的最大限度，但资本与收入或许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增加。

The natural advantages which one country has over another, in producing particular commodities, are sometimes so great, that it is acknowledged by all the world to be in vain to struggle with them. By means of glasses, hot-beds, and hot-walls, very good grapes can

be raised in Scotland, and very good wine, too, can be made of them, at about thirty times the expence for which at least equally good can be brought from foreign countries. Would it be a reasonable law to prohibit the importation of all foreign wines, merely to encourage the making of claret and Burgundy in Scotland? But if there would be a manifest absurdity in turning towards any employment thirty times more of the capital and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than would be necessary to purchase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n equal quantity of the commodities wanted, there must be an absurdity, though not altogether so glaring, yet exactly of the same kind, in turning towards any such employment a thirtieth, or even a three hundredth part more of either. Whether the advantages which one country has over another be natural or acquired, is in this respect of no consequence. As long as the one country has those advantages, and the other wants them, it will always be more advantageous for the latter rather to buy of the former than to make. It is an acquired advantage only, which one artificer has over his neighbour, who exercises another trade; and yet they both find it more advantageous to buy of one another, than to make what does not belong to their particular trades.

有时，生产某种商品，某国自然优势极大，使得全世界都认为难以与这种优势竞争。通过搭建玻璃、温床与温墙，苏格兰种植葡萄品质也可极高，并酿造极佳的葡萄酒，相比国外购买至少同样品质的葡萄酒，其成本约高30倍。仅为了鼓励苏格兰酿造波尔多和勃艮第红葡萄酒，就立法禁止一切外国葡萄酒进口，合理吗？但是，若苏格兰不向外国购买一定数量所需的葡萄酒，反而竟然以30倍的资本和劳动亲自酿造，显然不合理。若使用仅高1/30甚至1/300的资本与劳动，同样不合理。虽然不合理程度并不如此惊人，但却同样不合理。在这一方面，无论一国相比另一国的优势地位是固有的还是后来获得的，都无关紧要。但只要某国有他国没有的优势，而他国向该国购买就必然

比亲自制造更加有利。掌握某种技艺的工匠比另一种工匠更有优势，虽然只是后天获得，但二者都会认为，交换对方生产的产品比亲自制造更为有利。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are the people who derive the greatest advantage from this monopoly of the home market The prohibition of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cattle and of salt provisions, together with the high duties upon foreign corn, which in times of moderate plenty amount to a prohibition, are not near so advantageous to the graziers and farmers of Great Britain, as other regulations of the same kind are to its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Manufactures, those of the finer kind especially, are more easily transported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than corn or cattle. It is in the fetching and carrying manufactures, accordingly, that foreign trade is chiefly employed. In manufactures, a very small advantage will enable foreigners to undersell our own workmen, even in the home market. It will require a very great one to enable them to do so in the rude produce of the soil. If the fre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manufactures were permitted, several of the home manufactures would probably suffer,and some of them perhaps go to ruin altogether, and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stock and industry at present employed in them, would be forced to find out some other employment. But the freest importation of the rude produce of the soil could have no such effect upon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ry.

商人与制造业者，可通过垄断国内市场，获取最大利益。在收货量一般的季节，虽然禁止外国牲畜及腌制食品进口，以及对外国谷物征收高额关税，有利于英国牧畜者与农民，但有利程度不比商人与制造业者从同类限制中所获的利益。制造品，尤其是精制造品，比谷物

和牲畜更易于从某国运往他国。因此，通常，国外贸易的主要业务为出售制造品。就制造品而言，甚至在国内市场，但凡可获取一丝微薄的利润，外国人同样会以低于本国工人生产产品的价格出售制造品。但土地原生产物，除非可获取极高利益，则无法如此。若此时允许外国制造品自由进口，则或许会有若干国内制造业蒙受损失，或许有若干国内制造业会完全垮塌，使得大部分资本与劳动脱离现有用途而被迫寻找其他用途。但若最自由地进口土地原生产物，则无法对本国农业产生此类影响。

If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cattle, for example, were made ever so free, so few could be imported, that the grazing trade of Great Britain could be little affected by it. Live cattle are, perhaps, the only commodity of which the transportation is more expensive by sea than by land. By land they carry themselves to market. By sea, not only the cattle, but their food and their water too, must be carried at no small expence and inconveniency. The short sea between Ireland and Great Britain, indeed, renders the importation of Irish cattle more easy. But though the free importation of them, which was lately permitted only for a limited time, were rendered perpetual, it could have no considerable effect upon the interest of the graziers of Great Britain. Those parts of Great Britain which border upon the Irish sea are all grazing countries. Irish cattle could never be imported for their use, but must be drove through those very extensive countries, at no small expence and inconveniency, before they could arrive at their proper market. Fat cattle could not be drove so far. Lean cattle, therefore, could only be imported; and such importation could interfere not with the interest of the feeding or fattening countries, to which, by reducing the price of lean cattle it would rather be advantageous, but with that of the breeding countries only. The small number of Irish cattle imported since their importation was permitted, together with the good price at which

lean cattle still continue to sell, seem to demonstrate, that even the breeding countries of Great Britain are never likely to be much affected by the free importation of Irish cattle. The common people of Ireland, indeed, are said to have sometimes opposed with violence the exportation of their cattle. But if the exporters had found any great advantage in continuing the trade, they could easily, when the law was on their side, have conquered this mobbish opposition.

例如，即使如此自由地进口牲畜，但由于可输入量少，导致对英国牧畜业的影响并不大。活牲畜或许是唯一一种航运成本高于陆运的商品，因为在陆运时，牲畜可以行走，搬运自身。但海运时，不仅需要运输牲畜，还需要运输牲畜所需的饲料和饮水，成本更高，更为麻烦。而爱尔兰和大不列颠之间的航程很短，因此进口爱尔兰牲畜更为便利。近期，仅允许爱尔兰牲畜限时输入，但即使允许其永久自由输入，对大不列颠牧畜业者利益亦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大不列颠靠近爱尔兰海的地区都是畜牧用地。爱尔兰牲畜在进口时，须经过众多地区才能到达适合的市场，期间所费成本较高，且颇为劳烦。肥的牲畜行走距离有限，因此只可进口瘦牲畜，如此便降低了瘦牲畜价值，不会损害饲养牲畜或将牲畜养肥地区的利益，对这些地区有利，只会损害繁育地区的利益。自允许爱尔兰牲畜进口以来，其输入量并不多，而瘦牲畜价格依旧不菲。这一事实似乎足以证明，甚至大不列颠的繁养地区都未必受爱尔兰牲畜自由输入太大影响。据说，有时爱尔兰的普通人民强烈反对牲畜出口。但是，若输出者认为继续输出牲畜可获取较高利益，则在法律对他们有利时克服人民的反对，并不是难事。

Feeding and fattening countries, besides, must always be highly improved, whereas breeding countries are generally uncultivated. The high price of lean cattle, by augmenting the value of uncultivated land, is like a bounty against improvement. To any

country which was highly improved throughout, it would be more advantageous to import its lean cattle than to breed them. The province of Holland, accordingly, is said to follow this maxim at present. The mountains of Scotland, Wales, and Northumberland, indeed, are countries not capable of much improvement, and seem destined by nature to be the breeding countries of Great Britain. The freest importation of foreign cattle could have no other effect than to hinder those breeding countries from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rest of the kingdom, from raising their price to an exorbitant height, and from laying a real tax upon all the more improved and cultivated parts of the country.

此外，能够饲养牲畜或将牲畜养肥的地区必然都是已经经过高度改良的地区，而繁育地区却通常未经开垦。因未开垦土地价值提高，则提高瘦牲畜的价格无异于提供与改良背道而驰的奖金。任何地区，全地区都已高度改良，则进口瘦牲畜比繁殖更为有利。因此，据说当今荷兰就遵从该原则。苏格兰、威尔士及诺森伯兰的山地都是无法高度改良的地区，似乎自然注定要成为大不列颠的繁育地。外国牲畜最自由的进口，只会使得这些地区无法将联合王国其他地方日益增长的人口与提高的改良利用起来，即不能将牲畜价格提高到极高程度，不能对国内改良程度更高和开垦过的地区征收真实的税。

The freest importation of salt provisions, in the same manner, could have as little effect upon the interest of the graziers of Great Britain as that of live cattle. Salt provisions are not only a very bulky commodity, but when compared with fresh meat they are a commodity both of worse quality, and, as they cost more labour and expence, of higher price. They could never, therefore, come into competition with the fresh meat, though they might with the

salt provisions of the country. They might be used for victualling ships for distant voyages, and such like uses, but could never make any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food of the people. The small quantity of salt provisions imported from Ireland since their importation was rendered free, is an experimental proof that our graziers have nothing to apprehend from it.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the price of butcher's meat has ever been sensibly affected by it.

腌制食品最自由的输入同活牲畜一样，同样不能对大不列颠牧畜业者的利益产生太大影响。腌制食品这种商品不仅笨重，且其较鲜肉更低，因所需劳动较多、成本较高，其价格更为高昂。因此，这种腌制食品，虽可与本国的腌制食品竞争，但必然无法与本国的鲜肉竞争。虽然可将腌制食品作为远洋运粮船的食品以及类似用途，但它构不成人民食品德大部分。自允许腌制食品自由进口以来，从爱尔兰进口的腌制食品量依旧不多，该事实正是英国牧畜业者丝毫无需畏惧这种自由输入的实证。似乎，食用鲜肉的价格亦从未受其显著影响。

Even the fre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corn could very little affect the interest of the farmers of Great Britain. Corn is a much more bulky commodity than butcher's meat. A pound of wheat at a penny is as dear as a pound of butcher's meat at fourpence. The small quantity of foreign corn imported even in times of the greatest scarcity, may satisfy our farmers that they can have nothing to fear from the freest importation. The average quantity imported, one year with another, amounts only, according to the very well informed author of the Tracts upon the Corn Trade, to 23,728 quarters of all sorts of grain, and does not exceed the five hundredth and seventy-one part of the annual consumption. But as the bounty upon corn occasions a greater exportation in years of plenty, so it must, of consequence, occasion a greater importation in

years of scarcity, than in the actual state of tillage would otherwise take place. By means of it, the plenty of one year does not compensate the scarcity of another; and as the average quantity exported is necessarily augmented by it, so must likewise, in the actual state of tillage, the average quantity imported. If there were no bounty, as less corn would be exported, suit is probable that, one year with another, less would be imported than at present. The corn-merchants, the fetchers and carriers of cor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foreign countries, would have much less employment, and might suffer considerably; but the country gentlemen and farmers could suffer very little. It is in the corn-merchants, accordingly, rather than the country gentlemen and farmers, that I have observed the greatest anxiety for the renewal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bounty.

即使是外国谷物的自由进口，同样不能对大不列颠农业者的利益产生太大影响。谷物这种商品，比食用鲜肉笨重得多。4便士1磅的食用鲜肉和1便士1磅的小麦同样昂贵。甚至在严重欠丰收的季节，进口的外国谷物依然不多。该事实可打消英国农民对外国谷物自由进口的恐惧。根据对此知之甚多的谷物贸易研究者所著论文，英国平均每年进口的各种谷物总量不超过23728夸特，仅占本国年消费额1/571。但由于丰收季节，谷物奖金导致了输出量超出没有奖金的情况下的实际产量，亦即在歉收季节，必将导致进口量超出没有奖金的情况下的实际产量。如此，一年的丰收不能补偿来年的歉收。由于此种奖金必将提高平均的出口量，因此平均进口量，必将因此提高，超出出没有奖金的情况下的实际产量所允许的平均进口量。若无此奖金，则出口的谷物将少于目前。因此，逐年平均计算，进口量或许亦将少于目前。谷物商人，即在英国及他国间贩运谷物的人，也将因此而错过许多生意，蒙受很大损失；但乡绅和农业者的损失却极为有限，因此，最希望奖金制度继续实行的，不是乡绅与农业者，而是谷物商人。

Country gentlemen and farmers are, to their great honour, of all people, the least subject to the wretched spirit of monopoly. The undertaker of a great manufactory is sometimes alarmed if another work of the same kind is established within twenty miles of him; the Dutch undertaker of the woollen manufacture at Abbeville, stipulated that no work of the same kind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in thirty leagues of that city. Farmers and country gentlemen, on the contrary, are generally disposed rather to promote, than to obstruct, the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ir neighbours farms and estates. They have no secrets, such as thos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manufacturers, but are generally rather fond of communicating to their neighbours, and of extending as far as possible any new practice which they may have found to be advantageous. “Pius quaestus”, says old Cato, “stabilissimusque, minimeque invidiosus; minimeque male cogitantes sunt, qui in eo studio occupati sunt.” Country gentlemen and farmers, dispers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cannot so easily combine as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who being collected into towns, and accustomed to that exclusive corporation spirit which prevails in them, naturally endeavour to obtain, against all their countrymen, the same exclusive privilege which they generally possess against the inhabitants of their respective towns. They accordingly seem to have been the original inventors of those restraint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goods, which secure to them the monopoly of the home market. It was probably in imitation of them, and to put themselves upon a level with those who, they found, were disposed to oppress them, that the country gentlemen and farmers of Great Britain so far forgot the generosity which is natural to their station, as to demand the exclusive privilege of supplying their countrymen with corn and butcher's meat. They did not, perhaps, take time to consider how much less their interest could be affected by the freedom of trade, than that of the people whose example they followed.

乡绅与农业者最不具有卑劣的垄断精神，在全部人民中，这是他们极大的光荣。有时，若大制造厂企业家发现附近20英里内新建了一座同类工厂，可能就会感到惊慌。在阿布维尔经营毛织品制造业的荷兰人，规定在该城市周边60英里内，不允许建立同类工厂。相反，农业者与乡绅却通常不会阻止周边各村庄与土地的耕作与改良，更愿意为其推波助澜。大部分制造业者都有秘密，但他们却没有秘密，若他们发现有利的新方法，通常都会将方法告诉他们邻人，并尽可能推广新方法。老加图曾说："这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生活最为稳定，最不遭人忌恨，最没有抱怨。"乡绅与农业者分散于国内各地，不利于联合；商人与制造业者，却聚居于城市内，便于联合。后者都受城市盛行的联合专营精神的影响，通常在取得违反城市居民利益的专营特权后，自然就会尽力取得违反所有同胞利益的专营特权。对外国商品进口进行限制以保持国内市场的垄断，似乎就是他们首创的。乡绅和农业者就其地位而言需要有慷慨之心，他们却忘记了这一点，或许是在效仿商人和制造业者，有意打压对方，使其地位相当，因此却谋求对谷物及食用鲜肉供给的垄断权。而自由贸易对他们利益的影响远远小于对商人和制造业者利益的影响，或许他们没兴趣考虑这一问题。

To prohibit, by a perpetual law,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corn and cattle, is in reality to enact, that the population and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shall, at no time, exceed what the rude produce of its own soil can maintain.

以长期法律禁止谷物及牲畜进口，实际上就等于规定了一国人口与产业永远不得超过本国土地原生产物所能维持的限度。

There seem, however, to be two cases, in which it will

generally be advantageous to lay some burden upon foreign,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domestic industry.

然而，为外国产业增加些许负担以鼓励国内产业，似乎通常只在一下二种情况下是有利的。

The first is, when some particular sort of industry is necessary for the defence of the country. The defence of Great Britain, for example, depends very much upon the number of its sailors and shipping. The act of navigation, therefore, very properly endeavours to give the sailors and shipping of Great Britain the monopoly of the trade of their own country, in some cases, by absolute prohibitions, and in others, by heavy burdens upon the shipping of foreign countries. The following are the principal dispositions of this act.

第一，某产业为国防所必需。例如，大不列颠的国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水手与船只的数量。因此，大不列颠的航海法，必然力求通过绝对禁止外国航船，或对其征收重税，以使本国水手和船只垄断本国航运。航海法的规定要旨如下：

First, All ships, of which the owners, masters, and three-fourths of the mariners, are not British subjects, are prohibited, upon pain of forfeiting ship and cargo, from trading to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and plantations, or from being employed in the coasting trade of Great Britain.

一、与大不列颠定居地与种植园通商，或在大不列颠沿岸经商的

船只，若船主、船长及3/4船员不是英国籍臣民，则一律禁止，否则没收船只及所载货物。

Secondly, A great variety of the most bulky articles of importation can be brought into Great Britain only, either in such ships as are above described, or in ships of the country where those goods are produced, and of which the owners, masters, and three-fourths of the mariners, are of that particular country; and when imported even in ships of this latter kind, they are subject to double aliens duty. If imported in ships of any other country, the penalty is forfeiture of ship and goods. When this act was made, the Dutch were, what they still are, the great carriers of Europe; and by this regulation they were entirely excluded from being the carriers to Great Britain, or from importing to us the goods of any other European country.

二、只允许进口各类体积极大的商品通过上述船只或商品生产国的船只（船主、船长及3/4船员为该国人民）输入大不列颠，但由后者进口则必须加征收外商税。若通过其他船只进口，则一律没收船只及所载货物。此法令颁布时，荷兰人是欧洲的大运送业者，至今仍然如此。但该法令公布后，荷兰人就无法继续成为大不列颠的运送业者，无法将欧洲其他各国的货物输入英国。

Thirdly, A great variety of the most bulky articles of importation are prohibited from being imported, even in British ships, from any country but that in which they are produced, under pain of forfeiting ship and cargo. This regulation, too, was probably intended against the Dutch. Holland was then, as now, the great emporium for all European goods; and by this regulation, British

ships were hindered from loading in Holland the goods of any other European country.

三、进口各类体积极大的商品，只允许由生产国船只进行，即便是英国船只，同样禁止，否则没收船只与所载货物。或许该规定为荷兰人专设。当时，荷兰与如今相同，是欧洲各种货物的大市场，该规定使得英国船只无法将欧洲其他各国货物从荷兰境内运出。

Fourthly, Salt fish of all kinds, whale fins, whalebone, oil, and blubber, not caught by and cured on board British vessels, when imported into Great Britain, are subject to double aliens duty. The Dutch, as they are still the principal, were then the only fishers in Europe that attempted to supply foreign nations with fish. By this regulation, a very heavy burden was laid upon their supplying Great Britain.

四、在输入大不列颠时，须对非英国船只捕获或制作的各种腌鱼、鲸须、鲸鳍、鲸油和鲸脂征收加倍的外商税。当时，欧洲只有荷兰以捕鱼为业，供给他国，现在主要仍是荷兰人。该规定使得荷兰向英国供给鱼产品时须缴纳极重的税。

When the act of navigation was made, though England and Holland were not actually at war, the most violent animosity subsisted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It had begun dur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long parliament, which first framed this act, and it broke out soon after in the Dutch wars, during that of the Protector and of Charles II. It is not impossible, therefore, that some of the regulations of this famous act may have proceeded from

national animosity. They are as wise, however, as if they had all been dictated by the most deliberate wisdom. National animosity, at that particular time, aimed at the very same object which the most deliberate wisdom would have recommended, the diminution of the naval power of Holland, the only naval power which could endanger the security of England.

虽然该航海法制定时，英、荷两国没有实际上的战争，但两国之间已经树立了极大的仇恨。仇恨的出现，要追溯到制定该法律的长期议会统治时期，并在不久后，即克伦威尔王朝及查理二世王朝对的荷兰战争中爆发。因此，或许可以说称该著名法令中几条规定源于民族仇恨。但这些规定却仿佛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同样明智。在当时这个特殊时期，荷兰海军是唯一可能威胁英格兰安全的海军，民族仇恨就在于削弱荷兰海军，与深思熟虑得出的目标恰好相同。

The act of navigation is not favourable to foreign commerce, or to the growth of that opulence which can arise from it. The interest of a nation, in its commercial relations to foreign nations, is, like that of a merchant with regard to the different people with whom he deals, to buy as cheap, and to sell as dear as possible. But it will be most likely to buy cheap, when, by the most perfect freedom of trade, it encourages all nations to bring to it the goods which it has occasion to purchase;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it will be most likely to sell dear, when its markets are thus filled with the greatest number of buyers. The act of navigation, it is true, lays no burden upon foreign ships that come to export the produce of British industry. Even the ancient aliens duty, which used to be paid upon all goods, exported as well as imported, has, by several subsequent acts, been taken off from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articles of exportation. But if foreigners, either by prohibitions or high duties,

are hindered from coming to sell, they cannot always afford to come to buy; because, coming without a cargo, they must lose the freight from their own country to Great Britain. By diminishing the number of sellers, therefore, we necessarily diminish that of buyers, and are thus likely not only to buy foreign goods dearer, but to sell our own cheaper, than if there was a more perfect freedom of trade. As defence, however, is of much more importance than opulence, the act of navigation is, perhaps, the wisest of all the commercial regulations of England.

航海法对国外贸易，即对因国外贸易而增加的财富，是不利的。如同个人商人对交易对象的关系，一国对外国通商，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更为有利。但是，若贸易完全自由，则国家最可能有低价买入的机会，因为完全自由贸易鼓励一切国家，将所需物品运至国内。出于相同原因，亦最可能高价卖出，因为买房聚集于该国市场，使得货物售价得以尽量提高。当然，航海法并未对前往英国出口英国产品的外国船只征收税款。甚至，由于此后的若干法令，输出和输入货物通常都要缴纳的外商税，在输出大部分商品时都无需再行缴纳。但这些都不足以减弱航海法对国外贸易有害的倾向。若外国人受禁止或被征收高额关税就既无法到英国出售货物，也负担不起到英国购买的成本。因为若不装载货物，就必将损失从他们国家到大不列颠的船只费。因此，使售卖者减少，就是使购买者减少。如此，同贸易完全自由的时比较，我们不仅要以更高价格购买外国货物，且只得以更低价格出售本国货物。但是，由于国防比国富更为重要，因此，在英国各种通商条例中，航海法也许是最明智的一种。

The second case, in which it will generally be advantageous to lay some burden upon foreign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domestic industry, is when some tax is imposed at home upon the produce of the latter. In this case, it seems reasonable that an equal tax should

be imposed upon the like produce of the former. This would not give the monopoly of the borne market to domestic industry, nor turn towards a particular employment a greater share of the stock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than what would naturally go to it. It would only hinder any part of what would naturally go to it from being turned away by the tax into a less natural direction, and would leave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foreign and domestic industry, after the tax, as nearly as possible upon the same footing as before it. In Great Britain, when any such tax is laid upon the produce of domestic industry, it is usual,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stop the clamorous complaints of our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that they will be undersold at home, to lay a much heavier duty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all foreign goods of the same kind.

通常，向外国产业施加若干负担以鼓励国内产业，有第二种有利的情况，即在国内对国内生产物征税。此时，似乎对外国相同产物征收等额的税同样合理。如此不会赋予国内产业对国内市场的垄断权，也不会使流入某特殊用途的资本与劳动多于自然情况。征税仅仅会使得本要流入该用途的任一部分资本与劳动，不至流入较不自然的用途。而征税后，本国产业与外国产业仍能够在与税前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互相竞争。在大不列颠，若对国内产业的生产物征收此类税目，通常会对同类外国商品进口征收更高的关税，一面国内商人和制造业者大肆抱怨这些商品在国内的价格要大大降低。

This second limitation of the freedom of trade, according to some people, should, upon most occasions, be extended much farther than to the precise foreign commodities which could come into competition with those which had been taxed at home. Whe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have been taxed in any country, it becomes

proper, they pretend, to tax not only the like necessaries of life imported from other countries, but all sorts of foreign goods which can come into competition with any thing that is the produce of domestic industry. Subsistence, they say, becomes necessarily dearer in consequence of such taxes; and the price of labour must always rise with the price of the labourer's subsistence. Every commodity, therefore, which is the produce of domestic industry, though not immediately taxed itself, becomes dearer in consequence of such taxes, because the labour which produces it becomes so. Such taxes, therefore, are really equivalent, they say, to a tax upon every particular commodity produced at home. In order to put domestic upon the same footing with foreign industry, therefore, it becomes necessary, they think, to lay some duty upon every foreign commodity, equal to this enhancement of the price of the home commodities with which it can come into competition.

有些外国商品输入本国而与本国已经缴纳税款的商品竞争，有人认为，自由贸易的第二种限制，在一些情况下不应局限于这些外国商品，而应该延伸至许多其他外国商品。他们称，若在国内对生活必需品征税，则不仅对外国输入的同类必需品征税是正当的，且对输入本国，并对与本国任何产业的生产物竞争的各种外国商品征税也是正当的；征收此类税款必将使生活品价格上涨，劳动者生活品价格上涨，必将导致劳动价格随之上涨。因此，由于生产各种商品的劳动价格上涨，则虽然未对本国产业生产的各种商品直接征税，但其价格都将因此类征税而上涨。因此，虽然他们称此类征税仅针对生活必需品，但实际上等于对国内一切产物征税。他们认为，欲使国内产业与国外产业处于同等地位，则对输入本国而与本国任何商品竞争的每一类外国商品，必须征收与本国商品价格上涨额度相等的税。

Whether taxes upo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such as those in

Great Britain upon soap, salt, leather, candles, etc. necessarily raise the price of labour, and consequently that of all other commodities, I shall consider hereafter, when I come to treat of taxes. Supposing, however, in the mean time, that they have this effect, and they have it undoubtedly, this general enhancement of the price of all commodities, in consequence of that labour, is a case which differs in the two following respects from that of a particular commodity, of which the price was enhanced by a particular tax immediately imposed upon it.

英国的石硷税、盐税、皮革税、烛税等生活必需品的税是否必然会提高劳动价格，从而提高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我将在后文谈到赋税时加以考察。然而，假设这种税会有这样的影响，事实上它无疑必有次影响，则一切商品价格如此因劳动价格上涨而普遍上涨，则特定商品价格因直接征收特殊税而上涨，在以下两方面，情况有所不同。

First, it might always be known with great exactness, how far the price of such a commodity could be enhanced by such a tax; but how far the general enhancement of the price of labour might affect that of every different commodity about which labour was employed, could never be known with any tolerable exactness.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herefore, to proportion, with any tolerable exactness, the tax of every foreign, to the enhancement of the price of every home commodity.

第一，虽然必然能够准确判断此类特殊税可使某商品价格提高的程度，但劳动价格一般可提高到何种程度，从而影响各种不同劳动生产物的价格，却不能准确判断。因此，不可能准确地按各种国内商品价格上涨的比例，对各种外国商品征收相应的税。

Secondly, Taxes upo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have nearly the same effect up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people as a poor soil and a bad climate. Provisions are thereby rendered dearer, in the same manner as if it required extraordinary labour and expence to raise them. As, in the natural scarcity arising from soil and climate, it would be absurd to direct the people in what manner they ought to employ their capitals and industry, so is it likewise in the artificial scarcity arising from such taxes. To be left to accommodate, as well as they could, their industry to their situation, and to find out those employments in which, notwithstanding their un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they might have some advantage either in the home or in the foreign market, is what, in both cases, would evidently be most for their advantage. To lay a new-tax upon them, because they are already overburdened with taxes, and because they already pay too dear for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to make them likewise pay too dear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commodities, is certainly a most absurd way of making amends.

第二，生活必需品税对人民境况的影响，几乎相当于土壤贫瘠与气候不良所产生的影响。如此，食品价格会更加昂贵，正如在土壤贫瘠气候不良时生产食粮需要额外的劳动和成本一样。在因土壤和气候导致自然贫瘠时指导人民如何使用资本与劳动是不合理的；在对生活必需品征税而导致人为的匮乏时，指导人民如何使用资本与劳动，也是不合理的。明显以上两种情况中，让人民尽可能适应环境以寻找劳动的用途，使其在不利中取得国内或国外市场中略为优势的地位，对他们最为有利。他们负担的赋税已经太重，再征收新的赋税，则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已经支付过高的价格，再让他们对其他大部分物品也支付过高的价格以补救，无疑是最不合理的。

Such taxes, when they have grown up to a certain height, are a curse equal to the barrenness of the earth, and the inclemency of the heavens, and yet it is in the richest and most industrious countries that they have been most generally imposed. No other countries could support so great a disorder. As the strongest bodies only can live and enjoy health under an unwholesome regimen, so the nations only, that in every sort of industry have the greatest natural and acquired advantages, can subsist and prosper under such taxes. Holland is the country in Europe in which they abound most, and which, from peculiar circumstances, continues to prosper, not by means of them, as has been most absurdly supposed, but in spite of them.

此类赋税达到一定程度时的危害相当于土壤贫瘠和气候恶劣所造成的危害。但最最富裕和勤劳的国家却是征收这类赋税的最为普遍地方。其他国家，都难以承受如此混乱。只有最强健的身体才能以不卫生的饮食下生存并保持健康，因此，只有各种产业都具有天然最大优势和后天获取优势的国家，才能在这类赋税下存在而繁荣。荷兰是欧洲征收此类赋税最多的国家而荷兰的持续繁荣并非由于此类赋税，如此推测并不合理，而是因荷兰情况特殊，使此等赋税不能阻止其持续繁荣。

As there are two cases in which it will generally be advantageous to lay some burden upon foreign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domestic industry, so there are two others in which it may sometimes be a matter of deliberation, in the one, how far it is proper to continue the free importation of certain foreign goods; and, in the other, how far, or in what manner, it may be proper to restore that free importation, after it has been for some time interrupted.

向外国产业施加若干负担以鼓励本国产业，在以上两种情况下一般是有利的，而在以下两种情况则需慎重考虑。起义以何种程度继续允许某种外国货物自由输入是适当的；其二，以何种程度何种方式，在自由输入已经中断一段时间后恢复自由输入是适当的。

The case in which it may sometimes be a matter of deliberation how far it is proper to continue the free importation of certain foreign goods, is when some foreign nation restrains, by high duties or prohibitions, the importation of some of our manufactures into their country. Revenge, in this case, naturally dictates retaliation, and that we should impose the like duties and prohibition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some or all of their manufactures into ours. Nations, accordingly, seldom fail to retaliate in this manner. The French have been particularly forward to favour their own manufactures, by restraining the importation of such foreign goods as could come into competition with them. In this consisted a great part of the policy of Mr Colbert, who, notwithstanding his great abilities, seems in this case to have been imposed upon by the sophistry of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who are always demanding a monopoly against their countrymen. It is at present the opinion of the most intelligent men in France, that his operations of this kind have not been beneficial to his country. That minister, by the tariff of 1667, imposed very high duties upon a great number of foreign manufactures. Upon his refusing to moderate them in favour of the Dutch, they, in 1671, prohibited the importation of the wines, brandies, and manufactures of France. The war of 1672 seems to have been in part occasioned by this commercial dispute. The peace of Nimeguen put an end to it in 1678, by moderating some of those duties in favour of the Dutch, who in consequence took off their prohibition. It was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rench and English

began mutually to oppress each other's industry, by the like duties and prohibitions, of which the French, however, seem to have set the first example, The spirit of hostility which has subsisted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ever since, has hitherto hindered them from being moderated on either side. In 1697, the Ehglish prohibited the importation of bone lace, the manufacture of Flanders. The government of that country, at that time under the dominion of Spain, prohibited, in return, the importation of English woollens. In 1700, the prohibition of importing bone lace into England was taken oft; upon condition that the importation of English woollens into Flanders should be put on the same footing as before.

以何种程度继续允许某种外国商品自由输入适当，在某一外国以高关税或绝对禁止时，限制本国某些制造品输入时，在此情况下值得考虑。此时，报复心理自然会驱使我们对该国某些或全部制造品，征收同样的关税或推行禁令，通常各国都是如此报复。为保护本国制造业，法国特别倾向于禁止一切与他们形成争的外国商品。这似乎就是科尔伯特大部分的政策，科尔伯特虽颇有能力，但处理此问题时却似乎被商人和制造业者的诡辩所蒙骗。这些商人和制造业者总谋求一种对同胞不利的垄断权。如今法国最为明智的人都认为这种行为对法国没有益处。通过1667年的关税法，这位大臣对多数外国制造品征收极高的关税。荷兰人请求减轻关税，但遭到拒绝，于是在1671年禁止法国葡萄酒、白兰地及制造品输入。这次商业争端是1672年的战争爆发的部分原因。1678年的奈梅亨和约通过了荷兰人的请求，减轻了关税，于是荷兰人撤除了输入禁令。英法两国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互相征收高关税与推出禁令，以打压对方产业，但似乎是法国率先发难。从那时起，两国的敌意使得双方都让步。1697年，英国禁止佛兰德制梭结花边输入。佛兰德当时属西班牙领地，作为回击，其政府禁止英国毛织品输入。1700年，鉴于佛兰德撤回禁止英国毛纺品输入禁令，英国撤除禁止佛兰德梭结花边。

There may be good policy in retaliations of this kind, when there is a probability that they will procure the repeal of the high duties or prohibitions complained of. The recovery of a great foreign market will generally more than compensate the transitory inconveniency of paying dearer during a short time for some sorts of goods. To judge whether such retaliations are likely to produce such an effect, does not, perhaps, belong so much to the science of a legislator, whose deliberations ought to be governed by general principles, which are always the same, as to the skill of that insidious and crafty animal vulgarly called a statesman or politician, whose councils are directed by the momentary fluctuations of affairs. When there is no probability that any such repeal can be procured, it seems a bad method of compensating the injury done to certain classes of our people, to do another injury ourselves, not only to those classes, but to almost all the other classes of them. When our neighbours prohibit some manufacture of ours, we generally prohibit, not only the same, for that alone would seldom affect them considerably, but some other manufacture of theirs. This may, no doubt, give encouragement to some particular class of workmen among ourselves, and, by excluding some of their rivals, may enable them to raise their price in the home market. Those workmen however, who suffered by our neighbours prohibition, will not be benefited by ours. On the contrary, they, and almost all the other classes of our citizens, will thereby be obliged to pay dearer than before for certain goods. Every such law, therefore, imposes a real tax upon the whole country, not in favour of that particular class of workmen who were injured by our neighbours prohibitions, but of some other class.

高关税或输入禁令为人所抱怨，若为迫使其撤除而采用报复性政

策，只要迫使其撤除，就是好政策。通常，恢复大规模国外市场可抵消某些物品价格暂时的上涨而导致的暂时困难，且有剩余。判断报复能否达到目的，与其掌握有立法家的哲学，不如掌握政治家或政客的技巧，立法家的决议受固定一般原理指导，而世俗所谓政治家或政客，如阴险狡猾的动物，他们则受事件瞬时波动的影响。若不可能撤除禁令，为赔偿本国某些阶级人民遭受的损失，就伤害自身利益，则不仅会对该阶级的利益，而且汇兑几乎全部其他阶级的利益都造成损害，似乎是个坏的方法。若邻国禁止进口本国某种制造品，则我们通常不仅要禁止该国同类制造品，还要禁止该国其他制造品，仅禁止同类制造品几乎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无疑，这会鼓励本国某些产业的工人，为他们排除一些竞争者，使得他们可提高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价格。但是，这些工人不会受益于本国禁令。相反，这一阶级以及本国几乎全部其他阶级人民，购买某些货物都只得支付比从前更高的价格。因此，此类的法律事实上征税于全国，该阶级工人无法受益，受益的却是另一阶级人民。

The case in which it may sometimes be a matter of deliberation, how far, or in what manner, it is proper to restore the fre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goods, after it has been for some time interrupted, is when particular manufactures, by means of high duties or prohibitions upon all foreign goods which can come into competition with them, have been so far extended as to employ a great multitude of hands. Humanity may in this case require that the freedom of trade should be restored only by slow gradations, and with a good deal of reserve and circumspection. Were those high duties and prohibitions taken away all at once, cheaper foreign goods of the same kind might be poured so fast into the home market, as to deprive all at once many thousands of our people of their ordinary employment and means of subsistence. The disorder which this would occasion might no doubt be very considerable. It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however, be much less than is commonly

imagined, for the two following reasons.

在外国商品的自由输入已中断一段时间后，以何种程度或何种方式恢复自由输入才是适当的，在以下情况中值得考虑：因全部与某制造品形成竞争的外国商品都缴纳了高关税或被禁止输入，则本国该制造业因此而扩张，雇用大量工人。此时，或许出于人道主义，只得逐步而谨慎地缓慢恢复自由贸易。即刻撤除高关税与禁令，必将使更为廉价的同类外国商品快速流入国内市场，剥夺本国数以千计人民的一般职业与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如此必将导致的极大的混乱。但以下两个理由或许能够使现实不及想象那般混乱。

First, All those manufactures of which any part is commonly exported to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without a bounty, could be very little affected by the freest importation of foreign goods. Such manufactures must be sold as cheap abroad as any other foreign goods of the same quality and kind, and consequently must be sold cheaper at home. They would still, therefore, keep possession of the home market; and though a capricious man of fashion might sometimes prefer foreign wares, merely because they were foreign, to cheaper and better goods of the same kind that were made at home, this folly could, from the nature of things, extend to so few, that it could make no sensible impression upon the general employment of the people. But a great part of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our woollen manufacture, of our tanned leather, and of our hardware, are annually exported to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without any bounty, and these are the manufactures which employ the greatest number of hands. The silk, perhaps, is the manufacture which would suffer the most by this freedom of trade, and after it the linen, though the latter much less than the former.

第一，通常不需要奖金亦可输出至欧洲其他各国的制造品，不会受外国商品自由输入太大影响。此类制造品输往外国出售，其价格必定与同类、同品质的其他外国商品同样低廉。因此，其国内售价亦必然更为低廉，以占有国内市场份额。即使有任性者单单推崇外国商品，虽然本国制造的同类商品物美价廉，他们却不屑一顾，但此等愚蠢行径必然不会过于盛行，因此人民的一般职业不会受到显著影响。英国毛纺品制造业、皮革业和铁器业是雇用工人最多的制造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制造品每年不通过奖金即输往欧洲其他各国。遭自由贸易损害最为严重的也许是丝绸制造业，其次是麻布制造业，但后者所受损失比前者少得多。

Secondly, Though a great number of people should, by thus restoring the freedom of trade, be thrown all at once out of their ordinary employment and common method of subsistence, it would by no means follow that they would thereby be deprived either of employment or subsistence. By the reduction of the army and navy at the end of the late war, more than 100,000 soldiers and seamen, a number equal to what is employed in the greatest manufactures, were all at once thrown out of their ordinary employment: but though they no doubt suffered some inconveniency, they were not thereby deprived of all employment and subsistenc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eamen, it is probable, gradually betook themselves to the merchant service as they could find occasion, and in the mean time both they and the soldiers were absorbed in the great mass of the people, and employed in a great variety of occupations. Not only no great convulsion, but no sensible disorder, arose from so great a change in the situation of more than 100,000 men, all accustomed to the use of arms, and many of them to rapine and plunder. The number of vagrants was scarce anywhere sensibly increased by it; even the wages of labour were not reduced by it in any occupation, so far as I have been able to learn, except in that of

seamen in the merchant service. But if we compare together the habits of a soldier and of any sort of manufacturer, we shall find that those of the latter do not tend so much to disqualify him from being employed in a new trade, as those of the former from being employed in any. The manufacturer has always been accustomed to look for his subsistence from his labour only; the soldier to expect it from his pay. Application and industry have been familiar to the one; idleness and dissipation to the other. But it is surely much easier to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industry from one sort of labour to another, than to turn idleness and dissipation to any. To the greater part of manufactures, besides,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there are other collateral manufactures of so similar a nature, that a workman can easily transfer his industry from one of them to another. The greater part of such workmen, too, are occasionally employed in country labour. The stock which employed them in a particular manufacture before, will still remain in the country, to employ an equal number of people in some other way.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remaining the same, the demand for labour will likewise be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though it may be exerted in different places, and for different occupations. Soldiers and seamen, indeed, when discharged from the king's service, are at liberty to exercise any trade within any town or place of Great Britain or Ireland. Let the same natural liberty of exercising what species of industry they please, be restored to all his Majesty's subjects, in the same manner as to soldiers and seamen; that is, break down the exclusive privileges of corporations, and repeal the statute of apprenticeship, both which are really encroachments upon natural Liberty, and add to those the repeal of the law of settlements, so that a poor workman, when thrown out of employment, either in one trade or in one place, may seek for it in another trade or in another place, without the fear either of a prosecution or of a removal; and neither the public nor the

individuals will suffer much more from the occasional disbanding some particular classes of manufacturers, than from that of the soldiers. Our manufacturers have no doubt great merit with their country, but they cannot have more than those who defend it with their blood, nor deserve to be treated with more delicacy.

第二，虽然如此恢复自由贸易将使许多人民当即失去一般职业和普遍的谋生手段，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失业或无从生存。上次战争结束后，陆军、海军裁员超过10万，相当于最大规模的制造业所雇用的人数，他们骤然失去了他们平时从事的职业，无疑会感到困难，但并不意味着剥夺了他们一切职业与谋生手段。或许大部分水军会逐渐转移到船只上从事商业服务，被裁员的陆军与海军士兵都进入了广大的人民中，受雇于各种职业。其中许多人惯用武器，惯于劫掠，其境遇如此巨变，却不曾导致大动乱与显著的混乱。任何地方的暴徒并未因此而显著增加，且据我所知，除商船海员外，任何职业的劳动报酬都未减少。试比较士兵和任何种类制造业工人的习惯，可以发现后者更不倾向于转而从事新事业，降低身份。因为制造业工人总是仅靠自身劳动为生，而士兵则以军饷为生。工人习惯执行与勤劳，士兵则习惯懒惰与怠慢；只是改变勤劳的方向，无疑比改怠惰为勤劳更加容易。此外已经知道，大部分制造业都有性质相似的旁系制造业，因此，对于工人来说，易于将劳动从一种转向另一种制造业，且大部分此类工人，有时还受雇于从事乡村劳动。之前在某制造业中雇用他们的资本仍将留在国内，只是以另一种方式雇用等量的其他工人。国家资本未变，劳动需要也和之前完全或大致相同，只是使用于是在不同地点、不同职业。的确，若陆军与海军士兵不再为国王效力，则可自由地在大不列颠或爱尔兰任何城市或任何地方从事任何事业。若恢复国王所有属民选择任何职业的自由权利，如陆军与海军士兵那般，即瓦解同行业联合的专营特权，撤除学徒法令——二者都是对天赋自由的实际侵害，并进一步撤除居住法，使贫穷工人在某行业或某地失业后，可转向其他行业或其他地方而无需担心受控或驱赶，如此，由于某制造业工人偶然遣散而对社会或个人造成的损害，就不会大于因士兵遣散

所遭受的损害。无疑，制造业工人对国家的功劳很大，但同以鲜血保卫国家的士兵相比，就不应受更好的对待了。

To expect, indeed, that the freedom of trade should ever be entirely restored in Great Britain, is as absurd as to expect that an Oceana or Utopia should ever be established in it. Not only the prejudices of the public, but, what is much more unconquerable, the private interests of many individuals, irresistibly oppose it. Were the officers of the army to oppose, with the same zeal and unanimity, any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forces, with which master manufacturers set themselves against every law that is likely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heir rivals in the home market; were the former to animate their soldiers.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latter inflame their workmen, to attack with violence and outrage the proposers of any such regulation; to attempt to reduce the army would be as dangerous as it has now become to attempt to diminish, in any respect, the monopoly which our manufacturers have obtained against us. This monopoly has so much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some particular tribes of them, that, like an overgrown standing army, they have become formidable to the government, and, upon many occasions, intimidate the legislature. The member of parliament who supports every proposal for strengthening this monopoly, is sure to acquire not only the reputation of understanding trade, but great popularity and influence with an order of men whose numbers and wealth render them of great importance. If he opposes them, on the contrary, and still more, if he has authority enough to be able to thwart them, neither the most acknowledged probity, nor the highest rank, nor the greatest public services, can protect him from the most infamous abuse and detraction, from personal insults, nor sometimes from real danger, arising from the insolent outrage of furious and disappointed

monopolists.

诚然，正如不能期望将奥希阿纳或乌托邦建立在大不列颠一样，不能期望自由贸易在大不列颠完全恢复。不仅公众对其具有偏见，许多个人的私利更难客服，这些都是阻止自由贸易完全恢复不可抗的阻力。若军队官员都一致坚决反对缩减裁剪兵力，就像制造业者反对在国内市场增加竞争者人数的法律一样，都鼓动士兵暴力反击提议裁剪兵力者，就像制造业者鼓动工人暴力攻击法律提议者一样，则裁剪军队是十分危险的，正如当前在任何方面缩减本国制造业者危害对同胞有害的垄断权一样。此垄断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某些制造业的人数，这些人就像过于庞大的常备军，不仅威胁政府，而且往往还可以威胁立法机关。提议加强垄断权的国会议员，不仅可获赞通晓贸易，还可在因人数众多和财富丰富而占重要地位的阶级中受到欢迎，扩大影响力。相反，若反对此类提案，或有阻止这类提案的权力，则即使他是公认最正直的人，有最高的地位，或有对社会贡献最大，亦难免遭到最难堪的侮辱与诽谤，遭受人身攻击，且有时因为垄断者愤怒且失望以无理的暴行攻击他，使他面临真正的危险。

The undertaker of a great manufacture, who, by the home markets being suddenly laid open to the competition of foreigners, should be obliged to abandon his trade, would no doubt suffer very considerably. That part of his capital which had usually been employed in purchasing materials, and in paying his workmen, might,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perhaps, find another employment; but that part of it which was fixed in workhouses, and in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could scarce be disposed of without considerable loss. The equitable regard, therefore, to his interest, requires that changes of this kind should never be introduced suddenly, but slowly, gradually, and after a very long warning. The legislature, were it possible that its deliberations could be always

directed, not by the clamorous importunity of partial interests, but by an extensive view of the general good, ought, upon this very account, perhaps, to be particularly careful, neither to establish any new monopolies of this kind, nor to extend further those which are already established. Every such regulation introduces some degree of real disorder in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which it will be difficult afterwards to cure without occasioning another disorder.

若大制造业经营者因在国内市场遭逢外国商人的竞争而被迫放弃经营，则无疑会大受损失。通常，或许变更本用以购买原材料和支付报酬的资本用途并不困难，但工厂固定使用或用于经营手段的资本，难免会遭到较大损失。因此，出于公平考虑，大型制造业经营者的利益要求这种改变不能操之过急，而应在发出长期警告后，缓慢逐渐进行。若立法机关的决议不受个别利益的纠缠影响，而从普遍福祉的广阔视角出发，则立法机关需要格外谨慎，绝不能建立任何新的此类垄断，更不扩大现存的垄断，否则，此等法律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制造混乱，即使随后施行救济，亦难免导致另一种混乱。

How far it may be proper to impose taxe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goods, in order not to prevent their importation, but to raise a revenue for government, I shall consider hereafter when I come to treat of taxes. Taxes imposed with a view to prevent, or even to diminish importation, are evidently as destructive of the revenue of the customs as of the freedom of trade.

而以何种程度对外国商品的输入征税较为合适，即不为禁止输入，而为提高政府收入，是我在下文论及赋税时所要思考的。但以阻止输入甚至减少输入而征收的税，显然既会破坏贸易自由，又会破坏关税收入。

Chapter III. Of The ExtraordinaryRestraint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Goods of Almost All Kinds, FromThose Countries with Which theBalance Is Supposed To BeDisadvantageous

第三章、论针对认定贸易差额不利于本国的国家各种商品输入，加以额外限制

Part I. Of the Unreasonableness of those Restraints, even upon the-Principles of the Commercial System

第一节、即使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这种限制也不合理

To lay extraordinary restraint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goods of almost all kinds, from those particular countries with which the balance of trade is supposed to be disadvantageous, is the second expedient by which the commercial system proposes to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Thus, in Great Britain, Silesia lawns may be imported for home consumption, upon paying certain duties; but French cambrics and lawns are prohibited to be imported, except into the port of London, there to be warehoused for exportation. Higher duties are imposed upon the wines of France than upon those of Portugal, or indeed of any other country. By what is called the impost 1692, a duty of five and-twenty per cent. of the rate or value, was laid upon all French goods; while the goods of other nations we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subjected to much lighter duties, seldom exceeding five per cent. The wine, brandy, salt, and vinegar of France, were indeed excepted; these commodities being subjected to other heavy duties, either by other laws, or by particular clauses of the same law. In 1696, a second duty of twenty-five per cent. the first not having been thought a sufficient discouragement, was imposed upon all French goods, except

brandy; together with a new duty of five-and-twenty pounds upon the ton of French wine, and another of fifteen pounds upon the ton of French vinegar. French goods have never been omitted in any of those general subsidies or duties of five per cent. which have been imposed upon all, 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goods enumerated in the book of rates. If we count the one-third and two-third subsidies as making a complete subsidy between them, there have been five of these general subsidies; so that,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resent war, seventy-five per cent.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lowest duty to whic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goods of the growth, produce, or manufacture of France, were liable. But upon the greater part of goods, those duties are equivalent to a prohibition. The French, in their turn, have, I believe, treated our goods and manufactures just as hardly; though I am not so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particular hardships which they have imposed upon them. Those mutual restraints have put an end to almost all fair commerce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and smugglers are now the principal importers, either of British goods into France, or of French goods into Great Britain. The principles which I have been examining, in the foregoing chapter, took their origin from private interest and the spirit of monopoly; those which I am going te examine in this, from national prejudice and animosity. They are, accordingly, as might well be expected, still more unreasonable. They are so, even up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mmercial system.

针对认定贸易差额不利于本国的国家各种商品输入，加以额外限制，就是重商主义提倡的增加金银的第二种方法。就此方式，西里西亚的细竹布缴纳一定的税后即可输入英国以供消费，但法国的细葛布及细竹布却除输入伦敦港入仓以待输出之外，则会禁止输入。法国葡萄酒输入英国，相比葡萄牙或任何其他国家葡萄酒，都要缴纳更高额的税。根据1692年所谓的输入税，一切法国商品都须缴纳相当于其价

值25%的税，而其他各国商品应纳的税却大多少得多，很少超过5%。当然，法国葡萄酒、白兰地、食盐和醋，不在此税范围之内，但这些商品却依其他法律或该税令的特殊条款，须缴纳其他重税。1696年，又增收25%的税，因为英国认为首先的25%尚不足以阻止法国商品输入，白兰地除外，同时对每大桶法国葡萄酒收税25镑，对每大桶法国醋收税15镑。全部法国商品或税簿中列举的各类商品，从未免除这些额度为5%的一般补贴税和关税。若将三分之一补贴税和三分之二补贴税也计算在内，计入总补贴税，则一般补贴税就包括了五种。因此，在目前的战争打响前，法国大部分农产品、生产品或制造品至少需缴纳75%的税，但如此收税无异于禁止输入。我相信，法国也会予以回击，向英国商品与制造品征收同样繁重的税，只是我不知道法国征收的税具体繁重到何种程度。这些互相的限制几乎断绝了两国间一切正当贸易，无论从哪国运往另一国，都主要依靠走私者。此前的章节阐述的原则起源于私人利益和垄断精神；本章将要讨论的各项原则却起源于国民偏见与敌意。因此，正如人们所见，本章讨论的原则更不合理，即使根据重商主义原则，同样不合理。

First, Though it were certain that in the case of a free trade between France and England, for example, the balance would be in favour of France, it would by no means follow that such a trade would be disadvantageous to England, or that the general balance of its whole trade would thereby be turned more against it. If the wines of France are better and cheaper than those of Portugal, or its linens than those of Germany, it would be more advantageous for Great Britain to purchase both the wine and the foreign linen which it had occasion for of France, than of Portugal and Germany. Though the value of the annual importations from France would thereby be greatly augmented, the value of the whole annual importations would be diminished, in proportion as the French goods of the same quality were cheaper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two countries. This would be the case, even upon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whole French goods imported were to be consumed in Great Britain.

第一，即使确定英法两国自由通商，其贸易差额对法国有利，但不能以此断定此等贸易对英国不利，亦不能断言英国全部贸易总差额将因此等贸易而更加不利。若法国葡萄酒比葡萄牙葡萄酒、法国麻布比德国麻布更加物美而价廉，则英国向法国购买所需的葡萄酒和外国麻布，比向葡萄牙和德国购买更有利。但即使每年从法国进口的商品价值必将大大提高，但因同品质的法国商品比葡萄牙和德国商品价格更低，所以全部进口商品的价值必将随之成比例下降。即使进口的法国商品完全在英国消费，情况也是如此。

But, Secondly, A great part of them might be re-exported to other countries, where, being sold with profit, they might bring back a return, equal in value, perhaps, to the prime cost of the whole French goods imported. What has frequently been said of the East India trade, might possibly be true of the French; that th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ast India goods were bought with gold and silver, the re-exportation of a part of them to other countries brought back more gold and silver to that which carried on the trade, than the prime cost of the whole amounted t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ranches of the Dutch trade at present, consists in the carriage of French goods to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Some part even of the French wine drank in Great Britain, is clandestinely imported from Holland and Zealand. If there was either a free trade between France and England, or if French goods could be imported upon paying only the same duties as those of other European nations, to be drawn back upon exportation, England might have some share of a trade which is found so advantageous to Holland.

第二，然而所进口的全部法国商品，可能有大部分会再次输往其他国家出售，以赚取利润，也许还会将与法国全部进口商品原始成本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运回英国。人们通常对于东印度贸易的评论同样适用于法国，即虽然大部分东印度商品是用金银购买的，但相比全部商品的原始成本，再输出其中一部分可带回本国更多的金银。如今，荷兰贸易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即将法国商品运往欧洲其他各国。还有部分由英国消费的法国葡萄酒，暗中从荷兰及西兰岛输入英国。若英法两国之间的贸易自由，或进口法国商品与欧洲其他各国商品缴纳同样的税，并通过输出收回此税，此等贸易对荷兰十分有利，则英国可能就会分享到这种利益。

Thirdly, and lastly, There is no certain criterion by which we can determine on which side what is called the balance between any two countries lies, or which of them exports to the greatest value. National prejudice and animosity, prompted always by the private interest of particular traders, are the principles which generally direct our judgment upon all questions concerning it. There are two criterions, however, which have frequently been appealed to upon such occasions, the custom-house books and the course of exchange. The custom-house books, I think, it is now generally acknowledged, are a very uncertain criterion, on account of the inaccuracy of the valuation at which the greater part of goods are rated in them. The course of exchange is, perhaps, almost equally so.

第三，即最后一点，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明确标准，以判断两国间的贸易差额对何者有利，即何者输出的价值最大。通常个别营业家的私利左右国民偏见与敌意，国民偏见与敌意又是引导我们判断一切相关问题的准则。然而，人们往往通过两个标准，即关税账簿与汇兑情况以解决此类问题。关税账簿对大部分商品价值的评估大多不

准确，因此目前人们广泛认为该标准并不可靠。或许，汇兑情况几乎同样不可靠。

When the exchange between two places, such as London and Paris, is at par, it is said to be a sign that the debts due from London to Paris are compensated by those due from Paris to London. On the contrary, when a premium is paid at London for a bill upon Paris, it is said to be a sign that the debts due from London to Paris are not compensated by those due from Paris to London, but that a balance in money must be sent out from the latter place; for the risk, trouble, and expence, of exporting which, the premium is both demanded and given. But the ordinary state of debt and credit between those two cities must necessarily be regulated, it is said, by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eir dealings with one another. When neither of them imports from from other to a greater amount than it exports to that other, the debts and credits of each may compensate one another. But when one of them imports from the other to a greater value than it exports to that other, the former necessarily becomes indebted to the latter in a greater sum than the latter becomes indebted to it: the debts and credits of each do not compensate one another, and money must be sent out from that place of which the debts overbalance the credits. The ordinary course of exchange, therefore, being an indication of the ordinary state of debt and credit between two places, must likewise be an indication of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eir exports and imports, as these necessarily regulate that state.

例如，若伦敦与巴黎两地以均等价格汇兑，据说这就是一种迹象，表明两地之间的债务恰好抵消。相反，若在伦敦购买巴黎汇票，就说明伦敦欠巴黎的债务未被巴黎欠伦敦的债务抵消，伦敦就必须将

一定差额的货币运往巴黎。由于输出货币有风险、多烦劳、费用高，则汇费必由双方需要并支付。但据说这两座城市之间债权与债务的一般状态必然受两地通商一般方向支配。若从某城市输入另一城市的进口额不多于从后者输出至前者的出口额，且从后者至前者的输入额不大于从前者至后者的输出额，则双方债务与债权即可抵消。但若前者从后者输入的价值大于同向输出的价值，则前者对后者的债务必然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债务，此时债权与债务未能抵消，则货币必将从债务数额大于债权数额的城市输出。因此，汇兑的一般方向，显示两地间债务与债权的一般状态，同样显示两地间输出与输入的一般方向，因为前种状态必受后种方向影响。

But though the ordinary course of exchange shall be allowed to be a sufficient indication of the ordinary state of debt and credit between any two places, it would not from thence follow, that the balance of trade was in favour of that place which had the ordinary state of debt and credit in its favour. The ordinary state of debt and credit between any two places is not always entirely regulated by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eir dealings with one another, but is often influenced by that of the dealings of either with many other places. If it is usual, for example, for the merchants of England to pay for the goods which they buy of Hamburg, Dantzic, Riga, etc. by bills upon Holland, the ordinary state of debt and credit between England and Holland will not be regulated entirely by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e dealings of those two countries with one another, but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at of the dealings in England with those other places. England may be obliged to send out every year money to Holland, though its annual exports to that country may exceed very much the annual value of its imports from thence, and though what is called the balance of trade may be very much in favour of England.

但即使汇兑的一般方向可充分显示两地间债务与债权的一般状态，但同样不能因此就断定若债务与债权的一般状态有利于某地，贸易差额就同样对该地有利。两地间债务与债权的一般状态通常还受两地间任何一地对其他各地通商一般状态的支配，未必完全取决于两地间通商的一般状态。例如，英国商人购买汉堡、但泽、里加等地的商品，若以荷兰汇票支付商品价格，则英荷两国之间债务与债权的一般状态就不完全受两国间通商一般情况影响，还受英国对上述三地通商一般情况影响。此时即使英格兰每年向荷兰输出商品的价值远超从荷兰进口商品的价值，且所谓的贸易差额对英国非常有利，英国每年却仍不得不向荷兰输出货币。

In the way, besides, in which the par of exchange has hitherto been computed, the ordinary course of exchange can afford no sufficient indication that the ordinary state of debt and credit is in favour of that country which seems to have, or which is supposed to have, the ordinary course of exchange in its favour; or, in other words, the real exchange may be, and in fact often is, so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computed one, that, from the course of the latter, no certain conclusion can, upon many occasions, be drawn concerning that of the former.

此外，按照目前计算汇兑平价的方法，即使汇兑的一般方向确实或推测有利于债务与债券的一般状态，但汇兑的一般方向同样不能充分表示债务与债权的一般情况是否对国家有利。换言之，事实就是，真实的与计算的汇兑方向可能差别很大，因此许多时候，绝不能仅凭汇兑的一般方向就得出债务债权一般状态的确定结论。

When for a sum or money paid in England, containing,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the English mint, a certain number of

ounces of pure silver, you receive a bill for a sum of money to be paid in France, containing,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the French mint, an equal number of ounces of pure silver, exchange is said to be at par between England and France. When you pay more, you are supposed to give a premium, and exchange is said to be against England, and in favour of France. When you pay less, you are supposed to get a premium, and exchange is said to be against France, and in favour of England.

按照英国铸币厂标准，若在英国支付一笔货币，包含一定盎司的纯银，会得到一定数额的汇票，在法国兑现货币，其数额按照法国铸币厂标准，所含的纯银量恰好相等，就可以说英法两国以平价汇兑。若支付的金额多于兑现的金额，则称支付了汇费，此时汇兑不利于英国，有利于法国。若支付的金额少于兑现金额，则称收取了汇费，此时汇兑不利于法国而有利于英国。

But, first, We cannot always judge of the value of the current money of different countries by the standard of their respective mints. In some it is more, in others it is less worn, clipt, and otherwise degenerated from that standard. But the value of the current coin of every country, compared with that of any other country, is in proportion, not to the quantity of pure silver which it ought to contain, but to that which it actually does contain. Before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lver coin in King William's time, exchange between England and Holland, computed in the usual manner,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their respective mints, was five-and twenty per cent. against England. But the value of the current coin of England, as we learn from Mr Lowndes, was at that time rather more than five-and-twenty per cent. below its standard value. The real exchange, therefore, may even at that time have been in favour

of England, notwithstanding the computed exchange was so much against it; a smaller number or ounces of pure silver, actually paid in England, may have purchased a bill for a greater number of ounces of pure silver to be paid in Holland, and the man who was supposed to give, may in reality have got the premium. The French coin was, before the late re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gold coin, much less wore than the English, and was perhaps two or three per cent. nearer its standard. If the computed exchange with France, therefore, was not more than two or three per cent. against England, the real exchange might have been in its favour. Since th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the exchange has been constantly in favour of England, and against France.

然而首先，我们不能总是按照各国铸币厂的标准判断各国流通货币的价值。各国流通货币的磨损程度和价值下降程度可能或多火烧低于标准。某国与他国通用铸币的价值相比，不取决于应含的纯银量，而取决于实际包含的纯银量。在威廉国王时期改铸银币之前，按照各自铸币厂的标准以及通常的方法计算，英荷两国间的汇兑中，英国贴水25%。但我们从朗兹先生处得知，英国当时流通铸币的价值，低于标准价值25%。因此，虽然按通常的方法计算，当时两国间真正的汇兑对英国如此不利，但实际上是对英国有利的，在英国以少量纯银购买的汇票，可在荷兰兑现更多纯银。推测中支付汇水者，可能事实上获得了汇水。英国金币改铸以前，法国铸币比英国铸币的磨损程度小得多，而法国铸币或许比英国铸币更接近标准2%或3%。因此，若计算而得的英法汇兑对英国的不利程度未超过2%或3%，真实的汇兑便可对英国有利。自改铸金币以来，汇兑始终有利于英国而不利于法国。

Secondly, in some countries the expence of coinage is defrayed by the government; in others, it is defrayed by the private people,

who carry their bullion to the mint, and the government even derives some revenue from the coinage. In England it is defray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if you carry a pound weight of standard silver to the mint, you get back sixty-two shillings, containing a pound weight of the like standard silver. In France a duty of eight per cent. is deducted for the coinage, which not only defrays the expence of it, but affords a small revenue to the government. In England, as the coinage costs nothing, the current coin can never be much more valuable than the quantity of bullion which it actually contains. In France, the workmanship, as you pay for it, adds to the value, in the same manner as to that of wrought plate. A sum of French money, therefore, containing an equal weight of pure silver, is more valuable than a sum of English money containing an equal weight of pure silver, and must require more bullion, or other commodities, to purchase it. Though the current coin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refore, were equally near the standards of their respective mints, a sum of English money could not well purchase a sum of French money containing an equal number of ounces of pure silver, nor, consequently, a bill upon France for such a sum. If, for such a bill, no more additional money was paid than what was 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the expence of the French coinage, the real exchange might be at pa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ir debts and credits might mutually compensate one another, while the computed exchange was considerably in favour of France. If less than this was paid, the real exchange might be in favour of England, while the computed was in favour of France.

其次，有些国家的铸币费是由政府承担的，有些国家则由私人承担。在后一种国家中，持银块者向铸币厂提供银块，不仅要支付铸币费，有时政府还要从铸币中抽取收入。在英国，铸币费用由国家承担，向铸币厂提供一磅重的标准银可收回62令，其中包含类似标准的

银一磅。在法国，铸币须扣除8%的税，足以支付铸币费，还可为政府提供少量收入。英国不收取铸币费，因此铸币的价值不会超出铸币内包含的银块价值太多。在法国，工艺会增加铸币的价值，正如工艺增加精制的器皿价值一样。因此，一定数额的法国货币，包含一定重量的纯银，其价值相比包含等量纯银一定数额的英国货币更大，购买法国货币须支付更多的银块或商品。因此，虽然英法两国的铸币都接近各自铸币厂的标准，但包含等量纯银一定数额英国货币，未必就能购买包含等量纯银的法国货币，因此，也未必可以购买可在法国兑现这些货币的汇票。若英国购买汇票额外支付货币不多于足以补偿法国铸币费的数额，则事实上两国之间就是平价汇兑。即使这两国间计算出的汇兑有利于法国，债务与债权亦可互相抵消。若英国购买汇票支付的货币少于该数额，则两国间的汇兑，虽然按计算对法国有利，事实上却对英国有利。

Thirdly, and lastly, In some places, as at Amsterdam, Hamburg, Venice, etc. foreign bills of exchange are paid in what they call bank money; while in others, as at London, Lisbon, Antwerp, Leghorn, etc. they are paid in the common currency of the country. What is called bank money, is always of more value than the same nominal sum of common currency. A thousand guilders in the bank of Amsterdam, for example, are of more value than a thousand guilders of Amsterdam currenc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called the agio of the bank, which at Amsterdam is generally about five per cent. Supposing the current money of the two countries equally near to the standard of their respective mints, and that the one pays foreign bills in this common currency, while the other pays them in bank money,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omputed exchange may be in favour of that which pays in bank money, though the real exchange should be in favour of that which pays in current money;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the computed exchange may be in favour of that which pays in better money, or in money nearer to its own

standard, though the real exchange should be in favour of that which pays in worse. The computed exchange, before the lat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was generally against London with Amsterdam, Hamburg, Venice, and, I believe, with all other places which pay in what is called bank money. It will by no means follow, however, that the real exchange was against it. Since th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it has been in favour of London, even with those places. The computed exchange has generally been in favour of London with Lisbon, Antwerp, Leghorn, and, if you except France, I believe with most other parts of Europe that pay in common currency; and it is not improbable that the real exchange was so too.

第三，即最后一点，有些地方，如阿姆斯特丹、汉堡、威尼斯等地，都以他们所谓银行货币兑付外国汇票；但有些地方，如伦敦、里斯本、安特卫普、来航等地则以当地通用货币兑付。所谓银行货币，常常比账面金额相同的通用货币价值更高，例如，阿姆斯特丹银行货币1000盾，就比阿姆斯特丹通用货币1000盾价值更高，称其差额为银行的贴水，这在阿姆斯特丹的贴水通常约为5%。假设两国通用的货币接近各自铸币厂标准的程度相当，一国以这种通用货币兑付外国汇票，另一国则以银行货币兑付外国汇票，则即使两国间的真实汇兑有利于以通用货币兑付的国家，但根据计算则有利于以银行货币兑付的国家。正如出于同一原因，虽然两国间的汇兑事实上有利于以更远离标准的货币兑付外国汇票的国家，但根据计算，仍有利于以更接近标准的货币兑付的国家。我相信，在最近的金币改铸以前，对阿姆斯特丹、汉堡、威尼斯以及其他全部以所谓银行货币兑付的地方，伦敦的计算汇兑都不利，但不能就此断言汇兑事实上亦对伦敦不利。而自金币改铸以来，甚至同这些地方的汇兑都对伦敦有利。英国对里斯本、安特卫普和来航的计算汇兑都有利，我相信除对法国之外，伦敦对欧洲大多数以通用货币兑付汇票的地方，其计算汇兑都有利于伦敦；而事实上的汇兑同样如此，也并非没有可能。

Digression concerning Banks of Deposit,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that of Amsterdam.

暂且离题谈谈存款银行，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存款银行。

The currency of a great state, such as France or England, generally consists almost entirely of its own coin. Should this currency, therefore, be at any time worn, clipt, or otherwise degraded below its standard value, the state, by a reformation of its coin, can effectually re-establish its currency. But the currency of a small state, such as Genoa or Hamburg, can seldom consist altogether in its own coin, but must be made up, in a great measure, of the coins of all the neighbouring states with which its inhabitants have a continual intercourse. Such a state, therefore, by reforming its coin, will not always be able to reform its currency. If foreign bills of exchange are paid in this currency, the uncertain value of any sum, of what is in its own nature so uncertain, must render the exchange always very much against such a state, its currency being in all foreign states necessarily valued even below what it is worth.

法国、英国等大国的流通货币几乎全部由本国铸币构成。因此，若这种流通货币因磨损、价值降低或其他原因，其价值降低至标准之下，则国家可通过改铸而有效地复原流通货币。但是，热那亚和汉堡这等小国的流通货币几乎不是全部由本国铸币构成，必然有大部分流通货币由该国居民持续交流的各邻国铸币构成。因此，此等国家的改铸只能复原铸币，却未必能够改善流通货币。因流通货币本质极不确定，数额一定，价值却不确定。因此在外国，该流通货币估价必然低

于实际，若此等国家以这种流通货币兑付外国汇票，则汇兑就一定对该国非常不利。

In order to remedy the inconvenience to which this disadvantageous exchange must have subjected their merchants, such small states, when they began to attend to the interest of trade, have frequently enacted that foreign bills of exchange of a certain value should be paid, not in common currency, but by an order upon, or by a transfer in the books of a certain bank, established upon the credit, and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state, this bank being always obliged to pay, in good and true money, exactly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the state. The banks of Venice, Genoa, Amsterdam, Hamburg, and Nuremberg, seem to have been all originally established with this view, though some of them may have afterwards been made subservient to other purposes. The money of such banks, being better than the common currency of the country, necessarily bore an agio, which was greater or smaller, according as the currency was supposed to be more or less degraded below the standard of the state. The agio of the bank of Hamburg, for example, which is said to be commonly about fourteen per cent. is the suppose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ood standard money of the state, and the clipt, worn, and diminished currency, poured into it from all the neighbouring states.

汇兑不利必然使商人遭受损失，这样的小国为补偿商人损失，只要开始谋取贸易利益，就往往会规定禁止以通用货币兑付具有一定价值的外国汇票，仅允许以指定银行的银票兑付或在指定银行的账簿上转账。指定的银行是依靠国家信用并在国家的保护下建立起来的。根据国家标准，这种银行兑付汇票必须支付真正的优良货币。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汉堡和纽伦堡等地的银行，似乎最初都是因此

建立的，只是其中有些或许在后来被迫改变了宗旨。由于这种银行的货币优于国家的通用货币，就必然会产生贴水，贴水的大小则根据流通货币推测而得的低于国家标准的程度而定。例如，据说汉堡银行的贴水通常约为14%，即国家货币标准，与因从邻国流入而价值折损的劣币之间，通常认为的差额。

Before 1609, the great quantity of clipt and worn foreign coin which the extensive trade of Amsterdam brought from all parts of Europe, reduced the value of its currency about nine per cent. below that of good money fresh from the mint. Such money no sooner appeared, than it was melted down or carried away, as it always is in such circumstances. The merchants, with plenty of currency, could not always find a sufficient quantity of good money to pay their bills of exchange; and the value of those bills, in spite of several regulations which were made to prevent it, became in a great measure uncertain.

1609年以前，阿姆斯特丹的广泛贸易，使大量磨损贬值的外国铸币从欧洲各地流入本地，使阿姆斯特丹流通货币的价值比铸币厂新制造的优良货币价值约低9%。此时，新制造的优良货币往往一经铸造即被溶解或输出。拥有大量流通货币的商人，不能总是找到足够的优良货币以兑付汇票；因此即便有若干法规防止汇票价值不定，但兑付的这些汇票价值很大程度上变得不确定。

In order to remedy these inconveniencies, a bank was established in 1609, under the guarantee of the city. This bank received both foreign coin, and the light and worn coin of the country, at its real intrinsic value in the good standard money of the country, deducting only so much as was necessary for defraying the

expence of coinage and the other necessary expence of management. For the value which remained after this small deduction was made, it gave a credit in its books. This credit was called bank money, which, as it represented money exactly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the mint, was always of the same real value, and intrinsically worth more than current money. It was at the same time enacted, that all bills drawn upon or negotiated at Amsterdam, of the value of 600 guilders and upwards, should be paid in bank money, which at once took away all uncertainty in the value of those bills. Every merchant, in consequence of this regulation, was obliged to keep an account with the bank, in order to pay his foreign bills of exchange, which necessarily occasioned a certain demand for bank money.

为弥补此等不利，阿姆斯特丹于1609年经由全市担保，建立了一家银行。这家银行，既接受外国铸币，又接受本国磨损的轻铸币。该银行计算国家优良货币内在价值时，依国家优良货币标准，扣除必要的铸造费和管理费，扣除此等小额费用后剩余的价值，作为信用，计入银行账簿。该信用成为银行货币，银行货币代表恰好符合铸币厂标准的货币，真实价值常常相同，内在价值大于流通货币。同时还有规定，凡在阿姆斯特丹兑付或卖出价值600盾以上的汇票，都须以银行货币兑付，消除了汇票价值的不确定性。由于该规定，对于每位商人来说，为兑付外国汇票，就只得与银行通账，这就必然保证了对银行货币一定的需求。

Bank money, over and above both its intrinsic superiority to currency, and the additional value which this demand necessarily gives it, has likewise some other advantages, It is secure from fire, robbery, and other accidents; the city of Amsterdam is bound for it; it can be paid away by a simple transfer, without the trouble of

counting, or the risk of transporting it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In consequence of those different advantages, it seems from the beginning to have borne an agio; and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all the money originally deposited in the bank, was allowed to remain there, nobody caring to demand payment of a debt which he could sell for a premium in the market. By demanding payment of the bank, the owner of a bank credit would lose this premium. As a shilling fresh from the mint will buy no more goods in the market than one of our common worn shillings, so the good and true money which might be brought from the coffers of the bank into those of a private person, being mixed and confounded with the common currency of the country, would be of no more value than that currency, from which it could no longer be readily distinguished. While it remained in the coffers of the bank, its superiority was known and ascertained. When it had come into those of a private person, its superiority could not well be ascertained without more trouble than perhaps the difference was worth. By being brought from the coffers of the bank, besides, it lost all the other advantages of bank money; its security, its easy and safe transferability, its use in paying foreign bills of exchange. Over and above all this, it could not be brought from those coffers, as will appear by and by, without previously paying for the keeping.

银行货币对货币具有内在的优越性，上述需求必然使其价值增加，除此之外，它还具有其他优点。它免受火灾、抢劫及其他意外的威胁；阿姆斯特丹市对其负责，只需通过单纯的转账兑付，免除了计算的麻烦，亦无需承担由某地运往他地的风险。由于具有这些优点，银行货币似乎本身就会产生贴水；人们广泛相信，最初储存在银行内的货币仍然被允许在此保留，即便在市场上出售这些货币可获得一些贴水，但无人要求银行支还。若银行信贷的所有者要求银行支还，就

会失去此项贴水。在市场上，由铸币厂新制造的先令，不比普通磨损的先令可购买更多商品，因此从银行金库取出，纳入私人金库的真正良好货币，与该国流通货币混淆，则价值就不比流通货币更高，因其不易辨认。若储存在银行金库内，良好货币的优越性就是广为人知且认可的；若其进入私人金库，则除非付出高于两种货币差额的代价，无法确认其优越性。此外，一旦将银行货币从银行金库中提出，银行货币必将立即失去其他各项优点——安全性、方便的安全流动性以及支付外国汇票的可用性，尽皆失去。不仅如此，若没有预先支付保管费，就更无法将货币从银行金库中提取出。

Those deposits of coin, or those deposits which the bank was bound to restore in coin, constituted the original capital of the bank, or the whole value of what was represented by what is called bank money. At present they are supposed to constitute but a very small part of i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trade in bullion, the bank has been for these many years in the practice of giving credit in its books, upon deposits of gold and silver bullion. This credit is generally about five per cent. below the mint price of such bullion. The bank grants at the same time what is called a recipice or receipt, entitling the person who makes the deposit, or the bearer, to take out the bullion again at any time within six months, upon transferring to the bank a quantity of bank money equal to that for which credit had been given in its books when the deposit was made, and upon paying one-fourth per cent. for the keeping, if the deposit was in silver; and one-half per cent. if it was in gold; but at the same time declaring, that in default of such payment, and upon the expiration of this term, the deposit should belong to the bank, at the price at which it had been received, or for which credit had been given in the transfer books. What is thus paid for the keeping of the deposit may be considered as a sort of warehouse rent; and why this warehouse rent should be so much dearer for gold than for

silver, several different reasons have been assigned. The fineness of gold, it has been said, is more difficult to be ascertained than that of silver. Frauds are more easily practised, and occasion a greater loss in the most precious metal. Silver, besides, being the standard metal, the state, it has been said, wishes to encourage more the making of deposits of silver than those of gold.

这种铸币存款，即银行须以铸币交还的存款，是银行的最初资本，即所谓银行货币所代表的全部价值。如今，一般认为银行货币只是银行资本的极小部分。多年来，为促进以金银块支付的贸易，银行的措施是为储存金银块者提供信贷，计入账簿。这种信贷一般比金银块的铸币厂价格约低5%。同时银行会出具所谓的受领凭证或收据，授权储存者或持票人，通过偿还相当于该笔信贷的银行货币，并为黄金支付25‰，为白银支付25‰或50‰的保管费，即可在六个月内随时取回所存金银。但同时规定，若到期仍无法偿还与支付，则所存的金银即按储存受理时的价格，或按转账簿中记录的信贷价格，收归银行所有。可以认为，以此方式支付的保管费是一种仓库的租金；而为何储金仓库的租金比储银仓库的租金高如此之多，有多种不同理由。据说，金的纯度比银的纯度更难辨认，较贵的金属更容易作假，造成这种极贵重的金属极大的损失。此外，银是标准金属，据说，相比金的储存，国家更加有意鼓励银的储存。

Deposits of bullion are most commonly made when the price is somewhat lower than ordinary, and they are taken out again when it happens to rise. In Holland the market price of bullion is generally above the mint price,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it was so in England before the lat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The difference is said to be commonly from about six to sixteen stivers upon the mark, or eight ounces of silver, of eleven parts of fine and one part alloy. The bank price, or the credit which the bank gives for the

deposits of such silver (when made in foreign coin, of which the fineness is well known and ascertained, such as Mexico dollars), is twenty-two guilders the mark: the mint price is about twenty-three guilders, and the market price is from twenty-three guilders six, to twenty-three guilders sixteen stivers, or from two to three per cent. above the mint price.

人们通常在金银块价格略低于平常时，最普遍地储存金银，待价格上涨再取出。在荷兰，金银块的市场价格一般高于铸币厂价格，出于相同原因，上一次金币改铸以前，英格兰的情况也是如此。据说其差额通常为每马克6至16斯泰弗，即银八盎司，其中包含纯银十一分合金一分。储存这样的银（铸为外国铸币，其成色通常广为所知与认可，例如墨西哥元），银行对信贷的报价则为每马克22盾；铸币厂价格约为23盾，市场价格则为23盾6斯泰弗至23盾16斯泰弗，超出铸币厂价格2%至3%。

The following are the prices at which the bank of Amsterdam at present (September 1775)receives bullion and coin of different kinds:

以下是阿姆斯特丹银行目前（1775年9月）受理不同种类金银块和铸币的价格：

SILVER	
Mexico dollars	Guilders B-22 per mark
French crowns	Guilders B-22 per mark
English silver coin	Guilders B-22 per mark
Mexico dollars new coin	21 10
Ducatoons	3
Rix dollars	2 8

白银	
墨西哥银元	不多于 22 盾/马克
法国克朗	不多于 22 盾/马克
英国银币	不多于 22 盾/马克
墨西哥元新铸币	21 10
达克图	3
利克斯银元	2 8

Bar silver, containing 11-12ths fine silver, 21 Guilders / mark, and in this proportion down to 1-4th fine, on which 5 guilders are given.

包含11-12分纯银的银块为21盾/马克，以此比例，1-4分纯银的银块为5盾/马克。

Fine bars,… 28 Guilders / mark.

纯银块28盾/马克

Gold	
Portugal coin	B-310 per mark
Guineas	B-310 per mark
Louis d’ors new	B-310 per mark
Ditto old	300
New ducats	4 19 8 per ducat

黄金	
葡萄牙金币	不多于 310 盾/马克
几尼	不多于 310 盾/马克
新金路易	不多于 310 盾/马克
旧蒂托	300
新达克特	4 19 8/达克特

Bar or ingot gold is received in proportion to its fineness, compared with the above foreign gold coin. Upon fine bars the bank gives 340 per mark. In general, however, something more is given upon coin of a known fineness, than upon gold and silver bars, of which the fineness cannot be ascertained but by a process of melting and assaying.

相比上述外国金币，金银的受理价格视其成色而定。银行予纯金银每马克340的价格。然而，大体上，已确定成色的铸币获得的要比金银块多，因为除非将金银块熔化或试验，无法得知其成色。

The proportions between the bank price, the mint price, and the market price of gold bullion, are nearly the same. A person can generally sell his receipt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int price of bullion and the market price. A receipt for bullion is almost

always worth something, and it very seldom happens, therefore, that anybody suffers his receipts to expire, or allows his bullion to fall to the bank at the price at which it had been received, either by not taking it out before the end of the six months, or by neglecting to pay one fourth or one half per cent. in order to obtain a new receipt for another six months. This, however, though it happens seldom, is said to happen sometimes, and more frequently with regard to gold than with regard to silver, on account of the higher warehouse rent which is paid for the keeping of the more precious metal.

金银块的银行价格、铸币厂价格及市场价格几乎保持着相同的比例。通常，个人可因金银块的铸币厂价格与市场价格间的差额就出售受领凭证。金银块的受领凭证，几乎必有一定价值，因此，极少有人六个月期满后仍不提取，或为了得到另外六个月的新受领凭证而不支付25‰或50‰的保管费，使金银按受理时的价格收归银行所有。但是，虽然这种情况极少发生，但并非不会发生，金比银更常发生。因为，银的保管费较低，金则是更为贵重的金属，保管金，需支付较高的仓库租金。

The person who, by making a deposit of bullion, obtains both a bank credit and a receipt, pays his bills of exchange as they become due, with his bank credit; and either sells or keeps his receipt, according as he judges that the price of bullion is likely to rise or to fall. The receipt and the bank credit seldom keep long together, and there is no occasion that they should. The person who has a receipt, and who wants to take out bullion, finds always plenty of bank credits, or bank money, to buy at the ordinary price, and the person who has bank money, and wants to take out bullion, finds receipts always in equal abundance.

因储存金银块而取得银行信贷与受领凭证者，在汇票到期时将以银行信贷兑付。而选择出售或是保留受领凭证，取决于他对金银块价格涨跌的判断。大多此类银行信贷与受领凭证都不会长期保留，也没有必要长期保留。持有受领凭证并需要提取金银块的人，常会发现，可以普通价格购买许多银行信贷或银行货币，而持有银行货币并需要提取金银块的人，也常会发现有同样多的受领凭证可以购买。

The owners of bank credits, and the holders of receipts, constitute two different sorts of creditors against the bank. The holder of a receipt cannot draw out the bullion for which it is granted, without re-assigning to the bank a sum of bank money equal to the price at which the bullion had been received. If he has no bank money of his own, he must purchase it of those who have it. The owner of bank money cannot draw out bullion, without producing to the bank receipts for the quantity which he wants. If he has none of his own, he must buy them of those who have them. The holder of a receipt, when he purchases bank money, purchases the power of taking out a quantity of bullion, of which the mint price is five per cent. above the bank price. The agio of five per cent. therefore, which he commonly pays for it, is paid, not for an imaginary, but for a real value. The owner of bank money, when he purchases a receipt, purchases the power of taking out a quantity of bullion, of which the market price is commonly from two to three per cent. above the mint price. The price which he pays for it, therefore, is paid likewise for a real value. The price of the receipt, and the price of the bank money, compound or make up between them the full value or price of the bullion.

银行信贷所有者及受领凭证持有者是银行两种不同的债权人。受

领凭证持有者，除非将一定数额的银行货币，即等于受领金银块价格的银行货币支付给银行，就不能提取受领凭证标明的金银块。若他没有自己的银行货币，就须向有银行货币者购买。但若后者不能向银行提供标有所需数额的受领凭证，就同样不能提取金银块。若他没有受领凭证，就须向有受领凭证者购买。金银块的铸币厂价格，比其银行价格高5%，其实，持有受领凭证者购买银行货币，即购买提取一定数量金银块的权力。因此，购买银行货币通常需支付的5%贴水，他支付的贴水，并非支付给想象的价值，而是支付给实际的价值。金银块的市场价格，一般比其铸币厂价格高2%乃至3%，持有银行货币者购买受领凭证，其实就是购买提取一定数量金银块的权力。因此，购买受领凭证而支付的价格，同样是支付给了实际的价值，受领凭证及银行货币的价格一并构成金银块的全部价值或价格。

Upon deposits of the coin current in the country, the bank grant receipts likewise, as well as bank credits; but those receipts are frequently of no value and will bring no price in the market. Upon ducatoons, for example, which in the currency pass for three guilders three stivers each, the bank gives a credit of three guilders only, or five per cent. below their current value. It grants a receipt likewise, entitling the bearer to take out the number of ducatoons deposited at any time within six months, upon paying one fourth per cent. for the keeping. This receipt will frequently bring no price in the market. Three guilders, bank money, generally sell in the market for three guilders three stivers, the full value of the ducatoons, if they were taken out of the bank; and before they can be taken out, one-fourth per cent. must be paid for the keeping, which would be mere loss to the holder of the receipt. If the agio of the bank, however, should at any time fall to three per cent. such receipts might bring some price in the market, and might sell for one and three-fourths per cent. But the agio of the bank being now generally about five per cent. such receipts are frequently allowed

to expire, or, as they express it, to fall to the bank. The receipts which are given for deposits of gold ducats fall to it yet more frequently, because a higher warehouse rent, or one half per cent. must be paid for the keeping of them, before they can be taken out again. The five per cent. which the bank gains, when deposits either of coin or bullion are allowed to fall to it, maybe considered as the warehouse rent for the perpetual keeping of such deposits.

将国内流通的铸币存入银行后，银行提供银行信贷、出具受领凭证，但这些受领凭证通常没有价值，在市场上没有价格。例如，将价值3盾3斯泰弗的达克图存入银行，银行提供的信贷价值仅为3盾，低于流通价值5%。虽然银行同样出具了受领凭证，持此凭证者可在6个月内支付25‰的保管费，随时提取达克图，但通常这种受领凭证并不能在市场上以一定的价格出售。虽然3盾银行货币基本可在市场上以3盾3斯泰弗的价格出售，也就是提取后可得达克图的全部价值，但提取前须缴纳25‰的保管费，属于受领凭证持有者的纯支出。但若银行贴水在某一时间降为3%，则这种受领凭证便可以某种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可以1.75%出售。但目前的银行贴水通常约为5%，因此人们往往放任受领凭证到期，或称任其归银行所有。储存金达克特，提取前需支付的仓库租金更高，为50‰，因此更是常常任受领凭证期满。银行收归的铸币或金银块往往使银行获利5%，此等利润可视为永久储存的仓库租金。

The sum of bank money, for which the receipts are expired, must be very considerable. It must comprehend the whole original capital of the bank, which, it is generally supposed, has been allowed to remain there from the time it was first deposited, nobody caring either to renew his receipt, or to take out his deposit, as, for the reasons already assigned,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could be done without loss. But whatever may be the amount of this

sum, the proportion which it bears to the whole mass of bank money is supposed to be very small. The bank of Amsterdam has, for these many years past, been the great warehouse of Europe for bullion, for which the receipts are very seldom allowed to expire, or, as they express it, to fall to the bank.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bank money, or of the credits upon the books of the bank, is supposed to have been created, for these many years past, by such deposits, which the dealers in bullion are continually both making and withdrawing.

相应受领凭证期满的银行货币数额必然很大，其中必然包含银行的全部初始资本。通常假设，自银行的全部初始资本首次存入银行起，就无人有意更新受领凭证或取出存款，因为出于上述列举的原因，无论如何选择都必将负担损失。但根据假设，无论期满的银行货币数额如何之大，期满的部分占全部银行货币的比例总是很小的。近年来，阿姆斯特丹银行是欧洲最大的金银块仓库，但其受领凭证却很少逾期，即存款很少收归银行所有。大部分银行货币或银行账簿上的信贷，都是近年来，由金银块商人不断储存和提取而建立的。

No demand can be made upon the bank, but by means of a recipice or receipt. The smaller mass of bank money, for which the receipts are expired, is mixed and confounded with the much greater mass for which they are still in force; so that, though there may be a considerable sum of bank money, for which there are no receipts, there is no specific sum or portion of it which may not at any time be demanded by one. The bank cannot be debtor to two persons for the same thing; and the owner of bank money who has no receipt, cannot demand payment of the bank till he buys one. In ordinary and quiet times, he can find no difficulty in getting one to buy at the market price, which generally corresponds with the price

at which he can sell the coin or bullion it entitles him to take out of the bank.

只有通过提供受领凭证或收据，才能向银行提出需求。相应受领凭证逾期的较少量银行货币混合了受领凭证在有效期内的较大量银行货币，因此，虽然没有相应受领凭证的银行货币数额很可观，但没有任何数额、任何部分的银行货币永远无人需要。银行不能针对同一事物而作为两个人的债权人；没有受领凭证的银行货币持有者，不能在购买到受领凭证之前就要求银行付款。平时，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下，没有受领凭证的银行货币持有者轻而易举便可按市场价格购买受领凭证，通常市场价格与受领凭证可向银行提取铸币或金银块的市场售价同步。

It might be otherwise during a public calamity; an invasion, for example, such as that of the French in 1672. The owners of bank money being then all eager to draw it out of the bank, in order to have it in their own keeping, the demand for receipts might raise their price to an exorbitant height. The holders of them might form extravagant expectations, and, instead of two or three per cent. demand half the bank money for which credit had been given upon the deposits that the receipts had respectively been granted for. The enemy, informed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bank, might even buy them up,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carrying away of the treasure. In such emergencies, the bank, it is supposed, would break through its ordinary rule of making payment only to the holders of receipts. The holders of receipts, who had no bank money, must have received within two or three per cent. of the value of the deposit for which their respective receipts had been granted. The bank, therefore, it is said, would in this case make no scruple of paying, either with money or bullion, the full value of what the owners of

bank money, who could get no receipts, were credited for in its books; paying, at the same time, two or three per cent. to such holders of receipts as had no bank money, that being the whole value which, in this state of things, could justly be supposed due to them.

但在社会动乱时期就不会如此了，比如侵略。例如1672年法国侵入，使得银行货币持有者极希望将银行货币从银行提出以由自己保存，受领凭证需求大增，使得受领凭证的价格上涨到极高程度。持有受领凭证者的请求可能过度，不仅仅要求受领凭证标明银行货币的2%或3%，甚至拿到要求50%。为防止银行货币逃离金库，清楚银行构成者甚至可能买入所有受领凭证，以防止财宝搬出。一般认为，在遭遇这些特殊事件时，银行可能打破只为持受领凭证者兑现的常规。不持有银行货币却持有受领凭证者，必然只领取银行开具的受领凭证所标明的储存价值的2%或3%。因此，据说此时银行必将毫不犹豫地，以货币或金银块，对有银行货币信贷账簿记录但没有受领凭证以提取者支付全部价值；同时，对持受领凭证但无银行货币者支付2%或3%，即事情发展到此地步他们应得的全部价值。

Even in ordinary and quiet times, it is the interest of the holders of receipts to depress the agio, in order either to buy bank money (and consequently the bullion which their receipts would then enable them to take out of the bank) so much cheaper, or to sell their receipts to those who have bank money, and who want to take out bullion, so much dearer; the price of a receipt being generally equal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rket price of bank money and that of the coin or bullion for which the receipt had been granted. It is the interest of the owners of bank money, on the contrary, to raise the agio, in order either to sell their bank money so much dearer, or to buy a receipt so much cheaper. To prevent

the stock-jobbing tricks which those opposite interests might sometimes occasion, the bank has of late years come to the resolution, to sell at all times bank money for currency at five per cent. agio, and to buy it in again at four per cent. agio. In consequence of this resolution, the agio can never either rise above five, or sink below four per cent.; and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market price of bank and that of current money is kept at all times very near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ir intrinsic values. Before this resolution was taken, the market price of bank money used sometimes to rise so high as nine per cent. agio, and sometimes to sink so low as par, according as opposite interests happened to influence the market.

即使在没有意外的平时，降低贴水符合受领凭证持有者的利益，因其可以较低价格购买银行货币，从而以较低价格购买受领凭证标明的可提取金银块数额，或以较高价格将受领凭证向有银行货币并希望提取金银块者出售；通常，受领凭证的价格等于银行货币的市场价格与受领凭证标明的铸币或金银块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相反，提高贴水符合的是银行货币所有者的利益，他们以较高价格出售银行货币或以较低价格购买受领凭证。近年来，为了防止此等利益冲突可能不时导致的交易中的欺诈行为，银行决定任何时候出售银行货币换取流通货币都需要支付5%的贴水，再度购入银行货币则需支付4%贴水。这种决定使得贴水无法高于5%，亦无法低于4%；无论何时，银行货币与流通货币市场价格之间的比例，都非常接近其固有价值之间的比例。但由于这种利益冲突不时影响市场，做出此等决定之前，银行货币的市场价格贴水有时上升高达9%，有时又下跌，价格低至与通用货币等价。

The bank of Amsterdam professes to lend out no part of what is deposited with it, but for every guilder for which it gives credit in

its books, to keep in its repositories the value of a guilder either in money or bullion. That it keeps in its repositories all the money or bullion for which there are receipts in force for which it is at all times liable to be called upon, and which in reality is continually going from it, and returning to it again, cannot well be doubted. But whether it does so likewise with regard to that part of its capital for which the receipts are long ago expired, for which, in ordinary and quiet times, it cannot be called upon, and which, in reality, is very likely to remain with it for ever, or as long as the states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subsist, may perhaps appear more uncertain. At Amsterdam, however, no point of faith is better established than that, for every guilder circulated as bank money, there is a correspondent guilder in gold or silver to be found in the treasures of the bank. The city is guarantee that it should be so. The bank i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four reigning burgomasters who are changed every year. Each new set of burgomasters visits the treasure, compares it with the books, receives it upon oath, and delivers it over, with the same awful solemnity to the set which succeeds; and in that sober and religious country, oaths are not yet disregarded. A rotation of this kind seems alone a sufficient security against any practices which cannot be avowed. Amidst all the revolutions which faction has ever occasioned in the government of Amsterdam, the prevailing party has at no time accused their predecessors of infidelit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bank. No accusation could have affected more deeply the reputation and fortune of the disgraced party; and if such an accusation could have been supported, we may be assured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brought. In 1672, when the French king was at Utrecht, the bank of Amsterdam paid so readily, as left no doubt of the fidelity with which it had observed its engagements. Some of the pieces which were then brought from its repositories, appeared to have been scorched with the fire which happened in the town-house soon after

the bank was established. Those pieces, therefore, must have lain there from that time.

阿姆斯特丹银行宣布不会贷出存款的任何部分；账簿计入的信贷每增加一盾，就在金库内储存相当于一盾价值的货币或金银块。只要受领凭证未逾期，就可以随时从金库中提取，而事实上，无疑从金库中不断取出又存回的货币与金银块都是储存在金库内的。但在没有意外的平时，早已逾期的受领凭证无法要求提取，但实际上永远保存在银行内，或只需联邦国家存在就永远保存在银行内的存款，是否同样如此，则难以确定。然而，在阿姆斯特丹有一种观念，即拥有一盾银行货币就等于有一盾金银存在银行金库里，这种观念是最根深蒂固的。阿姆斯特丹市保障了这一观点。银行由四位现任市长管理，市长每年都要轮换。每届新任的四位市长将到访银行金库，并与账簿对比，宣誓接管金库，最后再以同样庄严的仪式，将金库移交给继任者。这个虔诚的宗教国家至今仍未废除宣誓。这样的轮换应该足以防止一切不光彩行为。在全部由派系斗争导致的阿姆斯特丹政治革命中，优势党派从未因银行管理而批评其不忠。而羞辱一个党派，攻击其名誉与命运，只有就其银行管理进行批评，影响最为深刻；若如此攻击能够得到支持，就可以断言，如此批评迟早会提出。1672年，法国国王在乌德勒支时，阿姆斯特丹银行付款如此迅速，使其履行契约的忠诚无可置疑。此后，还有些从银行金库中提取的货币在银行建立后的市政厅火灾中被烧毁。因此，这些货币必然是从那时起就在银行金库内储存的。

What may be the amount of the treasure in the bank, is a question which has long employed the speculations of the curious. Nothing but conjecture can be offered concerning it. It is generally reckoned, that there are about 2000 people who keep accounts with the bank; and allowing them to have, one with another, the value of £1500 sterling lying upon their respective accounts (a very large

allowance), the whole quantity of bank money, and consequently of treasure in the bank, will amount to about £3,000,000 sterling, or, at eleven guilders the pound sterling, 33,000,000 of guilders; a great sum, and sufficient to carry on a very extensive circulation, but vastly below the extravagant ideas which some people have formed of this treasure.

好奇者一直在猜测银行金库的金银总额究竟有多少，但也只能猜测而已。众人认为，假设在此银行开户者约2000人，若平均每人在账户内存入1500镑的价值（很高的假设），则银行货币总额以及金银总额约为300万镑，若合每镑11盾，就约合3300万盾。如此大的数额足以支持范围很广的货币流通，但大大少于某些人关于金库总额的夸大臆测。

The city of Amsterdam derives a considerable revenue from the bank. Besides what may be called the warehouse rent above mentioned, each person, upon first opening an account with the bank, pays a fee of ten guilders; and for every new account, three guilder's three stivers; for every transfer, two stivers; and if the transfer is for less than 300 guilders, six stivers, in order to discourage the multiplicity of small transactions. The person who neglects to balance his account twice in the year, forfeits twenty-five guilders. The person who orders a transfer for more than is upon his account, is obliged to pay three per cent. for the sum overdrawn, and his order is set aside into the bargain. The bank is supposed, too, to make a considerable profit by the sale of the foreign coin or bullion which sometimes falls to it by the expiring of receipts, and which is always kept till it can be sold with advantage. It makes a profit, likewise, by selling bank money at five per cent. agio, and buying it in at four. These different emoluments amount

to a good deal more than what is necessary for paying the salaries of officers, and defraying the expence of management. What is paid for the keeping of bullion upon receipts, is alone supposed to amount to a neat annual revenue of between 150,000 and 200,000 guilders. Public utility, however, and not revenue, was the original object of this institution. Its object was to relieve the merchants from the inconvenience of a disadvantageous exchange. The revenue which has arisen from it was unforeseen, and may be considered as accidental. But it is now time to return from this long digression, into which I have been insensibly led, in endeavouring to explain the reasons why the exchange between the countries which pay in what is called bank money, and those which pay in common currency, should generally appear to be in favour of the former, and against the latter. The former pay in a species of money, of which the intrinsic value is always the same, and exactly agreeable to the standard of their respective mints; the latter is a species of money, of which the intrinsic value is continually varying, and is almost always more or less below that standard.

阿姆斯特丹市从银行获得的收入非常可观。除已经提到的所谓仓库租金之外，首次开户需要缴纳10盾的费用；再次增开新账户则收取3盾3斯泰弗；每次转账收费2斯泰弗；为控制小额转账，若转账数额不足300盾，则收取6斯泰弗。拒绝每年清算账户2次者，扣25盾。请求转账数额若超出储存数额者，须支付差额3%的费用，并将该请求延迟交易。据推测，银行将受领凭证逾期而收归所有的外国铸币与金银块保存，待有利时出售，可获得大量利润。同样，将银行货币以5%的贴水出售，再以4%的贴水购买，银行同样可以获得利润，这些各种利润总额多于支付员工报酬与管理成本的必要所需。据推测，仅有受领凭证存款的保管费就合计15万至20万盾的纯年收入。然而，银行这个机构的最初目标不是收入而是公益，在于缓解商人因不利的汇兑导致的损失。人们并未预见会产生收入，可以说这是意外收获。现

在返回正题，讨论我一直造势的话题，即尽力解释为什么在以所谓银行货币兑付的国家和以通用货币兑付的国家，汇兑似乎通常有利于前者，而不利于后者。前者兑付汇票的货币固有价值是固定的，恰与各自国家铸币厂标准一致；后者兑付汇票的货币固有价值不断波动，几乎都多少低于铸币厂标准。

Part II. Of the Unreasonableness of those extraordinary Restraints, upon other Principles

第二节、根据其他原则，额外的限制也不合理

In the foregoing part of this chapter, I have endeavoured to show, even up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mmercial system, how unnecessary it is to lay extraordinary restraint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goods from those countries with which the balance of trade is supposed to be disadvantageous.

在本章前面的部分，我已尽力说明了，即使根据重商主义原理，对于贸易差额认定不利于本国的国家，亦不必对其商品进口加以额外限制。

Nothing, however, can be more absurd than this whole doctrine of the balance of trade, upon which, not only these restraints, but almost all the other regulations of commerce, are founded. When two places trade with one another, this doctrine supposes that, if the balance be even, neither of them either loses or gains; but if it leans in any degree to one side, that one of them loses, and the other gains, in proportion to its declension from the exact equilibrium. Both suppositions are false. A trade, which is

forced by means of bounties and monopolies, may be, and commonly is, disadvantageous to the country in whose favour it is meant to be established, as I shall endeavour to show hereafter. But that trade which, without force or constraint, is naturally and regularly carried on between any two places, is always advantageous, though not always equally so, to both.

然而，不仅这些限制，还有许多其他商业规定都建立在整个贸易差额学说基础之上，而这一学说是最为荒谬的。这种学说认为，若两地通商的贸易额是平衡的，则两地均无得失；若贸易差额多少有偏差，则必有一方损失，另一方获利，得失程度和较平均的偏差程度成正比。这两种设想都是错误的。我在后文将要说明，虽然奖金与垄断权是为本国利益而设立的，但通过奖金及垄断权促成的贸易，却可能不利于本国，事实通常就是如此。但是，不受强迫和限制而自然地、正常地在两地间进行的贸易，虽然未必对两地同样有利，但必然也是有利的。

By advantage or gain, I understand, not the increase of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but that of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or the increase of the annual revenue of its inhabitants.

我认为，所谓益处或利益不是金银量的增长，而是国家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交换价值的增长，即全国居民年收入的增长。

If the balance be even, and if the trade between the two places consist altogether in the exchange of their native commodities, they will, upon most occasions, not only both gain, but they will gain

equally, or very nearly equally; each will, in this case, afford a market for a part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 other; each will replace a capital which had been employed in raising and preparing for the market this part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 other, and which had been distributed among, and given revenue and maintenance to, a certain number of its inhabitants. Some part of the inhabitants of each, therefore, will directly derive their revenue and maintenance from the other. As the commodities exchanged, too, are supposed to be of equal value, so the two capitals employed in the trade will, upon most occasions, be equal, or very nearly equal; and both being employed in raising the native commodit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revenue and maintenance which their distribution will afford to the inhabitants of each will be equal, or very nearly equal. This revenue and maintenance, thus mutually afforded, will be greater or smaller,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their dealings. If these should annually amount to £100,000, for example, or to £1,000,000, on each side, each of them will afford an annual revenue, in the one case, of £100,000, and, in the other, of £1,000,000,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other.

若两地贸易差额平均，同时两地间的贸易全部由各自国产商品的交换构成，则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两国都会获利，且利益必然完全或几乎相等。如此，两国都为对方一部分剩余生产物提供了市场，都补偿了另一国为市场生产和制造这部分剩余生产物投入的资本，即向一定数量居民分配并提供收入或生存资料的资本；因此，两国都有部分居民将直接从另一国获取收入与生存资料。据假设，两国间交换的商品价值相等，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两国在贸易中投入的资本必然完全或几乎相等；且两国资本都用以生产国产商品，因此两国居民由此分配而得的收入与生存资料，同样必然完全或几乎相等。两国互相提供的收入与生存资料，与其贸易规模成正比，因此或多或少。例如，若这些贸易年总额为10万镑或100万镑，则双方向对方居民提供的年

收入也就是10万镑或100万镑。

If their trade should be of such a nature, that one of them exported to the other nothing but native commodities, while the returns of that other consisted altogether in foreign goods; the balance, in this case, would still be supposed even, commodities being paid for with commodities. They would, in this case too, both gain, but they would not gain equally; and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which exported nothing but native commodities, would derive the greatest revenue from the trade. If England, for example, should import from France nothing but the native commodities of that country, and not having such commodities of its own as were in demand there, should annually repay them by sending thither a large quantity of foreign goods, tobacco, we shall suppose, and East India goods; this trade, though it would give some revenue to the inhabitants of both countries, would give more to those of France than to those of England. The whole French capital annually employed in it would annually be distributed among the people of France; but that part of the English capital only, which was employed in producing the English commodities with which those foreign goods were purchased, would be annually distributed among the people of England. The greater part of it would replace the capitals which had been employed in Virginia, Indostan, and China, and which had given revenue and maintenance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ose distant countries. If the capitals were equal, or nearly equal, therefore, this employment of the French capital would augment much more the revenue of the people of France, than that of the English capital would the revenue of the people of England. France would, in this case, carry on a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with England; whereas England would carry on a round-about trade of the same kind with France.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a capital employed in the direct, and of one employed in the round-abou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have already been fully explained.

若两国间的贸易属于该性质，即一国仅向另一国出口国产商品，另一国向该国仅输回外国商品，则此时仍然认为两国的贸易差额均等，两国都以商品直接支付。此时两国仍将获利，只是获利程度不会均等；仅输出国产商品一国的居民从该贸易中获得的收入最高。例如，英国仅从法国输入法国国产商品，但英国没有法国需要的英国国产商品，因此英国每年只得以大量的外国商品支付，我们认为，如烟草和东印度商品。虽然该贸易可为两国居民提供一些收入，但法国居民所得收入必然多于英国居民所得收入。法国每年在该贸易中投入的全部资本，是每年在法国人民间分配的，但英国资本只有一部分是每年在英国人民间分配的，即用来生产英国商品以备交换外国商品的那部分资本。这部分资本大多用于偿还弗吉尼亚、印度和中国资本，为这些遥远国家的居民提供收入与生存资料。因此，若这些资本完全或几乎相等，则运用法国资本为法国人民增加的收入要多于运用英国资本而为英国人民增加的收入。此时，法国经营的是对英国消费品的直接国外贸易，英国经营的则是对法国同类商品的间接国外贸易。关于直接与间接国外贸易产生的不同结果，前文已经充分解释过了。

There is not, probably, between any two countries, a trade which consists altogether in the exchange, either of native commodities on both sides, or of native commodities on one side, and of foreign goods on the other. Almost all countries exchange with one another, partly native and partly foreign goods That country, however, in whose cargoes there is the greatest proportion of native, and the least of foreign goods, will always be the principal gainer.

或许，任何两国之间的贸易既不能全部交换双方的国产商品，也不能一方全为国产商品，一方全为外国货物。几乎所有国家与他国交换的商品，都有一部分是国产的，一部分是外国的。然而，在交换中，那些国产商品占最多而外国商品居少的国家总是主要的获利方。

If it was not with tobacco and East India goods, but with gold and silver, that England paid for the commodities annually imported from France, the balance, in this case, would be supposed uneven, commodities not being paid for with commodities, but with gold and silver. The trade, however, would in this case, as in the foregoing, give some revenue to the inhabitants of both countries, but more to those of France than to those of England. It would give some revenue to those of England. The capital which had been employed in producing the English goods that purchased this gold and silver, the capital which had been distributed among, and given revenue to, certain inhabitants of England, would thereby be replaced, and enabled to continue that employment. The whole capital of England would no more be diminished by this ex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than by the exportation of an equal value of any other goods. On the contrary, it would, in most cases, be augmented. No goods are sent abroad but those for which the demand is supposed to be greater abroad than at home, and of which the returns, consequently, it is expected, will be of more value at home than the commodities exported. If the tobacco which in England is worth only £100,000, when sent to France, will purchase wine which is in England worth £110,000, the exchange will augment the capital of England by £10,000. If £100,000 of English gold, in the same manner, purchase French wine, which in England is worth £110,000, this exchange will equally augment the capital of England by £10,000. As a merchant, who has £110,000 worth of wine in his cellar, is a richer man than he who has only

£100,000 worth of tobacco in his warehouse, so is he likewise a richer man than he who has only £100,000 worth of gold in his coffers. He can put into motion a greater quantity of industry, and give revenue, maintenance, and employment, to a greater number of people, than either of the other two. But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is equal to the capital of all its different inhabitants; and the quantity of industry which can be annually maintained in it is equal to what all those different capitals can maintain. Both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therefore, and the quantity of industry which can be annually maintained in it, must generally be augmented by this exchange. It would, indeed, be more advantageous for England that it could purchase the wines of France with its own hardware and broad cloth, than with either the tobacco of Virginia, or the gold and silver of Brazil and Peru. A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is always more advantageous than a round-about one. But a round-abou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which is carried on with gold and silver, does not seem to be less advantageous than any other equally round-about one. Neither is a country which has no mines, more likely to be exhausted of gold and silver by this annual exportation of those metals, than one which does not grow tobacco by the like annual exportation of that plant. As a country which has wherewithal to buy tobacco will never be long in want of it, so neither will one be long in want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has wherewithal to purchase those metals.

若英国不以烟草与东印度商品，而以金银支付法国每年的进口商品，此时，即认为贸易差额不均等，因为购买商品的，不是商品而是金银。然而此时却与此前一样，都为两国人民提供收入，英国人民必然会从中获得收入，只是法国人民所得收入较英国人民所得收入更多。为生产英国商品以购买金银而投下的资本，即在英国某些人民之间分配，并向他们提供收入的资本，可因此得到补偿，使其得以继续

当前的用途。输出金银不会减少英国资本总量，正如输出同等价值任何其他商品也不会减少英国资本总量一样。反之则在多数情况下会增加英国资本总量。若非认为国外需求大于国内需求，且输回商品在国内的价值大于输出商品，则商品不会输出国外。若一批烟草在英国价值仅10万镑，运往法国可购买在英国价值11万镑的葡萄酒，则完成交换即可增加英国资本1万镑。若英国以价值10万镑的金购买的法国葡萄酒同样值11万镑，则完成交换同样可以增加英国资本1万镑。酒窖中拥有价值11万镑葡萄酒的商人比仓库中拥有价值10万镑烟草的商人更富裕，同样，也比金柜中拥有价值10万镑金的商人更富裕。相比其他二人中的任一人，他可以实现更多劳动，向更多人民提供收入、生存资料与劳动机会。但是，国家资本相当于国内全体不同人民的资本，该国每年能够维持的劳动量相当于这些不同资本能够维持的劳动量。因此，该交换通常可使一国资本及国内每年能够维持的劳动量增加。的确，英国与其用弗吉尼亚烟草或巴西和秘鲁金银购买，必然不如以本国铁器及阔幅布购买法国葡萄酒更为有利。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总是比间接消费品国外贸易更有利。但以金银支付的间接消费品国外贸易，似乎并不比以任何其他货物支付的间接消费品国外贸易更为不利。没有矿藏的国家每年输出金银这类金属，更不会使金银趋于耗尽，没有烟草的国家每年输出烟草，不会使烟草趋于耗尽。有财力购买烟草的国家永远不会长期缺乏烟草；同样，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永远不会长期缺乏金银。

It is a losing trade, it is said, which a workman carries on with the alehouse; and the trade which a manufacturing nation would naturally carry on with a wine country, may be considered as a trade of the same nature. I answer, that the trade with the alehouse is not necessarily a losing trade. In its own nature it is just as advantageous as any other, though, perhaps, somewhat more liable to be abused. The employment of a brewer, and even that of a retailer of fermented liquors, are as necessary division's of labour as any other. It will generally be more advantageous for a workman to

buy of the brewer the quantity he has occasion for, than to brew it himself; and if he is a poor workman, it will generally be more advantageous for him to buy it by little and little of the retailer, than a large quantity of the brewer. He may no doubt buy too much of either, as he may of any other dealers in his neighbourhood; of the butcher, if he is a glutton; or of the draper, if he affects to be a beau among his companions. It is advantageous to the great body of workmen, notwithstanding, that all these trades should be free, though this freedom may be abused in all of them, and is more likely to be so, perhaps, in some than in others. Though individuals, besides, may sometimes ruin their fortunes by an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fermented liquors, there seems to be no risk that a nation should do so. Though in every country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spend upon such liquors more than they can afford, there are always many more who spend less. It deserves to be remarked, too, that if we consult experience, the cheapness of wine seems to be a cause, not of drunkenness, but of sobriety. The inhabitants of the wine countries are in general the soberest people of Europe; witness the Spaniards, the Italians, and the inhabitants of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France. People are seldom guilty of excess in what is their daily fare. Nobody affects the character of liberality and good fellowship, by being profuse of a liquor which is as cheap as small beer. On the contrary, in the countries which, either from excessive heat or cold, produce no grapes, and where wine consequently is dear and a rarity, drunkenness is a common vice, as among the northern nations, and all those who live between the tropics, the negroes, for example on the coast of Guinea. When a French regiment comes from some of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France, where wine is somewhat dear, to be quartered in the southern, where it is very cheap, the soldiers, I have frequently heard it observed, are at first debauched by the cheapness and novelty of good wine; but after a few months residenc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become as sober as the rest of the inhabitants. Were the duties upon foreign wines, and the excises upon malt, beer, and ale, to be taken away all at once, it might, in the same manner, occasion in Great Britain a pretty general and temporary drunkenness among the middling and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which would probably be soon followed by a permanent and almost universal sobriety. At present, drunkenness is by no means the vice of people of fashion, or of those who can easily afford the most expensive liquors. A gentleman drunk with ale has scarce ever been seen among us. The restraints upon the wine trade in Great Britain, besides, do not so much seem calculated to hinder the people from going, if I may say so, to the alehouse, as from going where they can buy the best and cheapest liquor. They favour the wine trade of Portugal, and discourage that of France. The Portuguese, it is said, indeed, are better customers for our manufactures than the French, and should therefore be encouraged in preference to them. As they give us their custom, it is pretended we should give them ours. The sneaking arts of underling tradesmen are thus erected into political maxims for the conduct of a great empire; for it is the most underling tradesmen only who make it a rule to employ chiefly their own customers. A great trader purchases his goods always where they are cheapest and best, without regard to any little interest of this kind.

有人称工人和酒馆之间进行的交易是一种亏本交易，可能还认为制造业国家和产葡萄酒国家之间自然进行的贸易具有同样的本质。我要对此做出回应：工人和酒馆之间的交易未必是亏本交易。就其本质而言，这种交易与其他交易同样有利，只是多少更可能被滥用。酿酒者甚至啤酒零售小贩从事的，与其他职业一样，都是必要的分工。通常，工人买酒，与其亲自酿造需要的酒，不如向酿酒者购买需要的量；而且若他是一位贫穷的工人，则通常与其向酿酒者大量购买，不

如向小酒贩少量地购买。他会向周边商家购买，因此无疑会向这些酒商购买许多酒，若他贪食，则会向屠夫大量购买；若他想在同伴中显示风度，则会向布商大量购买。虽然贸易自由可能被滥用，尤其有几类贸易自由，但贸易自由对于广大工人来说还是有利的。此外，嗜酒过度的人可能因此而倾家荡产，但似乎国家不会如此。虽然任何国家都有许多人对酒的花费超出其所能承担的范围，但有更多人的花费在可承受范围内。应该指出，根据经验，嗜酒应该不是葡萄酒价格低廉的原因，而其原因在于节制饮酒。通常，葡萄酒生产国的人民反而是欧洲饮酒最节制的，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及法国南部各省人民，人们很少因日常生活花费过度而感到内疚。即使慷慨地提供与低酒精度啤酒一样廉价的饮料，也不能体现出人的慷慨和好客。相反，有些国家因过热或过寒而不能生产葡萄，因此在这些国家，葡萄酒稀少而昂贵，如北方民族、热带民族和几内亚海岸黑人等黑人民族，嗜酒才成为普遍的恶习。当法国军队从法国北部各省来到南部各省，即从葡萄酒昂贵地区来到葡萄酒廉价地区时，我常听人说，可见到许多士兵发现上好的葡萄酒如此廉价与新鲜而堕落其中，但停留数月之后，大部分士兵又会同当地其他居民一样节制。若以同样方式，将外国葡萄酒税、麦芽税、啤酒税、麦芽酒税全部撤销，虽然可能养成英国中下等阶级人民暂时的嗜酒之风，但或许不久就会转变为长期而普遍的节制之风。如今，嗜酒已经不是上流社会，即有财力购买最贵饮料者的恶习，我们之中基本见不到因饮麦芽酒而大醉的绅士。此外，英国限制葡萄酒贸易，若可以这样说，即与其是为了阻止人民走进酒馆，不如说是为了阻止他们购买价最物美价廉的饮料。这些限制鼓励葡萄牙的葡萄酒贸易而压制法国的葡萄酒贸易。的确，据说，相比法国，将本国制造品出售给葡萄牙人是更好的选择，因此应该以葡萄牙人为优先并给予鼓励。有人假称，他们经常光顾我们，我们也应该经常光顾他们。此下等商人的下等伎俩居然就这样成为了指导大帝国行为的政治原则，因为最低等的商人才会以此为招揽顾客的主要原则。大商人则总会在最为物美价廉的地方购买货物，而不会理会此等小利。

By such maxims as these, however, nations have been taught

that their interest consisted in beggaring all their neighbours. Each nation has been made to look with an invidious eye upon the prosperity of all the nations with which it trades, and to consider their gain as its own loss. Commerce, which ought naturally to be, among nations as among individuals, a bond of union and friendship, has become the most fertile source of discord and animosity. The capricious ambition of kings and ministers has not, during the present and the preceding century, been more fatal to the repose of Europe, than the impertinent jealousy of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The violence and injustice of the rulers of mankind is an ancient evil, for which, I am afraid, the nature of human affairs can scarce admit of a remedy: but the mean rapacity, the monopolizing spirit, of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who neither are, nor ought to be, the rulers of mankind, though it cannot, perhaps, be corrected, may very easily be prevented from disturbing the tranquillity of anybody but themselves.

根据这些此类原则，各国都认为，使所有邻国陷入贫穷，就会使他们自己获利。各国都忌恨与他们通商国家的繁荣，认为这些国家获利就等同于他们的损失。就本质而言，商业本该是团结与友谊的纽带，却成为了不和与仇恨的最大原因。本世纪与上世纪，国王与其大臣们的野心反复无常，相比商人和制造业者莽撞的嫉妒心，对欧洲和平造成了更致命的危害。人类统治者的暴力与不公正是一种长久以来的祸患，恐怕就人类事务的本质而言，此等祸患难以补救。而商人和制造业者既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人类统治者，虽然或许无法根除他们吝啬的贪欲和垄断精神，但防止他们扰乱除自身之外他人的安宁却很容易。

That it was the spirit of monopoly which originally both invented and propagated this doctrine, cannot be doubted and they

who first taught it, were by no means such fools as they who believed it. In every country it always is, and must be, the interest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to buy whatever they want of those who sell it cheapest. The proposition is so very manifest, that it seems ridiculous to take any pains to prove it; nor could it ever have been called in question, had not the interested sophistry of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confounded the common sense of mankind. Their interest is, in this respect, directly opposite to that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As it is the interest of the freemen of a corporation to hinder the rest of the inhabitants from employing any workmen but themselves; so it is the interest of the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of every country to secure to themselves the monopoly of the home market. Hence, in Great Britain, and in most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the extraordinary duties upon almost all goods imported by alien merchants. Hence the high duties and prohibitions upon all those foreign manufactures which can come into competition with our own. Hence, too, the extraordinary restraint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almost all sorts of goods from those countries with which the balance of trade is supposed to be disadvantageous; that is, from those against whom national animosity happens ta be most violently inflamed.

最初催生并散布这种原则的无疑是垄断精神，其实最初散布此类原则的人，并不和信奉这种原则的人一样愚蠢。在任何国家，广大人民的利益总在于，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低者购买所需的物品。这一命题已经非常清楚，似乎痛苦地证明这一命题却是荒谬的。若商人和制造业者没有诡辩谋利而混淆了人们的常识，这更算不上问题。在这个方面，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直接对立。同行业联合中自由人的利益在于阻止国内其他居民雇用他人，而只希望雇用自己，与此相同，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在于保护自己在国内市场的

垄断权。因此，英国和大多数欧洲其他国家都对几乎全部外国商人输入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输入本国或可与本国制造品产生竞争的一切外国制造品征收高额关税，或禁止其输入。因此，会限制那些贸易差额认定不利于本国的国家，即限制民族仇恨极为激烈的国家几乎一切商品的输入。

The wealth of neighbouring nations, however, though dangerous in war and politics, is certainly advantageous in trade. In a state of hostility, it may enable our enemies to maintain fleets and armies superior to our own; but in a state of peace and commerce it must likewise enable them to exchange with us to a greater value, and to afford a better market, either for the immediate produce of our own industry, or for whatever is purchased with that produce. As a rich man is likely to be a better customer to the industrious people in his neighbourhood, than a poor, so is likewise a rich nation. A rich man, indeed, who is himself a manufacturer, is a very dangerous neighbour to all those who deal in the same way. All the rest of the neighbourhood, however, by far the greatest number, profit by the good market which his expence affords them. They even profit by his underselling the poorer workmen who deal in the same way with him. The manufacturers of a rich nation, in the same manner, may no doubt be very dangerous rivals to those of their neighbours. This very competition, however, is advantageous to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who profit greatly, besides, by the good market which the great expence of such a nation affords them in every other way. Private people, who want to make a fortune, never think of retiring to the remote and poor provinces of the country, but resort either to the capital, or to some of the great commercial towns. They know, that where little wealth circulates, there is little to be got; but that where a great deal is in motion, some share of it may fall to them. The same maxim which would in

this manner direct the common sense of one, or ten, or twenty individuals, should regulate the judgment of one, or ten, or twenty millions, and should make a whole nation regard the riches of its neighbours, as a probable cause and occasion for itself to acquire riches. A nation that would enrich itself by foreign trade, is certainly most likely to do so, when its neighbours are all rich, industrious and commercial nations. A great nation,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wandering savages and poor barbarians, might, no doubt, acquire riches by the cultivation of its own lands, and by its own interior commerce, but not by foreign trade. It seems to have been in this manner that the ancient Egyptians and the modern Chinese acquired their great wealth. The ancient Egyptians, it is said, neglected foreign commerce, and the modern Chinese, it is known, hold it in the utmost contempt, and scarce deign to afford it the decent protection of the laws. The modern maxims of foreign commerce, by aiming at the impoverishment of all our neighbours, so far as they are capable of producing their intended effect, tend to render that very commerce insignificant and contemptible.

然而，虽然邻国的财富在战争或政治方面对本国确有危险，但对本国贸易却有利。在敌对状态下，邻国财富可维持敌国陆军与海军，使其强于本国。但在和平与通商状态下，同样，邻国的财富必然使他们与我们交换的价值更大，为本国自身产业的直接生产物或以这种生产物购入的任何商品提供更好的市场。对于勤劳人民来说，相比穷人，周边的富人是更合适的顾客，周边的富国同样如此。的确，自身同样是制造业者的富人，对于周边其他从事同类制造业的人是危险的。但是，他的花费可为全部其余的周边人民提供好市场，对绝大多数周边人民有利。经营同种制造业的工人，也会因他们而降低售价，因此就有利于他人。同样，富国的制造业者无疑会成为邻国同类制造业者极为危险的竞争者，但这种竞争，却有利于广大人民，可因此获利，只因富国花费大，就必然会在其他方面向广大人民提供好市场。

希望获取财富的个人必然不会退居该国的穷乡僻壤，而必会居住在该国的首都或商业发达城市。他们知道，在财富流通少的地方可以获得的利润也少；在财富流通多的地方，则可能分享部分财富。同样的原则，会指导一个人、10个人甚至20个个人的常识，应该影响100万人、1000万人甚至2000万人的判断，还应该使全体国民都认为邻国的富裕才可能成为本国获得财富的原因，为其获取财富提供机会。若邻国都是富裕而勤劳的商业国家，则通过国外贸易积累财富的国家最易于致富。若一国周边都是未开化的游牧民族或贫穷的野蛮民族，则无疑可通过耕作本国土地与经营国内商业致富，但绝不可能通过经营国外贸易而致富。古埃及人和近代中国人似乎就是依靠前种活动而致富的。据说古埃及人极不重视国外贸易，且众所周知，近代中国人亦极度蔑视国外贸易，不对国外贸易进行正当的法律保护。近代外国通商原则目标在于使一切邻国陷入贫困，若产生了这些原则预料的结果，往往就会使国外贸易陷入不重要、可轻视的境地。

It is in consequence of these maxims, that the commerce between France and England has, in both countries, been subjected to so many discouragements and restraints. If those two countries, however, were to consider their real interest, without either mercantile jealousy or national animosity, the commerce of France might be more advantageous to Great Britain than that of any other country,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of Great Britain to France. France is the nearest neighbour to Great Britain. In the trade between the southern coast of England and the northern and north-western coast of France, the returns might be expect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the inland trade, four, five, or six times in the year. The capital, therefore, employed in this trade could, in each of the two countries, keep in motion four, five, or six times the quantity of industry, and afford employment and subsistence to four, five, or six time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ich all equal capital could do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other branches of foreign trade. Between the

parts of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most remote from one another, the returns might be expected, at least, once in the year; and even this trade would so far be at least equally advantageous, a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other branches of our foreign European trade. It would be, at least, three times more advantageous than the boasted trade with our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in which the returns were seldom made in less than three years, frequently not in less than four or five years. France, besides, is supposed to contain 24,000,000 of inhabitants. Our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were never supposed to contain more than 3,000,000; and France is a much richer country than North America; though, on account of the mor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riches, there is much more poverty and beggary in the one country than in the other. France, therefore, could afford a market at least eight times more extensive, and, on account of the superior frequency of the returns, four-and-twenty times more advantageous than that which our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ever afforded. The trade of Great Britain would be just as advantageous to France, 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wealth, population, and proximity of the respective countries, would have the same superiority over that which France carries on with her own colonies. Such is the very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at trade which the wisdom of both nations has thought proper to discourage, and that which it has favoured the most.

正是由于此等原则，英法之间的贸易在两国都受到如此之多的阻碍与限制。若两国都能思考真正的利益，放弃商业忌恨与国民仇恨，则法国的贸易对英国来说，会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更为有利；同样，英国贸易对法国来说，也会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更为有利。法国是距英国最近的邻国，英国南部沿海各地与法国北部及西北部沿海各地之间的贸易几乎无异于国内贸易，每年可往返4次、5次甚至6次，都是可以期望的。因此，两国在这种贸易中投入的资本，相比多数国外贸

易其他分支中投入的等量资本，前者能够产生4倍、5倍甚至6倍于后者的劳动，雇用供养4倍、5倍甚至6倍的人。即使两国相隔最远的地方进行贸易，每年同样可以至少往返一次。因此，即使是两国间最远的贸易，有利程度同样不逊于英国对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国外贸易。甚至，虽然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贸易有所夸大，期间往返通常需要3年、4年甚至5年才可进行一次，相比该贸易，前者有利程度至少高出3倍。此外，据判断，法国居民达2400万，英属北美殖民地居民却从未超过300万。虽然法国财富分配不平均，贫民与乞丐比北美洲多得多，但法国仍比北美洲更为富裕。因此，相比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国提供的市场至少广阔8倍；鉴于往返极为频繁，有利程度更要高24倍。英国贸易同样有利于法国，依两国财富、人口与距离来看，英国贸易对于法国的利益要大于法国殖民地贸易。两国明眼人认为对于一些贸易应该予以限制，有些却应鼓励，此即二者之间的差别。

But the very same circumstances which would have rendered an open and free commer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o advantageous to both, have occasioned the principal obstructions to that commerce. Being neighbours, they are necessarily enemies, and the wealth and power of each becomes, upon that account, more formidable to the other; and what would increase the advantage of national friendship, serves only to inflame the violence of national animosity. They are both rich and industrious nations; and the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of each dread the competition of the skill and activity of those of the other. Mercantile jealousy is excited, and both inflames, and is itself inflamed, by the violence of national animosity, and the traders of both countries have announced, with all the passionate confidence of interested falsehood, the certain ruin of each, in consequence of that unfavourable balance of trade, which, they pretend, would be the infallible effect of an unrestrained commerce with the other.

然而，同样的环境，使两国间开放且自由的贸易对两国都有利，却对此类贸易产生了主要的障碍。两国是邻国，就必然也是敌国，则一国的富强会加剧另一国的恐惧，本该增进民族友谊的有利因素却激发了激烈的民族仇恨。两国都是富裕而勤劳的国家，两国商人和制造业者，都担心另一国商人和制造业者因工艺或商业活动而对其产生竞争。激烈的民族仇恨激发并助长了商业忌恨，两种情绪相互助长，且两国商人都十分确信各自有关利益的谬论，以此宣称，不受限制的国外贸易必会产生不利的贸易差额，而不利的贸易差额必将导致国家灭亡。

There is no commercial country in Europe, of which the approaching ruin has not frequently been foretold by the pretended doctors of this system, from all unfavourably balance of trade. After all the anxiety, however, which they have excited about this, after all the vain attempts of almost all trading nations to turn that balance in their own favour, and against their neighbours,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any one nation in Europe has been, in any respect, impoverished by this cause. Every town and country, on the contrary, in proportion as they have opened their ports to all nations, instead of being ruined by this free trade, as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mmercial system would lead us to expect, have been enriched by it. Though there are in Europe indeed, a few towns which, in same respects, deserve the name of free ports, there is no country which does so. Holland, perhaps, approaches the nearest to this character of any, though still very remote from it; and Holland, it is acknowledged, not only derives its whole wealth, but a great part of its necessary subsistence, from foreign trade.

欧洲各商业国奉行这种学说的伪学者常常预告，不利的贸易差额将使国家趋于灭亡，引发了不少担忧，各商业国几乎都试图逆转贸易

差额，使贸易差额有利于本国，不利于邻国，大为忧虑，且尝试无果后，似乎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因上述原因而在任何方面陷入贫困。相反，重商主义原理可能指导我们预料的结果并未发生，实行开放并允许自由贸易的城市与国家，不仅未因自由贸易而灭亡，反而因此而致富。的确，在相同层面，欧洲确有几座城市称得上自由港口，但这样的国家却尚未出现。或许荷兰是最接近于此的国家，但仍有很大差距。众所承认，荷兰不仅通过对外贸易获取全部财富，且大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也是如此获得的。

There is another balance, indeed, which has already been explained,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balance of trade, and which, according as it happens to be either favourable or unfavourable, necessarily occasions the prosperity or decay of every nation. This is the balance of the annual produce and consumption. If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exceeds that of the annual consumption, the capital of the society must annually increase in proportion to this excess. The society in this case lives within its revenue; and what is annually saved out of its revenue, is naturally added to its capital, and employed so as to increase still further the annual produce. If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n the contrary, fall short of the annual consumption, the capital of the society must annually decay in proportion to this deficiency. The expence of the society, in this case, exceeds its revenue, and necessarily encroaches upon its capital. Its capital, therefore, must necessarily decay, and, together with it,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industry.

诚然，上文已说明有另一种差额大不同于贸易差额，即年生产物与年消费品的差额，一国的繁荣与衰落取决于此差额是否有利。我们

已经谈到，若年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大于年消费品交换价值，则每年社会资本必将与此超额成正比增长。此时，社会依靠收入而维系，每年从社会收入中的节省自然会加到社会资本，用于进一步增加年生产物。相反，若年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小于年消费品交换价值，每年社会资本每年必将与差额成正比减少。此时，社会支出大于收入，必然造成社会资本的侵蚀。资本必将减少，该社会产业年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必将随之减少。

This balance of produce and consumption is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what is called the balance of trade. It might take place in a nation which had no foreign trade, but which was entirely separated from all the world. It may take place in the whole globe of the earth, of which the wealth, population, and improvement, may be either gradually increasing or gradually decaying.

生产物与消费品的差额和所谓贸易差额完全不同，可能会在没有对外贸易且完全与世隔绝的国家中产生。全球财富、人口与土地改良可能逐渐发展或逐渐减退，全球也都可以产生这种差额。

The balance of produce and consumption may be constantly in favour of a nation, though what is called the balance of trade be generally against it. A nation may import to a greater value than it exports for half a century, perhaps, together;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comes into it during all this time, may be all immediately sent out of it; its circulating coin may gradually decay, different sorts of paper money being substituted in its place, and even the debts, too, which it contracts in the principal nations with whom it deals, may be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yet its real wealth,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s and labour,

may, during the same period, have been increasing in a much greater proportion. The state of our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and of the trade which they carried on with Great Britain,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resent disturbances, may serve as a proof that this is by no means an impossible supposition.

即使所谓的贸易差额大体上不利于某国家，生产物与消费品的差额仍可对该国持续有利。某国家可能半世纪以来的输入价值都大于输出价值；在此期间内，流入的金银可能全部立即输出国外；流通铸币逐渐减少，各种纸币取而代之；甚至该国对各个主要通商国家所负的债务同样逐渐增加；但该国真实财富和土地与劳动年生产物的交换价值，仍可此期间内，以较从前更大的比例增长。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现状，以及在如今的动乱发生以前，殖民地对大不列颠的贸易状态，都可证明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的假设。

Chapter IV. Of Drawbacks

第四章、论退税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are not contented with the monopoly of the home market, but desire likewise the most extensive foreign sale for their goods. Their country has no jurisdiction in foreign nations, and therefore can seldom procure them any monopoly there. They are generally obliged, therefore, to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petitioning for certain encouragements to exportation.

商人和制造业者不仅仅满足于垄断国内市场，此外还要为其商品最大限度开拓国外市场。但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对外国没有管辖权，

因此，对外国市场形成垄断，基本不可能，大体而言，受迫于此，这些商人和制造业者只得请求国家对出口进行一定的鼓励。

Of these encouragements, what are called drawbacks seem to be the most reasonable. To allow the merchant to draw back upon exportation, either the whole, or a part of whatever excise or inland duty is imposed upon domestic industry, can never occasion the exportation of a greater quantity of goods than what would have been exported had no duty been imposed. Such encouragements do not tend to turn towards any particular employment a greater share of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than what would go to that employment of its own accord, but only to hinder the duty from driving away any part of that share to other employments. They tend not to overturn that balance which naturally establishes itself among all the various employments of the society, but to hinder it from being overturned by the duty. They tend not to destroy, but to preserve, what it is in most cases advantageous to preserve, the natural divi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labour in the society.

所谓的退税，应该是各种鼓励措施中最为合理的。允许商人从出口中退还对国内产业征收的一切税或内地税的全部或一部分，必不会使货物的出口量比不征税时更大。此等鼓励措施，通常不会使大部分国家资本背离其自然用途而转向任何特殊用途，而会阻止因征税导致资本的任何部分转向其他用途；不会破坏社会各种资本用途间的建立的自然平衡，而会防止征税破坏这种自然平衡；不会破坏而会维系社会自然的分工与劳动分配，多数情况下，维系是有利的。

The same thing may be said of the drawbacks upon the re-exportation of foreign goods imported, which, in Great Britain,

generally amount to by much the largest part of the duty upon importation. By the second of the rules, annexed to the act of parliament, which imposed what is now called the old subsidy, every merchant, whether English or alien. was allowed to draw back half that duty upon exportation; the English merchant, provided the exportation took place within twelve months; the alien, provided it took place within nine months. Wines, currants, and wrought silks, were the only goods which did not fall within this rule, having other and more advantageous allowances. The duties imposed by this act of parliament were, at that time, the only dutie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goods. The term within which this, and all other drawbacks could be claimed, was afterwards (by 7 Geo. I. chap. 21. sect. 10.) extended to three years.

进口外国商品再输出时的退税同样如此。在英国，再输出的退税基本等于进口税的最大部分。议会法令附则的第二项，对如今所称的旧补贴税进行了规定，即允许无论是否为英国国籍的每个商人，在输出时收回旧补贴税的一半；但英国商人，须在12个月内进行输出，外国商人则为九个月。葡萄酒、小葡萄干和精制丝绸，是仅有的三种商品，享有其他更有利的津贴，未列入此规定范围。当时，该议会法令规定的税是唯一的外国商品进口税。此后，该规定范围内及其他各种退税的期限，经乔治一世第七年法令第21号第10条规定，延长为3年。

The duties which have been imposed since the old subsidy, a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wholly drawn back upon exportation. This general rule, however, is liable to a great number of exceptions; and the doctrine of drawbacks has become a much less simple matter than it was at their first institution.

旧补贴税实施后征收的大部分税，都在在输出时全部退还。然而，该通则存在许多例外情况。因此，相比各种税款最初制定时，关于退税的规定更为复杂了。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some foreign goods, of which it was expected that the importation would greatly exceed what was necessary for the home consumption, the whole duties are drawn back, without retaining even half the old subsidy. Before the revolt of our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we had the monopoly of the tobacco of Maryland and Virginia. We imported about ninety-six thousand hogsheads, and the home consumption was not supposed to exceed fourteen thousand. To facilitate the great exportation which was necessary, in order to rid us of the rest, the whole duties were drawn back, provided the exportation took place within three years.

部分外国商品的进口量可能大大超过国内必要的消费量，并不出人意料，在将外国商品输出时退还全部的税，甚至不留下旧补贴税的一半。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叛变前，我们垄断了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烟草，进口烟草约9.6万大桶，国内消费却据说不及1.4万大桶。这个余额，是必须输出的。为使这巨额必要的输出易于实现，凡是在3年内输出，所纳关税全部退还。

We still have, though not altogether, yet very nearly, the monopoly of the sugars of our West Indian islands. If sugars are exported within a year, therefore, all the duties upon importation are drawn back; and if exported within three years, all the duties, except half the old subsidy, which still continues to be retained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goods. Though the

importation of sugar exceeds a good deal w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home consumption, the excess is inconsiderable, in comparison of what it used to be in tobacco.

我们虽未全部垄断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砂糖，但已接近垄断。因此，若在一年内输出砂糖，则可退还输入时的一切税；若在3年内输出，则除一半旧补贴税之外，所有的税都可退还，而大部分货物的输出，则继续保留了一半的旧补贴税。虽然砂糖的进口量大大超过国内的必要消费量，但相比烟草，这种过剩通常不值一提。

Some goods, the particular objects of the jealousy of our own manufacturers, are prohibited to be imported for home consumption. They may, however, upon paying certain duties,be imported and warehoused for exportation. But upon such exportation no part of these duties is drawn back. Our manufacturers are unwilling, it seems, that even this restricted import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are afraid lest some part of these goods should be stolen out of the warehouse, and thus come into competition with their own. It is under these regulations only that we can import wrought silks, French cambrics and lawns, calicoes, painted, printed, stained, or dyed, etc.

一些商品被禁止输入英国以供消费，因国内制造业者对这些商品心存戒备。但是，若对这些商品征收一定的税，即可进口并存入仓库以供输出，但输出这些货物时征收的税毫不退还。似乎，我们的制造业者不愿鼓励这种受限制的进口，担心仓库货物被盗，与自己的货物形成竞争。在此种限制下，我们只得进口精制丝绸、法国细棉布与上等细麻布以及以各种工艺印花、染色的棉布等货物。

We are unwilling even to be the carriers of French goods, and choose rather to forego a profit to ourselves than to suffer those whom we consider as our enemies to make any profit by our means. Not only half the old subsidy, but the second twenty-five per cent. is retained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all French goods.

对于法国货物，我们甚至不愿充当搬运者，我们视法国为敌人，因其妨碍我们以自己的方式获利，宁可放弃自身利润，也不愿容忍他们。输出任何法国货物，都不仅不会退还旧补贴税的一半，25%的附加税同样不予退还。

By the fourth of the rules annexed to the old subsidy, the drawback allowed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all wines amounted to a great deal more than half the duties which were at that time paid upon their importation; and it seems at that time to have been the object of the legislature to give somewhat more than ordinary encouragement to the carrying trade in wine. Several of the other duties, too which were imposed either at the same time or subsequent to the old subsidy, what is called the additional duty, the new subsidy, the one-third and two-thirds subsidies, the impost 1692, the tonnage on wine, were allowed to be wholly drawn back upon exportation. All those duties, however, except the additional duty and impost 1692, being paid down in ready money upon importation, the interest of so large a sum occasioned an expence, which made it unreasonable to expect any profitable carrying trade in this article. Only a part, therefore of the duty called the impost on wine, and no part of the twenty-five pounds the ton upon French wines, or of the duties imposed in 1745, in 1763, and in 1778, were allowed to be drawn back upon exportation. The two imposts of five per cent. imposed in 1779 and 1781, upon all the former duties

of customs, being allowed to be wholly drawn back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all other goods, were likewise allowed to be drawn back upon that of wine. The last duty that has been particularly imposed upon wine, that of 1780, is allowed to be wholly drawn back; an indulgence which, when so many heavy duties are retained, most probably could never occasion the exportation of a single ton of wine. These rules took place with regard to all places of lawful exportation, except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America.

据旧补贴税法令附则第四条规定，允许输出所有葡萄酒退还的税多于一半输入时征收的税。当时立法者的目的似乎在于特别鼓励葡萄酒转口贸易。一些与旧补贴税同时征收或附加征收的其他税目、所谓的附加税、新补贴税、1/3补贴税及2/3补贴税、1692年关税和葡萄酒检验税，都允许在输出时全部退还。然而，除附加税与1692年关税之外，所有这些税都在输入时以现金形式缴纳；如此大额的利息耗资巨大，因此，期望此类货物的转口贸易有利可图是不现实的。因此，在输出时，所谓的葡萄酒关税只退还一部分，而法国葡萄酒进口每大桶所征收25镑的税，或1745年、1763年和1778年征收的关税，则毫不退还。1779年和1781年对一切货物进口都征收两种5%的附加关税，在输出所有其他货物时都尽数退还，输出葡萄酒以及1780年对葡萄酒特别征收的最后一道关税，同样全部退还；保留了如此多的繁重关税，这些优惠基本难以促使哪怕一吨的葡萄酒得以输出。除英属北美殖民地以外，这些规定适用于一切法律允许输出之地。

The 15th Charles II, chap. 7, called an act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trade, had given Great Britain the monopoly of supplying the colonies with all the commodities of the growth or manufacture of Europe, and consequently with wines. In a country of so extensive a coast as our North American and West Indian colonies, where our authority was always so very slender, and

where the inhabitants were allowed to carry out in their own ships their non-enumerated commodities, at first to all parts of Europe, and afterwards to all parts of Europe south of Cape Finisterre, it is not very probable that this monopoly could ever be much respected; and they probably at all times found means of bringing back some cargo from the countries to which they were allowed to carry out one. They seem, however, to have found some difficulty in importing European wines from the places of their growth; and they could not well import them from Great Britain, where they were loaded with many heavy duties, of which a considerable part was not drawn back upon exportation. Madeira wine, not being an European commodity, could be imported directly into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countries which, in all their non-enumerated commodities, enjoyed a free trade to the island of Madeira. These circumstances had probably introduced that general taste for Madeira wine, which our officers found established in all our colonies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which began in 1755, and which they brought back with them to the mother country, where that wine had not been much in fashion before. Upon the conclusion of that war, in 1763 (by the 4th Geo. III, chap. 15, sect. 12), all the duties except £3, 10s. were allowed to be drawn back upon the exportation to the colonies of all wines, except French wines, to the commerce and consumption of which national prejudice would allow no sort of encouragement. The period between the granting of this indulgence and the revolt of our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was probably too short to admit of any considerable change in the customs of those countries.

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第7号法令，称为贸易促进法案，赋予英国将包括葡萄酒在内的欧洲一切生产物或制造品对殖民地供给的垄断权。但是，英属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殖民地海岸线如此之长，英国对其统

治权如此之微；加上最初，当地居民可以其私有船只将政府未列出的商品运往欧洲各地，后来，又可运往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欧洲各国；出于此，无论何时，人们都可能有办法从目的地国家运回一些货物，导致该垄断权无法被人广泛尊重。然而，将欧洲的葡萄酒输入葡萄酒产地则会面临困难；英国葡萄酒税种类多、数额高，大不列颠大部分税又不可在输出时退还，因此进口欧洲葡萄酒同样困难。但马德拉岛的葡萄酒不属于欧洲商品，美洲与西印度群岛与马德拉岛自由交换的各种未列举商品，便可直接输入美洲与西印度群岛。1755年战争开始时，英国军官在各殖民地发现，人们对马德拉岛葡萄酒普遍有所嗜好，或许这种嗜好如此形成的。后来这些军官将这种嗜好带回英国，此前，这种葡萄酒在英国尚不盛行。战争结束后，1763年据乔治三世第四年法令第15号第12条，除法国葡萄酒之外，允许任何葡萄酒在输往殖民地时，3镑10先令以外所缴纳的任何税，此即国民的偏见不允许对法国葡萄酒的贸易与消费进行任何鼓励。但是，此等宽大条例与英属北美殖民地叛变相隔时间似乎过短，因此这些国家的风俗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显著变化。

The same act which, in the drawbacks upon all wines, except French wines, thus favoured the colonies so much more than other countries, in those upon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commodities, favoured them much less.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commodities to other countries, half the old subsidy was drawn back. But this law enacted, that no part of that duty should be drawn back upon the exportation to the colonies of any commodities of the growth or manufacture either of Europe or the East Indies, except wines, white calicoes, and muslins.

就除法国葡萄酒之外的一切葡萄酒的退税而言，相比其他各国，该法令赋予殖民地的利益更多，但就大部分其他商品的退税而言，殖民地所受的利益却更少。将大部分商品输出至其他各国时，退还了旧

补贴税的一半，但该法令却规定，除葡萄酒、白棉布及细棉布外，一切欧洲或东印度的农产品或制造品输出至殖民地时，不退还任何旧补贴税。

Drawbacks were, perhaps, originally granted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carrying trade, which, as the freight of the ship is frequently paid by foreigners in money, was supposed to be peculiarly fitted for bringing gold and silver into the country. But though the carrying trade certainly deserves no peculiar encouragement, though the motive of the institution was, perhaps, abundantly foolish, the institution itself seems reasonable enough. Such drawbacks cannot force into this trade a greater share of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than what would have gone to it of its own accord, had there been no duties upon importation; they only prevent its being excluded altogether by those duties. The carrying trade, though it deserves no preference, ought not to be precluded, but to be left free, like all other trades. It is a necessary resource to those capitals which cannot find employment, either in the agriculture or in the manufactures of the country, either in its home trade, or in its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或许，退税的本意就是鼓励转口贸易。船只的运费通常由外国人以货币形式支付，因此人们认为转口贸易尤其可为国家赚取更多金银。虽然转口贸易不应受特殊奖励，或许退税的动机颇为荒谬，但退税制度本身却似乎很合理。相比没有退税，如此退税必不会转口贸易流入更多资本，只不过使得转口贸易不至于完全被进口税所排斥。虽然不应鼓励转口贸易，可同样不应妨碍，而应该令其自由进行，正如对其他行业一样。转口贸易是资本的一种必然出路，使得既不能用于本国农业，又不能用于本国制造业、既不能用于国内贸易，又不能用于消费品国外贸易的资本，有所去向。

The revenue of the customs, instead of suffering, profits from such drawbacks, by that part of the duty which is retained. If the whole duties had been retained, the foreign goods upon which they are paid could seldom have been exported, nor consequently imported, for want of a market. The duties, therefore, of which a part is retained, would never have been paid.

由于退税时保留了部分关税，因此关税的收入将从此种退税中获利而不会受损。若保留全部关税，则已缴纳关税的外国商品，由于缺少市场，便无法输出，也不能输入。如此一来，本可以保留一部分的关税，都无从收取了。

These reasons seem sufficiently to justify drawbacks, and would justify them, though the whole duties, whether upon the produce of domestic industry or upon foreign goods, were always drawn back upon exportation. The revenue of excise would, in this case indeed, suffer a little, and that of the customs a good deal more; but the natural balance of industry, the natural divi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labour, which is always more or less disturbed by such duties, would be more nearly re-established by such a regulation.

这些理由似乎足以证明，即使在输出时全部退还本国产品或外国产品缴纳的关税，也是合理的退税。当然此时国内货物税的收入会略受损失，关税收入会受更大损失；但产业的自然平衡、劳动的自然分工与分配，都必然多少受到此类关税的干扰，将因这种规定而重新建立平衡。

These reasons, however, will justify drawbacks only upon exporting goods to those countries which are altogether foreign and independent, not to those in which our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enjoy a monopoly. A drawback, for example,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European goods to our American colonies, will not always occasion a greater exportation than what would have taken place without it. By means of the monopoly which our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enjoy there, the same quantity might frequently, perhaps, be sent thither, though the whole duties were retained. The drawback, therefore, may frequently be pure loss to the revenue of excise and customs, without altering the state of the trade, or rendering it in any respect more extensive. How far such drawbacks can be justified as a proper encouragement to the industry of our colonies, or how far it is advantageous to the mother country that they should be exempted from taxes which are paid by all the rest of their fellow-subjects, will appear hereafter, when I come to treat of colonies.

然而，这些理由证明，将商品出口至完全独立的外国，而不输出至占有垄断的本国商人和制造业者，退税才是合理的。例如，欧洲商品输出至英属北美殖民地，此时退税并不能使出口额大于没有退税时的出口额。因为本国商人、制造业者在殖民地占有垄断，因此即使保留全部税额，也未必会提高至殖民地的出口额。因此，此时退税只会纯粹造成国内货物税及关税收入损失，不会改变贸易状态，也不会在任何方面扩大贸易。而若称这种退税是对本国殖民地产业适当的鼓励，可以何种程度得到证明，或称以何种程度上对殖民地免除本国其他人民所不能免除的赋税才对本国有利，在我后文谈到殖民时会加以探讨。

Drawbacks, however, it must always be understood, are useful

only in those cases in which the goods, for the exportation of which they are given, are really exported to some foreign country, and not clandestinely re-imported into our own. That some drawbacks, particularly those upon tobacco, have frequently been abused in this manner, and have given occasion to many frauds, equally hurtful both to the revenue and to the fair trader, is well known.

但必须知道，只有出口商品真正输出至外国而不再暗中输入本国时，对于这些商品的退税才是有效的。人们知道，有些退税，尤其是烟草的退税，就往往以此方式受到滥用，滋生了许多既损害收入又损害正当商人的欺诈行为。

Chapter V. Of Bounties

第五章、论奖金

Bounties upon exportation are, in Great Britain, frequently petitioned for, and sometimes granted, to the produce of particular branches of domestic industry. By means of them, our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it is pretended, will be enabled to sell their goods as cheap or cheaper than their rivals in the foreign market. A greater quantity, it is said, will thus be exported, and the balance of trade consequently turned more in favour of our own country. We cannot give our workmen a monopoly in the foreign, as we have done in the home market. We cannot force foreigners to buy their goods, as we have done our own countrymen. The next best expedient, it has been thought, therefore, is to pay them for buying. It is in this manner that the mercantile system proposes to enrich the whole country, and to put money into all our pockets, by means of the balance of trade.

在大不列颠，针对某些国内分支产业产品，时常有民众请求奖金输出，有时政府也会做相应的输出。借助上述手段，我们的商人及制造业者可以在外贸中以竞争对手一样低廉的价格出售货物由此，我们听说了国内贸易输出量相应增加，并且贸易差额更为可观。外贸市场上，工人们不能像在国内市场一样得到垄断权。并且和本国情况不同的是，外国人具体买不买本国的货物，我们无法强迫。因此，我们采取了重商学说倡导的，用贸易差额来积累财富，即付钱给外国人，让他们来购买。

Bounties, it is allowed, ought to be given to those branches of trade only which cannot be carried on without them. But every branch of trade in which the merchant can sell his goods for a price which replaces to him,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the whole capital employed in preparing and sending them to market, can be carried on without a bounty. Every such branch is evidently upon a level with all the other branches of trade which are carried on without bounties, and cannot, therefore, require one more than they. Those trades only require bounties, in which the merchant is obliged to sell his goods for a price which does not replace to him his capital, together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 or in which he is obliged to sell them for less than it really cost him to send them to market. The bounty is given in order to make up this loss, and to encourage him to continue, or, perhaps, to begin a trade, of which the expence is supposed to be greater than the returns, of which every operation eats up a part of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it, and which is of such a nature, that if all other trades resembled it, there would soon be no capital left in the country.

对于奖金而言，一些人理解为其应当被给予那些急需的部门，那

些没有就无法运营的商业机构。然而，对于所有商业部门而言，如果借助货物所得偿还制造成本的利润，及上市后投入产出的正常收益均可以保持正常经营，便可无需奖金。类似这种商业部门和其他无奖金的组织一样，处于同等地位，因此这些部门并不需要奖金。只有当商人货物所得不足以偿还制造成本，或者售价不足以偿还上市支出时，才需要奖金。奖金的意义在于补偿损失，使其得以继续经营，或者奖励那些新兴开办的收益低于支出的行业。这些企业的每一次经营就会损耗掉部分的资金，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律，那些具备这样性质的公司不久就会资金匮乏。

The trades, it is to be observed, which are carried on by means of bounties, are the only ones which can be carried on between two nations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together, in such a manner as that one of them shall alway's and regularly lose, or sell its goods for less than it really cost to send them to market. But if the bounty did not repay to the merchant what he would otherwise lose upon the price of his goods, his own interest would soon oblige him to employ his stock in another way, or to find out a trade in which the price of the goods would replace to him,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sending them to market. The effect of bounties, like that of all the other expedients of the mercantile system, can only be to force the trade of a country into a channel much less advantageous than that in which it would naturally run of its own accord.

这样靠奖金经营的企业是在两国长期生意中持续亏损（售价低于上市费用）的那个。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奖金来弥补商品售价的损失，商人会根据自身的利润亏空来考虑改变资本的用途，或者从事那些能够盈利的、靠售价补偿上市费用的相关行业。对于重商主义者给出的结果而言，对于鼓励金的发放，会促使一国商业向不利的

方向发展，并且这样的发展并不是自然的、正常的。

The ingenious and well-informed author of the *Tracts upon the Corn Trade* has shown very clearly, that since the bounty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was first established, the price of the corn exported, valued moderately enough, has exceeded that of the corn imported, valued very high, by a much greater sum than the amount of the whole bounties which have been paid during that period. This, he imagines, upon the true principles of the mercantile system, is a clear proof that this forced corn trade is beneficial to the nation, the value of the exportation exceeding that of the importation by a much greater sum than the whole extraordinary expence which the public has been at in order to get it exported. He does not consider that this extraordinary expence, or the bounty, is the smallest part of the expence which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really costs the society. The capital which the farmer employed in raising it must likewise be taken into the account. Unless the price of the corn, when sold in the foreign markets, replaces not only the bounty, but this capital, together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the society is a loser by the difference, or the national stock is so much diminished. But the very reason for which it has been thought necessary to grant a bounty, is the supposed insufficiency of the price to do this.

见识广泛的《谷物贸易小谈》的作者曾清楚地指出，从第一次输出谷物奖金开始，谷物输出价格适度地超出了输入价格，然而大大超出了期间政府付给的全部奖金金额。由此他认为，重商主义提出的观点明确地证明了，强制性的谷物贸易对于国家是有利的，这是出于输出价值高于了输入，并且进一步弥补了国家奖金且有剩余收益这一情况所得到的判断结果。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种奖金费用仅仅作为社

会花费的很少一部分。我们必须还要考虑农业者栽种的那部分。然而如果外贸中谷物的售价不足以弥补奖金或者资本和利润，那么差额会造成社会的损失，国民资产的流失。然而鼓励金的发放也正是出于上述的售价不足的原因，以维持商业的正常运营。

The average price of corn, it has been said, has fallen considerabl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ounty. That the average price of corn began to fall somewha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has continued to do so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sixty-four first years of the present, I have already endeavoured to show. But this event, supposing it to be real, as I believe it to be, must have happened in spite of the bounty, and cannot possibly have happened in consequence of it. It has happened in France, as well as in England, though in France there was not only no bounty, but, till 1764,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was subjected to a general prohibition. This gradual fall in the average price of grain, it is probable, therefore, is ultimately owing neither to the one regulation nor to the other, but to that gradual and insensible rise in the real value of silver, which, in the first book of this discourse, I have endeavoured to show, has taken place in the general market of Europe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It seems to be altogether impossible that the bounty could ever contribute to lower the price of grain.

相传，自从鼓励金发放以来，谷物的均价显著下降。在上个世纪末，谷物均价略微跌落，并且一直持续到本世纪60年代。如果事实如我所言，即便是没有奖金的发放，也会是如今同样的结果。法国是没有奖金的，并且在1964年前的政策是不允许谷物输出，然而法国的谷物均价同英国一样走低。因此，谷物均价的逐渐走低，或许不是出于这样那样的条例而引起的，归根结底是银的价值的不经意上升。笔者

曾在本书第一篇中明确指出，本世纪欧洲市场上，银的价值逐渐上升。由此看来，奖金不可能是谷物价格降低的助因。

In years of plenty,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the bounty, by occasioning an extraordinary exportation, necessarily keeps up the price of corn in the home market above what it would naturally fall to. To do so was the avowed purpose of the institution. In years of scarcity, though the bounty is frequently suspended, yet the great exportation which it occasions in years of plenty, must frequently hinder, more or less, the plenty of one year from relieving the scarcity of another. Both in years of plenty and in years of scarcity, therefore, the bounty necessarily tends to raise the money price of corn somewhat higher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be in the home market.

我们已提到过，奖金在丰年的异常输出，势必造成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高于标准水平，而这也恰好是奖金制度倡导者所追求的目标。歉收季节的奖金大多停止发放，但它在丰年会引起较大输出，必将或多或少地使一年的收益不足以弥补另一年的缺损。因此，无论该年份收益如何，奖金必将引起谷物的售价略高于无奖金时国内市场上谷物售价。

That in the actual state of tillage the bounty must necessarily have this tendency, will not, I apprehend, be disputed by any reasonable person. But it has been thought by many people, that it tends to encourage tillage, and that in two different ways; first, by opening a more extensive foreign market to the corn of the farmer, it tends, they imagine, to increase the demand for, and consequently the production of, that commodity; and, secondly by

securing to him a better price than he could otherwise expect in the actual state of tillage, it tends, they suppose, to encourage tillage. This double encouragement must they imagine, in a long period of years, occasion such an increase in the production of corn, as may lower its price in the home market, much more than the bounty can raise it in the actual state which tillage may, a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happen to be in.

就现有的耕作情况来看，理性的人对奖金的状况是不会持有异议的。然而许多人认为，发放奖金对奖励耕作大有裨益，而奖励的方法有两种。首先，奖金给予了农业者一个更广大的外国市场，有助于谷物需求的提升，以及谷物生产的积极性；其次，奖金使农业者得到的粮食售价高于在无奖金时的售价。由此他们认为，这种双重奖励会在一个相对长时间内大大增进谷物的生产。实际耕作后，国内市场上谷价的跌落可能远高于奖金的发放。

I answer, that whatever extension of the foreign market can be occasioned by the bounty must, in every particular year, be altogether at the expence of the home market; as every bushel of corn, which is exported by means of the bounty, and which would not have been exported without the bounty, would have remained in the home market to increase the consumption, and to lower the price of that commodity. The corn bounty, it is to be observed, as well as every other bounty upon exportation, imposes two different taxes upon the people; first, the tax which they are obliged to contribute, in order to pay the bounty; and, secondly, the tax which arises from the advanced price of the commodity in the home market, and which, as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are purchasers of corn, must, in this particular commodity, be paid by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In this particular commodity, therefore, this

second tax is by much the heaviest of the two. Let us suppose that, taking one year with another, the bounty of 5s.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the quarter of wheat raises the price of that commodity in the home market only 6d. the bushel, or 4s. the quarter higher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in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crop. Even upon this very moderate supposition,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over and above contributing the tax which pays the bounty of 5s. upon every quarter of wheat exported, must pay another of 4s. upon every quarter which they themselves consume. But according to the very well informed author of the Tracts upon the Corn Trade, the average proportion of the corn exported to that consumed at home, is not more than that of one to thirty-one. For every 5s. therefore, which they contribute to the payment of the first tax, they must contribute £6:4s. to the payment of the second. So very heavy a tax upon the first necessary of life-must either reduce the subsistence of the labouring poor, or it must occasion some augmentation in their pecuniary wages, proportionable to that in the pecuniary price of their subsistence. So far as it operates in the one way, it must reduce the ability of the labouring poor to educate and bring up their children, and must, so far, tend to restrain the 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 So far as it operate's in the other, it must reduce the ability of the employers of the poor, to employ so great a number as they otherwise might do, and must so far tend to restrain the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The extraordinary exportation of corn, therefore occasioned by the bounty, not only in every particular year diminishes the home, just as much as it extends the foreign market and consumption, but, by restraining the population and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its final tendency is to stint and restrain the gradual extension of the home market; and thereby, in the long-run, rather to diminish than to augment the whole market and consumption of corn.

对上述意见，我认为，奖金所倡导的国外市场会以牺牲国内市场为代价。单靠奖励输出，无奖金就不输出的谷物，在无奖金时会滞留在国内市场上来增加消费，由此导致谷物的价格走低。应指出一点，谷物奖金一如其他输出奖金，以两种税征收在安置在人民身上。首先，人民必须为支付奖金纳税；其次，出于人民大众是谷物的购买者这一前提，国内市场上由于售价提高产生的相应金额必须由人民大众缴纳。因此，后者税比前者税赋更重。假定逐年平均计算，输出一夸特小麦奖金5先令，只需让国内市场价比在无奖金时按实际收获所得每蒲式耳高出6便士，即每夸特高4先令即可。即便按照这个相对合理的假设，人民除每夸特小麦输出奖金5先令以外，花费一夸特后还须多支付4先令。那位博闻的谷物贸易论文作者提出，输出的谷物与国内消费的比例，平均后不应超过1：31。由此我们得到，若他们的第一种税为5先令，则第二种税是6镑4先令。这样苛重的税必然会减少劳苦贫民的生活品，导致雇佣成本的提高。前者加重了劳苦贫民抚养子女、教育子女的困难，进而抑制国内人口增长。而后者会减低雇主雇用贫民的能力，使他们所雇用的人数少于无奖金时的情形，进而抑制了国内产业。奖金造成的谷物的不正常输出，既扩大国外市场，又减少国内消费，还间接限制国内人口与产业，最后必将抑制国内市场的扩大发展。因此，归根到底，与其说扩大谷物的整个市场和消费量，还不如说缩小谷物的整个市场和消费量。

This enhancement of the money price of corn, however, it has been thought, by rendering that commodity more profitable to the farmer, must necessarily encourage its production.

还有人提到，谷物售价提高利于农业者，会鼓励商品生产。

I answer, that this might be the case, if the effect of the bounty was to raise the real price of corn, or to enable the farmer, with an

equal quantity of it, to maintain a greater number of labourers in the same manner, whether liberal, moderate, or scanty, than other labourers are commonly maintained in his neighbourhood. But neither the bounty, it is evident, nor any other human institution, can have any such effect. It is not the real, but the nominal price of corn, which can in any considerable degree be affected by the bounty. And though the tax, which that institution imposes upon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may be very burdensome to those who pay it, it is of very little advantage to those who receive it.

对这种观点，我如下答复。发给奖金会使谷物的真实价格提高，使农业者能以等量谷物维持劳动者正常的生活劳作，无论其生活是否富庶贫穷。然而奖金同任何人为制度一样显然不会有这种结果。奖金只对谷物的名义价格有很大影响，而对谷物的真实价格没多大影响。这种制度对人民大众是苛重的负担，对收受者也是极小收益。奖金造成的，与其说是提高谷物的真实价值，不如说是压低银价，换句话说，等量的银只交换了小量的谷物，并只能交换较少的国内其他产品。

The real effect of the bounty is not so much to raise the real value of corn, as to degrade the real value of silver; or to make an equal quantity of it exchange for a smaller quantity, not only of corn, but of all other home made commodities; for the money price of corn regulates that of all other home made commodities.

谷物的价格主导着劳动的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需要支持劳动者购买一定数量的谷物，无论是否富庶，也能够维持其家庭生活。而社会繁荣或是低迷的大环境，会使雇主不得不维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无论是否足够殷实。

It regulates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which must always be such as to enable the labourer to purchase a quantity of corn sufficient to maintain him and his family, either in the liberal, moderate, or scanty manner, in which the advancing, stationary, or declining, circumstances of the society, oblige his employers to maintain him.

谷物的货币价格主导了土地其他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并且会和谷物的货币价格保持一定的比例，并且这个比例因阶段不同而不同。例如牧草、干草、肉、马、马粮，内陆运输以及大部分国内贸易，都受谷物货币价格影响。

It regulates the money price of all the other parts of the rude produce of land, which, in every period of improvement, must bear a certa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corn, though this proportion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It regulates, for example, the money price of grass and hay, of butcher's meat, of horse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horses, of land carriage consequently, or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inland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By regulating the money price of all the other parts of the rude produce of land, it regulates that of the materials of almost all manufactures; by regulating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it regulates that of manufacturing art and industry; and by regulating both, it regulates that of the complete manufacture.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and of every thing that is the produce, either of land or labour, must necessarily either rise or fall in proportion to the money price of corn.

谷物的货币价格主导了土地其他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及几乎一切制造业原料的货币价格。谷物的货币价格，主导了辛苦劳动和精湛技艺的货币价格。由于它与这二者相关，因此也和制造品的货币价格相关。劳动的货币价格，土地产出物还是劳动生产物的货币价格，都要按照谷物货币价格的升降比例而改变。

Though in consequence of the bounty, therefore, the farmer should be enabled to sell his corn for 4s. the bushel, instead of 3s:6d. and to pay his landlord a money rent proportionable to this rise in the money price of his produce; yet if, in consequence of this rise in the price of corn, 4s. will purchase no more home made goods of any other kind than 3s. 6d. would have done before, neith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farmer, nor those of the landlord, will be much mended by this change. The farmer will not be able to cultivate much better; the landlord will not be able to live much better. In the purchase of foreign commodities, this enhancement in the price of corn may give them some little advantage. In that of home made commodities, it can give them none at all. And almost the whole expence of the farmer, and the far greater part even of that of the landlord, is in home made commodities.

因此发给奖金虽然可以让农业者售卖谷物的价格由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至4先令，向雇主缴纳生产物售价成比例的地租，但谷物价格这样抬高的结果，现在四先令所可购买的国内商品，并不比以前3先令6便士的多，而农业者与雇主的关系，并不会受到价格改变而有所改善。农业者的耕作，不可能有大的改善；地主的生活，不可能有大的提高。这样抬高谷价，虽在购买外货时，有微小利益，但在购买国货时，一点利益也没有。然而，农业者的费用，几乎全部用于购买国货，甚至地主，亦如此。

That degradation in the value of silver, which is the effect of the fertility of the mines, and which operates equally, or very nearly equally,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ommercial world, is a matter of very little consequence to any particular country. The consequent rise of all money prices, though it does not make those who receive them really richer, does not make them really poorer. A service of plate becomes really cheaper, and every thing else remains precisely of the same real value as before.

矿山造成的银价低落，对大部分商业有类似影响，所以对个别国家而言，并不重要。由此货币价格升高不能让人民实际上更富或更穷。金银器皿的价格，实际上比之前低廉，但其他物品的真实价值，和从前完全一样。

But that degradation in the value of silver, which, being the effect either of the peculiar situation or of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particular country, takes place only in that country, is a matter of very great consequence, which, far from tending to make anybody really richer, tends to make every body really poorer. The rise in the money price of all commodities, which is in this case peculiar to that country, tends to discourage more or less every sort of industry which is carried on within it, and to enable foreign nations, by furnishing almost all sorts of goods for a smaller quantity of silver than its own workmen can afford to do, to undersell them, not only in the foreign, but even in the home market.

如果银价跌落，是个别国家的特殊情况或政治制度的改变，虽仅在一国发生，却也是极重要。这决不会使任何人实际上更富裕，却会

使人实际上更贫乏。一切商品货币价格的增加（或为该国特有的现象）会或多或少阻抑国内各种产业，因而使外国国民在出售货物所得银量小于该国工人所能出售的银量。

It is the peculiar situation of Spain and Portugal, as proprietors of the mines, to be the distributers of gold and silver to all the other countries of Europe. Those metals ought naturally, therefore, to be somewhat cheaper in Spain and Portugal than in any other part of Europe. The difference, however, should be no more than the amount of the freight and insurance; and, on account of the great value and small bulk of those metals, their freight is no great matter, and their insurance is the same as that of any other goods of equal value. Spain and Portugal, therefore, could suffer very little from their peculiar situation, if they did not aggravate its disadvantages by thei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西班牙和葡萄牙金银矿山多，所以能够以金银分配给欧洲其他国家。因此，这两种金属，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国内低廉，而在欧洲其他各国则略为昂贵。但其差额，不应大于运输费和保险费。由于金银体积小价值大，运输费不成大问题；至于保险费，也和其他等值货物的保险费相同。因此，两国通过政治制度，使其在经历特殊情况下蒙受的很小的代价。

Spain by taxing, and Portugal by prohibiting, the ex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load that exportation with the expence of smuggling, and raise the value of those metals in other countries so much more above what it is in their own, by the whole amount of this expence. When you dam up a stream of water, as soon as the dam is full, as much water must run over the dam-head as if there

was no dam at all. The prohibition of exportation cannot detain a greater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in Spain and Portugal, than what they can afford to employ, than what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ir land and labour will allow them to employ, in coin, plate, gilding, and other ornaments of gold and silver. When they have got this quantity, the dam is full, and the whole stream which flows in afterwards must run over. The annual ex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from Spain and Portugal, accordingly, is, by all accounts, notwithstanding these restraints, very near equal to the whole annual importation. As the water, however, must always be deeper behind the dam-head than before it, so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these restraints detain in Spain and Portugal, must, in proportion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ir land and labour, be greater than what is to be found in other countries. The higher and stronger the dam-head, the greater must be the difference in the depth of water behind and before it. The higher the tax, the higher the penalties with which the prohibition is guarded, the more vigilant and severe the police which looks after the execution of the law, the greater must be the difference in the proportion of gold and silver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Spain and Portugal, and to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It is said, accordingly, to be very considerable, and that you frequently find there a profusion of plate in houses, where there is nothing else which would in other countries be thought suitable or correspondent to this sort of magnificence. The cheapness of gold and silver, or, what is the same thing, the dearness of all commodities, which is the necessary effect of this redundanc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discourages both the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of Spain and Portugal, and enables foreign nations to supply them with many sorts of rude, and with almost all sorts of manufactured produce, for a smaller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than what they themselves can either raise or make them for at home. The tax and prohibition

operate in two different ways. They not only lower very much the valu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n Spain and Portugal, but by detaining there a certain quantity of those metals which would otherwise flow over other countries, they keep up their value in those other countries somewhat above what it otherwise would be, and thereby give those countries a double advantage in their commerce with Spain and Portugal. Open the flood-gates, and there will presently be less water above, and more below the dam-head, and it will soon come to a level in both places. Remove the tax and the prohibition, and as the quantity of gold and silver will diminish considerably in Spain and Portugal, so it will increase somewhat in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value of those metals, their proportion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land and labour, will soon come to a level, or very near to a level, in all. The loss which Spain and Portugal could sustain by this exportation of their gold and silver, would be altogether nominal and imaginary. The nominal value of their goods, and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ir land and labour, would fall, and would be expressed or represented by a smaller quantity of silver than before; but their real value would be the same as before, and would be sufficient to maintain, command, and employ the same quantity of labour. As the nominal value of their goods would fall, the real value of what remained of their gold and silver would rise, and a smaller quantity of those metals would answer all the same purposes of commerce and circulation which had employed a greater quantity before.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would go abroad would not go abroad for nothing, but would bring back an equal value of goods of some kind or other. Those goods, too, would not be all matters of mere luxury and expence, to be consumed by idle people, who produce nothing in return for their consumption. As the real wealth and revenue of idle people would not be augmented by this extraordinary ex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so neither would their consumption be much augmented by it. Those goods

would probably,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and certainly some part of them, consist in materials, tools, and provisions, for the employment and maintenance of industrious people, who would reproduce, with a profit, the full value of their consumption. A part of the dead stock of the society would thus be turned into active stock, and would put into motion a greater quantity of industry than had been employed before.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ir land and labour would immediately be augmented a little, and in a few years would probably be augmented a great deal; their industry being thus relieved from one of the most oppressive burdens which it at present labours under.

然而金银输出，西班牙征收赋税，而葡萄牙则加以禁止。输出须负担走私费用，使这两种金属在他国的价值高于西葡二国。比如，修堤坝截流，若坝内充满了水，水必越过坝头外流，如无堤坝。禁止金银输出，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禁止金银输出，不能在本国保留所能使用的金银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产出，限制了该国的铸币。在金银器皿上，在镀金上，在金银装饰品上，所可使用的金银量。若超过这个数量，就如堤坝满了以后流入的水外溢。这样，西葡二国，虽限制金银输出，但每年从西葡二国输出的金银，几乎等于其每年输入的金银。然而，正如坝内的水必比坝外的水深，西葡二国内的金银量，和它们的土地和劳动产出相比不成比例，且必大于其他各国。坝头愈高愈强，则坝内坝外水的深度的差必然愈大。所以，征税愈高，刑罚愈严峻，警察执法愈严密，西葡二国金银对土地和劳动的产出的比例，与其他各国相比，差额亦愈大。因此，在西葡二国，家家看到许多金银器皿，而看不到此奢华相称的其他东西。贵金属这样的过剩，必然金银低廉，或者说，一切商品昂贵，这就阻碍了西葡二国的农业与制造业，使外国能以比它们国内生产或制造所费的更小的金银量，供给它们以许多种类产品，和几乎一切种类制造品。征税及禁止，在两个不同方面起作用。不仅大大减低西葡二国贵金属的价值，而且由于保留不应保留的一定数量金银，致使其他各国贵金属的价值，略高于原

来的价值，从而，使其他各国与西葡二国通商，得享受双重利益。要是把水门开放，则坝内的水立刻减少，坝外的水立即增加，坝内外不久就会相等。要是撤掉征税与禁令，西葡二国的金银量就会大减，各国的金银量就会稍增，此等金属的价值，即对土地劳动年生产物的比例，不久就会在一切国家间相近。西葡二国由金银输出的损失，全然是名义上的、浮于表面上的。它们货物的名义价值，它们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出的价值下降，将以较少的金银量体现，然而其真实价值将和从前相同，所能维持、支配和雇用的劳动量，亦和从前相同。它们货物的价值同样将下降，所余金银的真实价值将高涨，于是和往昔为通商为流通而使用的较大金银量比较，现今的数量虽较小，但所能达到的与往常无异。流往外国的金银，决非无所谓地流往外国，那必然会带回等价值的各种物品。这些货物，又决不是游手好闲者所消费的奢侈品和消耗品。真实财富与收入，既不能由于异常的金银输出而增加，同时其消费亦不能大增。所以，由此带回来的货物，也许有大部分，但至少一部分是材料、工具、食料，也可用以雇用勤劳人民和维持基本生活。劳动人民，必能再生产他们所消费的全部价值并带来利润。这样，社会死钱的一部分就变为活钱，因此能推动比从前更大量的产业。它们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马上就会增加一点，再过几年，便会大大增加。所受最苛重的一个负担，就这样除去了。

The bounty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necessarily operates exactly in the same way as this absurd policy of Spain and Portugal. Whatever be the actual state of tillage, it renders our corn somewhat dearer in the home market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be in that state, and somewhat cheaper in the foreign; and as the average money price of corn regulates, more or less, that of all other commodities, it lowers the value of silver considerably in the one, and tends to raise it a little in the other. It enables foreigners, the Dutch in particular, not only to eat our corn cheaper than they otherwise could do, but sometimes to eat it cheaper than even our own people can do upon the same occasions; as we are assured by

an excellent authority, that of Sir Matthew Decker. It hinders our own workmen from furnishing their goods for so small a quantity of silver as they otherwise might do, and enables the Dutch to furnish theirs for a smaller. It tends to render our manufactures somewhat dearer in every market, and theirs somewhat cheaper,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be, and consequently to give their industry a double advantage over our own.

通过西葡二国不合理政策和谷物输出奖金造成的作用来看，不论耕作的实际状态，谷物输出奖金总会使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略高于无奖金水平，并使外贸的谷物价格略低于无奖金的场合。因为谷物的均价，多少支配一切其他商品的均价，由此，奖金又会大大减低国内白银的价值，稍提高国外白银的价值。这种奖金，使外国人，尤其是荷兰人，不但能以比无奖金时获得更廉的价格，而且能以比有奖金时获得更廉的价格购买本国货物；一位权威作者马太·德克尔，曾明确指出这一点。这种奖金使我们的工人，不能像在无奖金时那样用少量的白银卖给他们的货物，却使荷兰人能以较小量的白银而卖出他们的货物。这样就造成本国制造品无论何处，都比无奖金时稍贵，并使他们的制造品无论何处，都比无奖金时稍廉，因而，他们的产业能享受双重好处。

The bounty, as it raises in the home market, not so much the real, as the nominal price of our corn; as it augments, not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a certain quantity of corn can maintain and employ, but only the quantity of silver which it will exchange for; it discourages our manufactures, without rendering any considerable service, either to our farmers or country gentlemen. It puts, indeed, a little more money into the pockets of both, and it will perhaps be somewhat difficult to persuad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that this is not rendering them a very considerable service.

But if this money sinks in its value, in the quantity of labour, provisions, and homemade commodities of all different kinds which it is capable of purchasing, as much as it rises in its quantity, the service will be little more than nominal and imaginary.

然而奖金，在国内市场上所提高的，与其说是本国谷物的真实价格，还不如说是本国谷物的名义价格。所增加的，与其说是谷物所能维持和所雇用的劳动量，不如说是谷物所能交换的白银量。因此，必然妨害本国制造业，而对本国农业者又无大的利益。这两者都会因此而有较多的货币收入，要使他们大部分相信无多大利益，也许有点困难；然而，若货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食料量和各种国产商品量都减少了。那末，由此而得的利益，也就不过是名义上、浮于表面上的利益了。

There is, perhaps, but one set of men in the whole commonwealth to whom the bounty either was or could be essentially serviceable. These were the corn merchants, the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of corn. In years of plenty, the bounty necessarily occasioned a greater exportation than would otherwise have taken place; and by hindering the plenty of the one year from relieving the scarcity of another, it occasioned in years of scarcity a greater importation than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necessary. It increased the business of the corn merchant in both; and in the years of scarcity, it not only enabled him to import a greater quantity, but to sell it for a better price, and consequently with a greater profit, than he could otherwise have made, if the plenty of one year had not been more or less hindered from relieving the scarcity of another. It is in this set of men, accordingly, that I have observed the greatest zeal for the continuance or renewal of the bounty.

整个国家受这种奖金的实际利益的，或者这种奖金的实际利益的，只有一种人，即谷物商人或谷物输出者和谷物输入者。奖金必然使丰年谷物输出量大于无奖金的场合；而且今年的丰收不能救济歉收季节的不足，它必然使歉收季节谷物输入量大于无奖金。因此在丰年歉收季节都会增加谷物商人的业务。但在歉收季节，这种奖金，就不但使他能输入比无奖金时（即丰年可多少救济歉收季节不足时）更多谷物，且能用好的价格出售，由此获得较大的利润。因此赞成奖金的，就是这一种人。

Our country gentlemen, when they imposed the high duties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foreign corn, which in times of moderate plenty amount to a prohibition, and when they established the bounty, seem to have imitated the conduct of our manufacturers. By the one institution, they secured to themselves the monopoly of the home market, and by the other they endeavoured to prevent that market from ever being overstocked with their commodity. By both they endeavoured to raise its real value, in the same manner as our manufacturers had, by the like institutions, raised the real value of many different sorts of manufactured goods. They did not, perhaps, attend to the great and essential difference which nature has established between corn and almost every other sort of goods. When, either by the monopoly of the home market, or by a bounty upon exportation, you enable our woollen or linen manufacturers to sell their goods for somewhat a better price than they otherwise could get for them, you raise, not only the nominal, but the real price of those goods; you render them equivalent to a greater quantity of labour and subsistence; you increase not only the nominal, but the real profit, the real wealth and revenue of those manufacturers; and you enable them, either to live better themselves, or to employ a greater quantity of labour in those

particular manufactures. You really encourage those manufactures, and direct towards them a greater quantity of the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than what would properly go to them of its own accord. But when, by the like institutions, you raise the nominal or money price of corn, you do not raise its real value; you do not increase the real wealth, the real revenue, either of our farmers or country gentlemen; you do not encourage the growth of corn, because you do not enable them to maintain and employ more labourers in raising it. The nature of things has stamped upon corn a real value, which cannot be altered by merely altering its money price. No bounty upon exportation, no monopoly of the home market, can raise that value. The freest competition cannot lower it, Through the world in general, that value is equal to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it can maintain, and in every particular place it is equal to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it can maintain in the way, whether liberal, moderate, or scanty, in which labour is commonly maintained in that place. Woollen or linen cloth are not the regulating commodities by which the real value of all other commodities must be finally measured and determined; corn is. The real value of every other commodity is finally measured and determined by the proportion which its average money price bears to the average money price of corn. The real value of corn does not vary with those variations in its average money price, which sometimes occur from one century to another; it is the real value of silver which varies with them.

本国地主对外国输入谷物征收重税（丰年一般禁止），和对本国谷物的输出奖金，似乎在仿照制造业者。前一种手段，他们取得了国内市场垄断权；而后一种，他们企图严禁国内市场谷物过多囤积。因此，他们用上述两种方法，试图提高商品的真实价值。就这点，他们和制造业者的方法是相同的。制造业同样采取这两种方法，提高制造

品的真实价值。然而他们没注意到的是，谷物和其他各种货物有着明显的差别。利用垄断国内市场，或奖金输出的方法，让毛织物比无垄断时或者无奖金时售出更好的价格是可能的。因此这些手段，提高了货物的名义价格和真实价格，使货物代表了大的劳动量与质量，也就由此增益了制造业者的名义利润、财富和收入，而且增加了他们的真实利润、财富和收入；这样，他们就得到了优质的生活，或在此基础上，引入更大的劳动量和劳动者。实际上奖励此等制造业者会造成雇用的国内劳动者比无此制度时的多。然而这种制度一旦用于谷物，所提高的就只是谷物的名义价值，而不是真实价值。这种做法，既不能增加农业者的真实财富收入，也不能增加地主的真实财富收入。也不能刺激谷物的耕种，因为谷物能够养活和能够雇用更多的耕种谷物的劳动者并没有增加。按照这样的规律，谷物有一定的真实价值，不能随货币价格改变而改变。输出奖金，或者让国内市场垄断，均不可能提高谷物的真实价值。即便是自由的竞争，亦不能使其价值有所更改。全世界上，谷物的真实价值等于它所能维持的劳动量；就小地方，谷物的真实价值等于谷物按照当地维持劳动者基本生活的能力，即无论富庶贫困的状况但足以维持其生活，所能维持的劳动量。毛织物和麻织物并非支配性商品，并且一切其他商品的真实价值，最后并不是由毛织物和麻织物的价值来衡量的。谷物却不然。一切其他商品的真实价值，最后都要由各自均价对谷物均价的比例来衡量比对。谷物的均价，虽有时会随着年代不同，但其真实价值却不随此变动而变动。变动的只是白银的真实价值。

Bounties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any homemade commodity are liable, first, to that general objection which may be made to all the different expedients of the mercantile system; the objection of forcing some part of the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into a channel less advantageous than that in which it would run of its own accord; and, secondly, to the particular objection of forcing it not only into a channel that is less advantageous, but into one that is actually disadvantageous; the trade which cannot be carried on but by

means of a bounty being necessarily a losing trade. The bounty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is liable to this further objection, that it can in no respect promote the raising of that particular commodity of which it was meant to encourage the production. When our country gentlemen, therefore, deman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ounty, though they acted in imitation of our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they did not act with that complete comprehension of their own interest, which commonly directs the conduct of those two other orders of people. They loaded the public revenue with a very considerable expence: they imposed a very heavy tax upon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but they did not, in any sensible degree, increase the real value of their own commodity; and by lowering somewhat the real value of silver, they discouraged, in some degree, the general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and, instead of advancing, retarded more or less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own lands, which necessarily depend upon the general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国产商品输出奖金时往往惹人反对。首先，一般都可对重商主义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这些办法往往违反自然规律，造成国内部分产业流入集中的、较少利益的功用。其次，反对国产商品输出奖金办法，因为它不仅迫使国内一部分产业，流入集中、较少利益的功用，而且还造成其流入实际不利的用途。无奖金即不能经营的生意，本质上是一种亏损生意。谷物输出奖金，需要反对的还要有以下方面：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一做法都不能促进的商品的生产。地主们要求开设奖金，虽然属于模仿商人和制造业者，但商人和制造业者完全理解他们的利害关系，其行动通常有见解做指导，但地主们却完全没有见解。他们给国家收入造成一个相当大的浪费，给广大劳苦人民加上了一个极重的赋税，但他们自己的商品却没能显著地增加其真实价值。出于银的真实价值逐渐减低，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举措阻碍国家的一般产业的发展，这是基于土地改良程度取决于国家一般产业这个前提；

所以他们没有促进他们土地的改良，反而或多或少地起到了阻碍的效果。

To encourage the production of any commodity, a bounty upon production, one should imagine, would have a more direct operation than one upon exportation. It would, besides, impose only one tax upon the people, that which they must contribute in order to pay the bounty. Instead of raising, it would tend to lower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y in the home market; and thereby, instead of imposing a second tax upon the people, it might, at least in part, repay them for what they had contributed to the first. Bounties upon production, however, have been very rarely granted. The prejudices esta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system have taught us to believe, that national wealth arises more immediately from exportation than from production. It has been more favoured, accordingly, as the more immediate means of bringing money into the country. Bounties upon production, it has been said too, have been found by experience more liable to frauds than those upon exportation. How far this is true, I know not. That bounties upon exportation have been abused, to many fraudulent purposes, is very well known. But it is not the interest of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the great inventors of all these expedients, that the home market should be overstocked with their goods; an event which a bounty upon production might sometimes occasion. A bounty upon exportation, by enabling them to send abroad their surplus part, and to keep up the price of what remains in the home market, effectually prevents this. Of all the expedients of the mercantile system, accordingly, it is the one of which they are the fondest. I have known the different undertakers of some particular works agree privately among themselves to give a bounty out of their own pockets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the goods which they dealt in. This expedient succeeded so well, that it more than doubled the price of their goods in the home market, notwithstanding a very considerable increase in the produce. The operation of the bounty upon corn must have been wonderfully different, if it has lowered the money price of that commodity.

因此，有人这样认为，为刺激商品的生产，生产奖金比输出奖金作用更直接高效。此外只须对人民身上安置一种赋税，换句话说，人民只需缴纳税负用以支付奖金即可。然而，生产奖金不仅不会增加国内市场上商品的价格，结果还有造成其减低的倾向。另外，他们由此不会缴纳第二种税，并且他们所缴纳的第一种税可以部分补还。但是，政府是不常发放生产奖金的。重商主义使我们认为，国民财富直接获得并且自身生产的少，自身输出的多。输出被认为更直接高效，并且是很好的带回货币的方法，因此更受人民欢迎。同时又有人认为，依照经验，生产奖金，比输出奖金更易滋生欺诈行为。这种说法，我不知道其是否确凿可靠。但输出奖金，往往被滥用来搞很多不端的欺诈行为，这一点却是大家都广泛知道的。但这一举措的发明者即商人与制造业者，他们的利益体现在，他们的货物在国内市场上积存不多。有时生产奖金会造成这种情况，而输出奖金却使过剩部分送往他国，这样国内过剩的那部分货物的售价得以提高，所以能切实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在重商主义中，从这么多举措中脱颖而出的输出奖金，便成为最推举的一种了。某些行业的经营者会私自掏腰包来支持自己一定数量货物的输出。这种方策施行得很顺利，既可以很大程度增加了国产商品，又也能在国内市场上令货物的价格翻番儿一倍以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谷物奖金如果真的降低了谷物的货币价格，其效果必不同于上述情形。

Something like a bounty upon production, however, has been granted upon some particular occasions. The tonnage bounties

given to the white herring and whale fisheries may, perhaps, be considered as somewhat of this nature. They tend directly, it may be supposed, to render the goods cheaper in the home market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be. In other respects, their effects,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bounties upon exportation. By means of them, a part of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is employed in bringing goods to market, of which the price does not repay the cost, together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然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曾发放了很多类似生产奖金的奖金。按渔船吨数计算的，鳕白鱼业及鲸鱼业奖金，可视为具有类似性质。据传言，这种奖金使该种商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比无奖金时要低廉。其他方面而言，我们必须承认，该结果与输出奖金的结果相同。上述奖金的出现，使得国内一部分资本促进了货物的上市，但是，这种情形下价格不能补偿其支出，而且不能带来普通利润。

But though the tonnage bounties to those fisheries do not contribute to the opulence of the nation, it may, perhaps, be thought that they contribute to its defence, by augmenting the number of its sailors and shipping. This, it may be alleged, may sometimes be done by means of such bounties, at a much smaller expence than by keeping up a great standing navy, if I may use such an expression, in the same way as a standing army.

这类渔业具备的按吨计算的奖金，虽然对于国民财富增长无益，但是对于增加船只和水手数量还是有好处的。因此被认为有利于国防。或者换句话说，可以用这种鼓励金维持国防。比如类似于维护常备陆军那样规模的常备海军（如果我可以这样用词），也许费用有时要少得多。

Notwithstanding these favourable allegations, however,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dispose me to believe, that in granting at least one of these bounties, the legislature has been very grossly imposed upon:

但是虽然存在辩护，我相信如下的观点，通过这些可以证明议会在批准奖金时受到了欺骗。

First, The herring-buss bounty seems too large.

第一，对于鳙白色渔船的奖金金额过高。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inter fishing 1771, to the end of the winter fishing 1781, the tonnage bounty upon the herring-buss fishery has been at thirty shillings the ton. During these eleven years, the whole number of barrels caught by the herring-buss fishery of Scotland amounted to 378,347. The herrings caught and cured at sea are called sea-sticks. In order to render them what are called merchantable herrings, it is necessary to repack them with an additional quantity of salt; and in this case, it is reckoned, that three barrels of sea-sticks are usually repacked into two barrels of merchantable herrings. The number of barrels of merchantable herrings, therefore, caught during these eleven years, will amount only, according to this account, to 252,231¼. During these eleven years, the tonnage bounties paid amounted to £155,463:11s. or 8s:2¼d. upon every barrel of sea-sticks, and to 12s:3¾d. upon every barrel of merchantable herrings.

从1771年冬汛起，至1981年冬汛为止，鳙白鱼渔船的吨数奖金数额为每吨30先令。在这为期11年间，苏格兰鳙白鱼捕捞总数为378347桶，同时我们将在海上捕获即行腌存的鳙白鱼，称为海条。如果需要运到市场去售卖商用鳙白鱼则需要再加上定量的盐加以包装。这种情况下，3桶海条可以制作2桶商用鳙白鱼。因此这11年所获商用鳙白鱼，换算过来，总共有252231又1/3桶，其间的吨数奖金，价值总计155462镑11先令，换算后为海条每桶8先令2又1/4便士，商用鳙白鱼每桶12先令3又3/4便士。

The salt with which these herrings are cured is sometimes Scotch, and sometimes foreign salt; both which are delivered, free of all excise duty, to the fish-curers. The excise duty upon Scotch salt is at present 1s:6d., that upon foreign salt 10s. the bushel. A barrel of herrings is supposed to require about one bushel and one-fourth of a bushel foreign salt. Two bushels are the supposed average of Scotch salt. If the herrings are entered for exportation, no part of this duty is paid up; if entered for home consumption, whether the herrings were cured with foreign or with Scotch salt, only one shilling the barrel is paid up. It was the old Scotch duty upon a bushel of salt, the quantity which, at a low estimation, had been supposed necessary for curing a barrel of herrings. In Scotland, foreign salt is very little used for any other purpose but the curing of fish. But from the 5th April 1771 to the 5th April 1782, the quantity of foreign salt imported amounted to 936,974 bushels, at eighty-four pounds the bushel; the quantity of Scotch salt delivered from the works to the fish-curers, to no more than 168,226, at fifty-six pounds the bushel only. It would appear, therefore, that it is principally foreign salt that is used in the fisheries. Upon every barrel of herrings exported, there is, besides, a bounty of 2s:8d. and 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e buss-caught herrings are exported. Put

all these things together, and you will find that, during these eleven years, every barrel of buss-caught herrings, cured with Scotch salt, when exported, has cost government 17s:11¾d.; and, when entered for home consumption, 14s:3¾d.; and that every barrel cured with foreign salt, when exported, has cost government £1:7:5¾d.; and, when entered for home consumption, £1:3:9¾d. The price of a barrel of good merchantable herrings runs from seventeen and eighteen to four and five-and-twenty shillings; about a guinea at an average.

腌制商用鳕白鱼时用盐，有时产自苏格兰，有时产自外国，并且对国产腌鱼免税。然而，对目前情况而言，购买苏格兰每蒲式耳盐，须纳税1先令6便士，外国盐每蒲式耳须纳10先令。据说制作商用鳕白鱼每桶须用外国盐大约1又1/4蒲式耳。而苏格兰盐则须纳约2蒲式耳。若鳕白鱼出口，那就完全免纳盐税。若其销往本国，那么就无论所用哪种盐，每桶只纳1先令。这是苏格兰以往对1蒲式耳盐所要求的税收，一桶商用鳕白鱼所需的盐，最低亦需1蒲式耳。我们普遍知道在苏格兰，外国盐通常只用以制作商用鳕鱼。自1771年4月5日到1782年4月5日期间，输入的外国盐共计936974蒲式耳，并且换算英制单位每蒲式耳重84磅。苏格兰盐卖到腌鱼的价格总量，却不过168226蒲式耳，每蒲式耳仅56磅。由此我们看到，渔业所用盐主要来自国外。此外，每桶商用鳕白鱼出口，得奖金2先令便士。渔船捕获的鳕白鱼，又有2/3以上用于出口。综上所述，由此计算可得，这11年间，苏格兰盐腌存渔船捕获鳕白鱼一桶，出口费用17先令11又3/4便士，供国内消费时费用14先令3又3/4便士；外国盐腌存，出口费用1镑7先令5又3/4便士，供国内消费费用1镑3先令9又3/4便士。品相良好的一桶商用鳕白鱼最低17先令或18先令，最高24先令或25先令，平均约1几尼。

Secondly, The bounty to the white-herring fishery is a tonnage

bounty, and is proportioned to the burden of the ship, not to her diligence or success in the fishery; and it has, I am afraid, been too common for the vessels to fit out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catching, not the fish but the bounty. In the year 1759, when the bounty was at fifty shillings the ton, the whole buss fishery of Scotland brought in only four barrels of sea-sticks. In that year, each barrel of sea-sticks cost government, in bounties alone, £113:15s.; each barrel of merchantable herrings £159:7:6.

第二，鳙白鱼奖金是吨数奖金，是按照捕鱼船载重量发放，并非按照其出勤与所得配给的。这其中恐有许多开出去不以捕鱼为目的船只，以获得奖金为唯一目的。1759年，奖金为每吨50先令，但苏格兰全部渔船所获海条却不过四桶。这一年每桶海条，单就奖金，政府花费113镑15先令，而每桶商用鳙白鱼，为159镑7先令6便士。

Thirdly, The mode of fishing, for which this tonnage bounty in the white herring fishery has been given (by busses or decked vessels from twenty to eighty tons burden), seems not so well adapted to the situation of Scotland, as to that of Holland, from the practice of which country it appears to have been borrowed. Holland lies at a great distance from the seas to which herrings are known principally to resort, and can, therefore, carry on that fishery only in decked vessels, which can carry water and provisions sufficient for a voyage to a distant sea; but the Hebrides, or Western Islands, the islands of Shetland, and the northern and north-western coasts of Scotland, the countries in whose neighbourhood the herring fishery is principally carried on, are everywhere intersected by arms of the sea, which run up a considerable way into the land, and which, in the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are called sea-lochs. It is to these sea-lochs that the herrings principally resort during the

seasons in which they visit these seas; for the visits of this, and, I am assured, of many other sorts of fish, are not quite regular and constant. A boat-fishery, therefore, seems to be the mode of fishing best adapted to the peculiar situation of Scotland, the fishers carrying the herrings on shore as fast as they are taken, to be either cured or consumed fresh. But the great encouragement which a bounty of 30s. the ton gives to the buss-fishery, is necessarily a discouragement to the boat-fishery, which, having no such bounty, cannot bring its cured fish to market upon the same terms as the buss-fishery. The boat-fishery; accordingly, which,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uss-bounty, was very considerable, and is said to have employed a number of seamen, not inferior to what the buss-fishery employs at present, is now gone almost entirely to decay. Of the former extent, however, of this now ruined and abandoned fishery, I must acknowledge that I cannot pretend to speak with much precision. As no bounty was-paid upon the outfit of the boat-fishery, no account was taken of it by the officers of the customs or salt duties.

第三，获得吨数奖金的鳙白渔业往往采用载重20吨至80吨的大渔船或甲板船。这种捕鱼方式或许是学自荷兰，但并不适宜于苏格兰。荷兰大陆与鳙白鱼群落所在海域相距很远；所以，经营这种渔业只能使用甲板船，这是出于其可携带充足的水与食料远航的需要。但苏格兰的赫布里迪兹群岛或西部群岛、舍得兰群岛，以及北部海岸与西北部海岸，是鳙白鱼的主要产区，却到处都是伸入陆地的海湾。当地人把海湾称为海湖，且这些海湖为鳙白鱼群落聚集地。由于鳙白鱼（我相信还有其他多种鱼）来游往该聚集区的时间段很不固定，所以小舟渔业，看来最适宜于苏格兰。并且渔人一经捕到鳙白鱼，即运上岸腌存或直接生食。如政府支付每吨30先令奖金，虽然对大船渔业有较大的收益，但必然会损害小舟渔业的进一步发展。这是由于小舟渔业并没有获得奖金，无法同大舟渔业在同等条件下开展腌鱼生产。由此可

知，在大舟渔业前存在很多小舟渔业，此前曾雇用不少海员，而现今这些小渔业却几乎全然倒闭了。对于这些现已凋亡无人问津的小舟渔业，此前究竟具有何等规模，我必须承认没能得到准确的描述。出于小舟渔业此前没得到什么奖励，因即便是关税吏和盐税官都不曾留下什么记录。

Fourthly, In many parts of Scotland, during certain seasons of the year, herrings make no in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food of the common people. A bounty which tended to lower their price in the home market, might contribute a good deal to the relief of a great number of our fellow-subjects, whose circumstances are by no means affluent. But the herring-bus bounty contributes to no such good purpose. It has ruined the boat fishery, which is by far the best adapted for the supply of the home market; and the additional bounty of 2s:8d. the barrel upon exportation, carries the greater part, 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e produce of the buss-fishery abroad. Between thirty and forty years ago,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uss-bounty, 16s. the barrel, I have been assured, was the common price of white herrings. Between ten and fifteen years ago, before the boat-fishery was entirely ruined, the price was said to have run from seventeen to twenty shillings the barrel. For these last five years, it has, at an average, been at twenty-five shillings the barrel. This high price, however, may have been owing to the real scarcity of the herrings upon the coast of Scotland. I must observe, too, that the cask or barrel, which is usually sold with the herrings, and of which the price is included in all the foregoing prices, has, sinc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merican war, risen to about double its former price, or from about 3s. to about 6s. I must likewise observe, that the accounts I have received of the prices of former times, have been by no means quite uniform and consistent, and an old man of great accuracy and

experience has assured me, that, more than fifty years ago, a guinea was the usual price of a barrel of good merchantable herrings; and this, I imagine, may still be looked upon as the average price. All accounts, however, I think, agree that the price has not been lowered in the home market in consequence of the buss-bounty.

第四，在苏格兰许多地区，普通人民在每年某个时节以鳕白鱼为主要食品。由于奖金的减少，国内市场上鳕白鱼价格跌落，这对大多数不优裕本国人民而言，或许是一个很大的救济。但是采用大渔船奖金却无法得到这样好的效果。这是由于最适宜于国内市场的小舟渔业，曾遭到破坏；大渔船所捕鳕白鱼以每桶2先令8便士的附加输出奖金，将2/3以上的渔业产品销往国外。在大渔船奖金尚未采用的30、40年之前，我认为，那时每桶鳕白鱼的价格为16先令。在10至15年之前，小舟渔业尚未完全衰落，相传那时每桶鳕白鱼价格为17先令至20先令。在最近5年间，每桶鳕白鱼平均25先令。这种高价或许归因于苏格兰沿海鳕白鱼短缺。此外，我必须提到，与鳕白鱼同时卖掉的桶（桶价已经包含在上述各种价格内），自美洲战事开始已涨价约一倍，由原先大约3先令涨至大约6先令。另外，我所收集的往期市场价数据，并非完全一致、首尾连续的。有一个精明有阅历的老人曾对我描述到，50多年前，每桶品相良好的商用鳕白鱼为1几尼。我认为现今这个数额仍可看作为平均价格。一切记载都表明，国内市场上鳕白鱼的价格，并未受到大渔船奖金而下降。

When the undertakers of fisheries, after such liberal bounties have been bestowed upon them, continue to sell their commodity at the same, or even at a higher price than they were accustomed to do before, it might be expected that their profits should be very great; and it is not improbable that those of some individuals may have been so. In general, however, I have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ey have been quite otherwise. The usual effect of such bounties is,

to encourage rash undertakers to adventure in a business which they do not understand; and what they lose by their own negligence and ignorance, more than compensates all that they can gain by the utmost liberality of government. In 1750, by the same act which first gave the bounty of 30s. the ton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white herring fishery (the 23d Geo. II. chap. 24), a joint stock company was erected, with a capital of £500,000, to which the subscribers (over and above all other encouragements, the tonnage bounty just now mentioned, the exportation bounty of 2s:8d. the barrel, the delivery of both British and foreign salt duty free) were, during the space of fourteen years, for every hundred pounds which they subscribed and paid into the stock of the society, entitled to three pounds a-year, to be paid by the receiver-general of the customs in equal half-yearly payments. Besides this great company, the residence of whose governor and directors was to be in London, it was declared lawful to erect different fishing chambers in all the different out-ports of the kingdom, provided a sum not less than £10,000 was subscribed into the capital of each, to be managed at its own risk, and for its own profit and loss. The same annuity, and the same encouragements of all kinds, were given to the trade of those inferior chambers as to that of the great company. The subscription of the great company was soon filled up, and several different fishing chambers were erected in the different out-ports of the kingdom. In spite of all these encouragements, almost all those different companies, both great and small, lost either the whole 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capitals; scarce a vestige now remains of any of them, and the white-herring fishery is now entirely, or almost entirely, carried on by private adventurers.

或许有人认为，大船渔业受到丰厚奖金以后，仍按照往常或高些的售价来售卖商品，他们同样可以得到很大的利润。就某些人而言，

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一般说来，我有理由相信情况并非如此。奖金的意义是在于奖励那些草率以及冒险经营的企业家，政府发给的非常丰厚的奖金来弥补他们由于冒失而引起的损失。根据1750年首次颁布了每吨30先令奖励鳕白鱼渔业的法令（乔治二世第二十三年第24号法令），一个资本50万镑合股公司成立。纳资人（除了其他各种奖励，如上述吨数奖金，每桶2先令6便士的输出奖金，盐税一律免纳）需要在14年间，每纳资100镑收取3镑，并由关税征收，每半年支付一半份额。这家大公司的经理及理事都住在伦敦。除这家公司外，政府又宣布在国内各海港设立资本总额大于1万镑的小渔业公司。这些小渔业公司的经营，由经营者自行负责，自己承担亏损，同样可取得年金以及各种奖励。大公司的资本不久就满额了，并且在国内各海港也设立了好几家渔业公司。但是最终，这些无论大小，获得奖励的公司，几乎尽失其资本，如今我们无法找到这种公司的痕迹，鳕白鱼渔业现今几乎全部由私人投机家垄断。

If any particular manufacture was necessary, indeed, for the defence of the society, it might not always be prudent to depend upon our neighbours for the supply; and if such manufacture could not otherwise be supported at home, it might not be unreasonable that all the other branches of industry should be taxed in order to support it. The bounties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British made sail-cloth, and British made gunpowder, may, perhaps, both be vindicated upon this principle.

如果某制造业涉及国防工业，则该制造业依赖邻国，将不明智。如果制造业没有奖金就不能维持，那么依靠其他产业征税，来维持这种制造业，将不合理的。对于英国造的帆布和火药的输出奖金，或许按照这个原理来看，并不合理。

But though it can very seldom be reasonable to tax the industry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in order to support that of some particular class of manufacturers; yet, in the wantonness of great prosperity, when the public enjoys a greater revenue than it knows well what to do with, to give such bounties to favourite manufactures, may, perhaps, be as natural as to incur any other idle expence. In public, as well as in private expences, great wealth, may, perhaps, frequently be admitted as an apology for great folly. But there must surely be something more than ordinary absurdity in continuing such profusion in times of general difficulty and distress.

用对人民的税收来支持个别制造业，是不合理的。然而由于人民创造了很大产值，在大繁荣时期政府对于这一金额并不知道如何利用，因此不足为奇，对于某些制造业，政府会颁给奖金，仿佛无关痛痒也无需在意。金额无论公私，有钱了去铺张或将是愚蠢。但是在穷困时期，还要继续颁发奖金来浪费赋税，将是大错特错了。

What is called a bounty, is sometimes no more than a drawback, and, consequently, is not liable to the same objections as what is properly a bounty. The bounty, for example, upon refined sugar exported, may be considered as a drawback of the duties upon the brown and Muscovado sugars, from which it is made; the bounty upon wrought silk exported, a drawback of the duties upon raw and thrown silk imported; the bounty upon gunpowder exported, a drawback of the duties upon brimstone and saltpetre importe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customs, those allowances only are called drawbacks which are given upon goods exported in the same form in which they are imported. When that form has been so altered by manufacture of any kind as to come under a new denomination, they are called bounties.

某些奖金有时看作为退税，因此和真正的奖金不同。让我们举例说明，精装白砂糖的输出奖金，可以说是对红糖、黑砂糖的退税。精丝纺织品的输出奖金，可以说是对生丝、捻丝的退税。火药的输出奖金，可以说是硫黄硝石的退税。关税术语上讲，退税是那些输出时的商品形态和输入时相同的商品所获得的津贴。一旦输入以后形态由某种制造业经手后改变，其商品名称也就相应更改，纳入新的项目，此时该种津贴应叫做奖金。

Premiums given by the public to artists and manufacturers, who excel in their particular occupations, are not liable to the same objections as bounties. By encouraging extraordinary dexterity and ingenuity, they serve to keep up the emulation of the workmen actually employed in those respective occupations, and are not considerable enough to turn towards any one of them a greater share of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than what would go to it of its own accord. Their tendency is not to overturn the natural balance of employments, but to render the work which is done in each as perfect and complete as possible. The expence of premiums, besides, is very trifling, that of bounties very great. The bounty upon corn alone has sometimes cost the public, in one year, more than £300,000.

社会赋予专家与制造业者的奖金，也不能盖棺定论为奖金。虽然奖金可以用来奖励高超精湛的技能来提升各行业中在职工人的核心竞争力，但是这不能够作为国家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来流入其他行业，以便追求过大比例。此种奖金不能破坏各行业间的平衡，而是促使各行业得以完备。另外，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奖金花费低，但奖金花费高。单就谷物奖金这一种来看，社会每年可达30万镑以上。

Bounties are sometimes called premiums, as drawbacks are sometimes called bounties. But we must, in all cases, attend to the nature of the thing, without paying any regard to the word.

奖金有时被称为津贴，正如有时退税被叫做奖金一样。然而我们应时常注意事物的本质而非名称。

Digression concerning the Corn Trade and Corn Laws.

顺便谈谈谷物贸易与相关条例。

I cannot conclude this chapter concerning bounties, without observing, that the praises which have been bestowed upon the law which establishes the bounty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and upon that system of regulations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it, are altogether unmerited. A particular exa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corn trade, and of the principal British laws which relate to it, will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 the truth of this assertion.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this subject must justify the length of the digression.

人们对谷物输出奖金涉及的相关法律及相关条例规则大为支持。之前我对这种支持的否认还无法促使实现奖金的停发。有关谷物贸易性质及与英国有关的谷物贸易的法律研究，可充分证明我的正确观点，这项探讨将确认我们是否离题太远。

The trade of the corn merchant is composed of four different

branches, which, though they may sometimes be all carried on by the same person, are, in their own nature, four separate and distinct trades. These are, first, the trade of the inland dealer; secondly, that of the merchant-importer for home consumption; thirdly, that of the merchant-exporter of home produce for foreign consumption; and, fourthly, that of the merchant-carrier, or of the importer of corn, in order to export it again.

谷物贸易，有四个不同部门。虽然有时仅由一人单独经营，但是按其根本，实质为独立的四种不同贸易方式：第一，内地贸易；第二，国内消费品贸易；第三，国内生产物供给国外的出口贸易；第四，运输商人的贸易，类似于输入谷物目的在于输出。

I. The interest of the inland dealer, and that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how opposite soever they may at first appear, are, even in years of the greatest scarcity, exactly the same. It is his interest to raise the price of his corn as high as the real scarcity of the season requires, and it can never be his interest to raise it higher. By raising the price, he discourages the consumption, and puts every body more or less, but particularly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upon thrift and good management If, by raising it too high, he discourages the consumption so much that the supply of the season is likely to go beyond the consumption of the season, and to last for some time after the next crop begins to come in, he runs the hazard, not only of losing a considerable part of his corn by natural causes, but of being obliged to sell what remains of it for much less than what he might have had for it several months before. If, by not raising the price high enough, he discourages the consumption so little, that the supply of the season is likely to fall short of the consumption of the season, he not only loses a part of the profit

which he might otherwise have made, but he exposes the people to suffer before the end of the season, instead of the hardships of a dearth, the dreadful horrors of a famine. It is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that their daily, weekly, and monthly consumption should be proportioned as exactly as possible to the supply of the season. The interest of the inland corn dealer is the same. By supplying them, as nearly as he can judge, in this proportion, he is likely to sell all his corn for the highest price, and with the greatest profit; and his knowledge of the state of the crop, and of his daily, weekly, and monthly sales, enables him to judge, with more or less accuracy, how far they really are supplied in this manner. Without intending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he is necessarily led, by a regard to his own interest, to treat them, even in years of scarcity, pretty much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prudent master of a vessel is sometimes obliged to treat his crew. When he foresees that provisions are likely to run short, he puts them upon short allowance. Though from excess of caution he should sometimes do this without any real necessity, yet all the inconveniencies which his crew can thereby suffer are inconsiderable, in comparison of the danger, misery, and ruin, to which they might sometimes be exposed by a less provident conduct. Though, from excess of avarice, in the same manner, the inland corn merchant should sometimes raise the price of his corn somewhat higher than the scarcity of the season requires, yet all the inconveniencies which the people can suffer from this conduct, which effectually secures them from a famine in the end of the season, are inconsiderable, in comparison of what they might have been exposed to by a more liberal way of dealing in the beginning of it the corn merchant himself is likely to suffer the most by this excess of avarice; not only from the indignation which it generally excites against him, but, though he should escape the effects of this indignation, from the quantity of corn which it necessarily leaves upon his hands in the end of the season, and

which, if the next season happens to prove favourable, he must always sell for a much lower price than he might otherwise have had.

第一，内地商人的利益，起初无论怎样与人民的利益相背，但实际上，即使是歉收季节，二者也完全一致。他的利益是按照真实歉收，提高谷物价格到正常的程度，一旦超过限度，就会对他不利。提高价格会抑制消费，使人民尤其是下等，多少要节省食粮。一旦超过限度，就会很大程度抑制消费，最终一季度的供需超过消费，一直等到下次产品上市，上次的还有剩余。则谷物，不仅会遭受很大损失，而且剩余部分将不得以用低价抛售。一旦涨价不够，则不会抑制消费，最终一季度的供给小于消费，内地商人不仅会损失他的利润，而且人民在换季过程中会面临饥荒的威胁。从人民的利益来考虑，他们每天、每星期、每月份的支出，应尽可能与该季度供给产出相匹配，得以保持相应的比例。从内地商人的利益出发，同样如此。他靠经验确定比例，供给人民谷物，售价越高，利润可能越大。对于收获情况如何，即日、周、月营业额，他是了如指掌的。这种阅历，使他或多或少清醒地了解人民实际上的供给，其赚取利润的比例差大小。我们假定，他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及民众，那么他会打算，在歉收季节像船长有时对待海员的办法来对待人民，换句话说，当他预见到粮食即将短缺时，叫他们节食。虽然，船长顾虑太多时有发生，在不必要的时候节食，会使他们面对困难。但是这种困难的预测机制，和船长不谨慎所带来的饥荒比起来，算不得什么。同样来看，内地商人贪婪地把谷物价格提高到超出某歉收季度的价格，人民虽然感受到该季度的困难，但是和他们的该季度末的饥荒比起来并不算什么。与此反馈的是，谷物商人自身会因这种过度贪婪而深受其害；这不仅因为人民会憎恨他，并且他即使能够避免被责怪，也不能避免季末留下的谷物剩余，若下一季度丰收，剩余谷物必远远低于售价。

Were it possible, indeed, for one great company of merchants

to possess themselves of the whole crop of an extensive country, it might perhaps be their interest to deal with it, as the Dutch are said to do with the spiceries of the Moluccas, to destroy or throw away a considerable part of it, in order to keep up the price of the rest. But it is scarce possible, even by the violence of law, to establish such an extensive monopoly with regard to corn; and wherever the law leaves the trade free, it is of all commodities the least liable to be engrossed or monopolized by the forced a few large capitals, which buy up the greater part of it. Not only its value far exceeds what the capitals of a few private men are capable of purchasing; but, supposing they were capable of purchasing it, the manner in which it is produced renders this purchase altogether impracticable. As, in every civilised country, it is the commodity of which the annual consumption is the greatest; so a greater quantity of industry is annually employed in producing corn than in producing any other commodity. When it first comes from the ground, too, it is necessarily divided among a greater number of owners than any other commodity; and these owners can never be collected into one place, like a number of independent manufacturers, but are necessarily scattered through all the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country. These first owners either immediately supply the consumers in their own neighbourhood, or they supply other inland dealers, who supply those consumers. The inland dealers in corn, therefore, including both the farmer and the baker, are necessarily more numerous than the dealers in any other commodity; and their dispersed situation renders it altogether impossible for them to enter into any general combination. If, in a year of scarcity, therefore, any of them should find that he had a good deal more corn upon hand than, at the current price, he could hope to dispose of before the end of the season, he would never think of keeping up this price to his own loss, and to the sole benefit of his rivals and competitors, but would immediately lower it, in order to get rid of

his corn before the new crop began to come in. The same motives, the same interests, which would thus regulate the conduct of any one dealer, would regulate that of every other, and oblige them all in general to sell their corn at the price which, according to the best of their judgment, was most suitable to the scarcity or plenty of the season.

如果一个大国的全部产品由一大群商人占有，那么从他们自身考虑，也许会像荷兰人处置马鲁古群岛的香料那样，为了提高部分产品价格，把大部分毁掉或遗弃。但对谷物有这样的垄断，即使是借助法律也不容易实现；另外，在贸易自由的地方，最不易为被少数大资本势力垄断的就是谷物。一国收获的全部谷物太多，少数私人的资本是不能垄断的；即使有垄断能力，按照其生产方法也全然不能实现。任何国家都将谷物作为年消费额最大的商品。因此，一个国家每年用以生产的谷物必大于其他物品。在谷物收获出来后，其必在很多中间商中分配。这种中间商，决不像许多独立制造者一样集居。他们必散居国内各处。生产者生产的粮食，或直接供给邻近地域的消费者，或直接供给内地商人而最终间接供给消费者。内地谷物商人，包括农业者和面师，其人员总数必多于其他商品的商人，且散居各处。在歉收季节，如果一个商人发现按市价不能在季末售空谷物，那么他就不会保持价格，使自己蒙受损失而利于竞争者。因此他会立即减价，希望在新季度前，抛售他的谷物。主导商人行为的动机及利害关系，又会影响其他商人，促使他们都根据他们的判断，按照该季度最合适的价格来兜售谷物。

Whoever examines, with attention, the history of the dearths and famines which have afflicted any part of Europe during either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or that of the two preceding centuries, of several of which we have pretty exact accounts, will find, I believe, that a dearth never has arisen from any combination among the

inland dealers in corn, nor from any other cause but a real scarcity, occasioned sometimes, perhaps, and in some particular places, by the waste of war, but in by far the greatest number of cases by the fault of the seasons; and that a famine has never arisen from any other cause but the violence of government attempting, by improper means, to remedy the inconveniencies of a dearth.

对于本世纪及此前两世纪欧洲各处供粮不足与闹饥荒的情况，部分记载很可信。仔细研究就能够发现，粮食不足，并非是内地谷物商人的联合垄断，除了某些场合战争的浪费，而在最大多数情况下，限制于年成的不好。另外，闹饥荒的原因，也仅仅是政府粗暴地以不适当手段来克服粮食不足所使用的手段。

In an extensive corn country, between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which there is a free commerce and communication, the scarcity occasioned by the most unfavourable seasons can never be so great as to produce a famine; and the scantiest crop, if managed with frugality and economy, will maintain, through the year, the same number of people that are commonly fed in a more affluent manner by one of moderate plenty. The seasons most unfavourable to the crop are those of excessive drought or excessive rain. But as corn grows equally upon high and low lands, upon grounds that are disposed to be too wet, and upon those that are disposed to be too dry, either the drought or the rain, which is hurtful to one part of the country, is favourable to another; and though, both in the wet and in the dry season, the crop is a good deal less than in one more properly tempered; yet, in both, what is lost in one part of the country is in some measure compensated by what is gained in the other. In rice countries, where the crop not only requires a very moist soil, but where, in a certain period of its growing, it must be

laid under water, the effects of a drought are much more dismal. Even in such countries, however, the drought is, perhaps, scarce ever so universal as necessarily to occasion a famine, if the government would allow a free trade. The drought in Bengal, a few years ago, might probably have occasioned a very great dearth. Some improper regulations, some injudicious restraints, imposed by the serva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upon the rice trade, contributed, perhaps, to turn that dearth into a famine.

在自由通商和交通的广大产粮国，即便是最不好的年成也不会产生大范围供粮不足的饥荒。如果合理节省，即使最歉收的年度，也可在比丰年度略为拮据的情况下维持人民一年基本的生活。最不好的年成，往往干旱和雨涝。但是基于栽种麦田不受地域高低，泥土潮湿干燥所限，因此，洪涝情况不会影响高地，干旱状况也不影响低地。在干旱与多雨的季节，收获都比风调雨顺的季节明显减少，但无论干旱还是雨涝，国内的一部分损失，会从另一部分得到补偿。对水稻作物国家，不仅需要土壤潮湿，而且在其生长期内，还须浸在水里，所以干旱的对其有较大影响。然而，这样的国家里干旱也不会那么普遍，就造成必然的饥荒，只要政府允许自由贸易就可以避免。数年前，孟加拉大旱，或许粮食不足会转为饥谨，但是主要问题在于东印度公司，曾颁布不适当的条例，干涉了大米的正常贸易。

When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remedy the inconveniencies of a dearth, orders all the dealers to sell their corn at what it supposes a reasonable price, it either hinders them from bringing it to market, which may sometimes produce a famine eve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eason; or, if they bring it thither, it enables the people, and thereby encourages them to consume it so fast as must necessarily produce a famine before the end of the season. The unlimited, unrestrained freedom of the corn trade, as it is the only

effectual preventive of the miseries of a famine, so it is the best palliative of the inconveniencies of a dearth; for the inconveniencies of a real scarcity cannot be remedied; they can only be palliated. No trade deserves more the full protection of the law, and no trade requires it so much; because no trade is so much exposed to popular odium.

一旦政府要救济粮食不足，靠下达命令让商人合理均价来售卖谷物，其结果要么是商人拒绝谷物售卖，以致在季初闹饥荒，要么是（商人以谷物提供市场为前提）人民迅速消费，最终在季末闹饥荒。无拘束的自由谷物贸易是防止饥荒的唯一有效方法。这是因为，真正的粮食不足，是不能回避而只能缓解的。再没有任何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值得法律的保护，也再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需要，这是由于，再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容易引起人民的抵触。

In years of scarcity,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impute their distress to the avarice of the corn merchant, who becomes the object of their hatred and indignation. Instead of making profit upon such occasions, therefore, he is often in danger of being utterly ruined, and of having his magazines plundered and destroyed by their violence. It is in years of scarcity, however, when prices are high, that the corn merchant expects to make his principal profit. He is generally in contract with some farmers to furnish him,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years, with a certain quantity of corn, at a certain price. This contract price is settled according to what is supposed to be the moderate and reasonable, that is, the ordinary or average price, which, before the late years of scarcity, was commonly about 28s. for the quarter of wheat, and for that of other grain in proportion. In years of scarcity, therefore, the corn merchant buys a great part of his corn for the ordinary price, and

sells it for a much higher. That this extraordinary profit, however, is no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put his trade upon a fair level with other trades, and to compensate the many losses which he sustains upon other occasions, both from the perishable nature of the commodity itself, and from the frequent and unforeseen fluctuations of its price, seems evident enough, from this single circumstance, that great fortunes are as seldom made in this as in any other trade. The popular odium, however, which attends it in years of scarcity, the only years in which it can be very profitable, renders people of character and fortune averse to enter into it. It is abandoned to an inferior set of dealers; and millers, bakers, meal-men, and meal-factors, together with a number of wretched hucksters, are almost the only middle people that, in the home market, come between the grower and the consumer.

在歉收季节，人民往往把他们的穷困归因于商人的贪婪。因此谷物商人，成为他们仇恨的导火线。此种情况下，谷物商人不但无钱可赚，并且常有破产，其仓库也有被民众掠夺的风险。但是谷物商人赚取大利润的时候，也正是歉收季节。他通常与农业者契约，一定年限内以某种价格，供给定量的谷物，其契约价格，被认为是合理的，即按照均价制定的。在歉收年份以前，小麦约每夸特28先令；其他各种谷物每夸特售价以此为准。所以，谷物商人得在歉收季节以普通价格购买并以高价格售卖。这是一种高利润，但这也只够使他的行业与其他行业平等而已，只够补偿在其他场合，由商品的变质或价格意外波动而产生的损失。这种情形只要看看谷物生意对比其他生意，就会明白。他只能在歉收季节获取大利润，因此惹人们的反感。因此，稍有地位财产的人，多不愿加入此种行业。这种行业往往是一群下流商人经营；国内市场介于生产者及消费者中间，只有磨坊主，面包房主，制粉商，面粉经售人，以及部分困苦小贩了。

The ancient policy of Europe, instead of discountenancing this popular odium against a trade so beneficial to the public, seems, on the contrary, to have authorised and encouraged it.

欧洲当时的政策，对于这样有利于社会的行业不但不消除人们对其的反感，似乎反而认为人们的反感有理，并加以鼓励。

By the 5th and 6th of Edward VI cap. 14, it was enacted, that whoever should buy any corn or grain, with intent to sell it again, should be reputed an unlawful engrosser, and should, for the first fault, suffer two months imprisonment, and forfeit the value of the corn; for the second, suffer six months imprisonment, and forfeit double the value; and, for the third, be set in the pillory, suffer imprisonment during the king's pleasure, and forfeit all his goods and chattels. The ancient policy of most other parts of Europe was no better than that of England.

爱德华六世第五至第六年14号法令规定，凡购买谷物再拿来售卖的人视为垄断者，初犯，处以二个月监禁，处罚谷物价值相当的财款；重犯，处以六个月监禁，处罚谷物价值2倍相当的财款；再犯，处以枷刑，监禁长短由国王决定，并没收其全部动产。欧洲其他大多数地方政策，和英国相同。

Our ancestors seem to have imagined, that the people would buy their corn cheaper of the farmer than of the corn merchant, who, they were afraid, would require, over and above the price which he paid to the farmer, an exorbitant profit to himself. They endeavoured, therefore, to annihilate his trade altogether. They

even endeavoured to hinder, as much as possible, any middle man of any kind from coming in between the grower and the consumer; and this was the meaning of the many restraints which they imposed upon the trade of those whom they called kidders, or carriers of corn; a trade which nobody was allowed to exercise without a licence, ascertaining his qualifications as a man of probity and fair dealing. The authority of three justices of the peace was, by the statute of Edward VI. necessary in order to grant this licence. But even this restraint was afterwards thought insufficient, and, by a statute of Elizabeth, the privilege of granting it was confined to the quarter-sessions.

我们的祖先似乎认为，人们向农民直接购买谷物，比向谷物商人间接购买的便宜，这是因为他们害怕谷物商人剥削农民并且带来异常的利润。所以，他们企图完全消灭他的行业。甚至企图尽可能防止任何中间人的出现。他们对谷物商或谷物运送者经营施加了许多约束。那时没有证明诚实公正的特许状是不许经营的。依据爱德华六世的法令，若得不到三个治安人员共同认可，就无法拿到特许状。然而这样的限制被认为仍远远不够，所以后来伊丽莎白的推出一个法令，要求有权颁发此种特许状的机构为只有一年四次开庭的法庭。

The ancient policy of Europe endeavoured, in this manner, to regulate agriculture, the great trade of the country, by maxim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which it established with regard to manufactures, the great trade of the towns. By leaving a farmer no other customers but either the consumers or their immediate factors, the kidders and carriers of corn, it endeavoured to force him to exercise the trade, not only of a farmer, but of a corn merchant, or corn retailer. On the contrary, it, in many cases, prohibited the manufacturer from exercising the trade of a

shopkeeper, or from selling his own goods by retail. It meant, by the one law, to promote the general interest of the country, or to render corn cheap, without, perhaps, its being well understood how this was to be done. By the other, it meant to promote that of a particular order of men, the shopkeepers, who would be so much undersold by the manufacturer, it was supposed, that their trade would be ruined, if he was allowed to retail at all. The manufacturer, however, though he had been allowed to keep a shop, and to sell his own goods by retail, could not have undersold the common shopkeeper. Whatever part of his capital he might have placed in his shop, he must have withdrawn it from his manufacture. In order to carry on his business on a level with that of other people, as he must have had the profit of a manufacturer on the one part, so he must have had that of a shopkeeper upon the other. Let us suppose, for example, that in the particular town where he lived, ten per cent. was the ordinary profit both of manufacturing and shopkeeping stock; he must in this case have charged upon every piece of his own goods, which he sold in his shop, a profit of twenty per cent. When he carried them from his workhouse to his shop, he must have valued them at the price for which he could have sold them to a dealer or shopkeeper, who would have bought them by wholesale. If he valued them lower, he lost a part of the profit of his manufacturing capital. When, again, he sold them from his shop, unless he got the same price at which a shopkeeper would have sold them, he lost a part of the profit of his shopkeeping capital. Though he might appear, therefore, to make a double profit upon the same piece of goods, yet, as these goods made successively a part of two distinct capitals, he made but a single profit upon the whole capital employed about them; and if he made less than his profit, he was a loser, and did not employ his whole capital with the same advantage as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neighbours.

欧洲想按照古代的方式的管理农村最大产业即农业，而管理的原则与城市最大产业制造业的原则截然不同。这种政策使农民除了消费者、谷物经销商，即谷商及运粮人以外，不能有其他买主，因而强迫他们不止当农民，还要兼职批发商及零售商。与此相反的是，制造业方面，按照欧洲古代的政策，却在许多情况下禁止制造者开店零售。前一种法律要促进国家的普遍利益，使谷价走低，但人们也许不了解操作巨细。后一种法律要促进零售店老板的利益，当时人们认为零售老板将受制造业者所影响，若允许制造业者零售，就会造成其破败。即使当时允许制造业者开店零售，然而制造业者仍不会把货物卖得比零售老板还低廉。不管零售资本是大是小，但是它根源是从制造业中得到的价值。他与其他零售者处于同等层次经营业务，也就必然要求得到和零售老板的相同利润，正如制造业者同样要获利一样。假使他所居住的城里，制造业和零售业的利润都是10%，那么在制造者开店零售时，在店铺中每售去一件货物取利润20%。当他从工厂搬运货物至店铺时，他对货物的估价，也必然是零售店的批发价格。若估价过低，则失去了部分制造业的利润。当货物在零售时，若售价低于其他店售价，那他也同样失去了一部分零售利润。因此，对于同一件货物，该老板虽似乎取得了双份的利润，但是由于货物曾先后充作两个不同的资本来运作，所以，对于他投下的资本，和他最终收获的，其实只是单一利润。若他所得利润与同行相比少，他是在损失，即他所投入的资本与没能得到同行相同的利益。

What the manufacturer was prohibited to do, the farmer was in some measure enjoined to do; to divide his capital between two different employments; to keep one part of it in his granaries and stack-yard, for supplying the occasional demands of the market, and to employ the other in the cultivation of his land. But as he could not afford to employ the latter for less than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farming stock, so he could as little afford to employ the former for less than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mercantile stock. Whether the stock

which really carried on the business of a corn merchant belonged to the person who was called a farmer, or to the person who was called a corn merchant, an equal profit was in both cases requisite, in order to indemnify its owner for employing it in this manner, in order to put his business on a level with other trades, and in order to hinder him from having an interest to change it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some other. The farmer, therefore, who was thus forced to exercise the trade of a corn merchant, could not afford to sell his corn cheaper than any other corn merchant would have been obliged to do in the case of a free competition.

有些事业，不允许制造业者从事，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农业者经营，即将农业者的资本分别投入两种不同用途，即将部分资本投入谷仓及干草场，以供应市场不时之需，其余资本用于耕作土地。但投用于耕作土地所得的利润不能少于农业资本的普通利润，因此，投入前种用途所得的利润同样不能少于商业资本的普通利润。实际上经营谷物生意的资本，无论属于所谓的农业者还是属于所谓的谷物商人，都应产生相同的利润，以补偿如此投资的资本持有者，使他的职业与其他职业地位相当，以免他更换职业。因此，被迫兼营谷物商业的农业者，绝不能将谷物的售价降低到任何其他谷物商人在自由竞争场合不得不出售的价格之下。

The dealer who can employ his whole stock in one single branch of business, has an advantage of the same kind with the workman who can employ his whole labour in one single operation. As the latter acquires a dexterity which enables him, with the same two hands, to perform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work, so the former acquires so easy and ready a method of transacting his business, of buying and disposing of his goods, that with the same capital he can transact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business. As the

one can commonly afford his work a good deal cheaper, so the other can commonly afford his goods somewhat cheaper, than if his stock and attention were both employed about a greater variety of objects. The greater part of manufacturers could not afford to retail their own goods so cheap as a vigilant and active shopkeeper, whose sole business it was to buy them by wholesale and to retail them again. The greater part of farmers could still less afford to retail their own corn, to supply the inhabitants of a town, at perhaps four or five miles distance from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so cheap as a vigilant and active corn merchant, whose sole business it was to purchase corn by wholesale, to collect it into a great magazine, and to retail it again.

将全部资本投入单一行业，是对商人有利的，正如将全部劳动用于单一操作，对劳动者有利一样。劳动者可因此掌握一种技巧，使得他以同样的双手完成比他人多得多的工作；同样，商人也会掌握一种简便的买卖商品的方法，可以等量资本，经营比他人多得多的业务。通常而言，劳动者可因此以低廉得多的价格提供产品；而商人亦可因此以同样低廉的价格，提供商品，其价格比将资本和精力用与各类商品时更为低廉。大部分制造业者，都不能以同机警而活跃的小商人一样的价格出售商品，后者唯一的业务就是批发购买再零售商品。大部分农业者更不能以同像机警且活跃的谷物商人一样的低价，将谷物零售给距其四五英里城市的居民，谷物商人唯一业务就是批发购入谷物，存入大谷仓，再进行零售。

The law which prohibited the manufacturer from exercising the trade of a shopkeeper, endeavoured to force this division in the employment of stock to go on faster than it might otherwise have done. The law which obliged the farmer to exercise the trade of a corn merchant, endeavoured to hinder it from going on so fast. Both

laws were evident violations of natural liberty, and therefore unjust; and they were both, too, as impolitic as they were unjust. It is the interest of every society, that things of this kind should never either he forced or obstructed. The man who employs either his labour or his stock in a greater variety of ways than his situation renders necessary, can never hurt his neighbour by underselling him. He may hurt himself, and he generally does so. Jack-of-all-trades will never be rich, says the proverb. But the law ought always to trust people with the care of their own interest, as in their local situations they must generally be able to judge better of it than the legislature can do. The law, however, which obliged the farmer to exercise the trade of a corn merchant was by far the most pernicious of the two.

禁止制造者兼营小生意的法律，力求迫使资本用途的划分相比没有此等法律时更快进行。强迫农业者兼营谷物生意的法律，却妨碍这种划分的进行。显然，这两种法律都侵犯了天赋自由，因此都不正当又是失策。出于任何社会的利益，资本用途划分这等事情都不应强制，亦不应妨碍。以劳动或资本兼营不必要经营行业者，必不会以较邻者更低的价格出售货物，因此不会伤害邻者。或许，他会伤害自己，事实也大体如此。有句谚语，即从事全部生意者不会富裕。法律应该让人民自己关注各自利益。人民必定比立法者更了解自身利益，因其身处其自身境遇。然而，这二种法律最有害的则是强迫农民兼营谷物生意的法律。

It obstructed not only that division in the employment of stock which is so advantageous to every society, but it obstructed likewise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e land. By obliging the farmer to carry on two trades instead of one, it forced him to divide his capital into two parts, of which one only could be employed in

cultivation. But if he had been at liberty to sell his whole crop to a corn merchant as fast as he could thresh it out, his whole capital might have returned immediately to the land, and have been employed in buying more cattle, and hiring more servants, in order to improve and cultivate it better. But by being obliged to sell his corn by retail, he was obliged to keep a great part of his capital in his granaries and stack-yard through the year, and could not therefore cultivate so well as with the same capital he might otherwise have done. This law, therefore, necessarily obstruct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and, and, instead of tending to render corn cheaper, must have tended to render it scarcer, and therefore dearer, than it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该法律不仅妨碍了大大有利于社会的资本用途划分，且同样妨碍土地改良与耕作。它迫使农业者无法专心经营一项事业，而兼营二种事业，等于强迫农业者将资本一分为二，仅将一部分投入耕作事业。但他的全部农作物一经收获，就可以自由地向谷物商人出售，他的全部资本就会立即回到土地，用以购买更多耕牛，雇用更多佣工，以此更好地改良和耕作土地。若强迫他零售自己的谷物，他就只得将大部分资本滞留于谷仓或干草场中，无法同没有该法律时一样，将全部资本用于耕作土地。因此，此种法律必将妨碍土地改良，不但不能使谷物价格下降，反而会减少谷物产量，导致谷物价格上涨。

After the business of the farmer, that of the corn merchant is in reality the trade which, if properly protected and encouraged, would contribute the most to the raising of corn. It would support the trade of the farmer,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trade of the wholesale dealer supports that of the manufacturer.

最有利于谷物栽种的，除农业者业务之外，当属享有适当保护及奖励的谷物商人业务。正如批发商人的业务有助于制造业者的业务，谷物商人的业务亦有助于农业者的业务。

The wholesale dealer, by affording a ready market to the manufacturer, by taking his goods off his hand as fast as he can make them, and by sometimes even advancing their price to him before he has made them, enables him to keep his whole capital, and sometimes even more than his whole capital, constantly employed in manufacturing, and consequently to manufacture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goods than if he was obliged to dispose of them himself to the immediate consumers, or even to the retailers. As the capital of the wholesale merchant, too, is generally sufficient to replace that of many manufacturers, this intercourse between him and them interests the owner of a large capital to support the owners of a great number of small ones, and to assist them in those losses and misfortunes which might otherwise prove ruinous to them.

批发商人向制造者提供快销市场，在商品制造完成后立即出手，有时，在商品尚未制成前就预付货物价格，使得制造业者可将全部资本，甚至比其全部资本更多的资本不断投入制造业，使他制成的商品，比将商品出售给直接消费者甚至零售商人时多得多。由于批发商人的资本通常足以补偿许多制造业者的资本，因此他们之间的这种来往，使得大资本所有者，愿意为利润而支持许多小额资本所有者，并在他们遭受损失与不幸，面临破产危险时援助他们。

An intercourse of the same kind universally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farmers and the corn merchants, would be attended

with effects equally beneficial to the farmers. They would be enabled to keep their whole capitals, and even more than their whole capitals constantly employed in cultivation. In case of any of those accidents to which no trade is more liable than theirs, they would find in their ordinary customer, the wealthy corn merchant, a person who had both an interest to support them, and the ability to do it; and they would not, as at present, be entirely dependent upon the forbearance of their landlord, or the mercy of his steward. Were it possible, as perhaps it is not, to establish this intercourse universally, and all at once; were it possible to turn all at once the whole farming stock of the kingdom to its proper business, the cultivation of land, withdrawing it from every other employment into which any part of it may be at present diverted; and were it possible, in order to support and assist, upon occasion, the operations of this great stock, to provide all at once another stock almost equally great; it is not, perhaps, very easy to imagine how great, how extensive, and how sudden, would be the improvement which this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would alone produce upon the whole face of the country.

若农业者和谷物商人之间得以普遍建立同种来往，则其结果必同样有利于农业者。农业者因此能以其全部资本，甚至多于全部资本的资本，不断投入耕作事业。农业者这种职业比其他任何职业都更易于遭受各种意外，但通过这种来往，无论遭逢何种意外，他们都能发现，他们的常客，即富裕的谷物商人，愿意且能够支持他们。如此，他们就不必完全依赖地主的宽容及管家的怜悯，像目前那样。虽然恐怕并不可能，但若能立即普遍建立此种往来；若能立即将国家全部农业资本集中到合适的用途，即土地耕作事业；若在必要时，为使大额资本发挥作用，立即提供另一份几乎同规模的资本，则可能就很难想象，仅靠这种情况的变动，就会对国内全部土地产生如何深刻、广泛和快速的改良。

The statute of Edward VI. therefore, by prohibiting as much as possible any middle man from coming in between the grower and the consumer, endeavoured to annihilate a trade, of which the free exercise is not only the best palliative of the inconveniencies of a dearth, but the best preventive of that calamity; after the trade of the farmer, no trade contributing so much to the growing of corn as that of the corn merchant.

因此，爱德华六世的法令尽量禁止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任何中间人，尽力消灭一种贸易。若这种贸易能够自由进行，就不仅是减轻粮食短缺之痛的最佳方法，而且是预防此等灾祸的最佳方法。除农业者业务之外，最有利于谷物生产的，便是谷物商人的业务。

The rigour of this law was afterwards softened by several subsequent statutes, which successively permitted the engrossing of corn when the price of wheat should not exceed 20s. and 24s. 32s. and 40s. the quarter. At last, by the 15th of Charles II. c.7, the engrossing or buying of corn, in order to sell it again, as long as the price of wheat did not exceed 48s. the quarter, and that of other grain in proportion, was declared lawful to all persons not being forestallers, that is, not selling again in the same market within three months. All the freedom which the trade of the inland corn dealer has ever yet enjoyed was bestowed upon it by this statute. The statute of the twelfth of the present king, which repeals almost all the other ancient laws against engrossers and forestallers, does not repeal the restrictions of this particular statute, which therefore still continue in force.

该法律之严峻，因后续的数个法规而有所缓和。后续法规先后允许在小麦价格不超过每夸特20先令、24先令、32先令或40先令的前提下囤积谷物。最后，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第7号法令规定，若小麦价格不超过每夸特48先令（其他谷物价格以此为准），只要不是垄断者或购买谷物后三个月内就在同一市场再次出售者，则囤积谷物或购买谷物以待出售，都属合法。该法令赋予了内地谷物商人曾享受的贸易自由。乔治三世第十二年的法令几乎废止了其他一切取缔囤积及垄断的古代法令，但并未废除查理二世第十五年法令所设的限制，因此该限制仍然有效。

This statute, however, authorises in some measure two very absurd popular prejudices.

但是该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授权了两种极不合理却广为流传的偏见。

First, It supposes, that when the price of wheat has risen so high as 48s. the quarter, and that of other grain in proportion, corn is likely to be so engrossed as to hurt the people. But, from what has been already said, it seems evident enough, that corn can at no price be so engrossed by the inland dealers as to hurt the people; and 48s. the quarter, besides, though it may be considered as a very high price, yet, in years of scarcity, it is a price which frequently takes place immediately after harvest, when scarce any part of the new crop can be sold off, and when it is impossible even for ignorance to suppose that any part of it can be so engrossed as to hurt the people.

第一，该法令认为，若小麦价格上涨至每夸特48先令，其他各类谷物也应该相应地涨价，则囤积谷物就很可能伤害人民。但据上文所述，似乎很明显，内地谷物商人的囤积无论价格如何，都不足以伤害人民，且虽然可将48先令视为很高的价格，但在歉收季节，该价格往往是收获之后的即时价格，此时新谷物尚不可出售，甚至无知者都不会认为囤积任何部分的新谷物会伤害人民。

Secondly, It supposes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price at which corn is likely to be forestalled, that is, bought up in order to be sold again soon after in the same market, so as to hurt the people. But if a merchant ever buys up corn, either going to a particular market, or in a particular market, in order to sell it again soon after in the same market, it must be because he judges that the market cannot be so liberally supplied through the whole season as upon that particular occasion, and that the price, therefore, must soon rise. If he judges wrong in this, and if the price does not rise, he not only loses the whole profit of the stock which he employs in this manner, but a part of the stock itself, by the expence and loss which necessarily attend the storing and keeping of corn. He hurts himself, therefore, much more essentially than he can hurt even the particular people whom he may hinder from supplying themselves upon that particular market day, because they may afterwards supply themselves just as cheap upon any other market day. If he judges right, instead of hurting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he renders them a most important service. By making them feel the inconveniencies of a dearth somewhat earlier than they otherwise might do, he prevents their feeling them afterwards so severely as they certainly would do, if the cheapness of price encouraged them to consume faster than suited the real scarcity of the season. When the scarcity is real, the best thing that can be done for the people is, to divide the inconvenience of it as equally as possible, through all

the different months and weeks and days of the year. The interest of the corn merchant makes him study to do this as exactly as he can; and as no other person can have either the same interest, or the same knowledge, or the same abilities, to do it so exactly as he, this most important operation of commerce ought to be trusted entirely to him; or, in other words, the corn trade, so far at least as concerns the supply of the home market, ought to be left perfectly free.

第二，该法令认为，谷物在某价格下最易于被人垄断，即被人囤积，在不久后在同一市场再次出售，导致人民受到伤害。然而，若商人前往某一市场或在某一市场内收购全部谷物，以期不久后在同一市场再次出售，就必是因为他判断该市场不可能在整个季节都有当时那般充足的供给，因此谷物价格不久即将上涨。但若他判断失误，价格并未上涨，他就不仅会失去如此投资的全部利润，且因为储藏谷物承担费用而必然遭受损失。因此，如此投资必将损失一部分资本。如此，他自身受到的损害必然多于个别人民可能受到的损害。当然，由于囤积，在某一集日，个别人民可能得不到供给，但在此后任何集日，人民却可以同其他集日一样低廉的价格得到供给。若他判断正确，他就不仅不会伤害广大人民，反将对他们大有帮助，使他们提前察觉粮食不足之苦，不至于以后的痛苦过于沉重。若目前的低廉价格使他们不顾该季节的实际不足情况而更快地消费，日后他们必将承受沉重的乏粮之苦。若粮食的确不足，则对人民来说，最好尽可能将这种痛苦平均分配到一年各月、各星期甚至各日。谷物商人的利益使他尽可能准确地判断。任何其他人都没有相同的利益，也缺乏相同的知识，更缺乏这种能力准确判断。因此，此最重要的商业活动应全然信任他。换言之，至少谷物贸易在国内市场的供给应当完全自由。

The popular fear of engrossing and forestalling may be compared to the popular terrors and suspicions of witchcraft. The unfortunate wretches accused of this latter crime were not more

innocent of the misfortunes imputed to them, than those who have been accused of the former. The law which put an end to all prosecutions against witchcraft, which put it out of any man's power to gratify his own malice by accusing his neighbour of that imaginary crime, seems effectually to have put an end to those fears and suspicions, by taking away the great cause which encouraged and supported them. The law which would restore entire freedom to the inland trade of corn, would probably prove as effectual to put an end to the popular fears of engrossing and forestalling.

人们对囤积与垄断的普遍恐惧，恰似对巫术的广泛恐惧与疑惑。因巫术而被指控的不幸者，与因囤积和垄断而被指控的人，同样无罪。法律不再受理对巫术的指控，使人们不能因自己的恶意，而以这种想象的罪名控告邻者，似乎通过消除加剧并支持这种恐惧与疑惑的最大原因，有效地打消了这种恐惧与疑惑。同样，使内地谷物贸易完全恢复自由的法律，或许也有效地打消了人们对囤积与垄断的普遍恐惧。

The 15th of Charles II. c. 7, however, with all its imperfections, has, perhaps, contributed more, both to the plentiful supply of the home market, and to the increase of tillage, than any other law in the statute book. It is from this law that the inland corn trade has derived all the liberty and protection which it has ever yet enjoyed; and both the supply of the home market and the interest of tillage are much more effectually promoted by the inland, than either by the importation or exportation trade.

内地谷物贸易过去享受了很多自由和保护，这得益于查理二世十五年颁布的第7号法令。这项法令与法典中其他的法律相比有很多不

足，但是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增进耕作同时使得国内供给充足。自给自足的国内贸易，也就是国内自产自销的贸易方式比进出口贸易更能够促进耕作，增加供给。

The proportion of the average quantity of all sorts of grain imported into Great Britain to that of all sorts of grain consumed, it has been computed by the author of the Tracts upon the Corn Trade, does not exceed that of one to five hundred and seventy. For supplying the home market,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land trade must be to that of the importation trade as five hundred and seventy to one.

那位论述谷物贸易作者计算得出，大不列颠每年平均进口的各种谷物量与每年平均消费的各种谷物量的比例是1：570。这样看来，在供给方面，国内自产自销比进口贸易重要得多，其比例正是570：1。

The average quantity of all sorts of grain exported from Great Britain does not, according to the same author, exceed the one-and-thirtieth part of the annual produce.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tillage, therefore, by providing a market for the home produce,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land trade must be to that of the exportation trade as thirty to one.

他还计算出大不列颠每年谷物年产额的1/30用于出口，由此可以得出，在增进耕作方面，国内自产自销比出口贸易更有作用，其重要程度是出口贸易的30倍。

I have no great faith in political arithmetic, and I mean not to warrant the exactness of either of these computations. I mention them only in order to show of how much less consequence, in the opinion of the most judicious and experienced persons, the foreign trade of corn is than the home trade. The great cheapness of corn in the years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ounty may, perhaps with reason, he ascribed in some measure to the operation of this statute of Charles II. which had been enacted about five-and-twenty years before, and which had, therefore, full time to produce its effect.

我之所以引用该学者的计算作为例证并不是因为我相信政治算术，也不是想要他的正确性，而是要说明对思虑周全且经验丰富之人而言，将谷物投入与国内贸易比将其倾注与进出口贸易要划算的多。在设立奖金之前那几年，或许谷物价格大跌是有原因的，但有一部分原因是查理二世那项法令的作用。这项法令诞生于约25年前，这段时间足够酝酿出这样的结果。

A very few words will sufficiently explain all that I have to say concerning the other three branches of the corn trade.

其他三种谷物贸易部门就可以一言概括。

II. The trade of the merchant-importer of foreign corn for home consumption, evidently contributes to the immediate supply of the home market, and must so far be immediately beneficial to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It tends, indeed, to lower somewhat the average money price of corn, but not to diminish its real value, or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it is capable of maintaining. If importation was at all times free, our farmers and country gentlemen would probably, one year with another, get less money for their corn than they do at present, when importation is at most times in effect prohibited; but the money which they got would be of more value, would buy more goods of all other kinds, and would employ more labour. Their real wealth, their real revenue, therefore, would be the same as at present, though it might be expressed by a smaller quantity of silver, and they would neither be disabled nor discouraged from cultivating corn as much as they do at present. On the contrary, as the rise in the real value of silver, in consequence of lowering the money price of corn, lowers somewhat the money price of all other commodities, it gives the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where it takes place some advantage in all foreign markets and thereby tends to encourage and increase that industry. But the extent of the home market for corn must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general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where it grows, or to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produce something else, and therefore, have something else,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the price of something else, to give in exchange for corn. But in every country, the home market, as it is the nearest and most convenient, so is it likewise the greatest and most important market for corn. That rise in the real value of silver, therefore, which is the effect of lowering the average money price of corn, tends to enlarge the greatest and most important market for corn, and thereby to encourage, instead of discouraging its growth.

第二，进口外国谷物供国内消费显然可以增加国内供给，因而对人民有直接的好处。虽然它确实会稍微减低谷物的均价，但不会让它的价值受损，也可以说，不会降低谷物中所包含的人类劳动。如果进口自由，那每年本国农业家和乡绅销售谷物所得资本可能比现在禁止

自由进口所得的少。但他们所得的资本将有更高的价值，他们可以购买更多的其他物品，雇用更多的劳动。实际上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少了的财富和收入并不会比现在少；他们所耕种的谷物，也不会比现在少于此相反，谷物的价格下跌会导致银的真实价值的升高，使其他商品的价格降低，这样国内产业就能在外国市场上获得利益优势，此举能鼓励国内产业的发展。然而国内谷物市场的范围肯定会与种植、生产、出售谷物的国家的在产业、等价物或者说是价格上保持一定的比例，但在所有国家，国内自产自销对谷物市场而言最便利也最重大。由谷物均价下跌引起的银价升高有利于扩大国内贸易市场，因此它不但不会阻碍谷物生产，而且会促进谷物生产。

By the 22d of Charles II. c. 13, the importation of wheat, whenever the price in the home market did not exceed 53s:4d. the quarter, was subjected to a duty of 16s. the quarter; and to a duty of 8s. whenever the price did not exceed £4. The former of these two prices has,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past, taken place only in times of very great scarcity; and the latter has, so far as I know, not taken place at all. Yet, till wheat has risen above this latter price, it was, by this statute, subjected to a very high duty; and, till it had risen above the former, to a duty which amounted to a prohibition. The importation of other sorts of grain was restrained at rates and by duties, in proportion to the value of the grain, almost equally high. Before the 13th of the present king, the following were the duties payable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the different sorts of grain:

查理二世二十二年第13号法令规定，国内市场上若小麦价格低于一夸特53先令4便士，小麦输入每夸特须纳税16先令；国内市场上小麦价格若一夸特4镑，小麦输入每夸特须纳税8先令。第一种情况只在一世纪以前供给季极度不足时发生过；而据我所知，后一种情况则从未发生过。但是根据该法令，纳税人须缴纳如此重税，即使小麦未涨

到一夸特4镑；而小麦在未涨到一夸特53先令4便士以前所纳的税，等于禁止其输入。然而其他高额的关税或税率也是为了限制其他谷物的出口，其额度与谷物价值成正比，并几乎同样高额。以下是现任国王第13年之前可对不同种类谷物进口征收的税目：

Grain	Duties	Duties	Duties
Beans to 28s.	per qr. 19s. 10d. after till 40s.	16s. 8d.	then 12d.
Barley to 28s.	19s. 10d.	32s.	12d.
		16s.	
Malt is prohibited by the annual Malt-tax Bill.			
Oats to 16s.	5s. 10d. after		9 ½d.
Pease to 40s.	16s. 10d. after		9 ¾d.
Rye to 36s.	19s. 10d. till 40s.	16s. 8d.	then 12d.
Wheat to 44s.	21s. 10d. till 53s. 4d.	17s.	then 8s. till 4 l. and after that about 1s. 4d.
Buckwheat to 32s.	per qr. to pay 16s.		

谷物	税额	税额	税额
豆类 28 先令	每夸特 19 先令 10 便士至 40 先令	16 先令 8 便士	12 便士
大麦 28 先令	19 先令 10 便士	32 先令	16 先令 12 便士
年麦芽征税单禁止麦芽输入			
燕麦 16 先令	5 先令 10 便士		9½便士
豌豆 40 先令	16 先令 10 便士		9¾便士
黑麦 36 先令	19 先令 10 便士至 40 先令	16 先令 8 便士	12 便士
小麦 44 先令	21 先令 10 便士至 53 先令 4 便士	17 先令	8 先令至 4 镑，此后收约 1 先令 4 便士
荞麦 32 先令	每夸特赋税 16 先令		

These different duties were imposed, partly by the 22d of Charles II. in place of the old subsidy, partly by the new subsidy, by the one-third and two-thirds subsidy, and by the subsidy 1747. Subsequent laws still further increased those duties.

这些不同类目的税，一部分由查理二世第22年法令征收，代替旧补贴税，一部分由新补贴税、三分之一税补贴和三分之二补贴税、1747年补贴税征收。并且，之后的法律又加重了税负。

The distress which, in years of scarcity, the strict execution of those laws might have brought upon the people,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very great; but, upon such occasions, its execution was generally suspended by temporary statutes, which permitted, for a limited time,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corn. The necessity of these temporary statutes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s the impropriety of this

general one.

歉收季节，在此种严厉且暴力的法律控制下，一旦某一年歉收，对人们的打击是很大的。但在歉收季节，一般会颁布某些暂行的条例暂时中止此种法律，在一段时间内允许外国谷物进口。如果需要实施这种暂行条例，就充分说明了以往实行的法律已经不适用了。

These restraints upon importation, though prior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ounty, were dictated by the same spirit, by the same principles, which afterwards enacted that regulation. How hurtful soever in themselves, these, or some other restraints upon importation, became necessary in consequence of that regulation. If, when wheat was either below 48s. the quarter, or not much above it, foreign corn could have been imported, either duty free, or upon paying only a small duty, it might have been exported again, with the benefit of the bounty, to the great loss of the public revenue, and to the entire perversion of the institution, of which the object was to extend the market for the home growth, not that for the growth of foreign countries.

对输入的限制在设立奖金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其精神和原则与后来制定奖金条例的精神和原则是一致的。但制定了奖金制度之后，制定输入限制政策非常有必要，无论其本身是否害。只有当一夸特小麦价格小于等于48先令时，外国谷物才能够自由输入或纳小额的税。如果这样，也许就有人为了得到奖金再把谷物输出。这样做不但损害国家收入，而且也会使得推广本国产物的市场受到外国谷物的冲击，限制政策也就完全搞乱了。

III. The trade of the merchant-exporter of corn for foreign consumption, certainly does not contribute directly to the plentiful supply of the home market. It does so, however, indirectly. From whatever source this supply maybe usually drawn, whether from home growth, or from foreign importation, unless more corn is either usually grown, or usually imported into the country, than what is usually consumed in it, the supply of the home market can never be very plentiful. But unless the surplus can, in all ordinary cases, be exported, the growers will be careful never to grow more, and the importers never to import more, than what the bare consumption of the home market requires. That market will very seldom be overstocked; but it will generally be understocked; the people, whose business it is to supply it, being generally afraid lest their goods should be left upon their hands. The prohibition of exportation limits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e country to what the supply of its own inhabitants require. The freedom of exportation enables it to extend cultivation for the supply of foreign nations.

第三，谷物出口贸易无法直接助力国内市场的充足供给，但也有间接的贡献。供给通常不分来源，无论是本国生产，还是外国进口，除非其相加总量多于通常所消费的谷物量，否则国内市场很难有充足的供给。但一般而言，如果出口受阻，那生产者和进口商都会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制定生产量和进口量，不会多于市场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供给者都会担心货物造成积压，从而造成市场存货不足，而很少出现过剩的状况。禁止进口的政策对国内的改良与耕作造成了限制，使得国内谷物需求量多于攻击量。而自由出口的政策却使国内耕作事业推广，以供给外国。

By the 12th of Charles II. c.4,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was

permitted whenever the price of wheat did not exceed 40s. the quarter, and that of other grain in proportion. By the 15th of the same prince, this liberty was extended till the price of wheat exceeded 48s. the quarter; and by the 22d, to all higher prices. A poundage, indeed, was to be paid to the king upon such exportation; but all grain was rated so low in the book of rates, that this poundage amounted only, upon wheat to 1s., upon oats to 4d., and upon all other grain to 6d. the quarter. By the 1st of William and Mary, the act which established this bounty, this small duty was virtually taken off whenever the price of wheat did not exceed 48s. the quarter; and by the 11th and 12th of William III. c. 20, it was expressly taken off at all higher prices.

查理二世十二年第4号法令规定，如果小麦一夸特少于40先令，同时其他各种谷物的价格也与此价格成比例，就不会限制谷物出口。查理二世十五年又做出规定如果小麦价格少于每夸特48先令就允许谷物自由出口；查理二世二十二年进一步放开限制，即无论价格如何都允许谷物自由出口。显然出口谷物须向国王缴纳港税，但由于在关税表中对谷物评价低，所以对小麦和燕麦征收的港税仅为一夸特1先令和一夸特4便士，还有其他各种谷物征收6便士。威廉和玛利设立奖金，在第一年公布的法令中规定如果一夸特小麦少于48先令就不再征收这小额的税。威廉三世十二年第20号法令正式撤销这小额税，规定无论谷物价格如何都不会征收该项税。

The trade of the merchant-exporter was, in this manner, not only encouraged by a bounty, but rendered much more free than that of the inland dealer. By the last of these statutes, corn could be engrossed at any price for exportation; but it could not be engrossed for inland sale, except when the price did not exceed 48s. the quarter. The interest of the inland dealer, however, it has already

been shown, can never be opposite to that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That of the merchant-exporter may, and in fact sometimes is. If, while his own country labours under a dearth, a neighbouring country should be afflicted with a famine, it might be his interest to carry corn to the latter country, in such quantities as might very much aggravate the calamities of the dearth. The plentiful supply of the home market was not the direct object of those statutes; but, under the pretence of encouraging agriculture, to raise the money price of corn as high as possible, and thereby to occasion, as much as possible, a constant dearth in the home market. By the discouragement of importation, the supply of that market; even in times of great scarcity, was confined to the home growth; and by the encouragement of exportation, when the price was so high as 48s. the quarter, that market was not, even in times of considerable scarcity, allowed to enjoy the whole of that growth. The temporary laws, prohibiting, for a limited time,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and taking off, for a limited time, the duties upon its importation, expedients to which Great Britain has been obliged so frequently to have recourse,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 the impropriety of her general system. Had that system been good, she would not so frequently have been reduced to the necessity of departing from it.

这样，输出商人的贸易就能够同时享受奖金的奖励和内地商人的贸易更多的自由。根据上述最后一则法令规定，无论谷物价格高低谷物均可囤积以待出口；如果一夸特低于48先令，就禁止囤积谷物以待国内售卖。上文中曾提到，内地商人的利益关系必须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关系相一致。出口商人的利益关系，却不一定，事实上有时确是这样。当本国粮食供应不足时，邻国也会遭受饥荒，那出口商人可能会在利益驱使下将大量谷物输往邻国，加重本国粮食不足的灾难。这种法令的直接目的是以奖励农业为幌子提高谷物的价格，从而使国内粮食供应不足现象延续下去，而不是为国内提供粮食。阻碍出口的结

果，甚至在大大不足时，国内市场也只能依赖与本国的生产。在价格已高至一夸特48先令时还奖励输出，甚至在大大不足期间也延续该政策，国内市场也无法完全享受本国生产物。英国必须市场采取在一段时间内禁止谷物出口、同时免除谷物进口税的暂行法律，这事实上充分说明它的一般法律并不适用英国国情。若一般法律是适当的，那为什么要常常停止施行呢。

Were all nations to follow the liberal system of free exportation and free importation, the different states into which a great continent was divided, would so far resemble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of a great empire. As among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of a great empire, the freedom of the inland trade appears, both from reason and experience, not only the best palliative of a dearth, but the most effectual preventive of a famine; so would the freedom of the exportation and importation trade be among the different states into which a great continent was divided. The larger the continent, the easier the communication through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it, both by land and by water, the less would any one particular part of it ever be exposed to either of these calamities, the scarcity of any one country being more likely to be relieved by the plenty of some other. But very few countries have entirely adopted this liberal system. The freedom of the corn trade is almost everywhere more or less restrained, and in many countries is confined by such absurd regulations, as frequently aggravate the unavoidable misfortune of a dearth into the dreadful calamity of a famine. The demand of such countries for corn may frequently become so great and so urgent, that a small state in their neighbourhood, which happened at the same time to be labouring under some degree of dearth, could not venture to supply them without exposing itself to the like dreadful calamity. The very bad policy of one country may thus render it, in some measure, dangerous and imprudent to establish what would

otherwise be the best policy in another. The unlimited freedom of exportation, however, would be much less dangerous in great states, in which the growth being much greater, the supply could seldom be much affected by any quantity or corn that was likely to be exported. In a Swiss canton, or in some of the little states in Italy, it may, perhaps, sometimes be necessary to restrain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In such great countries as France or England, it scarce ever can. To hinder, besides, the farmer from sending his goods at all times to the best market, is evidently to sacrifice the ordinary laws of justice to an idea of public utility, to a sort of reasons of state; an act or legislative authority which ought to be exercised only, which can be pardoned only, in cases of the most urgent necessity. The price at which exportation of corn is prohibited, if it is ever to be prohibited, ought always to be a very high price.

如果所有国家都采用进出口自由制度，那大陆内各个国家就会像大国内各个省一样贸易自由。按照以往经验，大国内各省间贸易自由能够缓和粮食供给不足并防止饥谨；大陆内各国间的进出口贸易自由，也是缓和粮食不足和防止饥谨的最好方法。大陆的面积越宽广，其每个部分之间的交通越便利，包括水运陆运等。其中每个部分躲避此二种灾难的可能性便越大、越安全。如果一国的发展程度比较落后，则另一个相对发达的国家将会救助此国。但不幸的是，极少数的国家完全采取此种自由制度。在很多地方，谷物贸易的自由都在一定程度上受限制；有许多国家，没有合理地根据法律就肆意限制谷物贸易，因此带来不可避免的不幸：往往加重粮食不足的情况，使之成为可怕的饥荒灾难国家。这种国家，对谷物常常有巨大且紧急的需求，所以与它邻近的小国，若觉得自己的粮食有些不足，就要开始存储供应，以防自己陷于同样可怕的灾难。因此，一个国家采用了这种政策，往往会使另一个国家认为，采用原来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危险的、不谨慎的行为。但是，对大国来说，无限制的输出，存在的

危险性因素就小得多，因为大国的生产力大，无论输出谷物量如何，其供给都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在瑞士一州或意大利这样的小国内，也许有时还需要限制谷物输出。但在英国和法国那样的大国，可能没有这样的必要。而且，不让生产者把货物运到最好的市场，显然是为了功利，或因为国家的某种理由，抛弃了正义的一般法则。立法者不应该有这种行为，是很难被原谅的。除了在迫不得已的场合。若真要禁止，那就只有在谷物价格非常高的时候，才应该禁止其输出。

The laws concerning corn may everywhere be compared to the laws concerning religion. The people feel themselves so much interested in what relates either to their subsistence in this life, or to their happiness in a life to come, that government must yield to their prejudices, and,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public tranquillity, establish that system which they approve of. It is upon this account, perhaps, that we so seldom find a reasonable system established with regard to either of those two capital objects.

关于谷物的法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和有关宗教的法律相比拟。人民是那么关心对于现世生活的维持以及对于来世生活的幸福，因此政府必须听从人民的意见，而且为了确保公众的安宁，必须建立他们所赞成的制度。也许因为这样，关于这两件大事，我们很少看到合理的制度被建立起来。

IV. The trade of the merchant-carrier, or of the importer of foreign corn, in order to export it again, contributes to the plentiful supply of the home market. It is not, indeed, the direct purpose of his trade to sell his corn there; but he will generally be willing to do so, and even for a good deal less money than he might expect in a foreign market; because he saves in this manner the expence of

loading and unloading, of freight and insurance.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which, by means of the carrying trade, becomes the magazine and storehouse for the supply of other countries, can very seldom be in want themselves. Though the carrying trade must thus contribute to reduce the average money price of corn in the home market, it would not thereby lower its real value; it would only raise somewhat the real value of silver.

第四，输入外国谷物以备再输出的运送商人的贸易，有助于国内市场上足够的供给。此种贸易的直接目的，虽不是在国内售卖谷物，但运送商人却往往愿意这样做。即使这样出售所得的货币少于外国市场上的获得，他们也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可省去上货及下货、运送及保险等费用。以转口贸易为媒介而成为他国仓库的国家，其居民常不感到缺乏。因为转口贸易虽可减低国内市场上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但不会因此减少它的真实价值。而只会稍稍提高“银”的真实价值。

The carrying trade was in effect prohibited in Great Britain, upon all ordinary occasions, by the high dutie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cor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which there was no drawback; and upon extraordinary occasions, when a scarcity made it necessary to suspend those duties by temporary statutes, exportation was always prohibited. By this system of laws, therefore, the carrying trade was in effect prohibited.

在大不列颠，一般情况下国家禁止转口贸易，因为外国谷物进口须纳重税，而其中大部分又不能退还；而如果情况特殊，即粮食不足，国家就会通过暂行法律停止征税，禁止出口。因此，在这种法律统治下，谷物转口贸易实际上在一切场合都受到禁止。

That system of laws, therefore,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ounty, seems to deserve no part of the praise which has been bestowed upon it. The improvement and prosperity of Great Britain, which has been so often ascribed to those laws, may very easily be accounted for by other causes. That security which the laws in Great Britain give to every man, that he shall enjoy the fruits of his own labour, is alone sufficient to make any country flourish, notwithstanding these and twenty other absurd regulations of commerce; and this security was perfected by the Revolution, much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bounty was established. The natural effort of every individual to better his own condition, when suffered to exert itself with freedom and security, is so powerful a principle, that it is alone, and without any assistance, not only capable of carrying on the society to wealth and prosperity, but of surmounting a hundred impertinent obstructions, with which the folly of human laws too often encumbers its operations: though the effect of those obstructions is always, more or less, either to encroach upon its freedom, or to diminish its security. In Great Britain industry is perfectly secure; and though it is far from being perfectly free, it is as free or freer than in any other part of Europe.

因此，一直以来为人称颂的奖金制度的这一类法律其实毫不值得称赞。人们总是将英国的改良与繁荣归因于这种法律，其实很容易找到其他原因来解释。英国对人民自己的劳动果实的保护早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只要有法律保证，即使有以上二十条其他不合理的商业条例，英国的繁荣是注定的结果。同时，英国革命后建立了这种法律保障与奖金制度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个人为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而以一种自由且安全的方式努力，这种力量十分强大，在没有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也可以克服重重障碍为社会繁荣富裕做出贡献，其中的障碍包

括不合时宜的法律，之所以不合时宜是因为它们限制了追求财富的自由、降低了追求财富之路的安全性。在大不列颠，产业安全且自由，虽不能说是完全自由，但与欧洲各国比较，总是相差不多甚至更为自由。

Though the period of the greatest prosperity and improvement of Great Britain has been posterior to that system of laws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the bounty, we must not upon that account, impute it to those laws. It has been posterior likewise to the national debt; but the national debt has most assuredly not been the cause of it.

那些和奖金有关的法律实施以后大不列颠进入最繁荣最进步的时期，是在那些和奖金有关的法律实施以后，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断定说大不列颠繁荣与进步的原因就是那些法律。因为那一繁荣时期也出现在举借国债以后，但举借国债必定不是大不列颠繁荣与进步的原因。

Though the system of laws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the bounty, has exactly the same tendency with the practice of Spain and Portugal, to lower somewhat the valu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n the country where it takes place; yet Great Britain is certainly one of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Europe, while Spain and Portugal are perhaps amongst the most beggarly. This difference of situation, however, may easily be accounted for from two different causes. First, the tax in Spain, the prohibition in Portugal of exporting gold and silver, and the vigilant police which watches over the execution of those laws, must, in two very poor countries, which between them import annually upwards of six millions sterling, operate not only more directly, but much more forcibly, in reducing the value

of those metals there, than the corn laws can do in Great Britain. And, secondly, this bad policy is not in those countries counterbalanced by the general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the people. Industry is there neither free nor secure; and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governments of both Spain and Portugal are such as would alone be sufficient to perpetuate their present state of poverty, even though their regulations of commerce were as wise as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m are absurd and foolish.

与奖金有关的这一类法律能够稍减贵金属的价值，因此像西班牙与葡萄牙等实施这一类法律的国家都在实施与奖金有关的法律。但是，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贫乏与英国的富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们之间的不同大概是一下二个原因造成的。第一，西班牙和葡萄牙流出金银分别要纳税和被禁止，同时要实施这种法律会受到严厉的监视。由于这种原因，西班牙和葡萄牙每年会有600万镑以上金银流入，这些钱对金银的贬值作用一定比大不列颠实施谷物条例对金银的贬值作用更直接有力。第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般人们没有自由与安全的保障，这就无法抵消这种不良政策的影响。在这两国，产业没有所谓的自由与安全，民政制度也不完善，即使有能够促进发展的通商条例，也会像大部分其他条例陷入愚蠢荒谬的境地，是他们再次陷入贫穷的状态。

The 13th of the present king, c. 43, seems to have established a new system with regard to the corn laws, in many respects better than the ancient one, but in one or two respects perhaps not quite so good.

乔治三世第十三年第43号法令关于谷物条例似乎建立了一种新的体系，在许多方面都比旧的体系好，但有些地方却也许没有原来的那

么好。

By this statute, the high duties upon importation for home consumption are taken off, so soon as the price of middling wheat rises to 48s. the quarter; that of middling rye, pease, or beans, to 32s.; that of barley to 24s.; and that of oats to 16s.; and instead of them, a small duty is imposed of only 6d upon the quarter of wheat, and upon that or other grain in proportion. With regard to all those different sorts of grain, but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wheat, the home market is thus opened to foreign supplies, at prices considerably lower than before.

新法令规定，在中等小麦价格涨至一夸特48先令，中等黑麦、豌豆或蚕豆的价格涨至32先令，大麦的价格涨至24先令，燕麦的价格涨至16先令时，凡供应国内的消费，都可征小额税而免高关税。对小麦，一夸特征税6便士，其他各种谷物以此为准。这样，就各种谷物尤其是小麦来说，外国供应品以比从前低得多的价格供给国内市场。

By the same statute, the old bounty of 5s.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wheat, ceases so soon as the price rises to 44s. the quarter, instead of 48s. the price at which it ceased before; that of 2s:6d.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barley, ceases so soon as the price rises to 22s. instead of 24s. the price at which it ceased before; that of 2s:6d.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oatmeal, ceases so soon as the price rises to 14s. instead of 15s. the price at which it ceased before. The bounty upon rye is reduced from 3s:6d. to 3s. and it ceases so soon as the price rises to 28s. instead of 32s. the price at which it ceased before. If bounties are as improper as I have endeavoured to prove them to be, the sooner they cease, and the lower they are, so much

the better.

同一法令又规定，小麦价格涨至一夸特40先令（先前是48先令）时，则小麦输出的全部奖金（5先令）即行停止发给；大麦价格涨至一夸特22先令（先前是24先令）时，则大麦输出的全部奖金（2先令6便士）即行停止发给；燕麦粉价格涨至一夸特14先令（先前是15先令）时，则燕麦粉输出的全部奖金（2先令6便士），即行停止发给。黑麦的奖金，由3先令6便士减至3先令；其价格涨至28先令（先前是32先令）时，奖金即停止发给。若像我上面所说奖金不那么适当，那最后越早停发，数目越减少则越好。

The same statute permits, at the lowest prices, the importation of corn in order to be exported again, duty free, provided it is in the mean time lodged in a warehouse under the joint locks of the king and the importer. This liberty, indeed, extends to no more than twenty-five of the different ports of Great Britain. They are, however, the principal ones; and there may not, perhaps, be warehouses proper for this purpose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others.

同一法令又规定，在谷物价格最低的场合把输入的谷物堆在堆栈，同时用两把锁（一把是国王的，一把是输入商人的）锁住，那就准许为再输出而免税输入的谷物。但这种自由，只可在大不列颠25个海港内行使。那些全是主要的海港，而其余大部分海港，没有专为此用的堆栈。

So far this law seems evidently an improvement upon the ancient system.

就以上各项说，这项法令，就显然比旧的法令好。

But by the same law, a bounty of 2s. the quarter is given for the exportation of oats, whenever the price does not exceed fourteen shillings. No bounty had ever been given before for the exportation of this grain, no more than for that of pease or beans.

但这法令又规定，燕麦价格不超过一夸特14先令时，每输出一夸特，即可得奖金2先令。对于这种谷物的输出，正如对于豌豆或蚕豆的输出一样，以前都不曾发给奖金。

By the same law, too, the exportation of wheat is prohibited so soon as the price rises to forty-four shillings the quarter; that of rye so soon as it rises to twenty-eight shillings; that of barley so soon as it rises to twenty-two shillings; and that of oats so soon as they rise to fourteen shillings. Those several prices seem all of them a good deal too low; and there seems to be an impropriety, besides, in prohibiting exportation altogether at those precise prices at which that bounty, which was given in order to force it, is withdrawn. The bounty ought certainly either to have been withdrawn at a much lower price, or exportation ought to have been allowed at a much higher.

这法令还规定了小麦、黑麦、大麦和燕麦分别涨价到一夸特44先令、一夸特28先令、22先令和14先令就会禁止出口。这些价格似乎都太低了；而且，就以强迫输出为目的而发给的奖金为例，全面禁止出口仅仅以这一低价为标准似乎并不妥当。应该以极低的价格确定停止发给奖金的价格，否则就应该在极高的价格上允许谷物出口。

So far, therefore, this law seems to be inferior to the ancient system. With all its imperfections, however, we may perhaps say of it what was said of the laws of Solon, that though not the best in itself, it is the best which the interest, prejudices, and temper of the times, would admit of. It may perhaps in due time prepare the way for a better.

就上论述而言，这项法令又劣于旧法令。但即使有这些论点，我们可以借助前人批评索伦法律的话来批评这种法律，在他的话里他是这样说的：它本身虽不是至善的，但当时的利害关系、偏见和倾向不容许有更好的法律。未来的法律可能就会在此基础上再取得新的发展

Chapter VI. Of Treaties of Commerce

第六章、论通商条约

When a nation binds itself by treaty, either to permit the entry of certain goods from one foreign country which it prohibits from all others, or to exempt the goods of one country from duties to which it subjects those of all others, the country, or at least the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of the country, whose commerce is so favoured, must necessarily derive great advantage from the treaty. Those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enjoy a sort of monopoly in the country which is so indulgent to them. That country becomes a market, both more extensive and more advantageous for their goods: more extensive, because the goods of other nations being either excluded or subjected to heavier duties, it takes off a greater quantity of theirs; more advantageous, because the merchants of the favoured country, enjoying a sort of monopoly there, will often sell

their goods for a better price than if exposed to the free competition of all other nations.

如果某一国家因条约束缚，进口某种商品只能从某一个国家进口，而其他国家无法向该国输出商品，或者从对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重税而对单独的某一个国家免税，那被允许的那个国家在商业上受到很大的实惠，即使不是整个国家收益，至少它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必然会从这种条约中受益。这些受益者在对他们实施特惠的国家中享受了一种垄断权。这样，在该国，他们就有了一个更广阔又更有利的市场。说其更广阔是因为如果其他各国的货物要进入该市场就要征收更重的税，因此这个国家的市场容纳的几乎全是他们的货物，比没有条约时多得多；说其更有利是因为受惠国商人在那里享受了一种垄断权，没有自由竞争，这样就会享受价格优势，做价格垄断，出售他们的货物。

Such treaties, however, though they may be advantageous to the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of the favoured, are necessarily disadvantageous to those of the favouring country. A monopoly is thus granted against them to a foreign nation; and they must frequently buy the foreign goods they have occasion for, dearer than if the free competition of other nations was admitted. That part of its own produce with which such a nation purchases foreign goods, must consequently be sold cheaper; because, when two things are exchanged for one another, the cheapness of the one is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or rather is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dearness of the other.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its annual produce, therefore, is likely to be diminished by every such treaty. This diminution, however, can scarce amount to any positive loss, but only to a lessening of the gain which it might otherwise make. Though it sells its goods cheaper than it otherwise might do, it will

not probably sell them for less than they cost; nor, as in the case of bounties, for a price which will not replace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bringing them to market, together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The trade could not go on long if it did. Even the favouring country, therefore, may still gain by the trade, though less than if there was a free competition.

这种条约虽可对受惠国的商人及制造业者有利，但必定会对施惠国的商人及制造业者造成极大的冲击。因为这样会把一种本来自己享有垄断权让与某一外国，自由竞争中价格不会太高，而一国垄断就会使得他们用更昂贵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的外国商品。而这个国家必须以更低的价格出售自己商品来购买外国产品，因为在物物交换时，一个物品低廉另一个物品就会昂贵，更确切地说，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施惠国的年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就会因这样的条约而降低。但这种降低，不可以说是绝对的损失，却只是本来可得到的利益的减少。它出售货物的价格，虽低于没有通商条约时可售得的价格，但总售价不会低于成本，而且，决不会像一些其他货那样，不领取奖金，就不能够补偿运送货物上市所投的资本并提供其普通利润。否则，这种贸易就不能长久继续。所以，即就池惠国说，经营这种种贸易虽然有利，但有利程度没有自由竞争场合那么大。

Some treaties of commerce, however, have been supposed advantageous, upon principle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se; and a commercial country has sometimes granted a monopoly of this kind, against itself, to certain goods of a foreign nation, because it expected, that in the whole commerce between them, it would annually sell more than it would buy, and that a balance in gold and silver would be annually returned to it. It is upon this principle that the treaty of commerce between England and Portugal, concluded in 1703 by Mr Methuen, has been so much commended.

The following is a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at treaty,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articles only.

有些通商条约的根据和此原理有很大不同，有一些人却认为有利。有时，商业国给某一外国出售某种有害本国垄断权的商品，希望在两国间的各种贸易上，本国每年所售价格能多于他国每年所购，以致每年金银的利润极大都对自己有利。1703年英葡通商条约，就根据这原理而博得广泛的赞赏。以下便是这条约的直译文，仅有三条：

ART. I.

第一条

His sacred royal majesty of Portugal promises, both in his own name and that of his successors, to admit for ever hereafter, into Portugal, the woollen cloths, and the rest of the woollen manufactures of the British, as was accustomed, till they were prohibited by the law; nevertheless upon this condition:

葡萄牙国王陛下，以他自己及其继承人名义，约定在未受法律禁止以前，一直准许英国呢绒及其他毛纺品照常输入葡萄牙，但有以下几条所述为条件。

ART. II.

第二条

That is to say, that her sacred royal majesty of Great Britain shall, in her own name, and that of her successors, be obliged, for ever hereafter, to admit the wines of the growth of Portugal into Britain; so that at no time, whether there shall be peace or war between the kingdoms of Britain and France, any thing more shall be demanded for these wines by the name of custom or duty, or by whatsoever other titl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hether they shall be imported into Great Britain in pipes or hogsheads, or other casks, than what shall be demanded for the like quantity or measure of French wine, deducting or abating a third part of the custom or duty. But if, at any time, this deduction or abatement of customs, which is to be made as aforesaid, shall in any manner be attempted and prejudiced, it shall be just and lawful for his sacred royal majesty of Portugal, again to prohibit the woollen cloths, and the rest of the British woollen manufactures.

英国国王陛下，以他自己及其继承人名义，以后必须永远准许葡萄牙产的葡萄酒输入英国，无论何时、无论英法二王国是和是战、无论输入葡萄酒时所用的桶是105加仑桶、52.5加仑桶或其他，都不得在关税这名义下或其他任何名义下，都不得对于此种葡萄酒直接或间接要求比同量法国葡萄酒所纳更多的关税，并须减除1/3。若在将来的任何时候，上述关税的减除以任何形式上被侵害，则葡萄牙国王陛下，再禁止英国呢绒及其他毛纺品输入，就是正当而合法的。

ART. III.

第三条

The most excellent lords the plenipotentiaries promise and take upon themselves, that their above named masters shall ratify this treaty; and within the space of two months the ratification shall be exchanged.

两国全权大使相约负责取得各自国王批准条约，并约定在两个月内交换批准文件。

By this treaty, the crown of Portugal becomes bound to admit the English woollens upon the same footing as before the prohibition; that is, not to raise the duties which had been paid before that time. But it does not become bound to admit them upon any better terms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nation, of France or Holland, for example. The crown of Great Britain, on the contrary, becomes bound to admit the wines of Portugal, upon paying only two-thirds of the duty which is paid for those of France, the wines most likely to come into competition with them. So far this treaty, therefore, is evidently advantageous to Portugal, and disadvantageous to Great Britain.

这条约规定，葡萄牙国王不得把禁止以前的税额提高，有义务要按和英国毛织物禁止输入以前相同的条件，准许英国毛织物输入。但他没有义务要以比其他任何国家输入条件更好的条件输入，如法国或荷兰毛织物，准许英国毛织物。而英国国王，却有义务，要以比法国葡萄酒即最能与葡萄牙竞争的葡萄酒输入条件更好允许进口葡萄牙生产的葡萄酒而不进口法国葡萄酒，这样就能够少纳1/3的关税。就这

一点而言，这条约显然有利于葡萄牙而非大不列颠。

It has been celebrated, however, as a masterpiece of the commercial policy of England. Portugal receives annually from the Brazils a greater quantity of gold than can be employed in its domestic commerce, whether in the shape of coin or of plate. The surplus is too valuable to be allowed to lie idle and locked up in coffers; and as it can find no advantageous market at home, it must, notwithstanding; any prohibition, be sent abroad, and exchanged for something for which there is a more advantageous market at home. A large share of it comes annually to England, in return either for English goods, or for those of other European nations that receive their returns through England. Mr Barretti was informed, that the weekly packet-boat from Lisbon brings, one week with another, more than £50,000 in gold to England. The sum had probably been exaggerated. It would amount to more than £2,600,000 a year, which is more than the Brazils are supposed to afford.

但人们却赞扬这一条约是英国商业政策上一种杰作。葡萄牙每年都会从巴西掠夺来黄金，而其数量甚至多于以铸币及器皿形式用于国内贸易的数量。如果剩余额不用而是尘封与在金柜中就只能等着它贬值造成巨大的损失，然而在葡萄牙国内又没有有利的市场，因此，即使禁止出口也必须把货物运出去，这样才能得到国内更有利市场的物品。这其中有大部分每年输往英国，这样来交换英国货物，或间接从英国交换欧洲各国货物。巴雷特说，英国每周能从来自里斯本的周期邮船上得到平均5万镑以上黄金。虽然有些夸张，但如果是真的，英国人一年总计能得到260万镑以上黄金，这比人们普遍知晓的巴西每年所能提供的数额还要大。

Our merchants were, some years ago, out of humour with the crown of Portugal. Some privileges which had been granted them, not by treaty, but by the free grace of that crown, at the solicitation, indeed, it is probable, and in return for much greater favours, defence and protection from the crown of Great Britain, had been either infringed or revoked. The people, therefore, usually most interested in celebrating the Portugal trade, were then rather disposed to represent it as less advantageous than it had commonly been imagined. The far greater part, almost the whole, they pretended, of this annual importation of gold, was not on account of Great Britain, but of other European nations; the fruits and wines of Portugal annually imported into Great Britain nearly compensating the value of the British goods sent thither.

几年前，本国商人曾失去葡王的好感。葡王命令破坏或者是撤回某些非经条约规定而由葡王特赐的特权（这些特权可能是求来的，但结果是葡萄牙人却取得了英王重大的恩惠、防卫和保护）。于是，通常平日里对葡萄牙贸易政策最为赞赏的人都认为这种贸易的有利程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他们认为，每年几乎全部输入的黄金不是为着大不列颠利益，而是为着欧洲其他各国利益；英国每年来自葡萄牙的水果与葡萄酒，几乎抵消了它出口葡萄牙的货物的价值。

Let us suppose, however, that the whole was on account of Great Britain, and that it amounted to a still greater sum than Mr Barretti seems to imagine; this trade would not, upon that account, be more advantageous than any other, in which, for the same value sent out, we received an equal value of consumable goods in return.

就算这全部是为着英国利益，但其总额又比巴雷特所想象的大，

我们决不能不能因此断定这种贸易比出口商品价值等于进口商品价值的其他贸易更有利。

It is but a very small part of this importation which, it can be supposed, is employed as an annual addition, either to the plate or to the coin of the kingdom. The rest must all be sent abroad, and exchanged for consumable goods of some kind or other. But if those consumable goods were purchased directly with the produce of English industry, it would be more for the advantage of England, than first to purchase with that produce the gold of Portugal, and afterwards to purchase with that gold those consumable goods. A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is always more advantageous than a round-about one; and to bring the same value of foreign goods to the home market requires a much smaller capital in the one way than in the ether. If a smaller share of its industry, therefore, had been employed in producing goods fit for the Portugal market, and a greater in producing those lit for the other markets, where those consumable goods for which there is a demand in Great Britain are to be had, it would have been more for the advantage of England. To procure both the gold which it wants for its own use, and the consumable goods, would, in this way, employ a much smaller capital than at present. There would be a spare capital, therefore, to be employed for other purposes, in exciting an additional quantity of industry, and in raising a greater annual produce.

用一种安全的方法说，这全部输入额的一极小部分每年将会被用来增加国内器皿或铸币。其余必须以出口货物的方式来交换某些消费品，但不同的交换方式产生的结果不同。如果这种消费品是直接由英国生产物购买就会更有利，而先以英国生产物购买葡萄牙黄金，再用

黄金购买这种消费品就不如前者对英国有利。这就是说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总优于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而且，如果要从外国运一定价值的外国货物到本国市场，第一中贸易方式的成本比第二种贸易方式少得多。如果国内仅以较小部分生产适合葡萄牙市场需要的货物，而以较大部分生产适合其他市场需要的货物，而英国从此得到它所需要的消费品，那就对英国更有利。这样，英国要获得它需用的黄金及消费品，所使用的资本就比现今少得多。于是，英国便有一笔节省下来的资本可用于其他方面，即用来推动更多产业的发展和生产更多年生产物。

Though Britain were entirely excluded from the Portugal trade, it could find very little difficulty in procuring all the annual supplies of gold which it wants, either for the purposes of plate, or of coin, or of foreign trade. Gold, like every other commodity, is always somewhere or another to be got for its value by those who have that value to give for it. The annual surplus of gold in Portugal, besides, would still be sent abroad, and though not carried away by Great Britain, would be carried away by some other nation, which would be glad to sell it again for its price, in the same manner as Great Britain does at present. In buying gold of Portugal, indeed, we buy it at the first hand; whereas, in buying it of any other nation, except Spain, we should buy it at the second, and might pay somewhat dearer. This difference, however, would surely be too insignificant to deserve the public attention.

即使英国完全不与葡萄牙通商，英国在很多条件上，例如器皿上、铸币上或国外贸易上，每年所需的全部黄金，仍不难获得。英国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只要能对黄金支付价值的人在任何一些地方都可以取得所需要的黄金。而且，葡萄牙每年剩余的黄金，虽没有英国买去，但一定会由某一些其他国家买去，必须输出，而这一国家又一

定会像今日英国那样，愿以不错的价格，把这部分黄金再卖出去。而在购买其他各国（除了西班牙）黄金时，我们是间接购买，出价可能略高但这差额很小，政府不会注意。诚然，在购买葡萄牙黄金时，我们是直接购买，购买除西班牙之外的其他国家黄金时，是间接购买，并且多少以更高的价格支付。然而，这种不同的确不足以引起公众的关注。

Almost all our gold, it is said, comes from Portugal. With other nations, the balance of trade is either against as, or not much in our favour. But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the more gold we import from one country, the less we must necessarily import from all others. The effectual demand for gold, like that for every other commodity, is in every country limited to a certain quantity. If nine-tenths of this quantity are imported from one country, there remains a tenth only to be imported from all others. The more gold, besides, that is annually imported from some particular countries, over and above what is requisite for plate and for coin, the more must necessarily be exported to some others: and the more that most insignificant object of modern policy, the balance of trade, appears to be in our favour with some particular countries, the more it must necessarily appear to be against us with many others.

据说，本国几乎全部的黄金都来自葡萄牙。至于本国对其他各国形成的贸易差额，可能会对本国造成不利。但我们应当明白，本国从某一国输入了越多的黄金，则自然就会从其他各国输入的黄金就越少。对黄金的有效需求像对其他各种商品的有效需求一样，在任何一国，都有一定的上限。若本国从其他各国输入的是这有限量的1/10，则从某一国输入的就是有限量的9/10了。近世政策最无意义的目标——贸易差额，对某些国家来说，越是有利于本国，则对其他许多国家来说，就必然越不利于本国。而且，越是超过本国在器皿上、铸币

上所必要的分量，则向其他各国输出的黄金，亦必越是增多；例如每年从某些国家输入的黄金。

It was upon this silly notion, however, that England could not subsist without the Portugal trade, tha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late war, France and Spain, without pretending either offence or provocation, required the king of Portugal to exclude all British ships from his ports, and, for the security of this exclusion, to receive into them French or Spanish garrisons. Had the king of Portugal submitted to those ignominious terms which his brother-in-law the king of Spain proposed to him, Britain would have been freed from a much greater inconveniency than the loss of the Portugal trade, the burden of supporting a very weak ally, so unprovided of every thing for his own defence, that the whole power of England, had it been directed to that single purpose, could scarce, perhaps, have defended him for another campaign. The loss of the Portugal trade would, no doubt, have occasioned a considerable embarrassment to the merchants at that time engaged in it, who might not, perhaps, have found out, for a year or two, any other equally advantageous method of employing their capitals; and in this would probably have consisted all the inconveniency which England could have suffered from this notable piece of commercial policy.

一些人有一个可笑的想法：认为英国无葡萄牙贸易就不能存在，竟使法国和西班牙在上次战争快要完结的时候，并没有借口受到侮辱或挑衅而就要求葡王驱逐一切英船离开葡萄牙各港，并为防御英人起见，迎接法国或西班牙守备队入港。要是葡王接纳其姻兄西班牙王所提出的不名誉条件，英国就可免除比丧失葡萄牙贸易要大得多的困难，即可摆脱一个很大的负担，即支持一个在国防上是那么无设备的

极弱的盟国，以致在另一次战争中，英国即使倾尽全力，恐怕也不能作有效的保卫。对葡萄牙贸易的丧失，无疑会给当时经营此种贸易的商人带来很大的困难，使他们在一两年内，找不到任何其他同样有利的投资方法，可能这就是英国实施这引人注目的商业政策的同时所必须面对的困难。

The great annual im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is neither for the purpose of plate nor of coin, but of foreign trade. A round-abou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can be carried on more advantageously by means of these metals than of almost any other goods. As they are the universal instruments of commerce, they are more readily received in return for all commodities than any other goods; and, on account of their small bulk and great value, it costs less to transport them backward and forward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than almost any other sort of merchandize, and they lose less of their value by being so transported. Of all the commodities, therefore, which are bought in one foreign country, for no other purpose but to be sold or exchanged again for some other goods in another, there are none so convenient as gold and silver. In facilitating all the different round-about foreign trades of consumption which are carried on in Great Britain, consists the principal advantage of the Portugal trade; and though it is not a capital advantage, it is, no doubt, a considerable one.

每年大量输入金银的目的既不是为着制器皿，也不是为着铸币，而是为着进行国外贸易。以货币金属作为媒介进行的间接比用任何其他货物作媒介更有利。金银是普遍的商业手段，因而能够更容易为人接受从而成为固定的交换媒介，它的优点是体积小、价值大，来往运输所需要的费用又比几乎任何其他商品少，而且，由运输而造成的价值损失也小。在所有商品中几乎没有其他的商品能够与金银相媲美，

能够方便地用于购买在某一外国有售而再在其他外国脱售的商品了。葡萄牙贸易的主要利益就是使英国各种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更为便宜。这种利益虽然不能说是最大的利益，但也是相当大的利益。

That any annual addition which, it can reasonably be supposed, is made either to the plate or to the coin of the kingdom, could require but a very small annual import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seems evident enough; and though we had no direct trade with Portugal, this small quantity could always, somewhere or another, be very easily got.

显而易见的是，一国每年仅需输入极小量金银就够足够用于制造器皿和铸币，我们即使不和葡萄牙直接通商，也很容易从其他地方得到这极小量的金银。

Though the goldsmiths trade be very considerable in Great Britain,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new plate which they annually sell, is made from other old plate melted down; so that the addition annually made to the whole plate of the kingdom cannot be very great, and could require but a very small annual importation.

金匠这一行业在英国虽还不错，但每年售出的大部分新器皿都是由旧器皿熔化再造的。因此，本国每年只需要很少的金银的进口补充就够用在器皿上。

It is the same case with the coin. Nobody imagines, I believe, that eve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annual coinage, amounting, for ten

years together, before the lat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to upwards of £800,000 a-year in gold, was an annual addition to the money before current in the kingdom. In a country where the expence of the coinage is defray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value of the coin, even when it contains its full standard weight of gold and silver, can never be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an equal quantity of those metals uncoined, because it requires only the trouble of going to the mint, and the delay, perhaps, of a few weeks, to procure for any quantity of uncoined gold and silver an equal quantity of those metals in coin; but in every country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urrent coin is almost always more or less worn, or otherwise degenerated from its standard. In Great Britain it was, before the late reformation, a good deal so, the gold being more than two per cent., and the silver more than eight per cent. below its standard weight. But if forty-four guineas and a-half, containing their full standard weight, a pound weight of gold, could purchase very little more than a pound weight of uncoined gold; forty-four guineas and a-half, wanting a part of their weight, could not purchase a pound weight, and something was to be added, in order to make up the deficiency. The current price of gold bullion at market, therefore, instead of being the same with the mint price, or £46:14:6, was then about £47:14s., and sometimes about £48. Whe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oin, however, was in this degenerate condition, forty four guineas and a-half, fresh from the mint, would purchase no more goods in the market than any other ordinary guineas; because, when they came into the coffers of the merchant, being confounded with other money, they could not afterwards be distinguished without more trouble than the difference was worth. Like other guineas, they were worth no more than £46:14:6. If thrown into the melting pot, however, they produced, without any sensible loss, a pound weight of standard gold, which could be sold at any time for between £47:14s. and £48, either in gold or silver, as fit for all the

purposes of coin as that which had been melted down. There was an evident profit, therefore, in melting down new-coined money; and it was done so instantaneously, that no precaution of government could prevent it. The operations of the mint were, upon this account, somewhat like the web of Penelope; the work that was done in the day was undone in the night. The mint was employed, not so much in making daily additions to the coin, as in replacing the very best part of it, which was daily melted down.

就铸币而言，情况大致一样。我相信，没有谁会想象，在最近金币改铸以前的那10年间，每年80万镑以上的铸造中的大部分的总用仅仅是是增加国内一向流通着的货币。在一些国家，铸币费用由政府支付，而铸币内含金银都有充分的标准重量，其价值决不能比等量未铸金属的价值大许多。这是因为如果你要以一定数量未铸金银交换等量金银铸币，只需造访一下铸币厂，最多等待几个星期就行了。但是，任何国家流通铸币或多或少都会磨损造成其价值低于标准，当然，这也可能由其他原因引起。在英国，在最近的一次改铸之前就存在这种情况，金币常常以2%以上的量低于标准重量的程度，而银币是以8%以上的量低于标准重量的程度。但若44.5几尼（包含着十足的标准重量，即1磅金）所能购买的未铸的金不超过1磅，那它就不能购买1磅重的未铸的金，而须再加一些钱，以补不足。所以，金块的市场流通价格并不和其铸币厂价格一致，换句话说，金块的等价物不定，有时46镑14先令6便士，而有时大约为47镑14先令，有时又大约为48镑了。但在铸币大部分都是这样低于标准的时候，新从铸币厂出来的44.5几尼，不能在市场上购买比其他普通几尼更多的商品，因为它们很难于辨认当流入商人金柜中与其他货币混在一起的时候，即使能够辨认，所花费的价格必然多于它的真实价值。所以，其所值亦不多于46镑14先令6便士，就像其他几尼一样。但是，用不着有显著的损失当倾入熔锅，即可产出标准金的1磅，其效用，就那一方面说也与当初熔解的铸币相等，那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可换得金币或银币47镑14先令乃至48镑。于是，就从熔化新铸币中得到想要的利益，而且政府不

能预防它的融化速度。因此，白昼所纺织的在晚间又拆毁，铸币厂的活动，便有些像珀涅罗珀的织物了。铸币厂的工作，与其说是逐日增加铸币，倒不如说是补替逐日熔化的最好部分的铸币。

Were the private people who carry their gold and silver to the mint to pay themselves for the coinage, it would add to the value of those metals,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fashion does to that of plate. Coined gold and silver would be more valuable than uncoined. The seignorage, if it was not exorbitant, would add to the bullion the whole value of the duty; because, the government having everywhere the exclusive privilege of coining, no coin can come to market cheaper than they think proper to afford it. If the duty was exorbitant, indeed, that is, if it was very much above the real value of the labour and expence requisite for coinage, false coine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might be encouraged, by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alue of bullion and that of coin, to pour in so great a quantity of counterfeit money as might reduce the value of the government money. In France, however, though the seignorage is eight per cent., no sensible inconveniency of this kind is found to arise from it. The dangers to which a false coiner is everywhere exposed, if he lives in the country of which he counterfeits the coin, and to which his agents or correspondents are exposed, if he lives in a foreign country, are by far too great to be incurred for the sake of a profit of six or seven per cent.

假设自己支付铸币费用持金银到铸币厂铸造的私人，是那就会像器皿价值一样加工所费可增加此等金属的价值。未铸的金属更有价值比已铸的金属。将以税的全价值加入金银块之内若铸币税非过高，因为，政府享有专有的铸币特权在任何地方，没有什么铸币能以比这更低的价值提供市场。所征收的税，若比铸造所需劳动与费用的真实价

值大得多，换言之，若征税过重，那么金银块与金银铸币间价值巨大的差额，也会鼓励国内外私造货币者把大量伪币注入市场，以致减低官造货币的价值。在法国，未曾发生了什么显著的骚扰，但铸币税为8%。住在外国的他们的代理人或通信人和住在本国的私造货币者，都到处有遭受极大危险的可能，不值得为这6%或7%的利润而冒险。

The seignorage in France raises the value of the coin higher than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f pure gold which it contains. Thus, by the edict of January 1726, the mint price of fine gold of twenty-four carats was fixed at seven hundred and forty livres nine sous and one denier one-eleventh the mark of eight Paris ounces. The gold coin of France, making an allowance for the remedy of the mint, contains twenty-one carats and three-fourths of fine gold, and two carats one-fourth of alloy. The mark of standard gold, therefore, is worth no more than about six hundred and seventy-one livres ten deniers. But in France this mark of standard gold is coined into thirty louis d'ors of twenty-four livres each, or into seven hundred and twenty livres. The coinage, therefore, increases the value of a mark of standard gold bullion,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ix hundred and seventy-one livres ten deniers and seven hundred and twenty livres, or by forty-eight livres nineteen sous and two deniers.

法国的铸币税，使高于按纯金含量比例所应有的程度的铸币价值。于是，1726年1月敕令，24克拉纯金的铸币厂价格，定为740里弗赫9苏1又1/11迪尼厄，合巴黎8盎司的一马克。法国金币含有纯金21又3/4克拉，及合金2又1/4克拉扣除铸币厂的公差之后。所以，但在法国，一马克标准金铸为30个金路易，每个合24里弗赫，合计720里弗赫。标准金一马克，只值大约671里弗赫10迪尼厄。所以，增加了47里弗赫19苏2迪尼厄的价值。换言之，铸币税所增加于标准金一

马克的价值的，就是671里弗赫零10迪尼厄与720里弗赫之差了。

A seignorage will, in many cases, take away altogether, and will in all cases diminish, the profit of melting down the new coin. This profit always arises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bullion which the common currency ought to contain and that which it actually does contain. If this difference is less than the seignorage, there will be loss instead of profit. If it is equal to the seignorage, there will be neither profit nor loss. If it is greater than the seignorage, there will, indeed, be some profit, but less than if there was no seignorage. If, before the lat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for example, there had been a seignorage of five per cent. upon the coinage,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loss of three per cent. upon the melting down of the gold coin. If the seignorage had been two per cent., there would have been neither profit nor loss. If the seignorage had been one per cent.,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profit but of one per cent. only, instead of two per cent. Wherever money is received by tale, therefore, and not by weight, a seignorage is the most effectual preventive of the melting down of the coin,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of its exportation. It is the best and heaviest pieces that are commonly either melted down or exported, because it is upon such that the largest profits are made.

熔化新铸币的利润在许多情况下会因铸币税而完全沉没，而在利润必定会都会由于铸币税而减少。此种利润往往是从通用货币应含纯金银量与实含纯金银量二者的差额中得到的。这一差额如果小于铸币税，则不但没有利润而且会造成损失。如果与铸币税相等，则不赔不赚。如果大于铸币税，才会获得利润，而这一利润与没有铸币税的国家相比就会少得多。例如，在最近金币改铸以前，如果铸造货币须纳税5%，那熔解金币就会损失3%；如果铸币税为2%，那无不赔不

赚；如果铸币税为1%，才能获利1%。在货币以个数接受而非重量接受的地方，铸币税可以有效防止熔解铸币及输出铸币。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是因为被熔解或被输出的铸币大都是质量上乘铸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图取最大的利润。

The law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coinage, by rendering it duty-free, was first enacted during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for a limited time, and afterwards continued, by different prolongations, till 1769, when it was rendered perpetual. The bank of England, in order to replenish their coffers with money, are frequently obliged to carry bullion to the mint; and it was more for their interest, they probably imagined, that the coinage should be at the expence of the government than at their own. It was probably out of complaisance to this great company, that the government agreed to render this law perpetual. Should the custom of weighing gold, however, come to be disused, as it is very likely to be on account of its inconveniency; should the gold coin of England come to be received by tale, as it was before the late recoinage this great company may, perhaps, find that they have, upon this, as upon some other occasions, mistaken their own interest not a little.

第一个以免税方法奖励铸造货币的法律是查理二世制订的，但时效有限，那以后迭次延长限期，直到1769年，才改订为永久有效的法律。如果英格兰银行要以货币补充其金柜，必须持金银块到铸币厂；或许他们认为，相比于由自己担负铸币费，让政府担负铸币费对自己更有利益。也许就因为这大银行恳求，政府才同意将此法律改订为永久有效的法律。一旦秤金的不是主要的衡量手段，那因交换不便，法律很可能也将被废除；如果英国金币像改铸之前那样以个数计量，那这家大银行也许会发觉，它在这种情况下大大估错了它的利害关系。

Before the late recoinage, when the gold currency of England was two per cent. below its standard weight, as there was no seignorage, it was two per cent. below the value of that quantity of standard gold bullion which it ought to have contained. When this great company, therefore, bought gold bullion in order to have it coined, they were obliged to pay for it two per cent. more than it was worth after the coinage. But if there had been a seignorage of two per cent. upon the coinage, the common gold currency, though two per cent. below its standard weight, would, notwithstanding, have been equal in value to the quantity of standard gold which it ought to have contained; the value of the fashion compensating in this case the diminution of the weight. They would, indeed, have had the seignorage to pay, which being two per cent., their loss upon the whole transaction would have been two per cent., exactly the same, but no greater than it actually was.

在最近改铸以前，英国通用金币比其标准重量低2%，同时由于没有铸币税，其价值也比应含标准金量的价值低2%。因此，这家大银行购买金块以备铸造所出的价格一定会比铸成后的价值多2%。加入铸币税税率是2%，那通用金币虽比其标准重量低2%，但还是必须与应合的标准金量有相等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铸造的价值抵消了重量的减少。银行虽然必须支付2%的铸币税，但他们全过程中遭受的损失只是这2%，与现实的损失完全一样，不会更多。

If the seignorage had been five per cent. and the gold currency only two per cent. below its standard weight, the bank would, in this case, have gained three per cent. upon the price of the bullion; but as they would have had a seignorage of five per cent. to pay upon the coinage, their loss upon the whole transaction would, in the same manner, have been exactly two per cent.

若铸币税为5%，而通用金币仅比其标准重量低2%，则在这场合，银行将在金块价格上，得利3%；但由于它须支付铸币税5%，所以在这全部事务上，它的损失依然恰好是2%。

If the seignorage had been only one per cent., and the gold currency two per cent. below its standard weight, the bank would, in this case, have lost only one per cent. upon the price of the bullion; but as they would likewise have had a seignorage of one per cent. to pay, their loss upon the whole transaction would have been exactly two per cent.,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all other cases.

若通用金币比其标准重量低2%但铸币税仅为1%，则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只损失1%在金块价格上；之所以因为它在这全部事务上的损失，仍像其他任何场合一样，恰好是2%，是因为它须支付铸币税1%。

If there was a reasonable seignorag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in contained its full standard weight, as it has done very nearly since the late recoinage, whatever the bank might lose by the seignorage, they would gain upon the price of the bullion; and whatever they might gain upon the price of the bullion, they would lose by the seignorage. They would neither lose nor gain, therefore, upon the whole transaction, and they would in this, as in all the foregoing cases, be exactly in the same situation as if there was no seignorage.

若铸币同时包含十足的标准重量而铸币税不高不低，像最近改铸

以来它几乎包含十足标准重量那样，那么英格兰银行在金块价格上必有所得即使在铸币税上虽有所失，在金块价格上虽有所得，但在铸币税上必有所失。它在这全部事务上，无所得也无所失。于是它在这场合，就像在上述其他任何场合一样，处在和没有征税时完全相同的境地。

When the tax upon a commodity is so moderate as not to encourage smuggling, the merchant who deals in it, though he advances, does not properly pay the tax, as he gets it back in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y. The tax is finally paid by the last purchaser or consumer. But money is a commodity, with regard to which every man is a merchant. Nobody buys it but in order to sell it again; and with regard to it there is, in ordinary cases, no last purchaser or consumer. When the tax upon coinage, therefore, is so moderate as not to encourage false coining, though every body advances the tax, nobody finally pays it; because every body gets it back in the advanced value of the coin.

一种商品的税，不会奖励走私除非不适中，那末以运输此种商品为业的商人，不是真正的纳税者。因为虽然必须垫付此种赋税，但由于他可以在商品价格中取回，所以不是真正的纳税者。购买者是最后支付这种赋税的即消费者。但对于货币，一切购入者都是商人。就货币说，是不会有最后的购买者或消费者的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购买货币都是为了把它再行售卖。所以，没有一个人最后支付这种赋税，不至于奖励伪造时在铸币税是那么适中，虽然一切人都垫付赋税，但因为一切人都在提高的铸币价值中取回各自垫付的数额。

A moderate seignorage, therefore, would not, in any case, augment the expence of the bank, or of any other private persons

who carry their bullion to the mint in order to be coined; and the want of a moderate seignorage does not in any case diminish it. Whether there is or is not a seignorage, if the currency contains its full standard weight, the coinage costs nothing to anybody; and if it is short of that weight, the coinage must always cos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bullion which ought to be contained in it, and that which actually is contained in it.

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增加银行或任何持金银块往铸币厂铸造的私人费用对于适中的铸币税，如果没有这适中的铸币税，也不会减少他们的费用。铸造不会使任何人破费，若通用货币包含了十足的标准重量，无论有无铸币税；若不及这重量，则铸造所费必等于铸币应合纯金量及其实含纯金量之差。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when it defrays the expence of coinage, not only incurs some small expence, but loses some small revenue which it might get by a proper duty; and neither the bank, nor any other private persons, are in the smallest degree benefited by this useless piece of public generosity.

因此，政府支付铸币成本时，产生的不仅是一些小额成本，还会损失少部分收入，若适当收税，可获得这些收入；且银行与任何其他个人从这种无用的公共给予中，都可获得可观的收入。

The directors of the bank, however, would probably be unwilling to agree to the imposition of a seignorage upon the authority of a speculation which promises them no gain, but only pretends to insure them from any loss.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gold coin, and as long as it continues to be received by weight, they certainly would gain nothing by such a change. But if the custom of weighing the gold coin should ever go into disuse, as it is very likely to do, and if the gold coin should ever fall into the same state of degradation in which it was before the late recoinage, the gain, or more properly the savings, of the bank, inconsequence of the imposition of a seignorage, would probably be very considerable. The bank of England is the only company which sends any considerable quantity of bullion to the mint, and the burden of the annual coinage falls entirely, or almost entirely, upon it. If this annual coinage had nothing to do but to repair the unavoidable losses and necessary wear and tear of the coin, it could seldom exceed fifty thousand, or at most a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But when the coin is degraded below its standard weight, the annual coinage must, besides this, fill up the large vacuities which exportation and the melting pot are continually making in the current coin. It was upon this account, that during the ten or twelve years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late reformation of the gold coin, the annual coinage amounted, at an average, to more than £850,000. But if there had been a seignorage of four or five per cent. upon the gold coin, it would probably, even in the state in which things then were, have put an effectual stop to the business both of exportation and of the melting pot. The bank, instead of losing every year about two and a half per cent. upon the bullion which was to be coined into more than eight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pounds, or incurring an annual loss of more than £21,250 pounds, would not probably have incurred the tenth part of that loss.

倘若你对银行理事说，铸币税的征收虽不能给他们以任何利得，却可保证他们没有任何损失，他们也许不听这些话，就同意征收铸币

税。在金币现状下，他们不会因这种改制而得到利益，只要继续以重量接受。如果你认为征收铸币税虽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利得，却可保证他们不遭受损失，他们也许不会听了这些话便同意征收铸币税。在当前金币的现状下，只要继续以重量计量，他们就不会因改制就得到利益。但如果秤衡金币的传统被废（很可能被废），同时金币的质量又下跌至最近改铸以前，那征收铸币税的结果就是使银行的利得，更确切的说是银行节省出来的利润也许会极为可观。只有英格兰银行会把大量金银块送到铸币厂去的银行；每年铸币费的负担也全部或几乎全部由它负担。如果每年铸币的用途仅仅是来弥补铸币必要的损失或磨损，那就不会常超过5万镑，至多也不会超过10万镑。但如果铸币低于标准重量，就需要除了弥补损失之外年年铸币来补充铸币因不断熔化及输出造成的巨大缺额。这也是金币改铸前10年到12年间每年平均铸币85万镑以上的原因。但如果在当时那中情况下征收4%或5%的金币铸造税，也许就能有效阻止铸币的输出与熔解。这样，银行每年就不会因铸造85镑以上的金块上损失2.5%的利润，换句话说就是每年不会损失21250镑以上，因为当时如果征收铸造税的话，它所损失的也许还不到这数额的1/10。

The revenue allotted by parliament for defraying the expence of the coinage is but fourteen thousand pounds a-year; and the real expence which it costs the government, or the fees of the officers of the mint, do not, upon ordinary occasions, I am assured, exceed the half of that sum. The saving of so very small a sum, or even the gaining of another, which could not well be much larger, are objects too inconsiderable, it may be thought, to deserve the serious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But the saving of eighteen or twenty thousand pounds a-year, in case of an event which is not improbable, which has frequently happened before, and which is very likely to happen again, is surely an object which well deserves the serious attention, even of so great a company as the bank of England.

议会每年把岁入中不到14,000镑用作铸币费用。但其实真正的花费，包括铸币厂职员俸给，一般而言可能都不过这一数额之的一般。对一些人而言节省这点数额，或想取得比这大不了多少的另一数额没有多大意义，甚至不值得政府严重的注意。但是，只要想节省就能节省，而且根据往年经验，每一年大约都能节省出18000镑或2万镑，即使对英格兰银行那么大的公司来说，这也是一个值得严肃注意的数额。

Some of the foregoing reasonings and observations might, perhaps, have been more properly placed in those chapters of the first book which treat of the origin and use of money, and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al and the nominal price of commodities. But as the law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coinage derives its origin from those vulgar prejudices which have been introduced by the mercantile system, I judged it more proper to reserve them for this chapter. Nothing could be more agreeable to the spirit of that system than a sort of bounty upon the production of money, the very thing which, it supposes, constitutes the wealth of every nation. It is one of its many admirable expedients for enriching the country.

上述一些议论放在第一篇论货币起源及其效用和论商品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区别的那几章内也许会更加适当。但由于奖励铸造的法律起源于重商主义的流俗偏见，所以我觉得放在这一章更为合适。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构成一切国家财富，那奖励货币就是最能与重商主义精神吻合的东西。货币生产奖金是重商主义富国妙策之一。

Chapter VII. Of Colonies

第七章、论殖民地

Part I.Of the Motives for Establishing New Colonies

第一节、论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

The interest which occasioned the first settlement of the different European colonies in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was not altogether so plain and distinct as that which direc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ose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最初，欧洲人在美洲及西印度建立殖民地的动机，不如蒙古、希腊和罗马建立殖民地时那般显而易见。

All the different states of ancient Greece possessed, each of them, but a very small territory; and when the people in anyone of them multiplied beyond what that territory could easily maintain, a part of them were sent in quest of a new habitation, in some remote and distant part of the world; the warlike neighbours who surrounded them on all sides, rendering it difficult for any of them to enlarge very much its territory at home. The colonies of the Dorians resorted chiefly to Italy and Sicily, which, in the times preceding the foundation of Rome, were inhabited by barbarous and uncivilised nations; those of the Ionians and Aeolians, the two other great tribes of the Greeks, to Asia Minor and the islands of the Aegean sea, of which the inhabitants sewn at that time to have been pretty much in the same state as those of Sicily and Italy. The mother city, though she considered the colony as a child, at all times entitled to great favour and assistance, and owing in return much gratitude and respect, yet considered it as an emancipated

child, over whom she pretended to claim no direct authority or jurisdiction. The colony settled its own form of government, enacted its own laws, elected its own magistrates, and made peace or war with its neighbours,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which had no occasion to wait for the approbation or consent of the mother city. Nothing can be more plain and distinct than the interest which directed every such establishment.

由于古希腊各邦占有的领土面积极小；任何一邦，若其人民增加到本邦领土难以维持，便会将一部分人民遣送出国，前往世界遥远之地寻找新居所。这些国家周边的邻人尽皆好战，使其任何一邦，很难在国内大势扩张领土。多里安人大多到意大利及西西里寻找殖民地。在罗马建立以前，这两地为野蛮人占居。伊沃尼亚人及伊沃利亚人（希腊另外两大部落）多数到小亚细亚及爱琴海各岛寻找殖民地。当时这两地的居民，与意大利及西西里的情况类似。虽然母市把殖民地视作儿子，常给与大的恩惠与援助，得到殖民地的感激，但却把殖民地视作已解放的儿子，不进行直接统治。殖民地自选政体，自定法律，自派官吏，而且在无需母市同意的情况下，可以独立国资格向邻国宣战媾和。这种殖民的动机是最为明显、最显而易见的。

Rome, like most of the other ancient republics, was originally founded upon an agrarian law, which divided the public territory, in a certain proportion, among the different citizens who composed the state. The course of human affairs, by marriage, by succession, and by alienation, necessarily deranged this original division, and frequently threw the lands which had been allott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many different families, into the possession of a single person. To remedy this disorder, for such it was supposed to be, a law was made, restricting the quantity of land which any citizen could possess to five hundred jugera; about 350 English

acres. This law, however, though we read of its having been executed upon one or two occasions, was either neglected or evaded, and the inequality of fortunes went on continually increas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itizens had no land; and without it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ose times rendered it difficult for a freeman to maintain his independency. In the present times, though a poor man has no land of his own, if he has a little stock, he may either farm the lands of another, or he may carry on some little retail trade; and if he has no stock, he may find employment either as a country labourer, or as an artificer. But among the ancient Romans, the lands of the rich were all cultivated by slaves, who wrought under an overseer, who was likewise a slave; so that a poor freeman had little chance of being employed either as a farmer or as a labourer. All trades and manufactures, too, even the retail trade, were carried on by the slaves of the rich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masters, whose wealth, authority, and protection, made it difficult for a poor freeman to maintain the competition against them. The citizens, therefore, who had no land, had scarce any other means of subsistence but the bounties of the candidates at the annual elections. The tribunes, when they had a mind to animate the people against the rich and the great, put them in mind of the ancient divisions of lands, and represented that law which restricted this sort of private property as the fundamental law of the republic. The people became clamorous to get land, and the rich and the great, we may believe, were perfectly determined not to give them any part of theirs. To satisfy them in some measure, therefore, they frequently proposed to send out a new colony. But conquering Rome was, even upon such occasions, under no necessity of turning out her citizens to seek their fortune, if one may so, through the wide world, without knowing where they were to settle. She assigned them lands generally in the conquered provinces of Italy, where, being within the dominions of the republic, they could never

form any independent state, but were at best but a sort of corporation, which, though it had the power of enacting bye-laws for its own government, was at all times subject to the correction, jurisdiction, and legislative authority of the mother city. The sending out a colony of this kind not only gave some satisfaction to the people, but often established a sort of garrison, too, in a newly conquered province, of which the obedience might otherwise have been doubtful. A Roman colony, therefore, whether we consider the nature of the establishment itself, or the motives for making it, was altogether different from a Greek one. The words, accordingly, which in the original languages denote those different establishments, have very different meanings. The Latin word (colonia) signifies simply a plantation. The Greek word (apoixia), on the contrary, signifies a separation of dwelling, a departure from home, a going out of the house. But though the Roman colonies were, in many respects, different from the Greek ones, the interest which prompted to establish them was equally plain and distinct. Both institutions derived their origin, either from irresistible necessity, or from clear and evident utility.

与其它大部分古代共和国一样，古罗马最初由一种土地分配法而建立，即按一定比例将所有的公有领地，分配给市民。但由于人事的变迁，如结婚、承继、割让，必会搞乱原来的分配，常使原来由许多家族把持的土地，归一个人占有。为消除这种弊端——他们也认为这是一种弊端，于是颁布了新的法律，限制各市民占有的土地量，不超过500朱格拉，约合350英亩。但据我所知，该法律尽管实施过一两次，但大都遭人回避和忽视，使得财产分配日益不均。大部分市民没有土地；但按当时的风俗人情，没有土地难以维持自由人的独立。当时，无土地贫民如果有一些资财，可租耕他人土地经营一种零售业；即便毫无资财，也可成为乡村劳动者或工匠。但在古罗马，富人土地都由奴隶耕种；奴隶在监工的监督下工作，监工自身也是奴隶；所

以，贫穷自由人难有机会成为农民或乡村劳动者。奴隶经营得所有商业、制造业，甚至零售业，都服务于主人的利益。主人们的财富、权威和防卫，使贫穷的自由人难以和他们一起竞争。因此，无地市民，除在每年选举时获得候选人的赠金外，几乎无别种赚钱方法。护民官想鼓励人民反抗富人时，便让人民追忆古代的土地分配制度，称限制那种私有财产的法律是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人民抗议要求获得土地，但我们坚信，富豪们是决不会分给他们任何土地。但为了适度满足他们的愿望，富豪们往往提议建立新殖民地。但即便作为殖民征服者，罗马在这种情形下也没必要把市民送到世界各地，以寻找出路。首先，需知道市民究竟将在何处定居。罗马把多数在意大利获得的土地，指派给他们。在那里，他们像在共和国领土上一样，不能建立任何独立的共和国，至多能构建一种自治团体。该种自治团体，虽有制定地方法律的权力，但须受母市的统治和惩罚，并遵守母市制定的法律。但建立这种殖民地，不仅是为了满足部分要求，而是因为在一个新的征服地，当地人民是否服从尚未可知，通常可借此在当地建立一种守备队。所以，罗马殖民地无论在其性质或建立的动机方面，都与希腊殖民地全不相同。因此，原来用以表示这种建制的术语，有其完全不同的意义。拉丁语colonia一词表示殖民；而希腊语则表示离家、离乡、出门。罗马殖民地虽在许多点上，与希腊殖民地不同，但在建立的动机方面，却同样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制度都可追溯到溯源可查证的实例。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opean colonies in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arose from no necessity; and though the utility which has resulted from them has been very great, it is not altogether so clear and evident. It was not understood at their first establishment, and was not the motive, either of that establishment, or of the discoveries which gave occasion to it; and the nature, extent, and limits of that utility, are not, perhaps, well understood at this day.

欧洲人在美洲及西印度建立殖民地，不是由于必要；虽然建立殖民地获取了很大的利益，但并不那么显著。在殖民地建立之初，没人知道存在这种利益；其建立及发现的动机，也并非这种利益。而迄今为止，人们对这种利益的性质、范围及界限仍不清楚。

The Venetians, during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carried on a very advantageous commerce in spiceries and other East India goods, which they distributed among the other nations of Europe. They purchased them chiefly in Egypt, at that time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Mamelukes, the enemies of the Turks, of whom the Venetians were the enemies; and this union of interest, assisted by the money of Venice, formed such a connexion as gave the Venetians almost a monopoly of the trade.

14世纪至15世纪期间，威尼斯人经营着一种利润丰厚的贸易，即向欧洲其他各国贩运香料及其它东印度货物。他们大都在埃及购买。埃及当时由高加索军人统辖。高加索军人和威尼斯人均为土耳其的敌人。这种共有的厉害关系和威尼斯货币的援助，使得他们结合起来，从而使威尼斯人享有贸易垄断权。

The great profits of the Venetians tempted the avidity of the Portuguese. They had been endeavouring,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o find out by sea a way to the countries from which the Moors brought them ivory and gold dust across the desert. They discovered the Madeiras, the Canaries, the Azores, the Cape de Verd islands, the coast of Guinea, that of Loango, Congo, Angola, and Benguela, and, finally, the Cape of Good Hope. They had long wished to share in the profitable traffic of the Venetians, and this last discovery opened to them a probable prospect of doing

so. In 1497, Vasco de Gamo sailed from the port of Lisbon with a fleet of four ships, and, after a navigation of eleven months, arrived upon the coast of Indostan; and thus completed a course of discoveries which had been pursued with great steadiness, and with very little interruption, for near a century together.

威尼斯人获得的丰厚利润，引发了葡萄牙人的贪欲。15世纪中，他们不辞艰辛发现了一条摩尔人跨沙漠给他们带来象牙和金砂的海道。他们发现了马德拉群岛、卡内里群岛、亚速尔群岛、佛德角群岛、几内亚海岸、卢安果、刚果、安哥拉、本格拉各海岸，最终还发现了好望角。他们早就希望抢占威尼斯人有利可图的贸易；最后一次的发现，为他们带来了可能分占利润的机会。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在此从里斯本港起航，带着四船为一队，经11个月航行，到达了印度斯坦海岸。一世纪来，经过艰辛努力，所有发现工作告一段落。

Some years before this, while the expectations of Europe were in suspense about the projects of the Portuguese, of which the success appeared yet to be doubtful, a Genoese pilot formed the yet more daring project of sailing to the East Indies by the west. The situation of those countries was at that time very imperfectly known in Europe. The few European travellers who had been there, had magnified the distance, perhaps through simplicity and ignorance; what was really very great, appearing almost infinite to those who could not measure it; or, perhaps, in order to increase somewhat more the marvellous of their own adventures in visiting regions so immensely remote from Europe. The longer the way was by the east, Columbus very justly concluded, the shorter it would be by the west. He proposed, therefore, to take that way, as both the shortest and the surest, and he had the good fortune to convince Isabella of Castile of the probability of his project. He sailed from the port of

Palos in August 1492, near five years before the expedition of Vasco de Gamo set out from Portugal; and, after a voyage of between two and three months, discovered first some of the small Bahama or Lucyan islands, and afterwards the great island of St. Domingo.

之前许多年，当欧洲人怀疑葡萄牙是否成功时，一名热那亚舵工，提出了更为胆大的计划，即西航达东印度。当时欧洲对东印度各国的情况尚不清楚。由于无知少数欧洲旅行家曾夸大这些地方的距离，在那些不能计量距离的人看来，本来很远的距离，显得无限的远，也许是想借此夸大他们自己冒险访问离欧洲很远的地方的奇迹。哥伦布的说法很有道理，向东走越远，那向西走便越近。他建议走这一条路，因为这条路最近又最稳当。幸亏他说服了克斯梯的伊莎贝拉，使她相信他的计划是可行的。于是，在比瓦斯科·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的5年前—1492年8月，他从帕罗斯港出航，经两三个月的航程，先发现了小巴哈马群岛，即庐克圆群岛中若干小岛，而后发现了圣多明各大岛。

But the countries which Columbus discovered, either in this or in any of his subsequent voyages, had no resemblance to those which he had gone in quest of. Instead of the wealth, cultivation, and populousness of China and Indostan, he found, in St. Domingo, and in all the other parts of the new world which he ever visited, nothing but a country quite covered with wood, uncultivated, and inhabited only by some tribes of naked and miserable savages. He was not very willing, however, to believe that they were not the same with some of the countries described by Marco Polo, the first European who had visited, or at least had left behind him any description of China or the East Indies; and a very slight resemblance, such as that which he found between the name of Cibao, a mountain in St. Domingo, and that of Cipange, mentioned

by Marco Polo, was frequently sufficient to make him return to this favourite prepossession, though contrary to the clearest evidence. In his letters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 he called the countries which he had discovered the Indies. He entertained no doubt but that they were the extremity of those which had been described by Marco Polo, and that they were not very distant from the Ganges, or from the countries which had been conquered by Alexander. Even when at last convinced that they were different, he still flattered himself that those rich countries were at no great distance; and in a subsequent voyage, accordingly, went in quest of them along the coast of Terra Firma, and towards the Isthmus of Darien.

但哥伦布此次航海及以后各次航海所发现的地方，都和他既定要访问的地方不相同。虽然他并未发现中国和印度的财富、农业与稠密人口，却在圣多明各以及他曾到过的新世界的其他所有地方，发现一处未开垦的丛林，这处丛林由赤身露体、贫穷落后的野蛮人所占领。但他不愿相信，自己所发现的地方并不是马可·波罗所描写的一些地方。马可·波罗是第一个抵达过中国和东印度的欧洲人，至少，他是第一个把当地情况描写下来的人。于是，哥伦布发现圣多明各一座西巴奥山的名字与马可·波罗提到的西潘各的名字相似，因此认为那是他早就知道的地方，虽然有证据表明不是那地方。在给斐迪南及伊莎贝拉的信中，他提到把自己发现的那些地方叫做印度。他相信那是马可·波罗所描写的一处地方，且与恒河相距不远，换言之也与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地方相距不远。即便后来判明了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他还认为，这地方离富庶国家不远。所以，他在之后的一次航行中沿火地岛海岸向达里恩地峡航行以探寻那些国家。

In consequence of this mistake of Columbus, the name of the Indies has stuck to those unfortunate countries ever since; and when it was at last clearly discovered that the new were altogether

different from the old Indies, the former were called the West, in contradistinction to the latter, which were called the East Indies.

鉴于哥伦布的这一错误，自那时以来，那些不幸的国家一直叫做印度。最后发现了新印度，它与老印度完全不同，因此为了加以区别把前者叫做西印度，后者叫做东印度。

It was of importance to Columbus, however, that the countries which he had discovered, whatever they were, should be represented to the court of Spain as of very great consequence; and, in what constitutes the real riches of every country, the animal and vegetable productions of the soil, there was at that time nothing which could well justify such a representation of them.

然而，在哥伦布看来不论所发现的是什么地方，重要的是需向西班牙宫廷陈述其重要性。在各国，构成真实财富的都是土地上生产的动植物，而当时这些地方生产的动植物，不能证明他的陈述是正确的。

The cori, something between a rat and a rabbit, and supposed by Mr Buffon to be the same with the aperea of Brazil, was the largest viviparous quadruped in St. Domingo. This species seems never to have been very numerous; and the dogs and cats of the Spaniards are said to have long ago almost entirely extirpated it, as well as some other tribes of a still smaller size. These, however, together with a pretty large lizard, called the ivana or iguana, constituted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 animal food which the land afforded.

科里是介于鼠和兔之间的一种动物。布丰认为，科里和巴西的阿帕里亚是同类。当时，它是圣多明各最大的胎生四足兽，似乎这种动物自来稀有。据说，西班牙人的犬与猫，很早之前几乎吃掉了所有这种动物和躯体比这还小的其他动物。然而，此类动物以及伊文诺或伊关诺所谓的大蜥蜴，是当地能提供的最为主要的动物性食物。

The vegetable food of the inhabitants, though, from their want of industry, not very abundant, was not altogether so scanty. It consisted in Indian corn, yams, potatoes, bananas, etc., plants which were then altogether unknown in Europe, and which have never since been very much esteemed in it, or supposed to yield a sustenance equal to what is drawn from the common sorts of grain and pulse, which have been cultivated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time out of mind.

由于农业不发达，居民的植物性食物虽不丰富，但并不像动物性食物那么稀少，主要为玉米、芋、薯、香蕉等。这些食物都是欧洲不知道的，也不为欧洲人所看重，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植物和欧洲原来生产的一般谷豆具有相同的营养。

The cotton plant, indeed, afforded the material of a very important manufacture, and was at that time, to Europeans, undoubtedly the most valuable of all the vegetable productions of those islands. But though, in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muslins and other cotton goods of the East Indies were much esteemed in every part of Europe,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tself was not cultivated in any part of it. Even this production, therefore, could not at that time appear in the eyes of Europeans to be of very

great consequence.

诚然，棉花是制造业极重要的材料，而当时在欧洲人看来，已是那些岛上最有价值的产物。虽然在15世纪末，欧洲各地都极重视东印度的软棉布及其他棉织品，但欧洲各地都没有棉织制造业，所以，即使这种生产物在当时欧洲人看来，也不很重要。

Finding nothing, either in the animals or vegetables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countries which could justify a very advantageous representation of them, Columbus turned his view towards their minerals; and in the richness of their productions of this third kingdom, he flattered himself he had found a full compensation for the insignificancy of those of the other two. The little bits of gold with which the inhabitants ornamented their dress, and which, he was informed, they frequently found in the rivulets and torrents which fell from the mountains, were sufficient to satisfy him that those mountains abounded with the richest gold mines. St. Domingo, therefore, was represented as a country abounding with gold, and upon that account (according to the prejudices not only of the present times, but of those times), an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real wealth to the crown and kingdom of Spain. When Columbus, upon his return from his first voyage, was introduced with a sort of triumphal honours to the sovereigns of Castile and Arragon, the principal productions of the countries which he had discovered were carried in solemn procession before him. The only valuable part of them consisted in some little fillets, bracelets, and other ornaments of gold, and in some bales of cotton. The rest were mere objects of vulgar wonder and curiosity; some reeds of an extraordinary size, some birds of a very beautiful plumage, and some stuffed skins of the huge alligator and manati; all of which

were preceded by six or seven of the wretched natives, whose singular colour and appearance added greatly to the novelty of the show.

哥伦布看到各地新发现的动植物，都不足证明这些地方的重要性，就把眼光转移到矿物上来。他认为，丰富的矿物，足够补偿动植物界微薄的生产。他看到那里居民的服装上挂着小金片，并听他们说，那金片常可从山上下流的溪流或急流中发现，于是他坚信，那里的山里必有最丰饶的金矿。这样，圣多明各就被说成为金矿丰饶的国家，并因此（不仅根据现今的偏见而且根据当时的偏见），被说成是西班牙国王及其国家取之不尽的真实财富的源泉。哥伦布第一次航海回国时，按凯旋仪式引见克斯梯及亚拉冈国王，当时所发现的各国主要生产物，都由隆重的仪仗队带在他前面。但部分有价值只是金小发带、金腕环及其他各种金饰品，和几捆棉花。其余都是俗人惊异和珍奇的物品，譬如，几株极大的芦苇，几只羽毛极美的鸟，几只大鳄鱼、大海牛的剥皮。但在这一切之前，有六七个颜色和相貌奇怪的土人大大增加了这次展览的新奇。

In consequence of the representations of Columbus, the council of Castile determin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countries of which the inhabitants were plainly incapable of defending themselves. The pious purpose of converting them to Christianity sanctified the injustice of the project. But the hope of finding treasures of gold there was the sole motive which prompted to undertake it; and to give this motive the greater weight, it was proposed by Columbus, that the half of all the gold and silver that should be found there, should belong to the crown. This proposal was approved of by the council.

哥伦布陈述的结果使得克斯梯的枢密院，决定占领这些国家。它们的人民，当然没有抵抗能力。传布基督教这个敬神的目的，使这种非正义的计划，成为神圣的事业。但此种计划的唯一动机是乞求发现这些地方的金宝藏。而且为了突出此动机，哥伦布提议在那里发现的金藏一半应归国王。枢密院所采纳了该提议。

As long as the whole, 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gold which the first adventurers imported into Europe was got by so very easy a method as the plundering of the defenceless natives, it was not perhaps very difficult to pay even this heavy tax; but when the natives were once fairly stript of all that they had, which, in St. Domingo, and in all the other countries discovered by Columbus, was done completely in six or eight years, and when, in order to find more, it had become necessary to dig for it in the mines, there was no longer any possibility of paying this tax. The rigorous exaction of it, accordingly, first occasioned, it is said, the total abandoning of the mines of St. Domingo, which have never been wrought since. It was soon reduced, therefore, to a third; then to a fifth; afterwards to a tenth; and at last to a twentieth part of the gross produce of the gold mines. The tax upon silver continued for a long time to be a fifth of the gross produce. It was reduced to a tenth only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But the first adventurers do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much interested about silver. Nothing less precious than gold seemed worthy of their attention.

最初冒险家输入欧洲的黄金，全部或极大部分是由极容易的方法取得，即向无抵抗的土人劫掠，所以，要纳这样的重税，也不会有困难。但土人所有，一旦完全被剥夺尽了——事实上，在圣多明各及哥伦布所发现的一切其他地方，不到6年或8年，就完全被剥夺尽了——

要再发现一些，就必须从矿中掘出，便不能再纳这样的税。据说，严格征收该税，曾使圣多明各的矿山完全停止开采。所以不久金税就减至金矿总生产额的1/3，1/5，再减至1/10，最后减至1/20。银税在长期内为总生产额的1/5。直到现世纪，才减至1/10。但最初的冒险家，对银似乎不大关心，他们认为，比金低贱的东西都不值得他们注意。

All the other enterprizes of the Spaniards in the New World, subsequent to those of Columbus, seem to have been prompted by the same motive. It was the sacred thirst of gold that carried Ovieda, Nicuessa, and Vasco Nugnes de Balboa, to the Isthmus of Darien; that carried Cortes to Mexico, Almagro and Pizarro to Chili and Peru. When those adventurers arrived upon any unknown coast, their first inquiry was always if there was any gold to be found there; and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which they received concerning this particular, they determined either to quit the country or to settle in it.

继哥伦布之后的西班牙冒险家，似乎都抱有同一动机。从奥维耶多、尼克萨、瓦斯科·努格尼斯·德巴尔博亚到达里恩地峡，从科尔特斯到墨西哥以及从阿尔马格罗和皮萨罗到智利和秘鲁，都是强烈渴望黄金。当这班冒险家到达一个未曾被发现的海岸时，首先调查的就是那里有没有金矿可以发现。并依此决定他们的去留。

Of all those expensive and uncertain projects, however, which bring bankruptcy upo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eople who engage in them, there is none, perhaps, more perfectly ruinous than the search after new silver and gold mines. It is, perhaps, the most disadvantageous lottery in the world, or the one in which the gain

of those who draw the prizes bears the least proportion to the loss of those who draw the blanks; for though the prizes are few, and the blanks many, the common price of a ticket is the whole fortune of a very rich man. Projects of mining, instead of replacing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them, together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commonly absorb both capital and profit. They are the projects, therefore, to which, of all others, a prudent lawgiver, who desired to increase the capital of his nation, would least choose to give any extraordinary encouragement, or to turn towards them a greater share of that capital than what would go to them of its own accord. Such, in reality, is the absurd confidence which almost all men have in their own good fortune, that wherever there is the least probability of success, too great a share of it is apt to go to them of its own accord.

在一切费用浩大、成就不定并使大部分从事者破产的计划中，探索新金银矿山最容易让人破产。这或许是世界上获利最少的彩票，得彩者的利得不能补偿失彩者的损失。因为，有奖的票很少，无奖的票很多，但每一张票的普通价格是一个富人的全部财产。开矿的计划，不仅不能补偿开矿的资本并获得基本利润，而且大多把资本和利润吞并掉。因此，这种计划是希望增加本国资本的精明立法者最不愿意给予的特别鼓励，或以人为的方法使大部分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其中的计划。其实，这就是人们对自身的幸运抱有不合理的信念，认为只要有丝毫成功的机会就会有很大一部分资本自行流入。

But though the judgment of sober reason and experience concerning such projects has always been extremely unfavourable, that of human avidity has commonly been quite otherwise. The same passion which has suggested to so many people the absurd idea of the philosopher's stone, has suggested to others the equally

absurd one of immense rich mines of gold and silver. They did not consider that the value of those metals has, in all ages and nations, arisen chiefly from their scarcity, and that their scarcity has arisen from the very small quantities of them which nature has anywhere deposited in one place, from the hard and intractable substances with which she has almost everywhere surrounded those small quantities, and consequently from the labour and expence which are everywher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enetrate, and get at them. They flattered themselves that veins of those metals might in many places be found, as large and as abundant as those which are commonly found of lead, or copper, or tin, or iron. The dream of Sir Waiter Raleigh, concerning the golden city and country of El Dorado, may satisfy us, that even wise men are not always exempt from such strange delusions.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that great man, the Jesuit Gumila was still convinced of the reality of that wonderful country, and expressed, with great warmth, and, I dare say, with great sincerity, how happy he should be to carry the light of the gospel to a people who could so well reward the pious labours of their missionary.

依靠冷静、理智与经验做出的判断是绝对不可行的，但由人类贪欲做出的判断，却认为是完全可行的。这使得许多人有了点石成金的那种荒唐欲望，又使许多其他人有了金银矿山无限丰饶那种荒唐观念。他们没考虑到，就所有时代和所有国民来说，此等金属的价值，主要出于其稀有性，而其稀有性，又出于自然藏量很少，而且那少量金属，含有坚硬且难于处理的物质，以致挖掘并获取此等金属所需耗费大量劳动力与费用。他们认为，这些金属的矿脉，像铅、铜、锡、铁的矿脉类似，大而丰饶。沃尔特·雷利爵士所做的黄金国梦，充分证明了，即使有智之士，亦不免有此种奇异的幻想。而在这位伟人死了之后100余年，还有耶稣教会会员加米拉相信这个黄金国的存在，而且极其狂热地表示，若他能为那些能以优厚报酬酬答传道工作的人宣

传福音，真是不胜荣幸。

In the countries first discovered by the Spaniards, no gold and silver mines are at present known which are supposed to be worth the working. The quantities of those metals which the first adventurers are said to have found there, had probably been very much magnified, as well as the fertility of the mines which were wrought immediately after the first discovery. What those adventurers were reported to have found, however, was sufficient to inflame the avidity of all their countrymen. Every Spaniard who sailed to America expected to find an El Dorado. Fortune, too, did upon this what she has done upon very few other occasions. She realized in some measure the extravagant hopes of her votaries; and in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Mexico and Peru (of which the one happened about thirty, and the other about forty, years after the first expedition of Columbus), she presented them with something not very unlike that profus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 which they sought for.

现在看来，在西班牙人最初发现的那些国家里，没有一个拥有值得开采的金银矿山。最初，各冒验家发现的金属量，以及第一次发现后，各矿山的产出力，都被过分夸大了。但冒险家的报道，足以唤起本国人的贪欲。每一个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人，都希望发现一个黄金国。无独有偶，命运女神的光临，使虔信者的狂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而且在墨西哥和秘鲁被发现与被征服的时候（一在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大约30年之后，一在大约40年之后），可以说他们从命运女神手上得到了他们所要寻找的丰饶贵金属。

A project of commerce to the East Indies, therefore, gave

occasion to the first discovery of the West. A project of conquest gave occasion to all the establishments of the Spaniards in those newly discovered countries. The motive which excited them to this conquest was a project of gold and silver mines; and a course of accidents which no human wisdom could foresee, rendered this project much more successful than the undertakers had any reasonable grounds for expecting.

与东印度通商的计划西印度的被第一次发现。一个征服的计划，又使得西班牙人在这些新发现的国家里建造设施。然而他们征服的动机，却又是发现金银矿山。又由于一系列意料不到的事故，发现金银矿山的计划超出了人们的合理期望，获得了巨大成功。

The first adventurers of all the other nations of Europe who attempted to make settlements in America, were animated by the like chimerical views; but they were not equally successful. It was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first settlement of the Brazils, before any silver, gold, or diamond mines, were discovered there. In the English, French, Dutch, and Danish colonies, none have ever yet been discovered, at least none that are at present supposed to be worth the working. The first English settlers in North America, however, offered a fifth of all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should be found there to the king, as a motive for granting them their patents. In the patents of Sir Waiter Raleigh, to the London and Plymouth companies, to the council of Plymouth, etc. this fifth was accordingly reserved to the crown. To the expectation of finding gold and silver mines, those first settlers, too, joined that of discovering a north-west passage to the East Indies. They have hitherto been disappointed in both.

最初企图到美洲去殖民的其他欧洲冒险家，也是受同样的欲望驱使，但他们并不怎么成功。巴西自第一次殖民以来，经过百余年才发现金、银和金刚石矿山。在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国的殖民地中，至今都未能发现过贵金属矿山，至少还没有发现目前看来具有开采价值的矿山。但最初在北美殖民的英国人，为诱使国王给与他们特许状，都承诺将发现的1/5金银献给国王。沃尔特·雷利爵士的特许状，伦敦公司及普里木斯公司的特许状，普里木斯参议会的特许状等，都以把所得金银1/5献给国王为条件。这些最初的殖民者，既希望发现金银矿山，又希望发现到东印度去的西北通路，但梦想双双落空。

Part II.Causes of the Prosperity of New Colonies

第二节、论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

The colony of a civilised nation which takes possession either of a waste country, or of one so thinly inhabited that the natives easily give place to the new settlers, advances more rapidly to wealth and greatness than any other human society.

文明国家的殖民地，其土地荒芜，或人口稀少而易屈服于新来的殖民者的地方，往往比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富强得更快。

The colonies carry out with them a knowledge of agriculture and of other useful arts, superior to what can grow up of its own accord, in the course of many centuries, among savage and barbarous nations. They carry out with them, too, the habit of subordination, some notion of the regular government which takes place in their own country, of the system of laws which support it,

and of a regular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they naturally establish something of the same kind in the new settlement. But among savage and barbarous nations, the natural progress of law and government is still slower than the natural progress of arts, after law and government have been so far established as is necessary for their protection. Every colonist gets more land than he can possibly cultivate. He has no rent, and scarce any taxes, to pay. No landlord shares with him in its produce, and, the share of the sovereign is commonly but a trifle. He has every motive to render as great as possible a produce which is thus to be almost entirely his own. But his land is commonly so extensive, that, with all his own industry, and with all the industry of other people whom he can get to employ, he can seldom make it produce the tenth part of what it is capable of producing. He is eager, therefore, to collect labourers from all quarters, and to reward them with the most liberal wages. But those liberal wages, joined to the plenty and cheapness of land, soon make those labourers leave him, in order to become landlords themselves, and to reward with equal liberality other labourers, who soon leave them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they left their first master. The liberal reward of labour encourages marriage. The children, during the tender years of infancy, are well fed and properly taken care of; and when they are grown up, the value of their labour greatly overpays their maintenance. When arrived at maturity, the high price of labour, and the low price of land, enable them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ir fathers did before them.

此等殖民者带来的关于农业和有用的技术知识，比未开化野蛮人几百年、几千年自发地成长要强大。同时，此类殖民者，又带来了统治者的习惯，关于正常政府的观念，维持政府的法制观念以及正常司法制度的观念。他们自然要把这些在新殖民地建立起来。但在未开化

野蛮民族中，在保护自身所必需的法律与政府已经确立之后，法律与政府的自然进步就比技术的自然进步要慢。每个殖民者所得的土地，多于他所能耕作的土地。他无须支付地租，无需纳税。没有地主分享他们的收获，通常君主所得都很少。他自会使生产物增加，因为生产物几乎全是归他所有。但他拥有的土地往往都很广阔，以致尽自己全力以及他所能雇用的劳动，来避免土地生产减少1/10。所以，他迫切从各地搜集劳动者，并以最优厚的工资作为报酬。但优厚的工资加上土地的丰饶低廉，不久就使那些劳动者离开雇佣者，自作地主，以优厚的工资，雇佣其他劳动者。正如他们离开他们的主人一样，雇佣的劳动者不久也离开他们。优厚的报酬鼓励了通婚。使得儿童们在幼年得到很好的给养，受到很好的照顾，长大时，其劳动的价值，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抚养费。到成年时，劳动的高回报与土地的低价格，使他们像祖先一样能够自给。

In other countries, rent and profit eat up wages, and the two superior orders of people oppress the inferior one; but in new colonies, the interest of the two superior orders obliges them to treat the inferior one with more generosity and humanity, at least where that inferior one is not in a state of slavery. Waste lands, of the greatest natural fertility, are to be had for a trifle. The increase of revenue which the proprietor, who is always the undertaker, expects from their improvement, constitutes his profit, which,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s commonly very great; but this great profit cannot be made, without employing the labour of other people in clearing and cultivating the land; and the disproportion between the great extent of the land and the small number of the people, which commonly takes place in new colonies, makes it difficult for him to get this labour. He does not, therefore, dispute about wages, but is willing to employ labour at any price. The high wages of labour encourage population. The cheapness and plenty of good land encourage improvement, and enable the proprietor to pay those

high wages. In those wages consists almost the whole price of the land; and though they are high, considered as the wages of labour, they are low, considered as the price of what is so very valuable. What encourages the progress of population and improvement, encourages that of real wealth and greatness.

在其他国家，地租和利润吞没工资，两个上层阶级压迫下层阶级。但在新殖民地，两个上层阶级的利害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更宽宏人道地对待下层阶级；至少，在那里，下层阶级不受奴隶。生产力极大的荒地，只须付出很小代价就能够获得。身兼企业家的地主，希望改善耕作来增加收入，增加的收入，便是他的利润。在这情况下，利润通常相当丰厚。但这种丰厚的利润，若果不雇用他人的劳动来开垦土地耕作，就无法保障。在新殖民地上，土地面积之大与人口之少的不相称现象，使他难于获得这种劳动。所以，他不计较工资，愿在任何价格下雇用劳动。劳动工资高昂，鼓励了人口繁育。肥沃土地价格低廉且产量高，促进了改善耕作，使地主能支付这样高的工资。土地的全部价格，几乎由此种工资构成。劳动工资虽高，但土地价值大，并未觉得工资有多高。增加人口奖励和耕作，促使了真实财富的强大。

The progress of many of the ancient Greek colonies towards wealth and greatness seems accordingly to have been very rapid. In the course of a century or two, several of them appear to have rivalled, and even to have surpassed, their mother cities. Syracuse and Agrigentum in Sicily, Tarentum and Locri in Italy, Ephesus and Miletus in Lesser Asia, appear, by all accounts, to have been at least equal to any of the cities of ancient Greece. Though posterior in their establishment, yet all the arts of refinement, philosophy, poetry, and eloquence, seem to have been cultivated as early, and to have been improved as highly in them as in any part of the

mother country The schools of the two oldest Greek philosophers, those of Thales and Pythagoras, were established, it is remarkable, not in ancient Greece, but the one in an Asiatic, the other in an Italian colony. All those colonies had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countries inhabited by savage and barbarous nations, who easily gave place to the new settlers. They had plenty of good land; and as they were altogether independent of the mother city, they were at liberty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 in the way that they judged was most suitable to their own interest.

许多古希腊殖民地，似乎因此非常迅速地进军富强。在一世纪或二世纪中，就有一些能与母市抗衡，甚至超过母市的殖民地。例如，西西里的锡拉库萨及阿格里琴托、意大利的他林敦及洛克里、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和米利都，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可与古希腊的任一城市抗衡。建设虽晚，但一切学艺、哲学、诗学及修词学，却和母国发展得一样早，取得水平一样高。值得指出，两个最右的希腊学派，即泰勒斯学派及毕达哥拉学派，并不是建立在古希腊，而是一个建立在亚细亚殖民地，另一个建立在意大利殖民地。这一切殖民地，都建立在野蛮民族所居的地方，新殖民者在那里容易取得他们的住处。新殖民者有很多丰饶的土地，而且因为他们完全独立于母市，他们还能按照最有利于的方式，自由处理自己的事物。

The history of the Roman colonies is by no means so brilliant. Some of them, indeed, such as Florence, have, in the course of many ages, and after the fall of the mother city, grown up to be considerable states. But the progress of no one of them seems ever to have been very rapid. They were all established in conquered provinces, which in most cases had been fully inhabited before. The quantity of land assigned to each colonist was seldom very considerable, and, as the colony was not independent, they were

not always at liberty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 in the way that they judged was most suitable to their own interest.

罗马殖民地历史，似乎没有这样辉煌。确实，例如弗洛伦斯，经过许多年代，在母市崩溃之后，发展成为大国，但其进步程度却较慢。那些殖民地，都建立在被征服的地方，那里人口大多早已十分稠密。分给新殖民者的土地，大都较小。而且由于殖民地不能独立，他们并非经常能按照自己认为的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自由处理事务。

In the plenty of good land, the European colonies established in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resemble, and even greatly surpass, those of ancient Greece. In their dependency upon the mother state, they resemble those of ancient Rome; but their great distance from Europe has in all of them alleviated more or less the effects of this dependency. Their situation has placed them less in the view, and less in the power of their mother country. In pursuing their interest their own way, their conduct has upon many occasions been overlooked, either because not known or not understood in Europe; and upon some occasions it has been fairly suffered and submitted to, because their distance rendered it difficult to restrain it. Even the violent and arbitrary government of Spain has, upon many occasions, been obliged to recall or soften the orders which had been given for the government of her colonies, for fear of a general insurrection. The progress of all the European colonies in wealth, population, and improvement, has accordingly been very great.

就良地众多这一点来说，欧洲人在美洲和西印度建立的殖民地，和古希腊殖民地相似，甚至超过古希腊殖民地。拿附属于母国这一点说，它们虽和古罗马殖民地相似，但因为它们离欧洲很远，或多或少

地减低了这种依附程度。它们的位置，使它们受母国的监视和支配较小。在它们按自己的方式追求利益时，它们的行为，或由于欧洲不知道，或由于欧洲不了解，往往被忽视。有时，欧洲只能容忍，由于距离较远，难于管束。所以，就连像西班牙这样的专横政府，往往因恐全体叛乱，而把已经下发的对所属殖民地政府的命令撤回或修改。这样一来，欧洲的一切殖民地，在财富、人口、改良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The crown of Spain, by its share of the gold and silver, derived some revenue from its colonies from the moment of their first establishment. It was a revenue, too, of a nature to excite in human avidity the most extravagant expectation of still greater riches. The Spanish colonies, therefore, from the moment of their first establishment, attracted very much the attention of their mother country; while those of the other European nations were for a long time in a great measure neglected. The former did not, perhaps, thrive the better in consequence of this attention, nor the latter the worse in consequence of this neglect.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the country which they in some measure possess, the Spanish colonies are considered as less populous and thriving than those of almost any other European nation. The progress even of the Spanish colonies, however, in population and improvement, has certainly been very rapid and very great. The city of Lima, founded since the conquest, is represented by Ulloa as containing fifty thousand inhabitants near thirty years ago. Quito, which had been but a miserable hamlet of Indians, is represented by the same author as in his time equally populous. Gemel i Carreri, a pretended traveller, it is said, indeed, but who seems everywhere to have written upon extreme good information, represents the city of Mexico as containing a hundred thousand inhabitants; a number which, in spite of all the exaggerations of the Spanish writers, is probably

more than five times greater than what it contained in the time of Montezuma. These numbers exceed greatly those of Boston, 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 the three greatest cities of the English colonies. Before the conquest of the Spaniards, there were no cattle fit for draught, either in Mexico or Peru. The lama was their only beast of burden, and its strength seems to have been a good deal inferior to that of a common ass. The plough was unknown among them. They were ignorant of the use of iron. They had no coined money, nor any established instrument of commerce of any kind. Their commerce was carried on by barter. A sort of wooden spade was their principal instrument of agriculture. Sharp stones served them for knives and hatchets to cut with; fish bones, and the hard sinews of certain animals, served them with needles to sew with; and these seem to have been their principal instruments of trade. In this state of things, it seems impossible that either of those empires could have been so much improved or so well cultivated as at present, when they are plentifully furnished with all sorts of European cattle, and when the use of iron, of the plough, and of many of the arts of Europe, have been introduced among them. But the populousness of every country must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degree of its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In spite of the cruel destruction of the natives which followed the conquest, these two great empires are probably more populous now than they ever were before; and the people are surely very different; for we must acknowledge, I apprehend, that the Spanish creoles are in many respects superior to the ancient Indians.

西班牙国王由于分享金银，所以从殖民地初建以来，即从殖民地取得若干收入。这种收入，同时使西班牙国王得意忘形。因此，西班牙殖民地，从初设时起，就受到母国很大的关注，而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在长期间内却对此不大留意。但前者并不因此而较为繁荣，后者

亦不因为没有这种注意而不繁荣。而且，按土地面积比例说，西班牙殖民地的人口与农业改良，比不上欧洲其他国家殖民地。但西班牙殖民地在人口与农业改良方面取得了迅速而巨大的进步。据乌略亚所说，征服后建立的利马市，在将近30年前，还不到5万人。然而，据同一作者说，基托原仅系印第安一小村落，在那时和利马市有相同的人口。克麦利·卡雷里——虽然据说是个冒牌旅行家，但其著作，却是根据极可靠的报告写作而成——提到墨西哥城有居民10万。所以，无论西班牙各作家是怎样夸大，这10万的数目，亦比蒙特苏马时代的居民数大5倍以上。这一数目远远超过了英国殖民地三大城市——波士顿、纽约和费拉德尔菲亚的居民数。在墨西哥或秘鲁未被西班牙人征服以前，没有适当的驮畜。骆马是唯一的驮畜，其力气似与一般驴子相差甚远。他们没有耕犁。他们不知用铁。他们没有铸币，亦没有任何确定的通商媒介。他们的贸易，是物物交换。一种木制的锄，是他们农业上的主要用具。尖石是他们砍东西的刀斧。鱼骨或其他类别动物的坚腱作为针来缝制东西。但这一切，似乎就是他们职业上的主要用具。在这样的状态下，此等帝国，当然不能取得如今那样的进步和更好的耕作。现在，那里已有各种欧洲牲畜，已使用铁和耕犁，并采用了许多欧洲技术。但所有国家的人口密度，必和其改良及耕作程度相符合。所以，土人被征服以来，虽横遭残杀，但这两大帝国现在的人口仍比从前多。其人种，自然亦大大改变了。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西班牙裔的西印度人，在许多方面都比古印第安人种强。

After the settlements of the Spaniards, that of the Portuguese in Brazil is the oldest of any European nation in America. But as for a long time after the first discovery neither gold nor silver mines were found in it, and as it afforded upon that account little or no revenue to the crown, it was for a long time in a great measure neglected; and during this state of neglect, it grew up to be a great and powerful colony. While Portugal was under the dominion of Spain, Brazil was attacked by the Dutch, who got possession of seven of the fourteen provinces into which it is divided. They expected soon

to conquer the other seven, when Portugal recovered its independency by the elevation of the family of Braganza to the throne. The Dutch, then, as enemies to the Spaniards, became friends to the Portuguese, who were likewise the enemies of the Spaniards. They agreed, therefore, to leave that part of Brazil which they had not conquered to the king of Portugal, who agreed to leave that part which they had conquered to them, as a matter not worth disputing about, with such good allies. But the Dutch government soon began to oppress the Portuguese colonists, who, instead of amusing themselves with complaints, took arms against their new masters, and by their own valour and resolution, with the connivance, indeed, but without any avowed assistance from the mother country, drove them out of Brazil. The Dutch, therefore, finding it impossible to keep any part of the country to themselves, were contented that it should be entirely restored to the crown of Portugal. In this colony there are said to be more than six hundred thousand people, either Portuguese or descended from Portuguese, creoles, mulattoes, and a mixed race between Portuguese and Brazilians. No one colony in America is supposed to contain so great a number of people of European extraction.

除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地，算得上是欧洲人在美洲建立的最早的殖民地。但鉴于巴西发现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找到金银矿山，所以对国王所能提供的收入也很少甚至没有。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非常不受葡萄牙人的关注。然而，就在这种不受关注的情况下，它发展成为了强大的殖民地。在葡萄牙还被西班牙统治时，巴西为荷兰人侵袭。巴西原分为十四省，荷兰人占其中七省。荷兰人本要夺取其他七省，但不久葡萄牙恢复独立，布拉甘查王朝执政。当时作为西班牙敌人的荷兰人，成为葡萄牙人的朋友，因而葡萄牙人亦成为西班牙的敌人。所以，荷兰人同意把巴西其余未征服的七省，留给葡萄牙；葡萄牙人亦同意把巴西已征服的七省，留给荷兰

人。当时，两国为良好同盟，自不会因此发生争执。但荷兰政府不久即开始压迫葡萄牙的移民。这些葡萄牙移民，不满足于口头抱怨，终于拿起武器对付他们的新主。他们虽未得到母国的公开援助，但在母国默许之下，凭借自己的勇气和决心，把荷兰人赶出了巴西。鉴于自己不能保有巴西任何领土，荷兰人同意把巴西全部归还给葡萄牙国王。在此殖民地内，据说有60万以上人口，其中，有葡萄牙人和其后裔、西印度人、黑白混血种人、葡萄牙族及巴西族的杂种人。在美洲殖民地中，找不到任何一地能包含诸多的欧洲血统。

Towards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and dur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Spain and Portugal were the two great naval powers upon the ocean; for though the commerce of Venice extended to every part of Europe, its fleet had scarce ever sailed beyond the Mediterranean. The Spaniards, in virtue of the first discovery, claimed all America as their own; and though they could not hinder so great a naval power as that of Portugal from settling in Brazil, such was at that time the terror of their name,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other nations of Europe were afraid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in any other part of that great continent. The French, who attempted to settle in Florida, were all murdered by the Spaniards. But the declension of the naval power of this latter nation, in consequence of the defeat or miscarriage of what they called their invincible armada, which happen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put it out of their power to obstruct any longer the settlements of the other European nations. In the cour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refore, the English, French, Dutch, Danes, and Swedes, all the great nations who had any ports upon the ocean, attempted to make some settlements in the new world.

15世纪末和16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西班牙与葡萄牙是两大海军

国。威尼斯虽与欧洲各地通商，但其舰队从未驶出过地中海。因为西班牙人第一个发现美洲，他们认为美洲的一切为他们所有。虽然他们不能阻止大海军国葡萄牙殖民巴西，但大部分其他欧洲国家，都极其惧怕西班牙，都不敢在这块大陆上建立殖民地。企图在弗罗里达建立殖民地的法国人，全被西班牙人杀掉。但自所谓无敌舰队在16世纪末失败后，西班牙的海军力量也逐渐衰败，再没有能力阻止其他欧洲国家进行殖民。所以，在17世纪中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一切有海港的大国，都想在新大陆上殖民地。

The Swedes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New Jersey; and the number of Swedish families still to be found there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s, that this colony was very likely to prosper, had it been protected by the mother country. But being neglected by Sweden, it was soon swallowed up by the Dutch colony of New York, which again, in 1674, fell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English.

瑞典人在新泽西建立殖民地。那里，现今仍可发现不少瑞典家族，充分证明了，这个殖民地若能得母国保护，很可能繁荣。但瑞典不重视这块殖民地，所以不久就被荷兰人的纽约殖民地吞并。荷兰人的纽约殖民地，则于1674年由英国人吞并。

The small islands of St. Thomas and Santa Cruz, are the only countries in the new world that have ever been possessed by the Danes. These little settlements, too, were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an exclusive company, which had the sole right, both of purchasing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 colonies, and of supplying them with such goods of other countries as they wanted, and which, therefore, both in its purchases and sales, had not only the power of oppressing them, but the greatest temptation to do so. The

government of an exclusive company of merchants is, perhaps, the worst of all governments for any country whatever. It was not, however, able to stop altogether the progress of these colonies, though it rendered it more slow and languid. The late king of Denmark dissolved this company, and since that time the prosperity of these colonies has been very great.

丹麦人在新世界上仅占有圣托马斯和圣克罗斯两个小岛。这两个小殖民地，由一个专营公司统治。只有这个公司，有权购买殖民者的剩余生产物，并供他们所需的外国货物。所以，在买卖上，这家公司不仅有权力压迫他们，而且有迫切的愿望压迫他们。专营商业公司的统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最坏的统治，它不但能阻止此类殖民地的进步，还使其进步较为迟缓。于是，丹麦前国王谕令解散此公司。从那时起，这两个殖民地就开始变得非常繁荣。

The Dutch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as well as those in the East Indies, were originally put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an exclusive company. The progress of some of them, therefore, though it has been considerable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almost any country that has been long peopled and established, has been languid and slow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new colonies. The colony of Surinam, though very considerable, is still inferior to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ugar colonies of the other European nations. The colony of Nova Belgia, now divided into the two provinces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would probably have soon become considerable too, even though it had remained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Dutch. The plenty and cheapness of good land are such powerful causes of prosperity, that the very worst government is scarce capable of checking altogether the efficacy of their operation. The great distance, too, from the mother country,

would enable the colonists to evade more or less, by smuggling, the monopoly which the company enjoyed against them. At present, the company allows all Dutch ships to trade to Surinam, upon paying two and a-half per cent. upon the value of their cargo for a license; and only reserves to itself exclusively, the direct trade from Africa to America, which consists almost entirely in the slave trade. This relaxation in the exclusive privileges of the company, is probably the principal cause of that degree of prosperity which that colony at present enjoys. Curacoa and Eustatia, the two principal islands belonging to the Dutch, are free ports, open to the ships of all nations; and this freedom, in the midst of better colonies, whose ports are open to those of one nation only, has been the great cause of the prosperity of those two barren islands.

荷兰人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的殖民地，原本都由一个专营公司统治。所以，与旧殖民地比较，这些殖民地中的一些，有很大进步，但与大部分新殖民地比较，其进步很慢。苏里南殖民地，虽很有发展潜力，但还不如其他欧洲国家的大部分蔗田殖民地。现今分成纽约和新泽西二省的诺瓦·伯尔基亚殖民地，在荷兰统治下，不久会很有潜力。土地丰饶而低廉促使了繁荣，所以，最不好的政治，也不能完全阻止这因素发挥有效作用。而且，离母国很远，移居者可因此通过走私，或多或少避免该公司所具有破坏性的垄断权。现今，该公司允许一切荷兰船只，在纳货物价值2.5%的税后，领取特许状方可与苏里南通商，但非洲与美洲间的直接贸易——那几乎全是奴隶买卖——依然为其垄断。公司专营特权减少，也许是殖民地今日能够如此繁荣的最大原因。库拉索亚和尤斯特沙——属于荷兰的两大岛——是自由港，各国船只都能自由出入。主要因为有了这种自由，这两岛虽是不毛之地，但由于其周围较好的海港允许各国船只自由出入，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繁荣。

The French colony of Canada was, dur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some part of the present,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an exclusive company. Under so unfavourable an administration, its progress was necessarily very slow,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other new colonies; but it became much more rapid when this company was dissolved, after the fall of what is called the Mississippi scheme. When the English got possession of this country, they found in it near double the number of inhabitants which father Charlevoix had assigned to it between twenty and thirty years before. That jesuit had travelled over the whole country, and had no inclination to represent it as less inconsiderable than it really was.

在上世纪大部分时间和现世纪一部分时间内，法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地由一个专营公司统治。在如此不良的行政下，与其他殖民地比较，其进步必然很缓慢；但在所谓的密西西比计划失败后，该公司解散，这里的殖民地的发展变快。这殖民地后来被英国占领时，与比神父查理瓦所述二三十年前的人口相比，其人口增加了约一倍。这位耶稣教会会员曾游历加拿大各地，当然不想少报其实际人数。

The French colony of St. Domingo was established by pirates and freebooters, who, for a long time, neither required the protection, nor acknowledged the authority of France; and when that race of banditti became so far citizens as to acknowledge this authority, it was for a long time necessary to exercise it with very great gentlenes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opul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is colony increased very fast. Even the oppression of the exclusive company, to which it was for some time subjected with all the other colonies of France, though it no doubt retarded, had not been able to stop its progress altogether. The course of its

prosperity returned as soon as it was relieved from that oppression. It is now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sugar colonies of the West Indies, and its produce is said to be greater than that of all the English sugar colonies put together. The other sugar colonies of France are in general all very thriving.

法国在圣多明各的殖民地，系由海盗建立。他们在长时期内，不需法国的保护，亦不承认法国的政权。后来，这批盗匪受了招安，承认了法国的政权，但在一段长时期内仍受着非常宽厚的待遇。在这时期内，这殖民地的人口与技术改进都发展得很快。那里在一段时期内，虽也受某一专营公司的压迫，这种压迫难免阻碍其进步，但其前进的步伐并不因此而停止。这种压迫一旦解除，其繁荣的速度，又和以往一样快。现在，那里是西印度最重要的蔗田殖民地。据说，其产量超过全部英属蔗田殖民地总产量。法国其他蔗田殖民地也产量惊人。

But there are no colonies of which the progress has been more rapid than that of the English in North America.

但进步最快的殖民地，要属英国的北美洲殖民地。

Plenty of good land, and liberty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 their own way, seem to be the two great causes of the prosperity of all new colonies.

一切新殖民地繁荣的两大原因似乎是，多肥沃土地以及按照自己方式自由处理事务。

In the plenty of good land, the English colonies of North America, though no doubt very abundantly provided, are, however, inferior to those of the Spaniards and Portuguese, and not superior to some of those possessed by the French before the late war. But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English colonies have been more favourable to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is land,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three nations.

针对上一点，英国的北美洲殖民地，虽有很多良田，但也比不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殖民地，也不比上战前法国人的一些殖民地。但与其他三国任何一国殖民地的政治制度相比，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制度更有利于土地的改良与耕作。

First, The engrossing of uncultivated land, though it has by no means been prevented altogether, has been more restrained in the English colonies than in any other. The colony law, which imposes upon every proprietor the obligation of improving and cultivating, within a limited tim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his lands, and which, in case of failure, declares those neglected lands grantable to any other person; though it has not perhaps been very strictly executed, has, however, had some effect.

第一，在英国殖民地上，未垦地的垄断虽未完全防止，但比任何其他殖民地更受限制。殖民地法规定，各个地主有义务在限定期间内，改良并耕作部分土地，而在不履行义务时，可把此种土地交给任何其他人。这种法律虽执行得不严格，但取得的效果非常好。

Secondly, In Pennsylvania there is no right of primogeniture, and lands, like moveables, are divided equally among all the children of the family. In three of the provinces of New England, the oldest has only a double share, as in the Mosaical law. Though in those provinces, therefore, too great a quantity of land should sometimes be engrossed by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it is likely, in the course of a generation or two, to be sufficiently divided again. In the other English colonies, indeed, the right of primogeniture takes place, as in the law of England: But in all the English colonies, the tenure of the lands, which are all held by free soccage, facilitates alienation; and the grantee of an extensive tract of land generally finds it for his interest to alienate, as fast as he can, the greater part of it, reserving only a small quit-rent. In the Spanish and Portuguese colonies, what is called the right of majorazzo takes place in the succession of all those great estates to which any title of honour is annexed. Such estates go all to one person, and are in effect entailed and unalienable. The French colonies, indeed, are subject to the custom of Paris, which, in the inheritance of land, is much more favourable to the younger children than the law of England. But, in the French colonies, if any part of an estate, held by the noble tenure of chivalry and homage, is alienated, it is, for a limited time, subject to the right of redemption, either by the heir of the superior, or by the heir of the family; and all the largest estates of the country are held by such noble tenures, which necessarily embarrass alienation. But, in a new colony, a great uncultivated estate is likely to be much more speedily divided by alienation than by succession. The plenty and cheapness of good land,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are the principal causes of the rapid prosperity of new colonies. The engrossing of land, in effect, destroys this plenty and cheapness. The engrossing of uncultivated land, besides, is the greatest obstruction to its improvement; but the labour that is employed in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land

affords the greatest and most valuable produce to the society. The produce of labour, in this case, pays not only its own wages and the profit of the stock which employs it, but the rent of the land too upon which it is employed. The labour of the English colonies, therefore, being more employed in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land, is likely to afford a greater and more valuable produce than that of any of the other three nations, which, by the engrossing of land, is more or less diverted towards other employments.

第二，在宾夕法尼亚没有长子继承权，土地如动产一样，平均分配给家中儿女。和摩西律一样，新英格兰只有三个省有法律，允许长子得双份土地。在这三省，虽有时有个别人垄断较多土地，但只要经过一两代，土地又可能得以充分分配。在其他英属殖民地，虽然与英国法律一样，长子继承权依然存在，但在一切莫领殖民地上，根据自由借地法保有的土地借用权，使土地易于割让，大多大块土地的领受人认为，为自己的利益，不如尽快割让大部分土地，只保留小额免役地租。在西班牙及葡萄牙殖民地上，凡附有勋爵称号的大地产，其继承都有所谓的长子继承权。这种大地产全由一个人继承，实际上都是限定继承的，都是不可割让的。法国殖民地都遵循巴黎风俗习惯，在土地继承方面，比英国法律更有利于幼小的儿子。但在法国殖民地中，有骑士尊号和领地称号的贵族保有地，若有割让任何部分，那在有限期间内，依照赎买权由领地继承人或家族继承人赎回。国内一切大所有地，都属于贵族保有地，这必然有碍割让。但在新殖民地上，未垦的大地产通过割让似乎比通过继承分割快得多。我们说过，肥沃土地的富庶与廉价，是殖民地迅速繁荣的主要原因。土地垄断，实际上破坏了这种富庶与低廉。此外，未耕地的垄断，又是土地改良的最大障碍。对社会提供最多和最大价值的生产物，是用来改良和耕作土地的劳动力。在这场合，劳动的生产物，不仅支付自己的工资和雇用劳动的资本，还支付耕作地的地租。所以，在英国，用于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移民劳动，比其他三国中任何一国多，因此所提供的生产物，在数量和价值方面，也可能较大。其他三国的殖民地，都实行土

地垄断，这或多或少地使劳动流入其他用途。

Thirdly, The labour of the English colonists is not only likely to afford a greater and more valuable produce, but, in consequence of the moderation of their taxes,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is produce belongs to themselves, which they may store up and employ in putting into motion a still greater quantity of labour. The English colonists have never yet contributed any thing towards the defence of the mother country, or towards the support of its civil government. They themselves, on the contrary, have hitherto been defended almost entirely at the expence of the mother country; but the expence of fleets and armies is out of all proportion greater than the necessary expence of civil government. The expence of their own civil government has always been very moderate. It has generally been confined to what was necessary for paying competent salaries to the governor, to the judges, and to some other officers of police, and for maintaining a few of the most useful public works. The expence of the civil establishment of Massachusetts Bay,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resent disturbances, used to be but about £18;000 a-year; that of New Hampshire and Rhode Island, £3500 each; that of Connecticut, £4000; that of New York and Pennsylvania, £4500 each; that of New Jersey, £1200; that of Virginia and South Carolina, £8000 each. The civil establishments of Nova Scotia and Georgia are partly supported by an annual grant of parliament; but Nova Scotia pays, besides, about £7000 a-year towards the public expences of the colony, and Georgia about £2500 a-year. All the different civil establishments in North America, in short, exclusive of those of Maryland and North Carolina, of which no exact account has been got, did not,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resent disturbances, cost the inhabitants about £64,700 a-year; an ever memorable

example, at how small an expence three millions of people may not only be governed but well governed.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pence of government, indeed, that of defence and protection, has constantly fallen upon the mother country. The ceremonial, too, of the civil government in the colonies, upon the reception of a new governor, upon the opening of a new assembly, etc. though sufficiently decent, is not accompanied with any expensive pomp or parade. Their ecclesiastical government is conducted upon a plan equally frugal. Tithes are unknown among them; and their clergy, who are far from being numerous, are maintained either by moderate stipends, or by the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of the people. The power of Spain and Portugal, on the contrary, derives some support from the taxes levied upon their colonies. France, indeed, has never drawn any considerable revenue from its colonies, the taxes which it levies upon them being generally spent among them. But the colony government of all these three nations is conducted upon a much more extensive plan, and is accompanied with a much more expensive ceremonial. The sums spent upon the reception of a new viceroy of Peru, for example, have frequently been enormous. Such ceremonials are not only real taxes paid by the rich colonists upon those particular occasions, but they serve to introduce among them the habit of vanity and expence upon all other occasions. They are not only very grievous occasional taxes, but they contribute to establish perpetual taxes, of the same kind, still more grievous; the ruinous taxes of private luxury and extravagance. In the colonies of all those three nations, too, the ecclesiastical government is extremely oppressive. Tithes take place in all of them, and are levied with the utmost rigour in those of Spain and Portugal. All of them, besides, are oppressed with a numerous race of mendicant friars, whose beggary being not only licensed but consecrated by religion, is a most grievous tax upon the poor people, who are most carefully taught that it is a duty to give, and a

very great sin to refuse them their charity. Over and above all this, the clergy are, in all of them, the greatest engrossers of land.

第三，英国移民的劳动，不仅可提供较多和较有价值的生产物，而且因为赋税适中，大部分生产物属于他们自己，他们可贮蓄起来，用以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英国移民，对于母国的国防和行政费用，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反之，迄今为止，卫护他们所需的费用，几乎全部由母国支付。海陆军饷费用，大大超过必要的行政费用，所以行政费用总是很少，一般只包括总督、裁判官及其若干警察官吏的适当薪俸，以及维持最有用的公共工程的费用。现今，扰乱事件发生以前，马萨诸塞的行政设施费，往往一年仅接近18000镑。新罕布什尔州及罗得岛的行政设施费，各为每年3500镑；康涅狄格5000镑；纽约及宾夕法尼亚各4500镑；新泽西1200镑；弗吉尼亚及南卡罗来纳各8000镑。新斯科舍及乔治亚的行政费，一部分由议会每年拨款。而新斯科舍每年仅支出殖民地行政费约7000镑；乔治亚每年仅拨款约2500镑。总之，北美全部的行政设施费，除了马里兰及北卡罗来纳两州无确切记载外，在截至扰乱事件发生以前，所有用于侨民的费用，不过每年64700镑；如此少的费用，可以统治300万人，而且统治得很好，那值得我们永远记忆。政府费用的最重要部分即全部防卫费，不断由母国负担。在欢迎新总督及新议会开幕之际，殖民地政府的仪式，虽十分隆重，但不铺张浪费。他们的教会，也同样节俭。他们没有什一税。他们为数不多的牧师，靠微薄的薪俸或人民的捐款维持生活。反之，西班牙及葡萄牙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对殖民地征收税费。法国虽不曾从其殖民地获得可观的收入，但征收殖民地的税，虽大都用在殖民地，但其行政费，却与其他两国一样异常庞大，而仪式的费用则更大。例如，欢迎一个秘鲁新总督，所需费用就往往不赀。此等仪式不仅使富裕的移民，要在这样的情形纳税，而且使他们在其他场合都养成了一种铺张浪费的习惯。那不仅是暂时的苛税，而且形成了长期且更重的税，即养成了能使私人倾家荡产的奢侈浪费习惯。此外，在这三国的殖民地中，教会也施行苛政。这些地方都收取什一税；在西班牙及葡萄牙两国殖民地中，更是雷厉风行。这些殖民地都

有很多托钵和尚募化，未经政府认可，但为宗教所尊崇，这对贫民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他们都受教导，认为布施和尚是义务，拒绝布施是极大的罪恶。而且，在这三国殖民地内，僧侣都是最大的土地垄断者。

Fourthly, In the disposal of their surplus produce, or of what is over and above their own consumption, the English colonies have been more favoured, and have been allowed a more extensive market,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European nation. Every European nation has endeavoured, more or less, to monopolize to itself the commerce of its colonies, and, upon that account, has prohibited the ships of foreign nations from trading to them, and has prohibited them from importing European goods from any foreign nation. But the manner in which this monopoly has been exercised in different nations, has been very different.

第四，英国殖民地，在处理剩余生产物即自己消费不了的生产物时，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且拥有更广阔的市场。各个欧洲国家，或多或少地都企图垄断其所属殖民地的贸易，并因此禁止外国船只和它们通商，禁止它们从任何外国输入欧洲货物。但实施此种垄断的方法不尽相同。

Some nations have given up the whole commerce of their colonies to an exclusive company, of whom the colonists were obliged to buy all such European goods as they wanted, and to whom they were obliged to sell the whole of their surplus produce. It was the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therefore, not only to sell the former as dear, and to buy the latter as cheap as possible, but to buy no more of the latter, even at this low price, than what they

could dispose of for a very high price in Europe. It was their interest not only to degrade in all cases the value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 colony, but in many cases to discourage and keep down the natural increase of its quantity. Of all the expedients that can well be contrived to stunt the natural growth of a new colony, that of an exclusive company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effectual. This, however, has been the policy of Holland, though their company,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has given up in many respects the exertion of their exclusive privilege. This, too, was the policy of Denmark, till the reign of the late king. It has occasionally been the policy of France; and of late, since 1755, after it had been abandoned by all other nations on account of its absurdity, it has become the policy of Portugal, with regard at least to two of the principal provinces of Brazil, Pernambucco, and Marannon.

有些国家把殖民地的全部贸易，交给一个专营公司经营。殖民地人民必须向这个公司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欧产货物，并必须把他们的全部剩余生产物卖给该公司。所以，这个公司的利益，不仅在于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卖出前一种货物，并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后一种货物，而且即使后一种货物价格极低，其购入数量应以能在欧洲市场以极高价格脱售为限。公司的利益，不仅在于降低殖民地剩余生产物的价值，而且在于阻抑其自然增加产量。要妨碍新殖民地的自然发展，在所有预设方案中，设立公司最为有效。这一方案一直是为荷兰人所奉行，虽然荷兰的公司在本世纪中，在许多方面已不行使其独营权。丹麦的政策也是如此，直到前一国王即位，才放弃这种政策。法国的政策，偶尔如此。最近，自1755年以来，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都认为这种政策不合理将其放弃，但葡萄牙却仍奉行此种政策，至少在巴西二大省即派南布科及马伦豪仍实施这种政策。

Other nations, without establishing an exclusive company, have

confined the whole commerce of their colonies to a particular port of the mother country, from whence no ship was allowed to sail, but either in a fleet and at a particular season, or, if single, in consequence of a particular license, which in most cases was very well paid for. This policy opened, indeed, the trade of the colonies to all the natives of the mother country, provided they traded from the proper port, at the proper season, and in the proper vessels. But as all the different merchants, who joined their stocks in order to fit out those licensed vessels, would find it for their interest to act in concert, the trade which was carried on in this manner would necessarily be conducted very nearly upon the same principles as that of an exclusive company. The profit of those merchants would be almost equally exorbitant and oppressive. The colonies would be ill supplied, and would be obliged both to buy very dear, and to sell very cheap. This, however, till within these few years, had always been the policy of Spain; and the price of all European goods, accordingly, is said to have been enormous in the Spanish West Indies. At Quito, we are told by Ulloa, a pound of iron sold for about 4s:6d., and a pound of steel for about 6s:9d. sterling. But it is chiefly in order to purchase European goods that the colonies part with their own produce. The more, therefore, they pay for the one, the less they really get for the other, and the dearness of the one is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cheapness of the other. The policy of Portugal is, in this respect, the same as the ancient policy of Spain, with regard to all its colonies, except Pernambucco and Marannon; and with regard to these it has lately adopted a still worse.

有些国家，没设立这种专营公司，但限制它们殖民地的全部贸易，使其仅与母国某特定港通商，除在一定期间准许船队出航，或准许有特许状（那大都是给付很高代价领得的）的单船出航外，其他船只都禁止从此特定港出航。诚然，这种政策，使母国全体居民都能从

事殖民地贸易，只要他们在适当的港口，在适当的期间，使用适当的船只进行便可。但投资装备船只并领受此等特许证的商人，为了利益合作起来，所以这种贸易方式，大体上按照类似专营公司的经营原则而经营。这种商人的利润，和专营公司的利润几乎一样高。殖民地决不会得到很好的供给；它们必须以极高的价格购买，在以极低的价格售卖。这是西班牙的政策，截至前几年；据说，一切欧产货物的价格，在西属西印度都很高。乌略亚告诉我们，在基托，一磅铁卖价约4先令6便士，一磅钢售价约6先令9便士。但殖民地售卖自己产物，主要是为了要购买欧洲产物。对于后者，他们付价越高，对于前者，他们实得价格就越低。后者的高价与前者的低价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这一方年，葡萄牙对于派南布科及马伦豪二省以外的殖民地所采取的政策，和西班牙旧时的政策，完全一样，而对于那二省，最近则变本加厉。

Other nations leave the trade of their colonies free to all their subjects, who may carry it on from all the different ports of the mother country, and who have occasion for no other license than the common despatches of the custom-house. In this case the number and dispersed situation of the different traders renders it impossible for them to enter into any general combination, and their competition is sufficient to hinder them from making very exorbitant profits. Under so liberal a policy, the colonies are enabled both to sell their own produce, and to buy the goods of Europe at a reasonable price; but sinc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Plymouth company, when our colonies were but in their infancy, this has always been the policy of England. It has generally, too, been that of France, and has been uniformly so since the dissolution of what in England is commonly called their Mississippi company. The profits of the trade, therefore, which France and England carry on with their colonies, though no doubt somewhat higher than if the competition were free to all other nations, are, however, by no

means exorbitant; and the price of European goods, accordingly, is not extravagantly high in the greater past of the colonies of either of those nations.

有些国家，允许它们全体人民经营殖民地贸易。母国人民，得从母国任何港口与殖民地通商，除了海关的一般证件外，不需要任何特许状。在这种情形下，经商者人数众多，而且散居各地，不能相互结合，他们彼此间的竞争，使得他们不能榨取非常高的利润。在这样宽大的政策下，殖民地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售卖他们自己的产物，购买欧洲的商品。自普里木斯公司解散以来（那时本国殖民地还在摇篮时期），这一直是英国所采用的政策。一般来说，这也是法国的政策，而自英国人通常所称的密西西比公司解散以来，法国的政策，就一直如此。所以，英法两国经营殖民地贸易的利润并不非常高的，假若准许其他各国自由竞争，利润或许更低。这两国大部分殖民地的欧产商品价格，照此来说不算异常的高。

In the exportation of their own surplus produce, too, it is only with regard to certain commodities that the colonies of Great Britain are confined to the market of the mother country. These commodities having been enumerated in the act of navigation, and in some other subsequent acts, have upon that account been called enumerated commodities. The rest are called non-enumerated, and may be exported directly to other countries, provided it is in British or plantation ships, of which the owners and three fourths of the mariners are British subjects.

在大不列颠殖民地剩余生产品输出方面，只有一定种类商品，限定输到母国市场。此等商品，因曾列举在航海法及此后颁布的其他法令上，故名为列举商品，其余称为非列举商品，可直接输到他国，但

运船须为英国船或殖民地船。此种船只，须为英国人所有，其船员亦须有3/4为英国人。

Among the non-enumerated commodities ar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ductions of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grain of all sorts, lumber, salt provisions, fish, sugar, and rum.

美洲及西印度有几种极重要产物，也包含在非列举商品中，如各种谷物、木材、腌制食品、鱼类、砂糖及甜酒。

Grain is naturally the first and principal object of the culture of all new colonies. By allowing them a very extensive market for it, the law encourages them to extend this culture much beyond the consumption of a thinly inhabited country, and thus to provide beforehand an ample subsistence for a continually increasing population.

一切新殖民地耕种的最初的和主要的耕作对象为谷物。法律准许殖民地拥有极广阔的谷物市场，这样便奖励它们推广这种耕作，使其产品大大超过稀少人口的消费，从而，事先为日益增加的人口，储存丰富的生活资料。

In a country quite covered with wood, where timber consequently is of little or no value, the expence of clearing the ground is the principal obstacle to improvement. By allowing the colonies a very extensive market for their lumber, the law endeavours to facilitate improvement by raising the price of a

commodity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of little value, and thereby enabling them to make some profit of what would otherwise be mere expence.

在树木丛生的地方，木材价值低廉，甚至没有价值，由此土地的开拓费用，就成了改良的主要障碍。法律准许殖民地有极广阔的木材市场，使得本来价值低廉的商品，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价格，并使它们能够从本来是完全耗费的事业中，获得若干利润，这样改良就变得容易了。

In a country neither half peopled nor half cultivated, cattle naturally multiply beyond the consumption of the inhabitants, and are often, upon that account, of little or no value. But it is necessary, it has already been shown, that the price of cattle should bear a certa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corn, befo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ands of any country can be improved. By allowing to American cattle, in all shapes, dead and alive, a very extensive market, the law endeavours to raise the value of a commodity, of which the high price is so very essential to improvement. The good effects of this liberty, however, must be somewhat diminished by the 4th of Geo. III. c. 15, which puts hides and skins among the enumerated commodities, and thereby tends to reduce the value of American cattle.

在人口仍然稀少，耕作还未充分发展的地方，牲畜的繁殖自会超过当地居民的消费，因此牲畜往往价值低廉，乃至没有价值。但我们说过，牲畜的价格与谷物的价格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一国大部分的土地才能够进行改良。法律使美洲的死牲畜和活牲畜都有最广阔的市场，想以此来提高这种商品的价值，因为这种商品价格上涨，对于土

地改良非常重要。乔治三世第四年第15号法令，把皮革和毛皮定为列举商品，降低了美洲牲畜的价值。上述自由产生的良好影响，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被这个法令所抵消。

To increase the shipping and naval power of Great Britain by the extension of the fisheries of our colonies, is an object which the legislature seems to have had almost constantly in view. Those fisheries, upon this account, have had all the encouragement which freedom can give them, and they have flourished accordingly. The New England fishery, in particular, was, before the late disturbanc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rhaps, in the world. The whale fishery which, notwithstanding an extravagant bounty, is in Great Britain carried on to so little purpose, that in the opinion of many people (which I do not, however, pretend to warrant), the whole produce does not much exceed the value of the bounties which are annually paid for it, is in New England carried on, without any bounty, to a very great extent. Fish is one of the principal articles with which the North Americans trade to Spain, Portugal, and the Mediterranean.

通过扩展殖民地渔业来增加本国航运业和海军的力量，似乎是本国议会经常拥有的目标。因此，这种渔业便取得了自由制度所能给予的一切奖励，得以迅速繁荣。特别是新英格兰的渔业，在近来的变乱之前，也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渔业之一。捕鲸业，在英国虽有异常的奖金，但收效甚微，在一般人看来（但我不想作这种意见的证人），它全部生产物的价值与每年所付奖金的价值持平。而在新英格兰，虽无奖金，却在大规模经营。鱼是北美洲与西班牙、葡萄牙及地中海沿岸各国通商中的一种主要商品。

Sugar was originally an enumerated commodity, which could only be exported to Great Britain; but in 1751, upon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sugar-planters, its exportation was permitted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The restrictions, however, with which this liberty was granted, joined to the high price of sugar in Great Britain, have rendered it in a great measure ineffectual. Great Britain and her colonies still continue to be almost the sole market for all sugar produced in the British plantations. Their consumption increases so fast, that, though in consequence of the increasing improvement of Jamaica, as well as of the ceded islands, the importation of sugar has increased very greatly within these twenty years, the exportation to foreign countries is said to be not much greater than before.

砂糖本来也是只许输到英国的列举商品。但1751年，经甘蔗栽种者请愿，砂糖输出开始允许扩展到世界各地。但在给予此种自由时，附有各种限制，而砂糖价格在英国非常高，因此这种自由产生的作用不大。英国及其殖民地，依然是英国蔗糖殖民地生产砂糖的仅有市场。它们的消费量增加得很快，虽得到牙买加和被割让各岛日益的改良，砂糖的输入在这20年内仍有极大的增加，而输到外国去的，据称不比之前输出到国外的多。

Rum is a very important article in the trade which the Americans carry on to the coast of Africa, from which they bring back negro slaves in return.

甜酒是美洲与非洲沿岸通商极为重要商品，而从这种通商带回来的造成的结果就是贩卖黑奴。

If the whole surplus produce of America, in grain of all sorts, in salt provisions, and in fish, had been put into the enumeration, and thereby forced into the market of Great Britain, it would have interfered too much with the produce of the industry of our own people. It was probably not so much from any regard to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as from a jealousy of this interference, that those important commodities have not only been kept out of the enumeration, but that the importation into Great Britain of all grain, except rice, and of all salt provisions, has, in the ordinary state of the law, been prohibited.

如果美洲各种谷物、腌制食品和鱼类的全部剩余生产物，都定为列举商品，强行输入英国市场，那就会过度妨害本国人民的劳动生产物。此等重要商品因此不但没被定为列举商品，而且除了稻米，在一般情况下，一切谷物及腌制食品，都被明令禁止输入英国，并不是为了照顾美洲的利益，而是为了防止这种伤害加重。

The non-enumerated commodities could originally be exported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Lumber and rice having been once put into the enumeration, when they were afterwards taken out of it, were confined, as to the European market, to the countries that lie south of Cape Finisterre. By the 6th of George III. c. 52, all non-enumerated commodities were subjected to the like restriction. The parts of Europe which lie south of Cape Finisterre are not manufacturing countries, and we are less jealous of the colony ships carrying home from them any manufactures which could interfere with our own.

非列举商品，原可输往世界的各个地方。木材及稻米，曾一度定

为列举商品，而后定为非列举商品，但允许输往的欧洲市场，也只是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欧洲各国。依照乔治三世第六年第52号法令，一切非列举商品，收到同样的限制。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欧洲各国，都不是制造业国。所以我们并不担心殖民地船只，从它们那里把能冲击到我们本国制造品的商品带到输到我们的市场。

The enumerated commodities are of two sorts; first, such as are either the peculiar produce of America, or as cannot be produced, or at least are not produced in the mother country. Of this kind are molasses, coffee, cocoa-nuts, tobacco, pimento, ginger, whalefins, raw silk, cotton, wool, beaver, and other peltry of America, indigo, fustick, and other dyeing woods; secondly, such as are not the peculiar produce of America, but which are, and may be produced in the mother country, though not in such quantities as to supply the greater part of her demand, which is principally suppli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Of this kind are all naval stores, masts, yards, and bowsprits, tar, pitch, and turpentine, pig and bar iron, copper ore, hides and skins, pot and pearl ashes. The largest importation of commodities of the first kind could not discourage the growth, or interfere with the sale, of any part of the produce of the mother country. By confining them to the home market, our merchants, it was expected, would not only be enabled to buy them cheaper in the plantations, and consequently to sell them with a better profit at home, but to establish between the plantations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 advantageous carrying trade, of which Great Britain was necessarily to be the centre or emporium, as the European country into which those commodities were first to be imported. The importation of commodities of the second kind might be so managed too, it was supposed, as to interfere, not with the sale of those of the same kind which were produced at home, but with that of those which were import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because, by

means of proper duties, they might be rendered always somewhat dearer than the former, and yet a good deal cheaper than the latter. By confining such commodities to the home market, therefore, it was proposed to discourage the produce, not of Great Britain, but of some foreign countries with which the balance of trade was believed to be unfavourable to Great Britain.

列举商品共有二类。第一类，是美洲专有的产品，或是母国所不能生产，或不生产的产品。这一类商品有:蜜糖、咖啡、椰子果、烟草、红胡椒、生姜、鲸须、生丝、棉花、海狸皮和美洲其他各种毛皮、靛青、黄佛提树及其他各种染色树木等。第二类，非美洲专有的产品，母国也能够生产，但因其产品较少，供不应求，以致有大部分要进口自外国。这一类的，有所有海军用品，船桅、帆桁、牙樯、松脂、柏油、松香油、生铁、铁条、铜矿、生皮、皮革、锅罐、珍珠灰等。第一类商品即使最大量输入，也不会妨碍母国任何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我们的商人希望对这类商品进行限制，使其仅能输送到本国市场，这种限制为他们能在殖民地廉价购买提供了便利，从而在国内售卖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而且必须以英国为中心，才能在殖民地与外国之间，设立一种有利的转口贸易。也就是说，这样的商品输入欧洲，必须先输到英国。第二类商品的输入也应该妥为安排，使其不妨碍本国同类产品的售卖，只妨害外国输入品的售卖。因为，制定适当税收，那种商品总会比前者略贵，但比后者廉价得多。限制此等商品，使其仅能输入本国市场，并不是要妨碍英国产品，所要妨碍的，乃是那些外国的产物，它们的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英国。

The prohibition of exporting from the colonies to any other country but Great Britain, masts, yards, and bowsprits, tar, pitch, and turpentine, naturally tended to lower the price of timber in the colonies, and consequently to increase the expence of clearing their lands, the principal obstacle to their improvement. But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century, in 1703, the pitch and tar company of Sweden endeavoured to raise the price of their commodities to Great Britain, by prohibiting their exportation, except in their own ships, at their own price, and in such quantities as they thought proper. In order to counteract this notable piece of mercantile policy, and to render herself as much as possible independent, not only of Sweden, but of all the other northern powers, Great Britain gave a bounty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naval stores from America; and the effect of this bounty was to raise the price of timber in America much more than the confinement to the home market could lower it; and as both regulations were enacted at the same time, their joint effect was rather to encourage than to discourage the clearing of land in America.

船桅、帆桁、牙樯、松脂、柏油被禁止从殖民地输到大不列颠以外的任何国家，自然会使殖民地木材价格降低，因而会增加殖民地土地的开拓费用。这是改良土地的主要障碍。1703年，瑞典松脂柏油公司规定，禁止其商品输出，除非由它的船只装运，按其自定价格，并按其认为适当的数量运出。它想要通过这办法来抬高出口英国产品的价格。为了要对抗这一个引人注目的商业政策，并使英国不仅不依赖瑞典，而且无须依赖任何其他的北方国家，英国发奖金鼓励美洲海军用品的输入。这种奖金，使美洲木材价格抬高，大大超过了木材限定输入国内市场可以减低的程度。因为同时颁布了这两个规定，其连带的作用，是鼓励美洲土地开拓，而不是妨碍。

Though pig and bar iron, too, have been put among the enumerated commodities, yet as, when imported from America, they are exempted from considerable duties to which they are subject when imported front any other country, the one part of the regulation contributes more to encourage the erection of furnaces in

America than the other to discourage it. There is no manufacture which occasions so great a consumption of wood as a furnace, or which can contribute so much to the clearing of a country overgrown with it.

虽然列举商品中也包含生铁和铁条，但从美洲输入，免纳重税，而从其他各国输入，税收却很重，所以这规则一部分对美洲制铁厂建设做出了鼓励，另一部分却也妨碍了其发展，而鼓励的作用大于妨碍。没有一种制造业，柴火消费有熔铁炉那么大，或能那么促进开拓树木遍野的地方。

The tendency of some of these regulations to raise the value of timber in America, and thereby to facilitate the clearing of the land, was neither, perhaps, intended nor understood by the legislature. Though their beneficial effects, however, have been in this respect accidental, they have not upon that account been less real.

这些规定，有些会使美洲木材价值提高，因而促进土地的开拓。但这种趋势，立法机关并未注意，也不会理解。其有利效果，虽很偶然，但并不因此而不真实。

The most perfect freedom of trade is permitted between the British colonies of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both in the enumerated and in the non-enumerated commodities Those colonies are now become so populous and thriving, that each of them finds in some of the others a great and extensive market for every part of its produce. All of them taken together, they make a great internal market for the produce of one another.

无论就列举商品说或就非列举商品说，英属美洲殖民地及西印度间的贸易，自由度都最高。此等殖民地现在非常富庶，所以对于彼此所有的产物能提供广大的市场。把这些殖民地合起来，那对于各自的产物，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

The liberality of England, however, towards the trade of her colonies, has been confined chiefly to what concerns the market for their produce, either in its rude state, or in what may be called the very first stage of manufacture. The more advanced or more refined manufactures, even of the colony produce, the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of Great Britain chuse to reserve to themselves, and have prevailed upon the legislature to prevent their establishment in the colonies, sometimes by high duties, and sometimes by absolute prohibitions.

但其殖民地贸易所采用的宽大政策，英国主要限于粗制品或原料的贸易。至于殖民地产品更精致的加工，制造者和商人要自己经营，并向国会请求，通过高关税或组对进行禁止，从而使殖民地无法建立这些制造业。

While, for example, Muscovado sugars from the British plantations pay, upon importation, only 6s:4d. the hundred weight, white sugars pay £1:1:1; and refined, either double or single, in loaves, £4:2:5 8/20ths. When those high duties were imposed, Great Britain was the sole, and she still continues to be, the principal market, to which the sugar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could be exported. They amounted, therefore, to a prohibition, at first of claying or refining sugar for any foreign market, and at present of

claying or refining it for the market which takes off, perhaps, more than nine-tenths of the whole produce. The manufacture of claying or refining sugar, accordingly, though it has flourished in all the sugar colonies of France, has been little cultivated in any of those of England, except for the market of the colonies themselves. While Grenada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French, there was a refinery of sugar, by claying, at least upon almost every plantation. Since it fell into those of the English, almost all works of this kind have been given up; and there are at present (October 1773), I am assured, not above two or three remaining in the island. At present, however, by an indulgence of the custom-house, clayed or refined sugar, if reduced from loaves into powder, is commonly imported as Muscovado.

例如，粗制砂糖从英属殖民地输入，每百斤只需要纳税6先令4便士，白糖则需1镑1先令1便士的纳税，精制糖块单制或复制，纳税4镑2先令5又8/20。在如此严苛的征税下，英属殖民地砂糖输出的唯一市场是英国，而且至今仍然如此。这种高的关税，起初等于对白糖或精制砂糖禁止，使其无法在外国市场供应，现在又相当于直接禁止制造，使其不能供应，尽管在这一市场其销量占总产量9/10。因此，砂糖精制业在法国蔗糖殖民地很发达，但在英国殖民地上，只有供应殖民地本地市场的精制业。当法国人占领格伦纳达时，其他各蔗园，至少也有砂糖漂白厂。但一经英国人占领，这一类制造厂就几乎全部放弃了。现今（1773年10月）我相信，这岛上最多只有两三个厂。但是，因为现今海关宽纵，若能将块状研成粉末，白糖或精制糖通常可作为粗砂糖输入。

While Great Britain encourages in America the manufacturing of pig and bar iron, by exempting them from duties to which the like commodities are subject when imported from any other

country, she imposes an absolute prohibition upon the erection of steel furnaces and slit-mills in any of her American plantations. She will not suffer her colonies to work in those more refined manufactures, even for their own consumption; but insists upon their purchasing of her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all goods of this kind which they have occasion for.

英国，一方面允许从美洲无税输入生铁和铁条（由他国输入，则不能免税），对美洲这种制造业进行奖励，另一方面却又对在任何英属殖民地上建立制钢厂及铁工厂绝对禁止。它甚至不允许其殖民地人民为自身消费而制作这种精制品，却要他们向商人和制造者购买。

She prohibits the exportation from one province to another by water, and even the carriage by land upon horseback, or in a cart, of hats, of wools, and woollen goods, of the produce of America; a regulation which effectually prevent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y manufacture of such commodities for distant sale, and confines the industry of her colonists in this way to such coarse and household manufactures as a private family commonly makes for its own use, or for that of some of its neighbours in the same province.

它又禁止把美洲生产的帽、羊毛和毛织物，由水运，甚至由车马陆运，从一省运至另一省。这种条例，很有效地使这个殖民地无法以远地贩卖为目的建立这一类商品的制造业，这样殖民地人民只能经营那些粗糙物品的家庭制造业，它们通常仅供自用或其同省邻人使用。

To prohibit a great people, however, from making all that they can of every part of their own produce, or from employing their

stock and industry in the way that they judge most advantageous to themselves, is a manifest violation of the most sacred rights of mankind. Unjust, however, as such prohibitions may be, they have not hitherto been very hurtful to the colonies. Land is still so cheap, and, consequently, labour so dear among them, that they can import from the mother country almost all the more refined or more advanced manufactures cheaper than they could make them for themselves. Though they had not, therefore, been prohibited from establishing such manufactures, yet, in their present state of improvement, a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 would probably have prevented them from doing so. In their present state of improvement, those prohibitions, perhaps, without cramping their industry, or restraining it from any employment to which it would have gone of its own accord, are only impertinent badges of slavery imposed upon them, without any sufficient reason, by the groundless jealousy of the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of the mother country. In a more advanced state, they might be really oppressive and insupportable.

禁止人民大众制造他们所能制造的物品，不能把自己的资财与劳动，按照自己的判断投在最有利的用途上，这显然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然而，虽是那么不公正，此种禁令并没在很大程度上妨害殖民地。土地仍然低廉，劳动仍然昂贵，以致相比自己制，造他们仍能以更低廉的价格，从母国输入几乎一切种类的精制品。所以，在现有改良情况下，即使不对建立这一类制造业进行禁止，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也许就会不愿经营这种事业。在现有的改良情况下，此等禁令也许并未使他们的劳动受到拘束，也没使他们的劳动不能投在按自然趋势要投的用途上。不过母国商人和制造者由于无根据的嫉妒，毫无理由地在他们身上加上无礼的奴役标记。但在比较进步的情况下，这种禁令很可能成为不能容忍的真正的压迫。

Great Britain, too, as she confines to her own market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ductions of the colonies, so, in compensation, she gives to some of them an advantage in that market, sometimes by imposing higher duties upon the like productions when imported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sometimes by giving bounties upon their importation from the colonies. In the first way, she gives an advantage in the home market to the sugar, tobacco, and iron of her own colonies; and, in the second, to their raw silk, to their hemp and flax, to their indigo, to their naval stores, and to their building timber. This second way of encouraging the colony produce, by bounties upon importation, is, so far as I have been able to learn, peculiar to Great Britain: the first is not. Portugal does not content herself with imposing higher dutie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tobacco from any other country, but prohibits it under the severest penalties.

大不列颠限定输入殖民地某几种极重要产物，的市场，作为补偿，它又使某几种产物在市场里占有某种优势，以对由他国输入的同种产物征收高关税为手段，而给予奖金给由殖民地输入的商品。按前一种方法，它在国内市场里把上述好处给予殖民地的砂糖、烟草和铁，按后一种方法，它把输入奖金给予殖民地的生丝、大麻、亚麻、靛青、海军用品和建筑木材。这第二种方法，据我所知，是英国所特有的。第一种方法却不仅如此。葡萄牙不满足于仅以高关税限制从殖民地以外任何其他地方输入本国的烟草，干脆以重罚禁止其输入。

With regard to the importation of goods from Europe, England has likewise dealt more liberally with her colonies than any other nation.

英格兰对于殖民地欧洲货物的输入的处置，也比任何其他国家宽大。

Great Britain allows a part, almost always the half, generally a larger portion, and sometimes the whole, of the duty which is paid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goods, to be drawn back upon their exportation to any foreign country. No independent foreign country, it was easy to foresee, would receive them, if they came to it loaded with the heavy duties to which almost all foreign goods are subjected on their importation into Great Britain. Unless, therefore, some part of those duties was drawn back upon exportation, there was an end of the carrying trade; a trade so much favoured by the mercantile system.

对于外货输入时的纳税，大不列颠准其在再输出时，退还一部分，几乎是一半，一般是大部分，有时是全部。若外货输入英国时须征收极重的税，而在再输出时又不许退还，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外国能够承受这种再输出的商品。所以，重商主义提倡的转口贸易便会告终，除非在输出时退还部分的税。

Our colonies, however, are by no means independent foreign countries; and Great Britain having assumed to herself the exclusive right of supplying them with all goods from Europe, might have forced them (in the same manner as other countries have done their colonies) to receive such goods loaded with all the same duties which they paid in the mother country. But, on the contrary, till 1763, the same drawbacks were paid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foreign goods to our colonies, as to any independent foreign country. In 1763, indeed, by the 4th of Geo. III. c. 15, this

indulgence was a good deal abated, and it was enacted, “That no part of the duty called the old subsidy should be drawn back for any goods of the growth, production, or manufacture of Europe or the East Indies, which should be exported from this kingdom to any British colony or plantation in America; wines, white calicoes, and muslins, excepted.” Before this law, many different sorts of foreign goods might have been bought cheaper in the plantations than in the mother country, and some may still.

但殖民地并不是独立的外国，而以一切欧洲商品供给其所属殖民地的专营权利又被英国取得，正如他国对付殖民地一样，强制其所属殖民地＝承受在输入母国时征收重税的商品。但在1763年以前，大部分外货，在输到本国殖民地时和输到任何独立外国时一样，需要退税。不过，1763年乔治三世第四年第15号法令，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这种宽大待遇，它规定：“从本王国输到任何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欧洲或东印度的农产品、制造品，不得退还称为旧补贴税的那一种赋税的任何部分，但葡萄酒、白洋布、细洋布除外。”在这法律颁布之前，有许多种外国货，在殖民地购买更加价廉；现在仍然如此。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colony trade, the merchants who carry it on, it must be observed, have been the principal advisers. We must not wonder, therefore, if, in a great part of them, their interest has been more considered than either that of the colonies or that of the mother country. In their exclusive privilege of supplying the colonies with all the goods which they wanted from Europe, and of purchasing all such parts of their surplus produce as could not interfere with any of the trades which they themselves carried on at home, the interest of the colonies was sacrificed to the interest of those merchants. In allowing the same drawbacks upon the re-exporta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an and East India goods to the colonies, as upon their re-exportation to any independent country, the interest of the mother country was sacrificed to it, even according to the mercantile ideas of that interest. It was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merchants to pay as little as possible for the foreign goods which they sent to the colonies, and, consequently, to get back as much as possible of the duties which they advanced upon their importation into Great Britain. They might thereby be enabled to sell in the colonies, either the same quantity of goods with a greater profit, or a greater quantity with the same profit, and, consequently, to gain something either in th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 was likewise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colonies to get all such goods as cheap, and in as great abundance as possible. But this might not always be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mother country. She might frequently suffer, both in her revenue, by giving back a great part of the duties which had been paid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such goods; and in her manufactures, by being undersold in the colony market, in consequence of the easy terms upon which foreign manufactures could be carried thither by means of those drawbacks. The progress of the linen manufacture of Great Britain, it is commonly said, has been a good deal retarded by the drawbacks upon the re-exportation of German linen to the American colonies.

在制定大部分关于殖民地贸易的条例时，经营殖民地贸易的商人都是主要顾问，那是必须知道的。所以，此等条例，更加注意这种商人的利益，而不是殖民地或母国的利益，这一点不足为怪。专营的特权使他们有可以输运欧洲货物供应殖民地，又可以购买殖民地不妨害他们国内贸易的那部分剩余生产物。这种专营的特权，显然是顾全商人的利益，却牺牲了殖民地的利益。像输到独立国家去一样，他们在把欧洲及东印度大部分货物再输到殖民地去的时候，又享有退税。这种退税，即按照重商主义的利益观念，亦是顾全商人的利益，牺牲母

国利益。商人的利益在于，运送外国货物到殖民地去时，尽可能少纳税，对输入英国的外国货物，所垫付的税尽可能收回。这样他们就能在殖民地售卖较大数量货物，得到同样多的利润，或售卖等量货物，得到较多利润，这方面或那方面得利。殖民地的利益同样在于，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取得尽可能多的货物。但母国的利益，未必是这样。退还此等货物输入时所纳税的大部分，会使母国的收入受到影响；这种退税使外国制造品以更优惠的条件运到殖民地，母国制造品在殖民地市场跌价售卖，母国的制造业受到影响。人们常说，德国亚麻布再输到美洲殖民地的退税，使英国亚麻布制造业的进步大大推迟。

But though the policy of Great Britain, with regard to the trade of her colonies, has been dictated by the same mercantile spirit as that of other nations, it has, however, upon the whole, been less illiberal and oppressive than that of any of them.

但是，英国关于殖民地贸易的政策，虽和其他各国一样，被重商主义精神的支配，但总的说来，不像任何其他国家那么令人难受和狭隘。

In every thing except their foreign trade, the liberty of the English colonists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 their own way, is complete. It is in every respect equal to that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at home, and is secured in the same manner, by an assembly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 who claim the sole right of imposing taxes for the support of the colony government. The authority of this assembly overawes the executive power; and neither the meanest nor the most obnoxious colonist, as long as he obeys the law, has any thing to fear from the resentment, either of the governor, or of any other civil or military officer in the province.

The colony assemblies, though, like the house of commons in England, they are not always a very eq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yet they approach more nearly to that character; and as the executive power either has not the means to corrupt them, or, on account of the support which it receives from the mother country, is not under the necessity of doing so, they are, perhaps, in general more influenced by the inclinations of their constituents. The councils, which, in the colony legislatures, correspond to the house of lords in Great Britain, are not composed of a hereditary nobility. In some of the colonies, as in three of the governments of New England, those councils are not appointed by the king, but chosen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 In none of the English colonies is there any hereditary nobility. In all of them, indeed, as in all other free countries, the descendant of an old colony family is more respected than an upstart of equal merit and fortune; but he is only more respected, and he has no privileges by which he can be troublesome to his neighbours.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resent disturbances, the colony assemblies had not only the legislative, but a part of the executive power. In Connecticut and Rhode Island, they elected the governor. In the other colonies, they appointed the revenue officers, who collected the taxes imposed by those respective assemblies, to whom those officers were immediately responsible. There is more equality, therefore, among the English colonists than among the inhabitants of the mother country. Their manners are more re publican; and their governments, those of three of the provinces of New England in particular, have hitherto been more republican too.

除了对外贸易，就其他各方面说，英属殖民地人民都有完全的自由，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时按照自己的方式。他们的自由在一切方面，都和国内同胞相等，而且同样有人民代表议会来保证，人民代表

议会，为维持殖民地政府独享有权力征税。这个议会的权力，超越行政权力，即最卑贱的殖民地人民，不用忧惧总督或省内文武官吏对他们的愤怒，只要遵守法律。和英国众议院一样，殖民地议会，未必都是极平等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总更具有这种性质。行政机关也许无力收买议会，而且亦无收买议会的必要，因为行政机关经费由母国支付。所以，这种议会一般也许更受选举人意旨的影响。殖民地参议院，与英国贵族院相当，但不是由世袭的贵族构成。在一些殖民地，例如在新英格兰的三个殖民地，此等参议院议员由人民的代表推选，非由政府指派。没有一个英属殖民地有世袭的贵族。在所有殖民地，和在其他自由国家一样，老殖民家族的后裔，相比有同等功绩同等财产的暴发户虽然更受到人们尊敬，但亦只更受人们尊敬，并没有特权烦扰邻人。殖民地议会，在现今的变乱开始以前，不仅有立法权，而且有一部分行政权。在康涅狄克及罗得岛，总督亦由议会选举。在其他殖民地上，由会议直接派员出去征收会议规定的赋税，征收员对议会直接负责。所以，人民在英属殖民地，就比在母国更为平等了。他们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其政府，尤其是新英格兰那三个政府，一向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

The absolute governments of Spain, Portugal, and France, on the contrary, take place in their colonies; and the discretionary powers which such governments commonly delegate to all their inferior officers are, on account of the great distance, naturally exercised there with more than ordinary violence. Under all absolute governments, there is more liberty in the capital than in any other part of the country. The sovereign himself can never have either interest or inclination to pervert the order of justice, or to oppress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In the capital, his presence overawes, more or less, all his inferior officers, who, in the remoter provinces, from whence the complaints of the people are less likely to reach him, can exercise their tyranny with much more safety. But the European colonies in America are more remote than the most

distant provinces of the greatest empires which had ever been known before. The government of the English colonies is, perhaps, the only one which, since the world began, could give perfect security to the inhabitants of so very distant a provinc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rench colonies, however, has always been conducted with much more gentleness and moderation than that of the Spanish and Portuguese. This superiority of conduct is suitable both to the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nation, and to what forms the character of every nation, the nature of their government, which, though arbitrary and violent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Great Britain, is legal and free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of Spain and Portugal.

反之，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却又在它们各自的殖民地上建立起专制统治。此种政治，大都授予一切下级官吏独断权，由于相隔遥远，此等独断权的执行，比平常还要强暴。在一切专制政治之下，我们知道，首都总更有自由。君主自己，不想压迫人民大众，不想破坏正义的制度，这对他亦无利。下级官吏在君主所在地有所威慑，但在远地，人民的怨声不容易传到君主耳里，乃得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但是，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总比以前为人所知的最大帝国的最远省份要远得多。自有世界以来，也许只有英属殖民地政府，能完全遥远的省区人民。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殖民地的行政相比，法国殖民地的行政，总是较为宽宏温和。这种较好的政治，和法国民族的性格相称，也和一切民族的性格相称，与英国相比，他们政府的性质，虽较为专横，然与西班牙葡萄牙相比，则非常守法自由。

It is in the progress of the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however, that the superiority of the English policy chiefly appears. The progress of the sugar colonies of France has been at least equal, perhaps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of England;

and yet the sugar colonies of England enjoy a free government, nearly of the same kind with that which takes place in her colonies of North America. But the sugar colonies of France are not discouraged, like those of England, from refining their own sugar; and what is still of greater importance, the genius of their government naturally introduces a better management of their negro slaves.

英国殖民地政策的优越，主要表现为北美殖民地的进步。法国蔗糖殖民地的进步，与英国大部分蔗糖殖民地的进步，至少是相等的，甚或更胜一筹，但和英属北美殖民地一样，英国蔗糖殖民地享受同样的自由政治。不过，法国没像英国那样阻碍殖民地精制自产的砂糖；更重要的是，他们政府的特质，使他们有更好的黑奴管理方法。

In all European colonies, the culture of the sugar-cane is carried on by negro slaves. The constitution of those who have been born in the temperate climate of Europe could not, it is supposed, support the labour of digging the ground under the burning sun of the West Indies; and the culture of the sugar-cane, as it is managed at present, is all hand labour; though, in the opinion of many, the drill plough might be introduced into it with great advantage. But, as the profit and success of the cultivation which is carried on by means of cattle, depend very much upon the good management of those cattle; so the profit and success of that which is carried on by slaves must depend equally upon the good management of those slaves; and in the good management of their slaves the French planters, I think it is generally allowed, are superior to the English. The law, so far as it gives some weak protection to the slave against the violence of his master, is likely to be better executed in a colony where the government is in a great measure arbitrary, than in one

where it is altogether free. In ever country where the unfortunate law of slavery is established, the magistrate, when he protects the slave, intermeddles in some measure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the master; and, in a free country, where the master is, perhaps, either a member of the colony assembly, or an elector of such a member, he dares not do this but with the greatest caution and circumspection. The respect which he is obliged to pay to the master, renders it more difficult for him to protect the slave. But in a country where the government is in a great measure arbitrary, where it is usual for the magistrate to intermeddle even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individuals, and to send them, perhaps, a lettre de cachet, if they do not manage it according to his liking, it is much easier for him to give some protection to the slave; and common humanity naturally disposes him to do so.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gistrate renders the slave less contemptible in the eyes of his master, who is thereby induced to consider him with more regard, and to treat him with more gentleness. Gentle usage renders the slave not only more faithful, but more intelligent, and, therefore, upon a double account, more useful. He approaches more to the condition of a free servant, and may possess some degree of integrity and attachment to his master's interest; virtues which frequently belong to free servants, but which never can belong to a slave, who is treated as slaves commonly are in countries where the master is perfectly free and secure.

据说，甘蔗在一切欧洲人殖民地内都由黑奴栽种。生长在欧洲温带的人民的体格，不能在西印度炎日下从事挖土劳动。栽种甘蔗就今日情况说，都是手工劳动。许多人认为，使用锥犁，当大有利。但犁耕的利润与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良好管理牛马，奴隶耕作的利润与成效，必同样取决于良好管理奴隶。我想，法国种植者比英国种植者更擅长于管理奴隶，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在政治十分专制的殖民

地上，比在政治完全自由的殖民地上，对奴隶给予些微保护，使不大受主人侵凌的法律，似乎施行得更有效些。在设有不幸的奴隶法规的国家，地方长官在保护奴隶时，一定程度干涉了主人的私有财产管理。在自由国家，主人或为代表的选举人，或为殖民地议会代表，所以地方长官不敢干涉他们，除非充分考虑。地方长官不得不把他们放在眼中，这样就使他难于保护奴隶了。但在政府十分专制的国家，地方长官常常干涉个人的私有财产管理，他也许发出拘票逮捕不听从他意见的人，所以，他要保护奴隶，便容易得多；普通的人道心，自然会使他这样做。地方长官的保护，使主人不得不对奴隶给予相当的重视，和比较温和的待遇。温和的待遇，使奴隶更诚实、更聪明，也更有用。他的境遇，更接近于自由佣人的境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主人忠实，并照顾主人利益。奴隶决不会有自由佣人常有的这种德行。在主人有完全自由，并不受干涉的国家，奴隶一般受着奴隶的待遇。

That the condition of a slave is better under an arbitrary than under a free government, is, I believe, supported by the history of all ages and nations. In the Roman history, the first time we read of the magistrate interposing to protect the slave from the violence of his master, is under the emperors. When Vidius Pollio, in the presence of Augustus, ordered one of his slaves, who had committed a slight fault, to be cut into pieces and thrown into his fish-pond, in order to feed his fishes, the emperor commanded him, with indignation, to emancipate immediately, not only that slave, but all the others that belonged to him. Under the republic no magistrate could have had authority enough to protect the slave, much less to punish the master.

我相信，奴隶在专制政治下，比在自由政治下，有更好的境遇。一切时代和一切国民的政策，都可证明这种议论。在古罗马史上，皇帝是第一个保护奴隶，使不受主人欺凌的长官。在奥古斯丁皇帝面

前，维迪阿·波利奥要把仅仅犯了小过失的一个奴隶，截成小块，投入池中喂鱼，皇帝大为愤怒，命令立即将此奴释放，并同时释放他的其他奴隶。在共和政治下，长官不能有充足的权力来保护奴隶，更谈不上处罚主人了。

The stock, it is to be observed, which has improved the sugar colonies of France, particularly the great colony of St Domingo, has been raised almost entirely from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ose colonies. It has been almost altogether the produce of the soil and of the industry of the colonists,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the price of that produce, gradually accumulated by good management, and employed in raising a still greater produce. But the stock which has improved and cultivated the sugar colonies of England, has, a great part of it, been sent out from England, and has by no means been altogether the produce of the soil and industry of the colonists. The prosperity of the English sugar colonies has been in a great measure owing to the great riches of England, of which a part has overflowed, if one may say so, upon these colonies. But the prosperity of the sugar colonies of France has been entirely owing to the good conduct of the colonists, which must therefore have had some superiority over that of the English; and this superiority has been remarked in nothing so much as in the good management of their slaves.

应该指出，用以改良法国殖民地尤其是圣多明各大殖民地的资本，几乎全部来自逐渐改良与开垦此等殖民地。那几乎全是殖民地人民和土地的劳动的产物，换言之，是由良好经营而逐渐蓄积，并用以生产更多产物的那部分产物的价格。但英国蔗糖殖民地改良及开垦的资本，并不全部是土地和殖民地人民劳动的生产物，大部分来自英国。英国蔗糖殖民地繁，主要是是英国财富充溢，（若我可这样说）

一部分流到此等殖民地。但法国蔗糖殖民地繁荣，则是因为殖民地人民的良好经营。在这一点上，法国移民优于英国移民。在奴隶的良好管理上，这个优点最明白地显现出来。

Such have been the general outlines of the policy of the different European n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ir colonies.

以上所述，是欧洲各国对所属殖民地的政策的大纲。

The policy of Europe, therefore, has very little to boast of, either in the original establishment, or, so far as concerns their internal government, in the subsequent prosperity of the colonies of America.

所以，关于最初建立美洲殖民地及之后的繁荣（仅就内政方面说），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夸耀欧洲政策的地方。

Folly and injustice seem to have been the principles which presided over and directed the first project of establishing those colonies; the folly of hunting after gold and silver mines, and the injustice of coveting the possession of a country whose harmless natives, far from having ever injured the people of Europe, had received the first adventurers with every mark of kindness and hospitality.

似乎是痴想与不义支配着最初计划建立此等殖民地。金银矿山的

探求，足见其痴想；对一个由从未损害欧洲人，而且亲切殷勤地对待欧洲最初冒脸家的善良土人居住的国家贪图占有，足见其不义。

The adventurers, indeed, who formed some of the latter establishments, joined to the chimerical project of finding gold and silver mines, other motives more reasonable and more laudable; but even these motives do very little honour to the policy of Europe.

似乎除了妄想寻觅金银矿山外，后来建立殖民地的冒险家，还有其他比较合理比较可称颂的动机，但此等动机，亦不是为欧洲政策增光。

The English puritans, restrained at home, fled for freedom to America, and established there the four governments of New England. The English catholics, treated with much greater injustice, established that of Maryland; the quakers, that of Pennsylvania. The Portuguese Jews, persecuted by the inquisition, stript of their fortunes, and banished to Brazil, introduced, by their example, some sort of order and industry among the transported felons and strumpets by whom that colony was originally peopled, and taught them the culture of the sugar-cane. Upon all these different occasions, it was not the wisdom and policy, but the disorder and injustice of the European governments, which peopled and cultivated America.

因在国内受限制，英国的清教徒逃往美洲以求自由，并在新英格兰建立了四个政府。因所受待遇更为不公允，英国的天主教徒亦逃至美洲，在马里兰建立了政府，教友派教徒，则在宾夕法尼亚建立政

府。受宗教法庭的迫害，葡萄牙的犹太人财产被剥夺，而且被赶到巴西，在原为流犯与娼妇居住的殖民地，他们以身作则地传入了某种秩序与产业，并教他们栽种甘蔗。所以，使人民侨居美洲并从事耕作的，在这些场合是它们的乱政与横暴，而不是欧洲各国政府的智慧与精明。

In effectuation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establishments, the different governments of Europe had as little merit as in projecting them. The conquest of Mexico was the project, not of the council of Spain, but of a governor of Cuba; and it was effectuated by the spirit of the bold adventurer to whom it was entrusted, in spite of every thing which that governor, who soon repented of having trusted such a person, could do to thwart it. The conquerors of Chili and Peru, and of almost all the other Spanish settlements upon the continent of America, carried out with them no other public encouragement, but a general permission to make settlements and conquests in the name of the king of Spain. Those adventures were all at the private risk and expence of the adventurers. The government of Spain contributed scarce any thing to any of them. That of England contributed as little towards effectu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ome of its most important colonies in North America.

对于建立这种殖民地的一些最重要的计划和计划的实现，欧洲各国政府都没有一点功绩。墨西哥的征服，是古巴总督的计划，不是西班牙枢密院的计划。而使此计划实现的，乃是大胆冒险家的精神。总督把这种任务交给一个冒险家，不久就懊悔，但不能使这计划失败。在征服此等地方时，美洲大陆上西班牙一切其他殖民地的征服者，智利及秘鲁的征服者不曾受到国家的任何奖励，除了得到西班牙国王允许并以他的名义，建设殖民地和加以征服。西班牙政府，没对他们有

什么贡献。这班冒险家，都是自己冒危险出费用的。对其所属一些最重要的北美殖民地的拓殖，英国政府也同样没有贡献。

When those establishments were effectuated, and had become so considerable as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mother country, the first regulations which she made with regard to them, had always in view to secure to herself the monopoly of their commerce; to confine their market, and to enlarge her own at their expence, and, consequently, rather to damp and discourage, than to quicken and forward the course of their prosperity. In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this monopoly has been exercised, consists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differences in the policy of the different European n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ir colonies. The best of them all, that of England, is only somewhat less illiberal and oppressive than that of any of the rest.

但在相当可观的此等殖民地已经建立，足以引起母国政府的注意时，母国最初颁布的一些条例，总在于，限制它们的市场，牺牲它们以扩大自己的市场，保证它垄断此等殖民地的贸易。因此，倒不如说加以压抑，而不是促进它们的繁荣。不过，欧洲各国施行此种垄断的方法并不相同，这就是欧洲各国殖民政策大相径庭的一点。其中，英国的方法最好，但也只在一定程度上那么偏狭、那么苛刻罢了。

In what way, therefore, has the policy of Europe contributed either to the first establishment, or to the present grandeur of the colonies of America? In one way, and in one way only, it has contributed a good deal. Magna virum mater! It bred and formed the men who were capable of achieving such great actions, and of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so great an empire; and there is no other

quarter of the world; of which the policy is capable of forming, or has ever actually, and in fact, formed such men. The colonies owe to the policy of Europe the education and great views of their active and enterprizing founders; and some of the greatest and most important of them, so far as concerns their internal government, owe to it scarce anything else.

这样说来，欧洲政策，究竟在什么方面有助于美洲各殖民地的建立及繁荣呢？只在一个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它哺育了、造就了那些人才，他们能够完成伟大事业，建立伟大帝国。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政策，能够造就这种人才，亦不曾造就此种人才。欧洲政策是它们富有积极进取心的建设者所受的教育与他们所以具有伟大眼光的主要原因。就其内政说，一些最大最重要殖民地，亦就只有这一点，应归功于欧洲的政策。

Part III.Of the Advantages which Europe has derived From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and from that of a Passage to the East Indies by the Cape of Good Hope

第三节、美洲和经由好望角到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对于欧洲有什么利益

Such are the advantages which the colonies of America have derived from the policy of Europe.

美洲殖民地从欧洲政策所得的利益，已如上述。

What are those which Europe has derived from the discovery

and colonization of America?

欧洲从美洲的发现和拓殖所得的利益是怎样呢？

Those advantages may be divided, first, into the general advantages which Europe, considered as one great country, has derived from those great events; and, secondly, into the particular advantages which each colonizing country has derived from the colonies which particularly belong to it, in consequence of the authority or dominion which it exercises over them.

可总结为两类。第一，欧洲作为一个大国从此等大事件所得到的一般利益；第二，对所属殖民地享有统治权的各殖民国从所属殖民地所得到的特殊利益。

The general advantages which Europe, considered as one great country, has derived from the discovery and colonization of America, consist, first, in the increase of its enjoyments; and, secondly, in the augmentation of its industry.

欧洲作为一个大国从美洲的发现和拓殖取得了以下的利益：第一，增加享乐用品；第二，增大产业。

The surplus produce of America imported into Europe, furnishes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great continent with a variety of commodities which they could not otherwise have possessed; some

for conveniency and use, some for pleasure, and some for ornament; and thereby contributes to increase their enjoyments.

美洲剩余生产物输入欧洲，给大陆居民提供了许多种类的商品，他们是不可能有这些商品的，要不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拓殖。这其中有便利品与有用物品，有装饰品，也有享乐用品。

The discovery and colonization of America, it will readily be allowed, have contributed to augment the industry, first, of all the countries which trade to it directly, such as Spain, Portugal, France, and England; and, secondly, of all those which, without trading to it directly, send, through the medium of other countries, goods to it of their own produce, such as Austrian Flanders, and some provinces of Germany, which,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countries before mentioned, send to it a considerable quantity of linen and other goods. All such countries have evidently gained a more extensive market for their surplus produce, and must consequently have been encouraged to increase its quantity.

显而易见，美洲的发现与拓殖，使以下各国的产业得到促进：第一，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等与美洲直接通商的国家；第二，奥属佛兰德斯和德国的某几省等以他国为媒介，不直接与美洲通商，把大量麻布及其他货物送到美洲的国家。这一切国家，销售他们的剩余生产物都有比较广阔的市场，因而必然受到鼓励，来增加剩余生产物的数量。

But that those great events should likewise have contributed to encourage the industry of countries such as Hungary and Poland,

which may never, perhaps, have sent a single commodity of their own produce to America, is not, perhaps, altogether so evident. That those events have done so, however, cannot be doubted. Some part of the produce of America is consumed in Hungary and Poland, and there is some demand there for the sugar, chocolate, and tobacco, of that new quarter of the world. But those commodities must be purchased with something which is either the produce of the industry of Hungary and Poland, or with something which had been purchased with some part of that produce. Those commodities of America are new values, new equivalents, introduced into Hungary and Poland, to be exchanged there for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se countries. By being carried thither, they create a new and more extensive market for that surplus produce. They raise its value, and thereby contribute to encourage its increase. Though no part of it may ever be carried to America, it may be carried to other countries, which purchase it with a part of their share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America, and it may find a market by means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at trade which was originally put into motion by the surplus produce of America.

对于不曾把自己生产的物品输出到美洲去的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这类大事件是否也产生促进产业的作用，虽没有那么明显作用无可怀疑。有一部分美洲生产物是在匈牙利和波兰消费；那里，对于新世界的砂糖、巧克力、烟草，亦有若干需要。这类商品的购买，必须用匈牙利和波兰产业产物，或用若干此等产物购入的东西来购买。美洲的这类商品，乃是新的价值，新的等价物，输出到匈牙利和波兰，交换那里的剩余生产物。这类商品输到那里去，就给那里的剩余生产物开辟出一个较为广阔的新市场，提高它的价值，因而促进它的数量的增加。所以，那里的剩余生产物，虽可能没有任何部分输出到美洲，但可输到其他国家，由其他国家用一部分美洲剩余生产物来购买。这种贸易原来是由美洲剩余生产物引起的，匈牙利和波兰的剩余

生产物有赖于这种贸易，才找到了市场。

Those great events may even have contributed to increase the enjoyments, and to augment the industry, of countries which not only never sent any commodities to America, but never received any from it. Even such countries may have received a greater abundance of other commodities from countries, of which the surplus produce had been augmented by means of the American trade. This greater abundance, as it must necessarily have increased their enjoyments, so it must likewise have augmented their industry. A greater number of new equivalents, of some kind or other, must have been presented to them to be exchanged for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at industry. A more extensive market must have been created for that surplus produce, so as to raise its value, and thereby encourage its increase. The mass of commodities annually thrown into the great circle of European commerce, and by its various revolutions annually distributed among all the different nations comprehended within it, must have been augmented by the whole surplus produce of America. A greater share of this greater mass, therefore, is likely to have fallen to each of those nations, to have increased their enjoyments, and augmented their industry.

对于不曾把物品输到美洲而且没从美洲收到任何物品的国家，这类大事，也可能起增加享乐用品和增进产业的作用。就是这些国家，也可能从那些与美洲通商因而增加了剩余生产物的国家收到其他更多的商品。这种商品必然增加它们的享乐用品，必然增进其产业。有更多新的等价物呈现在它们面前，来交换它们产业的剩余生产物了。这样这个剩余生产物就有了更广阔的市场，提高它的价值，因而促进它的数量的增加。每年投入欧洲大商场，并通过周转，分配给欧洲各国

的商品总量，由于美洲全部剩余生产物而增加。这个总量加大了，各国的数量分归亦会加大，它们的享乐用品就会增加，促进它们的产业。

The exclusive trade of the mother countries tends to diminish, or at least to keep down below what they would otherwise rise to, both the enjoyments and industry of all those nations in general, and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particular. It is a dead weight upon the action of one of the great springs which puts into motion a great part of the business of mankind. By rendering the colony produce dearer in all other countries, it lessens its consumption, and thereby cramps the industry of the colonies, and both the enjoyments and the industry of all other countries, which both enjoy less when they pay more for what they enjoy, and produce less when they get less for what they produce. By rendering the produce of all other countries dearer in the colonies, it cramps in the same manner the industry of all other colonies, and both the enjoyments and the industry of the colonies. It is a clog which, for the supposed benefit of some particular countries, embarrasses the pleasures and encumbers the industry of all other countries, but of the colonies more than of any other. It not only excludes as much as possible all other countries from one particular market, but it confines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colonies to one particular market; and the difference is very great between being excluded from one particular market when all others are open, and being confined to one particular market when all others are shut up.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 colonies, however, is the original source of all that increase of enjoyments and industry which Europe derives from the discovery and colonization of America, and the exclusive trade of the mother countries tends to render this source much less abundant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be.

母国专营的贸易，会使美洲殖民地的享乐用品和产业减少，至少加以阻抑，使不能照常发展。这是阻抑使人类大部分事务所赖而推动的大发条之一的活动的一种巨大力量。这种专营贸易使殖民地产物在一切其他国家提高价格，这样殖民地生产物的消费就减少，因而殖民地的产业和一切其他国家的享乐用品与产业缩减，因为享乐用品价格较高，数量便减少，生产所得的价格较低，生产便减少。这种专营贸易，又使一切其他国家产物在殖民地价格提高，这样一切其他国家的产业也就缩减，并缩减殖民地的享乐用品与产业。为了想象上的利益，某些国家，妨碍了一切其他国家的享乐用品与产业，而殖民地所受的妨碍尤大。它不仅尽量排斥所有其他国家，使不能进入某一市场，而且尽量限制殖民地使仅能在某一市场贸易。开放某一市场而封闭其他一切市场，封闭某一市场而开放其他一切市场，这是完全两回事。但欧洲从美洲的发现和拓殖得以增进享乐用品和产业的源泉是殖民地剩余生产物，而母国的专营贸易却使这富足的源泉大大损害。

The particular advantages which each colonizing country derives from the colonies which particularly belong to it, are of two different kinds; first, those common advantages which every empire derives from the provinces subject to its dominion; and, secondly, those peculiar advantages which are supposed to result from provinces of so very peculiar a nature as the European colonies of America.

各殖民国家从所属殖民地得到的特殊利益，亦有二种。第一，各帝国从所属殖民地得到的一般利益；第二，那些据说由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这一非常特异的性质造成的特殊利益。

The common advantages which every empire derives from the

provinces subject to its dominion consist, first, in the military force which they furnish for its defence; and, secondly, in the revenue which they furnish for the support of its civil government. The Roman colonies furnished occasionally both the one and the other. The Greek colonies sometimes furnished a military force, but seldom any revenue. They seldom acknowledged themselves subject to the dominion of the mother city. They were generally her allies in war, but very seldom her subjects in peace.

各帝国从所属领地得到的一般利益如下：第一，各领地所提供的保卫帝国的兵力；第二，各领地所提供的维持帝国民政的收入。罗马殖民地，有时同时提供了这两种利益。希腊殖民地，有时提供兵力，但几乎不曾提供任何收入。它们几乎不承认母市应统治他们。它们在战时通常是母市的同盟，但在平时，它们的人民几乎不是母市的属民。

The European colonies of America have never yet furnished any military force for the defence of the mother country. The military force has never yet been sufficient for their own defence; and in the different wars in which the m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engaged, the defence of their colonies has generally occasioned a very considerable distraction of the military force of those countries. In this respect, therefore, all the European colonies have, without exception, been a cause rather of weakness than of strength to their respective mother countries.

在美洲的殖民地，欧洲从来不曾提供任何兵力来保卫母国。它们的兵力，不足以保卫它们自己；在母国加入战争时，它们不但不能助以兵力，而且往往使母国为保护所属殖民地要大大分散其兵力。所

以，在这一点上，一切欧属殖民地，与其说使母国强大，无宁说削弱母国，没有一个例外。

The colonies of Spain and Portugal only have contributed any revenue towards the defence of the mother country, or the support of her civil government. The taxes which have been levied upon those of other European nations, upon those of England in particular, have seldom been equal to the expence laid out upon them in time of peace, and never sufficient to defray that which they occasioned in time of war. Such colonies, therefore, have been a source of expence, and not of revenue, to their respective mother countries.

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为防卫母国或维持母国民政提供了若干收入。至于欧洲其他各国，尤其是英国，对殖民地所征的税，能与平时所付的费用相等，已属罕见，若要无论如何也不够支付战时殖民地所增加的费用。所以，对其母国，这样的殖民地，不是财源只是负担。

The advantages of such colonies to their respective mother countries, consist altogether in those peculiar advantages which are supposed to result from provinces of so very peculiar a nature as the European colonies of America; and the exclusive trade, it is acknowledged, is the sole source of all those peculiar advantages.

所以，各母国从此等殖民地所得的利益，就只有后一种利益了，即据说，由具有美洲殖民地这种非常特殊性质的领地造成的利益。大家又认为，专营贸易是这一切特殊利益唯一泉源。

In consequence of this exclusive trade, all that part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 English colonies, for example, which consists in what are called enumerated commodities, can be sent to no other country but England. Other countries must afterwards buy it of her. It must be cheaper, therefore, in England than it can be in any other country, and must contribute more to increase the enjoyments of England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country. It must likewise contribute more to encourage her industry. For all those parts of her own surplus produce which England exchanges for those enumerated commodities, she must get a better price than any other countries can get for the like parts of theirs, when they exchange them for the same commodities. The manufactures of England, for example, will purchase a greater quantity of the sugar and tobacco of her own colonies than the like manufactures of other countries can purchase of that sugar and tobacco. So far, therefore, as the manufactures of England and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are both to be exchanged for the sugar and tobacco of the English colonies, this superiority of price gives an encouragement to the former beyond what the latter can, in these circumstances, enjoy. The exclusive trade of the colonies, therefore, as it diminishes, or at least keeps down below what they would otherwise rise to, both the enjoyments and the industry of the countries which do not possess it, so it gives an evident advantage to the countries which do possess it over those other countries.

那一部分被称为列举商品的英属殖民地剩余生产物，这种专营贸易的结果，就只能输往英国，不能输往任可其他国家了。后来，其他国家，不得不向英国购买。在英国这类物品必比在任何其他国家低廉，因此与任何其他国家比较，必然在更大程度上增加英国享乐用品，也必然在更大程度上增加英国产业。英国在以本国剩余生产物交

换此等列举商品时，与任何其他国家比较必然得到更好的价格。例如，与任何其他国家同种制造品比较，英国的制造品能购得更大数量它所属殖民地的砂糖与烟草。所以，在英国制造品及他国制造品都用以交换英属殖民地砂糖及烟草时，这种优越的价格，就使英国制造业得到一种奖励，而其他各国不能享有这种奖励。由于减少了殖民地专营贸易，至少是阻抑了，不能经营此种贸易的国家的享乐用品与产业，所以就为能经营此种贸易的国家提供一种显然比其他国家优越的利益了。

This advantage, however, will, perhaps, be found to be rather what may be called a relative than an absolute advantage, and to give a superiority to the country which enjoys it, rather by depressing the industry and produce of other countries, than by raising those of that particular country above what they would naturally rise to in the case of a free trade.

但这种利益是相对的；实施此种专营贸易的国家，享有优越的利益，不是由于奖励本国的产业与生产，使其发展超过自由贸易下自然会有的发展，而是由于其他各国的产业与生产被阻抑。

The tobacco of Maryland and Virginia, for example, by means of the monopoly which England enjoys of it, certainly comes cheaper to England than it can do to France to whom England commonly sells a considerable part of it. But had France and all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been at all times allowed a free trade to Maryland and Virginia, the tobacco of those colonies might by this time have come cheaper than it actually does, not only to all those other countries, but likewise to England. The produce of tobacco, in consequence of a market so much more extensive than any which it

has hitherto enjoyed, might, and probably would, by this time have been so much increased as to reduce the profits of a tobacco plantation to their natural level with those of a corn plantation, which it is supposed they are still somewhat above. The price of tobacco might, and probably would, by this time have fallen somewhat lower than it is at present. An equal quantity of the commodities, either of England or of those other countries, might have purchased in Maryland and Virginia a greater quantity of tobacco than it can do at present, and consequently have been sold there for so much a better price. So far as that weed, therefore, can, by its cheapness and abundance, increase the enjoyments, or augment the industry, either of England or of any other country, it would probably, in the case of a free trade, have produced both these effects in somewhat a greater degree than it can do at present. England, indeed, would not, in this case, have had any advantage over other countries. She might have bought the tobacco of her colonies somewhat cheaper, and consequently have sold some of her own commodities somewhat dearer, than she actually does; but she could neither have bought the one cheaper, nor sold the other dearer, than any other country might have done. She might, perhaps, have gained an absolute, but she would certainly have lost a relative advantage.

例如，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烟草，能以较廉的价格输入英国就因为英国享有垄断权。至于法国，通常从英国转运所需烟草的大部分，所以此等烟草在法国的价格较为昂贵。若法国及欧洲一切其他国家，都能随时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自由通商，那末此等殖民地的烟草，就不但能以更低廉的价格输入一切其他国家，而且能以更低的价格输入英国。但烟草市场既然已经扩大，其产量或可大大增加，以致栽种烟草的利润——据说今日还是稍稍越过自然的标准——降落到和栽种谷物的利润相同的自然水平。烟草价格可降落到略低于今日的价格。于

是，与今日比较，英国及任何其他国家，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都能以同量商品购买较大数量的烟草，因而能在那里，以更好的价格售去它们的商品。所以此种烟草，若由于丰饶低廉，能增进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享乐用品或产业，那么在贸易自由的场合就更能增进。在这场合，英国就没有优于他国的任何利益。它也许要以略低的价格购买其殖民地的烟草，因而售卖它本国的商品则以略高的价格，但与他国比较，它既不能以较高的价格售卖后者，亦不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前者。这时它也许会得到一种绝对的利益，但一定会失去相对的利益。

In order, however, to obtain this relative advantage in the colony trade, in order to execute the invidious and malignant project of excluding, as much as possible, other nations from any share in it, England, there are very probable reasons for believing, has not only sacrificed a part of the absolute advantage which she, as well as every other nation, might have derived from that trade, but has subjected herself both to an absolute and to a relative disadvantage in almost every other branch of trade.

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可相信，英国为了要实施尽量排斥他国分享殖民地贸易那一种惹人恶感的有害计划，为了要取得殖民地贸易上这种相对的利益，不仅牺牲了它和一切其他国家本来能从此种贸易取得的绝对利益的一部分，而且忍受一种绝对的不利和一种相对的不利。

When, by the act of navigation, England assumed to herself the monopoly of the colony trade, the foreign capitals which had before been employed in it, were necessarily withdrawn from it. The English capital, which had before carried on but a part of it, was now to carry on the whole. The capital which had before supplied

the colonies with but a part of the goods which they wanted from Europe, was now all that was employed to supply them with the whole. But it could not supply them with the whole; and the goods with which it did supply them were necessarily sold very dear. The capital which had before bought but a part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 colonies, was now all that was employed to buy the whole. But it could not buy the whole at any thing near the old price; and therefore, whatever it did buy, it necessarily bought very cheap. But in an employment of capital, in which the merchant sold very dear, and bought very cheap, the profit must have been very great, and much above the ordinary level of profit in other branches of trade. This superiority of profit in the colony trade could not fail to draw from other branches of trade a part of the capital which had before been employed in them. But this revulsion of capital, as it must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competition of capitals in the colony trade, so it must have gradually diminished that competition in all those other branches of trade; as it must have gradually lowered the profits of the one, so it must have gradually raised those of the other, till the profits of all came to a new level, different from, and somewhat higher, than that at which they had been before.

在英国依据航海条例而垄断殖民地贸易时，先前经营这贸易的一部分的英国资本，现今要经营这贸易的全部。先前投在这种贸易上的外国资本不得不撤除出去。先前以殖民地所需欧洲产物的一部分供给殖民地的英国资本，现今要以全部殖民地所需欧洲产物供给殖民地了。由英国资本供给的商品，必然以很高价格在殖民地出售，因为英国资本不能供给这所需的全部。而且，原先只购买殖民地剩余生产物一部分的资本，现在又用来购买其全部了。但这样的资本，决不能依照和原价差不了多少的价格，把这全部买去，因此它所买的物品必然价格非常低廉。但商人能以非常昂贵的价格出售，而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购买，在资本的使用方面，其利润必然是非常的大，必然大大超过

其他贸易部门普通利润的标准。殖民地贸易利润的优越，必然吸引其他贸易部门资本的一部分。资本这样的转移，必然逐渐增加殖民地贸易中资本的竞争，因而必然逐渐减少其他贸易部门中资本的竞争；前者的利润必然逐渐减低，后者的利润因而必然逐渐提高，使一切的利润，达到一个与旧水平不同，而且比旧水平略高的新的水平。

This double effect of drawing capital from all other trades, and of raising the rate of profit somewhat higher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in all trades, was not only produced by this monopoly upon its first establishment, but has continued to be produced by it ever since.

从一切其他贸易吸引资本；提高所有贸易的利润率，使略高于先前的利润率——这双重的结果——不仅是此种垄断权知立时所产生的结果，而且是有此种垄断权以来所继续产生的结果。

First, This monopoly has been continually drawing capital from all other trades, to be employed in that of the colonies.

第一，这种垄断权，不断地从一切其他贸易吸引资本，使投入殖民地贸易。

Though the wealth of Great Britain has increased very much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ct of navigation, it certainly has not increased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that or the colonies. But the foreign trade of every country naturally increases in proportion to its wealth, its surplus produce in proportion to its whole produce;

and Great Britain having engrossed to herself almost the whole of what may be called the foreign trade of the colonies, and her capital not having increased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the extent of that trade, she could not carry it on without continually withdrawing from other branches of trade some part of the capital which had before been employed in them, as well as withholding from them a great deal more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gone to them.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ct of navigation, accordingly, the colony trade has been continually increasing, while many other branches of foreign trade, particularly of that to other parts of Europe, have been continually decaying. Our manufactures for foreign sale, instead of being suited, as before the act of navigation, to the neighbouring market of Europe, or to the more distant one of the countries which lie round the Mediterranean sea, hav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been accommodated to the still more distant one of the colonies; to the market in which they have the monopoly, rather than to that in which they have many competitors. The causes of decay in other branches of foreign trade, which, by Sir Matthew Decker and other writers, have been sought for in the excess and improper mode of taxation, in the high price of labour, in the increase of luxury, etc. may all be found in the overgrowth of the colony trade. The mercantile capital of Great Britain, though very great, yet not being infinite, and though greatly increased since the act of navigation, yet not being increased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the colony trade, that trade could not possibly be carried on without withdrawing some part of that capital from other branches of trade, nor consequently without some decay of those other branches.

英国财富自航海条例订立以来虽有了很大的增加，但其增加，必定没和殖民地贸易的增加，保持同一的比例。一国的国外贸易，自然

按其财富增加的比例而增加，其剩余生产物又自然按其全生产物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英国吞并了几乎所谓殖民地国外贸易的全部，却没和殖民地国外贸易量按同一比例增加资本，所以如不能不断地把其他贸易部门原先投在那里的资本吸取过来一部分，并吸取比原先投在那里的更大的资本，就将无法经营。因此，殖民地贸易不断增加自从航海条例订立以来，而对欧洲其他各国的国外贸易的部门，却不断凋落。本国以供外销为目的制造品，不像航海法未订立以前那样，适合于较远的地中海周围各国的市场，或适合于邻近的欧洲市场而却有较大部分，适合于更远的殖民地市场，换言之，适合于享有垄断权的市场，不适合于有许多竞争者的市场。德克尔爵士及其他作家，研究其他国外贸易部门衰落的原因，说是征税方法不当，赋税过重，奢侈增加劳动价格昂贵，等等。其实，全部原因殖民地贸易的过度膨大。英国的商业资本不是无限的；英国资本自航海条例订立以来大大增加，但没和殖民地贸易以同一的比例增加，因而为使其他贸易部门不在一定程度上衰落就要不断从其他贸易部门吸取一部分资本。那就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经营这种贸易。

England, it must be observed, was a great trading country, her mercantile capital was very great, and likely to become still greater and greater every day, not only before the act of navigation had established the monopoly of the corn trade, but before that trade was very considerable. In the Dutch war, during the government of Cromwell, her navy was superior to that of Holland; and in that which broke ou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it was at least equal, perhaps superior to the united navies of France and Holland. Its superiority, perhaps, would scarce appear greater in the present times, at least if the Dutch navy were to bear the same proportion to the Dutch commerce now which it did then. But this great naval power could not, in either of those wars, be owing to the act of navigation. During the first of them, the plan of that act had been but just formed; and though, before the breaking out of

the second, it had been fully enacted by legal authority, yet no part of it could have had time to produce any considerable effect, and least of all that part which established the exclusive trade to the colonies. Both the colonies and their trade were inconsiderable then, in comparison of what they are how. The island of Jamaica was an unwholesome desert, little inhabited, and less cultivated.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were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Dutch, the half of St. Christopher's in that of the French. The island of Antigua, the two Carolinas, Pennsylvania, Georgia, and Nova Scotia, were not planted. Virginia, Maryland, and New England were planted; and though they were very thriving colonies, yet there was not perhaps at that time, either in Europe or America, a single person who foresaw, or even suspected, the rapid progress which they have since made in wealth, population, and improvement. The island of Barbadoes, in short, was the only British colony of any consequence, of which the condition at that time bore any resemblance to what it is at present. The trade of the colonies, of which England, even for some time after the act of navigation, enjoyed but a part (for the act of navigation was not very strictly executed till several years after it was enacted), could not at that time be the cause of the great trade of England, nor of the great naval power which was supported by that trade. The trade which at that time supported that great naval power was the trade of Europe, and of the countries which lie round the Mediterranean sea. But the share which Great Britain at present enjoys of that trade could not support any such great naval power. Had the growing trade of the colonies been left free to all nations, whatever share of it might have fallen to Great Britain, and a very considerable share would probably have fallen to her, must have been all an addition to this great trade of which she was before in possession. In consequence of the monopoly, the increase of the colony trade has not so much occasioned an addition to the trade which Great Britain had before,

as a total change in its direction.

应该指出，英格兰已经是个大商业国，不仅在航海条例已使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得以巩固以前，而且在殖民地贸易尚未盛大以前，其商业资本已经很大，而且每天都在增大。在克伦威尔当政时期对荷战争中，其海军比荷兰海军强大。在查理二世即位之初爆发的战争中，英国海军的实力至少和荷法二国联合海军相等，也许还要强大。这种优越的海军力量，现今似未增大，至少在荷兰海军对荷兰商业今昔都保持同一比例的场合是这样。但在这两次战争中，这强大海军力量，并不归功于航海条例。第一次战争中，这个条例，刚刚拟订计划；第二次战争爆发前，这个条例虽已制定完成，但还不可能产生大的成效，时间不久，而条例中建立殖民地专营贸易的部分，则尤少成效。那时的殖民地和殖民地贸易与今日比较，都是不足道的。牙买加岛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居民，更没有什么耕作，居住的荒岛。圣克里斯托弗有一半为法国所占领。纽约和新泽西为荷兰占有。安提瓜岛、南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乔治亚、诺瓦斯科夏还没殖民。弗吉尼亚、马里兰、新英格兰虽是极繁荣的殖民地，但在那时，那里的财富、人口和改良后来会有那样急速的进步没被欧洲或美洲任何一个人预料到。在英国各殖民地中，当时的情形与今日情形相类似的只有巴巴多斯一个岛。殖民地贸易（即在航海条例订立以后若干时间内，英国仅占有此种贸易的一部分，因为航海条例在订立几年以后，才被严格执行），不能在当时成为海军力量强大的原因亦不能在当时成为英国贸易盛大的原因。当时是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各国的贸易支持着英国的强大海军力量。但英国今日所享有的这种贸易，在当时怕就不够支持如此强大的海军力量。若任由一切国家自由经营殖民地日益增长的贸易，那么英国所得而占有的部分——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归于英国——定然是它原先占有的大贸易的附加部分。垄断的结果，殖民地贸易增加了但只是引起了贸易方向完全的改变，而没有增加它原有的贸易。

Secondly, This monopoly has necessarily contributed to keep

up the rate of profit, in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British trade, higher than it naturally would have been, had all nations been allowed a free trade to the British colonies.

第二，这种垄断权必然会使英国各种贸易部门的利润率提高，使其超过一切国家都可自由与英属殖民地通商时的自然利润率。

The monopoly of the colony trade, as it necessarily drew towards that trade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e capital of Great Britain than what would have gone to it of its own accord, so, by the expulsion of all foreign capitals, it necessarily reduced the whole quantity of capital employed in that trade below what it naturally would have been in the case of a free trade. But, by lessening the competition of capitals in that branch of trade, it necessarily raised the rate of profit in that branch. By lessening, too, the competition of British capitals in all other branches of trade, it necessarily raised the rate of British profit in all those other branches. Whatever may have been, at any particular period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ct of navigation, the state or extent of the mercantile capital of Great Britain, the monopoly of the colony trade must,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that state, have raised the ordinary rate of British profit higher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both in that and in all the other branches of British trade. If,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ct of navigation, the ordinary rate of British profit has fallen considerably, as it certainly has, it must have fallen still lower, had not the monopoly established by that act contributed to keep it up.

大部分英国资本由于殖民地贸易的垄断，违反自然趋势，流入殖

民地贸易，所以殖民地排斥一切外国资本，垄断贸易，必然减少投在此种贸易上的资本的总量，使少于自由贸易下自然会有的资本量。但由于垄断贸易部门中资本的竞争减少，所以必然会提高这贸易部门的利润率。由于它减少一切其他贸易部门英国资本的竞争，所以一切其他贸易部门的英国利润率必然提高。英国商业资本自航海条例订立以来，不管是怎样，在任一时期的状况与范围，但在这状况延续的期间，殖民地贸易的垄断，使英国普通利润率必然提高，使英国这一贸易部门及一切其他贸易部门的利润率，高于没有这种垄断的场合。从航海条例订立以来，若英国普通利润率已大大降落——确已大大降落——那么，要是没有这个条例所建立的垄断权的作用，它就一定会落得更低。

But whatever raises, in any country, the ordinary rate of profit higher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be, necessarily subjects that country both to an absolute, and to a relative disadvantage in every branch of trade of which she has not the monopoly.

但是，什么提高其普通利润率，使一国违反自然趋势，必然使它的各种无垄断权的贸易蒙受绝对的和相对的不利。

It subjects her to an absolute disadvantage; because, in such branches of trade, her merchants cannot get this greater profit without selling dearer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do, both the goods of foreign countries which they import into their own, and the goods of their own country which they export to foreign countries. Their own country must both buy dearer and sell dearer; must both buy less, and sell less; must both enjoy less and produce less, than she otherwise would do.

这将使它蒙受绝对的不利，因为它的商人在此等贸易部门如不以比原来更高的价格售卖本国输出品及外国输入品，就不能取得较大的利润。他们的国家必须少买少卖，必须贵买贵卖，而它的享受和生产必然比它原来少。

It subjects her to a relative disadvantage; because, in such branches of trade, it sets other countries, which are not subject to the same absolute disadvantage, either more above her or less below her,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be. It enables them both to enjoy more and to produce more, in proportion to what she enjoys and produces. It renders their superiority greater, or their inferiority less,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be. By raising the price of her produce above what it otherwise would be, it enables the merchants of other countries to undersell her in foreign markets, and thereby to justle her out of almost all those branches of trade, of which she has not the monopoly.

这将使它蒙受相对的不利，因为不蒙受绝对不利的其他国家，在此等贸易部门，和它比较，将处于不像从前那么不利的地位，或者较前更有利的地位。于是，其他国家，能因此比它生产更多，享受更多。就是说，那便减小它们的劣势或增大它们的优势。由于提高了它生产物的价格，它使其他国家的商人，能在国外市场上以比它低的价格出卖，因而把它不曾享有垄断权的商品，从外国市场排除出去。

Our merchants frequently complain of the high wages of British labour, as the cause of their manufactures being undersold in foreign markets; but they are silent about the high profits of stock. They complain of the extravagant gain of other people; but they say nothing of their own. The high profits of British stock, however,

may contribute towards raising the price of British manufactures, in many cases, as much, and in some perhaps more, than the high wages of British labour.

本国商人常常埋怨说，他们制造品在外国市场贱卖的原因英国工资高昂，但他们却对资本利润的高昂三缄其口。他们常常对他们自己的过分利得，却默然不发一言，但埋怨他人的过分利得。在许多场合，英国资本利润的高昂，和英国劳动工资的高昂，一样起了提高英国制造品价格的作用，在若干场合，则前者尤有此种作用。

It is in this manner that the capital of Great Britain, one may justly say, has partly been drawn and partly been driven from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trade of which she has not the monopoly; from the trade of Europe, in particular, and from that of the countries which lie round the Mediterranean sea.

我们可恰当地说：就在这情况下，有一部分，英国资本，从本国未曾享有垄断权的各种贸易部门，尤其是欧洲贸易和地中海沿岸各国贸易中，被吸引过去，有一部分，被排除出去。

It has partly been drawn from those branches of trade, by the attraction of superior profit in the colony trade, in consequence of the continual increase of that trade, and of the continual insufficiency of the capital which had carried it on one year to carry it on the next.

一部分是这样被吸引过去的，殖民地贸易继续增大，一年一年经

营殖民地贸易的资本不足，造成殖民地贸易的高利润，这种高利润，把这些贸易部门的资本吸引过去。

It has partly been driven from them, by the advantage which the high rate of profit esta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gives to other countries, in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trade of which Great Britain has not the monopoly.

一部分资本是这样被排除出去的，在英国不享有垄断权的一切贸易部门中，英国建立的高利润率使其他各国，都处于优势。这种优势，把资本从这些贸易部门排除出去。

As the monopoly of the colony trade has drawn from those other branches a part of the British capital,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employed in them, so it has forced into them many foreign capitals which would never have gone to them, had they not been expelled from the colony trade. In those other branches of trade, it has diminished the competition of British capitals, and thereby raised the rate of British profit higher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On the contrary, it has increased the competition of foreign capitals, and thereby sunk the rate of foreign profit lower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Both in the one way and in the other, it must evidently have subjected Great Britain to a relative disadvantage in all those other branches of trade.

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原要投在其他贸易部门的英国资本一部分被吸引过去它使英国资本在这些贸易部门上的竞争减少了，因而使英国的利润率增高，超过应有水平。，它也使许多在殖民地无垄断权时不

会投在这些部门的外国资本流入这些部门。反之，它使外国资本的竞争增加，因而使外国的利润率减低到不应有的水平。两种作用，显然使英国在其他贸易部门蒙受相对的不利。

The colony trade, however, it may perhaps be said, is more advantageous to Great Britain than any other; and the monopoly, by forcing into that trade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e capital of Great Britain than w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gone to it, has turned that capital into an employment, more advantageous to the country than any other which it could have found. The most advantageous employment of any capital to the country to which it belongs, is that which maintains there the greatest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and increases the most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at country. But the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which any capital employed in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can maintain, is exactly in proportion, it has been shown in the second book, to the frequency of its returns. A capital of a thousand pounds, for example, employed in a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of which the returns are made regularly once in the year, can keep in constant employment, in the country to which it belongs, a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equal to what a thousand pounds can maintain there for a year. If the returns are made twice or thrice in the year, it can keep in constant employment a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equal to what two or three thousand pounds can maintain there for a year. A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carried on with a neighbouring, is, upon that account, in general, more advantageous than one carried on with a distant country;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a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as it has likewise been shown in the second book, is in general more advantageous than a round-about one.

什么都没像殖民地贸易对英国那么有利，而垄断迫使较大部分的资本，也许有人说，这样就使这种资本投入这种贸易，转到对英国更有利的用途。最有利的资本用途，乃是能够维持资本所属国家最大生产性劳动量和最能增加土地劳动年生产物的用途。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所能维持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与其往返的次数，恰成比例本书第二篇曾经指出。例如，1000镑资本，投在一年经常往返一次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上，所能继续雇用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等于1000镑每年所能维持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若一年往返两次或者三次，则所能继续雇用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等于2000镑或3000镑所能维持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所以，一般地说，对邻国进行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比对远国进行的更有利。我们在第二篇已经指出，由于同一理由，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比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更有利。

But the monopoly of the colony trade, so far as it has operated upon the employment of the capital of Great Britain, has, in all cases, forced some part of it from a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carried on with a neighbouring, to one carried on with a more distant country, and in many cases from a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to a round-about one.

但就其对英国资本用途的影响来说，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却在一切场合，都迫使一部分资本，从近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流入远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而在多数场合，迫使一部分资本，从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流人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

First, The monopoly of the colony trade has, in all cases, forced some part of the capital of Great Britain from a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carried on with a neighbouring, to one carried on with a more distant country.

第一，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在一切场合，都迫使一部分英国资本，从近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流入远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

It has, in all cases, forced some part of that capital from the trade with Europe, and with the countries which lie round the Mediterranean sea, to that with the more distant regions of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from which the returns are necessarily less frequent, not only on account of the greater distance, but on account of the peculiar circumstances of those countries. New colonies,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are always understocked. Their capital is always much less than what they could employ with great profit and advantage in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eir land. They have a constant demand, therefore, for more capital than they have of their own; and, in order to supply the deficiency of their own, they endeavour to borrow as much as they can of the mother country, to whom they are, therefore, always in debt. The most common way in which the colonies contract this debt, is not by borrowing upon bond of the rich people of the mother country, though they sometimes do this too, but by running as much in arrear to their correspondents, who supply them with goods from Europe, as those correspondents will allow them. Their annual returns frequently do not amount to more than a third, and sometimes not to so great a proportion of what they owe. The whole capital, therefore, which their correspondents advance to them, is seldom returned to Britain in less than three, and sometimes not in less than four or five years. But a British capital of a thousand pounds, for example, which is returned to Great Britain only once in five years, can keep in constant employment only one-fifth part of the British industry which it could maintain, if the whole was returned once in the year; and, instead of the quantity of

industry which a thousand pounds could maintain for a year, can keep in constant employment the quantity only which two hundred pounds can maintain for a year. The planter, no doubt, by the high price which he pays for the goods from Europe, by the interest upon the bills which he grants at distant dates, and by the commission upon the renewal of those which he grants at near dates, makes up, and probably more than makes up, all the loss which his correspondent can sustain by this delay. But, though he make up the loss of his correspondent, he cannot make up that of Great Britain. In a trade of which the returns are very distant, the profit of the merchant may be as great or greater than in one in which they are very frequent and near; but the advantage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he resides, the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constantly maintained there,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must always be much less. That the returns of the trade to America, and still more those of that to the West Indies, are, in general, not only more distant, but more irregular and more uncertain, too, than those of the trade to any part of Europe, or even of the countries which lie round the Mediterranean sea, will readily be allowed, I imagine, by everybody who has any experience of those different branches of trade.

在一切场合，殖民地贸易的垄断，都迫使一部分资本，从欧洲贸易及地中海沿岸各国贸易，流入更远的美洲贸易及西印度贸易。不仅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因为此等地方情况特殊，美洲贸易及西印度贸易，往返的次数较少。我们说过，资本不足总困扰着新殖民地。新殖民地的资本，总是比它们能够大大有利地用以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资本少得多。所以，它们总是不断需要自己资本以外的资本。它们尽可能设法向母国借债，为要弥补自己的不足，所以它们对于母国总负有债务。但最普通的殖民地人民借款方法，不是向母国富人立据借贷（虽然他们有时也这样做），却是以欧洲货物尽可能拖欠来往商人，

即供给他们的商人的款项。他们每年的还款，往往只达欠款的1/3，有时还不及1/3。于是，他们的来往商人，很少能够在3年以内归还英国垫付给他们的全部资本，有时甚至不能在4年5年内归还。但是，5年才往返一次的英国资本1000镑，其能经常雇用的英国劳动也只及一年往返一次的英国资本1000的1/5。这样，这1000资本一年内所能继续雇用的劳动量，仅等于200镑资本一年内所能继续雇用的劳动量了。美洲移民，以大佣钱调换短期的期票，以高利息购买远期的期票，以高价购买欧洲的货物，虽可弥补其来往商人因他付款延期而蒙受的损失，甚至能弥补且有余，但这不能弥补英国的损失，只能弥补其来往商人的损。商人的利润在往返期间相隔很远的贸易中可能和在往返期间相隔很近而且往返次数很多的贸易中一样大，甚或更大；但他居住国所能继续维持的生产性劳动量，他居住国的利益，他居住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却必定因此而少得多。我想凡对这些贸易部门略有经验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与欧洲贸易比较，甚至与地中海沿岸各国贸易比较，美洲贸易的往返期间相隔更远，而且更不确定、更不规则，西印度贸易尤甚。

Secondly, The monopoly of the colony trade, has, in many cases, forced some part of the capital of Great Britain from a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into a round-about one.

第二，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在多数场合，都迫使一部分英国资本，从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流入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

Among the enumerated commodities which can be sent to no other market but Great Britain, there are several of which the quantity exceeds very much the consumption of Great Britain, and of which, a part, therefore, must be exported to other countries. But this cannot be done without forcing some part of the capital of

Great Britain into a round-abou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Maryland, and Virginia, for example, send annually to Great Britain upwards of ninety-six thousand hogsheads of tobacco, and the consumption of Great Britain is said not to exceed fourteen thousand. Upwards of eighty-two thousand hogsheads, therefore, must be exported to other countries, to France, to Holland, and, to the countries which lie round the Baltic and Mediterranean seas. But that part of the capital of Great Britain which brings those eighty-two thousand hogsheads to Great Britain, which re-exports them from thence to those other countries, and which brings back from those other countries to Great Britain either goods or money in return, is employed in a round-abou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and is necessarily forced into this employment, in order to dispose of this great surplus. If we would compute in how many years the whole of this capital is likely to come back to Great Britain, we must add to the distance of the American returns that of the returns from those other countries. If, in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which we carry on with America, the whole capital employed frequently does not come back in less than three or four years, the whole capital employed in this round-about one is not likely to come back in less than four or five. If the one can keep in constant employment but a third or a fourth part of the domestic industry which could be maintained by a capital returned once in the year, the other can keep in constant employment but a fourth or a fifth part of that industry. At some of the outports a credit is commonly given to thos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to whom they export them tobacco. At the port of London, indeed, it is commonly sold for ready money: the rule is Weigh and pay. At the port of London, therefore, the final returns of the whole round-about trade are more distant than the returns from America, by the time only which the goods may lie unsold in the warehouse; where, however, they may sometimes lie long enough. But, had not the colonies been

confined to the market of Great Britain for the sale of their tobacco, very little more of it would probably have come to us than what was necessary for the home consumption. The goods which Great Britain purchases at present for her own consumption with the great surplus of tobacco which she exports to other countries, she would, in this case, probably have purchased with the immediate produce of her own industry, or with some part of her own manufactures. That produce, those manufactures, instead of being almost entirely suited to one great market, as at present,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fitted to a great number of smaller markets. Instead of one great round-abou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Great Britain would probably have carried on a great number of small direct foreign trades of the same kind. On account of the frequency of the returns, a part, and probably but a small part, perhaps not above a third or a fourth of the capital which at present carries on this great round-about trade, might have been sufficient to carry on all those small direct ones; might have kept inconstant employment an equal quantity of British industry; and have equally supported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Great Britain. All the purposes of this trade being, in this manner, answered by a much smaller capital,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large spare capital to apply to other purposes; to improve the lands, to increase the manufactures, and to extend the commerce of Great Britain; to come into competition at least with the other British capitals employed in all those different ways, to reduce the rate of profit in them all, and thereby to give to Great Britain, in all of them, a superiority over other countries, still greater than what she at present enjoys.

有几种在数量上大大超过英国的消费额，又不能运送到英国以外任何市场去的列举商品，因此不得不以一部分输到其他各国。但是，要这样做，就要迫使一部分英国资本流入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例

如，每年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送到英国去的烟草，在9.6万桶以上，但英国消费额，据说却不过1.4万桶。于是，有8.2万桶以上的烟草，必须输出到法国、荷兰及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各国去。运这8.2万桶烟草到英国，再把它输出到其他国家，并从其他国家挽回货物或货币的那一部分英国资本，就是投在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上，而且必须投在这用途上，以售脱这个大的剩余。若计算此种资本全部，要多少年才能回到英国，我们必须加上对其他各国贸易往返的期间。如若非3年4年，本国投在对美洲的直接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不能回到英国，那么非4年或5年投在这迂回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全部资本，就不能回到英国了。若前者与一年往返一次的资本比较，能够继续雇用1/3或1/4的本国劳动量，那么后者就只能继续雇用1/5或1/4的本国劳动量了。在某几个输出港上，外国商人输出烟草，往往可赊欠。在伦敦港，通例是现秤现付，通常以现钱售卖。所以，在伦敦港，全部迂回贸易的最后往返期间，仅比美洲贸易的往返期间，多了堆栈停留不卖的期间；但这期间，有时也是够长的。倘若殖民地烟草不仅仅售给英国市场，那么输入本国的烟草，也许只不过本国国内所需之数。本国现在以这大量剩余烟草输到他国而用售得之款购回的供本国消费的物品，在这情况下，也许就要用本国若干制造品或本国产业的直接产物来购买。现在，本国产业的直接产物或制造品，几乎全部只供应一个大市场，但若经这种变化，那也许会供应很多较小的市场。英国现在经营一个大的迂回消费品国外贸易，但若经这种变化，那也许会经营很多小的直接消费品国外贸易。由于往返频繁，只需现在经营这一个大迂回消费品国外贸易的资本的一部分，也许只需一小部分，即不过1/4或1/3，就够经营很多小的直接消费品国外贸易就可同样维持英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就可继续雇用等量的英国劳动。这样，这种贸易的各方面，就需要少得多的资本，就有大量可用于其他用途的剩余资本，即增加制造业，改良土地，扩张商业，至少也可以与投入这一切用途的其他英国资本相竞争，从而减低这一切用途的利润率，使英国对其他国家在这一切用途上，占有比现今更优越的地位。

The monopoly of the colony trade, too, has forced some part of the capital of Great Britain from all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to a carrying trade; and, consequently from supporting more or less the industry of Great Britain, to be employed altogether in supporting partly that of the colonies, and partly that of some other countries.

殖民地贸易的垄断也迫使一部分英国资本，从消费品国外贸易，流入转口贸易，因而使多少用以维持英国产业的资本，有一部分用来维持其他各国的产业，有一部分用来维持殖民地的产业。

The goods, for example, which are annually purchased with the great surplus of eighty-two thousand hogsheads of tobacco annually re-exported from Great Britain, are not all consumed in Great Britain. Part of them, linen from Germany and Holland, for example, is returned to the colonies for their particular consumption. But that part of the capital of Great Britain which buys the tobacco with which this linen is afterwards bought, is necessarily withdrawn from supporting the industry of Great Britain, to be employed altogether in supporting, partly that of the colonies, and partly that of the particular countries who pay for this tobacco with the produce of their own industry.

例如，用每年再输出这8.2万桶剩余烟草而购回英国的货物，并不完全在英国消费。其中，例如从德意志和荷兰购回的麻布，有一部分必须运到殖民地去，专供它们消费。但是，那一部分英国资本，即那一部分用以购烟草而以烟草购麻布的英国资本，必不能再用来维持英国的产业，而全部被抽出去，一部分用来维持那些以本国产业产物购买这种烟草的国家的产业，一部分用来维持殖民地的产业。

The monopoly of the colony trade, besides, by forcing towards it a much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e capital of Great Britain than what would naturally have gone to it, seems to have broken altogether that natural balance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taken place among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British industry. The industry of Great Britain, instead of being accommodated to a great number of small markets, has been principally suited to one great market. Her commerce, instead of running in a great number of small channels, has been taught to run principally in one great channel. But the whole system of her industry and commerce has thereby been rendered less secure; the whole state of her body politic less healthful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In her present condition, Great Britain resembles one of those unwholesome bodies in which some of the vital parts are overgrown, and which, upon that account, are liable to many dangerous disorders, scarce incident to those in which all the parts are more properly proportioned. A small stop in that great blood-vessel, which has been artificially swelled beyond its natural dimensions, and through which an unnatural proportion of the industry and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has been forced to circulate, is very likely to bring on the most dangerous disorders upon the whole body politic. The expectation of a rupture with the colonies, accordingly, has struck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with more terror than they ever felt for a Spanish armada, or a French invasion. It was this terror, whether well or ill grounded, which rendered the repeal of the stamp act, among the merchants at least, a popular measure. In the total exclusion from the colony market, was it to last only for a few years, the greater part of our merchants used to fancy that they foresaw an entire stop to their trade; the greater part of our master manufacturers, the entire ruin of their business;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our workmen, an end of their employment.

A rupture with any of our neighbours upon the continent, though likely, too, to occasion some stop or interruption in the employments of some of all these different orders of people, is foreseen, however, without any such general emotion. The blood, of which the circulation is stopt in some of the smaller vessels, easily disgorges itself into the greater, without occasioning any dangerous disorder; but, when it is stopt in any of the greater vessels, convulsions, apoplexy, or death, are the immediate and unavoidable consequences. If but one of those overgrown manufactures, which, by means either of bounties or of the monopoly of the home and colony markets, have been artificially raised up to any unnatural height, finds some small stop or interruption in its employment, it frequently occasions a mutiny and disorder alarming to government, and embarrassing even to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legislature. How great, therefore, would be the disorder and confusion, it was thought, which must necessarily be occasioned by a sudden and entire stop in the employment of so great a proportion of our principal manufacturers?

此外，殖民地贸易的垄断，迫使过大部分的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这种贸易，这似乎就完全破坏了英国一切产业部的自然均衡。英国产业，主要和一个大市场相适应，不和多数小的市场相适应。英国的贸易，主要被引到一个大的商业系统上去不在多数小的商业系统进行。这样，其政治组织的全部状态，也变得比较不健康了，它的整个商业与制造业系统，亦变得比较不安全了。英国在现今状态下，有些像一个不健全的机体，其中，有些重要生理器官长得过大，以致容易发生许多危险的疾病，那在各部分发展比较均衡的生理器官是不常有的。人为地造成的一个大血管过分的膨胀，并迫使过大部分的产业与商业流入这个血管，这样这大血管要是略有停滞，就会使全部政治组织陷于最危验的紊乱中。英国人民恐惧母国与殖民地决裂，超过了他们恐惧西班牙无敌舰队或法国侵袭。无论有没有道理，这种

恐惧，却使一般人，至少使各商人，都觉得应该把印花税法令废除。我们大部分商人往往认为，殖民地市场连续数年完全排斥英国商品，他们的贸易可预见得到会完全停止；本国大部分制造业者，也往往认为，可预见得到，他们的事业就会完全破坏；本国大部分工人，也往往认为，可预见得到他们会完全失业。但是，与大陆任何邻国绝交的可能，虽亦会使此等人民中，有一些预料会停止或中断其职业，但不会引起那么普遍的情绪。若干小血管内血液循环停滞，血液很容易流到大血管，不会引起任何危险性疾病。但是，任何大血管的血液要是停滞，其直接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痉挛，半身不遂，乃至死亡。没有一种制造业，由于国内市场及殖民地市场的垄断，或由于奖金，不自然地过度膨胀，超过自然发展的程度，那么只要稍有停滞或中断，往往就会意起骚扰与紊乱，使国会狼狈失措，政府惊骇。他们想，本国主要制造业者，若有许多突然完全停止营业，定会引起很大的紊乱与骚扰。

Some moderate and gradual relaxation of the laws which give to Great Britain the exclusive trade to the colonies, till it is rendered in a great measure free, seems to be the only expedient which can, in all future times, deliver her from this danger; which can enable her, or even force her, to withdraw some part of her capital from this overgrown employment, and to turn it, though with less profit, towards other employments; and which, by gradually diminishing one branch of her industry, and gradually increasing all the rest, can, by degrees, restore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it to that natural, healthful, and proper proportion, which perfect liberty necessarily establishes, and which perfect liberty can alone preserve. To open the colony trade all at once to all nations, might not only occasion some transitory inconveniency, but a great permanent loss, to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whose industry or capital is at present engaged in it. The sudden loss of the employment, even of the ships which import the eighty-two

thousand hogsheads of tobacco, which are over and above the consumption of Great Britain, might alone be felt very sensibly. Such are the unfortunate effects of all the regulations of the mercantile system. They not only introduce very dangerous disorders into the state of the body politic, but disorders which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remedy, without occasioning, for a time at least, still greater disorders. In what manner, therefore, the colony trade ought gradually to be opened; what are the restraints which ought first, and what are those which ought last, to be taken away; or in what manner the natural system of perfect liberty and justice ought gradually to be restored, we must leave to the wisdom of future statesmen and legislators to determine.

将来无论什么时候，要使英国能够甚或强制它从这种过大的用途，要把英国从这种危险中拯救出来，撤回一部分资本，投在利润较少的用途上，要逐渐增大一切其他产业部门，逐渐减缩一个产业部门，要一步一步地，把一切产业部门，恢复到自然的、健全的，并为完全自由制度所必然建立、亦仅能由完全自由制度加以保持的比例，唯一的方策，似乎就是逐渐地适度放宽那给英国以殖民地贸易垄断权的法律，一直到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为止。立即开放殖民地贸易，使一切国家都可以进来经营，那不仅会引起一些暂时性困难，而且将使现今以资本与劳动经营这种贸易的人，有大部分蒙受大的永久的损失。不说别的，单说那突然废而不用的输入82000桶烟草的船只，就会受到重大的损失。这就是重商主义一切法规的不幸结果！这一切法规，不仅给政治组织造成了危硷性很大的紊乱，而且这种紊乱，往往难于矫正，还会引起更大的紊乱。所以，什么限制应首先撤除，什么限制应最后撤除；殖民地贸易应怎样逐渐公开；完全自由与正义的自然制度应怎样逐渐恢复，这些问题，留待未来立法者和政治家运用智慧去解决吧。

Five different events, unforeseen and unthought of, have very fortunately concurred to hinder Great Britain from feeling, so sensibly as it was generally expected she would, the total exclusion which has now taken place for more than a year (from the first of December 1774) from a very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colony trade, that of the twelve associated provinces of North America. First, those colonies, in preparing themselves for their non-importation agreement, drained Great Britain completely of all the commodities which were fit for their market; secondly, the extra ordinary demand of the Spanish flota has, this year, drained Germany and the north of many commodities, linen in particular, which used to come into competition, even in the British market, with the manufactures of Great Britain; thirdly, the peace between Russia and Turkey has occasioned an extraordinary demand from the Turkey market, which, during the distress of the country, and while a Russian fleet was cruizing in the Archipelago, had been very poorly supplied; fourthly, the demand of the north of Europe for the manufactures of Great Britain has been increasing from year to year, for some time past; and, fifthly, the late partition, and consequential pacification of Poland, by opening the market of that great country, have, this year, added an extraordinary demand from thence to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the north. These events are all, except the fourth, in their nature transitory and accidental; and the exclusion from so important a branch of the colony trade, if unfortunately it should continue much longer, may still occasion some degree of distress. This distress, however, as it will come on gradually, will be felt much less severely than if it had come on all at once; and, in the mean time, the industry and capital of the country may find a new employment and direction, so as to prevent this distress from ever rising to any considerable height.

一年多以来（从1774年12月1日以来），北美洲十二联邦完全排斥英国商品。在殖民地贸易中丧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这在一般人想来，定会使英国人痛切地感到损失。幸而发生了五件不曾预见，而且不曾想到的事情，使他们没有这种感觉。（一）此等殖民地，相约不输入英国商品，曾为作好准备把适合于它们市场的一切英国商品全部买尽。（二）为着异常的需要，西班牙船队，曾在这一年买尽北欧及德意志的许多商品，尤其是亚麻布。那许多商品，甚至在英国市场，亦常和英国制造品竞争。（三）俄罗斯与土耳其媾和，使得土耳其市场有了异常的需要。因为，前些时候俄罗斯舰队在爱琴海巡逻，而土耳其在困难当中，土耳其市场非常缺乏供应品。（四）在过去若干时间，北欧对于英国制造品的需要，逐年增加。（五）波兰最近的被瓜分和平定，为这大国开拓了一个市场，使得除有北欧日益增加的需要外，英国制造品又在这一年，加上了这个市场异常的需要。除第四件外，这五件事情，按性质说都是暂时的偶然的。假设不幸，这十二联邦长此继续排斥英国货物，那么英国对殖民地贸易中这么重要的一部分被排斥，仍会惹起一定程度的痛苦。但这种痛苦，不像突然发生的痛苦那么难受因为来得渐缓。同时，英国的劳动与资本，也能发现新的用途与方向，使此种痛苦，不达到任何显著的高度。

The monopoly of the colony trade, therefore, so far as it has turned towards that trade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e capital of Great Britain than w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gone to it, has in all cases turned it, from a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with a neighbouring, into one with a more distant country; in many cases from a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into a round-about one; and, in some cases, from all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into a carrying trade. It has, in all cases, therefore, turned it from a direction in which it would have maintained a greater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into one in which it can maintain a much smaller quantity. By suiting, besides, to one particular market only, so great a part of the industry and commerce of Great Britain, it has

rendered the whole state of that industry and commerce more precarious and less secure, than if their produce had been accommodated to a greater variety of markets.

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既使过大部分的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此种贸易，所以在一切场合，使英国资本，在多数场合由直接的消费品国内贸易，改投到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使英国资本，由近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改投到远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又使英国资本在一些场合，由一切消费品国外贸易，改投到转口贸易。总之，在一切场合，都使英国资本，由所雇生产性劳动量较多的方面，改投到所雇生产性劳动量少得多的方面。此外，它使那么大的部分的英国产业与商业，仅仅适合于一个特殊市场，这样就使英国产业与商业的全部状态，比其生产物能适合较多市场的场合更不安全、更不确定。

We must carefully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effects of the colony trade and those of the monopoly of that trade. The former are always and necessarily beneficial; the latter always and necessarily hurtful. But the former are so beneficial, that the colony trade, though subject to a monopoly,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hurtful effects of that monopoly, is still, upon the whole, beneficial, and greatly beneficial, though a good deal less so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be.

我们必须细心分别殖民地贸易垄断及殖民地贸易的影响。后者总是而且必然是有利的；前者总是，而且必然是有害的。但因为后者是那么有利，所以，即使殖民地贸易被垄断，而垄断又是那么有害，就全体说，殖民地贸易，仍是有利，而且大大有利。不过，设若没有垄断，其有利程度就要大得多。

The effect of the colony trade, in its natural and free state, is to open a great though distant market, for such parts of the produce of British industry as may exceed the demand of the markets nearer home, of those of Europe, and of the countries which lie round the Mediterranean sea. In its natural and free state, the colony trade, without drawing from those markets any part of the produce which had ever been sent to them, encourages Great Britain to increase the surplus continually, by continually presenting new equivalents to be exchanged for it. In its natural and free state, the colony trade tends to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in Great Britain, but without altering in any respect the direction of that which had been employed there before. In the natural and free state of the colony trade, the competition of all other nations would hinder the rate of profit from rising above the common level, either in the new market, or in the new employment. The new market, without drawing any thing from the old one, would create, if one may say so, a new produce for its own supply; and that new produce would constitute a new capital for carrying on the new employment, which, in the same manner, would draw nothing from the old one.

殖民地贸易，在自然与自由状态下，给英国产业的邻近市场即地中海沿岸各国市场与欧洲市场所不能容纳的那一部分产物，开拓了一个虽是很远但却很大的市场。殖民地贸易，在自然与自由状态下，不会使英国从原来运销邻近的各市场的产物中抽出任何部分，却会使殖民地不断提出新等价物来交换英国剩余生产物，从而奖励英国不断增加其剩余生产物。殖民地贸易，在自然与自由状态下，不倾向于改变其原先的用途，倾向于增加英国生产性劳动量。殖民地贸易，在自然与自由状态下，得由一切其他国家进入竞争，这样就使新市场或新行业上的利润率不会上升到一般水平之上。新市场，就会创造（要是可以这样说）一个新生产物来供给自己。用不着从旧市场吸取任何东西，而这新化物同样用不着从旧行业吸取一点东西，就会构成一个新

资本，来经营新行业。

The monopoly of the colony trade, on the contrary, by excluding the competition of other nations, and thereby raising the rate of profit, both in the new market and in the new employment, draws produce from the old market, and capital from the old employment. To augment our share of the colony trade beyond what it otherwise would be, is the avowed purpose of the monopoly. If our share of that trade were to be no greater with,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without the monopoly, there could have been no reason for establishing the monopoly. But whatever forces into a branch of trade, of which the returns are slower and more distant than thos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trades,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e capital of any country, than what of its own accord would go to that branch, necessarily renders the whole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annually maintained there,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at country, less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be. It keeps down the revenue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at country below what it would naturally rise to, and thereby diminishes their power of accumulation. It not only hinders, at all times, their capital from maintaining so great a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as it would otherwise maintain, but it hinders it from increasing so fast as it would otherwise increase, and, consequently, from maintaining a still greater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反之，由于排斥其他国家的竞争，从而提高新市场及新行业上的利润率，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势必从旧行业吸取资本，从旧市场吸取产物。殖民地贸易中本国的份额增大，是这种垄断公开提出的目的。若殖民地贸易中本国所占的份额，并不比没有垄断时多，那就没有设立

这种垄断的理由。这种贸易的往返，比大部分其他贸易的往返时间相隔较久，也更慢。要是迫使任何一国过大部分的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这种贸易，必使那里每年所生产的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物的总量，每年所维持的生产性劳动的总量，比原来的少。这样就使这国居民的收入，不及自然状态下的收入，因而他们的蓄积能力减少。那不仅在一切时候，使其资本不能照常雇用那么大的生产性劳动量，而且使其资本不能照常增加，这样就使它不能雇用更大的生产性劳动量。

The natural good effects of the colony trade, however, more than counterbalance to Great Britain the bad effects of the monopoly; so that, monopoly and altogether, that trade, even as it is carried on at present, is not only advantageous, but greatly advantageous. The new market and the new employment which are opened by the colony trade, are of much greater extent than that portion of the old market and of the old employment which is lost by the monopoly. The new produce and the new capital which has been created, if one may say so, by the colony trade, maintain in Great Britain a greater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than what can have been thrown out of employment by the revulsion of capital from other trades of which the returns are more frequent. If the colony trade, however, even as it is carried on at present, is advantageous to Great Britain, it is not by means of the monopoly, but in spite of the monopoly.

但是，殖民地贸易的自然良好结果，就英国说足以抵消垄断的恶劣结果而有余，所以，虽有垄断的害处，如现今进行的此等贸易，不仅有利，而且大大有利。由殖民地贸易所开拓的新市场与新行业，比因垄断而损失的那一部分旧市场与旧行业大得多。由殖民地贸易而创造（若可这样说）的新资本与新产业，在英国所能维持的生产性劳动量，比因资本从往返次数较多的贸易部门突然撤回而失去的生产性劳

动量来得多。不过，若今日进行的那种殖民地贸易，对英国还有利，那是由于垄断以外的其他原因，不是由于垄断。

It is rather for the manufactured than for the rude produce of Europe, that the colony trade opens a new market. Agriculture is the proper business of all new colonies; a business which the cheapness of land renders more advantageous than any other. They abound, therefore, in the rude produce of land; and instead of importing it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y have generally a large surplus to export. In new colonies, agriculture either draws hands from all other employments, or keeps them from going to any other employment. There are few hands to spare for the necessary, and none for the ornamental manufacture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anufactures of both kinds they find it cheaper to purchase of other countries than to make for themselves. It is chiefly by encouraging the manufactures of Europe, that the colony trade indirectly encourages its agriculture. The manufacturers of Europe, to whom that trade gives employment, constitute a new market for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the most advantageous of all markets; the home market for the corn and cattle, for the bread and butcher's meat of Europe, is thus greatly extended by means of the trade to America.

殖民地贸易所开拓的新市场，与其说是欧洲原生产物的新市场，倒不如说是欧洲制造品的新市场。农业是一切新殖民地的适当业务；因为其土地低廉，农业显得更有利。所以，殖民地富有土地原生产物，它们不但不要输入土地原生产物，而且通常有大量的剩余输出。新殖民地的农业，往往把工人拉住，使其不流入任何其他职业，或从一切其他职业技取工人。留给必需品制造业使用的工人已经不多；装饰品制造业简直没有可使用的工人。所以，它们都觉得，对于这两种

制造品的大部分，与其亲自制造，不如向他国购买更合算。殖民地贸易对于欧洲农业的鼓励，主要是间接的，即鼓励欧洲制造业，从而间接鼓励欧洲农业。殖民地贸易所维持的欧洲制造业，是欧洲土地生产物的一个新市场。我们说过，最有利的谷物和牲畜、面包和家畜肉的国内市场，在这情况下，赖美洲贸易而大大扩张了。

But that the monopoly of the trade of populous and thriving colonies is not alone sufficient to establish, or even to maintain, manufactures in any country, the examples of Spain and Portugal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 Spain and Portugal were manufacturing countries before they had any considerable colonies. Since they had the richest and most fertile in the world, they have both ceased to be so.

但是，富庶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并不能使任何国家建立制造业，甚或不能维持制造业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先例就已充分证明。在没有任何大殖民地时，西葡两国就是工业国了。但自它们占有世界上最富沃的殖民地以来，便都不是工业国了。

In Spain and Portugal, the bad effects of the monopoly, aggravated by other causes, have, perhaps, nearly overbalanced the natural good effects of the colony trade. These causes seem to be other monopolies of different kinds: the degradation of the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below what it is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the exclusion from foreign markets by improper taxes upon exportation, and the narrowing of the home market, by still more improper taxes upon the transportation of goods from one part of the country to another; but above all, that irregular and partial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which often protects the rich and powerful debtor from the

pursuit of his injured creditor, and which makes the industrious part of the nation afraid to prepare goods for the consumption of those haughty and great men, to whom they dare not refuse to sell upon credit, and from whom they are altogether uncertain of repayment.

垄断的恶影响，加上其他原因，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许几乎把殖民地贸易的自然良好影响抵消了。这些其他原因似乎是：金银价值比其他大多数国家低；其他各种垄断；对输出品征收不适当的税，以致不能参加外国市场，对国内各地间货物的运输，征收不适当的税，以致缩小国内市场；最重要的是司法制度的不公平与不规则，常常保护有钱有势的债务人，使能避免受害的债权人的追索，并使国内劳动阶级不敢制造货物来供这些大人先生消费，因为，对于这写大人先生，他们不敢拒绝赊卖，而又极不确定大款能否归还。

In England, on the contrary, the natural good effects of the colony trade, assisted by other causes, have in a great measure conquered the bad effects of the monopoly. These causes seem to be, the general liberty of trade, which, notwithstanding some restraints, is at least equal, perhaps superior, to what it is in any other country; the liberty of exporting, duty free, almost all sorts of goods which are the produce of domestic industry, to almost any foreign country; and what, perhaps, is of still greater importance, the unbounded liberty of transporting them from one part of our own country to any other, without being obliged to give any account to any public office, without being liable to question or examination of any kind; but, above all, that equal and impartial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which renders the rights of the meanest British subject respectable to the greatest, and which, by securing to every man the fruits of his own industry, gives the greatest and

most effectual encouragement to every sort of industry.

反之，殖民地贸易的自然良好影响，加上其他原因，在英国曾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垄断的恶影响。这些其他原因似乎是：输出自由，本国产业的产物，几乎无论输到什么国家，又几乎无论什么种类，都能无税输出；贸易的一般自由，那里虽有若干限制，但与任何其他国家比较，至少与其他国家有相等的自由，也许有更大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本国产业的产物，由本国这地运至那地不须受任何盘问检查，不须报告任何官厅，换言之，得以享受毫无限制的自由；最重要的是平等而公平的司法制度，使各个人能保有各自的劳动果实，使最下级英国人民的权利，为最上级英国人民所尊重，这样就对各种产业，给予最有效且最大的鼓励。

If the manufactures of Great Britain, however, have been advanced, as they certainly have, by the colony trade, it has not been by means of the monopoly of that trade, but in spite of the monopoly. The effect of the monopoly has been, not to augment the quantity, but to alter the quality and shape of a part of the manufactures of Great Britain, and to accommodate to a market, from which the returns are slow and distant, w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accommodated to one from which the returns are frequent and near. Its effect has consequently been, to turn a part of the capital of Great Britain from an employment in which it would have maintained a greater quantit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one in which it maintains a much smaller, and thereby to diminish, instead of increasing, the whole quantit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aintained in Great Britain.

但是，设若英国制造业由于殖民地贸易而有所进步（事实上确曾

如此），是靠着垄断以外的其他途径，而不是靠了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垄断的结果，是改变英国制造品一部分的性质与形式，不是增加英国制造品产量，使其违反自然趋势，适合于往返迟缓而期间相隔又很久的市场，不再适合于往返频繁而期间相隔又很短暂的市场。所以，其结果乃是改变一部分英国资本的用途，大大减少这部分资本所能维持的制造业的数量，因此减少了英国制造业的总量。

The monopoly of the colony trade, therefore, like all the other mean and malignant expedients of the mercantile system, depresses the industry of all other countries, but chiefly that of the colonies, without in the least increasing, but on the contrary diminishing, that of the country in whose favour it is established.

所以，如重商主义其他卑劣有害的方策一样，殖民地贸易的垄断，阻抑其他一切国家的产业，但主要是殖民地的产业，减少那为着本国利益而设立的产业。

The monopoly hinders the capital of that country, whatever may, at any particular time, be the extent of that capital, from maintaining so great a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as it would otherwise maintain, and from affording so great a revenue to the industrious inhabitants as it would otherwise afford. But as capital can be increased only by savings from revenue, the monopoly, by hindering it from affording so great a revenue as it would otherwise afford, necessarily hinders it from increasing so fast as it would otherwise increase, and consequently from maintaining a still greater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and affording a still greater revenue to the industrious inhabitants of that country. One great original source of revenue, therefore, the wages of labour, the

monopoly must necessarily have rendered, at all times, less abundant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无论母国在特定期间有多少资本，这种垄断必定会妨碍它的资本，使它不能给劳动大众提供本来能够提供的那么多的收入，也使它不能维持本来能够维持的那么大的生产性劳动量。，妨碍资本使不能提供本来能够提供的那么多的收入的垄断，因为资本只能由节省收入而增加。必然妨碍资本，使不能按本来能够增加的速度增加起来，因而不能给国内劳动大众提供更多的收入，不能维持更大的生产性劳动量。劳动的工资作为一个很大的收入泉源，即由于有了这种垄断，必定在各个时候，都不像没有垄断的场合那么富足。

By raising the rate of mercantile profit, the monopoly discourages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The profit of improvement depends up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the land actually produces, and what, by the application of a certain capital, it can be made to produce. If this difference affords a greater profit than what can be drawn from an equal capital in any mercantile employment,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will draw capital from all mercantile employments. If the profit is less, mercantile employments will draw capital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Whatever, therefore, raises the rate of mercantile profit, either lessens the superiority, or increases the inferiority of the profit of improvement: and, in the one case, hinders capital from going to improvement, and in the other draws capital from it; but by discouraging improvement, the monopoly necessarily retards the natural increase of another great original source of revenue, the rent of land. By raising the rate of profit, too, the monopoly necessarily keeps up the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higher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be. But the price of l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rent

which it affords, the number of years purchase which is commonly paid for it, necessarily falls as the rate of interest rises, and rises as the rate of interest falls. The monopoly, therefore, hurts the interest of the landlord two different ways, by retarding the natural increase, first, of his rent, and, secondly, of the price which he would get for his l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rent which it affords.

垄断提高了商业利润率，因而妨碍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润，取决于土地现实生产额和加投资本后土地可能生产额之差。若所提供的利润，小于商业利润，商业就从土地改良事业吸去资本。若这差额所能提供的利润，比等量资本能从商业取得的利润大，那么土地改良事业，就从各种商业吸去资本。所以，凡是提高商业利润率的措施，就会使土地改良事业使其低的利润降得更低，或高的利润减低。在前一场合，把资本从这用途吸引出来；在后一场合，使资本不流入土地改良的用途。垄断妨碍土地的改良，势必延迟另一个大的收入原始泉源——土地的地租——的自然增加。此外，垄断提高利润率，势必提高市场利息率，使其达到不应有的水平。但与地租成比例的土地的价格，即通常按若干年地租而计算的买价，必随利息率下降而上升必随利息率上升而下降。这样，垄断在以下二方面妨害了地主的利益，即延迟地租的自然增加，并延迟与地租成比例的土地价格的自然增加。

The monopoly, indeed, raises the rate of mercantile profit and thereby augments somewhat the gain of our merchants. But as it obstructs the natural increase of capital, it tends rather to diminish than to increase the sum total of the revenue whic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derive from the profits of stock; a small profit upon a great capital generally affording a greater revenue than a great profit upon a small one. The monopoly raises the rate of profit, but it hinders the sum of profit from rising so high as it otherwise

would do.

诚然，垄断提高商业利润率，因而稍稍增加本国商人的利得。但由于它妨碍资本的自然增加，所以会减少国内人民从资本利润率所得收入的总额，而不会增加。大额资本的小利润，通常比小额资本的大利润提供更大的收入。垄断不能使利润总额增高到和没有垄断的时候一样，但提高了利润率。

All the original sources of revenue, the wages of labour, the rent of land, and the profits of stock, the monopoly renders much less abundant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be. To promote the little interest of one little order of men in one country, it hurts the interest of all other orders of men in that country, and of all the men in all other countries.

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使一切收入的原始泉源，即土地的地租、劳动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润，不像无垄断时那么富足。为了要促进一个小阶级的利益，垄断妨害了这个国家一切其他阶级的利益和一切其他国家一切阶级的利益。

It is solely by raising the ordinary rate of profit, that the monopoly either has proved, or could prove, advantageous to any one particular order of men. But besides all the bad effects to the country in general,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mentioned as necessarily resulting from a higher rate of profit, there is one more fatal, perhaps, than all these put together, but which, if we may judge from experience, is inseparably connected with it. The high rate of profit seems everywhere to destroy that parsimony which, in

other circumstances, is natural to the character of the merchant. When profits are high, that sober virtue seems to be superfluous, and expensive luxury to suit better the affluence of his situation. But the owners of the great mercantile capitals are necessarily the leaders and conductors of the whole industry of every nation; and their example has a much greater influence upon the manners of the whole industrious part of it than that of any other order of men. If his employer is attentive and parsimonious, the workman is very likely to be so too; but if the master is dissolute and disorderly, the servant, who shapes his work according to the pattern which his master prescribes to him, will shape his life, too, according to the example which he sets him. Accumulation is thus prevented in the hands of all those who are naturally the most disposed to accumulate; and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roductive labour, receive no augmentation from the revenue of those who ought naturally to augment them the most.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instead of increasing, gradually dwindles away, and the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maintained in it grows every day less and less. Have the exorbitant profits of the merchants of Cadiz and Lisbon augmented the capital of Spain and Portugal? Have they alleviated the poverty, have they promoted the industry, of those two beggarly countries? Such has been the tone of mercantile expence in those two trading cities, that those exorbitant profits, far from augmenting the general capital of the country, seem scarce to have been sufficient to keep up the capitals upon which they were made. Foreign capitals are every day intruding themselves, if I may say so, more and more into the trade of Cadiz and Lisbon. It is to expel those foreign capitals from a trade which their own grows every day more and more insufficient for carrying on, that the Spaniards and Portuguese endeavour every day to straiten more and more the galling bands of their absurd monopoly. Compare the mercantile manners of Cadiz and Lisbon with those of Amsterdam,

and you will be sensible how differently the conduct and character of merchants are affected by the high and by the low profits of stock. The merchants of London, indeed, have not yet generally become such magnificent lords as those of Cadiz and Lisbon; but neither are they in general such attetitive and parsimonious burghers as those of Amsterdam. They are supposed, however, many of them, to be a good deal richer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former, and not quire so rich as many of the latter: but the rate of their profit is commonly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the former, and a good deal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atter. Light come, light go, says the proverb; and the ordinary tone of expence seems everywhere to be regulated, not so much according to the real ability of spending, as to the supposed facility of getting money to spend.

垄断只有通过提高普通利润率才能使任何一个阶级得利或能够得利。但是，一般说来，高的利润率对于国家所必然产生的各种坏影响，除上述外，还有一种更坏的影响；按照经验，这种坏影响和高的利润率分不开，而其有害作用，也许比上述各种坏影响合起来的作用还要大。随便在什么地方，高的利润率，都会破坏商人在其他情况下自然会有的节俭性。穷奢极侈，似乎更适合于宽裕的境遇，而利润很高时，俭朴似乎是多事。但大商业资本所有者，必然是全国实业界的领袖和指导者。他们的榜样对国内全部勤劳民众生活方式的影响，比任何其他阶级的影响大得多。若主人是放浪的、随便的，则拥工亦会按主人的榜样工作，亦会按主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若雇主是小心的、节俭的，工人亦大都会如此。这样，本来最会蓄积的人，都不能在手上有所蓄积了。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不能因这些本来最会使这基金增加的人们的收入而有所增益。国家的资本逐渐枯竭。国内所维持的生产性劳动量，一天少似一天。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异常的利润，曾增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资本吗？他们促进了这两个乞丐般的国家的产业吗？减轻了这两个乞丐般的国家的贫穷吗？这两个商业城市的商人的费用是那么大，以致异常的利润不但没有增加国家的总资本，而

且不足保持原有的资本。我敢说，外国资本一天多似一天地闯进加的斯和里斯本的贸易中去。为了要把外国资本从自己资本日益不够经营的这种贸易中驱逐出去，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日渐地加强这种不合理的垄断。试比较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习俗和加的斯及里斯本的商人习俗，你就会感到，与受低利润影响的商人行为与性格，受高利润影响的商人行为与性格，是怎样不相同啊。诚然，伦敦的商人，虽不像加的斯和里斯本的商人那样，一般都成为堂堂贵族，但与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比较，却就一般是更不小心、更不节俭。但是，据说，大部分伦敦商人，比大部分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富裕得多，而比大部分阿姆斯特丹商人，却略有逊色。伦敦的利润率，与前者比较，一般是低得多；与后者比较，一般是高得多。俗语说，“容易来，容易去”。随便什么地方，消费的一般情况，受弄钱花费的难易程度支配而不是受真实消费能力的支配。

It is thus that the single advantage which the monopoly procures to a single order of men, is in many different ways hurtful to the general interest of the country.

这样，垄断给唯一阶级带来的唯一利益，在许多不同方面妨害国家的一般利益。

To found a great empire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raising up a people of customers, may at first sight, appear a project fit only for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It is, however, a project altogether unfit for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but extremely fit for a nation whose government is influenced by shopkeepers. Such statesmen, and such statesmen only, are capable of fancying that they will find some advantage in employing the blood and treasure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to found and maintain such an empire. Say to a

shopkeeper, Buy me a good estate, and I shall always buy my clothes at your shop, even though I should pay somewhat dearer than what I can have them for at other shops; and you will not find him very forward to embrace your proposal. But should any other person buy you such an estate, the shopkeeper will be much obliged to your benefactor if he would enjoin you to buy all your clothes at his shop. England purchased for some of her subjects, who found themselves uneasy at home, a great estate in a distant country. The price, indeed, was very small, and instead of thirty years purchase, the ordinary price of land in the present times, it amounted to little more than the expence of the different equipments which made the first discovery, reconnoitered the coast, and took a fictitious possession of the country. The land was good, and of great extent; and the cultivators having plenty of good ground to work upon, and being for some time at liberty to sell their produce where they pleased, became, in the course of little more than thirty or forty years (between 1620 and 1660), so numerous and thriving a people, that the shopkeepers and other traders of England wished to secure to themselves the monopoly of their custom. Without pretending, therefore, that they had paid any part, either of the original purchase money, or of the subsequent expence of improvement, they petitioned the parliament, that the cultivators of America might for the future be confined to their shop; first, for buying all the goods which they wanted from Europe; and, secondly, for selling all such parts of their own produce as those traders might find it convenient to buy. For they did not find it convenient to buy every part of it. Some parts of it imported into England, might have interfered with some of the trades which they themselves carried on at home. Those particular parts of it, therefore, they were willing that the colonists should sell where they could; the farther off the better; and upon that account proposed that their market should be confined to the countries south of Cape Finisterre. A clause in the

famous act of navigation established this truly shopkeeper proposal into a law.

仅仅为了要培育顾客而建立一个大帝国的计划，乍看起来，似乎仅仅适合于小买卖商人的国家，甚至对于小买卖商人的国家，也是全不相宜的，只适合于政府受小买卖商人支配的国家。只有这样的政治家，才会认为，用同胞的血与财宝来建设并维持这样一个帝国是有若干利益的。你对一个小买卖商人说，你卖给我一块地皮，我就会常常在你铺子里购买衣物，虽然你铺子里的卖价比别家铺子昂贵。他不见得会很踊跃地接受你的提议。但若另一个人吩咐你要在那小买卖商人铺子里购买你所需的一切衣物，并卖给你这样一块地皮，这小买卖商人对他便会非常感激。有些英国人在国内不能安居，英国给他们在远地购买了一块大地皮。诚然，其价格很小，只等于初次发现、踏勘海岸和夺取土地的各种费用不是今日的普通买价，即30年年租。但土地是广阔的、良好的、耕作者得有大量土地耕作，有时又得自由随意在任何地方售卖其生产物，所以不过三、四十年（1620—1660年），就变成了一个那么富庶繁荣的民族。于是，英国的各种商人及小买卖商人，都想长此垄断这些人的光顾。他们不敢说，他们原来用一部分货币购买土地，嗣后又用一部分货币来改良土地，他们只向国会请愿，美洲殖民地人民将来只许向他们的店铺买卖：（一）殖民地人民得向他们的店铺购买所需的一切欧洲产货物，；（二）殖民地人民要把他们认为适于购买的那些殖民地产物，全数卖给他们的商店。他们并不认为全部产物都适于购买，因为其中有若干部分输入英国可能妨害他们在国内经营的某些商业部门。他们自然希望移民们尽量对外地售卖这若干部分生产物，愈远愈好；即因此故，他们提议，在菲尼斯特海角以南各国限定这些生产物的销售市场。在有名的航海条例中，这种真正小买卖商人的提议被定为一个条款。

The maintenance of this monopoly has hitherto been the principal, or more properly, perhaps, the sole end and purpose of

the dominion which Great Britain assumes over her colonies. In the exclusive trade, it is supposed, consists the great advantage of provinces, which have never yet afforded either revenue or military force for the support of the civil government, or the defence of the mother country. The monopoly is the principal badge of their dependency, and it is the sole fruit which has hitherto been gathered from that dependency. Whatever expence Great Britain has hitherto laid out in maintaining this dependency, has really been laid out in order to support this monopoly. The expence of the ordinary peac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lonies amounted,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resent disturbances to the pay of twenty regiments of foot; to the expence of the artillery, stores, and extraordinary provisions, with which it was necessary to supply them; and to the expence of a very considerable naval force, which was constantly kept up, in order to guard from the smuggling vessels of other nations, the immense coast of North America, and that of our West Indian islands. The whole expence of this peace establishment was a charge upon the revenue of Great Britain, and was, at the same time, the smallest part of what the dominion of the colonies has cost the mother country. If we would know the amount of the whole, we must add to the annual expence of this peace establishment,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hich, in consequence of their considering her colonies as provinces subject to her dominion, Great Britain has, upon different occasions, laid out upon their defence. We must add to it, in particular, the whole expence of the late war, and a great part of that of the war which preceded it. The late war was altogether a colony quarrel; and the whole expence of it, in whatever part of the world it might have been laid out, whether in Germany or the East Indies, ought justly to be stated to the account of the colonies. It amounted to more than ninety millions sterling, including not only the new debt which was contracted, but the two shillings in the pound additional land tax,

and the sums which were every year borrowed from the sinking fund. The Spanish war which began in 1739 was principally a colony quarrel. Its principal object was to prevent the search of the colony ships, which carried on a contraband trade with the Spanish Main. This whole expence is, in reality, a bounty which has been given in order to support a monopoly. The pretended purpose of it was to encourage the manufactures, and to increase the commerce of Great Britain. But its real effect has been to raise the rate of mercantile profit, and to enable our merchants to turn into a branch of trade, of which the returns are more slow and distant than thos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trades,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eir capital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have done; two events which, if a bounty could have prevented, it might perhaps have been very well worth while to give such a bounty.

英国统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更确切地说唯一目的，一向就是维持垄断。殖民地不曾提供任何兵力，来维持母国的国防，不曾提供任何收入，来维持母国的内政，；其主要利益，据说就是这种专营的贸易。此种垄断，是是本国从这种隶属所得的唯一果实，也是此等殖民地隶属本国的主要标志。英国一向用以维持这种隶属的费用，其实都是用以维持这种垄断。在现今骚扰事件开始之前。殖民地按平时编制的一艘军饷，为炮兵队及军需品的费用，二十联队步兵的给养，和他们所需异常的食品，以及为警戒无限长的北美海岸及西印度海岸，并防范其他各国秘密出入船只而须不断维持的极大海军力量的费用。这平时编制的军饷全部，只是殖民地统治所费于母国的极小部分，却也是英国收入上一个负担。我们必须在这平时编制每年军事费用之外，加上英国在各个时期为防卫殖民地所花费的款项的利息，才能知道费用全数。尤其是上次战争的全部费用和这次战争以前的那次战争的费用大部分必须加上。上次战争纯然是殖民地战争，其用在德意志，或用在东印度，全部费用，无论用在什么地方，都应算在殖民地账上。总数在9000万镑以上，它包含每镑附加1先令的地税，也包含

新债，以及每年动用的减债基金。1739年开始的西班牙战争，主要是殖民地战争。其主要目的，是阻止殖民地与西班牙本土秘密通商的船只的搜查。这全部费用，其实等于维持垄断的奖金。其公然提出的目的，虽为发展英国商业、奖励英国制造业，但其实际结果，却是提高商业利润率，使本国商人能以过大部分的资本，转投到往返较为迟缓而相隔时间较长的贸易部门。若奖金能阻止那两种事件，那也许真值得发给这样一种奖金。

Under the present system of management, therefore, Great Britain derives nothing but loss from the dominion which she assumes over her colonies.

所以，在现今的经营管理下，英国从统治殖民地，只有损失，毫无所得。

To propose that Great Britain should voluntarily give up all authority over her colonies, and leave them to elect their own magistrates, to enact their own laws, and to make peace and war, as they might think proper, would be to propose such a measure as never was, and never will be, adopted by any nation in the world. No nation ever voluntarily gave up the dominion of any province, how troublesome soever it might be to govern it, and how small soever the revenue which it afforded might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expence which it occasioned. Such sacrifices, though they might frequently be agreeable to the interest, are always mortifying to the pride of every nation; and, what is perhaps of still greater consequence, they are always contrary to the private interest of the governing part of it, who would thereby be deprived of the disposal of many places of trust and profit, of many opportunities of

acquiring wealth and distinction, which the possession of the most turbulent, and, to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the most unprofitable province, seldom fails to afford. The most visionary enthusiasts would scarce be capable of proposing such a measure, with any serious hopes at least of its ever being adopted. If it was adopted, however, Great Britain would not only be immediately freed from the whole annual expence of the peac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lonies, but might settle with them such a treaty of commerce as would effectually secure to her a free trade, more advantageous to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though less so to the merchants, than the monopoly which she at present enjoys. By thus parting good friends, the natural affection of the colonies to the mother country, which, perhaps, our late dissensions have well nigh extinguished, would quickly revive. It might dispose them not only to respect, for whole centuries together, that treaty of commerce which they had concluded with us at parting, but to favour us in war as well as in trade, and instead of turbulent and factious subjects, to become our most faithful, affectionate, and generous allies; and the same sort of parental affection on the one side, and filial respect on the other, might revive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her colonies, which used to subsist between those of ancient Greece and the mother city from which they descended.

建议英国自动放弃它对殖民地的一切统治权，让它们自己决定对外措施和宣战，自己制定法律，自己选举地方长官，就等于提出一个从来不曾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采纳亦永远不会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采纳的议案。没有一个国家自动放弃过任何地方的统治权，尽管它所提供的收入与其所费相比是怎样微小，尽管这个地方是怎样难于统治。这种牺牲虽往往符合一国利益，但总会损害一国威信。更重要的也许是，这种牺牲，往往不符合其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因为他们那许多获取财富与荣誉的机会，亦将从此被剥夺他们对于许多有责任有利润的位

置的处分权，将从此被剥夺。占据最动乱不安而对人民最不利的地方，常能取得这种处分权与机会。所以，即使最爱作非非之想的人，也不会认真希望这种建议能被人采纳。但若真的被采纳，那么英国不仅能立即摆脱掉殖民地平时每年全部军事费用，而且可与殖民地可立商约，使英国能够有效地确保自由贸易，那与它今日享受的垄断权相比，对人民大众必更有利，虽对商人不怎么有利。这样，殖民地和母国，正如好朋友的分离，那么几乎为近来的不和所消灭的殖民地就会很快地恢复对母国的自然感情。他们不仅会长此尊重和我们分离时所订定的商约，而且将在贸易上、战争上赞助我们，不再作骚扰捣乱的人民，却将成为我们最亲切、最忠实、最宽宏的同盟。古希腊殖民地与其所从出的母市，一方面有一种孝敬之心，一方面有一种父母之爱。我们若那样办，我想，英国与其殖民地间同样的感情，亦会恢复起来。

In order to render any province advantageous to the empire to which it belongs, it ought to afford, in time of peace, a revenue to the public, sufficient not only for defraying the whole expence of its own peace establishment, but for contributing its proportion to the support of the general government of the empire. Every province necessarily contributes, more or less, to increase the expence of that general government. If any particular province, therefore, does not contribute its share towards defraying this expence, an unequal burden must be thrown upon some other part of the empire. The extraordinary revenue, too, which every province affords to the public in time of war, ought, from parity of reason, to bear the same proportion to the extraordinary revenue of the whole empire, which its ordinary revenue does in time of peace. That neither the ordinary nor extraordinary revenue which Great Britain derives from her colonies, bears this proportion to the whole revenue of the British empire, will readily be allowed. The monopoly, it has been supposed, indeed, by increasing the private revenue of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reby enabling them to pay greater taxes, compensates the deficiency of the public revenue of the colonies. But this monopoly, I have endeavoured to show, though a very grievous tax upon the colonies, and though it may increase the revenue of a particular order of men in Great Britain, diminishes, instead of increasing, that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and consequently diminishes, instead of increasing, the ability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to pay taxes. The men, too, whose revenue the monopoly increases, constitute a particular order, which it is both absolutely impossible to tax beyond the proportion of other orders, and extremely impolitic even to attempt to tax beyond that proportion, as I shall endeavour to show in the following book. No particular resource, therefore, can be drawn from this particular order.

一个省份，在平时对国家所提供的收入要有利于其所属的帝国不仅要足够支付其平时编制的军饷全部，而且要按比例提供收入来维持帝国总的政府。每一个省份，都必须或多或少地对于帝国总政府的经费的增加有所贡献。若有任何个别省份，不按比例担负这种费用，那么帝国一些省份的负担，就显得不均。此外，由此类推，对全帝国非常收入的负担，亦应保持同一的比例，像平时经常收入一样。对于英帝国的全部收人，英国从殖民地取得的经常收入与非常收入，不曾保持这个比例，那是大家都会承认的。据说，垄断增加英国人民的私人收入，因而增加他们的纳税能力，这样就补偿殖民地公共收入的不足。但是，这种垄断，我曾说过，虽对殖民地是一项极苛重的赋税，虽可增加英国特定阶级人民的收入，但不增加却减少人民大众的收入，因此不增加却减少人民大众的纳税能力。因垄断而收入增加了的人，是一个特殊阶级，要他们超出其他阶级应纳的比例完税，既是绝不可能，亦是最大的失策，这我要在下一篇来说明。所以，从这特殊阶级，不能取得特殊收入。

The colonies may be taxed either by their own assemblies, or by the parliament of Great Britain.

殖民地可由英国议会征税，也可由其自己的议会征税。

That the colony assemblies can never be so managed as to levy upon their constituents a public revenue, sufficient, not only to maintain at all times their own civil and military establishment, but to pay their proper proportion of the expence of the general government of the British empire, seems not very probable. It was a long time before even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though placed immediately under the eye of the sovereign, could be brought under such a system of management, or could be rendered sufficiently liberal in their grants for supporting the civil and military establishments even of their own country. It was only by distributing among the particular members of parliament a great part either of the offices, or of the disposal of the offices arising from this civil and military establishment, that such a system of management could be established, even with regard to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But the distance of the colony assemblies from the eye of the sovereign, their number, their dispersed situation, and their various constitutions, would render it very difficult to manage them in the same manner, even though the sovereign had the same means of doing it; and those means are wanting. It would be absolutely impossible to distribute among all the leading members of all the colony assemblies such a share, either of the offices, or of the disposal of the offices, arising from the general government of the British empire, as to dispose them to give up their popularity at home, and to tax their constituents for the support of that general government, of which almost the whole

emoluments were to be divided among people who were strangers to them. The unavoidable ignorance of administration, besides, concern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different members of those different assemblies, the offences which must frequently be given, the blunders which must constantly be committed, in attempting to manage them in this manner, seems to render such a system of management altogether impracticable with regard to them.

殖民地的议会，似不可能由母国操纵，使它们能向当地人民征收足够的公共收入，以维持一切时期的本地民政和军政，又按适当比例负担英帝国总政府的经费。甚至是直接受君主监督的英国国会，也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才被置于这样的管理制度之下，或者说才使它提供足够的税收，以维持本国军民两政。君主只由于曾以支配此官职的权能大部分及军政民政官职大部分，分给国会中个别议员。才取得了对英国国会的这种控制。殖民地议会数目众多，分散各处，离君主很远，而组织又多样，所以，君主即使拥有同样的控制手段，亦难于如此控制，而且‘他并没有这种手段。他绝对不能把英帝国总政府的职位大部分或支配此职位的权能大部分，分给殖民地议会的主要成员，使他们向选民课征，甘冒不韪，以维持那总政府，这样总政府的薪俸，几乎全部都要分配给他们不相识的人。此外，英国政府又难免不知道各个议会中各个代表的相对地位，征企图作这样的控制时，难免犯了错误，难免触犯他们，这样就会使这种控制办法，对殖民地议会全不适用。

The colony assemblies, besides, cannot be supposed the proper judges of w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defence and support of the whole empire. The care of that defence and support is not entrusted to them. It is not their business, and they have no regular means of information concerning it. The assembly of a province, like the

vestry of a parish, may judge very properly concerning the affairs of its own particular district, but can have no proper means of judging concerning those of the whole empire. It cannot even judge properly concerning the proportion which its own province bears to the whole empire, or concerning the relative degree of its wealth and importance,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provinces; because those other provinces are not under the inspection and superintendency of the assembly of a particular province. W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defence and support of the whole empire, and in what proportion each part ought to contribute, can be judged of only by that assembly which inspects and superintends the affairs of the whole empire.

而且，对于全帝国的国防经费及维持费，殖民地议会不可能是适当的判断者。此等事务，没委托殖民地议会考虑。这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关于此等事务，亦不能经常得到情报。如教区委员会一样，省议会关于所属地域的事务，能作适当的判断。但他们却无法判断全帝国的事务。关于本省与他省的相对重要性和富裕程度，或关于本省对全国所持的比例是怎样，它们甚至不能作适当的判断，因为其他各省，并不受这省区议会的监督和指挥。全帝国的国防和维持所需要的是什么，每省所负担的部分是多少，只有一个议会，即监督和指挥全帝国事务的议会能作适当的判断。

It has been proposed, accordingly, that the colonies should be taxed by requisition, the parliament of Great Britain determining the sum which each colony ought to pay, and the provincial assembly assessing and levying it in the way that suited bes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province. What concerned the whole empire would in this way be determined by the assembly which inspects and superintends the affairs of the whole empire; and the provincial

affairs of each colony might still be regulated by its own assembly. Though the colonies should, in this case, have no representative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 yet, if we may judge by experience, there is no probability that the parliamentary requisition would be unreasonable.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has not, upon any occasion, shewn the smallest disposition to overburden those parts of the empire which are not represented in parliament. The islands of Guernsey and Jersey, without any means of resisting the authority of parliament, are more lightly taxed than any part of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 in attempting to exercise its supposed right, whether well or ill grounded, of taxing the colonies, has never hitherto demanded of them anything which even approached to a just proportion to what was paid by their fellow subjects at home. If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olonies, besides, was to rise or fall in proportion to the rise or fall of the land-tax, parliament could not tax them without taxing, at the same time, its own constituents, and the colonies might, in this case, be considered as virtually represented in parliament.

于是，有人建议，向殖民地派征赋税，即各殖民地应纳的数额，由英帝国议会决定，而省议会则按各省情况，决定最适宜的抽取方法。这样，各殖民地当地的事务，仍可由其自己的议会决定。关于全帝国的事务，由监督和指挥全国事务的议会决定。在这场合，殖民地虽不派代表出席英国议会，但我们可根据经验来判断，国会的派征不至于不合理。英国议会对于不派代表出席国会的帝国所属各地，从来没有加以过重的负担。根西及泽西二岛，虽无任何手段抵抗国会权威，但比别省却纳更少的赋税。国会虽企图行使它想象中的向殖民地征收的权利（无论有无根据），但迄未要求殖民地人民，按他们国内同胞应纳的正当比例纳税。此外，若要按土地税的增减而比例增减殖民地纳税，那么国会非同时对其自己选民征税，即不能对殖民地征税，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可以说实际上在国会里派有代表。

Examples are not wanting of empires in which all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are not taxed, if I may be allowed the expression, in one mass; but in which the sovereign regulates the sum which each province ought to pay, and in some provinces assesses and levies it as he thinks proper; while in others he leaves it to be assessed and levied as the respective states of each province shall determine. In some provinces of France, the king not only imposes what taxes he thinks proper, but assesses and levies them in the way he thinks proper. From others he demands a certain sum, but leaves it to the states of each province to assess and levy that sum as they think proper. According to the scheme of taxing by requisition, the parliament of Great Britain would stand nearly in the same situation towards the colony assemblies, as the king of France does towards the states of those provinces which still enjoy the privilege of having states of their own, the provinces of France which are supposed to be the best governed.

若我可以这样说——各省不按同一办法同一标准征税——而由君主决定各省应纳数额，一些省份则由省议会决定抽收办法，另一些省份由君主决定抽收办法，这在其他帝国，也不乏先例。法国就有些省份，不仅纳税额由国王决定，而亦由国王决定抽收办法。但对另一些省份，而由省议会决定抽收办法，他仅仅决定数额。依据派征赋税计划，法国国王对于有权组织议会，而且据说又是治理得最好的那些省的议会，和英国国会对于殖民地会议，就几乎处在同样的地位了。

But though, according to this scheme, the colonies could have no just reason to fear that their share of the public burdens should ever exceed the proper proportion to that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at home, Great Britain might have just reason to fear that it never

would amount to that proper proportion. The parliament of Great Britain has not, for some time past, had the same established authority in the colonies, which the French king has in those provinces of France which still enjoy the privilege of having states of their own. The colony assemblies, if they were not very favourably disposed (and unless more skilfully managed than they ever have been hitherto, they are not very likely to be so), might still find many pretences for evading or rejecting the most reasonable requisitions of parliament. A French war breaks out, we shall suppose; ten millions must immediately be raised, in order to defend the seat of the empire. This sum must be borrowed upon the credit of some parliamentary fund mortgaged for paying the interest. Part of this fund parliament proposes to raise by a tax to be levied in Great Britain; and part of it by a requisition to all the different colony assemblies of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Would people readily advance their money upon the credit of a fund which partly depended upon the good humour of all those assemblies, far distant from the seat of the war, and sometimes, perhaps, thinking themselves not much concerned in the event of it? Upon such a fund, no more money would probably be advanced than what the tax to be levied in Great Britain might be supposed to answer for. The whole burden of the debt contracted on account of the war would in this manner fall, as it always has done hitherto, upon Great Britain; upon a part of the empire, and not upon the whole empire. Great Britain is, perhaps, since the world began, the only state which, as it has extended its empire, has only increased its expence, without once augmenting its resources. Other states have generally disburdened themselves, upon their subject and subordinate provinces,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expence of defending the empire. Great Britain has hitherto suffered her subject and subordinate provinces to disburden themselves upon her of almost this whole expence. In order to put Great Britain upon

a footing of equality with her own colonies, which the law has hitherto supposed to be subject and subordinate, it seems necessary, upon the scheme of taxing them by parliamentary requisition, that parliament should have some means of rendering its requisitions immediately effectual, in case the colony assemblies should attempt to evade or reject them; and what those means are, it is not very easy to conceive, and it has not yet been explained.

不过，按照这计划，虽然殖民地人民无正当理由可忧惧，和他们国内同胞的负担比较，他们对国家的负担，会超过适当的比例，但英国却有理由忧惧，殖民地对国家的负担不会达到这适当的比例。于有权组织议会的那些省份，法国对的统治权已经巩固，但在过去若干时期内英国，却没有确立同样的统治权。殖民地议会，若不十分乐意（他们是不大会十分乐意的，除非巧妙地加以控制），仍有许多借口来逃避或拒绝国会最合理的派征。假定说，一次对法战争爆发了，必须立即征收1000万镑，来保卫帝国中心地。这个款项，必须由国会以某项基金为担保，支付利息，向人民贷借。这基金的一部分，向美洲和西印度各殖民地议会派征，另一部分国会则提议在英国国内征税抽征。殖民地议会离战地遥远，而且有时认为与这事件无多大关系，而这个基金的募集，部分又取决于殖民地议会的高兴，那么人民肯不肯立即根据这个基金的担保，而贷借款项呢？由这样一个基金所贷得的货币，也许不会多于英国国内征税被设想可以偿还的数额。这样，就会像往昔一样，战时所借债务的全部负担总是落在大不列颠身上，换言之，落在帝国的一部分，不落在帝国的全部。自有世界以来，也许只有英国一国，开疆辟土，从没增加它的资源，只增加其费用。英国一向以这费用的几乎全部征收于本国，从而解除从属地方的负担。其他国家，大都以帝国防卫费绝大部分，征收于自己从属之地，从而解除自己的负担。要使大不列颠与法律一向认为是隶属大不列颠的殖民地享有平等的地位，国会在派征赋税计划上，似乎必须有手段，使其派征立即生效，不致为殖民地议会所拒绝、所逃避。至于这种手段是什么，却是个未曾阐明的问题，不容易想出来。

Should the parliament of Great Britain, at the same time, be ever fully established in the right of taxing the colonies, even independent of the consent of their own assemblies,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assemblies would, from that moment, be at an end, and with it, that of all the leading men of British America. Men desire to have some share in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 chiefly on account of the importance which it gives them. Upon the power whic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eading men, the natural aristocracy of every country, have of preserving or defending their respective importance, depends the stability and duration of every system of free government. In the attacks which those leading men are continually making upon the importance of one another, and in the defence of their own, consists the whole play of domestic faction and ambition. The leading men of America, like those of all other countries, desire to preserve their own importance. They feel, or imagine, that if their assemblies, which they are fond of calling parliaments, and of considering as equal in authority to the parliament of Great Britain, should be so far degraded as to become the humble ministers and executive officers of that parliamen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own importance would be at an end. They have rejected, therefore, the proposal of being taxed by parliamentary requisition, and, like other ambitious and high-spirited men, have rather chosen to draw the sword in defence of their own importance.

倘若英国国会，同时充分确立了不得殖民地议会同意即可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利，则马上就会终结此等议会的重要地位，而英属美洲领导人物的重要地位，亦必跟着完结。人们所以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是因为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可以取得重要地位。自由政府组织是怎样持久、怎样安定，就看这个国家大部分的领导人（即这个国

家的上层阶级），能如何保持或保卫其重要地位。所以，国内派别活动和野心活动，就在于此等领袖人物，保卫各自的重要地位，不断地互相攻击别人的重要地位。如一切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物一样，美洲的领导人物，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们觉得，若他们的议会——他们把它叫做国会，认为其权力与英国国会相等——大权旁落，仅仅成为英国国会的低声下气的巨仆或执行吏，他们自己的重要地位就大部分丧失了。所以，如雄心勃勃、意气昂扬的人一样，宁愿剑拔弩张来保卫自己的重要地位他们拒绝议会派征赋税的建议。

Towards the declens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the allies of Rome, who had borne the principal burden of defending the state and extending the empire, demanded to be admitted to all the privileges of Roman citizens. Upon being refused, the social war broke out. During the course of that war, Rome granted those privileges to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one by one, and in proportion as they detached themselves from the general confederacy. The parliament of Great Britain insists upon taxing the colonies; and they refuse to be taxed by a parliament in which they are not represented. If to each colony which should detach itself from the general confederacy, Great Britain should allow such a number of representatives as suited the proportion of what it contributed to the public revenue of the empire, in consequence of its being subjected to the same taxes, and in compensation admitted to the same freedom of trade with its fellow-subjects at home; the number of its representatives to be augmented as the proportion of its contribution might afterwards augment; a new method of acquiring importance, a new and more dazzling object of ambition, would be presented to the leading men of each colony. Instead of piddling for the little prizes which are to be found in what may be called the paltry raffle of colony faction, they might then hope, from the presumption which men naturally have in their own ability and

good fortune, to draw some of the great prizes which sometimes come from the wheel of the great state lottery of British politics. Unless this or some other method is fallen upon, and there seems to be none more obvious than this, of preserving the importance and of gratifying the ambition of the leading men of America, it is not very probable that they will ever voluntarily submit to us; and we ought to consider, that the blood which must be shed in forcing them to do so, is, every drop of it, the blood either of those who are, or of those whom we wish to have for our fellow citizens. They are very weak who flatter themselves that, in the state to which things have come, our colonies will be easily conquered by force alone. The persons who now govern the resolutions of what they call their continental congress, feel in themselves at this moment a degree of importance which, perhaps, the greatest subjects in Europe scarce feel. From shopkeepers, trades men, and attorneys, they are become statesmen and legislators, and are employed in contriving a new form of government for an extensive empire, which, they flatter themselves, will become, and which, indeed, seems very likely to become, one of the greatest and most formidable that ever was in the world. Five hundred different people, perhaps, who, in different ways, act immediately under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and five hundred thousand, perhaps, who act under those five hundred, all feel, in the same manner, a proportionable rise in their own importance. Almost every individual of the governing party in America fills, at present, in his own fancy, a station superior, not only to what he had ever filled before, but to what he had ever expected to fill; and unless some new object of ambition is presented either to him or to his leaders, if he has the ordinary spirit of a man, he will die in defence of that station.

当罗马共和国日趋衰微的时候，罗马同盟国负有防御国家扩大帝国重任，要求享有与罗马市民所享的同样特权。在共和国拒绝它们的要求时，内战就爆发了。在这样的战争中，罗马以此种特权，一个一个地给予大部分同盟国，而且按它们的独立程度给予。现在，英国的国会主张对殖民地征税，而殖民地因为未曾派代表出席国会，则拒绝这种征税。设者对要脱离联盟的各殖民地，英国都许其按所纳国税的比例，选举代表，而且由于纳税，允其自由贸易，使与他们本国同胞相等——其代表人数，随其纳税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那么各殖民地领导人物，就有了一个新的更迷人的野心对象，一种夺取重要地位的新方法。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对于自己才能及幸运自有妄想，不想从殖民地这小彩票获得小奖。这样，他们也许会希望，从英国政治界那国家彩票获得大奖。明显地，这种方法，最能保持美洲领导人物的重要地位，满足他们的野心。除了用这种方法或其他同样方法，他们不见得会自动服从我们的。我们应当知道，若以流血的方法，强迫他们服从我们，那流出的每一点血，都是我们国民的血，不然就是愿为我们国民的人的血。有些人非常愚钝地以为，时机一到，极易以武力征服殖民地，现今主持所谓联合殖民地议会的人，自己感到一种为欧洲最大公民所不会感到的重要地位。他们由商人、律师小买卖商人，一变而为政治家和立法者，给一个广大帝国制定一个新政体。他们自夸，世界上自有国家以来，那将成为最大而又最强的一个国家，也许真会如此。直接在联合殖民地议会工作的人，也许有500人，听这500人号令的人，也许有50万，他们都同样觉得，自己的重要性按地位重要性而提高了。美洲政党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想象自己现今的位置，比他们所预期的优越，也比过去优越。否则他若有一般人的志气，定会拼命护卫他的那个地位，除非有一种新的野心对象出现在他或其领袖面前。

It is a remark of the President Heynaut, that we now read with pleasure the account of many little transactions of the Ligue, which, when they happened, were not, perhaps, considered as very important pieces of news. But everyman then, says he, fancied

himself of some importance; and the innumerable memoirs which have come down to us from those times, we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written by people who took pleasure in recording and magnifying events, in which they flattered themselves they had been considerable actors. How obstinately the city of Paris, upon that occasion, defended itself, what a dreadful famine it supported, rather than submit to the best, and afterwards the most beloved of all the French kings, is well know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itizens, or those who governe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fought in defence of their own importance, which, they foresaw, was to be at an end whenever the ancient government should be re-established. Our colonies, unless they can be induced to consent to a union, are very likely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the best of all mother countries, as obstinately as the city of Paris did against one of the best of kings.

亨诺主席曾说，我们现今很有兴趣地读着关于同盟的许多小事件的记录，但当这些事情发生时，也许不被人看作极重要的新闻。他说，当时各人都认为他们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那时流传下来的记录，有大部分，是由那些高兴记录那些事件的人们记下来的。他们自夸是那些事件中的重要角色。世人熟知，巴黎市当时曾顽强地保卫自己，曾为着抗拒那位最好而后来又是最为人爱戴的国王而忍受一次那么可怕的饥谨。那里支配这大部分市民的人或者说市民的大部分，因为预先看到，旧政府一旦恢复，他们的重要地位就会立即消灭，所以竭力为保卫自己的重要地位而战。我们如果不能诱导本国殖民地同意和我们结合它们亦会抵抗母国中最好的一个母国，像巴黎市顽强抗拒其最好的国王那样。

The idea of representation was unknown in ancient times. When the people of one state were admitted to the right of

citizenship in another, they had no other means of exercising that right, but by coming in a body to vote and deliberate with the people of that other state. The admiss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inhabitants of Italy to the privileges of Roman citizens, completely ruined the Roman republic. It was no longer possi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who was, and who was not, a Roman citizen. No tribe could know its own members. A rabble of any kind c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assemblies of the people, could drive out the real citizens, and decide upon the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as if they themselves had been such. But though America were to send fifty or sixty new representatives to parliament, the door-keep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could not find any great difficulty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who was and who was not a member. Though the Roman constitution, therefore, was necessarily ruined by the union of Rome with the allied states of Italy, there is not the least probability that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would be hurt by the union of Great Britain with her colonies. That constitution, on the contrary, would be completed by it, and seems to be imperfect without it. The assembly which deliberates and decides concerning the affairs of every part of the empire, in order to be properly informed, ought certainly to have representatives from every part of it. That this union, however, could be easily effectuated, or that difficulties, and great difficulties, might not occur in the execution, I do not pretend. I have yet heard of none, however, which appear insurmountable. The principal, perhaps, arise, not from the nature of things, but from the prejudices and opinions of the people, both on this 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Atlantic.

古代没有代表制的观念。当一国人民在他国取得了市民权的时候，他们除了与他国人民一块儿讨论、一块儿投票，即无法行使这种权利。将罗马市民特权给予大部分意大利居民，就完全破坏了罗马共

和国。这样，就无从判别，谁是罗马市民，谁不是罗马市民。这样，一个氏族，就不知道它自己的成员。这样，任何种类的暴民，都可能被引入人民议会，他们可能俨然以真正市民自居，把真正市民赶走，自己决定共和国事务。但是，即使美洲派50或60个新代表出席国会，众议院的门房，亦不难判别，谁是国会议员，谁不是国会议员。所以，不同于罗马组织，英国组织却不会由于大不列颠与其殖民地联合而受丝毫损害。反之，其组织将因此而完善；没有这种联合，反会觉得不完善。讨论并决定为要得到正确的情报，帝国一切部分事务的议会，应当有各部分派出的代表。这种联合，能不能容易实行，执行时会不会发生困难，我没有听见，且不敢妄断不能克服的困难。主要的困难，并非出干事物的本性而可能来自大西洋两岸人民的成见和偏见。

We on this side the water are afraid lest the multitude of American representatives should overturn the balance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increase too much eith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rown on the one hand, or the force of the democracy on the other. But if the number of American representatives were to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produce of American taxation, the number of people to be managed would increase exactly in proportion to the means of managing them, and the means of managing to the number of people to be managed. The monarchical and democratical parts of the constitution would, after the union, stand exactly in the same degree of relative force with regard to one another as they had done before.

我们住在大西洋这一岸，不必忧惧美洲代表的众多，将打破组织的均衡，或过度地增加民主势力，或过度地增加国王势力。若美洲代表的人数，与美洲所纳的税成比例，那么统治手段的增加，将与受统治人数的增加，恰好成比例；受统治人数的增加，将与统治手段的增

加，恰好成比例。联合之后，君主势力与民主势力，仍必和联合之前一样，彼此间保持同程度的相对实力。

The peop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ater are afraid lest their distance from the seat of government might expose them to many oppressions; but their representatives in parliament, of which the number ought from the first to be considerable, would easily be able to protect them from all oppression. The distance could not much weaken the dependency of the representative upon the constituent, and the former would still feel that he owed his seat in parliament, and all the consequence which he derived from it, to the good-will of the latter. It would be the interest of the former, therefore, to cultivate that good-will, by complaining, with all the authority of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ure, of every outrage which any civil or military officer might be guilty of in those remote parts of the empire. The distance of America from the seat of government, besides, the natives of that country might flatter themselves, with some appearance of reason too, would not be of very long continuance. Such has hitherto been the rapid progress of that country in wealth, population, and improvement, that in the course of little more than a century, perhaps, the produce of the American might exceed that of the British taxation. The seat of the empire would then naturally remove itself to that part of the empire which contributed most to the general defence and support of the whole.

住在大西洋那一岸的人民，亦不必忧惧他们因离政府所在地遥远而可能遭受许多压迫。他们出席国会的代表，自始就该是很多的，他们的代表，必能保护他们，使其不受到这一切压迫。距离的远，不会削弱代表对于选民的依存性，前者仍必认为，靠后者选拔，才得议员

一席，并从这一席取得好处。前者为要保待后者对他的好感，定会以国会议员的权力，申诉帝国这辽远地带民政或军政长官的违法乱纪行为。而且，美洲人民，亦似有若干理由认为，他们不会长此继续与政府所在地远隔。也许只要一世纪，凭借那里一向在财富、人口和改良上那样快速的进步，美洲的纳税额将超过大不列颠的纳税额。帝国的首都，自然会迁到帝国内纳税最多的地方。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and that of a passage to the East Indies by the Cape of Good Hope, are the two greatest and most important events recorded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heir consequences have already been great; but, in the short period of between two and three centuries which has elapsed since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 whole extent of their consequences can have been seen. What benefits or what misfortunes to mankind may hereafter result from those great events, no human wisdom can foresee. By uniting in some measure the most distant parts of the world, by enabling them to relieve one another's wants, to increase one another's enjoyments, and to encourage one another's industry, their general tendency would seem to be beneficial. To the natives, however, both of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all the commercial benefits which can have resulted from those events have been sunk and lost in the dreadful misfortunes which they have occasioned. These misfortunes, however, seem to have arisen rather from accident than from any thing in the nature of those events themselves. At the particular time when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the superiority of force happened to be so great on the side of the Europeans, that they were enabled to commit with impunity every sort of injustice in those remote countries. Hereafter, perhaps, the natives of those countries may grow stronger, or those of Europe may grow weaker; and the inhabitants of all the different quarters of the world may

arrive at that equality of courage and force which, by inspiring mutual fear, can alone overawe the injustice of independent nations into some sort of respect for the rights of one another. But nothing seems more likely to establish this equality of force, than that mutual communication of knowledge, and of all sorts of improvements, which an extensive commerce from all countries to all countries naturally, or rather necessarily, carries along with it.

人类历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两件事，是美洲的发现及绕好望角到东印度通路的发现。其影响已经很大了；但自有这两个发现以来，只不过经历了二三百年，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其影响势不可能全部呈现出来。人类的智慧，还不能预见，这两大事件，以后对于人类，将产生利益，还是引出不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世界上最遥远的部分，使它们能互相救济彼此的缺乏，奖励彼此的产业，增加彼此的享受，其一般倾向似乎是有利的。不过，对于西印度及东印度两处的土人，这两事件本来能够产生的一切商业上的利益，却被它们所引起的不幸完全抵消了。这种不幸，是出于偶然而不是它们的本性。美洲及东印度通路被发现时，欧洲人的优越势力，使他们能为所欲为，在此等辽远地方，做出各种不合正义的事。今后，此等地方的土人，也许会日渐强盛，欧洲人也许会日趋衰弱，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实力与勇气。只有这样，才可引起相互的恐惧，从而威压一切独立国的专横，使它们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但最能建立此种同等实力的，似乎就是相互传授知识及改良技术了，但这种结果，必然会，伴随着世界各国广泛的商业而来临。

In the mean time, one of the principal effects of those discoveries has been, to raise the mercantile system to a degree of splendour and glory which it could never otherwise have attained to. It is the object of that system to enrich a great nation, rather by trade and manufactures than by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land, rather by the industry of the towns than by that of the country. But in consequence of those discoveries, the commercial towns of Europe, instead of being the manufacturers and carriers for but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world (that part of Europe which is washed by the Atlantic ocean, and the countries which lie round the Baltic and Mediterranean seas), have now become the manufacturers for the numerous and thriving cultivators of America, and the carriers, and in some respects the manufacturers too, for almost all the different nations of Asia, Africa, and America. Two new worlds have been opened to their industry, each of them much greater and more extensive than the old one, and the market of one of them growing still greater and greater every day.

同时，这两个发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促进重商主义的发展，使其达到非此决不能达到的那么显著、那么壮大的程度。这个主义的目标，是由商业及制造业而富国与其说是由土地改良及耕作而富国，而不是由乡村产业而富国。但这两个发现的结果，欧洲商业城市，不仅成为世界极小部分的运送业者和制造业者（那极小部分，即是大西洋流过的欧洲各国及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周围各国），而且亚洲、非洲、美洲各地的运送业者，和成为美洲许多繁荣耕作地区的制造业者，并在若干方面，亦是这各地的制造业者了。这样就给他们的产业，开拓了比旧世界大得多两个新世界，其中一个市场，还在日益扩大起来。

The countries which possess the colonies of America, and which trade directly to the East Indies, enjoy indeed the whole show and splendour of this great commerce. Other countries, however, notwithstanding all the invidious restraints by which it is meant to exclude them, frequently enjoy a greater share of the real benefit of it. The colonies of Spain and. Portugal, for example, give more real encouragement to the industry of other countries than to

that of Spain and Portugal. In the single article of linen alone, the consumption of those colonies amounts, it is said (but I do not pretend to warrant the quantity), to more than three millions sterling a-year. But this great consumption is almost entirely supplied by France, Flanders, Holland, and Germany. Spain and Portugal furnish but a small part of it. The capital which supplies the colonies with this great quantity of linen, is annually distributed among, and furnishes a revenue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ose other countries. The profits of it only are spent in Spain and Portugal, where they help to support the sumptuous profusion of the merchants of Cadiz and Lisbon.

诚然，占有美洲殖民地并直接与东印度通商的国家，在外表上享受这大商业全部。但其他国家，虽受那令人厌恶的旨在排斥它们的限制，却往往享受这大商业实际利益的较大部分，例如，对于其他国家产业所提供的真实奖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就比它们本国产业所受的鼓励大。单就亚麻布一项说，此等殖民地的消费，据说每年就在300万镑以上，不过我不敢肯定有这么多。但这巨额的消费。西班牙和葡萄牙，仅仅供给了一小部分，几乎全部由法国、佛兰德、荷兰、德意志供给。以此巨量亚麻布供给殖民地的资本，每年在那些国家人民中间分配，并给他们提供收入。仅仅是这资本的利润，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消费，给加的斯和里斯本的商人维持最豪侈的浪费。

Even the regulations by which each nation endeavours to secure to itself the exclusive trade of its own colonies, are frequently more hurtful to the countries in favour of which they are established, than to those against which they are established. The unjust oppression of the industry of other countries falls back, if I may say so, upon the heads of the oppressors, and crushes their industry more than it does that of those other countries. By those

regulations, for example, the merchant of Hamburg must send the linen which he destines for the American market to London, and he must bring back from thence the tobacco which he destines for the German market; because he can neither send the one directly to America, nor bring the other directly from thence. By this restraint he is probably obliged to sell the one somewhat cheaper, and to buy the other somewhat dearer, than he otherwise might have done; and his profits are probably somewhat abridged by means of it. In this trade, however, between Hamburg and London, he certainly receives the returns of his capital much more quickly than he could possibly have done in the direct trade to America, even though we should suppose, what is by no means the case, that the payments of America were as punctual as those of London. In the trade, therefore, to which those regulations confine the merchant of Hamburg, his capital can keep in constant employment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German industry than he possibly could have done in the trade from which he is excluded. Though the one employment, therefore, may to him perhaps be less profitable than the other, it cannot be less advantageous to his country. It is quite otherwise with the employment into which the monopoly naturally attracts, if I may say so, the capital of the London merchant. That employment may, perhaps, be more profitable to him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employments; but on account of the slowness of the returns, it cannot be more advantageous to his country.

连一国所订立以保证其所属殖民地的专营贸易的条例，亦在较小程度上有害于此种条例所要妨害的国家，在较大程度上有害于此种条例所要惠益的国家。而。对他国产业不正当的压迫，反过来（若我可以这样说）落在压迫者头上，并以更大的程度破坏他们的产业。例如，汉堡商人根据此等条例，必须把要送到美洲去的亚麻布送往伦敦，并把要送到德国去的烟草，从伦敦带回。因为此等商人不能直接

把亚麻布送到美洲，亦不能直接从美洲带回烟草。由于这种限制，此等商人也许不得不，而以稍稍昂贵的价格购买烟草，以稍稍低廉的价格售卖亚麻布，其利润也许因此缩减若干。但是，即使我们假定，美洲还款不像伦敦那么准时——这绝不是事实——汉堡与伦敦贸易，商人资本的往返，也许要比直接与美洲通商，要快得多。这样，排斥汉堡商人，使不能直接与美洲通商，反使汉堡商人的资本，能在德意志继续雇用大得多的劳动量。这样不会减少他的国家的利益，只可减少他个人的利润。但对英国，情形就全然两样了。垄断自然会吸引（若我可这样说）伦敦商人的资本，使流入对自己更有利而对国家却更不利的用途，因为往返缓慢。

After all the unjust attempts, therefore, of every country in Europe to engross to itself the whole advantage of the trade of its own colonies, no country has yet been able to engross to itself any thing but the expence of supporting in time of peace, and of defending in time of war, the oppressive authority which it assumes over them. The inconveniencies resulting from the possession of its colonies, every country has engrossed to itself completely. The advantages resulting from their trade, it has been obliged to share with many other countries.

欧洲各国虽都企图用各种不正当方法垄断所属殖民地贸易的全部利益，但除了担负平时维持和战时保卫其对殖民地的统治权所开支的费用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得到什么。由占有此等殖民地而产生的困难，应有尽有，且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分享由此等殖民地贸易而产生的利益。

At first sight, no doubt, the monopoly of the great commerce of America naturally seems to be an acquisition of the highest value.

To the undiscerning eye of giddy ambition it naturally presents itself, amidst the confused scramble of politics and war, as a very dazzling object to fight for. The dazzling splendour of the object, however, the immense greatness of the commerce, is the very quality which renders the monopoly of it hurtful, or which makes one employment, in its own nature necessarily less advantageous to the country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employments, absorb a much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than w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gone to it.

乍看起来，对美洲大贸易的垄断，似乎当然是一种无上价值的获得。在无辨别力的野心家看来，在纷杂的政争及战争中，那自然会成为一种很值得争夺的迷人的目标。但是，这贸易的巨大，目标的炫人外观，使垄断此种贸易具有有害的性质，换言之，垄断使一种用途比大部分其他用途对国家利益更少，但却比自然状态下吸收了更大部分的国家资本。

The mercantile stock of every country, it has been shown in the second book, naturally seeks, if one may say so, the employment most advantageous to that country. If it is employed in the carrying trade, the country to which it belongs becomes the emporium of the goods of all the countries whose trade that stock carries on. But the owner of that stock necessarily wishes to dispose of as great a part of those goods as he can at home. He thereby saves himself the trouble, risk, and expence of exportation; and he will upon that account be glad to sell them at home, not only for a much smaller price, but with somewhat a smaller profit, than he might expect to make by sending them abroad. He naturally, therefore, endeavours as much as he can to turn his carrying trade into a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If his stock, again, is employed in a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he will, for the same reason, be glad to dispose of, at home, as great a part as he can of the home goods which he collects in order to export to some foreign market, and he will thus endeavour, as much as he can, to turn his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into a home trade. The mercantile stock of every country naturally courts in this manner the near, and shuns the distant employment: naturally courts the employment in which the returns are frequent, and shuns that in which they are distant and slow; naturally courts the employment in which it can maintain the greatest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in the country to which it belongs, or in which its owner resides, and shuns that in which it can maintain there the smallest quantity. It naturally courts the employment which in ordinary cases is most advantageous, and shuns that which in ordinary cases is least advantageous to that country.

第二篇说过，一国商业资本，自然会寻求（若可这样说）最有利于国家的用途。倘若它投在转口贸易上，那么它所属的国家，将成为它所经营的各国货物贸易的中心市场。资本所有者，必愿尽其所能，把这货物的大部分，在国内售脱。这样他就省免了输出的麻烦、危险与费用，并因此尽管在国内市场，所得价格比输出后所可望获得的价格小得多，而所得利润亦比输出后所可望获得的利润小，他总必愿意在国内市场售卖。所以，他当然尽其所能，设法使转口贸易变作消费品国外贸易。此外，他的资本若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他又必为了同一理由，愿意尽其所能，把他搜集来准备输到外国市场去的国内货物的大部分，在国内售脱，因而设法使消费品国外贸易变成国内贸易。各国的商业资本，都自然避开远的用途，寻求近的用途，；避开往返远的用途，寻求往返次数多的用途，而；避开仅能雇用所属国或所在国最小生产性劳动量的用途，寻求能雇用所属国或所在国最大生产性劳动量的用途。总之，它自然会避开在普通场合对国家最无利的用途，寻求在普通场合最有利于国家的用途。

But if, in any one of those distant employments, which in ordinary cases are less advantageous to the country, the profit should happen to rise somewhat higher than what is sufficient to balance the natural preference which is given to nearer employments, this superiority of profit will draw stock from those nearer employments, till the profits of all return to their proper level. This superiority of profit, however, is a proof that, in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society, those distant employments are somewhat understocked in proportion to other employments, and that the stock of the society is not distributed in the properest manner among all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carried on in it. It is a proof that something is either bought cheaper or sold dearer than it ought to be, and that some particular class of citizens is more or less oppressed, either by paying more, or by getting less than what is suitable to that equality which ought to take place, and which naturally does take place, among all the different classes of them. Though the same capital never will maintain the same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in a distant as in a near employment, yet a distant employment maybe as necessary for the welfare of the society as a near one; the goods which the distant employment deals in being necessary, perhaps, for carrying on many of the nearer employments. But if the profits of those who deal in such goods are above their proper level, those goods will be sold dearer than they ought to be, or somewhat above their natural price, and all those engaged in the nearer employments will be more or less oppressed by this high price. Their interest, therefore, in this case, requires, that some stock should be withdrawn from those nearer employments, and turned towards that distant one, in order to reduce its profits to their proper level, and the price of the goods which it deals in to their natural price. In this extraordinary case, the public interest requires that some stock should be withdrawn

from those employments which, in ordinary cases, are more advantageous, and turned towards one which, in ordinary cases, is less advantageous to the public; and, in this extraordinary case, the natural interests and inclinations of men coincide as exactly with the public interests as in all other ordinary cases, and lead them to withdraw stock from the near, and to turn it towards the distant employments.

在普通场合，此等远的用途，虽对国家较少利益，但若其中有某一用途的利润，偶然提高，足够抵消近的用途的好处，那么这种高的利润，就会把资本从近的用途吸引过来，一直到各种用途的利润，都回到适当的水平为止。不过，这种高的利润证明，在社会实际情况下，此等远的用途的资本，与其他用途的资本，稍稍不相称，而全社会的资本，不按最适当的方式，分配到社会内不同用途。它证明，有若干物品，违反应有的程度，以较昂贵的价格卖出或以较廉的价格买入，市民中有某一阶级，多少受到压迫，以致违反自然会有或应有的一切阶级平等状态，支付较多或收得较少。同量资本，投在远的用途上，和投在近的用途上，虽决不能雇用相同的生产性劳动量，但近的用途和远的用途，也许同样为社会幸福所必需。许多由远的用途经营的货物，就为许多近的用途经营所必需。但若经营此等货物的人的利润，超过了应有的水平，此等货物就将违反应有的程度，以稍稍超过自然价格的价格售卖。此种高价格，就会使一切从事近的用途的人多少受到压迫。所以，在这场合，他们的利害关系，就要求有若干资本，从此等近的用途撤回，而转入远的用途，以降低他们所经营的货物的价格，使达到自然价格，并降低其利润，使达到适当水平。在这异常的场合，公共的利害关系，必定要求，从通常对公众较有利的用途撤回若干资本，能投到通常对公众较少利益的用途。和在一切其他通常的场合一样，在这异常的场合，个人的自然利害关系与倾向，恰好符合公众的利害关系，使他们从近的用途撤回资本，改投入远的用途。

It is thus that the private interests and passions of individuals naturally dispose them to turn their stock towards the employments which in ordinary cases, are most advantageous to the society. But if from this natural preference they should turn too much of it towards those employments, the fall of profit in them, and the rise of it in all others, immediately dispose them to alter this faulty distribution. Without any intervention of law, therefore, the private interests and passions of men naturally lead them to divide and distribute the stock of every society among all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carried on in it; as nearly as possible in the proportion which is most agreeable to the interest of the whole society.

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人通常把资本投在最有利于社会的方面。但若由于这种自然的倾向，人们把过多资本投在此等用途，那么这些用途利润的降低，和其他各用途利润的提高，会立即使他们改变这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的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

All the different regulations of the mercantile system necessarily derange more or less this natural and most advantageous distribution of stock. But those which concern the trade to America and the East Indies derange it, perhaps, more than any other; because the trade to those two great continents absorbs a greater quantity of stock than any two other branches of trade. The regulations, however, by which this derangement is effected in those two different branches of trade, are not altogether the same. Monopoly is the great engine of both; but it is a different sort of monopoly. Monopoly of one kind or another, indeed, seems to be the sole engine of the mercantile system.

一切的重商主义法规，必然或多或少地紊乱这种最有利而又自然的资本分配。但关于东印度贸易及美洲贸易的法规，则比其他任何法规，更能导致这种结果，因为这两大洲的贸易，吸收了比其他任何两个贸易部门所吸收的都要大的资本。不过，给这两个贸易部门造成紊乱的法规，却又不是完全相同的。二者都以垄断为大手段，但垄断的种类不同。这一种或那一种垄断，似乎是重商主义的唯一手段。

In the trade to America, every nation endeavours to engross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whole market of its own colonies, by fairly excluding all other nations from any direct trade to them. Dur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Portuguese endeavoured to manage the trade to the East Indies in the same manner, by claiming the sole right of sailing in the Indian seas, on account of the merit of having first found out the road to them. The Dutch still continue to exclude all other European nations from any direct trade to their spice islands. Monopolies of this kind are evidently established against all other European nations, who are thereby not only excluded from a trade to which it might be convenient for them to turn some part of their stock, but are obliged to buy the goods which that trade deals in, somewhat dearer than if they could import them themselves directly from the countries which produced them.

对于美洲贸易，各国都尽其所能，企图垄断其所属殖民地的全部市场，并完全排斥其他各国，使其不能与所属殖民地进行直接的通商。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葡萄牙人企图以同样方法，控制东印度的贸易，他们声言他们拥有印度各海的唯一航行权，因为他们第一次发现这条路。而荷兰人仍继续排斥欧洲一切其他国家，使之不能与其所属香料产岛进行直接通商。这种垄断，显然妨害欧洲其他一切国

家，使它们不能经营本来可投资的有利的贸易，并使它们不得不以比它们自己直接从产地输入时略高的价格，购买这专营贸易所经营的货物。

But since the fall of the power of Portugal, no European nation has claimed the exclusive right of sailing in the Indian seas, of which the principal ports are now open to the ships of all European nations. Except in Portugal, however, and within these few years in France, the trade to the East Indies has, in every European country, been subjected to an exclusive company. Monopolies of this kind are properly established against the very nation which erects them. The greater part of that nation are thereby not only excluded from a trade to which it might be convenient for them to turn some part of their stock, but are obliged to buy the goods which that trade deals in somewhat dearer than if it was open and free to all their countryme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for example, the other inhabitants of England, over and above being excluded from the trade, must have paid, in the price of the East India goods which they have consumed, not only for all the extraordinary profits which the company may have made upon those goods in consequence of their monopoly, but for all the extraordinary waste which the fraud and abuse inseparable from the management of the affairs of so great a company must necessarily have occasioned. The absurdity of this second kind of monopoly, therefore, is much more manifest than that of the first.

但从葡萄牙权力失坠以来，欧洲国家都不再要求在印度各海航行的专营权了，现今印度各海开放主要海港，一切欧洲国家船只都可航行。但除了葡萄牙及近来的法国，各欧洲国家的东印度贸易，都受一个专营公司的钳制。这一种垄断，妨害了实行垄断的国家。这国家大

多数人民，不仅从此失去一种本来可以投资的有利的贸易，而且不得不以比全国人民都能自由经营这种贸易时还略高的价格，购买这垄断贸易所经营的货物。例如，自从英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以来，英国其他居民，不但不能从事这种贸易，而且须以较高的价格，购买他们所消费的东印度货物。这种垄断，要使此公司，在售卖此等货物时，取得异常大的利润；而且这样一个大公司处理事务，难免发生弊端，因而引起异常的浪费。这种异常的利润和异常的浪费，都得由本国购买者支付。所以，第二类垄断的不合理性比第一类垄断的不合理性更为明显。

Both these kinds of monopolies derange more or less the natural distribution of the stock of the society; but they do not always derange it in the same way.

这两种垄断多少都会破坏社会资本的自然分配，但未必会以同样的方式破坏。

Monopolies of the first kind always attract to the particular trade in which they are established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e stock of the society than what would go to that trade of its own accord.

第一种垄断，总是违反自然趋势，吸引着大部分的社会资本，使流人享有垄断权的特殊贸易。

Monopolies of the second kind may sometimes attract stock towards the particular trade in which they are established, and sometimes repel it from that trad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In poor countries, they naturally attract towards that trade more stock than would otherwise go to it. In rich countries, they naturally repel from it a good deal of stock which would otherwise go to it.

第二种垄断，随着不同情况，有时会吸引资本。同样使流人享有垄断权的特殊贸易，有时又会排拒资本，使不流入这种贸易。在贫国，那当然是违反自然趋势，吸引过多的资本，使其流入这种贸易；但在富国，那当然是违反自然趋势，排拒许多资本，使其不流入这种贸易。

Such poor countries as Sweden and Denmark, for example, would probably have never sent a single ship to the East Indies, had not the trade been subjected to an exclusive company.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a company necessarily encourages adventurers. Their monopoly secures them against all competitors in the home market, and they have the same chance for foreign markets with the traders of other nations. Their monopoly shows them the certainty of a great profit upon a considerable quantity of goods, and the chance of a considerable profit upon a great quantity. Without such extraordinary encouragement, the poor traders of such poor countries would probably never have thought of hazarding their small capitals in so very distant and uncertain an adventure as the trade to the East Indies must naturally have appeared to them.

例如，东印度贸易，若不受一个专营公司的钳制，如丹麦和瑞典那样的贫国，也许从来不会派一艘到东印度去的船。这个专营公司的设立，必然会奖励冒险家。他们的垄断权，使他们在国内市场上可以

抵制一切竞争者，而在外国市场上，他们又和他国贸易者有同样的机会。他们的垄断权，告诉他们，他们对大量的货物，十拿九稳地可以收到大的利润，对大量货物，有得到大的利润的机会。没有这种异常的鼓励，这种贫国的穷商人，也许决不会想把小额资本冒险投在如东印度贸易那么遥远和那么不确定的事业上去。

Such a rich country as Holland, on the contrary, would probably, in the case of a free trade, send many more ships to the East Indies than it actually does. The limited stock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probably repels from that trade many great mercantile capitals which would otherwise go to it. The mercantile capital of Holland is so great, that it is, as it were, continually overflowing, sometimes into the public funds of foreign countries, sometimes into loans to private traders and adventurers of foreign countries, sometimes into the most round-about foreign trades of consumption, and sometimes into the carrying trade. All near employments being completely filled up, all the capital which can be placed in them with any tolerable profit being already placed in them, the capital of Holland necessarily flows towards the most distant employments. The trade to the East Indies, if it were altogether free, would probably absorb the greater part of this redundant capital. The East Indies offer a market both for the manufactures of Europe, and for the gold and silver, as well as for the several other productions of America, greater and more extensive than both Europe and America put together.

反之，如荷兰那样的富国，也许会在贸易自由的场合，派遣出比现今多得多的船只到东印度去。荷兰东印度公司资本的有限制性，使得许多本来会流入这种贸易的大商业资本，不会流入这种贸易。荷兰的商业资本很多，所以会不断流出，有时流到外国公债，有时流到冒

险家与外国商人的私债，有时流到转口贸易，有时流到最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一切近的用途都充满着资本，投入近的用途略有利润可图的资本，全都投下了，荷兰资本必然会流向最远的用途。假使东印度贸易是完全自由的，也许会吸收大部分过剩资本。东印度提供了一个比欧洲、美洲合起来还更大更广的市场，用来销售欧洲的制造品及美洲的金银和其他产物。

Every derangement of the natural distribution of stock is necessarily hurtful to the society in which it takes place; whether it be by repelling from a particular trade the stock which would otherwise go to it, or by attracting towards a particular trade that which would not otherwise come to it. If, without any exclusive company, the trade of Holland to the East Indies would be greater than it actually is, that country must suffer a considerable loss, by part of its capital being excluded from the employment most convenient for that port. And, in the same manner, if, without an exclusive company, the trade of Sweden and Denmark to the East Indies would be less than it actually is, or, what perhaps is more probable, would not exist at all, those two countries must likewise suffer a considerable loss, by part of their capital being drawn into an employment which must be more or less unsuitable to their present circumstances. Better for them, perhaps, in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to buy East India goods of other nations, even though they should pay somewhat dearer, than to turn so great a part of their small capital to so very distant a trade, in which the returns are so very slow, in which that capital can maintain so small a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at home, where productive labour is so much wanted, where so little is done, and where so much is to do.

资本自然分配的扰乱，不论是排拒资本，使其违反自然趋势，不流入一个特定贸易部门，还是吸引资本，使其违反自然趋势，流入这特定贸易部门，必然对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产生妨害。若没有任何专营公司，荷兰对东印度的贸易，必会比现在大，而它的一部分资本，不能投在最有利的用途上，当然是它的很大的损失。同样，若没有任何专营公司，瑞典和丹麦对东印度的贸易，将会比现在小，也许更会不存在，而它们一部分资本，投在不适合它们现今情况的用途上，当然也是它们很大的损失。按照它们现在的情况，宁可向他国购买东印度货物，尽管出价较高，也不应该从它们的小额资本中，抽出那么大部分来经营那么遥远的贸易，因为那种贸易的往返迟缓，所能维持的国内生产性劳动量是那么小，而在它们国内，特别需要生产性劳动，有许多事未曾进行，有许多事还待进行。

Though without an exclusive company, therefore, a particular country should not be able to carry on any direct trade to the East Indies, it will not from thence follow, that such a company ought to be established there, but only that such a country ought not,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o trade directly to the East Indies. That such companies are not in general necessary for carrying on the East India trade, is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d by the experience of the Portuguese, who enjoyed almost the whole of it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ogether, without any exclusive company.

所以，没有专营公司，虽有个别国家不能直接的对东印度进行贸易，但不能从此推定，这样的公司，应在那里设立，而只能推定，这样的国家，在这情况下，不应与东印度直接通商。葡萄牙的经验，充分证明，这样的公司，一般说来并不是必须经营东印度贸易的。因为，葡萄牙虽没有任何专营公司，却几乎享有了这贸易全部达一世纪以上。

No private merchant, it has been said, could well have capital sufficient to maintain factors and agents in the different ports of the East Indies, in order to provide goods for the ships which he might occasionally send thither; and yet, unless he was able to do this, the difficulty of finding a cargo might frequently make his ships lose the season for returning; and the expence of so long a delay would not only eat up the whole profit of the adventure, but frequently occasion a very considerable loss. This argument, however, if it proved any thing at all, would prove that no one great branch of trade could be carried on without an exclusive company,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experience of all nations. There is no great branch of trade, in which the capital of any one private merchant is sufficient for carrying on all the subordinate branches which must be carried on, in order to carry on the principal one. But when a nation is ripe for any great branch of trade, some merchants naturally turn their capitals towards the principal, and some towards the subordinate branches of it; and though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it are in this manner carried on, yet it very seldom happens that they are all carried on by the capital of one private merchant. If a nation, therefore, is ripe for the East India trade, a certain portion of its capital will naturally divide itself among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that trade. Some of its merchants will find it for their interest to reside in the East Indies, and to employ their capitals there in providing goods for the ships which are to be sent out by other merchants who reside in Europe. The settlements which different European nations have obtained in the East Indies, if they were taken from the exclusive companies to which they at present belong, and put under the immediate protection of the sovereign, would render this residence both safe and easy, at least to the merchants of the particular nations to whom those settlements belong. If, at any particular time, that part of the capital of any country which of its own accord tended and inclined, if I may say

so, towards the East India trade, was not sufficient for carrying on all those different branches of it, it would be a proof that, at that particular time, that country was not ripe for that trade, and that it would do better to buy for some time, even at a higher price, from other European nations, the East India goods it had occasion for, than to import them itself directly from the East Indies. What it might lose by the high price of those goods, could seldom be equal to the loss which it would sustain by the distraction of a large portion of its capital from other employments more necessary, or more useful, or more suitable to its circumstances and situation, than a direct trade to the East Indies.

据说，没有一个商人可以有足够的资本来维持东印度各港的代理人或经理人，使这些人能为他们不时开往那边的船只备办货物。除非他们能够这样做，否则寻找待运货物的困难，往往会使船期贻误，而船期延误引起的费用，不仅会吃掉冒险的利润，还往往会产生很大的损失。这种说法，若能够证明什么，所证明的就是，没有一个大贸易部门，能不惜专营公司而经营，这是违反一切民族的经验的。就一个大贸易部门说，任何一个私商的资本，也不够经营一切要经营主要贸易部门也必须经营的附属贸易部门。但在一国有资格经营某大贸易部门时，就自然会有些商人投资经营主要部门，有些商人投资经营附属部门。这一切贸易部门虽都有人经营，但极少见全由一个商人资本经营的事例。所以，一个国家，若有资格经营东印度贸易，自然有一定部分的资本，分投在这贸易的一切不同部门。其中，有些商人觉得，为自己的利益，要住在东印度投下资本，给住在欧洲的其他商人供给货物，任他们的船只运出。欧洲各国在东印度所获得的殖民地，若能从此等专营公司的手里，移归给君主直接管理，那就至少对于殖民地所属国的商人来说，是安全而又便易的居住地。若某个时候，某国自愿投于东印度贸易的那一部分资本，不够经营此贸易的各个部门，那就证明在那时候，那个国家还没有经营这种贸易的资格，宁可向其他欧洲国家购买所需的东印度货物，尽管价格大些，也不可直接从东印

度输入此等货物。因这种货物价格高而引起的损失，很少会等于因从其他更用途、更必要或更适宜的用途抽出一大部分资本来经营东印度直接贸易而遭受的损失。

Though the Europeans possess many considerable settlements both upon the coast of Africa and in the East Indies, they have not yet established, in either of those countries, such numerous and thriving colonies as those in the islands and continent of America. Africa, however, as well as several of the countries comprehended under the general name of the East Indies, is inhabited by barbarous nations. But those nations were by no means so weak and defenceless as the miserable and helpless Americans; 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natural fertility of the countries which they inhabited, they were, besides, much more populous. The most barbarous nations either of Africa or of the East Indies, were shepherds; even the Hottentots were so. But the natives of every part of America, except Mexico and Peru, were only hunters and the difference is very great between the number of shepherds and that of hunters whom the same extent of equally fertile territory can maintain. In Africa and the East Indies, therefore, it was more difficult to displace the natives, and to extend the European plantations ove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ands of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The genius of exclusive companies, besides, is unfavourable,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to the growth of new colonies, and has probably been the principal cause of the little progress which they have made in the East Indies. The Portuguese carried on the trade both to Africa and the East Indies, without any exclusive companies; and their settlements at Congo, Angola, and Benguela, on the coast of Africa, and at Goa in the East Indies though much depressed by superstition and every sort of bad government, yet bear some resemblance to the colonies of America,

and are partly inhabited by Portuguese who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ere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The Dutch settlements at the Cape of Good Hope and at Batavia, are at present the most considerable colonies which the Europeans have established, either in Africa or in the East Indies; and both those settlements an peculiarly fortunate in their situation. The Cape of Good Hope was inhabited by a race of people almost as barbarous, and quite as incapable of defending themselves, as the natives of America. It is, besides, the half-way house, if one may say so, between Europe and the East Indies, at which almost every European ship makes some stay, both in going and returning. The supplying of those ships with every sort of fresh provisions, with fruit, and sometimes with wine, affords alone a very extensive market for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 colonies. What the Cape of Good Hope is between Europe and every part of the East Indies, Batavia is between the principal countries of the East Indies. It lies upon the most frequented road from Indostan to China and Japan, and is nearly about mid-way upon that road. Almost all the ships too, that sail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touch at Batavia; and it is, over and above all this, the centre and principal mart of what is called the country trade of the East Indies; not only of that part of it which is carried on by Europeans, but of that which is carried on by the native Indians; and vessels navigated by the inhabitants of China and Japan, of Tonquin, Malacca, Cochin-China, and the island of Celebes, are frequently to be seen in its port. Such advantageous situations have enabled those two colonies to surmount all the obstacles which the oppressive genius of an exclusive company may have occasionally opposed to their growth. They have enabled Batavia to surmount the additional disadvantage of perhaps the most unwholesome climate in the world.

欧洲人虽在非洲海岸及东印度占有许多重要的殖民地，但在这些地方，他们却没有建立像美洲大陆及美洲各岛那么多那么富庶的殖民地。非洲及几个统称为东印度的国家，都是居住野蛮民族。不过此等民族，并不是像可怜的无用的美洲土人那么软弱且无抵抗力；而且，和他们居住地的自然产出力相称，他们的人烟稠密得多。非洲或东印度最野蛮的民族，都是游牧民族，连好望角的土人也都是游牧民族。但美洲各地的土人，除了墨西哥及秘鲁，只是狩猎民族。同样肥沃和同等面积的土地，所能维持的游牧人数与狩猎人数，相差是很大的。所以，在非洲及东印度，要想驱逐本土人，并把欧洲殖民地推广至土人居住的大部分地方，就比较困难。此外，已经有指出，专营公司的精神，不利于增长新殖民地，这也许是东印度殖民地不能有多大进步的主要原因。葡萄牙人经营非洲贸易及东印度贸易，未曾设有专营的公司；他们在非洲海岸的刚果。本格拉和安哥拉以及在东印度的果阿所建立的殖民地，虽由于迷信与各种恶政，未能充分发展，但总有些像美洲殖民地，有些地方葡萄牙人在那里已居住了好几世代。荷兰人在巴达维亚、在好望角的殖民地，现今算是欧洲人在东印度及美洲建立的最大殖民地了。这两个殖民地，都占有特别有利的地位。好望角的野蛮土人，如美洲土人一样无抵抗力。此外，那里又是欧洲和东印度间的半路客栈——若可以这样说——欧洲船只的往返，都得在此停留若干时候。此等船只所需的各种新鲜水果、食品、葡萄酒，由那里供给。单有这点，就给殖民地的剩余生产物，提供了一个极广泛市场。正如好望角是欧洲和东印度各地的半路客栈一样，巴达维亚也是东印度各大国间的半路客栈，当印度斯坦到中国与日本通路的要冲，并几乎居于此通路的中点。而航行于欧洲与中国间的一切船只，亦几乎都在巴达维亚停泊。此外，巴达维亚又是所谓东印度国家贸易的中央主要市场；欧洲人经营的那一部分，就不用说了，东印度土人所经营的那一部分，亦如是。中国人、越南东京人、日本人、马六甲人、西利伯岛人、交趾支那人所航的船只，往往在此停泊。这种有利的地位，使这两个殖民地能够克服一切障碍，虽有专营公司的压抑精神，也不能抑止它们的增长。这种有利的地位又使巴达维亚能够克服另一种不利情况，即巴达维亚也许是世界上气候最有利于健康的地方。

The English and Dutch companies, though they have established no considerable colonies, except the two above mentioned, have both made considerable conquests in the East Indies. But in the manner in which they both govern their new subjects, the natural genius of an exclusive company has shewn itself most distinctly. In the spice islands, the Dutch are said to burn all the spiceries which a fertile season produces, beyond what they expect to dispose of in Europe with such a profit as they think sufficient. In the islands where they have no settlements, they give a premium to those who collect the young blossoms and green leaves of the clove and nutmeg trees, which naturally grow there, but which this savage policy has now, it is said, almost completely extirpated. Even in the islands where they have settlements, they have very much reduced, it is said, the number of those trees. If the produce even of their own islands was much greater than what suited their market, the natives, they suspect, might find means to convey some part of it to other nations; and the best way, they imagine, to secure their own monopoly, is to take care that no more shall grow than what they themselves carry to market. By different arts of oppression, they have reduced the population of several of the Moluccas nearly to the number which is sufficient to supply with fresh provisions, and other necessaries of life, their own insignificant garrisons, and such of their ships as occasionally come there for a cargo of spices. Under the government even of the Portuguese, however, those islands are said to have been tolerably well inhabited. The English company have not yet had time to establish in Bengal so perfectly destructive a system. The plan of their government, however, has had exactly the same tendency. It has not been uncommon, I am well assured, for the chief, that is, the first clerk or a factory, to order a peasant to plough up a rich field of poppies, and sow it with rice, or some other grain. The pretence was, to prevent a scarcity of provisions; but the real

reason, to give the chief an opportunity of selling at a better price a large quantity of opium which he happened then to have upon hand. Upon other occasions, the order has been reversed; and a rich field of rice or other grain has been ploughed up, in order to make room for a plantation of poppies, when the chief foresaw that extraordinary profit was likely to be made by opium. The servants of the company have, upon several occasions, attempted to establish in their own favour the monopoly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ranches, not only of the foreign, but of the inland trade of the country. Had they been allowed to go on,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y should not, at some time or another, have attempted to restra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particular articles of which they had thus usurped the monopoly, not only to the quantity which they themselves could purchase, but to that which they could expect to sell with such a profit as they might think sufficient. In the course of a century or two, the policy of the English company would, in this manner, have probably proved as completely destructive as that of the Dutch.

虽然英荷两国的公司，除了上述两殖民地，不曾建立任何大的殖民地，但他们曾在东印度征服了许多地方。在它们统治新属民的方法上，这种专营公司所固有的精神，最明显地表示出来。据说，在香料产岛上，荷兰人恐惧其丰年所产的香料过多，不能提供他们认为满足的利润，把过多的部分往往加以焚毁。在他们未曾占有殖民地的岛上，他们对于采集丁香及豆蔻幼花绿叶的人，会给予一种补助金；那种天然生长在那里的植物，由于这种野蛮政策，据说现在几乎绝种了。据说，甚至在他们占有殖民地的岛上，他们亦大大减少了这类树木的数目。若他们领岛上的产物，超过了市场所需，他们就害怕土人会把其中若干部分运送到其他国家，于是，他们认为，保证垄断的最上策，乃是使产物不超过他们市场所需。他们曾通过各种压迫行为，减少马鲁古群岛中若干岛的人口，使其人数只够以新鲜食品及其他生

活必需品，供给他们自己的少数守备队和他们不时来运香料的船只。但是，即在葡萄牙那样的统治下，那些岛据说还人烟稠密。英国的公司还不曾有充分时间在孟加拉建立这么完全的破坏制度。但他们政府的计划却有这种趋势。我确信，公司分支机构的头脑命令农民往往掘翻罂粟良田以栽种稻米或其他谷物。其借口为防止粮食缺乏，而真实理由，则是给他以机会，使其可以以较好的价格，售卖他手上的大量鸦片。若他预先看到，售卖鸦片可得异常的利润，他命令农民掘翻栽种稻米或其他谷物的良地以栽种罂粟。公司的职员，为自己的利益，曾企图几次在一些最重要的国外和国内贸易部门中建立垄断。若继续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早晚定会企图限制他们要想垄断的特殊商品的生产，使其数量不超过他们所能购买的数量，而且使其数量能在售卖时给他们提供自己认为满足的利润。英国公司的政策，也许会在这情况下，在一世纪或二世纪内，如荷兰的政策一样，完全有破坏性。

Nothing, however, can be more directly contrary to the real interest of those companies, considered as the sovereigns of the countries which they have conquered, than this destructive plan. In almost all countries, the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is drawn from that of the people. The greater the revenue of the people, therefore, the greater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ir land and labour, the more they can afford to the sovereign. It is his interest, therefore, to increase as much as possible that annual produce. But if this is the interest of every sovereign, it is peculiarly so of one whose revenue, like that of the sovereign of Bengal, arises chiefly from a land-rent. That rent must necessarily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and value of the produce; and both the one and the other must depend upon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The quantity will always be suited, with more or less exactness, to the consumption of those who can afford to pay for it; and the price which they will pay will always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eagerness of their competition. It is the interest of such a sovereign, therefore, to open the most extensive market

for the produce of his country, to allow the most perfect freedom of commerce, in order to increas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number and competition of buyers; and upon this account to abolish, not only all monopolies, but all restraints upon the transportation of the home produce from one part of the country to mother, upon its exportation to foreign countries, or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goods of' any kind for which it can be exchanged. He is in this manner most likely to increase both the quantity and value of that produce, and consequently of his own share of it, or of his own revenue.

但是，对于作为他们所征服的国家的统治者的此等公司，再也没有比这个破坏性的计划，更能直接违反此等公司的利益的了。几乎一切国家统治者的收入，都来自人民的收入。人民的收入愈大，土地上劳动年生产物愈多，他们能给统治者缴纳的数额亦愈大。所以，统治者的利益，在于尽可能增加此类年生产物。但是，若这是一切统治者的利益，那么主要来自土地地租的统治者收入，如孟加拉统治者，这就更加是他的利益了。地租，必与生产物的价值与数量成比例，但生产物的价值与数量，必须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其数量，总会多少准确地适应有资力购买生产物的人的消费，而他们所愿给付的价格，总是和其竞争的热切程度成比例。所以，这样的统治者，为着自己利益，应给其国家生产物开拓最广泛的市场，准许最完全的贸易自由，以尽量增加购买者的竞争及人数；并因此故，不仅应废除一切垄断，而且应废除以下限制，限制本国生产物到外国的输出，即限制本国生产物由这一地方到那一地方的运输，和限制能可与本国生产物交换的任何商品的输入。这样，他就最能增加这生产物的价值与数量，因而，最能增加他享有的那一部分生产物，换而言之，最能增加的是他自己的收入。

But a company of merchants, are, it seems, incapable of considering themselves as sovereigns, even after they have become

such. Trade, or buying in order to sell again, they still consider as their principal business, and by a strange absurdity, regard the character of the sovereign as but an appendix to that of the merchant; as something which ought to be made subservient to it, or by means of which they may be enabled to buy cheaper in India, and thereby to sell with a better profit in Europe. They endeavour, for this purpose, to keep out as much as possible all competitors from the market of the countries which are subject to their government, and consequently to reduce, at least, some part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ose countries to what is barely sufficient for supplying their own demand, or to what they can expect to sell in Europe, with such a profit as they may think reasonable. Their mercantile habits draw them in this manner, almost necessarily, though perhaps insensibly, to prefer, upon all ordinary occasions, the little and transitory profit of the monopolist to the great and permanent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and would gradually lead them to treat the countries subject to their government nearly as the Dutch treat the Moluccas. It is the interest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considered as sovereigns, that the European goods which are carried to their Indian dominions should be sold there as cheap as possible; and that the Indian goods which are brought from thence should bring there as good a price, or should be sold there as dear as possible. But the reverse of this is their interest as merchants. As sovereigns, their interest is exactly the same with that of the country which they govern. As merchants, their interest is directly opposite to that interest.

但是，商人团体似乎并不可能把自己看作统治者，甚至在他们成为统治者以后，也不会这样看。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主要业务是贸易，即购买以后再售卖；他们不可思议地认为，统治者的地位仅是商人地位的一个附属物，前者应为后者服务，就是说，统治者要使他们

在印度能以较廉价格购买，并在欧洲售卖，能得到较好利润。为要达到这目的，他们企图在他们所统治国家的市场上，尽可能驱逐掉一切的竞争者，至少减少一部分所统治国家的剩余生产物，使其仅足供给他们自己的需要，换言之，使他们在欧洲售卖能得到自己认为合理的利润。他们这样作为商人的习惯，几乎必然，也许是不知不觉地，使他们在所有一般场合，宁可获得垄断者暂时小的利润，也不愿获得统治者的永久的大的收入，而且逐渐使他们，如荷兰人处置马鲁古那样，处置他们所统治的国家。东印度公司作为统治者的利益在于，将运至印度境内的欧洲货物，尽可能以最低价格的出售，而从印度输出的印度货物，尽可能以最好价格或最高价格在欧洲进行售卖。但他们作为商人的利益，则与此相反。作为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与所统治国家的利益恰相一致。这样，作为商人他们的利益与所统治国家的利益就直接相反。

But if the genius of such a government, even as to what concerns its direction in Europe, is in this manner essentially, and perhaps incurably faulty, that of its administration in India is still more so. That administration is necessarily composed of a council of merchants, a profession no doubt extremely respectable, but which in no country in the world carries along with it that sort of authority which naturally overawes the people, and without force commands their willing obedience. Such a council can command obedience only by the military force with which they are accompanied; and their government is, therefore, necessarily military and despotical. Their proper business, however, is that of merchants. It is to sell, upon their master's account, the European goods consigned to them, and to buy, in return, Indian goods for the European market. It is to sell the one as dear, and to buy the other as cheap as possible, and consequently to exclude, as much as possible, all rivals from the particular market where they keep their shop. The genius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erefore, so far as concerns

the trade of the company,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direction. It tends to make government subservient to the interest of monopoly, and consequently to stunt the natural growth of some parts, at least,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 country, to what is barely sufficient for answering the demand of the company,

这样一个政府的倾向，就其对欧洲的管理说，基本上也许是无可矫正的错误，就其对印度的统治说，更是这样的错误。这个统治机构，必然等于一个商人协会。商人的职务无疑是极可尊敬的，但这个职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带有一种本来会威压人民，不用暴力就可以使人民自愿服从的权威。这样一个商人协会，只能用武力来命令人民服从，所以，他们的政府，必然是凭武力执行命令和专横的政府，但他们的本来是商人的职务。他们的本来使命，是受主人委托，售卖欧洲货物，并买回在欧洲市场售卖的印度货物。就是说，尽可能以高价售卖前者，以廉价购买后者，从而尽可能在他们买卖的特定市场，排除一切竞争者。所以，就公司的贸易说，管理机构的倾向和统治机构的倾向，是相同的。它要使政府从属于垄断的利益，因而阻抑当地剩余生产物至少其若干部分的自然生长，使其仅足够供应这个公司的需要。

All the members of the administration besides, trade more or less upon their own account; and it is in vain to prohibit them from doing so. Nothing can be more completely foolish than to expect that the clerk of a great counting-house, at ten thousand miles distance, and consequently almost quite out of sight, should, upon a simple order from their master, give up at once doing any sort of business upon their own account abandon for ever all hopes of making a fortune, of which they have the means in their hands; and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the moderate salaries which those masters allow them, and which, moderate as they are, can seldom be

augmented, being commonly as large as the real profits of the company trade can afford. In such circumstances, to prohibit the servants of the company from trading upon their own account, can have scarce any other effect than to enable its superior servants, under pretence of executing their master's order, to oppress such of the inferior ones as have had the misfortune to fall under their displeasure. The servants naturally endeavour to establish the same monopoly in favour of their own private trade as of the public trade of the company. If they are suffered to act as they could wish, they will establish this monopoly openly and directly, by fairly prohibiting all other people from trading in the articles in which they choose to deal; and this, perhaps, is the best and least oppressive way of establishing it. But if, by an order from Europe, they are prohibited from doing this, they will, notwithstanding, endeavour to establish a monopoly of the same kind secretly and indirectly, in a way that is much more destructive to the country. They will employ the whol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and pervert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order to harass and ruin those who interfere with them in any branch of commerce, which by means of agents, either concealed, or at least not publicly avowed, they may choose to carry on. But the private trade of the servants will naturally extend to a much greater variety of articles than the public trade of the company. The public trade of the company extends no further than the trade with Europe, and comprehends a part only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the country. But the private trade of the servants may extend to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both of its inland and foreign trade. The monopoly of the company can tend only to stunt the natural growth of that part of the surplus produce which, in the case of a free trade, would be exported to Europe. That of the servants tends to stunt the natural growth of every part of the produce in which they choose to deal; of what is destined for home consumption, as well as of what is destined for exportation;

and consequently to degrade the cultiva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its inhabitants. It tends to reduce the quantity of every sort of produce, even that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whenever the servants of the country choose to deal in them, to what those servants can both afford to buy and expect to sell with such a profit as pleases them.

此外，一切行政人员，都多少为自己打算经营贸易，要加以禁止，亦无效果。此等行政人员，既有经营贸易的手段，其办公地点又在一万里以外，几乎全然不受主人的监视，要命令他们立即放弃一切为自己打算的营业，永远放弃一切发财的希望，去满足于主人所认可的不大可能增加的一般的，而且通常只与公司贸易所得真实利润相称的薪俸，那真是再蠢不过了。在这情况下，禁止公司人员为自己打算而贸易，除了使上级人员能借口执行主人命令来压迫不幸的下级人员以外，就再不会有其他的结果了。此等人员，自然会竭力效法公司的公贸易，而设立同样有利于他们个人贸易的垄断。若听任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将直接地、公开地建立这种垄断，并禁止一切其他人民，使他们不能经营他们要经营的那种货物的贸易。这也许是建立垄断的最好的而又是最不压迫人的方法。但若欧洲命令来到，禁止他们这样干下去，他们就会秘密地、间接地建立这样的垄断，那对国家就有了更大的害处。若有人干涉他们以代理人为媒介而秘密经营或至少不公开承认是他们经营的贸易部门，他们就会使用政府的全部权力，并颠倒是非曲直，加以钳制或破坏。但自比公司的公贸易，公司人员的私贸易，能推广到多得多的商品种类。公司的公贸易，仅限于欧洲的贸易，仅包含国外贸易的一部分，而公司人员的私贸易，却可推广到国内一切外贸易部门。公司的垄断，仅会阻抑在贸易自由时要输到欧洲去的那一部分剩余生产物的自然生长。公司人员的垄断，却将阻害他们一切要经营的产物，即输出的一切产物的自然生长或指定供作国内消费，结果会损坏全国的耕作事业，减少全国居民的人数。这样就会使公司人员所要经营的各种产物，甚至生活必需品，减少到他们可以购买和按他们预期获得利润而售卖的数量。

From the nature of their situation, too, the servants must be more disposed to support with rigourous severity their own interest, against that of the country which they govern, than their masters can be to support theirs. The country belongs to their masters, who cannot avoid having some regard for the interest of what belongs to them; but it does not belong to the servants. The real interest of their masters, if they were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it, is the same with that of the country; {The interest of every proprietor of India stock, however, is by no means the same with that of the country in the government of which his vote gives him some influence. -See book v, chap. 1, part ii.}and it is from ignorance chiefly, and the meanness of mercantile prejudice, that they ever oppress it. But the real interest of the servants is by no means the same with tha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most perfect information would not necessarily put an end to their oppressions. The regulations, accordingly, which have been sent out from Europe, though they have been frequently weak, have upon most occasions been well meaning. More intelligence, and perhaps less good meaning, has sometimes appeared in those established by the servants in India. It is a very singular government in which every member of the administration wishes to get out of the country, and consequently to have done with the government, as soon as he can, and to whose interest, the day after he has left it, and carried his whole fortune with him, it is perfectly indifferent though the whole country was swallowed up by an earthquake.

此等人员，由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性质，一定会使用比他们主子更严酷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利益，而危害被他们统治国家的利益。这国家属于他们的主子，他们的主子当然要相当注意属国的利益。但这国家不属于此等人员。他们主子的真实利益，若他们可以了解的话，

是与属国的利益恰好一致的；若主子压迫属国，那主要是由于无知和卑陋的重商偏见。但此等人员的真实利益并不与属国的利益一致，所以，即使有最完全的知识，也不一定会使他们不压迫属国。从欧洲发出的条例，虽甚脆弱，但在多数场合，都还是有善意。而在印度的工作人员，其所订条例，虽有时更为聪明，但也许更少有善意。这真是个奇怪的政府，其人员都想尽快地离开这国家，并尽快地和这政府脱离关系。在他们离去而财产亦全部搬出之后，纵然有地震把那个国家毁掉，也与他们的利害无关。

I mean not, however, by any thing which I have here said, to throw any odious imputation upon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serva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ouch less upon that of any particular persons. It is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y are placed, that I mean to censure, not the character of those who have acted in it. They acted as their situation naturally directed, and they who have clamoured the loudest against them would probably not have acted better themselves. In war and negotiation, the councils of Madras and Calcutta, have upon several occasions, conducted themselves with a resolution and decisive wisdom, which would have done honour to the senate of Rome in the best days of that republic. The members of those councils, however, had been bred to professions very different from war and politics. But their situation alone, without education, experience, or even example, seems to have formed in them all at once the great qualities which it required, and to have inspired them both with abilities and virtues which they themselves could not well know that they possessed. If upon some occasions, therefore, it has animated them to actions of magnanimity which could not well have been expected from them, we should not wonder if, upon others, it has prompted them to exploits of somewhat a different nature.

以上所述，并不是诋毁东印度公司一般人员的品格，更不是诋毁任何个别人员的品格。我所要责备的，是这些人员所处的地位，是政治组织，并不是这些人员的品格。他们的行为，是符合他们的地位的；厉声咒骂他们的人，其行为也不见得会更好。马德拉斯及加尔各答协议会，在战争及商议上，就有好几次的行动，其明智与果断，犹如罗马共和国最盛时代的罗马元老院。此等协议会成员的职业，与政治及战争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仅仅他们的地位，无需经验、教育甚或榜样，似乎就可陶冶他们的地位所要求的伟大品质，使他们具有德行与能力，他们自己也许还不知道自己有这种德行与能力。所以，他们的地位，若在某些场合诱使他们干出那样宽宏高洁出人意料的行为，那么他们的地位，在其他场合促使他们干出和上述多少不一样的行为，也是毫不足怪的。

Such exclusive companies, therefore, are nuisances in every respect; always more or less inconvenient to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are established, and destructive to those which have the misfortune to fall under their government.

所以，无论就那一点说，这种专营公司，都是有害的；对于设立此种公司的国家，它总会给国家多少带来困难，而对于不幸受此种公司统治的国家，它总会给国家多少带来祸害。

Chapter VIII. Conclusion of the Mercantile System

第八章、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Though the encouragement of exportation, and the discouragement of importation, are the two great engines by which

the mercantile system proposes to enrich every country, yet, with regard to some particular commodities, it seems to follow an opposite plan: to discourage exportation, and to encourage importation. Its ultimate object, however, it pretends, is always the same, to enrich the country by an advantageous balance of trade. It discourages the exportation of the materials of manufacture, and of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in order to give our own workmen an advantage, and to enable them to undersell those of other nations in all foreign markets; and by restraining, in this manner, the exportation of a few commodities, of no great price, it proposes to occasion a much greater and more valuable exportation of others. It encourages the importation of the materials of manufacture, in order that our own people may be enabled to work them up more cheaply, and thereby prevent a greater and more valuable importation of the manufactured commodities. I do not observe, at least in our statute book, any encouragement given to the importation of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When manufactures have advanced to a certain pitch of greatness, the fabrication of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becomes itself the object of a great number of very important manufactures. To give any particular encouragement to the importation of such instruments, would interfere too much with the interest of those manufactures. Such importation, therefore, instead of being encouraged, has frequently been prohibited. Thus the importation of wool cards, except from Ireland, or when brought in as wreck or prize goods, was prohibited by the 3rd of Edward IV.; which prohibition was renewed by the 39th of Elizabeth, and has been continued and rendered perpetual by subsequent laws.

所奉行的政策又似与此相反，即奖励输入和阻抑输出。但据称，二者最后目标都是通过有利的贸易差额，使国家致富。它阻抑工业原

料和职业用具的输出，使本国商人处于有利地位，并使他们在外国市场上能以比其他各国货物价格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货物。它提出限制几种价值不大的商品的输出，使其他商品在数量和价值上都能够有大得多的输出。它又提出奖励工业原料的输入，使本国人民能以较廉的价格把这些原料制成成品，从而防止制造品在数量和价值上较大的输入。在本国的法律全书中，我不曾看到奖励职业用具输入的法令。制造业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的时候，职业用具的制作，就成为许多极重要制造业的目标。对这种工具的输入给予任何奖励，当然大大妨碍这些制造业者的利益，所以，这样的输入，不但不被奖励，而且往往被禁止。例如羊毛梳具，除了从爱尔兰输入，或作为破船货物或捕获货物输入，都依据爱德华四世第三年的法令而禁止了。伊丽莎白女王第三十九年，又重申了这种禁令；在此后的法令中，它一直被继续禁止。

The importation of the materials of manufacture has sometimes been encouraged by an exemption from the duties to which other goods are subject, and sometimes by bounties.

工业原料的输入，有时会得到免税的奖励，有时会得到奖金。

The importation of sheep's wool from several different countries, of cotton wool from all countries, of undressed flax, of the greater part of dyeing drug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undressed hides from Ireland, or the British colonies, of seal skins from the British Greenland fishery, of pig and bar iron from the British colonies, as well as of several other materials of manufacture, has been encouraged by an exemption from all duties, if properly entered at the custom-house. The private interest of our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may, perhaps, have extorted from the legislature

these exemptions, as well as the greater part of our other commercial regulations. They are, however, perfectly just and reasonable; and if, consistently with the necessities of the state, they could be extended to all the other materials of manufacture, the public would certainly be a gainer.

羊毛从若干国家输入羊毛，从一切国家输入棉花，从爱尔兰或英属殖民地输入生麻、大部分染料和大部分生皮，从英属格林兰渔场输入海豹皮，从英属殖民地输入生铁和铁条，以及其他几种工业原料输入，若按正当手续呈报海关，即可得到免除一切征税的奖励。这种免税条例，以及许多其他商业条例，也许都是本国商人和制造业者，出于私人利害关系，硬要立法当局制定的。但这些规定，是完全正当的、合理的。要是符合国家的需要，可把这种规定推广到一切其他工业原料，这是一定有利于人民大众的。

The avidity of our great manufacturers, however, has in some cases extended these exemptions a good deal beyond what can justly be considered as the rude materials of their work. By the 24th Geo. II. chap. 46, a small duty of only 1d. the pound was imposed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brown linen yarn, instead of much higher duties, to which it had been subjected before, viz. of 6d. the pound upon sail yarn, of 1s. the pound upon all French and Dutch yarn, and of £2:13:4 upon the hundred weight of all spruce or Muscovia yarn. But our manufacturers were not long satisfied with this reduction: by the 29th of the same king, chap. 15, the same law which gave a bounty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British and Irish linen, of which the price did not exceed 18d. the yard, even this small duty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brown linen yarn was taken away. In the different operations, however,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the preparation of linen yarn, a good deal more industry is employed,

than in the subsequent operation of preparing linen cloth from linen yarn. To say nothing of the industry of the flax-growers and flaxdressers, three or four spinners at least are necessary in order to keep one weaver in constant employment; and more than four-fifths of the whole quantity of labour necessary for the preparation of linen cloth, is employed in that of linen yarn; but our spinners are poor people; women commonly scattered about in all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without support or protection. It is not by the sale of their work, but by that of the complete work of the weavers, that our great master manufacturers make their profits. As it is their interest to sell the complete manufacture as dear, so it is to buy the materials as cheap as possible. By extorting from the legislature bounties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their own linen, high dutie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all foreign linen, and a total prohibition of the home consumption of some sorts of French linen, they endeavour to sell their own goods as dear as possible. By encouraging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linen yarn, and thereby bringing it into competition with that which is made by our own people, they endeavour to buy the work of the poor spinners as cheap as possible. They are as intent to keep down the wages of their own weavers, as the earnings of the poor spinners; and it is by no mean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orkmen that they endeavour either to raise the price of the complete work, or to lower that of the rude materials. It is the industry which is carried o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rich and the powerful, that is principally encouraged by our mercantile system. That which is carried o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oor and the indigent is too often either neglected or oppressed.

可是，由于大制造业者的贪欲，这种免税，有时竟大大超过正当地加工原料的范围。乔治二世第二十四年第46号法令规定，外国黄麻织纱每输入一磅，仅纳微薄的1便士税。对比先前，输入一磅帆布麻

织纱须纳6便士，纱输入一磅法国和荷兰麻织须纳1先令，输入100磅一切普鲁士产的麻织纱须纳2镑13先令4便士。但本国制造业者，仍不长久满足于这样的减税。于是，乔治二世第二十九年第15号颁布法令，规定输出每码价格不超过1先令6便士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麻布可领奖金，还免除了对黄麻织纱输入所收轻微的税。其实，由亚麻制成麻织纱的各种操作，比由麻织纱制成麻布的操作，需要使用大得多的劳动量。且不说亚麻栽种者和亚麻梳理者的劳动，单说要使一个织工有不断的工作，就至少须有三个或四个纺工；制造麻布的全部劳动，有4/5以上，都是用在麻织纱制造上面。而本国的纺工，都是可怜人，他们通常散居国内各地，无依无靠的妇女。本国大制造业者取利润的方法，不是售卖纺工的制品，而是售卖织工的完全制品。他们的利益，在于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售卖完全制品，所以他们利益的获取，也在于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原材料。为使自己的货物能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他们硬要立法当局对他们自己的麻布的输出，发给奖金，对一切外国麻布的输入，征收高的关税，一律禁止法国输入的供国内消费的某几种麻布。为要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入贫纺工的制品，他们奖励外国麻织纱输入，使之与本国出品竞争。他们一心一意要压低自己所雇织工的工资，正如他们要压低贫纺工所得一样，所以，他们企图提高完全制造品价格或减低原料价格，都不是为着劳动者的利益。重商主义所要奖励的产业，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所经营的产业。至于为贫苦人民的利益而经营的产业，却往往被忽视、被压抑。

Both the bounty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linen, and the exemption from the duty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yarn, which were granted only for fifteen years, but continued by two different prolongations, expire with the end of the session of parliament which shall immediately follow the 24th of June 1786.

麻布输出奖金及外国麻织纱输入免税条例，颁布时原以十五年为期，以后经过二次延长，于1786年6月24日国会议期终结时满期失

效。

The encouragement given to the importation of the materials of manufacture by bounties, has been principally confined to such as were imported from our American plantations.

享受奖金而输入的工业原料，主要是从英属北美殖民地输入的。

The first bounties of this kind were those granted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century,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naval stores from America. Under this denomination were comprehended timber fit for masts, yards, and bowsprits; hemp, tar, pitch, and turpentine. The bounty, however, of £1 the ton upon masting-timber, and that of £6 the ton upon hemp, were extended to such as should be imported into England from Scotland. Both these bounties continued, without any variation, at the same rate, till they were severally allowed to expire; that upon hemp on the 1st of January 1741, and that upon masting-timber at the end of the session of parliament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24th June 1781.

最初发给这类奖金的最初发给，是在现世纪初叶，对美洲输入的造船用品。所谓造船用品，包括适于建造船桅、帆桁、牙樯的木材、大麻、柏油、松脂、松香油等。但船桅木材每吨20先令的输入奖金和大麻每吨6镑的输入奖金，也推广到苏格兰输入英格兰的船桅木材。这两种奖金，按原有金额无变更地继续发给，一直到满期之时为止。即大麻输入奖金，于1741年1月1日国会议期终结时满期失效，船桅木材输入奖金，于1781年6月24日国会议期终结时满期失效。

The bountie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tar, pitch, and turpentine, underwent, during their continuance, several alterations. Originally, that upon tar was £4 the ton; that upon pitch the same; and that upon turpentine £3 the ton. The bounty of £4 the ton upon tar was afterwards confined to such as had been prepared in a particular manner; that upon other good, clean, and merchantable tar was reduced to £2:4s. the ton. The bounty upon pitch was likewise reduced to £1, and that upon turpentine to £1:10s. the ton.

柏油、松脂、松香油输入奖金，在其继续有效期间内，经过了若干变更。原来，输入每吨柏油和松脂得奖金4镑；输入每吨松香油得奖金3镑。后来，输入每吨柏油奖金4镑，但仅限于按特殊方法制造的柏油，其他的良好纯洁的商用柏油，减为每吨44先令。松脂奖金减为每吨20先令；松香油奖金减为每吨1镑10先令。

The second bounty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any of the materials of manufacture,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ime, was that granted by the 21st Geo. II. chap.30,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indigo from the British plantations. When the plantation indigo was worth three-fourths of the price of the best French indigo, it was, by this act, entitled to a bounty of 6d. the pound. This bounty, which, like most others, was granted only for a limited time, was continued by several prolongations, but was reduced to 4d. the pound. It was allowed to expire with the end of the session of parliament which followed the 25th March 1781.

按照时间的先后，第二次发给工业原料输入奖金，是乔治二世第二十一年第30号法令对英国殖民地输入的蓝靛。在殖民地的蓝靛仅值

上等法国蓝靛价格的3/4时，便可以按这法令，领得每磅6便士的奖金。这个奖金的发给，亦是有限期的，但曾经数次延期，并减至每磅4便士，于1781年3月25日国会议期终结时满期失效。

The third bounty of this kind was that granted (much about the time that we were beginning sometimes to court, and sometimes to quarrel with our American colonies), by the 4th. Geo. III. chap. 26,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hemp, or undressed flax, from the British plantations. This bounty was granted for twenty-one years, from the 24th June 1764 to the 24th June 1785. For the first seven years, it was to be at the rate of £8 the ton; for the second at £6; and for the third at £4. It was not extended to Scotland, of which the climate (although hemp is sometimes raised there in small quantities, and of an inferior quality) is not very fit for that produce. Such a bounty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Scotch flax in England would have been too great a discouragement to the native produce of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第三次发给这一类奖金，乃是乔治三世第四年第26号法令对英国殖民地大麻或生亚麻的输入（在这期间，本国有时讨好北美殖民地，有时和它争执）。这个奖金，以二十一年为期，从1764年6月24日至1785年6月24日。每7年分为一期。第一期每吨奖金8镑；第二期6镑；第三期4镑。苏格兰气候不宜于种麻，虽亦种麻，但产量不多，品质较劣，故不得享受此种奖金。若苏格兰亚麻输入英格兰，便可得奖金，这对联合王国南部本地的生产，就未免是太大的妨害了。

The fourth bounty of this kind was that granted by the 5th Geo. III. chap. 45,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wood from America. It was granted for nine years from the 1st January 1766 to the 1st January

1775. During the first three years, it was to be for every hundred-and-twenty good deals, at the rate of £1, and for every load containing fifty cubic feet of other square timber, at the rate of 12s. For the second three years, it was for deals, to be at the rate of 15s., and for other squared timber at the rate of 8s.; and for the third three years, it was for deals, to be at the rate of 10s.; and for every other squared timber at the rate of 5s.

第四次发给的这一类奖金，乃是乔治三世第五年第45号法令对美洲木材输入。期限为9年，从1766年1月1日至1775年1月1日。每3年分为一期。第一期，每输入好松板120条，可得奖金20先令；其他方板每输入50立方英尺，可得奖金12先令。第二期，每输入好松板120条，可得奖金15先令；其他方板每输入50立方英尺，可得奖金8先令。第三期，每输入好松板120条，可得奖金10先令；其他方板每输入50立方英尺，可得奖金5先令。

The fifth bounty of this kind was that granted by the 9th Geo. III. chap. 38,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raw silk from the British plantations. It was granted for twenty-one years, from the 1st January 1770, to the 1st January 1791. For the first seven years, it was to be at the rate of £25 for every hundred pounds value; for the second, at £20; and for the third, at £15. The management of the silk-worm, and the preparation of silk, requires so much hand-labour, and labour is so very dear in America, that even this great bounty, I have been informed, was not likely to produce any considerable effect.

第五次发给的这一类奖金，乃是乔治三世第九年第38号法令，对英国殖民地生丝的输入。限期21年，从1770年1月1日至1791年1月1

日。每7年分为一期。第一期，每输入生丝价值100镑，可得奖金25镑；第二期，可得奖金20镑；第三期，可得奖金15镑。但养蚕造丝，需要那么多的手工，而在北美，工价又是那么高，所以连这样大的奖金，也不能产生什么大的效果。

The sixth Bounty of this kind was that granted by 11th Geo. III. chap. 50, for the importation of pipe, hogshead, and barrelstaves and leading from the British plantations. It was granted for nine years, from 1st January 1772 to the 1st January 1781. For the first three years, it was, for a certain quantity of each, to be at the rate of £6; for the second three years at £4; and for the third three years at £2.

第六次发给的这一类奖金，乃是乔治三世第十一年第50号法令，对英国殖民地酒桶、大桶、桶板、桶头板输入的。限期9年，从1772年1月1日至1781年1月1日。3年一期，第一期，输入各物一定量，得奖金6镑；第二期，得4镑；第三期，得2镑。

The seventh and last bounty of this kind was that granted by the 19th Geo. III chap. 37,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hemp from Ireland. It was grant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at for the importation of hemp and undressed flax from America, for twenty-one years, from the 24th June 1779 to the 24th June 1800. The term is divided likewise into three periods, of seven years each; and in each of those periods, the rate of the Irish bounty is the same with that of the American. It does not, however, like the American bounty, extend to the importation of undressed flax. It would have been too great a discouragement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at plant in Great Britain. When this last bounty was granted, the British and

Irish legislatures were not in much better humour with one another, than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had been before. But this boon to Ireland, it is to be hoped, has been granted under more fortunate auspices than all those to America. The same commodities, upon which we thus gave bounties, when imported from America, were subjected to considerable duties when imported from any other country. The interest of our American colonies was regarded as the same with that of the mother country. Their wealth was considered as our wealth. Whatever money was sent out to them, it was said, came all back to us by the balance of trade, and we could never become a farthing the poorer by any expence which we could lay out upon them. They were our own in every respect, and it was an expence laid out upon the improvement of our own property, and for the profitable employment of our own people. It is unnecessary, I apprehend, at present to say anything further, in order to expose the folly of a system which fatal experience has now sufficiently exposed. Had our American colonies really been a part of Great Britain, those bounties might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bounties upon production, and would still have been liable to all the objections to which such bounties are liable, but to no other.

第七次即最后一次发给的这一类奖金，乃是乔治王世十九年第37号法令，对爱尔兰大麻的输入。限期为21年，即从1779年6月24日至1800年6月24日，每7年分为一期。这和美洲大麻及生亚麻输入的奖金，都是一样，而每一期的奖金标准，亦是一样，但不像对美洲那样，奖金不推广到生亚麻。爱尔兰生亚麻输入的奖金，对大不列颠这种物品的栽种，是太大的妨害了。在对爱尔兰大麻输入发给奖金时，大不列颠议会和爱尔兰议会之间的感情，并不比以前大不列颠和美洲的感情好，但我们总希望，前者是在比后者更顺适的情况下发给的。同时，这几种商品，若从美洲输入，我们就给以奖金，若从任何其他国家输入，我们即征收高的关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利害关系，与祖

国的利害关系，被认为是一致的。他们的财富被认为是我们的财富。据说输到他们那里去的货币，会由于贸易差额，全部回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无论怎样在他们身上用钱，亦不会致使我们减少一个铜板。无论就哪一点说，他们的所有都是我们的所有，用钱在他们身上，等于用钱来增进我们自己的财产，这对本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样一个主义的愚妄，已为经验所充分暴露，我们无须多说一句话来暴露它的愚妄。若英属北美殖民地，真是大不列颠的一部分，此种奖金便可认为是对生产的奖金。我们依然为这类奖金所受非难，但不受其他的非难。

The exportation of the materials of manufacture is sometimes discouraged by absolute prohibitions, and sometimes by high duties.

工业原料的输出，有时由于被绝对禁止而受到妨碍，有时由于过高的关税而受到妨碍。

Our woollen manufacturers have been more successful than any other class of workmen, in persuading the legislature that the prosperity of the nation depended upon the success and extension of their particular business. They have not only obtained a monopoly against the consumers, by an absolute prohibition of importing woollen cloths from any foreign country; but they have likewise obtained another monopoly against the sheep farmers and growers of wool, by a similar prohibition of the exportation of live sheep and wool. The severity of many of the laws which have been enacted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revenue is very justly complained of, as imposing heavy penalties upon actions which, antecedent to the statutes that declared them to be crimes, had always been

understood to be innocent. But the cruellest of our revenue laws, I will venture to affirm, are mild and gentle, in comparison to some of those which the clamour of our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has extorted from the legislature, for the support of their own absurd and oppressive monopolies. Like the laws of Draco, these laws may be said to be all written in blood.

本国呢绒制造者，说服了国会，使国会相信，国家的繁荣，要依存于他们这种业务的成功与推广，他们在说服国会这一点上，比任何其他种类制造业者都更成功。他们不仅从外国呢绒输入的绝对禁止中，取得了一种妨害消费者的垄断，而且从禁止活羊及羊毛输出中，取得了一种妨害牧羊者及羊毛生产者的垄断。本国保证岁入的法律，有许多被人指斥说，对那些在法律未颁布前被认为无罪的行为处严厉处罚，实过于苛酷。但我敢说，连最苛酷的岁入法律，与本国商人和制造业者吵吵闹闹地硬要国会颁布，以支持他们那种荒谬的、不正当的垄断权的某几种法律比较，亦会使人觉得平和宽大。如德拉科的法律一样，那种垄断权的法律，可以说是用血写成的。

By the 8th of Elizabeth, chap. 3, the exporter of sheep, lambs, or rams, was for the first offence, to forfeit all his goods for ever, to suffer a year's imprisonment, and then to have his left hand cut off in a market town, upon a market day, to be there nailed up; and for the second offence, to be adjudged a felon, and to suffer death accordingly. To prevent the breed of our sheep from being propagated in foreign countries, seems to have been the object of this law. By the 13th and 14th of Charles II. chap. 18, the exportation of wool was made felony, and the exporter subjected to the same penalties and forfeitures as a felon.

伊丽莎白第八年第3号法令规定，不可输出绵羊、小羊、公羊老，初犯没收其全部货物，监禁1年，然后还会在某一市日，截断其左手，钉在市镇上示众；再犯，即宣告为重罪犯人，判处死刑。此法律的目的，在于防止国家的羊种在外国繁殖。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及第十四年第18号法令，又宣布输出羊毛亦犯重罪，输出者须受重犯罪人那样的刑罚，货物会被没收。

For the honour of the national humanity, it is to be hoped that neither of these statutes was ever executed. The first of them, however, so far as I know, has never been directly repealed, and serjeant Hawkins seems to consider it as still in force. It may, however, perhaps be considered as virtually repealed by the 12th of Charles II. chap. 32, sect. 3, which, without expressly taking away the penalties imposed by former statutes, imposes a new penalty, viz. that of 20s. for every sheep exported, or attempted to be exported, together with the forfeiture of the sheep, and of the owner's share of the sheep. The second of them was expressly repealed by the 7th and 8th of William III. chap. 28, sect. 4, by which it is declared that “Whereas the statute of the 13th and 14th of king Charles II. made against the exportation of wool, among other things in the said act mentioned, doth enact the same to be deemed felony, by the severity of which penalty the prosecution of offenders hath not been so effectually put in execution; be it therefore enacted, by the authority aforesaid, that so much of the said act, which relates to the making the said offence felony, be repealed and made void.”

为着国家的人道名誉，我们希望这两种法律都不实施。第一种，据我所知，虽尚未明令撤除，法学家霍金斯认为至今还是有效，但那法律，也许在查理二世第十二年第32号法令第三节中，实际就被取消

了。查理二世的法令，虽没有明白说明取消前法令所规定的刑罚，却规定了一种新刑罚，即凡输出或企图输出一头羊，科罚金20先令，并没收这头羊及其所有者对船只的部分所有权。第二种法律，则由威廉三世第七年、第八年第28号法令第4节撤废了。这法令宣称："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及第十四年颁布的禁止羊毛输出法令，把羊毛输出看做重罪。因为刑罚过于苛重，与犯罪者的控诉，未能按法办理。该法令关于该犯罪行为定为重罪一节，着即明令撤销，法令宣告无效。"

The penalties, however, which are either imposed by this milder statute, or which, though imposed by former statutes, are not repealed by this one, are still sufficiently severe. Besides the forfeiture of the goods, the exporter incurs the penalty of 3s. for every pound weight of wool, either exported or attempted to be exported, that is, about four or five times the value. Any merchant, or other person convicted of this offence, is disabled from requiring any debt or account belonging to him from any factor or other person. Let his fortune be what it will, whether he is or is not able to pay those heavy penalties, the law means to ruin him completely. But, as the morals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are not yet so corrupt as those of the contrivers of this statute, I have not heard that any advantage has ever been taken of this clause. If the person convicted of this offence is not able to pay the penalties within three months after judgment, he is to be transported for seven years; and if he returns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at term, he is liable to the pains of felony, without benefit of clergy. The owner of the ship, knowing this offence, forfeits all his interest in the ship and furniture. The master and mariners, knowing this offence, forfeit all their goods and chattels, and suffer three months imprisonment. By a subsequent statute, the master suffers six months imprisonment.

但是，不论是这个较和缓法令所制定的刑罚，还是先前法令所制定的刑罚，都还是十分严酷。除了没收货物，输出者每输出或企图输出羊毛一磅，须纳罚金3先令；这大抵比其原价高4倍乃至5倍。而且，犯此罪的商人或任何人，不得向任何代理人或其他人，索取债务或要求清还账目。不问其财产如何，不问其能否交付这样重的罚款，法律总想使他完全破产。但人民大众的道德，还没败坏到蒙法律制定人那样，所以我未曾听到过有人利用这个条款。倘若犯此罪的人，不能在判决后3个月内交付罚款，即处以7年的流刑，未满期逃归，则作为重犯处罚，不得享受僧侣的特典。船主知罪不告，没收船只及其设备。船长水手知罪不告，没收所有动产和货物，并处3个月的徒刑，后又改定为6个月的徒刑。

In order to prevent exportation, the whole inland commerce of wool is laid under very burdensome and oppressive restrictions. It cannot be packed in any box, barrel, cask, case, chest, or any other package, but only in packs of leather or pack-cloth, on which must be marked on the outside the words WOOL or YARN, in large letters, not less than three inches long, on pain of forfeiting the same and the package, and 8s. for every pound weight, to be paid by the owner or packer. It cannot be loaden on any horse or cart, or carried by land within five miles of the coast, but between sun-rising, and sun-setting, on pain of forfeiting the same, the horses and carriages. The hundred next adjoining to the sea coast, out of, or through which the wool is carried or exported, forfeits £20, if the wool is under the value of £10; and if of greater value, then treble that value, together with treble costs, to be sued for within the year. The execution to be against any two of the inhabitants, whom the sessions must reimburse, by an assessment on the other inhabitants, as in the cases of robbery. And if any person compounds with the hundred for less than this penalty, he is to be imprisoned for five years; and any other person may prosecute. These regulations take

place through the whole kingdom.

为防止输出，境内羊毛贸易，全部受到极苛刻极烦琐的限制。羊毛不得装在箱内、桶内、匣内，只可用布或皮革包装，外面写着三英寸长的“羊毛”或“毛线”，否则没收货物及其盛器，每磅罚所有者或包装者3先令。除了在日出及日落之间的时候，羊毛不可由马或马车搬运，也不可在离海达5英里以内由陆路搬运，否则没收货物及车马。邻近海岸的小邑，得于一年内，对由小邑或经过小邑而运出或输出羊毛的人，提出控诉，如羊毛价不及10镑，则处罚金20镑，如在10镑以上，则收3倍原价及3倍诉讼费的罚金。对居民中任何二人执行裁判，裁判所得向其他居民征税来偿还，如在盗窃的场合一样。倘有人私通小邑官吏，以求减免罚金，则处以徒刑5年；任何人都可告发这种行为。这种法规，全国通行。

But in the particular counties of Kent and Sussex, the restrictions are still more troublesome. Every owner of wool within ten miles of the sea coast must give an account in writing, three days after shearing, to the next officer of the customs, of the number of his fleeces, and of the places where they are lodged. And before he removes any part of them, he must give the like notice of the number and weight of the fleeces, and of the name and abode of the person to whom they are sold, and of the place to which it is intended they should be carried. No person within fifteen miles of the sea, in the said counties, can buy any wool, before he enters into bond to the king, that no part of the wool which he shall so buy shall be sold by him to any other person within fifteen miles of the sea. If any wool is found carrying towards the sea side in the said counties, unless it has been entered and security given as aforesaid, it is forfeited, and the offender also forfeits 3s. for every pound weight, if any person lay any wool, not entered as aforesaid,

within fifteen miles of the sea, it must be seized and forfeited; and if, after such seizure, any person shall claim the same, he must give security to the exchequer, that if he is cast upon trial he shall pay treble costs, besides all other penalties.

肯特及萨塞克斯二郡的限制尤为烦琐。距海岸10英里以内的羊毛所有者，必须在剪下羊毛后3天内，将其所剪的数量及藏所，书面报告给最近的海关。在其中任何部分迁移以前，又须把羊毛的捆数、重量，买者姓名住址，及移运地址，作同样的报告。在这二郡内，凡居在距海15英里内的人，在未向国王保证不把这样购得的羊毛的任何部分再售给距海15英里内任何他人以前，不得购买任何羊毛。倘若未作这样的报告和保证，即以羊毛向这二郡的海边输运，一被发觉，就没收其羊毛，犯者科罚金每磅3先令。倘若未作这样的报告，即以羊毛存放于距海15英里内者，查封没收其羊毛；倘在查封后，有人要求领还，就必须对国库提出保证，如果败诉，除了其他一切处罚，还须交付3倍的诉讼费。

When such restrictions are imposed upon the inland trade, the coasting trade, we may believe, cannot be left very free. Every owner of wool, who carrieth, or causeth to be carried, any wool to any port or place on the sea coast, in order to be from thence transported by sea to any other place or port on the coast, must first cause an entry thereof to be made at the port from whence it is intended to be conveyed, containing the weight, marks, and number, of the packages, before he brings the same within five miles of that port, on pain of forfeiting the same, and also the horses, carts, and other carriages; and also of suffering and forfeiting, as by the other laws in force against the exportation of wool. This law, however (1st of William III. chap. 32), is so very indulgent as to declare, that this shall not hinder any person from

carrying his wool home from the place of shearing, though it be within five miles of the sea, provided that in ten days after shearing, and before he remove the wool, he do under his hand certify to the next officer of the customs the true number of fleeces, and where it is housed; and do not remove the same, without certifying to such officer, under his hand, his intention so to do, three days before. Bond must be given that the wool to be carried coast-ways is to be landed at the particular port for which it is entered outwards; and if my part of it is landed without the presence of an officer, not only the forfeiture of the wool is incurred, as in other goods, but the usual additional penalty of 3s. for every pound weight is likewise incurred.

我相信，沿海贸易在境内贸易受这样的限制时，决不会很自由。羊毛所有者，要输运或企图输运羊毛到海岸任何港埠，从那边由海道运至海岸上其他港埠，那么在他输运羊毛路出口港五英里以内的地方以前，须先到出口港报告羊毛包数、重量及记号，否则没收羊毛，并没收马、马车或其他车辆；其他各种禁止羊毛输出迄今还有效的法律，当然也定有各种罚则。但威廉三世第一年第32号法令，却又是那么宽大，它宣称："若于剪毛10日后，将羊毛真实捆数及存地，亲自向最近的海关提出证明，并在羊毛迁运前3日，亲自向最近的海关说明其意图，就可把羊毛从剪毛地点运回家来，哪怕剪毛地点，是在距海五英里以内的地方。"向沿海输运的羊毛，必须保证在登记的某港口起运上陆，倘若没有官吏在前，即行上货，则没收其羊毛，并处每磅3先令的通常罚金。

Our woollen manufacturers, in order to justify their demand of such extraordinary restrictions and regulations, confidently asserted, that English wool was of a peculiar quality, superior to that of any other country; that the wool of other countries could

not, without some mixture of it, be wrought up into any tolerable manufacture; that fine cloth could not be made without it; that England, therefore, if the exportation of it could be totally prevented, could monopolize to herself almost the whole woollen trade of the world; and thus, having no rivals, could sell at what price she pleased, and in a short time acquire the most incredible degree of wealth by the most advantageous balance of trade. This doctrine, like most other doctrines which are confidently asserted by any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eople, was, and still continues to be, most implicitly believed by a much greater number: by almost all those who are either unacquainted with the woollen trade, or who have not made particular inquiries. It is, however, so perfectly false, that English wool is in any respect necessary for the making of fine cloth, that it is altogether unfit for it. Fine cloth is made altogether of Spanish wool. English wool, cannot be even so mixed with Spanish wool, as to enter into the composition without spoiling and degrading, in some degree, the fabric of the cloth.

本国呢绒制造者，为要证明他们对国会要求施行这样异常的限制，是完全正当，竟然说英国羊毛具有特殊品质，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羊毛都好；说他国的羊毛，如果不搀入若干英国羊毛，就不能造出有相当质量的制造品；说精良呢绒，非由英国羊毛，不能织成；说英国若能完全防止本国羊毛输出，就能垄断几乎全世界呢绒业，没有谁能和他竞争，英国就可随意抬高价格，售卖呢绒，并在短期间内，依最有利的贸易差额，取得非常大的财富。这种学说，如其他为许多人民所确信的大多数学说一样，在过去为多数人民所盲目信从，而且至今仍为他们所信从。至于一般不懂得呢绒业或未曾研究呢绒业的人，更是几乎全体相信。其实，英国羊毛，不但不是制造精良呢绒的必需品，而且完全不适合于制造精良呢绒。精良呢绒，实际上全由西班牙羊毛织成。把英国羊毛搀到西班牙羊毛中去织造，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呢绒的质量。

It has been shown in the foregoing part of this work, that the effect of these regulations has been to depress the price of English wool, not only below what it naturally would be in the present times, but very much below what it actually was in the time of Edward III. The price of Scotch wool, when, in consequence of the Union, it became subject to the same regulations, is said to have fallen about one half. It is observed by the very accurate and intelligent author of the *Memoirs of Wool* , the Reverend Mr. John Smith, that the price of the best English wool in England, is generally below what wool of a very inferior quality commonly sells for in the market of Amsterdam. To depress the price of this commodity below what may be called its natural and proper price, was the avowed purpose of those regulations; and there seems to be no doubt of their having produced the effect that was expected from them.

我们之前论述过，此等法规，不仅导致羊毛价格跌至现正常价格之下的水平，而且甚至比起爱德华三世时代的价格水平都大幅降低了。由于英格兰苏格兰合并，苏格兰因此也受此法规的管制。听说，苏格兰羊毛价格也因此跌了1/2。《羊毛研究录》的作者约翰·斯密眼光精准，极富智慧。这位令人尊敬的先生说，最好的英格兰羊毛在本地的价格，一般比阿姆斯特丹市场上极劣质的羊毛的一般售价还要低。这些法规公开宣称的目的是把该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或者说合适的价位）之下；毫无疑问，它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This reduction of price, it may perhaps be thought, by discouraging the growing of wool, must have reduced very much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at commodity, though not below what it formerly was, yet below what,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ings, it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had it, in consequence of an open and free market, been allowed to rise to the natural and proper price. I am, however, disposed to believe, that the quantity of the annual produce cannot have been much, though it may, perhaps, have been a little affected by these regulations. The growing of wool is not the chief purpose for which the sheep farmer employs his industry and stock. He expects his profit, not so much from the price of the fleece, as from that of the carcase; and the average or ordinary price of the latter must even, in many cases, make up to him whatever deficiency there may be in the average or ordinary price of the former. It has been observed, in the foregoing part of this work, that "whatever regulations tend to sink the price, either of wool or of raw hides, below what it naturally would be, must, in an improved and cultivated country, have some tendency to raise the price of butcher's meat. The price, both of the great and small cattle which are fed on improved and cultivated land, must be sufficient to pay the rent which the landlord, and the profit which the farmer, has reason to expect from improved and cultivated land. If it is not, they will soon cease to feed them. Whatever part of this price, therefore, is not paid by the wool and the hide, must be paid by the carcase. The less there is paid for the one, the more must be paid for the other. In what manner this price is to be divided upon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east, is indifferent to the landlords and farmers, provided it is all paid to them. In an improved and cultivated country, therefore, their interest as landlords and farmers cannot be much affected by such regulations, though their interest as consumers may, by the rise in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According to this reasoning, therefore, this degradation in the price of wool is not likely, in an improved and cultivated country, to occasion any diminution in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at commodity; except so far as, by raising the price of mutton, it may somewhat diminish the demand for, and consequently the production of, that particular

species of butcher's meat. Its effect, however, even in this way, it is probable, is not very considerable.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通过减少羊毛的产量来降低价格，必然会大幅度降低该商品的年产量。即使不低于之前的产量，也会低于目前这种公开自由的市场中任价格自然上涨时可能会有的产量。但我倾向于相信，羊毛年产量多少会受到相关法规的影响，但影响并不大。牧羊者使用其劳动与资本的主要目的不是生产羊毛。他从羊毛中期望获得的利润，远远低于从羊肉中期望获得的利润。对于牧羊者而言，在多数情况下，羊肉的平均或正常价位之高，可以补偿羊毛价格的不足。笔者在本书（第一篇第十一章）中写道："在较发达的国家，如果有一项政策把羊毛及未加工羊皮价格降至低于应有水平以下，那么该政策也有可能提高羊肉的价格。在改良的耕地上饲养的牲畜无论大小，其价格必须足够支付地主对改良耕地期许的租金和农民对其期盼的利润。如果价格不达标，饲养过程将迅速终止。羊毛羊皮的价格不足以支付的话，那就必须用羊肉来支付。前者的价格越低，后者的价格就越高。只要最终都收到钱款，地主与农民并不关心总价格究竟如何由羊的各部分承担。所以，在耕作发达的国家，作为地主与农民，他们的利益不会受到这种规定太大的影响；不过作为消费者，由于食品价格上涨，他们的利益难免遭受损害。"所以，由此推知，在耕作发达的国家，羊毛价格的降低，不太可能引起该商品年产量的减少，但它会使羊肉价格上涨，因而可能小幅度降低人们对羊肉的需求，从而使羊肉的生产稍微减少。但即便如此，其影响似乎不大。

But though its effect upon the quantity of the annual produce may not have been very considerable, its effect upon the quality, it may perhaps be thought, must necessarily have been very great. The degradation in the quality of English wool, if not below what it was in former times, yet below what it naturally would have been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must have

been, it may perhaps be supposed, very nearly in proportion to the degradation of price. As the quality depends upon the breed, upon the pasture, and upon the management and cleanliness of the sheep, during the whole progress of the growth of the fleece, the attention to these circumstances, it may naturally enough be imagined, can never be greater than in proportion to the recompense which the price of the fleece is likely to make for the labour and expense which that attention requires. It happens, however, that the goodness of the fleece depends, in a great measure, upon the health, growth, and bulk of the animal: the same attention which is necessar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arcase is, in some respects, sufficient for that of the fleece. Notwithstanding the degradation of price, English wool is said to have been improved considerably during the course even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he improvement, might, perhaps, have been greater if the price had been better; but the lowness of price, though it may have obstructed, yet certainly it has not altogether prevented that improvement.

然而，尽管政策对于年产量的影响不大，但可以认为，它对羊毛品质的影响非常大。英格兰羊毛的品质，虽不比从前低，但比现今改良农耕状态下应有的品质低。可以推测，品质的下降与价格的降低几乎成比例。羊毛的品质取决于品种、牧草以及对羊的管理与清洁。可以想象，在羊毛生产的整个过程中，牧羊者对这些条件的关注，决不大于羊毛价格可能对劳动和开支的补偿。但羊毛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羊的健康状况、生长状态和体积，而这些也是改良羊肉品质所必须注意的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改良羊肉的必要条件已经足够用于改良羊毛了。因此，英格兰羊毛的价格虽低，但其品质在当时，甚至在本世纪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如果当时的羊毛价格再高一些，改善程度也许会更高；价格之低虽然有可能阻碍了羊毛改良，却没有完全阻止这个进程。

The violence of these regulations, therefore, seems to have affected neither the quantity nor the quality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wool, so much as it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to do (though I think it probable that it may have affected the latter a good deal more than the former);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growers of wool, though it must have been hurt in some degree, seems upon the whole, to have been much less hurt than could well have been imagined.

因此，这些规定的威力对羊毛年产量及其品质的影响似乎并不如人们预期的大（尽管我认为它对品质的影响可能大于对产量的影响）；羊毛生产者的利益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但总的说来，其损害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大。

These considerations, however, will not justify the absolute prohibition of the exportation of wool; but they will fully justify the imposition of a considerable tax upon that exportation.

然而，这些考虑绝不能证明完全禁止羊毛出口是正当的，但它们能充分证明对羊毛出口征收重税不会是不正当的。

To hurt, in any degree, the interest of any one order of citizens, for no other purpose but to promote that of some other, is evidently contrary to that justice and equality of treatment which the sovereign owes to all the different orders of his subjects. But the prohibition certainly hurts, in some degree, the interest of the growers of wool, for no other purpose but to promote that of the manufacturers.

一国君主，应对各阶级国民给予公正平等的待遇，仅为某些阶级的利益而伤害其他阶级的利益显然是违反这一原则。但该禁令正是仅为制造商的利益而伤害了羊毛生产者的利益。

Every different order of citizens is bound to contribute to the support of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A tax of five, or even of ten shillings,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every ton of wool, would produce a very considerable revenue to the sovereign. It would hurt the interest of the growers somewhat less than the prohibition, because it would not probably lower the price of wool quite so much. It would afford a sufficient advantage to the manufacturer, because, though he might not buy his wool altogether so cheap as under the prohibition, he would still buy it at least five or ten shillings cheaper than any foreign manufacturer could buy it, besides saving the freight and insurance, which the other would be obliged to pay. It is scarce possible to devise a tax which could produce any considerable revenue to the sovereign, and at the same time occasion so little inconveniency to anybody.

各阶级人民都有纳税以支持君主或全体国民的义务。每输出1托德（即38磅）羊毛，收税5先令甚至10先令，这就给君主提供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这种税收与禁令相比，对减低羊毛价格起到的作用更小，所以对羊毛生产者利益的损害程度也会更少。对于制造商来说，这条禁令为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优势，因为在禁令之下，他们虽然不能以较低价格购买羊毛，但与外国制造商相比，他们至少能够少付5先令或10先令，而且还不用花费外国制造商必须支付的运费和保险费。几乎不可能发明一种既能给君主带来极大收入，又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不便的赋税。

The prohibition, notwithstanding all the penalties which guard it, does not prevent the exportation of wool. It is exported, it is well known, in great quantities.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ice in the home and that in the foreign market, presents such a temptation to smuggling that all the rigour of the law cannot prevent it. This illegal exportation is advantageous to nobody but the smuggler. A legal exportation subject to a tax, by affording a revenue to the sovereign, and thereby saving the imposition of some other, perhaps more burdensome and inconvenient taxes, might prove advantageous to all the different subjects of the state.

违反这种禁令虽会造成各种处罚，但并不能阻止羊毛的出口。众所周知，每年的出口额巨大。外国市场与本国市场上的羊毛价格有很大差距，因此走私的诱惑甚大，以致严苛的法律也无法阻挡。非法走私只对走私者有利，对其他任何人都无益处。而对合法出口的商品征收税款，既给君主提供了收入，又可避免征收其他更繁重、更不便的赋税，这或许对全国各阶级人民都有利。

The exportation of fuller's earth, or fuller's clay, supposed to be necessary for preparing and cleansing the woollen manufactures, has been subjected to nearly the same penalties as the exportation of wool. Even tobacco-pipe clay, though acknowledged to be different from fuller's clay, yet, on account of their resemblance, and because fuller's clay might sometimes be exported as tobacco-pipe clay, has been laid under the same prohibitions and penalties.

漂白土是呢绒制造及漂洗所必需的，因此出口漂白土所受的处罚几乎和出口羊毛一样。人们普遍认为烟管土和漂白土不相同，但由于二者很类似，并且漂白土有时会作为烟管土出口，因此出口烟管土也

会受到相同的禁止与处罚。

By the 13th and 14th of Charles II. chap, 7, the exportation, not only of raw hides, but of tanned leather, except in the shape of boots, shoes, or slippers, was prohibited; and the law gave a monopoly to our boot-makers and shoe-makers, not only against our graziers, but against our tanners. By subsequent statutes, our tanners have got themselves exempted from this monopoly, upon paying a small tax of only one shilling on the hundredweight of tanned leather, weighing one hundred and twelve pounds. They have obtained likewise the drawback of two-thirds of the excise duties imposed upon their commodity, even when exported without further manufacture. All manufactures of leather may be exported duty free; and the exporter is besides entitled to the drawback of the whole duties of excise. Our graziers still continue subject to the old monopoly. Graziers, separated from one another, and dispersed through all the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country, cannot, without great difficulty, combine together for the purpose either of imposing monopolies upon their fellow-citizens, or of exempting themselves from such as may have been imposed upon them by other people. Manufacturers of all kinds, collected together in numerous bodies in all great cities, easily can. Even the horns of cattle are prohibited to be exported; and the two insignificant trades of the horner and comb-maker enjoy, in this respect, a monopoly against the graziers.

查理二世在位的第十三年和十四年出台的第7号法令规定：除皮质鞋靴或拖鞋以外，一切生皮、鞣皮都禁止出口。这项法律让国内制鞋业占据了垄断地位，并损害了牧畜业和鞣皮业的利益。随后的法令让鞣皮业摆脱了制鞋业的垄断，他们只需要对每重112磅的鞣皮缴纳微不足道的1先令税款。即使是出口未经后续加工的鞣皮，他们也能

收回商品所纳消费税的2/3。一切皮革制品都能免税出口；出口商还可能获得消费税的退税。而国内牧畜者却继续遭受垄断带来的伤害。牧畜者散居国内各地，要想团结起来，对同胞们实施垄断或摆脱他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垄断，需要克服极大的阻力。各行业制造商都集居在大都市，团结起来十分容易。牛角被禁止出口；而制角器和制梳这两种不重要的行业，却享受着牧畜业者不具有的垄断地位。

Restraints, either by prohibitions, or by taxes,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goods which are partially, but not completely manufactured, are not peculiar to the manufacture of leather. As long as anything remains to be done, in order to fit any commodity for immediate use and consumption, our manufacturers think that they themselves ought to have the doing of it. Woollen yarn and worsted are prohibited to be exported, under the same penalties as wool. Even white cloths are subject to a duty upon exportation, and our dyers have so far obtained a monopoly against our clothiers. Our clothiers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it; but it happens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our principal clothiers are themselves likewise dyers. Watch-cases, clock-cases, and dial-plates for clocks and watches, have been prohibited to be exported. Our clock-makers and watch-makers are, it seems, unwilling that the price of this sort of workmanship should be raised upon them by the competition of foreigners.

以禁止或收税的方法限制半成品的出口，并不是皮革制造业所特有的。只要一件物品仍需进一步加工才能直接使用或消费，制造业者便以为这应当由他们来完成。羊毛线和呢绒一样禁止出口，否则会受相同的处罚，甚至未染色呢绒的出口也要纳税；在这点上，国内染业取得了一种损害呢绒业的垄断地位。国内的呢绒商虽有能力捍卫自身权利，但主要呢绒制造商大部分也经营染业，因而也就没有捍卫的必

要。表壳、钟壳、表针盘、钟针盘都被禁止出口。国内制表者和制钟者似乎都不希望这一类商品的价格因国外竞争而抬高。

By some old statutes of Edward III, Henry VIII. and Edward VI. the exportation of all metals was prohibited. Lead and tin were alone excepted, probably on account of the great abundance of those metals, in the exportation of which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trade of the kingdom in those days consisted.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mining trade, the 5th of William and Mary, chap.17, exempted from the prohibition iron, copper, and mundic metal made from British ore. The exportation of all sorts of copper bars, foreign as well as British, was afterwards permitted by the 9th and 10th of William III. chap 26. The exportation of unmanufactured brass, of what is called gun-metal, bell-metal, and shroff metal, still continues to be prohibited. Brass manufactures of all sorts may be exported duty free.

爱德华三世、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的一些法令，禁止一切金属的出口。铅和锡之所以例外，或许是因为这两种金属储量极高，其出口占当时全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威廉和玛利统治期间的第五年第17号法令，为鼓励矿业，允许出口由不列颠矿物冶炼的铁、铜和硫化铁。后来，在威廉三世第九年和第十年出台的第26号法令，允许出口产自本国或外国的各类铜块。未加工的黄铜，即所谓枪炮金属、钟铃金属或货币鉴定人金属，却仍被禁止出口。各种黄铜制品都可以免税出口。

The exportation of the materials of manufacture, where it is not altogether prohibited, is, in many cases, subjected to considerable duties.

不完全禁止出口的生产原料，往往都要缴纳相当大数额的关税。

By the 8th Geo. I. chap.15, the exportation of all goods, the produce or manufacture of Great Britain, upon which any duties had been imposed by former statutes, was rendered duty free. The following goods, however, were excepted: alum, lead, lead-ore, tin, tanned leather, copperas, coals, wool, cards, white woollen cloths, lapis calaminaris, skins of all sorts, glue, coney hair or wool, hares wool, hair of all sorts, horses, and litharge of lead. If you except horses, all these are either materials of manufacture, or incomplete manufactures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as materials for still further manufacture), or instruments of trade. This statute leaves them subject to all the old duties which had ever been imposed upon them, the old subsidy, and one per cent. outwards.

乔治一世在位第八年出台的第15号法令规定，大不列颠生产制造的一切货物（按照以前的法令须缴纳税款）都将免税出口，但以下各类货物除外：明矾、铅、铅矿石、锡、鞣皮、绿矾、煤炭、梳毛机、白呢绒、异极矿石、各种兽皮、胶、兔毛、野兔毛、其他各种毛、马匹、氧化铅矿石。除了马匹，这些物品中其余的都是生产原料、半制成品（可视为需要进一步加工的材料），或生产工具。这项法令使得这些货物须缴纳以往所纳税款，即过去的补助税及1％的出口税。

By the same statute, a great number of foreign drugs for dyers use are exempted from all duties upon importation. Each of them, however, is afterwards subjected to a certain duty, not indeed a very heavy one, upon exportation. Our dyers, it seems, while they thought it for their interest to encourage the importation of those

drugs, by an exemption from all duties, thought it likewise for their own interest to throw some small discouragement upon their exportation. The avidity, however, which suggested this notable piece of mercantile ingenuity, most probably disappointed itself of its object. It necessarily taught the importers to be more careful than they might otherwise have been, that their importation should not exceed what was necessary for the supply of the home market. The home market was at all times likely to be more scantily supplied; the commodities were at all times likely to be somewhat dearer there than they would have been, had the exportation been rendered as free as the importation.

这条法令又规定，许多染色用的外国染料进口时可免纳一切税。但随后出口时，须纳一定的税，但金额不算高。国内染业商人一方面认为，鼓励染料进口对自身有利；另一方面认为，对出口稍作阻碍对自己也有益处。但商人因贪欲产生的商业智慧，恐怕并未达到其目标。因为它必然会让进口商人更加小心，进口额不会超过国内市场的需要。国内市场上这类商品总是供应不足，且价格总是略高于进出口一样自由时的价格。

By the above-mentioned statute, gum senega, or gum arabic, being among the enumerated dyeing drugs, might be imported duty free. They were subjected, indeed, to a small poundage duty, amounting only to threepence in the hundred weight, upon their re-exportation. France enjoyed, at that time, an exclusive trade to the country most productive of those drugs, that which lie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Senegal; and the British market could not be easily supplied by the immediate importation of them from the place of growth. By the 25th Geo. II. therefore, gum senega was allowed to be imported (contrary to the general dispositions of the

Act of Navigation) from any part of Europe. As the law, however, did not mean to encourage this species of trade, so contrary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mercantile policy of England, it imposed a duty of ten shillings the hundred weight upon such importation, and no part of this duty was to be afterwards drawn back upon its exportation. The successful war which began in 1755 gave Great Britain the same exclusive trade to those countries which France had enjoyed before. Our manufacturers, as soon as the peace was made, endeavoured to avail themselves of this advantage, and to establish a monopoly in their own favour both against the growers and against the importers of this commodity. By the 5th of Geo. III. therefore, chap. 37, the exportation of gum senega, from his Majesty's dominions in Africa, was confined to Great Britain, and was subjected to all the same restrictions, regulations, forfeitures, and penalties, as that of the enumerated commoditie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Its importation, indeed, was subjected to a small duty of sixpence the hundred weight; but its re-exportation was subjected to the enormous duty of one pound ten shillings the hundred weight. It was the intention of our manufacturers, that the whole produce of those countries should be imported into Great Britain, and in order that they themselves might be enabled to buy it at their own price, that no part of it should be exported again, but at such an expense as would sufficiently discourage that exportation. Their avidity, however, upon this, as well as upon many other occasions, disappointed itself of its object. This enormous duty presented such a temptation to smuggling, that great quantities of this commodity were clandestinely exported, probably to all the manufacturing countries of Europe, but particularly to Holland, not only from Great Britain, but from Africa. Upon this account, by the 14th Geo. III. chap.10, this duty upon exportation was reduced to five shillings the hundredweight.

依照上述法令，美远至树胶或阿拉伯树胶在染料之列，可以免税进口。它们再次出口时，需缴纳少量的税，112磅染料的税金不过3便士。当时，法国在塞内加尔附近生产这种染料最高产的国家享有专营贸易特权，英国市场难以获得从生产地直接进口的染料供应。于是，乔治二世第二十五年规定，可以从欧洲各地进口美远至树胶（这极大地违背了航海条例的整体意志）。然而，此法令并非意在鼓励这种严重违背英格兰重商主义基本原则的贸易。此类进口贸易每112磅须纳税10先令，而在出口时不予退还。随着1755年爆发的这场战争的胜利，英国获得了法国曾经在那些国家所享有的专营贸易特权。和议一经达成，我们的制造商即刻抓住机遇，建立一种对自身大大有益却有害于该商品的生产者及进口商利益的垄断地位。所以，乔治三世第五年第37号法令规定，从英王陛下所管辖的非洲领土出口的美远至树胶只许输往大不列颠；并且与我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和西印度殖民地所列举的商品一样，需服从于同样的限制、规则，及没收和处罚条例。诚然，在进口贸易中每112磅只纳6便士的轻税，但在其再出口贸易中，每112磅须纳高达30先令的重税。我国制造业商的目标是把这些国家的产品全部运到英国来。此外，要使自己能以自定的价格购买这些产品，且其中任何产品都不能再出口。事实上，这样的费用就足以阻碍它的出口了。然而，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如同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都是为贪欲所驱使，且结果同样失望透顶。重税的实施为走私带来了巨大的诱惑。于是，许多这类商品从大不列颠，甚至非洲，被偷运至欧洲各制造国，尤其是荷兰。因此，乔治三世第十四年的第10号法令把这一出口税减为每112磅纳5先令。

In the book of rates, according to which the Old Subsidy was levied, beaver skins were estimated at six shillings and eight pence a piece; and the different subsidies and imposts which, before the year 1722, had been laid upon their importation, amounted to one-fifth part of the rate, or to sixteen pence upon each skin; all of which, except half the Old Subsidy, amounting only to twopence,

was drawn back upon exportation. This duty,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so important a material of manufacture, had been thought too high; and, in the year 1722, the rate was reduced to two shillings and sixpence, which reduced the duty upon importation to sixpence, and of this only one-half was to be drawn back upon exportation. The same successful war put the country most productive of beaver under the dominion of Great Britain and beaver skins being among the enumerated commodities, their exportation from America was consequently confined to the market of Great Britain. Our manufacturers soon bethought themselves of the advantage which they might make of this circumstance; and in the year 1764, the duty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beaver skin was reduced to one penny, but the duty upon exportation was raised to sevenpence each skin, without any drawback of the duty upon importation. By the same law, a duty of eighteen pence the pound was imposed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beaver wool or wombs, without making any alteration in the duty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that commodity, which, when imported by Britain, and in British shipping, amounted at that time to between fourpence and fivepence the piece. Coals may be considered both as a material of manufacture, and as an instrument of trade. Heavy duties, accordingly, have been imposed upon their exportation, amounting at present (1783) to more than five shillings the ton, or to more than fifteen shillings the chaldron, Newcastle measures, which is, in most cases, more than the original value of the commodity at the coal-pit, or even at the shipping port for exportation.

按照旧的补助税所依据的地方税，一件海狸皮的税值估定为6先令8便士。1722年以前，进口一件海狸皮需缴纳的各种补助税和关税，约等于地方税的1/5，即1先令4便士。在出口时，除了旧的补助税的一半（仅仅2便士）外，这些税收都可退还。如此重要的工业原

料，施加这样的进口税未免过高。于是，在1722年，地方税降至2先令6便士，进口税亦降至6便士。但在出口时，也只能退还上述税额的一半。同样由于一次战争的胜利，大不列颠占领了海狸产量最多的国家，而海狸皮又属于列举的商品，所以，从美洲出口的海狸皮就只能运至英国市场了。我国制造商们立刻想到借此机会获利。1764年，一件海狸皮的进口税减至1便士，而出口税则升至每件7便士，并不得退还任何进口税。该法令又规定，海狸毛或海狸腹部出口时每磅须纳税1先令6便士，而其进口税则没有变更；若是由英国人用英国船只进口的，其时需纳的进口税在4先令与5先令之间。煤炭既被视为工业原料，也被当作生产工具。因此，煤炭的出口征以重税，当前（1783年）是每吨纳税5先令以上，或每纽卡斯尔煤衡量纳税15先令以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已高于商品在煤坑处的原价，甚至高于商品在运货港的原价。

The exportation, however, of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properly so called, is commonly restrained, not by high duties, but by absolute prohibitions. Thus, by the 7th and 8th of William III chap.20, sect.8, the exportation of frames or engines for knitting gloves or stockings is prohibited under the penalty, not only of the forfeiture of such frames or engines, so exported, or attempted to be exported, but of forty pounds, one half to the king, the other to the person who shall inform or sue for the same. In the same manner, by the 14th Geo. III. chap. 71, the exportation to foreign parts, of any utensils made use of in the cotton, linen, woollen, and silk manufactures, is prohibited under the penalty, not only of the forfeiture of such utensils, but of two hundred pounds, to be paid by the person who shall offend in this manner; and likewise of two hundred pounds, to be paid by the master of the ship, who shall knowingly suffer such utensils to be loaded on board his ship.

不过，对真正生产工具的出口限制，往往不是通过高额关税，而是通过绝对禁令。故而，威廉三世第七年和第八年第20号法令第8条规定，禁止编织手套和长袜的织机机架或机械出口。若有违规，则不仅将用于出口的织机机架或机械没收，还需缴纳罚金40镑，一半献给国王，一半赏给告发者或控告人。同样，乔治三世第十四年第71号法令规定，禁止出口棉制造业、麻制造业、羊毛制造业和丝制造业使用的一切工具，若有违反，则没收货物，且犯者须缴纳罚金200镑；明知故犯，纵容这类工具上船的船主，也须缴纳罚金200镑。

When such heavy penalties were imposed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the dead instruments of trade, it could not well be expected that the living instrument, the artificer, should be allowed to go free. Accordingly, by the 5th Geo. I. chap. 27, the person who shall be convicted of enticing any artificer, of or in any of the manufactures of Great Britain, to go into any foreign parts, in order to practise or teach his trade, is liable, for the first offence, to be fined in any sum not exceeding one hundred pounds, and to three months imprisonment, and until the fine shall be paid; and for the second offence, to be fined in any sum,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twelve months, and until the fine shall be paid. By the 23rd George . II. chap. 13, this penalty is increased, for the first offence, to five hundred pounds for every artificer so enticed, and to twelve months imprisonment, and until the fine shall be paid; and for the second offence, to one thousand pounds, and to two years imprisonment, and until the fine shall be paid.

出口死的生产工具尚且受到如此重的处罚，作为活的生产工具的技工，自然也不能出入无间。因此，乔治一世第五年第27号法令规定，凡被判引诱英国技工或制造业工人到外国去从业或传授技艺者，初犯时处以100镑以下的罚金，并判处3个月监禁，至罚金付清方可释

放；再犯时罚金数额依法庭意旨而定，并判处12个月监禁，至罚金付清方可释放。乔治二世第二十三年第13号法令加重了这类处罚：对于初犯者，每引诱一名技工到国外须处以高达500镑的罚金，判处12个月监禁，至罚金付清方可释放；再犯时罚金增至1,000镑，判处2年监禁，至罚金付清方可释放。

By the former of those two statutes, upon proof that any person has been enticing any artificer, or that any artificer has promised or contracted to go into foreign parts, for the purposes aforesaid, such artificer may be obliged to give security,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that he shall not go beyond the seas, and may be committed to prison until he give such security.

根据上述两条法令中的前一条，任何人一旦被证明曾引诱某名技工，或某名技工被证明曾许诺或签订契约为上述目的奔赴他国，那么这名技工必须按法庭要求提交不再出国的保证书，在未向法庭提交保证书前暂由法庭拘禁。

If any artificer has gone beyond the seas, and is exercising or teaching his trade in any foreign country, upon warning being given to him by any of his Majesty's ministers or consuls abroad, or by one of his Majesty's Secretaries of State, for the time being, if he does not, within six months after such warning, return into this realm, and from henceforth abide and inhabit continually within the same, he is from thenceforth declared incapable of taking any legacy devised to him within this kingdom, or of being executor or administrator to any person, or of taking any lands within this kingdom, by descent, devise, or purchase. He likewise forfeits to the king all his lands, goods, and chattels; is declared an alien in every

respect; and is put out of the king's protection.

若某一技工已竟自出国，并在外国从业或传授技艺，一旦收到英王陛下的驻外公使或领事，抑或某位时任大臣的警告，则必须于六个月内回国，并从此以往继续居留在本国。否则，即从那时起被剥夺一切国内财产的继承权，不得做国内任何人的遗嘱执行人或财产管理人，更不得通过继承、遗赠或购买等方式获得国内任何土地。同样，他所有的动产及不动产也被国王没收；他被宣布为外国人，不再受国王的保护。

It is unnecessary, I imagine, to observe how contrary such regulations are to the boasted liberty of the subject, of which we affect to be so very jealous; but which, in this case, is so plainly sacrificed to the futile interests of our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无需说明，这类法规与我们用以自夸并精心守护的自由精神大相违背。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的自由成为商人和制造商获取琐碎利益的牺牲品。

The laudable motive of all these regulations, is to extend our own manufactures, not by their own improvement, but by the depression of those of all our neighbours, and by putting an end, as much as possible, to the troublesome competition of such odious and disagreeable rivals. Our master manufacturers think it reasonable that they themselves should have the monopoly of the ingenuity of all their countrymen. Though by restraining, in some trades, the number of apprentices which can be employed at one

time, and by imposing the necessity of a long apprenticeship in all trades, they endeavour, all of them, to confine the knowledge of their respective employments to as small a number as possible; they are unwilling, however, that any part of this small number should go abroad to instruct foreigners.

值得赞扬的是，这一切法令的目标在于壮大我国的制造业，但其采取的方法不是改良制造业本身，而是抑制邻国的制造业，并尽可能消灭所有具有威胁性的竞争。我国独立经营的制造商认为，他们理当独享同胞的技艺才干。通过限制某些职业在一段时间内可雇用的人数，并规定所有职业须有长时间的学徒期，他们竭力使其所在行业的知识尽可能为少数人所掌握。尽管如此，他们仍不愿这少数人中有任何人跨出国门，向外国人传授技能。

Consumption is the sole end and purpose of all production;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producer ought to be attended to, only so far as it may be necessary for promoting that of the consumer.

一切生产皆以消费为唯一目的。只有当生产者的利益对促进消费者的利益必不可少时，才应对其加以关照。

The maxim is so perfectly self-evident, that it would be absurd to attempt to prove it. But in the mercantile system, the interest of the consumer is almost constantly sacrificed to that of the producer; and it seems to consider production, and not consumption, as the ultimate end and object of all industry and commerce.

这一原则完全不证自明，若试图证明，反显荒唐可笑。但在重商主义体系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总是沦为生产者利益的牺牲品。这种重商主义体系似乎把生产，而不是消费，当作所有工商行业的终极目标。

In the restraint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all foreign commodities which can come into competition with those of our own growth or manufacture, the interest of the home consumer is evidently sacrificed to that of the producer. It is altogether for the benefit of the latter, that the former is obliged to pay that enhancement of price which this monopoly almost always occasions.

但凡能与本国产物或制造品竞争的外国商品，对其进口皆加以限制，显然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正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消费者才不得不为这种垄断所带来的价格上涨买单。

It is altogether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roducer, that bounties are granted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some of his productions. The home consumer is obliged to pay, first the tax which is necessary for paying the bounty; and, secondly, the still greater tax which necessarily arises from the enhancement of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y in the home market.

在出口国内生产的某些产品时对其赐以奖金，也全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首先，国内消费者必须缴纳为支付奖励金而不得不征收的赋税；其次，国内市场上商品价格抬升必然产生更大的赋税，他们也必须为此买单。

By the famous treaty of commerce with Portugal, the consumer is prevented by high duties from purchasing of a neighbouring country, a commodity which our own climate does not produce; but is obliged to purchase it of a distant country, though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the commodity of the distant country is of a worse quality than that of the near one. The home consumer is obliged to submit to this inconveniency, in order that the producer may import into the distant country some of his productions, upon more advantageous terms than he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allowed to do. The consumer, too, is obliged to pay whatever enhancement in the price of those very productions this forced exportation may occasion in the home market.

与葡萄牙签订的著名通商条约，使我国消费者因高额的关税而无法向邻国购买我国气候不宜生产的商品，而不得不向某个遥远的国家购买，即便众所周知，该国这种商品的品质不及邻国。国内消费者不得不忍受此种不便，只为使本国生产者能因此以相对有利的条件出口一些产品到这个遥远的国家去。这些产品的强行出口导致国内市场价格抬升，消费者也不得不为此买单。

But in the system of laws which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the management of our American and West Indian colonies, the interest of the home consumer has been sacrificed to that of the producer, with a more extravagant profusion than in all our other commercial regulations. A great empire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raising up a nation of customers, who should be obliged to buy, from the shops of our different producers, all the goods with which these could supply them. For the sake of that little enhancement of price which this monopoly might afford our

producers, the home consumers have been burdened with the whole expense of maintaining and defending that empire. For this purpose, and for this purpose only, in the two last wars, more than two hundred millions have been spent, and a new debt of more than a hundred and seventy millions has been contracted, over and above all that had been expended for the same purpose in former wars. The interest of this debt alone is not only greater than the whole extraordinary profit which, it ever could be pretended, was made by the monopoly of the colony trade, but than the whole value of that trade, or than the whole value of the goods which, at an average, have been annually exported to the colonies.

但对比我国其他所有通商条例，为管理美洲殖民地和西印度殖民地而建立的法律体系，在更大程度上牺牲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以照顾生产者的利益。由此建立起的庞大帝国，其目的便是建成一个顾客之国，使他们只能从国内各生产者的店铺购买所能供给的各种产品。国内生产者在这种垄断行为中获得的仅是价格的些许抬升，而国内消费者却要承担全部费用，以维持和捍卫这个帝国。为了这一目的，且仅以此为目的，我国在最近的两次战争中消耗掉2亿多镑，借债超过1亿7千万镑，远超以往类似战争中所消耗的费用。这一项借款的利息，不仅大于由殖民地贸易垄断所能获取的全部高额利润，而且大于全部贸易额；换而言之，大于平均每年出口到殖民地的全部商品的价值。

It cannot be very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o have been the contrivers of this whole mercantile system; not the consumers, we may believe, whose interest has been entirely neglected; but the producers, whose interest has been so carefully attended to; and among this latter class, our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have been by far the principal architects. In the mercantile regulations which

have been taken notice of in this chapter, the interest of our manufacturers has been most peculiarly attended to; and the interest, not so much of the consumers, as that of some other sets of producers, has been sacrificed to it.

确定谁是重商主义制度的筹谋者并不难。我们相信，此筹谋者决不是消费者，因为消费者的利益完全被忽略了；但一定是生产者，因为他们的利益得到了周全的保护。而在生产者中，我们的商人与制造商到目前为止又是主要的筹谋者。在本章所讨论的商业条例中，我国制造商的利益得到了最特别的关注，而消费者的利益，或不如说其他生产者的利益，则成为制造商利益的牺牲品。

Chapter IX. Of the Agricultural Systems, or of those Systems of Political Economy which Represent the Produce of Land, as Either the Sole or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the Revenue and Wealth of Every Country

第九章、论重农主义学说，即政治经济学中把土地生产物视为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或主要来源的学说

The agricultural system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ll not require so long an explanation as that which I have thought it necessary to bestow upon the mercantile or commercial system.

关于重商主义，我觉得有必要予以详细说明。但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农主义，则无需过多说明。

That system which represents the produce of land as the sole

source of the revenue and wealth of every country, has so far as I know, never been adopted by any nation, and it at present exists only in the speculations of a few men of great learning and ingenuity in France. It would not, surely, be worthwhile to examine at great length the errors of a system which never has done, and probably never will do, any harm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I shall endeavour to explain, however, as distinctly as I can, the great outlines of this very ingenious system.

据我所知，从未有任何国家采用过这种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和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且目前这种学说只存在于少数博学多才的法国学者的理论中。对于一种从未且或许永远不会危害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理论体系，长篇大论地讨论其谬误当然不值得。不过，我会尽可能清晰地概述出这一独特理论体系的轮廓。

Mr. Colbert, the famous minister of Louis XIV. was a man of probity, of great industry, and knowledge of detail; of great experience and acuteness in the examination of public accounts; and of abilities, in short, every way fitted for introducing method and good order into the collection and expenditure of the public revenue. That minister had unfortunately embraced all the prejudices of the mercantile system, in its nature and essence a system of restraint and regulation, and such as could scarce fail to be agreeable to a laborious and plodding man of business, who had been accustomed to regulate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public offices, and to establish the necessary checks and controls for confining each to its proper sphere. The industry and commerce of a great country, he endeavoured to regulate upon the same model as the departments of a public office; and instead of allowing every man to pursue his own interest in his own way, upon the liberal

plan of equality, liberty, and justice, he bestowed upon certain branches of industry extraordinary privileges, while he laid others under as extraordinary restraints. He was not only disposed, like other European ministers, to encourage more the industry of the towns than that of the country; but,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industry of the towns, he was willing even to depress and keep down that of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render provisions cheap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owns, and thereby to encourage manufactures and foreign commerce, he prohibited altogether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and thus excluded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from every foreign market, for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duce of their industry. This prohibition, joined to the restraints imposed by the ancient provincial laws of France upon the transportation of corn from one province to another, and to the arbitrary and degrading taxes which are levied upon the cultivators in almost all the provinces, discouraged and kept down the agriculture of that country very much below the state to which it would naturally have risen in so very fertile a soil, and so very happy a climate. This state of discouragement and depression was felt more or less in every different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many different inquiries were set on foot concerning the causes of it. One of those causes appeared to be the preference given, by the institutions of Mr. Colbert, to the industry of the towns above that of the country.

路易十四著名的大臣科尔伯，为人正直，异常勤勉，且知识渊博；对于检查公共账目，他经验丰富，观察敏锐。总而言之，从各方面看他都能力卓著，能把公共收入的征收与支出处理得秩序井然。不幸的是，这位大臣抱有重商主义体制的所有偏见。这种体制从性质和本质上看，就是一种限制与管理的体制，故而很能迎合一个勤苦工作，惯于管理各部门公务，并进行必要的检查与监督，使各部门事务在适当范围内进行的事务家的兴趣。对于一个大国的工商业，他所采

用的管理方式与管理各部门公务的方式一样；他不允许个人在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的计划下，以各自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却赐予某些产业部门极大的特权，而给其他产业部门施以极大的限制。他不仅像欧洲其他大臣一样，更加鼓励城市产业，不太鼓励农村产业，而且甚至愿意抑制农村产业，以支持城市产业。为了向城市居民提供价格低廉的产品，以此鼓励制造业与对外贸易，他完全禁止出口谷物；这样，农村居民就无法将其最重要的产业产品运到外国市场。这种禁令，加上法国昔日限制省际谷物运输的各省法规，以及各省对耕作者的大肆征税，使得这个国家的农业被压制得无法依照自然趋势，借助其肥沃的土壤和极好的气候得到应有的发展。全国各地都多少感觉到了这种消沉沮丧的状态，且对这种状态产生的原因已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科尔伯所领导的机构重城市产业而轻农村产业的做法，似乎是原因之一。

If the rod be bent too much one way, says the proverb, in order to make it straight, you must bend it as much the other. The French philosophers, who have proposed the system which represents agriculture as the sole source of the revenue and wealth of every country, seem to have adopted this proverbial maxim; and, as in the plan of Mr. Colbert, the industry of the towns was certainly over-valued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the country, so in their system it seems to be as certainly under-valued.

谚语有云，欲正曲棍，必逆而曲之。那些主张把农业视为各国收入与财富的唯一来源的法国学者们，似乎采用了这一格言。此外，由于在科尔伯的方案中，城市产业相较农村产业确实受到过分重视，故而在这些重农主义学者的学说中，城市产业必定受到轻视。

The different orders of people, who have ever been supposed to

contribute in any respect towards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they divide into three classes. The first is the class of the proprietors of land. The second is the class of the cultivators, of farmers and country labourers, whom they honour with the peculiar appellation of the productive class. The third is the class of artificers,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whom they endeavour to degrade by the humiliating appellation of the barren or unproductive class.

对于一般认为在某方面为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做出贡献的各阶级人民，他们将其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土地所有者阶级；第二种是耕作者、农场主和农村劳动者阶级，被赐以“生产阶级”这一特殊的称号；第三种是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阶级，被冠以“不生产阶级”这一不光荣的称谓。

The class of proprietors contributes to the annual produce, by the expense which they may occasionally lay out up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and, upon the buildings, drains, inclosures, and other ameliorations, which they may either make or maintain upon it, and by means of which the cultivators are enabled, with the same capital, to raise a greater produce, and consequently to pay a greater rent. This advanced rent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interest or profit due to the proprietor, upon the expense or capital which he thus employs in the improvement of his land. Such expenses are in this system called ground expenses (*depenses foncieres*).

所有者阶级之所以对年产量有贡献，是因为他们偶尔会花钱改良土地，修缮建筑物、排水沟、围墙，并进行其他改良或修缮活动。在

此基础上，耕作者就能以同样的资本生产出更多的生产物，故而能支付更高的地租。这种增高的地租，可视为所有者投入费用或资金改良其土地所应得的利息或利润。在重农主义体系中，这种费用被称为土地费用。

The cultivators or farmers contribute to the annual produce, by what are in this system called the original and annual expenses (depenses primitives, *et depenses annuelles*), which they lay out up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land. The original expenses consist in the instruments of husbandry, in the stock of cattle, in the seed, and i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farmer's family, servants, and cattle, during at least a great part of the first year of his occupancy, or till he can receive some return from the land. The annual expenses consist in the seed, in the wear and tear of instruments of husbandry, and in the annual maintenance of the farmer's servants and cattle, and of his family too, so far as any part of them can be considered as servants employed in cultivation. That part of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which remains to him after paying the rent, ought to be sufficient, first, to replace to him,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t least during the term of his occupancy, the whole of his original expenses, together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and, secondly, to replace to him annually the whole of his annual expenses, together likewise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Those two sorts of expenses are two capitals which the farmer employs in cultivation; and unless they are regularly restored to him, together with a reasonable profit, he cannot carry on his employment upon a level with other employments; but, from a regard to his own interest, must desert i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seek some other. That part of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which is thus necessary for enabling the farmer to continue his business, ought to be considered as a fund sacred to cultivation, which, if the landlord violates, he

necessarily reduces the produce of his own land, and, in a few years, not only disables the farmer from paying this racked rent, but from paying the reasonable rent which he might otherwise have got for his land. The rent which properly belongs to the landlord, is no more than the neat produce which remains after paying, in the completest manner, all the necessary expenses which must be previously laid out, in order to raise the gross or the whole produce. It is because the labour of the cultivators, over and above paying completely all those necessary expenses, affords a net produce of this kind, that this class of people are in this system peculiarly distinguished by the honourable appellation of the productive class. Their original and annual expenses are for the same reason called, in this system, productive expenses, because, over and above replacing their own value, they occasion the annual reproduction of this net produce.

耕作者或农场主对年产物的贡献在于支付耕作土地的费用。在重农主义体系中，该费用被称为原始费用和年度费用。原始费用包括：农具、耕畜、种子，以及在第一个耕作年（至少在其大部分时候）或在土地有所收成以前，供养农场主的家属、雇工和牲畜所需的费用。年度费用包括：种子、农具的磨损，以及每年供养农场主的雇工、耕畜和家属（只要某些家庭成员可视为耕作雇工）的费用。支付地租后剩余的那一部分土地生产物，首先应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在他耕种期间，足以补偿他的全部原始费用，并为其带来资本的普通利润；其次应该足以补偿他全部的年度费用，并使其获得资本的普通利润。农场主以这两种费用作为耕作的两种资本；倘若这两种资本不能定期地回到他手中，并使他获得合理的利润，他就无法保持其职业与其他职业处在同等地位；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他必然会尽快放弃这一职业，而另谋他职。应将保证农场主能坚守其职所必需的那部分土地生产物视为农耕的神圣基金，如果地主加以侵占，就必然会减少他自己土地的产量。在几年之内，就会使农场主不但无力支付繁重的地

租，而且不能支付土地所有者原本可以获得的合理地租。地主理应获得的地租，只是把先前用于获得总收入或总产量所必需的一切费用完全付清之后剩余的纯产量。由于耕作者的劳动在偿付所有必要费用之后，还能提供这种纯产量，所以这一阶级被重农主义学说尊称为生产阶级，以凸显其独特和重要。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原始费用和年度费用在这种学说中被称为生产性费用，因为这种费用除了补偿自身的价值外，还能使纯产物每年得以再生产。

The ground expenses, as they are called, or what the landlord lays out upon the improvement of his land, are, in this system, too, honoured with the appellation of productive expenses. Till the whole of those expenses, together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have been completely repaid to him by the advanced rent which he gets from his land, that advanced rent ought to be regarded as sacred and inviolable, both by the church and by the king; ought to be subject neither to tithe nor to taxation. If it is otherwise, by discouraging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the church discourages the future increase of her own tithes, and the king the future increase of his own taxes. As in a well ordered state of things, therefore, those ground expenses, over and above reproducing in the completest manner their own value, occasion likewise, after a certain time, a reproduction of a net produce, they are in this system considered as productive expenses.

土地费用是指地主用来改良自己土地的费用。在这种学说中，土地费用也被尊称为生产性费用。在增高的地租还未将全部此类费用及资本的普通利润完全还给地主以前，所增高的地租应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会和国王都不能加以征税。如若不然，则会阻碍土地的改良，继而妨碍教会未来什一税的增加，也不利于国王未来自身的赋税的增加。因为在状态良好的情况下，这类土地费用除了再生产它自身

的全部价值以外，还能在一段时间后，使纯产物实行再生产，所以这种学说也将它们称为生产性费用。

The ground expenses of the landlord, however, together with the original and the annual expenses of the farmer, are the only three sorts of expenses which in this system are considered as productive. All other expenses, and all other orders of people, even those who, in the common apprehensions of men, are regarded as the most productive, are, in this account of things, represented as altogether barren and unproductive.

然而，在这种学说中，被称作生产性费用的仅有三种，即地主的土地费用，农场主的原始费用及年度费用。其他诸般费用，其他一切阶级的人民，即使按常理被认为最具生产力的那些人，也因此被视为是完全不生产的。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in particular, whose industry, in the common apprehensions of men, increases so much the value of the rude produce of land, are in this system represented as a class of people altogether barren and unproductive. Their labour, it is said, replaces only the stock which employs them, together with its ordinary profits. That stock consists in the materials, tools, and wages, advanced to them by their employer; and is the fund destined for their employment and maintenance. Its profits are the fund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employer. Their employer, as he advances to them the stock of materials, tools, and wages, necessary for their employment, so he advances to himself what is necessary for his own maintenance; and this maintenance he generally proportions to the profit which he expects to make by

the price of their work. Unless its price repays to him the maintenance which he advances to himself, as well as the materials, tools, and wages, which he advances to his workmen, it evidently does not repay to him the whole expense which he lays out upon it. The profits of manufacturing stock, therefore, are not, like the rent of land, a neat produce which remains after completely repaying the whole expense which must be laid out in order to obtain them. The stock of the farmer yields him a profit, as well as that of the master manufacturer; and it yields a rent likewise to another person, which that of the master manufacturer does not. The expense, therefore, laid out in employing and maintaining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does no more than continue, if one may say so, the existence of its own value, and does not produce any new value. It is, therefore, altogether a barren and unproductive expense. The expense, on the contrary, laid out in employing farmers and country labourers, over and above continuing the existence of its own value, produces a new value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It is, therefore, a productive expense.

按照常理，工匠与制造业工人的劳动能大幅度增加土地原生产物的价值。但重农主义学说却尤其将工匠和制造业工人视为完全不生产的阶级。按其说法，他们的劳动只偿还雇用他们的资本，并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这种资本包括雇主预付给他们的原材料、工具和工资，是用来雇用和供养他们的基金，其利润是用来供养他们的雇主的基金。他们的雇主在预付他们工作所需的原材料、工具和工资的同时，也预付了维持他自身所需的费用。他所预付的这种维持费，通常和他在产品价格上所期望的利润成一定比例。如果产品价格不足以偿还他为自己预付的维持费，以及向劳动者预付的原材料、工具与工资，显然他就没有收回他所投入的全部费用。因此，制造业资本获得的利润与土地的地租不一样，它不是还清所需投入的全部费用以后剩下的纯产物。农场主的资本与制造业工人的资本一样，都为使资本所有者获

得利润；但农场主能给他人带来地租，制造业工人却不能。因此可以这样说，用来雇用和供养工匠、制造业工人的费用，只延续它自身的价值，并不能产生任何新的价值，所以它是完全不生产的费用。相反，用来雇用农场主或农村劳动者的费用，除了延续它自身的价值外，还生产一种新的价值，即地主的地租，故而是生产性费用。

Mercantile stock is equally barren and unproductive with manufacturing stock. It only continues the existence of its own value, without producing any new value. Its profits are only the repayment of the maintenance which its employer advances to himself during the time that he employs it, or till he receives the returns of it. They are only the repayment of a part of the expense which must be laid out in employing it.

与制造业资本一样，商业资本也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延续自身的价值，无法产生任何新的价值。它产生的利润，不过是补偿了投资人在投资期间或获得收益前为自身预付的维持费。换而言之，商业资本的利润不过是对投资所需费用的部分补偿而已。

The labour of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never adds anything to the value of the whole annual amount of the rude produce of the land. It adds, indeed, greatly to the value of some particular parts of it. But the consumption which, in the mean time, it occasions of other parts, is precisely equal to the value which it adds to those parts; so that the value of the whole amount is not, at any one moment of time, in the least augmented by it. The person who works the lace of a pair of fine ruffles for example, will sometimes raise the value of, perhaps, a pennyworth of flax to £30 sterling. But though, at first sight, he appears thereby to multiply the value of a

part of the rude produce about seven thousand and two hundred times, he in reality adds nothing to the value of the whole annual amount of the rude produce. The working of that lace costs him, perhaps, two years labour. The £30 which he gets for it when it is finished, is no more than the repayment of the subsistence which he advances to himself during the two years that he is employed about it. The value which, by every day's, month's, or year's labour, he adds to the flax, does no more than replace the value of his own consumption during that day, month, or year. At no moment of time, therefore, does he add any thing to the value of the whole annual amount of the rude produce of the land: the portion of that produce which he is continually consuming, being always equal to the value which he is continually producing. The extreme poverty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ersons employed in this expensive, though trifling manufacture, may satisfy us that the price of their work does not, in ordinary cases, exceed the value of their subsistence. It is otherwise with the work of farmers and country labourers.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is a value which, in ordinary cases, it is continually producing over and above replacing, in the most complete manner, the whole consumption, the whole expense laid out upon the employment and maintenance both of the workmen and of their employer.

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劳动，不能使土地原生产物年产量的价值有所增加。毫无疑问，他们的劳动确实能大幅度增加土地原生产物的某些特定部分的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们在劳动时对原生产物其他部分的消费，恰好等于对那些部分的增加。因此，无论何时，整体的价值量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劳动而有所增加。例如，生产一对细布蕾丝花边的人，有时会把或许只值1便士的亚麻的价值提高到30镑。然而，虽初步看来他似乎因此使一部分原生产物增值了约7,200倍，但事实上，原生产物年产量的价值并没有因为他而有所增加。他也许要花费

两年的时间来制造这种花边。花边完成时，他所获得的30镑仅仅是补偿了这两年他给自己预付的生活费用。他通过每日、每月或每年的劳动为亚麻所增加的价值，不过是补偿了其间他自己消耗掉的价值。因此，无论何时，他都没有使土地原生产物年产量的价值有所增加。他持续消耗的那部分原生产物，总是与他继续产生的价值等同。在这种费用大而工作十分琐碎的制造业，大部分受雇者都极其贫困。这或许可使我们相信，一般情况下，他们劳动的价格并没有超过他们生活资料的价值。但农场主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却与此大不相同。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劳动不仅能补偿自身的全部费用，补还雇用和维持工人及雇主的全部费用，还可继续生产一种价值，即地主的地租。

Artificers,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can augment the revenue and wealth of their society by parsimony only; or, as it is expressed in this system, by privation, that is, by depriving themselves of a part of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ir own subsistence. They annually reproduce nothing but those funds. Unless, therefore, they annually save some part of them, unless they annually deprive themselves of the enjoyment of some part of them, the revenue and wealth of their society can never be, in the smallest degree, augmented by means of their industry. Farmers and country labourers, on the contrary, may enjoy completely the whole funds destined for their own subsistence, and yet aug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revenue and wealth of their society. Over and above what is destined for their own subsistence, their industry annually affords a neat produce, of which the augmentation necessarily augments the revenue and wealth of their society. Nations, therefore, which, like France or England, consist in a great measure, of proprietors and cultivators, can be enriched by industry and enjoyment. Nations, on the contrary, which, like Holland and Hamburg, are composed chiefly of merchants,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can grow rich only through parsimony and privation. As the interest of

nations so differently circumstanced is very different, so is likewise the common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In those of the former kind, liberality, frankness, and good fellowship, naturally make a part of their common character; in the latter, narrowness, meanness, and a selfish disposition, averse to all social pleasure and enjoyment.

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若想增加社会的收入与财富，只能依靠极度的节俭，或者如这一学说所言，通过自我剥夺，即舍弃为自己提供生活费用的一部分基金。除却这种基金，他们每年再生产的别无他物。因此，他们必须每年节省下部分基金，且自行舍弃享受这部分基金的乐趣，否则，他们的劳动就无法使社会收入与财富有任何增加。相反，农场主及农村劳动者不仅可以全部享有自己的生活基金，还可同时增加社会的收入与财富。除却满足自身的生活消费，他们的劳动还能每年提供一种纯产量；这种纯产量一旦增加，社会的收入与财富必得以增长。故而，像法国和英国那样人口以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为主的国家，就能以勤劳和享乐富国。与此相反，像荷兰和汉堡那样人口以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为主的国家，却只能通过节俭与自我剥夺来致富。这些国家的境况各异，利害关系也大相径庭，故国民的性情也极为不同。在前一种国家，开明、率真和友爱自然成为国民性的一部分。在后一种国家，人民普遍性格偏狭、吝啬且自私，反对一切社会娱乐与享受。

The unproductive class, that of merchants,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is maintained and employed altogether at the expense of the two other classes, of that of proprietors, and of that of cultivators. They furnish it both with the materials of its work, and with the fund of its subsistence, with the corn and cattle which it consumes while it is employed about that work. The proprietors and cultivators finally pay both the wages of all the workmen of the unproductive class, and of the profits of all their employers. Those

workmen and their employers are properly the servants of the proprietors and cultivators. They are only servants who work without doors, as menial servants work within. Both the one and the other, however, are equally maintain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same masters. The labour of both is equally unproductive. It adds nothing to the value of the sum total of the rude produce of the land. Instead of increasing the value of that sum total, it is a charge and expense which must be paid out of it.

由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构成的不生产阶级，其供养和雇用费是由土地所有者阶级和耕作者阶级支付的。这两个阶级不仅为他们提供工作所需材料和生活基金，更为他们提供受雇工作时所消费的谷物和牲畜。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最终要支付不生产阶级全部工人的工资以及所有雇主的利润。这些工人和雇主实际上相当于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仆人。家仆往往在户内工作，而他们只是将工作地点转移到了户外。这两种佣人皆依赖同一个主人的资金生活，且他们的劳动都是不生产的，都不能使土地原生产物的总价值有所增加。这种劳动不但没有增加总价值量，其费用还必须从总价值量中支取。

The unproductive class, however, is not only useful, but greatly useful, to the other two classes. By means of the industry of merchants,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the proprietors and cultivators can purchase both the foreign goods and the manufactured produce of their own country, which they have occasion for, with the produce of a much smaller quantity of their own labour, than what they would be obliged to employ, if they were to attempt, in an awkward and unskilful manner, either to import the one, or to make the other, for their own use. By means of the unproductive class, the cultivators are delivered from many cares, which would otherwise distract their attention from the

cultivation of land. The superiority of produce, which in consequence of this undivided attention, they are enabled to raise, is fully sufficient to pay the whole expense which the maintenance and employment of the unproductive class costs either the proprietors or themselves. The industry of merchants,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though in its own nature altogether unproductive, yet contributes in this manner indirectly to increase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It increases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productive labour, by leaving it at liberty to confine itself to its proper employment, the cultivation of land; and the plough goes frequently the easier and the better, by means of the labour of the man whose business is most remote from the plough.

然而，不生产阶级对于其他两个阶级来说不仅有用，而且是大有用处。借助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者的劳动，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得以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产品，并用这些产品购买所需的外国商品和本国制造品。倘若他们试图用笨拙、不熟练的方法亲自进口或制造这些产品，必定需要更多的劳动。有了不生产阶级，耕作者能免除许多担忧，专注于土地耕作。一旦专心耕作，耕作者便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增加的产量足够补偿他们自己或土地所有者供养和雇用不生产阶级所消耗的全部费用。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劳动虽在本质上是完全不生产的，但对于土地生产物的增加有间接的贡献。他们的劳动使生产性劳动者自由地投入到耕作土地这一本职工作上，从而提高生产性劳动者的生产力。借助那些不以耕耘为业的人的劳动，耕作变得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好。

It can never be the interest of the proprietors and cultivators, to restrain or to discourage, in any respect, the industry of merchants,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The greater the liberty which this unproductive class enjoys, the greater will be the competition in all

the different trades which compose it, and the cheaper will the other two classes be supplied, both with foreign goods and with the manufactured produce of their own country.

在任何方面抑制或阻碍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都与土地所有者及耕作者的利益相违背。不生产阶级享有越大的自由，其内部各种职业的竞争就越激烈，其他两个阶级就能以越低廉的价格获得所需的外国商品及本国制造品。

It can never be the interest of the unproductive class to oppress the other two classes. It is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 land, or what remains after deducting the maintenance, first of the cultivators, and afterwards of the proprietors, that maintains and employs the unproductive class. The greater this surplus, the greater must likewise be the maintenance and employment of that class. The establishment of perfect justice, of perfect liberty, and of perfect equality, is the very simple secret which most effectually secures the highest degree of prosperity to all the three classes.

压制其他两个阶级，也绝不是不生产阶级的利益所在。不生产阶级的维持和雇用费是由剩余土地生产物支付的，即先后扣除耕作者和土地所有者的维持费后剩下来的部分。剩余的部分越多，不生产阶级就能享有越多的维持费。使这三个阶级都能达到最高度繁荣的简单却最有效的秘诀，就是建立绝对的正义、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平等。

The merchants,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of those mercantile states, which, like Holland and Hamburg, consist chiefly of this unproductive class, are in the same manner maintained and

employed altogether at the expense of the proprietors and cultivators of land.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those proprietors and cultivators a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placed at a most inconvenient distance from the merchants,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whom they supply with the materials of their work and the fund of their subsistence; are the inhabitant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subjects of other governments.

在那些主要由不生产阶级构成的商业国家，如荷兰和汉堡，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维持和雇用费也是由土地所有者及土地耕作者支付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大部分的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都远离这些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无所交集。为后者提供工作材料和生活基金的其实是他国的居民，归属于其他的政府。

Such mercantile states, however, are not only useful, but greatly useful,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ose other countries. They fill up, in some measure, a very important void; and supply the place of the merchants,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whom the inhabitants of those countries ought to find at home, but whom, from some defect in their policy, they do not find at home.

然而，这样的商业国家对他国的居民不仅有益，且大有益处。其他各国居民由于国家政策的某种缺陷而无法在国内找到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而商业国家为他们提供了这些人员，故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空缺。

It can never be the interest of those landed nations, if I may call them so, to discourage or distress the industry of such

mercantile states, by imposing high duties upon their trade, or upon the commodities which they furnish. Such duties, by rendering those commodities dearer, could serve only to sink the real value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ir own land, with which,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price of which those commodities are purchased. Such duties could only serve to discourage the increase of that surplus produce, and consequently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eir own land. The most effectual expedient, on the contrary, for raising the value of that surplus produce, for encouraging its increase, and consequently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eir own land, would be to allow the most perfect freedom to the trade of all such mercantile nations.

为抑制这类商业国的产业而对其贸易或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决不符合我所称的农业国家的利益。这种关税会提高商品的价格，故只会降低用以购买商业国商品的土地剩余生产物的真实价值。其唯一作用是阻碍这类剩余生产物的增加，从而使自己土地的改良与耕作也受到妨碍。相反，提高此类剩余生产物的价值，鼓励其增长，从而鼓励土地的改良及耕作，最有效的方法是使所有这类商业国享有绝对的贸易自由。

This perfect freedom of trade would even be the most effectual expedient for supplying them, in due time, with all the artificers,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whom they wanted at home; and for filling up, in the properest and most advantageous manner, that very important void which they felt there.

这种绝对的贸易自由能及时为他们提供国内缺少的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并以最适当、最有利的方式填补他们在国内所感到的那

种重要的缺陷，因而是最为有效的。

The continual increase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their land would, in due time, create a greater capital than what would be employed with the ordinary rate of profit in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land; and the surplus part of it would naturally turn itself to the employment of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at home. But those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finding at home both the materials of their work and the fund of their subsistence, might immediately, even with much less art and skill be able to work as cheap as the little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of such mercantile states, who had both to bring from a great distance. Even though, from want of art and skill, they might not for some time be able to work as cheap, yet, finding a market at home, they might be able to sell their work there as cheap as that of the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of such mercantile states, which could not be brought to that market but from so great a distance; and as their art and skill improved, they would soon be able to sell it cheaper. The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of such mercantile states, therefore, would immediately be rivalled in the market of those landed nations, and soon after undersold and justled out of it altogether. The cheapness of the manufactures of those landed nations, in consequence of the gradual improvements of art and skill, would, in due time, extend their sale beyond the home market, and carry them to many foreign markets, from which they would, in the same manner, gradually justle out many of the manufacturers of such mercantile nations.

对比按普通利润率在改良或耕作土地上所投入的资本，土地剩余生产物持续增长能及时创造出更多的资本，且多出的资本会自行用于

在国内雇用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然而，这些工匠和制造者一旦在国内找到工作材料和生活基金，即便其技艺大不如人，也能立即与商业国同类工匠及制造业工人一样，以同样低廉的成本制造产品，因为这类商业国的同类工匠和制造业工人须从更远的地方运来所需的工作材料与生活资料。即便在一定时间内由于技艺与熟练程度不足，他们无法像这类商业国的同类工匠及制造业工人一样，以同样低廉的成本制造产品，但也许能够在国内市场上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出售其产品，因为这类商业国的同类工匠及制造业工人生产的货物必须从更远的地方运来。而且，一旦技艺有所精进、熟练程度得以改善，他们很快就能以更低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因此，这类商业国的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立刻会在农业国的市场上遭遇劲敌，不久便不得不贱卖其产品，被淘汰出市场。技艺的日臻成熟使这类农业国的制造品价格低廉，从而使其产品得以适时走出国内市场，行销海外，并以同样的方式逐渐将这类商业国的许多制造品赶出国外市场。

This continual increase, both of the rude and manufactured produce of those landed nations, would in due time create a greater capital than could, with the ordinary rate of profit, be employed either in agriculture or in manufactures. The surplus of this capital would naturally turn itself to foreign trade and be employed in exporting, to foreign countries, such parts of the rude and manufactured produce of its own country, as exceeded the demand of the home market. In the exportation of the produce of their own country, the merchants of a landed nation would have an advantage of the same kind over those of mercantile nations, which its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had over the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of such nations; the advantage of finding at home that cargo, and those stores and provisions, which the others were obliged to seek for at a distance. With inferior art and skill in navigation, therefore, they would be able to sell that cargo as cheap in foreign markets as the merchants of such mercantile nations; and

with equal art and skill they would be able to sell it cheaper. They would soon, therefore, rival those mercantile nations in this branch of foreign trade, and, in due time, would justle them out of it altogether.

对比按普通利润率在农业或制造业上所投入的资本，在适当时期，农业国原生产物及制造品持续增长所创造的资本必然更多。多出的资本自然会转投在国外贸易上，把超出国内市场需求的过剩的原生产物及制造品运至国外。在出口本国产品时，农业国商人也会比商业国商人更享有优势；对比商业国工匠及制造业工人，农业国工匠及制造业工人亦享有同样的优势。其优势在于，农业国能在国内获得货物、存货与食品，商业国则必须在远地寻求此类供应。因此，即便航海技术较差，他们也能在外国市场上，以同商业国一样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货物。一旦拥有同样的航海技术，他们就能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售商品。所以，他们不久就能在国外贸易上赶超商业国商人，并适时将这些商人全部淘汰出去。

According to this liberal and generous system, therefore, the most advantageous method in which a landed nation can raise up artificers,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of its own, is to grant the most perfect freedom of trade to the artificers,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of all other nations. It thereby raises the value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its own land, of which the continual increase gradually establishes a fund, which, in due time, necessarily raises up all the artificers,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whom it has occasion for.

因此，这种宽宏自由的学说认为，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给予绝对的贸易自由，是农业国培育本国工匠、制造业

工人与商人最有利的方法。如此一来，国内剩余土地生产值会得到提高，在持续增加中将逐渐建立起一笔基金。假以时日，这笔基金必定会培养出所需的所有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

When a landed nation on the contrary, oppresses, either by high duties or by prohibitions, the trade of foreign nations, it necessarily hurts its own interest in two different ways. First, by raising the price of all foreign goods, and of all sorts of manufactures, it necessarily sinks the real value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its own land, with which,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price of which, it purchases those foreign goods and manufactures. Secondly, by giving a sort of monopoly of the home market to its own merchants,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it raises the rate of mercantile and manufacturing profit,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agricultural profit; and, consequently, either draws from agriculture a part of the capital which had before been employed in it, or hinders from going to it a part of w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gone to it. This policy, therefore, discourages agriculture in two different ways; first, by sinking the real value of its produce, and thereby lowering the rate of its profit; and, secondly, by raising the rate of profit in all other employments. Agriculture is rendered less advantageous, and trade and manufactures more advantageous,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be; and every man is tempted by his own interest to turn, as much as he can, both his capital and his industry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employments.

相反，倘若农业国通过施加高额关税或禁令来压制他国的贸易，必然从以下两个方面损害自身利益。首先，提高所有外国商品及各类制造品的价格，必定使得用来购买外国商品和制造品的本国剩余土地生产物的真正价值有所降低。其次，本国商人、工匠与制造业工人被

给予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会使工商业利润率抬升至农业利润率之上，如此一来，便抽走了原本投在农业上的一部分资本，或使原本要投在农业上的那部分资本无法流向农业。因此，这一政策对农业有两种损害：其一，降低农产品的真实价值，从而使农业利润率下降；其二，提高其他一切职业的资本利润率。农业享有的优势减少，而商业与制造业却因此占据比原先更多的优势。受自身利益的驱使，每个人都会尽可能把资本及劳动从农业改投到商业和制造业中。

Though, by this oppressive policy, a landed nation should be able to raise up artificers,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of its own, somewhat sooner than it could do by the freedom of trade; a matter, however, which is not a little doubtful; yet it would raise them up, if one may say so, prematurely, and before it was perfectly ripe for them. By raising up too hastily one species of industry, it would depress another more valuable species of industry. By raising up too hastily a species of industry which only replaces the stock which employs it, together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 it would depress a species of industry which, over and above replacing that stock, with its profit, affords likewise a neat produce, a free rent to the landlord. It would depress productive labour, by encouraging too hastily that labour which is altogether barren and unproductive.

尽管通过这种抑制政策，农业国培养本国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的速度比自由贸易时更大（这点并非无可置疑），但这种培养为时过早（若可以这么说的话），因为对他们来说时机并未成熟。过快地提升一种产业，就会抑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产业。过快地提升这种仅能补偿所投资本并提供普通利润的产业，就会抑制一种除却补偿资本并带来利润以外，还能提供纯产物（即地主地租）的产业。贸然鼓励完全不生产的劳动，必然压制生产性劳动。

In what manner, according to this system, the sum total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is distributed among the three classes above mentioned, and in what manner the labour of the unproductive class does no more than replace the value of its own consumption, without increasing in any respect the value of that sum total, is represented by Mr Quesnai, the very ingenious and profound author of this system, in some arithmetical formularies. The first of these formularies, which, by way of eminence, he peculiarly distinguishes by the name of the Economical Table, represents the manner in which he supposes this distribution takes place, in a state of the most perfect liberty, and, therefore, of the highest prosperity in a state where the annual produce is such as to afford the greatest possible net produce, and where each class enjoys its proper share of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Some subsequent formularies represent the manner in which he supposes this distribution is made in different states of restraint and regulation; in which, either the class of proprietors, or the barren and unproductive class, is more favoured than the class of cultivators; and in which either the one or the other encroaches, more or less, upon the share which ought properly to belong to this productive class. Every such encroachment, every violation of that natural distribution, which the most perfect liberty would establish, must, according to this system, necessarily degrade, more or less, from one year to another, the value and sum total of the annual produce, and must necessarily occasion a gradual declension in the real wealth and revenue of the society; a declension, of which the progress must be quicker or slower,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this encroachment, according as that natural distribution, which the most perfect liberty would establish, is more or less violated. Those subsequent formularies represent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declension which, according to this system, correspond to the different degrees in which this natural distribution of things is violated.

至于在这一学说中，全部土地年产物如何在上述三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不生产阶级的劳动为何只补偿它自身消耗的价值，而对总价值无所增益，这些问题则由该领域最聪慧渊博的作家魁奈用一些数学公式表述出来。这其中的第一个公式十分著名，他特别予以区分地将其命名为《经济表》。在这个公式中，他假定这种分配发生在一种绝对自由的状态下，并说明其分配方式：这种状态亦是最繁荣的状态，年产量足以提供最多的纯产物，每个阶层的人能在全部年产物中享有其应得的份额。在接下来的几个公式中，他又假定这种分配发生在各种限制及规章制度的状态下，并说明其分配方式：在这种状态下，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比耕作者阶级享有更多优待，前两个阶级会在一定程度上侵占生产阶级应得的份额。这一学说认为，每当由绝对的自由状态所确立的自然分配受到此类侵害或违背，势必会导致年产物的价值与总量逐年降低，故而必定使社会收入与财富逐渐减少。其减少的过程可急可缓，必须依照这种侵害的程度以及绝对自由所建立的自然分配不可避免地受到侵害的程度而定。这些公式以这种学说为依据，把自然分配所受的不同侵害程度，及其对应的财富的不同减少程度表述出来。

Some speculative physicians seem to have imagined that the health of the human body could be preserved only by a certain precise regimen of diet and exercise, of which every, the smallest violation, necessarily occasioned some degree of disease or disorder proportionate to the degree of the violation. Experience, however, would seem to show that the human body frequently preserves, to all appearance at least, the most perfect state of health under a vast variety of different regimens; even under some which are generally believed to be very far from being perfectly wholesome. But the healthful state of the human body, it would seem, contains in itself some unknown principle of preservation, capable either of preventing or of correcting, in many respects, the bad effects even

of a very faulty regimen. Mr Quesnai, who was himself a physician, and a very speculative physician, seems to have entertained a notion of the same kind concerning the political body, and to have imagined that it would thrive and prosper only under a certain precise regimen, the exact regimen of perfect liberty and perfect justice. He seems not to have considered, that in the political body, the natural effort which every man is continually making to better his own condition, is a principle of preservation capable of preventing and correcting, in many respects, the bad effects of a political economy, in some degree both partial and oppressive. Such a political economy, though it no doubt retards more or less, is not always capable of stopping altogether, the natural progress of a nation towards wealth and prosperity, and still less of making it go backwards. If a nation could not prosper without the enjoyment of perfect liberty and perfect justice, there is not in the world a nation which could ever have prospered. In the political body, however, the wisdom of nature has fortunately made ample provision for remedying many of the bad effects of the folly and injustice of man; in the same manner as it has done in the natural body, for remedying those of his sloth and intemperance.

有些喜欢思考的医生似乎认为，人体的健康只能通过某种正确的食物及运动养生方法来维持，稍有违犯，势必引起与违犯程度相等同的疾病。然而，经验似乎表明，人体（至少从表面上看）常能在各种不同的养生条件下保持最良好的状态，即使是在普遍认为很不卫生的情况也是如此。但人体的健康状态似乎本身就含有一种未知的保护原则，甚至能在许多方面防止或纠正错误的养生方法带来的不良影响。魁奈自己就是一名医生，并且极好思考，因而似乎对政治实体也持有同样的想法，以为它只有在某种绝对自由、绝对公平的正确制度下才能繁荣发展。他似乎未曾考虑到，每个处在政治实体中的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而自然而然地持续做出努力，这就是一种保护原则。它能在

许多方面防止并纠正由不公平和压抑性的政治经济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虽然这种政治经济无疑会或多或少阻碍一国富裕繁荣的自然发展进程，但并不能使其完全停止发展，更无法使其退步。如果一个国家一旦无法享受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正义，便无法繁荣发展，那世界上便再无可繁荣的国家。然而幸运的是，在国家政治实体内，自然的智慧已为纠正人类的愚蠢及不公正产生的诸多不良影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正如自然的智慧在人体内做好了充分准备，来弥补人类的懒惰及无节制的生活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The capital error of this system, however, seems to lie in its representing the class of artificers,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as altogether barren and unproductive.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may serve to show the impropriety of this representation.

然而，这种学说最主要的谬误似乎在于把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看作完全不生产的阶级。以下的评论或许可说明这种观点中的不恰当之处：

First, this class, it is acknowledged, reproduces annually the value of its own annual consumption, and continues, at least, the existence of the stock or capital which maintains and employs it. But, upon this account alone, the denomination of barren or unproductive should seem to be very improperly applied to it. We should not call a marriage barren or unproductive, though it produced only a son and a daughter, to replace the father and mother, and though it did not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he human species, but only continued it as it was before. Farmers and country labourers, indeed, over and above the stock which maintains and employs them, reproduce annually a net produce, a free rent to the

landlord. As a marriage which affords three children is certainly more productive than one which affords only two, so the labour of farmers and country labourers is certainly more productive than that of merchants,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The superior produce of the one class, however, does not, render the other barren or unproductive.

第一，这种学说承认，这一阶级每年可再生产自身所消费的价值，且至少延续了用以维持和雇用这一阶级的资本的存在。因此，称其为无生产或不生产者似乎不甚妥当。倘若一段婚姻中只生育了一男一女，即使它并没有增加人类的数量，只是通过代替父母延续了人类的发展，我们也不能称其为不生儿育女的婚姻。毫无疑问，农场主与农村劳动者在补偿用以维持和雇用他们的资本之余，每年还再生产一种纯产物，即地主的地租。生育3个孩子的婚姻确实比仅生育两个孩子的婚姻更有生产力，同理，农场主与农村劳动者的劳动必定比商人、制造者和工匠的劳动更多产。然而，一个阶级的多产，并不意味着其他阶级便是无生产或不生产的。

Secondly, it seems, on this account, altogether improper to consider artificers,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in the same light as menial servants. The labour of menial servants does not continue the existence of the fund which maintains and employs them. Their maintenance and employment is altogether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masters, and the work which they perform is not of a nature to repay that expense. That work consists in services which perish generally in the very instant of their performance, and does not fix or realize itself in any vendible commodity, which can replace the value of their wages and maintenance. The labour, on the contrary, of artificers,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naturally does fix and realize itself in some such vendible commodity. It is upon this

account that, in the chapter in which I treat of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 I have classed artificers,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among the productive labourers, and menial servants among the barren or unproductive.

第二，鉴于上述原因，把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当作家仆一般看待，似乎大为不当。家仆的劳动不会使雇用和维持其生活的基金得以持续存在。他们的维持与雇用费全部由其主人支付，而他们所进行的劳动，就其性质而言是无法偿还这种费用的。家仆的劳动大多在执行的那一刻便已消失，既不能固定于，也无法转换成任何可销售的商品；这类商品却能够补偿他们的工资及维持费。相比之下，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的劳动，却自然而然地固定于并转换成可销售的商品。正因于此，在探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那一章，我将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归为生产性劳动者，而将家仆归为不生产的劳动者。

Thirdly, it seems, upon every supposition, improper to say, that the labour of artificers,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does not increase the real revenue of the society. Though we should suppose, for example, as it seems to be supposed in this system, that the value of the daily, monthly, and yearly consumption of this class was exactly equal to that of its daily, monthly, and yearly production; yet it would not from thence follow, that its labour added nothing to the real revenue, to the real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society. An artificer, for example, who,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after harvest, executes ten pounds worth of work, though he should, in the same time, consume ten pounds worth of corn and other necessaries, yet really adds the value of ten pounds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society. While he has been consuming a half-yearly

revenue of ten pounds worth of corn and other necessaries, he has produced an equal value of work, capable of purchasing, either to himself, or to some other person, an equal half-yearly revenue. The value, therefore, of what has been consumed and produced during these six months, is equal, not to ten, but to twenty pounds. It is possible, indeed, that no more than ten pounds worth of this value may ever have existed at any one moment of time. But if the ten pounds worth of corn and other necessaries which were consumed by the artificer, had been consumed by a soldier, or by a menial servant, the value of that part of the annual produce which existed at the end of the six months, would have been ten pounds less than it actually is in consequence of the labour of the artificer. Though the value of what the artificer produces, therefore, should not, at any one moment of time, be supposed greater than the value he consumes, yet, at every moment of time, the actually existing value of goods in the market is, in consequence of what he produces, greater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be.

第三，宣称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的劳动不能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这种说法无论基于何种假设，都似乎是不正确的。例如，即便我们按照这种学说所假设的那样，假定这一阶级每日、每月或每年所消费的价值恰好等于他们在此期间所生产的价值，但这也不意味着们的劳动没有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没有使社会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真实价值有所增加。例如，一名工匠在收获季过后的前6个月时间里所完成的劳动价值10镑，那么即使他在此期间消费了价值10镑的谷物及其他必需品，但他实际上使社会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真实价值增加了10镑。尽管他消费了等同于自己半年收入的价值10镑的谷物及其他必需品，但他也制造出同等价值的产品，从而使他能为自己或别人购买同样的半年收入。因此，这六个月内所消费和生产的价值不等于10镑，而等于20镑。在此期间，固然始终只存在这10镑的价值，但如果这原本被工匠所消费的价值10镑的谷物及其他必需品，换而被一

名士兵或一名家仆消费，那么在六个月后存在的那部分年产物的价值，就比工匠劳动所产生的要少10镑。因此，尽管工匠所创造的价值从未超过他所消费的价值，但无论何时，他所生产的产品都使得市场上实际存在的货物价值比没有这些产品时更大。

When the patrons of this system assert, that the consumption of artificers,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is equal to the value of what they produce, they probably mean no more than that their revenue, or the fund destined for their consumption, is equal to it. But if they had expressed themselves more accurately, and only asserted, that the revenue of this class was equal to the value of what they produced, it might readily have occurred to the reader, that what would naturally be saved out of this revenue, must necessarily increase more or less the real wealth of the society. In order, therefore, to make out something like an argument, it was necessary that they should express themselves as they have done; and this argument, even supposing things actually were as it seems to presume them to be, turns out to be a very inconclusive one.

当这种学说的拥护者宣称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的消费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时，或许意在表明，这一阶级的收入或专供其消费的基金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等同。但如果他们能表达得更准确一些，只宣称这一阶级的收入等于其生产的价值，读者或许容易想到，从这一收入中自然而然节省下来的部分，必能在某种程度上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因此，为使其所述近似一个论点，他们必须按原有的方式来表达。然而，即便假设事情真如他们所认定的那样，这一论点最终也是无法使人信服的。

Fourthly, farmers and country labourers can no more augment,

without parsimony, the real revenue,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ir society, than artificers, manufacturers, and merchants.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any society can be augmented only in two ways; either, first, by some improvement in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the useful labour actually maintained within it; or, secondly, by some increase in the quantity of that labour.

第四，与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一样，农场主及农村劳动者若不节俭，则无法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即社会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任何社会都只能以两种方式来增加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或者改良社会上实际维持的有用劳动的生产力，或者增加社会上实际维持的有用劳动。

The improvement in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useful labour depends, first, upon the improvement in the ability of the workman; and, secondly, upon that of the machinery with which he works. But the labour of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as it is capable of being more subdivided, and the labour of each workman reduced to a greater simplicity of operation, than that of farmers and country labourers; so it is likewise capable of both these sorts of improvement in a much higher degree {See book I chap. 1.} In this respect, therefore, the class of cultivators can have no sort of advantage over that of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改良有用劳动的生产力，首先取决于劳动者能力的提升，其次取决于其工作所用机器的改进。然而，对比农场主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工匠及制造业工人的劳动能实行更细的分工，且每个工人的操作在降低难度后会更为简单，于是，工匠及制造业工人在这两个方面都

能实现更大程度的改进（见第一章）。因此，在这一点上，耕作者阶级并不比工匠及制造业工人所处阶级享有更多优势。

The increase in the quantity of useful labour actually employed within any society must depend altogether upon the increase of the capital which employs it; and the increase of that capital, again, must be exactly equal to the amount of the savings from the revenue, either of the particular persons who manage and direct the employment of that capital, or of some other persons, who lend it to them. If merchants,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are, as this system seems to suppose, naturally more inclined to parsimony and saving than proprietors and cultivators, they are, so far, more likely to augment the quantity of useful labour employed within their society, and consequently to increase its real revenue,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在任何社会，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的增加，都必须完全依赖于雇用有用劳动的资本的增加；而这种资本的增加，又必须完全等于从资本管理人的收入或者资本出借人的收入中节省下来的额度。倘若真如这一学说所设想的那样，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必然比土地所有者及耕作者更倾向于节俭储蓄，那他们也就更有可能增加其所在社会雇用的有用劳动，因而更有可能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Fifthly and lastly, though the revenue of the inhabitants of every country was supposed to consist altogether, as this system seems to suppose, in the quantity of subsistence which their industry could procure to them; yet, even upon this supposition, the revenue of a trading and manufacturing country must,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always be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one without trade or manufactures. By means of trade and manufactures, a greater quantity of subsistence can be annually imported into a particular country, than what its own lands, in the actual state of their cultivation, could afford. The inhabitants of a town, though they frequently possess no lands of their own, yet draw to themselves, by their industry, such a quantity of the rude produce of the lands of other people, as supplies them, not only with the materials of their work, but with the fund of their subsistence. What a town always is with regard to the country in its neighbourhood, one independent state or country may frequently be with regard to other independent states or countries. It is thus that Holland draws a great part of its subsistence from other countries; live cattle from Holstein and Jutland, and corn from almost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Europe. A small quantity of manufactured produce, purchases a great quantity of rude produce. A trading and manufacturing country, therefore, naturally purchases, with a small part of its manufactured produce, a great part of the rude produce of other countries; while, on the contrary, a country without trade and manufactures is generally obliged to purchase, at the expense of a great part of its rude produce,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manufactured produce of other countries. The one exports what can subsist and accommodate but a very few, and imports the subsistence and accommodation of a great number. The other exports the accommodation and subsistence of a great number, and imports that of a very few only. The inhabitants of the one must always enjoy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subsistence than what their own lands, in the actual state of their cultivation, could afford. The inhabitants of the other must always enjoy a much smaller quantity.

最后，即便真如这一学说所设想的那样，每个国家的居民收入全

部由居民劳动所能取得的生活资料构成，然而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工商业国家也总是比没有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拥有更多收入。有了商业及制造业的帮助，一国每年能进口的生活资料，就多于土地在现有耕作状态下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虽然城市居民往往不占有任何田地，但也能靠自身的劳动获得大量他人的土地原生产物，从而不仅获得工作的材料，而且获得生活基金。城市与其邻近农村的关系，往往就如同一个独立的领土或国家与其他独立的领土或国家的关系。荷兰就是这样从其他国家获得它大部分的生活资料的：活牲畜来自荷尔斯泰因和日德兰，谷物则几乎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用小量的制造业产品，就能购买大量的原生产物。如此一来，工商业国家自然能以小部分国内制造品，来交换其他国家大部分的原生产物；相反，没有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大都不得不用大部分国内原生产物，来购买其他国家极小部分的制造品。前一种国家出口的商品仅能维持和供应极少数人的生活，但其进口的商品却能维持和供应很多人的生活。后一种国家所出口的商品，能维持和供应很多人的生活，但其进口的商品却只能维持和供应极少数人的生活。前一种国家的居民所享用的生活资料，总能比其土地在现有耕作状态下所能提供的多很多。而后一种国家的居民所享用的生活资料却总是少很多。

This system, however, with all its imperfections, is perhaps the nearest approximation to the truth that has yet been published upon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is upon that account, well worth the consideration of every man who wishes to examine with attention the principles of that very important science. Though in representing the labour which is employed upon land as the only productive labour, the notions which it inculcates are, perhaps, too narrow and confined; yet in represent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as consisting, not in the unconsumable riches of money, but in the consumable goods annually reproduced by the labour of the society, and in representing perfect liberty as the only effectual expedient for rendering this annual reproduction the greatest possible, its

doctrine seems to be in every respect as just as it is generous and liberal. Its followers are very numerous; and as men are fond of paradoxes, and of appearing to understand what surpasses the comprehensions of ordinary people, the paradox which it maintains, concerning the unproductive nature of manufacturing labour, has not, perhaps, contributed a little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its admirers. They have for some years past made a pretty considerable sect, distinguished in the French republic of letters by the name of the Economists. Their works have certainly been of some service to their country; not only by bringing into general discussion, many subjects which had never been well examined before, but by influencing, in some measure,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favour of agriculture. It has been in consequence of their representations, accordingly, that the agriculture of France has been delivered from several of the oppressions which it before laboured under. The term, during which such a lease can be granted, as will be valid against every future purchaser or proprietor of the land, has been prolonged from nine to twenty-seven years. The ancient provincial restraints upon the transportation of corn from one province of the kingdom to another, have been entirely taken away; and the liberty of exporting it to all foreign countries,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the common law of the kingdom in all ordinary cases. This sect, in their works, which are very numerous, and which treat not only of what is properly called Political Economy, or of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ut of every other bran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all follow implicitly, and without any sensible variation, the doctrine of Mr. Quesnai. There is, upon this account, little variety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works. The most distinct and best connected account of this doctrine is to be found in a little book written by Mr. Mercier de la Riviere, some time intendant of Martinico, entitled, *The Natural and Essential Order of Political Societies* . The admiration of this whole sect for their master, who

was himself a man of the greatest modesty and simplicity, is not inferior to that of any of the ancient philosophers for the founders of their respective systems. 'There have been since the world began,' says a very diligent and respectable author, the Marquis de Mirabeau, 'three great inventions which have principally given stability to political societies, independent of many other inventions which have enriched and adorned them. The first is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which alone gives human nature the power of transmitting, without alteration, its laws, its contracts, its annals, and its discoveries. The second is the invention of money, which binds together all the relations between civilised societies. The third is the Economical Table the result of the other two, which completes them both by perfecting their object; the great discovery of our age, but of which our posterity will reap the benefit.'

虽有以上若干缺点，这一学说仍是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所发表过的最接近真理的学说。因此，对于每一个有意愿细心研究这种极重要科学原理的人，这一学说都值得关注。诚然，该学说把投在土地上的劳动看作唯一的生产性劳动，此种见解未免太过狭隘，但它也认为，国家财富不是由不可消费的货币构成，而由社会劳动每年再生产的可消费的商品构成。该学说还提出，绝对自由是最大程度获得每年再生产物的唯一有效方法。从各方面看，这种学说的观点都是既公正又宽大自由的。该学说的支持者很多。由于人们热衷于悖论，喜欢装作能理解普通人所无法理解的东西，故而该学说中关于制造业劳动是不生产的劳动这一悖论，或许为它赢得了更多的赞赏者。在过去的数年间，这些推崇者组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学派，在法国学术界享有经济学家的荣称。他们的作品当然对国家有所贡献，但其贡献不在于把许多从未被仔细研究过的题目提出来，供大众讨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行政机关开始支持农业的发展。由于他们提出了这些观点，法国农业才得以摆脱以往所受的各种压迫。土地租赁的有效期也由9年延长至27年，在此期间任何未来的土地购买者或所有者都不得加以侵犯。

昔日限制省际谷物运输的各省法规已被完全废止；对外出口谷物的自由，亦被确定落实到处理一切普通案件的国家普通法中。这个学派著作甚多，不仅探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国家财富的性质与起源，还研究国家政府其他各部门。这些著作都完全参照魁奈的学说，不加任何改动，故多是大同小异，鲜有变化。对这一学说所做的最清晰连贯的阐述，当属由曾任马提尼科州长的里维埃所著的《政治社会的性质与基本制度》那本小册子。整个学派对他们这位极其谦虚质朴的大师十分钦慕，不亚于古代任何哲学家对其学派创立者的崇拜之情。一位十分勤勉可敬的作家米拉波说："有史以来，有三大发明曾给政治社会带来极大的稳定，且这些发明独立于其他许多丰富并装饰政治社会的发明。第一项是书写的发明，它使人类得以将法律、契约、历史和发现按其本来面目传递下去。第二项是货币的发明，它将各文明社会联结在一起。第三项是《经济表》，它起源于前两种发明，又补充了这二者的目标，使其更加完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发现，而我们的子孙将因此获益。"

A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ations of modern Europe has been more favourable to manufactures and foreign trade, the industry of the towns, than to agriculture, the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so that of other nations has followed a different plan, and has been more favourable to agriculture than to manufactures and foreign trade.

近代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往往偏重于类属城市产业的制造业及对外贸易，而对类属农村产业的农业则略为轻视；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学却依循不同的方案，以农业为主，制造业及对外贸易则次之。

The policy of China favours agriculture more than all other employments. In China, the condition of a labourer is said to be as

much superior to that of an artificer, as in most parts of Europe that of an artificer is to that of a labourer. In China, the great ambition of every man is to get possession of a little bit of land, either in property or in lease; and leases are there said to be granted upon very moderate terms, and to be sufficiently secured to the lessees. The Chinese have little respect for foreign trade. Your beggarly commerce! was the language in which the mandarins of Pekin used to talk to Mr. de Lange, the Russian envoy, concerning it {See the *Journal of Mr. De Lange* , in *Bell 's Travels* , vol. ii. p. 258, 276, 293.}. Except with Japan, the Chinese carry on, themselves, and in their own bottoms, little or no foreign trade; and it is only into one or two ports of their kingdom that they even admit the ships of foreign nations. Foreign trade, therefore, is, in China, every way confined within a much narrower circle than that to which it would naturally extend itself, if more freedom was allowed to it, either in their own ships, or in those of foreign nations.

中国的政策对农业的重视就超过其他一切行业。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享有比技工更优越的地位，而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工匠的地位却高于农业劳动者。在中国，每个人都有一个宏大的目标，即通过拥有土地所有权或租地的方式来占有若干土地。据说租用土地的条件十分合理，对于租借人也有充分保障。中国人不重视对外贸易。当俄国公使朗格来北京请求通商时，北京的官吏对他说，“贸易如同求乞！”（见《贝尔旅行记》第二册，第258、276、293页，《朗格日记》）除了对日本，中国人很少甚至完全没有自己使用国内船只从事对外贸易，而且只有一两个港口允许外国船只进入。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被以各种方式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倘若该国船只或外国船只能更自由地从事对外贸易，该国的对外贸易自然会有所扩大。

Manufactures, as in a small bulk they frequently contain a great

value, and can upon that account be transported at less expense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than most parts of rude produce, are, in almost all countries, the principal support of foreign trade. In countries, besides, less extensive, and less favourably circumstanced for interior commerce than China, they generally require the support of foreign trade. Without an extensive foreign market, they could not well flourish, either in countries so moderately extensive as to afford but a narrow home market, or in countries wher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one province and another was so difficult, as to render it impossible for the goods of any particular place to enjoy the whole of that home market which the country could afford. The perfec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t must be remembered, depends altogether upon the division of labour;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division of labour can be introduced into any manufacture, is necessarily regulated, it has already been shown,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But the great exte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the vast multitude of its inhabitants, the variety of climate, and consequently of productions in its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the easy communication by means of water-carriage betwee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render the home market of that country of so great extent, as to be alone sufficient to support very great manufactures, and to admit of very considerable subdivisions of labour. The home market of China is, perhaps, in extent, not much inferior to the market of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Europe put together. A more extensive foreign trade, however, which to this great home market added the foreign market of all the rest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if any considerable part of this trade was carried on in Chinese ships, could scarce fail to increase very much the manufactures of China, and to improve very much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it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y a more extensive navigation, the Chinese would naturally learn the art of using and constructing, themselves, all the different machines made use of in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other improvements of art and industry which are practised in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Upon their present plan, they have little opportunity of improving themselves by the example of any other nation, except that of the Japanese.

制造品通常体积小而价值大。与大部分原生产物相比，制造品在各国间运输时所费更少，因此几乎是所有国家对外贸易的首要支柱。此外，对于幅员不似中国这般辽阔，国内贸易的环境也不像在中国那么有利的国家，制造业也通常需要对外贸易来支持。对于面积适中，仅能提供狭小的国内市场的国家，或国内各省间交通不便，导致国内任何地区的生产物都无法畅销全国的国家，倘若没有广阔的国外市场，制造业就无法得到发展。必须记住，完善制造业必须完全依赖于劳动分工。此外，正如上文所述，任何制造业所能引入的分工程度，又势必受市场大小的约束。中国幅员辽阔，居民甚多，气候多样，因此不同省份物产各异，且大部分省份之间的水上运输又极为便利，所以国内市场广大，足以支撑起庞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较大程度的劳动分工。中国国内市场的面积，可能甚至不小于全欧洲各国市场的总面积。然而，若能扩大对外贸易，从而在广大的国内市场之上加上世界各地的国外市场，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其制造业的生产力。若由中国船只经营其中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则效果更甚。通过扩大海上交通，中国人自然会习得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与建造方法，以及世界其他各个地区在技术和产业上所实现的其他各种改良。但以中国当前的形势，除了效仿日本以外，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借鉴其他国家的先例以改良自己。

The policy of ancient Egypt, too, and that of the Gentoo government of Indostan, seem to have favoured agriculture more than all other employments.

同样，古埃及和印度政府的政策，似乎也偏重农业，超过了其他一切行业。

Both in ancient Egypt and Indostan,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was divided into different castes or tribes each of which was confined, from father to son, to a particular employment, or class of employments. The son of a priest was necessarily a priest; the son of a soldier, a soldier; the son of a labourer, a labourer; the son of a weaver, a weaver; the son of a tailor, a tailor, etc. In both countries, the cast of the priests holds the highest rank, and that of the soldiers the next; and in both countries the caste of the farmers and labourers was superior to the castes of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在古埃及和印度，全体人民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或部族，每一个等级或部族都只能由父传子世代从事某一特定职业或某一类型的职业。僧侣的儿子必须是僧侣，士兵的儿子必须是士兵，体力劳动者的儿子必须是体力劳动者，织工的儿子必须是织工，缝工的儿子必须是缝工，以此类推。在这两个国家，僧侣阶级地位最高，其次是士兵；而农场主及农业劳动者阶级，都比商人及制造者阶级地位更高。

The government of both countries was particularly attentive to the interest of agriculture. The works constructed by the ancient sovereigns of Egypt, for the proper distribution of the waters of the Nile, were famous in antiquity, and the ruined remains of some of them are still the admiration of travellers. Those of the same kind which were constructed by the ancient sovereigns of Indostan, for the proper distribution of the waters of the Ganges, as well as of many other rivers, though they have been less celebrated, seem to

have been equally great. Both countries, accordingly, though subject occasionally to dearths, have been famous for their great fertility. Though both were extremely populous, yet, in years of moderate plenty, they were both able to export great quantities of grain to their neighbours.

两国的政府都对农业的利益给予特别的关注。古埃及历代法老为使尼罗河水合理分布而兴建的水利工程在古代享有盛名。其中一部分工程的遗迹至今还为游客所赞叹。印度国王为使恒河及其他诸多河流合理灌溉而兴建的同类工程，虽知名度不如前者，但似乎也同样伟大。因此，这两国虽偶尔遭受粮食短缺之苦，但都以土地富饶闻名于世。虽人口均极其稠密，但在普通的丰收年份，都能将大量谷物输往邻国。

The ancient Egyptians had a superstitious aversion to the sea; and as the Gentoo religion does not permit its followers to light a fire, nor consequently to dress any victuals, upon the water, it, in effect, prohibits them from all distant sea voyages. Both the Egyptians and Indians must have depended almost altogether upon the navigation of other nations for the exportation of their surplus produce; and this dependency, as it must have confined the market, so it must have discouraged the increase of this surplus produce. It must have discouraged, too, the increase of the manufactured produce, more than that of the rude produce. Manufactures require a much more extensive market than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rude produce of the land. A single shoemaker will make more than 300 pairs of shoes in the year; and his own family will not, perhaps, wear out six pairs. Unless, therefore, he has the custom of, at least, 50 such families as his own, he cannot dispose of the whole product of his own labour. The most numerous class of artificers will

seldom, in a large country, make more than one in 50, or one in a 100, of the whole number of families contained in it. But in such large countries, as France and Engl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has, by some authors been computed at a half, by others at a third and by no author that I know of, at less than a fifth of the whol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But as the produce of the agriculture of both France and England is,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it, consumed at home, each person employed in it must, according to these computations, require little more than the custom of one, two, or, at most, of four such families as his own, in order to dispose of the whole produce of his own labour. Agriculture, therefore, can support itself under the discouragement of a confined market much better than manufactures. In both ancient Egypt and Indostan, indeed, the confinement of the foreign market was in some measure compensated by the conveniency of many inland navigations, which opened, in the most advantageous manner, the whole extent of the home market to every part of the produce of every different district of those countries. The great extent of Indostan, too, rendered the home market of that country very great, and sufficient to support a great variety of manufactures. But the small extent of ancient Egypt, which was never equal to England, must at all times, have rendered the home market of that country too narrow for supporting any great variety of manufactures. Bengal accordingly, the province of Indostan which commonly exports the greatest quantity of rice, has always been more remarkable for the exportation of a great variety of manufactures, than for that of its grain. Ancient Egypt, on the contrary, though it exported some manufactures, fine linen in particular, as well as some other goods, was always most distinguished for its great exportation of grain. It was long the granary of the Roman empire.

古埃及有厌海的迷信；印度教不许教徒在水面生火，因而也不许教徒在水面烹调任何食物，这实际上等于禁止教徒做任何海上远航。埃及和印度人为输出其剩余生产物，必定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海航业。此种依赖，必然对市场有所限制，所以势必妨碍剩余生产物的增长。而且，制造品增加所受的妨碍，必然大于原生产物增加所受的妨碍。与土地原生产物中最重要的部分相比，制造品需要更为广阔的市场。一名鞋匠一年可制作300多双鞋，而其家属一年可能不会穿坏6双。因此，至少要有50家像他家属那样的顾客，否则，他就无法售出自己全部的劳动产品。在任何一个大国，即使人口最多的一类工匠，在国内居民中所占比例，很少超过2%或1%。但在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大国，农业从业者的人数占全国居民的比例，某些作家计算的结果为1/2，另一些作家计算的结果则为1/3，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结果低于1/5。由于英法两国的农产品大部分在国内消费，那么按照上述计算的结果，每一个受雇务农之人，只需一两家，或者至多4家像他家属那样的顾客来光顾，就可出售掉自己全部的劳动产品。所以，当受制于狭小的市场时，农业比制造业更能自食其力。在古埃及和印度，便利的内河航运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国市场的狭小，且为国内各地各种产品开拓了全国性的市场。此外，印度广袤的国土，使得国内市场广大，足够支撑多种制造业的发展。但古埃及面积狭小，不及英国，故而国内市场总是很狭小，无法支撑多种制造业的发展。因此，作为印度出口大米最多的省份，孟加拉之所以地位显著，更多是因为它出口了各种各样的制造品，而并非因其生产的谷物。与之相反，古埃及虽也出口一些制造品，尤其是亚麻细布及其他一些商品，但向来最以出口大量谷物而闻名。它在很长时期里都是罗马帝国的粮仓。

The sovereigns of China, of ancient Egypt, and of the different kingdoms into which Indostan has, at different times, been divided, have always derived the whole, or by far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ir revenue, from some sort of land tax or land rent. This land tax, or land rent, like the tithe in Europe, consisted in a certain proportion, a fifth, it is said, of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which was

either delivered in kind, or paid in money, according to a certain valuation, and which, therefore, varied from year to year, according to all the variations of the produce. It was natural, therefore, that the sovereigns of those countries should be particularly attentive to the interests of agriculture, upon the prosperity or declension of which immediately depended the yearly increase or diminution of their own revenue.

中国历代皇帝，古埃及历任法老，以及印度不同时代各割据王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收入都来源于某种地税或地租。这种地税或地租与欧洲的什一税一样，由一定比例的（据说是1/5）土地生产物组成，或以实物偿付，或根据估价以货币交付，故而随每年产量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此一来，这些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自然应该对农业的利益尤为关注，因为农业的盛衰直接决定了他们年收入的增减。

The policy of the ancient republics of Greece, and that of Rome, though it honoured agriculture more than manufactures or foreign trade, yet seems rather to have discouraged the latter employments, than to have given any direct or intentional encouragement to the former. In several of the ancient states of Greece, foreign trade was prohibited altogether; and in several others, the employments of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were considered as hurtful to the strength and agility of the human body, as rendering it incapable of those habits which their military and gymnastic exercises endeavoured to form in it, and as thereby disqualifying it, more or less, for undergoing the fatigues and encountering the dangers of war. Such occupations were considered as fit only for slaves, and the free citizens of the states were prohibited from exercising them. Even in those states where no such

prohibition took place, as in Rome and Athens,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were in effect excluded from all the trades which are now commonly exercised by the lower sort of the inhabitants of towns. Such trades were, at Athens and Rome, all occupied by the slaves of the rich, who exercised them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masters, whose wealth, power, and protection, made it almost impossible for a poor freeman to find a market for his work, when it came into competition with that of the slaves of the rich. Slaves, however, are very seldom inventive; and all the most important improvements, either in machinery, or in the arrange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work, which facilitate and abridge labour have been the discoveries of freemen. Should a slave propose any improvement of this kind, his master would be very apt to consider the proposal as the suggestion of laziness, and of a desire to save his own labour at the master's expense. The poor slave, instead of reward would probably meet with much abuse, perhaps with some punishment. In the manufactures carried on by slaves, therefore, more labour must generally have been employed to execute the same quantity of work, than in those carried on by freemen. The work of the former must, upon that account, generally have been dearer than that of the latter. The Hungarian mines, it is remarked by Mr. Montesquieu, though not richer, have always been wrought with less expense, and therefore with more profit, than the Turkish mines in their neighbourhood. The Turkish mines are wrought by slaves; and the arms of those slaves are the only machines which the Turks have ever thought of employing. The Hungarian mines are wrought by freemen, who employ a great deal of machinery, by which they facilitate and abridge their own labour. From the very little that is known about the price of manufactures in the times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it would appear that those of the finer sort were excessively dear. Silk sold for its weight in gold. It was not, indeed, in those times a European manufacture; and as it was all

brought from the East Indies, the distance of the carriage may in some measure account for the greatness of price. The price, however, which a lady, it is said, would sometimes pay for a piece of very fine linen, seems to have been equally extravagant; and as linen was always either an European, or at farthest, an Egyptian manufacture, this high price can be accounted for only by the great expense of the labour which must have been employed about it, and the expense of this labour again could arise from nothing but the awkwardness of the machinery which is made use of. The price of fine woollens, too, though not quite so extravagant, seems, however, to have been much above that of the present times. Some cloths, we are told by Pliny {Plin. 1. ix.c.39.}, dyed in a particular manner, cost a hundred denarii, or £3:6s:8d. the pound weight. Others, dyed in another manner, cost a thousand denarii the pound weight, or £33:6s:8d. The Roman pound, it must be remembered, contained only twelve of our avoirdupois ounces. This high price, indeed, seems to have been principally owing to the dye. But had not the cloths themselves been much dearer than any which are made in the present times, so very expensive a dye would not probably have been bestowed upon them. The disproportion would have been too great between the value of the accessory and that of the principal. The price mentioned by the same author {Plin. 1. viii.c.48.}, of some Triclinaria, a sort of woollen pillows or cushions made use of to lean upon as they reclined upon their couches at table, passes all credibility; some of them being said to have cost more than £30,000, others more than £300,000. This high price, too, is not said to have arisen from the dye. In the dress of the people of fashion of both sexes, 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much less variety, it is observed by Dr. Arbuthnot, in ancient than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very little variety which we find in that of the ancient statues, confirms his observation. He infers from this, that their dress must, upon the whole, have been cheaper than ours; but

the conclusion does not seem to follow. When the expense of fashionable dress is very great, the variety must be very small. But when, by the improvements in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manufacturing art and industry, the expense of any one dress comes to be very moderate, the variety will naturally be very great. The rich, not being able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 by the expense of any one dress, will naturally endeavour to do so by the multitude and variety of their dresses.

古希腊各共和国及古罗马的政策虽对农业的重视多于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但似乎更偏重于抑制后一种职业，而并非直接有意地鼓励前一种职业。在古希腊，有些城邦国家完全禁止对外贸易，有些认为工匠及制造业工人的职业会伤害人的体力和活动灵敏度，使人们无法养成在军事训练和体育训练中所能竭力养成的习惯，故而不能经受战争的疲劳和危险。此类职业被认为只适宜于奴隶，不允许各城邦国家的自由人从事。即使像罗马和雅典那样未设此禁令的城邦国家，大多数人事实上也不允许从事所有如今通常为下层城市居民所从事的职业。在雅典和罗马，从事这一类职业的全是富人的奴隶。奴隶们为其主人的利益而从事这些职业，而他们的主人既有财富和权力，又得到庇护。因此，在与富人的奴隶的产品竞争时，贫穷的自由人几乎无法为自己的产品寻得市场。然而，奴隶很少具有创造力，一切改良机器、改进工作安排与分工，从而便于且节省劳动的重要发现，都是自由人的功劳。倘若有奴隶提出这一类的改良建议，主人往往认为这是懒惰的表现，是奴隶想牺牲主人的利益来为自己节省劳动。可怜的奴隶也许要因此遭受诸多责骂，甚至受惩罚，而不是得到报酬。因此，为完成同样数量的产品，奴隶经营的制造业通常比自由人经营的制造业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因此，前者的产品通常比后者的产品更加昂贵。孟德斯鸠曾言，匈牙利的矿山虽不比邻近的土耳其矿山更为富饶，但总能以更小的费用开采，故而能获取更多的利润。土耳其的矿山由奴隶开采，奴隶的双臂是土耳其人所想到使用的唯一器械。匈牙利的矿山由自由人开采，自由人使用许多便于劳动且节省劳动的机械。从我

们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制造品价格的有限知识中可知，制作精良的产品似乎异常昂贵。丝以金的重量进行交换。丝在当时并非欧洲的制造品，全是从东印度运来，长途运输，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高昂的价格。然而，据说当时的贵妇有时会以同样过高的价格购买亚麻细布，而亚麻布大都在欧洲生产，最远也不过埃及。如此高价，只能归因于投入其中的高额劳动费用，而高昂的劳动费又只能由所用机械太过粗笨造成。此外，精制呢绒虽不至于如此昂贵，但似乎比如今贵得多。普利尼告诉我们（见普利尼，第一册，第9篇，第39章），按某种特定方式染的布料，每磅价值100迪纳里，即3镑6先令8便士，而按另一种方式染的布料，每磅价值1000迪纳里，即33镑6先令8便士。必须记住的是，罗马磅仅含今日常衡量12盎司。此般高价固然似乎主要归因于染料，但若布料本身价格不比现在所生产的高得多，那么大概也不会使用如此昂贵的染料，附属物价值与主要物价值之间也会非常不成比例。普利尼提到（见普利尼，第一册，第8篇，第48章），一种放在桌前躺椅上作倚靠之用的呢绒枕垫，其价格令人难以置信：有些据说值3万镑以上，另一些值30万镑以上。并且，据说这一高价也并非由染料造成。阿巴思诺特博士评论道，古代时髦男女的服装种类似乎比现代的少很多。我们在古代雕像身上只能发现极少式样的服装，由此便可证实他的说法。他由此推论，古代的服装在总体上必定比今日低廉，但这一结论似乎并不准确。若时装花费巨大，其款式必定很少。但若制造技艺及制造业的生产力改良，使任何服装的花费都变得合理，服装种类自然会多起来。富人在不能以一件服装的花费来凸显自己时，自然会竭力以服装数量之多和种类之繁来引人注目。

The greatest and most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commerce of every nation,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is that which is carried on betwee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own and those of the country.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own draw from the country the rude produce, which constitutes both the materials of their work and the fund of their subsistence; and they pay for this rude produce, by

sending back to the country a certain portion of it manufactured and prepared for immediate use. The trade which is carried on between these two different sets of people, consists ultimately in a certain quantity of rude produce exchanged for a certain quantity of manufactured produce. The dearer the latter, therefore, the cheaper the former; and whatever tends in any country to raise the price of manufactured produce, tends to lower that of the rude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thereby to discourage agriculture. The smaller the quantity of manufactured produce, which in any given quantity of rude produce,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which the price of any given quantity of rude produce, is capable of purchasing, the smaller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at given quantity of rude produce; the smaller the encouragement which either the landlord has to increase its quantity by improving, or the farmer by cultivating the land. Whatever, besides, tends to diminish in any country the number of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tends to diminish the home market,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markets, for the rude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thereby still further to discourage agriculture.

前文已说明过，城乡居民之间的贸易是任何一国贸易最大且最重要的部分。城市居民从农村获得原生产物，作为其工作材料及生活资料基金，而把一部分可即时使用的制成品送还农村，以此支付所获得的原生产物。城乡居民之间的贸易，最终是由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与一定数量的制造品相交换组成的。后者越昂贵，前者越低廉；在任何国家，凡能提高制造品价格的，往往也会减低土地原生产物的价格，从而损害农业。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或其价格所能购买的制造品量越小，该数量原生产物的交换价值便越小，地主或农场主就越没有动力通过改良土地或耕作土地来增加原生产量。此外，在任何国家，凡能减少工匠及制造业工人数量的，往往也会缩小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是原生产物最重要的市场，故其缩减又会进一步损害农业。

Those systems, therefore, which preferring agriculture to all other employm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it, impose restraints upon manufactures and foreign trade, act contrary to the very end which they propose, and indirectly discourage that very species of industry which they mean to promote. They are so far, perhaps, more inconsistent than even the mercantile system. That system, by encouraging manufactures and foreign trade more than agriculture, turns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capital of the society, from supporting a more advantageous, to support a less advantageous species of industry. But still it really, and in the end, encourages that species of industry which it means to promote. Those agricultural systems, on the contrary, really, and in the end, discourage their own favourite species of industry.

因此，重视农业超过其他一切职业，为促进农业发展而对制造业及对外贸易加以限制的那些学说，其作用恰好与其想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并且间接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学也许比重商主义更自相矛盾。重商主义鼓励制造业及对外贸易而轻视农业，虽因此使一部分社会资本从更有利的产业转向利益较少的产业，但它实际上最终还是鼓励了它所要促进的产业。而重农主义学说却恰恰相反，事实上最终妨害了这一学说所拥护的产业。

It is thus that every system which endeavours, either, by extraordinary encouragements to draw towards a particular species of industry a greater share of the capital of the society than what would naturally go to it, or, by extraordinary restraints, to force from a particular species of industry some share of the capital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employed in it, is, in reality, subversive of the great purpose which it means to promote. It retards, instead

of accelerating the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towards real wealth and greatness; and diminishes, instead of increasing, the real 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its land and labour.

正因如此，任何一种学说，倘若试图通过特别鼓励，把超过正常份额的社会资本投入到某个特定的产业，或试图通过特别限制，强行抽掉一部分原本要投在特定产业上的资本，这种学说实际上与它所支持的宏大目标背道而驰。它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与富强；且只能使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减少，不能使其增加。

All systems, either of preference or of restraint, therefore, being thus completely taken away, the obvious and simpl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 establishes itself of its own accord. Every man, as long as he does not violate the laws of justice, is left perfectly free to pursue his own interest his own way, and to bring both his industry and capital into competition with those of any other man, or order of men. The sovereign is completely discharged from a duty, in the attempting to perform which he must always be exposed to innumerable delusions, and for the proper performance of which, no human wisdom or knowledge could ever be sufficient; the duty of superintending the industry of private people, and of directing it towards the employments most suitable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 the sovereign has only three duties to attend to; three duties of great importance, indeed, but plain and intelligible to common understandings: first, the duty of protecting the society from violence and invasion of other independent societies; secondly, the duty of protecting, as far as possible, every member of the society from the injustice or oppression of every other member of it, or the duty of establishing an exact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thirdly,

the duty of erecting and maintaining certain public works, and certain public institutions, which it can never be for the interest of any individual, or small number of individuals to erect and maintain; because the profit could never repay the expense to any individual, or small number of individuals, though it may frequently do much more than repay it to a great society.

因此，倘若彻底移除一切主张优惠或限制的制度，一个简单明了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自行建立起来。每一个人，只要不违反正义之法，都应该给予其绝对的自由，让他以自己的方法来追求自身利益，以其劳动和资本来与其他人或其他阶级之人相竞争。君主们就被完全免除了监督和指导私人劳动，使之用于最符合社会利益的职业的义务。君主们在履行这种义务时必常常陷于各种幻象之中，要处理得当，并非人的智慧或知识所能办到。自然自由制度认为，君主只有三个应尽义务，虽极其重要，但对一般人来说清晰易懂。第一，保护社会安全，使之免于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入侵。第二，尽可能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的欺辱或压迫，即建立公正严明的司法机构。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工程及公共机构，且绝不以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为目的，因为此类工程和机关若由个人或少数人负责，其利润甚至无法补偿所消耗的费用，但若由整个社会经营，往往能补偿社会所耗而有余。

The proper performance of those several duties of the sovereign necessarily supposes a certain expense; and this expense again necessarily requires a certain revenue to support it. In the following book, therefore, I shall endeavour to explain, first, what are the necessary expenses of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and which of those expenses ought to be defrayed by the general contribu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which of them, by that of some particular part only, or of some particular members of the society: secondly,

what are the different methods in which the whole society may be made to contribute towards defraying the expenses incumbent on the whole society; and what are the principal advantages and inconveniences of each of those methods: and thirdly, what are the reasons and causes which have induced almost all modern governments to mortgage some part of this revenue, or to contract debts; and what have been the effects of those debts upon the real wealth,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society. The following book, therefore, will naturally be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君主要适当履行这些义务，必须有一定的费用，而这费用又需要一定的收入作为支撑。因此，在下一篇中，我会努力说明以下几点：第一，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有哪些，其中哪些费用应由全社会的一般税款来支付，哪些应由部分社会税款或特定社会成员的税款来支付。第二，通过哪些方法使全社会为其应支付的费用交税，而这些方法各自的主要利弊是什么。第三，促使现代各国政府几乎都抵押一部分此类收入或举债的原因何在，这些债务对作为社会真实财富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又有何影响。因此，下一篇自然分为三个章节。

Appendix to Book IV

附录

The two following accounts are subjoined, in order to illustrate and confirm what is said in the fifth chapter of the fourth book, concerning the Tonnage Bounty to the White-herring Fishery. The reader, I believe, may depend upon the accuracy of both accounts.

为说明并证实第四篇第五章中关于白鲱鱼渔业奖金的描述，下文附有两份表格。其准确性较高，或许可供读者参考。

An account of Busses fitted out in Scotland for Eleven Years, with the Number of Empty Barrels carried out, and the Number of Barrels of Herrings caught; also the Bounty at a Medium on each Barrel of Seasteeks, and on each Barrel when fully packed.						
Years	Number of Busses	Empty Barrels carried out	Barrels of Herrings caught	Bounty paid on the Busses		
				£	s.	d.
1771	29	5,948	2,832	2,085	0	0
1772	168	41,316	22,237	11,055	7	6
1773	190	42,333	42,055	12,510	8	6
1774	248	59,303	56,365	16,952	2	6
1775	275	69,144	52,879	19,315	15	0
1776	294	76,329	51,863	21,290	7	6
1777	240	62,679	43,313	17,592	2	6
1778	220	56,390	40,958	16,316	2	6
1779	206	55,194	29,367	15,287	0	0
1780	181	48,315	19,885	13,445	12	6
1781	135	33,992	16,593	9,613	12	6
Total	2,186	550,943	378,347	155,463	11	0
Seasteeks			378,347			
Bounty at a medium for each barrel of seasteeks				£0	8	2 1/4
But a barrel of seasteeks being only reckoned two-thirds of a barrel fully packed, one-third is deducted, which brings the bounty to				£0	12	3 3/4
1/3 deducted			126,115 2/3			
Barrels fully packed			252,231 1/3			
And if the herrings are exported, there is, besides, a premium of				0	2	8
So that the bounty paid by Government in money for each barrel is				£0	14	11 3/4
But if to this the duty of the salt usually taken credit for as expended in curing each barrel, which at a medium is of foreign, one bushel and one-fourth of a bushel, at 10s. a bushel, be added, viz.				0	12	6
The bounty on each barrel would amount to				£1	7	5 3/4

第一份表格中记载了苏格兰连续 11 年间装备的大渔船数量，运出的空桶数，以及捕获的白鲱鱼桶数；此外还有每桶海条和每满桶平均获得的奖励金。						
年份	大渔船数量	运出的空桶数量	捕获的白鲱鱼桶数	大渔船获得的奖励金		
				镑	先令	便士
1771	29	5,948	2,832	2,085	0	0
1772	168	41,316	22,237	11,055	7	6
1773	190	42,333	42,055	12,510	8	6
1774	248	59,303	56,365	16,952	2	6
1775	275	69,144	52,879	19,315	15	0
1776	294	76,329	51,863	21,290	7	6
1777	240	62,679	43,313	17,592	2	6
1778	220	56,390	40,958	16,316	2	6
1779	206	55,194	29,367	15,287	0	0
1780	181	48,315	19,885	13,445	12	6
1781	135	33,992	16,593	9,613	12	6
总额	2,186	550,943	378,347	155,463	11	0
海条			378,347			
每桶海条平均奖励金				镑 0	8	2 1/4
但每桶海条只按满桶量的 2/3 来计算，减去 1/3，奖励金为				镑 0	12	3 3/4
减去 1/3			126,115 2/3			
满桶			252,231 1/3			
如果鲱鱼被出口，则可获得额外的奖金				0	2	8
因此政府为每桶支付的货币奖励金为				镑 0	14	11 3/4
但如果在上述金额的基础上，加上腌制每桶海条所收的盐税（平均每桶需 1 又 1/4 蒲式耳外国盐，每蒲式耳盐 10 先令），也就是				0	12	6
每桶所获奖励金总计为				镑 1	7	5 3/4

An account of Busses fitted out in Scotland for Eleven Years, with the Number of Empty Barrels carried out, and the Number of Barrels of Herrings caught; also the Bounty at a Medium on each Barrel of Seasteeks, and on each Barrel when fully packed.						
Years	Number of Busses	Empty Barrels carried out	Barrels of Herrings caught	Bounty paid on the Busses		
				£	s.	d.
If the herrings are cured with British salt, it will stand thus, viz. Bounty as before				£0	14	11 3/4
But if to this bounty the duty on two bushels of Scots salt at 1s. 6d. per bushel, supposed to be the quantity at a medium used in curing each barrel is added, to wit				0	3	0
The bounty on each barrel will amount to				£0	17	11 3/4
And, When buss herrings are entered for home consumption in Scotland, and pay the shilling a barrel of duty, the bounty stands thus, to wit as before				£0	12	3 3/4
From which the 1s. a barrel is to be deducted				0	1	0
				0	11	3 3/4
But to that there is to be added again the duty of the foreign salt used in curing a barrel of herrings, viz.				0	12	6
So that the premium allowed for each barrel of herring entered for home consumption is				£1	3	9 3/4
If the herrings are cured with British salt, it will stand as follows, viz. Bounty on each barrel brought in by the busses as above				£0	12	3 3/4
From which deduct the 1s. a barrel paid at the time they are entered for home consumption				0	1	0
				£0	11	3 3/4
But if to the bounty the duty on two bushels of Scots salt at 1s. 6d. per bushel, supposed to be the quantity at a medium used in curing each barrel, is added, to wit				0	3	0
The premium for each barrel entered for home consumption will be				£0	14	3 3/4

第一份表格中记载了苏格兰连续 11 年间装备的大渔船数量，运出的空桶数，以及捕获的白鲱鱼桶数；此外还有每桶海条和每满桶平均获得的奖励金。						
年份	大渔船数量	运出的空桶数量	捕获的白鲱鱼桶数	大渔船获得的奖励金		
				镑	先令	便士
如果腌制鲱鱼所用盐产自英国，每桶所获奖励金则与最初相同				镑 0	14	11 3/4
但如果在此奖励金基础上，加上腌制每桶海条所收的盐税（平均每桶需 2 蒲式耳苏格兰盐，每蒲式耳盐 1 先令 6 便士），也就是				0	3	0
每桶所获奖励金总计为				镑 0	17	11 3/4
并且，当大渔船捕获的白鲱鱼被运回苏格兰用于国内消费，且支付每桶 1 先令的关税时，奖励金则与最初相同，即为				镑 0	12	3 3/4
从中需扣除每桶 1 先令				0	1	0
				0	11	3 3/4
但以上金额再加上腌制每桶鲱鱼的外国盐税，即为				0	12	6
于是每桶用于国内消费的鲱鱼可获得的额外奖励金为				镑 1	3	9 3/4
如果使用英国盐腌制鲱鱼，则该金额按以下情况保持不变。 由大渔船输入的海条每桶所获奖励金如上				镑 0	12	3 3/4
在此金额中扣除运回国内市场时支付的每桶 1 先令关税				0	1	0
				镑 0	11	3 3/4
但如果在此金额上，加上腌制每桶海条所收的盐税（平均每桶需 2 蒲式耳苏格兰盐，每蒲式耳盐 1 先令 6 便士），也就是				0	3	0
每桶运入国内市场的海条所获额外奖金即为				镑 0	14	3 3/4

Though the loss of duties upon herrings exported cannot, perhaps, properly be considered as bounty, that upon herrings entered for home consumption certainly may.

出口鲱鱼时将免除的关税称作奖励金或许不甚妥当，但当它运回国内市场时免除的关税是可以如此称呼的。

An Account of the Quantity of Foreign Salt imported in Scotland, and of Scots Salt delivered Duty free from the Works there for the Fishery, from the 5th of April 1771 to the 5th of April 1782, with a Medium of both for one Year.		
Period	Foreign Salt Imported Bushels	Scots Salt delivered from the Works Bushels
From the 5th of April 1771 to the 5th of April 1782	936,974	168,226
Medium for one Year	85,179 5/11	15,293 3/11

第二份表格记载了 1771 年 4 月 5 日至 1782 年 4 月 5 日期间，苏格兰进口的外国盐量，苏格兰的盐厂为渔业所生产的无税苏格兰盐量，以及以上两者每年的平均数。		
时期	进口的外国盐量	制盐厂生产的苏格兰盐量
	蒲式耳	蒲式耳
自1771年4月5日至1782年4月5曰	936, 974	168, 226
每年平均量	85, 159 5/11	15, 293 3/11

It is to be observed, that the bushel of foreign salt weighs 84lbs., that of British weighs 56lbs. only.

应当注意的是，外国盐每蒲式耳重84磅，英国盐每蒲式耳仅重56磅。

Book V Of the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Chapter I. Of the Expenses of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第一章、论君主或国家的费用

Part I. Of the Expense of Defence

第一节、论国防费用

The first duty of the sovereign, that of protecting the society from the violence and invasion of other independent societies, can be performed only by means of a military force. But the expense both of preparing this military force in time of peace, and of employing it in time of war, is very different in the different states of society,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improvement.

保护社会安全，使之免于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入侵，是君主的首要义务。履行这一义务，唯有借助军事力量。但在不同的社会状态，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平时期筹备兵力以及战时使用兵力的费用，都会大不相同。

Among nations of hunters, the lowest and rudest state of society, such as we find it among the native tribes of North America, every man is a warrior, as well as a hunter. When he goes to war, either to defend his society, or to revenge the injuries which have been done to it by other societies, he maintains himself by his

own labour, in the same manner as when he lives at home. His society (for in this state of things there is properly neither sovereign nor commonwealth) is at no sort of expense, either to prepare him for the field, or to maintain him while he is in it.

在社会处于最原始初级阶段的狩猎民族，比如北美土著部落，每个人不仅是狩猎者，还是战士。当他奔赴战场，为保护社会或为社会复仇而战时，他还要像在家时一样，用自己的劳动维持生存。由于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君主或国家，所以无论是他的战前准备，抑或是他作战期间的生活费用，都无需社会来承担。

Among nations of shepherds, a more advanced state of society, such as we find it among the Tartars and Arabs, every man is, in the same manner, a warrior. Such nations have commonly no fixed habitation, but live either in tents, or in a sort of covered waggons, which are easily transported from place to place. The whole tribe, or nation, changes its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easons of the year, as well as according to other accidents. When its herds and flocks have consumed the forage of one part of the country, it removes to another, and from that to a third. In the dry season, it comes down to the banks of the rivers; in the wet season, it retires to the upper country. When such a nation goes to war, the warriors will not trust their herds and flocks to the feeble defence of their old men, their women and children; and their old men, their women and children, will not be left behind without defence, and without subsistence. The whole nation, besides, being accustomed to a wandering life, even in time of peace, easily takes the field in time of war. Whether it marches as an army, or moves about as a company of herdsmen, the way of life is nearly the same, though the object proposed by it be very different. They all go to war

together, therefore, and everyone does as well as he can. Among the Tartars, even the women have been frequently known to engage in battle. If they conquer, whatever belongs to the hostile tribe is the recompense of the victory; but if they are vanquished, all is lost; and not only their herds and flocks, but their women and children become the booty of the conqueror. Even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who survive the action are obliged to submit to him for the sake of immediate subsistence. The rest are commonly dissipated and dispersed in the desert.

在社会更加进步的游牧民族，如鞑靼人和阿拉伯人，情况同样如此，每个人都是战士。这类民族通常居无定所，生活在帐篷中，或在一种易于移动的有篷马车中。在不同的季节，或者有其他偶发事故发生时，整个部落或民族的境况也会变化。当牧群消耗掉一个地方的牧草时，他们便迁往另一个地方，又继而迁至第三个地方。旱季时他们迁往河岸，雨季时又返回高地。当这样的民族开战时，战士们不会让自卫能力较弱的老幼妇孺看管牧群，也不会抛下他们，不予保护和供养。此外，即使在和平时期，整个民族也习惯漂泊的生活，所以在战争期间，上阵杀敌起来也十分容易。无论是作为进军的军队，还是作为游牧的牧民，虽然目的大不相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却几乎不变。战争时，他们全员出动，故而每个人都尽其所能。我们时常听闻，在鞑靼民族，即使妇女也要参战。如果获胜，敌方部落所拥有的一切都将成为他们的战利品；但一旦战败，他们会失去一切，不仅仅是牲畜，甚至妇女和儿童，也会成为对方的战利品。即使是战争幸存者，大部分也不得不为眼前的生存而服从于征服者。其余人等，则通常被驱逐流散至沙漠。

The ordinary life, the ordinary exercises of a Tartar or Arab, prepares him sufficiently for war. Running, wrestling, cudgel-playing, throwing the javelin, drawing the bow, etc. are the

common pastimes of those who live in the open air, and are all of them the images of war. When a Tartar or Arab actually goes to war, he is maintained by his own herds and flocks, which he carries with him,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peace. His chief or sovereign (for those nations have all chiefs or sovereigns) is at no sort of expense in preparing him for the field; and when he is in it, the chance of plunder is the only pay which he either expects or requires.

鞑靼人和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锻炼，使其对战争做好全力准备。赛跑、摔跤、舞棍、掷标枪、射箭等等，是那些露天而居者的日常消遣，其动作却类似于战斗。作战时，鞑靼人和阿拉伯人与平时一样，将牲畜带在身边，靠它们维持生活。这些民族皆有其首领或君主，但战士的战前准备不由首领或君主负担。作战时，他们唯一期待或要求的报酬就是能劫掠一番。

An army of hunters can seldom exceed two or three hundred men. The precarious subsistence which the chase affords, could seldom allow a greater number to keep together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An army of shepherds, on the contrary, may sometimes amount to two or three hundred thousand. As long as nothing stops their progress, as long as they can go on from one district, of which they have consumed the forage, to another, which is yet entire, there seems to be scarce any limit to the number who can march on together. A nation of hunters can never be formidable to the civilised nations in their neighbourhood; a nation of shepherds may. Nothing can be more contemptible than an Indian war in North America; nothing, on the contrary, can be more dreadful than a Tartar invasion has frequently been in Asia. The judgment of Thucydides, that both Europe and Asia could not resist

the Scythians united, has been verified by the experience of all age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extensive, but defenceless plains of Scythia or Tartary, have been frequently united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chief of some conquering horde or clan; and the havoc and devastation of Asia have always signalized their unio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inhospitable deserts of Arabia, the other great nation of shepherds, have never been united but once, under Mahomet and his immediate successors. Their union, which was more the effect of religious enthusiasm than of conquest, was signalized in the same manner. If the hunting nations of America should ever become shepherds, their neighbourhood would be much more dangerous to the European colonies than it is at present.

一支狩猎民族的作战队伍，通常不超过二三百人。狩猎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并不稳定，通常无法供很多人长时间同行。相反，一支游牧民族的作战队伍有时可达二三十万人。只要队伍的行进不受阻挠，只要他们在耗尽一个地区的牧草后，又能迁至另一个牧草完好的地区，那么一起行军的人数就似乎很少受到限制。文明国家从来不会惧怕邻近的狩猎民族，却可能对邻近的游牧民族闻之丧胆。没有什么比北美印第安人进行的战争更值得轻视，相反，没有什么比鞑靼人在亚洲的屡次侵略更为可怕。修昔底德认为，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都无力抵抗团结起来的塞西亚人。这一论断已被各个时代的经验所证实。塞西亚或鞑靼平原广袤无垠，无天然屏障。那里的居民往往由某个征服者部落或部族的首领统治，从而联合在一起。亚洲屡遭破坏和蹂躏，通常都是这类联合的结果。另一大游牧民族居住在荒凉的阿拉伯沙漠，只在穆罕默德及其第一位继任者的统治下联合过一次。那次联合的原因，与其说是战争征服，不如说是宗教狂热，其结果亦如上文所述。倘若美洲的狩猎民族都变成游牧民族，他们居住的地区对欧洲殖民者来说会比现在危险很多。

In a yet more advanced state of society, among those nations of husbandmen who have little foreign commerce, and no other manufactures but those coarse and household ones, which almost every private family prepares for its own use, every man, in the same manner, either is a warrior, or easily becomes such. Those who live by agriculture generally pass the whole day in the open air, exposed to all the inclemencies of the seasons. The hardiness of their ordinary life prepares them for the fatigues of war, to some of which their necessary occupations bear a great analogy. The necessary occupation of a ditcher prepares him to work in the trenches, and to fortify a camp, as well as to inclose a field. The ordinary pastimes of such husbandmen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shepherds, and are in the same manner the images of war. But as husbandmen have less leisure than shepherds, they are not so frequently employed in those pastimes. They are soldiers but soldiers not quite so much masters of their exercise. Such as they are, however, it seldom costs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any expense to prepare them for the field.

在社会更加进步的农耕民族，对外贸易尚未存在，制造品只是一些粗劣的家庭用品，几乎都是各个家庭供自己使用而准备的。在这样的社会，每个人也都是战士，或者很容易成为战士。以农业为生的人通常整天在户外劳作，受尽各个季节的风吹雨打。日常生活之艰辛使他们能承受战争之疲劳辛苦。农业中必要的劳作，与战争中一部分辛苦的工作十分类似。例如，修沟渠者的必要劳作，使他不仅能在农场上挖沟圈地，还能在战场上挖建战壕，构筑营地。与游牧民族的日常休闲一样，农民的日常消遣也类似于战斗。但由于农民不像游牧者那般闲暇，故不能耗费太多时间消遣娱乐。他们虽为兵，却并不善于战斗。尽管如此，他们的战前准备也很少需要君主或国家破费。

Agriculture, even in its rudest and lowest state, supposes a settlement, some sort of fixed habitation, which cannot be abandoned without great loss. When a nation of mere husbandmen, therefore, goes to war, the whole people cannot take the field together. The old men, the women and children, at least, must remain at home, to take care of the habitation. All the men of the military age, however, may take the field, and in small nations of this kind, have frequently done so. In every nation, the men of the military age are supposed to amount to about a fourth or a fifth part of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If the campaign, too, should begin after seedtime, and end before harvest, both the husbandman and his principal labourers can be spared from the farm without much loss. He trusts that the work which must be done in the mean time, can be well enough executed by the old men, the women, and the children. He is not unwilling, therefore, to serve without pay during a short campaign; and it frequently costs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as little to maintain him in the field as to prepare him for it. The citizens of all the different states of ancient Greece seem to have served in this manner till after the second Persian war; and the people of Peloponnesus till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e Peloponnesians, Thucydides observes, generally left the field in the summer, and returned home to reap the harvest. The Roman people, under their kings, and during the first ages of the republic, served in the same manner. It was not till the siege of Veii, that they who stayed at home began to contribute something towards maintaining those who went to war. In the European monarchies, which were founded upon the ruins of the Roman empire, both before, and for some tim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what is properly called the feudal law, the great lords, with all their immediate dependents, used to serve the crown at their own expense. In the field, in the same manner as at home, they maintained themselves by their own revenue, and not by any

stipend or pay which they received from the king upon that particular occasion.

农业，即使在其最原始粗野的状态，都是以安顿为前提，必须有一个固定住所。若舍弃这固定住所，必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当农耕民族作战时，就不能全体出战。至少老人、妇女和儿童必须留下，照看家园。不过，所有符合参军年龄的男子必须参战，在一些小的民族，亦常常如此。在任何一个国家，符合参战年龄的男子一般约占总人口的1/4或1/5。如果战争发生在播种期后，结束于收获期前，农民及主要农业劳动者即使离开农场，也不会蒙受太大损失。他们相信，老人、妇女和小孩就足以完成在这期间必须进行的劳作。因此，他们愿意无偿参加短期战役；如同他们在田地劳作，用以备战时一样，实际作战时，他们也不需要君主或国家破费太多。在第二次波斯战争爆发以前，古希腊各个城邦的市民，似乎就是以这种方式服兵役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前，伯罗奔尼撒人也是如此。修昔底德说，伯罗奔尼撒人一般在夏季离开战场，回家收割庄稼。历代国王统治下以及共和国初期的罗马人，也是以此种方式服兵役的。直到维伊之围以后，才开始由留守家乡的人承担部分维持前方作战所需费用。罗马帝国灭亡后，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欧洲各君主国。在这些国家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封建法律以前，甚至制定后的一定时期内，很多大领主及其扈从都曾自费为国王供职。他们在战场上与在家时一样，也是以自己的收入供己所需，而不是从国王那里领到特殊的俸禄或报酬。

In a more advanced state of society, two different causes contribute to render it altogether impossible that they who take the field should maintain themselves at their own expense. Those two causes are, the progress of manufactures, and the improvement in the art of war.

在更为进步的社会，有两种原因导致上阵杀敌的战士不再需要自费来供己所需。它们分别是：制造业的进步，以及战争技术的改良。

Though a husbandman should be employed in an expedition, provided it begins after seedtime, and ends before harvest, the interruption of his business will not always occasion any considerable diminution of his revenue.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his labour, nature does hersel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work which remains to be done. But the moment that an artificer, a smith, a carpenter, or a weaver, for example, quits his workhouse, the sole source of his revenue is completely dried up. Nature does nothing for him; he does all for himself. When he takes the field, therefore, in defence of the public, as he has no revenue to maintain himself, he must necessarily be maintained by the public. But in a country, of which a great part of the inhabitants are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a great part of the people who go to war must be drawn from those classes, and must, therefore, be maintained by the public as long as they are employed in its service.

就农民来说，如果远征出战是在播种后开始，收割季前结束，即使农事受到中断，他的收入也不一定会遭到巨大减损。因为，当他无法在田地劳作时，大自然可替他完成大部分剩下的工作。然而，对于一般的技工而言，如铁匠、木匠、织工等，一旦离开作坊，他们便完全失去了收入来源。大自然给不了任何帮助，他们的工作只能靠自己。因此，当他们为保卫国家奔赴战场时，就没有收入来供己所需，故而不得不由国家供养。如果一国的居民大部分是技工和制造业工人，则大部分作战的战士也必须从这些阶级而来，故而在战士服兵役期间，就必须由国家出资来维持其生活。

When the art of war, too, has gradually grown up to be a very intricate and complicated science; when the event of war ceases to be determined, as in the first ages of society, by a single irregular skirmish or battle; but when the contest is generally spun out through several different campaigns, each of which lasts dur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 it becomes universally necessary that the public should maintain those who serve the public in war, at least while they are employed in that service. Whatever, in time of peace, might be the ordinary occupation of those who go to war, so very tedious and expensive a service would otherwise be far too heavy a burden upon them. After the second Persian war, accordingly, the armies of Athens seem to have been generally composed of mercenary troops, consisting, indeed, partly of citizens, but partly, too, of foreigners; and all of them equally hired and paid at the expense of the state. From the time of the siege of Veii, the armies of Rome received pay for their service during the time which they remained in the field. Under the feudal governments, the military service, both of the great lords, and of their immediate dependants, was, after a certain period, universally exchanged for a payment in money, which was employed to maintain those who served in their stead.

此外，战争技术已日渐发展成一种错综复杂的科学。与社会发展初期不同，战争不再由某个随意的小冲突、小争斗就能决定其结果；往往一次战争需要持续几次战役之久，每场战役耗时大半年。因此，至少在战争期间，任何国家都有必要负担服兵役之人的生活费用。如若不然，无论参战之人平时从事何种职业，长时间昂贵的兵役支出，显然会给他带来过重的负担。因此，第二次波斯战争后，雅典的军队似乎大体上由雇佣兵组成，虽一部分是市民，但也包括一部分外国人，且都由国家财政发放薪饷。自维伊之围以来，留在战场的罗马军队也会得到一定报酬。在各封建政府统治一定时期后，大领主及其扈

从服兵役的义务，通常可用支付一笔钱款的方式作抵，这笔钱款就是用来支付替代他们服兵役的人。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can go to war, in proportion to the whole number of the people, is necessarily much smaller in a civilised than in a rude state of society. In a civilised society, as the soldiers are maintained altogether by the labour of those who are not soldiers, the number of the former can never exceed what the latter can maintain, over and above maintaining, in a manner suitable to their respective stations, both themselves and the other officers of government and law, whom they are obliged to maintain. In the little agrarian states of ancient Greece, a fourth or a fifth part of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soldiers, and would sometimes, it is said, take the field. Among the civilised nations of modern Europe, it is commonly computed, that not more than one-hundredth part of the inhabitants in any country can be employed as soldiers, without ruin to the country which pays the expense of their service.

与未开化的社会相比，文明社会里服兵役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必然要小得多。在文明社会，士兵全由那些没有参军的劳动者供养。除此之外，这些劳动者还不得不按照各自的身份，负担他们自身以及其他行政司法官员的开支。因此，士兵的人数，不能超过劳动者在维持自身及国家官吏之后所能维持的限度。在古希腊的小农业国家，全体人口中有1/4或1/5的人自认为是士兵，时时奔赴战场。据一般推算，在近代欧洲各文明国家，任何国家所雇士兵的人数都不能超过该国全体居民的1%，否则军事费用过大，必于国家有损。

The expense of preparing the army for the field seems not to

have become considerable in any nation, till long after that of maintaining it in the field had devolved entirely upon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In all the different republics of ancient Greece, to learn his military exercises, was a necessary part of education imposed by the state upon every free citizen. In every city 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a public field, in which,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magistrate, the young people were taught their different exercises by different masters. In this very simple institution consisted the whole expense which any Grecian state seems ever to have been at, in preparing its citizens for war. In ancient Rome, the exercises of the Campus Martius answered the same purpose with those of the Gymnasium in ancient Greece. Under the feudal governments, the many public ordinances, that the citizens of every district should practise archery, as well as several other military exercises, were intended for promoting the same purpose, but do not seem to have promoted it so well. Either from want of interest in the officers entrusted with the execution of those ordinances, or from some other cause, they appear to have been universally neglected; and in the progress of all those governments, military exercises seem to have gone gradually into disuse among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在各个国家，练兵备战的费用似乎向来并不庞大，直到战场上的士兵全部由君主或国家供养后，它才成为一笔大的支出。在古希腊各共和国，军事训练是国家强制每个自由公民必须参与的义务教育。每个城市几乎都设有一处公共场地，在政府官员的保护下，教师们对青年进行各种军事训练。这种简单的设施，似乎就是希腊各共和国为训练市民作战所担负的全部费用。古罗马战神广场的军事训练，与古希腊运动场的训练，持有相同的目的。后来封建各政府颁发了诸多国家法令，规定各区市民必须练习箭术，并接受其他多项军事训练，其目的亦是如此，但似乎并不奏效。也许是由于委任执行这些法令的官吏

并不重视，又或者是其他原因，此类法令似乎往往被忽视。随着这些政府的更迭发展，军事训练逐渐被人民大众废弃不用。

In the republics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of their existence, and under the feudal governments, for a considerable time after their first establishment, the trade of a soldier was not a separate, distinct trade, which constituted the sole or principal occupation of a particular class of citizens. Every subject of the state, whatever might be the ordinary trade or occupation by which he gained his livelihood, considered himself, upon all ordinary occasions, as fit likewise to exercise the trade of a soldier, and, upon many extraordinary occasions, as bound to exercise it.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和国时期，以及在封建政府成立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士兵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有区别性的职业，不属于某个市民阶级所唯一从事或主要从事的工作。一切人民，不论他平日里以何种职业谋生，都会在平时认为自己适于做军人，且在战争时期认为自己有义务参军。

The art of war, however, as it is certainly the noblest of all arts, so,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it necessarily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complicated among them. The state of the mechanical, as well as of some other arts, with which it is necessarily connected, determines the degree of perfection to which it is capable of being carried at any particular time. But in order to carry it to this degree of perfection, it is necessary that it should become the sole or principal occupation of a particular class of citizen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as necessar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is, as of

every other art. Into other arts,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naturally introduced by the prudence of individuals, who find that they promote their private interest better by confining themselves to a particular trade, than by exercising a great number. But it is the wisdom of the state only, which can render the trade of a soldier a particular trade, separate and distinct from all others. A private citizen, who, in time of profound peace, and without any particular encouragement from the public, should spend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time in military exercises, might, no doubt, both improve himself very much in them, and amuse himself very well; but he certainly would not promote his own interest. It is the wisdom of the state only, which can render it for his interest to give up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time to this peculiar occupation; and states have not always had this wisdom, even when their circumstances had become such, that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existence required that they should have it.

然而，战争技术毫无疑问是所有技术中最为重要的，因此在不断改良中，必会成为其中最为复杂深奥的。机械的发展状态，以及其他必然与战争技术相关联的技术，决定了战争技术在特定时期所能完善的程度。但是，为使战争技术至臻完善，必须让它成为某个市民阶级的主要职业或唯一职业。并且，如同其他技术的改良一样，改良战争技术，必须实现劳动力分工。对其他技术而言，劳动力分工是个人审慎抉择的必然结果，因为人们发现，精于一门职业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个人收益。而唯有国家的智慧才能使士兵独立并区别于其他职业，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在和平时期，如果一个公民在没有国家特别鼓励的情况下，用大部分时间进行军事训练，无疑能使他在军事上大有提高，且能好好消遣一番，但势必无法为他带来更多收益。唯有国家的智慧，才能使他为自己的利益将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这种特殊工作中。然而在很多国家，即使当这种智慧关系到国家存亡时，也未能有这样的智慧。

A shepherd has a great deal of leisure; a husbandman, in the rude state of husbandry, has some; an artificer or manufacturer has none at all. The first may, without any loss, employ a great deal of his time in martial exercises; the second may employ some part of it; but the last cannot employ a single hour in them without some loss, and his attention to his own interest naturally leads him to neglect them altogether. Those improvements in husbandry, too, which the progress of arts and manufactures necessarily introduces, leave the husbandman as little leisure as the artificer. Military exercises come to be as much neglected by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as by those of the town, and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becomes altogether unwarlike. That wealth, at the same time, which always follows the improvements of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and which, in reality, is no more than the accumulated produce of those improvements, provokes the invasion of all their neighbours. An industrious, and, upon that account, a wealthy nation, is of all nations the most likely to be attacked; and unless the state takes some new measures for the public defence, the natural habits of the people render them altogether incapable of defending themselves.

游牧民有大量闲暇时间，处于初级农业状态下的农民也有些许空闲，而手艺工人或制造业工人却不得空闲。参与军事训练时，第一种人即使花费大量时间也毫无损失，第二种人若只花费一部分时间，也不会蒙受损失。但对最后一种人而言，每花费一小时训练，便会有一小时的损失。考虑到自身利益，他自会完全漠视这类训练。此外，技术进步和制造业进步，势必引起农业上的种种改良，使得农民和城市的技工一样，不再有闲暇。于是，乡村居民变得和城市居民一样无视军事训练，以致全体人民皆不好战。与此同时，农业和制造业改良之后产生的财富，或者实际上正是这些改良所积累下来的财富，却又引

来各个邻国的侵略。事实上，以勤勉而富裕的国家，往往最容易被攻击。所以，国家若不采取新的国防措施，人民的自然习性会使他们完全丧失自卫的能力。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re seem to be but two methods by which the state can make any tolerable provision for the public defence.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似乎只能采取以下两种国防策略。

It may either, first, by means of a very rigorous police, and in spite of the whole bent of the interest, genius, and inclinations of the people, enforce the practice of military exercises, and oblige either all the citizens of the military age, or a certain number of them, to join in some measure the trade of a soldier to whatever other trade or profession they may happen to carry on.

第一，不顾人民的志趣、资质和意愿，用极其严厉的法令强行实施军事训练；强制所有或部分符合兵役年龄的市民，无论其从事何种职业，务必在一定程度上熟悉军事技能。

Or, secondly, by maintaining and employing a certain number of citizens in the constant practice of military exercises, it may render the trade of a soldier a particular trade, separate and distinct from all others.

第二，或者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对其进行军事训练，使士兵独立并区别于其他职业，成为一种特定的职业。

If the state has recourse to the first of those two expedients, its military force is said to consist in a militia; if to the second, it is said to consist in a standing army. The practice of military exercises is the sole or principal occupation of the soldiers of a standing army, and the maintenance or pay which the state affords them is the principal and ordinary fund of their subsistence. The practice of military exercises is only the occasional occupation of the soldiers of a militia, and they derive the principal and ordinary fund of their subsistence from some other occupation. In a militia, the character of the labourer, artificer, or tradesman, predominates over that of the soldier; in a standing army, that of the soldier predominates over every other character; and in this distinction seems to consis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ose two different species of military force.

国家若采取前一策略，其军队就是所谓的民兵部队；若采取后一策略，其军队则为所谓的常备军。常备军的唯一或主要职责是进行军事训练，他们的生活资料一般主要来源于国家提供的生活费用或薪饷。对民兵而言，军事训练则只是临时的任务，他们的生活资料一般主要来源于其他本职工作的收入。民兵队伍更具有工人、技工或商人的属性，常备军则更具有军人的属性。这两种军队本质上的区别似乎就在于此。

Militias have been of several different kinds. In some countries, the citizens destined for defending the state seem to have been exercised only, without being, if I may say so, regimented; that is,

without being divided into separate and distinct bodies of troops, each of which performed its exercises under its own proper and permanent officers. In the republics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each citizen, as long as he remained at home, seems to have practised his exercises, either separately and independently, or with such of his equals as he liked best; and not to have been attached to any particular body of troops, till he was actually called upon to take the field. In other countries, the militia has not only been exercised, but regimented. In England, in Switzerland, and, I believe, in every other country of modern Europe, where any imperfect military force of this kind has been established, every militiaman is, even in time of peace, attached to a particular body of troops, which performs its exercises under its own proper and permanent officers.

民兵队伍有几种。在一些国家，保卫国防的公民只接受了军事训练，却未被编制入伍；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被划分成各个独立的部队，没有各自正式和固定的军官带领其进行操练。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时期，每个公民留在家乡时，或是独自训练，或是和喜欢的同辈一同操练，直到实际应征作战时才隶属于特定的部队。在其他国家，民兵部队不仅要训练，还要编制入伍。在英国、瑞典，乃至近代欧洲一切设有这种不完全军事力量的国家，即使是和平时期，每个民兵都隶属于特定的部队，都有其正式和固定的长官。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firearms, that army was superior in which the soldiers had, each individually, the greatest skill and dexterity in the use of their arms. Strength and agility of body were of the highest consequence, and commonly determined the state of battles. But this skill and dexterity in the use of their arms could be acquired only, in the same manner as fencing is at present, by

practising, not in great bodies, but each man separately, in a particular school, under a particular master, or with his own particular equals and companions. Since the invention of firearms, strength and agility of body, or even extraordinary dexterity and skill in the use of arms, though they are far from being of no consequence, are, however, of less consequence. The nature of the weapon, though it by no means puts the awkward upon a level with the skilful, puts him more nearly so than he ever was before. All the dexterity and skill, it is supposed,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using it, can be well enough acquired by practising in great bodies.

在火器发明以前，在一支最优秀的队伍里，往往每个士兵都能最为熟练地使用武器。体力和敏捷度至关重要，通常决定了战斗的命运。如同今日的剑术一样，要掌握使用武器的技巧，不能众多人一起练习，而只能进入特定的学校，在特定老师的指导下独自训练，或与同伴一起训练。自火器发明以来，体力和敏捷度，甚至使用武器的技巧，虽未变得无足轻重，但已不如当初那般重要。笨拙者虽未因这种武器的特点而得以与熟练者并驾齐驱，但也比以往更接近这一水平。而且，众多人可以一起习得使用火器所必备的一切技巧。

Regularity, order, and prompt obedience to command, are qualities which, in modern armies, are of more importance towards determining the fate of battles, than the dexterity and skill of the soldiers in the use of their arms. But the noise of firearms, the smoke, and the invisible death to which every man feels himself every moment exposed, as soon as he comes within cannon-shot, and frequently a long time before the battle can be well said to be engaged, must render it very difficult to maintain any considerable degree of this regularity, order, and prompt obedience, even in the beginning of a modern battle. In an ancient battle, there was no

noise but what arose from the human voice; there was no smoke, there was no invisible cause of wounds or death. Every man, till some mortal weapon actually did approach him, saw clearly that no such weapon was near him. In these circumstances, and among troops who had some confidence in their own skill and dexterity in the use of their arms, it must have been a good deal less difficult to preserve some degree of regularity and order, not only in the beginning, but through the whole progress of an ancient battle, and till one of the two armies was fairly defeated. But the habits of regularity, order, and prompt obedience to command, can be acquired only by troops which are exercised in great bodies.

在近代军队中，纪律、秩序和迅速服从命令，比士兵使用武器的技巧更能决定战斗的命运。每个人只要到达炮弹的射程，往往在战争尚未开始时，就能听到火器的巨响，看到烟雾，感受到看不见的死亡。因此，近代的战争往往在开始前很久，士兵们便很难维持纪律秩序并迅速服从命令。在古代的战争中，只有人在战场上的吼叫声，没有其他巨响、烟气，也没有在无形中伤人或杀人的武器。每个人在致命武器真正靠近时，很清楚自己身边没有这类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从战斗开始到整个战斗过程，甚至直到两军胜负已定时为止，一支军队只要把握使用武器的技巧，则维持纪律和秩序就不会有太大难度。不过，纪律、秩序和迅速服从命令的习惯，只有在军队中众人一起训练才能习得。

A militia, however, in whatever manner it may be either disciplined or exercised, must always be much inferior to a well disciplined and well exercised standing army.

然而，不论以何种方式训练的民兵，总是远远比不上纪律良好、

训练娴熟的常备军。

The soldiers who are exercised only once a week, or once a month, can never be so expert in the use of their arms, as those who are exercised every day, or every other day; and though this circumstance may not be of so much consequence in modern, as it was in ancient times, yet the acknowledged superiority of the Prussian troops, owing, it is said, very much to their superior expertness in their exercise, may satisfy us that it is, even at this day, of very considerable consequence.

一周或一月训练一次的士兵，其使用武器的技巧，必不及每日或隔日训练一次的士兵。虽然使用武器的技巧，在近代已不如古代那般重要，但普鲁士军队之所以公认为优秀，据说就是因为他们在训练中精通使用武器的技巧。这足以让我们相信，即使在今日，使用武器的技巧还是极其重要的。

The soldiers, who are bound to obey their officer only once a-week, or once a-month, and who are at all other times at liberty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 their own way, without being, in any respect, accountable to him, can never be under the same awe in his presence, can never have the same disposition to ready obedience, with those whose whole life and conduct are every day directed by him, and who every day even rise and go to bed, or at least retire to their quarters, according to his orders. In what is called discipline, or in the habit of ready obedience, a militia must always be still more inferior to a standing army, than it may sometimes be in what is called the manual exercise, or in the management and use of its arms. But, in modern war, the habit of ready and instant obedience

is of much greater consequence than a considerable superiority in the management of arms.

有两种士兵，一种士兵每周或每月听从一次长官的指挥，其余一切时间则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情，在任何方面都不听命于长官。另一种士兵每日都将全部生活及行动服从于长官的指挥，甚至每日起床入睡（至少到营房就寝），都要依长官的命令而行。前一种士兵对长官的敬畏程度，迅速服从命令的程度，必不如后一种士兵。在所谓的操作训练方面，即使用武器的技巧，民兵往往不及常备军。在纪律方面，即迅速服从命令的习惯，民兵更是远不及常备军。可是，在近代战争中，相对于使用武器的超强本领，立即服从命令的习惯重要许多。

Those militias which, like the Tartar or Arab militia, go to war under the same chieftains whom they are accustomed to obey in peace, are by far the best. In respect for their officers, in the habit of ready obedience, they approach nearest to standing armies. The Highland militia, when it served under its own chieftains, had some advantage of the same kind. As the Highlanders, however, were not wandering, but stationary shepherds, as they had all a fixed habitation, and were not, in peaceable times, accustomed to follow their chieftain from place to place; so, in time of war, they were less willing to follow him to any considerable distance, or to continue for any long time in the field. When they had acquired any booty, they were eager to return home, and his authority was seldom sufficient to detain them. In point of obedience, they were always much inferior to what is reported of the Tartars and Arabs. As the Highlanders, too, from their stationary life, spend less of their time in the open air, they were always less accustomed to military exercises, and were less expert in the use of their arms than the

Tartars and Arabs are said to be.

像鞑靼及阿拉伯的民兵队伍那样，平日里听命于首领，并跟随首领作战，这样的民兵队伍是最优秀的。他们尊敬长官，随时服从命令，在这些方面几近常备军。苏格兰高地的民兵队伍服从于族长的指挥，因此也具有这类优点。不过，他们并非居无定所，而是有固定住所的牧人，因此在和平时期不会追随族长四处迁移。所以，与鞑靼人和阿拉伯人相比，他们不太愿意随族长远赴战场，也不愿意长时间留在战场。一旦获得战利品，他们马上渴望回家，即使族长的权威也很少能挽留他们。论及服从，他们一直都远不及鞑靼人和阿拉伯人。此外，苏格兰高地居民习惯了定居的生活，在野外的时候相对较少，所以与鞑靼人和阿拉伯人相比，他们不太习惯于军事训练，使用武器的技能也略逊一筹。

A militia of any kind, it must be observed, however, which has served for several successive campaigns in the field, becomes in every respect a standing army. The soldiers are every day exercised in the use of their arms, and, being constantly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ir officers, are habituated to the same prompt obedience which takes place in standing armies. What they were before they took the field, is of little importance. They necessarily become in every respect a standing army, after they have passed a few campaigns in it. Should the war in America drag out through another campaign, the American militia may become, in every respect, a match for that standing army, of which the valour appeared, in the last war at least, not inferior to that of the hardiest veterans of France and Spain.

必须注意的是，无论哪种民兵队伍，只要连续作战几次，就可以

成为一支合格的常备军。他们每天操练使用武器，由于不断接受长官的指挥，会养成常备军那样迅速服从命令的习惯。上战场前他们是什么样，这点无关紧要。只要经历过其中几场战役，他们必会成为一支十足的常备军。倘若美洲的战争持续至另一场战役，美洲的民兵可能在任何方面都足以与常备军相提并论，即使这支常备军在上一次战争中的英勇并不输给法国和西班牙最顽强的老兵。

This distinction being well understood, the history of all ages, it will be found, bears testimony to the irresistible superiority which a well regulated standing army has over a militia.

明白这一区别后，我们就可根据历史来证明，纪律严明的常备军比民兵队伍有不可辩驳的优越性。

One of the first standing armies, of which we have any distinct account in any well authenticated history, is that of Philip of Macedon. His frequent wars with the Thracians, Illyrians, Thessalians, and some of the Greek citie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Macedon, gradually formed his troops, which in the beginning were probably militia, to the exact discipline of a standing army. When he was at peace, which he was very seldom, and never for any long time together, he was careful not to disband that army. It vanquished and subdued, after a long and violent struggle, indeed, the gallant and well exercised militias of the principal republics of ancient Greece; and afterwards, with very little struggle, the effeminate and ill exercised militia of the great Persian empire. The fall of the Greek republics, and of the Persian empire was the effect of the irresistible superiority which a standing arm has over every other sort of militia. It is the first great revolution in the affairs of

mankind of which history has preserved any distinct or circumstantial account.

据可靠史料记载，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率领的军队是史上最早的常备军之一。他经常与色雷斯人、古伊利里亚人、色萨利亚人，以及马其顿周边的古希腊各城邦作战。他最初的军队也许只是民兵部队，但这些战争渐渐将它们训练成纪律严明的常备军。即使在少有且短暂的和平时期，他也谨慎而为，绝不解散军队。经过长久而激烈的战斗，他的军队打败并征服了古希腊主要共和国的多支英勇顽强、训练有素的民兵队伍。后来，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征服了大波斯帝国羸弱而训练不当的民兵队伍。常备军对民兵享有的无比的优越性，即是希腊各共和国和波斯帝国灭亡的原因。这是人类历史上有详细和明确记载的第一次重大革命。

The fall of Carthage, and the consequent elevation of Rome, is the second. All the varieties in the fortune of those two famous republics may very well be accounted for from the same cause.

迦太基的灭亡以及罗马帝国的随之崛起，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革命。这两个赫赫有名的共和国之所以经历种种兴衰成败，都是因为同一原因。

From the end of the first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Carthaginian war, the armies of Carthage were continually in the field, and employed under three great generals, who succeeded one another in the command; Hamilcar, his son-in-law hasdrubal, and his son Hannibal: first in chastising their own rebellious slaves, afterwards in subduing the revolted nations of Africa; and lastly, in

conquering the great kingdom of Spain. The army which Hannibal led from Spain into Italy must necessarily, in those different wars, have been gradually formed to the exact discipline of a standing army. The Romans, in the meantime, though they had not been altogether at peace, yet they had not, during this period, been engaged in any war of very great consequence; and their military discipline, it is generally said, was a good deal relaxed. The Roman armies which Hannibal encountered at Trebia, Thrasymenus, and Cannae, were militia opposed to a standing army. This circumstance, it is probable, contributed more than any other to determine the fate of those battles.

从第一次迦太基战争结束，到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爆发，迦太基的军队不断征战。在3位名将（即哈米尔卡尔、其婿哈斯德鲁巴及其子汉尼拔）的先后率领下，他们先是严惩国内叛变的奴隶，接着平定了非洲各叛乱的民族，最后又征服了西班牙王国。汉尼拔率领的军队从西班牙向意大利进攻时，必定在数次战争中被锻炼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在此期间，罗马人虽然并非完全身处和平，但也没有经历任何重大的战役。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罗马的军队训练相当松弛。所以当罗马军队与汉尼拔的军队在特雷比阿、斯雷米阿以及坎尼等地兵戎相见时，实际上是民兵队伍与常备军的对抗。这也许是决定这几次战争结局的主要因素。

The standing army which Hannibal left behind him in Spain had the like superiority over the militia which the Romans sent to oppose it; and, in a few years, under the command of his brother, the younger Hasdrubal, expelled them almost entirely from that country.

汉尼拔留在西班牙的常备军，也同样比罗马派去抵御它的民兵队伍更强大。所以，在几年之内，这常备军就在他弟弟小哈斯德鲁巴的指挥下，把罗马的民兵全部驱逐出西班牙。

Hannibal was ill supplied from home. The Roman militia, being continually in the field, became, in the progress of the war, a well disciplined and well exercised standing army; and the superiority of Hannibal grew every day less and less. Hasdrubaljudged it necessary to lead the whole, or almost the whole, of the standing army which he commanded in Spain, to the assistance of his brother in Italy. In this march, he is said to have been misled by his guides; and in a country which he did not know, was surprised and attacked, by another standing army, in every respect equal or superior to his own, and was entirely defeated.

汉尼拔的军队得不到国内充足的供给。同时，持续征战的罗马民兵队伍在战争中又锻炼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如此一来，汉尼拔原本享有的优势也日渐减少。小哈斯德鲁巴认为有必要带领全部或大部分他在西班牙统率的常备军，前往意大利支援其兄长。据说，在进军途中，他被引路人误导，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遭到了另一支同样精锐，甚至更精锐的常备军偷袭，结果全军覆没。

When Hasdrubalhad left Spain, the great Scipio found nothing to oppose him but a militia inferior to his own. He conquered and subdued that militia, and, in the course of the war, his own militia necessarily became a well disciplined and well exercised standing army. That standing army was afterwards carried to Africa, where it found nothing but a militia to oppose it. In order to defend Carthage, it became necessary to recall the standing army of

Hannibal. The disheartened and frequently defeated African militia joined it, and, at the battle of Zama, compose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troops of Hannibal. The event of that day determined the fate of the two rival republics.

当小哈斯德鲁巴带领军队离开西班牙后，罗马大将西庇阿发现所对抗的不过是一支弱于自己军队的民兵队伍。他打败了这支队伍，而他自己的民兵部队在战争过程中，必然地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后来，这支常备军被派往非洲，抵抗它的也不过是一支民兵队伍。这时，为保卫迦太基，汉尼拔的常备军不得不被召回。那些屡次战败后垂头丧气的非洲民兵也加入这支常备军。在扎马会战中，汉尼拔的军队主要由这些非洲民兵构成。正是此次战争决定了两大敌对的共和国后来的命运。

From the end of the second Carthaginian war till 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the armies of Rome were in every respect standing armies. The standing army of Macedon made some resistance to their arms. In the height of their grandeur, it cost them two great wars, and three great battles, to subdue that little kingdom, of which the conquest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still more difficult,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cowardice of its last king. The militias of all the civilised nations of the ancient world, of Greece, of Syria, and of Egypt, made but a feeble resistance to the standing armies of Rome. The militias of some barbarous nations defended themselves much better. The Scythian or Tartar militia, which Mithridates drew from the countries north of the Euxine and Caspian seas, were the most formidable enemies whom the Romans had to encounter after the second Carthaginian war. The Parthian and German militias, too, were always respectable, and upon several occasions, gained very considerable advantages over the Roman armies. In general,

however, and when the Roman armies were well commanded, they appear to have been very much superior; and if the Romans did not pursue the final conquest either of Parthia or Germany, it was probably because they judged that it was not worth while to add those two barbarous countries to an empire which was already too large. The ancient Parthians appear to have been a nation of Scythian or Tartar extraction, and to have always retained a good deal of the manners of their ancestors. The ancient Germans were, like the Scythians or Tartars, a nation of wandering shepherds, who went to war under the same chiefs whom they were accustomed to follow in peace. Their militia was exactly of the same kind with that of the Scythians or Tartars, from whom, too, they were probably descended.

从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结束，到罗马共和国灭亡，罗马的军队从各个方面来说都属于常备军。马其顿的常备军与之对抗。战争达到高潮时，罗马军队经过两次战争及3场大型会战，才击败这个小国，且如果马其顿最后一任国王不示弱投降，恐怕此次征服会更加困难。古代各文明国家，如希腊、叙利亚、埃及，其民兵队伍面对罗马的常备军，往往只能做微弱的抵抗。一些未开化民族的民兵抵抗起来则更为有力。罗马人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后不得不面对的最可怕的劲敌，是由米斯里德斯从黑海、里海以北各国率领来的塞西亚或鞑靼民兵。此外，帕提亚及日耳曼的民兵队伍也向来值得钦佩，曾有几次大败罗马军队。可是，罗马军队在一般情况下以及指挥得当时，似乎远超其对手。罗马人没有穷追不舍地彻底征服帕提亚和日耳曼，大概是认为帝国版图已足够大，再加入两个野蛮国家并没有什么价值。古代帕提亚民族似乎属于塞西亚或鞑靼人血统，始终保留了很多祖先风俗。和塞西亚人或鞑靼人一样，古代日耳曼人也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平时随首领四处迁移，战时依旧在首领的指挥下上阵杀敌。他们的民兵队伍与塞西亚人或鞑靼人的民兵队伍同属一类，而且有可能还是这两个民族的后裔。

Many different causes contributed to relax the discipline of the Roman armies. Its extreme severity was, perhaps, one of those causes. In the days of their grandeur, when no enemy appeared capable of opposing them, their heavy armour was laid aside as unnecessarily burdensome, their laborious exercises were neglected, as unnecessarily toilsome. Under the Roman emperors, besides, the standing armies of Rome, those particularly which guarded the German and Pannonian frontiers, became dangerous to their masters, against whom they used frequently to set up their own generals. In order to render them less formidable, according to some authors, Dioclesian, according to others, Constantine, first withdrew them from the frontier, where they had always before been encamped in great bodies, generally of two or three legions each, and dispersed them in small bodies through the different provincial towns, from whence they were scarce ever removed, but when it became necessary to repel an invasion. Small bodies of soldiers, quartered in trading and manufacturing towns, and seldom removed from those quarters, became themselves trades men,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The civil came to predominate over the military character; and the standing armies of Rome gradually degenerated into a corrupt, neglected, and undisciplined militia, incapable of resisting the attack of the German and Scythian militias, which soon afterwards invaded the western empire. It was only by hiring the militia of some of those nations to oppose to that of others, that the emperors were for some time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empire is the third great revolution in the affairs of mankind, of which ancient history has preserved any distinct or circumstantial account. It was brought about by the irresistible superiority which the militia of a barbarous has over that of a civilised nation; which the militia of a nation of shepherds has over that of a nation of husbandmen, artificers, and

manufacturers. The victories which have been gained by militias have generally been, not over standing armies, but over other militias, in exercise and discipline inferior to themselves. Such were the victories which the Greek militia gained over that of the Persian empire; and such, too, were those which, in later times, the Swiss militia gained over that of the Austrians and Burgundians.

多种原因导致了罗马军队纪律走向松弛。纪律过于严苛似乎也是原因之一。在他们极盛之时，再无敌人可以抵挡其威力。如此一来，沉重的盔甲成了累赘，被弃置一边，辛苦的训练也成为不必要的劳作，被忽略怠慢。此外，罗马皇帝旗下的常备军，特别是驻守在边境防备日耳曼人及潘诺尼亚人的常备军，屡次背叛其主，拥立自己的将军，对皇帝构成极大的威胁。据某些作家说，为削弱这些常备军势力，戴克里先大帝（又据其他作家说，是君士坦丁大帝）首先把长期驻扎在边境的常备军召回，把这种一般由两到三个军团组成的大部队分成多个小部队，驻扎在各个城市。除非抗敌需要，否则不得有任何变动。这些小部队屯驻在商业和制造业城市，极少移驻他处，士兵们也就渐渐变成了商人、技工或制造业工人，其市民的属性于是渐渐超过军人属性，成为其主要特征。如此，罗马的常备军日渐颓废，成为腐败堕落、玩忽职守、混乱无纪的民兵队伍。日耳曼和塞西亚民兵队伍入侵之时，西罗马帝国无力抵抗，敌人很快便长驱直入。那时，皇帝们想要保卫国家，唯有雇用一些国家的民兵来抵御另一国的民兵。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古代历史中仍存有比较明确和详细记载的人类第三次大革命。此次革命之所发生，正是由于野蛮国民兵队伍远比文明国民兵队伍强大，而游牧民族的民兵队伍亦远胜于由农夫、技工和制造业工人组成的国家的民兵队伍。民兵队伍所战胜的通常不是常备军，而是不如他们那样训练有素的民兵。希腊民兵战胜波斯民兵，以及后来瑞士民兵打败奥地利和勃艮第民兵，也是同样道理。

The military force of the German and Scythian nations, who

established themselves upon the ruins of the western empire, continued for some time to be of the same kind in their new settlements, as it had been in their original country. It was a militia of shepherds and husbandmen, which, in time of war, took the field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same chieftains whom it was accustomed to obey in peace. It was, therefore, tolerably well exercised, and tolerably well disciplined. As arts and industry advanced, however, the authority of the chieftains gradually decayed, and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had less time to spare for military exercises. Both the discipline and the exercise of the feudal militia, therefore, went gradually to ruin, and standing armies were gradually introduced to supply the place of it. When the expedient of a standing army, besides, had once been adopted by one civilised nation, it became necessary that all its neighbours should follow their example. They soon found that their safety depended upon their doing so, and that their own militia was altogether incapable of resisting the attack of such an army.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亚民族的国家。在新的国土上，这些民族的军队在一定时间内仍保持在故土时原本的样子。它是由牧人及农夫组成的民兵队伍，平日里听命于首领，战争时亦在该首领的指挥下前往战场作战，因此十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然而，随着技术及产业的进步，首长的权威日渐衰弱，大多数人民能闲下来接受军事训练的时间也减少了。因此，封建民兵纪律和训练逐渐荒废，逐渐被建立起来的常备军取代。此外，一旦某个文明国采用了常备军的策略，其他文明国就必会效仿。因为他们很快便发现，要想巩固国防，唯有效仿此法，因为自己的民兵队伍完全无力抵挡此类常备军的进攻。

The soldiers of a standing army, though they may never have

seen an enemy, yet have frequently appeared to possess all the courage of veteran troops, and, the very moment that they took the field, to have been fit to face the hardiest and most experienced veterans. In 1756, when the Russian army marched into Poland, the valour of the Russian soldiers did not appear inferior to that of the Prussians, at that time supposed to be the hardiest and most experienced veterans in Europe. The Russian empire, however, had enjoyed a profound peace for near twenty years before, and could at that time have very few soldiers who had ever seen an enemy. When the Spanish war broke out in 1739, England had enjoyed a profound peace for about eight-and-twenty years. The valour of her soldiers, however, far from being corrupted by that long peace, was never more distinguished than in the attempt upon Cartagena, the first unfortunate exploit of that unfortunate war. In a long peace, the generals, perhaps, may sometimes forget their skill; but where a well regulated standing army has been kept up, the soldiers seem never to forget their valour.

常备军的士兵，即使从未与敌人交手，也往往显得有老兵那样十足的勇气，而且，一旦上阵就足以和最顽强、最富经验的老兵一较高下。1756年，俄罗斯军队进攻波兰，俄罗斯军队所表现的武勇，绝不输于欧洲当时最顽强、最有作战经验的普鲁士军队。然而在此之前的20年中，俄罗斯帝国国泰民安，只有极少数士兵曾上阵杀敌过。1739年西班牙战争爆发时，英国已享受了28年的和平时期。但它的常备军战士并没有因为长期的和平而腐化。他们英勇依旧，在攻打卡塔赫那时，表现尤为突出。攻打卡塔赫那，是他们在这次不幸战争中的第一次不幸冒险。在长期的和平日子里，将军们的作战技巧有时可能会有所生疏，但在管理得当的常备军中，将士们似乎决不会忘却其英勇。

When a civilised nation depends for its defence upon a militia, it is at all times exposed to be conquered by any barbarous nation which happens to be in its neighbourhood. The frequent conquests of all the civilised countries in Asia by the Tartars,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s the natural superiority which the militia of a barbarous has over that of a civilised nation. A well regulated standing army is superior to every militia. Such an army, as it can best be maintained by an opulent and civilised nation, so it can alone defend such a nation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a poor and barbarous neighbour. It is only by means of a standing army, therefore, that the civilization of any country can be perpetuated, or even preserved,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如果一个文明国的国防依靠民兵队伍，它将随时可能被邻近的野蛮民族征服。亚洲各文明国家屡屡被鞑靼人征服，就足以证明野蛮国民兵对于文明国民兵具有天生的优越性。管理得当的常备军强于任何民兵队伍。这样的军队，只有在富裕的文明国家才能最好地维持其军力；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保卫这种国家，抵御贫困野蛮邻国的侵入。因此，任何国家若想延续或长久保存其文明，唯有建立常备军。

As it is only by means of a well regulated standing army, that a civilised country can be defended, so it is only by means of it that a barbarous country can be suddenly and tolerably civilised. A standing army establishes, with an irresistible force, the law of the sovereign through the remotest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and maintains some degree of regular government in countries which could not otherwise admit of any. Whoever examines with attention, the improvements which Peter the Great introduced into the Russian empire, will find that they almost all resolve themselves in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well regulated standing army. It is the

instrument which executes and maintains all his other regulations. That degree of order and internal peace, which that empire has ever since enjoyed, is altogether owing to the influence of that army.

唯有建立训练有素的常备军，文明国家才能抵御外敌，野蛮国家才能迅速地变得十分文明。君主的法令可借助常备军无可抵挡的威力，推行到一个帝国的最僻远之处，而政治混乱的国家，也可借常备军的威力维持一定程度的正常统治。任何人只要细心研究过彼得大帝在俄罗斯帝国的一系列改良，定会发现，所有改良措施都以建立一支正规的常备军为目的。这支常备军，是为彼得大帝执行和维持其他一切法规的工具。自那以后，俄罗斯帝国之所以享有高度的秩序与和平，完全是建立这支军队的结果。

Men of republican principles have been jealous of a standing army, as dangerous to liberty. It certainly is so, wherever the interest of the general, and that of the principal officers, are not necessarily connecte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The standing army of Caesar destroyed the Roman republic. The standing army of Cromwell turned the Long Parliament out of doors. But where the sovereign is himself the general, and the principal nobility and gentry of the country the chief officers of the army, where the military force is placed under the command of those who have the greatest interest in the support of the civil authority, because they have themselves the greatest share of that authority, a standing army can never be dangerous to liberty. On the contrary, it may, in some cases, be favourable to liberty. The security which it gives to the sovereign renders unnecessary that troublesome jealousy, which, in some modern republics, seems to watch over the minutest actions, and to be at all times ready to disturb the peace of every citizen. Where the security of the

magistrate, though supported by the principal people of the country, is endangered by every popular discontent; where a small tumult is capable of bringing about in a few hours a great revolution, the whol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must be employed to suppress and punish every murmur and complaint against it. To a sovereign, on the contrary, who feels himself supported, not only by the natural aristocracy of the country, but by a well regulated standing army, the rudest, the most groundless, and the most licentious remonstrances, can give little disturbance. He can safely pardon or neglect them, and his consciousness of his own superiority naturally disposes him to do so. That degree of liberty which approaches to licentiousness, can be tolerated only in countries where the sovereign is secured by a well regulated standing army. It is in such countries only, that the public safety does not require that the sovereign should be trusted with any discretionary power, for suppressing even the impertinent wantonness of this licentious liberty.

持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人，往往对常备军心存疑虑，恐其危及国家自由。当统领军队之人的利益与国家宪法的利益不一致时，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例如，恺撒的常备军破坏了罗马的共和政体，克伦威尔的常备军解散了英国的长期议会。但如果一国的军权掌握在君主手里，各军队的主要军官是该国的贵族和绅士，国家的军力就掌握在支持政府权威的人手中，如此一来，常备军就决不会危及国家自由。恰恰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可能有利于国家自由。有了常备军的保护，君主不再有一些不必要的疑虑，不需要像近代的一些共和国那样，对每个公民的一言一行加以监视，并时时烦扰公民的平静生活。如果一国行政长官，尽管受国内大部分人民的支持，但群众稍有不满，其安全便受到威胁；如果一次小规模暴动，就可能在几小时内掀起大的革命；为防微杜渐，政府必须利用其权力，镇压并处罚一切对其抱有微词之人。相反，如果一国君主感到自己不仅受世袭贵族的支

持，还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护其周全，那么即使发生最粗暴无理、最放肆的抗议，他也不会担心。由于他深知自己地位稳固，自然会大有把握地宽恕或忽略这些抗议。所以，只有在君主受精锐的常备军护卫的国家，才可容忍肆无忌惮的自由；也只有在这种国家，才无须为公共安全而赋予君主绝对权力，以镇压这种无礼放纵的过分自由。

The first duty of the sovereign, therefore, that of defending the society from the violence and injustice of other independent societies, grows gradually more and more expensive, as the society advances in civilization. The military force of the society, which originally cost the sovereign no expense, either in time of peace, or in time of war, must,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first be maintained by him in time of war, and afterwards even in time of peace.

因此，君主的首要义务就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其免受其他国家的暴力与侵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履行这一义务所需费用越来越大。社会的军队力量，原本在平时和战时均无需君主有任何支出，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慢慢开始需要君主支付战时的费用，后来在和平时期也需要由君主来供养。

The great change introduced into the art of war by the invention of firearms, has enhanced still further both the expense of exercising and disciplining any particular number of soldiers in time of peace, and that of employing them in time of war. Both their arms and their ammunition are become more expensive. A musket is a more expensive machine than a javelin or a bow and arrows; a cannon or a mortar, than a balista or a catapulta. The powder

which is spent in a modern review is lost irrecoverably, and occasions a very considerable expense. The javelins and arrows which were thrown or shot in an ancient one, could easily be picked up again, and were, besides, of very little value. The cannon and the mortar are not only much dearer, but much heavier machines than the balista or catapulta; and require a greater expense, not only to prepare them for the field, but to carry them to it. A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modern artillery, too, over that of the ancients, is very great; it has become much more difficult, and consequently much more expensive, to fortify a town, so as to resist, even for a few weeks, the attack of that superior artillery. In modern times, many different causes contribute to render the defence of the society more expensive. The unavoidable effects of the natural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have, in this respect, been a good deal enhanced by a great revolution in the art of war, to which a mere accident, the invention of gunpowder, seems to have given occasion.

火器的发明给战争技术带来了大的变革，进一步增加了平时训练士兵和战时使用士兵的费用。军队使用的武器与弹药都变得更加昂贵。火枪这种武器比矛和弓箭更贵，大炮或迫击炮也比弩炮或石弩更贵。近代阅兵式中使用的火药，一旦放射出去就消耗殆尽，从而产生巨额的费用。在古代，阅兵式中所投射的矛和箭很容易收回，并且造价极低。与弩炮或石弩相比，大炮或迫击炮不仅造价高出很多，而且极为笨重，因此无论是制造，还是运输至战场均需更大的费用。此外，与古代的炮类武器相比，近代大炮威力惊人，所以，要加固城防，抵御这类超级大炮的进攻，也就变得更加困难，甚至需耗时数周之久，因而所需费用也更加庞大。近代，导致国防费用日益增大的原因不一而足。在这方面，有事物自然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一结果又被战争技术大革命推波助澜。而引起这个大革命的，似乎只是一个偶发事件，即火药的发明。

In modern war, the great expense of firearms gives an evident advantage to the nation which can best afford that expense; and, consequently, to an opulent and civilised, over a poor and barbarous nation. In ancient times, the opulent and civilised found it difficult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the poor and barbarous nations. In modern times, the poor and barbarous find it difficult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the opulent and civilised. The invention of firearms, an invention which at first sight appears to be so pernicious, is certainly favourable, both to the permanency and to the extension of civilization.

近代战争火器费用庞大，使得能够负担这一费用的国家拥有明显优势，从而使富裕文明的国家比野蛮国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古代，富裕文明之国难以抵御贫穷野蛮之国的进攻；在近代，贫穷野蛮之国却很难抵抗富裕文明之国。表面看来，火器的发明似乎极其有害，但它实际上有利于文明的延续与扩张。

Part II. Of the Expense of Justice

第二节、论司法费用

The second duty of the sovereign, that of protecting, as far as possible, every member of the society from the injustice or oppression of every other member of it, or the duty of establishing an exact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requires, too, very different degrees of expense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society.

君主的第二大义务，就是设立一个公正严明的司法机构，保护每

个社会成员不受其他社会成员的侵犯或压迫。同样，履行这一义务所需费用，因社会时期不同而有所差异。

Among nations of hunters, as there is scarce any property, or at least none that exceeds the value of two or three days labour; so there is seldom any established magistrate, or any regular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Men who have no property, can injure one another only in their persons or reputations. But when one man kills, wounds, beats, or defames another, though he to whom the injury is done suffers, he who does it receives no benefit. It is otherwise with the injuries to property. The benefit of the person who does the injury is often equal to the loss of him who suffers it. Envy, malice, or resentment, are the only passions which can prompt one man to injure another in his person or reputation. But the greater part of men are not very frequent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ose passions; and the very worst men are so only occasionally. As their gratification, too, how agreeable soever it may be to certain characters, is not attended with any real or permanent advantage, it is, in the greater part of men, commonly restrained by prudential considerations. Men may live together in society with some tolerable degree of security, though there is no civil magistrate to protect them from the injustice of those passions. But avarice and ambition in the rich, in the poor the hatred of labour and the love of present ease and enjoyment, are the passions which prompt to invade property; passions much more steady in their operation, and much more universal in their influence. Wherever there is great property, there is great inequality. For one very rich man, there must be at least five hundred poor, and the affluence of the few supposes the indigence of the many. The affluence of the rich excites the indignation of the poor, who are often both driven by want, and prompted by envy to invade his possessions. It is only

under the shelter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that the owner of that valuable property, which is acquired by the labour of many years, or perhaps of many successive generations, can sleep a single night in security. He is at all times surrounded by unknown enemies, whom, though he never provoked, he can never appease, and from whose injustice he can be protected only by the powerful arm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continually held up to chastise it. The acquisition of valuable and extensive property, therefore, necessarily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 government. Where there is no property, or at least none that exceeds the value of two or three days labour, civil government is not so necessary.

狩猎民族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即使有，也不超过两三日劳动的价值，因此很少设有固定的法官，或者任何正规的司法机构。既然没有财产，人们也只能伤害到彼此的身体或名誉。而且，当一个人谋杀、伤害、殴打或者诽谤他人时，虽能给受害者带来痛苦，于其自身却毫无益处。可是财产损害则截然不同。施加伤害者所得的利益，往往与被伤害者所遭受的损失相同。人们往往只会在嫉妒、怨恨、愤怒等情绪的驱使下，才会去伤害他人的身体或名誉。但大多数人并不常常受这些情绪的支配，即使最恶毒之人，也不过偶尔为之。此外，无论这些情绪的满足对某种人来说多么愉悦，它都不能带来任何实际或持久的利益，因此大多数人一般会在深思熟虑后加以克制。即使没有司法官来保护人们不受这些情绪的侵害，人类也能十分安全地生活在一起。然而，富人的贪婪与野心，贫者好逸恶劳的习性，这些情绪都可以驱使人们侵害他人财产。并且这些情绪的效果更为牢固，影响更为普遍。哪里有巨额财产，哪里就有严重的不平等。每存在一个富人，必定至少存在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往往以多数人的贫穷为前提。穷人往往被富人的富裕激怒，因为贫穷和嫉妒而侵害富人的财产。唯有在司法官员的庇护下，那些通过多年的劳动或世代劳动而拥有大笔财产的人，才得以高枕无忧。富人随时都被潜在的敌人包围，即使不激怒敌人，却也无法满足敌人的欲望。要想避免敌人的侵害，

只有依赖强有力的司法官的保护，不断严惩此类非法行为。因此，大量财产的获得，必然要求建立政府。在没有财产，或财产总数不超过两三日劳动的价值的社会，就没有必要建立这种政府。

Civil government supposes a certain subordination. But as the necessity of civil government gradually grows up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valuable property; so the principal causes, which naturally introduce subordination, gradually grow up with the growth of that valuable property.

政府必须取得人民的服从。由于政府的必要程度随着财产价值的增加而逐渐增大，所以使人民自然服从于政府的主要因素，也是随财产价值的增长而逐渐发展。

The causes or circumstances which naturally introduce subordination, or which naturally and antecedent to any civil institution, give some men some superiority ove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brethren, seem to be four in number.

人民之所以会自然地服从政府，或者说，在民政机构形成以前，之所以会有一些人能居于大部分同胞之上，似乎有四种原因或情况。

The first of those causes or circumstances, is the superiority of personal qualifications, of strength, beauty, and agility of body; of wisdom and virtue; of prudence, justice, fortitude, and moderation of mind.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body, unless supported by those of the mind, can give little authority in any period of society. He is

a very strong man, who, by mere strength of body, can force two weak ones to obey him.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mind can alone give very a great authority. They are, however, invisible qualities; always disputable, and generally disputed. No society, whether barbarous or civilised, has ever found it convenient to settle the rules of precedency of rank and subordination, according to those invisible qualities; but according to something that is more plain and palpable.

其中第一种原因是个人资质的优越，如体格健硕、外貌俊美、动作敏捷；有智慧和美德；为人审慎、有正义感、坚韧有节制等。在任何社会时期，肉体上的资质都需要有精神品质的支撑，才能获得权威。一个体格健硕之人，单凭体力，便可迫使两个身体虚弱之人服从。精神上的品质同样也可赢得巨大的权威。然而，精神上的品质是不可见的，总有其不确定性，往往充满争议。无论是野蛮社会还是文明社会，在制定社会等级和主从关系的相关法则时，都很难以这些不可见的品质为根据，而往往参考一些更加显而易见的事物。

The second of those causes or circumstances, is the superiority of age. An old man, provided his age is not so far advanced as to give suspicion of dotage, is everywhere more respected than a young man of equal rank, fortune, and abilities. Among nations of hunters, such as the native tribes of North America, age is the sole foundation of rank and precedency. Among them, father is the appellation of a superior; brother, of an equal; and son, of an inferior. In the most opulent and civilised nations, age regulates rank among those who are in every other respect equal; and among whom, therefore, there is nothing else to regulate it. Among brothers and among sisters, the eldest always takes place; and in the succession of the paternal estate, every thing which cannot be

divided, but must go entire to one person, such as a title of honour, is in most cases given to the eldest. Age is a plain and palpable quality, which admits of no dispute.

第二种原因是年龄的优越。无论何地，年长者但凡没有到年老昏愦的程度，皆比有相同地位、财力和能力的年轻人更受尊重。在狩猎民族，如北美土著人，年龄是决定地位社会等级的唯一根据。他们称长辈为父，称同辈为兄弟，称下级为子。在文明富裕的国家，那些在一切方面皆平等的人，通常都以年龄来决定身份。在兄弟姐妹间，年龄最长者居第一位。承继父产时，名誉称呼这类不可分割而必须全部由一人占有的东西，大多由年龄最长者继承。年龄的优越是显而易见的，毫无争议性。

The third of those causes or circumstances, is the superiority of fortune. The authority of riches, however, though great in every age of society, is, perhaps, greatest in the rudest ages of society, which admits of any considerable inequality of fortune. A Tartar chief, the increase of whose herds and stocks is sufficient to maintain a thousand men, cannot well employ that increase in any other way than in maintaining a thousand men. The rude state of his society does not afford him any manufactured produce, any trinkets or baubles of any kind, for which he can exchange that part of his rude produce which is over and above his own consumption. The thousand men whom he thus maintains, depending entirely upon him for their subsistence, must both obey his orders in war, and submit to his jurisdiction in peace. He is necessarily both their general and their judge, and his chieftainship is the necessary effect of the superiority of his fortune. In an opulent and civilised society, a man may possess a much greater fortune, and yet not be able to command a dozen people. Though the produce of his estate may be

sufficient to maintain, and may, perhaps, actually maintain,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yet, as those people pay for every thing which they get from him, as he gives scarce any thing to any body but in exchange for an equivalent, there is scarce anybody who considers himself as entirely dependent upon him, and his authority extends only over a few menial servants. The authority of fortune, however, is very great, even in an opulent and civilised society. That it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either of age or of personal qualities, has been the constant complaint of every period of society which admitted of any considerable inequality of fortune. The first period of society, that of hunters, admits of no such inequality. Universal poverty establishes their universal equality; and the superiority, either of age or of personal qualities, are the feeble, but the sole foundations of authority and subordination. There is, therefore, little or no authority or subordination in this period of society. The second period of society, that of shepherds, admits of very great inequalities of fortune, and there is no period in which the superiority of fortune gives so great authority to those who possess it. There is no period, accordingly, in which authority and subordination are more perfectly established. The authority of an Arabian sherif is very great; that of a Tartar khan altogether despotical.

第三种原因，就是财产的优越。虽然富人在一切社会皆享有大的权威，但在财产最不平等的野蛮社会，其权威最大。一个鞑靼酋长拥有的牲畜，繁殖起来可以养活1,000人，除此之外再无他用。因为，在他所处的那种未开化的社会中，不可能用自己消费剩余的原生产物换回任何制造品、小装饰品或玩具。由他供给的1,000人要靠他生活，因而不仅在战时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在平时也要听命于他的管理。他必然就成了他们的统领和裁判官。他的酋长地位，就是他优越的财富的必然结果。在文明富裕的社会，一个人即使比别人拥有大得

多的财产，也无法支配十多个人。其财产的增加，或许能够供给1,000人，也许确实供给了1,000人，但这些人都支付了从他那里获得的一切，他给所有人的都是基于等价交换的原则。所以，没有人认为完全依赖于他，他也只能对一些家仆享有权威。然而在文明富裕社会里，财产依旧有相当大的权威。与年龄和个人资质相比，财产带来的权威往往大得多。这也是一切财产极不平等的社会时期人们所时常抱怨的。狩猎民族处于社会的第一时期，不可能有财产不平等。普遍的贫困造成了普遍的平等。年龄或个人资质的优越，却是决定权威和主从关系的唯一根据。游牧民族社会属于社会第二时期，出现了财产的极度不平等。此时财产所有者比任何时期都享有更大的权威，因而权威与主从关系的也更为确定。例如，阿拉伯人的首领享有高度的权威，鞑靼可汗则享有专制独裁的权威地位。

The fourth of those causes or circumstances, is the superiority of birth. Superiority of birth supposes an ancient superiority of fortune in the family of the person who claims it. All families are equally ancient; and the ancestors of the prince, though they may be better known, cannot well be more numerous than those of the beggar. Antiquity of family means everywhere the antiquity either of wealth, or of that greatness which is commonly either founded upon wealth, or accompanied with it. Upstart greatness is everywhere less respected than ancient greatness. The hatred of usurpers, the love of the family of an ancient monarch, are in a great measure founded upon the contempt which men naturally have for the former, and upon their veneration for the latter. As a military officer submits, without reluctance, to the authority of a superior by whom he has always been commanded, but cannot bear that his inferior should be set over his head; so men easily submit to a family to whom they and their ancestors have always submitted; but are fired with indignation when another family, in whom they had never acknowledged any such superiority, assumes a dominion

over them.

第四种原因是门第的优越。门第的优越以祖辈在财产上的优越为前提。论及古老悠久，任何家族都是一样的。王侯的祖先虽更为人所知，但在数量上却并不比乞丐的祖先多。无论在任何地方，古老的家族都曾拥有巨大的财富，或者曾因财富而声名显赫。古老的世族总是比暴发户更受尊重。人们憎恶篡夺者，而敬爱古老的王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生性爱轻视前者而崇拜后者。军官心甘情愿地服从于平日指挥他的上级，却无法容忍其下级升至高位。人们容易服从自己或祖先所服从过的家族，但当一向不比他们优越的家族忽然对其有支配权时，他们便会愤愤不平。

The distinction of birth, being subsequent to the inequality of fortune, can have no place in nations of hunters, among whom all men, being equal in fortune, must likewise be very nearly equal in birth. The son of a wise and brave man may, indeed, even among them, be somewhat more respected than a man of equal merit, who has the misfortune to be the son of a fool or a coward. The difference, however will not be very great; and there never was, I believe, a great family in the world, whose illustration was entirely derived from the inheritance of wisdom and virtue.

门第的显贵源于财产上的不平等。在财产平等、家世也几乎平等的狩猎民族，这种显贵就无法存在。不可否认，在那种社会中，即使是实力相当的两个人，聪明英武之人的儿子，多少会比与愚昧怯懦之人的儿子更受人尊敬。但这种差别微乎其微。我相信，世界上从未有哪个大家族的辉煌是全然来自于其祖辈的智慧与美德。

The distinction of birth not only may, but always does, take place among nations of shepherds. Such nations are always strangers to every sort of luxury, and great wealth can scarce ever be dissipated among them by improvident profusion. There are no nations, accordingly, who abound more in families revered and honoured on account of their descent from a long race of great and illustrious ancestors; because there are no nations among whom wealth is likely to continue longer in the same families.

在游牧民族，门第的显贵不仅有了存在的可能，而且向来存在。他们对奢华的生活全然不知，自然也很少去挥霍大笔财产。因此，在游牧民族，财富最能长期保留在一个家族中，故而仰仗显赫的祖先而受人尊敬的家族也最多。

Birth and fortune are evidently the two circumstances which principally set one man above another. They are the two great sources of personal distinction, and are, therefore, the principal causes which naturally establish authority and subordination among men. Among nations of shepherds, both those causes operate with their full force. The great shepherd or herdsman, respected on account of his great wealth, and of the great number of those who depend upon him for subsistence, and revered on account of the nobleness of his birth, and of the immemorial antiquity of his illustrious family, has a natural authority over all the inferior shepherds or herdsmen of his horde or clan. He can command the united force of a greater number of people than any of them. His military power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any of them. In time of war, they are all of them naturally disposed to muster themselves under his banner, rather than under that of any other person; and his birth and fortune thus naturally procure to him some sort of executive

power. By commanding, too, the united force of a greater number of people than any of them, he is best able to compel any one of them, who may have injured another, to compensate the wrong. He is the person, therefore, to whom all those who are too weak to defend themselves naturally look up for protection. It is to him that they naturally complain of the injuries which they imagine have been done to them; and his interposition, in such cases, is more easily submitted to, even by the person complained of, than that of any other person would be. His birth and fortune thus naturally procure him some sort of judicial authority.

门第与财产显然是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地位差别的两大要素，也是个人显贵的两大来源，故而也是人类自然地出现权威和主从关系的首要原因。在游牧民族，这两者的作用可谓发挥到了极致。拥有众多牲畜的大畜牧者，因拥有巨大的财富，且养活了许多人而受人尊敬，因出身门第、家族显赫而受人崇拜。他自然对同部落或同族中其他畜牧者享有权威。与其他人相比，他能团结并支配更多人，因而拥有更多的兵力。战争时期，人们皆愿意集合在其麾下，而不愿另投他处。门第和财产自然地为他赢得了决策权。此外，由于他能团结并支配更多的人，因此也最能迫使人们在伤害他人时补偿过失。于是，所有没有防御能力的人，自然都向他寻求保护。那些感到自己受到侵害之人，也自然会向他诉苦。对比别人所做的仲裁，他对这些纠纷所做的仲裁，更容易使被控诉者服从。于是，门第和财富又自然为他赢得了一种司法权力。

It is in the age of shepherds, in the second period of society, that the inequality of fortune first begins to take place, and introduces among men a degree of authority and subordination, which could not possibly exist before. It thereby introduces some degree of that civil government which is indispensably necessary for

its own preservation; and it seems to do this naturally, and even independent of the consideration of that necessity. The consideration of that necessity comes, no doubt, afterwards, to contribute very much to maintain and secure that authority and subordination. The rich, in particular, are necessarily interested to support that order of things, which can alone secure them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ir own advantages. Men of inferior wealth combine to defend those of superior wealth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ir property, in order that men of superior wealth may combine to defend them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irs. All the inferior shepherds and herdsmen feel, that the security of their own herds and flocks depends upon the security of those of the great shepherd or herdsman; that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lesser authority depends upon that of his greater authority; and that upon their subordination to him depends his power of keeping their inferiors in subordination to them. They constitute a sort of little nobility, who feel themselves interested to defend the property, and to support the authority, of their own little sovereign, in order that he may be able to defend their property, and to support their authority. Civil government, so far as it is instituted for the security of property, is, in reality, instituted for the defence of the rich against the poor, or of those who have some property against those who have none at all.

在游牧时代，即社会第二时期，财产上的不平等开始出现，从来带来了人与人之间过去不可能存在的某种程度的权威和主从关系，且因此又带来了维持权威和主从关系不可或缺的政府组织。这些变化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甚至并没有将上述必要性考虑在内。将这种必要性考虑在内，无疑在后来对维持和保障这种权威和主从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富人们必然尤其愿意维护这种等级秩序，因为只有这样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小富人联合起来保卫大富人的财产，只为使

大富人也能联合起来保卫他们的财产。所有小的畜牧者认为，他们畜群的安全仰赖于大畜牧者的畜群的安全；要维持他们的小权威，就必须维持大畜牧者较大的权威；并且，要使地位低的人臣服，他们就必须服从于地位更高之人。如此一来，他们就组成了一种小贵族。这种小贵族认为，只有维护小君主的财产和权威，他们自己的财产和权威才能受到小君主的保护。政府的建立，是为了保障财产的安全，但实际上就是保护富人来对抗穷人，或者说，保护有财产之人来对抗身无一物之人。

The judicial authority of such a sovereign, however, far from being a cause of expense, was, for a long time, a source of revenue to him. The persons who applied to him for justice were always willing to pay for it, and a present never failed to accompany a petition. After the authority of the sovereign, too, was thoroughly established, the person found guilty, over and above the satisfaction which he was obliged to make to the party, was likewise forced to pay an amercement to the sovereign. He had given trouble, he had disturbed, he had broke the peace of his lord the king, and for those offences an amercement was thought due. In the Tartar governments of Asia, in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which were founded by the German and Scythian nations who overturned the Roman empire,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was a considerable source of revenue, both to the sovereign, and to all the lesser chiefs or lords who exercised under him any particular jurisdiction, either over some particular tribe or clan, or over some particular territory or district. Originally, both the sovereign and the inferior chiefs used to exercise this jurisdiction in their own persons. Afterwards, they universally found it convenient to delegate it to some substitute, bailiff, or judge. This substitute, however, was still obliged to account to his principal or constituent for the profits of the jurisdiction. Whoever reads the instructions (They are to be

found in Tyrol's History of England) which were given to the judges of the circuit in the time of Henry II will see clearly that those judges were a sort of itinerant factors, sent round the country for the purpose of levying certain branches of the king's revenue. In those days,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not only afforded a certain revenue to the sovereign, but, to procure this revenue, seems to have been one of the principal advantages which he proposed to obtain by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然而，君主的司法权力不但不会给他带来任何支出，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他的一种收入来源。需要他裁判的人总愿意给他报酬，并且满足其意愿赠送各种礼物。君主权力确立以后，由于犯罪者麻烦并搅扰了君主，因此在赔偿原告损失的同时，还必须对君主缴纳罚金。在亚洲的鞑靼政府，对于君主，以及在特定部落、氏族或领地行使裁判权的酋长或诸侯来说，司法权力都是一大收入来源。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亚民族推翻罗马帝国后，所建立的欧洲各政府，亦是如此。最初，司法裁判权是由君主或酋长自己行使。此后，为方便之故，他们便委任代理人、执事或裁判官代为行使。不过，代理人仍有义务向君主或酋长报告司法收入。若阅读了亨利二世给巡回法官的指示（相关记载见蒂罗尔的《英格兰史》），任何人都会清楚地发现，那些巡回法官只是被派往全国各地为国王征收收入。在当时，司法行政不但为君主提供一定的收入，而且该收入是君主试图从司法行政中获得的主要利益。

This scheme of mak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subservient to the purposes of revenue, could scarce fail to be productive of several very gross abuses. The person who applied for justice with a large present in his hand, was likely to get something more than justice; while he who applied for it with a small one was likely to get something less. Justice, too, might frequently be delayed, in

order that this present might be repeated. The amercement, besides, of the person complained of, might frequently suggest a very strong reason for finding him in the wrong, even when he had not really been so. That such abuses were far from being uncommo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every country in Europe bears witness.

把司法行政变成敛财的工具，必定会产生一些严重的弊端。比如，送大礼来请求主持公道的人，往往得到的多于公道；送小礼物来请求主持公道的人，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公道。而且，为获得更多的礼物，司法判决往往被一再推延。此外，被告的罚金往往导致那些无罪者被判为有罪。欧洲各国古代史即可证明，司法上的这些弊病是司空见惯的。

When the sovereign or chief exercised his judicial authority in his own person, how much soever he might abuse it, it must have been scarce possible to get any redress; because there could seldom be any body powerful enough to call him to account. When he exercised it by a bailiff, indeed, redress might sometimes be had. If it was for his own benefit only, that the bailiff had been guilty of an act of injustice, the sovereign himself might not always be unwilling to punish him, or to oblige him to repair the wrong. But if it was for the benefit of his sovereign; if it was in order to make court to the person who appointed him, and who might prefer him, that he had committed any act of oppression; redress would, upon most occasions, be as impossible as if the sovereign had committed it himself. In all barbarous governments, accordingly, in all those ancient governments of Europe in particular, which were founded upon the ruins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ppears for a long time to have been extremely corrupt; far from being quite equal and impartial, even under the best monarchs, and

altogether profligate under the worst.

当君主或酋长直接行使司法权时，无论有何弊病，也无法纠正，因为任何人都没有足够的权力来责问他。不可否认，司法权若由代理者行使，是有纠正的可能。代理者若仅仅为了自身利益而妨碍司法公正，君主就可能施以惩罚，或强制他改正错误。但若代理者压迫他人是为了君主的利益，为了取悦于任命并重用他的人，那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如同君主自己妨碍司法公正一样，无法纠正。因此，在一切野蛮国政府，特别是建立在罗马帝国废墟上的欧洲各古老的政府，司法长期处于极其腐败的状态。即便在最好国王的统治下，也毫无平等或公正可言，而在最坏国王的统治下，司法完全被滥用。

Among nations of shepherds, where the sovereign or chief is only the greatest shepherd or herdsman of the horde or clan, he is maintain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any of his vassals or subjects, by the increase of his own herds or flocks. Among those nations of husbandmen, who are but just come out of the shepherd state, and who are not much advanced beyond that state, such as the Greek tribes appear to have been about the time of the Trojan war, and our German and Scythian ancestors, when they first settled upon the ruins of the western empire; the sovereign or chief is, in the same manner, only the greatest landlord of the country, and is maintain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any other landlord, by a revenue derived from his own private estate, or from what, in modern Europe, was called the demesne of the crown. His subjects, upon ordinary occasions, contributed nothing to his support, except whe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m from the oppression of some of their fellow-subjects, they stand in need of his authority. The presents which they make him upon such occasions constitute the whole ordinary revenue, the whole of the emoluments which, except,

perhaps, upon some very extraordinary emergencies, he derives from his dominion over them. When Agamemnon, in Homer, offers to Achilles, for his friendship, the sovereignty of seven Greek cities, the sole advantage which he mentions as likely to be derived from it was, that the people would honour him with presents. As long as such presents, as long as the emoluments of justice, or what may be called the fees of court, constituted, in this manner, the whole ordinary revenue which the sovereign derived from his sovereignty, it could not well be expected, it could not even decently be proposed, that he should give them up altogether. It might, and it frequently was proposed, that he should regulate and ascertain them. But after they had been so regulated and ascertained, how to hinder a person who was all-powerful from extending them beyond those regulations, was still very difficult, not to say impossible.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this state of things, therefore, the corruption of justice, naturally resulting from the arbitrary and uncertain nature of those presents, scarce admitted of any effectual remedy.

在游牧民族，君主或首领只是部落或氏族中最大的畜牧者，与其麾下的小牧民或臣民一样，也是靠自己的畜群维持生活。在刚脱离游牧状态，还没有取得很大进步的农耕民族，如特洛伊战争时代的希腊部族，以及移居到罗马帝国废墟上不久的日耳曼人和塞西亚人的祖先，君主或酋长同样不过是一国最大的地主；与一般的地主一样，完全靠自己私人土地（近代欧洲又称其为御地）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在平日里，他的臣民无需向他献上任何物品，只为避免受到同胞的压迫时才需要借助他的司法权力。臣民在这种情况下献给他的礼物，就算是他全部的日常收入，或者说，除了异常紧急的情况，这就是他享有支配权的全部报酬。根据荷马史诗所言，阿伽门农出于友谊，将希腊7个城邦的主权赠与阿基里斯，而人民敬奉的礼物是阿基里斯从那7个城邦中可能得到的唯一利益。这种礼物，即司法权的报酬，也即司法

手续费，只要它构成君主由其统治权所获得的全部日常收入，君主就不可能将其放弃，甚至对君主提出这一要求也是不大妥当的。但或许可以向君主提议，将这种礼物做明确的规定，实际上也曾有过这样的提议。但即使有了明确的规定，要制止一个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逾越规定的范围，即使有其可能性，也极其困难。因此，这种状态若持续下去，任意收取礼物必然使司法腐败变得无可挽回。

But when, from different causes, chiefly from the continually increasing expenses of defending the nation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other nations, the private estate of the sovereign had become altogether insufficient for defraying the expense of the sovereignty; and when it had become necessary that the people should, for their own security, contribute towards this expense by taxes of different kinds; it seems to have been very commonly stipulated, that no present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should, under any pretence, be accepted either by the sovereign, or by his bailiffs and substitutes, the judges. Those presents, it seems to have been supposed, could more easily be abolished altogether, than effectually regulated and ascertained. Fixed salaries were appointed to the judges, which were supposed to compensate to them the loss of whatever might have been their share of the ancient emoluments of justice; as the taxes more than compensated to the sovereign the loss of his. Justice was then said to be administered gratis.

诸多原因的出现，其中主要是国防费的持续增加，使得君主私有土地的收入完全不够支付国家费用。人民为保障自身安全，不得不缴纳各种赋税，以支付这些费用。此时，似乎才有了这样的普遍规定，即君主或君主的执行官、代理者及审判官，均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受任何礼物。似乎在当时的人看来，与其对收受礼物进行明确有效的管理，倒不如将其彻底废除来得容易。审判官享有固定的薪俸，这薪俸

可补偿他们旧时通过收取礼物获得的司法报酬；君主征收赋税，足以补偿君主此前从司法中获得的收入并有余。从那时起，司法审判算是免费了。

Justice, however, never was in reality administered gratis in any country. Lawyers and attorneys, at least, must always be paid by the parties; and if they were not, they would perform their duty still worse than they actually perform it. The fees annually paid to lawyers and attorneys, amount, in every court, to a much greater sum than the salaries of the judges. The circumstance of those salaries being paid by the crown, can nowhere much diminish the necessary expense of a law-suit. But it was not so much to diminish the expense, as to prevent the corruption of justice, that the judges were prohibited from receiving any present or fee from the parties.

然而，无论在哪个国家，司法审判都不是真正免费的。至少，诉讼双方应该支付律师和代辩人一定报酬，否则，他们执行职务时就不会尽责。每处法庭每年付给律师和代辩人的手续费，加起来大大高出所有审判官的薪俸。审判官的薪俸虽然由国王发放，但任何地方的诉讼案件的必要费用都没有大为减少。不过，禁止审判官收受诉讼当事人的礼物或手续费，并不是为了减少费用，而是为了防止司法腐败。

The office of judge is in itself so very honourable, that men are willing to accept of it, though accompanied with very small emoluments. The inferior office of justice of peace, though attended with a good deal of trouble, and in most cases with no emoluments at all, is an object of ambition to the greater part of our country gentlemen. The salaries of all the different judges, high and low, together with the whole expense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execution of justice, even where it is not managed with very good economy, makes, in any civilised country, but a very in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whole expense of government.

审判官是一个体面的官职，报酬虽少，人们却依然愿意从事。职位比审判官稍低的治安法官，工作上时常麻烦缠身，报酬通常极少，然而大多数的乡绅却渴望得到这一职位。在任何文明国家，所有司法人员的薪俸以及司法行政的一切费用，即使在不大节省的情况下，也只占政府全部费用的极小部分。

The whole expense of justice, too, might easily be defrayed by the fees of court; and, without expos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o any real hazard of corruption, the public revenue might thus be entirely discharged from a certain, though perhaps but a small incumbrance. It is difficult to regulate the fees of court effectually, where a person so powerful as the sovereign is to share in them and to derive any considerable part of his revenue from them. It is very easy, where the judge is the principal person who can reap any benefit from them. The law can very easily oblige the judge to respect the regulation though it might not always be able to make the sovereign respect it. Where the fees of court are precisely regulated and ascertained where they are paid all at once, at a certain period of every process, into the hands of a cashier or receiver, to be by him distributed in certain known proportions among the different judges after the process is decided and not till it is decided; there seems to be no more danger of corruption than where such fees are prohibited altogether. Those fees, without occasioning any considerable increase in the expense of a law-suit, might be rendered fully sufficient for defraying the whole expense of justice. By not being paid to the judges till the process was

determined, they might be some incitement to the diligence of the court in examining and deciding it. In courts which consisted of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judges, by proportioning the share of each judge to the number of hours and days which he had employed in examining the process, either in the court, or in a committee, by order of the court, those fees might give some encouragement to the diligence of each particular judge. Public services are never better performed, than when their reward comes only in consequence of their being performed, and is proportioned to the diligence employed in performing them. In the different parliaments of France, the fees of court (called epices and vacations) constitute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emoluments of the judges. After all deductions are made, the neat salary paid by the crown to a counsellor or judge in the parliament of Toulouse, in rank and dignity the second parliament of the kingdom, amounts only to 150 livres, about £6:11s. sterling a year. About seven years ago, that sum was in the same place the ordinary yearly wages of a common footman. The distribution of those epices, too, is according to the diligence of the judges. A diligent judge gains a comfortable, though moderate revenue, by his office; an idle one gets little more than his salary. Those parliaments are, perhaps, in many respects, not very convenient courts of justice; but they have never been accused; they seem never even to have been suspected of corruption.

此外，法院的手续费完全足够支付全部的司法经费。这样，司法行政不会有任何实际的腐败风险，还可为国家收入省去一小笔费用负担。如果像君主这样权力极大的人享有一部分法院手续费，且其收入大部分来源于此，则很难对这种手续费进行有效的管理。但如果享有法院手续费的人主要是审判官，那么进行有效的管理就极其容易。法律虽不能使君主始终遵守其规定，但要使审判官遵守却并不难。如果法院手续费得到严密的管理，并在诉讼的一定时期全部交给出纳机

构，在判决结束后才按照一定比例分发给各审判官，那么，征收这种手续费所带来的风险，并不比将其废除所带来的风险大。这种手续费不会使诉讼费用有明显的增加，却可能完全足够支付全部的司法费用。在案件判决后再向审判官支付手续费，可激励法院人员更加勤勉地进行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在审判官人数众多的法院，如果每人应分得的手续费份额，以他们在法院或审判委员会审理案件所花的时间为标准，这种手续费就更能激励各个审判官勤勉判案。只有在已执行的基础上，按勤勉程度来决定酬金，公共事务才能最好地完成。在法国，各高等法院所征收的手续费就是审判官主要的报酬。高居法国第二大法院地位的图卢兹高等法院，其律师或审判官每年由议会领到的薪俸，在扣除一切费用后，只有150里弗赫，约合6英镑10先令，相当于当地7年前一个普通仆役每年的普通工资。这种手续费也是根据各审判官的勤劳来分配的。一个勤勉的审判官，通过工作获得的收入虽然不多，但足以供其过上舒适的生活；而懒惰的审判官，就只能得到比薪俸多一点的收入。这些法国高等法院，也许在很多方面并不那么便利，但也从未受到指责，似乎也从未有腐败之嫌。

The fees of court seem originally to have been the principal support of the different courts of justice in England. Each court endeavoured to draw to itself as much business as it could, and was, upon that account, willing to take cognizance of many suits which were not originally intended to fall under its jurisdiction. The Court of King's bench, instituted for the trial of criminal causes only, took cognizance of civil suits; the plaintiff pretending that the defendant, in not doing him justice, had been guilty of some trespass or misdemeanour. The Court of Exchequer, instituted for the levying of the king's revenue, and for enforcing the payment of such debts only as were due to the king, took cognizance of all other contract debts; the plaintiff alleging that he could not pay the king, because the defendant would not pay him. In consequence of such fictions, it came, in many cases, to depend altogether upon the parties,

before what court they would choose to have their cause tried, and each court endeavoured, by superior dispatch and impartiality, to draw to itself as many causes as it could. The present admirable constitution of the courts of justice in England was, perhaps, originally, in a great measure, formed by this emulation, which anciently took place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judges: each judge endeavouring to give, in his own court, the speediest and most effectual remedy which the law would admit, for every sort of injustice. Originally, the courts of law gave damages onl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The Court of Chancery, as a court of conscience, first took upon it to enforce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agreements. When the breach of contract consisted in the non-payment of money, the damage sustained could be compensated in no other way than by ordering payment, which was equivalent to a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the agreement. In such cases, therefore, the remedy of the courts of law was sufficient. It was not so in others. When the tenant sued his lord for having unjustly outed him of his lease, the damages which he recovered were by no means equivalent to the possession of the land. Such causes, therefore, for some time, went all to the Court of Chancery, to the no small loss of the courts of law. It was to draw back such causes to themselves, that the courts of law are said to have invented the artificial and fictitious Writ of Ejectment, the most effectual remedy for an unjust outer or dispossession of land.

法院手续费最初似乎也是英国各法院的主要费用来源。各法院都竭力接收尽可能多的诉讼案件，因此即使本来不归自己管辖的案件，也愿意受理。英国的最高法院原是专门为审理刑事案件而设的，也会接受民事案件，理由是，原告声称被告者的不法行为犯了非法侵害罪或轻罪。财务大臣法院原本只是为了替国王课征收入和强制人民偿付对国王的债务而设立，但居然也受理其他一切契约债务的诉讼，理由

是，原告声称他之所以不能偿还对国王的债务，是因为被告不偿还对他的债务。由于这些托辞，许多案件完全由诉讼当事人选择由哪个法院审理，而各法院也力求迅速公正地进行审理，以此来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诉讼案件。英国目前的法院制度之所以值得赞赏，追根溯源，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昔日各法院法官之间的相互竞争所致：各个法庭的法官都力求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一切不法行为给予最迅速有效的裁决。最初，对于违反契约的行为，普通法院只是责令被告赔偿损害。高等法院的大法官法庭作为一种债权法院，首先会强制被告履行特定的合同。当被告人因为不肯支付货币而违反契约时，唯一补偿损失的办法就是责令被告偿还，相当于履行特定的合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法院能给予充分的补救，但在其他场合则不然。当佃户控诉他的领主非法夺回其租地时，他所获得的损害赔偿决不是占有土地。因此，在一段时期内，这类案件都由高等法院的大法官法庭审理，普通法院因此蒙受不小的损失。据说普通法院为使此类案件归于自己审理，发明了恢复土地占有令状，对于非法剥夺土地以及侵占土地的行为，这是最有效的法律有段。

A stamp-duty upon the law proceedings of each particular court, to be levied by that court, and applied toward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judges, and other officers belonging to it, might in the same manner, afford a revenue sufficient for defraying the expens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without bringing any burden upon the general revenue of the society. The judges, indeed, might in this case, be under the temptation of multiplying unnecessarily the proceedings upon every cause, in order to increas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produce of such a stamp-duty. It has been the custom in modern Europe to regulate, upon most occasions, the payment of the attorneys and clerks of court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pages which they had occasion to write; the court, however, requiring that each page should contain so many lines, and each line so many word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ir

payment, the attorneys and clerks have contrived to multiply words beyond all necessity, to the corruption of the law language of, I believe, every court of justice in Europe. A like temptation might, perhaps, occasion a like corruption in the form of law proceedings.

各法院在受理诉讼案件时收取印花税，用以维持法院法官及其他人员的生活，由此带来的收入同样足以支付司法行政的费用，并且不会给社会的一般收入增加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审判官的确可能会为了尽量增加印花税收入，而在各案件上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法律程序。按照近代欧洲的惯例，多数情况下，代辩人及法院书记的报酬由其所写的公文纸的页数决定，且法院还明确规定了每页公文的行数及每行的字数。代辩人及法院书记为增加其报酬，往往设法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语句，结果导致欧洲所有法院使用的文字都变得陈腐繁复。同样出于利益的诱惑，法律诉讼的程序或许也同样发生了腐化。

But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e so contrived as to defray its own expense, or whether the judges be maintained by fixed salaries paid to them from some other fund, it does not seem necessary that the person or persons entrusted with the executive power should be charged with the management of that fund, or with the payment of those salaries. That fund might arise from the rent of landed estates, the management of each estate being entrusted to the particular court which was to be maintained by it. That fund might arise even from the interest of a sum of money, the lending out of which might, in the same manner, be entrusted to the court which was to be maintained by it. A part, though indeed but a small part of the salary of the judges of the Court of Session in Scotland, arises from the interest of a sum of money. The necessary instability of such a fund seems, however, to render it an improper one for the maintenance of an institution which ought to last for

ever.

但无论是司法部门自行设法支付司法行政费用，或是司法人员通过其他资金获得定额薪俸，行政部门都没有管理这项基金或支付这类薪俸的责任。这资金可能来自于地租，此时这地租所维持的法院，就应当担负起管理地产的责任。这资金也可能出自一定数额的货币利息，由这利息维持的法院就应当担负起出贷此类货币的责任。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其法官的薪俸就有一小部分来源于一定数额货币的利息。然而，此类资金必然缺乏稳定性，用来维持一个永久存在的机构不大合理。

The separation of the judicial from the executive power, seems originally to have arisen from the increasing business of the society, in consequence of its increasing improvement.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ecame so laborious and so complicated a duty, as to require the undivided attention of the persons to whom it was entrusted. The person entrusted with the executive power, not having leisure to attend to the decision of private causes himself, a deputy was appointed to decide them in his stead. In the progress of the Roman greatness, the consul was too much occupied with the political affairs of the state, to attend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 praetor, therefore, was appointed to administer it in his stead. In the progress of the European monarchies, which were founded upon the ruins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sovereigns and the great lords came universally to consi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s an office both too laborious and too ignoble for them to execute in their own persons. They universally, therefore, discharged themselves of it, by appointing a deputy, bailiff or judge.

最初，司法权和行政权得以分离是由于社会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事务的增加。随着社会事务的增多，司法行政变得愈加繁难复杂，负责处理相关事务的人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同时，负责行政事务的人，因为无暇亲自处理私人诉讼案件，就任命代理人代为裁决。罗马帝国极盛之时，大执政官忙于国家政务，无暇处理司法行政事务，于是就任命司法官来代行这种职务。建立在罗马帝国废墟上的欧洲各王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君主和大领主们都认为亲自处理司法行政事务不仅劳苦，而且也有失其高贵身份。因此，他们都不再执行此类任务，而委任代理者、司法官或审判官去执行。

When the judicial is united to the executive power, it is scarce possible that justice should not frequently be sacrificed to what is vulgarly called politics. The persons entrusted with the great interests of the state may even without any corrupt views, sometimes imagine it necessary to sacrifice to those interests the rights of a private man. But upon the impartial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depends the liberty of every individual, the sense which he has of his own security. In order to make every individual feel himself perfectly secure in the possession of every right which belongs to him,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hat the judicial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 executive power, but that it should be rendered as much as possible independent of that power. The judge should not be liable to be removed from his office according to the caprice of that power. The regular payment of his salary should not depend upon the good will, or even upon the good economy of that power.

当司法权与行政权为一体时，司法很难不沦为所谓政治势力的牺牲品。肩负国家重任的人，即使不心存腐败，有时也不免认为个人权利必须为国家的重大利害做出牺牲。但是，每个人的自由和安全感，都依赖于公平的司法行政。为使每个人安心地享有一切应有的权利，

司法权不但应与行政权分离，而且应当完全独立于行政权。行政当局不得任意罢免审判官，行政部门的意愿和经济政策也不应该影响审判官的报酬。

Part III. Of the Expense of Public Work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第三节、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费用

The third and last duty of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is that of erecting and maintaining those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those public works, which though they may be in the highest degree advantageous to a great society, are, however, of such a nature, that the profit could never repay the expense to any individual, or small number of individuals; and which it, therefore, cannot be expected that any individual, or small number of individuals, should erect or maintain.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duty requires, too, very different degrees of expense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society.

建立并维持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是君主或国家的第三种义务。这些机构和工程，对整个社会来说大有益处，但就其性质来说，若由个人或少数人负责，所得利润决不能补偿其消耗的费用。因此，建设或维持这种工程和机构的义务，决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承担。并且，在不同社会发展时期，执行这种义务所需的费用也大不相同。

After the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works necessary for the defence of the society, and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oth of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mentioned, the other works and institutions of this kind are chiefly those for facilitating the commerce of the society, and those for promoting the instruction of

the people. The institutions for instruction are of two kinds: thos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th, and those for the instruction of people of all ages.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expense of those different sorts of public works and institutions may be most properly defrayed will divide this third part of the present chapter into three different articles.

除了上文论述的国防及司法行政两方面所必需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外，其他类似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主要以促进社会商业和人民教育为目的。其中，教育类设施可分为两种：一是青年教育的设施，一是各年龄人民的教育设施。关于如何妥善地支付此类设施和工程所需的费用，本章将从以下三项内容来论述。

ARTICLE I. Of the Public Works and Institutions for Facilitating the Commerce of the Society.

第一项、论促进社会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

And, first, of those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facilitating commerce in general.

论促进商业总体发展的公共工程和机构

That the ere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public works which facilitate the commerce of any country, such as good roads, bridges, navigable canals, harbours, etc. must require very different degrees

of expense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society, is evident without any proof. The expense of making and maintaining the public roads of any country must evidently increase with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at country, or with the quantity and weight of the goods which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fetch and carry upon those roads. The strength of a bridge must be suited to the number and weight of the carriages which are likely to pass over it. The depth and the supply of water for a navigable canal must be proportioned to the number and tonnage of the lighters which are likely to carry goods upon it; the extent of a harbour, to the number of the shipping which are likely to take shelter in it.

显然，建立并维持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公共工程，能促进一国的商业发展，且其费用在不同社会时期相差甚大。一国建设和维持公路的费用，显然必随该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增加而增加，或者说，必随公路上必须承载的货物量的增加而增加。桥梁的支撑力，必须与可能通行的车辆的数量和重量相适应。运河的深度及水量，必须与可能行驶的货船的数量及吨位相一致。港口的面积，必须适应可能停泊的船舶的数量。

It does not seem necessary that the expense of those public works should be defrayed from that public revenue, as it is commonly called, of which the collection and application is in most countries, assigned to the executive power. The greater part of such public works may easily be so managed, as to afford a particular revenue, sufficient for defraying their own expense without bringing any burden upon the general revenue of the society.

在许多国家，人们所谓的国家收入往往是由行政机构负责征收和

调用的。而这类公共工程的费用，似乎不必由国家收入来负担。大部分此类工程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简单的管理，而且可以带来特定的收入，足以支付自身的费用，不会为社会收入增加负担。

A highway, a bridge, a navigable canal, for example, may, in most cases, be both made and maintained by a small toll upon the carriages which make use of them; a harbour, by a moderate port-duty upon the tonnage of the shipping which load or unload in it. The coinage, another institution for facilitating commerce, in many countries, not only defrays its own expense, but affords a small revenue or a seignorage to the sovereign. The post-office, another institution for the same purpose, over and above defraying its own expense, affords, in almost all countries, a very considerable revenue to the sovereign.

例如，多数情况下，公路、桥梁、运河的建筑费和维持费，都可由通行车辆和船舶缴纳的小额通行费来支付；港口的建筑费和维持费，也可由装卸货的船只缴纳的小额港口税来支付。此外，在许多国家，为促进商业发展而设立的货币铸造机构，不仅可以负担自己的费用，而且能为君主带来一笔小的铸币税收入。几乎在所有国家，另一项商业机构，即邮政局，除负担自身费用外，还为君主带来一项极大的收入。

When the carriages which pass over a highway or a bridge, and the lighters which sail upon a navigable canal, pay toll in proportion to their weight or their tonnage, they pa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ose public works exactly in proportion to the wear and tear which they occasion of them. It seems scarce possible to invent a more equitable way of maintaining such works. This tax

or toll, too, though it is advanced by the carrier, is finally paid by the consumer, to whom it must always be charged in the price of the goods. As the expense of carriage, however, is very much reduced by means of such public works, the goods, notwithstanding the toll, come cheaper to the consumer than they could otherwise have done, their price not being so much raised by the toll, as it is lowered by the cheapness of the carriage. The person who finally pays this tax, therefore, gains by the application more than he loses by the payment of it. His payment is exactly in proportion to his gain. It is, in reality, no more than a part of that gain which he is obliged to give up, in order to get the rest. It seems impossible to imagine a more equitable method of raising a tax.

当车辆或船舶按照其所载货物重量或吨数来缴纳通行税时，实际上是按照对这些公共工程的损耗支付了相应比例的维持费。似乎很难再发现比这更合理的维持公共工程的方法。况且，通行税虽由运送人支付，但往往会转移到货物价格上，最终由消费者承担。然而，因为这类公共工程极大地减少了货物的运输费用，即使商品承担了一定的通行税，其价格对消费者来说也比没有这类公共工程时更便宜。因为通行税所抬高的价格，终究低于被低廉的运输所降低的价格。因此，最后支付税收的人，从税收中获得的利益要大于税收造成的损失。他所支付的和他所得的利益成比例。实际上，他只是舍弃了这一部分小利益，来获得其他的利益而已。似乎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公平的征税方法。

When the toll upon carriages of luxury, upon coaches, post-chaises, etc. is made somewhat higher in proportion to their weight, than upon carriages of necessary use, such as carts, waggons, etc. the indolence and vanity of the rich is made to contribute, in a very easy manner, to the relief of the poor, by rendering cheaper the

transportation of heavy goods to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以车辆的重量为标准，如果对豪华车辆、四马大马车和驿递马车等征收的通行税，高于对日用车辆，如二轮运货马车、四轮马车等征收的税，就可轻易地使懒惰虚荣的富人对贫民施以救济，因为这样一来便降低了运往全国各地的笨重货物的运费。

When highroads, bridges, canals, etc. are in this manner made and supported by the commerce which is carried on by means of them, they can be made only where that commerce requires them, and, consequently, where it is proper to make them. Their expense, too, their grandeur and magnificence, must be suited to what that commerce can afford to pay. They must be made, consequently, as it is proper to make them. A magnificent highroad cannot be made through a desert country, where there is little or no commerce, or merely because it happens to lead to the country villa of the intendant of the province, or to that of some great lord, to whom the intendant finds it convenient to make his court. A great bridge cannot be thrown over a river at a place where nobody passes, or merely to embellish the view from the windows of a neighbouring palace; things which sometimes happen in countries, where works of this kind are carried on by any other revenue than that which they themselves are capable of affording.

公路、桥梁、运河等既促进了商业，又由商业来建造和维持。因此，这种工程只能在商业对其有需要的地方兴建，故而只能在合适的地方建设。此外，建造的费用和规模，也必须适应商业的承受能力，适度而行。宽阔的大道不能建在没有商业的荒芜乡村，也不能单为连

接到省长或省长想要取悦的大领主的乡村别墅而建。同样的，不能在无人通过的地方或仅为增加宫殿外的景色，而在河上建设大桥。在发生此类事件的国家，公共工程建设自身的收入往往无力支付其费用，而由其他的收入予以支付。

In several different parts of Europe, the toll or lock-duty upon a canal is the property of private persons, whose private interest obliges them to keep up the canal. If it is not kept in tolerable order, the navigation necessarily ceases altogether, and, along with it, the whole profit which they can make by the tolls. If those tolls were put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commissioners, who had themselves no interest in them, they might be less attentive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works which produced them. The canal of Languedoc cost the King of France and the province upwards of thirteen millions of livres, which (at twenty-eight livres the mark of silver, the value of French money in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amounted to upwards of nine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When that great work was finished, the most likely method, it was found, of keeping it in constant repair, was to make a present of the tolls to Riquet, the engineer who planned and conducted the work. Those tolls constitute, at present, a very large estate to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the family of that gentleman, who have, therefore, a great interest to keep the work in constant repair. But had those tolls been put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commissioners, who had no such interest, they might perhaps, have been dissipated in ornamental and unnecessary expenses, while the most essential parts of the works were allowed to go to ruin.

在欧洲，一些地方的运河通行税或水闸税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为保持自身利益，这些人会尽力维护运河。如果不对其进行规整，航

运就无法通行，而他们从通行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也将消失殆尽。如果由那些没有利益关系的委员来管理运河的通行税，他们一定不会像个人那样留心维护这些产生通行税的工程。朗格多克运河的建造，耗去法国国王及朗格多克地区超过1,300万里弗赫（按上世纪末法国货币价值计算，每马克银合28里弗赫），约合90万英镑。这项大工程完成时，人们认为，把这运河的通行税全部赠予设计并监督该工程的技师里凯，是维持这一工程的最好办法。目前，这项通行税已成了里凯家族的一大笔财富。因此他们非常关注运河，时常修理。倘若当时把通行税交给与运河无利益关系的委员们管理，那么通行税可能全部消耗在不必要的开销上，而工程最重要的部分则可能任其破败。

The toll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a highroad cannot, with any safety, be made the property of private persons. A highroad, though entirely neglected, does not become altogether impassable, though a canal does. The proprietors of the tolls upon a highroad, therefore, might neglect altogether the repair of the road, and yet continue to levy very nearly the same tolls. It is proper, therefore, that the toll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such a work should be put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commissioners or trustees.

可是，维护公路的通行税，却不能成为个人财产。运河不加修理便会完全不能通航，但公路即使不修理也不会完全无法通行。因此，收取公路通行税者即使不修理道路，却依然可以从道路中获得同样多的通行税。因此，应当由委员或保管员负责维持这一类工程的通行税。

In Great Britain, the abuses which the trustees have committe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ose tolls, have, in many cases, been very justly complained of. At many turnpikes, it has been said, the

money levied is more than double of what is necessary for executing, in the completest manner, the work, which is often executed in a very slovenly manner, and sometimes not executed at all. The system of repairing the highroads by tolls of this kind, it must be observed, is not of very long standing. We should not wonder, therefore, if it has not yet been brought to that degree of perfection of which it seems capable. If mean and improper persons are frequently appointed trustees; and if proper courts of inspection and account have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for controlling their conduct, and for reducing the tolls to what is barely sufficient for executing the work to be done by them; the recency of the institution both accounts and apologizes for those defects, of which, by the wisdom of parliament, the greater part may, in due time, be gradually remedied.

在英国，这些保管员在管理道路通行税方面的弊病，时常引来诸多微词。多数情况下，这些抱怨都是合乎事实的。据说，在许多收费公路上，所征的税额往往是道路修理费用的两倍以上，然而工程却极其马虎，有时甚至根本不进行修理。然而必须注意，以通行税来负担修路费用的制度，并未成立很久，所以，即使还没有尽善尽美，也情有可原。任命不适当的通行税保管员，且不设立监督机构来限制他们滥征通行税的行为，这些缺陷都只因该制度创立不久。假以时日，议会必定采取明智的措施，对其加以矫正。

The money levied at the different turnpikes in Great Britain, is supposed to exceed so much what is necessary for repairing the roads, that the savings which, with proper economy, might be made from it, have been considered, even by some ministers, as a very great resource, which might, at some time or another, be applied to the exigencies of the state. Government, it has been said, by tak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turnpikes into its own hands, and by employing the soldiers, who would work for a very small addition to their pay, could keep the roads in good order, at a much less expense than it can be done by trustees, who have no other workmen to employ, but such as derive their whole subsistence from their wages. A great revenue, half a million, perhaps, it has been pretended, might in this manner be gained, without laying any new burden upon the people; and the turnpike roads might be made to contribute to the general expense of the state,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post-office does at present. {Since publishing the two first editions of this book, I have got good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all the turnpike tolls levied in Great Britain do not produce a neat revenue that amounts to half a million; a sum which,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would not be sufficient to keep, in repair five of the principal roads in the kingdom.}

英国各种收税道路所收的通行税，大大超过了道路修理所需的费用。甚至一些大臣也认为，这多出的数额若不滥用，可以成为一大笔财源，他日可满足国家的紧急需要。有人认为，政府若将收税公路归于自己管理，则对比保管员管理时，效果更好，所费更少。原因在于，保管员只能雇用一些靠工资来赚取生活资料的劳工；而政府可以派士兵来修缮公路，士兵们有固定的薪俸，政府只需略增一些报酬即可。因此有人声称，若由政府管理收税道路，国家可获得50万镑的巨额收入，而不必增加人民负担，收税道路就会和现在的邮政一样，为国家提供一般收入。（自本书前两个版本出版以来，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英国所有收税公路收取的通行税都未达到50万镑。在政府的管理下，这一通行税的金额，甚至不足以支付大不列颠五条主要公路的修缮费用。）

That a considerable revenue might be gained in this manner, I

have no doubt, though probably not near so much as the projectors of this plan have supposed. The plan itself, however, seems liable to several very important objections.

政府管理收税道路所获得的收入，虽不似这些人构想的那样庞大，但无疑是一大笔金额。然而，这计划似乎存在一些重大的缺陷。

First, if the tolls which are levied at the turnpikes should ever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resources for supplying the exigencies of the state, they would certainly be augmented as those exigencies were supposed to require. According to the policy of Great Britain, therefore, they would probably be augmented very fast. The facility with which a great revenue could be drawn from them, would probably encourage administration to recur very frequently to this resource. Though it may, perhaps, be more than doubtful whether half a million could by any economy be saved out of the present tolls, it can scarcely be doubted, but that a million might be saved out of them, if they were doubled; and perhaps two millions, if they were tripled. (I have now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all these conjectural sums are by much too large.) This great revenue, too, might be levied without the appointment of a single new officer to collect and receive it. But the turnpike tolls, being continually augmented in this manner, instead of facilitating the inland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as at present, would soon become a very great incumbrance upon it. The expense of transporting all heavy goods from one part of the country to another, would soon be so much increased, the market for all such goods, consequently, would soon be so much narrowed, that their production would be in a great measure discouraged, and the most important branches of the domestic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annihilated altogether.

第一，若将道路通行税作为国家紧急需要时的资金来源，势必要随国家紧急需求的增加而对其相应增加。因此，根据大不列颠的政策，通行税可能会迅速增长。一项设施如能带来巨大的收入，必然时常被政府挂念。尽管无法确定是否能从当前的通行税中节省出50万镑，但毫无疑问的是，若把通行税增加1倍，就可省下100万镑，若增加3倍，可能省下200万镑。（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以上所推测的资金数额实在过大。）此外，如此大笔收入无需任命一个新的收税官员来征收。但是，如果以此方式不断增加道路通行税，它将无法像现在这样促进国家的商业发展，反而会迅速对商业构成一大障碍。笨重货物在国内各地之间的运输费用将迅速增加，导致这类货物的市场大幅度缩小，其生产也将大受阻碍。如此一来，国内最重要的产业部门也要全部覆灭。

Secondly, a tax upon carriage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weight, though a very equal tax when applied to the sole purpose of repairing the roads, is a very unequal one when applied to any other purpose, or to supply the common exigencies of the state. When it is applied to the sole purpose above mentioned, each carriage is supposed to pay exactly for the wear and tear which that carriage occasions of the roads. But when it is applied to any other purpose, each carriage is supposed to pay for more than that wear and tear, and contributes to the supply of some other exigency of the state. But as the turnpike toll raises the price of good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weight and not to their value, it is chiefly paid by the consumers of coarse and bulky, not by those of precious and light commodities. Whatever exigency of the state, therefore, this tax might be intended to supply, that exigency would be chiefly suppli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poor, not of the rich; at the expense of those who are least able to supply it, not of those who are most able.

第二，根据重量征收的车辆通行税，如以修理道路为唯一目的，这种税就非常公平；但若仍有其他目的，或为了解决国家一般的急需，那么这种税就非常不公平。当道路通行税完全用于修理道路时，各车辆相当于完全按照其对道路所损耗的程度来缴纳税金。但若道路通行税还有其他用途，那么车辆所缴纳的税额，不仅支付了对道路的损耗，还承担了国家其他的急需费用。道路通行税使得货物的价格按其体重而非其价值抬价，因此，承担这种税收的人主要是粗劣笨重商品的消费者，而不是珍贵轻质的商品的消费者。因此，不管国家计划用这种税收来满足哪种急需，最终供应这急需的，不是最能承担这费用的富人，而是无力支付的穷人。

Thirdly, if government should at any time neglect the reparation of highroads, it would be still more difficult, than it is at present, to compel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any part of the turnpike tolls. A large revenue might thus be levied upon the people, without any part of it being applied to the only purpose to which a revenue levied in this manner ought ever to be applied. If the meanness and poverty of the trustees of turnpike roads render it sometimes difficult, at present, to oblige them to repair their wrong; their wealth and greatness would render it ten times more so in the case which is here supposed.

第三，如果政府对损坏的公路不予修理，要强制其适当地调出一部分通行税用于公路修理，将会比现在更困难。如此一来，此项收入虽以修缮道路为唯一目的而向人民征收，却完全背道而驰，丝毫没有用于修缮道路。如果让贫穷的通行税保管人改正弊病，在目前来说并不容易，那么，若由富裕有权势者来管理，要使其根除弊病，恐怕更是难上加难。

In France,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 reparation of the highroads are under the immediate direction of the executive power. Those funds consist, partly in a certain number of days labour, which the country people are in most parts of Europe obliged to give to the reparation of the highways; and partly in such a portion of the general revenue of the state as the king chooses to spare from his other expenses.

在法国，修理公路的基金由国家行政机构直接管理。该基金的一部分，是农村居民每年为修理公路义务提供一定天数的劳役（大部分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另一部分是国王从国家一般收入中划拨出来的修路款项。

By the ancient law of France, as well as by that of most other parts of Europe, the labour of the country people wa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local or provincial magistracy, which had no immediate dependency upon the king's council. But, by the present practice, both the labour of the country people, and whatever other fund the king may choose to assign for the reparation of the highroads in any particular province or generality, are entirely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intendant; an officer who is appointed and removed by the king's council, and who receives his orders from it, and is in constant correspondence with it. In the progress of despotism, the authority of the executive power gradually absorbs that of every other power in the state, and assumes to itself the management of every branch of revenue which is destined for any public purpose. In France, however, the great post-roads, the roads which mak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rincipal towns of the kingdom, are in general kept in good order; and, in some provinces, are even a good deal superior to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turnpike roads of England. But what we call the cross roads, that is,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roads in the country, are entirely neglected, and are in many places absolutely impassable for any heavy carriage. In some places it is even dangerous to travel on horseback, and mules are the only conveyance which can safely be trusted. The proud minister of an ostentatious court, may frequently take pleasure in executing a work of splendour and magnificence, such as a great highway, which is frequently seen by the principal nobility, whose applauses not only flatter his vanity, but even contribute to support his interest at court. But to execute a great number of little works, in which nothing that can be done can make any great appearance, or excite the smallest degree of admiration in any traveller, and which, in short, have nothing to recommend them but their extreme utility, is a business which appears, in every respect, too mean and paltry to merit the attention of so great a magistrate. Under such an administration therefore, such works are almost always entirely neglected.

按法国以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旧时法律，农村居民的劳役，向来由独立于国王枢密院的地方长官指挥监督。但依据现行法令，无论是农村居民提供的劳役，还是国王为特定省份或大部分地区分配的修路基金，全由州长管理；州长由国王的枢密院任免，必须接受枢密院的命令，并不断与其保持联络。随着政治不断专制化，行政机构逐渐大权独揽，将作为公共用途的一切收入全都归于自己管理。尽管如此，联络法国主要都市的大驿路一般都管理的井井有条；在有些省份内，这些大驿路比英国大部分道路宽阔壮观得多。可是在英国，大部分乡下道路，即我们所称的十字路，却全未得到修缮。在许多地方，重载车辆已无法通行，而在一些地方，甚至骑马也有危险，骡是唯一安全可靠的运载工具。身处浮华朝廷的骄傲大臣，往往乐意建造宏伟壮丽的工程，例如王公贵族们时常经过的大道。这些王公贵族的赞赏不但使他感到荣幸，甚至有利于他在朝廷上的地位。而乡村的许多小工

程，既不壮观，也不能赢得途经者的赞赏，除了有很大的实用性外，再无其他可取之处。这类工程的各方面都太过琐碎，身居高位的官吏们自然不会予以关注。所以，在这种人的管理下，此类小工程总是受到忽视。

In China, and in several other governments of Asia, the executive power charges itself both with the reparation of the highroads and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the navigable canals. In the instructions which are given to the governor of each province, those objects, it is said, are constantly recommended to him, and the judgment which the court forms of his conduct is very much regulated by the attention which he appears to have paid to this part of his instructions. This branch of public police, accordingly, is said to be very much attended to in all those countries, but particularly in China, where the highroads, and still more the navigable canals, it is pretended, exceed very much everything of the same kind which is known in Europe. The accounts of those works, however, which have been transmitted to Europe, have generally been drawn up by weak and wondering travellers; frequently by stupid and lying missionaries. If they had been examined by more intelligent eyes, and if the accounts of them had been reported by more faithful witnesses, they would not, perhaps, appear to be so wonderful. The account which Bernier gives of some works of this kind in Indostan, falls very much short of what had been reported of them by other travellers, more disposed to the marvellous than he was. It may too, perhaps, be in those countries, as it is in France, where the great roads, the great communications, which are likely to be the subjects of conversation at the court and in the capital, are attended to, and all the rest neglected. In China, besides, in Indostan, and in several other governments of Asia, the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arises almost altogether from a land tax or

land rent, which rises or falls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The great interest of the sovereign, therefore, his revenue, is in such countries necessarily and immedi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the land, with the greatness of its produce, and with the value of its produce. But in order to render that produce both as great and as valuable as possible, it is necessary to procure to it as extensive a market as possible, and consequently to establish the freest, the easiest, and the least expens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which can be done only by means of the best roads and the best navigable canals. But the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does not, in any part of Europe, arise chiefly from a land tax or land rent. In all the great kingdoms of Europe, perhaps, the greater part of it may ultimately depend upon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but that dependency is neither so immediate nor so evident. In Europe, therefore, the sovereign does not feel himself so directly called upon to promote the increase, both in quantity and value of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or, by maintaining good roads and canals, to provide the most extensive market for that produce. Though it should be true, therefore, what I apprehend is not a little doubtful, that in some parts of Asia this department of the public police is very properly managed by the executive power, there is not the least probability that, during the present state of things, it could be tolerably managed by that power in any part of Europe.

在中国以及亚洲其他一些国家，行政部门负责修缮公路及维持通航水道这两大任务。据说，在朝廷颁给各省官员的指令中，往往命其努力治河修路，并且，朝廷往往根据官员对这部分指令的执行来判断其政绩。因此，此类公共工程在所有这些国家十分受重视，在中国尤其如此。据称，中国的公路大大优于欧洲著名的公路，通航水道更是不在话下。不过，对于这些工程的描述，大多通过一些少见多怪的旅

行者，以及无知、爱说大话的教士传到欧洲的。倘若经过有识之士的观察，并且由可靠之人描述，那里的水道公路工程或许并非如此令人惊异。伯尼尔对印度这类工程所做的描述，就远没有其他旅行者的记述那么夸张。可能这些国家也如同法国一样，只有大的公路和重大的交通设施，才可能成为宫廷讨论的话题，得到养护，其余工程则往往偏废。此外，中印各国君主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土地税或地租。而此类租税的多少，取决于土地年产物的多寡。因此，在这类国家，君主的利益与收入，必然与土地的耕作状况、土地产量和产品的价值量直接相关。为使土地产量大、产品价值高，必然需要为其创造更广阔的市场，故而势必要在国内各地区间建立起最为自由便捷、花费最少的交通系统。而只有建设最好的道路和最好的通航运河，才能维持这种交通系统。然而在欧洲，各国君主的收入并非主要来源于土地税或地租。诚然，欧洲所有大国的大部分收入，也许最终是依赖于土地生产物的，但这种依赖不像在上述亚洲国家那样直接明显。因此，与亚洲君主相比，欧洲各国君主并不急切地增加土地生产物的数量和价值，也不会为扩大土地生产物的市场，而急切地维持良好的道路和水运。所以，即使在亚洲某些地方，此类公共工程可由行政部门有效地管理（如此一来，我此前的理解便大有疑问），但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任何欧洲国家的行政部门都不可能管理好这类工程。

Even those public works, which are of such a nature that they cannot afford any revenue for maintaining themselves, but of which the conveniency is nearly confined to some particular place or district, are always better maintained by a local or provincial revenue,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a local or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than by the general revenue of the state, of which the executive power must always have the management. Were the streets of London to be lighted and pav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treasury, is there any probability that they would be so well lighted and paved as they are at present, or even at so small an expense? The expense, besides, instead of being raised by a local tax upon the

inhabitants of each particular street, parish, or district in London, would, in this case, be defrayed out of the general revenue of the state, and would consequently be raised by a tax upon all the inhabitants of the kingdom, of whom the greater part derive no sort of benefit from the lighting and paving of the streets of London.

即便有些公共工程因其性质而无法供己所需，且只能为特定的地方或区域提供便利。将此类工程归于地方级行政部门管理，由地方收入来维持，总强于由国家一般收入维持，受行政机构管理。若由国库开支，伦敦市街上的照明与铺路能做到现在这样完善，且花费极少吗？况且，这费用不能由伦敦各街坊、教区和市内各区居民缴纳的地方税来支付，因而必然要由国家收入来支付。结果是，举国上下都要为此缴税，那些没有从伦敦街灯和铺路中享受到利益的大部分居民，也要无辜承受这负担。

The abuses which sometimes creep into the local and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a local and provincial revenue, how enormous soever they may appear, are in reality, however, almost always very trifling in comparison of those which commonly take place i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expenditure of the revenue of a great empire. They are, besides, much more easily corrected. Under the local or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Great Britain, the six days labour which the country people are obliged to give to the reparation of the highways, is not always, perhaps, very judiciously applied, but it is scarce ever exacted with any circumstance of cruelty or oppression. In France,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ndants, the application is not always more judicious, and the exaction is frequently the most cruel and oppressive. Such Corvees, as they are called, make one of the principal instruments of tyranny by which those officers chastise

any parish or communaute, which has had the misfortune to fall under their displeasure.

虽然地方政府和省政府管理地方收入和省内收入偶有弊端，但事实上，无论这种弊端多大，与一个大帝国管理和支出其收入时常常发生的弊病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且更容易得到矫正。在英国，农村居民在地方或省级治安推事的管理之下，每年为修缮公路提供六天的义务劳役。即使并非总是施行得当，但也极少采用残酷手段强行征用。在法国，此项劳役归州长管理，不一定比英国施行得当，且往往用残酷手段进行镇压和强征。如果某个教区或村社不幸得罪了官吏，这种劳役就成为官吏欺压当地百姓的工具。

Of the Public Works and Institutions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Facilitating Particular Branches of Commerce.

论促进特殊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

The object of the public works and institutions above mentioned, is to facilitate commerce in general. Bu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some particular branches of it, particular institutions are necessary, which again require a particular and extraordinary expense.

上述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的目的，在于促进一般商业的发展。但若要促进某些特殊商业的发展，则有需要一些特别的设施，以及额外的特殊费用。

Some particular branches of commerce which are carried on with barbarous and uncivilised nations, require extraordinary protection. An ordinary store or counting-house could give little security to the goods of the merchants who trade to the western coast of Africa. To defend them from the barbarous natives,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place where they are deposited should be in some measure fortified. The disorders in the government of Indostan have been supposed to render a like precaution necessary, even among that mild and gentle people; and it was under pretence of securing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 from violence, that both the English and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ies were allowed to erect the first forts which they possessed in that country. Among other nations, whose vigorous government will suffer no strangers to possess any fortified place within their territory, it may be necessary to maintain some ambassador, minister, or consul, who may both decid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ustoms, the differences arising among his own countrymen, and, in their disputes with the natives, may by means of his public character, interfere with more authority and afford them a more powerful protection than they could expect from any private man. The interests of commerce have frequently made it necessary to maintain ministers in foreign countries, where the purposes either of war or alliance would not have required any. The commerce of the Turkey Company first occasion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rdinary ambassador at Constantinople. The first English embassies to Russia arose altogether from commercial interests. The constant interference which those interests necessarily occasioned between the subjects of the different states of Europe, has probably introduced the custom of keeping, in all neighbouring countries, ambassadors or ministers constantly resident, even in the time of peace. This custom, unknown to ancient times, seems not to be older than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or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at is, than the

time when commerce first began to extend itself to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nations of Europe, and when they first began to attend to its interests.

与野蛮未开化的国家通商，通常需要特别保护。对于把货物出售到非洲西海岸的商人，普通的仓库和账房决不能保障其货物安全。为防止土著人抢夺，必须对存货之处加固防御工事。印度人本来温和友善，但印度政局混乱，与其贸易也应加强戒备。英法两国的东印度公司最初在印度建立的几个堡垒，就是以防范暴力、保护生命财产安全为由而获准修建的。在其他国家，强硬的政府往往不容许外国人在其境内兴建防御堡垒，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派驻大使、公使或领事。这些外交使臣可以依本国习惯对国民间的纠纷进行裁决；当自己国民与驻地居民发生争讼时，凭外交官的身份，他们比任何个人都更有权威进行干涉，并且能给其国人更多的保护。商业利益常常使国家必须在外国派驻使馆，而无论战争或同盟关系都没有这等需要。例如，英国在君士坦丁堡派驻大使，最初就是因为土耳其公司的商业活动。英国最初在俄罗斯建立的大使馆，也完全是为了商业利益。欧洲各国之所在和平时期也在一切邻国永久派驻公使，其原因可能就是欧洲各国人民因商业利害不断发生冲突。这种惯例，在古代社会从未有过，其最初形成也不早于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即在商业开始扩展到欧洲大部分国家，欧洲各国开始关注商业利益时。

It seems not unreasonable, that the extraordinary expense which the protection of any particular branch of commerce may occasion, should be defrayed by a moderate tax upon that particular branch; by a moderate fine, for example, to be paid by the traders when they first enter into it; or, what is more equal, by a particular duty of so much per cent. upon the goods which they either import into, or export out of, the particular countries with which it is carried on. The protection of trade, in general, from pirates and

freebooters, is said to have given occasion to the first institution of the duties of customs. But, if it was thought reasonable to lay a general tax upon trade, in order to defray the expense of protecting trade in general, it should seem equally reasonable to lay a particular tax upon a particular branch of trade, in order to defray the extraordinary expense of protecting that branch.

通过向某种特殊商业征收适度的税收，来支付保护这种商业的额外费用，此举合情合理。例如，在商人营业之初征收适当的营业税；或者更公平的做法是，对进口自或出口于特定国家的货物，按一定比例对其征收税费。据说，最初就是为了保护一般贸易免受海盗的抢劫，才建立关税制度，以支付其费用的。国家为支付保护一般贸易的费用，而征收一般税收，此举被视为合情合理的。那么，国家为支付保护特殊商业的额外费用，而征收特殊税费，也同样理所应当。

The protection of trade, in general, has always been considered as essential to the defence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upon that account, a necessary part of the duty of the executive power. The col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 duties of customs, therefore, have always been left to that power. But the protection of any particular branch of trade is a part of the general protection of trade; a part, therefore, of the duty of that power; and if nations always acted consistently, the particular duties levied for the purposes of such particular protection, should always have been left equally to its disposal. But in this respect, as well as in many others, nations have not always acted consistently; and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ommercial states of Europe, particular companies of merchants have had the address to persuade the legislature to entrust to them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part of the duty of the sovereign, together with all the powers which are necessarily

connected with it.

对一般贸易的保护常被视为国防的重中之重，因而也是行政机构必尽的义务。因此，一般关税的征收及使用，往往由行政部门负责。对特殊贸易的保护，是一般贸易保护的一部分，因而也是行政部门应尽的义务。在国家政策前后一致的情况下，为保护特殊贸易而征收的特殊税收，也应该始终由行政当局管理。然而在很多方面，包括在这件事情上，各个国家的行动常是矛盾的。在欧洲大部分商业国家，有一些商人集团就说服了立法机构，把管理此类税收的义务和相应的一切权力全部交付他们。

These companies, though they may, perhaps, have been useful for the first introduction of some branches of commerce, by making, at their own expense, an experiment which the state might not think it prudent to make, have in the long-run proved, universally, either burdensome or useless, and have either mismanaged or confined the trade.

这些公司自出资金，创办政府不敢轻易尝试的某些商业部门，因而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但最终，它们都因为经营不当或业务太狭窄，而对国家再无用处，成为累赘。

When those companies do not trade upon a joint stock, but are obliged to admit any person, properly qualified, upon paying a certain fine, and agreeing to submit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ompany, each member trading upon his own stock, and at his own risk, they are called regulated companies. When they trade upon a joint stock, each member sharing in the common profit or loss, in

proportion to his share in this stock, they are called joint-stock companies. Such companies, whether regulated or joint-stock, sometimes have, and sometimes have not, exclusive privileges.

这种公司有两类，第一类为规约公司。这类公司没有共同资本，凡具有一定资格的人，缴纳一定费用，并同意遵守公司规定，便可加入。各成员自理其款、自担风险。第二类为股份公司。这类公司以共同资本进行贸易，各股东按照所持股份，分配贸易上的一般利润或损失。无论是规约公司还是股份公司，都是时而享有专营特权，时而又不享有这一特权。

Regulated companies resemble, in every respect, the corporation of trades, so common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Europe; and are a sort of enlarged monopolies of the same kind. As no inhabitant of a town can exercise an incorporated trade, without first obtaining his freedom in the incorporation, so, in most cases, no subject of the state can lawfully carry on any branch of foreign trade, for which a regulated company is established, without first becoming a member of that company. The monopoly is more or less strict, according as the terms of admission are more or less difficult, and according as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have more or less authority, or have it more or less in their power to manage in such a manner as to confin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trade to themselves and their particular friends. In the most ancient regulated companies, the privileges of apprenticeship were the same as in other corporations, and entitled the person who had served his time to a member of the company, to become himself a member, either without paying any fine, or upon paying a much smaller one than what was exacted of other people. The usual corporation spirit, wherever the law does

not restrain it, prevails in all regulated companies. When they have been allowed to act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al genius, they have always, in order to confine the competition to as small a number of persons as possible, endeavoured to subject the trade to many burdensome regulations. When the law has restrained them from doing this, they have become altogether useless and insignificant.

规约公司在各个方面都与欧洲各都市普遍通行的同业协会类似，而且同为一种扩大的垄断团体。如果一位都市居民不先从同业协会那里取得自由营业权，他就不能从事同业协会的任何行业。同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国的任何公民，如不先成为规约公司的一员，他在法律上就没有权利经营规约公司任何部门的对外贸易。这种垄断权的强弱，与公司入伙条件的难易，以及公司董事权力之大小（即有多大权力能把公司大部分贸易控制在自己和亲友手中）相对应。一开始，规约公司的学徒所享有的特权与其他公司的无异。凡在公司工作了一定年限的学徒，不用交纳或只须交比平常人少得多的入伙金，即可成为公司的一员。只要法律不加限制，合伙的普通精神就盛行于一切规约公司中。若容许它们依照自然习性行动，它们总是订立种种严苛的规章，企图限制贸易，从而把竞争对象降至最少。但当法律对其行为加以限制时，它们就失去了往日的价值和重要地位。

The regulated companies for foreign commerce which at present subsist in Great Britain, are the ancient merchant-adventurers' company, now commonly called the Hamburg Company, the Russia Company, the Eastland Company, the Turkey Company, and the African Company.

如今，英国对外贸易的规约公司还有五个：汉堡公司（昔日的商人冒险家公司），俄罗斯公司，东方公司，土耳其公司及非洲公司。

The terms of admission into the Hamburg company are now said to be quite easy; and the directors either have it not in their power to subject the trade to any burdensome restraint or regulations, or, at least, have not of late exercised that power. It has not always been so.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fine for admission was fifty, and at one time one hundred pounds, and the conduct of the company was said to be extremely oppressive. In 1643, in 1645, and in 1661, the clothiers and free traders of the West of England complained of them to Parliament, as of monopolists, who confined the trade, and oppressed the manufactures of the country. Though those complaints produced no act of Parliament, they had probably intimidated the company so far, as to oblige them to reform their conduct. Since that time, at least, there have been no complaints against them. By the 10th and 11th of William III. c.6, the fine for admission into the Russia Company was reduced to five pounds; and by the 25th of Charles II. c.7, that for admission into the Eastland Company to forty shilling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weden, Denmark, and Norway, all the countries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Baltic, were exempted from their exclusive charter. The conduct of those companies had probably given occasion to those two Acts of Parliament. Before that time, Sir Josiah Child had represented both these and the Hamburg Company as extremely oppressive, and imputed to their bad management the low state of the trade, which we at that time carried on to the countries comprehended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charters. But though such companies may not, in the present times, be very oppressive, they are certainly altogether useless. To be merely useless, indeed, is perhaps, the highest eulogy which can ever justly be bestowed upon a regulated company; and all the three companies above mentioned seem, in their present state, to deserve this eulogy.

汉堡公司现在的入伙条件，据说非常简单。公司董事没有权力对贸易加以限制，或者至少他们近来从不使用这种权力。但他们并非向来如此。在上世纪中期，该公司的入伙金有时是50镑，有时是100镑。据说，那时候这家公司极其专横。由于该公司以垄断者地位限制贸易，压制其他生产商，因此先后于1643年、1645年和1661年，被英格兰西部毛织业者及自由贸易者诉至议会。这些控诉虽未使议会采取行动，但该公司却大为震慑，不得不改正其行为。自那时起，它至少没有再被控诉了。根据威廉三世第十年和第十一年第6号法令，俄罗斯公司的入伙金减为5镑；根据查理二世第二十五年第7号法令，东方公司的入伙金减为40先令。同时，这两家公司在瑞典、丹麦、挪威，以及在波罗的海北岸所有国家的专营特权，均被取消。议会颁发这两条法令，或许就是这两家公司的行为造成的。在此之前，乔赛亚·柴尔德曾称这两个公司及汉堡公司极其专横，并认为，正是这几家公司经营不当，才导致当时我国与享有特许权的国家间的贸易低迷不振。现在它们也许不再专横，但也失去了往日的价值。毫无价值，实在是规约公司应得的最好赞词，就上述三家公司的现状来说，它们皆可承受这一赞词。

The fine for admission into the Turkey Company was formerly twenty-five pounds for all persons under twenty-six years of age, and fifty pounds for all persons above that age. Nobody but mere merchants could be admitted; a restriction which excluded all shopkeepers and retailers. By a bye-law, no British manufactures could be exported to Turkey but in the general ships of the company; and as those ships sailed always from the port of London, this restriction confined the trade to that expensive port, and the traders to those who lived in London and in its neighbourhood. By another bye-law, no person living within twenty miles of London, and not free of the city, could be admitted a member; another restriction which, joined to the foregoing, necessarily excluded all

but the freemen of London. As the time for the loading and sailing of those general ships depended altogether upon the directors, they could easily fill them with their own goods, and those of their particular friends, to the exclusion of others, who, they might pretend, had made their proposals too late. In this state of things, therefore, this company was, in every respect, a strict and oppressive monopoly. Those abuses gave occasion to the act of the 26th of George II. c. 18, reducing the fine for admission to twenty pounds for all persons, without any distinction of ages, or any restriction, either to mere merchants, or to the freemen of London; and granting to all such persons the liberty of exporting, from all the ports of Great Britain, to any port in Turkey, all British goods of which the exportation was not prohibited, upon paying both the general duties of customs, and the particular duties assessed for defraying the necessary expenses of the company; and submitting, at the same time, to the lawful authority of the British ambassador and consuls resident in Turkey, and to the bye-laws of the company duly enacted. To prevent any oppression by those bye-laws, it was by the same act ordained, that if any seven members of the company conceived themselves aggrieved by any bye-law which should be enacted after the passing of this act, they might appeal to the Board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 (to the authority of which a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has now succeeded), provided such appeal was brought within twelve months after the bye-law was enacted; and that, if any seven members conceived themselves aggrieved by any bye-law which had been enacted before the passing of this act, they might bring a like appeal, provided it was within twelve months after the day on which this act was to take place. The experience of one year, however, may not always be sufficient to discover to all the members of a great company the pernicious tendency of a particular bye-law; and if several of them should afterwards discover it, neither the Board of Trade, nor the

committee of council, can afford them any redress. The object, beside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bye-laws of all regulated companies, as well as of all other corporations, is not so much to oppress those who are already members, as to discourage others from becoming so; which may be done, not only by a high fine, but by many other contrivances. The constant view of such companies is always to raise the rate of their own profit as high as they can; to keep the market, both for the goods which they export, and for those which they import, as much understocked as they can; which can be done only by restraining the competition, or by discouraging new adventurers from entering into the trade. A fine, even of twenty pounds, besides, though it may not, perhaps, be sufficient to discourage any man from entering into the Turkey trade, with an intention to continue in it, may be enough to discourage a speculative merchant from hazarding a single adventure in it. In all trades, the regular established traders, even though not incorporated, naturally combine to raise profits, which are noway so likely to be kept, at all times, down to their proper level, as by the occasional competition of speculative adventurers. The Turkey trade, though in some measure laid open by this Act of Parliament, is still considered by many people as very far from being altogether free. The Turkey Company contribute to maintain an ambassador and two or three consuls, who, like other public ministers, ought to be maintained altogether by the state, and the trade laid open to all his Majesty's subjects. The different taxes levied by the company, for this and other corporation purposes, might afford a revenue much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enable the state to maintain such ministers.

土耳其公司以往的入伙金，26岁以下者缴纳25镑，26岁以上者缴纳50镑。只有纯粹的商人才可加入。这一限制，把所有店员和零售

商都排斥在外。该公司章程规定，凡从英国出口至土耳其的制造品，只能由该公司船舶运输。由于该公司船舶一般由伦敦港起航，因此，英国对土耳其的贸易就局限于这个费用昂贵的港口上，此项贸易的经营者也局限于伦敦附近的居民了。该公司的另一章程又规定，凡居住在伦敦市20英里以外，且不拥有该市市民身份者，不得成为该公司的一员。这两种限制章程，必然把一切非伦敦市民者都排斥在外。由于该公司船舶的上货及起航时间概由公司董事决定，因此董事往往在船上装满自己及特殊亲友的货物，而以托运过迟为由，拒绝运载他人的货物。在这种情况下，该公司十足是一个专横的垄断组织。为纠正这种种弊端，乔治二世二十年第18号法令规定，不论年龄大小，也不论是否纯粹商人、是否取得伦敦市民身份，凡愿入伙者，缴纳入伙费20镑，即可成为公司成员。并且，除禁止出口的货物外，这些人一旦入伙，便可自由地从英国任一港口，将任何英国货物出口至土耳其任何地方；除禁止进口的商品外，他们可以自由进口一切土耳其商品，但必须缴纳普通关税和为支付该公司必要费用而征收的特殊税费，同时还必须服从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与领事的合法权威，须遵守公司制定的章程。为防范公司章程过于专横，该法令又规定，此法令生效后公司所订章程，如有任何七个合伙人感到受其侵害，可在章程制定一年内，向贸易及种植园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能现由枢密院所组织的委员会接管）申请修改。此外，此法令生效以前公司所制定的任何章程，如有任何七个合伙人感到受其侵害，也可在该法令生效后一年内呈请修改。一年的时间并不足以让大公司中各成员发现某一章程的弊端。倘有若干成员在限定期限后才发现一些弊端，那么即使贸易委员会和枢密院委员会也无能为力。此外，与一切同业协会的章程一样，一切规约公司的大部分章程，都不是为了压制其合伙人，而是为了阻止外人加入。除设置极高的入伙费外，它们还可使用其他许多策略以达到这一目的。此类公司长期的目标在于尽量抬高利润；为保证其进出口货物的市场供不应求，他们唯有限制竞争，阻止新的贸易商人加入同一贸易。此外，20镑的入伙费或许不足以阻拦一个想长久从事土耳其贸易的人加入，却可以使只想试一次的投机商人打消这一念头。在任何行业，长期从业者们即使未组建合并，也自然会联合起来抬高利润。投机者们偶尔带来的竞争，从来都无法使这种利润降至适当的

水平。英国对土耳其的贸易，虽在某种程度上由这条议会法案开放了，但在许多人看来，还远未达到完全自由的状态。土耳其公司担负了一名大使和两三名领事的维持费。其实，公使和领事与其他国家官员一样，本应由国家收入维持。而与土耳其的贸易，也应当对国王的所有臣民开放。况且，该公司为各种目的而征收的各项税务带来的收入，足以维持这几个驻外官员而有余。

Regulated companies, it was observed by Sir Josiah Child, though they had frequently supported public ministers, had never maintained any forts or garrisons in the countries to which they traded; whereas joint-stock companies frequently had. And, in reality, the former seem to be much more unfit for this sort of service than the latter. First, the directors of a regulated company have no particular interest in the prosperity of the general trade of the company, for the sake of which such forts and garrisons are maintained. The decay of that general trade may even frequently contribute to the advantage of their own private trade; as, by diminishing the number of their competitors, it may enable them both to buy cheaper, and to sell dearer. The directors of a joint-stock company, on the contrary, having only their share in the profits which are made upon the common stock committed to their management, have no private trade of their own, of which the interest can be separated from that of the general trade of the company. Their private interest is connected with the prosperity of the general trade of the company, and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the forts and garrisons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its defence. They are more likely, therefore, to have that continual and careful attention which that maintenance necessarily requires. Secondly, the directors of a joint-stock company have always the management of a large capital, the joint stock of the company, a part of which they may frequently employ, with propriety, in building, repairing, and

maintaining such necessary forts and garrisons. But the directors of a regulated company, having the management of no common capital, have no other fund to employ in this way, but the casual revenue arising from the admission fines, and from the corporation duties imposed upon the trade of the company. Though they had the same interest, therefore, to attend to the maintenance of such forts and garrisons, they can seldom have the same ability to render that attention effectual. The maintenance of a public minister, requiring scarce any attention, and but a moderate and limited expense, is a business much more suitable both to the temper and abilities of a regulated company.

据乔赛亚·柴尔德称，规约公司虽负责维持驻外官吏，却从未在与其贸易的国家维持任何堡垒和守备队。相反，股份公司却常常在贸易国维持堡垒和守备队。事实上，股份公司确实比规约公司更适合承当这一任务。第一，维持堡垒和守备队的目的在于保障公司一般贸易的繁荣，而此类贸易的繁荣对规约公司的董事并无特别的利害关系。相反，公司一般贸易衰退时，董事私人贸易的竞争者减少，他们就能贱买贵卖，从中获益。股份公司董事则不同。他们没有可以与公司的一般贸易分开的个人业务，且他们的个人利益，完全包含在其管理的共同资本所产生的共同利润中。他们的私人利益就与公司一般贸易的繁荣密切相关，从而也与保障这繁荣的堡垒和守备队的维持密切相关。因此，与规约公司相比，股份公司更可能持续关注对堡垒和或守备队的维持。第二，股份公司的董事常掌管一大笔公司的共同资本。必要时，他们随时可以适当地拨出一部分资本，用于堡垒和守备队的建设、修整和维持。而规约公司的董事则没有掌管任何共同资本。除了入伙金和对公司贸易征收的合伙税等临时性收入，再没有其他资金可以动用。所以，即使他们和股份公司董事一样，出于利害关系而关注堡垒和守备队的维持，但也很少有同样的资力来实施。维持驻外官员无需过多操心，只需适度的费用，因此与规约公司的性质和能力更为相称。

Long after the time of Sir Josiah Child, however, in 1750, a regulated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the present company of merchants trading to Africa; which was expressly charged at first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all the British forts and garrisons that lie between Cape Blanc a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and afterwards with that of those only which lie between Cape Rouge a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The act which establishes this company (the 23rd of George II. c.3), seems to have had two distinct objects in view; first, to restrain effectually the oppressive and monopolizing spirit which is natural to the directors of a regulated company; and, secondly, to force them, as much as possible, to give an attention, which is not natural to them, towards the maintenance of forts and garrisons.

柴尔德的时代过去很久后，1750年，一个规约公司又建立了，即现在的非洲贸易商人公司。最初，该公司负担非洲沿岸由布朗角至好望角间一切英国堡垒和守备队的维持费；后来只负责维持鲁杰角到好望角之间所有的堡垒和守备队。政府关于设立该公司的法案（乔治二世第二十年第3号法令），似乎有两个明确的目标：第一，有效地限制规约公司董事的压迫和垄断倾向；第二，强迫他们走出惯性思维，尽可能去关注堡垒与守备队的维持。

For the first of these purposes, the fine for admission is limited to forty shillings. The company is prohibited from trading in their corporate capacity, or upon a joint stock; from borrowing money upon common seal, or from laying any restraints upon the trade, which may be carried on freely from all places, and by all persons being British subjects, and paying the fine. The government is in a committee of nine persons, who meet at London, but who are chosen annually by the freemen of the company at London, Bristol,

and Liverpool; three from each place. No committeeman can be continued in office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together. Any committeeman might be removed by the Board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 now by a committee council, after being heard in his own defence. The committee are forbid to export negroes from Africa, or to import any African goods into Great Britain. But as they are charged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forts and garrisons, they may, for that purpose export from Great Britain to Africa goods and stores of different kinds. Out of the monies which they shall receive from the company, they are allowed a sum, not exceeding eight hundred pounds, for the salaries of their clerks and agents at London, Bristol, and Liverpool, the house-rent of their offices at London, and all other expenses of management, commission, and agency, in England. What remains of this sum, after defraying these different expenses, they may divide among themselves, as compensation for their trouble, in what manner they think proper. By this constitution, it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that the spirit of monopoly would have been effectually restrained, and the first of these purposes sufficiently answered. It would seem, however, that it had not. Though by the 4th of George III. c.20, the fort of Senegal, with all its dependencies, had been invested in the company of merchants trading to Africa, yet, in the year following (by the 5th of George III. c.44), not only Senegal and its dependencies, but the whole coast, from the port of Sallee, in south Barbary, to Cape Rouge, was exempted from the jurisdiction of that company, was vested in the crown, and the trade to it declared free to all his majesty's subjects. The company had been suspected of restraining the trade and of establishing some sort of improper monopoly. It is not, however, very easy to conceive how, under the regulations of the 23d George II. they could do so. In the printed debate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not always the most authentic records of truth, I observe, however, that they have been accused of

this.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of nine being all merchants, and the governors and factors in their different forts and settlements being all dependent upon them, it is not unlikely that the latter might have given peculiar attention to the consignments and commissions of the former, which would establish a real monopoly.

对于第一个目标，该法案将入伙费限定为40先令。此外，该法案禁止该公司以法人资格或合股经营的身份从事贸易；禁止该公司以公司印章借贷资本；允许所有缴费入伙的英国公民在各地自由贸易，不得加以限制。公司的管理权由驻伦敦的九人委员会掌控。每年从伦敦、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三地的公司合伙人中各选3名，组成9人委员会。任何委员都不得连任3年以上。任何委员若有不当行为，贸易及种植园委员会（现由枢密院委员会代行其职）可在听取其本人的辩护后予以免职。该法案禁止委员会由非洲输出黑奴，或将非洲货物进口到英国。但由于他们须负责维持驻在非洲的堡垒和守备军，所以可以由英国向非洲输出各种相关的货物及军需品。委员会可以在公司所给的资金中，支取不超过800镑金额，用于支付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三地的办事人员和经理人的薪俸，伦敦办公室的房租，以及其他一切杂费。在支付以上费用后，若此金额还有剩余，委员可以自行分配，作为他们辛苦的报酬。规定如此严格，本应能够有效限制垄断行为，充分实现第一项目标。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依乔治三世第四年第20号法令规定，塞内加尔的堡垒及其所有属地，全由非洲贸易商人公司管理。但第二年，乔治三世第五年第44号法令规定，该公司要把塞内加尔及其属地，连同由南巴巴利的萨利港至鲁杰角全海岸的管理权，全部移交国王。该法令还宣称，国王的所有臣民都可自由地进行非洲贸易。之所以颁布此法令，概因该公司有限制贸易并建立不正当垄断地位的嫌疑。然而，在乔治二世第二十三年法令的管制下，很难想象他们也会如此。但是，我曾在下议院的议事录（可能并不是最真实的记载）中看到他们受到这种控告。委员会的九位委员都是大商人，各堡垒及殖民地的官员都依靠他们来维持，因此很可能对委员会

的委任予以特别关注。如此一来，真正的垄断就形成了。

For the second of these purpose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forts and garrisons, an annual sum has been allotted to them by Parliament, generally about £13,000. For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this sum, the committee is obliged to account annually to the Cursitor Baron of Exchequer; which account is afterwards to be laid before Parliament. But Parliament, which gives so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millions, is not likely to give much to that of £13,000 a year; and the Cursitor Baron of Exchequer, from his profession and education, is not likely to be profoundly skilled in the proper expense of forts and garrisons. The captains of his Majesty's navy, indeed, or any other commissioned officers, appointed by the Board of Admiralty, may inquire into the condition of the forts and garrisons, and report their observations to that board. But that board seems to have no direct jurisdiction over the committee, nor any authority to correct those whose conduct it may thus inquire into; and the captains of his Majesty's navy, besides, are not supposed to be always deeply learned in the science of fortification. Removal from an office, which can be enjoyed only for the term of three years, and of which the lawful emoluments, even during that term, are so very small, seems to be the utmost punishment to which any committee-man is liable, for any fault, except direct malversation, or embezzlement, either of the public money, or of that of the company; and the fear of the punishment can never be a motive of sufficient weight to force a continual and careful attention to a business to which he has no other interest to attend. The committee are accused of having sent out bricks and stones from England for the reparation of Cape Coast Castle, on the coast of Guinea; a business for which Parliament had several times granted an extraordinary sum of money. These bricks and stones,

too, which had thus been sent upon so long a voyage, were said to have been of so bad a quality,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rebuild, from the foundation, the walls which had been repaired with them. The forts and garrisons which lie north of Cape Rouge, are not only maintain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state, but are under the immediate government of the executive power; and why those which lie south of that Cape, and which, too, are, in part at least, maintain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state, should be under a different government, it seems not very easy even to imagine a good reas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trade was the original purpose or pretence of the garrisons of Gibraltar and Minorca; and the maintenance and government of those garrisons have always been, very properly, committed, not to the Turkey Company, but to the executive power. In the extent of its dominion consists, in a great measure, the pride and dignity of that power; and it is not very likely to fail in attention to w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defence of that dominion. The garrisons at Gibraltar and Minorca, accordingly, have never been neglected; though Minorca has been twice taken, and is now probably lost for ever, that disaster was never even imputed to any neglect in the executive power. I would not, however, be understood to insinuate, that either of those expensive garrisons was ever, even in the smallest degree, necessary for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y were originally dismembered from the Spanish monarchy. That dismemberment, perhaps, never served any other real purpose than to alienate from England her natural ally the King of Spain, and to unite the two principal branches of the house of Bourbon in a much stricter and more permanent alliance than the ties of blood could ever have united them.

对于第二个目标，该法令规定：每年由议会拨给该公司13,000镑，作为堡垒和守备部队的维持费。公司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国库会计

报告这笔金额的使用情况，国库主计再向议会报告。但议会对数百万镑金额的使用也不放在心上，更不可能会关注这区区13,000镑的使用。而且，国库会计就其职务和教育而言，不太可能知晓堡垒和守备队的经费是否使用得当。国王的海军舰长或海军部委派的将官确实可以在海军部的委派下，调查堡垒和守备队的情况。但海军部似乎对该委员会没有直接支配权，也没有纠正被调查者行动的权力。此外，国王的海军舰长未必精通筑建堡垒这门学问。如非侵吞公款，欲对这些委员加以处罚，也不过罢免官职；委员的任期不过三年，而报酬又少，要想通过罢免来强制他们，使他们经常想到对自己并无利益关系的守戍事务，不太可能。为修缮几内亚海岸角堡的堡垒，议会曾几度予以特殊拨款。有人控诉该委员会由英格兰长途运去的砖石质量很差，以致用那砖石修筑的墙必须推倒再建。鲁杰角以北的堡垒要塞，不但由国家维持，其管辖权亦由行政当局掌管。但该角以南的堡垒要塞至少一部分也同样属于国家，而其管辖权却另归他处，实在令人费解。直布罗陀及米诺卡的守备设施，原本建筑目的或借口在于保护地中海贸易。这类守戍设施的维持及管理，从未交付土耳其公司，而始终由行政部门掌控。行政部门统治领域的广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威信所在，所以，必然不会忽视该领域的必要防御措施。实际上，直布罗陀及米诺卡要塞的管理从未被忽视。虽米诺卡曾两次被夺，且大概永远也无法收回，但从未被归咎于行政当局管辖上的疏忽。不过，我并非在暗示，有必要把这些耗费庞大的要塞从西班牙手中夺过来。夺取这些要塞意义不大，只会使英国与其自然的同盟者西班牙疏远，并使波旁王室的两大分支结成比血缘关系的更牢固更永久的同盟。

Joint-stock companies, established either by Royal Charter, or by Act of Parliament, are different in several respects, not only from regulated companies, but from private copartneries.

股份公司的设立，可经国王特许，也可由议会通过。其性质不但与规约公司不同，也与私人合伙公司相异。

First, in a private copartnery, no partner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company, can transfer his share to another person, or introduce a new member into the company. Each member, however, may, upon proper warning, withdraw from the copartnery, and demand payment from them of his share of the common stock. In a joint-stock company, on the contrary, no member can demand payment of his share from the company; but each member can, without their consent, transfer his share to another person, and thereby introduce a new member. The value of a share in a joint stock is always the price which it will bring in the market; and this may be either greater or less in any proportion, than the sum which its owner stands credited for in the stock of the company.

第一，在私人合伙公司中，合伙人不得在未经全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把股份转让给他人，或介绍他人入伙。但合伙人可以预先声明要退出，经过一定时间后拿回其股本。与之相反，在股份公司，股东不能要求从公司撤出其股本，但可将股票让渡给他人，从而引入新的股东。股票价值由其在市场上的价格决定，而市场上的价格不断波动，因此，股票所有者的实际股金常与股票上注明的金额有出入。

Secondly, in a private copartnery, each partner is bound for the debts contracted by the company, to the whole extent of his fortune. In a joint-stock company, on the contrary, each partner is bound only to the extent of his share.

第二，在私人合伙公司，各合伙人对公司全部债务负责。相反，在股份公司，各股东只按其股份来对公司债务负责

The trade of a joint-stock company is always managed by a court of directors. This court, indeed, is frequently subject, in many respects, to the control of a general court of proprietors. But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proprietors seldom pretend to understand anything of the business of the company; and when the spirit of faction happens not to prevail among them, give themselves no trouble about it, but receive contentedly such half-yearly or yearly dividend as the directors think proper to make to them. This total exemption from trouble and from risk, beyond a limited sum, encourages many people to become adventurers in joint-stock companies, who would, upon no account, hazard their fortunes in any private copartnery. Such companies, therefore, commonly draw to themselves much greater stocks, than any private copartnery can boast of. The trading stock of the South Sea Company at one time amounted to upwards of thirty-three millions eight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The divided capital of the Bank of England amounts, at present, to ten millions seven hundred and eighty thousand pounds. The directors of such companies, however, being the managers rather of other people's money than of their own, it cannot well be expected that they should watch over it with the same anxious vigilance with which the partners in a private copartnery frequently watch over their own. Like the stewards of a rich man, they are apt to consider attention to small matters as not for their master's honour, and very easily give themselves a dispensation from having it. Negligence and profusion, therefore, must always prevail, more or less,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affairs of such a company. It is upon this account, that joint-stock companies for foreign trade have seldom been able to maintain the competition against private adventurers. They have, accordingly, very seldom succeeded without an exclusive privilege; and frequently have not succeeded with one. Without an exclusive privilege, they have commonly mismanaged the trade. With an

exclusive privilege, they have both mismanaged and confined it.

股份公司历来由董事会经营。诚然，董事会在各方面受股东大会的支配。但大部分股东对于公司业务并不了解，如股东大会内部未出现派别之争，他们一般不会让董事会为难，而是满意地接受董事会每年或每半年分配给他们的股息。如此一来，既省去很多麻烦，又不用担太大风险，自然会鼓舞很多人将资金投入到股份公司，而不投于有风险的私人合伙公司。因此，股份公司吸收的资本通常超过任何私人合伙公司。在某一时期，南海公司的营业资本曾超过3,380万镑。英格兰银行的分红股本目前已达1,078万镑。不过，股份公司的董事是在为他人管理资金，而私人合伙公司的合伙人则是为自己管理资金。所以，在对财务的管理上，股份公司董事们很难做到像私人合伙公司合伙人那样警惕细心。就好比富人的管家，他们往往认为在小事上计较，于主人的荣誉无益，因此对于一些细枝末节也就不加理会了。因此，股份公司的业务经营中难免会产生疏忽和浪费。正因如此，从事对外贸易的股份公司，才往往无法与私人贸易商竞争。所以，股份公司很少在没有取得专营的特权时获得成功，即使取得了专营特权也鲜少成功。没有特权时他们往往经营不善，即便有了特权，他们不但仍旧经营不善，还会限制贸易的发展。

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 the predecessors of the present African Company, had an exclusive privilege by charter; but as that charter had not been confirmed by Act of Parliament, the trade, in consequence of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was, soon after the Revolution, laid open to all his Majesty's subjects. The Hudson's Bay Company are, as to their legal rights, in the same situation as 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 Their exclusive charter has not been confirmed by act of parliament. The South Sea Company, as long as they continued to be a trading company, had an exclusive privilege confirmed by Act of Parliament; as have likewise the present 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

皇家非洲公司，即如今的非洲公司的前身，曾经取得了专营特权。但这一特许状未经议会通过，因此，在英国的权利宣言出现后不久，非洲贸易就对全国人民开放了。在法律权利上，哈德逊湾公司与皇家非洲公司一样，其特许状亦未经议会通过。南海公司作为贸易公司期间，所享有的专营特权是经议会通过的。如今和东印度进行贸易的联合商人公司也是如此。

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 soon found that they could not maintain the competition against private adventurers, whom, notwithstanding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they continued for some time to call interlopers, and to persecute as such. In 1698, however, the private adventurers were subjected to a duty of ten per cent. upon almost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their trade, to be employed by the company in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forts and garrisons. But, notwithstanding this heavy tax, the company were still unable to maintain the competition. Their stock and credit gradually declined. In 1712, their debts had become so great, that a particular Act of Parliament was thought necessary, both for their security and for that of their creditors. It was enacted, that the resolution of two-thirds of these creditors in number and value should bind the rest, both with regard to the time which should be allowed to the company for the payment of their debts, and with regard to any other agreement which it might be thought proper to make with them concerning those debts. In 1730, their affairs were in so great disorder, that they were altogether incapable of maintaining their forts and garrisons, the sole purpose and pretext of their institution. From that year till their final dissolution, the Parliament judged it necessary to allow the annual sum of £10,000

for that purpose. In 1732, after having been for many years losers by the trade of carrying negroes to the West Indies, they at last resolved to give it up altogether; to sell to the private traders to America the negroes which they purchased upon the coast; and to employ their servants in a trade to the inland parts of Africa for gold dust, elephants teeth, dyeing drugs, etc. But their success in this more confined trade was not greater than in their former extensive one. Their affairs continued to go gradually to decline, till at last, being in every respect a bankrupt company, they were dissolved by Act of Parliament, and their forts and garrisons vested in the present regula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trading to Africa. Before the erection of 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 there had been three other joint-stock companies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one after another, for the African trade. They were all equally unsuccessful. They all, however, had exclusive charters, which, though not confirmed by Act of Parliament, were in those days supposed to convey a real exclusive privilege.

非洲贸易开放后，皇家非洲公司很快发现自己决难与非私人贸易商竞争。于是他们枉顾权利宣言，在一段时间里把这些私人贸易商称为无执照营业者，并以此为由加以迫害。1698年，私人贸易商几乎所有部门的贸易都须缴纳10%的税，税款由公司用于维持堡垒及守备队。但即使对私人贸易商课以重税，公司仍不是私人的竞争对手。公司的资本及信用日渐衰退。至1712年，皇家非洲公司负债累累，为保障公司及债权人的安全，议会制定了一条特殊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公司债务的偿付日期以及关于债务的其他必要协定，只需由公司2/3以上的债权人（就人数和价值而言）做出决议，就可对全体债权人有约束力。1730年，公司业务极度混乱，甚至无力维持它所管辖的堡垒和守备队，尽管当初设立该公司的唯一目的或托辞，就是维持这些堡垒和守备队。议会迫于形势所需，决定每年拨款10,000镑，用于维持这些堡垒和守备队，直到该公司解散为止。1732年，由于多年来对西

印度的黑奴贸易持续亏损，该公司决定从此中止此类贸易，而把已经由非洲海岸购买的黑奴转卖给美洲的私人贸易者，派公司雇员去非洲内地从事金沙、象牙和染料等贸易。但贸易范围虽缩小了，经营起来却并不比之前大范围的贸易更得心应手。公司业务依然日渐衰退，到了最后濒临破产之时，议会便下令将其解散了。其堡垒和守备队，如今由在非洲贸易商人所组建的规约公司管理。在组建皇家非洲公司之前，先后连续组建了三家经营非洲贸易的股份公司，但都没有成功。然而它们都持有特许状，虽未经议会通过，但在当时确实是享有真正的专营特权。

The Hudson's Bay Company, before their misfortunes in the late war, had been much more fortunate than 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 Their necessary expense is much smaller. The whole number of people whom they maintain in their different settlements and habitations, which they have honoured with the name of forts, is said not to exceed a hundred and twenty persons. This number, however, is sufficient to prepare beforehand the cargo of furs and other goods necessary for loading their ships, which, on account of the ice, can seldom remain above six or eight weeks in those seas. This advantage of having a cargo ready prepared, could not, for several years, be acquired by private adventurers; and without it there seems to be no possibility of trading to Hudson's Bay. The moderat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which, it is said, does not exceed one hundred and ten thousand pounds, may, besides, be sufficient to enable them to engross the whole, or almost the whole trade and surplus produce, of the miserable though extensive country comprehended within their charter. No private adventurers, accordingly, have ever attempted to trade to that country in competition with them. This company, therefore, have always enjoyed an exclusive trade, in fact, though they may have no right to it in law. Over and above all this, the moderate capital of this

company is said to be divided among a very small number of proprietors. But a joint-stock company, consisting of a small number of proprietors, with a moderate capital, approaches very nearly to the nature of a private copartnery, and may be capable of nearly the same degree of vigilance and attention. It is not to be wondered at, therefore, if, in consequence of these different advantages, the Hudson 's Bay Company had, before the late war, been able to carry on their trade with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success. It does not seem probable, however, that their profits ever approached to what the late Mr Dobbs imagined them. A much more sober and judicious writer, Mr Anderson, author of *The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Commerce* , very justly observes, that upon examining the accounts of which Mr. Dobbs himself has given for several years together, of their exports and imports, and upon making proper allowances for their extraordinary risk and expense,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their profits deserve to be envied, or that they can much, if at all, exceed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trade.

哈德逊湾公司虽在上次战争中运气不佳，但在此以前，却比皇家非洲公司幸运很多。它的必要费用很少，在各殖民地及居留地（该公司美其名曰堡垒）所维持的人数，据说总共不超过120名。但人数虽少，却足够在该公司货船未到以前，准备好装满货船所需数量的毛皮及其他货物。由于当地港口结冰期长，船舶很少能停泊七八周以上；因此，预先备货十分必要。做不到这一点，就无法在哈德逊湾从事贸易。而私人贸易商想做到这一点，往往需要数年的功夫。所以，该公司资本虽据说不到11万镑，然而已足够使它在那片广阔却贫乏的特许地带，将全部或大部分贸易和剩余生产物都垄断为己用。私人贸易商从未试图到那种地方与该公司竞争，所以，该公司虽在法律上不拥有专营特权，而实际上却已享受了专营贸易的利益。除此之外，该公司所拥有的少额资本，据说只在数量极少的股东之间进行分配。一个由

少数股东和小额资本组成的股份公司，其性质接近于私人合伙公司，从而几乎能和私人合伙公司实现同样谨慎细心的管理。鉴于其种种有利地位，哈德逊湾公司在上次战争前的贸易取得巨大成功，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该公司获得的利润，似乎没有多布斯所想象的那么多。《商业上历史和年代的推断》的作者安得生，比多布斯审慎明断许多。他在研究多布斯关于该公司数年中全部的进出口报告，并考虑该公司所冒的大危险和巨大开支后，认为该公司的利润并没有超过一般的贸易利润很多，因此并不值得羡慕。多布斯的这一评论很是恰当。

The South Sea Company never had any forts or garrisons to maintain, and therefore were entirely exempted from one great expense, to which other joint-stock companies for foreign trade are subject. But they had an immense capital divided among an immense number of proprietors. It was naturally to be expected, therefore, that folly, negligence, and profusion, should prevail in the whole management of their affairs. The knavery and extravagance of their stock-jobbing projects are sufficiently known, and the explication of them would be foreign to the present subject. Their mercantile projects were not much better conducted. The first trade which they engaged in, was that of supplying the Spanish West Indies with negroes, of which (in consequence of what was called the Assiento contract granted them by the Treaty of Utrecht) they had the exclusive privilege. But as it was not expected that much profit could be made by this trade, both the Portuguese and French companies, who had enjoyed it upon the same terms before them, having been ruined by it, they were allowed, as compensation, to send annually a ship of a certain burden, to trade directly to the Spanish West Indies. Of the ten voyages which this annual ship was allowed to make, they are said to have gained considerably by one, that of the Royal Caroline, in 1731, and to

have been losers, more or less, by almost all the rest. Their ill success was imputed, by their factors and agents, to the extortion and oppression of the Spanish government; but was, perhaps, principally owing to the profusion and depredations of those very factors and agents, some of whom are said to have acquired great fortunes, even in one year. In 1734, the company petitioned the king, that they might be allowed to dispose of the trade and tonnage of their annual ship, on account of the little profit which they made by it, and to accept such equivalent as they could obtain from the king of Spain.

南海公司从没有维持任何堡垒或守备队，因而完全无需负担其他对外贸易公司所负担的一大笔费用。不过，该公司资金额太大，股东人数众多，因而其整体业务经营难免会不明智，时有疏忽和浪费。至于其狡诈、无节制的招股计划，已为人所熟知，此处便不予以讨论了。而其商业计划的施行，也比招股计划好不了多少。该公司最初经营的贸易，就是把黑奴运往西属西印度群岛。由于《尤特雷特条约》中所谓“阿西思托约定”的认可，该公司取得了这种贸易的专营特权。但尽管如此，这项贸易却不一定能带来多少利润。因为，在该公司之前，葡萄牙及法国两国的公司同样对这种贸易享有特权，但纷纷倒闭了。作为前车之鉴，该公司获准每年派遣一定吨位的船舶，直接与西属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作为弥补。但结果该公司所派船舶的10次航行中，只有1731年加洛林皇后号的航行，获得巨大的利润，其余9次，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亏损。该公司的代理人都把贸易的失败归因于西班牙政府的强夺与压迫，但其主要原因或许是代理人的浪费与挥霍。据说，有好几个代理人在一年时间内就大发横财。1734年，该公司以营业利润太低为由，请求英王许其将贸易权与每年派遣的船舶等价卖给西班牙国王。

In 1724, this company had undertaken the whale fishery. Of

this, indeed, they had no monopoly; but as long as they carried it on, no other British subjects appear to have engaged in it. Of the eight voyages which their ships made to Greenland, they were gainers by one, and losers by all the rest. After their eighth and last voyage, when they had sold their ships, stores, and utensils, they found that their whole loss upon this branch, capital and interest included, amounted to upwards of £237,000.

1724年，该公司开始经营捕鲸业。它确实未曾对这项业务享有垄断权，但在它经营期间，并无其他英国人从事这项业务。该公司的船舶曾八次航行至格林兰，但仅有一次获利，其余几次皆亏损。在最后一次航行后，该公司拍卖其船只、存货和渔具时才发现，这项业务连同资本与利息，全部损失已超过237,000镑。

In 1722, this company petitioned the Parliament to be allowed to divide their immense capital of more than thirty-three millions eight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the whole of which had been lent to government, into two equal parts: the one half, or upwards of £16,900,000, to be put upon the same footing with other government annuities, and not to be subject to the debts contracted, or losses incurred, by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eir mercantile projects; the other half to remain as before, a trading stock, and to be subject to those debts and losses. The petition was too reasonable not to be granted. In 1733, they again petitioned the Parliament, that three-fourths of their trading stock might be turned into annuity stock, and only one-fourth remain as trading stock, or exposed to the hazards arising from the bad management of their directors. Both their annuity and trading stocks had, by this time, been reduced more than two million each, by several different payments from government; so that this fourth

amounted only to £3,662,784:8:6. In 1748, all the demands of the company upon the King of Spain, in consequence of the Assiento contract, were, by the Treaty of Aix-la-Chapelle, given up for what was supposed an equivalent. An end was put to their trade with the Spanish West Indies; the remainder of their trading stock was turned into an annuity stock, and the company ceased, in every respect, to be a trading company.

1722年，该公司请求议会把全部贷给政府的3,380万镑巨资划分为两个相同的部分：一半，即1,690多万镑，作为政府的公债，与其他公债一样，不得用于偿付和弥补该公司因董事经营不善而带来的债务或损失；另一半依旧作为贸易资本，用来偿付和弥补债务或损失。这一合理请愿被议会采纳了。1733年，该公司再向议会申请，把贸易资本的3/4作为公债，仅留其余1/4作为贸易资本，用于补偿因董事经营不善而造成的损失。此时，因政府几次偿还，该公司的公债及贸易资本已各减少了200万镑以上。因此，这1/4的贸易资本，也不过3,662,784镑8先令6便士。1748年，根据《亚琛条约》，该公司以等价条件，放弃此前依照“阿西恩托约定”从西班牙国王取得的一切权利。该公司在西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从此结束，其剩余贸易资本全部转化为公债。从此，该公司便不再是一个贸易公司了。

It ought to be observed, that in the trade which the South Sea Company carried on by means of their annual ship, the only trade by which it ever was expected that they could make any considerable profit, they were not without competitors, either in the foreign or in the home market. At Cartagena, Porto Bello, and La Vera Cruz, they had to encounter the competition of the Spanish merchants, who brought from Cadiz to those markets European goods, of the same kind with the outward cargo of their ship; and in England they had to encounter that of the English merchants, who

imported from Cadiz goods of the Spanish West Indies, of the same kind with the inward cargo. The goods, both of the Spanish and English merchants, indeed, were, perhaps, subject to higher duties. But the loss occasioned by the negligence, profusion, and malversation of the servants of the company, had probably been a tax much heavier than all those duties. That a joint-stock company should be able to carry on successfully any branch of foreign trade, when private adventurers can come into any sort of open and fair competition with them, seems contrary to all experience.

应该注意的是，每年派遣船只到西属西印度群岛进行的贸易，是南海公司能大获利润的唯一贸易。但当它所经营的这种贸易在国内国外市场都有竞争者存在。在卡塔赫纳、贝洛港以及拉维拉克鲁斯，该公司必须面对西班牙商人的竞争；凡是南海公司所运输的货物，这些西班牙商人也由加的斯运往那些地方的市场。在英国，该公司又不得不面对英国商人的竞争；凡是该公司从西印度进口的货物，这些英国商人也由加的斯进口。诚然，西班牙及英国商人的货物要负担较重的关税，但该公司雇员的疏忽、浪费和贪污造成的损失，恐怕是一种更重的税。如果私人贸易商能够与股份公司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股份公司还能从对外贸易中获利——这种说法与一切经验不符。

The old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in 1600, by a charter from Queen Elizabeth. In the first twelve voyages which they fitted out for India, they appear to have traded as a regulated company, with separate stocks, though only in the general ships of the company. In 1612, they united into a joint stock. Their charter was exclusive, and, though not confirmed by Act of Parliament, was in those days supposed to convey a real exclusive privilege. For many years, therefore, they were not much disturbed by interlopers. Their capital, which never exceeded

£744,000, and of which £50 was a share, was not so exorbitant, nor their dealings so extensive, as to afford either a pretext for gross negligence and profusion, or a cover to gross malversation. Notwithstanding some extraordinary losses, occasioned partly by the malice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partly by other accidents, they carried on for many years a successful trade. But in process of time, when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were better understood, it became every day more and more doubtful, how far a Royal Charter, not confirmed by Act of Parliament, could convey an exclusive privilege. Upon this question the decisions of the courts of justice were not uniform, but varied with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and the humours of the times. Interlopers multiplied upon them; an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through the whole of that of James II., and during a part of that of William III., reduced them to great distress. In 1698, a proposal was made to Parliament, of advancing two millions to government, at eight per cent. provided the subscribers were erected into a new East India Company, with exclusive privileges. The old East India Company offered seven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nearly the amount of their capital, at four per cent. upon the same conditions. But such was at that time the state of public credit, that it was more convenient for government to borrow two millions at eight per cent. than seven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at four. The proposal of the new subscribers was accepted, and a new East India Company established in consequence. The old East India Company, however, had a right to continue their trade till 1701. They ha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name of their treasurer, subscribed very artfully three hundred and fifteen thousand pounds into the stock of the new. By a negligence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Act of Parliament, which vested the East India trade in the subscribers to this loan of two millions, it did not appear evident that they were all obliged to unite into a joint stock. A few private traders, whose subscriptions

amounted only to seven thousand two hundred pounds, insisted upon the privilege of trading separately upon their own stocks, and at their own risks. The old East India Company had a right to a separate trade upon their own stock till 1701; and they had likewise,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at period, a right, like that of other private traders, to a separate trade upon the £315,000, which they had subscribed into the stock of the new company. The competition of the two companies with the private traders, and with one another, is said to have well nigh ruined both. Upon a subsequent occasion, in 1730, when a proposal was made to Parliament for putting the trade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a regulated company, and thereby laying it in some measure ope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opposition to this proposal, represented, in very strong terms, what had been, at this time, the miserable effects, as they thought them, of this competition. In India, they said, it raised the price of goods so high, that they were not worth the buying; and in England, by overstocking the market, it sunk their price so low, that no profit could be made by them. That by a more plentiful supply, to the great advantage and conveniency of the public, it must have reduced very much the price of Indian goods in the English market, cannot well be doubted; but that it should have raised very much their price in the Indian market, seems not very probable, as all the extraordinary demand which that competition could occasion must have been but as a drop of water in the immense ocean of Indian Commerce. The increase of demand, besides, though in the beginning it may sometimes raise the price of goods, never fails to lower it in the long-run. It encourages production, and thereby increases the competition of the producers, who, in order to undersell one another, have recourse to new divisions of labour and new improvements of art, which might never otherwise have been thought of. The miserable effects of which the company complained, were the cheapness of consumption, and the

encouragement given to production; precisely the two effects which it is the great business of political economy to promote. The competition, however, of which they gave this doleful account, had not been allowed to be of long continuance. In 1702, the two companies were, in some measure, united by an indenture tripartite, to which the queen was the third party; and in 1708, they were by Act of Parliament, perfectly consolidated into one company, by their present name of The 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 Into this act it was thought worth while to insert a clause, allowing the separate traders to continue their trade till Michaelmas 1711; but at the same time empowering the directors, upon three years notice, to redeem their little capital of seven thousand two hundred pounds, and thereby to convert the whole stock of the company into a joint stock. By the same act, th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in consequence of a new loan to government, was augmented from two millions to three millions two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In 1743, the company advanced another million to government. But this million being raised, not by a call upon the proprietors, but by selling annuities and contracting bond-debts, it did not augment the stock upon which the proprietors could claim a dividend. It augmented, however, their trading stock, it being equally liable with the other three millions two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to the losses sustained, and debts contracted by the company in prosecution of their mercantile projects. From 1708, or at least from 1711, this company, being delivered from all competitors, and fully established in the monopoly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to the East Indies, carried on a successful trade, and from their profits, made annually a moderate dividend to their proprietors. During the French war, which began in 1741, the ambition of Mr. Dupleix, the French governor of Pondicherry, involved them in the wars of the Carnatic, and in the politics of the Indian princes. After many signal successes, and

equally signal losses, they at last lost Madras, at that time their principal settlement in India. It was restored to them by the Treaty of Aix-la-Chapelle; and, about this time the spirit of war and conquest seems to have taken possession of their servants in India, and never since to have left them. During the French war, which began in 1755, their arms partook of the general good fortune of those of Great Britain. They defended Madras, took Pondicherry, recovered Calcutta, and acquired the revenues of a rich and extensive territory, amounting, it was then said, to upwards of three millions a-year. They remained for several years in quiet possession of this revenue; but in 1767, administration laid claim to their territorial acquisitions, and the revenue arising from them, as of right belonging to the crown; and the company, in compensation for this claim, agreed to pay the government £400,000 a year. They had, before this, gradually augmented their dividend from about six to ten per cent.; that is, upon their capital of three millions two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they had increased it by £128,000, or had raised it from one hundred and ninety-two thousand to thre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pounds a-year. They were attempting about this time to raise it still further, to twelve and a-half per cent., which would have made their annual payments to their proprietors equal to what they had agreed to pay annually to government, or to £400,000 a-year.

1600年，根据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状，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立了。在它最早的12次印度航行中，贸易资本归个人所有，只有船舶是共有的，仿佛就是在以规约公司的形式进行贸易。到了1612年，这些个人的资本才合并为共同资本。该公司持有的专营特许状虽未经议会批准，但在当时被认为具有真正的专营特权。因此，该公司经营多年，也很少受到其他竞争商人的打扰。它的股本总额仅744,000镑，每股为50镑。由于股本不是很大，且公司的营业规模适中，所以经营

上也不会出现疏忽、浪费或贪污。因此，虽然该公司也曾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陷害以及其他的意外事变，而遭受巨大损失，但在许多年里，它的贸易却很成功。然而，随着历史的推进，人们对自由有了更深的理解，人们越来越怀疑，由女王颁发而未经议会通过的特许状，能否真正具有专营特权。对于这一问题，法院的决定并不统一，而是随政府权力和各时代民意而不断变化。私人贸易者日益在公司特权范围内发展壮大。在查理二世晚年，詹姆士二世整个统治时期及威廉三世初年，该公司经营十分艰难。1698年，有人向议会建议，愿以8%的利息购买政府公债200万镑，条件是允许购买公债者设立一个有专营特权的新东印度公司。旧东印度公司也向议会提出，愿以4%的利息贷给政府70万镑（相当于该公司的全部资本额），条件与上述类似。当时王国的国家信用状态是，以4%的年息借入70万镑，倒不如以8%的年息借入200万镑更加便利。新公债贷款人的建议被采纳了，于是就建立了一个新东印度公司。不过，在1701年以前，旧东印度公司都可以进行贸易。同时，该公司曾以会计的名义，极巧妙地购买了新公司315,000的股本。对于认购200万镑公债者，议会法案授予其东印度贸易特权，但法案措辞含糊，并没有明确地说明应募者的资本是否必须合为共同资本。于是，应募仅有7,200镑的少数私人贸易者，坚持资本独立、自担危险地进行贸易的权利。1701年以前，旧东印度公司仍有使用其资本独立经营贸易的权利。并且，在此前后，该公司和其他私人贸易者一样，也可利用投入新公司的315,000镑的资本单独经营贸易。据说，这两家公司与私人贸易者间的竞争，以及两家公司彼此间的竞争，几乎使这二者全部毁灭。因此，1730年有人向议会提议，应把与印度的贸易归于一个规约公司管辖，使其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东印度公司对此极力反对。他们措辞强烈地陈述了当初上述竞争所造成的悲惨后果。按照他们的陈述，此类竞争使印度商品价格抬高到极不划算的程度；而在英国市场，这些货物又因存货过多，导致价格跌到毫无利润可言。毫无疑问，倘若商品供给充足，大众消费者会由此获益，英国市场上的印度商品价格则会大跌。而至于说因为购买者增多，而使印度市场上的商品大幅度增长，却不大可能。由竞争引起的大量需求，不过是印度贸易中极小的一部分。况且，需求的增加虽在一开始会抬高商品价格，但最终必使价格跌落。需求量的增

加，会鼓励生产，加强生产者间的竞争。各生产者为使自己的产品以更低的价格出售，会使用新的分工和新的改良技术。若非如此，他们恐怕根本想不到采用此法。消费变得便宜，生产也得到鼓励，这才是该公司所说的悲惨结果，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想要促成的结果。然而，他们沉痛诉说的竞争并没有继续很长时间。1702年，这两个公司与女王签订了三方协议，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合并起来。1708年，一条议会法案使这两个公司完全合为一体，成为今日的东印度贸易商人联合公司。该法案还附有另一条款，允许独立的私人贸易者继续营业到1711年的米迦勒节。该条款还授权公司董事通知这些独立私人贸易者，公司将用3年时间收购其7,200镑的小资本，从而把该公司的全部资本变为共同资本。此外，该法案还规定，由于对政府的新贷款，公司的资本将由200万镑增加至300万镑。1743年，该公司又贷给政府100万镑。不过，这项借款来自于公司发行的公债，而非来自股东，所以股东分红的资本并未增加。但这100万镑，与其他300万镑一样，也可负担公司营业上的亏损和债务，因此也增加了公司的贸易资本。从1708年或者至少从1711年开始，该公司摆脱了所有竞争者，完全垄断了英国在东印度的贸易。由于公司经营得当，股东每年都能从利润中分得不错的股息。在1741年爆发的对法战争期间，印度本地治里市的法国总督迪普莱野心勃勃，导致东印度公司卷入卡那提克之战和印度王室的政治纠纷中。经过无数次大起大落之后，该公司最终失去了它在印度的主要殖民地马德拉斯邦。后来，《亚琛条约》的签订，又使马德拉斯邦重归于该公司。从那时起，该公司派往印度的雇员似乎一直充满战斗及征服精神。在1755年爆发的法兰西战争中，该公司在印度的兵力，也交上了英国军队在欧洲大胜的好运气。他们守卫马德拉斯邦，占领本地治里，收复加尔各答，并获得一大片富裕领土的收入。据说，这一收入在当时每年超过300万镑。几年里，该公司平静地享有这笔巨大的收入。但1767年，政府声称，该公司占领的领土及其收入均属于国王。公司于是同意每年向政府缴纳40万镑，作为这权利的补偿。在此之前，公司分配的股息，已逐渐由6%增至10%。在总资本320万镑的基础上，股息已增加了128,000镑；也就是说，每年股息已由192,000镑增加至32万镑。但这次，公司又企图把股息进一步提高到12.5%。一旦实行，公司每年发放给股东的金额将达40万

镑，相当于每年上交政府的金额。

But during the two years in which their agreement with government was to take place, they were restrained from any further increase of dividend by two successive Acts of Parliament, of which the object was to enable them to make a speedier progress in the payment of their debts, which were at this time estimated at upwards of six or seven millions sterling. In 1769, they renewed their agreement with government for five years more, and stipulated, that during the course of that period, they should be allowed gradually to increase their dividend to twelve and a-half per cent; never increasing it, however, more than one per cent in one year. This increase of dividend, therefore, when it had risen to its utmost height, could augment their annual payments, to their proprietors and government together, but by £608,000, beyond what they had been before their late territorial acquisitions. What the gross revenue of those territorial acquisitions was supposed to amount to, has already been mentioned; and by an account brought by the Cruttenden East Indiaman in 1768, the net revenue, clear of all deductions and military charges, was stated at two millions forty-eight thousand seven hundred and forty-seven pounds. They were said, at the same time, to possess another revenue, arising partly from lands, but chiefly from the customs established at their different settlements, amounting to £439,000. The profits of their trade, too,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of their chairman before the House of Commons, amounted, at this time, to at least £400,000 a year; according to that of their accountant, to at least £500,000; according to the lowest account, at least equal to the highest dividend that was to be paid to their proprietors. So great a revenue might certainly have afforded an augmentation of £608,000 in their annual payme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have left a large sinking

fund, sufficient for the speedy reduction of their debts. In 1773, however, their debts, instead of being reduced, were augmented by an arrear to the treasury in the payment of the four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by another to the custom-house for duties unpaid, by a large debt to the bank, for money borrowed; and by a fourth, for bills drawn upon them from India, and wantonly accepted, to the amount of upwards of twelve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The distress which these accumulated claims brought upon them, obliged them not only to reduce all at once their dividend to six per cent. but to throw themselves upon the mercy of government, and to supplicate, first, a release from further payment of the stipulated £400,000 a year; and, secondly, a loan of £1,400,000, to save them from immediate bankruptcy. The great increase of their fortune had, it seems, only served to furnish their servants with a pretext for greater profusion, and a cover for greater malversation, than in proportion even to that increase of fortune. The conduct of their servants in India, and the general state of their affairs both in India and in Europe, became the subject of a Parliamentary inquiry: in consequence of which, several very important alterations were made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ir government,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India, their principal settlements of Madras, Bombay, and Calcutta, which had before been altogether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 were subjected to a governor-general, assisted by a council of four assessors, Parliament assuming to itself the first nomination of this governor and council, who were to reside at Calcutta; that city having now become, what Madras was before,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in India. The Court of the Mayor of Calcutta, originally instituted for the trial of mercantile causes, which arose in city and neighbourhood, had gradually extended its jurisdiction with the extension of the empire. It was now reduced and confined to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its institution. Instead of it, a new 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 was established,

consisting of a chief justice and three judges, to be appointed by the crown. In Europe, the qualification necessary to entitle a proprietor to vote at their general courts was raised, from five hundred pounds, the original price of a share in the stock of the company, to a thousand pounds. In order to vote upon this qualification, too, it was declared necessary, that he should have possessed it, if acquired by his own purchase, and not by inheritance, for at least one year, instead of six months, the term requisite before. The court of twenty-four directors had before been chosen annually; but it was now enacted, that each director should, for the future, be chosen for four years; six of them, however, to go out of office by rotation every year, and not to be capable of being re-chosen at the election of the six new directors for the ensuing year. In consequence of these alterations, the courts, both of the proprietors and directors, it was expected, would be likely to act with more dignity and steadiness than they had usually done before. But it seems impossible, by any alterations, to render those courts, in any respect, fit to govern, or even to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of a great empire; becaus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members must always have too little interest in the prosperity of that empire, to give any serious attention to what may promote it. Frequently a man of great, sometimes even a man of small fortune, is willing to purchase a thousand pounds share in India stock, merely for the influence which he expects to acquire by a vote in the court of proprietors. It gives him a share, though not in the plunder, yet in the appointment of the plunderers of India; the court of directors, though they make that appointment, being necessarily more or les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prietors, who not only elect those directors, but sometimes over-rule the appointments of their servants in India. Provided he can enjoy this influence for a few years, and thereby provide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his friends, he frequently cares little about the dividend, or even about the value

of the stock upon which his vote is founded. About the prosperity of the great empire, in the government of which that vote gives him a share, he seldom cares at all. No other sovereigns ever were, or, from the nature of things, ever could be, so perfectly indifferent about the happiness or misery of their subjects, the improvement or waste of their dominions, the glory or disgrace of their administration, as, from irresistible moral cause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roprietors of such a mercantile company are, and necessarily must be. This indifference, too, was more likely to be increased than diminished by some of the new regulations which were made in consequence of the Parliamentary inquiry. By a resolution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for example, it was declared, that when the £1,400,000 lent to the company by government, should be paid, and their bond-debts be reduced to £1,500,000, they might then, and not till then, divide eight per cent. upon their capital; and that whatever remained of their revenues and net profits at home sh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ree of them to be paid into the exchequer for the use of the public, and the fourth to be reserved as a fund, either for the further reduction of their bond-debts, or for the discharge of other contingent exigencies which the company might labour under. But if the company were bad stewards and bad sovereigns, when the whole of their net revenue and profits belonged to themselves, and were at their own disposal, they were surely not likely to be better when three-fourths of them were to belong to other people, and the other fourth, though to be laid ou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mpany, yet to be so under the inspection and with the approbation of other people.

可是，在公司与政府协议实施的两年有效期内，议会相继制定了两条法案，不允许公司股息再有增加，其目的就在于使公司加速偿清当时已达六七百万镑的债务。1769年，公司与政府所订协约延期五

年，并规定在这五年中，允许公司逐渐把股息增加至12.5%，但每年最多只能增加1%。因此，即使股息增加到最高，公司每年付给股东及政府的金额，也只增加了608,000镑，远不及公司最近所占土地的300余万镑的收入。按照1768年东印度贸易船克鲁登敦号所做的报告，扣除军事维持费及其他费用，这些占领的土地的纯收入达2,048,747镑。此外，据说公司还有其他收入，除一部分来自于土地外，大部分源自各殖民地所设的海关，总额达439,000镑。当时公司的贸易利润，按公司董事长在下议院的陈述，每年至少有40万镑；而按照公司会计的说法，每年至少有50万镑。不论怎样，即便在最少的情况下也不低于每年分给股东的最高股息。收入如此之高，公司每年应当有能力增加608,000镑的支出，并提供一项减债基金，足以加速偿还债务。然而直到1773年，公司债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赊欠国家40万镑；所欠关税，欠银行的借款，以及随意接受的来自印度的未承兑的汇票，三者共计120余万镑。债务堆积使公司陷入困境，不得不一次性将股息降至6%，并请求政府进行以下支援：第一，解除每年向政府上交40镑的协议；第二，向政府贷款140万镑，挽救公司的破产危机。公司虽在海外扩展了领地，财富也大幅度增长，但这似乎只使其雇员更有了浪费和贪污的借口。因此，该公司员工在印度的行为，以及公司在印欧两地整体的经营状况，都成了议会调查的目标。调查过后，议会对公司国内外管理机构进行了几种极其重要的改革。在印度方面，该公司在印度相互独立的主要殖民地，如马德拉斯邦、孟买、加尔各答，现归于同一总督管辖，并由4名顾问组成的委员会辅佐总督。第一任总督及顾问委员会由议会任命，且常驻在加尔各答。现在，加尔各答与以前的马德拉斯邦一样，成为英国在印度最重要的殖民地。加尔各答的市级法院，原本是为审理该市及其附近地区的商业案件而设立，后来其司法管辖权随帝国版图的扩大而相应扩大。此次改革将该法院的司法权限减小，并限制在最初的范围，替代其位置的是新设的最高法院，由1名审判长及3名审判官组成，且均由国王任命。在欧洲，以前股东要获得在股东大会中投票的资格，须交500镑（即公司每股原来的价格），如今将其增加至1,000镑。此外，如果股票是自己购买而非继承，以前是在购买六个月内就可行使投票权，现在则需要购买一年后才能行使。以前公司的24名董事每年改选

一次，现在变为4年改选一次，但每年24名董事中须有6名董事卸任，选入6名新董事。卸任的旧董事不能再选为下一年的新董事。此番改革，意在使股东会及董事会履行其职能时能更从容稳健。然而，无论如何变革，似乎都不可能使他们在任何方面足以统治或参与管理这个大的帝国。他们大多数人的利益既与大英帝国的利益无关，故而也不会关注其繁荣发展。不仅有钱人往往愿意购买1,000镑的印度股票，财力微弱之人也会偶尔为之，只为获得在股东大会的投票权。有了投票权，他们即使不能自己去印度参与殖民掠夺，也可参与掠夺者的任命。董事会虽负责此任命，但其本身多少要受股东的影响，因为股东不但选举董事，而且有时能对董事会关于派驻印度人员的任命予以否决。假若一个股东几年来一直享有这种影响力，在公司内部安排与其亲近之人，他往往不会在意股息的大小，甚至连决定他投票权的股份的价值也漠不关心。即使投票权让他得以参与国家的统治，他也不会关心国家的繁荣。没有任何君主像商业公司的大部分股东这样，由于无法抵挡的道德因素，对百姓的疾苦、领土的繁荣衰败，以及政府的荣辱如此漠不关心。议会依据调查结果制定的新规，不但没有缓解这种漠不关心，反而加深了其程度。例如，下议院的一项决议称，只有当公司还清欠政府的140万镑债务，且私人债务减至150万镑时，才可以对股本分配8%的股息。此外，将该公司留在国内的收入及纯利分成四部分，其中三部分交给国库，充当国家用途，剩下的一部分用来偿还债务和应付公司的不时之需。以往，当他们全部的纯收入和利润都归自己所有，任其自由支配时，公司的管理尚且如此糟糕；如今3/4的纯收入和利润归属他人，剩下的1/4还要在他人监督之下，须得许可方可动用，公司的管理自然无法改进。

It might be more agreeable to the company, that their own servants and dependants should have either the pleasure of wasting, or the profit of embezzling, whatever surplus might remain, after paying the proposed dividend of eight per cent. than that it should come into the hands of a set of people with whom those resolutions could scarce fail to set them in some measure at variance. The

interest of those servants and dependants might so far predominate in the court of proprietors, as sometimes to dispose it to support the authors of depredations which had been committed in direct violation of its own authority. With the majority of proprietors, the support even of the authority of their own court might sometimes be a matter of less consequence than the support of those who had set that authority at defiance.

分派8%的股息后，公司更愿意任由其雇员和隶属人员将剩余部分的金额滥用或侵吞，也不愿按照下议院的规定，把剩下的部分交给一群意气不投之人。此外，由于这些公司雇员和隶属人员可能在股东会里势力极大，股东们反而对这些侵犯了自己权威的贪污之人加以支持。对大部分股东来说，支持股东大会的权威，还不如支持那些侵犯他们权威之人重要。

The regulations of 1773, accordingly, did not put an end to the disorder of the company's government in India. Notwithstanding that, during a momentary fit of good conduct, they had at one time collected into the treasury of Calcutta more than £3,000,000 sterling;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y had afterwards extended either their dominion or their depredations over a vast accession of some of the richest and most fertile countries in India, all was wasted and destroyed. They found themselves altogether unprepared to stop or resist the incursion of Hyder Ali; and in consequence of those disorders, the company is now (1784) in greater distress than ever; and, in order to prevent immediate bankruptcy, is once more reduced to supplicate the assistance of government. Different plans have been proposed by the different parties in Parliament for the better management of its affairs; and all those plans seem to agree in supposing, what was indeed always abundantly evident, that it is

altogether unfit to govern its territorial possessions. Even the company itself seems to be convinced of its own incapacity so far, and seems, upon that account willing to give them up to government.

因此，1773年的种种规定，不能结束东印度公司的混乱管理。尽管公司曾因一时的管理得当而获得了300多万镑，存储于加尔各答金库之中。尽管在此之后，它的支配或掠夺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印度好几个最为富裕肥沃的地区，但最终一切都挥霍殆尽。当海德·阿利进攻时，公司全无防备，无力抵抗。种种混乱的局面，使得该公司如今（1784年）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为缓解当前的破产危机，该公司又不得不向政府请求援助。议会中各党派都提出种种计划，以改善该公司的业务经营。这些计划似乎都赞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该公司完全不适合统治它所占领的殖民领地。该公司自身也认为再无力统治这些领地，因而愿意交由政府来管理。

With the right of possessing forts and garrisons in distant and barbarous countries is necessarily connected the right of making peace and war in those countries. The joint-stock companies, which have had the one right, have constantly exercised the other, and have frequently had it expressly conferred upon them. How unjustly, how capriciously, how cruelly, they have commonly exercised it, is too well known from recent experience.

如果有权利在遥远的野蛮国度拥有堡垒和守备队，必然也有权利在当地宣战或议和。拥有前一项权利的股份公司，时常行使其后一项权利，且常常要求正式授予后一项权利。从最近的经验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在行使这种权利时多么任意妄为，且残忍不公。

When a company of merchants undertake, at their own risk and expense, to establish a new trade with some remote and barbarous nation, it may not be unreasonable to incorporate them into a joint-stock company, and to grant them, in case of their success, a monopoly of the trade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years. It is the easiest and most natural way in which the state can recompense them for hazarding a dangerous and expensive experiment, of which the public is afterwards to reap the benefit. A temporary monopoly of this kind may be vindicated, upon the same principles upon which a like monopoly of a new machine is granted to its inventor, and that of a new book to its author. But upon the expiration of the term, the monopoly ought certainly to determine; the forts and garrisons, if it was found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y, to be taken into the hands of government, their value to be paid to the company, and the trade to be laid open to all the subjects of the state. By a perpetual monopoly, all the other subjects of the state are taxed very absurdly in two different ways: first, by the high price of goods, which, in the case of a free trade, they could buy much cheaper; and, secondly, by their total exclusion from a branch of business which it might be both convenient and profitable for many of them to carry on. It is for the most worthless of all purposes, too, that they are taxed in this manner. It is merely to enable the company to support the negligence, profusion, and malversation of their own servants, whose disorderly conduct seldom allows the dividend of the company to exceed the ordinary rate of profit in trades which are altogether free, and very frequently makes it fall even a good deal short of that rate. Without a monopoly, however, a joint-stock company, it would appear from experience, cannot long carry on any branch of foreign trade. To buy in one market, in order to sell with profit in another, when there are many competitors in both, to watch over, not only the occasional variations in the demand, but the much greater and more frequent variations in the competition,

or in the supply which that demand is likely to get from other people; and to suit with dexterity and judgment both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ach assortment of goods to all these circumstances, is a species of warfare, of which the operations are continually changing, and which can scarce ever be conducted successfully, without such an unremitting exertion of vigilance and attention as cannot long be expected from the directors of a joint-stock company. The East India Company, upon the redemption of their funds, and the expiration of their exclusive privilege, have right, by Act of Parliament, to continue a corporation with a joint stock, and to trade in their corporate capacity to the East Indies, in common with the rest of their fellow subjects. But in this situation, the superior vigilance and attention of private adventurers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soon make them weary of the trade.

当一批商人自担风险，自付经费去与一些野蛮异域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时，政府将他们组成一个股份公司，并在经营顺利时，赋予其若干年的商业垄断地位，这种做法合情合理。这是国家对这种将来有利于人民的，且成本颇高的商业冒险，进行补偿的最简单自然的方法。这种暂时的垄断权，如同授予新机器的发明者专利，授予新著作的作者出版权一样。不过，若已达到限定的时期，垄断权必然应当取消的。如果堡垒和守备队仍有维持必要，政府应按其价值从所属公司购买过来，归于政府管理；而当地贸易的经营则应向全国人民开放。如果公司长期享有垄断权利，势必会对其他国民带来不合理的负担：第一，在自由贸易时，人民消费的商品价格更加低廉，垄断必使商品价格抬升。第二，使人们完全无法从事一种既便于经营又有较高利润的商业。并且，人民承受这些负担，不过是使公司能维持其懒散挥霍，甚至侵吞公款的雇员，实在是不值得。由于这些雇员的胡乱经营，导致公司股息很少超过其他自由贸易的一般利润率，甚至时常落于其后。然而从以往经验来看，股份公司如不享有垄断权，大概无法长久经营任何对外贸易。贸易商要从一处市场购入货物，在另一处市

场出售获利。当这两端都充满了竞争对手时，贸易商不仅要留意需求上偶尔的波动，还需警惕一种规模更大更频繁的竞争波动，即某一需求可能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供应。运用灵活的技巧和正确的判断力，使各种货物的质和量，都能适应需求、供给和竞争各方面的变动，这俨然就是一场持续变化的战争。唯有坚持不懈地加以警惕和关注，才有成功的可能。然而，股份公司的董事们是绝对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当债款已偿清，专营特权期限已到时，根据议会的法案，东印度公司仍有权利以股份公司的资格，在东印度与其他商人共同竞争。但在这种情形下，私人贸易商在经营时高度的警惕与关注，极可能让该公司在激烈的贸易竞争中疲惫不堪。

An eminent French author, of great knowledge in matters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Abbe Morellet, gives a list of fifty-five joint-stock companies for foreign trade,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Europe since the year 1600, and which, according to him, have all failed from mismanagement, notwithstanding they had exclusive privileges. He has been misinformed with regard to the history of two or three of them, which were not joint-stock companies and have not failed. But, in compensation,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joint-stock companies which have failed, and which he has omitted.

修道院院长莫雷勒为法国著名作家，对政治经济学也很有研究。他曾列举1600年以后，在欧洲各地设立的55家对外贸易股份公司。据他说，这些公司虽都享有专营特权，但都因管理不当而经营惨败。但他列举的这些公司中，有两三家公司的信息有误；它们并不是股份公司，也未遭失败。并且，还有若干惨遭失败的股份公司，他也没有将其列入。

The only trades which it seems possible for a joint-stock company to carry on successfully, without an exclusive privilege, are those, of which all the operations are capable of being reduced to what is called a Routine, or to such a uniformity of method as admits of little or no variation. Of this kind is, first, the banking trade; secondly, the trade of insurance from fire and from sea risk, and capture in time of war; thirdly, the trade of making and maintaining a navigable cut or canal; and, fourthly, the similar trade of bringing water for the supply of a great city.

股份公司若想不借助专营特权就取得成功，只有从事那些营业活动已简化为固有程序，方法千篇一律，缺少变化的事业。此类事业共有4种：第一，银行业；第二，水、火、战争灾害保险业；第三，修建并维持通航河道或运河；第四，为大城市供水。

Though the principles of the banking trade may appear somewhat abstruse, the practice is capable of being reduced to strict rules. To depart upon any occasion from those rules, in consequence of some flattering speculation of extraordinary gain, is almost always extremely dangerous and frequently fatal to the banking company which attempts it. But the constitution of joint-stock companies renders them in general, more tenacious of established rules than any private copartnery. Such companies, therefore, seem extremely well fitted for this trade. The principal banking companies in Europe, accordingly, are joint-stock companies, many of which manage their trade very successfully without any exclusive privilege. The Bank of England has no other exclusive privilege, except that no other banking company in England shall consist of more than six persons. The two banks of Edinburgh are joint-stock companies, without any exclusive privilege.

银行业的原理看似深奥，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可简化为成规，只需遵照即可。若投机获取厚利，背离这些成规，总是十分危险，而且往往使银行陷于危险的境地。但是，与私人合伙公司相比，股份公司往往更能遵守成规，因此，似乎非常适于银行业的经营。也正因如此，欧洲的主要银行企业都是股份制公司。在这些公司当中，有许多并不享有专营特权，却经营得十分成功。英格兰银行也不享有任何特权，与其他银行企业唯一的不同点是，其股东可以超过6人。爱丁堡的两家银行也全为股份公司，并无任何专营特权。

The value of the risk, either from fire, or from loss by sea, or by capture, though it cannot, perhaps, be calculated very exactly, admits, however, of such a gross estimation, as renders it, in some degree, reducible to strict rule and method. The trade of insurance, therefore, may be carried on successfully by a joint-stock company, without any exclusive privilege. Neither the London Assurance, nor the Royal Exchange Assurance companies have any such privilege.

火灾、水灾乃至战祸造成的损失，虽不能很准确地计算出来，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严密的规则和方法对其进行大概的估算。所以，股份公司即使不享有特权，也有可能成功经营保险业。伦敦保险公司和皇家贸易保险公司，都是没有取得任何特权的。

When a navigable cut or canal has been once made, the management of it becomes quite simple and easy, and it is reducible to strict rule and method. Even the making of it is so, as it may be contracted for with undertakers, at so much a mile, and so much a lock. The same thing may be said of a canal, an aqueduct, or a great pipe for bringing water to supply a great city. Such undertakings,

therefore, may be, and accordingly frequently are, very successfully managed by joint-stock companies, without any exclusive privilege.

通航河道或运河一旦修建完工，管理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可制定严密的规则与方法进行管理。甚至修建河道的过程也是如此。每英里的费用，每座水闸的费用等，均可在与承包人订立的合同中规定清楚。修建为城市供水的运河、沟渠或大水管，也可采用上述方法。因此，由股份公司经营这些事业，即使没有专营特权，也可大获成功，而事实也往往如此。

To establish a joint-stock company, however, for any undertaking, merely because such a company might be capable of managing it successfully; or, to exempt a particular set of dealers from some of the general laws which take place with regard to all their neighbours, merely because they might be capable of thriving, if they had such an exemption, would certainly not be reasonable. To render such an establishment perfectly reasonable, with the circumstance of being reducible to strict rule and method, two other circumstances ought to concur. First, it ought to appear with the clearest evidence, that the undertaking is of greater and more general utility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common trades; and, secondly, that it requires a greater capital than can easily be collected into a private copartnery. If a moderate capital were sufficient, the great utility of the undertaking would not be a sufficient reason for establishing a joint-stock company; because, in this case, the demand for what it was to produce, would readily and easily be supplied by private adventurers. In the four trades above mentioned, both those circumstances concur.

若仅仅因为股份公司善于经营某种事业，就建立这类公司，或者说，为了顾全一群特定商人的发展，而赋予他们特权，不用受其他人所遵循的普通法规的约束，必然是不合理的。要使股份公司的设立完全合理化，使其遵照严密的规则及方法经营，仍需要其他两个条件：第一，股份公司所经营的事业，其效用必须明显比大部分的普通商业更大，更普及。第二，股份公司所需资本必须大于私人合伙公司所能筹集到的数额。凡以微弱资本即能经营的事业，即使其效用很大，也不能因此而设立股份公司。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企业者也可以供应所需。上述4种事业，均满足这两个条件。

The great and general utility of the banking trade, when prudently managed, has been fully explained in the second book of this Inquiry. But a public bank, which is to support public credit, and, upon particular emergencies, to advance to government the whole produce of a tax, to the amount, perhaps, of several millions, a year or two before it comes in, requires a greater capital than can easily be collected into any private copartnery.

银行业若管理得当，会产生大而广泛的效用，本书第二篇已对此做过详细说明。但公共银行是为维持国家信用而设，在特殊的紧急时刻，它须为政府预付某一税收高达数百万的全部收入，而该税收在一两年后才能收回。这种银行所需资本，私人合伙公司当然无法轻易筹集得来。

The trade of insurance gives great security to the fortunes of private people, and, by dividing among a great many that loss which would ruin an individual, makes it fall light and easy upon the whole society. In order to give this security,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insurers should have a very large capital.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wo joint-stock companies for insurance in London, a list, it is said, was laid before the attorney-general,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private insurers, who had failed in the course of a few years.

保险业能极大地保障个人财产。对于个人来说，一次巨大的损失可能毁掉他的生活，但通过保险业，这种损失就可在很多人中分配，整个社会一同分担的话，就变得轻松了。不过，保险业者要想为他人提供保障，就必须有大量的资本。据说，伦敦西保险股份公司成立以前，检察长处有一份名单，里面列举了150个开业不到几年就失败的私人保险业者。

That navigable cuts and canals, and the works which are sometimes necessary for supplying a great city with water, are of great and general util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y frequently require a greater expense than suits the fortunes of private people, is sufficiently obvious.

显而易见，通航水道、运河以及为城市供水的各种必要工程，不仅有很大、很普遍的效用，而且其所需巨大费用，也不是个人财力所能满足的。

Except the four trades above mentioned,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recollect any other, in which all the three circumstances requisite for rendering reasonabl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joint-stock company concur. The English copper company of London, the lead-smelting company, the glass-grinding company, have not even the pretext of any great or singular utility in the object which they pursue; nor

does the pursuit of that object seem to require any expense unsuitable to the fortunes of many private men. Whether the trade which those companies carry on, is reducible to such strict rule and method as to render it fit for the management of a joint-stock company, or whether they have any reason to boast of their extraordinary profits, I do not pretend to know. The mine-adventurers company has been long ago bankrupt. A share in the stock of the British Linen Company of Edinburgh sells, at present, very much below par, though less so than it did some years ago. The joint-stock companies, which are established for the public-spirited purpose of promoting some particular manufacture, over and above managing their own affairs ill, to the diminution of the general stock of the society, can, in other respects, scarce ever fail to do more harm than good. Notwithstanding the most upright intentions, the unavoidable partiality of their directors to particular branches of the manufacture, of which the undertakers mislead and impose upon them, is a real discouragement to the rest, and necessarily breaks, more or less, that natural proportion which would otherwise establish itself between judicious industry and profit, and which, to the general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is of all encouragements the greatest and the most effectual.

总而言之，为使股份公司的设立变得合理，必须具备上述3个条件。且据我所知，只有这4种事业符合这3个条件。例如伦敦的英国制铜公司、熔铅公司以及玻璃公司。这些公司的效用既不大也无特别之处，所需费用也没有高到个人无法筹集的程度。至于这些公司的贸易是否制定了适合股份公司管理的严格规则和方法，是否如其夸耀的那样有可获厚利的理由，我就不得而知了。矿山企业公司早已破产。爱丁堡英国麻布公司的股票价格，虽不像数年前跌落得那么厉害，但目前也远低于其票面价格。还有一些为促进特殊制造业而建立的股份公司，除了自身经营不善，还导致社会总资产减少，且在其他各方面也

总是弊大于利。即使董事们在意图上正直不阿，但他们不可避免要受一些制造业当事人的蒙蔽，从而偏向于某些特定的制造业，如此一来，必定会抑制其他制造业的发展，并势必会破坏正常情况下产业与利润间的自然比例。而这自然比例，最能有效地促进一个国家一般产业的发展。

ARTICLE II. Of the Expense of the Institu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th.

第二项、论青年教育机构的支出

The institutions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th may, in the same manner, furnish a revenue sufficient for defraying their own expense. The fee or honorary, which the scholar pays to the master, naturally constitutes a revenue of this kind.

同样，青年教育机构产生的收入足以维持自身运营。学生付给教师的学费或谢礼，自然算这一类的收入。

Even where the reward of the master does not arise altogether from this natural revenue, it still is not necessary that it should be derived from that general revenue of the society, of which the collection and application is, in most countries, assigned to the executive power.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accordingly, the endowment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makes either no charge upon that general revenue, or but a very small one. It everywhere arises chiefly from some local or provincial revenue, from the rent

of some landed estate, or from the interest of some sum of money, allotted and put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rustees for this particular purpose, sometimes by the sovereign himself, and sometimes by some private donor.

即便教师的报酬不都来自于这类自然收入，由社会的一般收入支付教师的报酬也并非必要的手段；在大多数国家，社会一般收入的筹集以及花销都由行政力量管理。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设立普通学校及专科院校的基金，并不来源于社会一般收入，即便是的话，汲取的金额也十分有限。某地或者某区域的收入，某片地产的租金，或用于该目的的专项资金的利息收入一般构成了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这笔钱或由国王直接拨付，或由私人投资，委托他人管理。

Have those public endowments contributed in general, to promote the end of their institution? Have they contributed to encourage the diligence, and to improve the abilities, of the teachers? Have they directed the course of education towards objects more useful, both to the individual and to the public, than those to which it would naturally have gone of its own accord? It should not seem very difficult to give at least a probable answer to each of those questions.

这些公共教育资金是否从整体上促进了教育机构的发展？是否起到了鼓励教师勤奋，促进其提升能力的作用？比起自负盈亏而言，有公共资金的支持是否对于个人以及社会而言都能推动教育往实用化的方向发展？对于以上种种问题，我觉得针对每个问题至少给一个大概的答案不是很难。

In every profession, the exer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who exercise it, is always in proportion to the necessity they are under of making that exertion. This necessity is greatest with those to whom the emoluments of their profession are the only source from which they expect their fortune, or even their ordinary revenue and subsistence. In order to acquire this fortune, or even to get this subsistence, they must, in the course of a year, execute a certain quantity of work of a known value; and, where the competition is free, the rivalship of competitors, who are all endeavouring to justle one another out of employment, obliges every man to endeavour to execute his work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exactness. The greatness of the objects which are to be acquired by success in some particular professions may, no doubt, sometimes animate the exertions of a few men of extraordinary spirit and ambition. Great objects, however, are evidently not necessary, in order to occasion the greatest exertions. Rivalship and emulation render excellency, even in mean professions, an object of ambition, and frequently occasion the very greatest exertions. Great objects, on the contrary, alone and unsupported by the necessity of application, have seldom been sufficient to occasion any considerable exertion. In England, success in the profession of the law leads to some very great objects of ambition; and yet how few men, born to easy fortunes, have ever in this country been eminent in that profession!

对于任何一种职业而言，其专业人士付出的辛苦，主要取决于他们做出这种努力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因人而异。对于全指望职业收入挣钱，甚至指望收入维持日常的吃穿用度的人而言，必要性是最大的。为了挣钱或甚至仅为糊口，他们一年中必须做一定量且有一定价值的工作。如果竞争自由，人人争抢工作岗位，那么这种竞争，会使每个人自觉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无疑，在某些行当，通过出色的表现

才能达到的伟大目标有时会激励志向远大、意志坚定的人努力奋斗。但是，那些艰苦奋斗的人不一定是为了伟大的目标。竞争和竞赛可以激发优秀的表现，即便在卑微的行业中也是如此，想要赢过他人的欲望也经常刺激人们努力奋斗。反之，如果单有伟大目标却没有实现的必要，谁也应该不会付出太多努力。在英国，精通法律大大有助于促成其他成就，但那些出生于富庶家庭的人中，精通法律的又能有几个呢？

The endowments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have necessarily diminished, more or less, the necessity of application in the teachers. Their subsistence, so far as it arises from their salaries, is evidently derived from a fund, altogether independent of their success and reputation in their particular professions.

普通学校以及专科院校由公共资金支持，必然多多少少会减少教师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要是教师的生计靠薪资维持，就需要仰给公共资金的资助，而这和他们在业内取得多大的成就，有多响亮的名声丝毫无关。

In some universities, the salary makes but a part, and frequently but a small part, of the emoluments of the teacher, of which the greater part arises from the honoraries or fees of his pupils. The necessity of application, though always more or less diminished, is not, in this case, entirely taken away. Reputation in his profession is still of some importance to him, and he still has some dependency upon the affection, gratitude, and favourable report of those who have attended upon his instructions; and these favourable sentiments he is likely to gain in no way so well as by deserving them, that is, by the abilities and diligence with which he

discharges every part of his duty.

在有些大学，教师的报酬只有极小一部分来自于薪俸，其余大部分则来自学生的谢礼或学费。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勤勉工作的必要性确实有所降低，但他仍需敬职敬业，因为职业声誉仍然十分重要。他仍然需要学生对他的敬爱、感激及好评，且唯有在履行各项义务时尽职尽责，勤勉工作，方可博得这些好感。

In other universities, the teacher is prohibited from receiving any honorary or fee from his pupils, and his salary constitutes the whole of the revenue which he derives from his office. His interest is, in this case, set as directly in opposition to his duty as it is possible to set it. It is the interest of every man to live as much at his ease as he can; and if his emoluments are to be precisely the same, whether he does or does not perform some very laborious duty, it is certainly his interest, at least as interest is vulgarly understood, either to neglect it altogether, or, if he is subject to some authority which will not suffer him to do this, to perform it in as careless and slovenly a manner as that authority will permit. If he is naturally active and a lover of labour, it is his interest to employ that activity in any way from which he can derive some advantage, rather than in the performance of his duty, from which he can derive none.

其他大学禁止教师收受学生的谢礼或学费，教师从职务中获得的全部收入就是他的薪俸。如此一来，教师的义务与利益就被置于极其对立的局面。人的利益在于尽可能过安逸的生活。如果某种义务十分吃力，且无论他履行与否，报酬完全不变，那么为了自身利益，他就会玩忽职守。如果他所服从的权力不允许他放弃职务，那他就会在权

力容许的范围内，尽量敷衍了事。如果他积极活跃，爱好劳动，那么与其把活力用在无利可图的职务上，不如去寻求对他更加有利的职务。

If the authority to which he is subject resides in the body corporate, the college, or university, of which he himself is a member, and whic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other members are, like himself, persons who either are, or ought to be teachers, they are likely to make a common cause, to be all very indulgent to one another, and every man to consent that his neighbour may neglect his duty, provided he himself is allowed to neglect his own.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ublic professors have, for these many years, given up altogether even the pretence of teaching.

如果教师服从的权力归属于法人团体，即他所属的独立学院或大学，且其他成员大部分也是教师或即将成为教师者，那么他们会基于共同的立场，彼此间宽大为怀，容忍对方的玩忽职守。最近许多年来，牛津大学一大部分教授甚至连表面功夫也不愿意做了。

If the authority to which he is subject resides, not so much in the body corporate, of which he is a member, as in some other extraneous persons, in the bishop of the diocese, for example, in the governor of the province, or, perhaps, in some minister of state, it is not, indeed, in this case, very likely that he will be suffered to neglect his duty altogether. All that such superiors, however, can force him to do, is to attend upon his pupils a certain number of hours, that is, to give a certain number of lectures in the week, or in the year. What those lectures shall be, must still depend upon the

diligence of the teacher; and that diligence is likely to be proportioned to the motives which he has for exerting it. An extraneous jurisdiction of this kind, besides, is liable to be exercised both ignorantly and capriciously. In its nature, it is arbitrary and discretionary; and the persons who exercise it, neither attending upon the lectures of the teacher themselves, nor perhaps understanding the sciences which it is his business to teach, are seldom capable of exercising it with judgment. From the insolence of office, too, they are frequently indifferent how they exercise it, and are very apt to censure or deprive him of his office wantonly and without any just cause. The person subject to such jurisdiction is necessarily degraded by it, and, instead of being one of the most respectable, is rendered one of the meanest and most contemptible persons in the society. It is by powerful protection only, that he can effectually guard himself against the bad usage to which he is at all times exposed; and this protection he is most likely to gain, not by ability or diligence in his profession, but by obsequiousness to the will of his superiors, and by being ready, at all times, to sacrifice to that will the rights, the interest, and the honour of the body corporate, of which he is a member. Whoever has attended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French university, must have had occasion to remark the effects which naturally result from an arbitrary and extraneous jurisdiction of this kind.

如果教师们服从的权力掌握在他们所属法人团体之外的人物之手，如教区主教、州长或阁员，那么他们极可能无法做到全然忽略其义务。不过，这些上级所能强制的义务，也只是上课的时长以及做演讲的次数。至于演讲的内容如何，依旧要依赖教师的勤勉，而教师的勤勉，又由其努力的动机决定。此外，这种来自外部的监督在本质上任意专断，在执行时往往无知且反复不定。行使监督的人，既未亲自前往课堂听讲，又不一定懂得教师所教的学科，因此很难明断地执行

监督。此外，监督权产生的傲慢，往往使他们在行使职权时漫不经心，因而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任意谴责或开除教师。如此一来，教师的地位必然降低。他们原本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现在却沦为最卑贱、最受轻视之人。为有效地规避被随时恶劣对待的风险，他唯有全力做好自我保护，不仅不尽职尽责、勤勉于职，反而极可能对上级曲意逢迎，甚至为上级的意愿随时准备牺牲所在法人团体的权利、利益和名誉。但凡长期间留心观察过法国大学的管理之人，定可看到这种专断的外部监督必然产生的后果。

Whatever forces a certain number of students to any college or university, independent of the merit or reputation of the teachers, tends more or less to diminish the necessity of that merit or reputation.

如果一定人数的学生被强迫进入某学院或大学，而不论其教师的品德和名望，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师对品德和名望的重视。

The privileges of graduates in arts, in law, physic, and divinity, when they can be obtained only by residing a certain number of years in certain universities, necessarily force a certain number of students to such universities, independent of the merit or reputation of the teachers. The privileges of graduates are a sort of statutes of apprenticeship, which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just as the other statutes of apprenticeship have to that of arts and manufactures.

倘若艺术、法律、医学、神学等各科的学生，只要在某些大学住满一定年限，就能获得毕业生的种种特权，那必然使一定数量的学生

纷纷涌向这些大学，而不考虑教师的品行和名望。毕业生的特权也是一种学徒制。正如其他学徒制有助于技艺及制造上的改良，这种学徒制也能促进教育上的改良。

The charitable foundations of scholarships, exhibitions, bursaries, etc. necessarily attach a certain number of students to certain colleges, independent altogether of the merit of those particular colleges. Were the students upon such charitable foundations left free to choose what college they liked best, such liberty might perhaps contribute to excite some emulation among different colleges. A regulation, on the contrary, which prohibited even the independent members of every particular college from leaving it, and going to any other, without leave first asked and obtained of that which they meant to abandon, would tend very much to extinguish that emulation.

研究费、奖学金和助学金之类的慈善基金，必然吸引一定数量的学生到某些大学学习，而不考虑学校的名誉如何。若让这些依赖慈善基金的学生自由选择最喜欢的大学，或许会引起各大学间的竞争。反之，如果规定各大学的自费生未经本校许可就不得转入他校，这极可能会消灭学校间的竞争。

If in each college, the tutor or teacher, who was to instruct each student in all arts and sciences, should not be voluntarily chosen by the student, but appointed by the head of the college; and if, in case of neglect, inability, or bad usage, the student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change him for another, without leave first asked and obtained; such a regulation would not only tend very much to extinguish all emulation among the different tutors of the same

college, but to diminish very much, in all of them, the necessity of diligence and of attention to their respective pupils. Such teachers, though very well paid by their students, might be as much disposed to neglect them, as those who are not paid by them at all or who have no other recompense but their salary.

大学里传授文理科知识的导师或教师不由学生自主选择，而由校长指派；即使指派的教师教学能力差，行事怠慢，且品行不良，学生未经申请许可，也不得更换教师。如有这种规定，不但会扼杀同一学校内各导师和各教师间的竞争，而且会降低他们勤勉任教以及关心学生学习的必要性。这样的老师，即使收到学生丰厚的报酬，也可能像那些除了薪水之外再无报酬的人一样，对学生的学习漠不关心。

If the teacher happens to be a man of sense, it must be an unpleasant thing to him to be conscious, while he is lecturing to his students, that he is either speaking or reading nonsense, or what is very little better than nonsense. It must, too, be unpleasant to him to observe,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students desert his lectures; or perhaps, attend upon them with plain enough marks of neglect, contempt, and derision. If he is obliged, therefore, to give a certain number of lectures, these motives alone, without any other interest, might dispose him to take some pains to give tolerably good ones. Several different expedients, however, may be fallen upon, which will effectually blunt the edge of all those incitements to diligence. The teacher, instead of explaining to his pupils himself the science in which he proposes to instruct them, may read some book upon it; and if this book is written in a foreign and dead language, by interpreting it to them into their own, or, what would give him still less trouble, by making them interpret it to him, and by now and then making an occasional remark upon it, he may flatter himself

that he is giving a lecture. The slightest degree of knowledge and application will enable him to do this, without exposing himself to contempt or derision, by saying anything that is really foolish, absurd, or ridiculous. The discipline of the college, at the same time, may enable him to force all his pupils to the most regular attendance upon his sham lecture, and to maintain the most decent and respectful behaviour during the whole time of the performance.

如果教师是一个明智之人，当他自己意识到向学生讲授的不过是一些几乎无意义的内容时，定会十分不悦。此外，当他发现学生上他的课时出勤率低，或者态度上明显地漫不经心，甚至轻蔑嘲讽，他也一定会心情不悦。因此，在规定次数的讲课中，即使不涉及个人利益，他也会受这些心理的激励，费尽苦心，力求课程的完善。不过，他可能采用一些权宜之计，这样就会有力地削弱所有激励其勤勉的动机。老师在教授一门学科时，可能不对其加以阐释，而把相关的书籍拿来讲读；如果那种书籍是由一门已经不再使用的外语写成的，他就用本国语向学生译述；而更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学生们向他解释书本的内容，他只需间或插入一些评论，便可吹嘘说自己是在授课了。这些事只需些微的知识和勤勉就足以做到，可避免讲出真正愚昧而荒唐可笑的话，从而不会受到轻蔑或嘲弄。同时，借助学校的规则，教师可强制学生全部全勤出席他那名不副实的课堂，并在他讲授的全过程中表现得礼貌恭敬。

The disciplin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in general contrived, no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students, but for the interest, or, more properly speaking, for the ease of the masters. Its object is, in all cases, to maintain the authority of the master, and, whether he neglects or performs his duty, to oblige the students in all cases to behave to him as if he performed it with the greatest diligence and ability. It seems to presume perfect wisdom and virtue in the one

order, and the greatest weakness and folly in the other. Where the masters, however, really perform their duty, there are no examples, I believe,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tudents ever neglect theirs. No discipline is ever requisite to force attendance upon lectures which are really worth the attending, as is well known wherever any such lectures are given. Force and restraint may, no doubt, be in some degree requisite, in order to oblige children, or very young boys, to attend to those parts of education, which it is thought necessary for them to acquire during that early period of life; but after twelve or thirteen years of age, provided the master does his duty, force or restraint can scarce ever be necessary to carry on any part of education. Such is the generosity of the greater part of young men, that so far from being disposed to neglect or despise the instructions of their master, provided he shows some serious intention of being of use to them, they are generally inclined to pardon a great deal of incorrectness in the performance of his duty, and sometimes even to conceal from the public a good deal of gross negligence.

一般而言，独立学院及大学的校规代表的不是学生的利益，而是教师的利益，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为教师的安逸而制定的。无论何时，校规的目的在于维持教师的权威。不论教师有没有履行其职务，学生都必须毕恭毕敬地把他当作勤勉而尽职尽责的教师。这似乎是认为，教师占据了智慧和品德的制高点，而学生则是怯弱且愚笨的。然而，若教师真的履行了他们的职责，而大多数学生仍然对自己的义务漫不经心，我相信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倘若课程真的值得一听，无论在何处，学生们也会主动出席，无需校规的强制。对于儿童和少年，为使他们获得幼年时必须接受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需要强制干涉。但学生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只要教师履行其职务，任何课程都不需要强制干涉。大多数青年人都是心胸开阔的。只要教师表示要尽力帮助他们，他们不但不会疏忽轻蔑教师的教导，甚至能原谅

教师在履行职务上的一些错误。有时，他们甚至会为老师掩饰掉种种粗心大意，使其不为外人发现。

Those parts of education, it is to be observed, for the teaching of which there are no public institutions, are generally the best taught. When a young man goes to a fencing or a dancing school, he does not, indeed, always learn to fence or to dance very well; but he seldom fails of learning to fence or to dance. The good effects of the riding school are not commonly so evident. The expense of a riding school is so great, that in most places it is a public institution. The three most essential parts of literary education, to read, write, and account, it still continues to be more common to acquire in private than in public schools; and it very seldom happens, that anybody fails of acquiring them to the degree in which it is necessary to acquire them.

应该注意的是，未设公立机构的那一部分教育往往是最好的。例如，青年进入击剑学校或舞蹈学校学习，虽然未必都学得很精，但至少都学会了击剑和跳舞。马术学校费用巨大，属于名副其实的公共机构，但其教学效果却通常没有如此显著。文科教育中最重要的三部分为阅读、书写和算术。迄今为止，进私立学校学习这三种能力，仍然比进公立学校更为普遍。并且，学习者大多能够学到所必须学得的水平。

In England, the public schools are much less corrupted than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schools, the youth are taught, or at least may be taught, Greek and Latin; that is, everything which the masters pretend to teach, or which it is expected they should teach. In the universities, the youth neither are taught, nor always can find any

proper means of being taught the sciences, which it is the business of those incorporated bodies to teach. The reward of the schoolmaster, in most cases, depends principally, in some cases almost entirely, upon the fees or honoraries of his scholars. Schools have no exclusive privileges. In order to obtain the honours of graduation,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a person should bring a certificate of his having studied a certain number of years at a public school. If, upon examination, he appears to understand what is taught there, no questions are asked about the place where he learnt it.

在英国，公立学校虽也腐败，但比大学要好得多。在公立学校，青年学生至少可能学到希腊语和拉丁语，因为老师会将所有想教和应该教的内容全部教给学生。但在大学，这些法人团体应该教授的学科，青年学生们不仅统统没学到，而且也没有找到学习这些学科的适当方法。公立学校教师的报酬，多数情况下主要来自于学生的学费或谢礼，有时甚至完全来源于此。公立学校没有任何专有特权。一个人要取得毕业学位，并不一定要出示在公立学校学习满一定年限的证书。只要他在考试中能证明已掌握了在公立学校所教授的内容，至于在何处习得这些知识，就不会有人过问。

The parts of education which are commonly taught in universities, it may perhaps be said, are not very well taught. But had it not been for those institutions, they would not have been commonly taught at all; and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the public would have suffered a good deal from the want of those important parts of education.

可以这样说，大学里通常教授的那部分课程，并没有教得很好。

但是若没有这些大学机构，这部分教育就无法得到普及。而个人和社会都会认为，缺少这些重要的教育是重大的损失。

The present universities of Europe were originally,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ecclesiastical corporations, instituted for the education of churchmen. They were found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Pope; and were so entirely under his immediate protection, that their members, whether masters or students, had all of them what was then called the benefit of clergy, that is, were exempted from the civil jurisdiction of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ir respective universities were situated, and were amenable only to the ecclesiastical tribunals. What was taught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universities was suitable to the end of their institution, either theology, or something that was merely preparatory to theology.

现在大部分的欧洲大学，最初都是教皇为教育神职人员而设立的宗教团体。因此，学校中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完全由教皇直接庇护，并拥有当时所谓的神职人员特权。这一特权使他们只服从宗教法庭，而不受大学所在国的民事法庭的管辖。学校里教授的内容大部分要与学校的创立宗旨相一致，所以其课程主要是神学，以及学习神学必备的学问。

When Christianity was first established by law, a corrupted Latin had become the common language of all the western parts of Europe.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accordingly,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which was read in churches, were both in that corrupted Latin; that is, in the common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After the irruption of the barbarous nations who overturned the Roman empire, Latin gradually ceased to be the language of any

part of Europe. But the reverence of the people naturally preserves the established forms and ceremonies of religion long after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first introduced and rendered them reasonable, are no more. Though Latin, therefore, was no longer understood anywhere by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the whole service of the church still continued to be performed in that language. Two different languages were thus established in Europe,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ancient Egypt: a language of the priests, and a language of the people; a sacred and a profane, a learned and an unlearned language. But it was necessary that the priests should understand something of that sacred and learned language in which they were to officiate; and the study of the Latin language therefore made, from the beginning, an essential par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当法律确定基督教为国教时，转讹的拉丁语就成了西欧所有国家的通用语言。因此，教堂中的礼拜仪式，教堂中诵读的《圣经》译文，全用这种作为国家通用语的拉丁语。自从罗马帝国在野蛮民族的入侵下覆灭后，拉丁语渐渐不再是欧洲各地的通用语言。尽管当初使宗教仪式合理化的环境早已远逝，但人们的虔诚却自然地将这些既定的仪式保存下来。因此，尽管拉丁语已不再是任何地方的通用语，教堂举行礼拜仪式仍然全程使用这种语言。于是，如同在古代埃及一样，欧洲同时行使着两种不同的语言：神职人员的语言和人民的语言。前一种被视为神圣的、有学问的语言，后一种被视为世俗的、无学问的语言。由于神职人员在执行圣职时必须懂得这种神圣的、有学问的语言，所以拉丁语从一开始就是大学教育的重要部分。

It was not so with that either of the Greek or of the Hebrew language. The infallible decrees of the church had pronounced the Latin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commonly called the Latin Vulgate, to have been equally dictated by divine inspiration, and therefore of

equal authority with the Greek and Hebrew originals. The knowledge of those two languages, therefore, not being indispensably requisite to a churchman, the study of them did not for along time make a necessary part of the common cours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re are some Spanish universities, I am assured, in which the study of the Greek language has never yet made any part of that course. The first reformers found the Greek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even the Hebrew text of the Old, more favourable to their opinions than the Vulgate translation, which, as might naturally be supposed, had been gradually accommodated to support the doctrin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y set themselves, therefore, to expose the many errors of that translation, which the Roman Catholic clergy were thus put under the necessity of defending or explaining. But this could not well be done without some knowledge of the original languages, of which the study was therefore gradually introduced into the greater part of universities; both of those which embraced, and of those which rejected, the doctrines of the reformation. The Greek language was connected with every part of that classical learning, which, though at first principally cultivated by Catholics and Italians, happened to come into fashion much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doctrines of the Reformation were set on foot. In the greater part of universities, therefore, that language was taught previous to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and as soon as the student had made some progress in the Latin. The Hebrew language having no connection with classical learning, and, except the Holy Scriptures, being the language of not a single book in any esteem, the study of it did not commonly commence till after that of philosophy, and when the student had entered upon the study of theology.

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境况却大不相同。阐述教义无误的教会教令

曾宣布，拉丁语译本的《圣经》（即《拉丁语圣经》），与希腊语及希伯来语的原著同为上帝的灵感所口授，故有同等的权威。因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知识对于神职人员不再必不可少。于是，这两种语言的研究，并未长期作为大学必修的普通课程。我确信，西班牙的一些大学从未把希腊语研究设置为这类普通课程。最初的宗教改革者们发现，《新约全书》的希腊语原书，甚至《旧约全书》的希伯来语原书，对他们的主张更有利。不难想象，天主教为支持其教义，已渐渐对拉丁语译本的《圣经》做了一些调整。于是，这些改革者开始揭露拉丁译文中的诸多谬误，使得罗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则不得不出来辩护或说明。但是，若要为此辩护和说明，必然需要通晓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所以，无论是拥护宗教改革之人或是宗教改革的反对者，都渐渐将这两种语言的研究引入多数大学的课程之中。希腊语与各种古典研究密切关系。最初从事古典研究的虽以天主教教徒和意大利人为主，但在宗教着手改革教理时就成了时尚。因此，在多数大学中，学生在拉丁语学习略有进步时，即可学习希腊语，在此之后方可学习哲学。希伯来语和古典研究没有联系，除《圣经》外，再也没有一部著作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所以对这种文字的学习并不普遍。学生们往往是在学习了哲学之后，进行研究神学时，才开始学习希伯来语。

Originally, the first rudiments, both of the Greek and Latin languages, were taught in universities; and in some universities they still continue to be so. In other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student should have previously acquired, at least, the rudiments of one or both of those languages, of which the study continues to make everywhere a very considerable par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最初，各大学只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初步知识。到现在，有的大学仍是如此。另外一些大学则认为，学生应该至少掌握其中一种语言的初步知识。因此，这两种语言仍然是各地大学教育中极其重要的部分。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was divided into three great branches; physics, or natural philosophy; ethics, or moral philosophy; and logic. This general division seems perfectly agreeable to the nature of things.

古代希腊哲学可分有三个部分：物理学（或自然哲学）、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及逻辑学。这样的划分似乎完全合乎事物的自然规律。

The great phenomena of nature,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bodies, eclipses, comets; thunder and lightning, and other extraordinary meteors; the generation, the life, growth, and dissolu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are objects which, as they necessarily excite the wonder, so they naturally call forth the curiosity of mankind to inquire into their causes. Superstition first attempted to satisfy this curiosity, by referring all those wonderful appearances to the immediate agency of the gods. Philosophy afterwards endeavoured to account for them from more familiar causes, or from such as mankind were better acquainted with, than the agency of the gods. As those great phenomena are the first objects of human curiosity, so the science which pretends to explain them must naturally have been the first branch of philosophy that was cultivated. The first philosophers, accordingly, of whom history has preserved any account, appear to have been natural philosophers.

伟大的自然现象，天体的运行，日食月食，彗星；雷电及其他异常的大气现象；植物和动物的繁殖、生活、成长及死亡等，这些必定

使人类惊叹，所以自然会使人类好奇，想要一探究竟。迷信是人类为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初尝试。它把这一切惊异的现象都直接归因于神的力量。后来，哲学努力根据比神的力量更为人类所知的原因，去解释这些惊异的现象。这些伟大现象激发了人类最初的好奇心，对此进行说明的科学必然成为第一门哲学。因此，历史上所记载的最早的哲学家，似乎就是一些自然哲学家。

In every age and country of the world, men must have attended to the characters, designs, and actions of one another; and many reputable rules and maxims for the conduct of human life must have been laid down and approved of by common consent. As soon as writing came into fashion, wise men, or those who fancied themselves such, would naturally endeavour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hose established and respected maxims, and to express their own sense of what was either proper or improper conduct, sometimes in the more artificial form of apologues, like what are called the fables of Aesop; and sometimes in the more simple one of apophthegms or wise sayings, like the Proverbs of Solmnon, the verses of Theognis and Phocyllides, and some part of the works of Hesiod. They might continue in this manner, for a long time, merely to multiply the number of those maxims of prudence and morality, without even attempting to arrange them in any very distinct or methodical order, much less to connect them together by one or more general principles, from which they were all deducible, like effects from their natural causes. The beauty of a systematical arrangement of different observations, connected by a few common principles, was first seen in the rude essays of those ancient times towards a system of natural philosophy. Something of the same kind was afterwards attempted in morals. The maxims of common life were arranged in some methodical order, and connected together by a few common principles,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y had attempted to arrange

and connect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The science which pretends to investigate and explain those connecting principles, is what is properly called Moral Philosophy.

无论哪个时代和哪个国家，人们总会注意各自的性格、意向及行为；总会为人类的生活和行为共同确定并规定一些高尚的规则及准则。写作一开始流行，许多聪明人或自作聪明之人，就自然要努力来增加这些既定的高尚准则，并表达他们对于某种行为是否正当的意见。他们有时采用虚构的寓言，如《伊索寓言》；有时又使用比较简单的箴言，如《所罗门金言》，提西奥尼斯及弗西里迪斯的诗，以及赫西奥德的一部分作品等。在很长时间里，他们可能持续以这种方式来增加智慧及道德的准则，而从未试着用一种明确而系统的次序，将其整理起来。更不用说像推断因果关系那样，从诸多准则中推断中一两条一般性原则，使它们综合联系起来。把不同的观察结果用一些普通原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整体，这种明智的做法，最初出现在古代一些旨在将自然哲学发展成体系的尚未成熟的论文中。此后，道德方面也开始沿用此法。日常生活的诸多准则，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一样，也按某种系统性的次序整理起来了，用若干普通原理综合联系起来。所谓道德哲学，就是对这些起联系作用的普通原则进行研究和说明的科学。

Different authors gave different systems, both of natural and moral philosophy. But the arguments by which they supported those different systems, far from being always demonstrations, were frequently at best but very slender probabilities, and sometimes mere sophisms, which had no other foundation but the inaccuracy and ambiguity of common language. Speculative systems, have, in all ages of the world, been adopted for reasons too frivolous to have determined the judgment of any man of common sense, in a matter of the smallest pecuniary interest. Gross sophistry has scarce ever

had any influence upon the opinions of mankind, except in matters of philosophy and speculation; and in these it has frequently had the greatest. The patrons of each system of natural and moral philosophy, naturally endeavoured to expose the weakness of the arguments adduced to support the systems which were opposite to their own. In examining those arguments, they were necessarily led to consid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robable and a demonstrative argument, between a fallacious and a conclusive one; and Logic, or the science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good and bad reasoning, necessarily arose out of the observations which a scrutiny of this kind gave occasion to; though, in its origin, posterior both to physics and to ethics, it was commonly taught, not indeed in all, but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ancient schools of philosophy, previously to either of those sciences. The student, it seems to have been thought, ought to understand w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od and bad reasoning, before he was led to reason upon subjects of so great importance.

不同的作家将自然哲学及道德哲学归入不同的体系。但是支持那些体系的论证，往往毫无根据，多为极其无力的盖然论。有时，这些论证不过是诡辩，除了一些含糊不明的日常说法外，没有任何根据。在任何时代，思辨体系的采用往往太过琐细，且无关乎金钱利益，故而任何有常识之人都不会因此而影响自己的判断。诡辩几乎对人类的观点没有任何影响，但对哲学及思辨方面的问题却影响深远。每一种自然哲学体系及道德哲学体系的拥护者，自然会要竭力揭露异己者论点上的弱点。他们在研究异己者的议论时，必然会思考盖然的议论和论证的议论的差异，似是而非的议论和可信服的议论的差异。由这严密的审查引起的思考，必然导致了逻辑学的产生。逻辑学旨在讨论正确的和错误的推论的一般原理，其起源迟于物理学及伦理学的。但在古代大部分哲学学校中，逻辑学的学习通常先于这两种科学。那时候的观点似乎是，学生必须学会区分正确的推理和谬误的推理，方能在

物理学和伦理学这两种非常重要的课题上进行推理思考。

This ancient division of philosophy into three parts was,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changed for another into five.

古代哲学分为三个部分，而欧洲大部分大学则将其分为五部分。

In the ancient philosophy, whatever was taught concerning the nature either of the human mind or of the Deity, made a part of the system of physics. Those beings, in whatever their essence might be supposed to consist, were parts of the great system of the universe, and parts, too, productiv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ffects. Whatever human reason could either conclude or conjecture concerning them, made, as it were, two chapters, though no doubt two very important ones, of the science which pretended to give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revolutions of the great system of the universe. But in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where philosophy was taught only as subservient to theology, it was natural to dwell longer upon these two chapters than upon any other of the science. They were gradually more and more extended, and were divided into many inferior chapters; till at last the doctrine of spirits, of which so little can be known, came to take up as much room in the system of philosophy as the doctrine of bodies, of which so much can be known. The doctrines concerning those two subjects were considered as making two distinct sciences. What are called Metaphysics, or Pneumatics, were set in opposition to physics, and were cultivated not only as the more sublime, but, for the purposes of a particular profession, as the more useful science of the two. The

proper subject of experiment and observation, a subject in which a careful attention is capable of making so many useful discoveries, was almost entirely neglected. The subject in which, after a few very simple and almost obvious truths, the most careful attention can discover nothing but obscurity and uncertainty, and can consequently produce nothing but subtleties and sophisms, was greatly cultivated.

在古代哲学中，关于人类精神或神的性质的一切知识，都属于物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无论这精神或神的本质由什么构成，都属于宇宙这一大体系，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力。在说明宇宙大体系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中，人类用理性对精神或神的本质做出的一切论断和推测，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两章。但在欧洲各大学的教学中，哲学只是神学的附属部分，所以对于这两章，自然要比其他科学有更多的思考。因此，这两章逐渐地扩充开来，进一步细分为许多的小章节。最后，在哲学体系中，我们所知极少的精神学说，就与我们熟知的物体学说占有同样的比例。这两种学说，被视为两种不同类别的科学。所谓形而上学或精神学，因此被放在物理学的相对面，它不但被看作这两种科学中更为崇高的科学，而且就某一特定职业来说更为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主题，只要细心留意便可从中得出许多有用的发现，且适合作为实验及观察对象，却几乎被忽略。相反，另一种主题，除少数极其简单且显而易见的真理外，即使细心关注也只能从中得出含糊不明的发现，最终只能产生狡智和诡辩。这样的主题却广为研究。

When those two sciences had thus been set in opposition to one another,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m naturally gave birth to a third, to what was called Ontology, or the science which treated of the qualities and attributes which were common to both the subjects of the other two sciences. But if subtleties and sophisms compose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etaphysics or Pneumatics of the

schools, they composed the whole of this cobweb science of ontology, which was likewise sometimes called Metaphysics.

当上述两种科学被放在相对立的位置时，两者间的比较自然会生出第三种科学，即所谓的本体论。本体论讨论其他两种科学主题的共同特质及属性。但如果各学派的形而上学或精神学的主要内涵是狡智与诡辩，那本体论这种复杂的科学（有时亦称为形而上学）也是由狡智与诡辩组成。

Wherein consisted the happiness and perfection of a man, considered not only as an individual, but as the member of a family, of a state, and of the great society of mankind, was the object which the ancient moral philosophy proposed to investigate. In that philosophy, the duties of human life were treated as subservient to the happiness and perfection of human life. But when moral, as well as natural philosophy, came to be taught only as subservient to theology, the duties of human life were treated of as chiefly subservient to the happiness of a life to come. In the ancient philosophy, the perfection of virtue was represented as necessarily productive, to the person who possessed it, of the most perfect happiness in this life. In the modern philosophy, it was frequently represented as generally, or rather as almost always, inconsistent with any degree of happiness in this life; and heaven was to be earned only by penance and mortification, by the austerities and abasement of a monk, not by the liberal, generous, and spirited conduct of a man. Casuistry, and an ascetic morality, made up, in most case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the schools.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philosophy became in this manner by far the most corrupted.

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如何获得幸福，并实现自我完善，是古代道德哲学所探讨的对象。在古代道德哲学中，人生的义务就在于实现人类的幸福与自我完善。但是，当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学习只是为神学服务时，这种人生的义务主要以来生的幸福为目的。古代哲学认为，德行完美之人必然会在来生享受到最大的幸福。而近代哲学却认为，完美的德行，往往或几乎总是与来生的幸福无关。想要进入天堂，只有通过忏悔、禁欲，或者修道士般的苦行和自卑，而非慷慨、宽大和精神饱满的行动。决疑论及禁欲道德成为各学校道德哲学的主要部分。一切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就这样成了其中最被曲解的部分。

Such, therefore, was the common course of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universities in Europe. Logic was taught first; Ontology came in the second place; Pneumatology, comprehending the doctrine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soul and of the Deity, in the third; in the fourth followed a debased system of moral philosophy, which was considered as immedi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doctrines of Pneumatology, with the immortality of the human soul, and with th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which, from the justice of the Deity, were to be expected in a life to come; a short and superficial system of Physics usually concluded the course.

因此，欧洲大部分大学的哲学教育都遵循以下程序：首先学习论理学；第二，学习本体论；第三，学习精神学（即讨论人类灵魂和神的性质的科学）；第四，学习一种变质的道德哲学，这种哲学被认为与精神学说、人类灵魂不灭以及神对来生的审判直接相关；最后，通常以简单浅显的物理学来结束全部课程。

The alterations which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thus introduced into the ancient course of philosophy were all meant for the education of ecclesiastics, and to render it a more proper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ology. But the additional quantity of subtlety and sophistry, the casuistry and the ascetic morality which those alterations introduced into it, certainly did not render it more proper for the education of gentlemen or men of the world, or more likely either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r to mend the heart.

欧洲各大学对古代哲学课程内容所做的变更，都是旨在教育神职人员，使哲学成为神学研究的适当入门。但变更中加强了狡智与诡辩的学习，并引入决疑论与禁欲道德，完全没有使哲学更适宜于绅士或一般世人的教育，或者说，并没有增强他们的理解力，或改善其心理素质。

This course of philosophy is what still continues to be taught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with more or less diligence, according as the constitution of each particular university happens to render diligence more or less necessary to the teachers. In some of the richest and best endowed universities, the tutors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teaching a few unconnected shreds and parcels of this corrupted course; and even these they commonly teach very negligently and superficially.

在当今欧洲大部分大学里，这种哲学课程依然被纳入教学大纲。由于各大学对该课程教师的要求不一样，这一课程受到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在那些最富裕、有最多捐赠基金的大学，老师们教授的往往只是这种转讹课程的残章断篇，且教得非常马虎浅显。

The improvements which, in modern times have been made in several different branches of philosophy, have no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been made in universities, though some, no doubt, have. The greater part of universities have not even been very forward to adopt those improvements after they were made; and several of those learned societies have chosen to remain, for a long time, the sanctuaries in which exploded systems and obsolete prejudices found shelter and protection, after they had been hunted out of every other corner of the world. In general, the richest and best endowed universities have been the slowest in adopting those improvements, and the most averse to permit any considerable change in the established plan of education. Those improvements were more easily introduced into some of the poorer universities, in which the teachers, depending upon their reputation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subsistence, were oblig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rrent opinions of the world.

近代对哲学一些分支的改良，虽无疑已部分在大学中实行，但还有大部分未在大学中实行。大多数大学即使做了这些改良，也不急于采用。一些这样的学术团体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愿意容纳和保护那些被推翻的体系和陈腐的偏见，在它们为世界各地所不容时充当其避难所。总体来说，最富裕、有最多捐赠基金的大学，在实行改良时行动最为迟缓，也最不愿意对既定的教育计划做任何大的变动。在经济更加拮据的大学，老师们多依存于自己的名声，不得不更加留心世界的思想潮流，因而这类改良也更容易实行。

But though the public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of Europe were originally intended only for the education of a particular profession, that of churchmen; and though they were not always very diligent in instructing their pupils, even in the sciences which were

supposed necessary for that profession; yet they gradually drew to themselves the education of almost all other people, particularly of almost all gentlemen and men of fortune. No better method, it seems, could be fallen upon, of spending, with any advantage, the long interval between infancy and that period of life at which men begin to apply in good earnest to the real business of the world, the business which is to employ them during the remainder of their days. The greater part of what is taught i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does not seem to be the most proper preparation for that business.

然而，尽管欧洲最初建立公立学校及大学的目的仅在于培养神职人员这种特定的职业。虽然它们在教育学生方面，甚至在一些必要的学科上，都未能始终勤勉尽职；但它们却逐渐将几乎所有人，尤其是绅士及富人，都纳入自己的教学范围。人自幼年起，到开始热切投身于余生所经营的事业，此间很长的一段时间，最适合在学校里度过，别无其他。然而，各公立学校和大学所教授的大部分内容，并没有为学生后来经营的事务做好最合适的准备。

In England, it becomes every day more and more the custom to send young people to travel in foreign countries immediately upon their leaving school, and without sending them to any university. Our young people, it is said, generally return home much improved by their travels. A young man, who goes abroad at seventeen or eighteen, and returns home at one-and-twenty, returns three or four years older than he was when he went abroad; and at that age it is very difficult not to improve a good deal in three or four years. In the course of his travels, he generally acquires some knowledge of one or two foreign languages; a knowledge, however, which is seldom sufficient to enable him either to speak or write them with

propriety. In other respects, he commonly returns home more conceited, more unprincipled, more dissipated, and more incapable of any serious application, either to study or to business, than he could well have become in so short a time had he lived at home. By travelling so very young, by spending in the most frivolous dissipation the most precious years of his life, at a distance from the inspection and control of his parents and relations, every useful habit, which the earlier parts of his education might have had some tendency to form in him, instead of being riveted and confirmed, is almost necessarily either weakened or effaced. Nothing but the discredit into which the universities are allowing themselves to fall, could ever have brought into repute so very absurd a practice as that of travelling at this early period of life. By sending his son abroad, a father delivers himself, at least for some time, from so disagreeable an object as that of a son unemployed, neglected, and going to ruin before his eyes.

在英国，青年人高中毕业后立刻出国游学，而不进入大学，这种做法日益流行起来。据说，这些青年人游学归来会有很大的长进。一个年轻人在十七八岁出国，21岁归来，回国时会比出国时大三四岁。在这三四年的时间里，他必定进步很大。在游学过程中，他一般会习得一到两门外语知识，但很少能达到口语流利，写作通顺的地步。另一方面，回国之后，他往往会变得更加自负、随意和放任，更不能专心学习、勤奋做事。若他在这短暂的时期内留在国内，绝不至此。年纪轻轻就出国游学，将一生最宝贵的时光挥霍殆尽，远离父母及亲戚的监督和管控，早年教育中养成的好习惯，不但无法得到巩固，反而弱化，甚至消失。这种早年外出游学的荒诞做法之所以会流行，只能归因于社会对大学的不信任。为人父亲者，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看到自己的儿子无所事事、心不在焉地陷于堕落，不得已把孩子送出国去。

Such have been the effects of some of the modern institutions for education.

这正是一些近代教育机构所产生的影响。

Different plans and different institutions for education seem to have taken place in other ages and nations.

在其他时代及国家，实行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制度似乎也各不相同。

In the republics of ancient Greece, every free citizen was instruct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public magistrate, in gymnastic exercises and in music. By gymnastic exercises, it was intended to harden his body, to sharpen his courage, and to prepare him for the fatigues and dangers of war; and as the Greek militia was, by all accounts, one of the best that ever was in the world, this part of their public education must have answered completely the purpose for which it was intended. By the other part, music, it was proposed, at least by the philosophers and historians, who have given us an account of those institutions, to humanize the mind, to soften the temper, and to dispose it for performing all the social and moral duties both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每个自由市民都是在国家官员的指导下进行体操训练和音乐学习的。进行体操训练的目的是强身健体，增强勇气，并养成抵御战时疲劳和危险的能力。据说，希腊的民兵曾经是世

界上最好的民兵之一；所以，他们所接受的这部分公共教育完全实现了它所要达到的目的。至于这公共教育的另一部分，即音乐教育，至少在那些记录并传承这种制度的哲学家及历史学家看来，其目的在于使人通人情，性情变得柔和，并使人能够在社会生活及个人生活中履行一切社会义务和道德义务。

In ancient Rome, the exercises of the Campus Martius answered the same purpose as those of the Gymnasium in ancient Greece, and they seem to have answered it equally well. But among the Romans there was nothing which corresponded to the musical education of the Greeks. The morals of the Romans, however, both in private and public life, seem to have been, not only equal, but, upon the whole, a good deal superior to those of the Greeks. That they were superior in private life, we have the express testimony of Polybius, and of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two authors well acquainted with both nations; and the whole tenor of the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bears witness to the superiority of the public morals of the Romans. The good temper and moderation of contending factions seems to be the most essential circumstances in the public morals of a free people. But the factions of the Greeks were almost always violent and sanguinary; whereas, till the time of the Gracchi, no blood had ever been shed in any Roman faction; and from the time of the Gracchi, the Roman republic may be considered as in reality dissolved. Notwithstanding, therefore, the very respectable authority of Plato, Aristotle, and Polybius,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very ingenious reasons by which Mr. Montesquieu endeavours to support that authority, it seems probable that the musical education of the Greeks had no great effect in mending their morals, since, without any such education, those of the Romans were, upon the whole, superior. The respect of those ancient sages for the institutions of their ancestors had probably disposed them to find much political

wisdom in what was, perhaps, merely an ancient custom, continued, without interruption,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of those societies, to the times in which they had arrived at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refinement. Music and dancing are the great amusements of almost all barbarous nations, and the great accomplishments which are supposed to fit any man for entertaining his society. It is so at this day among the negroes on the coast of Africa. It was so among the ancient Celts, among the ancient Scandinavians, and, as we may learn from Homer, among the ancient Greeks, in the times preceding the Trojan war. When the Greek tribes had formed themselves into little republics, it was natural that the study of those accomplishments should for a long time make a part of the public and common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在古罗马战神广场上进行的训练，与古希腊体育馆中进行的训练，不但目的相同，效果也类似。但在古罗马人之中，并没有与希腊音乐教育相类似的内容。然而，无论在个人生活上还是在社会生活中，罗马人的道德都不比希腊人差，且整体在希腊人之上。罗马人在个人生活上优于希腊人的地方，我们能够从最通晓两国国情的作者坡里比阿和哈里卡纳萨的狄奥尼西阿两人身上看到例证。罗马人在社会道德上的优越，可以从希腊及罗马全程历史中得到证实。面对党派间的争执，能够做到脾气温和似乎就是一个自由民族在社会道德上最重要的事实了。而希腊人面对党派之争，总是动用暴力，流血牺牲。对比之，在罗马，在格拉奇时代之前都未曾发生流血事件。自格拉奇时代以后，罗马共和国实际上就算是解体了。因此，不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坡里比阿拥有多么令人尊重的权威，也不论孟德斯鸠多么努力地要去支持这一权威，似乎希腊人的音乐教育，对修复道德并未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罗马没有音乐教育，然而其道德总体上却超过了希腊。古代这些哲人对其祖先所制定的制度的尊敬，可能致使他们只从古代习俗中发掘政治智慧。这种习俗从太古社会以来一直未曾中断，一直流传到相当进步的当今社会。音乐及舞蹈是几乎所有野蛮民

族的重要娱乐方式，也是使他们适合任何人来款待友伴的重要才能。如今非洲沿岸的黑人如此，古代的凯尔特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也是如此。从荷马身上我们也能了解到，特洛伊战争以前的古代希腊人亦是如此。当希腊各部落将他们组织成各小共和国时，对此等艺能的研究，自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人民公共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一部分。

The masters who instructed the young people, either in music or in military exercises, do not seem to have been paid, or even appointed by the state, either in Rome or even in Athens, the Greek republic of whose laws and customs we are the best informed. The state required that every free citizen should fit himself for defending it in war, and should upon that account, learn his military exercises. But it left him to learn them of such masters as he could find; and it seems to have advanced nothing for this purpose, but a public field or place of exercise, in which he should practise and perform them.

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在法律、习俗为人们所熟知的希腊共和国的雅典，教授学生音乐和体操的教师们的薪俸似乎都不是由国家提供的，这些教师也不是由国家任命的。为了能够让民众能在战时捍卫国家，国家要求各自由市民受军事训练。但进行军训的教师，需要市民自己去寻找，国家除了提供公共场地作为市民训练操演的运动场所外，似乎并没有为实现此目的做出其他努力。

In the early ages, both of the Greek and Roman republics, the other parts of education seem to have consisted in learning to read, write, and account, according to the arithmetic of the times. These accomplishments the richer citizens seem frequently to have acquired at home, by the assistance of some domestic pedagogue,

who was, generally, either a slave or a freedman; and the poorer citizens in the schools of such masters as made a trade of teaching for hire. Such parts of education, however, were abandoned altogether to the care of the parents or guardians of each individual.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the state ever assumed any inspection or direction of them. By a law of Solon, indeed, the children were acquitted from maintaining those parents in their old age who had neglected to instruct them in some profitable trade or business.

在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初期，教育的其他部分所包含的其他科目似乎就是阅读、书写和当时的算术。富裕的市民往往在家庭教师——通常是奴隶或自由人——的帮助下在家里学习这些技能。而贫穷的市民，一般到以教书为业的教师设立的学校里去学习。然而，这部分教育，都全部由各自父母或监护人负责，国家似乎未曾进行任何监督或指导。事实上，据梭伦所制定的法律，假如父母忽视了教育子女从事某些有用的职业的义务，子女就可以免除养老的义务了。

In the progress of refinement, when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came into fashion, the better sort of people used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the schools of philosophers and rhetoricians, in order to be instructed in these fashionable sciences. But those schools were not supported by the public. They were, for a long time, barely tolerated by it. The demand for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was, for a long time, so small, that the first professed teachers of either could not find constant employment in any one city, but were obliged to travel about from place to place. In this manner lived Zeno of Elea, Protagoras, Gorgias, Hippias, and many others. As the demand increased, the schools, both of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became stationary, first in Athens, and afterwards in several other cities. The state, however, seems never to have encouraged them further,

than by assigning to some of them a particular place to teach in, which was sometimes done, too, by private donors. The state seems to have assigned the Academy to Plato, the Lyceum to Aristotle, and the Portico to Zeno of Citta, the founder of the Stoics. But Epicurus bequeathed his gardens to his own school. Till about the time of Marcus Antoninus, however, no teacher appears to have had any salary from the public, or to have had any other emoluments, but what arose from the honorarius or fees of his scholars. The bounty which that philosophical emperor, as we learn from Lucian, bestowed upon one of the teachers of philosophy, probably lasted no longer than his own life. There was nothing equivalent to the privileges of graduation; and to have attended any of those schools was not necessary, in order to be permitted to practise any particular trade or profession. If the opinion of their own utility could not draw scholars to them, the law neither forced anybody to go to them, nor rewarded anybody for having gone to them. The teachers had no jurisdiction over their pupils, nor any other authority besides that natural authority which superior virtue and abilities never fail to procure from young people towards those who are entrusted with any part of their education.

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哲学和修辞学流行起来，社会上比较上流的人物常常把孩子送往哲学家及修辞学家设立的学校学习这些流行的科学。不过，国家并未支持这类学校的设立。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国家只默认他们的存在而已。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哲学及修辞学的需要如此之小，以至于最初从事这两个学科教学的教师们，竟不能在任何一个城市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于是他们不得不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地方。埃利亚的曾诺、普罗塔哥拉斯、戈吉阿斯、希皮阿斯以及其他许多学者，过的都是这种生活。随着需求的增加，教授哲学及修辞学的学校逐渐固定下来。先是在雅典，接着到一些其他城市。可是，国家除了为某些学校安排特定场所作为办学地点外，再也没有

进一步鼓励这类学校的创办。有些学校的教学之处也是私人捐赠的。国家似乎是为柏拉图安排了学园，为亚里士多德安排了讲学地，为斯多噶学派创建者——基齐昂的芝诺——安排了学府。但伊壁鸠鲁将自己的花园改造成了学校。直到马卡斯·安托尼阿斯时代，没有哪位教师曾从国家手里领得薪俸，或者说，教师除了学生送的谢礼或酬金，没有其他的任何报酬。我们从鲁西安身上了解到，这位嗜好哲学的皇帝，曾给予一位哲学讲师奖励，可能在他去世之后这种奖励就停发了。毕业于这等学校，并不会获得什么特权；要想从事某项特定职业或事业，也没有在这类学校学习的必要。假如他们自己的效用不能吸引学生，法律也不会强制任何人进这类学校，同时也不会奖励任何人进入这类学校。学校的教师无权管辖学生，且除了凭借其优越德行和才能所拥有的自然权威以外，对其所教授的学生再无其他权威可言。

At Rome, the study of the civil law made a part of the education, no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itizens, but of some particular families. The young people, however, who wished to acquire knowledge in the law, had no public school to go to, and had no other method of studying it, than by frequenting the company of such of their relations and friends as were supposed to understand it. It is, perhaps, worthwhile to remark, that though the Laws of the Twelve Tables were many of them copied from those of some ancient Greek republics, yet law never seems to have grown up to be a science in any republic of ancient Greece. In Rome it became a science very early, and gave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illustration to those citizens who had the reputation of understanding it. In the republics of ancient Greece, particularly in Athens, the ordinary courts of justice consisted of numerous, and therefore disorderly, bodies of people, who frequently decided almost at random, or as clamour, faction, and party-spirit, happened to determine. The ignominy of an unjust decision, when it was to be divided among five hundred, a thousand, or fifteen

hundred people (for some of their courts were so very numerous), could not fall very heavy upon any individual. At Rome, on the contrary, the principal courts of justice consisted either of a single judge, or of a small number of judges, whose characters, especially as they deliberated always in public, could not fail to be very much affected by any rash or unjust decision. In doubtful cases such courts, from their anxiety to avoid blame, would naturally endeavour to shelter themselves under the example or precedent of the judges who had sat before them, either in the same or in some other court. This attention to practice and precedent, necessarily formed the Roman law into that regular and orderly system in which it has been delivered down to us; and the like attention has had the like effects upon the laws of every other country where such attention has taken place. The superiority of character in the Romans over that of the Greeks, so much remarked by Polybius and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was probably more owing to the better constitution of their courts of justice, than to any of the circumstances to which those authors ascribe it. The Romans are said to have been particularly distinguished for their superior respect to an oath. But the people who were accustomed to make oath only before some diligent and well informed court of justice, would naturally be much more attentive to what they swore, than they who were accustomed to do the same thing before mobbish and disorderly assemblies.

在罗马，学习民法是教育的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市民教育的一部分，而是一些个别家族教育的一部分。然而想要学习法律知识的青年，并没有可以进入的公立学校；除了通过加强与他们认为的那些了解法律的亲戚的交流之外，再无其他研究手段。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许多12铜表的法律都抄自古代某希腊共和国的法律，但法律似乎并未在希腊的任何一个共和国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在罗马，法律很早就是

一门科学了，且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那些因通晓法律而闻名的市民对它的了解程度。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尤其是雅典，普通法院由许多的无秩序的人民团体组成的，这些人民团体通常随意做出判决，偶尔也会根据周遭的喧嚣、派系之争和党派精神做出决定。当这种不正当裁判的可耻行径，分散到500人、1,000人或1,500人（希腊某些法院会有如此多的裁判）身上，就不会太严重了。相反，罗马的主要法院要么由一个裁判官构成，要么由少数裁判官构成，若是做出了草率或不公的裁决，裁判官的人格就一定会大大受到损，在公审场合尤其如此。这类法庭在遇到可疑案件时，由于迫切地想要躲避大家的指责，自然努力借用以本法院或其他法院前任裁判官的判决先例来保护自己。正是因为这种对于判决实践和先前判例的重视，罗马法才会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有规则、有组织的体系而流传至今。同时，在任何其他国家，只要法院也像罗马这样注重以往的判决或实践，他国的法律也都受到影响。罗马人的性格优于希腊人，坡里比阿和哈里卡纳萨的狄奥尼西阿斯，曾极力主张这一观点，不过这一看法想必更多的是来源于他们在法庭裁决上更加优越的制度，而非那些作者所描述的外部环境。据说，罗马人尤其因其对誓约的优先尊重而著名；不过，那些习惯于在办事勤奋、消息灵通的法院前发誓的人，自然会比那些习惯于在无纪律、无秩序的集会前发誓的人要更加尊重自己的誓言。

The abilities, both civil and military,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will readily be allowed to have been at least equal to those of any modern nation. Our prejudice is perhaps rather to overrate them. But except in what related to military exercises, the state seems to have been at no pains to form those great abilities; for I cannot be induced to believe that the musical education of the Greeks could be of much consequence in forming them. Masters, however, had been found, it seems, for instructing the better sort of people among those nations, in every art and science in which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society rendered it necessary or convenient for them to be instructed. The demand for such instruction

produced, what it always produces, the talent for giving it; and the emulation which an unrestrained competition never fails to excite, appears to have brought that talent to a very high degree of perfection. In the attention which the ancient philosophers excited, in the empire which they acquired over the opinions and principles of their auditors, in the faculty which they possessed of giving a certain tone and character to the conduct and conversation of those auditors, they appear to have been much superior to any modern teachers. In modern times, the diligence of public teachers is more or less corrupted by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render them more or less independent of their success and reputation in their particular professions. Their salaries, too, put the private teacher, who would pretend to come into competition with them, in the same state with a merchant who attempts to trade without a bounty, in competition with those who trade with a considerable one. If he sells his goods at nearly the same price, he cannot have the same profit; and poverty and beggary at least, if not bankruptcy and ruin, will infallibly be his lot. If he attempts to sell them much dearer, he is likely to have so few customers, that his circumstances will not be much mended. The privileges of graduation, besides, are in many countries necessary, or at least extremely convenient, to most men of learned professions, that is, to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ose who have occasion for a learned education. But those privileges can be obtained only by attending the lectures of the public teachers. The most careful attendance upon the ablest instructions of any private teacher cannot always give any title to demand them. It is from these different causes that the private teacher of any of the sciences, which are commonly taught in universities, is, in modern times,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in the very lowest order of men of letters. A man of real abilities can scarce find out a more humiliating or a more unprofitable employment to turn them to. The endowments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have in this manner not only corrupted the

diligence of public teachers, but have rendered it almost impossible to have any good private ones.

和任何现代国家相比，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行政上及军事上的能力，至少可以说是不相上下。我们的偏见可能是高估了他们的能力。但是，除了与军事有关的训练，国家似乎对于这伟大能力的养成不会出什么力；因为我并不相信希腊的音乐教育能够对这些才能的养成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不过，似乎对于这些国家中比较上层的人民来说，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学习大家认为必要或有益的技术及科学，找些老师并不难。对于这类教育的需要，促生了它总一直以来会生的结果——满足此需要的才能。此外，无限制的竞争始终能够激起的竞争之心，好像会使这一才能达到极其完善的程度。在引起听讲者的注意，控制听讲者的观念和看法，引导听讲者按照一定格调和风格行动和言论这一点上，古代哲学家似乎比现代教师做得更好。由于现代公立教师所处的环境，他们或多或少无需关心自己在特定领域是否声名在外或者成功。因而其勤勉便或多或少地受到阻碍。加之，他们所得的薪俸置那些妄图与他们竞争的私人教师于这样一种境地：就好像一个没有任何奖励金的商人妄图与得到很多奖励金的商人竞争。假如前者以一种几乎与后者相同的价格出卖货物，他就不能得到一样的利润，就算不会破产没落，最后至少也会落得个贫穷乞丐的命运。假如他把货物以过高的价格出售，顾客数量一定会极其有限，因而其境遇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善。此外，许多国家都有分划的特权，对于大多数从事博学的行业的人来讲——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需要这种博学教育的人——是十分便利的。不过，这些特权只有在听过公立教师的讲授之后才能取得。私人教师虽最具有教授能力，但是即使学生最细心地听其讲解也不能由此获取拥有此类特权的资格。正是由于这些迥异的原因，在大学里教授普通课程的私人教师，在现代人看来，他们往往是学者中最卑微的。真正有能力的人很少会找比这更可鄙和无益的职业。这样一来，普通学校和专科院校的捐赠基金不但使公立教师失去勤勉精神，也使得招聘一名优良的私人教师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Were there no public institutions for education, no system, no science, would be taught, for which there was not some demand, or which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s did not render it either necessary or convenient, or at least fashionable to learn. A private teacher could never find his account in teaching either an exploded and antiquated system of a science acknowledged to be useful, or a science universally believed to be a mere useless and pedantic heap of sophistry and nonsense. Such systems, such sciences, can subsist nowhere but in those incorporated societies for education, whose prosperity and revenue are in a great measure independent of their reputation and altogether independent of their industry. Were there no public institutions for education, a gentleman, after going through, with application and abilities, the most complete course of education which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s were supposed to afford, could not come into the world completely ignorant of everything which is the common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among gentlemen and men of the world.

假如不存在公立的教育机构，也就不会没有某种需要，也就不会有体系或科学，又或者说，非当时社会环境所认为所必要的、方便流行的体系或科学，就不会有人教授。一个人们从前认为有用但后来被人们推翻或流为陈腐的科学体系，或一门大家都认为无用、满是迂腐与诡辩的科学，私人教师教授这门学科一定不会得到好处。这样的科学，只可能在教育机构这种团体中存在。在教育机构中，教师的成功与收入大都与名声无关，同时与其勤勉完全无关。假如没有公家教育机构，一位绅士竭力付出勤勉和能力，在接受其所属社会环境所能提供的最完善的教育之后，那当他与其他绅士或世人谈论普通问题时就不会一无所知了。

There are no public institutions for the education of women, and there is accordingly nothing useless, absurd, or fantastical, in the common course of their education. They are taught what their parents or guardians judge it necessary or useful for them to learn, and they are taught nothing else. Every part of their education tends evidently to some useful purpose; either to improve the natural attractions of their person, or to form their mind to reserve, to modesty, to chastity, and to economy; to render them both likely to become the mistresses of a family, and to behave properly when they have become such. In every part of her life, a woman feels some conveniency or advantage from every part of her education. It seldom happens that a man, in any part of his life, derives any conveniency or advantage from some of the most laborious and troublesome parts of his education.

世界上并不存在女子的公立机构，因此，在女子教育的普通课程中便不存在无用的、荒唐的或空想出来的内容。女子所学，均为父母或监护人认为她必须学习或者对其有用的课程，别无其他。她所学的每项内容都明显地出于一定的有用目的：要么改善其形体上的自然风韵，要么养成其精神上的谨慎、谦逊、贞洁和节俭的美德；要么教之以妇道或者在其成为家庭主妇之后教会她们如何使其举止与其身份相称。女子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感到所接受的每份教育都会为自己带来某种方便或益处。男性则不然，他们一生中各阶段所接受的教育纵然十分辛劳和麻烦，但很少会有同女性一样的感受。

Ought the public, therefore, to give no attention, it may be asked, to 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Or, if it ought to give any, what are the different parts of education which it ought to attend to in the different orders of the people? and in what manner ought it to attend to them?

由此，可能有人会问：国家难道不应该重视人民的教育吗？假如国家应该予以重视，那国家对不同等级人民又应该分别注意哪些部分？同时，又该用什么方式来注重其教育呢？

In some cases, the state of the society necessarily places the greater part of individuals in such situations as naturally form in them, without any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almost all the abilities and virtues which that state requires, or perhaps can admit of. In other cases, the state of the society does not place the greater part of individuals in such situations; and som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almost entire corruption and degeneracy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在一些情况下，若政府不注意，社会的现状就必然会把大多数人置于某种境地，使他们自然养成当时环境所需要和容许的几乎所有能力和德行。在其他情况下，由于社会现状并不能把大多数人置于上述境地，所以，为了防止这些人几乎完全堕落或退化，政府就有必要加以注意。

In the progres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employment of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ose who live by labour, that is,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comes to be confined to a few very simple operations; frequently to one or two. But 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men are necessarily formed by their ordinary employments. The man whose whole life is spent in performing a few simple operations, of which the effects, too, are perhaps always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has no occasion to exert his understanding, or to exercise his invention, in finding out

expedients for removing difficulties which never occur. He naturally loses, therefore, the habit of such exertion, and generally becomes as stupid and ignorant as it is possible for a human creature to become. The torpor of his mind renders him not only incapable of relishing or bearing a part in any rational conversation, but of conceiving any generous, noble, or tender sentiment, and consequently of forming any just judgment concerning many even of the ordinary duties of private life. Of the great and extensive interests of his country he is altogether incapable of judging; and unless very particular pains have been taken to render him otherwise, he is equally incapable of defending his country in war. The uniformity of his stationary life naturally corrupts the courage of his mind, and makes him regard, with abhorrence, the irregular, uncertain, and adventurous life of a soldier. It corrupts even the activity of his body, and renders him incapable of exerting his strength with vigour and perseverance in any other employment, than that to which he has been bred. His dexterity at his own particular trade seems, in this manner, to be acquired at the expense of his intellectual, social, and martial virtues. But in every improved and civilised society, this is the state into which the labouring poor, that is,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must necessarily fall, unless government takes some pains to prevent it.

随着劳动分工的出现，靠劳动为生者——也就是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劳动——仅限于进行几项十分简单的操作，往往简单到只剩下一两种操作。但是大部分人的理解力一定是在日常工作中养成的。假如一个人毕生都在从事几项简单的操作，而这些操作对其产生的影响又是持续不变的或几乎相同的，那他就不会有发挥理解力或运用创造才能来找出解决困难办法的机会，因为他从来不会遇到困难。因此，他自然会丢掉努力的习惯，从而变成人类中最愚昧无知的那个。精神上这种无感觉的状态，不但使他无法领会或参与一切理性的对话，同时也

会使他不能拥有一切慷慨、高尚和温顺的情感。最后的结果是，他无法对许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义务做出适当的判断，更别说对国家重大和广泛的利益做出判断了。除非费好一番工夫来教他，否则根本无法在战时捍卫国家。安稳生活的单调一致自然会瓦解他精神上的勇气，同时使他厌恶士兵们的不规则、不确定和冒险的生活方式。这种单调一致甚至会毁灭他身体的活力，使其除了从事已经习惯了的职业，无法积极、坚定地去从事其他任何职业。这样看来，他为自己的特殊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所付出的代价似乎是牺牲自己的智力、交际能力和善战品质。但是，在一切发展和文明的社会中，除非政府加以阻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一定会陷入这种状态。

It is otherwise in the barbarous societies, as they are commonly called, of hunters, of shepherds, and even of husbandmen in that rude state of husbandry which precedes the improvement of manufactures, and the extension of foreign commerce. In such societies, the varied occupations of every man oblige every man to exert his capacity, and to invent expedients for removing difficulties which are continually occurring. Invention is kept alive, and the mind is not suffered to fall into that drowsy stupidity, which, in a civilised society, seems to benumb the understanding of almost all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In those barbarous societies, as they are called, every man,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is a warrior. Every man, too, is in some measure a statesman, and can form a tolerable judg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est of the society, and the conduct of those who govern it. How far their chiefs are good judges in peace, or good leaders in war, is obvious to the observation of almost every single man among them. In such a society, indeed, no man can well acquire that improved and refined understanding which a few men sometimes possess in a more civilised state. Though in a rude society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variety in the occupations of every individual, there is not a great deal in those of the whole

society. Every man does, or is capable of doing, almost everything which any other man does, or is capable of doing. Every man has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knowledge, ingenuity, and invention but scarce any man has a great degree. The degree, however, which is commonly possessed, is generally sufficient for conducting the whole simple business of the society. In a civilised state, on the contrary, though there is little variety in the occupation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individuals, there is an almost infinite variety in those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se varied occupations present an almost infinite variety of objects to the contemplation of those few, who, being attached to no particular occupation themselves, have leisure and inclination to examine the occupations of other people. The contemplation of so great a variety of objects necessarily exercises their minds in endless comparisons and combinations, and renders their understandings, in an extraordinary degree, both acute andcomprehensive. Unless those few, however, happen to be placed in some very particular situations, their great abilities, though honourable to themselves, may contribute very little to the good government or happiness of their society. Notwithstanding the great abilities of those few, all the nobler parts of the human character may be, in a great measure, obliterated and extinguished in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在野蛮社会，即通常所谓的猎人社会、牧人社会，甚至在制造业还在发展及国外贸易尚未扩大的原始农耕状态下的农夫社会，情形就大不一样。在这些社会中，每个人的工作的各式各样，人们不得不发挥自己的能力，并需要想办法去应对不断出现的困难。发明层出不穷，人的心智也不会像文明社会那样沦于呆滞愚钝。在文明社会中，几乎所有下层人民的理解力都处于麻木状态。此前我们提到过：所谓的野蛮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一名战士。在某种程度上还都是一名政治家，都能够在关乎社会利益的问题上和关乎统治者的行动上，做出

尚可的正确判断。到底酋长在和平时期是多好的裁判官，在战时是怎样的指挥官，很显然，是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上，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没有人能获得那些在文明社会中只有少数人能获得的精湛理解力。尽管在未开化社会，每个人的职业各不相同，整个社会却没有很多种职业。几乎每个人都在做或能做人人都能做的所有事或者成为其他人可以成为的人。每个人也拥有相当程度的知识、技巧和发明才能，但很少会一个人具备大量的知识、技巧和发明才能。不过，他们通常所具备的知识，对于处理社会的所有简单事件通常是足够的。相反，在文明社会，尽管大部分个人的职业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社会所有成员的职业却种类繁多。这些种类多样的职业，为那些少数未曾从事过任何特定职业、有闲暇和意向去研讨他人职业的人提供了无限的研究对象。要思考如此繁多的对象，需要大脑进行无数次的比较和组合，一定会很大程度上锻炼他们的脑力，从而使其变得异常敏锐与综合。不过，除非这些少数人恰好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否则尽管他们的高能力对他们自己来讲是一份荣耀，但对社会管理和社会和幸福不会有什么贡献。尽管这些少数人拥有伟大的能力，但在很大程度上来讲，人类性格中最高尚的那部分都在大多数人身上消失了。

The education of the common people requires, perhaps, in a civilised and commercial society,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more than that of people of some rank and fortune. People of some rank and fortune are generally eighteen or nineteen years of age before they enter upon that particular business, profession, or trade, by which they propose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 in the world. They have, before that, full time to acquire, or at least to fit themselves for afterwards acquiring, every accomplishment which can recommend them to the public esteem, or render them worthy of it. Their parents or guardians are generally sufficiently anxious that they should be so accomplished, and are in most cases, willing enough to lay out the expense which is necessary for that purpose. If they are not always properly educated, it is seldom from the want

of expense laid out upon their education, but from the improper application of that expense. It is seldom from the want of masters, but from the negligence and incapacity of the masters who are to be had, and from the difficulty, or rather from the impossibility, which there is,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ings, of finding any better. The employments, too, in which people of some rank or fortune spe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lives, are not, like those of the common people, simple and uniform. They are almost all of them extremely complicated, and such as exercise the head more than the hands. The understandings of those who are engaged in such employments, can seldom grow torpid for want of exercise. The employments of people of some rank and fortune, besides, are seldom such as harass them from morning to night. They generally have a good deal of leisure, during which they may perfect themselves in every branch, either of useful or ornamental knowledge, of which they may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or for which they may have acquired some taste in the earlier part of life.

在文明的商业社会中，普通人民的教育可能比有身份和财富者的教育更需要引起国家的注意。拥有身份和财富的人大都是在十八九岁以后才会从事他们打算扬名的特定事业、职业或艺业。在此以前，他们有足够多的时间——至少能够使自己为之后的学习做准备——习得那些能为自己博得世人尊重或值得尊重的一切知识。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通常都十分希望他们能有这般造诣，同时出于这一目的，希望他们在大多数场合能够毫不犹豫地把钱花在必要的事物上。如果他们不总是受到适当的教育，很少是由于费用短缺而是由于费用利用不当。很少是由于教师短缺，而是要成为教师的人的疏忽与无能；或是由于在目前情况下不易找到更好的教师，而不是不能找到更好的。此外，有身份和财富的人会把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更换职业上，而不像普通人民一样，职业简单而单一。几乎他们所有人的职业都极其复杂，动脑比动手的时候多。从事这类职业的人的理解力很少会由于

缺乏脑力锻炼而流于迟钝。此外，他们这类人所从事的职业，很少会从早到晚地忙碌。通常他们会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在此期间可以在各个方面来完善自己：要么是早年已经打下基础的那些有用的或装饰性的知识，要么是人生早期所获得的品位。

It is otherwise with the common people. They have little time to spare for education. Their parents can scarce afford to maintain them, even in infancy. As soon as they are able to work, they must apply to some trade, by which they can earn their subsistence. That trade, too, is generally so simple and uniform, as to give little exercise to the understanding;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ir labour is both so constant and so severe, that it leaves them little leisure and less inclination to apply to, or even to think of any thing else.

普通人民则不大相同。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接受教育。即使是在幼儿时期，他们的父母也几乎无力供应他们接受教育。他们一旦拥有了工作的能力，就必须从事某个行业来谋求生存。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大都很简单乏味，很少运用任何理解力。然而，同时他们的劳动既连续又严格，因而他们几乎没有闲暇去做，更不会想要去做别的事情，甚至不会思考其他的事情。

But though the common people cannot, in any civilised society, be so well instructed as people of some rank and fortune; the most essential parts of education, however, to read, write, and account, can be acquired at so early a period of life, that the greater part, even of those who are to be bred to the lowest occupations, have time to acquire them before they can be employed in those occupations. For a very small expense, the public can facilitate, can encourage and can even impose upon almost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the necessity of acquiring those most essential parts of education.

不过，尽管在任何文明社会，普通人民都不能和有身份和财富的人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教育中最重要的几部分——诵读、书写及算术——却是他们能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可以习得的；也就是说，即使是那些生来就要去从事最低贱职业的人，大部分也都有时间在从事职业以前学习这几门功课。国家只要用极少的费用，就可以帮助、鼓励甚至强制全体人民获得这最基本和必要的教育。

The public can facilitate this acquisition, by establishing in every parish or district a little school, where children maybe taught for a reward so moderate, that even a common labourer may afford it; the master being partly, but not wholly, paid by the public; because, if he was wholly, or even principally, paid by it, he would soon learn to neglect his business. In Scotl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parish schools has taught almost the whole common people to read, and a very great proportion of them to write and account. In Engl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arity schools has had an effect of the same kind, though not so universally, because the establishment is not so universal. If, in those little schools, the books by which the children are taught to read, were a little more instructive than they commonly are; and if, instead of a little smattering of Latin, which the children of the common people are sometimes taught there, and which can scarce ever be of any use to them, they were instructed in the elementary parts of geometry and mechanics; the literary education of this rank of people would, perhaps, be as complete as it can be. There is scarce a common trade, which does not afford some opportunities of applying to it the principles of geometry and mechanics, and which would not, therefore, gradually exercise and

improve the common people in those principles, the necessary introduction to the most sublime, as well as to the most useful sciences.

国家可在各教区或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小学校，收取甚至普通劳动者也能负担得起的廉价费用，以促成这种教育。学校教师的报酬，部分由国家负担，而非全部由国家负担；原因在于，假如全部或者大部分由国家负担，教师们会马上忘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在苏格兰，这类教区学校的设立，几乎教会了全体人民诵读，大部分人民都会书写和计算。在英格兰，慈善学校的设立，也实现了同样的效果，但是由于学校设立并没有那么普遍，故效果也没有那么普遍。假如在这些小学校内，教孩子们读的书比现在普遍所教的那些读物更有教育意义；假如取消普通人民的孩子在学校偶尔学习但全然无用一知半解的拉丁语课程，代之以几何学及机械学的入门知识；那这一阶层人民的文化教育可能就会十分完善。没有哪一种普通职业不需要运用几何学及机械学的原理，因此，没有哪一种普通职业不会逐渐增强普通人民对这些原理以及这种最高尚、最有用的科学的必要入门的理解。

The public can encourage the acquisition of those most essential parts of education, by giving small premiums, and little badges of distinction, to the children of the common people who excel in them.

国家可以通过为那些普通人民的孩子比较突出的儿童提供小额奖赏或颁发小荣誉奖章，这样一来，一定能够激励大家去接受这种基本的教育。

The public can impose upon almost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the necessity of acquiring those most essential parts of education, by obliging every man to undergo an examination or probation in them, before he can obtain the freedom in any corporation, or be allowed to set up any trade, either in a village or town corporate.

假如国家规定，全体国民在获得加入任何公司、开始从事某一行业或者进入某个乡村或城镇公司的自由之前，必须通过国家考试或检定，那国家就几乎能强制全体人民接受这部分最基本和必要的教育。

It was in this manner, by facilitating the acquisition of their military and gymnastic exercises, by encouraging it, and even by imposing upon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the necessity of learning those exercises, that the Greek and Roman republics maintained the martial spirit of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They facilitated the acquisition of those exercises, by appointing a certain place for learning and practising them, and by granting to certain masters the privilege of teaching in that place. Those masters do not appear to have had either salaries or exclusive privileges of any kind. Their reward consisted altogether in what they got from their scholars; and a citizen, who had learnt his exercises in the public gymnasia, had no sort of legal advantage over one who had learnt them privately, provided the latter had learned them equally well. Those republics encouraged the acquisition of those exercises, by bestowing little premiums and badges of distinction upon those who excelled in them. To have gained a prize in the Olympic, Isthmian, or Nemaean games, gave illustration, not only to the person who gained it, but to his whole family and kindred. The obligation which every citizen was under, to serve a certain number of years, if called upon, in the armies of the republic, sufficiently imposed

the necessity of learning those exercises, without which he could not be fit for that service.

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正是用这种方式才得以维持各自人民的尚武精神。他们通过鼓励甚至强制的方式促成全体人民接受军事及体操上的训练。为促成国内人民容易习得这种技能训练，他们都安排了一定的学习和实练场所，并授予某些教师在这些场所进行教授的特权。不过，这些教师似乎并没有国家发放的薪俸，也没有排他的特权。他们的报酬完全来自于学生。在公立体育馆或战神广场学习过技能操练的市民，和向私人教师学习这一技能的市民相比，假如二者学习效果等同，并不享有何等法律上的特权。为鼓励学习这种技能操练，各共和国会对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小额奖赏或颁发小荣誉奖章。举例来说，那些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地峡运动会或纳米安运动会中获奖的国民，不但获奖者本人有奖赏，其全部家人和亲戚都会获得奖赏。凡属共和国的国民，一经召集，都需要在共和国军队中服役一定年限。这种义务就足够强制一切国民学习军事及体操训练了，因为不学习这些操练，是不能够胜任军队服役的。

That in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the practice of military exercises, unless government takes proper pains to support it, goesgradually to decay, and, together with it, the martial spirit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the example of modern Europe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s. But the security of every society must always depend, more or less, upon the martial spirit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In the present times, indeed, that martial spirit alone, and unsupported by a well-disciplined standing army, would not, perhaps, be sufficient for the defence and security of any society. But where every citizen had the spirit of a soldier, a smaller standing army would surely be requisite. That spirit, besides, would necessarily diminish very much the dangers to liberty, whether real

or imaginary, which are commonly apprehended from a standing army. As it would very much facilitate the operations of that army against a foreign invader; so it would obstruct them as much, if unfortunately they should ever be directed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在军事训练的改进的过程中，须由政府予以大力支持，否则军事训练会日渐松懈，从而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也会衰退；现代欧洲的事例足以证明这一点。不过，各个社会的安全，或多或少依赖于大多数人的尚武精神。诚然，在现代，假如没有精练的常备军的支持，单靠尚武精神，可能无力防卫和保护任何社会。不过，假如每个公民都有士兵精神，常备军的规模就必然可以缩减。此外，大家普遍担忧的常备军会危害自由的问题——无论是真的有危害还是想象出来的危害——也必会因市民具有士兵精神而大大减少。这种尚武精神和士兵精神，一方面可以在面对外敌侵略时大大便利常备军的行动；另一方面，假如有人指挥常备军不幸违反国家宪法，这种精神可以很大程度上阻止这类事情的发生。

The ancient institutions of Greece and Rome seem to have been much more effectual for maintaining the martial spirit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than the establishment of what are called the militias of modern times. They were much more simple. When they were once established, they executed themselves, and it required little or no attention from government to maintain them in the most perfect vigour. Whereas to maintain, even in tolerable execution, the complex regulations of any modern militia, requires the continual and painful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without which they are constantly falling into total neglect and disuse. The influence, besides, of the ancient institutions, was much more universal. By means of them,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was completely

instructed in the use of arms. Whereas it is but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m who can ever be so instructed by the regulations of any modern militia, except, perhaps, that of Switzerland. But a coward, a man incapable either of defending or of revenging himself, evidently wants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parts of the character of a man. He is as much mutilated and deformed in his mind as another is in his body, who is either deprived of some of its most essential members, or has lost the use of them. He is evidently the more wretched and miserable of the two; because happiness and misery, which reside altogether in the mind, must necessarily depend more upon the healthful or unhealthful, the mutilated or entire state of the mind, than upon that of the body. Even though the martial spirit of the people were of no use towards the defence of the society, yet, to prevent that sort of mental mutilation, deformity, and wretchedness, which cowardice necessarily involves in it, from spreading themselves through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would still deserve the most serious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in the same manner as it would deserve its most serious attention to prevent a leprosy, or any other loathsome and offensive disease, though neither mortal nor dangerous, from spreading itself among them; though, perhaps, no other public good might result from such attention, besides the prevention of so great a public evil.

就维持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而言，希腊和罗马古代的制度，好像比现代所建立的民兵制度要有效得多。古代制度要简单得多。古代制度一经确立，就会顺利执行，无需政府多加丝毫或者任何注意就可以保持运行活力。然而，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现代复杂民兵规则运行，政府就要持续地费力关注；政府一不注意，民兵规则就会完全流于疏漏或废弃。此外，古代制度的影响更加普遍。在古代制度的管理下，全体国民都会使用武器。现代恐怕除了瑞士之外，其他国家的人民都不然。现代各国接受过民兵规则教育的人只占整个国民中的最小

部分。但是，一个无法防卫自己或为自己复仇的懦夫，显然缺乏人格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个精神上残疾或畸形的人无异于失去最重要的肢体器官并弃用的肢体残疾的人。显然，两者相比，前者更为不幸和悲惨。因为，幸福与悲惨全都产生于人的内心，必然取决于内心状态的健康与否和健全与否，而非身体的健康与健全状态。即使人们的尚武精神对社会防御无用，但为防止怯懦所必然会引发的那种精神残疾、畸形及悲剧在人民身上传播，政府仍应予以密切关注。就像麻风病或者其他任何一种令人不悦的疾病，纵然不会致死或不会产生什么危险，但为防止其在大多数人民之间传播，政府仍应予以密切关注。这种关注可能除了防止其造成大的社会危害之外，不会产生其他公共利益，但也是值得的。

The same thing may be said of the gross ignorance and stupidity which, in a civilised society, seem so frequently to benumb the understandings of all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A man without the proper use of the intellectual faculties of a man, is, if possible, more contemptible than even a coward, and seems to be mutilated and deformed in a still more essential part of the character of human nature. Though the state was to derive no advantage from the instruction of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it would still deserve its attention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altogether uninstructed. The state, however, derives no inconsiderable advantage from their instruction. The more they are instructed, the less liable they are to the delusions of enthusiasm and superstition, which, among ignorant nations frequently occasion the most dreadful disorders. An instructed and intelligent people, besides, are always more decent and orderly than an ignorant and stupid one. They feel themselves, each individually, more respectable, and more likely to obtain the respect of their lawful superiors, and they are, therefore, more disposed to respect those superiors. They are more disposed to examine, and more capable of seeing through, the

interested complaints of faction and sedition; and they are, upon that account, less apt to be misled into any wanton or unnecessary opposition to the measures of government. In free countries, where the safety of government depends very much upon the favourable judgment which the people may form of its conduct, it must surely be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disposed to judge rashly or capriciously concerning it.

在文明社会中，国民的无知与愚昧也是同样的道理，这种无知与愚昧使下层人民的理解力变得麻木。假如一个人不能恰当利用其智能，会比怯懦者更可耻，似乎是人性中更重要部分的残疾和畸形。尽管国家并不能从下层人民的教育中获得什么好处，但是假如他们全部处于未教育状态，则仍值得引起国家关注。然而，这类人群接受教育之后国家可以从中受益不少。狂热和迷信，往往会在无知的国民之中引发最可怕的骚乱。下层人民所受教育越多，愈不可能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此外，受过教育的智慧之人，总是比无知愚昧之人更知礼节、守秩序。他们也都会觉得自己更加独立、更高尚，更有可能获得法律所规定的上级的尊重，因此，他们就更有可能尊敬那些上级。对于那些旨在引发派别之争和骚乱的与利益相关的不平之鸣，他们就更能究其原委并看透其底细；因此，对于那些反对政府政策的放肆之举或不必要举动，就更不可能误导他们了。在自由国家，政府的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做出的良好评判，因此，人民能够不轻率任性地对此做出判断，必然对政府非常重要。

ARTICLE III. Of the Expense of the Institutions for the Instruction of People of all Ages.

第三项、论各年龄段人民的教育公共设施经费

The institutions for the instruction of people of all ages, are chiefly those for religious instruction. This is a species of instruction, of which the object is not so much to render the people good citizens in this world, as to prepare them for another and a better world in the life to come. The teachers of the doctrine which contains this instruction, in the same manner as other teachers, may either depend altogether for their subsistence upon the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of their hearers; or they may derive it from some other fund, to which the law of their country may entitle them; such as a landed estate, a tithe or land tax, an established salary or stipend. Their exertion, their zeal and industry, are likely to be much greater in the former situation than in the latter. In this respect, the teachers of a new religion have always had a considerable advantage in attacking those ancient and established systems, of which the clergy, reposing themselves upon their benefices, had neglected to keep up the fervour of faith and devotion in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and having given themselves up to indolence, were become altogether incapable of making any vigorous exertion in defence even of their own establishment. The clergy of an established and well endowed religion frequently become men of learning and elegance, who possess all the virtues of gentlemen, or which can recommend them to the esteem of gentlemen; but they are apt gradually to lose the qualities, both good and bad, which gave them authority and influence with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and which had perhaps been the original causes of the succes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ir religion. Such a clergy, when attacked by a set of popular and bold, though perhaps stupid and ignorant enthusiasts, feel themselves as perfectly defenceless as the indolent, effeminate, and full fed nations of the southern parts of Asia, when they were invaded by the active, hardy, and hungry Tartars of the North. Such a clergy, upon such an emergency, have commonly no other resource than to

call upon the civil magistrate to persecute, destroy, or drive out their adversaries, as disturbers of the public peace. It was thus that the Roman Catholic clergy called upon the civil magistrate to persecute the Protestants, and the Church of England to persecute the Dissenters; and that in general every religious sect, when it has once enjoyed, for a century or two, the security of a legal establishment, has found itself incapable of making any vigorous defence against any new sect which chose to attack its doctrine or discipline. Upon such occasions, the advantage, in point of learning and good writing, may sometimes be on the side of the established church. But the arts of popularity, all the arts of gaining proselytes, are constantly on the side of its adversaries. In England, those arts have been long neglected by the well endowed clergy of the established church, and are at present chiefly cultivated by the Dissenters and by the Methodists. The independent provisions, however, which in many places have been made for dissenting teachers, by means of voluntary subscriptions, of trust rights, and other evasions of the law, seem very much to have abated the zeal and activity of those teachers. They have many of them become very learned, ingenious, and respectable men; but they have in general ceased to be very popular preachers. The Methodists, without half the learning of the Dissenters, are much more in vogue.

所有年龄段人民的教育设施，主要是宗教教育类的公共设施。与其说该类教育的是将人民培养成现世好公民，不如说是为他们来世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讲授包含该教诲教义的教师同其他普通教师一样，或者只靠听众的自愿捐赠来过活。或者只靠所在国家法律许可的某些财源，比如说地产、什一税、土地税、固定的薪资或俸给等。同后一种情境比起来，他们在前一种情境中可能要更加努力、更热情、更勤勉。如此说来，新教派的教师们，在攻击那些已然建立的古老体

系时，会有不少优势；因为，旧教的牧师会倚仗自己的圣俸，忘记了保持大多数人信仰与归依的热情；懒惰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甚至失去了为保护自己所建立的教会而做出积极努力的能力。至于那些既建教会和频繁获得大量财产捐赠的宗教，它们的牧师们会变得博学而优雅，具有绅士的美德或拥有能够使他们获得与绅士一样受尊敬的品质。但他们很容易丧失那些令他们拥有权威及对下层人民有影响力的好品质与坏品质。这可能是他们宗教得以建立和获得成功的最初动因。当这样一位牧师遇到一群尽管愚钝无知却勇敢而广受欢迎的狂信者的攻击时，他会觉得自己就像是亚洲南部一些懒惰、柔弱、饱食的民族，遭遇了活跃、坚忍而苦饥的北方鞑靼人的入侵，完全没有任何防备。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该类牧师通常除了申诉于行政长官，声称他们为扰乱公共治安，从而将其加以迫害、扑灭或驱逐，别无他法。罗马天主教教士就是这样号召行政长官迫害新教徒的；英格兰教会也是这样迫害非国教教徒的。通常来说，每个已经安然存在了一两个世纪的合法既建宗教，会无法有力抵抗任何一个选择攻击其教义教律的新宗教地方长官。在这类情形下，就学习与做文章来讲，可能有时国教派会有优势。但新起的反对派，在获得大家欢迎和使信徒改变信仰上，更占优势。在英国，那些拥有大量捐赠财产的既建教派的牧师长久以来一直忽略了这项技术。目前这些技术主要是由该教派的反对者和信奉新法者培养的。不过，在很多地方，反对国教的教师通过自由捐赠、信托权利及其他逃避法律的行为，得到了中立派独立的给养，正是这些给养，似乎大大削弱了他们的热情和活动力。他们中很多人已成为非常博学、机敏而地位崇高的人物，但他们一般不会成为广受欢迎的传道者。那些学问不及反对国教派的牧师们一半的美以美派教徒更受欢迎。

In the Church of Rome the industry and zeal of the inferior clergy are kept more alive by the powerful motive of self-interest, than perhaps in any established Protestant church. The parochial clergy derive many of them, a very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ir subsistence from the voluntary oblations of the people; a source of

revenue, which confession gives them many opportunities of improving. The mendicant orders derive their whole subsistence from such oblations. It is with them as with the hussars and light infantry of some armies; no plunder, no pay. The parochial clergy are like those teachers whose reward depends partly upon their salary, and partly upon the fees or honoraries which they get from their pupils; and these must always depend, more or less, upon their industry and reputation. The mendicant orders are like those teachers whose subsistence depends altogether upon their industry. They are obliged, therefore, to use every art which can animate the devotion of the common peopl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wo great mendicant orders of St Dominic and St. Francis, it is observed by Machiavel, revived,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the languishing faith and devo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Roman catholic countries, the spirit of devotion is supported altogether by the monks, and by the poorer parochial clergy. The great dignitaries of the church, with all the accomplishments of gentlemen and men of the world, and sometimes with those of men of learning, are careful enough to maintain the necessary discipline over their inferiors, but seldom give themselves any trouble about the instruction of the people.

在罗马教会中，出于更强的利己动机，下级牧师会比任何既建的耶稣教教会的牧师更加勤勉和热心。许多教区牧师的大部分给养，都来自于人民的自愿捐赠；而忏悔又为他们加大了他们增加这种收入源泉的可能。托钵教团的给养也都出自这种捐赠。他们很像一些军队的轻骑和步兵，不掠夺，就不会有给养。教区牧师就像那些部分依靠俸给部分依靠学生所交费用或报酬的教师，这些酬劳或多或少靠的是他们自己的勤勉和剩余。托钵教团，就像那些只靠勤勉来获取给养的教师，因此，他们不得不使用每项能够激发普通民众皈依的各项技术。据马基弗利尔观察，在13世纪及14世纪，圣多米尼克及圣佛兰西斯托

钵教团的建立，重新扭转了人民对天主教教会的信仰和皈依减弱的局势。在罗马天主教各国，皈依精神靠的全是赖修道僧及更加贫困的教区牧师的支持。至于那些教会的高僧，尽管他们拥有绅士及通达世故者的一切造诣，有时也拥有和学者一样的成就，并留心维持下级牧师的必要秩序，但很少有人会不辞劳苦地教化人民。

“Most of the arts and professions in a state,” says by far the most illustrious philosopher and historian of the present age, “are of such a nature, that, while they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the society, they are also useful or agreeable to some individuals; and, in that case, the constant rule of the magistrate, except, perhaps, on the first introduction of any art, is, to leave the profession to itself, and trust its encouragement to the individuals who reap the benefit of it. The artisans, finding their profits to rise by the favour of their customers, increas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ir skill and industry; and as matters are not disturbed by any injudicious tampering, the commodity is always sure to be at all times nearly proportioned to the demand.

一位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技术及职业，都会有这样的性质：在促进社会利益的同时，他们对某些个人有所用处或令其愉悦。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在任一技术传入初期，法官所订立的恒定规则，应当交由职业本身，并把鼓励个人从事该职业的任务，交由从中获益的个人。工艺制造者的利益提升来自于顾客的青睐，因此会尽可能增强其技艺及勤勉程度。假如事物不被有害影响所扰乱，那商品的供给会随时与其需求相称。”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callings which, though useful and even necessary in a state, bring no advantage or pleasure to any

individual; and the supreme power is obliged to alter its conduct with regard to the retainers of those professions. It must give them public encouragement in order to their subsistence; and it must provide against that negligence to which they will naturally be subject, either by annexing particular honours to the profession, by establishing a long subordination of ranks, and a strict dependence, or by some other expedient. The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finances, fleets, and magistracy, are instances of this order of men.

“不过，有些职业，对于国家来讲虽然有用且必要，但不会为个人带来益处与欢乐。至于从事这类职业的人，最高权力机关必须调整其行为。为维持其生存，最高权力机关必须给予公共奖励。为防止其自然流于怠慢，最高权力机关要么通过建立一长串等级秩序和严格的从属关系需要给这些职业以特殊荣誉，或采取其他权宜之计。从事财政、海军和政治工作的人，都是这类人的例子。”

“It may naturally be thought, at first sight, that the ecclesiastics belong to the first class, and that their encouragement, as well as that of lawyers and physicians, may safely be entrusted to the liberality of individuals, who are attached to their doctrines, and who find benefit or consolation from their spiritual ministry and assistance. Their industry and vigilance will, no doubt, be whetted by such an additional motive; and their skill in the profession, as well as their address in governing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must receive daily increase, from their increasing practice, study, and attention.

“乍看之下，我们可能自然认为神职人员属于第一等，给他们的奖励，应该同律师及医师一样安然委托于人们——那些信仰其教义并

从其精神服务及援助受益或得到安慰的人——的施舍。无疑，其勤勉和警觉会由于这一附加动机而增强。他们职业技能上的娴熟，同他们支配人民思想的说辞技能，一定会随着其不断增长的实践、研究和关注而日益增强。”

“But if we consider the matter more closely, we shall find that this interested diligence of the clergy is what every wise legislator will study to prevent; because, in every religion except the true, it is highly pernicious, and it has even a natural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truth, by infusing into it a strong mixture of superstition, folly, and delusion. Each ghostly practitioner, in order to render himself more precious and sacred in the eyes of his retainers, will inspire them with the most violent abhorrence of all other sects, and continually endeavour, by some novelty, to excite the languid devotion of his audience. No regard will be paid to truth, morals, or decency, in the doctrines inculcated. Every tenet will be adopted that best suits the disorderly affections of the human frame. Customers will be drawn to each conventicle by new industry and address, in practising on the passions and credulity of the populace. And, in the end, the civil magistrate will find that he has dearly paid for his pretended frugality, in saving a fixed establishment for the priests; and that, in reality, the most decent and advantageous composition, which he can make with the spiritual guides, is to bribe their indolence, by assigning stated salaries to their profession, and rendering it superfluous for them to be farther active, than merely to prevent their flock from straying in quest of new pastures. And in this manner ecclesiastical establishments, though commonly they arose at first from religious views, prove in the end advantageous to the political interests of society.”

“但是，假如我们更加仔细地考虑一下这件事，就会发现牧师们这种利己的勤勉正是每位明智的立法者所要学着去防止的。因为，除了真的宗教，一切宗教都害处极大，而且都有一种将迷信、愚想及幻想强烈地灌输其中并扭曲真理的自然倾向。为了使其自身在信徒眼中更显得更加高贵与神圣，各宗教从业者总是向其信徒宣说其他一切宗派最横暴可恶的表现来启示其信徒，并通过一些新奇事件来以激发听众已经疲惫的热情。他们不会注意所授教义中包含的真理、道德或礼节，却采用了最适合扰乱人心的所有教理。为吸引“顾客”，各反国教徒的秘密集会运用新的勤勉和新的言辞技巧，在实践中激发众人的热情、骗取众人的信任。最后，地方长官将发现：他必须为自己本来想要实现的节省——不固定神职人员的薪俸——付出高昂的代价。并且，实际上，地方长官要与灵魂导师构成的最适宜、最有利的关系，也就是固定他们各自职业的薪俸，用贿赂滋养他们的懒惰，使他们觉得除了防止自己的羊群误寻新的牧场之外，做其他任何活动都是多余。这样一来，神职定俸，尽管通常最初产生于宗教观念，最终却有利于社会的政治利益。”

But whatever may have been the good or bad effects of the independent provision of the clergy, it has, perhaps, been very seldom bestowed upon them from any view to those effects. Times of violent religious controversy have generally been times of equally violent political faction. Upon such occasions, each political party has either found it, or imagined it, for its interest, to league itself with someone or other of the contending religious sects. But this could be done only by adopting, or, at least, by favouring the tenets of that particular sect. The sect which had the good fortune to be leagued with the conquering party necessarily shared in the victory of its ally, by whose favour and protection it was soon enabled, in some degree, to silence and subdue all its adversaries. Those adversaries had generally leagued themselves with the enemies of the conquering party, and were, therefore the enemies of

that party. The clergy of this particular sect having thus become complete masters of the field, and their influence and authority with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being in its highest vigour, they were powerful enough to overawe the chiefs and leaders of their own party, and to oblige the civil magistrate to respect their opinions and inclinations. Their first demand was generally that he should silence and subdue all their adversaries; and their second, that he should bestow an independent provision on themselves. As they had generally contributed a good deal to the victory, it seemed not unreasonable that they should have some share in the spoil. They were weary, besides, of humouring the people, and of depending upon their caprice for a subsistence. In making this demand, therefore, they consulted their own ease and comfort, without troubling themselves about the effect which it might have, in future times, upon the influence and authority of their order. The civil magistrate, who could comply with this demand only by giving them something which he would have chosen much rather to take, or to keep to himself, was seldom very forward to grant it. Necessity, however, always forced him to submit at last, though frequently not till after many delays, evasions, and affected excuses.

但是，不论影响好坏，给予神职人员以独立给养的人，可能很少会从影响角度来考虑这一点。在宗教纷争激烈的时代，一般也政治斗争也会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各政党都发觉或者猜想到：要实现自身利益，需要与各相争教派中的某一教派同盟。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采纳或至少要赞成这一特定教派的教理。该特定教派若十分幸运地与胜利政党结盟，它就一定会与其同盟者共享胜利。借由同盟者的庇佑和保护，它会迅速在一定程度上镇压和制服一切敌对教派。这些敌对教派，大都与胜利党的敌对党派结盟，因而也就成了该党派的敌人。因此，特定教派的那些教士在战场上成为了完全的支配者，其在大多数人民中的影响与权威抵达顶峰，他们权力大到能够威慑党内首

领和领导者，而且能顾强制地方长官尊重他们的见解和意向。他们对地方长官的首要要求，一般是为他们镇压和制服所有敌对教派。其次是要求其给他们独立给养。由于他们一般会对政治方面贡献较大，似乎他们要求分享一些战利品，并无不合理之处。此外，由于人心反复无常，他们已经厌倦了通过取悦民众来获取给养。所以，提出这个要求，他们考虑的是自身的安逸和舒适，并未考虑对他们未来秩序和权威的影响。而地方长官很少立即批准，原因是他只有把自己已经选择的或留给自己的东西转给他们，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不过，纵然会几经延搁，支吾搪塞和提供有力的借口，但地方长官最终还是会在这种需要面前妥协。

But if politics had never called in the aid of religion, had the conquering party never adopted the tenets of one sect more than those of another, when it had gained the victory, it would probably have dealt equally and impartially with all the different sects, and have allowed every man to choose his own priest, and his own religion, as he thought proper. There would in this case no doubt have been a great multitude of religious sects. Almost every different congregation might probably have made a little sect by itself, or have entertained some peculiar tenets of its own. Each teacher, would, no doubt, have felt himself under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the utmost exertion, and of using every art, both to preserve an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his disciples. But as every other teacher would have felt himself under the same necessity, the success of no one teacher, or sect of teachers, could have been very great. The interested and active zeal of religious teachers can be dangerous and troublesome only where there is either but one sect tolerated in the society, or where the whole of a large society is divided into two or three great sects; the teachers of each acting by concert, and under a regular discipline and subordination. But that zeal must be altogether innocent, where the society is divided into

two or three hundred, or, perhaps, into as many thousand small sects, of which no one could be considerable enough to disturb the public tranquillity. The teachers of each sect, seeing themselves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with more adversaries than friends, would be obliged to learn that candour and moderation which is so seldom to be found among the teachers of those great sects, whose tenets, being supported by the civil magistrate, are held in veneration by almost all the inhabitants of extensive kingdoms and empires, and who, therefore, see nothing round them but followers, disciples, and humble admirers. The teachers of each little sect, finding themselves almost alone, would be obliged to respect those of almost every other sect; and the concessions which they would mutually find it both convenient and agreeable to make one to another, might in time, probably reduce the doctrin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to that pure and rational religion, free from every mixture of absurdity, imposture, or fanaticism, such as wise men have, in all ages of the world, wished to see established; but such as positive law has, perhaps, never yet established, and probably never will establish in any country; because, with regard to religion, positive law always has been, and probably always will be, more or less influenced by popular superstition and enthusiasm. This plan of ecclesiastical government, or, more properly, of no ecclesiastical government, was what the sect called Independents (a sect, no doubt, of very wild enthusiasts), proposed to establish in Englan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 If it had been established, though of a very unphilosophical origin, it would probably, by this time, have been productive of the most philosophical good temper and moderation with regard to every sort of religious principle.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Pennsylvania, where, though the Quakers happen to be the most numerous, the law, in reality, favours no one sect more than another; and it is there said to have been productive of this philosophical good temper and moderation.

不过，假如政治不曾需要宗教的帮助，胜利党在取得胜利时又不曾采用任何教派的教理，有可能该政党会平等而无差别地对待所有不同教派，允许每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牧师和宗教。在这种情况下，无疑会出现多种教派。而几乎每个不同的宗教团体又会有自己的小教派，或者有自己的一些特殊教理。无疑，每位教师都会感受到自己尽最大努力利用每项技能来保持并增加现有教徒数量的必要性。不过其他所有教师也会同他一样感受到这种必要性的，因此没有哪位教师或哪个教派的教师会大获成功。宗教教师利己且积极的热情，只有在只容许一个教派存在的社会或全体只分成为两三个教派的大社会，且各教派的教师在一定纪律和从属关系下协同合作的场合，才会变得危险和麻烦。不过假如一个社会被分为二三百乃至数千小教派，任何小教派都不会大到能够干扰公共安定，教师们的热情，也就完全无害了。在这种场合，各宗教派别教师看到他们周围的敌人多于朋友，就不得不注意到那很少会为大教派教师注意到的笃实与中庸；大教派教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地方长官支持其教理，且得到了广大王国或帝国几乎所有居民的尊敬。因此教师们的周围只有其门人、信徒及卑微的崇拜者。小教派教师发觉自己孤立无援，不得不尊敬其他教派的教师；他们彼此会发现便利且适意的认可，可能使他们大部分的教义，及时地摆脱一切荒谬、欺骗或盲信，成为纯粹而理性的宗教。这各个时代全世界的明智之士最想要见其成立的宗教，不过类似的成文法律，可能从来没有颁布过，而且将来可能也没有哪个国家会颁布；原因是关乎宗教的成文法律一向或者可能会一直或多或少受世俗迷信及狂热的影响。这种教会管理方案，更恰当地说，无教会管理，就是所谓的“独立教派”（该教派无疑会拥有十分狂热的信徒）。英国内战结束时，有人建议在英国成立这样一个独立教派。假如成立了该教派，尽管其起源是极其非哲学的，可能此时已经产生出与各类宗教原则相关的最富有哲学性的平和气质和中庸精神了。宾夕法尼亚建立并实施了这一方案的，尽管此处教友派信徒占最多数，实际上其法律对各教派一视同仁，毫无偏颇。据说，宾夕法尼亚就产生了这种富有哲学性的平和气质和中庸精神。

But though this equality of treatment should not be productive of this good temper and moderation in all, or even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religious sects of a particular country; yet, provided those sects were sufficiently numerous, and each of them consequently too small to disturb the public tranquillity, the excessive zeal of each for its particular tenets could not well be productive of any very harmful effects, but, on the contrary, of several good ones; and if the government was perfectly decided, both to let them all alone, and to oblige them all to let alone one another, there is little danger that they would not of their own accord, subdivide themselves fast enough, so as soon to become sufficiently numerous.

不过，尽管这种一视同仁并不能使一个国家中全部教派或更大部分宗教团体产生这种平和气质和中庸精神，但假如教派的数目足够多且各教派的势力小到不至于搅扰社会治安，各教派对于各自教理的过度热情就不会产生很有害的后果，反之，却会产生一些好的影响。同时，假如政府方面断然决定不干涉宗教自由且不许任何教派相互干涉，那它们就不会再面临无法保持统一性而迅速自行分裂成多数教派的危险了。

In every civilised society, in every society where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has once been completely established, there have been always two different schemes or systems of morality current at the same time; of which the one may be called the strict or austere; the other the liberal, or, if you will, the loose system. The former is generally admired and revered by the common people; the latter is commonly more esteemed and adopted by what are called people of fashion. The degree of disapprobation with which we ought to mark the vices of levity, the vices which are apt to arise from great

prosperity, and from the excess of gaiety and good humour, seems to constitute the princip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ose two opposite schemes or systems. In the liberal or loose system, luxury, wanton, and even disorderly mirth, the pursuit of pleasure to some degree of intemperance, the breach of chastity, at least in one of the two sexes, etc. provided they are not accompanied with gross indecency, and do not lead to falsehood or injustice, are generally treated with a good deal of indulgence, and are easily either excused or pardoned altogether. In the austere system, on the contrary, those excesses are regarded with the utmost abhorrence and detestation. The vices of levity are always ruinous to the common people, and a single week's thoughtlessness and dissipation is often sufficient to undo a poor workman forever, and to drive him, through despair, upon committing the most enormous crimes. The wiser and better sort of the common people, therefore, have always the utmost abhorrence and detestation of such excesses, which their experience tells them are so immediately fatal to people of their condition. The disorder and extravagance of several years, on the contrary, will not always ruin a man of fashion; and people of that rank are very apt to consider the power of indulging in some degree of excess, as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ir fortune; and the liberty of doing so without censure or reproach, as one of the privileges which belong to their station. In people of their own station, therefore, they regard such excesses with but a small degree of disapprobation, and censure them either very slightly or not at all.

在每个文明社会，在每个阶级区别已完全确立的社会，向来会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道德体制或道德体系。其中一种可以称为严肃的或刻苦的体系，另外一种可称之为自由的体制，假若你愿意，还可以称之为宽松的体系。前者通常为普通人民所赞赏和尊崇；后者则一般为所谓的“上层社会”所尊重和采用。不过，依我想，我们对于轻浮这种

恶行——易始于大繁荣、生于过度欢情乐意——的非难程度，好像是这两个相反体制或体系的主要区别。在自由或宽松的体制中，奢侈、放肆甚至扰乱秩序的纵情欢愉，无节制的寻欢逐乐，两性中至少一方破坏贞节等行为，只要不到败坏风化的地步，不会造成虚妄或不义，通常就会非常宽大地予以处理，而且会很容易被宽恕或原谅。而在严肃的体系下，这些过分的行为，都是被极度憎恶与讨厌的。轻浮这一恶行总是会招致普通人的毁灭，就算是一个星期的轻率妄为与挥霍浪费，往往足以陷一个贫穷的劳动者于永恒的沦落，并驱使他陷于绝望的深渊，甚至去犯极大的罪恶。因此，比较明智和较好的一类普通人民总是会极度厌恶和嫌弃这类过度放荡的行为。经验告诉他们，这类行为会马上给处于这种境遇中的人以致命的打击。反之，多年的杂乱无序与挥霍浪费，不一定总会使上流人没落。这个阶层的人很容易把有些过度的放荡，看作其财产所带来的益处；他们会把放荡而不受谴责或非难，视为地位所带给他们的特权。因此，属于这类阶级的人认为这类放荡行为不太值得非难，只需要加以极其轻微的责备，或者根本无需责备。

Almost all religious sects have begun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from whom they have generally drawn their earliest, as well as their most numerous proselytes. The austere system of morality has, accordingly, been adopted by those sects almost constantly, or with very few exceptions; for there have been some. It was the system by which they could best recommend themselves to that order of people, to whom they first proposed their plan of reformation upon what had been before established. Many of them, perhap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have even endeavoured to gain credit by refining upon this austere system, and by carrying it to some degree of folly and extravagance; and this excessive rigour has frequently recommended them,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o the respect and veneration of the common people.

几乎所有教派都发源于普通人民，他们从普通人民中吸收了最早的一批和大多数的皈依者，因此，这些教派相继采用严肃的道德体系。其中虽不无例外，但为数极少。他们可以通过该体系向这一阶层的人民推荐自己，他们在确立之前就向他们首次提出了改革方案。许多教派，也许大多数教派，为了努力获取信任，会完善这一严肃体系，甚至有些愚蠢和过度。这种过度严格，通常会使他们比任何其他事物更能赢得普通人民的尊敬和崇拜。

A man of rank and fortune is, by his station, the distinguished member of a great society, who attend to every part of his conduct, and who thereby oblige him to attend to every part of it himself. His authority and consideration depend very much upon the respect which this society bears to him. He dares not do anything which would disgrace or discredit him in it; and he is obliged to a very strict observation of that species of morals, whether liberal or austere, which the general consent of this society prescribes to persons of his rank and fortune. A man of low condition, on the contrary, is far from being a distinguished member of any great society. While he remains in a country village, his conduct may be attended to, and he may be obliged to attend to it himself. In this situation, and in this situation only, he may have what is called a character to lose. But as soon as he comes into a great city, he is sunk in obscurity and darkness. His conduct is observed and attended to by nobody; and he is, therefore, very likely to neglect it himself, and to abandon himself to every sort of low profligacy and vice. He never emerges so effectually from this obscurity, his conduct never excites so much the attention of any respectable society, as by his becoming the member of a small religious sect. He from that moment acquires a degree of consideration which he never had before. All his brother sectaries are, for the credit of the sect, interested to observe his conduct; and, if he gives occasion to

any scandal, if he deviates very much from those austere morals which they almost always require of one another, to punish him by what is always a very severe punishment, even where no evil effects attend it, expulsion or excommunication from the sect. In little religious sects, accordingly, the morals of the common people have been almost always remarkably regular and orderly; generally much more so than in the established church. The morals of those little sects, indeed, have frequently been rather disagreeably rigorous and unsocial.

有身份和财富的人，其社会地位也是显赫的，他会留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他也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其权威和名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对它的尊敬程度。所以，他不干做任何污名失信的事；此外他不得不严密观察社会对于他这类有身份和财富的人普遍要求的那种或自由或严肃的道德。反之，地位低下的人远不是什么大社会的显赫人物。在乡下时，也许有人会注意他的行为，所以他不得不留意自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说他丧失了所谓的人格。但一旦他步入大的社会，他会马上堕入卑贱与黑暗之中。没有人会观察和注意他的行为，因此，他很有可能自我忽视并自暴自弃，行为低劣，肆意放荡，作恶多端。除了成为小教派的信徒外，其卑微的身份从来不能发挥过这等作用，其行为从未引起任何上流社会的注意。从成为某一教派信徒的那一刻起，他就会受到某种从来都没有受到过的尊重。为了教派的信誉，其所有教友都会有意观察他其行为；如果他做出什么羞耻的事情，或者他大大违反了教友所相互要求的严肃道德，他就会受到种极其严峻的惩罚——尽管这种惩罚不会带来什么恶劣的影响——开除教籍。因此，在小教派中，普通人民的道德几乎常是秩序井然的，通常比在国教要规范得多。事实上，这些小教派的道德，常常会过于严格或不近人情，令人不悦。

There are two very easy and effectual remedies, however, by

whose joint operation the state might, without violence, correct whatever was unsocial or disagreeably rigorous in the morals of all the little sects into which the country was divided.

不过，国家对于国内一切小教派道德上的任何不近人情或严肃到令人生厌程度的缺陷，无需使用暴力，只需用同时采用两种极其容易有效的方法就可弥补。

The first of those remedies is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which the state might render almost universal among all people of middling or more than middling rank and fortune; not by giving salaries to teachers in order to make them negligent and idle, but by instituting some sort of probation, even in the higher and more difficult sciences, to be undergone by every person before he was permitted to exercise any liberal profession, or before he could be received as a candidate for any honourable office, of trust or profit. If the state imposed upon this order of men the necessity of learning, it would have no occasion to give itself any trouble about providing them with proper teachers. They would soon find better teachers for themselves, than any whom the state could provide for them. Science is the great antidote to the poison of enthusiasm and superstition; and where all the superior ranks of people were secured from it, the inferior ranks could not be much exposed to it.

第一种弥补措施是国家强制国内拥有中等或中等以上的身份和财富的人，全都从事科学及哲学研究。国家不应当固定教师的薪俸以使其变得怠慢与懒惰，而应当设定一种检定或考试制度，甚至可对较高深和困难的科学也应设立这类制度，所有人在从事某种自由职业前，

或被提名为某个有信誉或有酬劳的体面职务的候选人前，都须通过该检定或考试。假如国家规定这一阶层的人必须研究学问，就不需要自找麻烦地为他们提供合适的教师。因为他们不久就会为自己找到比国家为他们提供的还要好的教师。科学是狂妄及迷信之毒的伟大解毒剂。上流社会的人一旦解了这类毒，下层人民就不会深受其害了。

The second of those remedies is the frequency and gaiety of public diversions. The state, by encouraging, that is, by giving entire liberty to all those who for their own interest would attempt, without scandal or indecency, to amuse and divert the people by painting, poetry, music, dancing; by all sorts of dramatic representations and exhibitions; would easily dissipate,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that melancholy and gloomy humour which is almost always the nurse of popular superstition and enthusiasm. Public diversions have always been the objects of dread and hatred to all the fanatical promoters of those popular frenzies. The gaiety and good humour which those diversions inspire, were altogether inconsistent with that temper of mind which was fittest for their purpose, or which they could best work upon. Dramatic representations, besides, frequently exposing their artifices to public ridicule, and sometimes even to public execration, were, upon that account, more than all other diversions, the objects of their peculiar abhorrence.

第二种弥补方法是增加公众消遣娱乐的方式。对于那些出于自身兴趣而不伤风败俗或下流粗鄙的人，他们努力通过绘画、诗歌、音乐、舞蹈，乃至一切戏剧表演等方式来取悦或者为人们提供消遣的，国家当予以奖励，也就是给他们以自由。大众迷信和狂妄，常产生于忧郁或悲观情绪，大部分这种情绪，可以用以上几种方式消除。公众娱乐始终是那些煽动俗众的狂信者所恐惧和厌恶的对象。娱乐所引发

的快感与乐趣，与最符合其目的的脾气心态是完全相反的。此外，戏剧表演，常会向公众揭穿其诡计，有时会使其成为公众嘲笑的对象，有时甚至为公众所憎恶。因此，戏剧比其他任何娱乐方式，更为人们所特别嫌恶。

In a country where the law favoured the teachers of no one religion more than those of another, it would not be necessary that any of them should have any particular or immediate dependency upon the sovereign or executive power; or that he should have anything to do either in appointing or in dismissing them from their offices. In such a situation, he would have no occasion to give himself any concern about them, further than to keep the peace among them, in the same manner as among the rest of his subjects, that is, to hinder them from persecuting, abusing, or oppressing one another. But it is quite otherwise in countries where there is an established or governing religion. The sovereign can in this case never be secure, unless he has the means of influencing in a considerable degre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teachers of that religion.

假如一国的法律能够对于国内所有宗教的教师一视同仁，那么这些教师就不必与君主或执政者保持特定或直接的从属关系。又或者君主或执政者不必在他们职务的任免上采取什么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或执政者就没有担心他们的必要了，同对待其他受统治的民众一样，只需要维持他们之间的和平，也就是阻止他们相互迫害、侵侮或压迫。但是，假如一个国家中存在国教或统治宗教，那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假如是那样的话，除非君主掌握了有力影响该宗教大部分教师的控制手段，否则他就永无安生日子。

The clergy of every established church constitute a great

incorporation. They can act in concert, and pursue their interest upon one plan, and with one spirit as much as if they wer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one man; and they are frequently, too, under such direction. Their interest as an incorporated body is never the same with that of the sovereign, and is sometimes directly opposite to it. Their great interest is to maintain their authority with the people, and this authority depends upon the supposed certain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whole doctrine which they inculcate, and upon the supposed necessity of adopting every part of it with the most implicit faith, in order to avoid eternal misery. Should the sovereign have the imprudence to appear either to deride, or doubt himself of the most trifling part of their doctrine, or from humanity, attempt to protect those who did either the one or the other, the punctilious honour of a clergy, who have no sort of dependency upon him, is immediately provoked to proscribe him as a profane person, and to employ all the terrors of religion, in order to oblige the people to transfer their allegiance to some more orthodox and obedient prince. Should he oppose any of their pretensions or usurpations, the danger is equally great. The princes who have dared in this manner to rebel against the church, over and above this crime of rebellion, have generally been charged, too, with the additional crime of heresy, notwithstanding their solemn protestations of their faith, and humble submission to every tenet which she thought proper to prescribe to them. But the authority of religion is superior to every other authority. The fears which it suggests conquer all other fears. When the authorized teachers of religion propagate through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doctrines subversive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sovereign, it is by violence only, or by the force of a standing army, that he can maintain his authority. Even a standing army cannot in this case give him any lasting security; because if the soldiers are not foreigners, which can seldom be the case, but drawn from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which must almost always

be the case, they are likely to be soon corrupted by those very doctrines. The revolutions which the turbulence of the Greek clergy was continually occasioning at Constantinople, as long as the eastern empire subsisted; the convulsions which, during the course of several centuries, the turbulence of the Roman clergy was continually occasioning in every part of Europe,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 how precarious and insecure must always be the situation of the sovereign, who has no proper means of influencing the clergy of the established and governing religion of his country.

所有国教的教士都是一个大的团体。他们协同合作，根据某个计划和精神来追求其利益，就好像他们是由同一个人指导的一样。实际上，他们也常常处在这样的指导之下。作为一个团体的主体，他们的利益从来不会与君主的利益一致，有时会与其完全相反。他们重大利益是维持他们在人民中的权威，这种权威主要取决于以下两点：首先是他们所反复灌输的全部教义所应有的确定性与重要性；其次是为了永远从悲惨中解脱出来，因盲目信仰而采纳所有教义的必要性。假如君主轻率地嘲笑或怀疑他们教义中甚至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并尝试以人道精神来保护其他嘲笑和怀疑教义的人，这些同君主没有从属关系的教士，就会认为其谨小慎微的荣誉被触犯，而宣布君主亵渎神灵，同时会使用所有恐怖的宗教手段来使人民对该君主的忠顺转移向另一个比较驯服的君主。假如君主反对对于他们的任何乖张或篡夺行为，也会面临同样大的危险。敢于如此反对教会的君主，他一定会被指控这一罪恶或者更加严重的反逆之罪的。此外，不管他们多么严肃地声明他们的信仰，表明他们对于一切教会认为君主所应当遵守的教义多么得谦卑服从，通常还是会被扣上异端邪说的罪名。宗教的权威胜过所有其他权威。这所带来的恐怖超越了其他一切恐怖。所以，若教会的权威教师要在广大人民中宣传颠覆君主权威的教义，君主只有凭借暴力或者常备军的武力，才能维持其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就连这常备军，也不能予以君主以长久的保障，因为假如士兵不是外国人——外国人很少充当士兵，通常情况下士兵是从本国人民中募集来的，那

么这些士兵很可能很快就会受到那些教义的腐蚀。在东罗马帝国存续的那段时间里，希腊教士在君士坦丁堡引发了多次革命；之后的几个世纪，罗马教士也在欧洲多地多次引发动乱，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假如一国君主没有适当手段来控制国教或统治宗教教师，那么他的地位就会多么岌岌可危和摇摇欲坠。

Articles of faith, as well as all other spiritual matters, it is evident enough, are not within the proper department of a temporal sovereign, who, though he may be very well qualified for protecting, is seldom supposed to be so for instructing the people. With regard to such matters, therefore, his authority can seldom be sufficient to counterbalance the united authority of the clergy of the established church. The public tranquillity, however, and his own security, may frequently depend upon the doctrines which they may think proper to propagate concerning such matters. As he can seldom directly oppose their decision, therefore, with proper weight and authority, it is necessary that he should be able to influence it; and he can influence it only by the fears and expectations which he may excite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individuals of the order. Those fears and expectations may consist in the fear of deprivation or other punishment, and in the expectation of further preferment.

很明显，宗教信条和其他所有与精神相关的事物，都不在现世君主的管辖范围内；纵然君主很有资格保护人民，但人们很少认为他有资格教化人民。在关乎上述教条及精神有关的事物上，君主的权威，很少能够往往比得上国教教士们的统一权威。不过，社会安定和君主自身的安全，可能经常会依赖于教士们认为关于这些事件应当宣传的教义。由于君主几乎不能直接反对教士们的决议，因此，他有必要用适当的压力和权威来影响他们的决定。君主只能通过他可能激发大部分该阶层的人所产生的恐惧和期待来影响其决定。这些恐惧与期待主

要来源是对于免职或其他处罚的恐惧和对禄位升迁的期待。

In all Christian churches, the benefices of the clergy are a sort of freeholds, which they enjoy, not during pleasure, but during life or good behaviour. If they held them by a more precarious tenure, and were liable to be turned out upon every slight disobligation either of the sovereign or of his ministers, it would perhaps be impossible for them to maintain their authority with the people, who would then consider them as mercenary dependents upon the court, in the security of whose instructions they could no longer have any confidence. But should the sovereign attempt irregularly, and by violence, to deprive any number of clergymen of their freeholds, on account, perhaps, of their having propagated, with more than ordinary zeal, some factious or seditious doctrine, he would only render, by such persecution, both them and their doctrine ten times more popular, and therefore ten times more troublesome and dangerous, than they had been before. Fear is in almost all cases a wretched instrument of government, and ought in particular never to be employed against any order of men who have the smallest pretensions to independency. To attempt to terrify them, serves only to irritate their bad humour, and to confirm them in an opposition, which more gentle usage, perhaps, might easily induce them either to soften, or to lay aside altogether. The violence which the French government usually employed in order to oblige all their parliaments, or sovereign courts of justice, to enregister any unpopular edict, very seldom succeeded. The means commonly employed, however, the imprisonment of all the refractory members, one would think, were forcible enough. The princes of the house of Stewart sometimes employed the like means in order to influence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and they generally found them equally intractable.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is now managed in another manner; and a very small experiment, which the Duke of Choiseul made, about twelve years ago, upon the Parliament of Paris, demonstrated sufficiently that all the parliaments of France might have been managed still more easily in the same manner. That experiment was not pursued. For though management and persuasion are always the easiest and the safest instruments of government as force and violence are the worst and the most dangerous; yet such, it seems, is the natural insolence of man, that he almost always disdains to use the good instrument, except when he cannot or dare not use the bad one. The French government could and durst use force, and therefore disdained to use management and persuasion. But there is no order of men, it appears I believe,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ll ages, upon whom it is so dangerous or rather so perfectly ruinous, to employ force and violence, as upon the respected clergy of any established church. The rights, the privileges, the personal liberty of every individual ecclesiastic, who is upon good terms with his own order, are, even in the most despotic governments, more respected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person of nearly equal rank and fortune. It is so in every gradation of despotism, from that of the gentle and mild government of Paris, to that of the violent and furious government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ough this order of men can scarce ever be forced, they may be managed as easily as any other;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sovereign, as well as the public tranquility, seems to depend very much upon the means which he has of managing them; and those means seem to consist altogether in the preferment which he has to bestow upon them.

所有任职于基督教会的牧师都拥有一项不动产——圣俸。只要牧师没有不端行为，就可以终生享有，不得剥夺。如果牧师的圣俸是一项不稳定的收入，只要君主和官员稍感不快，就要进行剥夺，那么牧

师在人民面前就没有了威信。因为一旦那样，人们就会认为，牧师不过是宫廷花钱雇来的，他们教诲的真诚度让人没有信心。不过，若是君主用暴力的手段，骤然夺去牧师圣俸中的某些部分，理由是他们宣传了比较有煽动性或推动派系斗争的教义，那么这种迫害，只会导致这些牧师和他们宣传的教义得到10倍于从前的名气。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使用恐怖手段都是政府所能采用的最糟糕的方式，但凡对独立自由有一丁点追求的人，都不起作用。越是恐吓这些人，这些人越是坚定；反倒是宽宏大量能够弱化反抗。法国政府经常对议会和皇家司法院使用暴力，强令他们发布不得人心的公告，却很少成功过。可是，政府能够强行关押一切反对分子，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多么强有力的手段。斯图亚特王室的君主们，用过此种方式，对英国议会中的一些议员施加压力，往往发现这些议员们非常顽强。因此，他们不得不另择良策。如今，对英国议会进行操控的方式已大不相同。约在12年前，奇瓦塞尔公爵对法国议会进行了一个小实验，充分说明，如果采用操控英国议会的方式，能够更容易操控法国议会。不过，这实验没能继续下去。这是因为，尽管对于一个政府来说，采用操控和劝说的方式最为简单保险，而强制和暴力总是糟糕而危险，但是由于人类本性傲慢，总是不屑于劝说或者控制，而是宁愿采用暴力强制。法国政府使用暴力强制的能力胆量都够充足，也就懒于去采用控制劝说手段了。从过去所有年代的经验中，在我看来，没有比对受人尊敬的牧师施加暴力更加危险而具毁灭性的事情了。哪怕把暴力用在其他阶级上，都尚且没有如此大的危害。即使是最为专制的政府统治之下，每一位神职人员，只要与其他神职人员关系融洽，那么就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尊敬，即使是那些和他地位财产差不多的人。作为宽厚和狂暴专制的两个极端代表的巴黎政府和君士坦丁政府都宽待牧师，更不要提其他政府了。不过，尽管对牧师阶级的统治不能以强制方式，但还是有别的方式，可以像统治其他阶级一样统治牧师。为了保障统治的稳定，让社会不发生动荡，君主就要采取必要手段操控牧师。这些手段中，就包括给牧师以晋升的机会。

In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the bishop

of each diocese was elected by the joint votes of the clergy and of the people of the episcopal city. The people did not long retain their right of election; and while they did retain it, they almost always ac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lergy, who, in such spiritual matters, appeared to be their natural guides. The clergy, however, soon grew weary of the trouble of managing them, and found it easier to elect their own bishops themselves. The abbot, in the same manner, was elected by the monks of the monastery, at least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abbacies. All the inferior ecclesiastical benefices comprehended within the diocese were collated by the bishop, who bestowed them upon such ecclesiastics as he thought proper. All church preferments were in this manner in the disposal of the church. The sovereign, though he might have some indirect influence in those elections, and though it was sometimes usual to ask both his consent to elect, and his approbation of the election, yet had no direct or sufficient means of managing the clergy. The ambition of every clergyman naturally led him to pay court, not so much to his sovereign as to his own order, from which only he could expect preferment.

在旧时期，基督教教会制度是，由主教治下的城市的牧师，以及人们一同选举各个主教领区的主教。人民并不能保留长期的选举权；而且就算是在有选举权的时期，他们也多半听从牧师的话；在有关精神世界的问题上，牧师自然而然就成了人民的导师。不过，操纵人民也并非易事，不久牧师们就感到疲惫，他们觉得，不如自己选举自己的主教来得要容易。大部分修道院中，也一样是由修士们选举他们的院长。主教对自己的领区内带有薪俸的神职进行任命。相当于主教决定了升迁权。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君主能够间接地影响这些选举，而且教会选举的结果有时候也需要君主许可，但是君主却没有直接有力的手段来操纵这个过程。每一个有野心的牧师，都不得不奉承教会中的人而不必取悦君主，因为要升迁只能靠教会。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the Pope gradually drew to himself, first the collation of almost all bishoprics and abbacies, or of what were called Consistorial benefices, and afterwards, by various machinations and pretence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inferior benefices comprehended within each diocese, little more being left to the bishop than what was barely necessary to give him a decent authority with his own clergy. By this arrangement the condition of the sovereign was still worse than it had been before. The clergy of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Europe were thus formed into a sort of spiritual army, dispersed in different quarters indeed, but of which all the movements and operations could now be directed by one head, and conducted upon one uniform plan. The clergy of each particular country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particular detachment of that army, of which the operations could easily be supported and seconded by all the other detachments quartered in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round about. Each detachment was not only independent of the sovereign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it was quartered, and by which it was maintained, but dependent upon a foreign sovereign, who could at any time turn its arms against the sovereign of that particular country, and support them by the arms of all the other detachments.

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教皇首先设法掌握了修道院院长（或即所谓主教公会有俸圣职）和主教的任命权。然后又以种种狡猾的手段，把控了主教区下级带薪俸神职人员的任免，只给主教手中留下了一点点管理自己所辖牧师的权力。这种做法，恶化了君主的境况。对于欧洲各国的牧师而言，此举几乎是组建了一支宗教信仰的军队。虽然这军队分散在各个地区，但是只要共同的首领一声令下，就能够进行各种进军和军事行动。每个国家中的牧师，都是军队的一部分，而且他们的行动，立刻会得到周边其他宗教军分支的支持与附和。每一个宗

教军分支，不仅不受所在国君主的约束，而且事实上还处于另一个君主的领导之下。这领导的君主随时如果打算起兵反对某个君主的统治，那他立刻就会得到治下所有分支宗教军的响应。

Those arms were the most formidable that can well be imagined. In the ancient state of Europe,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rts and manufactures, the wealth of the clergy gave them the same sort of influence over the common people which that of the great barons gave them over their respective vassals, tenants, and retainers. In the great landed estates, which the mistaken piety both of princes and private persons had bestowed upon the church, jurisdictions were established, of the same kind with those of the great barons,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In those great landed estates, the clergy, or their bailiffs, could easily keep the peace, without the support or assistance either of the king or of any other person; and neither the king nor any other person could keep the peace there without th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of the clergy. The jurisdictions of the clergy, therefore, in their particular baronies or manors, were equally independent, and equally exclusive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king's courts, as those of the great temporal lords. The tenants of the clergy were, like those of the great barons, almost all tenants at will, entirely dependent upon their immediate lords, and, therefore, liable to be called out at pleasure, in order to fight in any quarrel in which the clergy might think proper to engage them. Over and above the rents of those estates, the clergy possessed in the tithes a very large portion of the rents of all the other estates in every kingdom of Europe. The revenues arising from both those species of rents we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paid in kind, in corn, wine, cattle, poultry, etc. The quantity exceeded greatly what the clergy could themselves consume; and there were neither arts nor manufactures, for the produce of which they could exchange the

surplus. The clergy could derive advantage from this immense surplus in no other way than by employing it, as the great barons employed the like surplus of their revenues, in the most profuse hospitality, and in the most extensive charity. Both the hospitality and the charity of the ancient clergy, accordingly, are said to have been very great. They not only maintained almost the whole poor of every kingdom, but many knights and gentlemen had frequently no other means of subsistence than by travelling about from monastery to monastery, under pretence of devotion, but in reality to enjoy the hospitality of the clergy. The retainers of some particular prelates were often as numerous as those of the greatest lay-lords; and the retainers of all the clergy taken together were, perhaps, more numerous than those of all the lay-lords. There was always much more union among the clergy than among the lay-lords. The former were under a regular discipline and subordination to the papal authority. The latter were under no regular discipline or subordination, but almost always equally jealous of one another, and of the king. Though the tenants and retainers of the clergy, therefore, had both together been less numerous than those of the great lay-lords, and their tenants were probably much less numerous, yet their union would have rendered them more formidable. The hospitality and charity of the clergy, too, not only gave them the command of a great temporal force, but increased very much the weight of their spiritual weapons. Those virtues procured them the highest respect and veneration among all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of whom many were constantly, and almost all occasionally, fed by them. Everything belonging or related to so popular an order, its possessions, its privileges, its doctrines, necessarily appeared sacred in the eyes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every violation of them, whether real or pretended, the highest act of sacrilegious wickedness and profaneness. In this state of things, if the sovereign frequently found it difficult to resist the

confederacy of a few of the great nobility, we cannot wonder that he should find it still more so to resist the united force of the clergy of his own dominions, supported by that of the clergy of all the neighbouring dominions. In such circumstances, the wonder is, not that he was sometimes obliged to yield, but that he ever was able to resist.

这种军队的可怕程度简直难以想象。历史上的欧洲，制造业还没有大发展，牧师所拥有的财富让他们能够像诸侯影响自己的家臣、佃户和随从一样，影响普通的人民。诸侯在领地上享有司法权；类似的，牧师也在那些皇族与个人出于本不该怀有的敬意而捐赠给教会的土地上，确立了相似的司法权。在大面积的地产范围里，牧师和其执事能够轻易保持和平稳定，根本无需君主支持，也不需要他人的帮衬。然而反过来，君主与其他人，要是没有了牧师们的支持帮助，就无力维持治下的和平稳定了。因此，牧师们的司法权如同大领主对其领地及庄园拥有的司法权一样，独立于国王管辖的法院，不归国家司法管理。和大领主一样，牧师们也可以自由地让佃户退租，这就让佃户们无法不仰仗主人。牧师们之间的争斗若是召集他们来出力，他们不得不来。牧师们主要从两种租金中获得收入：一是从这所有地上收取地租，二是通过什一税的形式，获得欧洲所有国家地产地租的一个很大的部分。这两种租金，多是以实物地租的形式收取，如谷物、葡萄酒或牲口等等。收取的额度远多于牧师们自己能够消费的量。而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艺术品和制造品用来交换出这些剩余产品，于是，他们就像处理自己超额收入的诸侯一般，大摆宴席，大行慈善来消耗这些剩余。此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此，在过去，牧师们总是以很大的排场款待客人，大行施舍。他们不但是国家中全部贫困人民的衣食父母，并且，许多生计无望的骑士和绅士，也往来于各修道院之间，以皈依的名义，接受这种款待。某些修道院院长的家臣，数目与大领主的一样多到数不清，估计修道院院长们的家臣加起来，比领主们的家臣总数还要多。家臣家臣家臣家臣牧师们之间的关系，总是比世俗的领主们之间的关系要团结一致许多的。牧师们遵从着正式的

规则约束，对罗马教皇服从。而世俗的领主们不但互相嫉恨，而且对君主也报以同样的仇视。所以，虽然把牧师们的佃人和家臣加起来，并不及世俗领主的那样多，尤其佃户的数量远不及世俗领主，但是牧师们之间的团结却有无可匹敌的力量。此外，牧师们款待他人，大行慈善，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巨大的控制世俗社会的力量，还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精神武器的分量。他们对众人施以慈爱，令下层人民对他们顶礼膜拜，这些人民，许多是不断依赖他们的救济，有时候还全体由他们赡养。那么，对于这个大受爱戴的阶级来说，属于这个阶级的物品、特权乃至他们宣传的教义，在一般大众眼里都具有了神圣的性质；一切无论是真是假的冒犯，人民都认为不可饶恕。君主常常为大贵族之间结成的同盟而倍感烦恼，更不要说对付联合反对他的牧师们了；更何况一国的牧师常有邻国牧师为其作支援。这样的情况下，君主投降实不足怪。

The privileges of the clergy in those ancient times (which to us, who live in the present times, appear the most absurd), their total exemption from the secular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or what in England was called the benefit of the clergy, were the natural, or rather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s of this state of things. How dangerous must it have been for the sovereign to attempt to punish a clergyman for any crime whatever, if his own order were disposed to protect him, and to represent either the proof as insufficient for convicting so holy a man, or the punishment as too severe to be inflicted upon one whose person had been rendered sacred by religion? The sovereign could, in such circumstances, do no better than leave him to be tried by the ecclesiastical courts, who, for the honour of their own order, were interested to restrain, as much as possible, every member of it from committing enormous crimes, or even from giving occasion to such gross scandal as might disgust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在历史上，牧师们的种种特权，完全免于世俗司法的管辖，我们如今看来是非常荒唐的。比如，所谓的英格兰的牧师特权，就是这种情况的自然而又必然的结果。不管君主试图以什么样的罪名惩罚一个牧师，都将是非常危险的，只要教会想对他进行庇护，就能以罪证不足，或者是不可严厉惩罚神职人员为借口，让牧师逃脱处罚。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让教会对犯罪的牧师进行审判，那么教会为了牧师群体的名誉考虑，会避免牧师犯罪，或者做出世人厌弃的丑行。

In the state in which things were,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during the tenth, eleventh,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and for some time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at perio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of Rome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most formidable combination that ever was formed against the authority and security of civil government, as well as against the liberty, reason, and happiness of mankind, which can flourish only where civil government is able to protect them. In that constitution, the grossest delusions of superstition were supported in such a manner by the private interests of so great a number of people, as put them out of all danger from any assault of human reason; because, though human reason might, perhaps, have been able to unveil, even to the eyes of the common people, some of the delusions of superstition, it could never have dissolved the ties of private interest. Had this constitution been attacked by no other enemies but the feeble efforts of human reason, it must have endured for ever. But that immense and well-built fabric, which all the wisdom and virtue of man could never have shaken, much less have overturned, was, by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first weakened, and afterwards in part destroyed; and is now likely, in the course of a few centuries more, perhaps, to crumble into ruins altogether.

在第10世纪、11世纪、12世纪、13世纪的情况是，罗马教会组织，以前所未有的团结，反对世俗政府的权威和安全，阻碍了人类追求自由、理性和幸福，而这些人类的权利，只有世俗政府才能够对其进行保障。在这种制度下，许多人出于私人利益的需要，支持极其愚蠢的迷信，任何人类的理性都无法动摇它。因为，也许理性能够戳穿迷信，让一般民众明白其荒诞之处，但理性决不能摧毁利己之心。若是教会组织没遇到其他敌手，只有脆弱的人类理性对其展开对抗，这些组织将永远存在。然而这个广大牢固的组织，任一切人类智慧与美德都无力动摇分毫，却在形式的发展下，渐渐衰退，然后先后毁灭，照现在来看，彻底瓦解恐怕用不了几个世纪的时间。

The gradual improvements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the same causes which destroyed the power of the great barons, destroyed, in the same manner,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the whole temporal power of the clergy. In the produce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the clergy, like the great barons, found something for which they could exchange their rude produce, and thereby discovered the means of spending their whole revenues upon their own persons, without giving any considerable share of them to other people. Their charity became gradually less extensive, their hospitality less liberal, or less profuse. Their retainers became consequently less numerous, and, by degrees, dwindled away altogether. The clergy, too, like the great barons, wished to get a better rent from their landed estates, in order to spend it, in the same manner, upon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ir own private vanity and folly. But this increase of rent could be got only by granting leases to their tenants, who thereby became, in a great measure, independent of them. The ties of interest, which bound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to the clergy, were in this manner gradually broken and dissolved. They were even broken and dissolved sooner than those which bound the same ranks of people to the great barons;

because the benefices of the church be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much smaller than the estates of the great barons, the possessor of each benefice was much sooner able to spend the whole of its revenue upon his own person. Dur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the power of the great barons was,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in full vigour. But the temporal power of the clergy, the absolute command which they had once had over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was very much decayed. The power of the church was, by that time, very nearly reduced,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to what arose from herspiritual authority; and even that spiritual authority was much weakened, when it ceased to be supported by the charity and hospitality of the clergy.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no longer looked upon that order as they had done before; as the comforters of their distress, and the relievers of their indigence. On the contrary, they were provoked and disgusted by the vanity, luxury, and expense of the richer clergy, who appeared to spend upon their own pleasures what had always before been regarded as the patrimony of the poor.

技术、制造业和商业的逐渐发展，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了大领主的权力，也瓦解了欧洲大部分牧师的世俗权力。牧师们也和大领主们一样，因此找到了可以用于交换自己原有生产物的东西，也因此知道了如何花费掉自己的全部所有物，不必再把剩余物品施与他人。结果就是导致从前的许多家臣逐渐减少，四散而去。为了过上大领主的富裕生活，满足虚荣和欲望，这些牧师也同样想从自己所有的土地上获得更可观的租金。但是，如果要获得更多的地租，这笔钱只能从佃户身上来，那么就要签佃契。这一来，佃户很大程度上就成了独立的了。由于利益关系趋于松散，原本受牧师控制的下层人民就不必再听从牧师的命令。再加上牧师的采地面积远不如领主，他们支配下层人民的关系瓦解的更快一些。因此，每个采地的所有者，就能更快、更容易

地消费自己全部的收入。在14、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欧洲封建诸侯的势力达到顶点。而在大部分欧洲地区，牧师号令支配人民的权力已经大不如前，对人民只剩下了心灵上的权威作用。现在，人民得不到牧师的慈善和宽待，对牧师们仅存的一点心灵信仰，也要消失殆尽了。下层人民，不再把牧师看作从前的救济人。再加上人民看到了比较富裕的牧师那种虚荣的铺张浪费，心中倍感厌恶，因为原本应该救济穷人的东西，竟然被牧师们挥霍一空了。

In this situation of things, the sovereigns in the different states of Europe endeavoured to recover the influence which they had once had in the disposal of the great benefices of the church; by procuring to the deans and chapters of each diocese the restoration of their ancient right of electing the bishop; and to the monks of each abbacy that of electing the abbot. The re-establishing of this ancient order was the object of several statutes enacted in Englan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articularly of what is called the Statute of Provisors; and of the Pragmatic Sanction, established in Franc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order to render the election valid, it was necessary that the sovereign should both consent to it before hand, and afterwards approve of the person elected; and though the election was still supposed to be free, he had, however all the indirect means which his situation necessarily afforded him, of influencing the clergy in his own dominions. Other regulations, of a similar tendency, were established in other parts of Europe. But the power of the pope, in the collation of the great benefices of the church, seems, before the Reformation, to have been nowhere so effectually and so universally restrained as in France and England. The Concordat afterward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gave to the kings of France the absolute right of presenting to all the great, or what are called the consistorial, benefices of the Gallican Church.

这样的情况下，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希望能够再度夺回曾经在教会中，支配重要职位的权力。一方面，他们恢复从前各主教领区，副主教和牧师选举主教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们恢复各修道院的修道士选举自己院长的权力。14世纪英格兰的一些法令，尤其是所谓的有捧圣职栓叙条例的，与15世纪法国颁发的基本诏书一样，目的就是重建那样的旧制度。根据条例或者是诏书，君主要先同意，随后进行的选举才能发生效力；选出来的人物，也要得到君主的同意。这样，虽然看起来，选举是自由的，但是君主还是一定要用各种间接的方法，对下属的牧师进行支配。欧洲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规定，不过，在宗教改革前的英国和法国，对罗马教皇任命重要教职的权力，限制得最为严苛。到了16世纪，根据罗马教皇和法国君主签署的协定，法国君主有权推荐所有重要主教大会任职人选，而且这权力是决定权。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agmatic Sanction and of the Concordat, the clergy of France have in general shown less respect to the decrees of the papal court, than the clergy of any other Catholic country. In all the disputes which their sovereign has had with the pope, they have almost constantly taken part with the former. This independency of the clergy of France upon the court of Rome seems to be principally founded upon the Pragmatic Sanction and the concordat. In the earlier periods of the monarchy, the clergy of France appear to have been as much devoted to the pope as those of any other country. When Robert, the second prince of the Capetian race, was most unjustly excommunicated by the court of Rome, his own servants, it is said, threw the victuals which came from his table to the dogs, and refused to taste anything themselves which had been polluted by the contact of a person in his situation. They were taught to do so, it may very safely be presumed, by the clergy of his own dominions.

自从上述的协定签署以来，法国的牧师们就不再像其他天主教国家牧师那样尊敬教皇了。一旦君主和教皇起争执，他们几乎总是赞成君主。这样看来，法国的牧师们独立于罗马教廷的控制之外，主要就是因为基本诏书和协定。而之前的时代，法国的牧师们和其他国家的牧师一样，对教皇极为忠心。教皇虽以极为不公正的手段，把克培王室的第二君主罗伯特逐出了罗马教会但据说，当时的法王的侍从，把他桌上的食物投掷给了狗，而且一切法王触碰过的东西，他们都视为已经被污染，拒绝品尝。法王的贴身侍从竟敢如此大胆，必然受到了国内牧师的教唆。

The claim of collating to the great benefices of the church, a claim in defence of which the court of Rome had frequently shaken, and sometimes overturned, the thrones of some of the greatest sovereigns in Christendom, was in this manner either restrained or modified, or given up altogether, in many different parts of Europe, even before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As the clergy had now less influence over the people, so the state had more influence over the clergy. The clergy, therefore, had both less power, and less inclination, to disturb the state.

为了驳回基督教国家对于重要教职任免权的主张，罗马教廷甚至不惜颠覆一些基督教大国的政权。因此，许多欧洲基督教国家，不得不放弃了这一主张，或是施以诸多限制。而现在，牧师们既然无力影响人民，就势必要受到国家施加给他们的压力。牧师们对国家的干扰，无论是力量和意向都在衰微。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of Rome was in this state of declension, when the disputes which gave birth to the Reformation began in Germany, and soon spread themselves through every part

of Europe. The new doctrines were everywhere received with a high degree of popular favour. They were propagated with all that enthusiastic zeal which commonly animates the spirit of party, when it attacks established authority. The teachers of those doctrines, though perhaps, in other respects, not more learned than many of the divines who defended the established church, seem in general to have been better acquainted with ecclesiastical history, and with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at system of opinions upon which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was established; and they had thereby some advantage in almost every dispute. The austerity of their manners gave them authority with the common people, who contrasted the strict regularity of their conduct with the disorderly live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own clergy. They possessed, too, in a much higher degree than their adversaries, all the arts of popularity and of gaining proselytes; arts which the lofty and dignified sons of the church had long neglected, as being to them in a great measure useless. The reason of the new doctrines recommended them to some, their novelty to many; the hatred and contempt of the established clergy to a still greater number: but the zealous, passionate, and fanatical, though frequently coarse and rustic eloquence, with which they were almost everywhere inculcated, recommended them to by far the greatest number.

罗马教会的权威处于下滑状态的时候，德国的宗教改革大行其道，迅速传遍了欧洲。新教义所到之处大受欢迎，而且由于怀着推翻旧权威的心情，宣传者们总是怀着满腔的热情。而且，尽管在其他方面，信教的传播者或许不像旧牧师那样学识渊博，不过他们对于宗教体系的各种典故更为熟悉，也熟知旧教视为权威的基础的思想体系的起源和发展。所以，几乎在每一场争论里，他们都占据上风。他们过着简朴严肃的生活，普通人民把他们恪守规范的举动，和自己大多数牧师们的无节制的生活对照起来，就对他们分外敬重。再加上比起他

们的反对者们，这些人更善博取名声，吸引信徒，反对者们自视甚高，他们不屑于使用这些手段，早就忘得一干二净。新教义的理论，赢得了一些追随者；新教义的新奇，受许多人喜欢；新教对旧教牧师们的厌恶与轻蔑，赢得了更多的追随者。不过，最受大多数人欢迎的，还是新教义者们宣传教义时的激情与雄辩，这雄辩虽难免偶尔显得粗俗，却不乏热情、真诚和狂热。

The success of the new doctrines was almost everywhere so great, that the princes, who at that time happened to be on bad terms with the court of Rome, were, by means of them, easily enabled, in their own dominions, to overturn the church, which having lost the respect and veneration of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could make scarce any resistance. The court of Rome had disobliged some of the smaller princes in the northern parts of Germany, whom it had probably considered as too insignificant to be worth the managing. They universally, therefore, established the Reformation in their own dominions. The tyranny of Christian II, and of Troll Archbishop of Upsala, enabled Gustavus Vasa to expel them both from Sweden. The pope favoured the tyrant and the archbishop, and Gustavus Vasa found no difficulty in establishing the Reformation in Sweden. Christian II was afterwards deposed from the throne of Denmark, where his conduct had rendered him as odious as in Sweden. The pope, however, was still disposed to favour him; and Frederick of Holstein, who had mounted the throne in his stead, revenged himself, by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Gustavus Vasa. The magistrates of Berne and Zurich, who had no particular quarrel with the pope, established with great ease the Reformation in their respective cantons, where just before some of the clergy had, by an imposture somewhat grosser than ordinary, rendered the whole order both odious and contemptible.

新的教义几乎在各处都大获成功。和罗马教廷不和的君主，凭借这教义，轻易就能颠覆本国领土内的旧教会；而旧的教会由于失却了下层人民的尊敬与爱戴，在新教的颠覆面前束手无策。罗马教廷曾经不以为意的一些德意志北部小君主，由于曾经受到怠慢，纷统在领土境内施行宗教改革。由于克雷蒂恩二世及阿普索大主教特诺尔残暴狠毒，卡斯塔瓦斯·瓦萨因此能够把他们逐出瑞典；由于教皇要对这暴君和主教加以庇护，所以卡斯塔瓦斯·瓦萨在瑞典的宗教改革并没有什么困难。在丹麦的时候，雷蒂恩仍然像在瑞典时一般臭名昭著，被从王位上驱逐了下来。即便是这样，教皇还是力争袒护他。于是，霍斯泰恩的徘勒德烈继承了王位后，就循着卡斯塔瓦斯·瓦萨的前例进行了宗教改革，以报复教皇。柏恩与久里克政府这样和教皇没有什么恩怨的地方，也由于某些牧师的丑恶行径招致人民的厌憎，很快也顺利地进行了宗教改革。

In this critical situation of its affairs the papal court was at sufficient pains to cultivate the friendship of the powerful sovereigns of France and Spain, of whom the latter was at that time Emperor of Germany. With their assistance, it was enabled, though not without great difficulty, and much bloodshed, either to suppress altogether, or to obstruct very much, the progress of the Reformation in their dominions. It was well enough inclined, too, to be complaisant to the King of England. But from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s, it could not be so without giving offence to a still greater sovereign, Charles V., King of Spain and emperor of Germany. Henry VIII., accordingly, though he did not embrace himsel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doctrines of the Reformation, was yet enabled, by their general prevalence, to suppress all the monasteries, and to abolish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of Rome in his dominions. That he should go so far, though he went no further, gave some satisfaction to the patrons of the Reformation, who, having got possession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reign of his son and

successor completed, without any difficulty, the work which Henry VIII. had begun.

形式严峻，教皇只好与强有力的法兰西和西班牙君主交好，寻求支持。西班牙君主在当时是德国的皇帝。凭借他们的援助，教廷才没有在镇压本国宗教改革运动的过程中，遭遇太大的困难，或者发生太严重的流血事件。教皇本打算连同英格兰国王一起拉拢，但为了不得罪更强悍的西班牙国王兼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只好放弃与英格兰的友好关系。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本来并没有完全接受新教教义，他只是借助新教风行全国的情势，镇压寺院，捞到好处。尽管他的宗教改革进行的不怎么深入，那些新教的拥护者们却已经很有些满意了，他们在亨利八世的儿子即位的时候，掌握了政府的实权，毫不费力地完成了亨利八世没来得及完成的改革。

In some countries, as in Scotland, where the government was weak, unpopular, and not very firmly established, the Reformation was strong enough to overturn, not only the church, but the state likewise, for attempting to support the church.

有些国家就像苏格兰一样，政府羸弱，不得民心，而且根基不牢。那里的宗教改革运动，不但声势浩大到足以推翻罗马教会，并且企图支持罗马教会的国家，也会被这浪潮淹没。

Among the followers of the reformation, dispersed in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Europe, there was no general tribunal, which, like that of the court of Rome, or an oecumenical council, could settle all disputes among them, and, with irresistible authority, prescribe to all of them the precise limits of orthodoxy. When the

followers of the Reformation in one country, therefore, happened to differ from their brethren in another, as they had no common judge to appeal to, the dispute could never be decided; and many such disputes arose among them. Those concern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church, and the right of conferring ecclesiastical benefices, were perhaps the most interesting to the peace and welfare of civil society. They gave birth, accordingly, to the two principal parties or sects among the followers of the Reformation, the Lutheran and Calvinistic sects, the only sects among them, of which the doctrine and discipline have ever yet been established by law in any part of Europe.

分散在欧洲不同国家的宗教改革者们，缺乏一个像从前的罗马教会一样的共同领导，解决信教者之间的争论，并且以绝对的权威规定教义的规范。所以当各国宗教改革者们之间有所争执的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裁判来裁决，争议就总是悬而未决。而此类争论在他们彼此之间又非常多。和市民社会关系最密切的争论，大概就是如何管理教会，以及如何任免教会职务了。因此，所有的信徒就分裂成了两个主要党派或者说是教派，即路德派和加尔文派。路德派和加尔文派本来只是新教诸多教派中的两个，不过，却只有这两个宗派曾经在欧洲的各个地方，以法律形式规范教义和教律。

The followers of Luther, together with what is called the Church of England, preserved more or less of the episcopal government, established subordination among the clergy, gave the sovereign the disposal of all the bishoprics, and other consistorial benefices within his dominions, and thereby rendered him the real head of the church; and without depriving the bishop of the right of collating to the smaller benefices within his diocese, they, even to those benefices, not only admitted, but favoured the right of

presentation, both in the sovereign and in all other lay patrons. This system of church government was, from the beginning, favourable to peace and good order, and to submission to the civil sovereign. It has never, accordingly, been the occasion of any tumult or civil commotion in any country in which it has once been established. The Church of England, in particular, has always valued herself, with great reason, upon the unexceptionable loyalty of her principles. Under such a government, the clergy naturally endeavour to recommend themselves to the sovereign, to the court, and to the nobility and gentry of the country, by whose influence they chiefly expect to obtain preferment. They pay court to those patrons, sometimes, no doubt, by the vilest flattery and assentation; but frequently, too, by cultivating all those arts which best deserve, and which are therefore most likely to gain them, the esteem of people of rank and fortune; by their knowledge in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useful and ornamental learning, by the decent liberality of their manners, by the social good humour of their conversation, and by their avowed contempt of those absurd and hypocritical austerities which fanatics inculcate and pretend to practise, in order to draw upon themselves the veneration, and upon the greater part of men of rank and fortune, who avow that they do not practise them, the abhorrence of the common people. Such a clergy, however, while they pay their court in this manner to the higher ranks of life, are very apt to neglect altogether the means of maintaining their influence and authority with the lower. They are listened to, esteemed, and respected by their superiors; but before their inferiors they are frequently incapable of defending, effectually, and to the conviction of such hearers, their own sober and moderate doctrines, against the most ignorant enthusiast who chooses to attack them.

路德教派的追随者还有英格兰教会，或多或少主教管辖制，牧师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君主任免本国领域内的主教职位，以及主教会议牧师的职位，这事实上就让君主成为了真正的宗教领袖。尽管主教并没有被剥夺任免下级牧师的权力，但是君主和新教支持者，不仅被允许，甚至被鼓励推荐人选。这种教会管理组织，一开始就有助于维持和平，保障良好的秩序，保证教会对世俗君主的服从。所以，任何国家以内，只要建立了这个组织，就能防止国内产生骚乱。尤其是英格兰教会，具有充分的理由，宣称完全忠于自己信奉的教义。因为在这种教会管理制度之下，牧师们要想升迁，就自然会想方设法取悦君主和达官贵人们。他们还会学习一些技巧，以显得不得不进行的阿谀奉承看起来高雅一些，来赢得尊贵者的赏识。比如，学习各类既有用又可以装点门面的知识，比如养成体面自在的风度，再比如，学会旷达儒雅的谈吐。甚至通过对一般狂热信徒的苦行表示轻蔑来讨好显贵。他们公开轻蔑、反对狂热的信徒，是因为那些信徒疏导了普通百姓对于那些不虔诚的达官显贵们的厌憎，因而深得民心。这样，狂言者就可以教诲人民实施虚伪的苦行。尽管这些牧师讨了上层人的欢心，但是却忽略了在下层人中保持自己的影响力与权威。尽管能获得上层人的倾听、尊敬和赞许，他们在狂热的信徒们当着百姓的面攻击他们的时候，毫无招架之力，无法说服民众不要偏激，保持稳重。

The followers of Zwingli, or more properly those of Calvin, on the contrary, bestowed upon the people of each parish, whenever the church became vacant, the right of electing their own pastor; and established, at the same time, the most perfect equality among the clergy. The former part of this institution, as long as it remained in vigour, seems to have been productive of nothing but disorder and confusion, and to have tended equally to corrupt the morals both of the clergy and of the people. The latter part seems never to have had any effects but what were perfectly agreeable.

茨温克利的信奉者，更恰当地说，加尔文教的信奉者，就和路德教的追随者相反。他们把各个教会的牧师选举权交给相应教区的人民，让人民针对随时空缺出来的牧师职位进行选举。同时他们还坚决保持了牧师的平等。这个制度的前半部分在大行其道的时候，不断地制造混乱和无序，腐蚀了牧师和人民的道德。而后半部分无他，也仅仅是实现了平等而已。

As long as the people of each parish preserved the right of electing their own pastors, they acted almost alway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lergy, and generally of the most factious and fanatical of the order. The clergy,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ir influence in those popular elections, became, or affected to become, many of them, fanatics themselves, encouraged fanaticism among the people, and gave the preference almost always to the most fanatical candidate. So small a matter as the appointment of a parish priest, occasioned almost always a violent contest, not only in one parish, but in all the neighbouring parishes who seldom failed to take part in the quarrel. When the parish happened to be situated in a great city, it divided all the inhabitants into two parties; and when that city happened, either to constitute itself a little republic, or to be the head and capital of a little republic, as is the case with many of the considerable cities in Switzerland and Holland, every paltry dispute of this kind, over and above exasperating the animosity of all their other factions, threatened to leave behind it, both a new schism in the church, and a new faction in the state. In those small republics, therefore, the magistrate very soon found it necessary, for the sake of preserving the public peace, to assume to himself the right of presenting to all vacant benefices. In Scotland, the most extensive country in which this Presbyterian form of church government has ever been established, the rights of patronage were in effect abolished by the act which established

presbyter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William III. That act, at least, put it in the power of certain classes of people in each parish to purchase, for a very small price, the right of electing their own pastor. The constitution which this act established, was allowed to subsist for about two-and-twenty years, but was abolished by the 10th of Queen Anne, ch.12, on account of the confusions and disorders which this more popular mode of election had almost everywhere occasioned. In so extensive a country as Scotland, however, a tumult in a remote parish was not so likely to give disturbance to government as in a smaller state. The 10th of queen Anne restored the rights of patronage. But though, in Scotland, the law gives the benefice, without any exception to the person presented by the patron; yet the church requires sometimes (for she has not in this respect been very uniform in her decisions) a certain concurrence of the people, before she will confer upon the presentee what is called the cure of souls, or the ecclesiastical jurisdiction in the parish. She sometimes, at least, from an affected concern for the peace of the parish, delays the settlement till this concurrence can be procured. The private tampering of some of the neighbouring clergy, sometimes to procure, but more frequently to prevent this concurrence, and the popular arts which they cultivate, in order to enable them upon such occasions to tamper more effectually, are perhaps the causes which principally keep up whatever remains of the old fanatical spirit, either in the clergy or in the people of Scotland.

在各个教区的人民，几乎都是在牧师们的影响下行动的，而这些牧师又多半最会结党，也最为狂热。为了保持自身在选举时的势力，他们多数人成为了疯狂的信徒，或者假装成了疯狂的信徒，在人民中宣传狂信主义，并且更青睐那些最狂信的候选人。原本并不算什么大事的教区牧师任命，现在却常常要在本教区乃至相邻教区惹来大麻

烦。如果教区恰好是在大城市里，那这纷争就会把教区人民分成两大派。倘若那个城市像瑞士、荷兰许多大城市那样，本身就是一个小共和国或者是小共和国的首都，那么这种令人不齿的斗争，不仅会惹起其他派别的憎恶，还会在教会里形成新的宗派分支，使国家产生新党派。因此对那些小共和国来说，维持治安之道，就是牢牢掌握推荐牧师的权力。苏格兰是最大的实行长老管理教会制度的国家，威廉三世执政初期就通过一个长老会的法令取消了推荐权。而这项法令，事实上却使得某些阶级的人们能够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购买各自教区的牧师选举权。在这法律之上建立起的混乱制度只维持了22年，就被安妮女王十年的12号法令废除掉了。不过，像苏格兰这样面积广大的国家，发生在边远教区的混乱，并不会像面积更小的国家那样，动摇政府的统治。因此，同在安妮女王第十年，这推荐权又被恢复了。根据此法令，只要某个人选得到推荐，就能被依法授予牧师职位，但是根据不同的规定，有的教会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才可以授予被推荐人灵魂监督权，或者是教会管辖权。有时候，教会考虑到教区的稳定和平，也要拖延到人民许可为止。附近的一些牧师有时候为了赢得许可，更多的时候是为了阻止许可而培养种种技能，以便得到人民的支持。了解了这些手段，也许就了解了为何苏格兰民间以及牧师间仍然残留着狂信的旧俗。

The equality which the Presbyterian form of church government establishes among the clergy, consists, first, in the equality of authority or ecclesiastical jurisdiction; and, secondly, in the equality of benefice. In all Presbyterian churches, the equality of authority is perfect; that of benefice is not so. The difference, however, between one benefice and another, is seldom so considerable, as commonly to tempt the possessor even of the small one to pay court to his patron, by the vile arts of flattery and assentation, in order to get a better. In all the Presbyterian churches, where the rights of patronage are thoroughly established, it is by nobler and better arts, that the established clergy in general

endeavour to gain the favour of their superiors; by their learning, by the irreproachable regularity of their life, and by the faithful and diligent discharge of their duty. Their patrons even frequently complain of the independency of their spirit, which they are apt to construe into ingratitude for past favours, but which, at worst, perhaps, is seldom anymore than that indifference which naturally arises from the consciousness that no further favours of the kind are ever to be expected. There is scarce, perhaps, to be found anywhere in Europe, a more learned, decent, independent, and respectable set of men,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resbyterian clergy of Holland, Geneva, Switzerland, and Scotland.

长老管理教会制度让牧师之间保持着两种平等，一种是平等的权力和教会管辖权，另一种是平等的圣俸。在所有长老教会之中，权利平等完全实现了，但是圣俸却没有平等。不过，不同的圣俸之间的差异，究竟也没有大到让牧师们去曲意逢迎推荐者的地步。在所有长老教会中，牧师推荐权既然已经彻底建立了起来，牧师就要靠一些高雅的做法，比如学问通达，生活自律，履职勤恳等等。以至于推荐他们的人还会怪他们太独立，忘记了得到了什么帮助。其实，最差来说，他们只不过是因为没有更高的期望，无欲无求，显得冷淡。因此，全欧洲学问最了得，气度最高雅，精神最独立，最令人起敬的牧师，恐怕就是、荷兰、日内瓦、瑞士及苏格兰长老教会内的大多数牧师了。

Where the church benefices are all nearly equal, none of them can be very great; and this mediocrity of benefice, though it may, no doubt be carried too far, has, however, some very agreeable effects. Nothing but the most exemplary morals can give dignity to a man of small fortune. The vices of levity and vanity necessarily render him ridiculous, and are, besides, almost as ruinous to him as they are to the common people. In his own conduct, therefore, he is

obliged to follow that system of morals which the common people respect the most. He gains their esteem and affection, by that plan of life which his own interest and situation would lead him to follow. The common people look upon him with that kindness with which we naturally regard one who approaches somewhat to our own condition, but who, we think, ought to be in a higher. Their kindness naturally provokes his kindness. He becomes careful to instruct them, and attentive to assist and relieve them. He does not even despise the prejudices of people who are disposed to be so favourable to him, and never treats them with those contemptuous and arrogant airs, which we so often meet with in the proud dignitaries of opulent and well endowed churches. The Presbyterian clergy, accordingly, have more influence over the minds of the common people, than perhaps the clergy of any other established church. It is, accordingly, in Presbyterian countries only, that we ever find the common people converted, without persecution completely, and almost to a man, to the established church.

教会圣俸将近同等，不会有一份圣俸数额特别大，这种拉平差距的做法虽然不免矫枉过正，但对教会大有裨益。一个财产不多的人，要想拥有尊严，最好就是拥有堪当模范的德行。如果他轻薄虚荣，只会徒增笑耳，和一般没有钱财的破落子弟区别不大。因此，他们在言行上，就要遵从常人眼里超高的道德规范。他为了利益和地位考虑，也必须博得常人的尊敬，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如果一个人和我们情况相近，而且多少比我们更好，那我们自然会对此人心生好感。所以，普通人对这样的牧师就感到亲切，而牧师也会悉心教导、细心关怀，救济普通人。由于人们对他这样亲切，他当然不会因为人们的偏见就心存不屑，更不可能像那些极为富有的教会的牧师一样，对人民流露出傲慢的态度。因此，在影响人民的精神世界方面，长老教会的牧师恐怕比其他所有国教教会的牧师，都要胜过一筹。由于这个缘故，只有在长老教会制国家，才能不对人民加以迫害就让他们全部改

信国教。

In countries where church benefices a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very moderate, a chair in a university is generally a better establishment than a church benefice. The universities have, in this case, the picking and choosing of their members from all the churchmen of the country, who, in every country, constitute by far the most numerous class of men of letters. Where church benefices, on the contrary, are many of them very considerable, the church naturally draws from the universitie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eminent men of letters; who generally find some patron, who does himself honour by procuring them church preferment. In the former situation, we are likely to find the universities filled with the most eminent men of letters that are to be found in the country. In the latter, we are likely to find few eminent men among them, and those few among the youngest members of the society, who are likely, too, to be drained away from it, before they can have acquired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enough to be of much use to it. It is observed by Mr. de Voltaire, that Father Porrie, a Jesuit of no great eminence i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was the only professor they had ever had in France, whose works were worth the reading. In a country which has produced so many eminent men of letters, it must appear somewhat singular, that scarce one of them should have been a professor in a university. The famous Gassendi was, in the beginning of his life, a professor in the University of Aix. Upon the first dawning of his genius, it was represented to him, that by going into the church he could easily find a much more quiet and comfortable subsistence, as well as a better situation for pursuing his studies; and he immediately followed the advice. The observation of Mr. de Voltaire may be applied, I believe, not only to France, but to all other Roman Catholic countries. We very rarely

find in any of them an eminent man of letters, who is a professor in a university, except, perhaps, in the professions of law and physic; professions from which the church is not so likely to draw them. After the Church of Rome, that of England is by far the richest and best endowed church in Christendom. In England, accordingly, the church is continually draining the universities of all their best and ablest members; and an old college tutor who is known and distinguished in Europe as an eminent man of letters, is as rarely to be found there as in any Roman Catholic country, In Geneva, on the contrary, in the Protestant cantons of Switzerland, in the Protestant countries of Germany, in Holland, in Scotland, in Sweden, and Denmark, the most eminent men of letters whom those countries have produced, have, not all indeed, but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m, been professors in universities. In those countries, the universities are continually draining the church of all its most eminent men of letters.

如果一个国家教会的大部分圣俸都很平常，那么，这个国家里的大学教员，就比教会有俸圣职的拿到更丰厚的报酬。这样的情况下，大学会在全国的牧师中选拔他们的教授，因为在每个国家，牧师群体中都拥有最多的学者。相反，若某个教会的圣俸大部分都很可观，那自然会吸引到大多数的著名学者；这些学者很容易找到人推荐他们，因为这些当权者常以推荐他们为荣。前一种情形会让全国最为著名的学者们云集在大学之中；而在后一种情形下，愿意留在大学中的学者就屈指可数了，而其中年纪最轻的教师，还不等获得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精进的知识水平就已经被教会吸引走了。伏尔泰认为，耶稣教徒波雷，一个在这学者的国度中称不上了不得的人物，他的著作在法国各个大学中，居然是唯一值得一读的。一个国家既然产生了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奇怪的是竟然很少有做了大学教授的。闻名的加桑迪青年时期当过艾克斯大学教授。后正当他崭露头角时，就有人推荐他去教会，说那里的生活比较宁静愉悦，而且适合搞研究。他立即听从了

建议进了教会。我相信伏尔泰的结论不仅适用于法国，也适用于别的罗马天主教国家。大学教授中，基本上找不出知名学者，只有在法律医学人才中能找到，因为他们不受教会的青睐。在所有基督教国家中，除了罗马教会，英格兰教会是最富有的，得到的捐赠最多。因此，英格兰的教会，不断地吸引走了最有能力最优秀的学者。结果就是，要想在英格兰找一个学问在全欧洲都顶尖的资深教授，几乎不比在罗马天主教国家找寻更容易。日内瓦的情况正相反，在瑞士新教各州，在德意志新教各邦，在荷兰，在瑞士，在瑞典，在丹麦的情况也相反，这些国家造就的最优秀的学者，虽然不是人人，但也有很大部分，在大学当了教授。在这些国家，大学不断地把最为著名的学者吸引而来。

It may, perhaps, be worthwhile to remark, that, if we except the poets, a few orators, and a few historians,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other eminent men of letters, both of Greece and Rome, appear to have been either public or private teachers; generally either of philosophy or of rhetoric. This remark will be found to hold true, from the days of Lysias and Isocrates, of Plato and Aristotle, down to those of Plutarch and Epictetus, of Suetonius and Quintilian. To impose upon any man the necessity of teaching, year after year, in any particular branch of science seems in reality to be the most effectual method for rendering him completely master of it himself. By being obliged to go every year over the same ground, if he is good for anything, he necessarily becomes, in a few years, well acquainted with every part of it, and if, upon any particular point, he should form too hasty an opinion one year, when he comes, in the course of his lectures to reconsider the same subject the year thereafter, he is very likely to correct it. As to be a teacher of science is certainly the natural employment of a mere man of letters; so is it likewise, perhaps, the education which is most likely to render him a man of solid learning and knowledge. The

mediocrity of church benefices naturally tends to draw the greater part of men of letters in the country where it takes place, to the employment in which they can be the most useful to the public,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give them the best education, perhaps, they are capable of receiving. It tends to render their learning both as solid as possible, and as useful as possible.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希腊罗马，除了少数诗人、演讲家以及历史学家，绝大多数著名学者都在公立或者私立学校做老师，教授哲学或者是修辞学。从里西阿斯、伊索克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时代，一直到普鲁塔克、埃皮蒂塔斯、斯韦托尼阿及昆蒂里恩时代，情况都是这样。让某个人逐年专门教授某个学科，对于他的学问长进最有好处。因为，他每年都教授这一门学科，但凡是可造之材，几年之内对这门学问的了解就能面面俱到；并且今年他见解不够成熟的地方，次年一定会加以更正。教授科学的教师，如果一个人想成为学者，这职业是天然就很适当的，同时，这职业也让他以最好的方式受到了教育。如果一个国家教会的圣俸很一般，那么学者们大多会去从事教学，利国利民。这一来，他们的学问也变得充实而有用。

The revenue of every established church, such parts of it excepted as may arise from particular lands or manors, is a branch, it ought to be observed, of the general revenue of the state, which is thus diverted to a purpos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defence of the state. The tithe, for example, is a real land tax, which puts it out of the power of the proprietors of land to contribute so largely towards the defence of the state as they otherwise might be able to do. The rent of land, however, is, according to some, the sole fund; and, according to others, the principal fund, from which, in all great monarchies, the exigencies of the state must be ultimately supplied. The more of this fund that is given to the church, the less, it is

evident, can be spared to the state. It may be laid down as a certain maxim, that all other things being supposed equal, the richer the church, the poorer must necessarily be, either the sovereign on the one hand, or the people on the other; and, in all cases, the less able must the state be to defend itself. In several Protestant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all the Protestant cantons of Switzerland, the revenue which anciently belonged to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the tithes and church lands, has been found a fund sufficient, not only to afford competent salaries to the established clergy, but to defray, with little or no addition, all the other expenses of the state. The magistrates of the powerful canton of Berne, in particular, have accumulated, out of the savings from this fund, a very large sum, supposed to amount to several millions; part of which is deposited in a public treasure, and part is placed at interest in what are called the public funds of the different indebted nations of Europe; chiefly in those of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What may be the amount of the whole expense which the church, either of Berne, or of any other Protestant canton, costs the state, I do not pretend to know. By a very exact account it appears, that, in 1755, the whole revenue of the clergy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 including their glebe or church lands, and the rent of their manses or dwelling-houses, estimated according to a reasonable valuation, amounted only to £68,514:1:5 1/12d. This very moderate revenue affords a decent subsistence to nine hundred and forty-four ministers. The whole expense of the church, including what is occasionally laid out for the building and reparation of churches, and of the manses of ministers, cannot well be supposed to exceed eighty or eighty-five thousand pounds a-year. The most opulent church in Christendom does not maintain better the uniformity of faith, the fervour of devotion, the spirit of order, regularity, and austere morals, in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than this very poorly endowed Church of Scotland. All the good effects, both civil and religious, which an

established church can be supposed to produce, are produced by it as completely as by any othe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of Switzerland, which, in general, are not better endowed than the Church of Scotland, produce those effects in a still higher degree.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rotestant cantons, there is not a single person to be found, who does not profess himself to be of the established church. If he professes himself to be of any other, indeed, the law obliges him to leave the canton. But so severe, or, rather, indeed, so oppressive a law, could never have been executed in such free countries, had not the diligence of the clergy beforehand converted to the established church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with the exception of, perhaps, a few individuals only. In some parts of Switzerland, accordingly, where, from the accidental union of a Protestant and Roman Catholic country, the conversion has not been so complete, both religions are not only tolerated, but established by law.

每一个国教教会的收入，除了从特定土地庄园上产生的收入以外，其他部分也应当视为国家的一般收入。不过，这却没用在国防上，而是用在与国防目的大相径庭的地方去了。比如什一税就是真正的土地税，如果这笔钱不用交给教会，那么土地所有者对国家的贡献就会更大。有人认为土地地租是国家紧急开支的唯一来源，有人认为只是主要来源。非常明显，教会拿走的土地地租越多，国家拿到的就越少。其他的一切情况都是这样，教会越富，君主和人民得到的就越少，国防力量就越差，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在一些新教国家，尤其是所有的瑞士新教州中，曾经属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收入，即什一税和教会所有地的收入被发现是如此丰厚，不但足以用来支付国教牧师们适当的薪俸，而且只要稍加补充甚至不加，国家的其他种种开支也都足够了。尤其是强大的伯尔尼州政府，只要把从前给教会的资金存起来就能达到数百万镑之巨，他们把其中一部分存入国库，另一部分拿去投资欧洲各个债务国的公债赚取利息，主要是投资法兰西及

大不列颠国家公债。伯尔尼或瑞士其他新教州各教会究竟耗去了多少国家的财富，我难以猜测。根据精确计算，1755年苏格兰教会所有牧师的收入，包括教会所有地及他们住宅的房租，如果进行合理的估算，也不过68,514镑1先令5又1/12便士。这收入很是平常，却要拿来维持944名牧师的体面生活，再加上修建或者修缮教堂以及牧师住房的费用，总数算起来，每年亦不会超过8万镑乃至85,000镑。不消说，苏格兰教会实在没有多少资金。可是，若论起统一多数人民的信仰，虔诚、秩序严正以及道德优秀，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最富裕的教会，都无法和苏格兰教会相较一二。一切良好的效果，不管是社会还是宗教方面一个国教教会能带来的，苏格兰教会都能做到。瑞士新教教会甚至做的更好，而他们的资金，不见得比苏格兰教会丰厚。在瑞士大部分的新教州中，没有谁敢公然宣称他不是新教教会的信徒。当然，如有人宣称自己信仰其他教会，根据法律规定，他就必须离开这个州。但是，这么严苛又富于压迫性的法律，在自由国家中本来就是不能施行的，能够施行的原因，还要归功于牧师们勤奋地事先改变了人民的信仰，让他们都信了国教。因此在瑞士的一些地方，由于新教国家与罗马天主教国家非常偶然的联合，宗教改革没有进行的那么完全，新教和天主教都不仅互相容忍，还都在法律中得到了认可。

The proper performance of every service seems to require, that its pay or recompense should be, as exactly as possible, proportioned to the nature of the service. If any service is very much underpaid, it is very apt to suffer by the meanness and incapacity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who are employed in it. If it is very much overpaid, it is apt to suffer, perhaps still more, by their negligence and idleness. A man of a large revenue, whatever may be his profession, thinks he ought to live like other men of large revenues; and to spend a great part of his time in festivity, in vanity, and in dissipation. But in a clergyman, this train of life not only consumes the time which ought to be employed in the duties of his function, but in the eyes of the common people, destroys

almost entirely that sanctity of character, which can alone enable him to perform those duties with proper weight and authority.

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是做得好，都应该给予相称的报酬。如果给的报酬太低，就只能招到品行恶劣、能力不足的人员；如果给的报酬太高，又会使他们玩忽职守、游手好闲。一个手上有大额收入的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都会觉得自己应该像其他拿到大收入的人一样，过上挥霍铺张的生活。但是对于一个牧师来说，这等生活方式，不仅要把本来应该用来履职的时间花费掉，而且在一般民众眼中，也会丧失牧师的神圣感，牧师在人民心中的分量和权威感必将下落。

Part IV. Of the Expense of Supporting the Dignity of the Sovereign

第四节、论维持君主尊严的费用

Over and above the expenses necessary for enabling the sovereign to perform his several duties, a certain expense is requisite for the support of his dignity. This expense varies, both with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improvement, and with the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一国君主，除了行使职责所必要的花费之外，还需要一定的费用来维持排场、保障尊严。这笔费用需要多少，要视不同的发展时期和不同的政府形态而定。

In an opulent and improved society, where all the different orders of people are growing every day more expensive in their houses, in their furniture, in their tables, in their dress, and in their

equipage; it cannot well be expected that the sovereign should alone hold out against the fashion. He naturally, therefore, or rather necessarily, becomes more expensive in all those different articles too. His dignity even seems to require that he should become so.

社会既已发达富裕，所有阶级的人民，每天都在建设更豪华的房子，购买更奢侈的家具、桌子，穿着更加华丽的衣裳，配备更奢侈的用具。此等大环境下，自然不能苛求君主逆潮流而行。君主必然也会，也必须在种种事项上更为靡费，这是君主维持尊严的必然要求。

As, in point of dignity, a monarch is more raised above his subjects than the chief magistrate of any republic is ever supposed to be above his fellow-citizens; so a greater expense is necessary for supporting that higher dignity. We naturally expect more splendour in the court of a king, than in the mansion-house of a doge or burgomaster.

就维持尊严来说，一个国家的君主，要君临于自己的臣民，就要比一般共和国的元首显得更加高高在上；这更高的威严，就需要更多的费用来维持。在人民眼里，君主的宫殿自然应当比总督或者市长的宅院更为华丽。

CONCLUSION

本章的结论

The expense of defending the society, and that of supporting the dignity of the chief magistrate, are both laid out for the general benefit of the whole society. It is reasonable, therefore, that they should be defrayed by the general contribu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all the different members contributing, as nearly as possible, in proportion to their respective abilities.

对社会进行防御，以及维持君主尊严的费用，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而开支的。自然这笔开支应当从整个社会所赚取的利润中出。所有不同的社会成员，都最好尽可能，根据能力大小而对这笔费用有所贡献。

The expens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oo, may no doubt be considered as laid ou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re is no impropriety, therefore, in its being defrayed by the general contribu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 persons, however, who gave occasion to this expense, are those who, by their injustice in one way or another, make it necessary to seek redress or protection from the courts of justice. The persons, again, most immediately benefited by this expense, are those whom the courts of justice either restore to their rights, or maintain in their rights. The expens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erefore, may very properly be defrayed by the particular contribution of one or other, or both, of those two different sets of persons, according as different occasions may require, that is, by the fees of court. It cannot be necessary to have recourse to the general contribu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except for the conviction of those criminals who have not themselves any estate or fund sufficient for paying those fees.

司法费用毫无疑问，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而花费的。这费用理应从全社会的一般税收里支出。不过，导致还要有这么一笔开销的，是社会中那些不公不义的人，他们的行径使得弱者要去法院寻求公正的裁决；而最直接地受到这笔开支的好处的人，是那些被法院恢复或是保护了权利的人。因此，最合适的做法，就是让这两方中的一方，或是双方，以法院手续费的形式，视情况缴费。除了无力支付费用的罪犯，其他费用都不必全社会来负担。

Those local or provincial expenses, of which the benefit is local or provincial (what is laid out, for example, upon the police of a particular town or district), ought to be defrayed by a local or provincial revenue, and ought to be no burden upon the general revenue of the society. It is unjust that the whole society should contribute towards an expense, of which the benefit is confined to a part of the society.

凡是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州为了自己好处的开支，比如某个特定地区的警察费用，则必须从本地的费用，而不是全社会的费用里开支，不然不公平。

The expense of maintaining good roads and communications is, no doubt, beneficial to the whole society, and may, therefore, without any injustice, be defrayed by the general contributions of the whole society. This expense, however, is most immediately and directly beneficial to those who travel or carry good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and to those who consume such goods. The turnpike tolls in England, and the duties called peages in other countries, lay it altogether upon those two different sets of people, and thereby discharge the general revenue of the society from a

very considerable burden.

用来维持良好路况和交通的费用是为了全社会而开支的，自然应当从全社会的收入里开支。不过，这笔费用最直接的受益人是往来贩运货物的商人，以及这些货物的消费者。所以，在英格兰，消费者和商人要承担道路通行税，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路捐以及桥捐，从而大大减轻全社会共同的负担。

The expense of the institutions for education and religious instruction, is likewise, no doubt, beneficial to the whole society, and may, therefore, without injustice, be defrayed by the general contribu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This expense, however, might, perhaps, with equal propriety, and even with some advantage, be defrayed altogether by those who receive the immediate benefit of such education and instruction, or by the voluntary contribution of those who think they have occasion for either the one or the other.

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教育宗教设施，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好处的，费用从社会的一般收入中开销，也很合乎情理。可是，应当支付，或者是更好的支付方法，是让那些直接受教育，或是因教育和宗教而得到好处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主动支付。

When the institutions, or public works, which are beneficial to the whole society, either cannot be maintained altogether, or are not maintained altogether, by the contribution of such particular members of the society as are most immediately benefited by them; the deficiency must, in most cases, be made up by the general contribu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 general revenue of the

society, over and above defraying the expense of defending the society, and of supporting the dignity of the chief magistrate, must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many particular branches of revenue. The sources of this general or public revenue, I shall endeavour to explain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

为了全社会的好处修建的的公共设施或土木工程，最好让直接受益人来维持，如果不能，就只好从社会总收入里开支补缺。因此，社会的一般收入，除了用来维持君王尊严，还要开支国防费用，最后还要补足一些没有足够的特别收入。一般收入，或说是公共收入，其源泉何来，我将在接下来的一章详细阐述。

Chapter II. Of the Sources of the General or Public Revenue of the Society

第二章、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

The revenue which must defray, not only the expense of defending the society and of supporting the dignity of the chief magistrate, but all the other necessary expenses of government, for whic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has not provided any particular revenue may be drawn, either, first, from some fund which peculiarly belongs to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and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the revenue of the people; or, secondly, from the revenue of the people.

国防费用，君主维持尊严的费用，乃至收入源泉不明的不得不出的政府开支，统统属于国家开支。这些费用的开支，有两个来源：第一，专属于君主或者国家，不影响人民收入的来源；第二，人民的收

入。

Part I. Of the Funds, or Sources, of Revenue, which may peculiarly belong to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第一节、君主或国家的专属收入来源

The funds, or sources, of revenue, which may peculiarly belong to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must consist, either in stock, or in land.

专属于某位君主或国家的资源或是收入来源，包括资产和土地。

The sovereign, like, any other owner of stock, may derive a revenue from it, either by employing it himself, or by lending it. His revenue is, in the one case, profit, in the other interest.

与其他资产所有人相同，君主也有两种从财产中取得收入的方式，一是亲自使用这笔财产，二是出贷给他人。前一种方式的收入是利润，后一种方式的收入是利息。

The revenue of a Tartar or Arabian chief consists in profit. It arises principally from the milk and increase of his own herds and flocks, of which he himself superintends the management, and is the principal shepherd or herdsman of his own horde or tribe. It is, however, in this earliest and rudest state of civil government only, that profit has ever made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 public revenue of

a monarchical state.

鞑靼或阿拉伯酋长的收入全部取自利润，他们自身是统治集团中或者部落中最大的畜牧人，从自己牲畜的养殖管理和乳汁中获取收入。不过，只有政治形态发展最初，才是以利润作为君主国家主要收入的。

Small republics have sometimes derived a considerable revenue from the profit of mercantile projects. The republic of Hamburg is said to do so from the profits of a public wine-cellar and apothecary's shop. The state cannot be very great, of which the sovereign has leisure to carry on the trade of a wine-merchant or an apothecary. The profit of a public bank has been a source of revenue to more considerable states. It has been so, not only to Hamburg, but to Venice and Amsterdam. A revenue of this kind has even by some people been thought not below the attention of so great an empire as that of Great Britain. Reckoning the ordinary dividend of the Bank of England at five and a-half per cent., and its capital at ten millions seven hundred and eighty thousand pounds, the net annual profit, after paying the expense of management, must amount, it is said, to five hundred and ninety-two thousand nine hundred pounds. Government, it is pretended, could borrow this capital at three per cent. interest, and, by tak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bank into its own hands, might make a clear profit of two hundred and sixty-nine thousand five hundred pounds a-year. The orderly, vigilant, and parsimonious administration of such aristocracies as those of Venice and Amsterdam, is extremely proper, it appears from experie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a mercantile project of this kind. But whether such a government as that of England, which, whatever may be its virtues, has never been

famous for good economy; which, in time of peace, has generally conducted itself with the slothful and negligent profusion that is, perhaps, natural to monarchies; and, in time of war, has constantly acted with all the thoughtless extravagance that democracies are apt to fall into, could be safely trusted with the management of such a project, must at least be a good deal more doubtful.

小共和国多从商业经营中取得利润。据说，汉堡小共和国，主要从国营的酒窖还有药店中获取收入。自然，只有小国家的君主，才有此等余暇，去贩卖酒和药。对更大的国家来讲，更加主要的收入源泉，应当是来自于公立银行的利润。不但汉堡是如此，威尼斯及阿姆斯特丹也是同样的情形。许多人认为，就连不列颠这样大的一个帝国，也不能忽略这收入。英格兰银行的股息为5.5%，按资本10,780,000镑计算，去除营业费用之后的每年的纯利润达592,900镑以上。有人建议，如果政府把这项资本借过来，即使每年支付3%的利息，经过经营，每年也能拿到269,500镑的纯利润。这样的事业，须得有秩序、谨慎而又懂得节约的政府，比如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那种贵族统治下的政府；不过，像英格兰那样的政府，不管有何种优点，精打细算肯定不是其中的一项。这在君主来说，懒散和怠惰几乎是通病。而战争时期，总是像其他的民主国家一样，毫无规划，任意浪费。这样的经营管理是否能让这样的政府来做，还是令人怀疑的。

The post-office is properly a mercantile project. The government advances the expense of establishing the different offices, and of buying or hiring the necessary horses or carriages, and is repaid, with a large profit, by the duties upon what is carried. It is, perhaps, the only mercantile project which has been successfully managed by, I believe, every sort of government. The capital to be advanced is not very considerable. There is no mystery in the business. The returns are not only certain but immediate.

邮政业基本上可以看作一种商业。政府事前要垫付建设邮政设施的资本，购买或是雇佣必要的马匹和马车，很快，获得的巨大利润，就能够偿付垫款，还额外多出许多利润。恐怕政府能够成功经营的商业，在我看来，就只有这类了，垫付资本不必太多，也没有特别的经营技巧，回报不仅高额，而且固定而迅速。

Princes, however, have frequently engaged in many other mercantile projects, and have been willing, like private persons, to mend their fortunes, by becoming adventurers in the common branches of trade. They have scarce ever succeeded. The profusion with which the affairs of princes are always managed, renders it almost impossible that they should. The agents of a prince regard the wealth of their master as inexhaustible; are careless at what price they buy, are careless at what price they sell, are careless at what expense they transport his good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Those agents frequently live with the profusion of princes; and sometimes, too, in spite of that profusion, and by a proper method of making up their accounts, acquire the fortunes of princes. It was thus, as we are told by Machiavel, that the agents of Lorenzo of Medicis, not a prince of mean abilities, carried on his trade.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was several times obliged to pay the debt into which their extravagance had involved him. He found it convenient, accordingly to give up the business of merchant, the business to which his family had originally owed their fortune, and, in the latter part of his life, to employ both what remained of that fortune, and the revenue of the state, of which he had the disposal, in projects and expenses more suitable to his station.

但是，在其他的商业行业中，也常常能看到各国君主的身影，正

如普通人一般，为了改善个人收入状况，也要在商业行当里冒险，不过君主们鲜有成功者。让君主来经营业务的时候，他们难免会浪费。代理人们早就习惯了君主财富的无穷无尽，没有为主人节约财富的意识；他们无所谓进货价格，也不在乎以什么价格卖出，运费几何，统统不在意。这些代理人和他们的主人一样，过惯了奢侈的日子；并且，若有浪费，还有办法做假账，从君主那里窃取财产。据马基雅弗利说，麦迪西的洛伦素并非昏君，而是他的代理人经营商业，往往不善。弗洛伦斯共和国甚至被迫多次偿还代理人挥霍导致的亏空。于是，他放弃了曾经让他的家庭挣得财富的商业，在后半生，他把剩余的财产，还有可供他支配的国家收入，投入在了更适合君主经营的事业上。

No two characters seem more inconsistent than those of trader and sovereign. If the trading spirit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renders them very bad sovereigns, the spirit of sovereignty seems to have rendered them equally bad traders. While they were traders only, they managed their trade successfully, and were able to pay from their profits a moderate dividend to the proprietors of their stock. Since they became sovereigns, with a revenue which, it is said, was originally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sterling, they have been obliged to beg extraordinary assistance of government, in order to avoid immediate bankruptcy. In their former situation, their servants in India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the clerks of merchants; in their present situation, those servants consider themselves as the ministers of sovereigns.

再没有比商人和君主这两种身份更不相容的了。如果说，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精神毁坏了君主的性格，君主精神也让商人变得糟糕当东印度公司仅仅是一家商业公司的时候，经营商业是很成功的，还有能

力把不错的利润分给股东们。但自从东印度公司成为了当地的统治者，虽说每年的收入在300万以上，还不得不要求政府给他们额外的援助，以防止他们立刻破产。这是因为，作为商业公司的东印度公司，其员工觉得自己是公司职员，现在却觉得自己是君主的大臣。

A state may sometimes derive some part of its public revenue from the interest of money, as well as from the profits of stock. If it has amassed a treasure, it may lend a part of that treasure, either to foreign states, or to its own subjects.

一个国家，有时候会从货币利息或是资本利润中赚取一部分收入。如果一个国家有一笔财富，那这个国家就可以把这财富的一部分，借贷给外国或本国的人民。

The canton of Berne derives a considerable revenue by lending a part of its treasure to foreign states, that is, by placing it in the public funds of the different indebted nations of Europe, chiefly in those of France and England. The security of this revenue must depend, first, upon the security of the funds in which it is placed, or upon the good faith of the government which has the management of them; and, secondly, upon the certainty or probability of the continuance of peace with the debtor nation. In the case of a war, the very first act of hostility on the part of the debtor nation might be the forfeiture of the funds of its creditor. This policy of lending money to foreign states is, so far as I know peculiar to the canton of Berne.

伯尔尼联邦把一大部分本国财富借贷到国外，作为各个欧洲债务

国（主要是英法两国）的公债，从而拿到了一大笔收入。这收入是否稳定，一要看这笔资金投放的位置如何，要看管理资金的政府信用如何；二要看与债务国能有多大的可能性，保持长期的和平。战争爆发的时候，债务国最先采取的敌对行为就是没收债权国公债。以货币贷与外国，据我所知，那是伯尔尼联邦特有的政策。

The city of Hamburg has established a sort of public pawn-shop, which lends money to the subjects of the state, upon pledges, at six per cent interest. This pawn-shop, or Lombard, as it is called, affords a revenue, it is pretended, to the state, of a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crowns, which, at four and sixpence the crown, amounts to £33,750 sterling.

汉堡建立起一种公立的当铺，如果人民来典当，就借款给人民，收利息6%。这类当铺给国家带来的收入，算起来得有15万克朗，以每克朗4先令6便士计算，相当于英币33,750镑。

The government of Pennsylvania, without amassing any treasure, invented a method of lending, not money, indeed, but what is equivalent to money, to its subjects. By advancing to private people, at interest, and upon land security to double the value, paper bills of credit, to be redeemed fifteen years after their date; and, in the meantime, made transferable from hand to hand, like banknotes, and declared by act of assembly to be a legal tender in all payments from one inhabitant of the province to another, it raised a moderate revenue, which went a considerable way towards defraying an annual expense of about £4,500, the whole ordinary expense of that frugal and orderly government. The success of an expedient of this kind must have depended upon thre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first, upon the demand for some other instrument of commerce, besides gold and silver money, or upon the demand for such a quantity of consumable stock as could not be had without sending abroa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gold and silver money, in order to purchase it; secondly, upon the good credit of the government which made use of this expedient; and, thirdly, upon the moderation with which it was used, the whole value of the paper bills of credit never exceeding that of the gold and silver money which would have been necessary for carrying on their circulation, had there been no paper bills of credit. The same expedient was, upon different occasions, adopted by several other American colonies; but, from want of this moderation, it produced,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much more disorder than conveniency.

宾夕法尼亚政府虽然没积累起多少财富，却发明了新的借贷方法，那就是交给人民货币等价的信用券，而不是货币。而且这种证券的偿还期限为15年。而且在偿还给政府之前，这证券如同现金一样，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而且议会法律宣布这种证券为本州所有人民的法定货币。人民如果想借证券，除了利息，还要支付两倍于这证券价值的土地，来担保自己的借贷。节俭而有秩序的宾夕法尼亚政府，每年不过花费4,500镑的经常开支；这种证券借贷法的成功，能帮助政府支付其费用。衡量这种策略效果如何，要看以下的三条标准：第一，除了用真金白银外，有多少货物需要通过其他的商业手段来购买；第二，采取这策略的政府信用如何；第三，这种证券的价值总额，不能超过金银货币的价值总额，所以还要看证券发行是否合度。这样的证券，曾经在美洲的一些殖民地发行过，但是由于发行过度，带来的麻烦远远多于便利。

The unstable and perishable nature of stock and credit, however, renders them unfit to be trusted to as the principal funds

of that sure, steady, and permanent revenue, which can alone give security and dignity to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of no great nation, that was advanced beyond the shepherd state, seems ever to have derived the greater part of its public revenue from such sources.

资本和信用的性质都是缺乏稳定性，容易断流。这样的收入，不适合作为政府的主要资金来源。只有确定的、稳定的、永恒的收入，才足以保障政府的安全，维持政府的尊严。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已经不处于游牧阶段的大国，会把这种不稳定的收入作为公共收入的主要来源。

Land is a fund of more stable and permanent nature; and the rent of public lands, accordingly, has been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the public revenue of many a great nation that was much advanced beyond the shepherd state. From the produce or rent of the public lands, the ancient republics of Greece and Italy derived for a long time the greater part of that revenue which defrayed the necessary expenses of the commonwealth. The rent of the crown lands constituted for a long tim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revenue of the ancient sovereigns of Europe.

土地这种资源具有稳定而恒久的性质。只要已经过了游牧阶段，大国都愿意把地租作为主要的收入源泉。古代希腊及意大利各共和国就是如此。国家大部分的必要费用，都是从地租而来，或者从国有土地的产物而来。而且王室领地的地租，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构成了欧洲君主收入的大部分。

War, and the preparation for war, are the two circumstances which, in modern times, occasio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necessary expense of all great states. But in the ancient republics of Greece and Italy, every citizen was a soldier, and both served, and prepared himself for service, at his own expense. Neither of those two circumstances, therefore, could occasion any very considerable expense to the state. The rent of a very moderate landed estate might be fully sufficient for defraying all the other necessary expenses of government.

在近代，战争及准备战争在一国的必要开支中占了一大部分。但是在古希腊及古代意大利各共和国，每个市民同时也是兵士，服役和准备服役时都是费用自筹的，国家在这项事务上不需要开支。所以，即便地租不多，都大大足以支付所有政府的必要支出。

In the ancient monarchies of Europe,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time sufficiently prepared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for war; and when they took the field, they were, by the condition of their feudal tenures, to be maintained either at their own expense, or at that of their immediate lords, without bringing any new charge upon the sovereign. The other expenses of government we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very moder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t has been shown, instead of being a cause of expense was a source of revenue. The labour of the country people, for three days before, and for three days after, harvest, was thought a fund sufficient for making and maintaining all the bridges, highways, and other public works, which the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was supposed to require. In those days the principal expense of the sovereign seems to have consisted in the maintenance of his own family and household. The officers of his household, accordingly,

were then the great officers of state. The lord treasurer received his rents. The lord steward and lord chamberlain looked after the expense of his family. The care of his stables was committed to the lord constable and the lord marshal. His houses were all built in the form of castles, and seem to have been the principal fortresses which he possessed. The keepers of those houses or castles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sort of military governors. They seem to have been the only military officers whom it was necessary to maintain in time of peace.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rent of a great landed estate might, upon ordinary occasions, very well defray all the necessary expenses of government.

在欧洲古代君主国中，当时的风气尚武，人民都能随时准备投入战争；一旦应征，依照封建的租地条件，他们或是自己承担自己的费用，或是由自己的直接领主出资，君主无须额外出资在其他方面，政府需要支付的也极为有限。而司法方面，正如我之前曾经阐述过的，不但不要开支，反而是收入的来源。乡下人民在每年收获前及收获后，各提供三日劳动；国内商业所需要的桥梁建造，土木工程，都能由此建造。君主主要在维持家庭和宫廷上花费一些钱财。君主的宫廷官吏即为国家的大官。户部卿负责为君主收地租，宫内卿及内务卿掌管皇室的出纳费，君主的厩舍则由警卫卿和部署卿分别管理。国王居住的都是城堡，就像要塞一样，由类似于卫戍总督的人帮助守护。和平时期，君主只需要出资维持这些武官的生活就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大块所有地的地租，就足以维持所有政府的必要开支。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ivilised monarchies of Europe, the rent of all the lands in the country, managed as they probably would be, if they all belonged to one proprietor, would scarce, perhaps, amount to the ordinary revenue which they levy upon the people even in peaceable times. The

ordinary revenue of Great Britain, for example, including not only what is necessary for defraying the current expense of the year, but for paying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debts, and for sinking a part of the capital of those debts, amounts to upwards of ten millions a-year. But the land tax, at four shillings in the pound, falls short of two millions a-year. This land tax, as it is called however, is supposed to be one-fifth, not only of the rent of all the land, but of that of all the houses, and of the interest of all the capital stock of Great Britain, that part of it only excepted which is either lent to the public, or employed as farming stock in the cultivation of land. A very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produce of this tax arises from the rent of houses and the interest of capital stock. The land tax of the city of London, for example, at four shillings in the pound, amounts to £123,399: 6: 7; that of the city of Westminster to £63,092: 1: 5; that of the palaces of Whitehall and St. James's, to £30,754: 6: 3.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the land tax is, in the same manner, assessed upon all the other cities and towns corporate in the kingdom; and arises almost altogether, either from the rent of houses, or from what is supposed to be the interest of trading and capital stock.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ion, therefore, by which Great Britain is rated to the land tax, the whole mass of revenue arising from the rent of all the lands, from that of all the houses, and from the interest of all the capital stock, that part of it only excepted which is either lent to the public, or employed in the cultivation of land, does not exceed ten million sterling a-year, the ordinary revenue which government levies upon the people, even in peaceable times. The estimation by which Great Britain is rated to the land tax is, no doubt, taking the whole kingdom at an average, very much below the real value; though in several particular counties and districts it is said to be nearly equal to that value. The rent of the lands alone, exclusive of that of houses and of the interest of stock, has by many people been estimated at twenty million; an estimation made in a

great measure at random, and which, I apprehend, is as likely to be above as below the truth. But if the lands of Great Britain,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ir cultivation, do not afford a rent of more than twenty millions a-year, they could not well afford the half, most probably not the fourth part of that rent, if they all belonged to a single proprietor, and were put under the negligent, expensive, and oppressive management of his factors and agents. The crown lands of Great Britain do not at present afford the fourth part of the rent which could probably be drawn from them if they were the property of private persons. If the crown lands were more extensive, it is probable, they would be still worse managed.

对于大多数欧洲君主国现在的情况而言，全国所有土地的地租，全部归一个人管理的话，肯定收取不到像现在的国家从人民身上收到的租金额度。例如，英国平常的收入，经常开支、公款利息以及公债偿还，全加起来每年达1,000万镑以上。然而，即便每镑征4先令税，所收土地税也不到200万镑。按照计划，这土地税不仅要包括所有征得的土地地租的1/5，还要包括从所有房租、资本利息中征收的1/5，免征此税的资本只放贷于国家的及用于耕作的部分。这土地税大部分源自房租及资本利息。例如，以每镑征4先令计算，伦敦市的土地税共达123,399镑6先令7便士；威斯敏斯特市共达63,092镑1先令5便士；沃特赫尔及圣詹姆斯两宫殿共达30,754镑6先令3便士。按照同样的方式，这土地税的一部分征收于王国内的各个市镇，以房租、商业利息和借贷资本利息为基础。总之，英国值五抽一的土地税加起来不到200万镑，那就说明，所有的土地租金，房屋租金和其他资本所生出的利息总额度，不会超过1,000万镑。也就是说，并不到平时英国从人们身上征收到的金额。英国为了征收土地税，对各种收入进行了估计，这估计虽然在个别几个州区是准确的，从全国的大致情况看，和实际的收入情况相差甚远。据很多人估计，仅仅是土地地租，不把房租和资本的利息算在内，每年的总额都达到了2,000万镑。这样的估计，在我看来实在过高。但是，如果根据现在的土地耕种状况，英

国全部土地地租都不能超过2,000万镑，那么这土地若是全部归一人所有，让他那懈怠浪费而又专横的代理人这样管理，那能提供出来的土地地租，不要说2,000万镑的一半，恐怕一半的一半也提供不了。今天的英国王室领地能够缴纳的地租，还不及私人情况下的1/4。如果王室领地增加，那经营的情形恐怕更加糟糕。

The revenue which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derives from land is, in proportion, not to the rent, but to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of every country, if we except what is reserved for seed, is either annually consumed by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or exchanged for something else that is consumed by them. Whatever keeps down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below what it would otherwise rise to, keeps down the revenue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still more than it does that of the proprietors of land. The rent of land, that portion of the produce which belongs to the proprietors, is scarce anywhere in Great Britain supposed to be more than a third part of the whole produce. If the land which, in one state of cultivation, affords a rent of ten million sterling a-year, would in another afford a rent of twenty millions; the rent being, in both cases, supposed a third part of the produce, the revenue of the proprietors would be less than it otherwise might be, by ten millions a-year only; but the revenue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would be less than it otherwise might be, by thirty millions a-year, deducting only what would be necessary for seed. The 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 would be less by the number of people which thirty millions a-year, deducting always the seed, could maintain, according to the particular mode of living, and expense which might take place in the different ranks of men, among whom the remainder was distributed.

人民从土地中取得的收入，是按照土地地租比例而来，而不是土地生产物而来。除去存下来用于播种的种子，一个国家内，全部的土地生产物或是被人们逐年消费了，或是拿去换了其他东西。无论是何原因使土地生产物增加到本应达到的量，人民因此受到的损失总会比地主更大。英国任何地方的土地地租，即生产物中归属地主的部分，几乎都没有达到总生产物的1/3以上。如果在一种耕作状态下，一年只缴纳1,000万镑地租的土地一经改良，每年可带来2,000镑地租，假设两种情况下，地租都是相当于生产物的1/3，那么在前一种情况下，地主只是损失1,000镑，而人民收入却要因此损失3,000万镑；不过是播种的种子没有算在内。一国土地生产物若有3,000万镑减损，人口就也要以这3,000万镑减去种子价值后的余额，根据各阶级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所能供给的人数相应减少。

Though there is not at present in Europe, any civilised state of any kind which derives the greater part of its public revenue from the rent of lands which are the property of the state; yet, in all the great monarchies of Europe, there are still many large tracts of land which belong to the crown. They are generally forest, and sometimes forests where, after travelling several miles, you will scarce find a single tree; a mere waste and loss of country, in respect both of produce and population. In every great monarchy of Europe, the sale of the crown lands would produce a very large sum of money, which, if applied to the payment of the public debts, would deliver from mortgage a much greater revenue than any which those lands have ever afforded to the crown. In countries where lands, improved and cultivated very highly, and yielding, at the time of sale, as great a rent as can easily be got from them, commonly sell at thirty years purchase; the unimproved, uncultivated, and low-rented crown lands, might well be expected to sell at forty, fifty, or sixty years purchase. The crown might immediately enjoy the revenue which this great price would redeem

from mortgage. In the course of a few years, it would probably enjoy another revenue. When the crown lands had become private property, they would, in the course of a few years, become well improved and well cultivated. The increase of their produce would increase the 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 by augmenting the revenue and consumption of the people. But the revenue which the crown derives from the duties or customs and excise, would necessarily increase with the revenue and consumption of the people.

如今，已经没有哪一个现代的欧洲国家把国有土地地租，作为公共收入的主要来源了，但是欧洲的大君主国，仍然有大片大片的领地，归于君主所有。王室领地大多是林囿，可是这林囿，有时候即便是穿行几英里，你也找不到一棵树木。这对于国家生产物和人口来说，都是赤裸裸地造成了损失。在任何一个欧洲大君主国，只要君主肯贩卖领地，就能获得大笔收入；如果再把这收入用于清偿国债，收回担保物，那君主将获得从未有过的最高收入。在有些国家，土地改良和耕种状况都很不错，这样的土地地租能收取的很高，出售的时候，价格相当于30倍的年地租。王室领地，没有经过改良种植，地租很少，而售价却相当于40倍、50倍乃至60倍地租。君主用这样高的价格赎回国债的担保品，马上就能享受担保品收入，而且不要几年，还有其他收入。这是因为当原属于王室的领地进入私人手中时，新的主人为了利益考虑，不需要几年就会把土地加以良好的改良和种植。如果生产物这样增加，那么人口也要跟着增加，人民收入和消费也要增加。以此推断，君主也能从关税和国内货物税得到更多的收入。

The revenue which, in any civilised monarchy, the crown derives from the crown lands, though it appears to cost nothing to individuals, in reality costs more to the society than perhaps any other equal revenue which the crown enjoys. It would, in all cases, be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society, to replace this revenue to the

crown by some other equal revenue, and to divide the lands among the people, which could not well be done better, perhaps, than by exposing them to public sale.

文明国君主看起来是从王室的领地中获取收入的，对人民无害，但这其实是君主享受的各项同等收入里，最有损全社会的。如果要考虑全社会的利益，就最好拍卖了君主领地分给人民，原本君主从自身领地上获取的收入，也可以找到替代收入，比如人民提供的其他收入。

Lands, for the purposes of pleasure and magnificence, parks, gardens, public walks, etc. possessions which are everywhere considered as causes of expense, not as sources of revenue, seem to be the only lands which, in a great and civilised monarchy, ought to belong to the crown.

土地如果是用作赏玩娱乐，比如做公园、花园、公共的散步场所，不但从这上面得不到收入，反而要倒贴钱进行维护。我认为，在大的文明君主国里面，这样的土地是唯一应当归郡主所有的土地。

Public stock and public lands, therefore, the two sources of revenue which may peculiarly belong to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being both improper and insufficient funds for defraying the necessary expense of any great and civilised state; it remains that this expense must, the greater part of it, be defrayed by taxes of one kind or another; the people contributing a part of their own private revenue, in order to make up a public revenue to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因此，作为君主或是国家独有的两项收入源泉的公共资本和公共土地，既不合适，也不足以维持大的文明国家的必要开支。那么，就只有从税收中获得这必须开支的来源，也就是说，人民要拿出个人收入的一部分给君主或者国家，当作公共收入。

Part II. Of Taxes

第二节、论赋税

The private revenue of individuals, it has been shown in the first book of this Inquiry, arises, ultimately from three different sources; Rent, Profit, and Wages. Every tax must finally be paid from someone or other of those three different sources of revenue, or from all of them indifferently. I shall endeavour to give the best account I can, first, of those taxes which, it is intended should fall upon rent; secondly, of those which, it is intended should fall upon profit; thirdly, of those which, it is intended should fall upon wages; and fourthly, of those which, it is intended should fall indifferently upon all those three different sources of private revenue. The particular consideration of each of these four different sorts of taxes will divide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resent chapter into four articles, three of which will require several other subdivisions. Many of those taxes, it will appear from the following review, are not finally paid from the fund, or source of revenue, upon which it was intended they should fall.

个人收入的源泉，我在本书的第一篇已经阐述过，包括地租、利润与工资。每一种赋税，究其根本，肯定是这三大源泉中的某种，或者是无差别地由这三种源泉一同支付。因此，我尽力要对以下几点进

行阐述：第一，应当加在地租上的税款；第二，应当加在利润上的税款；第三，应当在工资上加的税；第四，应当无差别地加在这三项收入源泉上的税款。由于分别考究此四种赋税，本章第二节要分为四项，其中有三项还得细分为几个小点。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些赋税本来是打算从某基金或某项收入中征收的，结果却没有从那里支出，所以一定要细致地讨论一番。

Before I enter upon the examination of particular taxes, it is necessary to premise the four following maxims with regard to taxes in general.

在我进行接下来的特殊赋税讨论之前，我首先要列出关于一般赋税的四项原则：

1．The subjects of every state ought to contribute towards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as nearly as possible, in proportion to their respective abilities; that is, in proportion to the revenue which they respectively enjoy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state. The expense of government to the individuals of a great nation, is like the expense of management to the joint tenants of a great estate, who are all obliged to contribute in proportion to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s in the estate. In the observation or neglect of this maxim, consists what is called the equality or inequality of taxation. Every tax, it must be observed once for all, which falls finally upon one only of the three sorts of revenue above mentioned, is necessarily unequal, in so far as it does not affect the other two. In the following examination of different taxes, I shall seldom take much further notice of this sort of inequality; but shall, in most cases, confine my observations to that inequality which is occasioned by a

particular tax falling unequally even upon that particular sort of private revenue which is affected by it.

一、一个国家的公民，为了支持政府，要根据各自的能力，按照一定的比例，上交国税。一个大国，国家中的个人应当缴纳维持政府费用，就像一个大地产的租地者，应当根据自己在土地上的收益，按照比例缴纳管理费。赋税是否平等，在于是否尊重这些原则。需要注意的是，赋税要平等，就要从地租、利润、工资中平等地征收，而不能只对一种进行征收。关于这平等问题，我就讲这一次，此后不再多言。

2 . The tax which each individual is bound to pay, ought to be certain and not arbitrary. The time of payment, the manner of payment, the quantity to be paid, ought all to be clear and plain to the contributor, and to every other person. Where it is otherwise, every person subject to the tax is put more or less in the power of the tax-gatherer, who can either aggravate the tax upon any obnoxious contributor, or extort, by the terror of such aggravation, some present or perquisite to himself. The uncertainty of taxation encourages the insolence, and favours the corruption, of an order of men who are naturally unpopular, even where they are neither insolent nor corrupt. The certainty of what each individual ought to pay is, in taxation, a matter of so great importance, that a very considerable degree of inequality, it appears, I believe,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ll nations, is not near so great an evil as a very small degree of uncertainty.

二、各个国民应当缴纳多少赋税，应当有一个固定的税额，不能随意规定。缴纳清楚的期限、方式以及数额，事先都应该让所有纳税

者还有其他人了解清楚。不然的话，每个纳税人都不免会要被收税官克扣。这些收税官，也许会趁机多收税款，或者威胁要增加赋税，趁机强迫国民给他们送礼或者贿赂他们。如果赋税不能够固定下来，原本并不专横腐败的收税官，在利益诱使下，也会专横腐败，更何况他们这些人，本来就不那么受人欢迎。根据各国的实践经验，在我看来，严重的赋税不平等，都比不上税额不固定带来的危害巨大。

3 . Every tax ought to be levied at the time, or in the manner, in which it is most likely to be convenient for the contributor to pay it. A tax upon the rent of land or of houses, payable at the same term at which such rents are usually paid, is levied at the time when it is most likely to be convenient for the contributor to pay; or when he is most likely to have wherewithall to pay. Taxes upon such consumable goods as are articles of luxury, are all finally paid by the consumer, and generally in a manner that is very convenient for him. He pays them by little and little, as he has occasion to buy the goods. As he is at liberty too, either to buy or not to buy, as he pleases, it must be his own fault if he ever suffers any considerable inconveniency from such taxes.

三、各种赋税规定征收时间和方式的时候，应以最能方便纳税人为标准。征收房租税和地租税的时候，最好和缴纳房租地租的时间同步，因为纳税者这个时候是最拿得出钱来的。而奢侈品之类的消费税，最终还是由消费者来出，所以交税的方法也很方便。消费者每次购物都要缴纳消费税。每购物一次就要缴纳一些税款。购物与否是消费者的自由，交税不便的坏处，只能由自己来承担。

4 . Every tax ought to be so contrived, as both to take out and to keep out of the pockets of the people as little as possible, over

and above what it brings into the public treasury of the state. A tax may either take out or keep out of the pockets of the people a great deal more than it brings into the public treasury, in the four following ways. First, the levying of it may require a great number of officers, whose salaries may eat up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roduce of the tax, and whose perquisites may impose another additional tax upon the people. Secondly, it may obstruct the industry of the people, and discourage them from applying to certain branches of business which might give maintenance and employment to great multitudes. While it obliges the people to pay, it may thus diminish, or perhaps destroy, some of the funds which might enable them more easily to do so. Thirdly, by the forfeitures and other penalties which those unfortunate individuals incur, who attempt unsuccessfully to evade the tax, it may frequently ruin them, and thereby put an end to the benefit which the community might have received from the employment of their capitals. An injudicious tax offers a great temptation to smuggling. But the penalties of smuggling must arise in proportion to the temptation. The law, contrary to all the ordinary principles of justice, first creates the temptation, and then punishes those who yield to it; and it commonly enhances the punishment, too, in proportion to the very circumstance which ought certainly to alleviate it, the temptation to commit the crime. Fourthly, by subjecting the people to the frequent visits and the odious examination of the tax-gatherers, it may expose them to much unnecessary trouble, vexation, and oppression; and though vexation is not, strictly speaking, expense, it is certainly equivalent to the expense at which every man would be willing to redeem himself from it. It is in some one or other of these four different ways, that taxes are frequently so much more burdensome to the people than they are beneficial to the sovereign.

四、征收一切赋税，都要让人民付出的税款等于国家收入的税款。如果人民付出的多于国家获得的，那么原因有以下四条：第一，征收赋税所用的官吏人数过多，不仅要拿出一大笔税收作为他们的薪水，他们自己还要另外勒索人民，增加人民负担。第二，赋税征收损害了人民的积极性，让人们不再愿意从事给其他人提供工作机会的事业。由于要缴纳税款，也不再有人筹备基金，从事这些事业。第三，对于逃税没有成功的人，惩罚办法常常是财产充公，社会就不再能得到这部分资本产生的利益。逃税的一大原因就是赋税不当，而逃税的惩罚又加剧了不当征税。并且对逃税人的定罪，还要根据诱惑的大小而来，这样的定罪陷害人民，违反正义原则。第四，收税的官吏频繁上门对人民进行查访，让纳税者暴露在本不必要承受的麻烦、烦恼和压迫之中。尽管这烦恼不是金钱损失上的，但也让纳税人头疼不已。不仅不能给国家带来收入，而只是给人们增加困扰。

The evident justice and utility of the foregoing maxims have recommended them, more or less, to the attention of all nations. All nations have endeavoured, to the best of their judgment, to render their taxes as equal as they could contrive; as certain, as convenient to the contributor, both in the time and in the mode of payment, 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revenue which they brought to the prince, as little burdensome to the people. The following short review of some of the principal taxe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different ages and countries, will show, that the endeavours of all nations have not in this respect been equally successful.

以上四原则的道理和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原则，国家一般都会有所注意。这些国家，尽量让税赋公平，明确纳税的时间、方式，而且让纳税者感到便利。另外，这些国家也竭尽全力，保障纳税人在缴纳税款之外，不受其他压榨。但是，以下对各时代各国的主要赋税情况进行了叙述，说明各国的努力，并没有都取得成功。

ARTICLE I. - Taxes upon Rent - Taxes upon the Rent of Land.

第一条、地租税，即加在土地地租上的赋税

A tax upon the rent of land may either be imposed according to a certain canon, every district being valued at a curtain rent, which valuation is not afterwards to be altered; or it may be imposed in such a manner, as to vary with every variation in the real rent of the land, and to rise or fall with the improvement or declension of its cultivation.

土地地租上的税收，有两种征收方法：其一，按照一定的标准，给每个地区规定定额的地租，确定以后不再变更；其二，根据土地地租的实际额度，税收的额度也随之变化。

A land tax which, like that of Great Britain, is assessed upon each district according to a certain invariable canon, though it should be equal at the time of its first establishment, necessarily becomes unequal in process of time, according to the unequal degrees of improvement or neglect i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In England, the valuation, according to which the different counties and parishes were assessed to the land tax by the 4th of William and Mary, was very unequal even at its first establishment. This tax, therefore, so far offends against the first of the four maxims above mentioned. It is perfectly agreeable to the other three. It is perfectly certain. The time of payment for the tax,

being the same as that for the rent, is as convenient as it can be to the contributor. Though the landlord is, in all cases, the real contributor, the tax is commonly advanced by the tenant, to whom the landlord is obliged to allow it in the payment of the rent. This tax is levied by a much smaller number of officers than any other which affords nearly the same revenue. As the tax upon each district does not rise with the rise of the rent, the sovereign does not share in the profits of the landlord's improvements. Those improvements sometimes contribute, indeed, to the discharge of the other landlords of the district. But the aggravation of the tax, which this may sometimes occasion upon a particular estate, is always so very small, that it never can discourage those improvements, nor keep down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below what it would otherwise rise to. As it has no tendency to diminish the quantity, it can have none to raise the price of that produce. It does not obstruct the industry of the people; it subjects the landlord to no other inconveniency besides the unavoidable one of paying the tax.

英国采取的就是前一种方法。英国各地区，按照一个固定的标准，评定土地税。这固定的税收虽然在一开始是公平的，但由于每个地方耕作的质量良莠不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税收一定会走向不平等。英格兰由威廉及玛利第四年法令对各州各教区土地税的规定，在一开始就不公平。这样来看，这项赋税就违反了上面所提到的四项原则的第一条。不过，对于其他三项原则，它却是完全符合了。它是十分明确的。这项税的征收和缴纳时期是重合的。虽然在所有的情况下地主都是真正纳税的人，但是佃农却常常垫付税款。另外，和其他同等的税收相比，征收这项税并不需要太多的官吏。每个地区，税收的额度并不因为地租的上涨而调整，所以地主如果改良土地而得到的额外的利益，君主也不能享受。尽管某地的地主改良土地，会让这个地区其他地主破产，但是这只会在有限的程度上加重某些地区租税的负担，还不足以阻碍土地改良和正常生产。这样以来，就不会有人趋向

于减少生产量，也没有人想要提高生产物的价格。那么就不会阻碍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地主而言，就没有其他不便了。不过，纳税的不便还是不可避免的。

The advantage, however, which the landlord has derived from the invariable constancy of the valuation, by which all the lands of Great Britain are rated to the land-tax, has been principally owing to some circumstances altogether extraneous to the nature of the tax.

这恒久不变的土地税，无疑给英国的地主带来了好处。不过，这好处和赋税本身没有关系，主要是赋税之外的因素带来的好处。

It has been owing in part, to the great prosperity of almost every part of the country, the rents of almost all the estates of Great Britain having, since the time when this valuation was first established, been continually rising, and scarce any of them having fallen. The landlords, therefore, have almost all gain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ax which they would have paid,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rent of their estates, and that which they actually pay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valuation. Had the state of the country been different, had rents been gradually falling in consequence of the declension of cultivation, the landlords would almost all have lost this difference. In the state of things which has happened to take place since the revolution, the constancy of the valuation has been advantageous to the landlord and hurtful to the sovereign. In a different state of things it might have been advantageous to the sovereign and hurtful to the landlord.

英国各地的大大繁荣，以及持续增加少有下跌的土地地租，都要归功于英国评定了土地税，不过，这就使得目前应该交的地租高于从前评定的额度，所有的地主都从这里获得了好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地租随着耕作情况的恶化而减少，那么地主就赚不到这个差额了。自从英国革命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土地税如果恒久，就有利于地主，伤害君主利益；如果土地税是浮动的，那就有利于君主而损害地主利益了。

As the tax is made payable in money, so the valuation of the land is expressed in mone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valuation, the value of silver has been pretty uniform, and there has been no alteration in the standard of the coin, either as to weight or fineness. Had silver risen considerably in its value, as it seems to have done in the course of the two centuries which preceded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es of America, the constancy of the valuation might have proved very oppressive to the landlord. Had silver fallen considerably in its value, as it certainly did for about a century at least after the discovery of those mines, the same constancy of valuation would have reduced very much this branch of the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Had any considerable alteration been made in the standard of the money, either by sinking the same quantity of silver to a lower denomination, or by raising it to a higher; had an ounce of silver, for example, instead of being coined into five shillings and two pence, been coined either into pieces which bore so low a denomination as two shillings and seven pence, or into pieces which bore so high a one as ten shillings and four pence, it would, in the one case, have hurt the revenue of the proprietor, in the other that of the sovereign.

国家的税收是以货币的形式进行的，那么评估土地价格的时候，

也是以货币形式进行的。后来这个评价就没有过变动；铸币在重量和品质两方面的法定标准也没有变化。如果像在美洲的矿藏发现前的两个世纪那样，银价显著上涨，那么估价的稳定，将让地主非常吃亏。假如银价显著跌落，像发现美矿之后的一个世纪那样，那么估价的稳定将大大损害君主的收入。此外，如果货币的法定标准有了变动，同样的银量，提高或贬低其名义价格，比如，原本能铸造5先令2便士的银，现在铸造成2先令7便士，或者是10先令4便士，那么在后面这种情况下，收税的君主受到损害，在前面的情况下，纳税的地主要受到损害。

In circumstances, therefore,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ose which have actually taken place, this constancy of valuation might have been a very great inconveniency, either to the contributors, or to the commonwealth. In the course of ages such circumstances, however, must, at some time or other, happen. But though empires, like all the other works of men, have all hitherto proved mortal, yet every empire aims at immortality. Every constitution, therefore, which it is meant should be as permanent as the empire itself, ought to be convenient, not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only, but in all circumstances; or ought to be suited, not to those circumstances which are transitory, occasional, or accidental, but to those which are necessary and therefore always the same.

这样一来，在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的情况下，估价如太过于固定，不管是对纳税者还是国家，都造成了大大的不便。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发生种种情况。尽管帝国像其他一切人们创造出来的东西一样，必将走向消亡，但是这些帝国无一不在谋求万世永存。因此，帝国设立任何制度，都不仅仅着眼于在某些情形下适用，而是力求在所有情形下都适用。换句话说，制定的制度，不是为了一时应对特定偶然情况的，而是为了适于一切必然而不会变化的情形的。

A tax upon the rent of land which varies with every variation of the rent, or which rises and falls according to the improvement or neglect of cultivation, is recommended by that sect of men of letters in France who call themselves The Economists as the most equitable of all taxes. All taxes, they pretend, fall ultimately upon the rent of land, and ought therefore to be imposed equally upon the fund which must finally pay them. That all taxes ought to fall as equally as possible upon the fund which must finally pay them is certainly true. But without entering into the disagreeable discussion of the metaphysical arguments by which they support their very ingenious theory, it will sufficiently appear, from the following review, what are the taxes which fall finally upon the rent of the land, and what are those which fall finally upon some other fund.

土地税的征收随着地租的变动而变动，与土地耕作状况息息相关。曾经被法国自称是经济学派的学者建议，所有赋税都应当从土地地租中征得。因此，所有赋税加在它们最后的源泉——土地地租上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公平。但是，他们这样的学说，不免流于形而上学，太过抽象，没有讨论的意义。我们要看的是，究其根本，哪些地租落在了土地地租上，哪些又落在了其他资金上。

In the Venetian territory all the arable lands which are given in lease to farmers are taxed at a tenth of the rent. The leases are recorded in a public register which is kept by the officers of revenue in each province or district. When the proprietor cultivates his own lands, they are valued according to an equitable estimation, and he is allowed a deduction of one-fifth of the tax, so that for such lands he pays only eight instead of ten per cent of the supposed rent.

在威尼斯境内，一切以借贷的契约形式，借贷给农民的可耕种土地，都要收取相当于地租1/10的税。租地的契约，应该在公共登记用的账目上登记，这账目保存在每个省每个区的收税官那里。如果土地是土地主人自行耕种，那么税官进行估计后，还要减去1/5的税款。因此，对于土地所有者而言，要缴纳的土地赋税不是10%，而是8%了。

A land-tax of this kind is certainly more equal than the land-tax of England. It might not, perhaps, be altogether so certain, and the assessment of the tax might frequently occasion a good deal more trouble to the landlord. It might, too, be a good deal more expensive in the levying.

和英国相比，这种土地税确实是要公平多了。但是，它的税额并不确定，这就让地主很烦恼，因为这使得他们事实上要缴纳多得多的税款。

Such a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however, might perhaps be contrived as would, in a great measure, both prevent this uncertainty and moderate this expense.

可以设计一种制度，大幅度减少不确定性，降低费用。

The landlord and tenant, for example, might jointly be obliged to record their lease in a public register. Proper penalties might be enacted against concealing or misrepresenting any of the conditions; and if part of those penalties were to be paid to either of

the two parties who informed against and convicted the other of such concealment or misrepresentation, it would effectually deter them from combining together in order to defraud the public revenue. All the conditions of the lease might be sufficiently known from such a record.

比如，让地主和佃农的租约必须在公共的登记册上进行登记。如果某一方谎报或是不报，就要处罚金，并且将罚金奖励给告发者。这样，就能防止地主和佃农合伙骗取公共的收入，而且能够从这登记册上，获悉所有租约上的条件。

Some landlords, instead of raising the rent, take a fine for the renewal of the lease. This practice is in most cases the expedient of a spendthrift, who for a sum of ready money sells a future revenue of much greater value. It is in most cases, therefore, hurtful to the landlords. It is frequently hurtful to the tenant, and it is always hurtful to the community. It frequently takes from the tenant so great a part of his capital, and thereby diminishes so much his ability to cultivate the land, that he finds it more difficult to pay a small rent than it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to pay a great one. Whatever diminishes his ability to cultivate, necessarily keeps down, below what it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venue of the community. By rendering the tax upon such fines a good deal heavier than upon the ordinary rent, this hurtful practice might be discouraged, to the no small advantage of all the different parties concerned, of the landlord, of the tenant, of the sovereign, and of the whole community.

有些地主，在重新签订租约的时候，不是增加地租，而是续一些

租金就可以了。这样做其实是缺乏远见的。这样的行为，一般是因为太想要眼前的收入，而放弃更大的将来收入。不仅损害地主利益，还损害佃农利益。不过，无论是何种情况下，这样的行为都于国家不利。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佃农总是会耗费很多资本，这会大大损害耕作土地的能力。佃农会觉得，续租金提供较低的地租，比加付更高的地租还要来得困难。何况，土地税是国家收入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只要是让佃农的耕作能力降低，从而有损于土地税收入的事情，都对国家不利。总之，要求续租金，这样的行为是有害的。如果对这种续租金征收比普通地租更重的赋税，那么这样的行为就能够断绝了，而且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包括地主、佃农、君主和全社会都能得到好处。

Some leases prescribe to the tenant a certain mode of cultivation and a certain succession of crops during the whole continuance of the lease. This condition, which is generally the effect of the landlord's conceit of his own superior knowledge (a conceit in most cases very ill founded), ought always to be considered as an additional rent; as a rent in service instead of a rent in money. In order to discourage the practice, which is generally a foolish one, this species of rent might be valued rather high, and consequently taxed somewhat higher than common money rents.

有的租约甚至提前明确规定了种植的方法，轮种的时候种什么作物。如此规定都是地主自负，认为自己对于耕作的知识更为丰富导致的，实际上这是盲目的。受到了租契限制的佃农，事实上是以劳务而非货币的形式，提供了更高的地租。要制止这种愚昧无知的行径，就只有对这种劳务地租征收比货币地租更高的税。

Some landlords, instead of a rent in money, require a rent in kind, in corn, cattle, poultry, wine, oil, etc.; others, again, require a rent in service. Such rents are always more hurtful to the tenant than beneficial to the landlord. They either take more or keep more out of the pocket of the former than they put into that of the latter. In every country where they take place the tenants are poor and beggarly, pretty much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in which they take place. By valuing, in the same manner, such rents rather high, and consequently taxing them somewhat higher than common money rents, a practice which is hurtful to the whole community might perhaps be sufficiently discouraged.

有些地主不收货币地租，却要收谷物、牲口、酒类、油等实物地租。还有一些地主要求以劳动的方式偿付地租。这些地租危害佃农的程度，要高于造福地主的程度。佃农腰包里要出的钱，比地主得到的要多。这些地租的实行国家，佃农总是贫困的，实行越是严格，佃农越是贫弱不堪。这种行径对全社会都有害无益，如果能够对这种形式的地租课以重税，比货币地租收税更高，或许还可制止。

When the landlord chose to occupy himself a part of his own lands, the rent might be valued according to an equitable arbitration of the farmers and landlords in the neighbourhood, and a moderate abatement of the tax might be granted to him,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the Venetian territory, provided the rent of the lands which he occupied did not exceed a certain sum. It is of importance that the landlord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cultivate a part of his own land. His capital is generally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tenant, and with less skill he can frequently raise a greater produce. The landlord can afford to try experiments, and is generally disposed to do so. His unsuccessful experiments occasion only a

moderate loss to himself. His successful ones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and better cultiva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It might be of importance, however, that the abatement of the tax should encourage him to cultivate to a certain extent only. If the landlords shoul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be tempted to farm the whole of their own lands, the country (instead of sober and industrious tenants, who are bound by their own interest to cultivate as well as their capital and skill will allow them) would be filled with idle and profligate bailiffs, whose abusive management would soon degrade the cultivation and reduce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to the diminution, not only of the revenue of their masters, but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at of the whole society.

如果地主亲身耕种自己的一部分土地，那这块地当缴纳多少地租，可以让邻居农民或者其他地主来帮忙估计。如果这地租在规定的数额之内，可以按照威尼斯的办法，减去一些税额，以便于奖励地主自己耕种土地。地主的资本比起佃农总是要多的，即使耕种技术不及佃农，收获也不会少。而且地主还有财力进行试验。试验如果失败，受损有限；而一旦成功，对全国的耕作都大有好处。但是，通过减税鼓励地主自己耕种，也只能让他们耕种一部分土地。如果大部分地主受到引诱，去耕种自己所有的土地，那么全国到处都会是这种懒散而随意的地主管家。兢兢业业的佃农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在自己资本和技能范围内辛勤耕作，却被地主管家所代替。而地主管家那种靡费的管理经营方式，不需要多久，就会把耕地荒废得差不多，土地的年生产物也会减少。这不仅会导致地主收入受损，作为全社会最总要收入的一部分也要下跌。

Such a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might, perhaps, free a tax of this kind from any degree of uncertainty which could occasion either oppression or inconveniency of the contributor; and might at

the same time serve to introduce into the common management of land such a plan or policy as might contribute a good deal to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and good cultivation of the country.

施行上面那样的管理制度，从一方面说，或许让税收免于走向不固定，对纳税人带来可能的不便和压榨；另一方面来看，或许能够引进一种政策计划，能够对全国土地进行总体的改良，改善全国的耕作情况。

The expense of levying a land-tax which varied with every variation of the rent would no doubt be somewhat greater than that of levying one which was already rated according to a fixed valuation. Some additional expense would necessarily be incurred both by the different register offices which it would be proper to establish in the different districts of the country, and by the different valuations which might occasionally be made of the lands which the proprietor chose to occupy himself. The expense of all this, however, might be very moderate, and much below what is incurred in the levying of many other taxes which afford a very inconsiderable revenue in comparison of what might easily be drawn from a tax of this kind.

如果征收多少土地地租，是根据地租的变动而随时改变的，那么毫无疑问，比起不变的时候，要耗费更多的征收费用。这样的制度之下，只好在国家的各个地方设立登记机构。每当地主要自己耕作自己的土地时，就重新评估此地的地租。两种做法都要消耗更多费用。不过，这所有的费用都并不很多，和其他数额不如土地税，征收费用却高得多的税种比，这实在不算什么。

The discouragement which a variable land-tax of this kind might g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seems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ion which can be made to it. The landlord would certainly be less disposed to improve when the sovereign, who contributed nothing to the expense, was to share in the profit of the improvement. Even this objection might perhaps be obviated by allowing the landlord, before he began his improvement, to ascertai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officers of revenue, the actual value of his lands according to the equitable arbitration of a certain number of landlords and farmers in the neighbourhood, equally chosen by both parties, and by rating him according to this valuation for such a number of years as might be fully sufficient for his complete indemnification.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sovereign toward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and, from a regard to the increase of his own revenue, is one of the principal advantages proposed by this species of land-tax. The term, therefore, allowed for the indemnification of the landlord ought not to be a great deal longer than what was necessary for that purpose, lest the remoteness of the interest should discourage too much this attention. It had better, however, be somewhat too long than in any respect too short. No incitemen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sovereign can ever counterbalance the smallest discouragement to that of the landlord. The attention of the sovereign can be at best but a very general and vague consideration of what is likely to contribute to the better cultiva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dominions. The attention of the landlord is a particular and minute consideration of what is likely to be the most advantageous application of every inch of ground upon his estate. The principal attention of the sovereign ought to be to encourage, by every means in his power, the attention both of the landlord and of the farmer, by allowing both to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 in their own way and according to their own judgment; by giving to both the most perfect security that they

shall enjoy the full recompense of their own industry; and by procuring to both the most extensive market for every part of their produce, in consequence of establishing the easiest and safest communications both by land and by water through every part of his own dominions as well as the most unbounded freedom of exportation to the dominions of all other princes.

一个反对可变土地税的重要借口就是，若土地税并非固定不变，那就会阻碍耕地的改良。理由是，要是君主对改良所需的花费丝毫没有分担，却能够因为土地改良而受益，那么地主肯定是不愿意从事这种改良的。但是，这个问题是能够克服的。如果在让地主改良土地之前，能让地主和收税的官吏双方一起选择邻近的地主和农民，一起公平地裁定土地实际的价值，随后在一些年里，都按照这样定下的标准征税，让地主进行土地改良的费用得到补偿。这赋税有一大好处，那就是使得君主出于关心自身利益，而把注意力放在了土地改良上。所以，上述规定的时间，只是为了赔偿地主改良土地的费用。这个时间不必太久。如果太长，那么地主享受益处的时间太久，君主可能就不再关注改良土地。不过，也不要定的太短。因为定太短虽然能够极大地刺激君主关心农事，但是这不能弥补阻碍地主关心农事而带来的损失。君主关心的是大局，关心如何做能够有益于全国大部分土地的改良。而地主的注意力总是放在很细节的事情上，关心如何有效利用属于自己的每寸土地。总而言之，君主在权力能及的范围里，应当采取各种方式，鼓励地主和农民关心农事，让他们依照自己的判断和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让地主和农民都能够安心地享用自己的勤劳换来的报偿；并且，在领土内设置最便利最全的水陆交通机关，给他们各种各样的生产物提供最为广阔的市场，而且能顺利地运往其他国家。这些才是君主应该留意的地方。

If by such a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 tax of this kind could be so managed as to give, not only no discouragement, but, on the

contrary, some encouragement to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it does not appear likely to occasion any other inconveniency to the landlord, except always the unavoidable one of being obliged to pay the tax.

如果这样的管理制度不但让土地税不妨碍土地改良，而且还促进了土地改良，地主就不会觉得土地税带来了什么不便，仅有的麻烦也不过是必要的纳税义务。

In all the variations of the state of the society, in the improvement and in the declension of agriculture; in all the variations in the value of silver, and in all those in the standard of the coin, a tax of this kind would, of its own accord and without any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readily suit itself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ings, and would be equally just and equitable in all those different changes. It would, therefore, be much more proper to be established as a perpetual and unalterable regulation, or as what is called a fundamental law of the commonwealth, than any tax which was always to be levied according to a certain valuation.

不管社会状态的变化，农业发展的变化以及银价、铸币法定标准的变化，这种赋税，即使是没有政府注意到，也会自动根据周围事物的情况进行调整，而且变化之后也是恰当而公平的。所以，最好是把它定成永恒不变的规定，或者是制定成国家基本法律，而不是定成总按固定标准征收的税。

Some states, instead of the simple and obvious expedient of a register of leases, have had recourse to the laborious and expensive

one of an actual survey and valuation of all the lands in the country. They have suspected, probably, that the lessor and lessee, in order to defraud the public revenue, might combine to conceal the real terms of the lease. Domesday-Book seems to have been the result of a very accurate survey of this kind.

某些国家并不采取简单明了的方式对土地租约进行登记，而是不惜花费额外的劳务，对全国的土地进行调查和评估。这样做或许是害怕出租和承租方会为了非法获得公共收入而隐瞒租约的实际情况。土地丈量册就是这种精确丈量的结果。

In the ancient dominions of the King of Prussia, the land-tax is assessed according to an actual survey and valuation, which is reviewed and altered from time to time. According to that valuation, the lay proprietors pay from twenty to twenty-five per cent of their revenue. Ecclesiastics from forty to forty-five per cent. The survey and valuation of Silesia was made by order of the present king; it is said with great accuracy. According to that valuation, the lands belonging to the Bishop of Breslaw are taxed at twenty-five per cent of their rent. The other revenues of the ecclesiastics of both religions, at fifty per cent. The commanderies of the Teutonic order, and of that of Malta, at forty per cent. Lands held by a noble tenure, at thirty-eight and one-third per cent. Lands held by a base tenure, at thirty-five and one-third per cent.

从前，在普鲁士国王的领土内，收土地税都是以实际调查和丈量的结果为准的，而且要根据随时的丈量结果进行随时变更。根据当时的评价，普通土地所有者要上缴收入的20％至25％作为税款，而教士们要上缴40％到45％。西里西阿土地丈量、评价就是根据现在国王的

命令而施行的，据说精确无比。评价规定针对属于布勒斯洛主教的土地，征收地租的25%；而不管是新教还是旧教的教士，都要把其余收入的50%上交作为赋税。条顿骑士团采邑与马尔达骑士团采邑各自上缴40%。贵族保有地征收的税率是38.33%，而平民保有地为35.33%。

The survey and valuation of Bohemia is said to have been the work of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It was not perfected till after the peace of 1748, by the orders of the present empress queen. The survey of the duchy of Milan, which was begun in the time of Charles VI, was not perfected till after 1760. It is esteemed one of the most accurate that has ever been made. The survey of Savoy and Piedmont was executed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late King of Sardinia.

据说，波西米亚土地调查和评价进行了一百年不止，一直到1748年和平实现之时，现在的女王才下令，完成这项土地调查。在查理六世时代，米兰公领地测量一直到1760年以后才算完成。评论说这丈量再精确没有了。对塞沃伊及皮德蒙特的土地进行丈量，是在已经故去的国王沙廷尼亚的命令下完成的。

In the dominions of the King of Prussia the revenue of the church is taxed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lay proprietors. The revenue of the church is, the greater part of it, a burden upon the rent of land. It seldom happens that any part of it is applied towards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or is so employed as to contribute in any respect towards increasing the revenue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His Prussian Majesty had probably, upon that account, thought it reasonable that it should contribute a good deal more

towards relieving the exigencies of the state. In some countries the lands of the church are exempted from all taxes. In others they are taxed more lightly than other lands. In the duchy of Milan, the lands which the church possessed before 1575 are rated to the tax at a third only of their value.

在普鲁士王国中，对教会收入征税的数额，远远多于针对普通土地所有者收入的征税。教会收入的大部分都来自土地地租，不过却不常见用教会收入来改良土地，来增加大多数人民的收入。也许正因如此，普鲁士国王认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教会应当多出力。不过有些国家却对教会土地不收任何税。还有些国家，虽然对教会土地收税，但是收的比较少。一直到1575年，在米兰公国内，针对教会所拥有的土地，收税时仅仅按照其实际价值的1/3收税收取。

In Silesia, lands held by a noble tenure are taxed three per cent higher than those held by a base tenure. The honours and privileges of different kinds annexed to the former, his Prussian Majesty had probably imagined, would sufficiently compensate to the proprietor a small aggravation of the tax;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humiliating inferiority of the latter would be in some measure alleviated by being taxed somewhat more lightly. In other countries, the system of taxation, instead of alleviating, aggravates this inequality. In the dominions of the King of Sardinia, and in those provinces of France which are subject to what is called the real or predial taille, the tax falls altogether upon the lands held by a base tenure. Those held by a noble one are exempted.

在西里西阿，对贵族土地的征税比平民土地高3%。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普鲁士国王觉得既然贵族享受特权、荣誉等等，也

要承担略重的赋税。而且平民也可以找到心理平衡感，弥补自卑。不过，在沙廷尼阿王国，还有贡税制施行的法国各个省，贵族保有的土地不需要缴纳税款，反而平民要承担赋税。

A land-tax assessed according to a general survey and valuation, how equal soever it may be at first, must, in the course of a very moderate period of time, become unequal. To prevent its becoming so would require the continual and painful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to all the variations in the state and produce of every different farm in the country. The governments of Prussia, of Bohemia, of Sardinia, and of the duchy of Milan actually exert an attention of this kind; an attention so unsuitable to the nature of government that it is not likely to be of long continuance, and which, if it is continued, will probably in the long-run occasion much more trouble and vexation than it can possibly bring relief to the contributors.

如果土地税是根据对土地的一般调查和估计而征收的，那么肯定会随着时间流逝，从一开始的公平变成不公平。为了革除这一弊端，政府要始终关注国家里各个农场状态如何，生产物的情况。普鲁士政府、波希米亚政府、沙廷尼阿政府以及米兰公国政府，都曾对此加以关注。不过，政府的性质决定了这种时时的注意难以持久，即使长久注意，也对纳税者没什么益处，反而增加烦恼。

In 1666, the generality of Montauban was assessed to the real or predial taille according, it is said, to a very exact survey and valuation. By 1727, this assessment had become altogether unequal. In order to remedy this inconveniency, government has found no better expedient than to impose upon the whole generality an

additional tax of a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livres. This additional tax is rated upon all the different districts subject to the taille according to the old assessment. But it is levied only upon those which in the actual state of things are by that assessment undertaxed, and it is applied to the relief of those which by the same assessment are overtaxed. Two districts, for example, one of which ought in the actual state of things to be taxed at nine hundred, the other at eleven hundred livres, are by the old assessment both taxed at a thousand livres. Both these districts are by the additional tax rated at eleven hundred livres each. But this additional tax is levied only upon the district undercharged, and it is applied altogether to the relief of that overcharged, which consequently pays only nine hundred livres. The government neither gains nor loses by the additional tax, which is applied altogether to remedy the inequalities arising from the old assessment. The application is pretty much regulated according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intendant of the generality, and must, therefore, be in a great measure arbitrary.

据说，1666年的时候，芒托本为征收贡税，进行的丈量和估价极为精准。但到1727年，这税整个变得不公平起来。为了对此进行补救，政府只好对全区都征附加税12,000里弗赫，除此外别无他法。这项附加税原先是在一切按旧估税额的地方征收的，这些地方实际纳税比较少，例如，有两个区，一个实际上应该征税900里弗赫，另一个应该收1,000里弗赫，要是根据旧的估计税额，这两个地区都应该收1,000里弗赫。在征收附加税后，两者的税额，都定为1,100里弗赫。之前负担比较小的地区，要征附加税，而此前负担过重的地区，则因此要通过附加税得到平衡。所以，后一个区只是缴纳了900里弗赫。对于政府来说，并没有什么得失。不过，采用这样的平衡方式，主要依靠税区的行政长官来独自裁决。

Taxes which are proportioned, not to the Rent, but to the Produce of Land

不与地租成比例而与土地生产物成比例的赋税

Taxes upon the produce of land are in reality taxes upon the rent; and though they may be originally advanced by the farmer, are finally paid by the landlord. When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produce is to be paid away for a tax, the farmer computes, as well as he can, what the value of this portion is, one year with another, likely to amount to, and he makes a proportionable abatement in the rent which he agrees to pay to the landlord. There is no farmer who does not compute beforehand what the church tithe, which is a land-tax of this kind, is, one year with another, likely to amount to.

由土地生产物征税，其实就是基于土地地租的税。这税最开始是由农民垫付的，最后仍然是地主承担。如果把生产物的一部分作为赋税上缴，农民就要尽力算出每一年这个部分的大概价值，并且从他已经要付给地主的税赋中减去这一部分。比如要向教会上缴的什一税就是这样。农民不可能不预估每年的大概价值，就上缴这些年产物。

The tithe, and every other land-tax of this kind, under the appearance of perfect equality, are very unequal taxes;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produce being,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equivalent to a very different portion of the rent. In some very rich lands the produce is so great that the one half of it is fully sufficient to replace to the farmer his capital employed in cultivation, together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farming stock in the neighbourhood.

The other half,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the value of the other half, he could afford to pay as rent to the landlord, if there was no tithe. But if a tenth of the produce is taken from him in the way of tithe, he must require an abatement of the fifth part of his rent, otherwise he cannot get back his capital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 In this case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instead of amounting to a half or five-tenths of the whole produce, will amount only to four-tenths of it. In poorer lands, on the contrary, the produce is sometimes so small, and the expense of cultivation so great, that it requires four-fifths of the whole produce to replace to the farmer his capital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 In this case, though there was no tithe,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could amount to no more than one-fifth or two-tenths of the whole produce. But if the farmer pays one-tenth of the produce in the way of tithe, he must require an equal abatement of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which will thus be reduced to one-tenth only of the whole produce. Upon the rent of rich lands, the tithe may sometimes be a tax of no more than one-fifth part, or four shillings in the pound; whereas upon that of poorer lands, it may sometimes be a tax of one-half, or of ten shillings in the pound.

什一税和其他相类似的土地税，都是看起来无比公平，实则不然。不同的情形下，生产物的价格和地租价格极为不同。肥沃的土地往往生产物也很丰富，一半可以用来偿还农耕资本和相应的利润。另一半的价值，在没有什一税的情况下，足以偿付地租。但是，如果租地者把1/10的生产物拿来支付了什一税，那就要减少1/5的地租，不然资本利润就会丧失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地主的地租，就不会是全生产物的一半，而只有2/5了。对于贫瘠的土地而言，产量少费用又庞杂，需要用掉全生产物的4/5才能偿付农业活动消耗的资本，支付普通利润。在此情况下，即便没有什一税，地主所得地租，亦不能超过全生产物的1/5。如果农民为了支付什一税，花去了生产物的

1/10付了什一税，地主就要把同等的数额，从地租里面减掉。最终，地主只能得到总生产物的1/10。在肥沃土地上，什一税往往不过等于每镑1/4或每镑4先令的税，而在不那么肥沃的土地上，却相当于每镑1/2或每镑10先令的税。

The tithe, as it is frequently a very unequal tax upon the rent, so it is always a great discouragement both to the improvements of the landlord and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farmer. The one cannot venture to make the most important, which are generally the most expensive improvements, nor the other to raise the most valuable, which are generally too the most expensive crops, when the church, which lays out no part of the expense, is to share so very largely in the profit. The cultivation of madder was for a long time confined by the tithe to the United Provinces, which, being Presbyterian countries, and upon that account exempted from this destructive tax, enjoyed a sort of monopoly of that useful dyeing drug against the rest of Europe. The late attempts to introduce the culture of this plant into England have been made only in consequence of the statute which enacted that five shillings an acre should be received in lieu of all manner of tithe upon madder.

加在地租之上的什一税往往极不公平，也大大挫伤了地主土地改良的积极性，以及农夫耕作的积极性。地主和农民，看到教会不费任何功夫，就分得了如此多的利益，而对于地主来说，这种不公平就让他们进行各种改良，因此耗资太巨；对于农夫，也就不愿意种植事实上最有价值的谷物，因为花费过多。欧洲自征收什一税以来，只有荷兰联邦栽培茜草，独享而且垄断这种燃料，因为在长老教会制度的荷兰联邦，是不收取什一税的。最近英格兰亦开始栽培茜草了，近期英国议会颁布了法令，每亩茜草地的耕种，只收取5先令，作为什一税的替代。

As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the church, so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f Asia the state, is principally supported by a land-tax, proportioned, not to the rent, but to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In China, the principal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consists in a tenth part of the produce of all lands of the empire. This tenth part, however, is estimated so very moderately that, in many provinces, it is said not to exceed a thirtieth part of the ordinary produce. The land-tax or land-rent which used to be paid to the Mahometan government of Bengal, before that country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is said to have amounted to about a fifth part of the produce. The land-tax of ancient Egypt is said likewise to have amounted to a fifth part.

亚洲很多国家像大部分欧洲教会，靠征收和土地生产物成比例的税获取主要收入，这税不和土地地租成比例。在中国，皇家最主要的收入就是帝国土地生产物的1/10。不过，所谓征收1/10，由于估算的时候非常宽松，很多地方收取的量都没有超过普通生产物的1/30。印度在未成为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对象以前，孟加拉回教政府，据说所征土地税大概是土地生产物的1/5。而且据说，古埃及土地税也是收土地生产物的1/5。

In Asia, this sort of land-tax is said to interest the sovereign in the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land. The sovereigns of China, those of Bengal while under the Mahometan government, and those of ancient Egypt, are said accordingly to have been extremely attentive to the making and maintaining of good roads and navigable canals, in order to increase, as much as possible, both the quantity and value of every part of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by procuring to every part of it the most extensive market which their

own dominions could afford. The tithe of the church is divided into such small portions that no one of its proprietors can have any interest of this kind. The parson of a parish could never find his account in making a road or canal to a distant part of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extend the market for the produce of his own particular parish. Such taxes, when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tate, have some advantages which may serve in some measure to balance their inconveniency. When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hurch, they are attended with nothing but inconveniency.

由于亚洲的这种土地税的形式，使得君主们都对改良和耕作土地颇有兴趣。据说，中国的君主、回教政府治下的孟加拉君主、古代埃及君主都竭尽智慧和精力，让国内的土地生产物的价值和量都得到提升。为此，他们都建设公路和运河，目的是让各个部分的生产物都能在领土内畅销无阻。而对于欧洲各教会来说，能得到的什一税很少，所以与亚洲的君主不同，教会的人员对土地耕种改良毫无兴趣。一个教区的牧师，不会起心思在国内偏僻的地方开运河建公路，也不会想扩展本教区的市场。因此，如果这种税拿来维持国家运转，那么获得的利益，多少能够补偿带来的不便；若花在维持教会运转上，就没什么好处，只有不便了。

Taxes upon the produce of land may be levied either in kind, or, according to a certain valuation, in money.

对于土地生产无征税，有的是以实物征收，有的是根据特定的评价，以货币形式征收。

The parson of a parish, or a gentleman of small fortune who

lives upon his estate, may sometimes, perhaps, find some advantage in receiving, the one his tithe, and the other his rent, in kind. The quantity to be collected, and the district within which it is to be collected, are so small that they both can oversee, with their own eyes, the collection and disposal of every part of what is due to them. A gentleman of great fortune, who lived in the capital, would be in danger of suffering much by the neglect, and more by the fraud of his factors and agents, if the rents of an estate in a distant province were to be paid to him in this manner. The loss of the sovereign from the abuse and depredation of his tax-gatherers would necessarily be much greater. The servants of the most careless private person are, perhaps, more under the eye of their master than those of the most careful prince; and a public revenue which was paid in kind would suffer so much from the mismanagement of the collectors that a very small part of what was levied upon the people would ever arrive at the treasury of the prince. Some part of the public revenue of China, however, is said to be paid in this manner. The mandarins and other tax-gatherers will, no doubt, find their advantage in continuing the practice of a payment which is so much more liable to abuse than any payment in money.

教区的牧师，还有住在田庄里的财产不算多么丰裕的乡绅，也会在一些情况下，以实物的形式收取什一税和地租，认为这样可以获取好处。因为，既然征集的东西数量少，范围也小，所以能够亲自监管收集和处理这些实物。然而住在大都市中拥有巨额资产的绅士，如果想对自己分散的土地收取地租也征收实物的话，那么他的承办代理人有可能会工作懒散，甚至在工作中舞弊。再加上收税官吏的玩忽职守，给君主带来的损失大得多。一个极为不谨慎的人，在监督使用人方面，也比最明智的君主强得多。如以实物征收公共收入，那么经过税吏胡乱处理，损失很多部分之后，实际上交进国库的，也不过人民

真正缴纳的一小部分。据说，中国的公共收入的一部分，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缴付的。中国大官还有税吏们，自然非常乐意继续维持这样的征税惯例，因为征收实物时做手脚，比征收货币实在容易太多。

A tax upon the produce of land which is levied in money may be levied either according to a valuation which varies with all the variations of the market price, or according to a fixed valuation, a bushel of wheat, for example, being always valued at one and the same money price, whatever may be the state of the market. The produce of a tax levied in the former way will vary only according to the variations in the real produce of the land, according to the improvement or neglect of cultivation. The produce of a tax levied in the latter way will vary, not only according to the variations in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but according to both those in the valu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and those in the quantity of those metals which is at different times contained in coin of the same denomination. The produce of the former will always bear the same proportion to the value of the real produce of the land. The produce of the latter may, at different times, bear very different proportions to that value.

对土地生产物征税，也许要考虑市场价格的变动；有的则是按照固定价格，例如，市场价格不论怎么变，1蒲式耳的小麦，货币价格总是一样的。照从前的方式征收的税额，只是根据每年土地耕作状况而变动，而新的征收方式下，税额不仅要土地生产物变动，而且要随着贵金属价格的变动而变动，甚至随着各个时期铸币中的贵金属的含量而变动。因此，就前一种征收方式来看，税额总是和土地生产物的真正价值保持比例，而后一种征收方式，不同时期税额与土地生产物真正比例相差很大。

When, instead either of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produce of land, or of the price of a certain portion, a certain sum of money is to be paid in full compensation for all tax or tithe, the tax becomes, in this case, exactly of the same nature with the land-tax of England. It neither rises nor falls with the rent of the land. It neither encourages nor discourages improvement. The tithe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parishes which pay what is called a Modus in lieu of all other tithe is a tax of this kind. During the Mahometan government of Bengal, instead of the payment in kind of a fifth part of the produce, a modus, and, it is said, a very moderate one, was established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districts or zemindaries of the country. Some of the serva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under pretence of restoring the public revenue to its proper value, have, in some provinces, exchanged this modus for a payment in kind. Under their management this change is likely both to discourage cultivation, and to give new opportunities for abuse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ublic revenue which has fallen very much below what it was said to have been when it first fell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The servants of the company may, perhaps, have profited by this change, but at the expense, it is probable, both of their masters and of the country.

既不收一定部分得到土地生产物，也不用这一部分的价格，而是用一定数额的货币来代为交付所有的税负和什一税，这样的话，就和英格兰的土地税性质一样了。这样收税，不会随着土地地租的起落而发生改变，也不会阻碍或者鼓励土地改良。很多教区用征收货币代替征收实物，不再以实物的形式收什一税。那样的征税方式，和英格兰征收土地税非常类似。在孟加拉回教政府时代，其管理的大部分地区，据说用很少的货币代替要征收的1/5实物。后来，东印度公司的一部分职员，假意要恢复公共收入至应有的价值，而在一些州，把货币收税改成收实物。由于他们的这种管理，一方面阻碍了耕作，而且

给公共收入的征收创造了肆意滥收的机会。公司的人很可能以主人和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从这一改变中获取了好处。

Taxes upon the Rent of House.

房租税

The rent of a house may be distinguished into two parts, of which the one may very properly be called the Building-rent; the other is commonly called the Ground-rent.

房租一般有两类：一是建筑物房租，二是地皮租。

The building-rent is the interest or profit of the capital expended in building the house. In order to put the trade of a builder upon a level with other trades, it is necessary that this rent should be sufficient, first, to pay him the same interest which he would have got for his capital if he had lent it upon good security; and, secondly, to keep the house in constant repair,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to replace, within a certain term of years, the capital which had been employed in building it. The building-rent, or the ordinary profit of building, is, therefore, everywhere regulated by the ordinary interest of money. Where the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is four per cent the rent of a house which, over and above paying the ground-rent, affords six or six and a half per cent upon the whole expense of building, may perhaps afford a sufficient profit to the builder. Where the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is five per

cent, it may perhaps require seven or seven and a half per cent. If, in proportion to the interest of money, the trade of the builder affords at any time a much greater profit than this, it will soon draw so much capital from other trades as will reduce the profit to its proper level. If it affords at any time much less than this, other trades will soon draw so much capital from it as will again raise that profit.

建筑物的租金，是修建房子所耗资金的利息和利润。要想让建筑业和其他行业取得同等的地位，就有必要让建筑物租金充足。第一，要足够支付建筑业者把资产抵押出去应该能够得到的利息；第二，足以支付他维持房屋状态而付出的修缮费，这样才能保证他在一定期限内，收回建房子的成本。因此，各地的建筑物租，或建筑资本的普通利润，就常受货币的普通利息的支配。在市场利率为4%的地方，出租建筑物的租金，如果缴付了地皮租金之后，仍然能够保证产生6%或6.5%的收入，那么建筑主人的盈利就算是足够的。在市场利率为5.5%的地方，就也许要提供相当于全部建筑费的7%或7.5%的利润给建筑主，才算足够。在利润和利息成比例的情况下，要是建筑行业的利润大大超出这一比率，那许多其他行业资本就会纷纷流入建筑行业，从而导致建筑行业的利润下降到一个合理的比率上来。反过来，建筑业的利润，要是比正常的水平低的话，那建筑行业的资本会迅速流向其他的行业，逐渐让建筑业的利润再回升到原来的水平。

Whatever part of the whole rent of a house is over and above what is sufficient for affording this reasonable profit naturally goes to the ground-rent; and where the owner of the ground and the owner of the building are two different persons, is, in most cases, completely paid to the former. This surplus rent is the price which the inhabitant of the house pays for some real or supposed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In country houses at a distance from any

great town, where there is plenty of ground to choose upon, the ground-rent is scarce anything, or no more than what the ground which the house stands upon would pay if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In country villa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some great town, it is sometimes a good deal higher, and the peculiar conveniency or beauty of situation is there frequently very well paid for. Ground-rents are generally highest in the capital, and in those particular parts of it where there happens to be the greatest demand for houses, whatever be the reason of that demand, whether for trade and business, for pleasure and society, or for mere vanity and fashion.

对于整个房租而言，合理利润之外的部分，就是地皮租的部分。如果地皮主人和建筑主人是两个不同的人，那么这剩余的租金，就全部要归地皮主人所有。这剩余的租金，就是住户因为这个地址提供的真实的或是可能的利益而提供的报偿。远离都市、房屋空地很多的地方，地租几乎是免费的，或比那地皮用于农业的场合所得不会更多。城市郊外的别墅，地皮租金就非常高昂，而如果条件便利，周围景色绝佳，那就更贵了。在一国首都，尤其是在对房屋有最大需要的特别地段内地皮租金都最高，不管对这地皮需求这么高的原因是为了经营商业为了娱乐还是为了虚荣和赶时髦。

A tax upon house-rent, payable by the tenant and proportioned to the whole rent of each house, could not,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at least, affect the building-rent. If the builder did not get his reasonable profit, he would be obliged to quit the trade; which, by raising the demand for building, would in a short time bring back his profit to its proper level with that of other trades. Neither would such a tax fall altogether upon the ground-rent; but it would divide itself in such a manner as to fall partly upon the inhabitant of the

house, and partly upon the owner of the ground.

如果是让住户来出房屋税，而且按照房屋租金的比例来给的话，那么比较长的时间内，也是不会对建筑物的租金产生影响的。如果建筑业利润太低，这些人们就会纷纷转行，使得建筑业需求大于供给，这样不要多久，利润就会恢复从前的水平，和其他行业利润保持一致。当然，这笔税也不会全从地皮租里出，而是会由住户承担一部分，地皮的主人承担一部分。

Let us suppose, for example, that a particular person judges that he can afford for house-rent an expense of sixty pounds a year; and let us suppose, too, that a tax of four shillings in the pound, or of one-fifth, payable by the inhabitant, is laid upon house-rent. A house of sixty pounds rent will in this case cost him seventy-two pounds a year, which is twelve pounds more than he thinks he can afford. He will, therefore, content himself with a worse house, or a house of fifty pounds rent, which, with the additional ten pounds that he must pay for the tax, will make up the sum of sixty pounds a year, the expense which he judges he can afford; and in order to pay the tax he will give up a part of the additional conveniency which he might have had from a house of ten pounds a year more rent. He will give up, I say, a part of this additional conveniency; for he will seldom be obliged to give up the whole, but will, in consequence of the tax, get a better house for fifty pounds a year than he could have got if there had been no tax. For as a tax of this kind by taking away this particular competitor, must diminish the competition for houses of sixty pounds rent, so it must likewise diminish it for those of fifty pounds rent, and in the same manner for those of all other rents, except the lowest rent, for which it would for some time increase the competition. But the rents of

every class of houses for which the competition was diminished would necessarily be more or less reduced. As no part of this reduction, however, could,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at least, affect the building-rent, the whole of it must in the long-run necessarily fall upon the ground-rent. The final payment of this tax, therefore, would fall partly upon the inhabitant of the house, who, in order to pay his share, would be obliged to give up a part of his conveniency, and partly upon the owner of the ground, who, in order to pay his share, would be obliged to give up a part of his revenue. In what proportion this final payment would be divided between them it is not perhaps very easy to ascertain. The division would probably be ver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and a tax of this kind might, according to thos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affect very unequally both the inhabitant of the house and the owner of the ground.

比方说，有个人每年可以出房租60镑，而且为了缴纳房租税，租客还要另外根据租金，每镑缴纳4先令作为房租税，或全租金的1/5作为房租税。那这样的情形下，60镑租金的住宅，事实上要缴纳的是72镑；其中有12镑超过了他的预期。这一来，他就宁愿住差一点，比如住50镑一年的房屋，这50镑，加上额外的10镑房租费，刚好符合他对自己每年能够承担60镑的预期。那么就相当于为了缴纳房租税，租客放弃了本来可以租到的贵10镑的房屋带来的某些便利。我说放弃某些便利，指的是不必放弃所有的便利。由于房租税，租客花费50镑就租到了不收房租税的时候，50镑租不来的好房子，原因是房租税既然能让他放弃竞争，同理，年租60镑的房屋的竞争者也会减少，还有年租50镑的房屋的竞争者也减少了。以此类推，除了那些房租实在不能再低的房屋，在一定时间内会竞争加大以外，对于其他所有价格水平的房屋，竞争都在减少；结果就导致所有竞争减少的房屋，租金都有所下滑。不过，少收的这部分租金，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不能反映在建筑物租金上的，这个时候就要从地皮租金上补偿来。因此，房租税最

终部分落在了租客身上，另一部分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但是，很难断定，他们两类人之间，应当以怎样的比例来分担这最终的税负。在不同情况下，分配会大不相同；而且，住户和地皮所有者在不同情况下，会以很不相同的比例承担这项税负。

The inequality with which a tax of this kind might fall upon the owners of different ground-rents would arise altogether from the accidental inequality of this division. But the inequality with which it might fall upon the inhabitants of different houses would arise not only from this, but from another cause. The proportion of the expense of house-rent to the whole expense of living is different in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fortune. It is perhaps highest in the highest degree, and it diminishes gradually through the inferior degrees, so as in general to be lowest in the lowest degree.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occasion the great expense of the poor. They find it difficult to get food,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little revenue is spent in getting it. The luxuries and vanities of life occasion the principal expense of the rich, and a magnificent house embellishes and sets off to the best advantage all the other luxuries and vanities which they possess. A tax upon house-rents, therefore, would in general fall heaviest upon the rich; and in this sort of inequality there would not, perhaps, be anything very unreasonable. It is not very unreasonable that the rich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public expense, not only in proportion to their revenue, but something more than in that proportion.

此税给地皮租的拥有者造成的不平等，都是上述偶然不平等的税赋分配造成的。但是此税给住户带来的不平等，就不仅仅是分担造成的了。由于财产数量的不同，房租在生活费中所占的比例也不一样。财产越多，比例越大，财产越少，比例越低。贫穷的人大部分的费用

都消耗在了生活必需品上，他们很难得到食物，仅有的一点收入，都花在了食物上。而富有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收入的大部分都花在了奢侈品，以及为了面子买的装饰品上；而豪华的房屋，能够最好地展示他所拥有的奢侈品，撑起他的面子。因此，富有者要承担最重的房租税。这种不平等，也是有其道理的。在收入比例之外，富有的人应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费用，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The rent of houses, though it in some respects resembles the rent of land, is in one respect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it. The rent of land is paid for the use of a productive subject. The land which pays it produces it. The rent of houses is paid for the use of an unproductive subject. Neither the house nor the ground which it stands upon produce anything. The person who pays the rent, therefore, must draw it from some other source of revenue distinct from the independent of this subject. A tax upon the rent of houses, so far as it falls upon the inhabitants, must be drawn from the same source as the rent itself, and must be paid from their revenue, whether derived from the wages of labour, the profits of stock, or the rent of land. So far as it falls upon the inhabitants, it is one of those taxes which fall, not upon one only, but indifferently upon all the three different sources of revenue, and is in every respect of the same nature as a tax upon any other sort of consumable commodities. In general there is not, perhaps, any one article of expense or consumption by which the liberality or narrowness of a man's whole expense can be better judged of than by his house-rent. A proportional tax upon this particular article of expense might, perhaps, produce a more considerable revenue than any which has hitherto been drawn from it in any part of Europe. If the tax indeed was very high, the greater part of people would endeavour to evade it, as much as they could, by contenting themselves with smaller houses, and by turn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ir expense into some

other channel.

在一些方面，房租和土地地租很像，但有一方面根本不同。缴付土地地租，土地是一种自身有生产力的对象，需要缴付地租的土地本身产生地租。而房租的来源是没有生产力的房屋，房屋和房屋下的地皮都是没有生产能力的。所以，要支付房租，只有从与房屋没有干系的其他收入来源中，拿出相关款项。住户要支付房租，必须从和房租来源一致的地方出，而且从自己的收入中出，这收入可以是劳动工资，也可是资本利润或者是土地地租。只要是住户承担房租税，这种税不仅仅是从一个单一的收入来源征收，而是从上面所有收入来源中征收。这样来看，就和消费税一般无二了。再没有什么消费，比房租更加体现一个人的生活水平的了。对这种特殊消费对象比例征税，会得到比今天的欧洲任何其他税种都要多的税款。不过，大部分人会在房租较高的时候，转向较小的房屋，从而尽力避免缴付高房租。

The rent of houses might easily be ascertained with sufficient accuracy by a policy of the same kind with that which would be necessary for ascertaining the ordinary rent of land. Houses not inhabited ought to pay no tax. A tax upon them would fall altogether upon the proprietor, who would thus be taxed for a subject which afforded him neither conveniency nor revenue. Houses inhabited by the proprietor ought to be rated, not according to the expense which they might have cost in building, but according to the rent which an equitable arbitration might judge them likely to bring if leased to a tenant. If rated according to the expense which they may have cost in building, a tax of three or four shillings in the pound, joined with other taxes, would ruin almost all the rich and great families of this, and, I believe, of every other civilised country. Whoever will examine, with attention, the different town and country houses of some of the richest and

greatest families in this country will find that, at the rate of only six and a half or seven per cent upon the original expense of building, their house-rent is nearly equal to the whole net rent of their estates. It is the accumulated expense of several successive generations, laid out upon objects of great beauty and magnificance, indeed; but, in proportion to what they cost, of very small exchangeable value.

要是采用确定普通地租的方式来确定房租，那么房租定然会无比精确。空置的房屋应当免除税负。要是征税，就是要求房屋的所有者为一项既没有让自己收入增加，也没能给自己提供方便的东西付税。而且这税都要落在他身上。如果这房屋由所有者自住，那么要缴纳的税款不是按建筑费来算，而是假定这房子应该租给别人，公平的租金是多少来算的。要是按照建筑费来算，每镑交上3先令或者是4先令税，此外再加上其他的税项，那所有文明国家的大户富户都要破产了。只要是能够对本国的富户进行考察，了解他们城里住处和乡下宅院的情况，就知道如果按照最初建造房屋费用的6.5%或是7%来计算，他们要缴付的房租，几乎就要和地产的所有净租金相同。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他们建造出了美丽雄伟的豪宅，但是这和最初的花费相比，交换价值却极其有限。

Ground-rents are a still more proper subject of taxation than the rent of houses. A tax upon ground-rents would not raise the rents of houses. It would fall altogether upon the owner of the ground-rent, who acts always as a monopolist, and exacts the greatest rent which can be got for the use of his ground. More or less can be got for it according as the competitors happen to be richer or poorer, or can afford to gratify their fancy for a particular spot of ground at a greater or smaller expense. In every country the greatest number of rich competitors is in the capital, and it is there

accordingly that the highest ground-rents are always to be found. As the wealth of those competitors would in no respect be increased by a tax upon ground-rents, they would not probably be disposed to pay more for the use of the ground. Whether the tax was to be advanced by the inhabitant, or by the owner of the ground, would be of little importance. The more the inhabitant was obliged to pay for the tax, the less he would incline to pay for the ground; so that the final payment of the tax would fall altogether upon the owner of the ground-rent. The ground-rents of uninhabited houses ought to pay no tax.

与其对房租收税，不如对地皮征税。对地皮课税不会让房租上涨，而全由地皮所有者负担。地皮所有者认为自己是地皮的独占者，因此尽量想从土地上获得高额的租金。而至于能获得多少租金，取决于这些竞争者愿意为这块地出多少钱，以及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在所有的国家中，地皮的竞争者，最有钱的都集中在国都。所以一国首都中的地皮总是能得到最高的土地竞价。但是，并不会因为地皮税，竞争者的财富就有所增多，所以他们不愿意在使用地皮上多出租金。至于地皮租税是让地皮所有者垫付还是住户垫付，都不太要紧。住户必须上缴的税款数额越大，他就越不想为地皮出租金。地皮税最终都会由地皮所有者承担。对空置房屋的地皮租自然不应该课税。

Both ground-rents and the ordinary rent of land are a species of revenue which the owner, in many cases, enjoys without any care or attention of his own. Though a part of this revenue should be taken from him in order to defray the expenses of the state, no discouragement will thereby be given to any sort of industry.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society, the real wealth and revenue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might be the same after such a tax as before. Ground-rents and the ordinary rent

of land are, therefore, perhaps, the species of revenue which can best bear to have a peculiar tax imposed upon them.

在很多情况下，地皮租以及普通的土地地租不用所有者操心。如果这种收入上缴一部分给国家，也并不会对任何产业造成不利影响。和没有课税的时候比较，地皮税即使收税，也不会对人民的财富，也就是社会土地的年产物造成影响。这样看来，大概最合适负担特定税收的收入，就是地皮租和其他普通土地地租。

Ground-rents seem, in this respect, a more proper subject of peculiar taxation than even the ordinary rent of land. The ordinary rent of land is, in many cases, owing partly at least to the attention and good management of the landlord. A very heavy tax might discourage too, much this attention and good management. Ground-rents, so far as they exceed the ordinary rent of land, are altogether owing to the good government of the sovereign, which, by protecting the industry either of the whole people, or of the inhabitants of some particular place, enables them to pay so much more than its real value for the ground which they build their houses upon; or to make to its owner so much more than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which he might sustain by this use of it. Nothing can be more reasonable than that a fund which owes its existence to the good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should be taxed peculiarly, or should contribute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funds, towards the support of that government.

但从这一方面来看，比起普通土地地租，地皮租更适合作为特殊收税对象。这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需要良好的经营和照顾，才能有普通土地地租。如果地租税收的太重，就会阻碍这种经营和照顾。地

皮租则不然。要归功于君主治国有方，才有超过普通土地地租的地皮税。君主施政有方，使得居民能够对自己房屋的地皮支付远超实际价格的租金，使得这些居民缴付给地皮所有者的租金，远远多于地皮使用造成的费用。正是由于君主善于施政，才让人民有了这些资源，所以对这项收入征税比其他收入更多，用来作为建设国家的费用，这是很正当的。

Though,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f Europe, taxes have been imposed upon the rent of houses, I do not know of any in which ground-rents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a separate subject of taxation. The contrivers of taxes have, probably, found some difficulty in ascertaining what part of the rent ought to be considered as ground-rent, and what part ought to be considered as building-rent. It should not, however, seem very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those two parts of the rent from one another.

尽管欧洲不同的国家都会征收房租税，但是根据我的了解，还没有哪个国家把地皮租看作分开的独立征税对象。制定税法的人，也很难确定房租中究竟哪一部分应当算作是地皮租，哪一部分应当算作是建筑物租。

In Great Britain the rent of houses is supposed to be taxed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the rent of land by what is called the annual land-tax. The valuation, according to which each different parish and district is assessed to this tax, is always the same. It was originally extremely unequal, and it still continues to be so.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kingdom this tax falls still more lightly upon the rent of houses than upon that of land. In some few districts only, which were originally rated high, and in which the

rents of houses have fallen considerably, the land-tax of three or four shillings in the pound is said to amount to an equal proportion of the real rent of houses. Untenanted houses, though by law subject to the tax, are, in most districts, exempted from it by the favour of the assessors; and this exemption sometimes occasions some little variation in the rate of particular houses, though that of the district is always the same. Improvements of rent, by new buildings, repairs, etc., go to the discharge of the district, which occasions still further variations in the rate of particular houses.

在英国，如果按照年土地税的征收方法，房租税的税率和地租税是应当一致的。在不同的教区和行政区域，征收年土地税的评价常常都是一致的。从前极不公平，现在也还是这样。大概从全国来看的话，这税从地租上征收的比房租更多。据说，只有那些税率原本很高，房租又有回落的地区，每镑收3先令或者是4先令土地税，与实际房租比例相当。空置无人住的房子，估税的官吏总是出于好心，免除了税务，尽管法律规定是要纳税的。这样的免除有时候会引起特定房屋的税率变化，但是就全地区来看，税率一直是一样的。房屋建筑经过修缮之后，租金会上涨，但是房租税却没有变化。那么某些特定的房屋就会发生大的税率改变。

In the province of Holland every house is taxed at two and a half per cent of its value, without any regard either to the rent which it actually pays, or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its being tenanted or untenanted. There seems to be a hardship in obliging the proprietor to pay a tax for an untenanted house, from which he can derive no revenue, especially so very heavy a tax. In Holland, where the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does not exceed three per cent, two and a half per cent upon the whole value of the house must, in most cases, amount to more than a third of the building-rent, perhaps of

the whole rent. The valuation, indeed, according to which the houses are rated, though very unequal, is said to be always below the real value. When a house is rebuilt, improved, or enlarged, there is a new valuation, and the tax is rated accordingly.

荷兰境内的一切房屋，无论其实际房租，也不管是否有人居住，都按价值，征收2.5%的税。不过，对所有者不能因此获利的空置房屋强行缴税，而且还收如此重税，也实在是苛刻。荷兰的市场利息率，普通情况下，不到3%，而对整个房屋的价值课税到2.5%，这是很重的了，很多时候这金额会超过建筑物租，或全部租金的1/3以上。不过，虽然征税评价很不公平，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房屋实际价值的。如果房屋进行了重建和修缮，或是扩建，那么对房屋的价值就要重新评估了。

The contrivers of the several taxes which in England have, at different times, been imposed upon houses, seem to have imagined that there was some great difficulty in ascertaining, with tolerable exactness, what was the real rent of every house. They have regulated their taxes, therefore, according to some more obvious circumstances, such as they had probably imagined would, in most cases, bear some proportion to the rent.

各个时代，英格兰房屋税的制定者，似乎都认为以较高的准确性来制定每个房屋的实际房租，是很有些难处的。因此，他们就要通过明显的事实来做判断，也就是他们看来，对房租保留了一些比例的事实。

The first tax of this kind was hearth-money, or a tax of two

shillings upon every hearth. In order to ascertain how many hearths were in the house, it was necessary that the tax-gatherer should enter every room in it. This odious visit rendered the tax odious. Soon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refore, it was abolished as a badge of slavery.

这类税的始祖是炉捐，也就是对每个炉子征收2先令税。收税官为方便征税，对人民的居所挨着房间进行搜查。这种可憎的查访，使得这税同样令人憎恶。因此革命后，这种被视为奴隶制标志的税很快就被废除了。

The next tax of this kind was a tax of two shillings upon every dwelling-house inhabited. A house with ten windows to pay four shillings more. A house with twenty windows and upwards to pay eight shillings. This tax was afterwards so far altered that houses with twenty windows, and with less than thirty, were ordered to pay ten shillings, and those with thirty windows and upwards to pay twenty shillings. The number of windows can, in most cases, be counted from the outside, and, in all cases, without entering every room in the house. The visit of the tax-gatherer, therefore, was less offensive in this tax than in the hearth-money.

紧随其后的，是对每间房屋征税2先令的税。对于有14扇窗户的房屋，要增加4先令的税款，如果是大于等于20扇窗户，增收8先令。后来这项税的变化改变很大。凡是窗户数量在20扇，甚至是30扇以下的房屋，征收10先令，窗户数量大于等于30扇的房屋，征收20先令。收税官可以在室外统计窗户有多少扇，不必非要侵入人家的私宅，就没有收炉捐时的查访那样让人觉得受到冒犯了。

This tax was afterwards repealed, and in the room of it was established the window-tax, which has undergone, too, several alterations and augmentations. The window-tax, as it stands at present (January 1775), over and above the duty of three shillings upon every house in England, and of one shilling upon every house in Scotland, lays a duty upon every window, which, in England, augments gradually from twopence, the lowest rate, upon houses with not more than seven windows, to two shillings, the highest rate, upon houses with twenty-five windows and upwards.

之后，这项房屋税又被取消了，为了替代这税，又有了窗户税，这窗税前后也经历过几次修改和增补。到现在（1775年1月）在英格兰，每座屋子要收3先令的税，而苏格兰每座屋子征收1先令，此外，窗户还要另外征税。这税率也在不断上升，英格兰不到7扇窗户的房子，征收的是最低的税，是2便士，一直升到对大于等于25扇窗的房子，收最高的税，达到2先令。

The principal objection to all such taxes of the worst is their inequality, an inequality of the worst kind, as they must frequently fall much heavier upon the poor than upon the rich. A house of ten pounds rent in a country town may sometimes have more windows than a house of five hundred pounds rent in London; and though the inhabitant of the former is likely to be a much poorer man than that of the latter, yet so far as his contribution is regulated by the window-tax, he must contribute more to the support of the state. Such taxes are, therefore, directly contrary to the first of the four maxims above mentioned. They do not seem to offend much against any of the other three.

各种税最不得人心之处，就在于不平等。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对贫民征的税比对富人征的税还要重一些。一个乡间的房子，租金只要10镑，伦敦的房子要500镑租金，而前者比后者的窗户，还要多一些。即使前者主人家比后者要贫穷多少，但是要上缴的窗户税已经固定下来，前者人家，就只得多承担国家的税款。这样一来，这税就直接与前面所说的四项原则的头一项相冲了，但是对剩下的三条原则倒没有特别违背。

The natural tendency of the window-tax, and of all other taxes upon houses, is to lower rents. The more a man pays for the tax, the less, it is evident, he can afford to pay for the rent. Since the imposition of the window-tax, however, the rents of houses have upon the whole risen, more or less, in almost every town and village of Great Britain with which I am acquainted. Such has been almost everywhere the increase of the demand for houses, that it has raised the rents more than the window-tax could sink them; one of the many proofs of the great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and of the increasing revenue of its inhabitants.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tax, rents would probably have risen still higher.

窗户税，以及其他以房屋为对象的税款，一个自然的趋势，就是要房租更低。显然，一个人要缴纳的税款越多，就只好承担更少的房租。不过根据我所了解的，自从英国实行了窗户税，所有乡下村庄的房租，或多或少都有上涨。这是因为，各个地方对房子的需求增多了，也让房租增长，高过窗户税让房租减低的程度。这足以说明国家繁荣昌盛，居民的收入日渐增加。要是没有窗户税，或许房租要涨得更多。

Article II: Taxes on Profit, or upon the Revenue arising

from Stock

第二条、利润税，即从资本收入上的征税

The revenue or profit arising from stock naturally divides itself into two parts; that which pays the interest, and which belongs to the owner of the stock, and that surplus part which is over and above what is necessary for paying the interest.

资本生出的收入和利润，自然而然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支付利息，这部分归给资本所有者，另一部分是支付完利息以后的剩余利润。

This latter part of profit is evidently a subject not taxable directly. It is the compensation, and in most cases it is no more than a very moderate compensation, for the risk and trouble of employing the stock. The employer must have this compensation, otherwise he cannot, consistently with his own interest, continue the employment. If he was taxed directly, therefore, in proportion to the whole profit, he would be obliged either to raise the rate of his profit, or to charge the tax upon the interest of money; that is, to pay less interest. If he raised the rate of his profit in proportion to the tax, the whole tax, though it might be advanced by him, would be finally paid by one or other of two different sets of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he might employ the stock of which he had the management. If he employed it as a farming stock in the cultivation of land, he could raise the rate of his profit only by retaining a greater portion,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the price of a greater portion of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as this could be done only by a reduction of rent, the final payment of the tax would fall upon the landlord. If he employed it as a mercantile or manufacturing stock, he could raise the rate of his profit only by raising the price of his goods; in which case the final payment of the tax would fall altogether upon the consumers of those goods. If he did not raise the rate of his profit, he would be obliged to charge the whole tax upon that part of it which was allotted for the interest of money. He could afford less interest for whatever stock he borrowed, and the whole weight of the tax would in this case fall ultimately upon the interest of money. So far as he could not relieve himself from the tax in the one way, he would be obliged to relieve himself in the other.

很明显，对于后一部分的利润，不可以直接征税。因为这部分是对投资带来的风险和麻烦的偿还，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报偿相当有限。参与使用资本的人，须得有这报偿，才肯继续使用资本。要是得不到，考虑到个人的利益，就没人肯继续了。因此，他如果是要根据全部利润，按比例直接承担赋税，他就不得不提高自己的利润率，把税负转到货币利息上来承担，少付些利息。如果他根据征税的比例来提高自己的利润率，即便是所有的税都由他来垫付，最终还是照他的投资法，由其他两种人民来承担。如果他把资本充作农用，用于耕地，他就只能通过保留大部分土地生产物或价值，来提高利润率。这法子要想行得通，就必须得除去地租。这样一来，这税最后只要地主来支付了。如果他把这资本用在经商或制造业上，这种情况下，这税就要由消费者来出。要是他没有提高利润率，他就只要把全部税都转到利润中货币利息上去。对于借到的资本，他就只好给比较低的利息。全部的税，就从货币利息里面出。若是他用一个方式来减去赋税，他就会再去想其他法子。

The interest of money seems at first sight a subject equally capable of being taxed directly as the rent of land. Like the rent of land, it is a net produce which remains after completely compensating the whole risk and trouble of employing the stock. As a tax upon the rent of land cannot raise rents; because the net produce which remains after replacing the stock of the farmer, together with his reasonable profit, cannot be greater after the tax than before it, so, for the same reason, a tax upon the interest of money could not raise the rate of interest; the quantity of stock or money in the country, like the quantity of land, being supposed to remain the same after the tax as before it. The ordinary rate of profit, it has been shown in the first book, is everywhere regulated by the quantity of stock to be employed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f the employment, or of the business which must be done by it. But the quantity of the employment, or of the business to be done by stock, could neither be increased nor diminished by any tax upon the interest of money. If the quantity of the stock to be employed, therefore, was neither increased nor diminished by it, the ordinary rate of profit would necessarily remain the same. But the portion of this profit necessary for compensating the risk and trouble of the employer would likewise remain the same, that risk and trouble being in no respect altered. The residue, therefore, that portion which belongs to the owner of the stock, and which pays the interest of money, would necessarily remain the same too. At first sight, therefore, the interest of money seems to be a subject as fit to be taxed directly as the rent of land.

猛一看，货币利息似乎和地租一样能够直接课税，就如同地租一样，货币利息是经历过投资风险和麻烦以后余下的纯收入。对地租征税不能够提高地租，因为还了农业资本以及合理的利润以后，剩下的纯收入不可能在征税以后，比税前还多。同理，对货币利息征税，不

可能提高利息率，这是因为国家的资本量货币量，跟土地的数量是一样的，税前税后都一样。我在这部书的第一篇提到过：普通利润率，到处都是受可供使用的资本量对于使用的资本量的比例的支配。换言之，可用资本量对必须使用资本进行的营业量比例的支配作用，可以说处处可见。但任何利息税的变动，都不会使资本使用量，或使用资本进行的营业量相应变动。如果可供使用的资本不变，普通利润率也要保持不变。但是，冒着危险和困难得来的利润，也是保持不变的，因为危险和困难没有变化。因此，残余部分，即属于资本所有者，作为货币利息的部分也还是保持原来的水平。所以初步看来，货币利息好像是能够直接对其课税的，就像土地地租一样。

There are, however, two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which render the interest of money a much less proper subject of direct taxation than the rent of land.

不过，和地租相比，还是不好对货币利息直接征税。原因有两个：

First, the quantity and value of the land which any man possesses can never be a secret, and can always be ascertained with great exactness. But the whole amount of the capital stock which he possesses is almost always a secret, and can scarce ever be ascertained with tolerable exactness. It is liable, besides, to almost continual variations. A year seldom passes away, frequently not a month, sometimes scarce a single day, in which it does not rise or fall more or less. An inquisition into every man's private circumstances, and an inquisition which,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the tax to them, watched over all the fluctuations of his fortunes, would be a source of such continual and endless vexation as no

people could support.

第一，任何个人，其拥有的土地量多少，价值几何是不能保密的，而且可以进行准确的测定。然而某个人拥有多少资本，这个金额通常是保密的，几乎无法准确地测定。另外，资本额也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之中。不必说一年，就算是一个月、一天，也多少要发生变化。为了确定每个人适当地纳税额而对私人的情况进行调查，监视每个人的财产变动，这是让人生气，让人不能接受的事情。

Secondly, land is a subject which cannot be removed; whereas stock easily may. The proprietor of land is necessarily a citizen of the particular country in which his estate lies. The proprietor of stock is properly a citizen of the world, and is not necessarily attached to any particular country. He would be apt to abandon the country in which he was exposed to a vexatious inquisition, in order to be assessed to a burdensome tax, and would remove his stock to some other country where he could either carry on his business, or enjoy his fortune more at his ease. By removing his stock he would put an end to all the industry which it had maintained in the country which he left. Stock cultivates land; stock employs labour. A tax which tended to drive away stock from any particular country would so far tend to dry up every source of revenue both to the sovereign and to the society. Not only the profits of stock, but the rent of land and the wages of labour would necessarily be more or less diminished by its removal.

第二，土地虽然不能转移，但是资本很容易就转移了。土地所有者，一定是他的土地所在国家的一员。而资本所有者却不是这样，他可以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不需要属于某个特定的国家。如

果一个国家为了征收重税，那么此人为了摆脱烦扰的调查，就只好去别的国家。并且他可以把资产转移到其他随便什么国家，只要哪个国家能让他继续经营事业，自在地享受自己的财富。一旦他转移了资本，那么本来在该国经营的各项事业都要停止。耕作土地需要资本，雇佣劳动需要资本。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君主和全社会都要因此减少收入，资本利润、地租、劳动工资都要定然降低。

The nations, accordingly, who have attempted to tax the revenue arising from stock, instead of any severe inquisition of this kind, have been obliged to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some very loose, and, therefore, more or less arbitrary, estimation. The extreme inequality and uncertainty of a tax assessed in this manner can be compensated only by its extreme moderation, in consequence of which every man finds himself rated so very much below his real revenue that he gives himself little disturbance though his neighbour should be rated somewhat lower.

因此，要是国家想对资本收入征税，从来不会进行严苛的调查，即便是不得已，也要为了让人满意，而采取随意的估计方法，比较宽松。这样的征税方法并不公平，也只得用非常低的税率补偿。这样做的话，人人都会认为，既然按照自己的实际收入来说，已经缴税比较低了，那么邻居即便是交的税比他还要低一些，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By what is called the land-tax in England, it was intended that stock should be taxed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land. When the tax upon land was at four shillings in the pound, or at one-fifth of the supposed rent, it was intended that stock should be taxed at one-fifth of the supposed interest. When the present annual land-tax was

first imposed, the legal rate of interest was six per cent. Every hundred pounds stock, accordingly, was supposed to be taxed at twenty-four shillings, the fifth part of six pounds. Since the legal rate of interest has been reduced to five per cent every hundred pounds stock is supposed to be taxed at twenty shillings only. The sum to be raised by what is called the land-tax was divided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principal towns. The greater part of it was laid upon the country; and of what was laid upon the towns, the greater part was assessed upon the houses. What remained to be assessed upon the stock or trade of the towns (for the stock upon the land was not meant to be taxed) was very much below the real value of that stock or trade. Whatever inequalities, therefore, there might be in the original assessment gave little disturbance. Every parish and district still continues to be rated for its land, its houses, and its stock,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assessment; and the almost universal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which in most places has raised very much the value of all these, has rendered those inequalities of still less importance now. The rate, too, upon each district continuing always the same, the uncertainty of this tax so far as it might be assessed upon the stock of any individual, has been very much diminished, as well as rendered of much less consequence. I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ands of England are not rated to the land-tax at half their actual valu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tock of England is, perhaps, scarce rated at the fiftieth part of its actual value. In some towns the whole land-tax is assessed upon houses, as in Westminster, where stock and trade are free. It is otherwise in London.

英格兰的土地税，本来要和资本税税率保持一样。土地税率如果是按照地租的1/5来收，也就是每镑收4先令，资本收税也是利息的1/5。现行土地税刚刚推出的时候，法定利息率本来定的是6%，这样

算来，100镑资本收税24先令，即6镑中的1/5。法定利息减到5%的时候，每个100镑资本，应该就只收20先令。征收土地税，主要是乡村、城镇负担，而且乡村承担了一大部分。市镇方面负担的部分，大半是课自房屋，其对市镇上的资本或营业（因为对于投在土地上的资本不打算课税）征税的部分，远远低于资本营业的实际价值。因此，原始估定的税额虽然不算公平，但因为程度较轻，还是没有产生大的困扰。今天全国各地都大大繁荣起来了，在许多地方，土地、房屋及资本的价值已经大有提高，然而各教区、各地区对于这一切的课税，却依旧是继续使用那最初估定的税额，所以在现在看来，那种不公平，更无甚关系。再加上各个地区税率少有变化，那么征收个人资本的时候，这项税的不确定性不再巨大，也不再重要。如果虽英格兰大部分土地估定税额的时候，依据的价值还不足实际价值半数，那么，英格兰大部分资本，就恐怕没有依其实际价值1/50估定税额。在某些城市和乡镇，如威斯敏斯特，土地税都是针对房屋征收，并不对资本和营业征税。不过，伦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

In all countries a severe inquisition into the circumstances of private persons has been carefully avoided.

在一切国家，都小心规避了对个人私事的严苛调查。

At Hamburg every inhabitant is obliged to pay to the state one-fourth per cent of all that he possesses; and as the wealth of the people of Hamburg consists principally in stock, this tax may be considered as a tax upon stock. Every man assesses himself, an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magistrate, puts annually into the public coffer a certain sum of money which he declares upon oath to be one-fourth per cent of all that he possesses, but without declaring what it amounts to, or being liable to any examination upon that subject.

This tax is generally supposed to be paid with great fidelity. In a small republic, where the people have entire confidence in their magistrates, are convinced of the necessity of the tax for the support of the state, and believe that it will be faithfully applied to that purpose, such conscientious and voluntary payment may sometimes be expected. It is not peculiar to the people of Hamburg.

在汉堡，每一位居民，根据一切所有的财产对政府交纳2.5‰的税款。汉堡的居民主要以资本为财产，所以这税事实上是资本税。每个人要交给国家多少税，自己估算，在长官面前交给国家金库，并且发誓，这确实是自己财产的2.5‰，不过，居民并不需要公布自己财产的数额，也没有责任接受这方面的盘查。缴纳这样的税一般都是很诚实的，因为在小共和国中，每个人对长官都抱有完全的信心，而且认为税收是维持国家运转的必要，而且认为，自己缴纳的税款都会实实在在地用在国家事务上，这种出于自愿而又凭着良心的缴税方法，不限于在汉堡人民上能够有效，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成功。

The canton of Unterwald in Switzerland is frequently ravaged by storms and inundations, and is thereby exposed to extraordinary expenses. Upon such occasions the people assemble, and every one is said to declare with the greatest frankness what he is worth in order to be taxed accordingly. At Zurich the law orders that, in cases of necessity, every one should be taxed in proportion to his revenue- the amount of which he is obliged to declare upon oath. They have no suspicion, it is said, that any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will deceive them. At Basel the principal revenue of the state arises from a small custom upon goods exported. All the citizens make oath that they will pay every three months all the taxes imposed by the law. All merchants and even all innkeepers are trusted with keeping themselves the account of the goods which they sell either

within or without the territory. At the end of every three months they send this account to the treasurer with the amount of the tax computed at the bottom of it. It is not suspected that the revenue suffers by this confidence.

瑞士翁德沃尔德联邦，暴雨或洪水频发，因而时常遭受灾害，所以要另外筹集资费。这样的时候，人民总是集合在一处，以非常坦诚的态度，说明自己的财产数量，以此作为征税的依据。在久里奇，根据法律，有必要的时候，法律命令每个人根据收入的一定比例纳税，而且发誓收入数量属实。据说，行政管理部门，从不猜疑同胞市民会对财产有所隐瞒。在巴西尔，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对出口货物征收的关税，而且数额不多。所有的市民，都应该发誓每3个月都上交法律规定的一定额度的税。所有商人，包括所有旅店店主，都应该发誓，亲自登记自己在国土内外买卖商品的情况。每到3个月的月末，把计算单以及应该上缴的税额呈给国库的官吏。不会有人担心，因为人民不诚实而导致国库遭受损失

To oblige every citizen to declare publicly upon oath the amount of his fortune must not, it seems, in those Swiss cantons be reckoned a hardship. At Hamburg it would be reckoned the greatest. Merchants engaged in the hazardous protects of trade all tremble at the thoughts of being obliged at all to expose the real state of their circumstances. The ruin of their credit and the miscarriage of their projects, they foresee, would too often be the consequence. A sober and parsimonious people, who are strangers to all such projects, do not feel that they have occasion for any such concealment.

让瑞士联邦中的每一位市民，公开发誓自己拥有多少财产似乎并

非难事，如果是在汉堡，那就是了不得的难处了。对于做冒险性生意的商人来说，他们随时都在忧虑需要公开财产的真正状况，担惊受怕。他觉得，这肯定会毁坏他的信用，让企业倒闭。而那些完全没从事过冒险商业的淳朴民众，却不会觉得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财产。

In Holland, soon after the exaltation of the late Prince of Orange to the stadtholdership, a tax of two per cent, or the fiftieth penny, as it was called, was imposed upon the whole substance of every citizen. Every citizen assessed himself and paid his tax in the same manner as at Hamburg, and it was in general supposed to have been paid with great fidelity. The people had at that time the greatest affection for their new government, which they had just established by a general insurrection. The tax was to be paid but once, in order to relieve the state in a particular exigency. It was, indeed, too heavy to be permanent. In a country where the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seldom exceeds three per cent, a tax of two per cent amounts to thirteen shillings and fourpence in the pound upon the highest net revenue which is commonly drawn from stock. It is a tax which very few people could pay without encroaching more or less upon their capitals. In a particular exigency the people may, from great public zeal, make a great effort, and give up even a part of their capital in order to relieve the state. But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y should continue to do so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and if they did, the tax would ruin them so completely as to render them altogether incapable of supporting the state.

从前的奥伦治公爵担任总督一职后不久，荷兰就对全市公民征收2%的财产税，也就是每50个便士收1便士的税。一般情况下，可以认为他们诚信缴税，那时候的人民，因为政府是经过大暴动才刚刚建立的新政府，而对政府心怀热爱。何况这个税不是要永久征收的重税，

只是要为了救济国家的负担征收一次而已。荷兰整个国家当时的市场利息率鲜有超过3%的，而今对一般资本的最高纯收入收税2%，每镑要收取13先令4便士。为了承担这样的重税，人民只好让资本受到损害。国家危难之时，人民可以一腔热血地捐出一部分资产，但不可能长期这样做。若是长期这样，这税很快就会对人民造成损害，让他们再也无力负担整个国家的费用。

The tax upon stock imposed by the Land-tax Bill in England, though it is proportioned to the capital, is not intended to diminish or take away any part of that capital. It is meant only to be a tax upon the interest of money proportioned to that upon the rent of land, so that when the latter is at four shillings in the pound, the former may be at four shillings in the pound too. The tax at Hamburg and the still more moderate tax of Unterwald and Zurich are meant, in the same manner, to be taxes, not upon the capital, but upon the interest or net revenue of stock. That of Holland was meant to be a tax upon the capital.

英格兰收取的土地税，虽然是和资本额所要征收的比例相当，却不是要减少或者分走一部分资本，而是要按照和土地地租税的同等比例，对货币利息收同样的税。因此如果地租税是每镑收4先令，货币利息也一样收这么多税。汉堡的收税，还有翁德沃尔以及久里奇征收的更轻微的税，不是把资本作为征收对象，而是以资本利息、纯收入为征收对象的。而荷兰则是把资本列为征收对象。

Taxes upon as Profit of particular Employments

特定营业利润税

In some countries extraordinary taxes are imposed upon the profits of stock, sometimes when employed in particular branches of trade, and sometimes when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有些国家，在资本利润上还征收特别的税款，有时候是针对特殊商业部门的资本，有时候是针对农业资本。

Of the former kind are in England the tax upon hawkers and pedlars, that upon hackney coaches and chairs, and that which the keepers of ale-houses pay for a licence to retail ale and spirituous liquors. During the late war, another tax of the same kind was proposed upon shops. The war having been undertaken, it was said, in defence of the trade of the country, the merchants, who were to profit by it, ought to contribute towards the support of it.

在英格兰，前一种税包括针对小贩、行商所征收的税款，以及对出租马车、肩舆和出租马车的收税，还有酒店店主为了取得零售麦酒、火酒的执照而缴纳的税款。而在近期的战争中，有人提议对商店争取同样的税。战争开始后，又有人说，鉴于战争对本国的商业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因此而得到好处的商人，没有理由不出资支援战争。

A tax, however, upon the profits of stock employed in any particular branch of trade can never fall finally upon the dealers (who must in all ordinary cases have their reasonable profit, and where the competition is free can seldom have more than that profit), but always upon the consumers, who must be obliged to pay in the price of the goods the tax which the dealer advances; and

generally with some overcharge.

对于特殊的商业部门而言，对它们的资本征税，是由消费者承担这笔钱，而不是商贩承担。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商人应当获得合理的利润，而且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商人也几乎不能额外获得什么利润。消费者通过支付购买的价格，偿还了商人垫付的税款。

A tax of this kind when it is proportioned to the trade of the dealer is finally paid by the consumer, and occasions no oppression to the dealer. When it is not so proportioned, but is the same upon all dealers, though in this case, too, it is finally paid by the consumer, yet it favours the great, and occasions some oppression to the small dealer. The tax of five shillings a week upon every hackney coach, and that of ten shillings a year upon every hackney chair, so far as it is advanced by the different keepers of such coaches and chairs, is exactly enough proportioned to the extent of their respective dealings. It neither favours the great, nor oppresses the smaller dealer. The tax of twenty shillings a year for a licence to sell ale; of forty shillings for a licence to sell spirituous liquors; and of forty shillings more for a licence to sell wine, being the same upon all retailers, must necessarily give some advantage to the great, and occasion some oppression to the small dealers. The former must find it more easy to get back the tax in the price of their goods than the latter. The moderation of the tax, however, renders this inequality of less importance, and it may to many people appear not improper to give some discouragement to the multiplication of little ale-houses. The tax upon shops, it was intended, should be the same upon all shops. It could not well have been otherwise. I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to proportion with tolerable exactness the tax upon a shop to the extent of the trade

carried on in it without such an inquisition as would have been altogether insupportable in a free country. If the tax had been considerable, it would have oppressed the small, and forced almost the whole retail trade into the hands of the great dealers. The competition of the former being taken away, the latter would have enjoyed a monopoly of the trade, and like all other monopolists would soon have combined to raise their profits much beyond what was necessary for the payment of the tax. The final payment, instead of falling upon the shopkeeper, would have fallen upon the consumer, with a considerable overcharge to the profit of the shopkeeper. For these reasons the project of a tax upon shops was laid aside, and in the room of it was substituted the subsidy, 1759.

这种税，如果和商人的贸易量成比例，那么消费者承担这笔费用，不会给商人带来额外负担。如果这税并不和贸易量成正比，却让所有商人都要缴纳，那么即便这税都是从消费者身上出，那也是对大商人有益，却压榨了小商人。每周对每辆出租马车征税5先令，对每乘出租肩舆征税10先令，当这种税不超过由车舆所有主分别垫付的范围时，就正好与他们各自的营业范围成比例。这样收税，对大商人和小商人都是公平的，既不会有利也不会压榨。领麦酒贩卖执照所纳的税，每年20先令；领火酒贩卖执照所纳的税，每年20先令；领葡萄酒贩卖执照所纳的税，每年80先令，对于零售商而言，这样的税制把他们一视同仁，较大的零售商会受益，而小商贩肯定会受压榨。比起小商人，大商人更容易从货物的价格上赚回自己垫付的税款。不过，由于税率并不很高，尽管不公平也不太要紧。而且在不少人眼里，小麦酒馆越来越多，适当阻挡它们过分的增加也没什么不妥的。对于商店所征收的税款，本来是应该对所有商店都一视同仁的，不过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如果要想比较精确地根据贸易额的比例征收，那就只有进行严格的调查。这种调查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绝难得到人民的支持。而且，如果税收的太重，那么小商人就会失却他们的竞争力，大商人垄断市场。就像其他垄断者一样，这些大的垄断者会串通一气，

大大提高利润到必须纳税的额度之上。这样一来，商店的税款负担，最终是落在了消费者身上，而且消费者还要额外承担店主希求的利润。考虑到这些种种不便，于是就用1759补助税代替了上述税。

What in France is called the personal taille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tax upon the profits of stock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that is levied in any part of Europe.

法兰西有一种所谓个人贡税，这恐怕是针对农业资本的利润所课的最重的税了。全欧洲都实行这种税。

In the disorderly state of Europe during the prevalence of the feudal government, the sovereign was obliged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taxing those who were too weak to refuse to pay taxes. The great lords, though willing to assist him upon particular emergencies, refused to subject themselves to any constant tax, and he was not strong enough to force them. The occupiers of land all over Europe we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originally bondmen.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they were gradually emancipated. Some of them acquired the property of landed estates which they held by some base or ignoble tenure, sometimes under the king, and sometimes under some other great lord, like the ancient copy-holders of England. Others without acquiring the property, obtained leases for terms of years of the lands which they occupied under their lord, and thus became less dependent upon him. The great lords seem to have beheld the degree of prosperity and independency which this inferior order of men had thus come to enjoy with a malignant and contemptuous indignation, and willingly consented that the sovereign should tax them. In some

countries this tax was confined to the lands which were held in property by an ignoble tenure; and, in this case, the taille was said to be real. The land-tax established by the late King of Sardinia, and the taille in the provinces of Languedoc, Provence, Dauphine, and Brittany, in the generality of Montauban, and in the elections of Agen and Comdom, as well as in some other districts of France, are taxes upon lands held in property by an ignoble tenure. In other countries the tax was laid upon the supposed profits of all those who held in farm or lease lands belonging to other people, whatever might be the tenure by which the proprietor held them; and in this case the taille was said to be personal.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provinces of France which are called the Countries of Elections the taille is of this kind. The real taille, as it is imposed only upon a part of the lands of the country, is necessarily an unequal, but it is not always an arbitrary tax, though it is so upon some occasions. The personal taille, as it is intended to be proportioned to the profits of a certain class of people which can only be guessed at, is necessarily both arbitrary and unequal.

从前，欧洲封建政府处处都是，这些国家的君主，常常在情势所迫之时，退而求其次，对无力拒绝纳税的人们征税；而对大领主们，君主无力强迫他们纳税。大领主们愿意为君主救急，却也不愿意承认要永久纳税，欧洲的土地所有者大多出身农奴。后来，欧洲大部分农奴获得解放，其中有一部分就得到了地产。他们在国王之下或者是大领主下，以贱奴条件保有地产。其他没有能够获得保地权的人，在领主之下，租其所占有的土地若干年。这样一来，他们对领主的依附性也有所降低。大领主不愿意看到地位低下的这些人，现在居然能够获得繁荣与独立，心有不甘，巴不得君主对他们征收重税。在一些国家，这种税只在贱奴条件下保存的土地上征收。这样的情况下，这种税就是不动产的贡税。沙廷尼阿故王设定的土地税，以及在兰多克、普冯斯、多菲那及布列塔尼各州，在芒托本课税区，在亚琛及康顿选

举区，乃至在法兰西其他若干地区，征收的贡税都是对上述保有地上征收的。不管保有土地的条件是什么，其他国家中这项税的征收，是以租借他人土地的应得利润为基础的。可以说，这项税就是个人的贡税。这种税法，在法兰西的各个选举区盛行。这税虽然不尽公平，不过毕竟不是随意征收的。而个人的贡税，主要是针对某个特定阶级的利润按比例征收，而且还是以推测的利润数额为基础，所以一定是任意专断，缺少公平的。

In France the personal taille at present (1775) annually imposed upon the twenty generalities called the Countries of Elections amounts to 40,107,239 livres, 16 sous. The proportion in which this sum is assessed upon those different provinces varies from year to year according to the reports which are made to the king's council concerning the goodness or badness of the crops, as well as other circumstances which may either increase or diminish their respective abilities to pay. Each generality is divided into a certain number of elections, and the proportion in which the sum imposed upon the whole generality is divided among those different elections varies likewise from year to year according to the reports made to the council concerning their respective abilities. It seems impossible that the council, with the best intentions, can ever proportion with tolerable exactness either of those two assessments to the real abilities of the province or district upon which they are respectively laid. Ignorance and misinformation must always, more or less, mislead the most upright council. The proportion which each parish ought to support of what is assessed upon the whole election, and that which each individual ought to support of what is assessed upon his particular parish, are both in the same manner varied, from year to year, according as circumstances are supposed to require. These circumstances are judged of, in the one case, by the officers of the election, in the other by those of the parish, and

both the one and the other are, more or less, under the direc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intendant. Not only ignorance and misinformation, but friendship, party animosity, and private resentment are said frequently to mislead such assessors. No man subject to such a tax, it is evident, can ever be certain, before he is assessed, of what he is to pay. He cannot even be certain after he is assessed. If any person has been taxed who ought to have been exempted, or if any person has been taxed beyond his proportion, though both must pay in the meantime, yet if they complain, and make good their complaints, the whole parish is reimposed next year in order to reimburse them. If any of the contributors become bankrupt or insolvent, the collector is obliged to advance his tax, and the whole parish is reimposed next year in order to reimburse the collector. If the collector himself should become bankrupt, the parish which elects him must answer for his conduct to the receiver general of the election. But, as it might be troublesome for the receiver to prosecute the whole parish, he takes at his choice five or six of the richest contributors and obliges them to make good what had been lost by the insolvency of the collector. The parish is afterwards reimposed in order to reimburse those five or six. Such reimpositions are always over and above the taille of the particular year in which they are laid on.

现在的法国（1775年）所行的个人的贡税，每年在20个所谓的选举区征收，数额达到40,107,239里弗赫16苏。枢密院会根据得到的关于各州收成如何的报告，以及其他关于各州纳税能力的报告，变更各州承担赋税的比例。每个征税区内又划分为各个选举区；枢密院同样根据各个选举地区的纳税能力的报告，每年分配不同的纳税额。不过这样看来，虽然枢密院的出发点很好，但是也不太可能以完全正确的比例决定在某一年，某个州、区或者是地区实际应该纳税多少。由于无知或者是错误的信息，即使是最公正的枢密院，也会判断失误。

根据环境的要求，每一年，个人对自己所在教区应该纳税的比例，以及教区对整个选举区应当纳税的比例，都是有所变化的。教区的税额，由选举区的收税员判定，而每个个人交税多少，是教区的收税员来判断的，这两类收税员，都处于州长的指令和影响之下。据说，经常影响收税员判断的原因，不仅有无知、信息错误等，还有结党营私，或者是私人恩怨等。很显然，在没有评估出应交税额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该交多少的，甚至有时候评定之后也不确定。要是一个本来应该被免除税负的人，却被判定要交税，或者是该交税的人，却被判定要交超过比例的税，那么他们必须先暂时把税交上，然后再投诉。如果理由正当，那么教区为了公平，次年全教区都要追征一个附额，来补偿这些人。要是收税员自己破了产，他的教区，要对总收税员负责这个破产收税员的行动。总收税员为了免去控诉整个教区的麻烦，就会随意选出教区中最为富有的几个人来填补破产收税员的损失，随后再追征整个教区，补偿这几个人。

When a tax is imposed upon the profits of stock in a particular branch of trade, the traders are all careful to bring no more goods to market than what they can sell at a price sufficient to reimburse them for advancing the tax. Some of them withdraw a part of their stocks from the trade, and the market is more sparingly supplied than before. The price of the goods rises, and the final payment of the tax falls upon the consumer. But when a tax is imposed upon the profits of stock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it is not the interest of the farmers to withdraw any part of their stock from that employment. Each farmer occupies a certain quantity of land, for which he pays rent. For the proper cultivation of this land a certain quantity of stock is necessary, and by withdrawing any part of this necessary quantity, the farmer is not likely to be more able to pay either the rent or the tax. In order to pay the tax, it can never be his interest to diminish the quantity of his produce, nor consequently to supply the market more sparingly than before. The tax, therefore,

will never enable him to raise the price of his produce so as to reimburse himself by throwing the final payment upon the consumer. The farmer, however, must have his reasonable profit as well as every other dealer, otherwise he must give up the trade. After the imposition of a tax of this kind, he can get this reasonable profit only by paying less rent to the landlord. The more he is obliged to pay in the way of tax the less he can afford to pay in the way of rent. A tax of this kind imposed during the currency of a lease may, no doubt, distress or ruin the farmer. Upon the renewal of the lease it must always fall upon the landlord.

当一种税征收于某个特定商业部门的时候，商人们就会谨慎起来，防止商品货物量多于能卖掉的量，最多达到足够垫付税款的量就够了。他们有的从交易市场上收回部分资本，减少供给。国货价格很少大幅上涨，税负最后都由消费者承担了。但是，当一种税把农业资本利润作为基础征收的时候，农人如撤回一部分资本，一定得不到好处。各农民对自己占用的一定土地支付地租。要想合理耕作土地，必须要一定的资本。如果农民把这必须的资本撤回一部分，支付地租和赋税的能力就会降低。为付税，他不能减少农作物产量，也不能减少上市的农产品供给量。因此，这种税不会让他通过抬高产品价格，从消费者身上取得自己支付的税款。不过，像其他行业的从事者一样，农民也要保证自己获得合理的利润，不然他们就要转行。如果对农民施加这样的税负，农民还想保证获得合理的利润，唯一的途径就是少付给地主地租。他必须缴付的赋税愈多，他能够上交的地租就愈少。在租约还没满期，就对农民收这种税，那农民很可能要破产。可是，当租约满期，可以重新续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赋税转移在地主身上。

In the countries where the personal taille takes place, the farmer is commonly assessed in proportion to the stock which he

appears to employ in cultivation. He is, upon this account, frequently afraid to have a good team of horses or oxen, but endeavours to cultivate with the meanest and most wretched instruments of husbandry that he can. Such is his distrust in the justice of his assessors that he counterfeits poverty, and wishes to appear scarce able to pay anything for fear of being obliged to pay too much. By this miserable policy he does not, perhaps, always consult his own interest in the most effectual manner, and he probably loses more by the diminution of his produce than he saves by that of his tax. Though, in consequence of this wretched cultivation, the market is, no doubt, somewhat worse supplied, yet the small rise of price which may occasion, as it is not likely even to indemnify the farmer for the diminution of his produce, it is still less likely to enable him to pay more rent to the landlord. The public, the farmer, the landlord, all suffer more or less by this degraded cultivation. That the personal taille tends, in many different ways, to discourage cultivation, and consequently to dry up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the wealth of every great country, I have already had occasion to observe in the third book of this Inquiry.

在有个人贡税制度的国家，农民的赋税应该缴纳多少，是根据耕作中使用了多少成本，按比例来征收的。因为这样的情由，他常常害怕用了好马好牛，而宁愿去使用最粗劣糟糕的农具。农民不相信估税官的公正性，总是假装贫穷，生怕对方要自己缴纳重税。采用这可怜策术的，大概没有好好考虑他自己的利益吧。他由于不用好工具造成的损失，比减少的赋税还多。这种恶劣耕作的结果，就减少了市场供给，而且造成了轻微的价格上涨，但是这一点价格的补偿，恐怕就连赔偿他减少生产物的损失还嫌不够，更不能让他有余力还地租。这种倒退了的耕作水平，使得公共收入、农民、地主，都多少遭受损害。个人的贡税，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阻碍耕作，后果就是让国家财富的主要源泉趋于干涸，这一点我在本书第三篇已经进行过阐述了。

What are called poll-taxes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North America, and in the West Indian Islands annual taxes of so much a head upon every negro, are properly taxes upon the profits of a certain species of stock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As the planters a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both farmers and landlords, the final payment of the tax falls upon them in their quality of landlords without any retribution.

北美南部各州和西印度群岛，都有所谓的人头税，也就是每个黑奴每一年都要交税。这也就是一项以农业资本利润为征收基础的赋税。鉴于耕作者中有很大部分兼具农民和地主两个身份，所以最后，他们以地主的身份承担了这税的最终支付，没有什么报偿。

Taxes of so much a head upon the bondmen employed in cultivation seem anciently to have been common all over Europe. There subsists at present a tax of this kind in the empire of Russia. It is probably upon this account that poll-taxes of all kinds have often been represented as badges of slavery. Every tax, however, is to the person who pays it a badge, not of slavery, but of liberty. It denotes that he is subject to government, indeed, but that, as he has some property, he cannot himself be the property of a master. A poll-tax upon slaves is altogether different from a poll-tax upon freemen. The latter is paid by the persons upon whom it is imposed; the former by a different set of persons. The latter is either altogether arbitrary or altogether unequal, and in most cases is both the one and the other; the former, though in some respects unequal, different slaves being of different values, is in no respect arbitrary. Every master who knows the number of his own slaves knows exactly what he has to pay. Those different taxes, however, being

called by the same name,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of the same nature.

全欧洲都施行过对作为农业工具的农奴征收的税款，到现在俄罗斯都还有此税。由于人头税的历史是这样的，所以这项税被看作是奴隶制度的象征。但是，对于每个纳税者来讲，纳税不但说明不是奴隶，反而表明这个人是自由的。一个人要纳税，虽然表示他是归政府管辖的，但他既有财产需要纳税，他这个人就不可能是一种财产。加在奴隶身上的人头税，自由人缴纳人头税，完全不是一回事。自由人自行支付税款，而奴隶是由其他不同阶级的人支付。后者时有不公平征收，甚至随意抽征，而很多时候兼具随意性和不公平性。至于对奴隶征收人头税，虽不公平，但是是根据不同奴隶的价值而定，也不是随便收的。奴隶主知道自己有几个奴隶，就清楚应当纳税多少。不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头税总被看作性质相同，大概是因为名称一致的原因。

The taxes which in Holland are imposed upon men- and maid-servants are taxes, not upon stock, but upon expense, and so far resemble the taxes upon consumable commodities. The tax of a guinea a head for every man-servant which has lately been imposed in Great Britain is of the same kind. It falls heaviest upon the middling rank. A man of two hundred a year may keep a single manservant. A man of ten thousand a year will not keep fifty. It does not affect the poor.

荷兰对男仆女仆征收税款，是从开支上来而不是从资本上来，就好比对消费品征收的消费税。近期，英国对于每个男仆课税21先令，与荷兰的仆役税乃同种税收。这项税给中等阶级造成了最沉重的负担，因为年入百镑的中等阶级需要雇佣一个男仆，而年入万镑的人却

不可能按收入加倍，用上50个男仆。而贫民阶层，则完全不受影响。

Taxes upon the profits of stock in particular employments can never affect the interest of money. Nobody will lend his money for less interest to those who exercise the taxed than to those who exercise the untaxed employments. Taxes upon the revenue arising from stock in all employments where the government attempts to levy them with any degree of exactness, will, in many cases, fall upon the interest of money. The Vingtieme, or twentieth penny, in France is a tax of the same kind with what is called the land-tax in England, and is assessed, in the same manner, upon the revenue arising from land, houses, and stock. So far as it affects stock it is assessed, though not with great rigour, yet with much more exactness than that part of the land-tax of England which is imposed upon the same fund. It, in many cases, falls altogether upon the interest of money. Money is frequently sunk in France upon what are called Contracts for the constitution of a rent; that is, perpetual annuities redeemable at any time by the debtor upon repayment of the sum originally advanced, but of which this redemption is not exigible by the creditor except in particular cases. The Vingtieme, seems not to have raised the rate of those annuities, though it is exactly levied upon them all.

在特定用途的资本利润上征税，对货币的利息并无影响。放债的人不会从把资本用于有税用途的人身上收低利息，却从把资本用于收无税用途的人收取高利息。如果政府试图以比较精确的比例，对用在各种方面的资本的利润全部课税，那这税多数情况下，要从货币利息上收取。法兰西的1/20即20便士取一的税，与英格兰被称作土地税的税种相同，征收对象都是土地、房屋及资本的收入。法兰西虽然并未对资本严格收税，却比英格兰土地税对资本的征收正确得多。很多情

况下，这税完全从货币利息上面出。在法兰西，人们的钱大都投在了一种永久年金，也就是年金契约上，债务者可以随时清偿金额，只要他们能力足够，不过他们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能请求清偿。虽然一切年金都要上交1/20二十取一税，但好像也没有提高年金率。

Appendix to Articles I and II.

第一条和第二条的附录

Taxes upon the Capital Value of Land, Houses, and Stock

加在土地、房屋、资财上的资本价值的税

While property remains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same person, whatever permanent taxes may have been imposed upon it, they have never been intended to diminish or take away any part of its capital value, but only some part of the revenue arising from it. But when property changes hands, when it is transmitted either from the dead to the living, or from the living to the living, such taxes have frequently been imposed upon it as necessarily take away some part of its capital value.

对一个人的财产征税，无论多久，都不是要取走财产本身的部分，只是拿走财产收入的一部分。但当财产主人有变，由死者转到生者或由一个生者转到另一个生者时，就要对财产征收去除一部分资本价值的税款。

The transference of all sorts of property from the dead to the living, and that of immovable property, of lands and houses, from the living to the living, are transactions which are in their nature either public and notorious, or such as cannot be long concealed. Such transactions, therefore, may be taxed directly. The transference of stock, or movable property, from the living to the living, by the lending of money, is frequently a secret transaction, and may always be made so. It cannot easily, therefore, be taxed directly. It has been taxed indirectly in two different ways; first, by requiring that the deed containing the obligation to repay should be written upon paper or parchment which had paid a certain stamp-duty, otherwise not to be valid; secondly, by requiring, under the like penalty of invalidity, that it should be recorded either in a public or secret register, and by imposing certain duties upon such registration. Stamp-duties and duties of registration have frequently been imposed likewise upon the deeds transferring property of all kinds from the dead to the living, and upon those transferring immovable property from the living to the living, transactions which might easily have been taxed directly.

各种形式的财产，如果从逝者转移给生者，或者由生者把不动产转移给另一个生者，如土地、房屋，这转移是公开的，无法长久隐瞒，所以要直接对这种对象收税。至于生者彼此间在借贷关系上发生的资本或动产的转移，却是一直保持秘密。对于这秘密转移，不容易直接征税，那就采用间接征税：第一，要求凡债务契券，如果要发生效力，必须写在缴纳过印花税的专门用纸或羊皮纸上；第二，要求财产转赠行为，要想有效，必须登记在公开或秘密的簿册上，并征收一定的注册税。上述印花税和注册税的征收，还常见于对于容易直接课税的财产转移，即对各种证明财产从逝者转移给生者的证件，及对不动产由一生者转移给另一生者的有关证件。

The Vicesima Hereditatum, the twentieth penny of inheritances imposed by Augustus upon the ancient Romans, was a tax upon the transference of property from the dead to the living. Dion Cassius, the author who writes concerning it the least indistinctly, says that it was imposed upon all successions, legacies, and donations in case of death, except upon those to the nearest relations and to the poor.

缴纳1/20的遗产税是古罗马时代奥古斯塔斯设定的，这是一种财产由逝者转给活人的时候所需要课的税。迪昂·卡西阿斯详细记载了此项税。据他解释，这种税，课有人去世的时候，发生的继承、遗赠和赠与等事项上，除非是给了最亲近的亲属，或贫困的人才不用缴纳税款。

Of the same kind is the Dutch tax upon successions. Collateral successions are taxed,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relation, from five to thirty per cent upon the whole value of the succession. Testamentary donations, or legacies to collaterals, are subject to the like duties. Those from husband to wife, or from wife to husband, to the fiftieth penny. The Luctuosa Hereditas, the mournful succession of ascendants to descendants, to the twentieth penny only. Direct successions, or those of descendants to ascendants, pay no tax. The death of a father, to such of his children as live in the same house with him, is seldom attended with any increase, and frequently with a considerable diminution of revenue, by the loss of his industry, of his office, or of some life-rent estate of which he may have been in possession. That tax would be cruel and oppressive which aggravated their loss by taking from them any part of his succession. It may, however, sometimes be otherwise with those children who, in the language of the Roman law, are said to be

emancipated; in that of the Scotch law, to be forisfamiliated; that is, who have received their portion, have got families of their own, and are supported by funds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of those of their father. Whatever part of his succession might come to such children would be a real addition to their fortune, and might therefore, perhaps, without more inconveniency than what attends all duties of this kind, be liable to some tax.

荷兰收继承税，也是一样。旁系继承，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对其继承财产的总价值，征收5%乃至30%的税。如果是遗赠给旁系亲属，也同样征收此税。配偶遗赠，不论谁赠与谁接受，统一征税1/15。后辈去世，给长辈的那种悲惨的继承，则仅税1/20。直接继承，或者说长辈把东西给后辈继承，无须交税。父亲之死，对仍与父母一同居住的年幼子女来说，不仅不会增加收入，反而大大减少收入。父亲去世，相当于家中丧失了重要的劳动力，他在世的时候如果有官职，或终身年金之类，此时通通化为乌有。如果此时还要再征收遗产税，就几乎是残酷的压迫了。但对于罗马法所谓已经自由的子女，或者苏格兰法认定分过家了的子女，即已经分得了财产，成立了新家庭，不需要父亲的抚养，而且有父亲之外的财产源泉支持，情形就不一样了。无论父亲留下什么，他们一经继承，就直接增加财产。所以，此时征收继承税，也不至于惹来什么麻烦。

The casualties of the feudal law were taxes upon the transference of land, both from the dead to the living, and from the living to the living. In ancient times they constituted in every part of Europe one of the principal branches of the revenue of the crown.

封建法规定，逝者把东西让生者继承，还有生者转移给生者的土

地都要征税。从前，欧洲各国都把这当作是国王的主要收入来源。

The heir of every immediate vassal of the crown paid a certain duty, generally a year's rent, upon receiving the investiture of the estate. If the heir was a minor, the whole rents of the estate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the minority devolved to the superior without any other charge beside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minor, and the payment of the widow's dower when there happened to be a dowager upon the land. When the minor came to be of age, another tax, called Relief, was still due to the superior, which generally amounted likewise to a year's rent. A long minority, which in the present times so frequently disburdens a great estate of all its incumbrances and restores the family to their ancient splendour, could in those times have no such effect. The waste, and not the disincumbrance of the estate, was the common effect of a long minority.

诸侯去世后，他们的直接爵位继承人，继承采地的时候要缴纳税款，价值为一年的地租。假若去世诸侯的后人尚未成年，这采地地租都归国王所有，到诸侯继承人成年后再还给他，而且，国王要抚养未成年继承人，而且如果诸侯有遗孀，还要把相应的遗产交给诸侯遗孀，此外，国王再没有其他负担。继承人成年之时，还需向国王缴纳一笔相当于一年的地租的交代税。就目前而论，如果未成年的时间比较长，就能解除大地产上的债务，而恢复其家族以往的繁荣；但当时却不是这样。那时普遍的结果，不是解除债务，而是土地荒废。

By the feudal law the vassal could not alienat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his superior, who generally extorted a fine or composition for granting it. This fine, which was at first arbitrary,

came in many countries to be regulated at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price of the land. In some countries whe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other feudal customs have gone into disuse, this tax upon the alienation of land still continues to make a very considerable branch of the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In the canton of Berne it is so high as a sixth part of the price of all noble fiefs, and a tenth part of that of all ignoble ones. In the canton of Lucerne the tax upon the sale of lands is not universal, and takes place only in certain districts. But if any person sells his land in order to remove out of the territory, he pays ten per cent upon the whole price of the sale. Taxes of the same kind upon the sale either of all lands, or of lands held by certain tenures, take place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and make a more or less considerable branch of the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封建法规定，采地所有者必须在领主的许可下，才能够对土地进行让渡，一般是要给领主一笔钱财。最开始这笔钱给多少并不固定，后来逐渐在许多国家把这笔钱规定为土地价格中的部分。在有的国家中，虽然大部分封建习俗已经瓦解，土地让渡税却存续了下来，当作君主收入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这里。在伯尔尼联邦，此种税对贵族保有的土地进行变卖征收高达价格的1/6，对平民高达1/10。在卢塞恩联邦，土地变卖税并不那么盛行，只在一定地区才有。但是，一个人如果变卖土地是因为要迁出这个区，则对卖价抽税1/10。此外，土地变卖税在很多国家都有。有的是对一切土地买卖都要征税，还有的是对特定情境中保有的土地的变卖收税。这些税多少都构成了君主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

Such transactions may be taxed indirectly by means either of stamp-duties, or of duties upon registration, and those duties either may or may not be proportioned to the value of the subject which is

transferred.

上述交易可以印花税形式或注册税形式间接收税，这间接税，是否和转移物的价格成比例都是可以的。

In Great Britain the stamp-duties are higher or lower, not so much according to the value of the property transferred (an eighteenpenny or half-crown stamp being sufficient upon a bond for the largest sum of money) as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deed. The highest do not exceed six pounds upon every sheet of paper or skin of parchment, and these high duties fall chiefly upon grants from the crown, and upon certain law proceedings, without any regard to the value of the subject. There are in Great Britain no duties on the registration of deeds or writings, except the fees of the officers who keep the register, and these are seldom more than a reasonable recompense for their labour. The crown derives no revenue from them.

英国的印花税时高时低，并不完全根据转移的财产的价值而来，而是与契据的性质有关。（借据数额最高的情况，只需贴1先令6便士或2先令6便士的印花）。最重的印花税，为每张纸或羊皮纸贴6镑印花。这么高的税，收税对象一般是国王敕许证书，或者是某些法律手续，与转移物的价值无关。对于契约或文件的注册，毫无所税，即便是有，也只是交给管理此册据官吏的手续费罢了。其数额一般是为了支付给不管理者合理的劳动报酬。至于君主并不能分享此税。

In Holland there are both stamp-duties and duties upon registration, which in some cases are, and in some are not,

proportioned to the value of the property transferred. All testaments must be written upon stamped paper of which the price is proportioned to the property disposed of, so that there are stamps which cost from threepence, or three stivers a sheet, to three hundred florins, equal to about twenty-seven pounds ten shillings of our money. If the stamp is of an inferior price to what the testator ought to have made use of, his succession is confiscated. This is over and above all their other taxes on succession. Except bills of exchange, and some other mercantile bills, all other deeds, bonds, and contracts are subject to a stamp-duty. This duty, however, does not rise in proportion to the value of the subject. All sales of land and of houses, and all mortgages upon either, must be registered, and, upon registration, pay a duty to the state of two and a half per cent upon the amount of the price or of the mortgage. This duty is extended to the sale of all ships and vessels of more than two tons burden, whether decked or undecked. These, it seems, are considered as a sort of houses upon the water. The sale of movables, when it is ordered by a court of justice, is subject to the like duty of two and a half per cent.

荷兰同时有印花税和注册税。在一些情况下要征收这些税，要根据转移财产的价值按比例征收，在其他情况下却可以不这样进行。所有人写遗嘱，都要在印花纸上写，印花纸的价格按照要处理的财产的比例而来，印花纸的价格分布，就从3便士3斯泰弗1张纸，到三百佛洛林1张（相当于27镑10先令）。要是写遗嘱用的印花纸价格比应当使用的印花纸价格低，那么就要没收所有继承财产。这是对继承所需要征的税以外的其他税。所有的票据、借据都应该完全缴纳印花税，但是汇票和其他商用票据不需要。但是这项税并不根据转移物的价值比例而提高。售卖土地、房屋，还有抵押房屋、土地的契约，都要注册。在注册的时候，要对国家缴纳相当于售卖物或者是抵押品价格2.5%的税款。无论有没有甲板，所有载重量超过两百吨的船只，售

卖时也同样要缴纳这项税款。这似乎是把船只看成了水上的房子，依照法庭的命令售卖动产，也要缴纳2.5％的印花税。

In France there are both stamp-duties and duties upon registration. The former are considered as a branch of the aides or excise, and in the provinces where those duties take place are levied by the excise officers. The latter are considered as a branch of the domain of the crown, and are levied by a different set of officers.

在法兰西，印花税和注册税也是同时实施的。印花税也是国内的消费税的分支。需要征收此税的各个州，由专门的收税人员征收。而注册费则被看成是国王的收入，需要另派人员征收。

Those modes of taxation, by stamp-duties and by duties upon registration, are of very modern invention. In the course of little more than a century, however, stamp-duties have, in Europe, become almost universal, and duties upon registration extremely common. There is no art which one government sooner learns of another than that of draining money from the pockets of the people.

虽然印花税和注册税的征收方式都是近期发明的，但是不到百年，印花税在欧洲已经遍布，注册税也屡见不鲜。一个政府学习其他政府的技术，最先学会如何掏人民的口袋。

Taxes upon the transference of property from the dead to the living fall finally as well as immediately upon the person to whom the property is transferred. Taxes upon the sale of land fall

altogether upon the seller. The seller is almost always under the necessity of selling, and must, therefore, take such a price as he can get. The buyer is scarce ever under the necessity of buying, and will, therefore, only give such a price as he likes. He considers what the land will cost him in tax and price together. The more he is obliged to pay in the way of tax, the less he will be disposed to give in the way of price. Such taxes, therefore, fall almost always upon a necessitous person, and must, therefore, be frequently very cruel and oppressive. Taxes upon the sale of new-built houses, where the building is sold without the ground, fall generally upon the buyer, because the builder must generally have his profit, otherwise he must give up the trade. If he advances the tax, therefore, the buyer must generally repay it to him. Taxes upon the sale of old houses, for the same reason as those upon the sale of land, fall generally upon the seller, whom in most cases either conveniency or necessity obliges to sell. The number of new-built houses that are annually brought to market is more or less regulated by the demand. Unless the demand is such as to afford the builder his profit, after paying all expenses, he will build no more houses. The number of old houses which happen at any time to come to market is regulated by accidents of which the greater part have no relation to the demand. Two or three great bankruptcies in a mercantile town will bring many houses to sale which must be sold for what can be got for them. Taxes upon the sale of ground-rents fall altogether upon the seller, for the same reason as those upon the sale of land. Stamp-duties, and duties upon the registration of bonds and contracts for borrowed money, fall altogether upon the borrower, and, in fact, are always paid by him. Duties of the same kind upon law proceedings fall upon the suitors. They reduce to both the capital value of the subject in dispute. The more it costs to acquire any property, the less must be the net value of it when acquired.

财产要从死者传递给生者，要是对这财产征税，最终都将直接由接受财产者承担。而售卖土地要征收的税，却全部要由卖土地的人负担。卖土地的人往往是出于无奈才卖地，只得接受提供的价格。而买方也不是非买不可，也只肯给愿意给的价格。买方考虑土地的花费，要把价格和税赋一起考虑：赋税要付的越多，买方就越不愿意出高价。这样一来，这项税就常常落在了较为贫困的人身上，既残酷，也压榨。不卖地皮的时候，卖房子的收税，要从买方身上出，建筑方一般总能获取利润，要是没有利润，他就会改行。如果建筑方垫付了税款，买方也总是要偿还的。售卖房子的税款，也一般要落在卖方身上，这和卖土地的道理是相通的。卖房子是出于必要，或者是为了方便。每年卖的新房子，多少都是受需求的约束；这样的需求要是对建筑方没有好处，就不会去建房子了。至于每年都会卖出去的旧房子数目，都是由偶然事件所支配的，与需求无干。一个商业市镇，如果发生两到三起大破产，那就会有不少房子要卖，并且出价多少就只能卖多少。而卖地皮需要征收的税，也落在卖方的身上，和卖土地一样的道理。借贷字据契约所要缴的印花税，还有注册费，也都要由借方出，事实上也确实是由借方出。诉讼程序中所需要缴付的印花税和注册税，也是由诉讼方承担。无论是从原告还是从被告来看，争讼对象的资本上的价值免不了减少。为了争夺某项财产耗资越多，最后到手的纯价值必然越少。

All taxes upon the transference of property of every kind, so far as they diminish the capital value of that property, tend to diminish the funds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roductive labour. They are all more or less unthrifty taxes that increase the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which seldom maintains any but unproductive labourers, at the expense of the capital of the people, which maintains none but productive.

财产转移征收的税款，若对财产的价值造成损耗，也一定会削减

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人民的财产只能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君主的收入往往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总的来说，这些税还是在牺牲人民的资产来增加国君的收入，是不节省的。

Such taxes, even when they are proportioned to the value of the property transferred, are still unequal, the frequency of transference not being always equal in property of equal value. When they are not proportioned to this value, which is the case wit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tamp-duties and duties of registration, they are still more so. They are in no respect arbitrary, but are or may be in all cases perfectly clear and certain. Though they sometimes fall upon the person who is not very able to pay, the time of payment is in most cases sufficiently convenient for him. When the payment becomes due, he must in most cases have the money to pay. They are levied at very little expense, and in general subject the contributors to no other inconveniency besides always the unavoidable one of paying the tax.

即便是按照转移物的价值来征收这种税，仍然不够公平。在价值相等的情况下，转移的次数并不完全相同。要是像征收印花税、注册税那样，不根据价值比例征收，那就更不平等了。不过，这项税在何种情况下都有明文规定，不可随意决定。有时候虽然由能力不济的人承担这税负，但多数时候，还是对纳税者有便利的。到了支付截止的日期，总是付得起的。而且征收此税耗费很少。在纳税本身之外，不会额外带来任何不便。

In France the stamp-duties are not much complained of. Those of registration, which they call the Controle, are. They give occasion, it is pretended, to much extortion in the officers of the

farmers-general who collect the tax, which is in a great measure arbitrary and uncertain.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ibels which have been written against the present system of finances in France the abuses of the Controle make a principal article. Uncertainty, however, does not seem to be necessarily inherent in the nature of such taxes. If the popular complaints are well founded, the abuse must arise, not so much from the nature of the tax as from the want of precision and distinctness in the words of the edicts or laws which impose it.

在法兰西，对印花税人们没有什么抱怨，而对所谓注册税却是怨声载道。注册税授给了包税人任意大肆勒索的借口，正因如此，许多发表的文章反对法国现行财政制度。这种税的特性还不仅在于不确定。如果这些抱怨都是有根有据的，那这种税的坏处，是来自于课税敕令或法规用语有失于精确，而不是由于此税性质。

The registration of mortgages, and in general of all rights upon immovable property, as it gives great security both to creditors and purchasers, is extremely advantageous to the public. Tha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deeds of other kinds is frequently inconvenient and even dangerous to individuals, without any advantage to the public. All registers which, it is acknowledged, ought to be kept secret, ought certainly never to exist. The credit of individuals ought certainly never to depend upon so very slender a security as the probity and religion of the inferior officers of revenue. But where the fees of registration have been made a source of revenue to the sovereign, register offices have commonly been multiplied without end, both for the deeds which ought to be registered, and for those which ought not. In France there are several different sorts of secret registers. This abuse, though not perhaps a necessary,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is a very natural effect of such taxes.

抵押契据的注册，以及所有不动产权利注册，都非常有利公众，因为给了债权人、买入者巨大的保障。其他大部分的契据，不仅对公众无益处，甚至对个人造成危险和不方便。那些需要保守秘密的股据，人们认为，压根就不该存在。个人的私人信用安全，不能依赖底层级税收官的正直和信仰这种不可靠的保障。当注册费是作为君主的收入成分的时候，应不应该注册的契据都得注册，就会没有节制地增加注册机关。法国有各种各样的秘密注册簿。虽然这样的害处不一定是由这项税带来的，但是这项税，自然带来了这样的结果。

Such stamp-duties as those in England upon cards and dice, upo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 pamphlets, etc., are properly taxes upon consumption; the final payment falls upon the persons who use or consume such commodities. Such stamp-duties as those upon licences to retail ale, wine, and spirituous liquors, though intended, perhaps, to fall upon the profits of the retailers, are likewise finally paid by the consumers of those liquors. Such taxes, though called by the same name, and levied by the same officers and in the same manner with the stamp-duties above mentioned upon the transference of property, are, however, of a quite different nature, and fall upon quite different funds.

英格兰对纸牌、骰子、新闻印刷品和期刊征收的印花税，都可以看成是消费税；这些税负的支付，最终都是消费品的消费者和使用者来承担的。原本对零售麦酒、葡萄酒和火酒执照征税是想让零售商来承担这笔税，却最后还是被零售商转嫁。由消费的人，这类税虽然也叫印花税，和之前的财产转移印花税是一样的，征收人员、方式也都相同，现在却具有不一样的性质，承担税负的资源也不同了。

Article III Taxes upon the Wages of Labour

第三项、劳动工资税

The wages of the inferior classes of workmen, I have endeavoured to show in the first book, are everywhere necessarily regulated by two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the demand for labour, and the ordinary or average price of provisions. The demand for labour, according as it happens to be either increasing, stationary, or declining, or to require an increasing, stationary, or declining population, regulates the subsistence of the labourer, and determines in what degree it shall be, either liberal, moderate, or scanty. The ordinary or average price of provisions determines the quantity of money which must be paid to the workman in order to enable him, one year with another, to purchase this liberal, moderate, or scanty subsistence. While the demand for labour and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therefore, remain the same, a direct tax upon the wages of labour can have no other effect than to raise them somewhat higher than the tax. Let us suppose, for example, that in a particular place the demand for labour and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were such as to render ten shillings a week the ordinary wages of labour, and that a tax of one-fifth, or four shillings in the pound, was imposed upon wages. If the demand for labour and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remained the same, it would still be necessary that the labourer should in that place earn such a subsistence as could be bought only for ten shillings a week free wages. But in order to leave him such free wages after paying such a tax, the price of labour must in that place soon rise, not to twelve shillings a week only, but to twelve and sixpence; that is, in order to enable him to

pay a tax of one-fifth, his wages must necessarily soon rise, not one-fifth part only, but one-fourth. Whatever was the proportion of the tax, the wages of labour must in all cases rise, not only in that proportion, but in a higher proportion. If the tax, for example, was one-tenth, the wages of labour must necessarily soon rise, not one-tenth part only, but one-eighth.

本书第一篇里我努力想要阐明，底层级的劳动者的工资，要受到两种情形的约束，包括劳动需求和普通食物的平均价格。劳动需求量是不变、增加还是减少，换句话说，人口是需要增加、不变还是减少，这决定了劳动者的基本生活资料是充裕、不多不少，还是稀缺。食物一般的平均价格决定了要给劳动者多少钱，让他们能买到或是充足，或是一般，或是稀少的生活资料。如果劳动需求、食物的价格不变，对劳动工资征税，就只会让工资略高于赋税额度。如果有个特殊的场合，劳动需求量和食物的价格让普通劳动工资达到一星期10先令。又比如对工资收1/5的税，每镑收4个先令。如果劳动需求和食物价格保持不变，劳动者在那个地方能能每周获得价值10先令的生活资料。换句话说，上缴过工资税后，必须还剩下每周10先令的工资能够自由支配。要保证收完税以后，劳动者还能拿到这么多工资就必须提高那个地方的劳动价格一周12先令还不足，要提高到12先令6个便士才够。也就是说，为了交得上1/5工资的税款，工资就不能只上涨1/5，而是要上涨1/4。不管工资要按何种比例纳税，在一切情况下，工资不仅仅是根据这比例增加，而且还要更高。若税率是1/10，劳动工资上涨的幅度就不止1/10，而是1/8。

A direct tax upon the wages of labour, therefore, though the labourer might perhaps pay it out of his hand, could not properly be said to be even advanced by him; at least if tile demand for labour and the average price of provisions remained the same after the tax as before it. In all such cases, not only the tax but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tax would in reality be advanced by the person who immediately employed him. The final payment would in different cases fall upon different persons. The rise which such a tax might occasion in the wages of manufacturing labour would be advanced by the master manufacturer, who would both be entitled and obliged to charge it, with a profit, upon the price of his goods. The final payment of this rise of wages, therefore, together with the additional profit of the master manufacturer, would fall upon the consumer. The rise which such a tax might occasion in the wages of country labour would be advanced by the farmer, who,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ame number of labourers as before, would be obliged to employ a greater capital. In order to get back this greater capital, together with the ordinary profits of stock, it would be necessary that he should retain a larger portion,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the price of a larger portion, of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consequently that he should pay less rent to the landlord. The final payment of this rise of wages, therefore, would in this case fall upon the landlord, together with the additional profit of the farmer who had advanced it. In all cases a direct tax upon the wages of labour must, in the long-run, occasion both a greater reduction in the rent of land, and a greater rise in the price of manufactured goods, than would have followed from the proper assessment of a sum equal to the produce of the tax partly upon the rent of land, and partly upon consumable commodities.

直接对劳动工资收税，尽管劳动者或许也需要付出这笔税金，但是不能就说这笔钱就是由他垫付的；至少，在收税以后，劳动需要以及食物的一般价格与税前保持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是工资税款，还有除了这个税款以外的款项，也是由直接雇佣人员垫付的。最后的支付，在不同的情况下由不同的人承担。在制造业，由于收税而上涨的劳动工资数额，是由制造业主垫付的。制造业主能够，而且是

必须通过抬高货物的价格，赢回预支的数额以及应当的利润。因此，如果工资提高，或者利润增加，那么增加的这部分最终是由消费者来承担的。在乡村，因为征税而提高的劳动工资，是由农场主来垫付的。为收回这笔较大的资本和资本所产生的一般利润，他必须保留一大部分土地生产物或生产物价值。这样一来，他付给地主的地租就要相应减少。事实上，增加的劳动工资和利润额都是地主在承担。总而言之，如果对劳动工资直接进行征税，会让地租大幅减少，让制造品价格大幅度抬升，还不如征收其他与此数额相同的税，比如收税的时候，一部分从地租上来，一部分从消费品上来。

If direct taxes upon the wages of labour have not always occasioned a proportionable rise in those wages, it is because they have generally occasioned a considerable fall in the demand for labour. The declension of industry, the decrease of employment for the poor, the diminution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have generally been the effects of such taxes. In consequence of them, however, the price of labour must always be higher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in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demand: and this enhancement of price, together with the profit of those who advance it, must always be finally paid by the landlords and consumers.

如果对工资直接征税没有导致工资增高，说明一般劳动需要发生了大幅下降，导致工资增长被抵消。这种税一般会造成农业衰退，土地劳动年产物减少。不过，有了这项税，比起没有的时候，劳动价格会更高，这增加的额度和垫付这个价格的额外利润，要由消费者和地主承担。

A tax upon the wages of country labour does not raise the price

of the rude produce of l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tax,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a tax upon the farmer's profit does not raise that price in that proportion.

对乡村劳动工资征税，土地原生产物的价格并不会按照此税的比例而相应有所提高，理由和农业家利润税不会相应提高农业价格一样。

Absurd and destructive as such taxes are, however, they take place in many countries. In France that part of the taille which is charged upon the industry of workmen and day-labourers in country villages is properly a tax of this kind. Their wages are computed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rate of the district in which they reside, and that they may be as little liable as possible to any overcharge, their yearly gains are estimated at no more than two hundred working days in the year. The tax of each individual is varied from year to year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of which the collector or the commissary whom the intendant appoints to assist him are the judges. In Bohemia, in consequence of the alteration in the system of finances which was begun in 1748, a very heavy tax is imposed upon the industry of artificers. They are divided into four classes. The highest class pay a hundred florins a year which, at two-and-twenty pence halfpenny a florin, amounts to £9 7s. 6d. The second class are taxed at seventy; the third at fifty; and the fourth, comprehending artificers in villages, and the lowest class of those in towns, at twenty-five florins.

尽管这种税不合理又有害，却在很多国家都有施行。在法国，课在乡村劳动者及日工的劳动上的那部分贡税，可以说就是此种税。为

了减轻劳动者负担，征税的时候，依据居住地的普通工资率，按不到两百200天的工作日估计工资。每人的税，依各年度的情形而不同，而对这种情形的评定，由州长委派协助他的收税员或委员负责。1748年，波希米亚开始变革财政制度，规定手工业者的劳动成果要上缴重税。这些手工业者被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每年征税100佛洛林，每佛洛林按1先令10便士半换算，计达9镑7先令6便士；第二等级每年征税70佛洛林，第三等级每年征税50佛洛林，第四等级包括在乡村的手工业者，还有城镇中最低级手工业者，每年征收25佛洛林。

The recompense of ingenious artists and of men of liberal professions, I have endeavoured to show in the first book, necessarily keeps a certain proportion to the emoluments of inferior trades. A tax upon this recompense, therefore, could have no other effect than to raise it somewhat higher than in proportion to the tax. If it did not rise in this manner, the ingenious arts and the liberal professions, being no longer upon a level with other trades, would be so much deserted that they would soon return to that level.

出类拔萃的艺术家、自由职业者，比起较为低端的职业，他们得到的报酬必然是有一定倍数的。对这报酬征税，就会让报酬提升到比征税比例更高的程度。如果报酬得到发生这样的提升，优秀艺术和自由职业就不与其他职业地位平等，那么这些职业的从业者就会大量流失，这职业又复归于从前的地位。

The emoluments of offices are not, like those of trades and professions, regulated by the free competition of the market, and do not, therefore, always bear a just proportion to what the nature of the employment requires. They are, perhaps, in most countries,

higher than it requires; the persons who have the administration of government being generally disposed to reward both themselves and their immediate dependants rather more than enough. The emoluments of offices, therefore, can in most cases very well bear to be taxed. The persons, besides, who enjoy public offices, especially the more lucrative, are in all countries the objects of general envy, and a tax upon their emoluments, even though it should be somewhat higher than upon any other sort of revenue, is always a very popular tax. In England, for example, when by the land-tax every other sort of revenue was supposed to be assessed at four shillings in the pound, it was very popular to lay a real tax of five shillings and sixpence in the pound upon the salaries of offices which exceeded a hundred pounds a year, the pensions of the younger branches of the royal family, the pay of the officers of the army and navy, and a few others less obnoxious to envy excepted. There are in England no other direct taxes upon the wages of labour.

和一般的职业不同，政府官员的报酬并不像其他的职业那样，还要受自由市场竞争的影响，所以就职业性质而言，这些职业得到的报酬并不总是维持在适当的比例上。基本上在绝大多数国家，这种职业的报酬都高于必要的水平。管理国家政治的人，都乐于给自己和直接下属过于充裕的报酬。很多情况下，官员的报酬完全足以征税。有官职在身的人，尤其是薪资不菲的官员，在所有国家总是被一般大众嫉妒。即便对他们的报酬收以重税，比其他收入税收高再多，也一定令人开心。例如，在英格兰，按照土地税法，一切其他种类的收入都应当是每镑征收4先令。那些每年薪水超过百万镑以上的官员，除了皇室新家庭的年金，海军军官和陆军军官的薪水，还有其他不那么为人羡慕的官员收入，对他们每镑实际收5先令6便士，大快人心。英格兰并不对劳动工资收取其他直接税款。

Article IV: Taxes which, it is intended, should fall indifferently upon every different Species of Revenue

第四项、原计划无差别加在各项收入上的税

The taxes which, it is intended, should fall indifferently upon every different species of revenue, are capitation taxes, and taxes upon consumable commodities. These must be paid indifferently from whatever revenue the contributors may possess; from the rent of their land, from the profits of their stock, or from the wages of their labour.

本要无差别地加在各种收入上的税，也就是人头税、消费品税。该税收毫无差别地从纳税者的各项收入中征来，无论是土地地租收入，资本收入还是劳动工资。

Capitation Taxes

人头税

Capitation taxes, if it is attempted to proportion them to the fortune or revenue of each contributor, become altogether arbitrary. The state of a man's fortune varies from day to day, and without an inquisition more intolerable than any tax, and renewed at least once every year, can only be guessed at. His assessment, therefore, must in most cases depend upon the good or bad humour of his assessors,

and must, therefore, be altogether arbitrary and uncertain.

若人头税的征收，可以随意根据每个纳税者的财产以及收入而定，就彻底随心所欲征收了。一个人拥有的财富时时都在变化。如果不进行严苛的调查，或者登记的频率少于每年一次，那就只有全靠估计。大多数情况下，评估交税多少看的是估税员的心情，这就会导致随意征收且不稳定。

Capitation taxes, if they are proportioned not to the supposed fortune, but to the rank of each contributor, become altogether unequal, the degrees of fortune being frequently unequal in the same degree of rank.

假如人头税如果不是按照纳税人的财富，而是纳税人的身份进行征收，就会导致彻底的不公平。即便是地位不相上下的人，财富的多少也会大相径庭。

Such taxes, therefore, if it is attempted to render them equal, become altogether arbitrary and uncertain, and if it is attempted to render them certain and not arbitrary, become altogether unequal. Let the tax be light or heavy, uncertainty is always a great grievance. In a light tax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inequality may be supported; in a heavy one it is altogether intolerable.

若使这种税保持公平，就必然变得完全任意而不确定，而若使其确定而不任意，必然会带来不公平。无论税率高低，其不确定性总是民众不满的重要原因。若是轻税，人们或许可以容忍大的不公平；若

是重税，即便是一点的不公也是难以忍受的。

In the different poll-taxes which took place in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 of William III the contributors we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assessed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their rank; as dukes, marquisses, earls, viscounts, barons, esquires, gentlemen, the eldest and youngest sons of peers, etc. All shopkeepers and tradesmen worth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pounds, that is, the better sort of them, were subject to the same assessment, how great soever might be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fortunes. Their rank was more considered than their fortune. Several of those who in the first poll-tax were rated according to their supposed fortune were afterwards rated according to their rank. Serjeants, attorneys, and proctors at law, who in the first poll-tax were assessed at three shillings in the pound of their supposed income, were afterwards assessed as gentlemen. In the assessment of a tax which was not very heavy,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inequality had been found less insupportable than any degree of uncertainty.

威廉三世当政的时候，英格兰施行过各种各样的人头税，多数情况下，纳税多少是身份决定的。身份分为若干等级，有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士族、绅士及贵族长子末子等。所拥有的财富多于300镑的商人，也就是商人中比较小康的那一批，都要征税。而比300镑多多少，300镑之上的部分，却没有人考虑。在考虑这些人的税额的时候，有些人头税是据推断的人们所拥有的财富来征收的，后来却变成了根据身份征收。法律家、辩护人、代诉人，起初是按其收入征收人头税，每镑3先令，往后，改为按绅士的身份征税。在征税的过程中，如果税不重，那么不公平还是能忍受的，如果不确定，那就不可接受了。

In the capitation which has been levied in France without any interrup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he highest orders of people are rated according to their rank by an invariable tariff; the lower orders of people, according to what is supposed to be their fortune, by an assessment which varies from year to year. The officers of the king's court, the judges and other officers in the superior courts of justice, the officers of the troops, etc., are assessed in the first manner.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in the provinces are assessed in the second. In France the great easily submit 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inequality in a tax which, so far as it affects them, is not a very heavy one, but could not brook the arbitrary assessment of an intendant.

本世纪之初，法国征收的是人头税，现在还要继续施行。社会阶级最高的人民，征税的税率不予变化，而阶级最低的人，却要根据他们的财富每年的变化来征税。宫廷官吏，高级法院的裁判官、其他官吏，军队士官，都是用第一种方法进行征税的。各个州的下层人民，都以第二种方法征税。对法国的达官贵人来讲，加在他们身上的税，只要不是重税，哪怕不公平一点，也可以接受；但是，他们不能忍受州长随便估计和制定税额。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must, in that country, suffer patiently the usage which their superiors think proper to give them.

在法国，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内，下层人民就都能忍受上层所给的待遇。

In England the different poll-taxes never produced the sum

which had been expected from them, or which, it was supposed, they might have produced, had they been exactly levied. In France the capitation always produces the sum expected from it. The mild government of England, when it assessed the different ranks of people to the poll-tax, contented itself with what that assessment happened to produce, and required no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which the state might sustain either by those who could not pay, or by those who would not pay (for there were many such), and who, by the indulgent execution of the law, were not forced to pay. The more severe government of France assesses upon each generality a certain sum, which the intendant must find as he can. If any province complains of being assessed too high, it may, in the assessment of next year, obtain an abatement proportioned to the overcharge of the year before. But it must pay in the meantime. The intendant, in order to be sure of finding the sum assessed upon his generality, was empowered to assess it in a larger sum that the failure or inability of some of the contributors might be compensated by the overcharge of the rest, and till 1765 the fixation of this surplus assessment was left altogether to his discretion. In that year, indeed, the council assumed this power to itself. In the capitation of the provinces, it is observed by the perfectly well-informed author of the Memoires upon the impositions in France, the proportion which falls upon the nobility, and upon those whose privileges exempt them from the taille, is the least considerable. The largest falls upon those subject to the taille, who are assessed to the capitation at so much a pound of what they pay to that other tax.

在英格兰，各项人头税的征收从来没能够达到预期。如果征收过程精密些，这本可以达到的。相反，法兰西人头税总是能收足预期的金额。英国政府并不强硬，对各个阶级的人征税的时候，能收多少是

多少，对于为数不少不想缴纳税额的人和因法律不够严格而不缴纳足额税款的人，并不要求他们对其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法国政府却更为严苛，给各个州下达的征税任务，各州必须竭尽全力完成。如果某个州认为征税过高，那么在第二年，可以以评定的税额为基础进行适量的减少。不过，本年度估定的税额，还得缴纳。州长为了能保证收足税额，就会故意把税额说的大一些，让破产纳税人所造成的损失能够从其他人那里得到补偿。这种额外税，一直到1756年，还是由州长裁断的。但是1756年枢密院却把权力收回到自己手里。根据消息灵通，学识广博的法国征税记录人说，落在享有特权可以不缴纳贡税的贵族们身上的贡税份额是最低的。最大份额的贡税，是落在贡税纳税人身上的。他们收入中的每一镑都要被征收一定的贡税。

Capitation taxes, so far as they are levied upon the lower ranks of people, are direct taxes upon the wages of labour, and are attended with all the inconveniences of such taxes.

低层级人民所要缴纳的人头税，即对劳动工资直接征收的税款，在征收过程中有很多不便之处。

Capitation taxes are levied at little expense, and, where they are rigorously exacted, afford a very sure revenue to the state. It is upon this account that in countries where the ease, comfort, and security of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are little attended to, capitation taxes are very common. It is in general, however, but a small part of the public revenue which, in a great empire, has ever been drawn from such taxes, and the greatest sum which they have ever afforded might always have been found in some other way much more convenient to the people.

征收人头税耗费的金钱不多，严格执行起来成本不高，却能给国家带来确定的收入。因此，那些无视底层人民安康的国家，人头税遍行。一般来讲，大帝国，人头税不过是能公共收入的一小部分；人们能负担的起的最大税款总额，可能一直是通过其他更为便民的方式征收的。

Taxes upon Consumable Commodities

消费品税

The impossibility of taxing the people, in proportion to their revenue, by any capitation, seems to have given occasion to the invention of taxes upon consumable commodities. The state, not knowing how to tax, directly and proportionably, the revenue of its subjects, endeavours to tax it indirectly by taxing their expense, which, it is supposed, will in most cases be nearly in proportion to their revenue. Their expense is taxed by taxing the consumable commodities upon which it is laid out.

无论施行哪种人头税制度，都不可能按照人民的收入的比例来征收；因为这个缘故，才发明了消费税。国家做不到对人民的收入按比例征税，就通过消费税这个做法，间接对费用征税。多数时候，这消费税和收入是成比例的。对这些人的消费课税的方式，就是对他们所购买的物品课税。

Consumable commodities are either necessaries or luxuries.

消费品的种类，不是必需品，就是奢侈品。

By necessaries I understand not only the commodities which are indispensably necessary for the support of life, but whatever 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 renders it indecent for creditable people, even of the lowest order, to be without. A linen shirt, for example, is, strictly speaking, not a necessary of life. The Greeks and Romans lived, I suppose, very comfortably though they had no linen. But in the present times,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 a creditable day-labourer would be ashamed to appear in public without a linen shirt, the want of which would be supposed to denote that disgraceful degree of poverty which, it is presumed, nobody can well fall into without extreme bad conduct. Custom, in the same manner, has rendered leather shoes a necessary of life in England. The poorest creditable person of either sex would be ashamed to appear in public without them. In Scotland, custom has rendered them a necessary of life to the lowest order of men; but not to the same order of women, who may, without any discredit, walk about barefooted. In France they are necessaries neither to men nor to women, the lowest rank of both sexes appearing there publicly, without any discredit, sometimes in wooden shoes, and sometimes barefooted. Under necessaries, therefore, I comprehend not only those things which nature, but those things which the established rules of decency have rendered necessary to the lowest rank of people. All other things I call luxuries, without meaning by this appellation to throw the smallest degree of reproach upon the temperate use of them. Beer and ale, for example, in Great Britain, and wine, even in the wine countries, I call luxuries. A man of any rank may, without any reproach, abstain totally from tasting such liquors. Nature does not render them necessary for the support of life, and custom nowhere renders it indecent to live without them.

我这里说的必需品，不止是生活必需品，还包括那些即便是下层人民，也觉得缺少了就没有颜面的东西。打个比方，麻衬衫并非是生活必需品，希腊罗马人，就算是没有亚麻，还是能舒适地生活。但是，即便是现在的打杂日工，都不愿意不着衬衫在人前丢人现眼，展示自己已经穷到连衬衫都穿不起。若不是做了极其恶劣的事情，人不会破产到那种地步。同样，皮鞋也是英格兰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最穷的人也不愿意不穿皮鞋出去丢人。而在苏格兰，最下层的人们，男人还是要穿皮鞋，而女人就可以赤脚了。而在法国，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皮鞋都不是什么必备物品。最为底层的人，可以毫无顾忌地穿着木鞋，甚至光脚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所以，我认为必需品不仅包括自然必需品，还包括那些与颜面有关的东西因习俗而成为下层人民必需品的东西。举个例子，啤酒和麦酒以及葡萄酒，就算是在酒的产地国，也可称得上是奢侈品了，更不必说在英国。一个人无论身处哪个阶级，如果戒除了这类饮料，绝对谈不上有损体面。大自然没有让饮酒成为人类生活之必须，也没有哪个地方的风俗，认为不饮酒是丢人的。

As the wages of labour are everywhere regulated, partly by the demand for it, and partly by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necessary articles of subsistence, whatever raises this average price must necessarily raise those wages so that the labourer may still be able to purchase that quantity of those necessary articles which the state of the demand for labour, whether increasing, stationary, or declining, requires that he should have. A tax upon those articles necessarily raises their price somewhat higher than the amount of the tax, because the dealer, who advances the tax, must generally get it back with a profit. Such a tax must, therefore, occasion a rise in the wages of labour proportionable to this rise of price.

各个地方的劳动工资，既要受劳动需要的限制，还要受生活必需品的均价支配。所以，只要平均价格提高，那么劳动者工资也要提高，以保证劳动者无论是在劳动需求增加、不增不减还是减少的情况下，仍然都能买得起应有数量的必需品。（详见本书第一卷第8章）对必需品征税，会导致价格提高，而且比税额更高，这是因为，商人既然垫付了这项税，他就要从价格上找回来，还要另外找回应该的利润，这样看来，必需品税会引起劳动工资的上涨，工资上涨与物价保持一定的比例。

It is thus that a tax upo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operates exactly in the same manner as a direct tax upon the wages of labour. The labourer, though he may pay it out of his hand, cannot,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at least, be properly said even to advance it. It must always in the long-run be advanced to him by his immediate employer in the advanced rate of his wages. His employer, if he is a manufacturer, will charge upon the price of his goods this rise of wages, together with a profit; so that the final payment of the tax, together with this overcharge, will fall upon the consumer. If his employer is a farmer, the final payment, together with a like overcharge, will fall upon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这样一来，对生活必需品征税就和针对劳动工资直接征税效果一样了。虽然劳动者从自己手里支出税，但是长期来看，这税款还是由雇主垫付还给了他。如果雇主从事的是制造业，那么给劳动者增加的工资和利润，最终都增加在了货物的价格上面。所以，最后此税是由消费者承担了。如果雇主从事农业，那么，税负则由地主承担。

It is otherwise with taxes upon what I call luxuries, even upon those of the poor. The rise in the price of the taxed commodities

will not necessarily occasion any rise in the wages of labour. A tax upon tobacco, for example, though a luxury of the poor as well as of the rich, will not raise wages. Though it is taxed in England at three times, and in France at fifteen times its original price, those high duties seem to have no effect upon the wages of labour. The same thing may be said of the taxes upon tea and sugar, which in England and Holland have become luxuries of the lowest ranks of people, and of those upon chocolate, which in Spain is said to have become so. The different taxes which in Great Britain have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been imposed upon spirituous liquors are not supposed to have had any effect upon the wages of labour. The rise in the price of porter, occasioned by an additional tax of three shillings upon the barrel of strong beer, has not raised the wages of common labour in London. These were about eighteen pence and twenty pence a day before the tax, and they are not more now. The high price of such commodities does not necessarily diminish the ability of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to bring up families.

对奢侈品征税，即使是对贫穷者购买的奢侈品征税，又是另一回事。征税品价格的增加，并不一定引发劳动工资的增高。比如，虽然香烟对于穷人和富人来讲都是奢侈品。不过对香烟征税，还不至于让劳动工资提高。在英格兰，对香烟所征的税是香烟价格3倍，而在法国，则达到了原价的15倍。税率如此之高，劳动工资却没有因此上涨。在英格兰和荷兰，茶和砂糖是最底层人民的奢侈品，在西班牙，巧克力糖是底层人民的奢侈品。对这些物品征税，就像对香烟征税一样，并没有让工资上涨或下跌。对各种酒征税，也没有对劳动工资产生什么影响。对各种酒征税，并没有导致劳动工资受到何种影响。浓啤酒征收附加税每桶3先令，黑麦酒的酒价因此激增，但是伦敦的工人们，也没有因此涨工资。没有收附加税之前，这些工人每天的工资都是18或20便士，而现在也还是如此。

Upon the sober and industrious poor, taxes upon such commodities act as sumptuary laws, and dispose them either to moderate, or to refrain altogether from the use of superfluities which they can no longer easily afford. Their ability to bring up families, in consequence of this forced frugality, instead of being diminished, is frequently, perhaps, increased by the tax. It is the sober and industrious poor who generally bring up the most numerous families, and who principally supply the demand for useful labour. All the poor, indeed, are not sober and industrious, and the dissolute and disorderly might continue to indulge themselves in the use of such commodities after this rise of price in the same manner as before without regarding the distress which this indulgence might bring upon their families. Such disorderly persons, however, seldom rear up numerous families, their children generally perishing from neglect, mismanagement, and the scantiness or unwholesomeness of their food. If by the strength of their constitution they survive the hardships to which the bad conduct of their parents exposes them, yet the example of that bad conduct commonly corrupts their morals, so that, instead of being useful to society by their industry, they become public nuisances by their vices and disorders. Though the advanced price of the luxuries of the poor, therefore, might increase somewhat the distress of such disorderly families, and thereby diminish somewhat their ability to bring up children, it would not probably diminish much the useful 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

这些商品价格很高，不一定就会让底层人民养家能力降低。就像禁止购买奢侈品的法令一样，下层人民因此不会再购买那些他们轻易买不起的奢侈品。这样一来，他们养家能力，反而有所上升。一般情况下，这些朴实勤劳的底层人民，是养活大家庭和供给有用劳动的主

力军。当然，并非所有的贫民都勤劳朴实，还有一些懒散胡来的人，即便奢侈品价格上涨，也不顾家庭的重担，随意购买。不过这种任意胡来的人，一般也无力供养家庭，对孩子的照料也很草率，孩子也由于这种父母照顾不当、食物缺乏，卫生条件恶劣，早早就夭折了。这些儿童长大了，不但不能将其勤劳给贡献社会，而且会成为社会伤风败俗的害物。因此，尽管贫民阶级的奢侈品价格的激增会增加这类散漫的家庭的困苦，但是也不会让有用的人口大大缩减。

Any rise in the average price of necessaries, unless it is compensated by a proportionable rise in the wages of labour, must necessarily diminish more or less the ability of the poor to bring up numerous families, and consequently to supply the demand for useful labour, whatever may be the state of that demand, whether increasing, stationary, or declining, or such as requires an increasing, stationary, or declining population.

无论必需品的均价如何上涨，劳动工资不会相应的上涨，一定会削减贫民养家的能力，也就是说，劳动需要不管是增加、不变或是减少，都要求人口发生相应的变化。

Taxes upon luxuries have no tendency to raise the price of any other commodities except that of the commodities taxed. Taxes upon necessaries, by raising the wages of labour, necessarily tend to raise the price of all manufactures, and consequently to diminish the extent of their sale and consumption. Taxes upon luxuries are finally paid by the consumers of the commodities taxed without any retribution. They fall indifferently upon every species of revenue, the wages of labour, the profits of stock, and the rent of land. Taxes upon necessaries, so far as they affect the labouring poor, are finally

paid, partly by landlords in the diminished rent of their lands, and partly by rich consumers, whether landlords or others, in the advanced price of manufactured goods, and always with a considerable overcharge. The advanced price of such manufactures as are real necessaries of life, and are destined for the consumption of the poor, of coarse woollens, for example, must be compensated to the poor by a further advancement of their wages. The middling and superior ranks of people, if they understand their own interest, ought always to oppose all taxes upo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as well as all direct taxes upon the wages of labour. The final payment of both the one and the other falls altogether upon themselves, and always with a considerable overcharge. They fall heaviest upon the landlords, who always pay in a double capacity; in that of landlords by the reduction of their rent, and in that of rich consumers by the increase of their expense. The observation of Sir Matthew Decker, that certain taxes are, in the price of certain goods, sometimes repeated and accumulated four or five times, is perfectly just with regard to taxes upo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In the price of leather, for example, you must pay not only for the tax upon the leather of your own shoes, but for a part of that upon those of the shoemaker and the tanner. You must pay, too, for the tax upon the salt, upon the soap, and upon the candles which those workmen consume while employed in your service, and for the tax upon the leather which the salt-maker, the soap-maker, and the candle-maker consume while employed in their service.

对奢侈品征税，只对商品本身的价格有影响，对其他商品价格并没有影响。如果对必需品征税，然后增加劳动工资，只会对这一种商品价格有影响，对其他商品价格没有影响。而对必需品征税导致劳动工资增高，会让所有制造品价格都上升，缩减他们的市场。奢侈品税，最后是落在了消费者身上。而必需品税，如果影响贫民，最终，

还是由地主帮他们支付了一部分，方式是减少他们的地租。而另一部分税额的支付，靠的是更为富有的消费者和地主支付更高的制造品价格，以垫付这部分。他们一般要付额外不少的数额。至于真是贫民也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比如粗制毛料，一旦价格上涨，那么工资也必须上涨才能补偿缺口，让贫民买得起。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民，如果对自身的利益有清醒的人士，就不该支持对劳动工资直接收税，反对对生活必需品税。最终，生活必需品以及劳动工资的税收，都会在这两个阶级的人身上征收，还要另外有别的负担。加上地主的负担是最沉重的，他们以两种身份支付这一负担，一是作为地主，要用减少地租的形式来承担负担，二是，以消费者的身份，增加费用来承担。马太·德克尔对于生活必需品税的观察可以说是非常正确的。在他看来，某项税转移到商品上的时候重复累积了四五次。打个比方，当你支付皮革价钱的时候，你支付的不仅是你买的鞋子的皮革税，还要支付一部分鞋匠穿的鞋还有制革匠穿的鞋子的皮革税；而且，你需要支付这些工人在为你服务期间所消费的盐、肥皂及蜡烛等物品的税，乃至制盐者、制肥皂者、制蜡烛者工作期间消耗的皮革税。

In Great Britain, the principal taxes upo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are those upon the four commodities just now mentioned, salt, leather, soap, and candles.

在英国，生活必需品征税一般指的是四种商品：盐、皮、肥皂和蜡烛。

Salt is a very ancient and a very universal subject of taxation. It was taxed among the Romans, and it is so at present in, I believe, every part of Europe. The quantity annually consumed by any individual is so small, and may be purchased so gradually, that nobody, it seems to have been thought, could feel very sensibly

even a pretty heavy tax upon it. It is in England taxed at three shillings and fourpence a bushel- about three times the original price of the commodity.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the tax is still higher. Leather is a real necessary of life. The use of linen renders soap such. In countries where the winter nights are long, candles are a necessary instrument of trade. Leather and soap are in Great Britain taxed at three halfpence a pound, candles at a penny; taxes which, upon the original price of leather, may amount to about eight or ten per cent; upon that of soap to about twenty or five-and-twenty per cent; and upon that of candles to about fourteen or fifteen per cent; taxes which, though lighter than that upon salt, are still very heavy. As all those four commodities are real necessaries of life, such heavy taxes upon them must increase somewhat the expense of the sober and industrious poor, and must consequently raise more or less the wages of their labour.

对盐征税的历史最为悠久，也最为普遍。罗马就曾对盐征税，现在欧洲的每一个部分都征收盐税。个人每年消耗的盐量极为有限，而且这盐还是零散购买的，因此即便是盐征税很重，人们也不觉得多么难以接受。英格兰的盐税，每蒲式耳3先令4便士，约是其原价的。在其他国家，这项税还要再高昂一些。皮革当然是生活之必需，而亚麻布的适用，也使得肥皂也在生活中必不可少了。对于那些冬天夜晚比较长的国家来说，蜡烛对各行各业都不可或缺。英国皮革税和肥皂税，都是每磅3便士半。蜡烛则为每磅1便士。就皮革的原价说，皮革税约达8%或10%；就肥皂的原价说，肥皂税约达20%至25%；就蜡烛的原价说，蜡烛税约达14%或是15%。这些税相较于盐税来说，已经算是比较轻的了，但仍然也很重。这四种真正是必需品的商品，却征以如此重税，那就必须增加这些勤勉辛劳的贫民的工资，因为必需品增加了他们的消费。

In a country where the winters are so cold as in Great Britain, fuel is, during that season, in the strictest sense of the word, a necessary of life, not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dressing victuals, but for the comfortable subsistence of many different sorts of workmen who work within doors; and coals are the cheapest of all fuel. The price of fuel has so important an influence upon that of labour that all over Great Britain manufactures have confined themselves principally to the coal countries,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on account of the high price of this necessary article, not being able to work so cheap. In some manufactures, besides, coal is a necessary instrument of trade, as in those of glass, iron, and all other metals. If a bounty could in any case be reasonable, it might perhaps be so upon the transportation of coals from those parts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y abound to those in which they are wanted. But the legislature, instead of a bounty, has imposed a tax of three shillings and threepence a ton upon coal carried coastways, which upon most sorts of coal is more than sixty per cent of the original price at the coal-pit. Coals carried either by land or by inland navigation pay no duty. Where they are naturally cheap, they are consumed duty free: where they are naturally dear, they are loaded with a heavy duty.

对于像英国这样冬季寒冷异常的国家来讲，严格来说，燃料就是冬天的生活必需品——这不仅是就烹饪而言，也是出于维持室内劳动者工作的舒适度的考虑。对于劳动价格来说，燃料价格简直是非常重要，以至于整个英国，所有制造业都只能在产煤的区域周围发展；如果其他区域，那么煤就昂贵许多，无法以低廉的价格进行工作。此外，对于些制造业——如玻璃、铁及一切其他金属工业，煤都是不能够缺少的。如果在某些场合，奖励金能够算作合理，那么对于把煤从国内盛产区运到比较缺乏的地区这样的行为加以奖励，也是合理的。然而，立法机构不但没有对其进行奖励，还要对沿着海岸运输的煤征

税，一吨征收3先令3便士。对大多数煤的价格而言，这已经是出矿价格的60％以上了。而通过陆地运输或者内河运输的煤，却一律免税。这样看来，煤价天然低廉的地方不必交税就能消费，而煤价天然贵的地方，反而要征收重税。

Such taxes, though they raise the price of subsistence, and consequently the wages of labour, yet they afford a considerable revenue to government which it might not be easy to find in any other way. There may, therefore, be good reasons for continuing them. The bounty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so far as it tends in the actual state of tillage to raise the price of that necessary article, produces all the like bad effects, and instead of affording any revenue, frequently occasions a very great expense to government. The high dutie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corn, which in years of moderate plenty amount to a prohibition, and the absolute prohibition of the importation either of live cattle or of salt provisions, which takes place in the ordinary state of the law, and which, on account of the scarcity, is at present suspended for a limited time with regard to Ireland and the British plantations, have all the bad effects of taxes upo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and produce no revenue to government. Nothing seems necessary for the repeal of such regulations but to convince the public of the futility of that system in consequence of which they have been established.

虽然这类税提高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从而使劳动价格水涨船高。不过，对政府来说，这却是一项从其他途径难以获得的大笔收入。所以征收这类税的理由还是比较充分的。而在实际的农耕过程中，对谷物输出给予奖励金，肯定会抬高谷物这种必需品的价格，而后导致以上提到的所有恶劣后果。可是，这对于政府来说，既没有收入可图，又要额外支出大笔费用。在相对丰饶的年份，对于从国外进

口到本国的谷物征收重税，就相当于禁止进口，这样的规定会造成必需品税常见的各种不良后果，而且不能让政府获得什么收入。要让这些规定作废，只说服民众，让他们相信，这些规定是徒劳无功的就足够了，其他并不需要做什么。

Taxes upo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are much higher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than in Great Britain. Duties upon flour and meal when ground at the mill, and upon bread when baked at the oven, take place in many countries. In Holland the money price of the bread consumed in towns is supposed to be doubled by means of such taxes. In lieu of a part of them, the people who live in the country pay every year so much a head according to the sort of bread they are supposed to consume. Those who consume wheaten bread pay three guilders fifteen stivers- about six shillings and ninepence halfpenny. These, and some other taxes of the same kind, by raising the price of labour, are said to have ruine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anufactures of Holland. Similar taxes, though not quite so heavy, take place in the Milanese, in the states of Genoa, in the duchy of Modena, in the duchies of Parma, Placentia, and Guastalla, and in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A French author of some note has proposed to reform the finances of his country by substituting in the room of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taxes this most ruinous of all taxes. There is nothing so absurd, says Cicero, which has not sometimes been asserted by philosophers.

与英国相比较，其他国家对生活必需品的征税，要高不少。对在磨坊中磨制加工的麦粉粗粉征税，还有对炉上烤制的面包征税，这样的征税在很多国家都有。由于这面包税，荷兰城镇中消费的面包，价格都涨了一倍。而乡村的居民，则能够用其他税，部分代替这个税。根据推测出的面包消费种类，每年进行征税。例如，消费小麦面包的

人，税3盾15斯泰弗，约合6先令9便士半。由于抬高了劳动价格，这种税和类似的其他税，让荷兰的多数制造业衰落了。（参见《关于权利的回忆》210-211）同类的税在米兰公国，在热那亚各州，在摩登那公国，在帕马、普拉逊蒂阿、瓜斯塔拉各公国，虽然不像荷兰收的那么重，可是这种税，在教皇的领地里都有。法国一位有些名气的著者（改革者），曾经建议用这破坏性最大的税去替代其他各种税的一大部分，以对法国的财政进行改革。正如西塞罗所说，“哪怕再荒诞的事，一些哲学家有时候也会去支持”。

Taxes upon butchers' meat are still more common than those upon bread. It may indeed be doubted whether butchers' meat is anywhere a necessary of life. Grain and other vegetables, with the help of milk, cheese, and butter, or oil where butter is not to be had, it is known from experience, can, without any butchers' meat, afford the most plentiful, the most wholesome, the most nourishing, and the most invigorating diet. Decency nowhere requires that any man should eat butchers' meat, as it in most places requires that he should wear a linen shirt or a pair of leather shoes.

同这面包税相比，家畜肉税还要普遍一些。尽管值得怀疑的是，在各个地方，是否家畜肉是生活的必需品。不过根据经验来看，即使没有家畜肉，有蔬菜，有米和麦子，再加上牛奶、干酪和牛油（可用酥油代替）等食物，也足够丰盛和卫生，能够保障人营养够、精神足。很多地方体面的标准是要穿麻衬衫和皮鞋，没有哪个地方要人必须吃家畜肉的。

Consumable commodities, whether necessaries or luxuries, may be taxed in two different ways. The consumer may either pay an annual sum on account of his using or consuming goods of a certain

kind, or the goods may be taxed while they remain in the hands of the dealer, and before they are delivered to the consumer. The consumable goods which last a considerable time before they are consumed altogether are most properly taxed in the one way; those of which the consumption is either immediate or more speedy, in the other. The coach-tax and plate-tax are examples of the former method of impos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other duties of excise and customs, of the latter.

消费品有两种征税方法，不管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其一，消费者每年根据对某种特定商品的使用情况，缴纳一定额度的税款；其二，如果货物没有从商人那里脱手转卖给消费者，那么在卖出之前，就要征税。前一种征税方法，适合对不能马上用完，消费时间较长的商品，而后一种适合立刻消费或是消费时间比较短的商品。前一种方法，适合对马车、金银器皿征税，而后一种，适合大部分的消费税和关税。

A coach may, with good management, last ten or twelve years. It might be taxed, once for all, before it comes out of the hands of the coachmaker. But it is certainly more convenient for the buyer to pay four pounds a year for the privilege of keeping a coach than to pay all at once forty or forty-eight pounds additional price to the coachmaker, or a sum equivalent to what the tax is likely to cost him during the time he uses the same coach. A service of plate, in the same manner, may last more than a century. It is certainly easier for the consumer to pay five shillings a year for every hundred ounces of plate, near one per cent of the value, than to redeem this long annuity at five-and-twenty or thirty years' purchase, which would enhance the price at least five-and-twenty or thirty per cent. The different taxes which affect houses are

certainly more conveniently paid by moderate annual payments than by a heavy tax of equal value upon the first building or sale of the house.

如能妥善保管，一辆马车的使用期可达到10至12年。对于买方来讲，为了保有马车特权，每年要缴纳4镑，这是比较方便的做法了。更为麻烦的做法，是除了支付马车的价格外，另外付给马车制造者40或48镑，基本是马车使用期间应当缴纳清的税额。同样的，一件金银质地的器皿的寿命，有时候在一百年以上。作为金银器皿的消费者，对这种器皿100盎司每年缴付5先令，大约相当于器皿价格的1%。比起一次要缴付这个数额的25乃至30倍，还是要容易一些的。在对房屋征税时，还是每年征收比较少的数额比较便利，不要一次征收所有年份的税款，这过于沉重，而且对纳税人不便利。

It was the well-known proposal of Sir Matthew Decker that all commodities, even those of which the consumption is either immediate or very speedy, should be taxed in this manner, the dealer advancing nothing, but the consumer paying a certain annual sum for the licence to consume certain goods. The object of his scheme was to promote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foreign trade, particularly the carrying trade, by taking away all duties upon importation and exportation, and thereby enabling the merchant to employ his whole capital and credit in the purchase of goods and the freight of ships, no part of either being diverted towards the advancing of taxes. The project, however, of taxing, in this manner, goods of immediate or speedy consumption seems liable to the four following very important objections. First, the tax would be more unequal, or not so well proportioned to the expense and consumption of the different contributors as in the way in which it is commonly imposed. The taxes upon ale, wine, and spirituous

liquors, which are advanced by the dealers, are finally paid by the different consumers exactly in proportion to their respective consumption. But if the tax were to be paid by purchasing a licence to drink those liquors, the sober would, in proportion to his consumption, be taxed much more heavily than the drunken consumer. A family which exercised great hospitality would be taxed much more lightly than one who entertained fewer guests. Secondly, this mode of taxation, by paying for an annual, half-yearly, or quarterly licence to consume certain goods, would diminish very much one of the principal conveniences of taxes upon goods of speedy consumption the piecemeal payment. In the price of threepence halfpenny, which is at present paid for a pot of porter, the different taxes upon malt, hops, and beer, together with the extraordinary profit which the brewer charges for having advanced them, may perhaps amount to about three halfpence. If a workman can conveniently spare those three halfpence, he buys a pot of porter. If he cannot, he contents himself with a pint, and, as a penny saved is a penny got, he thus gains a farthing by his temperance. He pays the tax piecemeal as he can afford to pay it, and when he can afford to pay it, and every act of payment is perfectly voluntary, and what he can avoid if he chooses to do so. Thirdly, such taxes would operate less as sumptuary laws. When the licence was once purchased, whether the purchaser drank much or drank little, his tax would be the same. Fourthly, if a workman were to pay all at once, by yearly, half-yearly, or quarterly payments, a tax equal to what he at present pays, with little or no inconveniency, upon all the different pots and pints of porter which he drinks in any such period of time, the sum might frequently distress him very much. This mode of taxation, therefore, it seems evident, could never, without the most grievous oppression, produce a revenue nearly equal to what is derived from the present mode without any oppression. In several countries, however,

commodities of an immediate or very speedy consumption are taxed in this manner. In Holland people pay so much a head for a licence to drink tea.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a tax upon bread, which, so far as it is consumed in farm-houses and country villages, is there levied in the same manner.

马太·德克尔爵士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提议，认为一切立刻损耗的完毕的商品，征税方法都如下：消费者每年缴纳一定税额，来获得消费某商品的许可，直到全部缴纳为止。商人不需要缴纳任何税额。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撤销所有输入输出税，让商人把所有资本和信用都花在货物购买、船舶租赁上，而不需要把什么部分用在税款的垫支上。这样，所有部门的对外贸易，尤其是运输贸易都能有所进步。不过，如果对迅速消耗的商品这样征税的话，免不了有四项弊端：第一，与普通的征税方法比，这种方法更加不公平，因为无法按照纳税者费用与消费的比例征税。由商人垫支的麦酒、葡萄酒及火酒税，结果可由各消费者完全按照他们各个消费的数量的比例支付。如果这种税的缴纳方式，是通过饮酒许可证购买的方式缴纳清的，那么按照消费量来看，不爱喝酒的人反而比爱喝酒的人，按照比例缴税大得多；常有客人来访的家庭所付税款比例，远远小于宾客少的家庭。第二，照此法交税，按照一年一次或者半年一次，一个季度一次付钱换得许可证，那么就要大大丧失了逐渐针对快速消费品征税的便利性。现在黑啤酒一瓶的价格，为3便士半，其中对麦芽、酒花、啤酒所征各税以及酿酒者为垫支这些税所索的额外利润，大概要占1便士半。如果一个劳动者能够拿出3便士半就足够买到一瓶黑啤酒；就算买不到，买一品脱也就足够了，由于节约1便士，即等于获得1便士，他由这种节制就获得一点钱了。税负既然是陆续支付的，那么他可以随时凭着意愿支付，完全出于自愿；如果不想付税，他也是能做到的。第三，这种税，就不能取缔奢侈行为了。第四，如果我们要求一个劳动者每年一次，甚至半年一次、一个季度一次付出他所饮的每瓶或每品脱黑啤酒的赋税总额，那么本来还不让他感到麻烦的金额，会让他叫苦不迭。因此，因此，这样的征税方法，除非采取强硬的压迫手段，否则就收

不到现在的税额。而当下的收税方法，却不依靠任何强制手段，也受足了税额。然而，有些国家，就采取了压迫的手段，对消耗迅速的商品征税。荷兰人领取饮茶许可，也要付出若干税款。在前面我已经提到过，只要是在农户家中或是乡下村庄消费面包，都是以同一种方式征税的。

The duties of excise are imposed briefly upon goods of home produce destined for home consumption. They are imposed only upon a few sorts of goods of the most general use. There can never be any doubt either concerning the goods which are subject to those duties, or concerning the particular duty which each species of goods is subject to. They fall almost altogether upon what I call luxuries, excepting always the four duties above mentioned, upon salt soap, leather, candles, and, perhaps, that upon green glass.

国内的消费税主要是针对那些国内资产自销的货物。这税都是在广泛销售的几种货物上征收的。所以，征税的货物对象和特定的税率，好无疑问都是有明确规定的。消费税的征收对象，除了我前面提到的盐、肥皂、皮革、蜡烛以及普通玻璃外，大多数都是我所说的奢侈品。

The duties of customs are much more ancient than those of excise. They seem to have been called customs as denoting customary payments which had been in use from time immemorial. They appear to have been originally considered as taxes upon the profits of merchants. During the barbarous times of feudal anarchy, merchants, like all the other inhabitants of burghs, were considered as little better than emancipated bondmen, whose persons were despised, and whose gains were envied. The great nobility, who had

consented that the king should tallage the profits of their own tenants, were not unwilling that he should tallage likewise those of an order of men whom it was much less their interest to protect. In those ignorant times it was not understood that the profits of merchants are a subject not taxable directly, or that the final payment of all such taxes must fall, with a considerable overcharge, upon the consumers.

比起国内货物税，关税实行的时间要早得多。长久以来，关税这个词，一直和英文中的“习惯”是同一个词（customs），似乎是想表达关税是长期以来的一种习惯税。最初，这被看成是对商人的利润征的税，封建时代没有政府商人的人格，和城中其他居民一样被轻视，获得的利润还被嫉妒，再加上大贵族们已经认可国王对自己的佃农征收税款，对于那些和自己无关的商人们，大贵族们无意保护他们的利润，也不会不愿意国王对其征税。在那愚昧无知的时期，这些人都不明白，对商人获得的利润直接征税是做不到的。因为这样的税，最后肯定会落在消费者身上，而且还要加上额外的负担。

The gains of alien merchants were looked upon more unfavourably than those of English merchants. It was natural, therefore, that those of the former should be taxed more heavily than those of the latter.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duties upon aliens and those upon English merchants, which was begun from ignorance, has been continued from the spirit of monopoly, or in order to give our own merchants an advantage both in the home and in the foreign market.

比起英国本国的商人，外国商人利润的获得更加招来嫉恨，自然也要缴纳更多的赋税。在愚昧的时代，对外国商人和英国本国商人征

税是有所区别的，后来又为了独占市场，要求英国本国商人不仅仅在本国市场要占据有利位置，在国外市场也要占据有利地位才能得以发展。

With this distinction, the ancient duties of customs were imposed equally upon all sorts of goods, necessaries as well as luxuries, goods exported as well as goods imported. Why should the dealers in one sort of goods, it seems to have been thought, be more favoured than those in another? or why should the merchant exporter be more favoured than the merchant importer?

除了上述区别，古时候关税，是毫无区别的加在各种货物上的。不管是必需品、奢侈品、进口物品还是输出物品，收税平等。为何贩卖某种货物的商人比另一种商人得到更多支持？为何出口商人比进口商人享受更多的优惠待遇？

The ancient custom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branches. The first, and perhaps the most ancient of all those duties, was that upon wool and leather. It seems to have been chiefly or altogether an exportation duty. When the woollen manufacture came to be established in England, lest the king should lose any part of his customs upon wool by the exportation of woollen cloths, a like duty was imposed upon them. The other two branches were, first, a duty upon wine, which, being imposed at so much a ton, was called a tonnage, and, secondly, a duty upon all other goods, which, being imposed at so much a pound of their supposed value, was called a poundage. In the forty-seventh year of Edward III a duty of sixpence in the pound was imposed upon all goods exported and imported, except wools, wool-fells, leather, and wines, which were subject to

particular duties. In the fourteenth of Richard II this duty was raised to one shilling in the pound, but three years afterwards it was again reduced to sixpence. It was raised to eightpence in the second year of Henry IV, and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same prince to one shilling. From this time to the ninth year of William III this duty continued at one shilling in the pound. The duties of tonnage and poundage were generally granted to the king by one and the same Act of Parliament, and were called the Subsidy of Tonnage and Poundage. The Subsidy of Poundage having continued for so long a time at one shining in the pound, or at five per cent, a subsidy came, in the language of the customs, to denote a general duty of this kind of five per cent. This subsidy, which is now called the Old Subsidy, still continues to be levied according to the book of rates established in the twelfth of Charles II. The method of ascertaining, by a book of rates, the value of goods subject to this duty is said to be older than the time of James I. The New Subsidy imposed by the ninth and tenth of William III was an additional five per cent upon the greater part of goods. The One-third and the Two-third Subsidy made up between them another five per cent of which they were proportionable parts. The Subsidy of 1747 made a fourth five per cent upon the greater part of goods; and that of 1759 a fifth upon some particular sorts of goods. Besides those five subsidies, a great variety of other duties have occasionally been imposed upon particular sorts of goods, in order sometimes to relieve the exigencies of the state, and sometimes to regulate the trade of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mercantile system.

古时关税，有三个分支。第一个分支，或许是所有税收中最早的税了。换句话说，所有关税中最先出现的分支，就是针对羊毛和皮革所征收的税。这种税大部分是，或者全部都是出口税。英格兰刚刚建立起毛织物制造业的时候，国王担心出口毛织物，会让他失去羊毛关

税，于是就把相似的税加在毛织物上。其他两分支分别是葡萄酒税——也就是对每吨葡萄酒收一定的税，叫做吨税——和镑税。镑税是针对其他一切货物所征的税，就是对货物推断价格后，每镑征收一定税额。爱德华三世47年，对一切进出口的商品，除征有特别税的羊毛、羊皮、皮革及葡萄酒外，每镑征税6便士。查理二世14年，此税每镑提高至1先令，但三年以后，又由1先令缩减至6便士。亨利四世二年，又提高至8便士，仅仅两年后又回到了1先令。由此时至威廉三世9年止，一直是每镑收取1先令。根据议会颁布同一项法令，吨税及镑税要统统交由国王，名称为吨税和镑税补助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镑税补助税都是按照每镑1先令，或按照5%的比例征收，因此关税上说的补助税，都指的是这5%的税。这种补助税——现称旧补助税——至今仍照查理二世12年制定的关税表征收。据说，在詹姆士一世时代，按照关税表来确定应该纳税的货物价值的方法就已经使用过了。威廉三世9年、10年两次所征的新补助税，系对大部分货物增税5%。1/3补助税及2/3补助税两项加起来，组成了另外5%。1747年的补助税，是对大部分货物征收的第4个5%的税。1759年的补助税，是对一些特定的货物征收的第5个5%的税。除这五项补助税外，有时候或是为了救国家之急，或者是为了依照重商主义制度来管控本国的贸易，就会把很多种税加在特定种类的货物上去。

That system has come gradually more and more into fashion. The Old Subsidy was imposed indifferently upon exportation as well as importation. The four subsequent subsidies, as well as the other duties which have been occasionally imposed upon particular sorts of goods have, with a few exceptions, been laid altogether upon importatio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ancient duties which had been imposed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the goods of home produce and manufacture have either been lightened or taken away altogether. In most cases they have been taken away. Bounties have even been given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some of them. Drawbacks too, sometimes of the whole, and, in most cases, of a part of the duties

which are paid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goods, have been granted upon their exportation. Only half the duties imposed by the Old Subsidy upon importation are drawn back upon exportation: but the whole of those imposed by the latter subsidies and other imposts are, upon the greater part of goods, drawn back in the same manner. This growing favour of exportation, and discouragement of importation, have suffered only a few exceptions, which chiefly concern the materials of some manufactures. These our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are willing should come as cheap as possible to themselves, and as dear as possible to their rivals and competitors in other countries. Foreign materials are, upon this account, sometimes allowed to be imported duty free; Spanish wool, for example, flax, and raw linen yarn. The exportation of the materials of home produce, and of those which are the particular produce of our colonies, has sometimes been prohibited, and sometimes subjected to higher duties. The exportation of English wool has been prohibited. That of beaver skins, of beaver wool, and of gum Senega has been subjected to higher duties. Great Britain, by the conquest of Canada and Senegal, having got almost the monopoly of those commodities.

重商制度一天天流行起来。旧的补助税，对进出口货物一视同仁地征税。以后的四种补助税，还有其他时不时对特定货物征的税，除若干货物特殊外，都加在了进口货物上面。从前对本国产品及国内制造品出口征收的各项税款，大都减轻或彻底废除。这些货物的出口甚至有奖金鼓励。对进口又出口的外国货物，有时退还进口的时候缴纳的全部税款，但是多数时候，只是退还一部分。进口的时候由于旧辅助税而征收的税款，出口的时候只退一半；但由以后的补助税及其他关税所征收的税，大部分货物在出口的时候会全部退还。只有少数几种关乎某些制造品的制造原料，不受日益加大的支持进口和抑制出口这种情势的影响。我们的商人和制造业者们，自然希望这些原料能以

最低的价格买入，而自己的竞争对手买入时只能出高价。正是由于上述情由，我们期望有的时候能够免税买到国外的原料，像西班牙的羊毛、大麻，或者是粗亚麻纱线。有的时候，我们又对把国内或者本国殖民地的原料出口他国的行为征收高额税款，甚至禁止出口。英国对羊毛的出口是明令禁止的。海狸皮毛，还有远志橡胶如要出口，则要上交重税。自从英国政府了加拿大和塞尼加尔，几乎就垄断了这些货物。

That the mercantile system has not been very favourable to the revenue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to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I have endeavoured to show in the fourth book of this Inquiry. It seems not to have been more favourable to the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so far at least as that revenue depends upon the duties of customs.

我在本书第4篇说过，重商理论并不有利于增加大多数人的收入，也不会有利于增加国家土地和劳动年产出。似乎对君主的收入也没有什么有好处，至少，是无益于增加那些依靠关税所得的收入的。

In consequence of that system, the importation of several sorts of goods has been prohibited altogether. This prohibition has in some cases entirely prevented, and in others has very much diminished the importation of those commodities by reducing the importers to the necessity of smuggling. It has entirely prevented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woollens, and it has very much diminished that of foreign silks and velvets. In both cases it has entirely annihilated the revenue of customs which might have been levied upon such importation.

由于重商主义学说的流行，最终致使货物进口被禁止。于是进口商被迫进行走私活动；在一些情况下，走私无法实现，而其他情况下，进口也很有限。外国毛织品的进口完全被禁止了；外国输入本国的丝绒也大为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货物进口带来的关税收入几乎为零。

The high duties which have been imposed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many different sorts of foreign goods, in order to discourage their consumption in Great Britain, have in many cases served only to encourage smuggling, and in all cases have reduced the revenue of the customs below what more moderate duties would have afforded. The saying of Dr. Swift, that in the arithmetic of the customs two and two, instead of making four, make sometimes only one, holds perfectly true with regard to such heavy duties which never could have been imposed had not the mercantile system taught us, in many cases, to employ taxation as an instrument, not of revenue, but of monopoly.

有些重税是从国外进口的商品上征收得来的，其本来目的是为了阻止英国本国消费这些物品，事实上却鼓励了走私。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减少关税收入，反而不如征收轻税的时候。绥弗特博士说，计算关税的时候，2加2不一定得4，有可能只得1。若不是重商主义学说总是把征税看作独占市场的手段而不是增加收入的方法，也不会有人想收取重税。

The bounties which are sometimes given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home produce and manufactures, and the drawbacks which are paid upon the re-exporta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foreign goods, have given occasion to many frauds, and to a species of smuggling

more destructive of the public revenue than any other. In order to obtain the bounty or drawback, the goods, it is well known, are sometimes shipped and sent to sea, but soon afterwards clandestinely relanded in some other part of the country. The defalcation of the revenue of customs occasioned by the bounties and drawbacks, of which a great part are obtained fraudulently, is very great. The gross produce of the customs in the year which ended on the 5th of January 1755 amounted to £5,068,000. The bounties which were paid out of this revenue, though in that year there was no bounty upon corn, amounted to £167,800. The drawbacks which were paid upon debentures and certificates, to £2,156,800. Bounties and drawbacks together amounted to £2,324,600. In consequence of these deductions the revenue of the customs amounted only to £2,743,400: from which, deducting £287,900 for the expense of management in salaries and other incidents, the net revenue of the customs for that year comes out to be L2,455,500. The expense of management amounts in this manner to between five and six per cent upon the gross revenue of the customs, and to something more than ten per cent upon what remains of that revenue after deducting what is paid away in bounties and drawbacks.

对国内产物和制造品给予出口奖励金，对国外商品再次出口退税，曾导致种种欺诈行为的发生，并且导致了最破坏国家收入的走私行为。众所周知，为得到奖励金或退税，商人把货物用船运送出港口，又立马折返，从本国其他的沿海地区登岸。奖励金及退税对关税收入造成了了很大的损失，其中一大部分落到欺诈者之手。至1755年1月5日为止，年度的关税总收入达5,068,000镑。由这总收入中支出的奖励金（虽然该年度对谷物还没发给奖励金），达167,806镑。根据退税凭证和证明书而得到的退税金额，达2,156,800镑。二者相加，总数达到了2,324,600镑。把这一大金额除去，关税收入就不过

2,743,400镑。再减去官吏的薪水还有关税行政费，也就是287,900镑，该年度关税纯收入，就只有2,455,500镑了。这样，关税行政费，相当于关税总收入5%与6%之间，超过了扣除奖励金、退税金余额的10%。

Heavy duties being imposed upon almost all goods imported, our merchant importers smuggle as much and make entry of as little as they can. Our merchant exporters, on the contrary, make entry of more than they export; sometimes out of vanity, and to pass for great dealers in goods which pay no duty, and sometimes to gain a bounty or a drawback. Our exports, in consequence of these different frauds, appear upon the customhouse books greatly to overbalance our imports, to the unspeakable comfort of those politicians who measure the national prosperity by what they call the balance of trade.

由于所有进口货物都被征收了重税，所以我国的进口商人，希望尽可能多的进行走私输入，而尽可能少的进行报关输入。反之，我国出口商，为了面子，会假装成经营免税货物的大商人，还有时为了骗取奖励金和退税，报关输出量远超实际输出量。这些欺骗行为叠加起来，致使海关登记簿上的记录显示：我国的出口远大于进口。这让把贸易差额作为衡量国民繁荣标尺的政治家大感欣慰。

All goods imported, unless particularly exempted, and such exemptions are not very numerous, are liable to some duties of customs. If any goods are imported not mentioned in the book of rates, they are taxed at 4s. 9 9/20d. for every twenty shillings value, according to the oath of the importer, that is, nearly at five subsidies, or five poundage duties. The book of rates is extremely

comprehensive, and enumerates a great variety of articles, many of them little used, and therefore not well known. It is upon this account frequently uncertain under what article a particular sort of goods ought to be classed, and consequently what duty they ought to pay. Mistakes with regard to this sometimes ruin the custom-house officer, and frequently occasion much trouble, expense, and vexation to the importer. In point of perspicuity, precision, and distinctness, therefore, the duties of customs are much more inferior to those of excise.

除了个别免税商品，所有进口货物，都征收一定关税。如果进口货物的时候，这些货物并没有出现在关税表上，那么就根据此货物的价值，按照每20先令征收4先令99/20便士的关税比例征收。这个关税，与前面提过的五种镑税和补助税比例相当。当然，货物价值几何，是根据申报者的陈述得来的，申报者要发誓讲真话。很很多都不为一般人所知道。由于这个原因，某种货物当属哪种类别，当以何种税率进行征收，常常无法确定。这样的差错常常导致收税官收税失败，还让进口商感到麻烦和苦恼，而且耗资甚大。从明确、正确和清晰的程度来看，关税远远比不上国内的消费税。

In order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embers of any society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public revenue in proportion to their respective expense, it does not seem necessary that every single article of that expense should be taxed. The revenue which is levied by the duties of excise is supposed to fall as equally upon the contributors as that which is levied by the duties of customs, and the duties of excise are imposed upon a few articles only of the most general use and consumption. It has been the opinion of many people that, by proper management, the duties of customs might likewise, without any loss to the public revenue, and with great

advantage to foreign trade, be confined to a few articles only.

为了让多数人民按照自己消费的比例提供国家收入（纳税），好像没有必要让他们根据每一样购买的东西征税。消费者应该平等负担了国内货物税和关税的。不过，很多人认为，既然国内货物税只针对几种销路广阔的商品征收，那关税也可以同样只针对几种货物，既能给对外贸易带来很多收益，也不会损害公共收入。

The foreign articles of the most general use and consumption in Great Britain seem at present to consist chiefly in foreign wines and brandies; in some of the productions of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sugar, rum, tobacco, cocoanuts, etc.; and in some of those of the East Indies- tea, coffee, china-ware, spiceries of all kinds, several sorts of piece-goods, etc. These different articles afford, perhaps, at presen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revenue which is drawn from the duties of customs. The taxes which at present subsist upon foreign manufactures, if you except those upon the few contained in the foregoing enumeration, hav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been imposed for the purpose, not of revenue, but of monopoly, or to give our own merchants an advantage in the home market. By removing all prohibitions, and by subjecting all foreign manufactures to such moderate taxes as it was found from experience afforded upon each article the greatest revenue to the public, our own workmen might still have a considerable advantage in the home market, and many articles, some of which at present afford no revenue to government, and others a very inconsiderable one, might afford a very great one.

在英国，现在销路最广的外国商品，主要是国外进口的葡萄酒白

兰地，以及美洲、西印度等地出产的砂糖、蔗糖、酒类、烟草和椰子，还有东印度的茶、咖啡、瓷器、香料和各种纺织物。这些物品构成了关税收入的大部分来源。如果把上述货物的关税排除在外，那么有很大一部分关税，征收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收入，而是为了独占市场。因此，如果撤销所有禁令，根据经验，在恰当范围内对外国制造品征收能给国家最大收入的税，现在仅仅给政府带来少量收入的物品，到时候会位国家提供很多收入。

High taxes, sometimes by diminishing the consumption of the taxed commodities, and sometimes by encouraging smuggling, frequently afford a smaller revenue to government than what might be drawn from more moderate taxes.

收取某些重税，有时该类物品的消费量减少，有时还会鼓励走私。导致的结果，就是重税反倒不如轻税得到的收益大。

When the diminution of revenue is the effect of the diminution of consumption there can be but one remedy, and that is the lowering of the tax.

如果是消费减少带导致收入减少，那只能通过降低税率的方法，来进行补救。

When the diminution of the revenue is the effect of the encouragement given to smuggling, it may perhaps be remedied in two ways; either by diminishing the temptation to smuggle, or by increasing the difficulty of smuggling. The temptation to smuggle

can be diminished only by the lowering of the tax, and the difficulty of smuggling can be increased only by establishing that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which is most proper for preventing it.

如果是因为鼓励了走私才导致收入减少，那么补救方法有二：一是降低走私的诱惑，二是增加走私的阻碍。减少走私诱惑可以通过降低关税来实现，而增加走私的障碍，可以通过建立最为合理的管理制度实现。

The excise laws, it appears, I believe, from experience, obstruct and embarrass the operations of the smuggler much more effectually than those of the customs. By introducing into the customs a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excise as the nature of the different duties will admit, the difficulty of smuggling might be very much increased. This alteration, it has been supposed by many people, might very easily be brought about.

就往年的经验而看，在防止走私上，国内货物税法的作用比关税法大多了。在各种税性质允许的情况下，在关税方面应用类似国内货物税的制度，就能大大地防止走私。大家都能预想到，要实现这样的改变很容易。

The importer of commodities liable to any duties of customs, it has been said, might as his option be allowed either to carry them to his own private warehouse, or to lodge them in a warehouse provided either at his own expense or at that of the public, but under the key of the custom-house officer, and never to be opened but in his presence. If the merchant carried them to his own private

warehouse, the duties to be immediately paid, and never afterwards to be drawn back, and that warehouse to be at all times subject to the visit and examination of the custom-house officer, in order to ascertain how far the quantity contained in it corresponded with that for which the duty had been paid. If he carried them to the public warehouse, no duty to be paid till they were taken out for home consumption. If taken out for exportation, to be duty free, proper security being always given that they should be so exported. The dealers in those particular commodities, either by wholesale or retail, to be at all times subject to the visit and examination of the custom-house officer, and to be obliged to justify by proper certificates the payment of the duty upon the whole quantity contained in their shops or warehouses. What are called the excise-duties upon rum imported are at present levied in this manner, and the sam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might perhaps be extended to all duties upon goods imported, provided always that those duties were, like the duties of excise, confined to a few sorts of goods of the most general use and consumption. If they were extended to almost all sorts of goods, as at present, public warehouses of sufficient extent could not easily be provided, and goods of a very delicate nature, or of which the preservation required much care and attention, could not safely be trusted by the merchant in any warehouse but his own.

有人主张，如果进口商的货物都需要完整缴纳关税，那就要把商品搬进自己或是国家货栈。后者由海关人员看管，海关人员到场才能打开国家货栈。如果是商人把这些货物运进了自己的私人仓库，那就要立即上交税款，并且不得收回；并且，这私人仓库要随时接受海关人员的访问检查，以确定商人没有谎报纳税数量。如果商人把货物运进公家的仓库，这批货物如果销往国内，那么直到出货的时候才需要纳税；如果销往国外，则完全无须纳税。但是这样的情况下他须得提

供货物输出的担保。此外，无论是批发商还是零售商，所有的这些商人，都随时要准备有海关人员前来访问检查，此时他们有义务提供相应的证明，说明自己商店和仓库里所有的货物都已经缴纳过税款了。英国就是这样征收管理进口蔗糖和酒类的国内货物税的；也许，这样的管理制度，可以延伸到对所有进口货物的税收上去，不过，也仅限于若干种使用的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货物上，就像国内货物税那样。但是不能把这样的税收方式扩大到一切货物上去。一是国家货栈不够，二是商人也不放心把精细易损坏的货物，放在不属于自己的货栈中。

If by such a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smuggling, to any considerable extent, could be prevented even under pretty high duties, and if every duty was occasionally either heightened or lowered according as it was most likely, either the one way or the other, to afford the greatest revenue to the state, taxation being always employed as an instrument of revenue and never of monopoly, it seems not improbable that a revenue at least equal to the present net revenue of the customs might be drawn from dutie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only a few sorts of goods of the most general use and consumption, and that the duties of customs might thus be brought to the same degree of simplicity, certainty, and precision as those of excise. What the revenue at present loses by drawbacks upon the re-exportation of foreign goods which are afterwards relanded and consumed at home would under this system be saved altogether. If to this saving, which would alone be very considerable, were added the abolition of all bounties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home produce in all cases in which those bounties were not in reality drawbacks of some duties of excise which had before been advanced, it cannot well be doubted but that the net revenue of customs might, after an alteration of this kind, be fully equal to what it had ever been before.

如果能够施行这种税务管理机制，那么即便在关税很高的情况下，走私也可减少。如果抬高或者降低每一种税收，收税的目的只是让国家得到收入，而不是对什么物品进行垄断，那么，要想获得至少和现在一样的关税净收入，只用对几种用途最广，消费最多的货物征收关税就够了，也许关税还能因此获得和国内货物税一样的简单明了以及准确度。在该制度下，国家因这一现象——外货再次输出，实则输入国内——蒙受的退税金损失，就能免除。单是对退税金的节省就不是一笔小数目，再添上取消掉的对本国产物出口别国的奖励金——其实这些奖励金并不是从垫付的国内货物税中退来的——毫无疑问，最后关税的纯收入，经过这制度的种种调整以后，会和没调整之前完全相等。

If by such a change of system the public revenue suffered no loss, the trade and manufactures of the country would certainly gain a very considerable advantage. The trade in the commodities not taxed, by far the greatest number, would be perfectly free, and might be carried on to and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every possible advantage. Among those commodities would be comprehended all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and all the materials of manufacture. So far as the free importation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reduced their average money price in the home market it would reduce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but without reducing in any respect its real recompense. The value of money is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which it will purchase. That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is altogether independent of the quantity of money which can be had for them. The reduction in the money price of labour would necessarily be attended with a proportionable one in that of all home manufactures, which would thereby gain some advantage in all foreign markets. The price of some manufactures would be reduced in a still greater proportion by the

free importation of the raw materials. If raw silk could be imported from China and Indostan duty free, the silk manufacturers in England could greatly undersell those of both France and Italy. There would be no occasion to prohibit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silks and velvets. The cheapness of their goods would secure to our own workmen not only the possession of the home, but a very great command of the foreign market. Even the trade in the commodities taxed would be carried on with much more advantage than at present. If those commodities were delivered out of the public warehouse for foreign exportation, being in this case exempted from all taxes, the trade in them would be perfectly free. The carrying trade in all sorts of goods would under this system enjoy every possible advantage. If those commodities were delivered out for home consumption, the importer not being obliged to advance the tax till he had an opportunity of selling his goods, either to some dealer, or to some consumer, he could always afford to sell them cheaper than if he had been obliged to advance it at the moment of importation. Under the same taxes, the foreign trade of consumption even in the taxed commodities might in this manner be carried on with much more advantage than it can be at present.

这样的制度变革，会为全国贸易制造业带来很大的益处，而国家也没有什么损失。在贸易中占据了大部分的未经课税的商品，可以在世界各地销售，赚取所有能得到的利润。这些商品中，包含了所有生活之必须物品，还有制造这些必须的材料。至于生活必需品的自由输入，则会导致国际市场上货币平均价格和劳动货币价格的下跌，但是劳动真正报偿不变。货币的价值，和它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的数量相称，而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则与它所能换得的货币数量全然无关。若劳动货币价格跌落，则国内一切制造品的货币价格也必然跌落，这样一来，国内制造品，就可在一切国外市场上获得若干利益了。由于原料可以随意地运进国内，价格就降低更厉害。假若中国及印度生丝

能够无税输入，那么英格兰的丝绸制造商就能以大幅度的低价，把商品以远远低于法兰西和意大利同行竞争对手的价格，销售出去。这样一来，再去禁止从国外进口丝绒就没有必要了。只要本国商人的产品足够廉价，那本国的商人们在国内外的市场上就都能站稳脚跟。即便是课税商品的买卖，都会比现在得到更多的好处。如果，这些商品是要从公家的暂存仓库中运出去，出口到国外，并且获得相应的免税，那么买卖将无比畅通。无论是哪种货物进行转口贸易，在这种制度下，都能享尽好处。如果把这些货物由公家的暂存仓库运出来销往国内，那么进口商就没有义务垫付税款，除非他把这些货物买卖到了其他商人或者消费者手中。如果他没有一进口的时候就要垫付税金的义务，那么他肯定是能卖得便宜一些的。这样，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即使是要征税的销往国外的商品，也比目前获利多得多。

It was the object of the famous excise scheme of Sir Robert Walpole to establish, with regard to wine and tobacco, a system not very unlike that which is here proposed. But though the bill which was then brought into Parliament comprehended those two commodities, only it was generally supposed to be meant as an introduction to a more extensive scheme of the same kind, faction, combined with the interest of smuggling merchants, raised so violent, though so unjust, a clamour against that bill, that the minister thought proper to drop it, and from a dread of exciting a clamour of the same kind, none of his successors have dared to resume the project.

罗柏特·沃尔波尔那著名的国内货物税案，目的对葡萄酒和烟草设立税制，与上面的提议没有出入。他虽然对议会只提出了包含这两种商品的提案，但大家普遍推测，这意味着他将提出这类适用性更广的计划。因此，营私党派的利益与偷运商人的利益裹挟在一起，以掀起不正当骚乱的方式反对提案。这场骚乱如此猛烈，首相只能撤回提

案，其之后的继位者再也无人敢重新开始这一计划。

The duties upon foreign luxuries imported for home consumption, though they sometimes fall upon the poor, fall principally upon people of middling or more than middling fortune. Such are, for example, the duties upon foreign wines, upon coffee, chocolate, tea, sugar, etc.

虽然贫民不免要承担一些奢侈品税，但主要还是中层及上层人民负担这些奢侈品税，举个例子，对外国葡萄酒、咖啡、巧克力、茶叶和糖收关税。

The duties upon the cheaper luxuries of home produce destined for home consumption fall pretty equally upon people of all rank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respective expense. The poor pay the duties upon malt, hops, beer, and ale, upon their own consumption: the rich, upon both their own consumption and that of their servants.

对于国内自产自销的称不上太贵的奢侈品，按照每个人付出费用的比例，比较公平地由各个阶级的人民承担。贫者要承担自己消费的麦芽、酒花、啤酒、麦酒的税，而富有的人还要付自己所消费物品的税，及其奴仆所消费物品的税。

The whole consumption of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or of those below the middling rank, it must be observed, is in every country much greater, not only in quantity, but in value, than that of the middling and of those above the middling rank. The whole

expense of the inferior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superior ranks. In the first place, almost the whole capital of every country is annually distributed among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as the wages of productive labour. Secondly, a great part of the revenue arising from both the rent of land and the profits of stock is annually distributed among the same rank in the wages and maintenance of menial servants, and other unproductive labourers. Thirdly, some part of the profits of stock belongs to the same rank as a revenue arising from the employment of their small capitals. The amount of the profits annually made by small shopkeepers, tradesmen, and retailers of all kinds is everywhere very considerable, and makes a very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e annual produce. Fourthly, and lastly, some part even of the rent of land belongs to the same rank,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ose who are somewhat below the middling rank, and a small part even to the lowest rank, common labourers sometimes possessing in property an acre or two of land. Though the expense of thos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therefore, taking them individually, is very small, yet the whole mass of it, taking them collectively, amounts always to by much the largest portion of the whole expense of the society; what remains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for the consumption of the superior ranks being always much less, not only in quantity, but in value. The taxes upon expense, therefore, which fall chiefly upon that of the superior ranks of people, upon the smaller portion of the annual produce, are likely to be much less productive than either those which fall indifferently upon the expense of all ranks, or even those which fall chiefly upon that of the inferior ranks; than either those which fall indifferently upon the whole annual produce, or those which fall chiefly upon the larger portion of it. The excise upon the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e of home-made fermented and spirituous liquors is accordingly, of all the different taxes upon expense, by far the most

productive; and this branch of the excise falls very much, perhaps principally, upon the expense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the year which ended on the 5th of July 1775, the gross produce of this branch of the excise amounted to £3,341,837 9s. 9d.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下层人民的消费，同中层及以上阶级人民的消费比起来，在数量价值上都要超越许多。与上层阶级的全部费用比较，下层阶级的费用总和要大许多。首先，几乎每个国家的全部资本，每年都是要分给下层人民作为劳动工资的。其次，大部分从土地和资本盈利中得来的收入，都用在了给仆役等非生产性劳动者维持生活上。再者，资本利润的某些部分，要归于同样阶级的人，作为使用自己那些小额资本获得的收入。小商店老板、伙计还有从事各行各业的零售商人，每年挣得的利润无论在何地都相当大额，并占据了年收入大部分。第四，土地地租中，大部分属于中层以下的人民，而一小部分属于最下层人民。即便是普通劳动者，也拥有一两亩土地的。如果拆开来看，那些下层人民的花费，每个人都不多，但是加在一起积少成多，总额就占到了整个社会费用的最大部分；从一个国家全年的土地和劳动生产物中，除掉下层人民消费的量，剩余部分都是上层阶级所消费的。不过，不仅是价值，从数量上看也比下层消耗的少很多。因此，如果让税收的负担主要落在上层阶级身上，那么还不如无差别地从各个阶级身上出，这样获得的税额要多一些。单对上层阶级收税，所获得的甚至不如只从下层阶级收税所得。换句话说，与其对一小部分的年生产物征税，还不如对全部或者至少是大部分生产物征税。所以，以普通人民的消费对象为基础征税的税种里，最能够收到高税额的，就是以自制发酵酒以及其原料为对象征收的国内货物税。举个例子，到1775年7月5日为止，自制酒类及其原料的国内货物税年度总收入，共达到3.341.837镑9先令9便士。

It must always be remembered, however, that it is the luxurious and not the necessary expense of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that ought ever to be taxed. The final payment of any tax upon their necessary expense would fall altogether upon the superior ranks of people; upon the smaller portion of the annual produce, and not upon the greater. Such a tax must in all cases either raise the wages of labour, or lessen the demand for it. It could not raise the wages of labour without throwing the final payment of the tax upon the superior ranks of people. It could not lessen the demand for labour without lessening the annual produce of the land and labour of the country, the fund from which all taxes must be finally paid. Whatever might be the state to which a tax of this kind reduced the demand for labour, it must always raise wages higher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be in that state, and the final payment of this enhancement of wages must in all cases fall upon the superior ranks of people.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对下层人民的奢侈花费征税，而不能对必需品的花费征税。如果对他们的必需费用征收税额，上层人民要支付这费用，即由年生产物的较小部分负担，而不由年生产物的较大部分负担。在任何情况下，这税要么减少劳动需要，要么抬高劳动工资。最终不将该税的施加在上层阶级身上，劳动价格决无从提高；如果不减少所有税的支出源泉——土地劳动生产物，劳动需求也不会降低。不管这种税把劳动需要降低到何种状态，由于要征税，劳动工资也必须提高到高于征税前的水平。且在任何情况下，提高的工资部分，一定最后落在了上层阶级的身上。

Fermented liquors brewed, and spirituous liquors distilled, not for sale, but for private use, are not in Great Britain liable to any duties of excise. This exemption, of which the object is to save private families from the odious visit and examination of the tax-gatherer, occasions the burden of those duties to fall frequently

much lighter upon the rich than upon the poor. It is not, indeed, very common to distil for private use, though it is done sometimes. But in the country many middling and almost all rich and great families brew their own beer. Their strong beer, therefore, costs them eight shillings a barrel less than it costs the common brewer, who must have his profit upon the tax as well as upon all the other expense which he advances. Such families, therefore, must drink their beer at least nine or ten shillings a barrel cheaper than any liquor of the same quality can be drunk by the common people, to whom it is everywhere more convenient to buy their beer, by little and little, from the brewery or the alehouse. Malt, in the same manner, that is made for the use of a private family is not liable to the visit or examination of the tax-gatherer; but in this case the family must compound at seven shillings and sixpence a head for the tax. Seven shillings and sixpence are equal to the excise upon ten bushels of malt- a quantity fully equal to what all the different members of any sober family,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re at an average likely to consume. But in rich and great families, where country hospitality is much practised, the malt liquors consum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family make but a small part of the consumption of the house. Either on account of this composition, however, or for other reasons, it is not near so common to malt as to brew for private use.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any equitable reason why those who either brew or distil for private use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a composition of the same kind.

发酵或者是酿制酒精饮料，如果不是为了拿去市场上卖，而只是为了自己使用，在英国是不需要交国内货物税的。虽然，免除此种税的根由，是为了防止收税官到人家的私宅里面，进行令人厌恶的访问和检查，后果却是不理想的，原因是这会使富有者身上的赋税负担比贫穷者身上的反而轻得多。虽然为了自己使用而进行酒的蒸馏，并不

是那么常见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也会出现。不过，在乡下，许多中等阶级的人，以及几乎所有富贵家庭，都是自己酿酒饮用的。比起普通酿造者，这些人酿烈性啤酒的税金每桶都要少收8先令。对普通酿酒者来说，既然垫付了资金和税款，就一定要有相应的利润补偿。因为这个缘故，中等和富贵家庭在饮酒上的花费，比起一般市场上买啤酒的人，每桶要少花上9到12先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麦芽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生产的，虽然不必接受收税人员的访问和盘查，但是家庭中每个人都要缴纳7先令6便士。7先令6便士相当于对10蒲式耳麦芽所征收的国内货物税，而一个节俭的家庭，全家老小平均一共也就能消费10蒲式耳麦芽。然而在富贵家庭中，真正由富人及其家人饮用的部分，和消费的部分相比，很少。不过，或者是因为这个税，或者是因为其他，自己生产麦芽就不如自己酿酒那样流行。不过，要是这自己生产的麦芽被用来自己酿酒却不用缴纳麦芽税，这样的制度，想象不出其正当理由在哪里。

A greater revenue than what is at present drawn from all the heavy taxes upon malt, beer, and ale might be raised, it has frequently been said, by a much lighter tax upon malt, the opportunities of defrauding the revenue being much greater in a brewery than in a malt-house, and those who brew for private use being exempted from all duties or composition for duties, which is not the case with those who malt for private use.

有人常说，这是因为和麦芽制造比，酿酒能够有更多机会隐瞒交税。而且为自己酿造饮料的人不用纳税，为自己生产麦芽却要交税。

In the porter brewery of London a quarter of malt is commonly brewed into more than two barrels and a half, sometimes into three barrels of porter. The different taxes upon malt amount to six

shillings a quarter, those upon strong beer and ale to eight shillings a barrel. In the porter brewery, therefore, the different taxes upon malt, beer, and ale amount to between twenty-six and thirty shillings upon the produce of a quarter of malt. In the country brewery for common country sale a quarter of malt is seldom brewed into less than two barrels of strong and one barrel of small beer, frequently into two barrels and a half of strong beer. The different taxes upon small beer amount to one shilling and fourpence a barrel. In the country brewery, therefore, the different taxes upon malt, beer, and ale seldom amount to less than twenty-three shillings and fourpence, frequently to twenty-six shillings, upon the produce of a quarter of malt. Taking the whole kingdom at an average, therefore, the whole amount of the duties upon malt, beer, and ale cannot be estimated at less than twenty-four or twenty-five shillings upon the produce of a quarter of malt. But by taking off all the different duties upon beer and ale, and by tripling the malt-tax, or by raising it from six to eighteen shillings upon the quarter of malt, a greater revenue, it is said, might be raised by this single tax than what is at present drawn from all those heavier taxes.

在伦敦的黑麦酒酿酒厂里，一般每夸特麦芽，能够酿造出不止两桶半的酒，甚至能酿造到3桶。麦芽各项税费，每夸特征税6先令；各类烈性啤酒、麦酒，每桶收8先令。在黑麦酒酿造厂，对麦芽、啤酒和麦酒的征税达每夸特26先令，而每夸特麦芽征税达到30先令。乡下打算把酒卖给乡村的酿酒厂，每夸特麦芽最少能酿造出两桶烈啤酒，一桶麦酒，甚至能酿造出两桶半的烈啤酒。每桶麦酒收的税，每桶大约1先令4便士。因此，一般在乡下的酿造厂，一夸特麦芽一般要对麦芽、啤酒和麦酒共征收26先令的税，很少不到23先令4便士。从整个王国的平均数来看，一夸特麦芽，征收的麦芽、啤酒以及麦酒的税至少也有24或者25先令。然而要是撤销一切啤酒、麦酒税，把麦芽税增

加到之前的3倍，每夸特征收18先令而不是6先令，那么就是这一种税，就能比现在各种繁冗税收得来的收入更多。

Under the old malt tax, indeed, is comprehended a tax of four shillings upon the hogshead of cyder, and another of ten shillings upon the barrel of mum. In 1774, the tax upon cyder produced only £3083 6s. 8d. It probably fell somewhat short of its usual amount, all the different taxes upon cyder having, that year, produced less than ordinary. The tax upon mum, though much heavier, is still less productive, on account of the smaller consumption of that liquor. But to balance whatever may be the ordinary amount of those two taxes, there is comprehended under what is called the country excise, first, the old excise of six shillings and eightpence upon the hogshead of cyder; secondly, a like tax of six shillings and eightpence upon the hogshead of verjuice; thirdly, another of eight shillings and ninepence upon the hogshead of vinegar; and, lastly, a fourth tax of elevenpence upon the gallon of mead or metheglin: the produce of those different taxes will probably much more than counterbalance that of the duties imposed by what is called the annual malt tax upon cyder and mum.

旧麦芽税中包括：苹果酒每半桶4先令的税，烈啤酒每桶10先令的税。1774年，苹果酒税收入只有3083镑6先令8便士。比平常时候收税少，这是因为这一年对苹果所征收的税都比一般情况下少。尽管对烈啤酒收税更重，但囿于销量不及苹果酒，所以总的税额不如苹果酒税多。但是，为了让这两种税收达到平常水平，地方国内货物税含有：第一，旧国内货物税每半桶苹果酒收6先令8便士；第二，旧国内货物税每半桶酸果汁酒6先令8便士；第三，旧国内货物税醋每桶8先令9便士；第四，旧国内货物税甜酒或蜜糖水每加仑收11便士。麦芽税中的苹果酒税收入和烈啤酒税收入的欠缺，由这些税收来补，就绰

绰有余了。

	£	s.	d.
In 1772, the old malt-tax produced	722,023	11	11
The additional	356,776	7	9 3/4
In 1773, the old tax produced	561,627	3	7 1/2
The additional	278,650	15	3 3/4
In 1774, the old tax produced	624,614	17	5 3/4
The additional	310,745	2	8 1/2
In 1775, the old tax produced	657,357	0	8 1/4
The additional	323,785	12	6 1/4
	4) 3,835,580	12	0 3/4
Average of these four years	958,895	3	0 3/16
In 1772, the country excise produced	1,243,128	5	3
The London brewery	408,260	7	2 3/4
In 1773, the country excise	1,245,808	3	3
The London brewery	405,406	17	10 1/2
In 1774, the country excise	1,246,373	14	5 1/2
The London brewery	320,601	18	0 1/4
In 1775, the country excise	1,214,583	6	1
The London brewery	463,670	7	0 1/4
	4) 6,547,83	19	2 1/4
Average of these four years	1,636,958	4	9 1/2
To which adding the average malt-tax, or	958,895	3	0 3/16
The whole amount of those different taxes comes out to be	2,595,853	7	9 11/19
But by tripling the malt-tax, or by raising it from six to eighteen shillings upon the quarter of malt, that single tax would produce	2,876,685	9	0 9/16
A sum which exceeds the foregoing by	280,832	1	2 14/16

	镑	先令	便士
1772 年旧麦芽税收入	722, 023	11	11
附加税	356, 776	7	9 3/4
1773 年旧麦芽税收入	561, 627	3	7 1/2
附加税	278, 650	15	3 3/4
1774 年旧麦芽税收入	624, 614	17	5 3/4
附加税	310, 745	2	8 1/2
1775 年旧麦芽税收入	657, 357	0	8 1/4
附加税	323, 785	12	6 1/4
	4) 3, 835, 580	12	0 3/4
四年的平均数	958, 895	3	0 3/16
1772 年地方国内货物税收入	1, 243, 128	5	3
伦敦酿造厂税额	408, 260	7	2 3/4
1773 年地方国内货物税收入	1, 245, 808	3	3
伦敦酿造厂税额	405, 406	17	10 1/2
1774 年地方国内货物税收入	1, 246, 373	14	5 1/2
伦敦酿造厂税额	320, 601	18	0 1/4
1775 年地方国内货物税收入	1, 214, 583	6	1
伦敦酿造厂税额	463, 670	7	0 1/4
	4) 6, 547, 83	19	2 1/4
四年的平均数	1, 636, 958	4	9 1/2
加入麦芽税平均数	958, 895	3	0 3/16
两平均数的和	2, 595, 853	7	9 11/19
若将麦芽税提高到原来的三倍的程度，也就是从 6 先令上涨到 18 先令，那么就会带来	2, 876, 685	9	0 9/16
对于前者的超出额	280, 832	1	2 14/16

Malt is consumed not only in the brewery of beer and ale, but

in the manufacture of wines and spirits. If the malt tax were to be raised to eighteen shillings upon the quarter, it might be necessary to make some abatement in the different excises which are imposed upon those particular sorts of low wines and spirits of which malt makes any part of the materials. In what are called malt spirits it makes commonly but a third part of the materials, the other two-thirds being either raw barley, or one-third barley and one-third wheat. In the distillery of malt spirits, both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temptation to smuggle are much greater than either in a brewery or in a malt-house; the opportunity on account of the smaller bulk and greater value of the commodity, and the temptation on account of the superior height of the duties, which amount to 3s. 10 2/3d upon the gallon of spirits. (Though the duties directly imposed upon proof spirits amount only to 2s. 6d. per gallon, these added to the duties upon the low wines, from which they are distilled, amount to 3s. 10 2/3d. Both low wines and proof spirits are, to prevent frauds, now rated according to what they gauge in the wash.) By increasing the duties upon malt, and reducing those upon the distillery, bo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the temptation to smuggle would be diminished, which might occasion a still further augmentation of revenue.

不仅酿造啤酒和麦酒需要麦芽，制造下等火酒以及酒精，也需要麦芽。如果对麦芽的征税提到一夸特18先令，那就有必要减少下等火酒、酒精的征税，这些都是以麦芽为原料的。麦芽酒精中，一般情况下，原料中麦芽占了1/3，而其他的占2/3，有时是大麦小麦各占1/3，有时候则都是大麦。比起在酿造所或是麦芽制造厂，人们在麦芽酒精蒸馏所受的诱惑更大，也有更多机会去走私。酒精价值大，体积又小，有更多的走私机会；税率高，每加仑达3先令10又2/3便士，很有诱惑力。（尽管对含标准强度酒精的酒仅征收2先令6便士每加仑的税，但酿造这些酒所需的蒸馏酒的税收却由此增加到3先令10又2/3

便士。当前，为以防造假，蒸馏酒和含标准强度酒精的酒均按其加工时的测量结果来计算。）要减少走私机会，就要减少蒸馏所得税款，增加麦芽税，让国家收入增加得更多。

It has for some time past been the policy of Great Britain to discourage the consumption of spirituous liquors, on account of their supposed tendency to ruin the health and to corrupt the morals of the common people. According to this policy, the abatement of the taxes upon the distillery ought not to be so great as to reduce, in any respect, the price of those liquors. Spirituous liquors might remain as dear as ever,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wholesome and invigorating liquors of beer and ale might be considerably reduced in their price. The people might thus be in part relieved from one of the burdens of which they at present complain the mos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revenue might be considerably augmented.

酒精有损一般民众的健康，且于一般人民的道德无益，所以英国在历史上曾经推行政策，阻止酒精消费。依照这样，就不能大幅减少对蒸馏的征税，以防止降低酒精饮料价格；要维持酒精的高价，同时因为麦酒、啤酒于健康无害，于精神有益，要让其减价。最让人民怨声载道的税负就可一定程度减轻，国家的收入也得以大幅增长。

The objections of Dr. Davenant to this alteration in the present system of excise duties seem to be without foundation. Those objections are, that the tax, instead of dividing itself as at present pretty equally upon the profit of the maltster, upon that of the brewer, and upon that of the retailer, would, so far as it affected profit, fall altogether upon that of the maltster; that the maltster

could not so easily get back the amount of the tax in the advanced price of his malt as the brewer and retailer in the advanced price of their liquor; and that so heavy a tax upon malt might reduce the rent and profit of barley land.

达文南特博士反对针对嫌凶国内货物税制度进行此等改变，不过他的反对意见没什么依据。根据他的反对意见，本当由麦芽制造者、酿造者和零售业者平摊的利润上的国内货物税，将全部由麦芽制造者承担；酿造者和零售者能够对酒加价，对税额进行补偿，但是麦芽制造者却不行；而且对麦芽征收高额税款一定会降低大麦田地地租，减少其利润。

No tax can ever reduce, for any considerable time, the rate of profit in any particular trade which must always keep its level with other trades in the neighbourhood. The present duties upon malt, beer, and ale do not affect the profits of the dealers in those commodities, who all get back the tax with an additional profit in the enhanced price of their goods. A tax, indeed, may render the goods upon which it is imposed so dear as to diminish the consumption of them. But the consumption of malt is in malt liquors, and a tax of eighteen shillings upon the quarter of malt could not well render those liquors dearer than the different taxes, amounting to twenty-four or twenty-five shillings, do at present. Those liquors, on the contrary, would probably become cheaper, and the consumption of them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increase than to diminish.

很长时间之内，没有哪一种税，能够降低某个行业的利润率；所有行业都和附近其他各种行业的利润率相当。目前我们对麦芽、啤酒

和麦酒所征的税，还不足以影响商人在这些项目上的利润；这些商人增加酒的价格来抵消自己付的税额，还能再添上一些利润。确实，若是对一种货物征税，会使货物价格抬高，从而更少人买。不过对麦芽消费就在于麦芽酒上。每夸特麦芽征收18先令税的话，就也不会比征收24、25先令的时候贵；相反，酒的价格可能还要降低，人们对酒的消费会反增不降。

It is not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why it should be more difficult for the maltster to get back eighteen shillings in the advanced price of his malt than it is at present for the brewer to get back twenty-four or twenty-five, sometimes thirty, shillings in that of his liquor. The maltster, indeed, instead of a tax of six shillings, would be obliged to advance one of eighteen shillings upon every quarter of malt. But the brewer is at present obliged to advance a tax of twenty-four or twenty-five, sometimes thirty, shillings upon every quarter of malt which he brews. It could not be more inconvenient for the maltster to advance a lighter tax than it is at present for the brewer to advance a heavier one. The maltster doth not always keep in his granaries a stock of malt which it will require a longer time to dispose of than the stock of beer and ale which the brewer frequently keeps in his cellars. The former, therefore, may frequently get the returns of his money as soon as the latter. But whatever inconveniency might arise to the maltster from being obliged to advance a heavier tax, it could easily be remedied by granting him a few months' longer credit than is at present commonly given to the brewer.

酒精价格上涨了，酿造者能从中获取二十四五甚至30先令，然而麦芽制造者在麦芽涨价的时候，获取18先令都更加困难。这令人费解。的确，麦芽制造者现在每夸特麦芽缴纳的不是6先令税款而是18

先令；但是酿造者，每夸特的麦芽原材料缴付24、25先令乃至30先令。比起现在酿造者缴纳的沉重的税款，麦芽制造者缴纳的税款较轻，而且不会额外增添不便。麦芽制造者不会在仓库里存有那么多麦芽，以至于要花比酿酒者卖啤酒、麦酒更长的时间才能将其卖出去。这样来看，麦芽制造者的资金和酿酒者一样能很快收回。麦芽制造者虽然因为缴纳税款较重而承担更多麻烦，但是这麻烦只要让他有更长的时间缴纳税款，还是可以补救的。

Nothing could reduce the rent and profit of barley land which did not reduce the demand for barley. But a change of system which reduced the duties upon a quarter of malt brewed into beer and ale from twenty-four and twenty-five shillings to eighteen shillings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increase than diminish that demand. The rent and profit of barley land, besides, must always be nearly equal to those of other equally fertile and equally well-cultivated land. If they were less, some part of the barley land would soon be turned to some other purpose; and if they were greater, more land would soon be turned to the raising of barley. When the ordinary price of any particular produce of land is at what may be called a monopoly price, a tax upon it necessarily reduces the rent and profit of the land which grows it. A tax upon the produce of those precious vineyards of which the wine falls so much short of the effectual demand that its price is always above the natural proportion to that of the produce of other equally fertile and equally well cultivated land would necessarily reduce the rent and profit of those vineyards. The price of the wines being already the highest that could be got for the quantity commonly sent to market, it could not be raised higher without diminishing that quantity, and the quantity could not be diminished without still greater loss, because the lands could not be turned to any other equally valuable produce. The whole weight of the tax, therefore, would fall upon

the rent and profit- properly upon the rent of the vineyard. When it has been proposed to lay any new tax upon sugar, our sugar planters have frequently complained that the whole weight of such taxes fell, not upon the consumer, but upon the producer, they never having been able to raise the price of their sugar after the tax higher than it was before. The price had, it seems, before the tax been a monopoly price, and the argument adduced to show that sugar was an improper subject of taxation demonstrated, perhaps, that it was a proper one, the gains of monopolists, whenever they can be come at, being certainly of all subjects the most proper. But the ordinary price of barley has never been a monopoly price, and the rent and profit of barley land have never been above their natural proportion to those of other equally fertile and equally well-cultivated land. The different taxes which have been imposed upon malt, beer, and ale have never lowered the price of barley, have never reduced the rent and profit of barley land. The price of malt to the brewer has constantly risen in proportion to the taxes imposed upon it, and those taxes, together with the different duties upon beer and ale, have constantly either raised the price,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reduced the quality of those commodities to the consumer. The final payment of those taxes has fallen constantly upon the consumer, and not upon the producer.

如果没有什么会导致大麦需求减少，大麦耕地的地租和利润也不会减少。如果修改制度，把酿造啤酒和麦酒的麦芽，每夸特的税从24、25先令降低到18先令，其需求会增而非减少，在肥沃和耕作程度差不多的情况下，大麦耕地的地租及利润必定与其他土地大致相等。对比之后，若较少，那么一部分的大麦地就会被改作他用；如果较多，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土地用来栽种大麦。土地某特定产物的普通价格变成所谓的垄断价格时，征的税就会让那块土地的地租和利润减少。比如，葡萄酒的有效需求总是不充足的，因此，价格、肥沃程度

和耕作程度相同的土地在比较的时候，总是比自然的比例高；如果对优良的葡萄酒征税，那么一定会让葡萄园的地租和利润降低。因为，葡萄酒可能已经达到了上市的上限；数量不减少，价格就不会上升；而不遭受更大的损失，数量就不会减少，原因是这些土地不能用来生产其他同样价值的东西，所以，地租和利润要被征税，准确而言，就是葡萄园的地租被征税税。已经有人提出要对砂糖重新征一种税，国内种植蔗糖的人经常抱怨道，这项税是由由生产者负担的，而不是消费者来负担。征税之后，他们一直没能把砂糖价格提高到超过未征税之前的价位。然而在未征税之前，砂糖的价格似乎是垄断价格，所以，他们若是认为砂糖不应当作为征税的对象，并且拿出了证据，那恰恰表明，砂糖应该作为征税的对象；独占利益所获取的利润，无论何时都是恰当的征税对象。大麦的普通价格却从未形成垄断；大麦耕地获得的地租及利润，与其他同等肥沃、同样耕作良好的土地的地租及利润，这两者的比例从未超过正常数额。对麦芽、啤酒及麦酒征收的各项税收，从未使大麦价格下降，因而也从未减少大麦耕地的地租或利润。对酿造商来说，麦芽的价格不断地随麦芽税的增高而增高；而这种税以及对啤酒、麦酒征收的税，持续抬高商品的价格，或使商品的质量持续降低。因此，最后支付这类税的总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

The only people likely to suffer by the change of system here proposed are those who brew for their own private use. But the exemption which this superior rank of people at present enjoy from very heavy taxes which are paid by the poor labourer and artificer is surely most unjust and unequal, and ought to be taken away, even though this change was never to take place. It has probably been the interest of this superior order of people, however, which has hitherto prevented a change of system that could not well fail both to increase the revenue and to relieve the people.

只有一种人会因这种制度的改革而遭到损伤，那就是自产自销的酿造者。不过，大众贫苦劳力和工匠们承担了沉重的税收，上层阶级反而免除了税收，确实是非常不正当且不公平的；即便没有制度变更，也不应该就这样免除他们的赋税。然而，也正是上层阶级的利益，妨害了这些利国利民的制度改革。

Besides such duties as those of customs and excise above mentioned, there are several others which affect the price of goods more unequally and more indirectly. Of this kind are the duties which in French are called Peages, which in old Saxon times were called Duties of Passage, and which seem to have been originally established for the same purpose as our turnpike tolls, or the tolls upon our canals and navigable river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oad or of the navigation. Those duties, when applied to such purposes, are most properly imposed according to the bulk or weight of the goods. As they were originally local and provincial duties, applicable to local and provincial purposes,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m was in most cases entrusted to the particular town, parish, or lordship in which they were levied, such communities being in some way or other supposed to be accountable for the application. The sovereign, who is altogether unaccountable, has in many countries assumed to himsel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ose duties, and though he has in most cases enhanced very much the duty, he has in many entirely neglected the application. If the turnpike tolls of Great Britain should ever become one of the resources of government, we may learn, by the example of many other nations, what would probably be the consequence. Such tolls are no doubt finally paid by the consumer; but the consumer is not taxed in proportion to his expense when he pays, not according to the value, but according to the bulk or weight of what he consumes. When such duties are imposed, not

according to the bulk or weight, but according to the supposed value of the goods, they become properly a sort of inland customs or excises which obstruct very much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branches of commerce, the interior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除去关税、国内货物税，还有更多其他税种，更加不公平、更加间接影响货物价格。这就是法兰西所说的陆捐和桥捐。这在撒克逊时代，被称作是通行税，征收此税的目的一开始大约和我国征收道路通行税，以及运河、通航河流通行税是一样的，也就是用来维持道路、水路运转的费用。这样的税征收很方便，只要按照货物的容积重量来收取就可以了。一开始这些税都是地方税或省税，在地方或省州级别用于各种用途。在很多时候，税务管理是委托给纳税地方的指定市镇、教区或是庄园的，他们也需要纳税；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由这些团体通过种种方法施行这个税制。可是，在后来，许多国家的对此根本不负责任的君主，由自己掌握此税收的管理权。虽然君主会在许多情况下，大大提高税额，但却丝毫不关心它的实施状况。如果英国把道路通行税作为政府的资源之一，那么根据其他国家的例子，大抵能猜测到结果如何。这些通行税，毫无疑问是消费者缴纳的；然而消费者缴税，却不是按照消费比例缴纳，不是按照消费货物价值的比例缴纳，而是按照消费货物的容积、重量的比例缴纳。如果税收不按照货物的体积、重量征收，而是按照规定的货物价值征收的话，那它事实上就成了国内的关税，又或者说是国内货物税，会严重阻碍国家最重要的部门商业，也就是国内的贸易的发展。

In some small states duties similar to those passage duties are imposed upon goods carried across the territory, either by land or by water, from one foreign country to another. These are in some countries called transit-duties. Some of the little Italian states which are situated upon the Po and the rivers which run into it derive some revenue from duties of this kind which are paid altogether by

foreigners, and which, perhaps, are the only duties that one state can impose upon the subjects of another without obstructing in any respect the industry or commerce of its own.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it-duty in the world is that levied by the King of Denmark upon all merchant ships which pass through the Sound.

在一些小国家里，对于经过水路陆路通过其领土，从一个境外国家运到另一个境外国家的货物，会征收类似税款。在一些国家中，这被称为是国境税。波河以及各个直流沿岸的意大利小国家，收入的一部分便来自于此项税收。这收入是从外国人身上得来的，不会对本国的工商业造成损害，不过，这或许是唯一一项由一个国家加诸另一国人民身上的税了。全世界最为重要的一项国境税，或许就是丹麦国王对所有通过波罗的海海峡的商船所征收的税款。

Such taxes upon luxuries a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duties of customs and excise, though they all fall indifferently upon every different species of revenue, and are paid finally, or without any retribution, by whoever consumes the commodities upon which they are imposed, yet they do not always fall equally or proportionably upon the revenue of every individual. As every man's humour regulates the degree of his consumption, every man contributes rather according to his humour than in proportion to his revenue; the profuse contribute more, the parsimonious less, than their proper proportion. During the minority of a man of great fortune he contributes commonly very little, by his consumption, towards the support of that state from whose protection he derives a great revenue. Those who live in another country contribute nothing, by their consumption, towards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at country in which is situated the source of their revenue. If in this latter country there should be no land-tax, nor

any considerable duty upon the transference either of movable or of immovable property, as is the case in Ireland, such absentees may derive a great revenue from the protection of a government to the support of which they do not contribute a single shilling. This inequality is likely to be greatest in a country of which the government is in some respects subordinate and dependent upon that of some other. The people who possess the most extensive property in the dependent will in this case generally choose to live in the governing country. Ireland is precisely in this situation, and we cannot, therefore, wonder that the proposal of a tax upon absentees should be so very popular in that country. It might, perhaps, be a little difficult to ascertain either what sort or what degree of absence would subject a man to be taxed as an absentee, or at what precise time the tax should either begin or end. If you except, however, this very peculiar situation, any inequality in the contribution of individuals which can arise from such taxes is much more than compensated by the very circumstance which occasions that inequality- the circumstance that every man's contribution is altogether voluntary, it being altogether in his power either to consume or not to consume the commodity taxed. Where such taxes, therefore, are properly assessed, and upon proper commodities, they are paid with less grumbling than any other. When they are advanced by the merchant or manufacturer, the consumer, who finally pays them, soon comes to confound them with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ies, and almost forgets that he pays any tax.

像关税、大部分国内货物税中的奢侈品关税，虽然是毫无分别地由各种收入一同承担，最后由消费了货物的人纳税，不管他是谁，无偿支付，却不是平等地、按照一定比例地由每个人的收入承担。每个人个性不同，消费偏好也是由个性所决定的，这样一来，纳税的数额

并不视收入比例而定，而是以个性为根据；铺张的人缴纳比例大于适当比例，而节约的人却要小于这一比例。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尚未成年的时候，在国家的保护下，取得了大量收入，却只有极少的收入是通过消费奉献给国家的。而在其他国家生活的人，在消费上对财源国，并无一点贡献。如果像爱尔兰一样，财源国家，并不征收土地税，对动产或不动产的转移也不征收重税，那么，这个居留异国者，就不必对保护了自己享受巨额收入的政府，贡献哪怕一个先令。这对于某些方面从属或依赖于他国的国家政府来说，是很不公平的。若一个人，在附属国拥有广大的土地财产，在这个时候，也更乐意住在统治国。爱尔兰就是这样的一个附属国家，也难怪对居留他国的人征税的提议在该国受到青睐。不过一个居留外国的人，要外居到何种程度的才能作为纳税的对象，又或者征税应何时起止，这都不免难以定夺。但是，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那么此税征收时，对个人贡献造成的不公平，有可能在不公平的情况中得到补偿；也就是，每个人全凭自愿贡献税收，能够选择消不消费需要缴税的商品。如果对税务的评级不出现偏差，若选择征税的对象恰当的话，这种税由商人或者是制造商垫付，那么最后缴纳了这项税的消费者，就会把它和价格混做一谈，忘记自己付过税款。

Such taxes are or may be perfectly certain, or may be assessed so as to leave no doubt concerning either what ought to be paid, or when it ought to be paid; concerning either the quantity or the time of payment. Whatever uncertainty there may sometimes be, either in the duties of customs in Great Britain, or in other duties of the same kind in other countries, it cannot arise from the nature of those duties, but from the inaccurate or unskilful manner in which the law that imposes them is expressed.

这种税几乎能说是完全确定了的。换句话说，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应缴纳数额、全部缴纳的数量和日期。英国的关税，以及其他国家

类似的各项税务，虽然有时候看起来规定得不准确，那也不是因为税的性质，而是由于征税法律用词不够准确和灵活。

Taxes upon luxuries generally are, and always may be, paid piecemeal, or in proportion as the contributors have occasion to purchase the goods upon which they are imposed. In the time and mode of payment they are, or may be, of all taxes the most convenient. Upon the whole, such taxes, are, perhaps, as agreeable to the three first of the four general maxims concerning taxation as any other. They offend in every respect against the fourth.

奢侈品税往往是零碎地缴纳，也就是纳税者何时需要买多少，就何时缴纳多少。就缴纳时间和方式而言，这项税是，也可能是最方便的。总而言之，这项税和任何其他税一样，符合前面所提到过的四项征税原则中的前三个，然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却违反第四项原则。

Such taxes, in proportion to what they bring into the public treasury of the state, always take out or keep out of the pockets of the people more than almost any other taxes. They seem to do this in all the four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do it.

从征收此税的方面来讲，比起其他税种，人民实际缴纳的税额比进入国库的数额要多得多。有四种不同的情况造成了这个弊端。

First, the levying of such taxes, even when imposed in the most judicious manner, requires a great number of custom-house and

excise officers, whose salaries and perquisites are a real tax upon the people, which brings nothing into the treasury of the state. This expense, however,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is more moderate in Great Britain than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In the year which ended on the 5th of July 1775, the gross produce of the different duties,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missioners of excise in England, amounted to £5,507,308. 18s. 8 1/4d., which was levied at an expense of little more than five and a half per cent. From this gross produce, however, there must be deducted what was paid away in bounties and drawbacks upon the exportation of excisable goods, which will reduce the net produce below five millions.(The net produce of that year, after deducting all expenses and allowances, amounted to £4,975,652 19s. 6d.) The levying of the salt duty, an excise duty, but under a different management, is much more expensive. The net revenue of the customs does not amount to two millions and a half, which is levied at an expense of more than ten per cent in the salaries of officers, and other incidents. But the perquisites of custom-house officers are everywhere much greater than their salaries; at some ports more than double or triple those salaries. If the salaries of officers, and other incidents, therefore, amount to more than ten per cent upon the net revenue of the customs, the whole expense of levying that revenue may amount, in salaries and perquisites together, to more than twenty or thirty per cent. The officers of excise receive few or no perquisite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at branch of the revenue, being of more recent establishment, is in general less corrupted than that of the customs, into which length of time has introduced and authorized many abuses. By charging upon malt the whole revenue which is at present levied by the different duties upon malt and malt liquors, a saving, it is supposed, of more than fifty thousand pounds might be made in the annual expense of the excise. By confining the duties of customs to a few sorts of goods, and by levying those duties

according to the excise laws, a much greater saving might probably be made in the annual expense of the customs.

第一，要征收这项税款，需要用最为正确的方式，也需要许多海关和收税人员。他们的薪水和津贴要从人民身上而不是国家的财政中拿出来。但是不能不承认，这项费用，比起其他多数国家来，英国还是要少。到1775年1月5日，英格兰国内货物税委员所管理的各类税收的总收入，共达5,507,308镑18先令8又1/4便士，征收到这个数额，花了5.5%作为费用，再从总收入里面扣掉奖励金和输出退税，纯利润就不到500万镑了。（当年的纯产量，在扣除一切开支和津贴后，共计4,975,652镑19先令6便士。）国内货物税中，盐税也是一种，由于管理方法的缘故，征收所需的费用要多很多。关税的净收入不足250万镑，用于征收人员薪水和其他杂项的费用就占了10%以上。但是无论在哪里，海关人员都拿到比薪水更高的津贴，某些港口甚至达到了薪水的两三倍。要是海关人员的薪水和其他开支要占关税纯收入的10%以上，再加上征收此费用的全部费用，就会超过20%甚至30%，然而国内货物税征收人员却没什么津贴。这个收入部门管理机构是新成立的，并不至于腐败得像海关那样。海关成立时间太长，弊端累积，错综复杂，得到姑息。若现在就把从麦芽税、麦酒税获得的收入都转而从麦芽上征得。那征收国内货物税所耗的费用就至少要节省5万镑。要是关税只按照国内货物税法从少数货物上征得，那就能节约大笔的关税征收耗费。

Secondly, such taxes necessarily occasion some obstruction or discouragement to certain branches of industry. As they always raise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y taxed, they so far discourage its consumption, and consequently its production. If it is a commodity of home growth or manufacture, less labour comes to be employed in raising and producing it. If it is a foreign commodity of which the tax increases in this manner the price, the commodities of the same

kind which are made at home may thereby, indeed, gain some advantage in the home market, and a greater quantity of domestic industry may thereby be turned toward preparing them. But though this rise of price in a foreign commodity may encourage domestic industry in one particular branch, it necessarily discourages that industry in almost every other. The dearer the Birmingham manufacturer buys his foreign wine, the cheaper he necessarily sells that part of his hardware with which,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price of which he buys it. That part of his hardware, therefore, becomes of less value to him, and he has less encouragement to work at it. The dearer the consumers in one country pay for the surplus produce of another, the cheaper they necessarily sell that part of their own surplus produce with which,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price of which they buy it. That part of their own surplus produce becomes of less value to them, and they have less encouragement to increase its quantity. All taxes upon consumable commodities, therefore, tend to reduce the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below what it otherwise would be, either in preparing the commodities taxed, if they are home commodities, or in preparing those with which they are purchased, if they are foreign commodities. Such taxes, too, always alter, more or less, the natural direction of national industry, and turn it into a channel always different from, and generally less advantageous than that in which it would have run of its own accord.

第二，此种税必然会对某个部门产业造成种种妨碍。被征税的商品价格太高，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消费，进而妨害生产。如果这个商品是国产的，或者说，是国内制造的，生产制造的时候就会耗费更少的劳动。如果是外国的商品，并且因为征税的缘故，价格大涨，在本国生产的同一种商品，能够在国内市场获益，国内会有更多产业转向此类商品的生产，不过，要是外国商品的价格这样大涨，虽然国内

某个特殊分支的产业能大受鼓舞，但是别的部门产业就会受到阻碍。伯明翰制造商买外国葡萄酒的开销越大，他就要以愈低廉的价格卖掉一部分金属器具来买这种葡萄酒。与之前相比，这一部分金属器具不再那么值钱，他也不再那么有动力，去增加生产金属器具。一个国家的消费者对其他国家的剩余生产物支付的价格越高，他们卖出自己剩余生产物的价格就越低。与之前相比，剩余生产物对自己的价值越低，他们去生产这些东西的动力越小。所以，加在一切消费品上的税，都会使生产性劳动量低于无税收时的水平：或者导致生产国内赋税商品的劳动力减少；或者，那些用来购买外国商品的国内赋税商品，其劳动力也减少了。此外，此类税收常会使国民产业背离其自然方向，转向一个不利的方向。

Thirdly, the hope of evading such taxes by smuggling gives frequent occasion to forfeitures and other penalties which entirely ruin the smuggler; a person who, though no doubt highly blamable for violating the laws of his country, is frequently incapable of violating those of natural justice, and would have been, in every respect, an excellent citizen had not the laws of his country made that a crime which nature never meant to be so. In those corrupted governments where there is at least a general suspicion of much unnecessary expense, and great misapplication of the public revenue, the laws which guard it are little respected. Not many people are scrupulous about smuggling when, without perjury, they can find any easy and safe opportunity of doing so. To pretend to have any scruple about buying smuggled goods, though a manifest encouragement to the violation of the revenue laws, and to the perjury which almost always attends it, would in most countries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ose pedantic pieces of hypocrisy which, instead of gaining credit with anybody, serve only to expose the person who affects to practise them to the suspicion of being a greater knave than most of his neighbours. By this indulgence of the

public, the smuggler is often encouraged to continue a trade which he is thus taught to consider as in some measure innocent, and when the severity of the revenue laws is ready to fall upon him, he is frequently disposed to defend with violence what he has been accustomed to regard as his just property. From being at first, perhaps, rather imprudent than criminal, he at last too often becomes one of the hardiest and most determined violators of the laws of society. By the ruin of the smuggler, his capital, which had before been employed in maintaining productive labour, is absorbed either in the revenue of the state or in that of the revenue officer, and is employed in maintaining unproductive, to the diminution of the general capital of the society and of the useful industry which it might otherwise have maintained.

第三，走私者的逃税行为，常常导致财产被没收，并遭受其他惩罚，因此前途断送。虽然走私者触犯国法，无疑当加以惩罚，但他常常是不会违犯自然正义的法律的，假若国法没有违背大自然的意愿将此定为犯罪，他可能是一个十足的优良市民。在政府腐败，至少有任意支出、滥用公款之嫌的国家，保障国家财政的法律很少受到遵守。所以，若在不犯伪誓罪的情况下也能找到便捷安全的走私机会，许多人就会肆无忌惮地进行走私。假装对购买走私物品心存忌惮，尽管购买这种物品是明目张但地奖励侵犯财政法规的行为，是鼓励这种行为必然带来的伪证罪，在许多国家，这样的人都被视为卖弄伪善之人，不但不能赢得赞赏，反而只会使周围的人怀疑其恶劣的品行。公众的纵容使走私者认为这种行为是无罪的，因而更加肆无忌惮，当财政法对此施以严惩时，他常常会用武力，保护自己向来视为正当收入的财产。可能在最初他不过是为保护财产而轻率行动，算不上犯罪，但到最后往往会以最顽固而强硬的态度违反社会法律。走私者一旦落入法网，他此前用来雇佣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会被收归国有，或交由税务官员，而用以维持非生产性的劳动。如此一来，社会的总资本就要减少，原来可受此维持的有用产业也要减少。

Fourthly, such taxes, by subjecting at least the dealers in the taxed commodities to the frequent visits and odious examination of the tax-gatherers, expose them sometimes, no doubt, to some degree of oppression, and always to much trouble and vexation; and though vexation, as has already been said, is not, strictly speaking, expense, it is certainly equivalent to the expense at which every man would be willing to redeem himself from it. The laws of excise, though more effectual for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y were instituted, are, in this respect, more vexatious than those of the customs. When a merchant has imported goods subject to certain duties of customs, when he has paid those duties, and lodged the goods in his warehouse, he is not in most cases liable to any further trouble or vexation from the custom-house officer. It is otherwise with goods subject to duties of excise. The dealers have no respite from the continual visits and examination of the excise officers. The duties of excise are, upon this account, more unpopular than those of the customs; and so are the officers who levy them. Those officers, it is pretended, though in general, perhaps, they do their duty fully as well as those of the customs, yet as that duty obliges them to be frequently very troublesome to some of their neighbours, commonly contract a certain hardness of character which the others frequently have not. This observation, however, may very probably be the mere suggestion of fraudulent dealers whose smuggling is either prevented or detected by their diligence.

第四，此类税收使经营征收税商品的商人，不得不忍受税吏的频繁察访和令人不快的检查，因而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受压迫，且时常不胜其扰，苦恼不堪。前面已说过，虽严格说来，苦恼不算是费用，但人们却会为摆脱苦恼而愿意支出费用。国内货物税法虽有效地达到了立法目的，却也因此比关税更令人苦恼。多数情况下，商人缴

纳进口商品的关税后，把货物存放在自己的货栈中，此时他就不会再受海关人员的烦扰。但若货物须缴纳国内货物税，情形就不一样。商人要不断地受税务官的察访与检查，不得安宁。因此，国内货物税比关税更不受欢迎，征收国内货物税的税务官也比关税人员更不为人喜欢。有人说，论及执行职务，国内货物税官或许一般不比海关人员差，但因为职务需要，他们不得不时常要找邻人的麻烦，所以大都养成了海关人员所没有的冷酷性格。然而这种说法，极有可能出自那些从事不法买卖的商人，因为他们的走私行为常常要受到国内货物税官员的阻止和调查。

The inconveniencies, however, which are, perhaps, in some degree inseparable from taxes upon consumable commodities, fall as light upon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as upon those of any other country of which the government is nearly as expensive. Our state is not perfect, and might be mended, but it is as good or better than that of most of our neighbours.

不过，与消费品税密不可分的种种不便，不仅英国人民能感受到，在那些政费和英国一样浩大的国家，人们也能感受到同样程度的不便。我们国家虽并不完善，有待改良，但与大多数邻国相比，却并不逊色，甚至情况更好。

In consequence of the notion that duties upon consumable goods were taxes upon the profits of merchants, those duties have, in some countries, been repeated upon every successive sale of the goods. If the profits of the merchant importer or merchant manufacturer were taxed, equality seemed to require that those of all the middle buyers who intervened between either of them and the consumer should likewise be taxed. The famous alcavala of

Spain seems to have been established upon this principle. It was at first a tax of ten per cent, afterwards of fourteen per cent, and is at present of only six per cent upon the sale of every sort of property whether movable or immovable, and it is repeated every time the property is sold. The levying of this tax requires a multitude of revenue officers sufficient to guard the transportation of goods, not only from one province to another, but from one shop to another. It subjects not only the dealers in some sorts of goods, but those in all sorts, every farmer, every manufacturer, every merchant and shopkeeper, to the continual visits and examination of the tax-gatherers.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a country in which a tax of this kind is established nothing can be produced for distant sale. The produce of every part of the country must be proportioned to the consumption of the neighbourhood. It is to the alcavala, accordingly, that Ustaritz imputes the ruin of the manufactures of Spain. He might have imputed to it likewise the declension of agriculture, it being imposed not only upon manufactures, but upon the rude produce of the land.

由于一些国家认为消费品税是对商人利润所征的税，所以商品每出售一次，就须缴纳一次税收。如果对进口商或制造商的利润征税，那么作为他们与消费者中介的中间商，也要同样缴纳税款，方显公平。西班牙的消费税似乎就是基于这种原则设定的。各种动产或不动产，每经出售均需缴税，其征税比例最初是10%，后来涨为14%，如今只有6%（《合法财产备忘录》，tom. i. p. 15）。征收此税，不但要监视商品在各地间的转移，而且要监视商品在不同店铺之间的转移，所以需要大量的税务人员。此外，不仅是经营某些特定货物的商人，就连一切农场主、制造业工人，以及一切行商坐贾，都必须经受税务人员不断的察访和检查。实行此税的国家，大部分地区都不能生产用于远销的商品。各地方的生产，都必须与当地的消费一致。因此，乌斯塔里斯认为，西班牙制造业的没落应归因于这种消费税；同

样，西班牙农业的衰落，也可归因于此。因为不但制造品须缴纳此税，土地原生产物也不例外。

In the kingdom of Naples there is a similar tax of three per cent upon the value of all contracts, and consequently upon that of all contracts of sale. It is both lighter than the Spanish tax,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owns and parishes are allowed to pay a composition in lieu of it. They levy this composition in what manner they please, generally in a way that gives no interruption to the interior commerce of the place. The Neapolitan tax, therefore, is not near so ruinous as the Spanish one.

在那不勒斯王国也有同类的税，所有契约按其价值的3%缴税，因而对一切买卖契约也是如此。不过该国的这种税比西班牙税更轻，并且在大部分城市及教区都允许缴纳一种赔偿金，作为代替。各城市和教区征收此赔偿金的方法，听其自便，大概不阻碍当地的商业即可。因此，那不勒斯的税，没有西班牙税那样具有毁坏性。

The uniform system of taxation which, with a few exceptions of no great consequence, takes place in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leaves the interior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the inland and coasting trade, almost entirely free. The inland trade is almost perfectly free,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goods may be carried from one end of the kingdom to the other without requiring any permit or let-pass, without being subject to question, visit, or examination from the revenue officers. There are a few exceptions, but they are such as can give no interruption to any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inland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Goods carried coastwise, indeed, require certificates or coast-cockets. If

you except coals, however, the rest are almost all duty-free. This freedom of interior commerce, the effect of the uniformity of the system of taxation, is perhaps one of the principal causes of the prosperity of Great Britain, every great country being necessarily the best and most extensive market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roductions of its own industry. If the same freedom, in consequence of the same uniformity, could be extended to Ireland and the plantations, both the grandeur of the state and the prosperity of every part of the empire would probably be still greater than at present.

除却少数无关紧要的例外，这种统一的税收制度，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各地通行，几乎使国内商业，包括国内贸易及沿海贸易，完全享受自由。国内贸易几乎完全不受限制，大部分的货物皆可在王国内各地之间运输，无需任何许可证或通过证，也不受税务人员的盘问、视察或检查。虽有若干例外，但对国内商业的任何重要部门都不构成阻碍。沿海岸运输的货物，确实需要证明书或沿海海关通行证，但除煤炭以外，其余几乎都是免税的。由税制划一而产生的这种对内贸易的自由，或许就是英国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对每一个大国的大部分产业生产物来说，本土市场必定是最优质、最广阔的。假若使这种统一税制产生的自由惠及爱尔兰及各殖民地，则国家的伟大和帝国各部分的繁荣，说不定要远胜于今日。

In France, the different revenue laws which take place in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require a multitude of revenue officers to surround not only the frontiers of the kingdom, but those of almost each particular province, in order either to prevent the importation of certain goods, or to subject it to the payment of certain duties, to the no small interruption of the interior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Some provinces are allowed to compound for the gabelle or salt-tax.

Others are exempted from it altogether. Some provinces are exempted from the exclusive sale of tobacco, which the farmers-general enjoy throug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kingdom. The *aides* ,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excise in England, are ver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rovinces. Some provinces are exempted from them, and pay a composition or equivalent. In those in which they take place and are in farm there are many local duties which do not extend beyond a particular town or district. The *traites* , which correspond to our customs, divide the kingdom into three great parts; first, the provinces subject to the tariff of 1664, which are called the provinces of the five great farms, and under which are comprehended Picardy, Normandy,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interior provinces of the kingdom; secondly, the provinces subject to the tariff of 1667, which are called the provinces reckoned foreign, and under which are comprehende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frontier provinces; and, thirdly, those provinces which are said to be treated as foreign, or which, because they are allowed a free commerce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re in their commerce with other provinces of France subjected to the same duties as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These are Alsace, the three bishoprics of Metz, Toul, and Verdun, and the three cities of Dunkirk, Bayonne, and Marseilles. Both in the provinces of the five great farms (called so on account of an ancient division of the duties of customs into five great branches, each of which was originally the subject of a particular farm, though they are now all united into one), and in those which are said to be reckoned foreign, there are many local duties which do not extend beyond a particular town or district. There are some such even in the provinces which are said to be treated as foreign, particularly in the city of Marseilles. It is unnecessary to observe how much both the restraints upon the interior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umber of the revenue officers must be multiplied in order to guard the frontiers of those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districts which are subject to such different systems of taxation.

在法国，各省实行不同的税法，因此需要在国家边界及各省边界安排大量的税务官员，以阻止某种商品的进口，或对一些商品征收一定税额。如此一来，国内商业就要受到不少阻碍。在有些省份，盐务税可由赔偿金代替；而在其他各省，盐务税则完全免除。有些省份不实施烟草专卖，而税务官在全国大部分地方均可享有烟草专卖权。阿德斯相当于英格兰的国内货物税，在各省的情况大不相同。有若干省不收此税，而以一种赔偿金或其同等物代替。在其他征收此税且采用包税制度的各省，还有许多地方税，只通行于某特定的城镇或地区。托特斯相当于我国所称的关税，它将法国为三大部分：第一，由于施行1664年关税法而被称作五大包税区的区域，包括了皮卡迪、诺尔曼还有王国内地的各个省大部分地区；第二，由于施行了1667年税法，而被称作“外疆”的各个省，包括了边境各个省的一大部分；第三，被认为享受与外国同等待遇的各个省份，在受到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和外国进行自由的贸易，但是它们和法国的其他省贸易往来，与外国所受关税待遇一致。三个主教辖区，比如阿尔萨斯、茨图尔、凡尔登，三个市区，比如邓扣克、贝昂那，都是如此。在五大包税区的各个省（过去的时候，关税部门有五个，每个部门各负责一定的对象，因而有此称呼）以及外疆的各个省，都订立了地方税，税收限定在某个特定的城市或地区。所谓的和外国所获待遇相同的各个省，也要征收地方税，尤其是马赛市。这些税制是如何妨碍国内商业发展的，为了守卫这些税收地区和省的边界，又得增加收税人员，这些都明明白白，无须多言。

Over and above the general restraints arising from this complicated system of revenue laws, the commerce of wine, after corn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production of France, is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rovinces subject to particular restraints, arising from the favour which has been shown to the vineyards of

particular provinces and districts, above those of others. The provinces most famous for their wines, it will be found, I believe, are those in which the trade in that article is subject to the fewest restraints of this kind. The extensive market which such provinces enjoy, encourages good management both in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vineyards, and in the subsequent preparation of their wines.

除了复杂的税制带来的一般约束，葡萄酒贸易（可能是法国仅次于谷物的重要产物了）再大多数省份收到限制，这是因为某些特殊省份的葡萄园，得到了比其他省份更优惠的待遇。在葡萄酒贸易上受约束最少的省，也是因为葡萄酒而最负盛名的省份。这些省有广阔的市场销路，这鼓励了这些省份改进葡萄栽培，改进酿酒管理。

Such various and complicated revenue laws are not peculiar to France. The little duchy of Milan is divided into six provinces, in each of which there is a different system of taxation with regard to several different sorts of consumable goods. The still smaller territories of the Duke of Parma are divided into three or four, each of which has, in the same manner, a system of its own. Under such absurd management, nothing but the great fertility of the soil and happiness of the climate could preserve such countries from soon relapsing into the lowest state of poverty and barbarism.

并非只有法国才有这些繁复的税法。米兰那样的小公国有六个省份；各省根据一些种类的消费品，各自订立了特别的税收制度。而更小的帕马公爵的领土，还分成了三四个省，各自有其税收制度。税收制度如此不合理，若不是因为土壤条件非常肥沃，气候适宜无比，这些国家早就沦落成贫穷野蛮的国家了。

Taxes upon consumable commodities may either be levied by an administration of which the officers are appointed by government and are immediately accountable to government, of which the revenue must in this case vary from year to year according to the occasional variations in the produce of the tax, or they may be let in farm for a rent certain, the farmer being allowed to appoint his own officers, who, though obliged to levy the tax in the manner directed by the law, are under his immediate inspection, and are immediately accountable to him. The best and most frugal way of levying a tax can never be by farm. Over and above what is necessary for paying the stipulated rent, the salaries of the officers, and the whole expense of administration, the farmer must always draw from the produce of the tax a certain profit proportioned at least to the advance which he makes, to the risk which he runs, to the trouble which he is at, and to the knowledge and skill which it requires to manage so very complicated a concern. Government, by establishing an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ir own immediate inspection of the same kind with that which the farmer establishes, might at least save this profit, which is almost always exorbitant. To farm any considerable branch of the public revenue requires either a great capital or a great credit; circumstances which would alone restrain the competition for such an undertaking to a very small number of people. Of the few who have this capital or credit, a still smaller number have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or experience; another circumstance which restrains the competition still further. The very few, who are in condition to become competitors, find it more for their interest to combine together; to become co-partners instead of competitors, and when the farm is set up to auction, to offer no rent but what is much below the real value. In countries where the public revenues are in farm, the farmers are generally the most opulent people. Their wealth would alone excite the public indignation, and the vanity

which almost always accompanies such upstart fortunes, the foolish ostentation with which they commonly display that wealth, excites that indignation still more.

对消费品征税有两种方式，首先是可由政府收税。政府任命税收人员，直接对政府负责。政府的收入每年都会随着税收有所变动。又或者由政府把规定的税收承包给包收者，包收者再任命征收人员，征收人员虽然要按照法律义务收税，但是要对包收者直接负责，受其监督。不过，这种包收税的制度方法，并不妥当，也不节约。除了要垫付规定的税收额度，人员的薪水以及征收的费用还要从收入的税额里面扣除其垫付的金额。他们要积累处理纷杂事务的经验，还需要得到与这经验和知识相匹配的利润。如果政府自己管理机构自己监督，就像包收者管理事务那样，就可以节约出巨额的利润。要有大项税收，要有充足的资本和信用。囿于严格的条件，只有少数人能参与这项竞争。而且，即使有了资本或者信用，这些人本就少，再加上需要必要的知识经验，人就更少了。能够参与竞争的，就是极少数人。而这些人清楚，团结起来的利益比彼此竞争要大，因而彼此合作而不竞争。包税投标之时，他们会给出远低于真正价值的标额。若是在公共收入中应用包收制度，包收者都富裕无比，令人嫌恶。而这些暴发户，往往还会愚蠢的卖弄财富，四处炫耀，让人更加厌恶。

The farmers of the public revenue never find the laws too severe which punish any attempt to evade the payment of a tax. They have no bowels for the contributors, who are not their subjects, and whose universal bankruptcy, if it should happen the day after their farm is expired, would not much affect their interest. In the greatest exigencies of the state, when the anxiety of the sovereign for the exact payment of his revenue is necessarily the greatest, they seldom fail to complain that without laws more rigorous than those which actually take place, it will be impossible

for them to pay even the usual rent. In those moments of public distress their demands cannot be disputed. The revenue laws, therefore, become gradually more and more severe. The most sanguinary are always to be found in countries whe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ublic revenue is in farm; the mildest, in countries where it is levied under the immediate inspection of the sovereign. Even a bad sovereign feels more compassion for his people than can ever be expected from the farmers of his revenue. He knows that the permanent grandeur of his family depends upon the prosperity of his people, and he will never knowingly ruin that prosperity for the sake of any momentary interest of his own. It is otherwise with the farmers of his revenue, whose grandeur may frequently be the effect of the ruin, and not of the prosperity of his people.

公共收入的包收者会不惜手段，制定严苛法律，惩罚逃税。毕竟纳税者不是自己的人民，无须心存怜悯，而且要是纳税人在包收满期之后大量破产，也影响不到他们的利益。国家到了危急之时，君主必然对税收数额非常关心，此时包收者一定乘机倒苦水，说要是想征得以前的额度，必须更加严格法律，否则就办不到；这样一来，包收税发就一天比一天严苛。公共收入多用于包收制度；而君主直接监管税收的国家，往往税法较为温和。再愚昧的君主比起包税者来说，也是更加爱惜人民的。他知道，要想让王室永远伟大，就需要人民的繁荣昌盛而不能趋向眼前的短利。但是对于税务总官来说就不一样。他要靠着压迫人民而昌盛，而不是随着人民繁荣而繁荣。

A tax is sometimes not only farmed for a certain rent, but the farmer has, besides, the monopoly of the commodity taxed. In France, the duties upon tobacco and salt are levied in this manner. In such cases the farmer, instead of one, levies two exorbitant profits upon the people; the profit of the farmer, and the still more

exorbitant one of the monopolist. Tobacco being a luxury, every man is allowed to buy or not to buy as he chooses. But salt being a necessary, every man is obliged to buy of the farmer a certain quantity of it; because, if he did not buy this quantity of the farmer, he would, it is presumed, buy it of some smuggler. The taxes upon both commodities are exorbitant. The temptation to smuggle consequently is to many people irresistibl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rigour of the law, and the vigilance of the farmer's officers, render the yielding to that temptation almost certainly ruinous. The smuggling of salt and tobacco sends every year several hundred people to the galleys, besides a very considerable number whom it sends to the gibbet. Those taxes levied in this manner yield a very considerable revenue to government. In 1767, the farm of tobacco was let for twenty-two millions five hundred and forty-one thousand two hundred and seventy-eight livres a year. That of salt, for thirty-six millions four hundred and ninety-four thousand four hundred and four livres. The farm in both cases was to commence in 1768, and to last for six years. Those who consider the blood of the people as noth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e revenue of the prince, may perhaps approve of this method of levying taxes. Similar taxes and monopolies of salt and tobacco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the Austrian and Prussian dominions, and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tates of Italy.

包税者在提供一定金额的税收的同时，还能对税收的对象物品拥有独占权。法国的烟草税和盐税，都是如此征收的。在这种情况下，包收者从人民身上获得的利润是超额的，又获取了作为包收者的利润，又获取了垄断者的利润。烟草是奢侈品，人民还有不买的自由。然而盐确是必需品，每个人都得向包收者购买；要是不买而向其他人买，会被认为是从走私者那里买来的。对烟草和盐的征税异常繁重。因此，必定会有人受到极大诱惑而从事走私；不过，鉴于法律严苛非

常，包税者有警惕性极高的人手，受诱惑而走私的人必将破产。由于走私烟和烟草，每年都有数百人都要被收监，还有无数人被施以绞刑。不过，用这种方式征得了大量的政府税收。1767年，烟草的包税额为22,541,278里弗赫，盐的包税额为36,492,404里弗赫。1768年开始，盐和烟草的包额就订了延续六年。那些只在意君主的得利，而无视人民血汗钱的人，都赞成这样的征税方法。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境内，以及意大利多数小国家，都设了一样的税种和专属权。

In Franc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actual revenue of the crown is derived from eight different sources; the taille, the capitation, the two vingtiemes, the gabelles, the aides, the traites, the domaine, and the farm of tobacco. The five last are,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rovinces, under farm. The three first are everywhere levied by an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immediate inspection and direction of government, and it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in proportion to what they take out of the pockets of the people, they bring more into the treasury of the prince than the other five, of which the administration is much more wasteful and expensive.

法国国王的实际收入，主要有八个来源，即贡税、人头税、二十取一的税、盐税、国内货物税、关税、官有财产及烟草包征税。后面五项税，基本上每个省，采用的都是包征税制度，前三种税款，各个地方都是在政府的直接监管、指导下，由税务机关征收的。众所周知，根据从人民口袋里取得的收入来看，比起后五种，前三种更多的进入了国王的国库。后五种税在管理方面，更加靡费奢侈。

The finances of France seem, in their present state, to admit of three very obvious reformations. First, by abolishing the taille and

the capitation, and b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vingtiemes, so as to produce an additional revenue equal to the amount of those other taxes, the revenue of the crown might be preserved; the expense of collection might be much diminished; the vexation of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which the taille and capitation occasion, might be entirely prevented; and the superior ranks might not be more burdened tha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are at present. The vingtieme, I have already observed, is a tax very nearly of the same kind with what is called the land-tax of England. The burden of the taille, it is acknowledged, falls finally upon the proprietors of land; and a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apitation is assessed upon those who are subject to the taille at so much a pound of that other tax, the final paymen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it must likewise fall upon the same order of people. Though the number of the vingtiemes, therefore, was increased so as to produce an additional revenue equal to the amount of both those taxes, the superior ranks of people might not be more burdened than they are at present. Many individuals no doubt would, on account of the great inequalities with which the taille is commonly assessed upon the estates and tenants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The interest and opposition of such favoured subjects are the obstacles most likely to prevent this or any other reformation of the same kind. Secondly, by rendering the gabelle, the aides, the traites, the taxes upon tobacco, all the different customs and excises, uniform in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kingdom, those taxes might be levied at much less expense, and the interior commerce of the kingdom might be rendered as free as that of England. Thirdly, and lastly, by subjecting all those taxes to an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immediate inspection and direction of government, the exorbitant profits of the farmers-general might be added to the revenue of the state. The opposition arising from the private interest of individuals is likely to be as effectual for preventing the two last as the first-mentioned scheme of

reformation.

现在法国的财政状况，显而易见，应当接受三项改革。第一，废止贡税、人头税，增加二十分取一的税，让其带来额外的、等于前两者的金额之和的收入，这样一来，不单保证了国王收入，还大大减少了征收所需的费用；下层人民也不必再遭受贡税和人头税的负担，大部分上层人员也不会承担更重的负担。二十分取一税，与英格兰土地税属于同一种性质，众所周知，贡税最终是要由土地所有者承担的；大部分人头税是按照镑数的比重收取的，由贡税纳税者缴付，因此，最后该税大部分都要由同一阶层的人缴纳。这样看来，即使按照贡税和人头税数额增加税负，上层阶级的负担也不会比现在有所加重。不过目前各个人所有土地一级租户身上的贡税缴付并不公平，改革后，许多个人只好承担更重的税负。因此，目前享受到好处的人必将提出反对，这恐怕就会成为改革的障碍。第二，统一法国各个地方的盐税、国内货物税、关税、烟草税，也就是统一规定所有关税和消费税，如此，征税费用就可以远低于目前的费用，而且法国的国内商业自由程度可以与英国媲美。第三，所有税收的管理都由政府直接监管或统治，国家收入就可以将包税者的过多利润囊括进来。不过，最后两种改革计划也有可能被既得利益者反对，从而无法进行。

The French system of taxation seems, in every respect, inferior to the British. In Great Britain ten millions sterling are annually levied upon less than eight millions of people without its being possible to say that any particular order is oppressed.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Abbe Expilly, and the observations of the author of the Essay upon legislation and commerce of corn, it appears probable that France, including the provinces of Lorraine and Bar, contains about twenty-three or twenty-four millions of people three times the number perhaps contained in Great Britain. The soil and climate of France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Great Britain. The country

has been much longer in a state of 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on, and is, upon that account, better stocked with all those things which it requires a long time to raise up and accumulate, such as great towns, and convenient and well-built houses, both in town and country. With these advantages it might be expected that in France a revenue of thirty millions might be levied for the support of the state with as little inconveniency as a revenue of ten millions is in Great Britain. In 1765 and 1766, the whole revenue paid into the treasury of France, according to the best, though, I acknowledge, very imperfect, accounts which I could get of it, usually run between 308 and 325 millions of livres; that is, it did not amount to fifteen millions sterling; not the half of what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had the people contributed in the same proportion to their numbers as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The people of France, however, it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are much more oppressed by taxes than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however, is certainly the great empire in Europe which, after that of Great Britain, enjoys the mildest and most indulgent government.

从所有方面来讲，法国的征税制度似乎都不如英国。英国每年的1,000万镑税款，要从不到800万左右的人民身上征得，并没有什么阶级受到压榨。据埃克斯皮利神父搜集的材料，及《谷物法与谷物贸易论》作者观察，法国包括洛林及巴尔在内，人口约共2,300百万乃至2,400百万，是英国人口的近三倍。法国土壤、气候都胜于英国。法国也比英国先改良、耕作土地，凡是要历经一段较长的岁月才能建造和积累起来的东西，如大都会，或者是城里、乡村里适宜居住、建造得当的房屋，法国都比英国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英国，都能收入13,000万而不费什么功夫，法国应该也能比较容易地收到3,000万镑。然而根据我看到的很不全面的报告，法国1765年及1766年输归国库的全部收入，介于308,000,000里弗赫和325,000,000里弗赫之间，折算成英国的货币，尚且达不到1,500万镑。以法国人民的数

目，照英国人民的同一比例纳税，估计为3,000万镑。上述金额还不到3,000万镑的半数，但是众所周知，比起英国人民，法国人民身上的税负负担要严重得多。不过，除英国外，法国当然是欧洲拥有最温和宽大政府的一大帝国。

In Holland the heavy taxes upo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have ruined, it is said, their principal manufactures, and are likely to discourage gradually even their fisheries and their trade in shipbuilding. The taxes upo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are inconsiderable in Great Britain, and no manufacture has hitherto been ruined by them. The British taxes which bear hardest on manufactures are some duties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raw materials, particularly upon that of raw silk. The revenue of the states-general and of the different cities, however, is said to amount to more than five millions two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and a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cannot well be supposed to amount to more than a third part of those of Great Britain, they must, in proportion to their number, be much more heavily taxed.

在荷兰，对生活必需品征收的重税，已毁掉了该国所有主要的制造业。连渔业及造船业，可能也会逐渐受其阻碍。英国对必需品征收的税很轻，因此没有任何制造业受过它的破坏。英国制造业中赋税最重的是几种原料的进口税，特别是生丝的进口税。荷兰议会及各城市的收入，据说每年有525万镑以上。荷兰居民人数不超过英国居民的1/3，因此，按人口比例计算，荷兰的税务肯定繁重得多。

After all the proper subjects of taxation have been exhausted, if the exigencies of the state still continue to require new taxes, they

must be imposed upon improper ones. The taxes upo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therefore, the wisdom of that republic which, in order to acquire and to maintain its independency, has, in spite of its great frugality, been involved in such expensive wars as have obliged it to contract great debts. The singular countries of Holland and Zeeland, besides, require a considerable expense even to preserve their existence, or to prevent their being swallowed up by the sea, which must have contributed to increase considerably the load of taxes in those two provinces. The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seems to be the principal support of the present grandeur of Holland. The owners of great capitals, the great mercantile families, have generally either some direct share or some indirect influenc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at government. For the sake of the respect and authority which they derive from this situation, they are willing to live in a country where their capital, if they employ it themselves, will bring them less profit, and if they lend it to another, less interest; and where the very moderate revenue which they can draw from it will purchase less of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es of life than in any other part of Europe. The residence of such wealthy people necessarily keeps alive, in spite of all disadvantages, a certain degree of industry in the country. Any public calamity which should destroy the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should throw the whole administration into the hands of nobles and of soldiers, which should annihilate altogether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wealthy merchants, would soon render it disagreeable to them to live in a country where they were no longer likely to be much respected. They would remove both their residences and their capitals to some other country, and the industry and commerce of Holland would soon follow the capitals which supported them.

在已经向适合征税的对象都征过税以后，若是国家还需要新税救急，那就只好对不恰当的对象收税。因此，荷兰共和政府对必需品收税，并非出于愚昧无知。由于共和国要取得独立并维持独立，所以，尽管平日已经很节约，但是战争耗资之巨，政府只好大肆借债。除此之外，荷兰和西兰两个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国家得以保留而不被上升的海水吞没，都还要花上一大笔维护费，这些都要从人民身上征收。荷兰共和国政府的形式是这个国家的支撑。大资本家和商业大族，要么直接管理政府，要么对其有间接影响。这种地位使他们获得了尊敬和权威，因此，尽管在这个国家里，无论是投资资本所获得的利润，资本的出贷利息，还是从资本中获得的微薄收入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都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更少，但他们仍乐于居住在这里。由于这些富裕人定居于此，尽管荷兰面临诸多障碍，该国的产业仍能在某种程度上活跃着。一旦国家面临灾难，若共和国政体遭到破坏，沦落到由贵族和军人进行统治，这些富裕商人因此不再重要，他们就不会再愿意住在不被世人尊敬的国家，而携带着资本迁居其他国度。那么，他们所支持的荷兰产业商业，就要随之另寻出路了。

Chapter III. Of Public Debts

第三章、论公债

In that rude state of society which precedes the extension of commer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anufactures, when those expensive luxuries which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can alone introduce are altogether unknown, the person who possesses a large revenue, I have endeavoured to show in the third book of this Inquiry, can spend or enjoy that revenue in no other way than by maintaining nearly as many people as it can maintain. A large revenue may at all times be said to consist in the command of a large quantity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In that rude state of things it is commonly paid in a large quantity of those necessaries, in the

materials of plain food and coarse clothing, in corn and cattle, in wool and raw hides. When neither commerce nor manufactures furnish anything for which the owner can exchange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materials which are over and above his own consumption, he can do nothing with the surplus but feed and clothe nearly as many people as it will feed and clothe. A hospitality in which there is no luxury, and a liberality in which there is no ostentation, occasion, in this situation of things, the principal expenses of the rich and the great. But these, I have likewise endeavoured to show in the same book, are expenses by which people are not very apt to ruin themselves. There is not, perhaps, any selfish pleasure so frivolous of which the pursuit has not sometimes ruined even sensible men. A passion for cock-fighting has ruined many. But the instances, I believe, are not very numerous of people who have been ruined by a hospitality or liberality of this kind, though the hospitality of luxury and the liberality of ostentation have ruined many. Among our feudal ancestors, the long time during which estates used to continue in the same family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s the general disposition of people to live within their income. Though the rustic hospitality constantly exercised by the great land-holders may not, to us in the present times, seem consistent with that order which we are apt to consider as inseparably connected with good economy, yet we must certainly allow them to have been at least so far frugal as not commonly to have spent their whole income. A part of their wool and raw hides they had generally an opportunity of selling for money. Some part of this money, perhaps, they spent in purchasing the few objects of vanity and luxury with which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s could furnish them; but some part of it they seem commonly to have hoarded. They could not well, indeed, do anything else but hoard whatever money they saved. To trade was disgraceful to a gentleman, and to lend money at interest, which at that time was

considered as usury and prohibited by law, would have been still more so. In those times of violence and disorder, besides, it was convenient to have a hoard of money at hand, that in case they should be driven from their own home they might have something of known value to carry with them to some place of safety. The same violence which made it convenient to hoard made it equally convenient to conceal the hoard. The frequency of treasure-trove, or of treasure found of which no owner was known,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s the frequency in those times both of hoarding and of concealing the board. Treasure-trove was then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All the treasure-trove of the kingdom would scarce perhaps in the present times make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revenue of a private gentleman of a good estate.

在商业尚未开展、制造业尚未改进的处于原始状态社会，当人们对只能由商业和制造业来引进的高价奢侈品一无所知的时候，正如我在第三篇所提到的那样，高收入者，除了将这些收入用来维持尽可能多的人的生活，别无他用。可以说高额的收入主要用于购买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在那种原始状态的社会中，收入都是用来购买大量的必需品，即粗衣、粗食、谷物、牲畜、羊毛及生皮等原料。当时没有商业，也没有制造业，拥有某些物品的所有者并不能将自己不能消费完的大部分物品与他人交换，除了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吃穿意外，没有其他方式来处理这些盈余。假如没有奢侈品，人们就会殷勤款待；假如没有虚伪，人们就会变得乐善好施，这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钱才和权势的人就会把钱财主要花在这些事情上。不过，我在本书第三篇中也曾提到，这种情况，是不容易致使人破产的。不过，无聊的一己之欢就可能使人陷入破产的境地，追求这种一己之欢有时候也会使毁了智者的人生。对斗鸡的热情就曾经毁了很多人。但是，我相信，尽管由奢侈造成的殷勤款待和虚伪造成的施舍毁了很多人，但是因这种的殷勤款待和乐善好施而败家的事例并不多。在我们那些封建

社会的祖先之中，同一家族长时间持续拥有同一地产，充分证明了表示他们通常在生活上所持有的量入为出的性向。尽管他们拥有大片土地，也持续进行着乡下式的款待，看起来似乎与我们在现代生活中往往看来紧密联系的良好的经济原则并不一致，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至少也很简朴，因为他们没有将全部收入都花费在这些事情上。他们把一部分羊毛和生皮刘存起来，通常会会有机会把他们卖掉换成货币。他们可能将一部分货币花在购买当下环境中所能供给他们的几种虚荣品及奢侈品；不过他们通常还会蓄藏一部分。实际上，他们除了将节约的这部分钱蓄藏起来，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了。经商对于绅士来讲是丢面子的事情；放贷在当时被看作不正义的且法律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做，这样做更会丢面子。此外，在那样一个暴力和混乱的年代，手边存点钱是很合算的，免得他们那一天被赶出家园，可能还能把一些大家都认为值钱的东西带到安全的地方。在这个暴力的时代，存蓄些货币很合算，隐瞒这种行为也很合算。按照大家发现收藏物和无主财宝的频率来看，足以说明当时大家藏蓄藏宝和隐瞒自己藏蓄财富的频繁程度了。当时人们将收藏物看作君主的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今天看来，即使是全国的所有收藏物都很少能够被看做是一个民间绅士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The same disposition to save and to hoard prevailed in the sovereign as well as in the subjects. Among nations to whom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are little known, the sovereign,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in the fourth book, is in a situation which naturally disposes him to the parsimony requisite for accumulation. In that situation the expense even of a sovereign cannot be directed by that vanity which delights in the gaudy finery of a court. The ignorance of the times affords but few of the trinkets in which that finery consists. Standing armies are not then necessary, so that the expense even of a sovereign, like that of any other great lord, can be employed in scarce anything but bounty to his tenants and hospitality to his retainers. But bounty and hospitality very seldom

lead to extravagance; though vanity almost always does. All the ancient sovereigns of Europe accordingly,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had treasures. Every Tartar chief in the present times is said to have one.

储蓄和与秘藏这两种行为，在君主身上常见，民间也同样流行。我在本书的第4篇中早就提到过，在几乎没有商业及制造业的国家，君主所处的境地自然就决定了他奉行会蓄积所要求的节约。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是君主的话费，也不能受虚荣心的驱使去要个装饰华丽的宫廷，在那个年代，人们是无知的，华丽的宫廷装饰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当时常备军并不是必需的，所以即使是君主的花费也和其他大领主的花费一样，除了奖励其佃户和款待家臣，不会花在别的事情上。不过奖励和宽带很少会导致铺张浪费；尽管虚荣常常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于是，我们可看到，欧洲所有的古代君王都会拥有财富。据说即在今日，每位鞑靼酋长也都有自己的财宝。

In a commercial country abounding with every sort of expensive luxury, the sovereign, in the same manner as almost all the great proprietors in his dominions, naturally spends a great part of his revenue in purchasing those luxuries. His own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supply him abundantly with all the costly trinkets which compose the splendid but insignificant pageantry of a court. For the sake of an inferior pageantry of the same kind, his nobles dismiss their retainers, make their tenants independent, and become gradually themselves as insignificant a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wealthy burghers in his dominions. The same frivolous passions which influence their conduct influence his. How can it be supposed that he should be the only rich man in his dominions who is insensible to pleasures of this kind? If he does not, what he is very likely to do, spend upon those pleasures so great a part of his

revenue as to debilitate very much the defensive power of the state, it cannot well be expected that he should not spend upon them all that part of it which is over and above what is necessary for supporting that defensive power. His ordinary expense becomes equal to his ordinary revenue, and it is well if it does not frequently exceed it. The amassing of treasure can no longer be expected, and when extraordinary exigencies require extraordinary expenses, he must necessarily call upon his subjects for an extraordinary aid. The present and the late king of Prussia are the only great princes of Europe who, since the death of Henry IV of France in 1610, are supposed to have amassed any considerable treasure. The parsimony which leads to accumulation has become almost as rare in republican as in monarchical governments. The Italian republics, th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are all in debt. The canton of Berne is the single republic in Europe which has amassed any considerable treasure. The other Swiss republics have not. The taste for some sort of pageantry, for splendid buildings, at least, and other public ornaments, frequently prevails as much in the apparently sober senate-house of a little republic as in the dissipated court of the greatest king.

在商业国家里，会富有各种价格高昂的奢侈品，这样一来，该国君主自然会把大部分收入都用来购买这些奢侈品，就和其领土内所有的大地主一样。本国及邻近各国会为他供给各种之前的装饰物，虽然会是宫廷看起来富丽堂皇，但却毫无意义。为了求得比君主次一等的富丽堂皇，君主属下的贵族们会解雇家臣，并让佃户独立出去，逐渐和国内其他大部分富裕市民变得一样不那么重要了。同样的一种浮薄热望影响了他们的行为，也影响了君主的举动试想一下，举国上下的富人都在享乐，他怎么可能单单不被这种享乐所吸引呢？他很有可能会将大部分的收入用于享乐，以至于削弱国家的国防力量，假使它不这么做，那我们也很难指望他会把超出维持国防所需的那部分收入也

花在国防上。他平时通常会收支相抵；要是不入不敷出就算很好了。他不会再进行财富积累；若因为紧急情况需要特殊花费，他一定会像人民请求特别援助。自从1610年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去世之后后，据推测欧洲大君主只有普鲁士的现国王及前国王积累了很多财富。无论是在君主政府还是在共和政府，为了积累财富而厉行节约的事情几乎都十分罕见。意大利各共和国和尼得兰共和国均有负债。伯尔尼联邦是欧洲唯一一个积累了大量的财宝的。其他瑞士共和国的联邦都没有财富积累。对某种壮丽盛景、富丽堂皇的建筑，至少也是其他公共装饰品的喜爱，显然会体现在会在最伟大国王的放荡的宫廷里，自然也会频频体现在那些小共和国里看似质朴的议会议事堂里。

The want of parsimony in time of peace imposes the necessity of contracting debt in time of war. When war comes, there is no money in the treasury but what is necessary for carrying on the ordinary expense of the peace establishment. In war an establishment of three of four times that expense becomes necessary for the defence of the state, and consequently a revenue three or four times greater than the peace revenue. Supposing that the sovereign should have, what he scarce ever has, the immediate means of augmenting his revenue in proportion to the augmentation of his expense, yet still the produce of the taxes, from which this increase of revenue must be drawn, will not begin to come into the treasury till perhaps ten or twelve months after they are imposed. But the moment in which war begins, or rather the moment in which it appears likely to begin, the army must be augmented, the fleet must be fitted out, the garrisoned towns must be put into a posture of defence; that army, that fleet, those garrisoned towns must be furnished with arms, ammunition, and provisions. An immediate and great expense must be incurred in that moment of immediate danger, which will not wait for the gradual and slow returns of the new taxes. In this exigency

government can have no other resource but in borrowing.

和平时期平时缺少节俭意识，战时被迫借债。当战争来临，国库空空如也，只有平时编制所需的日常开支。战争时期，编制所需费用是平时国防费用的三四倍；因此在战时的收入也必须是和平时期收入的三四倍。假设君主能够立即采取一种措施根据费用增加的比例来增加他的收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要增加这一收入，一定会出自赋税，而赋税在征收之后要可能要经过10个月或者12个月才会进入国库。不过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刻，或者说，在战争好像就要爆发的那一瞬间，就必须扩充军队了，舰队一定要有装备，防军所驻扎的城镇一定要设防，而军队、舰队、防军所驻扎的城镇都需要配备武器、弹药和粮食。在危险快速降临的瞬间，就立刻会产生一项巨额费用——这种费用等不得新税逐渐而缓慢地流入国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政府除了借债，别无他法。

The same commercial state of society which, by the operation of moral causes, brings government in this manner into the necessity of borrowing, produces in the subjects both an ability and an inclination to lend. If it commonly brings along with it the necessity of borrowing, it likewise brings along with it the facility of doing so.

因为道德原因在发挥作用，这会使政府陷入有借款必要的商业社会状态，也会使人民具备贷款给国家的能力并产生贷款给国家的意向。假如这种商业社会状态通常会产生借款的必要性，同样，它也会带来借款的便利性。

A country abounding with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necessarily abounds with a set of people through whose hands not only their own capitals, but the capitals of all those who either lend them money, or trust them with goods, pass as frequently, or more frequently, than the revenue of a private man, who, without trade or business, lives upon his income, passes through his hands. The revenue of such a man can regularly pass through his hands only once in a year. But the whole amount of the capital and credit of a merchant, who deals in a trade of which the returns are very quick, may sometimes pass through his hands two, three, or four times a year. A country abounding with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therefore, necessarily abounds with a set of people who have it at all times in their power to advance, if they choose to do so, a very large sum of money to government. Hence the ability in the subjects of a commercial state to lend.

假如一个国家拥有大量的商人和工厂主，那么曾国家里一定会有许多人——不但掌控和经手着是自己的资本，也掌控和经手着所有那些愿意将货币借给他们或把货物委托给他们经营的人的资本，和那些不做生意不搞经营，单靠自己收入为生的民营业主的收入一样频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种私人收入，通常每年自己只经手一次。但从事那本利收回迅速行业的商人，其全部资本和信用通常他每年都会流通经手三四次。因此，假如一个国家商人和工厂主都很多，那么这个国家也一定有很多人愿意随时贷给以政府巨额款项。所以，商业国家的人民都具有出贷的能力。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can seldom flourish long in any state which does not enjoy a regular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which the people do not feel themselves secure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ir property, in which the faith of contracts is not supported by law, and in which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is not supposed to be

regularly employed in enforcing the payment of debts from all those who are able to pay.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in short, can seldom flourish in any state in which there is not a certain degree of confidence in the justice of government. The same confidence which disposes great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upon ordinary occasions, to trust their property to the protection of a particular government, disposes them, upon extraordinary occasions, to trust that government with the use of their property. By lending money to government, they do not even for a moment diminish their ability to carry on their trade and manufactures. On the contrary, they commonly augment it. The necessities of the state render government upon most occasions willing to borrow upon terms extremely advantageous to the lender. The security which it grants to the original creditor is made transferable to any other creditor, and, from the universal confidence in the justice of the state, generally sells in the market for more than was originally paid for it. The merchant or monied man makes money by lending money to government, and instead of diminishing, increases his trading capital. He generally considers it as a favour, therefore, when the administration admits him to a share in the first subscription for a new loan. Hence the inclination or willingness in the subjects of a commercial state to lend.

在任何一个不具备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的国家，拥有财产的人不会觉得安心，大家对于契约信仰并不能收到法律保护，他们也不会认为政府会定期强制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偿还其债务，这样一来，商业和制造业很难获得长足的发展。简言之，假如人民对政府的公正没有信心，该国的商业和制造业就很难繁荣。假如大商人和大工厂主平时就信任政府，敢将财产委托于政府保护，那么在非常时期他们同样也敢于将财产交给政府使用。借予政府钱财，丝毫会削弱他们进行商业贸易和尚品制造的能力；反之，通常会增强这种能力。在国家急需的

情况下，大都会令政府愿意以极其有利于出借人的条件来借款。政府付与原债权者的保证物，不得不转移于任何其他债权者；同时，因为人民普遍相信政府的正义，通常这些保证物能够以比原价更高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商人或富豪通过将钱财贷予政府来赚钱，其营业资本而不会因此有什么损失，反而会增加。因此，假如政府允许这些商人或者富豪率先同他人一起提供贷款，他们通常会将次视为一种特惠。所以，商业国家的人民，都会有为国家提供贷款的意向或意愿。

The government of such a state is very apt to repose itself upon this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of its subjects to lend it their money on extraordinary occasions. It foresees the facility of borrowing, and therefore dispenses itself from the duty of saving.

这类国家的政府，很容易在特殊时期寄希望于向国内人民借款的能力和意愿。国家预见到了向人民借款轻而易举，因此平时就不会厉行节约。

In a rude state of society there are no great mercantile or manufacturing capitals. The individuals who hoard whatever money they can save, and who conceal their hoard, do so from a distrust of the justice of government, from a fear that if it was known that they had a hoard, and where that hoard was to be found, they would quickly be plundered. In such a state of things few people would be able, and nobody would be willing, to lend their money to government on extraordinary exigencies. The sovereign feels that he must provide for such exigencies by saving because he foresees the absolute impossibility of borrowing. This foresight increases still further his natural disposition to save.

在原始状态下的社会，既没有大商业资本也没有大制造业资本。那些把能节约的货币都藏蓄起来，把能隐藏起来的钱财都隐匿起来的个人，之所以会这么做，一定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政府的公正。同时他们担心一旦有人知道了他们的藏蓄行为或者发现了他们所隐藏的财产，可能很宽就会被掠夺走。在这种事态下，很少有人，或者说没有人愿意贷款给政府救急的。因为君主，预知绝对不可能拿到借款，因此他就会觉出为应对紧急情况而厉行节约。这种先见之明自然会增强其节约的倾向。

The progress of the enormous debts which at present oppress, and will in the long-run probably ruin, all the great nations of Europe has been pretty uniform. Nations, like private men, have generally begun to borrow upon what may be called personal credit, without assigning or mortgaging any particular fund for the payment of the debt; and when this resource has failed them, they have gone on to borrow upon assignments or mortgages of particular funds.

这种巨额债务累积的过程，对于欧洲各大国来讲，情况类似，各国均受这一过程的压迫，长期来看还有可能破产国家与个人类似，通常在刚开始借款的时候凭借的可以说是个人信用，不需要为偿还债务而转让或抵押任何特别资源。在这一信用失效以后，它们会通过转让或抵押某些特殊资源来继续借款。

What is called the unfunded debt of Great Britain is contracted in the former of those two ways. It consists partly in a debt which bears, or is supposed to bear, no interest, and which resembles the debts that a private man contracts upon account, and partly in a debt which bears interest, and which resembles what a private man

contracts upon his bill or promissory note. The debts which are due either for extraordinary services, or for services either not provided for, or not paid at the time when they are performed, part of the extrordinaries of the army, navy, and ordnance, the arrears of subsidies to foreign princes, those of seamen's wages, etc., usually constitute a debt of the first kind, sometimes in payment of a part of such Navy and exchequer bills, which are issued sometimes in payment of a part of such debts and sometimes for other purposes, constitute a debt of the second kind- exchequer bills bearing interest from the day on which they are issued, and navy bills six months after they are issued. The Bank of England, either by voluntarily discounting those bills at their current value, or by agreeing with government for certain considerations to circulate exchequer bills, that is, to receive them at par, paying the interest which happens to be due upon them, keeps up their value and facilitates their circulation, and thereby frequently enables government to contract a very large debt of this kind. In France, where there is no bank, the state bills (billets d'etat) have sometimes sold at sixty and seventy per cent discount. During the great recoinage in King William's time, when the Bank of England thought proper to put a stop to its usual transactions, exchequer bills and tallies are said to have sold from twenty-five to sixty per cent discount; owing partly, no doubt, to the supposed instability of the new government established by the Revolution, but partly, too, to the want of the suppor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所谓的大不列颠无担保公债，就是通过刚才提到的前两种方式来借入的。这种公债一部分为全无利息或大家认为全无利息的债务——与个人约定偿还的债务类似；一部分为有利息的债务——与个人用期票或汇票借入的债务类似。凡因特别服役或尚未及时给付报酬的服役所欠的债务、陆军海军及军械方面的部分临时开支、外国君王补助金

的欠款和海员工资的欠款等，通常成为前一种债务。海军证券或财政部证券——有时候是为了支付部分这类债务，有时为其他目的而发行——构成了后一种债务。财政部证券的利息自发行之日就开始结算；海军证券的利息自发行后六个月开始计算。英格兰银行，要么通过自动按照时价为这种证券进行贴现，要么以其与政府商议确定以某种报酬为其流通财政部证券，也就是说，他们以额面价格收受该证券并支付应付利息，为证券保值，方便其流通，从而使政府能够协议借到这种巨额债务。法兰西没有银行，国家证券有时须要按照6折或7折出售。在威廉王大改铸币的时代，英格兰银行认为其应当暂停其平常所办理的业务，据说财政部证券和符契不得不以2.5折到6折的折扣出售。毫无疑问，一部分原因是革命结束后刚刚建立的新政府可能尚不安定，不过，另一部分原因是英格兰银行并没给予援助。

When this resource is exhausted, and it becomes necessary, in order to raise money, to assign or mortgage some particular branch of the public revenue for the payment of the debt, government has upon different occasions done this in two different ways. Sometimes it has made this assignment or mortgage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only, a year, or a few years, for example; and sometimes for perpetuity. In the one case the fund was supposed sufficient to pay, within the limited time, both principal and interest of the money borrowed. In the other it was supposed sufficient to pay the interest only, or a perpetual annuity equivalent to the interest, government being at liberty to redeem at any time this annuity upon paying back the principal sum borrowed. When money was raised in the one way, it was said to be raised by anticipation; when in the other, by perpetual funding, or, more shortly, by funding.

在这种方式行不通的情况下，为了筹集资金，政府必须转让或者抵押某些特定的国家收入，在不同情况下，政府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方

式。有时这种转让或抵押为期较短，如一年或几年；有时，又为为永久转塘或抵押。在一种情形下（短期转让或抵押），假如政府认为其资金足以在规定期限内偿还所贷款项的本金和利息。在另一种情形下（长期转让或抵押），政府推想其资金只够支付利息或与利息的永久年金大致相抵，政府就在能偿还借入的本金的时候才清偿。前一种筹集资金的方式，被称作预支法；后一种筹集资金的方式叫做永久付息法，或简称为息债法。

In Great Britain the land and malt taxes are regularly anticipated every year, by virtue of a borrowing clause constantly inserted into the acts which impose them. The Bank of England generally advances at an interest, which since the Revolution has varied from eight to three per cent, the sums for which those taxes are granted, and receives payment as their produce gradually comes in. If there is a deficiency, which there always is, it is provided for in the supplies of the ensuing year. The only considerable branch of the public revenue which yet remains unmortgaged is thus regularly spent before it comes in. Like an improvident spendthrift, whose pressing occasions will not allow him to wait for the regular payment of his revenue, the state is in the constant practice of borrowing of its own factors and agents, and of paying interest for the use of its own money.

在大不列颠，政府每年都会通过强制添加进借款条款中的法令，来预先征收土地税和麦芽税。自革命以来，英格兰银行通常会以3%-8%的不等利息收取利息提前垫付这些税收总额款项，等税款陆续纳入国库时，再逐渐收回。假如某年的征收的税款不足以支付银行为其垫付的金额及其利息（这类事情时有发生），那么这部分欠款则由下一年度的税款补齐。因此，国家收入中唯一尚未用来作担保的收入分支，通常在未收归国库之前，就被提前消费了。政府就像是一个

目光短浅的挥霍者，收入还没到手里就迫不及待地预先出息借支，国家不断地向其代理人和经理人借款，而又不断地为使用自己的货币支付利息。

In the reign of King William, and during a great part of that of Queen Anne, before we had become so familiar as we are now with the practice of perpetual fund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new taxes were imposed but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for four, five, six, or seven years only), and a great part of the grants of every year consisted in loans upon anticipations of the produce of those taxes. The produce being frequently insufficient for paying within the limited term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of the money borrowed, deficiencies arose, to make good which it became necessary to prolong the term.

在威廉王在位期间及安妮女王在位的大部分期间，当时我们对永久付息这种借款方式并不熟悉，当时大部分新税只能短期（仅限四年、五年、六年或七年）征收，每年国库的大部分拨款都来源于提前挪用这些税收的借款。在规定时期内，税收通常不够支付借款的本金和利息，因此就出现了亏空，要补足这一亏空，就必须延长收税年限。

In 1697, by the 8th of William III., c. 20, the deficiencies of several taxes were charged upon what was then called the first general mortgage or fund, consisting of a prolongation to the first of August 1706 of several different taxes which would have expired within a shorter term, and of which the produce was accumulated into one general fund. The deficiencies charged upon this prolonged term amounted to 5,160,459l. 14s. 9 1/4d.

1697年，依照威廉三世第八年第20号法令，将这几项短期之内就会到期的税收的征收年限延长至1706年8月1日，来补足其亏空。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第一次总抵押或基金。这一延长期的亏空总额达到了5,160,459镑14先令9.5便士。

In 1701, those duties, with some others, were still further prolonged for the like purposes till the first of August 1710, and were called the second general mortgage or fund. The deficiencies charged upon it amounted to 2,055,999l. 7s. 11.5d.

1701年，这些税以及其他若干税的征收年限，又因同一目的延长至1710年8月1日，称为第二次总抵押或基金。这一延长期内的亏空总额，共达2,055,999镑7先令11又1/2便士。

In 1707, those duties were still further prolonged, as a fund for new loans, to the first of August 1712, and were called the third general mortgage or fund. The sum borrowed upon it was 983,254l. 11s. 9 1/4d.

1707年，这些税又被延期至1712年8月1日，作为一种新公债的基金，称为第三次总抵押或基金。由此抵押借入的金额为983,254镑11先令9¼便士。

In 1708, those duties were all (except the Old Subsidy of Tonnage and Poundage, of which one moiety only was made a part of this fund, and a duty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Scotch linen, which

had been taken off by the Articles of Union) still further continued, as a fund for new loans, to the first of August 1714, and were called the fourth general mortgage or fund. The sum borrowed upon it was 925,176l. 9s. 2 1/4d.

1708年，这些税（除去吨税、镑税这两种旧补助税的一半，以及由英格兰苏格兰合并协定而撤废的苏格兰亚麻进口税）的征收年限又延长至1714年8月1日，作为一种新公债基金，称为第四次总抵押或基金。由此抵押借入的金额共达925,176镑9先令2又1/4便士。

In 1709, those cities were all (except the Old Subsidy of Tonnage and Poundage, which was now left out of this fund altogether) still further continued for the same purpose to the first of August 1716, and were called the fifth general mortgage or fund. The sum borrowed upon it was 922,029l. 6s.

1709年，这些税（吨税、镑税这两种旧补助税从此完全从这新债基金中剔除，因此可全部除去）的征收年限，出于相同的目的，又延长至1716年8月1日，称为第五次总抵押或基金。由此抵押借入的金额共达922,029镑6先令。

In 1710, those duties were again prolonged to the first of August 1720, and were called the sixth general mortgage or fund. The sum borrowed upon it was 1,296,552l. 9s. 11 3/4d.

1710年，这些税再延长至1720年8月1日，是第六次总抵押或基金。由此抵押借入的金额，共达1,296,552镑9先令11又3/4便士。

In 1711, the same duties (which at this time were thus subject to four different anticipations) together with several others were continued for ever, and made a fund for paying the interest of the capital of the South Sea Company, which had that year advanced to government, for paying debts and making good deficiencies, the sum of 9,177,967l. 15s. 4d.; the greatest loan which at that time had ever been made.

1711年，这些税（此时须供应四种预支的本息）及其他若干税，规定永久征收下去，作为支付南海公司资本利息的基金。该公司在同年度曾贷给政府9,177,967镑15先令4便士，用于还债及弥补税收的不足。此次借款，为当时的最大借款。

Before this period, the principal, so far as I have been able to observe, the only taxes which in order to pay the interest of a debt had been imposed for perpetuity, were those for paying the interest of the money which had been advanced to government by the Bank and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of what it was expected would be advanced, but which was never advanced, by a projected land bank. The bank fund at this time amounted to 3,375,027l. 17s. 10.5d., for which was paid an annuity or interest of 206,501l. 13s. 5d. The East India fund amounted to 3,200,000l., for which was paid an annuity or interest of 160,000l.—the bank fund being at six per cent, the East India fund at five per cent. interest.

据我所知，在此之前，为支付债务利息而永久课征的主要税收，只有为支付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以及当时计划中的土地银行这三者的贷款利息的各税（土地银行的贷款只是一种拟议，未成事实）。

这时，英格兰银行贷与政府的金额为3,375,027镑17先令10.5便士，年息共达206,501镑15先令5便士。东印度公司贷与政府的金额为320万镑，年息5%，计达16万镑。

In 1715, by the 1st of George I., c. 12, the different taxes which had been mortgaged for paying the bank annuity, together with several others which by this act were likewise rendered perpetual, were accumulated into one common fund called The Aggregate Fund, which was charged not only with the payments of the bank annuity, but with several other annuities and burdens of different kinds. This fund was afterwards augmented by the 3rd of George I., c. 8, and by the 5th of George I., c. 3, and the different duties which were then added to it were likewise rendered perpetual.

1715年，即乔治一世元年，依据该年的12号法令，那些担保英格兰银行年金的各税，以及由这则法令定为永久征收的其他若干税，被集为一项共同基金，称为总基金。此基金不仅用以支付英格兰银行的年金，而且用以支付其他年金及债务。此后，依据乔治一世第三年第8号法令，及第五年第3号法令，此基金再次扩大，而当时附加的各种税务，也同样定为永久的了。

In 1717, by the 3rd of George I., c. 7, several other taxes were rendered perpetual, and accumulated into another common fund, called The General Fund, for the payment of certain annuities, amounting in the whole to 724,849l. 6s. 10.5d.

1717年，即乔治一世第三年，依据该年第7号法令，又有其他若干种税被定为永久征收，集成又一个共同基金，称为一般基金。此基

金所支付的年金共计724,849镑6先令10又1/2便士。

In consequence of those different act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taxes which before had been anticipated only for a short term of years were rendered perpetual as a fund for paying, not the capital, but the interest only, of the money which had been borrowed upon them by different successive anticipations.

基于以上各种法令，以前只短期预支的大部分税种，全都变成永久征收，以此集成的基金，不是用于支付连续通过预支所借款项的本金，而是用于支付其利息。

Had money never been raised but by anticipation, the course of a few years would have liberated the public revenue without any other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besides that of not overloading the fund by charging it with more debt than it could pay within the limited term, and of not anticipating a second time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first anticipation. But the greater part of European governments have been incapable of those attentions. They have frequently overloaded the fund even upon the first anticipation, and when this happened not to be the case, they have generally taken care to overload it by anticipating a second and a third time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first anticipation. The fund becoming in this manner altogether insufficient for paying both principal and interest of the money borrowed upon it, it became necessary to charge it with the interest only, or a perpetual annuity equal to the interest, and such unprovident anticipations necessarily gave birth to the more ruinous practice of perpetual funding. But though this practice necessarily puts off the liberation of the public revenue from a fixed

period to one so indefinite that it is not very likely ever to arrive, yet as a greater sum can in all cases be raised by this new practice than by the old one of anticipations, the former, when men have once become familiar with it, has in the great exigencies of the state been universally preferred to the latter. To relieve the present exigency is always the object which principally interests those immediately concerned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affairs. The future liberation of the public revenue they leave to the care of posterity.

假若政府只通过预支来筹集资金，那它只要注意两点，数年之内，就可使公共收入从债务中解放出来：第一，不使基金在限定时间内负担的债务，超过其所能支付的数额；第二，第一次预支未到期限以前，不作第二次预支。但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未能注意到这些。它们往往在第一次预支时，就让基金负担过重；即便不是如此，也往往在第一次预支未偿清以前，就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的预支，从而加重基金的负担。这样下去，基金就变得完全不够支付所借款项的本金及利息，不得不单用来支付利息，或支付与利息相等的永久年金。像这样毫无规划的预支，必然导致了更具破坏性的永久基金的产生。虽然这种做法势必使公共收入的负债状态无限延长，似乎永无解放之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由这种新方法总是比旧的预支方法能够筹到更大款额的资金。所以，当人们熟知这种新方法后，每当国家财政吃紧时，一般都更愿采用新的筹款方法。直接参与国事者向来以解决眼前的急难为目标，至于使公共收入摆脱债务，这一任务则留给后继者来负责。

During the reign of Queen Anne, the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had fallen from six to five per cent, and in the twelfth year of her reign five per cent. was declared to be the highest rate which could lawfully be taken for money borrowed upon private security. Soon

afte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temporary taxes of Great Britain had been rendered perpetual, and distributed into the Aggregate, South Sea, and General Funds, the creditors of the public, like those of private persons, were induced to accept of five per cent. for the interest of their money, which occasioned a saving of one per cent. upon the capital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debts which had been thus funded for perpetuity, or of one-sixth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annuities which were paid out of the three great funds above mentioned. This saving left a considerable surplus in the produce of the different taxes which had been accumulated into those funds over and above what was necessary for paying the annuities which were now charged upon them,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of what has since been called the Sinking Fund. In 1717, it amounted to 323,434l. 7s. 7.5d. In 1727, the interest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ublic debts was still further reduced to four per cent; and in 1753 and 1757, to three and a half and three per cent; which reductions still further augmented the sinking fund.

在安妮女王时期，市场利率由6%降至5%；安妮女王12年，宣布私人抵押借款的最高合法利率为5%。英国大部分暂行税变为永久税，且分配至总基金、南海基金及一般基金后不久，国家债权者与私人债权者一样，也被说服接受5%的利息。因此，由短期公债换为长期公债的大部分借款，就产生了1%的节余。换言之，由上述三种基金支付的大部分年金节省了1/6。这一节省下来的款项，使得用作基金的各税，在支付所担保的各项年金后，仍有巨额的剩余，为此后的减债基金打下基础。1717年，此剩余额达523,454镑7先令7又1/2便士。1727年，大部分公债的利息进一步降为4%，1753年降至3.5%，1757年又降为3%。利息不断降低，使减债基金持续增大。

A sinking fund, though instituted for the payment of old,

facilitates very much the contracting of new debts. It is a subsidiary fund always at hand to be mortgaged in aid of any other doubtful fund upon which money is proposed to be raised in an exigency of the state. Whether the sinking fund of Great Britain has been more frequently applied to the one or to the other of those two purposes will sufficiently appear by and by.

减债基金虽为支付旧债而设，但也便于新债的征募。它是一种补助基金，在国家急需资金的情况下，即可用它作为抵押，弥补其他基金的不足。至于英国用此基金是更多地偿还旧债，还是更多地另举新债，不久之后自见分晓。

Besides those two methods of borrowing, by anticipations and by perpetual funding, there are two other methods which hold a sort of middle place between them. These are, that of borrowing upon annuities for terms of years, and that of borrowing upon annuities for lives.

除了预支和永久息债这两种借款方法，还有其他两种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方法，即有期年金借款方法和终生年金借款方法。

During the reigns of King William and Queen Anne, large sums were frequently borrowed upon annuities for terms of years, which were sometimes longer and sometimes shorter. In 1693, an act was passed for borrowing one million upon an annuity of fourteen per cent, or of 140,000l. a year for sixteen years. In 1691, an act was passed for borrowing a million upon annuities for lives, upon terms which in the present times would appear very advantageous. But

the subscription was not filled up.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e deficiency was made good by borrowing upon annuities for lives at fourteen per cent, or at little more than seven years purchase. In 1695, the persons who had purchased those annuities were allowed to exchange them for others of ninety-six years upon paying into the Exchequer sixty-three pounds in the hundred;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ourteen per cent. for life, and fourteen per cent. for ninety-six years, was sold for sixty-three pounds, or for four and a half years purchase. Such was the supposed instability of government that even these terms procured few purchasers. In the reign of Queen Anne money was upon different occasions borrowed both upon annuities for lives, and upon annuities for terms of thirty-two, of eighty-nine, of ninety-eight, and of ninety-nine years. In 1719, the proprietors of the annuities for thirty-two years were induced to accept in lieu of them South Sea stock to the amount of eleven and a half years purchase of the annuities, together with an additional quantity of stock equal to the arrears which happened then to be due upon them. In 1720,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other annuities for terms of years both long and short were subscribed into the same fund. The long annuities at that time amounted to 666,821l. 8s. 3.5d. a year. On the 5th of January 1775, the remainder of them, or what was not subscribed at that time, amounted only to 136,453l. 12s. 8d.

在威廉国王及安妮女王时期，往往以有期年金方法借入大笔款项，其期限时长时短。1693年，议会通过一则法案，以14%的年金，即每年14万镑，借款100万镑，期限是16年。1691年，议会通过一则法案，以终生年金的方式借款100万镑，在今日看来，这一条件可算是非常有利于债权者的，但应募之数未达到这一额度。为填补这项未满金额，1692年以14%的终生年金借款，此条件使债券者七年便可收回本金。1695年，凡购有此项年金的人，许其往财政部对每百

镑缴交63镑，换取其他为期96年的年金，换言之，终生年金14%与96年年金14%的差额，以63镑卖出，或者说，以相当于四年半的年金卖出。条件虽如此有利，但因当时政府地位不稳，应募者寥寥无几。安妮女王在位时，政府曾以终生年金及32年、89年、98年、99年的有期年金，借入款项。1719年，32年期的年金所有者，以其所有年金，换取数额等于11年半年金的南海公司股本；此外，对于欠款的部分，也发给等价的南海公司股本。1720年，其他大部分年限不等的有期年金，也都合为同一基金。当时每年应付的长期年金，计达666,821镑8先令3.5便士。1777年1月5日，其剩余部分，即当时未募满的款项，不过136,453镑12先令8便士。

During the two wars which began in 1739 and in 1755, little money was borrowed either upon annuities for terms of years, or upon those for lives. An annuity for ninety-eight or ninety-nine years, however, is worth nearly as much money as a perpetuity, and should, therefore, one might think, be a fund for borrowing nearly as much. But those who, in order to make family settlements, and to provide for remote futurity, buy into the public stocks, would not care to purchase into one of which the value was continually diminishing; and such people make a very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both of the proprietors and purchasers of stock. An annuity for a long term of years, therefore, though its intrinsic value may be very nearly the same with that of a perpetual annuity, will not find nearly the same number of purchasers. The subscribers to a new loan, who mean generally to sell their subscrip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prefer greatly a perpetual annuity redeemable by Parliament to an irredeemable annuity for a long term of years of only equal amount. The value of the former may be supposed always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and it makes, therefore, a more convenient transferable stock than the latter.

在1739年和1755年开始的两场战争期间，不管来自于有期年金还是终生年金，都没有借入多少款项。不过，以98年或者是99年为期的年金，价值和永久年金相差无几。因此有人就会设想，不妨借入像永久年金一样一样多的款。若是要为家庭添置财产，或者是为久远的未来而计划，要购买公债也不能买价值不断下跌的公债；大部分人在购买公债的问题上都做如是考虑，这样一来，长期年金的价值与永久年金的内在价值虽然相差不多，但更多的购买者还是会去购买永久年金。新认购了公债的人，通常都打算将认购的公债尽快转让，因此都宁愿购买可由议会偿还的永久年金，而不愿购买不能赎还的长期年金。永久年金的价值始终如一或者几乎毫无变化，所以比长期年金更便于转让。

During the two last-mentioned wars, annuities, either for terms of years or for lives, were seldom granted but as premiums to the subscribers to a new loan over and above the redeemable annuity or interest upon the credit of which the loan was supposed to be made. They were granted, not as the proper fund upon which the money was borrowed, but as an additional encouragement to the lender.

在上述两场战争期间，有期年金或终生年金，除用于可赎还的年金或利息外，还作为新应募者的奖金。因此，此类年金不是作为偿还所借款项的基金，而是作为对出借人的附加奖励。

Annuities for lives have occasionally been granted in two different ways; either upon separate lives, or upon lots of lives, which in French are called Tontines, from the name of their inventor. When annuities are granted upon separate lives, the death of every individual annuitant disburthens the public revenue so far as it was affected by his annuity. When annuities are granted upon

tontines, the liberation of the public revenue does not commence till the death of all annuitants comprehended in one lot, which may sometimes consist of twenty or thirty persons, of whom the survivors succeed to the annuities of all those who die before them, the last survivor succeeding to the annuities of the whole lot. Upon the same revenue more money can always be raised by tontines than by annuities for separate lives. An annuity, with a right of survivorship, is really worth more than an equal annuity for a separate life, and from the confidence which every man naturally has in his own good fortune, the principle upon which is founded the success of all lotteries, such an annuity generally sells for something more than it is worth. In countries where it is usual for government to raise money by granting annuities, tontines are upon this account generally preferred to annuities for separate lives. The expedient which will raise most money is almost always preferred to that which is likely to bring about in the speediest manner the liberation of the public revenue.

终生年金的授予方法或是针对个别人终生授予，或是对一群人终生授予。对一群人终生授予的方法叫做顿廷法（根据法国发明人名字命名）。若年金是对独立的个人终身授与的，各受领年金者一旦死亡，国家财政即减轻了他这一部分负担。倘若年金是按顿廷法授予的，那么只有当全部受领年金者均去世时，国家财政方减轻了这一部分的负担。；顿廷法的成员有时有20人至30人，死者的年金由生者继承，最后留下的人则继承所有的年金。若是以同一收入抵押借款，用顿廷法总能比用个别人终生年金法筹集到更多的款项。因为，未死者有继承全部年金的权利，在金额相等的情况下，也比由个别人单独领取的年金数额更大。彩票生意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天然地对自己的运气有几分自信。由于这种自信心理，顿廷年金所卖得的价格，通常都高过其真实价值。因此，对于常使用年金来借款的国家，政府往往更愿意采用顿廷法。政府几乎总是更偏向于选择能够筹到最

多款项的方策，而是能够最快速地解除国家财政负担的方法。

In France a much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e public debts consists in annuities for lives than in England. According to a memoir presented by the Parliament of Bordeaux to the king in 1764, the whole public debt of France is estimated at twenty-four hundred millions of livres, of which the capital for which annuities for lives had been granted is supposed to amount to three hundred millions, the eighth part of the whole public debt. The annuities themselves are computed to amount to thirty millions a year, the fourth part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millions, the supposed interest of that whole debt. These estimations, I know very well, are not exact, but having been presented by so very respectable a body as approximations to the truth, they may, I apprehend, be considered as such. It is not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anxiety in the two governments of France and England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public revenue which occasions this difference in their respective modes of borrowing. It arises altogether from the different views and interests of the lenders.

比起英国，法国的公债中，有更多的终生年金。1764年，波尔多议院向国王提交了备忘录，称全部的法国公债大约有24亿里弗赫，其中的3亿里弗赫是以终生年金的形式借入的，占了总公债的1/8。这年金估算起来大约每年3000万里弗赫，而全部公债的利息约为1.2亿里弗赫，大约占1/4。我确信这样的计算不准确，不过，这样一个权威的机关估计的数字，总会和事实相差不远了。英国和法国在借债方式上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借债人利益有变化，视角也不一样，而不是处于减轻国家负担的考虑。

In England, the seat of government being in the greatest mercantile city in the world, the merchants are generally the people who advance money to government. By advancing it they do not mean to diminish, but, on the contrary, to increase their mercantile capitals, and unless they expected to sell with some profit their share in the subscription for a new loan, they never would subscribe. But if by advancing their money they were to purchase, instead of perpetual annuities, annuities for lives only, whether their own or those of other people, they would not always be so likely to sell them with a profit. Annuities upon their own lives they would always sell with loss, because no man will give for an annuity upon the life of another, whose age and state of health are nearly the same with his own, the same price which he would give for one upon his own. An annuity upon the life of a third person, indeed, is, no doubt, of equal value to the buyer and the seller; but its real value begins to diminish from the moment it is granted, and continues to do so more and more as long as it subsists. It can never, therefore, make so convenient a transferable stock as a perpetual annuity, of which the real value may be supposed always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在英国，政府位于最大的商业城市，所以多是商人把钱借给了政府。商人把钱借出来，不是为了减少，而是为了增加商业资本，所以要不是新债债券能够赚得利润，这些商人就不会去认购新债券。但如果商人借出资金后，不是买进永久年金而是终生年金，那不管这是他自己还是别人的终生年金，转卖的时候都得不到什么利润。不管是谁，都不愿出和买自己终身年金相同的价钱，去买另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健康程度差不多的人的终生年金。因此，若是出卖以自己的生命为基础的年金，一定会蒙受损失。至于以第三方的生命为基础而购买年金，虽然对于买方和卖方而言，价值相同，不过真正的价值开始从接受年金的时候就在减少，在年金有效的期间，价值一直在减少。

因此，要想使终身年金和永久年金一样真实价值始终如一或不会有大出入，成为同样便于转让的资财，极难做到。

In France, the seat of government not being in a great mercantile city, merchants do not make so great a proportion of the people who advance money to government. The people concerned in the finances, the farmers general, the receivers of the taxes which are not in farm, the court bankers, &c. make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who advance their money in all public exigencies. Such people are commonly men of mean birth, but of great wealth, and frequently of great pride. They are too proud to marry their equals, and women of quality disdain to marry them. They frequently resolve, therefore, to live bachelors, and having neither any families of their own, nor much regard for those of their relations, whom they are not always very fond of acknowledging, they desire only to live in splendour during their own time, and are not unwilling that their fortune should end with themselves. The number of rich people, besides, who are either averse to marry, or whose condition of life renders it either improper or inconvenient for them to do so, is much greater in France than in England. To such people, who have little or no care for posterity, nothing can be more convenient than to exchange their capital for a revenue which is to last just as long, and no longer, than they wish it to do.

法国政府并非设在商业大都市，因而贷与政府款项的人中商人的比例并不高。向政府贷款以应付急需的，多是向那些与财政相关的人，如赋税包征者、未经包给人的税务官、宫廷银行家等，往往是。这些人往往出身微贱，但因为十分富有，所以很骄傲，不屑与同等身份的妇人结婚，而较有身份的妇人也不屑与他们结婚。所以，他们往往决定过独身生活。他们既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又不愿意与亲戚往

来，所以只求一生过得精彩，不介意用掉所有财产。此外，在法国，厌婚或因生活状况而不宜结婚的富人的人数，比英国多出许多。对于这种不大为后人打算的独身者，以其资财换来一种持续时间正合其愿的收入，恐怕是最为便利的。

The ordinary expense of the greater part of modern governments in time of peace being equal or nearly equal to their ordinary revenue, when war comes they are both unwilling and unable to increase their revenue in proportion to the increase of their expense. They are unwilling for fear of offending the people, who, by so great and so sudden an increase of taxes, would soon be disgusted with the war; and they are unable from not well knowing what taxes would be sufficient to produce the revenue wanted. The facility of borrowing delivers them from the embarrassment which this fear and inability would otherwise occasion. By means of borrowing they are enabled, with a very moderate increase of taxes, to raise, from year to year, money sufficient for carrying on the war, and by the practice of perpetually funding they are enabled, with the smallest possible increase of taxes, to raise annually the largest possible sum of money. In great empires the people who live in the capital, and in the provinces remote from the scene of action, feel, many of them, scarce any inconveniency from the war; but enjoy, at their ease, the amusement of reading in the newspapers the exploits of their own fleets and armies. To them this amusement compensates the smal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axes which they pay on account of the war, and those which they had been accustomed to pay in time of peace. They are commonly dissatisfied with the return of peace, which puts an end to their amusement, and to a thousand visionary hopes of conquest and national glory from a longer continuance of the war.

近代各国政府在和平时期的一般费用，多半与其一般收入相等或大约持平。因此，战争一旦爆发，要根据增加的费用来相应地增加收入，不但非政府所愿，也是非其所能。政府之所以不愿如此，是因为担心突然增加如此巨额的税，会激起民怨，使百姓嫌恶战争。之所以不能如此，是因为无法确定应增加多少赋税才可满足战争所需。采用举债之法，各国政府便可走出这些困境了。通过借债，这些国家只需增税少许，就可逐年筹得足够的费用，供战争所需。并且，通过永久基金，它们能以最小额的增税，每年筹得最大的款项。在各大帝国，大部分住在首都和住在远离战场地带的人，都不会由战争而感到任何不便。相反，当他们从报纸上读到本国海陆军的英勇战绩时，会悠然自得，乐享其中。这种乐趣可补偿战时税额的增加给他们带来的轻微损失。和平一旦恢复，这种乐趣便随即终止，因此，他们通常会感到不满。并并且，战争若不再继续，他们关于征服与国家荣耀的种种幻想也将破灭。

The return of peace, indeed, seldom relieves them from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taxes imposed during the war. These are mortgaged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debt contracted in order to carry it on. If, over and above paying the interest of this debt, and defraying the ordinary expense of government, the old revenue, together with the new taxes, produce some surplus revenue, it may perhaps be converted into a sinking fund for paying off the debt. But,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sinking fund, even supposing it should be applied to no other purpose, is generally altogether inadequate for paying, in the course of any period during which it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hat peace should continue, the whole debt contracted during the war;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this fund is almost always applied to other purposes.

和平的恢复，并不意味着在战争中加重的赋税负担便可大部分解

除。那些赋税，都作了战争所需债务利息的担保。如果在支付支付战债利息和政府的日常开销后，旧的税收和新的税收仍有余剩，则余剩部分或许可以变为偿还债务的减债基金。然而，首先，这种减债基金即便不移作他用，在和平能允许其存在的期限内，它也一般不够支付全部的战争借债。；其次，这种基金几乎总被移作他用。

The new taxes were imposed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paying the interest of the money borrowed upon them. If they produce more, it is generally something which was neither intended nor expected, and is therefore seldom very considerable. Sinking funds have generally arisen not so much from any surplus of the taxes which was over and above what was necessary for paying the interest or annuity originally charged upon them, as from a subsequent reduction of that interest. That of Holland in 1655, and that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in 1685, were both formed in this manner. Hence the usual insufficiency of such funds.

征收新税的唯一目的在于支付以此为担保的借款的利息。若有余剩，往往出乎意料或在计划之外，所以一般数额不大。减债基金的产生，与其说是由于所收税额超过应付利息或年金的数额，不如说是由于税额的余剩使应付利息减少。1655年荷兰的减债基金，1685年教皇领地的减债基金，均由利息减少而形成。因此，这种基金往往不足以偿还债务。

During the most profound peace various events occur which require an extraordinary expense, and government finds it always more convenient to defray this expense by misapplying the sinking fund than by imposing a new tax. Every new tax is immediately felt more or less by the people. It occasions always some murmur, and

meets with some opposition. The more taxes may have been multiplied, the higher they may have been raised upon every different subject of taxation; the more loudly the people complain of every new tax, the more difficult it becomes, too, either to find out new subjects of taxation, or to raise much higher the taxes already imposed upon the old. A momentary suspension of the payment of debt is not immediately felt by the people, and occasions neither murmur nor complaint. To borrow of the sinking fund is always an obvious and easy expedient for getting out of the present difficulty. The more the public debts may have been accumulated, the more necessary it may have become to study to reduce them, the more dangerous, the more ruinous it may be to misapply any part of the sinking fund; the less likely is the public debt to be reduced to any considerable degree, the more likely, the more certainly is the sinking fund to be misapplied towards defraying all the extraordinary expenses which occur in time of peace. When a nation is already overburdened with taxes, nothing but the necessities of a new war, nothing but either the animosity of national vengeance, or the anxiety for national security, can induce the people to submit, with tolerable patience, to a new tax. Hence the usual misapplication of the sinking fund.

在国家太平时，若因各种事件需要特别开支，对政府来说，挪用减债基金比征收新税更为便利。每征收一种新税，人民都有切身体会，多有怨言，一片反对之声。征收的税种越多，已有的各税愈加重，人民对新税的怨言必然越多，另征新税或加重旧税就愈加困难。而暂时停止偿还债务，人民是不会直接地感受到，因此也不会怨言四起。显然，挪用减债基金，更容易解决眼前的困难。可是，公债所积愈多，就愈加需要研究缩减公债的办法，而滥用减债基金就更加危险、更具毁灭性。减少公债越困难，就越需要挪用减债基金来应付平时的各种特别开支。当一个国家已担负重税时，除非迫于新的战争，

或者涉及国家仇恨，或者为保护国防，人民是不能再忍受新税的。所以减债基金常常被滥用。

In Great Britain, from the time that we had first recourse to the ruinous expedient of perpetual funding, the reduction of the public debt in time of peace has never borne any proportion to its accumulation in time of war.

在英国，自从最初采用具有破坏性的永久基金以来，平时公债的减少，从未与战时公债的增加相称。

It was in the war which began in 1688, and was concluded by the Treaty of Ryswick in 1697, th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esent enormous debt of Great Britain was first laid.

爆发于1668年，并以1697年的《里斯韦克条约》结束的那场战争，是如今英国巨额公债的起源。

On the 31st of December 1697, the public debts of Great Britain, funded and unfunded, amounted to 21,515,742l. 13s. 8½d. A great part of those debts had been contracted upon short anticipations, and some part upon annuities for lives, so that before the 31st of December 1701, in less than four years, there had partly been paid off, and partly reverted to the public, the sum of 5,121,041l. 12s. 0¾d.; a greater reduction of the public debt than has ever since been brought about in so short a period of time. The remaining debt, therefore, amounted only to 16,394,701l. 1s. 7¼d.

1697年12月31日，英国的公债，无论是有资金的还是没资金的，计达21,515,742镑13先令8又1/2便士。其中，短期预支的占了大多数，还有一部分，是以终身年金的方式借入的。在1701年的12月31日前，还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得到了部分偿还，还有一部分归给了国库，其金额达5,121,041镑12先令3/4便士。这么多公债用这么短的时间偿还，这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剩余的债务额为16,394,701镑1先令7又1/4便士。

In the war which began in 1702, and which was concluded by the Treaty of Utrecht, the public debts were still more accumulated. On the 31st of December 1714, they amounted to £53,681,076 5s. 6 1/2d. The subscription into the South Sea fund of the short and long annuities increased the capital of the public debts, so that on the 31st of December 1722 it amounted to £55,282,978 1s. 3. 5/6d. The reduction of the debt began in 1723, and went on so slowly that, on the 31st of December 1739, during seventeen years of profound peace, the whole sum paid off was no more than £8,328,354. 17s. 11, 3/12d., the capital of the public debt at that time amounting to £46,954,623 3s. 4. 7/12d.

那场战争起于1702年，以乌特勒克特条约的签订而告终，在那一场战争中，公债增多。1714年12月31日，公债数额累计达53,681,076镑5先令6½便士。由于认购了南海公司的基金，公债更加增多。在1722年12月31日，公债数额达到55,282,978镑1先令3又5/6便士。从1723起，债务就慢慢开始得到偿还。到1739年12月31日，17年和平时期内，偿还的公债也总共只有8,328,554镑17先令11又3/12便士。那一年末，公债余额，还有46,954,623镑3先令4又1/12便士。

The Spanish war, which began in 1739, and the French war which soon followed it occasioned further increase of the debt, which, on the 31st of December 1748, after the war had been concluded by the Treaty of Aix-la-Chapelle, amounted to £78,293,313 1s. 10 3/4d. The most profound peace of seventeen years continuance had taken no more than £8,328,354 17s. 11 3/12d. from it. A war of less than nine years' continuance added £31,338,689 18s. 6 1/6d. to it.

1739年西班牙战争爆发，法兰西战争紧随其后，公债增多。1748年12月31日，该战争以埃·拉·查帕尔条约告终，公债数额已达78,293,313镑1先令10又3/4便士。上述是17年和平时期的公债偿还额，不过8,328,354镑17先令11又1/4便士；然而不足九年的战争时期所增加的公债额，却为31,338,689镑18先令6又1/6便士。（见詹姆士·波斯尔思韦特的《公共税收史》）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Mr. Pelham,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debt was reduced, or at least measures were taken for reducing it, from four to three per cent; the sinking fund was increased, and some part of the public debt was paid off. In 1755, before the breaking out of the late war, the funded debt of Great Britain amounted to £72,289,673. On the 5th of January 1763,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peace, the funded debt amounted to £122,603,336 8s. 2 1/4d. The unfunded debt has been stated at £13,927,589 2s. 2d. But the expense occasioned by the war did not end with the conclusion of the peace, so that though, on the 5th of January 1764, the funded debt was increased (partly by a new loan, and partly by funding a part of the unfunded debt) to £129,586,789 10s. 1 3/4d., there still remained (according to the very well informed author of the Considerations on the Trade and Finances of

Great Britain) an unfunded debt which was brought to account in that and the following year of £9,975,017 12s. 2d 15/44d. In 1764, therefore, the public debt of Great Britain, funded and unfunded together, amounted, according to this author, to £139,516,807 2s. 4d. The annuities for lives, too, which had been granted as premiums to the subscribers to the new loans in 1757, estimated at fourteen years' purchase, were valued at £472,500; and the annuities for long terms of years, granted as premiums likewise in 1761 and 1762, estimated at twenty-seven and a half years' purchase, were valued at £6,826,875. During a peace of about seven years' continuance, the prudent and truly patriot administration of Mr. Pelham was not able to pay off an old debt of six millions. During a war of nearly the same continuance, a new debt of more than seventy-five millions was contracted.

佩兰主政时，公债利息由4%减低至3%，于是减债基金增加，抵偿了一部分的公债。1755年战争，即最近的这次战争爆发以前，英国长期公债为72,289,675镑。1763年1月5日，即签订和约时，长期公债达122,603,336镑8先令2又1/4便士，且还有无担保公债13,927,589镑2先令2便士。但是，由战争带来的费用，并不终止于合约签订之日，所以1764年1月5日，长期公债虽已增至129,586,789镑10先令1又3/4便士（其中一部分为新公债，一部分则为由无担保公债改成的长期公债），但根据一位博闻强识的作者所著的《英国商业及财政的考察》，该年和下一年，还余有9,975,017镑12先令2又15/44便士的无担保公债。因此，根据该作者的说法，在1764年，英国的公债，包括长期公债和无担保公债在内，达到139,561,807镑2先令4便士。此外，按相当于14年年金估计，1757年以奖金形式授予新公债应募者的终身年金，约为472,500镑；按相当于27年半年金估计，1761年及1762年以奖金形式授予新公债应募者的长期年金，约为6,826,875镑。经过七年的和平岁月，佩兰对待国家大事如此慎重热诚，尚且负有600万镑债款无力偿还，但在年数相同的战争中，新借

债却达7,500万镑以上。

On the 5th of January 1775, the funded debt of Great Britain amounted to £124,996,086 1s. 6 1/4d. The unfunded, exclusive of a large civil list debt, to £4,150,263 3s. 11. 7/8d. Both together, to £129,146,322 5s. 6d. According to this account the whole debt paid off during eleven years' profound peace amounted only to £10,415,474 16s. 9. 7/8d. Even this small reduction of debt, however, has not been all made from the savings out of the ordinary revenue of the state. Several extraneous sums, altogether independent of that ordinary revenue, have contributed towards it. Amongst these we may reckon an additional shilling in the pound land-tax for three years; the two millions received from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s indemnification for their territorial acquisitions; and the one hundred and ten thousand pounds received from the bank for the renewal of their charter. To these must be added several other sums which, as they arose out of the late war, ought perhaps to be considered as deductions from the expenses of it. The principal are,

1775年1月5日，英国长期公债达124,996,086镑1先令6又1/4便士，在去掉一大笔皇室费债务后，无担保公债为4,150,236镑3先令11又7/8便士，两者合计为129,146,322镑5先令6便士。由此计算，在17年的和平期间所偿还的债务，仅有10,415,476镑16先令9又7/8又便士。然而即使减少公债额度这么低，还并非是由国家经常收入的节余偿还的，有许多是以与国家经常收入毫不相关外来款项偿还的。例如，三年内对土地税每镑增加1先令的税款若干镑，东印度公司为获得新地区缴纳国家的赔偿金200万镑，以及英格兰银行为更换特许状缴纳的11万镑，都应计入外来款项。他由最近战争产生的若干款项，理应视为此次战费的扣除额，所以亦须附加在这外来的款项。主要如

下：

	£	s.	d.
The produce of French prizes	690,449	18	9
Composition for French prisoners	670,000	0	0
What has been received from the sale of the ceded islands	95,500	0	0
Total	1,455,949	18	9

	镑	先令	便士
法国战利品收入	690, 449	18	9
法国俘虏赔偿金	670, 000	0	0
由割让各岛而得的代价	95, 500	0	0
合计	1, 455, 949	18	9

If we add to this sum the balance of the Earl of Chatham's and Mr. Calcraft's accounts, and other army savings of the same kind, together with what has been received from the bank,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additional shilling in the pound land-tax, the whole must be a good deal more than five millions. The debt, therefore, which since the peace has been paid out of the savings the ordinary revenue of the state, has not, one year with another, amounted to half a million a year. The sinking fund has, no doubt, been considerably augmented since the peace, by the debt which

has been paid off, by the reduction of the redeemable four per cents to three per cents, and by the annuities for lives which have fallen in, and, if peace were to continue, a million, perhaps, might now be annually spared out of it towards the discharge of the debt. Another million, accordingly, was paid in the course of last year; but, at the same time, a new civil list debt was left unpaid, and we are now involved in a new war which, in its progress, may prove as expensive as any of our former wars.(It has proved more expensive than all of our former wars; and has involved us in an additional debt of more than one hundred millions. During a profound peace of eleven years, little more than ten millions of debt was paid; during a war of seven years, more than one hundred millions was contracted.) The new debt which will probably be contract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next campaign may perhaps be nearly equal to all the old debt which has been paid off from the savings out of the ordinary revenue of the state. It would be altogether chimerical, therefore, to expect that the public debt should ever be completely discharged by any savings which are likely to be made from that ordinary revenue as it stands at present.

如果我们在这个总额上，再加上查特姆伯爵及克尔克拉弗特的推算，还有其他军费节约出来的金额，还有从银行、从东印度公司得到的收入以及提高土地税多得到的款项，所有总额加起来，远远大于500万镑。因此，进入和平时期开始，从国家经常收入的剩余中拿来还公债的部分，还不到一年50万镑。自从和平以来，清还了一部分公债，又把利息从原来的4%降到了现在的3%，减债基金自然是大幅度上涨；如果这一和平时期能够一直持续，到现在很可能每年都能从中间拿100万镑还债。去年就已经还了100万镑的债务。不过与此同时，皇家欠下的一大笔钱都还没有还清，我们又开始打仗。随着战争的发展，很可能和从前的战争一样耗资巨大。（按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场战争比我们以往的任何战争都要花费巨大，使我国增添负债1亿

多。在长达11年的太平盛世时期，国家支付的债务仅有1,000万，而在七年之战中，我国已举债超过1亿。）在这新开展的战争还没有结束之前，又要添上很多笔新债务，数额很可能与经常账目结余赔付的旧债一样多。因此，不太现实的想法，才是用目前国家经常收入的结余还清各种公债。

The public funds of the different indebted nations of Europe, particularly those of England, have by one author been represented as the accumulation of a great capital superadded to the other capital of the country, by means of which its trade is extended, its manufactures multiplied, and its lands cultivated and improved much beyond what they could have been by means of that other capital only. He does not consider that the capital which the first creditors of the public advanced to government was, from the moment in which they advanced it,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annual produce turned away from serving in the function of a capital to serve in that of a revenue; from maintaining productive labourers to maintain unproductive ones, and to be spent and wasted, generally in the course of the year, without even the hope of any future reproduction. In return for the capital which they advanced they obtained, indeed, an annuity in the public funds in most cases of more than equal value. This annuity, no doubt, replaced to them their capital, and enabled them to carry on their trade and business to the same or perhaps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before; that is, they were enabled either to borrow of other people a new capital upon the credit of this annuity, or by selling it to get from other people a new capital of their own equal or superior to that which they had advanced to government. This new capital, however, which they in this manner either bought or borrowed of other people, must have existed in the country before, and must have been employed, as all capitals are, in maintaining productive labour. When it came into

the hands of those who had advanced their money to government, though it was in some respects a new capital to them, it was not so to the country, but was only a capital withdrawn from certain employments in or to be turned towards others. Though it replaced to them what they had advanced to government, it did not replace it to the country. Had they not advanced this capital to government, there would have been in the country two capitals, two portions of the annual produce, instead of one, employed in maintaining productive labour.

据某作者主张：欧洲各债务国——尤其是英国——的公债，一直是除了国内其他资本外的一个大的资本来源，通过这个资本能够扩展商业，发展制造业，改良和开垦土地，比起单独依靠其他资本，这样做的成果要大很多。可是，作者欠考虑的地方是，当债权者把资金借给政府的那一瞬间，年生产物的一部分，就从资本变成了一笔收入。也就是说，这笔钱从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变成了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而政府当年就会把它花费或是浪费掉，想要把这笔资本用于未来的再生产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不过对于债券人来说，他们已经获得了公债年金，作为他们借出去的资本的补偿。这笔钱除了补偿了资金，还让他们得以进行贸易和商业活动，把这些活动开展的更加风生水起。也就是说，他们或者是可以把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年金专卖给他人，或者是可以以这年金为担保，从别人那里借到更多的资本，甚至多于他们借给政府的资本。但是，对于这些借债给国家的人来说，虽然借入的资本是新资本，对国家来说却不是。这些资本在国家中，只不过是从一种用途转为另一种罢了。所以，个人的资本虽然得到了补偿，但是国家却没有额外得到什么补偿。要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资本借给政府，说不定政府有两部分资本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而不是只拥有现在的一部分资本。

When for defraying the expense of government a revenue is

raised within the year from the produce of free or unmortgaged taxes,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revenue of private people is only turned away from maintaining one species of unproductive labour towards maintaining another. Some part of what they pay in those taxes might no doubt have been accumulated into capital, and consequently employed in maintaining productive labour; but the greater part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spent and consequently employed in maintaining unproductive labour. The public expense, however, when defrayed in this manner, no doubt hinders more or less the further accumulation of new capital;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occasion the destruction of any actually existing capital.

如果政府为了进行消费，而把当年的还没拿来做担保的赋税拿来筹集收入，那不过相当于把人民的收入，从一种非生产性劳动转为另一种。毫无疑问，人民用以付税的款项中，必有若干部分是储蓄起来的资本，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但其大部分一般是被消费掉，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然而，国家费用若以这种方式支付，无疑会在不同程度上阻碍新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但不一定会破坏现存的资本。

When the public expense is defrayed by funding, it is defrayed by the annual destruction of some capital which had before existed in the country; by the perversion of some portion of the annual produce which had before been destin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roductive labour towards that of unproductive labour. As in this case, however, the taxes are lighter than they would have been had a revenue sufficient for defraying the same expense been raised within the year, the private revenue of individuals is necessarily less burdened, and consequently their ability to save and accumulate some part of that revenue into capital is a good deal less impaired. If the method of funding destroys more old capital, it at the same

time hinders less the accumulation or acquisition of new capital than that of defraying the public expense by a revenue raised within the year. Under the system of funding, the frugality and industry of private people can more easily repair the breaches which the waste and extravagance of government may occasionally make in the general capital of the society.

当一个国家通过举债进行开支、的时候，该国家已有的资本每年都将受到破坏；几年以来一直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生产物，一定会被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征收的税，比前一种情况少，所以，人民在个人收入上的负担较少，因而人们存蓄收入积累资本的能力损失也较少。同用年度赋税收入来支付年度开支相比，假如说借债的方法在对旧资本造成了大的破坏，那么它也对新资本的获得和积累产生了小的破坏。在借债的情况下，由于政府乱花费而引起的损失，可以通过人民的勤俭节约而弥补。

It is only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war, however, that the system of funding has this advantage over the other system. Were the expense of war to be defrayed always by a revenue raised within the year, the taxes from which that extraordinary revenue was drawn would last no longer than the war. The ability of private people to accumulate, though less during the war, would have been greater during the peace than under the system of funding. War would not necessarily have occasioned the destruction of any old capitals, and peace would have occasioned the accumulation of many more new. Wars would in general be more speedily concluded, and less wantonly undertaken. The people feeling,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the war, the complete burden of it, would soon grow weary of it, and government, in order to humour them, would not be under the necessity of carrying it on longer than it

was necessary to do so. The foresight of the heavy and unavoidable burdens of war would hinder the people from wantonly calling for it when there was no real or solid interest to fight for. The seasons during which the ability of private people to accumulate was somewhat impaired would occur more rarely, and be of shorter continuance. Those, on the contrary, during which the ability was in the highest vigour would be of much longer duration than they can well be under the system of funding.

不过，只有战争时期，借债制度比起其他制度才更有优势。如果战争开支可以从本年取得的收入中支出，那么从不同寻常的收入上征得的赋税，等不到战争结束就花完了。如果实行这一制度，人民在和平时期储蓄的能力就要大于战争时期。战争不一定破坏旧的资本，和平会让新的资本持续累积。一般在这种制度下，战争会更快结束，并且不会轻易发生。战争期间，经济负担让人民感到厌倦；民意所向，政府不可延长战争期限。战争带来的负重可想而知，若没有确定的好处，人民远不会贸然投入战争。因此，人民的蓄积能力不免受到损害的时期，比较少有，且持续时间较短。相反，在借债基金制度下，积蓄能力强大的时期要长久得多。

When funding, besides, has made a certain progress, the multiplication of taxes which it brings along with it sometimes impairs as much the ability of private people to accumulate even in time of peace as the other system would in time of war. The peace revenue of Great Britain amounts at present to more than ten millions a year. If free and unmortgaged, it might be sufficient, with proper management and without contracting a shilling of new debt, to carry on the most vigorous war. The private revenue of the inhabitants of Great Britain is at present as much encumbered in time of peace, their ability to accumulate is as much impaired as it

would have been in the time of the most expensive war had the pernicious system of funding never been adopted.

况且，当债务增加时，由此增加的赋税，在平时对人民积蓄能力的损害，也往往与上述征税制度在战时对这种能力的损害不相上下。目前，英国平时的收入每年达1,000万镑以上。假如这些收入不用作担保，只要经过妥善管理，就足以应付哪怕最激烈的战争，无须有任何新债。在耗费庞大的战争时期，若没有采用这种有害的借债制度，英国居民的个人收入和积蓄能力往往大大受损；而如今，即便在平时，这两种能力也受到同样程度的损害。

In the payment of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debt, it has been said, it is the right hand which pays the left. The money does not go out of the country. It is only a part of the revenue of one set of the inhabitants which is transferred to another, and the nation is not a farthing the poorer. This apology is founded altogether in the sophistry of the mercantile system, and after the long examination which I have already bestowed upon that system, it may perhaps be unnecessary to say anything further about it. It supposes, besides, that the whole public debt is owing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which happens not to be true; the Dutch, as well as several other foreign nations, having a very considerable share in our public funds. But though the whole debt were owing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it would not upon that account be less pernicious.

支付公款利息就好像把右手的钱付给左手，货币都没有流出国外，不过是把一部分居民的收入转给另一部分居民，国家并不会流失金钱。这种辩解完全基于重商主义学说的诡辩；我已对此学说做过详

细的讨论，此处无须赘述。此外，主张此说者认为，全部公债都来自于居民的收入，但事实并非如此。荷兰人及其他外国人的投资在我国公债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即使全部公债均取之于民，其危害也不会减少。

Land and capital stock are the two original sources of all revenue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Capital stock pays the wages of productive labour, whether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manufactures, or commerce. The management of those two original sources of revenue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sets of people; the proprietors of land, and the owners or employers of capital stock.

无论是公家还是私人收入，土地和资本都是最初的两个源头。资本可以用于支付劳动工资，不管是农业、制造业还是商业方面的生产性劳动。土地是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源泉，而资本是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源泉。

The proprietor of land is interested for the sake of his own revenue to keep his estate in as good condition as he can, by building and repairing his tenants' houses, by making and maintaining the necessary drains and enclosures, and all those other expensive improvements which it properly belongs to the landlord to make and maintain. But by different land-taxes the revenue of the landlord may be so much diminished, and by different duties upon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es of life that diminished revenue may be rendered of so little real value, that he may find himself altogether unable to make or maintain those expensive improvements. When the landlord, however, ceases to do his part, it is altogether impossible that the tenant should continue to do his.

As the distress of the landlord increases,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ry must necessarily decline.

为了自身收入的考虑，土地所有者必须建造、修理租户的房子，建造和保持所属房屋所必需的排水渠和围墙，还需进行其他种类的改造，以保持所有土地的良好状态。但如果土地税繁多，会导致致地主收入大减；再加上种种生活必需品税与便利税，那么本已经减少的收入价值将更为轻微，地主就会发现自己完全不具备改良所要花费大笔钱财的财力了。地主无法完成本职工作，租地人也同样无法完成。总的来说，地主的困难增加，该国的农业就难免会有荒废之虞。

When, by different taxes upon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es of life, the owners and employers of capital stock find that whatever revenue they derive from it will not, in a particular country, purchase the same quantity of thos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es which an equal revenue would in almost any other, they will be disposed to remove to some other. And when, in order to raise those taxes, all or the greater part of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that is, all 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employers of great capitals, come to be continually exposed to the mortifying and vexatious visits of the tax-gatherers, the disposition to remove will soon be changed into an actual removal. The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will necessarily fall with the removal of the capital which supported it, and the ruin of trade and manufactures will follow the declension of agriculture.

如果对生活中的必需品、便利品进行的征税让资本所有者和使用者，感觉他们从资本中获取的收入，在同等收入情况下，不如在其他国家能买到的必需品、便利品多时，他们就会将资本转移到其他国

家。如果征税让多数商人、制造商，即绝大多数资本使用者，不断遭到税务官的骚扰，那他们不久就会移民。资本一旦外流，相关支撑的产业就会衰落，商业、制造业，也将随之趋于衰退。

To transfer from the owners of those two great sources of revenue, land and capital stock, from the persons immediately interested in the good condition of every particular portion of land, and in the good management of every particular portion of capital stock, to another set of persons (the creditors of the public, who have no such particular interes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revenue arising from either must, in the long-run, occasion both the neglect of land, and the waste or removal of capital stock. A creditor of the public has no doubt a general interest in the prosperity of the agriculture,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and consequently in the good condition of its lands, and in the good management of its capital stock. Should there be any general failure or declension in any of these things, the produce of the different taxes might no longer be sufficient to pay him the annuity or interest which is due to him. But a creditor of the public, considered merely as such, has no interest in the good condition of any particular portion of land, or in the good management of any particular portion of capital stock. As a creditor of the public he has no knowledge of any such particular portion. He has no inspection of it. He can have no care about it. Its ruin may in some cases be unknown to him, and cannot directly affect him.

土地状态是否良好，资本经营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所有者的利益，若将土地和资本移交给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如国家债权者——手中，假以时日，土地必会荒芜，资本必将滥用。国家农业、制造业以及商业是否繁荣，土地状态如何、资本运行状况如何，对于国家债

权者来说，无疑是有利益相关性的，如果农业、制造业或者商业中有任何一种产业衰退，从中获得的税收就不足以支付其年金或者利息。然而，就国家债权者来讲，他们对于土地的状态，或者资本经营状况并不关心。国家债权者对具体的土地或资本状况并不了解，也缺少观察，既无所知，也无从视察，更不会在意。土地荒废了，产业衰退了，他要么并不知道，要么即便知道了却不在意，因为他们不是直接利益相关者。

The practice of funding has gradually enfeebled every state which has adopted it. The Italian republics seem to have begun it. Genoa and Venice, the only two remaining which can pretend to an independent existence, have both been enfeebled by it. Spain seems to have learned the practice from the Italian republics, and (its taxes being probably less judicious than theirs) it has, in proportion to its natural strength, been still more enfeebled. The debts of Spain are of very old standing. It was deeply in debt before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bout a hundred years before England owed a shilling. France, notwithstanding all its natural resources, languishes under an oppressive load of the same kind. The republic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is as much enfeebled by its debts as either Genoa or Venice. Is it likely that in Great Britain alone a practice which has brought either weakness or desolation into every other country should prove altogether innocent?

曾经采用借债策略的国家都趋于衰弱。意大利的各个共和国首先采用了这一方法。意大利共和国中仅存有两个独立共和国，即热那亚和威尼斯。而这两个国家却都因借债而衰落下去。西班牙从意大利共和国学习到了借债的粗略，然而西班牙的国力，比上述两个共和国衰退得更厉害（这或许可以归因为西班牙的税制更为不佳）。西班牙负债历史很久。早在16世纪末前，此后的一百年英格兰未负任何债务，

西班牙就已经负债累累。法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也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荷兰共和国也是由于负债而衰落下去，和热那亚和威尼斯不分伯仲。由于举债而导致衰退甚至衰微的国家，处处皆有，英国也不能成为特例。

The system of taxation established in those different countries, it may be said, is inferior to that of England. I believe it is so. But it ought to be remembered that, when the wisest government has exhausted all the proper subjects of taxation, it must, in cases of urgent necessity, have recourse to improper ones. The wise republic of Holland has upon some occasions been obliged to have recourse to taxes as inconvenient as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of Spain. Another war begun before any considerable liberation of the public revenue had been brought about, and growing in its progress as expensive as the last war, may, from irresistible necessity, render the British system of taxation as oppressive as that of Holland, or even as that of Spain. To the honour of our present system of taxation, indeed, it has hitherto given so little embarrassment to industry that, during the course even of the most expensive wars, the frugality and good conduct of individuals seem to have been able, by saving and accumulation, to repair all the breaches which the waste and extravagance of government had made in the general capital of the society.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late war, the most expensive that Great Britain ever waged, her agriculture was as flourishing, her manufacturers as numerous and as fully employed, and her commerce as extensive as they had ever been before. The capital, therefore, which supported all those different branches of industry must have been equal to what it had ever been before. Since the peace, agriculture has been still further improved, the rents of houses have risen in every town and village of the country-a proof of the increasing wealth and revenue of the people; and the

annual amoun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old taxes, of the principal branches of the excise and customs in particular, has been continually increasing- an equally clear proof of an increasing consumption, and consequently of an increasing produce which could alone support that consumption. Great Britain seems to support with ease a burden which, half a century ago, nobody believed her capable of supporting. Let us not, however, upon this account rashly conclude that she is capable of supporting any burden, nor even be too confident that she could support, without great distress, a burden a little greater than what has already been laid upon her.

有人说，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税制并不如我国，的确如此。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即便是最为优秀的政府，在对所有收税对象进行征税后，有紧急需要的时候，也只能进行非正常状态下的征税。即便是荷兰那样的政府，也不得不时时像西班牙政府那般，需要进行一些并不恰当的税收。如果在国家收入的问题尚未有效解决之时，英国爆发了战争，在核战争发展过程中的费用消耗和最近这场战争不相上下，情势逼人。由于战争所迫，英国处于战争需要状态，或许会向荷兰学习税制，甚至像西班牙一样频频有苛捐杂税。拜现行税制所赐，我国的产业目前自由地向前发展，所以在耗费巨资的战争中，仿佛个人若厉行节约，是个明智的选择，就能够补上政府所滥用的社会资本。近期以来的战争耗资之巨，为英国历来战争所罕见。然而在战争结束之时，农业并没有衰退，制造业也依旧兴旺，商业进展顺利。可见各产业的支撑资本并未减少。进入和平时期以来，农业持续推进，国内的各座城市和村落的房租都有所上涨，这正说明了人民的财富和收入都有所增加。在过去收取的赋税，尤其是国内货物税和关税，每年都有所增长，这说明消费明显增加，也明显说明消费所必需的生产也增加了。如今的英国毫不费力的就能承担起半个世纪之前难以置信的沉重负担。不过，我们万万不可因此就认定，英国能承受住任何负担，更不能过分自信地认为英国能够轻松自如地应对沉重的负担。

When national debts have once been accumulated to a certain degree, there is scarce, I believe, a single instance of their having been fairly and completely paid. The liberation of the public revenue, if it has ever been brought about by bankruptcy; sometimes by an avowed one, but always by a real one, though frequently by a pretended payment.

当举借的公债过多时，几乎没有过能够完全偿还的例子。若是说国家收入负担曾经有彻底解决的时候，那就是通过倒账解决，有时通过明目张胆的倒账，有时候是通过假偿还。

The raising of the denomination of the coin has been the most usual expedient by which a real public bankruptcy has been disguised under the appearance of a pretended payment. If a sixpence, for example, should either by Act of Parliament or Royal Proclamation be raised to the denomination of a shilling, and twenty sixpences to that of a pound sterling, the person who under the old denomination had borrowed twenty shillings, or near four ounces of silver, would, under the new, pay with twenty sixpences, or with something less than two ounces. A national debt of about a hundred and twenty-eight millions, nearly the capital of the funded and unfunded debt of Great Britain, might in this manner be paid with about sixty-four millions of our present money. It would indeed be a pretended payment only, and the creditors of the public would really be defrauded of ten shillings in the pound of what was due to them. The calamity, too, would extend much further than to the creditors of the public, and those of every private person would suffer a proportionable loss; and this without any advantage, but in most cases with a great additional loss, to the creditors of the

public. If the creditors of the public, indeed, were generally much in debt to other people, they might in some measure compensate their loss by paying their creditors in the same coin in which the public had paid them. But in most countries the creditors of the public a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wealthy people, who stand more in the relation of creditors than in that of debtors towards the rest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A pretended payment of this kind, therefore, instead of alleviating, aggravates in most cases the loss of the creditors of the public, and without any advantage to the public, extends the calamity to a great number of other innocent people. It occasions a general and most pernicious subversion of the fortunes of private people, enriching in most cases the idle and profuse debtor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dustrious and frugal creditor, and transporting a great part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from the hands which were likely to increase and improve it to those which are likely to dissipate and destroy it. When it becomes necessary for a state to declare itself bankrupt, in the same manner as when it becomes necessary for an individual to do so, a fair, open, and avowed bankruptcy is always the measure which is both least dishonourable to the debtor and least hurtful to the creditor. The honour of a state is surely very poorly provided for when, in order to cover the disgrace of a real bankruptcy, it has recourse to a juggling trick of this kind, so easily seen through, and at the same time so extremely pernicious.

用虚假偿还公债的方式进行倒账，其常见伎俩之一就是提高货币的名义价值。打比方说，议会发布法令，或是国王发布通告，把价值六便士的银币提高名义价值为一先令，或者将20枚6便士的银币，提高其名义价值为1镑，在名义价值提升之前借入20先令或是4盎司银的人，在法令颁布后，清偿债务只需要20枚银币，或者是不足2盎司的银。约102,800,000镑的国债，约等于英国的长期短期公债之和。这样一来，用6,400万英镑的现金就可以偿还清楚。只不过这种偿清债

务只不过是表面上的，事实上，国家债权者收回的债务中，平均每1镑都少了10先令。不过，不仅是国家债权者深受其害，私人债权人也一样蒙受损失。对于国家债权者来说，没有好处反而常常增添损失。若是国家的债权者负有其他人的巨债，如此赔偿就可减少损失。然而在多数情况下，能借贷给国家的都是富裕人民，对于其同胞而言，他们是债权人而非债务人。这样算来，国家并不能获得半点好处，而其人民却受到灾祸。如此一来，私人财产普遍受损，勤俭节约的债权者蒙受损失，而懒惰的债务人反而收到好处；因此，相当于国家的大部分资本都从对资本有益的人手中，转入了会破坏资本的人手里。如果国家确实有必要，不如公开倒账，对债务者的名誉和利益还能少一些损害。国家为了遮掩倒账，欺骗人民，容易被识破，当然使其荣誉受损，同时也真是愚蠢的举动。

Almost all states, however, ancient as well as modern, when reduced to this necessity have, upon some occasions, played this very juggling trick. The Romans,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Punic war, reduced the As, the coin or denomination by which they computed the value of all their other coins, from containing twelve ounces of copper to contain only two ounces; that is, they raised two ounces of copper to a denomination which had always before expressed the value of twelve ounces. The republic was, in this manner, enabled to pay the great debts which it had contracted with the sixth part of what it really owed. So sudden and so great a bankruptcy, we should in the present times be apt to imagine, must have occasioned a very violent popular clamour. It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occasioned any. The law which enacted it was, like all other laws relating to the coin, introduced and carried through the assembly of the people by a tribune, and was probably a very popular law. In Rome, as in all the other ancient republics, the poor people were constantly in debt to the rich and the great, who in order to secure their votes at the annual elections, used to lend them money at

exorbitant interest, which, being never paid, soon accumulated into a sum too great either for the debtor to pay, or for anybody else to pay for him. The debtor, for fear of a very severe execution, was obliged, without any further gratuity, to vote for the candidate whom the creditor recommended. In spite of all the laws against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bounty of the candidates, together with the occasional distributions of corn which were ordered by the senate, were the principal funds from which, during the latter times of the Roman republic, the poorer citizens derived their subsistence. To deliver themselves from this subjection to their creditors, the poorer citizens were continually calling out either for an entire abolition of debts, or for what they called New Tables; that is, for a law which should entitle them to a complete acquittance upon paying only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their accumulated debts. The law which reduced the coin of all denominations to a sixth part of its former value, as it enabled them to pay their debts with a sixth part of what they really owed, was equivalent to the most advantageous New Tables.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people, the rich and the great were, upon several different occasions, obliged to consent to laws both for abolishing debts, and for introducing New Tables; and they probably were induced to consent to this law partly for the same reason, and partly that, by liberating the public revenue, they might restore vigour to that government of which they themselves had the principal direction. An operation of this kind would at once reduce a debt of a hundred and twenty-eight millions to twenty-one millions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thre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three pounds six shillings and eightpence. In the course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the As was still further reduced, first, from two ounces of copper to one ounce, and afterwards from one ounce to half an ounce; that is, to the twenty-fourth part of its original value. By combining the three Roman operations into one, a debt of a hundred and twenty-eight millions

of our present money might in this manner be reduced all at once to a debt of five millions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thre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three pounds six shillings and eightpence. Even the enormous debts of Great Britain might in this manner soon be paid.

几乎所有国家，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古代，常常出此下策，欺瞒人民。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打完仗，就把阿斯（当时计算一切其他铸币以此为准）的价值，从12盎司的含铜量减到了2盎司，相当于把二盎司的铜的价值与以前的12盎司画上了等号。此法一出，共和国只需还款之前的1/6。倒账数额如此巨大，来的又突然，若是今日，势必有一场大的喧哗；然而当时这都没有发生。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法律像其他货币相关法一样，也是由护民官提议，由民会通过并施行的；这一法律在当时，也许符合民意。因为在罗马，有权有势者为了保证得到穷人的选票，经常带给穷人高利贷，此债就从未偿付的债务积累成了债务者无法偿付的巨债，即使其他人也无力代付。债务者恐惧高额的债务，不得不将票投给债权者指定候选人，即使并没有额外的赏钱。尽管当时的法律明令禁止贿选和腐败，但是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穷人们为维持生活，需要候选人的酬金，以及元老院分发的粮谷。这些贫穷的市民们一直在呼吁取消债务，或者是提出新的法案，即将积累的债务偿还一部分就算还清了。若是把铸币的价值减至原先价值的1/6，使其以原先1/6的货币偿还全部债务，此种法律最为有利。为了让人民满意，有钱有势者在许多情况下，只好同意新的法律，取消债务。不过他们同意这法律的原因，除了上述理由，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政府的领导。通过此种方式，他们想减轻国家的负担，恢复了能量。此法一用，128百万镑的债务很快就减为21,333,333镑6先令8便士了。在第二次罗马和迦太基战争期间，阿斯又有了两次贬值，第一次是由含铜2盎司减至1盎司，第二次由1盎司减至半盎司，相当于原来的1/24。如果三次贬值一同实行，那么，像我国现币128百万镑的债务，就可一下子减至5,333,333镑16先令8便士。运用这种方式，哪怕英国负债巨大，也可立刻偿还。

By means of such expedients the coin of, I believe, all nations has been gradually reduced more and more below its original value, and the same nominal sum has been gradually brought to contain a smaller and a smaller quantity of silver.

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想像到，所有国家的货币都曾因此而逐渐贬值，在相同名义的币值下，实际所含的银，都因此越来越少。

Nations have sometimes, for the same purpose, adulterated the standard of their coin; that is, have mixed a greater quantity of alloy in it. If in the pound weight of our silver coin, for example, instead of eighteen pennyweight,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standard, there was mixed eight ounces of alloy, a pound sterling, or twenty shillings of such coin, would be worth little more than six shillings and eightpence of our present money. The quantity of silver contained in six shillings and eightpence of our present money would thus be raised very nearly to the denomination of a pound sterling. The adulteration of the standard has exactly the same effect with what the French call an augmentation, or a direct raising of the denomination of the coin.

有的时候，国家为了相同的目的，会在铸币中掺入入其他的成分。比如，在现今的规定下，1镑重的银币，只能够掺进去18个本尼威特的劣质金，要是掺入8盎司，那么这种银币的1镑或是20个先令，就会和现在铸币的6先令8便士价值相当，而我国现在铸币6先令8便士的含银量，名义价值几乎要提高到1镑。这种降低标准成色的做法和法国人提出的直接提高货币名义价值的说法，是完全一样的。

An augmentation, or a direct raising of the coin, always is, and from its nature must be, an open and avowed operation. By means of it pieces of a smaller weight and bulk are called by the same name which had before been given to pieces of a greater weight and bulk. The adulteration of the standard, on the contrary, has generally been a concealed operation. By means of it pieces were issued from the mint of the same denominations, and, as nearly as could be contrived, of the same weight, bulk, and appearance with pieces which had been current before of much greater value. When King John of France, in order to pay his debts, adulterated his coin, all the officers of his mint were sworn to secrecy. Both operations are unjust. But a simple augmentation is an injustice of open violence, whereas the adulteration is an injustice of treacherous fraud. This latter operation, therefore, as soon as it has been discovered, and it could never be concealed very long, has always excited much greater indignation than the former. The coin after any considerable augmentation has very seldom been brought back to its former weight; but after the greater adulterations it has almost always been brought back to its former fineness. It has scarce ever happened that the fury and indignation of the people could otherwise be appeased.

直接增加货币的名义价值，从本质上来说，不得通过公开宣布这一做法的方法。这样一来，即使重量较轻，体积较小的铸币，也会取得和从前更大更重货币的相同币值。至于降低货币标准成色，大多会偷偷进行。造币局努力让货币的外观、重量和大小与从前一样，让人难以辨别，然而货币实际的价值和从前已经天差地别。法国国王约翰为了清偿债务，在铸币中掺入其他成色，这时候所有造币局的官吏都必须发誓，保守这个秘密。这两种做法都称不上正当。然而增加价值这个简单做法是公开的、粗暴的行为，而降低标准的方式则狡猾而阴险。所以，降低成色的方式一旦被发现，必然招致更大的非议。假如

铸币的名义价值大大被提升，就极其难以恢复到从前的重量，然而被压低标准成色以后，却总是要恢复到从前的成色。这是因为，为了平复民众的愤怒，只好恢复成色。

In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and in the beginning of that of Edward VI the English coin was not only raised in its denomination, but adulterated in its standard. The like frauds were practised in Scotland during the minority of James VI. They have occasionally been practised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在亨利八世统治末期到爱德华六世当政之初，英国铸币不仅仅名义价值提升，标准成色也有所下降。詹姆士六世统治初期，此种欺诈曾经在苏格兰盛行，在其他国家也常常出现。

That the public revenue of Great Britain can never be completely liberated, or even that any considerable progress can ever be made towards that liberation, while the surplus of that revenue, or what is over and above defraying the annual expense of the peace establishment, is so very small, it seems altogether in vain to expect. That liberation, it is evident, can never be brought about without either some very considerable augmentation of the public revenue, or some equally considerable reduction of the public expense.

英国收入上的负担永远不可能完全解除，而财政收入盈余或年度支出中超出平时编制的部分也很难取得大的进展，财政收入之少，总体看来是杯水车薪。由此，很明显若不大幅增加财政收入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财政支出，所谓的减轻财政收入负担不过是一句空谈。

A more equal land-tax, a more equal tax upon the rent of houses, and such alterations in the present system of customs and excise as those which have been mentioned in the foregoing chapter might, perhaps, without increasing the burde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eople, but only distributing the weight of it more equally upon the whole, produce a considerable augmentation of revenue. The most sanguine projector, however, could scarce flatter himself that any augmentation of this kind would be such as could give any reasonable hopes either of liberating the public revenue altogether, or even of making such progress towards that liberation in time of peace as either to prevent or to compensate the further accumulation of the public debt in the next war.

若是土地税更加公平，或者是房产税更加公平，或者是依照前一章对于现行关税制度及国内货物税进行改革，或许能够大大增加国家收入，当然这是在不增加多数人民负担，而是把负担让全国人民共同承担的情况下。然而，无论设计者愿望多么良好，这样增加的收入也不太能完全解除国家收入负担。就解除负担而言，即使是在和平期间也不大可能，有这样的进展，在下一次战争中，公债仍然要增加，而且增加的公债并不能有所抵偿。

By extending the British system of taxation to all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inhabited by people of either British or European extraction, a much greater augmentation of revenue might be expected. This, however, could scarce, perhaps, be done, consistently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without admitting into the British Parliament, or if you will into the states general of the British empire, a fair and equal representation of all those different provinces, that of each province bearing the same

proportion to the produce of its taxes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Great Britain might bear to the produce of the taxes levied upon Great Britain. The private interest of many powerful individuals, the confirmed prejudices of great bodies of people seem, indeed, at present, to oppose to so great a change such obstacles as it may be very difficult, perhaps altogether impossible, to surmount. Without, however, pretending to determine whether such a union be practicable or impracticable, it may not, perhaps, be improper, in a speculative work of this kind, to consider how far the British system of taxation might be applicable to all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what revenue might be expected from it if so applied, and in what manner a general union of this kind might be likely to affect the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of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comprehended within it. Such a speculation can at worst be regarded but as a new Utopia, less amusing certainly, but not more useless and chimerical than the old one.

如果英国不管当地居民是英国人还是欧洲人，在英帝国的各个省份实行其税制，那么国家的收入一定会大幅增长。然而，这一做法却行不通。因为根据英国的宪法，各个地方议会中议员各占据多少席位，与其纳税多少息息相关，如今要把税制在一切属地中推行，就必须在帝国议会中按照比例加入属地中的议员，以保证公正，遵循宪法的原则。强力的变革可能会与既得利益者，以及大部分人民的看法相冲突。其实是万万难以达成的。然而，既然是探讨猜想型的著作，可以讨论英国的税收制度可否在各个不同属地实行，考察这种推行可以取得何种收入，若是税收制度统一，或许并无坏处。这样的猜想最差也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虽然没那么有趣，但总是比莫尔的乌托邦更有实际意义。

The land-tax, the stamp-duties, and the different duties of

customs and excise constitute the four principal branches of the British taxes.

英国主要有四大税种：土地税、印花税、关税和国内货物税。

Ireland is certainly as able, and our American and West Indian plantations more able to pay a land-tax than Great Britain. Where the landlord is subject neither to tithe nor poor-rate, he must certainly be more able to pay such a tax than where he is subject to both those other burdens. The tithe, where there is no modus, and where it is levied in kind, diminishes more what would otherwise be the rent of the landlord than a land-tax which really amounted to five shillings in the pound. Such a tithe will be found in most cases to amount to more than a fourth part of the real rent of the land, or of what remains after replacing completely the capital of the farmer, together with his reasonable profit. If all moduses and all impropriations were taken away, the complete church tith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could not well be estimated at less than six or seven millions. If there was no tithe either in Great Britain or Ireland, the landlords could afford to pay six or seven millions additional land-tax without being more burdened than a very great part of them are at present. America pays no tithe, and could therefore very well afford to pay a land-tax. The lands in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indeed, are in general not tenanted nor leased out to farmers. They could not therefore be assessed according to any rent-roll. But neither were the lands of Great Britain, in the 4th of William and Mary, assessed according to any rent-roll, but according to a very loose and inaccurate estimation. The lands in America might be assessed either in the same manner, or according to an equitable valuation in consequence of an accurate survey like

that which was lately made in the Milanese, and in the dominions of Austria, Prussia, and Sardinia.

爱尔兰和英国缴纳土地税的能力相差不远，而我们的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甚至更胜一筹。与负担有什一税、救贫税的地方的地主相比，无此负担的地方的地主，更能有力地上缴土地税如果不是折算成了金钱，比起每镑要征收5先令，征收实物，地主的地租会更加减少。多数情况下，什一税几乎相当于真正土地地租的1/4以上，或者是相当于土地资本和常规利润之后的剩余。把代金和俗人代为保管的教会的财产都不算在内，英国和爱尔兰的什一税至少将有六七百万镑。要是英国和爱尔兰不收什一税，地主就有能力另付六七百万镑的土地税，并不比现在负担沉重多少。美洲并不需要交什一税，当然交土地税并不费力。总的来说，美洲和西印度确实不会把土地租给农民，也就没有地租簿可以做收税的凭据。但是在威廉和玛丽共同执政的第四年，英国的土地税不过是通过粗略而有失准确的估算而来，并没有凭据任何地租簿来计算。美洲的土地要么就以同样的方法粗略估算，要么就按照近期米兰公国、奥地利、普鲁士和沙廷尼亚领地的做法——在经过精确的丈量后，公平地估值征税，

Stamp-duties, it is evident, might be levied without any variation in all countries where the forms of law process, and the deeds by which property both real and personal is transferred, are the same or nearly the same.

显然，在各个诉讼程序、动产不动产转移契约形式相似的属地，推行印花税是很容易的，这种税不作变化，像从前一样征收。

The extension of the custom-house laws of Great Britain to

Ireland and the plantations, provided it was accompanied, as in justice it ought to be, with an extension of the freedom of trade, would be in the highest degree advantageous to both. All the invidious restraints which at present oppress the trade of Irel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enumerated and non-enumerated commodities of America, would be entirely at an end. The countries north of Cape Finisterre would be as open to every part of the produce of America as those south of that Cape are to some parts of that produce at present. The trade between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ritish empire would, in consequence of this uniformity in the custom-house laws, be as free as the coasting trade of Great Britain is at present. The British empire would thus afford within itself an immense internal market for every part of the produce of all its different provinces. So great an extension of market would soon compensate both to Ireland and the plantations all that they could suffer from the increase of the duties of customs.

要把英国关税推广到爱尔兰或者殖民地，并且让这些地方的贸易自由度增加，那么对双方来说都是最好的。目前，有许多令人厌恶的束缚阻碍了爱尔兰的贸易，还有美洲产物的列举货物和非列举货物的区别，也将消失。现在菲尼斯特尔海角南部的地区已经对美洲生产的物品开放了市场，那么海角北部的各地，也将对美洲的产品开放市场。关税法整齐划一的征收后，大英帝国各个属地的贸易，就会像现在的不列颠沿海的贸易那样自由。大英帝国广大的领土，可以自给自足一个巨大的内部市场。这么一来，即便是爱尔兰和其他殖民地，其由于关税增加而带来的负担，也能得到立刻的偿还。

The excise is the only part of the British system of taxation which would require to be varied in any respect according as it was applied to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It might be applied

to Ireland without any variation, the produce and consumption of that kingdom being exactly of the same nature with those of Great Britain. In its application to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of which the produce and consumption are so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Great Britain, some modification might be necessary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its application to the cyder and beer counties of England.

在英国税制中，只有国内货物税需要加以必要的修改后才能适应各自属地的情况。爱尔兰的生产消费过程与不列颠类似所以不列颠的税制，可以不加修改地应用于爱尔兰。而美洲和西印度的生产消费与不列颠大不一样，不列颠的税制，必须加以修改才能应用。比如说要把税制用于英格兰产苹果汁和啤酒行业，就是如此。

A fermented liquor, for example, which is called beer, but which, as it is made of molasses, bears very little resemblance to our beer, makes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common drink of the people in America. This liquor, as it can be kept only for a few days, cannot, like our beer, be prepared and stored up for sale in great breweries; but every private family must brew it for their own use,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y cook their victuals. But to subject every private family to the odious visits and examination of the tax-gatherers, in the same manner as we subject the keepers of alehouses and the brewers for public sale, would be altogether inconsistent with liberty. If for the sake of equality it was thought necessary to lay a tax upon this liquor, it might be taxed by taxing the material of which it is made, either at the place of manufacture, or, i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rade rendered such an excise improper, by laying a duty upon its importation into the colony in which it was to be consumed. Besides the duty of one penny a

gallon imposed by the British Parliament upon the importation of molasses into America, there is a provincial tax of this kind upon their importation into Massachusetts Bay, in ships belonging to any other colony, of eightpence the hogshead; and another upon their importation, from the northern colonies into South Carolina, of fivepence the gallon. Or if neither of these methods was found convenient, each family might compound for its consumption of this liquor, either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persons of which it consist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private families compound for the malt-tax in England; or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ages and sexes of those persons, in the same manner as several different taxes are levied in Holland; or nearly as Sir Matthew Decker proposes that all taxes upon consumable commodities should be levied in England. This mode of taxation,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when applied to objects of a speedy consumption is not a very convenient one. It might be adopted, however, in cases where no better could be done.

举个例子，美洲当地人常见的饮料，并不同于英国所谓的啤酒，这种饮料是由糖浆做出来的。该饮料不能在大酿造厂中酿造、贮存后出售，而是只能保存几天。每个家庭对这种饮料都是自给自足的，像做一日三餐一样，不过，如果各个家庭也要像麦酒店家，或者是以卖酒为目的的酒家一样，被税务人员上门收税、检查，这是超出自由许可的。倘若如此征税是为了公平，那就对原料制造商收税；若是为了商业缘故，不能对此征税，那就在原料进入殖民地的时候征收进口税。英国议会对输入美洲的蜜糖每加仑收税1便士，其他殖民地若将糖蜜输送到马萨诸塞州，每霍格彻德要收税8便士，由北部各殖民地输入南卡罗林那的糖蜜，每加仑要收5便士州税。若是觉得这些收税方法都不够可行，不妨学习英格兰，不收麦芽税，而是根据家庭人数来缴纳一定金额，或是按照荷兰征税的方式，每个家庭都根据成员的以年龄和性别，每年缴费一定金额；或者是按照德克尔的建议的那样，对所有英格兰的消费品征税。我们前面业已提到过他的征税方

法，不过该方法不能应用于即时消费的东西。然而若无更好的方案，则可以考虑采用。

Sugar, rum, and tobacco are commodities which are nowhere necessaries of life, which are become objects of almost universal consumption, and which are therefore extremely proper subjects of taxation. If a union with the colonies were to take place, those commodities might be taxed either before they go out of the hands of the manufacturer or grower, or if this mode of taxation did not sui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ose persons, they might be deposited in public warehouses both at the place of manufacture, and at all the different ports of the empire to which they might afterwards be transported, to remain there, under the joint custody of the owner and the revenue officer, till such time as they should be delivered out either to the consumer, to the merchant retailer for home consumption, or to the merchant exporter, the tax not to be advanced till such delivery. When delivered out for exportation, to go duty free upon proper security being given that they should really be exported out of the empire. These are perhaps the principal commodities with regard to which a union with the colonies might require some considerable change in the present system of British taxation.

作为到处都需要的商品，如砂糖、烟草和甜酒，既然不是生活必需品，就可以很恰当地对它们征税。如果英国能够和各个殖民地统一，那么一经制造者、种植者制造出商品，就可以对其征税。如果这样征税不易实行，这些商品就能存在制造地的仓库中，或者是存在可能的销售目的地的仓储地，在消费者、国内零售商和出口商经手之前，不需要纳税，而是由所有者和税务机关管理。如果是从仓储地出口，出口商提供出口担保凭证，就可以免于缴税。待英国与各殖民地

统一，这几种商品税就不得不做修改。

What might be the amount of the revenue which this system of taxation extended to all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might produce, it must, no doubt, be altogether impossible to ascertain with tolerable exactness. By means of this system there is annually levied in Great Britain, upon less than eight millions of people, more than ten millions of revenue. Ireland contains more than two millions of people, and according to the accounts laid before the congress, the twelve associated provinces of America contain more than three. Those accounts, however, may have been exaggerated, in order, perhaps, either to encourage their own people, or to intimidate those of this country, and we shall suppose, therefore, that our North American and West Indian colonies taken together contain no more than three millions; or that the whole British empire, in Europe and America, contains no more than thirteen millions of inhabitants. If upon less than eight millions of inhabitants this system of taxation raises a revenue of more than ten millions sterling, it ought upon thirteen millions of inhabitants to raise a revenue of more than sixteen millions two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From this revenue, supposing that this system could produce it, must be deducted the revenue usually raised in Ireland and the plantations for defraying the expense of their respective civil governments. The expense of the civil and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Ireland, together with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debt, amounts, at a medium of the two years which ended March 1775, to something less than seven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pounds a year. By a very exact account of the revenue of the principal colonies of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it amounted,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resent disturbances, to a hundred and forty-one thousand eight hundred pounds. In this account,

however, the revenue of Maryland, of North Carolina, and of all our late acquisitions both upon the continent and in the islands is omitted, which may perhaps make a difference of thirty or forty thousand pounds. For the sake of even numbers, therefore, let us suppose that the revenue necessary for supporting the civil government of Ireland and the plantations may amount to a million. There would remain consequently a revenue of fifteen millions two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pounds to be applied towards defraying the general expense of the empire, and towards paying the public debt. But if from the present revenue of Great Britain a million could in peaceable times be spared towards the payment of that debt, six millions two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pounds could very well be spared from this improved revenue. This great sinking fund, too, might be augmented every year by the interest of the debt which had been discharged the year before, and might in this manner increase so very rapidly as to be sufficient in a few years to discharge the whole debt, and thus to restore completely the at present debilitated and languishing vigour of the empire. In the meantime the people might be relieved from some of the most burdensome taxes; from those which are imposed either upo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or upon the materials of manufacture. The labouring poor would thus be enabled to live better, to work cheaper, and to send their goods cheaper to market. The cheapness of their goods would increase the demand for them, and consequently for the labour of those who produced them. This increase in the demand for labour would both increase the numbers and improve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labouring poor. Their consumption would increase, and together with it the revenue arising from all those articles of their consumption upon which the taxes might be allowed to remain.

若这种税制在帝国及各属地推行，如何能来计算得到的税赋总额呢？显然要算出精确的数字自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在人口800万之下的情况下，依照这一制度，每年能够征得1,000万镑的税收。而爱尔兰的人口就在200万之上。美洲的12个结为同盟的州，人口加起来就达到300万之上，这是美洲的议会报告上提出的数字。但是这种报告仍是夸大其词了，这是用来鼓励本国人民，恐吓我国的。如果我们假设我国北美洲和西印度的属地人口加起来不足300万，而欧洲美洲的帝国人民加起来不到1,300百万，这一税收制度在800万一下人口就能够征收赋税1,000万镑以上，在1,300万人口身上就能收到1,625万镑以上的收入。以此作为假定收入，还要减去爱尔兰等属地的政府开支。根据1775年3月之前两年的平均数计算，爱尔兰行政支出以及军费、公债利息，年均不足75万镑。在眼下的纷争开始之前，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的主要收入，精确计算的话能够达到141,800镑。但是这并不包括马里兰、北卡罗林和英国在大陆岛屿近期的领地收入。这些收入至少也有三四百万镑。我们假设爱尔兰和各殖民地的行政开支必要收入为一百万镑，这样便于计算。若是少算那100万镑，1,625万镑就还剩下1,525万镑。这些可用于支付帝国的一般性开支和公债利息。英国可以从现有收入中省下100万镑用于公债的支付，在增加收入中省下625万镑用于公债偿还。以前每个年度已经偿还了的公债不必再支付利息，这笔减债基金就会逐年增加。假如能够这样迅速增长，那么全部的公债就可以在短短几年内偿清并恢复现在快要衰落的帝国力量。在这同时，人民就可以在那些最为沉重的赋税中解脱出来，比如从生活必需品的征税，或是制造原料税中间获得片刻喘息。做苦力的穷人们就能够过的好一些，以较低的价格出卖劳动，其制造的商品在市场上售卖的也会更低价。低廉的价格之下，货物的需求量更大，劳动所需人口更多，也就会有更多的劳动贫民投入劳动，让自身的境遇改善。生活水平上升，消费增加，也能对消费品付出更多的税款。

The revenue arising from this system of taxation, however, might not immediately increase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were subjected to it. Great indulgence would for some time be due to those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which were thus subjected to burdens to which they had not before been accustomed, and even when the same taxes came to be levied everywhere as exactly as possible, they would not everywhere produce a revenue proportioned to the numbers of the people. In a poor country the consumption of the principal commodities subject to the duties of customs and excise is very small, and in a thinly inhabited country the opportunities of smuggling are very great. The consumption of malt liquors among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in Scotland is very small, and the excise upon malt, beer, and ale produces less there than in Engl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s of the people and the rate of the duties, which upon malt is different on account of a supposed difference of quality. In these particular branches of the excise there is not, I apprehend, much more smuggling in the one country than in the other. The duties upon the distillery,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duties of customs,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s of people in the respective countries, produce less in Scotland than in England, not only on account of the smaller consumption of the taxed commodities, but of the much greater facility of smuggling. In Ireland the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are still poorer than in Scotland, and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re almost as thinly inhabited. In Ireland, therefore, the consumption of the taxed commodities might,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the people, be still less than Scotland, and the facility of smuggling nearly the same. In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the white people even of the lowest rank are in much better circumstances than those of the same rank in England, and their consumption of all the luxuries in which they usually indulge themselves is probably much greater. The blacks, indeed, who mak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inhabitants both of the southern colonies upon the continent and of the West India islands, as they are in a state of slavery, are, no

doubt, in a worse condition than the poorest people either in Scotland or Ireland. We must not, however, upon that account, imagine that they are worse fed, or that their consumption of articles which might be subjected to moderate duties is less than that even of the lower ranks of people in England. In order that they may work well, it is the interest of their master that they should be fed well and kept in good heart in the same manner as it is his interest that his working cattle should be so. The blacks accordingly have almost everywhere their allowance of rum and molasses or spruce beer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white servants, and this allowance would not probably be withdrawn though those articles should be subjected to moderate duties. The consumption of the taxed commodities, therefore,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inhabitants, would probably be as great in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as in any part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opportunities of smuggling, indeed, would be much greater; America,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the country, being much more thinly inhabited than either Scotland or Ireland. If the revenue, however, which is at present raised by the different duties upon malt and malt liquors were to be levied by a single duty upon malt, the opportunity of smuggling in the most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excise would be almost entirely taken away: and if the duties of customs, instead of being imposed upon almost all the different articles of importation, were confined to a few of the most general use and consumption, and if the levying of those duties were subjected to the excise laws, the opportunity of smuggling, though not so entirely taken away, would be very much diminished. In consequence of those two, apparently, very simple and easy alterations, the duties of customs and excise might probably produce a revenue as great in proportion to the consumption of the most thinly inhabited province as they do at present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the most populous.

但是征收税收入并不能很快根据赋税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英帝国内有些属地，从前并没有经历过此种赋税，因此开始的时候不宜征收重税。并且，即便在各处都严格地依法征收，也并不是每个地方产生的收入都能与其居民数量成比例。在贫瘠的地方，缴纳关税及国内货物税的主要商品的消费量非常少；而在居民稀少的国家，走私的机会又非常多。在苏格兰的下层人民中，麦芽饮料的消费极少；按口数量及税率（由于麦芽品质的差异，英格兰与苏格兰的麦芽税税率不同）比例计算，苏格兰的麦芽、啤酒及麦酒的国内货物税收入，一定比英格兰少。而对于这些特定的国内货物税，这两国的走私漏税程度，恐怕是不相上下的。按人口比例对酿造所征收的税及大部分关税，苏格兰之所以比英格兰少，不仅仅是因为被税商品在苏格兰的消费较少，而且是因为该地走私更为便利。与苏格兰相比，爱尔兰的下层阶级人民更为贫困，且大部分地方的人口同样稀少。因此，按人口比例计算，爱尔兰被税商品的消费比苏格兰更少，而走私却几乎与在苏格兰同样便利。在美洲和西印度，即使是最下层阶级的白人，其处境也比英格兰同一阶级人民好得多。他们对于一切奢侈品的享受性消费，也比英格兰同一阶层人民的多很多。诚然，南部各殖民地及西印度群岛的居民以黑人为主。由于这些黑人现在还是奴隶，其处境无疑比苏格兰或英格兰的最穷人民更为糟糕。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的饮食以及消费的轻税物品量，就比不上英格兰的最下层人民。正如对待代劳的牲畜一样，主人为了自身利益，也会照顾好这些奴隶的饮食，使其心情畅快，以保证他们能好好地工作。因此，各地的黑人几乎与白人仆人一样享有甜酒、糖蜜及针枞酒的补助，即使对这些物品征收轻税，这补助恐怕是也不会取消。因此，按居民人数比例计算，美洲及西印度的被税商品的消费，可能不少于大英帝国任何地方。毫无疑问，按国土面积的比例计算，美洲比苏格兰或爱尔兰更为人烟稀少，因而走私的机会也大得多。然而，当前通过麦芽及麦芽饮料的各税所获得的收入，若由单独的麦芽税来代替，则几种最为重要的国内货物税，几乎不再有逃税的机会。如果不对各种进口物品征收关税，而只将关税局限于少数用途最广、消费最多的物品，且都按国内货物税税法征收，那么，走私漏税的机会纵不会完全消失，也会大大减少。这两种改革显然十分简单容易，一旦施行，按消费比例计算的关税及国

内货物税，哪怕在人口最稀少的地方，也会产生和现在人口最稠密地方一样大的收入。

The Americans, it has been said, indeed, have no gold or silver money; the interior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being carried on by a paper currency, and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occasionally come among them being all sent to Great Britain in return for the commodities which they receive from us. But without gold and silver, it is added,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paying taxes. We already get all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they have. How is it possible to draw from them what they have not?

有人说，美洲没有金币和银币储存，内地贸易都是通过纸币进行的，即使有时候金银流入到当地，也都又用来交换了我们的商品，再次流入英国。纳税没有金银不行。我们不能榨取他们的金银，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了他们的金银。

The present scarcity of gold and silver money in America is not the effect of the poverty of that country, or of the inability of the people there to purchase those metals. In a country where the wages of labour are so much higher, and the price of provisions so much lower than in Engl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eople must surely have wherewithal to purchase a greater quantity if it were either necessary or convenient for them to do so. The scarcity of those metals, therefore, must be the effect of choice, and not of necessity.

但是美洲地区金银少，并不是因为贫困，也非囿于当地人民的购

买力。比起英格兰，那里的劳动收入高，食品价格低廉，如果有必要，他们并不缺乏购买力。由此可见，这些金属很少是因为他们选择不去购买，而非形势所迫。

It is for transacting either domestic or foreign business that gold and silver money is either necessary or convenient.

为了进行国内外交易，金银币是必要的，或是出于便利考虑，他们也需要金银。

The domestic business of every country, it has been shown in the second book of this Inquiry, may, at least in peaceable times, be transacted by means of a paper currency with nearly the same degree of conveniency as by gold and silver money. It is convenient for the Americans, who could always employ with profit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lands a greater stock than they can easily get, to sav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expense of so costly an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s gold and silver, and rather to employ that part of their surplus produce which would be necessary for purchasing those metals in purchasing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the materials of clothing, several parts of household furniture, and the ironwork necessary for building and extending their settlements and plantations; in purchasing, not dead stock, but active and productive stock. The colony governments find it for their interest to supply the people with such a quantity of papermoney as is fully sufficient and generally more than sufficient for transacting their domestic business. Some of those governments, that of Pennsylvania particularly, derive a revenue from lending this paper-money to their subjects at an interest of so much per cent. Others, like that of

Massachusetts Bay, advance upon extraordinary emergencies a paper-money of this kind for defraying the public expense, and afterwards, when it suits the conveniency of the colony, redeem it at the depreciated value to which it gradually falls. In 1747(Hutchinson's *Hist. of Massachusetts Bay* , vol. ii.l page 436, et seq.) that colony paid, in this manner, the greater part of its public debts with the tenth part of the money for which its bills had been granted. It suits the conveniency of the planters to save the expense of employing gold and silver money in their domestic transactions, and it suits the conveniency of the colony governments to supply them with a medium which, though attended with some very considerable disadvantages, enables them to save that expense. The redundancy of paper-money necessarily banishes gold and silver from the domestic transactions of the colonies,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it has banished those metals from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domestic transactions in Scotland; and in both countries it is not the poverty, but the enterprising and projecting spirit of the people, their desire of employing all the stock which they can get as active and productive stock, which has occasioned this redundancy of paper-money.

在这本书第二篇中我曾经提到过，国内交易用纸币和金币银币，便利程度是一样的。即便是以能力范围之外的资本放在土地改良上，美洲人也能获得利润；所以要把剩余生产物中必须用于购买昂贵金银的部分，用来购买其从事职业所需要的用具、衣服料子、家具、开垦耕地所需要的铁制农具。换句话说，对他们来讲，比较便利的做法不是买进固定资本，而是买入活的生产资料。殖民地有益的做法，就是供给人民足够或者多于国内交易所需要的纸币数量，这对殖民地政府也有好处。比如殖民地政府中的宾夕法尼亚政府，会用几厘的利息贷给人民纸币，以此获得收入。再比如马萨诸塞湾政府，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就发行纸币来供国家使用，在以后方便的时候，根据下跌的市

价收回该殖民地的纸币。在1747年的时候（参见哈钦森的《马萨诸塞湾的历史》，第二卷，436页及之后），曾按照这个方法，用发行纸币1/10的部分偿还公债的一大部分，省去国内交易上使用金银的费用，方便了殖民地的人民；尽管供给一种媒介物并没有好处，但是可以因此节约费用，对各殖民地政府都有益处。如果纸币量太大，金银一定会被驱赶出殖民地的国内贸易市场，就像曾经金银被驱逐出苏格兰大部分国内贸易领域一样。不是人民的贫乏让纸币过多，在这两国让纸币过多的，是企业的计划精神。他们希望把自己所有的资产，都当做活动的生产资产。

In the exterior commerce which the different colonies carry on with Great Britain, gold and silver are more or less employed exactly in proportion as they are more or less necessary. Where those metals are not necessary they seldom appear. Where they are necessary they are generally found.

各殖民地与英国进行对外贸易的时候，要根据需求大小，来确定金银的使用量。不需要金银的时候很少见到金银，而在需要的时候，又不愁金银缺乏。

In the commerce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tobacco colonies the British goods are generally advanced to the colonists at a pretty long credit, and are afterwards paid for in tobacco, rated at a certain price. It is more convenient for the colonists to pay in tobacco than in gold and silver. It would be more convenient for any merchant to pay for the goods which his correspondents had sold to him in some other sort of goods which he might happen to deal in than in money. Such a merchant would have no occasion to keep any part of his stock by him unemployed, and in ready money,

for answering occasional demands. He could have, at all times, a larger quantity of goods in his shop or warehouse, and he could deal to a greater extent. But it seldom happens to be convenient for all the correspondents of a merchant to receive payment for the goods which they sell to him in goods of some other kind which he happens to deal in. The British merchants who trade to Virginia and Maryland happen to be a particular set of correspondents, to whom it is more convenient to receive payment for the goods which they sell to those colonies in tobacco than in gold and silver. They expect to make a profit by the sale of the tobacco. They could make none by that of the gold and silver. Gold and silver, therefore, very seldom appear in the commerce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tobacco colonies. Maryland and Virginia have as little occasion for those metals in their foreign as in their domestic commerce. They are said, accordingly, to have less gold and silver money than any other colonies in America. They are reckoned, however, as thriving, and consequently as rich, as any of their neighbours.

英国与产烟殖民地间进行贸易时，通常是先将英国货物赊与殖民者，很长时间之后，再由一定价格的烟草偿付。对殖民者来说，烟草比金银更便于支付。对商人来说，从其他商人那里购得商品时，若以自己所经营的商品来支付，也比用金银支付更为便利。如此一来，他就不必为应付临时的需要，而将一部分营业资本蓄积不用。他可以随时在店铺或货栈中，存储更多的货物，或者扩大经营。但是，这种以经营的商品来支付的做法，对于交易的收款方来说，却很少会感到同样便利。情少见不过，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却碰巧都觉得对于卖给这些殖民地的货物，以取烟草为酬比取金银来得便利。他们可从通过转售烟草而获取利润，而从金银中却不能。因此，英国与产烟殖民地间进行的贸易，极少用到金银。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外贸易，几乎同样都不需要使用金银。因此它们所拥有的金银，比美洲其他殖民都要少，而论及繁荣富

庶，却不逊色于邻近的殖民地。

In the northern colonies, Pennsylvania, New York, New Jersey, the four governments of New England, etc., the value of their own produce which they export to Great Britain is not equal to that of the manufactures which they import for their own use, and for that of some of the other colonies to which they are the carriers. A balance, therefore, must be paid to the mother country in gold and silver, and this balance they generally find.

在北部各殖民地，即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新英格兰四州等地，出口到英格兰的产品的价值，低于它们为自己使用，及为其他殖民地担任运送人时，由英格兰进口的制造品的价值。因此，这项差额就必须以金银付给英格兰，而它们通常都能找到足够的金银。

In the sugar colonies the value of the produce annually exported to Great Britain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all the goods imported from thence. If the sugar and rum annually sent to the mother country were paid for in those colonies, Great Britain would be obliged to send out every year a very large balance in money, and the trade to the West Indies would, by a certain species of politicians, be considered as extremely disadvantageous. But it so happens that many of the principal proprietors of the sugar plantations reside in Great Britain. Their rents are remitted to them in sugar and rum, the produce of their estates. The sugar and rum which the West India merchants purchase in those colonies upon their own account are not equal in value to the goods which they annually sell there. A balance, therefore, must necessarily be paid to them in gold and silver, and this balance, too, is generally found.

产砂糖的殖民地每年出口到英格兰的产品的价值，比它们由英格兰进口的所有商品的价值要大得多。如果宗主国所获得的砂糖及甜酒都必须支付给这些殖民地，那英国每年就不得不送出巨额的现金。于是，对于某类政治家来说，与西印度的贸易将变得极为不利。但事实却是，许多砂糖种植园的主要所有者都住在英国。他们的地租都是以自己农场生产的砂糖和甜酒来支付的。西印度商人在这些殖民地购买的砂糖及甜酒的价值，也比他们每年在那里出售的货物的价值小。因此，此项差额必然也要以金银支付给这些商人；而这些金银通常也是能够设法找到的。

The difficulty and irregularity of payment from the different colonies to Great Britain have not been at all in proportion to the greatness or smallness of the balances which were respectively due from them. Payments have in general been more regular from the northern than from the tobacco colonies, though the former have generally paid a pretty large balance in money, while the latter have either paid no balance, or a much smaller one. The difficulty of getting payment from our different sugar colonies has been greater or less in proportion, not so much to the extent of the balances respectively due from them, as to the quantity of uncultivated land which they contained; that is, to the greater or smaller temptation which the planters have been under of overtrading, or of undertaking the settlement and plantation of greater quantities of waste land than suited the extent of their capitals. The returns from the great island of Jamaica, where there is still much uncultivated land, have, upon this account, been in general more irregular and uncertain than those from the smaller islands of Barbadoes, Antigua, and St. Christophers, which have for these many years been completely cultivated, and have, upon that account, afforded less field for the speculations of the planter. The

new acquisitions of Grenada, Tobago, St. Vincents, and Dominica have opened a new field for speculations of this kind, and the returns from those islands have of late been as irregular and uncertain as those from the great island of Jamaica.

各殖民地向英国支付货款时遇到的困难与不确定性，并不与他们各自所欠差额的大小成比例。尽管北部各殖民地需向英国支付大量的差额，而产烟各殖民地所需支付的差额很小，甚至无差额需支付，但是，前者一般比后者更能按期偿付。我们从各产糖殖民地收取货款的困难程度，不与各殖民地应付差额成比例，而与它们未开垦土地的面积成比例。未开垦土地的面积越大，就越能激励殖民者在超过自己资力的情况下开荒垦殖，因而更不容易付还欠债。正因如此，和那些土地已经完全耕种多年，没有余地可供殖民者投机的小岛，如巴巴多斯、安提瓜及圣克里斯托弗等岛比较，拥有大量荒地的牙买加大岛，就往往不能如期偿还欠债。最近格伦纳达、多巴哥、圣文逊特及多米尼加的占领，给这种投机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地。而这些岛屿最近付款的不规则与不确定，与牙买加这个大岛一样。

It is not, therefore, the poverty of the colonies which occasions,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m, the present scarcity of gold and silver money. Their great demand for active and productive stock makes it convenient for them to have as little dead stock as possible, and disposes them upon that account to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a cheaper though less commodious instrument of commerce than gold and silver. They are thereby enabled to convert the value of that gold and silver into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into the materials of clothing, into household furniture, and into the ironwork necessary for building and extending their settlements and plantations. In those branches of business which cannot be transacted without gold and silver money, it appears that they can always find the necessary

quantity of those metals; and if they frequently do not find it, their failure is generally the effect, not of their necessary poverty, but of their unnecessary and excessive enterprise. It is not because they are poor that their payments are irregular and uncertain, but because they are too eager to become excessively rich. Though all that part of the produce of the colony taxes which was over and above what was necessary for defraying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civil and military establishments were to be remitted to Great Britain in gold and silver, the colonies have abundantly wherewithal to purchase the requisite quantity of those metals. They would in this case be obliged, indeed, to exchange a part of their surplus produce, with which they now purchase active and productive stock, for dead stock. In transacting their domestic business they would be obliged to employ a costly instead of a cheap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nd the expense of purchasing this costly instrument might damp somewhat the vivacity and ardour of their excessive enterprise in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It might not, however, be necessary to remit any part of the American revenue in gold and silver. It might be remitted in bills drawn upon and accepted by particular merchants or companies in Great Britain to whom a part of the surplus produce of America had been consigned, who would pay into the treasury the American revenue in money, after having themselves received the value of it in goods; and the whole business might frequently be transacted without exporting a single ounce of gold or silver from America.

所以大部分殖民地缺少金银并不是因为贫穷，他们还是大量需要生产性资本。因此，他们尽量节省固定的固定资本，并且，比起金银，更为廉价的交易媒介虽然不合适，但是却更让他们满意。仅此一条，他们就能够把金银的价值，转而用在生产工具、衣服料子、家具或者开垦用的铁农具上。在那些必须要金银才能办事的交易部门，总

是能找到所必需的金银。要是找不到，那也不是因为贫乏，而是因为从事了不必要的、膨大过分的企业。这些部门拖延偿付，不是由于贫乏，而是过于渴望发财。即便是殖民地的税收，除去当地行政费用和军事设备的开销，其他的部分，都应当以金银的形式送到英国来，它们也有足够的手段，购买必要的金银。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得不将用来购买生产性资本的一些剩余生产物，转去购买固定资产。虽然它们为了国内交易只能用廉价交易媒介而不是昂贵媒介，而且交易媒介的代价昂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让它们不那么过度冒险地改良土地，防止侵略之心过度。但是，美洲收入的任何部分，都不需要用金银送往英国，可以汇票汇寄。这汇票是向曾受委托代售美洲剩余产物的特定英国商人或公司开出，并由其承兑。该商人或公司收到货物后，即按票额把美洲收入以货币形式上交国库。这一来，美洲无须输出一盎司金银，一切即可办理妥当。

It is not contrary to justice that both Ireland and America should contribute towards the discharge of the public debt of Great Britain. That debt has been contracted in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by the Revolution, a government to which the Protestants of Ireland owe, not only the whole authority which they at present enjoy in their own country, but every security which they possess for their liberty, their property, and their religion; a government to which several of the colonies of America owe their present charters, and consequently their present constitution, and to which all the colonies of America owe the liberty, security, and property which they have ever since enjoyed. That public debt has been contracted in the defence, not of Great Britain alone, but of all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the immense debt contracted in the late war in particular, and a great part of that contracted in the war before, were both properly contracted in defence of America.

英国的公债若由爱尔兰或美洲偿还，必是不公道的。英国的公债原是革命建立的政府借来的。正是因为该政府，爱尔兰新教徒才拥有了现在在国内享有的权利自由、财产和宗教并由此获得保护。美洲的部分殖民地现在的特许状和宪法，也都归功于这个政府。美洲的殖民地人民也是依赖政府，才能得到自由、安全和财产保障。公债不仅是为了保护英国本身，也是为了保护英国的属地。近期的战争中，英国借了巨额的公债，包括在前一次战争中所借的大部分公债，本来也都是用来保护美洲的。

By a union with Great Britain, Ireland would gain, besides the freedom of trade, other advantages much more important, and which would much more than compensate any increase of taxes that might accompany that union. By the union with England the middling and inferior ranks of people in Scotland gained a complete deliverance from the power of an aristocracy which had always before oppressed them. By a union with Great Brita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eople of all ranks in Ireland would gain an equally complete deliverance from a much more oppressive aristocracy; an aristocracy not founded, like that of Scotland, in the natural and respectable distinctions of birth and fortune, but in the most odious of all distinctions, those of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rejudices; distinctions which, more than any other, animate both the insolence of the oppressors and the hatred and indignation of the oppressed, and which commonly render the inhabitants of the same country more hostile to one another than those of different countries ever are. Without a union with Great Britain the inhabitants of Ireland are not likely for many ages to consider themselves as one people.

若爱尔兰归属于大不列颠，不仅能够获得自由贸易的好处，还有其他更多的好处，这些好处能够十分有力地补偿归属后所增加的缴

税。苏格兰归属于大不列颠之后，中层和下层人民,就能从贵族权力的压迫中彻底解放出来。在爱尔兰，贵族权力更甚，受害者更众，如果并入英国合并，大部分人民也能免于贵族压迫。与苏格兰贵族不同的是，爱尔兰贵族不是建立在出身和财富这些自然的且值得尊重的差别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最可憎的差别之上——宗教偏见及政治偏见。这种差别比任何其他差别都能滋养压迫阶级的傲慢，激发被压迫阶级对他们的憎恨与愤怒，通常会使同国居民间彼此之间的相互怀有敌意，超过了对他国人民的敌意。假使爱尔兰不归并于大不列颠，可能其居民在今后的数年之内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同国的人民。

No oppressive aristocracy has ever prevailed in the colonies. Even they, however, would, in point of happiness and tranquility, gain considerably by a union with Great Britain. It would, at least, deliver them from those rancorous and virulent factions which are inseparable from small democracies, and which have so frequently divided the affections of their people, and disturbed the tranquillity of their governments, in their form so nearly democratical. In the case of a total separation from Great Britain, which, unless prevented by a union of this kind, seems very likely to take place, those factions would be ten times more virulent than ever.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resent disturbances, the coercive power of the mother country had always been able to restrain those factions from breaking out into anything worse than gross brutality and insult. If that coercive power were entirely taken away, they would probably soon break out into open violence and bloodshed. In all great countries which are united under one uniform government, the spirit of party commonly prevails less in the remote provinces than in the centre of the empire. The distance of those provinces from the capital, from the principal seat of the great scramble of faction and ambition, makes them enter less into the views of any of the contending parties, and renders them more

indifferent and impartial spectators of the conduct of all. The spirit of party prevails less in Scotland than in England. In the case of a union it would probably prevail less in Ireland than in Scotland, and the colonies would probably soon enjoy a degree of concord and unanimity at present unknown in any part of the British empire. Both Ireland and the colonies, indeed, would be subjected to heavier taxes than any which they at present pay. In consequence, however, of a diligent and faithful application of the public revenue towards the discharge of the national debt,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taxes might not be of long continuance, and the public revenue of Great Britain might soon be reduced to what was necessary for maintaining a moderate peace establishment.

压迫性的贵族体制并没有在各殖民地流行开来。不过，这些殖民地若并入大不列颠，就其幸福与安定而言，甚至会会受益匪浅。至少，他们一经合并，这些殖民地它可以免受在小民主政体之下难以避免的充满仇恨和敌意的党派之争，这种争斗通常会使他们民族感情分裂，并扰乱政府统治的稳定，毕竟他们形式上一经如此接近民主了。假如殖民地完全从大不列颠中脱离出来，那么除非用这种合并防止其脱离，否则脱离起来很容易，那党派之争一定会比之前凶残十倍。在目前这种混论局面开始之前，假如宗主国的强压力，总是能够压制住这类党争，以免其超过暴行及侮辱范围。假如宗主国不施加这种压力，很可能不久就会演变成暴力流血事件了。在所有由同一个单一政府统治的大国之中，党派精神通常在帝国的中心地区比偏远地区要肆虐的多。各省州与首都距离，也就是他们与党派之争和野心的主游涡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使得他们对于任何纷争党派的观念都理解不深刻，同时他们对各党派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更加中立和公正的旁观态度。苏格兰的党派精神远没有英格兰那样普遍；假如实现了合并，可能爱尔兰的党派精神会比苏格兰更微弱；各殖民地可能不久就会出现大不列颠帝国的任何属地都未曾出现过的和谐一致的景象。的确，那样的话爱尔兰和各殖民地难免会需要承担比现在更加沉重赋税。不

过，假如他们能够能勤勉、忠诚地将国家收入用于偿还国家债务，想必这种赋税不会持续太久，同时国家收入会减少到能够维持军队平时编制就可以了。

The territorial acquisition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he undoubted right of the crown, that is, of the state and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might be rendered another source of revenue more abundant, perhaps, than all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Those countries are represented as more fertile, more extensive, and, in proportion to their extent, much richer and more populous than Great Britain. In order to draw a great revenue from them, it would not probably be necessary to introduce any new system of taxation into countries which are already sufficiently and more than sufficiently taxed. It might, perhaps, be more proper to lighten than to aggravate the burden of those unfortunate countries, and to endeavour to draw a revenue from them, not by imposing new taxes, but by preventing the embezzlement and misapplica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ose which they already pay.

东印度公司所得到的那些领地，毫无疑问是国王的权利，也就是说，这些领地属于大不列颠及其人民。那些领地也可以成为另一项收入来源，或许会比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各种收入来源都更丰富。和大不列颠比起来，据说那些地方更广袤和肥沃，就其土地面积来说说，这些领地更富裕，人口更稠密。为了从中获取收入，可能不必引入任何新的赋税制度，就可以征收足够多甚至超出所应该征收的赋税了。可能更加妥当的方法是减轻那些不幸的国家的负担，而非为了努力从他们身上获取收入而强制征收新的赋税要做的是防止大部分已经征得的赋税的滥用与挪用。

If it should be found impracticable for Great Britain to draw any considerable augmentation of revenue from any of the resources above mentioned, the only resource which can remain to her is a diminution of her expense. In the mode of collecting and in that of expending the public revenue, though in both there may be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Great Britain seems to be at least as economical as any of her neighbours.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which she maintains for her own defence in time of peace is more moderate than that of any European state which can pretend to rival her either in wealth or in power. None of those articles, therefore, seem to admit of any considerable reduction of expense. The expense of the peac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lonies was,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resent disturbances, very considerable, and is an expense which may, and if no revenue can be drawn from them ought certainly to be saved altogether. This constant expense in time of peace, though very great, is insignificant in comparison with what the defence of the colonies has cost us in time of war. The last war, which was undertaken altogether on account of the colonies, cost Great Britain, it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upwards of ninety millions. The Spanish war of 1739 was principally undertaken on their account, in which, and in the French war that was the consequence of it, Great Britain spent upwards of forty millions, a great part of which ought justly to be charged to the colonies. In those two wars the colonies cost Great Britain much more than double the sum which the national debt amounted to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irst of them. Had it not been for those wars that debt might, and probably would by this time, have been completely paid; and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colonies, the former of those wars might not, and the latter certainly would not have been undertaken. It was because the colonies were supposed to be provinc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at this expense was laid out upon them. But countries which contribute neither revenue nor

military force towards the support of the empire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provinces. They may perhaps be considered as appendages, as a sort of splendid and showy equipage of the empire. But if the empire can no longer support the expense of keeping up this equipage, it ought certainly to lay it down; and if it cannot raise its revenue in proportion to its expense, it ought, at least, to accommodate its expense to its revenue. If the colonies, notwithstanding their refusal to submit to British taxes, are still to be considered as provinc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ir defence in some future war may cost Great Britain as great an expense as it ever has done in any former war. The rulers of Great Britain have,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past, amused the people with the imagination that they possessed a great empire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Atlantic. This empire, however, has hitherto existed in imagination only. It has hitherto been, not an empire, but the project of an empire; not a gold mine, but the project of a gold mine; a project which has cost, which continues to cost, and which, if pursued in the same way as it has been hitherto, is likely to cost, immense expense, without being likely to bring any profit; for the effects of the monopoly of the colony trade, it has been shown, are, to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mere loss instead of profit. It is surely now time that our rulers should either realize this golden dream, in which they have been indulging themselves, perhaps, as well as the people, or that they should awake from it themselves, and endeavour to awaken the people. If the project cannot be completed, it ought to be given up. If any of the provinc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nnot be made to contribute towards the support of the whole empire, it is surely time that Great Britain should free herself from the expense of defending those provinces in time of war, and of supporting any part of their civil or military establishments in time of peace, and endeavour to accommodate her future views and designs to the real mediocrity of her

circumstances.

假若大不列颠并不能按照上述方法实现收入增加，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费用支出了。尽管大不列颠在征收征赋税和国家收入的支出模式上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同任何邻国比起来，都至少算不上不经济。大不列颠和平时期的军事机构的设置，和那些看起来能够与之势均力敌的欧洲任何国家比起来，都更为稳健，所以想在这个项目上节省开支，似乎没有减少的可能。在战乱出现之前，大不列颠花在各殖民地平时编制上的费用，数量可观，假如并不能从这些殖民地手中取得收入，那么这项费用完全应该节省。尽管在和平时期持续之处的费用尽管数额巨大，但这些费用和大不列颠在战争时期为防御它们作战的之处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大不列颠完全为了保障殖民地而进行的上一场战争，花了9,000多英镑。1739年的西班牙战争主要就是出于保护殖民地的目的，而由此次又引发了法兰西战争，耗费了4,000多英镑；当然这笔费用大部分应该由各殖民地负担。在这两场战争上，大不列颠花在各殖民地上的费用比第一场战争开始之前大不列颠所负公债总额的两倍还要多。假如没有这几次战争，可能或者很可能现在已经偿清了当时的公债。若不是为了这些殖民地，可能前一次战争不会发生，而后一次战争则一定不可能发生。正是因为大不列颠将这些殖民地视为它的省州，才会支出这么多的费用。但是，那些既不会为帝国贡献收入也不提供军事力量的国土，不能被视作省州。它们也许可以算作一种附属品和帝国壮丽而华美的装备。不过假如帝国不能继续支付维系这种装备费用，当然应该将其放弃；假如不能按照其支出比例来增加收入，至少应该能够量入为出。假如各殖民地还是拒绝向大不列颠王国纳税，却依旧将其视为英帝国的省州，在将来防御殖民地的战争中，恐怕还要耗去大不列颠在以前几次战争中所耗费的巨额费用。在过去百余年中，大不列颠的统治者们曾以该国在大西洋西岸拥有大帝国的想象来取悦其国民。然而，这个帝国至今也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至今存在的并不是一个帝国，而只是建立帝国的计划；并不是金矿，而只是开发金矿的计划。假如我们继续追逐这样一个计划——过去在耗费财力，到现在还在耗

费财力——很可能还会耗费巨大的费用，而可能不会带来任何利润。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垄断殖民地贸易的结果，对于大多数人民来讲有害无益。诚然，现在我们的统治者要么应该取实现自己一直所沉迷于——可能人民也同样沉迷于此——的黄金梦了；要么他们应该从这样的梦中清醒过来，并努力唤醒其人民。假如无法完成该计划，那就应该放弃了。假如英帝国的任何省州不能对维持整个帝国的运行有所贡献，那么大不列颠就该将自己从这种在战争时期为防御那些省份而支出费用的情况中解脱出来，并努力将未来的蓝图和规划安排得适应其所处环境的实际情况。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美］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科学管理原理

Frederick Win slow Taylor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科学管理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美）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INTRODUCTION 引言
- CHAPTER I. FUNDAMENTAL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第一章　科学管理的基础
- CHAPTER II.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第二章　科学管理原理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INTRODUCTION

引言

President Roosevelt in his address to the Governors at the White House, prophetically remarked that “The conservation of our national resources is only preliminary to the larger question of national efficiency.”

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向各位州长们发表讲话时曾预言：“保护我们的国家资源，仅是提高全国工作效率这一重大问题的第一步。”

The whole country at once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conserving our material resources and a large movement has been started which will be effective in accomplishing this object. As yet, however, we have but vaguely apprecia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larger question of increasing our national efficiency.”

举国上下立即认识到了保护物资资源的重要性，为了有效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发起了大规模运动。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尚未清楚认识到“提高全国工作效率这一重大问题”的重要性。

We can see our forests vanishing, our water-powers going to waste, our soil being carried by floods into the sea; and the end of our coal and our iron is in sight. But our larger wastes of human effort, which go on every day through such of our acts as are

blundering, ill-directed, or inefficient, and which Mr. Roosevelt refers to as a lack of “national efficiency,” are less visible, less tangible, and are but vaguely appreciated.

可以看到，我们的森林正在消失，水资源被浪费，土壤被洪水冲入大海，矿产资源也面临枯竭。但是，决策不当、指挥不当和效率低下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这浪费了巨多人力资源。这种浪费就是罗斯福先生所提到的“全国工作效率”欠佳。不过这种浪费并不是很直观，即使有人意识到了，也是模糊不清的。

We can see and feel the waste of material things. Awkward, inefficient, or ill-directed movements of men, however, leave nothing visible or tangible behind them. Their appreciation calls for an act of memory, an effort of the imagination. And for this reason, even though our daily loss from this source is greater than from our waste of material things, the one has stirred us deeply, while the other has moved us but little.

我们能够看到并感觉到物质资源的浪费。然而，因人们决策不当、效率低下或指挥不当而造成的浪费既不直观，也不易察觉。意识到这些需要我们记住一些事实，并发挥想象力。基于此，与物质资源浪费相比，我们的日常浪费甚至更加严重，但如今物质资源的浪费已然让人们深感不安，以致日常浪费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广泛关注。

As yet there has been no public agitation for “greater national efficiency,” no meetings have been called to consider how this is to be brought about. And still there are signs that the need for greater efficiency is widely felt.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未公开宣扬“提高全国工作效率”，也未曾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有迹象表明，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提高效率的必要了。

The search for better, for more competent men, from the presidents of our great companies down to our household servants, was never more vigorous than it is now. And more than ever before is the demand for competent men in excess of the supply.

从大公司的董事长到家庭保姆，人们对优秀人才的需求从未如此强烈。而这种人才的需求大于供给，也是前所未有的。

What we are all looking for, however, is the ready-made, competent man; the man whom some one else has trained. It is only when we fully realize that our duty, as well as our opportunity, lies in systematically cooperating to train and to make this competent man, instead of in hunting for a man whom some one else has trained, that we shall be on the road to national efficiency.

然而，我们正在寻找的是现有经过他人培训的优秀人才。我们的职责和机遇在于通过系统协作，培训和造就这样的人才，而不是猎取别人培训成果。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算走上了提高全国工作效率的道路。

In the past the prevailing idea has been well expressed in the saying that “Captains of industry are born, not made”; and the

theory has been that if one could get the right man, methods could be safely left to him.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appreciated that our leaders must be trained right as well as born right, and that no great man can (with the old system of personal management) hope to compete with a number of ordinary men who have been properly organized so as efficiently to cooperate.

这句俗语可以表达过去普遍流行的观点："工业界的领袖皆是天生的，而非后天培养的"。过去盛行的观点是：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那就可以放手让他去做。将来我们便会领悟到，我们的领导者必须经过后天的培养，就像天生的一样，而旧人事管理体制下的伟人也不能与若干组织有序、能有效合作的普通人相比。

In the past the man has been first; in the future the system must be first. This in no sense, however, implies that great men are not needed. On the contrary, the first object of any good system must be that of developing first-class men; and under systematic management the best man rises to the top more certainly and more rapidly than ever before.

过去，人一直是第一位的；将来，体制才是第一位的。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伟大的人物已无用武之地。恰恰相反，无论何种先进体制，培养一流的人才都是重中之重。此外，在系统管理下，我们更有把握将最优秀的人才快速提升到企业高层。

This paper has been written:

本文旨在实现以下目标：

First. To point out, through a series of simple illustrations, the great loss which the whole country is suffering through inefficiency in almost all of our daily acts.

第一，通过一系列简单举证，指明整个国家因效率低下使我们日常生活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Second. To try to convince the reader that the remedy for this inefficiency lies in systematic management, rather than in searching for some unusual or extraordinary man.

第二，向读者说明解决效率低下的最佳途径是系统化管理而非寻找某些与众不同或杰出的大人物。

Third. To prove that the best management is a true science, resting upon clearly defined laws, rules, and principles, as a foundation. And further to show tha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are applicable to all kinds of human activities, from our simplest individual acts to the work of our great corporations, which call for the most elaborate cooperation. And, briefly, through a series of illustrations, to convince the reader that whenever these principles are correctly applied, results must follow which are truly astounding.

第三，证明最佳管理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它以明确规定的法律法规和原则为基础；笔者进一步表明，科学管理原理适用于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我们最简单的个人行动，到优秀企业间的紧密合作，都会有其适用之处。总而言之，通过一系列简明的举证，笔者会让读者相信，只要这些原则得以正确运用，我们一定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This paper was originally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to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The illustrations chosen are such as, it is believed, will especially appeal to engineers and to managers of industrial and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 and also quite as much to all of the men who are working in these establishments. It is hoped, however, that it will be clear to other readers that the same principles can be applied with equal force to all social activities: to the management of our homes; the management of our farms; the management of the business of our tradesmen, large and small; of our churches, our philanthropic institutions, our universities, and our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本文的初衷是向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提交报告。笔者相信，这里所选用的简明例证将会引发工程师、工业和制造业等企业管理者的浓厚兴趣，同时也会吸引这些企业的员工。笔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使其他读者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所有的社会活动，例如我们的家庭管理，农场管理，各种商业活动的管理，教堂、慈善机构、大学和政府部门的管理。

CHAPTER I. FUNDAMENTAL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第一章　科学管理的基础

The principal object of management should be to secure the maximum prosperity for the employer, coupled with the maximum prosperity for each employee.

管理的第一要务应该是保证雇主以及每一位雇员实现财富最大化。

The words “maximum prosperity” are used, in their broad sense, to mean not only large dividends for the company or owner, but the development of every branch of the business to its highest state of excellence, so that the prosperity may be permanent.

“财富最大化”，从广义上说不仅意味着企业或其所有者能获得高额利润，还意味着企业的各个部门运营状况达到最佳，只有这样，每位雇主才能实现永久的财富最大化。

In the same way maximum prosperity for each employee means not only higher wages than are usually received by men of his class, but, of more importance still, it also means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man to his state of maximum efficiency, so that he may be able to do, generally speaking, the highest grade of work for which his natural abilities fit him, and it further means giving him, when

possible, this class of work to do.

同理，雇员的财富最大化不仅意味着他的收入一般会比其他同级别的雇员高，更重要的是，这还表明每位雇员的工作效率达到了最大化。因此，总的来说，如果能给他机会，他或许能够从事同他的天赋和能力相符的最高级别的工作。

It would seem to be so self-evident that maximum prosperity for the employer, coupled with maximum prosperity for the employee, ought to be the two leading objects of management, that even to state this fact should be unnecessary. And ye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roughout the industrial world, a large par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employers, as well as employees, is for war rather than for peace, and that perhaps the majority on either side do not believe that it is possible so to arrange their mutual relations that their interests become identical.

不言而喻，管理的两个首要目标应该是雇主财富的最大化及雇员财富的最大化。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整个工业领域，无论是雇主的组织还是雇员的组织，其成立目标都是赢得竞争而非寻求合作，以致大部分雇主和雇员都不认为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

The majority of these men believe tha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employees and employers are necessarily antagonistic. Scientific management, on the contrary, has for its very foundation the firm conviction that the true interests of the two are one and the same; that prosperity for the employer cannot exist through a long term of years unless it is accompanied by prosperity for the

employee, and *vice versa;* an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give the workman what he most wants—high wages—and the employer what he wants—a low labor cost—for his manufactures.

这些人大多相信，雇主和雇员的根本利益肯定是对立的。与之相反，科学管理坚信两者真正利益是一致的，这也是科学管理的基础；没有雇员的长久富裕就无法保证雇主的长久富裕，反之亦然；而我们可以同时满足雇员的高工资要求和雇主生产产品的低劳工成本要求。

It is hoped that some at least of those who do not sympathize with each of these objects may be led to modify their views; that some employers, whose attitude toward their workmen has been that of trying to get the largest amount of work out of them for the smallest possible wages, may be led to see that a more liberal policy toward their men will pay them better; and that some of those workmen who begrudge a fair and even a large profit to their employers, and who feel that all of the fruits of their labor should belong to them, and that those for whom they work and the capital invested in the business are entitled to little or nothing, may be led to modify these views.

希望那些反对上述观点的人，至少有一些人能够通过笔者的引导改变自己的看法；对于那些试图以极低的工资让雇员们完成大量生产任务的雇主，我们可以引导他们的意识，使他们对雇员们采取更宽松的策略，这样反而会获得更高的利润；某些雇员认为雇主不应获得一笔合理甚至是巨额的利润，自己才是劳动成果的所有者，而他们的雇主或投资人不应当享有或只应享有劳动成果的一小部分，我们希望可以引导这些人改变自己的看法。

No one can be found who will deny that in the case of any single individual the greatest prosperity can exist only when that individual has reached his highest state of efficiency; that is, when he is turning out his largest daily output.

没人会否认：只有当这个人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即当他的日产量最大化时，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富裕。

The truth of this fact is also perfectly clear in the case of two men working together. To illustrate: if you and your workman have become so skilful that you and he together are making two pairs of shoes in a day, while your competitor and his workman are making only one pair, it is clear that after selling your two pairs of shoes you can pay your workman much higher wages than your competitor who produces only one pair of shoes is able to pay his man, and that there will still be enough money left over for you to have a larger profit than your competitor.

当两个人合作时，这种情况也十分常见。举例而言，如果你和你的工人技艺已足够娴熟，每天合作能生产两双鞋，而你的竞争对手和他的工人只能生产一双，显然，鞋子售出后，你支付给自己工人的工资比对手多，而你仍会有一笔钱留给自己，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In the case of a more complicated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 it should also be perfectly clear that the greatest permanent prosperity for the workman, coupled with the greatest prosperity for the employer, can be brought about only when the

work of the establishment is done with the smallest combined expenditure of human effort, plus nature's resources, plus the cost for the use of capital in the shape of machines, buildings, etc. Or, to state the same thing in a different way: that the greatest prosperity can exist only as the result of the greatest possible productivity of the men and machines of the establishment—that is, when each man and each machine are turning out the largest possible output; because unless your men and your machines are daily turning out more work than others around you, it is clear that competition will prevent your paying higher wages to your workmen than are paid to those of your competitor. And what is true as to the possibility of paying high wages in the case of two companies competing close beside one another is also true as to whole districts of the country and even as to nations which are in competition. In a word, that maximum prosperity can exist only as the result of maximum productivity. Later in this paper illustrations will be given of several companies which are earning large dividends and at the same time paying from 30 per cent to 100 per cent higher wages to their men than are paid to similar men immediately around them, and with whose employers they are in competition. These illustrations will cover different types of work, from the most elementary to the most complicated.

同样，就某个更复杂的制造企业而言，我们要清楚：只有将企业各项工作的总支出（包括人力、自然资源和使用机器、建筑等资本产生的成本等）最小化，才能实现雇主和雇员最大程度的富裕。或者，换言之，只有当雇员和机器都尽可能达到最高生产率，即只有每位工人和每台机器都尽可能完成最大产出量时，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富裕。因为，自己的雇员要想获得比你的竞争对手支付给其雇员的工资更高的收入，他们和机器的日产量就必须比周围其他人多。而这种情况，无论是对于在竞争激烈的两家公司而言，还是对处于竞争中的一

国不同地区而言，甚至是相互竞争的国与国之间，情况与上述事例都是相同的。总而言之，只有达到最大的生产效率，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富裕。本文在之后的章节将给出几家公司的实例，这些公司在获得大额利润的同时，给予员工高于其竞争对手的员工30%-100%的工资。这些实例涵盖了多种复杂程度不同的工作。

If the above reasoning is correct, it foll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 of both the workmen and the management should be th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each individual in the establishment, so that he can do (at his fastest pace and with the maximum of efficiency) the highest class of work for which his natural abilities fit him.

如果以上推论正确，那么雇员和管理者最重要的目的，都是企业中每个成员的培训和发展，以便其能够（以其最快的速度和最高的效率）胜任与其天赋相符的最高级的工作。

These principles appear to be so self-evident that many men may think it almost childish to state them. Let us, however, turn to the facts, as they actually exist in this country and in England. 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peoples are the greatest sportsmen in the world. Whenever an American workman plays baseball, or an English workman plays cricket, it is safe to say that he strains every nerve to secure victory for his side. He does his very best to make the largest possible number of runs. The universal sentiment is so strong that any man who fails to give out all there is in him in sport is branded as a “quitter,” and treated with contempt by those who are around him.

许多人或许会认为花时间去阐述这些原理很幼稚，毕竟这些原理人人皆知。然而，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那些在我国和英国都确切存在的实例。英国人和美国人堪称世界上最棒的运动员。每当美国工人打棒球或英国工人打板球时，他们定会拼尽全力为自己的球队取胜，会竭尽所能争取得到最高的分数。只要有人没有尽其最大努力，人们就会十分愤怒：将他冠以“懦夫”之名，抑或对其加以鄙视。

When the same workman returns to work on the following day, instead of using every effort to turn out the largest possible amount of work, in a majority of the cases this man deliberately plans to do as little as he safely can—to turn out far less work than he is well able to do—in many instances to do not more than one-third to one-half of a proper day's work. And in fact if he were to do his best to turn out his largest possible day's work, he would be abused by his fellow-workers for so doing, even more than if he had proved himself a “quitter” in sport. Under working, that is, deliberately working slowly so as to avoid doing a full day's work, “soldiering,” as it is called in this country, “hanging it out,” as it is called in England, “ca canae,” as it is called in Scotland, is almost universal in industrial establishments, and prevails also to a large extent in the building trades; and the writer asserts without fear of contradiction that this constitutes the greatest evil with which the working-people of both England and America are now afflicted.

第二天，这名工人回到工作场所后不会拼命工作，他多半会故意缩减其工作量，但是以他的能力，本可以完成更多。在许多情况下，他完成的工作量甚至不到平日的1/3-1/2。事实上，要是他努力工作，同事就会嘲笑他，这要比称他为球场“懦夫”更令人难受。在工作中，故意放慢速度可以避免劳累一整天，我国将此举称为“磨洋工”，英国称之为“闲逛”，苏格兰则称之为“慢行”，这种举措常见于工业领

域，甚至是建筑行业。笔者可以肯定，这已构成现在影响英国和美国工人的最大恶疾。

It will be shown later in this paper that doing away with slow working and “soldiering” in all its forms and so arrang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employer and employs that each workman will work to his very best advantage and at his best speed, accompanied by the intimate cooperation with the management and the help (which the workman should receive) from the management, would result on the average in nearly doubling the output of each man and each machine. What other reforms, among those which are being discussed by these two nations, could do as much toward promoting prosperity, toward the diminution of poverty, and the alleviation of suffering? America and England have been recently agitated over such subjects as the tariff, the control of the large corporations on the one hand, and of hereditary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and over various more or less socialistic proposals for taxation, etc. On these subjects both peoples have been profoundly stirred, and yet hardly a voice has been raised to call attention to this vastly greater and more important subject of “soldiering,” which directly and powerfully affects the wages, the prosperity, and the life of almost every working-man, and also quite as much the prosperity of every industrial establishment in the nation.

稍后，本书会向读者展示：如何摈弃怠工和各种形式的“磨洋工”；如何合理安排雇主与雇员间的关系——每位雇员应充分发挥所长，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尽可能多的工作量；雇主（管理层）应与雇员密切合作，并向其给予必要的帮助。如此一来，平均每位雇员和每台机器的产量都可以增加一倍。当前，两国人民就促进繁荣、减少贫困和减轻痛苦讨论出的各种改革措施都不及对管理的探讨。美国和英国

最近一直深受诸多问题的困扰，包括关税、管控大企业的同时持有遗产继承权，以及其他带有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税收提案等，这些问题引起了两国人民的热议。然而，虽然我们意识到“磨洋工”问题更加重大，它能够直接而有力地影响到每个国民的工资、财富和生活，甚至一国工业企业的兴衰。

The elimination of “soldiering” and of the several causes of slow working would so lower the cost of production that both our home and foreign markets would be greatly enlarged, and we could compete on more than even terms with our rivals. It would remove one of the fundamental causes for dull times, for lack of employment, and for poverty, and therefore would have a more permanent and far-reaching effect upon these misfortunes than any of the curative remedies that are now being used to soften their consequences. It would insure higher wages and make shorter working hours and better working and home conditions possible.

解决“磨洋工”问题，消除那些导致怠工的因素，不仅能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国内外市场，还能提高我们的竞争力。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解决导致生意惨淡、就业岗位不足以及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从而产生更为深远且持久的影响。这是目前用以缓解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它让我们有望拿到更高的工资、缩短工时，创造更好的工作和家庭条件。

Why is it, then, in the face of the self-evident fact that maximum prosperity can exist only as the result of the determined effort of each workman to turn out each day his largest possible day's work, that the great majority of our men are deliberately doing just the opposite, and that even when the men have the best

of intentions their work is in most cases far from efficient?

那么，面对这一明摆着的事实，即只有当每位雇员每天竭尽所能工作时才能实现财富的最大化，为什么大多数工人却要故意怠工呢？为什么在多数情况下，即使工人们怀有最积极的工作态度，却仍效率低下呢？

There are three causes for this condition, which may be briefly summarized as:

原因有三，笔者简要归纳如下：

First. The fallacy, which has from time immemorial been almost universal among workmen, that a material increase in the output of each man or each machine in the trade would result in the end in throwing a large number of men out of work.

第一，谬误。长时间以来，工人中普遍流传着这样的观念：在企业中，如果必须增加每个人或每台机器的产出量，就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Second. The defective systems of management which are in common use, and which make it necessary for each workman to soldier, or work slowly, in order that he may protect his own best interests.

第二，普遍采用的管理制度存在缺陷。每位雇员为了维护自身的最大利益，不得不采取“磨洋工”或减缓工作速度的做法。

Third. The inefficient rule-of-thumb methods, which are still almost universal in all trades, and in practicing which our workmen waste a large part of their effort.

第三，效率低下的经验原则方法。该方法普遍存在于各行各业，工人使用这种方法会浪费大部分的努力。

This paper will attempt to show the enormous gains which would result from the substitution by our workmen of scientific for rule-of-thumb methods.

本文试图向读者们展示以科学管理方法代替经验原则方法所带来的巨大效益。

To explain a little more fully these three causes:

以下就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作更为细致的说明：

First. The great majority of workmen still believe that if they were to work at their best speed they would be doing a great injustice to the whole trade by throwing a lot of men out of work, and yet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trade shows that

each improvement, whether it be the invention of a new machine or the introduction of a better method, which results in increasing the productive capacity of the men in the trade and cheapening the costs, instead of throwing men out of work make in the end work for more men.

第一，大多数工人仍认为要是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工作会对整个行业不公，因为这会让许多人失业。然而，各个行业的发展史表明，无论是发明了一台新机器，还是引进了一项更优的方案，任何一项进步都可以提高本行业工作人员的生产能力，降低生产成本。这样做不仅不会让许多人失业，还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The cheapening of any article in common use almost immediately results in a largely increased demand for that article. Take the case of shoes, for instance. The introduction of machinery for doing every element of the work which was formerly done by hand has resulted in making shoes at a fraction of their former labor cost, and in selling them so cheap that now almost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in the working-classes buys one or two pairs of shoes per year, and wears shoes all the time, whereas formerly each workman bought perhaps one pair of shoes every five years, and went barefoot most of the time, wearing shoes only as a luxury or as a matter of the sternest necessity. In spite of the enormously increased output of shoes per workman, which has come with shoe machinery, the demand for shoes has so increased that there are relatively more men working in the shoe industry now than ever before.

一旦日用商品价格下降，人们对其需求量也会增加。以鞋子为

例，之前，我们全凭手工制鞋，而引入机器制鞋后，人们付出少量劳动就能做好一双鞋，并以低价出售，所以现在无论男女老少，每年可买一到两双鞋，可以确保时时都有鞋穿。而此前，每个工人每五年或许才能买上一双鞋，大部分时间都要赤脚走路，穿鞋只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或是迫不得已的需要。虽然由于制鞋机器的引进，每位工人得以大大增加鞋子的产量，人们对鞋子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但现在，在鞋厂工作的工人比以前多得多。

The workmen in almost every trade have before them an object lesson of this kind, and yet, because they are ignorant of the history of their own trade even, they still firmly believe, as their fathers did before them, that it is against their best interests for each man to turn out each day as much work as possible.

几乎在所有行业的工人面前都摆着这样一种客观事实。但是，由于忽视了所从事行业的发展史，他们甚至仍与其先辈持有同一种观点：工人每天拼命工作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

Under this fallacious idea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workmen of both countries each day deliberately work slowly so as to curtail the output. Almost every labor union has made, or is contemplating making, rules which have for their object curtailing the output of their members, and those men who have the greatest influence with the working-people, the labor leaders as well as many people with philanthropic feelings who are helping them, are daily spreading this fallacy and at the same time telling them that they are overworked.

这种谬论让我们两国大量的工人每天故意放慢工作速度以减少他们的产量。几乎每个已经或正在考虑制订各种条例的工会都以缩减工人们的工作量为奋斗目标。而每天都在传播这一谬论的人们，即那些深深影响着工人的劳工领袖及帮助工人的仁慈之人告诉工人们说他们已经超负荷工作。

A great deal has been and is being constantly said about “sweat-shop” work and conditions. The writer has great sympathy with those who are overworked, but on the whole a greater sympathy for those who are *under paid* . For every individual, however, who is overworked, there are a hundred who intentionally under work—greatly under work—every day of their lives, and who for this reason deliberately aid in establishing those conditions which in the end inevitably result in low wages. And yet hardly a single voice is being raised in an endeavor to correct this evil.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谈论“血汗工厂”的工作和工作条件。笔者对那些超负荷工作的工人深表同情，但更为同情那些报酬过低的工人。然而，对每个超负荷工作的人而言，每一天，他们的生活中都充斥着一百个有意缩减工作量的人，而且是大大缩减他们的工作量，所以他们工资低在所难免。可是，目前没有人提出纠正这一恶疾的方法。

As engineers and managers, we are more intimately acquainted with these facts than any other class in the community, and are therefore best fitted to lead in a movement to combat this fallacious idea by educating not only the workmen but the whole of the country as to the true facts. And yet we are practically doing nothing in this direction, and are leaving this field entirely in the hands of the labor agitators (many of whom are misinformed and

misguided), and of sentimentalists who are ignorant as to actual working conditions.

作为工程师和管理者，我们比一国之中的其他阶级更熟知这些事实，因此，我们是引导人们纠正这一谬误的最佳人选。我们不仅要教育工人，还要教育全国人民认清事实。然而，我们几乎没有付出任何努力，而是将此任务全部交予那些煽风点火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被误导的）和那些忽视实际工作环境的感情用事者手里。

Second. As to the second cause for soldiering—the relations which exist between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under almost all of the systems of management which are in common use—it is impossible in a few words to make it clear to one not familiar with this problem why it is that the *ignorance of employers* as to the proper time in which work of various kinds should be done makes it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workman to "soldier."

第二，造成"磨洋工"的第二个原因——普遍采用的管理体制下雇主与雇员间的关系。人们无法用三言两语向一个不熟悉此问题的人阐释清楚为什么雇主会忽视这一点，即为不同工作分配适当的时间符合"磨洋工人"的利益。

The writer therefore quotes herewith from a paper read before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in June, 1903, entitled "Shop Management," which it is hoped will explain fully this cause for soldiering:

因此，为了充分解释“磨洋工”的第二个原因，笔者在此引用1903年6月在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上宣读的一篇题为《工厂管理》的部分内容：

“This loafing or soldiering proceeds from two causes. First, from the natural instinct and tendency of men to take it easy, which may be called natural soldiering. Second, from more intricate second thought and reasoning caused by their relations with other men, which may be called systematic soldiering.”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磨洋工’现象：第一，人们天生倾向于轻松的生活，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天生磨洋工’；第二，与他人间的关系会让人们多一些深思熟虑与理性的思考，我们可将其称为‘系统磨洋工’。”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tendency of the average man (in all walks of life) is toward working at a slow, easy gait, and that it is only after a good deal of thought and observation on his part or as a result of example, conscience, or external pressure that he takes a more rapid pace.”

“毫无疑问，慢节奏、轻松的工作是各行各业普通工人的偏好。只有在经过大量观察与思考后，或由于模范、良心或外部压力，他们才会加快工作速度。”

“There are, of course, men of unusual energy, vitality, and ambition who naturally choose the fastest gait, who set up their

own standards, and who work hard, even though it may be against their best interests. But these few uncommon men only serve by forming a contrast to emphasize the tendency of the average.”

“当然，也有一些在精力、活力和志向方面非同寻常的人，他们自然会选择以最快的节奏工作，为自己设定工作的标准并刻苦工作，即便这样可能违背他们的最佳利益。但这些人的态度却反映出了与大多数人的怠惰趋势。”

“This common tendency to 'take it easy' is greatly increased by bringing a number of men together on similar work and at a uniform standard rate of pay by the day.”

“这种通过招收大批从事相似工作的员工并按照统一的标准日结工资的方法急剧加速了‘怠惰’的滋长。”

“Under this plan the better men gradually but surely slow down their gait to that of the poorest and least efficient. When a naturally energetic man works for a few days beside a lazy one, the logic of the situation is unanswerable.” “Why should I work hard when that lazy fellow gets the same pay that I do and does only half as much work?”

“如果采用这种做法，就算是平日里积极工作的工人也一定会逐渐放慢自己的工作速度，降低工作效率。假如一个天生精力充沛的工人与一个生性懒惰的工人共事，不出几天，那位精力充沛的工人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这一想法：既然这个懒惰的工人以我一半的工作量却

拿着和我一样的薪酬，那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工作呢？”

“A careful time study of men working under these conditions will disclose facts which are ludicrous as well as pitiable.”

“如果你肯花些时间，认真研究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的工人，就会发现那些既荒谬又令人同情的事实。”

“To illustrate: The writer has timed a naturally energetic workman who, while going and coming from work, would walk at a speed of from three to four miles per hour, and not infrequently trot home after a day's work. On arriving at his work he would immediately slow down to a speed of about one mile an hour. When, for example, wheeling a loaded wheelbarrow, he would go at a good fast pace even up hill in order to be as short a time as possible under load, and immediately on the return walk slow down to a mile an hour, improving every opportunity for delay short of actually sitting down. In order to be sure not to do more than his lazy neighbor, he would actually tire himself in his effort to go slow.”

“为阐述这一点，笔者为一个天生精力充沛的人计时后发现：他以每小时3-4英里的速度步行上下班，甚至时不时在下班后跑着回家。但每当他开始工作后，就会立即减慢速度至每小时近1英里。以载物的手推车为例，为了尽快减轻负重，即使在上坡时他也会快速前进；沿原路返回时，为了抓住每一个机会延长自己的休息时间，他的速度马上会减慢到每小时1英里。为了保证自己不比懒惰的同事做得多，他甚至会竭力表现出疲劳的情态以放慢自己的工作速度。”

“These men were working under a foreman of good reputation and highly thought of by his employer, who, when his attention was called to this state of things, answered: 'Well, I can keep them from sitting down, but the devil can't make them get a move on while they are at work.'”

“这些人在一位名声好且深受雇主器重的工头手下工作。当工头注意到了这种情况时表示：‘我是可以不让他们坐下休息，但魔鬼才能让他们加快工作速度！’”

“The natural laziness of men is serious, but by far the greatest evil from which both workmen and employers are suffering is the *systematic soldiering* which is almost universal under all of the ordinary schemes of management and which results from a careful study on the part of the workmen of what will promote their best interests.”

“人类的‘惰性’是一大弊病，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对工人还是对雇主来说，最大的恶疾却是‘系统性磨洋工’。在所有常见的管理体制下，这种磨洋工几乎无处不在，他们是工人从保护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衍生出的。”

“The writer was much interested recently in hearing one small but experienced golf caddy boy of twelve explaining to a green caddy, who had shown special energy and interest, the necessity of going slow and lagging behind his man when he came up to the ball, showing him that since they were paid by the hour, the faster

they went the less money they got, and finally telling him that if he went too fast the other boys would give him a licking.”

“最近有一件事笔者很感兴趣。一个年仅十二岁但却经验丰富的球童向一位充满干劲、兴致勃勃的球童新手传授慢慢去捡球的必要性：因为球童们按小时计酬，他们捡球速度越快，得到的报酬反而越少。最后，那位小球童告诉新手：如果你跑得快，其他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This represents a type of *systematic soldiering* which is not, however, very serious, since it is done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employer, who can quite easily break it up if he wishes.”

“这代表了一类‘系统性磨洋工’，他们的惰性并不是很严重。因为雇主很清楚，只要他愿意，他可以轻易地让这些磨洋工改掉惰性。”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ystematic soldiering,* however, is done by the men with the deliberate object of keeping their employers ignorant of how fast work can be done.”

“然而，大多数‘系统性磨洋工’的人刻意隐瞒雇主他们完成工作的速度。”

“So universal is soldiering for this purpose that hardly a competent workman can be found in a large establishment, whether he works by the day or on piece work, contract work, or under any

of the ordinary systems, who does not devote a considerable part of his time to studying just how slow he can work and still convince his employer that he is going at a good pace.”

“因此，抱有这种目的的磨洋工比比皆是，你几乎无法在一个大企业中找到一个有能力的工人，无论他是计时工、计件工、包工，还是置身于任何普通体系下的工人，他们都会花大量时间研究如何能减慢工作速度，却仍试图让雇主相信，他已经干得很快了。”

“The causes for this are, briefly, that practically all employers determine upon a maximum sum which they feel it is right for each of their classes of employees to earn per day, whether their men work by the day or piece.”

“简单来说，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几乎所有的雇主会根据自己的感觉决定适合各类雇员（无论是计时工还是计件工）的最高日薪。”

“Each workman soon finds out about what this figure is for his particular case, and he also realizes that when his employer is convinced that a man is capable of doing more work than he has done, he will find sooner or later some way of compelling him to do it with little or no increase of pay.”

“不久后，每个工人就会发现为什么自己的日薪如此之少，同时，他还会意识到当他的雇主认为有人能比他干得多时，雇主迟早会以某种方式强迫自己也干那么多，而工资涨幅有限，甚至根本不会

涨。”

“Employers derive their knowledge of how much of a given class of work can be done in a day from either their own experience, which has frequently grown hazy with age, from casual and unsystematic observation of their men, or at best from records which are kept, showing the quickest time in which each job has been done. In many cases the employer will feel almost certain that a given job can be done faster than it has been, but he rarely cares to take the drastic measures necessary to force men to do it in the quickest time, unless he has an actual record proving conclusively how fast the work can be done.”

“雇主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虽然随着岁月流逝，人们会淡忘这种经验）或根据自己随意、非系统的观察了解每天各类工作的完成情况。当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查看每项工作最快完成的时间记录。很多情况下，虽然雇主确信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完成某项工作，但几乎没有雇主会采取极端手段，强迫工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除非他有实际记录能证明这项工作的完成速度。”

“It evidently becomes for each man's interest, then, to see that no job is done faster than it has been in the past. The younger and less experienced men are taught this by their elders, and all possible persuasion and social pressure is brought to bear upon the greedy and selfish men to keep them from making new records which result in temporarily increasing their wages, while all those who come after them are made to work harder for the same old pay.”

“显然，每个工人逐渐培养了一种特殊的‘兴趣’——保证自己的干活速度不比以前快。老员工会教导那些年轻和缺少经验的工人；为了防止那些‘贪婪又自私’的新手获得刷新纪录获得暂时加薪，这些老员工会对他们进行一番劝说，甚至还对他们施以社会压力；而对于那些盲目的跟风者，老员工会告诫他们为了得到与之前同样的报酬，必须更加努力工作。”

“Under the best day work of the ordinary type, when accurate records are kept of the amount of work done by each man and of his efficiency, and when each man's wages are raised as he improves, and those who fail to rise to a certain standard are discharged and a fresh supply of carefully selected men are given work in their places, both the natural loafing and systematic soldiering can be largely broken up. This can only be done, however, when the men are thoroughly convinced that there is no intention of establishing piece work even in the remote future, and it is next to impossible to make men believe this when the work is of such a nature that they believe piece work to be practicable. In most cases their fear of making a record which will be used as a basis for piece work will cause them to soldier as much as they dare.”

“通常，在最好的计时工资制下，我们需要准确记录每个人的工作量和工作效率，且如果个人取得工作上的进步，他的工资也会随之增长，而那些不能达到特定标准的人将被解雇，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经过新一轮仔细筛选的员工。然而，只有在工人们十分确信在遥远的未来，计件工作将不复存在的条件下，才能消除大部分本性磨洋工与故意磨洋工。如果工人们认为计件工作本质上仍是可行的，那么我们几乎不可能让他们确信：在未来不会存在计件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们担心用作计件工作根据的记录会导致他们尽可能去偷懒。”

“It is, however, under piece work that the art of systematic soldiering is thoroughly developed; after a workman has had the price per piece of the work he is doing lowered two or three times as a result of his having worked harder and increased his output, he is likely entirely to lose sight of his employer's side of the case and become imbued with a grim determination to have no more cuts if soldiering can prevent it. Unfortunately for the character of the workman, soldiering involves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mislead and deceive his employer, and thus upright and straightforward workmen are compelled to become more or less hypocritical. The employer is soon looked upon as an antagonist, if not an enemy, and the mutual confidence which should exist between a leader and his men, the enthusiasm, the feeling that they are all working for the same end and will share in the results is entirely lacking.

“然而，在计件工作体制下，工人们全面发展了‘系统性磨洋工’技巧；如果某位工人辛勤工作后增加了产量，却发现每件产品得到的薪金减少了2-3倍，而不增加产量就能避免这种情况，那么他会将雇主利益抛在一边，做一位故意磨洋工。遗憾的是，工人的本性会发生变化：磨洋工会故意误导、欺骗雇主，因此就连最正直坦率的工人也或多或少会变得有些虚伪。不久之后，即使雇主雇员不是敌人，雇主在雇员眼中也相当于对手，领导与其员工间的互信，以及他们为了同一目标而奋斗的那种感觉与激情已不复存在。”

“The feeling of antagonism under the ordinary piece-work system becomes in many cases so marked on the part of the men that any proposition made by their employers, however reasonable, is looked upon with suspicion, and soldiering becomes such a fixed habit that men will frequently take pains to restrict the product of

machines which they are running when even a large increase in output would involve no more work on their part.”

“在很多情况下，置身于普通计件工作体制下的工人身上会体现出这种相互对立感：其雇主的任何观点，无论是否合理，都会受到工人们的怀疑。因此，磨洋工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习惯，即工人们会竭尽全力限制他们所操作的机器的产量，即便增加产量可以减少他们的工作量。”

Third. As to the third cause for slow work, considerable space will later in this paper be devoted to illustrating the great gain, both to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which results from the substitution of scientific for rule-of-thumb methods in even the smallest details of the work of every trade. The enormous saving of time and therefore increase in the output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effect through eliminating unnecessary motions and substituting fast for slow and inefficient motions for the men working in any of our trades can be fully realized only after one has personally seen the improvement which results from a thorough motion and time study, made by a competent man.

第三。至于说磨洋工的第三个成因，笔者将在后面花大篇幅尽全力阐述：在任何行业，即使是在工作的细微之处，利用科学方法代替经验法则，都能使雇主和雇员双方获得巨大利益。各行各业，去除不必要的动作，以快动作代替缓慢、低效的动作可以节约大量时间，进而提高产量。而一个能干的人只有通过掌握全面的动作和时间研究，见证自己的进步后才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To explain briefly: ow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workmen in all of our trades have been taught the details of their work by observation of those immediately around them,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in common use for doing the same thing, perhaps forty, fifty, or a hundred ways of doing each act in each trade,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there is a great variety in the implements used for each class of work. Now, among the various methods and implements used in each element of each trade there is always one method and one implement which is quicker and better than any of the rest. And this one best method and best implement can only be discovered or developed through a scientific study and analysis of all of the methods and implements in use, together with accurate, minute, motion and time study. This involves the gradual substitution of science for rule of thumb throughout the mechanic arts.

简要解释如下：事实上，为了了解各行各业中的工作细节，工人会观察身边的人，做同一件事的方法多种多样——各行各业的每项工作或许有四十、五十或上百种方法。同理，完成每项工作的工具也是多种多样。现在，谈到各行各业中每项工作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总能找到一种最快最佳的方法和工具。只有进行科学研究、分析所有使用的方法和工具，并辅以精确、细致入微的动作与时间研究，才能发现这种方法和工具。在整个机械工艺中，我们要逐渐以科学替代经验原则。

This paper will show that the underlying philosophy of all of the old systems of management in common use makes it imperative that each workman shall be left with the final responsibility for doing his job practically as he thinks best, with comparatively little help and advice from the management. And it will also show that because of this isolation of workmen, it is in most cases impossible

for the men working under these systems to do their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and laws of a science or art, even where one exists.

本文将指出，所有常用的旧有管理体制下隐含的原理，必然会让每位工人在管理层给予其相对较少的帮助与建议的情况下，负责任地完成自己所认为的最佳的工作。此外，本文还将指出，由于工人们孤军奋战，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让置身于这些体系下的工人依照某门科学或工艺的规则和法律（如果存在的话）做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The writer asserts as a general principle (and he proposes to give illustrations tending to prove the fact later in this paper) that in almost all of the mechanic arts the science which underlies each act of each workman is so great and amounts to so much that the workman who is best suited to actually doing the work is incapable of fully understanding this science, without the guidance and help of those who are working with him or over him, either through lack of education or through insufficient mental capacity. In order that the work may b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scientific laws,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re shall be a far more equal divis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between the management and the workmen than exists under any of the ordinary types of management. Those in the management whose duty it is to develop this science should also guide and help the workman in working under it, and should assume a much larger share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results than under usual conditions is assumed by the management.

笔者断言，作为一个普遍原理（后文将给出实例阐述这一事实），几乎在所有的机械工艺中，每位工人完成每项工作依据的科学

是伟大的，且意义重大：即使对最适合做某项工作的工人而言，如果他缺少与其共事的工人或其雇主的指导和帮助，抑或自己缺乏教育或智力低下，也不能充分理解这门科学。为了依照科学规律完成工作，管理层与工人间责任的分配要比现有普遍管理体制下所进行的分配更加平等，这一点至关重要。管理层人员的责任在于发展这门科学，他们还应该指导、帮助手下的员工，同时应该承担起比以前管理层在通常情况下要承担的更多的责任。

The body of this paper will make it clear that, to work according to scientific laws, the management must take over and perform much of the work which is now left to the men; almost every act of the workman should be preceded by one or more preparatory acts of the management which enable him to do his work better and quicker than he otherwise could. And each man should daily be taught by and receive the most friendly help from those who are over him, instead of being, at the one extreme, driven or coerced by his bosses, and at the other left to his own unaided devices.

本文主体部分将向读者明确阐述：要按照科学规律工作，管理层必须接管、从事大量目前留给工人的工作；几乎工人的每项工作，都应以管理层准备的一项甚至多项工作为向导，从而提高他的工作质量与速度。每天，雇主都会给予每个工人指导和友善的帮助，而不是驱使或胁迫他们，也不是只留给他们一些设备，不给予他们任何指导与帮助。

This close, intimate, pers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anagement and the men is of the essence of modern scientific or task management.

这种管理层和工人之间亲近、密切、个人的合作，是现代科学或任务管理的本质所在。

It will be shown by a series of practical illustrations that, through this friendly cooperation, namely, through sharing equally in every day's burden, all of the great obstacles (above described) to obtaining the maximum output for each man and each machine in the establishment are swept away. The 30 per cent to 100 per cent increase in wages which the workmen are able to earn beyond what they receive under the old type of management, coupled with the daily intimate shoulder to shoulder contact with the management, entirely removes all cause for soldiering. And in a few years, under this system, the workmen have before them the object lesson of seeing that a great increase in the output per man results in giving employment to more men, instead of throwing men out of work, thus completely eradicating the fallacy that a larger output for each man will throw other men out of work.

笔者将通过一系列的实例阐述：这种友好合作，即平等分担每天的任务，可以清除所有（如前所述）阻碍企业每位工人和每台机器最大产量的因素。工人们的工资比旧有管理模式下上涨30%-100%，加上每天与管理层的亲密接触，可以完全消除“磨洋工”。几年后，在这种制度下工作的工人会意识到，每位工人产量的增加能为更多的人带来工作岗位，而不是让更多的人失业，从而彻底推翻了原来的谬论：随着每位工人产量的增加，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失业。

It is the writer's judgment, then, that while much can be done and should be done by writing and talking toward educating not

only workmen, but all classes in the community, as to the importance of obtaining the maximum output of each man and each machine, it is only through the adoption of modern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at this great problem can be finally solved. Probably most of the readers of this paper will say that all of this is mere theory. On the contrary, the theory, or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is just beginning to be understood, whereas the management itself has been a gradual evolution, extending over a period of nearly thirty years. And during this time the employees of one company after another, including a large range and diversity of industries, have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 ordinary to the scientific type of management. At least 50,000 work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w employed under this system; and they are receiving from 30 per cent to 100 per cent higher wages daily than are paid to men of similar caliber with whom they are surrounded, while the companies employing them are more prosperous than ever before. In these companies the output, per man and per machine, has on an average been doubled. During all these years there has never been a single strike among the men working under this system. In place of the suspicious watchfulness and the more or less open warfare which characterizes the ordinary types of management, there is universally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anagement and the men.

据笔者推断，虽然我们能够且应该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教育工人和社会各阶层的人，让他们意识到每位工人和每台机器获得最大产量的重要性，但磨洋工这个重大问题只能够通过采用现代科学管理办法才能得到最终解决。或许本文大多数读者会说，所有这一切仅是理论而已。相反，人们才刚开始了解科学管理的理论或原理，而管理本身已逐渐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在这一期间，一个接一个的公司，包括涉猎范围广且富有多样性的企业，已逐渐由普通管理模式转变为科学

管理模式。现在，在这种制度下工作的美国工人至少有50000名，他们每天的薪水比周围同等能力水平的工人要高30%-100%，而且雇佣他们的公司生意也比以前更兴隆。在这些公司里，每位工人和每台机器的平均产量均翻了一倍。在这些年里，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工作的工人从没有举行过罢工。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普通管理模式下怀疑、提防及或多或少公开的冲突了，而是愈加普遍的友好合作。

Several papers have been written, describing the expedients which have been adopted and the details which have been developed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the steps to be taken in changing from the ordinary to the scientific type. But unfortunately most of the readers of these papers have mistaken the mechanism for the true essence. Scientific management fundamentally consists of certain broad general principles, a certain philosophy, which can be applied in many ways, and a description of what any one man or men may believe to be the best mechanism for applying these general principles should in no way be confused with the principles themselves.

有人发表了有一些关于科学管理制度下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及运作细节的论文。此外，这些论文还叙述了从普通管理模式向科学管理模式转变的步骤。但遗憾的是，这些论文的大多数读者误解了这一机制的真正内涵。从根本上说，科学管理既包括特定、广泛且通用的原则，即可用于多方面的特定原理，也包括描述任何人应用这些普遍原则时的最佳机制。但这些原则决不能与原则本身混为一谈。

It is not here claimed that any single panacea exists for all of the troubles of the working-people or of employers. As long as some

people are born lazy or inefficient, and others are born greedy and brutal, as long as vice and crime are with us, just so long will a certain amount of poverty, misery, and unhappiness be with us also. No system of management, no single expedient—within the control of any man or any set of men can insure continuous prosperity to either workmen or employers. Prosperity depends upon so many factors entirely beyond the control of any one set of men, any state, or even any one country, that certain periods will inevitably come when both sides must suffer, more or less. It is claimed, however, that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 intermediate periods will be far more prosperous, far happier, and freer from discord and dissension. And also, that the periods will be fewer, shorter and the suffering less. And this will be particularly true in any one town, any one section of the country, or any one state which first substitutes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for the rule of thumb.

这里并不是说，有一种灵丹妙药能解决工人和其雇主所有的问题。只要一些人天性懒惰、低效，其他人则天性贪婪、冷酷，只要邪恶与犯罪仍然伴我们左右，就意味着我们也会面对贫穷、不幸和苦恼。在人的控制下，无论何种管理体系或应急措施，都能保证工人或雇主的持续富裕。富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它超越了任何人、任何州，甚至是任何国家的控制。在特定时期内，无论是雇主还是工人，都会或多或少遭受痛苦。然而，我们坚信：在科学管理下，中间期会更繁荣、更快乐，社会中不和谐之音会更少。此外，这种时期会更少更短，人们遭受的痛苦也会更少。在最先以科学管理原则取代经验原则的城镇、一国的某一区域或一个州，这一点会显得尤为突出。

That these principles are certain to come into general use practically throughout the civilized world, sooner or later, the

writer is profoundly convinced, and the sooner they come the better for all the people.

笔者深信，这些原则必将遍及整个文明世界，且人们越早应用这些原则，从中得到的好处就越多。

CHAPTER II.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第二章　科学管理原理

The writer has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questions uppermost in the minds of men when they become interested in scientific management.

笔者发现，对于科学管理感兴趣的人最关心三个问题。

First. Wherein do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differ essentially from those of ordinary management?

第一，科学管理原理与普通管理原理之间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Second. Why are better results attained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an under the other types?

第二，为什么科学管理所产生的结果优于其他的管理模式？

Third.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that of getting the right man at the head of the company? And if you have the right man cannot the choice of the type of management be safely left to him?

第三，公司难道不应优先选派合适的人做领导吗？如果选对了人，公司是否就可以将管理模式的选择权放心地交给他呢？

One of the principal objects of the following pages will be to give a satisfactory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下面的内容将对这三个问题给出满意的回答。

THE FINEST TYPE OF ORDINARY MANAGEMENT

最佳普通管理模式

Before starting to illustrate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or “task management” as it is briefly called, it seems desirable to outline what the writer believes will be recognized as the best type of management which is in common use. This is done so that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est of the ordinary management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may be fully appreciated.

在对科学管理或简称为“任务管理”的原理进行阐述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概括一下当今使用最普遍的、得到公认的最佳管理模式，以充分彰显最佳的普通管理模式和科学管理模式之间的巨大差异。

In an industrial establishment which employs say from 500 to

1000 workmen, there will be found in many cases at least twenty to thirty different trades. The workmen in each of these trades have had their knowledge handed down to them by word of mouth, through the many years in which their trade has been developed from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in which our far-distant ancestors each one practiced the rudiments of many different trades, to the present state of great and growing subdivision of labor, in which each man specializes upon some comparatively small class of work.

在一家拥有500至1000名工人的工业企业里，一般至少有20至30个工种。每个工种的工人所具备的知识都是由其前辈口头传授的。在工种发展的初始阶段，我们的远祖们常常对不同工种的基本原理进行推敲，此后这些工种经过多年的发展，最终实现了劳动分工，而且分得很细。不仅如此，这个分工还将不断地发展下去。劳动的细分表明，每个人只专长于某项工作中某个较小的环节。

The ingenuity of each generation has developed quicker and better methods for doing every element of the work in every trade. Thus the methods which are now in use may in a broad sense be said to be an evolution representing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d best of the ideas which have been developed since the starting of each trade. However, while this is true in a broad sense, only those who are intimately acquainted with each of these trades are fully aware of the fact that in hardly any element of any trade is there uniformity in the methods which are used. Instead of having only one way which is generally accepted as a standard, there are in daily use, say, fifty or a hundred different ways of doing each element of the work. And a little thought will make it clear that this must inevitably be the case, since our methods have been handed down from man to man by word of mouth, or have, in most cases,

been almost unconsciously learned through personal observation. Practically in no instances have they been codified or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or described. The ingenuity and experience of each generation—of each decade, even, have without doubt handed over better methods to the next. This mass of rule-of-thumb or traditional knowledge may be said to be the principal asset or possession of every tradesman. Now, in the best of the ordinary types of management, the managers recognize frankly the fact that the 500 or 1000 workmen, included in the twenty to thirty trades, who are under them, possess this mass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a large part of which is not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management. The management, of course, includes foremen and superintendents, who themselves have been in most cases first-class workers at their trades. And yet these foremen and superintendents know, better than any one else, that their own knowledge and personal skill falls far short of the combined knowledge and dexterity of all the workmen under them. The most experienced managers therefore frankly place before their workmen the problem of doing the work in the best and most economical way. They recognize the task before them as that of inducing each workman to use his best endeavors, his hardest work, all his traditional knowledge, his skill, his ingenuity, and his good-will in a word, his “initiative,” so as to yield the largest possible return to his employer. The problem before the management, then, may be briefly said to be that of obtaining the best *initiative* of every workman. And the writer uses the word “initiative” in its broadest sense, to cover all of the good qualities sought for from the men.

每一代都有能工巧匠，他们利用自己的智慧为生产的每个环节提出了又快又好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说，现在企业里所使用的方法，从广义来说，并非从一开始到后来一直是最合适的、最好的方法，而

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同其他方法对比后最终胜出的。问题是，尽管现在所使用的方法从广义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只有熟谙相关工种技能的人才深知，这些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任何一件事情，在日常生活中都存在着50到100种的做法，而不是只有一种所谓的标准做法。愿意动脑思考的人都可以明白这一点，这是因为方法是人口口相传的。不仅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方法是人通过自身的观察下意识地获取的。实际上，这些方法从未经过整理、系统地分析或描述。每一代人，甚至相隔十年的人，都在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经验给后人提供更加优化的方式方法。大量的经验法则或传统知识都是每位工匠的资产和财产。坦率地说，在当今最佳的普通管理模式当中，管理者们能够意识到他们手下的500至1000位工人拥有涉及20至30个工种的传统知识，但是这些传统知识中的大部分却不属于管理领域。管理领域包括的是工头和主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原本就是某行一流的工人。然而这些工头和主管比谁都明白，他们自身的知识和个人的技术不敌手下所有人的知识和动手能力的总和。因此，最有经验的管理者就会让工人们思考，怎样才是最好、最经济的工作方法。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引导工人竭尽全力工作，掌握传统知识和技能，发挥创造性，表现善意——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以最大的产量回报企业。所以对于管理层面来说，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用一句简单的话语来描述就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位工人的“积极性”。笔者在这里所采用的“积极性”是广义的，它涵盖希望能从工人们身上看到所有的优良品质。

On the other hand, no intelligent manager would hope to obtain in any full measure the initiative of his workmen unless he felt that he was giving them something more than they usually receive from their employers. Only those among the readers of this paper who have been managers or who have worked themselves at a trade realize how far the average workman falls short of giving his employer his full initiative. It is well within the mark to state that in nineteen out of twenty industrial establishments the

workmen believe it to be directly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to give their employers their best initiative, and that instead of working hard to do the largest possible amount of work and the best quality of work for their employers, they deliberately work as slowly as they dare while they at the same time try to make those over them believe that they are working fast. [3_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没有一个明智的管理者真的希望能够得到工人们百分之百的积极性，除非他承诺给这些工人得到比他们平时得到的更多的好处。此刻的读者，如果你们当中有谁曾经当任过管理者或在某行当过工人的话，便可知道没有哪位工人愿意发挥出百分之百的积极性。我们可以这样说，在20家工业企业里就有19家企业的工人都认为，为企业积极主动地奋斗是直接违背自己的利益的，所以他们并不会竭力为企业完成量大质优的工作，而是尽可能放慢工作的速度，但表面上使领导相信自己在快速地工作。 [4_1]

The writer repeats, therefore, that in order to have any hope of obtaining the initiative of his workmen the manager must give some *special incentive* to his men beyond that which is given to the average of the trade. This incentive can be given in several different ways, as, for example, the hope of rapid promotion or advancement; higher wages, either in the form of generous piecework prices or of a premium or bonus of some kind for good and rapid work; shorter hours of labor; better surrounding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than are ordinarily given, etc., and, above all, this special incentive should be accompanied by that personal consideration for, and friendly contact with, his workmen which comes only from a genuine and kindly interest in the welfare of those under him. It is only by giving a special inducement or “incentive” of this kind that the employer can hope even

approximately to get the “initiative” of his workmen. Under the ordinary type of management the necessity for offering the workman a special inducement has come to be so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ose most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look upon the adoption of some one of the modern schemes for paying men (such as piece work, the premium plan, or the bonus plan, for instance) as practically the whole system of management.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however, the particular pay system which is adopted is merely one of the subordinate elements.

因此，笔者在此重申，为了能让工人们主动积极地工作，管理者给工人除了正常的福利外，还得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激励”。激励措施可以有如下几种方式，例如给他们快速晋升和提升的希望；给他们涨薪，形式可以是丰厚的计件报酬，也可以是因奖励工作又快又好而发的津贴或奖金；减少工作时间；提供高于正常水准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等等。总之，这种特别的激励方式还应让工人们体会到是领导对自己的关照和友好，是领导真正关心下属的福利。只有为工人提供这样的刺激或“激励”，才有可能让工人们“积极主动地”工作。由于在普通的管理模式下，向工人提供某些特殊的激励这一做法已经达成共识，所以很多人就把当下向工人付报酬（例如计件工作、津贴计划或奖金制度）的做法视为管理制度的全部鼓励。然而，在科学管理模式中，这种特别的薪酬制度只是管理制度的从属部分。

Broadly speaking, then, the best type of management in ordinary use may be defined as management in which the workmen give their best *initiative* and in return receive some *special incentive* from their employers. This type of management will be referred to as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 in contradistinction to scientific management, or task management, with which it is to

be compared.

那么，从广义上来讲，我们可以将普通管理中的最佳管理模式定义为：在该管理制度中，工人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积极主动性，并能从企业里得到某项“特别的激励”作为回报。这种类型的管理将被称为“积极性加激励”管理模式，以此对比即将讨论的科学管理（或称为任务管理模式）的差异。

The writer hopes that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will be recognized as representing the best type in ordinary use, and in fact he believes that it will be hard to persuade the average manager that anything better exists in the whole field than this type. The task which the writer has before him, then, is the difficult one of trying to prove in a thoroughly convincing way that there is another type of management which is not only better but overwhelmingly better than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笔者希望“积极性加激励”的管理模式能被视为普通管理中最好的一种管理模式，但是笔者知道，要想说服普通管理者相信在这个领域里还有比这种管理更好的模式是很困难的。困难在于，如何能采用一种彻底令人信服的方式来证明还有一种更好的管理模式存在。该管理模式不仅要比“积极性加激励”好，而且还要好很多。

The universal prejudice in favor of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is so strong that no mere theoretical advantages which can be pointed out will be likely to convince the average manager that any other system is better. It will be upon a

series of practical illustrations of the actual working of the two systems that the writer will depend in his efforts to prove that scientific management is so greatly superior to other types. Certain elementary principles, a certain philosophy, will however be recognized as the essence of that which is being illustrated in all of the practical examples which will be given. And the broad principles in which the scientific system differs from the ordinary or "rule-of-thumb" system are so simple in their nature that it seems desirable to describe them before starting with the illustrations.

一般管理者对"积极性加激励"的管理模式的偏见根深蒂固，所以如果笔者仅仅摆出理论上的优势，是不太可能说服他们的。所以，笔者将从两个体系入手，列举实际操作中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案例来证明科学管理模式大大地优越于其他管理模式。需要大家做到的是，从下面所要列举的例子中能够看出某些基本原理或某个理念就是科学管理模式的基本原理和概念。由于科学管理制度与普通管理模式或"经验法则"之间的差异从本质上来讲不复杂，所以下面的论述将采用先描述后举例的方法。

Under the old type of management success depends almost entirely upon getting the "initiative" of the workmen, and it is indeed a rare case in which this initiative is really attained.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 "initiative" of the workmen (that is, their hard work, their good-will, and their ingenuity) is obtained with absolute uniformity and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is possible under the old system; and in addition to this improvement on the part of the men, the managers assume new burdens, new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never dreamed of in the past. The managers assume, for instance, the burden of gathering together all of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which in the past has been possessed by the workmen

and then of classifying, tabulating, and reducing this knowledge to rules, laws, and formulae which are immensely helpful to the workmen in doing their daily work. In addition to developing a *science* in this way, the managers take on three other types of duties which involve new and heavy burdens for themselves.

在旧的管理模式下，成功几乎完全依赖于工人的“积极性”，而那种模式下没有真正获得工人的积极性。但是，在科学管理模式下，工人发挥的“积极性”（努力地工作，积极地配合，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等）是有绝对的统一标准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比旧的管理模式更容易达到。除了工人这方面有所改进外，管理者这边也会产生新的负担、新的任务和新的责任，而这一切的负担、任务和责任在过去是不敢企及的。比如说，管理者要负责把过去只有工人才拥有的传统知识收集起来，然后分类、制作出表格，再把这些知识变成规章制度、条例和公式。这样做，将大大利于工人开展日常工作。除了以这种方式将管理当成一门科学来开发之外，管理者还承担其他三项职责，这些都将成为他们全新而繁重的任务。

These new duties are grouped under four heads:

总的来说，管理者要承担以下四项新任务：

First. They develop a science for each element of a man's work, which replaces the old rule-of-thumb method.

第一，为每位工人的每一项工作研发出一套科学方法，以替代旧有的经验原则法。

Second. They scientifically select and then train, teach, and develop the workman, whereas in the past he chose his own work and trained himself as best he could.

第二，科学筛选工人，然后进行训练、教育，促进其发展，而在过去，工人自己任意挑选工作、尽其所能展开自我培训。

Third. They heartily cooperate with the men so as to insure all of the work being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science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第三，与工人们真诚合作，以确保所有工作都按照已发展起来的科学原则进行。

Fourth. There is an almost equal division of the work and the responsibility between the management and the workmen. The management take over all work for which they are better fitted than the workmen, while in the past almost all of the work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were thrown upon the men.

第四，在管理和工人之间，工作的分配和责任的分担几乎是均等的，管理者当局把自己比工人更胜任的各种工作都承揽下来，而在过去，他们几乎把全部工作和大部分责任都推给工人。

It is this combination of the initiative of the workmen, coupled

with the new types of work done by the management, that makes scientific management so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old plan.

由于工人们结合了自己的积极性，加上管理层承揽的新工作，才使得科学管理比原有管理模式更高效。

Three of these elements exist in many cases,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in a small and rudimentary way, but they are, under this management, of minor importance, whereas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y form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whole system.

在很多情况下，以上所列的前三个方面，在“积极性加激励”管理下仅经历了小规模的初步探索，但它们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大；而在科学管理下，它们却构成了整个管理体系的核心。

The fourth of these elements, “an almost equal divis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between the management and the workmen,” requires further explanati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makes it necessary for each workman to bear almost the entir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general plan as well as for each detail of his work, and in many cases for his implements as well. In addition to this he must do all of the actual physical labor. The development of a science, on the other hand, involves the establishment of many rules, laws, and formulae which replace the judgment of the individual workman and which can be effectively used only after having been systematically recorded, indexed, etc. The practical use of scientific data also calls for a room in which to

keep the books, records [3_2] , etc., and a desk for the planner to work at. Thus all of the planning which under the old system was done by the workman, as a result of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must of necessity under the new system be done by the manag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science; because even if the workman was well sui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scientific data, it would be physically impossible for him to work at his machine and at a desk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clear that in most cases one type of man is needed to plan ahead and an entirely different type to execute the work.

第四个方面，即“管理者和工人平均分配工作和职责”需进一步阐述。在“积极性加激励”管理模式下，每位工人几乎承担包括总体规划、工作细节及多数情况下的工作工具在内的所有责任。此外，他必须依靠实际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一门科学的研发，包括制定许多规则、法律和方案以取代个体工人的判断，而这只有经过系统记录、索引后方能得到有效运用。实际使用科学数据的过程中，还需要一间保存档案 [4_2] 的房间，并为规划者工作准备一张办公桌。因此，在旧有体系下所有的规划工作全部由工人依据自己的经验完成。而在新的体系下，这一切全部由管理者遵照科学原理完成。因为即使工人十分适应整理、使用科学数据，他也不可能在亲自操作机器的同时，还在办公桌上办公。显然，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需要让部分工人事先做好规划，再让另一部分工人执行任务。

The man in the planning room, whose specialty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is planning ahead, invariably finds that the work can be done better and more economically by a subdivision of the labor; each act of each mechanic, for example, should be preceded by various preparatory acts done by other men. And all of this involves, as we have said, “an almost equal divis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work between the management and the workman.”

在科学管理体制下，专门从事规划的工人必然会发现工作细分可以更好、更经济地完成工作。例如，每位技工应该在其他工人做好准备工作后再开工。正如我们曾说过的，这一切都涉及“管理层与工人间近乎平等地分摊职责与工作。”

To summarize: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practically the whole problem is “up to the workman,” while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fully one-half of the problem is “up to the management.”

总的来说，在“积极性加激励”的管理下，所有的问题实际上都“取决于工人”，而在科学管理下，一半的问题“由管理层定夺”。

Perhaps the most prominent single element in modern scientific management is the task idea. The work of every workman is fully planned out by the management at least one day in advance, and each man receives in most cases complete written instructions, describing in detail the task which he is to accomplish, as well as the means to be used in doing the work. And the work planned in advance in this way constitutes a task which is to be solved, as explained above, not by the workman alone, but in almost all cases by the joint effort of the workman and the management. This task specifies not only what is to be done but how it is to be done and the exact time allowed for doing it. And whenever the workman succeeds in doing his task right, and within the time limit specified,

he receives an addition of from 30 per cent to 100 per cent to his ordinary wages. These tasks are carefully planned, so that both good and careful work are called for in their performance, but it should be distinctly understood that in no case is the workman called upon to work at a pace which would be injurious to his health. The task is always so regulated that the man who is well suited to his job will thrive while working at this rate during a long term of years and grow happier and more prosperous, instead of being overworked. Scientific management consists very largely in preparing for and carrying out these tasks.

或许，任务观念才是现代科学管理中最显著的要素。管理层至少要提前一天规划好每个工人的工作。而在多数情况下，每个工人都会收到一份描述其具体工作内容及工作方法的书面指南。由此一来，提前制定的计划就构成了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如上所述，这项任务不是由工人单独完成，而是大多由工人和管理层合作完成的。这项任务不仅描述了需要完成的任务，还说明了如何完成这项任务以及完成时限。只要工人能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完成任务，他就可以获得额外30%-70%的加薪。这些任务应经过精心规划，可以让工人们又好又细心地完成工作。但我们必须要明白，无论何时，都决不能要求工人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加速完成工作。每位工人应定期从事某项最适合他的任务，常年以一定的速度完成某项任务，让自己快乐成长，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而非超负荷工作。科学管理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制定并实施工作计划。

The writer is fully aware that to perhaps most of the readers of this paper the four elements which differentiate the new management from the old will at first appear to be merely high-sounding phrases; and he would again repeat that he has no idea of convincing the reader of their value merely through announcing

their existence. His hope of carrying conviction rests upon demonstrating the tremendous force and effect of these four elements through a series of practical illustrations. It will be shown, first, that they can be applied absolutely to all classes of work, from the most elementary to the most intricate; and second, that when they are applied, the results must of necessity be overwhelmingly greater than those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attain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笔者强烈意识到，或许就本文的多数读者而言，新旧管理模式这四方面的差异起初看起来仅仅是在唱高调。笔者特此重申，笔者并非仅仅通过宣称存在新的管理模式来说服读者相信它们的价值。笔者希望列举诸多实例证明这四方面展现的巨大力量和效果，以此服众。首先，笔者要表明：这四方面绝对可以应用于各种工作，无论是最基本的还是最复杂的工作。其次，当我们应用新型管理模式时，必然会取得比“积极性加激励”的管理模式更丰硕的成果。

The first illustration is that of handling pig iron, and this work is chosen because it is typical of perhaps the crudest and most elementary form of labor which is performed by man. This work is done by men with no other implements than their hands. The pig-iron handler stoops down, picks up a pig weighing about 92 pounds, walks for a few feet or yards and then drops it on to the ground or upon a pile. This work is so crude and elementary in its nature that the writer firmly believes that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train an intelligent gorilla so as to become a more efficient pig-iron handler than any man can be. Yet it will be shown that the science of handling pig iron is so great and amounts to so much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man who is best suited to this type of work to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s of this science, or even to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principles without the aid of a man better educated than he is. And the further illustrations to be given will make it clear that in almost all of the mechanic arts the science which underlies each workman's act is so great and amounts to so much that the workman who is best suited actually to do the work is incapable (either through lack of education or through insufficient mental capacity) of understanding this science. This is announced as a general principle, the truth of which will become apparent as one illustration after another is given. After showing these four elements in the handling of pig iron, several illustrations will be given of their application to different kinds of work in the field of the mechanic arts, at intervals in a rising scale, beginning with the simplest and ending with the more intricate forms of labor.

第一个实例是搬运生铁。工人们选择这项工作是因为它或许是最原始、最基本的劳动形式。工人们用双手，而非工具来完成这种工作。搬生铁的工人弯下腰，捡起一块重约92磅的生铁，走几米或十几米远，然后将生铁扔在地上或一堆生铁上。这种工作本上是原始和基本的，笔者坚信我们有可能训练一只机灵的大猩猩，让它成为比工人更有效率的“生铁搬运工”。然而，搬运生铁的科学如此深奥，即使是最适合做这项工作的工人也不可能理解这一科学的原理，甚至如果没有得到某个比他接受过更好培训的人帮助他，他就无法依据这些原理完成工作。接下来，笔者要进一步举例阐述：在几乎所有的机械工艺中，工人每项行动背后隐含的科学是如此深奥，即使是最适合做这项工作的工人（由于缺乏教育或缺乏心智），也不可能理解这门科学。我们将此宣称为一项普遍原则，看过下面列举的一个个实例，其道理会显而易见。笔者已向读者们阐述了这四个方面在搬运生铁中的应用，接下来，笔者将列举几例阐述这四方面在机械工艺领域中应用于不同工种的情况，从最简单的劳动形式向更复杂的劳动形式过度。

One of the first pieces of work undertaken by us, when the writer started to introduce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to the Bethlehem Steel Company, was to handle pig iron on task work. The opening of the Spanish War found some 80,000 tons of pig iron placed in small piles in an open field adjoining the works. Prices for pig iron had been so low that it could not be sold at a profit, and it therefore had been stored.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Spanish War the price of pig iron rose, and this large accumulation of iron was sold. This gave us a good opportunity to show the workmen, as well as the owners and managers of the works, on a fairly large scale the advantages of task work over the old-fashioned day work and piece work, in doing a very elementary class of work.

当笔者开始为伯利恒钢铁公司介绍科学管理时，我们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以计件工取代生铁搬运工。西班牙战争拉开序幕时，人们在厂房附近空旷的田野上发现了8万多吨堆成一小堆一小堆的生铁。那时，生铁价格很低，即使卖掉也赚不了多少钱，所以就一直堆放在那里。西班牙战争爆发后，生铁价格上涨，大量堆积的生铁终于得以卖出。这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机遇：向工人们，厂房所有者及经理们证明——在完成非常基本的工作时，计件工作要比老式的计日工作和计件工作更有优势。

The Bethlehem Steel Company had five blast furnaces, the product of which had been handled by a pig-iron gang for many years. This gang, at this time, consisted of about 75 men. They were good, average pig-iron handlers, were under an excellent foreman who himself had been a pig-iron handler, and the work was done, on the whole, about as fast and as cheaply as it was anywhere else at that time.

伯利恒钢铁公司有5座高炉，多年来，该公司一直指定某个生铁搬运小组搬运其生产的产品。那时，由约75人组成的该搬运小组有一批技能娴熟、水平中等的生铁搬运工，他们由一位杰出的工头领导，而工头本身也曾是一名生铁搬运工。总的来说，当时，该小组完成这项工作与其他地方一样快、成本一样低廉。

A railroad switch was run out into the field, right along the edge of the piles of pig iron. An inclined plank was placed against the side of a car, and each man picked up from his pile a pig of iron weighing about 92 pounds, walked up the inclined plank and dropped it on the end of the car.

有条铁路转轨到工厂领域，正好沿着生铁堆的边沿。一块斜跳板靠在一节车厢边上，每位工人从自己的生铁堆搬起一块重约92磅的生铁，然后走上斜跳板，把它扔在车厢里。

We found that this gang were loading on the average about 12 1/2 long tons per man per day. We were surprised to find, after studying the matter, that a first-class pig-iron handler ought to handle between 47 [3_3] and 48 long tons per day, instead of 12 1/2 tons. This task seemed to us so very large that we were obliged to go over our work several times before we were absolutely sure that we were right. Once we were sure, however, that 47 tons was a proper day's work for a first-class pig-iron handler, the task which faced us as managers under the modern scientific plan was clearly before us. It was our duty to see that the 80,000 tons of pig iron was loaded on to the cars at the rate of 47 tons per man per day, in place of 12 1/2 tons, at which rate the work was then being done. And it was further our duty to see that this work was done without

bringing on a strike among the men, without any quarrel with the men, and to see that the men were happier and better contented when loading at the new rate of 47 tons than they were when loading at the old rate of 12 1/2 tons.

我们发现，平均下来，这个小组每人每天装生铁约12.5吨。经研究，我们惊奇地发现，一位一流的生铁搬运工每天本应搬运47 [4_3] ~48吨生铁，而不是12.5吨。这件事看起来对我们意义重大，所以在确定我们得出正确结论前必须要多次验证我们的研究成果。然而，当我们证实得出的是正确的结论后，即一个一流的生铁搬运工每天可搬运47吨生铁，在现代科学规划下，摆在我们经理们面前的任务已非常明确。我们的职责是监督工人们将八万吨生铁以每人每天47吨，而不是当时的12.5吨的速度装入车厢。我们更进一步的职责在于监管工人们在不发起罢工运动、且相互间不发生任何争吵的条件下完成这项工作；看一看在以每人每天47吨装车速度工作时，工人们是否比之前以每人每天12.5吨装车速度工作时更快乐、更满意。

Our first step was the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the workman. In dealing with workmen under this type of management, it is an inflexible rule to talk to and deal with only one man at a time, since each workman has his own special a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and since we are not dealing with men in masses, but are trying to develop each individual man to his highest state of efficiency and prosperity. Our first step was to find the proper workman to begin with. We therefore carefully watched and studied these 75 men for three or four days, at the end of which time we had picked out four men who appeared to be physically able to handle pig iron at the rate of 47 tons per day. A careful study was then made of each of these men. We looked up their history as far back as practicable and thorough inquiries were made as to the character, habits, and the

ambition of each of them. Finally we selected one from among the four as the most likely man to start with. He was a little Pennsylvania Dutchman who had been observed to trot back home for a mile or so after his work in the evening about as fresh as he was when he came trotting down to work in the morning. We found that upon wages of $1.15 a day he had succeeded in buying a small plot of ground, and that he was engaged in putting up the walls of a little house for himself in the morning before starting to work and at night after leaving. He also had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exceedingly “close,” that is, of placing a very high value on a dollar. As one man whom we talked to about him said, “A penny looks about the size of a cart-wheel to him.” This man we will call Schmidt.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用科学方法挑选工人。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与工人打交道时的一项死规矩是：一次只能与一个工人交谈或打交道，因为每个工人都有自身的专长和缺点，由于我们并不是和众多工人打交道，而是试着培养每个工人，让他达到最高效率，实现最大富裕。首先，我们要找寻合适的工人。因此，我们花了三四天的时间，对这75个人进行了细心观察和研究。最后，我们挑选了4个人，从体力来看，他们能以每天47吨的速度搬运生铁。接下来，我们对每个人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我们尽量查阅了他们的记录，并详细询问每一个人的性格、习惯和志向。最终，我们从这四人中选出了一人作为最佳人选。他是来自宾夕法尼亚荷兰裔人，身材矮小。我们发现他每晚结束工作后都要快步走上1英里回家，尽管如此，他看起来仍和早上快步走到工厂上班时一样精神。我们还发现，凭借每天赚1.15美元的微薄工资，他买下一小块地，然后在每天早上上班前和晚上下班后，为自己的小房子砌墙。他还以十分“吝啬”闻名，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正如一个和我们谈论他的人所说：“1便士对他来说和车轮一样大。”这个工人叫施密特。

The task before us, then, narrowed itself down to getting Schmidt to handle 47 tons of pig iron per day and making him glad to do it. This was done as follows. Schmidt was called out from among the gang of pig-iron handlers and talked to somewhat in this way:

这样，我们的任务就是施密特每天高高兴兴地搬运47吨生铁。以下是具体实施过程。我们把施密特从生铁搬运小组中叫出来，跟他展开了以下谈话：

“Schmidt, are you a high-priced man?”

“施密特，你觉得自己能否创造高价值？”

“Vell, I don't know vat you mean.”

“啊，我不懂您的意思。”

“Oh yes, you do. What I want to know is whether you are a high-priced man or not.”

“不！你懂。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Vell, I don't know vat you mean.”

“啊，我还是不明白您的意思。”

“Oh, come now, you answer my questions. What I want to find out is whether you are a high-priced man or one of these cheap fellows here. What I want to find out is whether you want to earn $1.85 a day or whether you are satisfied with $1.15, just the same as all those cheap fellows are getting.”

“哦，那你现在来回答我的问题。我想知道你是否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还是和这些没什么价值的家伙一样；我想知道，你是希望一天挣1.85美元呢，还是和那些没什么价值的家伙一样，只满足于每天挣1.15美元。”

“Did I vant $1.85 a day? Vas dot a high-priced man? Vell, yes, I vas a high-priced man.”

“您问我是否每天想要1.85美元吗？如果想挣这么多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吗？那样的话，是的，我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Oh, you're aggravating me. Of course you want $1.85 a day—every one wants it! You know perfectly well that that has very little to do with your being a high-priced man. For goodness' sake answer my questions, and don't waste any more of my time. Now come over here. You see that pile of pig iron?”

“噢，你把我激怒了。你当然想要每天挣1.85美元——谁不想呀！你很清楚这和你是否很有价值没半毛钱关系。天啊，你快回答我的问题，别再浪费我的时间了。现在你跟我过来，你看见那堆生铁了吗？”

“Yes.”

“看见了。”

“You see that car?”

“你看见那个车厢吗？”

“Yes.”

“看见了。”

“Well, if you are a high-priced man, you will load that pig iron on that car tomorrow for $1.85. Now do wake up and answer my question. Tell me whether you are a high-priced man or not.”

“好，如果你是个很有价值的人，只要你明天把那堆生铁装进车厢，就可以挣到1.85美元。现在，振作起来，回答我的问题。告诉我，你是否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Vell, did I got $1.85 for loading dot pig iron on dot car tomorrow?”

“嗯……只要我明天把那堆生铁装上车厢真的能挣1.85美元吗？”

“Yes, of course you do, and you get $1.85 for loading a pile like that every day right through the year. That is what a high-priced man does, and you know it just as well as I do.”

“是的，当然，只要你每天都能把这样的一堆生铁装车，你今年每天都能挣1.85美元。那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做的工作，你和我一样，都明白这一点。”

“Vell, dot's all right. I could load dot pig iron on the car tomorrow for $1.85, and I get it every day, don't I?”

“那好，我明天就把那堆生铁装车，拿到1.85美元的日薪。而且每天我都能挣那么多，没错吧？”

“Certainly you do—certainly you do.”

“当然，当然。”

“Vell, den, I vas a high-priced man.” “Now, hold on, hold on. You know just as well as I do that a high-priced man has to do exactly as he's told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You have seen this man here before, haven't you?”

“那这样一来，我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了！”“现在，等一等，等一等。你我都明白：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必须从早到晚都要按吩咐做事。你之前已经见过这个人了，不是吗？”

“No, I never saw him.”

“不，我从没见过他。”

“Well, if you are a high-priced man, you will do exactly as this man tells you tomorrow,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When he tells you to pick up a pig and walk, you pick it up and you walk, and when he tells you to sit down and rest, you sit down. You do that right straight through the day. And what's more, no back talk. Now a high-priced man does just what he's told to do, and no back talk. Do you understand that? When this man tells you to walk, you walk; when he tells you to sit down, you sit down, and you don't talk back at him. Now you come on to work here to-morrow morning and I'll know before night whether you are really a high-priced man or not.”

“好，如果你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明天从早到晚就要听他的吩咐做事。他让你搬生铁你就搬，他让你休息你就休息，这一整天，你

就这样做。此外，记住：不许顶嘴。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就按照吩咐做事，不许无理顶撞。你明白了吗？他叫你走你就走，叫你坐你就坐，决不能无理顶撞。这样，你明早就来这里工作，用不着等到晚上我就能判断出，你是否很有价值。”

This seems to be rather rough talk. And indeed it would be if applied to an educated mechanic, or even an intelligent laborer. With a man of the mentally sluggish type of Schmidt it is appropriate and not unkind, since it is effective in fixing his attention on the high wages which he wants and away from what, if it were called to his attention, he probably would consider impossibly hard work.

这看似是一次略显粗鲁的对话，事实上，如果对一位受过培训的技工，甚至一个智慧的劳工而言，这的确是一次粗鲁的对话。但对于像施密特这样有些懈怠的工人而言，这样的对话恰当又友好，因为将其注意力集中到他渴望的高薪上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如若不然，他或许不可能考虑干这种苦力活。

What would Schmidt's answer be if he were talked to in a manner which is usual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say, as follows:

如果置于“积极性加激励”管理模式下，施密特又会给出何种回答呢？比如：

“Now, Schmidt, you are a first-class pig-iron handler and know

your business well. You have been handling at the rate of 12 1/2 tons per day. I have given considerable study to handling pig iron, and feel sure that you could do a much larger day's work than you have been doing. Now don't you think that if you really tried you could handle 47 tons of pig iron per day, instead of 12 1/2 tons?”

“施密特，现在你已经是个一流的生铁搬运工了，也精通你的行业。一直以来，你每天搬运12.5吨生铁。我大量研究过搬运生铁，所以能够保证你每天能比一直以来干得更多。你难道不想试试看自己每天能搬运47吨生铁，而不是12.5吨吗？”

What do you think Schmidt's answer would be to this?

你觉得施密特会如何回答呢？

Schmidt started to work, and all day long, and at regular intervals, was told by the man who stood over him with a watch, “Now pick up a pig and walk. Now sit down and rest. Now walk—now rest,” etc. He worked when he was told to work, and rested when he was told to rest, and at half-past five in the afternoon had his 47 1/2 tons loaded on the car. And he practically never failed to work at this pace and do the task that was set him during the three years that the writer was at Bethlehem. And throughout this time he averaged a little more than $1.85 per day, whereas before he had never received over $1.15 per day, which was the ruling rate of wages at that time in Bethlehem. That is, he received 60 per cent higher wages than were paid to other men who were not working on task work. One man after another was picked out and trained to

handle pig iron at the rate of 47 1/2 tons per day until all of the pig iron was handled at this rate, and the men were receiving 60 per cent more wages than other workmen around them.

施密特开始没日没夜的定期按照吩咐工作了。每当他干活时，旁边就会有一个人戴着手表，密切监督他，给施密特“指令”：“现在开始工作；现在可以坐下休息了；现在工作；现在休息……”让他干活，他就干活；让他休息，他就休息，如此反复。到了下午五点半，他把47.5吨生铁装上了车。笔者在伯利恒的三年间，他几乎从未怠工，一直都保持此速度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每天的工资平均下来都略多于1.85美元，而此前，他每天的薪金甚至从未超过1.15美元（当时伯利恒工厂的平均工资）。这意味着，他的薪水比其他做任务型工作的工人多了60%。接下来，我们又挑选了一个又一个工人，并训练他们每天以47.5吨的速度搬运生铁，直到这些挑选出的工人都能以此速度搬运生铁，而他们的工资也比身边其他工人高60%。

The writer has given abov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ree of the four elements which constitute the essenc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first, the careful selection of the workman, and, second and third, the method of first inducing and then training and helping the workman to work according to the scientific method. Nothing has as yet been said about the science of handling pig iron. The writer trusts, however, that before leaving this illustration the reader will be thoroughly convinced that there is a science of handling pig iron, and further that this science amounts to so much that the man who is suited to handle pig iron cannot possibly understand it, nor even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is science, without the help of those who are over him.

笔者已经简要描述了构成科学管理精髓四个方面中的其中的三方面：第一，精心挑选工人，第二和第三，先调动工人积极性，然后对其展开训练，让他们按科学方法工作。人们迄今尚未讨论过搬运生铁这门科学，但笔者相信，阐述完这一实例前，读者会完全相信存在搬运生铁的科学，而且这门科学意义重大，如果没有领导的辅助，即使是最适合搬运生铁的工人，甚至是按照这门科学的规律工作的工人也不可能参透其中奥秘。

The writer came into the machine-shop of the Midvale Steel Company in 1878, after having served an apprenticeship as a pattern-maker and as a machinist. This was close to the end of the long period of depression following the panic of 1873, and business was so poor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many mechanics to get work at their trades. For this reason he was obliged to start as a day laborer instead of working as a mechanic. Fortunately for him, soon after he came into the shop the clerk of the shop was found stealing. There was no one else available, and so, having more education than the other laborers (since he had been prepared for college) he was given the position of clerk. Shortly after this he was given work as a machinist in running one of the lathes, and, as he turned out rather more work than other machinists were doing on similar lathes, after several months was made gang boss over the lathes.

1878年，笔者在中部溪谷钢铁公司机械车间工作，在此之前，还当过制模工和机械工学徒。1878年时值1873年爆发的长期经济大萧条的尾声，那时，生意经营不善，许多机械工在他们的行业里根本找不到工作。所以，笔者不能再当机械工，只好从日工做起。幸运的是，进车间不久，车间管理员就被逮到有盗窃行为。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顶替他，而正巧笔者受教育程度比其他人高（笔者曾准备考大

学），就拿到了管理员的职位。不久后，他要求笔者做一名操作车床的机械工。由于笔者完成的工作量比做相同工作的其他机械工多，几个月后，成功被任命为车床组组长。

Almost all of the work of this shop had been done on piece work for several years. As was usual then, and in fact as is still usual in most of the shops in this country, the shop was really run by the workmen, and not by the bosses. The workmen together had carefully planned just how fast each job should be done, and they had set a pace for each machine throughout the shop, which was limited to about one-third of a good day's work. Every new workman who came into the shop was told at once by the other men exactly how much of each kind of work he was to do, and unless he obeyed these instructions he was sure before long to be driven out of the place by the men.

几年来，这个车间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计件工作。那时，计件工作很平常，而事实上，时至今日，这个国家大部分车间仍在沿用计件工作，即车间由工人运行，而不是由组长管理。工人们共同精心规划每天各项工作的进度，还为全车间的所有机器都规定了运转速度，从而将每日工作量限制在最佳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每当车间有新入职的工人，其他工人马上就会告诉他，每种工作他要完成多少，他必须按照指示干活，否则，他很快就会被工人们从赶出车间。

As soon as the writer was made gang-boss, one after another of the men came to him and talked somewhat as follows:

笔者升职为组长后，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找到我，以下是我们的

谈话内容：

“Now, Fred, we're very glad to see that you've been made gang-boss. You know the game all right, and we're sure that you're not likely to be a piecework hog. You come along with us, 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 but if you try breaking any of these rates you can be mighty sure that we'll throw you over the fence.”

“弗雷德，恭喜你当上组长了。你很清楚我们的游戏规则，我们知道你不可能支持计件工作。如果，你站在我们这边，那就什么事都好说；但如果你想搞破坏，你肯定会被我们赶出去的。”

The writer told them plainly that he was now working on the side of the management, and that he proposed to do whatever he could to get a fair day's work out of the lathes. This immediately started a war; in most cases a friendly war, because the men who were under him were his personal friends, but none the less a war, which as time went on grew more and more bitter. The writer used every expedient to make them do a fair day's work, such as discharging or lowering the wages of the more stubborn men who refused to make any improvement, and such as lowering the piece-work price, hiring green men, and personally teaching them how to do the work, with the promise from them that when they had learned how, they would then do a fair day's work. While the men constantly brought such pressure to bear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works) upon all those who started to increase their output that they were finally compelled to do about as the rest did, or else quit. No one who has not had this experience can have an idea of the bitterness which is gradually developed in such a struggle. In a war

of this kind the workmen have one expedient which is usually effective. They use their ingenuity to contriv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 machines which they are running are broken or damaged—apparently by accident, or in the regular course of work—and this they always lay at the door of the foreman, who has forced them to drive the machine so hard that it is overstrained and is being ruined. And there are few foremen indeed who are able to stand up against the combined pressure of all of the men in the shop. In this case the problem was complic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shop ran both day and night.

笔者坦率地告诉他们，现在我在为管理层工作，我提议要竭尽全力提高车间的工作效率。这马上挑起了一场斗争；当然，多数情况下是友好的斗争，因为在我手下工作的这些工人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斗争毕竟是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斗争也愈加激烈。笔者使出浑身解数，让他们完成日工作量，比如降低那些顽固、拒绝改进的工人的工资、降低计件工作的价格、雇用新手还在私下里教他们如何工作，并让他们保证一旦学会如何工作后就要完成每日规定的工作。虽然这些人一直承受来自工作内外的压力，但那些一开始还增加其产量的工人最后被迫向其他工人看齐，降低产量，否则就得卷铺盖卷走人。没有这般经历的人，无法明白在这样的争斗中逐渐增强的敌意。在这类斗争中，工人们通常有一种有效的权宜之计。他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想方设法破坏操作的机器——让它们从表面上看是偶然损坏或正常损耗——他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工头，称他逼迫他们片刻不停地操作机器，导致机器超负荷而损坏，而能抵住所有车间工人联合压力的工头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车间日夜运作，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The writer had two advantages, however, which are not possessed by the ordinary foreman, and these came, curiously

enough, from the fact that he was not the son of a working man.

然而，笔者有两个普通工头没有的优势，而令人好奇的是，这些优势来源于笔者不是工人之子这一事实。

First, owing to the fact that he happened not to be of working parents, the owners of the company believed that he had the interest of the works more at heart than the other workmen, and they therefore had more confidence in his word than they did in that of the machinists who were under him. So that, when the machinists reported to the Superintendent that the machines were being smashed up because an incompetent foreman was overstraining them, the Superintendent accepted the word of the writer when he said that these men were deliberately breaking their machines as a part of the piece-work war which was going on, and he also allowed the writer to make the only effective answer to this Vandalism on the part of the men, namely: “There will be no more accidents to the machines in this shop. If any part of a machine is broken the man in charge of it must pay at least a part of the cost of its repair, and the fines collected in this way will all be handed over to the mutual beneficial association to help care for sick workmen.” This soon stopped the willful breaking of machines.

第一，由于笔者恰巧不是工人之子，雇主们认为我打心底比其他工人更关心公司的利益。因此，比起我手下的工人，雇主相信我的话：当机械工们向公司主管报告，由于工头缺乏能力而导致机器使用过度而损坏时，我表示，这些人故意破坏了这些机器以反对计件工作，主管选择相信我的话，还准许了我提出的有效制止工人们故意破坏公物的方法，即：“车间里今后再也能出现机器故障。如果哪台机

器出了问题，操作这台机器的工人必须支付一部分修理费用。以这一方式收到的罚款将全部交给互助会用以帮助那些生病的工人。”实施这种方法不久便制止了工人们故意破坏机器的行为。

Second. If the writer had been one of the workmen, and had lived where they lived, they would have brought such social pressure to bear upon him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to have stood out against them. He would have been called “scab” and other foul names every time he appeared on the street, his wife would have been abused, and his children would have been stoned. Once or twice he was begged by some of his friends among the workmen not to walk home, about two and a half miles along the lonely path by the side of the railway. He was told that if he continued to do this it would be at the risk of his life. In all such cases, however, a display of timidity is apt to increase rather than diminish the risk, so the writer told these men to say to the other men in the shop that he proposed to walk home every night right up that railway track; that he never had carried and never would carry any weapon of any kind, and that they could shoot and be d—.

第二，如果笔者曾经是工人中的一员，并且与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向我施加社会压力，而我根本不可能与他们对立。每当我走在街上，他们可能会骂我“工贼”或其他不堪入耳的名字；而我的妻子也因为我而遭到谩骂；别的孩子们会向我的孩子扔石头。我的一些工人朋友曾劝我不要走路回家（我每天都要沿着铁路孤寂的小路走上2英里半才到家）。别人告诉我，如果我坚持走回家，可能会有性命之忧。然而，尽管如此，我深知如果表现出怯懦只会徒增危险，根本无法消除危险。因此，笔者让这些人转告工厂里的其他工人，我每天晚上还会坚持沿铁轨小路步行回家，而且以前不会将来也不会随身携带任何

武器；他们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我。

After about three years of this kind of struggling, the output of the machines had been materially increased, in many cases doubled, and as a result the writer had been promoted from one gang-boss-ship to another until he became foreman of the shop. For any right-minded man, however, this success is in no sense a recompense for the bitter relations which he is forced to maintain with all of those around him. Life which is one continuous struggle with other men is hardly worth living. His workman friends came to him continually and asked him, in a personal, friendly way, whether he would advise them, for their own best interest, to turn out more work. And, as a truthful man, he had to tell them that if he were in their place he would fight against turning out any more work, just as they were doing, because under the piecework system they would be allowed to earn no more wages than they had been earning, and yet they would be made to work harder.

这样的斗争持续了近三年，在这期间，车间机器大大提高了产量，而且多数情况下，产量翻了一番。担任了几任组长后，雇主最终提升我为工厂的工头。当然，这种成功对于像我这样理性的人而言，根本无法缓解自己与工人们的紧张关系。如果每天只在与他人的争斗中度过，生活就毫无意义可言。有好几次，和我关系友好的工人朋友私下里问我，如果我将工人利益摆在首位，还会不会要求他们干这么多的活。我诚恳地告诉他们，如果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我不会要求他们像现在一样干那么多活。因为在过时的计件工作模式下，他们被迫干更多的活，却得不到更高的收入。

Soon after being made foreman, therefore, he decided to make

a determined effort to in some way change the system of management, so that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kmen and the management should become the same, instead of antagonistic. This resulted, some three years later, in the starting of the type of management which is described in papers presented to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entitled “A Piece-Rate System” and “Shop Management.”

因此，为了让工人与管理者的利益协调一致，而非相互冲突，笔者成为工头后不久，誓要努力制定一种新的管理制度。笔者花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初步制定了一种管理模式并在提交给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两篇论文（《计件工资制》和《工厂管理》）中对其作了阐述。

In preparation for this system the writer realized that the greatest obstacle to harmoniou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workmen and the management lay in the ignorance of the management as to what really constitutes a proper day's work for a workman. He fully realized that, although he was foreman of the shop, the combined knowledge and skill of the workmen who were under him was certainly ten times as great as his own. He therefore obtained the permission of Mr. William Sellers, who was at that time the President of the Midvale Steel Company, to spend some money in a careful,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time required to do various kinds of work.

笔者在探索这种管理制度的过程中意识到：管理者不清楚如何适当分配工人的日工作量是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协调合作的最大阻碍。笔者发现，虽然我是车间的工头，但拥有的知识与技巧根本比不上在我手下工作的工人。因此，时任中部溪谷钢铁公司总裁的威廉·塞勒先生

同意赞助我，以科学方法认真调查各种工作所需的时间。

Mr. Sellers allowed this more as a reward for having, to a certain extent, “made good” as foreman of the shop in getting more work out of the men, than for any other reason. He stated, however, that he did not believe that any scientific study of this sort would give results of much value.

塞勒先生同意笔者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我在担任工头期间“表现出色”，让手下的工人增加了工作量，以示对我的奖励。不过，塞勒先生表明，他觉得即使做了科学调查，得出的结论也没有多大意义。

Among several investigations which were undertaken at this time, one was an attempt to find some rule, or law, which would enable a foreman to know in advance how much of any kind of heavy laboring work a man who was well suited to his job ought to do in a day; that is, to study the tiring effect of heavy labor upon a first-class man. Our first step was to employ a young college graduate to look up all that had been written on the subject in English, German, and French. Two classes of experiments had been made: one by physiologists who were studying the endurance of the human animal, and the other by engineers who wished to determine what fraction of a horse-power a man-power was. These experiments had been made largely upon men who were lifting loads by means of turning the crank of a winch from which weights were suspended, and others who were engaged in walking, running, and lifting weights in various ways. However, the records of these investigations were so meager that no law of any value could be

deduced from them. We therefore started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of our own.

为了让工头提前掌握每天应分配给一个适合做某种体力劳动的人的工作量，即体力劳动对一位一流工人疲劳程度的影响，我在诸多调查中试图找出其中的一些规律。首先，我们雇用了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让他查阅这一主题下所有的英文、德文、法文资料。接着我们做了两项实验：一是生理学家研究人类耐力的实验，二是工程师们研究一人力等于多少马力的实验。实验步骤基本如下：让一部分人使用曲柄绞车吊运重物，另一部分人则通过走、跑或其他方式提升重物。但我们缺少足够的调查记录，无法推断出有价值的规律。因此，我们开始进行一系列试验。

Two first-class laborers were selected, men who had proved themselves to be physically powerful and who were also good steady workers. These men were paid double wages during the experiments, and were told that they must work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y at all times, and that we should make certain tests with them from time to time to find whether they were “soldiering” or not, and that the moment either one of them started to try to deceive us he would be discharged. They worked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y throughout the time that they were being observed.

我们挑选了两个体力好且状态稳定的一流工人。实验期间，这两位工人可以得到双倍收入，前提是必须始终竭尽所能去工作。我们会时不时地测试他们，看看他们是否是“磨洋工”。只要有人试图欺骗我们，他马上会被解雇。在整个被监视期间，这两名工人都努力工作。

Now it must be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in these experiments we were not trying to find the maximum work that a man could do on a short spurt or for a few days, but that our endeavor was to learn what really constituted a full day's work for a first-class man; the best day's work that a man could properly do, year in and year out, and still thrive under. These men were given all kinds of tasks, which were carried out each day under the close observation of the young college man who was conducting the experiments, and who at the same time noted with a stop-watch the proper time for all of the motions that were made by the men. Every element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the work which we believed could have a bearing on the result was carefully studied and recorded. What we hoped ultimately to determine was what fraction of a horse-power a man was able to exert, that is, how many foot-pounds of work a man could do in a day.

现在，我们必须明确，在这些实验中，我们并没有试图去发掘一个人在一次短促突击或几天时间内最多能完成多少工作，而是努力研究对一个一流工人而言，一整天的时间他到底干了什么，以及年复一年，为何工人仍能以最饱满的精神完成规定的日工作量。我们给这些工人布置了不同的任务，在进行实验时，那名年轻大学生每天都会密切观察这些工人，并用秒表记录工人们完成每个动作的用时。我们会仔细的研究并记录每一个与工作相关的要素。最终，我们希望能确定每天一个人能发挥多少马力的力量，即每人每天所做工作相当于多少磅。。

After completing this series of experiments, therefore, each man's work for each day was translated into foot-pounds of energy, and to our surprise we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constant or uniform relation between the foot-pounds of energy which the man exerted

during a day and the tiring effect of his work. On some kinds of work the man would be tired out when doing perhaps not more than one-eighth of a horse-power, while in others he would be tired to no greater extent by doing half a horse-power of work. We failed, therefore, to find any law which was an accurate guide to the maximum day's work for a first-class workman.

因此，完成这些实验后，我们将每人每天所做的工作转换为以尺为单位的能量。我们惊奇地发现，工人每天消耗的能量与他的疲劳程度之间没有固定、一致的联系。对于某些工作而言，或许还未等工人发挥到八分之一马力时，其体力就已经耗尽了。而对于其他一些工作而言，可能直到工人消耗近二分之一马力的体力时才会感到劳累。因此，我们未能找到能指导一等工人每日最大工作量的规律。

A large amount of very valuable data had been obtained, which enabled us to know, for many kinds of labor, what was a proper day's work. It did not seem wise, however, at this time to spend any more money in trying to find the exact law which we were after. Some years later, when more money was available for this purpose, a second series of experiments was made, similar to the first, but somewhat more thorough. This, however, resulted as the first experiments, in obtaining valuable information but no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law. Again, some years later, a third series of experiments was made, and this time no trouble was spared in our endeavor to make the work thorough. Every minute element which could in anyway affect the problem was carefully noted and studied, and two college men devoted about three months to the experiments. After this data was again translated into foot-pounds of energy exerted for each man each day, it became perfectly clear that there is no direct relation between the horse-power which a

man exerts (that is, his foot-pounds of energy per day) and the tiring effect of the work on the man. The writer, however, was quite as firmly convinced as ever that some definite, clear-cut law existed as to what constitutes a full day's work for a first-class laborer, and our data had been so carefully collected and recorded that he felt sure that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was included somewhere in the records. The problem of developing this law from the accumulated facts was therefore handed over to Mr. Carl G. Barth, who is a better mathematician than any of the rest of us, and we decid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blem in a new way, by graphically representing each element of the work through plotting curves, which should give us, as it were, a bird's-eye view of every element. In a comparatively short time Mr. Barth had discovered the law governing the tiring effect of heavy labor on a first-class man. And it is so simple in its nature that it is truly remarkable that it should not have been discovered and clearly understood years before. The law which was developed is as follows:

我们收集到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从而能得知多种工作的合理日工作量。然而，这时如果再花钱去探寻准确的规律并不是明智之举。几年后，我们终于有了足够的资金，于是又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实验。虽然与前一次做的一系列实验很相似，但这次做的这些实验更加全面。然而，和之前一样，虽然我们收集到了有价值的信息，但没有总结出任何规律。又过了几年，我们又一次开始了一系列实验。这一次，我们全力以赴。我们认真留意、研究每一个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微小要素。两个大学生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协助我们进行实验。此后，我们再一次将每人每天完成工作量的数据转换为以磅为单位的能量，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以下结论：一个工人发挥的“马力”，即他每天消耗的以磅为单位的能量，与其疲劳程度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然而，笔者深信，一名头等工人日工作构成上会存在一些特定的规律，此外，我们仔细收集、记录了数据，而且我确定那些必要的信

息就在这些记录的数据中。因此，我将基于已有信息进而总结出规律的任务移交给了卡尔·G.　　巴思先生，他是一位比我们都厉害的数学家。我们决定通过绘制代表各个要素的曲线图，从新的视角研究这个问题，这些曲线图使我们得以鸟瞰各个要素。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巴思先生发现了影响一个一等工人从事重度劳动时疲劳程度的规律。从本质上讲，这个规律很简单，人们甚至认为，该规律本该在几年前就能发现并清楚阐述的。笔者现将此规律阐述如下：

The law is confined to that class of work in which the limit of a man's capacity is reached because he is tired out. It is the law of heavy laboring, corresponding to the work of the cart horse, rather than that of the trotter. Practically all such work consists of a heavy pull or a push on the man's arms, that is, the man's strength is exerted by either lifting or pushing something which he grasps in his hands. And the law is that for each given pull or push on the man's arms it is possible for the workman to be under load for only a definite percentage of the day. For example, when pig iron is being handled (each pig weighing 92 pounds), a first-class workman can only be under load 43 per cent of the day. He must be entirely free from load during 57 per cent of the day. And as the load becomes lighter, the percentage of the day under which the man can remain under load increases. So that, if the workman is handling a half-pig, weighing 46 pounds, he can then be under load 58 per cent of the day, and only has to rest during 42 per cent. As the weight grows lighter the man can remain under load during a larger and larger percentage of the day, until finally a load is reached which he can carry in his hands all day long without being tired out. When that point has been arrived at this law ceases to be useful as a guide to a laborer's endurance, and some other law must be found which indicates the man's capacity for work.

提出这个规律的前提是：如果一个工人感到疲惫不堪，就意味着他已达到了能力上限。适用于重度劳动者的规律与拉马车的马而不是快步马一致。事实上，这些活是依靠工人用手臂使劲地推或拉完成的，即工人提起或推动手里握着的东西来用力。每次提起或推动东西时隐含的规律是：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内，工人能够负重。例如，搬运生铁时（每块生铁92镑），一等工人每天只能负重43%，即一天57%的时间他都处于完全放松的状态。当负重减轻，这名工人一天内所能负重的时间比会增加。因此，如果一个工人搬运46磅的半块生铁，他能在一天中58%的时间内处于负重状态，即他休息的时间只占一天时间的42%。随着生铁变轻，这个工人仍能增加他每天负重的时间比，直到最后他一整天都在搬运生铁，却不感到疲惫。到那时，这个规律就无法预测一个工人的耐久力了。这时我们需要探寻其他规律以体现工人工作的能力。

When a laborer is carrying a piece of pig iron weighing 92 pounds in his hands, it tires him about as much to stand still under the load as it does to walk with it, since his arm muscles are under the same severe tension whether he is moving or not. A man, however, who stands still under a load is exerting no horse-power whatever, and this accounts for the fact that no constant relation could be traced in various kinds of heavy laboring work between the foot-pounds of energy exerted and the tiring effect of the work on the man. It will also be clear that in all work of this kind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arms of the workman to be completely free from load (that is, for the workman to rest) at frequent intervals. Throughout the time that the man is under a heavy load the tissues of his arm muscles are in process of degeneration, and frequent periods of rest are required in order that the blood may have a chance to restore these tissues to their normal condition.

一个工人用手搬运92磅的生铁时，无论他是站着，还是走路，都会感到同样疲劳；因为只要他在动作，即使他在负重时站立不发挥任何“马力”，其手臂肌肉也处于一样的紧张状态。这就证实了：在各种重度劳动中，工人工作时消耗的以磅为单位的能量和工作时的疲劳程度之间无固定联系。这表明，我们有必要让从事这类工作的工人经常放松其手臂，让他们得到适当休息。一个工人在负重时，手臂肌肉组织正在消耗元气，因此，必须要时不时放松手臂，通过血液循环使这些组织还原至正常状态。

To return now to our pig-iron handlers at the Bethlehem Steel Company. If Schmidt had been allowed to attack the pile of 47 tons of pig iron without the guidance or direction of a man who understood the art, or science, of handling pig iron, in his desire to earn his high wages he would probably have tired himself out by 11 or 12 o'clock in the day. He would have kept so steadily at work that his muscles would not have had the proper periods of rest absolutely needed for recuperation, and he would have been completely exhausted early in the day. By having a man, however, who understood this law, stand over him and direct his work, day after day, until he acquired the habit of resting at proper intervals, he was able to work at an even gait all day long without unduly tiring himself.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伯利恒钢铁公司的生铁搬运工。如果为了赚取更高的工资，雇主准许施密特亲手搬运47吨的生铁，但没有精通搬运生铁技术或科学的人指导他，那么，可能他在干到十一二点钟时就已没力气了，由于一直在工作，他的肌肉得不到适当休息，因此，他很早就会完全精疲力竭了。然而，如果身边有一个了解这一规律的人每天都给予他相应指导，直到他养成时不时休息的习惯，他就能在不让自己过度疲惫的情况下，以平均的速度干上一整天。

Now one of the very first requirements for a man who is fit to handle pig iron as a regular occupation is that he shall be so stupid and so phlegmatic that he more nearly resembles in his mental make-up the ox than any other type. The man who is mentally alert and intelligent is for this very reason entirely unsuited to what would, for him, be the grinding monotony of work of this character. Therefore the workman who is best suited to handling pig iron is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real science of doing this class of work. He is so stupid that the word “percentage” has no meaning to him, and he must consequently be trained by a man more intelligent than himself into the habit of work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is science before he can be successful.

对一个胜任搬运生铁的工人而言，他必须是像牛一样又愚笨又迟钝。也就是说，那些聪慧机敏的人根本就不做这种枯燥乏味的工作，这会令他们倍感折磨。因此，胜任搬运生铁这项工作的工人是那些不懂得以科学的方法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或许，他根本不理解何为“百分比”。只有在一个聪明之人的指导下，养成在工作中遵循科学规律的习惯，他才可能成功。

The writer trusts that it is now clear that even in the case of the most elementary form of labor that is known, there is a science, and that when the man best suited to this class of work has been carefully selected, when the science of doing the work has been developed, and when the carefully selected man has been trained to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science, the results obtained must of necessity be overwhelmingly greater than those which are possible under the plan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笔者坚信，就算是最基本的工作，其背后也蕴含科学规律。只要我们细心挑选胜任这项工作的工人，找寻其背后蕴含的科学规律，再依据这些规律培训这些工人，就能收获比“积极性加激励”管理模式下更丰硕的成果。

Let us, however, again turn to the case of these pig-iron handlers, and see whether, under the ordinary type of management, it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to obtain practically the same results.

下面，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些生铁搬运工，看看在普遍的管理模式下，是否不可能取得相同结果。

The writer has put the problem before many good managers, and asked them whether, under premium work, piece work, or any of the ordinary plans of management, they would be likely even to approximate 47 tons [3_4] per man per day, and not a man has suggested that an output of over 18 to 25 tons could be attained by any of the ordinary expedients.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the Bethlehem men were loading only 12 1/2 tons per man.

笔者曾向许多杰出的管理者询问过此问题，即在补贴工作、计件工作或其他常见的管理规划下，他们能否让每人每天的搬运量接近47吨 [4_4] 。结果，这些管理者们都认为工人每人每天的搬运量超不过18-25吨。毕竟伯利恒的工人每人每天仅能搬运12.5吨生铁。

To go into the matter in more detail, however: As to the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the men, it is a fact that in this gang of 75 pig-iron handlers only about one man in eight was physically capable of handling 47 1/2 tons per day. With the very best of intentions, the other seven out of eight men were physically unable to work at this pace. Now the one man in eight who was able to do this work was in no sense superior to the other men who were working on the gang. He merely happened to be a man of the type of the ox, no rare specimen of humanity, difficult to find and therefore very highly prized. On the contrary, he was a man so stupid that he was unfitted to do most kinds of laboring work, even. The selection of the man, then, does not involve finding some extraordinary individual, but merely picking out from among very ordinary men the few who are especially suited to this type of work. Although in this particular gang only one man in eight was suited to doing the work, we had not the slightest difficulty in getting all the men who were needed—some of them from inside of the works and others from the neighboring country—who were exactly suited to the job.

让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从以科学方法挑选工人的角度来看，事实上，由75人构成的生铁搬运组中，只有八分之一的人每天能搬运47.5吨生铁。而另外八分之七的工人如果以同样的速度工作，就会感到体力不支，不是因为他们比组里其他工人更能干，而是他们恰巧能像牛一般工作，这样的工人并不难找，而且他们的价值也不高：因为这类人很愚笨，甚至只能胜任大部分体力劳作。挑选工人时，雇主们并不奢望工人们多么出色，只要他们胜任这项工作就可以。虽然在这个生铁搬运组中，只有八分之一的人胜任这项工作，但我们还是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胜任这项工作的工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其他小组，有些则来自附近的农村。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the

attitude of the management is that of “putting the work up to the workmen.” What likelihood would there be, then, under the old type of management, of these men properly selecting themselves for pig-iron handling? Would they be likely to get rid of seven men out of eight from their own gang and retain only the eighth man? No! And no expedient could be devised which would make these men properly select themselves. Even if they fully realized the necessity of doing so in order to obtain high wages (and they are not sufficiently intelligent properly to grasp this necessity), the fact that their friends or their brothers who were working right alongside of them would temporarily be thrown out of a job because they were not suited to this kind of work would entirely prevent them from properly selecting themselves, that is, from removing the seven out of eight men on the gang who were unsuited to pig-iron handling.

管理者们在“积极性加激励”的管理模式下，会将所有工作推给工人来做。在旧有的管理模式下，组里的工人如何选择胜任搬运生铁的工人呢？有没有可能淘汰另外7人而只留下第8人？不可能！因为不管怎样，就算他们充分意识到这样做能赚取高薪（他们还不够聪明，无法恰当把握这种必要性），也不能正确地自行选择，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即淘汰不胜任搬运生铁的7人，就会让自己的朋友或兄弟暂时失业。

As to the possibility, under the old type of management, of inducing these pig-iron handlers (after they had been properly selected) to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ience of doing heavy laboring, namely, having proper scientifically determined periods of rest in close sequence to periods of work. As has been indicated before, the essential idea of the ordinary types of management is that each workman has become more skilled in his own trade than

it is possible for any one in the management to be, and that, therefore, the details of how the work shall best be done must be left to him. The idea, then, of taking one man after another and training him under a competent teacher into new working habits until he continually and habitually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scientific laws, which have been developed by some one else, is directly antagonistic to the old idea that each workman can best regulate his own way of doing the work. And besides this, the man suited to handling pig iron is too stupid properly to train himself. Thus it will be seen that with the ordinary types of managemen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replace rule of thumb, the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the men, and inducing the men to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scientific principles are entirely out of the question. And this because the philosophy of the old management puts the entire responsibility upon the workmen, while the philosophy of the new places a great part of it upon the management.

经过适当挑选的生铁搬运工，在旧有的管理模式下，是否有可能按照科学规律从事重度劳动？工人们能否合理安排其作息时间？正如之前提到的，管理模式主要强调：各行各业的工人比其管理者更精通其从事的工作。因此，如何更好地完成工作应交由工人自己决定。如果为每位工人安排一位合格的老师，在老师的训练下，让其养成新的操作习惯，直到他习惯于且坚持按照他人总结的科学规律去操作，但这样一来，就与旧有的管理模式发生了冲突。因为在旧有的管理模式下，每个工人擅长自行规划自己的工作，此外，胜任搬运生铁的工人很愚笨，不能以恰当的方式训练自己。因此，在普通的管理模式下，不可能以科学方法代替经验原则，不可能科学选择工人，也不可能敦促工人们在操作过程中遵循科学规律。旧有管理模式下的管理者会将责任全部推给工人，而管理者在科学管理模式下会承担工作中的大部分责任。

With most readers great sympathy will be aroused because seven out of eight of these pig-iron handlers were thrown out of a job. This sympathy is entirely wasted, because almost all of them were immediately given other jobs with the Bethlehem Steel Company. And indeed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that the removal of these men from pig-iron handling, for which they were unfit, was really a kindness to themselves,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step toward finding them work for which they were peculiarly fitted, and at which, after receiving proper training, they could permanently and legitimately earn higher wages.

多数读者可能会对那7名即将失业的生铁搬运工深表同情。然而，我们根本无需同情他们，因为伯利恒钢铁公司马上就会为这些人安排新工作。事实上，让这些人离开不胜任的生铁搬运工作，也是对他们有益，因为如果要找到他们胜任的工作，这是他们要走的第一步。而为了长久赚取高薪，他们在新工作中还要经过适当的培训。

Although the reader may be convinced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science back of the handling of pig iron, still it is more than likely that he is still skeptical as to the existence of a science for doing other kinds of labor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objects of this paper is to convince its readers that every single act of every workman can be reduced to a science. With the hope of fully convincing the reader of this fact, therefore, the writer proposes to give several more simple illustrations from among the thousands which are at hand.

读者或许已经意识到搬运生铁的背后还蕴含某种科学规律，但他

们仍然会怀疑，是否其他体力劳动背后也蕴含着科学规律。说服读者相信每个工人每个简单动作的背后都包含一定的科学规律，这是本文的主要写作目的。为了充分说服读者，笔者计划从收集到的上千个事例中选出几个简单事例进行阐述。

For example, the average man would question whether there is much of any science in the work of shoveling. Yet there is but little doubt, if any intelligent reader of this paper were deliberately to set out to find what may be call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science of shoveling, that with perhaps 15 to 20 hours of thought and analysis he would be almost sure to have arrived at the essence of this science. On the other hand, so completely are the rule-of-thumb ideas still dominant that the writer has never met a single shovel contractor to whom it had ever even occurred that there was such a thing as the science of shoveling. This science is so elementary as to be almost self-evident.

例如，人们可能会问，铲运工作背后也蕴含什么科学吗？如果聪明的读者们有心去探寻铲运科学，那么或许经过15-20个小时的思考和分析，自然就能发现这门科学的本质。此外，人们依然倾向于利用经验原则做事，因此，时至今日，笔者仍未遇到过研究并发现铲挖科学的铲运工头。但毋庸置疑，这门科学的确存在，而且通俗易懂，甚至不言而喻。

For a first-class shoveler there is a given shovel load at which he will do his biggest day's work. What is this shovel load? Will a first-class man do more work per day with a shovel load of 5 pounds, 10 pounds, 15 pounds, 20, 25, 30, or 40 pounds? Now this is a question which can be answered only through carefully made

experiments. By first selecting two or three first-class shovelers, and paying them extra wages for doing trustworthy work, and then gradually varying the shovel load and having all the conditions accompanying the work carefully observed for several weeks by men who were used to experimenting, it was found that a first-class man would do his biggest day's work with a shovel load of about 21 pounds. For instance, that this man would shovel a larger tonnage per day with a 21-pound load than with a 24-pound load or than with an 18-pound load on his shovel. It is, of course, evident that no shoveler can always take a load of exactly 21 pounds on his shovel, but nevertheless, although his load may vary 3 or 4 pounds one way or the other, either below or above the 21 pounds, he will do his biggest day's work when his average for the day is about 21 pounds. The writer does not wish it to be understood that this is the whole of the art or science of shoveling. There are many other elements, which together go to make up this science. But he wishes to indicate the important effect which this one piec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has upon the work of shoveling.

一个一流铲运工有其每日完成的最大日铲运量，即铲运负荷量。这个铲运负荷量是多少呢？一个一流铲运工每锹的负重是5磅、10磅、15磅，抑或20磅、25磅、30磅，还是40磅呢？其日工作量是否与铲运负荷量成正比？以上问题必须经过认真实验方能一一解答。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挑选2-3名一流铲运工。为了让这些铲运工在实验过程中尽全力工作，我们会给他们发放额外的薪金。接下来的数周里，实验人员要逐渐改变铲运的负荷量，并细心观察继而发生的一切变化。结果显示，一名一流铲运工要达到最大的日铲运量，其每锹负重约21磅，这意味着工人每锹负重21磅时比每锹24磅或18磅能铲运更多物料。我们自然不可能强制铲运工每锹的负荷量达21磅。然而，就算出于各种原因，每锹的负荷量会有3磅或4磅的差异，但是无论铲运工每锹的负荷量高于还是低于21磅，只要他平均在一天中每次铲运负

荷量保持在21磅左右，就能达到最大日铲运量。希望读者们不要认为以上内容包含了铲运科学或艺术的全部，事实上，这门科学的构成要素还有很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科学知识对铲运工作至关重要。

At the works of the Bethlehem Steel Company, for example, as a result of this law, instead of allowing each shoveler to select and own his own shovel, it became necessary to provide some 8 to 10 different kinds of shovels, etc., each one appropriate to handling a given type of material; not only so as to enable the men to handle an average load of 21 pounds, but also to adapt the shovel to several other requirements which become perfectly evident when this work is studied as a science. A large shovel tool room was built, in which were stored not only shovels but carefully designed and standardized labor implements of all kinds, such as picks, crowbars, etc. This made it possible to issue to each workman a shovel which would hold a load of 21 pounds of whatever class of material they were to handle: a small shovel for ore, say, or a large one for ashes. Iron ore is one of the heavy materials which are handled in a works of this kind, and rice coal, owing to the fact that it is so slippery on the shovel, is one of the lightest materials. And it was found on studying the rule-of-thumb plan at the Bethlehem Steel Company, where each shoveler owned his own shovel, that he would frequently go from shoveling ore, with a load of about 30 pounds per shovel, to handling rice coal, with a load on the same shovel of less than 4 pounds. In the one case, he was so overloaded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him to do a full day's work, and in the other case he was so ridiculously underloaded that it was manifestly impossible to even approximate a day's work.

为了验证这一规律，伯利恒钢铁公司展开了实验，实验过程中铲运工严禁挑选、保管自己的铁锨，必须使用工厂为其准备的8-10种铁锨。每种铁锨搭配特定的物料，从而不仅能满足工人们平均每锨铲运约21磅物料的要求，还能满足其他要求，尤其是将铲运视作一门科学的要求。我们特意修建了一个大型铲运工具仓库，不仅可储存铁锨，还可储存所有经过精心设计、符合标准的工具，如铁镐、撬棍等。这样一来，铲运工都可以拿到一把合适的铁锨，搬运21磅重的任何物料：比如使用小规格的铁锨铲运矿石，使用大规格的铁锨铲运灰土。由于铁矿石较重，因此适宜使用小规格铁锹铲运；而碎煤较轻，且易滑落，因此适宜使用小锨。我们还调查了伯利恒钢铁公司在经验原则指导下从事的工作。结果显示，每个铲运工拥有自己的铁锨，既可以铲运矿石，又可以铲运碎煤。铲运矿石时每锨负重达30磅，而铲运碎煤时，每锨负重不足4磅。在前一种条件下，工人负重工作，无法坚持干一整天的工作；而在后一种条件下，由于负荷过低，工人无法完成一天规定的工作量。

Briefly to illustrate some of the other elements which go to make up the science of shoveling, thousands of stop-watch observations were made to study just how quickly a laborer, provided in each case with the proper type of shovel, can push his shovel into the pile of materials and then draw it out properly loaded. These observations were made first when pushing the shovel into the body of the pile. Next when shoveling on a dirt bottom, that is, at the outside edge of the pile, and next with a wooden bottom, and finally with an iron bottom. Again a similar accurate time study was made of the time required to swing the shovel backward and then throw the load for a given horizontal distance, accompanied by a given height. This time study was made for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distance and height. With data of this sort before him, coupled with the law of endurance described in the case of the pig-iron handler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man who is

directing shovelers can first teach them the exact methods which should be employed to use their strength to the very best advantage, and can then assign them daily tasks which are so just that the workman can each day be sure of earning the large bonus which is paid whenever he successfully performs this task.

笔者接下来要简要举例阐述其他构成铲运科学的要素。通过秒表计时，我们观察了上千次工人的铲运速度，即计算从工人利用合适的铲挖工具将铁锨插入物料堆到铲出适量物料的用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观察铲挖灰土、木质、矿石等物料时，从中部铲挖的情况；接下来，观察从底部铲挖的情况；随后，计算抬起铁锨，将所铲物料投入指定位置所需的确切时间。这一项实验测试了距离与高度的不同组合。管理者收集到这些数据后，结合搬运生铁的耐久力规律，就可以指导工人正确合理地用力，同时为每位工人合理分配任务，工人们成功完成这些任务后，就可以拿到一大笔奖金。

There were about 600 shovelers and laborers of this general class in the yard of the Bethlehem Steel Company at this time. These men were scattered in their work over a yard which was, roughly, about two miles long and half a mile wide. In order that each workman should be given his proper implement and his proper instructions for doing each new job, it wa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detailed system for directing men in their work, in place of the old plan of handling them in large groups, or gangs, under a few yard foremen. As each workman came into the works in the morning, he took out of his own special pigeonhole, with his number on the outside, two pieces of paper, one of which stated just what implements he was to get from the tool room and where he was to start to work, and the second of which gave the history of his previous day's work; that is, a statement of the work which he had

done, how much he had earned the day before, etc. Many of these men were foreigners and unable to read and write, but they all knew at a glance the essence of this report, because yellow paper showed the man that he had failed to do his full task the day before, and informed him that he had not earned as much as $1.85 a day, and that none but high-priced men would be allowed to stay permanently with this gang. The hope was further expressed that he would earn his full wages on the following day. So that whenever the men received white slips they knew that everything was all right, and whenever they received yellow slips they realized that they must do better or they would be shifted to some other class of work.

当时，伯利恒钢铁公司的铲挖工人和其他工人加在一起有600名左右。这些工人的工作地点是长约两英里、宽约半英里的工场。我们必须以一套详细的制度代替旧有的管理模式，让每个工人都能拿到合适的工具，收到合理的指示，以更好地完成工作，在为数不多的工场工头的带领下，工人们以群组或班组为单位完成工作。上班前，工人会在自己已标号的专用分类架上看到两张纸：一张写着他当日应完成什么工作，使用什么工具；另一张则写着他已完成的工作和前一天的收入。许多工人是不识字的外国人，但只要看一眼，他们就能掌握这份报告的要点：黄色的纸代表他前一天没有完成规定工作，也就说明他没能拿到1.85美元的日薪。能继续待在这个班组的是那些有价值的人，这暗示着他必须要在接下来的一天拿到全额薪金。如果工人们收到白色的纸，就表明他们的表现良好；而如果收到黄色的纸，就表明自己必须更加努力，否则就可能面临失业风险。

Dealing with every workman as a separate individual in this way involved the building of a labor office for the superintendent and clerks who were in charge of this section of the work. In this

office every laborer's work was planned out well in advance, and the workmen were all moved from place to place by the clerks with elaborate diagrams or maps of the yard before them, very much as chessmen are moved on a chess-board, a telephone and messenger system having been installed for this purpose. In this way a large amount of the time lost through having too many men in one place and too few in another, and through waiting between jobs, was entirely eliminated. Under the old system the workmen were kept day after day in comparatively large gangs, each under a single foreman, and the gang was apt to remain of pretty nearly the same size whether there was much or little of the particular kind of work on hand which this foreman had under his charge, since each gang had to be kept large enough to handle whatever work in its special line was likely to come along.

如果在与工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运用了上述方法，我们就要为该工作的主管和工作人员准备一间办公室。他们可以利用这间办公室为每个工人预先规划工作，并像棋手移动棋盘上的棋子一样，参照工场的结构图或地图调整工人的位置。此外，他们还会制定一套电话和通讯系统从而避免了某部分工人过多而其他部分工人过少以及窝工造成大量时间浪费的现象。工人在传统的制度下被分配到较大的班组，每个班组在一个工头的领导下起早贪黑地工作。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大量生产线工作，无论工作量多少，班组的规模一般都保持不变。

When one ceases to deal with men in large gangs or groups, and proceeds to study each workman as an individual, if the workman fails to do his task, some competent teacher should be sent to show him exactly how his work can best be done, to guide, help, and encourage him,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study his possibilities as a workman. So that, under the plan which

individualizes each workman, instead of brutally discharging the man or lowering his wages for failing to make good at once, he is given the time and the help required to make him proficient at his present job, or he is shifted to another class of work for which he is either mentally or physically better suited.

如果我们对工人进行个例研究，而不是通过小组或群体对其进行研究，就应该在他无法完成工作时，请一名合格的老师指导、帮助、鼓励他以助其更好地完成任务，还要检验他能否成为称职的工人。因此，研究工人个体时，我们不会因为他没有出色完成工作就无情地开除他，或给他降薪。为使其精通所从事的工作，我们会给予他时间和帮助，或者考虑其智力和体力，为其选择一种胜任的工作。

All of this requires the kindly cooperation of the management, and involves a much more elaborate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than the old-fashioned herding of men in large gangs. This organization consisted, in this case, of one set of men, who were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laboring through time study, such as has been described above; another set of men, mostly skilled laborers themselves, who were teachers, and who helped and guided the men in their work; another set of tool-room men who provided them with the proper implements and kept them in perfect order, and another set of clerks who planned the work well in advance, moved the men with the least loss of time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and properly recorded each man's earnings, etc. And this furnishes an elementary illustration of what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anagement and the workmen.

为了与传统将工人分组这一方案相区分开来，这一切都需要工人

与管理层间的合作，其中包括一套更加详细的组织制度。在这种模式下，通过研究以上时间，一部分人专门负责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一部分人则负责为工人提供帮助和指导，他们本身也是技能娴熟的工人；一部分在工具室工作的人负责为工人提供工具并维持秩序；还有一部分人，负责提前安排工作，让工人在最短时间内转移工作地点，并准确记录每个工人的收入。这一切初步为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合作做出了示范。

The question which naturally presents itself is whether an elaborate organization of this sort can be made to pay for itself; whether such an organization is not top-heavy. This question will best be answered by a statement of the results of the third year of working under this plan.

这样一来，自然会产生这一问题：是否有必要精心制定如此复杂的制度，换言之，如此制度是否会负担过重？为了给出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笔者现给出实施这一规划第三年时的工作成果报表：

And in computing the low cost of $0.033 per ton, the office and

tool-room expenses, and the wages of all labor superintendents, foremen, clerks, time-study men, etc., are included.

计算低至每吨0.033美元的费用，涵盖办公室、工具间花费以及所有主管、工头、办事员、计时员等人员的收入。

During this year the total saving of the new plan over the old amounted to $36,417.69, and during the six months following, when all of the work of the yard was on task work, the saving was at the rate of between $75,000 and $80,000 per year.

实施新管理制度一年以来，共计节省36417.69美元。如果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工厂的工作全部改为计件工作，每年可节省75000-80000美元。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results attained was the effect on the workmen themselves. A careful inquiry into the condition of these men developed the fact that out of the 140 workmen only two were said to be drinking men. This does not, of course, imply that many of them did not take an occasional drink. The fact is that a steady drinker would find it almost impossible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which was set, so that they were practically all sober. Many, if not most of them, were saving money, and they all lived better than they had before. These men constituted the finest body of picked laborers that the writer has ever seen together, and they looked upon the men who were over them, their bosses and their teachers, as their very best friends; not as nigger drivers, forcing them to work extra hard for ordinary wages, but as

friends who were teaching them and helping them to earn much higher wages than they had ever earned before. It would have been absolutely impossible for any one to have stirred up strife between these men and their employers. And this presents a very simple though effective illustration of what is meant by the words "prosperity for the employee, coupled with prosperity for the employer," the two principal objects of management. It is evident also that this result has been brought about b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ou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或许，新管理制度的最重要的成果体现在工人自身。在详细调查了工人的生活状况后，我们发现，在140名工人中，只有两人喝酒。当然，其他人不是说滴酒不沾；意思是，那些嗜酒者几乎无法完成既定工作，因此，他们在工作时，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就算多数人没存钱，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在存钱，而且其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改善。在所有经挑选组成的班组中，笔者认为这一小组是最出色的：他们把其上级，包括他们的主管和老师视作他们最好的朋友，而不是逼迫他们为了一般性收入而超负荷工作的凶狠工头；他们的这些最好的朋友给予他们工作上的指导，甚至还帮助他们赚取更高的薪金。因此，无论是谁，都绝不可能挑起这些工人和其雇主之间的争端。从中，我们用简单的方法，有效阐述了管理的两个主要目的："实现雇员财富最大化与雇主财富最大化"。同时，这一成果明显是应用科学管理的四个基本原则后取得的。

As another illustration of the value of a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motives which influence workmen in their daily work, the loss of ambition and initiative will be cited, which takes place in workmen when they are herded into gangs instead of being treated as separate individuals. A careful analysis had demonstrated the fact that when workmen are herded together in gangs, each man in the

gang becomes far less efficient than when his personal ambition is stimulated; that when men work in gangs, their individual efficiency falls almost invariably down to or below the level of the worst man in the gang; and that they are all pulled down instead of being elevated by being herded together. For this reason a general order had been issued in the Bethlehem Steel Works that not more than four men were to be allowed to work in a labor gang without a special permit, signed by the General Superintendent of the works, this special permit to extend for one week only. It was arranged that as far as possible each laborer should be given a separate individual task. As there were about 5000 men at work in the establishment, the General Superintendent had so much to do that there was but little time left for signing these special permits.

此外，我们有必要用科学方法研究影响工人日常工作的动机。笔者现列举一例，即让工人失去抱负，打击工人积极性。如果不将工人视为个体对待，而是将其置于整个班组的管控之下，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仔细分析后的结果显示：工人们被分入班组后，该小组每名工人的工作效率比工人们个人抱负得到激励时的要低；如果工人们以小组为单位工作，他们个人的工作效率几乎总会降至甚至低于班组里最差工人的水平。以小组为单位工作只会降低而非提升其工作效率。基于此，伯利恒钢铁工厂发布了一项通令：除非得到工厂总指挥签署的特别许可（仅在一周内有效），否则一个劳动班组内不得有超过四名工人一起工作。此外，要尽可能为每位劳工分配单独的任务。因为在该公司有大约有5000名员工，总指挥一人忙不过来，所以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签署这些特别许可。

After gang work had been by this means broken up, an unusually fine set of ore shovelers had been developed, through careful selection and individual, scientific training. Each of these

men was given a separate car to unload each day, and his wages depended upon his own personal work. The man who unloaded the largest amount of ore was paid the highest wages, and an unusual opportunity came for demonst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izing each workman. Much of this ore came from the Lake Superior region, and the same ore was delivered both in Pittsburg and in Bethlehem in exactly similar car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ore handlers in Pittsburg, and hearing of the fine gang of laborers that had been developed at Bethlehem, one of the Pittsburg steel works sent an agent to hire the Bethlehem men. The Pittsburg men offered 4 9/10 cents a ton for unloading exactly the same ore, with the same shovels, from the same cars, that were unloaded in Bethlehem for 3 2/10 cents a ton. After carefully considering this situation, it was decided that it would be unwise to pay more than 3 2/10 cents per ton for unloading the Bethlehem cars, because, at this rate, the Bethlehem laborers were earning a little over $1.85 per man per day, and this price was 60 per cent more than the ruling rate of wages around Bethlehem.

这样一来，班组工作就瓦解了。随后，工厂培养了一批经过精心挑选并加以科学培训的非凡、精英式矿砂铲运工。每天工厂都会为每位工人单独分配一辆车卸料，工人的薪金取决于个人的工作，卸矿砂最多的工人得到的报酬最高，这为证明赋予每位工人个性化的重要性提供了不寻常的机会。这种矿砂大多源自苏必利尔湖区域，并用同样的车运送到匹兹堡和伯利恒。匹兹堡缺少矿砂工，一听说伯利恒已成立出色的铲运组，一家匹兹堡钢厂便派一名代理雇佣伯利恒的工人。匹兹堡工厂出4.9美分作为每卸一吨矿砂的报酬，而伯利恒工厂愿意付每吨3.2美分卸相同的矿砂。仔细思量后，伯利恒工厂觉得每吨付3.2美分不合理，因为这样一来，伯利恒的工人每人每天的收入会超过1.85美元，而这个价格比伯利恒周边的基本工资高60%。

A long series of experiments, coupled with close observation, had demonstrated the fact that when workmen of this caliber are given a carefully measured task, which calls for a big day's work on their part, and that when in return for this extra effort they are paid wages up to 60 per cent beyond the wages usually paid, that this increase in wages tends to make them not only more thrifty but better men in every way; that they live rather better, begin to save money, become more sober, and work more steadily. Whe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receive much more than a 60 per cent increase in wages, many of them will work irregularly and tend to become more or less shiftless, extravagant, and dissipated. Our experiments showed, in other words, that it does not do for most men to get rich too fast.

长期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加上密切观察已证实：如果具备这种才干的工人接到了一项经过仔细测量的任务，就意味着他们要干上一整天；而作为对他们额外工作的回报，他们可以得到比原工资高60%的收入。这种收入的增加不仅可以使他们在各方面更富足，而且他们开始存钱，变得更加理智，一步一个脚印。另一方面，当他们的收入比原来高60%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会不定期工作，或多或少会变得不思上进，铺张浪费，挥霍无度。换句话说，我们的实验表明：大多数人太快致富是不可行的。

After deciding, for this reason, not to raise the wages of our ore handlers, these men were brought into the office one at a time, and talked to somewhat as follows:

基于此，决定不给矿砂搬运工加薪后，他们将这些工人一个接一个地带到办公室，以下是具体的谈话内容：

“Now, Patrick, you have proved to us that you are a high-priced man. You have been earning every day a little more than $1.85, and you are just the sort of man that we want to have in our ore-shoveling gang. A man has come here from Pittsburg, who is offering 4 9/10 cents per ton for handling ore while we can pay only 3 2/10 cents per ton. I think, therefore, that you had better apply to this man for a job. Of course, you know we are very sorry to have you leave us, but you have proved yourself a high-priced man, and we are very glad to see you get this chance of earning more money. Just remember, however, that at any time in the future, when you get out of a job, you can always come right back to us. There will always be a job for a high-priced man like you in our gang here.”

“现在，帕特里克，你已经向我们证明了你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你每天的工资已超过1.85美元，说明你就是我们矿砂铲挖小分队所需要的那种人。有一个来自匹兹堡的人愿意为铲挖每吨矿砂支付4.9美分，而对于同样的工作，我们只能支付3.2美分。因此，我觉得你最好向那个人递交工作申请。当然，你知道，我们对你要你离开我们深表遗憾，但是你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如果你能赚取更多工资，我们会为你感到高兴的。但请记住：无论何时，只要你想找工作，我们随时欢迎你的回归。在我们这个班组，总能为像你这样高价值的人才找到工作的。

Almost all of the ore handlers took this advice, and went to Pittsburg, but in about six weeks most of them were again back in Bethlehem unloading ore at the old rate of 3 2/10 cents a ton. The writer had the following talk with one of these men after he had returned:

听到这条建议后，矿砂铲挖工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到匹兹堡去工作。然而，不到六周，大部分人又会回到伯利恒，拿着原来每吨3.2美分的工资装卸矿砂。笔者和其中一个回到伯利恒的工人展开了下面的对话：

“Patrick, what are you doing back here? I thought we had gotten rid of you.”

“你为什么回来了，帕特里克？我以为你不会再来这儿工作了。”

“Well, Sir, I'll tell you how it was. When we got out there Jimmy and I were put on to a car with eight other men. We started to shovel the ore out just the same as we do here. After about half an hour I saw a little devil alongside of me doing pretty near nothing, so I said to him, 'Why don't you go to work? Unless we get the ore out of this car we won't get any money on pay-day.' He turned to me and said, 'Who in——are you?' 'Well,' I said, 'tha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and the little devil stood up to me and said, 'You'll be minding your own business, or I'll throw you off this car!' Well, I could have spit on him and drowned him, but the rest of the men put down their shovels and looked as if they were going to back him up; so I went round to Jimmy and said (so that the whole gang could hear it), 'Now, Jimmy, you and I will throw a shovelful whenever this little devil throws one, and not another shovelful.' So we watched him, and only shoveled when he shoveled. When pay-day came around, though, we had less money than we got here at Bethlehem. After that Jimmy and I went in to the boss, and asked him for a car to ourselves, the same as we got at Bethlehem, but he

told us to mind our own business. And when another pay-day came around we had less money than we got here at Bethlehem, so Jimmy and I got the gang together and brought them all back here to work again."

"那个，先生，我来告诉您发生了什么。到了匹兹堡，他们把我和吉米以及其他8个人分配到一节车厢工作。一开始，我们和在这里一样负责铲矿砂，干了大约半小时后，我看到身边的一个小鬼几乎什么活也没做，我问他，'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干？如果不把这车的矿砂卸下来，那么等开工资，我们可拿不到什么钱。'他却转过身，向我怒吼道，'你算哪根葱？这不关你的事，你别多嘴，要不我就把你扔出车厢！'我真想用唾沫淹死他，但没想到其他人都放下了铁锨，看起来好像是支持他；于是，我走到吉米身边，为保证全组人都听清，我大声说，'吉米，既然这样，我们也学学那个小鬼，只铲一锨，多一锨也不铲。'就这样，我们观察这个小鬼，看他铲，我们再铲。等到发工资时，我发现我们拿的工资没这儿多。后来，我和吉米去请求工头，像在伯利恒时那样，给我们单独分一节车厢，但是他却让我们少管闲事。一直等到下个月发工资，我们拿到的工钱还是没有在伯利恒时多。就这样，我召集了所有原班组的成员，一起回到了这里。"

When working each man for himself, these men were able to earn higher wages at 3 2/10 cents a ton than they could earn when they were paid 4 9/10 cents a ton on gang work; and this again shows the great gain which results from working according to even the most elementary of scientific principles. But it also shows that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st elementary principles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management to do their share of the work in cooperating with the workmen. The Pittsburg managers knew just how the results had been attained at Bethlehem, but they were unwilling to go to the small trouble and expense required to plan ahead and

assign a separate car to each shoveler, and then keep an individual record of each man's work, and pay him just what he had earned.

虽然工人们以个人为单位干活时，每铲1吨赚3.2美分，但比他们以小组为单位每铲1吨赚4.9美分挣得还多。这个实例再次证明：在最基本的科学原则的指导下工作同样能收获颇丰。此外，管理者和工人在合作的过程中运用这些原则，必须各尽其责。虽然匹兹堡的管理者明白如何能做好工作，却觉得这些事做起来太麻烦，不愿花钱做好预先规划；分配给每位铲挖工一节指定车厢；准备记录每位工人的工作量以按照工作量多少支付他薪酬等。

Bricklaying is one of the oldest of our trades.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re has been little or no improvement made in the implements and materials used in this trade, nor in fact in the method of laying bricks. In spite of the millions of men who have practiced this trade, no great improvement has been evolved for many generations. Here, then, at least, one would expect to find but little gain possible through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study. Mr. Frank B. Gilbreth, a member of our Society, who had himself studied bricklaying in his youth,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decided to apply them to the art of bricklaying. He made an intensely interesting analysis and study of each movement of the bricklayer, and one after another eliminated all unnecessary movements and substituted fast for slow motions. He experimented with every minute element which in any way affects the speed and the tiring of the bricklayer.

砌砖是历史最悠久的行业。几百年来，人们一直沿用这一行业所使用的工具和材料，尽管从事这一行业的工人数不胜数，但历经数

代，没有人对其进行革新。因此，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们将希望寄托于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以期获得一点改进。我们协会的会员弗兰克·B.　吉尔伯莱斯先生在年轻时，曾研究过砌砖，自那时起一直喜欢研究科学管理原理，决定要将其应用于砌砖这项工作中。他以生动有趣的方法认真分析、研究了砌砖的全过程，消除了那些不必要的动作，以快动作替代慢动作，他对所有会影响砌砖工人速度和疲劳程度的微小因素进行了实验。

He developed the exact position which each of the feet of the bricklayer should occupy with relation to the wall, the mortar box, and the pile of bricks, and so made it unnecessary for him to take a step or two toward the pile of bricks and back again each time a brick is laid.

他精确测量了砌砖工每只脚站立的位置与墙、灰浆箱和砖堆的位置关系，这样一来，砌砖工就不必在每次砌砖时朝着砖堆来回走动了。

He studied the best height for the mortar box and brick pile, and then designed a scaffold, with a table on it, upon which all of the materials are placed, so as to keep the bricks, the mortar, the man, and the wall in their proper relative positions. These scaffolds are adjusted, as the wall grows in height, for all of the bricklayers by a laborer especially detailed for this purpose, and by this means the bricklayer is saved the exertion of sto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his feet for each brick and each trowel full of mortar and then straightening up again. Think of the waste of effort that has gone on through all these years, with each bricklayer lowering his body, weighing, say, 150 pounds, down two feet and raising it up again

every time a brick (weighing about 5 pounds) is laid in the wall! And this each bricklayer did about one thousand times a day.

他根据研究得出的灰浆箱和砖堆的最佳高度设计了一种支架，上面放一张平板，将全部物料放在上面，从而保证砖、灰浆箱、砌砖工和墙处于相对适宜的位置。随着墙不断砌高，一位专门的负责人员为所有的砌砖工调整这些支架，省得砌砖工每次取砖和灰浆时，反复站起身来。想想这些年工人们每次砌砖浪费的体力：每个砌砖工俯下身（假设其体重为150磅）至双脚处，然后再伸直，而一天下来每位砌砖工要重复这样的动作上千次！

As a result of further study, after the bricks are unloaded from the cars, and before bringing them to the bricklayer, they are carefully sorted by a laborer, and placed with their best edge up on a simple wooden frame, constructed so as to enable him to take hold of each brick in the quickest time and in the most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is way the bricklayer avoids either having to turn the brick over or end for end to examine it before laying it, and he saves, also, the time taken in deciding which is the best edge and end to place on the outside of the wall. In most cases, also, he saves the time taken in disentangling the brick from a disorderly pile on the scaffold. This pack" of bricks (as Mr. Gilbreth calls his loaded wooden frames) is placed by the helper in its proper position on the adjustable scaffold close to the mortar box.

经过进一步研究，在从车厢卸完砖后，一名工人先对其细心分类，再把这些砖置于简单木框架上的最佳边缘。这样，这名工人就能以最快的时间在最有优势的位置握住每块砖，以这种方式，砌砖工就不必在砌砖前浪费时间将砖块翻来倒去以决定砌在墙外用哪边最好。

同样，在多数情况下，他还节省了整理支架上无序堆放的砖块的时间。辅助人员将这个砖块“包”（吉尔伯莱斯先生对已装运的木框架的称呼）摆放在灰浆箱旁可调节支架的适当位置上。

We have all been used to seeing bricklayers tap each brick after it is placed on its bed of mortar several times with the end of the handle of the trowel so as to secure the right thickness for the joint. Mr. Gilbreth found that by tempering the mortar just right, the bricks could be readily bedded to the proper depth by a downward pressure of the hand with which they are laid. He insisted that his mortar mixers should give special attention to tempering the mortar, and so save the time consumed in tapping the brick.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把每块砖放到灰浆底后，砌砖工通常会拿泥刀敲打几下砖的一端以使接缝处打到合适厚度。吉尔伯莱斯先生发现，如果能调出合适的灰浆，那么在砌砖时，只需用手按压，让砖块位置合适后，一块砖就砌好了。因此，他特别叮嘱灰浆调和工重视调和灰浆，从而帮助砌砖工节省敲打砖的时间。

Through all of this minute study of the motions to be made by the bricklayer in laying bricks under standard conditions, Mr. Gilbreth has reduced his movements from eighteen motions per brick to five, and even in one case to as low as two motions per brick. He has given all of the details of this analysis to the profession in the chapter headed “Motion Study,” of his book entitled “Bricklaying System,” published by Myron C. Clerk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and Chicago; E. F. N. Spon, of London.

经过仔细研究，吉尔伯莱斯先生掌握了砌砖工所有标准的砌砖动作，并把砌砖的18个动作减少至5个，在某种情况下，只需两个动作就可完成砌砖。由纽约和芝加哥米隆·C. 克拉克出版公司和伦敦E. F. N. 斯邦出版的其著作《砌砖动作》中，他在“动作研究”一章中，详细分析了砌砖的动作。

An analysis of the expedients used by Mr. Gilbreth in reducing the motions of his bricklayers from eighteen to five shows that this improvement has been made in three different ways:

对吉尔伯莱斯先生利用可取的方法把砌砖工的动作从18个减少到5个所作的分析表明他利用三种不同方法做出了这种改进：

First. He has entirely dispensed with certain movements which the bricklayers in the past believed were necessary, but which a careful study and trial on his part have shown to be useless.

第一，他完全免除了砌砖工过去所认为的必要的特定动作，因为他的细心研究和实验已经证实这些动作是无用的。

Second. He has introduced simple apparatus, such as his adjustable scaffold and his packets for holding the bricks, by means of which, with a very small amount of cooperation from a cheap laborer, he entirely eliminates a lot of tiresome and time-consuming motions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the bricklayer who lacks the scaffold and the packet.

第二，他引进了一些简单的工具，例如可调节的支架和摆放砖块的硬板盒，在一名廉价劳工的少量合作下，他完全可以消除砌砖工疲惫又耗时的动作，而这正是缺少支架和硬板盒的砌砖工所必需的。

Third. He teaches his bricklayers to make simple motions with both hands at the same time, where before they completed a motion with the right hand and followed it later with one from the left hand.

第三，他传授砌砖工用双手同时去做一些简单动作。以前，砌砖工先用右手完成一个动作后，再使用左手去完成另一个动作。

For example, Mr. Gilbreth teaches his bricklayer to pick up a brick in the left hand at the same instant that he takes a trowel full of mortar with the right hand. This work with two hands at the same time is, of course, made possible by substituting a deep mortar box for the old mortar board (on which the mortar spread out so thin that a step or two had to be taken to reach it) and then placing the mortar box and the brick pile close together, and at the proper height on his new scaffold.

例如，吉尔伯莱斯先生教砌砖工一边用左手拾起一块砖，一边用右手铲一泥刀灰浆。当然，只有用深灰浆箱代替旧的灰浆板才能让双手同时操作（灰浆板上的灰浆只有浅浅的一层，而要接触到灰浆还需要走一两步），接下来将灰浆箱和砖堆摆在一起，将其置于新支架适当的高度。

These three kinds of improvements are typical of the ways in which needless motions can be entirely eliminated and quicker types of movements substituted for slow movements when scientific motion study, as Mr. Gilbreth calls his analysis, time study, as the writer has called similar work, are applied in any trade.

以上三种改进方法的典型意义体现在：各行各业中，只要利用吉尔伯莱斯先生“科学的动作研究和工时研究”就能完全消除所有不必要的动作，用快动作替代慢动作。

Most practical men would (knowing the opposition of almost all tradesmen to making any change in their methods and habits), however, be skeptical as to the possibility of actually achieving any large results from a study of this sort. Mr. Gilbreth reports that a few months ago, in a large brick building which he erected, he demonstrated on a commercial scale the great gain which is possible from practically applying his scientific study. With union bricklayers, in laying a factory wall, twelve inches thick, with two kinds of brick, faced and ruled joints on both sides of the wall, he averaged, after his selected workmen had become skilful in his new methods, 350 bricks per man *per hour;* whereas the average speed of doing this work with the old methods was, in that section of the country, 120 bricks per man per hour. His bricklayers were taught his new method of bricklaying by their foreman. Those who failed to profit by their teaching were dropped, and each man, as he became proficient under the new method, received a substantial (not a small) increase in his wages. With a view to individualizing his workmen and stimulating each man to do his best, Mr. Gilbreth also developed an ingenious method for measuring and recording the number of bricks laid by each man, and for telling each

workman at frequent intervals how many bricks he had succeeded in laying.

然而，大多数实干家（知道几乎所有的生意人都反对改变他们的方法和习惯）都怀疑从此类研究中取得实际的丰硕成果。几个月前，吉尔伯莱斯先生说，在他所建立的一座以砖堆砌而成的大型建筑物中，他展示了应用其科学研究可能取得的巨大商业收益。砌砖工会的砌砖工用两种砖砌一堵12英尺（3.6米）厚的工厂墙，给墙两边的接缝抹泥和画线，在他挑选的那些工人已经熟练掌握了他的新方法后，吉尔伯莱斯先生经过计算，得出：每名工人平均每小时砌350块砖；而在农村地区沿用传统方法的工人平均砌砖的速度为每人每小时120块。工头们将吉尔伯莱斯提出的砌砖新方法交给砌砖工们。那些不能从工头们的教导中获利的工人会被解雇，而对于任何一个工人，只要他精通这种新方法，就可以大大提高其薪金。为了赋予工人个性化，激励他们竭尽全力完成工作，吉尔伯莱斯先生还提出了衡量并记录每名工人砌砖数的独特方法，并时不时告诉每个工人他已完成的砌砖数。

It is only when this work is compared with the conditions which prevail under the tyranny of some of our misguided bricklayers' unions that the great waste of human effort which is going on will be realized. In one foreign city the bricklayers' union have restricted their men to *275 bricks per day* on work of this character when working for the city, and *375* per day when working for private owners. The members of this union are probably sincere in their belief that this restriction of output is a benefit to their trade. It should be plain to all men, however, that this deliberate loafing is almost criminal, in that it inevitably results in making every workman's family pay higher rent for their housing, and also in the end drives work and trade away from their

city, instead of bringing it to it.

只有将这种工作模式与某些砌砖工会不当的专制模式进行对比，才能意识到我们浪费了大量人力。在一个外国的城市，砌砖协会已将为城市砌砖的工人每日的砌砖量限制为275块；而将为私营业主砌砖的工人每日的砌砖量限制为375块。这个工会的成员或许会衷心地相信这种对产量的限制有利于他们的行业发展。然而，所有人都应该明白，这种故意“磨洋工”几乎就是犯罪，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让每个家庭支付更高的房费，最终不仅不会为城市创造就业，还会将工作机遇从这座城市驱逐出去。

Why is it, in a trade which has been continually practiced since before the Christian era, and with implements practically the same as they now are, that this simplification of the bricklayer's movements, this great gain, has not been made before?

事实上，早在公元前就已存在且时至今日仍存在的行业，还在使用以前所使用的工具。为什么在过去不能通过简化砌砖动作而获得丰厚收益呢？

It is highly likely that many times during all of these years individual bricklayers have recognized the possibility of eliminating each of these unnecessary motions. But even if, in the past, he did invent each one of Mr. Gilbreth's improvements, no bricklayer could alone increase his speed through their adoption because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in all cases several bricklayers work together in a row and that the walls all around a building must grow at the same rate of speed. No one bricklayer, then, can work much faster than

the one next to him. Nor has any one workman the authority to make other men cooperate with him to do faster work. It is only through *enforced* standardization of methods, *enforced* adoption of the best implement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and *enforced* cooperation that this faster work can be assured. And the duty of enforcing the adoption of standards and of enforcing—this cooperation rests with the *management* alone. The *management* must supply continually one or more teachers to show each new man the new and simpler motions, and the slower men must be constantly watched and helped until they have risen to their proper speed. All of those who, after proper teaching, either will not or cannot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 methods and at the higher speed must be discharged by the *management.* The *management* must also recognize the broad fact that workmen will not submit to this more rigid standardization and will not work extra hard, unless they receive extra pay for doing it.

这些年来，个体砌砖工很可能多次意识到可以剔除这些不必要的动作。但是，在过去，即使某个砌砖工发明了吉尔伯莱斯先生的其中一项改进方法，没有哪个砌砖工能独自通过这些改进方法提高其工作速度，因为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会铭记多个砌砖工在一排工作，建筑物周围的墙一定要以相同的速度提升高度。因此，没有一个砌砖工会比身旁的工人干得快，也没有一个砌砖工有权力让与他合作的工人干得快些。只有通过讲方法标准化，使用最好的工具，采用最佳的工作条件，团结协作，才能保证加快工作速度。采用标准化的方法，展开合作的职责完全在于管理者。管理者必须不断让一位甚至多位老师向每位工人演示新的、更简单的动作；必须持续关注并帮助那些工作速度慢的工人，直到他们能提升至适当的工作速度。得到适当教导后，所有工人，只要他不能按照新方法以更快的速度工作，都会被管理者解雇。管理者也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工人们不会遵循这些严格的标准，也不会更努力地工作，除非他们能得到更多的报

酬。

All of this involves an individual study of and treatment for each man, while in the past they have been handled in large groups.

以上一切包括每名工人的个人研究与个别对待，而在过去，他们一直都被视为群体对待。

The *management* must also see that those who prepare the bricks and the mortar and adjust the scaffold, etc., for the bricklayers, cooperate with them by doing their work just right and always on time; and they must also inform each bricklayer at frequent intervals as to the progress he is making, so that he may not unintentionally fall off in his pace. Thus it will be seen that it is the assumption by the management of new duties and new kinds of work never done by employers in the past that makes this great improvement possible, and that, without this new help from the management, the workman even with full knowledge of the new methods and with the best of intentions could not attain these startling results.

此外，管理者也必须看到那些为砌砖工准备砖块和灰浆，调节支架的工人付出的辛苦，并通过恰当、及时地完成工作与砌砖工展开合作。他们还必须时不时地告知每位砌砖工其工作进展，这样一来，这个砌砖工就不会在无意间掉队。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多亏了管理者承担起以前的雇主从未履行过的新职责，做了那些雇主们以前从未做过的新工作，才让这项伟大的改进成为可能。如果没有管理者的帮助，纵使工人们完全掌握了新方法，怀着最好的工作动机，也不可能

取得这些惊人的成果。

Mr. Gilbreth's method of bricklaying furnishes a simple illustration of true and effective cooperation. Not the type of cooperation in which a mass of workmen on one side together cooperate with the management; but that in which several men in the management (each one in his own particular way) help each workman individually, on the one hand, by studying his needs and his shortcomings and teaching him better and quicker methods, and, on the other hand, by seeing that all other workmen with whom he comes in contact help and cooperate with him by doing their part of the work right and fast.

吉尔伯莱斯先生的砌砖方法是这种真实、有效的合作的简单例证。这种合作不是一群工人与管理者的合作，而是几位管理者以其独到的方式给予每个工人个别帮助：一方面，他们会研究这位工人的需求和缺点，传授给他更快更好的方法；另一方面，他们要了解与其接触的所有其他工人是否能通过更快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给予他帮助，并与他合作。

The writer has gone thus fully into Mr. Gilbreth's method in order that it may be perfectly clear that this increase in output and that this harmony could not have been attained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that is, by putting the problem up to the workman and leaving him to solve it alone) which has been the philosophy of the past. And that his success has been due to the use of the four elements which constitute the essenc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因此，笔者按顺序充分阐述了吉尔伯莱斯先生的办法，以证明这种产量的提高和工作的协调，不可能在过去遵循的原理："积极性加激励"的管理模式下实现（把问题留给工人自己解决）。吉尔伯莱斯先生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他利用了四大要素，它们共同构成科学管理的本质：

First. The development (by the management, not the workman) of the science of bricklaying, with rigid rules for each motion of every man, and the perfec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all implement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第一，由管理者而非工人提出并发展砌砖科学，包括每名工人每个动作的严格要求，以及所有工具和工作条件的完善和标准化。

Second. The careful selection and subsequent training of the bricklayers into first-class men, and the elimination of all men who refuse to or are unable to adopt the best methods.

第二，细心筛选、培训砌砖工人，让他们成为一流工人，淘汰所有拒绝或不能采用新方法的工人。

Third. Bringing the first-class bricklayer and the science of bricklaying together, through the constant help and watchfulness of the management, and through paying each man a large daily bonus for working fast and doing what he is told to do.

第三，让一流砌砖工了解砌砖科学。这一点可以通过管理者的持续帮助与监督，每天奖励工作迅速的员工。

Fourth. An almost equal division of the work and responsibility between the workman and the management. All day long the management work almost side by side with the men, helping, encouraging, and smoothing the way for them, while in the past they stood one side, gave the men but little help, and threw on to them almost the entire responsibility as to methods, implements, speed, and harmonious cooperation.

第四，近乎平等分配工人和管理者间的工作和职责。管理者一整天几乎都与工人待在一起，给予他们帮助、鼓励和便利。而以前，他们虽然站在工人旁边，但几乎不给予工人任何帮助，甚至还把包括方法、工具、速度以及协调合作等在内的近乎所有责任推给工人。

Of these four elements, the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bricklaying)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spectacular. Each of the three others is, however, quite as necessary for success.

在这四个要素中，第一个要素，即提出并发展砌砖科学，最有趣、最令人惊叹。而其他三个要素对成功也是必需的。

It must not be forgotten that back of all this, and directing it, there must be the optimistic, determined, and hard-working leader who can wait patiently as well as work.

我们切莫忘记，在这一切要素背后，一定要有乐观、坚定及刻苦的领导者，这位领导则技能耐心等待，又能做实事。

In most cases (particularly when the work to be done is intricate in its nat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four great elements of the new management. There are instances, however, in which the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the workman” counts for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在多数情况下，尤其是要做的工作从本质上讲很复杂的时候，在新型管理模式下的四大要素中，提出并发展发现科学是最重要的。然而，有许多实例证明“科学筛选工人”是重中之重。

A case of this type is well illustrated in the very simple though unusual work of inspecting bicycle balls.

检查自行车钢珠这一简单又不平常的工作能够很好地阐述这一点。

When the bicycle craze was at its height some years ago several million small balls made of hardened steel were used annually in bicycle bearings. And among the twenty or more operations used in making steel ball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was that of inspecting them after final polishing so as to remove all fire-cracked or otherwise imperfect balls before boxing.

前些年，人们狂热迷恋自行车时，每年需要使用几百万硬化钢做成的小钢珠制成自行车轴承。我们要需要20甚至更多程序方能制成这些钢珠，而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钢珠抛光后对钢珠的检验，这一步可以在装配前移除那些有裂痕或有瑕疵的钢珠，以确保所有钢珠都符合标准。

The writer was given the task of systematizing the largest bicycle ball factory in this country. This company had been running for from eight to ten years on ordinary day work before he undertook its reorganization, so that the one hundred and twenty or more girls who were inspecting the balls were “old hands” and skilled at their jobs. It is impossible even in the most elementary work to change rapidly from the old independence of individual day work to scientific cooperation.

笔者曾收到过一项任务：将本国最大的自行车钢珠制造厂系统化。在进行结构重组之前，这个工厂采用普通的计日工作运营了8-10年。因此检验这些钢珠的120多个女工都是“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工人。即使是最基本的工作，也不可能迅速从旧有的计日工作转变为科学合作。

In most cases, however, there exist certain imperfections in working conditions which can at once be improved with benefit to all concerned.

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工作条件中必然存在不完美之处，这些不完美可以即刻得到改善，从而使所有相关人员获益。

In this instance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spectors (girls) were working ten and one-half hours per day (with a Saturday half holiday.)

从这一例子中，我们发现这些检验员（女孩们）每天要工作10.5个小时（只在星期六有半天假）。

Their work consisted briefly in placing a row of small polished steel balls on the back of the left hand, in the crease between two of the fingers pressed together, and while they were rolled over and over, they were minutely examined in a strong light, and with the aid of a magnet held in the right hand, the defective balls were picked out and thrown into especial boxes. Four kinds of defects were looked for—dented, soft, scratched, and fire-cracked—and they were mostly so minute as to be invisible to an eye not especially trained to this work. It required the closest attention and concentration, so that the nervous tension of the inspectors was considerable,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comfortably seated and were not physically tired.

她们的工作包括以下几个过程：将一排已抛光的小钢珠放在左手背上，让它们在两只手之间的夹缝中滚动，在它们滚来滚去的过程中，通过强光的照射对其仔细检查。她们右手握着磁铁，挑出那些有缺陷的钢珠并把它们扔进特殊的盒子中。她们要找的缺陷有四种：凹痕、过软、刮痕和裂痕，这些缺陷极小，除非经过特殊训练，否则用肉眼根本无法看到。尽管检验员的座椅很舒服，她们自身也不感到疲惫，但完成这项工作的检验员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这样才能让其神经高度紧张。

A most casual study made it evident that a very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ten and one-half hours during which the girls were supposed to work was really spent in idleness because the working period was too long.

一个最随意的研究发现，由于工作周期过长，本该原本在一天中工作10.5个小时的女孩们在很长的工作时间内是无所事事的。

It is a matter of ordinary common sense to plan working hours so that the workers can really “work while they work” and “play while they play,” and not mix the two.

规划工作时间在常人看来就是让工人们能真正做到“在工作时工作，在玩的时候痛快玩”，而不是将二者掺杂在一起。

Before the arrival of Mr. Sanford E. Thompson, who undertook a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whole process, we decided, therefore, to shorten the working hours.

因此，我们决定，在对整个工作流程进行科学研究的桑福德·E. 汤普森先生到来之前减少工作时间。

The old foreman who had been over the inspecting room for years was instructed to interview one after another of the better inspectors and the more influential girls and persuade them that they could do just as much work in ten hours each day as they had

been doing in ten and one-half hours. Each girl was told that the proposition was to shorten the day's work to ten hours and pay them the same day's pay they were receiving for the ten and one-half hours.

多年来，负责检验室的领班接到指令，要与那些表现出众且影响力大的女检验员们进行一一面谈，说服她们每天要用10小时完成原来10.5个小时的工作。领班告诉这些女孩们，这项提议是为了将其工作时间缩短至10小时，并且支付给她们和原来工作10.5个小时一样的工资。

In about two weeks the foreman reported that all of the girls he had talked to agreed that they could do their present work just as well in ten hours as in ten and one-half and that they approved of the change. The writer had not been especially noted for his tact so he decided that it would be wise for him to display a little more of this quality by having the girls vote on the new proposition. This decision was hardly justified, however, for when the vote was taken the girls were unanimous that 10 1/2 hours was good enough for them and they wanted no innovation of any kind.

大约两周后，领班汇报说所有与他交谈过的女孩都同意可以在10小时内完成现在花10.5个小时完成的工作，并且很赞赏这种改变。笔者认为自己还没有那么聪明，所以决定采取让女孩对这项新提议进行投票表决的明智之举。然而，这项决定很难说它是合理的，因为这些女孩一致投票认为10.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已经足够了，她们不想要任何改革。

This settled the matter for the time being. A few months later tact was thrown to the winds and the working hours were arbitrarily shortened in successive steps to 10 hours, 9 1/2, 9, and 8 1/2 (the pay per day remaining the same); and with each shortening of the working day the output increased instead of diminishing.

这就暂时解决了时间问题。几个月后，工作时间任意地缩短到10小时、9.5个小时、9小时，直到8.5个小时（日工资保持不变）；而且每次缩短工作时间，产量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

The change from the old to the scientific method in this department was mad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r. Sanford E. Thompson, perhaps the most experienced man in motion and time study in this country, under the general superintendence of Mr. H. L. Gantt.

该部门从传统方法转变为科学方法是在桑福德·E. 汤普森先生的指导下实现的。而作为我国最有经验的研究动作与时间的桑福德·E. 汤普森先生则得到过H. L. 甘特先生的指导。

In the Physiological departments of our universities experiments are regularly conducted to determine what is known as the “personal coefficient” of the man tested. This is done by suddenly bringing some object, the letter *A* or *B* for instance, within the range of vision of the subject, who, the instant he recognizes the letter has to do some definite thing, such as to press a particular electric button. The time which elapses from the instant the letter

comes in view until the subject presses the button is accurately recorded by a delicate scientific instrument.

我们大学的生理实验室会定期进行一些生理科实验以确定测试者“个人系数”。以下是具体实验过程：突然给出测试者某些目标物（以字母A或B为例），测试者看到目标物后，即刻做出某些反应，如按下某个特定的电子按钮。一个敏锐的科学仪器会记录测试者从看到字母到按下按钮所用的精确时间。

This test shows conclusively that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personal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 men. Some individuals are born with unusually quick powers of perception accompanied by quick responsive action. With some the message is almost instantly transmitted from the eye to the brain, and the brain equally quickly responds by sending the proper message to the hand. Men of this type are said to have a low “personal coefficient,” while those of slow perception and slow action have a *high* “personal coefficient.”

从这项实验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不同人的“个人系数”存在很大的差异。某些人天生感知能力强，且反应迅速：眼睛看到某些信息后几乎马上向大脑发送信号，大脑通过向手传递适当信息也作出相应快速的反应。据说这种人“个人系数”低，而那些感知差，反应迟缓的人“个人系数”高。

Mr. Thompson soon recognized that the quality most needed for bicycle ball inspectors was a low “personal coefficient.” Of course the ordinary qualities of endurance and industry were also called for.

汤普森先生很快就意识到自行车钢珠检验员最需要具备的是低“个人系数”。当然，他们也需要具备耐性和勤劳的品质。

For the ultimate good of the girls as well as the company, however, it became necessary to exclude all girls who lacked a low “personal coefficient.” And unfortunately this involved laying off many of the most intelligent, hardest working, and most trustworthy girls merely because they did not possess the quality of quick perception followed by quick action.

然而，对于这些女检验员和公司的最终利益而言，将那些不具备低“个人系数”的女孩们解雇是十分必要的。遗憾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仅仅因为不具有快速感知及快速反应的品质，许多最为聪明、最为刻苦以及最为可信的女孩可能会被辞退。

While the gradual selection of girls was going on other changes were also being made.

在逐一筛选这些女孩的同时，还发生着其他的变革。

One of the dangers to be guarded against, when the pay of the man or woman is made in any way to depend on the quantity of the work done, is that in the effort to increase the quantity the quality is apt to deteriorate.

我们还要加以防范的是：由于产量决定工人的薪金，所以如果工人仅关注产品数量，就会使产品质量大打折扣。

It is necessary in almost all cases, therefore, to take definite steps to insure against any falling off in quality before moving in any way towards an increase in quantity. In the work of these particular girls quality was the very essence. They were engaged in picking out all defective balls.

因此，我们一般采用的方法是：先采取某些措施保证产品质量，再提高产量。工作质量对这些专门负责挑选有瑕疵的钢珠的女检验员而言至关重要。

The first step, therefore, was to make it impossible for them to slight their work without being found out. This was accomplished through what is known as over-inspection. Each one of four of the most trustworthy girls was given each day a lot of balls to inspect which had been examined the day before by one of the regular inspectors; the number identifying the lot to be over-inspected having been changed by the foreman so that none of the over-inspectors knew whose work they were examining. In addition to this one of the lots inspected by the four over-inspectors was examined on the following day by the chief inspector, selected on account of her especial accuracy and integrity.

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保证能及时发现这些女孩是否在工作时偷了懒。这一步可通过复查钢珠完成：挑选四名可信赖的女检验员承担复查任务，她们要检查检验员在前一天检验过的钢珠；由于领班事

先已打乱钢珠编码，复查员无法得知自己复查的是谁的检验成果。此外，挑选出的正直、追求精准的检验长在转天会对这四名复查员的复查成果作进一步检验。为了检验复查员是否诚实，复查结果是否精确，有一个有效的方法：领班每过两三天会特意准备一定数量的合格钢珠和存在缺陷的钢珠。检验员或复查员都无法分辨这些钢珠，从而可以提防她们中任何人对工作的怠慢和虚报。

An effective expedient was adopted for checking the honesty and accuracy of the over-inspection. Every two or three days a lot of balls was especially prepared by the foreman, who counted out a definite number of perfect balls, and added a recorded number of defective balls of each kind. Neither the inspectors nor the over-inspectors had any means of distinguishing this prepared lot from the regular commercial lots. And in this way all temptation to slight their work or make false returns was removed. After insuring in this way against deterioration in quality, effective means were at once adopted to increase the output. Improved day work was substituted for the old slipshod method. An accurate daily record was kept both as to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work done in order to guard against any personal prejudice on the part of the foreman and to insure absolute impartiality and justice for each inspector. In a comparatively short time this record enabled the foreman to stir the ambition of all the inspectors by increasing the wages of those who turned out a large quantity and good qual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lowering the pay of those who did indifferent work and discharging others who proved to be incorrigibly slow or careless. A careful examination was then made of the way in which each girl spent her time and an accurate time study was undertaken, through the use of a stop-watch and record blanks, to determine how fast each kind of inspection should be done, and to establish the exact conditions under which each girl could do her quickest and best

work, while at the same time guarding against giving her a task so severe that there was danger from over fatigue or exhaustion. This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the girls spent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ir time either in partial idleness, talking and half working, or in actually doing nothing.

采用这种方式，可以解雇那些试图怠工或虚报的工人。在保证工作质量之后，下一步要采取有效手段提高产量。经改进后的计日工作取代了旧有不负责任的做法。为避免领班产生偏见，确保每个检验员都受到公正对待，每天都要精确记录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不久后，所作的产品记录就能激发所有检验员的工作热情：那些出色的检验员可以加薪，那些表现平平的检验员会降薪，而那些无法提升工作效率的检验员会被辞退。随后，通过秒表计时，记录时间间隔，计算每个检验员的工作时间，进而精确研究时间，以决定每种检验的用时，并为每名检验员提供完美的工作条件，让她们最快最好地完成工作。此外，切莫让她们的工作过于繁重，这可能让她们过度劳累。该调查结果显示，检验员们大部分时间都相对空闲，或者边工作边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

Even when the hours of labor had been shortened from 10 1/2 to 8 1/2 hours, a close observation of the girls showed that after about an hour and one-half of consecutive work they began to get nervous. They evidently needed a rest. It is wise to stop short of the point at which overstrain begins, so we arranged for them to have a ten minutes period for recreation at the end of each hour and one quarter. During these recess periods (two of ten minutes each in the morning and two in the afternoon) they were obliged to stop work and were encouraged to leave their seats and get a complete change of occupation by walking around and talking, etc.

仔细观察这些检验员后，我们发现尽管已将她们的工作时间从10.5个小时缩短至8.5个小时，但在连续工作1.5个小时之后她们仍会表现出忧虑焦躁。显然，她们需要休息，疲惫时罢工一小会儿以调整状态是明智的。因此，每工作1小时15分钟，我们都会安排这些女孩们休息10分钟。我们强迫她们在休息时（上下午各两次），停下手中的工作，建议她们离开座位，去散步或与他人聊天。

In one respect no doubt some people will say that these girls were brutally treated. They were seated so far apart that they could not conveniently talk while at work.

毋庸置疑，一些人会说如此对待这些女孩太过残酷。她们彼此的座位离得很远，工作时根本不便于交谈。

Shortening their hours of labor, however, and providing so far as we knew the most favorable working conditions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m to really work steadily instead of pretending to do so.

但如果减少她们的工作时间，为她们提供迄今最佳的工作条件，她们就能够踏实工作，而不会怠工。

And it is only after this stage in the reorganization is reached, when the girls have been properly selected and on the one hand such precautions have been taken as to guard against the possibility of over-driving them,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temptation to slight their work has been removed and the most favorable working condition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at the final step should be taken

which insures them what they most want, namely, *high wages,* and the employers what they most want, namely, the maximum output and best quality of work, which means *a low labor cost.*

只有结构重组达到了这一阶段，即合理地挑选出检验员，同时一方面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过度驱使她们，另一方面打消她们怠工的念头并创建有利的工作条件，才能采取最后一步，确保她们得到最想要的高工资，确保雇主得到他们最想要的高产量和最优质的工作，因为这意味着低劳动力成本。

This step is to give each girl each day a carefully measured task which demands a full day's work from a competent operative, and also to give her a large premium or bonus whenever she accomplishes this task.

下一步是每天给每个女孩分配一份经仔细测量的任务，这需要一位能干的技工干上一整天，同时无论她何时完成这项任务，都要给予她一大笔奖金或红利。

This was done in this case through establishing what is known as differential rate piece work. [3_5] Under this system the pay of each girl was increased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f her output and also still more in proportion to the accuracy of her work.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建立差别计件工资制度 [4_5] 可以实现上述情况。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女孩的工资与她的产量成正比，也与其工作准确度成正比。

As will be shown later, the differential rate (the lots inspected by the over-inspectors forming the basis for the differential) resulted in a large gain in the quantity of work done and at the same time in a marked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后文将显示，差别计件（复查员检验的物品为这一差别奠定了基础）大大提高了工作的产量，也明显改善了工作质量。

Before they finally worked to the best advantage it was found to be necessary to measure the output of each girl as often as once every hour, and to send a teacher to each individual who was found to be falling behind to find what was wrong, to straighten her out, and to encourage and help her to catch up.

在她们最终圆满完成任务前，我们有必要每隔1小时测量一次每个女孩的产量，只要发现哪个女孩工作进度落后了，就要派一名老师去找出她的问题所在，帮助她及时改正以跟上大家的进度。

There is a general principle back of this which should be appreciated by all of those who ar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the management of men.

在这背后，是一个所有对员工管理感兴趣的人应该明白的总原则。

A reward, if it is to be effective in stimulating men to do their best work, must come soon after the work has been done. But few men are able to look forward for more than a week or perhaps at most a month, and work hard for a reward which they are to receive at the end of this time.

如果想让奖金有效激励工人竭尽所能去工作，就必须在他们完成工作后马上兑现。但几乎没有人期望为了获得奖金，要努力工作一周多或近一个月。

The average workman must be able to measure what he has accomplished and clearly see his reward at the end of each day if he is to do his best. And more elementary characters, such as the young girls inspecting bicycle balls, or *children,* for instance, should have proper encouragement either in the shape of personal attention from those over them or an actual reward in sight as often as once an hour.

普通工人必须能估算自己已完成的工作，认清如果他竭尽所能，自己每天结束工作后能得到多少奖励。那些只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工人，如检查自行车钢珠的年轻女孩或孩童，应该得到适当的鼓励，这种鼓励可以是来自领导的关注，也可以是每个小时都能见到的实际奖励。

This is one of the principal reasons why cooperation or “profit-sharing” either through selling stock to the employees or through dividends on wages received at the end of the year, etc., have been at the best only mildly effective in stimulating men to work hard.

The nice time which they are sure to have to-day if they take things easily and go slowly proves more attractive than steady hard work with a possible reward to be shared with others six months later. A second reason for the inefficiency of profit-sharing schemes had been that no form of cooperation has yet been devised in which each individual is allowed free scope for his personal ambition. Personal ambition always has been and will remain a more powerful incentive to exertion than a desire for the general welfare. The few misplaced drones, who do the loafing and share equally in the profits, with the rest, under cooperation are sure to drag the better men down toward their level. Other and formidable difficulties in the path of cooperative schemes are, the equitable division of the profits, and the fact that, while workmen are always ready to share the profits, they are neither able nor willing to share the losses. Further than this, in many cases, it is neither right nor just that they should share either the profits or the losses, since these may be due in great part to causes entirely beyond their influence or control, and to which they do not contribute.

这就是为什么通过向员工售卖股票或在年底分红的方式与员工进行合作或“分享收益”不能有效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证明，他们每天不紧不慢地工作所度过的美好时光比踏实努力工作半年后得到的与同事共享的奖励更有吸引力。分红制度低效的第二个原因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合作形式能允许工人自由追求其个人抱负。与公共福利相比，实现个人抱负更能鼓励工人充分发挥其工作能力。少量置于错误工作岗位上的磨洋工与他人平等分享所得。在与他人的合作中，这些人一定会拖累那些更优秀的工人，甚至将他们的水平拉到和自己一样的水平。在合作的过程中其他令人畏惧的困难是公平分配利润。事实上，虽然工人们总是计划与他人分享利润，但他们既不能够也不愿意与他人分担损失。此外，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分享利润抑或分担损失既不正确也不公正，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完

全不在他们的影响或控制下的，他们对此没有任何的贡献。

To come back to the girls inspecting bicycle balls, however, the final outcome of all the changes was that *thirty-five girls did the work formerly done by one hundred and twenty*. And that the *accuracy of the work at the higher speed was two-thirds greater than at the former slow speed.*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些检验自行车钢珠的女孩们，经过改进后，35个女孩完成了以前需要120个人完成的工作。而且她们在保障快速完成工作的同时，其工作的精准度比以前慢速工作时还要高出三分之二。

The good that came to the girls was,

这些女孩可以得到以下好处：

First. That they averaged from 80 to 100 per cent higher wages than they formerly received.

第一，她们可以加薪80%-100%。

Second. Their hours of labor were shortened from 10 1/2 to 8 1/2 per day, with a Saturday half holiday. And they were given four recreation periods properly distributed through the day, which

made overworking impossible for a healthy girl.

第二，她们每天的工作时长由原来的10.5个小时减少至8.5个小时。此外，她们每天都有四次休息间歇，因此不会让一个健康的女孩超负荷工作。

Third. Each girl was made to feel that she was the object of especial care and interest on the part of the management, and that if anything went wrong with her she could always have a helper and teacher in the management to lean upon.

第三，每个女孩都得到了管理层的特别关照和关注。因此，一旦出现问题，她可以从管理层寻求帮助和指导。

Fourth. All young women should be given two consecutive days of rest (with pay) each month, to be taken whenever they may choose. It is my impression that these girls were given this privilege, although I am not quite certain on this point.

第四，每个年轻的女孩每个月都有为期两天的带薪休假，且她们可自由选择在哪两天休假。尽管我不是很确定，但我确实记得女孩们都获得了这项特权。

The benefits which came to the company from these changes were:

公司则可以得到以下好处：

First. A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第一，公司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Second. A material reduction in the cost of inspection, in spite of the extra expense involved in clerk work, teachers, time study, over-inspectors, and in paying higher wages.

第二，尽管多出了雇佣办事员、教师、时间研究员和复查员的成本，还为工人支付了更高的工资，但检验的成本却大大降低了。

Third. That the most friendly relations existed between the management and the employees, which rendered labor troubles of any kind or a strike impossible.

第三，公司和雇员之间关系友善，从而几乎无工人罢工或与公司产生劳动纠纷。

These good results were brought about by many changes which substituted favorable for unfavorable working conditions. It should be appreciated, however, that the one element which did more than all of the others was, the careful selection of girls with quick perception to replace those whose perceptions were slow—(the

substitution of girls with a low personal coefficient for those whose personal coefficient was high)—the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the workers.

由于有利的工作条件取代了不利的工作条件，这些改变带来了佳绩。然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有一个因素比其他因素都重要，即细心挑选女孩，以感知快的女工取代感知慢的女工（以“个人系数”低的女工取代“个人系数”高的女工），这是科学选择工人的方法。

The illustrations have thus far been purposely confined to the more elementary types of work, so that a very strong doubt must still remain as to whether 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is desirable in the case of more intelligent mechanics, that is, in the case of men who are more capable of generalization, and who would therefore be more likely, of their own volition, to choose the more scientific and better methods. The following illustrations will be given for the purpose of demonstrating the fact that in the higher classes of work the scientific laws which are developed are so intricate that the high-priced mechanic needs (even more than the cheap laborer) the cooperation of men better educated than himself in finding the laws, and then in selecting, developing, and training him to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laws. These illustrations should make perfectly clear our original proposition that in practically all of the mechanic arts the science which underlies each workman's act is so great and amounts to so much that the workman who is best suited to actually doing the work is incapable, either through lack of education or through insufficient mental capacity, of understanding this science.

截至目前，作者有意识地列举一些与更基本的工作种类相关的实例。因此，读者必定会产生强烈的怀疑：这种合作是否是那些比较聪明的技工们，即那些总结能力强也因此更有可能自愿选择更科学、更好方法的人？笔者将以下面的例子论证：在更高级的工种中，发展的科学规律很复杂，因此昂贵的技工比廉价的技工更需要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合作以探寻这些规律，然后挑选、培养和训练这名工人按这些规律做事。这些实例应该清晰阐述我们之前的假设，即实际上，所有的技工工艺都是每位工人行为背后所蕴含的科学，它极为深奥，就算是最适合做这项工作的工人也会由于缺乏教育或心智不足，无法理解这门科学。

A doubt, for instance, will remain in the minds perhaps of most readers (in the case of an establishment which manufactures the same machine, year in and year out, in large quantities, and in which, therefore, each mechanic repeats the same limited series of operations over and over again), whether the ingenuity of each workman and the help which he from time to time receives from his foreman will not develop such superior methods and such a personal dexterity that no scientific study which could be made would result in a material increase in efficiency.

例如，大多数读者可能会心存疑问（在一家企业一年接一年地大量生产同种机器的情况下，每台机器反复重复相同且有限的操作序列）：每个工人的智力以及他时不时从工头得到的帮助是否能助他形成独特超前的方法和一种个人的技艺（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呢？

A number of years ago a company employing about three hundred men, which had been manufacturing the same machine for

ten to fifteen years, sent for us to report as to whether any gain could be made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ir shops had been run for many years under a good superintendent and with excellent foremen and workmen, on piece work. The whole establishment was, without doubt, in better physical condition than the average machine-shop in this country. The superintendent was distinctly displeased when told that through the adoption of task management the output, with the same number of men and machines, could be more than doubled. He said that he believed that any such statement was mere boasting, absolutely false, and instead of inspiring him with confidence, he was disgusted that any one should make such an impudent claim. He, however, readily assen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he should select any one of the machines whose output he considered as representing the average of the shop, and that we should then demonstrate on this machine that through scientific methods its output could be more than doubled.

几年前，一家连续10-15年都制造同一种机器的公司（公司大约共有300名工人）派人邀请我去他们公司，以引进科学管理方法能够带来的收益为题作一个报告。多年来，他们公司的车间在一位出色主管的带领下及杰出的计件工工头和工人的合作下运转。毋庸置疑，整个企业的车间条件高于本国平均水平。听说采用任务管理制度，可以在雇佣同样多工人，操作相同数目的机器的条件下可以使产量翻一番后，主管很不悦。他说他认为这种说辞不过是吹牛罢了，绝对是谣言。这样轻率的说法非但不会增强他的信心，只会令他作呕。然而，他还是答应接受这项提议，即他可以挑选任何一台他认为最能代表全车间平均水平的机器，然后用科学方法证明这台机器可以使产量翻一番。

The machine selected by him fairly represented the work of the shop. It had been run for ten or twelve years past by a first-class mechanic who was more than equal in his ability to the average workmen in the establishment. In a shop of this sort, in which similar machines are made over and over again, the work is necessarily greatly subdivided, so that no one man works upon more than a comparatively small number of parts during the year. A careful record was therefore made, in the presence of both parties, of the time actually taken in finishing each of the parts which this man worked upon. The total time required by him to finish each piece, as well as the exact speeds and feeds which he took, were noted, and a record was kept of the time which he took in setting the work in the machine and removing it. After obtaining in this way a statement of what represented a fair average of the work done in the shop, we applied to this one machine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他所挑选的机器公正地代表了车间的工作情况。在过去的10-12年间，一名一流的技工一直在操作这台机器。他的能力略高于该企业中工人的平均水平。在这种重复生产同样机器的车间里，我们有必要将工作进行细分，从而保证每名工人在全年所做的工作仅仅限于相对少量的零部件上。因此，在双方均在场时，我们仔细记录了这个工人完成所负责的每个部件的实际用时，记录了他完成每个部件所需的总时间，他送料的速度、调整及拆卸机器的时间等。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报表，代表了该车间平均的工作情况，接下来，我们便将科学管理原则应用到这台机器上。

By means of four quite elaborate slide-rules, which have been especially made for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 the all-round capacity of metal-cutting machines, a careful analysis was made of

every element of this machine in its relation to the work in hand. Its pulling power at its various speeds, its feeding capacity, and its proper speeds were determined by means of the slide-rules, and changes were then made in the countershaft and driving pulleys so as to run it at its proper speed. Tools, made of high-speed steel, and of the proper shapes, were properly dressed, treated, and ground.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however, that in this case the high-speed steel which had heretofore been in general use in the shop was also used in our demonstration.) A large special slide-rule was then made, by means of which the exact speeds and feeds were indicated at which each kind of work could be done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in this particular lathe. After preparing in this way so that the workman should work according to the new method, one after another, pieces of work were finished in the lathe, corresponding to the work which had been done in our preliminary trials, and the gain in time made through running the machine according to scientific principles ranged from two and one-half times the speed in the slowest instance to nine times the speed in the highest.

利用这把专为确定金属切割机的最大功率而制作的计算尺，我们认真分析了这台机器的每一部分与手头工作间的关系。利用计算尺，我们可以确定这台机器在不同速度运转下的拉力，其传动能力及其合理速度，继而为使其以适当速度运转，我们要调整它的中间轴和传动皮带轮。以高速钢按照适当的形状制成的工具可以得到适当的加工、处理和打磨（然而，我们应该明白，在这个例子中，高速钢不仅在以前在车间里普遍使用，而且也同样用于我们的展示中）。接下来，我们又做了一把特殊的大计算尺，用以指示准确的速度和传送率，从而保证用最短的时间完成这部特定车床上相关的各项工作。按照这种方式做好准备后，工人应该按照新方法一件接一件地完成车床上的计件工作。根据我们在之前的试验中所做的工作以及按照科学原则运转机器所获得的时间效益，工人完成工作的速度最慢的相当于原来的1.5-2

倍，而最快的则相当于原来的9倍。

The change from rule-of-thumb management to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volves, however, not only a study of what is the proper speed for doing the work and a remodeling of the tools and the implements in the shop, but also a complete change in the mental attitude of all the men in the shop toward their work and toward their employers. The physical improvements in the machines necessary to insure large gains, and the motion, study followed by minute study with a stop-watch of the time in which each workman should do his work, can be made comparatively quickly. But the change in the mental attitude and in the habits of the three hundred or more workmen can be brought about only slowly and through a long series of object-lessons, which finally demonstrates to each man the great advantage which he will gain by heartily cooperating in his every-day work with the men in the management. Within three years, however, in this shop, the output had been more than doubled per man and per machine. The men had been carefully selected and in almost all cases promoted from a lower to a higher order of work, and so instructed by their teachers (the functional foremen) that they were able to earn higher wages than ever before. The average increase in the daily earnings of each man was about 35 per cen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sum total of the wages paid for doing a given amount of work was lower than before. This increase in the speed of doing the work, of course, involved a substitution of the quickest hand methods for the old independent rule-of-thumb methods, and an elaborate analysis of the hand work done by each man. (By hand work is meant such work as depends upon the manual dexterity and speed of a workman, and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the work done by the machine.) The time saved by scientific hand work was in many

cases greater even than that saved in machine-work.

以科学管理替代依靠经验原则的管理模式包含的不仅是要研究完成工作的适当速度及对车间工具的重塑，还包含车间所有工人对待其工作和其雇主态度的完全转变。机器的改进是保证确保获得巨大收益的必要条件。接下来，利用秒表仔细观察每个工人干活应该需要的时间，这一步可以较快完成。但是，只有通过一系列有目的性的课程才能改变三百多名工人态度及习惯，这可以向每位工人证明每天与管理层通力合作完成工作可以使他们获利。然而，在三年内，该车间每位工人和每台机器的产量都翻了一番还多。几乎所有经过精心挑选的工人在工作上都有所提升（从低级向高级工作提升），他们的老师（责任领班）教导他们说，他们可以比以前挣得更多。每个工人平均每天的工资上涨35%左右；与此同时，做某一特定工作所得的总收入比以前要低。当然，完成工作速度的提升包含以最快的手工劳作替代传统独立的经验原则方法，以及详细分析每名工人所做的手工作业。（手工作业指依靠工人的手工技巧和速度所做的工作，与机器完成的工作无关）。科学的手工劳作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比机器作业节省更多的时间。

It seems important to fully explain the reason why, with the aid of a slide-rule, and after having studied the art of cutting metals, it was possible for the scientifically equipped man, who had never before seen these particular jobs, and who had never worked on this machine, to do work from two and one-half to nine times as fast as it had been done before by a good mechanic who had spent his whole time for some ten to twelve years in doing this very work upon this particular machine. In a word, this was possible because the art of cutting metals involves a true science of no small magnitude, a science, in fact, so intricate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any machinist who is suited to running a lathe year in and year out

either to understand it or to work according to its laws without the help of men who have made this their specialty. Men who are unfamiliar with machine-shop work are prone to look upon the manufacture of each piece as a special problem, independent of any other kind of machine-work. They are apt to think, for instance, that the problems connected with making the parts of an engine require the especial study, one may say almost the life study, of a set of engine-making mechanics, and that these problems are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which would be met with in machining lathe or planer parts. In fact, however, a study of those elements which are peculiar either to engine parts or to lathe parts is trifling, compared with the great study of the art, or science, of cutting metals, upon a knowledge of which rests the ability to do really fast machine-work of all kinds.

为什么有了计算尺的辅助，以及在研究了切割金属的工艺后，一个以前从未操作过机器，也从未见过这些特殊的工作，却懂得科学的工人能比10-12年来一直使用这台特定的机器从事这种工作的一名杰出技工的工作速度还要快2.5-9倍？看来，充分解释一下其中原因至关重要。简言之，以上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切割金属的工艺包含一门重大的真正科学。实际上，这门科学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如果没有相关专业人士的帮助，即使胜任这项工作的技工，经年累月操作一台机床，也不可能弄懂它的原理，或依照其规律去干活。不熟悉机械加工的人们倾向于将制作每件产品视为与所有机械加工无关的一个特殊问题。例如，他们会觉得与制作引擎零部件相关的问题需要做特别的研究，你也可以将其称为对引擎制作工艺毕生的研究，而这些问题与制作机床或刨床部件时面对的问题截然不同。但事实上，与对金属切割工艺或科学的研究相比，那些对引擎零部件或机床零部件的研究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前者可以让人们真正有能力完成各类机械加工。

The real problem is how to remove chips fast from a casting or a forging, and how to make the piece smooth and true in the shortest time, and it matters but little whether the piece being worked upon is part, say, of a marine engine, a printing-press, or an automobile. For this reason, the man with the slide rule, familiar with the science of cutting metals, who had never before seen this particular work, was able completely to distance the skilled mechanic who had made the parts of this machine his specialty for years. It is true that whenever intelligent and educated men find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making progress in any of the mechanic arts rests with them, instead of upon the workmen who are actually laboring at the trade, that they almost invariably start on the road which lead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science where, in the past, has existed mere traditional or rule-of-thumb knowledge. When men, whose education has given them the habit of generalizing and everywhere looking for laws, find themselves confronted with a multitude of problems, such as exist in every trade and which have a general similarity one to another,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y should try to gather these problems into certain logical groups, and then search for some general laws or rules to guide them in their solution. As has been pointed out, however,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that is, the underlying philosophy of this management, necessarily leaves the solution of all of these problems in the hands of each individual workman, while the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places their solu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management. The workman's whole time is each day taken in actually doing the work with his hands, so that, even if he had the necessary education and habits of generalizing in his thought, he lacks the time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developing these laws, because the study of even a simple law involving say time study requires the cooperation of two men, the one doing the work while the other times him with a stop-watch.

And even if the workman were to develop laws where before existed only rule-of-thumb knowledge, his personal interest would lead him almost inevitably to keep his discoveries secret, so that he could, by means of this special knowledge, personally do more work than other men and so obtain higher wages.

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快速将铸件或锻件上的切屑清除，如何利用最短的时间，精确完成这个铸件或锻件，且保证其光滑，而这个铸件或锻件究竟是一台海用引擎、一台印刷机还是一辆汽车上的，并不重要。基于此，使用计算尺且熟悉金属切割科学的工人，虽然他以前从未见过这种特殊的工作，但他能远远超过那个多年来一直以制作这种机器零部件为专业的技能娴熟的技工。无论何时，聪明而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发现，改进机械工艺的职责在他们身上，而不是在那些实际工作的工人身上，他们几乎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踏上一条通向科学的路，过去那里只存在传统的经验原则。当教育让人们习惯于总结并到处探索规律时，人们就会发现自己面临着许多问题，如各行各业都存在问题且这些问题彼此很相似。毫无疑问，他们应尝试收集这些问题并将其合理分类，然后，寻找一些通用的规律或规则，指导他们解决问题。然而，正如前文指出的，在“积极性加激励”管理模式下，将这些问题全部交由工人们去解决是必要的；而科学管理模式将问题交由管理者去解决。每天，工人的全部时间实际花在用双手去工作上。这样一来，即使他接受过必要的教育，思考时习惯总结，但他缺少形成这些规律的时间和机遇。因为即使是研究一条简单的规律，如时间研究，也需要两个人的合作——其中一人工作，另一人用秒表为他计时。此外，即使这个工人能提出一些规律（以前只有经验原则的相关知识），他的个人利益几乎会让他不可避免地对其发现保密，这样他才能利用这种特殊的知识，让自己比他人做得多，拿到比他人更高的工资。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becomes

the duty and also the pleasure of those who are engaged in the management not only to develop laws to replace rule of thumb, but also to teach impartially all of the workmen who are under them the quickest ways of working. The useful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ese laws are always so great that any company can well afford to pay for the time and the experiments needed to develop them. Thus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exact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methods are everywhere, sooner or later, sure to replace rule of thumb, whereas under the old type of management working in accordance with scientific laws is an impossibility.

另一方面，在科学管理模式下，管理者不仅需要以规律取代经验原则，还要公正地教导所有在他手下工作的工人如何最快地完成工作，这不仅使他的职责，也是他的乐趣所在。利用这些规律取得的成果总是客观的，任何公司都愿意为研究这些规律所需的时间和试验买单。因此，在科学管理模式下，确切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迟早会取代经验原则。而在传统管理模式下不可能做到依照科学规律做事。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 or science of cutting metals is an apt illustration of this fact. In the fall of 1880, about the time that the writer started to make the experiments above referred to, to determine what constitutes a proper day's work for a laborer, he also obtained the permission of Mr. William Sellers, the President of the Midvale Steel Company, to make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to determine what angles and shapes of tools were the best for cutting steel, and also to try to determine the proper cutting speed for steel. At the time that these experiments were started it was his belief that they would not last longer than six months, and, in fact, if it had been known that a longer period than this would be required, the permission to spend a considerable sum of money in making

them would not have been forthcoming.

发展切割金属工艺或科学是一个合适的实例。1880年秋天，笔者刚开始进行上述实验，以确定一名工人每天适当的工作量。得到了中部溪谷钢铁公司总裁威廉·塞勒斯先生的同意后，笔者又做了一系列实验以确定切割金属工具的最佳角度和最佳形状同时以及切割钢材的适当速度。在这些实验开始时，笔者认为这些实验不会超过六个月。而事实上，要是知道这些实验会耗费更长的时间，笔者就不会得到花费巨资进行这些实验的许可了。

A 66-inch diameter vertical boring-mill was the first machine used in making these experiments, and large locomotive tires, made out of hard steel of uniform quality, were day after day cut up into chips in gradually learning how to make, shape, and use the cutting tools so that they would do faster work. At the end of six months sufficient practical information had been obtained to far more than repay the cost of materials and wages which had been expended in experimenting. And yet the comparatively small number of experiments which had been made served principally to make it clear that the actual knowledge attained was but a small fraction of that which still remained to be developed, and which was badly needed by us, in our daily attempt to direct and help the machinists in their tasks.

首先用来做这些实验的机器是直径66英寸的立式镗床，经过一天天切割那些用质量相同的硬质钢制成的大机车轮箍，笔者逐渐了解到，如何制作、塑造并使用切割工具让其加快工作速度。六个月后，笔者已收集到足够的实际信息，其价值远远超过做实验所花费的物料及工资成本。然而，这些相对较少的实验已能清晰说明：实际获得的

知识只是仍待发展的一小部分，而我们在每天知道、帮助这些技工完成任务时则迫切需要这些知识。

Experiments in this field were carried on, with occasional interruption, through a period of about 26 years, in the course of which ten different experimental machines were especially fitted up to do this work. Between 30,000 and 50,000 experiments were carefully recorded, and many other experiments were made, of which no record was kept. In studying these laws more than 800,000 pounds of steel and iron was cut up into chips with the experimental tools, and it is estimated that from $150,000 to $200,000 was spent in the investigation.

随着间歇性的中断，有关这一领域的实验前前后后进行了26年左右，在这期间，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一共配置了十台不同的实验机器。我们认真记录了30000-50000次试验，当然还有许多我们做过但没有记录的实验。在研究这些规律的过程中，我们使用实验仪器一共把80万磅重的钢铁切割成了碎屑。据估计，我们花费约150000-200000美元用于调查。

Work of this character is intensely interesting to any one who has any lov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however, it should be fully appreciated that the motive power which kept these experiments going through many years, and which supplied the money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their accomplishment, was not an abstract search after scientific knowledge, but was the very practical fact that we lacked the exact information which was needed every day, in order to help our machinists to do their work in the best way and in the quickest time.

只要是喜爱科学研究的人都会对这种性质的工作感兴趣。但是，从本文的写作目的来看，我们应充分了解，这些实验能持续多年进行并能为实验的成功提供资金与机遇的动力并不是对科学知识的抽象探索，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缺少必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帮助技工们每天以最佳方式，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工作。

All of these experiments were made to enable us to answer correctly the two questions which face every machinist each time that he does a piece of work in a metal-cutting machine, such as a lathe, planer, drill press, or milling machine. These two questions are:

我们所做的全部实验可以让我们准确回答每个技工每次利用一台金属切割机的车床、钻床或铣床时会遇到的两个问题：

In order to do the work in the quickest time,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工作。

At what cutting speed shall I run my machine? And

我在操作机器时应该让机器保持多快的切削速度？

What feed shall I use?

我应该使用何种进料？

They sound so simple that they would appear to call for merely the trained judgment of any good mechanic. In fact, however, after working 26 year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answer in every case involves the solution of an intricate mathematical problem, in which the effect of twelve independent variables must be determined.

这听起来十分简单，看起来所有经过培训的优秀技工都能作出回答。然而，事实上，我们发现，这些技工在工作了26年后，每一种情况下所做的回答都要解决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确定12个自变量的影响。

Each of the twelve following variables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upon the answer. The figures which are given with each of the variables represent the effect of this element upon the cutting speed. For example, after the first variable (A) we quote, “The proportion is as 1 in the case of semi-hardened steel or chilled iron to 100 in the case of a very soft, low-carbon steel.” The meaning of this quotation is that soft steel can be cut 100 times as fast as the hard steel or chilled iron. The ratios which are given, then, after each of these elements, indicate the wide range of judgment which practically every machinist has been called upon to exercise in the past in determining the best speed at which to run the machine and the best feed to use.

下面这12个变量都对回答上述问题至关重要。每个变量给出的数字代表这一因素对切割速度的影响。例如，我们在第一个变量（A）后引述："半硬钢或冷铁与柔软的低碳钢的比例为1：100。"这段引述表明切割软钢的速度是切割软钢或冷铁的100倍。那么，提供了所有这些因素的比例后，我们不难看出每个技工实际上作出判断的范围很广。而在过去，每名技工要在工作后才能决定运转机器的最佳速度及应该使用何种最佳进料。

(A) The quality of the metal which is to be cut; *i.e.,* its hardness or other qualities which affect the cutting speed. The proportion is as 1 in the case of semi-hardened steel or chilled iron to 100 in the case of very soft, low-carbon steel.

（A）切削金属的性质；例如，其硬度或其他影响切割速度的性质。半硬钢或冷铁为与柔软的低碳钢的比例为1：100。

(B)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steel from which the tool is made, and the heat treatment of the tool. The proportion is as 1 in tools made from tempered carbon steel to 7 in the best high-speed tools.

（B）制作工具的钢的化学构成及工具的热处理，中碳钢工具与最佳高速工具的比例为1：7。

© The thickness of the shaving, or, the thickness of the spiral strip or band of metal which is to be removed by the tool. The

proportion is as 1 with thickness of shaving 3/16 of an inch to 3 1/2 with thickness of shaving 1/64 of an inch.

（C）刨削厚度或工具切割金属的螺旋条或带的厚度。其比例为1（每英寸刨削3/16）：3.5（每英寸刨削1/64）。

(D) The shape or contour of the cutting edge of the tool. The proportion is as 1 in a thread tool to 6 in a broad-nosed cutting tool.

（D）工具切割边沿的形状或轮廓。线型工具与宽鼻工具的比例为1：6。

(E) Whether a copious stream of water or other cooling medium is used on the tool. The proportion is as 1 for tool running dry to 1.41 for tool cooled by a copious stream of water.

（E）工具是否利用源源不断的水流或其他冷却剂。工具干燥时运转与工具经水流冷却后运转的比例为1：1.14。

(F) The depth of the cut. The proportion is as 1 with 1/2 inch depth of cut to 1.36 with 1/8 inch depth of cut.

（F）切割的深度。1英寸的切割深度与1/2英寸的切割深度的比例为1：1.36。

(G) The duration of the cut, *i.e.,* the time which a tool must last under pressure of the shaving without being reground. The proportion is as 1 when tool is to be ground every 1 1/2 hours to 1.20 when tool is to be ground every 20 minutes.

（G）切割的持续时间，例如：在不再磨切时某个工具必须承受压力的时间。工具每1.5小时被触碰一次与工具每20分钟被触碰一次的比例为1：1.20。

(H) The lip and clearance angles of the tool. The proportion is as 1 with lip angle of 68 degrees to 1.023 with lip angle of 61 degrees.

（H）工具口和间隙角。工具口角度为68°与工具口角度为61°时的比例为1：1.023。

(J) The elasticity of the work and of the tool on account of producing chatter. The proportion is as 1 with tool chattering to 1.15 with tool running smoothly.

（J）震颤时操作与工具的弹性。工具震颤时与工具平稳运转时的比例为1：1.15。

(K) The diameter of the casting or forging which is being cut.

（K）正在被切割的铸件或锻件的直径。

(L) The pressure of the chip or shaving upon the cutting surface of the tool.

（L）切削或刨削对工具切割表面的压力大小。

(M) The pulling power and the speed and feed changes of the machine.

（M）机器的拉力、速度和进料改变。

It may seem preposterous to many people that it should have required a period of 26 year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se twelve variables upon the cutting speed of metals. To those, however, who have had personal experience as experimenters, it will be appreciated that the great difficulty of the problem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contains so many variable elements. And in fact the great length of time consumed in making each single experiment was caused by the difficulty of holding eleven variables constant and uniform throughout the experiment, while the effect of the twelfth variable was being investigated. Holding the eleven variables constant was far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welfth element.

对于许多人来说，花费26年的时间去调查这12个变量对金属切割

速度的影响十分荒唐。然而，那些具有亲身经验的实验人员认为，问题的最大困难在于它所涉及的变量实在太多。事实上，每个单项试验耗时之久是因为在整个研究12个变量的影响这一实验过程中让其他11个变量保持恒定十分困难。让11个变量保持不变远比研究第12个因素困难得多。

As, one after another, the effect upon the cutting speed of each of these variables was investigated, in order that practical use could be made of this knowledge, it was necessary to find a mathematical formula which expressed in concise form the laws which had been obtained. As examples of the twelve formulae which were developed, the three following are given:

我们逐一对这12个变量对切割速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为了实际利用这种知识，我们还必须总结出一个能准确表达这些已发现的规律的数学公式。我们以总结了12个公式，以下列举其中3个作以说明：

After these laws had been investigated and the various formulae which mathematically expressed them had been determined, there still remained the difficult task of how to solve one of these complicated mathematical problems quickly enough to

make this knowledge available for every-day use. If a good mathematician who had these formula before him were to attempt to get the proper answer (*i.e.,* to get the correct cutting speed and feed by working in the ordinary way) it would take him from two to six hours, say, to solve a single problem; far longer to solve the mathematical problem than would be taken in most cases by the workmen in doing the whole job in his machine. Thus a task of considerable magnitude which faced us was that of finding a quick solution of this problem, and as we made progress in its solution, the whole problem was from time to time presented by the writer to one after another of the noted mathematicians in this country. They were offered any reasonable fee for a rapid, practical method to be used in its solution. Some of these men merely glanced at it; others, for the sake of being courteous, kept it before them for some two or three weeks. They all gave us practically the same answer: that in many cases it was possible to solve mathematical problems which contained four variables, and in some cases problems with five or six variables, but that it was manifestly impossible to solve a problem containing twelve variables in any other way than by the slow 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

研究了这些规律，也总结出能准确表达这些规律的数学公式后，我们仍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如何能快速解决这些复杂的数学问题以供人们每天应用这方面的知识。面对这些公式，如果出色的数学家想要寻找到正确的答案（如，在普通的方式工作以获得合适的切割速度和进料），他会花费2-6小时解决其中一个问题。而解决这个数学问题要比多数情况下工人们操作机器已完成全部工作耗时更长。因此，我们面对的一项艰巨任务是找到这一问题的快速解决方案。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笔者时常向国内知名数学家请教这一问题。如果他们能快速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法以解决这一问题，我就会支付给他们一笔合理的报酬。他们中有些人只是瞥了一眼这个问题，有些人则出于

礼貌，把问题留了两三周。他们基本上给出了同样的答复：多数情况下，解决包含四个变量的数学问题是可能的，甚至是包含5-6个变量的数学问题也可以解决，但不管你用何种方式，想要解决一个包含12个变量的数学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使用“反复试验”法，但这样估计会花很长时间。

A quick solution was, however, so much of a necessity in our every-day work of running machine-shops, that in spite of the small encouragement received from the mathematicians, we continued at irregular periods, through a term of fifteen years, to give a large amount of time searching for a simple solution. Four or five men at various periods gave practically their whole time to this work, and finally, while we were at the Bethlehem Steel Company, the slide-rule was developed which is illustrated on Folder No.11 of the paper “On the Art of Cutting Metals,” and is described in detail in the paper presented by Mr. Carl G. Barth to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entitled “Slide-rules for the Machine-shop, as a part of the Taylor System of Management” (Vol. XXV of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By means of this slide-rule, one of these intricat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in less than a half minute by any good mechanics whether he understands anything about mathematics or not, thus making available for every-day, practical use the years of experimenting on the art of cutting metals.

尽管数学家们多少给予了我们一些鼓励，但由于每日运营机器车间的需要，我们必须快点找到解决方案。我们继续不定期地花大量的时间去探索，只为找到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一做就是15年。在不同时期，四五个人几乎把全部时间投在了这项工作中，他们在这项工作上几乎投入了他们全部的时间。最后，我们在伯利恒钢铁公司研究出

了计算尺，其具体内容在档案夹11《切割金属的工艺》这篇论文中作了阐述，卡尔·G.　巴斯先生向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提交的题为《机器车间计算尺——泰勒管理体制的一部分》（《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事务》第25卷）的论文中有更详尽的描述。这些任何一位优秀的技工，不管他是否了解数学知识，都可以利用这把计算尺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内解决其中一个复杂的问题，从而使多年来对金属切割工艺的实验实际应用于日常工作中。

This is a good illustration of the fact that some way can always be found of making practical, everyday use of complicated scientific data, which appears to be beyond the experience and the range of the technical training of ordinary practical men. These slide-rules have been for years in constant daily use by machinists having no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这很好地证明了我们总可以寻找到某些方法在每天应用这些复杂的科学数据，似乎这些数据看起来已超过普通操作工人技术培训的经验和范围。多年来，那些不具备数学知识的技工每天都在使用这些计算尺。

A glance at the intricate mathematical formula (see page 109) which represent the laws of cutting metals should clearly show the reason why it is impossible for any machinist, without the aid of these laws, and who depends upon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correctly to guess at the answer to the two questions,

大致看一下这些代表切割金属规律的复杂的数学公式，我们就能清楚为什么在无这些规律的辅助下，任何技工，即使可能已重复干这

件工作无数次，都不可能凭借其个人经验准确猜出以下两个问题的答案：

What speed shall I use?

我应保持多快的速度？

What feed shall I use?

我应使用何种进料？

even though he may repeat the same piece of work many times.

即便他可能无数次地重复这份工作。

To return to the case of the machinist who had been working for ten to twelve years in machining the same pieces over and over again, there was but a remote chance in any of the various kinds of work which this man did that he should hit upon the one best method of doing each piece of work out of the hundreds of possible methods which lay before him. In considering this typical case, it must also be remembered that the metal-cutting machines throughout our machine-shops have practically all been speeded by their makers by guesswork, and without the knowledge obtained through a study of the art of cutting metals. In the machine-shops

systematized by us we have found that there is not one machine in a hundred which is speeded by its makers at anywhere near the correct cutting speed. So that, in order to compete with the science of cutting metals, the machinist, before he could use proper speeds, would first have to put new pulleys on the countershaft of his machine, and also make in most cases changes in the shapes and treatment of his tools, etc. Many of these changes are matters entirely beyond his control, even if he knows what ought to be done.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位已工作了10-12年的技工，他已无数次加工了同一种活计。要让他从数百种工作方法中选择最佳方法很难。考虑到这种典型案例，我们必须记住：全车间金属切割机器的速度几乎都是由不具备金属切割工艺知识的操作者按照自己的猜测决定的。在经我们系统化的机器车间，我们发现在上百台机器中，没有一台机器的速度接近其合适的切割速度。这样一来，为了与金属切割科学展开竞争，在技工掌握适当速度前，他首先不得不在机器的副轴上新加上滑轮，在多数情况下，还要改变其工具的形状和加工方法等。即使这名技工了解应该做什么，但许多这样的改变完全不受他控制。

If the reason is clear to the reader why the rule-of-thumb knowledge obtained by the machinist who is engaged on *repeat work* cannot possibly compete with the true science of cutting metals, it should be even more apparent why the high-class mechanic, who is called upon to do a *great variety* of work from day to day, is even less able to compete with this science. The high-class mechanic who does a different kind of work each day, in order to do each job in the quickest time, would need, in addition to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art of cutting metals, a vast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quickest way of doing each kind of hand

work. And the reader, by calling to mind the gain which was made by Mr. Gilbreth through his motion and time study in laying bricks, will appreciate the great possibilities for quicker methods of doing all kinds of hand work which lie before every tradesman after he has the help which comes from a scientific motion and time study of his work.

如果读者已经明白为什么干着重复工作的技工凭借经验原则不可能与真正的切割金属科学相抗衡，那么更显而易见的是，一位每天要做大量工作的高级技工更不可能与这种科学相竞争。这名高级技工每天要做不同的工作，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每项工作，他除了要全面了解切割金属的知识，还要掌握以最快的方式完成这种手工劳作的知识和经验。通过铭记吉尔伯莱斯先生在砌砖动作和工时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读者意识到只要掌握各行各业的科学动作和工时，每个工人都可以更快地完成每项手工劳作。

For nearly thirty years past, time-study men connected with the management of machine-shops have been devoting their whole time to a scientific motion study, followed by accurate time study, with a stop-watch, of all of the elements connected with the machinist's work. When, therefore, the teachers, who form one section of the management, and who are cooperating with the working men, are in possession both of the science of cutting metals and of the equally elaborate motion-study and time-study science connected with this work, it is not difficult to appreciate why even the highest class mechanic is unable to do his best work without constant daily assistance from his teachers. And if this fact has been made clear to the reader, one of the important objects in writing this paper will have been realized.

近三十年过去了，与机器车间管理者有联系的工时研究人员把全部时间奉献于科学动作研究。继而又利用秒表展开了精确的工时研究，记录与技工工作相关的所有要素。因此，如果作为管理层一部分且与工人们合作的老师们掌握了金属切割科学及与此类工作相关的同样精确的动作研究和工时研究科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使是那些最高级的技工，在没有老师的辅助下，也不可能做好他的工作。如果读者清楚了解了这一点，那么笔者就达到了一个重要的写作目的。

It is hoped that the illustrations which have been given make it apparent why scientific management must inevitably in all cases produce overwhelmingly greater results, both for the company and its employees, than can be obtained with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And it should also be clear that these results have been attained, not through a marked superiority in the mechanism of one type of management over the mechanism of another, but rather through the substitution of one set of underlying principles for a totally different set of principles, by the substitution of one philosophy for another philosophy in industrial management.

笔者希望列举的这些实例能清楚阐述为什么科学管理模式在所有情况下都无一例外地能比"积极性加激励"的管理模式为企业和其雇员带来更丰硕的成果。此外，我们还应该明白这些成果的取得并不是由于某种管理机制明显优于另一种机制，而是由于我们用一套基本原则替代了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原则（在工业管理中，以一种原理取代另一种原理）。

To repeat them throughout all of these illustrations,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useful results have hinged mainly upon (1) the substitution of a science for the individual judgment of the

workman; (2) the scientific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kman, after each man has been studied, taught, and trained, and one may say experimented with, instead of allowing the workmen to select themselves and develop in a haphazard way; and (3) the intimate cooperation of the management with the workmen, so that they together do the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ientific laws which have been developed, instead of leaving the solution of each problem in the hands of the individual workman. In applying these new principles, in place of the old individual effort of each workman, both sides share almost equally in the daily performance of each task, the management doing that part of the work for which they are best fitted, and the workmen the balance.

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实例，不难发现主要有用的一些成果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以一种科学代替工人的个人判断；（2）科学选择并培养工人：应对每个工人进行研究、教育、培训，或者可以说是对工人们进行实验，而不是让工人自行选择并进行自我培养；（3）管理者与工人的密切合作，这样一来，他们能按照已研究出的科学规律共同完成工作，而不是让每位工人自己解决问题。这些新原则取代了传统让每位工人依靠自己努力的模式，管理者和工人双方在每天承担的任务几乎相等，管理者负责完成自己胜任的工作，剩下的任务交由工人完成。

It is for the illustration of this philosophy that this paper has been written, but some of the elements involved in its general principles should be further discussed.

本文的写作目的是阐述这一原理，但其一般原则中包含的某些因素还应进一步讨论。

The development of a science sounds like a formidable undertaking, and in fact anything like a thorough study of a science such as that of cutting metals necessarily involves many years of work. The science of cutting metals, however, represents in its complication, and in the time required to develop it, almost an extreme case in the mechanic arts. Yet even in this very intricate science, within a few months after starting, enough knowledge had been obtained to much more than pay for the work of experimenting. This holds true in the case of practically all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the mechanic arts. The first laws developed for cutting metals were crude, and contained only a partial knowledge of the truth, yet this imperfect knowledge was vastly better than the utter lack of exact information or the very imperfect rule of thumb which existed before, and it enabled the workmen, with the help of the management, to do far quicker and better work.

研究一门科学听起来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事实上全面研究诸如金属切割这样的科学也要耗时数年。然而，从其复杂性和所需研究时间来看，金属切割的科学的确是机械工艺中一个特例。但即使是这门极其复杂的科学，我们能在研究开始后的几个月内积累足够的知识远比为进行实验付出的成本更有价值。而这也同样适用于机械工艺所有的科学发展。我们最初形成的金属切割规律可能是粗略的，它只包含了部分真理，然而这种不完整的知识远比此前缺乏准确的信息或不完善的经验原则优越；它让工人们在管理者的帮助下更快更好地完成任务。

For example, a very short time was needed to discover one or two types of tools which, though imperfect as compared with the

shapes developed years afterward, were superior to all other shapes and kinds in common use. These tools were adopted as standard and made possible an immediate increase in the speed of every machinist who used them. These types were superseded in a comparatively short time by still other tools which remained standard until they in their turn made way for later improvements. [3_6]

例如，我们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找到一两种工具，虽然这些工具与数年后发明的工具相比外观并不完美，但它们也比普遍使用的其他所有种类和外形的工具优越。我们将这些工具视为标准工具，并让每名使用它们的技工马上加快工作速度成为可能。这些工具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被其他工具所超越，但它们可以为未来工具的改善 [4_6] 奠定基础。

The science which exists in most of the mechanic arts is, however, far simpler than the science of cutting metals. In almost all cases, in fact, the laws or rules which are developed are so simple that the average man would hardly dignify them with the name of a science. In most trades, the science is developed through a comparatively simple analysis and time study of the movements required by the workmen to do some small part of his work, and this study is usually made by a man equipped merely with a stop-watch and a properly ruled notebook. Hundreds of these “time-study men” are now engaged in developing elementary scientific knowledge where before existed only rule of thumb. Even the motion study of Mr. Gilbreth in bricklaying (described on pages 77 to 84) involves a much more elaborate investigation than that which occurs in most cases. The general steps to be taken in developing a simple law of this class are as follows:

然而，大部分机械工艺所蕴含的科学，远比金属切割科学简单得多。实际上，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已形成的规律或规则太过简单以至于普通人很难会称其为一门科学。在大多数行业中，科学通过分析并研究工人们在做小部分工作时的动作和工时而形成。而这项研究通常由携带秒表和一个记录册的工人完成。像这样的数百名工时研究员现在正在研究这门基础的科学，而他们在过去只参照经验原则做事。即使是吉尔伯莱斯先生对砌砖的动作分析也比那些多数情况下所做的调查要更加详尽。要研究这一简单规律，我们要采取以下几步：

First. Find, say, 10 or 15 different men (preferably in as many separate establishment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who are especially skilful in doing the particular work to be analyzed.

第一，比如说，找10-15个不同的、对所分析的特定工作特别擅长的人（最好从本国多个不同的企业和部门中寻找）。

Second. Study the exact series of elementary operations or motions which each of these men uses in doing the work which is being investigated,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s each man uses.

第二，研究这些工人在从事所研究的工作时的基本操作或动作及使用的工具。

Third. Study with a stop-watch the time required to make each of these elementary movements and then select the quickest way of doing each element of the work.

第三，使用秒表研究所有这些基本动作，然后选出完成每部分工作时的最快方法。

Fourth. Eliminate all false movements, slow movements, and useless movements.

第四，剔除所有假动作、慢动作和无用的动作。

Fifth. After doing away with all unnecessary movements, collect into one series the quickest and best movements as well as the best implements.

第五，在剔除了所有不必要的动作后，把最快最佳的动作以及最好的工具汇聚为一个系列。

This one new method, involving that series of motions which can be made quickest and best, is then substituted in place of the ten or fifteen inferior series which were formerly in use. This best method becomes standard, and remains standard, to be taught first to the teachers (or functional foremen) and by them to every workman in the establishment until it is superseded by a quicker and better series of movements. In this simple way one element after another of the science is developed.

接下来，这个包含了能让动作最快最好的系列动作的新方法会取

代之前所使用的10-15种次级系列。这个最佳方法会成为且将一直被视为标准方法。第一个学习这些方法的人是老师们（或职能领班），然后他们再将这些方法传授给企业的员工，直到出现更快更好的动作能代替它。通过这种简单方式，我们建立起这种科学的一个又一个要素。

In the same way each type of implement used in a trade is studied. Und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each workman is called upon to use his own best judgment, so as to do the work in the quickest time, and from this results in all cases a large variety in the shapes and types of implements which are used for any specific purpose. Scientific management requires, first, a careful investigation of each of the many modifications of the same implement, developed under rule of thumb; and second, after a time study has been made of the speed attainable with each of these implements, that the good points of several of them shall be united in a single standard implement, which will enable the workman to work faster and with greater ease than he could before. This one implement, then, is adopted as standard in place of the many different kinds before in use, and it remains standard for all workmen to use until superseded by an implement which has been shown, through motion and time study, to be still better.

我们可以利用相同的方法研究各行各业所使用的工具。在“积极性加激励”模式下，每名工人要利用最佳的判断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在所有情况下，工人们发明了大量形状各异、种类繁多的工具以达到不同的目的。科学管理首先需要在经验原则指导下细心调查同一工具的多种改进方法；然后，研究完使用这些工具所能达到的速度后，汇集这些工具的优点，制成一种标准工具，它能让工人们更快

更好地完成工作。接下来，这种工具被视为标准工具，取代了许多之前使用的工具。直到通过动作和时间研究，发明了一种比它更优越的工具前，这件工具将一直沿用。

With this explanation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 science to replace rule of thumb is in most cases by no means a formidable undertaking, and that it can be accomplished by ordinary, every-day men without any elaborate scientific training; but that, on the other hand, the successful use of even the simplest improvement of this kind calls for records, system, and cooperation where in the past existed only individual effort.

从这种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形成一门科学以取代经验原则在多数情况下绝不是艰巨的任务，即使是未经过科学培训的普通人也能完成这一任务；但另一方面，要想让这种最简单的改进得到成功应用，我们必须要调用此类记录，建立相应体制，加强合作，而不能像以前一样只依靠个人努力。

There is another type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which has been referred to several times in this paper, and which should receive special attention, namely, the accurate study of the motives which influence men. At first it may appear that this is a matter for individual observation and judgment, and is not a proper subject for exact scientific experiments. It is true that the laws which result from experiments of this class, ow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very complex organism—the human being—is being experimented with, are subject to a larger number of exceptions than is the case with laws relating to material things. And yet laws of this kind, which apply to a large majority of men, unquestionably exist, and when

clearly defined are of great value as a guide in dealing with men. In developing these laws, accurate, carefully planned and executed experiments, extending through a term of years, have been made, similar in a general way to the experiments upon various other elements which have been referred to in this paper.

本文还多次提及另一种科学调查模式，我们应该给予其特别关注，即准确研究可能对人们造成影响的动机。初看起来，这是有关个人观察和判断的事，对于科学实验而言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主题。的确，由于人类——实验参与者——是非常复杂的有机体，所以这些实验总结出的规律注定会比与物质相关的规律出现许多例外情况。然而，毫无疑问，对大部分人都适用的这种规律是存在的。如果能清楚阐述这些规律，可以作为有价值的资源指导我们与他人打交道。在总结这些规律时，我们历经多年，精确、认真地规划并实施了实验，总的实验方法与我们在本文所提到的基于其他原理所进行的实验十分相似。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law belonging to this class, in its relation to scientific management, is the effect which the task idea has up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workman. This, in fact, has become such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mechanism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at by a great number of people scientific management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task management.”

或许在与科学管理相关的这类规律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任务理念对工人效率的影响。事实上，这已成为科学管理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人已将科学管理视为“任务管理”。

There is absolutely nothing new in the task idea. Each one of us will remember that in his own case this idea was applied with good results in his schoolboy days. No efficient teacher would think of giving a class of students an indefinite lesson to learn. Each day a definite, clear-cut task is set by the teacher before each scholar, stating that he must learn just so much of the subject; and it is only by this means that proper, systematic progress can be made by the students. The average boy would go very slowly if, instead of being given a task, he were told to do as much as he could. All of us are grown-up children, and it is equally true that the average workman will work with the greatest satisfaction, both to himself and to his employer, when he is given each day a definite task which he is to perform in a given time, and which constitutes a proper day's work for a good workman. This furnishes the workman with a clear-cut standard, by which he can throughout the day measure his own progress,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which affords him the greatest satisfaction.

关于任务理念绝对没有什么是大家不知道的。我们都记得，在上学时，我们通过这个理念获得了好成绩。没有一位讲求效率的教师会上一节无限期的课。每天，老师会为每位学生布置明确的任务，告诉学生，他们只能在课上学到这么多；只有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学生们才能取得系统、适当的进步。如果教师不布置作业，只是告诉学生在课上尽可能地多学东西，那么水平中等的学生进步会很慢。我们都是已长大的孩子，同理，如果每天吩咐工人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明确的一个任务（相当于一位优秀工人一天正常的工作量），那么为了让雇主和自己满意，普通工人会竭尽全力工作。这样一来，工人就可以依据这个明确的标准在全天衡量自己的工作进度。如果完成任务，就能给予他最大的满足感。

The writer has described in other papers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made upon workmen, which have resulted in demonstrating the fact that it is impossible, through any long period of time, to get workmen to work much harder than the average men around them, unless they are assured a large and a permanent increase in their pay. This series of experiments, however, also proved that plenty of workmen can be found who are willing to work at their best speed, provided they are given this liberal increase in wages. The workman must, however, be fully assured that this increase beyond the average is to be permanent. Our experiments have shown that the exact percentage of increase required to make a workman work at his highest speed depends upon the kind of work which the man is doing.

作者已经在其他文章里描述了以工人为实验对象的一系列实验，这些实验证明了：我们不可能长期让工人比周围普通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除非我们向他们保证能永久为其加薪。然而，这一系列的实验还证明了：只要能涨工资，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竭尽全力工作的工人。但是，必须向这些工人保证他们能得到永久加薪。我们的实验显示，一名工人以其最快的速度工作而获得的工资涨幅取决于他的工种。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hen, when workmen are daily given a task which calls for a high rate of speed on their part, that they should also be insured the necessary high rate of pay whenever they are successful. This involves not only fixing for each man his daily task, but also paying him a large bonus, or premium, each time that he succeeds in doing his task in the given time. It is difficult to appreciate in full measure the help which the proper use of these two elements is to the workman in elevating him to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efficiency and speed in his trade, and then keeping him

there, unless one has seen first the old plan and afterward the new tried upon the same man. And in fact until one has seen similar accurate experiments made upon various grades of workmen engaged in doing widely different types of work. The remarkable and almost uniformly good results from the *correct* application of the task and the bonus must be seen to be appreciated.

那么，如果每天都分配给工人们需要快速完成的工作任务，那么，无论其能否成功，绝对要向其保证会为他加薪。这不仅涉及让每位工人完成每天的任务，还包括每次在他按照给定时间出色完成规定的任务时支付给他一大笔奖金。除非某个人将新旧方案在同一工人身上实验过，或者我们看到有人对从事各种不同工作的不同等级的工人也实施了相似实验，否则我们难以全面评价恰当运用任务和奖金这两个因素对将工人的效率提升至最高水平并使其保持这一水平会有怎样的帮助。我们必须赞赏正确应用任务和奖金这两个因素所带来的显著、近乎一致的良好效果。

These two elements, the task and the bonus (which, as has been pointed out in previous papers, can be applied in several ways), constitut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of the mechanism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y are especially important from the fact that they are, as it were, a climax, demanding before they can be used almost all of the other elements of the mechanism; such as a planning department, accurate time study, standardization of methods and implements, a routing system, the training of functional foremen or teachers, and in many cases instruction cards, slide-rules, etc. (Referred to later in rather more detail on page 129.)

任务和奖金这两个因素（正如以前的文章指出的那样，可以获得应用的方法有很多）是科学管理机制最重要的两个构成因素。由于这两个因素本身就是顶点，可以比科学管理机制的其他因素，诸如，一个策划部门、精确的工时研究、方法和工具的标准化、一套日常体系、培训职能领班或老师，在许多情况下还有指示卡片、计算尺等更早得到应用，因此它们就显得尤为重要。

The necessity for systematically teaching workmen how to work to the best advantage has been several times referred to. It seems desirable, therefore, to explain in rather more detail how this teaching is done. In the case of a machine-shop which is managed under the modern system, detailed written instructions as to the best way of doing each piece of work are prepared in advance, by men in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These instructions represent the combined work of several men in the planning room, each of whom has his own specialty, or function. One of them, for instance, is a specialist on the proper speeds and cutting tools to be used. He uses the slide-rules which have been above described as an aid, to guide him in obtaining proper speeds, etc. Another man analyzes the best and quickest motions to be made by the workman in setting the work up in the machine and removing it, etc. Still a third, through the time-study records which have been accumulated, makes out a timetable giving the proper speed for doing each element of the work. The directions of all of these men, however, are written on a single instruction card, or sheet.

我们已多次提及系统培训工人如何竭尽全力工作的必要性。因此，看起来详细阐述这种培训是如何进行的符合读者的期待。以在现代化体制管理下的一个机器车间为例，规划部门的员工负责提前以书面形式指示工人完成每件工作的最佳方法。这些指示代表着在规划室

几位各具专长或职能的人的共同工作。例如，其中有一个人擅长分析适当的速度和使用的切割工具。他使用上面我们描述过的辅助工具——计算尺指导其获得恰当的速度等；另一人擅长分析工人在操作机器或调动活计时的最佳和最快动作等；而第三个人擅长通过积累的工时研究记录制定一份时间表，给出完成每项工作的适宜速度。而所有这些人的指示全部写在一张指示卡或指示表上。

These men of necessity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in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because they must be close to the records and data which they continually use in their work, and because this work requires the use of a desk and freedom from interruption. Human nature is such, however, that many of the workmen, if left to themselves, would pay but little attention to their written instructions. It is necessary, therefore, to provide teachers (called functional foremen) to see that the workmen both understand and carry out these written instructions.

这些必要的人员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规划部门，因为他们必须不断接触工作中使用的记录和数据，而且因为这样的工作还需要使用一张书桌以排除外界干扰。然而，人性如此——如果不管理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不会关注那些书面说明。因此，提供老师们（我们将其称为功能领班）监督工人理解并遵循书面说明做事十分必要。

Under functional management, the old-fashioned single foreman is superseded by eight different men, each one of whom has his own special duties, and these men, acting as the agents for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see paragraph 234 to 245 of the paper entitled “Shop Management”), are the expert teachers, who are at all times in the shop, helping and directing the workmen. Being

each one chosen for his knowledge and personal skill in his specialty, they are able not only to tell the workman what he should do, but in case of necessity they do the work themselv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workman, so as to show him not only the best but also the quickest methods.

在职能管理体制下，8个各具专职的人替代了传统模式的单个领班，这些充当规划部门代理人（详见“车间管理”论文第234-245段）的人是专家性的老师，他们一直待在车间里，帮助并指导工人们。由于他们每个人都是因其知识和个人技巧而被挑选出来的，所以他们不仅能告诉工人他们应该做什么，还能在必要时亲身示范，告诉工人们最快最佳的工作方法。

One of these teachers (called the inspector) sees to it that he understands the drawings and instructions for doing the work. He teaches him how to do work of the right quality; how to make it fine and exact where it should be fine, and rough and quick where accuracy is not required, the one being just as important for success as the other. The second teacher (the gang boss) shows him how to set up the job in his machine, and teaches him to make all of his personal motions in the quickest and best way. The third (the speed boss) sees that the machine is run at the best speed and that the proper tool is used in the particular way which will enable the machine to finish its product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In addition to the assistance given by these teachers, the workman receives orders and help from four other men; from the “repair boss” as to the adjustment, cleanliness, and general care of his machine, belting, etc.; from the “time clerk,” as to everything relating to his pay and to proper written reports and returns; from the “route clerk,” as to the order in which he does his work and as

to the movement of the work from one part of the shop to another; and, in case a workman gets into any trouble with any of his various bosses, the “disciplinarian” interviews him.

其中一位老师（称为检查员）负责让工人们明白与所做工作相关的图纸和指令。他会教工人如何保证工作质量；如何将精细的工作做得精细，而将不讲求精准的工作做得糙且快，让工人明白不同干法对取得成功是同等重要的。第二位老师（工头）教工人如何利用他的机器完成工作，教他以最快最好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动作。第三位老师（专长速度的领导）负责让机器以最佳速度运转，保证选用适当的工具，让机器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产品的生产。除了这些老师所给予的帮助外，其他四人也给予了工人指令和帮助。这四个人是：“专长修理的领导”指导工人调整、清扫、维护其机器；“时间职员”负责撰写工人工资的书面报告和统计表；“路线职员”向工人发布工作指令，并指示工人从车间的一种工作转向完成另一种工作；如果工人与其中任意一个负责人产生纠纷，“纪律管理员”就会找他谈话。

It must be understood, of course, that all workmen engaged on the same kind of work do not require the same amount of individual teaching and attention from the functional foremen. The men who are new at a given operation naturally require far more teaching and watching than those who have been a long time at the same kind of jobs.

当然，我们必须了解所有从事同一工种的工人不要求得到职能领班同等的个别指导和关注。某一工种的新手自然比长期从事相同工种的工人更需要指导和关注。

Now, when through all of this teaching and this minute instruction the work is apparently made so smooth and easy for the workman, the first impression is that this all tends to make him a mere automaton, a wooden man. As the workmen frequently say when they first come under this system, “Why, I am not allowed to think or move without some one interfering or doing it for me!” The same criticism and objection, however, can be raised against all other modern subdivision of labor. It does not follow, for example, that the modern surgeon is any more narrow or wooden a man than the early settler of this country. The frontiersman, however, had to be not only a surgeon, but also an architect, house builder, lumberman, farmer, soldier, and doctor, and he had to settle his law cases with a gun. You would hardly say that the life of the modern surgeon is any more narrowing, or that he is more of a wooden man than the frontiersman. The many problems to be met and solved by the surgeon are just as intricate and difficult and as developing and broadening in their way as were those of the frontiersman.

现在，由于接受了这些指导和训练，我们可以更容易、更顺利地为工人安排工作。但这会让我们留下这一印象，即这一切都倾向于将他变成一个如同木头人一般机械操作的人。正如初到该体制下工作的工人们经常所说的：“没有人给我指示或帮我做，怎么就不能允许我想一下或动一下了？”然而，所有其他现代化的分工中也可能会招致同样的批评和抵制。比方说，与本国早期移民相比，现代外科大夫不见得是生活范围更狭窄或更呆板的人。而边远地区的居民不仅应是一名外科大夫，还应是一名建筑师、建房者、伐木者、农民、士兵和医生，此外，他还应该能用用枪解决其法律案件。这样一来，你就不会说现代外科大夫的生活范围更狭窄了，也不会说与边远地区的居民相比，他是一个呆板的人。外科大夫面对的和要解决的许多问题与边远地区居民开拓其道路一样复杂、艰难。

And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the training of the surgeon has been almost identical in type with the teaching and training which is given to the workman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 surgeon, all through his early years, is under the closest supervision of more experienced men, who show him in the minutest way how each element of his work is best done. They provide him with the finest implements, each one of which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special study and development, and then insist upon his using each of these implements in the very best way. All of this teaching, however, in no way narrows him. On the contrary he is quickly given the very best knowledge of his predecessors; and, provided (as he is, right from the start) with standard implements and methods which represent the best knowledge of the world up to date, he is able to use his own originality and ingenuity to make *real additions to the world's knowledge, instead of reinventing things which are old.* In a similar way the workman who is cooperating with his many teachers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has an opportunity to develop which is at least as good as and generally better than that which he had when the whole problem was “up to him” and he did his work entirely unaided.

我们应该牢记：培训外科大夫的形式与在科学管理模式下教育、培训工人几乎一样。而在富有经验的人们最严格的监督下，我们使用最精细的方法在早期对外科大夫进行教育，教导他如果最出色地完成每个工作环节。我们还提供给他经过特殊研究而制成的最好的工具；我们坚持要求他使用最佳方法使用每一件工具。这些教育定然不会使其眼界狭窄，相反，他马上就掌握了前辈们所了解的最优越的知识，还接受了标准的工具和方法。所有这一切都代表着当今世界最优越的知识。此后，他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与机智为世界知识宝库增添新的财产，而不是去重复构造一些陈旧的东西。在现代科学管理模式下，那些和他的老师合作的工人也有同样的机会得以发展，这至

少和让工人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条件下自己解决所有问题能取得一样的效果，甚至多数情况下效果更好。

If it were true that the workman would develop into a larger and finer man without all of this teaching, and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laws which have been formulated for doing his particular job, then it would follow that the young man who now comes to college to have the help of a teacher in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Latin, Greek, etc., would do better to study these things unaided and by himself. The only difference in the two cases is that students come to their teachers, while from the nature of the work done by the mechanic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 teachers must go to him. What really happens is that, with the aid of the science which is invariably developed, and through the instructions from his teachers, each workman of a given intellectual capacity is enabled to do a much higher, more interesting, and finally more developing and more profitable kind of work than he was before able to do. The laborer who before was unable to do anything beyond, perhaps, shoveling and wheeling dirt from place to place, or carrying the work from one part of the shop to another, is in many cases taught to do the more elementary machinist's work, accompanied by the agreeable surroundings and the interesting variety and higher wages which go with the machinist's trade. The cheap machinist or helper, who before was able to run perhaps merely a drill press, is taught to do the more intricate and higher priced lathe and planer work, while the highly skilled and more intelligent machinists become functional foremen and teachers. And so on, right up the line.

如果工人在不接受此类教育，不需要各种与所做工作相关的规律

的条件下，就能发展成为更优秀的人，那么，现在大学里，所有向老师请教有关数学、物理、化学、拉丁文、希腊文等知识的年轻人就可以通过自学了解这些知识，而无需老师帮助。这两种情况存在的唯一差异在于：学生必须去学校，接受老师的教导；而在科学管理模式下技工工作的性质决定了老师必须来到工厂给予工人指导。有了必定会发展的科学的帮助和老师的教导，每个有一定智力的工人一定能比以前干得更好、对其工作更有兴趣，从而让自己更有发展前途，获得更多利益。那些在以前无非是锹铲、搬运垃圾或将车间的物品从一头搬到另一头的工人，得到帮助后，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从事一些初级的机工活。这样一来，不仅改善了劳动环境，而且其工作也变得更加有趣，拿到的工资也更高了。或许以前那些低级的机工或助手只能操作一台钻床，现在，他们可以干一些更复杂的价值更高的车工和刨工活计。那些技能高度熟练、更加机智的机工们成为了职能领班和老师。就这样，工人们得以逐步发展和提升。

It may seem that with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re is not the same incentive for the workman to use his ingenuity in devising new and better methods of doing the work, as well as in improving his implements, that there is with the old type of management. It is true that with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 workman is not allowed to use whatever implements and methods he sees fit in the daily practice of his work. Every encouragement, however, should be given him to suggest improvements, both in methods and in implements. And whenever a workman proposes an improvement, it should be the policy of the management to make a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new method, and if necessary conduct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to determine accurately the relative merit of the new suggestion and of the old standard. And whenever the new method is found to be markedly superior to the old, it should be adopted as the standard for the whole establishment. The workman should be given the full credit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should be paid a cash

premium as a reward for his ingenuity. In this way the true initiative of the workmen is better attained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an under the old individual plan.

与传统管理模式相比，科学管理模式下的工人看起来在利用其智慧规划新的、更好的工作方法和改进其工具方面会缺乏积极性。然而，实际上，在科学管理模式下，不允许工人在日常操作过程中任意使用自己觉得合适的工具和方法。然而，无论是方法还是工具，只要是工人提出的改进建议都应得到鼓励。管理者应仔细分析工人的建议，如有必要，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实验以准确判断新旧方法各自的优缺点。如果发现新方法明显要比老方法优越，就应将新方法视为全企业的标准，并给予提出这种建议的工人充分的荣誉；此外，还应该奖励其一笔现金，作为他聪明才智的酬劳。如此一来，工人的积极性得以在科学管理模式下得到更好的发挥。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up to date, however, calls for a word of warning. The mechanism of management must not be mistaken for its essence, or underlying philosophy. Precisely the same mechanism will in one case produce disastrous results and in another the most beneficent. The same mechanism which will produce the finest results when made to serve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will lead to failure and disaster if accompanied by the wrong spirit in those who are using it. Hundreds of people have already mistaken the mechanism of this system for its essence. Messrs. Gantt, Barth, and the writer have presented papers to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on the subject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these papers the mechanism which is used has been described at some length. As elements of this mechanism may be cited:

然而，科学管理模式发展到今天已向我们发出如下警告：不能误读管理结构的实质或根本的道理。对于相同的管理结构，在某种情况下会带来灾害性的后果，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可带来丰厚的收益。如果利用管理机制为科学管理的根本原理服务，就会带来最佳结果；而一旦在同样的管理机制中混入了使用者的错误思想，就会导致失败和灾难。上百人都没能懂得：利用科学管理模式时，要应用一种结构的实质。甘特、巴思先生等人和作者曾就科学管理的问题向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提交论文。而笔者想要阐述的这种结构在这些论文中多有涉及，现将该这种结构的要素列举如下：

Time study, with the implements and methods for properly making it.

时间分析，以及完成分析所使用的合适工具和方法。

Functional or divided foremanship and its superiority to the old-fashioned single foreman.

职能或分工领班制度比传统的单人领班制度更优越。

The standardization of all tools and implements used in the trades, and also of the acts or movements of workmen for each class of work.

所有行业中使用的工具和工人们从事的每一种工作动作的标准化。

The desirability of a planning room or department.

一个规划室或部门的必要性。

The “exception principle” in management.

管理者的“例外原则”。

The use of slide-rules and similar timesaving implements.

应用计算尺或类似的省时工具。

Instruction cards for the workman.

为工人提供的指示卡。

The task idea in management, accompanied by a large bonus for the successful performance of the task.

管理观念及奖励出色完成工作的工人一大笔奖金。

The “differential rate.”

“差别费率”。

Mnemonic systems for classifying manufactured products as well as implements used in manufacturing.

为分类、制造工业产品时使用的工具设立记忆法制度。

A routing system.

日常工作制度。

Modern cost system, etc., etc.

现代成本制度等。

These are, however, merely the elements or details of the mechanism of management.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its essence, consists of a certain philosophy, which results, as before stated, in a combination of the four great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3_7]

然而，以上只是管理机制的要素或细节。从实质来看，科学管理包含一定的道理，从而有了如前所述的管理者的四大根本原则 [4_7] 。

When, however, the elements of this mechanism, such as time study, functional foremanship, etc., are used without being accompanied by the tru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the results are in many cases disastrous. And, unfortunately, even when men who are thoroughly in sympathy with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undertake to change too rapidly from the old type to the new, without heeding the warnings of those who have had years of experience in making this change, they frequently meet with serious troubles, and sometimes with strikes, followed by failure.

当然，如果没有结合管理者的真正宗旨，运用这个结构的要素（诸如时间分析、职能领班，等）时在许多情况下，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遗憾的是，就算是那些对科学管理原则大为赞赏的人，如果忽视有多年改革经验的人们的警告，忙着将过去的东西改为新的东西，就会经常遇到麻烦，起初可能只是工人罢工，继而便是失败。

The writer, in his paper on “Shop Management,” has called e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risks which managers run in attempting to change rapidly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management. In many cases, however, this warning has not been heeded. The physical changes which are needed, the actual time study which has to be mad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all implements connected with the work, the necessity for individually studying each machine and placing it in perfect order, all take time, but the faster these elements of the work are studied and improved, the better for the undertak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ally great problem involved

in a change from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to scientific management consists in a complete revolution in the mental attitude and the habits of all of those engaged in the management, as well of the workmen. And this change can be brought about only gradually and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 of many object-lessons to the workman,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teaching which he receives, thoroughly convince him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 new over the old way of doing the work. This change in the mental attitude of the workman imperatively demands time. It is impossible to hurry it beyond a certain speed. The writer has over and over again warned those who contemplated making this change that it was a matter, even in a simple establishment, of from two to three years, and that in some cases it requires from four to five years.

在题为《工厂管理》一文中，笔者曾指出，我们需格外注意：经理们往往在尽快将传统管理制度转变为新型管理制度时要冒风险。然而，很多情况下，人们忽视了这种警告。实际需要变革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必须进行的工时研究；所有与工作相关的工具的标准化；对每台机器每个部件的分析，并使其运转良好等。这一切都要耗费时间。如果能尽快研究并改进工作中的这些要素，就可以更好地完成工作。另外，彻底改变所有从事管理的人员（包括工人）精神状态和习惯是将“积极性加激励”的管理模式改为科学管理模式时真正面临的大问题。我们只能通过为工人讲解实物教学课逐渐实现这种改变，因为工人只有在接受了教育后，才能相信新的管理模式比传统模式更具优越性，能让他们更好地工作。我们同样也需要一些时间改变工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只求速度。笔者曾一再警告过那些人，就算是在一个单纯的企业里，也需要2-3年才能实现这种变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要历时4-5年。

The first few changes which affect the workmen should be made exceedingly slowly, and only one workman at a time should be dealt with at the start. Until this single man has been thoroughly convinced that a great gain has come to him from the new method, no further change should be made. Then one man after another should be tactfully changed over. After passing the point at which from one-fourth to one-third of the men in the employ of the company have been changed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very rapid progress can be made, because at about this time there is, generally, a complete revolution in the public opinion of the whole establishment and practically all of the workmen who are working under the old system become desirous to share in the benefits which they see have been received by those working under the new plan.

应循序渐进改变工人们的思想。最初每次只能和一个工人打交道，直到已充分说服该工人运用新的方法，并取得丰厚的收获，否则就不要进行下一步，进而让每一名工人顺利完成新旧转换。当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公司员工已完成新旧方法的转换，就可以快速推进这种变革了，因为到那时，企业的舆论会彻底改变；而且那些仍在旧有制度下工作的工人都希望分享他们所看见的在新体制下工作的工人所获得的收益。

Inasmuch as the writer has personally retired from the business of introducing this system of management (that is, from all work done in return for any money compensation), he does not hesitate again to emphasize the fact that those companies are indeed fortunate who can secure the services of experts who have had the necessary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introducing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who have made a special study of its principles. It is not enough that a man should have been a manager in an

establishment which is run under the new principles. The man who undertakes to direct the steps to be taken in changing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particularly in any establishment doing elaborate work) must have had personal experience in overcoming the especial difficulties which are always met with, and which are peculiar to this period of transition.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 writer expects to devote the rest of his life chiefly to trying to help those who wish to take up this work as their profession, and to advising the managers and owners of companies in general as to the steps which they should take in making this change.

笔者已不再从事介绍这种管理制度的工作（所有有报酬的工作）了，所以会毫不犹豫地强调：如果能得到专家们提供的服务，那么这样的企业是非常幸运的。这些专家们拥有丰富的介绍、引进科学管理的实际经验，对科学管理从事过专门的研究。就算是有经验的企业经理，也无法承担这项改革任务。我们要请指导过改革（特别是在具有复杂的工作种类的机构）的人来执行这项改革任务，此外，执行改革任务的人还必须具有能克服各种特殊困难的经验。特别在过渡时期，我们会经常遇到这些困难。基于此，笔者希望在有生之年，为那些愿把这项工作当作自己职业的人们提供帮助，并就如何实现这项变革为一般公司的经理和老板们提供建议。

As a warning to those who contemplate adopting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 following instance is given. Several men who lacked the extended experience which is required to change without danger of strikes, or without interference with the success of the business, from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to scientific management, attempted rapidly to increase the output in quite an elaborate establishment, employing between three thousand and four thousand men. Those who undertook to make

this change were men of unusual ability, and were at the same time enthusiasts and I think had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kmen truly at heart. They were, however, warned by the writer, before starting, that they must go exceedingly slowly, and that the work of making the change in this establishment could not be done in less than from three to five years. This warning they entirely disregarded. They evidently believed that by using much of the mechanism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management of “initiative and incentive,” instead of with thes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at they could do, in a year or two, what had been proved in the past to require at least double this time. The knowledge obtained from accurate time study, for example, is a powerful implement, and can be used, in one case to promote harmony between the workmen and the management, by gradually educating, training, and leading the workmen into new and better methods of doing the work, or, in the other case, it may be used more or less as a club to drive the workmen into doing a larger day's work for approximately the same pay that they received in the past. Unfortunately the men who had charge of this work did not take the time and the trouble required to train functional foremen, or teachers, who were fitted gradually to lead and educate the workmen. They attempted, through the old-style foreman, armed with his new weapon (accurate time study), to drive the workmen, against their wishes, and without much increase in pay, to work much harder, instead of gradually teaching and leading them toward new methods, and convincing them through object-lessons that task management means for them somewhat harder work, but also far greater prosperity. The result of all this disregard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was a series of strikes, followed by the downfall of the men who attempted to make the change, and by a return to conditions throughout the establishment far worse than those which existed before the effort was made.

笔者列举以下实例，以警告那些考虑采取科学管理的人们。有这样几个人：他们在缺乏相应经验的情况下，即不知道应该实施怎样的变革，才能不招致罢工以及如何能不影响营业的效果，就想在一家极为复杂、雇佣了三四千人的企业里实施变革，一心顾着增加产量。如果想推行这种改革，这样的企业必须拥有那些具备非凡的能力且热心的工人，而且这些人还必须真正顾及工人们的利益。尽管笔者在改革开始前警告过他们，必须要缓慢地进行这种改革，对于他们那样的企业而言，改革所用时间少则三五年。然而，他们完全将这种警告抛在脑后。显而易见，在他们看来，只要结合“积极性加激励”的管理原则而非科学管理的原则，充分利用科学管理机制，他们就可以利用一两年的时间完成过去至少需要加倍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比如，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精确的工时研究这一强有力的工具，促进工人们和管理者之间的协调，即一步一步地教育、培训和引导工人们在工作中使用新的、更好的方法，或者在其他情况下，驱使工人们每天增加工作量，但工资保持不变。遗憾的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并没有为今后培训那些能领导和教育工人们的领班或老师付出必要的时间和努力。他们并没有逐渐教育、引导工人采用新方法，也没有以实物教学说服工人们接受这种新方法，并让他们明白：虽然科学管理模式下，工人们要更艰苦地工作，但也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而是尝试利用精确的工时研究，通过过去的领班，违背工人的意愿，驱使工人们去干更辛苦的工作，却不为其涨工资。无视这种根本原则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工人们发起的一系列的罢工，继而使那些企图实施这种变革的人们垮台，从而恶化整个企业的处境。

This instance is cited as an object-lesson of the futility of us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new management while leaving out its essence, and also of trying to shorten a necessarily long operation in entire disregard of past experience.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the men who undertook this work were both able and earnest, and that failure was not due to lack of ability on their part, but to their

undertaking to do the impossible. These particular men will not again make a similar mistake, and it is hoped that their experience may act as a warning to others.

在一堂实物教学课列举的这个实例可以说明那种做法不会带来好结果。它想要运用新的管理模式，却又忽视其实质；想要缩短一个较长却必要的操作过程，却又忽视过往的经验。我们应强调：这些能干、对工作充满热情的工人之所以失败不是由于不在于他们缺乏能力，而在于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希望这些人不会再犯相同的错误，让他们的经验教训能为他人带来警示。

In this connection, however, it is proper to again state that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that we have been engaged in introducing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re has not been a single strike from those who were working in accordance with its principles, even during the critical period when the change was being made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If proper methods are used by men who have had experience in this work, there is absolutely no danger from strikes or other troubles.

无论如何，如此阐述这个问题还算恰当。三十年以来，我们一直引进、介绍科学管理的相关内容，就算是在新旧交替的危急时刻，只要是依据科学管理的原则行事，都不会引发工人的罢工。如果那些已有过经验教训的人们使用恰当的方法，就可以省去工人罢工或面临其他危险的麻烦。

The writer would again insist that in no case should the managers of an establishment, the work of which is elaborate,

undertake to change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type unless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fully understand and believe i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unless they appreciate all that is involved in making this change, particularly the time required, and unless they want scientific management greatly.

笔者坚信，除非公司的董事能充分理解、信赖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重视所有与变革相关的内容（尤其是所需的时间），同时，迫切需要实行科学管理模式，否则，一家工种复杂的企业管理者就不应该进行从传统向新型管理模式转变的变革。

Doubtless some of those who ar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working men will complain because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 workman, when he is shown how to do twice as much work as he formerly did, is not paid twice his former wages, while others who a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dividends than the workmen will complain that under this system the men receive much higher wages than they did before.

毋庸置疑，某些关心工人的人们会有所埋怨：虽然在科学管理下，工人完成的工作量是以前的两倍，但他拿到的工资却不是原来的两倍。但那些对公司股利更感兴趣的人会埋怨道，工人们能得到比以前高得多的工资。

It does seem grossly unjust when the bare statement is made that the competent pig-iron handler, for instance, who has been so trained that he piles 3 6/10 times as much iron as the incompetent

man formerly did, should receive an increase of only 60 per cent in wages.

表面看起来，这样的管理模式对工人而言似乎的确很不公平的：一个能干的生铁搬运工搬运的生铁是以前那些能力不足的人搬运的3.6倍，但他的工资却只涨了60%。

It is not fair, however, to form any final judgment until all of the elements in the case have been considered. At the first glance we see only two parties to the transaction, the workmen and their employers. We overlook the third great party, the whole people,—the consumers, who buy the product of the first two and who ultimately pay both the wages of the workmen and the profits of the employers.

但是，如果未考虑所有要素就忙着下定论也是不公平的。我们只留意了其中的两方：工人和其雇主，而忽视了第三方：作为消费者的全体人民，即那些购买前两方生产的产品并支付工人工资、为雇主提供利润的人。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are therefore greater than those of either employer or employee. And this third great party should be given its proper share of any gain. In fact, a glance at industrial history shows that in the end the whole people receiv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benefit coming from industrial improvements.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for example, the greatest factor tending toward increasing the output, and thereby the prosperity of the civilized world, has been the introduction of machinery to replace hand

labor. And without doubt the greatest gain through this change has come to the whole people—the consumer.

这样看来，由于人民的权利高于雇主或工人的权利，所以他们理应在各种获利中享有合理的利益。实际上，浏览一下工业史，就不难发现：全体人民最终从进步的产业中获得了更多利益。例如：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产量得以增加的最重要要素是引进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全世界也因此而变得更加繁荣。无疑，全体人民，即消费者，才是这些变革中最大的获利者。

Through short period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patented apparatus, the dividends of those who have introduced new machinery have been greatly increased, and in many cases, though unfortunately not universally, the employees have obtained materially higher wages, shorter hours, and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s. But in the end the major part of the gain has gone to the whole people.

在短时间内，尤其是具有专利设备的条件下，如果引进机器，管理者就可以增加其股利，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遗憾的是并非所有），雇员的工资也增加了、工作时间缩短了，工作条件改善了。然而，还是全体人民获得了最主要的收获。

And this result will follow the introduction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just as surely as it has the introduction of machinery.

正如引进机器所带来的影响一样，实行科学管理意义重大。

To return to the case of the pig-iron handler. We must assume, then, that the larger part of the gain which has come from his great increase in output will in the end go to the people in the form of cheaper pig-iron. And before deciding upon how the balance is to be divided between the workmen and the employer, as to what is just and fair compensation for the man who does the piling and what should be left for the company as profit, we must look at the matter from all sides.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生铁搬运工的例子。我们必须假定，大部分由产量增加所获得的收益将以更加廉价的生铁的形式流向人民手中。在决定如何使工人与雇主的分配保持平衡前，我们需要统筹考虑整个问题，包括如何能合理又公平地补偿搬运生铁的工人以及公司应留下什么作为利润等。

First. As we have before stated, the pig-iron handler is not an extraordinary man difficult to find, he is merely a man more or less of the type of the ox, heavy both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第一、如前所述，寻找生铁搬运工并不困难，他只是像头牛一样，智力低下且身强体壮的人。

Second. The work which this man does tires him no more than any healthy normal laborer is tired by a proper day's work. (If this man is overtired by his work, then the task has been wrongly set and this is as far as possible from the object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第二、就疲劳程度而言，从事这项工作的工人与其他适量完成一天工作的普通工人相当。（如果他感到过度疲劳，就说明分配给他的工作量显然不合适，而且违背了科学管理的宗旨。）

Third. It was not due to this man's initiative or originality that he did his big day's work, but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science of pig-iron handling developed and taught him by some one else.

第三、遵循科学方法，在别人的教导下竭尽所能完成一天的工作，而不是仅凭工人的积极主动尽可能完成一天最大量的工作。

Fourth. It is just and fair that men of the same general grade (when their all-round capacities are considered) should be paid about the same wages when they are all working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ies. (It would be grossly unjust to other laborers, for instance, to pay this man 3 6/10 as high wages as other men of his general grade receive for an honest full day's work.)

第四、所有工人都竭尽所能工作时，处于同一水平的工人（综合考虑其多方面的能力）拿到的工资应该相等。（例如，如果一天下来，完成相同的工作量，但某人的工资是其他同水平工人的3.6倍，那这样对其他人而言很不公平。）

Fifth. As is explained (page 74), the 60 per cent increase in pay which he received was not the result of an arbitrary judgment of a foreman or superintendent, it was the result of a long series of

careful experiments impartially made to determine what compensation is really for the man's true and best interest when all things are considered.

第五、如前面所阐述的那样，他的工资是否能增加60%不是由领班或主管随意决定的，而是要经过长时间系统、客观的实验，由领班或主管公平地决定最符合这名工人利益的工资。

Thus we see that the pig-iron handler with his 60 per cent increase in wages is not an object for pity but rather a subject for congratulation.

由此看来，我们应该祝贺生铁搬运工能增加60%的工资，而不是对他们表示同情。

After all, however, facts are in many cases more convincing than opinions or theories, and it is a significant fact that those workmen who have come under this system during the past thirty years have invariably been satisfied with the increase in pay which they have received, while their employers have been equally pleased with their increase in dividends.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事实往往比观点或理论更具说服力，所以认清以下事实意义重大：过去三十年中，在科学管理模式下工作的工人非常满意于自己工资的涨幅，而雇主们也为增加了利润而倍感高兴。

The writer is one of those who believes that more and more will the third party (the whole people), as it becomes acquainted with the true facts, insist that justice shall be done to all three parties. It will demand the largest efficiency from bo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It will no longer tolerate the type of employer who has his eye on dividends alone, who refuses to do his full share of the work and who merely cracks his whip over the heads of his workmen and attempts to drive them into harder work for low pay. No more will it tolerate tyranny on the part of labor which demands one increase after another in pay and shorter hour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t becomes less instead of more efficient. And the means which the writer firmly believes will be adopted to bring about, first, efficiency both in employer and employs and then an equitable division of the profits of their joint efforts will be scientific management, which has for its sole aim the attainment of justice for all three parties through impartial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all the elements of the problem. For a time both sides will rebel against this advance. The workers will resent any interference with their old rule-of-thumb methods, and the management will resent being asked to take on new duties and burdens; but in the end the people through enlightened public opinion will force the new order of things upon both employer and employee.

笔者认为，越来越多的第三方（即全体人民）在事实面前都坚信自己能受到公平的对待，这将为管理者和工人提供强大动力以充分发挥最大工效。从此以后，他们无须容忍那些只注重企业利润而拒绝承担全部工作职责或是那些只会驱使工人努力工作，并企图让工人更加努力工作却减少工人工资的管理者。此外，他们也无须容忍管理者提出的苛刻的工作要求：要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而工作效率却越来越低。笔者坚信，未来采取的措施可以为我们带来科学管理。首先，提高雇主和雇员的工作效率；接下来，公平合理地划分经由双方

共同努力获得的利润，就是为了科学、公正地调查这个问题的所有要素，实现所有三方的公平。双方曾一致反对这种改进。虽然工人们不愿有人干涉他们依靠经验原则的传统做法，且管理者又不愿意承担新的责任；但是，最终，随着公众思想的进步，雇主和雇员将被迫出台一套新规则。

It will doubtless be claimed that in all that has been said no new fact has been brought to light that was not known to some one in the past. Very likely this is true. Scientific managem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involve any great invention, nor the discovery of new or startling facts. It does, however, involve a certain *combination* of elements which have not existed in the past, namely, old knowledge so collected, analyzed, grouped and classified into laws and rules that it constitutes a science; accompanied by a complete change in the mental attitude of the working men as well as of those on the side of the management, toward each other, and toward their respectiv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lso, a new division of the duti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intimate, friendly cooperation to an extent that is impossible und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old management. And even all of this in many cases could not exist without the help of mechanisms which have been gradually developed.

的确，以上内容没有人们以前不了解的新鲜事。科学管理并不一定会有什么大发明，也不一定发现了什么新鲜或骇人的事。但是，科学管理确实涉及一个结合，即收集已有知识，并加以分析、组合并归类成规律和规则，进而构成一种科学，该结合包含了过去没有的诸多要素，还使得工人和管理者彻底改变了对彼此职责、责任和态度的看法。此外，双方的职责有了新的分工，而在传统的管理原则下，是不可能达到如此亲密、友善协作的程度的。如果没有逐步形成的新管理

机制的帮助，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这一切。

It is no single element, but rather this whole combination, that constitutes scientific management, which may be summarized as:

将所有要素（而不是某个要素）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科学管理，我们可以将其归纳如下：

Science, not rule of thumb.

科学，而非依赖经验原则。

Harmony, not discord.

协调，而非不和谐。

Cooperation, not individualism.

合作，而非个人主义。

Maximum output, in place of restricted output.

最高的产量，而非有限的产量。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man to his greatest efficiency and prosperity.

每个人达到最高工作效率，实现财富的最大化。

The writer wishes to again state that: “The time is fast going by for the great personal or individual achievement of any one man standing alone and without the help of those around him. And the time is coming when all great things will be done by that type of cooperation in which each man performs the function for which he is best suited, each man preserves his own individuality and is supreme in his particular function, and each man at the same time loses none of his originality and proper personal initiative, and yet is controlled by and must work harmoniously with many other men.”

笔者再次强调：“独自在无他人帮助的情况下，一个人能获得很高的成就，这样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现在，我们迎来的是通力协作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所有人完成其胜任的工作，在保证不失去个人独创性和主动性的前提下，保留其个性并在特定的位置上享有自己最大的权威，并与许多工人密切合作。”

The examples given above of the increase in output realized under the new management fairly represent the gain which is possible. They do not represent extraordinary or exceptional cases,

and have been selected from among thousands of similar illustrations which might have been given.

以上列举的新管理模式下实现增产的实例代表了可能得到的收益。这些例子不是什么特殊或例外情况，而是从上千个相似的实例中挑选的。

Let us now examine the good which would follow the general adoption of these principles.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遵循这些原则后能获得什么好处。

The larger profit would come to the whole world in general.

概括来说，全世界将因此获得最高收益。

The greatest material gain which those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have over past generations has come from the fact that the average man in this generation, with a given expenditure of effort, is producing two times, three times, even four times as much of those things that are of use to man as it was possible for the average man in the past to produce. This increase in the productivity of human effort is, of course, due to many causes, besides the increase in the personal dexterity of the man. It is due to the discovery of steam and electricity, to the introduction of machinery, to inventions, great and small, and to the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education. But from whatever cause this increase in productivity has come, it is to the greater productivity of each individual that the *whole country* owes its greater prosperity.

与过去若干代所获得的最大物质利益相比，现今这一代获得的要更多。一般而言，这一代人只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就可能比过去的一般人多生产两三倍甚至四倍对人有价值的产品。当然，除了个人的技巧，还有其他许多原因能提高生产能力，诸如发现并使用蒸汽和电气，使用机器等发明，以及科教进步等。但是，无论生产能力因何提高，全国能更富强，还要得益于个人生产能力的提高。

Those who are afraid that a large increase in the productivity of each workman will throw other men out of work, should realize that the one element more than any other which differentiates civilized from uncivilized countries—prosperous from poverty-stricken peoples—is that the average man in the one is five or six times as productive as the other. It is also a fact that the chief cause for the large percentage of the unemployed in England (perhaps the most virile nation in the world), is that the workmen of England, more than in any other civilized country, are deliberately restricting their output because they are possessed by the fallacy that it is against their best interest for each man to work as hard as he can.

一些人会担忧：如果大幅提高了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那么其他人就会失业。但是，他们应该意识到：之所以产生文明与野蛮、富裕与贫穷之间的差异正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普通人的劳动生产率在某个地区可能是另一个地区的五六倍。实际上，英国（或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生机的国家）出现大量失业的主要原因在于：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人受到了更多、有意的劳动生产率限制。那些错误的观念

充满他们的头脑，在他们看来，努力工作与获得最佳利益相矛盾。

The general adoption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would readily in the future double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average man engaged in industrial work. Think of what this means to the whole country. Think of the increase, both in the necessities and luxuries of life, which becomes available for the whole country, of the possibility of shortening the hours of labor when this is desirable, and of the increased opportunities for education, culture, and recreation which this implies. But while the whole world would profit by this increase in production, the manufacturer and the workman will be far more interested in the especial local gain that comes to them and to the people immediately around them. Scientific management will mean, for the employers and the workmen who adopt it—and particularly for those who adopt it first—the elimination of almost all causes for dispute and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m. What constitutes a fair day's work will be a question for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instead of a subject to be bargained and haggled over. Soldiering will cease because the object for soldiering will no longer exist. The great increase in wages which accompanies this type of management will largely eliminate the wage question as a source of dispute. But more than all other causes, the close, intimate cooperation, the constant personal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sides, will tend to diminish friction and discontent. It is difficult for two people whose interests are the same, and who work side by side in accomplishing the same object, all day long, to keep up a quarrel.

普遍实行科学管理可以成倍提高从事工业工作的人的生产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思考一下，这对整个国家有何意义？再想一想，缩短了工作时间，有可能增产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有良好的机会提高教

育、文化和娱乐生活等，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全世界都可以因这种增长而获益，但雇主和工人们最关心的却是自身及身边与其有直接关系的人们所能得到的特殊利益。在科学管理模式下，这对雇主们和工人们（尤其是那些率先采用这种管理模式的）意味着他们可排除所有纷争及不和谐的因素。何为合理的工作日已不再是要谈判和讨价还价的主题，而将是一个科学调查的问题。由于“磨洋工”的目的已不存在，“磨洋工”自然就会消失。这种管理模式可大量增加工资，从而基本排除工资这一产生纷争的其中一个原因。然而，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密切的合作和频繁的个人接触将有利于减少双方间的摩擦和不满。只要双方具有相同的利益，为了实现同一目标而通力合作，就不容易产生纠纷。

The low cost of production which accompanies a doubling of the output will enable the companies who adopt this management, particularly those who adopt it first, to compete far better than they were able to before, and this will so enlarge their markets that their men will have almost constant work even in dull times, and that they will earn larger profits at all times.

降低的成本及成倍增长的产量将使得采用这种管理模式的企业（尤其是那些率先采用此管理模式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这样不仅可以大力扩展其市场，使得即使在淡季，工人们也有可干的工作，而且还能让他们总能获得大量利润。

This means increase in prosperity and diminution in poverty, not only for their men but for the whole community immediately around them.

这意味着不仅这些工人，包括他们所属的整个社区都越来越富裕，贫困状况得到缓解。

As one of the elements incident to this great gain in output, each workman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trained to his highest state of efficiency, and has been taught to do a higher class of work than he was able to do under the old types of manage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he has acquired a friendly mental attitude toward his employers and his whole working conditions, whereas before a considerable part of his time was spent in criticism, suspicious watchfulness, and sometimes in open warfare. This direct gain to all of those working under the system is without doubt the most important single element in the whole problem.

产量增长的其中一个要素是：经过系统的培训，每个工人的工作效率能达到最高；而经过教导后的工人所做的工作比传统的管理模式更高级。以前，工人们会花大量时间批评、提防，甚至公开展开斗争，而现在，工人们会对其雇主和工作环境表现出友善的态度。在这个体制下所有的工人，都认为这个收获对整个问题至关重要。

Is not the realization of results such as these of far more importance than the solution of most of the problems which are now agitating both 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peoples? And is it not the duty of those who are acquainted with these facts, to exert themselves to make the whole community realize this importance?

实现以上目标不是比处理大多使英美两国人民忧虑的问题更重要吗？努力使全社会认识到这一重要性难道不是了解这些事实的人们的

职责所在吗？

[3_1].The writer has tried to make the reason for this unfortunate state of things clear in a paper entitled "Shop Management," read before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3_2].For example, the records containing the data used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an ordinary machine-shop fill thousands of pages.

[3_3].See foot-note at foot of page 60.

[3_4].Many people have questioned the accuracy of the statement that first-class workmen can load 47 1/2 tons of pig iron from the ground on to a car in a day. For those who are skeptical,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data relating to this work are given: First. That our experiments indicated the existence of the following law: that a first-class laborer, suited to such work as handling pig iron, could be under load only 42 per cent of the day and must be free from load 58 per cent of the day. Second. That a man in loading pig iron from piles placed on the ground in an open field on to a car which stood on a track adjoining these piles, ought to handle (and that they did handle regularly) 47 1/2 long tons (2240 pounds per ton) per day. That the price paid for loading this pig iron was 3.9 cents per ton, and that the men working at it averaged $1.85 per day, whereas, in the past, they had been paid only $1.15 per day. In addition to these facts, the following are given: 47 1/2 long tons equal 106,400 pounds of pig iron per day. At 92 pounds per pig, equals 1156 pigs per day. 42 per cent of a day under load equals 600 minutes; multiplied by 0.42 equals 252 minutes under load. 252 minutes divided by 1156 pigs equals 0.22 minutes per pig under load.
A pig-iron handler walks on the level at the rate of one foot in 0.006 minutes. The average distance of the piles of pig iron from the car was 36 feet. It is a fact, however, that many of the pig-iron handlers ran with their pig as soon as they reached the inclined plank. Many of them also would run down the plank after loading the car. So that when the actual loading went on, many of them moved at a faster rate than is indicated by the above figures. Practically the men were made to take a rest, generally by sitting down, after loading ten to twenty pigs. This rest was in addition to the time which it took them to walk back from the car to the pile. It is likely that many of those who are skeptical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loading this amount of pig iron do not realize that while these men were walking back they were entirely free from load, and that therefore their muscles had, during that time, the opportunity for recuperation. It will be noted that with an average distance of 36

feet of the pig iron from the car, these men walked about eight miles under load each day and eight miles free from load.
If anyone who is interested in these figures will multiply them and divide them, one into the other, in various ways, he will find that all of the facts stated check up exactly.

[3_5].See paper read before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by Fred. W. Taylor, Vol. XVI, p. 856, entitled "Piece Rate System."

[3_6].Time and again the experimenter in the mechanic arts will find himself face to face with the problem as to whether he had better make immediate practical use of the knowledge which he has attained, or wait until some positive finality in his conclusions has been reached. He recognizes clearly the fact that he has already made some definite progress, but sees the possibility (even the probability) of still further improvement. Each particular case must of course be independently considered, but the general conclusion we have reached is that in most instances it is wise to put one's conclus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the rigid test of practical use. The one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for such a test, however, is that the experimenter shall have full opportunity, coupled with sufficient authority, to insure a thorough and impartial trial. And this, owing to the almost universal prejudice in favor of the old, and to the suspicion of the new, is difficult to get.

[3_7].*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a true science. *Second.* The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the workman. *Third.* His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Fourth.* Intimate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anagement and the men.

[4_1].笔者曾在另一篇论文《工厂管理》中试图解释造成这种不幸现象的原因。该论文曾在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上宣读过。

[4_2].例如，档案中包含在科学管理模式下机械数千页的工厂使用数据。

[4_3].见第60页脚注。

[4_4].许多人质疑这一说法的准确性：一等工人每天能将47.5吨生铁从地面装运到车厢中。因此，为了向那些持怀疑态度人验证这一说法，笔者给出了如下数据：第一，我们的实验表明存在以下规律：一位胜任搬运生铁这项工作的一等工人，每天只能有42%的时间处于负重状态，而在58%的时间内处于放松状态。第二，一个工人，如果将堆放在空旷地面上的生铁搬运到这些生铁堆旁的卡车上，每天应该搬运（他们定期进行搬运）47.5吨生铁（每吨生铁重2240磅）。装运这些生铁的薪酬是每吨3.9美分，干这种活的工人每天平均赚取1.85美元，而在过去，他一天的收入只有1.15美元。

此外，笔者还需阐述以下几点：47.5吨相当于每天搬运106,000磅重的生铁。每块生铁重92磅，这就意味着工人每天要搬运1156块生铁。每天42％的工作时间（即600分钟）都处于负重状态，再乘以0.42，相当于252分钟处于负重状态。252分钟再除以1156（块生铁），等于搬运每块生铁有0.22分钟处于负重状态。
一位生铁搬运工以每0.006分钟1英尺的速度行走。生铁堆到车厢的平均距离为36英尺。然而，事实上，许多生铁搬运工都拿着生铁跑到倾斜的木板处，甚至有些人在将生铁装车后还从木板跑下来。因此，在实际装车的过程中，一些工人移动的速度比上述数据给出的速度要快。在装运10-20块生铁后，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能得到休息（通常是坐一会儿）。他们从车厢回到生铁堆旁的时间不算入这个休息时间中。那些怀疑工人们是否能装运这么多生铁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当这些工人走回来时，他们完全不负重，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肌肉得以恢复。我们还要注意到，由于生铁堆与车厢间的平均距离为36英尺，这些工人每天在负重下要行进8英里左右，而不负重行走的距离也是8英里。
对这些数字感兴趣的人可以用不同方法对其做乘除运算，这样，你就会发现所有笔者陈述的事实可以得到完全验证。

[4_5].详见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上弗莱德． W·泰勒宣读的题为《计件工资制》第十六卷，第856页。

[4_6].机械工艺实验人员一次又一次发现自己会面连这样的问题：马上就利用自己获得的知识和等到最后得出结论后再利用自己获得的知识，哪种是自己最好的选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但已经意识到还可以取得进一步的成功。当然，每一个特例都要做单独考虑，但我们所得出的总结论是：在多数情况下，要尽快实际运用自己的结论，让其经受严格的考验，这才是明智之举。然而，这样做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实验人员有足够多的机会及权力以确保进行一场全面、公正的实验。由于人们普遍支持传统，而怀疑新事物，所以这一点很难实现。

[4_7].第一：发展真正的科学；第二：科学选择工人；第三：工人的科学教育与发展；第四：管理者与工人间密切、友善的合作。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通货原理研究

Thomas Tooke

托马斯·图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通货原理研究

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托马斯·图克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reface 序
- Introduction 导论
- Chapter 1　Statement of the Currency Principle 第一章　通货原理的论述
- Chapter 2　Mode of Operation of a Metallic Circulation 第二章　金属货币的流通方式
- Chapter 3　Mistaken View by the Currency Theory of the Working of the Existing System 第三章　通货理论对现行体制运行所持的错误观点
- Chapter 4　Distinctive Properties Ascribed to Bank Notes 第四章　银行券的特殊性
- Chapter 5　Deposits and Cheques 第五章　存款及支票
- Chapter 6　Bills of Exchange 第六章　汇票
- Chapter 7　Distinction of Circulation as Between Dealer and Dealer, and Between Dealer and Consumer 第七章　商人与商人间、商人与消费者间的区别
- Chapter 8　Regulation of the Circulation by the Foreign Exchanges 第八章　用国际汇兑管理货币流通
- Chapter 9 Scotch Banking. Regulation by Foreign Exchanges. And Distinc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Currency 第九章　苏格兰银行业根据国际汇兑状况管理流通的情况，以及资本与通货的区别
- Chapter 10　Charges Against the Managemen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第十章　英格兰银行管理状况遭到的指控
- Chapter 11　The Bank of England Has Not the Power to

Add to the Circulation 第十一章　英格兰银行无权增加发行量
- Chapter 12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mount of the Currency and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第十二章　论通货数量与商品价格的关系
- Chapter 13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Prices 第十三章　论利率和物价的关系
- Chapter 14　Distinction Between Issuing and Non-issuing Banks 第十四章　发钞行和非发钞行的区别
- Chapter 15　Review of the Currency Principle in Its Application to Our Banking System 第十五章　论通货原理在我国银行制度中的应用
- Summary of Conclusions 结论
- Postscript 附言
- Appendix 附录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reface

序

Some part of the following pages was written immediately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the reports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Banks of Issue, and the greater part has since been put together without any definite view to publication. The reason which has determined me in now publishing them is, that whether the views here presented be assented to or not, they are such, I think, as ought not to be wholly overlooked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measures which the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its intention of proposing to Parliament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session, with a view to placing the banking system of the United Kingdom on an unproved and permanent footing.

下议院钞票发行委员会公布报告之后，我即着手完成了本书的部分内容。而剩余的大部分内容是随后收集整理的，此举本非明确为将其付梓。现在我之所以决定要出版此书，是因为政府有意向本届议会提出一些具体措施的建议，以便为英国的银行体系奠定一个待证实的稳固基础。在我看来，无论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是否得到认同，在政府考虑措施时，这些观点都该得到重视。

Some of the points which I have endeavoured to establish may probably be thought not to be made out with sufficient fullness of explanation, and doubtless on several of the topics a more exhaustive process of proof and illustration might be required for the purpose of anticipating and answering objections. But such a

process could not be comprised within a readable compass. It would require a book instead of a pamphlet.

对于我竭力想阐明的一些观点，有人可能认为我的解释不够充分。显而易见，为了回答大家提出的异议，我仍需要对很多问题作出更为详尽的证明和阐述。但此书不过是本通俗易懂的指南，无法涵盖这些内容。想要囊括这些内容，恐怕需要一部巨著，这任务绝非一本小册子能完成。

The necessity for compression, which I feel to be thus imposed upon me, has prevented me from touching at all upon topics which are of importance and connected in some points of view with the subject here discussed, but to which justice could not be done in an incidental notice.

我觉得有必要压缩篇幅，所以对某些话题没有展开探讨。从某些角度看，这些话题十分重要，而且与本书中所述的话题息息相关，但对其附带着泛泛而谈反而不合适。

One of the great difficulties of dealing with the subject about to be discussed, as indeed in most cases of controversy, but in this more than in most others, arises from the use of the same words in different senses. Not to mention the mooted points, as to whether deposits, bankers' cheques, and bills of exchange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money or currency; because these involve rather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s for which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employed, than that loose and ambiguous use of terms to which I allude.

同大多数存有争议的情形一样，本书在阐述所要讨论的主题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同一个词语表达的涵义不同，此情况在本书中尤甚。暂且不提那些早就争议颇多的观点，例如存款、银行支票、汇票是否应该被看作是货币或通货，因为这牵涉到的是按照使用目的来下定义和进行分类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我所指的词语使用含糊不清。

This consists in a shifting of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when applied indiscriminately in the same argument to designate things and processes totally distinct.

这种词语使用的不准确包括忽视术语含义随语境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随意使用相同的说法来表示迥然不同的事物和过程。

It will be seen in the course of this discussion how much of the obscurity and perplexity and error, in which the objects of inquiry are involved, may be traced to the vague and ambiguous language commonly employed in treating of them: such for instance as “gold and silver,” “the precious metals,” and “bullion,” used indiscriminately and synonymously with “money” and “currency;” the terms “money and currency” employed when “capital” is meant. “Issues of paper,” meaning bank notes, for mere advances of capital where no bank notes pass; the “value of money or currency,” for the rate of interest or discount. “Abundance and cheapness, or scarcity and dearness of money,” to signify a lower or a higher rate of interest, or a tendency to either. And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of the currency, or of the circulation,” when undue extension of credit, and its consequent revulsion, would be the correct description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在本书的探讨过程中，读者会看到许多晦涩、困惑和错误之处。究其原因，正是使用了模糊的、含义不明的词语，例如将“金银”、“贵重金属”和“纯金”不加区别地使用，并一律将之用作“货币”和“通货”的同义词。“货币和通货”则用来表示“资本”这一概念。“纸币的发行”本意是钞票的发行，被用来表示在没有钞票流通的地方资本的预付金。“货币和通货的价值”被用来表示利率或贴现率。“货币的充裕和不足，廉价和高价”则用来表示利率的高低及变化趋势。此外，还有“通货或流通的扩张和紧缩”一词的乱用，而正确说法是未到期的信贷延期及随后的回收信贷。

The instances in which confusion and inconsistency in reasoning may be traced to this loose and ambiguous use of language are innumerable; and if I could hope that by directing attention to the sources of error so pointed out, and thus induce more care and distinctness of phraseology, so as to render future discussions on the subject more intelligible, and consequently to narrow the grounds for difference of opinion, I should consider that my labour, in this publication has not been thrown away, even although I should fail of gaining assent to the conclusions, or any part of them, which I have endeavoured to establish.

因为词句表意不明而给推理造成了困惑和矛盾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希望可以通过指出这些错误的根源使人们在用词时更为小心准确。这样将来对此话题的探讨就可以更清楚，读者理解上的分歧也会更少。那么，即使我竭力证明的结论或部分结论没有得到认可，我也觉得自己在本书中所做的努力没有白费。

London, March, 1844.

1844年3月于伦敦

Introduction

导论

It was held by most writers of any authority on the subject of the Currency, till within the last few years, that the purposes of a mixed circulation of coin and paper were sufficiently answered, as long as the coin was perfect, and the paper constantly convertible into coin; and that the only evils to be guarded against by regulation, were those attending suspension of payment and insolvency of the banks, a large proportion of which blend an issue of promissory notes with their other business. This, in point of fact, is what is understood in general terms as the banking principle, and is that upon which our system of currency is constructed and conducted.

直到近几年，大多数探讨通货问题的权威作者依旧认为，只要硬币是完好的，且纸币能随时兑换成硬币，那么纸币和硬币混合流通的目的就可以实现。需要调节预防的仅仅是银行暂停支付和破产所带来的问题，因为大多数银行将本票发行和其他银行业务混合起来。事实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银行原理，我们的银行体系正是基于这一原理建立运行的。

But a new canon of currency has of late been promulgated by persons of no mean authority. According to these authorities, it is not sufficient that the bank notes should be at all times strictly convertible into coin, and that the banks, whether issuing or not issuing, should be solvent; they consider that a purely metallic

circulation (excepting only as regards the convenience and economy of paper), is the type of a perfect currency, and contend that the only sound principle of a mixed currency is that by which the bank notes in circulation should be made to conform to the gold, into which they are convertible, not only in value, but in amount; that is to say, that the bank notes being supposed to be a substitute, and the only substitute, for so much coin, should vary exactly in amount as the coin would have done if the Currency had been purely metallic; and that the test of good or bad management is not, as is considered under the mere banking principle, in the extent or proportion of reserve in treasure and in immediately convertible securities held by the banks; but in the degree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variations in the amount of bullion, and variations in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in circulation. A regulation of the issue of bank notes, in conformity with this doctrine, is now understood to be designated as the Currency principle.

但近期某些绝对权威人士公布了一套新的通货标准。按照他们的看法，纸币随时可以兑换成硬币这种做法远远不够。无论是否发行纸币，银行都应有偿付能力；他们认为纯粹的金属流通才是完美的通货形式（尽管纸币更方便和节约），并主张唯一合理的混合通货的原理就是无论在价值上还是数量上，流通中的纸币应该与所能兑换的黄金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被认为是一定数量硬币的替代物，且是其唯一替代物的纸币，应与货币完全是金属情况下的硬币数量变化保持一致；检验银行管理好坏的标准既不像纯粹的银行原理认为的那样，取决于储备金的多少，也不取决于银行持有的即可兑换的证券数量；而是看金块数量的变化与流通中银行券数量的变化保持一致的程度。根据该理论来调节纸币的发行，被称作符合通货原理。

With a view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principle to practice,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either a national bank should be established under commissioners, whose duty and functions should be confined to the exchange of paper against gold, and of gold against paper, for all beyond a fixed amount of paper issued against securities; or that the Bank of England should be the sole source of issue, under the strictest rule of separ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issue from the merely banking department.

为了将此原理应用于实践，有人提议建立一个由银行理事监管的国家银行，它的职责和功能仅限于用纸币兑换黄金，以及当纸币发行量超过以担保品做抵押发行的固定纸币数量时，用黄金兑换纸币；或者限定英格兰银行为唯一有权发行纸币的银行，将发行职能和银行业务职能严格区分开来。

The arguments urged in favour of such separation have, as it should seem, made considerable impression on the public mind, and schemes founded upon this principle have been strongly pressed on th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on the ground not only of guarding against the danger of suspension and insolvencies, but of imparting more confidence and stability to credit and trade, and of securing greater steadiness in prices, and thus obviating or abating the alternations of feverish excitement, and the extreme of depression, which have prevailed under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which are imputed to a neglect of the Currency principle.

支持这种区分的论断似乎在公众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基于此原则创建的计划也受到了政府的极大关注，主要因为当前的目的不仅是应对暂停支付和破产的威胁，还要稳定民众对信贷和贸易的信心，并确保价格波动更为平稳，消弭和避免现行体制普遍存在的过度兴奋

和极度沮丧交替的现象。这种现象一般被归咎于忽视通货原理。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constant convertibility of the paper can, or cannot, be preserved and maintained under a prudent management, on the existing footing of a union of issue and banking, will be considered hereafter. But, waiving for the present all consideration of the question of security against suspension and insolvencies, it is desirable to examine the grounds on which it is contended that other evils, besides the danger of non-convertibility and insolvencies of banks of issue, arise out of, the present system as compared with the currency-principle system, and that the test of good or bad management of the country banks of issue consists, not in the amount of their reserves in gold and available securities, compared with their liabilities, but in the conformity of the variations of their circulation to those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ank of England; while the test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s in the conformity of the variations in the amount of its circulation to those of the efflux or influx of the precious metals.

现在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稳健的管理下，在现存的发行与银行业务结合的体制下，能否保持货币的自由兑换。即便现在可以不考虑暂停支付和破产的问题，也应该考虑为什么要让人们意识到，与通货原理体制相比，现行体制除了使发钞银行停止自由兑换并破产外，还存在其他弊端。而且检验地方发钞银行管理好坏的标准，不是黄金储备及有效证券的数量与其负债的比例，而是银行的发行量是否与英格兰银行的发行量一致。而检验英格兰银行管理的好坏的标准则在于发行量的变化是否同贵重金属流入流出的变化相一致。

Chapter 1　Statement of the Currency Principle

第一章　通货原理的论述

The theory of the Currency principle numbers among its advocates many distinguished names. The fullest and most elaborate statements of it, however, are to be found in the publications of Mr. Norman, Mr. Loyd, and Colonel Torrens, and in the evidence of the two former gentlemen before the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Banks of Issue in 1840. I therefore avail myself mainly of their exposition of the doctrine, and their arguments in support of it, as affording the best grounds for an examination of the theory, and of the practice recommended as an application of it. The following extract from Mr. Norman's evidence conveys a concise statement of the theory, and of the proposed application of it, as the only sound rule for the paper portion of the currency, namely bank notes, which he limits to those notes which are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通货原理理论的拥趸者中不乏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对之最完整而详尽的阐述，在诺曼先生、劳埃德先生和托伦斯上尉的出版物中，以及在前两位先生于1840年给下议院发钞银委员会提供的证词中可见一斑。因此，检验这一理论及其应用的最好基础，就是借用他们有关此理论的解释和他们支持此理论的证据。下文的诺曼先生证词摘录简要指出，通货原理及其应用方式是管理银行券唯一合理的规则，且银行券仅指公众手中的票据。

I consider a metallic currency to be the most

perfect currency, except so far as respects inconvenience in some respects, and cost. In everything else a metallic currency is the most perfect, and should be looked upon as the type of all other currencies; and as from their superior convenience and greater cheapness, bank notes are introduced to supply the place of a certain portion of metallic currency, I think that bank notes should be so managed, that they should possess all the other attributes of a metallic currency, and among those attributes, I conceive the most important to be that they should increase and decrease in the same way that a metallic currency would increase and decrease. I do not think it is possible to improve upon a metallic currency, except in the two points of convenience and cheapness. [3_1]

“我认为金属货币是完美的通货形式，尽管它在某些方面存在不便，而且成本极高。除此之外，金属货币在其他方面都是完美无缺的，应被视为其他通货的样本；为了更方便、成本更低，我们引入了银行券用来代替部分金属货币。我认为应妥善管理银行券，使之具备金属货币的一切属性。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属性就是，银行券应和金属货币一样增减。我认为除了方便和成本低廉这两方面，在其他方面对金属货币加以改进是不可能的。” [4_1]

Mr. Norman afterwards explained, that by convenience he meant the easier transfer, and by cheapness, the economy of using the less costly material; so that the paper, thus regulated, would be

so far an improvement on a metallic currency.

诺曼先生随后解释道，方便指的是易于转让，而成本低廉则是使用更为节约的原料。所以，调节后的纸币仅仅是在这两方面对金属货币进行了改进而已。

The following are the chief [3_2] evils which present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Mr. Norman's view, in our existing paper circulation, from its not conforming to such rule:

在诺曼先生看来，如果我们现行的纸币流通不遵循以下规则，那么就会产生如下弊端：[4_2]

1．A tendency to vary, both as to excess and deficiency, in an unnecessary degree, and at unsuitable periods.

1．纸币的数量在不恰当的时期出现不必要的变动，要么过剩，要么不足。

2．A liability to discredit, both mercantile and political, in a large portion of it, if not the whole.

2．无论从商业还是政治角度来看，全部或绝大部分纸币会丧失信用。

3．Temporary or permanent insolvency on the part of many of the issuers.

3．许多发行人会处于暂时或永久无力偿还的境地。

Mr. Loyd in his evidence gives the following view of the inconvenience, which he ascribes to the present system:—

劳埃德先生对现行体制的不便之处做了如下阐述：

Q. 2748. “Are there any other evils besides the danger of no convertibility that arise out of the present system?”

问题2748：“现行体制除了不能自由兑换外，是否还产生了其他弊端？”

A. “There can be no doubt about it;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has a very direct effect upon the state of credit, of confidence, of prices, and of banking; and i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be allowed to become an unnatural one, unnatural and pernicious effects will be produced upon all those. If your circulation is subject either to depreciation from excess of its amount, or to violent fluctuations of amount, then undoubtedly that will be followed by corresponding effects upon confidence, upon

credit, upon prices, upon banking, and so forth. Those things are also affected by other considerations. I do not se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analyse the effects, and to attribute to each cause its respective share in producing those effects; all that can certainly be understood is, that if you regulate the paper circulation upon sound principles, you may be quite sure that you have then removed that portion of the evil effects which was attributable to the want of due regulation."

回答："这点毋庸置疑；纸币的发行状况对信用、信息、物价以及银行的状况有直接的影响；如果纸币的流通状况反常，则会对上述各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发行量过多导致纸币贬值，或者发行量剧烈波动，无疑信心、信用、物价和银行等会受到相应的影响。这些事物也受其他因素影响。我认为这些原因无法分析，无法说出每个原因对最终结果造成了多大影响；我们唯一可以确认的就是，如果按照健全的原则管理纸币的发行，那么就一定可以减少由于管理不善带来的弊端。"

By an unnatural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and the want of due regulation, must be understood, in the sense in which Mr. Loyd uses the term, a non-conformity of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to the amount of bullion.

劳埃德先生使用的发行的不自然状态以及缺乏正确管理，是指银行券的数量和金块数量的不一致。对此我们必须按照他的意思理解。

[3_1].G. W. Norman. Evidence. Committee on Banks of Issue. Question No. 1749.

[3_2]."Remarks on Currency and Banking," by G. W. Norman, 1888.

[4_1].G. W. 诺曼，证词，银行发钞委员会，问题1749。

[4_2].《论通货和银行业务问题》。G. W. 诺曼，1888年。

Chapter 2　Mode of Operation of a Metallic Circulation

第二章　金属货币的流通方式

Admitting, for the sake of argument, that a metallic circulation is the type of a perfect currency, it should seem that those who confidently pronounce it to be so, labour under a most egregious misconception of what the working of it would be.

为了便于论证，我们先承认金属货币是一种完美的通货形式，那些满怀信心地作出此等论断的人，却似乎大大误解了金属货币的运作方式。

Upon the grounds which I have now to state, it will be evident that the operation of a perfectly metallic circulation would not be attended with the advantages which they contemplate; nor,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disadvantages which might be apprehended, if it were to work as they seem to imagine it would.

根据我现在要陈述的理由，显然完全金属货币的流通并没有带来预想的好处；另一方面，如果将金属货币按照他们设想的方式运作，也不会产生人们所担心的坏处。

According 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every export of the precious metals under a metallic circulation, would be attended with a contraction of the amount and value of the currency, causing

a fall of prices, until the degree of contraction and consequent fall of prices should be such, as by inducing a diminished import and increased export of commodities, to cause a reflux of the metals and a restoration of prices to their proper level. So, on the other hand, an influx of the precious metals would raise prices, till they reached a level at which the converse of the process would take place. This oscillating process of a rise and fall of prices with every influx or efflux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ndependently of circumstances connected with the cost of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and the ordinary rate of consumption, would be perplexing enough, and anything but convenient to the commercial, or the manufacturing, or the agricultural community.

根据通货原理，在金属货币流通时，伴随每一次贵重金属的输出而来的都是通货价值和数量的收缩，引发物价下跌，直到收缩和随后的物价下跌引发商品的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从而造成贵重金属的逆流，物价恢复到适当水平，此时这种现象才会停止。另一方面，贵重金属的输入会导致物价上涨，直至达到一定水平，产生和上述过程相反的情况为止。这种伴随贵重金属的输入输出而产生的物价来回波动的过程与商品生产成本和普通的消费率因素无关，这着实令人费解。而且它对商业、制造业和农业毫无影响。

The advocates, however, of the doctrine contend that, although thus the oscillations might be more frequent, the scale of them would be more contracted, every divergence being more quickly checked. I firmly believe, however, that if every export and import of the precious metals were attended with the effects imputed to them by this theory, the inconvenience would be felt to be intolerable; and that some of what Mr. Norman calls economising expedients would be devised and applied as a remedy. But the

operation would not be that which the theory, as it is stated in the following passages, supposes:

然而，支持者认为尽管这样的波动会愈加频繁，但波动的范围也会不断缩小，而且会很快得到解决。但我坚信，如果贵重金属的每一次输入和输出都会产生该理论预期的影响，那么这种不便将令人感觉无法忍受。而且我们将设计并应用诺曼先生所谓的节约手段作为补救办法。然而金属货币的流通并不像该理论如下所述：

> It is universally admitted by persons acquainted with monetary science, that paper money should be so regulated as to keep the medium of exchange, of which it may form a part, in the same state, with respect to amount and to value, in which the medium of exchange would exist, were the circulating portion of it purely metallic. Now, it is self-evident, that if the circulation were purely metallic, an adverse exchange, causing an exportation of the metals to any given amount, would occasion a contraction of the circulating currency to the same amount; and that a favourable exchange, causing an importation of the metals to a given amount, would cause an expansion of the circulating currency to the same amount. If the currency of the metropolis consisted of gold, an adverse exchange, causing an exportation of gold to the amount of 1,000,000*l.* , would withdraw from circulation one million of sovereigns.“—TORRENS. *Letter to Lord Melbourne, pp.* 29, 30.

“了解货币学的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对纸币加以管理，从而使纸币充当部分交换媒介时，其数量和价值要与金属货币充当交换媒介时完全一样。毫无疑问，如果流通中的全部是金属货币，引发一定数量金属输出的逆差会造成等额的流通货币收缩；而引发一定数量金属输入的顺差会造成等额的流通货币的增加。如果这个都会的通货由黄金构成，那么，造成价值100万英镑黄金输出的逆差，会使流通的货币减少100万英镑金币。”——托伦斯《致墨尔本勋爵的信》，第29、30页。

The amount of the import or export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s a pretty sure measure of what would have been the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the amount of a metallic currency.“—S. J. LOYD.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cy, page* 34.

“贵金属的流入流出数量，是金属货币的增减量的可靠度量值。”——S. J. 劳埃德《对货币的进一步思考》，第34页。

And Mr. Norman, after explaining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exchanges, as between two countries, A and B, may be rendered adverse to A, so as to cause an export of coin or bullion, goes on to say:—

在解释了A、B两国之间的汇兑以何种方式可能会对A国造成不

利，从而产生硬币或金块的输出后，诺曼先生说道：

> The export of coin and bullion will cause general prices to fall in country A, and to rise in B, supposing the debt to B not to be sooner discharged, until it becomes more advantageous to export goods than money—*Letter to C. Wood, Esq. M.P., p.* 17.

> “假设A国不必立刻偿还B国的债务，那么硬币和金块的输出会导致A国总体物价下跌，B国物价上涨，直到输出商品比输出货币对A国更为有利为止。——《致议员C. 伍德先生的信》，第17页。

In these passages, and many more that might be cited, it is assumed that the precious metals, gold, and silver, and bullion, are synonymous with currency and money, and are convertible terms. And accordingly every export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s not only considered, in the supposition of a metallic circulation, as a contraction of the currency of this country; but as so much added to the currency of the country to which it is exported. Such alteration in the relative quantity of the metals in the respective countries from which or to which they are transmitted being,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an abstraction or addition of so much money; and prices, that is, the general prices of commodities, being considered as depending on the quantity of money, a corresponding rise or fall of them is assumed to be the consequence. In this view some very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are overlooked.

在上述这些段落和更多原本可能被引用的段落中，我们均假设贵金属、黄金、白银和金块是通货和货币的同义词，是可以通用的词汇。因此在假设只有金属货币流通的前提下，人们认为贵重金属的每次输出不仅减少了输出国的货币，同时也增加了输入国的货币。根据该理论，输入国和输出国的金属相对数量的变化，等同于货币数量的缩减和增加；物价，也就是商品的总体价格，被认为取决于货币的数量，物价的相应上涨或下跌则是数量变化产生的结果。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情况。

Before entering upon them, however, I must premise, that throughout this discussion the value of gold in the commercial world is assumed to be constant, *i.e.* , that the cost of production and the general demand are unvaried; also that the tariffs of foreign countries are *in status quo* , so as to confine the consideration to the effects of an influx or efflux of bullion on the currencies of the respective countries, divested of any reference to disturbing causes, beyond those incidental to the course of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banking.

然而在探讨这些情况前，我必须假设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黄金的价值在商界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其生产成本和总需求是不变的；外国的关税也是不变的，因此只考虑金块的输入输出对各国通货的影响，而不用考虑除了贸易和国际银行业这些偶然因素外的其他干扰因素。

There is, and must generally be, in a country like this or like France, a stock greater or less of gold and silver, beyond that which is in use as money or as plate, or which is in the mint, and in goldsmiths' and silversmiths' hands, in preparation for use as either.

This surplus or floating stock may be considered as seeking a market, whether for internal purposes or for export; and, be the quantity greater or less, can it be said of it, if it is exported, that the amount is so much abstracted from the currency of the country, any more than if an equal value of tin or zinc, or lead or iron were exported?

在英国或法国这样的国家中，金银除了用作货币或用于器皿或铸币之外，金匠和银匠手里也会有以备不时之需的金银，此外，一定还有或多或少的金银储备。无论是为了国内使用还是用于对外输出，这些盈余和流动的储备可被看作是在寻求市场；如果是作输出之用，那么不管数量多少，能否认为这减少了国家的通货呢？这是否与输出等价的锡、锌、铅或铁一样呢？

Moreover, of that part of the stock existing in the shape of coin in this country it may be observed, that as the coinage is not subject to a seignorage, there may be, and frequently is, in that shape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he precious metals which may not be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circulating as money, nor in the reserves of the different banks, the Bank of England excepted; but may, like the uncoined metals, be seeking a market at home or abroad. It may be in the coffer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but held as bullion, being in the shape of coin equally convenient for every purpose, and more convenient for some purposes, in that form, besides that of serving for currency, than in uncoined gold, that is, in bars or ingots.

此外，当不需要缴纳铸币税时，可以说，英国现有的部分硬币存货中经常会有相当一部分既不在公众手中，除英格兰银行外其他各家银行也都没有储备，而是可能像未铸造的金属那样，在国内外寻找市

场。它可能存在英格兰银行的金库中，以硬币的形式像金块那样存放，无论怎么使用都很方便。除了被用作通货之外，硬币与未铸造的金条或金锭相比，在某些用途上更为便利。

The idea of gold seeking a market, and not immediately finding one, may seem strange, and by the firm believers in the currency-principle doctrine may be set down as paradoxical and absurd.

黄金在寻找市场，但又不能立即找到，这样的观点可能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但那些通货原理的虔诚信徒们认为这既互相矛盾又很荒谬。

Gold is an object in such universal demand, or in other words so universally marketable, that its being supposed to be kept on hand at all, under the uncertainty of finding a suitable market for it, appears to be inconceivable, or almost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黄金是一种普遍需求的商品，或者换句话说，它拥有很广阔的市场，所以人们认为手中持有黄金而找不到合适的市场的想法是难以置信的，或者是自相矛盾的。

I am ready to admit that gold is a commodity in such general demand that it may always command a market, that it can always buy all other commodities; whereas, other commodities cannot always buy gold. The markets of the world are open to it as merchandise at less sacrifice upon an emergency, than would attend an export of any other article, which might in quantity or kind be

beyond the usual demand in the country to which it is sent. So far there can be, I presume, no difference of opinion.

我愿意承认对于黄金的需求极为普遍，以致它总是能找到市场，总是能用它购买其他一切商品；然而，其他的商品并非总能购买黄金。在紧急情况下，世界市场总是以比其他出口商品更好的价格接受黄金，其他商品可能在数量和种类上不符合进口国的一般需求。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没什么观点分歧。

But there will be found to be no inconsiderable difference, if we distinguish as we ought to do, for the purpose whether of theory or practice, between gold considered as merchandise, *i.e.* , as capital, and gold considered as currency circulating in the shape of coin among the public.

但出于理论或实践的目的，我们将作为资本的黄金和作为公众手中通货的黄金进行区分，就会发现出现很大的分歧。

Mr. Senior, in one of his lectures on the value of money, observes, “The valu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as money must depend ultimately on their value as materials of jewellery and plate; since if they were not used as commodities, they could not circulate as money.” And he makes a remark to the same effect in an article in the “Edinburgh Review” for July last, on Free trade and Retaliation. “The primary cause of the utility of gold is of course its use as the material of plate. The secondary cause is its use as money.” Of the truth of these propositions there can be no doubt.

西尼尔先生在他的一次关于货币价值的演讲中这样讲道："贵金属作为货币的价值最终必将取决于它们作为珠宝和金属器皿的原料的价值；因为如果不被当作商品的话，它们就不能当作货币流通。"去年七月，他在《爱丁堡评论》发表过的一篇题为《自由贸易与报复》的文章中，也有过类似的论断，"黄金产生效用的首要原因当然是因为它能被用作金属器皿的原材料。其次才是它被用作货币。"毋庸置疑，这些主张是正确的。

In a new and enlarged edition, just published, of that vast repertory of various and important information, "The Commercial Dictionary," Mr. McCulloch, after weighing different authorities, gives the following estimate of the consumpt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 for purposes distinct from their use as money:—

收录了丰富而重要信息的《商业词典》的增订版刚刚出版。麦卡洛克先生在权衡了各方权威人士的意见后，在这本字典中对贵金属未用作货币时的消耗作了以下估算：

> According to this view of the matter, the present annual consumption in the arts will be the United Kingdom 2,500,000*l.*; France, 1,000,000*l.*; Switzerland, 450,000*l.*; the rest of Europe, 1,600,000*l.*; in all, 5,550,000*l.* To which adding 500,000*l.* for the consumption of North America, the total consumption will be 6,050,000*l.*
>
> "根据此观点，目前用于艺术品方面的金银年消费量分别为：英国，2,500,000英镑；法国，

1,000,000英镑；瑞士，450,000英镑；欧洲其他国家，1,600,000英镑；总计5.550,000英镑。加上北美消耗的500,000英镑，总消耗量为6,050,000英镑。

But a portion of the gold and silver annually made use of in the arts, is derived from the fusion of old plate, the burning of lace, picture frames, etc.

“但是，每年部分用于制造艺术品的金银来自于熔化旧的金银器皿、花边和相框等。

Assuming that, as a medium, twenty per cent, or one-fifth part, of the precious metals annually made use of in the arts, is obtained from the fusion of old plate, we shall have, by deducting this proportion from the 6,050,000*l.* applied to the arts in Europe and America, 4,840,000*l.* as the total annual appropriation of the new gold and silver dug from the mines to such purposes, leaving about 4,400,000*l.* a year to be manufactured into coin, and exported to India, etc.”

“假设平均每年用于制造艺术品的20％或1／5贵金属来自于熔化的金属器皿，我们就该从欧美用于制造艺术品的6,050,000英镑中扣除这部分，每年用4,840,000英镑新开采的金银来制造艺术品，每年剩下4,400,000英镑制成硬币，并出口印度等等。”

Mr. McCulloch estimates the present annual produc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from the American, European, and Russo-Asiatic mines, at 9,250,000*l.* [4_1]

据麦卡洛克先生估计，现在美国、欧洲和俄属亚洲的矿山每年产出价值9,250,000英镑的贵金属。 [5_1]

As this country is not only a large consumer of the precious metals for purposes other than money, but is also an entrepôt for receiving from the mines, and distributing the greater portion of the quantity applicable to the consumption of other countries, the bullion trade, totally independently of supplying the currency, must of necessity be very considerable. In resorting to this entrepôt the metals can only be considered as merchandise in transit, seeking a market for consumption either in this country or abroad.

由于英国不仅是非货币用途贵金属的消费大国，也是运自矿山的贵金属的集散地，把大量的贵金属运输到他国供其消费，故而此地的金银块贸易完全不受货币供给的影响，其交易数量相当可观。在运往存储仓库时，金属只能被当作正在寻求国内外消费市场的商品。

But beyond the stock which is requisite for this purpose, and which must always include more or less of surplus to meet occasional extra demand, there must be a very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he precious metals applicable and applied as the most convenient mode of 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balances, being a commodity more generally in demand, and less liable to

fluctuations in market value than any other. I will not venture, in the absence of any recognised grounds for computation, to hazard an estimate of the amount so required; but bearing in mind the immense extent of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seasons,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affecting the relative imports and exports of food, and raw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es, besides the variations in the market value of national and private securities interchangeable, it cannot but be that the quantity of bullion required to be constantly available for the purpose must be very large; the principal deposits of it being in the Bank of England, the Bank of France, and the public banks of Hamburg and Amsterdam. These deposits may, moreover, in some of the public banks, be swelled by coins which have become superfluous in the circulation.

除了为此目的进行的必要储备，且为了满足时而产生的额外需求所需或多或少的剩余外，必须还要有相当数量的贵重金属作为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最便利手段。这是因为作为一种受到普遍需求的商品，贵金属比其他商品的市场价值波动更小。在缺少公认的计算根据的前提下，我不会冒险去估计为此所需的数量；但鉴于国际贸易的范围之大，季节变换和其他影响食物、原材料和制成品的相关进出口因素，以及国家和私人可交换证券的市场价值的变化，不得不说为此目的而需要的金块数量相当可观，它们主要存储在英格兰银行、法国银行、汉堡和阿姆斯特丹的国家银行中。此外在一些国家银行，这些储备可能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剩而会有所增加。

If, therefore, we take into account the magnitude of the stock necessarily imported, partly for the consumption of plate in this country, and partly for that abroad, and of the amount required as available funds for the 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balances, it may not be deemed an extravagant supposition that there might

occasionally be under a perfectly metallic circulation fluctuations, within moderately short periods, to the extent of at least five or six millions sterling in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bullion, perfectly extrinsic of the amount or value of the coin circulating as money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nd perfectly without influence on the general prices of commodities, as equally without general prices having been a cause of such fluctuations.

因此，如果我们考虑到用于国内外金属器皿消耗的必要进口储备，以及用于调节国际收支平衡所需要的可用基金数量，那么如下推测看来可能并不过分：在全部是金属货币流通的前提下，进出口金块短期内会出现偶然的适度波动，波动幅度至少是五六百万英镑，这种波动与公众手中用于通货的货币数量和价值无关，也对商品的一般价格没有影响，同样，物价也不是造成波动的原因。

It may be objected that the quantity of bullion which I have supposed to be in deposit among the principal public banks of the commercial world, applicable to the 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balances, should be looked upon as performing the functions of money, in restoring the level of the currencies, which the very fact of the necessity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y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proves to have been disturbed. This objection is found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gold and silver are money or currency, and it is supposed that the transmissions of bullion for the purposes in question have a direct operation upon the amount of money or currency in actual circulation in the several countries. But in this objection the consideration is overlooked, that the coins only which enter into, that is, form part of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can be designated as currency, while bullion can only be viewed in the light of capital. [4_2]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在通货水平恢复时，我认为储存在商界里主要国有银行中可用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金银，其职能发挥应被视作货币的执行手段，而货币需要从一国传输到另一国这一事实则证明通货受到了干扰。这种反对意见是基于对金银是货币或通货的假设，且认为以此为目的的金银传输对一些国家实际流通的货币或通货的数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但这种反对意见却忽略了一点：硬币只有在进入，或者说成为国家内部流通的一部分时，才能被称为通货，而金银只能被当作是资本。[5_2]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ullion, as merchandise or capital, and coins, as money or currency, may be exemplified in the case of coins which are subject to a seignorage, and in cases such as that of Hamburg, where the money current for all the ordinary expenditure of income consists chiefly of a variety of foreign coins, passing from hand to hand at a conventional value, while all mercantile payments are made by transfers of capital, deposited in the form of fine silver, and called bank-money.

作为商品或资本的金银与作为货币或通货的硬币间的区别，可以用硬币需要缴纳铸币税的案例加以证明。例如在汉堡，所有用于正常收支的货币主要由外币构成，而所有的商业支付则通过以纯银形式储存在银行中的资本转移完成，这些资本被称作银行票据。

In such a case as that of Hamburg there have been, and must often again be, very great fluctuations in the amount of silver in the bank, and consequently of bank money, without any obviously corresponding variations in the amount of money in circulation for current purposes of expenditure by the community, or any variation

as arising from that cause in the general prices of their commodities. And if a seignorage were imposed on the gold coin of this country on correct principles (that is, accompanied by a limitation of tender, and by a power on the part of the holders to demand gold bullion at 3*l.* 17*s.* 10½*d.* per ounce), there might be, and there would be, supposing a purely metallic circulation, occasionally very considerable variation in the amount of bullion in the coffers of the national bank, or in the hands of dealers in bullion, without necessarily in the slightest degree affecting the amount of the currency actually in circulation, in the ordinary daily transactions arising out of the expenditure of individuals composing the public, and without variation in general prices.

在汉堡这类情况下，银行中白银的数量一定会反复出现较大的波动，银行票据也是如此，而大众手中用于消费的流通货币数量则不会出现相应的明显变化，商品的价格也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如果按照正确的原则征收该国的金币铸币税（设定金币为法定货币，并赋予金币持有人权利以每盎司3英镑17先令10便士的价格兑换金币），假设在通货只有金属的情况下，国家银行金库中的金块数量偶尔会出现大幅变动，经销商手中的金块也是如此，未必会对实际流通的通货数量产生影响，公众开支引起的日常普通交易的数量也不一定会产生改变，物价也不会发生变化。

The views, of which an outline has here been sketched, distinguishing bullion as a commodity, constituting the readiest means of international transfers of capital, from the currency employed for internal purposes, will be rendered more clear when I come to point out, as I shall presently endeavour to do,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that part of the circulating medium which is employed in the transfer and distribution of capital, from

that which is employed in the expenditure of incomes, that is, in the retail trade of the country. And I do not now enter more fully into detail as to what I conceive would be the working of a purely metallic circulation, because that question does not form the main ground of the present inquiry, which is as to the sufficiency of the arguments adduc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ory of the currency principle, in favour of an entire separ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banks of issue from those of ordinary banking.

上文大致阐述了进行国际资本转化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把用于商品的金块，同用于国际用途的通货区别开来。在我接下来努力阐明用作转让和分配资本的通货媒介和用于收支即用作该国零售业的流通媒介的区别时，上述区别会更加明显。我就不在这里对我眼中纯粹的金属流通作更为详细的说明了，因为这不是当前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研究的是，那些根据通货原理所提出的将银行的发钞职能同普通的银行业务完全分离的观点是否正确。

In the doctrine which it is my purpose here to examine, the perfection of a metallic circulation is assumed to be beyond question; while the imperfection of our present system of paper credit, quite apart from the danger of inconvertibility, is pointed out and enlarged upon, by reference to the degree in which it is asserted to depart from this assumed model of perfection,—a model of whose properties and mode of operation the most erroneous notions seem to be entertained by those who set it up. [4_3]

本文要检验的学说认为，金属流通的完美是毋庸置疑的；而我们目前的纸币信用制度是不完美的，这种不完美和停止自由兑换完全无关。该学说也指出了这种制度与假设的完美模式之间存在偏差的程

度，那些建立该制度的人，对于这种模式的性能和操作方式有着错误的认识。[5_3]

“But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quantity of 631 poods obtained from washings in Siberia in 1842, the silver obtained from the mines of Kolyvan yielded, in the course of the same year, 30 poods of gold, while the washings and mines of the Oural mountains yielded no fewer than 310 poods; making the total produce 971 poods; equal to 35,030 lb. avoirdupois, or 42,571 lb. Troy, which, at 46*l.* 14*s.* 6*d.* per lb. is equivalent to 1,989,128*l.* 11*s* .“—(*Supplement au Journal de l'intérieur for 1842, p. 16.*)

“除了上述提到的于1842年从西伯利亚获得的631普特（俄罗斯重量单位）的黄金外，同一年于科雷万矿山获得的白银产出了30普特的黄金，而乌拉尔山的砂金矿和矿山也产出了至少310普特的金矿；总产量为971普特；相当于35,030常衡磅。相当于42,571金衡磅。若按每磅46镑，14先令，6便士计算，相当于1,989,128英磅11先令。”——《国内报纸增刊》，1842年，第16页。

It is necessary, however, to bear in mind that the Russian government imposes a duty, varying,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from 20 to 25 per cent, on the produce of the mines and washings; and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temptation to avoid so heavy a duty, and the pecul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agents for the Crown, must give rise to a great deal of smuggling. Perhap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we should not be far wrong if we estimated the metal of which no account is taken at 1/4th part of the above; but taking it only at 1/5th part, we have a sum of no less than 2,386,000*l.* for the produce of the Russian gold mines and washings

in 1842.

但有必要牢记，俄罗斯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沙金矿和金矿产量征收20％－25％的税；毫无疑问，为了避免重税和挪用公款，皇室代理人一定会大量走私。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将未登记在账簿的黄金数量估计上述的1／4不会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但姑且只按1／5来算吧，则1842年的俄罗斯的金矿和砂金矿的产量的走私量不少于2,386,000英镑。

It may be supposed, perhaps, that it would be wrong to take the produce of the Russian washings and mines in 1842 as a fair criterion of their future produce, seeing that the produce of the washings in that year was not far from being twice as great as it had been in any previous year. But it is to be observed, that the produce in question has been progressively and rapidly augmenting during the 13 years ending with 1842; and it is stated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whence we have borrowed these details, that s*elon toute probabilité, et à moins. qu'on ne manque d'ouvriers, le chiffre de l'année 1843 offrira de nouveau sur celui de l'année dernière un excédant très-considéable* . (We have since learned, as this article was going to press that the produce of the Russian gold and mines and washings in 1843 amounted to no less than 1342 poods! Being equivalent, adding one fifth for the quantity not brought to account, to 3,298,962*l.* 11s. 1d. sterling; an increase which is altogether extraordinary, and will have the most powerful influence.)

如果将1842年俄罗斯的砂金矿和金矿的产量作为未来产量的标准的话，可能是错误的，因为那年的砂金矿的产量大约是前些年的2倍。但应该知道，俄国黄金产量已经在1842年前的13年间逐渐猛

增；在此我们借用官方文件上的一些信息：“除非劳动力严重缺乏，否则1843年的产量会再次增加。　　”（正当本文将要付梓时我们了解到，1843年俄罗斯黄金，金矿和砂金矿的产量不会少于1342普特。按等值计算，加上没有登记在账簿的部分，结果是3,298,9621英镑11先令1便士；增长的数量惊人，产生的影响也将十分巨大。）

In addition to this vast quantity of gold, Russia produces a quantity of silver, which may, perhaps, be estimated, at an average, at about 1,300 poods a year, worth, at 5*s.* 2*d.* an ounce, 193,440*l.*

除了大量的黄金之外，俄罗斯还生产许多白银，据估计，白银每年的产量可能是1,300普特，按照每盎司5先令2便士计算，总计193,400英镑。

We have seen no very recent accounts of the produce of the Saxon, Hungarian, and other European mines, on which it would be at all safe to place much reliance. We incline, however, to think that their produce may be safely estimated at about 750,000*l.* a year.

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最近撒克逊、匈牙利和其他欧洲矿山的产量的可靠报道，然而我们倾向于认为他们的产量可能保守估计为每年750,000英镑。

Hence, supposing we are nearly right in these estimates, the total available produce of the American, European, and Russo-Asiatic mines will be, S. American and Mexican, 5,600,000*l.* ; U.

States, 100,000*l.*; European, 750,000*l.*; Russo-Asiatic, 2,600,000*l.*; making in all, 9,050,000*l.* And therefore, should these estimates be not very wide of the mark, it may be concluded, in opposition to the commonly received opinions on the subject, that the suppl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s at present but little inferior to what it amounted to when the American mines were most productive.

因此，假设我们的估计基本正确，美国、欧洲、俄属亚洲地区的矿山可利用的总产量将为：南美和墨西哥：5,600,000英镑；美国：100,000英镑；欧洲：750,000英镑；俄属亚洲：2,600,000英镑；总计9,050,000英镑。因此，如果这些预测与实际出入不大的话，则可以推测出与这一普遍观点相反的看法，贵重金属现今的供应量只略逊于美国矿山鼎盛时期的产量。

[4_1].Although the question of the total annual produce of gold and silver may not be considered as having any immediate bearing on the point now under discussion, it is a matter of such general interest, especially as relates to the vast increase of gold in Siberia and the Oural district of Russia, that I am induced to give Mr. McCulloch's view of the quantities produced from the several sources which he specifies. After stating from the most recent authorities the quantities produced from the South American and Mexican mines, he goes on to observe:—

[4_2].With the exception of Mexican dollars, this being the form in which the produce of the silver mines of America is mainly distributed, and Imperials, the golden coin of Russia, being the form in which the extraordinarily large and increasing produce of the Asiatic provinces of that empire is adding to the general suppl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and further excepting the gold coins of this country, which, being issued without any charge whatever for manufacture, are found to be for some purposes of export more convenient than bars or ingots: with these exceptions, the instances are rare in which, unless depreciated at home by compulsory paper money, the coins usually circulating as money are withdrawn to supply foreign payments of any magnitude.

[4_3].In the text I have taken what may be called the mercantile view of the question of international temporary movements of the precious metals, the general

value of them being assumed to be constant; and this view I am persuaded is the correct one, for the purpose either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or of intelligible explanation of the actual course of commercial affairs. As to the more general and abstruse question of the laws which determine the more permanent distribution of those metals among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constituting the level of the currenci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s exhibited in their general prices, and in wages especially, valued in gold and silver, it would require, in order to have justice done to it, a more scientific exposition, embracing a much wider range of reasoning and of facts than would comport with the scope or purpose of my present argument.

[5_1].尽管金银的年产量的问题和我们当下讨论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仍是人们都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关系到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黄金产量巨大增长的问题，所以我援引了麦卡洛克先生指出的一些地区产量的观点。在根据最新权威的数据，指出了南美和墨西哥的矿山产量后，他接着又继续说道：

[5_2].例外的是墨西哥元和俄国金币。美洲产出的银矿主要是以墨西哥元的形式流通到各地，而俄罗斯的金币，因为其亚洲各省的产量迅速增多，从而增加了贵金属的一般供给；更为例外的是我国的金币。因为免收铸造费用，因此其输出比金条或金锭方便。除了这些例外情况，除非国内纸币强行贬值，否则通常作为通货的硬币的流通功能被撤销，以便进行任何等级的外国支付的情况十分罕见。

[5_3].在本文中，我已经陈述了贵重金属短期内在国家之间流动的商业观点，关于这个一般观点的假设是不断变化的；而说服我的这个观点无论是从实际应用角度还是从商务实际过程角度考虑，都是正确的。至于那些更普遍、更深奥的问题，如是什么规律决定了这些金属货币在世界各国的长期分布状况，是什么导致了通过一般物价，尤其是工资表现的不同国家的货币流通水平等问题，可能需要更加科学的解释以及更充分的理由方为公正。这超出了我当前论证的范围和目的。

Chapter 3　Mistaken View by the Currency Theory of the Working of the Existing System

第三章　通货理论对现行体制运行所持的错误观点

If sufficient grounds have here been adduced to give rise to, at least, a suspicion that the propounders of the currency theory are unaware, or rather are under a total misconception, of what would be the working of a purely metallic circulation, we are inevitably led to suspect, or rather I should say to conclude, that they may and do labour under a misconception fully as great, not only as to what would be the working of a mixed circulation of coin and bank notes, administere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that is, so as to conform to what they suppose would be the working of a metallic circulation, but as to what the working of it actually has been and is under the existing banking system.

如果上述理由足够充分，至少会使人怀疑通货理论的提出者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更确切地说，错误地理解了纯粹金属货币的运行方法。那么我们必然会怀疑，更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不仅完全错误地理解了依据通货原理管制的硬币和银行票据的混合流通方式——他们以为这与他们设想的金属货币流通方式一样，而且错误地理解了这种混合流通方式的实际情况以及现行银行体系下的运行情况。

The misconception which, as it should seem, they labour under, may be referred mainly to the view which they take of bank notes, as being essentially distinct in all their attributes and functions from each and every other of th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circulating

medium, and as coming exclusively along with coin under the designation of *money* .

这种错误观点似乎主要存在于他们对银行券的看法上，他们认为银行券的属性和功能和其他各种流通媒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毕竟只有银行券和硬币才可被称为“货币”。

Bank notes, accordingly, they call paper money, and ascribing, as they do, a direct influence to the quantity of money on the state of trade, of confidence, and credit, and on prices, they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fact of any increase or diminution of bank notes in circulation, more especially as regards a conformity, or non-conformity, of such increase or diminution to variations in the amount of bullion. As therefore they conceive that it is in the power of the banks of issue so to regulate the amount of their notes in circulation, as to conform to variations in the amount of bullion, or, as it is more commonly termed, to regulate their issues, by the exchanges (inasmuch as attention to the exchanges will serve to indicate whether gold is coming in or going out, or likely to come in or go out), they consider the conformity or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fluctuations in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in circulation and the amount of bullion in the coffer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as the test or criterion of the good or bad management of the banks.

于是，他们认为名为“纸币”的银行券对贸易中货币的数量、信心、信誉和价格有着直接的影响，他们非常关注流通中银行票据的数量增减，尤其是这种增减的变化是否和金块增减的变化一致。因此他们认为发钞行有能力控制流通中银行券的数量，从而使其与金块的数量变化保持一致。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兑换来调节发行量（须注意通

过兑换可以了解黄金是进口还是出口，或者黄金流动的趋势），他们认为流通中银行券的数量和英格兰银行金库中的金块数量是一致还是有所偏差，是银行管理好坏的评价标准。

On occasions of marked discrepancy, the persons who espouse the currency principle, and are, at the same time, favourable to the Bank of England, charge the country banks with counteracting, by their inattention to the exchanges in regulating their issues, all attempt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to restrain the general circulation within due bounds; while the country banks, both private and joint-stock, maintain, through their organs, that it is not in their power to determine what shall be the amount of their notes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nd not content with thus repelling the charge made upon them, they retort it upon the Bank of England, which, according to them, has the control of the whole circulation, and expands or contracts the amount according as suits its own purpose.

如果出现明显不一致的情况，那么支持通货原理同时也拥护英格兰银行的人会指责地方银行因没有注意到兑换可以调节发行的事实，从而使英格兰银行试图将流通的数量限制在适当范围内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而地方银行，不管是私人的还是股份合资的，都通过宣传手段坚持认为，它们没有能力决定公众手中银行券的数量。而且它们对自身遭受的指控表示不满，反驳说英格兰银行掌握着整个流通体系的控制权，却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随意增加或缩减流通数量。

It appears to me that neither of these parties is right in charging the other; and, moreover, that those persons who, on the part of the public, judging only by the Criterion set up by the currency theory, namely, by the conformity of variations in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to variations in the amount of bullion, charge the present system with causing irregularity in the circulation, and with all the evils which flow from bad regulation, are equally far from a right judgment.

在我看来，双方的相互指责都是不对的。此外，那些仅仅通过通货原理所设立的标准来进行判断的公众，即通过银行券的变化是否与金块的变化相一致进行判断的民众，认为所有的弊端都是由不正当的管理造成的，这种判断也是不正确的。

I am quite convinced, and will endeavour to show, that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in circulation, that is, out of the walls of the issuing banks, and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furnishes no criterion of good or bad management by the banks of issue, and is not an efficient cause operating upon trade and confidence and credit, and upon prices; and that, excepting the greater inconvenience attending the insolvency of an issuing than of a non-issuing bank,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descriptions of banks as regards their influence on the value of the currency.

我确信，并会竭力证明，流通中银行券的数量，即发钞银行已经发行的、公众手中持有的银行票据，并不是判断发钞行管理好坏的标准，也不是影响贸易、信心、信誉和物价的直接原因。除了发钞银行破产带来的不便之处超过非发钞银行之外，这两类银行对通货价值的影响区别甚微。

I cannot help thinking that there is a lurking impression among the doctrinaires of the currency theory, arising mainly from their

use of the term “issue of paper money,” which leads them to confound bank notes strictly convertible into coin, with a compulsory and inconvertible paper currency. It is true, no doubt, that they are aware that the liability to payment on demand in gold will eventually check any excess of issue in the one, and will thus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other. But it seems to me equally true, judging by all their expressions and the whole course of their arguments, that they are misled by a false analogy, and that although they admit in general terms that there must be a check to the power of issue by its being brought to the test of convertibility, they are of opinion that there is a power in each individual bank of issue, and in the banks of issue collectively, to operate at any given time in adding directly to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in circulation, and in withdrawing them from it. The presumption that the advocates of the currency principle a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mistaken analogy will be strengthened when we come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effects on trade, credit, and prices, which they ascrib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quantity of money, meaning bank notes and coin. In the meantime it may be proper to bestow some remarks on the reasoning by which it is proposed to be proved that bank notes differ in all essential properties, as regard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unctions of money, from all other forms of paper credit employed in the business of interchange.

我不禁要想，在笃信通货理论的迂腐人士中，存在一种潜在的观念。它主要是由使用“纸币的发行”这个词引起的，这个词使这些迂腐人士混淆了可兑换成硬币的银行券和强制使用、不可兑换的纸币的概念。毫无疑问，他们确实意识到，见索即付的债务最终会终止发行量过剩的现象，并会将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在对他们的观念和整个辩论过程进行判断之后，我发现他们被一种错误的类推误导了，尽管在大体上他们承认，发钞行的发行能力一定会因可兑换性的检验而受到

限制。但他们相信，每一家单个的发钞行和全体发钞银行都有能力随时直接增加流通中银行券的数量，并从流通中将其收回。在通货原理拥护者考虑货币的数量，即银行票据和硬币的数量对贸易、信誉和物价的影响时，他们一定也受到了上述错误类推的影响。与此同时，也许是时候评论一下他们提出银行券在执行货币职能时，其基本性质不同于交换业务中其他形式的纸币这一论断了。

Chapter 4　Distinctive Properties Ascribed to Bank Notes

第四章　银行券的特殊性

Mr. Norman, after noticing what he calls the contrivances usually resorted to for the purpose of either dispensing with the use of money altogether, or of diminishing the quantity of it, which is absolutely required for the adjustment of existing transactions, observes—

诺曼先生提出了他所谓的便利方法，利用这种方法人们可以达到不使用货币，或是减少使用中的货币数量的目的，这对调节现有的交易活动非常必要。他说道：

> On these contrivances one general remark may be made, as it affords a ready and practical, if not a strictly scientific distinction between such substitutes for money, and that which, as I conceive, really constitutes money, viz, coin and bank notes. If bank notes are withdrawn from circulation, their place must necessarily be supplied by an equal amount of coin; but the abolition of any, or of all of the contrivances for dispensing with the use of money, will not necessitate the introduction in their place of an equal amount of coin or bank notes. —*Letter to C. Wood, Esq., p.* 34.

“关于这些便利的方法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总体评价，那就是它在货币的替代品以及硬币和钞票等真实的货币间提供了一种现成且实用的区别方式，尽管这种区分方式还不够严格科学。如果在流通中收回银行券，那么必须有等量的硬币填补其位置；但是废除所有为了避免使用货币的便利方法之后，并不一定能够引入等量的硬币或银行券来代替它们。”——《致C·伍德先生的信》，第34页。

In dealing with this proposition, let us try it by putting the case in the strongest way, and suppose that the Bank of England has the power, and is disposed to withdraw all its notes from circulation; or, in order to obviate the objection, that in such case other banks might supply the vacuum, let us suppose that all promissory notes, payable on demand, were suppressed by act of parliament. Would Mr. Norman contend, that the whole amount must of necessity be replaced by coin? Most assuredly such would not be the effect.

在考虑这个命题的时候，让我们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检验。假设英格兰银行有能力且愿意将它所发行的所有银行券从流通中收回；或者为了避免反对意见，其他银行会在这种情况下填补空缺，让我们假设议会通过法案废止所有见票即付的票据。那么诺曼先生还会坚持认为硬币将取代所有的银行券吗？很显然绝对不会。

A moment's consideration must be sufficient to satisfy any one that it would only be the smaller denomination of notes, which, if suppressed, would require to be replaced by coin; the whole of the 1*l.* notes which still circulate in Ireland and Scotland, would require to be so replaced,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5*l.* notes, and a small

part of the 10*l.* no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稍作思考人们就会明白，如果禁止使用银行券，那么硬币就只能取代小额的银行券；目前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使用的所有面额1英镑的银行券，以及在全英国的大部分面值5英镑及少部分10英镑银行券也会被取代。

All the larger amounts might be, and most probably would be, supplied by cheques and bills of exchange and settlements.

所有较大的数额可能，且极有可能被支票、汇票和结账等替代。

The employment of the higher denominations of Bank of England notes is chiefly for the following purposes:—

英格兰银行较大面额的银行券主要用于以下目的：

1．Collection of the public revenue, and the payment of it into the Exchequer.

1．征集国民税收，并将所得上缴国库。

2．Payments on sales and mortgages of landed and other fixed property. Till lately the rule in transactions of this nature, was

almost uniformly that the payment, on conveyance of the deeds, should be made in bank notes. But there has of late been a tendency to relax this rule, and cheques are now not unfrequently received in payment on such occasions.

2．支付土地及其他不动产的交易或抵押款项。直到前不久，处理这类交易的规则还通常是用银行券支付转让契约的款项。但最近，这项规则有放松的趋势，此类付款通常可以用支票进行。

3．Dividends and rents received by persons who do not employ bankers.

3．向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支付股息和租金。

4．Payments for debts in cases in which the debtor has not a banker, or in which he would not be trusted so far as to have his cheque received in satisfaction of the claim.

4．如果债务人没有银行账户，或者债务人无法得到信任，因而不能用支票偿还债务时，银行券被用来偿还债务。

5．Payments into Court in litigated claims.

5．提出诉讼时，向法庭缴纳费用。

6．Reserves held by bankers, and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west end of the town, and by the joint-stock banks in the city who are not admitted to the clearing-house.

6．银行家，尤其是在伦敦西区的银行家用于持有储备金，以及不被清算行承认的伦敦市内的联合股份银行的持有储备金。

7．Settlements at the clearing-house.

7．票据交换所用于结算。

Now these are peculiar purposes, most or all of which might be answered by other means than bank notes, and most assuredly not by supplying their place by coin.

以上这些特殊目的，大多或全部可以用其他方法取代银行券进行支付，但肯定不能用硬币代替银行券。

1．The public revenue is, i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nstances, paid into the Exchequer by drafts on the Bank of England.

1．用英格兰银行的汇票向国库缴纳税收的例子越来越多。

2．Payments for landed and fixed property are i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nstances paid by cheques.

2．土地和不动产的付款越来越多地用支票进行支付。

3．Dividends to persons not keeping bankers, might be retained by them in the shape of warrants.

3．以认购证书的形式向那些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支付股息。

4．and 5. Involve so small an amount, as not materially to affect the question.

4和5涉及的数额小，对我们的问题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6．The circulation of Bank of England notes among bankers, whether between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west-end bankers, and the city joint stock banker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ountry bank notes, in settlements among each other, are mere conventional transfers of capital.

6．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在银行家之间流通，无论是在英格兰银行和西部银行家间流通，还是用作交换市内联合股份，银行券用于相互结算的流通情况，只不过是资本的常规转移。

7．The clearings among the bankers of the city of London, might all be effected either by Exchequer bills, as in the case of the banks of Edinburgh, or by cheques on the Bank of England.

7．伦敦市银行间的清算，就像爱丁堡各家银行那样，可以通过国库券或者英格兰银行的支票来完成。

The country bank notes above the lowest denominations, (which are in use in the retail trade, and in the payment of wages), are mostly employed in the provision markets, and in cattle and horse fairs, purposes for which, as I shall proceed to show, bills of exchange were formerly, and might be again very extensively employed.

大于最低面额的地方银行券（用于零售业和工资支付），大部分用于粮食市场和牛马市场，就像我接下来所说的，汇票先前曾得以广泛使用，以后也可能会再次得以广泛使用。

Chapter 5　Deposits and Cheques

第五章　存款及支票

Among the contrivances which the currency theory allows to be the means of dispensing with the use of money, although it will not admit that they perfectly perform the functions of money, are deposits or lodgements in banks, subject to certain stipulations of repayment. In the examination by the Committees on Banks of Issue in 1840, 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a great waste of time and temper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question, whether deposit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currency, and as performing the functions of money.

尽管还不承认通货原理允许的货币替代物可以完美地执行货币职能，但它可按特定规定偿还银行存款或银行储蓄。1840年，在发钞银行委员会对发钞行的调查中，对存款是否应被当作货币并执行货币职能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看起来这项工作费时费力。

There is an obvious objection to speaking of deposits in general terms as performing the functions of money, inasmuch as deposits are of different descriptions as to the conditions of repayment attaching to them. But supposing the deposits to the strictly payable on demand, there is still an apparent impropriety in ascribing to them qua deposits a direct agency or activity.

当谈到一般意义上存款可以执行货币职能时，就会听到明显的反对声音，因为存款在其附带的偿还条件方面是不同的。但假设存款严

格执行见票即付的规定，把存款归为能直接起作用的那一类货币显然也不合适。

It sounds oddly, to say the least of it, to speak of deposits or lodgements of money as being active. The activity, if any, is in the payment by cheques founded upon the deposits. It is not the deposits, but the transfers of them; or, in other words, the cheques that constitute the actual instruments of interchange, and effect payments concurrently with bank notes. They perform the functions of money not only as perfectly as bank notes, but in the description of transactions to which they are applicable, they are more convenient than bank notes.

退一步讲，称存款或者储蓄是主动的，这听起来也很奇怪。如果有任何这样的说法，那也是形容根据存款用支票进行支付这项活动富有活力。不是存款，而是存款的转移活动；或者换句话说，构成实际的交换工具的支票，和银行券一起执行支付职能。它们不仅像银行券那样完美地执行了货币的职能，而且在适用的范围内执行交易活动时，比银行券更加便捷。

They obviate the trouble of paying fractional parts of the sum in coin; they, in many cases, supersede the use of stamped receipts, inasmuch as the books of the bankers serve as evidence of the payment. They obviate the risk of robbery or fire, which attends the possession of bank notes by persons not having the accommodation of strong and fire-proof safes. The cheque books of the drawers serve also to preserve a counterpart of all the particulars of the payment, and so assist in tracing error or irregularity, if there be any, in the payment or in the entry of it. And the use of crossed

cheques, as far as regards the London bankers who resort to the clearing-house, admits of the drawers of such cheques adjusting their receipts and payments between the opening of business and half-past three or four o'clock, so as that their banker shall have only the balance to pay, or receive, or set off. Some or all of these advantages, with possibly others, which may exist and may have escaped my observation, are sufficient to account for the great and increasing tendency to the employment of cheques in preference to bank notes in the pecuniary transactions of the metropolis and of the metropolitan district. [7_1] Independently of the greater convenience which is found to attach to the use of cheques instead of bank notes, by persons who are in the habit of employing bankers, the employment of bankers by persons, whether traders or not, of the middle classes (the upper classes of course, all, or nearly all, employ bankers), is daily gaining ground, and this is an additional cause of the displacement of bank notes by cheques.

支票避免了用硬币支付小笔金额的麻烦；多数情况下，支票代替了盖戳的收据，因为银行家的账簿就是付款的证据。它们避免了被抢劫和火灾的风险，而对于没有牢固的防盗和安全的防火设施的银行券持有者来说，抢劫和火灾经常发生。开票人的支票簿也保留了所有付款细节，如果在付款或收款时出现任何差错，有助于追查错误或异常情况。至于常常去票据交换所的伦敦银行家们，使用划线支票允许他们在营业开始到三点半或四点半之间调整收款和付款，这样银行家得到的只是付款、收款或收支相抵后所得的余额。以上这些优势，加上其他一些可能存在但我尚没有发现的优势，足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大都市和都市行政区的金钱交易中，越来越倾向使用支票而不是银行券。 [8_1] 惯用银行账户的人发现使用支票而非银行券会带来更大的便利，除此之外，中产阶级中（当然，上层阶级已经全部或几乎全部使用银行账户）使用账户的人（无论是否从商）也日益增多，这是支票代替银行券的另一个原因。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a much larger amount of payment in the metropolitan districts is effected by drafts on bankers than by bank notes. And the circumstance that deposits payable on demand are the foundations on which drafts are passed, such drafts effecting more payments than bank notes, seems to be the ground on which the late Mr. Page in his evidence (and Mr. Hume in his examinations, his views being identical with those of Mr. Page) contended that deposits are currency and more active in making payments than bank notes.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伦敦的大额付款是由银行汇票而非银行券完成的。见票即付的存款是汇票得以流通的基础，这类汇票完成的支付比银行券多，佩奇先生似乎正是基于这一点，在他的证词中（休姆先生在调查中的观点与佩奇先生的完全相同）主张存款是通货，且在支付中比银行券更为活跃。

> *Qu* . 770. (*Mr. Hume* .) “As you have stated that circulation and deposits are both currency, which of the two do you consider to be most active in making payments?”

> 问题770（休姆先生）：“您说过纸币和存款都是通货，那么您认为二者在支付时哪个更活跃呢？”

An . “Deposits beyond all question.”

回答："无疑是存款。"

I do not, as I have before had occasion to observe, concur in the propriety of applying the term currency to deposits, because, although such of them as are payable on demand may and do serve for payments by the means of transfer, it is the transfers or cheques, and not the deposits, which, in point of fact, constitute the instruments of exchange. But whether deposits payable on demand, or only the drafts against them, are to be considered as currency, is immaterial to this part of my argument, which is to show that, as instruments of exchange, cheques, or the deposits on which these are founded, answer the purposes of money, as conveniently in nearly all instances as bank notes, and more conveniently in most cases; [7_2] and that therefore whatever influence may be ascribed to bank notes, whether on prices, or on the rate of interest, or on the state of trade, cannot be denied to cheques or to their substratum, deposits payable on demand.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不赞成将通货说成是存款，因为，尽管见票即付的存款确实可以通过转让手段用于支付。但实际上，是支票或转让凭单构成了交换工具，而不是存款本身。但是否把见票即付的存款抑或是抵付存款的汇票看作通货，对于我论证的部分并不重要。我想阐述的是，作为交换工具，支票或者基于支票的存款，都执行了货币的职能，这和银行券一样方便。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比银行券更为方便；[8_2] 因此，无论银行券对物价、利率或者是贸易状况产生了什么影响，都不能否认支票或其基础——见票即付的存款，也会产生这种影响。

[7_1].In illustration of the tendency to a preference of the use of cheques over bank notes in mercantile transactions in London, it may here be observed, that if a

merchant in the course of his business receives Bank of England notes of 100*l.* or upwards, and has on the same day to pay away a sum or sums exactly equal to the notes, he will in most cases make his payment by a cheque or cheques, and put the bank notes into his banker's, to be placed to his credit against his drafts.

[7_2].There is a great saving of coin in paying by drafts instead of bank notes. In payments by bank notes all fractional parts of 5*l.* must be paid by coin. Upon the very numerous payments in the Kingdom (Ireland and Scotland, where 1*l.* notes still circulate, excepted) the saving of coin thus effected must amount to a considerable sum.

[8_1].在伦敦的商业交换中，支票比银行券更受青睐．在阐述这一问题时，我发现如果商人在交易过程中，收到的英格兰银行票据超过100英镑，那么在同一天，如果支付同额的数量，大多数情况下他会选择支票并将银行券放进他的户头中，用以抵押汇票。

[8_2].使用汇票比使用银行券更节省硬币。用银行券支付小额部分5英镑必须用硬币支付。英国进行的支付众多（除了1英镑银行券仍然流通的爱尔兰和苏格兰地区），因而其中节省硬币的数额总和相当庞大。

Chapter 6　Bills of Exchange

第六章　汇票

That transactions to a very large amount are adjusted by bills of exchange has long been known and admitted in general terms; but the vastness of the amount was not brought distinctly under the notice of the public till the appearance of a pamphlet by the late Mr. Leatham, an eminent banker at Wakefield. According to a computation, which he seems to have made with great care, founded upon official returns of bill stamps issued, the following are the results:—

长期以来，用汇票是一种广为人知并被广泛认可的调节大额交易的方式。但直到韦克菲尔德杰出的已故银行家利瑟姆先生的小册子出版之后，其数额之大才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根据发行的官方印花税票，他做了精心的计算，以下就是其计算结果：

Return of Bill Stamps, for 1832 to 1839 Inclusive

1832-1839年间印花税票带来的收益

Mr. Leatham gives the process by which, upon the data furnished by the returns of stamps, he arrives at these results; and I am disposed to think that they are as near an approximation to the truth as the nature of the materials admits of arriving at. And some corroboration of the vastness of the amounts is afforded by a reference to the adjustments at the clearing house in London, which in the year 1839 amounted to 954,401,600*l.* , making an average amount of payment of upwards of 3,000,000*l.* of bills of exchange and cheques daily effected through the medium of little more than 200,000*l.* of bank notes.

利瑟姆先生根据税票收益情况所提供的数据得出了上述结果，并阐述了计算过程。我倾向于认为，若按照其依据的材料看，他的结果是非常接近于真实情况的。通过参看伦敦票据交换所的清算数据也可证实这笔款项的数额之大。1839年，其数额达到954,401,600英镑，每天通过仅仅多于200,000英镑的银行票据平均完成了3,000,000英镑以上的汇票和支票的支付。

As illustrative of the position for which Mr. Leatham contends, and conclusively, as I think, that bills of exchange perform the functions of money, he observes,—

为了说明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利瑟姆先生认为汇票执行了货币的职能，他将其概括为：

For a great number of years, it had been the custom of merchants to pay the clothiers in small bills of 10*l.* , 15*l.* , 20*l.* , and so up to 100*l* , drawn at two months after date on London bankers. I have always considered this the best part of our paper currency, ranking next to gold; the bills existing only for limited periods, and acquiring increased security as they pass from hand to hand by endorsement. From the unreasonably high stamp laid on small bills in 1815, the merchants have ceased to pay in bills, but pay notes instead, requiring 2d. in the pound for cash from the receiver; and I find the revenue has much decreased in consequence in this class of stamps. *pp.* 44, 45.

“多年以来，商人早已经习惯于向呢绒商支付10英镑、15英镑、20英镑、最多100英镑的小额款项，并在两个月后从伦敦的银行提款。我一直认为这些占纸质通货的大部分，仅次于黄金；这种汇票有特定的期限，随着背书，从一个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其安全性也逐渐增加。但在1815年，在对小额汇票收取不合理的高额印花税后，商人们不再用汇票进行支付，而代之以银行券，但需要收款人每英镑支付2便士的现金。我发现印花税的出现导致了国家税收的大幅度减少。”第44、45页。

Mr. Lewis Loyd, when examined by the House of Lords' Committee on the Resumption of Cash Payments in 1819, gave the following evidence.

路易斯·伊德先生在1819年接受英国上议院恢复现金支付委员会调查时，给出了以下证词：

Qu. 9．At the time when you began business in Manchester, in 1792, were there any country banks which issued notes in that town, or in any other part of Lancashire?

问题9：当你于1792年在曼彻斯特开始做生意时，有没有在那里或者在兰开夏郡的任何其他地方银行发行过银行券？

None, I believe.

答：我记得没有。

10．Have there never been, at any time, country banks issuing notes in Lancashire?

问题10：那么兰开夏郡任何时间都没有发行过银行券吗？

None within my recollection. I began to reside in Manchester in 1789. There had been, before that

period, notes issued there about the year 1787 or 1788; I think by a bank which failed. I believe that was the only attempt ever made in Lancashire till lately, except that there was lately, and is now, an attempt made to issue them at Blackburn.

答：在我的印象中没有。自1789年开始，我就住在曼彻斯特。在那之前，我记得一家银行在1787年或1788年发行过银行券，但后来它倒闭了。除了最近和现在布莱克本试图发行银行券之外，我想那是兰开夏郡为发行银行券所做出的唯一一次尝试。

11．How has the circulation of Lancashire been carried on since the period to which you refer?

问题11：那么自您上述提及的时间之后，兰开夏郡的流通是如何进行的呢？

Wholly in Bank of England notes and bills of exchange.

答：全部都是用英格兰银行券和汇票。

12．Is the proportion of Bank of England notes very considerable as compared with bills of

exchange?

问题12：与汇票相比，英格兰银行券所占比例大吗？

About one-tenth, I think, in Bank of England notes, and nine-tenths, at least, in bills of exchange. These bills of exchange circulate from band to hand, till they are covered with endorsements.

答：我想大概有1/10的英格兰银行券，但至少有9/10的汇票。汇票在人们手中流通，直到上面满是背书为止。

13．Is any inconvenience felt from this mode of circulation by bills of exchange?

问题13：汇票的流通带来了任何不便之处吗？

None whatever.

答：没有任何不便。

14．Has the circulation of Bank of England

notes increased or decreased of late years in proportion to bills of exchange?

问题14：英格兰银行券与汇票的流通比例近几年来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

I think the proportion of bank notes has increased.

答：我认为银行券的比例增长了。

15．To what do you attribute that increase?

问题15：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增长呢？

Partly to the great increase of the stamp duties. It is within my knowledge, from the transactions of my own house, that the supplies of provisions, which are drawn from the neighbouring counties, used to be paid for in small bills of exchange, mostly of 10*l.* or lower; but now the persons going to the neighbouring localities for supplies of provisions take with them bank notes and bank post bills, stating that the stamp is too serious an object to them to be paid on such small sums.

There is scarcely a day when I do not send 2000*l.* in bank post bills for that purpose to Manchester, which we hardly ever used to do before the last addition to the stamp duty.

部分原因是由于印花税的增加。从我自身商号的交易活动来看，据我所知过去人们通常用小面额——多为10英镑或更小面额——的汇票从邻郡购买食品；但如今，人们要从邻郡购买食品，通常会带着银行券或者银行汇票，他们说印花税的征收太过严苛，就算是支付这么小面额的费用也要征税。在最近增加了印花税之后，为了购买食品，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向曼彻斯特邮寄2000英镑的银行汇票，我之前几乎从未这么做过。

16．Were these bills of exchange drawn for specific loans previous to their employment, or were they bills resulting from antecedent transactions?

问题16：这些汇票是在其使用之前因特殊贷款而得的，还是在先前的交易中产生的？

Those who purchased provisions used to go to fairs and markets with bills ready drawn in their favour, very often for specific sums, as for the round sum of 10*l.* , just as they now take 10*l.* in Bank of England notes and bank post bills. There

was this peculiar circumstance attending them, that the bills were usually drawn at two months' date, and were considered as cash payment; they were bills drawn on London by country bankers, and remitted to London as suited the convenience of the parties who received them. Now, in consequence of having bank post bills and Bank of England notes, the persons who receive the bills make an allowance to those who pay them of two months' interest. My answer applies to the supply of the town with provisions. Nearly all the other transactions of Manchester, except the payment of labourers, are still carried on in bills of exchange, and the payment of labourers is mostly made in 1*l.* Bank of England notes.

那些购买食品的人，过去常常带着已经开好且以本人为收款人的汇票去集市和市场。通常这些汇票的数额是特定的，比如10英镑，就像他们现在带着10英镑的英格兰券和银行汇票一样。这些汇票期限通常是两个月，而且被用作现金来进行支付，这正是这些汇票的特别之处。这些汇票由伦敦的地方银行来出票，然后寄回伦敦银行，这样对收票人比较便利。如今，由于有了银行汇票和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收到汇票的人要向兑票人付两个月的利息。我的回答适用于曼彻斯特食品供应的现状。除劳工报酬外，曼彻斯特的其他交易几乎都用汇票进行。劳工报酬大多用面额为1英镑的由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支付。

If by an alteration in an opposite direction, the

stamp duty on bills of exchange were reduced or abolished, while that on promissory notes on demand remained the same, and still more, if it were raised, there would be a considerable change in practice, by making the smaller payments among dealers in bills of exchange as a substitute for bank notes.

如果情况与此相反，减少或取消汇票的印花税，而见票即付的本票的印花税保持不变或者增加，如果增加的话，实际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商人之间在进行小额支付时就会用汇票来替代银行券。

In a work by the late Mr. Henry Thornton, [8_1] which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at the time, and which formed the subject of an article by Mr. Homer, in the first Number of the *Edinburgh Review* in 1802, there is a distinct and full descripti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bills of exchange performed in his time the function of money; a description which is strictly applicable at the present day. He observes with reference to bills of exchange,—

已故的亨利·桑顿先生的一篇著作 [9_1] 曾在当时引起了无数人的关注，荷马先生在1802年第一期《爱丁堡评论》中还以此为主题写过一篇文章。在书中，桑顿先生详尽地描述了汇票在他那个时代执行货币职能的方式；当初的描述也完全适用于如今的情况。他是这样描述汇票的：

They not only spare the use of ready money,

they also occupy its place in many cases. Let us imagine a farmer in the country to discharge a debt of 101. to his neighbouring grocer, by giving to him a bill for that sum, drawn on his corn-factor in London, for grain sold in the metropolis; and the grocer to transmit the bill, he having previously endorsed it to a neighbouring sugar baker, in the discharge of a like debt, and the sugar baker to send it, when again endorsed, to a West India merchant in an out-port, and the West India merchant to deliver it to his country banker, who also endorses it, and sends it into further circulation. The bill, in this case, will have effected five payments, exactly as if it were a 10*l.* note payable to bearer on demand. It will, however, have circulated in consequence chiefly of the confidence placed by each receiver of it in the last endorser, his own correspondent in trade; whereas the circulation of a bank note is rather owing to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name of the issuer being so well known as to give to it an universal credit. A multitude of bills pass between trader and trader in the country in the manner which has been described; and they evidently form, in the strictest sense, a part of the circulating medium of the kingdom.

“汇票不仅省了现金的使用，也在许多情况下代替了现金。让我们想象一下如下场景：如果一位村民向开杂货店的邻居偿还10英镑的债务，农民支付给杂货商一张他在城市售卖谷物所得的一张同等数额的

汇票；杂货商将这个汇票背书后发给他临近的一名面包师，以偿还之前他欠的同等数额的债务，而面包师在又一次背书后又把汇票转交给一位外阜的西印度商人，西印度商人将其背书的汇票交给地方银行进行进一步的流通。在这种情况下，汇票就完成了五次支付，完全像一张见票即付的10英镑银行券一样。但是，汇票得以流通，靠的主要是收票人对最后一位背书人的信用和他自己的商业代理商的信任；而银行券的流通则主要由于发行人的信用良好，从而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大量的汇票在国内商人间以上述方式进行流通；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已经构成了英国流通媒介的一部分。

Bills, since they circulate chiefly among the trading world, come little under the observation of the public. The amount of bills in existence may yet, perhaps, be at all times greater than the amount of all the bank notes of every kind, and of all the circulating guineas. Liverpool and Manchester effect the whole of their larger mercantile payments, not by country bank notes, of which none are issued by the banks of those places, but by bills at one or two months' date, drawn on London. The bills annually drawn by the banks of each of those towns amount to many millions.

“因为汇票主要在商界流通，所以很少受到公众关注。但现有的汇票数量，也许会一直多于各种银行券和全部流通基尼（英国旧时金币名）的数量。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是用一月期或两月期，由伦敦兑付的

汇票完成所有的大额商业支付，而不由地方银行券进行支付，这些地方银行也从未发行过大额银行券。这两个城市每年开出的汇票数额高达数百万英镑。”

The late Sir Francis Baring, writing at a still earlier period (1797), and of a state of things within his immediate experience, refers, in the following passage, to the practice prevalent among country bankers, of issuing notes payable after date or after sight,—

已故的弗朗西斯·巴林先生，早在1797年时就凭亲历写下了下列段落，提到了在地方银行中盛行的，发行见票即付或到期即付的汇票的方式。

>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1793, and of the present year, 1797, the banks of Newcastle stopped payment, while those of Exeter and of the West of England stood their ground. The partners in the banks at Newcastle were far more opulent, but their private fortunes being invested could not be realised in time to answer a run on their banks. Their notes allowed interest to commence some months after date, and were then payable on demand; by which means they had not an hour to prepare for their discharge. The banks of Exeter issued notes payable twenty days after sight with interest, to commence from the date of the note, and to cease on the day of acceptance.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practice of the banks at Newcastle is more lucrative, whilst it must for ever,

be more liable to a return of what has happened. The twenty days received at Exeter furnishes ample time to communicate with London, and receive every degree of assistance which may be required. [8_2]

“在1793年年初到今年1797年年初，纽卡斯尔银行停止这种支付，而埃克赛特银行和西英格兰银行仍坚持用该种方式进行支付。纽卡斯尔银行的合伙人们资金雄厚，但他们的私人财富不能及时得到兑现，因而无法维持银行的继续运营。他们的票据允许出票后数月开始支付利息，并且见票即付；这意味着他们没有任何时间去准备偿还债务。埃克赛特银行发行的票据，20天后见票即付，利息从发行之日算起，到兑现完成后截止。毫无疑问，纽卡斯尔银行的操作方式更加赚钱，但它同时必须保持能够随时兑付。埃克赛特银行有20天的时间，这样就足以和伦敦方面交流，以便得到需要的一切帮助。” [9_2]

If, according to the currency theory, the circumstance that written promises to pay being after date or sight, and to order, and therefore requiring an endorsement, are disqualified from being considered as performing the functions of money, on what ground is it that bank post bills, which are after sight and to order, have been always included in the returns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ank of England? They are by their form strictly bills of exchange, being not only after sight and to order, but commonly used for transmission by post; and if these are considered to be part of the circulation, on what ground are the bills of the Bank of Ireland, and of the chartered Banks of Scotland, and of such banks throughout the

United Kingdom as are of undoubted credit, not included in the return of the country circulation? This applies indeed only to short-dated bills of the most unquestioned credit; longer-dated bills, of more doubtful security, seem to have been alone in the view of those persons who assert the exclusive title of bank notes to be considered as money. Bills of this description, that is long-dated bills, are sometimes not used for purposes of circulation,—they are simply written evidence of a debt which is discharged at maturity, without passing into third hands. I will not stop now to enter in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ong and short-dated bills in the comparison with bank notes, and between bills drawn by bankers, and bills by merchants or dealers on dealers. It is a sufficient negative of the main proposition on which the currency theory rests, to have shown that short-dated bills of exchange are substitutes not only for coin, but for bank notes.

根据通货原理，如果以书面形式承诺凭背书出票或见票后即付，那么背书就不具备执行货币职能的资格，那么见票即付的银行汇票，又凭什么一直被算在英格兰银行的流通报表中呢？从形式上，它们完全是汇票，不仅是因为见票即付，而且是因为它们通常是通过邮局邮递；如果把它们看作是流通的一部分，那么凭什么爱尔兰银行、特许建立的苏格兰银行以及英国各地信用良好的银行的银行汇票，却没有出现在地方流通的报表中呢？确实，这只适用于信用非常高的短期汇票；至于长期汇票，只有在那些认为仅银行券可以充当货币的人的观念中，才存在安全问题。这类汇票，即长期汇票，有时并不用于流通，它们无需经第三方之手，仅仅是到期还债的证据。现在，我不会停下来去比较长短期汇票和银行券的区别，也不去区分银行开的汇票和商人开的汇票，以及商人向商人开的票据之间的不同。如果可以证明短期汇票不仅能取代硬币，而且还能取代银行券，那么通货理论所依据的主要命题就完全被否定了。

If, as a last resort in the argument, it be said that bills of exchange require the intervention of bank notes for the ultimate payment, the answer is, that this is a mere fiction, for that in fact the adjustment takes place by settlement, and that a small amount of bank notes for the balance effects the liquidation, which might equally be effected by drafts on the Bank of England; or, as is done in Scotland, by exchequer bills. An alteration in the stamp duties has, as stated by Mr. Lewis Loyd and Mr. Leatham, operated against the employment of the smaller bills of exchange instead of bank notes. If the case were reversed, the stamps lowered on bills and raised on notes, we should see an immense increase in the former, and a great diminution in the latter,—in other words, bank notes would be withdrawn, and bills of exchange supply their place.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要说汇票最终的支付需要银行券的介入，那么答案就是，这仅仅是一个谬论，因为事实上，结算可以对此进行调整，小额的银行券可以完成余额清算，英格兰银行汇票同样可以完成；或者，像苏格兰银行那样用国库券完成清算。正如路易斯·伊德先生和兰瑟姆先生所说的那样，印花税的修改，妨碍了小面额汇票代替银行券。如果情况相反的话，减少对汇票征收的印花税，增收银行券的印花税，我们应该会看到前者迅速增长，后者迅速减少。换句话说，银行券会减少，而汇票会取而代之。

It is hardly perhaps necessary to advert to the latter part of the proposition quoted at page 20, viz., that the abolition of any or of all the contrivances for dispensing with the use of money, will not necessitate the introduction in their place of an equal amount of coin or bank notes. There surely can be little doubt but that the abolition of such contrivances would necessitate the substitute of an equal amount of bank notes or coin.

也许几乎没有必要提及20页所引用命题的后半部分，也就是，废除任何或所有的避免货币使用的替代物，这不一定会引进同等数量的硬币或银行券。完全无需怀疑，此类替代物的废除会促生同等数量的硬币或银行券被替代。

Sufficient grounds have, as I venture to think, been stated for establishing the claim in behalf of cheques on bankers, and of bills of exchange, to be considered as performing, concurrently with bank notes, the functions of money for the purposes for which they are respectively used.

我大胆地认为自己已经提出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了银行支票、汇票和银行券，各自执行了其为人们所使用的货币职能。

If the propounders of the currency theory would confine their distinction in favour of bank notes to the lowest denominations, namely, the 1*l.* notes wholly, and the 5*l.* and 10*l.* notes partially, it might, as I have already observed, be conceded; but then what becomes of the dogma or the axiom of Mr. Norman and Mr. Loyd, on which the currency theory is made to rest?—and what becomes of the inferences which they have drawn as to the management of banks, from a view exclusively to the whole of the circulation, large notes as well as small? In truth, their tests of good and bad management, and their views of the purposes and properties of the whole of the circulating medium and of its component parts, are essentially defective and erroneous. They draw distinctions which are not real or substantial, as, for instance, of the higher denomination of bank notes compared with bills of exchange and

cheques; while they totally overlook and confound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instruments of interchange which are used in the distribution and expenditure of incomes,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instruments which are used in the distribution and employment of capital.

如果通货原理的支持者能够将对银行券的区分限制到最小面额上，也就是说，全部1英镑、5英镑和部分10英镑的银行券，就像我曾经说的那样，这或许会得到承认；但诺曼先生和伊德先生的通货原理所依据的信条和原理又该何去何从呢？他们从整个出票的流通（无论面额大小）中得出的关于银行管理的观点又会是怎样的呢？事实上，他们所说的管理好坏的检验标准，他们关于全部流通媒介及其组成部分的性能和目的的看法本质上是有缺陷的，也是错误的。他们得出的区别，例如较大面额的银行券与汇票和支票的区别，既不真实，也不是实质性的；同时他们也完全忽略和混淆了同用于分配和使用资本的工具相比，用于收入分配和支出的交换工具所具有的突出特征。

[8_1]."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Effects of the Paper Credit of Great Britain."

[8_2]."Observations on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on the Paper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p. 17.

[9_1].参见《英国纸币信用的性质和影响的调查》。

[9_2].参见《对英格兰银行以及英国纸币流通状况的观察》，第17页。

Chapter 7　Distinction of Circulation as Between Dealer and Dealer, and Between Dealer and Consumer

第七章　商人与商人间、商人与消费者间的区别

It i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to a clear view of the working of the present system that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s of the instruments of interchange should be observed and defined. Dr. Adam Smith has noticed the distinction, and has accordingly, in his views of the operation of paper money, steered clear of the confusion between currency and capital which pervades and disfigures nearly all modern reasoning on the subject.

指出并确定交换工具的不同特征并对这一现行体制保持清醒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亚当·斯密博士已经认识到这种区别，因此，在他关于纸币运行的观点中，就清楚地绕开了通货和资本之间相混淆的问题，这一问题几乎渗透和破坏了现代关于这一主题的所有推理。

> “The circulation of every country,” Dr. Smith observes, “may be considered as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branches—the circulation of the dealers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circulation between the dealers and the consumers. Though the same pieces of money, whether paper or metal, may be employed, sometimes in the one circulation and sometimes in the other, yet as both are constantly going on at the same time, each requires a certain stock of money of one kind or another to carry it

on. The value of the goods circulated between the different dealers with one another never can exceed the value of those circulated between the dealers and the consumers, whatever is bought by the dealers being ultimately destined to be sold to the consumers. Paper money may be so regulated as either to confine itself very much to the circul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dealers, or to extend itself likewise to a great part of that between the dealers and the consumers. When no bank notes are circulated under ten pounds' value, as in London, paper money confines itself very much to the circulation between the dealers. When a ten-pound bank note domes into the hands of a consumer he is generally obliged to change it at the first shop where he has occasion to purchase five shillings' worth of goods, so that it often returns into the hands of a dealer before the consumer has spent a fortieth part of the money.“ [9_1]

斯密博士说：“每个国家的流通都可以分为两类，即商人与商人之间的流通，以及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尽管同样是货币，不管是纸币还是金属货币，有时可以在一种情况下使用，有时可以在另一种情况下使用，但是由于两者会经常同时使用，每一种流通都需要一种或另一种货币的储备才得以继续进行。在不同商人间相互流通的商品价值决不能超过在商人和消费者间流通的商品价值，因为不管商人购买的是什么，这些最终都要卖给消费者。应该对纸币加以管理，要么限制其只能在不同商人间的交换中使用，要么将其使用扩大到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

中。如果像伦敦那样把银行券的价值限制到10英镑之内，那么纸币就更多地在商人之间流通。如果一张10英镑的银行券在消费者手中，通常情况下，当他在第一家商店购买5先令商品时，就得兑换，所以在消费者消费1/40的银行券之前，它往往就回到商人的手中了。“ [10_1]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distinction here made is substantially correct. Bearing in mind this distinction, the reason is obvious why, as far as relates to the interchange between dealers and consumers (including the payment of wages, which constitute the principal means of the consumers), coin, and the smaller denomination of notes serving as coin, are essential to such interchange, and why, consequently, if those smaller notes are withdrawn, their place must be supplied by coin; but not so as regards the interchange between dealers and dealers. Bank notes are not only not essential to that interchange, but it must be manifest to anyone having even a slight knowledge only of the manner in which such interchange is conducted, that, in point of fact, bank notes are rarely used in the larger dealings of sales and purchases.

毫无疑问，此处的区别实质上是正确的。将这种区别牢记于心，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硬币以及充当硬币职能的小额银行券在商人和消费者之间进行交换时（包括构成消费者主要支付手段的工资支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如果收回那些小额银行券，它们的位置必须由硬币替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换也是如此。银行券不仅对那些交换无关紧要，而且事实上，任何稍微知道如何进行交换的人都会明白，为什么在大宗交易里，很少会使用银行票据。

The great bulk of the wholesale trade of the country is carried on and adjusted by settlements or sets-off of debts and credits, the written evidences of which are in bills of exchange (including in that term all promissory notes payable to order after date), while current payments for what are called cash sales are mostly discharged by cheques; the ultimate balance only, arising out of the vast mass of such transactions, requiring liquidation in a comparatively small amount of bank notes. The principal exceptions to this, I apprehend, are in the provision trade, and in the sheep and cattle and horse fairs, in which the payments are mostly made in coin and bank notes; but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that for amounts of 10*l.* and upwards, bills of exchange might be, as they formerly were, and, but for the increased stamp duty, would be, substituted.

我国的批发贸易是通过结算或抵消债务和债权来进行和调节的，汇票则是债务的书面凭证（包括所用的要求到期即付的本票），而被称作现货的支付通常由支票完成；仅有此类大宗交易的最终余额，要求小量数额的银行券进行清算。我认为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粮食的交易和牛羊马市场中的支付，这类交易大多是用硬币和银行券完成的；但毫无疑问，要不是增加了印花税，10英镑或者更大面额的支付可能如先前那样会被汇票取代。

Of the fact th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se, and perhaps of some few other wholesale trades in which no credit is given, there is little or no intervention of bank notes in purchases or sales among wholesale dealers, no doubt can be entertained. And I have now to state the explanation, which I am not aware of having met with among the various lucubrations on the subject of the currency which it has been my lot to see, of the reason why, with the

exceptions I have pointed out, such sales and purchases are effected without actual payment in money, which, by the currency theory, is defined to be coin or bank notes.

事实上，除了以上这些情况以及少数不适用信贷的批发交易之外，批发商的买卖活动很少或几乎用不到银行券，这点毋庸置疑。这里我不得不澄清一下，在我知道的关于通货理论的诸多著作中，没有一本书解释为什么除了我所指出的那些例子之外，买卖活动可以在没有实际货币支付的情况下完成，此处的货币在通货原理中被定义为硬币或银行票据。

The reason is, that all the transactions between dealers and dealers, by which are to be understood all sales from the producer or importer, through all the stages of intermediate processes of manufacture or otherwise to the retail dealer or the exporting merchant, are resolvable into movements or transfers of capital. Now transfers of capital do not necessarily suppose, nor do actually as a matter of fact entail, in the great majority of transactions, a passing of money, that is, bank notes or coin—I mean bodily, and not by fiction—at the time of transfer. All the movements of capital may be, and the great majority are, effected by the operations of banking and credit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actual payment in coin or bank notes, that is, actual, visible, and tangible bank notes, not supposititious bank notes, issued with one hand and received back by the other, or, more properly speaking, entered on one side of the ledger with a counter-entry on the other. And there is the further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transactions between dealers and dealers must, in the last resort, be determined and limited by the amount of those between dealers and consumers.

原因在于，商人与商人之间的所有交易，也就是经过所有中间制造过程的各个阶段之后，生产商或进口商向零售商或者出口商的所有出售活动，都可以归结为资本的流动或转移。在大多数交易中，资本的转移不一定要求，实际上也不会引起货币的流通——这里所说的货币，我指的是有形的银行券和硬币，而不是虚构的货币。资本的全部运作可能是，而且绝大多数是通过银行和信贷完成的，而不涉及实际的银行券和硬币。也就是说，这里指的是实际的、看得见的、有形的银行券，不是假想的由一只手发行，另一只手收回的银行券。或者更确切地说，资本的流动是通过在总账的一边进入而另一边加以抵消来完成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交易总额，最终取决和受限于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总额。

The business of bankers, setting aside the issue of promissory notes on demand,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branches, corresponding with the distinction pointed out by Dr. Smith of the transactions between dealers and dealers, and between dealers and consumers. One branch of the banker's business is to collect capital from those who have not immediate employment for it, and to distribute or transfer it to those who have. The other branch is to receive deposits of the incomes of their customers, and to pay out the amount, as it is wanted for expenditure, by the latter in the objects of their consumption. The former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business behind the counter, and the latter before or over the counter: the former being a circulation of capital, the latter of currency.

除了发行见票即付的本票之外，银行家的其他业务可以分为两类（与斯密博士所提出的分类一致），即商人与商人间的交易和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银行家的一类业务是从那些资本暂时闲置的人手中收集资本，然后将其分配给立即需要使用这些资本的人。另一类业

务就是接收消费者的存款，并根据其消费所需支付相应数额。前者可视为柜台后业务，后者则为柜台前或柜台上业务；前者是资本的流通，后者是通货的流通。

The distinction or separation in reasoning of that branch of banking which relates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t on the other, from that branch which is employed in administering the circulation for local purposes of the district, is so important in its bearing on the question of regulating the circulation by the foreign exchanges, and on that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urrency and prices, that the fullest elucidation of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at distinction may naturally be required. I have, therefore, as the best method of elucidating this point, drawn largely on the examinations by the Committee on Banks of Issue in 1841; and if it be objected that more than enough of the evidence is here adduced for the purpose, seeing that the point is so clear when simply stated, my answer to the objector is, that simple and clear as the distinction may appear to him, so imbued were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who took a prominent part in the examination, with the tenets of the currency theory, as to have remained apparently (judging at least by the reiteration of their questions to the same effect) unconvinced of the powerlessness of the banks of issue to influence directly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And even to this day, with all the light of subsequent experience, it should seem, judging by speeches and publications, and the declamations against excessive paper issues, which still appear occasionally on the subject, that the dogma of the power of banks of issue to create paper money *ad libitum* prevails to nearly as great an extent as ever.

在论证银行业务分支时，要注意以下区别：银行的部分业务一方面是资本集中，另一方面是资本分配；而另一部分业务是出于地区局部目的而进行的货币流通管理。在通过外汇管理流通的问题上，以及在通货和物价间的关系问题上，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关于区分的实际意义自然需要充分说明。作为阐述这一观点的最好方法，我大量使用了发钞银行委员会在1841年进行的调查。如果有人认为仅仅进行简单的说明就能清晰地阐述，而反对我引用了过多证据，对此我这样认为：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区别可能看起来很简单明了，但那些在调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委员们，也深受通货原理这种想法的影响（至少根据他们反复提出的相同的问题来看），以至于他们迄今显然仍不相信发钞行不能直接影响流通量。甚至时至今日，虽然有了后来经历的，但根据仍然时而出现的对过量发行纸币的反对言论、出版物和演说来判断，发钞行能够随意发行纸币这一点，仍是广为接受的信条。

[9_1]."Wealth of Nations," McCulloch's Edition, pp. 141, 142.

[10_1].《国富论》，麦卡洛克版，第141、142页。

Chapter 8　Regulation of the Circulation by the Foreign Exchanges

第八章　用国际汇兑管理货币流通

All the country bankers examined concur in stating that they have not the power by loans or discounts beyond the ordinary transactions of the neighbourhood to extend or contract the local circulation or to influence prices. They could, indeed, refuse to issue their own notes in answering the demands of their depositors, but such refusal must be accompanied by offering Bank of England notes or coin, and thus the local circulation would be equally filled up; they may curtail or call in their advances and so diminish their engagements, and eventually render a smaller amount of circulation necessary; but the immediate demands for notes for local purposes must still be satisfied.

所有接受调查的地方银行家们纷纷表明，他们没有能力利用超过该地区正常交易范围的贷款或贴现，来扩大或缩减当地银行券的流通量，或影响该地物价。事实上，为了满足储户的需要，银行家可以拒绝发行自己的银行券。但是，这样势必要提供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或硬币，当地流通额才不会减少。他们可以通过缩减或要求偿还贷款来减少债务，并最终减少流通量；但他们仍然必须满足当地对银行券的直接需求。

It appears by that evidence, that their circulation is devoted and confined to local purposes, chiefly in small amounts, for the retail trade; and in the rural districts, in advances to farmers for the purchase of stock and seed, and to cattle dealers and provision

merchants: but that when called upon to make advances by way of loan or discount on a larger scale, it is always by a draft or order upon London, or upon such of their correspondents in other towns as happen to suit the borrowers—such loans or discounts being invariably made out of capital, or, in other words, out of the general resources of the bank.

这些证据表明，他们发行的纸币专用于并仅限于在当地流通，主要用于零售交易中的小额支付。在农村地区，这些纸币用于购买农具和种子时对农民进行预付，以及用于向牛贩子和粮商进行预付。但如果要用贷款或贴现的方式进行大规模预付，则通常使用伦敦兑付的汇票，或用适合借款人的其他城镇代理银行的汇票进行支付。这种贷款或贴现毫无例外是来自资本，换句话说，来自银行的一般资金。

Among the country bankers of England I have selected the evidence of Mr. Stuckey, the head of the admirably conducted banks of Somersetshire under his firm, because there is no one more conversant,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than he is with the subject of banking. By his position formerly he was in intimate communication with Lord Liverpool and Mr. Huskisson. He was examined by the Bullion Committee in 1819. He was an adherent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late Mr. Ricardo; and he expressed opinions of the desirableness of having the circulation of bank notes regulated by a view to the foreign exchanges. [10_1] But what is the result of his very large experience as a banker?

在英格兰的众多银行家中，我选择了斯塔基先生。他的公司旗下拥有萨默赛特郡多家经营有方的银行。我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银行业务。由于他以前同利物

浦勋爵和赫斯基森先生过从甚密，1819年他受到了金银委员会的调查。他是已故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先生理论的忠实信徒，并认为通过国际汇兑调节银行券的流通是可行的。 [11_1] 这位经验丰富的银行家会给出什么答案呢？

477．(*Chairman.*) Do you conceive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is an insuperable difficulty in country banks exercising such a control over their own issues, as to reduce them to some extent during a period of adverse foreign exchange?

477．（主席）您是否认为一般来说，地方银行在控制自身发行方面有不能克服的困难，从而在国际汇兑状况不利的时期无法减少一定程度的发行额？

I really do not see how that is to be done.

我确实不认为会这样。

478．Then what is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the regard to foreign exchanges, which you think all country bankers ought to pay?

478．您认为所有的地方银行家都应关注国际汇兑状况，那么这样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呢？

The practical effect is to make them more cautious and circumspect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ir money transactions; but I should not state, that in the agricultural districts, the circulation would be altered by the foreign exchanges.

实际效果就是，他们在管理货币交易时会更加谨慎小心。但我并不会说，在农村地区，国际汇兑状况会改变流通状况。

479．Do you conceive, that although the country bankers ought to pay regard to the state of the foreign exchanges, it is not in their power to bring that regard into practical effect by reducing the amount of their issues during the period of adverse exchange?

479．您是否认为，虽然地方银行家都应该关注国际汇兑状况，但即使在汇兑状况不利期间，他们也无权通过减少发行额来让他们的关注产生实际效果？

I do not see how it could be done.

我不认为会这样。

480．Will then the regard which you

recommend they should pay to the foreign exchanges produce any practical effect whatever upon their issues?

480．您既然建议他们应关注国际汇兑状况，那么这难道对他们的发行没有一点实际影响吗？

Yes, it would produce effect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ir monied concerns.

是的，这样的关注会影响到他们对金融事务的管理。

481．What practical effect would it produce on their *issues*？

481．那对他们的发行 会产生什么实际影响呢？

Very little; my own opinion is, that country issues have very little to do with exchanges.

影响甚微　。我认为地方发行额与国际汇兑状况关系不大。

482．Would the regard which you recommend to the foreign exchanges produce any effect upon their issues?

482．您所提议的对国际汇兑的关注会对他们的发行产生影响吗？

Very little; it would produce some effect upon the management of their monied concerns.

影响甚微　。只会对他们的金融事务管理产生一些影响。

483．(*Sir T. Fremantle.*) Upon their liabilities?

483．（T. 弗里曼特尔爵士）那么对他们的债务会产生影响吗？

Yes.

是的。

484．*But comparatively little on their issues?*

484．但相对而言，对他们的发行影响甚微，是吗 ？

Yes: particularly in the agricultural parts of the country.

是的，尤其在农村地区。

485．Upon what do you think the issues of the country bankers depend?

485．您认为地方银行家靠什么发行银行券呢？

More on the state of agriculture than any thing else. When the landed interest is in a comfortable state, I consider the issues to be increased.

大多是依靠农业状况，而非其他。我认为，当土地收益较大时，发行量会增加。

491．(*Sir T. Fremantle.*) The advance which you make to the agriculturists is an advance of capital, whether it is paid to them in your own notes, or Bank of England notes or gold?

491．（T. 弗里曼特尔爵士）您在给农民支付垫付款，也就是一种资本预付金的时，是使用自己的银行券，还是用英格兰银行券或黄金呢？

Yes; the advance is generally made to agriculturists in our own notes.

是的，通常给农民的垫付款是用自己的银行券。

492．But if the state of the country is such as not to require an increase of your own issues, you are quite sure that those notes will come back to you in the course of a short time?

492．但是，如果国家的状况不需要增大你们自身的发行额，您是否有把握短期内收回您的银行券？

Exactly.

当然。

493．Therefore the advance that you make in that case is an advance of capital, and not an advance of mere issue?

493．因此，在刚刚那种状况下，您进行的垫付是一种资本垫付，而不是纯粹的发行垫付，是吗？

Exactly; it is made out of our resources.

确实，它出自我们的资金。

501．(*Chairman.*) Will you state how you are affected by foreign exchanges?

501．（主席）您可以说明一下国际汇兑对您有何影响吗？

I think the London banker is affected by them, therefore I am affected; I naturally know that if my deposits are withdrawn, and any demand is made upon me, I must sell my securities; therefore, I look to the foreign exchanges in order to ascertain how the money market is, that I may know what securities I shall dispose of.

在我看来，伦敦的银行家们受国际汇兑状况影响，因此我会受到影响。我当然知道，如果我的存款被提走，而有人需要兑换的话，我就必须出售证券。因此，我时刻关注国际汇兑状况以确认货币市场的状况，这样我就知道我该出售哪种证券了。

524．(*Chairman.*) Suppose the case of an adverse foreign exchange, when, according to your own opinion, the paper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ought to be reduced, would you, on a depositor asking for the payment of a deposit in notes, be at all guided by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foreign exchanges, as to whether you paid that deposit in Bank of England notes, or in your own local notes?

524．（主席）假设国际汇兑情况不利，您的观点是应该减少国家纸币流通，而此时储户要求用银行券支付他们的存款，此时国际汇兑状况会影响您在英格兰银行券和您当地的银行券之间的选择吗？

I admit that I should not be guided by the foreign exchanges, but I should be guided by knowing where the deposit money was to go to.

我承认我不会受国际汇兑支配影响 ，但如果我知道了存款的流向，我会受存款流向的影响。

525．(*Sir T. Fremantle.*) You have stated that when you have observed gold going out of the country, and money becoming tight in London, you have been in the habit of issuing directions to your different branches, to be more circumspect in the advances they make; has the effect of that been

practically to diminish the amount of your notes in circulation in those districts?

525．（T. 弗里曼特尔爵士）您曾说，当您看到黄金流向国外，伦敦货币紧张时，您习惯向各个分行发布指示，要求在预付款时更加谨慎。这实际上会不会减少您的银行券在那些地区的流通呢？

I do not think it has; I am not aware that it has.

我认为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据我所知从未出现这样的结果。

526．What has the effect been?

526．那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To make them more cautious in their advances, keeping our resources more within our own command instead of discounting a bill, which we should discount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 we have refused it; and instead of advancing 1000*l* . or 2000*l* ., we have desired the person to take 500*l* .; therefore we keep our banking capital and banking resources more under our own command.

会让他们在预付款方面更加谨慎，确保资金在我们的掌控范围内；拒绝贴现在某些情况下本应贴现的票据；我们不希望有1,000英镑或2,000英镑的预付款，而希望只贷出500英镑。这样我们就可以使资本和财力更多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527．But are you prepared to say that the circulation of your own notes has not been affected by that course of conduct?

527．但您是否打算说这种行动没有影响到您自己的银行券的流通？

I am not aware that it has.

我认为没有这种影响 。

537．Supposing, for instance, it should ultimately be thought that it is desirable that the country circulation should have a general conformity to the state of the foreign exchanges, do you conceive that this could be in any way effected by the country bankers?

537．假设最终认为地方的流通应该与国际汇兑

状况基本一致，您认为地方银行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做到吗？

I do not at present know how it could be accomplished; and I may take the liberty of going further in that question, and saying that it appears to me that the country issues, as conducted in the west of England, have very little or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oreign exchanges.

目前我还不知道怎么做到 ；恕我冒昧地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地方银行券的发行，如英格兰西部银行券的发行，与国际汇兑关系甚微，或者说根本无关。

538．Do you conceive then that the only circulation which ought to have reference to the foreign exchanges is tha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538．那您是否认为只有英格兰银行券的流通应该参照国际汇兑状况？

I do conceive that it is the only thing which ought to have reference to them, being the circulation of London, and London being the spot where the foreign exchanges are generally effected.

我的确认为只有英格兰银行券的流通应该参照国际汇兑状况，因为它是在伦敦流通的，而国际汇兑通常也是在此地进行的。

539．(*Mr. Grote.*) Do you mean to state that you think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ank of England ought to be made to vary in conformity with the foreign exchanges, but that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banks ought not to be affected by the foreign exchanges?

539．（格罗特先生）您的意思是，您认为英格兰银行券的流通应随国际汇兑的变化而变化，但地方银行的流通不应该受国际汇兑状况的影响吗？

No, I do not go so far as that; my opinion is that the country circulation does not affect the foreign exchanges, because it is a different kind of circulation; the foreign exchanges are, we all know, affected in various ways, but I do not think they are affected by the country circulation, and I have looked attentively at that question.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观点是，地方流通不影响国际汇兑状况，因为那是一种不同的流通。众所周知，国际汇兑受各种因素影响，但我认为它们并不受地方流通的影响，我一直密切关注这一问题。

The evidence of Mr. Gilbart, of the London and Westminster Bank, of Mr. Hobhouse, of a bank at Bath, and of Mr. Rodwell, of a bank at Ipswich, is full of information as to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influence and limit the country circulation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reference to the exchanges. But as these gentlemen do not profess ever to have entertained an opinion of its being desirable, if it were practicable, to regulate the country circulation by the foreign exchanges, I have preferred a reference to Mr. Stuckey's evidence, he having entertained and professed an opinion that it was desirable, but had made the discovery, confirmed by long experience on a very extensive scale, of its utter impracticability.

伦敦和威斯敏斯特银行的吉尔巴特先生，巴斯某银行的霍布豪斯先生及伊普斯威奇某银行的罗德韦尔先生，他们的证词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表明在不受国际汇兑状况影响的情况下，到底哪些因素影响和限制着地方流通。但这几位先生认为，通过国际汇兑状况调节地方流通，即便可行也不可取。因此，我更愿意引用斯塔基先生的证词，他认为并宣称，虽然通过国际汇兑状况调节地方流通是可取的，但他长期的经验却证实这是完全不可行的。

Mr. Gurney was examined on this point by the Committee on the Bank Charter in 1832. I have before had occasion to notice his evidence at some length, [10_2] and will now only refer to the concluding part of it:—

1832年，银行特许证委员会就此问题问了格尼先生。我之前已经详尽提到了他的证词，[11_2] 在这里仅引用其结尾部分：

Does it not follow from what you have said, that an over-issue of notes of country bankers cannot easily be effected?

据您所说的，是否能得出如下结论：地方银行家不容易过量发行银行券？

My belief is that it cannot be effected by any act of the country bankers.

我坚信，地方银行家无论怎么做也无法使地方银行券发行过量。

As far as this point is concerned, it might perhaps be deemed to be sufficiently proved by the evidence already adduced. But not the evidence only on this point is confirmed, but also much additional light is thrown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currency, by a view of the Scotch system of banking. The examinations of some of the managers of the Scotch banks by the Committee in 1841, are accordingly well worthy of attention as illustrative of that distinction.

就这一点而言，或许可以认为引用的证词已给出了充分的证据。不仅这一点得到了证词的证明，而且通过苏格兰银行体系，更进一步阐明了资本和通货之间的区别。因此，1841年委员会对一些苏格兰银行经理进行的调查值得关注，因为它们说明了这种区别。

122．“How do you regulate your issues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s?—By the notes being returned for gold or silver for export.”

122．“您是如何根据国际汇兑状况来调节发行额的？——通过把银行券换成金银再输出到国外。”

123．“Do you regulate them from the returns you have of what the foreign exchanges are, or from the action which takes place upon the Bank?—The action which takes place upon the Bank.”

123．“您是根据国际汇兑状况的报告来调节发行，还是根据英格兰银行所受的影响来调节发行呢？——是根据英格兰银行所受的影响来调节的。”

125．“Do you not sometimes anticipate the actual action upon the Bank, by the demand for gold, when you see there is a tendency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to produce that action?—No; we wait for the actual demand.”

125．“当您看到国际汇兑的趋势时，您会不会有时预料到黄金的需求对英格兰银行的实际影响呢？——不，我们会等待实际需求。”

It is clear that in point of fact the directors are and can be guided only by the state of their treasure; and that, instead of the expression of “regulating the circulation by the foreign exchanges,”

the terms descriptive of the actual process should be, “regulating the securities by the efflux or influx of bullion.”

很显然，董事们实际上仅仅并且只能受他们财富状况的指导。用来描述实际操作过程的词语应是“根据黄金的流入和流出调节证券”，而不是“根据国际汇兑状况调节流通”。

[10_1].The regulation of issues by the foreign exchanges is an expression which, like all the rest of the language of the currency theory, conveys no clear description of the actual process. One would suppose that the director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who profess to regulate their issues by the foreign exchanges, attend to the variations in the quotations, and according as these indicate an adverse or a favourable tendency, regulate their issues, or rather their advances, accordingly. No such thing. It is only by the influx or efflux of bullion that they are guided, and very properly so. It is impossible for any but Exchange-jobbers to judge of the quotations, allowing for agios, and dates, and distances. And the idea that country-bankers could judge of them! The evidence of Mr. Palmer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the Bank Charter in 1832, is decisive on this point:—

[10_2]."History of Prices," vol. iii. p. 193.

[11_1].就像所有通货理论中的其他表述一样，根据国际汇兑来调节发行，这种说法并未对发行的实际过程有清晰的描述。有人或许认为，宣称根据国际汇兑状况调节发行额的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都关注国际汇兑行情的变化，并且根据其显示的利弊趋势来相应地调节他们的发行，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的贷款。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仅仅且完全根据黄金的流入和流出状况进行管理。只有外汇经纪人能判断行情，估算贴水、日期和距离。竟然有观点认为地方银行家能够判断行情！帕尔默先生于1832年向银行特许证委员会提供的证词，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11_2].《物价史》，第3卷，第193页。

Chapter 9　Scotch Banking. Regulation by Foreign Exchanges. And Distinc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Currency

第九章　苏格兰银行业根据国际汇兑状况管理流通的情况，以及资本与通货的区别

The evidence of Mr. Alexander Blair, treasurer and manager of the Bank of Scotland, which is the oldest of the chartered banks, having been established in 1695, and which appears to be conducted with great ability and prudence, is full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as to the machinery and working of the Scotch system of banking.

成立于1695年的苏格兰银行是一家最古老的特许银行，现在也还经营得有条不紊。该行的财务主管兼经理亚历山大·布莱尔先生的证词，在苏格兰的银行体系的组织和运营方面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He mentions a curious fact relating to the mode in which the balances resulting from the exchanges twice a week among the banks are adjusted by the means of exchequer bills which, to the amount of 450,000*l* ., they hold for that express purpose. Here we have exchequer bills answering all the purposes that Bank of England notes at the clearing house in London do.

对于这种模式，他提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银行间每周两次的票据兑换余额是通过国库券的方式调节的。为了这一明确目的所持有的

国库券高达450,000英镑。此处的国库券就像英格兰银行券在伦敦票据交换所中那样万能。

Mr. Blair also states that seven million in amount of notes is found to be requisite in order to keep up an *average* circulation of three million,—a very curious fact, as it appears that the stamp duty is paid upon the whole stock, whether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or within the walls of the banks, and that the whole amount is out in circulation for a few days at two seasons of the year.

布莱尔先生还说，要维持3,000,000英镑的平均流通额，就需要发行7,000,000英镑的银行券。这很奇怪，因为似乎所有的银行券，不管是在公众手中还是在银行手里，都要付印花税；并且全部银行券在一年的两个时期中只有几天是流通的。

It is stated, moreover, upon the same authority,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deposits which, in 1826, was computed to be about twenty-one million, had in 1841 reached to about twenty-seven million.

此外，他还指出，1826年全部存款约为21,000,000英镑，到1841年，存款数额达到约27,000,000英镑。

It is a remarkable circumstance that, while there has been a great extension of banking capital, and of banking accommodation, and of banking competition, in Scotland since 1826, the amount of the aggregate circulation has considerably diminished. What a

commentary upon the received doctrine of the power of banks to increase their issues of paper money as suits their interests or convenience; and that it is the effect of the competition of banks of issue to create a vast mass of worthless paper.

这非常值得关注。尽管自1826年以来，苏格兰的银行资本得到了大幅增加，银行贷款也大为扩充，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但总流通量却大大减少。这恰好说明了一个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信条，即银行有能力出于自身利益和方便而增加纸币发行量，而银行间竞相发行的后果就是制造了大量无价值的纸币。

Mr. Blair gav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of the increase of banking accommodation in Scotland:—

对于苏格兰银行贷款的增加，布莱尔先生这样说道：

> There are about 380 bank offices in Scotland, of which 348 are branches. The population may be stated at 2,500,000; thus there is one bank for every 6600 individuals.
>
> “苏格兰有约380家银行的营业点，其中有348家分行。苏格兰人口估算为2,500,000，也就是说，每6,600人就有一家银行。
>
> There were in 1825, 167 offices, of which 133

were branch banks. The population being then 2,200,000, there was one bank to every 13,170 individuals.

“1825年时有167家营业点，其中133家是分行。当时人口2,200,000，每13,170人设置一家银行。

The amount of notes exchanged per annum by the banks of Scotland is believed to be not under 100,000,000*l* . delivered, and 100,000,000*l* . received. The Bank of Scotland alone delivers 10,000,000*l* ., and receives in exchange as much.

每年通过苏格兰银行进行兑付的银行券不低于100,000,000英镑，接收额也不低于100,000,000英镑。单就苏格兰银行而言，兑付额为10,000,000英镑，接收额也是100,000,000英镑。”

But the immediate purpose of my reference to the evidence of Mr. Blair and other managers of the Scotch banks, is to show that they do not and cannot regulate their circulation by the foreign exchanges; and that, when they make advances, it is out of their capital or that of their depositors, without any direct influence on their *circulation* ; that they attend to the conduc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n regulating their *advances* , which, however, have no immediate influence on their *circulation* .

但是，我之所以提到布莱尔和苏格兰其他银行经理的证词，直接目的就是要说明他们不会也不能通过国际汇兑状况管理流通；而且当他们进行预付时，资金来自于他们的资本或储户的资本，这对他们的流通没有任何直接影响；他们关注英格兰银行对预付款的管理方式，然而，这对他们的流通也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

Mr. Blair was asked by the chairman,—

主席先生问布莱尔，

> Do you conceive that the amount of notes in circulation should be regulated in any way with reference to the state of the foreign exchanges?
>
> 您是否认为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应根据国际汇兑状况进行调节？

I conceive that the loans and discounts of banks should be regulat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state of the foreign exchanges, *but I would not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regulate the circulation by the foreign exchanges.*

我认为，银行的贷款和贴现应根据国际汇兑进行调节，但没有必要根据国际汇兑状况来调节流通 。

1879．(*Mr. Grote.*) Then, is it your opinion that,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Bank of England is contracting its circul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correcting an unfavourable exchange, the provincial banks should proceed in the same track, and contract their circulation also?

1879．（格罗特先生）那么在您看来，当英格兰银行为了扭转外币兑换的不利状况而缩小流通量时，地方银行也应采用同样的方法吗？

I think that they should consider the action of the Bank of England, at that time, with reference to their general rules of discount. *I would beg to leave the circulation out of the question;* I would say that the banks should look to the amount of their loans and discount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 would say, that the Bank (of England) should keep a large reserve, to be determined by their past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for which, to the extent it is held for public account, they should receive compensation.

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地方银行在考虑英格兰银行的举措时，应参考自身贴现的基本规则。我请求不要考虑流通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银行应关注其贷款和贴现的数量；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应持有大量储备金，数额由其以往的经验和所做的观察决定。储备金中为了公共利益而持有的部分，银行

应得到赔偿。

1880．Then, is it your opinion, that at a period when the exchanges are unfavourable, and the Bank of England are contracting their circulation, the provincial banks ought to be more cautious in granting loans and discounts than they were before?

1880．那么您认为，当汇兑状况不利，英格兰银行缩减发行量时，地方银行应比以前更加谨慎地进行贷款和贴现吗？

Certainly.

当然。

1881．(*Sir J. R. Reid.*) Does your bank act upon that principle?

1881．（J. R. 里德爵士）您的银行是根据这种原则运营的吗？

It does.

是的。

The examinations, however, of Mr. Kennedy, manager of the Ayrshire Bank, and of Mr. Anderson, of the Glasgow Union Banking Company, went more particularly to the quest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currency; and their evidence is calculated to throw great light on this point.

然而，对艾尔郡银行经理肯尼迪先生和格拉斯哥联合银行公司的安德森先生的提问，更有利于说明资本和通货的区别，而且他们的证词正是为了阐明这点。

Mr. Kennedy is asked:—

肯尼迪先生被问道：

> 2092．(*Mr. Grote.*) You stated that the causes affecting the quantity of your notes which were out in circulation at any time, were, in your opinion, independent of the ac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s?
>
> 2092．（格罗特先生）您曾说过，在任何时候，您的流通的银行券数量都不受国际汇兑的影响，是这样吗？

I did.

我是这样说过。

2093 . But you also stated that at the time when the foreign exchanges were unfavourable, and when there was a pressure upon the money market, you thought it imperative, as a measure of prudence, to realise some of your reserves and to call in funds from Edinburgh or London?

2093 . 但您也说过，在国际汇兑状况不利的情况下，以及在货币市场承受压力的情况下，您认为谨慎的做法是兑现您的一些储备金，并从爱丁堡或伦敦收回一些资金，是吗？

Yes, that is an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是的，我正是这样说的。

2094 . Then do you not think that that act of yours, in bringing into your country funds realised in Edinburgh or London is, in point of fact, tantamount to your acquiring for yourself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London currency or the Edinburgh currency, inasmuch as the local increase of your

currency is not at that moment tantamount to the increase of the aggregate currency of the country?

2094．那么，您不认为您把在爱丁堡或伦敦兑现的资金引入您所在的地方，这种行为实际上等同于您为自己赢得了一定数额的伦敦货币或爱丁堡货币，因为您在当地货币的增加不等于同时增加了当地总通货量？

But we do not bring into our country the Edinburgh or London money. The diminution of our reserves takes place in this way: parties have payments to make in Edinburgh or London or other places, and we draw upon our reserves there to meet those payments, *but we do not bring down gold or Bank of England* notes from the London market in order to pay them away in our country.

但是我们并没有把爱丁堡或伦敦的货币引入当地。我们储备金的减少是这样发生的：当事人需要在爱丁堡、伦敦或其他地方进行现金支付，在那里我们用储备金进行支付，但我们并没有为了在本地支付，而减少伦敦市场上的黄金或英格兰银行券 。

2095．Though you may not actually bring down gold or Bank of England notes, is not the effect of your diminishing the amount of your reserve in Edinburgh and London, and increasing by that means the advances to certain local borrowers, *tantamount to*

bringing down so much of the Edinburgh or London currency into your locality?

2095．尽管您可能实际上没有减少伦敦市场上的黄金或英格兰银行券，但您减少在爱丁堡和伦敦的储备金，用以增加某些当地借款人的预付款，那这样做不就无异于把爱丁堡或伦敦减少的通货引入当地了吗 ？

I cannot see that I bring any currency down; it is merely a payment made in London, or in Edinburgh, from one party to another.

我不认为我从伦敦拿来了任何通货 。这仅仅是在伦敦或爱丁堡由一方对另一方进行支付而已。

2096．Will you describe in what way your reserves are usually kept?

2096．您能说一下您一般是如何保存储备金的吗？

In easy negotiable securities, such as exchequer bills and short-dated bills of exchange, money lying in our banker's hands in London, and in other parties' hands in London, and money lying in our

agents' hands in Edinburgh and Glasgow, and other places.

简单地以可转让证券的方式保存，如国库券和短期汇票，还有我们在伦敦的银行家手中的货币，伦敦其他合伙人手中的货币，以及我们在爱丁堡、格拉斯哥和其他地方的代理人手中的货币。

2097．Suppose you sell so many thousand exchequer bills either in London or in Edinburgh, of course the proceeds of those exchequer bills are placed to the credit of your agent, whether your Edinburgh agent or your London agent?

2097．假如您在伦敦或爱丁堡售出了几千英镑的国库券，那这些国库券的收益您一定会放在您在爱丁堡或伦敦的代理人的账户上吗？

Yes.

当然会。

2098．In that case, when you direct those funds to be paid out, *you do in point of fact dispose of an equal amount of London currency or of Edinburgh currency* for the purposes of your bank?

2098．在那种情况下，当您指示把那些资金支付出去时，您实际上就为您的银行支付了同等数额的伦敦或爱丁堡的通货 ，是吗？

Yes.

是的。

2099．Then, in point of fact, do you not consider that you are enabled by means of *that portion of the London currency or the Edinburgh currency* of which you thus acquire the disposal, to obtain a certain increase of the amount of notes in your own district, and does not that, in point of fact, occasion a certain *diminution in the London or the Edinburgh currency* which may be set against the increase of your own local issues at the time?

2099．那么您不认为，通过处理，您获得的那部分伦敦或爱丁堡通货 ，您事实上增加了您所在地区的银行券数量吗？这实际上岂不是减少了伦敦或爱丁堡的通货， 而且减少的数额不正是您当时在所在地增加的发行额吗？

But when I give a draft upon the London agent I do not in consequence of the increased sum that I

have put at his command give out notes for it. I give a draft upon London payable to some party in London; the money is paid over in London, so that I do not make an issue upon that.

但我向伦敦代理人签发汇票时，我并没有因此增加他支配的银行券。我只是签发了由伦敦方面付款的汇票，付给在伦敦的当事人，而且钱是在伦敦进行支付的，因此我并没有为此发行银行券。

2100．But *the quantity of currency* which is available to other parties in London or Edinburgh is diminished by that portion which you draw for your own use?

2100．但是伦敦或爱丁堡的其他当事人所能获得的通货数量　　就会因为您支取了一部分通货而减少，不是吗？

I do not see how it diminishes the quantity of currency in London: it merely transfers it from one party to another.

我并不认为这会减少伦敦的通货数量，仅仅是从一方转入另一方而已。

2101 . If you were not to employ that portion of *the London currency which you acquire* by realising your exchequer bills, that portion would be at the disposal of some other person in London for the purpose of granting accommodation to London borrowers?

2101 . 如果您不使用通过兑现国库券得到的那部分伦敦通货， 那么，伦敦的其他人不就会用那部分通货向伦敦的借款人放款吗？

But I do not take it out of London; it is still in the hands of some party in London.

但我并没有把那部分通货带出伦敦；它仍然在伦敦某位当事人的手中 。

2102 . But if by means of that operation you are enabled to extend your accommodation to your local borrowers, you do make it serviceable to the wants of your district, and is it not tantamount, in point of fact, to a transfer of so much capital from employment in London to employment in Ayrshire: is not that the general effect of the operation?

2102 . 但是如果通过那种方法，您能扩大您对当地贷款人的贷款规模，并满足当地的需求，这实际

上不就等同于把资本从伦敦转移到了艾尔郡，这不就是这种操作带来的一般结果吗？

That may be the effect of it; *but it has no effect in diminishing the amount of the currency in the London market.* I do not bring out of London any currency; I merely take the currency from one party in London, and give it to another.

这也许就是其结果；但伦敦市场上的通货数量并没有减少 。我并没有把通货带出伦敦。我只是把通货从伦敦的一位当事人手里拿走，交给另外一位当事人。

2103．Do not you bring down from London to Ayrshire a certain portion of capital which was before in London?

2103．您没有把以前在伦敦的部分资本转到艾尔郡吗？

I do not see that.

我认为没有。

2104 . If the effect of this transaction be to enable you to supply the wants of borrowers in Ayrshire, which otherwise you could not supply, surely that does amount to a transfer of so much of your banking capital from London to the country?

2104．如果这种交易的结果能使您满足艾尔郡借款人的需求，否则您就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么这不就是把这么多的银行资本从伦敦转移到地方了吗？

It is rather more the payment of a debt due by some parties in Ayrshire to some parties in London.

更确切地说，是艾尔郡的当事人向伦敦的当事人偿还应付的债务。

Mr. Kennedy is right: the operation is the mere transfer of a debt. The Ayrshire bank is creditor of a bank in London to the amount of 1000*l* ., and passes its draft on London for that sum; the person or firm that takes and pays for the draft of the Ayrshire bank has a payment to make to his correspondent in London. The transactions balance each other. The ultimate balances, as between Scotland and England, must be adjusted by an increase or diminution of the funds possessed in England by the Scotch banks and in some cases, although not frequent, nor to any considerable amount, there may be a transmission of Bank of England notes or coin.

肯尼迪先生是正确的：这种操作不过就是转移债务。艾尔郡银行是伦敦一家银行的债权人，债务额为1,000英镑，它把这笔债务的汇票转移到伦敦；收到或兑付艾尔郡银行汇票的客户或公司要向其在伦敦的代理银行还款。这样的交易使两者相互抵消。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最终差额，必须通过增加或减少苏格兰银行在英格兰拥有的资金进行调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伴随着英格兰银行券或货币的转移，尽管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数额也不大。

Notwithstanding the clearness of this evidenc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put by the Committee, as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currency, in the subsequent examination of Mr. Anderson, manager of the Glasgow Union Banking Company, will show the little impression produced by it on the examiners:—

尽管这些证词很清晰，但该委员会对格拉斯哥联合银行公司经理安德森先生提问时，提出了以下有关资本和通货之间的区别的问题，这表明证词并没有给提问者留下什么印象：

> 2323．(*Chairman.*) Do you at all attempt to regulate your circulation by the state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
> 2323．（主席）您是否试图根据国际汇兑状况来调节流通？
>
> *Not the circulation;* we regulate our business by

the state of the foreign exchanges, but we consider that the circulation does not require any regulation; *our advances and loans we regulate, but not the circulation of our notes.*

不是调节流通。　我们根据国际汇兑状况来调节我们的业务，但我们认为流通不需要任何调节。我们调节预付款和贷款，但不会调节银行券的流通 。

2324 . Do you conceive that the circulation is sufficiently regulated by your simply answering the demands of your customers?

2324．您是否认为，仅仅满足顾客的需求就充分地调节了流通额呢？

I think so.

我认为是这样的。

2335 . Do you conceive that the consequence of restraining your loans and advances is to produce any effect upon the amount of your circulation?

2335．您是否认为限制贷款和预付款的结果，会对流通额产生任何影响呢？

No immediate effect upon the amount of our circulation.

不会对我们的流通额产生直接影响 。

2336．Does it eventually?

2336．那最终是否会有影响？

The circulation is eventually affected by the languor that follows a pressure; when wages are low and people are out of employment, there is less money circulating among them, and our circulation is diminished, but the immediate effect of a pressure *is not to diminish the circulation.*

流通最终会受压力造成的疲软的影响。当工资低且人们失业时，流通的货币就会减少，我们的流通额也会随之减少，但压力的直接后果不是流通额减少。

2337．Does then any diminution of the circulation which takes place *arises from a less*

demand on the part of the public, and not as the result of any greater caution on the part of the bank?

2337．那流通量的减少是由公众需求减少引起的，而不是由于银行更加谨慎的行为导致的吗 ？

Exactly.

的确如此。

2338．(*Mr. Grote.*) But the effects you have described imply an increased demand on the part of the public at such periods for your circulation?

2338．（格罗特先生）但您所说的结果是不是意味着，公众在这个时期对流通量的需求有所增加？

It is an increased demand for money, [11_1] but not for circulation.

是对货币需求有所增加， [12_1] 而不是对流通量需求的加大。

2339．When those demands are made, in what

manner do you supply them; is it not by an increase of your own notes?

2339．当有这种需求时，您是如何满足的？不是通过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吗？

In most cases an increased demand comes upon us in the shape of orders upon London, or orders upon Manchester or Liverpool; the pressure upon us is chiefly from the South, and an extra demand from London, Liverpool, and Manchester we feel as the first indication of pressure; it is not from our own immediate districts.

大多数情况下，需求的增长是以伦敦兑付的汇票，或是曼彻斯特或利物浦兑付的汇票方式呈现出来的。我们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南方，开始出现压力时会感觉到伦敦、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额外需求，它并不是直接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地区。

2340．(*Chairman.*) Do you mean that your customers have demands upon them, which it is necessary for them to discharge in Manchester, London, and other places?

2340．（主席）您是不是说您的顾客需要它们，以便在曼彻斯特、伦敦或其他地方进行付款呢？

Yes, that i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e case.

是的，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

2341 . (*Mr. Grote.*) In what manner do you enable your customers to make those payments which you have to make in Liverpool, or London, or Manchester?

2341 . （格罗特先生）您是如何使您的顾客进行那种您不得不在利物浦、伦敦或曼彻斯特进行的支付呢？

By giving them orders upon our agents and correspondents in those places.

通过给他们签发我们在那些地方的代理人或代理银行兑付的汇票。

2342 . You direct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funds which you have in London, or Liverpool, or Manchester to be applied to that purpose?

2342 . 您是否把您在伦敦、利物浦或曼彻斯特

的部分资金用于这个目的呢？

We do.

我们是这样做的。

2343 . Then, in point of fact, you make those advances not out of your own local currency, but out of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London currency upon which you have a demand?

2343．那么，您实际上不就是没有用您本地的通货，而是用您在伦敦所需的一部分通货来进行预付的吗？

No; I think that does not precisely describe the operation. It is our capital; it is capital which we have collected in Scotland, and placed in London for that purpose; it is not London currency lent to Scotland, but it is capital belonging to Scotland that has been placed in London, and is now applied to the purposes for which it is wanted.

不，我认为这样描述这种操作不够准确。这是我们的资本，是我们在苏格兰筹集，并为了这一目的存放在伦敦的资本。它不是借给苏格兰的伦敦通货，而

是属于苏格兰的资本，只是一直存放在伦敦，现在它又物归所用。

2344．But if you direct payment to be made in London, this payment must be made by means of the note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which alone circulate in London?

2344．但是如果您直接在伦敦进行支付的话，必须使用英格兰银行券进行，因为这是伦敦地区唯一流通的银行券，是这样吗？

Of course. [11_2]

当然。 [12_2]

2348．When increased demands are made upon you by your customers in Glasgow, do you not answer those demands by means of your own local notes, and not by orders upon London?

2348．当您在格拉斯哥的顾客需求增加时，您不是用您当地的银行券和伦敦兑付的汇票来满足顾客吗？

Certainly; our circulation from Tuesday to Friday, and from Friday to Tuesday again, is increased upon this occasion; but we do not reckon that circulation, because we know that it is immediately to return upon us, and that it is an advance, not of circulation, but of capital; it becomes at the next exchange-day an advance of our capital.

当然是这样。我们的流通量从周二到周五，又从周五到周二根据这一情况增加，但我们不会把这个流通量计算在内，因为我们知道它很快又会返回来，并且它不是一种货币预付，而是资本预付，它会在下一个交易日成为我们资本的预付。

2349 . You feel satisfied that the increase of notes which you might make at that period would immediately come back upon you in the exchange, and that you would be required to pay them by orders on London?

2349．您是否确信您那时增加发行的银行券在交易所内会很快返给您，并要求您用伦敦兑付的汇票支付呢？

Yes; or by exchequer bills in Edinburgh.

是的；或者在爱丁堡用国库券支付。

2361 . Do you not, by means of this increased amount of advances in the extraordinary periods to which the questions have alluded, add to the means of purchasing goods possessed by the persons who borrow from you?

2361．您有没有通过在那种特殊时期增加预付额，从而增加借款人购买货物的手段？

Yes, we do.

确实有过。

2362 . And is not that practically tantamount to so much increase of circulation in the local districts in which your loans take place?

2362．这实际上不就相当于在您放贷的地区增加了同等的流通量吗？

I think not of circulation; I think it is capital; because the notes we pay out are not retained for days or weeks to make the purchases, they are paid

immediately to some other bank, and come back to us upon the exchange, and t*hey become an advance of capital by us to the party, to enable him to make his purchases.* [11_3]

我认为增加的不是流通量，而是资本。因为我们支付出去的银行券不是等几天或几周后才进行购买，而是立即被支付给其他银行，兑付后又返回到我们这里。它们成为了我们预付给当事人的资本，使他能够完成购买活动 。 [12_3]

2363 . But although ultimately it comes to be an advance out of your capital, yet for a certain time it is an advance made by means of your circulation only, without the aid of your capital?

2363 . 但是，尽管最终是用您的资本做出的预付，然而在一定时期内它只是借助您的流通量，而非您的资本进行的预付，不是吗？

For two or three days it is.

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是这样。

2364 . For a certain time, longer or shorter, as the case may be?

2364．到底是更长还是更短的一段时间呢？

It cannot, I think, be longer than till the next exchange-day with regard to those extra advances.

考虑到额外的预付，我想不超过下个交易日。

2365．(*Mr. Gisborne.*) Practically, has it more effect *in giving power of purchasing* goods in London, than if you gave them a draft upon your banker in London?

2365．（吉斯伯恩先生）对比您在伦敦签发银行兑付的汇票，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不是更能赋予他们在伦敦的购买力 呢？

No; I think not.

不，我认为不会 。

2366．(*Mr. Grote.*) But during the period which elapses between the time of your making the advance originally in your own notes, and the time when you give the order on London, in

consequence of the notes coming back to you during that interval, whether it be long or whether it be short, must there not be an increase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generally?

2366．（格罗特先生）但是，从您用自己的银行券进行预付，到签发伦敦兑付的汇票，在这段或长或短的时间里，银行券会返回到您那里，难道不会必然增加当地的总流通量吗？

I think that brings us back to the question which has been so much discussed here, viz, whether deposits form a part of the circulation. *Those notes which we pay out do not remain out;* they must be paid back either to us or to some other bank, in the shape of deposits, till they are to be used, and they do not increase the permanent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unless for a day or two, scarcely for even a day.

我认为这又把我们带回了多次讨论的问题上，这个问题就是，存款是否属于流通的一部分。我们支付出去的银行券没有在市场流通，而必须以存款的方式返回到我们或其他银行手里，直到它们被使用。它们只会在一两天或仅仅一天内增加流通量，而不会永久地增加本地的流通量。

2367．(*Sir James Graham.*) What proportion

of the people of Scotland receiving notes employ bankers?

2367．（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接受银行券的苏格兰人中有多少人会在银行开户？

A very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people of Scotland employ bankers; we have been enquiring into that since we came together. One of the gentlemen here, who is at the head of a bank with a large number of country branches, informs me, that the number of creditors of his bank is 20,000. In our case I have a return since I came to town, making the number in our bank 15,770; and one of the gentlemen who is here, and who is at the head of a bank without branches, says that he has 7000 people holding his obligations.

很大一部分苏格兰人会在银行开户。我们聚在一起后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这里有一位先生是一家拥有多家地方分行的银行的经理。他告诉我，他的银行有20,000名债权人。从我们自身的情况来看，我到这里之后看到一个报告，说我们银行的债权人有15,770名。这里的另一位先生掌管的银行没有分行，他告诉我说有7,000人和他有债务关系。

2368．(*Mr. Grote.*) Deposit accounts?

2368．（格罗特先生）是定期存款账户吗？

Yes; deposit accounts, or current accounts bearing interest.

是的，定期存款账户，或者带息的活期账户。

2369．(*Sir James Graham.*) Inasmuch as every payment into a bank, whether in the shape of a deposit, or to the credit of a current account, bears interest day by day, and inasmuch as no commission is charged upon operations on an account, and inasmuch as a great proportion of the people receiving money in Scotland employ bankers, does it not follow that every payment made in local notes finds its way almost immediately within the space of twenty-four hours into the hands of some banker?

2369．（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由于支付给银行的每一笔钱，不管是以定期存款的形式，或是以活期账户存款的形式支付，都会按日计息，并且由于对账户的交易不收取手续费，而且得到货币的大多数英格兰人都会开银行账户，那不就意味着，任何使用当地银行券进行的支付，在24小时之内立刻就回到了银行的手中吗？

I think it does.

我认为是这样的。

2370．(*Mr. Grote.*) Would not the consequence of that proposition be, if followed out,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notes whatever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but that all the notes issued by each bank should be in fact in the hands of other banks?

2370．（格罗特先生）如果继续进行推论，其结论就是，公众手中没有任何银行券，而实际上每家银行发行的银行券都在其他银行的手中，是这样吗？

That is the effect. There are three million of notes out, which is a very small amount; *people must have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in their pockets and boxes at home, and shopkeepers must keep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in their tills,* the daily receipts of their business; *and manufacturers must keep notes to pay people's wages, and so on;* but that altogether forms but a small proportion compared to the circulation of England. Our three million in Scotland amount to about 1*l* . a head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in England, although you have a gold circulation for every thing below 5*l* ., your paper circulation amounts to 2*l* . a head. I am taking

about fifteen million for the population, and thirty million for the currency.

确实是这样。现在市面上有3,000,000英镑的银行券进行流通，这是一笔很小的数额。人们必须在口袋和家里放些钱，店主也必须在店里放些钱，这是日常生意的收款；工厂主也必须留些银行券来支付工人的工资等等。但是同英格兰的流通量相比，所有这些钱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在苏格兰，3,000,000英镑相当于所有人口每人1英镑。在英格兰，尽管5英镑以下的交易都要用黄金，但纸币流通额实际上也相当于每人2英镑。人口是15,000,000，通货发行额是30,000,000英镑。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urrency and capital, which is so clearly shown by these remarkably intelligent witnesses, is not a mere matter of classification or of verbal criticism. The confounding of one with the other is a prolific source of fallacy in reasoning, and of error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management or regulation of banks.

通货与资本之间的区别，已经由以上那些极其聪明的证人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区别不仅仅关乎分类或语言上的批评。把两者混淆在一起，既造成银行管理或调节问题出现荒谬推理，也使银行的实际管理出错。

Of this a striking instance was exhibited in the reasons adduced by the advocates of the currency theory, in justification of the

advances made by the Bank of England in 1835, against the deposits on the West India loan. The justification proceeded on the ground that, but for those advances, *the currency would have been unduly contracted.* What the notion could be of undue contraction of the currency, that is, of an inconvenient want of bank notes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or of the bankers, as long as any amount might be obtained by discount at 4 per cent, passes all reasonable comprehension. The truth is, that it was wholly a question of disposable capital; and was it possible to imagine that there could be any danger of an insufficiency of it, at a time when the disposal of it was so recklessly going forward in credits to America? While as regards the circulation or currency,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on a view of the state of things at that time, that the amount would have been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it was, whether the advances had been made or withheld.

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是，1835年英格兰银行以西印度群岛贷款的保证金作抵押来进行预付，通货理论的倡导者们为此预付进行辩护，并列举了若干理由。辩护的一个理由是，如果没有这些预付，通货就会过度收缩　　。以4%的贴现率想贷多少款都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若是紧缩，公众或银行家若因手中缺少银行券而感到不便，这实在不合理。事实就是，这完全取决于如何自由支配资本。若在自由支配资本时不计后果地向美国放出大量贷款，又怎么能够想象会有资本不足之险呢？根据当时的情况，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不管是否进行预付，通货数量与此前相比无增无减。

[11_1].It is quite clear that by money the witness means capital, as distinguished from circulation.

[11_2].The question and answer are both wrong. The former assumes that the payment *must* be made in Bank of England notes, and the latter acquiesces in the supposed necessity: they *may* be paid, and most commonly *are*, by being set off

at the clearing-house.

[11_3].It is impossible to place in a clearer ligh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circulation, as applied to purchases between dealers and dealers.

[12_1].显而易见，证词中的货币指的是资本，它不同于流通。

[12_2].问题和答案都是错误的。前者假设支付必须用英格兰银行券进行，后者则认同这种推测的必然性：实际上可以对其进行支付，并且通常都是通过在票据交换所相互抵消完成的。

[12_3].商人与商人之间的购买活动，最清楚地说明了资本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区别。

Chapter 10 Charges Against the Managemen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第十章　英格兰银行管理状况遭到的指控

The foregoing extracts from the examinations of the country bankers give the evidence of witnesses who, while explaining the working of the country bank system, offer no opinion, adverse or otherwise, as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But there are witnesses before that Committee who, while giving very elaborate evidence, comprising highly interesting details, serving to exhibit what, from their regularity, may be deemed to be laws determining the variations of the country circulation, change the whole course of their reasoning when they give their opinion upon the conduc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上述摘录来自对地方银行家的调查结果。摘录中各亲历者的证词虽然解释了地方银行体系的运营机制，却对英格兰银行的管理却没有发表任何褒贬意见。但委员会询问的其他一些证人所提供的极为详实的证词中，却包含着极其有趣的细节。这些细节说明了，从规律性来看，决定地方流通变化的规则可能是什么。但当他们对英格兰银行的管理提出看法的时候，却改变了整个推理过程。

They charge that institution with being the main cause, by undue expansion and subsequent contraction of *its issues* , of causing the alternations of excitement and depression which have characterised the commercial state of this country of late years. And a whole host of writers, some as partisans of the joint stock banks,

others unconnected with any banks, are loud in their declamations against what appears in their eyes the monster monopol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contending, as they do, that whereas the country banks of issue are limited as to any power of adding to the circulation, no limitation exists to the power of the Bank of England to make any addition to its issues, which a view to the interests of its proprietors may dictate; that it can purchase exchequer bills and other government securities and bullion, and discount bills, and make advances to any amount that may suit its convenience, against issues of its notes; and that if then the exchanges become adverse, and its bullion goes out, it puts on the screw, to the great derangement of all commercial operations.

他们指责英格兰银行是国家近年来商业状况时好时坏的罪魁祸首，因为它先是过度扩大发行量 ，随后又缩减其发行量 。众多的作者中，有些是联合股份银行的绝对拥护者，另一些与银行没有任何联系。但这些人都认为英格兰银行是一大垄断机构，并且坚决反对这种垄断。他们认为地方银行增加流通量的发行能力受到限制，而英格兰银行增加发行额的能力不受任何限制。但考虑到英格兰银行所有者的利益，其发行能力应该受到限制。英格兰银行能购买国库券和其他政府债券、黄金和贴现票据，并能以其银行券的发行作支撑，随意对任何数额进行预付。如果汇兑状况不利，黄金外流，英格兰银行就对其加以控制，导致所有的商业活动陷入混乱。

The evidence of Mr. Hobhouse and Mr. Gilbart furnishes striking instances of the mode of reasoning by which it is attempted to be shown that, while the country banks are perfectly powerless in any attempt to regulate their issues, the Bank of England is all powerful, and can enlarge and contract its circulation at pleasure, subject only to an ultimate limitation by the exhaustion of its

treasure.

霍布豪斯先生和吉尔巴特先生的证词提供了突出的例子，说明这些人是怎样试图证明地方银行根本没有能力调节其发行量，而英格兰银行完全有能力随意扩大或缩紧发行量，仅仅在黄金储备耗尽时才会最终受到限制。

H. W. Hobhouse, Esq.

H.W.霍布豪斯先生的证词：

> 158．(*Mr. Gisborne.*) Can you state any marked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country bankers as issuers?
>
> 158．（吉斯伯恩先生）您能说明一下在充当发行人时，英格兰银行和地方银行家之间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
>
> I think the banks in the country are banks of issue to a very small amount compared with the Bank of England. The Bank of England deals with nothing *but its own currency; it is always buying and selling circulation, if I may use the expression; it issues circulation against gold,* which I consider to be a very unwholesome thing, whether London or the

country wants the circulation or not. Then, again, they lend their notes for circulation in the country, which a country banker never does; he would lose his credit if he did that: he could never hold up his head afterwards, *if he attempted to put out his circulation as the Bank of England does;* then the Bank of England is buying and selling securities, *and acting upon the circulation,* whereas the country bankers are entirely passive, and that is the great distinction which I should draw: they carry on the business of issuing to an infinitely smaller extent than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refore that is not a fair measure to judge them by.

我认为，同英格兰银行相比，地方银行发行额非常小。英格兰银行处理的仅仅是自己的通货，而且总是对通货的流通进行买进和售出，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它会抵押黄金来发行银行券，不管伦敦或其他地方是否需要货币流通，在我看来这都是非常有害的。并且，英格兰银行还向地方放贷，而地方银行家绝不会这么做，因为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他就会失去信用。如果他试图像英格兰银行那样做的话，他之后会永远抬不起头。此外，英格兰银行还买卖证券，并对货币流通量产生影响，而地方银行家在这方面是完全被动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最主要的区别。地方银行家的发行业务同英格兰银行相比简直太小了，因此，以此方法来对他们做出判断太有失公允。

159．(*Mr. Hume.*) Are the Committee to understand that you object to the Bank of England

issuing notes for gold?

159．（休姆先生）委员会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反对英格兰银行用黄金担保来发行银行券？

If there is no actual demand for purposes of circulation, i*t increases the circulation when it is not wanted.* If a person were to come to my bank and put a quantity of gold into my bank and ask me to issue notes against it, I would not do it, for I could not make them stay out unless they were wanted; they would come back; therefore, as I say, I could not conduct my business in the same way as the Bank of England does. If a person brought gold to me I should have to pay coin for it.

如果没有实际流通需求，那英格兰银行就是增加了不需要的流通量 。如果一个人来到我的银行，存入一些黄金，并要我以此作为担保来发行银行券，我是不会同意的。因为，除非人们需要这些银行券，否则我无法让它们在市面上流通，它们最后会回到我的手中。因此，正如我所说的，我不能像英格兰银行一样管理我的银行业务。如果一个人拿着黄金来我的银行，我不得不支付他一些货币。

160．(*Mr. Grote.*) And the person who brings to you bullion might go and get that coined at the Mint?

160．（格罗特先生）那么，拿着黄金去您那里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去铸币厂将其铸造成货币呢？

Yes, but if there is no demand for circulation he does not do it; but in the case of the Bank of England he puts it in for a temporary purpose, and *out come the bank notes;* it may be a very wholesome thing for the Bank of England to have that power, but I could not do it. I know that the notes would return upon me immediately; in short, *I have no power over the circulation.* %

是的，但是如果没有实际流通需求的话，他不会那么做。但在英格兰银行，他却可以为了一时的目的，把黄金存在那里以得到银行券 。这对于英格兰银行来说是十分正常的，但我却无法这样做，因为我知道那些银行券会马上返回我的银行。总之，我无法控制流通 。

J. W. Gilbart, Esq.

J.W.吉尔巴特先生的证词：

1015．(*Chairman.*) What are the other tests by which you ascertain whether the issue of bank notes was or was not required?

1015．（主席）您还有其他标准来确定是否需要发行银行券吗？

Besides the rate of interest, I consider the amount of money in circulation, as far as regard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a test.

除利率外，就英格兰银行而言，我认为流通货币的数额也是一种检验标准。

1016．Will you explain that answer more fully?

1016．您能否对您的回答做出更全面的解释呢？

An increase i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 conceive, differs from an increase i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banks, because the increase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banks is drawn out by the state of trade in their respective districts. The country bankers having no power to purchase stock, or exchequer bills, or bullion, with their notes, an increase of circulation by them is indicative of an increase of trade in their districts; either that there is a greater briskness of trade, and

a greater quantity of commodities bought and sold, or else, from some other circumstance, there is an advance in the price of those commodities, and, therefore, I do not consider that any positive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banks is any absolute proof of excess of issue; if that were the case, it would appear that the circulation of Ireland, which was very much larger in December, is a proof of an excessive issue of notes in that country, whereas the fact is, that a larger number of not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are drawn out by the produce of the harvest being brought to market. *But an increase of the Bank of England circulation arising from an issue of its notes against bullion, or against purchase of government securities,* would be an increase not required by trade, and would necessarily reduce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lead to speculation in trade, and investments in foreign securities.

我认为，英格兰银行流通额的增加是不同于地方银行的。因为，地方银行流通额的增加是由地方各自的商业状况造成的。地方银行家无法用他们自己的银行券购买股票、国库券或黄金，因此其流通额的增加表明了当地商业的发展，要么是商业更加繁荣，商品买卖数量增加，要么是其他情况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因此，我认为地方银行流通额的增加并不一定证明银行在该地区过量发行银行券。否则，爱尔兰的流通额在12月份大幅度增加，那就证明该地过量发行银行券。事实是，年底农作物的丰收和入市交易导致了大量银行券被提取。但是，英格兰银行以黄金作担保或

通过购买政府证券发行银行券，从而造成该银行流通额的增加 ，这种增加不是由商业需求引起的，必然会减少利率，导致商业投机，使人们转而投资国外证券。

1017．Do you mean, then, that any increase of issue of bank notes against bullion, or by the purchase of securities, is, in your opinion, an excess of issue?

1017．那么在您看来，任何用黄金作担保或通过购买证券而增加发行的银行券都是过度发行呢？

I must again guard myself; I am very averse to universal propositions, because I believe there are no universal propositions in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at they are all subject to exceptions, and may be modified by circumstances. But taking it as a general rule, and, referring to experience, *I think that an issue of notes against a lodgement of bullion will be usually found to be an excess of issue.*

我必须再次谨慎地说明，我坚决反对这种一概而论的观点。因为我认为在政治经济学中没有普适的观点，任何观点都有例外的情况，并且可能会依照不同的情况而进行调整。但一般来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以黄金作担保发行的银行券通常都是过度发行 。

From the tenour of these answers it might be inferred that every purchase of securities or of bullion by the Bank of England is made in bank notes which remain out and add to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and if they do not remain out, how can they be said to add to the circulation? As to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securities, this, the Bank, having a large capital and deposits, might do if it were not a bank of issue. But, say Mr. Hobhouse and Mr. Gilbart, the country banks, if they buy securities, cannot pay for them in their notes, the demand for these being limited; they must therefore pay for them in an order on London. But what is that order? It enables the holder of it to get gold for it, if he has occasion for or can make use of the gold. And what does the Bank of England do, more or less, when it makes advances by loan or discount, or buys securities? The seller of the securities or the borrower may claim bank notes or gold as he might claim Bank of England notes or gold from any other bank of issue. But he may not, and in most cases does not, want the bank notes or gold. He may require only the power of passing a cheque against the amount, which he pays into his banker. And, in point of fact, unless there is a demand for gold, the great bulk of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whether in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securities or of bullion, is accompanied with as little effect upon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s are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country banks of issue.

从这些回答的大意我们可以推断出，英格兰银行每次都用银行券购买证券或黄金，这些银行券通过此种方法在市面流通，并增加了流通额。如果它们不在市面进行流通的话，怎么会说它们增加了流通额呢？至于买卖证券，即使英格兰银行不是发钞行，它也可以进行证券的买卖，因为它有大量资本和存款。但霍布豪斯先生和吉尔巴特先生说，地方银行如果购买证券，它们不能用其银行券进行支付，因此，对其银行券的需求是有限的。地方银行必须用伦敦兑换的汇票来购买

证券。但什么是汇票？如果汇票持有者需要或能够使用黄金，他可以通过汇票获得黄金。那么，当英格兰银行通过贷款或贴现的方式进行预付或购买证券时，它做了什么？正如他可以向其他发钞银行要求提供英格兰银行券或黄金一样，证券的卖方或借款人可以要求拿到银行券或黄金。但他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不会想要拿到银行券或黄金。他可能仅仅要求有权力用存入银行的数额作抵押使用支票。事实上，除非需要黄金，否则英格兰银行的大多数交易，不管是买卖证券还是黄金，都像地方发钞银行的交易一样，对公众手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会产生影响。

The most extraordinary part of the charge against the Bank of England is, that it *issues its notes* in excess by its purchases of bullion.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is no more reason for supposing that bank notes of necessity actually pass out of the Bank for purchases of bullion than for purchases of securities; but, in the next place, the Bank cannot help purchasing gold. The gold comes into the Bank sometimes from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and in that case it is paid in as a matter of course; sometimes it comes in as bullion from abroad in the shape of sovereigns which had been previously exported, there being no seignorage; and in such case also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the Bank must be passive in receiving them and in paying for them either in notes or in a book credit. But take the case of uncoined gold. If the Bank objected to buy it, it might be taken to the Mint by the importer, and when coined paid into the Bank. Mr. Hobhouse says that it would not be taken of necessity to the Mint, because there might be no want of it in the circulation. This would be true if it could only find vent in the circulation as currency, meaning for retail purposes, those being the only purposes for which coins circulate. But the importer requires the use of it as capital, and if the Bank will not buy it as bullion, he must submit to the delay of having it coined, so that he might pay it

into the Bank, and thus by a small sacrifice of interest get the command of his capital. The Bank, therefore, in buying the bullion at 3*l* . 17*s*. 9*d*. per ounce spares the importers this round-about process. It is, moreover, to be observed, that the Bank is by its constitution a dealer in bullion, and if it were not, some other establishment would be.

在对英格兰银行的指控中，尤其突出的是，它通过购买黄金而过量发行银行券 。首先，没有理由认为英格兰银行一定是为了购买证券而发行银行券，也更没有理由认为它一定是为了购买黄金而发行银行券。其次，英格兰银行不得不购买黄金。黄金有时从内部流通领域进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黄金就自然而然存入了银行。有时黄金以金币的形式从国外进入银行，这些金币以前输出到国外，不征收铸币税。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英格兰银行必须被动地接受它们，并且还要用银行券或赊欠账户的方式进行支付。但是，让我们看看未铸造成硬币的黄金的例子。如果银行拒绝购买黄金，进口商们可能会把它们带到铸币厂，铸造成硬币后再存入银行。霍布豪斯先生说，它不一定会被带到铸币厂，因为流通中可能不需要。如果它只能作为通货进入到流通领域的话，哪怕货币流通仅仅以零售为目的，这都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进口商要求把它当作资本，如果英格兰银行不购买黄金，进口商必须把它铸造成硬币以便存入银行，从而有所耽搁。这样，在利益上做出微小的牺牲，就可得到对资本的控制权。因此，英格兰银行以每盎司3英镑17先令9便士的价钱购买黄金，就为进口商省却了这种迂回的过程。此外，应该注意的是，英格兰银行在性质上便是黄金交易机构，而且如果它不这样做，一些其他的银行也会这样做。

So inconsistent, indeed, are the charges against the Bank of England with reference to its supposed management of the circulation, that while the country bankers are charging it with issuing its notes in excess by purchases of bullion, the partisans of

the currency principle, that is, of a metallic variation, consider it to be an imputation upon the present system or upon the management, that an import of bullion is not attended with a corresponding increase in the circulation.

因此，就假定的流通管理对英格兰银行提出的上述指控，确实是前后矛盾的。地方银行家指控英格兰银行通过购买黄金来过度发行银行券，而通货原理（即金属货币原理）的拥护者却认为，这是对现行制度或管理的诋毁，并且认为输入的黄金不会引起流通额的相应增加。

Chapter 11　The Bank of England Has Not the Power to Add to the Circulation

第十一章　英格兰银行无权增加发行量

From the description which has been given (at p. 21.) of the employment of bank notes when issued and circulating out of the walls of the Bank, it must be evident that the uses of them are such, the purposes for which they are wanted so defined and limited, that in no case could the Bank, by its own volition, add one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perhaps not one hundred pounds to the amount already in circulation among the public. I do not mean that the Bank might not enter into some spontaneous operation which should be of such a nature as to require notes to pass out of its hands without being returned on the same or the following day in the shape of deposits or of a demand for bullion. The nature of the transaction might be such as to require a lodgement of the bank notes in the exchequer or in the hands of agents or of bankers for a few days. What I do mean to say is, that the notes would, in such case, inevitably return to the Bank as deposits, or, wha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be idle in the tills of the bankers, without having performed any of the functions of money in the transactions of purchase or of payment, distinct from that to which they had been specifically applied. I quoted on a former occasion [13_1] an opinion, of Mr. Gurney's delivered in 1833, that while the transactions of London are abundantly supplied with notes, the effect of an additional 5,000,000*l.* would be, that it would remain inoperative or rather idle in the tills of the bankers.

前文在第21页对于人们如何使用已经发行的和在英格兰银行之外流通的银行券进行了描述，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银行券的使用情况，其用途受到严格的限制限定，以致英格兰银行绝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发行100,000英镑，甚至是100英镑，来增加公众手中流通的货币数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英格兰银行不能进行某种自发的活动，这种活动从本质上使银行券脱离英格兰银行而不再以存款或黄金需求的形式在当天或第二天就返回银行。这种交易的性质可能会要求银行券在国库、代理人手中或银行家手中存放几天。我的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券会不可避免地以存款的形式返回英格兰银行；或者说，除了在某种特定的活动中是用银行券外，它们会闲置在银行家的钱柜中，在购买或支付交易中，不执行任何货币功能。前面 [14_1] 我曾经援引过格尼先生在1883年发表的观点：只要伦敦交易所的银行券供给充足，多增加5,000,000英镑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或者说它们会闲置在银行家的钱柜中。

In the evidence before the Committee of 1840 on Banks of Issue, the question of the power of the Bank to increase the circulation is raised in a form which admits of a further illustration of the negative of the existence of such power. It is to be borne in mind that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volve a reference to the effect of the supposed operation of the Bank of England on prices, as well as on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and on the rate of interest. My immediate object in the quotation is to show that the Bank could not add by the operation to the amount of its outstanding notes in circulation.

在1840年发钞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有人提出了英格兰银行是否有权增加发行量的问题，答案就是它没有这种权力。请记住，以下问题与回答涉及人们假设的英格兰银行的活动对物价、流通数额及利率的影响。我做以上引述的直接目的是要表明英格兰银行不能通过其

活动增加在外流通的银行券数量。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by Sir Robert Peel, and answers by Mr. Page, had been preceded by a question which assumed the Bank to have 20,000,000*l.* of notes in circulation, and 10,000,000*l.* of coin in its coffers.

以下问题是罗伯特·皮尔爵士提出的，佩吉先生对此做了回答。问题和回答的假设是英格兰银行有20,000,000英镑的银行券在市面流通，还有10,000,000英镑的货币存放在金库中。

> *Qu.* 832 . Supposing the 20,000,000*l.* of notes issued upon the discount of bills of exchange or advances to government remained the same, and that the Bank were suddenly to throw 5,000,000 of sovereigns into *active circulation* , as advances upon landed securities, would there be no effect produced upon the currency of the country?
>
> 问题832．假设依据交易所的贴现汇票或向政府放款而发行的20,000,000英镑银行券保持不变，且英格兰银行突然抛出5,000,000金币使其进入实际的流通 ，作为地产证券进行的垫付，难道就不会对国家通货产生影响吗？
>
> Yes, if they remained out there would be an effect on prices; but they would soon come back.

There would in that case, in the first instance, be no alteration in the total quantity of money as administered by the Bank of England, but the Bank would do just what a private banker does—he would employ the money he has in deposit in the purchase of securities without increasing his liabilities; but that state of things would never last; because *either those sovereigns would be wanted in the circulation or they would not; they most certainly would not; because before that time they were never called for, and, not being wanted in the circulation, they would return to the Bank to increase the deposits* , and then the Bank would be precisely in the situation I have mentioned before; they would increase their securities and increase their liabilities.

当然会有影响，如果它们在市面上流通，就会影响物价，但它们很快就会返回银行。在此情况下，英格兰银行最初的货币总量不会有什么变化，但英格兰银行会像私人银行家那样，用其存款购买证券，而又不会增加其债务；但情况不会一直这样。因为在流通领域里，要么需要这些金币，要么不需要。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的，因为之前从未有过这种需要。既然流通领域中不需要，它们就返回英格兰银行，从而增加了存款 。那么，英格兰银行的情况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既增加了英格兰银行的证券，也增加了债务。

833 . They would return to the Bank because they would have depreciated the currency; but

would not they affect prices while they remained out?

833．它们将返回英格兰银行，否则就会使货币贬值；但是，如果它们仍在外流通，难道就不会影响物价吗？

They would not remain out for any length of time.

它们在外流通的时间不会很长。

If Mr. Page had confined himself to that part of his answer which I have marked with italics he would have been correct. The sovereigns, not being wanted in the circulation, would return to the Bank to increase the deposits; and then, if the following question, instead of “833. They would return to the Bank because they would have depreciated the currency; but would they not affect prices while they remained out?” which assumes that they would have entered into the circulation as currency—if instead of this erroneous assumption, the question had been *why* or in what sense the sovereigns would not be wanted and would return to the Bank, the proper answer would have been, that the circulation of sovereigns is wanted chiefly, if not exclusively, for purposes of income, including wages, and of expenditure, and not as instruments for transfers of capital. It is in the retail trade between dealer and consumer that coins are principally used. Now, as it does not appear why any additional demand in the retail trade should be caused by

this forced issue of sovereigns by the way of loan on mortgage, they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as being most inconvenient instruments for a mere advance of capital, return to the Bank as deposits.

如果佩吉先生只回答我用着重号标记出的那部分问题的话，那么他的回答是正确的。流通领域不需要那些金币的话，它们就会回到英格兰银行，这样就会增加存款。随后，如果不提出“833．它们将返回英格兰银行，否则就会使货币贬值；但是，如果它们仍在外流通，难道就不会影响物价吗？”这种假设它们已经作为通货进入流通领域的问题的话，如果不作出这一错误的假设，而是这样问：为什么或者在何种意义上不需要这些金币，以及它们会返回英格兰银行？则正确的答案就是：流通领域需要金币，即使不是专门用于、也是主要用于收入（包括工资）和支出的目的，而不是当作资本转移的手段。硬币主要用于商人和消费者间的零售交易。由于没有解释为什么上述以抵押贷款的方式强制发行的黄金引发了零售交易中需求量的增加，所以这些金币仅仅作为预付资本这种最麻烦的手段，极有可能会以存款的方式返回英格兰银行。

By the supposition it is a forced operation of the Bank. In effecting its purpose of making advances to that extent on mortgage, it would have to displace the existing capital (because the hypothesis assumes that things were in a sound and quiescent state, in other words, *in equilibrio* , there being no new circumstances to induce fresh borrowers on that description of securities at the existing rate of interest) which had been previously advanced and was absorbed in mortgages. This could not be effected without a great reduction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on that description of securities by way of a sufficient inducement to fresh borrowers, or to the existing mortgagees to pay off their loan and to borrow from the Bank at the reduced rate.

据猜测，英格兰银行是被迫进行这一活动的。要达到这种程度的抵押预付，英格兰银行就不得不置换现有的资本（因为假设前提是情况良好、状态平稳，换句话说，是一种“状态均衡 ”，没有发生新的事件推动新晋借款人按现行利率购买证券），而现有的资本之前已经预付并进行了抵押。而要想置换现有的资本，就要大幅度降低上述证券的利率，以充分诱导新晋借款人或现有抵押权人偿清贷款，并以降低了的利率向英格兰银行贷款。

The mortgagees being unexpectedly, and to them inconveniently, paid off, would of course seek other investments, but these they would not readily find, unless by offers of capital at a still lower rate of interest. This would only remove the difficulty of finding employment for the capital by a single step, or rather merely shift it; for whatever securities were purchased by the capitalists whose mortgages had been paid off and transferred to the Bank, would set afloat just so much capital as would be produced by the transfer of those securities.

当抵押权人的贷款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偿清后，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有些不便，他们当然就会寻求其他投资机会。但寻求机会并非易事，除非他们可以以更低的利率提供资本。这种做法在消除为资本寻求投资机会的困难方面只是迈出了一小步，或者说这只是转嫁了困难。因为资本家的抵押贷款得到偿还并转移到英格兰银行后，他们购买多少证券就会使多少资本在市面上流通，这些资本等同于转让那些证券产生的资本。

The result would not be materially varied if the supposed advances made by the Bank on mortgage were to parties who were

buying land speculatively or otherwise. There would, of course, while the operation was in progress, be a temporary rise in the number of years' purchase of landed property. In this case the sellers of the land would probably, after paying off incumbrances, seek investment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amount in securities at home or abroad, and would, in the first instance, with the mortgagees who were paid off, deposit the sovereigns so received at their banker's. In either or both cases, the deposits in the Bank of England or other banks would be increased. The deposits so accumulated would, by the operation of a greatly reduced rate of interest, gradually find employment as capital at home or abroad, without necessarily having in the meantime produced the slightest effect in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or depreciating the currency, as by the question was supposed, in any other sense at least than in reducing the rate of interest.

即使英格兰银行提供给土地投机者或其他投机者抵押预付，结果也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当然，在这些投机活动进行过程中，地产的年购买量会有短暂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卖方很有可能在付清了债务后，用余款在国内外投资证券。此外，最初的时候他们还会和还清了抵押贷款的抵押权人一起，把得到的金币存入银行。不论哪一种情况，英格兰银行或其他银行的存款都会增加。由于利率的大幅下降，以此种方式积累下的存款会逐渐以资本的形式在国内外寻找其投资机会。正如上面的提问所猜测的，至少在利率降低时，不会同时出现流通量增加或货币贬值的情况。

I have been the rather induced to remark upon the opinion of Sir Robert Peel, as conveyed by his question No. 832., because it should seem that the examin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Banks of Issue, of which he was a member and in which he took part, had

not shaken his belief that it was in the power of the Bank, by an attempt at a forced issue,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either in gold or bank notes, and so to depreciate the currency. On the last day of the session of 1842, Sir Robert Peel, after remarking on the tendency of the improvements effected by his tariff to mitigate the existing distress, concluded with saying,—

我对罗伯特·皮尔爵士的编号832的问题所表达的观点做了特别评论，这是因为发钞银行委员会的调查。皮尔先生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并且参与了此次调查。但这竟然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即英格兰银行确实有权强制发行银行券来增加黄金或银行券的流通量，以使通货贬值。在1842年会议的最后一天，罗伯特·皮尔爵士谈到他所说的关税会使情况向好发展，减轻现有的痛苦，随后他总结道：

> I admit that there are modes by which a temporary prosperity might be created. I might create a temporary prosperity by the issue of 1*l.* notes, and by encouraging the Bank to make large issues of paper; but such a prosperity would be wholly delusive. It is much wiser, in my opinion, to abstain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imulus. [13_2]

> “我承认，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创造短暂的繁荣，发行面值1英镑的银行券和鼓励英格兰银行大量发行纸币，都可以做到这点。但这种繁荣完全是虚幻的。我认为更聪明的方法就是避免运用这些刺激手段。” [14_2]

The effect of the issue of five million being in 1*l.* notes instead of sovereigns would be so far, and only so far different, that although they would not, provided they were issued on securities, form an addition to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there might be such a preference on the part of the public for 1*l.* notes over sovereigns, that gold coin would go back to the Bank instead of the small notes.

发行5,000,000英镑面额为1英镑的银行券与发行金币，造成的结果只有这样的区别，虽然是在抵押证券的情况下进行的发行，它们不会增加流通量，相对金币而言，人们可能更偏爱面额1英镑的银行券。那么是金币而不是这些小额银行券返回英格兰银行。

It would appear from the conclusion of the speech just quoted, and from his examination of Mr. Page, that Sir Robert Peel is of opinion that a forced issue of sovereigns or of 1*l.* notes would be *most* efficacious, but that large issues of paper generally by the Bank under encouragement from government, would in *the next degree* be effectual, and serve as a *stimulus* in creating a temporary prosperity.

从引用的演讲的尾声部分以及对佩吉先生的调查来看，罗伯特·皮尔爵士认为，强制发行金币或面额1英镑的银行券会是最有效 的方法，而这种在政府鼓励下英格兰银行大量发行纸币是次之 有效的方法，两者都是创造短暂繁荣的刺激 手段。

Now, whatever may be the ultimate permanent effects of a fall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on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it is quite clear that temporary prosperity is not the necessary or immediate

consequence of a greatly reduced rate. At the time when Sir Robert Peel made the remark which I have quoted, namely, in August, 1842, the rate of interest had fallen below what it had been for several years before, and most assuredly nothing like a return of prosperity, however short-lived, had yet manifested itself. He cannot, therefore, any longer have supposed, whatever may have been his impression when examining Mr. Page two years before, the rate of interest being then still comparatively high, that mere advances on securities, that is, loans or discounts by the Bank (always assuming that the securities are unexceptionable) could have the desired effect. How he would have proposed the extra issue to be made, with the view of creating temporary prosperity, does not appear.

那么，利率的下降无论最终会对国家的繁荣产生什么长远的影响，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短暂繁荣并不是大幅降低利率的必然或直接的结果。我援引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那段评价是1842年8月所讲的，当时的利率已经低于多年以前的水平，并且非常确定的就是经济并未复苏，即使是非常短暂的繁荣也没出现。因此，不管在两年前他调查佩吉先生时持什么看法（那时的利率仍相对较高），他不再认为纯粹的证券担保预付，即英格兰银行的贷款或贴现（一直认为证券是毫无例外的）会起到预想的作用。至于他为何会为了创造短暂的繁荣而提倡发行额外的银行券，这点并未提及。

The object of tracing thus far the operation, hypothetically suggested by Sir Robert Peel, is to show that the Bank of England cannot, any more than the country banks, at its pleasure, or for the purpose of employing productively, that is, in securities, a larger than usual proportion of its deposits or of its bullion, cause an enlargement of the circulation; and that the usual phraseology, by

which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country banks are said to enlarge their circulation as a voluntary act, is incorrect, so far as implying a power which they do not possess of directly adding to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remaining out in circulation, passing from hand to hand among the public, and performing the functions of money in daily transactions.

如此深入讨论罗伯特·皮尔爵士提出的假定的情况，目的就是要表明英格兰银行和地方银行一样，不能随意或为了一味追求结果而增加发行量，不能用多于日常的存款或黄金来购买证券。还要表明，英格兰银行和地方银行扩大发行量是有意为之的这种常规说法并不正确。他们没有能力直接增加市面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这里的流通指的是在人们手中流转，并在日常交易中发挥其货币职能的银行券。

It is possible that, coincidently with this operation of the Bank in a sudden forced advance of 5,000,000*l.* on mortgage, there might be circumstances in progress, such as an extension of trade and a rise of prices, or a state of discredit of country bank paper, which might absorb a part of the extra sum issued by the Bank; in which case a part only of that extra sum would return to the Bank, some of it as deposits, and some of it to be exchanged for notes, the gold not being wanted for internal purposes. Bu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here supposed, an increased amount of bank notes would, but for this operation of the Bank, have been called forth, either by depositors or by discounts, or by an influx of bullion.

英格兰银行可能突然碰巧被迫提供5,000,000英镑贷款抵押，这时可能会有以下的情况，比如：贸易扩大，物价上涨，或地方银行纸币的信用下降；这时英格兰银行可能吸收一部分过度发行的银行券，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有一部分额外的钱会返回英格兰银行，有些是以存款的形式返回，有些以兑换银行券的形式返回，因为国内流通不需要黄金，所以这些不需要兑换成黄金。但是，在这里假设的情况下，即使英格兰银行不增加发行量，存款人、贴现或黄金的流入也会增加银行券的发行。

The conclusion from the view here presented is, that neither the country banks nor the Bank of England have a *direct* power (their advances being on securities, and the paper convertible) of enlarging their circulation; and that the inference, from the mere fact of an increase or diminution of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in circulation, as being an indication of a designed enlargement or contraction of issue by the Bank of England to the extent of the difference, proceeds on a false analogy by neglecting a considerat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ssues used synonymously with advances “on securities,” and issues of government bank notes or assignats. It is only the latter description of circulation of bank notes which admits of being increased in amount at the will of the issuers.

依据上述观点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地方银行还是英格兰银行都没有直接 扩大发行量的权力（他们的预付以证券担保，纸币可以自由兑换）。仅仅用流通中银行券数量的增减作为英格兰银行故意扩大或缩小发行量的证据，这样的推断是错误的，因为这忽视了不同发行的区别，一种是发行等同于以抵押证券进行预付，一种是政府银行券或纸币的发行。只有后者的银行券的发行能按照发行人的意愿增加。

[13_1]."History of Prices," vol. iii. p. 156.

[13_2].Hansard, 12th August, 1842.

[14_1].《物价史》第三卷，第156页。

[14_2].英国国会议事录，1842年8月12日。

Chapter 12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mount of the Currency and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第十二章　论通货数量与商品价格的关系

A great part of the examination of witnesses by the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Banks of Issue in 1840 was directed to the eliciting of opinions as to the terms by which the various kinds of instruments of exchange should be designated and classified. The witnesses were severally called upon to define the sense in which they used the terms “money, currency, and circulation,” and to say whether they included deposits in the Bank and bills of exchange under any or all these terms.

1840年，下议院发钞银行委员会对证人进行了问询，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为了让证人表述对一些术语的看法，这些术语是用来特指各种交换手段及其分类的。在问询中，证人需要各自明确说明在何种意义下使用“货币、通货、流通”等术语，并说明他们是否将英格兰银行的存款和汇票纳入了这些术语的范畴之内。

The importance which was attached to the attempt at settling those definitions seems to have arisen from an opinion which prevailed evidently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14_1] that, by arriving at a conclusion as to what part of the various forms of paper credit should be considered exclusively as money or currency, conferring *a power of purchase,* some criterion or test might be found of the influence of one of the principal elements upon which not only the state of trade and credit, but also general

prices depend; it being assumed that commodities, although liable in each particular instance to be influenced by circumstances affecting the supply and demand, are more or less under a direct influence from variations in the quantity of money or currency. And the same assumption of a direct agency of the quantity of money, according to the assumed definition of it, on prices, will be found to be either expressed or implied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numberless publications to which the currency question has given rise. [14_2]

何以如此重视这些术语的界定？这似乎源于发钞银行委员会成员中盛行的一种观点 [15_1] ，这种观点是：在各种形式的信用券之中，一旦确定哪些可以被看作是具有购买能力 的货币或者通货，那么就找到了一种可以用来衡量和检测某个重要因素的标准，这个因素不仅影响贸易和信用的状态，也影响着一般物价水平；并认为商品的价格，尽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容易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但也或多或少会受到货币或者通货数量变化的直接影响。在讨论通货的绝大多数出版物之中都会找到或明示或暗示这一假定的论断：不管对货币如何界定，货币的数量都会直接影响物价。 [15_2]

An increase or diminution of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is evidently considered, not only by the professed adherent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currency principle, but by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public who take an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to be analogous, in the effects on markets, to alterations in the quantity of a government compulsory paper; or, in other words, they consider that prices in such cases are under a direct influence from, and affected in the same manner by, variations in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in circulation, which they designate indiscriminately as paper money.

银行券数量的增减和政府强制发行的纸币数量的变化，这二者对市场的影响效果是类似的，对于这一点，无论是通货理论的公开拥护者还是大多数对通货感兴趣的公众都明显认同。或者，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物价直接受到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变化的影响，并且他们认为流通中的银行券就是纸币。

This erroneous impression arises from a neglect of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manner and purpose of the issue. I have not met with an instance in the inquiry by the committees, or in the numerous publications which have appeared on the subject of the currency, of any attention having been paid to this particular point. Indeed, the context in all of them seems to assume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and that therefore any attempt at explanation would be a work of supererogation. Thus, Mr. Porter who, in the chapter on Currency, in his highly valuable work "On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ttributes to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great influence on prices, contents himself with observing, "*It is not necessary to explain,* at any length, *in what manner* excessive issues of currency tend to raise the general prices of goods." [14_3] : Now an explanation, however brief, of this point was exactly the thing wanted. And I cannot help thinking, that if he had suffered himself to pause and reflect upon it, he could hardly have failed to modify the opinion he has there expressed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amount of the currency on prices, and he would possibly have been led to distrust the correctness of the view presented by the table which he has inserted in illustration of his opinion of that connection.

这种错误的认识源于忽略了发行方式和发行目的的差别。在各委员会进行的问询或者大量有关通货问题的出版物之中，我还没有发现

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它们似乎都认为二者不存在差异，因此任何相关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例如，波特先生著有一本极具价值的书——《论国家的进步》，在其论述通货的一章中波特先生认为流通货币的数量会大大影响物价的波动，并且非常满足于自己的这一论断，在书中他写道："对于通货的过度发行会如何 引起一般物价的上涨，没有必要进行详细解释 。"[15_3] 因此现在对这一点的解释不管多么简单，都是恰如其分的。我不禁在想，如果当时波特先生停下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么他很可能就会更改他当时所表述的关于通货数量影响物价的观点，并很可能会怀疑他为了表述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而插入的表格中的观点是否正确。

A moment's consideration will serve to show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stinction to which I have here alluded.

只要稍加考虑就会看出我这里所提及的这种差别的重要性。

When a government issues paper money, inconvertible and compulsorily current, it is usually in payment for—

政府发行的强制流通、不能兑换的纸币，通常用于支付：

1．The personal expenditure of the Sovereign or the governing power.

1．君主或统治者的个人开销。

2．Public Works and Buildings.

2．公共工程与建筑。

3．Salaries of Civil Servants.

3．公职人员薪酬。

4．Maintenance of Military and Naval Establishments.

4．陆军和海军建设费用。

It is quite clear that paper created and so paid away by the Government, not being returnable to the issuer, will constitute a fresh source of demand, and must be forced into and permeate all the channels of circulation. Accordingly, every fresh issue, beyond the point at which former issues had settled in a certain rise of prices and of wages, and a fall of the exchanges, is soon followed by a further rise of commodities and wages, and a fall of the exchanges; the depreciation being in the ratio of the forcibly increased amount of the issues. [14_4]

很明显，由政府发行并按如上所述方式支出的纸币，不会再回到发行者手里，它将成为一种新的需求来源，并注定被迫进入到所有流通渠道中。因此，每一次新的发行，只要超过曾经引起物价和工资上

涨以及汇率下降的水平，都将迅速地引起商品价格和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和汇率下降；贬值的幅度与强制增加的发行量是成比例的。 [15_4]

It will hence appear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aper money so issued and bank notes such as those of this country consists, not only in the limit prescribed by their convertibility to the amount of them, but in the mode of issue. The latter are issued to those only who, being entitled to demand gold, desire to have notes in preference; and it depends upon the particular purposes for which the notes are employed, whether a greater or less quantity is required. The quantity, therefore, is an effect, and not a cause of demand. A compulsory government paper,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it is in the course of augmentation, acts directly as an originating cause on prices and incomes, constituting a fresh source of demand in money, depreciated in value as compared with gold, but of the same nominal value as before.

由此看来如此强制发行的纸币和诸如英国的银行券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它们的可兑换性对其数量的限制，也在于它们的发行方式。后者只发行给那些有权得到黄金却偏偏期望持有银行券的人；而银行券的使用决定了所需银行券数量的多少。所以银行券的数量变化是需求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另一方面，政府强制发行的纸币，在其增加发行的过程中，会作为初始原因直接影响物价和收入，从而形成一种对货币需求的新的源头，其相对于黄金在贬值，而其名义价值较先前没有什么变化。

In a convertible state of the currency, given the actual and contingent supply of commodities, the greater or less demand will depend, not upon the total quantity of money in circulation, but

upon the quantity of money constituting the revenues, valued in gold, of the different orders of the state under the head of rents, profits, salaries, and wages, destined for current expenditure.

在通货可兑换的状态下，若给定商品的实际供给和随机供给，则需求量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总量，而是取决于构成国家各阶层收入的货币量，这些收入包括以下名目：租金、利润、薪水和工资，它们以黄金来定价，用于现期支出。

Dr. Adam Smith, in the passage which I have before quoted from him (at p. 34.) observes: “The value of the goods circulated between the different dealers never can exceed the value of those circulated between the dealers and the consumers; whatever is bought by the dealers being ultimately destined to be sold to the consumers.” Assuredly, then, the prices at which the commodities have gone into consumption, the result of them constituting the return for the capital expended in the production, may be considered with greater propriety than any other description as general prices.

我先前引用过亚当·斯密博士的一段文字（第34页），他说：“流通于不同商人之间的商品的价值永远不会超过流通于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商品的价值；不管商人购买何种商品，最终都要卖给消费者。”商品被出售给消费者就完成了对其生产中所耗资本的回报，那么毫无疑问，此时的价格或许比任何其他价格都更适合被称之为一般价格。

The cost of production will determine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the supply will be continued, but the extent of the effectual demand, in a given state of the supply, will be measured by the prices which the consumers may be able and willing to pay. Now, the power of purchase by the consumers depends upon their incomes; and the measure of the extent and of the exercise of such power is, as has just been observed, in that portion of their revenues which is destined for expenditure in objects of immediate consumption.

生产成本将决定是否继续供给和以何种程度继续供给，但是如果给定供给状态，那么有效需求的程度将由消费者能够且愿意支付的价格来衡量。消费者的购买力取决于他们的收入；购买力的大小及其实施程度，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是以他们将多少收入用于购买即期消费品来衡量的。

Of the revenues or incomes of the community devoted to immediate expenditure, by fa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consists of wages, from those of the skilled artisan, who gets his 5*l.* a week or upwards, to those of the day labourers and common workmen, whose earnings with their families are from 20s. to 7s. a week. Any increase, accordingly, of incomes, of which wages constitute the largest part, will raise general prices, and a fall of wages will depress them, supposing no alteration in the cost of production, or in the actual and contingent supply.

公众用于当下支出的各种收入中，最大一部分来自工资，从每周薪酬5英镑或以上的熟练技工，到每周薪酬 7 先令到20先令不等（其中还包括其家人的收入）的日工和普通工人，都大抵如此。因此，假设生产成本不变，实际和随机供给也不变，那么对于以工资作为最大

构成部分的各种收入，其增长将会带来一般价格的上涨，反之，工资的降低会使价格下跌。

If prices of one or more articles of consumption fall from diminished demand, and continue for any length of time below the cost of production, the supplies will fall off until, in consequence of the diminution of supply, the price rises, so as again to cover the cost. Or if the cost of production is raised by permanent causes, the means of the consumers being limited if the article is not a necessary of life, and if the supply falls off so as to raise the price, there will be a permanent falling off of the demand, and less of the article will be produced and consumed. But, given the cost of production, and, barring the effect of vicissitudes of the seasons, and other casualties affecting the supply, the quantity consumed, at certain prices, which is the test of effectual demand, will, as I have said, depend upon that portion of the incomes of the different orders of the community which may be destined for expenditure in immediate objects of consumption.

如果一种或者多种消费品的价格由于需求减小而下跌，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生产成本价之下，那么供给也会随之减少，直到供给的减少使价格上涨到足以抵偿成本为止。如果某种物品的生产成本由于一些永久性的原因而增加，如果由于这种物品不是生活必需品而使得消费者对其购买力受到限制，并且如果供给减少致使价格上涨，那么需求将永久性减少，这种物品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也会减少。但是，如果给定生产成本，不考虑季节变化以及其他影响供给的不确定因素，那么就像我所说的，在一定的价格之下，消费量（作为有效需求的衡量标准）将由社会不同阶层的公众用于购买即期消费品的那部分收入来决定。

As an instance of the false practical conclusions to which the currency theory leads, in the view take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ills of exchange and bank notes, and in overlooking, as it does,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credit, and capital, and currency, and between wholesale and retail dealings, I have to ci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Mr. Norman's Letter to Charles Wood, Esq. (page 43.) proposing to show, according to his view, the usual effect of bills of exchange on price:—

通货原理区分了汇票和银行券，却忽略了信贷、资本和通货的不同特征，以及批发交易和零售交易的区别，因而得出了一些错误的实际结论。为了证明此事我将引用诺曼先生写给查尔斯·伍德阁下的一封建议信（第43页）中的一段话，他想通过这段话来说明通常情况下汇票如何影响价格：

> A buys cotton of B at 10 per cent in advance on the previous price, payable at three months, and gives his acceptance for the amount. At the close of this period, or after one or more renewals, the bill must be paid out of the currency in existence; and if there is not enough money to sustain such a price, a fall in prices must ensue, and B will suffer from his bargain. But further, if the advanced price has become general, a stimulus will be given to the importation of cotton, a check to its exportation, or to that of articles manufactured from it, and the final result will probably be a fall below the original price, commensurate with or perhaps greater than the original rise. This imaginary case may be taken as a fair representation of *the usual*

effect of bills of exchange on price.

> “A按照先前的价格从B手中购进棉花，预付10%的货款，约定以三个月为付款期，并签发承兑汇票。在到达付款期后，或者在一次或数次延期后，汇票必须用现有通货支付；若无足够货币来维持既定价格，则交易价格必然随之下跌，B将会因交易而蒙受损失。但若价格普遍升高，则会刺激棉花进口，抑制棉花或棉织品出口，最终或许棉花价格将降至比最初价格还低，下降幅度相当于或者大于最初的增长幅度。这个假设的案例或许可以清晰地表明通常情况下　汇票如何影响 价格。”

The bills of exchange are here supposed to have an effect on price, that is, to be a cause of price; whereas *the very reverse is the fact.* The bills of exchange, so far from being a cause, are the effect of price. *The prospect of advantage supplies the motive, and the credit of the buyer constitutes the power of purchase,* while the bill of exchange is a mere written evidence or acknowledgment of the debt, accompanied with a promise to pay the amount at some definite period. If A, the buyer at the advanced price, has not under-estimated the supply, or over-estimated the consumption, the manufacturer must give the advanced price, and, by his acceptance or cheque, enable A to discharge his acceptance at the time of its becoming due, with a profit, or, by the supposition, without loss. But if A has been mistaken in his view of the supply, actual and contingent, compared with the rate of consumption, the price will fall, and he will suffer from his bargain; and if he trades upon a large proportion of borrowed capital and the loss be heavy, he will fail.

在此，汇票被假定对价格有影响，即汇票是形成价格的原因；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汇票绝非是价格的原因，反而是价格的结果。对利润的预期促成了动机，买方的信用构成了购买力 ，而汇票只是一张债务书面证明，承诺在某一约定日期付款。若A以上涨的价格购买棉花，且没有低估供给或高估消费，那么制造商必须按照上涨的价格以其承兑汇票或支票付款，使A能够清偿其到期汇票，A因此而盈利，或者根据以上的假设不会亏损。但是如果A基于实际消费情况错误地估计了实际和随机供给，那么价格将下跌，A将因交易而蒙受损失；如果A大部分是依靠借入资本进行交易并且损失惨重，那么他将面临破产。

So much of the results, in the alternative of the two suppositions, is clear enough according to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But, according to Mr. Norman's view, if I understand it rightly, the price would fall, not because the buyer had been mistaken in his view of facts and in his reasoning as to the supply relatively to the rate of consumption, but *because there was not enough money to sustain the advanced price.*

在上述两种假设的前提下，按照交易的正常过程，显然只能得出上述结论。但是，根据诺曼先生的观点，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价格下跌不是因为买方误判了事实或者根据消费率误判了供给，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货币来维持既定价格 。

Mr. Norman does not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quantity of money requisite to sustain the advanced price of cotton in the case supposed is necessarily dependent on the aggregate of coin and bank notes, which he considers as the currency in existence in the

country, and out of which he states that the bill given by the buyer of the cotton must be paid. He seems not to be aware that the quantity of money applicable to the purchase of cotton and cotton goods from the raw material in the hands of the grower, to the finished article in the hands of the consumers, is dependent upon that portion of the money incomes of the consumers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they are able and willing to expend i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ir wants for cotton clothing and the other uses of cotton goods. All sales and purchases from those of raw cotton in the hands of the planters, till the finished goods find their way into the hands of the consumers, must in the aggregate reach that amount, and cannot but by miscalculation of employers of capital and labour, in the distribution and the manufacture through the intermediate stages, exceed that amount, whatever may be the multiplication of bills arising out of the intermediate transactions.

诺曼先生并没有试图去表明，在假设案例中维持棉花价格上涨所需货币量必然取决于硬币和银行券的总量（他认为这一总量即为本国现存通货，并且棉花买方的汇票必须从这一总量中偿付）。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可用于购买棉花和棉织品（即种植商手中的原料和消费者手中的成品）的货币量，取决于国内外消费者能够并且愿意用来满足他们对棉布和棉织品的需求所支付的那部分货币收入。从种植者手中的所有原棉买卖到最终产品流入消费者手中，所有这些买卖活动所用货币量加总后必然会达到那个数额，并且不管在中间交易中增加了多少汇票，都不可能超过那个数额，除非雇主误算了中间的分配和生产阶段产生的资本和劳力消费。

The principle of limitation, therefore, to the maintenance of an advanced price of any particular article, in consequence of actual or apprehended deficiency of supply, *is not the quantity of money in*

existence in the country, but *the quantity of money in the hands or pockets of the consumers destined for expenditure in that article.* And the eventual fall of price will not be from deficiency of the quantity of currency in the country to sustain the advance, as supposed in the foregoing passage, but from the inability or unwillingness of the consumer to pay the advanced price, and from a restoration, actual or expected, of the usual or a greater supply.

因此，若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由于实际供给不足或者对供给不足的担心而抬高了，那制约这一价格维持下去的关键因素不是国内的现存货币量，而是消费者手中或者口袋里用于购买这类物品的货币量。而且价格的最终下跌，并非像上文假设的那样，是本国通货数量不足以维持高价格，而是由于消费者无力或者不愿支付上涨的价格，或者由于供给（不管是实际的还是预期的）恢复正常或增加了。

But then follows a passage which shows that in that which I have just quoted, the effect ascribed to bills of exchange on prices is supposed to arise from the circumstance, not of their creation, but of their changing hands by indorsements:—

但是接下来诺曼先生又说了一段话（我刚刚引用过），表明汇票对价格的影响是由这些支票的背书转手造成的，而不是由开立这些汇票造成的：

> A large proportion of bills are drawn and paid which have no effect on the currency whatever. Thus let A sell coffee to B at three months, and at a fair current price, draw for the amount, and keep

the bill in his portfolio until due; it is clear that the result will be the same as if he had given a simple credit for the same period. The economy in the use of money will commence when he makes a payment to C by means of an indorsement, and will be repeated as often as the bill, by a repetition of this process, changes hands. Thus even purchases on credit, at advanced prices, against which bills are drawn, may be made without any new creation of money, and without the necessity of employing an economising expedient.

“大部分汇票的开立和偿付，对通货丝毫没有影响。例如，A向B出售咖啡，B在三个月后付款，按照交易额以合理的时价开出汇票，A持有此汇票直到兑付期限；显然，这与A提供相同期限的信贷的结果是一样的。当A用这张汇票以背书方式向C付款时，就会节省货币，并且通过不断地背书转手可以持续节省货币。因此，即使用开立汇票的赊账方式，以上涨的价格进行购买，也可能不会创造任何新的货币，并且不一定节省货币。”

The advance in the price paid for cotton in the first of the hypothetical cases stated, and the fair price at which the coffee is in the second case supposed to have been sold, should seem upon the face of the statements to be essential conditions of the cases; but the two concluding sentences are calculated to remove that impression, and to lead to the inference that the prices pai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question, how far bills of exchange do or do not answer the purposes of money in a supposed effect on prices.

从表面看来，在上述第一个假设案例中，棉花价格的上涨，以及在第二个假设案例中咖啡的公平售价，似乎应该是这两个案例的必要条件；但是最后的两句总结却使人消除了这种想法，并得出这一推论：汇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货币的作用从而对物价产生预期的影响，与支付的价格毫无关系。

The cases only prove what I have before endeavoured to show, that purchases and sales between dealers and dealers may be, and are in a great majority of cases, transacted through the medium of credit, of which bills of exchange are the written evidence; the successive indorsements adding to the credit of the original names on the bills, and serving the purpose of so many transfers of capital. And I have only referred to the cases stated by Mr. Norman as bearing on the question of the connection of the currency with prices, in order to point out the grave error of his doctrine, in ascribing to bills of exchange an effect *on* prices, instead of viewing them as an effect of prices.

这两个案例只是证明了我之前竭力想表明的那点，即商人之间的买卖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通过信用方式进行，汇票是这种方式的书面证据；连续不断的背书增加了汇票原始签署人的信用，完成了资本的多次转让。我提及诺曼先生这两个有关通货与价格关系的例子，只是为了指出他的理论中的严重错误，即他错误地认为汇票影响价格，而不是把汇票看作是价格波动的结果。

The same error, being no less than that *of substituting cause for effect,* is observable in a still greater degree (because more importance is attached to it) in the influence ascribed by the

currency theory to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that is, of bank notes, on prices. It is an error which perverts the reasoning, and distorts the view of facts, in every attempt to apply the theory of the currency principle to the actual course of commercial affairs.

通货原理认为银行券的发行量影响价格，这与上面把原因当成结果　　的错误相比，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通货原理更重视这一点）。这一错误让人们在努力将通货原理运用于实际商业事务的过程中，误用了推理，并且歪曲了对事实的认识。

[14_1].From the tenour of the questions which were put to me and other witnesses by Mr. Hume, it might be inferred that he was of opinion that bank notes and deposits, as they conferred a *power of purchase*, were operative as a cause of variations of prices. And it is possible that such was then his opinion; but, not long before, he seems to have entertained a very different view. In the debate on Sir W. Clay's motion for a committee on Joint Stock Banks, May 12. 1836, Mr. Hume said, "With regard to the amount of paper issues, I think I could show tha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issue too much paper money, if it were made convertible into gold in every part of the kingdom on demand. Indeed, I believe that great delusion exists in the country with regard to the effect on prices of the currency. My opinion is, that the quantity of money depends on the rise of prices; and that the rise of prices does not depend on the quantity of money. I hold the prevailing doctrine to be extremely erroneous on this point. The currency doctors I know differ from me; but there has never been a fair opportunity of demonstrating the truth of my propositions."

[14_2].See Appendix (A.).

[14_3]."Progress of the Nation," vol. ii. p. 225.

[14_4].Discredit is not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variations of the value of an inconvertible paper, nor is depreciation always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inconvertibility. The note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of the private banks of this country, were, for two years after the restriction, of the same value as if they had been convertible, and never experienced any discredit. There were great fluctuations in the credit of the paper mone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ring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and also in the case of the French assignats, arising from fluctuating

opinions as to the chances of redemption; and both descriptions became ultimately valueless by excess, when all prospect of redemption had ceased. But the Russian government paper, although, during the progress of its depreciation, by successively increasing issues, no certain or probable prospect of redemption had been held out, seems never to have suffered any discredit; and the variations of the exchanges, beyond those produced by the mere excess of the paper, were such only as are incidental to variations in the state of trade. The effect of increased issues so made was exactly analogous to a progressive deterioration of the coin. The depreciation of the paper reached 75 per cent. At this point it stopped, and the government, by requiring payments for customs and other taxes to be made in the proportion of four paper rubles to one silver ruble, virtually established a degradation of the standard in that proportion, just as if the standard in this country had been reduced to five shillings for the sovereign. After continuing for some years at this rate of depreciation, the value of the paper was raised to 3 rs. 60 cs. for the silver ruble; and in 1888 a silver currency was re-established at the, standard which existed previous to the degradation, provision being made for contracts that had been entered into *specifically* in bank notes, as contradistinguished from contracts in silver money.

[15_1].从休姆先生向我以及其他证人提出的问题的要旨看，或许可以推断，休姆先生认为，银行券和存款由于赋予人们“购买力”，而成为价格变化的原因。当时他可能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就在不久前，他似乎又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1836年5月12日，在针对W.　克莱先生提议建立联合股份银行委员会而进行的辩论中，休姆先生说：“就纸币的发行量而言，我想我能够证明如果在大不列颠王国的每个地方纸币都能见票即兑换成黄金，那么就不可能发行太多的纸币。实际上，我认为，关于通货对价格的影响这一问题，我国存在着巨大的错觉。我的观点是，货币量多少取决于物价的上涨；物价的上涨却不取决于货币量多少。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广泛盛行的学说是极其错误的。我知道，研究通货的学者和我的观点不一样；但是从来也没有一个公平的机会让我来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15_2].参见附录（A.）。

[15_3].《论国家的进步》，第二卷，第225页。

[15_4].信用丧失不是引发无法兑现的纸币价值变化的重要因素，贬值也不总是无法兑现的纸币的必然后果。英格兰银行券及本国私立银行的银行券在历经两年的限制之后，价值仍然相同，就仿佛它们一直可以相互兑换，而且从未有过信用丧失似的。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的纸币信用波动很大，法国革命时期纸币的信用也产生过这个问题，原因都是人们对偿还的可能性的看法左右摇摆。当最终不再有任何偿还可能的时候，这两种货币都因过度发行而变得一文不值了。但俄国政府发行的纸币，尽管因不断增发、不确定能否偿还或没有偿还的可能性而贬值，但它似乎从未贬值；汇兑的变

动，除了由单纯纸币过量而产生的以外，还有的则是由贸易状况的变化而造成的。增发造成的这种影响与硬币的逐步衰败别无二致。纸币贬值了75%。到了这一点上贬值停顿了下来。政府要求依照4卢布纸币换1个银卢布的比例征收关税及其他税收，这样实际以这个比例关系为贬值确立了标准，正如我国的兑换率降低到5先令换1金币那样。这个贬值率持续了几年，随后纸币的价格上涨到了3卢布60分兑1个银卢布；1888年银通货的标准又恢复到了贬值前的水平，并且为银行券支付的合同作出了特殊规定，而之前是对以银币支付的合同作出过相应规定。

Chapter 13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Prices

第十三章 论利率和物价的关系

On the Stock Exchange, and in the Money Market, the term money is used synonymously with capital. Abundance and cheapness of money mean abundance of capital seeking employment, and a low rate of interest as the consequence; as, on the other hand, scarcity of money, and tightness of the money market, mean comparative scarcity of disposable capital, and a consequent advance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when confined to operations on the stock exchange or in the money market, the terms so applied being technical and perfectly understood among the parties using them, lead to no inconvenience either in practice or in reasoning. But, in all general reasoning on the subject of the currency, an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m to proposed regulations of banking, the ambiguity of the term value of money or of the currency, when employed indiscriminately as it is, to signify both value in exchange for commodities, and value in use of capital, is a constant source of confusion: accordingly, in many of the writings on the subject, and in much of the evidence given before the Banking Committee, abundant instances may be found in which parties using the terms appear to have their minds floating between the two meanings, and to come in consequence to anything but clear conclusions.

在证券交易所和货币市场，货币和资本被用作同义词。货币的充足和廉价意味着待用资本的充足，因而利率低；另一方面，货币短缺

和货币市场紧缩意味着闲置资本相对短缺，利率因此而上升。当仅限于在证券交易所和货币市场的运营方面使用时，这些词作为专门术语能够被使用者完全理解，不会给使用和推理过程带来不便。但是，在所有针对通货问题进行的一般推理过程中，或在使用这些词汇讨论银行业的拟议条例时，如果对货币价值和通货价值不加以区分，都用来表示商品的交换价值和资本的使用价值，那么这种用词模糊就会不断导致混乱的情况。因此在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中，或向发钞委员会提供的大部分证词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子，证明使用这些词汇的人的思维总是在这两个含义之间游离不定，也因此根本不会得出清晰的结论。

I will not here stop to point out the fallacious inferences to which, on the general subject, this ambiguous use of the terms necessarily leads. My immediate purpose is to remark upon it only as relates to the inquiry how far the abundance or scarcity of money, in the language of the money market, or in more correct and less mistakable terms, a low or high rate of interest, is calculated to exercise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The commonly received opinion is, that a low rate of interest is calculated to raise prices, and a high rate to depress them. Mr. Gilbart in an article in the Westminster Review for January, 1841, thus explains the effects which he ascribes to the abundance or scarcity of money in the stock exchange and money market, use of the term, meaning capital:—“Speculators and merchants have always some peculiar reason for dealing in one commodity rather than another; but the facility of obtaining the money (*i.e.* , the use of capital) is the moving cause of the speculation, and the price of each commodity will advance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y of money brought to bear on that particular market.” So far from its being true that the facility of obtaining money (always understood on sufficient securities) i*s the*

moving cause of speculation in commodities, Mr. Gilbart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to point out a single instance where the mere facility of borrowing on sufficient security has been the moving cause of any considerable speculation in commodities.

在此我不想停下来指出，在一般推理过程中，针对这一问题模糊地使用这些词语必然会推出什么荒谬的结论。我谈论这一点的目的只是想快点弄清：货币的充裕和短缺，或者用货币市场中更加准确的、不易误解的词语来说，低利率或者高利率，究竟会对商品价格产生多大的直接影响。普遍认可的观点是，低利率会抬高物价，而高利率则会抑制物价。吉尔巴特先生在1841年1月的《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把物价受到的影响归因于货币的充裕或者短缺（这里货币一词取其在证券交易所和货币市场中使用时的含义，意为资本）。在文中他这样解释道："投机者和商人为何经营这种商品而不经营另一种，总是有某种特殊原因的；但是容易获得货币（也就是指容易获得资本的使用）是投机的动因，并且每种商品的价格会随着特定市场的货币量而上涨。"容易获得货币（通常被认为是依靠充足的担保品）是商品投机的动因 ，这一点完全站不住脚，吉尔巴特先生也很难找到哪怕是一个例子来证明，只依靠充足的担保就能实现借贷，并进而进行大宗的商品投机活动。

It may be worthwhile, by way of exhibiting the mode in which advances by the Bank of England, unattended with an increase of the circulation, may be supposed, according to the doctrine which is here under examination, to act upon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to refer to the following further extract from Mr. Gilbart's review:—

或许有必要从吉尔巴特先生的评论中进一步摘录下面一段话，借此来说明，根据这里正在考证的通货理论，英国银行的预付款在没有

增加流通量的情况下是怎样影响商品的价格的：

Again, suppose the circulation is at its proper amount, and the Bank should purchase a million of exchequer bills, the notes thus put in circulation not finding immediate employment might be returned to the Bank, and be lodged on deposit. *Here there would be no increase in the circulation, but an increase of a million in the deposits. A power of purchase to the extent of a million sterling* would have been created by the Bank, and the efforts of the depositors, to make the most advantageous investments, would have the effect of advancing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and of stimulating a spirit of speculation; and should the Bank consider this increase in the deposits a sufficient reason for adding another million to the circulation, this additional million might also come back, and be added to the deposits; *thus a power of purchase to the extent of two million* would be created, and a spirit of speculation would be still further promoted, without any addition in the monthly returns to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再次假设流通量处于正常水平，假设英格兰银行购买1,000,000英镑国库券，那么被投入流通中没有立即得到使用的银行券可能会因此而作为存款返回英格兰银行。这里流通量没有增长，但是存款量增加了1,000,000英镑。英格兰银行因此将创造出1,000,000英镑的购买力 ，同时储户努力进行最有利

的投资时，将会使商品价格上涨，并且刺激投机势头；如果英格兰银行认为存款的增加使其有充分理由再增加1,000,000英镑的流通量，那么再次增加的1,000,000英镑也有可能作为存款再回流到银行；这样 就创造了2,000,000英镑的购买力 ，并且将进一步刺激投机势头，而月统计表中流通量却不会有任何增加。”

This might be taken for a caricature of the notion of the power of purchase, which seemed to be so prevalent in the minds of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A *power of purchase* might thus doubtless be created; but why should it be directed to the purchase of commodities if there was nothing in the state of supply, relatively to the rate of consumption, to afford the prospect of gain on the necessary eventual resale? The truth is, that the power of purchase by persons having capital and credit is much beyond any thing that those who are unacquainted practically with speculative markets have any idea of. [15_1] The error is in supposing the *disposition* or *will* to be coextensive with the power. The limit to the motive for the exercise of the power is in the prospect of resale with a profit.

这个例子可以被看作是对购买力这一概念的歪曲，银行委员会的某些成员似乎对这种看法也深表认同。无疑，购买力 因而会被创造出来；但是如果相对于消费状况，供给状况并无任何转售盈利的迹象，那么这种购买力为什么非要用在购买商品上？事实上，拥有资本和信用的那些人的购买力绝不是那些实际上不熟悉投机市场的人们所能想象的。 [16_1] 错误就在于他们利用购买力的意向或者意志 与购买力同时扩张。而运用购买力的动机其实是受转售盈利前景的限制。

Mr. Bosanquet, in a tract entitled, “Metallic, Paper, and Credit Currency,” containing much valuable information and ingenious reasoning on those topics, whilst agreeing with me [15_2] as to the absence of any direct influence of the amount of the currency on price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fluence which he ascribes to the rate of interest on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At the time, however, when he wrote, which is more than two years ago (and the same remark applies to Mr. Gilbart), the rate of interest was not so low as it has since been, and it may perhaps be considered hardly fair to make use of recent experience in commenting upon opinions delivered under such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在名为《硬币、纸币和信用通货》的小册子中，博赞基特先生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并且对这些论题进行了独到的推理，他和我一样都认为通货的数量不会对物价产生直接影响 [16_2] ，但他认为利率却会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并且对这一影响非常重视。然而在他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也就是两年多以前（吉尔巴特先生的情况也一样），利率没有像现在这样低，因此用现在的经验来评论在当时那个与现在大相径庭的环境下发表的观点，或许很难说是公平的。

It is not, however, as judging by the event that I have to remark upon Mr. Gilbart's and Mr. Bosanquet's opinions on this point. My reason for referring to them is, that they state, in a manner more positive and detailed than I have met with in other writers, what they conceive to be the mode of operation of variations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on prices of commodities.

但是，我对吉尔巴特先生和博赞基特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的评论，并不是依据利率的这种变化所做的。我提到他们的观点，是因

为与我所见过的其他作家相比，他们更加肯定且详细地陈述了，在他们看来利率的变化是如何影响物价的。

Mr. Bosanquet observes (p. 73.):” Were the rate of interest reduced as low as 1 per cent, capital borrowed would be placed nearly on a par with capital possessed.”

博赞基特先生说（第73页）：“若利率降至1％，则借入资本就与自身拥有的资本几乎同价。”

That a capital borrowed at that, or even a lower. rate, should be considered nearly on a par with capital *possessed* , is a proposition so strange as hardly to warrant serious notice, were it not advanced by a writer so intelligent, and, on some points of the subject, so well informed. Has he overlooked the circumstance, or does he consider it of little consequence, that there must, by the supposition, be a condition of repayment? He goes on, however, to say:” The demand for issues of money” (loans of capital?), “or the means of procuring capital, would, in such cases, be limited merely by the amount of available security to be produced, and the effect would be, the rise in price of all those commodities which can in any way be turned to account so as to produce profit.”

认为以那么低或者更低的利率借入的资本几乎与自己拥有的 资本同价，这个观点很奇怪，如果不是出自一个如此智慧并且在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有着广博见识的作家，那么这个观点就几乎得不到重视。根据假设，必定是要存在偿还条件的，他是忽略了这一点，还是认为这一点并不重要？然而他接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货币发行的需

求”（资本借贷？），“或者获取资本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只会受到可提供的担保品的数量的限制，结果就是，通过任何方式能被用来获利的商品的价格都会上涨。”

There seems to be a strange misapprehension involved in this mode of accounting for the effect here ascribed to the low rate of interest. We must suppose that this reduced rate is general, but that good security is required; because, if credit is given indiscriminately, without reasonable security for repayment, there is no recklessness of adventure that would not be entered into. Suppose, then, that the reduced rate is general, and the loans for such length of time as to admit of being extensively acted upon by the different dealers in commodities. The effect would be precisely the reverse of that which the author would anticipate.

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低利率的效果，似乎存在着让人感到很奇怪的误解。我们必须假设这种利率降低是普遍的，而可信的担保品是必需的；因为如果随意地提供信贷而没有合理的偿还担保，那么人们就会肆意地进行投机活动。因此，假设利率普遍下降，贷款期限足够长，使不同商品的经营者受到广泛的影响。那么结果将和博赞基特先生所预期的截然相反。

A general reduction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is equivalent to or rather constitutes a diminution of the cost of production. This is more especially and very obviously a necessary effect where much fixed capital is employed, as in the case of manufactures, but it likewise operates in all cases where an outlay of capital is required,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of time ordinarily occupied in bringing the commodities, whether raw produce or finished goods, to market;

the diminished cost of production hence arising would, by the competition of the producers, inevitably cause a fall of prices of all the articles into the cost of which the interest of money entered as an ingredient. And the presumption accordingly is, that the very reduced rate of interest which has prevailed within the last two years must have operated as one of the contributing causes of the great reduction of prices of some of our most important manufactures which has occurred coincidently with reduction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利率的普遍降低等同于，或者说是造成了生产成本的降低。在大量运用固定资本的地方，这种必然的结果就尤为明显，制造业就是这样，并且在其他情况下，只要需要资本支出，只要花费一定时间商品就可以进入市场，不管这商品是原材料还是制成品，那么上述结果同样会出现；由此导致的低生产成本，再加上生产商之间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所有商品的价格下降，因为货币利息是商品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可以推测，过去两年一直很普遍的低利率一定是我们一些最重要的制造品大幅降价的原因之一，因为大幅降价恰好与利率降低同时发生。

It is probable, however, that Mr. Bosanquet, in his theory of high prices as a consequence of a low rate of interest, may b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ame opinion, as that of Mr. Gilbart and many others—that a facility of borrowing at a low rate of interest not only confers the power of purchasing, but affords the inducement—applies *the stimulus* to speculation in commodities. If by facility of borrowing he meant a laxity of regard to security for repayment on the part of the lender, there is every probability that money so borrowed will be hazardously, if not recklessly employed; and whether in the purchase of shares, or of foreign securities, or of

merchandize, or in any other mode of adventure or enterprise, or in mere personal expenditure, is a matter of chance, depending on the disposition and views of the borrower; such borrowers are not *stimulated* to purchase commodities speculatively, merely because they can borrow on low terms; they are but too happy if they can borrow at all. But to suppose that persons entitled to credit are likely to be induced—*stimulated* is the favourite term—by the mere circumstance of a low rate of interest to enter into speculations in commodities (using the term speculation in its obnoxious sense), argues a want of knowledge of the motives which lead to such speculations. These are seldom if ever entered into with borrowed capital, except with a view to so great an advance of price, and to be realized within so moderate a space of time, as to render the rate of interest or discount a matter of comparatively trifling consideration.

然而，博赞基特先生的低利率导致高物价的理论，或许就受了诸如吉尔巴特先生和很多其他人的观点的影响，他们认为，容易以低利率借款不仅可以创造购买力，还可以提供诱因，从而刺激 商品投机活动。如果在他看来，容易借款意味着放款人对偿还担保品不在意，那么很有可能对于这样借来的贷款，借款人即使不鲁莽地使用也会冒风险地去使用；是用来购买股票，购买外国债券，购买商品，还是用于任何其他投机事业，还是只是用来个人消费，这完全是偶然，取决于借款人的意向和见解；这些借款人不仅仅因为他们能够以低利率贷款就受到刺激 而去购买商品进行投机活动；他们只要能够借到款就高兴得不行了。但是如果认为仅仅通过低利率就能诱使（人们更喜欢用“刺激 ”一词）有资格贷款的人进行商品投机活动（投机一词在此用作贬义），那就证明对诱使人们进行投机活动的动机缺乏了解。用借入资本进行投机活动，这种情况很少，几乎从来没有过，除非认为价格会暴涨，并且在短时间内会实现利润，以至利率或贴现率可以忽略不计。

In truth,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speculations in commodities, whether as connected with bank notes, or with the rate of interest, or with expansions and contractions of the Currency, in whatever sense these terms are used, is greatly exaggerated. As long as vicissitudes of the seasons are among the ordinances of Providence, and as long as political and fiscal obstructions to the freedom of commercial intercourse are among the errors of legislation, aggravating all other causes of fluctuation, and among these the sliding-scale of our Corn Laws in a pre-eminent degree, there will, in any state of the Currency, be speculation, which, in its obnoxious sense, implies an exaggerated view of a deficiency of supply, and of the probable effect of it on prices.

事实上，商品投机活动的重要性，无论从与银行券、利率，还是与通货扩张和紧缩的关系来看（不管这些词语被用作什么意思）一般都被过分夸大了。只要季节的变化依然是上天注定的，只要立法中仍然错误地借助政治和财政手段限制贸易自由，从而使波动的成因更大，并使我国《谷物法》中的浮动税率变化最为剧烈，那么不管通货处于何种状态，都将出现投机活动。贬义的投机意味着人们夸大了供给不足以及供给不足可能对物价产生的影响。

Not only in the view which Mr. Bosanquet takes of the effect of variations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on prices, but in the influence which he ascribes to those variations on the state of trade and of credit, I differ from him most widely. Agreeing with him as I do in his argument against some of the prominent assumptions involved in the currency theory, nothing, in my opinion, can exceed the inconsistency of reasoning, and the unfounded supposition of facts,

upon which he grounds his belief (p. 108), that in the attempts on the part of the Bank to rectify the exchanges, a variation is sometimes effected in prices of from 25 to 50 per cent. He, in this instance, takes for gospel the assertion in the report of the Man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 published at the close of 1839, that the revulsion of credit and of prices in 1837 had entailed a diminution in the value of commodities to that extent. And with the framers of the report he ascribes that revulsion of credit and fall of prices to the measure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n discountenancing the paper of the American houses, and in raising the rate of discount.

博赞基特先生认为，利率的变化影响物价，同时也影响贸易和信用的状况，在这两点上我和他的观点迥异。尽管我和他都一致反对通货原理中的一些重要的假设，但是在我看来，最不能让我忍受的还是通货原理前后矛盾的推理和对于事实毫无根据的假定，而正是基于这些博赞基特先生认为（第108页）：英格兰银行调整汇率的尝试，有时会导致物价出现25％至50％的波动。在此例中，他把发表于1839年末的曼彻斯特商会报告的观点奉为圭臬，认为1837年信用和物价的突变导致商品价值出现25％至50％的下降。和报告的撰写人一样，他把信用的降低和物价的下跌归结于英格兰银行为提高贴现率，以及反对美国公司的票据而采取的举措。

As to the revulsion of credit, it was a necessary effect of the previous undue and extravagant extension of it. But what I have to remark upon is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raising of the Bank rate of discount, in 1836, to 4 per cent, and ultimately to 5 per cent, had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in depressing prices. Now if this advance in the Bank rate of discount were to be considered as the main cause, or even a materially contributing cause, of the fall in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at that time, how was it that an advance in the rate of discount by the Bank of England in 1839 to 6 per cent had not any such depressing effect? There was a great feeling of uneasiness, and even of alarm, through the summer and autumn of 1839, and yet not the slightest depressing effect from these combined circumstances was felt in the prices of produce. Circulars of brokers and merchants are usually published at the close of the past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ming year; and in some of those of the 1st of January, 1840, it was stated as a matter of wonder, that though the value of money (meaning the rate of interest) had advanced 50 per cent, that is, from 4 to 6 per cent, the markets for produce had been so well maintained. [15_3]

1837年信用降低是之前对信用过度扩张的必然结果。但是我必须要谈论一下这个假定，即1836年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提高至4%，最后又提高至5%，这对物价下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英格兰银行贴现率的上升被认为是当时引起商品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甚至是一个决定性原因，那么1839年英格兰银行贴现率虽然上升到了6%却没有压低物价，这又是为什么呢？1839年的整个夏秋两季都出现了极大的不安甚至是恐慌情绪，然而这一切丝毫没有产生压低产品价格的影响。股票经纪人和商人的通告一般都是在本年底或者下年初发布；1840年1月1日发布的一些通告内容惊人，尽管货币价值（即利率）上升了50%，从4%上升到6%，但是产品市场却一直保持平稳。[16_3]

There was, moreover,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of pressure on the money market (by which is meant an advanced and unusually high rate of interest), a remarkable absence of commercial failures of any magnitude; whereas the progressive fall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1840 to the close of 1842,

when it reached its lowest point, was accompanied by a marked fall in most of the leading articles of consumption (the greatest depression of prices coinciding with the lowest rate of interest, viz. 1.5 per cent), and by numerous failures, among which were mercantile and banking firms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A fall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between 1818 and the close of 1822, was accompanied by a still greater fall in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and instances without end could be multiplied to the same effect. It is not easy, indeed, to imagine evidence of facts more decisive, than those which can be adduced of the negative of the direct influence ascribed to a low rate of interest in raising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and *vice versa* . The theory is not only not true, but the reverse of the truth.

此外，在货币市场受压（也就是利率上升并保持高水平）的整个期间，显然没有出现各种程度的商业破产情形；然而从1840年初利率连续不断下降，直至1842年末降至最低，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主要消费品价格却都明显下跌（物价下跌最严重的时候正是利率降至最低点1.5%的时候），并且很多公司破产，其中还包括非常重要的商业公司和银行。从1818年到1822年末期间利率下降，同时商品价格也出现了更严重的下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事实上，列举的这些事实最有力地否定了低利率直接造成商品价格上涨，而高利率直接导致价格下跌这一理论。这个理论不仅错误，而且与事实恰恰相反。

The rise of prices in 1835-6 was mainly the consequence of an extraordinary demand, arising from a spirit of speculation which had its origin in America, and to which an infatuated confidence of the houses here in that trade, ministered by unbounded credits. A collapse of credit, as the ultimate result of such a previous inflation of it, is so obviously an inevitable necessity, as to supersede any call

for explanation.

1835年至1836年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由于需求过大造成的，这种需求是由源于美国的投机热引发的，我国的一些商行又依靠不受限制的信贷痴迷于这种投机活动。先前的信用膨胀，其最终结果必定是不可避免的信用崩溃，对这一点不需要作任何解释。

But, in truth, both the currency theory, and the money market theory, that is, on the one hand, the theory which connects prices with bank not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theory which connects them with the rate of interest, are equally in error.

但是，事实上，通货原理（联系物价和银行券的理论）和货币市场原理（联系物价和利率的理论）都是错误的。

The phenomena of the great fluctuations of prices which they attempt, in the face of all facts and of all correct reasoning, to account for by the supposed influence of bank notes, or of the rate of interest, are those of credit, too easily and extensively given in the first instance, and withdrawn of necessity in the end with more or less violence,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greater or less undue extension. The alternations of excessive extension of credi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aggerated opinion, with the subsequent more or less violent contraction, are, by the convenient ambiguity and laxity of the phraseology which is in use in discussions on this subject, more, perhaps, than on any other, termed *expansions and contractions of the currency or of the circulation.*

这两种理论不顾所有事实和所有正确的推论，试图用它们所假定的银行券或者利率的影响解释物价大幅波动的现象，而事实上物价的波动是信用波动引起的，信用开始是过度扩张，最终又必然收缩，收缩带来的损害取决于之前过度扩张的程度。比起讨论其他问题，人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为了方便或许毫不在意地使用了模糊的词语，把信用的交替变化（信用在过于乐观的看法影响下过度扩张，随后又猛烈收缩）称为通货或者流通的扩张和收缩 。

Nothing, indeed, can be more convenient in argument than this ambiguous phraseology as a ground, whether of attack or defence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or of the country banks, or of the present system of banking generally (with a view to the substitution of some other system), in order to prove, according to the sense in which the term currency is used, that the mismanagement of one or other of these is the cause of all the mischief of which the public thinks itself entitled to complain.

实际上，在论证中没有什么比使用这种模糊的词语更便利的了，不管是抨击英格兰银行和地方银行的管理或现行的银行体制（目的是用某一种其他体制来代替），还是为它们辩护，如果在这个意义上使用通货一词，都可以证明，正是它们的管理不当造成了公众有权抱怨的所有祸患。

There is one further remark before dismissing the question of the connection of the currency with prices which it occurs to me to make, and that is, that with the same laxity of language as is observable in all discussions on this topic, the term price is often applied indiscriminately to commodities and to securities. Now it must be quite obvious, that these two descriptions of objects of

purchase are acted upon by a low rate of interest in an exactly opposite direction. A low rate of interest is almost synonymous with a high price of securities; while, as I have shown, its necessary tendency is to reduce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by diminishing the cost of production. And in point of fact, the phenomena of the last three years have exhibited a rise in the prices of the public funds, and of shares and of securities generally, and a fall in the markets for commodities.

在停止讨论关于通货与物价的关系这一问题之前，我还想说，与探讨这个话题时人们明显毫不拘谨地使用语言一样，价格这个词也经常被不加区别地用在商品和证券上。现在很显然，这两种购买品受到的低利率的影响，方向恰恰相反。低利率几乎就是高价证券的同义词；而就像我之前表述的，低利率必然会降低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商品价格。事实上，过去三年的种种现象已经表明，公共基金、股票和证券的价格普遍上涨，而商品价格则在下跌。

[15_1].See Appendix (B.).

[15_2]."I perfectly agree with Mr. Tooke that, whatever may be the increase or diminution in the amount of money, bills of exchange, or deposits, *as long as the increase or diminution shall have taken place strictly according to the wants of the community*, variation in quantity is in no way chargeable with variation in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Prices may rise beyond their just level (inevitably to fall again from want of demand), and the currency may increase in quantity in proportion; or prices may he depressed from the state of markets at home or abroad below their ordinary level, trade may become stagnant, goods may want purchasers (inevitably to rise again from increase of demand), and the quantity of currency may decrease in proportion; but the amount of currency will neither be the cause of the state of prices, nor will it in any way affect the value of money." If, instead of the lines which I have marked with italics, be introduced the clause as long as the paper is convertible, I perfectly assent to that exposition of my views.

[15_3].Appendix (C.).

[16_1].见附录（B.）。

[16_2].“我完全赞同图克先生的观点：不管货币、汇票或存款的增量或减量是多少，只要其增减与社会需求完全相符　，其数量的变动绝对不会导致商品价格的波动。价格可能会超过正常的水平（不可避免地会因需求减少而降低价格），而且通货的数量可能成比增涨；或者国内外市场状况可能会将价格压低至正常水平之下，贸易可能不景气，货物缺乏销路（不可避免会因需求增大而抬升物价），而且通货的数量可能成比减少；但是通货的数量既不会对价格的状态造成影响，也不会影响货币的价值。”如果去掉我用着重号标示的文字，而使用纸币是可以兑换的这一条件，我则完全同意对我观点的这种阐述了。

[16_3].见附录（C.）。

Chapter 14　Distinction Between Issuing and Non-issuing Banks

第十四章　发钞行和非发钞行的区别

We have thus seen, that neither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bank notes) nor the rate of interest or discount, to the extent to which it has hitherto varied, can be considered as exercising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but that the greater part, if not the whole of the fluctuations of prices which are over and above those that are necessarily incidental to the nature of the commodities,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of credi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opinion of dealers or speculators, more or less exaggerated, of the prospect of markets.

因此我们看到，不管是银行券的发行量，还是利率或者贴现率，从它们迄今为止的变化程度讲，都没有对商品价格产生直接影响。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的特性所带来的必然波动除外），即便不是全部，也大部分归因于信用的扩张或收缩。信用的扩张或收缩受到商人或投机者对于市场前景的看法的影响，而这些人的看法多多少少是有些夸大的。

Credit, in its most simple expression, is the confidence which, well or ill-founded, leads a person to entrust another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capital, in money, or in goods computed at a value in money agreed upon, and in each case payable at the expiration of a fixed term. In the case where the capital is lent in money, that is, whether in bank notes, or in a cash credit, or in an order upon a correspondent, an addition for the use of the capital of so much

upon every 100*l.* is made to the amount to be repaid. In the case of goods the value of which is agreed in terms of money, constituting a sale, the sum stipulated to be repaid includes a consideration for the use of the capital and for the risk, till the expiration of the period fixed for payment. Written obligations of payment at fixed dates mostly accompany these credits, and the obligations or promissory notes after date being transferable, form the means by which the lenders, if they have occasion for the use of their capital, in the shape whether of money or goods,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term of the bills they hold, are mostly enabled to borrow or to buy on lower terms, by having their own credit strengthened by the names on the bills in addition to their own. A great proportion of the vast transactions of the country among wholesale dealers are carried on by credit, simple and direct for the most part in its origin, however ramified and complicated in some of its subsequent processes.

信用，最简单地讲，就是一种信任；不管根据充分与否，这种信任都会使一个人以货币或者商品（其价值按双方商定的货币价值计算）形式将一定量的资本委托给另一个人，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在规定期限届满时偿还。在以货币形式借出资本的情况下，不管货币是银行券、现金信贷还是代理银行汇票，都要在应偿还数额的基础上附加使用资本应付的利息（按照每100英镑计算）。在以商品形式（商品的价值以商定好的货币价值计算，就是出售这种商品）借出资本的情况下，规定的偿还款项包括在规定期限届满前使用资本和借出资本所冒风险的双项报酬。这些信用大部分都附有规定期还款的书面契约，这种契约或者本票到期后可以转让，因此，如果出借方在他们持有的期票到期前使用资本（不管是以货币形式还是商品形式），那么他们就大都可以通过背书转让的方式加强自己的信用，从而以更低的条件借入资本或者购买商品。我国批发商之间的大部分大宗批发交易都是通过信用进行的。信用起初简便直接，然而后来就变得错综复杂

起来。

It is quite clear that credit as between dealers and dealers (including in this term, merchants, manufacturers, and farmers), however liable to occasional abuse, does not admit of being regulated by any legislative interference. But it is charged against our banking system, on its present footing, that it is, if not an originating, a very powerfully aggravating cause of the violent variations of credit to which the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is occasionally exposed. And to some extent the charge must be admitte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banks, whether private or joint stock, may, if imprudently conducted, minister to an undue extension of credit for the purpose of speculations, whether in commodities, or in over-trading in exports or imports, or in building or in mining operations, and that they have so ministered not unfrequently, and in some cases to an extent ruinous to themselves, and without ultimate benefit to the parties to whose views their resources were made subservient, is unfortunately but too true.

非常明显，商人（包括批发商、制造商和农场主）之间的信用，不管偶尔滥用的现象多容易发生，也不可能通过立法干预进行管理。然而对于我国现行的银行体制，人们却指责说，它纵使没有引发，也大大加重了我国商业时常遭受的信用的急剧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接受这种指责。毫无疑问，银行，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合股的，如果管理不当，就可能出现信用过度扩张，以助长各种投机活动发生，比如商品投机、进出口贸易投机、建筑业投机或者矿业投机等等。这些情况并非偶尔发生，在某些情况下其破坏性会招致银行破产。而本来想利用银行资产进行有益投机活动的各方最终均未获利。这种情况是不幸的，却是非常真实的。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opinion founded on the prevalence of the theory of the currency principle, it is to banks of issue mainly, if not exclusively, that the charge here stated is made to apply. And the House of Commons appears to have been under a full persuasion to this effect, when it appointed a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the subject of banking, having named for its object Banks of Issue. The question which I now therefore propose to examine, is to what extent this opinion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well founded.

根据通货原理的一般观点，这里所说的指责主要针对发钞银行。下议院似乎完全信服这种观点，当它委派调查委员会去对银行问题进行调查时，竟然把发钞银行指定为调查对象。因此，我现在提出要探讨的问题是，这个观点的可信度有多高。

It is, I conceive, impossible, upon a view of the evidence before the committee in 1841, on the part of the country banks, of which I have given extracts, to resist the force of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mount of notes which can circulate in a given district is strictly determined and limited by the wants of the neighbourhood, so that it is not in the power of any one or more of the banks, or of all of them together, to add to the total amount of notes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within that district; nor, unless by substituting Bank of England notes or coin, *directly* [16_1] to diminish the amount of local notes. If this be true, and that it is so rests, as it seems to me, upon facts and reasoning so clear as not to leave room for the shadow of a doubt, what becomes of the distinction set up by the currency theory, between issuing and non-issuing banks in the power of the former as compared with the latter, to influence and disturb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前文我已经摘录了1841年提交给发钞银行委员会的关于地方银行问题的证词，根据证词中的观点我认为是不可能否定这个结论的，即某一地区的银行券的流通量是严格取决于并受限于该地区的需求的，因此并不是依靠某一家或者更多家或者全部银行的力量就能增加这一地区公众手中的银行券的总量；除非用英格兰银行券或者硬币来代替地方银行券，否则也不可能依靠某一家或者更多家或者全部银行的力量就能直接 [17_1] 减少地方银行券的数量。如果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就像我认为的那样，这一结论是建立在清晰的不容置疑的事实和推理基础上的，那么通货理论对发钞银行和非发钞银行进行的区分，即认为发钞银行有能力去影响和干预流通数量，而非发钞银行没有这种能力，又怎么解释呢？

The following passages in Mr. Norman's letter to Mr. C. Wood present an elaborate view of the supposed difference of the inducement and power of banks in a purely metallic circulation (being the same as non-issuing banks) to make advances, and thereby influence prices, as compared with banks that have the power of creating, as it is termed, paper money in aid of their other business.

下文选自诺曼先生写给C. 伍德先生的书信，文中详尽阐述了他所认为的下面两种银行的区别，即：一种银行（相当于非发钞银行）在只有金属币流通的情况下有动因和能力提供贷款，从而影响物价，而与之相比，另一种银行有能力进行所谓的创造，即创造纸币以帮助它的其他业务。

> It is plain that it *would never be the interest of anybody to issue metallic money in excess,* because the coin can never exchange for a greater amount

of commodities than the metal of which it is formed has cost, plus the seignorage, if a seignorage be taken, *it yields therefore, in ordinary circumstances, no profit* . With bank notes the case is widely different; they yield a very considerable profit, and it is the interest of their issuers *to keep in circulation as large an amount as possible* . Hence one source of the danger of *an over-issue* . Another is found in the bodies from which they emanate. In this country the banks of England and Ireland, joint stock and private banks, are not merely *creators* , but also bankers in the proper sense of the term, *dealers in money* , and in this capacity they are exposed to a strong *temptation* to avail themselves of their privilege as issuers in aid of the other branch of their business. When the prices of goods rise, or when there is a struggle in progress against an impending fall of prices, the customers of a banker usually call upon him for increased assistance which it is difficult for him to refuse, while if at the same time interest rises the prospect of enlarging his profit is an additional inducement for him to enlarge his advances, *and to aid his banking resources by an augmentation of his circulatio* n. Now a rise in prices frequently precedes an unfavourable state of the exchanges, and a struggle against a fall of prices and an advance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are its ordinary concomitants. Thus we see that the first stages of an export of treasure are generally characterised by circumstances which tend to cause an augmentation of bank notes, while with a metallic currency they would necessarily be

accompanied by a reduction in the circulation, as in that case all the coin exported would be taken from it. It appears, then, that with a mixed currency, like that which exists in this country, the tendency of things when the exchanges are unfavourable, is exactly contrary to what would occur had we only coin. During a favourable exchange it is equally so. Further, with a metallic currency *the gold imported would be added to the circulation,* while at present in such a state of things prices fall, and the rate of interest being usually low, loans are redeemed, advances are paid off, and the paper circulation is thus kept down. The experience of the last few years furnishes us abundance of facts confirmatory of this theoretic view of the subject. [16_2]

“显然，过度发行金属货币绝对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利益，因为硬币能交换到的商品的数量绝不会比铸造硬币所耗费的金属加铸币税的总和更多，因而如果取消铸币税，那么通常情况下硬币是不会盈利的。换作银行券，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银行券可以产生相当可观的利润，因此银行券发行者的利益就在于保持尽可能大的流通量。所以银行券就成为了超发的一个危险源。另一个危险源就是银行券发行机构。在我国，英格兰银行和爱尔兰的银行，不论是合股的还是私人的，都不仅是货币的创造者，恰当地讲还是银行家和货币兑换商。身处这样的位置，他们面对着强大的诱惑去利用自己作为货币发行者所拥有的特权，来帮助自己的其他业务。当物价上涨时，或者当银行努力防止物价下跌时，银行家的客户们通常就会要求他增加援助，而对于这一点银行家很难拒绝。如

果同时利率上升，那么利润增加的前景会进一步诱惑他去扩大放款，并且通过增加发行量来扩充银行资金。因此物价的上涨经常是先于不利的兑换率状况之前发生，并且通常与这种不利状况伴随的是努力防止物价下跌和利率上升。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在金银输出的开始阶段通常会伴随着银行券的增加，而在只流通金属货币的情况下，金银输出则必然会伴随货币流通量的减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输出的硬币都来自于流通货币。那么在我国目前这样流通金属币和纸币两种货币的情况下，汇率不利时的趋势与只流通硬币时恰好相反。在汇率有利时期也同样如此。并且，若只流通金属货币，输入的黄金就会增加流通量，同时在目前这种状态下，物价会下跌，利率通常会较低，贷款得到偿还，预付款被还清，纸币流通额就会下降。近几年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事实，证实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观点是正确的。” [17_2]

The passages in this extract marked with italics appear to me to involve ambiguity of meaning in the terms and fallacy in the reasoning. The proposition involved in the very first sentence is untenable. It undoubtedly might be occasionally the interest, real or fancied, of bankers dealing only in metallic money, to issue it in excess. Supposing all the deposits received by a banker to be in coin, might it not be his business then, as now, in consideration of his care and trouble in keeping the cash and answering the depositors' drafts, to employ so much of the deposits as by experience he computes may not be immediately wanted by the depositors, in loans and discounts. How then can it be said that the issue of metallic money in ordinary circumstances yields no profit? And can it with truth be maintained that he cannot issue it in excess? Is he not, just as much as the issuing banker, exposed to the

importunity of customers, whom it may be impolitic to refuse, for loans or discounts, or to be tempted by a high interest? And may he not be induced to encroach so much upon his deposits, as to leave him, under not improbable circumstances, unable to meet the demands of his depositors? Would not this be issuing metallic money in excess? In what respect, indeed, would the case of a banker in a perfectly metallic circulation differ from that of a London banker at the present day? He is not a creator of money, he cannot avail himself of his privilege as an issuer in aid of his other business, and yet there have been lamentable instances of London bankers issuing money in excess.

在这个摘录段落里，加着重号的语句在我看来都包含有术语意思模糊和推理荒谬的错误。第一句中的命题就站不住脚。毫无疑问，对于只经营金属货币交易的银行家们，过度发行金属货币有时会给他们带来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真实还是假想的。假设一个银行家收到的所有存款都是硬币，他也要像现在一样不辞辛苦地去保存现金和兑现储户的汇票，考虑到这些，他难道不会把根据经验得知的储户不会立即需要的那部分存款用于放款和贴现吗？那么怎么可以说通常情况下发行金属货币不会产生利润呢？又怎么能确定地认为他不会过度发行金属货币呢？像发钞银行家一样，他怎么可能不受到客户的强求，强求之下怎么会拒绝放款或者贴现，又怎么可能不受到高利率的诱惑呢？在可能的情况下，他难道不会受到诱惑去大量占用他掌握的存款，以至于无法满足储户的提款要求吗？这难道不是超发金属货币吗？只流通金属货币情况下的银行家，到底在哪方面与目前伦敦的银行家不同？他不是货币的创造者，不能利用自己货币发行者的特权来帮助自己的其他业务，然而伦敦银行家超发货币这样的可悲例子确有发生。

But, says the theory, it is the interest of issuers of notes to keep

in circulation as large an amount as possible; granted: but have they the power as well as the inclination to add to the amount of their notes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t any given time, and thus “to aid their banking resources by an augmentation of their circulation?” The supposition of their having the power, implies, as I have before observed, a lurking impression of similarity in the issue between a convertible and an inconvertible paper. The issuer of inconvertible paper has the power up to the limit of utter worthlessness; while there are, as has been incontrovertibly shown, narrow and impassable limits, totally independent of the foreign exchanges, to the power of issue of a strictly convertible paper. Admitting, although with qualification, as matters of fact “that a rise in prices frequently precedes an unfavourable state of the exchanges, and that a struggle against a fall of prices and an advance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are its ordinary concomitants, and that the first stages of an export of treasure are generally characterised by circumstances which tend to cause an augmentation of bank notes.” I am not only not prepared to admit " that with a metallic currency they would necessarily be accompanied by a reduction in the circulation, as in that case all the coin exported would be taken from it;” but I have no hesitation in stating it as my opinion, that in the early stages of a rise of prices, and for a limited time there would, with a metallic currency, be an increase in the circulation of coin notwithstanding an incipient export of bullion; [16_3] such export of bullion not being necessarily or probably “so much coin taken from it;” nor during a favourable exchange “with a metallic currency would the gold imported be added to the circulation” any more than it is now. And I utterly deny that “the experience of the last few years furnishes abundance of facts *confirmatory* of the theoretic view of the subject as set forth in the foregoing extracts.” I admit some of the facts, but no part of the hypothetical contrast, upon which the theory is founded.

然而，通货原理认为，银行券发行者的利益就在于保持尽可能大的流通量；不过就算是这样，他们能否有能力和意愿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去增加公众手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从而“通过增加发行量来扩充他们的银行资金”呢？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假设银行券发行者有这样的能力就意味着，无形中认为可兑换纸币的发行和不可兑换纸币的发行没有什么区别。不可兑换的纸币的发行者拥有的权利，最高限度是使纸币完全丧失价值；而对于严格可兑换的纸币，就像无可争辩的结论显示的那样，其发行权的行使限度是狭窄的、不可逾越的、完全不受外汇影响的。我承认（尽管这种承认是有条件的），事实上“物价的上涨经常是先于不利的兑换利率状况之前发生，并且经常伴随发生的是努力防止物价下跌和利率上升，同时在金银输出的开始阶段一般都会引起银行券增加”。但是，我不仅不会承认“在只流通金属货币的情况下，金银输出则必然会伴随着货币流通量的减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输出的硬币都来自于流通货币”，而且还坚定地认为：在只流通金属货币的情况下，在物价上涨的初期，硬币流通量会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不会受到已经开始的金块输出的影响； [17_3] 这样的金块输出不一定也不可能“都来自于流通中的硬币”；即使在“只流通金属货币的情况下”，在汇率有利时期，“输入的金块”也不会比现在更多地“增加流通量”。我也完全不认同，“近几年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事实，证实了前面摘录中所提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观点是正确的”。我对某些事实是认可的，但是对于那种假设的差异一点也不认可，而这种差异恰恰就是诺曼理论的基础。我完全不认同，“近几年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事实，证实了 前面摘录中所提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观点是正确的”。我对某些事实认可，但是对于那种假设的差异我一点也不认可，而这种差异恰恰就是诺曼理论的基础。

In corroboration of my views on this point I avail myself of the authority of a very accomplished writer, who unites with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a banker a rare power of philosophical and scientific exposition: I mean the author of an Essay on Value, On

the Formation of Opinions, &c. In a tract entitled “A Defence of Joint Stock Banks and Country Issues,” he observes (p. 85.):—

为了证实我在这点上的观点，我要借用一位颇有造诣的作家的权威，他集银行家的实际经验和罕见的哲学和科学阐述能力于一身，我说的就是《论价值及舆论的形成》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的作者。在一本名为《为合股银行和地方发行辩护》的小册子中（第85页）他说道：

> If the country banks have erred at all, it has not been in their conduct as banks of issue, but in their conduct as banks for discounts and loans; a matter altogether different and distinct, with which the legislature has no more to do than with rash speculations in corn or cotton, or improvident shipments to China or Australia.

> “如果地方银行真的犯了错，不会是错在作为发钞银行而行使的职权上，而是错在作为贴现或者放款行行使的职权上；两者完全不同，立法机构与之毫无关系，就像立法机构与不顾后果的谷物和棉花投机活动，或者毫无远见地向中国或澳大利亚输送货物的行为毫不相关一样。

> These two things are often confounded, and many of the evils which have been attributed to mismanagement of the circulation, to improper and excessive expansions and contractions, have in

reality proceeded from improper discounts and loans,—transactions which would take place under any system whatever, and the evils of which can be remedied only by a progress in intelligence. On this distinction, indeed, being properly understood and kept in view, will depend, in a great measure, the wisdom of any decision which may be come to relative to the great question of a single Bank, or a multiplicity of Banks of issue.

“这两件事经常被混为一谈，许多祸患被认为是由发行的管理不善、不当和过度的扩张和收缩引起的，但事实上它们却是源于不论在任何银行制度下都会发生的不当的贴现和放款，这些祸患只有通过智慧的进步才能消除。在与一家发钞银行或者多家发钞银行相关的重大问题上，能否做出明智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取决于是否能够正确理解并且牢记这一区别。

No one would be mad enough to attempt to interfere in any way with the management of establishments for borrowing and lending money, and yet it is not too much to say, that in that character banks are of far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community than the other; that they produce far more extensive consequences by the regulation of their loans than they can produce by any fluctuations which they have the power of effecting as banks of issue, so long as their paper is convertible. Whatever arrangements consequently

are adopted in regard to the currency, the principal sources of good and evil in the system of banking will continue.

“没有哪个人会疯狂到企图以任何方式去干预银行管理借款和放款，然而要说在借款和放款这方面银行的角色比其他机构重要得多，一点也不过分；而且还可以说，只要它们的纸币是可兑换的，它们通过管理贷款产生的影响要比它们作为发钞银行通过自身能力造成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广泛得多。因此不管对通货采取何种安排，银行制度中为之带来利与害的主要根源仍将继续存在。

Supposing country issues to be suppressed, and no paper but that of one single issuer to be allowed, the banks would still be at liberty to make any loans they might think proper. All the effects, whether good or bad, produced on the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by banking institutions would remain, except those which are specifically occasioned by local paper. Banks properly conducted would then be of the highest service to commerce as they are now, while banks improperly conducted, making immoderate and unwarrantable advances for improvident undertakings, and risking their money on hazardous or worthless securities, would bring great evils both on themselves and on the community, just like any other mercantile establishments in the hands of bad managers.

“假设地方银行被禁止发行纸币，只允许一家银行发行纸币，地方银行还是可以自由地发放它们认为合适的贷款。除了完全由地方纸币造成的那些影响外，银行体系带给地方商业的所有影响，不管好坏，都将继续存在。管理得当的银行会像现在一样对商业发展贡献卓著，而管理不当的银行会过度地不正当地放贷给毫无远见的企业，会购买有风险的或毫无价值的证券，正如掌控在糟糕的管理者手中的任何其他商业机构那样，这些行为会给自己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It is necessary, therefore, in order to arrive at sound conclusions on the questions before us, not to mix up the benefits and evils of the trade of borrowing and lending capital, with the specific effects of issuing promissory notes.

“因此，为了对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得出合理的结论，我们有必要把借入资本和贷出资本带来的利害和发行期票产生的影响区分开来。

If we would form a proper judgment of the competency of any banks of issue whatever, to perform their functions, we must endeavour to attain definite views of the peculia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at sort of currency which they circulate.

“如果我们想对任何一家发行银行的职责履行能力形成正确的评判，我们都必须尽力去确切地了解这些银行发行的通货所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劣势。

What then are the specific effects of a paper currency? What are the resulting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o the community, and what are the institutions best adapted to secure and properly distribute the one, and to avoid the other?

“那么纸币通货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对社会又有怎样的好处和坏处呢？什么制度能够最好地稳固并合理扩散这种好处同时避免那种坏处呢？

A few brief hints in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are all that can be here offered to the reader.

“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这里将为读者做一些简要的提示。

Everyone must see on reflection that there are two advantages resulting from what may be termed a credit-note currency such as ours the convenience arising from its form and the saving of capital.

“经过反复考虑，每个人都会发现，所谓的信用

证通货有两点好处，即形式便利，节省资本。

The former advantage would be as effectually attained if every note were the representative of an actual quantity of gold in deposit; or, in other words, if notes were not issued to a greater amount than the coin or bullion lodged in the bank which issued them. For the sake of distinctness in the present discussion, let these be called bullion-notes.

“如果每张票据都代表着一份黄金的真正存储量，或者换句话说，如果票据的发行量不超过其发行银行中存储的硬币或黄金储备，那么前一个优势就会有效地实现。为了将现在的讨论与其他的区别开来，我们姑且将这些票据称为金块票据。

The latter advantage, viz, the saving of capital, depends on notes being issued to a greater amount than the bullion held in deposit, and it is important to remark that it is the *sole peculiar advantage* necessarily attending such a currency.

“后一种优势，也就是节省资本，取决于正在发行的多于金块存储量的票据，能意识到这种通货所必然具有的独特优势 很重要。”

And yet seeing so clearly as he does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business of loans and discounts and that of issue in the case of the country bankers, he seems to lose sight of the distinction when he refers to the effects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He says, p. 62, when comparing the character and position of the Bank of England with country banks, “The former, in order to put out an additional amount of paper, has merely to purchase securities to that amount, while the latter have no direct means whatever of effecting an expansion.” Now I have shown, as I trust satisfactorily, that the Bank of England has no more direct power in this respect than the country banks.

尽管他清楚地看到了地方银行的放款和贴现业务与发行业务的区别，但是当他谈及英格兰银行管理的影响时，似乎忽略了这个区别。他在比较英格兰银行和地方银行的特性和地位时说（第62页）：“前者为了多发行一定量的纸币只需购买等量的证券，而后者却没有任何直接方法来扩大发行。”我相信我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在这一方面英格兰银行并没有比地方银行更直接的权力扩大发行额。

The only plausible argument that I have met with for a distinction between issuing and non-issuing banks, in their tendency to issue money in excess (meaning, if translated into correct language, “to make advances of capital in excess”), is, that in the competition, either of new Banks of Issue, to get a portion of the existing circulation, or of established banks to get an increased share at the expense of neighbouring banks, they are induced, with a view of getting out their notes, to make advances to an undue extent and upon insufficient securities. This, I think, may be admitted as true to some extent; and to this extent there may be sufficient ground for making whatever regulations should be thought advisable to guard against malversation of banks generally,

more stringent as against Banks of Issue. But the distinction, to the extent which I have here admitted, does not affect the question of the currency principle.

在过度超发货币（正确的表达就是“过度预付资本”）的趋势方面，认为发钞银行和非发钞银行存在差异的观点中，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还合理一点的观点就是，新发钞行想获得现有流通额的一部分，老发钞银想牺牲临近发钞行的份额来增加自己的份额，在竞争中，它们为了发行自己的银行券，都会在担保不足的情况下预先过度放款。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被认作是事实；在这个程度上或许有充足的理由来制定各种规章制度防止银行的贪污腐败，特别是严格抵制发钞银行的贪污腐败。在这一程度上我所承认的区别并不会影响通货原理这一问题。

According to that principle, Banks of Issue have the power of issuing paper money ad libitum up to the check of convertibility, in giving accommodation to their customers, beyond the ordinary resources of their banking business.

根据通货原理，发钞行可以在保证自由兑换的限度内随意发行纸币，也就是超过银行业务正常财力向客户放贷。

Now, so far from this being the case, namely, that the power of issue has come in aid of their resources, the truth is, that in all the flagrant cases of mismanagement of banks, the resources of the business, that is, the deposits and the capital of the shareholders or partners, have been brought in aid of the efforts to get a share of the existing circulation, not to add to it, for that was impossible.

But it is doubtful, to say the least of it, whether, in point of fact, the more striking instances of excessive advances were in any degree owing to their being the means of getting into circulation an additional amount of notes.

情况非但不是发钞行利用了发行权来增加其财力，事实上恰好相反，在其所有管理不善的恶劣案例中，发钞行都是利用业务资金，即存款和股东或合伙人的资本，来努力占有现有流通额的一部分，而不是增加现有流通额，因为那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说，事实上，那些过度放款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否完全归因于银行能够向流通领域增加一定量的银行券，这一点让人怀疑。

In the case of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Bank, which was a striking instance of a recklessly managed establishment, their liabilities were said to exceed 1,600,000*l.* , while their circulation was somewhat under 300,000*l.*. Now the presumption is, that although their advances were beyond all doubt in great excess, their issues, meaning their notes which remained out, were not excessive; that is, did not exceed the necessities of the circulation; or, in other words, the amount that would have been in circulation, if, for instance, Bank of England notes only had circulated there. A strong ground for presumption to this effect is, that the whole amount of the notes of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Bank, when withdrawn by their discredit, appear to have been replaced by an equal amount of Bank of England notes. It was on the 1st of December, 1836, that the Bank of England came to a determination to assist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Bank, and a part of the arrangement was to take up the circulation of the latter. Now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ank of England stood thus:

北部和中部银行是管理不善的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据说这个银行的债务超过了160万英镑，然而其发行量却不足30万英镑。那么可以推断，尽管其放款毫无疑问过度了，但是，其发行额，即其流通中的银行券，却没有过度；就是说，其发行额没有超过流通的需求量；或者换句话说，没有超过假如在那里只流通英格兰银行券而可能出现的流通额。对于这个推论的有力证据就是，北部和中部银行的全部银行券，在失去信用被收回后，好像被等量的英格兰银行券取代了。在1836年12月1日英格兰银行决定帮助北部和中部银行，其中一部分安排计划就是取代后者的银行券。英格兰银行的发行量如下：

And I would ask whether presumptive proof can be stronger than that this excess of the country issue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at the precise time of its intervention for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Bank, was a necessary substitute for the withdrawn notes of the latter?

我想问的是，就在英格兰银行干预北部和中部银行的时候，英格兰银行的地方发行量增加了，这是否再充分不过地证明了，必定是英格兰银行增发的银行券取代了北部和中部银行被收回的银行券？

There is, moreover, this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arising out of the view here presented, and that is, that whereas the propounders of the currency theory have stated it as an anomaly of the existing system, that the country circulation has occasionally been extended (and this has been particularly remarked by them in regard to the very time here mentioned) when the Bank of England has contracted its circulation, and so far counteracted the effort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to redress the exchanges; here was an increase of the *country issue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not distinguished as such in the Gazette returns) of 340,000*l.* , while the London circulation was reduced by upwards of 500,000*l.* !

此外，这里我所提出的观点引发了如下很重要的思考，即，当英格兰银行缩减其货币发行量时，地方发行量有时却扩大（他们特别谈到了这里所提到的那一时期的情况），这样就抵消了英格兰银行为调整汇率所做的努力，通货理论的支持者把这看作是现有制度的一种反常现象；上述表格显示，英格兰银行的地方发行量 （政府公报中没有进行这样区分）增加了340,000英镑，而伦敦的流通量却减少了超过500,000英镑！

It is not, therefore, the *issues* (notes) of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Bank that were in excess, but their *advances* that were greatly so. And this, I have no doubt, would be found to be the case, if inquired into, of every issuing bank that has failed. If the issues (notes) of a Bank, however small the amount, prove to be beyond the power of the issuers to pay on demand, they are virtually in excess as soon as, on being tested by that criterion, they are found to fail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dition on which they were issued, and which gave them their value. But as long as they

continue in credit, however undeserved, and in circulation, under the impression of their being strictly convertible, the amount cannot be excessive. The *quality* may, unsuspected by the holders, be bad, when the *quantity* may not be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answer the purposes of convenience for which alone there is a call for any circulation or currency whatever.

因此，并不是北部和中部银行的银行券发行 过度了，而是其放款严重过度了。如果调查的话，我确信每一家破产的发钞行都会是这种情况。如果一个银行的银行券发行量，不管有多么小，证明超过了其作为发行人的见票即付的能力，那么根据这一标准检验，只要发现这些银行券无法履行它们所依据的并且赋予它们价值的发行条件，它们实际上就是过度发行。然而，只要它们继续保有信用（不管多么不该保有），继续流通，给人以可以严格兑换的印象，它们的数量就不会过度。它们的质量 （尽管持有者并没有怀疑）或许很差，但它们的数量 或许并未超过满足便利需要的数量，而人们只是为了便利才需要纸币或者通货。

In treating of Banks of Issue, as contradistinguished from non-issuing Banks, it is material to bear in mind a distinction between Joint-Stock and Private Banks of Issue, which is, that in the case of Joint-Stock Banks there has not, to the best of my recollection, been a single instance of a failure of any importance which has extended to the non-payment of the notes in circulation.

与非发钞行相比，探讨发钞银行时，关键要记住合股银行和私人发钞行的区别，那就是，在我记忆中，还没有哪家重要的合股银行经营到无力兑付其发行的银行券而破产的地步。

My impression is, that in most, if not in all instances, the notes of Joint-Stock Banks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have been paid without delay, and at all events that they have been ultimately discharged. Delay or hesitation applying is only in the first instance to the depositors, while the loss has ultimately fallen, as it ought to do, upon the shareholders. In the instances of private issuing Banks that have failed, the case has so far been different that the holders of notes and the depositors have equally been sufferers. But although the failures of private Banks of Issue have (as well as those of Joint-Stock Banks) been within the last two or three years lamentably frequent, the collective amount of their notes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has been very inconsiderable, not to say insignificant. So inconsiderable, as assuredly not of itself to be allowed to weigh in any degree worth mentioning among the reasons for the great change which has been proposed in the footing of our paper circulation by the propounders of the currency principle, that is of superseding all other sources by a single Bank of Issue.

我的印象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公众手中持有的合股银行的银行券都毫无拖延地兑付了，并且无论如何最终都偿清了。合股银行起初只是想拖延储户的提款申请，然而最终损失，理所当然的，却落到了股东身上。对于破产的私人发钞银行，情况迥异，其银行券的持有者和储户同样都是受害者。然而，尽管私人发钞银行（和合股银行一样）在最近两三年不幸经常破产，但是公众手中持有的私人发钞银行和合股银行的银行券的总数虽说不上无足轻重，也是极其有限的。如此琐屑，以至于通货原理的拥护者无法以此作为原因来提议对我国的纸币发行制度进行改革，即用一个发钞银行取代所有其他的发钞银行。

I am ready to admit that the failure of a private issuing Bank on the grounds here stated, namely, that the holders of notes come in only *pari passu* with depositors, is a greater evil than the failure of non-issuing Banks, or than the failure of issuing Joint-Stock Banks.

我愿意承认，私人发钞行如果是因为这里所提到的原因（也就是银行券的持有者与储户一同挤兑）而破产，那么其带来的危害要比非发钞银行或者合股发钞行的破产带来的危害更大。

But admitting, as I do, that this is an evil attending private Banks of Issue as compared with non-issuing Banks, or with issuing Joint-Stock Banks, it is an evil of infinitely less importance now than when country bank notes under 5*l.* were in circulation throughout the United Kingdom. They are now confined to Scotland and Ireland. The difference is immeasurably great as relates to the suffering or hardship attending the suspension of payments of the notes of a local bank, between notes of 1*l* . and notes of 5*l* . and upwards. Where the smaller notes, that is, of 1*l* ., are issued, they circulate among the working classes of the population. Consequently, whenever banks issuing 1*l* . notes failed, the loss fell heavily on those classes among whom the artisans and better class of operatives received their wages in that form. That I have not been unmindful of the evil attending the issue of this description of notes, as connected with the risk of failure of the issuing banks, may be seen by the following extract from a Tract of mine, entitled, “Considerations on the State of the Currency,” published in January, 1826.

但是，尽管我承认私人发钞行破产的危害要比非发钞银行或者合股银行更大，可是现在这种危害的严重性要远远小于以前整个英国都流通面值5英镑以下的地方银行券的时候。现在面值5英镑以下的地方银行券只限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流通。暂停兑付面值1英镑的地方银行券和暂停兑付面值5英镑和5英镑以上的地方银行券，两者造成的痛苦和困难有着天壤之别。在较小面值的纸币，也就是1英镑银行券发行的地方，这些银行券在工人阶级人群中流通。因此，不管何时，一旦发行1英镑银行券的银行破产，技工和较之处境稍好的操作工人就要承受这些损失，他们领取的工资一般都是1英镑面值的银行券支付的。我并没有忽略发钞银行破产时这些小面值银行券的发行带来的危害，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一段摘录中看出来，这段话引自我在1826年1月出版的名为《论通货的状况》的小册子。

> Whatever may be determined upon as to the expediency of providing additional security for the general circulation of the country banks, there is one part of that circulation which ought not upon any footing, or with any modification, to be any longer tolerated. I mean the notes under 5*l.* These are in every point of view a most objectionable medium of exchange. Leaving out of the question the consideration of fluctuations in the value of the currency, some protection of the lower classes against the severe losses to which they have so often been exposed, as the holders of small notes, when the banks issuing them have failed, is imperatively called for. It is quite idle to say that the lower classes have the option of refusing to take the country notes, practically in the great majority of instances, they have not and cannot have any such option. But if there is any object more

important than another, for which the government of every state has been invested with the privilege of coining money, it is that of protecting the lower classes of society, who are little competent in this particular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the risk of loss in receiving their stipulated wages or other payments. And this function of the sovereignty of issuing coin, which, under the strongest sanctions, certifies to every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the weight and fineness of the money, when he may be entitled to receive it, justly guarded against the interference of private individuals by the severest penalties. But by a strange inconsistency, while such care is manifested to secure the community from being imposed upon by metallic money of less than standard value, every adventurer who chooses to follow the trade of a banker is allowed to issue a spurious paper money, which having neither intrinsic value nor any adequate security for eventual convertibility, is in too many instances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a fraud, a fraud of which the most numerous and helpless classes and those who can least bear the loss are most commonly the victims.—*Consideration on the State of the Currency* , 1826, p. 127, 128.

“无论采用怎样的权宜之计来为地方银行发行的所有银行券提供额外的担保，这些银行券中有一部分是不应因为任何理由或者条件再去忍受的。我指的是面值低于5英镑的银行券。不论从哪种观点来看，它们都是最令人反对的交换媒介。暂不考虑通货价值的

波动，当务之急是要保护下层阶级，使他们不再遭受作为小额面值银行券的持有者在小额面值银行券发行银行破产时经常遭受的损失。下层阶级有权选择拒绝接受地方银行券，这种说法毫无意义，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选择权。然而如果各国政府被赋予铸造钱币的特权是出于一个最重要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就是保护社会下层阶级，使他们在接受规定的工资和其他报酬时不受损失，因为在这方面他们几乎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发行硬币的国家的这一职能，要求它在社会的任何一个公民有权利获得货币的时候来向其证明货币重量和纯度，以最严厉的惩罚来保护个人利益免受侵害。但是让人感到奇怪的矛盾现象是，政府在如此小心地保护社会免遭不足值金属货币的欺骗的同时，又允许每一个选择从事银行家职业的冒险家发行伪造纸币，这种纸币既没有内在价值也不能给予最终的兑换任何足够的担保，很多情况下这些冒险家简直就是在欺诈，而受害者通常是那些人数最多而又无助的阶级和那些最无力承受损失的人们。”《论通货的状况》1826年，第127、128页。

At the time when these remarks were written,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of one pound notes in England and Wales had been computed at upwards of five million. The evil, therefore, of the suspension of so many issuing banks as had then recently failed was one of great magnitude, which fully justified, or rather demanded,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egislature to provide a remedy, and this was most effectually done by the suppression of that objectionable class of notes. At present the entire circulation of notes of 6*l.* and upwards, issued by private banks in England and Wales, hardly exceeds amount what was the circulation of 1*l.* notes

alone prior to 1826. And however to be regretted that the holders of private country banker's notes, being now of the denomination of 5*l.* and upwards, should occasionally be exposed to loss by failure of the issuers, it will hardly be contended that their case is so important and so clearly distinct from the case of depositors, and other sufferers by the failure of Banks, as to justify, with the view of protecting them, an alteration of the whole system of issue in the Kingdom.

在写下这些评论的时候，1英镑银行券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流通量估计就已经超过了5,000,000英镑。因此，当时许多发钞银行破产，闭门停业所带来的危害巨大，这充分证明了政府和立法机关有理由进行干预，或者更确切的说，它们需要进行干预，从而挽救局面，通过禁止发行这种让人讨厌的银行券可以最有效地实施这一点。目前，由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私人银行发行的6英镑及6英镑以上面值的银行券的流通总量几乎没有超过1826年之前的1英镑银行券的单独流通量。私人发钞银行券的持有者（现在为5英镑及5英镑以上面值银行券的持有者）偶尔会遭受到发钞行破产带来的损失，无论这一点多么让人遗憾，都很难让我们坚持认为，他们的情况是如此的重要，如此明显地有别于储户以及银行破产的受害者的情况，以至于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而有理由去改变联合王国的整个发行制度。

But as it appears that whatever the relative merits may in other respects be, as between private and Joint-Stock Banks of Issue, the circulation of the latter is much more secure, a mode of gradually substituting the issues of them for those of private Banks with the least inconvenience to the public, and without injury to existing interests, would be simply that of not granting licenses for the issue of notes to any private Banks which are not already in possession of the privilege. The notes of Joint-Stock Banks and of the Branche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would thus by degrees supersede those of the private Banks, and so remove one source of inconvenience from the present system.

但是，与私人发钞银行相比，无论合股发钞银行在其他方面可能存在着怎样的优点，后者发行的银行券都更安全，因此要想逐渐由合股银行的银行券代替私人银行的银行券，最大程度地方便公众又不伤害现存利益的方式就是不再授权任何尚未拥有发钞权的私人银行发行银行券。合股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分行的银行券就会逐渐地取代私人发钞银行的银行券，从而消除现行银行制度引起麻烦的根源。

I have noticed at some length this point, namely, the insecurity of the notes of private Banks, because it has been brought in as a make weight among the arguments in favour of a single Bank of Issue. On the grounds which have here been stated, I hold it to be utterly insignificant in that view.

我已经相当详细地谈论了这一点，即私人银行券的不安全性，因为人们一直把它当作补充论据来更加有说服力地支持单一发钞银行的实行。然而，根据这里所陈述过的理由，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支持实行单一发钞银行的观点完全没有意义。

I shall therefore proceed to make the few further remarks which occur to me on the currency principle, in its application to our Banking system, leaving out of the question, or leaving as a point for separate discussion by those who deem it of sufficient importance, the liability to insolvency of private Banks of Issue.

因此，对于通货理论，我将继续做进一步论述，讨论将通货理论运用于我国的银行制度，而暂且不考虑私人发钞银行易于破产的问题，或者干脆把这个问题留给那些认为它很重要的人单独讨论。

[16_1].I use the term "directly," because after a period in which there has been a pressure on the money market, and the banks generally have curtailed their advances, a state of languor (as Mr. Anderson in his evidence, p. 50, observed) is apt to supervene, and to he attended with diminished transactions, and a consequent reduction of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So, on the other hand, after a period in which a low rate of interest and revived confidence and extended credit have been in operation for some time, the consequent increase of transactions would probably require to be followed by an increased amount of bank notes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I say probably, not necessarily, because in 1885, notwithstanding the unbounded confidence and extension of credit which then prevailed, there was no extension, and, if any thing, a reduction of the amount of notes in circulation. In every case they are a consequence, and not a cause.

[16_2].See also "Reflections, &c." by S. J. Loyd, p. 45. &c.

[16_3].See also "Reflections, &c." by S. J. Loyd, p. 45. &c.

[17_1].我使用“直接”这个词，是因为如果在一段时期内货币市场受到压力，银行普遍缩减贷款，那么这段时期之后紧接着就会出现疲软状态（就像安德森先生在他的证词第50页说的那样），伴随出现的就是交易量减少，结果银行券数量就会减少。因此，另一方面，如果在一段时期内，低利率、信心的恢复和信用的扩张在起作用，那么随之增加的交易量就可能要求公众手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也随之增加。我之所以说“可能”，而不是“必然”，是因为在1885年尽管信心无穷，信用扩张，但是流通银行券的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如果真有变化的话，反而还减少了。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银行券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17_2].另请参阅S. J. 劳埃德所著的《……考察》，第45页及随后各页。

[17_3].如果有人问增加的硬币来自何处，答案则是，来自银行家的储备；如果银行家不能满足储户的所有提款要求，那么他们必须停止支付。

Chapter 15 Review of the Currency Principle in Its Application to Our Banking System

第十五章 论通货原理在我国银行制度中的应用

If the views which have thus far been unfolded are admitted to be correct, it can hardly fail of being seen as a fair deduction from them, that the whole of the ground on which the theory of the Currency principle proceeds is unsound. The error of supposing that, if the currency were purely metallic, every export or import of bullion would be so much taken from or added to the quantity of money in circulation, is so obvious, so palpable, as to make it a matter of surprise that such a notion should ever have been entertained. And must it not, as an inevitable consequence, follow that it is equally an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paper money, if administered upon the footing proposed by the currency doctrine, of a single source of issue, having a fixed amount on securities, and beyond that, exchanging only paper against gold, and vice versa, would vary in amount and value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with variations in the quantity of bullion exported or imported, or in the quantity of bullion in the coffers of the Bank?

如果我们认可前文所述观点的正确性，那么便可以从中合理推断出，通货原理的整个基础是不稳固的。如果通货完全是金属货币，那么每一次输出或输入的纯金量应等于流通环节消耗或增加的货币数量，这种假设显然是荒谬的，可是人们竟然会持有这样的观点，实在让人惊讶。由此，我们是否必然可以断定下面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呢：如果依照通货理论提出的观点进行纸币管理，也就是说由一家拥有固定数额有价证券的银行发行纸币，超过这一数额时，只能用黄金兑换

纸币，或者用纸币兑换金币。这样，百姓手中纸币的数量和价值就会随着银行金银量的输出或输入变化而改变，或是随着银行金库中的金银量变化而变化？

I would not misrepresent the doctrine; but instances innumerable might be adduced from the writings, and from the examination by the Committee on Banks of Issue, of the advocates of that doctrine, that it goes to the full extent here stated; tabular statements being exhibited of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bullion in the Bank and notes out of it, with a view to prove, according to the occasion, sometimes against the country banks, and sometimes against the Bank of England, the charge of mismanagement. One source of their error is their imagining that, in their supposed Bank of exclusive Issue, the notes paid for gold exported must necessarily be taken from out of those circulating among the public, and that the gold imported would be taken to the Bank to exchange for bank notes, which would go into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nd they hold it to be the opprobrium of the present system, that this is not now the case. It must, however be clear, if I have made myself at all intelligible, that in neither case would it necessarily or generally be the case, or rather, it would be rarely so, under a single bank of issue; and, except under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the amount of notes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would be nearly, if not quite, the same under one system as under the other.

我不想歪曲通货原理；但是在有关通货原理的各种著作以及对发钞银行委员会及其拥护者的调查中，有不胜枚举的例子说明它与这里阐述的观点一致。通货原理的拥护者提出了一些计算表，体现了英格兰银行黄金存量与其所发行的银行券数量不一致的情况，根据个中情况以便证明英格兰银行和各级地方银行偶尔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他

们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想象着在他们所设想的独家发行纸币的银行里，用于输出黄金支付的银行券一定来自那些百姓手中正流通的纸币，而那些处于输入状态的黄金则会进入英格兰银行系统用于兑换银行券，这些银行券会流入百姓手中；可是现在情况并非如此，所以他们认为这种现象是现行制度的耻辱。然而，如果我已经表达清楚了，在只有一家发钞银行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不一定会出现那样的情形，或者更确切地说，几乎不会出现那种情形；除非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两种不同的制度下，百姓手中的银行券数量即使不是完全相同的，也几乎是一样多的。

It may be asked, and the question is a very natural one for those who are impressed with the notion that bank notes are operative by their amount, and who are not aware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urrency and capital, how it is that the Bank of England, or the banks collectively, if they cannot contract the circulation, (as I maintain that they cannot by any direct operation,) nor operate through that medium on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are to be supposed to have the power of influencing the exchanges? The answer is, that it is only by a forcible action on their securities that they can influence the exchanges, so as to arrest a drain, or to resist an excessive influx. By a forcible action on securities is meant a great advance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on the one hand, or a great reduction of it on the other. And the rationale of such operation on the rate of interest is, that it renders disposable capital in the one case scarce, and in the other abundant; forcing it from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former, and to them in the latter case. The effect of the pumping in or forcing out of bullion by this means is infallible; and the only practical question is of the moral, or commercial, or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which may interfere with the full exertion of the power.

人们可能会问，英格兰银行或是所有银行，如果不能缩减流通额（正如我坚持认为这些银行不能通过任何直接运作方法缩减流通额），也不能通过商品价格波动来操控流通额，那怎么能认定它们会具有影响汇率的能力呢？问这样的问题对于那些觉得银行券是因数量起作用的人和那些弄不清流通货币与资本之间区别的人来说，是极其自然的。答案是，各银行只有通过对自己拥有的证券采取强制性措施，才能够影响汇率，从而制止金银储备外流或抵制过量流入。对证券的强制性措施，可能意味着利率的大幅提升，也可能意味着利率的大幅下跌。对利率如此操控的原理是，它在某种情形下会使可支配资本短缺，而在另外的情形下会使可支配资本充足；前一种情况迫使源于境外的资本注入国内，后一种情况则迫使资本流向境外。采用这一方法吸纳或消耗黄金是绝对可靠的；实践中唯一的问题是对道德、商业、政治等方面的考虑，关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可能妨碍这种权力的效果。

A forcible operation by the Bank on its securities, in either direction, will not, of necessity, as I have shown, be attended with an immediate or direct effect on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The effect, if any, can be only indirect, through the medium of credit, and dependent on the previous state of the market.

如我所述，无论英格兰银行从何种角度对其证券采取强制性操作，都不一定会直接对商品价格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即使产生了影响，也仅仅是通过信贷产生的间接影响，且依赖于之前的市场状况。

I have before had occasion to notice, in referring to the examinations of the country bankers, the confounding of currency with capital, which was observable in the questions put by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That confusion, being traceable to

the deep-seated impression which they seem to have been under, that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was the main point for consideration, as having a direct an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prices, and on credit, and on trade, instead of being as it is,—a mere effect or indic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call out and maintain that amount. The same wedded attachment to the doctrine of the Currency principle which looks to bank notes, and to bank notes only, as the *primum mobile* in our monetary system, may account for the little research which the Committee made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variations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for the strange misconception which pervaded the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at point, of those of its members who took a leading part in the examinations. They seem from first to last to have looked upon variations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as of importance only, inasmuch as those variations might be supposed to affect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之前在谈到对地方各银行家进行调查时，我曾提及发钞银行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很显然在提问时把通货与资本混为一谈了。这似乎是由各位银行家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造成的。他们觉得公众持有的银行券数量是关注的焦点，它会对物价、信用以及贸易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而非对它们自身的各种导致支出或保有公众手中银行券数量这一实际情况产生的影响。通货原理将且仅将银行券视为我国货币制度的“原动力”，正是由于固执地相信这样的理论，发钞银行委员会才没有研究利率变化的原因与结果，而且委员会里那些进行调查的主要成员对此问题持有不可思议的错误看法。他们似乎始终都认为，利率的变化只有在影响货币的流通数量时才重要。

In point of fact, the liability to variation, greater or less,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constitutes in the next degree only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onvertibility of the paper,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present system, with some amendment, should be continued, or some one or other of the numerous schemes for a government or national bank should be substituted for it. Mr. Bosanquet, in his publication, to which I have alluded, entertains such exaggerated views of the disastrous effects on the commerce of the country, of a considerable advance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which he seems to consider as an alter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currency, that in his scheme for a bank or banks of issue, he would prescribe a compulsory maximum and minimum of the rate, variable between six and four per cent, according to certain rules which he lays down with reference to the exchanges: and rather than allow a forcible operation on the rate of interest, in order to stop a drain on the treasure of the Bank, he would resort first to a temporary issue of 1*l.* notes, and if that should prove insufficient, suspend the convertibility of the paper! How any well-informed person, not of the Birmingham school, could seriously propose to have cash payments suspended, rather than that the mercantile community should be subjected to some inconvenience from an advance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what he chooses to consider as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a fall of prices, is to me matter of unutterable surprise. It may serve as a proof of the exaggerated views entertained in some quarters of the effects of a forcible operation on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it forms a contrast to the little attention paid to that point, not only by the committee on Banks of Issue, but by the propounders of the various schemes for a government or national bank.

事实上，利率或大或小的可变性仅次于保证纸币的可兑换性，那么现行制度应该经过微调后继续得以实行，还是改而实行只允许政府或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制度，这是应重点关注的。博赞基特先生在我

前面提到的那部著作中，过分夸大了利率的大幅度上升（似乎他把这视为通货价值的变化）对国家商业活动的灾难性影响，以致在他提出的只允许一家银行或多家银行发行纸币的计划中，他根据与汇率相关联的某些规则，规定了强制性的最高和最低利率分别为6%和4%：为制止英格兰银行的金银储备外流，他不愿让政府操作利率，而宁愿先暂时发行面额为1英镑的银行券，如果这不足以制止金储备外流，就暂停兑换货币！除了伯明翰学派的人士，任何一位见识广博的人都不会认真地提议暂停支付现金，而不提议提高利率，这会给商业界造成不便，他认为提高利率必然导致物价下跌，这使我感到惊讶。他的这种观点可作为一项证据，证明某些人夸大了强制性操控利率行为所产生的作用，这些人与不关注这一行为的发钞银行委员会和鼓吹建立政府或国家发钞银行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Now, without attaching such exaggerated importance as Mr. Bosanquet and Mr. Gilbart, and some others who oppose the currency principle do, to the effects of great variations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I am inclined to think, that excepting the convertibility of the paper and the solvency of banks, which are and ought to be within the province of the legislature most carefully to preserve,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one system of banking and another, is the greater or less liability to abrupt changes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in the state of commercial credit incidental to one a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and a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the various plans which have been submitted to the public for carrying out the currency principle, has led to a confirmation of the opinion which I have before expressed, that under a complete separ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issue and banking, the transitions would be more abrupt and violent than under the existing system; unless, and upon this, in my opinion, the question hinge, the deposit or banking department were bound to hold a much larger reserve than seems to be contemplated by any of the plans which I have seen.

博赞基特先生、吉尔伯特先生以及其他反对通货原理的人，都夸大了利率大幅波动产生的影响，而我则倾向于认为，除了纸币的可兑换性和银行的偿付能力外（这两点应该处于立法机构最谨慎的保护区域内），两种银行制度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利率或大或小突然变化的倾向，在于依附于两种银行制度下商业信用状况的变化倾向；仔细思考为贯彻通货原理而向公众提交的各种计划，即可证实我曾经发表过的那种观点——如果把发行职能和银行业务职能完全分离，则变化会比在现有制度下更加剧烈；在我看来，除非问题有所逆转，储蓄或者银行业务部门将拥有比我见过的任何计划预期多得多的存款。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cannot be placed in a more striking point of view than in the following passages of a printed letter which Colonel Torrens addressed to me on occasion of the opinions which I had expressed on the subject in a former work.

托伦斯上校在寄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谈及了我先前一部著作中就此话题发表过的观点的原因，这封信中如下几段话表明了两种银行制度之间的差别，观点鲜明确切，且不可替代。

“The difference,” Colonel Torrens says, “between us is this, you contend that the proposed separation of the business of the bank into two distinct departments would check over-trad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issue, but would not check over-trad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deposit; while I maintain, on the contrary, that the proposed separation would check overtrading in both departments.”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separation would have this two-fold effect will be seen by the following example.

托伦斯上校说："就此问题，你我之间的分歧在于，你认为把银行的业务分成两个性质不同的部门，有助于抑制货币发行部门的过度交易，但不利于抑制存款部门的过度交易；然而我却认为，提议的部门划分对这两个部门的过度贸易都有抑制作用。"下面举例说明两个独立的部门如何具有双重作用。

> Let us assume that the bank holds 18,000,000*l.* of securities and 9,000000*l.* of bullion, against 18,000,000*l.* of outstanding notes and 9,000,000*l.* of deposits, and let an adverse exchange require that the depositors should draw out their deposits in bullion to the amount of 3,000,000*l.* "In this case, if the business of issue were mixed up with that of deposit, the drawing out of the 3,000,000*l.* of deposits in bullion would have no other effect than that of reducing both deposits and bullion by the amount of 3,000,000*l.* , while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and of the securities, and the power of the bank, as its securities fell due, to continue the discount business to the same extent as before, would suffer no diminution. But let the department of issue be wholly separated from that of deposit, and the result would be widely different.

> "我们来假设，银行持有18,000,000英镑的证券和9,000,000英镑的金银储备，以抵付18,000,000英镑已经公开发行的银行券和9,000,000英镑的存款，这时出现了逆汇兑，储户要求以金银货币的方式兑现其存款，数额达到3,000,000英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行业务与存款业务混在一起，3,000,000英镑

的金银货币提款要求会同时导致银行存款和金银储备减少3,000,000英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影响，而货币流通量和证券的数量，以及证券到期时银行继续以从前的规模从事贴现业务的实力不会减少和降低。但是，如果发行部门完全与存款部门分开，结果就截然不同了。

As soon as the separation was effected the deposit department holding 9,000,000*l.* of deposits with 9,000,000*l.* of securities would be obliged to sell some part of its securities, say one-third, in order to be prepared to meet the demands of its depositors. The state of the two departments would then stand thus:

“两个部门一旦分开，持有9,000,000英镑存款和9,000,000英镑证券的存款部门将不得不出售其部分证券，比如三分之一，来满足储户的提款需求。那样，这两个部门的状况将呈现为：

Circulating Department .

发行部门

Deposit Department .

存款部门

This being the previous state of things, the demand of the depositors for 3,000,000*l.* , in gold would produce the following changes. The 3,000,000*l.* of bank notes held by the deposit department as reserve would be drawn out by the depositors and paid into the circulating department in exchange for gold, while the directors of the

deposit department, in order to recover a reserve equal to one-third of their deposits would be obliged to sell 2,000,000*l.* out of the 6,000,000*l.* held in securities. The results would be, that in the circulating department the bullion would be reduced from 9,000,000*l.* to 6,000,000*l.* , and the circulation from 18,000,000*l.* to 15,000,000*l.* , and that in the deposit department the deposits would be reduced from 9,000,000*l.* to 6,000,000*l.* , the securities from 6,000,000*l.* , to 4,000,000*l.* , and the reserve from 3,000,000*l.* to 2,000,000*l.* It is self-evident that the effect of these changes would be not only a contraction of the circulation but a limitation to the power to over-trade in discount and loans.

“据此，储户要求提取价值3,000,000英镑的黄金时，就会产生以下变化。存款部门本持有3,000,000英镑银行券作为储备金，将被初回提走，并用以在发行货币的部门兑换黄金，此时，存款部门经理为了弥补相当于其存款储备的三分之一，必须出售其持有的6,000,000英镑证券中的2,000,000。结果是，发行部门持有的金银储备将从9,000,000英镑削减到6,000,000英镑，发行额从18,000,000英镑减少至15,000,000万英镑，而存款部门的存款将从9,000,000英镑减少至6,000,000英镑，其证券额将从6,000,000英镑减少到4,000,000英镑，储备从3,000,000英镑减少到2,000,000英镑。显而易见，这些变化不仅导致银行券发行额缩减，还会限制银行在贴现和放贷方面的过度交易。”

I am willing to admit this statement as exhibiting in substa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 According to my view, as there may be variations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s, in other words, of a balance of trade, without any grounds for inference of alterations in the value of the currencies of the countries from which or to which such balance may be due, the presumption is, that an occasional efflux of four or five or six million would be followed at no distant period by a fully equal reflux. Such was the case in 1828-29 and 1831-32, when the treasure of the Bank having been reduced by five or six million was replenished without the slightest operation of the Bank on the amount of its securities, or its rate of interest. And such efflux and reflux might again take place under a continuance of the present system, provided that the Bank habitually held a large reserve, without any disturbance of the money-market, and without any influence on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Now, under a system of separation, and in the position of the two departments in the case supposed by Colonel Torrens, what would be the operation of a demand for export to the extent of three million of gold? In all probability, this demand would almost exclusively fall upon the deposit department.

我愿意承认这种论述基本说明了我们之间的分歧。依我所见，由于国际支付方式是变化多样的，也就是说，贸易平衡也是变化多样的，而顺差或逆差国家的通货价值对变化起不到任何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推定，4,000,000英镑、5,000,000英镑或6,000,000英镑的金银储备的偶然流出，完全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等额回流。这一分析正是1828-1829年和1831-1832年情况的体现，当时英格兰银行的金银储备减少了5,000,000到6,000,000英镑，但该银行并未进行证券数量或利率方面的任何调整，而减少的金银储备却得到了补足。倘若英格兰银行一直持有大量的金银储备，在现有的银行体系下，此类金银储备的流动就会再次发生，而对货币市场没有任何干扰，也不会对公众

手中持有的银行券数额带来任何影响。现在，如果发行部门和存款部门分离管理，两部门分别处于托伦斯上校的假设下，那么，储户3,000,000英镑黄金提兑的要求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毫无悬念，这样的需求完全会落在存款部门肩上。

This being the case, the Directors would not have a moment to lose upon the first manifestation of such demand, without taking measures for retaining or restoring the proportion of their reserve. They must sell securities, or allow the existing ones, if short-dated, to run off, and they must inexorably shut their doors to all applications for advances or discounts. This would, as Colonel Torrens justly observes, operate as a limitation of the power to over-trade in discount and loans. Most effectual, indeed, would it be, and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of the trade, it would operate with a degree of violence on the state of credit of which, as it appears to me, Colonel Torrens has no adequate idea. This is not to be wondered at in a writer not practically conversant with trade or banking; but that other advocates for the measure of separation, who number among them merchants and bankers, should be so unaware of it as they seem to be, does indeed surprise me. Before two or three million of bank notes could be forcibly abstracted from the amount in circulation among the public, the pressure upon the reserves of the London bankers must be extreme. They would, of course, to the utmost extent practicable, call in their loans, and resolutely refuse further accommodation. [17_1]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储户提出提取黄金实物的要求时，存款部门经理不可以有片刻迟疑，必须要采取措施保证或恢复其黄金储备。他们必须出售证券，或是任凭现有的短期证券外流，不留情面地拒绝各类贷款或贴现申请。正如托伦斯上校所观察到的，这会限制银行在

贴现和贷款方面进行过度交易的能力。事实上，最有效的限制银行的能力，在某些交易状况下会对信用度产生巨大影响，在我看来，托伦斯上校对此没有充分理解。对于一位实际上并不精通贸易和银行业务的作家来说，这现象不足为奇；但是，对于那些支持分管方式的人来说，其中不乏商人和银行家，他们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确实令我惊讶。从公共流通额中强行抽取2,000,000英镑或3,000,000英镑的银行券之前，伦敦银行家们的储备压力必然巨大。当然，他们会尽力收回贷款，并坚决拒绝进一步放贷。

Although there is no modern experience of such a state of things, if any merchant, banker, or money dealer were to have the case laid distinctly before them, could any of them for a moment have a doubt as to the extremity of pressure which it would cause? I am most intimately persuaded that it would be within the mark to suppose that a rate of discount (assuming that the doors of the Bank and the ears of the Directors were inexorably closed against all applications) of 20 per cent and upwards would, in many cases, be submitted to, and sacrifices of goods, if any large proportion were held on credit, would be made at a still greater loss. And, after all, it might be a question, whether even this effort of the Bank on its securities would be effectual in restoring its reserve in sufficient time to meet the exigency. This would depend entirely upon the character of its deposits. If these were strictly payable on demand, while the circumstances determining the efflux were strong and urgent, the payment of 3,000,000*l.* accompanied by forced sales of securities might prove insufficient in point of time to arrest the demand; and in this case, while the circulating department would still have 6,000,000*l.* of bullion, the deposit department would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stop payment. A most absurd, however disastrous a state of things. But it would be too disastrous, and too absurd to be allowed to take its course. If such a crisis were to

happen, as most probably it would at the time when the dividends on the public funds became due,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imperatively called upon to interfere and prevent so ridiculous, however lamentable, a catastrophe. And the only interference that could meet the emergency would be to authorise a temporary transfer of coin from the issuing to the banking department.

虽然最近没有类似情况发生，但是任何一位商人、银行家或是货币兑换商要面临明摆在眼前的这样的状况时，有人对由此产生的极端压力有片刻的怀疑吗？可以设想，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必须接受20％或更高的贴现率（假设银行和经理们无情地将所有申请拒之门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且如果大部分货物是赊购的，货物会以更加亏本的价格抛售。况且还有一个问题，英格兰银行在证券方面的努力是否能有效而及时地恢复其储备以满足紧急需求。这完全取决于银行存款的性质。如果银行严格按票即付，导致证券外流的状况很紧急，那么伴随着证券强制出售3,000,000英镑的支付可能无法及时阻止储户提款的需求；在这种情形下，虽然发行部门仍然持有6,000,000英镑的金银储备量，但是存款部门除了停止支付客户要求外别无选择。这是一种十分荒谬而颇具灾难性的局面。但是其灾难性与荒谬性会导致人们不再任凭这样的局面发展下去。如果这样的危机发生了，最可能会发生在公债利息到期之时，那时公众会紧急要求政府干预并制止这种荒谬又可悲的灾难。能够应对这样紧急局面的唯一干预手段，就是授权硬币由发行部门临时转移到营业部门进行管控。

The truth is, that no bank of mere deposit could undertake the Government business, involving an annual receipt and expenditure of 50,000,000*l.* , subject to deficiency of the revenue at one time, and to overflow at another, with so small a reserve as 3,000,000*l.* , whatever its other business might b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conceive how it could, without the profit of the circulation, afford the much

larger amount which would be requisite: But this is a point which it is foreign to my purpose to discuss. What I have to observe is, that supposing the violent effort of the Bank, on its securities, to be effectual, there cannot be a doubt that the violence of the effort would have been attended with inconvenience to the public. And all this inconvenience may have been purely gratuitous, as a sacrifice 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because the utmost demand for gold might have been satisfied by an export of 3,000,000*l.* or 4,000,000*l.* which, under a system of union of issuing and banking, would have been attended, as in the instances of 1828-29, and 1831-32, with no inconvenience whatever.

事实是，仅经营存款业务的银行，无论有没有其他业务活动，都不能承担政府的职责，因为政府的职责是50,000,000英镑的年收支，有时收入不足，有时收入过剩，而银行的储备仅有3,000,000英镑；很难设想没有发行部门的支持，银行怎么能负担得起所要求的如此巨大的数额。但是这个问题与我此处探讨的目的无关。我要指出的是，假设英格兰银行花大力气来有效出售其证券，那么毫无疑问，这样的出售行为会给公众带来巨大不便。所有的不便也许完全是不必要的，反而成为了通货原理的牺牲品；因为对于黄金的极大需求可通过输出3,000,000英镑或4,000,000英镑黄金储备来满足，这在发行部门和银行业务部门的联合体制下就能做到，正如1828-1829年以及1831-1832年的情况，当时就没有给公众造成任何不便。

But it may be asked; and here is the point; supposing that the demand for export of bullion be such that not three or four million, but nine or ten million will be required to satisfy it. What then becomes of a plan of quiescence? My answer is, that I would not be accountable for a plan of quiescence upon an amount of treasure in the Bank not exceeding nine million at the outset of a drain. It was

an error of the Bank in 1839, to have been perfectly quiescent until a loss of treasure from 9,336,000*l.* to 5,119,000*l.* had taken place. And the only effort then made was an advance of the rate of interest, step by step, to 6 per cent, and a reduction of the date of the bills admissible for discount from ninety days to sixty days; the limitation of days being of much more importance than the increase of the rate.

但是人们也许会问，这同时也是关键，即假设对金银储备的输出需求极大，不仅是需要3,000,000或4,000,000英镑，而是9,000,000到10,000,000英镑，才能满足需求，那么不采取行动的后果是什么呢？我的解答是，当黄金储备开始外流时，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不超过9,000,000英镑，我不会为不采取行动的方案负责。1893年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从9,336,000英镑减少到5,119,000英镑时，该银行仍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是个错误。当时唯一做出的努力就是把利率逐步提高到6%，缩短了存单贴现率的期限，从90天变为60天；缩短期限比提高利率更重要。

This effort was altogether inadequate; a difference in the rate of discount of 2 per cent per annum, is a trifling consideration on bills having at the utmost sixty days to run; and accordingly, the Bank did not only not succeed by these measures in reducing its securities, but, as was inevitable as long as the door for discounts was left open, actually increased them. So that with advances on deficiency bills, the securities instead of being diminished, were actually increased by three or four millions during the greatest pressure of the drain. Still, with the aid of the credits on Paris, the drain was surmounted; and although this last resource was anything but creditable, yet, inasmuch as the crisis was thus got over, merit may be claimed in behalf of the system for having come through

with little, if any, suffering or inconvenience, commercial or financial. The markets for produce were perfectly undisturbed, there were no mercantile, or manufacturing, or banking failures of any note, and there was no great fall in the prices of public securities; so that the actual inconvenience proved to be in effect very unimportant. This exemption from suffering or material inconvenience, in surmounting the drain was, as some may think, and I among them, dearly purchased: but so it was.

这些措施还是不够；每年提高2%的贴现率，对于最高期限为60天的票据来说微不足道；就此，英格兰银行采用这些方法不仅没有成功减少其证券量，相反，只要贴现的大门是敞开的，这些方法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证券量。由于存在着亏垫款，证券非但没有减少，实际上反倒在金银储备外流压力最大的时候增加了3,000,000到4,000,000英镑。但借助于巴黎的贷款，黄金外流还是被阻止了；虽然这最后一招不那么光彩，却克服了危机，因而现行银行制度仍然是有功的，它几乎没有带来商业上或金融上的痛苦和不便。产品市场完全未受干扰，没有一家大商店、大工厂或是大银行倒闭，公债价格也未大幅下跌。在没有遭受重大不便的情况下阻止黄金外流，正如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认为的，是以巨大的代价换取的，仅此而已。

Now, how would the case have stood, if the separation had existed in 1839?

那么，若是1839年发行部门与存款部门分立而治，情况又如何呢？

Tak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Bank in January, 1839, and

on the supposition of a separation of the functions, allotting twelve million of securities (instead of nine million, an amount obviously too low) to the circulating department, the two branches would have stood as follows:— [17_2]

以1839年1月英格兰银行的实际情况为例，假定当时其发行职能与存款的职能是分离的，将12,000,000英镑（不是9,000,000英镑，这数字显然太低）的证券分配给发行部门，则两个部门的情况如下：[18_1]

Circulating Department .

发行部

Banking Department .

银行营业部

Upon the occurrence of the demand for gold (which would naturally be, and was in point of fact made, by depositors in the banking department), and which was to the extent of a little more than a million between January and March, it may be taken for granted that the directors would see reason to sell or to allow the running off of securities to the same extent, and if they at the same time shut their doors against discounts and advances on deficiency bills, their liabilities would be reduced to the same extent. The notes would be taken from the banking to the circulating department in exchange for gold, and leave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without any alteration. And this process might by supposition have continued till the remaining bank notes were transferred from the banking to the issuing department, without producing the slightest effect on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兑换黄金的需求一旦发生（银行营业部门的储户们很自然地有兑换黄金的要求，并且他们也确实兑换了），而且1至3月对黄金的需求略多于1,000,000英镑，董事们很自然地就会觉得有理由出售证券或允许同样数量的证券流出。如果他们同时对亏空款项不予贴现和预

付，他们的债务将同比减少。银行券将被从银行营业部门提取至发行部门以兑换黄金，使公众持有的银行券流通量不发生任何变化。可想而知，这样的过程会持续到余留的银行券都从营业部转移到发行部为止，但对公众持有的银行券流通量不产生丝毫影响。

A forcible reduction, however, of the securities to the extent supposed, would doubtless have abated the force of the drain, and might possibly have overcome it; but seeing the combination of circumstances which led to that drain, it may fairly be doubted whether the effort here assumed would have been sufficient to arrest it. My strong conviction is, that it would not have been sufficient, if even it had been practicable; but I doubt whether it would have been practicable. Notwithstanding the endeavours of the directors, when their attention had been fully roused to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measures of precaution, and notwithstanding a rise in the rate of discount and a limitation of the date of bills admissible, the securities not only were not reduced by three million, as I have supposed they would be under a separation, but were actually increased by three million, partly by advances on deficiency bills. Now between a withdrawal from employment of disposable capital to the extent of three million, and an actual advance to the same amount, is a difference of six million. Such a reduction, suddenly effected, in the amount of available capital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could not fail to be attended with very important and highly inconvenient effects. The state of credit would necessarily be deranged, as would be the markets into which credit entered largely.

然而，证券被强制性减少到设想的额度，无疑会减轻黄金外流的压力，且可能避免黄金的外流；但由于导致黄金外流的情况错综复

杂，这里所假设的措施是否足以制止这种外流是颇为值得怀疑的。我确信，即使这种措施可行，也不足以制止黄金外流；而且我怀疑这种措施是否可行。董事们在充分意识到采取预防措施的重要性后做出了种种努力，尽管贴现率有所提升，各类票据的期限也得到了重新规定，但证券不仅没有如我推测的那样在分离制度下减少3,000,000英镑，实际上反倒增加了3,000,000英镑，部分是由预付了亏空款项造成的。由于可自由支配的资本缩减了3,000,000英镑，外加实际预付的3,000,000英镑，便会出现6,000,000英镑的差额。公众持有的可利用资本数量骤然减少，必然导致公众的严重不便。恰如信贷在市场上大量增加一样，这必然会扰乱信用状况。

But great as might be the inconvenience, it ought to be submitted to rather than that the Bank should fail in its engagements.

但是，尽管造成了巨大不便，却应当加以忍受，英格兰银行则不能爽约。

What I wish to impress by this view is, that by the separation, the banking department would not have time to judge of the nature and probable extent of the drain, but must take forcible measures for self-preservation upon the first manifestation of it. And with only such a proportion of treasure, that is, of bank notes and coin, as has hitherto been supposed necessary to allot to it, the chances are, tha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s occurred in 1839, (as also, indeed, in 1835 and 1836,) the measures to be taken to arrest a drain, however prompt and forcible, might not be effectual in sufficient time to prevent a suspension of payment by the banking department; while, by the time gained under a system of union, and

the aid to the treasure of the deposit department by gold obtained from the circulating department, the pressure might be greatly diminished, and eventually got over, without any inconvenience to the public.

我希望借此观点让大家明白，发行部与银行营业部分离时，银行营业部将没有时间判断黄金外流的性质和可能的程度，但是必须在一出现黄金外流的倾向时就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自我保护。如果银行营业部门仅有少量储备，即只拥有银行券和硬币，这些还是迄今为止人们认为必须分配给营业部门的，很可能就像在1839年那样的情况下（以及像在1835年和1836年那样的情况下），不管其采取的制止黄金外流的措施多么迅速和有力，都不可能及时而有效地制止银行营业部的暂停支付；而两部门联合在一起的管理体系则可以赢得时间，从发行部门得到的黄金可用来支持存款部门，由此可能会极大地减轻黄金外流的压力，并最终克服这一压力，不给公众带来任何不便。

But then again comes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security that the pressure would be eventually got over, and the convertibility of the paper preserved?

但问题又来了，到底有多大把握最终能克服压力并维持纸币的自由兑换？

I have on this point only to refer to the opinions which I have on former occasions expressed, and which all the additional light since thrown upon the subject by the mass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Reports of the Committees on Banks of Issue, and by the currency pamphlets, and, above all, by recent experience, has

tended to confirm and strengthen.

对此，我只想谈谈我以前表达过的观点，这些观点已经被收录进发钞银行委员会报告中的大量资料以及论述通货的各种小册子中，尤其通过最近的经验被进一步证实和强化。

In a work published in the spring of 1838, [17_3] I took occasion to observe, “that as far as the eventful experience of the last fourteen years, viz, since 1824, can serve as a guide for judgment, there appear to be good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not less than 10,000,000*l.* can ever be considered as a safe position of the treasure of the Bank of England, seeing the sudden calls to which it is liable.” And two years later, in February 1840, I ventured to suggest the following plan as that according to which, as it appeared to me, the circulation might be conducted with the greatest convenience to the public, and with the least danger to the convertibility of the paper.

我在1838年春天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曾指出 [18_2] ：“若最近14年，即1824年以来的重要的经验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我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既然人们经常突然从英格兰银行提出提款要求，所以应把不少于10,000,000英镑的数额视为英格兰银行货币储备的安全保障。”两年后，即1840年2月，我冒昧地提出了以下计划，在我看来，实施该计划后，纸币发行可以给公众带来极大的便利，而又几乎不会对纸币的兑换构成威胁。

> The plan which I would propose is, that when the tide of the metals sets fully in again, the Bank

rate of discount should be kept so steadily above the market rate, as progressively to reduce the securities through that channel, without increasing them by other investments. The effect of this would be to ensure a replenishment of their coffers to ten million; and with the purpose of endeavouring to preserve that amount on an average, it would not be expedient on the part of the Bank to take any active measures for the increase of its securities. It is not improbable, judging by the strength and fullness of the tide with which the metals have flowed in on some former occasions, *that the amount might thus reach fifteen million,* beyond which, according to analogy from former experience, it is not likely that it would go. The probability is, that in the fluctuations to which our trade, particularly that in corn, is liable, the exchanges would take an adverse turn; bullion would flow out, the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would rise to the Bank rate, and then it would be that the advantage of the large stock of bullion would be felt; because to the extent of five million the foreign exchanges or internal demand might be allowed to operate upon the stock of bullion, without the necessity on the part of the Bank to counteract that demand by any active measures in raising its rate of discount or selling its public securities. The quantity of money in such case in actual circulation would not be reduced, excepting in a small proportion only,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amount of bullion, because the withdrawal of deposits would, under the alight pressure on the

money market which would attend a rise in the market rate of discount to the Bank rate, restore to the circulation an amount of Bank notes nearly equivalent to that which had been in circulation against the bullion taken out.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of the variations in the value of our currency relative to the currencies of other countries, whether originating on this side or the other,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be satisfied by the export of that amount of bullion. If the drain, however, on the coffers of the Bank should, after a reduction to ten million, continue so as to give reason to apprehend the existence of more extensive and deeper seated causes of demand for the metals, measures might be taken for its counteraction, without producing alarm and disturbance of the money market on the one hand, or endangering an extreme and unsafe degree of reduction of the Bank treasure on the other.

“我所提出的计划是，当贵金属的流入再次达到最高点的时候，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应稳定地保持在高于市场利率的状态，从而逐渐减少这一渠道内的证券，而且不通过其他投资增加证券。这么做能保证英格兰银行的金库储备重新达到10,000,000英镑的数额；一般来说，为尽力维持这一数额，英格兰银行采取任何主动措施来增加其证券都称不上权宜之举。根据以往贵金属流入的强度来判断，英格兰银行的储备数额很可能达到15,000,000英镑。从以往经验来看，储备数额是不可能超过这个数字的。结果随着我国贸易的变化，尤其是谷物贸易的变化，汇率将呈反

向变化；金银将外流，市场利率将上涨到英格兰银行利率的水平，由此可知大规模储备金银的益处；因为在5,000,000英镑的限度内，国际汇率或者国内需求可能对金银储备产生影响，而英格兰银行不需采取任何主动措施去提高贴现率或出售公债来抑制那种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实际流通量不会减少，即使减少了，相对于金银储备数量的减少而言也极小，因为在这样的轻微压力下，货币市场的贴现率将上升到英格兰银行的水平，提取的存款会以一定数量的英格兰银行券的形式回归到流通领域，返回的银行券数量几乎与当初被提取后退出流通领域的金银储备相持平。在我国的通货价值相对于其他国家的通货价值发生变化的大多数情况中，不管变化起源于哪一方，很可能国际收支差额要由输出相应数额的金银储备来清偿。然而，如果英格兰银行金库储备减少到10,000,000英镑后还持续外流，那我们有理由认为存在着较为广泛和深刻的原由导致了对贵金属的需求，就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这些措施既不能造成货币市场的恐慌和混乱，也不能使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减少到极其危险的程度。

A latitude for variation between fifteen million and five million would afford a much greater exemption from shocks on the money market than a variation, as it has recently been, between ten million and nothing.

“介于15,000,000英镑和5,000,000英镑之间的变化，与近期介于10,000,000英镑和零之间的变化相比，能更大地免除货币市场的震荡。

That the Bank might, by a regulation of its securities, maintain a high average amount of bullion, such as has here been suggested of fully ten million, cannot admit of any reasonable doubt. And I believe that such a regulation would be more easily practicable than either that of maintaining the securities even, or of preserving the bullion in any given proportion to the liabilities. The money market would be less liable to be disturbed than under either of the two latter alternatives. The utmost alteration of the rate of discount to which the Bank might have occasion to resort would probably not exceed 1 per cent; and the occasions for an alteration even to that extent would probably be rare. A system like this would be less restrictive, that is, the principle of limitation would operate less rigidly under such a regulation of the bullion, consistently with a blending, as at present, of the issue and deposit departments in the Bank of England, than by their total separation. [17_4]

“英格兰银行通过规划其证券发行，也许能保持高水平的金银储备量，例如此处建议的整整10,000,000英镑数量，这是毋庸质疑的。而且我相信，这样的规划调节，无论是与保持证券数量相比，还是与保障金银储备量与债务间的固定比例相比，都更易于实施。比起采用另外两种方法，这样一来货币市场反而较不易受到干扰。英格兰银行能够调整贴现率的最大幅度将不会超过1％；甚至也极少有机会做这个幅度的调整。类似这样的制度限制性较小，也就

是说，在这样的金银储备调节制度下，即像当下英格兰银行合并了发行部门和存款部门的制度下，比把两部门完全分隔开来，限制原则会少一些。”[18_3]

After the lapse of four years since the passage here quoted was written, I see nothing to alter in this recommendation. The treasure has reached the maximum which I had contemplated; and this circumstance will render more practicable any scheme of regulation which should have for its object the maintenance of a high average amount of treasure. The main objection or difficulty in the way of maintaining so large an average amount of treasure as ten million, is in its unproductiveness, and its consequent drawback from the profits of the Bank: but against this consideration must be set the greater security of its position; and, after all, the amount is not larger than any prudent banker would deem it right to hold against liabilities so large and so fluctuating as those of the Bank of England.

此处引用的这段文字成文于四年前，而我不觉得该修改建议的内容。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已经达到我设想的最高限额；这一局面将使目的在于维持高额储备的所有规划调控方案更切实可行。维持10,000,000英镑如此庞大的储备，反对这一点的主要理由或者困难就在于该储备不产生效益，反而会导致英格兰银行的利润下降；但是英格兰银行的地位却会更加安全可靠；况且，任何稳健的银行家，在看到英格兰银行债务数额如此巨大又变化不定后，都不会认为这一储备数额比它应该持有的数额大。

In addition to this objection, which naturally has great weight, I took occasion in the same work, p. 198, from which the foregoing

passage has been extracted, to state another, which, although in my opinion of no real weight, is so specious and popular that the remarks which I then made upon it may be worth here repeating.

除了这样自然很有分量的反对意见外，我借机在同一著作的198页里谈及另一种意见（之前的那段文字也引自此书），尽管我认为其无足轻重，但这些文字浅显易懂又流行，在此值得重复一下我当时发表的观点。

> One among other reasons that might and probably would be urged against any scheme involving so large a reserve of bullion as has here been suggested, rests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attracting of the extra amount must be preceded by, and attended with, an undue and unnatural contraction of the currency, the effect of which would be, a depression of prices to an unnecessary extent.

> “针对任何涉及巨额金银储备的计划，就像这个提出的计划一样，人们很可能会提出另外一些反对意见，其中之一依据的推测是：吸引额外数额的金银储备，定会导致并伴随过度的、反常的货币紧缩，其结果是物价过大幅度地下跌。

> This is a consideration with a view to the public, which, coinciding as the reasoning does with the objection on the score of profit, to a large

reserve, it is probable weighed with the Bank directors in their efforts to stop the influx, and to get rid of what they seem to have considered the excess, of bullion, in the spring of 1838.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flux at that time, Mr. Norman, in the tract before quoted, observed,—

“这是在为公众利益着想，与基于利润方面的考虑而反对巨额储备的意见恰好一致，这种想法可能对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产生过很大影响。1838年春，他们正试图阻止金银流入并摆脱他们似乎觉得过剩的金银储备。关于当时金银的流入，诺曼先生在前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中说道：

It is probable that an increase will be found in the treasure of the Bank, between its lowest amount last spring and the highest just previous to the next turn of the exchanges, of from seven to eight million. Now such an influx of treasure is unnatural, and could never occur with a metallic circulation. Its effects, greater or less in proportion to the error, will be accompan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 depression of prices, unnecessary in extent and continued too long, and finally by a reaction, which will occasion an equally unnecessary and faulty excess on the other. p. 91.

“‘人们很可能会发觉，英格兰银行的金银储备在增加，介于去年春天的低谷储备到下一个兑换期开始

前的最多储备额之间，即从7,000,000英镑增加到8,000,000英镑。金银如此流入是不正常的，在只有金属货币流通的情况下绝不会发生。结果就是，无论错误比例较大或较小，都首先伴随着物价大幅度且长时间的下跌，最后伴随着一种反作用，即几乎是金银储备不必要地、错误地过多流入。’（第91页）

Why such an influx of treasure could never occur with a metallic circulation, or why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unnatural, does not very clearly appear. With our very extended foreign trade, which is habitually conducted on the footing of a large proportion of our exports being on long credits, while our imports are mostly paid for at short dates, and with our present restrictions on the corn trade, there might be, as there have been, on the one hand, large sudden payments abroad requiring a considerable export of bullion before any excess of merchandise exported could bring returns; and,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demand for corn and for other imports, including foreign securities, ceased or abated, the returns for an excess of former exports would be coming forward, and bullion must in that case form, for want of other means, a large part of such returns. Such was the case in 1815-16, in 1820-22, and, excepting as regards corn, such was the case with the influx of bullion in 1826, and in the early part of 1838. If the ports should be shut against the importation of corn for the next two or three years, and, at the same time, from salutary distrust or other causes,

there should be a diminished demand for foreign securities, there is likely to be a strong tendency to an influx of the metals, [17_5] and it is not easy to understand why it should not be equally strong with a purely metallic variation. The Bank of England may doubtless, as in 1836 and 1838, by a competition for the investment of its deposits, create a renewed demand for foreign securities, and so stop the influx of bullion; but so the deposit department likewise might do if its functions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issuing department.

“为什么在仅有金属货币流通的时候金银绝对不会这样流入，或者说，为什么应把这样的现象看作是不正常的，确实搞不懂。我国外贸急剧扩大，通常出口大多借助于长期信用，而进口大多借助于短期信用，而且我国当前对谷物贸易进行限制，这样一来，可能或是已经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可能会产生突然巨额的国外支付，要求在过量出口商品带来收益之前，大量输出金银；而另一方面，当对于谷物以及外国证券在内的其他进口商品的需求停止或减少时，前面过多的出口商品却能带来收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欠缺其他措施，金银储备必然成为这种收益中很大的组成部分。这正是1815年至1816年及1820年至1822年的状况，也是1826年和1838年初金银流入的状况，但这刨除了对谷物贸易的考虑。如果今后两三年中禁止各港口的谷物进口贸易，同时，出于有利的怀疑或其他原因，对国外证券的需求减少，那就很可能会出现贵金属流入的强大趋势 [18_4] 。毫无疑问，英格兰银行能够像1836和1838年一样，通过对其存款的投资来创造对国外证券的新需求，以阻止金

银的流入。但是尽管存款部门的职能和发行部门的职能相互分离，存款部门或许也会这样做。

But it is to the supposed unnatural depression of prices, ascribed as an effect of the contraction of the circulation which is assumed to lead to the influx of the metals, that my remark is directed. This hypothesis rests upon the currency theory of prices, which supposes that the contraction of the circulation, in such a case as that alluded to, reduces prices, and that the reduced prices force an influx of the metals; whereas the contraction, or rather the diminution of the circulation, is in such cases the consequence of a fall of prices from causes arising from the state of trade, and peculiar circumstances affecting the supply and cost of produc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consumption on the other. As to an increased valu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which might be supposed to be the consequence of retaining permanently an addition of fully five million as a reserve in the coffers of the Bank, it would, according to any received grounds of computation, amount to so very minute a percentage, as to have no *perceptible* influence, and may, therefore, safely be neglected.

“但是所谓的不正常的物价下跌，被归因于货币紧缩的影响，这种紧缩被认为是导致我所谈及的贵金属流入的原因。这样的假设是基于通货价格理论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所提到的情况中是通货紧缩导致

物价下跌，物价下跌又造成贵金属流入；然而，通货紧缩，或准确地说，流通货币数量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却是物价下跌的结果，而物价下跌则是由贸易状况导致的，并受特殊环境影响，这种环境一方面影响产品供给和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又影响消费。贵金属增加的价值可被视为永久保持额外的整整5,000,000英镑作为英格兰银行金库储备的结果。根据公认的计算标准，这一增加的价值所占比例极小，以致不会产生可感知 的影响，因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The views which have here been presented for consideration,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 union of the business of banking with that of issue, when conducted by well regulated banks, is calculated to be much more convenient to the public than a separation of those functions.

在此提出的供读者思考的上述看法，引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管理良好的银行指导时，银行业务同发行业务的合并，同把他们的职能分离开相比，预计会给公众带来更多的便利。

Mr. Norman and Mr. Loyd have, very wisely as I think, refrained from committing themselves to any specific plan for carrying their views of the separation of functions into effect. Other writers who have espoused the same views have not been so cautious; and numerous, therefore, have been the schemes which have been proposed for establishing a single source of issue, and, for the most part, a government bank. It is not my purpose to enter into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any of them; but I cannot help remarking that, among those which have come under my notice,

the greater part are crude and undigested, while some of them are so fanciful as to border on the burlesque. I have seen none in which the supposed advantages of the plans sketched out are not greatly exaggerated; while the inconveniences attending so great a change are underrated in the same degree, and in all of them the arguments urged in favour of the proposed alteration proceed upon a complete misconcep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machinery, and the working of the present system, which they seek to displace.

依我所见，诺曼先生和劳埃德先生都非常明智，避谈他们如何实施把银行业务同发行业务分离这一想法的具体计划。其他作者虽鼓吹相同观点，但没有这么审慎；他们提出了许多计划，建议建立一个单一发行机构，而且大多数计划主张建立政府银行。我不打算详尽地考察他们提出的任何计划，但是我不得不指明，引起我注意的那些计划，大部分粗制滥造且毫无条理。其中有些则异想天开，让人觉得滑稽可笑。我发觉这些计划无一不严重夸大了设想的好处，严重低估了伴随着如此巨大的变化给人们带来的不便。在所有这些计划中，那些主张改变的论点都完全误解了他们试图取代的现行体制的本质及其运作情况。

[17_1].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the Committee on Bank of Issue in 1840, instead of expanding so much time upon mere controversial points of definition, and confusing themselves and the witnesses by the ambiguous terms in which the questions were conveyed, did not see fit to examine some both of the West End and City's Bankers and the money-dealers, as to such of the details of their business, without any disclosure of their particular transactions, might have served to explain for what purposes banknotes are used, and how far it would be in the power of the Bank of England to operate directly upon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17_2].This is assumed as the position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n January, 1889, in a paper communicated to me by Mr. Pennington, and inserted in my "History of Prices," vol. iii. p. 279, 283., since reprinted in Mr. Pennington's Letter to Kirkman Finlay, Esq., in 1840, p.97. As I consider Mr. Pennington's knowledge of the principles and working of the currency to be both profound and accurate, and as my

views of the effects of a separation of issue from banking correspond with those which he has stated in the paper here alluded to, I am induced again to insert it, and accordingly refer the reader to it in the Appendix (D.), with the addition of some remarks made by him on the letter addressed to me by Colonel Torrens.

[17_3]."History of Prices," vol. ii. p. 880.

[17_4]."History of Prices," vol. iii. p. 187.

[17_5].The tendency to an influx of the metals from these causes has been so strong, that the bullion in the Bank has exceeded the utmost amount that I had in contemplation as within reasonable probability, being now about 16.000,000*l.* But of this amount there is reason to suppose that about 1,000,000*l.* may be the consequence of the light gold taken out of circulation and replaced by notes.

[18_1].这是彭宁顿先生在给我的一篇论文中所设想的1839年1月英格兰银行的状况，载于我的作品《物价史》第3卷279页至283页，之后又转载于1840年出版的《彭宁顿致柯克曼·芬利先生的信》97页。由于我认为彭宁顿先生对通货原理及通货的运转状况非常了解，对关于银行发行部和营业部分离经营会产生的结果也有真知灼见。我的看法与他不谋而合，故转载至此，读者可参考附录（D.），那里有他对托伦斯上校写给我的信所作的评论。

[18_2].《物价史》第2卷880页。

[18_3].《物价史》第3卷187页。

[18_4].由于以上原因，贵金属流入的趋势一直非常强烈，导致英格兰银行拥有的金块数量超过了我所认为最高的合理数额，达到16,000,000英镑。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其中大约1,000,000英镑可能已经退出流通领域，是用银行券替代的不足值金币。

Summary of Conclusions

结论

The conclusions which I have thus endeavoured to establish are,—

我所力图确立的结论如下：

1．That if a purely metallic currency existed in a country situated as this is, transmissions of the precious metals might and would take place occasionally between this and other countries to a considerable amount (five or six million *at least*), without affecting the amount or value of the currency of the country from which or to which the transmissions were made; and without being a cause or a consequence of alteration in general prices.

1．如果在如我国这样的国家中只流通金属通货，那么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偶尔可能会转移大量贵金属（至少 5,000,000英镑到6,000,000英镑），但这不会影响贵金属流入或流出国家的货币数量和价值，也不会成为总物价变化的原因和结果。

2．That consequently the doctrine by which it is maintained that every export or import of bullion in a metallic circulation must entail a corresponding diminution of, or addition to, the quantity of money in circulation, and thus cause a fall or rise of general prices,

is essentially incorrect and unsound.

2．因此，以下学说本质上是错误且没有根据的。它们认为，在只流通贵金属货币的情况下，金银每次流出或流入都必然引起流货币数量的相应减少或增加，进而导致总物价的下跌或上涨。

3．That the distinction set up by the currency theory between bank notes and other forms of paper credit, is not founded in any essential difference, except in so far as relates to the lowest denomination of notes, which are required in the transactions between dealers and consumers; that is, in the retail trade, and in the payment of wages.

3．根据通货理论建立的银行券和其他形式的信用券的区分标准，并非建立在任何的本质区别上，只适用于最低面额的银行券。这种银行券是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所需要的，也就是在零售业和工资支付中所需要的。

4．That bills of exchange might, but for the obstacle of stamp duties, be extensively substituted in all transactions of purchase and sale between dealers and dealers for bank notes of 10*l.* and upwards, and that, in point of fact, they were extensively so used until a disproportioned duty was laid upon the smaller bills.

4．如果没有印花税的干扰，汇票在商人之间的各种买卖交易中可广泛替代10英镑以及10英镑以上面值的银行券。事实上，汇票一直被广泛使用，直到对小额汇票征税过重。

5．That cheques perform the functions of money as conveniently, in most respects, as bank notes, and more conveniently in many respects.

5．支票行使着货币的职能，在大多数方面像银行券一样方便，甚至在许多方面比银行券使用更方便。

6．That bank notes of the higher denominations are used for peculiar purposes, chiefly in settlements, such as the clearing house, and in sales of landed and fixed property, as regards Bank of England notes; and in the provision markets and cattle fairs, as regards the country circulation; purposes for which substitutes might easily be found if bank notes were suppressed, by bills of exchange, and as regards the settlements among bankers, by exchequer bills, and by what have recently been termed economical expedients.

6．面额较大的银行券会用于一些特定的目的，主要是在清算时，例如，在票据交换所以及地产和不动产的出售中，使用英格兰银行券结算；在粮食市场和家畜市场上，使用地方银行券结算。如果禁止在这些方面使用银行券，汇票则可以很容易地取而代之。至于银行之间的清算，可以采用国库券以及最近被称为经济手段的方法解决。

7．That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is determined by the purposes for which they are required, in circulating the capital, and in distributing the revenues of the different orders of the community, valued in gold.

7．公众手中的银行券数量取决于所需银行券的用途，包括资本流转和以黄金来计算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

8．That it is not in the power of Banks of Issue, including the Bank of England, to make any direct addition to the amount of notes circulating in their respective districts, however disposed they may be to do so. In the competition of Banks of Issue to get out their notes, there may be an extension of the circulation of some one or more of them in a large district, but it can only be by displacing the notes of rival banks.

8．发钞银行无法在其各自的地区内直接增加流通银行券的数量，不管发钞银行多想这样做，也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发钞银行竞相抛出各自的银行券时，在一个大地区内某家发钞银行或几家发钞银行的发行额可能会扩大，但是只有取代竞争银行的银行券后才能实现。

9．That neither is it in the power of Banks of Issue directly to diminish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circulation; particular banks may withhold loans and discounts, and may refuse any longer to issue their own notes; but their notes so withdrawn will be replaced by the notes of other banks, or by other expedients calculated to answer the same purpose.

9．发钞银行无法直接减少流通总量；个别银行或许可以停止发放贷款和贴现，拒绝再继续发行自己的银行券；但由此收回的银行券会由其他银行的银行券取代，或是被能达到同样目的的其他手段所取代。

10 . That it is consequently an error to suppose that, however well informed the country bankers might be of the state of the foreign exchanges, and disposed to follow those indications, they would be able to regulate their circulation in conformity with such views. And that it is equally an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Bank of England can exercise a direct power over the exchanges, through the medium of its circulation.

10．如果认为地方银行很了解国际汇兑的情况，因此有意于按照国际汇兑的状况行事，能够按照了解的情况对其发行额进行管理，那就错了。同样，如果认为英格兰银行可以通过控制发行额直接影响汇兑，这也是错误的。

11 . That neither the country banks nor the Bank of England have it in their power to make additional issues of their paper come in aid of their banking resources. All advances by way of loan or discount, when the circulation is already full, can only be made by Banks of Issue in the same way as by non-issuing banks, out of their own capital, or that of their depositors.

11．地方银行和英格兰银行都不能扩大其纸币的发行额，从而补充其银行财力。一旦流通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发钞银行就只能像非发钞银行那样，用自己或储户的资本，通过放贷或贴现来进行各种预付。

12 . That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do not depend upon the quantity of money indicated by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nor upon

the amount of the whole of the circulating medium; but that, on the contrary, the amount of the circulating medium is the consequence of prices.

12．商品的价格不取决于货币数量，这一数量由银行券的数量显示，也不取决于所有流通媒介的数量；相反，流通媒介的数量取决于物价。

13．That it is the quantity of money, constituting the revenues of the different orders of the State, under the head of rents, profits, salaries, and wages, destined for current expenditure, that alone forms the limiting principle of the aggregate of money prices, the only prices that can properly come under the designation of general prices. As the cost of production is the limiting principle of supply, so the aggregate of money incomes devoted to expenditure for consumption is the determining and limiting principle of demand.

13．货币数量构成了社会不同阶层人民的不同收入，分别被称为地租、利润、薪酬和工资，且用于日常开支。因而货币数量决定了货币总价格的限定原则，只有这种货币价格可以被正当地称为总物价。既然生产成本决定供给，那么用于消费支出的货币收入总额也就决定和限制需求。

14．That a reduced rate of interest has no necessary tendency to raise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On the contrary, it is a cause of diminished cost of production, and consequently of cheapness.

14．降低的利率不一定能够提升商品的价格。相反，降低利率会导致生产成本降低，因此导致物价低廉。

15．That it is only through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the state of credit, that the Bank of England can exercise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foreign exchanges.

15．只有通过利率和信用状况，英格兰银行才能对外币汇兑施加直接影响。

16．That the greater or less liability to variation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constitutes, in the next degree only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onvertibility of the paper and the solvency of banks,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the regulation of our banking system.

16．利率较大或较小的变化苗头，在调整我国银行制度方面都是最值得考虑的因素，其重要性仅仅低于维持纸币的可兑换性和银行的清偿能力这两个方面。

17．That a total separation of the business of issue from that of banking is calculated to produce greater and. more abrupt transitions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in the state of credit, than the present system of union of the departments.

17．发行业务同银行业务完全分离，与把这两个业务联合在一起的制度相比，很可能会促使更大更急剧的利率和信用状况变化。

Postscript

附言

There has recently been a good deal of animation in the markets for colonial produce, attended with a rise in the prices of several articles. And this improvement, and the speculative feeling with which, as usual on such occasions it is accompanied, have been, according to the prevailing doctrine which enters into all the reasoning of brokers in their circulars, and into the accounts furnished to the newspapers, ascribed to the *abundance of money*. Now I would, in the first place, ask those who assign this as the cause of the recent advance of prices to point out a single article in respect of which there are not, in the opinion of persons most conversant with the market, sufficient grounds, by reference to the actual and contingent supply compared with the rate of consumption, to justify a rise of price. A rise, be it observed, from a lower point of depression, in the case of several of the articles, than had ever been known, and in some cases below the lowest cost of production.

近日，殖民地产品市场呈现一派生机，部分产品价格随之上涨。根据经纪人通报和报纸报道中流行的说法，他们往往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出现的投机现象归因于货币的充裕 。那么，首先我将要求那些把货币充裕视为近来物价上涨之因的人指出一种产品，这种产品的价格上涨，在最熟悉市场的人眼里，参照同消费比率相比较的实际和偶然的供给情况，并没有充足的理由。有些产品的价格上涨，如果能被观察到的话，是从萧条时期的较低点开始的，而另外一些产品的价格上涨，是从低于最低生产成本开始的。

During the great and long continued fall, the dealers both wholesale and retail, and the manufacturers, having been repeatedly disappointed, by finding the price give way after they had got into stock, became disposed to run off their existing stocks before they re-embarked in fresh purchases. From the extensive prevalence of this disposition, there has been, in some of the leading articles of merchandise, a great reduction of stocks, both of raw produce and of finished goods, in the hands of dealers, and manufacturers, and shopkeep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unprecedentedly low prices had extended the consump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ttention being at length drawn to this state of things, and confidence being acquired that prices had seen their lowest, a general disposition has naturally arisen to get into stock. Now it must be clear that, if a disposition among dealers and manufacturers to get out of stock is attended, as it is known to be, with dull and declining markets, a disposition to replenish their stocks when greatly reduced cannot fail of having an opposite effect. And as they erred in too confident an anticipation of a further fall of prices, they are liable to err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在价格大幅度且长期持续下降期间，包括批发商和零售商在内的所有商人和制造商们一直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发现进货后价格一再下跌，于是他们倾向于在开始新一轮货物购入前，处理掉手中的存货。由于这种倾向普遍存在，商人、制造商和店主们手中一些主要商品的原料和制成品库存已大幅度下降；同时，这种史无前例的低价也影响到国内外的商品消费。注意到这种情况，价格降至最低点，所以他们又都恢复了信心，于是又很自然地倾向于增加进货。很明显，若是如我们所了解的，商人和制造商倾向于在市场萧条和衰退时处理存货，那么当库存大幅减少，他们便倾向于补充存货，这必然产生相反的作用。正如他们过于自信地错误预期价格会进一步下降那样，他们也很

容易犯相反的错误。

That some rise of price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is a necessary result, must be obvious. The degree of the rise must be matter of opinion, in the exercise of which there must be much latitude for miscalculation, till it be brought to the test of facts, viz, the supply and the consumption; the demand by consumers being the ultimate limit to the returns to be received by the wholesale purchasers, whether manufacturers, dealers, or speculators.

在此情况下，显而易见的是价格的必然上涨。至于上涨幅度，人们各持己见，在按照自己的看法来行事时，他们必然还会产生更多的判断失误，直至得到事实的检验，即供给和消费的检验；无论大买主们是制造商、商人还是投机者，消费者的需求最终决定着他们的收益。

If, therefore, there be, as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re is, in every instance of the recent rise of prices, a sufficient, or, at least, a plausible, reason for it on the plain mercantile ground of supply compared with consumption, why call in the aid of abundance of money, meaning the low rate of interest, as a cause originating or even contributing? And why, if the low rate of interest is the present *stimulus* to purchases, did it not *stimulate* dealers and speculators a twelve-month ago, when the rate of interest was as low as it is now, or only six months ago, when there was not a trace of a speculative tendency in the markets for commodities? or why, above all, did it not operate in deterring the dealers and manufacturers from getting out of stock, and in thus arresting the decline of prices which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corn) took

place nearly, *pari passu* , with the fall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or as it would in the modern use of the word be called, the increasing abundance of money from 1840 to the summer of 1843?

因此，如果在最近物价上涨的每时每刻，都能从供给与消费的明显对比中，确定无疑地为这种上涨找到一个充足或至少说的过去的理由，又为什么还要说是货币充裕及其导致的低利率引起了价格上涨呢？而且，如果说低利率是目前刺激 购买力的因素，那它为什么在一年前，当时利率同现在一样低的时候，或是仅仅半年前，商品市场上没有怎么没出现投机迹象的时候，对商人和投机商没有刺激 作用呢？尤其是，为什么低利率没有阻止商人和制造商处理存货，进而阻止价格的下跌呢（谷物价格除外）？从1840年至1843年夏季，这种价格的下跌几乎与利率的降低同时发生，或者用当今较流行的说法，是与货币的日益充裕同时发生的。

I have just now before me some of the circulars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brokers in the markets for colonial produce; for it is in these that the recent advance of prices has given occasion to the supposition that what is called the abundance of money has been the cause of the rise. And it is not a little amusing to observe, that while the writers of the circulars think it incumbent upon them, according to the prevailing fashion, to ascribe considerable influence to the abundance of money, the information which they convey, respecting each of the articles that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advance, is quite decisive in proving that the recent rise of price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low rate of interest, but is in each instance amply justified upon the simple and obvious ground of a diminution of supply and an increase of the consumption.

我手头恰有几份从殖民地产品市场上的大经纪人那儿弄来的通报；就是在这些通报中，他们认为近期物价上涨是所谓的货币充裕导致的。非常可笑的是，虽然这些通报的作者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根据流行趋势把价格受到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货币充裕，但他们在通报上所传递的信息都十分明确地证实了，近来价格的上涨和低利率毫无关系，反而他们提供的每一种情况都表明，价格上涨完全是由供给减少而消费增加这个简单原因造成的。

So striking and whimsical is this exhibition of the prevalence of what may be called currency pedantry, that although a detailed reference to actual or comparative prices, and the state of markets, formed no part of my plan in this publication, I am induced to give the following brief view of them, as showing how little they bear out the opinion expressed in the circulars, that it is the abundance of unemployed capital that has led to the investments in commodities.

通货学说迂腐但很流行，这很不可思议，我本来不打算在本书中详细谈论实际价格或比较价格以及市场概况，但现在却不得不简要地谈谈这些情况，借以表明它们并没有证实通报中所提出的看法，也就是说正是充足的游资导致了对商品的投资。

In a circular dated 2rd March, 1844, full of just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of the position of the markets for transatlantic produce, the details relative to that position are prefaced by the following remarks:

1844年3月2日的一份通报中，都是关于美洲产品市场状况的精

准信息，在详尽地描述这种状况之前，是下面这样一段评述：

> A very large amount of capital, both here and on the Continent, has been employed in the purchase of goods, and almost every article in the Colonial market has already felt the influence of it. *These operations have not altogether been influenced by any calcul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but were entered into from a conviction that the lowest point of depression had been reached, and that the abundance of unemployed money and the improved condition of trade were at length about to cause a general advance in prices.* This effect has been partially attained; during the past fortnight an increased value of from ten to fifteen per cent. has been realised upon coffee, sugar, rice, and many minor articles, and more animation has been witnessed in Mincing Lane than has existed for the last ten years.

> “这里与欧洲的巨额资本都被用来购买货物，殖民地市场上几乎每件商品都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影响。这些购买活动未受到任何有关供需预测的影响，人们深信经济萧条已经到达最低点，充足的游资和贸易状况的好转最终可能促进物价的普遍提高 。这一作用已经部分实现了。在过去的两个星期，咖啡、糖、稻谷和许多其他次要商品的价格已经上涨了10%到15%；在明辛街，贸易要比过去十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a decided movement has commenced, and that, from many circumstances, it bears the probability of further extension. The great commercial difficulties under which nations have laboured have been mainly surmounted;—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Great Britain has been materially improved,—money is still very abundant, and the Bank coffers are full of bullion. All public funds have increased in value, and investments in railway securities (from their magnitude a most important item) have become less eligible, owing to their advanced price. *It was therefore almost an inevitable consequence, that articles of foreign merchandise which bore so depressed a value should attract money to them; and if the operations are confined within reasonable bounds, they seem legitimate enough, but it will become important to keep a watchful eye on the money market* .

“不可否认，一种明显的变化过程已然开始，根据诸多情况来判断，它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各个国家基本走出了所经历的巨大的商业困境；大不列颠的金融状况已有了显著的改善，货币仍然非常充裕，英格兰银行的金银储备也是充足的。所有的公债价格都上涨了，由于铁路债券的价格上涨，对铁路债券投资（从规模分析，这是相当重要的项目）已经变得不大适合了。因此，外国商品价格特别低廉，不可避免地吸引了大量货币；如果这些交易活动被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它们看起来是完全合法的，但我们必须密切关注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 。”

In former times, and in plain mercantile language, the expression of the first sentence would have been simply, that large purchases had been made, and that prices had risen in consequence—a very natural consequence. But the passage following, which I have marked with italics, exemplifies, in a pre-eminent degree, the tendency to introduce the money market, *à tort et à travers* , into the markets for commodities. If the operations alluded to were not altogether influenced by a calcul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all that could be said of them would be, that they were very silly ones. But it will be seen by the showing of this very circular, that they were very wise ones, proceeding as they are proved to have done, upon a very sound and rational view of supply and demand. Before entering upon the proofs to that effect, I would merely call attention to the last sentence of the above extract, remarking, however, upon it only, that instead of recommending to the operators in the markets for commodities to keep a watchful eye on the money market, the sounder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to shut their eyes altogether to it, but to be wide awake to all circumstances affecting the actual and probable supply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consumption, whether at home or abroad, on the other.

以前，用简明的商业语言来表达，第一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进行大规模购买后结果自然就会导致价格上涨。但接下来的那些我用着重号标示的话，却突出表明，人们现在常常胡乱地 把金融市场引入商品市场。如果所提到的那些购买活动完全不受供需预测影响，那我只能说，购买者都很愚蠢。但是从这份通报中我们将看到，他们是十分聪明的，他们实际上都在根据稳定合理的供需理念进行经营。在论证这一点之前，我只想请读者们注意引用部分的最后一句，不过对此我只想说，我不建议商品市场上的参与者们密切关注货币市场，对他们更为有益的建议，不是让他们完全不理会货币市场，而是让他们一

方面对影响实际和可能的供给情况保持高度警觉，另一方面对国内外的消费保持高度敏感。

The articles alluded to in the circular as having experienced the most decided improvement are, sugar, coffee, and rice, and the following are the statements respecting these descriptions of produce:—

那份通报中提到的价格上涨最为突出的商品是食用糖、咖啡以及稻谷，下面是有关这些种类产品的说明：

> *Sugar*. —There has been a very steady demand for British Plantation sugar throughout the month, and the West India market continuing very barely supplied, especially with good and fine qualities, and the arrivals of East India and Mauritius being very moderate, prices have advanced 1*s.*@ 2*s.* , the greatest rise being on the lower descriptions. An additional reason for this improvement is the large increase of the deliveries for the first two months of this year, which not only exceed the same period both of 1842 and 1843, but are in excess of the imports to this date, by nearly 13,000 tons, thus producing a large decrease of stock; to this circumstance may also be added a general belief that the crop in Jamaica will be deficient. The supplies near at hand are not large, prices consequently, are likely to be well maintained, particularly as consumption is evidently so largely

on the increase.

“食用糖 。对英国种植园生产的食用糖需求整个月来都很稳定，西印度群岛市场上的食用糖供应持续紧张，尤其是优质糖和上等糖供应不足，东印度群岛和毛里求斯的到货数量有限，单位价格上涨了1先令到2先令，价格上涨最多的是劣质糖。价格上涨的另一个因素是到货量在今年头两个月大增，不仅超过了1842年和1843年的同期数据，而且到目前为止几乎超过进口数13,000吨，造成库存锐减；此外，人们普遍认为牙买加的粮食产量会不足。近来供给量不大，因此价格很可能保持稳定，尤其是在消费明显大幅增加时。

The Imports of *East and West India and Mauritius* into Great Britain amounted to 19,000 tons, against 26,500 in 1843, and 19,900 in 1842; the deliveries to 30,800 tons, against 26,800 in 1843, and 21,000 in 1842; and the stock to 29,800 tons, against 39,500 in 1843, and 28,800 in 1842.

“东西印度群岛和毛里求斯 进口到大不列颠的食用糖数量达到了19,000吨，而1843年是26,500吨，1842年是19,900吨；交货量达到了30,800吨，而1843年是26,800吨，1842年是21,000吨；库存达到了29,800吨，而1843年是39,500吨，1842年是28,800吨。”

And the demand for foreign sugars, independent of short stocks relatively to the exports, was increased by a prevailing impression of the chance of a reduction of duty.

人们对外国食用糖的需求增加，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关税有可能降低。这种需求不依赖于相对出口而言稍显不足的库存。

Coffee. —The business in the home market has been very large, the trade having bought extensively. The imports have fallen off, and the consumption has again increased, and as there cannot be any arrivals of importance for some time, there is a probability of still further advance in price, as the rise in the value of foreign descriptions suitable for the home trade will prevent their being brought into competition. Nearly 13,000 bags of *Ceylon* have changed hands, at 65*s.* @ 68*s.* 6*d.* , which is an advance of 2*s.* @ 3*s.* since the first ultimo. In foreign *East India* sorts 3,000 bags of *Java* have been sold at 36*s.* @ 53*s.* ; from 3,000 @ 4,000 bags *Padang* at 26*s.* @ 32*s.* ; and 1,500 bales *Mocha* , at 68*s.* @ 75*s.*

“咖啡 。国内咖啡市场贸易量一直很大，而且贸易范围很广。进口量已经下降了，消费量却再次上涨，且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大量到货，所以价格仍有可能进一步上涨，因为对于适合国内交易的外国咖啡来说，价格的上涨将防止它们受到竞争。将近13,000袋的锡兰咖啡 已经以每袋65先令到68先令6便士的

价格易手，比上个月上涨了2到3先令。在海外的东印度群岛 ，3,000袋的爪哇咖啡 已经以每袋36到53先令的价格成交；3,000到4,000袋的巴丹咖啡则以每袋26到32先令的价格售出；1,500大包的穆哈咖啡 价格是每包68到75先令之间。

A very important speculation has taken place in all descriptions of foreign coffee. It commenced in Holland, and has been extended to London, Hamburg and Antwerp, and will doubtless spread throughout Europe. Statements of an extensive operation were privately put forth in certain quarters as early as the month of November last, and measures were silently prepared which have since been effectually accomplished. Upwards of 300,000 bags (19,000 tons) have been sold here and on the Continent, and an advance of 3*s.* @ 5*s.* has been realized in this market These large transactions appeared rather unexpectedly, for although the stock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were less than it was calculated they would be, coffee had been so long subjected to neglect, that it was not a favourite article.

“针对各种外国咖啡的大型投机活动已经上演。这种投机行为始于荷兰，现扩张到伦敦、汉堡和安特卫普，且毫无疑问将扩散到整个欧洲。早在去年的11月，某些地区便传出小道消息，说是会发生广泛的投机活动，对应方案也在悄悄筹备中，这些方案都卓有成效地落实了。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已销售了超过

300,000袋（19,000吨）的咖啡，市场上每袋咖啡价格已经上涨了3到5先令。而且这些大规模的贸易来的很突然，因为尽管到年底咖啡的库存低于大家预计的数量，但是咖啡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它不是特别受消费者青睐的商品。”

Could there be a better ground for a rise of price than that the stocks were less than had been calculated, and that the article had been long neglected? There seems, likewise, to have been an idea prevalent that some alteration of the duty might take place.

除了库存低于人们预计的数量以及长期被人们忽略以外，还有更好的理由可以解释咖啡价格的上涨吗？似乎人们普遍认为关税可能会发生变化。

Rice.—In common with many articles of extensive general consumption, rice of late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as an object for investment, and large transactions accordingly have resulted therefrom, causing an advance in prices of is. 1*s.* 6*d.* per cwt. The quotations for *Bengal* being now 12*s.* @ 12*s.* 6*d.* per cwt., and Java 9*s.* @ 12*s.* No less than 50,000 bags have changed hands in the course of the month, and the market still presents a buoyant aspect. The imports for the first two-month amount to 11,300 bags, against 27,200 for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 in 1843, and the stock stands at 107,000 bags, against 139,600.

“大米。与许多消费需求广泛的商品相同，作为投资对象，大米近来引起了人们关注，因而引起了大规模交易，使得每英担大米的价格上涨了1先令6便士。现在每英担孟加拉大米的报价为12先令至12先令6便士，每英担爪哇大米的报价为9至12先令。本月成交的大米不少于50,000袋，市场仍然势头看涨。头两个月进口大米数量达到了11,300袋，而1843年的同期数量为27,200袋，库存为107,000袋，而1843年的同期数量为13,9600袋。”

The speculation in cotton, and the rapid rise in the price of that article, took place some months ago, when reports of a deficiency of the crop of 1843 began to gain ground. That the crop has been a deficient one is on all hands now admitted; but as the advance of price had some weeks since reached the utmost height, which, as the result of the conflict of opinions and interests, the deficiency of the crop, combined with a view to the rate of consumption, seemed to warrant, this article has not participated in the animation which is described as prevailing in the markets for several other articles of transatlantic produce.

对棉花的投机行为和棉价的快速上涨数月前就发生了，当时关于1843年棉花欠收的传闻已开始扩散。如今，关于棉花产量不足的消息在各处都已经得到了证实；但是随后几周，棉价已经涨到了顶点，这样的结果要归因于各种观念和利益的冲突，棉花产量的不足以及消费状况，似乎也因此导致了这一商品的价格没有像其他几种美洲产品一样上涨。

It would weary the reader to go on with a statement respecting

other articles which had risen in price. Suffice it to say that there is not one, as to which it is not proved, that, upon the principle of supply and demand, there has been clearly a ground for some advance, and in no one does the rise of price hitherto appear to have been unreasonable.

继续列举其他价格上涨的商品，会令读者感到厌倦。只要说明没有一种商品，尚未被证明其价格的上涨是不受供求关系原理影响的，指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产品的价格上涨是没有道理的，就足够了。

While Indigo, of which the crop is reported to be unusually large, has of late experienced a fall of upwards of 20 per cent.

另外，据报道，靛蓝的产量普遍比往年要大，因此后期价格下跌了20%以上。

At the same time, several important articles, such, among others, as those of Baltic produce, are in a perfectly quiescent state.

同时，一些重要商品的价格，比如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产品的价格，则处于完全静止不变的状态。

I will only further give an extract from another price current, dated 5th March, 1844, for the purpose of a remark which I shall have to make upon it.

我将进一步摘引另一份市价表上的一段文字，其标记日期为1844年3月5日，并以此为基础做出评论。

> We confess it was always matter of surprise to us to see coffee so long and so fearfully depressed, not being like many things which are deteriorated by keeping; this, on the contrary, improves. *The abundance of money having at length caused the attention of capitalists to be turned to goods,* coffee has been one of the favoured articles; the speculation commenced abroad, but its influence was soon communicated to our market, causing, as before noticed, a rapid and great advance. The bulk of the transactions here have comprised Brazil and St. Domingo. The impression of many is that prices will be forced up still higher; and this, is more likely to be the case, if, as is stated, the small merchants and shop-keepers abroad are entirely bare of stock.

> “咖啡与许多易腐蚀产品的价格不同，其价格长期低迷，这让我们很惊讶；反过来现在情况正在好转。货币充裕终于使资本家把注意力转向了商品，咖啡就是一直受到人们钟爱的商品之一；对咖啡的投机行为从国外开始，其影响很快就扩散到国内市场，这导致了咖啡价格快速大幅提升。在此进行的大宗交易已经扩展到巴西和圣多明哥。许多人认为，价格还将被拉得更高。如果如传言所说，国外的小商人和小店主完全没有存货，这种价格的上涨就更有可能发生。”

Here, again, we have the money market gratuitously brought in. It was not the abundance of money that dire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capitalists* (as it is becoming the fashion to call wealthy merchants), but the low price and long previous neglect of the article. But what I have principally to remark upon is, the observation in the above extract,—that the small merchants and shopkeepers abroad had become bare of stock. This process of getting out of stock by the dealers commonly accompanies, and is both cause and effect of declining prices when supplies have increased or consumption fallen off for some length of time, beyond the expectation of the dealers; till stocks have diminished, and consumption has increased, when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m, and a re-action is the consequence.

在此，我们把货币市场又一次毫无道理地牵扯进来了。不是货币充裕引导了资本家 （对富商更加时尚的称呼）的注意力，而是低价和长期对这一商品的忽视。但是我所要着重评论的是以上引文中的这样一种言论：国外小商人和小店主的库存几近为零。如果商品供给增加或消费减少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超出了商人们的预期，他们通常会处理掉库存，这既是物价下降的原因，也是结果；直到存货减少、消费增长，这一过程才会停止，届时注意力被吸引过来，才会导致反作用。

The best informed merchants and dealers are commonly the first to have their attention so drawn; and, as in the case of the large coffee speculation, which has had its origin in Holland, the parties to it having, the most extensive correspondence on the Continent; were the best calculated and most likely to obtain information, and to act successfully upon it, respecting an article,

the supplies of which are derived from many sources, and the stocks and consumers of which are spread over the whole civilised world. They have thus anticipated the smaller merchants and dealers, as is mentioned in the circular. It is not their abundance of capital that directed their attention, for of capital they have long had abundance, but their attention being habitually engaged in the article, they must have been collecting information respecting it for some time, till they became assured that the consumption at the existing prices, which were below the cost of production, was rapidly gaining ground upon the supply; and when they became so assured, they acted upon that view, as they would equally have done, whether the interest of money had been 2 per cent or 5 per cent. The only difference that this makes is, that, in a small degree, they may be induced to realise by re-sale at a lower price than if the cost had been somewhat raised by the charge of higher interest.

信息最灵通的商人们通常最先被吸引；正如在对咖啡进行大规模投机的情况下，这种投机行为从荷兰开始，投机商们在欧洲大陆拥有最广泛的关系网；他们既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有可能获得某种商品的信息的人，因此他们在投机活动中获得成功，毕竟这种商品符合多渠道供给的特征，其库存和消费者遍布于整个文明世界。故而正如通报中所提，这些商人们比小商人们抢先一步。并不是资本充裕引导了他们的注意力，而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资本早就很充裕，且持续关注某种商品。他们肯定一直都在收集有关这一商品的信息，直至他们确信，消费正在以低于生产成本的现价快速与供给持平为止；等他们确信了这一点，他们就会据此行事，无论货币的利息是2%还是5%。因为利率高低造成的唯一差别就是，低利率时商人们以低价位转售，而在高利率时他们转售的价格较高，因为高利率或多或少提升了成本。

I have been induced to notice this point at some length,

because I am convinced that opinions like those contained in the extracts which I have quoted are calculated to mislead, by inducing, in those to whom they are an authority, a reliance upon a supposed general cause, which has no existence, to the neglect of the more correct rule of reasoning and acting, according to the best information as to the actual and contingent supply and the rate of consumption. It cannot be too often repeated, that abundance of money in the hands of capitalists is in itself a cause of cheapness, while abundance of money in the hands of consumers is a cause of dearness.

我之所以详尽地讨论这一点，是因为我确信，像我引用的那些文摘中陈述的观点可能会误导别人，使那些坚信这些观点的人相信这种本不存在的、假想的一般性原因，而忽视更为正确的推理和行动准则，它们才是根据实际供给和消费的最可靠的信息得来的。我们再怎么重复都不为过的是，资本家手中的货币充裕是导致物价低廉的实质原因，而消费者手中的货币充裕则是导致物价高涨的原因。

There is one other remark suggested by the accounts in the Circulars, of the animation which prevails in Mincing Lane, and that is, that the speculation which has attracted most attention, namely, that in coffee has had its rise in Holland, and has extended in its effects to other towns on the Continent, as well as to this country; the prices abroad, however, being full as high as *here* , or, if anything, higher. And I understand that, in the case of nearly all the articles which have recently experienced a considerable advance in this country, the advance on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is in fully the same, if not in a greater proportion. And, generally speaking, prices on the Continent, I mean of articles of consumption of its population, are fully as high in proportion as they are here, bating

corn and such other articles as are subject to high or prohibitory duties in this country. Now, according to the currency theory, prices abroad ought to be depressed, and at a much lower range than they are here, seeing the large quantit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which has been abstracted from them to form the accumulation of bullion now existing in the coffer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在通报的描述中，还有一点要补充，即明辛街的兴旺生意是吸引了大多数人注意力的投机活动，对咖啡的投机活动始于荷兰，随后其影响力扩展到本国以及欧洲大陆其他城镇；然而，国外的咖啡价格完全与本国一样高，甚至有的更高。据我了解，在我国近来价格大幅上涨的所有商品，在欧洲大陆上的物价涨幅不是更高，就是完全与我国相同。一般说来，欧洲大陆所有商品价格，我指所有居民消费品，除了谷物和其他在我国被征收高额关税的商品，其价格完全同这里的商品价格一样高。如今，根据通货理论，国外物价应该下跌，而且应该远低于我国物价水平，因为大量取自国外的贵金属正堆积在英格兰银行金库里，是它的金银储备。

The present state of facts, therefore, may be considered as adding, if any addition were wanting, to the arguments which have in the foregoing pages been adduced to show the unsoundness of that theory.

因此，目前的实际情况可以视作强化了前几页列举的论点，如果这些论点是需要加强的话，它们证明了通货理论是没有根据的。

Appendix

附录

(A.)

（A.）

From a wish not to encumber the argument as stated in the text, to which this is a note, I then abstained from noticing a prepossession or prejudice (besides that of the assumed analogy of a compulsory government paper), which, in the popular view, leads irresistibly to the persuasion, that the quantity of money, according to whatever may be the supposed test of the quantity, must have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The prepossession or prejudice to which I allude, has its rise in the following very specious reasoning.

以下几段文字是对正文的注释，鉴于写作时不想妨碍论证的进行，我回避了成见或是偏见（提到的只有认为强制流通的政府纸币与银行券类似这种偏见），这种偏见会使老百姓不由自主地认为：货币的数量，不论依据什么标准进行检验，必然会直接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我提及的这种偏见，依据的是以下几种似是而非的推理。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depend upon supply and demand; now, given the supply, prices depend upon the demand. But money

is the instrument of demand; therefore, any increase of money must be an increase of demand, and must consequently raise prices; and as bank notes are by the definition money, an increase of bank notes must increase the demand for, and raise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商品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如果供给条件确定，价格则取决于需求。但是货币是需求的手段；因此，货币出现的任何增长必定会引发需求增长，也必然导致物价上涨；根据定义，银行券就是货币，因此银行券的增加必然导致需求增加及商品价格的提高。

The following passage of the late Mr. James Mill's Essay on Political Economy (3d ed. p. 131.) is calculated to countenance this, which, as expressed in these general terms, I cannot but consider as an erroneous view:

已故的詹姆斯•穆勒先生在其《论政治经济学》（第3版，第131页）一书中写下了支持上述观点的文字，他使用普通语言所表达的观点我不敢苟同：

> It is not difficult to perceive that it is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money in any country, which determines what portion of that quantity shall exchange for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goods or commodities of that country.

“不难看出，对于任一国家，正是其货币总量决

定了其中多大部分可用于该国某一部分货物或是商品的交易中。

If we suppose that all the goods of this country are on one side, all the money on the other, and that they are exchanged at once against one another, it is obvious that one tenth, or one hundredth, or any other part of the goods, will exchange against one tenth or any other part of the whole of the money and that this tenth &c., will be a great quantity or small exactly in proportion as the whole quantity of the money of the country is great or small. If this were the state of the facts, therefor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value would depend wholly upon the quantity of it. It will appear that the case is precisely the same in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facts.

“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国家所有的货物都放在一边，而所有的货币都放在另一边，他们立即进行交换，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货物的十分之一或是百分之一，或是任何其他部分，将交换到同样比例的货币份额，而且这样的比例所包含的数量多少与该国货币总量的多少成比例。如果这就是实际情况，那么显然，货币价值完全取决于货币数量。似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Mr. Senior, in one of his lectures on the value of money, and in the article of the Edinburgh Review, which I have before referred

to, has commented on the above passage in Mr. Mill's essay, and pointed out the fallacy of it, in overlooking the consideration, that it is the cost of product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 and not their quantity, which constitutes their value, and determines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st of production of the latter measured in metallic value.

西尼尔先生在一篇有关货币价值的讲演，以及在我前面提到过的一篇刊发在《爱丁堡评论》上的文章中，均对穆勒先生论文中的以上段落进行了评论，指出了其谬误所在，即他忽略了这一点：恰恰是贵金属的生产成本而不是数量构成了它们的价值，并决定了各种商品的价格，而商品的生产成本又是以贵金属的价值来衡量的。

Mr. Mill, however, in a subsequent passage, page 167, illustrates his view by a hypothetical case. “Suppose,” he says, “the market to be a very narrow one, of bread solely on the one side and money on the other. Suppose that the ordinary state of the market is one hundred loaves on the one side, and one hundred shillings on the other, the price of bread accordingly a shilling a loaf. Suppose,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quantity of loaves is increased to two hundred, while the money remains the sam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price of the bread must fall one half, or to sixpence per loaf.”

然而，穆勒先生在第167页的一段文字中，以一种假设的例子说明了他的观点。他说，“假设市场非常狭小，一边只售面包，另一边只有货币。假设市场的常态是一边有100个面包，另一边有100先令，那么，面包就是1先令1个。假设在这些情况下，面包的数量增加至200个，而货币数量不变；很明显，面包价格必然下降一半，即降到6便士一个。”

It should seem from this last passage that Mr. Mill had so far qualified, or perhaps, more strictly speaking, lost sight of the view conveyed by the former passage, as to confine the supposition of the quantity of money affecting prices, to that which was in the pockets or hands of the consumers, going to market to supply their immediate wants. And to this limited extent it may be admitted that the quantity of money has an influence on prices. But, so limited, this proposition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doctrine of the currency theory, which ascribes an influence to the quantity of money indicated by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in circulation, or by the whole of the circulating medium.

从穆勒先生所表述的最后一段文字来看，他似乎加上了限制条件，或者更为严格地说，前面段落表述的立场不见了，他把影响物价的货币数量限定在消费者口袋里或是手中持有的、准备用于市场交换以满足直接需求的货币数量。在这一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承认的是，货币数量影响物价波动。但在这样的限制下，穆勒的观点与通货原理大相径庭，因为该原理认为，影响物价的货币数量是指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或全部流通手段所表示的货币数量。

(B.)

（B.）

The expression in the text respecting the power of purchase by persons having capital and credit may require some explanation, which I have here accordingly to give, accompanied by an

illustration of my meaning by reference to actual occurrences. What I mean to say is, that a person having the reputation of capital enough for his regular business, and enjoying good credit in his trade, if he takes a sanguine view of the prospect of a rise of price of the article in which he deals, and is favoured by circumstances in the outset and progress of his speculation, may affect purchases to an extent perfectly enormous compared with his capital. The conditions requisite are that the market should be a large one, and the article susceptible of great fluctuation of price, from political or physical causes; and, in fact, it is only articles of this description that are the subject of speculations sufficiently extensive to attract notice. I propose to exemplify this by what occurred in the Tea trade in 1839, when the disturbances in China broke out; and by the speculation in the Corn trade between 1838 and 1842.

正文中提到了拥有资本和信用的个人的购买力，对此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这里我将参照实际情况举例说明。对于那些拥有充足资本来开展正常业务而且在交易中享有良好信誉的人来说，如果对他所经营的商品价格上涨持乐观态度，且这样的看法在其投机之初和进展中得到印证，那么他的购买活动就会受到影响，其购买活动与资本相比甚至达到非常巨大的程度。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市场应该是十分庞大的，而且商品价格随着政治或自然原因会有大幅度的波动；事实上，只有这类商品才是足以吸引商人注意力的投机对象。我想以1839年的茶叶贸易中发生的情况（当时中国爆发动乱）以及1838至1842年间谷物贸易中的投机活动为例，对这一点进行阐述。

Among the earliest speculations for an advance in the price of Tea, in consequence of our dispute with China in 1839, were several retail grocers and tea dealers. There was a general disposition among the trade to get into stock, that is, to lay in at

once a quantity which would meet the probable demand from their customers for several months to come. Some, however, among them, more sanguine and adventurous than the rest, availed themselves of their credit with the importers and wholesale dealers for purchasing quantities much beyond the estimated demand in their own business. As the purchases were made in the first instance ostensibly, and perhaps really, for the legitimate purposes, and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ir regular business, the parties were enabled to buy without the condition of any deposit; whereas speculators, known to be such, are required to pay 2*l.* per chest, to cover any probable difference of price which might arise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prompt, which, for this article, is three months. *Without, therefore, the outlay of a single farthing of actual capital or currency in any shape,* they made purchase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and, with the profit realised on the resale of a part of these purchases, they were enabled to pay the deposit on further quantities when required, as was the ease when the extent of the purchases attracted attention.

1839年我国与中国发生了争端，预期茶叶价格会上涨，一些零售商和茶商便最先开始投机活动。行业中存在一种囤货的普遍倾向，即一次性地备足未来几个月内客户可能需求的货物。然而其中有些商人比其他人更乐观且更富有冒险精神，利用他们在进口商和批发商那里的信用度，购置远远超过他们自己生意中预估需求的货物。由于这样的购买活动起初是公开的，或许确实是出于合法目的，并且在他们常规的生意范围内，因此他们不需要支付定金就能够进行购买；而那些众所周知的投机商则被要求在这种商品3个月的付款期限到来前，每箱支付2英镑以补偿任何可能出现的差价。因此，不用支付任何形式的实际资本或流通货币 ，他们就购买了大量的茶叶；而用转手一部分茶叶所得的利润，他们就能为购买更多的茶叶支付保证金，而且通常是在购买数量很大，引起人们注意时，才被要求支付保证金。

In this way, the speculation went on at advancing prices (100 per cent and upwards), till nearly the expiration of the prompt: and if at that time circumstances had been such as to justify the apprehension, which at one time prevailed, that all future supplies would be cut off, the prices might have still further advanced, and, at any rate, not have retrograded. In this case, the speculators might have realised by sales, if not all the profit they had anticipated, a very handsome sum, upon which they might have been enabled to extend their business greatly, or to retire from it altogether, with a reputation for great sagacity in thus making their fortune. But instead of this favourable result, it so happened that two or three cargoes of Tea which had been transhipped were admitted,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to entry on their arrival here, and it was found that further indirect shipments were in progress. Thus the supply was increased beyond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peculator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umption had been diminished by the high price. There was, consequently, a violent reaction on the market: the speculators were unable to sell without such a sacrifice as disabled them from fulfilling their engagements, and several of them consequently failed. Among these, one was mentioned who, having a capital not exceeding 1200*l.* , which was locked up in his business, had contrived to buy 4000 chests, value above 80,000*l.* , the loss upon which was about 16,000*l.*

就这样，投机活动在物价上涨（上涨幅度达100%或更多）的情况下，一直持续到付款期限几乎到期为止：如果在付款期限到期时情况一直如此，则印证了以下这种看法是合理的，即未来所有供给将被切断，物价仍会进一步上涨，且无论如何都不会回落。在这种情况下，投机者本可通过销售茶叶实现目的，即使不能获得预期的全部利润，也能得到一笔不错的收益，有了这笔钱就更能扩大他们的生意，

或干脆抽身不干了，还得到个有远见能赚钱的美名。但是这种有利的结果没出现，反倒与期望相反，恰巧有两三船转运的茶叶刚一抵达就被允许进港，还发现有更多的茶叶在间接运往这里。因此供给增加，超过了投机者的预计；同时，消费也因高价而减少。所以，市场上价格暴跌：投机商们不亏本就卖不出去茶叶，以致他们无法偿债，有些人还因此破产了。这其中有个人要提及，他拥有的资本不超过1,200英镑，全投入到茶叶生意了，设法购买了4,000箱茶叶，价值超过80,000英镑，由此所受的损失达到16,000英镑。

The other example which I have to give is that of the operation on the corn market between 1838 and 1842. There was an instance of a person who, when he entered on his extensive speculations, was, as it appeared by the subsequent examination of his affairs, possessed of a capital not exceeding 6000*l.* , but, being successful in the outset, and favoured by circumstances in the progress of his operations, he contrived to make purchase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when he stopped payment his engagements were found to amount to between 500,000*l.* and 600,000*l.* Other instances might be cited of parties without any capital at all, who, by dint of mere credit, were enabled, while the aspect of the market favoured their views, to make purchases to a very great extent.

我要举的另一个例子是1838年到1842年间谷物市场上的投机行为。有这样一个人，涉足了广泛的投机行为，随后的调查发现，他只有不超过6,000镑的资本，投机初期是成功的，投机的过程也进展顺利，他便想法子大肆购买谷物，以致当他停止支付时，发现债务已达到了500,000英镑到600,000英镑。其他可举的例子，是完全没有任何资本的人，他们仅仅凭信用进行投机活动，在市场条件支持他们时，他们就可以大规模地进行购买活动。

And be it observed, that these speculations involving enormous purchases, on little or no capital, were carried on in 1839 and 1840, when the money market was in its most contracted state; or when, according to modern phraseology, there was the greatest scarcity of money.

应注意，这些以很少的资本或零资本进行巨额购买的投机行为发生在1839年至1840年期间，当时的货币市场正值最紧缩的阶段；或者根据现代的说法，当时货币极其稀缺。

(C.)

（**C.**）

It is not easy to imagine a view less reconcilable with a correct appreciation of the state of things as regards pric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in 1839, than is contained in the following question and answer in the examination of Mr. Norman by the Committee on Banks of Issue, the material fact being admitted, *that prices were firmly maintained at that time, notwithstanding an advance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to 6 per cent:*

假如我们承认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尽管当年利率上涨了6%，但物价仍保持稳定 ，那么，对于正确理解1839年物价与货币流通情况的关系而言，很难想象出有比包含在下面的问答中更错误的观点了，这些是由发钞银行委员会对诺曼先生进行调查时的问答：

1926．*Chairman* ．Were not, generally,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in 1839 maintained during that period *by those issues of the Bank,* in defiance of their rule? Ans. I believe that prices were very firmly maintained during 1839; but I believe also that the restrictive measures of the Bank had an effect upon prices; because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exportat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 was by no means equal to the demand for extra-foreign payment; and in explanation I would say that I apprehend the foreign payment for corn from the autumn of 1838 to have been fully ten million sterling, and I cannot trace an exportation exceeding about six or seven million.

“1926．主席——一般来说1839年间商品的价格不是因那些不服从规定的发钞银行　　而保持不变的吗？答：我相信1839年物价保持得很稳定；但是我也相信，英格兰银行的限制性措施对物价有影响；因为我确信贵金属的出口绝对不能应对超额的国外支付需求；作为解释，我得说，我担心自1838年秋季来针对谷物的国外支付已经完全达到了10,000,000英镑，而我没能查到过超出6,000,000到7,000,000英镑的出口记录。”

The version in the answer of Mr. Palmer to the question, subjoined, conveys, as it strikes me, the correct view:

在我看来，帕尔默先生对此问题追加回答倒是传达出了正确的观

点：

1473．*Chairman*．If more stringent measures for the purpose of reducing the accommodation to the commerce of this country had been taken (in 1839), would not prices necessarily have come down, and exports thus have been increased for the purpose of meeting the foreign payment? Ans. I think it is very doubtful, from the extent and power of capital in this country, and the diminished stocks of goods then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merchants, whether that result could have been attained.

“1473．主席——如果（在1839年）为了减少商业贷款而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那么物价就不一定会下跌，这样能增加出口以满足国外支付需求吗？答：我认为，从我国的资本数额和实力以及商人拥有的库存减少的趋势来看，是否能达到那一结果很值得怀疑。”

(D.) Paper Communicated by Mr. Pennington

（D.）彭宁顿先生的投稿

It has been proposed that the business of the Bank shall be separated into two distinct departments, one to be called the circulation

department, the other the deposit department; that the circulating department shall hold a fixed and unvarying amount of securities, and that its functions shall be confined solely to the exchange of gold for notes, and of notes for gold; and that the deposit department shall manage the funds intrusted to it on the ordinary principles which are observed by the London bankers, and independent of the promissory note department.

“一直有人提议，英格兰银行的业务应该分由两个独立的部门负责，一个称为发行部门，另一个称为存款部门；发行部门应持有固定不变的证券，其职能仅限于黄金与银行券之间的兑换；而存款部门则应基于伦敦银行家们所遵守的基本原则管理受托给它的基金，并且独立于期票部门。

It may be worthwhile to inquire, what would be the probable operation of such a plan.

“这一计划可能的运作方式是什么，也许值得研究。

In carrying it into execution, I apprehend, it would be proper, in the first instance, to assign to the deposit department such a proportion of the securities, and of the bullion, in possession of the Bank, as would, together, be equal to the amount of

the deposits. Thus, if the Bank held eighteen million of securities, and nine million of bullion, against eighteen million of outstanding notes, and nine million of deposits, it would probably be deemed expedient to assign to the deposit department six million of securities, and three million of bullion, and to retain in the circulating department six million of bullion, and twelve million of securities.

“我认为进入执行阶段时，首先应该将英格兰银行持有的证券和金银储备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存款部门，且分配的总额应与存款总额相等。这样，如果英格兰银行持有18,000,000英镑的证券和9,000,000英镑的黄金储备，用以抵付18,000,000英镑的公开发行的银行券和9,000,000英镑的存款，那么就应该分配6,000,000英镑的证券和3,000,000英镑的黄金储备给存款部门，并留给发行部门6,000,000英镑的黄金储备和12,000,000英镑的证券。

If such a separation were made, it is obvious, that as the exchange of gold for notes, or of notes for gold, between the two branches, *would not affect the amount of bank paper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nd as such interchange might take place frequently, and to a great extent, *the increase or diminution of outstanding notes would form no certain criterion of the amount of paper circulating out of doors,* unless it were, at the same time, known what amount of notes was held by the department of

deposit.

“如果这样分配，很明显，由于在两个部门之间黄金与银行券的相互兑换将不会影响公众持有的银行券数量，由于这样的兑换可能频繁且大规模地发生，因此，除非有人同时知道存款部门持有的银行券数量，不然已公开发行的银行券的数额增减将不会成为衡量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的可靠标准。

Disregarding, for the present, any objection which it may be supposed would arise from this consideration, let us at once proceed to inquire what effect would be produced by a demand upon the Bank for bullion.

“现在暂时忽略针对这一计划可能引起的反对意见，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向英格兰银行要求兑换黄金储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The action and condition of the deposit department will be more distinctly perceived, if we suppose that, under circumstances above stated, the whole of the three million of bullion are exchanged, on its first establishment, for three million of notes. The position of the two departments would then be as follows:—

“如果我们假设，在上述情况下，存款部门建立之初就把全部3,000,000英镑的金银储备兑换为3,000,000英镑的银行券，那么存款部门的行动和状况便会更加清晰。两个部门的情况将如下所述：

This being the position of the two departments, let us suppose that an adverse foreign exchange has created a demand upon the Bank for bullion for exportation. Now, such a demand for bullion may be satisfied, either by a reduction of the notes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or by a reduction of the deposits at the Bank. If the former, then the separation of the business of the Bank into two departments will have answered the purpose expected from it; if the latter, then, in so for as relates to the increase or diminution of Bank notes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by the ac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no satisfactory result will have been produced. In the latter case, no advantage in the regulation of the circulation will have resulted from the separation.

“两个部门的情况就如此，我们便可假设逆汇兑已创造了对英格兰银行黄金储备的出口需求。现在满足这样一种对黄金储备的需求有两条途径，要么减少公众持有的银行券，要么减少英格兰银行存款。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来满足这样的需求，那么银行业务分成两个部门的做法就会实现预期目的；如果采用第二种方法，那么就公众持有的英格兰银行券的增减而言，国际汇兑的变化不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在后一种情况下，把业务分开管理的做法并不会使货币发行的规范有所进步。

It may, perhaps, be said, that if the business of banking were separated from that of circulation, and conducted in the manner and upon the principles which are adopted by the private bankers of the metropolis, a diminution of deposits would be immediately followed by the sale or realization of a corresponding amount of securities, and thus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in the external circulation, would be reduced to an extent commensurate with the delivery of bullion.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银行的业务同发行业务分离，并按照城市私人银行所采用的方式和原则进行管理，那么存款减少后，相应数量的证券会立即被出售、兑现，在外部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会减少到与金银储备交割一致的水平。

But such a sale or realization of securities, in similar circumstances, may be effected under the present system of management. Whether the existing system be continued, or the business of the Bank be separated into two departments, the sale or realization of securities must depend on the views and the discretion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Bank.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ases is this; that the counteracting effect occasioned by paying out bank notes to the depositors would be limited to three million: upon the present system it may be carried to a much greater extent.

“但是在类似情况下，证券也许会在目前的管理制度下出售或兑现。无论是否维持现有体系，或者把英格兰银行的业务划分为两部门，证券的出售或兑现都必须取决于银行董事们的立场和判断。这两种情况的唯一不同在于，向储户支付银行券的反作用会被限制在3,000,000英镑之内，根据当前体制，这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作用。

It may be observed, moreover, that if the demand for bullion for exportation should exceed three million, and if that demand should fall on the deposit department, that department would be reduced to the necessity, *either of forcibly realizing a portion of its securities, or of stopping payment at a time when the circulating department was abundantly provided with specie.*

“此外应注意的是，如果对金银储备的出口需求超过了3,000,000英镑，且如果这一需求落在了存款部门，那么该部门的金银储备必将减少，要么强制兑现部分证券，要么在发行部门有充足货币的时候停止支付 。

It may be desirable to apply the foregoing principles and observations to the actual position of the Bank, at certain periods, within the last four years.

“也许应该把上述原则和观点应用到英格兰银行过去四年中某个时期的实践中。”

In January 1834 the liabilities and assets were as follows:—

“1834年1月债务和资产情况如下：

If, at that time, it had been determined to divide the business of the Bank into two departments, it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deemed expedient to assign 12,000,000*l.* of the securities to the circulating department, as a fixed amount which was at no future time to be exceeded. The remaining securities would, of course, go to the banking department. The outstanding notes, amounting to 18,236,000 l, would then have for their basis 12,000,000*l.* of securities, and 6,236,000*l.* of bullion. But, as the deposit department would probably prefer notes to gold, on account of the greater convenience of the former, the position of the two departments would have been as follows:—

“当时如果英格兰银行决定将业务一分为二，人们可能会认为应把12,000,000英镑的证券分配给发行部，作为日后不得超过的固定数额。当然，剩下的证券会进入银行营业部。数量达到18,236,000英镑的已发行银行券会将12,000,000英镑的证券和6,236,000英镑的黄金储备作为其基础。但是，存款部门可能会更倾向于收银行券而不是黄金，因为银行券更为方便，这两个部门的情况如下：

The following would have been the position of two branches at the under-mentioned periods:

接下来是下述期间两个部门的情况：

It will be seen, by the foregoing statement, that if the business of the Bank had been separated into two departments in January 1834, and if the rule, which we have supposed to have been at that time established, had, since, been inflexibly adhered to, the paper issues of the circulating department in

July last (1839) would have been less by 2,364,000*l.* than their actual amount at that period, and the cash of the deposit department would have been wholly exhausted. In July 1835 and July 1839 the securities held by the deposit department would have exceeded the aggregate amount of the rest and the deposits. This department could not have held this excess of securities over deposits, unless the circulating department had transgressed the prescribed rule to an extent equal to the amount of that excess.

“由上述内容可见，如果英格兰银行的业务于1834年1月被划分为两个部门管理，并且严格遵守当时我们假设的规则，那么发行部门于1839年7月的货币发行量将比当时实际发行额减少2,364,000英镑，存款部门的现金将完全被兑现。1835年7月和1839年7月，存款部门持有的证券会超过其他项和存款项的总和。存款部门不可能持有超出存款实际数额的证券，除非发行部门违规发行与超出存款量等同的货币。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exhaustion of its cash, the banking department would, no doubt, have endeavoured to withdraw bank notes from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by disposing of a large amount of its securities. A rigid adherence to the rule by the directors of the circulating department, and a due regard to its safety by the managers of the banking branch, would have rendered the amount

of the securities in possession of the latter, in July last, less by three or four million than it appears actually to have been; or, which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t that time would have been three or four million less than it appears to have actually been. The consequence would have been, a very severe pressure on the money market.

“为了阻止现金被提兑一空，毫无疑问，银行营业部门将通过处理掉大量证券的方式竭力从公众手中收回银行券。发行部门经理严格坚守规定，银行营业部门经理适当顾及其工作规则，因此银行营业部门去年7月拥有的证券比其实际持有的数额少3,000,000或4,000,000英镑；或者说，当时公众持有的银行券数量比其实际拥有的少3,000,000或4,000,000英镑。结果可能还会使金融市场压力十分严重。

Hitherto, we have supposed the business of the Bank to be separated into two distinct departments, and a formal apportionment of debts and assets to have been made. Now without such a formal separation and apportionment, precisely the same action upon the currency would result from the strict observance of the following rule; namely, that the Bank shall not, upon any occasion, issue bank notes beyond a certain amount (that amount we have supposed, to be 12,000,000*l.*), except upon the deposit of bullion. If this rule had been adopted in January 1839, and afterwards rigidly adhered to,

a great reduction of the securities held by the Bank would have been necessary, in order to avoid a suspension of the payment of its deposits. It is probable, indeed, that such a reduction of the securities would have arrested the drain of treasure at an early period of the year. If, however, the drain had continued, notwithstanding the reduction, it would have been necessary, in July last (1839), to have carried the reduction to the extent of three or four million below the amount which the Bank actually held at that period.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假设了英格兰银行的业务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部门管理，并对债务和资产进行了正式的分配。现在，如果没有这一正式的分配安排，只要严格遵守下述规则，就可以对通货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也就是说，英格兰银行在任何情况下不可发行超过一定数额的银行券（我们已假设这一数额为12,000,000英镑），除非以其金银储备为基础。如果这一规则于1839年1月采纳，随后被坚决遵守，那么英格兰银行持有的证券必然大幅度减少，以避免其存款支付的停止。如此减少证券的做法确实可能会在今年早些时候遏制银行黄金储备外流。尽管银行减少了所持有的证券，可是如果黄金储备持续外流，英格兰银行必然于（1839年）7月将其持有的证券减少到比它当时持有的数量少3,000,000或4,000,000英镑。

Whether a formal separation of the Bank into two departments take place, or the rule last mentioned be adopted, it may be expected that *the*

public will be exposed to very great alternations of comparative ease and difficulty in the operations of the money market.

“无论英格兰银行是否正式分为两个部门，是否采用刚提及的规则，可以预期的是，公众都要面临货币市场运作中较松和较紧的不断交替。

It may here be proper to observe,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ule above mentioned and that explained by Mr. Horsley Palmer and Mr. Norman in their evidence is this;—that, while the former rule would preclude the Bank from issuing notes in the payment of deposits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is equal, in amount,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mount of notes at any time outstanding and 12,000,000*l.* , plus the amount of bullion in possession of the Bank, the latter would allow the Bank to substitute notes for deposits to an unlimited extent. The former rule would be the same in its operation as a division of the Bank into two departments. The sole effect of the latter would be, the increase or diminution of the aggregate amount of the notes and deposits of the Bank with the increase or diminution of its bullion.

“在此应该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规则和霍斯利·帕尔默先生与诺曼先生在其证明中阐述的内容有所区别：前一种规则会限制英格兰银行为支付存款而发行

的银行券数量超过这样一个限度，即任何时候已经发行的银行券数量和12,000,000英镑加上英格兰银行持有的黄金储备之间的差额；后一种规则允许英格兰银行不受限制地以银行券代替存款。前一规则所起的作用与英格兰银行被划分为两个部门管理是相同的；后一规则的唯一作用是使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和存款的累积量随其金银储备的增减而增减。

There is one point connected with the proposed division of the Bank into two departments to which I have not adverted, but which it may be material to notice.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disposable funds of the banking department, it would be desirable that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capital of the Bank, now lent to the state,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for banking purposes. By this I apprehend it is meant, that a portion of the 3 per cent stock in which the original capital of the Bank is invested shall be sold, and the proceeds of the sale invested in other securities, and in commercial loans and discounts, at the pleasure and discretion of the Bank.

“有一点内容与前面提及的英格兰银行划分为两个部门有关，我还未谈及，但值得关注一下。有人建议，为了增加银行营业部门的可支配资金，应该把英格兰银行目前借给政府的那部分资本用于银行业务。我认为这个建议的意思是，将英格兰银行以原始资本购买的3%的股份出售，所得收益由英格兰银行自主支配，可以投资购买其他证券，发放商业贷款以及进

行贴现。

Of this suggestion it may be observed, that it is a proposal to withdraw a certain amount of funds from the use and employment of one class of persons, in order that it may be transferred by the Bank to the use and employment of another class of persons. By this process no new funds would be created in the money market. The change would be merely the transfer of funds already existing from one kind of investment to another. The operation w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of an individual stockholder who sells his stock in order to employ the money arising from the sale in commercial discounts. The operation of the individual stockholder would, in its consequences, be comparatively of little importance; but if five million of the original capital of the Bank were sold, as has been proposed, and the proceeds of the sale mixed up with and employ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deposits at the Bank, although no greater reserve of bank notes in the banking department, in consequence of this accession of funds, would be necessary, yet the varying employment of funds of such magnitude, during alternate periods of commercial excitement and depression, might produce a prodigious effect upon the general circulation. At one time the additional, fund might be employed in commercial loans and discounts; at another time a great part of it might be withdrawn from the public, and held by the

Bank, in bank notes and specie; thus creating an alternate abundance and scarcity of money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t the pleasure of the Bank.

“可以看出，这一建议旨在从一类人那里抽回一定数额的资金，通过英格兰银行将其转移给另一类人使用。这一过程未使金融市场创造出新资金。单纯把已有资金从一种投资转移到另一种上，这样操作所起的作用类似于股东个人为了进行商业贴现而出售股票所得。从结果上看，股东的个人行为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如前所述，假设英格兰银行5,000,000英镑的原始资本被出售，所得收益与英格兰银行存款混在一起，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尽管银行业务部门的银行券储备不一定随资金的扩充而增加，但是在商业繁荣与萧条交替的时候，如此庞大数额的资金用途也在不断变化，这会对资金的总体流通产生异常影响。在一段时期内，增加的资金可能会用于发放商业贷款并进行贴现。在另一段时期内，大部分增加的资金可能会从公众手中抽回，并以银行券和硬币的方式由英格兰银行持有。由此，英格兰银行便可如愿地制造这样一种现象，即公众持有货币的多少造成盈亏交替。”

Thus far was communicated to me in the paper by Mr. Pennington, and I have now to add the following extract from his letter to Mr. K. Finlay:—

以上就是彭宁顿先生在那篇论文中传达给我们的意思，现在我得从他给K. 芬利先生的书信中摘录出以下段落：

If it should be determined to adopt the proposed plan of separation, the most difficult, and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for consideration, would be, to determine the fixed amount of securities to be held by the department of issue. If that point were once properly settled, the principal object of the plan might be attained, without a formal division into two departments of the business of the Bank. Such a separation would be desirable only as it might afford a better security than could be otherwise obtained, that the fixed amount of securities would, at no future time, nor upon any occasion, however urgent, be exceeded.

“如果决定采纳之前的分离计划，应考虑的最大的困难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确定发行部门持有固定数量的证券。一旦这一点被正式确定下来，该计划的主要目的便可以达成，无需再将英格兰银行的业务部门一分为二。这样的分离计划只有在其可靠性得以保障的基础上，才有价值——在未来，不管遇到何种紧急情况，发行部门持有的证券都不得超过规定的固定数额。

In the supposed ease above stated, namely, that previous to the separation, the Bank is in possession of 18,000,000*l.* of securities, and 9,000,000*l.* of treasure, against 18,000,000*l.* of outstanding notes, and 9,000,000*l.* of deposits, I have assumed the fixed amount of securities, to be held by the department of issue, to be 12,000,000*l.*

If that were the amount fixed, the outstanding notes must, according to the prescribed rule, be 21,000,000*l.* , of which, as 18,000,000*l.* are supposed to be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3,000,000*l.* must necessarily be placed at the disposal of the banking department.

“根据上述假设，即在分离计划实施之前，英格兰银行拥有证券18,000,000英镑，黄金储备9,000,000英镑，可抵付已公开发行的银行券18,000,000英镑和存款9,000,000英镑，我认为发行部门应持有固定数额的证券12,000,000英镑。如果固定数额是12,000,000英镑，那么根据已制定的规则，公开发行的银行券必须达到21,000,000英镑，其中18,000,000英镑由公众持有，另外的3,000,000英镑则必须由银行营业部门支配。

In a letter to Mr. Tooke, lately published, Colonel Torrens has assumed, for the purpose of illustration, the same supposed case, and has fixed the amount of securities to be held by the circulating department, at 9,000,000*l.* In so fixing the amount, he place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supposed) the banking department precisely in the situ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which is contemplated by Mr. Tooke, that is, that of being without either notes or gold wherewith to pay any immediate demands of the depositors, and of being obliged, in order to obtain the requisite means, to force on the money market the sale of a portion of its securities.

He supposes that, for this purpose, a sale of 3,000,000*l.* of securities would be necessary, and that, consequently, the 18,000,000*l.* previously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would be reduced to 15,000,000*l.*

“在近期发表的一封致图克的信中，托伦斯上校为说明情况，假设了同样的情况，并确定了发行部门应持有的证券数为9,000,000英镑。在确定这一数额时，他假设银行营业部门正好处于既没有银行券也没有黄金储备可用来支付储户任何即时提款需求的情况，为了获得必要的财力，银行不得不在金融市场上强制出售部分证券。他假设，银行为达此目的必须出售3,000,000英镑的证券，因此，先前公众持有的18,000,000英镑将被缩减到15,000,000英镑。

Notwithstanding this pressure on the money market, we are to suppose that an adverse exchange has produced a demand upon the Bank for gold to the extent of 3,000,000*l.* Colonel Torrens then says, “The 3,000,000*l.* bank notes, held by the deposit department as reserve, would be drawn out by the depositors, and paid into the circulating department in exchange for gold; while the directors of the deposit department, in order to recover a reserve equal to one-third of their deposits, would be obliged to sell 2,000,000*l.* of the 6,000,000*l.* held in securities. The results would be, that in the circulating department, the bullion would be reduced from 9,000,000*l.* to 6,000,000*l.* ,

and the circulation from 18,000,000*l.* to l5,000,000*l.* ; and that in the deposit department, the deposits would be reduced from 9,000,000*l.* to 6,000,000*l.* ; the securities from 6,000,000*l.* to 4,000,000*l.* ; and the reserve from 3,000,000*l.* to 2,000,000*l.* It is self-evident that the effect would be, not only a contraction of the circulation, but a limitation of the power to overtrade in discounts and loans."

"尽管金融市场中存在这样的压力，但我们还是假设逆汇兑给英格兰银行造成了3,000,000英镑黄金储备的需求。托伦斯上校随后说：'存款部门作为储备持有的3,000,000英镑银行券会被储户提走，并用来投入流通部门兑换黄金，而存款部门的经理们为了弥补相当于他们存款三分之一的储备，将不得不出售其持有的6,000,000英镑证券中的3,000,000英镑。结果导致发行部门的黄金储备从9,000,000英镑减到6,000,000英镑，银行券将从18,000,000英镑减少到15,000,000英镑。存款部门的存款从9,000,000英镑减少到6,000,000英镑，证券将从6,000,000英镑减少到4,000,000英镑，储备将从3,000,000英镑减少到2,000,000英镑。不言而喻，这样的影响将不仅使发行额紧缩，而且在贴现和放贷方面限制了过度交易的情况。'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bank notes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from 18,000,000*l.* to 13,000,000*l.* , *would,* indeed, *effectually prevent overtrading in discounts and loans.*

“将公众持有的银行券数量从18,000,000英镑减少到13,000,000英镑，确实会有效遏制贴现和放贷方面的过度交易 。

Although so extreme a case as that put by Colonel Torrens is not likely to occur, yet if it were to occur, all the consequences which he has described would ensue, without a separation of debts and assets, from a strict observance of the rule described in the paper communicated to Mr. Tooke, namely, that the Bank shall not, upon any occasion, issue notes beyond a certain fixed amount, except upon receiving into its possession a corresponding amount of gold. A division of the business of the Bank into two departments, or a strict observance of the rule, without the division, would produce the same results.

“尽管托伦斯上校所述的极端状况不太可能出现，但是一旦出现，即便债务和资产不分离，他在给图克先生的论文中所阐述的一切后果也会随之发生。也就是说，英格兰银行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得发行超过某一固定数量的银行券，除非收到并持有相应数量的黄金。否则，不管英格兰银行的业务部门是否一分为二，都会产生一样的结果。

There is one material circumstance, however, which renders it doubtful whether a separation of

functions in the way proposed, would be the most effectual means of obtaining the requisite security for the due observance of the rule.

“然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存疑，即以提议的方式进行职能划分能否最有效地保证该规则被适当遵守。

Hitherto it has been the practice of the Bank of England to cancel all notes brought in for payment, never to re-issue them. Now, although an adherence to this practice would not occasion any insuperable difficulty in carrying out the proposed arrangement, yet it would render it necessary that the banking department should generally keep on hand a very large amount of gold, or of notes signed, and ready for delivery. To hold a very large amount of notes signed and completely executed, might be deemed hazardous or inconvenient. If, in order to avoid that risk and inconvenience, the banking department were to keep on hand the cancelled notes, and requir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issue new notes for the old ones, at such times, and to such an extent, as suited its occasional wants and convenience, the department of issue would be virtually a depository for the banking department, and, though the banking department, a depository, to a greater or less extent, for others. Arrangements might, no doubt, be made, and a system of checks contrived, that would prevent any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plan; but the requisite machinery

would be a matter of considerable nicety, of which the operation and the object would not easily be perceived and understood by the public.

“截至目前，英格兰银行的习惯做法是取消所有用于支付的银行券，决不再发行。尽管在按照建议进行调整时，坚守这一做法没有什么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营业部必须持有巨额黄金或是已经签章的银行券以供使用。持有巨额已签章并完全生效的银行券可能有风险而且不太方便，如果银行营业部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和不便，会持有已经注销的银行券，随时根据自己的临时需要向发行部门要求以旧换新，发行部门实际上成了业务部门的存储处，并通过营业部或多或少地成为他人的存储处。毫无疑问，银行可以设置一个检查机构，防止违反计划原则的事发生，但是设置何种机构又是个相当微妙的问题，毕竟这个机构的设置目的和运作方式不易被公众理解。”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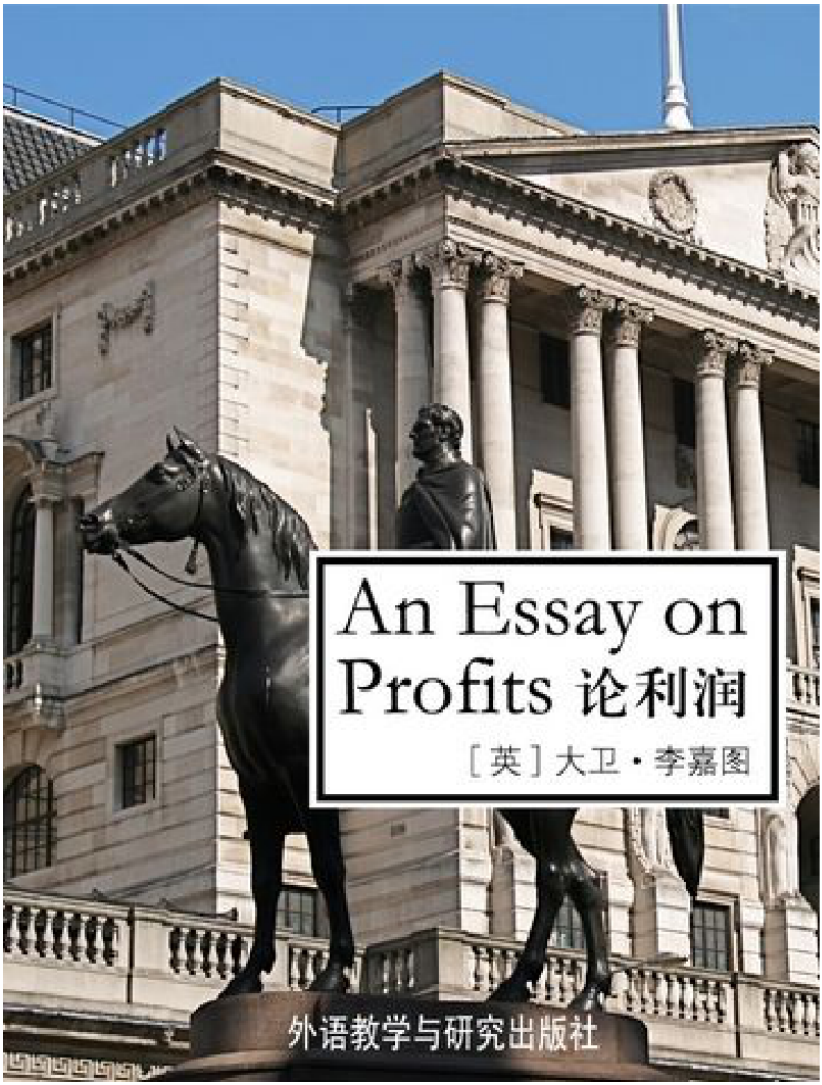

An Essay on Profits 论利润

[英] 大卫·李嘉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论利润

An Essay on Profits

大卫·李嘉图 著

目 录

- INTRODUCTION 简介
- ON THE INFLUENCE, etc. 影响等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INTRODUCTION

简介

In treating on the subject of the profits of capital,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principles which regulate the rise and fall of rent; as rent and profits, it will be seen, have a very intimate connexion with each other. The principles which regulate rent are briefly stated in the following pages, and differ in a very slight degree from those which have been so fully and so ably developed by Mr Malthus in his late excellent publication, to which I am very much indebted. The consideration of those principles, together with those which regulate the profit of stock, have convinced me of the policy of leaving the importation of corn unrestricted by law. From the general principle set forth in al Mr Malthus's publications, I am persuaded that he holds the same opinion as far as profit and wealth are concerned with the question; — but, viewing, as he does, the danger as formidable of depending on foreign supply for a large portion of our food, he considers it wise, on the whole, to restrict importation. Not participating with him in those fears, and perhaps estimating the advantages of a cheap price of corn at a higher value, I have come to a different conclusion. Some of the objections urged in his last publication, — “Grounds of an Opinion,” &c. I have endeavoured to answer; they appear to me unconnected with the political danger he apprehends, and to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general doctrines of the advantages of a free trade, which he has himself, by his writings, so ably contributed to establish.

要讨论资本利润，我们有必要考虑调控租金起伏的准则；人们可以看到租金和利润彼此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对于调控租金的准则，接下来会做简要说明。马尔萨斯先生在晚年所发表的一篇优秀作品中对这些准则做了充分、详实的阐释，对于这篇作品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但本文所讲述的准则同马尔萨斯先生所提出的略有不同。对于这些准则以及调控股本利润的准则，我做了认真的思考，我认为政府不应用法律政策来限制玉米的进口。从马尔萨斯先生发表的所有著作所提出的一般准则来看，我认为在利润和财富问题方面他所持的观点和我是一样的；但是在食物供应严重依赖国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这个问题上，他认为从整体上限制进口是明智之举。我没有像他那样的担忧，或许由于我看到了廉价买进优质玉米的好处，因此我得出了一个与之不同的结论。其中某些反对意见促使他发表了自己的最后一篇论文《一个观点的根据》。我一直都在努力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认为这好像同他所理解的政治危机没有关联，也同有关自由贸易优势的普遍原则不一致。在自由贸易原则的建立上，他本人也通过著文立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ON THE INFLUENCE, etc.

影响等

Mr Malthus very correctly defines, “the rent of land to be that por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whole produce which remains to the owner, after all the outgoings belonging to its cultivation, of whatever kind, have been paid, including the profits of the capital employed, estimated according to the usual and ordinary rate of the profits of agricultural stock at the time being.”

马尔萨斯先生所下的定义非常准确，“地租就是偿付一切种植开销后，全部生产价值中依然属于业主的那部分价值。其中种植开销包括根据当前农业股的一般利润和普通利润来进行估算的资本利润。”

Whenever, then, the usual and ordinary rate of the profits of agricultural stock, and all the outgoings belonging to the cultivation of land, are together equal to the value of the whole produce, there can be no rent.

那么，无论何时当农业股的一般利润和普通利润以及土地耕作的全部开销的总和等于全部生产的总价值时，就不会有租金。

And when the whole produce is only equal in value to the outgoings necessary to cultivation, there can neither be rent nor profit.

当全部生产产品的的价值只相当于必要的种植开销时，就既不会有租金也不会有利润。

In the first settling of a country rich in fertile land, and which may be had by any one who chooses to take it, the whole produce, after deducting the outgoings belonging to cultivation, will be the profits of capital, and will belong to the owner of such capital, without any deduction whatever for rent.

一个国家的广阔、肥沃的土地（这些土地可能会被任何欲占有之的人所占有）首次被开垦时，在扣除种植开销后的全部生产价值将是资本的利润，而且这部分价值属于资金的所有者，且不必扣除任何租金等费用。

Thus, if the capital employed by an individual on such land were of the value of two hundred quarters of wheat, of which half consisted of fixed capital, such as buildings, implements, etc. and the other half of circulating capital, — if, after replacing the fixed and circulating capital, the value of the remaining produce were one hundred quarters of wheat, or of equal value with one hundred quarters of wheat, the neat profit to the owner of capital would be fifty per cent or one hundred profit on two hundred capital.

因此，如果个人投资于土地上的资金相当于二百夸特小麦的价值（其中的一半由固定资本组成，如建筑场所、工具等等，另一半由流动资本组成）；如果取代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后，剩余生产产品的价值是一百夸特的小麦或相当于一百夸特小麦的价值，那么资本所有者

的净利润将是百分之五十，即每二百的资本会收到一百的利润。

For a period of some duration, the profits of agricultural stock might continue at the same rate, because land equally fertile, and equally well situated, might be abundant, and therefore, might be cultivated on the same advantageous terms, in proportion as the capital of the first, and subsequent settlers augmented.

在一段时间内，土地保持肥沃，地理位置优越性不变，产量富足，后续的种植因而采取和首次投资同样的有利条件，这就使得农业股的利润率可能会持续保持在某一水平。随后的定居者也增多了。

Profits might even increase, because the population increasing, at a more rapid rate than capital, wages might fall; and instead of the value of one hundred quarters of wheat being necessary for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ninety only might be required: in which case, the profits of stock would rise from fifty to fifty-seven per cent.

由于人口以高于资本增长的速度持续增加，所以利润甚至可能会上升，但工资却可能会下降。必要的流动资本可能不再是一百夸特小麦的价值，而是九十夸特。在这种情况下，股本的利润将会从50%上升到57%。

Profits might also increase, because improvements might take place in agriculture, or in the implements of husbandry, which would augment the produce with the same cost of production.

若农业或发展畜牧业的器具得到进一步发展，利润也可能会上法术连击升，并且这也可能会在不增加生产成本的基础上扩大生产。

If wages rose, or a worse system of agriculture were practised, profits would again fall.

如果工资上涨，或实施的农业体制带来更为不利的后果，那么利润可能会再次下降。

These are circumstances which are more or less at all times in operation — they may retard or accelerate the natural effects of the progress of wealth, by rising or lowering profits — by increasing or diminishing the supply of food, with the employment of the same capital on the land.[^AnEssayonProfitsen-1]

上述情况一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农业经营中。这些情况可能会延缓或促进财富增长的自然进程，因为这会提高或降低利润，或者会增加或减少粮食供给（但投资于土地的资金不会发生改变）。[^AnEssayonProfitsch-1]

We will, however, suppose that no improvements take place in agriculture, and that capital and population advance in the proper proportion, so that the real wages of labour, continue uniformly the same; — that we may know what peculiar effects are to be ascribed to the growth of capital,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nd the extension of cultivation, to the more remote, and less fertile land.

然而，我们将假设农业不会得到任何改进，而资金和人口也会以适当的比例增长，因此劳动人员的实际工资将继续保持同样的水平；也许我们可能会知道资金的增加、人口的增长、种植面积向更边远地区的扩大以及不太肥沃的土地分别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In this state of society, when the profits on agricultural stock, by the supposition, are fifty per cent the profits on all other capital, employed either in the rude manufactures, common to such a stage of society, or in foreign commerce, as the means of procuring in exchange for raw produce, those commodities which may be in demand, will be also, fifty per cent.[ˆAnEssayonProfitsen-2] If the profits on capital employed in trade were more than fifty per cent capital would be withdrawn from the land to be employed in trade. If they were less, capital would be taken from trade to agriculture.

在当前社会，假如农业股的利润是50%，则其他资本的利润也将是50%——无论这些资本是投资于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原始制造业，还是投资于对外贸易（一种换取所需的原材料产品的手段）。[ˆAnEssayonProfitsch-2]如果投资于贸易的资本的利润大于50%，投资于土地的资本将会被撤出，并转移到贸易上。反之，资本将会从贸易转移到农业。

After all the fertile land in the immediate neighbourhood of the first settlers were cultivated, if capital and population increased, more food would be required, and it could only be procured from land not so advantageously situated. Supposing then the land to be equally fertile, the necessity of employing more labourers, horses, etc. to carry the produce from the place where it was grown, to the place where it was to be consumed, although no alteration were to

take place in the wages of labour, would make it necessary that more capital should be permanently employed to obtain the same produce. Suppose this addition to be of the value of ten quarters of wheat, the whole capital employed on the new land would be two hundred and ten, to obtain the same return as on the old; and, consequently the profits of stock would fall from fifty to forty-three per cent or ninety on two hundred and ten.[^AnEssayonProfitsen-3]

当周边所有肥沃的土地都被第一批定居者开发完之后，如果资本和人口仍在增加，这将需要更多的粮食，因此人们只能继续开发地理位置相对较差的土地。假设这些土地也同样肥沃，将需要雇用更多的劳动人员和马匹等，以将粮食从生产地运往消费市场，而这将需要长期注入更多的资金以保证同等的产量。假设额外注入的资金等于十夸特小麦的价值，在新开发的土地上所投入的全部资金将相当于二百一十夸特小麦的价值，以从中获得同之前相同的利润。而结果却是股本利润从50%降到45%（即二百一十夸特小麦价值的资本获得九十夸特小麦价值的利润）。[^AnEssayonProfitsch-3]

On the land first cultivated, the return would be the same as before, namely, fifty per cent or one hundred quarters of wheat; but, the general profits of stock being regulated by the profits made on the least profitable employment of capital on agriculture, a division of the one hundred quarters would take place, forty-three per cent or eighty-six quarters would constitute the profit of stock, and seven per cent or fourteen, quarters, would constitute rent. And that such a division must take place is evident, when we consider that the owner of the capital of the value of two hundred and ten quarters of wheat would obtain precisely the same profit, whether he cultivated the distant land, or paid the first settler fourteen quarters for rent.

在第一批开发的土地上所得到的回报将和之前相同，即50%的利润或一百夸特小麦的价值；然而，由从回报最少的农业投资中所得的利润所控制的股本中获取的总利润之中，有一百夸特将会被分配，其中43%即八十六夸特小麦的价值是股本利益，7%即14夸特小麦的价值是地租。假使资本所有者持有的相当于二百一十夸特小麦的价值的资本获得了刚好相同的利润，那么无论他是开发遥远地区的土地或者给第一批定居者支付十四夸特度的地租，上述这样的分配都必然会发生。

In this stage, the profits on, all capital employed in trade would fall to forty-three per cent.

在这一阶段，所有贸易投资的利润将会降到43%。

If, in the further progress of population and wealth, the produce of more land were required to obtain the same return, it might be necessary to employ, either on account of distance, or the worse qualIty of land, the value of two hundred and twenty quarters of wheat, the profits of stock would then fall to thirty-six per cent or eighty on two hundred and twenty, and the rent of the first land would rise to twenty-eight quarters of wheat, and on the second portion of land cultivated, rent would now commence, and would amount to fourteen quarters.

如果，人口进一步增加，财富进一步累加，就需要有更多的土地能获得相同的利润，也许将有必要利用相当于二百二十夸特小麦的价值的资金（无论是由于地理位置还是土地质量较差的原因），而股本

的利润将会降到36%（即二百二十夸特小麦价值的资本获得八十夸特小麦价值的利润），第一批土地的租金将上升到二十八夸特小麦的价值，而在第二批开发的土地上将开始缴纳租金，地租将会是十四夸特小麦的价值。

The profits on all trading capital would also fall to thirty-six per cent.

所有交易资本的利润也将会下降到36%。

Thus by bringing successively land of a worse quality, or less favourably situated into cultivation, rent would rise on the land previously cultivated, and precisely in the same degree would profits fall; and if the smallness of profits do not check accumulation, there are hardly any limits to the rise of rent, and the fall of profit.

因此，如果土地的质量持续下降或地理位置欠佳，之前所耕种的土地上的租金就会上涨，而利润也会以相同的比例下降。若微薄的利润得不到增长，这将很难限制租金的上涨以及利润的不断下降。

If instead of employing capital at a distance on new land, an additional capital of the value of two hundred and ten quarters of wheat be employed on the first land cultivated, and its return were in like manner forty-three per cent or ninety on two hundred and ten; the produce of fifty per cent on the first capital, would be divid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before forty-three per cent or eighty-

six quarters would constitute profit, and fourteen quarters rent.

如果不在遥远的新土地上进行投资，而是将价值为二百一十夸特小麦的额外资本用于第一批开荒的土地上，其回报率同样也是43%，或90/210；第一资本所产生的50%的利润将会以之前的方式进行分配——即43%或86夸特是利润，14夸特是租金。

If two hundred and twenty quarters were employed in addition with the same result as before, the first capItal would afford a rent of twenty-eight; and the second of fourteen quarters, and the profits on the whole capital of six hundred and thirty quarters would be equal, and would amount to thirty-six per cent.

如果额外利用了二百二十夸特，但成效却一样，那么第一资本要支付二十八夸特的租金；第二资本要支付十四夸特，所有六百三十夸特的资本所产生的利润将会是一样的，将达36%。

Supposing that the nature of man was so altered, that he required double the quantity of food that is now necessary for his subsistence, and consequently, that the expenses of cultivation were very greatly increased.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knowledge and capital of an old society employed on fresh and fertile land in a new country would leave a much less surplus produce; consequently, the profits of stock could never be so high. But accumulation, though slower in its progress, might still go on, and rent would begin just as before, when more distant or less fertile land were cultivated.

假设人的本性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类需要相当于目前食用量双倍的食物才能维持生存，那么耕种的成本将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若一个旧式社会在一个新国家刚开发的肥沃的土地上投入了知识和资本，所产生的生产剩余将大大减少；因此，股本的利润绝不可能达如此之高。然而，虽然资本的积累比较缓慢，但可能仍在积累，而租金也会像之前——即更遥远或更贫瘠的土地被开发时——那样开始收取。

The natural limit to population would of course be much earlier, and rent could never rise to the height to which it may now do; because,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land of the same poor quality would never be brought into cultivation; — nor could the same amount of capital be employed on the better land with any adequate return of profit.[^AnEssayonProfitsen-4]

人口的自然限制当然要早得多，租金也不可能涨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因为，从事物的本质上而言，同样贫瘠的土地不可能被开发；——若要在更富饶的土地上进行投资并获得足够的利润回报，其所需的资金也不可能同在贫瘠土地上的投资额相同。[^AnEssayonProfitsch-4]

The following table is constructed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first portion of land yields one hundred quarters profit on a capital of two hundred quarters; the second portion, ninety quarters on two hundred and ten, according to the foregoing calculations.[AnEssayonProfitsen-5]It will be seen that during the progress of a country the whole produce raised on its land will Increase, and for a certain time that part of the produce which belongs to the profits of stock, as well as that part which belongs to rent will increase; but that at a later period, every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will be attended with an absolute, as well as a proportionate diminution of

profits, — though rents will uniformly increase. A less revenue, it will be seen, will be enjoyed by the owner of stock, when on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quarters are employed on the different qualities of land, than when one thousand one hundred were employed. In the former case the whole profits will be only two hundred and seventy, in the latter two hundred and seventy five; and when one thousand six hundred and ten are employed, profits will fall to two hundred and forty-one and a half.[AnEssayonProfitsen-6]

根据上述计算，我们可以假设第一块土地在投入了二百夸特资本的基础上得到了一百夸特的利润，而第二块土地在投入二百一十夸特资本的基础上得到九十夸特的利润。下表即是根据这一假设制成的。[AnEssayonProfitsch-5]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土地的全部产量将会增长，而且在一定时期内，那一部分属于属于股本利润的产量以及属于租金的那部分产量也会增加；但在随后的时期，资本的每一次积累都将带来绝对利润，而且利润额将以适当的比例逐渐缩小，然而租金将一致上涨。从表中还可看出，股本持有者的收入将会减少，因为这时投入到土质各异的土地上的资本是一千三百五十夸特，而之前的投资是一千一百夸特。在前一情况下，全部利润将为二百七十夸特，后者的利润是二百七十五夸特；若投入的资本是一千六百一十夸特，利润将下降到二百四十一点五夸特。[AnEssayonProfitsch-6]

This is a view of the effects of accumulation which is exceedingly curious, and has, I believe, never before been noticed.

这是我对积累的影响的看法，这一积累过程非常奇怪，但我相信人们之前从未注意过这一点。

It will be seen by the table, that, in a progressive country, rent is not only absolutely increasing, but that it is also increasing in its ratio to the capital employed on the land; thus when four hundred and ten was the whole capital employed, the landlord obtained

three and a half per cent; when one thousand one hundred-thirteen and a quarter per cent; and when one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eighty-sixteen and a half per cent. The landlord not only obtains a greater produce, but a larger share.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租金不仅绝对持续增长，而且其增长的比率是同土地投资呈正比；因此，当投入的总资本是四百一十夸特时，租主得到的租金是3.5%；当总资本是一千一百一十三夸特时，租金是四分之一；当总资本是一千八百八十六夸特时，租金是百分之五十。租主不仅会得到大部分农产品，而且还持有较大的股份。

TABLE, shewing the Progress of Rent and Profit under an assumed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该表显示的是在假设资本增加的情况下租金和利润的增长

Capital estimated to quarters of wheat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以夸特为单位进行估算的资本[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Profit per cent [50, 43, 36, 30, 25, 20, 15, 11]

利润的百分比 [50, 43, 36, 30, 25, 20, 15, 11]

Neat produce to quarters of wheat after paying the cost of production on each capital.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支付生产成本后每一投资所产生的小麦净产量（以夸特计算）[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Profit of 1st portion of land in quarters of wheat. [100, 86, 72, 60, 50, 40, 30, 22]

第一部分土地的利润（以夸特为单位计算）。[100, 86, 72, 60, 50, 40, 30, 22]

Rent of 1st portion of land in quarters of wheat. [none, 14, 28, 40, 50, 60, 70, 78]

第一部分土地的租金（以夸特为单位计算）。[无, 14, 28, 40, 50, 60, 70, 78]

Profit of 2nd portion of land in quarters of wheat. [- ,90, 76, 63, 52 1/2, 42, 31 1/2, 23]

第二部分土地的利润（以夸特为单位计算）。[- ,90, 76, 63, 52

1/2, 42, 31 1/2, 23]

Rent of 2nd portion of land in quarters of wheat. [- , none, 14, 27, 37 1/2, 48, 58 1/2, 67]

第二部分土地的租金（以夸特为单位计算）。[- , 无, 14, 27, 37 1/2, 48, 58 1/2, 67]

Profit of 3rd portion of land in quarters of wheat. [- , - , 80, 66, 55, 44, 33, 24]

第三部分土地的利润（以夸特为单位计算）。[- , - , 80, 66, 55, 44, 33, 24]

Rent of 3rd portion of land in quarters of wheat. [- , - , none, 14, 25 36, 47, 56]

第三部分土地的租金（以夸特为单位计算）。[- , - , 无, 14, 25 36, 47, 56]

Profit of 4th portion of land in quarters of wheat. [- , - , - , 70, 57 1/2, 46, 34 1/2, 25.3]

第四部分土地的利润（以夸特为单位计算）。[- , - , - , 70, 57

1/2, 46, 34 1/2, 25.3]

Rent of 4th portion of land in quarters of wheat. [- , - , - , none, 12 1/2, 24, 35 1/2, 44.7]

第四部分土地的租金（以夸特为单位计算）。[- ，- ，- ，无, 12 1/2, 24, 35 1/2, 44.7]

Profit of 5th portion of land in quarters of wheat. [- , - , - , - , 60, 48, 36, 26.4]

第五部分土地的利润（以夸特为单位计算）。[- ，- ，- ，- ，60, 48, 36, 26.4]

Rent of 5th portion of land in quarters of wheat. [- , - , - , - , none, 12, 24, 33.6]

第五部分土地的租金（以夸特为单位计算）。[- ，- ，- ，- ，无, 12, 24, 33.6]

Profit of 6th portion of land in quarters of wheat. [- , - , - , - , - , 50, 37 1/2, 27 1/2]

第六部分土地的利润（以夸特为单位计算）。[- , - , - , - , - , 50,

37 1/2, 27 1/2]

Rent of 6th portion of land in quarters of wheat. [- , - , - , - , - , none, 12 1/2, 22 1/2]

第六部分土地的租金（以夸特为单位计算）。[- , - , - , - , - , 无, 12 1/2, 22 1/2]

Profit of 7th portion of land in quarters of wheat. [- , - , - , - , - , - , 40, 27.6]

第七部分土地的利润（以夸特为单位计算）。[- , - , - , - , - , - , 40, 27.6]

Rent of 7th portion of land in quarters of wheat. [- , - , - , - , - , - , none, 12.4]

第七部分土地的租金（以夸特为单位计算）。[- , - , - , - , - , - , 无, 12.4]

Profit of 8th portion of land in quarters of wheat. [- , - , - , - , - , - , - , 29.7]

第八部分土地的利润（以夸特为单位计算）。[- , - , - , - , - , - , -

, 29.7]

1st period, 2nd ditto, 3rd ditto, 4th ditto, 5th ditto, 6th ditto, 7th ditto, 8th ditto

第一时期，第二时期同上、第三时期同上、第四时期同上、第五时期同上、第六时期同上、第七时期同上、第八时期同上

When the whole capital employed is [200, 410, 630, 860, 1100, 1350, 1610, 1880]

当所投入的总资本是[200, 410, 630, 860, 1100, 1350, 1610, 1880]

Whole amount of rent received by landlords to quarters of wheat [none, 14, 42, 81, 125, 180, 248 1/2, 314 1/2]

租主所得到的租金总额（以夸特为单位计算）[无, 14, 42, 81, 125, 180, 248 1/2, 314 1/2]

Whole amount of profits to quarters received by owners of stock [100, 176, 228, 259, 175, 270, 241 1/2, 205 1/2]

股本持有者所获得的总利润 [100, 176, 228, 259, 175, 270, 241

1/2, 205 1/2]

Profits per cent on the whole capital [50, 43, 36, 30, 25, 20, 15, 11]

利润在总资本中所占百分比[50, 43, 36, 30, 25, 20, 15, 11]

Rent per cent on the whole capital [- , 3 1/2, 6 3/4, 9 1/3, 11 1/2, 13 1/4, 15 1/2, 16 1/3]

租金在总资本中所占百分比[- , 3 1/2, 6 3/4, 9 1/3, 11 1/2, 13 1/4, 15 1/2, 16 1/3]

Total produce to quarters of wheat, after paying the cost of production [100, 190, 270, 340, 400, 450, 490, 520]

支付生产成本之后的总产量（以夸特为单位计算）[100, 190, 270, 340, 400, 450, 490, 520]

Rent[ˆAnEssayonProfitsen-7] then is in all cases a portion of the profits previously obtained on the land. It is never a new creation of revenue, but always part of a revenue already created.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租金[ˆAnEssayonProfitsch-7]都是先前从

土地上取得的利润的一部分。这绝不是新创造的收入，但却一直都是已创造的收入的一部分。

Profits of stock fall only, because land equally well adapted to produce food cannot be procured; and the degree of the fall of profits, and the rise of rents, depends wholly on the increased expense of production:

股本利润下降的唯一原因是无法购买同样适合粮食耕种的土地；利润下降的程度以及租金的上涨水平完全取决于生产成本的增加：

If, therefore, in the progress of countries in wealth and population, new portions of fertile land could be added to such countries, with every increase of capital, profits would never fall, nor rents rise.[^AnEssayonProfitsen-8]

因此，如果有些国家在财富和人口增长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新的肥沃土地且资本不断增长，那么其利润绝不会下降而租金也绝不会上涨。[^AnEssayonProfitsch-8]

If the money price of corn, and the wages of labour, did not vary In price in the least degree, during the progress of the country in wealth and population, still profits would fall and rents would rise; because more labourers would be employed on the more distant or less fertile land, in order to obtain the same supply of raw produce; and therefore the cost of production would have increased, whilst the value of the produce continued the same.

如果一个国家在财富和人口增长的过程中，玉米的货币价格以及劳动力的工资丝毫没有变化，利润依然会下降而租金也会上涨；因为更多的劳动力将在更遥远或更贫瘠的土地上进行劳作，以获得等量的原始农产品；因此，生产成本将会增长，但农产品的价值却仍保持在原来的水平。

But the price of corn, and of all other raw produce, has been invariably observed to rise as a nation became wealthy, and was obliged to have recourse to poorer lands for the production of part of its food; and very little consideration will convince us, that such is the effect which would naturally be expected to take plac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但是据观察，国家富强后，玉米的价格以及其他所有原始农产品的价格总是会上涨，而该国也被迫开发较为贫瘠的土地进行粮食生产；只要稍作思考，我们就会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结果必然会出现。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all commodities, rises as the difficulties of their production increase. If then new difficulties occur in the production of corn, from more labour being necessary, whilst no more labour is required to produce gold, silver, cloth, linen, &c.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corn will necessarily rise, as compared with those things. On the contrary, facilities in the production of corn, or of any other commodity of whatever kind, which shall afford the same produce with less labour, will lower its exchangeable value.[AnEssayonProfitsen-9] Thus we see that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e, or in the implements of husbandry, lower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corn;[AnEssayonProfitsen-10]improvements in the machinery connected with the manufacture of cotton, lower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cotton goods; and improvements in mining, or the discovery of new and more abundant mines of the precious metals, lower the value of gold and silver, or which is the same thing, raises the price of all other commodities. Wherever competition can have its full effect,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commodity be not limited by nature, as in the case with some wines, the difficulty or facility of their production will ultimately regulate their exchangeable value.[^AnEssayonProfitsen-11]The sole effect then of the process of wealth on prices, independently of all improvements, either in agriculture or manufactures, appears to be to raise the price of raw produce and of labour, leaving all other commodities at their original prices, and to lower general profits In consequence of the general rise of wages.

由于生产的难度增加，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都会上升。如果玉米生产遇到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一新的困难，但同时金、银、布、麻等的生产却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那么同金、银、布、麻等产品相比，玉米就有必要增加交换价值。相反，生产玉米所需的设备或者生产任何种类的其他商品所需的设备可以让人们凭借更少的劳动力生产出相同数量的产品，而这会降低产品的交换价值。[AnEssayonProfitsch-9]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农业的进步或农牧业的发展降低了玉米的交换价值；[AnEssayonProfitsch-10]机械设备同棉花制造业具有一定的联系，机械设备的进步降低了棉制品的交换价值；采矿业的发展或者新发现的更富饶的贵金属矿降低了金银的价值，但也提高了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在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以及商品的生产不受自然限制的地方，如某些酒品，生产的难度或生产设备将最终决定产品的交换价值。[^AnEssayonProfitsch-11]无论是农业还是制造业，财富在价格上的体现同任何发展都无关，因此价格所体现的价值过程的唯一影响似乎是提高了原始农产品和劳动力的价格，从而使其他所有商品都保持原有

的价格，以及降低普遍利润以应对工资的普遍上涨。

This fact is of more importance than at first sight appears, as it relates to the interest of the landlord, and the other parts of the community. Not only is the situation of the landlord improved, (by the increasing difficulty of procuring food, in consequence of accumulation) by Obtaining an increased quantity of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but also by the increased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at quantity. If his rent be increased from fourteen to twenty-eight quarters, it would be more than doubled, because he would be able to command more than double the quantity of Commodities, in exchange for the twenty-eight quarters. As rents are agreed for, and paid in money, he woul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supposed, receive more than double of his former money rent.

该情况比乍看之下更重要，因为这关系到租主以及社会上其他人的利益。租主的情况会得到改善，（由于积累的原因，粮食采购的难度不断加大），因为租主会得到更多的农产品而且这部分农产品的交换价值也会增大。如果他的租金从十四夸特提升到二十八夸特，那么租金不仅仅是增加了一倍，因为他可以要求两倍以上的商品以换取二十八夸特。由于双方就租金达成了协议，并要求以货币进行支付，所以在假定的情况下，他获得的租金将是之前的货币租金的两倍以上。

In like manner, if rent fell, the landlord would suffer two losses; he would be a loser of that portion of the raw produce which constituted his additional rent; and further, he would be a loser by the depreciation in the real or exchangeable value of the raw produce in which, or in the value of which, his remaining rent would be paid.[^AnEssayonProfitsen-12]

同理，若租金下降，租主也将蒙受双倍的损失；他将失去属于原始农产品的那部分租金，但这部分正是他的额外租金；此外，原始农产品的真实价值或交换价值也会下降，但他的其余租金正是用原始农产品或农产品的价值进行支付的，因此他也会因此蒙受损失。[^AnEssayonProfitsch-12]

As the revenue of the farmer is realized in raw produce, or in the value of raw produce, he is interested, as well as the landlord, in its high exchangeable value, but a low price of produce may be compensated to him by a great additional quantity.

由于农民的收入是用原始农产品或原始农产品的价值来计算的，因此农民以及租主都希望农产品有较高的交换价值。但若农产品的价格较低，他可以通过大量的额外数量得到补偿。

It follows then, that the interest of the landlord is always opposed to the interest of every other class in the community. His situation is never so prosperous, as when food is scarCe and dear: whereas, all other persons are greatly benefited by procuring food cheap. High rent and low profits, for they invariably accompany each other, ought never to be the subject of complaint, if they are the effect of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因此，租主的利益总是同社会其他各个阶层的利益相对。对租主而言，最繁荣的时期就是粮食短缺、价格昂贵的时期；然而，若粮食的购买价格较低，其他所有人都会从中获益。高租金和低利润总是相伴而行，如果这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人们绝不会对此有所抱怨。

They are the most unequivocal proofs of wealth and prosperity, and of an abundant population, compared with the fertility of the soil. The general profits of stock depend wholly on the profits of the last portion of capital employed on the land; if, therefore, landlords were to relinquish the whole of their rents, they would neither raise the general profits of stock, nor lower the price of corn to the consumer. It would have no other effect, as Mr Malthus has observed, than to enable those farmers, whose lands now pay a rent, to live like gentlemen, and they would have to expend that portion of the general revenue, which now falls to the share of the landlord.

同土壤的生产能力相比，租金和利润是财富和繁荣以及人口充足的最明确的证明。股本的普遍利润完全取决于投入土地的最后一部分资本所带来的利润；因此，如果租主欲放弃其全部租金，那么他们要么会提高股本的普遍利润，要么就会降低玉米的售价。根据马尔萨斯先生的观察，其唯一影响就是让那些现在需要缴纳地租的农民可以在生活中拥有绅士风度，此外他们还必须要扩大一般收入，但这部分资金现在却成为租主的囊中之物。

A nation is rich, not accordIng to the abundance of its money, nor to the high money value at which its commodities circulate, but according to the abundance of its commodities, contributing to its comforts and enjoyments. Although this is a proposition, from which few would dissent, many look with the greatest alarm at the prospect of the diminution of their money revenue, though such reduced revenue should have so Improved in exchangeable value, as to procure considerably more of all the necessaries and luxuries of life.

一个国家是否富强所依赖的不是充裕的金钱，也不是商品流通中较高的货币价值，而是充裕的商品，因为这是保证一个国家环境舒适和生活幸福的重要因素。虽然这一论断几乎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是很多人都对货币收入减少的可能性保持高度的警惕，尽管这些减少的收入本就应提高交换价值以获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

If then, the principles here stated as governing rent and profit be correct, general profits on capital, can only be raised by a fall in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food, and which fall can only arise from three causes:

如果这里所谈到的控制租金和利润的准则是正确的，那么资本的普遍利润只有通过降低粮食的交换价值才能得以提高。引起粮食的交换价值下降的原因有三种：

1st. The fall of the real wages of labour, which shall enable the farmer to bring a greater excess of produce to market.

第一，降低劳动力的实际工资，这可以使农民将更多的过剩农产品推向市场。

2d.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e, or in the implements of husbandry, which shall also increase the excess of produce.

第二，农业的进步或农牧业的发展，这也可以增加剩余农产品的

数量。

3dly. The discovery of new markets, from whence corn may be imported at a cheaper price than It can be grown for at home.

第三，发现新市场，从新市场人们可以以低于本地的价格买进玉米。

The first of these causes is more or less permanent, according as the price from which wages fall, is more or less near that remuneration for labour, which is necessary to the actual subsistence of the labourer.

第一个原因有点永久性的性质，因为降低工资时的起始水平有点接近劳动力的报酬——这部分报酬是保证劳动者足以维持生计的必要资本。

The rise or fall of wages is common to all states of society, whether it be the stationary, the advancing, or the retrograde state. In the stationary state, it is regulated wholly by the increase or falling off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advancing state, it depends on whether the capital or the population advance, at the more rapid course. In the retrograde state, it depends on whether population or capital decrease with the greater rapidity.

在任何社会——无论是处于静止、前进还是倒退的状态——，工

资的涨落都是常见的现象。在处于静止状态的社会，工资的涨落完全受人口增减的制约。在处于进步状态的社会，工资的涨落取决于资本或人口是否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在处于倒退状态的社会，工资的涨落取决于人口或资本是否以更快的速度减少。

As experience demonstrates that capital and population alternately take the lead, and wages in consequence are liberal or scanty, nothing can be positively laid down, respecting profits, as far as wages are concerned.

经验表明，资本和人口轮流起主导作用，因此工资有时比较丰厚、有时比较微薄。说到工资，当涉及利润时，任何东西都不能被乐观地搁置一旁。

But I think it may be most satisfactorily proved, that in every society advancing in wealth and population, independently of the effect produced by liberal or scanty wages, general profits must fall, unless there be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e, or corn can be imported at a cheaper price.

但是我认为得到最有力的证明的一个事实是：在任何财富和人口不断增长且不受高额或微薄的工资影响的社会，普遍利润必然会下降，除非农业得到了改善或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进口玉米。

It seems the necessary result of the principles which have been stated to regulate the progress of rent.

这似乎是上述调控租金进展的原则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This principle will, however, not be readily admitted by those who ascribe to the extension of commerce, and discovery of new markets, where our commodities can be sold dearer, and foreign commodities can be bought cheaper, the progress of profits, without any reference whatever to the state of the land, and the rate of profit obtained on the last portions of capital employed upon it. Nothing is more common than to hear it asserted, that profits on agriculture no more regulate the profits of commerce, than that the profits of commerce regulate the profits on agriculture. It is contended, that they alternately take the lead; and, if the profits of commerce rise, which it is said they do, when new markets are discovered, the profits of agriculture will also rise; for it is admitted, that if they did not do so, capital would be withdraw from the land to be employed in the more profitable trade. But if the principles respecting the progress of rent be correct, it is evident, that with the same population and capital, whilst none of the agricultural capital is withdrawn from the cultivation of the land, agricultural profits cannot rise, nor can rent fall: either then it must be contended, which is at variance with all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that the profits on commercial capital will rise considerably, whilst the profits on agricultural capital suffer no alteration, or, tha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profits on commerce will not rise. [^AnEssayonProfitsen-13]

然而，有些人不愿接受这一点，因为他们将功劳归因于商业贸易的扩展、新市场的开发（在新市场上商品的售价更高，外来商品的进价更低）以及利润的增长，他们完全不考虑土地的状况或从投资于这片土地的最后一部分资本中所获得的利润。人们听到的最多的声音是

有人声称农业的利润不再约束贸易的利润。有人认为，这两者轮流起主导作用；如果发现新市场时，贸易利润上涨（据说贸易利润目前的确有所上涨），农业的利润也会上涨；否则，人们认为，资本会被撤出并投入更盈利的行业。然而，若有关租金进展的准则是准确的，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如果人口和资本相同，同时农业资本也丝毫不从耕种的土地上撤出，那么农业利润就不会上涨而租金也不会下降。那么人们会产生两种观点：一，商业资本会大幅上升，而农业资本的利润却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但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准则的影响，这一观点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二，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利润不会上涨。[ˆAnEssayonProfitsch-13]

It is this latter opinion which I consider as the true one. I do not deny that the first discoverer of a new and better market may, for a time, before competition operates, obtain unusual profits. He may either sell the commodities he exports at a higher price than those who are ignorant of the new market, or he may purchase the commodities imported at a cheaper price. Whilst he, or a few more exclusively follow this trade, their profits will be above the level of general profits. But it is of the general rate of profit that we are speaking, and not of the profits of a few individuals; and I cannot doubt that, in proportion as such trade shall be generally known and followed, there will be such a fall in the price of the foreign commodity in the importing country, in consequence of its increased abundance, and the greater facility with which it is procured, that its sale will afford only the common rate of profits — that so far from the high profits obtained by the few who first engaged in the new trade elevating the general rate of profits — those profits will themselves sink to the ordinary level.

我认为后一种观点是正确的。第一个发现更好的新市场的人可能

在出现竞争前的一段时间会得到一笔非比寻常的利润，这一点我不否认。或许他会以高于那些无视新市场的人的价格出口自己的商品，或许他会以更低的价格进口商品。同时，他或者更多的几个人会全身致力于这一行业，他们的利润将高于普遍利润的水平。但是我们谈论的是普遍利润，而不是少数个别人的利润；如果这一行业能被人们所熟知并有一定比例的人投身该行业，外来商品的数量将极大充裕，购买商品的渠道也会更加便利，因此其价格也将大大下降。此外，销量将只能涵盖普遍利润——该新行业提高了普遍利润，但从事这一新行业的人非常少，目前为止普遍利润来自这些人所获得的高额利润——，这些利润将自行降到一般水平。对于这一点，我没有怀疑。

The effects are precisely similar to those which follow from the use of improved machinery at home. Whilst the use of the machine is confined to one, or a very few manufacturers, they may obtain unusual profits, because they are enabled to sell their commodities at a price much above the cost of production — but as soon as the machine becomes general to the whole trade,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ies will sink to the actual cost of production, leaving only the usual and ordinary profits.

这些影响同使用国内经过改进的机械设备所带来的影响极为相似。虽然机器的使用仅局限于一个或极少数的生产商，但他们获得的利润却可能非比寻常，这是因为他们可以以远远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来销售商品。但是，一旦该机器被整个行业所普遍采用，商品的价格将降为实际生产成本，生产商也只能得到普通利润和一般利润。

During the period of capital moving from one employment to another, the profits on that to which capital is flowing will be relatively high, but will continue so no longer than till the requisite

capital is obtained.

在资本从此处转移到彼处的这段期间，资本所流向的领域将获得较高的利润；但是获得所需的资本后，利润将有所下降。

There are two ways in which a country may be benefited by trade — one by the increase of the general rate of profits, which, according to my opinion, can never take place but in consequence of cheap food, which is beneficial only to those who derive a revenue from the employment of their capital, either as farmers, manufacturers, merchants, or capitalists, lending their money at interest — the other by the abundance of commodities, and by a fall in their exchangeable value, in which the whole community participate. In the first case, the revenue of the country is augmented — in the second the same revenue becomes efficient in procuring a greater amount of the necessaries and luxuries of life.

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从贸易中获利。一种方式是提高普遍利润率。在我看来，除非粮食的价格低，否则这一方法决不可行。这一方式只能让那些从资本投资中获得收入的人获益，因为他们会收取利息，无论他是农民、生产商、商人还是资本家。另一方式是充裕商品的数量以及降低产品的交换价值，至于这一方式整个社会都会参与其中。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的收入将会增加；在第二种情况下，同等数额的收入将在采购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上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It is in this latter mode only[ˆAnEssayonProfitsen-14] that nations are benefited by the extension of commerce, by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manufactures, and by the discovery of machinery, — they all augment the amount of commodities, and contribute very much to the ease and happiness of mankind; but, they have no effect on the rate of profits, because they do not augment the produce compared with the cost of production on the land, and it is impossible that all other profits should rise whilst the profits on land are either stationary, or retrograde.

只有在后一种模式下[ˆAnEssayonProfitsch-14]，国家才能从扩大贸易市场、在生产部门进行劳动分工以及发明新机器中获益。这些方式都增加了商品的数量，给人类提供了更舒适的环境并大大增强了人们的幸福感；然而，这些却未对利润产生影响，因为同投入土地上的生产成本相比，这些方法并未使产量得以增加。此外，在土地带来的利润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的情况下，其他所有方面的利润不可能上涨。

Profits then depend on the price, or rather on the value of food. Every thing which gives facility to the production of food, however scarce, or however abundant commodities may become, will raise the rate of profits, whilst on the contrary, every thing which shall augment the cost of production without augmenting the quantity of food,[ˆAnEssayonProfitsen-15] will, under every circumstance, lower the general rate of profits. The facility of obtaining food is beneficial in two ways to the owners of capital, it at the same time raises profits and increases the amount of consumable commodities. The facility in obtaining all other things, only increases the amount of commodities.

因此，利润取决于价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取决于粮食的价值。

为粮食生产提供便利的所有事物——无论粮食多么短缺或商品是否充裕——，都会提高利润；相反，任何提高了生产成本但未能增加粮食产量的事物[^AnEssayonProfitsch-15]，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降低普遍利润。对资本持有者而言，获取粮食的渠道在两方面十分有利，同时这也提高了利润并增加了消费品的数量。而其他获取其他所有事物的渠道只是增加了商品的数量。

If, then, the power of purchasing cheap food be of such great importance, and if the importation of corn will tend to reduce its price, arguments almost unanswerable respecting the danger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countries for a portion of our food, for in no other view will the question bear an argument, ought to be brought forward to induce us to restrict importation, and thereby forcibly to detain capital in an employment which it would otherwise leave for one much more advantageous.

那么，如果廉价粮食购买力如此重要，如果进口玉米会降低其价格，那么在依赖外国进口粮食所带来的风险这个问题上几乎无可争辩。这是因为无论怎样看，这一问题都是无可辩驳的。我们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以此来引导我们限制进口，从而强行保留住资本，以防其流入其他更有利的投资环境中。

If the legislature were at once to adopt a decisive policy with regard to the trade in corn — if it were to allow a permanently free trade, and did not with every variation of price, alternately restrict and encourage importation, we should undoubtedly be a regularly importing country. We should be so in consequence of the superiority of our wealth and population, compared to the fertility of our soil over our neighbours. It is only when a country is

comparatively wealthy, when all its fertile land is in a state of high cultivation, and that it is obliged to have recourse to its inferior lands to obtain the food necessary for its population; or when it is originally without the advantages of a fertile soil, that it can become profitable to import corn.[^AnEssayonProfitsen-16]

如果司法机关能立刻就玉米贸易问题制定政策并予以坚决执行——如果政策允许永久性的自由贸易，但并不对价格的每一次变动都予以批准，对进口时而限制时而鼓励，那么我们无疑将成为定期进口国。因此，除了土壤比邻国肥沃，我们还应该在财富和人口上也占有优势。一个国家只有在比别国富裕，所有的肥沃土壤都十分高产却依然还需要依靠相对贫瘠的土地来获得本国人口所需的粮食时，或者当该国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土壤肥沃这一优势时，从国外进口玉米才会是有益的。[^AnEssayonProfitsch-16]

It is, then, the dangers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supply for any considerable quantity of our food, which can alone be opposed to the many advantages which, circumstanced as we are, would attend the importation of corn. These dangers do not admit of being very correctly estimated, they are in some degree, matters of opinion and cannot like the advantages on the other side, be reduced to accurate calculation. They are generally stated to be two — 1st, that in the case of war a combin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 or the influence of our principal enemy, might deprive us of our accustomed supply — 2dly, that when bad seasons occurred abroad, the exporting countries would have, and would exercise, the power of withholding the quantity usually exported to make up for their own deficient supply.(17*)

依赖国外提供相当数量的粮食供应具有一定的风险，这些风险本身就同众多有利于玉米进口的优势相对，而现在我们就面对很多进口玉米的优势。目前人们尚未明确确定其风险是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无法像与之对应的优势那样进行准确的计算。一般而言，风险有两个：一，若欧洲发生战争或由于主要敌军的影响，我们可能会丧失通常的供应源；二，若国外的季节气候不好，出口国将保留那部分通常会出口的农产品以弥补本国粮食短缺的状况。

If we became a regularly importing country, and foreigners could confidently rely on the demand of our market, much more land would be cultivated in the corn counties with a view to exportation. When we consider the value of even a few weeks consumption of corn in England, no interruption could be given to the export trade, if the continent supplied us with any considerable quantity of corn, without the most extensively ruinous commercial distress — distress which no sovereign, or combination of sovereigns, would be willing to inflict on their people; and, if willing, it would be a measure to which probably no people would submit. It was the endeavour of Buonaparte to prevent the exportation of the raw produce of Russia, more than [any] other cause which produced the astonishing efforts of the people of that county against the most powerful force perhaps ever assembled to subjugate a nation.

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定期进口国，外国人就会放心地依赖我们的市场需求，因此玉米生产县将利用更多的土地种植玉米以进行出口。以对英国的玉米出口为例，只要我们的土地给我们提供的玉米产量尚算可观，并且没有遭遇最具破坏性的商业灾难大范围波及，那么即使只有几周的玉米消费的出口价值，我们也不会中断对英国的玉米出口贸

易。任何国家领导或领导层都不愿将商业灾难施加给人民；如果他们这样做了，这一举措也很可能遭致人民的抗拒。布尔拿巴曾努力阻止俄罗斯将原始农产品出口到国外，这是导致当地的人民竭力反对一个最强大的力量的主要原因，这一最强大的力量若聚集起来甚至会颠覆整个国家。

The immense capital which would be employed on the land, could not be withdrawn suddenly, and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without immense loss; besides which, the glut of corn in their markets, which would affect their whole supply, and lower its value beyond calculation; the failure of those returns, which are essential in all commercial adventures, would occasion a scene of wide spreading ruin, which if a country would patiently endure, would render it unfit to wage war with any prospect of success. We have all witnessed the distress in this country, and we have all heard of the still greater distress in Ireland, from a fall in the price of corn, at a time too when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our own crop has been deficient; when importation has been regulated by price, and when we have not experienced any of the effects of a glut. Of what nature would that distress have been if the price of corn had fallen to a half a quarter, or an eighth part of the present price. For the effects of plenty or scarcity, in the price of corn, are incalculably greater than in proportion to the increase or deficiency of quantity. These then, are the inconveniencies which the exporting countries would have to endure.

投入土地的巨额资金不能突然撤出，否则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此外，市场上玉米过剩的情况（这会影响玉米的整体供应并会大大降低玉米的价值）以及无法盈利的现象（在所有冒险性的商业活动中都可能出现这一状况）将导致广泛的损失，如果一个国家能承受住这一

切的话，该国将不适合发动工资战争——即使工资战争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我们所有人都目睹了这个国家所承受的困扰，我们所有人都听闻了爱尔兰所遭遇的更大的困境——即爱尔兰的玉米价格有所下降。当时，人们都公认我们处于玉米短缺期时，同时价格控制着进口，而玉米过剩也未给我们带来任何影响。如果玉米的价格降到当前售价的八分之一，那么上述窘境的实质会是什么呢。就玉米充裕或短缺所带来的影响而言，以价格来衡量远远比以产量增加或产量不足进行衡量要大得多。因此，这些都是出口国所要承受的不便之处。

Ours would not be light. A great diminution in our usual supply, amounting probably to one-eighth of our whole consumption, it must be confessed, would be an evil of considerable magnitude; but we have obtained a supply equal to this, even when the growth of foreign countries was not regulated by the constant demand of our market. We all know the prodigious effects of a high price in procuring a supply. It cannot, I think be doubted, that we should obtain a considerable quantity from those counties with which we were not at war; which, with the most economical use of our own produce, and the quantity in store, [ˆAnEssayonProfitsen-18] would enable us to subsist till we had bestowed the necessary capital and labour on our own land, with a view to future production. That this would be a most afflicting change, I certainly allow; but I am fully persuaded that we should not be driven to such an alternative, and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war, we should be freely supplied with the corn, expressly grown in foreign counties for our consumption. Buonaparte, when he was most hostile to us, permitted the exportation of corn to England by licences, when our prices were high from a bad harvest, even when all other commerce was prohibited. Such a state of things could not come upon us suddenly; a danger of this nature would be partly foreseen, and due precautions would be taken. Would it be wise

then to legislate with the view of preventing an evil which might never occur; and to ward off a most improbable danger, sacrifice annually a revenue of some millions?

而我们承受的负担也不轻。如果我们通常的玉米供应量大大减少（或许是总消费的八分之一），这将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然而，我们获得了同等数量的供应，虽然国外的增长并不受我国市场需求不断的制约。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以高价买进商品的巨大影响。我们应该从与本国没有战争的国家进口大量的商品，我认为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本国的农产品以及商店里正出售的农产品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AnEssayonProfitsch-18]这将足以使我们维持生计，直到我们将足够的资金和劳动力投入到本国的土地耕作以在未来获得足量的产品。这定会是一个几经困难的历程，这一点我当然承认。但是我认为我们完全不必受制于这一选择，我认为尽管有战争，我们也不应限制玉米的供应，而是应从国外进行进口。在布尔拿巴最痛恨我们的时候，当由于收成不好我们的价格非常高的时候，甚至是当其他所有的贸易都被禁止的时候，他依然允许在经过许可的条件下将玉米出口到英国。这种情况不会骤然发生在我们身上；此类风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前预见，人们可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那么，每年耗费几百万的资金，通过制定法律来预防一个绝不可能出现的灾难或阻止一个最不可能发生的危险是否是明智之举呢？

In contemplating a trade in corn, unshackled by restrictions on importation, and a consequent supply from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where it can be brought to market, at a price not much above half that at which we can ourselves produce it on some of our poorer lands, Mr Malthus does not sufficiently allow for the greater quantity of corn, which would be grown abroad, if importation was to become the settled policy of this country. There cannot be the least doubt that if the corn countries could depend on

the markets of England for a regular demand, if they could be perfectly secure that our laws, respecting the corn trade, would not be repeatedly vacillating between bounties, restrictions, and prohibitions, a much larger supply would be grown, and the danger of a greatly diminished exportation, in consequence of bad seasons, would be less likely to occur. Countries which have never yet supplied us, might, if our policy was fixed, afford us a considerable quantity.

进口方面没有限制，玉米进口主要来自销售玉米的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玉米的价格还不及我们在本国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培植玉米所需成本的一半。在考虑这样的玉米贸易时，马尔萨斯先生并未充分考虑到当出口成为这个国家的既定政策时玉米总量的大部分都是在国外种植的。如果玉米生产国可以依赖英国的常规需求，如果这些国家可以完全确保我们所制定的有关玉米贸易的法律不会时而允许玉米馈赠、时而限制或禁止玉米贸易，玉米的供应量将会增加，在气候条件欠佳的季度大幅降低出口额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如果我们制定了法律，那些从未向我国进行过出口的国家可能会向我们出口大量的产品。

It is at such times that it would be particularly the interest of foreign countries to supply our wants, as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corn does not rise in proportion only to the deficiency of supply, but two, three, four, times as much,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the deficiency.

在诸如这样的时期，外国尤其愿意满足我国的进口需求。这是因为由于供应不足，玉米的交换价值不仅会以相应的比例上涨，而且会根据缺少的量呈两倍、三倍、四倍的增长。

If the consumption of England is ten million quarters, which, in an average year, would sell for forty millions of money; and, if the supply should be deficient one fourth, the seven million five hundred thousand quarters would not sell for forty millions only, but probably for fifty millions, or mor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n of bad seasons, the exporting country would content itself with the smallest possible quantity necessary for their own consumption, and w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high price in England, to sell all they could spare, as not only would corn be high, as compared with money, but as compared with all other things; and if the growers of corn adopted any other rule, they would be in a worse situation, as far as regarded wealth, than if they had constantly limited the growth of corn to the wants of their own people.

如果英国的消费量是一千万夸特（其每年的平均售价为四千万），如果供应量不足、缺少四分之一，那么这七百五十万夸特的售价将不仅是四千万，也许是五千万，甚至更高。如果季节气候欠佳，出口国将把本国所需的消费量降到最低，从而将所能剩余的部分全部出口到英国并从高额的售价中获利，因为玉米的价格不仅从货币角度而言会上涨，同时同其他所有商品相比都有所上涨。如果玉米种植者接受了其他任何规定，就财富方面而言，他们的处境会更糟糕，其收益会还不及不断限制玉米生产以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所带来的收益。

If one hundred millions of capital were employed on the land, to obtain the quantity necessary to their own subsistence, and twenty millions more, that they might export the produce, they would lose the whole return of the twenty millions in the scarce year, which they would not have done had they not been an exporting country.

如果投入土地的资本是一亿，若要获得足以维持自己生存的农产品和两千万的收益，也许他们会将产品进行出口，但在收成欠佳的年份他们将得不到两千万的收益。如果他们并非是出口国的话，情况将不会是这样。

At whatever price exportation might be restricted, by foreign countries, the chance of corn rising to that price would be diminished by the greater quantity produced in consequence of our demand.

无论外国将出口价格限制在怎样的水平，由于我们的需求量增大，玉米产量也会增加，价格上涨到该水平的可能性会因此而降低。

With respect to the supply of corn, it has been remarked, in reference to a single country, that if the crops are bad in one district, they are generally productive in another; that if the weather is injurious to one soil, or to one situation, it is beneficial to a different soil and different situation; and, by this compensating power, Providence has bountifully secured us from the frequent recurrence of dearths. If this remark be just, as applied to one country, how much more strongly may it be applied to all the countries together which compose our world? Will not the deficiency of one country be made up by the plenty of another? and, after the experience which we have had of the power of high prices to procure a supply, can we have any just reason to fear that we shall be exposed to any particular danger from depending on importation, for so much corn as may be necessary for a few weeks of our consumption.

至于玉米的供应，有人指出，就一个国家而言，如果一个地区的庄稼收成欠佳，在其他另一地区的收成通常比较好。如果天气状况对某片土地或某种情况不利，那对另一方土地或情况将有利。由于这一补偿性因素的原因，普罗维登斯从很大程度上确保我们可以免受不断出现的供应不足带来的影响。如果这一观点是合理的且适用于某一国家，那么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呢？一国供应不足可否从另一国供应充足中得到补充呢？此外，有过以高价进口产品的经历之后，我们是否有理由有这样的担忧呢：仅仅通过进口来维持数周所需的玉米消费或可将我们置身于任何特殊的风险之中。

From all that I can learn, the price of corn in Holland, which country depends almost wholly on foreign supply, has been remarkably steady, even during the convulsed times which Europe has lately experienced — a convincing proof, notwithstanding the smallness of the country, that the effects of bad seasons are not exclusively borne by importing countries.

据我所知，几乎全部依赖国外供给的荷兰，玉米的价格一直以来都十分稳定，甚至在欧洲最近经历的几次动荡时期亦是如此。这强有力地证明，虽然荷兰的国土面积较小，但受到季节气候欠佳的影响的不单是进口国。

That great impro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agriculture, and that much capital has been expended on the land, it is not attempted to deny; but, with all those improvements, we have not overcome the natural impediments resulting from our increasing wealth and prosperity, which obliges us to cultivate at a disadvantage our poor lands, if the importation of corn is restricted or prohibited. If we were left to ourselves, unfettered by legislative

enactments, we should gradually withdraw our capital from the cultivation of such lands, and import the produce which is at present raised upon them. The capital withdrawn would be employ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such commodities as would be exported in return for the corn.[ˆAnEssayonProfitsen-19] Such a distribution of part of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would be more advantageous, or it would not be adopted. This principle is one of the best established in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by no one is more readily admitted than by Mr Malthus. It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his arguments, in his comparison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ttending an unrestricted trade in corn, in his “Observations on the Corn Laws.”

农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土地耕种上也投入了更多的资金，这一点无可否认。然而，虽然取得了这样的进步，但是我们仍尚未克服由财富的不断积累和社会的不断繁荣所必然带来的种种障碍；因此，若玉米进口受到制约或限制，我们就不得不开发贫瘠的土地，虽然这存在一定的劣势。如果我们可以不受法律规章的制约自主做决定，那么我们应逐步撤出投资于这些土地的资本，并从国外进口目前在这些土地上所种植的粮食。撤出的资本将会投资于此类商品的生产，并会进行出口以换取玉米。[ˆAnEssayonProfitsch-19]这种对该国部分资本的分配方式将更加有利，否则将不被采纳。这是政治经济学中最完善的一个准则，马尔萨斯先生对这一原则最为认可。在其所写的《谷物法探究》一文中，他对加入自由玉米贸易的优缺点进行了对比，这一对比也是其所有论点的基础。

In his last publication, however, in one part of it, he dwells with much stress on the losses of agricultural capital, which the country would sustain, by allowing an unrestricted importation. He laments the loss of that which by the course of events has become

of no use to us, and by the employment of which we actually lose. We might just as fairly have been told, when the steam-engine, or Mr Arkwright's cotton-machine, was brought to perfection, that it would be wrong to adopt the use of them, because the value of the old clumsy machinery would be lost to us. That the farmers of the poorer lands would be losers, there can be no doubt, but the public would gain many times the amount of their losses; and, after the exchange of capital from land to manufactures had been effected, the farmers themselves, as well as every other class of the community, except the landholders, would very considerably increase their profits.

然而，在其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中，有一部分特别强调了农业资本的损失；但若允许自由进口，该国则可以保留住这部分资本。他感叹道，随着事态的发展以及对已经损失的资本的利用，损失的这部分资本将失去利用价值。当蒸汽机或阿克赖特先生的棉纺机得到改进时，也许有人会很合理告诉我们说使用这些设备是不对的，因为笨重的老式机械将失去价值。在贫瘠的土地上进行劳作的农民将蒙受损失，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社会大众所得的利益将是农民损失的数倍。当资本从土地转移到制造商之后，农民本人以及社会各个阶层（土地租主除外）的利润将大大增加。

It might, however, be desirable, that the farmers, during their current leases, should be protected against the losses which they would undoubtedly suffer from the new value of money, which would result from a cheap price of corn, under their existing money engagements with their landlords.

然而，在当前的租赁期内，农民应受到保护，以妨其受到损失。

由于币值发生变化，农民必然会遭受损失，这是因为在其当前同租主所达成的款额协议的条件下，玉米的价格会比较低廉。

Although the nation would sacrifice much more than the farmers would save even by a temporary high price of corn, it might be just to lay restrictive duties on importation for three or four years, and to declare that, after that period, the trade in corn should be free, and that imported corn should be subject to no other duty than such as we might find it expedient to impose on corn of our own growth.[^AnEssayonProfitsen-20]

即使临时提高玉米的价格，国家所付出的代价也远远大于农民的收益，但是政府可以在三四年内制定严格的进口关税，并宣布之后将开放玉米贸易而且除了为限制国内玉米产量的增长而临时收取关税外，进口的玉米不再收取其他任何关税。[^AnEssayonProfitsch-20]

Mr Malthus is, no doubt, correct, when he says, “If merely the best modes of cultivation now in use, in some parts of Great Britain, were generally extended, and the whole country was brought to a level, in proportion to its natural advantages of soil and situation, by the further accumulation and more equable distribution of capital and skill, the quantity of additional produce would be immense, and would afford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to a very great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nEssayonProfitsen-21]

马尔萨斯先生说，“如果英国某些地区目前所采用的最佳耕种模式能得到广泛的普及，并通过进一步的积累以及对资本和技术进行更平均的分配使整个国家能充分利用肥沃的土壤和优越的地理条件等自

然优势，农产品的产量将大大增加，因而能够养活快速增长的人口。”无疑，马尔萨斯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
[^AnEssayonProfitsch-21]

This rejection is true, and is highly pleasing — it shows that we are yet at a great distance from the end of our resources, and that we may contemplate an increase of prosperity and wealth, far exceeding that of any country which has preceded us. This may take place under either system, that of importation or restriction, though not with an equally accelerated pace, and is no argument why we should not, at every period of our improvement, avail ourselves of the full extent of the advantages offered to our acceptance — it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not make the very best disposition of our capital, so as to ensure the most abundant return. The land has, as I before said, been compared by Mr Malthus to a great number of machines, all susceptible of continued improvement by the application of capital to them, but yet of very different original qualities and powers. Would it be wise at a great expense to use some of the worst of these machines, when at a less expense we could hire the very best from our neighbours.

不过的确有人持反对意见，但这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这表明我们远未穷尽对资源的开发，我们可以考虑进一步促进繁荣、增加财富，并远远超过任何目前领先于我们的国家。这一目标可以通过进口或限制进口这两种体制来实现，不过两者的进度并不一致，而且至于在任何发展时期我们为什么不应充分利用所有的优势，这也是无可争辩的——对于我们为什么不应对资本进行最佳配置以确保最丰厚的回报，这无可解释。如之前所言，马尔萨斯先生将土地和许多机器进行了对比。若投入一定的资本，所有这些机器都可以得到不断改进，但是改进后的设备在质量和作用上都同之前有了很大的差异。当我们

可以以较少的花费雇用最能干的邻居时，却耗巨资使用某些最不好用的机器是否是明智之举呢？

Mr Malthus thinks that a low money price of corn would not be favourable to the lower classes of society, because the real exchangeable value of labour; that is, its power of commanding the necessaries, conveniences, and luxuries of life, would not be augmented, but diminished by a low money price. Some of his observations on this subject are certainly of great weight, but he does not sufficiently allow for the effects of a better distribution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lower classes. 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m, because the same capital would employ more hands; besides, that the greater profits would lead to further accumulation; and thus would a stimulus be given to population by really high wages, which could not fail for a long time to ameliorate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马尔萨斯先生认为，玉米的货币价格低对下层社会很不利，这是因为劳动力的实际交换价值（即要求生活必需品、便利的生活条件以及生活奢侈品的能力）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他在有关这一问题上的分析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他并未充分考虑到若将国家资本更好地分配给下层阶级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将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同等的资本可以雇用到更多的人手。此外，更大的利润将促进资本的进一步积累，而人们将得到高额工资，因此他们的积极性也会更高。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改善劳动阶级的工作条件。

The effects on the interests of this class, would be nearly the same as the effects of improved machinery, which it is now no longer questioned, has a decided tendency to raise the real wages of

labour.

这对该阶层的利益所产生的影响同改进机械设备所带来的影响几乎一样。这无疑将会提高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对于这一点人们早已没有任何疑问。

Mr Malthus also observes, “that of the commercial and manufacturing classes, only those who are directly engaged in foreign trade will feel the benefit of the importing system.”

马尔萨斯先生还发现，“在商界和制造业领域，只有那些直接从事外贸的人才会感受到进口体制的好处。”

If the view which has been taken of rent be correct, — if it rise as general profits fall, and falls as general profits rise, — and if the effect of importing corn is to lower rent, which has been admitted, and ably exemplified by Mr Malthus himself, — all who are concerned in trade, — all capitalists whatever, whether they be farmers, manufacturers, or merchants, will have a great augmentation of profits. A fall in the price of corn, in consequence of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e or of importation, will lower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corn, only — the price of no other commodity will be affected. If, then, the price of labour falls, which it must do when the price of corn is lowered, the real profits of all descriptions must rise; and no person will be so materially benefited as the 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ial part of society.

如果对租金的看法是正确的，——即：若普遍利润下降，租金则会上涨，若普遍利润上升，租金则会下降——，那么若玉米进口降低了租金（马尔萨斯先生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并做了充分的阐释），与贸易相关的所有人（所有的资本家，无论其是农民、生产商还是商人）都将获得丰厚的利润。由于农业的进步或进口的影响，玉米的价格会降低，这也将降低玉米的交换价值，但其他商品的价格不会受到影响。那么，若劳动力的价格降低——若玉米的价格降低，劳动力价格必然会下降——，所有人的实际利润必然会增加，而获益最大的是社会上从事制造业和商业的那些人。

If the demand for home commodities should be diminished, because of the fall of rent on the part of the landlords, it will be increased in a far greater degree by the increased opulence of the commercial classes.

如果由于土地租主降低了租金，导致人们对国内商品的需求量减少，那么通过增加商业产品的数量可以大大提高人们的需求量。

If restrictions on the importation of corn should take place, I do not apprehend, that we shall lose any part of our foreign trade; on this point, I agree with Mr Malthus. In the case of a free trade in corn, it would be considerably augmented; but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we can retain the same foreign trade — but, whether, in both cases, it will be equally profitable.

如果对玉米进口施加限制，我认为我们不会失去任何外贸机会。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同马尔萨斯先生是一致的。若玉米贸易是自由的，贸易额将大大增加。但问题不是我们能否维持同样的外贸关系，

而是这两种情况下的盈利状况是否一样。

Our commodities would not sell abroad for more or for less in consequence of a free trade, and a cheap price of corn; but the cost of production to our manufacturers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if the price of corn was eighty, or was sixty shillings per quarter; and consequently profits would be augmented by all the cost sa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exported commodities.

自由贸易以及较低的玉米价格不会影响我们出口到国外的商品的数量。但若玉米的售价是每夸特八十还是六十先令，生产商的生产成本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由于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利润将有所增加。

Mr Malthus notices an observation, which was first made by Hume, that a rise of prices, has a magic effect on industry: he states the effects of a fall to be proportionally depressing. [^AnEssayonProfitsen-22]A rise of prices has been stated to be one of the advantages, to counterbalance the many evils attendant on a depreciation of money, from a real fall in the valu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from rising the denomination of the coin, or from the overissue of paper money.

休谟最先认识到价格上涨对工业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马尔萨斯先生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指出降低价格会让人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沮丧心理。[^AnEssayonProfitsch-22]由于贵金属的价值下降、硬币的面值上升或者纸币的发行过量，货币可能会贬值。价格上涨是一大优势，它可以抵消货币贬值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

It is said to be beneficial, because it betters the situation of the commercial classes at the expense of those enjoying fixed incomes; — and that it is chiefly in those classes, that the great accumulations are made, and productive industry encouraged.

据说这会带来好处，因为这会改善改善商业层的处境，但这会损害享受固定工资的阶层的利益。然而，资本的大规模积累主要是在享受固定工资的阶层，生产性行业也主要在这些阶层得到鼓励。

A recurrence to a better monetary system, it is said, though highly desirable, tends to give a temporary discouragement to accumulation and industry, by depressing the commercial part of the community, and is the effect of a fall of prices: Mr Malthus supposes that such an effect will be produced by the fall of the price of corn. If the observation made by Hume were well founded, still it would not apply to the present instance: — for every thing that the manufacturer would have to sell, would be as dear as ever: it is only what he would buy that would be cheap, namely, corn and labour by which his gains would be increased. I must again observe, that a rise in the value of money lowers all things; whereas a fall in the price of corn, only lowers the wages of labour, and therefore raises profits.

有人指出，虽然再次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货币体系是非常可取的措施，但这往往会暂时阻碍资本的积累和工业的发展，因为这会影响社会中商业的发展。此外，再建一个更完善的货币体系也是价格下降所带来的结果：马尔萨斯先生认为这将是玉米价格下降所产生的影响。即使休谟的这一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但这仍不适用于当前的情况：因

为生产商要销售的所有产品都会同以往一样昂贵：只有他要购买的产品（即玉米和劳动力）会比较便宜，因此他可以提高自己的收益。我必须再次重申：货币价值上涨会降低所有东西的价值；然而，玉米的价格下降只会降低劳动力的工资，因而利润会增加。

If then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mmercial classes, will most certainly lead to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productive industry; these can by no means be so surely obtained as by a fall in the price of corn.

若商业层繁荣发展，这肯定会促使资本不断积累并能鼓励生产性行业的发展。仅靠降低玉米价格绝不能取得这样的发展。

I cannot agree with Mr Malthus in his approbation of the opinion of Adam Smith, “that no equal quantity of productive labour employed in manufactures, can ever occasion so great a reproduction as in agriculture.” I suppose that he must have overlooked the term ever in this passage, otherwise the opinion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doctrine of the Economists, than with those which he has maintained; as he has stated, and I think correctly, that in the first settling of a new country, and in every stage of its improvement, there is a portion of its capital employed on the land, for the profits of stock merely, and which yields no rent whatever. Productive labour employed on such land never does in fact afford so great a reproduction, as the same productive labour employed in manufactures.

亚当·斯密指出，“若在制造业和农业投入同等数量的生产劳动，

其给农业带来的再生产能力绝对大于制造业。”马尔萨斯先生十分认可他的这一观点，但我却无法同马尔萨斯先生达成一致。我认为他一定是忽视了本文所涉及的条款，否则该观点会更符合经济学家的学说，而不是他所坚持的观点。他曾指出，一个新的国家在首次有人定居时以及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其部分资本会用于土地耕作，其得到的利润只是股本，并不会产生任何租金。事实上，投资于此类土地的生产劳动所产生的再生产能力绝不像投资于制造业的同等劳动力所产生的那样多。

The difference is not indeed great, and is voluntarily relinquished, on account of the security and respectability which attends the employment of capital on land. In the infancy of society, when no rent is paid, is not the re-production of value in the coarse manufactures, and in the implements of husbandry with a given capital, at least as great as the value which the same capital would afford if employed on the land?

其差异其实并不大，而且可以自行忽略，因为安全性和名声也是进行土地投资所考虑的因素。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不用支付租金，在当时若投入同等的资本，至少能和投资于土地的资本获得同样的价值的不是粗糙的制造业的再生产价值，而是具有一定资本的农牧业。

This opinion indeed is at variance with all the general doctrines of Mr Malthus, which he has so ably maintained in this as well as in all his other publications. In the “Inquiry,” speaking of what I consider a similar opinion of Adam Smith, he observes, “I cannot, however, agree with him in thinking that all land which yields food must necessarily yield rent. The land which is successively taken

into cultivation in improving countries, may only pay profits and labour. A fair profit on the stock employed,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payment of labour, will always be a sufficient inducement to cultivate." The same motives will also induce some to manufacture goods, and the profits of both in the same stages of society will be nearly the same.

在本文及其发表的其他所有作品中，马尔萨斯先生对其所持的普遍学说进行了有力的阐释。受其所阐释的所有普遍学说的影响，上述观点其实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探究》一文中，当谈到一个我认为同亚当·斯密的观点非常相似的观点时，他说到，“他认为所有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都必须要缴纳租金，但我对此并不认可。为促进国家的发展而不断用于农业耕种的土地应只需创造利润并支付劳动酬薪。合理的股本利润肯定包括劳动酬薪，也将足以吸引人们从事土地耕作。”这一动机同样也会吸引某些人去从事制造业。在社会的同一发展阶段，这两者所产生的利润几乎是一样的。

In the course of these observations, I have often had occasion to insist, that rent never falls without the profits of stock rising. If it suit us to day to import corn rather than grow it, we are solely influenced by the cheaper price. If we import the portion of capital last employed on the land, and which yielded no rent, will be withdrawn; rent will fall and profits rise, and another portion of capital employed on the land will come under the same description of only yielding the usual profits of stock.

在这些评论中，我往往可以坚持这样一个观点：租金下降时，股本利润必然会上升。如果我们更适合进口玉米，而不是在本国进行生产，那么只有在价格低廉时我们才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撤出那部分

最后投资于之前无需缴纳租金的土地上的资金，租金将会下降，利润将会上涨，而投资于土地的另一部分资金也将只创造普遍股本利润。

If corn can be imported cheaper than it can be grown on this rather better land, rent will again fall and profits rise, and another and better description of land will now be cultivated for profits only. In every step of our progress, profits of stock increase and rents fall, and more land is abandoned: besides which, the country saves a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ice at which corn can be grown, and the price at which it can be imported, on the quantity we receive from abroad.

如果进口玉米的价格比在更肥沃的土地上种植玉米的成本还要低，租金将再次下降，利润也会再次上涨，而质量更好的土地现在也将被开发以获取利润。在每一步发展阶段，股本利润都会上涨，租金都会下降，而更多的土地也被遗弃。此外，国家通过控制玉米进口总量来消除玉米种植成本与玉米进口价格之间的种种差异。

Mr Malthus has considered, with the greatest ability, the effect of a cheap price of corn on those who contribute to the interest of our enormous debt. I most fully concur in many of his conclusions on this part of the subject. The wealth of England would, I am persuaded, be considerably augmented by a great reduction in the price of corn, but the whole money value of that wealth would be diminished. It would be diminished by the whole difference of the money value of the corn consumed, — it would be augmented by the increased exchangeable value of all those commodities which would be exported in exchange for the corn imported. The latter would, however, be very unequal to the former; therefore the

money value of the commodities of England would, undoubtedly, be considerably lowered.

目前，我们的债务十分庞大。马尔萨斯先生发挥了自己最大的能力，认真思索了玉米价格低廉对债务利息的影响。对于他在有关这一问题上的很多观点我都完全认可。他让我相信，由于玉米价格的大幅下降，英国的财富将大大增加，但是这部分财富的整体货币价值将减少：减少是由于消费的玉米在货币价值上所存在的整体差异。而所有出口商品（出口国外以换取玉米）的交换价值增加会带来整体货币价值的增加。然而，后者的增加量并不够抵消前者的减少量，因此，英国商品的货币价值无疑将大大降低。

But, though it is true, that the money value of the mass of our commodities would be diminished, it by no means follows, that our annual revenue would fall in the same degree. The advocates for importation ground their opin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it on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revenue would not so fall. And, as it is from our revenue that taxes are paid, the burthen might not be really augmented.

然而，虽然我们的大量商品的货币价值将会减少，但这绝不代表我们的年度收入也会以相同的比例下降。提倡进口的人认为收入不会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下降，这也是他们认为出口之所以有利的根据。此外，由于税收来自我们的收入，也许负担并不会加重。

Suppose the revenue of a country to fall from ten to nine millions, whilst the value of money altered in the proportion of ten to eight, such country would have a larger neat revenue, after

paying a million from the smaller, than it would have after paying it from the larger sum.

假如一个国家的收入从一千亿降到九百亿，而币值在10%到8%之间徘徊，那么该国在从九百亿中支付一百亿后所得的纯收入将比从一千亿中支付一百亿后所得的纯收入高。

That the stockholder would receive more in real value than what he contracted for, in the loans of the late years, is also true; but, as the stockholders themselves contribute very largely to the public burthens, and therefore to the payment of the interest which they receive, no in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the taxes would fall on them; and, if we estimate at its true value the additional profits made by the commercial class, they would still be great gainers, notwithstanding their really augmented contributions.

在借贷期的最后几年，股东所获得的实际价值要比合同上规定的多，这一点也是事实。但是由于股东本人在很大程度上给公众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因此在给他们支付利息时，他们的税收比例将会非常高。此外，若以其真正的价值估计商业层所创造的额外利润，那么他们依然将得到丰厚的利润，尽管他们的确对社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The landlord would be the only sufferer by paying really more, not only without any adequate compensation, but with lowered rents.

租主将是唯一的受害者，因为他们要支付非常多的费用，他们不

仅得不到足够的补偿，同时租金也会降低。

It may indeed be urged, on the part of the stockholder, and those who live on fixed incomes, that they have been by far the greatest sufferers by the war. The value of their revenue has been diminished by the rise in the price of corn, and by the depreciation in the value of paper money,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the value of their capital has been very much diminished from the lover price of the funds. They have suffered too from the inroads lately made on the sinking fund, and which, it is supposed, will be still further extended, — a measure of the greatest injustice, — in direct violation of solemn contracts; for the sinking fund is as much a part of the contract as the dividend, and, as a source of revenue, utterly at variance with all sound principles. It is to the growth of that fund that we ought to look for the means of caring on future wars, unless we are prepared to relinquish the funding system altogether. To meddle with the sinking fund, is to obtain a little temporary aid at the sacrifice of a great future advantage. It is reversing the whole system of Mr Pitt, in the creation of that fund: he proceeded on the conviction, that, for a small present burthen, an immense future advantage would be obtained; and, after witnessing, as we have done, the benefits which have already resulted from his inflexible determination to leave that fund untouched, even when he was pressed by the greatest financial distress, when three per cents were so low as forty-eight, we cannot, I think, hesitate in pronouncing, that he would not have countenanced, had he still lived, the measures which have been adopted.

也许人们极力认为，到目前为止，股东以及其他工资收入稳定的人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玉米价格的上涨以及纸币的贬值降低了他们

的收入的价值。同时，由于基金的价值下降，其资本的价值也大大降低。由于最近偿债基金的数额有所减少，他们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在未来，偿债基金将进一步缩减——这是最有失公正的一个措施，但这会直接违反正规合同的规定。这是因为偿债基金是合同以及股息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收入的来源，同所有的合理性原则完全不同。我们应该通过增加偿债基金来寻求解决未来战争的途径，除非我们做好了放弃整个基金制度的准备。干预偿债基金就意味着要暂时获得一些援助，但代价是会失去未来的一个极大的优势。这就意味着要颠覆皮特先生所提出的建立偿债基金所依赖的整个体制：他相信，若目前加重一点负担，在未来将获得巨大的优势。我们看到，即使面临最严峻的财政困难，即使百分之三（即四十六）的比例也非常低，他也坚定地决定不动用偿债基金，因而这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他仍在世的话，他不会同意目前所采取的措施。

To recur, however, to the subject before me, I shall only further observe, that I shall greatly regret that considerations for any particular class, are allowed to check the progress of the wealth and 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 If the interests of the landlord be of sufficient consequence, to determine us not to avail ourselves of all the benefits which would follow from importing corn at a cheap price, they should also influence us in rejecting all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e, and in the implements of husbandry; for it is as certain that corn is rendered cheap, rents are lowered, and the ability of the landlord to pay taxes, is for a time, at least, as much impaired by such improvements, as by the importation of corn. To be consistent then, let us by the same act arrest improvement, and prohibit importation.

然而，要回到面前的这个问题，我只会进一步指出：我感到非常

遗憾的是人们会用任何特定的阶层来衡量国家的财富以及人口的增长。如果租主的利益能够带来足够大的影响，即让我们决定不再利用一切以低价进口玉米的优势，那么他们也会对我们产生其他的影响，如拒绝农业以及农牧业的一切进步。因为玉米的售价肯定会较低，租金也一定会下降，因此租主缴纳税收的能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将受到农业和农牧业的进步以及玉米进口的影响。让我们以同样的方式限制进步并禁止进口，以保持一致。

NOTES:

注释：

[ˆAnEssayonProfitsen-1]Mr Malthus considers that the surplus of produce obtained in consequence of diminished wages, or of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e, to be one of the causes to raise rents. To me it appears that it will only augment profits.

[ˆAnEssayonProfitsch-1]马尔萨斯先生认为，由于降低工资或农业的进步而产生的农产品过剩的现象是造成租金上涨的原因之一。我认为，这只会增加利润。

>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beyond the means of employing it on land of the greatest natural fertility, and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situation, must necessarily lower profits; while the tendency of population to increase beyond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must, after a certain time,

lower the wages of labour.

“若非通过将资本投入先天最肥沃或地理位置最优越的土地这一方式来进行资本积累，那么利润必然会降低；若人口的增长呈现难以使其维持生计的趋势，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劳动力的工资必然会降低。

“The expense of production will thus be diminished, but the value of the produce, that is, the quantity of labour, and of the other products of labour besides corn, which it can command instead of diminishing, will be increased.

“生产成本会因此而降低，但是农产品的价值——即劳动量以及除玉米以外的其他劳动产品——将会上涨，而不是下降。

“There will b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demanding subsistence, and ready to offer their services in any way in which they can be useful.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food will therefore be in excess above the cost of production, including in this cost the full profits of the stock employed upon the lan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rate of profits, at the time being. And this excess is rent.” —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Progress of Rent, page 18.

“在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要求获得借以维持生计的途径，他们也愿意以任何有价值的方式为人们提供服务。因此，根据当前的实际利润，粮食的交换价值将远远超过包括投资于土地上的全部股本利润在内的生产成本。超出的部分即为租金。”——《自然以及租金的发展之探究》，第18页。

[^AnEssayonProfitsen-2]It is not meant, that strictly the rate of profits on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will be the same, but that they will bear some proportion to each other. Adam Smith has explained why profits are somewhat less on some employments of capital than on others, according to their security, cleanliness, and respectibility, etc.

[^AnEssayonProfitsch-2]这并不是说农业利润和制造业的利润将完全一样，而是说两者之间将保持一定的比例。亚当·斯密曾根据安全性、纯度以及声望等，就为什么资本投资于某些领域时会比投资于其他领域所获得的利润少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

> What the proportion may be, is of no importance to my argument, as I am only desirous of proving that the profits on agricultural capital cannot materially vary, without occasioning a similar variation in the profits on capital, employed on manufactures and commerece.

> 无论两者之间的比例是多少，对我的论点而言，这都不重要，因为我只想证明：农业资本的利润若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投资于制造业以及商业的资本所

带来的利润必然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AnEssayonProfitsen-3]Profits of stock fall because land equally fertile cannot be obtained, and through the whole progress of society, profits are regulated by the difficulty or facility of procuring food. This is a principle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has been almost overlooked in the writing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They appear to think that profits of stock can be raised by commercial causes, independently of the supply of food.

[^AnEssayonProfitsch-3]由于无法获得同样肥沃的土地，股本利润会有所下降。在社会的整个发展史上，支配利润的是采购粮食的难易程度。这一准则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却几乎被完全忽略。他们似乎认为股本利润可以不受粮食供应的限制，可以通过商业手段来提高。

[^AnEssayonProfitsen-4]In all that I have said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rent, I have briefly repeated, and endeavoured to elucidate the principles which Mr Malthus has so ably laid down, on the same subject, in his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Progress of Rent;” a work abounding in original ideas, — which are useful not only as they regard rent, but as connected with the question of taxation; perhaps, the most difficult and intricate of all the subjects on which Political Economy treats.

[^AnEssayonProfitsch-4]《自然以及租金的发展之探究》中讲到了很多独到的见解，该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涉及了租金，而且还讲述了税制这个问题。在本书中，马尔萨斯先生就租金的起源和发展这一

问题提出了强有力的准则。在有关该问题的陈述中，我简要重复并努力阐释了这些准则。

[^AnEssayonProfitsen-5]It is scarcely necessary to observe that the data on which this table is constructed are assumed, and are probably very far from the truth. They are fixed on as tending to illustrate the principle, — which would be the same, whether the first profits were fifty per cent or five, — or, whether an additional capital of ten quarters, or of one hundred, were required to obtain the same produce from the cultivation of new land. In proportion as the capital employed on the land, consisted more of fixed capital, and less of circulating captial, would rent advance, and profits fall less rapidly.

[^AnEssayonProfitsch-5]该表所采用是假设性的数据，对于这一点几乎没必要做探讨。所列数据的目的是对该准则进行解释——无论所获得第一笔利润是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五，或者无论额外投入的是十夸特还是一百夸特的资本以从新开发的土地上获得等量的农产品，这一准则都不会发生改变。投资于土地的资本会以适当的比例增大固定资本并减少流通资本，土地会提前出租，而利润下降的速度也会相应减慢。

[^AnEssayonProfitsen-6]This would be the effect of a constantly accumulating capital, in a country which refused to import foreign and cheaper corn. But after profits have very much fallen, accumulation will be checked, and capital will be exported to be employed in those countries where food is cheap and profits high. All European coloni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with the capital of the mother countries, and have thereby checked accumulation. That

part of the population too, which is employed in the foreign carrying trade, is fed with foreign corn. It cannot be doubted, that low profits, which are the inevitable effects of a really high price of corn,tend to draw capital abroad; this consideration ought therefore to be a powerful reason to prevent us from restricting importation.

[^AnEssayonProfitsch-6]若一个国家拒绝进口国外更廉价的玉米，那么资本的不断积累将带来上述影响。但是当利润大大降低之后，人们会仔细审核积累的资本，并将资本投资于粮食廉价且利润丰厚的国家。欧洲所有的殖民地都是在殖民国家投入大量资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殖民地也因此对资本积累进行了核查。受雇于外贸交易的那部分人口所食用的也是进口玉米。若玉米的价格异常高，利润必然会比较低，而较低的利润往往容易吸收国外资本。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基于这一方面的考虑，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能限制进口的强有力的理由。

[^AnEssayonProfitsen-7]By rent I always mean the remuneration given to the landlord for the use of the original power of the land. If either the landlord expends capital on his own land, or the capital of a preceding tenant is left upon it at the expiration of his lease, he may obtain what is indeed called a larger rent, but a portion of this is evidently paid for the use of capital. The other portion only is paid for the use of the orginal power of the land.

[^AnEssayonProfitsch-7]我一直都认为租金指的是因使用了土地的原始耕种能力而偿付给租主的资金。如果租主将资金投入自己的土地上或者在租赁期结束后，将之前租户的资金投入这片土地上，他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租金，但是其中一部分显然要用于对利用的资本进行补偿。而另一部分仅用于偿付对土地的原始耕种能力的使用。

[^AnEssayonProfitsen-8]Excepting, as has been before observed, the real wages of labour should rise, or a worse system of agriculture be practised.

[^AnEssayonProfitsch-8]之前曾谈到，例外的情况是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上涨或所实行的农业体制更不合理。

[^AnEssayonProfitsen-9]The low price of corn, caused by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e, would give a stimulus to population, by increasing profits and encouraging accumulation, which would again raise the price of corn and lower profits. But a larger population could be maintained at the same price of corn, the same profits, and the same rents.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e may then be said to increase profits, and to lower for a time rents.

[^AnEssayonProfitsch-9]由于农业的进步，玉米的价格会有所下降。通过提高利润以及鼓励资本积累，玉米价格较低的情况将刺激人口的增长，而这又将会提高玉米的价格并降低利润。但是可以以同样的玉米价格、同等的利润以及相同的租金来维持更大的人口。因此，可以说农业的进步提高了利润，并在一段时间内降低了租金。

[^AnEssayonProfitsen-10]The causes, which render the acquisition of an additional quantity of corn more difficult are, in progressive countries, in constant operation, whilst marked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e, or in the implements of husbandry are of less frequent occurrence. If these opposite causes acted with equal effect, corn would be subject only to accidental variation of

price, arising from bad seasons, from greater or less real wages of labour, or from an alteration in the valu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proceeding from their abundance or scarcity.

[^AnEssayonProfitsch-10]在先进的国家，各种原因不断导致进口更多的玉米更加困难，然而农业或农牧业却未取得较多的显著发展。如果这些不利条件所带来的后果是一样的，玉米所受到的唯一影响是价格发生的意外变化。价格发生变化的原因包括季节气候欠佳，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的起伏或者受供应充足或供应不足的影响而引起的贵金属的价值发生变化。

[^AnEssayonProfitsen-11]Through the price of all commodities is ultimately regulated by, and is always tending to, the cost of their production, including the general profits of stock, they are all subject, and perhaps corn more than most others, to an accidental price, proceeding from temporary causes.

[^AnEssayonProfitsch-11]虽然所有商品的价格最终而且往往都受包括股本的普遍利润在内的生产成本的制约，但是所有商品都受由于临时原因而导致的价格突变的影响，也许受这一影响最大的是玉米。

[^AnEssayonProfitsen-12]It has been thought that the price of corn regulates the prices of all other things. This appears to me to be a mistake. If the price of corn is affected by the rise or fall of the valu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themselves, then indeed will the price of commodities be also affected, but they vary, because the value of money varies, not because the value of corn is altered. Commodities, I think, cannot materially rise or fall, whilst money

and commodities continue in the same proportions, or rather whilst the cost of production of both estimated in corn continues the same. In the case of taxation, a part of the price is paid for the liberty of using the commodity,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its real price.

[^AnEssayonProfitsch-12]有人认为玉米的价格制约着其他所有产品的价格。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如果贵金属本身价值的涨落影响了玉米的价格，那么其他商品的价格也会受到影响，但不同的商品受影响的程度并不一样，其原因是货币的价值会发生变化而不是玉米的价值产生了变化。我认为，商品不会大幅度上升或下降，然而货币和商品的比例将保持不变，生产玉米的过程中所利用的货币和商品也将是一样的。在税收体制下，价格的一部分所支付的是自由消费产品的权利，这部分价格并不是其真实价格的组成部分。

[^AnEssayonProfitsen-13]Mr Malthus has supplied me with a happy illustration — he has correctly compared “soil to a great number of machines, all susceptible of continued improvement by the application of capital to them, buy yet of very different original qualities and powers.” How, I would ask, can profits rise whilst we are obliged to make use of that machine which has the worst original qualities and powers? We cannot abandon the use of it; for it is the condition on which we obtain the food necessary for our popul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food is by the supposition not diminished — but who would consent to use it if he could make greater profits elsewhere?

[^AnEssayonProfitsch-13]马尔萨斯先生的解释我十分满意。他正确地将“土地和许多机器进行了对比。若投入一定的资本，所有这些机器都可以得到不断改进，但是改进后的设备在质量和作用上都同之

前有了很大的差异。”但我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质量和作用在起初都非常差的机器，利润如何上涨呢？我们不能放弃对这种机器的使用，因为我们要借此获得维持人口生存所必须的粮食，而且人们认为粮食需求不会减少。但是，如果人们可以在其他地方获得更大的利润，谁会愿意继续使用该设备呢？

[^AnEssayonProfitsen-14]Excepting when the extension of commerce enables us to obtain food at really cheaper prices.

[^AnEssayonProfitsch-14]商业的发展使我们能够以非常低的价格买进玉米的时期除外。

[^AnEssayonProfitsen-15]If by foreign commerce,or the discovery of machinery, the commodities consumed by the labourer should become much cheaper, wages would fall; and this, as we have before observed, would raise the profits of the farmer, and therefore, all other profits.

[^AnEssayonProfitsch-15]若受对外贸易或新发明的机器设备的影响，劳动者所消费的商品变得更加便宜，那么工资将会下降。这将提高农民的利润，并因此提高其他所有利润，对于这一点在之前也曾探讨过。

[^AnEssayonProfitsen-16]This principle is most ably stated by Mr Malthus in page 42 of “An Inquiry”.

[^AnEssayonProfitsch-16]在《探究》的42页，马尔萨斯先生对这一准则进行了最详实的阐释。

[^AnEssayonProfitsen-17]It is this latter opinion which is chiefly insisted upon by Mr Malthus in his late publication, “The grounds of An Opinion,” &c.

[^AnEssayonProfitsch-17]在马尔萨斯先生最后发表的《一个观点的根据》中，他主要坚持的后一种观点。

[^AnEssayonProfitsen-18]As London is to be a depot for foreign corn, this store might be very great.

[^AnEssayonProfitsch-18]由于伦敦将成为对外出口粮食的仓库，玉米储量也许非常巨大。

[^AnEssayonProfitsen-19]If it be true, as Mr Malthus observes, that in Ireland there are no manufactures in which capital could be profitably employed, capital would not be withdrawn from the land, and then there would be no loss of agricultural capital. Ireland would, in such case, have the same surplus corn produce, although it would be of less exchangeable value. Her revenue might be diminished; but if she would not, or could not manufacture goods, and would not cultivate the ground, she would have no revenue at all.

[^AnEssayonProfitsch-19]马尔萨斯先生发现：若在爱尔兰无论资本投资于任何制造产业都不会获利，那么资本将从土地上撤出，因此农业资本将不会受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爱尔兰将剩余等量的玉米，不过玉米的交换价值将会降低。她的收入或许会减少；然而，若她不去或不能生产商品，也不进行土地耕种，那么她将得不到任何收入。

[^AnEssayonProfitsen-20]I by no means agree with Adam Smith, or with Mr Malthus, respecting the effects of taxation o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The former can find no term too severe by which to characterize them. Mr Malthus is more lenient. They both think that such taxes, incalculably more than any other, tend to diminish capital and production. I do not say that they are the best of taxes, but they do not, I think, subject us to any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which Adam Smith speaks in foreign trade: nor do they produce effects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 taxes. Adam Smith thought that such taxes fell exclusively on the landholder; Mr Malthus thinks they are divided between the landholder and consumer. It appears to me that they are paid wholly by the consumer.

[^AnEssayonProfitsch-20]在有关生活必需品的税收制度这一问题上，我完全不同意亚当·斯密或马尔萨斯先生的观点。前者没有找到具有典型特征的苛刻条款。马尔萨斯先生的态度更加宽松。他们都认为这种税收比任何其他税收都高得多，这种税收往往会降低资本和产量。亚当·斯密曾说过对外贸易中存在诸多不利。虽然我并不是说上述是最好的税收，但我认为这些税收不会让我们受到亚当·斯密所谈及的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这些税收所产生的影响同其他税收所产生的影响也没有很大的差异。亚当·斯密认为只有土地所有者才缴纳此种税收，但马尔萨斯先生认为土地所有者和消费者都要缴纳。但我认为，该税收完全是由消费者缴纳的。

[^AnEssayonProfitsen-21]Page 22, Grounds.

[^AnEssayonProfitsch-21]《根据》，22页。

[^AnEssayonProfitsen-22]Grounds, p.32.

[^AnEssayonProfitsch-22]《根据》，32页。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Benjamin Franklin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富兰克林自传

本杰明·富兰克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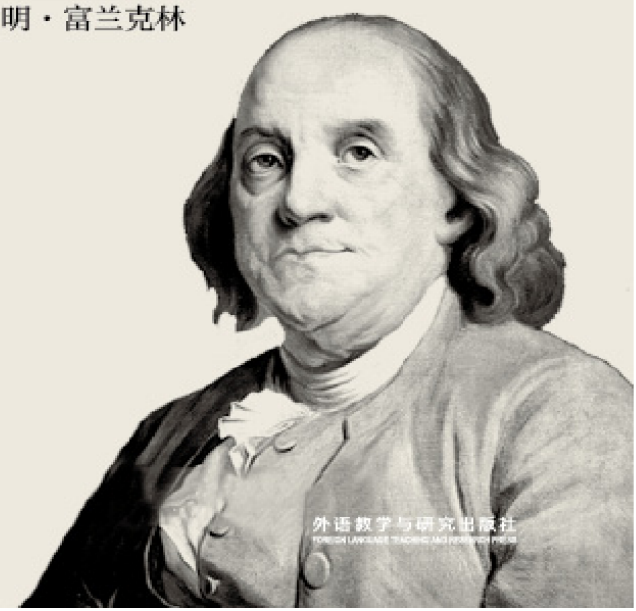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富兰克林自传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富兰克林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ART ONE 第一部分
- PART TWO 第二部分
- PART THREE 第三部分
- PART FOUR 第四部分
- CHIEF EVENTS IN FRANKLIN's LIFE 富兰克林生平大事记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ART ONE

第一部分

(TWYFORD, at the Bishop of St. Asaph's, 1771.)

（1771年写于特怀福德的圣阿萨夫主教家中）

DEAR SON: I have ever had pleasure in obtaining any little anecdotes of my ancestors. You may remember the inquiries I made among the remains of my relations when you were with me in England, and the journey I undertook for that purpose. Imagining it may be equally agreeable to [1_1] you to know the circumstances of my life, many of which you are yet unacquainted with, and expecting the enjoyment of a week's uninterrupted leisure in my present country retirement, I sit down to write them for you. To which I have besides some other inducements. Having emerged from the poverty and obscurity in which I was born and bred, to a state of affluence and some degree of reputation in the world, and having gone so far through life with a considerable share of felicity, the conducing means I made use of, which with the blessing of God so well succeeded, my posterity may like to know, as they may find some of them suitable to their own situations, and therefore fit to be imitated.

亲爱的孩子：我历来喜欢搜集我祖先的点滴趣闻轶事。你也许还记得你随我在英国的时候，我曾为此长途跋涉，拜访仍然在世的亲

戚。想来你可能也同样想了解我生活的经历，其中许多你还并不熟悉；想到我将在乡下度过一周清净无扰的闲暇时光，于是我就坐下来为你写下这些事情。除此之外，我提笔写作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出身贫寒卑微，童年在穷困中度过，后来竟过上了富足生活，在世界上也有了些名望。我的人生走到今天，经历中有很多运气的成分，承蒙上帝眷顾，我的处世之道还算成功。我的子孙们也许希望对此有所了解，以便日后遇到适宜情况或许可以效仿一二。

That felicity, when I reflected on it, has induced me sometimes to say, that were it offered to my choice, I should have no objection to a repetition of the same life from its beginning, only asking the advantages authors have in a second edition to correct some faults of the first. So I might, besides correcting the faults, change some sinister accidents and events of it for others more favorable. But though these were denied, I should still accept the offer. Since such a repetition is not to be expected, the next thing most like living one's life over again seems to be a recollection of that life, and to make that recollection as durable as possible by putting it down in writing.

当我回忆起那种幸运的时候，我有时忍不住想说，如果有机会选择，我会毫不介意从头至尾再过一遍这样的人生；但只恳求能拥有作家的特权，可以在再版时纠正第一版的一些错误。除此之外，我还想改变某些不幸遭遇，让人生更顺利些。不过，即使这个愿望实现不了，我还是会接受让人生重来一次的提议。但由于这样的重演是不会实现的，而与重演人生最相近的似乎就是回顾人生的一切境遇，并提笔写下这些回忆，让它经久不衰。

Hereby, too, I shall indulge the inclination so natural in old

men, to be talking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own past actions; and I shall indulge it without being tiresome to others, who, through respect to age, might conceive themselves obliged to give me a hearing, since this may be read or not as any one pleases. And, lastly (I may as well confess it, since my denial of it will be believed by nobody), perhaps I shall a good deal gratify my own vanity. Indeed, I scarce ever heard or saw the introductory words, “Without vanity I may say,” etc., but some vain thing immediately followed. Most people dislike vanity in others, whatever share they have of it themselves; but I give it fair quarter wherever I meet with it, being persuaded that it is often productive of good to the possessor, and to others that are within his sphere of action; and therefore, in many cases, it would not be altogether absurd if a man were to thank God for his vanity among the other comforts of life.

因此，我也会沉浸在老年人的自然爱好中，那就是谈论自己，谈论自己的旧事；我会沉浸其中，但不会使听者厌烦，他们出于对年长者的尊敬不得不听我诉说，而如果把这些事情写下来，读与不读就悉听尊便了。最后（我也承认这一点，因为即使我否认也没人相信），也许我的虚荣心能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的确，我经常听到或看到开场白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等，随即跟上的却是自负之语。不管人们自己自负的程度如何，他们大多不喜欢他人狂妄自负；但每当我遇到自负之人，都能予以宽容和理解，因为我相信，这自负不管对于自负者本人，还是与他相处的旁人，都颇有裨益；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人们因为属于人生诸多慰藉之一的自负心而感谢上帝，倒也并不荒唐。

And now I speak of thanking God, I desire with all humility to acknowledge that I owe the mentioned happiness of my past life to His kind providence, which lead me to the means I used and gave

them success. My belief of this induces me to hope, though I must not presume, that the same goodness will still be exercised toward me, in continuing that happiness, or enabling me to bear a fatal reverse, which I may experience as others have done: the complexion of my future fortune being known to Him only in whose power it is to bless to us even our afflictions.

既然提到感谢上帝，我想非常谦卑地承认，我所提及的过去生活中的幸福都来自上帝的眷顾，是他让我悟出了处世之道并取得成功。这一信念让我怀抱期望，尽管我不应妄自肯定他仍将施与我同样的恩惠，使我继续先前的幸福，或者让我在像他人一样遭遇致命的人生逆境时，依然能够承受得住：只有上帝知道我未来的命运，他会祝福我们，即使这种祝福是以施与苦难的形式实现的。

The notes one of my uncles (who had the same kind of curiosity in collecting family anecdotes) once put into my hands, furnished me with several particulars relating to our ancestors. From these notes I learned that the family had lived in the same village, Ecton, in Northamptonshire, for three hundred years, and how much longer he knew not (perhaps from the time when the name of Franklin, that before was the name of an order of people, was assumed by them as a surname when others took surnames all over the kingdom), on a freehold of about thirty acres, aided by the smith's business, which had continued in the family till his time, the eldest son being always bred to that business; a custom which he and my father followed as to their eldest sons. When I searched the registers at Ecton, I found an account of their births, marriages and burials from the year 1555 only, there being no registers kept in that parish at any time preceding. By that register I perceived that I was the youngest son of the youngest son for five generations back.

My grandfather Thomas, who was born in 1598, lived at Ecton till he grew too old to follow business longer, when he went to live with his son John, a dyer at Banbury, in Oxfordshire, with whom my father served an apprenticeship. There my grandfather died and lies buried. We saw his gravestone in 1758. His eldest son Thomas lived in the house at Ecton, and left it with the land to his only child, a daughter, who, with her husband, one Fisher, of Wellingborough, sold it to Mr. Isted, now lord of the manor there. My grandfather had four sons that grew up, viz.: Thomas, John, Benjamin and Josiah. I will give you what account I can of them, at this distance from my papers, and if these are not lost in my absence, you will among them find many more particulars.

我的一位伯父曾交给我一些笔记（他和我一样爱好搜集家族趣闻），让我对我们家族先人的某些事情有了了解。从这些笔记中我得知，我们家族在北安普敦郡的埃克顿村居住了300年，在这之前还有多少年他不得而知（“富兰克林”原本是一个社会阶层的名字，后来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开始采用姓氏时，“富兰克林”开始被他们当作姓，也许我们家族从那时起就在此居住了），我们的家族拥有约30英亩的自由土地，并以铁匠生意为副业，一直经营到伯父那个时候，都是由家里的长子继承这门生意的，伯父和我父亲都遵循了这一传统。我查询了埃克顿的登记册，发现只有1555年以后关于他们出生、婚嫁和丧葬的记录，此前的记录在该教区均已无据可考。从那本登记册上我了解到，我是家族里五代人中最小儿子的最小儿子。我的祖父托马斯生于1598年，一直住在埃克顿，直到因年老而不能打理生意才搬到牛津郡的班伯里和儿子约翰一起住。约翰是个染工，我父亲还曾给他当过学徒。祖父后来在牛津郡去世，并葬在了那里。我们曾于1758年见过他的墓碑。他的长子托马斯住在埃克顿的房子里，后来把房子与土地留给了他的独生女。女儿的丈夫是韦灵伯勒一个叫费舍尔的人，他们把土地卖给了伊斯特先生，他现在是那块领地的主人。祖父有四个儿子长大成人，他们是托马斯、约翰、本杰明和乔赛亚。我没把关于他们

的记录带在身边，我只能尽我所能向你描述他们的状况，如果那些记录在我不在时不会丢失的话，你可以从中了解到更多细节。

Thomas was bred a smith under his father; but, being ingenious, and encouraged in learning (as all my brothers were) by an Esquire Palmer, then the principal gentleman in that parish, he qualified himself for the business of scrivener; became a considerable man in the county; was a chief mover of all public-spirited undertakings for the county or town of Northampton, and his own village, of which many instances were related of him; and much taken notice of and patronized by the then Lord Halifax. He died in 1702, January 6, old style, just four years to a day before I was born. The account we received of his life and character from some old people at Ecton, I remember, struck you as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from its similarity to what you knew of mine.

大儿子托马斯跟着他的父亲学了打铁，但他天资聪颖，当时教区的大绅士帕尔默先生鼓励他（我的其他兄弟们也都一样）继续学习。后来他获得了文书资格，在郡里颇有影响，还是北安普敦郡、乡镇以及本村所有公益事业的主要推动者。我听人们讲述了他的许多事迹，他还得到了哈利法克斯勋爵的赏识和资助。托马斯于旧历1702年1月6日去世，而我恰好在他去世四年后的那一天出生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听完埃克顿的一些老人讲述他的生平和性格后，你着实吃惊不小，因为这和你所了解的我很相似。

“Had he died on the same day,” you said, “one might have supposed a transmigration.”

“如果他在你出生的日子去世，”你说，“人们会以为你是他的转世。”

John was bred a dyer, I believe of woolens. Benjamin was bred a silk dyer, serving an apprenticeship at London. He was an ingenious man. I remember him well, for when I was a boy he came over to my father in Boston, and lived in the house with us some years. He lived to a great age. His grandson, Samuel Franklin, now lives in Boston. He left behind him two quarto volumes, MS., of his own poetry, consisting of little occasional pieces addressed to his friends and relations, of which the following, sent to me, is a specimen. (Here follow in the margin the words, in brackets, “here insert it,” but the poetry is not given.) He had formed a short-hand of his own, which he taught me, but, never practising it, I have now forgot it. I was named after this uncle, there being a particular affection between him and my father. He was very pious, a great attender of sermons of the best preachers, which he took down in his short-hand, and had with him many volumes of them. He was also much of a politician; too much, perhaps, for his station. There fell lately into my hands, in London, a collection he had made of all the principal pamphlets, relating to public affairs, from 1641 to 1717; many of the volumes are wanting as appears by the numbering, but there still remain eight volumes in folio, and twenty-four in quarto and in octavo. A dealer in old books met with them, and knowing me by my sometimes buying of him, he brought them to me. It seems my uncle must have left them here, when he went to America, which was about fifty years since. There are many of his notes in the margins.

二儿子约翰学做了染工，好像是染羊毛的。三儿子本杰明成了丝

绸染工，在伦敦当学徒。他是个聪慧灵巧的人。我很清楚地记得他，因为在我还小的时候他来波士顿找过我父亲，和我们一起住了几年。他活得年岁很高，他的孙子塞缪尔·富兰克林现居波士顿。本杰明死后留下两卷四开本的诗集手稿，都是他自己创作的，其中有些是题赠给朋友和亲戚的应景小诗，下面这首写给我的小诗就是个例子。（在此页空白处有个括号，里面有“在此插入”的字样，但没有给出小诗。）他还自创了一种速记方法，并把它教给了我，只是我从未练习过，现在都忘了。当时他和我父亲感情特别好，所以我的名字也是随他起的。本杰明是个虔诚的教徒，一直坚持去听当时最了不起的牧师布道，并用自创的速记法记下来，他还留有好几卷这样的布道笔记。他还是位出色的政治家，也许就他的地位而言，他在政治上倾注的精力过多了。我最近在伦敦得到一本他搜集的集子，涵盖了1641年至1717年间所有关于公共事务的重要论文。从编号来看，文集中的许多卷已经缺失了，但是仍然留下了8卷对开本、24卷四开本和八开本。一位旧书商偶然得到它们，因为我有时在他那儿买书，所以他认识我，于是就把这些书送到了我这里。这似乎是我伯父去美国时留在这里的，距今大约已有50年了。书页空白处还留有许多他做的笔记。

This obscure family of ours was early in the Reformation, and continued Protestants through the reign of Queen Mary, when they were sometimes in danger of trouble on account of their zeal against popery. They had got an English Bible, and to conceal and secure it, it was fastened open with tapes under and within the cover of a joint-stool. When my great-great-grandfather read it to his family, he turned up the joint-stool upon his knees, turning over the leaves then under the tapes. One of the children stood at the door to give notice if he saw the apparitor coming, who was an officer of the spiritual court. In that case the stool was turned down again upon its feet, when the Bible remained concealed under it as before. This anecdote I had from my uncle Benjamin. The family continued all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till about the end of Charles

the Second's reign, when some of the ministers that had been outed for nonconformity holding conventicles in Northamptonshire, Benjamin and Josiah adhered to them, and so continued all their lives; the rest of the family remained with the Episcopal Church.

我们这个卑微的家庭很早就响应了宗教改革，玛丽女王统治时期也始终信仰新教，他们有时还因强烈反对天主教而陷入险境。家里有一本英文《圣经》，为了隐藏和保住这本《圣经》，他们把它打开，用胶带绑在折叠凳的背面。高祖父向全家颂读《圣经》时，便把折叠板凳翻过来放在膝盖上，再翻开藏在胶带下的书页。这时会有一个孩子站在门口把风，如果看见宗教法庭官员来了就赶紧报信儿，高祖父就把折叠板凳翻转回来放在地上，于是《圣经》仍像先前一样藏在折叠板凳下面了。这则轶事我是从本杰明伯父那儿听来的。直到查理二世统治末期，家人都一直信仰英国国教，后来有些因不信国教被开除教籍的牧师在北安普敦郡举行秘密集会，本杰明和乔赛亚改信了他们的教派且终生不渝，家里其他人则始终信仰国教。

Josiah, my father, married young, and carried his wife with three children into New England, about 1682. The conventicles having been forbidden by law, and frequently disturbed, induced some considerable men of his acquaintance to remove to that country, and he was prevailed with to accompany them thither, where they expected to enjoy their mode of religion with freedom. By the same wife he had four children more born there, and by a second wife ten more, in all seventeen; of which I remember thirteen sitting at one time at his table, who all grew up to be men and women, and married; I was the youngest son, and the youngest child but two, and was born in Boston, New England. My mother, the second wife, was Abiah Folger, daughter of Peter Folger, one of the first settlers of New England, of whom honorable mention is

made by Cotton Mather in his church history of that country, entitled 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 as “a godly, learned Englishman,” if I remember the words rightly. I have heard that he wrote sundry small occasional pieces, but only one of them was printed, which I saw now many years since. It was written in 1675, in the home-spun verse of that time and people, and addressed to those then concerned in the government there. It was in favor of liberty of conscience, and in behalf of the Baptists, Quakers, and other sectaries that had been under persecution, ascribing the Indian wars, and other distresses that had befallen the country, to that persecution, as so many judgments of God to punish so heinous an offense, and exhorting a repeal of those uncharitable laws. The whole appeared to me as written with a good deal of decent plainness and manly freedom. The six concluding lines I remember, though I have forgotten the two first of the stanza; but the purport of them was, that his censures proceeded from good-will, and, therefore, he would be known to be the author.

小儿子乔赛亚是我父亲，娶妻很早，1682年左右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迁到了新英格兰。当时非国教的集会均被法律禁止，活动常常受到干扰，这使得与父亲相识的几位颇有影响的人迁往了新英格兰，而父亲也经他们劝说同意一起走，希望在新英格兰能享有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他的第一位妻子在新英格兰又生了4个孩子，第二位妻子生下10个孩子，一共17个；我还记得其中13个一同坐在桌边的情景，他们后来都长大成人，各自成家。我是最小的儿子，出生在新英格兰的波士顿，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我母亲，也就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名叫艾比亚·福尔杰，是新英格兰第一批移民彼得·福尔杰的女儿，科顿·马瑟曾在其所著的《新英格兰宗教史》这本讲述美国基督教历史的书中提到过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马瑟在书里称他是“一个虔诚、博学的英国人”。我听说外祖父曾写下过各类应景小诗，但只有一篇付印，我许多年前曾经读过。那首诗写于1675年，是用当时的

朴实诗体写成的，写给当时当地的政府人士。诗中的观点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支持浸信会、贵格会和其他受迫害的教派，将印第安人战争和其他降临于这片土地的不幸归咎于宗教迫害，称上帝给了如此多的审判就是为了惩罚人们可恶的罪行。诗中还力主废除残酷的法律。在我看来，全诗是以大气直白和颇具男子气概的自由风格写就。我仍然记得结尾的六行，尽管诗节的头两句我已经忘了；那几行大概是说他的指责乃出于好意，因此他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诗的作者。

“Because to be a libeller (says he) I hate it with my heart; From Sherburne town, where now I dwell My name I do put here; Without offense your real friend, It is Peter Folger.”

“诋毁诽谤他人，我满心憎恶；我住在舍本镇，我的名字也定留在这里；无意冒犯，我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彼得·福尔杰。”

My elder brothers were all put apprentices to different trades. I was put to the grammar-school at eight years of age, my father intending to devote me, as the tithe of his sons, to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My early readiness in learning to read (which must have been very early, as I do not remember when I could not read), and the opinion of all his friends, that I should certainly make a good scholar, encouraged him in this purpose of his. My uncle Benjamin, too, approved of it, and proposed to give me all his short-hand volumes of sermons, I suppose as a stock to set up with, if I would learn his character. I continued, however, at the grammar-school not quite one year, though in that time I had risen gradually from the middle of the class of that year to be the head of it, and farther was removed into the next class above it, in order to go with that into the third at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my father, in the

meantime, from a view of the expense of a college education, which having so large a family he could not well afford, and the mean living many so educated were afterwards able to obtain—reasons that he gave to his friends in my hearing—altered his first intention, took me from the grammar-school, and sent me to a school for writing and arithmetic, kept by a then famous man, Mr. George Brownell, very successful in his profession generally, and that by mild, encouraging methods. Under him I acquired fair writing pretty soon, but I failed in the arithmetic, and made no progress in it. At ten years old I was taken home to assist my father in his business, which was that of a tallow-chandler and soap-boiler; a business he was not bred to, but had assumed on his arrival in New England, and on finding his dying trade would not maintain his family, being in little request. Accordingly, I was employed in cutting wick for the candles, filling the dipping mold and the molds for cast candles, attending the shop, going of errands, etc.

我的兄长们都被送到不同行业去当学徒，我则于八岁时进了文法学校，因为父亲希望我——他的第十个儿子——成为牧师。我很小就学会阅读（一定很小，因为我不记得自己有过不识字的时候），加之父亲所有的朋友都认为我一定能成为一位优秀的学者，因此父亲对我抱了更大的希望。本杰明伯父对此也很赞同，还提议说，如果我能认识他的字，就把他所有速记下来的布道笔记留给我，作为知识积累的开始。但我在文法学校学习还不到一年，父亲便决定让我转学，去上了一所学习写作和算术的学校。而那时我已逐渐从班上中等水平进步到名列前茅，还进入了更高的年级，准备年终时升入三年级读书。不过，父亲当时考虑到家里人口众多，很难再承担昂贵的大学学费，而且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后来也过得相当穷困——我亲耳听他对朋友们这么说过——致使他改变了初衷。我后来去的那所学校是由当时的知名人士乔治·布朗威尔先生办的。布朗威尔先生对学生采取温和、鼓励性的教学方法，因此把教育办得非常成功。在他那里我很快学会了

写一手好字，但算术学得不好，没取得什么进步。10岁时，父亲让我回家协助他做生意，卖油烛和肥皂；他以前没有学过这行，是到新英格兰之后才开始干的，因为他发现在这里做染工没什么生意，养不了家。就这样，我开始给蜡烛剪烛芯，填灌蜡烛模子，照管店铺，跑跑腿什么的。

I disliked the trade, and had a strong inclination for the sea, but my father declared against it; however, living near the water, I was much in and about it, learnt early to swim well, and to manage boats; and when in a boat or canoe with other boys, I was commonly allowed to govern, especially in any case of difficulty; and upon other occasions I was generally a leader among the boys, and sometimes led them into scrapes, of which I will mention one instance, as it shows an early projecting public spirit, tho' not then justly conducted.

我不喜欢这一行，反而很想去航海，可父亲却明确反对。不过，由于住在沿海一带，我常去海边和水中玩耍，很早就学会了游泳，游得还很好，也学会了划船。我和其他男孩在船上或独木舟上时，他们一般都让我来当头儿，尤其是遇到困难时。在其他时候我一般也是同伴中的头儿，尽管有时我也会把大家带入窘境。我来举一个例子吧，从中可以看出我很早就具有突出的领导精神！只是当时用错了地方。

There was a salt-marsh that bounded part of the mill-pond, on the edge of which, at high water, we used to stand to fish for minnows. By much trampling, we had made it a mere quagmire. My proposal was to build a wharf there fit for us to stand upon, and I showed my comrades a large heap of stones, which were intended for a new house near the marsh, and which would very well suit

our purpose. Accordingly, in the evening, when the workmen were gone, I assembled a number of my play-fellows, and working with them diligently like so many emmets, sometimes two or three to a stone, we brought them all away and built our little wharf. The next morning the workmen were surprised at missing the stones, which were found in our wharf. Inquiry was made after the removers; we were discovered and complained of; several of us were corrected by our fathers; and though I pleaded the usefulness of the work, mine convinced me that nothing was useful which was not honest.

磨房的贮水池旁边有一片盐沼地，水位升高时，我们常常站在旁边钓米诺鱼。因为过度踩踏，这儿已经被我们弄成一片泥地了。于是我提议修一个码头，好让我们站在上面，还把一大堆石块指给同伴们看，那本是人家要用来在沼泽边建新房子的，但非常符合我们的需要。于是，等晚上工匠们离开后，我召集了许多同伴，像蚂蚁一样努力工作起来，有时两三个人搬一块石头，直到全部搬完，建起了我们的小码头。第二天早上，工匠们发现石块不见了，大吃一惊，后来发现石块已被我们用来建了码头。经过一番调查，发现我们就是搬走石头的人，就向我们各自家里告状，有几个同伴被自己父亲教训了一顿；尽管我向父亲辩解我们建的码头很有用，但他告诉我说，如果不诚实，什么都没有用。

I think you may like to know something of his person and character. He had an excellent constitution of body, was of middle stature, but well set, and very strong; he was ingenious, could draw prettily, was skilled a little in music, and had a clear pleasing voice, so that when he played psalm tunes on his violin and sung withal, as he sometimes did in an evening after the business of the day was over, it was extremely agreeable to hear. He had a mechanical genius too, and, on occasion, was very handy in the use of other

tradesmen's tools; but his great excellence lay in a sound understanding and solid judgment in prudential matters, both in private and publick affairs. In the latter, indeed, he was never employed, the numerous family he had to educate and the straitness of his circumstances keeping him close to his trade; but I remember well his being frequently visited by leading people, who consulted him for his opinion in affairs of the town or of the church he belonged to, and showed a good deal of respect for his judgment and advice: he was also much consulted by private persons about their affairs when any difficulty occurred, and frequently chosen an arbitrator between contending parties.

我想你可能希望了解我父亲的为人和个性。他身板很好，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天资聪颖，擅长绘画，也略通音乐，声音清朗动听，因此有的晚上，他会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后，拉起小提琴，唱起圣歌，十分悦耳动听。他也是机械方面的好手，有时使用其他工匠的工具也非常得心应手；但他最杰出的才能还在于处理公私事务中的重大问题时那种良好的理解力和可靠的判断力。的确，从没有人正式聘用他去参与公共事务，由于家里众多子女需要教育，经济又困难，因此他只能围着自己的生意转。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经常有头面人物拜访他，向他请教镇上或是本教区的公共事务，且他们对他的判断和建议都表现出十分的尊重；也经常有人在私事上遇到困难时向父亲咨询，他还经常被选作某事争议双方的仲裁人。

At his table he liked to have, as often as he could, some sensible friend or neighbor to converse with, and always took care to start some ingenious or useful topic for discourse, which might tend to improve the minds of his children. By this means he turned our attention to what was good, just, and prudent in the conduct of life; and little or no notice was ever taken of what related to the

victuals on the table, whether it was well or ill dressed, in or out of season, of good or bad flavor, preferable or inferior to this or that other thing of the kind, so that I was bro't up in such a perfect inattention to those matters as to be quite indifferent what kind of food was set before me, and so unobservant of it, that to this day if I am asked I can scarce tell a few hours after dinner what I dined upon. This has been a convenience to me in travelling, where my companions have been sometimes very unhappy for want of a suitable gratification of their more delicate, because better instructed, tastes and appetites.

他常常喜欢邀请一些精明通达的朋友或邻居一起围坐在餐桌旁聊天，而且总是有意谈些睿智或是有用的话题，以提高孩子们的心智。通过这样的方法，他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行为操守中善良、正直、谨慎的品德，而很少或完全不去留意餐桌上的食物，不管它们烹调得好不好、合不合时令、味道如何、与同类的其他食物相比有何优劣，因此我从小便受教导对眼前摆放的是什么食物这些事情一向不十分在意，也不去观察；所以到了现在，即使刚吃完饭几个小时，要是有人问我刚吃了什么，我很少能答得上来。这让我在旅途中倒挺方便，而我的同伴们有时会因为没法满足自幼养成的更为精细的味觉和挑剔的胃口而十分不悦。

My mother had likewise an excellent constitution: she suckled all her ten children. I never knew either my father or mother to have any sickness but that of which they dy'd, he at 89, and she at 85 years of age. They lie buried together at Boston, where I some years since placed a marble over their grave, with this inscription:

我母亲也同样有着很好的体格：她哺育了自己的10个孩子。父亲

于89岁、母亲于85岁时因病去世，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他们生病。父母去世后合葬在波士顿，几年前，我在他们的墓前立了一块大理石石碑，上面刻着这样的碑文：

JOSIAH FRANKLIN, and ABIAH his Wife, lie here interred.

乔赛亚·富兰克林，和他的妻子艾比亚·富兰克林合葬于此。

They lived lovingly together in wedlock fifty-five years.

他们婚后相亲相爱共同生活了55年。

Without an estate, or any gainful employment,

他们没有田产，没有收入可观的职业，

By constant labor and industry, with God's blessing,

但凭着不懈的劳动和勤勉，还有上帝的祝福，

They maintained a large family

养育了一个大家庭，

comfortably,

安逸舒适，

and brought up thirteen children and seven grandchildren reputably.

养大了13个儿女和7个孙子孙女，声誉卓著。

From this instance, reader,

看到这块墓碑的人啊，

Be encouraged to diligence in thy calling,

希望受此激励，勤勉劳作，

And distrust not Providence.

勿疑上帝。

He was a pious and prudent man; She, a discreet and virtuous woman.

他是虔诚而审慎的男子，她是谨慎而贤淑的女子。

Their youngest son,

他们的幼子，

In filial regard to their memory,

心存孝心，追忆双亲，

Places this stone.

特立此碑。

J.F. born 1655, died 1744, AEtat 89.

乔赛亚·富兰克林，生于1655年，卒于1744年，享年89岁。

A.F. born 1667, died 1752,—85.

艾比亚·富兰克林，生于1667年，卒于1752年，享年85岁。

By my rambling digressions I perceive myself to be grown old. I us'd to write more methodically. But one does not dress for private company as for a public ball. 'tis perhaps only negligence.

我又不知不觉跑题了，由此看来自己真是老了，我以前写作要更有条理些。但是就像一个人参加私人聚会时不会像参加公众舞会一般盛装，这也许只是疏忽罢了。

To return: I continued thus employed in my father's business for two years, that is, till I was twelve years old; and my brother John, who was bred to that business, having left my father, married, and set up for himself at Rhode Island, there was all appearance that I was destined to supply his place, and become a tallow-chandler. But my dislike to the trade continuing, my father was under apprehensions that if he did not find one for me more agreeable, I should break away and get to sea, as his son Josiah had done, to his great vexation. He therefore sometimes took me to walk with him, and see joiners, bricklayers, turners, braziers, etc., at their work, that he might observe my inclination, and endeavor to fix it on some trade or other on land. It has ever since been a pleasure to me to see good workmen handle their tools; and it has been useful to me, having learnt so much by it as to be able to do little jobs myself in my house when a workman could not readily be got, and to construct little machines for my experiments, while the

intention of making the experiment was fresh and warm in my mind. My father at last fixed upon the cutler's trade, and my uncle Benjamin's son Samuel, who was bred to that business in London, being about that time established in Boston, I was sent to be with him some time on liking. But his expectations of a fee with me displeasing my father, I was taken home again.

言归正传：我在父亲那儿干了两年，直到我12岁；我的哥哥约翰本是学做油烛和肥皂的，他此时已经离开父亲，娶了妻，并在罗得岛立了脚，这样看来我注定是要子承父业成为一名油烛匠了。但我仍然不喜欢这一行，父亲很担心，怕我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我就要像他的儿子乔赛亚一样离家去航海了，这让他很烦恼。因此他有时会让我和他一块儿去散步，带我去看木匠、砖匠、车工、铜匠等人的工作，以便观察我的喜好，努力想把我的兴趣固定在陆地上的某个行业里。自那以后，看手艺灵巧的工匠们操持工具对我来说是种乐趣，而且也很有用，我从中学到许多，以致后来家中一时找不到工匠时，零星小活我自己也能干些，而且在我做实验的兴致颇高时，我还能为我的实验制造些小机器。父亲最终决定让我当一名刀匠，本杰明伯父的儿子塞缪尔曾在伦敦学这行，当时他已在波士顿独立门户，我被送去给他当了一阵子学徒，试试看是否喜欢。但是他希望我掏钱付学徒费，这让父亲很不高兴，于是又把我带回了家。

From a child I was fond of reading, and all the little money that came into my hands was ever laid out in books. Pleased with the Pilgrim's Progress, my first collection was of John Bunyan's works in separate little volumes. I afterward sold them to enable me to buy R. Burton's Historical Collections; they were small chapmen's books, and cheap, 40 or 50 in all. My father's little library consisted chiefly of books in polemic divinity, most of which I read, and have since often regretted that, at a time when I had such a thirst for

knowledge, more proper books had not fallen in my way since it was now resolved I should not be a clergyman. Plutarch's Lives there was in which I read abundantly, and I still think that time spent to great advantage. There was also a book of Defoe's, called An Essay on Projects, and another of Dr. Mather's, called Essays to do Good, which perhaps gave me a turn of thinking that had an influence on some of the principal future events of my life.

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喜欢看书，我所有的那点儿零用钱都花在了书本上。我喜爱《天路历程》，我买的第一套书籍就是约翰·班扬的作品，都是单独发行的小文集。后来我把它们卖了，用卖得的钱又买了伯顿的《历史记录》，我是从小贩那儿买的，很便宜，总共花了四五十。我父亲的小书屋里收藏的主要是关于神学论辩的书，大多我都读过，我后来常常觉得遗憾，在我对知识如饥似渴、孜孜以求的时候，没能读到更多合适的书，因为那时已经确定我不会成为牧师了。我读了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读得很仔细，直到现在也依然觉得花在此书上的时间非常值得。还有一本笛福的书，名叫《论计划》，以及一本马瑟博士的《论行善》，这些书也许让我的思想有了转变，对我后来人生中的某些重要事件产生了影响。

This bookish inclination at length determined my father to make me a printer, though he had already one son (James) of that profession. In 1717 my brother James returned from England with a press and letters to set up his business in Boston. I liked it much better than that of my father, but still had a hankering for the sea. To prevent the apprehended effect of such an inclination, my father was impatient to have me bound to my brother. I stood out some time, but at last was persuaded, and signed the indentures when I was yet but twelve years old. I was to serve as an apprentice till I was twenty-one years of age, only I was to be allowed journeyman's

wages during the last year. In a little time I made great proficiency in the business, and became a useful hand to my brother. I now had access to better books. An acquaintance with the apprentices of booksellers enabled me sometimes to borrow a small one, which I was careful to return soon and clean. Often I sat up in my room reading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night, when the book was borrowed in the evening and to be returned early in the morning, lest it should be missed or wanted.

我对读书的热爱最终使我父亲决定让我当一名印刷工，尽管他已经有一个儿子在从事这一行了（詹姆斯）。1717年，我哥哥詹姆斯从英国回来，带回了一台印刷机和一套铅字，打算在波士顿创立自己的生意。比起我父亲那一行来，我对印刷业要喜欢得多，但我还是渴望去航海。为了避免这种渴望带来令人忧虑的后果，我父亲迫不及待地想把我拴在哥哥那里。我反对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同意了，签了学徒契约，当时我还只有12岁。我当学徒一直要当到21岁，只有学徒期的最后一年才能拿熟练工的工资。我很快就熟悉了印刷工的工作，成了哥哥的得力助手。现在我可以读到更好的书了。我认识了书店老板的学徒，有时能从他们那儿借本小书，每次我都很小心，要很快归还，还要保持书面整洁。如果书是在晚上借到，第二天一早就要归还，于是我常常会大半个晚上都在房间里读书，怕人家发现丢了书或是有人要买。

And after some time an ingenious tradesman, Mr. Matthew Adams, who had a pretty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who frequented our printing-house, took notice of me, invited me to his library, and very kindly lent me such books as I chose to read. I now took a fancy to poetry, and made some little pieces; my brother, thinking it might turn to account, encouraged me, and put me on composing occasional ballads. One was called The Lighthouse Tragedy, and

contained an account of the drowning of Captain Worthilake, with his two daughters: the other was a sailor's song, on the taking of Teach (or Blackbeard) the pirate. They were wretched stuff, in the Grub-street-ballad style; and when they were printed he sent me about the town to sell them. The first sold wonderfully, the event being recent, having made a great noise. This flattered my vanity; but my father discouraged me by ridiculing my performances, and telling me verse-makers were generally beggars. So I escaped being a poet, most probably a very bad one; but as prose writing had been of great use to me in the course of my life, and was a principal means of my advancement, I shall tell you how, in such a situation, I acquired what little ability I have in that way.

过了些时日，一位藏书丰富的精明商人马修·亚当斯先生经常光顾我们的印刷店，他注意到了我，邀我去他的图书室，还非常好心地把我想读的书借给我。当时我迷上了诗歌，也写了几首小诗。我哥哥认为写诗或许有用，于是鼓励我，让我写几首应景叙事诗。我写了一首，叫做《灯塔的悲剧》，讲述沃斯雷克船长和他的两个女儿溺水而亡的故事，另一首是水手之歌，讲述水手擒获海盗蒂奇（又叫黑胡子）的故事。这两首诗写得很差劲，都是低俗的街头风格，哥哥把它们印出来后，让我去镇上卖。第一首诗卖得很不错，因为那一事件刚发生不久，也很轰动。这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但父亲却打击我，嘲笑我的诗作，还告诫我说写诗的人通常都穷得叮当响。因此我没有成为诗人，即使成了，也很可能只是三流诗人，但是散文写作却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大为有用，也是我取得进步的主要方法，我要告诉你，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怎样获得我在这方面的一点小小才能的。

There was another bookish lad in the town, John Collins by name, with whom I was intimately acquainted. We sometimes disputed, and very fond we were of argument, and very desirous of

confuting one another, which disputatious turn, by the way, is apt to become a very bad habit, making people often extremely disagreeable in company by the contradiction that is necessary to bring it into practice; and thence, besides souring and spoiling the conversation, is productive of disgusts and, perhaps enmities where you may have occasion for friendship. I had caught it by reading my father's books of dispute about religion. Persons of good sense, I have since observed, seldom fall into it, except lawyers, university men, and men of all sorts that have been bred at Edinborough.

镇上还有个小伙子也爱读书，叫约翰·柯林斯，我和他关系很好。我们有时会发生争论，且深得其乐，都很想驳倒对方。顺便说一句，争辩这种嗜好容易成为一个坏毛病，要争辩，人们就必须提出反驳意见，这常常会让其他人非常不悦。因此，争辩除了破坏谈话气氛以外，还让人心生厌恶，或许还让原本可能产生的友谊化作了敌意。我是从父亲那些讲述宗教论辩的书中学会争辩的。后来我发现，除了律师、大学里的人，还有在爱丁堡长大的形形色色的人之外，智者很少与人争辩。

A question was once, somehow or other, started between Collins and me, of the propriety of educating the female sex in learning, and their abilities for study. He was of opinion that it was improper, and that they were naturally unequal to it. I took the contrary side, perhaps a little for dispute's sake. He was naturally more eloquent, had a ready plenty of words; and sometimes, as I thought, bore me down more by his fluency than by the strength of his reasons. As we parted without settling the point, and were not to see one another again for some time, I sat down to put my arguments in writing, which I copied fair and sent to him. He answered, and I replied. Three or four letters of a side had passed,

when my father happened to find my papers and read them. Without entering into the discussion, he took occasion to talk to me about the manner of my writing; observed that, though I had the advantage of my antagonist in correct spelling and pointing (which I ow'd to the printing-house), I fell far short in elegance of expression, in method and in perspicuity, of which he convinced me by several instances. I saw the justice of his remark, and thence grew more attentive to the manner in writing, and determined to endeavor at improvement.

不知何故，有一次我和柯林斯讨论起女性接受教育是否合适以及她们的学习能力的问题。他认为女性接受教育是不适宜的，她们天生缺乏学习能力。我的意见则恰恰相反，也许有些刻意为了争辩而争辩吧。他天生口才比我要好，现成的词汇丰富，有时我想，他之所以更胜一筹，更多是因为他表达流利，而非其论证强而有力。我们分开时还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而且将有一段时间见不了面，于是我坐下来写下我的观点，工工整整地抄好寄给他。他回了信，我又提笔答复，双方各写了三四封的时候，我父亲偶然发现了我的信，读了起来。他没有参与我们的讨论，只是借机和我谈了谈我的写作风格。他评论道，尽管在单词拼写和标点方面我要比我的对手更胜一筹（这得益于印刷店的工作），但在措词的文雅程度、论述方法和条理清晰方面，我都远不如他，父亲还举了几个例子向我证明。我意识到他说得很公正，从那以后特别注意写作风格，决心努力改进。

About this time I met with an odd volume of the Spectator. It was the third. I had never before seen any of them. I bought it, read it over and over, and was much delighted with it. I thought the writing excellent, and wished, if possible, to imitate it. With this view I took some of the papers, and, making short hints of the sentiment in each sentence, laid them by a few days, and then,

without looking at the book, try'd to compleat the papers again, by expressing each hinted sentiment at length, and as fully as it had been expressed before, in any suitable words that should come to hand. Then I compared my Spectator with the original, discovered some of my faults, and corrected them. But I found I wanted a stock of words, or a readiness in recollecting and using them, which I thought I should have acquired before that time if I had gone on making verses; since the continual occasion for words of the same import, but of different length, to suit the measure, or of different sound for the rhyme, would have laid me under a constant necessity of searching for variety, and also have tended to fix that variety in my mind, and make me master of it. Therefore I took some of the tales and turned them into verse; and, after a time, when I had pretty well forgotten the prose, turned them back again. I also sometimes jumbled my collections of hints into confusion, and after some weeks endeavored to reduce them into the best order, before I began to form the full sentences and compleat the paper. This was to teach me method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oughts. By comparing my work afterwards with the original, I discovered many faults and amended them; but I sometimes had the pleasure of fancying that, in certain particulars of small import, I had been lucky enough to improve the method or the language, and this encouraged me to think I might possibly in time come to be a tolerable English writer, of which I was extremely ambitious. My time for these exercises and for reading was at night, after work or before it began in the morning, or on Sundays, when I contrived to be in the printing-house alone, evading as much as I could the common attendance on public worship which my father used to exact on me when I was under his care, and which indeed I still thought a duty, though I could not, as it seemed to me, afford time to practise it.

大约就在这时，我看到一本单册的《旁观者》杂志，是第三期。以前我从未读过这本杂志。我买下它，反复阅读，非常喜欢。我觉得它的文笔很好，可能的话想要模仿它。抱着这种想法，我挑了其中一些文章，对文中每句话的观点作了些简短概括当作提示，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边。几天后，我试着不看原文，用所能想到的合适字词把概括之后的文章观点详尽地表达出来，尽可能和原来一样完整，使之成文。然后我把我写的《旁观者》与原文进行对照，发现了自己的几处错误，便进行改正。但我发现自己词汇贫乏，或者说不能及时想起它们并加以运用，我想如果当初我继续写诗的话，我应该早就会用那些词了。因为写诗时总要搜寻同义但长度不同的单词以符合诗的音步，或是同义但读音不同的单词以配合诗的韵律，这会让我时时需要搜寻各种不同的单词，并使它们嵌入我的脑海，做到可以信手拈来。于是我将其中一些故事改写成诗歌，过了一段时间，当我把原文忘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又把它们改写回去。有时我会把记下的文章概要打乱，几个星期后又努力把它们编排出最合适的次序，然后再将它们扩充成完整的句子与文章。这种做法旨在教会我整理思绪的方法。随后，通过将自己的文章与原文比较，我发现了自己的许多错误，并进行了修改；但有时我也喜欢幻想在某些次要的细节上，我十分有幸改进了原文的论述方法或是语言，这鼓励了我，认为自己将来或许也能成为一位还不赖的英语作家，我对此抱有极大的雄心。我做这些练习及读书都是在夜里工作结束之后或是早上开工之前，或者是在周日，周日我总是争取单独呆在印刷店，尽力避免那些大家都出席的公共礼拜。在我还由父亲照顾时他总是一定要我参加，确实我仍然认为参加礼拜是应尽的义务，但是在我看来我本不必花时间去实践这个义务。

When about 16 years of age I happened to meet with a book, written by one Tryon, recommending a vegetable diet. I determined to go into it. My brother, being yet unmarried, did not keep house, but boarded himself and his apprentices in another family. My refusing to eat flesh occasioned an inconveniency, and I was frequently chid for my singularity. I made myself acquainted with

Tryon's manner of preparing some of his dishes, such as boiling potatoes or rice, making hasty pudding, and a few others, and then proposed to my brother, that if he would give me, weekly, half the money he paid for my board, I would board myself. He instantly agreed to it, and I presently found that I could save half what he paid me. This was an additional fund for buying books. But I had another advantage in it. My brother and the rest going from the printing-house to their meals, I remained there alone, and, despatching presently my light repast, which often was no more than a biscuit or a slice of bread, a handful of raisins or a tart from the pastry-cook's, and a glass of water, had the rest of the time till their return for study, in which I made the greater progress, from that greater clearness of head and quicker apprehension which usually attend temperance in eating and drinking.

大概16岁那年我偶然看到一本书，作者是个叫特赖恩的人，介绍素食。我决定仔细阅读此书。哥哥当时尚未娶妻，自己也不操持家务，他和学徒们食宿都在别人家里。我不吃荤腥给他们带来了不便，也常常因这种特立独行遭到责备。我自学了特赖恩的一些烹饪方法，比如煮土豆、煮饭、制作速食布丁以及一些其他菜式，然后向哥哥提出，如果他每周把我食宿费的一半给我，我可以自己开伙。他立即同意了，而我发现我还能从他给我的钱中省下一半，于是这些钱便成了我买书的额外基金。但我从中还得到了另一个好处。哥哥和其他人离开印刷店去吃饭时，我可以单独留在那里，迅速吃完自己清淡的一餐，常常只是一块饼干或者一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者从糕点店买来的一块馅饼，还有一杯白开水。在他们回来之前，余下的时间里我都在学习，因为饮食清淡节制，头脑更加清醒，理解力也增强，因此进步也比以前大了。

And now it was that, being on some occasion made asham'd of

my ignorance in figures, which I had twice failed in learning when at school, I took Cocker's book of Arithmetick, and went through the whole by myself with great ease. I also read Seller's and Shermy's books of Navigation, and became acquainted with the little geometry they contain; but never proceeded far in that science. And I read about this time Locke *On Human Understanding* , and the *Art of Thinking* , by Messrs. du Port Royal.

我在学校时算术曾经两次不及格，后来在某些场合我常为此羞愧于自己在数字方面的无知，于是我拿起柯克的《算术》，轻松地从头至尾自学了一遍。我还读了塞拉和舍米合著的《航海学》，对其中包含的浅显的几何学知识也有了了解，但我后来再未深入学习这门科学。我那时还读了洛克的《人类悟性论》和波尔罗亚尔隐修院修士的《思维的艺术》。

While I was intent on improving my language, I met with an English grammar (I think it was Greenwood's), at the end of which there were two little sketches of the arts of rhetoric and logic, the latter finishing with a specimen of a dispute in the Socratic method; and soon after I procur'd Xenophon's Memorable Things of Socrates, wherein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of the same method. I was charm'd with it, adopted it, dropt my abrupt contradiction and positive argumentation, and put on the humble inquirer and doubter. And being then, from reading Shaftesbury and Collins, become a real doubter in many points of our religious doctrine, I found this method safest for myself and very embarrassing to those against whom I used it; therefore I took a delight in it, practis'd it continually, and grew very artful and expert in drawing people, even of superior knowledge, into concessions, the consequences of which they did not foresee, entangling them in difficulties out of

which they could not extricate themselves, and so obtaining victories that neither myself nor my cause always deserved. I continu'd this method some few years, but gradually left it, retaining only the habit of expressing myself in terms of modest diffidence; never using, when I advanced anything that may possibly be disputed, the words certainly, undoubtedly, or any others that give the air of positiveness to an opinion; but rather say, I conceive or apprehend a thing to be so and so; it appears to me, or I should think it so or so, for such and such reasons; or I imagine it to be so; or it is so, if I am not mistaken. This habit, I believe, has been of great advantage to me when I have had occasion to inculcate my opinions, and persuade men into measures that I have been from time to time engag'd in promoting; and, as the chief ends of conversation are to inform or to be informed, to please or to persuade, I wish well-meaning, sensible men would not lessen their power of doing good by a positive, assuming manner, that seldom fails to disgust, tends to create opposition, and to defeat every one of those purposes for which speech was given to us, to wit, giving or receiving information or pleasure. For, if you would inform, a positive and dogmatical manner in advancing your sentiments may provoke contradiction and prevent a candid attention. If you wish in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from the knowledge of others,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express yourself as firmly fix'd in your present opinions, modest, sensible men, who do not love disputation, will probably leave you undisturbed in the possession of your error. And by such a manner, you can seldom hope to recommend yourself in pleasing your hearers, or to persuade those whose concurrence you desire. Pope says, judiciously:

当我一心要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时，我偶然得到一本英语语法书（我想那是格林伍德写的），书末有两篇对修辞学和逻辑学的简略介

绍，逻辑学那篇以苏格拉底式的论辩实例结尾。不久之后我又得到了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这本书，其中有许多使用同种方法的例子。我为之深深着迷，于是采用它，放弃了自己突兀的驳论和独断的论证，而是谦卑地提问和质疑。后来我又读了沙夫茨伯里和柯林斯的书，开始真正质疑我们宗教学说中的许多观点。我觉得这种方法对我而言最有把握，运用时使我的对手非常犯难，因此我十分高兴，便不断练习和运用，逐渐变得十分在行和熟练，致使即使知识比我渊博的人也作出让步，他们又预料不到这种让步的后果如何，因此陷入自己无法解脱的困境里，我就这样取得论辩的胜利，尽管这胜利是我和我的论辩主张并不应得的。这种方法我用了几年，后来渐渐不用了，只保留了在陈述观点时保持谦虚态度的习惯。在提出任何可能有争议的问题时，我从不使用“当然”、“毫无疑问”或其他类似表达肯定语气的字眼；而会说，“我以为或按我的理解，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在我看来好像是或者我想应该是如何如何的，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或者“我想象它是这样的”，或者“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它是这样的”等。我认为在我要使他人接受我的观点，劝服他人采取我时常提倡的措施时，这个习惯于我大有裨益。因为谈话的主要目的是告知或获得信息、取悦或劝服他人，所以我希望，善意明智的人们不要因自己独断不逊的语气而削弱自己行善的能力，这种语气常常令人反感，引起对立，使上述谈话的目的，即思辨、交流信息、相互打趣都流于失败。因为如果你想传递信息，提出观点时绝对、武断的态度可能会引起他人的反对，因而得不到应有的注意力；如果你希望从他人的知识中获得信息并改进自己，但同时又执囿于自己的观点，那么谦虚明智的人因为不爱争辩，很可能让你死守自己的错误。同样地，持这样的态度，你也不太可能取悦你的听众，或说服他人接受你的意见。蒲柏说得很有见地：

“Men should be taught as if you taught them not,

“要想教人，则不应摆出教人的姿态；

And things unknown propos'd as things forgot;”

要想告知未知之事，最好将其当成遗忘之事来告知。”

farther recommending to us

他进一步建议我们说：

“To speak, tho' sure, with seeming diffidence.”

“尽管深信不疑，说话时也要有谦虚的姿态。”

And he might have coupled with this line that which he has coupled with another, I think, less properly,

蒲柏此处可能想用下面这句对刚才那句，但最终却对了另一句，我认为，对得不太合适：

“For want of modesty is want of sense.”

“因为缺乏谦逊，就是缺乏理智。”

If you ask, Why less properly? I must repeat the lines,

如果你问，为什么对得不太合适呢？我只好重复原诗了：

“Immodest words admit of no defense,

“既然口出狂言，也就不容辩解；

For want of modesty is want of sense.”

因为缺乏谦逊就是缺乏理智。”

Now, is not want of sense (where a man is so unfortunate as to want it) some apology for his want of modesty? —and would not the lines stand more justly thus—

你看，“缺乏理智”（人缺乏理智可真不幸）不正是对“缺乏谦逊”的辩解吗？这样下面两句不是更恰当吗？

“Immodest words admit but this defense,

“既然口出狂言，只有此种辩解，

That want of modesty is want of sense.”

即为缺乏谦逊就是缺乏理智。”

This, however, I should submit to better judgments.

但这样到底是否更好，只有留待高明之士判断了。

My brother had, in 1720 or 1721, begun to print a newspaper. It was the second that appeared in America, and was called the New England Courant. The only one before it was the Boston News-Letter. I remember his being dissuaded by some of his friends from the undertaking, as not likely to succeed, one newspaper being, in their judgment, enough for America. At this time (1771) there are not less than five-and-twenty. He went on, however, with the undertaking, and after having worked in composing the types and printing off the sheets, I was employed to carry the papers thro' the streets to the customers.

1720年或1721年，我哥哥开始出版报纸。那是美国出现的第二份报纸，名叫《新英格兰报》。在它之前的那一份叫做《波士顿通讯》。我记得他的一些朋友认为办报纸很可能不会成功，曾劝他放弃，在他们看来美国有一份报纸就够了，而现在（1771年），这里发行的报纸已经不下25份。但当时我哥哥还是办了下去，报纸排好版面并印刷好后，他就差我上街把报纸送到订户家里。

He had some ingenious men among his friends, who amus'd themselves by writing little pieces for this paper, which gain'd it credit and made it more in demand, and these gentlemen often visited us. Hearing their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ccounts of the approbation their papers were received with, I was excited to try my hand among them; but, being still a boy, and suspecting that my brother would object to printing anything of mine in his paper if he knew it to be mine, I contrived to disguise my hand, and, writing an anonymous paper, I put it in at night under the door of the printing-house. It was found in the morning, and communicated to his writing friends when they call'd in as usual. They read it, commented on it in my hearing, and I had the exquisite pleasure of finding it met with their approbation, and that, in their different guesses at the author, none were named but men of some character among us for learning and ingenuity. I suppose now that I was rather lucky in my judges, and that perhaps they were not really so very good ones as I then esteem'd them.

哥哥的朋友中有些睿智、机敏的人，他们给报纸写些小短文，以资消遣，这提高了报纸的声誉，销量也增加了。这些朋友常常来拜访我们，听了他们的谈话，听到他们说报纸受到欢迎后，我非常兴奋，跃跃欲试想要投稿。但我那时还是个孩子，担心哥哥如果知道是我写的文章，不会同意在报上发表，于是我努力掩饰自己的笔迹，写了一篇匿名文章，夜里把它塞在印刷店的门下。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了这篇文章，并在哥哥那些写文章的朋友照例拜访时交给了他们。他们读了文章，并对它作了点评，当时我也在场。他们对文章作了充分肯定，还纷纷猜测文章的作者是谁，提到的都是我们之中一些颇有学识和智慧的杰出人物，听到这些，我别提有多高兴了。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当时能听到他们评价我的文章是相当幸运的，也许他们也不像我当时所想的那样眼力高明。

Encourag'd, however, by this, I wrote and convey'd in the same way to the press several more papers which were equally approv'd; and I kept my secret till my small fund of sense for such performances was pretty well exhausted and then I discovered it, when I began to be considered a little more by my brother's acquaintance, and in a manner that did not quite please him, as he thought, probably with reason, that it tended to make me too vain. And, perhaps, this might be one occasion of the differences that we began to have about this time. Though a brother, he considered himself as my master, and me as his apprentice, and accordingly, expected the same services from me as he would from another, while I thought he demean'd me too much in some he requir'd of me, who from a brother expected more indulgence. Our disputes were often brought before our father, and I fancy I was either generally in the right, or else a better pleader, because the judgment was generally in my favor. But my brother was passionate, and had often beaten me, which I took extremely amiss; and, thinking my apprenticeship very tedious, I was continually wishing for some opportunity of shortening it, which at length offered in a manner unexpected. (I fancy his harsh and tyrannical treatment of me might be a means of impressing me with that aversion to arbitrary power that has stuck to me through my whole life.) [1_2]

但我从中得到了很大鼓励，又写了几篇文章，并以同样方法向报纸投稿，都获得了好评。我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自己写文章的那点有限的才华行将枯竭时才公布自己的名字，于是我哥哥的朋友开始对我稍加留意了。这让我哥哥不太高兴，他觉得这会让我骄傲自满，也许他也是有道理的吧。大概从这时起我们之间有了分歧，可能这件事也是起因之一。尽管他是我哥哥，但他把自己看成我的主人，而我是他的学徒，因此他期望我也像其他学徒一样为他尽力，而我却

觉得他要求我做的某些事情过于贬低了我的身份，从兄弟的角度来说我期待更多的宽待。我们之间的争吵常常交由父亲裁决，我想也许我一般都在理，或者我比哥哥更善于求情，父亲的裁决总是对我有利。但哥哥脾气急躁，常常打我，我认为这样做很不对。另外，我觉得学徒生活冗长，令人生厌，常常希望有机会能将它缩短，终于，这样的机会出人意料地来了。（我认为，他对我的严苛与专横可能是使我终生厌恶专制权力的原因之一。）

One of the pieces in our newspaper on some political point, which I have now forgotten, gave offense to the Assembly. He was taken up, censur'd, and imprison'd for a month, by the speaker's warrant, I suppose, because he would not discover his author. I too was taken up and examin'd before the council; but, tho'I did not give them any satisfaction, they content'd themselves with admonishing me, and dismissed me, considering me, perhaps, as an apprentice, who was bound to keep his master's secrets.

我们报纸上登的一篇表达某种政治观点的文章冒犯了州议会，具体是何观点我现在已经忘了。议长一纸命令，哥哥被抓起来接受责罚，入狱一个月，我想也许这是因为他不肯透露文章作者的姓名吧。我也被他们抓了去，还在会议上接受审讯，我的回答没让他们满意，不过他们仅仅教训了我一番，就放我走了，也许他们认为我作为一名学徒，为主人保守秘密是理所应当的吧。

During my brother's confinement, which I resented a good deal, notwithstanding our private differences, I had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per; and I made bold to give our rulers some rubs in it, which my brother took very kindly, while others began to consider me in an unfavorable light, as a young genius that had a turn for libelling

and satyr. My brother's discharge was accompany'd with an order of the House (a very odd one), that “James Franklin should no longer print the paper called the New England Courant.”

尽管我和哥哥私下里有分歧，但他被关押一事还是让我非常愤慨，在这期间，我掌管了报社。我在报纸上大胆批评当权者，这些文章受到哥哥的喜爱，但其他人对我的印象却开始转坏，认为我这样一个有些才华的年轻人变得喜欢诽谤讥讽。哥哥被释放了，但议会同时下了这样一道命令（非常奇怪的命令）：“詹姆斯·富兰克林不得继续出版名叫《新英格兰报》的报纸。”

There was a consultation held in our printing-house among his friends, what he should do in this case. Some proposed to evade the order by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paper; but my brother, seeing inconveniences in that, it was finally concluded on as a better way, to let it be printed for the future under the name of BENJAMIN FRANKLIN; and to avoid the censure of the Assembly, that might fall on him as still printing it by his apprentice, the contrivance was that my old indenture should be return'd to me, with a full discharge on the back of it, to be shown on occasion, but to secure to him the benefit of my service, I was to sign new indentures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term, which were to be kept private. A very flimsy scheme it was; however, it was immediately executed, and the paper went on accordingly, under my name for several months.

哥哥和几个朋友在我们的印刷店开了个会，商量这种情况下他该怎么办。有人提议更改报纸名称来规避议会命令，但哥哥认为这样做会带来诸多不便，最终决定采用一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今后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继续发行报纸。为避免因学徒仍在出版这份报纸而

受到议会责难，哥哥想了这样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我以前的学徒契约归还给我，并在背面写明雇佣关系完全解除，需要时我可以把这份契约拿出来给人看。但为了保证我继续为他效力，我要就学徒期余下的时间签一份新的契约，这份契约我们私下保存不予公开。这是一个非常蹩脚的计划，但很快付诸实际，报纸也因而以我的名字继续出版了好几个月。

At length, a fresh difference arising between my brother and me, I took upon me to assert my freedom, presuming that he would not venture to produce the new indentures. It was not fair in me to take this advantage, and this I therefore reckon one of the first errata of my life; but the unfairness of it weighed little with me, when under the impressions of resentment for the blows his passion too often urged him to bestow upon me, though he was otherwise not an ill-natur'd man: perhaps I was too saucy and provoking.

终于，我和哥哥之间产生了新的矛盾，我认定哥哥不会冒险拿出这份新契约，便借此机会争取自己的自由。我钻这个空子的做法对他不太公平，因此我把这件事看成我人生中最初犯下的错误之一。但他脾气暴躁，常常打我，我对此十分厌恶，因此这种不公平并未让我感到多少内疚。他在其他方面并不是个性情恶劣的人，也有可能是我当时太无礼、太让他生气了。

When he found I would leave him, he took care to prevent my getting employment in any other printing-house of the town, by going round and speaking to every master, who accordingly refus'd to give me work. I then thought of going to New York, as the nearest place where there was a printer; and I was rather inclin'd to leave Boston when I reflected that I had already made myself a little

obnoxious to the governing party, and, from the arbitrary proceedings of the Assembly in my brother's case, it was likely I might, if I stay'd, soon bring myself into scrapes; and farther, that my indiscrete disputations about religion began to make me pointed at with horror by good people as an infidel or atheist. I determin'd on the point, but my father now siding with my brother, I was sensible that, if I attempted to go openly, means would be used to prevent me. My friend Collins, therefore, undertook to manage a little for me. He agreed with the captain of a New York sloop for my passage, under the notion of my being a young acquaintance of his, that had got a naughty girl with child, whose friends would compel me to marry her, and therefore I could not appear or come away publicly. So I sold some of my books to raise a little money, was taken on board privately, and as we had a fair wind, in three days I found myself in New York, near 300 miles from home, a boy of but 17, without the least recommendation to, or knowledge of any person in the place, and with very little money in my pocket.

哥哥意识到我要离开他后，便刻意阻止我在镇上其他印刷店找到工作。他到店老板那里到处游说，于是他们都拒绝雇我。我就想到了去纽约，那里离波士顿最近，也有一家印刷店，而且我也倾向于离开波士顿，我想到我给当局已经留下了极恶劣的名声，从州议会处理哥哥案子的恣意专横可以看出如果我留在波士顿，很可能很快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此外，我关于宗教的轻率论辩，已开始让自己成为善男信女的众矢之的，他们心怀恐惧，把我看成异教徒或者无神论者。于是我决意离开，但父亲此刻已站在哥哥一边了。我意识到，如果我公开出走，他们会想办法来阻止我。因此我的朋友柯林斯帮我想了个办法，他和一艘纽约帆船的船长说好，让我搭乘他的船。柯林斯把我说成是他的一个年轻朋友，因为让一个轻佻的姑娘怀了孕，她的朋友强迫我娶她，因此我不能公开露面，只能悄悄离开。于是我卖了些书换了点钱，悄悄上了船，一路是顺风向，三天后我就到达了离家近300

英里的纽约。当时我只有17岁，在这里既无人举荐，亦无亲无故，口袋里也只剩下很少的一点钱。

My inclinations for the sea were by this time worn out, or I might now have gratify'd them. But, having a trade, and supposing myself a pretty good workman, I offer'd my service to the printer in the place, old Mr. William Bradford, who had been the first printer in Pennsylvania, but removed from thence upon the quarrel of George Keith. He could give me no employment, having little to do, and help enough already; but says he, “My son at Philadelphia has lately lost his principal hand, Aquila Rose, by death; if you go thither, I believe he may employ you.” Philadelphia was a hundred miles further; I set out, however, in a boat for Amboy, leaving my chest and things to follow me round by sea.

这时我对航海的兴趣已经消磨殆尽，不然这时的我倒是可以如愿以偿了。但因为有一门手艺，而且觉得自己干得还不错，我到当地印刷店老板老威廉·布拉德福德先生那里找工作。他开了宾夕法尼亚的第一家印刷店，因为和乔治·基思发生争执才搬来这里。他那儿活儿不多，而且人手已够，所以没能雇我，但他说：“我儿子在费城，他的主要助手阿奎拉·罗斯最近去世了，如果你去那儿，我想他会雇你的。”费城离纽约还有100英里，但我还是乘船向安博伊出发了，留下箱子和其他行李随后由海路运来。

In crossing the bay, we met with a squall that tore our rotten sails to pieces, prevented our getting into the Kill and drove us upon Long Island. In our way, a drunken Dutchman, who was a passenger too, fell overboard; when he was sinking, I reached through the water to his shock pate, and drew him up, so that we got him in

again. His ducking sobered him a little, and he went to sleep, taking first out of his pocket a book, which he desir'd I would dry for him. It proved to be my old favorite author, Bunyan's Pilgrim's Progress, in Dutch, finely printed on good paper, with copper cuts, a dress better than I had ever seen it wear in its own language. I have since found that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ost of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suppose it has been more generally read than any other book, except perhaps the Bible. Honest John was the first that I know of who mix'd narration and dialogue; a method of writing very engaging to the reader, who in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s finds himself, as it were, brought into the company and present at the discourse. De Foe in his Cruso, his Moll Flanders, Religious Courtship, Family Instructor, and other pieces, has imitated it with success; and Richardson has done the same, in his Pamela, etc.

穿越海湾时，我们遇上了狂风，破烂的船帆被撕成了碎片，我们未能驶入基尔河，风把我们吹向长岛去了。途中，一位喝醉的荷兰乘客从船上跌了下去，他正往下沉时，我连忙伸手抓住了他头顶上的头发，把他从水中拉了上来，这样他又重回到了船上。落入水中倒让他清醒了一点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给我，让我帮他弄干，便去睡觉了。这本书恰是我之前最喜欢的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的荷兰语译本，书的纸质很好，还附有铜版插图，装订比我所见过的原本还要精美。后来我发现这本书已被译成了欧洲许多语言，我认为也许这是除了《圣经》之外读者群最广泛的一本书。“诚实的约翰”是我所知的作家中第一个将叙述和对话两种写作手法穿插使用的，这种写作手法很能吸引读者，在作品最有趣的部分，读者仿佛能身临其境，亲耳听到人物的谈话。笛福在他的《鲁宾逊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宗教求爱》、《家庭教师》及其他作品中成功模仿了这种写作手法，理查森在他的《帕美勒》等作品中也使用了这种手法。

When we drew near the island, we found it was at a place where there could be no landing, there being a great cliff on the stony beach. So we drop anchor, and swung round towards the shore. Some people came down to the water edge and hallow'd to us, as we did to them; but the wind was so high, and the cliff so loud, that we could not hear so as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There were canoes on the shore, and we made signs, and hallow'd that they should fetch us; but they either did not understand us, or thought it impracticable, so they went away, and night coming on, we had no remedy but to wait till the wind should abate; and, in the meantime, the boatman and I concluded to sleep, if we could; and so crowded into the scuttle, with the Dutchman, who was still wet, and the spray beating over the head of our boat, leak'd thro' to us, so that we were soon almost as wet as he. In this manner we lay all night, with very little rest; but, the wind abating the next day, we made a shift to reach Amboy before night, having been thirty hours on the water, without victuals, or any drink but a bottle of filthy rum, and the water we sail'd on being salt.

船驶近岛时，我们发现海滩上波涛汹涌，乱石丛立，无法靠岸登陆。于是我们抛了锚，向岸边侧转船身。有人来到海边，冲我们大声打招呼，我们也冲他们大声打招呼，但是风大浪高，听不清更不明白对方说什么。岸边有些独木舟，我们向他们打手势，大喊请他们驾舟来接我们，但他们要么没领会，要么觉得做不到，就离开了。天色渐晚，我们依然束手无策，只能等风势减弱。于是我和船夫决定睡觉去，只要我们能睡得着。我们和那位全身依然湿着的荷兰人挤在小船舱里，盖过船头的浪花溅了下来，我们很快就几乎和他一样身上全湿了。我们就这样躺了一晚上，没怎么睡着，但第二天风势减弱了，我们想尽力在入夜前抵达安博伊，这时我们已在水上航行了30个小时，没吃没喝，只有一瓶不干净的朗姆酒，连船航行的水域的水也是咸的。

In the evening I found myself very feverish, and went in to bed; but, having read somewhere that cold water drank plentifully was good for a fever, I follow'd the prescription, sweat plentiful most of the night, my fever left me, and in the morning, crossing the ferry, I proceeded on my journey on foot, having fifty miles to Burlington, where I was told I should find boats that would carry me the rest of the way to Philadelphia.

晚上我发现自己烧得厉害，就躺到床上，但我曾记得在哪里读过，喝足够多的冷水能有助于退烧，于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出了大半夜汗，终于退了烧。早上我跨过渡口上了岸，徒步继续我的行程，此时离伯灵顿还有50英里，有人告诉我在那里可以找到船送我去费城。

It rained very hard all the day; I was thoroughly soak'd, and by noon a good deal tired; so I stop at a poor inn, where I staid all night, beginning now to wish that I had never left home. I cut so miserable a figure, too, that I found, by the questions ask'd me, I was suspected to be some runaway servant, and in danger of being taken up on that suspicion. However, I proceeded the next day, and got in the evening to an inn, within eight or ten miles of Burlington, kept by one Dr. Brown. He entered into conversation with me while I took some refreshment, and, finding I had read a little, became very sociable and friendly. Our acquaintance continu'd as long as he liv'd. He had been, I imagine, an itinerant doctor, for there was no town in England, or country in Europe, of which he could not give a very particular account. He had some letters, and was ingenious, but much of an unbeliever, and wickedly undertook, some years after, to travesti the Bible in doggrel verse, as Cotton had done Virgil. By this means he set many of the facts in a very ridiculous

light, and might have hurt weak minds if his work had been published; but it never was.

大雨下了一整天，我浑身都湿透了，到了中午已是非常疲惫，于是就在一个破败的小旅馆停了下来，并在那里住了一夜。这时我开始后悔真不该离家出走。因为外表狼狈，我从别人的盘问中发现自己被怀疑是逃跑的仆人，因此有被抓捕的危险。但我第二天就上了路，晚上歇在一个叫布朗医生开的旅馆里，当时离伯灵顿只有8到10英里了。吃点心时布朗医生和我聊了一会儿，发现我读过些书后，他对我的态度变得非常友善。我们后来一直保持着联系，直至他去世。我想他以前应该是个江湖游医，因为他对英国的每个镇或欧洲每个国家都能详尽描述。他有些学问，也很聪明，但他不信教，几年后还恶作剧式地把《圣经》改写成拙劣的韵文诗，就像科顿改写维吉尔的诗一样。布朗医生的改写使得许多事实变得非常荒谬，如果其作品得以出版的话，恐怕会伤害那些意志薄弱的人，但它从未出版。

At his house I lay that night, and the next morning reach'd Burlington, but had the mortification to find that the regular boats were gone a little before my coming, and no other expected to go before Tuesday, this being Saturday; wherefore I returned to an old woman in the town, of whom I had bought gingerbread to eat on the water, and ask'd her advice. She invited me to lodge at her house till a passage by water should offer; and being tired with my foot travelling, I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She understanding I was a printer, would have had me stay at that town and follow my business, being ignorant of the stock necessary to begin with. She was very hospitable, gave me a dinner of ox-cheek with great good will, accepting only a pot of ale in return; and I thought myself fixed till Tuesday should come. However, walking in the evening by the side of the river, a boat came by, which I found was going

towards Philadelphia, with several people in her. They took me in, and, as there was no wind, we row'd all the way; and about midnight, not having yet seen the city, some of the company were confident we must have passed it, and would row no farther; the others knew not where we were; so we put toward the shore, got into a creek, landed near an old fence, with the rails of which we made a fire, the night being cold, in October, and there we remained till daylight. Then one of the company knew the place to be Cooper's Creek, a little above Philadelphia, which we saw as soon as we got out of the creek, and arriv'd there about eight or nine o'clock on the Sunday morning, and landed at the Market-street wharf.

我在布朗医生的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抵达了伯灵顿，却很懊恼地发现船已经在我到之前一小会儿开走了，下一班要到星期二，而这时才星期六。于是我回到镇上一位老妇人那里，我刚在她那儿买了准备在船上吃的姜饼，这时回来询问她的建议，她留我住在她家，直到有船可以使我成行。我当时因长途跋涉，双脚已十分劳累，便接受了她的邀请。老妇人知道我是个印刷工后，让我留在这里开个印刷店，殊不知开印刷店是需要些资本的。她非常好客，还极为好心地招待我吃了牛脸肉当晚餐，并只接受一小罐麦芽酒作为回报。于是我想下周二前就留在这里吧。但傍晚我在河边散步的时候，一艘船驶了过来，我发现是去往费城的，船上有几个人。他们让我上了船，因为无风，我们一路划船前进。大约半夜时分，还是没有望见费城，我们中有些人很肯定地认为我们已经过了费城，不肯再划，其他人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儿，于是我们划向岸边，进入一条小河道，在一道破旧的栅栏旁登陆。我们取了栅栏的木头生了火，十月的夜晚很冷，我们就这样呆到天亮。一位同伴认出这里是库珀河，位于费城北边不远。我们驶出小河后马上望见了费城，星期天早上大约八九点到了那里，并在市场街码头上了岸。

I have been the more particular in this description of my journey, and shall be so of my first entry into that city, that you may in your mind compare such unlikely beginnings with the figure I have since made there. I was in my working dress, my best cloaths being to come round by sea. I was dirty from my journey; my pockets were stuff'd out with shirts and stockings, and I knew no soul nor where to look for lodging. I was fatigued with travelling, rowing, and want of rest, I was very hungry; and my whole stock of cash consisted of a Dutch dollar, and about a shilling in copper. The latter I gave the people of the boat for my passage, who at first refus'd it, on account of my rowing; but I insisted on their taking it. A man being sometimes more generous when he has but a little money than when he has plenty, perhaps thro' fear of being thought to have but little.

我对这段旅程记述得特别详细，对我初次来到这座城市的情景也要细细描写一番，好让你在心里能将我初来乍到时的窘况与我后来在此地取得的成就作个比较。我当时穿着以前的工作服，我最好的衣服还没从海上运来。我一路奔波，身上很脏，口袋里塞满了衬衫和长袜，在这里又无亲无故，不知上哪儿找住宿的地方。这些天我一直奔波、划船，又缺乏休息，已十分疲惫，并且饥肠辘辘。我所有的现金只有一元荷兰盾，还有约值一先令的铜币。我把那块铜币当作旅费给了船上的人，他们起初不收，因为我帮他们划船了，但我执意让他们收下。有时候，人手上只有一点钱反而会比富有时更慷慨，可能因为怕被人当成穷人吧。

Then I walked up the street, gazing about till near the market-house I met a boy with bread. I had made many a meal on bread, and, inquiring where he got it, I went immediately to the baker's he directed me to, in Second street, and ask'd for biscuit, intending

such as we had in Boston; but they, it seems, were not made in Philadelphia. Then I asked for a three-penny loaf, and was told they had none such. So not considering or knowing the difference of money, and the greater cheapness nor the names of his bread, I made him give me three-penny worth of any sort. He gave me, accordingly, three great puffy rolls. I was surpriz'd at the quantity, but took it, and, having no room in my pockets, walk'd off with a roll under each arm, and eating the other. Thus I went up Market-street as far as Fourth-street, passing by the door of Mr. Read, my future wife's father; when she, standing at the door, saw me, and thought I made, as I certainly did, a most awkward, ridiculous appearance. Then I turned and went down Chestnut-street and part of Walnut-street, eating my roll all the way, and, corning round, found myself again at Market-street wharf, near the boat I came in, to which I went for a draught of the river water; and, being filled with one of my rolls, gave the other two to a woman and her child that came down the river in the boat with us, and were waiting to go farther.

然后我上街逛去了，一路四下张望，在市场附近遇见一个拿着面包的男孩。尽管我有好多顿饭只吃面包，不过我还是问了问他是在哪儿买的，而后就立刻去了他指给我的位于第二街上的面包房。我想买在波士顿买过的那种面包，但费城好像没有，我又想买一块三便士的面包，他们说也没有。我索性不考虑物价，而且当时我并不知道费城物价很低，也不知道店里各种面包的名字，我直接和他说卖给我价值三便士的面包，于是他给了我三个很大的面包卷。我很惊讶居然能买这么多，但还是买下了，兜里放不下，就两只胳膊各夹一个，嘴里还吃着一个。我就这副模样沿着市场街走到了第四街，路过了我未来岳父里德先生家门口，当时我未来的妻子站在门口看见了我，觉得我当时的样子既难看又可笑，也的确如此。我转身走过栗子街，来到核桃街上，一路啃着面包卷，转过弯来，发现自己又到了市场街的码头，

而且就在我所乘的船附近。我上码头去喝了口河水，因为吃了一个面包卷已经很饱了，就把剩下两个给了一位和我们一起乘船到此的妇人和她的孩子，他们还等着去更远的地方。

Thus refreshed, I walked again up the street, which by this time had many clean-dressed people in it, who were all walking the same way. I joined them, and thereby was led into the great meeting-house of the Quakers near the market. I sat down among them, and, after looking round awhile and hearing nothing said, being very drowsy thro' labor and want of rest the preceding night, I fell fast asleep, and continued so till the meeting broke up, when one was kind enough to rouse me. This was, therefore, the first house I was in, or slept in, in Philadelphia.

吃了面包恢复了精神，我又溜达上街了，这回我看见许多衣着干净的人，他们都朝一个方向走着。我加入了他们，结果被带到了市场附近贵格会的大教堂里。我在他们中间坐下，四下里望了望，没听见任何人说话。因为前一晚非常劳累又缺乏休息，此时已觉很困，于是我沉沉地睡了过去，直到散会时有人好心叫醒了我。于是这里就成了我在费城走进去或在里面睡觉的第一间房子。

Walking down again toward the river, and, looking in the faces of people, I met a young Quaker man, whose countenance I lik'd, and, accosting him, requested he would tell me where a stranger could get lodging. We were then near the sign of the Three Mariners. “Here,” says he, “is one place that entertains strangers, but it is not a reputable house; if thee wilt walk with me, I'll show thee a better.” He brought me to the Crooked Billet in Water-street. Here I got a dinner; and, while I was eating it, several sly questions

were asked me, as it seemed to be suspected from my youth and appearance, that I might be some runaway.

我又朝着河的方向走去，观察路上行人的面庞。我遇见一位年轻的贵格会信徒，他看上去面容和善，于是我就上前和他说话，请他告诉我外地人在哪儿能找到住宿的地方。我们当时就在“三个水手”旅馆的招牌附近，他说：“这里就是一个招待外地人的地方，但名声不怎么好。如果你愿意跟我走，我可以把你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他领着我来到水街的克鲁克德旅馆，我在那里吃了饭。吃饭时店家拐弯抹角地问了我几个问题，可能因为我很年轻，又是这副模样，让人怀疑是逃亡出来的吧。

After dinner, my sleepiness return'd, and being shown to a bed, I lay down without undressing, and slept till six in the evening, was call'd to supper, went to bed again very early, and slept soundly till next morning. Then I made myself as tidy as I could, and went to Andrew Bradford the printer's. I found in the shop the old man his father, whom I had seen at New York, and who, travelling on horseback, had got to Philadelphia before me. He introduc'd me to his son, who receiv'd me civilly, gave me a breakfast, but told me he did not at present want a hand, being lately suppli'd with one; but there was another printer in town, lately set up, one Keimer, who, perhaps, might employ me; if not, I should be welcome to lodge at his house, and he would give me a little work to do now and then till fuller business should offer.

吃过饭后，我的困意再次袭来，店家把我带到一张床跟前，我就和衣而睡了，一直到晚上六点，他们叫我起来吃晚饭。饭后我又早早上了床，安然睡到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努力把自己打扮整洁，去

了安德鲁·布拉德福德的印刷店。在店里，我见到了店主的父亲，就是我在纽约见过的那位老人，他当时骑马过来，在我之前到了费城。他把我介绍给他儿子，小布拉德福德待我很有礼貌，还请我吃了早饭。但他告诉我最近刚找了个伙计，暂时不需要帮手，但城里还有一家新近开张的印刷店，老板叫凯默，他也许会雇我；如果他不雇我的话，我可以先在布拉德福德店里住下，他会不时给我些零活儿干，直到我找到正式工作。

The old gentleman said he would go with me to the new printer; and when we found him, “Neighbor,” says Bradford, “I have brought to see you a young man of your business; perhaps you may want such a one.” He ask'd me a few questions, put a composing stick in my hand to see how I work'd, and then said he would employ me soon, though he had just then nothing for me to do; and, taking old Bradford, whom he had never seen before, to be one of the town's people that had a good will for him, enter'd into a conversation on his present undertaking and projects; while Bradford, not discovering that he was the other printer's father, on Keimer's saying he expected soon to get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business into his own hands, drew him on by artful questions, and starting little doubts, to explain all his views, what interests he reli'd on, and in what manner he intended to proceed. I, who stood by and heard all, saw immediately that one of them was a crafty old sophister, and the other a mere novice. Bradford left me with Keimer, who was greatly surpris'd when I told him who the old man was.

老布拉德福德说他陪我一起去那家新开的印刷店。找到店主后，布拉德福德对凯默说：“邻居，我给你带来个干你这行的小伙子，也许你正想要这样一个人吧。”凯默问了我几个问题，又给我个排字盘

要看看我活儿干得如何，然后说他不久后能雇用我，但这时还没什么工作让我做。他此前从未见过布拉德福德，以为他是镇上一个对他心怀善意的人，就和他谈起了自己现在的事业和计划。当时凯默并没有意识到布拉德福德是城里另一家印刷店老板的父亲，但布拉德福德听凯默说希望很快把费城大部分的印刷业务抢到自己手里，于是他巧妙地问了些问题，提了些小小的疑惑，引着凯默详细地讲了自己的全部想法，凯默还谈到他所依靠的势力以及他打算怎样开展业务。我站在一旁，听见了他们全部的谈话，立刻看出他们一个精明老到，另一个则只是个新手。布拉德福德离开时把我留在凯默店里，我告诉凯默这位老人是谁时，他大吃了一惊。

Keimer's printing-house, I found, consisted of an old shatter'd press, and one small, worn-out font of English which he was then using himself, composing an Elegy on Aquila Rose, before mentioned, an ingenious young man, of excellent character, much respected in the town, clerk of the Assembly, and a pretty poet. Keimer made verses too, but very indifferently. He could not be said to write them, for his manner was to compose them in the types directly out of his head. So there being no copy, but one pair of cases, and the Elegy likely to require all the letter, no one could help him. I endeavor'd to put his press (which he had not yet us'd, and of which he understood nothing) into order fit to be work'd with; and, promising to come and print off his Elegy as soon as he should have got it ready, I return'd to Bradford's, who gave me a little job to do for the present, and there I lodged and dieted. A few days after, Keimer sent for me to print off the Elegy. And now he had got another pair of cases, and a pamphlet to reprint, on which he set me to work.

我发现凯默的印刷店里只有一台破旧的印刷机和一套已经磨损的

小号英文铅字，他正用这套铅字排一首纪念阿奎拉·罗斯的挽歌。阿奎拉·罗斯在前文提到过，这个年轻人品行端正，才思敏捷，在城里很受尊敬，既是州议会的秘书，又是一位不错的诗人。凯默也作诗，但作得不好。其实不能说他是在写诗，因为他一般是把脑子里想出的诗句直接用铅字排出来，因此他的作品没有手稿，而排字盘只有一副，写一首挽歌可能要用上所有的铅字，所以没人能帮他的忙。我尽力想把那台印刷机（他还没有使用过，对它也一无所知）修好以便开始工作，还答应他一等他排好那首挽歌就过来把它印出来。我先回了布拉德福德店里，布拉德福德给我临时安排了些零活儿，我食宿也都在那里。几天后，凯默派人叫我去印那首挽歌，那时他又弄到了一副排字盘，还有一本小册子需要重印，他把这活儿也派给了我。

These two printers I found poorly qualified for their business. Bradford had not been bred to it, and was very illiterate; and Keimer, tho' something of a scholar, was a mere compositor, knowing nothing of presswork. He had been one of the French prophets, and could act their enthusiastic agitations. At this time he did not profess any particular religion, but something of all on occasion; was very ignorant of the world, and had, as I afterward found, a good deal of the knave in his composition. He did not like my lodging at Bradford's while I work'd with him. He had a house, indeed, but without furniture, so he could not lodge me; but he got me a lodging at Mr. Read's, before mentioned, who was the owner of his house; and, my chest and clothes being come by this time, I made rather a more respectable appearance in the eyes of Miss Read than I had done when she first happen'd to see me eating my roll in the street.

我发现这两位印刷店老板都不大是干印刷行业的料。布拉德福德没有学过印刷，又没念过什么书，而凯默尽管像个学者的样子，却只

会排字，对于印刷则一无所知。凯默曾是法国先知派教徒，言行举止可以装得像他们那样热情激动。如今凯默并没宣称信仰某个特定宗教，而是见风使舵，对各个教派都信一点。他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我后来发现，他的脾性里还颇有些无赖气。凯默不喜欢我在他那儿工作却住在布拉德福德店里，他倒是有间房子，但里头没家具，因此不能让我寄宿。但他帮我在前面提过的里德先生家里找了个住宿的地方，里德先生也是他的房东。这时我的箱子和衣服都已运到费城，因此在里德小姐眼中，我的模样已比她第一次碰巧看见我在街上啃面包卷时要体面得多了。

I began now to have some acquaintance among the young people of the town, that were lovers of reading, with whom I spent my evenings very pleasantly; and gaining money by my industry and frugality, I lived very agreeably, forgetting Boston as much as I could, and not desiring that any there should know where I resided, except my friend Collins, who was in my secret, and kept it when I wrote to him. At length, an incident happened that sent me back again much sooner than I had intended. I had a brother-in-law, Robert Holmes, master of a sloop that traded between Boston and Delaware. He being at Newcastle, forty miles below Philadelphia, heard there of me, and wrote me a letter mentioning the concern of my friends in Boston at my abrupt departure, assuring me of their good will to me, and that every thing would be accommodated to my mind if I would return, to which he exhorted me very earnestly. I wrote an answer to his letter, thank'd him for his advice, but stated my reasons for quitting Boston fully and in such a light as to convince him I was not so wrong as he had apprehended.

此时我逐渐结识了城里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也热爱阅读，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很多愉快的夜晚。因为勤奋节俭，我赚了些钱，过得也

很不错。我尽量忘记波士顿，不想波士顿有谁知道我现在住在哪里。只有我的朋友柯林斯知道这个秘密，我写信给他，要他别说出去。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不得不回去，时间比我预期得要早多了。我有个姐夫叫罗伯特·霍姆斯，他有一艘帆船在波士顿和特拉华之间开展贸易往来。当时他正在费城南面40英里的纽卡斯尔，听说我在费城就给我写了封信，说我突然离开，波士顿的朋友都非常挂念。他向我保证他们对我都是心怀善意的，如果我能回去，一切都会遂我心愿，极力劝我回去。我回信感谢他的建议，但也向他充分说明了我离开波士顿的原因，让他明白我不像他所想的那样犯了大错。

Sir William Keith, governor of the province, was then at Newcastle, and Captain Holmes, happening to be in company with him when my letter came to hand, spoke to him of me, and show'd him the letter. The governor read it, and seem'd surpris'd when he was told my age. He said I appear'd a young man of promising parts,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encouraged; the printers at Philadelphia were wretched ones; and, if I would set up there, he made no doubt I should succeed; for his part, he would procure me the public business, and do me every other service in his power. This my brother-in-law afterwards told me in Boston, but I knew as yet nothing of it; when, one day, Keimer and I being at work together near the window, we saw the governor and another gentleman (which proved to be Colonel French, of Newcastle), finely dress'd, come directly across the street to our house, and heard them at the door.

本州的州长威廉·基思爵士当时也在纽卡斯尔，霍姆斯船长收到我的回信时恰好和他在一起，就向他提到了我，并把信给他看了。读完信之后，州长又知道了我的年龄，似乎很惊讶。他说我看来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人，应该加以鼓励。费城的印刷店都很糟糕，他认为如果我

在费城开印刷店，一定会成功，而且就他而言，会把政府部门的生意招揽给我，还会尽其所能给我其他帮助。这是我姐夫后来在波士顿告诉我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有一天我和凯默在窗前一块儿工作，我们看见州长和另一位绅士（后来知道他是纽卡斯尔的弗伦奇上校）穿戴得体面精致，穿过街道径直朝我们的房子走来，接着就听见他们在门口的声音。

Keimer ran down immediately, thinking it a visit to him; but the governor inquir'd for me, came up, and with a condescension of politeness I had been quite unus'd to, made me many compliments, desired to be acquainted with me, blam'd me kindly for not having made myself known to him when I first came to the place, and would have me away with him to the tavern, where he was going with Colonel French to taste, as he said, some excellent Madeira. I was not a little surprised, and Keimer star'd like a pig poison'd. I went, however, with the governor and Colonel French to a tavern, at the corner of Third-street, and over the Madeira he propos'd my setting up my business, laid before me the probabilities of success, and both he and Colonel French assur'd me I should have their interest and influence in procuring the public business of both governments. On my doubting whether my father would assist me in it, Sir William said he would give me a letter to him, in which he would state the advantages, and he did not doubt of prevailing with him. So it was concluded I should return to Boston in the first vessel, with the governor's letter recommending me to my father. In the mean time the intention was to be kept a secret, and I went on working with Keimer as usual, the governor sending for me now and then to dine with him, a very great honor I thought it, and conversing with me in the most affable, familiar, and friendly manner imaginable.

凯默立即跑了下去，以为他俩是来拜访他的，但州长却问起了我，然后走上楼，对我赞许有加，说想要多认识我，又和善地责备我初到费城时没让他知道，还邀我和他一起去酒馆喝杯上好的马德拉白葡萄酒，他说他和弗伦奇上校正要去品尝品尝，言辞之间透露的谦卑恳切和彬彬有礼，让我非常不习惯。我对此十分诧异，凯默则惊得呆若木鸡。但我还是和州长还有弗伦奇上校去了第三街街角的一家酒馆，喝着白葡萄酒时，州长提议我自己开家印刷店，并给我讲了成功的可能性，他和上校两人都向我保证会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帮我招揽政府和军队这两方面的生意。我对我父亲是否会帮我心存疑虑，威廉爵士说他会让我给我父亲带封信，向他详细说说这些有利条件，他毫不怀疑这样一定能够说服我的父亲。最后我们敲定，由我带着州长写给我父亲的推荐信，乘第一班轮船回到波士顿。同时，州长的这种意图不会公开，我还像往常一样在凯默店里上班，州长不时派人邀我去和他吃饭，我认为这是我莫大的荣耀，他还总是用想象得到的最和蔼、最亲切和最友好的方式与我谈话。

About the end of April, 1724, a little vessel offer'd for Boston. I took leave of Keimer as going to see my friends. The governor gave me an ample letter, saying many flattering things of me to my father, and strongly recommending the project of my setting up at Philadelphia as a thing that must make my fortune. We struck on a shoal in going down the bay, and sprung a leak; we had a blustering time at sea, and were oblig'd to pump almost continually, at which I took my turn. We arriv'd safe, however, at Boston in about a fortnight. I had been absent seven months, and my friends had heard nothing of me; for my br. Holmes was not yet return'd, and had not written about me. My unexpected appearance surpriz'd the family; all were, however, very glad to see me, and made me welcome, except my brother. I went to see him at his printing-house. I was better dress'd than ever while in his service, having a genteel new suit from head to foot, a watch, and my pockets lin'd

with near five pounds sterling in silver. He receiv'd me not very frankly, look'd me all over, and turn'd to his work again.

大约在1724年4月底，有艘小船要开往波士顿去。我向凯默告别，说要去看望朋友。州长交给我一封长信，信里向我父亲大大夸奖了我一番，还极力建议让我在费城开印刷店，认为这一定会让我赚大钱的。我们的船驶出海湾时碰上了沙洲，船身裂了一条缝；在海上行驶时狂风大作，我们只得频繁地抽水，我也轮班承担了这一工作。大约两周以后，我们终于平安抵达波士顿。此时我离开波士顿已经七个月了，朋友们都没有我的消息，因为我姐夫霍姆斯还没回来，也没有写信提到我的情况。我的突然出现让我家人惊讶不已，但大家见到我都很高兴，除了我哥哥外他们都欢迎我回来。我去哥哥的印刷店见了他，当时我穿得比在他店里当学徒的任何时候都要好多了，从头到脚都穿着体面的新衣服，还戴着表，口袋里有近五镑银币。他勉为其难地接待了我，将我全身打量了一番，然后又去工作了。

The journeymen were inquisitive where I had been, what sort of a country it was, and how I lik'd it. I prais'd it much, the happy life I led in it, expressing strongly my intention of returning to it; and, one of them asking what kind of money we had there, I produc'd a handful of silver, and spread it before them, which was a kind of raree-show they had not been us'd to, paper being the money of Boston. Then I took an opportunity of letting them see my watch; and, lastly (my brother still grum and sullen), I gave them a piece of eight to drink, and took my leave. This visit of mine offended him extremely; for, when my mother some time after spoke to him of a reconciliation, and of her wishes to see us on good terms together, and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future as brothers, he said I had insulted him in such a manner before his people that he could never forget or forgive it. In this, however, he

was mistaken.

店里的伙计都很好奇我去了哪里，那是什么样的地方，我觉得那里怎么样等等。我对费城称赞有加，说在那里生活得很快乐，还强调了要回费城的打算。他们其中一个问我费城用什么样的钱，我掏出一把银币给他们看，这样的稀罕物他们可没怎么见过，因为波士顿使用的是纸币。后来我又借机让他们看了我的表，最后（我哥哥还是阴沉着脸）还给了他们一块银币让他们买酒喝，这才告辞。我的这次拜访让我哥哥极为不快，后来我母亲向他提到让我们和解，说希望看到我们和睦相处、依然手足情深时，他说我在他的伙计面前对他如此羞辱，他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能原谅。但是这一点，他弄错了。

My father received the governor's letter with some apparent surprise, but said little of it to me for some days, when Capt. Holmes returning he showed it to him, ask'd him if he knew Keith, and what kind of man he was; adding his opinion that he must be of small discretion to think of setting a boy up in business who wanted yet three years of being at man's estate. Holmes said what he could in favor of the project, but my father was clear in the impropriety of it, and at last gave a flat denial to it. Then he wrote a civil letter to Sir William, thanking him for the patronage he had so kindly offered me, but declining to assist me as yet in setting up, I being, in his opinion, too young to be trusted with the management of a business so important, and for which the preparation must be so expensive.

我父亲读完州长的信后明显很惊讶，但好几天他都没怎么和我说起此事。霍姆斯船长回来后，父亲把信给他看，问他是否认识基思，他是怎样的人，另外父亲还说，这人提出让一个离成年还差三岁的孩

子创业，一定考虑得不太周全。霍姆斯极力说他支持让我开店的计划，但父亲态度明确，认为此事并不恰当，最终直接否决了它。然后他给威廉爵士写了封措词委婉的信，向他对我的好心帮助表示了感谢，但不同意资助我开店，他认为我还太年轻，还无法把如此重要的事业经营托付于我，且开印刷店的话，前期成本也太高了。

My friend and companion Collins, who was a clerk in the post-office, pleas'd with the account I gave him of my new country, determined to go thither also; and, while I waited for my father's determination, he set out before me by land to Rhode Island, leaving his books, which were a pretty collection of mathematicks and natural philosophy, to come with mine and me to New York, where he propos'd to wait for me.

我的朋友和伙伴柯林斯当时在邮局里当职员，他听了我对那个新地方的描述，非常高兴，决定和我一起去那里，于是当我还在等父亲作出决定时，他已先我由陆路去了罗得岛。他收藏了很多数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书，也交给了我，由我连同自己的书一起带至纽约，他说他在那里等我。

My father, tho' he did not approve Sir William's proposition, was yet pleas'd that I had been able to obtain so advantageous a character from a person of such note where I had resided, and that I had been so industrious and careful as to equip myself so handsomely in so short a time; therefore, seeing no prospect of an accommodation between my brother and me, he gave his consent to my returning again to Philadelphia, advis'd me to behave respectfully to the people there, endeavor to obtain the general esteem, and avoid lampooning and libeling, to which he thought I

had too much inclination; telling me, that by steady industry and a prudent parsimony I might save enough by the time I was one-and-twenty to set me up; and that, if I came near the matter, he would help me out with the rest. This was all I could obtain, except some small gifts as tokens of his and my mother's love, when I embark'd again for New York, now with their approbation and their blessing.

我父亲尽管不赞成威廉爵士的提议，但仍然很高兴我能得到当地这样一位知名人士对我赞誉有加的推荐信，且很高兴看到我如此勤奋细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便把自己打扮得如此得体。因此，当父亲意识到我和哥哥无法和睦相处后，便同意我回到费城去，还建议我对那里的人要以礼相待，努力得到大家的尊重，不要嘲讽和诽谤他人，父亲认为我很有此种倾向。父亲说，只要我一直勤奋工作，审慎节俭，到21岁时我也许能攒够钱开店，等我的积蓄接近所需资金时，他会帮我凑齐不足的那部分。除了一些表达父母之爱的小礼物，这就是我所得到的一切，我再次动身前往纽约时，是带着他们的赞许和祝福走的。

The sloop putting in at Newport, Rhode Island, I visited my brother John, who had been married and settled there some years. He received me very affectionately, for he always lov'd me. A friend of his, one Vernon, having some money due to him in Pensilvania, about thirty-five pounds currency, desired I would receive it for him, and keep it till I had his directions what to remit it in. Accordingly, he gave me an order. This afterwards occasion'd me a good deal of uneasiness.

帆船驶入了罗得岛的新港，我去拜访了我哥哥约翰，他已成家，定居在此好几年了。他热情地招待了我，因为他一直都很喜欢我。约

翰哥哥有个朋友叫弗农，宾夕法尼亚州有人欠他些钱，大约35镑，弗农希望我能代他收下欠款并在通知我这笔钱的用处之前代为保管，他还为此给我开了一张付款委托书。后来这件事给我带来了诸多不安。

At Newport we took in a number of passengers for New York, among which were two young women, companions, and a grave, sensible, matron-like Quaker woman, with her attendants. I had shown an obliging readiness to do her some little services, which impress'd her I suppose with a degree of good will toward me; therefore, when she saw a daily growing familiarity between me and the two young women, which they appear'd to encourage, she took me aside, and said: “Young man, I am concern'd for thee, as thou has no friend with thee, and seems not to know much of the world, or of the snares youth is expos'd to; depend upon it, those are very bad women; I can see it in all their actions; and if thee art not upon thy guard, they will draw thee into some danger; they are strangers to thee, and I advise thee, in a friendly concern for thy welfare, to have no acquaintance with them.” As I seem'd at first not to think so ill of them as she did, she mentioned some things she had observ'd and heard that had escap'd my notice, but now convinc'd me she was right. I thank'd her for her kind advice, and promis'd to follow it. When we arriv'd at New York, they told me where they liv'd, and invited me to come and see them; but I avoided it, and it was well I did; for the next day the captain miss'd a silver spoon and some other things, that had been taken out of his cabbin, and, knowing that these were a couple of strumpets, he got a warrant to search their lodgings, found the stolen goods, and had the thieves punish'd. So, tho' we had escap'd a sunken rock, which we scrap'd upon in the passage, I thought this escape of rather more importance to me.

我们的船在新港上了好些去纽约的乘客，其中有两位年轻女性是同伴，还有一位表情严肃、明白事理、看起来像位主妇的贵格会女士和她的随从。我表现出随时乐于为她帮点小忙的意思，我想这给她留下了一定的好印象。因此，当她见我和两位年轻女士日渐熟络且她们似乎热衷与我相熟时，便把我拉到一旁，说："年轻人，我很关心你，因为你没有和朋友一起，似乎也不太了解世事，不了解年轻会面对多少陷阱。相信我，这两个女人很坏，我能从她们的举动中看出来，如果你不提防着些，她们会让你陷入危险中的。你并不认识她们，我善意相劝是为了你好，你不要和她们来往。"我开始时并不像她一样对那两位女士如此反感，直到她提到一些她看到和听到而我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我才相信她是对的。我感谢她好心的建议，保证一定会听她的话。我们到达纽约时，那两位年轻女士告诉了我她们的住所，邀我前去探望她们，但我没有去，这个决定很明智。因为第二天船长丢了一把银勺还有其他一些物品，这些都是在他的房间里被偷出去的。船长知道这两位女士是妓女，他得到搜查证后搜查了她们的住所，找到了被盗物品，并使这两个小偷受到了处罚。因此，尽管我们在航行中躲过了暗礁，但我认为没有落入她们的陷阱，对我的意义更为重大。

At New York I found my friend Collins, who had arriv'd there some time before me. We had been intimate from children, and had read the same books together; but he had the advantage of more time for reading and studying, and a wonderful genius for mathematical learning, in which he far outstrip me. While I liv'd in Boston most of my hours of leisure for conversation were spent with him, and he continu'd a sober as well as an industrious lad; was much respected for his learning by several of the clergy and other gentlemen, and seemed to promise making a good figure in life. But, during my absence, he had acquir'd a habit of sotting with brandy; and I found by his own account, and what I heard from others, that he had been drunk every day since his arrival at New

York, and behav'd very oddly. He had gam'd, too, and lost his money, so that I was oblig'd to discharge his lodgings, and defray his expenses to and at Philadelphia, which prov'd extremely inconvenient to me.

在纽约我见到了我的朋友柯林斯，他比我早到一些。我们从孩提时代起就很要好，曾一起阅读同样的书籍，但他比我有优势，他有更多时间用来阅读和学习，他还在数学上有极高的天赋，在这一点上远超于我。我还在波士顿的时候，大部分空闲时间都是和他聊天，他那时还是一个滴酒不沾、勤奋刻苦的少年，因颇有学识而受到好几位牧师和其他绅士的尊敬，似乎以后要出人头地。但在我离开波士顿以后，他染上了酗饮白兰地的习惯，我从他自己和其他人口中得知，他到纽约后，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且行为怪异。他还参与赌博，把钱都输了，我只得帮他支付住宿费，还得承担他去费城的旅费和在费城的开销，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The then governor of New York, Burnet (son of Bishop Burnet), hearing from the captain that a young man, one of his passengers, had a great many books, desir'd he would bring me to see him. I waited upon him accordingly, and should have taken Collins with me but that he was not sober. The gov'r. treated me with great civility, show'd me his library, which was a very large one, and we had a good deal of conversation about books and authors. This was the second governor who had done me the honor to take notice of me; which, to a poor boy like me, was very pleasing.

当时纽约的州长伯内特先生（伯内特主教的儿子）听船长说他的乘客中有个年轻人有很多藏书，希望能够见我。于是我前去拜访他，本来我要带柯林斯一起去，但他那天喝醉了。州长很有礼貌地接待了

我，还带我参观了他的藏书室，那间藏书室很大，我们就书籍和作家谈了很多。这是第二位注意到我的州长，我觉得很荣幸，这对于像我这样的穷孩子来说，是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

We proceeded to Philadelphia. I received on the way Vernon's money, without which we could hardly have finish'd our journey. Collins wished to be employ'd in some counting-house, but, whether they discover'd his dramming by his breath, or by his behaviour, tho' he had some recommendations, he met with no success in any application, and continu'd lodging and boarding at the same house with me, and at my expense. Knowing I had that money of Vernon's, he was continually borrowing of me, still promising repayment as soon as he should be in business. At length he had got so much of it that I was distress'd to think what I should do in case of being call'd on to remit it.

我们继续向费城进发。在路上我收回了弗农的欠款，要是没这笔钱，我们可能都回不到费城。柯林斯想去某家会计所找活干，尽管他有些推荐信，但人家或是通过他的呼吸或是他的行为发现他爱饮酒，所以他的求职全都失败了，只能继续和我吃住在一起，费用都由我承担。柯林斯知道我收了弗农的欠款后，不断向我借钱，并许诺一找到工作就立刻还给我。终于，他把那笔钱借走了很大一部分，这让我很苦恼，万一弗农让我把欠款汇回去该怎么办。

His drinking continu'd, about which we sometimes quarrell'd, for, when a little intoxicated, he was very fractious. Once, in a boat on the Delaware with some other young men, he refused to row in his turn. “I will be row'd home,” says he. “We will not row you,” says I. “You must, or stay all night on the water,” says he, “just as

you please.” The others said, “Let us row; what signifies it?” But, my mind being soured with his other conduct, I continu'd to refuse. So he swore he would make me row, or throw me overboard; and coming along, stepping on the thwarts, toward me, when he came up and struck at me, I clapped my hand under his crutch, and, rising, pitched him head-foremost into the river. I knew he was a good swimmer, and so was under little concern about him; but before he could get round to lay hold of the boat, we had with a few strokes pull'd her out of his reach; and ever when he drew near the boat, we ask'd if he would row, striking a few strokes to slide her away from him. He was ready to die with vexation, and obstinately would not promise to row. However, seeing him at last beginning to tire, we lifted him in and brought him home dripping wet in the evening. We hardly exchang'd a civil word afterwards, and a West India captain, who had a commission to procure a tutor for the sons of a gentleman at Barbados, happening to meet with him, agreed to carry him thither. He left me then, promising to remit me the first money he should receive in order to discharge the debt; but I never heard of him after.

柯林斯还是经常喝酒，我们有时为此争吵，因为他一旦有些醉意，就变得非常暴躁。有一次我们和其他几个年轻人乘船在特拉华河上航行，轮到他划船时，他不肯划。“你们划船带我回家吧。”他说。“我们不会代你划船的。”我回答。“你们必须得划，要不然就在这河上呆一夜吧，”他说，“随你们便。”其他人说道：“我们自己划吧，这有什么关系呢？”当时我心里正因他的其他行为生气，所以坚持拒绝划船。于是他狠狠地说一定要让我划，不然就把我扔下河去。他踩到坐板上，向我走了过来，他走到我面前要打我时，我一把托住他胯下，站起身，将他头朝下扔下了河。我知道他水性很好，所以不怎么担心他，但在他游过来要抓住船之前，我们又划了几下，让他够不着，每次他游得离船很近时，我们一边问他愿不愿意划船，一边又划

几下让船离他远些。他恼羞成怒，还是一意孤行地不肯答应划船。但我们见他已经有些疲乏了，就把他拽了上来，晚上才把全身湿透的他送回家。此后，我们之后很难像从前那样和颜悦色地说话。一位西印度的船长受托为巴巴多斯一位绅士的儿子们找一位家庭教师，恰好遇见了他，便同意带他去那里。于是柯林斯离开了我，承诺把拿到的第一笔工资汇给我还债，但我此后再没他的消息。

The breaking into this money of Vernon's was one of the first great errata of my life; and this affair show'd that my father was not much out in his judgment when he suppos'd me too young to manage business of importance. But Sir William, on reading his letter, said he was too prudent. There was great difference in persons; and discretion did not always accompany years, nor was youth always without it. “And since he will not set you up,” says he, “I will do it myself. Give me an inventory of the things necessary to be had from England, and I will send for them. You shall repay me when you are able; I am resolv'd to have a good printer here, and I am sure you must succeed.” This was spoken with such an appearance of cordiality, that I had not the least doubt of his meaning what he said. I had hitherto kept the proposition of my setting up, a secret in Philadelphia, and I still kept it. Had it been known that I depended on the governor, probably some friend, that knew him better, would have advis'd me not to rely on him, as I afterwards heard it as his known character to be liberal of promises which he never meant to keep. Yet, unsolicited as he was by me, how could I think his generous offers insincere? I believ'd him one of the best men in the world.

动用弗农那笔钱是我人生中最早犯下的大错之一，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父亲当时认为我太年轻，还没有能力经营重要的事业并没有

错。但威廉爵士读了我父亲的信之后，认为他太过谨慎了。各人性格迥异，谨慎的品质不一定年长的人才有，而年轻人也并非全都行事鲁莽。“既然他不肯帮你开店，”威廉爵士说，“那我来帮你吧。你把需在英国购买的东西列个清单，我派人去买。等你有能力了，再把这钱还给我，我一定要让费城有家像样的印刷店，我也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他说这话时非常诚恳，我一点也不怀疑他是确有此意。我要开店的计划在费城一直是个秘密，我至今也还对此守口如瓶。要是别人知道我依靠州长，也许一些更了解他的朋友会劝我不要指望他，如我后来所闻，众人皆知他爱随意许下承诺却从不兑现。但并不是我主动求他帮忙，又怎能想到他如此慷慨地提出帮我并非真心实意的呢？我当时还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呢。

I presented him an inventory of a little print'g-house, amounting by my computation to about one hundred pounds sterling. He lik'd it, but ask'd me if my being on the spot in England to chuse the types, and see that every thing was good of the kind, might not be of some advantage. “Then,” says he, “when there, you may make acquaintances, and establish correspondences in the bookselling and stationery way.” I agreed that this might be advantageous. “Then,” says he, “get yourself ready to go with Annis;” which was the annual ship, and the only one at that time usually passing between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But it would be some months before Annis sail'd, so I continu'd working with Keimer, fretting about the money Collins had got from me, and in daily apprehensions of being call'd upon by Vernon, which, however, did not happen for some years after.

我给威廉爵士列了张开家小印刷店所需物品的清单，我算了算大概需要100镑吧。他很高兴，又说如果我亲自去英国挑选铅字，确保每件物品都质量上乘是否会更好一些。他说：“那样的话，你可以在

那里结交一些朋友，建立书籍和文具生意方面的往来。”我对他的话表示同意，认为这样应该是有利的。“那么，”他又说，“做好准备乘坐安妮斯号出发吧。”安妮斯号是当时唯一一艘航行于伦敦和费城之间的轮船，每年在两座城市之间往来一次。但那时离安妮斯号起航还有几个月，因此我仍旧在凯默的店里工作，心里总为柯林斯从我这儿拿走的钱烦恼，每天都担心弗农让我汇钱给他，但这事直到好几年之后才发生。

I believe I have omitted mentioning that, in my first voyage from Boston, being becalm'd off Block Island, our people set about catching cod, and hauled up a great many. Hitherto I had stuck to my resolution of not eating animal food, and on this occasion consider'd, with my master Tryon, the taking every fish as a kind of unprovoked murder, since none of them had, or ever could do us any injury that might justify the slaughter. All this seemed very reasonable. But I had formerly been a great lover of fish, and, when this came hot out of the frying-pan, it smelt admirably well. I balanc'd some time between principle and inclination, till I recollected that, when the fish were opened, I saw smaller fish taken out of their stomachs; then thought I, “If you eat one another, I don't see why we mayn't eat you.” So I din'd upon cod very heartily, and continued to eat with other people, returning only now and then occasionally to a vegetable diet. So convenient a thing it is to be a reasonable creature, since it enables one to find or make a reason for everything one has a mind to do.

我想我忘了提一件事，在我第一次离开波士顿的旅途中，船曾因无风在布洛克岛附近停航，我们船上的人开始捕鳕鱼，而且捕上来得还不少。那时我还是坚持不沾荤腥。我赞同我的导师特赖恩的观点，在这种情形下每捕捞一条鱼就等于一次无端谋杀，因为没有哪条鱼曾

对我们或者能对我们造成任何伤害，所以我们捕鱼并没有什么正当理由。这些话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我以前很爱吃鱼，当热气腾腾的鱼出锅时，香味四溢，非常诱人。我在原则和爱好之间徘徊了好一阵，后来我回忆起曾有人在剖开鱼肚子时从中拿出小鱼来，于是我想，“如果你们可以互相吃掉对方，我不懂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吃你们。”就这样，我津津有味地吃起鳕鱼来，后来还照样和其他人一起吃，只是偶尔才恢复食素的习惯。做一个拥有理性的生物是多么便利啊，因为不管想做什么事，他都能找到或者编造出一个理由来。

Keimer and I liv'd on a pretty good familiar footing, and agreed tolerably well, for he suspected nothing of my setting up. He retained a great deal of his old enthusiasms and lov'd argumentation. We therefore had many disputations. I used to work him so with my Socratic method, and had trepann'd him so often by questions apparently so distant from any point we had in hand, and yet by degrees lead to the point, and brought him into difficulties and contradictions, that at last he grew ridiculously cautious, and would hardly answer me the most common question, without asking first, “What do you intend to infer from that?” However, it gave him so high an opinion of my abilities in the confuting way, that he seriously proposed my being his colleague in a project he had of setting up a new sect. He was to preach the doctrines, and I was to confound all opponents. When he came to explain with me upon the doctrines, I found several conundrums which I objected to, unless I might have my way a little too, and introduce some of mine.

凯默和我变得熟悉起来，我们相处得还不错，因为他对我开店的计划一无所知。他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以前对宗教的热忱，很喜欢论辩，因此我们曾经辩论过很多次。我常用苏格拉底的方法同他辩论，

问一些与我们的论题明显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逐渐引入辩题，使他陷入窘境与矛盾之中，中我的圈套。后来凯默变得非常谨慎，竟到了一种可笑的地步，即使问他最普通的问题，他也会首先问我：“你想从中推出什么呢？”不过，这也让他对我的辩才大为赏识，他打算成立一个新教派时，竟郑重提出希望我做他的同事，由他来布道，我则负责反驳所有的反对者。后来他向我说明他的教义时，我发现我并不赞成他一些难以理解的观点，除非我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或加入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Keimer wore his beard at full length, because somewhere in the Mosaic Law it is said, “Thou shalt not mar the corners of thy beard.” He likewise kept the Seventh day, Sabbath; and these two points were essentials with him. I dislik'd both; but agreed to admit them upon condition of his adopting the doctrine of using no animal food. “I doubt,” said he, “my constitution will not bear that.” I assur'd him it would, and that he would be the better for it. He was usually a great glutton, and I promised myself some diversion in half starving him. He agreed to try the practice, if I would keep him company. I did so, and we held it for three months. We had our victuals dress'd, and brought to us regularly by a woman in the neighborhood, who had from me a list of forty dishes to be prepar'd for us at different times, in all which there was neither fish, flesh, nor fowl, and the whim suited me the better at this time from the cheapness of it, not costing us above eighteen pence sterling each per week. I have since kept several Lents most strictly, leaving the common diet for that, and that for the common, abruptly, without the least inconvenience, so that I think there is little in the advice of making those changes by easy gradations. I went on pleasantly, but poor Keimer suffered grievously, tired of the project, long'd for the flesh-pots of Egypt, and order'd a roast pig. He invited me and two women friends to dine with him; but, it

being brought too soon upon table, he could not resist the temptation, and ate the whole before we came.

凯默胡子很长，因为摩西律法中有一处说过："不可修剪胡须。"同样，他还遵守每星期第七天为安息日的习惯。这两件事对他至关重要，我却都不喜欢，只因他同意采纳不食荤腥的教义才同意将这两条也作为新教派的教义。凯默说："我担心我的身体承受不住。"我向他保证一定承受得住，而且他的身体会因食素变得更好。他常常大吃大喝，我想到他半饥半饱的样子，觉得很有趣。他答应如果我和他一起的话，他也愿意尝试。我同意了，我们将这个饮食习惯保持了三个月。我们让街坊上一位妇人为我们准备食物，做好了之后给我们送来。我给她开了一张单子，上面列了40种菜式，以备更换，其中既无鱼肉，也无鸡鸭。这办法非常省钱，对此时的我来说正合适，这样我们每人每周最多只用花18便士的伙食费了。后来我曾经好几次极为严格地遵守四旬斋，不管是突然不吃普通食物改为吃斋，还是突然停止吃斋改吃普通食物，都没有任何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膳食并不需要循序渐进。我吃素吃得很舒心，而可怜的凯默则吃尽了苦头，他厌倦了这个计划，极渴望吃埃及做法的肉，于是买了一只烤乳猪。凯默本来邀我和两位女性朋友同吃，但这烤乳猪端上桌太早，他抵挡不了诱惑，在我们赶到之前就全都吃完了。

I had made some courtship during this time to Miss Read. I had a great respect and affection for her, and had some reason to believe she had the same for me; but, as I was about to take a long voyage, and we were both very young, only a little above eighteen, it was thought most prudent by her mother to prevent our going too far at present, as a marriage, if it was to take place, would be more convenient after my return, when I should be, as I expected, set up in my business. Perhaps, too, she thought my expectations not so well founded as I imagined them to be.

这段时间里，我向里德小姐求爱了。我对她非常尊重和爱慕，也有理由相信她对我怀有同样的感觉。但因我不久就要出远门，而且我们都还年轻，才18岁出头，她母亲认为我俩暂时不要走得太近才更为妥当，如果考虑婚事，也要等我回来才更方便，我想那时我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也许她对我的期望并不像我自己想的那样根基牢靠吧。

My chief acquaintances at this time were Charles Osborne, Joseph Watson, and James Ralph, all lovers of reading. The two first were clerks to an eminent scrivener or conveyancer in the town, Charles Brockden; the other was clerk to a merchant. Watson was a pious, sensible young man, of great integrity; the others rather more lax in their principles of religion, particularly Ralph, who, as well as Collins, had been unsettled by me, for which they both made me suffer. Osborne was sensible, candid, frank; sincere and affectionate to his friends; but, in literary matters, too fond of criticising. Ralph was ingenious, genteel in his manners, and extremely eloquent; I think I never knew a prettier talker. Both of them great admirers of poetry, and began to try their hands in little pieces. Many pleasant walks we four had together on Sundays into the woods, near Schuylkill, where we read to one another, and conferr'd on what we read.

我当时主要交往的伙伴有查尔斯·奥斯本、约瑟夫·沃森和詹姆斯·拉尔夫，他们都热爱阅读。前两位是城上有名的公证人或者转让事务代办人查尔斯·布罗克登的书记员，最后一位是一位商人的职员。沃森是个虔诚、明智的年轻人，非常正直，其他两位在宗教信仰上较为松懈，尤其是拉尔夫，他和柯林斯一样受到我的影响而对信仰产生动摇，这也给我惹来麻烦。奥斯本明白事理，直率坦诚，对待朋友真挚

亲切，但他太爱对文学作品评头论足。拉尔夫天性聪颖，举止优雅，口才出众，我想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健谈的人了。奥斯本和拉尔夫两人都非常热爱诗歌，也写了一些小诗试手。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四个经常一起去斯库尔基尔河附近的树林里散步，在那儿轮流朗读作品，并就其进行讨论，非常美好。

Ralph was inclin'd to pursue the study of poetry, not doubting but he might become eminent in it, and make his fortune by it, alleging that the best poets must, when they first began to write, make as many faults as he did. Osborne dissuaded him, assur'd him he had no genius for poetry, and advis'd him to think of nothing beyond the business he was bred to; that, in the mercantile way, tho' he had no stock, he might, by his diligence and punctuality, recommend himself to employment as a factor, and in time acquire wherewith to trade on his own account. I approv'd the amusing one's self with poetry now and then, so far as to improve one's language, but no farther.

拉尔夫想要研究诗学，他毫不怀疑自己会在写诗上有所成就，并能因此致富，他断言最优秀的诗人刚开始写诗时，犯过的错误也不比他少。奥斯本劝阻他，说他并没有写诗的天赋，劝他心无旁骛地从事他的本行，这样在经商方面，即使他暂时没有资本，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守时可靠，一定能成为代理商，假以时日，便能独立门户。我也赞成偶尔写写诗自娱自乐，但我只是为了锤炼自己的语言，没有别的目的。

On this it was propos'd that we should each of us, at our next meeting, produce a piece of our own composing, in order to improve by our mutual observations, criticisms, and corrections. As

language and expression were what we had in view, we excluded all considerations of invention by agreeing that the task should be a version of the eighteenth Psalm, which describes the descent of a Deity. When the time of our meeting drew nigh, Ralph called on me first, and let me know his piece was ready. I told him I had been busy, and, having little inclination, had done nothing. He then show'd me his piece for my opinion, and I much approv'd it, as it appear'd to me to have great merit. “Now,” says he, “Osborne never will allow the least merit in anything of mine, but makes 1000 criticisms out of mere envy. He is not so jealous of you; I wish, therefore, you would take this piece, and produce it as yours; I will pretend not to have had time, and so produce nothing. We shall then see what he will say to it.” It was agreed, and I immediately transcrib'd it, that it might appear in my own hand.

关于学习写诗一事，我们提议每人都创作一首诗，下次聚会时带来，相互品读、评论并提出修改意见，以便取得进步。鉴于诗歌的语言和表现力是我们着意提高的，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改写描写神祇降临人间的《诗篇》第18章，这样我们完全不用考虑诗歌的创意。我们聚会的时间临近了，拉尔夫先来找了我，告诉我他已经把那首诗改写好了。我告诉他我很忙，也不太想写，所以还没动笔。拉尔夫把他改写的诗拿给我看，让我评论一下，我对那首诗大加赞赏，因为在我看来它很有价值。他说：“你看，奥斯本从不承认我的任何作品有一丝一毫的优点，他对我千般挑剔，这完全是出于嫉妒罢了。他对你倒是没什么嫉妒之心，所以我希望你能把这首诗当成是你写的，我呢就假装没有时间，什么也没写，我们来看看他会对这首诗作何评价吧。”我同意就这么办，于是立即把这首诗誊抄了一遍，让它看起来像出自我的手笔。

We met; Watson's performance was read; there were some

beauties in it, but many defects. Osborne's was read; it was much better; Ralph did it justice; remarked some faults, but applauded the beauties. He himself had nothing to produce. I was backward; seemed desirous of being excused; had not had sufficient time to correct, etc.; but no excuse could be admitted; produce I must. It was read and repeated; Watson and Osborne gave up the contest, and join'd in applauding it. Ralph only made some criticisms, and propos'd some amendments; but I defended my text. Osborne was against Ralph, and told him he was no better a critic than poet, so he drop the argument. As they two went home together, Osborne expressed himself still more strongly in favor of what he thought my production; having restrain'd himself before, as he said, lest I should think it flattery. “But who would have imagin'd,” said he, “that Franklin had been capable of such a performance; such painting, such force, such fire! He has even improv'd the original. In his common conversation he seems to have no choice of words; he hesitates and blunders; and yet, good God! How he writes!” When we next met, Ralph discovered the trick we had plaid him, and Osborne was a little laught at.

聚会的时间到了。我们首先读了沃森的作品，这首诗有些闪光之处，但也有许多缺点。然后我们读了奥斯本的诗，写得比沃森的好得多，拉尔夫对其作了公正的评价，指出了诗的一些毛病，但对其优美之处也不吝溢美之词，但他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写。我有些退缩，似乎想为自己找借口，说没有足够的时间对诗进行修改等等。但是他们不听我的辩解，一定要我把诗拿出来。于是我朗读了这首诗，还重复了一遍。沃森和奥斯本自认写得不如我，退出了比赛，还齐声赞美我的诗。拉尔夫对诗稍稍作了些批评，还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而我则为自己的作品辩护。奥斯本不同意拉尔夫的看法，说他的评论和他的诗作一样平庸，于是拉尔夫就不再争辩了。奥斯本和拉尔夫两人一起回家时，奥斯本对“我的诗”更是大加赞赏，说先前他克制着自己，以免我

觉得他在奉承我。“但谁能想到，”奥斯本说，“富兰克林能写得如此生动出色、如此掷地有声、如此激情澎湃！他写得甚至比原诗还要好！他平常谈话似乎并不讲究词句，说话支支吾吾，多有谬误，但我的天啊，他居然写得出这么好的诗！”我们第二次见面时，拉尔夫揭穿了我们开的玩笑，奥斯本被大家笑话了一番。

This transaction fixed Ralph in his resolution of becoming a poet. I did all I could to dissuade him from it, but he continued scribbling verses till Pope cured him. He became, however, a pretty good prose writer. More of him hereafter. But, as I may not have occasion again to mention the other two, I shall just remark here, that Watson died in my arms a few years after, much lamented, being the best of our set. Osborne went to the West Indies, where he became an eminent lawyer and made money, but died young. He and I had made a serious agreement, that the one who happen'd first to die should, if possible, make a friendly visit to the other, and acquaint him how he found things in that separate state. But he never fulfill'd his promise.

这件事让拉尔夫坚定了成为诗人的决心。我竭尽所能劝他放弃，但他依然坚持写诗，直到蒲柏说服了他。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很好的散文家。我稍后会提到更多关于他的事。但其他两位此后可能没有机会再提，所以这里要交代一下。沃森数年之后在我怀中去世了，我感到十分悲痛，我认为他是我们之中最出色的一个。奥斯本去了西印度群岛，在那里成了一名杰出的律师，赚了很多钱，但英年早逝。我和他曾郑重约定，如果可能，我俩中先一步离开人世的要去友好地拜访另一位，告诉他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但他从未履行这个约定。

The governor, seeming to like my company, had me frequently

to his house, and his setting me up was always mention'd as a fixed thing. I was to take with me letters recommendatory to a number of his friends, besides the letter of credit to furnish me with the necessary money for purchasing the press and types, paper, etc. For these letters I was appointed to call at different times, when they were to be ready, but a future time was still named. Thus he went on till the ship, whose departure too had been several times postponed, was on the point of sailing. Then, when I call'd to take my leave and receive the letters, his secretary, Dr. Bard, came out to me and said the governor was extremely busy in writing, but would be down at Newcastle before the ship, and there the letters would be delivered to me.

州长似乎很喜欢与我为伴，常常邀我去他的寓所，也经常向我提及帮助我开店的事，似乎这事已成定局。他答应除了给我开一封信用证明，以让我获得购买印刷机、铅字、纸张等物品所需的款项，还给我写几封推荐信给他的朋友。为了去取这些信，我按约定的时间去拜访了他好几次，但他总是往后推，再约一个靠后的时间。就这样他一直拖延着，那艘船的启程日期也推迟了好几次，直到它真要起航了，我去向州长辞行，并去取那些信件，他的秘书巴德博士出来接待了我，说州长正忙着写信，他会在那艘船抵达纽卡斯尔之前到那里，可以在那里把信交给我。

Ralph, though married, and having one child, had determined to accompany me in this voyage. It was thought he intended to establish a correspondence, and obtain goods to sell on commission; but I found afterwards, that, thro' some discontent with his wife's relations, he purposed to leave her on their hands, and never return again. Having taken leave of my friends, and interchang'd some promises with Miss Read, I left Philadelphia in the ship, which

anchor'd at Newcastle. The governor was there; but when I went to his lodging, the secretary came to me from him with the civil lest message in the world, that he could not then see me, being engaged in busines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but should send the letters to me on board, wish'd me heartily a good voyage and a speedy return, etc. I returned on board a little puzzled, but still not doubting.

拉尔夫已经成家，还有一个孩子，但他决定和我一同出海航行。我原以为他打算设立一个代理处，进货销售，从中得到佣金。但我后来发现，他是因为和妻子的亲戚关系不和，打算把妻子留给他们，自己再也不回来了。我和朋友们告了别，又和里德小姐山盟海誓了一番，然后乘船离开了费城。船停靠纽卡斯尔时，州长果然在那里，但我去他的住处拜访时，他的秘书代他出来见我，以极其客气的语气告诉我，州长正在处理极为重要的公务，不能见我，但一定会把那几封信送到船上，还衷心祝我一路顺风，早日返回等等。我回到船上，心里有些不解，但还是没有产生怀疑。

Mr. Andrew Hamilton, a famous lawyer of Philadelphia, had taken passage in the same ship for himself and son, and with Mr. Denham, a Quaker merchant, and Messrs. Onion and Russel, masters of an iron work in Maryland, had engag'd the great cabin; so that Ralph and I were forced to take up with a berth in the steerage, and none on board knowing us, were considered as ordinary persons. But Mr. Hamilton and his son (it was James, since governor) return'd from Newcastle to Philadelphia, the father being recall'd by a great fee to plead for a seized ship; and, just before we sail'd, Colonel French coming on board, and showing me great respect, I was more taken notice of, and, with my friend Ralph, invited by the other gentlemen to come into the cabin, there being

now room. Accordingly, we remov'd thither.

费城一位著名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先生和他的儿子也在这艘船上，还有一位贵格会商人德纳姆先生，以及马里兰一家铸铁厂的厂主奥尼恩先生和罗素先生，他们几个包下了头等舱，因此我和拉尔夫只得在末等舱里找个铺位。船上没有人认识我们，人们只把我们当成普通人罢了。但汉密尔顿先生和他的儿子（名叫詹姆斯，后来当了州长）从纽卡斯尔又回了费城，因为汉密尔顿先生被人用重金请回去为一艘被扣留的船作辩护。船快开的时候，弗伦奇上校上了船，对我尊敬有加，人们这才对我多加注意，其他绅士请我和拉尔夫搬去头等舱，因为恰好有地方空出来了。于是，我们就搬到了头等舱。

Understanding that Colonel French had brought on board the governor's despatches, I ask'd the captain for those letters that were to be under my care. He said all were put into the bag together and he could not then come at them; but, before we landed in England, I should have an opportunity of picking them out; so I was satisfied for the present, and we proceeded on our voyage. We had a sociable company in the cabin, and lived uncommonly well, having the addition of all Mr. Hamilton's stores, who had laid in plentifully. In this passage Mr. Denham contracted a friendship for me that continued during his life. The voyage was otherwise not a pleasant one, as we had a great deal of bad weather.

我以为弗伦奇上校把州长的信件带上船了，于是就去找船长要那些将由我保管的信。船长说所有信件都放在信件袋里了，一时取不出来，但我们抵达英国前，我会有机会把它们拣出来。于是我暂时安了心，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在船舱里聊得很愉快，船上的生活也很好，因为汉密尔顿先生把他为此次航行储备的所有东西都留了下来，

非常丰富。这次航行让我和德纳姆先生成了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止。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次航行也并不愉快，因为很多时候天气都很糟糕。

When we came into the Channel, the captain kept his word with me, and gave me an opportunity of examining the bag for the governor's letters. I found none upon which my name was put as under my care. I picked out six or seven, that, by the handwriting, I thought might be the promised letters, especially as one of them was directed to Basket, the king's printer, and another to some stationer. We arriv'd in London the 24th of December, 1724. I waited upon the stationer, who came first in my way, delivering the letter as from Governor Keith. “I don't know such a person,” says he; but, opening the letter, “O! This is from Riddlesden. I have lately found him to be a compleat rascal, and I will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him, nor receive any letters from him.” So, putting the letter into my hand, he turn'd on his heel and left me to serve some customer. I was surprized to find these were not the governor's letters; and, after recollecting and comparing circumstances, I began to doubt his sincerity. I found my friend Denham, and opened the whole affair to him. He let me into Keith's character; told me there was not the least probability that he had written any letters for me; that no one, who knew him, had the smallest dependence on him; and he laught at the notion of the governor's giving me a letter of credit, having, as he said, no credit to give. On my expressing some concern about what I should do, he advised me to endeavor getting some employment in the way of my business. “Among the printers here,” said he, “you will improve yourself, and when you return to America, you will set up to greater advantage.”

我们的船驶入英吉利海峡后，船长遵守和我的约定，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从信件袋里取出州长的信。我并未发现署名由我保管的信。我从中挑了六七封出来，从信封上的笔迹推测应该是承诺为我写的信，特别是其中有一封是写给英国皇家印刷所巴斯克特的，还有一封是写给某位文具商的。我们于1724年12月24日抵达伦敦。因为顺路，我先去拜访了那位文具商，把基思州长的信交给他。“我不认识这样一个人”，那位文具商说道，但打开信之后，又说，“哦，是那个里德斯登写来的。我最近发现他完全是个骗子，我不会跟他有任何往来了，也不会再收他任何信件。”就这样，他把信交还给我，转身去招呼别的顾客了。我非常惊讶地发现这不是州长写的信。经过仔细回想，认真比较前后发生的事，我开始怀疑州长的诚意了。我找到我的朋友德纳姆先生，把整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德纳姆先生和我讲了基思州长的为人，说他是绝无可能给我写什么推荐信的，还说了解基思的人里没有谁会信赖他。听说基思州长给了我一封信用证明，德纳姆先生笑了，说基思连自己的信用都不能保证。我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不知该怎么办，德纳姆先生建议我尽力在这里的印刷店找个活儿干，他说：“通过在这里的印刷店里干活，你能够提高自己，等你回美国了，开起店来也更有优势。”

We both of us happen'd to know, as well as the stationer, that Riddlesden, the attorney, was a very knave. He had half ruin'd Miss Read's father by persuading him to be bound for him. By this letter it appear'd there was a secret scheme on foot to the prejudice of Hamilton (suppos'd to be then coming over with us); and that Keith was concerned in it with Riddlesden. Denham, who was a friend of Hamilton's thought he ought to be acquainted with it; so, when he arriv'd in England, which was soon after, partly from resentment and ill-will to Keith and Riddlesden, and partly from good-will to him, I waited on him, and gave him the letter. He thank'd me cordially, the information being of importance to him; and from that time he became my friend, greatly to my advantage afterwards

on many occasions.

我和德纳姆先生像那位文具商一样，知道那个里德斯登律师是个十足的骗子。他曾骗得里德小姐的父亲和他立约，使她父亲几乎破产。从这封信来看，似乎有人在密谋陷害汉密尔顿（他本来是要和我们一起来英国的），而基思也与里德斯登一起参与其中。德纳姆先生是汉密尔顿的朋友，认为应把这件事告知汉密尔顿。因此过了不久，当汉密尔顿先生来到英国时，我去拜访了他，将这封信交给了他，这一半是出于我对基思和里德斯登的憎恶，一半是出于对汉密尔顿先生的好意。汉密尔顿先生衷心地感谢了我，说这一消息对他非常重要。从此，他成了我的朋友，后来多次给我很大帮助。

But what shall we think of a governor's playing such pitiful tricks, and imposing so grossly on a poor ignorant boy! It was a habit he had acquired. He wish'd to please everybody; and, having little to give, he gave expectations. He was otherwise an ingenious, sensible man, a pretty good writer, and a good governor for the people, tho' not for his constituents, the proprietaries, whose instructions he sometimes disregarded. Several of our best laws were of his planning and passed during his administration.

但一位州长竟然玩这种可憎的把戏，如此卑鄙地陷害一个可怜无知的少年，我们又该作何感想呢！这是他已经养成的习惯，他希望取悦每一个人，但又没什么可赠与的，于是就空口给出许诺。但另一方面，他天资聪颖，通情达理，写得一手好文章，对于人民来说也是一个好州长，尽管对他的选民——殖民地领主来说并非如此，因为他有时会忽视他们的意见。我们一些最公正的法律就是由他规划制定，并在他的任期内通过的。

Ralph and I were inseparable companions. We took lodgings together in Little Britain at three shillings and sixpence a week—as much as we could then afford. He found some relations, but they were poor, and unable to assist him. He now let me know his intentions of remaining in London, and that he never meant to return to Philadelphia. He had brought no money with him, the whole he could muster having been expended in paying his passage. I had fifteen pistoles; so he borrowed occasionally of me to subsist, while he was looking out for business. He first endeavored to get into the playhouse, believing himself qualify'd for an actor; but Wilkes, to whom he apply'd, advis'd him candidly not to think of that employment, as it was impossible he should succeed in it. Then he propos'd to Roberts, a publisher in Paternoster Row, to write for him a weekly paper like the Spectator, on certain conditions, which Roberts did not approve. Then he endeavored to get employment as a hackney writer, to copy for the stationers and lawyers about the Temple, but could find no vacancy.

我和拉尔夫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我们在小不列颠街住了下来，住宿费为每周3先令6便士——这是我们当时出得起的最高价格了。拉尔夫找到一些亲戚，但他们也很穷，帮不了他。这时他告诉我他打算留在伦敦，再也不回费城了。拉尔夫没有带钱来，筹到的所有钱都已用作旅费了。我有15个皮斯托尔，所以他在外找活儿干时，有时会向我借钱维持生活。一开始他想进入戏院，认为自己够格当一名演员，但他向威尔克斯申请戏院的工作时，威尔克斯坦白地告诉他不要作此打算了，他不可能成功的。后来他又联系了帕特诺斯特街上一位叫罗伯茨的出版商，自荐为他编《旁观者》那样的周报，但罗伯茨没有答应他提出的某些条件。随后拉尔夫还想找文员的工作，为圣殿教堂附近的文具商和律师抄写东西，但也没找到。

I immediately got into work at Palmer's, then a famous printing-house in Bartholomew Close, and here I continu'd near a year. I was pretty diligent, but spent with Ralph a good deal of my earnings in going to plays and other places of amusement. We had together consumed all my pistols, and now just rubbed on from hand to mouth. He seem'd quite to forget his wife and child, and I, by degrees, my engagements with Miss Read, to whom I never wrote more than one letter, and that was to let her know I was not likely soon to return. This was another of the great errata of my life, which I should wish to correct if I were to live it over again. In fact, by our expenses, I was constantly kept unable to pay my passage.

我很快就在帕尔默印刷所找到了工作。那是巴塞洛缪小街上一家著名的印刷所，我在那里干了将近一年。我干活儿很勤快，但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花在和拉尔夫一起去看戏或者去其他娱乐场所了。我们还一起花完了我那15个皮斯托尔，当时的收入仅能糊口而已。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的妻儿，而我，也渐渐不记得和里德小姐的约定了，我只给她写过一封信，而且是告诉她我不会很快回去。这是我人生中的又一大错误，如果能够从头再来，我希望能改正这个错误。事实上，因为我们花钱大手大脚，我一直没钱支付回程的旅费。

At Palmer's I was employed in composing for the second edition of Wollaston's “Religion of Nature.” Some of his reasonings not appearing to me well founded, I wrote a little metaphysical piece in which I made remarks on them. It was entitled “A Dissertation on Liberty and Necessity, Pleasure and Pain.” I inscribed it to my friend Ralph; I printed a small number. It occasion'd my being more consider'd by Mr. Palmer as a young man of some ingenuity, tho' he seriously expostulated with me upon the principles of my pamphlet, which to him appear'd abominable. My

printing this pamphlet was another erratum. While I lodg'd in Little Britain, I made an acquaintance with one Wilcox, a bookseller, whose shop was at the next door. He had an immense collection of second-hand books. Circulating libraries were not then in use; but we agreed that, on certain reasonable terms, which I have now forgotten, I might take, read, and return any of his books. This I esteem'd a great advantage, and I made as much use of it as I could.

在帕尔默印刷所，我当时在为沃拉斯顿的《自然宗教》的第二版排版。我认为他的一些推理并没有充分的论据，于是写了一篇简短的哲学论文对其进行评论，文章名字叫《论自由与穷困、快乐与痛苦》。我把这篇文章题赠给我的朋友拉尔夫，还印刷了若干份。这使帕尔默先生对我稍加重视了，认为我是一个有些天分的年轻人。不过他严肃地跟我争辩小册子里的那些观点，它们在他看来很是可恶。印刷这本小册子是我的又一大错误。我在小不列颠街寄住时，认识了一个叫威尔科克斯的书商，他的书店就在我住所的隔壁。他收集了大量旧书，当时还没有流通图书馆，但我们约定，我付一笔合理的费用后——具体数目我已经忘了——我可以借阅他的任何书籍，读完后归还。这在我看来是个极大的好处，于是就极尽所能地加以利用。

My pamphlet by some means falling into the hands of one Lyons, a surgeon, author of a book entitled “The Infallibility of Human Judgment,” it occasioned an acquaintance between us. He took great notice of me, called on me often to converse on those subjects, carried me to the Horns, a pale alehouse in—Lane, Cheapside, and introduced me to Dr. Mandeville, author of the “Fable of the Bees,” who had a club there, of which he was the soul, being a most facetious, entertaining companion. Lyons, too, introduced me to Dr. Pemberton, at Batson's Coffee-house, who promis'd to give me an opportunity, some time or other, of seeing

Sir Isaac Newton, of which I was extremely desirous; but this never happened.

我的小册子辗转到了一位叫莱昂斯的外科医生手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人类判断的正确性》，我们因此结识了。他对我非常重视，经常前来拜访，并就某些问题和我展开讨论。莱昂斯还带我去了齐普赛街某条巷子里一家叫“霍恩斯”的酒馆，把我介绍给《蜜蜂的寓言》一书的作者曼德维尔博士。曼德维尔博士幽默风趣，在这家酒馆有个俱乐部，他是俱乐部的灵魂人物。在巴特森咖啡馆，莱昂斯又把我介绍给了彭伯顿博士，他答应我过些时候找个机会带我去见见艾萨克·牛顿爵士，我极希望能有这个机会，但从未实现。

I had brought over a few curiosities, among which the principal was a purse made of the asbestos, which purifies by fire. Sir Hans Sloane heard of it, came to see me, and invited me to his house in Bloomsbury Square, where he show'd me all his curiosities, and persuaded me to let him add that to the number, for which he paid me handsomely.

我从美国带来了几件珍品，其中为首的一件是一个石棉制成的钱包，火烧后洁白干净。汉斯·斯隆爵士听说后来见我，邀请我去他在布卢姆斯伯里广场的寓所，向我展示了他收藏的所有珍宝，劝说我把那个钱包让给他，以增加他的藏品，他为此付给了我一大笔钱。

In our house there lodg'd a young woman, a milliner, who, I think, had a shop in the Cloisters. She had been genteelly bred, was sensible and lively, and of most pleasing conversation. Ralph read plays to her in the evenings, they grew intimate, she took another

lodging, and he followed her. They liv'd together some time; but, he being still out of business, and her income not sufficient to maintain them with her child, he took a resolution of going from London, to try for a country school, which he thought himself well qualified to undertake, as he wrote an excellent hand, and was a master of arithmetic and accounts. This, however, he deemed a business below him, and confident of future better fortune, when he should be unwilling to have it known that he once was so meanly employed, he changed his name, and did me the honor to assume mine; for I soon after had a letter from him, acquainting me that he was settled in a small village (in Berkshire, I think it was, where he taught reading and writing to ten or a dozen boys, at sixpence each per week), recommending Mrs. T—to my care, and desiring me to write to him, directing for Mr. Franklin, schoolmaster, at such a place.

我们的寓所里还住着一位年轻妇女，是个做帽子生意的，我想她在修道院附近有家店面。她修养很好，知书达理，聪颖敏慧，和她谈话非常愉快。晚上的时候，拉尔夫会朗读剧本给她听，他们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她另找了住处，拉尔夫也跟着搬了过去，他们同居了一段时间。但由于拉尔夫还是没有找到工作，而她的收入也不足以维持他们两人还有她的孩子的生活，拉尔夫决心离开伦敦去一所乡下学校教书，他认为自己完全能胜任那份工作，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又精通算术和会计。但他认为自己做那份工作太大材小用了，他相信自己将来定能有所成就，到那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曾经干过这么卑微的活儿，就改换了姓名，使用了我的名字，很给我面子。我之所以直到这些是因为过了不久，我收到拉尔夫的一封来信，他告诉我他住在一个小村子（我想是在伯克郡，他在那里为10到12个孩子教授阅读和写作，每人每周6便士学费），他还托我照顾一位T夫人，并希望我给他写信，把信按所给地址寄给教师富兰克林先生。

He continued to write frequently, sending me large specimens of an epic poem which he was then composing, and desiring my remarks and corrections. These I gave him from time to time, but endeavor'd rather to discourage his proceeding. One of Young's Satires was then just published. I copy'd and sent him a great part of it, which set in a strong light the folly of pursuing the Muses with any hope of advancement by them. All was in vain; sheets of the poem continued to come by every post. In the meantime, Mrs. T—, having on his account lost her friends and business, was often in distresses, and us'd to send for me, and borrow what I could spare to help her out of them. I grew fond of her company, and, being at that time under no religious restraint, and presuming upon my importance to her, I attempted familiarities (another erratum) which she repuls'd with a proper resentment, and acquainted him with my behaviour. This made a breach between us; and, when he returned again to London, he let me know he thought I had cancell'd all the obligations he had been under to me. So I found I was never to expect his repaying me what I lent to him, or advanc'd for him. This, however, was not then of much consequence, as he was totally unable; and in the loss of his friendship I found myself relieved from a burthen. I now began to think of getting a little money beforehand, and, expecting better work, I left Palmer's to work at Watts's, near Lincoln's Inn Fields, a still greater printing-house. Here I continued all the rest of my stay in London.

拉尔夫还是经常给我写信，还把他写的长篇史诗寄给我，请我加以评论和修改。我修改过好几次，但也试图说服他不要继续写下去了。当时扬的一部讽刺诗刚出版不久，这首诗语词激烈地指出，抱着在诗歌创作上取得进步的希望继续写诗，继续追逐诗神缪斯的行为是愚蠢的，于是我把这首诗的大部分誊抄下来，寄给了他。但一切都是徒劳，他每次写信，还是会把自己一页页的诗稿一同寄来。这时，那

位T夫人因为拉尔夫已经众叛亲离，丢了买卖，常常陷于穷困中，因此她经常叫我去看她，还问我借我手头上多余的钱来救急。我慢慢地喜欢上和她在一起，当时也没有宗教的约束，又仗着自己对她很重要，试图和她发展更亲密的关系（又一个大错）。她相当愤怒地拒绝了，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拉尔夫。这件事让我和拉尔夫之间的友谊破裂了。拉尔夫回到伦敦后，说他认为我的行为已使他将他先前受之于我的恩惠一笔勾销。于是我明白，我再也不要指望他会把借给他和替他垫付的钱还给我了。但当时，这对我来说并没多大影响，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能力还钱，而且没了他这个朋友，我觉得自己反而少了个负担。这时，我开始打算先攒点儿钱，而且也希望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于是我离开了帕尔默印刷所，来到林肯菲尔兹广场附近的沃茨印刷所工作。这家印刷所规模要更大一些，我后来一直在这里工作，直到离开伦敦。

At my first admission into this printing-house I took to working at press, imagining I felt a want of the bodily exercise I had been us'd to in America, where presswork is mix'd with composing. I drank only water; the other workmen, near fifty in number, were great guzzlers of beer. On occasion, I carried up and down stairs a large form of types in each hand, when others carried but one in both hands. They wondered to see, from this and several instances, that the Water-American, as they called me, was stronger than themselves, who drank strong beer! We had an alehouse boy who attended always in the house to supply the workmen. My companion at the press drank every day a pint before breakfast, a pint at breakfast with his bread and cheese, a pint between breakfast and dinner, a pint at dinner, a pint in the afternoon about six o'clock, and another when he had done his day's work. I thought it a detestable custom; but it was necessary, he suppos'd, to drink strong beer, that he might be strong to labor. I endeavored to convince him that the bodily strength afforded by beer could only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grain or flour of the barley dissolved in the water of which it was made; that there was more flour in a pennyworth of bread; and therefore, if he would eat that with a pint of water, it would give him more strength than a quart of beer. He drank on, however, and had four or five shillings to pay out of his wages every Saturday night for that muddling liquor; an expense I was free from. And thus these poor devils keep themselves always under.

初进这家印刷所时，我在印刷机旁工作。我当时觉得缺乏身体锻炼，因为原来在美国的时候，操作印刷机和排版的工作是在一块儿的，我已经习惯了那种劳作。我平时只喝水，而其他工人，有近50人，全都嗜饮啤酒。有时候，我上下楼梯时两只手各拿一大版铅字，而其他人双手才能捧住一版。从这件事还有其他一些例子中，他们很惊讶地发现，只喝水的美国人——他们是这么叫我的——比喝浓啤酒的他们还要强壮！有个酒馆的孩子一直给我们印刷店的工人送酒。与我同在印刷机旁工作的伙伴每天早餐前要喝一品脱酒，早餐时就着面包和奶酪要喝一品脱酒，早餐和午餐之间要喝一品脱，午餐时饮一品脱，下午六点左右饮一品脱，一天工作结束时还要再喝一品脱。我觉得这是个恶习，但他认为喝浓啤酒十分必要，因为这样他才有力气工作。我试图说服他，说啤酒给人提供的体力与其原材料——溶解在水中的大麦粒或大麦粉——成正比，价值一便士的面包里有更多面粉，因此，他吃块面包再喝一品脱水所能获得的体力比喝一夸脱啤酒还要多。但他还是坚持喝酒，每周六晚上都要从工资里拿出四五个先令去买那浑浊的液体，而我就不用花这笔钱。就这样，这些可怜鬼一直这么穷困潦倒。

Watts, after some weeks, desiring to have me in the composing-room, I left the pressmen; a new bien venu or sum for drink, being five shillings, was demanded of me by the compositors. I thought it

an imposition, as I had paid below; the master thought so too, and forbad my paying it. I stood out two or three weeks, was accordingly considered as an excommunicate, and had so many little pieces of private mischief done me, by mixing my sorts, transposing my pages, breaking my matter, etc., etc., if I were ever so little out of the room, and all ascribed to the chappel ghost, which they said ever haunted those not regularly admitted,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master's protection, I found myself oblig'd to comply and pay the money, convinc'd of the folly of being on ill terms with those one is to live with continually.

几个星期以后，沃茨希望我去排版室工作，于是我告别了这些印刷工人。新到排版室，排字工人们让我出五先令的入室费或说是酒钱，我觉得这是敲我的竹杠，因为我原先已经出过了。老板也这么认为，就不让我出这笔钱。我坚持了两三个星期没交，于是就被他们当成了圈外人，私下里对我做了许多小恶作剧。我要是出去一小会儿，他们就会弄乱我的铅字，颠倒页码，破坏我的物品等等，然后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教堂里的鬼魂，说这些鬼魂就是爱萦绕在那些不按规矩交纳入室费的人周围。因此，虽然有老板的保护，我发现自己不得不遵从他们，出这笔钱，我也从中意识到，和自己要长期相处的人关系闹得很僵是件愚蠢的事。

I was now on a fair footing with them, and soon acquir'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I propos'd some reasonable alterations in their chappel laws, and carried them against all opposition. From my example, a great part of them left their muddling breakfast of beer, and bread, and cheese, finding they could with me be suppli'd from a neighboring house with a large porringer of hot water-gruel, sprinkled with pepper, crumbl'd with bread, and a bit of butter in it, for the price of a pint of beer, viz., three half-pence. This was a

more comfortable as well as cheaper breakfast, and kept their heads clearer. Those who continued sotting with beer all day, were often, by not paying, out of credit at the alehouse, and us'd to make interest with me to get beer; their light, as they phrased it, being out. I watch'd the pay-table on Saturday night, and collected what I stood engag'd for them, having to pay sometimes near thirty shillings a week on their account. This, and my being esteem'd a pretty good riggite, that is, a jocular verbal satirist, supported my consequence in the society. My constant attendance (I never making a St. Monday) recommended me to the master; and my uncommon quickness at composing occasioned my being put upon all work of dispatch, which was generally better paid. So I went on now very agreeably.

后来，我和他们的关系相当不错，没多久就在他们中间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我对他们的印刷所规矩提出了一些合理修改，并驳倒了一切反对意见使它们得以通过。很多人以我为榜样，不再把啤酒、面包和奶酪混在一起当早餐，而是和我一样从隔壁商店里买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稀粥，撒上点胡椒粉，再加上碎面包，涂点黄油，加起来才一品脱啤酒的价钱，也就是一个半便士。这样的早餐吃起来更舒服，也更便宜，还能保持头脑清醒。那些仍然整天酗饮啤酒的经常付不起账，因此他们在酒店失去了信用也赊不到酒，就来找我以付利息为前提借钱买啤酒，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已经能量耗尽黯淡无光了。星期六晚上，我就查阅工资表，把他们欠我的钱收齐，有时候我一周得替他们垫付将近30先令呢。因为这个原因，加上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幽默诙谐的讽刺家，我在他们之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我工作始终保持全勤（从不休圣星期一），老板对此非常赞赏，而且我排版速度非常快，因此所有的急件都交给我做，这种活儿的报酬一般会高一些。因此这时我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My lodging in Little Britain being too remote, I found another in Duke-street, opposite to the Romish Chapel. It was two pair of stairs backwards, at an Italian warehouse. A widow lady kept the house; she had a daughter, and a maid servant, and a journeyman who attended the warehouse, but lodg'd abroad. After sending to inquire my character at the house where I last lodg'd she agreed to take me in at the same rate, 3s. 6d. per week; cheaper, as she said, from the protection she expected in having a man lodge in the house. She was a widow, an elderly woman; had been bred a Protestant, being a clergyman's daughter, but was converted to the Catholic religion by her husband, whose memory she much revered; had lived much among people of distinction, and knew a thousand anecdotes of them as far back as the times of Charles the Second. She was lame in her knees with the gout, and, therefore, seldom stirred out of her room, so sometimes wanted company; and hers was so highly amusing to me, that I was sure to spend an evening with her whenever she desired it. Our supper was only half an anchovy each, on a very little strip of bread and butter, and half a pint of ale between us; but the entertainment was in her conversation. My always keeping good hours, and giving little trouble in the family, made her unwilling to part with me; so that, when I talk'd of a lodging I had heard of, nearer my business, for two shillings a week, which, intent as I now was on saving money, made some difference, she bid me not think of it, for she would abate me two shillings a week for the future; so I remained with her at one shilling and sixpence as long as I staid in London.

我在小不列颠街的住处离印刷所太远了，于是就在公爵街另找了一处住所，正对着罗马教堂，在一家意大利仓库背后的三层楼上。一位寡妇守着这房子，她有个女儿和一个女仆，还有个学徒工照看仓库，但他住在外面。这位妇人派人去我上家寄宿的地方了解了我的人

品之后，同意我以同样的价格在她这儿寄宿，即每周3先令6便士。她说这租金比较低廉，因为她指望有个男人住在这屋里，可以保护她们。她是个寡妇，又上了岁数，曾接受过新教教育，因为她父亲是个牧师，但后来随着丈夫改信了天主教，现在对逝去的丈夫依然怀念敬重。她从前结交的都是知名人士，知道他们的许多趣闻轶事，有些轶闻甚至要追溯到查理二世时期呢。她膝部患了痛风，腿脚不便，极少离开卧室，因此有时需要人陪伴。和她在一起很有意思，所以只要她需要，我一定陪她一晚上。我们晚餐各自只吃半条凤尾鱼，加上一小条抹了黄油的面包，再各喝半品脱啤酒，但乐趣却在于和她交谈。我总是早睡早起，生活规律，没给她家添什么麻烦，因此她不想让我离开。后来我听说离印刷所更近的地方能以每周两先令的价格租到房子，当时我一心攒钱，这差价对我来说不是小数。我提到要搬到那儿去住时，她让我不要做此打算，她以后从我的租金中减去两先令就是了。就这样，我一直住在她那里，以每周1先令6便士的租金租房，直到离开伦敦。

In a garret of her house there lived a maiden lady of seventy, in the most retired manner, of whom my landlady gave me this account: that she was a Roman Catholic, had been sent abroad when young, and lodg'd in a nunnery with an intent of becoming a nun; but, the country not agreeing with her, she returned to England, where, there being no nunnery, she had vow'd to lead the life of a nun, as near as might be done in those circumstances. Accordingly, she had given all her estate to charitable uses, reserving only twelve pounds a year to live on, and out of this sum she still gave a great deal in charity, living herself on water-gruel only, and using no fire but to boil it. She had lived many years in that garret, being permitted to remain there gratis by successive Catholic tenants of the house below, as they deemed it a blessing to have her there. A priest visited her to confess her every day. “I have ask'd her,” says my landlady, “how she, as she liv'd, could possibly

find so much employment for a confessor?” “Oh,” said she, “it is impossible to avoid vain thoughts.” I was permitted once to visit her, She was cheerful and polite, and convers'd pleasantly. The room was clean, but had no other furniture than a madras, a table with a crucifix and book, a stool which she gave me to sit on, and a picture over the chimney of Saint Veronica displaying her handkerchief, with the miraculous figure of Christ's bleeding face on it, which she explained to me with great seriousness. She look'd pale, but was never sick; and I give it as another instance on how small an income life and health may be supported.

她房子的阁楼上住着一位70岁的老处女，深居简出，我的房东给我讲了以下这个故事：她信仰天主教，年轻时被送去国外，住在一家修道院里立志成为修女，但在当地水土不服，只好回到英国。可英国没有修道院，她已立誓要过修女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也要使自己的生活尽可能与修女的生活接近。因此，她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用于了慈善目的，只给自己留下每年12英镑的生活费，就连这12英镑，也还要从中拿出许多用于救济施舍。她自己只喝稀粥，除了煮粥以外从不生火。她在那个阁楼上生活了很多年，一位又一位的天主教租户都不要她交房租，他们认为她住在那里，是会带来福气的。一位牧师每天都来拜访她，听她忏悔。我的房东说：“我曾问过她，像她这样生活，怎会需要经常向人忏悔呢？”她答道：“哦，有些毫无意义的想法总是难以避免啊。”有一次，我得到允许前去拜访她，她很高兴，待我彬彬有礼，和我愉快地交谈。她的房间干净整洁，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个垫子，一张放着十字架和书的桌子，还有张她给我坐的凳子。阁楼烟囱上挂着圣维罗妮卡展示手帕的画像，那手帕上是耶稣满脸流血的奇异情景，她还郑重其事地把这画的含义解释给我听。她面色苍白，但从不生病，我把她当成又一个实例：微薄的收入一样可以维持生活，并保持健康的身体。

At Watts's printing-house I contracted an acquaintance with an ingenious young man, one Wygate, who, having wealthy relations, had been better educated than most printers; was a tolerable Latinist, spoke French, and lov'd reading. I taught him and a friend of his to swim at twice going into the river, and they soon became good swimmers. They introduc'd me to some gentlemen from the country, who went to Chelsea by water to see the College and Don Saltero's curiosities. In our return, at the request of the company, whose curiosity Wygate had excited, I stripped and leaped into the river, and swam from near Chelsea to Blackfryar's, performing on the way many feats of activity, both upon and under water, that surpris'd and pleas'd those to whom they were novelties.

在沃茨印刷所，我结识了一位机灵聪颖的年轻人，叫瓦格特。他有很富有的亲戚，因此所受教育比大多数印刷工都要好一些，拉丁文还不错，还会说法语，热爱阅读。我曾教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在河里游泳，只教了两次，他们很快就游得很好了。他们介绍我认识了乡下的一些绅士，这些绅士是乘船去切尔西参观学院和唐·索尔特洛咖啡馆的珍玩的。在我们回来的路上，瓦格特激发了大家对我游泳的好奇心，于是应他们的要求，我脱掉衣服，跳入河中，从切尔西附近一直游到布莱克法尔。一路上我展示了许多游泳的花样，时而浮在河面，时而潜入水中，这在他们看来很新奇，既惊讶又开心。

I had from a child been ever delighted with this exercise, had studied and practis'd all Thevenot's motions and positions, added some of my own, aiming at the graceful and easy as well as the useful. All these I took this occasion of exhibiting to the company, and was much flatter'd by their admiration; and Wygate, who was desirous of becoming a master, grew more and more attach'd to me on that account, as well as from the similarity of our studies. He at

length proposed to me travelling all over Europe together, supporting ourselves everywhere by working at our business. I was once inclined to it; but, mentioning it to my good friend Mr. Denham, with whom I often spent an hour when I had leisure, he dissuaded me from it, advising me to think only of returning to Pennsilvania, which he was now about to do.

我从小就喜爱游泳这项运动，曾经学习和练习过戴丰乐所有的动作和姿势，还加入了一些自己的动作，希望既能做到实用，又能姿势优美、来去自如。我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些都表演给大家看，他们对此赞赏不已，我也感到非常满足。瓦格特希望能成为游泳好手，加上我俩的知识背景非常相似，他与我的关系日益密切了。后来，瓦格特提议我们一起周游欧洲，在各地印刷店工作以维持生活。我一度颇为动心，但当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我的好朋友德纳姆先生后（我一闲下来就常常去和他聊天）他劝我不要去，建议我只考虑回宾夕法尼亚的事，他当时也要回去了。

I must record one trait of this good man's character. He had formerly been in business at Bristol, but failed in debt to a number of people, compounded and went to America. There, by a close application to business as a merchant, he acquir'd a plentiful fortune in a few years. Returning to England in the ship with me, he invited his old creditors to an entertainment, at which he thank'd them for the easy composition they had favored him with, and, when they expected nothing but the treat, every man at the first remove found under his plate an order on a banker for the full amount of the unpaid remainder with interest.

我得记下反映出德纳姆先生好品德的一则轶事。他以前在布里斯

托尔做生意，但生意失败了，欠了很多人钱，好歹还上了一些之后，就去了美国。他在那儿一心一意地经商，只几年的工夫就积累了很大一笔财富。和我同船回到英国之后，德纳姆先生邀请了所有他昔日的债主前来赴宴。席间，他对当年他们没有向他催讨欠款表示了感谢，而债主们除了一顿大餐之外也并无其他期待，但当他们刚一移动碗盘时，却发现所有人的盘子下都放着一张银行支票，除了将当年的欠款完全付清之外，还支付了利息。

He now told me he was about to return to Philadelphia, and should carry over a great quantity of goods in order to open a store there. He propos'd to take me over as his clerk, to keep his books, in which he would instruct me, copy his letters, and attend the store. He added that, as soon as I should be acquainted with mercantile business, he would promote me by sending me with a cargo of flour and bread, etc., to the West Indies, and procure me commissions from others which would be profitable; and, if I manag'd well, would establish me handsomely. The thing pleas'd me; for I was grown tired of London, remembered with pleasure the happy months I had spent in Pennsylvania, and wish'd again to see it; therefore I immediately agreed on the terms of fifty pounds a year, Pennsylvania money; less, indeed, than my present gettings as a compositor, but affording a better prospect.

德纳姆先生当时告诉我，他要回费城了，还要带大量货物回去在那儿开店。他提出让我当他的职员，负责管理账簿（这点他可以教我）、抄写信件，还有照管店铺。他还说，等我了解如何经商后，他就提拔我，派我带着一船面粉和面包等去西印度群岛，并使我从其他有利可图的方面得到佣金，如果我经营得当的话，我能积累很大一笔财富。这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已经厌倦了伦敦，回想在宾夕法尼亚那快乐的日子时总是倍感愉悦，希望能够再回到那里。于是我立即接

受了这一职位，每年工资为50镑宾夕法尼亚货币，这比我当时当排版工挣的的确要少，但前景要更好一些。

I now took leave of printing, as I thought, forever, and was daily employed in my new business, going about with Mr. Denham among the tradesmen to purchase various articles, and seeing them pack'd up, doing errands, calling upon workmen to dispatch, etc.; and, when all was on board, I had a few days' leisure. On one of these days, I was, to my surprise, sent for by a great man I knew only by name, a Sir William Wyndham, and I waited upon him. He had heard by some means or other of my swimming from Chelsea to Blackfriar's, and of my teaching Wygate and another young man to swim in a few hours. He had two sons, about to set out on their travels; he wish'd to have them first taught swimming, and proposed to gratify me handsomely if I would teach them. They were not yet come to town, and my stay was uncertain, so I could not undertake it; but, from this incident, I thought it likely that, if I were to remain in England and open a swimming-school, I might get a good deal of money; and it struck me so strongly, that, had the overture been sooner made me, probably I should not so soon have returned to America. After many years, you and I had something of more importance to do with one of these sons of Sir William Wyndham, become Earl of Egremont, which I shall mention in its place.

那时我就离开了印刷业，我想是永远离开了这一行。我每天都忙于新的差事，与德纳姆先生一起来往于各色生意人之中，采购各类商品，亲自监督他们包装，外出办事，找工人发送货物等等，待所有货物都上船之后，我还能歇息几天。其中某一天，有位我只闻其名、并未谋面的大人物——威廉·温德姆爵士派人来找我，我非常惊讶，于是

我去拜访了他。他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我从切尔西游泳游到布莱克法尔，还在几个小时里教会了瓦格特和另一位年轻人游泳的事。他有两个儿子，即将外出旅行，他希望他俩能先学会游泳，说如果我愿意教他们的话会给我丰厚的报酬。当时他两个儿子还没到城里来，我能在那儿停留多久也不确定，因此我没有揽下这个活儿。但从这件事中，我意识到如果我留在英国开一所游泳学校的话，或许能大赚一笔。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非常强烈，如果他早些向我提出这件事的话，我很可能不会这么早就回到美国来。多年以后，你我还与这位威廉·温德姆爵士的一个儿子（后来已是埃格雷蒙特伯爵）因更重要的事情打过交道，这些我会在适当的地方提到。

Thus I spent about eighteen months in London; most part of the time I work'd hard at my business, and spent but little upon myself except in seeing plays and in books. My friend Ralph had kept me poor; he owed me about twenty-seven pounds, which I was now never likely to receive; a great sum out of my small earnings! I lov'd him, notwithstanding, for he had many amiable qualities. I had by no means improv'd my fortune; but I had picked up some very ingenious acquaintance, whose conversation was of great advantage to me; and I had read considerably.

就这样，我在伦敦生活了约18个月的时间。大部分时候我都在印刷所努力地干活，除了看戏和读书外，其他花销非常少。我的朋友拉尔夫让我一直很穷，他欠我大约27英镑，不会再还了，对于收入微薄的我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啊！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他，因为他有许多讨人喜欢的品质。我在这里虽然没有积累什么财富，但认识了不少聪明的朋友，和他们谈话使我受益匪浅，而且我在这儿读了很多书。

We sail'd from Gravesend on the 23d of July, 1726. For the incidents of the voyage, I refer you to my journal, where you will find them all minutely related.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at journal is the plan to be found in it, which I formed at sea, for regulating my future conduct in life. It is the more remarkable, as being formed when I was so young, and yet being pretty faithfully adhered to quite thro' to old age.

1726年7月23日，我们从格雷夫森德启程离开了英国。关于这次航行中所发生的事情，你可以去读我的日志，那上面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也许那本日志最重要的部分是其中记录的一个计划，那是我在船上制定的，用来调整规范我未来生活中的行为。这个计划的不寻常之处在于，我年纪轻轻就制定了它，到年老的时候还是一如既往地严格执行着。

We landed in Philadelphia on the 11th of October, where I found sundry alterations. Keith was no longer governor, being superseded by Major Gordon. I met him walking the streets as a common citizen. He seem'd a little asham'd at seeing me, but pass'd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I should have been as much asham'd at seeing Miss Read, had not her friends, despairing with reason of my return after the receipt of my letter, persuaded her to marry another, one Rogers, a potter, which was done in my absence. With him, however, she was never happy, and soon parted from him, refusing to cohabit with him or bear his name, it being now said that he had another wife. He was a worthless fellow, tho' an excellent workman, which was the temptation to her friends. He got into debt, ran away in 1727 or 1728, went to the West Indies, and died there. Keimer had got a better house, a shop well supply'd with stationery, plenty of new types, a number of hands, tho' none good,

and seem'd to have a great deal of business.

10月11日，我们在费城登陆，这时的费城已发生了许多变化。基思已不再是州长了，戈登少校已经取而代之。我看见基思在街上走着，只是个普通市民而已。他见到我有些羞愧，但一言不发地走了过去。其实我见到里德小姐本该一样感到羞愧，好在收到我的信后，她的朋友有理由相信我不会回来了，说服她嫁给了一个叫罗杰斯的制陶工。婚事是我不在的时候办的。但里德小姐和他在一起并不幸福，很快就离开了他，不肯再和他共同生活，也不愿随他的姓氏。据说他现在已经另娶了一个妻子。罗杰斯这人没什么可称道之处，只是制陶的手艺不错，当初里德小姐的朋友就是看中了他这一点。他后来欠了债，于1727或是1728年逃走了，去了西印度群岛，并死在了那里。凯默的印刷店规模扩大了，还开了家文具店，添了不少新铅字，还请了很多帮手，只是他们技术都不好，但看起来生意很不错。

Mr. Denham took a store in Water-street, where we open'd our goods; I attended the business diligently, studied accounts, and grew, in a little time, expert at selling. We lodg'd and, boarded together; he counsell'd me as a father, having a sincere regard for me. I respected and lov'd him, and we might have gone on together very happy; but, in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1726-7, when I had just pass'd my twenty-first year, we both were taken ill. My distemper was a pleurisy, which very nearly carried me off. I suffered a good deal, gave up the point in my own mind, and was rather disappointed when I found myself recovering, regretting, in some degree, that I must now, some time or other, have all that disagreeable work to do over again. I forget what his distemper was; it held him a long time, and at length carried him off. He left me a small legacy in a nuncupative will, as a token of his kindness for me, and he left me once more to the wide world; for the store

was taken into the care of his executors, and my employment under him ended.

德纳姆先生在水街开了家店，我们把货物都陈列在那里。我勤快地照管店铺，学习记账，没多久就成了推销货物的好手。我和德纳姆先生食宿都在一起，他像父亲一样教导我，真心地关怀我，我对他也非常敬重和爱戴。我们本可以这样快乐地相处下去，可惜1727年2月初，我刚过了21岁生日，我俩就都病倒了。我得了胸膜炎，这病差点要了我的命。我受尽了疾病的折磨，心里几乎已经放弃了生的希望，后来发现自己身体好转倒还有些失望了，因为想到今后早晚还得再忍受一遍走向死亡的痛苦，便感到有些懊悔。我忘了德纳姆先生得的是什么病，只记得这病拖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在口头遗嘱里给我留下了一小笔遗产，表示对我的关爱。就这样，他的离去让我再次失业，重新回到这个广袤无垠的世界里，因为这家店铺由他的继承人接管了，而我在他店里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My brother-in-law, Holmes, being now at Philadelphia, advised my return to my business; and Keimer tempted me, with an offer of large wages by the year, to come and take the management of his printing-house, that he might better attend his stationer's shop. I had heard a bad character of him in London from his wife and her friends, and was not fond of having any more to do with him. I tri'd for farther employment as a merchant's clerk; but, not readily meeting with any, I clos'd again with Keimer. I found in his house these hands: Hugh Meredith, a Welsh Pensilvanian, thirty years of age, bred to country work; honest, sensible, had a great deal of solid observation, was something of a reader, but given to drink. Stephen Potts, a young countryman of full age, bred to the same, of uncommon natural parts, and great wit and humor, but a little idle. These he had agreed with at extreme low wages per week, to be

rais'd a shilling every three months, as they would deserve by improving in their business; and the expectation of these high wages, to come on hereafter, was what he had drawn them in with. Meredith was to work at press, Potts at book-binding, which he, by agreement, was to teach them, though he knew neither one nor t'other. John—, a wild Irishman, brought up to no business, whose service, for four years, Keimer had purchased from the captain of a ship; he, too, was to be made a pressman. George Webb, an Oxford scholar, whose time for four years he had likewise bought, intending him for a compositor, of whom more presently; and David Harry, a country boy, whom he had taken apprentice.

我姐夫霍姆斯当时正在费城，他建议我回到印刷业去干老本行。凯默也用丰厚的年薪诱惑我，希望我帮他管理印刷所，这样他可以更好地照管文具店。在伦敦的时候，我从他妻子和他妻子的朋友那里听说他为人卑劣，因此不想再与他打交道。我想找个商店职员的工作，但没有找到，只好又去了凯默那里。我在他店里结识了这样一些人：休·梅雷迪斯，一个威尔士籍的宾夕法尼亚人，30岁，从小就做农活，诚实明理，观察敏锐，喜欢读点书，但嗜好饮酒；史蒂芬·波茨，一个年轻的乡下人，已经成年，也是从小务农，很有天分，机智幽默，但有点闲散。凯默每周给他们极低的工资，随着他们业务能力的长进每三个月增长一先令。许诺未来给他们高额工资是凯默引诱他们在此工作的手段。梅雷迪斯操作印刷机，波茨负责装订书本。根据合同，凯默要教他们这两项技术，但他自己一项都不懂。约翰，我忘记了他的姓，是个粗野的爱尔兰人，没学过什么技术，在印刷所的雇佣期为四年，是凯默从一个船长那儿花钱买来的，凯默也答应把他培养成印刷工。乔治·韦伯，一位牛津的学者，他四年的雇佣期也是凯默买来的，凯默打算让他当一名排字工人，关于他的事情，我下面还要讲到；大卫·哈里，一个乡下来的孩子，在店里当学徒。

I soon perceiv'd that the intention of engaging me at wages so much higher than he had been us'd to give, was, to have these raw, cheap hands form'd thro' me; and, as soon as I had instructed them, then they being all articled to him,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without me. I went on, however, very cheerfully, put his printing-house in order, which had been in great confusion, and brought his hands by degrees to mind their business and to do it better.

我很快看出，凯默之所以付给我比往常高许多的工资，是想让我培训这些廉价的生手，因为他们都和他订了约，一旦我教会他们，他也就不需要我了。但我还是干得很愉快，把凯默原本混乱不堪的印刷所管理得井井有条，也使他的工人们对自己的活儿渐渐地多花心思，并加以改进。

It was an odd thing to find an Oxford scholar in the situation of a bought servant. He was not more than eighteen years of age, and gave me this account of himself; that he was born in Gloucester, educated at a grammar-school there, had been distinguish'd among the scholars for some apparent superiority in performing his part, when they exhibited plays; belong'd to the Witty Club there, and had written some pieces in prose and verse, which were printed in the Gloucester newspapers; thence he was sent to Oxford; where he continued about a year, but not well satisfi'd, wishing of all things to see London, and become a player. At length, receiving his quarterly allowance of fifteen guineas, instead of discharging his debts he walk'd out of town, hid his gown in a furze bush, and footed it to London, where, having no friend to advise him, he fell into bad company, soon spent his guineas, found no means of being introduc'd among the players, grew necessitous, pawn'd his cloaths, and wanted bread. Walking the street very hungry, and not

knowing what to do with himself, a crimp's bill was put into his hand, offering immediate entertainment and encouragement to such as would bind themselves to serve in America.

一位牛津的学者被买来当雇工，这是件很奇怪的事。乔治·韦伯还不到18岁，他给我讲述了自己的过去：他出生于英国格洛斯特，在那儿上的文法学校，学生们演出戏剧时，他因在表演上明显高人一筹而引人注目。他参加了当地的“诙谐社”，也写过一些散文和诗歌发表在格洛斯特的报纸上，后来就被送到牛津学习。他在牛津学习约一年，并不满足，特别希望去伦敦看看并成为一名演员。后来，他拿到了三个月补助金，共15几尼。他没有先去还债，而是出了城，把他的学生袍藏在荆豆丛里，花钱去了伦敦。他在伦敦没有朋友规劝，认识了坏人，很快就把钱花光了，但又没有办法被引荐入演员的圈子，日渐拮据，只好把衣服都典当了，而且连面包也买不起。走在街上，饥肠辘辘，无所适从，一张诱骗人当兵的宣传单塞到了他手中，上面说凡愿去美国服役的可以马上提供食宿并给予奖励。

He went directly, sign'd the indentures, was put into the ship, and came over, never writing a line to acquaint his friends what was become of him. He was lively, witty, good-natur'd, and a pleasant companion, but idle, thoughtless, and imprudent to the last degree.

韦伯立即就去了，与他们签了服务契约，然后上了船，来到了美国，从来没有给朋友写过只言片语告诉他们自己的近况。他活泼幽默，性情和善，与他在一起很快乐，但他不够勤快，做事欠考虑，而且极度鲁莽轻率。

John, the Irishman, soon ran away; with the rest I began to live very agreeably, for they all respected me the more, as they found Keimer incapable of instructing them, and that from me they learned something daily. We never worked on Saturday, that being Keimer's Sabbath, so I had two days for reading. My acquaintance with ingenious people in the town increased. Keimer himself treated me with great civility and apparent regard, and nothing now made me uneasy but my debt to Vernon, which I was yet unable to pay, being hitherto but a poor economist. He, however, kindly made no demand of it.

那个爱尔兰人约翰不久就逃跑了，我和其他人都相处得很愉快，因为他们发现凯默什么也教不了他们，倒是从我这儿每天都能学些东西，于是他们对我愈发尊敬。我们星期六从不工作，因为那是凯默的安息日，因此我有两天的时间可以用来读书。我在城里认识的贤达人士也多了起来。凯默对我也彬彬有礼，颇为敬重。这时，除了欠弗农的钱，没有什么事让我心情不安了。我依旧还不起这笔钱，因为我一直不擅理财。但弗农很好，没有向我提起还钱的事。

Our printing-house often wanted sorts, and there was no letter-founder in America; I had seen types cast at James's in London, but without much attention to the manner; however, I now contrived a mould, made use of the letters we had as puncheons, struck the matrices in lead, And thus supply'd in a pretty tolerable way all deficiencies. I also engrav'd several things on occasion; I made the ink; I was warehouseman, and everything, and, in short, quite a factotum.

我们印刷所经常缺铅字，而美国又没有造铅字的铸造所。在伦敦

时，我曾在詹姆斯的店里见过别人浇铸铅字，可没有多加留心，不知道具体方法是什么。但我发明了一种模具，以我们已有的铅字为模板，把铅铸成铅字模型，这基本上还算补齐了我们缺少的铅字。我有时还雕刻些东西，制作油墨，还负责管理仓库和其他很多事情。简而言之，我就是个勤杂工。

But, however serviceable I might be, I found that my services became every day of less importance, as the other hands improv'd in the business; and, when Keimer paid my second quarter's wages, he let me know that he felt them too heavy, and thought I should make an abatement. He grew by degrees less civil, put on more of the master, frequently found fault, was captious, and seem'd ready for an outbreaking. I went on, nevertheless, with a good deal of patience, thinking that his encumber'd circumstances were partly the cause. At length a trifle snapt our connections; for, a great noise happening near the court-house, I put my head out of the window to see what was the matter. Keimer, being in the street, look'd up and saw me, call'd out to me in a loud voice and angry tone to mind my business, adding some reproachful words, that nettled me the more for their publicity, all the neighbors who were looking out on the same occasion being witnesses how I was treated. He came up immediately into the printing-house, continu'd the quarrel, high words pass'd on both sides, he gave me the quarter's warning we had stipulated, expressing a wish that he had not been oblig'd to so long a warning. I told him his wish was unnecessary, for I would leave him that instant; and so, taking my hat, walk'd out of doors, desiring Meredith, whom I saw below, to take care of some things I left, and bring them to my lodgings.

不过，不管我多能干，随着其他人在业务上的日益进步，我发觉

我在印刷所里的重要性日见降低。凯默付我第二季度的工资时，说他给我的钱太多，认为我应该降低薪水。他对我渐渐不再那么有礼貌，摆出了一副老板的架子，常常找茬，吹毛求疵，随时准备和我大吵一架。但我还是继续耐心对待，认为他之所以这样，部分是因为他现在负担太重了。终于，一件小事使我们的关系彻底破裂了。那天，法院附近突然喧哗起来，我把头伸出窗外看发生了什么事。凯默当时正在街上，抬头看见了我，冲我气愤地大声吼叫让我别管闲事，还说了些责骂的话。这样公开指责我，让我十分恼怒，当时也在往外看热闹的邻居都见证了我受到了怎样的对待。凯默还立刻冲进了印刷所，上楼继续和我吵，于是我们双方都高声吵嚷起来，他说要解雇我，按照合同规定提前三个月给我解雇通知，还说当初要没规定须提前这么久通知就好了。我告诉他大可不必这么遗憾，因为我马上就走，于是我拿着帽子就出了门。我在楼下碰见了梅雷迪斯，请他帮我打点我留下的东西，然后送到我的住所来。

Meredith came accordingly in the evening, when we talked my affair over. He had conceiv'd a great regard for me, and was very unwilling that I should leave the house while he remain'd in it. He dissuaded me from returning to my native country, which I began to think of; he reminded me that Keimer was in debt for all he possess'd; that his creditors began to be uneasy; that he kept his shop miserably, sold often without profit for ready money, and often trusted without keeping accounts; that he must therefore fall, which would make a vacancy I might profit of. I objected my want of money. He then let me know that his father had a high opinion of me, and, from some discourse that had pass'd between them, he was sure his father would advance money to set us up, if I would enter into partnership with him. “My time,” says he, “will be out with Keimer in the spring; by that time we may have our press and types in from London. I am sensible I am no workman; if you like it, your skill in the business shall be set against the stock I furnish, and

we will share the profits equally.”

晚上梅雷迪斯按我说的造访了我的住处，说了说我的事情。他非常敬重我，因此在我离开印刷所以后，他也不愿意留在那里了。我原本打算回波士顿，但他劝我别回去，他说凯默所欠的债务已与其财产相当，现在那些债主们已感到不安，他把印刷店管理得非常糟糕，经常为了得到现钱做些不赚钱的生意，还常把货物赊出去，又不记账，因此他的印刷店一定会垮的，这样我就有可乘之机了。我说我没有钱，开不了店，梅雷迪斯告诉我他的父亲对我评价很高，通过他和父亲之间的谈话，他相信只要我能和他合作，他父亲会出钱帮我们开店的。梅雷迪斯说：“我和凯默之间的合同春天就会到期，到时候我们可以从伦敦购买印刷机和铅字。我知道自己印刷手艺不好，如果你愿意，你出技术，我出钱备货，利润我们平分。”

The proposal was agreeable, and I consented; his father was in town and approv'd of it; the more as he saw I had great influence with his son, had prevail'd on him to abstain long from dram-drinking, and he hop'd might break him off that wretched habit entirely, when we came to be so closely connected. I gave an inventory to the father, who carry'd it to a merchant; the things were sent for, the secret was to be kept till they should arrive, and in the mean time I was to get work, if I could, at the other printing-house. But I found no vacancy there, and so remain'd idle a few days, when Keimer, on a prospect of being employ'd to print some paper money in New Jersey, which would require cuts and various types that I only could supply, and apprehending Bradford might engage me and get the jobb from him, sent me a very civil message, that old friends should not part for a few words, the effect of sudden passion, and wishing me to return. Meredith persuaded me to comply, as it would give more opportunity for his improvement

under my daily instructions; so I return'd, and we went on more smoothly than for some time before. The New Jersey jobb was obtain'd, I contriv'd a copperplate press for it, the first that had been seen in the country; I cut several ornaments and checks for the bills. We went together to Burlington, where I executed the whole to satisfaction; and he received so large a sum for the work as to be enabled thereby to keep his head much longer above water.

他这个提议很不错，我同意了。他父亲当时正在城里，也对我们的计划表示赞同，尤其是他看见我对他儿子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让他很久都没有沾酒。他希望我们通过这样密切的合作，可以帮梅雷迪斯彻底改掉这个坏习惯。我开了一张所需物品的清单给他父亲，他父亲交给一个商人去采购了，货物运到之前我们说好要保守秘密，在此期间如果可能的话，我先去另一家印刷所找工作。但那里没有空缺职位，因此我闲了好些日子。当时凯默正在争取印刷新泽西纸币的生意，需要有只有我才能制作刻版和各种铅字，他担心布拉德福德雇了我之后会把这笔生意抢走，于是给我写了一封恭敬的信，说老朋友不要因为几句话就分道扬镳，那都是一时冲动而已，希望我能回到他的印刷店工作。梅雷迪斯劝我答应，因为这样他就能每天接受我的指导，有更多进步的机会。于是我回去了，我和凯默相处得比以前好多了。凯默揽到了新泽西的生意，我为此设计了一部铜版印刷机，这在美国还是第一次见到呢，另外我还为纸币设计了一些花纹和符号。我们一起去了趟柏林敦，我在那里满意地完成了所有工作，凯默也因此得到一笔巨款，这使他能维持更长一段时间不至破产了。

At Burlington I made an acquaintance with many principal people of the province. Several of them had been appointed by the Assembly a committee to attend the press, and take care that no more bills were printed than the law directed. They were therefore, by turns, constantly with us, and generally he who attended,

brought with him a friend or two for company. My mind having been much more improv'd by reading than Keimer's, I suppose it was for that reason my conversation seem'd to be more valu'd. They had me to their houses, introduced me to their friends, and show'd me much civility; while he, tho' the master, was a little neglected. In truth, he was an odd fish; ignorant of common life, fond of rudely opposing receiv'd opinions, slovenly to extreme dirtiness, enthusiastic in some points of religion, and a little knavish withal.

在柏林敦，我结识了新泽西的许多重要人物，其中有几位是州议会指定成立的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负责监督纸币印刷，保证其印刷数量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数量。因此，他们轮流和我们在一起，来监督的人一般会带上一两个朋友来作伴。因为我读过很多书，见识比凯默要多得多，我想他们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更喜欢和我聊天吧。他们邀请我去他们家里，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对我很有礼貌，而我的老板却有些被忽略了。事实上，凯默这人很古怪，对公共生活一无所知，却又喜欢粗鲁地反对大家公认的意见，平时不修边幅，非常邋遢，对宗教中的有些观点十分狂热，此外还有些无赖。

We continu'd there near three months; and by that time I could reckon among my acquired friends, Judge Allen, Samuel Bustill, the secretary of the Province, Isaac Pearson, Joseph Cooper, and several of the Smiths, members of Assembly, and Isaac Decow, the surveyor-general. The latter was a shrewd, sagacious old man, who told me that he began for himself, when young, by wheeling clay for the brick-makers, learned to write after he was of age, carri'd the chain for surveyors, who taught him surveying, and he had now by his industry, acquir'd a good estate; and says he, “I foresee that you will soon work this man out of business, and make a fortune in it at Philadelphia.” He had not then the least intimation of my

intention to set up there or anywhere. These friends were afterwards of great use to me, as I occasionally was to some of them. They all continued their regard for me as long as they lived.

我们在新泽西呆了近三个月，那段时间我结交了艾伦法官，州务卿塞缪尔·巴斯蒂尔，艾萨克·皮尔逊，约瑟夫·库柏和几个姓史密斯的人，他们都是州议员；还有测绘局长艾萨克·狄考。狄考是一位精明睿智的老人，他告诉我，他年轻时从为砖匠运送黏土起步，成年后才学会写字，后来去为测量员背链子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测量，凭着自己的勤奋努力，现在已赚得了一份可观的家产。狄考说："我预言你很快就会让凯默在印刷业失去立足之地，而且你将靠印刷生意在费城发财起家。"说这番话时，狄考不知我在费城或别处开店的打算。这些朋友后来对我帮助很大，有时我也能帮上他们的忙。终其一生，他们对我始终关心敬重。

Before I enter upon my public appearance in business, it may be well to let you know the then state of my mind with regard to my principles and morals, that you may see how far those influenc'd the future events of my life. My parents had early given me religious impressions, and brought me through my childhood piously in the Dissenting way. But I was scarce fifteen, when, after doubting by turns of several points, as I found them disputed in the different books I read, I began to doubt of Revelation itself. Some books against Deism fell into my hands; they were said to be the substance of sermons preached at Boyle's Lectures. It happened that they wrought an effect on me quite contrary to what was intended by them; for the arguments of the Deists, which were quoted to be refuted, appeared to me much stronger than the refutations; in short, I soon became a thorough Deist. My arguments perverted some others, particularly Collins and Ralph; but, each of them

having afterwards wrong'd me greatly without the least compunction, and recollecting Keith's conduct towards me (who was another freethinker), and my own towards Vernon and Miss Read, which at times gave me great trouble, I began to suspect that this doctrine, tho' it might be true, was not very useful. My London pamphlet, which had for its motto these lines of Dryden:

在我谈到正式开店前，最好先给你讲讲当时我的原则和道德观，这样你就知道这些观念是怎样影响我未来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我的父母很早就让我了解宗教，并在我童年时期让我虔诚地接受不顺从国教的教育。我在不同的书中读到一些关于教条的争辩，对它们产生了怀疑，后来连《启示录》都开始怀疑了，当时我还不到15岁。那时我得到一些反对自然神论的书，据说这些书是博伊尔讲道时的主要内容。它们对我产生的作用却与其目的恰好相反，因为书中引用了自然神论的观点以便对其加以驳斥，但这些观点在我看来却比驳斥强有力得多。简言之，我很快便成了一位彻底的自然神论者。我的观点将一些人引入歧途，尤其是柯林斯和拉尔夫，不过他们二人后来对我如此恶劣，毫无良心可言；我又回想起基思（他也是个自由思想家）对我的所作所为，还有我自己对弗农和里德小姐的行为，这些都不时让我十分苦恼，我开始怀疑，尽管这种学说可能正确，但并不是很实用。我在伦敦所著的小册子里就引用了德莱顿的这些诗句作为箴言：

“Whatever is, is right. Though purblind man

“存在即为合理；半盲的人

Sees but a part o' the chain, the nearest link:

只见到链条的一部分——那最近的链环；

His eyes not carrying to the equal beam,

他的眼睛看不到处于一切之上的

That poises all above;”

公平的秤杆。”

and from the attributes of God, his infinite wisdom, goodness and power, concluded that nothing could possibly be wrong in the world, and that vice and virtue were empty distinctions, no such things existing, appear'd now not so clever a performance as I once thought it; and I doubted whether some error had not insinuated itself unperceiv'd into my argument, so as to infect all that follow'd, as is common in metaphysical reasonings.

我在文章中还从上帝的品质、他无穷的智慧、善良和力量中总结出：世上一切都是正确的，罪恶和美德的区分毫无意义，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以前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精妙至极，现在看来却不是如此了，我怀疑某些谬误不知不觉地混入了我的论证，以致它们影响了后面的所有推论。这种现象在形而上学的推论中是非常常见的。

I grew convinc'd that truth, sincerity and integrity in dealings

between man and man were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to the felicity of life; and I form'd written resolutions, which still remain in my journal book, to practice them ever while I lived. Revelation had indeed no weight with me, as such; but I entertain'd an opinion that, though certain actions might not be bad because they were forbidden by it, or good because it commanded them, yet probably these actions might be forbidden because they were bad for us, or commanded because they were beneficial to us, in their own natures,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ngs considered. And this persuasion, with the kind hand of Providence, or some guardian angel, or accidental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and situations, or all together, preserved me, thro' this dangerous time of youth, and the hazardous situations I was sometimes in among strangers, remote from the eye and advice of my father, without any willful gross immorality or injustice, that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from my want of religion. I say willful, because the instances I have mentioned had something of necessity in them, from my youth, inexperience, and the knavery of others. I had therefore a tolerable character to begin the world with; I valued it properly, and determin'd to preserve it.

我逐渐相信，人际交往中的真实、诚恳和正直对于获得人生幸福至关重要，于是我写下了我的决心（这些仍保留在我的日志中），打算在我有生之年不断地实践。《启示录》固然对我倒不太重要，但我怀抱一种态度，即有些行为并不因《启示录》禁止就真正恶劣，也不因《启示录》让我们做就是善行，而应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很可能这些行为就其本质而言对我们是有害的，所以才被禁止，或对我们有利才让我们去做。这种信念，加之上帝的恩惠或某位守护天使的保佑，或偶然的有利环境和局面，或者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我得以在没有父亲监督和教导的情况下，安然度过这危险的青年时期，并且在偶尔身处异乡的困境中全身而退，没有故意犯下任何严重的不道德

或违法行为；这都源自我缺乏宗教信仰。我说“故意”，是因为上面提到的例子都有某种必然性，我年纪轻轻，涉世不深，别人又做了那些无赖的事情。因此，我在涉世之初就有着较好的品行，我对此颇为珍惜，决定将其保持下去。

We had not been long return'd to Philadelphia before the new types arriv'd from London. We settled with Keimer, and left him by his consent before he heard of it. We found a house to hire near the market, and took it. To lessen the rent, which was then but twenty-four pounds a year, tho' I have since known it to let for seventy, we took in Thomas Godfrey, a glazier, and his family, who were to pay a considerable part of it to us, and we to board with them. We had scarce opened our letters and put our press in order, before George House, an acquaintance of mine, brought a countryman to us, whom he had met in the street inquiring for a printer. All our cash was now expended in the variety of particulars we had been obliged to procure, and this countryman's five shillings, being our first-fruits, and coming so seasonably, gave me more pleasure than any crown I have since earned; and the gratitude I felt toward House has made me often more ready than perhaps I sh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to assist young beginners.

我们回到费城不久，新的印刷机就从伦敦运来了。我们和凯默协商好，经他同意离开了他的印刷所，但还没告诉他我们开店的事情。我们在市场附近找了间房子，租了下来。当时的房租是每年24镑，据我所知现在已经到70镑了。当时为了减轻房租负担，我们让玻璃工托马斯·戈弗雷一家住了进来，他们向我们支付房租的一大部分，而我们就把伙食包给他家。我们刚要把铅字拆封打开，整理好印刷机，我一个朋友乔治·豪斯就带了一个乡下人来了。这个人是他在街上遇见的，当时他正在找印刷店。此前我们所有的现金都用来置办各类必备物品

了，这个乡下人的五先令，是我们赚得的第一笔钱，它来得这么及时，带给我的快乐比我后来赚到的任何一个克朗都要多。我对豪斯的感激使我后来常常十分热衷于帮助刚创业的年轻人，不然我可能没有这么热心呢。

There are croakers in every country, always boding its ruin. Such a one then lived in Philadelphia; a person of note, an elderly man, with a wise look and a very grave manner of speaking; his name was Samuel Mickle. This gentleman, a stranger to me, stopt one day at my door, and asked me if I was the young man who had lately opened a new printing-house. Being answered in the affirmative, he said he was sorry for me, because it was an expensive undertaking, and the expense would be lost; for Philadelphia was a sinking place, the people already half-bankrupts, or near being so; all appearances to the contrary, such as new buildings and the rise of rents, being to his certain knowledge fallacious; for they were, in fact, among the things that would soon ruin us. And he gave me such a detail of misfortunes now existing, or that were soon to exist, that he left me half melancholy. Had I known him before I engaged in this business, probably I never should have done it. This man continued to live in this decaying place, and to declaim in the same strain, refusing for many years to buy a house there, because all was going to destruction; and at last I had the pleasure of seeing him give five times as much for one as he might have bought it for when he first began his croaking.

每个地方都有预言毁灭即将到来的人，费城也不例外。那是一位知名的长者，面相睿智，说话时态度十分严肃，名叫塞缪尔·米克尔。我并不认识这位老人，但他有天来到我门前，问我是不是那位新开了家印刷店的年轻人。我回答是，他说他为我深感惋惜，因为开印刷店

成本很高，这些花费会亏损掉的。费城是个没落的城市，这里的市民都已在半破产或即将破产状态中了。所有与此相反的繁荣景象，如新的建筑、租金的上涨等，就他所知都是假的，因为它们其实都是即将造成我们毁灭的东西。他还详细讲述了当前存在或即将发生的种种不幸，他走后我有些闷闷不乐。如果我在开店之前认识他，很可能就不会开店了。这位老人现在仍然住在这个正在衰落的地方，仍然用他一贯的语调预言着，多年以来一直不肯在费城买所房子，因为他觉得一切都将走向灭亡。但最终，我颇为自得地发现他以他最初开始不祥预言时高出五倍的价格买了一所房子。

I should have mentioned before, that, in the autumn of the preceding year, I had form'd most of my ingenious acquaintance into a club of mutual improvement, which we called the JUNTO; we met on Friday evenings. The rules that I drew up required that every member, in his turn, should produce one or more queries on any point of Morals, Politics, or Natural Philosophy, to be discuss'd by the company; and once in three months produce and read an essay of his own writing, on any subject he pleased. Our debates were to b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president, and to be conducted in the sincere spirit of inquiry after truth, without fondness for dispute, or desire of victory; and, to prevent warmth, all expressions of positiveness in opinions, or direct contradiction, were after some time made contraband, and prohibited under small pecuniary penalties.

我本应早些提到，在我开店前一年的秋天，我和我大多数富有才华的朋友成立了一个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俱乐部，叫做“秘社”，每周五晚上聚会一次。我起草的章程中要求每位社员轮流提出关于道德、政治学或自然哲学任何方面的一个或多个问题的论文，供大家讨论；每三个月要写一篇文章并在聚会时朗读，题目自选。我们的辩论

由会长主持，大家秉着真诚探寻真理的精神，不得以争论为好，不得执拗取胜。为了避免讨论过于激烈，后来又规定所有太过绝对的肯定意见或是针锋相对的反驳都是不允许的，违规者要处以少量的罚金。

The first members were Joseph Breintnal, a copyer of deeds for the scriveners, a good-natur'd, friendly, middle-ag'd man, a great lover of poetry, reading all he could meet with, and writing some that was tolerable; very ingenious in many little Nicknackeries, and of sensible conversation.

最初的会员有约瑟夫·布莱恩特纳尔，他是公证处的契约书誊写人，是个脾气好、待人友善的中年人。他非常热爱诗歌，读过所有他能找到的诗，自己也写过一些还算可以的诗，善于做很多精巧的小玩意儿，谈话也很有见地。

Thomas Godfrey, a self-taught mathematician, great in his way, and afterward inventor of what is now called Hadley's Quadrant. But he knew little out of his way, and was not a pleasing companion; as, like most great mathematicians I have met with, he expected universal precision in everything said, or was forever denying or distinguishing upon trifles, to the disturbance of all conversation. He soon left us.

托马斯·戈弗雷，一位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在数学方面造诣很深，后来成为现在我们称为“哈德利象限仪”的发明者。但他对数学以外的方面了解很少，和他在一起并不愉快，就像我遇到过的大多数伟大的数学家一样，他要求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绝对精确，总是纠缠于细枝末节，从而妨碍了所有谈话的进行。他不久就离开了我们。

Nicholas Scull, a surveyor, afterwards surveyor-general, who lov'd books, and sometimes made a few verses.

尼古拉斯·斯卡尔，一位测量员，后来成了测绘局长，爱读书，有时会写些诗歌。

William Parsons, bred a shoemaker, but loving reading, had acquir'd a considerable share of mathematics, which he first studied with a view to astrology, that he afterwards laught at it. He also became surveyor-general.

威廉·帕森斯，以前是个鞋匠，爱读书，学过不少数学知识。最初他是为了以后学习占星术才学习数学的，后来谈起这件事他就笑了。他也成了测绘局长。

William Maugridge, a joiner, a most exquisite mechanic, and a solid, sensible man.

威廉·毛格里治，一位细木匠，技艺极其精湛，为人明智可靠。

Hugh Meredith, Stephen Potts, and George Webb I have characteriz'd before.

休·梅雷迪斯、史蒂芬·波茨和乔治·韦伯，他们三人我已在前面已

经讲过。

Robert Grace, a young gentleman of some fortune, generous, lively, and witty; a lover of punning and of his friends.

罗伯特·格雷丝，一位有些家产的年轻绅士，慷慨大方，活泼睿智，爱使用双关语，也爱朋友。

And William Coleman, then a merchant's clerk, about my age, who had the coolest, dearest head, the best heart, and the exactest morals of almost any man I ever met with. He became afterwards a merchant of great note, and one of our provincial judges. Our friendship continued without interruption to his death, upward of forty years; and the club continued almost as long, and was the best school of philosophy, morality, and politics that then existed in the province; for our queries, which were read the week preceding their discussion, put us upon reading with attention upon the several subjects, that we might speak more to the purpose; and here, too, we acquired better habits of conversation, everything being studied in our rules which might prevent our disgusting each other. From hence the long continuance of the club, which I shall have frequent occasion to speak further of hereafter.

威廉·科尔曼，当时在一个商人那儿当职员，和我年龄相仿，他几乎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头脑最为冷静清晰、心地最为善良、品行最为端正的一个。他后来成为一位非常知名的商人，也是我们州法院的法官之一。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了40年，从未中断，直至他离开人世。我们的俱乐部也持续了几乎同样长的时间，是当时我们州最好的哲

学、道德和政治学团体。因为我们的问题会在讨论前一周公布，这让我们能就这些问题用心阅读，这样在讨论时才更能抓住要点，我们也因此养成了更好的谈话习惯。一切讨论都遵循我们的章程，以免彼此之间产生嫌隙。这个俱乐部也因此得以长期存在，我后面还有很多地方会讲到它。

But my giving this account of it here is to show something of the interest I had, every one of these exerting themselves in recommending business to us. Breintnal particularly procur'd us from the Quakers the printing forty sheets of their history, the rest being to be done by Keimer; and upon this we work'd exceedingly hard, for the price was low. It was a folio, pro patria size, in pica, with long primer notes. I compos'd of it a sheet a day, and Meredith worked it off at press; it was often eleven at night, and sometimes later, before I had finished my distribution for the next day's work, for the little jobbs sent in by our other friends now and then put us back. But so determin'd I was to continue doing a sheet a day of the folio, that one night, when, having impos'd my forms, I thought my day's work over, one of them by accident was broken, and two pages reduced to pi, I immediately distributed and compos'd it over again before I went to bed; and this industry, visible to our neighbors, began to give us character and credit; particularly, I was told, that mention being made of the new printing-office at the merchants' Every-night club, the general opinion was that it must fail, there being already two printers in the place, Keimer and Bradford; but Dr. Baird (whom you and I saw many years after at his native place, St. Andrew's in Scotland) gave a contrary opinion: “For the industry of that Franklin,” says he, “is superior to any thing I ever saw of the kind; I see him still at work when I go home from club, and he is at work again before his neighbors are out of bed.” This struck the rest, and we soon after had offers from one of them

to supply us with stationery; but as yet we did not chuse to engage in shop business.

我在这里讲述我们这个俱乐部，是想告诉你我从中得到的一些好处，因为俱乐部里的每个人都尽力帮我们介绍生意。尤其是布莱恩·特纳尔，他从贵格会成员那里帮我们揽到印刷他们40页历史的生意，其余部分由凯默来印。这桩生意我们做得极为辛苦，因为交易价格很低。这是用12磅活字印的“为祖国”式的对开本，上面还有很长的用小号铅字印的注释。我每天排一大张纸，再由梅雷迪斯印出来，等到我为次日的工作排好版时，往往已经夜里11点了，有时更晚，因为其他朋友偶尔介绍些零活给我们，会耽搁些时间。但我还是决意坚决每天完成一大张的排版，甚至有天夜里，我已完成排版，以为这天的工作结束了，但一不小心碰坏了其中一版，有两页的活字完全弄乱了，于是我立即拆版，重新再排一遍，全部完成才上床睡觉。我工作如此勤奋，邻居们都看在眼里，于是开始给予我们好评和信任，尤其是别人告诉我，商人们的“夜间俱乐部”里有人提到我们新开的印刷店时，人们普遍认为我们会失败，因为城里已经有凯默和布拉德福德两家印刷店了，但贝尔德博士（很多年后，你和我曾在他的家乡——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见过他）却持反对意见，他说：“富兰克林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人，我从俱乐部回家时，看见他还在工作，而早上邻居们还没起床，他又开始工作了。”他的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很快他们其中一位就提出向我们提供文具让我们经销，但我们当时还没有打算涉足商店零售。

I mention this industry the more particularly and the more freely, tho' it seems to be talking in my own praise, that those of my posterity, who shall read it, may know the use of that virtue, when they see its effects in my favor throughout this relation.

我特别强调、格外直率地提到这种勤奋这一点，尽管看起来有些自吹自擂，但阅读我文字的后人们，当你在我的全部叙述中看到勤奋对我的帮助时，就知道这种美德的可贵之处了。

George Webb, who had found a female friend that lent him wherewith to purchase his time of Keimer, now came to offer himself as a journeyman to us. We could not then employ him; but I foolishly let him know as a secret that I soon intended to begin a newspaper, and might then have work for him. My hopes of success, as I told him, were founded on this, that the then only newspaper, printed by Bradford, was a paltry thing, wretchedly manag'd, no way entertaining, and yet was profitable to him; I therefore thought a good paper would scarcely fail of good encouragement. I requested Webb not to mention it; but he told it to Keimer, who immediately, to be beforehand with me, published proposals for printing one himself, on which Webb was to be employ'd. I resented this; and, to counteract them, as I could not yet begin our paper, I wrote several pieces of entertainment for Bradford's paper, under the title of the BUSY BODY, which Breintnal continu'd some months. By this means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k was fixed on that paper, and Keimer's proposals, which we burlesqu'd and ridicul'd, were disregarded. He began his paper, however, and, after carrying it on three quarters of a year, with at most only ninety subscribers, he offered it to me for a trifle; and I, having been ready some time to go on with it, took it in hand directly; and it prov'd in a few years extremely profitable to me.

乔治·韦伯找了个女朋友，她借给他些钱，使他可以向凯默赎回自己务工期限的合同，然后韦伯来了我们店里，希望当个印刷工。我们当时雇不了他，但我愚蠢地告诉了他我不久后打算办张报纸的秘密，

那时可能会雇用他。我还告诉他，我成功的希望尽在于此：当时唯一的报纸是由布拉德福德办的，办得很糟糕，经营混乱，索然无味，但却还有钱可赚，于是我认为，办得好的报纸不可能无利可图。我请韦伯不要向别人提起我的计划，但他却告诉了凯默，于是凯默抢在我之前，宣布他要办一份报纸，还为此雇用了韦伯。我非常恼怒，因为自己当时还不能办报，为了破坏他们的计划，就以《好事者》为题，写了几篇饶有趣味的文章发表在布拉德福德的报纸上，布莱恩特纳尔还续了好几个月。通过这种方法，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布拉德福德的报纸上，而凯默的办报计划，经过我们的冷嘲热讽，也遭到了人们的漠视。但凯默的报纸还是办了，在连续发行三个季度，最多只有90位订户之后，他把报纸廉价卖给了我，而我早已准备接手，就直接承办了过来，数年后证明经营报纸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收益。

I perceive that I am apt to speak in the singular number, though our partnership still continu'd; the reason may be that, in fact, the whole management of the business lay upon me. Meredith was no compositor, a poor pressman, and seldom sober. My friends lamented my connection with him, but I was to make the best of it.

我知道自己喜欢用单数第一人称说话，尽管我和梅雷迪斯当时属于合伙经营，这可能因为事实上，整个印刷店的管理都由我来负责。他不会排字，印刷也不行，又经常酗酒。我的朋友们都为我和他合作感到惋惜，但我依旧想在逆境中好好经营。

Our first papers made a quite different appearance from any before in the province; a better type, and better printed; but some spirited remarks of my writing, on the dispute then going on between Governor Burnet and the Massachusetts Assembly, struck the principal people, occasioned the paper and the manager of it to

be much talk'd of, and in a few weeks brought them all to be our subscribers.

我们报纸的外貌与本州以前的报纸大不相同，我们的报纸字体清晰，印刷精美，当时伯内特州长和马萨诸塞议会之间正有些争论，我就这些争论写了些言辞激烈的评论文章引起了当时重要人物的注意，使得这份报纸和它的经营者成为人们经常讨论的材料。不出几周，他们全都成为我们的订户。

Their example was follow'd by many, and our number went on growing continually. This was one of the first good effects of my having learnt a little to scribble; another was, that the leading men, seeing a newspaper now in the hands of one who could also handle a pen, thought it convenient to oblige and encourage me. Bradford still printed the votes, and laws, and other publick business. He had printed an address of the House to the governor, in a coarse, blundering manner, we reprinted it elegantly and correctly, and sent one to every member. They were sensible of the difference: it strengthened the hands of our friends in the House, and they voted us their printers for the year ensuing.

于是许多人效仿他们，跟进订阅我们的报纸，报纸的发行量持续上升。这是我曾学了点写作的好处之一；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时的领导人物见这家报纸是由一个会写作的人经营的，他们就认为应当鼓励我，资助我。布拉德福德仍然印刷选票、法典还有其他政府交印的东西，他曾把一篇议会给州长的演讲稿印刷得粗糙不堪、错误百出，我们拿来重新印刷，印得既美观又准确，并将稿件送至每位议员手中。他们从中看出了我们的不同，这增强了议会里的朋友为我们讲话的分量，于是接下来这一年，他们选定我们来做印刷任务。

Among my friends in the House I must not forget Mr. Hamilton, before mentioned, who was then returned from England, and had a seat in it. He interested himself for me strongly in that instance, as he did in many others afterward, continuing his patronage till his death.

在议会里的朋友中，我决不能忘记前面提到过过的汉密尔顿先生，他当时已从英国回来，是州议会议员。他在这件事上大力支持我，后来还帮过我很多次，一生对我十分关怀和爱护（我曾帮他的儿子得到500镑——旁注）。

Mr. Vernon, about this time, put me in mind of the debt I ow'd him, but did not press me. I wrote him an ingenuous letter of acknowledgment, crav'd his forbearance a little longer, which he allow'd me, and as soon as I was able, I paid the principal with interest, and many thanks; so that erratum was in some degree corrected.

这时，弗农先生提醒我还欠他的钱，但并未催促我。我给他写了封信，坦白承认自己曾经的行为，恳请他再宽限些时日，他答应了。我攒够钱之后，立即连本带息还给了他，并向他表示感谢，这样我的大错才在某种程度上总算得以纠正。

But now another difficulty came upon me which I had never the least reason to expect. Mr. Meredith's father, who was to have paid for our printing-house, according to the expectations given me, was able to advance only one hundred pounds currency, which had

been paid; and a hundred more was due to the merchant, who grew impatient, and su'd us all. We gave bail, but saw that, if the money could not be rais'd in time, the suit must soon come to a judgment and execution, and our hopeful prospects must, with us, be ruined, as the press and letters must be sold for payment, perhaps at half price.

但此时，出乎我意料的另一个困难发生了。根据我的预期，梅雷迪斯先生的父亲要为我们的印刷店出资，但他只预付了100镑现金，我们还欠着商人100镑，这个商人失去了耐心，将我们告到法院。我们缴了保释金，但知道如果不能及时筹到钱的话，法院很快就会对这桩官司进行裁决并命令执行，那么我们大有希望的前途就会和我们自己一起毁于一旦，因为印刷机和铅字一定会被售卖以清偿债务，也许还会以半价出售。

In this distress two true friends, whose kindness I have never forgotten, nor ever shall forget while I can remember anything, came to me separately, unknown to each other, and, without any application from me, offering each of them to advance me all the money that should be necessary to enable me to take the whole business upon myself, if that should be practicable; but they did not like my continuing the partnership with Meredith, who, as they said, was often seen drunk in the streets, and playing at low games in alehouses, much to our discredit. These two friends were William Coleman and Robert Grace. I told them I could not propose a separation while any prospect remain'd of the Merediths' fulfilling their part of our agreement, because I thought myself under great obligations to them for what they had done, and would do if they could; but, if they finally fail'd in their performance, and our partnership must be dissolv'd, I should then think myself at liberty

to accept the assistance of my friends.

在这样的困境中，两位真正的朋友向我伸出了援手，他们的善心我从未忘记，而且在毕生中将永志不忘。他俩互不相识，各自来找我，主动提出如果行得通的话，他们可以帮我垫付独自经营印刷店所需的款项，但希望我不要再和梅雷迪斯继续合作，说经常见到梅雷迪斯醉醺醺地走在街上，还在酒馆里玩下流的娱乐，这实在影响我的名声。这两位朋友就是威廉·科尔曼和罗伯特·格雷斯。我告诉他们，只要梅雷迪斯父子还有可能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我就不能提出中断合作，因为我觉得自己过去受过他们很大的恩惠，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他们还会愿意帮我很多忙，但如果他们没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导致我们就非散伙不可的话，那时我认为自己就可以自由地接受朋友们的帮助了。

Thus the matter rested for some time, when I said to my partner, “Perhaps your father is dissatisfied at the part you have undertaken in this affair of ours, and is unwilling to advance for you and me what he would for you alone. If that is the case, tell me, and I will resign the whole to you, and go about my business.” “No,” said he, “my father has really been disappointed, and is really unable; and I am unwilling to distress him farther. I see this is a business I am not fit for. I was bred a farmer, and it was a folly in me to come to town, and put myself, at thirty years of age, an apprentice to learn a new trade. Many of our Welsh people are going to settle in North Carolina, where land is cheap. I am inclin'd to go with them, and follow my old employment. You may find friends to assist you. If you will take the debts of the company upon you; return to my father the hundred pound he has advanced; pay my little personal debts, and give me thirty pounds and a new saddle, I will relinquish the partnership, and leave the whole in

your hands.” I agreed to this proposal: it was drawn up in writing, sign'd, and seal'd immediately. I gave him what he demanded, and he went soon after to Carolina, from whence he sent me next year two long letters, containing the best account that had been given of that country, the climate, the soil, husbandry, etc., for in those matters he was very judicious. I printed them in the papers, and they gave great satisfaction to the publick.

就这样，这件事在一段时期内悬而未决，我对我的合伙人说：“也许你父亲不喜欢你与我共事，因此不愿意为我们的合伙出资，但是他可能愿意替你一人出钱。如果真的是这样，请告诉我，我会退出，把一切都让给你，我再另找工作吧。”他说：“不是，我的父亲真的非常失望，他的确无力继续出资，我也不想让他愈加难过了。我觉得自己并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我从小就务农，后来来到城里，到了30岁又从头学习一个新的行业，真是犯傻。我们很多威尔士人去了北卡罗来纳定居，那里土地便宜。我也想和他们一起去，重新拾起我的老行当。你可以找些朋友帮你，如果你愿意承担印刷所的债务，把我父亲垫付的100镑还给他，帮我还清我个人的小额欠款，再给我30镑和一副新马鞍，我愿退出合伙，把整个印刷所留给你。”我同意了他的提议，我们立即写下了书面协议，并签字盖章。我给了他他所要求的东西，不久他就去卡罗来纳了，第二年还给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信里对那个地方有着极为详尽丰富的描写，讲述了那里的气候、土地、农业状况等，他对这些方面是非常了解的。我把他的信刊登在报纸上，受到读者的极大欢迎。

As soon as he was gone, I recurr'd to my two friends; and because I would not give an unkind preference to either, I took half of what each had offered and I wanted of one, and half of the other; paid off the company's debts, and went on with the business in my own name, advertising that the partnership was dissolved. I think

this was in or about the year 1729.

他一走，我就去求助我那两位朋友。我不想在他们二人中表现出偏爱，以免让他们不高兴，于是我就向每位借了他所我提供的半数，也就是我向两人各借一半，还清了印刷所的债务，然后就以我个人的名义继续经营，并登报说明我和梅雷迪斯的合作关系已经解除。我想这大概是1729年前后发生的事。

About this time there was a cry among the people for more paper money, only fifteen thousand pounds being extant in the province, and that soon to be sunk. The wealthy inhabitants oppos'd any addition, being against all paper currency, from an apprehension that it would depreciate, as it had done in New England, to the prejudice of all creditors. We had discuss'd this point in our Junto, where I was on the side of an addition, being persuaded that the first small sum struck in 1723 had done much good by increasing the trade, employment, and number of inhabitants in the province, since I now saw all the old houses inhabited, and many new ones building; whereas I remembered well, that when I first walk'd about the streets of Philadelphia, eating my roll, I saw most of the houses in Walnut-street, between Second and Front streets, with bills on their doors, “To be let” ; and many likewise in Chestnut-street and other streets, which made me then think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ity were deserting it one after another.

约在这个时候，民众中产生了增发纸币的呼声，当时本州库存纸币只有15,000镑，而且就连这个数字也在不断减少。富有的居民反对增发纸币，甚至反对所有的纸币，因为他们担心纸币如在新英格兰一

样贬值，这会对所有债权人不利。我们在秘社里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赞成增加纸币发行量，因为我认为1723年发行的那一小部分纸币做了不少好事，它促进了贸易和就业，增加本州居民，因为我见到所有的老房子里都住满了人，许多新建筑也正在建造中。但我也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走在费城街头吃着我的面包卷时，看见核桃街上以及第二街和前街之间大多数房子的大门上都贴着“招租”的告示，栗树街和其他街道上也有许多房屋如此，这当时让我觉得居民们正在相继离开这座城市。

Our debates possess'd me so fully of the subject, that I wrote and printed an anonymous pamphlet on it, entitled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 It was well receiv'd by the common people in general; but the rich men dislik'd it, for it increas'd and strengthen'd the clamor for more money, and they happening to have no writers among them that were able to answer it, their opposition slacken'd, and the point was carried by a majority in the House. My friends there, who conceiv'd I had been of some service, thought fit to reward me by employing me in printing the money; a very profitable jobb and a great help to me. This was another advantage gain'd by my being able to write.

我们的辩论使我对这个议题十分感兴趣，于是我提笔写了一篇匿名文章，并将它印发成小册子，题目为《纸币的性质和需要》。这本小册子在普通民众中反响很好，但富人们不喜欢它，因为它增强了对加大纸币发行量的呼声，而富人阶层中又刚好没人能写文章反驳我的观点，于是他们的反对意见削弱了，因此议会以多数赞成通过了增发纸币的议案。我在议会里的朋友认为我也为此出了力，应该让我来承印纸币，作为酬谢。这桩生意利润丰厚，对我帮助很大，这是写作给我带来的又一好处。

The utility of this currency became by time and experience so evident as never afterwards to be much disputed; so that it grew soon to fifty-five thousand pounds, and in 1739 to eighty thousand pounds, since which it arose during war to upwards of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pounds, trade, building, and inhabitants all the while increasing, till I now think there are limits beyond which the quantity may be hurtful.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经验的考验，纸币的效用变得十分明显，后来再也没有多少争论了。纸币发行量很快达到55,000镑，1739年达到80,000镑，后来战争期间又增加到35万镑，因为贸易、建筑和居民人数都在不断增加。我现在认为纸币发行量应该有个限度，否则也会带来害处。

I soon after obtain'd, thro' my friend Hamilton, the printing of the Newcastle paper money, another profitable jobb as I then thought it; small things appearing great to those in small circumstances; and these, to me, were really great advantages, as they were great encouragements. He procured for me, also, the printing of the laws and votes of that government, which continu'd in my hands as long as I follow'd the business.

不久之后，我通过朋友汉密尔顿先生获得了印刷纽卡斯尔纸币的任务，这在当时的我看来又是一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对于小生意人来说，一笔小买卖也显得意义重大，而这些生意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大好处，因为它们对我是莫大的鼓舞。汉密尔顿先生还介绍我承印政府的法律文书和选票的生意，且这些生意在我离开印刷业之前一直是由我来做的。

I now open'd a little stationer's shop. I had in it blanks of all sorts, the correctest that ever appear'd among us, being assisted in that by my friend Breintnal. I had also paper, parchment, chapmen's books, etc. One Whitemash, a compositor I had known in London, an excellent workman, now came to me, and work'd with me constantly and diligently; and I took an apprentice, the son of Aquila Rose.

现在我开了家小文具店。店里卖各式各样的空白单据，是市面上单据中最为准确的，这有赖于我的朋友布莱恩特纳尔的帮助。我的店里也有纸张、羊皮纸、小贩的账簿等等。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位叫怀特马什的排字工人来到我的店里工作，他干活非常出色，而且始终勤勤恳恳。我还招了个学徒，是阿奎拉·罗斯的儿子。

I began now gradually to pay off the debt I was under for the printing-house. In order to secure my credit and character as a tradesman, I took care not only to be in reality industrious and frugal, but to avoid all appearances to the contrary. I drest plainly; I was seen at no places of idle diversion. I never went out a fishing or shooting; a book, indeed, sometimes debauch'd me from my work, but that was seldom, snug, and gave no scandal; and, to show that I was not above my business, I sometimes brought home the paper I purchas'd at the stores thro' the streets on a wheelbarrow. Thus being esteem'd an industrious, thriving young man, and paying duly for what I bought, the merchants who imported stationery solicited my custom; others proposed supplying me with books, and I went on swimmingly. In the meantime, Keimer's credit and business declining daily, he was at last forc'd to sell his printing house to satisfy his creditors. He went to Barbados, and there lived some years in very poor circumstances.

此时我开始逐渐还清为创办印刷所欠的债务。为了获得商人的信用和声誉，我不仅切实做到勤奋节俭，还尽力避免与之相反的种种表现。我穿着朴素，从不去打发时光的娱乐场所。我从不外出钓鱼或者打猎，有时读书的确会让我忘记工作，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且非常保险，不会引起流言蜚语。为了表明我不以印刷业为耻，我有时会把在商店购买的纸张放在手推车里，自己推着车穿过街道带回家来。因此，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勤奋上进的年轻人，从不拖欠，进口文具的商人都希望与我做生意，还有人提出给我供书让我代销，总之我的生意进行得非常顺利。同时，凯默的信誉和生意都日渐衰落，最终被迫把自己的印刷所卖了还债。后来他去了巴巴多斯，在那里窘困地生活了几年。

His apprentice, David Harry, whom I had instructed while I work'd with him, set up in his place at Philadelphia, having bought his materials. I was at first apprehensive of a powerful rival in Harry, as his friends were very able, and had a good deal of interest. I therefore propos'd a partnership to him which he, fortunately for me, rejected with scorn. He was very proud, dress'd like a gentleman, liv'd expensively, took much diversion and pleasure abroad, ran in debt, and neglected his business; upon which, all business left him; and, finding nothing to do, he followed Keimer to Barbados, taking the printing-house with him. There this apprentice employ'd his former master as a journeyman; they quarrel'd often; Harry went continually behindhand, and at length was forc'd to sell his types and return to his country work in Pensilvania. The person that bought them employ'd Keimer to use them, but in a few years he died.

我在凯默的店里工作时，曾经指导过他的学徒大卫·哈利，现在他

买了凯默的印刷设备，也在费城开了印刷店。我起初担心哈利会成为我强有力的对手，因为他的朋友们都非常能干，也很有势力。因此，我向哈利提出要与他合作，但他轻蔑地拒绝了，这对我倒是好事。他为人傲慢，穿得像个绅士，生活奢侈，经常在外面寻欢作乐，还欠下了债务，也不打理自己的生意。因此，他所有的生意都丢了，无事可做之后，就学着凯默去了巴巴多斯，把印刷所也搬了过去。在巴巴多斯，曾经的学徒雇佣从前的老板为工人，他们常常吵架。哈利的债务越来越多，最终不得不卖掉铅字，回到宾夕法尼亚继续务农。买下那些印刷设备的人又雇了凯默来操作设备，但过了没几年凯默就去世了。

There remained now no competitor with me at Philadelphia but the old one, Bradford; who was rich and easy, did a little printing now and then by straggling hands, but was not very anxious about the business. However, as he kept the post-office, it was imagined he had better opportunities of obtaining news; his paper was thought a better distributer of advertisements than mine, and therefore had many, more, which was a profitable thing to him, and a disadvantage to me; for, tho' I did indeed receive and send papers by the post, yet the publick opinion was otherwise, for what I did send was by bribing the riders, who took them privately, Bradford being unkind enough to forbid it, which occasion'd some resentment on my part; and I thought so meanly of him for it, that, when I afterward came into his situation, I took care never to imitate it.

此时，除了布拉德福德这位老对手外，费城再没有人和我竞争了。布拉德福德很有钱，生活安逸，偶尔雇些零工做些印刷生意，对此并不是很操心。但是，因为他管理邮局，人们认为他有比别人优先获得新闻的机会，觉得他的报纸广告效力比我的报纸大，所以他报纸

上的广告比我的多，这对他有利，对我不利。尽管我的确也是通过邮局发行报纸，但公众却不这么看，因为我是通过贿赂邮差，由邮差将我的报纸寄送各地的，而布拉德福德竟恶意禁止邮差们这样做，他们只能暗中收件。这让我非常愤恨，认为他这么做太可耻了，将来邮局若由我管理，我决不效仿他的行为。

I had hitherto continu'd to board with Godfrey, who lived in part of my house with his wife and children, and had one side of the shop for his glazier's business, tho' he worked little, being always absorbed in his mathematics. Mrs. Godfrey projected a match for me with a relation's daughter, took opportunities of bringing us often together, till a serious courtship on my part ensu'd, the girl being in herself very deserving. The old folks encourag'd me by continual invitations to supper, and by leaving us together, till at length it was time to explain. Mrs. Godfrey manag'd our little treaty. I let her know that I expected as much money with their daughter as would pay off my remaining debt for the printing-house, which I believe was not then above a hundred pounds. She brought me word they had no such sum to spare; I said they might mortgage their house in the loan-office. The answer to this, after some days, was, that they did not approve the match; that, on inquiry of Bradford, they had been inform'd the printing business was not a profitable one; the types would soon be worn out, and more wanted; that S. Keimer and D. Harry had failed one after the other, and I should probably soon follow them; and, therefore, I was forbidden the house, and the daughter shut up.

那时我还一直在戈弗雷家寄膳。戈弗雷和他的妻小住着我房子的一部分，他在印刷店的一边开了家玻璃铺，但他并不怎么开工，总是埋头于数学之中。戈弗雷夫人想撮合我与她一个亲戚的女儿，经常找

机会让我们见面，后来我正式开始追求她，这位女孩儿倒是值得追求的。这些老年人鼓励我的追求，经常邀请我去吃晚饭，还留下我们单独相处，直到该要谈婚论嫁了。戈弗雷夫人从中替我们传话。我告诉她，希望他们女儿陪嫁的财产能帮我付清印刷所剩下的债务，我想那时已经不到100镑了。她给我带话说他们没有那么多钱，我说他们可以去当铺抵押房子。过了些日子，他们那边答复说不赞成我们的婚事了。在询问了布拉德福德之后，他们了解到印刷所并不是很赚钱的生意，铅字磨损得很快，常要购买新的，凯默和哈利的生意都相继失败了，我可能很快也要步他们的后尘，所以，他们不再让我进他们家门，他们的女儿也被锁在了屋子里。

Whether this was a real change of sentiment or only artifice, on a supposition of our being too far engaged in affection to retract, and therefore that we should steal a marriage, which would leave them at liberty to give or withhold what they pleas'd, I know not; but I suspected the latter, resented it, and went no more. Mrs. Godfrey brought me afterward some more favorable accounts of their disposition, and would have drawn me on again; but I declared absolutely my resolution to have nothing more to do with that family. This was resented by the Godfreys; we differ'd, and they removed, leaving me the whole house, and I resolved to take no more inmates.

不管这是因为他们情感真正发生了改变还是只是计谋，以为我们用情已深无法自拔，会想办法偷偷结为连理，从而使他们随意地给些陪嫁财产或是什么也不给，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怀疑是后者，所以很是愤愤不平，再也不去她家了。戈弗雷夫人后来告诉我他们态度有所好转，希望我能回头，但我断然宣布说决心不再与那户人家往来了。这让戈弗雷一家非常气愤，我们之间产生了裂痕，于是他们搬出了印刷所。我一人住在这所大房子里，决心再也不招收租户。

But this affair having turned my thoughts to marriage, I look'd round me and made overtures of acquaintance in other places; but soon found that, the business of a printer being generally thought a poor one, I was not to expect money with a wife, unless with such a one as I should not otherwise think agreeable. In the meantime, that hard-to-be-governed passion of youth hurried me frequently into intrigues with low women that fell in my way, which were attended with some expense and great inconvenience, besides a continual risque to my health by a distemper which of all things I dreaded, though by great good luck I escaped it. A friendly correspondence as neighbors and old acquaintances had continued between me and Mrs. Read's family, who all had a regard for me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lodging in their house. I was often invited there and consulted in their affairs, wherein I sometimes was of service. I piti'd poor Miss Read's unfortunate situation, who was generally dejected, seldom cheerful, and avoided company. I considered my giddiness and inconstancy when in London as in a great degree the cause of her unhappiness, tho' the mother was good enough to think the fault more her own than mine, as she had prevented our marrying before I went thither, and persuaded the other match in my absence. Our mutual affection was revived, but there were now great objections to our union. The match was indeed looked upon as invalid, a preceding wife being said to be living in England; but this could not easily be prov'd, because of the distance; and, tho' there was a report of his death, it was not certain. Then, tho' it should be true, he had left many debts, which his successor might be call'd upon to pay. We ventured, however, over all these difficulties, and I took her to wife, September 1st, 1730. None of the inconveniences happened that we had apprehended, she proved a good and faithful helpmate, assisted me much by attending the shop; we throve together, and have ever

mutually endeavored to make each other happy. Thus I corrected that great erratum as well as I could.

但这件事情让我开始想结婚了。我开始在自己身边留意，也认识了其他地方的一些人，但我很快发现，人们一般认为开印刷店不是什么赚钱的生意，所以我不能指望未来的妻子会带着财产陪嫁过来，而但凡有钱陪嫁的，她的人又不合我意。这段时间，那难以抑制的年轻人的欲念让我常和偶然遇见的粗俗女人厮混，花费了不少金钱，带来了很大不便，最让我害怕的是有染上疾病的危险，不过很幸运，我没有染上。当时，作为邻居和老朋友，我和里德小姐一家还有着友好来往，从我起初在他们家寄宿时起，他们一家就对我非常关心。他们常常邀我去家里，和我商量他们的事情，有时我也能帮上些忙。我很同情可怜的里德小姐的处境，她郁郁寡欢，极少开怀，还处处躲着人。我认为她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在伦敦时的轻率和缺乏定性所致，尽管她母亲善意地把责任归咎于自己身上，因为她那时不许我们在我离开前结婚，我走之后又劝女儿嫁给了别人。我和里德小姐旧情复燃了，但当时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大阻力。她第一次的婚姻虽然已被认为失效，据说他的前妻现在生活在英国，但这些事情因为距离的原因不易证实，还有尽管有人说他已经去世，但这也是不确定的。另外，即使这些消息都属实，他还留下许多债务，可能要由他妻子的下一任丈夫来还。但我们还是不顾一切，毅然于1730年9月1日结婚了。我们担心的麻烦事都没有发生，她是一位善良忠实的好帮手，大力帮助我照管店铺。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努力相互安慰体贴。就这样，我算是尽力改正了那一大过错。

About this time, our club meeting, not at a tavern, but in a little room of Mr. Grace's, set apart for that purpose, a proposition was made by me, that, since our books were often referr'd to in our disquisitions upon the queries, it might be convenient to us to have them altogether where we met, that upon occasion they might be

consulted; and by thus clubbing our books to a common library, we should, while we lik'd to keep them together, have each of us the advantage of using the books of all the other members, which would be nearly as beneficial as if each owned the whole. It was lik'd and agreed to, and we fill'd one end of the room with such books as we could best spare. The number was not so great as we expected; and tho' they had been of great use, yet some inconveniences occurring for want of due care of them, the collection, after about a year, was separated, and each took his books home again.

大约这个时候，我们学习社的聚会从酒馆搬到了格雷斯先生家为此分开的一个小房间里，那间屋子有特殊用途。因此我提议，既然我们讨论问题时经常要参阅书籍，如果能把这些书集中在我们聚会的地方，那就很方便了，需要时我们就能随时参考。这样，我们把各自的书合并为一个普通图书馆，集中保管，只要我们愿意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能使用其他成员的书，这样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所有藏书一样了。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赞同，于是我们在这个房间的一端放满了我们能拿出来的所有书籍。书的数目没有我们原先预料得那么多，尽管放在一起很便利，但因为缺乏对书籍的适当保管，时有麻烦事发生，所以大约在一年以后，我们又把藏书分开，各自把书搬回家去了。

And now I set on foot my first project of a public nature, that for a subscription library. I drew up the proposals, got them put into form by our great scrivener, Brockden, and, by the help of my friends in the Junto, procured fifty subscribers of forty shillings each to begin with, and ten shillings a year for fifty years, the term our company was to continue. We afterwards obtain'd a charter, the company being increased to one hundred: this was the mother of all

the North American subscription libraries, now so numerous. It is become a great thing itself, and continually increasing. These libraries have improved the general conversation of the Americans, made the common tradesmen and farmers as intelligent as most gentlemen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perhaps have contributed in some degree to the stand so generally made throughout the colonies in defense of their privileges.

这时我开始着手进行我第一个带有公共性质的计划，就是建立一个会员图书馆。我起草了提案，请我们的大律师布罗克登帮忙整理成型，在我秘社的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一开始就征集到了50位会员，每人先交40先令，以后50年每年再交10先令，50年是我们打算维持的期限。后来我们获得了特许状，会员也增加到了100位，这是北美所有会员图书馆的鼻祖，现在这样的图书馆已经为数众多了。图书馆本身成为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且在持续扩大。这些图书馆改善了美国人的谈吐，使得一般的商人和农民也和其他国家大多数绅士一样拥有智慧，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帮助了全殖民地纷纷奋起的保卫自身权益的斗争。

[1_1].(After the words "agreeable to" the words "some of" were interlined and afterward effaced.—B.)

[1_2].I fancy his harsh and tyrannical treatment of me might be a means of impressing me with that aversion to arbitrary power that has stuck to me through my whole life.

PART TWO

第二部分

(Memo. Thus far was written with the intention express'd in the beginning and therefore contains several little family anecdotes of no importance to others. What follows was written many years after in compliance with the advice contain'd in these letters, and accordingly intended for the public. The affairs of the Revolution occasion'd the interruption.)

（备注：上面的叙述是按照本文开头时所表达的目的而写，因此文中有一些对他人无足轻重的家庭琐事。下部分是多年以后，根据下面几封信中所提的建议所写，原是是写给公众看的。独立革命的爆发曾中断写作。）

Letter from Mr. Abel James, with Notes of my Life (received in Paris).

这是埃布尔·詹姆斯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附有我的自传摘录（在巴黎收到）。

“MY DEAR AND HONORED FRIEND:

“我敬爱的的朋友：

I have often been desirous of writing to thee, but could not be reconciled to the thought that the letter might fa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British, lest some printer or busy-body should publish some part of the contents, and give our friend pain, and myself censure.

我常想给您写信，但想到信件可能会落入英国佬手中又只好作罢，免得某些印刷商或好事者将信的部分内容发表出来，给我的朋友带来伤害，让我自己受到责难。

“Some time since there fell into my hands, to my great joy, about twenty-three sheets in thy own handwriting,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parentage and life of thyself, directed to thy son, ending in the year 1730, with which there were notes, likewise in thy writing; a copy of which I inclose, in hopes it may be a means, if thou continued it up to a later period, that the first and latter part may be put together; and if it is not yet continued, I hope thee will not delay it. Life is uncertain, as the preacher tells us; and what will the world say if kind, humane, and benevolent Ben. Franklin should leave his friends and the world deprived of so pleasing and profitable a work; a work which would be useful and entertaining not only to a few, but to millions? The influence writings under that class have on the minds of youth is very great, and has nowhere appeared to me so plain, as in our public friend's journals. It almost insensibly leads the youth into the resolution of endeavoring to become as good and eminent as the journalist. Should thine, for instance, when published (and I think it could not fail of it), lead the youth to equal the industry and temperance of thy early youth, what a blessing with that class would such a work be! I know of no character living, nor many of them put together, who has so much

in his power as thyself to promote a greater spirit of industry and early attention to business, frugality, and temperance with the American youth. Not that I think the work would have no other merit and use in the world, far from it; but the first is of such vast importance that I know nothing that can equal it.”

不久之前，我非常高兴地获得到了您的23张手稿，它是寄给令郎的，其中讲述了您的出身和生平，一直写到了1730年。同时还有一些注释，也是您的手稿。我把它誊写了一份，随信附上，如果您能继续写下去，希望这抄本可以用来把前后两个时期连接起来。倘若迄今您还没有动笔，我希望您不要再拖延了。牧师告诫我们，人生变幻无常，如果善良仁慈的本·富兰克林离开人世，这世界就会失去一部令人愉悦又很有价值的作品，一部不只局限于少数人，而是对数百万人而言都既有用又有趣的作品，到时人们该说什么呢？这类作品对年轻人思想的影响非常深远，在我看来，像您这样一位公众人物的日志所起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它几乎在不知不觉中使年轻人下定决心，要努力成为日志记录者这样优秀、杰出的人。打比方说，如果您的作品得以发表（我想它一定会发表），它将引导年轻人效仿您早年时候的勤奋和节制，那么这样一部作品对于他们来说是何等的幸事啊！据我所知，现今在世的人里没有谁能够像您一样有能力帮助美国青年培养勤奋、潜心事业、节俭生活以及自我克制的品质，即使许多人的合力也起不到您这样的作用。我并非说除此以外您的作品别无其他优点和作用，事实远非如此，但它的首要作用却是如此重要，我想不出什么能可与之匹敌的。

The foregoing letter and the minutes accompanying it being shown to a friend, I received from him the following:

我把前面这封信和附在信中的记录交给一个朋友看了以后，收到

他下面这封回信：

Letter from Mr. Benjamin Vaughan. “PARIS, January 31, 1783.

本杰明·沃恩先生的来信1783年1月31日于巴黎：

“My DEAREST SIR: When I had read over your sheets of minutes of the principal incidents of your life, recovered for you by your Quaker acquaintance, I told you I would send you a letter expressing my reasons why I thought it would be useful to complete and publish it as he desired. Various concerns have for some time past prevented this letter being written, and I do not know whether it was worth any expectation; happening to be at leisure, however, at present, I shall by writing, at least interest and instruct myself; but as the terms I am inclined to use may tend to offend a person of your manners, I shall only tell you how I would address any other person, who was as good and as great as yourself, but less diffident. I would say to him, Sir, I solicit the history of your life from the following motives: Your history is so remarkable, that if you do not give it, somebody else will certainly give it; and perhaps so as nearly to do as much harm, as your own management of the thing might do good. It will moreover present a table of the internal circumstances of your country, which will very much tend to invite to it settlers of virtuous and manly minds. And considering the eagerness with which such information is sought by them, and the extent of your reputation, I do not know of a more efficacious advertisement than your biography would give. All that has happened to you is also connected with the detail of the manners and situation of a rising people; and in this respect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writings of Caesar and Tacitus can be more interesting to a true judge of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But these, sir, are small reasons, in my opinion, compared with the chance which your life will give for the forming of future great men;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your Art of Virtue (which you design to publish) of improving the features of private character, and consequently of aiding all happiness, both public and domestic. The two works I allude to, sir, will in particular give a noble rule and example of self-education. School and other education constantly proceed upon false principles, and show a clumsy apparatus pointed at a false mark; but your apparatus is simple, and the mark a true one; and while parents and young persons are left destitute of other just means of estimating and becoming prepared for a reasonable course in life, your discovery that the thing is in many a man's private power, will be invaluable! Influence upon the private character, late in life, is not only an influence late in life, but a weak influence. It is in youth that we plant our chief habits and prejudices; it is in youth that we take our party as to profession, pursuits and matrimony. In youth, therefore, the turn is given; in youth the education even of the next generation is given; in youth the private and public character is determined; and the term of life extending but from youth to age, life ought to begin well from youth, and more especially before we take our party as to our principal objects. But your biography will not merely teach self-education, but the education of a wise man; and the wisest man will receive lights and improve his progress, by seeing detailed the conduct of another wise man. And why are weaker men to be deprived of such helps, when we see our race has been blundering on in the dark, almost without a guide in this particular, from the farthest trace of time? Show then, sir, how much is to be done, both to sons and fathers; and invite all wise men to become like yourself, and other men to become wise. When we see how cruel statesmen and warriors can be to the human race,

and how absurd distinguished men can be to their acquaintance, it will be instructive to observe the instances multiply of pacific, acquiescing manners; and to find how compatible it is to be great and domestic, enviable and yet good-humored.

“亲爱的先生：我读完了您的贵格会朋友寄还给您的关于您人生重大事件的记录后，曾说过要给您写一封信，说明我的理由，为什么我认为假如您照他的要求把它写完并发表，将是一桩有益的事。以前因为种种琐事缠身，没能提笔，我也不知这封信是否值得您对它的期望，但我最近恰好有空，所以决定提起笔来，至少这是我自己感兴趣并且获益。也许我的措词会冒犯您这样人物，但我只想告诉您，如果是给另一位像您这样善良伟大、但不如您谦逊的人写信，我会说什么。我会和他说，先生，基于以下几个原因，我请您将自己的人生历程记录下来：您的过去如此非同寻常，如果您自己不写，一定会有人为您编写，与其有别人来写，带来许多危害，不如您亲自记述，要好得多；此外，您还的自传可以介绍贵国的内部情形，这很可能会吸引善良勇敢的人移民于此，考虑到他们正热切地搜寻这类信息，而您又是如此美名远扬，我想不出比您的自传更有效的广告了。您的毕生经历也是与一个崛起民族的风俗和处境相关联的，从此种角度来看，我认为对于研究人性和人类社会的真正行家来说，您的自传可与恺撒和塔西佗的作品相媲美。但先生，在我看来这些理由并不重要，因为您的人生传记还可能对未来伟人的塑造产生影响，并与您所著的《道德的艺术》一起（您打算发表的）改善个人性格，从而增进社会和家庭幸福起到重要作用。先生，我提到的这两部作品将为自我教育提供崇高的法则和范例。学校教育和其他教育形式常常不按正确的原理进行，它们使用笨拙的方法，指向错误的目标；您的方法则十分简单，目标也非常正确。当父母和孩子因找不到其他恰当的方法而彷徨迷茫，不知对未来一生中合理的道路方向当如何进行评估和准备时，您却发现，许多东西是人们力量能及的，这个发型多么宝贵啊！对一个人后期私人品德的影响，不仅为时太晚，而且影响甚微。我们是在青年时期形成我们主要的习惯和见解的；我们是在青年时期选择职业、

确定追求、步入婚姻的。因此，青年时期是我们人生转折点。青年时期我们甚至影响了下一代的教育；青年时期决定了一个人的私德和公德。人生的长度不过是青年到老年而已，因此青年时，人生就当有个良好的开始，尤其是在我们确定人生的主要目标之前。但您的自传绝不仅仅讲授自我教育，而是论述进行教育从而成为一位智者的方法；即便是最聪明的人，在看到另外一个智者的一举一动的详细报道之后，也能获得智慧。当我们回头看到远古以来人类一直在黑暗中摸索，跌跌撞撞，无人指引，我们为什么还要剥夺弱者获得帮助的机会呢？所以先生啊，告诉父亲们和儿子们该做些什么吧，让智者都能成为像您一样的人物，让其他人都能成为智者。当我们看到政治家和好战者对待人类同胞是如何残酷，看到所谓杰出人士对待朋友是如何荒唐时，如果能见平和顺从的风气渐长，发现伟大与擅长理家，令人称羡与平易近人的诸多品格是如何协调地集于一身，人们将受益无穷。

“The little private incidents which you will also have to relate, will have considerable use, as we want, above all things, rules of prudence in ordinary affairs; and it will be curious to see how you have acted in these. It will be so far a sort of key to life, and explain many things that all men ought to have once explained to them, to give, them a chance of becoming wise by foresight. The nearest thing to having experience of one's own, is to have other people's affairs brought before us in a shape that is interesting; this is sure to happen from your pen; your affairs and management will have an air of simplicity or importance that will not fail to strike; and I am convinced you have conducted them with as much originality as if you had been conducting discussions in politics or philosophy; and what more worthy of experiments and system (its importance and its errors considered) than human life?

您在自传中必然讲述的琐碎私事，它们也将大有用处，因为我们

最需培养日常生活中审慎的原则，所以想看您是怎样处理这些事情的。您的自传将会成为一种生活的指南，向人们解释早该有人解释过的许多问题，使他们有机会成为远虑睿智的人。与自己亲身经历最为接近的，是阅读他人那描写得饶有趣味的类似经历，而您的文笔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您的为人处世将会给人平易朴实的感觉，或令人深深意识到这种处世态度的重要性。我深信您在处理这些事务时独出心裁，如同您在政治学或哲学讨论中表现的一样；考虑到人生的重要性及种种过失，又有什么比人生更值得尝试，更值得进行系统总结规划的呢？

“Some men have been virtuous blindly, others have speculated fantastically, and others have been shrewd to bad purposes; but you, sir, I am sure, will give under your hand, nothing but what is at the same moment, wise, practical and good, your account of yourself (for I suppose the parallel I am drawing for Dr. Franklin, will hold not only in point of character, but of private history) will show that you are ashamed of no origin; a thing the more important, as you prove how little necessary all origin is to happiness, virtue, or greatness. As no end likewise happens without a means, so we shall find, sir, that even you yourself framed a plan by which you became considerable;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may see that though the event is flattering, the means are as simple as wisdom could make them; that is, depending upon nature, virtue, thought and habit. Another thing demonstrated will be the propriety of everyman's waiting for his time for appearing upon the stage of the world. Our sensations being very much fixed to the moment, we are apt to forget that more moments are to follow the first, and consequently that man should arrange his conduct so as to suit the whole of a life. Your attribution appears to have been applied to your life, and the passing moments of it have been enlivened with content and enjoyment instead of being tormented

with foolish impatience or regrets. Such a conduct is easy for those who make virtue and themselves in countenance by examples of other truly great men, of whom patience is so often the characteristic. Your Quaker correspondent, sir (for here again I will suppose the subject of my letter resembling Dr. Franklin), praised your frugality, diligence and temperance, which he considered as a pattern for all youth; but it is singular that he should have forgotten your modesty and your disinterestedness, without which you never could have waited for your advancement, or found your situation in the meantime comfortable; which is a strong lesson to show the poverty of glory and the importance of regulating our minds. If this correspondent had known the nature of your reputation as well as I do, he would have said, your former writings and measures would secure attention to your Biography, and *Art of Virtue* ; and your Biography and *Art of Virtue* , in return, would secure attention to them. This is an advantage attendant upon a various character, and which brings all that belongs to it into greater play; and it is the more useful, as perhaps more persons are at a loss for the means of improving their minds and characters, than they are for the time or the inclination to do it. But there is one concluding reflection, sir, that will shew the use of your life as a mere piece of biography. This style of writing seems a little gone out of vogue, and yet it is a very useful one; and your specimen of it may be particularly serviceable, as it will make a subject of comparison with the lives of various public cutthroats and intriguers, and with absurd monastic self-tormentors or vain literary triflers. If it encourages more writings of the same kind with your own, and induces more men to spend lives fit to be written, it will be worth all Plutarch's Lives put together. But being tired of figuring to myself a character of which every feature suits only one man in the world, without giving him the praise of it, I shall end my letter, my dear Dr. Franklin, with a personal application to your proper self. I am earnestly desirous,

then, my dear sir, that you should let the world into the traits of your genuine character, as civil broils nay otherwise tend to disguise or traduce it. Considering your great age, the caution of your character, and your peculiar style of thinking, it is not likely that any one besides yourself can be sufficiently master of the facts of your life, or the intentions of your mind. Besides all this, the immense revolution of the present period, will necessarily turn our attention towards the author of it, and when virtuous principles have been pretended in it, it will be highly important to shew that such have really influenced; and, as your own character will be the principal one to receive a scrutiny, it is proper (even for its effects upon your vast and rising country, as well as upon England and upon Europe) that it should stand respectable and eternal. For the furtherance of human happiness, I have always maintain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rove that man is not even at present a vicious and detestable animal; and still more to prove that good management may greatly amend him; and it is for much the same reason, that I am anxious to see the opinion established, that there are fair characters existing among the individuals of the race; for the moment that all men, without exception, shall be conceived abandoned, good people will cease efforts deemed to be hopeless, and perhaps think of taking their share in the scramble of life, or at least of making it comfortable principally for themselves. Take then, my dear sir, this work most speedily into hand: shew yourself good as you are good; temperate as you are temperate; and above all things, prove yourself as one, who from your infancy have loved justice, liberty and concord, in a way that has made it natural and consistent for you to have acted, as we have seen you act in the last seventeen years of your life. Let Englishmen be made not only to respect, but even to love you. When they think well of individuals in your native country, they will go nearer to thinking well of your country; and when your countrymen see themselves well thought of

by Englishmen, they will go nearer to thinking well of England. Extend your views even further; do not stop at those who speak the English tongue, but after having settled so many points in nature and politics, think of bettering the whole race of men. As I have not read any part of the life in question, but know only the character that lived it, I write somewhat at hazard. I am sure, however, that the life and the treatise I allude to (on the *Art of Virtue*) will necessarily fulfil the chief of my expectations; and still more so if you take up the measure of suiting these performances to the several views above stated. Should they even prove unsuccessful in all that a sanguine admirer of yours hopes from them, you will at least have framed pieces to interest the human mind; and whoever gives a feeling of pleasure that is innocent to man, has added so much to the fair side of a life otherwise too much darkened by anxiety and too much injured by pain. In the hope, therefore, that you will listen to the prayer addressed to you in this letter, I beg to subscribe myself, my dearest sir, etc., etc.

有些人盲目地善良，有人是天马行空的胡乱猜想，还有人心怀不轨、精于算计，但是，先生，我相信您所写的一定是睿智、实用而又善良的东西。您在自述中表明（我想我所描述的与富兰克林博士类似的这个人，不仅在品行方面与您相近，在个人经历上也是如此），您不以出身卑微为耻，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您证明了出身对于幸福、美德和伟大而言，是多么无关紧要。但是要达到一个目标也不能没有具体的方法，所以我们将看到，先生，连您都制定了使自己出类拔萃的方案。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结局是美好的，实现这个方案的手段而却是人类智慧所能想到的最为简单的手段，那就是：依靠人的本性、美德、思想和习惯。自传中体现的另外一点就是：每个人都应等待合适的时机登上世界舞台。我们常常过于关注当下，忘了来日方长，因此人应当合理安排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整个人生。您的这种品质似乎就贯穿于您的整个人生中，使得人生的每个短暂瞬间都因知足

和愉悦之心而充满生气，不为愚蠢的急躁或懊悔而备受折磨。对于那些以真正的伟人为榜样，恪守道德修身养性的人来说，这样做法原本并不困难，因为伟人们通常具备耐心。先生，给您写信的那位贵格会朋友（这里我要再次假设我的信是写给一个类似富兰克林博士的人）赞扬您的节俭、勤奋和节制，他认为这是所有年轻人应当效仿的典范。但奇怪的是，他却忘了您的谦虚谨慎、公正无私。没有这两点，您不会耐心等待人生道路上的前进，也不会舒心坦然地面对自己的遭遇。这是强有力的教训，表明荣耀和名誉控制我们心智的重要性。如果给您写信的人如我一样了解您声誉的实质，他会说；您以前的文章和行为将使人们注意到您的《自传》和《道德的艺术》，而反过来，您的《自传》和《道德的艺术》又将使人们注意到您以前的文章和议案。这是拥有丰满人格的人所拥有的优势，它能使自身拥有的一切品质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样的自传将更有用，因为不懂得到底如何提升心智、磨炼性格的人或许比没有时间或意愿从事这样工作的人多。但我最后还有一个想法，先生，那就是说明把您的生平作为一部纯粹的传记的用处。自传似乎有些过时了，但它还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您写的自传，一定更为有用，因为我们可以将传记中您的人生与各类凶残者和阴谋家的人生相比较，与荒诞的修道院苦行僧或目空一切、游手好闲的文人相比较。如果您的传记能鼓舞更多人写出这样的作品，激励更多人过上充满意义、值得提笔记载的生活，那么它的价值将相当于普卢塔克的所有传记价值之和。但我已厌倦了在自己脑海中勾勒这样一个人物——他的每一个特点只契合于这世上的唯一一人——一点也不能让我们对他赞颂。亲爱的富兰克林博士，在我结束这封信前，我想向您提个私人请求。我热忱盼望，亲爱的先生，您能让世人了解您真实的性格特征，否则政治上的争论或许会掩盖或是诋毁您的真性情了。考虑到您的高龄，性格谨慎，思维方式又十分独特，恐怕除了您自己，再无他人能对您的人生历程和思想意图有充分的了解了。除此之外，现阶段革命形势如火如荼，人们必将注意到这场革命的发起者；既然革命宣称是为了某些道德的原则，那么告诉世人这些道德原则如何真正影响了革命，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您的人格，必将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因此，它应当是值得尊敬并将流芳百世的（即使考虑到它对您幅员辽阔、正在崛起的国家和对英国、对欧洲的

影响）。为了促进人类的幸福，我一直认为我们不仅有必要证实，人类目前是一种生性卑劣、可憎的动物，而更加有必要证明正确处理人生可以大大地改变人的本性。出于同样原因，我极希望使人们相信：人世间仍有高尚的灵魂存在，因为一旦人们认为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寡廉鲜耻、自甘堕落，那么善良的人们会放弃认为注定无望的努力，可能也会想在人生的无情争夺中分得一杯羹，或至少为自己谋得个安逸舒适的所在。所以啊，我亲爱的先生，尽快着手这项工作吧！您是善良的，因为您确实是这样；您是节制的，因为您确实如此；尤为重要的是，证明您是一个自幼就热爱正义、自由和和谐的人，这种信仰是使您自然而然地一贯地像我们在最近17年里看到您的为人处世一般。但愿使得英国人不仅尊敬您，更爱戴您吧。当英国人尊敬贵国的个别国民时，他们会逐渐地尊敬贵国。而当贵国人们知道自己受英国人尊敬时，他们也就会逐渐地看得起美国了。甚至把您的眼光再放长远些，不要仅仅关注讲英语的国家，在解决了人性和政治上如此多的问题后，您就应当努力改进全人类了。由于我未曾读过这部自传的任何部分，只是认识自传的主人公，所以我有点胡言乱语。但我相信，我提到的您的自传和您的论文（见《道德的艺术》）必将满足我的主要期望。如果您写作时还能采纳上面提到的几点想法，那就再好不过了。即使退一步说，这些作品不能满足您那些热忱的仰慕者的期望，您至少可以创作几篇愉悦心智的作品。如果能给人带来单纯的快乐，那么也为人生增添了许多美好，人生本来就有着过多的焦虑和痛苦。因此，希望您能听从我这封信里对您的祈求，最亲爱的先生，我请求您同意。

“Signed, BENJ. VAUGHAN.”

本杰明·沃恩（签名）

Continuation of the Account of my Life, begun at Passy, near Paris, 1784.

（自传续编，1784年写于巴黎近郊帕西）

It is some time since I receiv'd the above letters, but I have been too busy till now to think of complying with the request they contain. It might, too, be much better done if I were at home among my papers, which would aid my memory, and help to ascertain dates; but my return being uncertain and having just now a little leisure, I will endeavor to recollect and write what I can; if I live to get home, it may there be corrected and improv'd.

我收到上面两封信有些时日了，但我一直太忙，直到现在才想起满足信里提出的要求。同时，若我能在家里写作，手边有我以前写的文章可帮助回忆，帮助我确定某些事件的时间，也许我能写得更好。但我还不知何时回去，现在又有些空闲，所以我尽量回忆，把我所能记得的事情写下来；若我有生之年能够生还故乡，再来更正错误、修改文章吧。

Not having any copy here of what is already written, I know not whether an account is given of the means I used to establish the Philadelphia public library, which, from a small beginning, is now become so considerable, though I remember to have come down to near the time of that transaction (1730). I will therefore begin here with an account of it, which may be struck out if found to have been already given.

因为我手头没有上半部的稿子，所以不知道是否已经讲述过费城公共图书馆是怎么建立的，。图书馆起步时很小，而现在已有相当规

模了。我记得已经写到建立图书馆这件事情前后了（1730年），所以我就接着从这儿开始吧，如果以后发现这部分已经写过，那就再把它删掉吧。

At the time I establish'd myself in Pennsylvania, there was not a good bookseller's shop in any of the colonies to the southward of Boston. In New York and Philad'a the printers were indeed stationers; they sold only paper, etc., almanacs, ballads, and a few common school-books. Those who lov'd reading were oblig'd to send for their books from England; the members of the Junto had each a few. We had left the alehouse, where we first met, and hired a room to hold our club in. I propos'd that we should all of us bring our books to that room, where they would not only be ready to consult in our conferences, but become a common benefit, each of us being at liberty to borrow such as he wish'd to read at home. This was accordingly done, and for some time contented us.

我在宾夕法尼亚开业时，在波士顿以南的各殖民地都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书店。在纽约和费城，印刷所实际上就是文具店，只出售纸张等物品，还有年历、民歌和一些普通的课本。热爱读书的人只好请人从英国代为买书。秘社的成员各有些藏书，我们当时已经离开了最初见面的酒馆，租了间房子用于俱乐部聚会。我提议大家把各自的藏书都带到那间房子里来，这样不但我们聚会时能随时参阅相关书籍，还能使大家都受益，每个人都能把他想读的书借回家去阅读。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当时我们也感到非常满意。

Finding the advantage of this little collection, I propos'd to render the benefit from books more common, by commencing a public subscription library. I drew a sketch of the plan and rules

that would be necessary, and got a skilful conveyancer, Mr. Charles Brockden, to put the whole in form of articles of agreement to be subscribed, by which each subscriber engag'd to pay a certain sum down for the first purchase of books, and an annual contribution for increasing them. So few were the readers at that time in Philadelphia, and the majority of us so poor, that I was not able, with great industry, to find more than fifty persons, mostly young tradesmen, willing to pay down for this purpose forty shillings each, and ten shillings per annum. On this little fund we began. The books were imported; the library wag opened one day in the week for lending to the subscribers, on their promissory notes to pay double the value if not duly returned. The institution soon manifested its utility, was imitated by other towns, and in other provinces. The libraries were augmented by donations; reading became fashionable; and our people, having no publick amusements to divert their attention from study, became better acquainted with books, and in a few years were observ'd by strangers to be better instructed and more intelligent than people of the same rank generally are in other countries.

后来发现这个小型藏书库的优点后，我主张推广读书的利益，提议开办一个公共会员图书馆。我草拟了一份必要的开办计划和规章，请经验丰富的代办人查尔斯·布罗克登先生把它整理为订阅协议条款。根据协议，每位会员要先交一笔钱作为首次购书的费用，以后每年还要再支付一定金额的会费来添置书籍。当时费城的读书人少之又少，我们大多数人又非常贫穷，因此尽管我四处奔波，最终也只能找到五十多位会员而已。大多数都是年轻商人，其中每个人同意为此先付40先令，以后每年再出10先令。我们的图书馆就以这笔小小的资金启动了。书是在国外购买的，图书馆每周开放一天，可让会员借阅书籍，借阅时需要出一份承诺书，承诺如未按期归还，将缴纳书价两倍的罚金。图书馆很快显示了它的用处，其他城镇甚至其他州也纷纷效仿。

后来有了捐款，图书馆的规模日益扩大，读书成为了一种风尚。我们的人民没有别的公共消遣可以转移注意力，就愈加热爱读书。几年之后，外国人就发现，我们的人民比他国同一阶层的民众文化水平更高，更有智慧。

When we were about to sign the above-mentioned articles, which were to be binding upon us, our heirs, etc., for fifty years, Mr. Brockden, the scrivener, said to us, “You are young men, but it is scarcely probable that any of you will live to see the expiration of the term fix'd in the instrument.” A number of us, however, are yet living; but the instrument was after a few years rendered null by a charter that incorporated and gave perpetuity to the company.

我们要签署上面提过的合同了，这合同以50年为期限，对我们本人和后代等都有约束力。代办人布罗克登先生对我们说：“你们虽是年轻人，但你们不太可能会有人活到协议期满的那一天。”但是，我们中间很多人至今仍然在世，而那份合同过了几年就被一张特许状宣布无效，同时这个图书馆也改组成了一家永久性公司。

The objections and reluctances I met with in soliciting the subscriptions, made me soon feel the impropriety of presenting one's self as the proposer of any useful project, that might be suppos'd to raise one's reputation in the smallest degree above that of one's neighbors, when one has need of their assistance to accomplish that project. I therefore put myself as much as I could out of sight, and stated it as a scheme of a number of friends, who had requested me to go about and propose it to such as they thought lovers of reading. In this way my affair went on more smoothly, and I ever after practis'd it on such occasions; and, from

my frequent successes, can heartily recommend it. The present little sacrifice of your vanity will afterwards be amply repaid. If it remains a while uncertain to whom the merit belongs, some one more vain than yourself will be encouraged to claim it, and then even envy will be disposed to do you justice by plucking those assumed feathers, and restoring them to their right owner.

我在征集会员时遭遇的种种回绝和抗拒使我很快意识到，当一个有用的公共计划可能被认为是会使一个需要邻居们的帮助来完成这项计划时，人们可能认为你是借机为自己扬名，以超过他们，最好不要宣称自己就是首创者。因此我尽量将自己藏起来，说这是许多朋友的共同计划，他们委托我来拜访那些被认为是爱好读书的人并邀请他们参加。这样事情就办得顺利些了，后来在类似情况下我还是这么办，屡获成功，因此，我诚心向大家推荐这个方法。你目前牺牲了一点荣光，以后你可以获得巨大的报酬。如果一时不能确定功劳该归谁，有些比你更爱虚荣的人会宣称应归功于他们，但不用担心失了公道，这时定有别人对他们心生嫉妒，揭穿他们，把这称誉还给那应得之人。

This library afforded me the means of improvement by constant study, for which I set apart an hour or two each day, and thus repair'd in some degree the loss of the learned education my father once intended for me. Reading was the only amusement I allow'd myself. I spent no time in taverns, games, or frolicks of any kind; and my industry in my business continu'd as indefatigable as it was necessary. I was indebted for my printing-house; I had a young family coming on to be educated, and I had to contend with for business two printers, who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place before me. My circumstances, however, grew daily easier. My original habits of frugality continuing, and my father having, among his instructions to me when a boy, frequently repeated a proverb of Solomon, “Seest

thou a man diligent in his calling, he shall stand before kings, he shall not stand before mean men," I from thence considered industry as a means of obtaining wealth and distinction, which encourag'd me, tho' I did not think that I should ever literally stand before kings, which, however, has since happened; for I have stood before five, and even had the honor of sitting down with one, the King of Denmark, to dinner.

这个图书馆给我一个不断钻研提高自己的机会，我每天都花一两个小时读书，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缺陷，我父亲曾经希望让我受这种高深广博的教育。除了读书之外，我不允许自己有其他的娱乐，我从不流连于酒馆，从不醉心于赌博或是其他娱乐，我依然勤恳地工作着，不知疲倦，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印刷所的债没有还清，我的孩子们即将上学了，业务上我还得与当地另两家先于我成立的印刷所竞争。虽然如此，我的境况却在日益好转。我还是保留着原先节俭的习惯，父亲在我儿时对我的诸多教诲中，常常引用所罗门的一句箴言“那些勤奋工作的人，将立于君王面前，而非与下等人为伍。”从那时起，我便认为勤奋是获得财富和名望之道，尽管我并没想过自己当真要立于君王面前，但这激励了我。不过，这事倒真的发生了，因为我曾立于五位君王面前，甚至还荣幸地与丹麦国王同席共进晚餐。

We have an English proverb that says, “He that would thrive, must ask his wife.” It was lucky for me that I had one as much dispos'd to industry and frugality as myself. She assisted me cheerfully in my business, folding and stitching pamphlets, tending shop, purchasing old linen rags for the papermakers, etc., etc. We kept no idle servants, our table was plain and simple, our furniture of the cheapest. For instance, my breakfast was a long time bread and milk (no tea), and I ate it out of a two penny earthen porringer,

with a pewter spoon. But mark how luxury will enter families, and make a progress, in spite of principle: being call'd one morning to breakfast, I found it in a China bowl, with a spoon of silver! They had been bought for me without my knowledge by my wife, and had cost her the enormous sum of three-and-twenty shillings, for which she had no other excuse or apology to make, but that she thought her husband deserv'd a silver spoon and China bowl as well as any of his neighbors. This was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plate and China in our house, which afterward, in a course of years, as our wealth increas'd, augmented gradually to several hundred pounds in value.

有句英国谚语这样说："要想取得成功，必要请教妻子。"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位和我一样克勤克俭的妻子。她愉快地在事业上帮助我，帮我折叠和装订那些小册子，照管店铺，为造纸商收购破布等等。我们不雇仆人，凡事都自己做，所吃的饭菜简单朴素，家具都是最便宜的。比如，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早餐只是面包和牛奶而已（没有茶），用的是一个只值两便士的陶制小碗和一只锡制汤匙。但请注意，奢侈的习惯是怎样进入家庭并且继续滋长，尽管你在原则上反对它：一天早上我吃早饭时，竟发现餐具换成了瓷碗和银匙！它们是我妻子瞒着我买的，花了高达23先令的巨款！她对此没找托词，也没有道歉，只说她认为她的丈夫应当向邻居一样拥有一把银匙和一个瓷碗。这是金属器皿和瓷器第一次在我们家出现，在后来许多年里，随着我们财富的增加，我家器皿和瓷器也逐渐增加到价值几百镑的总数了。

I had been religiously educated as a Presbyterian; and tho' some of the dogmas of that persuasion, such as the eternal decrees of God, election, reprobation, etc., appeared to me unintelligible, others doubtful, and I early absented myself from the public

assemblies of the sect, Sunday being my studying day, I never was without some religious principles. I never doubted, for instance, the existence of the Deity; that he made the world, and govern'd it by his Providence; that the most acceptable service of God was the doing good to man; that our souls are immortal; and that all crime will be punished, and virtue rewarded, either here or hereafter. These I esteem'd the essentials of every religion; and, being to be found in all the religions we had in our country, I respected them all, tho'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respect, as I found them more or less mix'd with other articles, which, without any tendency to inspire, promote, or confirm morality, serv'd principally to divide us, and make us unfriendly to one another. This respect to all, with an opinion that the worst had some good effects, induc'd me to avoid all discourse that might tend to lessen the good opinion another might have of his own religion; and as our province increas'd in people, and new places of worship were continually wanted, and generally erected by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my mite for such purpose, whatever might be the sect, was never refused.

在宗教方面我从小受的是长老会的熏陶，尽管它们有些教条在我看来有些难以理解，比如上帝的永恒谕令、上帝的选拔和摈弃等等，还有一些值得怀疑。尽管我早已不参加他们的公众集会，因为星期天是我读书的日子，但我仍然保持着某些宗教信仰，比如，我深信上帝的存在，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按他的意旨管理世界，上帝最喜欢为人类造福，我们的灵魂不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报应不是在今世就是在来生。这些我认为这是任何宗教的要旨。因为在我国现存的所有宗教里都能找到这些要素，所以我尊重所有宗教，虽然我尊重的程度有所差别，因为我发现它们之中或多或少都混杂有别的东西，这些杂质不能鼓舞、促进或是巩固道德观念，而主要使我们分裂，让我们互相不友好。我认为即使最坏的教派也有积极作用，这中尊重一切宗教的态度使我避免了一切可能使他人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不良印象的

言论。随着本州人口增多，不断需要建造新的教堂，其资金一般来自民众自愿捐款，所以不管哪个教派，只要人们需要我捐献，我从总是愿意出一臂之力。

Tho' I seldom attended any public worship, I had still an opinion of its propriety, and of its utility when rightly conducted, and I regularly paid my annual subscription for the support of the only Presbyterian minister or meeting we had in Philadelphia. He us'd to visit me sometimes as a friend, and admonish me to attend his administrations, and I was now and then prevail'd on to do so, once for five Sundays successively. Had he been in my opinion a good preacher, perhaps I might have continued, notwithstanding the occasion I had for the Sunday's leisure in my course of study; but his discourses were chiefly either polemic arguments, or explications of the peculiar doctrines of our sect, and were all to me very dry, uninteresting, and unedifying, since not a single moral principle was inculcated or enforc'd, their aim seeming to be rather to make us Presbyterians than good citizens.

虽然我很少参加公共礼拜，我仍然认为，如果支持得当的话，礼拜是应该的，有用的。我还定期缴纳年费，维持费城唯一的长老会牧师或教堂。这位牧师有时会以朋友的身份拜访我，劝我参加他的教堂做礼拜，我有时也会依从他的建议，有一次还连去五个星期日。如果当时我认为他是位好牧师，也许我会继续参加下去，尽管我需要星期天的空闲时间看书。但他的布道要么是谈各派的神学争论，要么是就解释长老会的特定教义，这些对我来讲都枯燥无味，毫无启发，因为这种讲道从未宣扬或强调过哪怕是一条道德准则，其目的是希望我们我们做长老会教徒，而不是要我们做好公民。

At length he took for his text that verse of the fourth chapter of Philippians, “Finally, brethren, whatsoever things are true, honest, just, pure, lovely, or of good report, if there be any virtue, or any praise, think on these things.” And I imagin'd, in a sermon on such a text, we could not miss of having some morality. But he confin'd himself to five points only, as meant by the apostle, viz.: 1. Keeping holy the Sabbath day. 2. Being diligent in reading the holy Scriptures. 3. Attending duly the publick worship. 4. Partaking of the Sacrament. 5. Paying a due respect to God's ministers. These might be all good things; but, as they were not the kind of good things that I expected from that text, I despaired of ever meeting with them from any other, was disgusted, and attended his preaching no more. I had some years before compos'd a little Liturgy, or form of prayer, for my own private use (viz., in 1728), entitled, Articles of Belief and Acts of Religion. I return'd to the use of this, and went no more to the public assemblies. My conduct might be blameable, but I leave it, without attempting further to excuse it; my present purpose being to relate facts, and not to make apologies for them.

后来，牧师以《腓立比书》第四章中的一节作为讲道的内容：“最后，弟兄们，凡是真实的、诚实的、正义的、纯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考。”我想，就这样的内容布道，一定是会谈到道德的。但他却把使徒的意图仅局限于五点：1．虔守安息日；2．勤读《圣经》；3．按时做礼拜；4．参加圣礼；5．尊敬牧师。这些道理都是好的，但不是我意料中那段经文引申出来的好东西，于是我再也不期望从其他经文中得出我所要的，对此心生厌烦，就再也不去听他布道了。几年以前（1728年）我曾编过一本小小的祈祷书，或是祈祷文，准备仅自己使用，名叫《信仰和宗教行为条例》。我又重新使用此书，再也不去教堂做礼拜了。我的行为也许有些不当，但我不去理会，也不想寻找借

口为自己开脱，因为我现在的目的只是叙述事实，而非为过去的事情道歉。

It was about this time I conceiv'd the bold and arduous project of arriving at moral perfection. I wish'd to live without committing any fault at any time; I would conquer all that either natural inclination, custom, or company might lead me into. As I knew, or thought I knew, what was right and wrong, I did not see why I might not always do the one and avoid the other. But I soon found I had undertaken a task of more difficulty than I had imagined. While my care was employ'd in guarding against one fault, I was often surprised by another; habit took the advantage of inattention; inclination was sometimes too strong for reason. I concluded, at length, that the mere speculative conviction that it was our interest to be completely virtuous, was not sufficient to prevent our slipping; and that the contrary habits must be broken, and good ones acquired and established, before we can have any dependence on a steady, uniform rectitude of conduct. For this purpose I therefore contrived the following method.

大约这个时期，我构想出一个大胆而艰巨的道德完善计划。我希望永远不犯任何错误，要克服所有缺点，不管这是天生的喜好也好，习惯也好，抑或是交友不慎所引起的。既然我能明辨是非，或自以为拥有这种能力，那我为什么不选择正确并且规避错误呢？但过了不久，我就发现，这个任务比想象的要更艰难。当我小心翼翼地防范某个错误时，经常一不留神就犯了另一个错误。习惯总是趁人一时疏忽时得逞，而面对个人爱好，理智有时又不够强大。后来我得出了结论，仅仅凭空相信拥有所有美德对我们很有好处，还不足以避免自己失足犯错；我们首先应改掉错误的习惯，养成正确的习惯，然后才能相信自己会始终如一地保持正确的言行。为实现这一目的，我设计了

如下方法。

In the various enumerations of the moral virtues I had met with in my reading, I found the catalogue more or less numerous, as different writers included more or fewer ideas under the same name. Temperance, for example, was by some confined to eating and drinking, while by others it was extended to mean the moderating every other pleasure, appetite, inclination, or passion, bodily or mental, even to our avarice and ambition. I propos'd to myself, for the sake of clearness, to use rather more names, with fewer ideas annex'd to each, than a few names with more ideas; and I included under thirteen names of virtues all that at that time occurr'd to me as necessary or desirable, and annexed to each a short precept, which fully express'd the extent I gave to its meaning.

我曾读过关于道德品质的种种列举，发现其分类名目多种多样，不同的作者会对同一名词作或广义或狭义的诠释。例如节制，有人仅仅将其限于饮食，而有人却将它推而广之，涵盖对其他各种娱乐、欲望、爱好、肉体或精神冲动的节制，甚至将对贪欲和野心的控制也包含在内。为了清晰起见，我宁可使用更多的名词，每个词只涵盖较少的义项，这比用较少的名词来指代很多意思要好。我将当时所有自认为必要或合意的品质归于13项美德名下，并对每一项都附上简短的解释，以充分说明我认为该项美德应包含哪些内容。

These names of virtues, with their precepts, were:

这些美德和它们的具体解释分别是：

TEMPERANCE. Eat not to dullness; drink not to elevation.

节制。食不过饱；饮不过量。

SILENCE. Speak not but what may benefit others or yourself; avoid trifling conversation.

沉默。不说对人对己毫无益处的话；不参与闲谈。

ORDER. Let all your things have their places; let each part of your business have its time.

有序。一切物品都应规整有序；每件事情都应安排时间完成。

RESOLUTION. Resolve to perform what you ought; perform without fail what you resolve.

决心。当做必做；下决心做的事应该坚持不懈。

FRUGALITY. Make no expense but to do good to others or yourself; i.e., waste nothing.

节俭。所费钱财必须于人或于己有利，换言之，不浪费一分一

厘。

INDUSTRY. Lose no time; be always employ'd in something useful; cut off all unnecessary actions.

勤奋。不浪费时间；每一分钟都做有用的事，戒掉一切不必要的行为。

SINCERITY. Use no hurtful deceit; think innocently and justly, and, if you speak, speak accordingly.

真诚。不欺骗伤害他人；思想要纯洁公正；说话要实事求是。

JUSTICE. Wrong none by doing injuries, or omitting the benefits that are your duty.

正直。不冤枉伤害他人，不忽略自己造福他人而又是你应尽的义务。

MODERATION. Avoid extremes; forbear resenting injuries so much as you think they deserve.

中庸。避免趋于极端；如果受到应得伤害，不要恼怒。

CLEANLINESS. Tolerate no uncleanliness in body, cloaths, or habitation.

清洁。保持身体、衣服和住所始终干净整洁。

TRANQUILLITY. Be not disturbed at trifles, or at accidents common or unavoidable.

镇静。不受琐事及普通或难以避免的事故而惊慌失措。

CHASTITY. Rarely use venery but for health or offspring, never to dulness, weakness, or the injury of your own or another's peace or reputation.

贞洁。少行房事，除非为了健康或生养后代起见，以免使大脑迟钝，使身体虚弱，或是破坏自己或他人的安宁和名声。

HUMILITY. Imitate Jesus and Socrates.

谦逊。效仿基督和苏格拉底。

My intention being to acquire the habitude of all these virtues, I judg'd it would be well not to distract my attention by attempting the whole at once, but to fix it on one of them at a time; and, when

I should be master of that, then to proceed to another, and so on, till I should have gone thro' the thirteen; and, as the previous acquisition of some might facilitate the acquisition of certain others, I arrang'd them with that view, as they stand above. Temperance first, as it tends to procure that coolness and clearness of head, which is so necessary where constant vigilance was to be kept up, and guard maintained against the unremitting attraction of ancient habits, and the force of perpetual temptations. This being acquir'd and establish'd, Silence would be more easy; and my desire being to gain knowledge at the same time that I improv'd in virtue, and considering that in conversation it was obtain'd rather by the use of the ears than of the tongue, and therefore wishing to break a habit I was getting into of prattling, punning, and joking, which only made me acceptable to trifling company, I gave Silence the second place. This and the next, Order, I expected would allow me more time for attending to my project and my studies. Resolution, once become habitual, would keep me firm in my endeavors to obtain all the subsequent virtues; Frugality and Industry freeing me from my remaining debt, and producing affluence and independence, would make more easy the practice of Sincerity and Justice, etc., etc. Conceiving then, that, agreeably to the advice of Pythagoras in his Golden Verses, daily examination would be necessary, I contrived the following method for conducting that examination.

我希望拥有上述所有美德并能养成相应习惯，但我认为最好不要试图毕其功于一役，以免分散注意力，而应循序渐进，每次以培养一种美德为目标，待完成之后再继续前进，直到做到这13项为止。考虑到先拥有某些美德将使后来者的培养更容易，我将它们的顺序作了适当安排，如上面排序所示。我把节制放在第一，因为它能使头脑冷静清晰，这对于时刻保持警醒来说十分必要，以防止旧习惯的不断引诱，抵御那些无穷无尽的诱惑。在养成“节制”这一美德后，“沉默”就

要容易些了。因为我在培养品德的同时也希望获得知识，而谈话时，知识的获得需要侧耳倾听，而非不停地动嘴皮子，于是我希望自己改掉喜欢闲聊、说话爱玩文字游戏、爱开玩笑的习惯，这些习惯只让我结交些浅薄之人，所以我把“沉默”列在第二位。养成“沉默”和下一位“有序”的美德后，我希望我能花更多时间执行自己的计划来读书。等养成决心这一习惯后，我就能更坚定地努力获得其余的美德了。“节俭”和“勤奋”能使我尽快还清剩下的债务，为我创造财富，真正独立，并使“真诚”和“正直”更易践行，如此等等。然后我又想到，根据毕达哥拉斯在《金色诗篇》里提出的建议，我认为每日必须自省，于是我又想出下面的方法用于自省。

I made a little book, in which I allotted a page for each of the virtues. I rul'd each page with red ink, so as to have seven columns, one for each day of the week, marking each column with a letter for the day. I cross'd these columns with thirteen red lines,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each line with the first letter of one of the virtues, on which line, and in its proper column, I might mark, by a little black spot, every fault I found upon examination to have been committed respecting that virtue upon that day.

我制作了一个小册子，册子上每种德行各占一页。我用红色墨水在每页纸上画上直线，形成7列，用于记录一周7天，并在每列的顶部标上一个字母代表那一天。在这7列上我再画上13条红线，在每一行的开头标上13项美德的首字母，我可以记一个小黑点代表在反省当天该项美德时所发现的错误。

Form of the pages.

表格如下：

I determined to give a week's strict attention to each of the virtues successively. Thus, in the first week, my great guard was to avoid every the least offence against Temperance, leaving the other virtues to their ordinary chance, only marking every evening the faults of the day. Thus, if in the first week I could keep my first line, marked T, clear of spots, I suppos'd the habit of that virtue so much strengthen'd and its opposite weaken'd, that I might venture extending my attention to include the next, and for the following week keep both lines clear of spots. Proceeding thus to the last, I could go thro' a course compleat in thirteen weeks, and four courses in a year. And like him who, having a garden to weed, does not attempt to eradicate all the bad herbs at once, which would exceed his reach and his strength, but works on one of the beds at a time, and, having accomplish'd the first, proceeds to a second, so I should have, I hoped, the encouraging pleasure of seeing on my pages the progress I made in virtue, by clearing successively my lines of their spots, till in the end, by a number of courses, I should be happy in viewing a clean book, after a thirteen weeks' daily examination.

我决定每周严格遵守一种美德。因此，第一周内，我要全力避免违反“节制”原则的任何小失误，而对其他美德暂时不管，只在每晚记下有关过失。这样，如果第一周内我能保持注明为“节制”的第一行没有小黑点，我就以为这一项美德已经加强了，而与此相反的不良习惯则大为削弱，这样我就可以大胆地将注意力扩展到包括下一美德的培养上。第二周，我要保持第二页的头两行没有小黑点。这样依次进行，直至最后一项，从而在13周之内完成全部过程，每年循环四次。这就像一个人为花坛除草，他不会企图一次除尽所有杂草，这将超出他的能力与体力；他应一次只为一个花园除草，除完第一个之后花坛

再开始第二个。因此我希望，我能令人快慰地在我的表格上看到自己的进步，在逐步地清除每一行的小黑点，直到最后，通过多个循环之后，在13周的日检之后，我能高兴地看到一本干净的小册子。

This my little book had for its motto these lines from Addison's Cato:

我从艾迪生的《卡托》中摘录了下面几句话作为这本小册子的题词：

“Here will I hold. If there's a power above us

“我要在这坚持到底。若是上苍有灵

(And that there is all nature cries aloud Thro' all her works), He must delight in virtue;

（整个宇宙和宇宙间的一切都在大声呼喊证明上帝的存在），上帝必然喜悦美好的德行；

And that which he delights in must be happy.”

而上帝所喜悦的人必然幸福。”

Another from Cicero,

另外还引了西塞罗的话作为题句：

“O vitae Philosophia dux! O virtutum indagatrix

“啊，哲学，生命的导师！啊，美德的探寻者，

expultrixque vitiorum! Unus dies, bene et ex praeceptis

罪恶的清除者！按您的敕令认真活一天，

tuis actus, peccanti immortalitati est anteponendus.”

也好过带着满身罪恶长生不死。”

Another from the Proverbs of Solomon, speaking of wisdom or virtue:

另外一句引自所罗门的箴言，谈到智慧和美德时说：

“Length of days is in her right hand, and in her left hand riches

and honour. Her ways are ways of pleasantness, and all her paths are peace.” iii. 16, 17.

“她右手掌握着无穷无尽的岁月，左手里全是财富和荣誉。她的道路是幸福快乐的，她的方向是和平的。”（《箴言》第三章第16、17节）

And conceiving God to be the fountain of wisdom, I thought it right and necessary to solicit his assistance for obtaining it; to this end I formed the following little prayer, which was prefix'd to my tables of examination, for daily use.

我认为上帝是智慧的源泉，因此我觉得恳求他助我得到智慧是既正确又必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写了下面这篇短小的祈祷文，并把它放在自省表格之前，每日诵读：

“O powerful Goodness! Bountiful Father! Merciful Guide! Increase in me that wisdom which discovers my truest interest. Strengthen my resolutions to perform what that wisdom dictates. Accept my kind offices to thy other children as the only return in my power for thy continual favors to me.”

“噢，全能的上帝！慈悲的天父！仁慈的向导！增加我的智慧，让我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吧；坚定我的决心，让我完成智慧赋予的任务吧。接受我为您其他子民的诚心服务吧，以此作为我对您不断给我恩惠的唯一报答。”

I used also sometimes a little prayer which I took from Thomson's Poems, viz.:

我有时也引用汤姆逊的诗歌作为简短的祈祷文：

“Father of light and life, thou Good Supreme!

“光明与生命的父亲，您至高无上的主啊！

O teach me what is good; teach me Thyself!

啊，教导我什么是美德，您亲自教导我吧！

Save me from folly, vanity, and vice,

救赎我，使我脱离愚昧、虚荣和罪恶吧！

From every low pursuit; and fill my soul

让我摒弃低劣的追求，让我的灵魂

With knowledge, conscious peace, and virtue pure;

拥有知识、内心的宁静和纯洁的品德吧！

Sacred, substantial, never-fading bliss!”

请给我神圣、充足和永无止境的福佑！”

The precept of Order requiring that every part of my business should have its allotted time, one page in my little book contain'd the following scheme of employment for the twenty-four hours of a natural day:

“有序”的准则要求我分配固定的时间完成每件事情，在我那本小册子中，有一页将一天24小时的时间分配作了如下安排：

I enter'd upon the execution of this plan for self-examination, and continu'd it with occasional intermissions for some time. I was surpris'd to find myself so much fuller of faults than I had imagined; but I had the satisfaction of seeing them diminish. To avoid the trouble of renewing now and then my little book, which, by scraping out the marks on the paper of old faults to make room for new ones in a new course, became full of holes, I transferr'd my tables and precepts to the ivory leaves of a memorandum book, on which the lines were drawn with red ink, that made a durable stain, and on those lines I mark'd my faults with a black-lead pencil, which marks I could easily wipe out with a wet sponge. After a while I went thro' one course only in a year, and afterward only one

in several years, till at length I omitted them entirely, being employ'd in voyages and business abroad, with a multiplicity of affairs that interfered; but I always carried my little book with me.

我开始执行这个每日自省的计划，除了偶尔间断之外，一直坚持了一段时间。出乎意料地，我发现自己的过失比想象的要多得多，但后来又满意地看到它们日渐减少。我把纸上代表以前过失的小黑点擦掉，以便在一个新的循环开始后可以记入新的记号，可这样小册子的很多地方都被擦破了，为了避免不时需要重新制作小册子的麻烦，我把表格和箴言放在一本用厚纸制成的备忘录里，横直线是用红色墨水画上的，可以经久耐用，在格子里我用黑色铅笔记录自己的过失，这些标记很容易用湿海绵擦去。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中年，我只完成一个循环，后来的几年才完成一个循环，直到最后，我常常因旅行或公事在外，被各类事务缠身，只好完全放弃了这个计划，但我一直随身携带着这本小册子。

My scheme of ORDER gave me the most trouble; and I found that, tho' it might be practicable where a man's business was such as to leave him the disposition of his time, that of a journeyman printer, for instance, it was not possible to be exactly observed by a master, who must mix with the world, and often receive people of business at their own hours. Order, too, with regard to places for things, papers, etc., I found extremely difficult to acquire. I had not been early accustomed to it, and, having an exceeding good memory, I was not so sensible of the inconvenience attending want of method. This article, therefore, cost me so much painful attention, and my faults in it vexed me so much, and I made so little progress in amendment, and had such frequent relapses, that I was almost ready to give up the attempt, and content myself with a faulty character in that respect, like the man who, in buying an ax

of a smith, my neighbor, desired to have the whole of its surface as bright as the edge. The smith consented to grind it bright for him if he would turn the wheel; he turn'd, while the smith press'd the broad face of the ax hard and heavily on the stone, which made the turning of it very fatiguing. The man came every now and then from the wheel to see how the work went on, and at length would take his ax as it was, without farther grinding. “No,” said the smith, “turn on, turn on; we shall have it bright by-and-by; as yet, it is only speckled.” “Yes,” said the man, “but I think I like a speckled ax best.” And I believe this may have been the case with many, who, having, for want of some such means as I employ'd, found the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good and breaking bad habits in other points of vice and virtue, have given up the struggle, and concluded that “a speckled ax was best” ; for something, that pretended to be reason, was every now and then suggesting to me that such extreme nicety as I exacted of myself might be a kind of foppery in morals, which, if it were known, would make me ridiculous; that a perfect character might be attended with the inconvenience of being envied and hated; and that a benevolent man should allow a few faults in himself, to keep his friends in countenance.

“有序”原则这一项给我带来最多的麻烦。我发现，如果一个人的工作可以让他自己支配时间，比如像印刷工人，这条原则是可行的，但对于店老板来说，他得同别人打交道，得随时接待自由来访的客户，所以他没法严格遵守这条原则。还有，我发现使物品、纸张等摆放有序也极其困难。我一开始对此不太习惯，因为我记忆力极佳，并未觉得物品摆放缺乏方法会带来什么不便。因此，这条原则让我花了许多心血，这方面的过失让我倍感烦恼，而我对此取得的进步微乎其微，常常故态复萌，几乎要使我放弃努力，接受自己的性格在这方面有所缺陷了。这就像有人从我的铁匠邻居那儿买斧头，希望整把斧头都磨得像斧刃一样光亮。铁匠说，如果他能帮忙转动砂轮的话，可以

帮他把斧头抛光，于是此人就去转轮子了，而铁匠就把斧头的阔刃面使劲儿压在磨石上，使得转动砂轮变得非常吃力。于是这人不时过来瞧斧子磨得怎样了，后来，他也不想磨了，宁愿接受原来的斧头了。“不，”铁匠说，“继续转吧，继续转吧，慢慢地我们会把斧头磨亮的，现在只是有些斑点。”这人说：“是啊，但我想我还是更喜欢带斑点的斧头。”我相信许多人可能都是这样，他们因为没有使用像我所使用的那些方法，在其他方面发现要改掉坏习惯，养成好习惯非常困难，于是放弃了挣扎，还断定“带斑点的斧头就是最好的斧头”。因为有些冒充理性之物的东西会不时暗示我，对自己如此这般要求严格也许是种道德上的愚蠢行为，如果为人所知，我将成为笑柄；且完美无缺的人格也许反遭人嫉恨，那倒反而麻烦了；又说善良的人应允许自己有些不足，为他的朋友们留些面子。

In truth, I found myself incorrigible with respect to Order; and now I am grown old, and my memory bad, I feel very sensibly the want of it. But, on the whole, tho' I never arrived at the perfection I had been so ambitious of obtaining, but fell far short of it, yet I was, by the endeavor, a better and a happier man than I otherwise should have been if I had not attempted it; as those who aim at perfect writing by imitating the engraved copies, tho' they never reach the wish'd-for excellence of those copies, their hand is mended by the endeavor, and is tolerable while it continues fair and legible.

说实话，我发现自己在“有序”方面的毛病难以改正，现在我年纪大了，记忆力也衰退了，真切地感受到缺少这种好习惯的不便。但总体来说，尽管我从未如自己所期能做到尽善尽美，且我距目标还十分遥远，但通过努力，我成为了一个比原来更优秀、更快乐的人；如果我不曾尝试这个计划，我是无法达到这一点的。这就像通过临摹字帖来练习书法一样，尽管练习的人没能像字帖写得那么好，但通过练习

他们的字体也有所改进，如果能继续练习下去，也相当不错了。

It may be well my posterity should be informed that to this little artifice, with the blessing of God, their ancestor ow'd the constant felicity of his life, down to his 79th year, in which this is written. What reverses may attend the remainder is in the hand of Providence; but, if they arrive, the reflection on past happiness enjoy'd ought to help his bearing them with more resignation. To Temperance he ascribes his long-continued health, and what is still left to him of a good constitution; to Industry and Frugality, the early easiness of his circumstances and acquisition of his fortune, with all that knowledge that enabled him to be a useful citizen, and obtained for him some degree of reputation among the learned; to Sincerity and Justice, the confidence of his country, and the honorable employs it conferred upon him; and to the joint influence of the whole mass of the virtues, even in the imperfect state he was able to acquire them, all that evenness of temper, and that cheerfulness in conversation, which makes his company still sought for, and agreeable even to his younger acquaintance. I hope, therefore, that some of my descendants may follow the example and reap the benefit.

我的后人们应当晓得他们的祖先一生持久不变的幸运，到他79岁还能撰写自传为止，全靠这个小小的计划和上帝的祝福。余生会遭遇什么不幸，全由上帝决定；但如果真遭遇不幸，想到过去经历的种种幸福，对于厄运他也将更加坦然地接受。因为“节制”，他身体一直很好，直到现在还很硬朗；因为“勤奋”、“节俭”，他得以早年境遇平顺，积累了财富，获得了知识，使自己成为有用之才，也在有学术界赢得了一些声誉；因为“真诚”和“正直”，他的祖国赋予了他信任和光荣的使命。他的和气和谈吐幽默爽直都归功于这些品德的综合影响，

而尽管他还没有臻于至善，由于他言语风趣，即使在晚年还颇受欢迎，甚至年轻的朋友也乐于与他交往。因此，我希望我的子孙后代中能有人效仿我，从中受益。

It will be remark'd that, tho' my scheme was not wholly without religion, there was in it no mark of any of the distinguishing tenets of any particular sect. I had purposely avoided them; for, being fully persuaded of the utility and excellency of my method, and that it might be serviceable to people in all religions, and intending some time or other to publish it, I would not have any thing in it that should prejudice any one, of any sect, against it. I purposed writing a little comment on each virtue, in which I would have shown the advantages of possessing it, and the mischiefs attending its opposite vice; and I should have called my book *THE ART OF VIRTUE* (Nothing so likely to make a man's fortune as virtue.), because it would have shown the means and manner of obtaining virtue, which would have distinguished it from the mere exhortation to be good, that does not instruct and indicate the means, but is like the apostle's man of verbal charity, who only without showing to the naked and hungry how or where they might get clothes or victuals, exhorted them to be fed and clothed.

这里要说明一下，尽管我的计划并非完全没有涉及宗教，但它却没提到任何教派的主要教条。我有意避免它们，因为我深信自己的方法实用而卓越，它对信仰任何宗教的人们来说都可能有用，并且我还打算找个时间将它出版，所以不希望其中包含任何足以使任何教派的人反对的东西。我曾打算替每项美德写些评论，指出拥有此项美德的好处，以及与其背道而驰的坏处，我把这本书起名为《道德的艺术》（没有什么能像道德一样使人获得财富），因为我会在这本书里说明养成美德的方法和方式，这使它不同于那些仅仅劝人从善大的书籍，

后者没有指出具体方法，就像使徒口头行善一般，他们劝告那些衣不蔽体、饥肠辘辘的人们要穿衣吃饭，却不告诉他们怎样或何处可以找到衣食。

—*James* ii. 15, 16.

——《雅各书》第2章第15、16节。

But it so happened that my intention of writing and publishing this comment was never fulfilled. I did, indeed, from time to time, put down short hints of the sentiments, reasonings, etc., to be made use of in it, some of which I have still by me; but the necessary close attention to private business in the earlier part of thy life, and public business since, have occasioned my postponing it; for, it being connected in my mind with a great and extensive project, that required the whole man to execute, and which an unforeseen succession of employs prevented my attending to, it has hitherto remain'd unfinish'd.

但是碰巧，我撰写并发表这些评论的愿望未能实现。的确，我会不时写些感想、推论之类的短小文章，以便日后使用，有些文章我至今仍然保存着！但我由于早年需要认真打理私人事务，后来又有公共事务需要操心，于是只得把写作计划搁浅了。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个宏大的工程，需要投入全部精力来进行，而后来种种未预料到的事务使我无法专注于此，这个计划也就搁置了下来。

In this piece it was my design to explain and enforce this doctrine, that vicious actions are not hurtful because they are

forbidden, but forbidden because they are hurtful, the nature of man alone considered; that it was, therefore, every one's interest to be virtuous who wish'd to be happy even in this world; and I should, from this circumstance (there being always in the world a number of rich merchants, nobility, states, and princes, who have need of honest instrument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ir affairs, and such being so rare), have endeavored to convince young persons that no qualities were so likely to make a poor man's fortune as those of probity and integrity.

在这部作品中，我想解释并强调这样一种说法，即如果仅考虑人的本性，那么恶行不因其遭到禁止而有害，而正是因有害才遭到禁止。因此，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即使他希望在此世界获得快乐，与他也是有益的。由此可见（世界上总有许多富商、贵族和王公需要诚实的人为他们管理自己的事务，而这种诚实的人又很罕见），我本应努力地使年轻人相信，世上没有什么品质能像正直诚实一样使一个穷人发财。

My list of virtues contain'd at first but twelve; but a Quaker friend having kindly informed me that I was generally thought proud; that my pride show'd itself frequently in conversation; that I was not content with being in the right when discussing any point, but was overbearing, and rather insolent, of which he convinc'd me by mentioning several instances; I determined endeavoring to cure myself, if I could, of this vice or folly among the rest, and I added Humility to my list, giving an extensive meaning to the word.

我所列出的美德起初只包含12项，但一位教友会的朋友好心地告诉我，人们一般都认为我很自大，我的这种傲气常常在谈话中流露出

来；在讨论问题时，我并不满足于证明我是正确的，而且还傲慢自大，有点盛气凌人，他还举了些例子为证。于是我决心尽可能地克服其他缺点的同时，努力改掉这个毛病或说是愚行，因此我把“谦逊”一项加到我的列表中，并对这个词作了广义的解释。

I cannot boast of much success in acquiring the reality of this virtue, but I had a good deal with regard to the appearance of it. I made it a rule to forbear all direct contradiction to the sentiments of others, and all positive assertion of my own. I even forbid myself, agreeably to the old laws of our Junto, the use of every word or expression in the language that imported a fix'd opinion, such as certainly, undoubtedly, etc., and I adopted, instead of them, I conceive, I apprehend, or I imagine a thing to be so or so; or it so appears to me at present. When another asserted something that I thought an error, I deny'd myself the pleasure of contradicting him abruptly, and of showing immediately some absurdity in his proposition; and in answering I began by observing that in certain cases or circumstances his opinion would be right, but in the present case there appear'd or seem'd to me some difference, etc. I soon found the advantage of this change in my manner; the conversations I engag'd in went on more pleasantly. The modest way in which I propos'd my opinions procur'd them a readier reception and less contradiction; I had less mortification when I was found to be in the wrong, and I more easily prevail'd with others to give up their mistakes and join with me when I happened to be in the right.

我不敢自夸在养成谦虚这方面，实质上我有多大成就，但在外表上我确是谦虚了不少。我经常禁止自己不能直接反驳他人意见，也不讲过分自信的话。我甚至按照我们秘社以前的规定，不允许自己使用

英语中一切肯定意见的单词或辞句，比如“当然地”、“无疑地”等等，转而使用“我猜想”、“我料想”、“我猜想这件事是如此”、“现在在我看来好像是……”。如果别人表示一个我认为是错误的意见时，我也不再粗暴地直接反驳他，立即指出其论断中的荒谬之处，我放弃了这样驳斥时带来的快感。而是回答说在某些情况下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在当前情形下，在我看来或者是好像有些不同，等等。我很快发现这一态度转变的好处，我和别人谈话更加融洽了。由于我谦虚地提出了我的见解，这些意见反而更易于被人接受，持反对意见的人少了。当我发现我错了时，也不再觉得那么懊悔，要是我是对的，我也更能说服别人放弃他们错误的观点，接受我的意见。

And this mode, which I at first put on with some violence to natural inclination, became at length so easy, and so habitual to me, that perhaps for these fifty years past no one has ever heard a dogmatical expression escape me. And to this habit (after my character of integrity) I think it principally owing that I had early so much weight with my fellow-citizens when I proposed new institutions, or alterations in the old, and so much influence in public councils when I became a member; for I was but a bad speaker, never eloquent, subject to much hesitation in my choice of words, hardly correct in language, and yet I generally carried my points.

我起初认为这种方法违背自己的自然习惯，有些难以执行，后来终于变得非常容易、非常习惯了，可能过去50年里没有人再听我说过一句武断的话。我想也是因为这种习惯（还有我正直的品格），早年在我提出建立新制度或是改革旧制度时，民众总是非常重视我的意见，后来成为各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后也颇有影响力。尽管我不擅长演讲，也不是能言善辩之人，讲话模糊，常有语病，但我的意见一般都会获得人们的支持。

In reality, there is, perhaps, no one of our natural passions so hard to subdue as pride. Disguise it, struggle with it, beat it down, stifle it, mortify it as much as one pleases, it is still alive, and will every now and then peep out and show itself; you will see it, perhaps, often in this history; for, even if I could conceive that I had compleatly overcome it, I should probably be proud of my humility.

事实上，我们天生各种感情中，恐怕没有什么比傲慢更难以克服了。尽管我们将它改头换面，与之斗争，使劲消灭，它却依然存在，不时还会出来显露一番。也许你在这本自传里还常常见到它，因为尽管我认为自己已完全克服了傲慢的习气，但我很可能又为自己的谦逊而感到骄傲了。

(Thus far written at Passy, 1741.)

（1741年写于帕西）

PART THREE

第三部分

[“I am now about to write at home, August, 1788, but can not have the help expected from my papers, many of them being lost in the war. I have, however, found the following.”]

（“现在是1788年8月，我要在家里，快要动笔了。我的许多文章都已在战争中遗失，因此不能像原来期望的那样从中寻找资料。但是终究还是找到了以下部分。”）

HAVING mentioned a great and extensive project which I had conceiv'd, it seems proper that some account should be here given of that project and its object. Its first rise in my mind appears in the following little paper, accidentally preserv'd, viz.:

既然提到我曾制定过一个宏大的计划，我想在这里该谈谈这个计划及其目标。我把最初产生这个想法的过程记在了下面这张小纸上，偶然得以保存下来：

Observations on my reading history, in Library, May 19th, 1731.

这是1731年5月19日我在图书馆阅读历史著作时的一些感想：

“That the great affairs of the world, the wars, revolutions, etc., are carried on and affected by parties.

“世界大事，如战争、革命等，都是受政党推进、影响的。

“That the view of these parties is their present general interest, or what they take to be such.

这些政党的观点代表着他们当前的利益，或是他们认为是当前的利益。

“That the different views of these different parties occasion all confusion.

不同政党的不同意见引起了各种纷争和混乱。

“That while a party is carrying on a general design, each man has his particular private interest in view.

一个政党在执行一个大计划时，党内各人心中都有他独特的个人利益。

“That as soon as a party has gain'd its general point, each

member becomes intent upon his particular interest; which, thwarting others, breaks that party into divisions, and occasions more confusion.

一旦政党完成其宏观目标，各党员即开始着力要求实现其个人利益，这些个人利益错综复杂，相互矛盾，使得政党四分五裂，结果引起更大混乱。

“That few in public affairs act from a meer view of the good of their country, whatever they may pretend; and, tho' their actings bring real good to their country, yet men primarily considered that their own and their country's interest was united, and did not act from a principle of benevolence.

不管人们口头上怎么说，政界中的行动很少单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尽管他们的行为会给国家带来真正的好处，但人们仍只是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一致这一角度出发的，而非出于爱国的热忱。

“That fewer still, in public affairs, act with a view to the good of mankind.

而在政界中以造福人类为目标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There seems to me at present to be great occasion for raising a United Party for Virtue, by forming the virtuous and good men of all nations into a regular body, to be govern'd by suitable good and

wise rules, which good and wise men may probably be more unanimous in their obedience to, than common people are to common laws.

在我看来，当前很有必要建立一个“道德联合党”，将各国善良、有德行的人们组织成一个正规的团体。党员要服从恰当、合适又科学的党章。这些善良、睿智的人们，与普通人遵守普通法律相比，会更自觉自愿地遵守党章。

“I at present think that whoever attempts this aright, and is well qualified, cannot fail of pleasing God, and of meeting with success. B. F.”

目前，我认为，如果一个有资格有能力的人能正确地做此尝试，他必然不会让上帝失望，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本杰明·富兰克林”

Revolving this project in my mind, as to be undertaken hereafter, when my circumstances should afford me the necessary leisure, I put down from time to time, on pieces of paper, such thoughts as occurr'd to me respecting it. Most of these are lost; but I find one purporting to be the substance of an intended creed, containing, as I thought, the essentials of every known religion, and being free of everything that might shock the professors of any religion. It is express'd in these words, viz.:

我想今后的当我有必要的空闲时，就来完成这项计划。但在筹划时，我不时把与此有关的想法记在纸上。这些纸片大多数都遗失了，

但我找到一个本打算作为教条草案要旨的文件，其中包含当时我认为是各个知名教派的教义精髓，它没有任何冒犯任何宗教信徒的东西。原文如下：

“That there is one God, who made all things.

“天地间有个创造了世间万物的主宰。

“That he governs the world by his providence.

上帝运用天道统治世界。

“That he ought to be worshiped by adoration, prayer, and thanksgiving.

人应用敬慕、祈祷、感恩来敬拜上帝。

“But that the most acceptable service of God is doing good to man.

而最被上帝喜悦的服务方式是与人为善。

“That the soul is immortal.

灵魂不灭。

“And that God will certainly reward virtue and punish vice either here or hereafter.”

或在此时，或在他日，上帝必将褒奖美德、惩治恶行。”

My ideas at that time were, that the sect should be begun and spread at first among young and single men only; that each person to be initiated should not only declare his assent to such creed, but should have exercised himself with the thirteen weeks' examin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virtues, as in the before-mention'd model; that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society should be kept a secret, till it was become considerable, to prevent solicitations for the admission of improper persons, but that the members should each of them search among his acquaintance for ingenuous, well-disposed youths, to whom, with prudent caution, the scheme should be gradually communicated; that the members should engage to afford their advice, assistance, and support to each other in promoting one another's interests, business, and advancement in life; that, for distinction, we should be call'd The Society of the Free and Easy: free, as being, by the general practice and habit of the virtues, free from the dominion of vice; and particularly by the practice of industry and frugality, free from debt, which exposes a man to confinement, and a species of slavery to his creditors.

当时我的想法是：成立初期，这一教派应先只在年轻的单身汉中

传播。加入本教派的人不仅要宣布服从以上信条，还应按照前面提过的方法进行13周的道德自省和实践。为防止坏人申请入教，教派成员应对外严格保密，直至教派发展壮大。但信徒们均应在友人中物色率直、好心的年轻人，逐渐谨慎地告诉他们关于这个教派计划的信息。教派各成员应互相劝谏、互相帮扶，以促进彼此利益，帮助彼此事业发展，取得人生的进步。这一教派应起名为“自由和富裕人会”，以区分其他教派。所谓“自由”，是指养成了各种美德的习惯后，人们能够摆脱了恶行的控制，尤其是养成勤奋和节俭美德之后人们可以避免负债，而使人有遭到拘禁及被债主奴役的危险。

This is as much as I can now recollect of the project, except that I communicated it in part to two young men, who adopted it with some enthusiasm; but my then narrow circumstances, and the necessity I was under of sticking close to my business, occasion'd my postponing the further prosecution of it at that time; and my multifarious occupations, public and private, induc'd me to continue postponing, so that it has been omitted till I have no longer strength or activity left sufficient for such an enterprise; tho' I am still of opinion that it was a practicable scheme, and might have been very useful, by forming a great number of good citizens; and I was not discourag'd by the seeming magnitude of the undertaking, as I have always thought that one man of tolerable abilities may work great changes, and accomplish great affairs among mankind, if he first forms a good plan, and, cutting off all amusements or other employments that would divert his attention, makes the execution of that same plan his sole study and business.

关于这个计划，我所能记得的就是这些了。此外，我还记得曾把部分计划告诉过两个年轻人，他们相当热情地采纳了这个计划。但我当时境遇窘困，需要潜心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当时只好推迟执行

这个计划。后来我各种公私事务缠身，只得将其继续拖延，直至我终究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活力来完成这样一种事业，也就将其淡忘了。虽然迄今我还认为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如果能够把好公民组织起来，可能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这项事业表面看来艰巨繁杂，但我并未因此而气馁。我向来认为，一个有相当才能的人若能先制定良好的计划，并舍弃一切可能分散其注意力的娱乐活动或事务，将执行这项计划作为其唯一的对象和事业，就会带来巨大变革，在人世间成就伟大事业。

In 1732 I first publish'd my Almanack, under the name of Richard Saunders; it was continu'd by me about twenty-five years, commonly call'd Poor Richard's Almanac. I endeavor'd to make it both entertaining and useful, and it accordingly came to be in such demand, that I reap'd considerable profit from it, vending annually near ten thousand. And observing that it was generally read, scarce any neighborhood in the province being without it, I consider'd it as a proper vehicle for conveying instruction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who bought scarcely any other books; I therefore filled all the little spaces that occurr'd between the remarkable days in the calendar with proverbial sentences, chiefly such as inculcated industry and frugality, as the means of procuring wealth, and thereby securing virtue; it being more difficult for a man in want, to act always honestly, as, to use here one of those proverbs, it is hard for an empty sack to stand up-right.

1732年，我用理查德·桑德斯的名字首次发行了我的年鉴。我后来继续发行大约25年，人们一般称为《穷理查德年鉴》。我努力使它既有味又有用，因此这本书风靡一时，年销量接近一万本，使我获利颇丰。我看到大多数读者都读这本书，本州几乎每家都有一本，我想这是向普通民众传递知识的好方式，因为他们几乎就只买这本书。于

是，我把成语箴言印在历书中重要的日子之前的空白处，主要是教导人们勤奋和节俭是致富从而养成美德的方法。对于穷人来说，始终做到诚实比富人更难，这可以用其中一句谚语来形容，即空口袋难立直。

These proverbs, which contained the wisdom of many ages and nations, I assembled and form'd into a connected discourse prefix'd to the Almanack of 1757, as the harangue of a wise old man to the people attending an auction. The bringing all these scatter'd counsels thus into a focus enabled them to make greater impression. The piece, being universally approved, was copied in all the newspapers of the Continent; reprinted in Britain on a broad side, to be stuck up in houses; two translations were made of it in French, and great numbers bought by the clergy and gentry, to distribute gratis among their poor parishioners and tenants. In Pennsylvania, as it discouraged useless expense in foreign superfluities, some thought it had its share of influence in producing that growing plenty of money which was observable for several years after its publication.

这些谚语包含着来自各个时代不同国家的智慧，我将它们收集起来写成一篇衔接连贯的文章，放在1757年年鉴的前面，就像一位睿智的老者向参与拍卖会的人们大声演说一般。这样将分散的谏言集中起来能给人们留下更深的印象。文章得到众人赞赏，美国各家报纸都纷纷刊载；在英国，人们用大幅纸张翻印，准备贴在家里；文章还有两个法语译本，牧师和贵族都大量购买，免费将其发放给穷困的教区居民和佃农。在宾夕法尼亚，这篇文章反对把钱浪费在外国奢侈品上，这在文章发表后的几年里，市场上的货币不断地增多了，有人认为它对财富的增长起着一定作用。

I considered my newspaper, also, as another means of communicating instruction, and in that view frequently reprinted in it extracts from the Spectator, and other moral writers; and sometimes publish'd little pieces of my own, which had been first compos'd for reading in our Junto. Of these are a Socratic dialogue, tending to prove that, whatever might be his parts and abilities, a vicious man could not properly be called a man of sense; and a discourse on self-denial, showing that virtue was not secure till its practice became a habitude, and was free from the opposition of contrary inclinations. These may be found in the papers about the beginning Of 1735.

我认为我的报纸也是教导民众的另外一种途径，因此我常在报上登载《旁观者》或是其他道德论说文的摘要，有时还会刊发一些自己的小文章，这最初是我为在“密社”中讨论而写。其中有一篇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体写的，意在证明无论才华和能力如何，品行不端之人都不能称为明达之人。还有一篇讲述自制克己的文章，指出只有美德成为习惯，并不受相反习性所干扰时，这种品德才真正养成。这些文章也许可在1735年初的报纸上找到。

In the conduct of my newspaper, I carefully excluded all libelling and personal abuse, which is of late years become so disgraceful to our country. Whenever I was solicited to insert anything of that kind, and the writers pleaded, as they generally did,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and that a newspaper was like a stagecoach, in which anyone who would pay had a right to a place, my answer was, that I would print the piece separately if desired, and the author might have as many copies as he pleased to distribute himself, but that I would not take upon me to spread his detraction; and that, having contracted with my subscribers to

furnish them with what might be either useful or entertaining, I could not fill their papers with private altercation, in which they had no concern, without doing them manifest injustice. Now, many of our printers make no scruple of gratifying the malice of individuals by false accusations of the fairest characters among ourselves, augmenting animosity even to the producing of duels; and are, moreover, so indiscreet as to print scurrilous reflections on the government of neighboring states, and even on the conduct of our best national allies, which may be attended with the most pernicious consequences. These things I mention as a caution to young printers, and that they may be encouraged not to pollute their presses and disgrace their profession by such infamous practices, but refuse steadily, as they may see by my example that such a course of conduct will not, on the whole, be injurious to their interests.

在办报纸时，我小心地避免刊登一切带有诽谤性和人身攻击色彩的文章。近年来，这类文章给我国带来了莫大的负面影响。每当有人央求我在文章中插入该类语句时，他们一般会会辩解说，我们有出版自由，报纸就像公共马车，只要花钱就可以在上面占一个位置。我则会回答说，如果他愿意，我可以替他单独印刷那篇文章，由他自己去散发，他需要多少分都可以，但我不会承担他散播诽谤言论的责任。再者，既然我与我的订户签订了合约，要为他们提供或有实用性或有趣味性的东西，那我就不能在报纸上登载与他们无关的私人争论，假如我这样做，那显然对他们不公平。现在，我国报纸发行人中有许多人，为了迎合个人的恶意，毫不犹豫无事生非地污蔑诽谤我们中间一些品德最优秀的人物，挑拨离间，甚至引起决斗。此外，有些报纸还草率地发表关于邻国政府的低级言论，甚至对我们最友好的盟国也说三道四，这种举动可能会引起极为严重的后果。我提及这些事情是想告诫年轻的报纸发行人，劝告他们不要做这样令人不齿的事情，以免玷污他们的出版物，使他们的职业为之蒙羞。他们应坚定地拒绝这种

行为，因为他们可以从我的事例中看出，总体来说，这样做并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In 1733 I sent one of my journeymen to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where a printer was wanting. I furnish'd him with a press and letters, on an agreement of partnership, by which I was to receive one-third of the profits of the business, paying one-third of the expense. He was a man of learning, and honest but ignorant in matters of account; and, tho' he sometimes made me remittances, I could get no account from him, nor any satisfactory state of our partnership while he lived. On his decease, the business was continued by his widow, who, being born and bred in Holland, where, as I have been inform'd, the knowledge of accounts makes a part of female education, she not only sent me as clear a state as she could find of the transactions past, but continued to account with the greatest regularity and exactness every quarter afterwards, and managed the business with such success, that she not only brought up reputably a family of children, but, at the expiration of the term, was able to purchase of me the printing-house, and establish her son in it.

1733年，我派一个工人去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那里正缺一个印刷所。我提供给他一部印刷机和一些铅字，并与他订立了合伙协议，我将获得印刷所三分之一的利润，并负担三分之一的开支。他很有学问，人也诚实，就是不懂会计。所以虽然他有时给我汇钱，但我却从他那儿拿不到会计账目，他在世时我也没得到对我们合伙情况的令人满意的报告。他去世后，他的遗孀接管印刷所的事务交。她在荷兰出生并长大，据我所知，在荷兰，会计知识是女性教育的内容之一。她不仅把她能找到的关于以前生意的记录尽可能清楚地寄给我，后来每个季度都会寄来规范且精确的会计账目表。她把印刷店经营得

很成功，不仅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颇有名声，而且在合约期满时，她还有能力把印刷所从我手上买下来，让儿子独立经营。

I mention this affair chiefly for the sake of recommending that branch of education for our young females, as likely to be of more use to them and their children, in case of widowhood, than either music or dancing, by preserving them from losses by imposition of crafty men, and enabling them to continue, perhaps, a profitable mercantile house, with establish'd correspondence, till a son is grown up fit to undertake and go on with it, to the lasting advantage and enriching of the family.

我提这件事，主要是希望我们的女青年也能接受会计方面的教育。这样万一婚后守了寡，会计知识对她们和她们的孩子来说，可能要比音乐或舞蹈实用得多，它能使她们不受奸人蒙骗而受损失，或许还能让她们凭着业已建立的业务往来继续经营盈利的生意，直到儿子长大能够接手并继续经营为止，这样对于家庭既有益又有利。

About the year 1734 there arrived among us from Ireland a young Presbyterian preacher, named Hemphill, who delivered with a good voice, and apparently extempore, most excellent discourses, which drew together considerable numbers of different persuasion, who join'd in admiring him. Among the rest, I became one of his constant hearers, his sermons pleasing me, as they had little of the dogmatical kind, but inculcated strongly the practice of virtue, or what in the religious stile are called good works. Those, however, of our congregation, who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orthodox Presbyterians, disapprov'd his doctrine, and were join'd by most of the old clergy, who arraign'd him of heterodoxy before the synod,

in order to have him silenc'd. I became his zealous partisan, and contributed all I could to raise a party in his favor, and we combated for him a while with some hopes of success. There was much scribbling pro and con upon the occasion; and finding that, tho' an elegant preacher, he was but a poor writer, I lent him my pen and wrote for him two or three pamphlets, and one piece in the Gazette of April, 1735. Those pamphlets, as is generally the case with controversial writings, tho' eagerly read at the time, were soon out of vogue, and I question whether a single copy of them now exists.

大约在1734年，一位名叫汉姆菲尔年轻的长老会传教士从爱尔兰来到我们这儿。他声音洪亮，而且讲起道来，虽未经准备也能讲的天花乱坠，他的说教吸引了众多不同教派的信徒聚在一起，纷纷夸赞他。我也经常和其他人一起听他演讲，我很喜欢他的布道，因为他极少空谈教条，而是大力劝谏人们践行道德，或用宗教术语来讲所谓的积德。但我们会众中有些人自认为是正统的长老会教徒，反对汉姆菲尔讲的教义，大多数老牧师也站在他们这边，在教会会议上提出控告，抨击他为异端，想要禁止他传教。我成了汉姆菲尔的热烈拥护者，并尽我所能地组织了一个团体来支持他，为他斗争了一段时间，当时还有一些成功的希望。当时双方你来我往地展开笔伐。我发现尽管汉姆菲尔牧师演讲能力出众，但他的写作能力并不好，于是我代他写了两三本小册子，还有一篇文章发表在1735年4月的政府公报上的论文。如同所有争论性文章一样，那些小册子在当时风靡一时，但事后很快就无人问津了，恐怕现在一本也没留下来。

During the contest an unlucky occurrence hurt his cause exceedingly. One of our adversaries having heard him preach a sermon that was much admired, thought he had somewhere read the sermon before, or at least a part of it. On search he found that

part quoted at length, in one of the British Reviews, from a discourse of Dr. Foster's. This detection gave many of our party disgust, who accordingly abandoned his cause, and occasion'd our more speedy discomfiture in the synod. I stuck by him, however, as I rather approv'd his giving us good sermons compos'd by others, than bad ones of his own manufacture, tho' the latter was the practice of our common teachers. He afterward acknowledg'd to me that none of those he preach'd were his own; adding, that his memory was such as enabled him to retain and repeat any sermon after one reading only. On our defeat, he left us in search elsewhere of better fortune, and I quitted the congregation, never joining it after, tho' I continu'd many years my subscription for the support of its ministers.

在这场争论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大大损害了他的事业。我们的敌方中有个人曾听他讲授过一篇广为称道的教义，觉得以前在哪儿听过，或者至少听过一部分。经过搜索，他发现了那部分讲道的详细出处，原来是摘自一期《英国评论》上登载的福斯特博士的文章。这一发现使我们这派的许多人都开始厌恶汉姆菲尔，因此也就不再支持他，这就使我们在教会会议上的斗争很快地失败了。但我始终支持他，因为我听他念别人写的优秀的讲道文，也不愿听他自己杜撰的恶劣的说教，虽然我们普通的传教士都是自己写讲道文的。后来他向我承认，他所传授的教义都不是由他自己写的，还说他的记忆力非常惊人，任何教义但凡读过一遍，都能过目不忘。我们失败之后，他就离开了我们，去别处碰运气了。我也退出了教会会议，后来再没参加过，虽然我多年以来始终捐款支持牧师们。

I had begun in 1733 to study languages; I soon made myself so much a master of the French as to be able to read the books with ease. I then undertook the Italian. An acquaintance, who was also

learning it, us'd often to tempt me to play chess with him. Finding this took up too much of the time I had to spare for study, I at length refus'd to play anymore, unless on this condition, that the victor in every game should have a right to impose a task, either in parts of the grammar to be got by heart, or in translations, etc., which tasks the vanquish'd was to perform upon honour, before our next meeting. As we play'd pretty equally, we thus beat one another into that language. I afterwards with a little painstaking, acquir'd as much of the Spanish as to read their books also.

1733年，我开始学习外语。我很快便掌握了法语，能够轻松阅读法语书籍。接着我又开始学习意大利语。我有个朋友也在学意大利语，过去他常常怂恿我和他下棋。当我发现下棋占用了我太多的学习时间，后来就拒绝和他下了，除非他答应一个条件，即每盘棋的胜出一方有权让另一方完成一项任务，或是背诵语法，或是翻译等等，失败一方在下次见面前要完成这项任务。我俩的棋艺势均力敌，因此我们都起到了敦促对方学习那种语言的作用。后来我又花了些工夫学习西班牙语，也能阅读西班牙语书籍。

I have already mention'd that I had only one year's instruction in a Latin school, and that when very young, after which I neglected that language entirely. But, when I had attained an acquaintance with the French, Italian, and Spanish, I was surpriz'd to find, on looking over a Latin Testament, that I understood so much more of that language than I had imagined, which encouraged me to apply myself again to the study of it, and I met with more success, as those preceding languages had greatly smooth'd my way.

我在上文中已经提过，年幼时我只在一所拉丁学校读过一年书，

后来把拉丁文全都忘了。但学习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后，我在翻阅拉丁文版本的《圣经》时惊讶地发现，我对这种语言掌握得比我想象的要多，这鼓舞了我，决心再次学习拉丁文。后来我收获颇多，因为之前的语言学习已经为我大大地铺平了道路。

From these circumstances, I have thought that there is some inconsistency in our common mode of teaching languages. We are told that it is proper to begin first with the Latin, and, having acquir'd that, it will be easier to attain those modern languages which are deriv'd from it; and yet we do not begin with the Greek, in order more easily to acquire the Latin. It is true that, if you can clamber and get to the top of a staircase without using the steps, you will more easily gain them in descending; but certainly, if you begin with the lowest you will with more ease ascend to the top; and I would therefore offer it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ose who superintend the education of our youth, whether, since many of those who begin with the Latin quit the same after spending some years without having made any great proficiency, and what they have learnt becomes almost useless, so that their time has been lost, it would not have been better to have begun with the French, proceeding to the Italian, etc.; for, tho', after spending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quit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never arrive at the Latin, they would, however, have acquired another tongue or two, that, being in modern use, might be serviceable to them in common life.

从这些情况看来，我认为我们教授语言的一般模式存在不合理之处。人们常说应先从拉丁文学起，在掌握拉丁文之后，再去学习由其衍生而来的现代语言会容易一些。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从希腊语学起呢？这样再来学习拉丁文也会更容易些。的确，如果你不借助

台阶便能登至楼梯顶点，下楼时会更容易，但如果你从最低一级台阶开始往上爬，就能更容易到达顶点。许多人学拉丁文，学了几年毫无成就便停止了学习，而他们所学的几乎完全无用，因此时间也就浪费了。因此，我要请主管青年教育的部门考虑语言是否应先从法语学起，然后学意大利语等，因为即使在花费同样的时间后，他们停止语言学习，也达不到学习拉丁文的程度，但他们学到了现代通用的一两种语言，这在日常生活中也许对他们更有用。

After ten years' absence from Boston, and having become easy in my circumstances, I made a journey thither to visit my relations, which I could not sooner well afford. In returning, I call'd at Newport to see my brother, then settled there with his printing-house. Our former differences were forgotten, and our meeting was very cordial and affectionate. He was fast declining in his health, and requested of me that, in case of his death, which he apprehended not far distant, I would take home his son, then but ten years of age, and bring him up to the printing business. This I accordingly perform'd, sending him a few years to school before I took him into the office. His mother carried on the business till he was grown up, when I assisted him with an assortment of new types, those of his father being in a manner worn out. Thus it was that I made my brother ample amends for the service I had depriv'd him of by leaving him so early.

我离开波士顿已经10年了，如今生活富足，于是我就踏上旅途，回波士顿去拜访我的亲戚，而以前我是负担不起旅费的。在回乡的途中，我去新港看望了哥哥，他当时已经把他的印刷店搬到了那里了。我们从前的芥蒂一笔勾销，会面亲切而融洽。哥哥身体每况愈下，恐怕死期不远了，于是请求我在他去世后把他当时只有10岁的儿子接到我家去，让他学习印刷业务。他的请求我照办了，我先把他的儿子送

到学校学习了几年，后来又让他跟着学习印刷业务。他母亲继续经营印刷所的事务，直到他成年为止。他成人后，我送他一套新铅字，他父亲那些已经磨损了。当年我很早就离开了哥哥，没有为他服务多久，通过这种方式，我对他做了丰厚的补偿。

In 1736 I lost one of my sons, a fine boy of four years old, by the small-pox, taken in the common way. I long regretted bitterly, and still regret that I had not given it to him by inoculation. This I mention for the sake of parents who omit that operation,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y should never forgive themselves if a child died under it; my example showing that the regret may be the same either way, and that, therefore, the safer should be chosen.

1736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是个四岁的漂亮男孩，因感染天花夭折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懊悔不已，现在仍然后悔没给他种痘。我提及此事，是为了提醒那些疏忽此事的父母，万一孩子因此而死，他们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我的实例表明，种与不种都可能都有危险，因此还是应该采取更为安全的办法。

Our club, the Junto, was found so useful, and afforded such satisfaction to the members, that several were desirous of introducing their friends, which could not well be done without exceeding what we had settled as a convenient number, viz., twelve. We had from the beginning made it a rule to keep our institution a secret, which was pretty well observ'd; the intention was to avoid applications of improper persons for admittance, some of whom, perhaps, we might find it difficult to refuse. I was one of those who were against any addition to our number, but, instead of it, made in writing a proposal, that every member separately should

endeavor to form a subordinate club, with the same rules respecting queries, etc., and without informing them of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Junto. The advantages proposed were, the improvement of so many more young citizens by the use of our institutions; our better acquaintance with the general sentiments of the inhabitants on any occasion, as the Junto member might propose what queries we should desire, and was to report to the Junto what pass'd in his separate club; the promotion of our particular interests in business by more extensive recommendation, and the increase of our influence in public affairs, and our power of doing good by spreading thro' the several clubs the sentiments of the Junto.

我们的社团（即“密社”）对于会员来说大有裨益，能带来很大的满足感，于是有些会员想介绍朋友入会，但这样就会超过我们曾经约定的俱乐部的适当限额，即12个人。从一开始我们一向是秘密的，这一点大家都严格遵守了，目的就在于避免坏人申请加入，其中的某些人可能会使我们难以拒绝。我是反对放宽限额的人之一，还写了一份建议书，提议俱乐部的每个成员设法单独成立下属俱乐部，拟定同样的讨论规则等，但不要透露他们与“密社”的关系。这一提议的好处是，更多年轻人可以通过参加我们的俱乐部得到进步，在任何时候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居民们的意见，因为社员可以在分社中提议讨论我们研讨的问题，然后向“密社”报告各分社的讨论过程；通过更为广泛的推广和介绍，我们可以增进各人事业上的利益；我们可以把“密社”里的主张和看法散播到分社中去，这样可以加强我呢边的政治影响和为社会服务的力量。

The project was approv'd, and every member undertook to form his club, but they did not all succeed. Five or six only were compleated, which were called by different names, as the Vine, the Union, the Band, etc. They were useful to themselves, and afforded

us a good deal of amusement, information, and instruction, besides answering, in some considerable degree, our views of influencing the public opinion on particular occasions, of which I shall give some instances in course of time as they happened.

我的提议通过了，每位成员都着手成立自己的分社，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成功，只有五六个分社真正组织起来了。它们的名字多种多样，如“葡萄藤”、“联盟会”、“联合社”等等。它们不但对社员很有益，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乐趣、信息与启示，还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我们的期望，在某些特定事件中影响公众的舆论，我会在后面在恰当的时候还要举出一些这样的例子。

My first promotion was my being chosen, in 1736, clerk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The choice was made that year without opposition; but the year following, when I was again propos'd (the choice, like that of the members, being annual), a new member made a long speech against me, in order to favor some other candidate. I was, however, chosen, which was the more agreeable to me, as, besides the pay for the immediate service as clerk, the place gave me a better opportunity of keeping up an interest among the members, which secur'd to me the business of printing the votes, laws, paper money, and other occasional jobs for the public, that, on the whole, were very profitable.

1736年我当选为州议会秘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升迁。那年我全票通过，但第二年我又被提名为秘书人选时（和议员一样，秘书的任期也是一年），一位新议员发表了长篇演说反对我，以帮助另一位候选人。但我还是当选了，这让我十分愉快，因为我除了可以得到秘书的工资外，这一职位还能让我更好地与议员们保持联系，从而揽得印

刷选票、法律、纸币的生意和其他临时的公家业务。总体来说，这些生意的利润十分丰厚。

I therefore did not like the opposition of this new member, who was a gentleman of fortune and education, with talents that were likely to give him, in time, great influence in the House, which, indeed, afterwards happened. I did not, however, aim at gaining his favor by paying any servile respect to him, but, after some time, took this other method. Having heard that he had in his library a certain very scarce and curious book, I wrote a note to him, expressing my desire of perusing that book, and requesting he would do me the favor of lending it to me for a few days. He sent it immediately, and I return'd it in about a week with another note, expressing strongly my sense of the favor. When we next met in the House, he spoke to me (which he had never done before), and with great civility; and he ever after manifested a readiness to serve me on all occasions, so that we became great friends, and our friendship continued to his death. This is another instance of the truth of an old maxim I had learned, which says, “He that has once done you a kindness will be more ready to do you another, than he whom you yourself have obliged.” And it shows how much more profitable it is prudently to remove, than to resent, return, and continue inimical proceedings.

我很不希望这位新议员反对我。因为他是一位财力雄厚、教养良好的绅士，才能出众，假以时日的话，他很可能会成为议会中一个很有势的人，后来也确实如此。但我不想靠卑躬屈膝去奉承他，以获得他的支持，一段时间后，我通过其他方式做到了。我听说他藏有一本十分稀有且珍贵的书，就写了张便条给他，表示很希望拜读此书，请他将书借我几日。他便立刻把书寄来了，大约一周后，我把书还给了

他，又附上一张便条，对他的恩惠深表感激。我们再在议会见面时，他就开口和我说话了（此前从未有过），且彬彬有礼。从此以后，无论什么情况，他总是愿意帮我的忙，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这又一次印证了我曾经听过的一句古老的格言："曾施惠于你的人会愿意再次施惠于你，他们比受你恩惠的人更加乐意这么做。"这件事也说明，与其憎恨、报复对方，使双方的敌意持续下去，不如谨慎地消除这种情绪更为有益。

In 1737, Colonel Spotswood, late governor of Virginia, and then postmaster-general, being dissatisfied with the conduct of his deputy at Philadelphia, respecting some negligence in rendering, and inexactitude of his accounts, took from him the commission and offered it to me. I accepted it readily, and found it of great advantage; for, tho' the salary was small, it facilitated the correspondence that improv'd my newspaper, increas'd the number demanded, as well as the advertisements to be inserted, so that it came to afford me a considerable income. My old competitor's newspaper declin'd proportionably, and I was satisfy'd without retaliating his refusal, while postmaster, to permit my papers being carried by the riders. Thus he suffer'd greatly from his neglect in due accounting; and I mention it as a lesson to those young men who may be employ'd in managing affairs for others, that they should always render accounts, and make remittances, with great clearness and punctuality. The character of observing such a conduct is the most powerful of all recommendations to new employments and increase of business.

1737年，斯波茨伍德上校（弗吉尼亚前任州长，时任邮电总长）因不满费城的代理人在账目处理上的疏忽和账目不明，就免了其职务，让我接任。我欣然接受，后来发现这个职位对我大有好处，因为

尽管薪水不高，却让报纸发行更加方便，间接改进了报纸，并增加了发行量，同时也招揽来更多广告，结果是这一职位大大增加了我的收入。我那位老竞争对手的报纸相应地走了下坡路。我心满意足，也不去报复他管理邮局时不许邮差替我送报的行为了。就这样，他因疏于账目管理而备受其害。我提到这点，是希望年轻人能吸取教训，如若受雇于人，替人管理事务，就应始终做到清楚记账，按时汇款，条理清晰，不出差错。如能做到这点，那么其品格就是他谋求新职位、拓展新业务时最好的推荐书，能为他谋得新职位，招揽来更多生意。

I began now to turn my thoughts a little to public affairs, beginning, however, with small matters. The city watch was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at I conceiv'd to want regulation. It was managed by the constables of the respective wards in turn; the constable warned a number of housekeepers to attend him for the night. Those who chose never to attend paid him six shillings a year to be excus'd, which was suppos'd to be for hiring substitutes, but was, in reality, much more than was necessary for that purpose, and made the constableship a place of profit; and the constable, for a little drink, often got such ragamuffins about him as a watch, that respectable housekeepers did not choose to mix with. Walking the rounds, too, was often neglected, and most of the nights spent in tippling. I thereupon wrote a paper, to be read in Junto, representing these irregularities, but insisting more particularl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is six-shilling tax of the constables, respect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those who paid it, since a poor widow housekeeper, all whose property to be guarded by the watch did not perhaps exceed the value of fifty pounds, paid as much as the wealthiest merchant, who had thousands of pounds worth of goods in his stores.

这时我开始把自己的想法稍稍转至公共事务上来，但一开始我是从小事着手的。费城的巡查制度是我认为亟待整顿的几件事之一。夜间巡查原是由各区的治安官轮流执行，治安官通知若干户主和他一起巡夜。那些不来巡查的每年出六个先令，便可免去这项差役。这笔钱原本是用来雇用替代者的，而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实际所需，于是治安官一职就成了肥差。治安官因为贪杯，便常常找些流浪汉一起巡夜，而品行端正的户主就不愿参与其中了。巡查工作也常常被忽视，大多数夜晚都在喝酒中度过的。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在“密社”中宣读，指出了这些不当情形，还着重强调了不考虑各人实际情况、一律规定付给治安官六先令的做法造成的不公，因为一个穷困的寡妇所需保护的全部财产价值也许还不超过50镑，但她所付的钱却和库存中有价值千镑的富商一样多。

On the whole, I proposed as a more effectual watch, the hiring of proper men to serve constantly in that business; and as a more equitable way of supporting the charge the levying a tax that should be proportion'd to the property. This idea, being approv'd by the Junto, was communicated to the other clubs, but as arising in each of them; and though the plan was not immediately carried into execution, yet, by preparing the minds of people for the change, it paved the way for the law obtained a few years after, when the members of our clubs were grown into more influence.

大体上讲，我提出了一种更为有效的巡夜方式，即雇用合适的人手长期巡夜；另外，为使巡夜费的征收更为公平，各人应根据自己的财产额度按比例交费。这一想法经秘社通过后，就传到各个分社，作为各分社自己提出的一个计划。尽管这项计划未能马上实施，但它使人们对改革做好了心理准备，也为几年以后法律的通过铺平了道路，那时我们俱乐部会员的影响力已经更大了。

About this time I wrote a paper (first to be read in Junto, but it was afterward publish'd) on the different accidents and carelessnesses by which houses were set on fire, with cautions against them, and means proposed of avoiding them. This was much spoken of as a useful piece, and gave rise to a project, which soon followed it, of forming a company for the more ready extinguishing of fires, and mutual assistance in removing and securing the goods when in danger. Associates in this scheme were presently found, amounting to thirty. Our articles of agreement oblig'd every member to keep always in good order, and fit for use, a certain number of leather buckets, with strong bags and baskets (for packing and transporting of goods), which were to be brought to every fire; and we agreed to meet once a month and spend a social evening together, in discoursing and communicating such ideas as occurred to us upon the subject of fires, as might be useful in our conduct on such occasions.

大约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首先在秘社里宣读，后来发表了），论述使房子着火的各种事故和疏忽和防火须知，提醒人们要小心火烛。人们纷纷认为这篇文章非常有益，并由此制定计划来组建一支消防队，以便能更迅速扑灭火灾及危险时要互帮互助转移货物。不久就有30人参加这个组织。我们订立了合约，规定每个成员都应随时备好一定数量且适用的皮水桶，还有结实的袋子和篮子（用于包装和运送货物），一旦发生火灾就必须把它们运到现场。我们还约定每月见面开一次晚会，相互交流讨论我们能够想到的防火话题，这在火灾真正发生时或许对我们有用。

The utility of this institution soon appeared, and many more desiring to be admitted than we thought convenient for one company, they were advised to form another, which was

accordingly done; and this went on, one new company being formed after another, till they became so numerous as to include most of the inhabitants who were men of property; and now, at the time of my writing this, tho' upward of fifty year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at which I first formed, called the Union Fire Company, still subsists and flourishes, tho' the first members are all deceas'd but myself and one, who is older by a year than I am. The small fines that have been paid by members for absence at the monthly meetings have been apply'd to the purchase of fire-engines, ladders, fire-hooks, and other useful implements for each company, so that I question whether there is a city in the world better provided with the means of putting a stop to beginning conflagrations; and, in fact, since these institutions, the city has never lost by fire more than one or two houses at a time, and the flames have often been extinguished before the house in which they began has been half consumed.

消防队的效用不久就很明显了，要求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大大超过我们认为合适的限额，于是建议他们另组一队，他们就照办了。就这样，新的消防队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数量越来越多，后来大多数有钱居民也加入其中。到现在我写自传之时，尽管离消防队建立已有50年之久，但我最初成立的“联合消防队”仍然存在，且发展很好，只是第一批成员中只我和另一位依然健在，此人比我要大一岁。当时每月开会缺席的成员要交纳数额不大的罚款，用于为各队购买救火机、消防梯、消防钩和其他灭火设备，因此我想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能比费城更为迅速地控制住刚刚发生的火灾了。事实上，自从成立了消防队之后，费城从未有过烧毁两间住房以上的大火灾，通常在起火房屋被烧毁一半之前，火就被扑灭了。

In 1739 arrived among us from Ireland the Reverend Mr.

Whitefield, who had made himself remarkable there as an itinerant preacher. He was at first permitted to preach in some of our churches; but the clergy, taking a dislike to him, soon refus'd him their pulpits, and he was oblig'd to preach in the fields. The multitudes of all sects and denominations that attended his sermons were enormous, and it was matter of speculation to me, who was one of the number, to observe the extraordinary influence of his oratory on his hearers, and how much they admir'd and respected him, notwithstanding his common abuse of them, by assuring them that they were naturally half beasts and half devils. It was wonderful to see the change soon made in the manners of our inhabitants. From being thoughtless or indifferent about religion, it seem'd as if all the world were growing religious, so that one could not walk thro' the town in an evening without hearing psalms sung in different families of every street.

1739年，怀特菲尔德牧师从爱尔兰来到了我们这里，他是一位巡回传教士，在爱尔兰颇有名气。起初，他被允许在我们这儿的几个教堂内布道，但教堂的牧师不喜欢他，不久就不许他在教坛上讲道了，他只好在狂野传道。各个教派听他传道的人都非常多，我也是听众之一。看得出，他的演讲对听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他常常辱骂他们，说他们天生就一半是野兽，一半是魔鬼，他们还是崇拜他、尊敬他，这令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怀特菲尔德的演讲很快使居民们的行为习惯发生了改变，我对此感到十分惊奇。他们原本认为宗教无足轻重、可有可无，而现在似乎整个世界都宗教化了；傍晚时分在这座城市中行走时，人们总能听到每条街上各家各户都在唱赞美诗。

And it being found inconvenient to assemble in the open air, subject to its inclemencies, the building of a house to meet in was no sooner propos'd, and persons appointed to receive contributions,

but sufficient sums were soon receiv'd to procure the ground and erect the building, which was one hundred feet long and seventy broad, about the size of Westminster Hall; and the work was carried on with such spirit as to be finished in a much shorter time than could have been expected. Both house and ground were vested in trustees, expressly for the use of any preacher of any religious persuasion who might desire to say something to the people at Philadelphia; the design in building not being to accommodate any particular sect, but the inhabitants in general; so that even if the Mufti of Constantinople were to send a missionary to preach Mohammedanism to us, he would find a pulpit at his service.

因为受天气影响，露天集会常有不便，于是很快就有人提出建造教堂的计划，还指定了专人接受捐款，这样，马上就募集了足够的钱款，作为购买地皮修造教堂的费用。教堂长100尺，宽70尺，面积大小与威斯敏斯特教堂差不多。人们修建教堂的情绪十分高，工程完成时间比预计工期要短得多。教堂建筑和地皮都授权给保管委员会保管，任何教派的牧师若想对费城的民众进行布道，都可使用这座教堂。它的建造不是为了某个特定教派行方便，而是为普通民众考虑，因此，即使是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学者要派传教士来向我们传授伊斯兰教教义，他也能在此讲授。

Mr. Whitefield, in leaving us, went preaching all the way thro' the colonies to Georgia. The settlement of that province had lately been begun, but, instead of being made with hardy, industrious husbandmen, accustomed to labor, the only people fit for such an enterprise, it was with families of broken shop-keepers and other insolvent debtors, many of indolent and idle habits, taken out of the jails, who, being set down in the woods, unqualified for clearing land, and unable to endure the hardships of a new settlement,

perished in numbers, leaving many helpless children unprovided for. The sight of their miserable situation inspir'd the benevolent heart of Mr. Whitefield with the idea of building an Orphan House there, in which they might be supported and educated. Returning northward, he preach'd up this charity, and made large collections, for his eloquence had a wonderful power over the hearts and purses of his hearers, of which I myself was an instance.

怀特菲尔德先生离开我们后，沿途继续布道，经过了诸多殖民地，一直到了佐治亚。佐治亚的移民潮刚刚开始，但移居去的不是强壮勤劳、惯于劳作的农夫（他们是唯一适于此项事业的人），而是些破产的商人，以及其他破产的债务人及其家属。他们大都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刚从监狱出来，住在林地里以后因不能胜任开垦土地的工作，不能忍受拓荒的艰苦，大批死亡，留下许多无依无靠的孩子。看到他们悲惨的境况，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慈悲之心大受触动，想在当地办一家孤儿院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在回北方的路上，他一直宣传这项慈善事业，筹集了许多款项，因为他口才出众，能使听众们心悦诚服地慷慨解囊，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I did not disapprove of the design, but, as Georgia was then destitute of materials and workmen, and it was proposed to send them from Philadelphia at a great expense, I thought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to have built the house here, and brought the children to it. This I advis'd; but he was resolute in his first project, rejected my counsel, and I therefore refus'd to contribute. I happened soon after to attend one of his sermons, in the course of which I perceived he intended to finish with a collection, and I silently resolved he should get nothing from me, I had in my pocket a handful of copper money, three or four silver dollars, and five pistols in gold. As he proceeded I began to soften, and concluded to

give the coppers. Another stroke of his oratory made me asham'd of that, and determin'd me to give the silver; and he finish'd so admirably, that I empty'd my pocket wholly into the collector's dish, gold and all. At this sermon there was also one of our club, who, being of my sentiments respecting the building in Georgia, and suspecting a collection might be intended, had, by precaution, emptied his pockets before he came from home. Towards the conclusion of the discourse, however, he felt a strong desire to give, and apply'd to a neighbor, who stood near him, to borrow some money for the purpose. The application was unfortunately [made] to perhaps the only man in the company who had the firmness not to be affected by the preacher. His answer was, “At any other time, Friend Hopkinson, I would lend to thee freely; but not now, for thee seems to be out of thy right senses.”

我并不反对这项计划，但当时佐治亚缺乏材料和劳力。有人建议花高价把所需的人力物力从费城运过去，我倒认为这还不如把孤儿院建在费城，把孩子们接到费城来。我向他提了这个建议，但他决意要执行原来的计划，不听我的忠告，因此我也拒绝捐款。不久之后，我恰好参加了他的一场布道会，当时我看出他打算在布道会结束时向听众募集资金，我暗暗打定主意，一个钱也不给。当时我的口袋里有一把铜钱，三四个银元，还有五个金币。当他讲道时，我开始软化，决定把铜钱捐给他；后来他的演说再次触动了我，让我深感羞愧，我决定把银元也捐出去；到了演讲末尾，他又讲得如此之妙，于是我把口袋的钱倾囊相赠，全都放进了收款人的盘子里，包括金币在内。同时听道的还有我们秘社的一员，他也像我一样不赞同在佐治亚州修建孤儿院，他猜到也许要捐款，于是为小心起见，他在出门前就掏空了自己的口袋。然而演讲快要结束时，他十分想捐点钱，就向站在他附近的一位邻居借钱捐款。但是不幸的是他的邻居可能是在场所有人里唯一未受布道者的影响、始终保持坚定立场的人。他回答说：“我的朋友霍普金森啊，其他任何时候我都会大方地把钱借给你，但是现在不

行，因为你看来有些不大对劲了。”

Some of Mr. Whitefield's enemies affected to suppose that he would apply these collections to his own private emolument; but I who was intimately acquainted with him (being employed in printing his Sermons and Journals, etc.), never had the least suspicion of his integrity, but am to this day decidedly of opinion that he was in all his conduct a perfectly honest man, and methinks my testimony in his favor ought to have the more weight, as we had no religious connection. He us'd, indeed, sometimes to pray for my conversion, but never had the satisfaction of believing that his prayers were heard. Ours was a mere civil friendship, sincere on both sides, and lasted to his death.

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几位敌人故意宣称他会把这些筹得的捐款作为个人报酬，但我与他关系很好（曾为他印刷过布道文和日志等），对他的正直品格毫不怀疑，直到今天，我依然坚定地相信，从他的一举一动来看，怀特菲尔德先生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我想我替他作证应该受人重视，因为我们不属于同一教派。的确，他有时会为我祈祷，希望我改信他的宗教，但我没有改信，因此他也没有理由相信上帝听到了他的祈祷从而心满意足。我们之间仅仅保持着世俗的友谊，双方诚恳相待，直至他去世。

The following instance will show something of the terms on which we stood. Upon one of his arrivals from England at Boston, he wrote to me that he should come soon to Philadelphia, but knew not where he could lodge when there, as he understood his old friend and host, Mr. Benezet, was removed to Germantown. My answer was, “You know my house; if you can make shift with its

scanty accommodations, you will be most heartily welcome.” He reply'd, that if I made that kind offer for Christ's sake, I should not miss of a reward. And I returned, “Don't let me be mistaken; it was not for Christ's sake, but for your sake.” One of our common acquaintance jocosely remark'd, that, knowing it to be the custom of the saints, when they received any favor, to shift the burden of the obligation from off their own shoulders, and place it in heaven, I had contriv'd to fix it on earth.

下面这件事多少可以说明我们的友情。有一次他从英格兰来到波士顿，给我写信说很快要到费城来，但不知在费城逗留期间可以住在哪里，因为他得知老朋友兼房东贝内泽先生已搬到日耳曼城去了。我回复道：“你知道我住的地方，如果你不嫌简陋愿意将就的话，我由衷地欢迎你来我家住。”他回答说如果我看在基督的份上愿意招待他，一定会有好报。我又回复说：“不要误会我，我可不是看在基督的份上，而是看在你的份上。”我们两人共同的一位朋友打趣地说，这是圣徒的习惯，当他们受到恩惠时，会把这人情从他们自己肩上移开，记在天上，而我却想把它记在地上。

The last time I saw Mr. Whitefield was in London, when he consulted me about his Orphan House concern, and his purpose of appropriating i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llege.

我最后一次见到怀特菲尔德先生是在伦敦，当时他询问我孤儿院的事，他打算用那儿的建筑办一所大学。

He had a loud and clear voice, and articulated his words and sentences so perfectly, that he might be heard and understood at a

great distance, especially as his auditories, however numerous, observ'd the most exact silence. He preach'd one evening from the top of the Court-house steps, which are in the middle of Market-street, and on the west side of Second-street, which crosses it at right angles. Both streets were fill'd with his hearers to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Being among the hindmost in Market-street, I had the curiosity to learn how far he could be heard, by retiring backwards down the street towards the river; and I found his voice distinct till I came near Front-street, when some noise in that street obscur'd it. Imagining then a semi-circle, of which my distance should be the radius, and that it were fill'd with auditors, to each of whom I allow'd two square feet, I computed that he might well be heard by more than thirty thousand. This reconcil'd me to the newspaper accounts of his having preach'd to twenty-five thousand people in the fields, and to the ancient histories of generals haranguing whole armies, of which I had sometimes doubted.

怀特菲尔德先生声音洪亮清晰，他发音清楚，离他很远都能听到他说话并能听清楚他的话，尤其无论听众，无论人数多少，总是鸦雀无声。有天傍晚，他在法院台阶上面布道。法院位于市场街中部，第二街路西（这两条街成直角交错）。两条街上都站满了听众，直到很远的地方。我当时站在市场街的尽头，好奇地想知道他的声音可以传多远，于是一直沿街向河边后退。我发现直到走近前街，他的声音依然清晰可闻，当我跑到前街时，街上嘈杂声才能把他的声音盖过去。当时我就想：假如以我的距离做个半圆，我与他的距离是半径，半圆中站满了听众，假定每人占地两平方英尺，经计算得出，可能超过三万人都能够听到他演讲。这使我终于相信报纸上关于他曾在野外向25,000人布道的报道，以及将军们慷慨激昂地向全军发表讲话的古老历史，以前我还不时对此持怀疑态度呢。

By hearing him often, I came to distinguish easily between sermons newly compos'd, and those which he had often preach'd in the course of his travels. His delivery of the latter was so improv'd by frequent repetitions that every accent, every emphasis, every modulation of voice, was so perfectly well turn'd and well plac'd, that, without being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one could not help being pleas'd with the discourse; a pleasure of much the same kind with that receiv'd from an excellent piece of musick. This is an advantage itinerant preachers have over those who are stationary, as the latter cannot well improve their delivery of a sermon by so many rehearsals.

因为常常听他布道，我渐渐能将他新近创作的布道文和曾在旅途中多次传授的布道文轻易辨别开了。因为重复讲了多次，他传授后者时演说有了很大改进，每一个重音、每一次强调、每一次声调的变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即使听者对演讲的主题不感兴趣，也忍不住会对他的演讲倍感愉快，如同听到一首美妙的乐曲一样。比起固定在某地的牧师，这是巡回传教士的优势所在，因为前者无法通过多次演练来提高自己布道演说的水平。

His writing and printing from time to time gave great advantage to his enemies; unguarded expressions, and even erroneous opinions, delivered in preaching, might have been afterwards explain'd or qualifi'd by supposing others that might have accompani'd them, or they might have been deny'd; but litera scripta monet. Critics attack'd his writings violently, and with so much appearance of reason as to diminish the number of his votaries and prevent their encrease; so that I am of opinion if he had never written anything, he would have left behind him a much more numerous and important sect, and his reputation might in that

case have been still growing, even after his death, as there being nothing of his writing on which to found a censure and give him a lower character, his proselytes would be left at liberty to feign for him as great a variety of excellence as their enthusiastic admiration might wish him to have possessed.

怀特菲尔德先生不时地写作并发表文章，让他的敌人有很大可乘之机。假如布道时说错了话甚至提出错误的观点，以后都能加以解释，或是再用别的话作出修正，或是直接加以否认，但白纸黑字却是不会磨灭的。批评者们猛烈抨击他的文章，而且似乎说得很有道理，以使他的信徒人数日渐减少、再无增加。所以我认为，如果他没有写过任何文章的话，他的信徒一定更多，所创的教派一定更加举足轻重，而他的名声也会继续扩大，甚至他离开人世后也会依然如此。因为没有留下什么作品，别人就无从责难和诋毁他，他的信徒们会热烈地崇拜着他，会尽情想象着他具有种种优良的品质。

My business was now continually augmenting, and my circumstances growing daily easier, my newspaper having become very profitable, as being for a time almost the only one in this and the neighboring provinces. I experienced, too, the truth of the observation, “that after getting the first hundred pound, it is more easy to get the second,” money itself being of a prolific nature.

这时，我的印刷生意越来越好，境况也日渐宽裕，我办的报纸获利丰厚，因为一段时间内，它几乎是本州及邻州惟一一家报社。我也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理：“赚到第一个100镑后，再赚第二个就容易多了”，因为金钱本身就是繁生的。

The partnership at Carolina having succeeded, I was encourag'd to engage in others, and to promote several of my workmen, who had behaved well, by establishing them with printing-houses in different colonies, on the same terms with that in Carolina. Most of them did well, being enabled at the end of our term, six years, to purchase the types of me and go on working for themselves, by which means several families were raised. Partnerships often finish in quarrels; but I was happy in this, that mine were all carried on and ended amicably, owing, I think, a good deal to the precaution of having very explicitly settled, in our articles, everything to be done by or expected from each partner, so that there was nothing to dispute, which precaution I would therefore recommend to all who enter into partnerships; for, whatever esteem partners may have for, and confidence in each other at the time of the contract, little jealousies and disgusts may arise, with ideas of inequality in the care and burden of the business, etc., which are attended often with breach of friendship and of the connection, perhaps with lawsuits and other disagreeable consequences.

我在卡罗来纳的合伙取得了成功，于是备受鼓舞，想继续开展其他合伙业务。我提拔了一些表现良好的工人，按卡罗来纳合伙的条件，与他们订立合约，让他们去别的殖民地开印刷所。他们大多数都干得不错，六年合约期满时，已有能力从我这儿买下铅字，独立门户了。好几户人家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养家糊口，养育子女。合伙关系常以双方争执告终，但我却很高兴地看到，我与他人的合伙都进行得很顺利，结局也很和谐。我想，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事先有所防范，在我们的合约中清楚地列出了各方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这样合伙双方就不至于发生争执。因此，我建议要和别人建立合伙关系的人们都事先做好防范，因为不管合伙双方如何互相尊敬，签订合约时如何互相信赖，日后都有可能心生嫉妒和嫌隙，认为对方在事务的照管和承担上不平等，等等，这常常会使得友谊破裂，往来断绝，或许还

要闹出官司及引起其他不良后果。

I had, on the whole, abundant reason to be satisfied with my being established in Pennsylvania. There were, however, two things that I regretted, there being no provision for defense, nor for a compleat education of youth; no militia, nor any college. I therefore, in 1743, drew up a proposal for establishing an academy; and at that time, thinking the Reverend Mr. Peters, who was out of employ, a fit person to superintend such an institution, I communicated the project to him; but he, having more profitable views in the service of the proprietaries, which succeeded, declin'd the undertaking; and, not knowing another at that time suitable for such a trust, I let the scheme lie a while dormant. I succeeded better the next year, 1744, in proposing and establishing a Philosophical Society. The paper I wrote for that purpose will be found among my writings, when collected.

总体来说，我对自己在宾夕法尼亚的立业这一点感到很满意。然而，有两件事却让我遗憾不已，一是这里没有防卫的准备，二是没有一所完整的教育年轻人的学府。这里没有军队，也没有大学。因此，在1743年时我提出了建立一所高校的议案，当时彼得斯牧师正好没有工作，我认为他是管理这样一个机构的合适人选，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他。但是他认为为地主服务更能赚钱，而且已经谋得了这样一个职位，当时就婉拒了这个工作。我那时想不出第二个可以托付此事的人，于是把这个计划暂时搁置了。第二年，也就是1744年，我提出并成功创办了一所哲学学会。我为此所写的文章可在我以后出版的文集里找到。

With respect to defense, Spain having been several years at war

against Great Britain, and being at length join'd by France, which brought us into great danger; and the labored and long-continued endeavor of our governor, Thomas, to prevail with our Quaker Assembly to pass a militia law, and make other provisions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province, having proved abortive, I determined to try what might be done by a voluntary association of the people. To promote this, I first wrote and published a pamphlet, entitled PLAIN TRUTH, in which I stated our defenceless situation in strong lights, with the necessity of union and discipline for our defense, and promis'd to propose in a few days an association, to be generally signed for that purpose. The pamphlet had a sudden and surprising effect. I was call'd upon for the instrument of association, and having settled the draft of it with a few friends, I appointed a meeting of the citizens in the large building before mentioned. The house was pretty full; I had prepared a number of printed copies, and provided pens and ink dispers'd all over the room. I harangued them a little on the subject, read the paper, and explained it, and then distributed the copies, which were eagerly signed, not the least objection being made.

至于防卫事务，当时西班牙已与英国交战数年，后来法国也加入了西班牙的阵线，使我们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我们的州长托马斯不断竭力劝说以贵格会为主导的议会通过民兵法，并采取其他措施保卫本州安全，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我决定尝试招募志愿部队用于防卫。为促进此事，我先撰写并发行了一本小册子，叫做《明显的事实》。在小册子里，我强调了我们当前缺乏防卫的状态，指出我们必须征集并训练军队用以防卫。我还保证在数天内提议组织一个团体，广泛征人签名加入。这本小册子产生了意想不到令人惊奇的效果。人们向我索要入队志愿书，我就和几个朋友一块儿草拟了一份，并在前面提过的教堂里召开了一次市民大会。当时教堂里挤满了人，我预先印好了申请书，在教堂各处也备好了笔墨。我就防卫问题做了个简短

演说，又把申请书朗读了一遍并作了解释，然后把申请书分发下去。人们踊跃在申请书上签名，没有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When the company separated, and the papers were collected, we found above twelve hundred hands; and, other copies being dispersed in the country, the subscribers amounted at length to upward of ten thousand. These all furnished themselves as soon as they could with arms, formed themselves into companies and regiments, chose their own officers, and met every week to be instructed in the manual exercise, and other parts of military discipline. The women, by subscriptions among themselves, provided silk colors, which they presented to the companies, painted with different devices and mottos, which I supplied.

散会之后，我们把申请书收集起来，我们征集了1,200名以上的队员。当时还有申请书被发到了本州各地，最终申请的人数达一万以上。他们立即准备武器，自行编成连队和团队，选出指挥官，每周集会一次进行武器操练或是其他军事训练。妇女们集资购买了丝制彩旗，送给各个连队，上面印有我提供的各类图案和箴言。

The officers of the companies composing the Philadelphia regiment, being met, chose me for their colonel; but, conceiving myself unfit, I declin'd that station, and recommended Mr. Lawrence, a fine person, and man of influence, who was accordingly appointed. I then propos'd a lottery to defray the expense of building a battery below the town, and furnishing it with cannon. It filled expeditiously, and the battery was soon erected, the merlons being fram'd of logs and fill'd with earth. We bought some old cannon from Boston, but, these not being sufficient, we

wrote to England for more, soliciting, at the same time, our proprietaries for some assistance, tho' without much expectation of obtaining it.

组成费城防卫队的各连队的指挥官们选我担任他们的团长，但我认为自己不适合，谢绝了这个职位，并向他们推荐了劳伦斯先生。他人品很好，很有影响力，于是他们就请他为团长。接着我提议发行奖券，集资在费城南面修建炮台、装备大炮。资金很快筹集齐了，炮台也很快建成，炮眼用圆木构成，中间填了泥土。我们从波士顿买了一些旧大炮，但还不够，于是又写信到英国订购，同时请我们的领主给予帮助，虽然我们对此并没抱多大希望。

Meanwhile, Colonel Lawrence, William Allen, Abram Taylor, Esqr., and myself were sent to New York by the associators, commission'd to borrow some cannon of Governor Clinton. He at first refus'd us peremptorily; but at dinner with his council, where there was great drinking of Madeira wine, as the custom of that place then was, he softened by degrees, and said he would lend us six. After a few more bumpers he advanc'd to ten; and at length he very good-naturedly conceded eighteen. They were fine cannon, eighteen-pounders, with their carriages, which we soon transported and mounted on our battery, where the associators kept a nightly guard while the war lasted, and among the rest I regularly took my turn of duty there as a common soldier.

与此同时，团队派劳伦斯上校、威廉·艾伦、艾布拉姆·泰勒和我去纽约向克林顿州长借几门大炮。起初他不容分说地拒绝了我们，但是和他的参事会成员们一块儿吃饭时，根据当时当地的习惯，他们喝了很多马德拉酒，于是他的态度渐渐有些软化，说可以借给我们六尊

大炮。再喝了几杯后，他说可以借10尊。最终，他爽快地答应借给我们18尊。这些大炮十分精良，能发射18磅的炮弹，还配有炮架。我们很快把大炮运了回来，装在炮台上。战争期间，团队每夜都派人站岗看护大炮，我也和其他普通士兵一样轮流站岗执勤。

My activity in these operations was agreeable to the governor and council; they took me into confidence, and I was consulted by them in every measure wherein their concurrence was thought useful to the association. Calling in the aid of religion, I propos'd to them the proclaiming a fast, to promote reformation, and implore the blessing of Heaven on our undertaking. They embrac'd the motion; but, as it was the first fast ever thought of in the province, the secretary had no precedent from which to draw the proclamation. My education in New England, where a fast is proclaimed every year, was here of some advantage: I drew it in the accustomed stile, it was translated into German, printed in both languages, and divulg'd thro' the province. This gave the clergy of the different sects an opportunity of influencing their congregations to join in the association, and it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general among all but Quakers if the peace had not soon interven'd.

我在这些事务中的活跃表现颇得州长和参事会欣赏。他们对我推心置腹，对于任何措施都会询问我是否对防卫队有益。为了获得宗教界的支持，我向他们提议宣布斋戒，以促进团队改革，并祈求上天赐福于我们的事业。他们接受了我的提议，但因为这是本州第一次斋戒，没有先例可以援引，州秘书不知如何起草公告。我以前是在新英格兰上学，那里每年宣布一次斋戒，我的经验在这儿就派上了些用场：我按约定俗成的格式起草了一份公告，他们把它译成德语，用两种语言在全州印发。这使得不同教派的牧师们可以借此机会鼓励教众加入防卫队。若不是战争很快结束的话，很可能除了贵格会的所有教

派都会踊跃参加。

It was thought by some of my friends that, by my activity in these affairs, I should offend that sect, and thereby lose my interest in the Assembly of the province, where they formed a great majority. A young gentleman who had likewise some friends in the House, and wished to succeed me as their clerk, acquainted me that it was decided to displace me at the next election; and he, therefore, in good will, advis'd me to resign, as more consistent with my honour than being turn'd out. My answer to him was, that I had read or heard of some public man who made it a rule never to ask for an office, and never to refuse one when offer'd to him. “I approve,” says I, “of his rule, and will practice it with a small addition; I shall never ask, never refuse, nor ever resign an office. If they will have my office of clerk to dispose of to another, they shall take it from me. I will not, by giving it up, lose my right of some time or other making reprisals on my adversaries.” I heard, however, no more of this; I was chosen again unanimously as usual at the next election. Possibly, as they dislik'd my late intimacy with the members of council, who had join'd the governors in all the disputes about military preparations, with which the House had long been harass'd, they might have been pleas'd if I would voluntarily have left them; but they did not care to displace me on account merely of my zeal for the association, and they could not well give another reason.

我有些朋友认为，我积极参与这些事务会冒犯贵格会，而且会因此在以贵格会为主导的州议会中失势。有位年轻绅士在州议会里有些朋友，希望把我挤走，由他来做州议会秘书。他告诉我议会已经决定在下次选举时把我免职，因此他善意地建议我主动辞职，认为辞职比

免职更体面。我回答他说，我曾读过或听过某位公众人物的原则：绝不主动谋求职位，但也不拒绝别人提供的工作。我说："我十分赞同他的原则，但实行起来还有一点增加，那就是我绝不谋求或拒绝工作，更不会主动辞职。如果他们希望由他人来做我现在的秘书工作，可以免去我的职位。但我不会主动辞职，从而失去适时报复我的对手的权利。"但是此后我再也没听到此事了。待到下次选举，我同往常一样一致通过地当选了。也许他们不喜欢我与参事会成员过从甚密，因为他们在军事准备问题的争论上总站在州长们一边，使州议会不堪其扰。如果我能主动减少和他们的往来，州议会的贵格会议员也许会十分高兴，但他们还不至于仅仅因为我热心于防卫队的事情就把我免职，而除此之外他们又找不到其他理由。

Indeed I had some cause to believe that the defense of the country was not disagreeable to any of them, provided they were not requir'd to assist in it. And I found that a much greater number of them than I could have imagined, tho' against offensive war, were clearly for the defensive. Many pamphlets pro and con were publish'd on the subject, and some by good Quakers, in favor of defense, which I believe convinc'd most of their younger people.

的确，我有理由相信，只要不要求他们给予援助，他们谁也不会反对加强防卫的事情。我还发现，他们中很多人尽管反对侵略性战争，但很明显是支持自我防御的，这类人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赞成和反对双方就这一问题撰写并发表了许多小册子，有些赞成防御的小册子是由优秀的贵格会成员所写，我相信这些文章说服了大多数年轻的贵格会成员。

A transaction in our fire company gave me some insight into their prevailing sentiments. It had been propos'd that we should

encourage the scheme for building a battery by laying out the present stock, then about sixty pounds, in tickets of the lottery. By our rules, no money could be dispos'd of till the next meeting after the proposal. The company consisted of thirty members, of which twenty-two were Quakers, and eight only of other persuasions. We eight punctually attended the meeting; but, tho' we thought that some of the Quakers would join us, we were by no means sure of a majority. Only one Quaker, Mr. James Morris, appear'd to oppose the measure. He expressed much sorrow that it had ever been propos'd, as he said Friends were all against it, and it would create such discord as might break up the company. We told him that we saw no reason for that; we were the minority, and if Friends were against the measure, and outvoted us, we must and should, agreeably to the usage of all societies, submit. When the hour for business arriv'd it was mov'd to put the vote; he allow'd we might then do it by the rules, but, as he could assure us that a number of members intended to be present for the purpose of opposing it, it would be but candid to allow a little time for their appearing.

我们消防队里发生了一件事，使我对他们的普遍想法有了深入了解。当时有人提出，为了支持修建炮台的计划，我们应用消防队的约60镑资金来购买彩票。根据我们的规章，如果需要动用资金，须在建议提出后的下一次会议上进行表决。消防队有30名成员，其中22名是贵格会成员，只有8人属于其他教派。我们8人准时参加了会议，尽管我们认为有几位贵格会会员会站在我们一边，但对能否得到多数支持还是毫无把握。只有一位贵格会会员反对这项提案，他就是詹姆斯·莫里斯先生。他对有人提出这样的提案深表痛心，说所有贵格会会员都对其表示反对，这种提案会造成诸多不和，可能导致消防队解散。我们告诉他这种担忧并无理由，我们只占少数，如果贵格会会员反对这项提案并且在投票表决时票数超过我们，根据章程我们必须也应当服从多数。讨论这项提案到了投票表决的时间，他承认按照规定我们当

时可以进行投票，但是他肯定地说许多会员原本打算前来投下反对票的，所以我们得等他们一会儿才算公正。

While we were disputing this, a waiter came to tell me two gentlemen below desir'd to speak with me. I went down, and found they were two of our Quaker members. They told me there were eight of them assembled at a tavern just by; that they were determin'd to come and vote with us if there should be occasion, which they hop'd would not be the case, and desir'd we would not call for their assistance if we could do without it, as their voting for such a measure might embroil them with their elders and friends. Being thus secure of a majority, I went up, and after a little seeming hesitation, agreed to a delay of another hour. This Mr. Morris allow'd to be extremely fair. Not one of his opposing friends appear'd, at which he express'd great surprize; and, at the expiration of the hour, we carry'd the resolution eight to one; and as, of the twenty-two Quakers, eight were ready to vote with us, and thirteen, by their absence, manifested that they were not inclin'd to oppose the measure, I afterward estimated the proportion of Quakers sincerely against defense as one to twenty-one only; for these were all regular members of that society, and in good reputation among them, and had due notice of what was propos'd at that meeting.

我们正在争论时，一个侍者过来告诉我说下面有两位绅士想找我谈话。我下了楼，发现那是我们消防队的两位贵格会队员。他们告诉我他们有8个人在附近一家酒馆里聚会，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坚决会来为我们投赞成票，但是他们希望不必这样做。假如我们可以不需要他们的出席而通过议案，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叫他们来协助，因为如果为这个提案投赞成票，他们的长辈和朋友可能会为难他们。在有把握能获得多数的选票后，我回到了楼上，假装犹豫了一阵后，同意将投票

再推迟一个小时。这才让莫里斯先生认为公平。但他那些要投反对票的朋友一个也没出现，这让他大为惊讶。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了，我们八比一通过了提案。在22位贵格会成员中，有8人打算为我们投票，13人没有出席，表示他们不反对这项提案，我事后估算了一下，真正反对加强防卫与不反对的贵格会成员之比为1：21，因为他们都是贵格会的忠实信徒，声誉良好，对于都知道会议上要讨论的议程。

The honorable and learned Mr. Logan, who had always been of that sect, was one who wrote an address to them, declaring his approbation of defensive war, and supporting his opinion by many strong arguments. He put into my hands sixty pounds to be laid out in lottery tickets for the battery, with directions to apply what prizes might be drawn wholly to that service. He told me the following anecdote of his old master, William Penn, respecting defense. He came over from England, when a young man, with that proprietary, and as his secretary. It was war-time, and their ship was chas'd by an armed vessel, suppos'd to be an enemy. Their captain prepar'd for defense; but told William Penn and his company of Quakers, that he did not expect their assistance, and they might retire into the cabin, which they did, except James Logan, who chose to stay upon deck, and was quarter'd to a gun. The suppos'd enemy prov'd a friend, so there was no fighting; but when the secretary went down to communicate the intelligence, William Penn rebuk'd him severely for staying upon deck, and undertaking to assist in defending the vessel,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s of Friends, especially as it had not been required by the captain. This reproof, being before all the company, piqu'd the secretary, who answer'd, “I being thy servant, why did thee not order me to come down? But thee was willing enough that I should stay and help to fight the ship when thee thought there was danger.”

受人尊敬、学识渊博的罗根先生一直是贵格会信徒，他给其他信徒写了一篇文章，宣布他支持防御性战争，还列举了很多有力论据支持他的观点。他交给我60镑，去购买彩票修建炮台，还说如若中奖，奖金也全作修筑炮台之用。罗根先生还告诉我他以前的领主威廉·佩恩的关于防卫的一桩轶事。罗根年轻时作为秘书跟随领主从英格兰来到这里。当时正值战争时期，一艘武装的船只紧紧地追逐他们的船，他们猜想那是一艘敌船。他们的船长准备自我防卫，但告诉威廉·佩恩和他的贵格会同伴说不希望他们提供帮助，他们可以躲到船舱里去。于是他们就回到了船舱，只有詹姆斯·罗根一人，选择留在甲板上，船长就命令他去看守一门大炮。这艘假想的敌船是一只友好的船只，结果没有发生战事。但当这位秘书下到船舱里报告消息时，威廉·佩恩却狠狠地责骂他不该留在甲板上，违反了贵格会教规去参加自卫工作，尤其是船长并未要求他这样做。佩恩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责骂这位秘书的，这让他恼怒不已，于是他答道："我是您的仆人，为什么您不命令我下来呢？您觉得情况危急的时候，倒是很愿意我留在甲板上帮他们反击那艘船。"

My being many years in the Assembly, the majority of which were constantly Quakers, gave me frequent opportunities of seeing the embarrassment given them by their principle against war, whenever application was made to them, by order of the crown, to grant aids for military purposes. They were unwilling to offend government, on the one hand, by a direct refusal; and their friends, the body of the Quakers, on the other, by a compliance contrary to their principles; hence a variety of evasions to avoid complying, and modes of disguising the compliance when it became unavoidable. The common mode at last was, to grant money under the phrase of its being "for the king's use," and never to inquire how it was applied.

州议会议员一向以贵格会信徒居多，我在州议会任职多年，曾多次见到他们因国王命令他们通过军事补助议案而感到左右为难，因为贵格会是秉持反战原则的。他们一方面不愿直接反对议案从而得罪英王政府，而直截了当地拒绝拨款，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违反教义而触怒朋友，即贵格会的大多数人。因此，他们想出各种借口进行推托，实在推不掉了，就想法掩饰。最后，他们的常用方法是在“供国王使用”的名义下通过拨款审批，却从不询问钱款具体用途。

But, if the demand was not directly from the crown, that phrase was found not so proper, and some other was to be invented. As, when powder was wanting (I think it was for the garrison at Louisburg), and the government of New England solicited a grant of some from Pennsilvania, which was much urg'd on the House by Governor Thomas, they could not grant money to buy powder, because that was an ingredient of war; but they voted an aid to New England of three thousand pounds, to be put into the hands of the governor, and appropriated it for the purchasing of bread, flour, wheat, or other grain. Some of the council, desirous of giving the House still further embarrassment, advis'd the governor not to accept provision, as not being the thing he had demanded; but be reply'd, “I shall take the money, for I understand very well their meaning; other grain is gunpowder,” which he accordingly bought, and they never objected to it.

但是，如果资金需求不是直接来自国王，那种说法就不太合适了，他们就会想出别的说辞来。例如，新英格兰政府因缺乏火药（我想是为了防守路易堡）而请求宾夕法尼亚拨给一些，托马斯州长也大力劝说州议会予以批准，但他们却不能拨款去购买火药，因为火药是战争的一大要素。于是他们投票同意拨款3,000镑用于援助新英格兰，把钱款交给州长，用于购买面包、面粉、小麦或其他粮食。参事

会的有些成员想给议会添更多麻烦，建议州长不要接受这笔钱，因为这不符合他的要求，但州长答道：“我要接受这笔钱，因为我很明白他们的意思，所谓粮食就是火药。”于是他购买了火药，议会也没有反对。

It was in allusion to this fact that, when in our fire company we feared the success of our proposal in favor of the lottery, and I had said to my friend Mr. Syng, one of our members, “If we fail, let us move the purchase of a fire-engine with the money; the Quakers can have no objection to that; and then, if you nominate me and I you as a committee for that purpose, we will buy a great gun, which is certainly a fire-engine.” “I see,” says he, “you have improv'd by being so long in the Assembly; your equivocal project would be just a match for their wheat or other grain.

在我们消防队里，当我们害怕购买彩票的提案无法获得通过时，我就会想到这件事，我对我的朋友辛格先生（消防队的队员之一）说：“如果我们的提案没有通过，那么我们就提议用这笔钱来购买消防车吧，贵格会信徒不会反对这件事的。然后我们互相提名，组成一个采购委员会，再去买一尊大炮，大炮显然也属于火器呀。”“我明白了，”他说，“原来在州议会里呆了那么久，你也有进步了。你这双关的计划简直可与他们的‘小麦或其他粮食’相媲美了。”

These embarrassments that the Quakers suffer'd from having establish'd and published it as one of their principles that no kind of war was lawful, and which, being once published, they could not afterwards, however they might change their minds, easily get rid of, reminds me of what I think a more prudent conduct in another sect among us, that of the Dunkers. I was acquainted with one of its

founders, Michael Welfare, soon after it appear'd. He complain'd to me that they were grievously calumniated by the zealots of other persuasions, and charg'd with abominabl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to which they were utter strangers. I told him this had always been the case with new sects, and that, to put a stop to such abuse, I imagin'd it might be well to publish the articles of their belief, and the rules of their discipline. He said that it had been propos'd among them, but not agreed to, for this reason: “When we were first drawn together as a society,” says he, “it had pleased God to enlighten our minds so far as to see that some doctrines, which we once esteemed truths, were errors; and that others, which we had esteemed errors, were real truths. From time to time He has been pleased to afford us farther light, and our principles have been improving, and our errors diminishing. Now we are not sure that we are arrived at the end of this progression, and at the perfection of spiritual or theological knowledge; and we fear that, if we should once print our confession of faith, we should feel ourselves as if bound and confin'd by it, and perhaps be unwilling to receive farther improvement, and our successors still more so, as conceiving what we their elders and founders had done, to be something sacred, never to be departed from.”

贵格会信徒把“一切战争皆为非法”确立并公开宣布为他们的教义之一，尽管他们后来可能改变了主张，但一经公开宣布，就不能轻易改变了，他们常因此陷入一些两难局面。这让我想起我们中间言行更为谨慎的另一个教派，即德国浸礼会。这个教派成立不久，我就认识了它的创始人之一迈克尔·威尔菲尔。他向我抱怨说他们受到其他教派狂热分子的严重诽谤，抨击他们有一些恶劣的教义和行为，这其实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我告诉他，对于新成立的教派来说，这是常有的事儿，要想阻止这种诽谤，我想最好是公布他们的教义及教规。他说他们教徒中有人提过这个建议，但是没有达成一致，他说：“我们最初

成立这个教派时，蒙上启示，我们曾经奉为真理的某些信条实为谬误，而我们以为错误的却是真理。时不时地上帝乐于赋予我们更多光明，使我们的信条不断改进，谬误不断减少。现在我们不确定是否已登峰造极，我们的心灵或神学的知识是否已臻于至善；我们担心，如果将自己的教义刊印出来，我们将受其桎梏，也许就不愿继续进步，而我们的后来者则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将他们的先辈和创始者所做的一切视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当信守不渝的。”

This modesty in a sect is perhaps a singular instanc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every other sect supposing itself in possession of all truth, and that those who differ are so far in the wrong; like a man traveling in foggy weather, those at some distance before him on the road he sees wrapped up in the fog, as well as those behind him, and also the people in the fields on each side, but near him all appears clear, tho' in truth he is as much in the fog as any of them. To avoid this kind of embarrassment, the Quakers have of late years been gradually declining the public service in the Assembly and in the magistracy, choosing rather to quit their power than their principle.

一个教派如此谦逊，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所有其他教派都认为自己拥有一切真理，认为与他们见解不同的教派都是错误的；这就像一个人在大雾天行路，走在他前面有些距离的那些人在他看来处于浓雾当中，走在他身后及两边田野里的人也是一样，但他近处的人看起来都很清晰，尽管事实上，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在雾中行走的。为了避免陷入这样的两难局面，近年来贵格会信徒渐渐淡出议会和政府，宁愿选择放弃权力也不愿在原则上妥协。

In order of time, I should have mentioned before, that having,

in 1742, invented an open stove for the better warming of rooms, and at the same time saving fuel, as the fresh air admitted was warmed in entering, I made a present of the model to Mr. Robert Grace, one of my early friends, who, having an iron-furnace, found the casting of the plates for these stoves a profitable thing, as they were growing in demand. To promote that demand, I wrote and published a pamphlet, entitled “An Account of the new-invented Pennsylvania Fireplaces; wherein their Construction and Manner of Operation is particularly explained; their Advantages above every other Method of warming Rooms demonstrated; and all Objections that have been raised against the Use of them answered and obviated,” etc. This pamphlet had a good effect. Gov'r. Thomas was so pleas'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stove, as described in it, that he offered to give me a patent for the sole vending of them for a term of years; but I declin'd it from a principle which has ever weighed with me on such occasions, viz., That, as we enjoy great advantages from the inventions of others, we should be glad of an opportunity to serve others by any invention of ours; and this we should do freely and generously.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我在前面就应提到过，1742年我发明了一种“开放式火炉”这种火炉能改善房间供暖，同时还能节省燃料，因为冷空气一进入火炉便被加热了。我制作了一个火炉的模型送给我早年认识的一位朋友罗伯特·格雷斯先生。他有家炼铁厂，因为当时火炉的需求量渐增，他发现为这些火炉铸造铁板是有利可图的。为了进一步打开销路，我撰写并发行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新发明的宾夕法尼亚壁炉说明：详细解释其构造和操作方法，展示其较之其他取暖优点，驳斥一切反对使用这种火炉的异议》。这本小册子发行后效果良好，托马斯州长非常喜欢书中描述的火炉构造，甚至还提出要授予我一定年限的专卖权，但我婉拒了，因为这种情况下我一直秉持这样的原则：我们享受着他人发明带来的巨大好处，就应乐于有机会用自己的

发明服务他人，而且这种服务应当是无偿的、慷慨的。

An ironmonger in London however, assuming a good deal of my pamphlet, and working it up into his own, and making some small changes in the machine, which rather hurt its operation, got a patent for it there, and made, as I was told, a little fortune by it. And this is not the only instance of patents taken out for my inventions by others, tho' not always with the same success, which I never contested, as having no desire of profiting by patents myself, and hating disputes. The use of these fireplaces in very many houses, both of this and the neighboring colonies, has been, and is, a great saving of wood to the inhabitants.

但伦敦的一个铁器商从我的小册子中窃取了大量信息，铸造了一个自己的火炉，对我的发明做了一些小改动，减低了火炉的效用。我听说他在伦敦获得了火炉的专利，并借此发了一笔小财。别人从我的发明中窃取我的专利权不限于这一个例子，尽管并不是人人都能同样获得成功。我从不与他们争执此事，因为我并不想通过取得专利而获利，而且也讨厌争吵。无论本州还是邻州许多家庭都使用这种火炉，给居民们节省了大量柴火。

Peace being concluded, and the association business therefore at an end, I turn'd my thoughts again to the affair of establishing an academy. The first step I took was to associate in the design a number of active friends, of whom the Junto furnished a good part; the next was to write and publish a pamphlet, entitled Proposals Relating to the Education of Youth in Pennsylvania. This I distributed among the principal inhabitants gratis; and as soon as I could suppose their minds a little prepared by the perusal of it, I set

on foot a subscription for opening and supporting an academy; it was to be paid in quotas yearly for five years; by so dividing it, I judg'd the subscription might be larger, and I believe it was so, amounting to no less, if I remember right, than five thousand pounds.

战争结束了，于是防卫队的事务告一段落，我的心思再次转到建立一所学院上来。我的第一步行动是联系许多积极热心的朋友参与我的计划，其中大部分都是秘社成员；第二步是撰写并刊发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有关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我把小册子免费赠给居民中有地位的人，等他们通过阅读小册子对此稍有思想准备之后，我就开始募捐，用于建立一家学院并维持其运营。捐款以五年为期，每年支付一定数额，我认为这样实行分期支付可能会使捐款额大一些。我相信，如果没记错的话，捐款额不下5,000镑。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se proposals, I stated their publication, not as an act of mine, but of some publick-spirited gentlemen, avoiding as much as I could, according to my usual rule, the presenting myself to the publick as the author of any scheme for their benefit.

在这篇建议的序言中，我把建议的提出归功于一些具有公益精神的绅士们，而非我自己。秉承我的一贯原则，我尽力避免在公众面前把自己当做公益计划发起人公布出去。

The subscribers, to carry the project into immediate execution, chose out of their number twenty-four trustees, and appointed Mr. Francis, then attorney-general, and myself to draw up constitu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academy; which being done and signed, a house was hired, masters engag'd, and the schools opened, I think, in the same year, 1749.

为了尽快实现这个计划，捐款人从他们中间推选出21名理事，并指定当时任检察长的弗朗西斯先生和我为学院起草管理章程。章程拟定并签署后，我们租了一套校舍，聘请了老师，这样学校就开学了，我记得那同样是在1749年。

The scholars increasing fast, the house was soon found too small, and we were looking out for a piece of ground, properly situated, with intention to build, when Providence threw into our way a large house ready built, which, with a few alterations, might well serve our purpose. This was the building before mentioned, erected by the hearers of Mr. Whitefield, and was obtained for us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原来你的校舍很快就装不下了，于是我们开始物色一块位置合适的地皮，打算兴建校舍。这时承蒙上帝眷顾，有幢刚好建成的大厦，只要稍加几处改动，我们就能使用。这就是前面提过的由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听众修建的教堂，我们是这样得到它的。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he contributions to this building being made by people of different sects, care was taken in the nomination of trustees, in whom the building and ground was to be vested, that a predominancy should not be given to any sect, lest in time that predominancy might be a means of appropriating the whole to the use of such sect, contrary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It was therefore

that one of each sect was appointed, viz., one Church-of-England man, one Presbyterian, one Baptist, one Moravian, etc., those, in case of vacancy by death, were to fill it by election from among the contributors. The Moravian happen'd not to please his colleagues, and on his death they resolved to have no other of that sect. The difficulty then was, how to avoid having two of some other sect, by means of the new choice.

我们记得这座教堂是由不同教派的信徒共同出资建造的，因此在任命负责照管教堂建筑和地皮的理事时，任何教派都不能占据支配地位，以免将来该教派利用这种支配地位将其留为己用，这就与其本意背道而驰了。因此，每个教派均指定一人担任理事，即：一位英国国教教徒、一位长老会教友、一位浸信会教友、一位摩拉维亚教会教徒等等。如果他们去世使得职位空缺，则从教堂捐助者中选举填补。那位摩拉维亚教徒恰好与同事不和，他去世以后，他们决定不再从摩拉维亚教派中选举理事。那么选举新理事时，如何避免一个教派中有两个理事就成了问题。

Several persons were named, and for that reason not agreed to. At length one mention'd me, with the observation that I was merely an honest man, and of no sect at all, which prevail'd with them to chuse me. The enthusiasm which existed when the house was built had long since abated, and its trustees had not been able to procure fresh contributions for paying the ground-rent, and discharging some other debts the building had occasion'd, which embarrass'd them greatly. Being now a member of both sets of trustees, that for the building and that for the Academy, I had a good opportunity of negotiating with both, and brought them finally to an agreement, by which the trustees for the building were to cede it to those of the academy, the latter undertaking to discharge the debt, to keep for

ever open in the building a large hall for occasional preachers,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maintain a free school for the instruction of poor children. Writings were accordingly drawn, and on paying the debts the trustees of the academy were put in possession of the premises; and by dividing the great and lofty hall into stories, and different rooms above and below for the several schools, and purchasing some additional ground, the whole was soon made fit for our purpose, and the scholars remov'd into the building. The care and trouble of agreeing with the workmen, purchasing materials, and superintending the work, fell upon me; and I went thro' it the more cheerfully, as it did not then interfere with my private business, having the year before taken a very able, industrious, and honest partner, Mr. David Hall, with whose character I was well acquainted, as he had work'd for me four years. He took off my hands all care of the printing-office, paying me punctually my share of the profits. This partnership continued eighteen years, successfully for us both.

有几个人被提名了，但因上述原因未能通过。后来有人提名我，他认为我为人诚实，不信仰任何教派，这下说服了其他理事，于是他们一致推选我。修建教堂时的激情早已退却，理事们无法获得新的捐款以支付地租和清偿教堂修建时欠下的债务，因此感到十分为难。这时我已是教堂保管和学院这两个理事会的理事，有很好的机会与两方协商，使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教堂保管理事会的理事们将教堂转让给学院理事会，后者则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并根据修建教堂的本意，将教堂的一间大厅永久开放以满足布道者的临时布道之需，同时要为穷人子弟开办一所免费学校。双方就此订立了合同，学院理事会的理事们付清了债务之后，教堂建筑和地皮就归他们所有了。他们把雄伟高大的教堂分为几层，上下又分为几个房间作为教室，还另购置了一些地，很快就把一切安排得符合我们的需要，让学生们搬进了这所大楼。与工人们签订合同、采购物资、监督工程的

责任都由我承担，但整个过程我都非常愉快，因为这些责任并未妨碍我的私人事务，一年前我和一位非常能干、勤劳、诚实的大卫·霍尔先生合伙，他的性格我非常了解，他以前为我做了四年工。他负责印刷所的一切工作，使我得以脱身，他按时将我的利润份额付给我。这一合伙关系持续了18年，对双方来说都非常成功。

The trustees of the academy, after a while, were incorporated by a charter from the governor; their funds were increas'd by contributions in Britain and grants of land from the proprietaries, to which the Assembly has since made considerable addition; and thus was established the present 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 I have been continued one of its trustees from the beginning, now near forty years, and have had the very great pleasure of seeing a number of the youth who have receiv'd their education in it, distinguish'd by their improv'd abilities, serviceable in public stations and ornaments to their country.

一段时间后，学院委员会的理事们得到州长颁发的执照，批准学校成立，委员会的资金也有所增加，因为有来自英国的捐款，还有领主们提供的土地，州议会也拨了许多款；费城大学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了。我从一开始就继续担任其理事的职务，至今已近40年。看到大批青年在此接受教育，增长才干并脱颖而出，为社会机构服务，为国家增光添彩，我感到非常欣慰。

When I disengaged myself, as above mentioned, from private business, I flatter'd myself that, by the sufficient tho' moderate fortune I had acquir'd, I had secured leisure during the rest of my life for philosophical studies and amusements. I purchased all Dr. Spence's apparatus, who had come from England to lecture here,

and I proceeded in my electrical experiments with great alacrity; but the publick, now considering me as a man of leisure, laid hold of me for their purposes, every part of our civil government, and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imposing some duty upon me. The governor put me into the commission of the peace; the corporation of the city chose me of the common council, and soon after an alderman; and the citizens at large chose me a burgess to represent them in Assembly. This latter station was the more agreeable to me, as I was at length tired with sitting there to hear debates, in which, as clerk, I could take no part, and which were often so unentertaining that I was induc'd to amuse myself with making magic squares or circles, or any thing to avoid weariness; and I conceiv'd my becoming a member would enlarge my power of doing good. I would not, however, insinuate that my ambition was not flatter'd by all these promotions; it certainly was; for, considering my low beginning, they were great things to me; and they were still more pleasing, as being so many spontaneous testimonies of the public good opinion, and by me entirely unsolicited.

如上所述，我不再管理我的私人事务时，已获得一笔足够的财产，虽然数目有限，但是能使我在未来一生中有闲暇从事哲学研究，欢度晚年了。我购买了斯宾士博士的所有仪器，他是从英格兰来到这里讲学的。我兴致盎然地进行着我的电气实验，但这时公众认为我是个闲人了，于是让我为他们办事。我们政府的每个部门几乎同时都给我派了任务，州长让我担任治安委员会委员，市政当局选我为市参事会成员，不久又推我为市政委员会委员，市民们也选我为议员作为他们在州议会的代表。州议员这个职位让我比较满意，因为我已厌倦透了在担任州议会秘书时坐在那里旁听我当时不能参加的辩论，而这些辩论又常常索然无味，于是我只得通过解魔方阵或魔圈或其他东西自娱自乐，消解烦闷。我认为，当了议员，我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但

我不会假惺惺地说我对这些荣誉无动于衷，我当然感到很光荣，因为考虑到我出身卑微，能获得此种地位实属难得；而尤其这些职位代表着公众对我的很高评价，这是自发的称赞，而非我筹谋所得，这就让我更为高兴了。

The office of justice of the peace I try'd a little, by attending a few courts, and sitting on the bench to hear causes; but finding that more knowledge of the common law than I possess'd was necessary to act in that station with credit, I gradually withdrew from it, excusing myself by my being oblig'd to attend the higher duties of a legislator in the Assembly. My election to this trust was repeated every year for ten years, without my ever asking any elector for his vote, or signifying,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y desire of being chosen. On taking my seat in the House, my son was appointed their clerk.

治安法官的职务我做了一点。我出席了几次庭审，坐在法官席上听诉讼，但我发现我对习惯法的肤浅知识是不够的，于是借口说不得不在州议会里担任议员这一更为重要的职务，渐渐退出了。我每年都当选为州议员，连续10年之久，我从未请选民们投票给我，也从未直接或间接表示希望能够当选。我当州议员后，我的儿子当了州议会秘书。

The year following, a treaty being to be held with the Indians at Carlisle, the governor sent a message to the House, proposing that they should nominate some of their members, to be join'd with some members of council, as commissioners for that purpose. The House named the speaker (Mr. Norris) and myself; and, being commission'd, we went to Carlisle, and met the Indians accordingly.

第二年，我们将和印第安人在卡莱尔缔结条约。州长来函州议会，提议他们指定几位议员，和几位参事会成员一起担任专员处理此事。议会指定了议长（诺里斯先生）和我，我们就奉命去了卡莱尔，与印第安人会面。

As those people are extremely apt to get drunk, and, when so, are very quarrelsome and disorderly, we strictly forbad the selling any liquor to them; and when they complain'd of this restriction, we told them that if they would continue sober during the treaty, we would give them plenty of rum when business was over. They promis'd this, and they kept their promise, because they could get no liquor, and the treaty was conducted very orderly, and concluded to mutual satisfaction. They then claim'd and receiv'd the rum; this was in the afternoon; they were near one hundred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nd were lodg'd in temporary cabins, built in the form of a square, just without the town. In the evening, hearing a great noise among them, the commissioners walk'd out to see what was the matter. We found they had made a great bonfire in the middle of the square; they were all drunk, men and women, quarreling and fighting. Their dark-colour'd bodies, half naked, seen only by the gloomy light of the bonfire, running after and beating one another with firebrands, accompanied by their horrid yellings, form'd a scene the most resembling our ideas of hell that could well be imagin'd; there was no appeasing the tumult, and we retired to our lodging. At midnight a number of them came thundering at our door, demanding more rum, of which we took no notice.

因为印第安人极好喝酒，酒醉后还吵吵闹闹，没规没矩，所以我们严格禁止向印第安人出售任何酒类。他们为此表示不满，于是我们

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在谈判期间不喝酒，事情办完后我们可以给他们许多朗姆酒。他们答应了，也信守了承诺，因为他们什么酒也买不到，于是我们很顺利地缔结了条约，双方都非常满意。他们随后向我们要酒，我们就给了他们。这是那天下午。他们共有近100人，男女老少都住在城外的临时小木屋里，木屋围起一个方形广场。晚上的时候，听到他们那边十分嘈杂，几位专员就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发现他们在广场的中央燃起了一大簇篝火，男女全都喝得醉醺醺的，还相互争吵、打架。他们暗黑的肤色和半裸的身体只能在篝火那暗淡的光亮下依稀可见，他们还举着火把相互追逐、殴打，口中发出可怖的尖叫声，此番情景像极了我们所能想象的地狱。他们的喧闹没有停歇的意思，于是我们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半夜时，许多印第安人跑来大声敲打我们的门，向我们要更多朗姆酒，我们没有理睬。

The next day, sensible they had misbehav'd in giving us that disturbance, they sent three of their old counselors to make their apology. The orator acknowledg'd the fault, but laid it upon the rum; and then endeavored to excuse the rum by saying, “The Great Spirit, who made all things, made every thing for some use, and whatever use he design'd any thing for, that use it should always be put to. Now, when he made rum, he said 'Let this be for the Indians to get drunk with,' and it must be so.” And, indeed, if it be the design of Providence to extirpate these savages in order to make room for cultivators of the earth, it seems not improbable that rum may be the appointed means. It has already annihilated all the tribes who formerly inhabited the sea-coast.

第二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不该打扰我们，就派了三个酋长前来道歉。开口道歉的那个印第安人承认了他们的过错，但把责任归咎于朗姆酒，后来又竭力为酒辩解道：“上帝创造了万物，使万物皆有用处，无论这用处是什么，我们都应按此用途来使用它。现在他创造

了朗姆酒，他说‘让印第安人喝朗姆酒一醉方休吧’，于是我们就得按此执行。”的确，如果上帝有心灭绝这些野蛮人，从而为地球上的拓荒者腾出地方，那么很可能朗姆酒就是注定的方法了。它已消灭了原住在海岸边上的所有印第安人部落都。

In 1751, Dr. Thomas Bond, a particular friend of mine, conceived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a hospital in Philadelphia (a very beneficent design, which has been ascrib'd to me, but was originally his), for the reception and cure of poor sick persons, whether inhabitants of the province or strangers. He was zealous and active in endeavoring to procure subscriptions for it, but the proposal being a novelty in America, and at first not well understood, he met with but small success.

1751年，我的一位好朋友托马斯·邦德医生想在费城建一家医院（一个非常仁慈的计划，人们后来将其归功于我，其实最初是他的想法），用于接待并治疗穷困的病人，不论他们是本州居民还是外地人。他对募集捐款一事热心积极，但这个计划此前在美国从未有过，人们一开始对此并不非常理解，因此他没有取得多大成功。

At length he came to me with the compliment that he found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carrying a public-spirited project through without my being concern'd in it. “For,” says he, “I am often ask'd by those to whom I propose subscribing, Have you consulted Franklin upon this business? And what does he think of it? And when I tell them that I have not (supposing it rather out of your line), they do not subscribe, but say they will consider of it.” I enquired into the nature and probable utility of his scheme, and receiving from him a very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I not only

subscrib'd to it myself, but engag'd heartily in the design of procuring subscriptions from others. Previously, however, to the solicitation, I endeavored to prepare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by writing on the subject in the newspapers, which was my usual custom in such cases, but which he had omitted.

后来邦德医生来到我这里，称赞我说，他觉得要开展公益项目，没有我参与可不行。“这是因为，”他说，“我去募捐时，人们常常问我，‘这件事儿你和富兰克林商量过吗？他持什么意见？’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咨询过你（我认为此事非你所长），他们就不捐款，但表示他们会考虑的。”我询问他那项计划的性质和大概用途，他的解释令我非常满意，我不仅自己捐了款，还热心帮他向别人募捐。不过在此之前，我就这个项目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使人们对此做好思想准备，这是我遇到这类事情的习惯做法，而他却忽略了此事。

The subscriptions afterwards were more free and generous; but, beginning to flag, I saw they would be insufficient without some assistance from the Assembly, and therefore propos'd to petition for it, which was done. The country members did not at first relish the project; they objected that it could only be serviceable to the city, and therefore the citizens alone should be at the expense of it; and they doubted whether the citizens themselves generally approv'd of it. My allegation on the contrary, that it met with such approbation as to leave no doubt of our being able to raise two thousand pounds by voluntary donations, they considered as a most extravagant supposition, and utterly impossible.

后来人们捐款变得踊跃慷慨，但不久又开始减少，我意识到如果没有州议会的帮助，只靠捐款是不足够的。因此，我提议向议会申请

拨款，接着便付诸实施。起初，来自乡村的议员对这个计划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反对说这个计划只能服务于城市，因此该让市民们自己出钱，他们还怀疑市民们自己也不一定都赞同这个计划。我的意见却与此相反，我认为这项计划将备受欢迎，肯定能募集到2,000镑捐款。他们认为我期望过高，完全是痴人说梦。

On this I form'd my plan; and asking leave to bring in a bill for incorporating the contributors according to the prayer of their petition, and granting them a blank sum of money, which leave was obtained chiefly on the consideration that the House could throw the bill out if they did not like it, I drew it so as to make the important clause a conditional one, viz., “And be it enacted, by the authority aforesaid, that when the said contributors shall have met and chosen their managers and treasurer, and shall have raised by their contributions a capital stock of—value (the yearly interest of which is to be applied to the accommodating of the sick poor in the said hospital, free of charge for diet, attendance, advice, and medicines), and shall make the same appear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speaker of the Assembly for the time being, that then it shall and may be lawful for the said speaker, and he is hereby required, to sign an order on the provincial treasurer for the payment of two thousand pounds, in two yearly payments, to the treasurer of the said hospital, to be applied to the founding, building, and finishing of the same.”

为此，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请求议会准许我提出一项议案，即按捐款人的请求把他们组织起来，并给予一定金额的津贴。他们之所以允许我提出这项议案，主要是考虑到如果州议会不喜欢它，可以把它推翻，而我在议案里为这项重要条款加上了附加条件，即：“经议会决定，所述捐款人应集合起来，选出管理人和司库，募集捐款若干

镑（捐款的年利息将用于为医院贫困患者提供帮助，免除他们的伙食、看护、就诊和药物费用），报给议会议长审批，若得通过，则议长应签署命令，准许本州司库向本医院司库拨款2,000镑，分两年付清，作医院创办、修建和装修之用。”

This condition carried the bill through; for the members, who had oppos'd the grant, and now conceiv'd they might have the credit of being charitable without the expence, agreed to its passage; and then, in soliciting subscriptions among the people, we urg'd the conditional promise of the law as an additional motive to give, since every man's donation would be doubled; thus the clause work'd both ways. The subscriptions accordingly soon exceeded the requisite sum, and we claim'd and receiv'd the public gift, which enabled us to carry the design into execution. A convenient and handsome building was soon erected; the institution has by constant experience been found useful, and flourishes to this day; and I do not remember any of my political manoeuvres, the success of which gave me at the time more pleasure, or wherein, after thinking of it, I more easily excus'd myself for having made some use of cunning.

这一附加条件使议案得以通过；曾经反对拨款的议员见他们不花一分一厘就能赚个乐善好施的美名，就同意了议案。随后，我们在民众中募集捐款时，竭力强调法案中那项附有条件的允诺，以使人们乐于捐款，这样每人的捐款都会加倍。如此一来，这一条款在两方面都起到了作用。捐款金额很快超过了所需数额，我们向议会提出请求，得到了议会拨款，将计划付诸实施。我们很快修建了一座舒适美观的大楼，后来的长期经验证明，这家医院发挥了很大作用，直至今日依然兴旺发达。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哪项政治策略的成功在当时能让我如许满足，或是事后回忆起来时，能让我如此容易地原谅自己使用了些计谋。

It was about this time that another projector, the Rev. Gilbert Tennent, came to me with a request that I would assist him in procuring a subscription for erecting a new meeting-house. It was to be for the use of a congregation he had gathered among the Presbyterians, who were originally disciples of Mr. Whitefield. Unwilling to make myself disagreeable to my fellow-citizens by too frequently soliciting their contributions, I absolutely refus'd. He then desired I would furnish him with a list of the names of persons I knew by experience to be generous and public-spirited. I thought it would be unbecoming in me, after their kind compliance with my solicitations, to mark them out to be worried by other beggars, and therefore refus'd also to give such a list. He then desir'd I would at least give him my advice. “That I will readily do,” said I; “and, in the first place, I advise you to apply to all those whom you know will give something; next, to those whom you are uncertain whether they will give any thing or not, and show them the list of those who have given; and, lastly, do not neglect those who you are sure will give nothing, for in some of them you may be mistaken.” He laugh'd and thank'd me, and said he would take my advice. He did so, for he ask'd of everybody, and he obtained a much larger sum than he expected, with which he erected the capacious and very elegant meeting-house that stands in Arch-street.

大约这个时候，另一位计划发起人吉尔伯特·坦南特牧师来找我，请我协助他募集捐款建一座新教堂。这座教堂将作他所召集的长老会教徒们集会之用，这些教徒原是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信徒。我不愿频繁向公众募集捐款，以免惹人厌烦，就坚决拒绝了他。于是他希望我给他列一张名单，列出我所知道的既慷慨又热心公益的人。我想这些人在我募捐时已做了善意的响应，现在我又把他们的名字挑出来，告诉别的募捐者，使他们备受烦扰，这种行为很不合适，因此我拒绝给他

列这个名单。他又请我至少给他些建议。我说："这我倒愿意。首先，我建议你向那些你知道一定会捐钱的人募捐；然后，向你不确定是否会捐款的人募捐，并给他们看已捐款人的名单；最后，不要忽略那些你确信不会捐钱的人，因为你可能会看错他们中的一些人。"他笑着感谢我，说会采纳我的建议。他的确这样做了，他向所有人募捐，而且所获捐款比他预料的要多出很多，他用这笔钱在拱街上修建了一座宽敞高雅的教堂。

Our city, tho' laid out with a beautiful regularity, the streets large, strait, and crossing each other at right angles, had the disgrace of suffering those streets to remain long unpav'd, and in wet weather the wheels of heavy carriages plough'd them into a quagmire, so that it was difficult to cross them; and in dry weather the dust was offensive. I had liv'd near what was call'd the Jersey Market, and saw with pain the inhabitants wading in mud while purchasing their provisions. A strip of ground down the middle of that market was at length pav'd with brick, so that, being once in the market, they had firm footing, but were often over shoes in dirt to get there. By talking and writing on the subject, I was at length instrumental in getting the street pav'd with stone between the market and the brick'd foot-pavement, that was on each side next the houses. This, for some time, gave an easy access to the market dry-shod; but, the rest of the street not being pav'd, whenever a carriage came out of the mud upon this pavement, it shook off and left its dirt upon it, and it was soon cover'd with mire, which was not remov'd, the city as yet having no scavengers.

我们的城市虽然规划得美观整齐，街道宽阔平直，纵横交错，但不雅的是路面长久不曾铺设，一到雨天，沉重的马车轮碾过，街道就成了泥沼，使人们寸步难行，而天气干燥时，街上又尘土飞扬，令人

不快。我那时住在泽西市场附近，看到居民们在市场采购时跋涉泥泞的情形，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市场中央的一长条地面上终于铺了砖块，这样市民们到了市场之后就有稳固的落脚之处了，但他们往往还没到市场就已经满脚泥了。马路两边都有房屋，两排房屋前是铺了砖的人行道，我认为应在市场和人行道之间的道路上铺设石料。我和人议过此事，也就此写过文章，终于将其促成。这样，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就可以轻易抵达市场而不把鞋子弄湿了。但街道其余部分还没有铺，每当马车从泥泞处走到石路时，把它的泥土震下来，堆在石板上，很不久石路也泥泞不堪，而且又没有人去清除这些污泥，因为当时城市里还没有清洁工。

After some inquiry I found a poor industrious man, who was willing to undertake keeping the pavement clean, by sweeping it twice a week, carrying off the dirt from before all the neighbors' doors, for the sum of sixpence per month, to be paid by each house. I then wrote and printed a paper setting forth the advantages to the neighborhood that might be obtain'd by this small expense; the greater ease in keeping our houses clean, so much dirt not being brought in by people's feet; the benefit to the shops by more custom, etc., etc., as buyers could more easily get at them; and by not having, in windy weather, the dust blown in upon their goods, etc., etc. I sent one of these papers to each house, and in a day or two went round to see who would subscribe an agreement to pay these sixpences; it was unanimously sign'd, and for a time well executed. All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ity were delighted with the cleanliness of the pavement that surrounded the market, it being a convenience to all, and this rais'd a general desire to have all the streets paved, and made the people more willing to submit to a tax for that purpose.

经过一番寻访，我找到一个贫穷勤快的人，他愿意承担保持街道清洁的工作，每周清扫路面两次，并把各家各户门前的尘泥清除垃圾搬走，每家每月出六便士，由各户共同支付。然后我撰写并刊印了一篇文章，向居民们陈述这一小笔支出的种种好处，如人们脚上不再带进如此多的泥土，更易于保持屋内卫生；对于店家来说，光顾的客人会有所增加，营业额也会上涨，因为人们更容易到达商店；起风时也不会有沙尘落到他们的货物上等等。我每家各送一份传单，一两天后再去各家看谁愿意签订协议支付这六便士。人们全都签了协议，一段时期内这个计划得以顺利进行。所有市民都高兴地见到市场周围的街道变得干净清洁了，这方便了大家，也使人们普遍希望所有街道都能铺设好，他们也更加愿意为此缴纳税款了。

After some time I drew a bill for paving the city, and brought it into the Assembly. It was just before I went to England, in 1757, and did not pass till I was gone and then with an alteration in the mode of assessment, which I thought not for the better, but with an additional provision for lighting as well as paving the streets, which was a great improvement. It was by a private person, the late Mr. John Clifton, his giving a sample of the utility of lamps, by placing one at his door, that the people were first impress'd with the idea of enlighting all the city. The honour of this public benefit has also been ascrib'd to me but it belongs truly to that gentleman. I did but follow his example, and have only some merit to claim respecting the form of our lamps, as differing from the globe lamps we were at first supply'd with from London. Those we found inconvenient in these respects: they admitted no air below; the smoke, therefore, did not readily go out above, but circulated in the globe, lodg'd on its inside, and soon obstructed the light they were intended to afford; giving, besides, the daily trouble of wiping them clean; and an accidental stroke on one of them would demolish it, and render it totally useless. I therefore suggested the composing them of four

flat panes, with a long funnel above to draw up the smoke, and crevices admitting air below, to facilitate the ascent of the smoke; by this means they were kept clean, and did not grow dark in a few hours, as the London lamps do, but continu'd bright till morning, and an accidental stroke would generally break but a single pane, easily repair'd.

一段时间以后，就在1757年我去英格兰之前，我起草了铺设全城街道的议案，并将其提交至州议会，直到我走后议案才获得通过。当时议案中估定税额的方式有所更改，我认为这并没带来什么改善，倒是其中提出除铺设街道外还要安装路灯，这是一项很大的进步。这个提议是由一个平头百姓、已故的约翰·克利夫顿先生提出的，他在自家门前装了一盏灯，向大家展示灯的用处，使人们初次产生了照亮整座城市的想法。人们把这项公益事业的荣誉也归功于我，但其实它是属于那位先生的。我的确遵从了他的想法，但只是在改进灯的形状方面略有功劳。我们使用的灯的那种最初从伦敦购买的球形灯不太一样，那种灯我们发现在如下方面有诸多缺点：灯的下方不通空气，使灯烟不能从上面出去，而是在球形里流动，附在灯的内壁上，很快就会阻挡灯的光线；此外，这使得灯具需要每天擦拭保持清洁；还有如果一不小心敲一下，灯具就会毁坏，就完全没用了。因此，我建议把四块平板玻璃拼起来作为灯罩，在上方安一支长烟囱以排空烟气，在下方开裂缝使空气进入，从而促使烟气上升。这个方法既能保持灯具清洁，也不像从在伦敦买的灯一样几小时之内就变得黯淡，而是可以持续发光直至天明，不小心碰碎到它一般只会打破一块玻璃，易于修补。

I have sometimes wonder'd that the Londoners did not, from the effect holes in the bottom of the globe lamps us'd at Vauxhall have in keeping them clean, learn to have such holes in their street lamps. But, these holes being made for another purpose, viz., to

communicate flame more suddenly to the wick by a little flax hanging down thro' them, the other use, of letting in air, seems not to have been thought of; and therefore, after the lamps have been lit a few hours, the streets of London are very poorly illuminated.

我有时觉得奇怪，在沃克斯豪尔使用的球形灯底部是有孔的，可以使灯的内部保持清洁，怎么伦敦人就没学会在他们的街灯上也开几个孔呢？但他们的孔是有其他用途的，即从中垂下一小块亚麻布，使火焰更快到达灯芯，而他们似乎没有想到通气的这种用途，因此，路灯点亮几个小时后，伦敦的街道就变得十分昏暗了。

The mention of these improvements puts me in mind of one I propos'd, when in London, to Dr. Fothergill, who was among the best men I have known, and a great promoter of useful projects. I had observ'd that the streets, when dry, were never swept, and the light dust carried away; but it was suffer'd to accumulate till wet weather reduc'd it to mud, and then, after lying some days so deep on the pavement that there was no crossing but in paths kept clean by poor people with brooms, it was with great labor rak'd together and thrown up into carts open above, the sides of which suffer'd some of the slush at every jolt on the pavement to shake out and fall, sometimes to the annoyance of foot-passengers. The reason given for not sweeping the dusty streets was, that the dust would fly into the windows of shops and houses.

提到这些改进，使我想起了在伦敦时向福瑟吉尔博士提议的事情。福瑟吉尔博士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人之一，也是一位公益计划的伟大倡导者。我曾经注意到，天气干燥时，街道从来没人打扫，灰尘从来没人清扫，就这么累积起来，一到下雨天便成了泥浆，几天以

后，人行道上的污泥堆得如此之厚，甚至不能穿过街道，只有穷人用扫帚扫出来的小路是干净的。人们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把这污泥耙到一起，倒进上端敞开的手推车中，但车子在路上行进时，每颠簸一次都会有些污泥从车的两边震落下来，掉在路上，有时让路人烦恼不已。而不清扫满是灰尘的街道的理由是，清扫时灰尘会飞进商铺和房屋的窗户里。

An accidental occurrence had instructed me how much sweeping might be done in a little time. I found at my door in Craven-street, one morning, a poor woman sweeping my pavement with a birch broom; she appeared very pale and feeble, as just come out of a fit of sickness. I ask'd who employ'd her to sweep there; she said, “Nobody, but I am very poor and in distress, and I sweeps before gentlefolkses doors, and hopes they will give me something.” I bid her sweep the whole street clean, and I would give her a shilling; this was at nine o'clock; at 12 she came for the shilling. From the slowness I saw at first in her working, I could scarce believe that the work was done so soon, and sent my servant to examine it, who reported that the whole street was swept perfectly clean, and all the dust plac'd in the gutter, which was in the middle; and the next rain wash'd it quite away, so that the pavement and even the kennel were perfectly clean.

一次偶然事件让我了解到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完成多少清扫工作。一天早上，我在克雷文街住所的门口发现一位穷苦的妇人正用一把桦木扫帚扫着我门口的人行道，她看起来非常苍白虚弱，似乎大病初愈。我问她是谁雇她来这儿扫地的，她说：“没人雇我，但我穷困潦倒，就来上流人士的家门口扫地，希望他们能施舍我点儿。”我让她把整条街都扫干净，我可以给她一先令。当时是9点钟，她12点时来拿钱了。开始时我见她动作很慢，难以相信她能这么快完成工作，于

是就派我的仆人去检查，仆人回来报告说，整条街都打扫得十分干净，所有灰尘都扫到街中央的阴沟里了。后来下了一场雨，把它们都冲走了，这样整条人行道甚至阴沟都变得非常干净。

I then judg'd that, if that feeble woman could sweep such a street in three hours, a strong, active man might have done it in half the time. And here let me remark the convenience of having but one gutter in such a narrow street, running down its middle, instead of two, one on each side, near the footway; for where all the rain that falls on a street runs from the sides and meets in the middle, it forms there a current strong enough to wash away all the mud it meets with; but when divided into two channels, it is often too weak to cleanse either, and only makes the mud it finds more fluid, so that the wheels of carriages and feet of horses throw and dash it upon the foot-pavement, which is thereby rendered foul and slippery, and sometimes splash it upon those who are walking. My proposal, communicated to the good doctor, was as follows:

于是我判断，如果那个虚弱的妇人能在三小时内打扫干净一条街，那么一个身强力壮、行动迅速的男子可能只用一半的时间就能完成。这里我还有话要说，在这样一条窄街上，只有中间一条阴沟而非两边人行道附近各一条是有好处的，因为落在街上的所有雨水从两边汇集到中间时，能够形成一股急流冲刷掉所有遇到的泥土；而如果这股水流分为两道，那么常常力度太弱，不足以清洗掉两边的泥土，只会让泥沾了水后变得稀软，当马车轮碾过或马蹄踏过时溅到人行道上去，弄得人行道上又脏又滑，有时还会溅到行人身上。于是我向这位优秀的博士提出了如下建议：

“For the more effectual cleaning and keeping clean the streets

of London and Westminster,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several watchmen be contracted with to have the dust swept up in dry seasons, and the mud rak'd up at other times, each in the several streets and lanes of his round; that they be furnish'd with brooms and other proper instruments for these purposes, to be kept at their respective stands, ready to furnish the poor people they may employ in the service.

“为更有效地打扫和保持使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街道清洁，我建议雇用若干人手，监管干燥季节时灰尘的清扫和雨季时污泥的耙除，每人负责几条街道及附近的小巷，我们给他们提供扫帚和其他适当的清扫工具，平时保存在各自的场所，以备受雇的穷人清扫街道时使用。”

“That in the dry summer months the dust be all swept up into heaps at proper distances, before the shops and windows of houses are usually opened, when the scavengers, with close-covered carts, shall also carry it all away.

“干燥的夏季时节，应在商店和住宅的窗户打开之前打扫灰尘，每隔适当距离积成一堆，再由清洁工用上端封闭的小车把它们全部运走。”

“That the mud, when rak'd up, be not left in heaps to be spread abroad again by the wheels of carriages and trampling of horses, but that the scavengers be provided with bodies of carts, not plac'd high upon wheels, but low upon sliders, with lattice bottoms, which, being cover'd with straw, will retain the mud thrown into

them, and permit the water to drain from it, whereby it will become much lighter, water making the greatest part of its weight; these bodies of carts to be plac'd at convenient distances, and the mud brought to them in wheel-barrows; they remaining where plac'd till the mud is drain'd, and then horses brought to draw them away.”

“耙集起来的泥巴不要再堆积放置在街上，以免被车轮或马蹄踏散开来。清洁工应配备一些小车，车身不要高高放置在车轮之上，而是低低的放在滑盘上，底部是格子结构，上面铺上稻草，这样既可以兜住污泥，又能使水从中排出，如此一来整个重量就要轻许多，因为水占了大部分重量。这些车辆应置放在适当距离之处，污泥用手推车送来，倒入其中，等泥巴中的水都沥干之后用马匹把它们拖走。”

I have since had doubts of the practicability of the latter part of this proposal, on account of the narrowness of some streets, and the difficulty of placing the draining-sleds so as not to encumber too much the passage; but I am still of opinion that the former, requiring the dust to be swept up and carry'd away before the shops are open, is very practicable in the summer, when the days are long; for, in walking thro' the Strand and Fleet-street one morning at seven o'clock, I observ'd there was not one shop open, tho' it had been daylight and the sun up above three hours; the inhabitants of London chusing voluntarily to live much by candle-light, and sleep by sunshine, and yet often complain, a little absurdly, of the duty on candles and the high price of tallow.

我后来对该建议后一部分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因为有些街道很窄，要把手推车放在那儿而不阻碍交通是很困难的。但我还是认为要求在商店开门之前清扫并运走尘土的这一部分在夏季是十分可行的，

因为日照时间很长。一天早晨七点时，我走过钢绞线大道和舰队街，发现没有一家商店开门，尽管当时已经天色大亮，日上三竿。伦敦居民宁愿在烛光下生活、在阳光下睡觉，却又常常抱怨蜡烛征税太高，烛价太高，真有些可笑。

Some may think these trifling matters not worth minding or relating; but when they consider that tho' dust blown into the eyes of a single person, or into a single shop on a windy day, is but of small importance, yet the great number of the instances in a populous city, and its frequent repetitions give it weight and consequence, perhaps they will not censure very severely those who bestow some attention to affairs of this seemingly low nature. Human felicity is produc'd not so much by great pieces of good fortune that seldom happen, as by little advantages that occur every day. Thus, if you teach a poor young man to shave himself, and keep his razor in order, you may contribute more to the happiness of his life than in giving him a thousand guineas. The money may be soon spent, the regret only remaining of having foolishly consumed it; but in the other case, he escapes the frequent vexation of waiting for barbers, and of their sometimes dirty fingers, offensive breaths, and dull razors; he shaves when most convenient to him, and enjoys daily the pleasure of its being done with a good instrument. With these sentiments I have hazarded the few preceding pages, hoping they may afford hints which some time or other may be useful to a city I love, having lived many years in it very happily, and perhaps to some of our towns in America.

有人可能认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并不值得注意或是谈及，但如果他们认为大风天气里，灰尘吹进某个人眼睛或是刮进某家商店里并不是什么大事，那么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里，许多人或许多商店受

到风沙袭击，而且这样的事经常重复发生，这就十分严重了，也许这样他们就不会严厉责备那些对这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有所留意的人了。人类幸福不是因鲜有发生撞大运而产生，而在于平日里得到的小小福利。因此，如果你能教会一个穷困的年轻人自己剃须，并好好保存剃须刀，这比赠给他1,000几尼更能给其人生带来幸福。钱财可能很快花光，剩下的只有对愚蠢挥霍金钱的懊悔；但如果你能教他剃须，那么他就能免去常常等待理发师的烦恼，不用忍受他们时常肮脏的手指、难闻的呼吸以及迟钝的剃刀，他可以选择自己最方便的时间剃须，还能每天享受使用好剃刀刮须的快乐。抱着这些想法，我冒昧写下前面几页文章，希望它们能在某些时候对我所热爱的城市有所帮助，我在这里已经快乐地生活了很多年，也许它们对我们美国的其他城镇也有所裨益。

Having been for some time employed by the postmaster-general of America as his comptroller in regulating several offices, and bringing the officers to account, I was, upon his death in 1753, appointed, jointly with Mr. William Hunter, to succeed him, by a commission from the postmaster-general in England. The American office never had hitherto paid any thing to that of Britain. We were to have six hundred pounds a year between us, if we could make that sum out of the profits of the office. To do this, a variety of improvements were necessary; some of these were inevitably at first expensive, so that in the first four years the office became above nine hundred pounds in debt to us. But it soon after began to repay us; and before I was displac'd by a freak of the ministers, of which I shall speak hereafter, we had brought it to yield three times as much clear revenue to the crown as the postoffice of Ireland. Since that imprudent transaction, they have receiv'd from it—not one farthing!

我受美国邮电总长任命担任他的审计员已有一段时间，负责管理若干分局，并检查邮局职员的工作。他于1753年逝世，我和威廉·亨特先生一同被英国邮电总长指定接任他的职位。此前美国邮局从未向英国邮局缴纳任何钱款。我们两人的年薪一共为600镑，如果我们能从邮局利润中获得这一数目的话。为实现这一点，我们对邮局工作作了各种必要改进，有些措施一开始必然要花费些金钱，因此在开始的四年里，邮局欠了我们900多镑薪金，但是很快就还给了我们。在我被某个狂妄的大臣免职之前（我稍后会提到），我们使邮局缴纳给英王的净税收额是爱尔兰邮局缴纳的三倍。在我被他们草率地免职之后，他们从那儿得到的收入——居然降为零！

The business of the postoffice occasion'd my taking a journey this year to New England, where the College of Cambridge, of their own motion, presented me with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Yale College, in Connecticut, had before made me a similar compliment. Thus, without studying in any college, I came to partake of their honours. They were conferr'd in consideration of my improvements and discoveries in the electric branch of natural philosophy.

邮局事务让我这一年有机会去了一趟新英格兰，那里的剑桥大学主动授予我文学硕士学位。康涅狄格的耶鲁大学此前也授予我一项类似的学位。就这样，我从未在任何大学学习过，却享有它们的荣誉。这些学位的授予是因为我在自然科学的电学分支学科上有所改进和发明。

In 1754, war with France being again apprehended, a congress of commissioners from the different colonies was, by an order of the Lords of Trade, to be assembled at Albany, there to confer with the chiefs of the Six Nations concerning the means of defending both

their country and ours. Governor Hamilton, having receiv'd this order, acquainted the House with it, requesting they would furnish proper presents for the Indians, to be given on this occasion; and naming the speaker (Mr. Norris) and myself to join Mr. Thomas Penn and Mr. Secretary Peters as commissioners to act for Pennsylvania. The House approv'd the nomination, and provided the goods for the present, and tho' they did not much like treating out of the provinces; and we met the other commissioners at Albany about the middle of June.

1754年，我们与法国再次开战，商务大臣命令各殖民地派出代表委员在奥尔巴尼举行集会，与印第安人六部落的首领就共同防卫的方式进行协商。汉密尔顿州长收到命令后，通知了议会，请求他们提供适当礼物，在开会时送给印第安人，还提名议长诺里斯先生和我会同托马斯·佩恩先生及彼得斯秘书先生一起担任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委员。议会通过了这项提名，还提供了礼物，尽管议员们并不太乐意在外地招待别人；我们大约在六月中旬时与其他委员们在奥尔巴尼会面。

In our way thither, I projected and drew a plan for the union of all the colonies under one government, so far as might be necessary for defense, and other important general purposes. As we pass'd thro' New York, I had there shown my project to Mr. James Alexander and Mr. Kennedy, two gentlemen of great knowledge in public affairs, and, being fortified by their approbation, I ventur'd to lay it before the Congress. It then appeared that several of the commissioners had form'd plans of the same kind. A previous question was first taken, whether a un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which pass'd in the affirmative unanimously. A committee was then appointed, one member from each colony, to consider the several plans and report. Mine happen'd to be preferr'd, and, with a few

amendments, was accordingly reported.

在我们前往奥尔巴尼的路上，我按照国防和其他重大共同事业的可能需要拟定了一项计划，将所有殖民地联合在一个政府下。我们经过纽约时，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了詹姆斯·亚历山大先生和肯尼迪先生，他们是在公共事务领域颇有见识的两位绅士，他们的赞同给了我信心，于是我大胆地在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当时似乎好几位委员都提出了同样的计划。我们首先讨论了一个先决问题，即是否应该成立一个联盟，这个问题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然后大会指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每个殖民地各选一人，来考虑这几个计划和报告。我的计划凑巧获得了委员会的青睐，在经过几处修改后，就向大会作了报告。

By this plan the general government was to be administered by a president-general, appointed and supported by the crown, and a grand council was to be chosen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 of the several colonies, met in their respective assemblies. The debates upon it in Congress went on daily, hand in hand with the Indian business. Many objections and difficulties were started, but at length they were all overcome, and the plan was unanimously agreed to, and copies ordered to be transmitted to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o the assemblies of the several provinces. Its fate was singular: the assemblies did not adopt it, as they all thought there was too much prerogative in it, and in England it was judg'd to have too much of the democratic.

根据这项计划，联邦政府将由一位总统管理，总统由英王指定，受其支持，另外还应选举出一个大理事会，由各殖民地的人民代表在各自议会里开会选举产生。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每日进行，与印第安人事务的讨论齐头并进。会上出现了许多反对意见和困难，但

最终都被驳倒和克服，这项计划获得了一致通过，其副本被送至贸易委员会和各州议会处。这个计划的命运非常奇特：各州议会并不采纳它，因为他们都认为按此计划，联邦政府拥有太多特权，而英国方面却认为这计划使他们下放了太多权力。

The Board of Trade therefore did not approve of it, nor recommend it for the approbation of his majesty; but another scheme was form'd, supposed to answer the same purpose better, whereby the governors of the provinces, with some members of their respective councils, were to meet and order the raising of troops, building of forts, etc., and to draw on the treasury of Great Britain for the expense, which was afterwards to be refunded by an act of Parliament laying a tax on America. My plan, with my reasons in support of it, is to be found among my political papers that are printed.

因此贸易委员会没有批准这个计划，也不提请英王批准，但是这时却形成了另一项计划，应能更好地服务于同一目的。根据这个计划，各州州长应与各参事会成员集会，决定招募军队、修建堡垒等等事宜，所有花费由大不列颠王国国库支付，事后由英国议会颁布一项向美国征税的法令来偿还。我的计划书和支持这项计划的理由可以在我已经刊印的政治论文中找到。

Being the winter following in Boston, I had much conversation with Governor Shirley upon both the plans. Part of what passed between us on the occasion may also be seen among those papers. The different and contrary reasons of dislike to my plan makes me suspect that it was really the true medium; and I am still of opinion it would have been happy for both sides the water if it had been

adopted. The colonies, so united, would have been sufficiently strong to have defended themselves; there would then have been no need of troops from England; of course, the subsequent pretence for taxing America, and the bloody contest it occasioned, would have been avoided. But such mistakes are not new; history is full of the errors of states and princes.

那年冬天我在波士顿，这期间我与雪利州长就这两个计划有过许多讨论。我们当时讨论的部分内容也可在那些论文中找到。对我的计划，反对者有的持不同意见，有的持相反意见，这让我怀疑这就是真正的折中之道。我也依然认为如果它能被采纳，对大洋两岸的双方都有好处。各殖民地按照这一计划联合起来后，将足够强大以进行自我防卫，那么到时就没有必要再从英国派军队过来，以后自然也就没有向美国征税的借口了，也不会引起血腥争夺了。但是这样的错误绝不新鲜，历史上国家和君王犯错的例子比比皆是。

Look round the habitable world, how few Know their own good, or, knowing it, pursue!

环顾世界，明察自身利益之人何其少，明察并能勇敢追求之人又何其少！

Those who govern, having much business on their hands, do not generally like to take the trouble of considering and carrying into execution new projects. The best public measures are therefore seldom adopted from previous wisdom, but forc'd by the occasion.

执政之人有太多事务需要处理，一般不愿劳神去考虑和执行新的计划。因此，最佳公共措施很少是因先见之明而被采纳的，一般都是情势所逼而已。

The Governor of Pennsylvania, in sending it down to the Assembly, express'd his approbation of the plan, “as appearing to him to be drawn up with great clearness and strength of judgment, and therefore recommended it as well worthy of their closest and most serious attention.” The House, however, by the management of a certain member, took it up when I happen'd to be absent, which I thought not very fair, and reprobated it without paying any attention to it at all, to my no small mortification.

宾夕法尼亚州长将我的计划交给议会时，他表示赞同，“在他看来，这个计划逻辑清晰，观点合理，因此他认为值得议员们仔细阅读，认真对待。”但是，有个议员耍了个手段，趁我不在时在议会讨论这个计划，而且完全不加考虑，马马虎虎地否定了它，我不但认为这种行为鬼鬼祟祟，完全不正派，而且对结果表示十分遗憾。

In my journey to Boston this year, I met at New York with our new governor, Mr. Morris, just arriv'd there from England, with whom I had been before intimately acquainted. He brought a commission to supersede Mr. Hamilton, who, tir'd with the disputes his proprietary instructions subjected him to, had resign'd. Mr. Morris ask'd me if I thought he must expect as uncomfortable an administration. I said, “No; you may, on the contrary, have a very comfortable one, if you will only take care not to enter into any dispute with the Assembly.” “My dear friend,” says he, pleasantly, “how can you advise my avoiding disputes? You know I love

disputing; it is one of my greatest pleasures; however, to show the regard I have for your counsel, I promise you I will, if possible, avoid them." He had some reason for loving to dispute, being eloquent, an acute sophister, and, therefore, generally successful in argumentative conversation. He had been brought up to it from a boy, his father, as I have heard, accustoming his children to dispute with one another for his diversion, while sitting at table after dinner; but I think the practice was not wise; for, in the course of my observation, these disputing, contradicting, and confuting people are generally unfortunate in their affairs. They get victory sometimes, but they never get good will, which would be of more use to them. We parted, he going to Philadelphia, and I to Boston.

这一年在去波士顿的途中，我在纽约见到了我们的新州长莫里斯先生。他刚从英格兰来到这里，我以前和他关系很好。他奉命来此接替汉密尔顿先生，后者厌倦了因领主指令的约束而与议会发生争执，于是辞职了。莫里斯先生问我他是否会在政府管理上遇到同样的困难，我说："不会，相反，只要你小心不与议会发生任何争论，你的处境会一帆风顺。""我亲爱的朋友，"他愉快地说，"你怎么能建议我避免争论呢？你知道我很爱争论，这是我的最大乐趣之一。但是，为了表示我对你建议的尊重，我向你保证，如果可能的话，我会避免争论的。"他爱好争论是有些理由的，他口才很好，是一个精明的巧辩家，因此在论证性谈话中常常能够胜出。他孩童时代起就学习辩论，我听说他父亲吃完晚饭坐在桌旁时，会让孩子们相互争论，以此为乐。但我认为这么做并不高明，因为通过观察，这些爱好争论、反驳和驳斥的人们在自己的事务中一般都很不幸。他们有时会取得胜利，但从来得不到人们的善意对待，而这善意对待要比赢得争论更为有用。我们分开之后，他去了费城，我到了波士顿。

In returning, I met at New York with the votes of the Assembly,

by which it appear'd that, notwithstanding his promise to me, he and the House were already in high contention; and it was a continual battle between them as long as he retain'd the government. I had my share of it; for, as soon as I got back to my seat in the Assembly, I was put on every committee for answering his speeches and messages, and by the committees always desired to make the drafts. Our answers, as well as his messages, were often tart, and sometimes indecently abusive; and, as he knew I wrote for the Assembly, one might have imagined that, when we met, we could hardly avoid cutting throats; but he was so good-natur'd a man that no personal difference between him and me was occasion'd by the contest, and we often din'd together.

在回来的路上，我在纽约看到了议会的表决结果。从表决结果来看，尽管他向我许了诺，他和议会已经争论不休了。在他任职期间，他们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休止。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因为我一回到州议会，每个委员会都让我答复他的演说和咨文，而委员会则总是让我起草这些文件。我们的答复和他的咨文往往尖酸刻薄，有时还有无礼的谩骂。他知道我为议会撰写回复文章后，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们见面时免不了会斗个你死我活，但他的性情如此之善良，以至于我和他之间从未因争论而心生嫌隙，我们还常常一块儿吃饭呢。

One afternoon, in the height of this public quarrel, we met in the street. “Franklin,” says he, “you must go home with me and spend the evening; I am to have some company that you will like” ; and, taking me by the arm, he led me to his house. In gay conversation over our wine, after supper, he told us, jokingly, that he much admir'd the idea of Sancho Panza, who, when it was proposed to give him a government, requested it might be a of blacks, as then, if he could not agree with his people, he might sell

them. One of his friends, who sat next to me, says, “Franklin, why do you continue to side with these damn'd Quakers? Had not you better sell them? The proprietor would give you a good price.” “The governor,” says I, “has not yet blacked them enough.” He, indeed, had labored hard to blacken the Assembly in all his messages, but they wip'd off his coloring as fast as he laid it on, and plac'd it, in return, thick upon his own face; so that, finding he was likely to be negrofied himself, he, as well as Mr. Hamilton, grew tir'd of the contest, and quitted the government.

一天下午，正当这场公务上的争论处于高潮之时，我们在街上相遇了。“富兰克林，”他说，“你今天晚上一定得和我去我家，我有些朋友要来，你会喜欢的。”于是，他挽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去了他家。晚饭后，我们把酒言欢之时，他戏谑地告诉我们他非常喜欢桑乔·潘沙的想法，有人提出要让桑乔·潘沙来管理一个政府时，他则要求这个政府统治的是黑人，这样的话，当他和他的人民意见不一时，他还可以卖掉他们。他的一位坐在我身边的朋友说道：“富兰克林，为什么你还要站在那些该死的贵格会信徒一边呢？你把他们卖了不是更好吗？领主会给你开个好价钱的。”我说：“州长还没把他们涂得够黑啊。”他在他所有的咨文中的确都极力抹黑议会的名声，但他刚把颜色涂上去他们就将它擦拭干净了，还把它狠狠回敬到他自己脸上；就这样，当他发现自己很有可能被涂为黑人时，也像汉密尔顿先生一样，厌倦了争论，从政府中辞职了。

These public quarrels were all at bottom owing to the proprietaries, our hereditary governors, who, when any expense was to be incurred for the defense of their province, with incredible meanness instructed their deputies to pass no act for levying the necessary taxes, unless their vast estates were in the same act expressly excused; and they had even taken bonds of these deputies

to observe such instructions. The Assemblies for three years held out against this injustice, tho' constrained to bend at last. At length Captain Denny, who was Governor Morris's successor, ventured to disobey those instructions; how that was brought about I shall show hereafter.

这些公务上的争论其实都起源于领主，他们是我们世袭的统治者。每当需要为本州防卫支付费用时，他们表现出来的吝啬让人难以置信，他们会叮嘱代理人，让他们不要通过征收必要税款的法案，除非同一法案中明文批准他们数额巨大的财产可以免税；他们甚至还和这些代理人订立合约，确保他们遵照其命令。议会连续三年抵抗这种不公平的做法，但最终还是被迫让步。终于，莫里斯州长的继任者丹尼上尉大胆地拒绝那些命令，这件事情的经过我会稍后说明。

But I am got forward too fast with my story: there are still some transactions to be mention'd that happened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Governor Morris.

但是我的故事讲述得太快了，抢 到故事前面去了，在莫里斯州长任职期间，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一提。

War being in a manner commenced with France, the government of Massachusetts Bay projected an attack upon Crown Point, and sent Mr. Quincy to Pennsylvania, and Mr. Pownall, afterward Governor Pownall, to New York, to solicit assistance. As I was in the Assembly, knew its temper, and was Mr. Quincy's countryman, he appli'd to me for my influence and assistance. I dictated his address to them, which was well receiv'd. They voted

an aid of ten thousand pounds, to be laid out in provisions. But the governor refusing his assent to their bill (which included this with other sums granted for the use of the crown), unless a clause were inserted exempting the proprietary estate from bearing any part of the tax that would be necessary, the Assembly, tho' very desirous of making their grant to New England effectual, were at a loss how to accomplish it. Mr. Quincy labored hard with the governor to obtain his assent, but he was obstinate.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与法国的战争已经开始了。马萨诸塞湾政府打算袭击克朗波因特，派昆西先生和波纳尔先生（后来的波纳尔州长）分别去宾夕法尼亚和纽约请求援助。因为我是州议员，了解议会的情况，又和昆西先生是同乡，所以他希望我利用自己的影响帮助他。我向昆西先生口述了他要向议员们发表的演讲，那篇演讲反响良好。议员们投票通过了一万镑的援助款，用于购买粮草。但州长却拒绝批准这一议案（该议案包含这项援助，以及其他为英王所用的津贴），除非其中加上领主的财产可免交所有必要税款的条款，尽管议会极其希望能对新英格兰施以有效援助，但此时却束手无策。昆西先生竭力劝说州长批准法案，但州长还是固执己见。

I then suggested a method of doing the business without the governor, by orders on the trustees of the Loan Office, which, by law, the Assembly had the right of drawing. There was, indeed, little or no money at that time in the office, and therefore I propos'd that the orders should be payable in a year, and to bear an interest of five per cent. With these orders I suppos'd the provisions might easily be purchas'd. The Assembly, with very little hesitation, adopted the proposal. The orders were immediately printed, and I was one of the committee directed to sign and dispose of them. The fund for paying them was the interest of all the paper currency then

extant in the province upon loan, together with the revenue arising from the excise, which being known to be more than sufficient, they obtain'd instant credit, and were not only receiv'd in payment for the provisions, but many money'd people, who had cash lying by them, vested it in those orders, which they found advantageous, as they bore interest while upon hand, and might on any occasion be used as money; so that they were eagerly all bought up, and in a few weeks none of them were to be seen. Thus this important affair was by my means compleated. Mr. Quincy return'd thanks to the Assembly in a handsome memorial, went home highly pleas'd with the success of his embassy, and ever after bore for me the most cordial and affectionate friendship.

于是我提出了一个绕开州长的行事办法，即向贷款办公室理事开具汇票，根据法律，议会是有这项权利的。其实那时贷款办公室没什么资金，于是我提议，汇票应在一年内支付，并支付5%的利息。有了这些汇票，我想购买粮草应当不是什么难事。议会没怎么犹豫就采纳了这一提议。汇票很快付印了，我被指定为签署并发行汇票的委员之一。收购汇票的资金是当时全州所有纸币贷款的利息以及消费税所得，人们知道要收购汇票，这二者之和是绰绰有余的，于是汇票很快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它们不仅被用来购买粮食，很多手头有现钱的富人还将钱投入那些汇票，他们发现这样有利可图，因为持有汇票可以获得利息，又随时可当现金使用，因此他们都积极购买，几个星期后所有证券就全都卖光了。就这样，这一重大事件按我的方法就完成了。昆西先生写了一篇典雅的文章向议会表示感谢，顺利完成了使命后，兴高采烈地回家了。从此以后，他对我总是怀着最真挚、最深切的友情。

The British government, not chusing to permit the union of the colonies as propos'd at Albany, and to trust that union with their

defense, lest they should thereby grow too military, and feel their own strength, suspicions and jealousies at this time being entertain'd of them, sent over General Braddock with two regiments of regular English troops for that purpose. He landed at Alexandria, in Virginia, and thence march'd to Frederictown, in Maryland, where he halted for carriages. Our Assembly apprehending, from some information, that he had conceived violent prejudices against them, as averse to the service, wish'd me to wait upon him, not as from them, but as postmaster-general, under the guise of proposing to settle with him the mode of conducting with most celerity and certainty the despatches between him and the governors of the several provinces, with whom he must necessarily have continual correspondence, and of which they propos'd to pay the expense. My son accompanied me on this journey

英国政府不会容忍奥尔巴尼提案中成立殖民地联盟的建议，不会任由这个联盟建立防卫力量，以防其军事壮大。在提案时，英国政府感到自己有实力，并且对殖民地联盟产生怀疑和嫉妒，于是派布雷多克将军率领两支英国正规军过去。布雷多克将军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港登陆后，想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敦进军，并在那里驻扎下来。议会收到了一些消息并认为他们的军队在那里的人对英军持有偏见认为他们很暴力，因而抵制他们的帮助，于是派我在那等着那位将军。不是为了迎接英军，而是作为邮电总长，打着与其商讨的幌子解决他和几个州长（显然他们之间一直有往来）的最简单且行之有效的方式，那些州长提议承担此次行动的费用。在此期间，我的儿子全程在陪伴我。

We found the general at Frederictown, waiting impatiently for the return of those he had sent thro' the back parts of Maryland and Virginia to collect waggons. I stayed with him several days, din'd

with him daily, and had full opportunity of removing all his prejudices, by the information of what the Assembly had before his arrival actually done, and were still willing to do, to facilitate his operations. When I was about to depart, the returns of waggons to be obtained were brought in, by which it appear'd that they amounted only to twenty-five, and not all of those were in serviceable condition. The general and all the officers were surpris'd, declar'd the expedition was then at an end, being impossible, and exclaim'd against the ministers for ignorantly landing them in a country destitute of the means of conveying their stores, baggage, etc., not less than one hundred and fifty waggons being necessary.

我们在弗雷德里克敦见到了这位将军，他当时正在焦急地等待派往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边境地区征集车辆的人回来。我和他共处了几天，每天和他一起吃饭，有充足的机会消除他的所有偏见，我告诉他议会在他抵达之前所做的一切，现在他们依然愿意这样做以协助他的行动。我正要离开时，所征车辆情况的材料呈递了进来，报告上说只征集到25辆车，其中有些已不能使用。将军和所有的军官都惊慌失措，宣布这次出征就此终结，任务不能完成了，他们还大声怒骂英国政府愚昧无知地让他们在这样一个地方登陆，这里连运送军需品和行李等等的工具都没有，而他们至少需要150辆运货马车。

I happened to say I thought it was a pity they had not been landed rather in Pennsylvania, as in that country almost every farmer had his waggon. The general eagerly laid hold of my words, and said, “Then you, sir, who are a man of interest there, can probably procure them for us; and I beg you will undertake it.” I ask'd what terms were to be offer'd the owners of the waggons; and I was desir'd to put on paper the terms that appeared to me

necessary. This I did, and they were agreed to, and a commission and instructions accordingly prepar'd immediately. What those terms were will appear in the advertisement I publish'd as soon as I arriv'd at Lancaster, which being, from the great and sudden effect it produc'd, a piece of some curiosity, I shall insert it at length, as follows:

我无意中提到，他们要是在宾夕法尼亚登陆就好了，因为在那儿，几乎每个农夫都有自己的马车。将军立即接我的话说道：“那么先生，您在那儿是个有影响的人，很可能可以帮我们征到车辆，我请您应下此事。”我问他对马车车主有何报酬，他让我将我认为必要的报酬写在纸上。我写了下来，他同意这些条件，于是立即把相应的委任书和通告令准备好。这些报酬是什么可以在我抵达兰开斯特后立即发布的公告上看到，从它迅速引起的巨大反响来看，这公告倒是很有意思，我把全文插在此处，如下所示：

“ADVERTISEMENT.”

公告

LANCASTER, April 26, 1755.

兰开斯特1755年4月26日

“Whereas, one hundred and fifty waggons, with four horses to each waggon, and fifteen hundred saddle or pack horses, are

wanted for the service of his majesty's forces now about to rendezvous at Will's Creek, and his excellency General Braddock having been pleased to empower me to contract for the hire of the same, I hereby give notice that I shall attend for that purpose at Lancaster from this day to next Wednesday evening, and at York from next Thursday morning till Friday evening, where I shall be ready to agree for waggons and teams, or single horses, on the following terms, viz.: 1. That there shall be paid for each waggon, with four good horses and a driver, fifteen shillings per diem; and for each able horse with a pack-saddle, or other saddle and furniture, two shillings per diem; and for each able horse without a saddle, eighteen pence per diem. 2. That the pay commence from the time of their joining the forces at Will's Creek, which must be on or before the 20th of May ensuing, and that a reasonable allowance be paid over and above for the time necessary for their travelling to Will's Creek and home again after their discharge. 3. Each waggon and team, and every saddle or pack horse, is to be valued by indifferent persons chosen between me and the owner; and in case of the loss of any waggon, team, or other horse in the service, the price according to such valuation is to be allowed and paid. 4. Seven days' pay is to be advanced and paid in hand by me to the owner of each waggon and team, or horse, at the time of contracting, if required, and the remainder to be paid by General Braddock, or by the paymaster of the army, at the time of their discharge, or from time to time, as it shall be demanded. 5. No drivers of waggons, or persons taking care of the hired horses, are on any account to be called upon to do the duty of soldiers, or be otherwise employed than in conducting or taking care of their carriages or horses. 6. All oats, Indian corn, or other forage that waggons or horses bring to the camp, more than is necessary for the subsistence of the horses, is to be taken for the use of the army, and a reasonable price paid for the same.

兹因英王陛下的军队将在威尔斯克里克集结，需150辆马车，每辆马车需配马四匹，还需1,500匹驯马或驮马，尊敬的布雷多克将军阁下授权我为他租马并订立合约。因此，我将于今日至下周三晚在兰开斯特、于下周四上午至周五晚在约克办理此事，特此公告。另车辆、马车联队及单匹马的租金如下：1．配有四匹良马及一位马夫的马车，每日付给15先令；配有驮鞍或其他马鞍及装备的健壮马匹，每日付给两先令；无马鞍的健壮马匹，每日付给18便士。2．租金从车辆和马匹加入位于威尔斯克里克的军队之时开始计算，报到时间为接下来的5月20日或此日期之前。除租金外，就往返路途的必要时间也会给予适当补贴。3．每辆车及马车联队、每匹驯马或驮马将由我和车马主人选择的中立人士进行估价，如若车辆、马车联队或其他马匹在服役时有所损失，应根据估价给予赔偿。4．订立合约时，如车马主人需要，可由我预先支付七日租金，余下部分由布雷多克将军或军队出纳员在车马服役结束时支付，或根据需要择期支付。5．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要求驾车人或马夫履行士兵职责，也不使其承担驾车或养马以外的任务。6．凡由车马运至军营的所有燕麦、玉米或其他饲料，如满足饲养马匹需要之外还有剩余，可由军队按照合理价格收购，以供军用。

“Note.—My son, William Franklin, is empowered to enter into like contracts with any person in Cumberland County.

注：我的儿子威廉·富兰克林亦有权与坎伯兰郡任何人订立此类合同。

“B.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ies of Lancaster, York and Cumberland.

致兰开斯特、约克及坎伯兰郡居民书

“Friends and Countrymen,

朋友们，同乡们：

“Being occasionally at the camp at Frederic a few days since, I found the general and officers extremely exasperated on account of their not being supplied with horses and carriages, which had been expected from this province, as most able to furnish them; but, through the dissensions between our governor and Assembly, money had not been provided, nor any steps taken for that purpose.

几天前，我偶然去了弗雷德里克军营，发现将军和军官们因缺乏马匹和车辆供给而极为恼怒，他们希望能从本州获得供给，因为本州最具备这种能力。但因州长和议会不和，未能提供资金，也未为此采取任何措施。

“It was proposed to send an armed force immediately into these counties, to seize as many of the best carriages and horses as

should be wanted, and compel as many persons into the service as would be necessary to drive and take care of them.

有人提议立即派遣一支军队进入诸郡，按其所需数量，抢夺优良车马，强迫必要数量的人们到军队驾车养马。

“I apprehended that the progress of British soldiers through these counties on such an occasion,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temper they are in, and their resentment against us, would be attended with many and great inconveniences to the inhabitants, and therefore more willingly took the trouble of trying first what might be done by fair and equitable means. The people of these back counties have lately complained to the Assembly that a sufficient currency was wanting;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of receiving and dividing among you a very considerable sum; for, if the service of this expedition should continue, as it is more than probable it will, for one hundred and twenty days, the hire of these waggons and horses will amount to upward of thirty thousand pounds, which will be paid you in silver and gold of the king's money.

我担心英国士兵在此情景下行经诸郡，尤其考虑到他们此刻的情绪及对我们的憎恶，会给居民们造成诸多巨大不便，因此，我更加愿意不辞劳苦，尝试先用公平合理的办法解决此事。诸郡人民近来向议会抱怨缺乏足够货币，现在你们有机会获得并分享一大笔财产，如此一次远征服役能持续120天（这是极有可能的），这些车马的租金将高于三万镑，并将以英王的金币和银币支付。

“The service will be light and easy, for the army will scarce march above twelve miles per day, and the waggons and baggage-horses, as they carry those things that are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the welfare of the army, must march with the army, and no faster; and are, for the army's sake, always placed where they can be most secure, whether in a march or in a camp.

服役工作将会轻松容易，因为军队每天行进的路程很少超过12英里，而车辆及运输行李的马匹所运之物对军队福利而言必不可少，必须与军队共同行进，不能更快，不管是在行进中还是军营里，为了军队自身考虑，车马一定始终处于最安全的位置。

“If you are really, as I believe you are, good and loyal subjects to his majesty, you may now do a most acceptable service, and make it easy to yourselves; for three or four of such as can not separately spare from the business of their plantations a waggon and four horses and a driver, may do it together, one furnishing the waggon, another one or two horses, and another the driver, and divide the pay proportionately between you; but if you do not this service to your king and country voluntarily, when such good pay and reasonable terms are offered to you, your loyalty will be strongly suspected. The king's business must be done; so many brave troops, come so far for your defense, must not stand idle through your backwardness to do what may be reasonably expected from you; waggons and horses must be had; violent measures will probably be used, and you will be left to seek for a recompense where you can find it, and your case, perhaps, be little pitied or regarded.

如你们像我相信的那样，的确是英国善良而忠诚的子民，你们现在有一个尽忠的机会，而且做起来也使你们可以承担这项最受欢迎的服役自己不至为难；如果有三四户人家无法从其种植工作中单独抽出一辆车、四匹马和一位车夫，那么他们可以合力，一家提供马车，一家提供一两匹马，再有一家提供车夫，并将所获租金按比例分配。如果你们面对这样优厚的租金、这样合理的条件，仍然不愿主动效忠国家，那么人们会大大地怀疑你们的忠心了。国王的任务必须完成，如此多英勇的军队千里迢迢前来保卫你们，决不能因为你们迟迟不肯尽该尽的责任而袖手旁观，他们也一定要得到车马，便可能会采取过激手段，到时你们就只能自寻出路，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没人会同情和关心你们了。

“I have no particular interest in this affair, as, except the satisfaction of endeavoring to do good, I shall have only my labor for my pains. If this method of obtaining the waggons and horses is not likely to succeed, I am obliged to send word to the general in fourteen days; and I suppose Sir John St. Clair, the hussar, with a body of soldiers, will immediately enter the province for the purpose, which I shall be sorry to hear, because I am very sincerely and truly your friend and well-wisher, B. FRANKLIN.”

此事并未牵涉我本人的具体利益，除了让我拥有尽力行善的满足感外，我只能不辞辛劳，努力促成此事。如果这种征集车马的方法不成功，两周内我只能将此事向将军报告，我想轻骑兵约翰·圣克莱尔爵士会立即率领一队士兵来本州搜寻车马，这会令我非常遗憾，因为我是你们非常诚恳真实的朋友和祝福者。本杰明·富兰克林

I received of the general about eight hundred pounds, to be disbursed in advance-money to the wagon owners, etc.; but, that

sum being insufficient, I advanc'd upward of two hundred pounds more, and in two weeks the one hundred and fifty waggons, with two hundred and fifty-nine carrying horses, were on their march for the camp. The advertisement promised payment according to the valuation, in case any waggon or horse should be lost. The owners, however, alleging they did not know General Braddock, or what dependence might be had on his promise, insisted on my bond for the performance, which I accordingly gave them.

我从将军处得到大约800镑，用于向车主们预付租金等等，但这笔钱还不够，我又垫付了200多镑。两周后，征集到的150辆车和259匹马就将启程前往军营了。通告中规定，如果车马折损，将按估价赔偿。但车马主称他们不认识布雷多克将军，不知他的承诺是否可靠，坚持让我亲自为此担保，我就依了他们的话。

While I was at the camp, supping one evening with the officers of Colonel Dunbar's regiment, he represented to me his concern for the subalterns, who, he said, were generally not in affluence, and could ill afford, in this dear country, to lay in the stores that might be necessary in so long a march, thro' a wilderness, where nothing was to be purchas'd. I commiserated their case, and resolved to endeavor procuring them some relief. I said nothing, however, to him of my intention, but wrote the next morning to the committee of the Assembly, who had the disposition of some public money, warmly recommending the case of these officers to their consideration, and proposing that a present should be sent them of necessaries and refreshments. My son, who had some experience of a camp life, and of its wants, drew up a list for me, which I enclos'd in my letter. The committee approv'd, and used such diligence that, conducted by my son, the stores arrived at the camp as soon as the

waggons. They consisted of twenty parcels, each containing

有天晚上我在军营中和邓巴上校部队的军官们共进晚餐，邓巴上校向我表达了他对部下们的关切之情，他说他们基本都收入不多，在这个物价高昂的地方，他们无力购买并储存足够数量的物品以备长途跋涉所需，穿越荒野时又无处可买。我对他们的境况表示同情，决心设法为他们减轻些负担。但我并没告诉他我的打算，只是第二天早上给议会负责管理一些公款的委员会写了封信，热忱希望他们能考虑这些军官的情况，建议赠送些必需品和食物。我的儿子曾有过军营生活的经历，了解其所需之物，就给我列了张清单，我也随信附上了。委员会同意了此事，并予以迅速办理，以至车马的队伍抵达军营时，由我儿子护送的必需品也到了。运去的必需品共有20袋，每袋中有：

These twenty parcels, well pack'd, were placed on as many horses, each parcel, with the horse, being intended as a present for one officer. They were very thankfully receiv'd, and the kindness acknowledg'd by letters to me from the colonels of both regiments, in the most grateful terms. The general, too, was highly satisfied with my conduct in procuring him the waggons, etc., and readily paid my account of disbursements, thanking me repeatedly, and

requesting my farther assistance in sending provisions after him. I undertook this also, and was busily employ'd in it till we heard of his defeat, advancing for the service of my own money, upwards of one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of which I sent him an account. It came to his hands, luckily for me, a few days before the battle, and he return'd me immediately an order on the paymaster for the round sum of one thousand pounds, leaving the remainder to the next account. I consider this payment as good luck, having never been able to obtain that remainder, of which more hereafter.

这20大袋东西包装完好，由20匹马驮着，每袋东西和一匹马一起作为礼物送给一名军官。军官们收下了这些礼物，十分感激，两个团的上校都写信给我，感谢我们的善举，言辞间充满了感激之情。将军也对我为他征得车辆等物十分满意，欣然把我垫付的钱支付给我，还再三感谢我，请我继续协助他运输粮草。我将此事也承担了下来，并一直为此忙碌，直至听说他战败。我为此垫付了1,000英镑，把账单寄给了他。幸运的是，账单在开战前几天到了他手里，他立即寄给我一张汇单，让我向军队出纳员支取1,000镑整，余下数目并入下次账目。我认为能收回这笔钱款十分幸运，因为余数就再也没能收回，这是后话了。

This general was, I think, a brave man, and might probably have made a figure as a good officer in some European war. But he had too much self-confidence, too high an opinion of the validity of regular troops, and too mean a one of both Americans and Indians. George Croghan, our Indian interpreter, join'd him on his march with one hundred of those people, who might have been of great use to his army as guides, scouts, etc., if he had treated them kindly; but he slighted and neglected them, and they gradually left him.

我认为这位将军是个勇敢的人，在某些欧洲战争中，他也许能成为一位优秀的军官。但他过于自信，对常规军的战斗力估计过高，又太过蔑视美国军队及印第安军队的战斗力。我们的印第安语翻译乔治·克罗根带着100名印第安人加入了他的行军队伍，如将军能善待他们，他们也许能担任向导、侦察员等，对他的军队大有益处，但他轻视、忽略了他们，他们也就渐渐离开了他。

In conversation with him one day, he was giving me some account of his intended progress. “After taking Fort Duquesne,” says he, “I am to proceed to Niagara; and, having taken that, to Frontenac, if the season will allow time; and I suppose it will, for Duquesne can hardly detain me above three or four days; and then I see nothing that can obstruct my march to Niagara.” Having before revolv'd in my mind the long line his army must make in their march by a very narrow road, to be cut for them thro' the woods and bushes, and also what I had read of a former defeat of fifteen hundred French, who invaded the Iroquois country, I had conceiv'd some doubts and some fears for the event of the campaign. But I ventur'd only to say, “To be sure, sir, if you arrive well before Duquesne, with these fine troops, so well provided with artillery, that place not yet completely fortified, and as we hear with no very strong garrison, can probably make but a short resistance. The only danger I apprehend of obstruction to your march is from ambuscades of Indians, who, by constant practice, are dexterous in laying and executing them; and the slender line, near four miles long, which your army must make, may expose it to be attack'd by surprise in its flanks, and to be cut like a thread into several pieces, which, from their distance, can not come up in time to support each other.”

有一天我和他谈话，他告诉了我他的一些计划。他说：“夺取迪凯纳堡垒后，我要进军尼亚加拉，攻下尼亚加拉后，如果季节合适，就进攻弗隆特纳克。我想这可以实现，因为攻下迪凯纳堡垒最多需要三四天时间，然后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向尼亚加拉进发了。”我早就料到他的军队得在一条很窄的路上行进，队伍必然拉得很长，一定会被树林和灌木丛隔断，此外我在书上读到，之前法国一支1,500人的部队在攻打易洛魁郡时吃了败仗，因此对他的这次作战能否取胜有些怀疑和担忧。但我只敢对他说：“当然，先生，如果您带领这样一支备有足够火炮的精锐之师顺利抵达迪凯纳堡垒，而那里的防御工事又尚未修好，加上我们听说那儿的驻军力量也并不强大，所以他们可能抵抗不了多久。我所担心阻碍行军的唯一危险是印第安人的埋伏，他们不断练习，在设陷阱、伏击方面行动敏捷灵巧，到时您的军队一定绵延近四英里，两侧可能会遭遇突然袭击，如一条线一样被切为数截，由于距离太远，他们也不能及时相互支援。”

He smil'd at my ignorance, and reply'd, “These savages may, indeed, be a formidable enemy to your raw American militia, but upon the king's regular and disciplin'd troops, sir, it is impossible they should make any impression.” I was conscious of an impropriety in my disputing with a military man in matters of his profession, and said no more. The enemy, however, did not take the advantage of his army which I apprehended its long line of march expos'd it to, but let it advance without interruption till within nine miles of the place; and then, when more in a body (for it had just passed a river, where the front had halted till all were come over), and in a more open part of the woods than any it had pass'd, attack'd its advanced guard by a heavy fire from behind trees and bushes, which was the first intelligence the general had of an enemy's being near him. This guard being disordered, the general hurried the troops up to their assistance, which was done in great confusion, thro' waggons, baggage, and cattle; and presently the fire

came upon their flank: the officers, being on horseback, were more easily distinguish'd, pick'd out as marks, and fell very fast; and the soldiers were crowded together in a huddle, having or hearing no orders, and standing to be shot at till two-thirds of them were killed; and then, being seiz'd with a panick, the whole fled with precipitation.

他笑我无知，答道："这些野蛮人对你们那未经训练的美国民兵团来说可能的确是个可怕的敌人，但是先生，对英国国王训练有素的常规军而言，他们根本不值一提。"我意识到自己与一位军人就他的本行争论并不妥当，于是没再多说。但是敌人并没利用我担忧的行进队伍太长这一点进行攻击，而是不加阻挠的任其前进至离目的地9英里以内的地方。当时部队已基本集中起来（因为部队刚刚渡河，前方士兵停止了行进，等待后面部队全都过河），来到一处比之前任何地方都更为开阔的林间空地上，就在此处，敌人从树木和灌木丛后用重型火力向其前哨部队发起袭击，而直至此时，将军才知道敌人就在附近。前哨部队方寸大乱，将军立即派大部队前去支援，由于要穿过马车、行李和牲口，部队陷入极大混乱中。此时敌人已向他们侧翼开火，军官们骑在马上，更易被辨认出来当成射击目标，很快就摔落马下。士兵们挤作一堆，没人向他们发号施令，或是根本听不到，只是站在那里挨枪子儿，直到三分之二的人被杀死，人们才都惊慌失措，仓促逃散了。

The waggoners took each a horse out of his team and scamper'd; their example was immediately followed by others; so that all the waggons, provisions, artillery, and stores were left to the enemy. The general, being wounded, was brought off with difficulty; his secretary, Mr. Shirley, was killed by his side; and out of eighty-six officers, sixty-three were killed or wounded, and seven hundred and fourteen men killed out of eleven hundred. These

eleven hundred had been picked men from the whole army; the rest had been left behind with Colonel Dunbar, who was to follow with the heavier part of the stores, provisions, and baggage. The flyers, not being pursu'd, arriv'd at Dunbar's camp, and the panick they brought with them instantly seiz'd him and all his people; and, tho' he had now above one thousand men, and the enemy who had beaten Braddock did not at most exceed four hundred Indians and French together, instead of proceeding, and endeavoring to recover some of the lost honour, he ordered all the stores, ammunition, etc., to be destroy'd, that he might have more horses to assist his flight towards the settlements, and less lumber to remove. He was there met with requests from the governors of Virginia, Maryland, and Pennsylvania, that he would post his troops on the frontiers, so as to afford some protection to the inhabitants; but he continu'd his hasty march thro' all the country, not thinking himself safe till he arriv'd at Philadelphia, where the inhabitants could protect him. This whole transaction gave us Americans the first suspicion that our exalted ideas of the prowess of British regulars had not been well founded.

车夫们各自从马车联队上解下一匹马，急忙逃走了，其他人立即效仿，于是所有马车、粮食、炮弹和其他储备都留给了敌人。将军负了伤，被艰难救出，他的秘书雪利先生在他身边中弹身亡，86名军官中有63名伤亡，1,100名士兵中有714名丧命。这1,100名士兵是从全军中挑选出来的，余下部队还在后面，由邓巴上校率领，他押运着大部分储备物资、粮食和行李跟随在后面。逃走的士兵没有人追赶，逃到了邓巴的军营里，他们的恐慌令邓巴和他的部下惊慌失措，尽管他现在麾下拥有1,000多名士兵，而打败布雷多克的敌军是加起来最多不超过400名的印第安人和法国人。邓巴不但不命令军队继续前进，一雪前耻，反而下令将所有物资储备、军火等全都毁掉，以腾出更多马匹助他逃回驻地，不至于太过累赘难以前进。他在那儿接到弗吉尼

亚、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总督们的请求，请他驻军于前线，为居民们提供保护。但邓巴上校仍然匆忙前进，穿过诸州，直到抵达费城才感到安全，因为费城居民可以保护他。我们美国人一向认为英国常规军英勇善战，对他们充满敬意，这整件事情使我们第一次产生怀疑，原来心怀的敬意是毫无理由的。

In their first march, too, from their landing till they got beyond the settlements, they had plundered and stripped the inhabitants, totally ruining some poor families, besides insulting, abusing, and confining the people if they remonstrated. This was enough to put us out of conceit of such defenders, if we had really wanted any. How different was the conduct of our French friends in 1781, who, during a march thro' the most inhabited part of our country from Rhode Island to Virginia, near seven hundred miles, occasioned not the smallest complaint for the loss of a pig, a chicken, or even an apple.

也是在英国常规军第一次行军中，从登陆美国直到离开驻地，他们抢掠居民的财物，使一些穷困家庭完全破产；如遇反抗，他们则对反抗者大肆辱骂，虐待囚禁，无所不用。即使我们果真需要保卫者，如此行径也足以使我们对这等保卫者心生厌烦了。这与1781年我们法国朋友的表现是多么不一样啊！我们的法国朋友从罗得岛向弗吉尼亚前进，途径本州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全程近700英里，却丝毫未引起人们的任何抱怨，连丢失一头猪、一只鸡、甚至一个苹果的怨言也未曾听说。

Captain Orme, who was one of the general's aids-de-camp, and, being grievously wounded, was brought off with him, and continu'd with him to his death, which happen'd in a few days, told me that

he was totally silent all the first day, and at night only said, “Who would have thought it?” That he was silent again the following day, saying only at last, “We shall better know how to deal with them another time;” and dy'd in a few minutes after.

奥姆上校是这位将军的一位副官，他受了重伤，和将军一起得救，并且他们一直都在一起，直至几天后将军去世为止。他告诉我，将军头一天一言不发，直到夜里才说：“谁能想得到啊！”第二天，将军仍然沉默不语，最后只说了一句：“我们下次就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了。”几分钟后他就去世了。

The secretary's papers, with all the general's orders, instructions, and correspondence, falling into the enemy's hands, they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into French a number of the articles, which they printed, to prove the hostile intentions of the British court before the declaration of war. Among these I saw some letters of the general to the ministry, speaking highly of the great service I had rendered the army, and recommending me to their notice. David Hume, too, who was some years after secretary to Lord Hertford, when minister in France, and afterward to General Conway, when secretary of state, told me he had seen among the papers in that office, letters from Braddock highly recommending me. But, the expedition having been unfortunate, my service, it seems, was not thought of much value, for those recommendations were never of any use to me.

秘书的文件全都落入敌军手里，包括将军的命令、指示以及来往信函等，他们从中挑选了许多文章并将其翻译成法语，刊印出来以证明英国王室在宣战之前已怀有敌意。其中我看到有几封将军写给内阁

的信，他在信中对我为军队所做的一切赞誉有加，大力举荐我。大卫·休谟数年后成为时任驻法公使的赫特福德特勋爵的秘书，后来康韦威将军担任国务卿时又为他担任秘书，他也告诉我，他曾在那间办公室的文件之中看到布雷多克将军极力举荐我的信。但是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人们似乎认为我所做的工作没什么价值，因此那些推荐从未对我起过什么作用。

As to rewards from himself, I ask'd only one, which was, that he would give orders to his officers not to enlist any more of our bought servants, and that he would discharge such as had been already enlisted. This he readily granted, and several were accordingly return'd to their masters, on my application. Dunbar, when the command devolv'd on him, was not so generous. He being at Philadelphia, on his retreat, or rather flight, I apply'd to him for the discharge of the servants of three poor farmers of Lancaster county that he had enlisted, reminding him of the late general's orders on that bead. He promised me that, if the masters would come to him at Trenton, where he should be in a few days on his march to New York, he would there deliver their men to them. They accordingly were at the expense and trouble of going to Trenton, and there he refus'd to perform his promise, to their great loss and disappointment.

我只向将军本人要求过一个酬谢，那就是请他命令他的军官不要再征募我们的雇工，已被征用的请将他们释放。他立即答应了，经过我的请求，有几位雇工被送还到他们的主人那儿。将军把职权移交给邓巴后，邓巴就没那么慷慨了。他撤退或者说逃奔至费城时，我请他释放他所征募的兰开斯特郡三位贫农的雇工，还提醒他已故将军曾对此有过指示。他答应我说，他即将前往纽约，几天后应该能到托伦顿，如果这些雇工的主人们去托伦顿找他，他可以在那把雇工还给他

们。于是雇工们花费金钱不辞辛苦地赶到托伦顿，邓巴却拒绝履行自己的承诺，使他们蒙受极大的损失，也十分失望。

As soon as the loss of the waggons and horses was generally known, all the owners came upon me for the valuation which I had given bond to pay. Their demands gave me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my acquainting them that the money was ready in the paymaster's hands, but that orders for paying it must first be obtained from General Shirley, and my assuring them that I had apply'd to that general by letter; but, he being at a distance, an answer could not soon be receiv'd, and they must have patience, all this was not sufficient to satisfy, and some began to sue me. General Shirley at length relieved me from this terrible situation by appointing commissioners to examine the claims, and ordering payment. They amounted to near twenty thousand pound, which to pay would have ruined me.

车辆和马匹受到折损的消息一传开，所有车马主都来找我，让我根据担保给予赔偿。他们的要求给我造成很大麻烦，我告诉他们那笔钱已在军队出纳员手中，但还需等待雪利将军的命令才能支付，我向他们保证已写信向将军申请，但由于相距遥远，回信到来还需时日，请他们一定要有耐心。这一切还不能使他们满意，有人开始要起诉我。终于，雪利将军指定了几位委员前来审查这些要求，并下令支付赔款，这才使我从那可怕的局面中解脱出来。全部赔款接近两万镑，如果由我来付，我只能破产了。

Before we had the news of this defeat, the two Doctors Bond came to me with a subscription paper for raising money to defray the expense of a grand firework, which it was intended to exhibit at

a rejoicing on receipt of the news of our taking Fort Duquesne. I looked grave, and said it would, I thought, be time enough to prepare for the rejoicing when we knew we should have occasion to rejoice. They seem'd surpris'd that I did not immediately comply with their proposal. “Why the d—l!” says one of them, “you surely don't suppose that the fort will not be taken?” “I don't know that it will not be taken, but I know that the events of war are subject to great uncertainty.” I gave them the reasons of my doubting; the subscription was dropt, and the projectors thereby missed the mortification they would have undergone if the firework had been prepared. Dr. Bond, on some other occasion afterward, said that he did not like Franklin's forebodings.

我们得知战败的消息之前，有两位邦德医生带着募捐名册前来找我，为一场盛大的烟火表演集资，准备在我们得知攻下迪凯纳堡垒的消息后举办的庆祝会上用。我表情严肃地说，我认为等我们确认有庆祝的机会时再来筹备也不迟。他们似乎对我没有立即响应他们的提议感到惊奇，其中一位说：“见鬼！你不会认为这堡垒我们攻不下吧？”“我认为我们能攻下这堡垒，但我也知道战争之事变数太多。”我告诉了他们我的担忧，于是募捐就此作罢，也使募捐发起者避免了若果真准备了烟火所产生的窘迫。后来在另一个场合，邦德医生说他不喜欢富兰克林对不祥之事的预知。

Governor Morris, who had continually worried the Assembly with message after message before the defeat of Braddock, to beat them into the making of acts to raise money for the defense of the province, without taxing, among others, the proprietary estates, and had rejected all their bills for not having such an exempting clause, now redoubled his attacks with more hope of success, the danger and necessity being greater. The Assembly, however, continu'd firm,

believing they had justice on their side, and that it would be giving up an essential right if they suffered the governor to amend their money-bills. In one of the last, indeed, which was for granting fifty thousand pounds, his propos'd amendment was only of a single word. The bill expressed “that all estates, real and personal, were to be taxed, those of the proprietaries not excepted.” His amendment was, for not read only: a small, but very material alteration. However, when the news of this disaster reached England, our friends there, whom we had taken care to furnish with all the Assembly's answers to the governor's messages, rais'd a clamor against the proprietaries for their meanness and injustice in giving their governor such instructions; some going so far as to say that, by obstructing the defense of their province, they forfeited their right to it. They were intimidated by this, and sent orders to their receiver-general to add five thousand pounds of their money to whatever sum might be given by the Assembly for such purpose.

布雷多克战败之前，莫里斯总督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咨文烦扰议会，想促使议会制定法案为本州防卫筹集资金，但征税对象不包括领主的财产，凡是没有这一免税条款的议案，总督一律否决。后来情势愈加危急，防卫也变得愈加必要，总督自认为成功的希望加大，就变本加厉，对此事催得更紧了。但议会依然固守立场，相信正义属于他们，如果他们任由总督修改财政法案，那么议会就放弃了一项基本权利。最后各议案中，有一项议案是关于拨款五万镑的，的确，总督仅仅修改了其中一个字。议案是这样表述的：“所有财产，无论不动产或动产，都应缴税，领主的财产不可例外。”总督的改动非常小，但却十分关键：他把“不”字改成了“唯”字。我们一直都将议会对总督文章的所有答复特地寄给我们在英格兰的朋友。战败的消息传至英格兰后，朋友们都义愤填膺，纷纷指责领主们卑鄙吝啬，违背公义，居然向总督下达这样的指示，有人甚至说他们既然阻碍本州的防卫事务，实际就是放弃他们在该州的权利。此种言论让他们倍感压力，于是命

令他们的财务总管从他们的收入中捐出5,000镑给议会，不管议会用于防卫的款项到底是多少。

This, being notified to the House, was accepted in lieu of their share of a general tax, and a new bill was form'd, with an exempting clause, which passed accordingly. By this act I was appointed one of the commissioners for disposing of the money, sixty thousand pounds. I had been active in modelling the bill and procuring its passage, and had, at the same time, drawn a bill for establishing and disciplining of a voluntary militia, which I carried thro' the House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as care was taken in it to leave the Quakers at their liberty. To promote the association necessary to form the militia, I wrote a dialogue, stating and answering all the objections I could think of to such a militia, which was printed, and had, as I thought, great effect.

议会得知此事后，接受了这笔款项，用以代替领主们的应缴税款。议会还制定了一项含免税条款的新议案，也得到通过。根据这一议案，我被指派为委员之一，负责处理这笔六万镑的钱款。我积极参与了议案的起草工作，并使其获得通过，同时我还提出一项建立并训练志愿部队的议案，也毫不费力地使它在议会中通过了，因为议案特别表明了贵格会信徒可自由选择是否应征。为了尽快成立一个建立部队所需的筹备委员会，我写了一篇问答文章，列举并回答了所有我能想到的反对成立此部队的意见，并将它刊印出来，我认为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While the several companies in the city and country were forming and learning their exercise, the governor prevail'd with me to take charge of our North-western frontier, which was infested by

the enemy, and provide for the defense of the inhabitants by raising troops and building a line of forts. I undertook this military business, tho' I did not conceive myself well qualified for it. He gave me a commission with full powers, and a parcel of blank commissions for officers, to be given to whom I thought fit. I had but little difficulty in raising men, having soon five hundred and sixty under my command. My son, who had in the preceding war been an officer in the army rais'd against Canada, was my aid-de-camp, and of great use to me. The Indians had burned Gnadenhut, a village settled by the Moravians, and massacred the inhabitants; but the place was thought a good situation for one of the forts.

当城市和乡村已有数支连队组织起来并进行操练时，总督说服我管理我们饱受敌军骚扰的西北边界，并组织军队、修建堡垒、保卫人民。我接受了这项军事任务，尽管我认为自己并不怎么够格。总督向我授予了全权委任状，还有一沓空白委任状，可授予我认为合适的人。在征募军队上我没遇到什么困难，很快就召集了560人在我麾下。之前的战争中，我的儿子在对抗加拿大的部队里担任军官，这时成为我的副官，对我帮助很大。印第安人烧毁了摩拉维亚教徒的居住地——吉内登哈滕，还屠杀了村民，但此地却是一个修建堡垒的有利位置。

In order to march thither, I assembled the companies at Bethlehem, the chief establishment of those people.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it in so good a posture of defense; the destruction of Gnadenhut had made them apprehend danger. The principal buildings were defended by a stockade; they had purchased a quantity of arms and ammunition from New York, and had even plac'd quantities of small paving stones between the windows of their high stone houses, for their women to throw down upon the

heads of any Indians that should attempt to force into them. The armed brethren, too, kept watch, and reliev'd as methodically as in any garrison town. In conversation with the bishop, Spangenberg, I mention'd this my surprise; for, knowing they had obtained an act of Parliament exempting them from military duties in the colonies, I had suppos'd they were conscientiously scrupulous of bearing arms. He answer'd me that it was not one of their established principles, but that, at the time of their obtaining that act, it was thought to be a principle with many of their people. On this occasion, however, they, to their surprise, found it adopted by but a few. It seems they were either deceiv'd in themselves, or deceiv'd the Parliament; but common sense, aided by present danger, will sometimes be too strong for whimsical opinions.

为向吉内登哈滕进军，我把军队集中在伯利恒，这是摩拉维亚教徒最主要的居住区。我很惊讶地发现，此地防卫准备非常齐全，因为吉内登哈滕被毁，这里的人们也意识到了危险。他们的主要建筑都用栅栏围住，还从纽约购买了许多武器和军火，他们甚至还在高大石屋的窗户间放置了许多小铺路石，如有印第安人想强闯入室，妇女们可以用石子砸他们的头。武装的弟兄们也站岗放哨，和城里的驻军一样按时换班。与斯潘根贝格主教交谈时，我说这里的防卫令我感到惊讶，因为我知道他们已获得议会的豁免法案特许，免除他们在殖民地的兵役，我以为他们心里并不愿意拿起武器武装起来。主教回答我说，反对兵役并不是他们的教义之一，但那项豁免法案通过时，人们以为他们的许多信徒是反对兵役的。但是这一次，他们惊讶地发现只有少数人秉持这一原则。看来他们不是欺骗了自己，就是欺骗了议会，但现在身处险境之中，常识的力量有时会变得非常强大，足以克制住那些古怪念头。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January when we set out upon this

business of building forts. I sent one detachment toward the Minisink, with instructions to erect one for the security of that upper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another to the lower part, with similar instructions; and I concluded to go myself with the rest of my force to Gnadenhut, where a fort was tho't more immediately necessary. The Moravians procur'd me five waggons for our tools, stores, baggage, etc.

一月初，我们开始着手修建堡垒。我派了一支小分队前往密尼辛克，指导当地人修建一座堡垒，保护该郡的高地地区，然后又派了一支小分队前往低洼地区，执行同样的命令。最后，我自己率领剩余部队前往吉内登哈滕，那儿急需修建一座堡垒。摩拉维亚教徒为我准备了五辆马车，驮着我们的工具、物资以及行李等。

Just before we left Bethlehem, eleven farmers, who had been driven from their plantations by the Indians, came to me requesting a supply of firearms, that they might go back and fetch off their cattle. I gave them each a gun with suitable ammunition. We had not march'd many miles before it began to rain, and it continued raining all day; there were no habitations on the road to shelter us, till we arriv'd near night at the house of a German, where, and in his barn, we were all huddled together, as wet as water could make us. It was well we were not attack'd in our march, for our arms were of the most ordinary sort, and our men could not keep their gun locks dry. The Indians are dextrous in contrivances for that purpose, which we had not. They met that day the eleven poor farmers above mentioned, and killed ten of them. The one who escap'd inform'd that his and his companions' guns would not go off, the priming being wet with the rain.

有11位农民被印第安人从自己的农场里赶了出来，就在我们离开伯利恒前，他们前来找我，请我为他们提供一些武器，这样他们可以回去把他们的牲口抢回来。我给他们每人一把枪和相配的子弹。我们还没有走多少英里的路，天就开始下雨了，一整天都没停。我们在路上没有找到避雨的地方，直到快要入夜，才到了一个德国人家里，我们在他家的谷仓里挤在一起，浑身湿透了。还好我们路上没有遭遇袭击，因为我们的武器都是最普通的，而我的士兵们无法使枪机部位保持干燥。印第安人深谙保持武器干燥之道，我们却不知如何是好。那天，印第安人遇到了那11位可怜的农民，杀了其中10位。得以逃脱的那个人告诉我们，他和同伴们的枪打不出子弹来，因为点火器已被雨淋湿了。

The next day being fair, we continu'd our march, and arriv'd at the desolated Gnadenhut. There was a saw-mill near, round which were left several piles of boards, with which we soon hutted ourselves; an operation the more necessary at that inclement season, as we had no tents. Our first work was to bury more effectually the dead we found there, who had been half interr'd by the country people.

第二天天气晴朗，我们继续前进，抵达了荒凉的吉内登哈滕。附近有一家锯木厂，周围留下了几堆木板，我们很快就用这些木板搭了棚屋来栖身。这在天气恶劣时更为必要，因为我们没有帐篷。我们的首要工作是妥善安葬我们见到的那些尸体，此前当地乡民们只是将他们草草埋了。

The next morning our fort was plann'd and mark'd out, the circumference measuring four hundred and fifty-five feet, which would require as many palisades to be made of trees, one with

another, of a foot diameter each. Our axes, of which we had seventy, were immediately set to work to cut down trees, and, our men being dextrous in the use of them, great despatch was made. Seeing the trees fall so fast, I had the curiosity to look at my watch when two men began to cut at a pine; in six minutes they had it upon the ground, and I found it of fourteen inches diameter. Each pine made three palisades of eighteen feet long, pointed at one end. While these were preparing, our other men dug a trench all round, of three feet deep, in which the palisades were to be planted; and, our waggons, the bodys being taken off, and the fore and hind wheels separated by taking out the pin which united the two parts of the perch, we had ten carriages, with two horses each, to bring the palisades from the woods to the spot. When they were set up, our carpenters built a stage of boards all round within, about six feet high, for the men to stand on when to fire thro' the loopholes. We had one swivel gun, which we mounted on one of the angles, and fir'd it as soon as fix'd, to let the Indians know, if any were within hearing, that we had such pieces; and thus our fort, if such a magnificent name may be given to so miserable a stockade, was finish'd in a week, though it rain'd so hard every other day that the men could not work.

第二天早上，我们对要建的堡垒作好规划，并在地基上标记了出来，其周长为455英尺，这需要455根木块做成栅栏，一一排开，每根木块直径为一英尺。我们有70把斧头，全都立即派上了用场，用来砍树，士兵们斧头用得都很熟练，很快就砍伐了很多木材。伐木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当两个人开始砍一棵松树时，我好奇地读表计时。他们只用6分钟就把树伐倒了，而我发现那棵树直径为14英寸。每株松树的木材可制三根18英尺长的木块，一端为尖头。他们正在准备这些时，其他人在四周挖掘3英尺深的壕沟，把木制栅栏插进去。我们把马车车身卸下，把连接车辆两段连杆的销子拔出来，以使前后轮分

开，这样我们就有10辆马车了，每辆车配有两匹马，可以把木块从树林里运至修建地点。栅栏修建起来后，我们的木匠沿着栅栏在其内部搭建了一个木制的台子，约6英尺高，供人们透过枪眼开火时站在上面。我们有一尊旋转炮，我们把它架在一个角上，放置好后立即开了一炮，如果附近有印第安人能听到的话好让他们知道，我们也有这样的武器。就这样，我们的堡垒——如果“堡垒”这样一个宏大的名词能用来形容这么简陋的栅栏的话——在一周之内就修建完毕，尽管这里每隔一天就下一场大雨，使人们无法工作。

This gave me occasion to observe, that, when men are employ'd, they are best content'd; for on the days they worked they were good-natur'd and cheerful, and,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having done a good day's work, they spent the evening jollily; but on our idle days they were mutinous and quarrelsome, finding fault with their pork, the bread, etc., and in continual ill-humor, which put me in mind of a sea-captain, whose rule it was to keep his men constantly at work; and, when his mate once told him that they had done every thing, and there was nothing further to employ them about, “Oh,” says he, “Make them scour the anchor.”

这件事使我有机会观察到，人们工作时是最为满足的。那些工作的日子里，人们和蔼可亲，十分愉快，意识到自己很好地工作了一天后，他们晚上会非常快乐；而无所事事的日子里，人们暴躁不已，总想争吵，挑剔猪肉、面包等食物，经常发脾气。这使我想起一位船长，他的原则是使水手们不停地工作，有一次大副告诉他说水手们干完了所有的活儿，再没别的工作可做了，他说：“哦，让他们擦擦铁锚吧。”

This kind of fort, however contemptible, is a sufficient defense

against Indians, who have no cannon. Finding ourselves now posted securely, and having a place to retreat to on occasion, we ventur'd out in parties to scour the adjacent country. We met with no Indians, but we found the places on the neighboring hills where they had lain to watch our proceedings. There was an art in their contrivance of those places, that seems worth mention. It being winter, a fire was necessary for them; but a common fire on the surface of the ground would by its light have discovered their position at a distance. They had therefore dug holes in the ground about three feet diameter, and somewhat deeper; we saw where they had with their hatchets cut off the charcoal from the sides of burnt logs lying in the woods. With these coals they had made small fires in the bottom of the holes, and we observ'd among the weeds and grass the prints of their bodies, made by their laying all round, with their legs hanging down in the holes to keep their feet warm, which, with them, is an essential point. This kind of fire, so manag'd, could not discover them, either by its light, flame, sparks, or even smoke: it appear'd that their number was not great, and it seems they saw we were too many to be attacked by them with prospect of advantage.

尽管这种堡垒很简陋，但抵御没有加农炮的印第安人也是绰绰有余的。我们现在已经做好安全防备，有情况发生时也有路可退，于是就大胆地结队在附近搜寻。我们没有遇到印第安人，但在附近小山上发现了他们的潜伏之处，他们就在此监视我们的活动。他们的藏身之所设计精妙，值得一提。当时是冬天，生火对他们来说是必需的，但如果在地面上用平常方法生火，其光亮在远处也能看得见，他们的位置就因此暴露了。于是他们在地上凿了一些直径约为三英尺、深度超过三英尺的大坑，我们在坑里发现了木炭，那是他们用短斧在树林里被火烧过的木头边缘砍下的，他们就用这些木炭在坑底生起小火。我们还在杂草丛中发现了他们身体留下的痕迹，他们躺在坑边，两腿伸

到坑里取暖，对他们来说，双腿的保暖是十分重要的。这样的生火方式就不会使他们暴露，不会让我们看到火光、火焰、火星，甚至是升起的烟。他们似乎人数并不多，可能见我们人多势众，觉得袭击我们也没有取胜的希望。

We had for our chaplain a zealous Presbyterian minister, Mr. Beatty, who complained to me that the men did not generally attend his prayers and exhortations. When they enlisted, they were promised, besides pay and provisions, a gill of rum a day, which was punctually serv'd out to them, half in the morning, and the other half in the evening; and I observ'd they were as punctual in attending to receive it; upon which I said to Mr.Beatty, “It is, perhaps, below the dignity of your profession to act as steward of the rum, but if you were to deal it out and only just after prayers, you would have them all about you.” He liked the tho't, undertook the office, and, with the help of a few hands to measure out the liquor, executed it to satisfaction, and never were prayers more generally and more punctually attended; so that I thought this method preferable to the punishment inflicted by some military laws for non-attendance on divine service.

我们有一位热心的长老会牧师比蒂先生担任我们的随军牧师，他向我抱怨说，士兵们基本不来听他祈祷和布道。士兵们应征入伍时，除了薪水和伙食外，我们还允诺每天发给他们一吉耳朗姆酒。朗姆酒每天按时分发，早晚各发一半，我观察到士兵们总是准时领酒，就对比蒂先生说：“也许让您给他们发酒太辱没了您，但如果由您来分发，且只在祈祷会后发酒的话，他们全都会参加的。”比蒂先生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就应承下了这个工作，有几个人帮他斟量，整件事情都很圆满，士兵们从未这样齐整、这样准时地参加祈祷会。因此我认为，对于不出席宗教仪式的人，用这个办法比用军法惩治要好。

I had hardly finish'd this business, and got my fort well stor'd with provisions, when I receiv'd a letter from the governor, acquainting me that he had call'd the Assembly, and wished my attendance there, if the posture of affairs on the frontiers was such that my remaining there was no longer necessary. My friends, too, of the Assembly, pressing me by their letters to be, if possible, at the meeting, and my three intended forts being now compleated, and the inhabitants contented to remain on their farms under that protection, I resolved to return; the more willingly, as a New England officer, Colonel Clapham, experienced in Indian war, being on a visit to our establishment, consented to accept the command. I gave him a commission, and, parading the garrison, had it read before them, and introduc'd him to them as an officer who, from his skill in military affairs, was much more fit to command them than myself; and, giving them a little exhortation, took my leave. I was escorted as far as Bethlehem, where I rested a few days to recover from the fatigue I had undergone. The first night, being in a good bed, I could hardly sleep, it was so different from my hard lodging on the floor of our hut at Gnaden wrapt only in a blanket or two.

我刚完成这项任务，为堡垒储备好粮草，就收到了总督的一封来信，他告诉我他已召集议会，如果边境事务进行顺利，无需我留在此处的话，那么他希望我回去出席。我在议会的朋友们也写信给我，催促我如果可能的话，就回去参加议会会议。当时我计划兴建的三座堡垒已经完工，居民们有了堡垒的保护，也安居于自家农场，于是我决定回去。更幸运的是，一位曾参加过印第安战争的新英格兰军官克拉彭上校正在我们的驻地访问，他答应接替我担任指挥官，这使我更能放心回去了。我把委任状授予克拉彭上校，部队检阅时，又把委任状当众宣读出来，并向士兵们介绍了他，说他拥有很高的军事才能，比我更能胜任指挥官一职，然后我向士兵们作了一番训诫，就离开了。

我被护送到伯利恒，在此休息了几日，从疲劳中恢复了过来。躺在舒适的床上，第一夜我难以入睡，在吉内登哈滕时，仅仅裹着一两条毯子在棚屋内席地而睡，十分艰苦，现在与那时真是天差地别啊。

While at Bethlehem, I inquir'd a little into the practice of the Moravians: some of them had accompanied me, and all were very kind to me. I found they work'd for a common stock, eat at common tables, and slept in common dormitories, great numbers together. In the dormitories I observed loopholes, at certain distances all along just under the ceiling, which I thought judiciously placed for change of air. I was at their church, where I was entertain'd with good musick, the organ being accompanied with violins, hautboys, flutes, clarinets, etc. I understood that their sermons were not usually preached to mixed congregations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s is our common practice, but that they assembled sometimes the married men, at other times their wives, then the young men, the young women, and the little children, each division by itself. The sermon I heard was to the latter, who came in and were plac'd in rows on benches; the boys under the conduct of a young man, their tutor, and the girls conducted by a young woman. The discourse seem'd well adapted to their capacities, and was deliver'd in a pleasing, familiar manner, coaxing them, as it were, to be good. They behav'd very orderly, but looked pale and unhealthy, which made me suspect they were kept too much within doors, or not allow'd sufficient exercise.

在伯利恒时，我稍微了解了一些摩拉维亚教徒的习俗。他们有几个陪伴着我，都对我很友好。我发现他们集体劳动，吃集体伙食，许多人一起住在集体宿舍里。我在宿舍看到靠近天花板的四周墙上，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些小孔，我想这是为了使空气流通。我还去了他们的

教堂，在那儿欣赏到了美妙的音乐，是管风琴与小提琴、双簧管、长笛、单簧管等乐器的合奏。我知道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把男女老少各类人群集合起来统一传道，他们有时召集已婚男子进行布道，有时召集已婚妇女，还有年轻男子、年轻女子以及儿童，全都分开布道。我听过的那次是向已婚男子之外的人布道的那次，人们进入教堂，成排坐在长凳上，男孩由一位年轻男子指导，他是他们的老师，女孩则由一位年轻女性指导。布道内容似乎很适合大家的理解能力，讲解方式令人感到愉快亲切，似乎在哄他们做个好孩子一样。大家举止规范，但看起来脸色苍白，并不健康，这让我怀疑他们在室内时间过长，或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锻炼。

I inquir'd concerning the Moravian marriages, whether the report was true that they were by lot. I was told that lots were us'd only in particular cases; that generally, when a young man found himself dispos'd to marry, he inform'd the elders of his class, who consulted the elder ladies that govern'd the young women. As these elders of the different sexes were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tempers and disposit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pupils, they could best judge what matches were suitable, and their judgments were generally acquiesc'd in; but if, for example, it should happen that two or three young women were found to be equally proper for the young man, the lot was then recurred to. I objected, if the matches are not made by the mutual choice of the parties, some of them may chance to be very unhappy. “And so they may,” answer'd my informer, “if you let the parties chuse for themselves;” which, indeed, I could not deny.

我打听了摩拉维亚教徒的婚俗，想知道他们是否如传闻所说，依靠抽签决定婚事。别人告诉我，抽签只在特定情况下使用，一般而言，年轻男子想成家时，先把自己的意愿告诉指导他们的长辈，再由长辈与管理年轻女性的年长妇女们商量。因为这些长辈对各自学生的

脾气性格非常了解，所以他们能最准确地判断谁与谁结婚最合适，一般而言，年轻男女双方是遵从他们的判断的。但比如说，如果有两三位姑娘都同样适合一个年轻小伙儿，这时就采用抽签的办法。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婚姻大事不由双方自己选择，有些婚姻可能会不幸福。告知我此事的人回答说："如果你让男女双方自己选择，他们还是可能会不幸福的。"这句话我也的确不能否认。

Being returned to Philadelphia, I found the association went on swimmingly, the inhabitants that were not Quakers having pretty generally come into it, formed themselves into companies, and chose their captains, lieutenants, and ensigns, according to the new law. Dr. B. visited me, and gave me an account of the pains he had taken to spread a general good liking to the law, and ascribed much to those endeavors. I had had the vanity to ascribe all to my Dialogue; however, not knowing but that he might be in the right, I let him enjoy his opinion, which I take to be generally the best way in such cases. The officers, meeting, chose me to be colonel of the regiment, which I this time accepted. I forget how many companies we had, but we paraded about twelve hundred well-looking men, with a company of artillery, who had been furnished with six brass field-pieces, which they had become so expert in the use of as to fire twelve times in a minute. The first time I reviewed my regiment they accompanied me to my house, and would salute me with some rounds fired before my door, which shook down and broke several glasses of my electrical apparatus. And my new honour proved not much less brittle; for all our commissions were soon after broken by a repeal of the law in England.

回到费城后，我发现防卫队的事务进行得很顺利，非贵格会信徒的居民们基本都加入了，并根据新的法律自行组成连队，选出了上

尉、中尉和少尉。邦德医生前来拜访我，向我述说了他为使新法得到普遍支持而付出的辛苦努力，并认为新法能得到支持，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付出。此前我一直将此归功于我的那篇问答文章，但他说的或许是对的，所以我没有反驳他的观点，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最好的办法。防卫队的军官集会时选我为上校，这次我接受了任命。我忘了当时我们有多少个连队，但我们列队集合时约有1,200名健壮士兵，还有一个炮兵连队，配有6门铜制野战炮，均能熟练使用，一分钟能开炮12次。第一次检阅部队后，他们护送我到住所，还要在我家门前向我鸣炮致敬，结果把我电学仪器上的几块玻璃震坏了。我的新荣誉也和这玻璃一样脆弱，因为没过多久英国就废除了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所有职位也因此不存在了。

During this short time of my colonelship, being about to set out on a journey to Virginia, the officers of my regiment took it into their heads that it would be proper for them to escort me out of town, as far as the Lower Ferry. Just as I was getting on horseback they came to my door, between thirty and forty, mounted, and all in their uniforms. I had not been previously acquainted with the project, or I should have prevented it, being naturally averse to the assuming of state on any occasion; and I was a good deal chagrin'd at their appearance, as I could not avoid their accompanying me. What made it worse was, that, as soon as we began to move, they drew their swords and rode with them naked all the way. Somebody wrote an account of this to the proprietor, and it gave him great offense. No such honor had been paid him when in the province, nor to any of his governors; and he said it was only proper to princes of the blood royal, which may be true for aught I know, who was, and still am, ignorant of the etiquette in such cases.

在担任上校的这段短暂时间内，有一次我要去弗吉尼亚，团里的

军官认为应由他们护送我出城，直至下渡口。我正要上马时，他们大约三四十人骑着马，全都穿着制服，来到我家门口。我先前并不知道他们要这样做，否则会阻止他们，因为我一向不喜欢在任何场合摆架子，他们的出现让我大为不安，因为这时我已经无法让他们不护送了。更糟糕的是，我们刚一出发，他们就拔剑出鞘，一路举着剑骑马前进。有人写信把此事告诉了领主，他对此十分不悦。他在本州从未受过这种礼遇，即使他的上级也从未有人向他们表示过这样的敬意，他说只有皇室的王公们才有资格享受，这也许不假，但是我一无所知，无论以前还是现在，我对礼节之事依然一无所知。

This silly affair, however, greatly increased his rancour against me, which was before not a little, on account of my conduct in the Assembly respecting the exemption of his estate from taxation, which I had always oppos'd very warmly, and not without severe reflections on his meanness and injustice of contending for it. He accused me to the ministry as being the great obstacle to the king's service, preventing, by my influence in the House, the proper form of the bills for raising money, and he instanced this parade with my officers as a proof of my having an intention to take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ovince out of his hands by force. He also applied to Sir Everard Fawkener, the postmaster-general, to deprive me of my office; but it had no other effect than to procure from Sir Everard a gentle admonition.

无论如何，这件蠢事使领主对我的敌意大增。他以前就非常讨厌我，因为我在州议会里一直强烈反对向领主免征财产税一事，还曾言辞激烈地批评他谋求此种权利是卑鄙自私、罔顾正义的。他向内阁指控我，说我严重妨碍英王的公务，利用自己在议会的影响，阻挠正当的筹款法案顺利通过，他还援引军官列队护送我一事，证明我有意从他手中强行夺取本州政权。他还请求邮电总长埃韦拉多·福克纳爵士免

去我的职务，但埃韦拉多爵士只是温和地告诫了我一番，别无其他。

Notwithstanding the continual wrangle between the governor and the House, in which I, as a member, had so large a share, there still subsisted a civil intercourse between that gentleman and myself, and we never had any personal difference. I have sometimes since thought that his little or no resentment against me, for the answers it was known I drew up to his messages, might be the effect of professional habit, and that, being bred a lawyer, he might consider us both as merely advocates for contending clients in a suit, he for the proprietaries and I for the Assembly. He would, therefore, sometimes call in a friendly way to advise with me on difficult points, and sometimes, tho' not often, take my advice.

尽管总督和州议会之间一直摩擦不断，作为议会议员，我也很大程度上参与其中，但我和总督先生之间仍然保持着友好交往，从未有过任何私人矛盾。我有时认为，他知道议会对他的答复都由我起草，却没有或极少对我心存怨恨，这可能是出于职业习惯；他是律师出身，可能仅把我俩看成一场诉讼中对抗双方的律师而已，他代表领主，而我代表议会。因此，他有时会友好地拜访我，就一些难题给我些建议，有时他也会听取我的意见，尽管这并不经常发生。

We acted in concert to supply Braddock's army with provisions; and, when the shocking news arrived of his defeat, the governor sent in haste for me, to consult with him on measures for preventing the desertion of the back counties. I forget now the advice I gave; but I think it was, that Dunbar should be written to, and prevail'd with, if possible, to post his troops on the frontiers for their protection, till, by re-enforcements from the colonies, he might

be able to proceed on the expedition. And, after my return from the frontier, he would have had me undertake the conduct of such an expedition with provincial troops, for the reduction of Fort Duquesne, Dunbar and his men being otherwise employed; and he proposed to commission me as general. I had not so good an opinion of my military abilities as he profess'd to have, and I believe his professions must have exceeded his real sentiments; but probably he might think that my popularity would facilitate the raising of the men, and my influence in Assembly, the grant of money to pay them, and that, perhaps, without taxing the proprietary estate. Finding me not so forward to engage as he expected, the project was dropt, and he soon after left the government, being superseded by Captain Denny.

我们共同行动，为布拉多克的军队供应粮草，当他战败的惊天消息传来之时，总督让我迅速去见他，与他商议防止偏远市郡居民弃城逃亡的办法。现在我已经忘了我提了什么建议，但我想自己是提议给邓巴写信，如果可能说服他在边境驻军，保卫这些市郡，等到殖民地援军赶到，他也许就能继续征伐。我从边境回来后，总督让我率领本州部队进行远征，去攻下杜肯堡，而邓巴及其下属则另有任用，他还提出要任命我为将军。我自己的军事才能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高，也相信他一定是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加以夸大才说出来，但很可能他认为我的声望会有助于招募士兵，我在议会的影响则能促使议会拨款支付军饷，也许还能免除领主的财产税。总督发现我不像他预料的那样热衷此事后，就放弃了这项计划，不久他就不再担任总督一职了，由丹尼上校接任。

Before I proceed in relating the part I had in public affairs under this new governor's administration, it may not be amiss here to give some account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my philosophical

reputation.

在我继续讲述新任总督当政时我从事的公务活动之前，我先在此谈谈我的学术声望是如何产生并蒸蒸日上的，这应当不为过。

In 1746, being at Boston, I met there with a Dr. Spence, who was lately arrived from Scotland, and show'd me some electric experiments. They were imperfectly perform'd, as he was not very expert; but, being on a subject quite new to me, they equally surpris'd and pleased me. Soon after my return to Philadelphia, our library company receiv'd from Mr. P. Collinson,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a present of a glass tube,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use of it in making such experiments. I eagerly seized the opportunity of repeating what I had seen at Boston; and, by much practice, acquir'd great readiness in performing those, also, which we had an account of from England, adding a number of new ones. I say much practice, for my house was continually full, for some time, with people who came to see these new wonders.

1746年我在波士顿时，遇见了一位斯彭斯博士，他刚从苏格兰来，做了一些电气实验给我看。实验做得不算太好，因为他并不在行，但这项内容对于我而言却非常新鲜，同样让我又惊又喜。回到费城后不久，我们的图书馆收到伦敦皇家学会会员柯林森先生赠送的一根玻璃管，内附利用玻璃管做实验的说明书。我立即借此机会重复了我在波士顿见到的实验，多次练习之后，我做这些英国寄来的说明书上提到的实验已经游刃有余了，此外我还添加了许多新实验。我说“多次练习”是因为有段时间我家常常挤满了人，他们都来瞧这些新奇玩意儿。

To divide a little this incumbrance among my friends, I caused a number of similar tubes to be blown at our glass-house, with which they furnish'd themselves, so that we had at length several performers. Among these, the principal was Mr. Kinnersley, an ingenious neighbor, who, being out of business, I encouraged to undertake showing the experiments for money, and drew up for him two lectures, in which the experiments were rang'd in such order, and accompanied with such explanations in such method, as that the foregoing should assist in comprehending the following. He procur'd an elegant apparatus for the purpose, in which all the little machines that I had roughly made for myself were nicely form'd by instrument-makers. His lectures were well attended, and gave great satisfaction; and after some time he went thro' the colonies, exhibiting them in every capital town, and pick'd up some money. In the West India islands, indeed, it was with difficulty the experiments could be made, from the general moisture of the air.

为使朋友们帮我稍稍分担一些这样的负担，我请我们的玻璃厂制造了许多类似的玻璃管，这样他们也有了玻璃管，我们就能有多人来演示实验了。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一位非常聪明的邻居金纳斯利先生，他当时正失业，于是我鼓励他以向人展示实验赚钱，还给他写了两篇讲稿，其中各实验安排有序，还配有解释说明及操作方法，这样前面的实验有助于观察者对后面实验的理解。他为此还买了一台美观的仪器，仪器上所有小机件都是由仪器制造师精心制造，而我原来自己做的却很粗糙。他的演讲听众很多，反响都非常满意，一段时间后，他去了各个殖民地，在各主要城镇进行演示，也赚了些钱。在西印度群岛，演示这些实验确实很难，因为那里空气一般都很潮湿。

Oblig'd as we were to Mr. Collinson for his present of the tube, etc., I thought it right he should be inform'd of our success in using

it, and wrote him several letters containing accounts of our experiments. He got them read in the Royal Society, where they were not at first thought worth so much notice as to be printed in their Transactions. One paper, which I wrote for Mr. Kinnersley, on the sameness of lightning with electricity, I sent to Dr. Mitchel, an acquaintance of mine, and one of the members also of that society, who wrote me word that it had been read, but was laughed at by the connoisseurs. The papers, however, being shown to Dr. Fothergill, he thought them of too much value to be stifled, and advis'd the printing of them. Mr. Collinson then gave them to Cave for publication in his Gentleman's Magazine; but he chose to print them separately in a pamphlet, and Dr. Fothergill wrote the preface. Cave, it seems, judged rightly for his profit, for by the additions that arrived afterward they swell'd to a quarto volume, which has had five editions, and cost him nothing for copy-money.

我们对柯林森先生送我们玻璃管等物非常感激，我想应该告诉他我们成功地使用玻璃管做了实验，就给他写了几封信，描述了我们所做的实验。他在皇家学会朗读了这些信件，一开始人们认为信件所述内容没多大价值，不值得发表在他们的学报上。我为金纳斯利先生撰写的文章中有一篇是论述闪电与电的同一性，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我的朋友米切尔博士，他也是皇家学会的会员，他写信告诉我这篇文章已在学会宣读，但被那些行家嘲笑了。但是，福瑟吉尔博士看了这些文章后，认为它们极有价值，绝不能埋没，还建议将它们刊印出来。于是柯林森先生把文章交给凯夫，让他刊登在《绅士杂志》上，但凯夫却把它们单独印成一本小册子，由福瑟吉尔博士作序。从获利的角度来看，凯夫的决定似乎是正确的，因为此后不断交给他新的文章，使那本小册子扩展为四开本，还不得不出了五版，他却完全不用支付稿费。

It was, however, some time before those papers were much taken notice of in England. A copy of them happening to fa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Count de Buffon, a philosopher deservedly of great reputation in France, and, indeed, all over Europe, he prevailed with M. Dalibard to translate them into French, and they were printed at Paris. The publication offended the Abbe Nollet, preceptor in Natural Philosophy to the royal family, and an able experimenter, who had form'd and publish'd a theory of electricity, which then had the general vogue. He could not at first believe that such a work came from America, and said it must have been fabricated by his enemies at Paris, to decry his system. Afterwards, having been assur'd that there really existed such a person as Franklin at Philadelphia, which he had doubted, he wrote and published a volume of Letters, chiefly address'd to me, defending his theory, and denying the verity of my experiments, and of the positions deduc'd from them.

但是一段时期内，这些文章并未在英国引起注意。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享有盛誉的哲学家德布丰伯爵偶然得到这本论文集，他说服达利巴尔先生将其翻译成法语，并在巴黎刊印。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惹恼了皇室自然哲学的导师诺莱神父，他也是一位能干的实验家，提出并发表过一套电学理论，当时还颇为流行。他起初不相信这样一部作品来自美国，还说这一定是他在巴黎的对手为贬低他的学术体系而捏造的。后来，当他确信费城真有富兰克林这样一个人后（他原先怀疑这点），他撰写并发表了很多信件，主要是写给我的，为他的理论辩护，并否认我的实验及从实验中推导出的结论的真实性。

I once purpos'd answering the abbe, and actually began the answer; but, on consideration that my writings contain'd a description of experiments which any one might repeat and verify,

and if not to be verifi'd, could not be defended; or of observations offer'd as conjectures, and not delivered dogmatically, therefore not laying me under any obligation to defend them; and reflecting that a dispute between two persons, writing in different languages, might be lengthened greatly by mistranslations, and thence misconceptions of one another's meaning, much of one of the abbe's letters being founded on an error in the translation, I concluded to let my papers shift for themselves, believing it was better to spend what time I could spare from public business in making new experiments, than in disputing about those already made. I therefore never answered M. Nollet, and the event gave me no cause to repent my silence; for my friend M. le Roy,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 took up my cause and refuted him; my book was translated into the Italian, German, and Latin languages; and the doctrine it contain'd was by degrees universally adopted by the philosophers of Europe, in preference to that of the abbe; so that he lived to see himself the last of his sect, except Monsieur B—, of Paris, his eleve and immediate disciple.

我曾打算回复这位神父，事实上也已经提笔，但考虑到我的文章包含对实验过程的描述，任何人都能对此进行重复和检验，如果不予检验，也就不可能为其辩护，而文章中的观点只是推测而已，并没有独断地表述，因此我也没有为其辩护的必要。想到争论双方是用不同语言写作的人，可能由于误译或对对方意思的误解而争论不休，神父有一封信中的大部分论述就是因为一处误译引起，因此我决定不再为我的论文辩护，我相信与其为已经做过的实验争论不休，还不如把处理公务剩下的时间用来做新的实验呢。因此我没有给诺莱先生回复，而有件事情让我毫不后悔自己保持了缄默，因为我的朋友、皇家科学学院的勒罗伊先生出来替我驳斥了他的观点。我的论文集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德语及拉丁语，其中包含的学说逐渐得到欧洲科学家们的普遍认可，神父的观点则逐渐失势，因此，神父成了有生之年这个学派

的最后一位支持者，除了他的学生和门徒——巴黎的B先生外。

What gave my book the more sudden and general celebrity, was the success of one of its proposed experiments, made by Messrs. Dalibard and De Lor at Marly, for drawing lightning from the clouds. This engag'd the public attention every where. M. de Lor, who had an apparatus for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d lectur'd in that branch of science, undertook to repeat what he called the Philadelphia Experiments; and, after they were performed before the king and court, all the curious of Paris flocked to see them. I will not swell this narrative with an account of that capital experiment, nor of the infinite pleasure I receiv'd in the success of a similar one I made soon after with a kite at Philadelphia, as both are to be found in the histories of electricity.

我的论文集之所以很快受到普遍欢迎，还因为书中所提的一个实验获得了成功。这个实验是要将云中的闪电引到地上来，是由在马莱的达利巴尔先生和勒罗伊先生做的，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勒罗伊先生有一台实验科学仪器，并讲授实验科学，他重复进行所谓的“费城实验”。他们在国王和王室面前表演后，所有好奇的巴黎人都蜂拥而至，要来观摩实验。我不再详细叙述那次重要实验的情形了，不久之后我在费城用风筝进行了类似的实验，这次成功带给我的无穷快乐也不再多提，因为这两件事已在电学史中有所记载。

Dr. Wright, an English physician, when at Paris, wrote to a friend, who was of the Royal Society, an account of the high esteem my experiments were in among the learned abroad, and of their wonder that my writings had been so little noticed in England. The society, on this, resum'd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letters that had

been read to them; and the celebrated Dr. Watson drew up a summary account of them, and of all I had afterwards sent to England on the subject, which be accompanied with some praise of the writer. This summary was then printed in their Transactions; and som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in London, particularly the very ingenious Mr. Canton, having verified the experiment of procuring lightning from the clouds by a pointed rod, and acquainting them with the success, they soon made me more than amends for the slight with which they had before treated me. Without my having made any application for that honor, they chose me a member, and voted that I should be excus'd the customary payments, which would have amounted to twenty-five guineas; and ever since have given me their Transactions gratis. They also presented me with the gold medal of Sir Godfrey Copley for the year 1753, the delivery of which was accompanied by a very handsome speech of the president, Lord Macclesfield, wherein I was highly honoured.

英国的一位叫赖特的医生当时正在巴黎，给他的一位皇家学会的朋友写信，描述了我的实验在外国学者中得到的高度评价，他们纳闷儿为何我的论文在英国却少人问津。因此，皇家学会重新考虑了曾向他们宣读的信件，著名的沃森博士对这些信件及此后我寄至英国的有关这一内容的所有文章作了概要报告，还附上了对作者的一些赞誉。这一概要报告随后刊登在他们的学报上，有几位在伦敦的学会成员，尤其是非常聪明的坎顿先生，已经证实了用一根尖针可从云中得到电的实验，并告知皇家学会他们的实验取得了成功，于是，皇家学会很快改变了此前对我的轻蔑态度。在我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就把我选为学会会员，投票同意免除我的例行入会费25几尼，以后还会免费将他们的学报赠给我。他们还把戈弗雷·科普利爵士1753年的金质奖章赠给我，学会主席麦克尔斯菲尔德勋爵就此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说，其中给了我极高的赞誉。

Our new governor, Captain Denny, brought over for me the before-mentioned medal from the Royal Society, which he presented to me at an entertainment given him by the city. He accompanied it with very polite expressions of his esteem for me, having, as he said, been long acquainted with my character. After dinner, when the company, as was customary at that time, were engag'd in drinking, he took me aside into another room, and acquainted me that he had been advis'd by his friends in England to cultivate a friendship with me, as one who was capable of giving him the best advice, and of contributing most effectually to the making his administration easy; that he therefore desired of all things to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with me, and he begg'd me to be assur'd of his readiness on all occasions to render me every service that might be in his power. He said much to me, also, of the proprietor's good disposition towards the province, and of the advantage it might be to us all, and to me in particular, if the opposition that had been so long continu'd to his measures was dropt, and harmony restor'd between him and the people; in effecting which, it was thought no one could be more serviceable than myself; and I might depend on adequate acknowledgments and recompenses, etc., etc. The drinkers, finding we did not return immediately to the table, sent us a decanter of Madeira, which the governor made liberal use of, and in proportion became more profuse of his solicitations and promises.

我们的新任总督丹尼上校帮我把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上述奖章带回了美国，在费城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把奖章授予我，还极有礼貌地向我表示敬意，如他所说，他早已了解我的为人了。晚餐后，当众人如惯常一样开始饮酒时，丹尼上校把我带入另一个房间，告诉我说他的英国朋友建议他和我成为朋友，因为我能给他最好的意见，能最有效地帮助他，使他顺利执政，因此他极力希望与我交好，并请我相信

在任何情况下，凡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愿为我提供帮助。他也和我就领主对本州所怀的善意谈了很多，说若能放弃对领主各项措施长久以来的反对，双方重新建立和谐关系，将会对大家都有好处，尤其是对我。为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没人能比我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我也会得到可观的酬金和回报等等。饮酒的人们见我们没有很快回到桌上，就派人给我们送了一瓶马德拉酒，于是总督开怀畅饮起来，而他喝得越多，请求和许诺也就越多。

My answers were to this purpose: that my circumstances, thanks to God, were such as to make proprietary favors unnecessary to me; and that, being a member of the Assembly, I could not possibly accept of any; that, however, I had no personal enmity to the proprietary, and that, whenever the public measures he propos'd should appear to be fo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no one should espouse and forward them more zealously than myself; my past opposition having been founded on this, that the measures which had been urged were evidently intended to serve the proprietary interest, with great prejudice to that of the people; that I was much obliged to him (the governor) for his professions of regard to me, and that he might rely on every thing in my power to make his administration as easy as possible, hoping at the same time that he had not brought with him the same unfortunate instruction his predecessor had been hamper'd with.

我的回答大意如此：感谢上帝，我的经济情况使我无需接受来自领主的任何财产恩惠，作为一名议员，我也不可能接受任何恩惠，但我与领主没有私人恩怨，凡他提出有助于公益的措施，没有人会比我更热烈地表示支持，过去之所以反对，全因其采取的措施显然是领主从自身的权益出发，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我非常感谢总督对我怀有这般敬意，他可以相信，我会尽我所能使他顺利治政，同时也希望

他不会像他的前任那样下达不幸的指示，他的前任就是被这种命令拖累了。

On this he did not then explain himself; but when he afterwards came to do business with the Assembly, they appear'd again, the disputes were renewed, and I was as active as ever in the opposition, being the penman, first, of the request to have a communication of the instructions, and then of the remarks upon them, which may be found in the votes of the time, and in the Historical Review I afterward publish'd. But between us personally no enmity arose; we were often together; he was a man of letters, had seen much of the world, and was very entertaining and pleasing in conversation. He gave me the first information that my old friend Jas. Ralph was still alive; that he was esteem'd one of the best political writers in England; had been employ'd in the dispute between Prince Frederic and the king, and had obtain'd a pension of three hundred a year; that his reputation was indeed small as a poet, Pope having damned his poetry in the Dunciad; but his prose was thought as good as any man's.

对这一点他当时没有解释，但后来他开始和议会一起处理公务时，这样的指示再次出现，双方的争论又一次产生了，而我还如往常一般积极表示反对，首先，请求总督向议会传达领主有关命令的文件是我起草的，然后，议会对这些命令的意见书也是我起草的，这两份文件可在当时的表决书和我后来发表的《历史评论》中找到。但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人怨恨，我们经常在一起，他属于文人雅士，见过很多世面，和他交谈令人感到轻松愉快。他最先告诉我，我的老朋友詹姆斯·拉尔夫仍然在世，他在英国被尊为最杰出的政治作家之一，曾参与过弗雷德里克王子和国王之间的纷争，并获得每年300英镑的养老金。作为诗人，他的名望确实不大，蒲柏曾在《愚人志》里抨击过他

的诗歌，但是他的散文可与任何名家匹敌。

The Assembly finally finding the proprietary obstinately persisted in manacling their deputies with instructions inconsistent not only with the privileges of the people, but with the service of the crown, resolv'd to petition the king against them, and appointed me their agent to go over to England, to present and support the petition. The House had sent up a bill to the governor, granting a sum of sixty thousand pounds for the king's use (ten thousand pounds of which was subjected to the orders of the then general, Lord Loudoun), which the governor absolutely refus'd to pass, in compliance with his instructions.

议会终于发现，领主们还是冥顽不化地用这样的命令束缚他们的代理人，这不仅违反人民的利益，也与为英王服务的使命背道而驰，于是议会决定向英王请愿，并指定我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去英国提交并解释我们的请愿书。议会向总督提交了一份议案，拨款六万镑供国王使用（其中一万镑应由当时的劳登勋爵支配），但遵照领主的命令，总督坚决拒绝批准这项议案。

I had agreed with Captain Morris, of the paquet at New York, for my passage, and my stores were put on board, when Lord Loudoun arriv'd at Philadelphia, expressly, as he told me, to endeavor an accommodation between the governor and Assembly, that his majesty's service might not be obstructed by their dissensions. Accordingly, he desir'd the governor and myself to meet him, that he might hear what was to be said on both sides. We met and discuss'd the business. In behalf of the Assembly, I urg'd all the various arguments that may be found in the public papers of

that time, which were of my writing, and are printed with the minutes of the Assembly; and the governor pleaded his instructions; the bond he had given to observe them, and his ruin if he disobey'd, yet seemed not unwilling to hazard himself if Lord Loudoun would advise it. This his lordship did not chuse to do, though I once thought I had nearly prevail'd with him to do it; but finally he rather chose to urge the compliance of the Assembly; and he entreated me to use my endeavors with them for that purpose, declaring that he would spare none of the king's troops for the defense of our frontiers, and that, if we did not continue to provide for that defense ourselves, they must remain expos'd to the enemy.

我与一艘纽约邮船的莫里斯船长商定乘他的船前往英国。我的物品都已搬上船，这时劳登勋爵抵达了费城，他告诉我，他此行目的很明确，即努力促使总督和议会之间达成和解，不要因双方意见不合而阻碍了英王的事务。于是，他希望我和总督都去见他，这样他就能听听我们双方的说法。我们见了面，讨论了这件事情。我代表议会强调了当时政府公共文件中的各种理由，那些文件由我起草，随议会会议记录一起印了出来。总督则以领主的命令为由，说自己有义务遵守这些命令，否则会被免职。如果当时劳登勋爵提议让他冒险一试，他似乎并非不情愿，但劳登勋爵却没有这么做，尽管有一次我觉得我就快说服他了，但最后他还是希望议会能够服从，还恳求我运用自己的影响达到这个目的，宣称他绝不会让英王的任何军队来保卫我们的边境，如果我们自己不继续为防御做准备，那么我们的边境定会受到敌人的袭击了。

I acquainted the House with what had pass'd, and, presenting them with a set of resolutions I had drawn up, declaring our rights, and that we did not relinquish our claim to those rights, but only suspended the exercise of them on this occasion thro' force, against

which we protested, they at length agreed to drop that bill, and frame another conformable to the proprietary instructions. This of course the governor pass'd, and I was then at liberty to proceed on my voyage.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paquet had sailed with my sea-stores, which was some loss to me, and my only recompense was his lordship's thanks for my service, all the credit of obtaining the accommodation falling to his share.

我把事情经过告知议会，并向他们提交了我起草的一系列决议，其中申明了我们的权利，宣布我们绝不放弃这些权利，此次被武力胁迫，我们只是暂停行使这些权利，我们反对这种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议会最终同意放弃原先的议案，制定了服从领主命令的另一项议案。这项议案总督当然批准了，于是我也可以踏上旅途，没人限制了。但这时，那艘邮船已经载着我的物品起航了，这对我造成了一定损失，而我所得到的唯一补偿只是劳登勋爵的几句感谢致辞，调解双方矛盾的功劳全都落在了他身上。

He set out for New York before me; and, as the time for dispatching the paquet-boats was at his disposition, and there were two then remaining there, one of which, he said, was to sail very soon, I requested to know the precise time, that I might not miss her by any delay of mine. His answer was, “I have given out that she is to sail on Saturday next; but I may let you know, entre nous, that if you are there by Monday morning, you will be in time, but do not delay longer.” By some accidental hinderance at a ferry, it was Monday noon before I arrived, and I was much afraid she might have sailed, as the wind was fair; but I was soon made easy by the information that she was still in the harbor, and would not move till the next day. One would imagine that I was now on the very point of departing for Europe. I thought so; but I was not then

so well acquainted with his lordship's character, of which indecision was one of the strongest features. I shall give some instances. It was about the beginning of April that I came to New York, and I think it was near the end of June before we sail'd. There were then two of the paquet-boats, which had been long in port, but were detained for the general's letters, which were always to be ready to-morrow. Another paquet arriv'd; she too was detain'd; and, before we sail'd, a fourth was expected. Ours was the first to be dispatch'd, as having been there longest. Passengers were engag'd in all, and some extremely impatient to be gone, and the merchants uneasy about their letters, and the orders they had given for insurance (it being war time) for fall goods! But their anxiety avail'd nothing; his lordship's letters were not ready; and yet whoever waited on him found him always at his desk, pen in hand, and concluded he must needs write abundantly.

他在我之前动身前往纽约。因为邮船的出发时间由他决定，当时还有两艘邮船在纽约，他说其中有一艘很快就会起航，于是我询问他邮船出发的具体时间，免得错过。他的回答是："我已经宣布这艘船将于下周六起航，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周一早上到那儿也能赶得及，但不能再晚了，这个你可别告诉别人。"由于渡口突然有些事情延误，我到码头时已是周一中午了，我很担心邮船已经起航，因为当天行船顺风，但我很快松了一口气，因为得知邮船仍在港口停泊，直到周二才会起航。人们可能会想我现在即将出发前往欧洲了。我也这么认为，但我那时还不太了解劳登勋爵的脾性，不知道犹豫不决是他最大的特点之一。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我到纽约时大约是四月初，我想直到六月底我们才起航。当时有两艘邮船在港口停泊已久，但因等将军的信函迟迟未能出发，每次问起，回答总是说信函明天就到。另一艘邮船抵达了港口，也只能在此停留。我们的船出发之前，预计第四艘船也要到了。我们的船在港口等得最久，因此首先出发。乘客们都为各类事宜忙碌着，有些人已迫不及待地要出发了，商人们在为他

们的信函和秋季货物保险的订单（当时是战时）担忧，但他们的忧虑是无济于事的，劳登勋爵的信函还未准备好，但去拜访他的人却发现他总是伏在案上，手里握着钢笔，以为他一定有很多东西要写呢。

Going myself one morning to pay my respects, I found in his antechamber one Innis, a messenger of Philadelphia, who had come from thence express with a paquet from Governor Denny for the General. He delivered to me some letters from my friends there, which occasion'd my inquiring when he was to return, and where be lodg'd, that I might send some letters by him. He told me he was order'd to call to-morrow at nine for the general's answer to the governor, and should set off immediately. I put my letters into his hands the same day. A fortnight after I met him again in the same place. “So, you are soon return'd, Innis?” “Returned! No, I am not gone yet.” “How so?” “I have called here by order every morning these two weeks past for his lordship's letter, and it is not yet ready.” “Is it possible, when he is so great a writer? for I see him constantly at his escritoire.” “Yes,” says Innis, “but he is like St. George on the signs, always on horseback, and never rides on!” This observation of the messenger was, it seems, well founded; for, when in England, I understood that Mr. Pitt gave it as one reason for removing this general, and sending Generals Amherst and Wolfe, that the minister never heard from him, and could not know what he was doing.

有天早上，我亲自去拜访他，在他的会客室里看到一位来自费城名叫因尼斯的邮差，他从费城来为丹尼总督送个包裹给这位将军。他还交给我几封我的费城朋友写来的信，于是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住在哪里，好托他帮我带几封信回去。他告诉我，将军命他第二天九点来取写给总督的回信，然后他就立即动身。于是当天我就把信交到了

他手里。两周以后，我在同一个地方又见到了他。“因尼斯，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回来？没呢，我还没走呢！”“怎么会呢？”“这两个星期里，我每天上午都奉命来取将军的信，但直到现在信也没写好。”“这不可能呀，将军非常喜欢写作的，我总是看到他伏在书桌旁。”“是的，”因尼斯说：“但他就像画像上的圣乔治一样，总是骑在马上，却永远不会前进。”邮差的这个评论似乎颇有道理。因为在英国的时候，我就知道皮特先生之所以免除这位将军的职务，派阿默斯特将军和乌尔夫将军取代他，其原因之一就是内阁从来都听不到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

This daily expectation of sailing, and all the three paquets going down to Sandy Hook, to join the fleet there, the passengers thought it best to be on board, lest by a sudden order the ships should sail, and they be left behind. There, if I remember right, we were about six weeks, consuming our sea-stores, and oblig'd to procure more. At length the fleet sail'd, the General and all his army on board, bound to Louisburg, with intent to besiege and take that fortress; all the paquet-boats in company ordered to attend the General's ship, ready to receive his dispatches when they should be ready. We were out five days before we got a letter with leave to part, and then our ship quitted the fleet and steered for England. The other two paquets he still detained, carried them with him to Halifax, where he stayed some time to exercise the men in sham attacks upon sham forts, then alter'd his mind as to besieging Louisburg, and return'd to New York, with all his troops, together with the two paquets above mentioned, and all their passengers! During his absence the French and savages had taken Fort George, on the frontier of that province, and the savages had massacred many of the garrison after capitulation.

每天盼着开船，而三只邮船都要开到桑迪胡克与舰队会合，旅客们认为最好还是呆在船上，免得邮船突然接到命令起航，他们就上不了船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在那儿等了大约六个星期，准备的食物都消耗殆尽，只得再另行购买。舰队终于起航了，将军和他的全部部队都在船上，他们要去往路易斯堡，打算围攻并夺下此地，随行的所有邮船都按照命令与将军的船同行，将军一把公文写好，他们就立即准备离开。我们启程五天后才接到一封信，允许我们离开，于是我们的船就离开舰队，驶向英国。另两艘邮船还被他留在舰队里随行，不能离开，就这样一直随他到了哈利法克斯。将军在那儿停留了一段时间，训练士兵们对模拟堡垒作模拟袭击，然后又改变了围攻路易斯堡的想法，回到了纽约，他的所有部队，还有上述两艘邮船和所有旅客，就这样跟着他回到了纽约！而在他离开纽约期间，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已夺取了本州边境的乔治堡，印第安人还屠杀了许多投降的驻军官兵。

I saw afterwards in London Captain Bonnell, who commanded one of those paquets. He told me that, when he had been detain'd a month, he acquainted his lordship that his ship was grown foul, to a degree that must necessarily hinder her fast sailing, a point of consequence for a paquet-boat, and requested an allowance of time to heave her down and clean her bottom. He was asked how long time that would require. He answer'd, three days. The general replied, “If you can do it in one day, I give leave; otherwise not; for you must certainly sail the day after to-morrow.” So he never obtain'd leave, though detained afterwards from day to day during full three months.

我后来在伦敦见到了邦内尔船长，他掌管这其中的一艘邮船。他告诉我，他的船被扣留一个月时，曾向将军报告船底长满了水草，一定会妨碍邮船行驶的速度，这对邮船来说是非常严重的，请求将军给

他一些时间，好让他把船倾翻过来，把船底清扫干净。将军问他需要多长时间，他说需要三天，将军回答他说：“如果你能在一天内完成，我就批准，否则不行，因为后天你一定要起航了。”所以，他的请求没有得到允许，尽管后来他的船还是一天一天被扣留在那里，足足扣了三个月。

I saw also in London one of Bonnell's passengers, who was so enrag'd against his lordship for deceiving and detaining him so long at New York, and then carrying him to Halifax and back again, that he swore he would sue for damages. Whether he did or not, I never heard; but, as he represented the injury to his affairs, it was very considerable.

我也曾在伦敦见到过一位邦内尔船长的乘客，这位乘客曾被他的统治者欺骗因而滞留纽约好长时间，随后在被派往哈利法克斯后又调回，他对此异常愤怒。他发誓要为挽回自己的损失上诉。至于他后来有没有真的上诉，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代表了为工作所累的一个群体，这类群体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

On the whole, I wonder'd much how such a man came to be intrusted with so important a business as the conduct of a great army; but, having since seen more of the great world, and the means of obtaining, and motives for giving places, my wonder is diminished. General Shirley, on whom the command of the army devolved upon the death of Braddock, would, in my opinion, if continued in place, have made a much better campaign than that of Loudoun in 1757, which was frivolous, expensive, and disgraceful to our nation beyond conception; for, tho' Shirley was not a bred soldier, he was sensible and sagacious in himself, and attentive to

good advice from others, capable of forming judicious plans, and quick and active in carrying them into execution. Loudoun, instead of defending the colonies with his great army, left them totally expos'd while he paraded idly at Halifax, by which means Fort George was lost, besides, he derang'd all our mercantile operations, and distress'd our trade, by a long embargo on the exportation of provisions, on pretence of keeping supplies from being obtain'd by the enemy, but in reality for beating down their price in favor of the contractors, in whose profits, it was said, perhaps from suspicion only, he had a share. And, when at length the embargo was taken off, by neglecting to send notice of it to Charlestown, the Carolina fleet was detain'd near three months longer, whereby their bottoms were so much damaged by the worm that a great part of them foundered in their passage home.

总体而言，我非常奇怪，这样的人如何能被委以执掌大军的重任，但后来随着我阅历的加深，看多了世间的种种钻营方法和封官授爵的动机后，我心中的疑问才渐渐解开。布雷多克死后，雪利将军接替他执掌了军队大权，我认为如果雪利将军留任此职，1757年战争中他所取得的战绩一定比劳登要辉煌得多。劳登办事轻率，铺张浪费，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耻辱。尽管雪利并未学过如何作战，但他通情达理，富有远见，善于听取他人好的意见，能够作出明智的计划，并迅速主动地将计划付诸行动；而劳登非但没有率领大军保卫各个殖民地，还在哈利法克斯懒散地练兵，使各殖民地在此期间毫无防备，遭遇重创，以致乔治堡失陷。此外，他还以防止粮食落入敌军之手为借口，对粮食出口实行长期禁运，扰乱我们所有的商业活动，阻挠贸易往来，而实际上，其目的在于压低粮价，使其有利于军粮承包商，据说（可能只是猜测）他也能从承包商所得的利润中分得一杯羹。当最终禁运被取消时，他又忘记把这一消息通知查尔斯敦，于是卡罗莱纳舰队被多扣留了近三个月，船底生了蛀虫，受损严重，许多船就在归途中沉没了。

Shirley was, I believe, sincerely glad of being relieved from so burdensome a charge as the conduct of an army must be to a man unacquainted with military business. I was at the entertainment given by the city of New York to Lord Loudoun, on his taking upon him the command. Shirley, tho' thereby superseded, was present also. There was a great company of officers, citizens, and strangers, and, some chairs having been borrowed in the neighborhood, there was one among them very low, which fell to the lot of Mr. Shirley. Perceiving it as I sat by him, I said, “They have given you, sir, too low a seat.” “No matter,” says he, “Mr. Franklin, I find a low seat the easiest.”

对于不谙军务的人来说，管理一支军队一定是沉重的负担，因此我相信，雪利对自己被免职一事一定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参加了纽约为劳登将军接任统帅一职举行的招待会，雪利尽管已不再担任这一职务，但也出席了。招待会上来了很多军官、市民和外地人，有些椅子是从附近居民家借来的，其中有一把非常矮，恰好雪利先生坐了。我坐在他旁边看到了，便说：“先生，他们给您的椅子太矮了。”他说：“不要紧，富兰克林先生，我发觉矮的座位最舒适。”

While I was, as afore mention'd, detain'd at New York, I receiv'd all the accounts of the provisions, etc., that I had furnish'd to Braddock, some of which accounts could not sooner be obtain'd from the different persons I had employ'd to assist in the business. I presented them to Lord Loudoun, desiring to be paid the ballance. He caus'd them to be regularly examined by the proper officer, who, after comparing every article with its voucher, certified them to be right; and the balance due for which his lordship promis'd to give me an order on the paymaster. This was, however, put off from

time to time; and, tho' I call'd often for it by appointment, I did not get it. At length, just before my departure, he told me he had, on better consideration, concluded not to mix his accounts with those of his predecessors. “And you,” says he, “when in England, have only to exhibit your accounts at the treasury, and you will be paid immediately.”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被扣留在纽约时，我收到了为布雷多克采购粮食等物的所有账单，其中有些账单我还没能及时从我雇来协助采购的人那里得到。我把账单送到劳登勋爵那里，希望他如数支付我垫付的差额。他命令主管军官仔细检查账单，这位军官将每一项内容与其单据进行核对，证明账单准确无误，劳登答应给我开张汇单，让我向军队出纳员提取应付的余额。但此事再三拖延，尽管我常常如约前来拿钱，但一直没有拿到。终于，在我离开之前，劳登告诉我，经过更仔细的考虑，他决定不要把他的账目和其前任们的混淆起来。他说：“你到英国后，只要把你的账单送交国库，他们就会立即付给你钱。”

I mention'd, but without effect, the great and unexpected expense I had been put to by being detain'd so long at New York, as a reason for my desiring to be presently paid; and on my observing that it was not right I should be put to any further trouble or delay in obtaining the money I had advanc'd, as I charged no commission for my service, “O, sir,” says he, “you must not think of persuading us that you are no gainer; we understand better those affairs, and know that every one concerned in supplying the army finds means, in the doing it, to fill his own pockets.” I assur'd him that was not my case, and that I had not pocketed a farthing; but he appear'd clearly not to believe me; and, indeed, I have since learnt that immense fortunes are often made in such employments. As to my

ballance, I am not paid it to this day, of which more hereafter.

我提到我被迫长期滞留纽约时，有许多额外的花销，希望他们能立即把钱付给我，但他们无动于衷。我指出如果收回预支钱款时我还要遭遇更多麻烦或者拖延，这就太不公平了，因为我没有从中赚取佣金。他说："哦，先生，你不会想让我们相信你没有从中赚钱吧，我们对这种事情再了解不过了，我们知道每一个为军队采购的人都中饱私囊。"我肯定地告诉他我没有，我连一分钱都没有私吞，但他很明显不相信我。的确，我后来知道干这一行的人常常从中发了大财。至于我垫付的那笔钱，至今也没有拿到，稍后我会再讲述。

Our captain of the paquet had boasted much, before we sailed, of the swiftness of his ship; unfortunately, when we came to sea, she proved the dullest of ninety-six sail, to his no small mortification. After many conjectures respecting the cause, when we were near another ship almost as dull as ours, which, however, gain'd upon us, the captain ordered all hands to come aft, and stand as near the ensign staff as possible. We were, passengers included, about forty persons. While we stood there, the ship mended her pace, and soon left her neighbor far behind, which prov'd clearly what our captain suspected, that she was loaded too much by the head. The casks of water, it seems, had been all plac'd forward; these he therefore order'd to be mov'd further aft, on which the ship recover'd her character, and proved the sailer in the fleet.

在我们起航前，我们那艘邮船的船长常常夸耀自己的船行驶得如何之快，不幸的是，我们出海后，这艘邮船是96艘帆船中最为迟缓笨拙的，这让他大失颜面。对此我们曾多次猜测其原因，有一次我们附近有艘船几乎和我们一样行驶迟缓，但超过了我们，船长就命令所有

人站到船尾去，并尽量靠近旗杆。包括我们乘客在内大约40人。我们站在那儿时，船的行驶速度加快了，很快就把那艘船远远抛在后面，这也清楚地证实了船长的猜测，即船头载重太大了。原来水桶似乎都放在船头，因此船长命令把水桶移到船尾来，这样我们的船就再次显示了它的特点，证明了它的确是舰队中最好的帆船。

The captain said she had once gone at the rate of thirteen knots, which is accounted thirteen miles per hour. We had on board, as a passenger, Captain Kennedy, of the Navy, who contended that it was impossible, and that no ship ever sailed so fast, and that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error in the division of the log-line, or some mistake in heaving the log. A wager ensu'd between the two captains, to be decided when there should be sufficient wind. Kennedy thereupon examin'd rigorously the log-line, and, being satisfi'd with that, he determin'd to throw the log himself. Accordingly some days after, when the wind blew very fair and fresh, and the captain of the paquet, Lutwidge, said he believ'd she then went at the rate of thirteen knots, Kennedy made the experiment, and own'd his wager lost.

船长说这艘船曾以13节的速度行驶过，折算一下，也就是每小时13英里。我们船上的乘客里有位海军的肯尼迪船长，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哪艘船能行驶得那么快，一定是计程绳上的刻度有错误，或是投掷计程绳时出了什么问题。两位船长打了个赌，留待风足够大时来决定。肯尼迪对计程绳做了严格检查，认为没有问题后，他决定亲自把计程绳抛下去。过了几天后，风势变强了，邮船船长勒特威奇说他相信这时船正以13节的速度行驶着，肯尼迪做了实验测量后，承认自己输了。

The above fact I give for the sake of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 It has been remark'd, as an imperfection in the art of ship-building, that it can never be known, till she is tried, whether a new ship will or will not be a good sailer; for that the model of a good-sailing ship has been exactly follow'd in a new one, which has prov'd, on the contrary, remarkably dull. I apprehend that this may partly be occasion'd by the different opinions of seamen respecting the modes of lading, rigging, and sailing of a ship; each has his system; and the same vessel, laden by the judgment and orders of one captain, shall sail better or worse than when by the orders of another. Besides, it scarce ever happens that a ship is form'd, fitted for the sea, and sail'd by the same person. One man builds the hull, another rigs her, a third lades and sails her. No one of these has the advantage of knowing all the ideas and experience of the others, and, therefore, can not draw just conclusions from a combination of the whole.

我之所以提到上面这个事情，是为了说明下面这一点。人们已经指出，造船术中有个缺陷，即一艘新船是否是一艘好船要待试水后才知道。因为尽管新船是严格模仿船的模型建造的，但结果却往往相反，造出来的新船十分笨重。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水手们对于装货、扬帆和航行的方式有着不同意见，每人都各有一套方法，同样一艘船，根据一位船长的判断和命令进行装货，其行驶速度与在另一位船长指令下进行装货后的行驶速度相比大为不同。此外，一艘船的制造、装备和航行很少是由同一人完成的，一人建造船身，一人负责装配，再有一人负责装货和驾驶。他们没有谁能了解其他人的所有想法和经验，因此，把这几方面综合起来时，也就无法得出正确结论了。

Even in the simple operation of sailing when at sea, I have often observ'd different judgments in the officers who commanded the successive watches, the wind being the same. One would have

the sails trimm'd sharper or flatter than another, so that they seem'd to have no certain rule to govern by. Yet I think a set of experiments might be instituted, first, to determine the most proper form of the hull for swift sailing; next, the best dimensions and properest place for the masts: then the form and quantity of sails, and their position, as the wind may be; and, lastly, the disposition of the lading. This is an age of experiments, and I think a set accurately made and combin'd would be of great use. I am persuaded, therefore, that ere long some ingenious philosopher will undertake it, to whom I wish success.

我常常注意到，即使是海上航行的简单操作，当风势相同时，在相邻时段值班的船员也会做出不同的判断。一个船员可能会比另一个把船帆调得或陡一些，或平一些，因此他们似乎并非有章可循。但我想也许可以先设计一组实验，首先决定最适宜快速航行的船身样式，再来确定桅杆的最佳尺寸和最恰当位置，然后根据风势，确定帆的样式、数量和位置，最后还要想好货物装船的方法。这是个实验的时代，我想一组设计严谨、相得益彰的实验是大为有用的。因此我相信不久以后会有一位聪颖灵巧的哲学家进行这项研究，我祝他成功。

We were several times chas'd in our passage, but outsail'd every thing, and in thirty days had soundings. We had a good observation, and the captain judg'd himself so near our port, Falmouth, that, if we made a good run in the night, we might be off the mouth of that harbor in the morning, and by running in the night might escape the notice of the enemy's privateers, who often crus'd near the entrance of the channel. Accordingly, all the sail was set that we could possibly make, and the wind being very fresh and fair, we went right before it, and made great way. The captain, after his observation, shap'd his course, as he thought, so as to pass wide

of the Scilly Isles; but it seems there is sometimes a strong indraught setting up St. George's Channel, which deceives seamen and caused the loss of Sir Cloudesley Shovel's squadron. This indraught was probably the cause of what happened to us.

我们在航行途中数次被敌人追逐，但我们的船行驶得比他们都快，30天后我们行至了浅水区域。我们的测量非常准确，船长判断我们离法尔茅斯港已经很近了，如果我们夜里能顺利行进的话，第二天一早我们也许就能到达港口了，而且夜间行驶能逃过敌方私掠船的注意，这种船多数是在海峡入口处巡航的。于是我们尽可能扬起所有的帆，由于风势很强，我们顺风行驶，行进迅速。船长经观察之后确定了航线，他以为那样可以避开锡利群岛，但有时圣乔治海峡处似乎有一股强劲的洋流，欺骗了不少水手，还造成了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的舰队在此失事。这股洋流很可能就是我们遭遇险情的原因。

We had a watchman plac'd in the bow, to whom they often called, “Look well out before there,” and he as often answered, “Ay ay; " but perhaps had his eyes shut, and was half asleep at the time, they sometimes answering, as is said, mechanically; for he did not see a light just before us, which had been hid by the studdingsails from the man at the helm, and from the rest of the watch, but by an accidental yaw of the ship was discover'd, and occasion'd a great alarm, we being very near it, the light appearing to me as big as a cart-wheel. It was midnight, and our captain fast asleep; but Captain Kennedy, jumping upon deck, and seeing the danger, ordered the ship to wear round, all sails standing; an operation dangerous to the masts, but it carried us clear, and we escaped shipwreck, for we were running right upon the rocks on which the light-house was erected. This deliverance impressed me strongly with the utility of light-houses, and made me resolve to encourage

the building more of them in America, if I should live to return there.

我们在船头安排了一个看守，他们常常冲他喊：“在那儿好好看着！”看守总是回答：“是，是。”但也许有时他闭上了眼睛在半睡半醒之间吧，答话只是机械的反应而已，因为他就连在我们前方的灯都没有看见，这座灯被副帆遮住了，所以掌舵人和其他值班人员都没有看到，但船身偶然偏了一下，于是人们发现了它，都惊慌不已，因为我们离它已经很近了，灯光在我看来有车轮那般大。当时是半夜，船长正在熟睡之中，这时肯尼迪船长跳上了甲板，看到险情后下令张起所有的帆，掉转船头，这个动作对桅杆来说非常危险，但却让我们安然度过危险，幸免于难，因为当时我们正向建有灯塔的礁石全力驶去。这次成功脱险让我深深感受到灯塔的作用，我决心如果还能活着回到美国，一定要大力倡导在美国多修灯塔。

In the morning it was found by the soundings, etc., that we were near our port, but a thick fog hid the land from our sight. About nine o'clock the fog began to rise, and seem'd to be lifted up from the water like the curtain at a play-house, discovering underneath, the town of Falmouth, the vessels in its harbor, and the fields that surrounded it. This was a most pleasing spectacle to those who had been so long without any other prospects than the uniform view of a vacant ocean, and it gave us the more pleasure as we were now free from the anxieties which the state of war occasion'd.

早上时，通过测量水深等方法，我们发现已离港口不远，但当时起了浓雾，看不见陆地。大约九点钟时，浓雾渐渐散去，如同剧院里的帷幕一样，从水面升了起来，露出幕下的法尔茅斯镇，还有在港口

里停靠的船舶和四周的田野。对于长期以来眼前除了单调的茫茫大海别无其他景象的人而言，这幅画面实在赏心悦目，我们现在也不用再为战争而忧心忡忡，这让我们更加深深的感到愉快。

I set out immediately, with my son, for London, and we only stopt a little by the way to view Stonehenge on Salisbury Plain, and Lord Pembroke's house and gardens, with his very curious antiquities at Wilton. We arrived in London the 27th of July, 1757.

我和我的儿子立即出发前往伦敦，途中只稍作停留，去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看了巨石阵，去威尔顿参观了彭布罗克勋爵的房屋、花园以及他收藏的珍稀文物。1757年7月27日，我们抵达了伦敦。

PART FOUR

第四部分

AS SOON as I was settled in a lodging Mr. Charles had provided for me, I went to visit Dr. Fothergill, to whom I was strongly recommended, and whose counsel respecting my proceedings I was advis'd to obtain. He was against an immediate complaint to government, and thought the proprietaries should first be personally appli'd to, who might possibly be induc'd by the interposition and persuasion of some private friends, to accommodate matters amicably. I then waited on my old friend and correspondent, Mr. Peter Collinson, who told me that John Hanbury, the great Virginia merchant, had requested to be informed when I should arrive, that he might carry me to Lord Granville's, who was then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and wished to see me as soon as possible. I agreed to go with him the next morning. Accordingly Mr. Hanbury called for me and took me in his carriage to that nobleman's, who receiv'd me with great civility; and after some questions respecting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in America and discourse thereupon, he said to me: “You Americans have wrong ideas of the nature of your constitution; you contend that the king's instructions to his governors are not laws, and think yourselves at liberty to regard or disregard them at your own discretion. But those instructions are not like the pocket instructions given to a minister going abroad, for regulating his conduct in some trifling point of ceremony. They are first drawn up by judges learned in the laws; they are then considered, debated, and perhaps amended in Council, after which they are signed by the king. They are then, so far as they relate to you, the law of the land, for the

king is the LEGISLATOR OF THE COLONIES." I told his lordship this was new doctrine to me. I had always understood from our charters that our laws were to be made by our Assemblies, to be presented indeed to the king for his royal assent, but that being once given the king could not repeal or alter them. And as the Assemblies could not make permanent laws without his assent, so neither could he make a law for them without theirs. He assur'd me I was totally mistaken. I did not think so, however, and his lordship's conversation having a little alarm'd me as to what might be the sentiments of the court concerning us, I wrote it down as soon as I return'd to my lodgings. I recollected that about 20 years before, a clause in a bill brought into Parliament by the ministry had propos'd to make the king's instructions laws in the colonies, but the clause was thrown out by the Commons, for which we adored them as our friends and friends of liberty, till by their conduct towards us in 1765 it seem'd that they had refus'd that point of sovereignty to the king only that they might reserve it for themselves.

查尔斯先生为我安排了住处，我一安顿好后，就立即去拜访了福瑟吉尔博士，因为有人向他强烈引荐了我，还建议我就诉讼事务向他咨询。福瑟吉尔博士反对立即向政府提出控诉，认为应首先和领主们私下商量，通过一些朋友从中劝说调解，也许能就此事达成和解。我又去拜访了与我通信的老朋友彼得·柯林森先生，他告诉我来自弗吉尼亚的大商人约翰·汉伯里先生请求在我到达时通知他，他可以带我去见时任枢密院院长的格兰维尔勋爵，后者也希望尽快见到我。我答应第二天早上和他一起去。于是汉伯里先生来接我，我们坐着他的马车到了格兰维尔勋爵那里，勋爵待我亲切有礼。在问了我一些有关美国现状的问题，并就此谈了一会儿后，他对我说："你们美国人对你们宪法的本质有着错误的认识，你们认为英王给总督的命令并不是法律，还认为你们可以自由选择遵守或是漠视这些命令。但它们并不是国王

授予即将出国的公使的袖珍指令，告诉他一些有关礼仪的细枝末节。它们首先由熟谙法律的法官们起草，再由枢密院反复考虑、辩论或者修改，然后由国王签字认可。因此，这些命令对你们来说即是法律，因为国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我告诉勋爵我从未听过这样的理论。我从宪章上早就得知，我们的法律应由我们的议会制定，固然需要呈交国王批准，但一经批准，国王就不能再加以废止或是更改。没有国王的批准，议会不能制定永久性法律，而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也同样不能制定法律。勋爵肯定地说我完全错了。但我不这么认为，和勋爵的谈话倒是提醒了我英国内阁对于我们有着怎样的看法，于是我一回到住处就把这次谈话记录了下来。我回忆起约20年前，内阁向议会提出的议案中有这么一条，即国王的命令应成为殖民地的法律，但当时议会下院将此条否决了，我们还因此非常尊敬他们，把他们看成是朋友，是自由的朋友，直到1765年他们做出那样的事情，可能他们当时拒绝国王在殖民地拥有主权，只是想把这一权利留给自己吧。

After some days, Dr. Fothergill having spoken to the proprietaries, they agreed to a meeting with me at Mr. T. Penn's house in Spring Garden. The conversation at first consisted of mutual declarations of disposition to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 but I suppose each party had its own ideas of what should be meant by reasonable. We then went into consideration of our several points of complaint, which I enumerated. The proprietaries justify'd their conduct as well as they could, and I the Assembly's. We now appeared very wide, and so far from each other in our opinions as to discourage all hope of agreement. However, it was concluded that I should give them the heads of our complaints in writing, and they promis'd then to consider them. I did so soon after, but they put the paper into the hands of their solicitor, Ferdinand John Paris, who managed for them all their law business in their great suit with the neighboring proprietary of Maryland, Lord Baltimore, which had subsisted 70 years, and wrote for them all their papers and

messages in their dispute with the Assembly. He was a proud, angry man, and as I had occasionally in the answers of the Assembly treated his papers with some severity, they being really weak in point of argument and haughty in expression, he had conceived a mortal enmity to me, which discovering itself whenever we met, I declin'd the proprietary's proposal that he and I should discuss the heads of complaint between our two selves, and refus'd treating with anyone but them. They then by his advice put the paper into the hands of the Attorney and Solicitor-General for their opinion and counsel upon it, where it lay unanswered a year wanting eight days, during which time I made frequent demands of an answer from the proprietaries, but without obtaining any other than that they had not yet received the opinion of the Attorney and Solicitor-General. What it was when they did receive it I never learnt, for they did not communicate it to me, but sent a long message to the Assembly drawn and signed by Paris, reciting my paper, complaining of its want of formality, as a rudeness on my part, and giving a flimsy justification of their conduct, adding that they should be willing to accommodate matters if the Assembly would send out some person of candour to treat with them for that purpose, intimating thereby that I was not such.

几天以后，福瑟吉尔博士已同领主们谈过此事，他们同意与我在托马斯·佩恩先生在春季花园的住所里见面。会面一开始，各方都宣称希望谋求事情的合理解决，但我想至于什么是“合理”，各自都有不同的见解。然后我们开始讨论我们的几点控诉意见，我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领主们尽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而我则证明州议会的决定是正当的。我们这时的分歧非常大，似乎没有达成一致的希望。但我们最终决定由我把我们的控诉意见写下来交给他们，他们答应会予以考虑。我很快照办了，但是他们却把这份文件交给他们的律师费迪南德·约翰·帕里斯，此人负责他们与毗邻的马里兰州领主巴尔的摩勋爵的大

诉讼案中的全部法律事务，这桩案子已经持续了70年之久，他还为领主们撰写与州议会争辩的所有文件和文章。他生性傲慢，脾气不好，我曾在为州议会写的回复文章中言辞激烈地反驳他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确实论证薄弱，语气傲慢，于是他把我看成他的死敌，每次我们碰面，这种敌意就自然流露出来。领主们提议让我和他两人来讨论我们的控诉意见，我予以拒绝并表示只和他们本人进行讨论。于是领主们根据他的建议把这份文件交给检察长和副检察长，征询他们的意见。这份文件在他们那里搁置了一年只差八天，期间我常常向领主们询问答复，除了他们还未收到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意见外，别无任何音信。他们收到意见后，我也从不知道意见内容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告诉我，只向州议会写了封由帕里斯拟定和签名的长信，详谈了我的意见书，说这篇意见书写得毫无规矩，从中看出我的粗鲁无礼，信中为他们的行为做了牵强附会的辩护，还说如果州议会能指派个坦诚正直的人来和他们处理此事，他们会更愿意达成和解，言下之意就是我不是这样的人。

The want of formality or rudeness was, probably, my not having address'd the paper to them with their assum'd titles of True and Absolute Proprietaries of the Province of Pennsylvania, which I omitted as not thinking it necessary in a paper, the intention of which was only to reduce to a certainty by writing, what in conversation I had delivered viva voce.

他说我没有规矩、粗鲁无礼，大概是因为我在意见书中没有使用他们的尊称“宾夕法尼亚州真正和绝对的领主们”，我认为在这份文件中没有必要用这样的称呼，所以省略了，因为这份文件的目的只是将我在谈话中已经口头表达的意见用书面形式确定下来而已。

But during this delay, the Assembly having prevailed with

Gov'r Denny to pass an act taxing the proprietary estate in common with the estates of the people, which was the grand point in dispute, they omitted answering the message.

但就在意见书耽搁期间，州议会已经说服丹尼总督批准了对领主财产和平民财产同样征税的法案，这是我们的争论焦点，所以州议会也不会再回复他们的信了。

When this act however came over, the proprietaries, counselled by Paris, determined to oppose its receiving the royal assent. Accordingly they petition'd the king in Council, and a hearing was appointed in which two lawyers were employ'd by them against the act, and two by me in support of it. They alledg'd that the act was intended to load the proprietary estate in order to spare those of the people, and that if it were suffer'd to continue in force, and the proprietaries who were in odium with the people, left to their mercy in proportioning the taxes, they would inevitably be ruined. We reply'd that the act had no such intention, and would have no such effect. That the assessors were honest and discreet men under an oath to assess fairly and equitably, and that any advantage each of them might expect in lessening his own tax by augmenting that of the proprietaries was too trifling to induce them to perjure themselves. This is the purport of what I remember as urged by both sides, except that we insisted strongly on the mischievous consequences that must attend a repeal, for that the money, L100,000, being printed and given to the king's use, expended in his service, and now spread among the people, the repeal would strike it dead in their hands to the ruin of many, and the total discouragement of future grants, and the selfishness of the proprietors in soliciting such a general catastrophe, merely from a

groundless fear of their estate being taxed too highly, was insisted on in the strongest terms. On this, Lord Mansfield, one of the counsel rose, and beckoning me took me into the clerk's chamber, while the lawyers were pleading, and asked me if I was really of opinion that no injury would be done the proprietary estate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act. I said certainly. “Then,” says he, “you can have little objection to enter into an engagement to assure that point.” I answer'd, “None at all.” He then call'd in Paris, and after some discourse, his lordship's proposition was accepted on both sides; a paper to the purpose was drawn up by the Clerk of the Council, which I sign'd with Mr. Charles, who was also an Agent of the Province for their ordinary affairs, when Lord Mansfield returned to the Council Chamber, where finally the law was allowed to pass. Some changes were however recommended and we also engaged they should be made by a subsequent law, but the Assembly did not think them necessary; for one year's tax having been levied by the act before the order of Council arrived, they appointed a committee to examine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ssessors, and on this committee they put several particular friends of the proprietaries. After a full enquiry, they unanimously sign'd a report that they found the tax had been assess'd with perfect equity.

当这项法案送交英国时，领主们在帕里斯的建议下决定反对其得到英王批准。他们在枢密院向国王请愿，枢密院指定了时间对此事进行听审。领主们请了两个律师反对这项法案，我也请了两个律师为法案辩护。领主们宣称，该法案目的在于加重领主财产负担以减轻平民负担，如果法案持续有效，由于平民普遍憎恶领主，在确定征税比例上如任由平民决定，那么领主不可避免地会破产。我们回答说法案并无此种目的，也不会产生这种结果。财产估价员们诚实谨慎，曾起誓要公平公正地对财产进行估价，他们如通过增加领主税额来减少自己的税款，从中所获的利益实在微不足道，不值得为此违背自己的誓

言。这就是我所记得的双方的主张。此外，我们还着重强调如果撤销法案，后果将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已印发10万英镑的纸币，供给英王使用，为英王服务，现在已在人民中流通，如果撤销法案，人民手中的纸币就成了废纸，这会使很多人破产，将来政府要通过拨款也不太可能了。我们还用最激烈的言辞强调，领主们仅仅因为无端地担心自己的财产缴税太多，便要招致这样一场巨大灾难，实在是自私自利。这时，各位律师还在辩论，枢密院的一位顾问曼斯菲尔德勋爵站起身来，向我招手把我带到秘书室里，问我法案的执行是否真的不会对领主的财产造成损失。我说当然。他说："那么你应该不反对订约保证这一点吧。"我说："一点也不反对。"于是他把帕里斯叫了进来，经过一番谈话后，双方都同意了勋爵的提议。枢密院的秘书为此起草了一份文件，我和查尔斯先生签了字，他也是为他们处理日常事务的州代表。这时曼斯菲尔德勋爵回到了枢密院会议室里，法案最终得到了通过。但枢密院提出应对法案做些修改，我们也保证将在随后的法律中把这些改动加以确定，但州议会却认为无此必要，因为在枢密院的指令下达之前，该年的税款已根据法案征收。他们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检查征税财产估价员们的工作，并把领主的几位特殊的朋友安排在委员会中。经过详细审查，委员会成员一致认可财产估价做到了完全公平，并在报告上签了字。

The Assembly looked into my entering into the first part of the engagement, as an essential service to the Province, since it secured the credit of the paper money then spread over all the country. They gave me their thanks in form when I return'd. But the proprietaries were enraged at Governor Denny for having pass'd the act, and turn'd him out with threats of suing him for breach of instructions which he had given bond to observe. He, however, having done it at the instance of the General, and for His Majesty's service, and having some powerful interest at court, despis'd the threats and they were never put in execution…[Unfinished].

州议会认为我所订合约的第一部分是对本州的重大贡献，因为它保证了当时已在全州发行的纸币的信用。我回美国时，他们向我郑重道谢。但是领主们对丹尼总督批准法案感到怒不可遏，他们撤销了他的职务，还威胁说因为他违反了遵守领主命令的职责，所以要起诉他。但丹尼总督是在将军的要求下这么做的，同时也是为英王陛下服务，加上他在英国内阁认识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所以他并不把领主的威胁放在眼里，而这些威胁也从来没有付诸实行……（未完成）

CHIEF EVENTS IN FRANKLIN's LIFE

富兰克林生平大事记

Ending, as it does, with the year 1757, the autobiography leaves important facts un-recorded. It has seemed advisable, therefore, to detail the chief events in Franklin's life, from the beginning, in the following list:

富兰克林的自传只写到1757年，有许多重要事件没有记载。因此在此从头详细记录富兰克林生平的大事似乎很有意义，详见下表：

1706 He is born, in Boston, and baptized in the Old South Church.

1706年　富兰克林出生于波士顿，在旧南方教堂受洗。

1714 At the age of eight, enters the Grammar School.

1714年　八岁时进入文法学校学习。

1716 Becomes his father's assistant in the tallow-chandlery business.

1716年　为父亲的油烛生意帮忙。

1718 Apprenticed to his brother James, printer.

1718年　到哥哥詹姆斯的印刷店里当学徒。

1721 Writes ballads and peddles them, in printed form, in the streets; contributes, anonymously, to the “New England Courant,” and temporarily edits that paper; becomes a free-thinker, and a vegetarian.

1721年　创作叙事诗并沿街叫卖印刷出来的诗歌；匿名给《新英格兰报》投稿，担任该报的临时编辑；成为自由思想者和素食者。

1723 Breaks his indenture and removes to Philadelphia; obtaining employment in Keimer's printing-office; abandons vegetarianism.

1723年　抛弃学徒契约，来到费城；在凯默的印刷所工作；放弃食素。

1724 Is persuaded by Governor Keith to establish himself independently, and goes to London to buy type; works at his trade there, and publishes “Dissertation on Liberty and Necessity, Pleasure and Pain.”

1724年　接受基思总督的建议，决定独立开店，前往伦敦购置铅字；在印刷店干活，并发表《论自由与穷困、快乐与痛苦》一文。

1726 Returns to Philadelphia; after serving as clerk in a dry goods store, becomes manager of Keimer's printing-house.

1726年　回到费城；在一家干货店担任职员，后为凯默管理印刷店。

1727 Founds the Junto, or “Leathern Apron” Club.

1727年　成立“秘社”，或叫“皮围裙”俱乐部。

1728 With Hugh Meredith, opens a printing-office.

1728年　与休·梅雷迪斯合开印刷所。

1729 Becomes proprietor and editor of the “Pennsylvania Gazette”; prints, anonymously,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 opens a stationer's shop.

1729年　接办《宾夕法尼亚报》并担任编辑；匿名印发《论纸币的本质和必要性》一文；开文具店。

1730 Marries Rebecca Read.

1730年　与丽贝卡·里德结婚。

1731 Founds the Philadelphia Library.

1731年　建立费城图书馆。

1732 Publishes the first number of “Poor Richard's Almanac” under the pseudonym of “Richard Saunders.” The Almanac, which continued for twenty-five years to contain his witty, worldly-wise sayings, played a very large part in bringing together and molding the American character which was at that time made up of so many diverse and scattered types.

1732年　以理查德·桑德斯的笔名发表《穷理查德年鉴》的第一版。《穷理查德年鉴》连续发行25年，包含他许多充满智慧和世俗经验的格言，这对凝聚和塑造原无定性的美利坚民族性格发挥了重要作用。

1738 Begins to study French, Italian, Spanish, and Latin.

1738年　开始学习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

1736 Chosen clerk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forms the Union Fire Company of Philadelphia.

1736年　被选为州议会秘书；成立费城联合消防队。

1737 Elected to the Assembly; appointed Deputy Postmaster-General; plans a city police.

1737年　当选为州议会议员；担任副邮政总长；计划成立费城警察局。

1742 Invents the open, or “Franklin,” stove.

1742年　发明开式或“富兰克林式”火炉。

1743 Proposes a plan for an Academy, which is adopted 1749 and develops into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743年　提出成立学院的计划，于1749年实现，该学院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前身。

1744 Establishes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744年　成立美国哲学学会。

1746 Publishes a pamphlet, “Plain Truth,” on the necessity for disciplined defense, and forms a military company; begins electrical experiments.

1746年　出版一本小册子《明显的事实》，论述建立规范化防务的必要性，并组建了一支军队；开始电学实验。

1748 Sells out his printing business; is appointed on the Commission of the Peace, chosen to the Common Council, and to the Assembly.

1748年　将印刷所出售；担任治安委员会委员，当选为参事会成员及州议会议员。

1749 Appointed a Commissioner to trade with the Indians.

1749年　担任与印第安人贸易的专员。

1751 Aids in founding a hospital.

1751年　帮助建立医院。

1752 Experiments with a kite and discovers that lightning is an electrical discharge.

1752年　用风筝做实验，发现闪电是一种放电现象。

1753 Awarded the Copley medal for this discovery, and elected a member of the Royal Society; receives the degree of M.A. from Yale and Harvard. Appointed joint Postmaster-General.

1753年　因这一发现被授予科普利奖章，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获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学位；与他人共同担任邮政总长。

1754 Appointed one of the Commissioners from Pennsylvania to the Colonial Congress at Albany; proposes a plan for the union of the colonies.

1754年　作为宾夕法尼亚代表之一出席在奥尔巴尼举行的殖民地大会；提出殖民地联盟计划。

1755 Pledges his personal property in order that supplies may be raised for Braddock's army; obtains a grant from the Assembly in aid of the Crown Point expedition; carries through a bill establishing a voluntary militia; is appointed Colonel, and takes the field.

1755年　为布雷多克军队筹集车马并用个人财产作担保；因克朗波因特之行获得州议会拨款；使建立一支志愿民兵部队的议案在议会获得通过；担任防卫队上校，带军打仗。

1757 Introduces a bill in the Assembly for paving the streets of Philadelphia; publishes his famous “Way to Wealth”; goes to England to plead the cause of the Assembly against the Proprietaries; remains as agent for Pennsylvania; enjoys the friendship of the scientific and literary men of the kingdom.

1757年　提出为费城街道铺路的议案；发表著名的《通向财富之路》一文；去英国为州议会向领主征税抗辩；留在英国担任宾夕法尼亚代理人；与英国科学界和文学界人士结下友谊。

[HERE THE AUTOBIOGRAPHY BREAKS OFF]

自传写到此处

1760 Secures from the Privy Council, by a compromise, a decision obliging the Proprietary estates to contribute to the public revenue.

1760年　通过让步，使枢密院决定同意对殖民地领主财产征税作为财政收入。

1762 Receives the degree of LL.D. from Oxford and Edinburgh; returns to America.

1762年　获得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到美国。

1763 Makes a five months' tour of the northern colonies for the purpose of inspecting the post-offices.

1763年　对北部殖民地作为期五个月的访问，视察当地邮局。

1764 Defeated by the Penn faction for reelection to the Assembly; sent to England as agent for Pennsylvania.

1764年　在州议会改选中败给佩恩一派；作为宾夕法尼亚代理人前往英国。

1765 Endeavors to prevent the passage of the Stamp Act.

1765年　尽力阻止《印花税法案》通过。

1766 Examined before the House of Commons relative to the passage of the Stamp Act; appointed agent of Massachusetts, New Jersey, and Georgia; visits Gottingen University.

1766年　因《印花税法案》通过一事在英国下议院答问；担任马萨诸塞、新泽西和佐治亚代理人；访问哥廷根大学。

1767 Travels in France and is presented at court.

1767年　在法国旅行，被引见给法国王室。

1769 Procures a telescope for Harvard College.

1769年　为哈佛大学购买一架望远镜。

1772 Elected Associe Etranger of the French Academy.

1772年　当选为法国科学院外国合作院士。

1774 Dismissed from the office of Postmaster-General; influences Thomas Paine to emigrate to America.

1774年　被免去邮政总长一职；影响托马斯·潘恩使其移民美国。

1775 Returns to America; chosen a delegate to the 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 placed on the 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 appointed one of the commissioners to secure the cooperation of Canada.

1775年　回到美国；当选为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担任秘密通讯委员会委员；担任确保加拿大合作事务的专员之一。

1776 Placed on the committee to draft a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chosen presid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mmittee of Pennsylvania; sent to France as agent of the colonies.

1776年　担任《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制宪会议主席；作为殖民地代理人前往法国。

1778 Concludes treaties of defensive alliance, and of amity and commerce; is received at court.

1778年　与法国签订防御联盟条约和友好商务条约；接受法国国王会见。

1779 Appointe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to France.

1779年　担任驻法全权大使。

1780 Appoints Paul Jones commander of the “Alliance.”

1780年　任命保罗·琼斯为“联军”指挥官。

1782 Signs the preliminary articles of peace.

1782年　签订和平合约草案。

1783 Signs the definite treaty of peace.

1783年　签订和平合约。

1785 Returns to America; is chosen President of Pennsylvania; reelected 1786.

1785年　回到美国；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州州长；1786年再次当选。

1787 Reelected President; sent as delegate to the convention for framing a Federal Constitution.

1787年　再次当选为州长；作为代表出席联邦制宪会议。

1788 Retires from public life.

1788年　退出公共生活。

1790 April 17, dies. His grave is in the churchyard at Fifth and Arch streets, Philadelphia. Editor.

1790年4月17日　与世长辞。安葬在费城第五街和拱街墓地，墓志铭为“编辑富兰克林”。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伦敦蒙难记

Kidnapped in London

英汉双语

孙中山

SUN ZHONG SHA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UBLISHING CO.

伦敦蒙难记

Kidnapped in London

孙中山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REFACE 序
- CHAPTER I THE IMBROGLIO 第一章 原 因[^1]
- CHAPTER II MY CAPTURE 第二章 被诱
- CHAPTER III MY IMPRISONMENT 第三章 被禁时之情形
- CHAPTER IV PLEADING WITH MY GAOLERS FOR LIFE 第四章 幽 禁
- CHAPTER V THE PART MY FRIENDS PLAYED 第五章 良友营救
- CHAPTER VI THE SEARCH FOR A DETECTIVE 第六章 访求侦探
- CHAPTER VII THE GOVERNMENT INTERVENE 第七章 英政府之干涉
- CHAPTER VIII RELEASED 第八章 省 释
- Appendix 附 录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REFACE

序

My recent detention in the Chinese Legation, 49 Portland Place, London, has excited so much interest,has brought me so many friends and has raised so many legal, technical and international points of law, that I feel I should be failing in my duty did I not place on public record, all the circumstances connected with the historical event.I must beg the indulgence of all readers for my shortcomings in English composition, and confess that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help rendered by a good friend, who transcribed my thoughts, I could never have ventured to appear as the Author of an English book.

近者，予被逮于伦敦中国公使馆，颇为当世所注意。予且因是结纳多数良友，泰西学子藉为法律问题之讨论者尤众。予若不以案中实情布告当世，则予之职为未尽。顾予于英文著述非所长，惟冀读者恕其谫陋 [2_1] ，勿加督责。而遗辞达意尤得吾友匡助之力为多，使非然者，予万不敢贸然以著作自鸣也。

SUN YAT SEN. London, 1897.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 孙文识于伦敦

[2_1].谫陋：（见识）浅薄贫乏。

CHAPTER I THE IMBROGLIO

第一章 原 因 [3_1]

When in 1892 I settled in Macao, a small island near the mouth of the Canton river, to practise medicine, I little dreamt that in four years' time I should find myself a prisoner in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London, and the unwitting cause of a political sensation which culminated in the active interference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procure my release. It was in that year however, and at Macao, that my first acquaintance was made with political life; and there began the part of my career which has been the means of bringing my name so prominently before the British people.

时在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予卜居于珠江江口之澳门，以医为业，藐兹一身 [3_2] 。初不料四年后竟被幽于伦敦中国使馆，更不料以是轰动政界，甚且由英政府出而为实地之干涉，以要求彼使馆之见释也。虽然，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喧腾于英人之口，实始于是地。

I had been studying medicine, during the year 1886, in Canton at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venerable Dr. Kerr, when in 1887 I heard of the opening of a College of Medicine at Hong Kong, and determined immediately to avail myself of the advantages it offered. After five years' study (1887-1892) I obtained the diploma entitling me to style myself "Licentiate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Hong Kong."

当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时，予学医于广州之英美传道会，主政者为戈尔医学博士。次年，闻香港创立医科大学，遂决计赴香港肄业。阅五年而毕业，得医学博士文凭。

Macao has belonged to Portugal for 360 years; but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is Europeanised, the inhabitants are mostly Chinese, and the section of the population which styles itself Portuguese, consists really of Eurasians of several in-bred generations.

澳门一埠，其隶属于葡萄牙者盖三百六十年矣。顾政柄 [3_3] 虽属欧人，而居民多称华籍，即其自称为葡人者亦大半为本地之欧亚杂种也。

In my newly selected home, I foun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of the native hospital willing to help me forward in the matter of affording me opportunities to practise European medicine and surgery. They placed a ward at my disposal, supplied me with drugs and appliances from London, and granted me every privilege whereby to secure my introduction amongst them on a fair footing.

予既卜居于澳门，澳门中国医局之华董所以提携而嘘拂之者无所不至，除给予医室及病房外，更为予购置药材及器械于伦敦。

This event deserves special notice as marking a new and significant departure in China; for never before ha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any Chinese hospital throughout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e great empire given any direct official encouragement to

Western medicine. Many patients, more especially surgical cases, came to my wards, and I had the opportunity of performing several of the major operations before the Directors. On the other hand, I had difficulty from the first with the Portuguese authorities. It was not the obstructive ignorance of the East, but the jealousy of the West, which stepped in to thwart my progress. The law of Portugal forbids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within Portuguese territory, by any one who is not possessed of a Portuguese diploma, obtainable only in Europe. Under this rule the Portuguese doctors took refuge and fought my claims to practise. They first forbade me to practise amongst, or prescribe for, Portuguese; the dispensers in the pharmacies were not allowed to dispense prescriptions from the pen of a doctor of any alien nationality; consequently my progress was hampered from the first. After futile attempts to establish myself in Macao, and at considerable pecuniary loss, for I had settled down little dreaming of opposition, I was induced to go to Canton.

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则自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尝为正式之提倡，有之，自澳门始。予既任事于医局，求治者颇众，而尤以外科为繁。然亚东之闭塞，甫见开通，而欧西之妒焰已起而相迫。盖葡人定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澳门葡医以此相龀 [3_4] ，始则禁阻予不得为葡人治病，继则饬 [3_5] 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以是之故，而予医业之进行猝遭顿挫，虽极力运动，终归无效。顾予赴澳之初，并不料其有是，资本损失为数不少，旋即迁徙至广州焉。

It was in Macao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 Its objects were so wise, so modest, and so hopeful, that my sympathies were at once enlisted in its behalf, and

I believed I was doing my best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my country by joining it. The idea was to bring about a peaceful reformation, and we hoped, by forwarding modest schemes of reform to the Throne, to initiate a form of government more consistent with modern requirements. The prime essence of the movement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orm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o supplement the old-fashioned, corrupt, and worn-out system under which China is groaning.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可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3_6]。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3_7]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

It is unnecessary to enter into details as to what form of rule obtains in China at present. It may be summed up, however, in a few words. The people have no say whatever in the management of Imperial, National, or even Municipal affairs. The mandarins, or local magistrates, have full power of adjudication, from which there is no appeal. Their word is law, and they have full scope to practise their machinations with complete irresponsibility, and every officer may fatten himself with impunity. Extortion by officials is an institution; it is the condition on which they take office; and it is only when the bleeder is a bungler that the government steps in with pretended benevolence to ameliorate but more often to complete the depletion. English readers are probably unaware of the smallness of the established salaries of provincial magnates. They will scarcely credit that the Viceroy of, say, Canton, ruling a country with a population larger than that of Great Britain, is

allowed as his legal salary the paltry sum of £60 a year; so that, in order to live and maintain himself in office, accumulating fabulous riches the while, he resorts to extortion and the selling of justice. So-called education and the results of examinations are the one means of obtaining official notice. Granted that a young scholar gains distinction, he proceeds to seek public employment, and, by bribing the Peking authorities, an official post is hoped for. Once obtained, as he cannot live on his salary, perhaps he even pays so much annually for his post, licence to squeeze is the result, and the man must be stupid indeed who cannot, when backed up by government, make himself rich enough to buy a still higher post in a few years. With advancement comes increased licence and additional facility for self-enrichment, so that the cleverest "squeezer" ultimately can obtain money enough to purchase the highest positions. This official thief, with his mind warped by his mode of life, is the ultimate authority in all matters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criminal life. It is a feudal system, an imperium in imperio, an unjust autocracy, which thrives by its own rottenness. But this system of fattening on the public vitals—the selling of power—is the chief means by which the Manchu dynasty [2_1] continues to exist. With this legalised corruption stamped as the highest ideal of government, who can wonder at the existence of a strong undercurrent of dissatisfaction among the people? The masses of China, although kept officially in ignorance of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world around them, are anything but a stupid people. All European authorities on this matter state that the latent intellectual ability of the Chinese is considerable; and many place it even above that of the masses in any other country, European or Asiatic. Books on politics are not allowed; daily newspapers are prohibited in China; the world around, its people and politics, are shut out; while no one below the grade of a mandarin of the seventh rank is allowed to read Chinese geography, far less foreign.

The laws of the present dynasty are not for public reading; they are known only to the highest officials. The reading of books on military subjects is, in common with that of other prohibited matter, not only forbidden, but is even punishable by death.No one is allowed, on pain of death, to invent anything new, or to make known any new discovery. In this way are the people kept in darkness, while the government doles out to them what scraps of information it finds will suit its own ends. The so-called “literati” of China are allowed to study only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commentaries thereon.These consist of the writings of ancient philosophers, the works of Confucius and others. But of even these, all parts relating to the criticism of their superiors are carefully expunged, and only those parts are published for public reading which teach obedience to authorities as the essence of all instruction. In this way is China ruled— or rather misruled— namely, by the enforcement of blind obedience to all existing laws and formalities. To keep the masses in ignorance is the constant endeavour of Chinese rule. In this way it happened, that during the last Japanese incursion, absolutely nothing was known of the war by the masses of China, in parts other than those where the campaign was actually waged. Not only did the people a short way inland never hear of the war, but the masses had never even heard of a people called Japanese; and even where the whisper had been echoed, it was discussed as being a “rebellion” of the “foreign man.”

至中国现行之政治，可以数语赅括[3_8]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3_9]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间有一二被政府惩治或斥革者，皆其不善自谋者也。然经一番之惩治或斥革，而其弊害乃逾

甚。至官场俸额之微，殆非英人所能梦见。彼两广总督所治区域，人口之众过于全英，然其一岁之俸禄，合诸英金不过六十镑而已。是则一行作吏，安得而不以婪索及枉法为事乎？就教育而言，士惟以科第为荣，姓名一登榜上，即有入官之望；于是纳贿当道，出而任事。彼既不能以官俸自养，而每年之贡献于上官者又至多，虽欲不贪安可得乎？况有政府以为其贪黩之后盾，自非痴骇，更安肯以清廉自矢？且囊橐 [3_10] 既盈，则不数年又可斥其一分之资以谋高位，为计之便，无过于此。顾兹民贼，即后日最高级之上官，而一切社会、政治、刑律事件之所由取决者也。夫满政府既借苞苴 [3_11] 科敛 [3_12] 、卖官鬻爵以自存，则正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潜滋而暗长乎！至其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尤有可骇者。凡政治之书，多不得流览；报纸之行，尤悬为厉禁。是以除本国外，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国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与闻。谈兵之书，不特为禁品之一，有研究者甚或不免于一死。至于新器之创造、新学之发明，人民以惕 [3_13] 于死刑，罕敢从事。是故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即政府有时微透一二消息，然其所透者，皆其足以自利者也。虽然，华人之被桎梏纵极酷烈，而其天生之性灵，深沉之智力，终不可磨灭。凡欧人之稔知华事者多如此评论，且谓其往往有超出欧人之处也。不幸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学者如此，平民可知。此所以中国之政治无论仁暴美恶，而国民对于现行之法律典章，惟有兢兢遵守而已。近者日本命将遣师，侵入吾土，除宅居战地之人民外，罕有知中日开衅之举者。彼内地之民，或并不知世界有日本国，即使微有风传，获闻一二，亦必曰是外夷之犯顺，而断不信其为敌国之相侵也。

With this incubus hanging over her, China has no chance of reform except it come from the Throne; and it was to induce the Throne to modify this pernicious state of things that the “Young

China” party was formed. Hoping that the Peking authorities, by their more extended contact during recent years with foreign diplomatists, might have learned something of constitutional rule, and might be willing to aid the people in throwing off their deplorable ignorance, I ventured, with others, to approach them, beseeching them, in all humility, to move in this direction for the welfare of China. These petitions only resulted in the infliction of many rigorous punishments. We had seized the moment when the Japanese were threatening Peking, and the Emperor, fearing that harsh dealings with the reformers might alienate many of his people, took no notice of them until peace was assured. Then an edict was issued denouncing the petitioners and commanding the immediate cessation of all suggestions of reform.

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极，以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此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也。且近年以来，北京当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触接较近，其于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利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寝阁 [3_14] 不报。顾中日战事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之人加以谴责，且谓此等陈请变法之条陈，以后概不得擅上云云。

Finding the door closed to mild means, we grew more concrete in our notions and demands, and gradually came to see that some degree of coercion would be necessary. In all quarters we found supporters. The better classes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behaviour of our armies and fleets, and knew that corruption in its worst forms was the cause of their failure. This feeling was not confined

to one locality, but was widespread and deep-rooted, and promised to take shape and find expression in decided action.

吾党于是怃然 [3_15] 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而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军界，盖海陆军人腐败贪黩，养成积习，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矣。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 [3_16] ，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was really in Shanghai, but the scene of action was to be laid in Canton. The party was aided in its course by one or two circumstances. First among these was the existence of discontented soldiery. Three-fourths of the Cantonese contingent were disbanded when the war in the North had ceased in 1895. This set loose a number of idle, lawless men; and the small section of their comrades who were retained in service were no better pleased than those dismissed. Either disband all or retain all, was their cry; but the authorities were deaf to the remonstrance. The reform party at once enlisted the sympathies of these men in their cause, and so gained numerical strength to their military resources.

兴中会之总部，设于上海。而会员用武之地，则定于广州。当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北方战事既息之后，广州军队之被政府遣散者约居四分之三，此等军队多散而为流民、为盗贼。即其未解散者亦多愤懑不平，群谓欲解散则全体解散，欲留用则全体留用；然当事者充耳若弗闻也。吾党于是急起而运动之，冀收为己用。各军士皆欣然从命，愿效死力。由是而吾党之武力略具矣。

Another chance coincidence hastened events. For some reason or other a body of police, discarding their uniform, set to work to loot and plunder a section of the city. After an hour or two, the inhabitants rose, and obtaining mastery of the quondam police, shut some half-dozen of the ringleaders up in their Guildhall.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official police then sent out a force to release the marauders, and proceeded forthwith to plunder the Guildhall itself. A meeting of the inhabitants was immediately held, and a deputation of 1000 men sent to the Governor's residence to appeal against the action of the police. The authorities, however, told the deputation that such a proceeding was tantamount to a rebellion, and that they had no right to threaten their superiors. They thereupon arrested the ringleaders of the deputation, and sent the others about their business. The discontents soon became disaffected, and, the "Young China" party making advances, they readily joined the reformers.

时适巡防肇事，弃其军服，四出劫掠。百姓愤甚，因起而合捕之，囚其为首者若干人于会馆。讵 [3_17] 知巡防局员率众而出，扑攻会馆，既将被囚诸人一律释放，并将馆中所有劫掠一空。于是居民特开会议，议决以代表一千人赴诉于巡抚衙门。当事者斥为犯上作乱，下领袖代表于狱，余人悉被驱散。于是民怨日深，而投身入兴中会者益众。

Yet a third and a fourth incident helped to swell their ranks. The Viceroy, Li Han Chang (brother of the famous Viceroy Li), put a fixed tariff on all official posts throughout . his two provinces, Kwang-Tung and Kwang-Si. This was an innovation which meant a further "squeeze" of the people, as the officials, of course, made the people pay to indemnify them for their extra payments. The fourth,

and the most characteristically Chinese, method of extortion was afforded in the occasion of the Viceroy's birthday. The officials in his provinces combined to give their master a present, and collected money to the amount of a million taels (about £200,000). Of course the officials took the money from the richer merchants in the usual way, by threats, by promises, and by blackmailing. A follower of Li Han Chang, Che Fa Nung by name, further angered all the "Literati" by selling, to all who could afford to pay, diplomas of graduation for 3000 taels (about £500) each. The richer men and the "Literati" became thereby disaffected and threw in their lot with "Young China."

时为两广总督者曰李瀚章，即李鸿章之弟［兄］也，在粤桂两省之内创行一种新例：凡官场之在任或新补缺者，均须纳定费若干于督署。是又一间接剥民之法也。官吏既多此额外之费，势不得不取偿于百姓。且中国官界，每逢生日，其所属必集资以献。时两广官场以值李督生日，醵金 [3_18] 至一百万两以充贺礼；此一百万两者，无非以诱吓兼施、笑啼并作之法，取资于部民之较富者。而同时督署中，又有出卖科第、私通关节之事，每名定费三千两。以是而富者怨，学者亦怨。凡兹所述，皆足以增兴中会之势力，而促吾党之起事者也。

In this way the reform movement acquired great strength and coherence and wide-spread influence, and brought matters all too soon to a climax. The plan was to capture the city of Canton and depose the authorities, taking them by surprise and securing them in as quiet a way as possible, or, at any rate, without bloodshed. To ensure a complete coup, it was considered necessary to bring an overwhelming force to bear; consequently, two bodies of men were employed, one in Swatow and the other from the banks of the West river. These places were fixed upon as the Swatow men, for

instance, were totally ignorant of the Cantonese language. Although only 180 miles north of Canton, the language of Swatow differs as much from that of Canton as English does from Italian. It was deemed wise to bring strangers in, as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be staunch to the cause, since they could not communicate with, and therefore could not be tampered with by, Cantonese men. Nor would it be safe for them to disband or desert, as they would be known as strangers, and suspicion would at once fall on them were they found in Canton after the disturbance.

于是而兴中会起事之计划定矣。定计于广州突举义旗，据省城而有之，尽逐诸官吏；举事之际，不特须极秘密，使仓卒 [3_19] 不及备，且须力主沉静，不以杀戮为能。因于汕头及西江沿岸募集两军，同时向广州进逼。盖以汕头及沿江之人与广州有主客之分，汕头在广州之北，虽相距仅一百八十英里，而语言之殊异，不啻英国之于意大利。所以用客军进取者，因其与土人不相习，无牵率之虑，可一意以争胜利；万一客军中途变计，相率溃散，则事后踪迹易显，断不能存身于广州。凡此皆所以逼其进取，而为韬略上不得已之作用也。

It was arranged that on a certain day in October, 1895, these men should march across country, one body from the south-west, the other from the north-east, towards Canton. All proceeded satisfactorily, and they commenced their advance. Frequent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of Reformers were held, and arms, ammunition and dynamite were accumulated at the headquarters. The soldiers advancing across the country were to be still further strengthened by a contingent of four hundred men from Hong Kong. The day for the assemblage came and the southern men were halted within four hours' march of the city. A guard of one hundred men, fully armed, was stationed around the Committee in their Guild;

runners, some thirty in number, were despatched to the disaffected over the city to be ready for the following morning. Whilst the conspirators sat within their hall a telegram was received to the effect that the advancing soldiers had been stayed in their progress,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forthwith became disconcerted. It was impossible to recall the messengers, and others could not be found who knew where the disaffected were resident. Further news came to hand rendering it impossible to proceed, and the cry arose "Sauve qui peut." A general stampede followed; papers were burnt, arms hidden, and telegrams despatched to Hong Kong to stop the contingent from that place. The telegram to the Hong Kong agent, however, only reached him after all his men had been got on board a steamer, which also carried many barrels of revolvers. Instead of dismissing the men as he should have done, he allowed them to proceed, and they landed on the wharf of Canton only to find themselves placed under arrest. The leaders in Canton fled, some one way, some another; I myself, after several hairbreadth escapes, getting on board a steam launch in which I sailed to Macao. Remaining there for twenty-four hours only, I proceeded to Hong Kong, where, after calling on some friends, I sought my old teacher and friend, Mr.James Cantlie. Having informed him that I was in trouble through having offended the Cantonese authorities, and fearing that I should be arrested and sent to Canton for execution, he advised me to consult a lawyer, which I immediately proceeded to do.

是两军者，期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十月某日，一由西南，一由东北，同时向广州进发。吾党筹备进行甚形惬意。兴中会会员且时时集议，所需军械药弹以及炸药之属，随时屯积于大本营者甚富。除汕头及西江两军外，又有四百人自香港驰至。迨会兵之期已届，各军与省城之距离，军行约四小时可达；又有卫队百名，身藏利器，巡行

于兴中会之四周；复有急使三十人，奉会员命分赴各邑，令党人于翌晨同时起事。讵意会员部署略定，忽有密电驰至，谓西南、东北两军中途被阻。两军既不得进，则应援之势已孤，即起事之谋已败。然急使既遣，万难召回。一面又连接警报，谓两军万难进行，幸彼此各自为谋，未尽覆没。于是党员急起而消灭种种形迹，毁文籍，藏军械，且连电香港，令缓师。然香港党员接电之时，已在港军尽发之后。港军乘轮舟赴粤，并挈有大宗枪械，分储若干箱。党员接电后，非特不将港军暂行遣散，且追踪至粤。于是该党员及其部众尽投于罗网矣。至广州诸党魁，亦纷纷四散。予于奔避之际，遇险者数，后幸得达一小汽船，乘之以走澳门。在澳门留二十四小时，即赴香港，略访故人，并投康德黎①君之门而求见焉。康德黎者，以一身而兼为予之师友也。康德黎君闻予出奔之故，即令予求见香港某律师，与商此后之行止。

[2_1].Manchu dynasty: 清朝（Qing dynasty）。

[3_1].据冯自由《孙总理修正伦敦被难记＞　第一章恭注》载：一九○一年春孙中山在横滨时，冯自由谈到《伦敦被难记》（英文本）第一章，认为所述曾在澳门投身主张君主立宪的少年中国党、纠合全体党员联名向清廷上书请愿立宪、在上海设总部等与事实不符，请问其故，孙中山答称　　：“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世有约翰牛（John Bull）之称，其宪法号称不流血的和平宪法，若与之谈急激之革命手段，彼国人必不乐闻，故不得不从权以此立言。且香港为其殖民地，时有禁压党人行动以交欢清政府情事；吾党每次向粤进攻之出发点始终不能离开香港，故亦不能坦白陈述，以妨碍进行。容日后至相当时期，方可据实修正。”（《革命逸史》第三集，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五年版）（转引自《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9 页注释）

[3_2].藐兹一身：指一个人的身躯和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藐，微小。

[3_3].政柄：政权。

[3_4].齕：咬。

[3_5].饬：命令。

[3_6].据英文本，原文作“Young　China”party，意为“少年中国”党。但译者在这里将少年中国党与兴中会等同起来，又在下文多次直译为兴中会是不妥当的。（转引自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0 页注释）

[3_7].俾：使（达到某种效果）。

[3_8].赅括：概括。

[3_9].婪索：凭借权势等向人索取财物。

[3_10].囊橐：口袋、袋子，借指粮仓、粮库。

[3_11].苞苴：包装鱼肉等用的草袋。泛指馈赠的礼物，又指贿赂。

[3_12].科敛：凑集或搜刮钱财。

[3_13].惕：戒惧。

[3_14].寝阁：搁置。

[3_15].怃然：形容失望的样子。

[3_16].自矢：对自己发誓。

[3_17].讵：岂，表示反问。

[3_18].醵金：凑钱；集资。

[3_19].仓卒：现在一般写作“仓猝”。

CHAPTER II MY CAPTURE

第二章 被诱

I did not see Mr. Cantlie again, as Mr. Dennis, who directed my steps, constrained me to get away at once. In two days' time I went by Japanese steamer to Kobe, whence, after a few days' stay, I proceeded to Yokohama. There I changed my Chinese attire for a European costume à la Japanese. I removed my queue, allowed my hair to grow naturally and cultivated my moustache. In a few days I sailed from Yokohama for the Hawaiian Islands and there took up my quarters in the town of Honolulu, where I had many relations, friends and well-wishers. Wherever I went, whether in Japan, Honolulu, or America, I found all intelligent Chinese imbued with the spirit of reform and eager to obtain a form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for their native land.

予所就教者为达尼思律师。达尼思询悉颠末 [4_1] ，即令予走避他方，毋以逗遛 [4_2] 致祸。时予至香港已二日矣，闻律师言，不及与康德黎君握别，即匆匆乘日本汽船赴神户。居神户数日，又至横滨。在横滨购日本人所制之欧服，尽易旧装，留须割辫。一二日后，由横滨乘轮赴哈威夷 [4_3] 群岛，就寓于火纳鲁鲁 [4_4] 。火纳鲁鲁为予亲故及同志所在，相处甚欢。予生平每经一地，如日本，如火纳鲁鲁，如美利坚，与华侨相晋接，觉其中之聪明而有识者，殆无一不抱有维新之志愿，深望母国能革除专制，而创行代议政体也。

Whilst walking in the streets of Honolulu I met Mr. and Mrs. Cantlie and family, who were then on their way to England. They

did not at first recognise me in my European dress, and their Japanese nurse at once addressed me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taking me for a countryman. This happened frequently, Japanese everywhere at first taking me for one of themselves and only finding their mistake when they spoke to me.

予在火纳鲁鲁时，偶于道上与康德黎君及其家属相邂逅；康盖率眷回英国，而道出火纳鲁鲁也。渠等见予不复相识，而其同行之日本乳媪 [4_5] ，方以予为日本人而改易欧装者，遂以日本语与予相问答。此为予易服后数遇不鲜之事，盖日本人多以予为同乡，待启口而后始悟其非是也。

I left Honolulu in June, 1896, for San Francisco, where I remained for a month before proceeding eastward. There I met many of my countrymen and was well received by them. I spent three months in America, and came to Liverpool by the s.s. Majestic. In New York I was advised to beware the Chinese Minister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he is a Manchurian [3_1] , and has but little sympathy with Chinese generally and a reformer in particular.

予于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六月，由火纳鲁鲁赴旧金山，旧金山之华人均与予一见如故，所以相遇者甚厚。阅一月，游历至美利坚。在美三月，乘轮船“麦竭斯的”号东行至英国之利物浦。方予在纽约时，友人多来相告，谓中国驻美公使为满洲人，其与汉人本无感情，而恶新党尤甚，故令予兢兢致慎云。

On October 1st, 1896, I arrived in London and put up at Haxell’s Hotel in the Strand. I went next day to Mr. Cantlie’s, at 46

Devonshire Street, Portland Place, W., where I received a hearty welcome from my old friend and his wife. Lodgings were found for me at 8 Gray's Inn Place, Gray's Inn, Holborn. Henceforward I proceeded to settle down to enjoy my stay in London and to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he many sights, the museums and the historical relics in this very centre of the universe. What impressed me, a Chinaman [3_2] , most was the enormous vehicular traffic, the endless and unceasing stream of omnibusses, cabs, carriages, wagons, and wheeled conveyances of humbler character which held the streets; the wonderful way in which the police controlled and directed the traffic, and the good humour of the people. The foot passengers are, of course, many, but they are not in such crowds as we find in Chinese streets. For one thing, our streets are much narrower, being, in fact, mere alleys;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all our goods are conveyed by human carriage, everything being slung from a bamboo pole carried across the shoulders. Yet even in the wide streets of Hong Kong our foot passenger traffic is in swarms.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一日，予始抵伦敦，投止于斯屈朗（伦敦路名）之赫胥旅馆。翌日，往访康德黎君。康德黎君夫妇相待极殷挚。康所居在波德兰（伦敦区名）覃文省街之四十六号，因为予觅相近之舍馆曰葛兰旅店，使徙止焉。予自是即小住伦敦，或游博物院，或访各处之遗迹。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来往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凡此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

I was just beginning to know Holborn from the Strand, and Oxford Circus from Piccadilly Circus, when I was deprived of my liberty in the fashion so fully described by the public press of the country. I had been frequently at Mr. Cantlie's, almost daily in fact, and spent most of my time in his study. One day at luncheon he

alluded to the Chinese Legation being in the neighbourhood, and jokingly suggested that I might go round and call there; whereat his wife remarked, “You had better not. Don’t you go near it; they’ll catch you and ship you off to China.” We all enjoyed a good laugh over the remark, little knowing how true the womanly instinct was, and how soon we were to experience the reality. While dining one evening at Dr. Manson’s, whom I had also known in Hong Kong, as my teacher in medicine, I was jokingly advised by him also to keep away from the Chinese Legation. I was well warned, therefore; but as I did not know where the Legation was, the warning was of little use. I knew that to get to Devonshire Street I had to get off the omnibus at Oxford Circus, and from thence go straight north up a wide street till I found the name Devonshire on the corner house. That was the extent of my knowledge of the locality at this time.

予无日不造访康德黎君。每至，辄入其书室，藉资消遣。一日，予于其家进中膳时，康德黎君戏谓中国使馆与伊家为邻，盍 [4_6] 过访之。因相视而笑。康德黎夫人戒曰：“子毋然，彼公使馆中人睹子之面，行当出而相捕，械送回国耳！”予闻夫人言，益相与大笑。初不料夫人之谈言微中 [4_7] ，不久即见诸实事也。一夕，予饭于孟生医学博士家。孟生君亦予香港旧识，曾授予医学者。君亦笑谓予曰：“慎勿行近中国使馆，至堕虎口。”予以是于中国使馆之可畏，及其相距之不远，历经良友之告诫，非全措意者；然予至伦敦为日犹浅，途径未熟，彼良友之告诫于予初无所济也。

On Sunday morning, October 11th, at almost half-past ten, I was walking towards Devonshire Street, hoping to be in time to go to church with the doctor and his family, when a Chinaman approached in a surreptitious manner from behind and asked, in English, whether I was Japanese or Chinese. I replied, “I am

Chinese." He then inquired from what province I came, and when I told him I was from Canton he said, "We are countrymen, and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I am from Canton." It should be observed that English or "Pidgin," that is "business" English, is the common language between Chinamen from different localities. A Swatow and a Cantonese merchant, although their towns are but 180 miles apart (less than the distance between London and Liverpool), may be entirely ignorant of each other's spoken language. The written language is the same all over China, but the written and spoken languages are totally different, and the spoken languages are many. A Swatow merchant, therefore, do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with a Cantonese man, speaks English, but writes in the common language of China. While upon this subject it may be well to state that the Japanese written language is the same in its characters as that used by the Chinese; so that a Chinaman and a Japanese when they meet, although having no spoken words in common, can figure to each other on the ground or on paper, and frequently make imaginary figures on one hand with the forefinger of the other to their mutual understanding.

是年十月十一日，适值星期，予于上午十点半钟时，自葛兰旅店（葛兰旅店在伦敦霍尔庞之葛兰旅店街；霍尔庞，区名）赴覃文省街，欲随同康德黎君等赴礼拜堂祈祷。正踯躅间，一华人自予后潜步而至，操英语问予曰："君为日本人欤？抑中国人欤？"予答曰："予中国人也。"其人叩予以何省，予答以广东。其人仍操英语曰："然则我与君为同乡，我亦来自广州者也。"夫中国盛行不规则之英语，名曰"Pidgin"英语，意即商业英语也。华人虽同隶一国，而言语多相扞格[4_8]，譬如汕头之与广州相距仅一百八十英里，视伦敦之与利物浦犹相近，然其商人之言语，乃彼此不相通，以是不得不藉商业英语通其邮，彼汕头人与广州人之商于香港者多以英语相晋接，此足以见中国言语之歧杂矣。虽文字之功用及于全国，初无二致，然中文之与日

本文固亦大致相似者也。中日两国人相遇之时，即或言语不通，而彼此尽可画地为书或操纸笔以谈也。

My would-be Chinese friend, therefore, addressed me in English until he found my dialect. We then conversed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Whilst he was talking we were slowly advancing along the street, and presently a second Chinaman joined us, so that I had now one on each side. They pressed me to go in to their “lodgings” and enjoy a smoke and chat with them. I gently demurred, and we stopped on the pavement. A third Chinaman now appeared and my first acquaintance left us. The two who remained further pressed me to accompany them, and I was gradually, and in a seemingly friendly manner, led to the upper edge of the pavement, when the door of an adjacent house suddenly opened and I was half-jokingly and half-persistently compelled to enter by my companions, one on either side, who reinforced their entreaties by a quasi-friendly push. Suspecting nothing, for I knew not what house I was entering, I only hesitated because of my desire to get to Mr. Cantlie’s in time for church, and I felt I should be too late did I delay. However, in good faith I entered, and was not a little surprised when the front door was somewhat hurriedly closed and barred behind me. All at once it flashed upon me that the house must be the Chinese Legation, thereby accounting for the number of Chinamen in mandarin attire, and for the large size of the house; while I also recollected that the Minister resided somewhere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Devonshire Street, near to which I must then be.

予途遇之华人既稔予为粤人，始以粤语与予相酬答，且语且行，步履颇舒缓。俄而又有一华人来，与予辈交谈。于是予之左右，如有一人并行矣。是二人者，坚请予过其所居，谓当进雪茄，烹杯茗，略

叙乡谊。予婉却之，遂相与伫立于道旁阶砌。未几，又有一华人至，其最先与予相遇者即迤逦 [4_9] 而去。于是与予相共之二人，或推予，或挽予，必欲屈予过从，其意气若甚殷勤者。予是时已及于阶砌傍屋之侧，正趦趄 [4_10] 间，忽闻邻近之屋门砉然 [4_11] 而辟，予左右二人挟予而入，其形容笑貌又似谐谑，又似周旋，一纷扰间，而予已入，门已闭，键已下矣！然予未知此屋为谁之所居，故方寸间并无所疑惧。予之所以犹豫不即入者，以急欲往访康德黎君博士，冀同往礼拜堂，稍一迟回，不免过晏耳。迨予既入门，睹其急遽之状，且屋宇如彼其宽广，公服之华人如彼其众多，因陡然动念曰："是得非中国使馆乎？"又忆中国使馆在覃文省街之邻，意者予向时踯躅之所，即中国使馆左右之道途乎？

I was taken to a room on the ground floor whilst one or two men talked to me and to each other. I was then sent upstairs, two men, one on either side, conducting and partly forcing me to ascend. I was next shown into a room on the second floor and told I was to remain there. This room, however, did not seem to satisfy my captors, as I was shortly afterwards taken to another on the third floor with a barred window looking out to the back of the house. Here an old gentleman with white hair and beard came into the room in rather a bumptious fashion and said: "Here is China for you; you are now in China."

予入门后，被引至一室。室中有一二人与予接谈数语，又自相磋商数语，遂遣二人挟予登楼。既登楼，复入一室，令予坐候。未几而二人又至，更挟予登一楼，是为第二层楼。仍入一室中，其室有窗，护以铁栅，窗外即使馆之屋后也。未几，有一须发俱白之老人，施施然饶有官气，一入室即谓予曰："汝到此即到中国，此间即中国也。"

Sitting down, he proceeded to interrogate me. Asked what my name was, I replied “Sun.”

言已就坐，叩予之姓，予答曰：“孙。”

“Your name,” he replied, “is Sun Wen; and we have a telegram from the Chinese Minister in America informing us that you were a passenger to this country by the s.s. Majestic; and the Minister asks me to arrest you.”

其人曰：“汝姓孙名文，予得驻美使臣来电，谓汝乘轮船‘麦竭斯的号’游历至英，因令我捕汝于此。”

“What does that mean?” I enquired.

予问曰：“捕予何意？”

To which he replied: “You have previously sent in a petition for reform to the Tsung-Li-Yamen in Peking asking that it be presented to the Emperor. That may be considered a very good petition; but now the Tsung-Li-Yamen want you, and therefore you are detained here until we learn what the Emperor wishes us to do with you.”

其人曰：“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惟今者总理衙门急欲得汝，因令余暂相羁留，以待朝廷之命。”

“Can I let my friend know I am here?” I asked.

予曰：“予被留于此，可使吾友知之乎？”

“No,” he replied; “but you can write to your lodging for your luggage to be sent you.”

曰：“否，是不能！惟旅馆中之行李，汝可驰一函，俾此间人为汝取之。”

On my expressing a wish to write to Dr. Manson, he provided me with pen, ink and paper. I wrote to Dr. Manson informing him that I was confined in the Chinese Legation, and asking him to tell Mr. Cantlie to get my baggage sent to me. The old gentleman, however,—whom I afterwards learned to be Sir Halliday Macartney,—objected to my using the word “confined,” and asked me to substitute another. Accordingly I wrote: “I am in the Chinese Legation; please tell Mr. Cantlie to send my luggage here.”

予告以欲致书于孟生博士 [4_12] 。其人乃命人给予纸笔。予书中大意，谓此身被禁于中国使馆，请转告康德黎君，俾取予行李畀 [4_13] 予云云。其人阅竟，甚不以函中“被禁”字为然，因嘱予别缮 [4_14] 一函。予乃缮曰：“顷予在中国使馆，乞告康德黎君，为予送行李至此。”云云。是老人者，予初不稔为何许人，厥后而始知其即盛名鼎鼎之马凯尼 [4_15] 也。

He then said he did not want me to write to my friend, and asked me to write to my hotel. I informed him that was not at a hotel, and that only Mr. Cantlie knew where I was living. It was very evident my interrogator was playing a crafty game to get hold of my effects, and more especially my papers, in the hope of finding correspondence whereby to ascertain who my Chinese accomplices or correspondents were. I handed him the letter to Dr. Manson, which he read and returned, saying, “That is all right.” I put it in an envelope and gave it to Sir Halliday Macartney in all good faith that it would be delivered.

马凯尼君忽又谓予可径函告旅馆，不必托友代取。予答以予所寓者并非旅馆，除康德黎君外无知予居处者。因以改缮之函授之。马凯尼唯唯，许为代寄。马凯尼之所以忽然转念者，盖欲是以搜予行箧，或能得吾党之姓名及往来之函牍耳。计亦狡矣！

[3_1].Manchurian: 满洲人；Manchuria，满洲，旧指中国东北一带。

[3_2].Chinaman: 旧时对中国人的贬称。本书中泛指“中国人”。

[4_1].颠末：自始至终的经过情形。

[4_2].逗遛：现在规范词形写作“逗留”。

[4_3].哈威夷：夏威夷。（转引自《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4 页注释）

[4_4].火纳鲁鲁：火奴鲁鲁。（转引自《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4 页注释）

[4_5].乳媪：乳母。

[4_6].盍：何不。

[4_7].谈言微中：形容说话委婉曲折而切中事理。

[4_8].扞格：抵触。

[4_9].迤逦：形容缓慢行进的样子。

[4_10].趦趄：同“趑趄”，想前进又不敢前进。

[4_11].砉然：形容迅速动作的声音。

[4_12].孟生博士：孙中山在西医书院习医时的教务长。

[4_13].畀：给予。

[4_14].缮：抄写。

[4_15].马凯尼：清驻英公使馆二等参赞，在当时使馆文书中译作“马格里”。

CHAPTER III MY IMPRISONMENT

第三章 被禁时之情形

Sir Halliday then left the room, shut the door and locked it, and I was a prisoner under lock and key. Shortly afterwards I was disturbed by the sound of carpentry at the door of my room, and found that an additional lock was being fixed thereto. Outside the door was stationed a guard of never less than two people, one of whom was a European; sometimes a third guard was added. During the first twenty-four hours the Chinese guards at the door frequently came in and spoke to me in their own dialect, which I understood fairly well. They did not give me any information as to my imprisonment—nor did I ask them any questions—further than that the old gentleman who had locked me up was Sir Halliday Macartney, the Ma-Ta- Yen, as they called him: Ma standing for "Macartney," Ta-Yen being the equivalent for "His Excellency." This is in the same category with the name under which the Chinese Minister passes here, Kung-Ta-Yen. Kung is his family name or surname; Ta-Yen indicates his title, meaning "His Excellency." He never gives his real name in public matters, thereby compelling every foreigner to unconsciously style him "His Excellency." I often wonder if he deals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under this cognomen solely; if he does, it is a disparagement and slight that is meant. Court and diplomatic etiquette in China is so nice, that the mere inflection of a syllable is quite enough to change the meaning of any communication to the foreigner from a compliment to a slight. This is constantly striven after in all dealings with foreigners, and it requires a very good knowled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deed, to know that any message delivered to a foreigner

does not leave the Chinese diplomatist hugging himself with delight at having insulted a foreigner of high rank, without his knowing it. To the people around him he thereby shows his own preeminence, and how the “foreign devils”—the Yang Quei Tze—are his inferiors.

马凯尼君既出，即阖予所居室之门，并下键焉。自是予遂遭幽禁矣。未几，闻门外有匠人施斧凿之声，则于原键外更增一键也。且特遣监守二人，一中一西，严视门外；有时或于二监者之外更添一人。当最初之二十四小时内，其中国监守二人，时或入予室，与予相语。其于予被禁之缘由虽无一语宣泄，予亦不之问，然曾告予以顷者相见之老人即马大爷，予审为马凯尼也。大爷者，官场通俗之尊称，犹当时驻英公使龚某 [5_1] 之称龚大人也。使臣与外人酬酢 [5_2] ，不用真名，遂使外国人人称之曰大人。特不知与英政府公牍往还，亦称龚大人否耳。中国官场及外交礼节，往往有以一字之微而易等［尊］重为侮慢者，西人欲稔知之，非于文学风俗殚心研究不可。彼外交官辄喜于晋接之间，以言语文字愚弄外国人，偶或占胜，即诩诩自得曰：“洋鬼子被屈于我矣！”

Several hours after my imprisonment, one of the guard came into my room and told me that Sir Halliday Macartney had ordered him to search me. He proceeded to take my keys, pencil and knife. He did not find my pocket in which I had a few bank notes; but he took the few unimportant papers I had. They asked me what food I wanted, and at my request brought me some milk which I drank.

予被禁后数小时，有监守者一人入。谓奉马凯尼君之命，搜检予身，因探取予钥匙、铅笔、小刀等物。然予另有一衣袋，藏有钞票数纸，彼不及检取，彼所挈以去者惟无关重要之文件数纸而已。监守者询予以饮食，予仅令取牛乳少许而已。

During the day two English servants came to light the fire, bring coals and sweep the room. I asked the first who came to take a letter out for me, and being promised that this would be done, I wrote a note addressed to Mr. Cantlie, 46 Devonshire Street, W. When the second servant came I did the same thing. I did not, of course, know till later what had happened to my letters, but both men said they had sent them. That (Sunday) evening an English woman came in to make up my bed. I did not address her at all. All that night I had no sleep, and lay with my clothes on.

是日，有英国仆役二人入室燃火炉，除洒扫外，并置煤于室，以供燃火之用。予令先至之英仆为予寓书于覃文省街四十六号康德黎家，仆唯唯。迨后至之英仆来，予亦托之如前。此二仆者，厥后 [5_3] 并称已将予信递寄，然所言殊未足信也。是晚，有一英国妇人入，为予设卧具。予并未与彼妇接谈。及夜，和衣而卧，然实彻旦未眠也。

On the following day—Monday, 12th October—the two English servants came again to attend to the room, and brought coals, water and food. One said he had sent the note with which I had entrusted him, while the other, Cole, said he could not get out to do so. I suspected, however, that my notes had never reached their destination.

翌晨，即礼拜一日，为十月十二号，二英仆又来予室，畀予以煤料、清水及食物。其一人曰：“君书已代递矣。”其一人名柯尔者则曰：“予不能出公使馆，故尚未能为君寄书也。”

On Tuesday, the 13th, I again asked the younger manservant—not Cole—if he had delivered my letter and had seen Mr. Cantlie. He said he had; but as I still doubted him, he swore he had seen Mr. Cantlie, who on receiving the note said, “All right!” Having no more paper, I wrote with pencil on the corner of my handkerchief, and asked him to take it to my friend. At the same time I put a half-sovereign in his hand, and hoped for the best. I was dubious about his good faith, and I found that my suspicions were but too well-founded; for I ascertained subsequently he went immediately to his employers and disclosed all.

礼拜二日（即十月十三号），予又以寄书事询英仆。此仆为二人中之年齿较少者，非柯尔也。其答称确已代递，且已面晤康德黎君，康德黎君读竟后即遣去之曰：“是耳。”仆言之凿凿，且以天日自矢。予是时已无复余纸，遂裂所用手巾，急书数语，乞其再付康德黎君；并劳以小金钱一枚， 诿 [5_4] 至再，期勿相误。仆虽诺诺承命，而讵知其一出予室，即驰报于使馆中人，尽情吐露无遗也。

On the fourth day of my imprisonment Mr. Tang, as he is called, came to see me, and I recognised in him the man who had kidnapped me. He sat down and proceeded to converse with me. “When I last saw you,” he began, “and took you in here, I did so as part of my official duty: I now come to talk with you as a friend. You had better confess that you are Sun Wen; it is no use denying it: everything is settled.” In a vein of sarcastic-pseudo flattery he continued: “You are well known in China: the Emperor and the Tsung-Li- Yamen are well acquainted with your history; it is surely worth your while dying with so distinguished a name as you have made for yourself upon you.” (This is a species of Oriental flattery scarcely perhaps to be appreciated by Western minds; but it is

considered everything in China, how and under what name and reputation you die.) “Your being here,” he proceeded, “means life or death. Do you know that?”

予被禁之第四日，有所谓唐[5_5]先生者来视予，是即诱予入使馆之人也。唐先生就坐，与予纵谈曰：“尔日与君相见，即挈君至此，乃公事公办，义不容辞。今日之来，则所以尽一己之私情。君不如直认为孙文，讳亦无益，盖所事均已定夺也。君在中国卓有声望，皇上及总理衙门均稔知汝为人，君姓名已震铄寰球，即死亦可以无憾。君在此间，实生死所关，君知之乎？”

“How?” I asked. “This is England, not China. What do you propose to do with me? If you wish extradition, you must let my imprisonment be known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I do not think the Government of this country will give me up.”

予曰：“何也？此为英国，非中国，公等将何以处吾？按诸国际交犯之例，公等必先将予被逮事闻于英政府，予意英政府未必肯遽从所请也。”

“We are not going to ask legal extradition for you,” he replied. “Everything is ready; the steamer is engaged; you are to be bound and gagged and taken from here, so that there will be no disturbance; and you will be placed on board in safe keeping. Outside Hong Kong harbour there will be a Chinese gunboat to meet you, and you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at and taken to Canton for trial and execution.”

唐答曰："吾侪不请于英政府，为正式之授受。今已事事停妥，轮舟亦既雇定。届时当箝君口，束君肢体，舁[5_6]赴舟上。既登舟，即置君于严密之所，鼓轮而行。迨抵香港，当有中国炮舰泊于港口之外，即以君移交彼舰，载往广州听官司鞫审[5_7]，并明正典刑焉。"

I pointed out that this would be a risky proceeding, as I might have the chance of communicating with the English on board on the way. This, however, Tang declared would be impossible, as, said he, "You will be as carefully guarded as you are here, so that all possibility of escape will be cut off." I then suggested that the officers on board might not be of the same mind as my captors, and that some of them might sympathise with me and help me.

予告以此等举动未免冒险已甚，盖予在舟中，或得乘机与在舟英人通消息也。唐曰："否否，君万不能出此。君既登舟，即有人严密看视，与在此无异。苟有可与外人通消息处，吾等当先事杜绝，决不使有丝毫间隙也。"予又曰："舟中员司未必与使馆沆瀣一气，其中安知无矜悯予而为予援应者？"

"The steamboat company," replied Tang, "are friends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s and will do what they are told."

唐曰："是轮船公司与马凯尼君交谊甚深，该公司自当遵马君之命而行，决不虑其有所阻梗。"

In reply to my questions he told me that I should be taken by one of the "Glen" Line of Steamers, but that my departure would

not take place that week (this was October 14th), as the Minister was unwilling to go to the expense of exclusively chartering the steamer, and he wished to have the cargo shipped first, so that only the passenger tickets would have to be paid for. “Some time next week,” he added, “the cargo will be embarked and you will go then.”

唐又答予所问曰：“是轮船者属于格来公司，本星期内未必启程（按唐某与予谈话之日为十月十四号，即礼拜三日）。盖公使以惜费故，不欲专雇是船，因令其先载货物，而行旅之费则由使馆全认；迨次星期，则货物之装载既竟，而君亦须附载以行矣。”

On my remarking that this was a very difficult plan to put into execution, he merely said: “Were we afraid of that, we could kill you here, because this is China, and no one can interfere with us in the Legation.”

予谓此等计划，欲见诸实行亦良难。唐曰：“予侪如不出此，则亦不妨戮汝于此，藉免周折。盖此间即中国，凡使馆中所为之事，无论谁何决不能干涉也。”

For my edification and consolation he then quoted the case of a Korean patriot, who, escaping from Korea to Japan, was induced by a countryman of his to go to Shanghai, where he was put to death in the British concession. His dead body was sent back by the Chinese to Korea for punishment, and on arrival there it was decapitated, while the murderer was rewarded and given a high political post. Tang was evidently fondly cherishing the belief that

he would be similarly promoted by his government for arresting me and securing my death.

唐言已，又举高丽某志士事为予劝慰，并资启迪。盖某志士自高丽出奔至日本，被其同国人诱赴上海，戕毙于英租界内，由华人将志士遗骸运往高丽，高丽政府戮尸示惩，而其戕毙志士之凶徒则获重赏并擢高位焉。唐历述此事，津津若有余味，盖其意以为此次有捕予之功，中国政府亦当加以重赏、锡[5_8]以高位也。

I asked him why he should be so cruel.

予问曰："公等何残忍若是？"

He replied: "This is by order of the Emperor, who wants you captured at any price, alive or dead." I urged that the Korean case was one of the causes of the Japanese war, and that my capture and execution might lead to further trouble and great complication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 said, "may ask for the punishment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is Legation; and, as you are a countryman of mine, my people in the province of Kwang-Tung may revenge themselves on you and your family for your treatment of me."

唐曰："此系皇上之命，凡有能生致汝或取汝死命者，皇上均当加以不次之赏。"予又进逼曰："高丽志士之案即中日开衅之一因，今公等致予于此，或招起极大之交涉，未可知也。将来英政府对于使馆中人，或不免要求中国政府全数惩治。况君与予有桑梓之谊，吾党之在粤省者甚多，他日或出为予复仇，岂第君之一身可虑，甚或累及君

之家族，亦意中事耳！”

He then changed his tone, desisted from his arrogant utterances, and remarked that all he was doing was by the direction of the Legation, and that he was merely warning me in a friendly way of my plight.

唐某闻予言，其豪悍之口吻不觉顿变，遂曰：“凡我所为，皆公使之命，我此来不过为彼此私情计，俾君知前途之危险耳。”

[5_1].龚某：龚照瑗。（转引自《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8 页注释）

[5_2].酬酢：宾主互相敬酒，泛指应酬。

[5_3].厥后：其后。

[5_4].诿：嘱托。

[5_5].唐：原文Tang，应译作邓，即邓廷铿。下同。（转引自《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9 页注释）

[5_6].舁：共同扛、抬。

[5_7].鞫审：审问。

[5_8].锡：赐给。

CHAPTER IV PLEADING WITH MY GAOLERS FOR LIFE

第四章 幽 禁

At twelve o’clock the same night Tang returned to my room and re-opened the subject. I asked him, if he was really a friend of mine, what he could do to help me.

是日，夜半后十二点钟时，唐又至予室与予谈。予曰：“君如真为予友，则将何以援予？”

“That is what I came back for,” he replied, “and I want to do all I can, and will let you out by-and-by. Meantime,” he continued, “I am getting the locksmith to make two duplicate keys, one for your room and one for the front door.” Tang had to take this step, he said, as the keys were kept by the confidential servant of the Minister, who would not part with them.

唐答曰：“此即我之所以来也。我当竭尽绵力，冀脱君于厄。我今方令匠人密制二钥，一以启此室之门，一以启使馆之前门。我之所以出此者，以掌钥者为公使之亲随，乃其腹心所寄，决不肯出以相授也。”

To my inquiry as to when he could let me out, he stated tha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ill the following day, and that he could

probably manage it at two a.m. Friday morning.

予问以出险当在何时？唐答称："必须俟诸次日，即礼拜五日（按是时已在礼拜三夜十二点钟以后，故应作为礼拜四日，而所谓次日者乃礼拜五日也）。礼拜五日清晨二点钟时，我或能蹈隙以来，俾君出兹罗网，未可知也。"

As he left the room he counselled me to be ready to get out on the Friday. After his departure I wrote down a few words on a paper to give to the servants to take to Mr. Cantlie. Next morning, Thursday, October 15th, I gave the note to the servant; but, as Tang told me on the afternoon of that day, it was handed by the servant to the Legation authorities. Tang declared that by my action I had spoiled all his plans for rescuing me, and that Sir Halliday Macartney had scolded him very much for telling me how they intended to dispose of me.

当唐兴辞时，又告予以"礼拜五清晨必来相援，汝可预为之备"云云。然唐去后，予仍取片纸，草数语，俟礼拜四日（即十月十五号）上午授之英仆，乞其密致康德黎君。及下午，唐复来，谓此纸已由英仆径呈使馆，马凯尼君睹之，即向唐某大肆诟詈[6_1]，谓不应以使馆密谋告予。是在唐某虽有相救之心，而予此举实足破坏其计划，未免自误云云。

I thereupon asked him if there was any hope for my life, to which he replied: "Yes, there is still great hope; but you must do what I tell you."

予乃叩以尚有一线生机否？唐曰：“生机正自未绝，特君必须遵我命而行，慎毋再误。”

He advised me to write to the Minister asking for mercy. This I agreed to do, and asked for pen, ink and paper. These Tang told Cole to bring me. I asked, however, that Chinese ink and paper should be supplied me, as I could not write to the Chinese Minister in English.

唐乃劝予致书公使，乞其相宥 [6_2] 。予从之。唐立命西仆柯尔将纸笔墨水至，予请易中国文具，盖上书公使宜用汉文，未便作西字也。

To this Tang replied: “Oh, English is best, for the Minister is but a figurehead; everything is in Macartney’s hands, and you had better write to him.”

唐曰：“否，英文良佳。盖此间大权均操诸马凯尼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此书，宜畀马凯尼也。”

When I asked what I should write, he said: “You must deny that you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Canton plot, declare that you were wrongly accused by the mandarins, and that you came to the Legation to ask for redress.”

予问书中宜如何措辞？唐曰：“君必须极力表明，谓身系良民，

并非逆党，徒以华官诬陷，至被嫌疑，因亲诣使馆，意在吁求伸雪”云云。

I wrote to his dictation a long letter to this effect in Tang’s presence. Having addressed the folded paper to Sir Halliday Macartney (whose name Tang spelt for me, as I did not know how) I handed it to Tang, who went off with it in his possession, and I never saw the intriguer again.

予即在唐某之前，就其所授之意，缮成一长函。折叠既竟，通例应于纸背标明受书人姓名，唐乃为予读马凯尼君姓名之缀法曰：Sir Halliday Macartney。盖是时予仅知其姓氏之音为马凯尼，而犹未稔其文字上之缀法也。既而授函于唐，唐怀之而去，自是不复睹斯人之面矣。

This was no doubt a very stupid thing to have done, as I thereby furnished my enemies with documentary evidence that I had come voluntarily to the Legation. But as a dying man will clutch at anything, so I, in my strait, was easily imposed upon.

予此举实堕唐某之奸计，可谓其愚已甚。盖书中有亲诣公使馆吁求伸雪等语，是岂非授以口实，谓予之至使馆乃出自己愿，而非由诱劫耶？虽然，人当堕落深渊之际，苟有毫发可资凭藉，即不惜攀以登，更何暇从容审择耶？更何能辨其为愚弄否耶？

Tang had informed me that all my notes had been given up by the servants, so that none of them had reached my friends outside. I

then lost all hope, and was persuaded that I was face to face with death.

唐曾告予，凡予所缮各函，均由仆人出首于使馆，并未尝达于予友。是时，予想望已绝，惟有坐以待毙而已。

During the week I had written statements of my plight on any scraps of paper I could get and thrown them out of the window. I had at first given them to the servants to throw out, as my window did not look out on the street; but it was evident all of them had been retained. I therefore attempted to throw them out at my own window myself, and by a lucky shot one fell on the leads of the back premises of the next house. In order to make these missives travel further I weighted them with coppers, and, when these were exhausted, two-shilling pieces, which, in spite of the search, I had managed to retain on my person. When the note fell on the next house I was in hopes that the occupants might get it. One of the other notes, striking a rope, fell down immediately outside my window. I requested a servant—not Cole—to pick it up and give it to me; but instead of doing so he told the Chinese guards about it, and they picked it up. Whilst searching about, the letter on the leads of the next house caught their attention, and, climbing over, they got possession of that also, so that I was bereft of that hope too. These notes they took to their masters.

是一星期内，予苟觅得片纸，即以被难情形疾书其上，令英仆为予掷于窗外，冀有人拾得之，或生万一之望。予被禁之室虽有窗，并不临街，故不得不乞仆人代投。既而知仆之愚予也，遂拟自起而为之。因于所居室之窗内一再外掷，某次，幸及于邻家之铅檐。然纸团

之力，所及不远，故始则裹之以铜币，铜竭则媵[6_3]之以银；此钱币者，乃予密藏于身畔，幸未于搜检时被获者也。迨所掷之纸及于邻屋，窃意邻家或万一能拾视之矣。然同时别有一纸，掷出时误触绳，中道被阻，而径堕于予室之窗外，因命西仆往拾之。此西仆即二仆中之少者，非柯尔也，闻命后不往拾，而反告监守者。于是监守者往拾，并留心四顾，则铅檐上之纸团亦为所见；遂攀登邻屋，取之以归，呈之使馆。自是而予一线仅存之希望亦尽绝矣！

I was now in a worse plight than ever, for they screwed up my window, and my sol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seemed gone. My despair was complete, and only by prayer to God could I gain any comfort. Still the dreary days and still more dreary nights wore on, and but for the comfort afforded me by prayer I believe I should have gone mad. After my release I related to Mr. Cantlie how prayer was my one hope, and told him how I should never forget the feeling that seem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me as I rose from my knees on the morning of Friday, October 16th—a feeling of calmness, hopefulness and confidence, that assured me my prayer was heard, and filled me with hope that all would yet be well. I therefore resolved to redouble my efforts, and made a determined advance to Cole, beseeching him to help me.

使馆之所以防予者，视前益密，窗上均加以螺钉，不复能启闭自如。藐藐我躬，真堕落于穷谷中矣！惟有一意祈祷，聊用自慰，当时之所以未成狂疾者，赖有是也。及礼拜五（即十月十六号）上午，予祈祷既竟，起立后觉方寸为之一舒，一若所祷者已上达帝听。因决计再尽人力，待英仆柯尔来，复向之哀恳，藉脱予厄。

When he came in I asked him: “Can you do anything for me?”

予谓柯尔曰："子能为予尽力乎？"

His reply was the question: "What are you?"

柯尔反诘予曰："君何人也？"

"A political refugee from China," I told him.

予曰："中国之国事犯而出亡于外者。"

As he did not seem to quite grasp my meaning, I asked him if he had heard much about the Armenians. He said he had, so I followed up this line by telling him that just as the Sultan of Turkey wished to kill all the Christians of Armenia, so the Emperor of China wished to kill me because I was a Christian, and one of a party that was striving to secure good government for China. "All English people," I said, "sympathise with the Armenians, and I do not doubt they would have the same feeling towards me if they knew my condition."

柯尔于国事犯之名称，若未能领会。予乃叩以生平于阿美尼亚人之历史，亦尝有所闻否？柯尔颔之。予遂迎机以导，告以中国皇帝之欲杀予，犹土耳其苏丹之欲杀阿美尼亚人；土耳其苏丹之所疾视者为阿美尼亚之基督教徒，故欲聚而歼之，中国皇帝之所疾视者为中国之基督教徒，故欲捕而斩之；予即中国基督教徒之一，且尝尽力以谋政

治之改革者也。凡英国之人民无不表同情于阿美尼亚人者，故予之身世及予目前这情况苟为英国人所谂知，则其表同情于予亦不言而可决也。

He remarked that he did not know whethe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would help me, but I replied that they would certainly do so, otherwise the Chinese Legation would not confine me so strictly, but would openly ask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or my legal extradition.

柯尔谓不识英政府亦肯相助否？予曰："唯唯，英政府之乐于相助，又宁待言。否则中国使馆只须明告英政府，请其捕予而交与中国可矣，又何必幽禁予于斯，恐外人之或闻耶？"

"My life," I said to him, "is in your hands. If you let the matter be known outside, I shall be saved; if not, I shall certainly be executed. Is it good to save a life or to take it? Whether is it more important to regard your duty to God or to your master?—to honour the just British, or the corrupt Chinese, Government?" I pleaded with him to think over what I had said, and to give me an answer next time he came, and tell me truly whether he would help me or not.

予又进迫之曰："予之生死，实悬君手。君若能以此事闻于外，则予命获全；否则予惟有被宰割，受屠戮耳！君试思救人于死与致人于死，其善恶之相去若何？又试思吾人尽职于上帝为重要乎，抑尽职于雇主为重要乎？更试思保全正直之英政府为重要乎，抑袒助腐败之中国政府为重要乎？君其三思予言，乞于下次相见时以君之决心示

予。”

He went away, and I did not see him till next morning. It may well be imagined how eager I was to learn his decision. While engaged putting coals on the fire he pointed to a paper he had placed in the coal scuttle. On the contents of that paper my life seemed to depend. Would it prove a messenger of hope, or would the door of hope again be shut in my face? Immediately he left the room I picked it up and read:

翌晨柯尔以煤至，既投煤于炉，复以手微指煤篓。予见其所指者为一纸，不觉中心跳荡，予之生死固惟此片纸所书者是赖也。柯尔既出，急取而读之，其文曰：

“I will try to take a letter to your friend. You must not write it at the table, as you can be seen through the keyhole, and the guards outside watch you constantly. You must write it on your bed.”

“某当为君递一书于君友。惟君缮书时，慎勿据案而坐，盖守者伺察甚严，得于钥孔中窥见所为也。君若伏于卧榻而缮之，则得矣。”

I then lay down on my bed, with my face to the wall, and wrote on a visiting card to Mr. Cantlie. At noon Cole came in again, and I pointed to where my note was. He went and picked it up, and I gave him all the money I had about me—£20. Mr. Cantlie’s note in reply was placed by Cole behind the coal scuttle, and by a

significant glance he indicated there was something there for me. When he had gone I anxiously picked it up, and was overjoyed to read the words:

予于是偃卧 [6_4] 榻上，取名刺 [6_5] 一纸，面壁而书；书系致予友康德黎君者也。亭午，柯尔复来，取予书去。予媵以二十镑为酬劳之费，顾自是而予囊亦告罄矣。既而柯尔复持煤篓至，以目示意。予待其去后，急搜煤篓，得一纸，读之，大喜逾望。文曰：

“Cheer up! The Government is working on your behalf, and you will be free in a few days.”

“勉之，毋丧气！政府方为君尽力，不日即见释矣。”

Then I knew God had answered my prayer. During all this time I had never taken off my clothes. Sleep came but seldom, only in snatches, and these very troubled. Not until I received my friend’s cheering news did I get a semblance of real rest.

以是而予知祷告之诚，果上达于天也；以是而予知上帝，固默加呵护者也。予自被逮后，衣未尝解带，夜未尝安眠，至此始酣然一睡，及旦而醒。

My greatest dread was the evil that would befal [5_1] the cause for which I had been fighting, and the consequences that would ensue were I taken to China and killed. Once the Chinese got me

there, they would publish it abroad that I had been given up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due legal fashion, and that there was no refuge in British territory for any of the other offenders.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will remember the part played by England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how by English interference that great national and Christian revolution was put down. Had I been taken to China to be executed, the people would have once more believed that the revolution was again being fought with the aid of Britain, and all hopes of success would be gone. Had the Chinese Legation got my papers from my lodgings, further complications might have resulted to the detriment of many friends. This danger, it turned out, had been carefully guarded against by a thoughtful lady. Mrs. Cantlie, on her own responsibility, had gone to my lodgings, carefully collected my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 and within a few hours of her becoming acquainted with my imprisonment, there and then destroyed them. If some of my friend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have had no reply to their letters, they must blame this considerate lady for her wise and prompt action, and forgive my not having answered them, as I am minus their addresses, and in many cases do not even know their names. Shoul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gain entrap me, they will find no papers whereby my associates can be made known to them.

予之所惴惴致惧者，生命事小，政见事大。万一果被递解 [6_6] 至中国，彼政府必宣示通国，谓予之被逮回华，实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后中国之国事犯决无在英国存身之地。吾党一闻此言，必且回忆金田军起义之后，政府实赖英人扶助之力，始得奏凯。吾国人又见予之被逮于英而被斩于华，必且以为迩来 [6_7] 革命事业之失败，仍出英国相助之功。自是而吾华革命主义，永无告成之望矣！且予旅馆之中，行李而外尚有若干文件，设为中国使馆所得，则株连之祸实不知其所终极。幸康德黎夫人以一女子而能为予预料及此，毅然赴旅馆中尽取

予书札文牍之属，捆载而归，付之一炬。是其识力之有造于吾党者，诚不鲜也。

I luckily did not think of poison in my food, but my state of mind was such that food was repulsive to me. I could only get down liquid nourishment, such as milk and tea, and occasionally an egg. Only when my friend’s note reached me could I either eat or sleep.

予被幽使馆中，第觉饮食之可厌，而并未念及饮食之可以置毒，故尚日进乳茗少许，间或啖鸡卵一枚，得藉延残喘，以待予良友之营救。厥后接康德黎君来简，而食量之增与睡境并进矣。

[5_1].befal: 旧时英语拼写，现作befall。

[6_1].诟詈：诟骂。

[6_2].宥：宽恕；原谅。

[6_3].媵：陪送女儿出嫁。此处为比喻义。

[6_4].偃卧：仰卧。

[6_5].名刺：名片，在交际场合使用的写有自己名字、籍贯、职务等的木片或竹简。东汉时叫“刺”，后来叫“名刺”，明清时叫“名帖”，现在叫“名片”。

[6_6].递解：旧指将犯人从一地解往另一地，由沿途官府依次派人押送。

[6_7].迩来：近来。

CHAPTER V THE PART MY FRIENDS PLAYED

第五章　良友营救

Outside the Legation, I of course knew nothing of what was going on. All my appeals, all my winged scraps I had thrown out at the window, all my letters I had handed officially to Sir Halliday Macartney and Tang, I knew were useless, and worse than useless, for they but increased the closeness of my guard and rendered communication with my friends more and more an impossibility. However, my final appeal on Friday morning, October 16th, had made an impression, for it was after that date that Cole began to interest himself in my behalf. Cole's wife had a good deal to do with the initiative, and it was Mrs. Cole who wrote a letter to Mr. Cantlie on Saturday, October 17th, 1896, and so set the machinery going. The note reached Devonshire Street at 11 p.m. Imagine the Doctor's feelings when he read the following:

自礼拜五日（即十月十六号）后，英仆柯尔始为予效奔走，求解脱。柯尔之妻尤尽力。其于礼拜六日（即十月十七号）密白予友康德黎君之书，即出自柯尔妇之手笔。康德黎君接书，已在是日夜间十一点钟时。书曰：

"There is a friend of yours imprisoned in the Chinese Legation here since last Sunday. They intend sending him out to China, where it is certain they will hang him. It is very sad for the poor man, and unless something is done at once, he will be taken away and no one will know it. I dare not sign my name; but this is the

truth, so believe what I say. Whatever you do must be done at once, or it will be too late. His name is, I believe, Lin Yin Sen.”

“君有友某自前礼拜日来，被禁于中国使馆中。使馆拟递解回国，处以死刑。君友遭此，情实堪怜，设非急起营救，恐将无及。某于此书虽不敢具名，然所言均属实情。君友之名，某知其为林行仙。”

No time was evidently to be lost. Late as it was, after ascertaining Sir Halliday Macartney’s address, Mr. Cantlie set out to find him. He little knew that he was going straight to the head centre of all this disgraceful proceeding. Luckily or unluckily for me, one will never know which, he found the house, 3 Harley Place, shut up. It was 11.15 p.m. on Saturday night, and the policeman on duty in the Marylebone Road eyed him rather suspiciously as he emerged from the compound in which the house stands. The policeman said that the house was shut up for six months, the family having gone to the country. Mr. Cantlie asked how he knew all this, and the policeman retorted that there had been a burglary attempted three nights previously, which led to close enquiries who the tenants were; therefore, the information he had, namely a six months’ “anticipated” absence, was evidently definite and precise. Mr. Cantlie next drove to Marylebone Lane Police Office, and laid the matter before the Inspector on duty. He next went to Scotland Yard and asked to see the officer in charge. A Detective Inspector received him in a private room, and consented to take down his evidence. The difficulty was to get anyone to believe so improbable a story. The Police authority politely listened to the extraordinary narrative, but declared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Scotland Yar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and Mr. Cantlie found himself in the street about

1 a.m., in no better plight than when he set out.

康德黎君既得此书，其感情若何，可以不言而喻。时虽深夜，然恐营救无及之故，急起而检查马凯尼君之居址；居址既得，即匆匆出门，驰往求见。夫此等不名誉之举动，实以马凯尼为主谋，而予友不知，反驰往哈兰区三号之屋，向之求助。时已礼拜六夜十一点一刻钟。予友既造其庐，则见重门紧闭，人声俱无。不得已出至场地外，则梅尔蓬路中有一值夜之警察，警察目注予友，若甚疑者。据该警察谓此屋空闭，期以六阅月 [7_1] ，居中人均往乡间云云。予友叩以何能详悉若是，则反唇以稽曰："三日前有盗夜破是屋，闻于警署，警署因是而查得屋中人之姓名及其现在之踪迹。所谓六阅月始回者，其言当不谬也。"康德黎君闻言，乃驱车至梅尔蓬巷警署，以予被拘事呈诉于值日警监。继复至苏格兰场警署，侦探长在私室接见，允其呈诉一切，以便存案。惟康德黎君所诉之事，颇出常情之外，殊难置信。侦探长静听既毕，即告以此事关系重大，非渠所能主持云云。迨康德黎君步出警署之门，已在夜半后一点钟，然所事则并未见有丝毫进步也。

Next morning Mr. Cantlie went to Kensington to consult with a friend as to whether or not there was any good in asking the head of the Chinese Customs in London to approach the Legation privately, and induce them to reconsider their imprudent action and ill-advised step.

翌日上午，康德黎君奔驰至甘星敦，就商于其友，意欲往见现寓伦敦之中国某税务司，乞其以私情晋谒中国公使，告以私捕人犯之事殊属非理，宜三思而行云云。

Not receiving encouragement in that direction, he went again to 3 Harley Place, in hopes that at least a caretaker would be in possession, and in a position to at least tell where Sir Halliday Macartney could be found or reached by telegram. Beyond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policeman's story that burglary had been attempted, by seeing the evidence of "jemmies" used to break open the door, no clue could be found as to where this astute orientalised diplomatist was to be unearthed.

康德黎君之友颇不以此策为然。于是复往哈兰区三号屋，盖其意以为屋中人虽往乡间，必有一二守宅之人，或可访得马凯尼君之踪迹及其通信之地。讵知既抵其处，除于盗劫之事更闻一过及睹一二斧凿散弃地上外，更不能别获丝毫之消息，以踪迹彼同化东亚之外交家。

Mr. Cantlie then proceeded to Dr. Manson's house, and there, at his front door, he saw a man who proved to be Cole, my attendant at the Legation. The poor man had at last summoned up courage to disclose the secret of my imprisonment, and in fear and trembling sought out Mr. Cantlie at his house; but being told he had gone to Dr. Manson's, he went on there and met both the doctors together. Cole then presented two cards I had addressed to Mr. Cantlie, stating:

康德黎君乃往访孟生博士，既及门，见有一人趦趄于门外，则中国使馆之西仆柯尔也。盖柯尔是日决计躬往康德黎君之家，尽以中国使馆拘予之密史倾吐于予友。康德黎君家人告以予友已出访孟生博士，柯尔乃疾趋至孟生博士之门外，意欲俟康德黎君之来，而并谒孟生博士。柯尔随康德黎君入，即授以予函，是函系予以名片二纸缮成者。康德黎君乃与孟生博士同阅之，文曰：

“I was kidnapped on Sunday last by two Chinamen, and forcibly taken into the Chinese Legation. I am imprisoned, and in a day or two I am to be shipped off to China, on board a specially-chartered vessel. I am certain to be beheaded. Oh! woe is me.”

“予于前礼拜日，被二华人始则诱骗，继则强挟入中国使馆。予今方在幽禁中。一二日后，将乘使馆特雇之船递解回国，回国后必被斩首。噫！予其已矣！”

Dr. Manson heartily joined with his friend in his attempt to rescue me, and proceeded to interrogate Cole. Mr. Cantlie remarked: “Oh, i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were only in town, it would be all right. It is a pity he is away; where can we find him? ”

孟生博士既备闻斯情，即与康德黎君从事营救。康德黎君叹曰：“设马凯尼君未下乡，则此事当无难措手；不幸马凯尼又他出，吾侪当于何处求之也？”

Cole immediately retorted: “Sir Halliday is in town, he comes to the Legation every day; it was Sir Halliday who locked Sun in his room, and placed me in charge, with directions to keep a strict guard over the door, that he should have no means of escape.”

柯尔闻言，即告之曰：“马凯尼君何尝远出？彼固无日不赴中国使馆。幽孙氏于其室中者，马凯尼也。以孙氏付于吾，令吾严密防守，勿使得逸者，亦马凯尼也。”

This information was startling, and placed the difficulty of release on a still more precarious footing. The proceedings would have to be still more carefully undertaken, and the highest authorities would have to be called in, were these crafty and masterful men to be outwitted.

柯尔此言，实足使康、孟二君骇愕不已。且此事既由马凯尼主谋，则营救不免更难，措置益须加慎，设非就商于政府中之秉政者，恐未易为功矣。

Cole, in answer to further interrogations, said that it was given out in the Legation that I was a lunatic; that I was to be removed to China on the following Tuesday (that was in two days more); that he did not know by what line of ships I was going, but a man of the name of McGregor, in the City,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it. It also came out that two or three men dressed as Chinese sailors had been to the Legation during the week, and Cole had no doubt their visit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my removal, as he had never seen men of that description in the house before.

柯尔经孟、康二君诘问后，又答称中国使馆诡称孙氏为疯汉，拟于二日后即下礼拜二日押解回国。至轮舟之名虽不得而知矣，然伦敦城中有名麦奇谷者，柯尔知其必尝与闻斯事也。又谓本星期内忽来中国兵三、四名，止于使馆中，使馆向无此等人物，是则兵士之来当与孙氏之起解必有关系也。

Cole left, taking a card with the names of my two friends upon

it to deliver to me, in the hopes that its advent would allay my fears, and serve as a guarantee that Cole was actually working on my behalf at last. The two doctors then set out to Scotland Yard to try the effects of a further appeal in that direction. The Inspector on duty remarked: “You were here at 12.30 a.m. this morning. I am afraid it is no use your coming here again so soon.” The paramount difficulty was to know where to go to represent the fact that a man’s life was in danger; that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ere being outraged; that a man was to be practically given over, in the Metropolis of the British Empire, to be murdered.

柯尔临行时，康、孟二君各予以名刺一纸，俾转授于予。盖一则欲藉此以稍慰予心，一则证明柯尔之确已为予奔走也。孟、康二博士复往苏格兰场警署，拟再求警察出而干涉，或可有济于万一。值日之侦探长谓康德黎君曰：“君于昨日夜半后十二点半钟时尝来此陈诉，乃时未久而君又来，此时实不及有所为也。”

On quitting the premises they took counsel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invade the precincts of the Foreign Office. They were told the resident clerk would see them at five p.m. At that hour they were received, and delivered their romantic tale to the willing ears of the courteous official. Being Sunday, of course nothing further could be done, but they were told that the statement would be laid before a higher authority on the following day. But time was pressing, and what was to be done? That night might see the tragedy completed and the prisoner removed on board a vessel bound for China. What was most dreaded was that a foreign ship would be selected; and under a foreign flag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were powerless. The last hope was that, if I were removed before they succeeded in rousing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vessel actually got

away, that it might be stopped and searched in the Suez Canal; but, were I shipped on board a vessel under a flag other than British, this hope would prove a delusion. With this dread upon them, they decided to take the decisive step of going to the Legation, and telling the Chinese that they were acquainted with the fact that Sun was a prisoner in their hands, and th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police knew of their intention to remove him to China for execution. Dr. Manson decided he should go alone, as Mr. Cantlie's name in connection with Sun's was well known at the Legation.

孟、康二博士既出警署，又熟筹良策，于是决计赴外部姑为尝试。抵部后，部中人告以下午五点钟时复来，当令值日司员接见。如期复往，书记员招待甚有礼，而于二君陈诉之辞不能不疑信参半。既而谓本日适值星期，无可设法，当于翌日转达上官云云。二博士无如何。既思时期已极迫促，设中国使馆即于是夜实行其计划，将奈之何！况更有可虑者，彼使馆所雇者或系外国轮船，则英政府虽欲搜检，亦安从而搜检？盖人犯既已被解，轮舟既已开行，设为英国船，则不及搜索于伦敦，尚可截留于苏彝士河[7_2]；若为外国船，则此望亦等诸泡幻矣。二君因毅然决计，先径往中国使馆，告以孙某被拘事已为外人所知，英政府及伦敦警署已知其拟将孙某递解处以死刑云云，俾中国使馆闻之，或将有所惕而不敢遽行。孟生博士以中国使馆稔知康德黎君与予相习，故决计只身前往。

Accordingly Dr. Manson called alone at 49 Portland Place. The powdered footman at the door was asked to call one of the English-speaking Chinamen. Presently the Chinese interpreter, my captor and tormentor, Tang himself, appeared. Dr. Manson said he wanted to see Sun Yat Sen. A puzzled expression fell o'er Tang's face, as though seeking to recall such a name. "Sun!—Sun! there is no such person here." Dr. Manson then proceeded to inform him that he was

quite well aware that Sun was here; that he wished to inform the Legation that the Foreign Office had been made cognisant of the fact; and that Scotland Yard was posted in the matter of Sun's detention. But a Chinese diplomatist is nothing if not a capable liar, and Tang's opportunity of lying must have satisfied even his Oriental liking for the rôle. With the semblance of truth in his every word and action, Tang assured his interrogator that the whole thing was nonsense, and that no such person was there. His openness and frankness partly shook Dr. Manson's belief in my condition, and when he got back to Mr. Cantlie's he was so impressed with the apparent truthfulness of Tang's statement, that he even suggested that the tale of my imprisonment might be a trick by myself to some end—he knew not what. Thus can my countrymen lie; Tang even shook the belief of a man like Dr. Manson, who had lived in China twenty-two years; who spoke the Amoy [6_1] dialect fluently; and was thereby more intimately acquainted with the Chinese and their ways than nine-tenths of the people who visit the Far East. However, he had to dismiss the thought, as no ulterior object could be seen in a trick of the kind. Tang is sure to rise high in the service of his country; a liar like that is sure to get his reward amongst a governing class who exist and thrive upon it.

于是孟生博士驰赴波德兰区四十九号，叩中国使馆之门，令门外守兵招一华人之能操英语者出见。俄而一中国通译员出接，其人即唐某，始则捕予于途，继则饵予于使馆者也。孟生博士启口第一语，即曰“某欲一见孙逸仙。”唐某面作踌躇之色，口中喃喃曰：“孙……孙……”一若不知斯名之谁属者。既而答曰：“是间并无此人。”孟生博士即告以孙某确在是间，无庸讳饰，今英国外务部已知此事，而苏格兰警署且已派员澈查云云。然唐某竭力剖辨，谓此种消息纯属谬妄。其言侃侃，其色肫肫 [7_3] 。虽以旅居中华至二十二年、善操厦门方言其熟如流、而于华人之性情习俗又号称洞悉之孟生博士，亦不觉为所

摇惑，几疑予被拘之事之全不足信也。若唐某者，洵不愧为中国之外交家，将来出其善作诳语之才力，何难取卿相、列台阁？孟生博士归为康德黎君言："当其辨白之时，形容极坦率，辞气极质直，甚且谓孙某被幽之信，或出孙某之自行捏造，冀以达其不可测度之目的焉。"

It was seven o'clock on Sunday evening when the two doctors desisted from their labours, parted company, and considered they had done their duty. But they were still not satisfied that I was safe. The danger was that I might be removed that very night, especially since the Legation knew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ere now aware of the fact, and that if immediate embarkation were not possible, a change of residence of their victim might be contemplated. This was a very probable step indeed, and, if it had been possible, there is no doubt it would have been accomplished. Luckily for me, the Marquis Tseng, as he is called, had shortly before left London for China, and given up his residence. Had it not been so, it is quite possible the plan of removal to his house would have recommended itself to my clever countryman; and when it was accomplished, they would have thrown themselves upon the confidence and good friendship of the British, and asked them to search the house. That ruse could not be carried out; but the removal to the docks was quite feasible. It was expected I was to sail on Tuesday, and, as the ship must be now in dock, there was nothing more likely than that the "lunatic" passenger should be taken on board at night, to escape the excitement and noise of the daily traffic in the streets.

康、孟二君为予奔走营救，至是晚即礼拜日下午七点钟时始各分袂 [7_4] 。然二君均以所谋无当，意殊不慊 [7_5] 。且恐中国使馆既知英政府已有所闻，或即于是夜实行递解亦未可知，否则亦必将移禁他

处。二君所虑，不为无见。幸当时之所谓曾侯（按即曾纪泽，龚使之前任也）者，甫自伦敦返国，已将居宅退赁，否则使馆中人必且以予改禁曾宅，而反请英政府赴使馆检查，以辟外间之流言，而示推诚相与之态度矣。虽然，改禁之计虽可无虑，而递解之期既定于礼拜二日，则承载之轮舟是时必已安泊于船坞可知。彼使馆或托词押解疯汉，在夜深人静后，藉免途人之属目，而因以纳予于船坞，又未可知。此予友之所以不能无惴惴也。

[6_1].Amoy: 15—16 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对厦门的称谓。

[7_1].六阅月：经过了六个月。

[7_2].苏彝士河：苏伊士运河。

[7_3].肫肫：诚恳的样子。

[7_4].分袂：离别。

[7_5].慊：满足；满意。

CHAPTER VI THE SEARCH FOR A DETECTIVE

第六章　访求侦探

With all this in his mind Mr. Cantlie set forth again, this time to search out some means of having the Legation watched. He called at a friend's house and obtained the address of Slater's firm of private detectives in the City. Hither he went; but Slater's office was closed. On Sunday it would seem no detectives are required. Can no trouble arise on Sunday in England?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the division of the month is but an artificial and mundane convenience, and crime does not always accommodate itself to such vagaries of the calendar as portioning the month into weeks. However, there was the hard fact, Slater's office was shut, and neither shouting, bell-ringing, nor hard knocks could elicit any response from the granite buildings in Basinghall Street.

予友康德黎君以是不能释然于心，计惟有遣人密伺于中国使馆之外，借以侦察其行动。因急往访某友，某友告以“思兰德号”之所在。“思兰德号”者，美国私家侦探设于伦敦本区（所谓伦敦本区者，盖伦敦全境分为若干区，而此则名伦敦城，即伦敦本区也）以待雇者也。顾是日为礼拜日，康德黎君既抵佩星和尔街，见有花刚石所建华屋，审为“思兰德号”，即按其铃，挝[8_1]其门，甚且大声以呼，而屋中阒然[8_2]无应者。盖以礼拜日之故，循例休业。然则英国于礼拜日无应办之案乎？曰：非也。所谓礼拜星期者，不过借人为之力强分一月为若干部分，藉以取便于世俗而已。彼犯案者，何尝辨其为礼拜日与非礼拜日哉！

A consultation in the street with a policeman and the friendly cabman, who was taken into the secret of my detention, ended in a call at the nearest police station. Here the tale had to be unfolded again, and all the doubts as to the doctor's soberness and sanity set at rest before anything further could be attempted.

康德黎君不得已与在途巡警相商，且与御者互相讨论，此御者已知中国使馆之案，而颇欲尽力驰驱者也。既而定计往最近警署，康德黎君入见，具陈中国使馆之事。

"Where was the place?"

警官问曰："君所欲侦察之地果何在乎？"

"Portland Place, West."

予友曰："在西境之波德兰区。"

"Oh! it is no good coming here, you must go back to the West End; we belong to the City police." To the doctor's mind neither eastern nor western police were of any avail.

警官曰："嘻！君盍回西境谋之。若本署则属伦敦本区，与西境无涉也。"

“However,” he persisted, “could a detective not be obtained to watch the house?”

康德黎君之意，固知东境与西境之警署同一无济，因复请曰：“可由贵署遣一侦探往伺中国使馆否？”

“No. It was out of the power of the City police to interfere in the West End work.”

警官曰：“是不能，伦敦本区之警察实不能与闻西境之事。”

“Have you not some old police constable, a reserve man, who would be willing to earn a little money at a job of the kind?” Mr. Cantlie asked.

康德黎君曰：“然则贵署亦有更事既久而今已退闲之警察，愿为予略尽微劳，以邀少许之酬谢者乎？”

“Well, there might be—let us see.”

警官曰：“是或有之，当为君搜索也。”

And here a number of men fell good-naturedly to discussing whom they could recall to memory. Well, yes; they thought So-and-

so would do.

警署中人互相商议，冀得一相当之人以充数，既而曰：“得之矣，有某某者似可以膺[8_3]斯任也。”

“Where does he live?”

予友叩以其人之居址.

“Oh! he lives in Leytonstone. You could not get him to-night: this is Sunday, you know.”

则曰：“斯人寓蓝藤斯敦，君今夜恐无从访得之；盖今为礼拜日，固君所知也。”

Sunday I should think it was, and my head in the balance. After a long discussion a man’s name was suggested, and they got rid of the persistent doctor. The man’s address was Gibston Square, Islington.

既而警署中人又聚议良久，始得一相当之人，其所居在伊士林敦之吉勃斯屯场。既以其姓名居址见告，予友乃兴辞而出。

But before starting thence, Mr. Cantlie thought he would give

the newspapers the whole tale, so he drove to the Times Office and asked for the sub-editor. A card to fill in was handed him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business; and he wrote: “Case of Kidnapping at the Chinese Legation!” This was 9 p.m., and he was told no one would be in until 10 p.m.

予友既出门，思先往报馆，以予被逮事告诸新闻记者，而后赴伊士林敦访侦探。即驱车至太晤士 [8_4] 报馆谒其副主笔，馆人出会客启一纸，令予友声明请见之缘由。予友大书曰：“中国使馆之诱捕案。”时已夜间九点钟矣。馆人约以十点钟时再往相见。

Away then he went to Islington in search of his “man.” After a time the darkly-lit square was found, and the number proving correct, the abode was entered. But again disappointment followed; for “he could not go, but he thought he knew a man that would.” Well, there was no help for it; but where did this man live? He was a wonderful chap; but the card bearing his address could not be found. High and low was it looked for: drawers and boxes, old packets of letters and unused waistcoats were searched and turned out. At last, however, it was unearthed, and then it was known that the man was not at home, but was watching a public-house in the City.

于是予友赴伊士林敦，访警署介绍之侦探。既抵其境，搜觅良久，始得吉勃斯屯场。其地殊幽暗，少灯火。既得吉勃斯屯场，复按户检查，始得警署所示之某号。予友叩户而入，所谓某侦探者固自不误。而其人以事不克承命，愿转荐一人，予友不得已诺之。特其所荐之人之居址，须求诸其人之名刺，于是倾筐倒箧，并破衣败絮之中亦复搜寻殆遍。既而见一纸，谓予友曰：“得之矣。虽然，此人近方守

护伦敦本区某旅馆，勿庸至其家访之也。”

Well, even this was overcome, for the Doctor suggested that one of the numerous children that crowded the parlour should be sent with a note to the home address of the detective, whilst the father of the flock should accompany the Doctor to the City in search of the watcher. At last the hansom cab drew up at a little distance from a public-house, somewhere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Barbican, and the place was reconnoitred. But no watcher could be seen around, and a futile search was settled in this way: that the public-house should be watched until eleven o’clock, when the house closed, at which time in all probability the “man” would be forthcoming. Mr. Cantlie left his erstwhile friend outside the house and set off again for the Times Office. There he was received in “audience” and his statement was taken down,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tale was left to the Times’ discretion. By this time it was 11.30 p.m. on Sunday, and at last the restless Doctor sought his home. He was somewhat chagrined to find that at 12 midnight his expected detective had not yet appeared, but, nothing daunted, he prepared to keep watch himself. He said good-night to his wife, and set out to observe the Legation, ready to interfere actively if need be.

予友踌躇者再，既见侦探室中有数童子拥挤一队，乃请于侦探，令速具一函，遣一童径送其人之家，予友复偕同侦探亲访其人于某旅馆，是两者必遇其一矣。部署既定，予友与侦探驱车至某旅馆。馆在巴毕干（即古堡）邻近，顾探索良久，迄未见是人踪影。既而知旅馆须于十一点钟始闭门，则是人亦必于是时始至。康德黎君因令同行之侦探在旅馆外候其友，而己则驰赴太晤士报馆，尽以予被捕事告记者。记者以所言缮存一纸，而登载与否，则当听报馆之主裁。康德黎

君是日回寓，已在夜间十一点半钟。及十二点钟，而拟雇之侦探尚未至。康德黎君虽甚焦闷，而热心豪气曾不稍减。计惟有亲赴中国使馆，躬自侦守于门外，果有潜解人犯事，可立起而干涉。因以此意告诸康德黎夫人，与夫人握手而出。

However, as he strode forth with valiant intent, the Doctor encountered his expected “man” in the street, and immediately posted him. His Gibston Square friend had proved himself reliable and sent his deputy. The windows of the Legation, late as it was,— past twelve at night,— were still lit up, indicating a commotion within, the result, no doubt, of Dr. Manson’s intimation that their evil ways were no longer unknown. The “man” was placed in a hansom cab in Weymouth Street, under the shadow of a house on the south side of the street, between Portland Place and Portland Road. It was a beautiful moonlight night, and both the Legation entrances could be clearly seen. The hansom cab was a necessary part of the sentinel on duty, as, supposing I had been hurried from the house across the pavement and into a carriage, I should have been carried beyond the reach of a person on foot in a few minutes. Cabs cannot be had at any moment in the early morning hours; hence the necessary precaution of having the watchman in a position by which he could follow in pursuit, if he were required so to do. The newspapers had it, that the cab was intended to carry me off when the rescue party had freed me, but this is another part of the story which I will relate later on.

康德黎君甫出门，即与一人相值，审知为奉命而至之侦探，乃偕彼赴中国使馆。是时虽已十二点钟半，而使馆内灯火犹明，人影未息，是可知孟生博士昼间一言，实足致个中人之惊扰也。康德黎君令侦探伺于一亨生车 [8_5] 内，车在渭墨街街南屋宇下，介于波德兰区及

波德兰路之间。是夜月明如水，中国使馆出入虽有二门，而车中人并可瞭[8_6]见。万一予于深夜被押解出，则车中人得以驰逐于后，以踪迹予之所往，若步行则必有所不及也。

At 2 a.m. the Doctor got to bed, and having informed the Government, told the police, given the tale to the newspapers, posted private detectives for the night, his day's work was finished and practically my life was saved, although I did not know it.

予友康德黎君归寝，已在二点钟时矣。此一日间所为之事，如禀诸政府，诉诸警署，告诸报馆，而终则密遣侦探伺察于使馆之外，予友一日之心力竭，而予命亦赖是以获全。

[8_1].挝：敲；打。

[8_2].阒然：形容寂静无声的样子。

[8_3].膺：承受；承当。

[8_4].太晤士：今译“泰晤士（报）”。

[8_5].亨生车：（驾车人座位高于乘客座位并位于其后的）双轮双座马车。

[8_6].瞭：从高处向远处看。

CHAPTER VII THE GOVERNMENT INTERVENE

第七章　英政府之干涉

On Monday, October 19th, Slater's office was again asked for detectives, and, when they came, they were posted with instructions to watch the Legation night and day. At 12 noon, by appointment at the Foreign Office, Mr. Cantlie submitted his statement in writing. The Foreign Office were evidently anxious that some less official plan of release should be effected than by their active interference, in the hopes that international complications might be averted. Moreover, the proofs of my detention were mere hearsay, and it was unwise to raise a question which seemed to be founded on an improbable statement. As a step in the evidence, enquiry was made at the "Glen" Line Office, and when it was found that a passage had been asked for, the Government then knew by direct evidence that the tale was not only true, but that actual steps for its execution had been carefully laid. From this moment the affair passed into Government hands, and my friends were relieved of their responsibility.

礼拜一日即（十月十九号），康德黎君复往"思兰德号"，雇一侦探授以方略，令旦夕伺于中国使馆之外。及午，康德黎君以本国外部命，将此案始末缮成禀牍，上诸部。盖英外部之意，欲筹一非正式之办法，冀中国使馆就此释予，免致酿成国际上不堪收拾之交涉。况予之被逮纯出传闻，或得诸密诉，尚无确实之证据，故当事者谓不用正式交涉为宜。迨英政府质诸格来轮船公司，而知中国使馆确曾雇定船舱，于是始瞭然于不特私捕人犯为非虚，且实行递解亦在即。于是此案经由英政府办理，而予友之责任始宽。

Six detectives were told off by Government for duty outside the Legation, and the police in the neighbourhood were made cognisant of the facts and apprised to be vigilant. The police had, moreover, my photograph, which I had had taken in America in my European dress. To the eye of the foreigner, who has not travelled in China, all Chinese are alike so that an ordinary photograph was not likely to be of much assistance; but in this photograph I wore a moustache and had my hair “European fashion.” No Chinaman wears a moustache until he has attained the “rank” of grandfather; but even in the country of early marriages, I, who have not yet attained the age of thirty, can scarcely aspire to the “distinction.”

英政府遣侦探六人密伺于中国使馆之外，并密饬附近警署加意防守。予有欧装小影一帧系游美时所摄写者，英政府发交警吏，借资辨认。盖外国人未尝赴华游历者，其视华人面目几于彼此相同，无甚识别，故予平时所摄之影殊不足资英警察之用；若此照则不特身服西装，且有短须，即额上发亦理成欧式也。吾华虽为早婚之国，而留须极迟，其有此资格者大抵已身为人父或为人祖父，若予当时则行年犹未三十也。

On Thursday, October 22nd,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was made out against either the Legation or Sir Halliday Macartney, I know not which, but the Judge at the Old Bailey would not agree to the action, and it fell through.

及礼拜四日（即十月二十二号），英政府缮就保护人权令，拟饬中国使馆或马凯尼将人犯交出审讯。嗣以中央刑事裁判所不允，遂未见实行。

On the afternoon of the same day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of the Globe called at Mr. Cantlie's house and asked him if he knew anything about a Chinaman that had been kidnapped by the Chinese Legation. Well, he thought he did; what did the Globe know about it? The Doctor said he had given the information to the Times on Sunday, October 18th, five days before, and further supplemented it by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Monday, October 19th, and that he felt bound to let the Times make it public first. However, Mr. Cantlie said, "Read over what you have written about the circumstance, and I will tell you if it is correct." The information the Globe had received proving correct, the Doctor endorsed it, but requested his name not to be mentioned.

是日（十月二十二号）下午，有《地球报》特派访员造见康德黎君，询以中国使馆诱捕之某华人，其生平行事及本案情节。康君尽以所知相告，并称尝于五日前即礼拜日（即十月十八号）以孙某事告于太晤士报馆，继复于礼拜一日（即十月十九号）续往报告，故康德黎君之意，此案宜向《太晤士报》首先发表。既而康德黎君又谓《地球报》访员曰："虽然，君试以笔录者为吾一诵之，吾当为君正之也。"于是访员以所草之稿，向康德黎君诵毕，康德黎曰："甚是，君可即以此登报，惟稿中不可述康德黎之姓名。"

Of course many persons were acquainted with the circumstances long before they appeared in print. Some two or three hundred people knew of my imprisonment by Tuesday morning, and it was a wonder that the ever eager correspondents did not know of it before Thursday afternoon. However, once it got wind there was no hushing the matter up, for from the moment the Globe published the startling news, there was no more peace at 46

Devonshire Street, W.

此案于未经刊布之前，知者已不乏人，当礼拜二日（即十月二十号）之晨至少已及二三百之数。然彼到处谘询、随事刺探之报馆访员，则至礼拜四日（即十月二十二号）之下午而始有所闻，亦可异也。迨报界风闻，则事难更隐。自《地球报》揭露此可惊可愕之异闻，而覃文省街四十六号之屋几乎户限为穿，予老友康德黎君遂觉应接不暇矣。

Within two hours after the issue of the fifth edition of the Globe, Mr. Cantlie was interviewed by a Central News and a Daily Mail reporter. He was too reticent to please them, but the main outlines were extracted from him. The two searchers after truth next called at the Chinese Legation and asked to see Sun. They were met by the ever-ready and omnipresent Tang, who denied all knowledge of such a man. Tang was shown the report in the Globe, at which he laughed merrily and said the whole thing was a huge imposition. The Central News reporter, however, said it was no good denying it, and that if Sun was not given up, he might expect 10,000 men here to-morrow to pull the place about his ears. Nothing, however, moved Tang, and he lied harder than ever.

《地球报》发行后不及二小时，《中央新闻》及《每日邮报》各有访员一人登予友之门，咨访此事。予友虽力主缄默，然于本案大概情形，仍举一二以告。两访员兴辞后，径往中国使馆求晤孙某，其出接者即彼机变环生之唐先生。唐先生力称使馆并不知有孙某。于是访员示以《地球报》所刊新闻。唐大笑曰："是皆欺人之谈，纯出凭空构造。"《中央新闻》访员乃正告之曰："君无庸讳饰，彼孙某被幽于斯，若不立行释放，则明日之晨将见有数千百之市民围绕使馆，义愤

所发，诚不知其所极耳！”唐某仍声色不动，且狡展 [9_1] 更甚于前。

Sir Halliday Macartney was next unearthed at the Midland Hotel and interviewed. His statements are best gathered from the Press reports.

既而访员等四出以求马凯尼之踪迹，得诸米突兰旅馆。其与访员问答之辞，详见英国各报纸，今转录如下：

Sir Halliday Macartney, Counsellor of the Chinese Legation, visited the Foreign Office at 3.30 yesterday afternoon. In conversation with a press representative, Sir Halliday said: I am unable to give you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man detained at the Legation, beyond what has already appeared in print. On being informed that the Foreign Office had just issued an announcement to the effect that Lord Salisbury had requested the Chinese Minister to release the prisoner, Sir Halliday admitted that this was so, and in answer to a further question as to what would be the result of the request, replied: “The man will be released, but this will be done strictly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s of the Legation involved.”

中国使馆参赞马凯尼勋爵于昨日下午三点半钟赴外部，面陈一切。马凯尼答某报访员之问曰：“某甲被留于中国使馆一事，除报纸已载之消息外，我殊不能更有所陈述。”访员曰：“外部刊有布告，谓外部大臣萨里斯伯已照会中国公使，请其将拘留之人释放矣。”马凯尼曰：“诚然。”访员曰：“敢问此照会之结果若何？”马凯尼答曰：“某甲自当释放，然释放之时须力顾公使馆之权利，勿使稍受侵害。”

In course of a later conversation with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ess, Sir Halliday Macartney said: Sun Yat Sen is not the name of the man whom we have in detention upstairs. We have no doubt of his real identity, and have been from time to time fully informed of all his movements since he set foot in England. He came of his own free will to the Legation, and was certainly not kidnapped or forced or inveigled into the premises. It is quite a usual thing for solitary Chinamen in London to call here to make casual inquiries, or to have a chat with a countryman. There appears, moreover, to be some ground for suspecting that this peculiar visitor, believing himself unknown, came with some idea of spying on us and getting some information. Nobody knew him by sight. When he called he got into conversation with one of our staff, and was afterwards introduced to me. We chatted for a while, and some remarks he made led me after he had gone to suspect he might be the person we were having watched. These suspicions being confirmed, he was, on returning the following day, detained, and he is still under detention pending instruction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厥后又有某报访员晋谒马凯尼，马凯尼谓之曰："彼拘留于本使馆之华人，并非孙逸仙。此人之果为谁某，及其既抵英国后之一举一动，本使馆洞悉靡遗。彼之赴使馆系出自己意，并非由使馆之引诱或强迫或拘捕。盖华人之来伦敦者，独居无俚[9_2]，人地生疏，而至使馆问讯或与使馆中人聚语，固属常有之事。特此人之来，其形迹似有所窥伺，且自恃使馆中无识其人者，故敢为之而无忌。初时由使馆某员接见，既而介绍于我（马凯尼自谓），谈言酬酢之中，彼无意倾吐一二语，始疑及此人者殆即本使馆所伺其举动、稔其平昔之某某也。迨次日复来，而其人之为某某确已徵实，遂拘留于此，俟中国政府训令既至，而后量为处置。"

Speak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side of the matter, Sir Halliday said: The man is not a British, but a Chinese, subject. We contend that for certain purposes the Legation is Chinese territory, where the Chinese Minister alone has jurisdiction. If a Chinaman comes here voluntarily, and if there are charges or suspicions against him, we contend that no one outside has any right to interfere with his detention. It would be quite different if he were outside this building, for then he would be on British territory, and we could not arrest him without a warrant.

马凯尼之论国际问题则曰："某甲华人也，非英人也。中国之公使馆不啻为中国之领土，其有统治权者惟中国公使一人而已。华人之赴公使馆，既出自其人之本意，而公使馆以其有罪案嫌疑之故，即加以拘留，此在外人实无干涉之权。设其人而在公使馆之门外，则办法即从而大异。盖门外为英国之领土，公使馆非先请信票，即不能逮捕也。"

Answering further questions, Sir Halliday mentioned that the man was not treated like a prisoner, and every consideration had been paid to his comfort. Sir Halliday ridiculed the statement which has appeared that the captive might be subjected to torture or undue pressure. He added a statement that a letter of inquiry had been received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on the subject, which would receive immediate attention.

马凯尼又答曰："某甲虽被拘留，然使馆并不视为囚犯，起居饮食均甚优待。外间所称某甲或受非刑，或遭虐迁等语，殊堪嗤笑。"马凯尼又谓英国外部已来函质问，公使馆拟即备文答复云云。

The Central News says: Sir Halliday Macartney, on his return to the Chinese Legation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proceeded to the bedside of the Minister Kung Ta Jen, and explained to him that Lord Salisbury had insisted upon the release of Sun Yat Sen.

《中央新闻》曰："马凯尼勋爵自外部回中国使馆后，即趋至龚大人之寝室，告以外部大臣萨里斯伯必欲将孙逸仙释出使馆之种种理由。"

It is not for me to discuss the behaviour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I leave that to public opinion and to his own conscience. In his own mind, I have no doubt, he has reasons for his action; but they seem scarcely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a sane man, let alone the importance of the position he occupies. I expect Tang expressed the position pretty exactly when he told me that "the Minister is but a figure-head here, Macartney is the ruler."

马凯尼之所言所行是否正当，非予所欲言，直宜听诸公论，并质诸其一己之良心而已。在马凯尼之意，以为彼之举动亦自具有理由，然在头脑清醒者当不出此，而况马凯尼又身为使馆参赞，其职位至为重要乎！且不第身为参赞而已，彼唐先生不云乎：中国公使仅拥虚名，而使署大权则尽操诸其手也。

Various reports of an intended rescue crept into the newspapers. The following is an example:

当时予友所以营救予者，几于无计不施，录新闻纸一则亦足以见

其大概也：

In reference to the arrest of Sun Yat Sen, it has been ascertained that his friends had arranged a bold scheme to bring about his rescue. Had they not been definitely assured by the Foreign Office and Scotland Yard that no harm whatever should come to him, his rescue was to be effected by means of breaking the window of his room, and descending from the roof of No. 51 Portland Place, the residence of Viscount Powerscourt. His friends had succeeded in informing him of the plan they intended to pursue, and although information which was subsequently obtained pointed to the fact that Sun Yat Sen was being kept handcuffed, a promise of inside assistance in opening the window satisfied his friends of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lan. Indeed, so far matured was the scheme, that a cab was held in waiting to convey Sun Yat Sen to the home of a friend. By the prisoner's friends it is declared that Long, the interpreter at the Legation, was one of the Chinamen who actually decoyed Sun into the Legation, though he was invariably the most positive subsequently in denying that such a man had ever been inside the Legation walls. His friends declare that Sun was dressed in English clothes, and so far from his being a typical Oriental, when dressed according to Western fashion was invariably taken for an Englishman. He is declared to be a man of unbounded good nature and of the gentlest disposition in Hong Kong, and the various places where he practised medicine he obtained a reputation for skill and benevolence towards the poor. He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in a great extent the tool of the Canton conspirators, though he never hesitated to condemn the cruel and oppressive Government of the Viceroy of Canton. He is said to have journeyed throughout Canton in the interests of his society, and the plot itself is declared to be the most widespread and formidable

since the present Emperor commenced to reign.

“现访得孙逸仙之友，曾筹备一勇悍之策，以为援救。后由外部及苏格兰警署向某等担保，谓孙某在中国使馆决不至受荼毒，其策因以作罢。盖孙君之友已请于包华斯谷子爵，拟登家之屋顶，攀缘以达中国使馆，破孙君所居室之窗，挟之而出。子爵家在波德兰区五十一号，与中国使馆比邻。某等并将此计密达孙君。孙君虽被中国使馆加以桎梏，行动不得自由，然仍密报其友，谓如蒙相援，当于室内用力毁去窗棂，以期出险等语。其友辈并备一车，候于中国使馆侧，待孙君既出，即乘车疾驰至其友家。”

The real facts are these. Cole sent the following communication to Mr. Cantlie on October 19th, 1896: “I shall have a good opportunity to let Mr. Sun out on to the roof of the next house in Portland Place to-night. If you think it advisable, get permission from the occupants of the house to have someone waiting there to receive him. If I am to do it, find means to let me know.” Mr. Cantlie went with this letter to Scotland Yard and requested that a constable be posted with himself on the roof of the house in question; but the Scotland Yard authorities, thinking it was an undignified proceeding, dissuaded him from his purpose, and gave it as their firm conviction that I should walk out by the front door in a day or two.

报纸所载虽不尽无因，然与事实略有异同。盖英仆柯尔于十月十九号遗书于予友康德黎君，谓某于今夕当有一绝妙机会，可使孙君攀缘至波德兰区邻屋之巅，借以出险；君如以此计为可行，则请商准邻屋主人，遣一人待于其室，借资援手，并望赐复以定进止云云。康德黎君既接此书，即持赴苏格兰场警署，乞遣一巡警与康德黎君偕往波

德兰区，用相协助。惟警署中人，以为此等计划不免损失威严，殊非正办，故力劝予友勿行；并谓孙某必能于一二日后，由中国使馆正门徜徉以出云。

[9_1].狡展：狡辩抵赖。

[9_2].无俚：亦作“无里”，无聊。

CHAPTER VIII RELEASED

第八章 省 释

On October 22nd Cole directed my attention to the coal scuttle, and when he left the room I picked up a clipping from a newspaper, which proved to be the Globe. There I read the account of my detention, under the heading: “Startling Story! Conspirator Kidnapped in London! Imprisonment at the Chinese Embassy!” And then followed a long and detailed account of my position. At last the Press had interfered, and I felt that I was really safe. It came as a reprieve to a condemned man, and my heart was full of thankfulness.

十月二十二号，柯尔携煤篓入，微示意于予。待其既出，就篓中检得一纸，则剪自《地球报》者。其载予被逮情形，颇称详尽，即观其标题已足骇人心目，如曰《可惊可愕之新闻》，曰《革命家之被诱于伦敦》，曰《公使馆之拘囚》。予急读一过，知英国报界既出干涉，则予之生命当可无害。当时予欣感之情，真不啻临刑者之忽逢大赦也！

Friday, October 23rd, dawned, and the day wore on, and still I was in durance. At 4.30 p.m., however, on that day, my English and Chinese guards came into the room and said “Macartney wants to see you downstairs.” I was told to put on my boots and hat and overcoat. I accordingly did so, not knowing whither I was going. I descended the stairs, and as it was to the basement I was being conducted, I believed I was to be hidden in a cellar whilst the house

was being searched by the command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 was not told I was to be released, and I thought I was to enter another place of imprisonment or punishment. It seemed too good to be true that I was actually to be released. However, Mr. Cantlie presently appeared on the scene in company with two other men, who turned out to be Inspector Jarvis from Scotland Yard, and an old man, the messenger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礼拜五日（即十月二十三号）自朝至午，仍幽居一室中，未见有何发动。及傍晚四点半钟，彼监守予之使馆卫兵，一中一西，忽发键而入，谓予曰："马凯尼君在楼下待汝。"旋令予纳履戴冠，并加外褂，既毕，即导予至最下一层。予意英政府或将遣一人搜检，故若辈欲藏予于地窟中，未可知也。守兵虽告予省释在即，然予终未敢遽信。既而忽睹予友康德黎君，又见有与予友偕至者二人，予心始为之一舒，而知省释之言为非谬矣。

Sir Halliday Macartney then, in the presence of these gentlemen, handed me over the various effects that had been taken from me, and addressed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the following effect:— "I hand this man over to you, and I do so on condition that neither the prerogative nor the diplomatic rights of the Legation are interfered with," or words to that effect. I was too excited to commit them to memory, but they seemed to me then, as they do now, senseless and childish.

与予友偕至者，一为苏格兰场之侦探长，其一年事已老则英外部之使者也。马凯尼当诸人之前，将搜去各物一一还予，并对侦探长及外部使者为简短之说辞，曰："某今以此人交付君等。某之为此，期在使本公使馆之特别主权及外交权利两不受损。"云云。予当时方寸

激扰，更不能深辨其言之趣味，然在今日观之，则其所云云，岂非毫无意旨，而又童騃[10_1]之甚者哉！

The meeting related above took place in a passage in the basement of the house, and I was told I was a free man. Sir Halliday then shook hands with us all, a post- Judas salutation, and we were shown out by a side-door leading to the area. From thence we ascended the area steps, and issued into Weymouth Street from the back door of the Legation. It will perhaps escape observation and pass out of mind as but a minor circumstance that we were sent out by the back door of the Legation. The fact of the rescue was the all important measure in the minds of the little group of Englishmen present; not so, however, with my astute countrymen; not so especially with Sir Halliday Macartney, that embodiment of retrograde orientalism. The fact tha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ere shown out by the back door, as common carrion, will redound to the credit of the Minister and his clientelle in the high courts of their country. It was intended as a slight and insult, and it was carried out as only one versed in the Chinese methods of dealing with foreigners can appreciate. The excuse, no doubt, was that the hall was crowded with reporters; that a considerable throng of people had assembled in the street outside the building; that the Foreign Office was anxious that the affair should be conducted quietly without demonstration. These, no doubt, were the reasons present in the everready minds of these Manchurian rapscallions and their caretaker Macartney.

既而马凯尼告予，谓予已恢复自由，遂与予侪一一握手，启使馆之侧门，肃予侪出。予侪于是出门下阶，由使馆屋后而入于渭墨街中矣。兹事虽微，然以英政府之代表而竟令从后门出，在中国外交家方

且自诩其交涉之间又得一胜利，其为有意简亵 [10_2] ，固无可讳言。彼马凯尼虽非华人，然固同化于华俗，而又于东方风气之中深得其江河日下之一部分者也。倘外人以此相责，则马凯尼又必有随机而发之诡辞，如谓使馆前厅既为报馆访员所占，而使馆大门之外又为千百市民所围绕，当时英国外部之意急欲将此案暗中了结，勿俾张扬，则使者之出虽由后户，而于英国当道之用心固不失为体贴尽致也。

To English ways of looking at things, the fact of my release was all that was cared for; but to the Chinese the manner of the release wiped out all the triumph of British diplomacy in obtaining it. Both had their triumph, and no doubt it brought them equal gratification.

英人观念与华人不同。在英人方以为外交之胜利，而中国使馆只须于省释时之举动间略加播弄，即不难一变而为中国外交之胜利。故予之省释，在英华两方面固各有其可慰者在也。

It was not an imposing party that proceeded to the Chinese Legation that Friday afternoon in October; but one member of it, the venerable old messenger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had a small note concealed in the depths of his great-coat pocket that seemed to bear great weight. It must have been short and to the point, for it took Macartney but two or three seconds to master its contents. Short it may have been, but it bore the sweet message of freedom for me, and an escape from death, and what I dreaded more, the customary exquisite torture to which political prisoners in China are submitted to procure confession of the names of accomplices.

予省释之前，外部使者于衣囊中探一纸授马凯尼。马凯尼才一展阅，即毕稔其内容。是可知此纸所书，仅寥寥数语而已，然予之生死则固系于是矣。

In Weymouth Street a considerable crowd had assembled, and the ever-present newspaper reporter tried to inveigle me there and then into a confession. I was, however, speedily put into a four-wheeled cab, and, in company with Mr. Cantlie, Inspector Jarvis, and the messenger, driven off towards Scotland Yard. On the way thither Inspector Jarvis gravely lectured me on my delinquencies, and scolded me as a bad boy, and advised me to have nothing to do any more with revolutions. Instead of stopping at Scotland Yard, however, the cab drew up at the door of a restaurant in Whitehall, and we got out on the pavement. Immediately the newspaper men surrounded me; where they came from I could not tell. We had left them a mile away in Portland Place, and here they were again the moment my cab stopped. There is no repressing them; one man had actually, unknown to us, climbed up on the seat beside the driver. He it was that stayed the cab at the restaurant, knowing well that if once I was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Scotland Yard they could not get at me for some time. Unless the others—some dozen in number—were on the roof of my cab, I cannot understand where they sprang from. I was hustled from the pavement into the back premises of the hostelry with much more violence than ever was expended upon me when originally taken within the Chinese Legation, and surrounded by a crowd thirsting for knowledge as eagerly as my countrymen thirsted for my head. Pencils executed wonderful hieroglyphics which I had never seen before, and I did not know until that moment that English could be written in what seemed to me cuneiform characters. I found out afterwards it was in shorthand they were writing. I spoke until I could speak no more, and it was

only when Mr. Cantlie called out “Time, gentlemen!” that I was forcibly rescued from their midst and carried off to Scotland Yard. At the Yard I was evidently regarded as a child of their own delivery, and Jarvis’s honest face was a picture to behold. However, the difficult labour was over, and here I was free to make my own confession. I was detained there for an hour, during which time I made a full statement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my capture and detention. This was all taken down and read over to me, and I appended my signature and bade a cordial adieu to my friends in the police force. Mr. Cantlie and myself then hied ourselves homewards, where a hospitable welcome was accorded me, and over an appetising dinner, a toast to my “head” was drunk with enthusiasm.

既出使馆门，则渭墨街中之环而待者，亦至拥挤。彼报馆访员见予，即欲要予叙话。侦探长急拥予入一四轮车，与予友康德黎及外部使者同驱至苏格兰场。侦探长名乔佛斯，在车中危言正色向予诰诫[10_3]，甚且呼予为顽童；谓此后务宜循规蹈矩，不可复入会党，从事革命。车抵白宫区某旅馆前，忽焉停轮，予辈自车中出，立于道旁。瞬息间，各报访员已绕予而立。予辈自波德兰区驰骋至此，已半英里有余，而各访员又何能突然出现于此？中有一人，予见其曾跃登御人之侧，与御人共坐而来。然此外尚有十余人，岂盘踞于予辈车顶而偕来者耶？各报访员虑予一入苏格兰场警署，或不免有稍久之盘桓，因要予于某旅馆前，俟予出，即拥予至旅馆之后屋。其为势之强，较诸唐某等曳予入使馆时为尤甚；而各访员等之渴欲探予消息，较诸中国使馆之渴欲得予头颅为尤剧也。予既入旅馆，被围于众人之中，有问即答，各访员随答随写，其疾如飞。予观其所书，心窃异之，盖予当时犹未知其所用者为速记书法也。予言既穷，无可复语，忽闻予友康德黎君呼曰：“诸君乎，时至矣！”予仍被拥簇入车，向苏格兰场进发。警署之视予，直同一无知少年，即观于侦探长乔佛斯可见。盖乔佛斯诚挚之容色，坦率之言辞，长者之对于卑幼则然也。予既入警

署，即将前后所遭历述一过。警官录毕，向予宣读，读毕命予署名纸末。所历可一小时，乃偕予友康德黎君兴辞而出。

During the evening I was frequently interviewed, and it was not until a late hour that I was allowed to rest. Oh! that first night's sleep! Shall I ever forget it? For nine hours did it last, and when I awoke it was to the noise of children romping on the floor above me. It was evident by their loud, penetrating voices some excitement was on hand, and as I listened I could hear the cause of it. "Now, Colin, you be Sun Yat Sen, and Neil will be Sir Halliday Macartney, and I will rescue Sun." Then followed a turmoil; Sir Halliday was knocked endways, and a crash on the floor made me believe that my little friend Neil was no more. Sun was brought out in triumph by Keith, the eldest boy, and a general amnesty was declared by the beating of drums, the piercing notes of a tin whistle, and the singing of "The British Grenadiers." This was home and safety, indeed; for it was evident my youthful friends were prepared to shed the last drop of their blood on my behalf.

康德黎君挈予归，相见之悲喜，接待之殷挚，自无待言。康德黎君夫妇等，咸举杯为予头颅寿。是晚求见予者弗绝，至深夜始得就寝。此一宵睡梦之酣，实为予有生以来所罕觏 [10_4] 。连睡至九小时，忽为楼上群儿跳号之声所警醒。第闻康德黎君之长子名坎思者，谓其弟妹曰："柯林，汝扮作孙逸仙。柰儿，汝扮作马凯尼。我则为援救孙逸仙者。"未几，喧闹杂沓之声大作，马凯尼被扑于地矣，孙逸仙被援出险矣。于是鼓声，笛声呜呜，以示大赦罪之意；而合唱一歌，名曰《布列颠之前锋队》。

During Saturday, October 24th, I was interviewing all day. The

one question put was, “How did you let the doctors know?” and the same question was addressed to Mr. Cantlie many scores of times. We felt, however, that our tongues were tied; as, by answering the query, we should be incriminating those who, within the Legation walls, had acted as my friends, and they would lose their positions. However, when Cole resolved to resign his appointment, so that none of the others should be wrongly suspected, there was no object in hiding who had been the informant. It is all very well to say that I bribed him; that is not the case. He did not understand that I gave him the money by way of fee at all; he believed I gave it him to keep for me; he told Mr. Cantlie he had the £20 the day he got it, and offered to give it to him for safe keeping. When I came out Cole handed the money back to me, but it was the least I could do to urge him to keep it. I wish it had been more, but it was all the ready money I had. Cole had many frights during this time, but perhaps the worst scare he got was at the very first start. On the Sunday afternoon, October 18th, when he had made up his mind to help me practically, he took my notes to Mr. Cantlie, in his pocket, at 46 Devonshire Street. The door was opened and he was admitted within the hall. The doctor was not at home, so he asked to see his wife. Whilst the servant was gone to fetch her mistress, Cole became conscious of the presence of a Chinaman watching him from the far end of the hall. He immediately suspected that he had been followed or rather anticipated, for here was a Chinaman, pigtail and all, earnestly scrutinising him from a recess. When Mrs. Cantlie came down she beheld a man, trembling with fear and pale from terror, who could hardly speak. The cause of this alarm was a model of a Chinaman, of most life-like appearance, which Mr. Cantlie had brought home with him amongst his curios from Hong Kong. It has frightened many other visitors with less tender consciences than Cole’s, whose overwrought nerves actually endowed the figure with a halo of terrible reality. Mrs. Cantlie

relieved Cole’s mind from his fear and sent him in to find her husband at Dr. Manson’s.

礼拜六日（即十月二十四号），来访者仍终日弗绝。予与康德黎君一一应答，几于舌敝唇焦。且来访者无不亟亟问讯，康德黎、孟生二博士何以能得此消息。设予侪漫应曰“赖使馆中人之密为传递”，则使馆中人之厚予者反不免因是而被嫌疑，遭摈斥，是大不可也。乃英仆柯尔自此案既白，即毅然辞退，不愿复役于中国使馆。是则以一身之去，免余人于嫌疑，而予侪亦可以道破实情，谓居间通信乃出于柯尔之力也。至外间谓予厚赂柯尔因得脱险，殊非事实。予以密信授柯尔，并以二十镑，固谓柯尔为予效奔走，不得不稍偿其劳；讵知柯尔即于得金之次日，转授于予友康德黎君，谓此为孙某之物，请予友代为收贮。及予既归，始知其事，乃以二十镑力迫柯尔受之。予当时财力止此，故所赠亦止此，揆 [10_5] 诸方寸，殊嫌未惬也。当十月十八号（即礼拜日）下午柯尔为予投书至康德黎家时，既已按铃入门，达于厅事，知予友已外出，乃请见康德黎夫人。仆闻言，入白夫人。柯尔独立厅事中，瞥见厅之一隅有一华人伫立而望，因大惊失色，自思此来必已为使馆所知，故遣人尾随至此。迨夫人出，柯尔以所疑告。夫人急慰解之，令其无恐。盖立于室隅者实一塑成之中国人形，其大小与人身相似，康德黎君在香港行道时赏其塑制之工，遂购归，设于厅事。骤见者往往怪诧，而柯尔心胆既虚，则惶恐尤甚也。

My part of the tale is nearly ended; what further complica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ffair may arise I cannot say. There is not time, as yet, to hear how the papers in other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will deal with the subject, and as Parliament has not yet assembled I cannot say what questions appertaining to the event may be forthcoming. I have, however, found many friends since my release. I have paid several pleasant visits to the country. I have been dined and feasted, and run a good chance of being

permanently spoiled by my well-wishers in and around London.

予当日遭逢，大略尽是。是时英议院尚未届召集之期，故不知议院云何。然予自出险之后，相识渐众，伦敦及伦敦以外之英人多以是谬相推爱，极一时宾朋酬酢之乐焉。

[10_1].童騃：年幼无知。

[10_2].简亵：怠慢不恭；轻慢无礼。

[10_3].诰诫：告诫。

[10_4].罕觏：难得遇见。

[10_5].揆：推测揣度。

Appendix

附 录

I append a few of the numerous articles called forth by my arrest.

当时英国报纸关于此案之记载评论，谨择要附录于下。

The first is a letter from Professor Holland to The Times, and is headed: *The Case of Sun Yat Sen* :

其最先投函于伦敦《太晤士报》者，为荷兰学士，文曰《孙逸仙案》：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记者足下：

Sir,—Th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imprisonment of Sun Yat Sen are two in number. First, was the act of the Chinese Minister in detaining him an unlawful act? And secondly, if so, what steps could properly have been taken to obtain his release had it been refused?

因孙逸仙案而发生之问题有二：（一）中国公使之拘留孙某，是否为违法举动？（二）设其为违法举动，而又不允释放，则宜用何种适当之方法，俾将孙某释出？

The reply to the former question is not far to seek. The claim of an Ambassador to exercise any sort of domestic jurisdiction, even over members of his suite, is now little heard of, although, in 1603, Sully, then French Ambassador, went so far as to sentence one of his attachés to death, handing him over to the Lord Mayor for execution. I can recall but one instance of an attempt on the part of a Minister to exercise constraint against a person unconnected with his mission. In 1642, Leitao, Portuguese Minister at the Hague, detained in his house a horse-dealer who had cheated him. The result was a riot, in which the hotel was plundered, and Wicquefort remarks upon the transaction that Leitao, who had given public lectures on the Law of Nations, ought to have known qu'il ne lui estoit pas permis de faire une prison de sa maison. Sun Yat Sen, while on British soil as a subditus temporarius, was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our Laws, and his confinement in the Chinese Legation was a high offence against 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rown.

第一问题之答语，固无庸远求。盖自一千六百又三年法国苏尔黎为驻英公使时，虽有将某随员判定死罪移请伦敦市尹正法之事，然自是厥后，凡为公使者罕或行使其国内裁判权，即对于使馆中人亦久不行用此权。惟一千六百四十二年，葡萄牙驻荷公使蓝陶氏以见欺于马贩某，将该马贩拘禁于使馆，终至激起荷人之暴动，将公使馆搜劫一空。当时荷人威克福氏对于蓝陶此举深致评驳，盖蓝陶氏固尝在大庭广众中演说万国公法，非不知法律者也。今孙逸仙既在英国，自当受英国法律之保护，乃公使馆骤加拘禁，是其侵犯吾英国之主权者大

矣。

The second question, though not so simple, presents no serious difficulty. A refusal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Minister to release his prisoner would have been a sufficient ground for requesting him to leave the country. If this mode of proceeding would have been too dilatory for the exigencies of the case, it can hardly be doubted that the circumstances would have justified an entry upon the Legation premises by the London police. An Ambassador's hotel is said to be "extra-territorial," but this too compendious phrase means no more than that the hotel is for certain purposes inaccessible to the ordinary jurisdiction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it stands. The exemptions thus enjoyed are, however, strictly defined by usage, and new exemptions cannot be deduced from a metaphor. The case of Gyllenburg, in 1717, showed that if a Minister is suspected of conspiring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o which he is accredited he may be arrested and his cabinets may be ransacked. The case of the coachman of Mr. Gallatin, in 1827, establishes that, after courteous notice, the police may enter a Legation in order to take into custody one of its servants who has been guilty of an offence elsewhere. There is also a general agreement that, except possibly in Spain and in the South American Republics, the hotel is no longer an asylum for even political offenders. Still less can it be supposed that an illegal imprisonment in a Minister's residence will not be put an end to by such action of the local police as may be necessary.

第二问题虽不若第一问题之单简［简单］，然解决之方，要亦无甚困难。中国公使如不允将孙某释出，则英国借此理由，已足请该公使退出英国。如以事机急迫，恐饬令该公使回国之举或不免涉于迟

缓，则以本案情节而论，即令伦敦警察入搜使馆，亦不必疑其无正当理由也。或谓使馆应享有治外法权，此治外法权一语过于简括，实则其意义不过谓使馆之于驻在国，为某种缘由之故，间有非该驻在国平常法权所能及耳。然此等享有权历来相习成风，业已限制甚严，且证诸成案，而于通行之享有权外，实不能复有所增益也。证诸一千七百十七年裘伦保之案，可见使臣驻节于他国，苟犯有潜谋不利于该国之嫌疑，则该国政府得拘捕其人，搜检其使馆。又证诸一千八百二十七年茄赖丁之御人一案，只须驻在国之政府以和平有礼之通牒报告使馆之后，即可遣派警察赴该使馆拘逮犯案之仆役。又除西班牙及南美洲各共和国之外，凡使馆已不复能藏匿犯人，即政事犯亦不得借此为逋逃薮 [11_1] ，是又各国所公许者也。至于公使馆而擅行逮捕人犯，私加羁禁，则驻在国之地方警察惟有斟酌情势所需，为实力之干涉，以资解决而已。

It seems needless to inquire into the responsibility which would rest upo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f Sun Yat Sen was, as he alleges, kidnapped in the open street, or would have rested upon them had they removed him through the streets, with a view to shipping him off to China. Acts of this kind find no defenders. What is admitted to have occurred is sufficiently serious, and was doubtless due to excess of zeal on the part of the subordinates of the Chinese Legation. International law has long been ably taught by Dr. Martin at the Tung-wen College of Peking, and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cannot be supposed to be indifferent to a strict conformity to the precepts of the science on the part of its representatives at foreign Courts.

今孙逸仙坚称被中国公使馆诱劫于道途，且将舁赴轮舟，以便解送至中国，是中国官场对于此案所负之责任，固无庸深诘。中国官场悍然出此，岂尚能有辩护之余地乎？万一诱劫之情果属非虚，押解之

谋见诸实责，则此案之情之严重，不言可知。而其出于公使馆僚属之急于见功，亦可洞见麦丁博士在北京同文馆教授国际法有年，使臣在外应遵何道以行，中国政府岂犹茫然未之审也？

I am, Sir, your obedient servant, Oxford, T. E. Holland.

奥克斯福于荷兰

October 24th

十月二十四日。”

Another legal opinion is referred to below:

楷文狄虚者，生平于国际交犯之法律最极研究有素者也，其语某君之语曰：

Mr. Cavendish, one of the best authorities on the law of extradition, informed an interviewer at Bow Street yesterday that, speaking from memory, he could cite no case at all parallel with the case of Sun Yat Sen. The case of the Zanzibar Pretender was, of course, in no way parallel, for he took refuge in the German Consulate. He threw himself on the hospitality of the German Government, which, following the procedure sanctioned by International Law, refuses to give him up, and conveyed him to German territory on the mainland. Sun Yat Sen’s case was that of an alleged Chinese subject, having come within the walls of the Legation of his own country, was arrest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his

own Government for an offence against that Government. Mr. Cavendish assumed that if the facts were as stated, the case could only be dealt with by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 on the part of our Foreign Office, and not by any known legal rule.

“孙逸仙一案，以予记忆所及，实无其他相同之例案可资引证。昔者桑西巴（东非洲国名）谋篡君位之人犯，系自行走避于伦敦德国领事署，挟德政府相厚之情，冀为庇护；既而国际法之问题起，德人不允交出，遂移往欧洲大陆之德属境内。此与本案截然不同。盖孙逸仙系中国之籍民，其所入者系本国之使馆，其逮捕者系本国之使臣，其罪名则系谋覆本国之政府，凡此所述如悉系事实，则只须由英国外务部出而为外交上之陈辞，而无须为法律上之办理，盖按诸法律实无可引之条也。”

The next is a letter from Mr. James G. Wood to the same paper discussing some of the points of law raised in Professor Holland’s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

胡德氏为荷兰氏所建之议，亦投函《太晤士报》，为法律问题之讨论曰：

Sir,—The second question proposed by Professor Holland, though fortunatel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not of present importance, is deserving of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venture to think his answer to it unsatisfactory.

“荷兰学士所拟第二问题，虽揆诸情势，幸已无甚重要。然此端

实大有足供研究者在。窃谓该学士所拟之答语，殊不足令人满意也。

It is suggested that on a refusal by the Chinese Minister to release his prisoner, “it can hardly be doubted that the circumstances would have justified an entry on the Legation premises by the London police.” But why there should not be such a doubt is not explained. This is not solving the question but guessing at its solution. The London police have no roving commission to release persons unlawfully detained in London houses; and anyone attempting to enter for such a purpose could be lawfully resisted by force. The only process known to the law as applicable to a case of unlawful detention is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and this is where the real difficulty lies. Could such a writ be addressed to an Ambassador or any member of the Legation? Or if it were, and it were disregarded, could process of contempt follow? I venture to think not; and I know of no precedent for such proceeding.

该学士论及中国公使万一不肯将人犯释放条下，有云‘以本案情节而论，即令伦敦警察入搜使馆，亦不必疑其无正当理由’云云。该学士既曰不必疑，则必有其可疑者可知；至于可疑者究竟何在，则该学士未之释明也。以该学士之所答，并不能谓为解决问题，只可谓之猜测而得一解决法耳。公使馆即或违法而拘留人犯，然伦敦警察并无入公使馆释放人犯之职权；万一有入公使馆而为此举动者，公使馆尽可以强力拒敌之，揆诸法律无不合也。以吾所闻，公使馆果有私拘人犯之事，则揆诸法律所可以行用之手续，惟有颁发交犯审讯之渝（即保护人权之令，若被捕后不即交审，可发此谕交由公堂讯判，如无罪则二十四小时后即应保释）而已。顾事有难焉者，则此渝将交诸公使乎？抑交诸公使馆中之员役乎？设交诸公使或员役，而彼乃置诸不问，则可施以藐视公堂之处断乎？以予所知，实无成案可以援引也。

I agree that the phrase that an Ambassador's hotel is extraterritorial is so metaphysical as to be misleading. It is, in fact, inaccurate. The more careful writers do not use it. The true proposition is not that the residence is extra-territorial in the sense in which a ship is often said to be so, but the Minister himself is deemed to be so; and as a consequence he and the members of his family and suite are said to enjoy a complete immunity from all civil process.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what mayor may not be done in the residence, but what mayor may not be done to individuals. That being so, the process I have mentioned appears to involve a breach of the comity of nations.

荷兰学士又谓公使之所居应享有治外法权，其实公使馆与轮舟不同，彼享有此权者乃公使之本身而非公使馆也。相传公使之本身及其家属随员等，于民事诉讼得享有完全蠲免 [11_2] 权，是以此等问题者，乃个人问题，而非居处问题；乃若者可施若者不可施诸公使及其家属随员等之问题，而非若者可施若者不可施诸公使馆之问题也。惟其然也，故予所拟颁布交犯审讯令之办法，似不免牵涉而有碍于邦交也。

To adduce cases where the police have under a warrant entered an Embassy to arrest persons who have committed an offence elsewhere to found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local police may take action to put an end to an illegal imprisonment," begun and continued within the Embassy, does not land us on safe ground. There is no common feature in the two cases.

至引用成案，谓警察得持信票入公使馆拘捕在他处犯有罪案之人犯，如荷兰学士所谓'公使馆而擅行逮捕人犯，私加羁禁，则地方警察

惟有为实力之干涉’云云。斯论也，实亦不足为万全之计，盖此等成案与孙逸仙案并无公同之点也。

I am, Sir, your obedient servant, James G. Wood.

胡德氏

October 27th

十月二十七日”

The Supposed Chinese Revolutionist from the CHINA MAIL, Hong Kong, Dec. 3rd, 1896: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二月三日香港《中国邮报》有论云：

Sun Yat Sen, who has recently been in trouble in London through the Chinese Minister attempting to kidnap him for execution as a rebel, is not unlikely to become a prominent character in history. Of course, it would not be right to state, until a duly constituted court of law has found, that a man is definitely connected with any illegal movement, or that any movement with which he is connected is definitely antidynastic. The only suggestion of Dr. Sun Yat Sen being a rebel in any sense comes from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London and the officials of Canton. But without any injury to him it may be safely said that he is a remarkable man, with most enlightened views on the undoubtedly miserable state of China’s millions, and that there are many Chinese

who feel very strongly on the subject and try now and then to act very strongly. The allegation of the officials is that these people tried to accomplish a revolution in October, 1895, and that Sun Yat Sen was a leader in the conspiracy. Foreigners, even those resident in the Far East, had little knowledge how near the long-expected break-up of China then was. As it happened, the outbreak missed fire, and what little attention it did attract was of the contemptuous sort. The situation was, however, one of as great danger as any since the Tai Pings were suppressed, and the organisation was much more up-to-date and on a more enlightened basis than even that great rebellion. In fact, it was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principal movers that caused the movement to be discountenanced at an early stage as premature, instead of struggling on with a more disastrous failure in view, for the revolution is only postponed, not abandoned for ever. The origin of the movement cannot be specifically traced; it arose from the general dissatisfaction of Chinese with Manchu rule, and it came to a head on the outbreak of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malcontents saw that the war afforded an opportunity to put their aspirations into shape, and they promptly set to work. At first, that is to say before China had been so soundly thrashed all along the line, they had in view purely lawful and constitutional measures, and hoped to effect radical changes without resort to violence. Dr. Sun worked hard and loyally to fuse the inchoate elements of disaffection brought into existence by Manchu misgovernment, and to give the whole reform movement a purely constitutional form, in the earnest hope of raising his wretched country out of the Slough of Despond in which it was and is sinking deeper daily. His was the master-mind that strove to subdue the wild uncontrollable spirits always prominent in Chinese reactionary schemes, to harmonise conflicting interests, not only as between various parties in his own country but also a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ers, and as between various foreign

Powers.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 was to work out the sequel of any upheaval—to anticipate and be ready in advance to deal with all the complications bound to ensue as soon as the change took place. Moreover he had to bear in mind that any great reform movement must necessarily depend very largely on the aid of foreigners, of nations and individuals as well, while there is throughout China an immense mass of anti-foreign prejudice which would have to be overcome somehow. The task was stupendous, hopeless in fact, but he recognised that the salvation of China depended and still depends on something of the sort being some day rendered possible, and that the only way to accomplish it was to try, try, try again. That is to say, last year's attempt was not likely to succeed, but was likely to bring success a stage nearer, and in that sense it was well worth the effort to an ardent patriot. Dr. Sun was the only man who combined a complete grasp of the situation with a reckless bravery of the kind which alone can make a national regeneration. He was born in Honolulu, and had a good English education. He has travelled extensively in Europe and America, and is a young man of remarkable attainments. He was for some time a medical student in Dr. Kerr's School in Tientsin, and afterwards was on the staff of the Alice Memorial Hospital in Hong Kong. He is of average height, thin and wiry, with a keenness of expression and frankness of feature seldom seen in Chinese. An unassuming manner and an earnestness of speech, combined with a quick perception and resolute judgment, go to impress one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he is in every way an exceptional type of his race. Beneath his calm exterior is hidden a personality that cannot but be a great influence for good in China sooner or later, if the Fates are fair. In China, any advocate of reform or any foe of corruption and oppression is liable to be regarded as a violent revolutionist, and summarily executed. It has been the same in the history of every country when freedom and enlightenment were in their infancy, or

not yet born. The propaganda had therefore to be disseminated with the greatest care, and at imminent peril. First, an able and exhaustive treatise on political matters wa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and circulated all over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south, where it created a sensation, early in 1895. It was most cautiously worded, and the most censorious official could not lay his finger on a word of it and complain; but it depicted in vivid colours the beauties of enlightened and honest government, contrasted with the horrors of corrupt and tyrannical misgovernment. This feeler served to show how much voluntary reform could be expected of Chinese officialdom, for it had as much effect as a volume of sermons thrown among a shoal of sharks. Then it became no longer possible to control the spirits of insurrection. Steps were at once taken to organise a rebellion, with which it is alleged, but not yet proved, that Dr. Sun Yat Sen was associated. Before the war there had been insurrectionary conspiracies—in fact, such things are chronic in China. The navy was disaffected, because of certain gross injustices and extortions practised on the officers and men by the all-powerful mandarins. The commanders of land forces and forts were not much different, and many civilian officials were willing to join in a rising. No doubt much of the support accorded to the scheme was prompted by ulterior motives, for there are more of that sort than of any other in China. The rebellion was almost precipitated in March, when funds were supplied from Honolulu, Singapore, Australia, and elsewhere; but men of the right sort were still wanting, and arms had not been obtained in great quantity, and wiser counsels prevailed.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perhaps if wiser counsels had prevailed in October, but wisdom cannot come without experience, and for the sake of the experience the leaders of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do not greatly regret their action. Some indeed drew out as soon as it became certain that violent measures were to be adopted; but the penalty of death would not be obviated by that,

and it was at imminent risk of his life that Dr. Sun had been travelling throughout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China,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good government and gathering recruits for constitutional reform. His allies, never very confident in pacific methods, planned a bold coup d'état, which might have gained a momentary success, but made no provision for what would happen in the next few moments. Men were drafted to Hong Kong to be prepared for an attack on Canton; arms and ammunition were smuggled in cement-casks; money was subscribed lavishly, foreign advisers and commanders were obtained, and attempts were made, without tangible result, to secure the co-operation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hat would have been the result if the verbal sympathy of Japanese under-officials had been followed by active sympathy in higher quarters, none can tell; the indemnity, the Liao-tung settlement, the commercial treaty,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and Europe since the war might have been totally different. Every detail of the plot was arranged, but before the time for striking the blow, treachery stepped in. A prominent Chinese merchant of Hong Kong had professed adherence to the reform movement, for he had much to gain by it; then he concluded that he could gain more by playing into the hands of the official vampires, for he was connected with one of the many syndicates formed to compete for railway and mining concessions in China after the war. So he gave information, and the cement was examined,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whole coup d'état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flash in the pan. Dr. Sun happened to be in Canton at the time, and was accused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violent section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to be innocent is not to be safe; an accusation is none the less dangerous for being utterly unfounded. Sun had to fly for his life, without a moment's deliberation as to friends or property or anything else; and for two or three weeks he was a fugitive hiding in the labyrinthine canals

and impenetrable pirate-haunts of the great Kwang-tung Delta. A report has been published that forty or fifty of his supposed accomplices were executed, and a reward was offered for his arrest, but he got away to Honolulu and thence to America. The story goes that this indomitable patriot immediately set to work converting the Chinese at the Washington Embassy to the cause of reform, and that afterwards he tried to do the same in London; that one of the Chinese in the Legation at Washington had professed sympathy with the apostle of enlightenment, and then thought more money could be made on the other side, and so telegraphed to the London Embassy to arrest Sun and kidnap him back to China by hook or by crook. However that may be, he was captured and confined in a most outrageous manner in the London Legation, whatever plausible piffle may be put forward by Sir Halliday Macartney, or any servile prevaricator; and it is due to Dr. Cantlie, Sun's friend and teacher in Hong Kong, that one of the best men China has ever produced was rescued by British justice from the toils of treacherous mandarindom. All who know Dr. Cantlie—and he is well known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agree that a more upright, honourable and devoted benefactor of humanity has never breathed. Dr. Sun is in good hands, and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such a man as Dr. Cantlie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he will pursue his chosen career with single-hearted enthusiasm and most scrupulous straightforwardness of methods, until at last the good work of humanising the miserabl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is brought to a satisfactory state of perfection.

“孙逸仙者，即近日被逮于伦敦中国公使馆，拟置诸典刑，视同叛逆者也。顾此人他日似未必不为历史中之重大人物，然未经正当之法庭加以审讯，自不得谓为与会党有关，且不得谓该会党之举动确在倾覆中国朝廷也。彼以孙逸仙为叛逆者，仅出于伦敦中国使馆与夫广

东官场之拟议耳。然孙君固非寻常人物，以开通之知识而目击中国数百兆人之流离困苦，彼一般华人之中，且有慨然动念、奋然思起者矣。据中国官场之宣告，谓此等华人曾于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十月间起而图乱，其为之领袖者，则孙逸仙也。中国之不免于变乱，夫人而能言之；而其变乱之期之迫于眉睫，则无论居于外国之外人不能知，即寓于远东之外人亦罕有能知之者也。迨广州之变既作，以事机不密，倏就倾覆，而当事者仍漠然不动于心，至堪齿冷 [11_3] 。他日变起，其可危必更甚于昔之金田军；盖其组织之新颖，基础之文明，较金田军尤数倍过之也。总之，领袖诸人以事机未熟，故暂图偃伏，非以偶然失败之故而遂尽弃其革命之计划也。至革命派之缘起，虽无由追溯，而其大致要由不慊于清廷之行事。近中日一战，而此派遂崭然露其头角。孙逸仙博士辈之初意，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要求立宪政体之创行而已，迨至和平无效，始不得不出于强力。然历观中国历史中之崛起陇亩、谋覆旧朝者，其精神意气大都豪悍不驯；而孙氏则独不然，秉其坚毅之心志，不特欲调和中国各党派，且将使华人与西人、中国与外国亦得于权利之间悉泯 [11_4] 冲突焉。然而事有至难解决者，则一举之后必有种种继起之困难，而此等困难最足使任事者穷于应付也。孙氏岂不知有大兴作，不得不借外国之国家与个人为之援助，然而中华全国方无处不为排外之精神所贯彻，是则欲泯除而开导之，固不能不有需乎时日也。总之，此等事业，其性质至为宏硕，而其举措又至为艰难。惟孙氏则本其信心，谓他日欲救中国，势不能不出乎此；而目前则惟有黾勉 [11_5] 以图，冀其终底于成功而已。孙氏诞生于火纳鲁鲁，受有英国完美之教育，且于欧美二洲游历甚广，其造诣亦至深。昔尝学医于天津，继复执业于香港。其躯干适中，肌肤瘦挺，容貌敏锐而爽直，举动之间毫无矫矜，而言语又极恳挚；至其知觉之敏捷，处事之果毅，尤足使人油然生信仰之心，是诚不可谓非汉族中之杰出者也。中国今日正与各国在专制时代无异，凡主张创行新政、革除腐败者，概被以叛逆之名，故有志之士欲传播其主义，势不得出以慎密。孙氏于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始著有政治性质之文字，发行于香港，而传播于中国南省。其于良政府与恶政府描述极为尽致，两两相较，自足使人知所去取。然而措辞至为留意，虽以彼很［狠］若狼虎、善于吹求之中国官吏，亦复未从而指摘之。中国人士得读此

书，无不慨然动念。未几，遂有秘密会社之发生，则孙氏与焉。当中日战事未起以前，中国水陆两军，以上官之遏抑，已多怀怨望；即文官亦非无表同意者。况中国伏莽 [11_6] 遍地，响应尤易。其初次起事之期定于本年三月间，时则火纳鲁鲁、新嘉坡 [11_7] 、澳洲等处，纷纷输资回华。然人才尚形缺乏，军需亦未充足，遂改期至十月间。于时军械弹药陆续购备矣，香港之党人赴粤以攻广州矣，饷项亦甚形富足矣，外国之参谋官及军事家已延聘矣。日本政府虽无明白之答复，而党人则已请其援应矣。凡起事之谋，可谓应有尽有。不幸为奸人所算，泄其谋于当事，卒至全功尽覆。盖当时有侨寓香港之中国某富商，附和新党，知其集资购械等事可缘以为利，遂宛然以富商而为志士。既而知起事期迫，该商方为中日战事后某财政团之一，经营中国路矿等事，恐干戈一起则权利将受影响，遂不惜举党人之谋尽泄于粤官，而仍缘之以为利。党人之计既被所倾覆，孙氏即出奔于异国。此次以嫌疑被戮者凡四五十人，并悬赏以缉孙氏。孙氏由香港至火纳鲁鲁，复由火纳鲁鲁至美国。驻美中国公使馆中人闻孙氏之绪论，颇有志于革新。既而赴伦敦，思欲以鼓吹驻美使馆者鼓吹驻英使馆。而不意美使馆有阳则赞成革命，阴则志香港富商之志，思缘以为利者，密白其事于驻英使馆。而孙逸仙被使馆诱劫之案，遂因以演成矣。此案虽由马凯尼一再辨护，而孙氏之始则被劫，继则羁禁，固已无可讳言。至孙氏之得脱于祸，实赖友人康德黎博士之力云。”

A leading article in The Times of Saturday, October 24th, 1896, discusses the question very fully:

当时英人士讨论此案，多集矢于马凯尼，《太晤士报》最先著论抨击之，文曰：

While the “Concert of Europe” is supposed to be making steady progress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harmony amongst the

constituent Powers, the ordinarily smooth course of diplomatic intercourse has been ruffled by a curious violation of law and custom at the Chinese Legation—a violation which might have led to tragic consequences, but which has so turned out as to present chiefly a ludicrous side for our consideration. Through a communication made on Thursday to our contemporary the Globe, it became known that a Chinese visitor to England, a doctor named Sun Yat Sen, was imprisoned at the house of the Chinese Minister, and that it was supposed to be the intention of his captors to send him under restraint to his own country, there to receive such measure of justice as a Chinese tribunal might be expected to extend to an alleged conspirator. Fortunately for the prisoner, he had studied medicine at Hong Kong, where he had made the acquaintance and had won the friendly regard of Mr. Cantlie, the Dean of the Hong Kong Medical College, and of Dr. Manson, both of whom are now residing in London. Sun Yat Sen was sufficiently supplied with money, and he succeeded in finding means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se English friends, who at once took steps to inform the police authorities and the Foreign Office of what was being don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y employed detectives to watch the Lega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risoner being secretly conveyed away. Lord Salisbury, as soon as he was informed of what had occurred, made a demand for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the prisoner, who was forthwith set at liberty, and was taken away by Mr. Cantlie and Dr. Manson, who attended in order to identify him as the person they had known. He has since furnish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ress with an account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capture and detention, an account which differs in important respects from that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f the Chinese had accomplished their supposed object, and had smuggled Sun Yat Sen on shipboard, to be tried and probably executed in China, our Foreign Office would have had to deal with

an offence against the comity of nations for which it would have been necessary to demand and obtain the punishment of all concerned. The failure of the attempt may perhaps be held to bring it too near the confines of comic opera to furnish a subject for anything more than serious remonstrance. The offence alleged against Sun Yat Sen is that his medical character is a mere cloak for other designs, and that he is really Sun Wên, the prime mover in a conspiracy which was discovered in 1894, and which had for its object the dethronement of the present reigning dynasty. The first step of the conspirators was to be the capture of the Viceroy of Canton, who was to be kidnapped when inspecting the arsenal; but the plot, like most plots, leaked out or was betrayed, and fifteen of the ringleaders were arrested and decapitated. Sun Wên saved himself by timely flight, and made his way through Honolulu and America to this country, being all the time carefully watched by detectives. On reaching Engl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month, he called upon his old friends, Mr. Cantlie and Dr. Manson, and prepared to commence a course of medical study in London. A few days later he disappeared, and on the evening of last Saturday Mr. Cantlie was informed of his position. Sun Wên, or Sun Yat Sen, whichever he may be alleges that he was walking in or near Portland Place on the 11th inst., when he was accosted in the street by a fellow-countryman, who asked whether he was Chinese or Japanese; and, being told in reply that he was Chinese and a native of Canton, hailed him as a fellow provincial, and kept him in conversation until a second and then a third Chinaman joined them. One of the three left, while the other two walked slowly on until they reached the Legation, when the others invited Sun to enter, and supported the invitation by the exercise of a certain amount of force. As soon as he was inside, the door was shut and he was conveyed upstairs to a room where, as he alleges, he was seen by Sir Halliday Macartney, and in which he was afterwards kept close

prisoner until released by the intervention of Lord Salisbury. The officials of the Chinese Legation, on the other hand, assert that the man came to the Legation of his own accord on Saturday, the 10th, and entered into conversation, talking about Chinese affairs, and appearing to want only a chat with some of his fellow-countrymen, after having which he went away; and that it was not until after he had gone that suspicion was excited that he might be the notorious Sun Wên, who had fled from justice at home, whose passage through America and departure for England had already been telegraphed to the Legation, and who was actually then being watched by a private detective in the employm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un came to the Legation a second time, on Sunday, the 11th, and then, evidence of his identity having been obtained, he was made prisoner. It had been supposed that he was about to return to Hong Kong as to a convenient base for further operations; and it was the inten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sk for his extradition as soon as he arrived there. In the meanwhile the actual presence of the supposed conspirator in the Legation furnished a temptation which it was found impossible to resist, and he was locked up until instructions with regard to him could arrive from Pekin.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these instructions, if they had been received and could have been acted upon, would have effectually destroyed his power to engage in any further conspiracies; and it may be assumed that the intervention of Lord Salisbury was not too early. Even as it was Sun appears to have suffered considerable anxiety lest the food supplied to him at the Legation should be unwholesome in its character. The simple process of cutting a knot is often preferable to the labour of untying it, and we are not very much surprised that the Chinese Minister or his representative should have authorized the adoption of the course which has happily failed of success. But we cannot conceal our surprise that Sir Halliday Macartney, himself an Englishman,

should have taken any part in a transaction manifestly doomed to failure, and the success of which would have been ruinous to all engaged in it. The Chinese Minister is said to have surrendered his prisoner “without prejudice,” as lawyers say, to his assumed rights; but he appears to have claimed a right which is not acknowledged by any civilized country, and which would be intolerable if it were exercised. It would be a somewhat similar proceeding if the Turkish Ambassador were to inveigle some of the leading members of the Armenian colony in London into the Embassy, in order to despatch them, gagged and bound, as an offering to his Imperial Majesty the Sultan, or if Lord Dufferin had in the same way made a private prisoner of Tynan, and had sent him to stand his trial at the Old Bailey. It is well recognised that the house of a foreign mission is regarded as a portion of the country from which the mission is sent, and that not only the Minister himself, but also the recognised members of his suite, enjoy an immunity from liability to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to which the Ambassador is accredited; but this hardly entitles the Ambassador to exercise powers of imprisonment or of criminal jurisdiction, and the privileges of the Embassy as a place of refuge for persons unconnected with it are strictly limited to the ground on which it stands. Even if the Chinese Minister could not have been prevented from keeping Sun in custody, he would have been liberated by the police as soon as he was brought over the threshold to be conveyed elsewhere. It is fortunate that he did not suffer from any form of illness; for if he had died during his imprisonmen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say what could have been done in consequence. Evidence would have been very hard to procure; and, even if it had been procured, the persons of the Minister and of his servants would have been sacred. Probably the only course would have been to demand that the Minister should be recalled, and that he should be put upon his trial in his own country; a demand which might perhaps have been readily complied with, but

which might not improbably have led to what Englishmen would describe as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 We think that this country, almost as much as the prisoner, may be congratulated upon the turn of events; and we have no doubt that the Foreign Office will find ways and means of making the rulers of the Celestial Empire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gone a little too far, and that they must not commit any similar offence in the future.

“欧洲各国方以目前为邦交辑睦、彼此相安无事之时，而岂知伦敦中国公使馆突然发见一案，其以破坏法律及成例，而足以惹起国际之交涉者，关系固不浅哉！孙逸仙被幽于中国公使馆之中，幸其财力犹足以暗通消息，俾其英国友人得施营救之计。英警署既派遣侦探密伺于公使馆之外，俾该使馆无由将孙氏运解至船。而外务大臣萨里斯伯又要求该使馆期以立释。幸而此案早破，得以无事。否则孙氏既被递解，就刑戮于中国，英之外务部必且致责言于中国政府，而勒令将本案有关之人一一惩办，其损害于邦交固何如哉！孙氏既被诱劫入公使馆，即由马凯尼勋爵出见，旋即被锢一室，直至英外部出而干涉，始克见释。夫马凯尼，英人也，乃亦躬与于此案。此案之失败固可预料，即幸而获免，然他日与于此案者亦必同受巨创，马凯尼此举不亦可异乎？闻中国公使当释放孙氏之时，谓渠之释放此人，期无损于使臣应有之权利。噫！此等权利似决非文明国所欲享有者也，设竟或使用此等权利，则其为不可恕，又岂待言？昔者土耳其使臣在伦敦诱亚美尼亚人入使馆，意在絷 [11_8] 其体，塞其口，而舁送登舟，递解回国，冀为土耳其皇之牺牲。孙氏之案，毋乃类是乎？”

This Article called forth a remonstrance from Sir Halliday Macartney, in which he stated his views: Sir,—In your leading article of to-day, commenting on the alleged kidnapping of an individual, a Chinese subject, calling himself, amongst numerous other aliases, by the name of Sun Yat Sen, you make some remarks

with regard to me which I cannot but consider as an exception to the fairness which in general characterises the comments of The Times. After stating the case as given by the two opposite parties, in the surprise which you express at my conduct, you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the statement of Sun Yat Sen is the correct one and that of the Chinese Legation the wrong one. I do not know why you make this assumption, for you undoubtedly do so when you say the case is as if the Turkish Ambassador had inveigled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Armenian colony of London into the Embassy with a view to making them a present to his Majesty the Sultan. Now, I repeat what I have said before—that in this case there was no inveiglement. The statement of Sun Yat Sen—or, to call him by his real name, Sun Wên—that he was caught in the street and hustled into the Legation by two sturdy Chinamen is utterly false. He came to the Legation unexpectedly and of his own accord, the first time on Saturday, the 10th, the second on Sunday, the 11th. Whatever the pundits of international law may think of his detention, they may take it as being absolutely certain that there was no kidnapping and that he entered the Legation without the employment of force or guile. I am, Sir, your obedient servant, Halliday Macartney.

马凯尼睹是论即复书该报曰："贵报评论向极公正，乃本日社论中评某华人被诱于中国使馆一案，词连于予，殊失贵报公正之素旨。彼华人之自称姓名甚多，而孙逸仙其一也。贵报既历叙使馆与孙逸仙所述之案情，而对于予之行为则颇致微辞，是明明以孙逸仙之所言为可信，而以使馆之所言为不足据也。贵报引土耳其使臣在伦敦诱亚美尼亚人事为佐证，殊不知本案并无所谓诱劫，彼原名孙文、伪名孙逸仙所供之辞，如谓被捕于道途、被挟入使馆等语，皆至不足信者也。孙逸仙之至使馆，系出己意，且为使馆中人所不料。其初次之来在礼拜六日，即十月十号。二次之来在礼拜日，即十月十一号。治国际法

学者对于孙逸仙被使馆拘留一节，无论作何评论，抱何见解，然必先知本案并无所谓诱骗，即其入使馆时亦并未尝施以强力或欺诈，此为本案之事实，而亦至可凭信者也。”

Sir Halliday Macartney’s remarks about my going under various aliases, is no doubt intended to cast a slur upon my character; but Sir Halliday knows, no one better, that every Chinaman has four names at least to which he is entitled. 1st, the name one’s parents bestow on their child. 2nd, the name given by the schoolmaster. 3rd, the name a young man wishes to be known by when he goes out into society. 4th, the name he takes when he is married. The only constant part of the name is the first syllable—the surname, really the family name; the other part of the name varies according as it is the parent, the schoolmaster, etc., chooses. Whilst upon this subject it may not be without interest to know that my accuser has various aliases by which he is known to the Chinese. In addition to the name Ma-Ta-Yen, which means Macartney, His Excellency, he is also known as Ma-Ka-Ni, and as Ma-Tsing-Shan, showing that no name is constant in China except the family name.

观马凯尼此书，其云孙逸仙姓名甚多，是明明将以此肆其污蔑，使外国知予非正人。而不知华人习俗，多有以一人而兼三、四名者，此在马凯尼要无不稔知之也。华人自有生以后，襁褓中父母所呼之名，一也；稍长从师，学塾中师长所授之名，二也；既而身入社会，则有所谓字者，有所谓号者，惟名字屡易，而姓则不变。彼马凯尼之在中国，有称为马大爷者，有称为马凯尼者，有称为马晋山者，以此例彼，其道一也。

The Dungeons of Portland Place (from the speaker, October, 31st, 1896.)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斯比克报》亦刊有一论，其标题为《波德兰区之牢狱》，论曰：

Sir Halliday Macartney is an official in the servi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fact seems to have deprived him of any sense of humour he might otherwise have had, which, we imagine, would in no circumstances have been conspicuous. The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Legation has struck an attitude of injured innocence in The Times. He is like Woods Pasha, when that undiscerning personage stands up for the Turkish Government in an English newspaper. What in a true Oriental would seem natural and characteristic, in the sham Oriental is merely ridiculous. Sir Halliday Macartney assures the world that the Chinese medical gentleman who was lately released from the Portland Place Bastille was not inveigled into that institution. To the obvious suggestion that Sun Yat Sen would never have walked into the Chinese Embassy of his own accord, had he known the real identity of his entertainers, Sir Halliday vouchsafes no reply. It is unquestionable that he saw the captive, and took no measures to set him at liberty, till a peremptory requisition came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If it was not intended to deport Sun Yat Sen to China, why was he kept a prisoner? Sir Halliday Macartney is in the pitiable position of an Englishman who is forced by his official obligations to palliate in London what would be the ordinary course of justice at Canton. A purely Chinese emissary would have said nothing. Having failed in his manoeuvre, he would have accepted the consequences of defeat with the fatalism of his race and native climate. The spectacl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fussing and fuming in The Times like an Englishman, when he ought to hold his peace like a Chinaman, can only suggest to the authorities at Pekin that their English representative here is a rather incompetent person.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is Chinese kidnapping which is irresistibly diverting. Englishmen can never take the Chinaman seriously, in spite of Charles Pearson's prediction that the yellow man will one day eat us up. The personality of Ah Sin, especially when he wears a pigtail and his native costume, is purely comic to the average sightseer. If the men who decoyed Sun Yat Sen were pointed out to a London crowd, they would be greeted not with indignation, but with mildly derisive banter. It might go hard with any Europeans who had tried the same game; but Ah Sin, the childlike and bland, is a traditional joke. His strategy excites no more resentment than the nodding of the ornamental mandarin on the mantelpiece. The popular idea of Lord Salisbury's intervention in this case is probably that the Chinaman's pigtail has been gently but decisively pulled, and that such a lesson is quite sufficient without any public anger. Had a German or a Frenchman been kidnapped in similar circumstances, the situation would at once have been recognised as extremely serious. The capture and incarceration in Portland Place simply excite a smile. The newspapers have treated the incident as they treat the announcement that Li Hung Chang, promoted to be Imperial Chancellor of China, had at the same time been punished for an unauthorised visit to the Empress Dowager. How can you be angry with a people whose solemnities frequently strike the Occidental mind as screaming farce? It is impossible to pass No. 40 Portland Place with a romantic shudder. That middle-class dwelling, of substantial and comfortable aspect, is now a Bastille pour rire, and excites the mirth of tradesmen's boys, who must feel strongly tempted, by way of celebrating the Fifth of November, to ring the

bell and introduce a Celestial guy to the puzzled servitors of the Embassy, with a fluent tirade in pigeon-English. As for Sun Yat Sen, it cannot escape his notice that there is little curiosity to know the precise reason why he is obnoxiou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e is said to have taken part in a conspiracy against the Viceroy of Canton, a statement which conveys no vivid impression to the popular mind. Political refugees—Italians, Poles, Hungarians—have commonly inspired a romantic interest in this country. They have figured in our fiction, always a sure criterion of public sympathies. When the storyteller takes the foreign conspirator in hand, you may be sure that the machinations, escapes, and so forth touch a responsive chord in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But no storyteller is likely to turn the adventures of Sun Yat Sen to such account, though they may be really thrilling, and though this worthy Celestial medico may have been quite a formidable person in his native land. Even the realistic descriptions, by travellers of Chinese administration, the gentle coercion of witnesses in the courts by smashing their ankles, the slicing of criminals to death, have not given a sinister background to the figure of the Heathen Chinee. The ignominious defeat of the Chinese arms in the late war has strengthened the conception of the yellow man as a rather grotesquely ineffectual object. If Sun Yat Sen were to deliver a lecture on his adventures, and paint the tyranny of the Viceroy of Canton in the deepest colours, or i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were to show that his late prisoner was a monster of ferocity, compared to whom all the Western dynamiters were angels in disguise, we doubt whether either story would command the gravity of the public. The Chinese have their virtues; they are a frugal, thrifty, and abstemious people; they practise a greater respect for family ties than Western nations. The custom of worshipping their ancestors, though one of the chief stumbling-blocks to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probably exercises a greater moral influence than the reverence for genealogy

here. But no audience in England or America would accept these virtues as rebukes to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Anglo-Saxon civilisation. So deep is the gulf between Occident and Orient that the pride of neither will learn from the other, and both are indifferent to the warnings of prophets who foretell the triumph of the Caucasian in the Flowery Land or the submergement of Europe by the yellow flood of immigration. All Western notions are regarded in China with a contempt which even the travels of Li are not likely to dispel; and No. 40 Portland Place can never recover that prestige of harmless nonentity it enjoyed before the pranks of the Chinese Embassy made it a centre of the ludicrous.

“马凯尼者，役于中国公使馆者也。此公使馆之受役者，以不慊于《太晤士报》之评斥，而投函更正，是亦犹土耳其大僚胡资氏为土政府辨护之故，而现身于英国之报纸也。然此事出诸真正之东方人，则不特为情理所宜然，而亦足徵其性质之特别；若出诸假托之东方人，则适足以供嘲笑而已。马凯尼之布告天下，谓孙逸仙医士之入公使馆，并非由于诱劫；然使孙逸仙当时稔知彼延接者、招待者为何如人，孙氏固肯步入彼波德兰区之牢狱（以公使馆在伦敦之波德兰区，故名）而绝无趄瑟缩乎？马凯尼于此语乃不置一答辞，何也？况马凯尼既睹孙氏被捕，而乃绝不设法以冀省释，直待外务部出而为坚毅之要求，始得出狱，又何故也？夫公使馆苟不欲解孙氏回国，何必系之于使馆中？马凯尼身在伦敦，且以迫于责任之故，遂不得不陷入此可怜之地位。若此剧而演于中国之广州，固不失为循法而行，至正至当也。马凯尼既遭失败，将使北京当道者病其无能，固应缄口结舌，自比于中国人之所为，而乃犹昂首伸眉，论列是非于伦敦《太晤士报》乎？且使此次被劫者而为德国人或法国人，则事之严重将不可问，幸而其人籍隶中国，闻者不过一笑置之。而报纸之对于此事，亦仅如闻李鸿章之忽焉而畀以相位，忽焉而以未奉召命擅自入宫，被太后之谴责而已。然而自今以往，凡过波德兰区之牢狱者，不得不竦然以惧、哑然以笑也。（下略）”

The following is a copy of the letter I sent to the newspapers thanking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ess for what they had done for me:

予得释后，即投函各报馆，以谢英政府及英报纸相援之情，文曰：

Sir,—Will you kindly express through your columns my keen appreciation of the action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effecting my release from the Chinese Legation? I have also to thank the Press generally for their timely help and sympathy. If anything were needed to convince me of the generous public spirit which pervades Great Britain, and the love of justice which distinguishes its people, the recent acts of the last few days have conclusively done so. Knowing and feeling more keenly than ever what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an enlightened people mean, I am prompted still more actively to pursue the cause of advancement, education, and civilisation in my own well-beloved but oppressed country.

予此次被幽于中国公使馆，赖英政府之力，得蒙省释。并承报界共表同情，及时援助。予于英人之尚公德、好正义，素所钦仰，身受其惠，益堪徵信 [11_9] 。且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之真价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谋吾祖国之进步，并谋所以开通吾横被压抑之亲爱同胞乎！

Yours faithfully,

爰 [11_10] 驰寸简，敬鸣谢忱。

Sun Yat Sen

孙文缄

46 Devonshire Street, Portland Place, W.

波德兰区覃文省街之四十六号

[11_1].逋逃薮：藏纳逃亡者的地方。

[11_2].蠲免：免除。

[11_3].齿冷：笑久了牙齿也会感到寒冷。借指耻笑。

[11_4].泯：消灭；丧失。

[11_5].黾勉：努力；勉力。

[11_6].伏莽：指军队埋伏在草莽中。亦指潜藏的寇盗。

[11_7].新嘉坡：新加坡。

[11_8].絷：捆绑。

[11_9].徵信：考证核实；取信，凭信。

[11_10].爰：表示顺承关系，相当于“于是”。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精神分析引论（上）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过失心理学

SIGMUND FREU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WAI YU JIAO XUE YU YAN JIU CHU BAN SHE

精神分析引论（上）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卢屹 译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reface 译者序
- First lecture　Introduction 第一讲　引言
- Second Lecture　The Psychology of Errors 第二讲　过失心理学
- Third Lecture　The Psychology of Errors—(Continued) 第三讲　过失心理学（续）
- Fourth Lecture　The Psychology of Errors—(Conclusion) 第四讲　过失心理学（完）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reface

译者序

Few, especially in this country, realize that while Freudian themes have rarely found a place on the programs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hey have attracted great and growing attention and found frequent elaboration by students of literature, history, biography, sociology, morals and aesthetics, anthropology, education, and religion. They have given the world a new conception of both infancy and adolescence, and shed much new light upon characterology; given us a new and clearer view of sleep, dreams, reveries, and revealed hitherto unknown mental mechanisms common to normal and pathological states and processes, showing that the law of causation extends to the most incoherent acts and even verbigerations in insanity; gone far to clear up the *terra incognita* of hysteria; taught us to recognize morbid symptoms, often neurotic and psychotic in their germ; revealed the operations of the primitive mind so overlaid and repressed that we had almost lost sight of them; fashioned and used the key of symbolism to unlock many mysticisms of the past; and in addition to all this, affected thousands of cures, established a new prophylaxis, and suggested new tests for character, disposition, and ability, in all combining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 to a degree salutary as it is rare.

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在美国尤其如此）：虽然弗洛伊德诸理论在美国心理学协会各项目中鲜有一席之地，但是在文学、历史、传记、社会学、道德与美学、人类学、教育及宗教等专业的学生中，它

们引发了巨大的、与日俱增的关注，而且经常被论及。这些理论带给世界关于婴儿期和青春期的全新观念，给人格学以新的启迪；就睡眠、梦境、冥想提出了一种全新且更清晰的观点，并前所未有地揭示了正常和病态的状态及过程拥有同样的心理机制，从而表明因果规律同样适用于大多数无逻辑行为，甚至精神错乱中的语言重复；这些理论阐明了癔症这一未知领域；指导我们辨别通常根源于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病态状态；揭示了因被掩盖、压抑而几乎被忽略的原始意识活动；创造性地运用象征意义这一钥匙，打开过去的神秘之门；除此之外，这些理论还帮助治愈了数千个病例，确立了新的预防法，建议了性格、性情及能力测试的新方法。总之，其实践与理论的结合程度难能可贵，大有裨益。

These twenty-eight lectures to laymen are elementary and almost conversational. Freud sets forth with a frankness almost startling the difficulties and limitations of psychoanalysis, and also describes its main methods and results as only a master and originator of a new school of thought can do. These discourses are at the same time simple and almost confidential, and they trace and sum up the results of thirty years of devoted and painstaking research. While they are not at all controversial, we incidentally see in a clearer light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master and some of his distinguished pupils. A text like this is the most opportune and will naturally more or less supersede all other introductions to the general subject of psychoanalysis. It presents the author in a new light, as an effective and successful popularizer, and is certain to be welcomed not only by the large and growing number of students of psychoanalysis in this country but by the yet larger number of those who wish to begin its study here and elsewhere.

本书的28讲课程是针对入门者的初级知识，基本为谈话形式。弗

洛伊德以近乎惊人的坦诚，列举了精神分析的困难和局限性，也以一个新思潮学派宗师和创始人的独特身份，阐述了其主要方法和结果。这些课程浅显易懂，同时几近倾囊相授，它们梳理和总结了30年来潜心探索、精心研究的成果。虽说并无太多争议，我们还是在不经意间更清楚地看到大师与其得意门生的不同之处。这样的文本恰逢其时，当然多少会将其他所有精神分析概论取而代之。它以一个新视角展现了作者的风采，他是一位有感染力的、成功的推广普及者，在他的拥戴者中，不仅有大批的、仍在不断增多的本国精神分析专业学习者，还有更多的国内外有志于学习本专业者。

The impartial student of Sigmund Freud need not agree with all his conclusions, and indeed, like the present writer, may be unable to make sex so all-dominating a factor in the psychic life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as Freud deems it to be, to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he is the most original and creative mind in psychology of our generation. Despite the frightful handicap of the *odium sexicum* , far more formidable today than the *odium theologicum* , involving as it has done for him lack of academic recognition and even more or less social ostracism, his views have attracted and inspired a brilliant group of minds not only in psychiatry but in many other fields, who have altogether given the world of culture more new and pregnant *appercus* than those which have come from any other source within the wide domain of humanism.

一个理性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理论学习者无需附和其所有结论，事实上，正如笔者一样，也许我们未必能像弗洛伊德那样主张人类今昔心理生活中的绝对主导因素是性，但还是要承认他是当代心理学最具开拓创新精神的思想者。尽管弗洛伊德所谓的“性憎恶”之说有着惊人的缺陷，而且如今看来远远要比“神学憎恶”更令人生畏，并致使他缺乏学术界的认可，甚至有些遭到社会的反感，但他的观点还是吸引

和启发了一批杰出人士，他们来自精神病学界和其他诸多学科，共同为文明世界奉献了崭新、丰硕的思想成果，比宽广的人文领域中其他任何来源的贡献都多。

A former student and disciple of Wundt, who recognizes to the full his inestimable services to our science, cannot avoid making certain comparisons. Wundt has had for decades the prestige of a most advantageous academic chair. He founded the first laboratory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which attracted many of the most gifted and mature students from all lands. By his development of the doctrine of apperception he took psychology forever beyond the old associationism which had ceased to be fruitful. He also established the independence of psychology from physiology, and by his encyclopedic and always thronged lectures, to say nothing of his more or less esoteric seminary, he materially advanced every branch of mental science and extended its influence over the whole wide domain of folklore, mores, language, and primitive religion. His best texts will long constitute a thesaurus which every psychologist must know.

若某人从前是冯特的门生信徒，充分认同他对本学科不可估量的贡献，则不免会将两位大师做一番比较。冯特数十年来的学术地位都极为优越，声望卓著。他创立了第一个实验心理学实验室，吸引了各国众多最有天赋和经验的学生。他发展了统觉论，使心理学达到已无建树的老派联想心理学难以企及的高度。他还确立了心理学独立于生理学的学科地位。他的演讲旁征博引，场场爆满，更不用说他那些可谓艰深的授课内容，通过这些努力，他显著地改进了精神学科的每一个分支，将其影响延伸到民俗、民风、语言及原始宗教等诸多领域。他的最佳著作所构建的专业语汇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每位心理学研究者必须熟稔于心的。

Again, like Freud, he inspired students who went beyond him (the Wurzburgers and introspectionists) whose method and results he could not follow. His limitations have grown more and more manifest. He has little use for the unconscious or the abnormal, and for the most part he has lived and wrought in a preevolutionary age and always and everywhere underestimated the genetic standpoint. He never transcends the conventional limits in dealing, as he so rarely does, with sex. Nor does he contribute much likely to be of permanent value in any part of the wide domain of affectivity. We cannot forbear to express the hope that Freud will not repeat Wundt's error in making too abrupt a break with his more advanced pupils like Adler or the Zurich group. It is rather precisely just the topics that Wundt neglects that Freud makes his chief corner-stones, viz., the unconscious, the abnormal, sex, and affectivity generally, with many genetic, especially ontogenetic, but also phylogenetic factors. The Wundtian influence has been great in the past, while Freud has a great present and a yet greater future.

然而，就像弗洛伊德一样，冯特启蒙了一些学生，而他们却超越了他（如符兹堡学派和内省心理学派），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令他难以理解。他的局限性正日益明显。他很少用到潜意识或变态心理学，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进化论之前的年代，因而总是处处低估遗传的观点立场。对于性的研究，因为鲜少尝试，他从未跳脱那些传统局限。他很可能也没有对情感性这一宽广范畴中的任何部分有所建树，创造出持久的价值。我们不禁希望弗洛伊德不会犯冯特的错误，后者过于仓促地与阿德勒、苏黎世学派这些较资深的学生划清了界限。冯特所疏忽的课题，恰恰是令弗洛伊德有所成的主要基石，即潜意识、变态、性，以及一般的、带有多种遗传特性（特别是自体发育，同时也有系统发育等因素）的情感性。在过去，冯特的理论影响很大，而弗洛伊德理论则在当下盛行，甚至对未来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In one thing Freud agrees with the introspectionists, viz., in deliberately neglecting the “physiological factor” and building on purely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although for Freud psychology is mainly unconscious, while for the introspectionists it is pure consciousness. Neither he nor his disciples have yet recognized the aid proffered them by students of the autonomic system or by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epicritic and protopathic functions and organs of the cerebrum, although these will doubtless come to have their due place as we know more of the nature and processes of the unconscious mind.

弗洛伊德同意内省派的一个做法，即刻意忽略“生理因素”，建构于纯粹的心理学基础上。不过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学主要与潜意识有关，而内省派则认为它是纯粹的意识。弗洛伊德及其门徒尚未意识到他们获得的援助，这些援助或来自于自主（神经）系统的学习者，或得益于（皮肤）精细觉、原发性机能与大脑器官之间的差别。不过，随着人类对潜意识心理特性和过程认知的深入，这些知识无疑将获得其应有的地位。

If psychologists of the normal have hitherto been too little disposed to recognize the precious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 made by the cruel experiments of Nature in mental diseases, we think that the psychoanalysts, who work predominantly in this field, have been somewhat too ready to apply their findings to the operations of the normal mind; but we are optimistic enough to believe that in the end both these errors will vanish and that in the great synthesis of the future that now seems to impend our science will be made vastly richer and deeper on the theoretical side and also far more practical than it has ever been before.

如果时至今日，普通心理学的研究者仍不愿承认精神疾病中残酷的自然实验对于心理学的宝贵贡献，我们会认为在此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分析学者有些过于一厢情愿，以致不能将他们的发现运用于普通心理活动的研究；但是我们乐观地相信，这两种错误最终都会消失，并且就目前来看，未来即将出现观念的大融合，我们的学科在理论上将更丰满、更深刻，同时比以往更务实。

G. Stanley Hall.

G.斯坦利·霍尔

Clark University, April, 1920.

1920年4月于美国克拉克大学

First lecture　Introduction

第一讲　引言

I do not know how familiar some of you may be, either from your reading or from hearsay, with psychoanalysis. But, in keeping with the title of these lectures—*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I am obliged to proceed as though you knew nothing about this subject, and stood in need of preliminary instruction.

我不了解大家对于精神分析的熟悉程度，有些读者也许通过阅读或是道听途说有所了解。不过，为了紧扣该系列讲课的主题“精神分析引论”，我要假定大家对这门学科一无所知，需要入门指导。

To be sure, this much I may presume that you do know, namely, that psychoanalysis is a method of treating nervous patients medically. And just at this point I can give you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how the procedure in this field is precisely the reverse of that which is the rule in medicine. Usually when we introduce a patient to a medical technique which is strange to him we minimize its difficulties and give him confident promises concerning the result of the treatment. When, however, we undertake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with a neurotic patient we proceed differently. We hold before him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method, its length, the exertions and the sacrifices which it will cost him; and, as to the result, we tell him that we make no definite promises, that the result depends on his conduct, on his understanding, on his

adaptability, on his perseverance. We have, of course, excellent motives for conduct which seems so perverse, and into which you will perhaps gain insight at a later point in these lectures.

诚然，至少我能假定大家都知道，精神分析顾名思义，是一种针对神经患者的医学治疗方法。而我正可以就此举例说明，此类治疗过程与常规医学治疗规律恰恰相反。通常，当我们向病人推荐他们所陌生的医疗技术时，我们会尽量弱化治疗难点，就治疗效果信心十足地给他们以承诺。然而，当我们对于神经症患者实施精神分析治疗时，方法却有所不同。我们会向病人列数治疗方法的难点、时间长度、耗费的精力和付出的代价，并且，关于治疗效果，我们会告知病人，我们无法绝对保障，疗效取决于病人的行为、理解力、适应力和毅力。当然，这些貌似有悖常理的行为是有充分理由的，这一点大家深入听课后也许会有所启示。

Do not be offended, therefore, if, for the present, I treat you as I treat these neurotic patients. Frankly, I shall dissuade you from coming to hear me a second time. With this intention I shall show what imperfections are necessarily involved in the teaching of psychoanalysis and what difficulties stand in the way of gaining a personal judgment. I shall show you how the whole trend of your previous training and all your accustomed mental habits must unavoidably have made you opponents of psychoanalysis, and how much you must overcome in yourselves in order to master this instinctive opposition. Of course I cannot predict how much psychoanalytic understanding you will gain from my lectures, but I can promise this, that by listening to them you will not learn how to undertake a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or how to carry one to completion. Furthermore, should I find anyone among you who does not feel satisfied with a cursory acquaintance with

psychoanalysis, but who would like to enter into a more enduring relationship with it, I shall not only dissuade him, but I shall actually warn him against it. As things now stand, a person would, by such a choice of profession, ruin his every chance of success at a university, and if he goes out into the world as a practicing physician, he will find himself in a society which does not understand his aims, which regards him with suspicion and hostility, and which turns loose upon him all the malicious spirits which lurk within it.

因此，我暂时把大家像神经症患者一样对待，请不要介怀。坦白说，我本该奉劝大家不要再来听我的课。既然有此居心，我应该证明精神分析教学中必然的不足之处，以及在获得个人判断力之路上的艰难险阻。我应该证明，大家以往所受的训练和所有习惯思维方式，令你们站在了精神分析的对立面，你们必须花很大精力去克服自身障碍，以控制这种本能的抵触。当然，我无法预测大家从我的课上会对精神分析有多少理解，但我可以肯定，大家听课之后，并不会懂得如何实施或完成一项精神分析治疗。而且，如果有人由于不满足于粗浅地了解精神分析，而想要长期从事这项工作，我不但要劝阻他们，甚至要告诫他们谨慎行事。就目前状况看，做出这样的职业选择，会毁掉他们大学学业成功的机会，更有甚者，如果他们以执业医师的身份走向社会，他们会发现自己身处的环境不理解他们的抱负，对他们投以怀疑和敌意的眼光，甚至会将所有潜在的恶意发泄在他们身上。

However, there are always enough individuals who are interested in anything which may be added to the sum total of knowledge, despite such inconveniences. Should there be any of this type among you, and should they ignore my dissuasion and return to the next of these lectures, they will be welcome. But all of you have the right to know what these difficulties of psychoanalysis

are to which I have alluded.

然而，即便如此艰难，只要能增进个人知识总量，总有不少人会产生兴趣。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无视我的告诫，再来听我的课，我对他们表示欢迎。但是所有人都有权了解我所指出的精神分析的难点。

First of all, we encounter the difficulties inherent in the teaching and exposition of psychoanalysis. In your medical instruction you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visual demonstration. You see the anatomical specimen, the precipitate in the chemical reaction, the contraction of the muscle as the result of the stimulation of its nerves. Later the patient is presented to your senses; the symptoms of his malady, the products of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es, in many cases even the cause of the disease is shown in isolated state. In the surgical department you are made to witness the steps by which one brings relief to the patient, and are permitted to attempt to practice them. Even in psychiatry, the demonstration affords you, by the patient's changed facial play, his manner of speech and his behavior, a wealth of observations which leave far-reaching impressions. Thus the medical teacher preponderantly plays the role of a guide and instructor who accompanies you through a museum in which you contract an immediate relationship to the exhibits, and in which you believe yourself to have been convinced through your own observ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new things you see.

首先，我们将面对精神分析教学和授课的固有难点。大家所受的医学教育，使大家习惯了实物示范。你们会观察解剖标本、化学反应的沉淀物和神经受刺激引发的肌肉收缩。然后，你们可以观察真正的

病人，观察他们的病症、病理过程的结果，在不少病例中甚至可以单独观察病因。你们在外科可以目睹救治患者的各个步骤，而且获许尝试练习这些步骤。即使是精神病科，也会为你们提供示范，展示患者的面部活动变化、语言行为方式，使你们通过充分观察产生深刻印象。因而医学老师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向导和讲解员，他会陪伴着你在博物馆与展品密切接触，而你在其中通过亲身观察确定了新事物的存在。

Unfortunately,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in psychoanalysis. In psychoanalysis nothing occurs but the interchange of words between the patient and the physician. The patient talks, tells of his past experiences and present impressions, complains, confesses his wishes and emotions. The physician listens, tries to direct the thought processes of the patient, reminds him of things, forces his attention into certain channels, gives him explanations and observes the reactions of understanding or denial which he calls forth in the patient. The uneducated relatives of our patients—persons who are impressed only by the visible and tangible, preferably by such procedure as one sees in the moving picture theatres—never miss an opportunity of voicing their scepticism as to how one can “do anything for the malady through mere talk.” Such thinking, of course, is as shortsighted as it is inconsistent. For these are the very persons who know with such certainty that the patients “merely imagine” their symptoms. Words were originally magic, and the word retains much of its old magical power even today. With words one man can make another blessed, or drive him to despair; by words the teacher transfers his knowledge to the pupil; by words the speaker sweeps his audience with him and determines its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Words call forth effects and are the universal means of influencing human beings. Therefore let us not underestimate the use of words in psychotherapy, and let us be

satisfied if we may be auditors of the words which are exchanged between the analyst and his patient.

不幸的是，在精神分析中一切都有所不同。在精神分析治疗中，除了患者与医师之间的语言交流以外别无他事。患者说话，讲述过去的经历及现在的感觉，发发牢骚，坦白自己的愿望和情绪。医师会倾听，试图引导患者的思考过程，做一些提醒，尽力将其注意力引入特定轨道，为其做些解释，对病人进行刺激，观察其理解或否认的反应。患者有些无知的亲人，他们只相信可见的、有形的东西，尤其是电影里看到的治疗方法，他们从来都不放过质疑的机会，表示“单凭闲聊怎么改善症状”。这种想法当然既鼠目寸光，又自相矛盾。因为他们确信病人“只是想象了”自己的症状。语言本来就很神奇，直至今日仍保有它古老的神奇力量。语言既能使人感到幸福，又能将人逼到绝望；老师用语言给学生传道授业，演讲者用语言使观众心悦诚服，彻底影响他们的观点和决定。语言可以产生效应，它是影响人类的通用方法。因此请不要低估语言在精神治疗中的作用，只要能旁听到精神病医师和患者交流的话，我们就该知足了。

But even that is impossible. The conversation of which the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consists brooks no auditor, it cannot be demonstrated. One can, of course, present a neurasthenic or hysteric to the students in a psychiatric lecture. He tells of his complaints and symptoms, but of nothing else. The communications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the analysis are made onl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 special affective relationship to the physician; the patient would become dumb as soon as he became aware of a single impartial witness. For these communications concern the most intimate part of his psychic life, everything which as a socially independent person he must conceal from others; these communications deal with everything which, as a harmonious

personality, he will not admit even to himself.

但是，即使那样也是不可能做到的。精神分析治疗中的谈话不容许旁听，它无法公开示范。当然，可以在精神病学课上让学生观摩神经衰弱患者或是癔症病患者。患者会讲述烦心事和症状，此外无他。精神分析中的必要沟通，必须在患者对医师形成特定情感依赖的前提下进行，患者一旦面对态度中立的听众，立刻会变得木讷少言。因为这些交流与最私密的心理活动有关，那是作为一个独立社会人士应该对他人秘而不宣的事情；这些交流中所涉的事实是在患者人格健全时连自己都不会承认的。

You cannot, therefore, “listen in” on a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You can only hear of it. You will get to know psychoanalysis, in the strictest sense of the word, only by hearsay. Such instruction even at second hand, will place you in quite an unusual position for forming a judgment. For it is obvious that everything depends on the faith you are able to put in the instructor.

因此，“旁听”精神分析治疗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耳闻。严格来说，逐步认识精神分析的途径只能是道听途说。这种甚至是间接的指导方式，会使你在相当特殊的境况中作出判断。因为显而易见，一切都依赖于你对指导者的信任。

Imagine that you are not attending a psychiatric, but an historical lecture, and that the lecturer is telling you about the life and martial deed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What would be your reasons for believing in the authenticity of his statements? At first

sight, the condition of affairs seems even more unfavorable than in the case of psychoanalysis, for the history professor was as little a participant in Alexander's campaigns as you were; the psychoanalyst at least tells you of things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he himself has played some role. But then the question turns on this —what set of facts can the historian marshal in support of his position? He can refer you to the accounts of ancient authors, who were either contemporaries themselves, or who were at least closer to the events in question; that is, he will refer you to the books of Diodor, Plutarch, Arrian, etc. He can place before you pictures of the preserved coins and statues of the king and can pass down your rows a photograph of the Pompeiian mosaics of the battle of Issos. Yet, strictly speaking, all these documents prove only that previous generations already believed in Alexander's existence and in the reality of his deeds, and your criticism might begin anew at this point. You will then find that not everything recounted of Alexander is credible, or capable of proof in detail; yet even then I cannot believe that you will leave the lecture hall a disbeliever in the reality of Alexander the Great. Your decision will be determined chiefly by two considerations; firstly, that the lecturer has no conceivable motive for presenting as truth something which he does not himself believe to be true, and secondly, that all available histories present the events in approximately the same manner. If you then proceed to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older sources, you will consider the same data, the possible motives of the writers an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various parts of the evidence. The result of the examination will surely be convincing in the case of Alexander. It will probably turn out differently when applied to individuals like Moses and Nimrod. But what doubts you might raise against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sychoanalytic reporter you will see plainly enough upon a later occasion.

想象一下，大家不是在上精神病学课，而是历史课，老师在讲述亚历山大大帝的生平和战绩。你相信他们讲述的内容是真实的，有什么理由呢？乍看之下，历史事件的情况似乎比精神分析还不靠谱，因为历史教授跟大家一样，也并没有亲历亚历山大的战争；精神分析医师至少能告诉你与他们个人经历相关的事情。但接着问题一转——历史学家可整理出哪些实例，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他们可以向你引用古代作家的叙述，这些人与当事人处于同一年代，或最起码与相关事件年代相近；这意味着，他们会引述狄奥多、普鲁塔克、阿里安等人的著作。他们会给你看保存至今的硬币和亚历山大国王雕像的照片，会给你们传阅出土于庞贝的伊苏斯战役马赛克画的照片。然而，严格说来，这些文件只是证明，先辈们已经相信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存在及其事迹的真实性，对此又可以重新提出不同意见。接下来，你会发现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叙述并不全部可信，或是并无详细证据支持，但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你在离开课堂时，会成为亚历山大大帝史实的否定派。你的决定将主要取决于两个考量因素：首先，历史课老师没理由会将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当作真事讲述；其次，现存所有史料对于历史事件的描述方式几乎如出一辙。如果你接下来着手查证年代更久的资料来源，你会考虑同样的材料，考量历史作家可能的动机，核对史实证据各方面的一致性。检查结果在亚历山大大帝的事例上肯定很有说服力，可能应用在摩西和尼姆罗德这些圣经人物上就会有所不同。那么，对于精神分析叙述者的可信度，你们又会产生怎样的怀疑呢，这一点大家以后会清楚地了解。

At this point you have a right to raise the question, “If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objective verification of psychoanalysis, and no possibility of demonstrating it, how can one possibly learn psychoanalysis and convince himself of the truth of its claims?” The fact is, the study is not easy and there are not many persons who have learned psychoanalysis thoroughly; but nevertheless, there is a feasible way. Psychoanalysis is learned, first of all, from a study of one's self, through the study of one's own personality. This is not

quite what is ordinarily called self-observation, but, at a pinch, one can sum it up thus. There is a whole series of very common and universally known psychic phenomena, which, after some instruction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one can make the subject matter of analysis in one's self. By so doing one obtains the desired conviction of the reality of the occurrences which psychoanalysis describes and of the correctness of its fundamental conception. To be sure, there are definite limits imposed on progress by this method. One gets much further if one allows himself to be analyzed by a competent analyst, observes the effect of the analysis on his own ego,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es use of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finer details of the technique of procedure. This excellent method is, of course, only practicable for one person, never for an entire class.

到这里，大家有权这样质疑："既然精神分析既得不到客观求证，又不可能公开展示，那怎么可能学习精神分析，又如何相信其内容真实性呢？"诚然，这项研究谈何容易，能将精神分析研究透的人也寥寥无几。不过话虽如此，可行方法还是有的。学习精神分析，首先要从自我研究着手，通过探究自我的性格进行。这并不完全等同于通常所说的"自我省视"，不过实在要这么理解也无可厚非。有一系列极为常见且众所周知的心理现象，学习者可以先了解一些精神分析技巧，然后将它们作为自我分析的研究素材。这么做能够树立信心，相信精神分析所描述现象的真实性，及其基本观念的正确性。不可否认，用这种方法推进研究确实会受到种种限制。要得到很大进步，就得敢于接受业务熟稔的分析师对自己进行分析，观察这种分析对于自我的影响，同时要借机学习分析过程中的一些精湛技巧。当然，这个方法只适用于个人学习，绝不能全班一起进行。

There is a second difficulty in your relation to psychoanalysis

for which I cannot hold the science itself responsible, but for which I must ask you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upon yourselves, ladies and gentlemen, at least in so far as you have hitherto pursued medical studies. Your previous training has given your mental activity a definite bent which leads you far away from psychoanalysis. You have been trained to reduce the functions of an organism and its disorders anatomically, to explain them in terms of chemistry and physics and to conceive them biologically, but no portion of your interest has been directed to the psychic life, in which, after all, the activity of this wonderfully complex organism culminates. For this reason psychological thinking has remained strange to you and you have accustomed yourselves to regard it with suspicion, to deny it the character of the scientific, to leave it to the laymen, poets, natural philosophers and mystics. Such a delimitation is surely harmful to your medical activity, for the patient will, as is usual in all human relationships, confront you first of all with his psychic facade; and I am afraid your penalty will be this, that you will be forced to relinquish a portion of the therapeutic influence to which you aspire, to those lay physicians, nature-cure fakers and mystics whom you despise.

学习精神分析的第二个难点不能归咎于学科本身，必须得说，在座各位女士们、先生们自己要承担这个责任，至少它与大家至今的医学研究息息相关。大家以前的教育背景使你们的心理活动形成明显倾向，与精神分析的要求大相径庭。大家习惯了仅仅从解剖学的角度认识机体的机能和失调，用化学和物理学原理去解释，并且形成生物学概念，但根本无意去了解心理生活层面，殊不知，精神活动正是精妙而复杂的机体机能运行的极致体现。正因为此，心理学思维方式对大家来说仍是陌生的，大家惯于用疑惑的眼光看待它，否定它的科学性，认为它只属于外行人、诗人、自然哲学家及玄学家等人群。这种思维定势对于大家的医疗工作绝对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就像所有人际

关系中所常见的那样，你的病人一见到你，就会先展露自己的心理活动。我担心大家原有的思维会带来以下后果：你们将不得不把一些心仪的治疗机会拱手让给那些你们所不齿的赤脚医生、江湖术士和神汉巫婆。

I am not overlooking the excuse, whose existence one must admit, for this deficiency in your previous training. There is no philosophical science of therapy which could be made practicable for your medical purpose. Neither speculative philosophy nor descriptive psychology nor that so-call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which allies itself with the physiology of the sense organs as it is taught in the schools, is in a position to teach you anything useful concer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hysical and the psychical or to put into your hand the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a possible disorder of the psychic functions. With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psychiatry does, it is true, occupy itself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observed psychic disorders and with their grouping into clinical symptom-pictures; but in their better hours the psychiatrists themselves doubt whether their purely descriptive account deserves the name of a science. The symptoms which constitute these clinical pictures are known neither in their origin, in their mechanism, nor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There are either no discoverable corresponding changes of the anatomical organ of the soul, or else the changes are of such a nature as to yield no enlightenment. Such psychic disturbances are open to therapeutic influence only when they can be identified as secondary phenomena of an otherwise organic affection.

大家原先所受教育的缺陷毋庸置疑是情有可原的，对此我不会视而不见。就医学研究目标而言，大家并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治疗哲

学。无论是思辨哲学，还是描述心理学，抑或是学校在授课时将其与感官生理学牵扯在一起的所谓实验心理学，都教不会你们任何有关生理、心理之间关系的有用知识，也不会告诉你们理解某种心理机能失调的秘诀。在医学领域，精神病学确实专注于描述观察到的心理失调现象，并汇编成临床症状图册。但是，连精神病学家也会不时自我怀疑，这种纯描述性的解读是否算得上真正的科学。这些临床图册里体现的症状，其根源、机制及相互关系都不得而知。在灵魂的解剖学器官（指大脑）中，要么没有可察觉的相应变动，要么就是这些变动的性质无助于理解。这些心理紊乱只有在确认为某种器质性疾病的次生现象时，才有可能诉诸治疗。

Here is the gap which psychoanalysis aims to fill. It prepares to give psychiatry the omitted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it hopes to reveal the common basis from which, as a starting point, constant correlation of bodily and psychic disturbances becomes comprehensible. To this end, it must divorce itself from every anatomical, chemical or physiological supposition which is alien to it. It must work throughout with purely psychological therapeutic concepts, and just for that reason I fear that it will at first seem strange to you.

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要填补这种缺陷。它为精神病学奠定了被疏漏的心理学基础；它希望揭示生理和心理的共性基础，使得机体和心理紊乱的固定相关性变得容易理解。为此，精神分析必须与以解剖学、化学和生理学等为基础的各种想法分道扬镳，因为它们互不相容。精神分析必须自始至终完全用心理治疗的理念进行研究，正因如此我才担心，一开始大家也许会适应不了。

I will not make you, your previous training, or your mental

bias share the guilt of the next difficulty. With two of its assertions, psychoanalysis offends the whole world and draws aversion upon itself. One of these assertions offends an intellectual prejudice, the other an aesthetic-moral one. Let us not think too lightly of these prejudices; they are powerful things, remnants of useful, even necessary, developments of mankind. They are retained through powerful affe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them is a hard one.

接下来的一个难点与教育背景或是思维倾向无关。精神分析有两个主张冒犯了世人，招致了唾弃。其中一个主张羞辱了理性认知的成见，另一个则针对道德和审美的偏见。别太轻视这些偏见，它们的生命力很强，在人类有益甚至必要的发展历程中，它们遗留下来，被强有力的情绪保驾护航，与它们的斗争是一场硬仗。

The first of these displeasing assertions of psychoanalysis is this, that the psychic processes are in themselves unconscious, and that those which are conscious are merely isolated acts and parts of the total psychic life. Recollect that we are, on the contrary, accustomed to identify the psychic with the conscious. Consciousness actually means for us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psychic life, and psychology is the science of the content of consciousness. Indeed, so obvious does this identification seem to us that we consider its slightest contradiction obvious nonsense, and yet psychoanalysis cannot avoid raising this contradiction; it cannot accept the identity of the conscious with the psychic. Its definition of the psychic affirms that they are processes of the nature of feeling, thinking, willing; and it must assert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unconscious thinking and unconscious willing. But with this assertion psychoanalysis has alienated, to start with, the sympathy of all friends of sober science, and has laid itself

open to the suspicion of being a fantastic mystery study which would build in darkness and fish in murky waters. You, however, ladies and gentlemen, naturally cannot as yet understand what justification I have for stigmatizing as a prejudice so abstract a phrase as this one, that “the psychic is consciousness.” You cannot know what evaluation can have led to the denial of the unconscious, if such a thing really exists, and what advantage may have resulted from this denial. It sounds like a mere argument over words whether one shall say that the psychic coincides with the conscious or whether one shall extend it beyond that, and yet I can assure you that by the acceptance of unconscious processes you have paved the way for a decisively new orientation in the world and in science.

精神分析的第一个令人不快的主张是，心理过程本身是潜意识的，而那些有意识的心理活动仅仅是整个心理生活中孤立的行动和碎片。须知，我们反而是习惯于用意识来衡量心理活动的。意识于我们而言，实际上意味着心理生活的显著特征，心理学是研究意识内涵的科学。的确，这种判断在我们看来太显而易见，哪怕有人对其稍加反驳，我们都觉得显然是无稽之谈。但是精神分析仍免不了要提出这样的反驳，它无法认可心理活动的特点是意识。它对于心理活动的定义，肯定了心理活动是情感、思考和欲求等本能活动的过程，而且它明确主张潜意识思考和潜意识欲求的存在。但正因有此主张，精神分析首先就无法被所有理性研究科学的同僚所同情，甚至被怀疑是装神弄鬼的虚幻玄学研究。然而，我对于诸如“心理的即意识的”此类用抽象词语堆砌的偏见持批判态度，诸位自然还理解不了我的正当理由。大家无法认识到，如果潜意识真的存在，否定它所导致的后果，以及否定它可能获得的好处。听起来这只是措辞之争，是该说心理与意识相伴而生，还是该说其含义不仅于此。但是我保证，承认了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就能为世界和科学发展的关键新方向铺平道路。

Just as little can you guess how intimate a connection this initial boldness of psychoanalysis has with the one which follows. The next assertion which psychoanalysis proclaims as one of its discoveries, affirms that those instinctive impulses which one can only call sexual in the narrower as well as in the wider sense, play an uncommonly large role in the causation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 and that those impulses are a causation which has never been adequately appreciated. Nay, indeed, psychoanalysis claims that these same sexual impulses have made contributions whose value cannot be overestimated to the highest cultural, artistic and social achievements of the human mind.

无法想象，精神分析最初的无畏精神与接下来这件事关系紧密。下一个主张是精神分析所宣称的发现之一，它肯定地认为，那些无论广义狭义都只能被称为性冲动的本能冲动，对神经和心理疾病的形成起了不同寻常的重要作用，而且这些冲动从来都是一个未被充分理解的成因。不，其实应该说，精神分析宣称，同样也是这些性冲动，为人类文化、艺术及社会等方面的最高成就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According to my experience, the aversion to this conclusion of psychoanalysis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source of the opposition which it encounters. Would you like to know how we explain this fact? We believe that civilization was forged by the driving force of vital necessity, at the cost of instinct-satisfaction, and that the process is to a large extent constantly repeated anew, since each individual who newly enters the human community repeats the sacrifices of his instinct-satisfaction for the sake of the common good. Among the instinctive forces thus utilized, the sexual impuls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They are thereby sublimated, i.e., they are diverted from their sexual goals and directed to ends

socially higher and no longer sexual. But this result is unstable. The sexual instincts are poorly tamed. Each individual who wishes to ally himself with the achievements of civilization is exposed to the danger of having his sexual instincts rebel against this sublimation. Society can conceive of no more serious menace to its civilization than would arise through the satisfying of the sexual instincts by their redirection toward their original goals. Society, therefore, does not relish being reminded of this ticklish spot in its origin; it has no interest in having the strength of the sexual instincts recognized and the meaning of the sexual life to the individual clearly delineated. On the contrary, society has taken the course of diverting attention from this whole fiel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society will not tolerate the above-mentioned results of psychoanalytic research, and would prefer to brand it as aesthetically offensive and morally objectionable or dangerous. Since, however, one cannot attack an ostensibly objective result of scientific inquiry with such objections, the criticism must be translated to an intellectual level if it is to be voiced. But it is a predisposition of human nature to consider an unpleasant idea untrue, and then it is easy to find arguments against it. Society thus brands what is unpleasant as untrue, denying the conclusions of psychoanalysis with logical and pertinent arguments. These arguments originate from affective sources, however, and society holds to these prejudices against all attempts at refutation.

根据我的经验，精神分析学这一论调正是它四面楚歌的主要原因。大家想知道我们是如何解释这个事实的吗？我们认为创造文明的动力来自于基本生存需求，阻力则来自于本能的满足。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在不停地循环往复，因为每个刚踏入社会的个体都会重复着为了大局而牺牲小我本能满足的做法。在被利用的那些本能力量中，性冲动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由此得到升华，比如由原来的性欲求转向

了社会上更高级的追求，不再带有性的色彩。但这一结果并不稳定。人的性本能是桀骜不驯的。每个希望与文明成就沾边的人，自己的性本能都有可能与那种升华作对。重新转向原始目标，以满足性本能，社会上没有比这更危害文明的了。因此，社会起初就不愿意提及这个棘手问题，无意承认性本能的力量，也不想揭示个人性生活的意义。相反，社会采取措施，从这一领域转移注意力。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无法容忍精神分析研究的上述结论，宁愿鼓吹它是对美学的羞辱，对道德的践踏或危害。然而，这个看似客观的结论是科学研究得出的，不能用谩骂来攻击，因而就必须把批判上升到理论高度才足以表明立场。不过，人性使然，人们通常会认为，不讨喜的观点就是错误的，然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乎，社会上就会大吹“讨厌即谬误”之风，从逻辑上和情理上找证据否认精神分析学的结论。然而，这些论据本就是情绪化的产物，社会仍固守这些偏见，打压所有反驳的声音。

However, we may claim,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 we have followed no bias of any sort in making any of these contested statements. We merely wished to state facts which we believe to have been discovered by toilsome labor. And we now claim the right unconditionally to reject the interferenc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of any such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even before we have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 apprehension which these considerations are meant to instil are justified or not.

尽管如此，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可以宣称，我们发表这些反驳声明时不带有任何偏见。我们只是希望把我们坚信是通过辛勤努力发现的事实公之于众。而且我们宣布，我们有权无条件地对干扰科学研究的各种居心说不，甚至无需事先查证这些居心有无营造紧张气氛的正当理由。

These, therefore, are but a few of the difficulties which stand in the way of your occupation with psychoanalysis. They are perhaps more than enough for a beginning. If you can overcome their deterrent impression, we shall continue.

总之，以上就是阻碍大家从事精神分析研究的几个难点。开篇讲这些大概太多了。如果大家克服得了它们带来的震慑，我们再继续讲。

Second Lecture　The Psychology of Errors

第二讲　过失心理学

We begin with an investigation, not with hypotheses. To this end we choose certain phenomena which are very frequent, very familiar and very little heeded, and which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athological, inasmuch as they can be observed in every normal person. I refer to the errors which an individual commits—as for example, errors of speech in which he wishes to say something and uses the wrong word; or those which happen to him in writing, and which he may or may not notice; or the case of misreading, in which one reads in the print or writing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what is actually there. A similar phenomenon occurs in those cases of mishearing what is said to one, where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an organic disturbance of the auditory function. Another series of such occurrences is based on forgetfulness—but on a forgetfulness which is not permanent, but temporary, as for instance when one cannot think of a name which one knows and always recognizes; or when one forgets to carry out a project at the proper time but which one remembers again later, and therefore has only forgotten for a certain interval. In a third class this characteristic of transience is lacking, as for example in mislaying things so that they cannot be found again, or in the analogous case of losing things. Here we are dealing with a kind of forgetfulness to which one reacts differently from the other cases, a forgetfulness at which one is surprised and annoyed, instead of considering it comprehensible. Allied with these phenomena is that of erroneous ideas—in which the element of transience is again prominent, inasmuch as for a while one believes something which, before and after that time, one knows to

be untrue—and a number of similar phenomena of different designations.

我们一开始要做的是调查，而不是假设。出于此目的，我们要选择那些频繁出现、非常熟悉却很少有人留意的现象，这些现象与病态无关，在每个正常人身上都能观察到。我指的作为个人会犯的过失，比如口误，即要表达某事却用词错误；或是发生在书写过程中的笔误，可能注意得到，也可能注意不到；或是误读，即朗读书本或抄写时，所读或所写与原文不一致。类似现象还有误听，即没有听力障碍的人听错了对方的话。还有一类事件是源于遗忘，但只是一时而非永久的遗忘。例如，记不起一个老熟人的名字，或是忘记及时完成一项任务，但稍后又记起来，因而只是短暂地遗忘了。第三类事件则不具备短暂性，比如把物品放错地方，再也找不到它们，或是类似遗失物品的事件。在这类遗忘中，当事人的反应与其他遗忘事例不同，他们会感到惊讶和气恼，而不是觉得情有可原。与上述现象相关的还有一类是错误认知，其暂时性特征也很突出，即只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事信以为真，而之前和之后都明白是假的。此外还有很多类似现象，只是名称不一样罢了。

These are all occurrences whose inner connection is expressed in the use of the same prefix of designation. [3_1] They are almost all unimportant, generally temporary and without much significance in the life of the individual. It is only rarely that one of them, such as the phenomenon of losing things, attains to a certain practical importance. For that reason also they do not attract much attention, they arouse only weak affects.

这些事例的内在联系，在德语里是用相同的名称 [4_1] 前缀“ver”来体现的。它们几乎都不重要，一般是暂时的，在个人生活中

意义不大。其中随便一种，比如遗失物品之类，很少有什么实际意义。由此，它们也得不到太多关注，只是引发了一些微弱的情绪波动而已。

It is, therefore, to these phenomena that I would now direct your attention. But you will object, with annoyance: “There are so many sublime riddles in the external world, just as there are in the narrower world of the psychic life, and so many wonders in the field of psychic disturbances which demand and deserve elucidation, that it really seems frivolous to waste labor and interest on such trifles. If you can explain to us how an individual with sound eyes and ears can, in broad daylight, see and hear things that do not exist, or why another individual suddenly believes himself persecuted by those whom up to that time he loved best, or defend, with the most ingenious arguments, delusions which must seem nonsense to any child, then we will be willing to consider psychoanalysis seriously. But if psychoanalysis can do nothing better than to occupy us with the question of why a speaker used the wrong word, or why a housekeeper mislaid her keys, or such trifles, then we know something better to do with our time and interest.”

因此，我现在倒要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向这些现象。可大家会不胜其烦地抗议道：“无论是外面的大千世界，还是心理生活的小世界，都有诸多宏大谜团，心理紊乱有诸多难题，不仅需要、也值得我们去解读，在这些小事上耗费精力和兴趣，实在没有意义。您倒是跟我们讲讲，一个视听力健全的正常人何以看见或听到了不存在的事物，或是为什么另一个人突然感到自己被亲人们迫害，或者能找到些妙论，来解释那些连稚子小儿都觉得荒唐的幻觉，这样的话，我们才愿意认真严肃地看待精神分析。可如果精神分析只不过让我们忙着寻找一些

答案，诸如说话者为何用错词语，管家为何找不到钥匙之类的琐碎小事，我们还不如花时间做些其他感兴趣的事。”

My reply is: “Patience, ladies and gentlemen. I think your criticism is not on the right track. It is true that psychoanalysis cannot boast that it has never occupied itself with trifles. On the contrary, the objects of its observations are generally those simple occurrences which the other sciences have thrown aside as much too insignificant, the waste products of the phenomenal world. But are you not confounding, in your criticism, the sublimity of the problems with the conspicuousness of their manifestations? Are there not very important things which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and at certain times, can betray themselves only by very faint signs? I could easily cite a great many instances of this kind. From what vague signs, for instance, do the young gentlemen of this audience conclude that they have won the favor of a lady? Do you await an explicit declaration, an ardent embrace, or does not a glance, scarcely perceptible to others, a fleeting gesture, the prolonging of a hand-shake by one second, suffice? And if you are a criminal lawyer, and engaged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a murder, do you actually expect the murderer to leave his photograph and address on the scene of the crime, or would you, of necessity, content yourself with fainter and less certain traces of that individual? Therefore, let us not undervalue small signs; perhaps by means of them we will succeed in getting on the track of greater things. I agree with you that the larger problems of the world and of science have the first claim on our interest. But it is generally of little avail to form the definite resolution to devote oneself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s or that problem. Often one does not know in which direction to take the next step.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t is more fruitful to attempt what happens to be before one at the moment and for

whose investigation there is a discoverable method. If one does that thoroughly without prejudice or predisposition, one may, with good fortune, and by virtue of the connection which links each thing to every other (hence also the small to the great) discover even from such modest research a point of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big problems.”

我的回答是：“女士们、先生们，请稍安勿躁。我认为大家的批评不在点子上。确实，精神分析不敢自诩从来都不碰琐碎小事。相反，它的观察对象一般都是简单事例，是其他学科都嫌微不足道而舍弃了的，是大千世界中的废弃产品。可大家的批评是不是把显著的命题混淆为宏大的命题了呢？难道没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物，在特定情形和时间里，仅因为极微弱的迹象就暴露了的呢？我可以轻易举出一大堆这样的例子。譬如说，听众中的年轻男士，你们会从怎样的暧昧信号中，判断自己赢得了一位姑娘的青睐呢？你们是否指望着对方的明确表白，或热烈拥抱呢，还是她的偷偷一瞥、转瞬即逝的动作、握手多了一秒，这些信号就足够了呢？假设你是位刑事律师，正在参与一宗谋杀案的调查，你会真的指望凶手在现场留下照片和地址，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因为发现了凶手的蛛丝马迹而额手称庆？可见低估细枝末节是不可取的，我们也许能借它们的光，成功地发现更重要的事情。我同意，我们应该优先关注世界上和科学界中那些更大的问题。可是，树立坚定决心去全心研究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结果一般都是徒劳的。人常常会对下一步要选择的方向感到迷茫。更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是，选择一个近在眼前的、有现成方法的课题。只要没有成见和偏向性，一路向前，运气好的话，就可能会凭借着事物之间的联系（这里也包括小事与大事的联系）见微知著，从平凡的研究中发现一个通向宏大命题的路径。”

Thus would I answer, in order to secure your attention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se apparently insignificant errors made by

normal people. At this point, we will question a stranger to psychoanalysis and ask him how he explains these occurrences.

我作此回应是为了提起大家的兴趣，去思考这些常人易犯的、显然是不足挂齿的过失。在这里，我们想问问一位精神分析的外行人，听听他如何解释这些现象。

His first answer is sure to be, “Oh, they are not worth an explanation; they are merely slight accidents.” What does he mean by this? Does he mean to assert that there are any occurrences so insignificant that they fall out of the causal sequence of things, or that they might just as well be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what they are? If any one thus denies the determination of natural phenomena at one such point, he has vitiated the entire scientific viewpoint. One can then point out to him how much more consistent is the religious point of view, when it explicitly asserts that “No sparrow falls from the roof without God's special wish.” I imagine our friend will not be willing to follow his first answer to its logical conclusion; he will interrupt and say that if he were to study these things he would probably find an explanation for them. He will say that this is a case of slight functional disturbance, of an inaccurate psychic act whose causal factors can be outlined. A man who otherwise speaks correctly may make a slip of the tongue—when he is slightly ill or fatigued; when he is excited; when his attention is concentrated on something else. It is easy to prove these statements. Slips of the tongue do really occur with special frequency when one is tired, when one has a headache or when one is indisposed. Forgetting proper names is a very frequent occurrence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Many persons even recognize the imminence of an indisposition by the inability to recall proper names. Often also one

mixes up words or objects during excitement, one picks up the wrong things; and the forgetting of projects, as well as the doing of any number of other unintentional acts, becomes conspicuous when one is distracted; in other words, when one's attention is concentrated on other things. A familiar instance of such distraction is the professor in *Fliegende Blätter* , who takes the wrong hat because he is thinking of the problems which he wishes to treat in his next book. Each of us knows from experience some examples of how one can forget projects which one has planned and promises which one has made, because an experience has intervened which has preoccupied one deeply.

他肯定会先这么回答："唉，这些事情不值得解释。它们只是些小插曲。"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是说有些事情太微不足道，都不配成为事物因果关系的一环了吗，还是说这些事最好还是变成其他事？如果有人用这样的论调就此否定自然现象的决定律，就已经伤害了整个科学观。因此有人会向他指出，连宗教教义的逻辑都比这严密得多，因为它明确提出"只要上帝不特别指示，小麻雀也不得从屋顶摔落"。可以想象，我们这位仁兄不会想要跟着他第一个答案的逻辑路子走，他会插嘴说，如果让他研究一下这些事情，他大概能给它们找到一个解释。他会说，这些案例是关于轻微机能紊乱、关于错误心理行为的，而这些行为发生的原因是可以解释的。一位平常措辞准确的人，在身体微恙或疲惫时，在兴奋时，或在注意力分散时，也会出现口误。要证明这些说法很容易。在当事人疲惫、头痛或不专心时，口误现象确实会以一定频率发生。在这些情况下，忘记固有名称这一事件的发生频率极高。很多人甚至把记不起固有名称当成生病的预兆。同样，人在兴奋时，常常会语无伦次或混淆事情，也会拿错东西。还有，当人心不在焉时，换言之就是注意力在其他事情上时，遗忘工作任务或是做出无心之举的现象就会变得显著。有一个关于心不在焉的著名例子，是德国讽刺杂志《飞舞之叶》中写的一位教授，他因为思考下一本书里要解决的问题而拿错了帽子。半路冒出来的事情让人深

陷其中，因此忘记了计划好的任务，或忘记了许过的承诺；像这样的事，我们每个人都能从经历中找到一些例证。

This seems both comprehensible and irrefutable. It is perhaps not very interesting, not as we expected it to be. But let us consider this explanation of errors. The conditions which have been cited as necessary for the occurrence of these phenomena are not all identical. Illness and disorders of circulation afford a physiological basis. Excitement, fatigue and distraction are conditions of a different sort, which one could designate as psycho-physiological. About these latter it is easy to theorize. Fatigue, as well as distraction, and perhaps also general excitement, cause a scattering of the attention which can result in the act in progress not receiving sufficient attention. This act can then be more easily interrupted than usual, and may be inexactly carried out. A slight illness, or a chang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blood in the central organ of the nervous system, can have the same effect, inasmuch as it influences the determining factor, the distribution of attention, in a similar way. In all cases, therefore, it is a question of the effects of a distraction of the attention, caused either by organic or psychic factors.

这道理似乎可以理解，也无可辩驳。但它可能不太有趣，迎合不了我们的期待。不过请大家细想一下关于过失的上述解释。这些据说是此类现象发生的必要条件不尽相同。循环系统的疾病和失调是其生理原因。兴奋、疲惫和分心则是另一类的前提条件，可称为精神生理原因。后者很容易推导。疲惫及分心，也许还包括通常的兴奋，引发了注意力分散，这可能会导致进行中的行动得不到充分关注。该行动可能因此比往常更易受到干扰，执行时也许就会出错。一种轻微的疾病，或者中枢神经系统血液分配的变化，可能会产生相同的后果，因

为它们对注意力分配这一决定因素的影响是相似的。因而，所有案例的问题都在于注意力分散，而原因分为机体和心理两种。

But this does not seem to yield much of interest for our psychoanalytic investigation. We might even feel tempted to give up the subject. To be sure, when we look more closely we find that not everything squares with this attention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errors, or that at any rate not everything can be directly deduced from it. We find that such errors and such forgetting occur even when people are not fatigued, distracted or excited, but are in every way in their normal state; unless, in consequence of these errors, one were to attribute to them an excitement which they themselves do not acknowledge. Nor is the mechanism so simple that the success of an act is assured by an intensification of the attention bestowed upon it, and endangered by its diminution. There are many acts which one performs in a purely automatic way and with very little attention, but which are yet carried out quite successfully. The pedestrian who scarcely knows where he is going, nevertheless keeps to the right road and stops at his destination without having gone astray. At least, this is the rule. The practiced pianist touches the right keys without thinking of them. He may, of course, also make an occasional mistake, but if automatic playing increased the likelihood of errors, it would be just the virtuoso whose playing has, through practice, become most automatic, who would be the most exposed to this danger. Yet we see, on the contrary, that many acts are most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when they are not the objects of particularly concentrated attention, and that the mistakes occur just at the point where one is most anxious to be accurate—where a distraction of the necessary attention is therefore surely least permissible. One could then say that this is the effect of the “excitement,” but we do not understand why the

excitement does not intensify the concentration of attention on the goal that is so much desired. If in an important speech or discussion anyone says the opposite of what he means, then that can hardly be explained according to the psycho-physiological or the attention theories.

可是这似乎并不能令我们对精神分析研究产生太大兴趣。我们甚至可能会有放弃课题的冲动。不可否认，细看之下，我们会发现，不是每件事都与这种心理过失的注意力理论对得上号，或者至少不是每件事都能直接从它推导出来。我们发现，即使人并不疲惫、并没有分心或兴奋，各方面状态完全正常时，这些过错和遗忘依然会发生；除非别人会把发生过失的原因归罪于兴奋，但犯错者本人却不这么认为。而且，一个行动实施的原理也并非那么简单，不是靠强化一下分配给它的注意力就能成功，也不是减少点注意力就有失败的危险。有不少行动，人们纯粹是在无意识地进行，只给予极少的注意力，但仍然可以完成得很成功。几乎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行人，却能走对道路，并到达目的地而不会迷路。至少这种情况很普遍。熟练的钢琴师会不假思索地弹准琴键。当然，他也可能会偶尔犯错，但假如无意识的演奏会增加犯错几率，那么那些大师们经过练习，无意识的演奏方式已经炉火纯青，按理应是最容易犯错的。相反，我们会发现，很多行动在它们不是特别专注的对象时，反而实行得最完美，而犯错发生的时间，恰恰是在当事人最渴望把事情做好的时候，此时正是最不容许必要注意力分散的时刻。有人会说这是“兴奋”的副作用，可我们不理解，这样的兴奋为什么没能加强对渴望目标的专注度呢？如果有人在重要演讲或讨论中所说的话与自己的本意相反，那么这就不太能用精神生理原因或注意力理论来解释了。

There are also many other small phenomena accompanying these errors, which are not understood and which have not been rendered comprehensible to us by these explanations. For instance,

when one has temporarily forgotten a name, one is annoyed; one is determined to recall it and is unable to give up the attempt. Why is it that despite his annoyance the individual cannot succeed, as he wishes, in directing his attention to the word which is “on the tip of his tongue,” and which he instantly recognizes when it is pronounced to him? Or, to take another example, there are cases in which the errors multiply, link themselves together, substitute for each other. The first time one forgets an appointment; the next time, after having made a special resolution not to forget it, one discovers that one has made a mistake in the day or hour. Or one tries by devious means to remember a forgotten word, and in the course of so doing loses track of a second name which would have been of use in finding the first. If one then pursues this second name, a third gets lost, and so on. It is notorious that the same thing can happen in the case of misprints, which are of course to be considered as errors of the typesetter. A stubborn error of this sort is said to have crept into a Social–Democratic paper, where, in the account of a certain festivity was printed, “Among those present was His Highness, the Clown Prince.” The next day a correction was attempted. The paper apologized and said, “The sentence should, of course, have read 'the Clown Prince.'” One likes to attribute these occurrences to the printer's devil, to the goblin of the typesetting machine, and the like—figurative expressions which at least go beyond a psycho-physiological theory of the misprint.

与这些过失相关的还有其他许多细微现象，它们难以理解，即使用上述说法解释，我们仍旧稀里糊涂。譬如，有人要是暂时性忘记一个名字，会心中气恼，决意要回忆起那个名字，而且会无休止地尝试下去。是何缘由，当事人尽管心中气恼，却不能如愿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那个“就在嘴边”而且一提醒就知道的词呢？又比如说，在有些案例中，过失会衍生增多、互相关联、互为替代。某人第一次忘记赴

约，在痛下决心不能忘记后，又一次发现自己记错了日期或时间。又如，某人搜肠刮肚地回忆一个想不起的单词，在此过程中他知道第二个单词可以帮助回忆第一个单词，但又想不起来第二个单词。如果继续回想这第二个单词，那他会记不起第三个，诸如此类。众所周知，同样的印刷错误可能反复发生，这当然被看作是排版机器的过失。这一类顽固过失据说悄然潜入了一张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某个庆祝活动的报道印成了这样："出席嘉宾中包括王丑（Clown Prince,应为'Crown Prince'王储）殿下。"第二天出了更正声明。报纸致歉并声称："这句话理应写作'王畜（Crow Prince）殿下'。"人们爱把这种现象归罪于印刷机作祟、排版机作怪之类的原因——这种拟人化的说辞，至少不是印刷错误的精神生理原因能解释得了的。

I do not know if you are acquainted with the fact that one can provoke slips of the tongue, can call them forth by suggestion, as it were. An anecdote will serve to illustrate this. Once when a novice on the stage was entrusted with the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id of Orleans* of announcing to the King, "Connétable sheathes his sword," the star played the joke of repeating to the frightened beginner during the rehearsal, instead of the text, the following, "Comfortable sends back his steed," [3_2] and he attained his end. In the performance the unfortunate actor actually made his début with this distorted announcement; even after he had been amply warned against so doing, or perhaps just for that reason.

不知大家是否熟悉这样一个事实，某种程度上，口误是可以被激发的，可以通过暗示引诱出来。有件趣闻可以作为佐证。有一次，一位舞台新人在席勒名作《奥尔良的姑娘》中被委以重任，在戏中向国王禀报"警长送回宝剑"，主角在彩排时戏弄紧张的新人，反复对他念诵与原文不一样的台词"紧张纵回宝驹" [4_2] ，而他得逞了。在演出时，尽管事先被反复告诫不要念错台词，那位倒霉的新人在他首演时

还是念了那句篡改的台词，或者也许恰恰是由于被反复告诫才出错。

These little characteristics of errors are not exactly illuminated by the theory of diverted attention. But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prove the whole theory wrong. There is perhaps something missing, a complement by the addition of which the theory would be made completely satisfactory. But many of the errors themselves can be regarded from another aspect.

这些过失的细微特点用注意力分散理论并不能完全阐明。可是这也不能证明该理论是全盘错误的。其中也许缺失了一些东西，把补充因素添加进去，该理论也许就可自圆其说了。不过许多过失自身可以从其他角度看待。

Let us select slips of the tongue, as best suited to our purposes. We might equally well choose slips of the pen or of reading. But at this point, we must make clear to ourselves the fact that so far we have inquired only as to when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one's tongue slips, and have received an answer on this point only. One can, however, direct one's interest elsewhere and ask why one makes just this particular slip and no other; one can consider what the slip results in. You must realize that as long as one does not answer this question—does not explain the effect produced by the slip—the phenomenon in its psychological aspect remains an accident, even if its physiological explanation has been found. When it happens that I commit a slip of the tongue, I could obviously make any one of an infinite number of slips, and in place of the one right word say any one of a thousand others, make innumerable distortions of the right word. Now, is there anything

which forces upon me in a specific instance just this one special slip out of all those which are possible, or does that remain accidental and arbitrary, and can nothing rational be found in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我们就以口误为例，因为它最贴近我们的需求。同样我们也可以选择笔误或误读。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清楚，到现在我们只探讨了口误发生的时间及条件，也只就这一点找到了答案。然而，有人会产生其他疑问，问为什么人只会犯某个特定口误而不是其他的，他们可以考虑一下口误的后果。大家必须意识到，要是不回答这个问题（不解释口误产生的后果），即使该现象的生理原因已知，其心理原因也会一直被认为是随机的。比如，我犯口误毛病时，可能的错话显然有无数种，替代正确词语的错话可以有上千种，正确词语变形的可能性有无数种。那么，在诸多可能性中，有什么原因导致我犯了一个特定的口误呢？或者这仍是随机和任意发生的，这个问题本就没有合理答案？

Two authors, Meringer and Mayer (a philologist and a psychiatrist) did indeed in 1895 make the attempt to approach the problem of slips of the tongue from this side. They collected examples and first treated them from a purely descriptive standpoint. That, of course, does not yet furnish any explanation, but may open the way to one. They differentiated the distortions which the intended phrase suffered through the slip, into: interchanges of positions of words, interchanges of parts of words, perseverations, compoundings and substitutions. I will give you examples of these authors' main categories. It is a case of interchange of the first sort if someone says “the Milo of Venus” instead of “the Venus of Milo.” An example of the second type of interchange, “I had a blush of rood to the head” instead of “rush of

blood”; a perseveration would be the familiar misplaced toast, “I ask you to join me in hiccoughing the health of our chief.“ [3_3] These three forms of slips are not very frequent. You will find those cases much more frequent in which the slip results from a drawing together or compounding of syllables; for example, a gentleman on the street addresses a lady with the words, “If you will allow me, madame, I should be very glad to *inscort* you.“ [3_4] In the compounded word there is obviously besides the word “escort,” also the word “insult” (and parenthetically we may remark that the young man will not find much favor with the lady). As an example of the substitution, Meringer and Mayer cite the following: “A man says, 'I put the specimens in the letterbox,' instead of 'in the hot-bed,' and the like.“ [3_5]

有两位作者，语言学家梅林格和精神病学家迈耶，他们在1895年时确实尝试过从这个角度研究口误问题。他们收集实例，率先用纯描述性的方法研究它们。当然这并不能提供一种解答，但也许为解答指明了方向。他们将正确词组的口误错话区分成以下几种：词语位置互换、词语构成互换、语音持续、混合及替代。我会就两位作者的主要分类分别举例。第一种词语互换，比如把“米洛的维纳斯”（the Venus of Milo）说成“维纳斯的米洛”（the Milo of Venus）；第二种词语构成互换，比如把“怒发冲冠”（rush of blood）说成“怒冠冲发”（a blush of rood）；语音持续有个有名的祝酒词例子：“让我们为长官的健康而干咳 [4_3] 。”这三种口误发生并不频繁。大家会发现，音节纠结、混合的口误现象发生频率要高得多。比如，一位男士在街上跟一位女士这样搭讪道：“如蒙小姐允许，我将乐于讽陪 [4_4] 。”这个混合生造词显然是把“奉陪”和“讽刺”做了结合（顺便一说，这位年轻人恐怕是得不到姑娘的好感了）。至于替代的例子，梅林格和迈耶举了这个：“某男说道：‘我把样品放在邮箱里’，而他本该说‘放在恒温箱里 [4_5] ’，诸如此类。”

The explanation which the two authors attempt to formulate on the basis of this collection of examples is peculiarly inadequate. They hold that the sounds and syllables of words have different values, and that the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of more highly valued syllables can interfere with those of lower values. They obviously base this conclusion on the cases of fore-sounding and perseveration which are not at all frequent; in other cases of slips of the tongue the question of such sound priorities, if any exist, does not enter at all. The most frequent cases of slips of the tongue are those in which instead of a certain word one says another which resembles it; and one may consider this resemblance sufficient explanation. For example, a professor says in his initial lecture, "I am not *inclined* to evaluate the merits of my predecessor." [3_6] Or another professor says, "In the case of the female genital, despite many *temptations* … I mean many attempts… etc." [3_7]

两位作者试图在这一套实例基础上做出的解释很不充分。他们认为，单词拥有不同音值的发音和音节，人们在发出和感知音值较高的音节时，会干扰到音值较低的音节的发音和感知。他们得出此结论，显然是以预发声和语音持续的案例为基础的，但它们的发生频率并不高。在其他口误案例中，即便存在这种发音优先级的问题，它也不起作用。口误发生最频繁的案例是说了与某个词相似的词，这种相似性足以说明问题。比如，一位教授在首次讲课时说："我不屑 [4_6] 评价前任教授的优点。"或者另一位教授说："关于女性生殖器，尽管有很多诱惑 ……我是说有很多困惑……" [4_7]

The most common, and also the most conspicuous form of slips of the tongue, however, is that of saying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one meant to say. In such cases, one goes far afield from the problem of sound relations and resemblance effects, and can cite,

instead of these, the fact that opposites have an obviously close relationship to each other, and have particularly close relations in the psychology of association. There are historical examples of this sort. A president of our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ce opened the assembly with the words, “Gentlemen, I declare a quorum present, and herewith declare the assembly *closed* .”

但是，口误中最为常见、也是最显著的形式，是说出的话与想说的话意思截然相反。此类事例就跟发音关系和单词相似性相去甚远了。显然，反义词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反而很近，在联想心理学上，它们的关系极其相近。关于这类现象有一个历史事例。德国曾有一位众议院主席在议会开幕时这样致辞道：“先生们，我宣布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因此宣布本届议会闭幕 。”

Similar, in its trickiness, to the relation of opposites is the effect of any other facile association which may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arise most inopportunely. Thus, for instance, there is the story which relates that on the occasion of a festivity in honor of the marriage of a child of H. Helmholtz with a child of the well-known discoverer and captain of industry, W. Siemon, the famous physiologist Dubois–Reymond was asked to speak. He concluded his undoubtedly sparkling toast with the words, “Success to the new firm—Siemens and—Halske!” That, of course, was the name of the well-known old firm. The association of the two names must have been about as easy for a native of Berlin as “Weber and Fields” to an American.

吊诡的是，与反义词关系类似的情况是其他任何一种随机联想的结果，这种联想在某些情境下会很不合时宜地出现。举例而言，有一

个故事发生在德国生理学家赫尔姆霍兹和著名发明家、大企业家西蒙两位名人的子女的结婚庆典上，著名生理学家杜布瓦 - 雷蒙应邀在婚礼上致辞。在发表了一番精彩祝的酒词之后，他这样说道：“祝西门子和哈尔斯基两家的合作圆满成功！”这说的当然是德国那家著名电气公司的名字（西门子和哈尔斯基联合公司）。这两个名字对于柏林本地人来说肯定太容易联想到了，就像美国人非常熟悉喜剧搭档“韦伯和菲尔德斯”一样。

Thus we must add to the sound relations and word resemblances the influence of word associations. But that is not all. In a series of cases, an explanation of the observed slip is unsuccessful unless we take into account what phrase had been said or even thought previously. This again makes it a case of perseveration of the sort stressed by Meringer, but of a longer duration. I must admit, I am on the whole of the impression that we are further than ever from an explanation of slips of the tongue!

这样，我们就必须要在发音关系和单词相似性之外再加一个单词联想的作用。不过这还没完。在这系列的口误案例中，必须同时考虑在那之前说过、哪怕是想过的短语，否则对它的解释不能成立。这里的案例还是梅林格所强调的语音持续类型的口误，只不过持续时间更长。必须承认，我的整个感觉是，我们离口误成因的解释越来越远了！

However, I hope I am not wrong when I say that during the above investigation of these examples of slips of the tongue, we have all obtained a new impression on which it will be of value to dwell. We sought the gener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slips of the tongue occur, and then the influences which determine the kind of

distortion resulting from the slip, but we have in no way yet considered the effect of the slip of the tongue in itself, without regard to its origin. And if we should decide to do so we must finally have the courage to assert, “In some of the examples cited, the product of the slip also makes sense.” What do we mean by “it makes sense”? It means, I think, that the product of the slip has itself a right to be considered as a valid psychic act which also has its purpose, as a manifestation having content and meaning. Hitherto we have always spoken of errors, but now it seems as if sometimes the error itself were quite a normal act, except that it has thrust itself into the place of some other expected or intended act.

不过我认为，我们在探究口误事例的过程中，都已经获得了值得细说的全新认知，但愿我的判断没错。我们先是探索了口误发生的一般条件，接着探索了影响口误形成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语言变形的种类，但我们还未做到忽略口误根源而去考虑口误对其自身影响。如果我们决定这么做，则必须敢于宣称：“在所举的一些例子里，口误的产物也是有意义的。”我们说“它有意义”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意思是，口误的产物自身理应被看待成一种有效的心理行动，作为一种内容和意义兼具的表达，它也有其目的性。我们至今一直在谈论所谓的“过失”，但现在看来似乎过失本身也不失为一种正常行动，只是它喧宾夺主地替代了另一个期待或预期中的行动。

In isolated cases this valid meaning seems obvious and unmistakable. When the president with his opening words closes the session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stead of opening it, we are inclined to consider this error meaningful by reason of our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slip occurred. He expects no good of the assembly, and would be glad if he could terminate it immediately. The pointing out of this mea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error, gives us no difficulty. Or a lady, pretending to admire, says to another, “I am sure you must have *messed up* this charming hat yourself.“ [3_8] No scientific quibbles in the world can keep us from discovering in this slip the idea “this hat is a mess.” Or a lady who is known for her energetic disposition, relates, “My husband asked the doctor to what diet he should keep. But the doctor said he didn't need any diet, he should eat and drink whatever *I* want.” This slip of tongue is quite an unmistakable expression of a consistent purpose.

在个别案例中，这种有效的意义似乎很明显、也不易误解。比如那位主席在众议院致辞时宣布闭幕、而非开幕的例子，我们基于对口误发生场合的认知，往往会认为这种过失是有意味的。他对议会毫无期待，巴不得立即结束它。指出这种意思、解读这种过失，对我们来说是小菜一碟。或比如一位女士假装羡慕地跟另一位说：“我打保票，你是亲自给这顶漂亮帽子折磨 的 [4_8] 。”什么科学上的辩解都无法阻止我们从这个口误中发现她的潜台词：“这顶帽子一团糟。”又比如，有位性格泼辣的女士这样诉说道：“我丈夫问医生是否需要调整饮食，可医生说他根本用不着调整，他吃啥喝啥都应该随我 高兴。”这个口误非常确凿地表达了一个一贯的心愿。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it should turn out that not only a few cases of slips of the tongue and of errors in general, but the larger part of them, have a meaning, then this meaning of errors of which we have hitherto made no mention, will unavoidably become of the greatest interest to us and will, with justice, force all other points of view into the background. We could then ignore all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and devote ourselves to the purely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sense, that is, the meaning, the purpose of these errors. To this end therefore we will

not fail, shortly, to study a more extensive compilation of material.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我们最终发现，在口误和一般过失中，有意义的不只是少数，而是大多数事例，那么我们至今尚未提到的过失的意义，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最大的关注点，并且它会理所应当地排在其他理论立场之前。这样我们可以忽略所有生理学和精神生理学的原因，专注于考察纯粹心理学上的意义，即这些过失的意义和目的。有鉴于此，我们不会就此止步，并很快将着手研究更广泛的素材。

But before we undertake this task, I sh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follow another line of thought with me. It has repeatedly happened that a poet has made use of slips of the tongue or some other error as a means of poetic presentation. This fact in itself must prove to us that he considers the error, the slip of the tongue for instance, as meaningful; for he creates it on purpose, and it is not a case of the poet committing an accidental slip of the pen and then letting his pen-slip stand as a tongue-slip of his character. He wants to make something clear to us by this slip of the tongue, and we may examine what it is, whether he wishes to indicate by this that the person in question is distracted or fatigued. Of course, we do not wish to exagger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fact that the poet did make use of a slip to express his meaning. It could nevertheless really be a psychic accident, or meaningful only in very rare cases, and the poet would still retain the right to infuse it with meaning through his setting. As to their poetic use, however, it would not be surprising if we should glean mor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slips of the tongue from the poet than from the philologist or the psychiatrist.

不过在开始这项任务之前，我想请大家跟进另一条思考线索。有个经常发生的现象，就是诗人会运用口误或其他过失作为一种诗意的表达方式。这一现象本身也向我们说明了，诗人认为这一过失（比如口误）是有意义的，因为他有意创造了这一过失，而不是诗人偶尔犯了个笔误，然后把这个笔误当作其笔下人物的口误。他想借由这个口误清楚地表达某个意思，这样一来，我们便可探究这种意思，研究诗人是否希望以此暗示笔下人物是在分心或是疲惫了。诗人确实利用口误表达了他们的意思，当然，这一现象的重要性无需夸大。也许它真的只不过是一起偶发心理事件，或者只是在极少案例中才有意义，即便如此，诗人也许仍然可以塑造背景，赋予口误以意义。只是，说到它们的文学用途，我们从诗人那里吸收的关于口误的信息，比从语言学家或精神病学家那儿得到的更多，这也不足为奇。

Such an example of a slip of the tongue occurs in *Wallenstein* (*Piccolomini* , Act 1, Scene 5). In the previous scene, Max Piccolomini has most passionately sided with the Herzog, and dilated ardently on the blessings of peace which disclosed themselves to him during the trip on which he accompanied Wallenstein's daughter to the camp. He leaves his father and the courtier, Questenberg, plunged in deepest consternation. And then the fifth scene continues:

在席勒所著《华伦斯坦》第一幕第五场中出现了一个口误例子。在前一场中，马克斯·皮科洛米尼陪同华伦斯坦公爵的女儿去营地，感受到和平的可贵，因而非常热情地拥护公爵并热烈赞美和平。他的行为令他的父亲奥克塔维奥和朝臣奎斯登贝格陷入深深的惊恐之中。接着第五场开始了：

Q.

奎：

Alas! Alas! and stands it so?

哎呀！哎呀！就这么着了吗？

What friend! and do we let him go away

我的朋友！我们就这样放他走了

In this delusion—let him go away?

就这么——让他带着幻想走了？

Not call him back immediately, not open

不马上叫他回来，不在这里

His eyes upon the spot?

让他睁开眼看清楚吗？

OCTAVIO.

奥克塔维奥：

(Recovering himself out of a deep study)

（从沉思中回过神来 ）

He has now opened mine,

他倒让我开了眼了，

And I see more than pleases me.

我看到了不愿看到的东西。

Q.

奎：

What is it?

看到什么？

OCTAVIO.

奥克塔维奥：

A curse on this journey!

这趟旅程应该受到诅咒！

Q.

奎：

But why so? What is it?

为什么？你指的什么？

OCTAVIO.

奥克塔维奥：

Come, come along, friend! I must follow up

快，快来，朋友！我必须赶快

The ominous track immediately. Mine eyes

顺着这不详之路追踪下去。我的双眼

Are opened now, and I must use them.

如今已然睁开，必须加以利用。

Come!

快来！

(Draws Q. on with him.)

（拉着奎跟着他 ）

Q.

奎：

What now? Where go you then?

现在干什么？你要去哪儿？

OCTAVIO.

奥克塔维奥：

(Hastily.) To her herself

（匆忙地 ）去她那儿，她自己那儿。

Q.

奎：

To—

去——

OCTAVIO.

奥克塔维奥：

(Interrupting him and correcting himself.)

（打断他并纠正自己 ）

To the duke. Come, let us go—.

是去公爵那儿。快，我们走——

Octavio meant to say, “To him, to the lord,” but his tongue slips and through his words “*to her* ” he betrays to us, at least, the fact that he had quite clearly recognized the influence which makes the young war hero dream of peace.

奥克塔维奥本想说：“去他那儿，公爵那儿。”但是他口误了，从他说错的“去她那儿”则透露了他的心思，于是我们知道，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使得这位年轻战斗英雄转而梦想和平的动力是什么了。

A still more impressive example was found by O. Rank in Shakespeare. It occurs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 in the famous scene in which the fortunate suitor makes his choice among the three caskets; and perhaps I can do no better than to read to you here Rank's short account of the incident:

奥地利心理学家奥拓·兰克在莎士比亚戏剧里找到了一个更妙的例子。它出现在《威尼斯商人》著名的一场戏中，那位幸运的追求者在三个宝物箱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最好直接引述兰克对此例的短评：

> A slip of the tongue which occurs in Shakespeare's *Merchant of Venice* , Act III, Scene II, is exceedingly delicate in its poetic motivation and technically brilliant in its handling. Like the slip in *Wallenstein* quoted by Freud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 2d ed., p. 48), it shows that the poets well know the meaning of these errors and assume their comprehensibility to the audience. Portia, who by her father's wish has been bound to the choice of a husband by lot, has so far escaped all her unfavored suitors through the fortunes of chance. Since she has finally found in Bassanio the suitor to whom she is attached, she fears that he, too, will choose the wrong casket. She would like to tell him that even in that event he may rest assured of her love, but is prevented from so doing by her oath. In this inner conflict the poet makes her say to the welcome suitor:

“在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二场中出现的人物口误，艺术表现力极为细腻，措辞技巧也极为精妙。就像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学》（第2版第48页）里所举《华伦斯坦》的例子一样，它表明诗人熟谙这些过失的意思，并推测观众也理解这些意思。按照父亲的意愿，鲍西亚不得不靠抽签结果选择丈夫，至今她仅凭好运气摆脱了所有不喜欢的追求者。虽然她最终对追求者巴萨尼奥心有所属，但她担心他也会选了错的宝物箱。她想告诉他，即便在那种情况下，他也大可对她的爱放心，但因为她立过誓而不能明说。在她的内心挣扎下，诗人让她对情郎说出了以下的话：

PORTIA:

鲍西娅：

I pray you tarry; pause a day or two,

求你再想想，等一两天

Before you hazard; for, in choosing wrong

再来碰运气；因为，要选错了，

I lose your company; therefore, forbear a while:

我们就没戏了，所以，你再熬一会。

There's something tells me, (but it is not love)

像有什么声音在告诉我（可那不是爱情）

I would not lose you: …

我不能失去你……

… I could teach you

……我可以教你

How to choose right, but then I am forsworn,

怎么选对，可这样我就违背了誓言，

So will I never be: so may you miss me;

所以我万万做不到，这么着你也许会选错；

But if you do, you'll make me wish a sin

但你要选错了，又会让我起了恶念，

That I had been forsworn. Beshrew your eyes.

宁愿自己背弃了誓言。你的眼睛真可恶，

They have o'erlook'd me, and divided me;

把我看透了，把我分裂开。

One half of me is yours, the other half yours,

我的一半是你的，另一半是你的，

Mine own, I would say: but if mine, then yours,

我的意思是我自己的。可既是我的，那就是你的，

And so all yours.

所以我全都是你的。

Just that, therefore, which she meant merely to indicate faintly to him or really to conceal from him entirely, namely that even before the choice of the lot she was his and loved him, this the poet—with admirable psychological delicacy of feeling—makes apparent by her slip; and is able, by this artistic device, to quiet the unbearable uncertainty of the lover, as well as the equal suspense of the audience as to the issue of the choice.

这样，她那种本意只是想向他稍加暗示，其实又想对他全然隐瞒的心思，就是，即便抽签之选不可测，她也是他的人，并深爱着他。诗人令人叫绝地处理了微妙的心理感受，用她的口误把这种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通过这种春秋笔法，平息了她爱人不堪忍受的疑虑，同样打消了观众对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的担忧。”

Notice, at the end, how subtly Portia reconciles the two declarations which are contained in the slip, how she resolv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m and finally still manages to keep her promise:

注意，在最后口误那段，鲍西亚把两句表白的话处理得何其巧妙，既解决了两者的矛盾，又最终成功守住了她的承诺：

"… but if mine, then yours,

"……可既是我的，那就是你的，

And so all yours."

所以我全都是你的。"

Another thinker, alien to the field of medicine, accidentally disclosed the meaning of errors by an observation which has anticipated our attempts at explanation. You all know the clever satires of Lichtenberg (1742–1749), of which Goethe said, "Where he jokes, there lurks a problem concealed." Not infrequently the joke also brings to light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Lichtenberg mentions in his jokes and satiric comments the remark that he always read "Agamemnon" for "angenommen," [3_9] so intently had he read Homer. Herein is really contained the whole theory of

misreadings.

另一位对于医学全然不知的思想家偶然间揭示了过失的意义，他的发现预见到了我们寻求解答的种种尝试方法。大家都很熟悉利希滕贝格在1742–1749年间的那些诙谐的讽刺作品，歌德曾评价说：“他调侃之处，必潜藏问题。”他的调侃往往能启发问题的解决之道。利希滕贝格在他的笑话和讽刺评论中提到这样的话，他读《荷马史诗》太专心，总是有意地把“阿伽门农”读成“安根农门” [4_9] 。这里其实就隐含了误读现象的全部奥秘了。

At the next session we will see whether we can agree with the poets in their conception of the meaning of psychological errors.

下一节课中，我们会看看诗人对心理过失意义的判断是否合理。

[3_1]."Fehl-leistungen."

[3_2].In the German, the correct announcement is, "connectable schickt sein Schwert zurück." The novice, as a result of the suggestion, announced instead that "komfortabel schickt sein Pferd zurück."

[3_3]."Aufstossen" instead of "anstossen."

[3_4]."Begleit-digen" compounded of "begleiten" and "beleidigen."

[3_5]."Briefkasten" instead of "Brütkasten."

[3_6]."Geneigt" instead of "geeignet."

[3_7]."Versuchungen" instead of "Versuche."

[3_8]."Aufgepatzt" instead of "aufgeputzt."

[3_9]."Angenommen" is a verb, meaning "to accept."

[4_1].德语作“fehl-leistungen”。

[4_2].在德语中，正确的台词是“Connetable schickt sein Schwert zurück”（警长送回了宝剑），而那个新演员在暗示的引导下说成了“Komfortabel schickt sein Pferd zurück”（独马车送回了马）。

[4_3].德语“anstossen”（干杯）误说成“aufstossen”（打嗝）。

[4_4].德语“begleit-digen”是“begleiten”（陪同）和“beleidigen”（侮辱）的混合词。

[4_5].德语“brütkasten”（恒温箱）误为“briefkasten”（邮箱）。

[4_6].德语“geeignet”（适宜）误为“geneigt”（倾向）。

[4_7].德语“versuche”（尝试）误为“versuchungen”（诱惑）。

[4_8].德语“aufgeputzt”（褶边）误为“aufgepatzt”（折磨）。

[4_9].“angenommen”是动词，意为“接受”。

Third Lecture　The Psychology of Errors—(Continued)

第三讲　过失心理学（续）

At the last session we conceived the idea of considering the error, not in its relation to the intended act which it distorted, but by itself alone, and we received the impression that in isolated instances it seems to betray a meaning of its own. We declared that if this fact could be established on a larger scale, then the meaning of the error itself would soon come to interest us more tha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error occurs.

上一讲中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研究过失时，不去考虑它与它所歪曲的预期行动的关系，而仅仅考虑它本身；并且我们形成了一个认知，即：在个别事例中，它自身的意义似乎能暴露出来。我们宣布，如果这个事实在更大范围内也能够成立，我们研究过失本身意义的兴趣，将很快超越对过失发生条件的研究。

Let us agree once more on what we understand by the “meaning” of a psychic process. A psychic process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purpose which it serves and the position which it holds in a psychic sequence. We can also substitute the word “purpose” or “intention” for “meaning” in most of our investigations. Was it then only a deceptive appearance or a poetic exagger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an error which made us believe that we recognized a purpose in it?

请我们再次就心理过程的“意义”的理解达成一个共识。心理过程包括了它的目的以及它在连续心理活动中所处的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意义”替换成“目的”或“意向”。那么，一个过失是否徒有骗人的表象，或是它的重要性被诗意地夸张了，使得我们相信它也有所谓的目的呢？

Let us adhere faithfully to the illustrative example of slips of the tongue and let us examine a larger number of such observations. We then find whole categories of cases in which the intention, the meaning of the slip itself, is clearly manifest. This is the case above all in those examples in which one says the opposite of what one intended. The president said, in his opening address, “I declare the meeting closed.” His intention is certainly not ambiguous.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his slip is that he wants to terminate the meeting. One might point the conclusion with the remark “he said so himself.” We have only taken him at his word. Do not interrupt me at this point by remarking that this is not possible, that we know he did not want to terminate the meeting but to open it, and that he himself, whom we have just recognized as the best judge of his intention, will affirm that he meant to open it. In so doing you forget that we have agreed to consider the error entirely by itself. Its relation to the intention which it distorts is to be discussed later. Otherwise you convict yourself of an error in logic by which you smoothly conjure away the problem under discussion; or “beg the question,” as it is called in English.

我们还是坚定不移地使用口误作为例证，并且检视更多资料。这样我们会发现在这类案例中，口误本身目的和意义清晰明了。这其中最多的案例是把要说的话说反。那位众议院主席在开幕词中说：“我宣布会议闭幕。”他的意愿当然是毫不含糊的。他口误的意义和目的

就是，他希望会议结束。可以用“他自己这么说的”这样的话来下此定论。我们只是相信他的话语本身。现在先别打岔说这不可能，说他不是想闭幕，而是想开幕，说他本人应该最清楚自己的意图，他会确认自己的本意是想开幕。大家如果这样看，就忘记了我们有约在先，要完全只看待过失本身。关于过失与被其曲解的意向间的关系应该以后再讨论。否则大家就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轻飘飘地就把要讨论的问题给赶走了，或者说“想当然”。

In other cases in which the speaker has not said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he intended, the slip may nevertheless express an antithetical meaning. “I am not *inclined* to appreciate the merits of my predecessor.” “*Inclined* ” is not the opposite of “*in a position to* ,” but it is an open betrayal of intent in sharpest contradiction to the attempt to cope gracefully with the situation which the speaker is supposed to meet.

在一些其他案例中，说话者的口误与要说的话并不是完全相反，它却还是能表达相反的意思。比如“我不屑 评价前任教授的优点”，“不屑”并不是“不宜”的反义词，但它还是彻底暴露了一种心思，说话者本希望措辞得体，而他的话与他的尝试形成了最尖锐的对比。

In still other cases the slip simply adds a second meaning to the one intended. The sentence then sounds like a contradiction, an abbreviation, a condensation of several sentences. Thus the lady of energetic disposition, “He may eat and drink whatever *I* please.” The real meaning of this abbreviation is as though the lady had said, “He may eat and drink whatever he pleases. But what does it matter what *he* pleases! It is *I* who do the pleasing.” Slips of the tongue often give the impression of such an abbreviation. For

example, the anatomy professor, after his lecture on the human nostril, asks whether the class has thoroughly understood, and after a unanimous answer in the affirmative, goes on to say: “I can hardly believe that is so, since the people who understand the human nostril can, even in a city of millions, be counted on *one finger* —I mean, on the fingers of one hand.” The abbreviated sentence here also has its meaning: it expresses the idea that there is only one person who thoroughly understands the subject.

还有些口误案例只是在要说的话上加了第二个意思。这样，所说的句子听起来前后矛盾，像是省略或是凝缩了几个句子。以那位性格泼辣的女士为例：“他吃啥喝啥应该随我 高兴。”这个省略句听着就像在说：“他吃啥喝啥应该随他高兴。可是他高兴有什么要紧？要紧的是我高兴。”口误通常会给人以意犹未尽的感觉。比如，一位解剖学教授上完人类鼻腔课后，问全班是不是都懂了，得到一致肯定的回答后，他继续说道：“我几乎不敢相信，即使在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熟悉人类鼻腔知识的人也是一指 ——我是说屈指可数。”这个简略化的句子也有言外之意：这表明他内心认为只有一个人完全理解了该学科。

In contrast to these groups of cases are those in which the error does not itself express its meaning, in which the slip of the tongue does not in itself convey anything intelligible; cases, therefore, which are in sharpest opposition to our expectations. If anyone, through a slip of the tongue, distorts a proper name, or puts together an unusual combination of syllables, then this very common occurrence seems already to have decided in the negativ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ll errors contain a meaning. Yet closer inspection of these examples discloses the fact that an understanding of such a distortion is easily possible, indee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unintelligible cases and the previous comprehensible ones is not so very great.

与这几类案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过失本身没有表达其意思的例子，口误自身没有传达任何能理解的内容，因而这些案例与我们的设想大相径庭。比如，有人在口误中说错了一个专有名词，或是生造了个怪异的音节组合，这些很常见的现象似乎已经对“是否所有过失都有意义”这一问题给出了否定答案。但是再仔细检视一下这些例子后会发现，其实理解这些错误也大有可能，其实晦涩难懂的案例与清晰易懂的案例之间，差别也不是很大。

A man who was asked how his horse was, answered, “Oh, it may *stake* —it may take another month.” When asked what he really meant to say, he explained that he had been thinking that it was a *sorry* business and the coming together of “*take* ” and “*sorry* ” gave rise to “*stake* .” (Meringer and Mayer.)

前面提到的梅林格和迈耶有个案例，一男子被人问到他马的情况，他答道：“噢，它大概还能猜（stake）——捱（take）一个月。”对方问他到底想说什么，他解释说，他心里正想着这事真惨（sorry），然后“捱 ”和“惨 ”凑在一起就成了“猜 ”。

Another man was telling of some incidents to which he had objected, and went on, “and then certain facts were *re-filed* .” Upon being questioned, he explained that he meant to stigmatize these facts as “*filthy* .” “*Revealed* ” and “*filthy* ” together produced the peculiar “*re-filled* .” (Meringer and Mayer.)

还是梅林格和迈耶的例子，一个人列举了一些他讨厌的事情后接着说：“这样的话，有些事情也就暴废（re-filed）了。”人家问他什么意思，他解释说他心里觉得这些事很“污秽”（filthy），“暴露”（revealed）和“污秽”碰在一块就成了个怪词“暴废”。

You will recall the case of the young man who wished to “*inscort*” an unknown lady. We took the liberty of resolving this word construction into the two words “*escort*” and “*insult*,” and felt convinced of this interpretation without demanding proof of it. You see from these examples that even slips can be explained through the concurrence, the interference, of two speeches of different intentions. The difference arises only from the fact that in the one type of slip the intended speech completely crowds out the other, as happens in those slips where the opposite is said, while in the other type the intended speech must rest content with so distorting or modifying the other as to result in mixtures which seem more or less intelligible in themselves.

大家应该记得前一讲提到的那个年轻人，他对一位陌生女士说了“讽陪”。我们自行把这个词的构造分解成了“奉陪”和“讽刺”这两个词，没有求证就对这个看法确信无疑。从这些例子中可见，口误还能解释成两个意向不一致的话语同时发生并互相干扰的结果。差别只在于，一种口误中，想说的话完全排斥了另一个意向，比如说了相反的意思；而另一种口误是，想说的话安于现状，与被歪曲或篡改了的另一意向合伙造出一些混合词语，它们本身的意思也是能窥见一二的。

We believe that we have now grasped the secret of a large number of slips of the tongue. If we keep this explanation in mind

we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still other hitherto mysterious groups. In the case of the distortion of names, for instance, we cannot assume that it is always an instance of competition between two similar, yet different names. Still, the second intention is not difficult to guess. The distorting of names occurs frequently enough not as a slip of the tongue, but as an attempt to give the name an ill-sounding or debasing character. It is a familiar device or trick of insult, which persons of culture early learned to do without, though they do not give it up readily. They often clothe it in the form of a joke, though, to be sure, the joke is of a very low order. Just to cite a gross and ugly example of such a distortion of a name, I mention the fact that the nam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French Republic, *Poincaré* , has been at times, lately, transformed into "*Schweinskarré* ." It is therefore easy to assume that there is also such an intention to insult in the case of other slips of the tongue which result in the distortion of a name. In consequence of our adherence to this conception, similar explanations force themselves upon us, in the case of slips of the tongue whose effect is comical or absurd. "I call upon you to *hiccough* the health of our chief." [4_1] Here the solemn atmosphere is unexpectedly disturb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a word that awakens an unpleasant image; and from the prototype of certain expressions of insult and offense we cannot but suppose that there is an intention striving for expression which i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ostensible respect, and which could be expressed about as follows, "You needn't believe this. I'm not really in earnest. I don't give a whoop for the fellow—etc." A similar trick which passes for a slip of the tongue is that which transforms a harmless word into one which is indecent and obscene. [4_2]

相信大家现在已经掌握了多数口误的奥秘。只有对这个解释心中有数，才能够理解其他几类至今都很神秘的现象。譬如名字的变形，

我们不能假定它总是两个类似但不同的名字间的斗争。不过第二个意图是不难猜到的。名字变形不是口误的情况不算少见，它也许是故意让名字变得难听或不雅。这是一种常见的侮辱手法或技巧，有教养的人早就学会避之不用，但他们并不甘心放弃它们。他们经常把它包装成笑话，只不过这种笑话确实挺低级。举一个关于名字变形的粗鄙例子，法国共和国总统庞加莱（Poincaré）的名字，后来经常被人改为“胖大赖”（Schweinskarré）。因此容易猜得到，在导致其他名字变形的口误中，也有一种侮辱的意向。一旦我们坚持了这个说法，类似情况就顺理成章了，比如引发滑稽或荒诞效果的口误。“让我们为长官的健康干咳[5_1]。”在这里，因为有人说了一个引发不良联想的单词，庄严的气氛被搅乱了。羞辱和冒犯的语汇有特定表达模式，大家未免会由此猜想，这其中一定说明某种意向在蠢蠢欲动地表达，与表面上的毕恭毕敬形成了鲜明对比，实际上可以解读为以下的话：“大家不必相信，我其实并不真挚，我根本瞧不上那家伙。”一个冒充口误的类似花招，是把一个无伤大雅的单词改装成一个粗鄙下流的字眼。[5_2]

We know that many persons have this tendency of intentionally making harmless words obscene for the sake of a certain lascivious pleasure it gives them. It passes as wit, and we always have to ask about a person of whom we hear such a thing, whether he intended it as a joke or whether it occurred as a slip of the tongue.

我们知道，有许多人喜欢故意把无辜的单词念得很下流，只是为了从中获得些低级趣味。这成了经验之谈：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追问当事人是故意说笑，还是一时口误。

Well, here we have solved the riddle of errors with relatively little trouble! They are not accidents, but valid psychic acts. They

have their meaning; they arise through the collaboration—or better, the mutual interference—of two different intentions. I can well understand that at this point you want to swamp me with a deluge of questions and doubts to be answered and resolved before we can rejoice over this first result of our labors. I truly do not wish to push you to premature conclusions. Let us dispassionately weigh each thing in turn, one after the other.

好，现在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开了过失的谜团！它们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有效的心理行动。它们有其意义，是两种不同意向互相作用、更确切地说是互相干扰的结果。现在我心里明白得很，大家还没有为我们的劳动成果欢欣鼓舞，就有一大堆的问题和疑惑要我解答和解决了。我诚心希望大家不要急着得出草率的结论。让我们冷静一下，一个接一个地审视每件事。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Whether I think this explanation is valid for all cases of slips of the tongue or only for a certain number? Whether one can extend this same conception to all the many other errors—to mis-reading, slips of the pen, forgetting, picking up the wrong object, mislaying things, etc? In the face of the psychic nature of errors, what meaning is left to the factors of fatigue, excitement, absent-mindedness and distraction of attention? Moreover, it is easy to see that of the two competing meanings in an error, one is always public, but the other not always. But what does one do in order to guess the latter? And when one believes one has guessed it, how does one go about proving that it is not merely a probable meaning, but that it is the only correct meaning?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 wish to ask? If not, then I will continue. I would remind you of the fact that we really are not much concerned with the errors themselves, but we wanted only to learn something of

value to psychoanalysis from their study. Therefore, I put the question: What are these purposes or tendencies which can thus interfere with others, and what relation is there between the interfering tendencies and those interfered with? Thus our labor really begins anew, after the explanation of the problem.

大家想说什么？我认为这个解释是适用于所有口误案例还是仅限于一部分？是不是能用这个概念解释其他各类过失，比如误读、笔误、遗忘、拿错物品、找不到东西等等？面对过失的心理特性，疲惫、兴奋、心不在焉和注意力分散等因素有何意义？而且很容易发现，一个过失里两个互斗的意义中，一个总是明显的，而另一个却不一定。那么怎么做才能猜测到后者是什么意义？当我们认为猜到其意义后，如何去证明它不仅是可能的意义，而且是唯一正确的意义呢？大家还有什么要问的？如果没有，我会继续讲下去。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对过失本身其实并不太关心，我们只是希望通过研究它们了解对精神分析有价值的信息。因此，我会提出这个问题：能对其他同类造成如此干扰的目的或倾向是什么？干扰和被干扰的倾向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就这样，刚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我们又要费力解决新问题了。

Now, is this the explanation of all tongue slips? I am very much inclined to think so and for this reason that as often as one investigates a case of a slip of the tongue, it reduces itself to this type of explanat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one cannot prove that a slip of the tongue cannot occur without this mechanism. It may be so; for our purposes it is a matter of theoretical indifference, since the conclusions which we wish to draw by way of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remain untouched, even if only a minority of the cases of tongue slips come within our conception, which is surely not the case. I shall anticipate the next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we may extend to other types of errors what we have gleaned from slips of the tongue, and answer it in the affirmative. You will convince yourselves of that conclusion when we turn our attention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examples of pen slips, picking up wrong objects, etc. I would advise you, however, for technical reasons, to postpone this task until we shall have investigated the tongue slip itself more thoroughly.

我在此试问，这个解释对所有口误都说得通吗？我非常倾向于这个观点，也因此认为研究口误的案例只需用这个解释即可。不过另一个方面，我们又无法证明没有不适用本原理的口误现象。也许如此吧，不过这在理论上也不要紧，这是因为，即使我们的观点只适用于一小部分口误（这肯定不是真实情况），我们通过引介精神分析学得出的结论仍可保持不变。我可以猜到下一个问题是：我们从口误中观察到的规律是不是能扩展到其他类型的过失上？答案是肯定的。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对笔误、拿错物品等过失的调查后，会对刚才的结论深信不疑。然而我会建议大家，理论上还是要等口误研究得更透彻之后，再推进这项任务。

The question of what meaning those factors which have been placed in the foreground by some authors—namely, the factors of circulatory disturbances, fatigue, excitement, absent-mindedness, the theory of the distraction of attention—the question of what meaning those factors can now have for us if we accept the above described psychic mechanism of tongue slips, deserves a more detailed answer. You will note that we do not deny these factors. In fact, it is not very often that psychoanalysis denies anything which is asserted on the other side. As a rule psychoanalysis merely adds something to such assertions and occasionally it does happen that what had hitherto been overlooked, and was newly added by

psychoanalysis, is just the essential thing. The influence on the occurrence of tongue slips of such physiological predispositions as result from slight illness, circulatory disturbances and conditions of fatigue, should be acknowledged without more ado. Daily personal experience can convince you of that. But how little is explained by such an admission! Above all, they are not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the errors. Slips of the tongue are just as possible when one is in perfect health and normal condition. Bodily factors, therefore, have only the value of acting by way of facilitation and encouragement to the peculiar psychic mechanism of a slip of the tongue.

关于被一些学者看得很重的因素（亦即循环性紊乱、疲惫、兴奋、心不在焉、注意力分散说等）的意义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了前述口误的心理机制说法，那么关于这些因素存在的意义，就值得我们进行更详细的解答。大家注意，我们不否定这些因素。事实上，精神分析并不总是否定与其不一样的论调。一般而言，精神分析只会对这些论调做些补充，不过确实偶尔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至今被忽视的、被精神分析最新填补上的东西正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关于轻微疾病、循环性紊乱和疲惫状态等导致的生理倾向对于口误发生的影响，无需赘言，我们承认其存在。大家可以在个人日常生活经验中进行验证。但是承认这一点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呢？关键在于，它们并不是过失的必要条件。口误在人体处于完全健康和正常状态时也很有可能发生。因此身体原因只有在对口误的特有心理机制具有促进和刺激作用时才有价值。

To illustrate this relationship, I once used a simile which I will now repeat because I know of no better one as substitute. Let us suppose that some dark night I go past a lonely spot and am there assaulted by a rascal who takes my watch and purse; and then, since I did not see the face of the robber clearly, I make my

complaint at the nearest police station in the following words: “Loneliness and darkness have just robbed me of my valuables.” The police commissioner could then say to me: “You seem to hold an unjustifiably extreme mechanistic conception. Let us rather state the case as follows: Under cover of darkness, and favored by the loneliness, an unknown robber seized your valuables. The essential task in your case seems to me to be to discover the robber. Perhaps we can then take his booty from him again.”

为了说明这个关系，我有次打了个比方，在此我重提一次，因为我找不到更好的例子了。假设在某个黑夜，我经过一处僻静地点时，被一个歹徒袭击并抢去了手表和皮包；跟着，因为我没有清楚地看到抢劫犯的面孔，我在最近的警署报案时这么说：“僻静和黑暗抢走了我的贵重物品。”警署长官可能会对我这么说：“您的说法似乎没有道理，生硬得很。我们应该这么描述这个案子：在黑暗的掩护下，由于僻静的帮助，一位不知名的抢劫犯抢去了您的贵重物品。我认为您的案子中关键任务是找到抢劫犯。也许我们能夺回赃物。”

Such psycho-physiological moments as excitement, absent-mindedness and distracted attention, are obviously of small assistance to us for the purpose of explanation. They are mere phrases, screens behind which we will not be deterred from looking. The question is rather what in such cases has caused the excitement, the particular diversion of attention. The influence of syllable sounds, word resemblances and the customary associations which words arouse should also be recognized as having significance. They facilitate the tongue slip by pointing the path which it can take. But if I have a path before me, does that fact as a matter of course determine that I will follow it? After all, I must have a stimulus to make me decide for it, and, in addition, a force

which carries me forward on this path. These sound and word relationships therefore serve also only to facilitate the tongue slip, just as the bodily dispositions facilitate them; they cannot give the explanation for the word itself. Just consider, for example, the fact that in an enormously large number of cases, my lecturing is not disturbed by the fact that the words which I use recall others by their sound resemblance, that they are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opposites, or arouse common associations. We might add here the observation of the philosopher Wundt, that slips of the tongue occur when, in consequence of bodily fatigue, the tendency to association gains the upper hand over the intended speech. This would sound very plausible if it were not contradicted by experiences which proved that from one series of cases of tongue-slips bodily stimuli were absent, and from another, the association stimuli were absent.

像兴奋、心不在焉和注意力分散这样的精神生理状况，对于我们的解释显然帮助不大。它们只是些说法，像透明屏风似的，即使在面前也不会阻挡我们的视线。重要的是，在这些案例中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兴奋或特别的注意力转移。音节发音、单词相似性以及单词引发的习惯联想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它们影响了口误的路径方向，促使口误发生。但如果我面前有一条路径，是否意味着我必然要走这条道路呢？最终必须要有一个原因刺激我决定走下去，另外也必须要一股动力，推动我在这条路上向前走。因而这些发音和单词联系也只能作为口误的诱发因素，正如身体状况也是诱发因素一样，它们不能为单词本身提供解释。请思考一下，比如我讲解了数量极多的案例，照理说我用的单词该使人想到发音相似的单词，或者联系紧密的反义词，或者会引发常见联想，但是我的讲解并未受到干扰。在此可以补充哲学家冯特的一个发现，即：身体疲惫之后，联想的倾向占了想说的话语的上风，这时口误就发生了。这貌似不无道理，但是与之矛盾的一些经验表明，身体状况的刺激在有一系列的口误案例中是缺席的，而在

另一系列中缺席的则是联想的刺激。

However, your next question is on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me, namely, in what way can one establish the existence of the two mutually antagonistic tendencies? You probably do not suspect how significant this question is. It is true, is it not, that one of the two tendencies, the tendency which suffers the interference, is always unmistakable? The person who commits the error is aware of it and acknowledges it. It is the other tendency, what we call the interfering tendency, which causes doubt and hesitation. Now we have already learned, and you have surely not forgotten, that these tendencies are, in a series of cases, equally plain. That is indicated by the effect of the slip, if only we have the courage to let this effect be valid in itself. The president who said the opposite of what he meant to say made it clear that he wanted to open the meeting, but equally clear that he would also have liked to terminate it. Here the meaning is so plain that there is nothing left to be interpreted. But the other cases in which the interfering tendency merely distorts the original, without bringing itself to full expression—how can one guess the interfering meaning from the distortion?

然而，大家的下一个问题是我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也就是：用什么方法可以确认两个互为对立倾向的存在？大家应该不会怀疑该问题的重要性。这两个倾向中被干扰的倾向总是确凿无疑的，这是事实，不是吗？犯错的当事人是知道并承认它的。另一个倾向，我们称为干扰性倾向，才是存疑和模糊的。现在我们知道了，而且大家肯定没忘记，这些倾向在一系列案例中同样很清楚。这是由口误的效果所暗示的，不过我们要敢于承认这一效果本身的有效性。那位说的与想的话意思相反的议会主席显然是想宣布会议开幕的，同时显然他也希望会议结束。这里的意思很明白，无需多做解释。但是在其他案例中，干

扰性倾向只是让原意变了形，无法完全解释清楚，如此怎么能从变形中猜到干扰项的意义呢？

By a very sure and simple method, in the first series of cases, namely, by the same method by which one establishes the existence of the meaning interfered with. The latter is immediately supplied by the speaker, who instantly adds the originally intended expression. “It may *stake* —no, it may *take* another month.” Now we likewise ask him to express the interfering meaning; we ask him: “Now, why did you first say *stake* ?” He answers, “I meant to say —'This is a *sorry* business.'” And in the other case of the tongue slip —*re-filed* —the subject also affirms that he meant to say “It is a *filthy* business,” but then moderated his expression and turned it into something else. Thus the discovery of the interfering meaning was here as successful as the discovery of the one interfered with. Nor did I unintentionally select as examples cases which were neither related nor explained by me or by a supporter of my theories. Yet a certain investigation was necessary in both cases in order to obtain the solution. One had to ask the speaker why he made this slip, what he had to say about it. Otherwise he might perhaps have passed it by without seeking to explain it. When questioned, however, he furnished the explanation by means of the first thing that came to his mind. And now you see,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 this slight investig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 are already a psychoanalysis, and the prototype of every psychoanalytic investigation which we shall conduct more extensively at a later time.

在第一类案例中，我们可以用一种有把握的简单方法，它与确认被干扰项意义时使用的方法相同。说话者会立刻补充后者的意思。比

如“它能再猜 ——不，再捱 一个月。”现在我们或许会请他表述干扰项的意义，问他：“那么，你为什么会先说猜 ？”他答道：“我本想说‘这事真惨 ’。”在另一个口误例子中（暴废 ），当事人也确定自己想说“这事真污秽 ”，但是又改了口，换成其他的说辞。就这样，我们可以像发现被干扰项的意义时一样，成功发现干扰项的意义。我并没有下意识地选择那些我本人或我的理论支持者擅长讲解的事例。不过为了解决问题，有必要对这两个案例做个调查。必须询问说话者口误的原因，问问关于这个口误他还有什么要说的。否则他有可能放过这个口误，而不去解释原因。但是一旦被问到，他们会通过首先想到的事情找到答案。现在，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明白了吧，这个小调查及其结果已经是一次精神分析了，我们以后会进行大量的精神分析调查，而这就是一个小模型。

Now, am I unduly suspicious if I suspect that at the same moment in which psychoanalysis emerges before you, your resistance to psychoanalysis also raises its head? Are you not anxious to raise the objection that the information given by the subject we questioned, and who committed the slip, is not proof sufficient? He naturally has the desire, you say, to meet the challenge, to explain the slip, and hence he says the first thing he can think of if it seems relevant. But that, you say, is no proof that this is really the way the slip happened. It might be so, but it might just as well be otherwise, you say. Something else might have occurred to him which might have fitted the case just as well and better.

现在如果我怀疑大家因为近距离接触精神分析，对精神分析的抵触情绪抬头了的话，我是不是疑心过重了呢？大家难道不会急于反对我说，我们质询的对象，即口误的当事人，他所给出的信息并不是充分的证据？你们会说：他当然希望接受挑战、去解释口误，因此他觉

得首先想到的事大概与此有关；不过这并不能证明它就是口误发生的原因；也许它是原因，但说不定有其他原因，也许是他心里其他念头更符合实情也未可知呢。

It is remarkable how little respect, at bottom, you have for a psychic fact! Imagine that someone has decided to undertake the chemical analysis of a certain substance, and has secured a sample of the substance, of a certain weight—so and so many milligrams. From this weighed sample certain definit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Do you think it would ever occur to a chemist to discredit these conclusions by the argument that the isolated substance might have had some other weight? Everyone yields to the fact that it was just this weight and no other, and confidently builds his further conclusions upon that fact. But when you are confronted by the psychic fact that the subject, when questioned, had a certain idea, you will not accept that as valid, but say some other idea might just as easily have occurred to him! The trouble is that you believe in the illusion of psychic freedom and will not give it up. I regret that on this point I find myself in complete opposition to your views.

可见大家打心底里对一个心理事实是有多么轻视！假设有人打算对某一物质进行化学分析，想办法弄到了一定重量的样品，大概不少毫克吧。从这个一定重量的样品中就可以得出一些确定的结论。大家觉得，一个化学家会因为这种物质中有极个别的可能会有其他重量，而质疑这些结论吗？大家都默许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它的重量，别无其他，然后在这个事实基础上自信地做出更多推论。可是当大家面对一个心理事实——即被询问的当事人有了某个念头时，大家却不相信它的有效性，还说他很可能会有其他念头！麻烦的是，大家对所谓“心理活动自由”的幻觉深信不疑，对它念念不忘。很遗憾，我在这一点上的看法与大家恰恰相反。

Now you will relinquish this point only to take up your resistance at another place. You will continue, “We understand that it is the peculiar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that the solution of its problems is discovered by the analyzed subject himself. Let us take another example, that in which the speaker calls upon the assembly 'to *hiccough* the health of their chief.' The interfering idea in this case, you say, is the insult. It is that which is the antagonist of the expression of conferring an honor. But that is mere interpretation on your part, based on observations extraneous to the slip. If in this case you question the originator of the slip, he will not affirm that he intended an insult, on the contrary, he will deny it energetically. Why do you not give up your unverifiable interpretation in the face of this plain objection?”

即便现在大家放弃这个观点，也会变着法子反驳我的。大家会继续说：“我们知道，让分析对象自己发现问题的症结，是精神分析的特殊技巧。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话人在宴会上号召‘为长官的健康干咳　’那个例子，你说在这个案例中起干扰作用的念头是讥讽。它与原本的奉承话是背道而驰的。但那只是你的一面之词，依据的也是与该口误不相干的见闻认识。在这个案例中，如果你去询问制造口误的人，他肯定不会认可讥讽的说法，反而会极力反对。在听了这个明确反对之后，你为何不放弃你那种无法求证的解释呢？”

Yes, this time you struck a hard problem. I can imagine the unknown speaker. He is probably an assistant to the guest of honor, perhaps already a minor official, a young man with the brightest prospects. I will press him as to whether he did not after all feel conscious of something which may have worked in opposition to the demand that he do honor to the chief. What a fine success I'll

have! He becomes impatient and suddenly bursts out on me, “Look here, you'd better stop this cross-examination, or I'll get unpleasant. Why, you'll spoil my whole career with your suspicions. I simply said '*auf* -gestossen' instead of '*an* -gestossen,' because I'd already said '*auf* ' twice in the same sentence. It's the thing that Meringer calls a perservation, and there's no other meaning that you can twist out of it. Do you understand me? That's all.”

嗯，这一回大家的问题挺棘手。他可能是这位重要贵宾的助手，大概已经是个小官，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我会追问他当时到底有没有一些心理活动，对恭维长官的本意起了反作用。瞧，我会打个漂亮仗！他会不耐烦起来，突然对我发火：“我说，你最好不要再追根问底了，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你疑神疑鬼，妄图毁我前途，是何居心？我把‘干杯 ’（*an* -gestossen）说成了‘干咳 ’（*auf*- gestossen），只是因为我在一个句子里发了两次相同的音（auf）。梅林格把这叫做语音持续，你是曲解不成其他意思的。明白了吗？仅此而已。”

Hm, this is a surprising reaction, a really energetic denial. I see that there is nothing more to be obtained from the young man, but I also remark to myself that he betrays a strong personal interest in having his slip mean nothing. Perhaps you, too, agree that it is not right for him immediately to become so rude over a purely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but, you will conclude, he really must know what he did and did not mean to say.

嗯，这可是个出人意料的反应，否认得真够彻底。我知道从年轻人身上榨不出什么东西了，但我还是要说，他暴露了自己的强烈意图，就是宣称他的口误没别的意思。也许大家也会同意，他不应该在一个纯粹理论调查中瞬间变得如此粗鲁，但是大家会下结论说，他一

定知道他本意想说什么、无意去说什么。

Really? Perhaps that's open to question nevertheless.

真的吗？不过这大概有待讨论。

But now you think you have me. “So that is your technique,” I hear you say. “When the person who has committed a slip gives an explanation which fits your theory, then you declare him the final authority on the subject. 'He says so himself!' But if what he says does not fit into your scheme, then you suddenly assert that what he says does not count, that one need not believe him.”

不过大家现在会觉得自己抓到了我的把柄。“原来这就是你的花招。”你们会这么说，“要是口误当事人的解释符合你的理论，你就把他当成问题的最终裁判，‘他自己这么说的！’可要是他的话与你的想法对不上，你马上就断言他的话不算数，不必相信他。”

Yet that is certainly true. I can give you a similar case in which the procedure is apparently just as monstrous. When a defendant confesses to a deed, the judge believes his confession. But if he denies it, the judge does not believe him. Were it otherwise, there would be no way to administer the law, and despite occasional miscarriages you must acknowledge the value of this system.

可这么做确实是对的。我举一个类似的事例吧，其中的程序显然

也不公正。当被告供认一桩事情时，法官会相信他们的供认。可是当他们否认时，法官却不相信他们。若不如此，法律就根本无法执行，尽管这种体制偶尔也会出点岔子，但你必须承认它的作用。

Well, are you then the judge, and is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slip a defendant before you? Is a slip of the tongue a crime?

那么，是不是你成了法官，面前的口误当事人成了被告，而口误成了犯罪？

Perhaps we need not even decline this comparison. But just see to what far-reaching differences we have come by penetrating somewhat into the seemingly harmless problems of the psychology of errors, differences which at this stage we do not at all know how to reconcile. I offer you a preliminary compromise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ogy of the judge and the defendant. You will grant me that the meaning of an error admits of no doubt when the subject under analysis acknowledges it himself. I in turn will admit that a direct proof for the suspected meaning cannot be obtained if the subject denies us the information; and, of course, that is also the case when the subject is not present to give us the information. We are, then, as in the case of the legal procedure, dependent on circumstances which make a decision at one time seem more, and at another time, less probable to us. At law, one has to declare a defendant guilty on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for practical reasons. We see no such necessity; but neither are we forced to forego the use of these circumstances.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believe that a science consists of nothing but conclusively proved theorems, and any such demand would be unjust. Only a person with a mania for authority,

a person who must replace his religious catechism with some other, even though it be scientific, would make such a demand. Science has but few apodeictic precepts in its catechism; it consists chiefly of assertions which it has developed to certain degrees of probability. It is actually a symptom of scientific thinking if one is content with these approximations of certainty and is able to carry on constructive work despite the lack of the final confirmation.

或许，我们先不要拒绝这样的对比。想想看，在深入研究过失心理学那些貌似无害的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之间产生了多大的分歧，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调和这些分歧。我借用法官和被告的比方，提出了一个初步和解的办法：大家会认可我说的，当被分析者自己承认时，过失的意义是确认无疑的；而我会相应地承认，如果当事人向我们否认该情况，则我们无法取得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揣测的意义，当然，如果当事人无法到现场给予我们信息，也是如此。这样，我们像在走法律程序一样，依据具体情节（或间接证据）来定夺，得出结论的可能性时而大、时而小。在法律上，依据间接证据对被告定罪是有实际原因的。我们则没有必要这么做，但也不用刻意摒弃这些间接证据不用。不应该错误地认为，一门科学除了确凿论证过的理论之外别无其他，这样要求是不公平的。只有迷信权威的人、用科学替代宗教教义的人，才会这么要求。科学的教义中也仅有极少数无可置疑的定论，而科学论断主要包括不同程度的概率。实际上科学思维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满足于近似确定的观点，即使得不到最终确认也能继续开展建设性的工作。

But where do we get the facts for our interpretations, the circumstances for our proof, when the further remarks of the subject under analysis do not themselves elucidate the meaning of the error? From many sources. First of all, from the analogy with phenomena extraneous to the psychology of errors; as, for example,

when we assert that the distortion of a name as a slip of the tongue has the same insulting significance as an intentional name distortion. We get them also from the psychic situation, in which the error occurred, from our knowledge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error, from the impressions which that person received before making the error, and to which he may possibly have reacted with this error. As a rule, what happens is that we find the meaning of the error according to general principles. It is then only a conjecture, a suggestion as to what the meaning may be, and we then obtain our proof from examination of the psychic situation. Sometimes, too, it happens that we have to wait for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which have announced themselves, as it were, through the error, in order to find our conjecture verified.

但是，如果被分析者接下来的话不能说明过失的意义，我们从何处去搜集可供解释的事实和可以佐证的证据呢？有很多途径。首先，可以把过失心理和与其无关的现象做类比，比如说，我们断定，口误导致的名字变形与故意为之的变形一样具有侮辱的意味。我们也可以分析过失发生时的心理状况、我们对过失当事人性格的认知、他犯过失前给人的印象以及过失发生后作出的反应，从而进行判断。一般来讲，我们大概会根据普遍原则去发现过失的意义。我们当时对可能的意义只是提出猜测或建议，然后通过检视心理状况获得验证。或许，我们有时必须等待过失之后可能出现的后续进展，目的是证实我们的猜测。

I cannot easily give you proof of this if I have to limit myself to the field of tongue slips, although even here there are a few good examples. The young man who wished to “*inscort* ” the lady is certainly shy; the lady whose husband may eat and drink whatever

she wants I know to be one of those energetic women who know how to rule in the home. Or take the following case: At a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ncordia Club, a young member delivers a vehement speech in opposition, in the course of which he addresses the officers of the society as: “Fellow committee lenders.” We will conjecture that some conflicting idea militated in him against his opposition, an idea which was in some way based on a connection with money lending. As a matter of fact, we learn from our informant that the speaker was in constant money difficulties, and had attempted to raise a loan. As a conflicting idea, therefore, we may safely interpolate the idea, “Be more moderate in your opposition, these are the same people who are to grant you the loan.”

如果仅限于口误的研究，要给出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容易，不过即便如此也有几个不错的例子。想“讽陪　”那位小姐的年轻人肯定很害羞；那位说丈夫可以随她 高兴吃喝的女士依我看是有一家之主风范的热情主妇。或者看下面的例子：在协和俱乐部的全员会议上，一位年轻人作了言辞激烈的攻击性演讲，其中他称呼本社团的官员为“委员会诸位贷人（lenders，应该是leaders，大人）”。我们会猜测他当时心里有一个抢戏的念头影响了他的反对演讲，大概是与钱物借贷有关的念头。实际上，我们从知情人处得知，讲话人长期经济困难，尝试过申请贷款。因而，由于这个抢戏的念头，我们就能成功地插嘴说：“攻击别人时口气缓和点，他们也是给你贷款的人。”

But I can give you a wide selection of such circumstantial proof if I delve into the wide field of other kinds of error.

要是深入探究其他种类的过失，我能给出更多的间接证据。

If anyone forgets an otherwise familiar proper name, or has difficulty in retaining it in his memory despite all efforts, then the conclusion lies close at hand, that he has something against the bearer of this name and does not like to think of him. Consider in this connection the following revelation of the psychic situation in which this error occurs: “A Mr. Y. fell in love, without reciprocation, with a lady who soon after married a Mr. X.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Mr. Y. has known Mr. X. a long time, and even has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him, he forgets his name over and over again, so that he found it necessary on several occasions to ask other people the man's name when he wanted to write to Mr. X.“ [4_3]

如果有人忘记了一个相当熟悉的固有名称，想尽办法都很难回忆出来，结论就是很现成的了，他可能对该名字的载体有些反感，不想记起那个人。用这层关联考虑一下以下例子中，产生过失的心理状况所带来的启示：Y先生对一位小姐患了单相思，后者不久后嫁给了X先生。尽管Y先生认识X先生很久了，他总是反复忘记他的名字，以至于好几次想给X先生写信时，要向其他人询问X的名字。 [5_3]

Mr. Y. obviously does not want to have his fortunate rival in mind under any condition. “Let him never be thought of.”

Y先生显然无论何时都不愿意记得他幸运的情敌。“永远不要想起他。”

Another example: A lady makes inquiries at her doctor's

concerning a mutual acquaintance, but speaks of her by her maiden name. She has forgotten her married name. She admits that she was much displeased by the marriage, and could not stand this friend's husband. [4_4]

另一个例子：一位女士在诊所咨询时谈到一个熟人，但只记得她的娘家姓。她忘记了朋友婚后改的夫姓。她承认说，她很不看好这场婚姻，无法忍受朋友的丈夫。 [5_4]

Later we shall have much to say in other relations about the matter of forgetting names. At present we are predominantly interested in the psychic situation in which the lapse of memory occurs.

关于名字遗忘的其他关联我们后面还会详谈。现在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记忆丢失发生的心理状况上。

The forgetting of projects can quite commonly be traced to an antagonistic current which does not wish to carry out the project. We psychoanalysts are not alone in holding this view, but this is the general conception to which all persons subscribe the daily affairs, and which they first deny in theory. The patron who makes apologies to his protegé, saying that he has forgotten his requests, has not squared himself with his protegé. The protegé immediately thinks: “There's nothing to that; he did promise but he really doesn't want to do it.” Hence, daily life also proscribes forgetting, in certain connection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pular and the psychoanalytic conception of these errors appears to be removed.

Imagine a housekeeper who receives her guest with the words: “What, you come today? Why, I had totally forgotten that I had invited you for today”; or the young man who might tell his sweetheart that he had forgotten to keep the rendezvous which they planned. He is sure not to admit it, it were better for him to invent the most improbable excuses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hindrances which prevented him from coming at that time, and which made it impossible for him to communicate the situation to her. We all know that in military matters the excuse of having forgotten something is useless, that it protects one from no punishment; and we must consider this attitude justified. Here we suddenly find everyone agreed that a certain error is significant, and everyone agrees what its meaning is. Why are they not consistent enough to extend this insight to the other errors, and fully to acknowledge them? Of course, there is also an answer to this.

遗忘任务经常能追溯到一股抗拒的暗流，即不情愿执行任务。精神分析师不是持有该观点的唯一人群，这是所有人对于日常事务的普遍态度，只不过他们起初在理论上不愿承认罢了。比如帮人者跟求人者道歉说，他忘记了对方的请求，但是求人者并不这么看。求人者会立刻想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虽然应承了但实际上并不想干。”由此可见，日常生活中，遗忘在某些方面也会招人怨恨，普罗大众和精神分析师对于这些过失的理解并无不同之处。设想一下，一位家庭主妇在客人来访时这么说：“啊，你今天怎么来了？哎呀，我完全忘了请你今天来的事了。”或是，一个年轻人本该跟恋人说，他忘记两个人计划好的约会了，但他肯定不会承认，对他来说最好是即兴编造一些荒唐借口，一些使他当时无法赴约、以及无法及时通知她的困难。我们都知道，在军事事务中，忘事的借口是不起作用的，并不能免责；而且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态度是合理的。现在我们突然发现，每个人都同意，某一特定过失是有意义的，也同意它的意义。为什么他们不能观点一致些，也这么去看待其他过失，并完全承认它们

呢？当然，这也是有答案的。

If the meaning of this forgetting of projects leaves room for so little doubt among laymen, you will be less surprised to find that poets make use of these errors in the same sense. Those of you who have seen or read Shaw's *Caesar and Cleopatra* will recall that Caesar, when departing in the last scene, is pursued by the idea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more he intended to do, but that he had forgotten it. Finally he discovers what it is: to take leave of Cleopatra. This small device of the author is meant to ascribe to the great Caesar a superiority which he did not possess, and to which he did not at all aspire. You can learn from historical sources that Caesar had Cleopatra follow him to Rome, and that she was staying there with her little Caesarion when Caesar was murdered, whereupon she fled the city.

如果遗忘任务的意义连外行人都能轻松理解的话，那么诗人同样会利用这些过失，就更不足为奇了。读过萧伯纳的《凯撒与克丽奥佩拉》的人会记得，在最后一场戏里，凯撒出发时脑子里有个挥之不去的念头，似乎有其他什么事是他想做但忘记了的。最后他想起来了，他没去跟克丽奥佩拉辞别。作者用此细腻笔法，意在表现凯撒大帝的目中无人，其实凯撒本人并没有、而且根本不追求优越感。从史料可知，凯撒偕同克丽奥佩拉回到罗马，并且直到凯撒被害，她和儿子小凯撒还留在罗马，之后才逃离了城市。

The cases of forgetting projects are as a rule so clear that they are of little use for our purpose, i.e., discovering in the psychic situation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of the meaning of the error. Let us, therefore, turn to a particularly ambiguous and untransparent

error, that of losing and mislaying objects. That we ourselves should have a purpose in losing an object, an accident frequently so painful, will certainly seem incredible to you. But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similar to the following: A young man loses the pencil which he had liked very much. The day before he had received a letter from his brother-in-law, which concluded with the words, “For the present I have neither the inclination nor the time to be a party to your frivolity and your idleness.“ [4_5] It so happened that the pencil had been a present from this brother-in-law. Without this coincidence we could not, of course, assert that the loss involved any intention to get rid of the gift. Similar cases are numerous. Persons lose objects when they have fallen out with the donors, and no longer wish to be reminded of them. Or again, objects may be lost if one no longer likes the things themselves, and wants to supply oneself with a pretext for substituting other and better things in their stead. Letting a thing fall and break naturally shows the same intention toward that object. Can one consider it accidental when a school child just before his birthday loses, ruins or breaks his belongings, for example his school bag or his watch?

遗忘任务的案例通常意义清晰，不太能帮助我们实现目标——从心理状态里找到关于过失意义的间接证据。因而，我们要转向一种特别含糊不清的过失，即遗失和找不到物品。说遗失物品这个常发生的烦人意外应该是有目的的，这听似匪夷所思。但有很多类似以下例子的现象：一位年轻人丢了一支他很喜欢的铅笔。前一天他收到姐夫写来的一封信，信的结尾这样说：“眼下我既没兴趣、也没功夫跟你一起玩乐和懒散。” [5_5] 这支钢笔正好是他姐夫所赠。没有这个巧合，我们当然不能断言这次遗失有故意扔掉礼物的意向。类似案例举不胜举。人们与他人发生龃龉时会丢失对方送的礼物，不想再记起它们。抑或是，如果物主不再喜欢这些东西本身，想为自己找个借口以便用其他更好的东西替代它们，就会把它们弄丢。放任物品跌落摔坏，表

明了对待该物品的同样意图。一个上学的孩子在生日前遗失或损毁了东西，比如书包或手表，你能说这是偶然吗？

He who has frequently experienced the annoyance of not being able to find something which he has himself put away, will also be unwilling to believe there was any intent behind the loss. And yet the examples are not at all rare in which the attendant circumstances of the mislaying point to a tendency temporarily or permanently to get rid of the object. Perhaps the most beautiful example of this sort is the following: A young man tells me: “A few years ago a misunderstanding arose in my married life. I felt my wife was too cool and even though I willingly acknowledged her excellent qualities, we lived without any tenderness between us. One day she brought me a book which she had thought might interest me. I thanked her for this attention, promised to read the book, put it in a handy place, and couldn't find it again. Several months passed thus, during which I occasionally remembered this mislaid book and tried in vain to find it. About half a year later my beloved mother, who lived at a distance from us, fell ill. My wife left the house in order to nurse her mother-in-law. The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 became serious, and gave my wife an opportunity of showing her best side. One evening I came home filled with enthusiasm and gratitude toward my wife. I approached my writing desk, opened a certain drawer with no definite intention but as if with somnambulistic certainty, and the first thing I found is the book so long mislaid.”

如果一个人经常为找不到自己放好的东西而苦恼，那么他也不会愿相信丢三落四的背后是有动机的。但是从物品放错地方的伴随情节中，能看出一种暂时或永久丢弃该物品的倾向，此类案例并不罕见。

也许下面的例子是此类中最出彩的：一位年轻人告诉我：“几年前我的婚姻生活中发生了一个误会。我感觉我的妻子太冷漠，即使我承认她很好，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彼此没有温存。有一天她带给我一本书，以为我会感兴趣。我谢谢她的关心，答应读读这本书，随手放在了一个地方，然后再也找不到了。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期间我偶尔会想起这本不知去向的书，并尝试找到它，却徒劳无功。半年后，我亲爱的母亲生病了，她住得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于是我妻子离开家去照顾她的婆婆。母亲病情加重，这让我妻子有机会表现出她最好的一面。一天晚上，我满怀对妻子的痴情和感激回到家。我走近写字台，打开某个抽屉，并非完全刻意，但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似地，我一眼就看到了失踪很久的那本书。”

With the cessation of the motive, the inability to find the mislaid object also came to an end.

伴随着动机的终结，找不到失踪物品的情况也消失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I could increase this collection of examples indefinitely. But I do not wish to do so here. In my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first published in 1901), you will find only too many instances for the study of errors. [4_6]

女士们、先生们，此类例子无穷无尽，但我在这里就不多举了。在我的书《日常生活心理学》（1901年首次出版，参见本书第二讲）中，大家可以找到的过失研究案例实在是太多了。 [5_6]

All these examples demonstrate the same thing repeatedly:

namely, they make it seem probable that errors have a meaning, and show how one may guess or establish that meaning from the attendant circumstances. I limit myself today because we have confined ourselves to the purpose of profiting in the preparation for psychoanalysis from the study of these phenomena. I must, however, still go into two additional groups of observations, into the accumulated and combined errors and into the confirmation of our interpretations by means of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所有这些例子反复说明了同一件事，也就是说，它们验证了过失有意义的可能性，表明了通过伴随情节猜测或确认该意义的方法。我今天讲得比较局限，因为我们的目的仅限于研究此类现象，以便更好地为精神分析做准备。然而，我必须要再讲两组案例观察，一是重复和混合过失，二是通过后续发展确认我们的解释。

The accumulated and combined errors are surely the fine flower of their species. If we were interested only in proving that errors may have a meaning, we would limit ourselves to the accumulated and combined errors in the first place, for here the meaning is unmistakable, even to the dullest intelligence, and can force conviction upon the most critical judgment. The accumulation of manifestations betrays a stubbornness such as could never come about by accident, but which fits closely the idea of design. Finally, the interchange of certain kinds of error with each other shows us what is the important and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error, not its form or the means of which it avails itself, but the purpose which it serves and which is to be achieved by the most various paths. Thus I will give you a case of repeated forgetting. Jones recounts that he once allowed a letter to lie on his writing desk several days for reasons quite unknown. Finally he made up his mind to mail it; but

it was returned from the dead letter office, for he had forgotten to address it. After he had addressed it he took it to the post office, but this time without a stamp. At this point he finally had to admit to himself his aversion against sending the letter at all.

重复和混合过失当真是过失界的奇葩了。要是我们只对证明过失有意义感兴趣，我们一开始就可以只研究重复和混合过失，因为它们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即使最笨的头脑也看得懂，最挑剔的眼睛也不得不信服。重复的过失表现，是顽固心理的显露，这必然不是偶然的，也很能说明存心犯错的概念。最后，某几种过失的交织，则告诉我们过失的重要乃至关键因素，不是其形式或其发生的途径，而是其行动目的，它可以借由各种途径达成。这里我举一个反复遗忘的案例。琼斯讲述道，他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把一封信放在写字台上好几天。最终他下决心把信寄掉了；但是信又作为无法投递信件被退回了，因为他忘记写地址。他写好地址把信带到邮局后，又忘了贴邮票。到这里他才承认自己根本不愿意寄那封信。

In another case a mistake is combined with mislaying an object. A lady is traveling to Rome with her brother-in-law, a famous artist. The visitor is much fêted by the Germans living in Rome, and receives as a gift, among other things, a gold medal of ancient origin. The lady is vexed by the fact that her brother-in-law does not sufficiently appreciate the beautiful object. After she leaves her sister and reaches her home, she discovers when unpacking that she has brought with her—how, she does not know—the medal. She immediately informs her brother-in-law of this fact by letter, and gives him notice that she will send the medal back to Rome the next day. But on the following day, the medal has been so cleverly mislaid that it can neither be found nor sent, and at this point it begins to dawn upon the lady that her “absent-mindedness” means,

namely, that she wants to keep the object for herself. [4_7]

在另一个案例中，误拿他人物品的过错与找不到物品结合在了一起。一位女士与她的姐夫，一位知名艺术家，一起去罗马。这位艺术家受到了住在罗马的德国人的盛情款待，还收到一些礼物，其中有一枚古董金质勋章。这位女士很奇怪，她姐夫并不十分欣赏这件漂亮物品。当她离开姐姐家回到自己家中后，在收拾行李时发现不知怎么地，她把那枚勋章带回来了。她马上写信把此事告知了姐夫，并通知他次日会把勋章寄回罗马。但是第二天那枚勋章却离奇失踪，恰巧不知被自己放到了何处，既找不到也不能寄出去了，此时该女士才恍然大悟，她的心不在焉意味着她想把该物品留给自己。 [5_7]

I have already given you an example of a combination of forgetfulness and error in which someone first forgot a rendezvous and then, with the firm intention of not forgetting it a second time, appeared at the wrong hour. A quite analogous case was told me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by a friend who pursues literary interests in addition to his scientific ones. He said: “A few years ago I accepted the election to the board of a certain literary society, because I hoped that the society could at some time be of use to me in helping obtain the production of my drama, and, despite my lack of interest, I took part in the meetings every Friday. A few months ago I received the assurance of a production in the theatre in F., and since that time it happens regularly that I forget the meetings of that society. When I read your article on these things, I was ashamed of my forgetfulness, reproached myself with the meanness of staying away now that I no longer need these people and determined to be sure not to forget next Friday. I kept reminding myself of this resolution until I carried it out and stood before the door of the meeting room. To my astonishment, it was closed, the

meeting was already over; for I had mistaken the day. It was already Saturday.”

我举过一个关于遗忘和过失混合的例子，某人先是忘记赴一个约会，于是下定决心不忘赴约，第二次却在错误的时间到场。还有一个很类似的例子，是一位朋友讲述的亲身经历，他除了从事科学研究，还从事文学创作。他说：“几年前，我被某个文学社团选为董事，因为我希望这个社团哪天能派上点用场，帮着推销我的戏剧作品，就接受了这个职位。所以，尽管兴趣索然，我还是参加了每周五的例会。几个月前，我收到确认消息，我的作品可以在F市剧院上演。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忘记那个社团的会议。当我读到你关于这类事情的文章时，我很为自己的遗忘羞耻，谴责自己很卑鄙，不需要人家了就离得远远的。我决定下周五一定不忘记去开会。我不停地用这个决心提醒自己，直到我如约而至，站在了会议室门口。令我惊讶的是门关着，会议已经开过了，因为我搞错了日期。那天已经是星期六了。”

It would be tempting enough to collect similar observations, but I will go no further; I will let you glance instead upon those cases in which our interpretation has to wait for its proof upon future developments.

我忍不住要举更多类似的事例，不过我该打住了。下面我会让你们看另一些案例，我们必须要等待后续发展的证明，才能给予这些案例解释。

The chief condition of these cases is conceivably that the existing psychic situation is unknown to us or inaccessible to our inquiries. At that time our interpretation has only the value of a

conjecture to which we ourselves do not wish to grant too much weight. Later, however, something happens which shows us how justified was our interpretation even at that time. I was once the guest of a young married couple and heard the young wife laughingly tell of a recent experience, of how on the day after her return from her honeymoon she had hunted up her unmarried sister again in order to go shopping with her, as in former times, while her husband went to his business. Suddenly she noticed a gentlema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eet, and she nudged her sister, saying, “Why look, there goes Mr. K.” She had forgotten that this gentleman was her husband of some weeks' standing. I shuddered at this tale but did not dare to draw the inference. The little anecdote did not occur to me again until a year later, after this marriage had come to a most unhappy end.

这些案例的要点想来应该是，现有的心理状况对我们是未知的，或是无法通过调查得到。我们当时的解读只是种猜测，对其分量也不抱期望。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了我们当时的解读是很合理的。我曾经拜访过一对刚结婚的夫妇，年轻的妻子在谈笑间告诉了我一个最近的经历，当她蜜月归来，在丈夫去办公事后，她又去找未婚的妹妹陪她一起去购物。突然她看到街对面有位男士，于是碰了一下妹妹说道：“你看，那不是K先生吗。”她忘记了那位先生跟她做了几个星期的夫妻。我听到这个故事很震惊，但不敢妄下推断。直到一年以后，这段婚姻很不愉快地收场，我才又想起这段轶事。

A.Maeder tells of a lady who, the day before her wedding, forgot to try on her wedding dress and to the despair of the dressmaker only remembered it later in the evening. He adds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forgetfulness the fact that she divorced her husband soon after. I know a lady now divorced from her husband,

who, in managing her fortune, frequently signed documents with her maiden name, and this many years before she really resumed it. I know of other women who lost their wedding rings on their honeymoon and also know that the course of the marriage gave a meaning to this accident. And now one more striking example with a better termination. It is said that the marriage of a famous German chemist did not take place because he forgot the hour of the wedding, and instead of going to the church went to the laboratory. He was wise enough to rest satisfied with this one attempt, and died unmarried at a ripe old age.

梅德谈到过，一位女士在她的婚礼前一天忘记试穿婚纱，到晚上才想起来，让裁缝很沮丧。他补充了与这个遗忘相关的一个事实——她不久就与丈夫离婚了。我认识一位女士，现在已经跟丈夫离了婚，她过去在打理自己财产时，经常用娘家姓签署文件，过了很多年，她真的恢复了娘家姓。我还知道另一个女子在蜜月里丢了两人的婚戒，也知道这个婚姻的走向为这个事件注解了一个意义。现在再举一个更精彩的例子，它的结局不坏。据说，一位著名的德国化学家因为忘记了婚礼时间而没有结成婚。并且，他没去教堂而去了实验室。他倒是非常明智，满足于仅仅一次的尝试，终生未婚直到以高龄辞世。

Perhaps the idea has also come to you that in these cases mistakes have taken the place of the *Omina* or omens of the ancients. Some of the *Omina* really were nothing more than mistakes; for example, when a person stumbled or fell down. Others, to be sure, b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bjective occurrences rather than that of subjective acts. But you would not believe how difficult it sometimes is to decide in a specific instance whether the act belongs to the one or the other group. It so frequently knows how to masquerade as a passive experience.

也许你也会觉得，这些案例中的错误与古人所言的预兆如出一辙。有些预兆确实就是错误。比如，某人走路不稳或摔倒。其他的预兆其实具有客观事件而不是主观行动的特性。不过，你或许不会相信，有时候要确定一个特定事例中行动的类别非常困难。因为主观行动常常会伪装成一个被动经历。

Everyone of us who can look back over a longer or shorter life experience will probably say that he might have spared himself many disappointments and painful surprises if he had found the courage and decision to interpret as omens the little mistakes which he made in his intercourse with people, and to consider them as indications of the intentions which were still being kept secret. As a rule, one does not dare do this. One would feel as though he were again becoming superstitious via a detour through science. But not all omens come true, and you will understand from our theories that they need not all come true.

如果我们中有人回首长期或短期的生活经历，他们可能会说，如果当初自己能有勇气和决心，把那些预兆理解成自己在人际交往中所犯的小错误，将它们看作尚未显山露水的意愿的信号，他们就能少经历一些失望和惊吓。通常人们没有这样的勇气。人会觉得自己明明绕道走上了科学的路，却又变得迷信起来。但是并非所有预兆都成了真，大家从我们的理论中应该体会得到，预兆其实未必全部成真。

[4_1].The young man here said "aufzustossen" instead of "anzustossen."

[4_2].Prof. Freud here gives the two examples, quite untranslatable, of "apopos" instead of "apropos," and "eischeiszwaibehen" instead of "eiweiszscheibehen."

[4_3].From C. G. Jung.

[4_4].From A. A. Brill.

[4_5].From B. Dattner.

[4_6].So also in the writings of A. Maeder (French), A. A. Brill (English) J. Stärke (Dutch) and others.

[4_7].From R. Reitler.

[5_1].年轻人这里把德语“anstossen”（干杯）说成了“aufstossen”（打嗝）。

[5_2].弗洛伊德在此给了两个德语例子，不能转换成英文，如“apropos”说成“apopos”；“eiweiszscheibehe”说成“eischeiszwaibehen”。

[5_3].这是荣格的例子。

[5_4].这是布瑞尔的例子。

[5_5].这是达特纳的例子。

[5_6].也可参看法国人梅德、英国人布里尔、荷兰人斯达克等人的著作。

[5_7].这是赖特乐的例子。

Fourth Lecture　The Psychology of Errors—(Conclusion)

第四讲　过失心理学（完）

We may certainly put it down as the conclusion of our labors up to this point that errors have a meaning, and we may make this conclusion the basis of ou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Let me stress the fact once more that we do not assert—and for our purposes need not assert—that every single mistake which occurs is meaningful, although I consider that probable. It will suffice us if we prove the presence of such a meaning with relative frequency in the various forms of errors. These various forms, by the way, behave differently in this respect. In the cases of tongue slips, pen slips, etc., the occurrences may take place on a purely physiological basis. In the group based on forgetfulness (forgetting names or projects, mislaying objects, etc.), I cannot believe in such a basis. There does very probably exist a type of case in which the loss of objects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unintentional. Of the mistakes which occur in daily life, only a certain portion can in any way be brought within our conception. You must keep this limitation in mind when we start henceforth from the assumption that mistakes are psychic acts and arise through the mutual interference of two intentions.

到这里，我们通过辛勤研究得出了结论，即过失是有意义的，我们当然能够以此结论为基础进行下一步的考察。我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断言（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也无需断言）每一个发生的错误都是有意义的，尽管我认为那很有可能。能够证明这种意义较为频繁地存在于各种不同形式的过失之中，对我们来说足够了。顺便提一下，不同形式的过失在这方面的表现是不同的。口误、笔误等过失的

发生可以是基于纯粹生理原因。但是，对基于遗忘的过失类别（如遗忘名字或任务、找不到物品等等），我不认为有此生理基础。在丢失物品的过失中，确实有一部分失主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无论如何，在日常生活里发生的错误中，我们的理念只能涉及某一部分。大家一定要牢记上述限制，今后才能以“错误乃心理行为，是两个意向互相干扰的结果”作为假设前提开始研究。

Herein we have the first result of psychoanalysis. Psychology hitherto knew nothing of the occurrence of such interferences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y might have such manifestations as a consequence. We have widened the province of the world of psychic phenomena quite considerably, and have brought into the province of psychology phenomena which formerly were not attributed to it.

如此我们得出了精神分析的第一个结论。心理学界以前并不了解这些干扰的发生，也不知道干扰的结果可能会有这些表现。我们将心理现象领域的范畴拓宽了很多，并在心理学范畴中加入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Let us tarry a moment longer over the assertion that errors are psychic acts. Does such an assertion contain more than the former declaration that they have a meaning? I do not believe so. On the contrary, it is rather more indefinite and open to greater misunderstanding. Everything which can be observed about the psychic life will on occasion be designated as a psychic phenomenon. But it will depend on whether the specific psychic manifestations resulted directly from bodily, organic, material influences, in which case their investigation will not fall within the province of psychology, or whether it was more immediately the

result of other psychic occurrences, back of which, somewhere, the series of organic influences then begins. We have the latter condition of affairs before us when we designate a phenomenon as a psychic manifestation, and for that reason it is more expedient to put our assertion in this form: the phenomena are meaningful; they have a meaning. By “meaning” we understand significance, purpose, tendency and position in a sequence of psychic relations.

我们先多花些功夫，研究“过失即心理行动”这一认定。比起之前“过失有意义”的口号，这个认定的内涵是否更丰富呢？我不这么认为。它反而更不确定，更容易导致误解。心理生活中凡可观察的现象皆可称作心理现象。但前提是，这些具体心理表现不是直接来自身体的、物质的影响因素，如果是，则对它们的考察不属于心理学范畴；或者它们是另一类心理事件的直接结果，这些现象的背后某处有一系列的机体影响。我们把后一种情况称为心理现象，因此，说（心理）现象是有意义的、它们具有某种意义，其实是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我们理解的“意义”包括重要性、目的、倾向，以及在心理关系序列中的地位。

There are a number of other occurrences which are very closely related to errors, but which this particular name no longer fits. We call them *accidental and symptomatic* acts. They also have the appearance of being unmotivated, the appearance of insignificance and unimportance, but in addition, and more plainly, of superfluity. They are differentiated from errors by the absence of another intention with which they collide and by which they are disturbed. On the other side they pass over without a definite boundary line into the gestures and movements which we count among expressions of the emotions. Among these accidental acts belong all those apparently playful, apparently purposeless performances in

connection with our clothing, parts of our body, objects within reach, as well as the omission of such performances, and the melodies which we hum to ourselves. I venture the assertion that all these phenomena are meaningful and capable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same way as are the errors, that they are small manifestations of other more important psychic processes, valid psychic acts. But I do not intend to linger over this new enlargement of the province of psychic phenomena, but rather to return to the topic of errors,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which the important psychoanalytic inquiries can be worked out with far greater clarity.

与过失密切相关的其他事件还有不少，但不适合冠以这一特定名词。我们把它们称为偶然性及症候性行动 。它们不仅表面上是无动机、无意义和不重要的，而且更显然的是，它们是多余的。它们没有另一个与之冲突、干扰它们的意向，因而与过失不同。另一方面，它们与那些我们称为情绪表现的姿势和行动之间没有确定的界限。这些偶然性行动包括所有那些显然是嬉戏性的、无目的的小动作，比如用衣服、身体某些部分或手边物品等当道具，也可以是不做这些小动作，以及自己哼小曲等。我大胆断言，所有这些现象都有意义，都可和过失作同样的解释，都能用与过失相同的原理解释，它们是其他更重要的心理过程的细微表现，因而是有效的心理行动。不过我不想赘述这个心理现象范畴的新成员了。我们还是回到过失的话题上来，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将重要的精神分析问题研究得更为透彻。

The most interesting questions which we formulated while considering errors, and which we have not yet answered, are, I presume, the following: We said that the errors are the result of the mutual interference of two different intentions, of which the one can be called the intention interfered with, and the other the interfering intention. The intentions interfered with give rise to no

further questions, but concerning the others we want to know, firstly, what kind of intentions are these which arise as disturbers of others, and secondly, in what proportions are the interfering related to the interfered?

我们在讨论过失时发现的最有趣但尚无答案的问题，大概是这个：我们说了，过失是两个不同意向相互干扰的结果，两个意向之一可称为被干扰意向，另一个则为干扰意向。关于被干扰意向没有其他问题可问了；但关于干扰意向我们想知道，首先，哪一类意向是作为其他意向的干扰项出现的？其次，干扰意向与被干扰意向的相关性如何？

Will you permit me again to take the slip of the tongue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whole species and allow me to answer the second question before the first?

请大家允许我再将口误现象作为所有过失的代表，让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然后再回答第一个问题。

The interfering intention in the tongue slip may stand in a significant relation to the intention interfered with, and then the former contains a contradiction of the latter, correcting or supplementing it. Or, to take a less intelligible and more interesting case, the interfering intenti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intention interfered with.

口误中的干扰意向与被干扰意向之间关系可能是很重要的，前者

含有对后者的抵触，起到修改或补充的作用。不过，还有一种较难理解但比较有趣的案例，其干扰意向与被干扰意向互不相关。

Proofs for the first of the two relations we can find without trouble in the examples which we already know and in others similar to those. In almost all cases of tongue slips where one says the contrary of what he intended, where the interfering intention expresses the antithesis of the intention interfered with, the error i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wo irreconcilable strivings. “I declare the meeting opened, but would rather have it closed,” is the meaning of the president's slip. A political paper which has been accused of corruptibility, defends itself in an article meant to reach a climax in the words: “Our readers will testify that we have always interceded for the good of all in the most *disinterested* manner.” But the editor who had been entrusted with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efence, wrote, “in the most *interested* manner.” That is, he thinks “To be sure, I have to write this way, but I know better.”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 who urges that the Kaiser should be told the truth “*rückhaltlos* ,” hears an inner voice which is frightened by his boldness, and which through a slip changes the “*rückhaltlos* ” into “*rückgratlos* .“ [5_1]

对于这两种相互关系中的第一种，我们能在已知的或其他类似例子中轻易找到证据。几乎在所有说了反话的口误案例中，干扰意向表达了与被干扰意向相反的意思，过失体现的就是两者不可调和的冲突。“我宣布会议开幕，可巴不得它闭幕”是议会主席口误的意义。一个政治类报纸被人指责腐败，它在一篇自辩文章中原本想用以下语句制造高潮：“我们的读者将证明，本报一直以大公无私（disinterested）的态度，为大众的福利请愿。”但是受命撰写该自辩文章的编辑却写了“大公无耻 ”（interested）。这代表他的内心话

是："我必须这么写，但我可不这么看。"一位人民代表呼吁应该对德皇"直言（rückhaltlos）相告"，可是内心被自己的大胆吓到了，犯了口误，把"直言"说成了"食言"（rückgratlos）。[6_1]

In the examples familiar to you, which give the impression of contraction and abbreviation, it is a question of a correction, an addition or continuation by which the second tendency manifests itself together with the first. "Things were revealed, but better say it right out, they were *filthy* , therefore, things were *refiled* ." [5_2] "The people who understand this topic can be counted on the *fingers of one hand* , but no, there is really only *one* who understands it; therefore, counted *on one finger* ." Or, "My husband may eat and drink whatever *he* wants. But you know very well that *I* don't permit him to want anything; therefore he may eat and drink whatever *I want* ." In all these cases, therefore, the slip arises from the content of the intention itself, or is connected with it.

大家熟悉的例子还有给人凝缩或省略印象的口误，这反应了第二个意向与第一个意向共处时，以修改、增加或延续的形式表现自己。"事情暴露了，但最好直接说它们很污秽，所以事情暴废了。"[6_2] "理解这个题目的人屈指可数，不，只有一个人理解，所以是一指可数。"还有，"我丈夫可以随他心意吃喝。但是很明显我不允许他自作主张，所以他可以随我心意吃喝。"可见，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口误是从意向本身的内容中产生的，或是与它相关联。

The other typ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terfering intentions seems strange. If the interfering intenti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one interfered with, where then does it come from and how does it happen to make itself manifest as

interference just at that point? The observation which alone can furnish an answer here, recognizes the fact that the interference originates in a thought process which has just previously occupied the person in question and which then has that after-effect,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it has already found expression in speech or not. It is therefore really to be designated as perseveration, but not necessarily as the perseveration of spoken words. Here also there is no lack of an associa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nterfering and the interfered with, yet it is not given in the content, but artificially restored, often by means of forced connecting links.

另一类干扰与被干扰意向的关系似乎有些奇怪。如果干扰意向与被干扰对象的内容毫无关联，那它从何而来，怎么会碰巧在当时以干扰项的形式现身的呢？通过观察，可以直接得出答案，事实上，干扰项产生自当事人之前所沉浸的某个思考过程，不管它是否在讲话中有所表达，结果产生了这个后遗症。因此它其实可称为语音持续，但不一定是说过单词的语音持续。这里的干扰和被干扰项之间也不乏联想关系，但这种关系不在说话内容里，而通常是用强制性连接被牵强地体现出来。

Here is a simple example of this, which I myself observed. In our beautiful Dolomites, I meet two Viennese ladies who are gotten up as tourists. I accompany them a short distance and we discuss the pleasures, but also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tourist's mode of life. One lady admits this way of spending the day entails much discomfort. “It is true,” she says, “that it is not at all pleasant, when one has tramped all day in the sun, and waist and shirt are soaked through.” At this point in this sentence she suddenly has to overcome a slight hesitancy. Then she continues: “But then, when one gets *nach Hose* , and can change….“ [5_3] We did not analyze this

slip, but I am sure you can easily understand it. The lady wanted to make the enumeration more complete and to say, “Waist, shirt and drawers.” From motives of propriety, the mention of the drawers (Hose) was suppressed, but in the next sentence of quite independent content the unuttered word came to light as a distortion of the similar word, house (Hause).

这里举个我自己观察到的简单例子。在意大利风光秀丽的多洛米蒂山地区，我碰到两位游客装扮的维也纳女士。我陪她们走了一小段路，谈论了旅行生活方式的快乐和烦恼。一位女士承认，这么过一天会不太舒适。“确实，”她说，“如果整天在太阳底下暴晒，腰身、衬衫都湿透了，并无愉快可言。”在说这句话时她突然稍许犹豫了一下。然后继续说，“不过，如果回裤里（nach Hose）换……”[6_3] 我们没细究这个口误，但我肯定大家能轻松地理解。这位女士本想列举得更全些，说：“腰身、衬衫和内裤。”但出于社交礼貌，对“内裤”（Hose）避而不谈,但在下一句内容不一样的话中，没有说出的单词把近似单词“屋里”（Hause）变了个形后脱口而出。

Now we can turn at last to the long delayed main question, namely, what kind of intentions are these which get themselves expressed in an unusual way as interferences of others, intentions within whose great variety we wish nevertheless to find what is common to them all! If we examine a series of them to this end, we will soon find that they divide themselves into three groups. In the first group belong the cases in which the interfering tendency is known to the speaker, and which, moreover, was felt by him before the slip. Thus, in the case of the slip “*refilled* ,” the speaker not only admits that he agreed with the judgment “*filthy* ,” on the incidents in question, but also that he had the intention (which he later abandoned) of giving it verbal expression. A second group is made

up of those cases in which the interfering tendency is immediately recognized by the subject as his own, but in which he is ignorant of the fact that the interfering tendency was active in him just before the slip. He therefore accepts our interpretation, yet remains to a certain extent surprised by it. Examples of this situation can perhaps more easily be found among errors other than slips of the tongue. In a third group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fering intention is energetically denied by the speaker. He not only denies that the interfering tendency was active in him before the slip, but he wants to assert that it was at all times completely alien to him. Will you recall the example of “hiccough,” and the absolutely impolite disavowal which I received at the hands of this speaker by my disclosure of the interfering intention. You know that so far we have no unity in our conception of these cases. I pay no attention to the toastmaster's disavowal and hold fast to my interpretation; while you, I am sure, are ye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s repudiation and are considering whether one ought not to forego the interpretation of such slips, and let them pass as purely physiological acts, incapable of further analysis. I can imagine what it is that frightens you off. My interpretation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intentions of which he himself knows nothing may manifest themselves in a speaker, and that I can deduce them from the circumstances. You hesitate before so novel a conclusion and one so full of consequences. I understand that, and sympathize with you to that extent. But let us make one thing clear: if you want consistently to carry through the conception of errors which you have derived from so many examples, you must decide to accept the above conclusion, even though it be unpleasant. If you cannot do so, you must give up that understanding of errors which you have so recently won.

现在我们总算能转向那个久拖未决的主要问题，也就是，以干扰其他意向的非常规方式现身的意向是什么样的，我们希望从这些形式繁多的意向中发现的共同点是什么？以此目的来检视一系列意向，我们将很快发现，它们分成三组类别。第一组案例中，说话者清楚该干扰倾向，并且他在口误前就感觉到了。这样，在“暴废　”的口误例子里，说话人不但承认他认为所谈事情很“污秽　”，而且还承认有意向（但后来放弃了）把它口头表达出来。第二组案例中，当事人很快知道了干扰倾向，但是没有意识到干扰倾向刚好在口误之前影响了他。因此他能够接受我们的解释，但对此依然会有些讶异。这种情况的例子大概更容易在口误之外的过失中找到。第三组案例中，说话者极力否认其干扰意向的含义。他们不但否认该干扰意向在口误前对他们有影响，还一口咬定他们一直没存这个念头。大家记得“干咳”（hiccough）那个例子吧，当我解释了干扰意向后，我当场遭到说话者粗鲁的矢口否认。大家知道，直到现在我们对于这些案例的看法都没有统一。我不在乎那个致祝酒词者的否认，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看法。不过可以肯定，你们各位还是受到他死不承认的影响，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对这些口误的解释，就把它们当作生理性行为而不去做深究。我可以想到大家担心的原因。我的解释所引向的结论是，有些意向即使说话者完全没意识到，也有可能在他的话里体现出来，而且能够通过当时的情节推断出来。面对这么标新立异和意味深长的结论，你们不免会迟疑。我理解这一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同情大家。但是要搞清楚一件事：我们通过这么多例子得出了关于过失的观念，大家要是愿意一以贯之地持有这个观念，那就必须接受上述结论，即使它并不讨人喜欢。如果大家不能这么做，就只能放弃新近获得的对过失的认识。

Let us tarry a while over the point which unites the three groups, which is common to the three mechanisms of tongue slips. Fortunately, that is unmistakable. In the first two groups the interfering tendency is recognized by the speaker; in the first there is the additional fact that it showed itself immediately before the

slip. In both cases, however, *it was suppressed. The speaker had made up his mind not to convert the interfering tendency into speech and then the slip of the tongue occurred; that is to say, the suppressed tendency obtains expression against the speaker's will, in that it changes the expression of the intention which he permits, mixes itself with it or actually puts itself in its place.* This is, then, the mechanism of the tongue slip.

让我们花点时间聊聊前面三组案例的相同之处，同时也是口误发生的三种机制的相同之处。幸运的是，这显而易见。在前两组中，说话者承认干扰倾向，而且第一组中在口误前就体现出来了。但是，在这两组案例中，这个意向都被压抑了。说话人决定不把这个干扰倾向转换成语言，然后口误就发生了。这就是说，被压抑的倾向违背说话人的意志而体现了出来，改变了他所许可的意向的表达方式，把自己混入其中，或是实际上取而代之。 这便是口误的发生机制。

From my point of view, I can also best harmonize the processes of the third group with the mechanism here described. I need only assume that these three groups are differentiated by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effectiveness attending the suppression of an intention. In the first group, the intention is present and makes itself perceptible before the utterance of the speaker; not until then does it suffer the suppression for which it indemnifies itself in the slip. In the second group the suppression extends farther. The intention is no longer perceptible before the subject speaks. It is remarkable that the interfering intention is in no way deterred by this from taking part in the causation of the slip. Through this fact, however, the explanation of the procedure in the third group is simplified for us. I shall be so bold as to assume that in the error a tendency can manifest itself which has been suppressed for even a longer time,

perhaps a very long time, which does not become perceptible and which, therefore, cannot be directly denied by the speaker. But leave the problem of the third group;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the other cases, you most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uppression of the existing intention to say something is the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of the occurrence of a slip* .

就我看来，我一样能把第三组的心理过程和这里描述的机制统一起来。我只需要假设，这三组案例的区别在于意向被压抑的程度。在第一组中，该意向是明显的，在说话者讲话前就呈现出来，从那时起它开始受到压抑，但它因此以口误的方式保存了自己。第二组中的压抑现象持续得更久。该意向在当事人说话前并没有被察觉到。精彩的是，这丝毫没有阻止该干扰意向导致口误发生。不过，有了这一事实，我们对第三组过程的解释就简化了。我会大胆假定，一个甚至被压抑了更久的、也许是非常久的意向也能在口误中表现出来，它不是很易察觉，因而说话人不能直接予以否认。不过，抛开第三组的疑问不说，大家通过观察其他案例也能得出一个结论：想说出某事的已有意向受到压抑，是口误发生不可或缺的条件。

We may now claim that we have made further progress in understanding errors. We know not only that they are psychic acts, in which we can recognize meaning and purpose, and that they arise through the mutual interference of two different intentions, but, in addition, we know that one of these intentions must have undergone a certain suppression in order to be able to manifest itself through interference with the other. The interfering intention must itself first be interfered with before it can become interfering. Naturally, a complete explanation of the phenomena which we call errors is not attained to by this. We immediately see further questions arising, and suspect in general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occasions for new questions as we progress further. We might, for example, ask why the matter does not proceed much more simply. If there is an existing purpose to suppress a certain tendency instead of giving it expression, then this suppression should be so successful that nothing at all of the latter comes to light; or it could even fail, so that the suppressed tendency attains to full expression. But errors are compromise formations. They mean some success and some failure for each of the two purposes. The endangered intention is neither completely suppressed nor does it, without regard to individual cases, come through wholly intact. We can imagine that special conditions must be existent for the occurrence of such interference or compromise formations, but then we cannot even conjecture what sort they may be. Nor do I believe that we can uncover these unknown circumstances through further penetration into the study of errors. Rather will it be necessary thoroughly to examine other obscure fields of psychic life. Only the analogies which we there encounter can give us the courage to draw those assumptions which are requisite to a more fundamental elucidation of errors. And one thing more. Even working with small signs, as we have constantly been in the habit of doing in this province, brings its dangers with it. There is a mental disease, combined paranoia, in which the utilization of such small signs is practiced without restriction and I naturally would not wish to give it as my opinion that these conclusions, built up on this basis, are correct throughout. We can be protected from such dangers only by the broad basis of our observations, by the repetition of similar impressions from the most varied fields of psychic life.

现在我们可以宣称，我们对过失的理解又进了一步。我们不但知道它们是具有意义和目的的心理行动，而且知道它们在两个不同意向的互相干扰下发生，此外我们还知道了，这些意向必定要遭受某种压

抑，才可以通过对另一个意向的干扰体现自己。干扰意向自己必须先受到干扰，然后才能干扰别的意向。当然，我们无法就此获得过失现象的完整解释。我们马上又会发现新问题涌现，而且一般会猜想，随着研究的进展，新问题会有新的解释。比如，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事情没有往更简单的方向发展。如果有一个现成的目的压抑了某个倾向，不让它表达出来，那么这个压抑应该做得非常成功，以至于后者毫无表达的机会；或者它应该直接失败，让被压抑的倾向完全表达出来。但是过失是一种折中的结果。它们意味着两个目的各有一些成功和失败。受到威胁的意向既没有被完全压抑，而且，除了个案特例之外，也没有完好无损地得以自保。可以想象，关于这种干扰或折中形式，一定会有特殊情况，但是我们甚至猜测不到它们的形式。我也不认为我们能通过对过失的深入研究找到这些未知的情节。而去检视心理生活的其他模糊领域倒是极有必要的。只有在那些地方看到了一些类似的现象，我们才能放心作出一些必要推断，以便对过失作出更根本的解读。还有一点就是，即便是使用细微迹象（这是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习惯了的做法），也是有其风险的。有一种精神病叫“组合妄想症”，就是不加节制地利用了这种细微迹象。我当然不愿意认同这样的观点：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这些结论是始终正确的。我们只需将考察的基础扩大，反复从心理生活中的多种样式里汲取类似灵感，便可以使自己免于这些风险。

We will therefore leave the analysis of errors here. But may I remind you of one thing more: keep in mind, as a prototype, the manner in which we have treated these phenomena. You can see from these examples what the purposes of our psychology are. We do not wish merely to describe the phenomena and to classify them, but to comprehend them as signs of a play of forces in the psychic, as expressions of tendencies striving to an end, tendencies which work together or against one another. We seek a dynamic conception of psychic phenomena. The perceived phenomena must, in our conception, give way to those strivings whose existence is

only assumed.

我们就要放下对过失的解析了。但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要记住我们分析这些现象的方法，把它当成一种模板。大家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我们心理学的目标所在。我们所希望的不仅仅是描述和归类这些现象，而是要将它们理解为心理活动中力量博弈的信号、倾向朝着目标努力的表现以及相辅相成或互相抵触的倾向。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心理现象概念。在这一概念里，可见的现象一定要让位于那些仅仅是被推测的内心活动。

Hence we will not go deeper into the problem of errors, but we can still undertake an expedition through the length of this field, in which we will reëncounter things familiar to us, and will come upon the tracks of some that are new. In so doing we will keep to the division which we made in the beginning of our study, of the three groups of tongue slips, with the related forms of pen slips, misreadings, mishearings, forgetfulness with its subdivisions according to the forgotten object (proper names, foreign words, projects, impressions), and the other faults of mistaking, mislaying and losing objects. Errors, in so far as they come into our consideration, are grouped in part with forgetfulness, in part with mistakes.

这样，我们对过失问题的探究算是暂告一个段落，但我们仍然可以对该领域做一次整体回顾，这样既能温习已知的知识，也能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在回顾时，我们还是要坚持开始研究时所作的分类：三种口误和相应形式的笔误、误读、误听，根据对象（专有名词、外语单词、物品及印象等）划分细类的遗忘，以及其他类似拿错、找不到、丢失物品的错误。我们把至今所考察的过失分成遗忘型和错误型

两大类。

We have already spoken in such detail of tongue slips, and yet there are still several points to be added. Linked with tongue slips are smaller effective phenomena which are not entirely without interest. No one likes to make a slip of the tongue; often one fails to hear his own slip, though never that of another. Tongue slips are in a certain sense infectious; it is not at all easy to discuss tongue slips without falling into slips of the tongue oneself. The most trifling forms of tongue slips are just the ones which have no particular illumination to throw on the hidden psychic processes, but are nevertheless not difficult to penetrate in their motivation. If, for example, anyone pronounces a long vowel as a short, in consequence of an interference no matter how motivated, he will for that reason soon after lengthen a short vowel and commit a new slip in compensation for the earlier one. The same thing occurs when one has pronounced a double vowel unclearly and hastily; for example, an “eu” or an “oi” as “ei.” The speaker tries to correct it by changing a subsequent “ei” or “eu” to “oi.” In this conduct the determining factor seems to be a certain consideration for the hearer, who is not to think that it is immaterial to the speaker how he treats his mother tongue. The second, compensating distortion actually has the purpose of making the hearer conscious of the first, and of assuring him that it also did not escape the speaker. The most frequent and most trifling cases of slips consist in the contractions and foresoundings which show themselves in inconspicuous parts of speech. One's tongue slips in a longer speech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 last word of the intended speech is said too soon. That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a certain impatience to be finished with the sentence and gives proof in general of a certain resistance to communicating this sentence or speech as a whole.

Thus we come to borderline cases in whic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sychoanalytic and the common physiological conception of tongue slips are blended. We assume that in these cases there is a tendency which interferes with the intention of the speech. But it can only announce that it is present, and not what its own intention is. The interference which it occasions then follows some sound influences or associative relationship, and may be considered as a distraction of attention from the intended speech. But neither this disturbance of attention nor the associative tendency which has been activated, strikes the essence of the process. This hints, however, at the existence of an intention which interferes with the purposed speech, an intention whose nature cannot (as is possible in all the more pronounced cases of tongue slips) this time be guessed from its effects.

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口误，但依然还要增加几点。有些与口误有关联的细微的有效现象并非完全不值得关注。没有人喜欢犯口误，人经常听不出自己的口误，但总是听得出别人的口误。口误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传染的。没有犯过口误的人要讨论口误并非易事。最细微的口误形式对于隐藏的心理过程虽没有特别启示，其动机却不难洞察。比如，有人把长元音发成了短音，无论干扰的动机是什么，他会因此马上加长一个短元音，以犯一个新口误来弥补前面的口误。同理，有人将一个双元音发得含混仓促，比如把“eu”或“oi”发成了“ei”。说话者会把接下来的“ei”或“eu”音发成“oi”作为修正。这种行为的决定因素似乎是顾虑听众会不喜欢说话者讲母语的随便态度。第二个补偿性变形的实际目的是让听众意识到第一个口误，并使听众相信说话者已经意识到第一个错误。最频繁、最细微的口误是那些凝缩和语音前置，它们在讲话中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体现出来。要说的话太长了，结果结尾词说得过于匆忙，犯下了口误。这给人的印象是急于结束这句话，一般也可以证明对于讲整段话或整句话的某种抵触心理。这里我们就触及了精神分析与常见生理学口误概念混合相交处的边界

案例。我们推测，在这些案例中有一个倾向干扰了说话的意向，但这只能说明它的存在，并不能说明它自身的意向为何。它引起的干扰，影响了发音或是导致了联想，使人在说话时分心。但这种对注意力的干扰和被激活的联想倾向都与口误的本质无关，不过这却暗示我们，干扰想说的话的意向确实存在，现在我们无法从口误效果中判断这个意向的性质（但在所有更明显的口误案例中是可以判断的）。

Slips of the pen, to which I now turn,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ose of the tongue to the extent that we need expect to gain no new points of view from them. Perhaps we will be content with a small gleaning. Those very common little slips of the pen—contractions, anticipations of later words, particularly of the last words—again point to a general distaste for writing, and to an impatience to be done; the pronounced effects of pen slips permit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the interfering tendency to be recognized. One knows in general that if one finds a slip of the pen in a letter everything was not as usual with the writer. What was the matter one cannot always establish. The pen slip is frequently as little noticed by the person who makes it as the tongue slip.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 is striking: There are some persons who have the habit of always rereading a letter they have written before sending it. Others do not do so. But if the latter make an exception and reread the letter, they always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finding and correcting a conspicuous pen slip. How can that be explained? This looks as if these persons knew that they had made a slip of the pen while writing the letter. Shall we really believe that such is the case?

我现在要转到笔误上了，它们与口误的成因很相似，我们不必指望从中得到新的观点。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稍微汲取点知识。很常见的

小小笔误——凝缩、先写后面的词（尤其是最后的单词）——通常也说明了对于写作的厌烦和急于结束的心情；笔误的显著效果，使干扰倾向的性质和目的得以辨识。一般都知道，如果在信中发现笔误，说明写信人不在平常状态。至于具体原因就未必总能找到。笔误和口误一样，犯错的人常常注意得到。下面的事例很震撼：有些人习惯于在寄信前再读一遍自己的写信内容。另一些人则无此习惯。但是如果后者破例又读了信，他们总有机会发现和纠正一个明显笔误。这作何解释呢？这看起来就像这些人在写信时就已经知道犯了笔误似的。我们该认同这个说法吗？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problem linked with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en slip. You may recall the case of the murderer H., who made a practice of obtaining cultures of the most dangerous disease germs from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by pretending to be a bacteriologist, and who used these cultures to get his close relatives out of the way in this most modern fashion. This man once complained to the authorities of such an institution about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e culture which had been sent to him, but committed a pen slip and instead of the words, “in my attempts on mice and guinea pigs,” was plainly written, “in my attempts on people.“ [5_4] This slip even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doctors at the institution, but so far as I know, they drew no conclusion from it. Now what do you think? Might not the doctors better have accepted the slip as a confession and instituted an investigation through which the murderer's handiwork would have been blocked in time? In this case was not ignorance of our conception of errors to blame for an omission of practical importance? Well, I am inclined to think that such a slip would surely seem very suspicious to me, but a fact of great importance stands in the way of its utilization as a confession. The thing is not so simple. The pen slip is surely an indication, but by itself it would not have been

sufficient to instigate an investigation. That the man is preoccupied with the thought of infecting human beings, the slip certainly does betray, but it does not make it possible to decide whether this thought has the value of a clear plan of injury or merely of a phantasy having no practical consequence. It is even possible that the person who made such a slip will deny this phantasy with the best subjective justification and will reject it as something entirely alien to him. Later, when we give our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sychic and material reality, you will understand these possibilities even better. Yet this is again a case in which an error later attained unsuspected significance.

这是一个与笔误的实际意义相关的有趣问题。大家是否记得谋杀犯H的案子，他假扮细菌学家，从科学机构获取了危害极大的病菌培养物，然后用病菌培养物这种现代武器除掉自己的亲人。他有一次跟某个机构的负责人抱怨说，寄给他的培养物没有效力，但是他犯了个笔误，他本来想写“我在老鼠和豚鼠身上的试验”，结果直接写成了“我在人身上的试验”。 [6_4] 这个笔误甚至引起了该机构医生们的注意，不过就我所知，他们没下什么判断。现在你们怎么看？要是这些医生把这个笔误视作罪行坦白而着手调查的话，这个谋杀犯的伎俩岂不是能被及时阻止吗？这个案件中，难道不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我们的过失观念而导致了重大失误吗？其实，我会这么想：这样的笔误对我来说肯定很可疑，但是就这样的重大事件而言，它还不能当作一个坦白。事情没那么简单。该笔误肯定是一个提示，但是单凭它还不足以提起调查。这个人满脑子想的都是让人染上病毒，笔误当然暴露了他的想法，但未必能判定这个想法是否包括了一个清晰的害人计划，还是说它只是一个没有实际害处的幻想。这个犯笔误的人甚至可能用“主观臆断”这个无懈可击的理由否认这个幻想，并说这种事情对他来说是天方夜谭，以此加以驳斥。以后我们会注意到心理和物质现实的区别，大家会更加理解这些可能性。但这个事例再次证明了，有些过失后在来被证明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性。

In misreading, we encounter a psychic situation which is clearly differentiated from that of the tongue slips or pen slips. The one of the two rival tendencies is here replaced by a sensory stimulus and perhaps for that reason is less resistant. What one is reading is not a production of one's own psychic activity, as is something which one intends to write. In a large majority of cases, therefore, the misreading consists in a complete substitution. One substitutes another word for the word to be read, and there need be no connection in meaning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product of the misreading. In general, the slip is based upon a word resemblance. Lichtenberg's example of reading "*Agamemnon* " for "*angenommen* " [5_5] is the best of this group. If one wishes to discover the interfering tendency which causes the misreading, one may completely ignore the misread text and can begin the analytic investigation with the two questions: What is the first idea that occurs in free association to the product of the misreading, and, in what situation did the misreading occur? Now and then a knowledge of the latter suffices by itself to explain the misreading. Take, for example, the individual who, distressed by certain needs, wanders about in a strange city and reads the word "*Closethaus* " on a large sign on the first floor of a house. He has just time to be surprised at the fact that the sign has been nailed so high up when he discovers that, accurately observed, the sign reads "*Corset-haus* ." In other cases the misreadings which are independent of the text require a penetrating analysis which cannot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practice and confidence in the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But generally it is not a matter of much difficulty to obtain the elucidation of a misreading. The substituted word, as in the example, "*Agamemnon* ," betrays without more ado the thought sequence from which the interference results. In war times, for instance, it is very common for one to read into everything which

contains a similar word structure, the names of the cities, generals and military expressions which are constantly buzzing around us. In this way, whatever interests and preoccupies one puts itself in the place of that which is foreign or uninteresting. The after-effects of thoughts blur the new perceptions.

关于误读，我们面对的心理状况与口误或笔误不同。两个敌对倾向之一被替代为一种感觉刺激，这样也许抵抗性就不太大。跟自己想写些什么东西不一样，阅读内容并非阅读者的心理活动。因此在大部分案例中，误读属于一种完全替代。把读到的一个词替换成了另一个词，原文和误读的意义之间没有联系。通常，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单词的相似性。利希滕贝格举的那个把“阿伽门农 ”（Agamemnon）读成“安根农门 ”（angenommen）[6_5] 的例子就是这一类误读的最佳范例。有人如果想了解引起误读的干扰倾向，就要完全忽略被误读的原文，就两个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对误读结果进行任意联想，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是什么？误读发生的情境是什么？有时，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就足以解释误读本身了。举例来说，一个人因为内急，在一个陌生城市里乱晃，看到一栋房子一楼的一个大牌子上写着“Closethus”（德语，意为盥洗间）这个词。他正奇怪牌子钉得太高时，再仔细一看，原来牌子其实写的是“Corset-haus”（德语，意为文胸屋）。其他一些与原文无关的误读案例需要进行深入分析，没有一定的精神分析技巧经验和信心是完成不了的。如上面“阿伽门农 ”的例子中，替代词毫无悬念地暴露了导致干扰的思维过程。比如在战争年代，人们耳边充斥着各种城市、将领的名字和军事术语，看到任何结构类似的词时常常会将它们误读。这样，使人感兴趣或思考的事情替代了那些陌生或不吸引人的事情。思考的后遗症模糊了新的感知。

There are other types of misreadings, in which the text itself arouses the disturbing tendency, by means of which it is then most often changed into its opposite. One reads something which is

undesired; analysis then convinces one that an intensive wish to reject what has been read should be made responsible for the alteration.

还有些误读是原文本身引发了干扰倾向，被干扰后它经常被修改成其反义词。如果让一个人读他不喜欢的东西，那么分析研究会表明，他内心对所读的东西的强烈抵触，是导致变化的罪魁。

In the first mentioned and more frequent cases of misreading, two factors are neglected to which we g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echanism of errors: the conflict of two tendencie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one which then indemnifies itself by producing the error. Not that anything like the opposite occurs in misreading, but the importunity of the idea content which leads to misreading is nevertheless much more conspicuous than the suppression to which the latter may previously have been subjected. Just these two factors are most tangibly apparent in the various situations of errors of forgetfulness.

我们提到的第一种、也是更常见的误读案例里，在过失原理中很重要的两个因素被忽略了：第一个是冲突因素，即这两个倾向的冲突；第二个是压抑因素，即其中一个冲突被压抑，然后通过制造过失保存自己。并非因为误读中出现了相反情况，而是因为导致误读的念头是纠缠不休的，比起它之前承受的压抑要显著得多。而在遗忘类过失的种种情境中，这两种因素是极其明显可见的。

Forgetting plans is actually uniform in meaning; its interpretation is, as we have heard, not denied even by the layman.

The tendency interfering with the plan is always an antithetical intention, an unwillingness concerning which we need only discover why it does not come to expression in a different and less disguised manner. But the existence of this unwillingness is not to be doubted. Sometimes it is possible even to guess something of the motives which make it necessary for this unwillingness to disguise itself, and it always achieves its purpose by the error resulting from the concealment, while its rejection would be certain were it to present itself as open contradiction. If an important change in the psychic situation occurs betwee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plan and its execution, in consequence of which the execution of the plan does not come into question, then the fact that the plan was forgotten is no longer in the class of errors. One is no longer surprised at it, and one understands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superfluous to have remembered the plan; it was then permanently or temporarily effaced. Forgetting a plan can be called an error only when we have no reason to believe there was such an interruption.

对计划的遗忘，其意义是一致的；对它的解释，正如我们所知，连外行人也不否认。对计划进行干扰的倾向总是一种抵触倾向，一种不情愿，对此我们只需了解，为什么它没有以不同且不太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无需怀疑这种不情愿的存在。这个不情愿必须隐藏自己，其动机有时我们甚至能猜出一二。它如果以明目张胆的抵抗形式出现，则势必遭到反对；如果深藏不露，则通过引发过失，总能实现其目的。如果在从计划制定到计划实施前的期间，心理状况发生了重要变化，结果使决定不实施计划，那么对计划的遗忘，就不属于过失的范畴了。当事人不再感到惊讶，知道现在记住计划是多此一举，于是记忆就被永久地或暂时地抹掉了。只有不存在所谓的中途变卦时，对计划的遗忘才可称为过失。

The cases of forgetting plans are in general so uniform and transparent that they do not interest us in our investigation. There are two points, however, from which we can learn something new. We have said that forgetting, that is, the non-execution of a plan, points to an antipathy toward it. This certainly holds, bu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our investigations, the antipathy may be of two sorts, direct and indirect. What is meant by the latter can best be explained by one or two examples. If a patron forgets to say a good word for his protegé to a third person, it may be because the patron is not really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the protegé, therefore, has no great inclination to commend him. It is, at any rate, in this sense that the protegé will construe his patron's forgetfulness. But the matter may be more complicated. The patron's antipathy to the execution of the plan may originate in another quarter and fasten upon quite a different point. It need no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protegé, but may be directed toward the third person to whom the good word was to have been said. Thus, you see what doubts here confront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our interpretation. The protegé, despite a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rgetfulness, stands in danger of becoming too suspicious, and of doing his patron a grave injustice. Or, if an individual forgets a rendezvous which he has made, and which he had resolved to keep, the most frequent basis will certainly be the direct aversion to encountering this person. But analysis might here supply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interfering intention was not directed against that person, but against the place in which they were to have met, and which was avoided because of a painful memory associated with it. Or, if one forgets to mail a letter, the counter-intention may be directed against the content of that letter, yet this does not in any way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letter is harmless in itself, and only subject to the counter-intention because something about it reminds the writer of another letter written previously, which, in fact, did

afford a basis for the antipathy. One can say in such a case that the antipathy has here transferred itself from that former letter where it was justified to the present one in which it really has no meaning. Thus you see that one must always exercise restraint and cau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pretations, even though the interpretations are justified. That which is psychologically equivalent may nevertheless in practice be very ambiguous.

遗忘计划的案例通常都很雷同和明显，我们对此不会有研究兴趣。不过有两点可以帮我们了解些新知识。我们已说过，遗忘，即对计划的不实施，指的是针对计划的一股抗性。这当然是成立的，但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结果，这种抗性可有直接和间接两种。间接的意思，用一两个例子就能很好解释。譬如帮人者忘记为求人者跟第三方美言几句，可能因为他对于求人者没有兴趣，因而不情愿引荐他。至少，求人者会这么看待帮人者遗忘的原因。但情况也可能更复杂些。帮人者对于计划实施的抵触，也许有其他原因，有很不同的解释。它未必与求人者有关系，而可能指向他要为求人者美言几句的第三方。这样，大家就知道，我们的解释在实际应用时会面临哪些疑点。尽管求人者对于该遗忘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他可能会太多疑，令帮人者蒙冤。又比如，某人遗忘了自己定好的约会，最常见的起因，当然是对见到对方的一种直接的厌恶心情。但研究分析也表明，干扰意向不一定是直接指向对方的，而是双方见面的地点，这个地点引发了某个痛苦回忆，因而被刻意地回避了。又如，有人忘记寄信，该反抗性意向也许与信的内容直接有关，但无法排除的可能是，信本身是无害的，遭受反抗性意向，是因为信的某些内容使作者联想到以前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则是引发抗性的原因。可以说，在这个案例中，这种抗性从它的合理出处——上一封信，转移到它不存在任何意义的地方——现在这封信上了。因此，大家明白了，即使解释本身是合理的，对于解释的应用，也必须一直持严谨和审慎的态度。心理学视为等同的现象，在现实中的意义可能是含混不清的。

Phenomena such as these will seem very unusual to you. Perhaps you are inclined to assume that the “indirect” antipathy is enough to characterize the incident as pathological. Yet I can assure you that it also occurs in a normal and healthy setting. I am in no way willing to admit the unreliability of our analytic interpretation. After all, the above-discussed ambiguity of plan-forgetting exists only so long as we have not attempted an analysis of the case, and are interpreting it only on the basis of our general suppositions. When we analyze the person in question, we discover with sufficient certainty in each case whether or not it is a direct antipathy, or what its origin is otherwise.

这样的现象对大家而言似乎很不寻常。也许大家愿意认为，该“间接”抗性足以把这个事件定性为病态行为了。但我跟大家保证，它也发生在正常和健康的情况下。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承认我们的解析不可靠。毕竟，上面提到的对计划的遗忘，只有在我们不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只作笼统解释的时候，它才会意义含混。我们具体分析每个案例的当事人时，都能十分确定地发现过失中有无直接抗性，或者有无其他原因。

A second point is the following: when we find in a large majority of cases that the forgetting of a plan goes back to an antipathy, we gain courage to extend this solution to another series of cases in which the analyzed person does not confirm, but denies, the antipathy which we inferred. Take as an example the exceedingly frequent incidents of forgetting to return books which one has borrowed, or forgetting to pay one's bills or debts. We will be so bold as to accuse the individual in question of intending to keep the books and not to pay the debts, while he will deny such an intention but will not be in a position to give us any other

explanation of his conduct. Thereupon we insist that he has the intention, only he knows nothing about it; all we need for our inference is to have the intention betray itself through the effect of the forgetfulness. The subject may then repeat that he had merely forgotten it. You now recognize the situation as one in which we once before found ourselves. If we wish to be consistent in our interpretation, an interpretation which has been proved as manifold as it is justified, we will be unavoidably forc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are tendencies in a human being which can become effective without his being conscious of them. By so doing, however, we place ourselves in opposition to all the views which prevail in daily life and in psychology.

第二点如下：当我们在大量案例中发现对计划的遗忘出现了抗性后，会敢于将此解释应用于其他类型的案例，这些案例中被分析者没有确认，而是否认了我们推想的抗性。比如，非常频繁地忘记还书，忘记付账单或还债等例子。我们会大胆地指摘当事人意图把书据为己有，或不愿还债，但是他会否认有此意向，但不会为他的行为作出其他解释。因此我们会坚持认为他有此意向，只是他没意识到，要证明我们的推理，只需说这个意向已在遗忘的后果中暴露无遗。然后当事人会再次说，他只是忘记而已。大家此刻会觉得，这种情境我们自己也体会过。假如我们希望坚持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虽合理但也有多层含义），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人类身上有些倾向即使本人没有意识到，也可以起到作用。但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把自己置于与日常生活和心理学界盛行的全部观点的对立面。

Forgetting proper names and foreign names as well as foreign words can be traced in the same manner to a counter-intention which aim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t the name in question. I have already given you an example of such direct antipathy. The

indirect causation, however, is particularly frequent and generally necessitates careful analysis for its determination. Thus, for example, in war times which force us to sacrifice so many of our former inclinations, the ability to recall proper names also suffers severely in consequence of the most peculiar connections. A short time ago it happened that I could not reproduce the name of that harmless Moravian city of Bisenz, and analysis showed that no direct dislike was to blame, but rather the sound resemblance to the name of the Bisenzi palace in Orrieto, in which I used to wish I might live. As a motive for the antagonism to remembering the name, we here encounter for the first time a principle which will later disclose to us its whole tremendous significance in the causation of neurotic symptoms, viz., the aversion on the part of the memory to remembering anything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unpleasant experience and which would revive this unpleasantness by a reproduction. This intention of avoiding unpleasantness in recollections of other psychic acts, the psychic flight from unpleasantness, we may recognize as the ultimate effective motive not only for the forgetting of names, but also for many other errors, such as omissions of action, etc.

遗忘专有名词和外国名字或外语单词，都可以用相同方法找到一个反抗性意向，它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该名词。我已经举过一个有直接抗性的例子。但间接成因特别常见，一般需要谨慎分析其决定因素。比如，在战时，我们不得不牺牲很多以前的习惯，因为一些极特殊的原因，我们对于专有名词的记忆能力也大打折扣。不久前，我突然老记不起比森兹（Bisenz）这个无辜的摩拉维亚城市名字，细究之下，原来我对它并无直接的厌恶，只是它的发音与奥维多的比森茨宫（Bisenzi palace）很接近，那里曾是我求之不得的居所。这里出现了对名字记忆的抵触动机，我们首次遇到了一个原则，以后我们会发现它在神经性症状中的重大意义，这个原则是：任何事物如与不愉快的

经历有关，再现该事物则会激活不愉快感，因而记忆会反对回忆它。我们认为，这种通过其它心理行为回避不愉快感的意向，这种对不愉快感产生的心理逃避，是遗忘名字及遗漏行动事项等诸多过失的终极有效动机。

Forgetting names does, however, seem to be especially facilitated psycho-physiologically and therefore also occurs in cases in which the interference of an unpleasantness-motive cannot be established. If anyone once has a tendency to forget names, you can establish by analytical investigation that he not only loses names because he himself does not like them, or because they remind him of something he does not like, but also because the same name in his mind belongs to another chain of associations, with which he has more intimate relations. The name is anchored there, as it were, and denied to the other associations activated at the moment. If you will recall the tricks of mnemonic technique you will ascertain with some surprise that one forgets names in consequence of the same associations which one otherwise purposely forms in order to save them from being forgotten. The most conspicuous example of this is afforded by proper names of persons, which conceivably enough must have very different psychic values for different people. For example, take a first name, such as Theodore. To one of you it will mean nothing special, to another it means the name of his father, brother, friend, or his own name. Analytic experience will then show you that the first person is not in danger of forgetting that a certain stranger bears this name, while the latter will be constantly inclined to withhold from the stranger this name which seems reserved fo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Let us now assume that this associative inhibition can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 unpleasantness-principle, and in addition with an indirect mechanism, and you will be in a position to form a correct picture

of the complexity of causation of this temporary name-forgetting. An adequate analysis that does justice to the facts, however, will completely disclose these complications.

但是，精神生理上的刺激似乎特别能影响到人们对名字的记忆，所以遗忘名字的现象也存在于一些无法确认有不愉快感动机干扰的案例中。如果某人有遗忘名字的倾向，经过研究分析可以认定，他记不起名字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他不喜欢那些名字，或是它们使他回想起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情；二是这个名字属于与他密切相关的其他联想。某种程度上，这个名字被锁定在那里，被拒绝成为当时被激活的其他联想的一部分。大家想想那些记忆术的花招，就能惊讶地想通了：遗忘名字是联想的结果，可这些联想同样也是人有意制造以防止遗忘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人名，它们对不同的人想必具有不同的心理价值。举个例子，“西奥多”这个名字，对于某人来说可能没有特别意义，但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他的父亲、兄弟、朋友或者自己的名字。分析可知，前一种人认为某个陌生人也可以叫这个名字，而后者则一直倾向于认为它不属于陌生人，应该为亲友保留这个名字。现在我们推断，这种联想性禁忌可能与不愉快感原则的运行类似，并且是间接原因造成的，这样大家就清楚地看到了，关于暂时遗忘名字，成因非常复杂。但是，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进行透彻分析，完全能揭开这些复杂原因。

Forgetting impressions and experiences shows the working of the tendency to keep unpleasantness from recollection much more clearly and conclusively than does the forgetting of names. It does not, of course, belong in its entirety to the category of errors, but only in so far as it seems to us conspicuous and unjustified, measured by the measuring stick of our accustomed conception—thus, for example, where the forgetfulness strikes fresh or important impressions or impressions whose loss tears a hole in the otherwise

well-remembered sequence. Why and how it is in general that we forget, particularly why and how we forget experiences which have surely left the deepest impressions, such as the incidents of our first years of childhood, is quite a different problem, in which the defense against unpleasant associations plays a certain role but is far from explaining everything. That unpleasant impressions are easily forgotten is an indubitable fact. Various psychologists have observed it, and the great Darwin was so struck by it that he made the “golden rule” for himself of writing down with particular care observations which seemed unfavorable to his theory, since he had convinced himself that they were just the ones which would not stick in his memory.

遗忘印象和经历，比起遗忘名字更清楚、更确凿地表明了去除回忆中不愉快感倾向的作用。当然，它并不完全属于过失的范畴，仅限于那些在我们熟悉的理念标尺的衡量下看似显著、不合理的案例。比如，遗忘了新鲜或者重要的印象；或是忘记了本来清楚记得的连续事件当中的一段。我们为何、如何会普遍地有遗忘症，特别是会遗忘那些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历，比如幼年发生的事故？这是个不同的问题，其中对于不愉快联想的抵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远远不能解释全部。不愉快的印象容易被遗忘，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不少心理学家注意到了，伟大的达尔文对此非常惊叹，因而为自己定下“黄金原则”，要特别谨慎地记录那些似乎对他的学说不太有利的观察结果，因为他认为，这些观察结果不愿停留在他的记忆中。

Those who hear for the first time of this principle of defense against unpleasant recollections by means of forgetting, seldom fail to raise the objection that they, on the contrary, have had the experience that just the painful is hard to forget, inasmuch as it always comes back to mind to torture the person against his will—

as, for example, the recollection of an insult or humiliation. This fact is also correct, but the objection is not valid. It is important that one begin betimes to reckon with the fact that the psychic life is the arena of the struggles and exercises of antagonistic tendencies, or, to express it in non-dynamic terminology, that it consists of contradictions and paired antagonisms. Information concerning one specific tendency is of no avail for the exclusion of its opposite; there is room for both of them. It depends only on how the opposites react upon each other, what effects will proceed from the one and what from the other.

第一次听说通过遗忘抵御不愉快记忆这一原则的人，很少会不提出反对，他们说自己反而会有很难遗忘痛苦事物的体验，因为它总是在记忆中挥之不去，令当事人不由自主地受着折磨，比如关于被辱骂或羞辱的回忆。这是事实，但是这一反对意见并不合理。重要的是，要及时体会到，心理生活是反抗性倾向挣扎和活跃的平台，或者用静态术语表达，它包含的是矛盾与对抗。了解一个具体倾向的情况，并不会排除其反对倾向，两个可以共存。取决因素只在于，两个相反倾向对彼此的反应，两种倾向会各自引发什么效应。

Losing and mislaying objects is of especial interest to us because of the ambiguity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tendencies in whose services the errors may act. The common element in all cases is this, that one wished to lose something. The reasons and purposes thereof vary. One loses an object when it has become damaged, when one intends to replace it with a better one, when one has ceased to like it, when it came from a person whose relations to one have become strained, or when it was obtained under circumstances of which one no longer wishes to think. The same purpose may be served by letting the object fall, be damaged or broken. In the life of

society it is said to have been found that unwelcome and illegitimate children are much more often frail than those born in wedlock. To reach this result we do not need the coarse technique of the so-called angel-maker. A certain remissness in the care of the child is said to suffice amply. In the preservation of objects, the case might easily be the same as with the children.

我们对丢失、找不到物品的案例有特别的兴趣，因为导致这些过失发生的倾向意义含混而多样。案例中的共同点是，丢东西是故意的，只是原因和目的各有不同。丢掉物品的起因可能是东西损坏了，或是物主想把它换成更好的物品，或是物主不再喜欢它，或是物主与它的原主人关系紧张，或是物主不愿再想起得到它时的场景。同样的目的也适用于让物品掉落、损坏。在社会生活中，据说有这样的现象：不受欢迎的私生子常常比婚生子体弱很多。有此结果，倒不一定是所谓“天使制造者”们养育方法粗暴。据说在养育孩子时某种怠慢就足够造成问题了。保存物品跟养育孩子的情况，可能大有相同之处。

But things may be singled out for loss without their having forfeited any of their value, namely, when there exists the intention to sacrifice something to fate in order to ward off some other dreaded loss. Such exorcisings of fate are,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analysis, still very frequent among us; therefore, the loss of things is often a voluntary sacrifice. In the same way losing may serve the purposes of obstinacy or self-punishment. In short, the more distant motivation of the tendency to get rid of a thing oneself by means of losing it is not overlooked.

不过也有特殊情况，有些东西即便没有失去价值也会丢失，就是说存在一个意向，为驱除厄运而牺牲掉一些东西，以阻挡其他可怕的

损失。根据分析发现，这种驱除厄运的做法，在我们之中仍很常见，因而，丢失东西常常是一种自愿牺牲。同样，丢失的目的也可以是因为偏执或自我惩罚等。简言之，通过丢失而除掉自己某个物品的倾向，即使动机较为遥远，也不会被忽略。

Mistakes, like other errors, are often used to fulfill wishes which one ought to deny oneself. The purpose is thus masked as fortunate accident; for instance, one of our friends once took the train to make a call in the suburbs, despite the clearest antipathy to so doing, and then, in changing cars, made the mistake of getting into the train which took him back to the city. Or, if on a trip one absolutely wants to make a longer stay at a half-way station, one is apt to overlook or miss certain connections, so that he is forced to make the desired interruption to the trip. Or, as once happened to a patient of mine whom I had forbidden to call up his fiancée on the telephone, “by mistake” and “absent-mindedly” he asked for a wrong number when he wanted to telephone to me, so that he was suddenly connected with the lady. A pretty example and one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making a direct mistake is the observation of an engineer at a preliminary hearing in a damage suit:

像其他过失一样，错误也经常用于满足自我否认的愿望。其目的被掩盖成了偶然事件，比如，我们一个朋友有一次坐火车去郊区拜访某人，但他显然很不想去。因此，他在换乘时错误地上了回城的火车。或者，如果有人在旅途中很想在中转站停留更久，很容易会忽略或错过换乘班次，这样就被迫但又如愿地中断旅途了。或者比如，我的一个病人，虽然我禁止他与未婚妻通话，但有一次他想打电话给我时，“一不小心”、“错误地”要了一个不对的电话号码，他就一下子打到那位小姐那儿了。一位工程师在一起损害赔偿案预审中自述的见闻，是个有趣的例子，且说明了直接犯错的现实意义：

Some time ago I worked with several colleagues in the laboratory of a high school on a series of complicated elasticity experiments, a piece of work which we had undertaken voluntarily but which began to take more time than we had expected. One day as I went into the laboratory with my colleague F., the latter remarked how unpleasant it was to him to lose so much time that day, since he had so much to do at home. I could not help agreeing with him, and remarked half-jokingly, alluding to an incident of the previous week: “Let's hope that the machine gives out again so that we can stop work and go home early.”

“前些日子，我跟几个同事在一个中学的实验室做一系列的复杂弹力试验，这本是我们自愿做的工作，但我们渐渐发现耗费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一天我与同事F一起进实验室时，后者谈到，他家里有很多事要做，这一天要浪费那么多时间，他很不开心。我不禁随声附和，而且针对上星期发生的事故半开玩笑地说：‘希望机器再次停转，我们就可以放下工作早点回家了。’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t happened that F. was given the regulation of the valve of the press, that is to say, he was, by means of a cautious opening of the valve, to let the liquid pressure from the accumulator flow slowly into the cylinder of the hydraulic press. The man who was directing the job stood by the manometer (pressure gauge) and when the right pressure had been reached called out in a loud voice: “Stop.” At this command F. seized the valve and turned with all his might—to the left! (All valves, without exception, close to the right.) Thereby the whole pressure of the

accumulator suddenly became effective in the press, a strain for which the connecting pipes are not designed, so that a connecting pipe immediately burst—quite a harmless defect, but one which nevertheless forced us to drop work for the day and go home.

> “在分工时，F碰巧负责管理压力机阀门，就是说，他要小心地开阀门，让液压从收集器缓慢流入液压机中。指挥工作的人站在压力计边上，当压力达到正确值时，高声喊‘停！’F听到指令抓住阀门，用尽全力把它——转向了左边！（所有阀门无一例外都是向右转关闭。）这样收集器里的全部压力突然施加在压力机上，张力超过连接管的设计承受力，一根管子随即破裂——这是个小事故，不过有人立刻强令我们当天停止工作回家。

It is characteristic, by the way, that some time afterward when we were discussing this occurrence, my friend F. had no recollection whatever of my remark, which I could recall with certainty.

> “另外，有意思的是，当事后我们谈论此事时，我朋友F不记得我说过的任何话，而我则清楚地记得。”

From this point you may reach the conjecture that it is not harmless accident which makes the hands of your domestics such dangerous enemies to your household property. But you can also raise the question whether it is always an accident when one

damages himself and exposes his own person to danger. There are interests the value of which you will presently be able to test by means of the analysis of observations.

由此可以推测，你家的佣人做事毛糙，弄坏家中财物，未必都是清白的偶然过失。但是大家会问道，人弄伤自己，或把自身置于险地，这是不是都是偶然的呢？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可以自己尝试分析案例进行验证。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far from being all that might be said about errors. There is indeed much left to investigate and to discuss. But I am satisfied if, from our investigations to date, your previous views are somewhat shaken and if you have acquired a certain degree of liberality in the acceptance of new ones. For the rest, I must content myself with leaving you face to face with an unclear condition of affairs. We cannot prove all our axioms by the study of errors and, indeed, are by no means solely dependent on this material. The great value of errors for our purpos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y are very frequent phenomena that can easily be observed on oneself and the occurrence of which do not require a pathological condition. I should like to mention just one more of your unanswered questions before concluding: “If, as we have seen in many examples, people come so close to understanding errors and so often act as though they penetrated their meaning, how is it possible that they can so generally consider them accidental, senseless and meaningless, and can so energetically oppose their psychoanalytic elucidation?”

女士们、先生们，关于过失要说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仍有很多

问题留待考察和讨论。但若是大家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动摇了以前的观点，并对接受新观点有了相当开放的心态，我就满足了。至于其他尚未搞懂的问题，我就乐得让大家自行面对了。研究过失不能证明我们所有的原理，并且，事实上我们一定不能单纯依赖于这类研究材料。过失对于我们研究目的的重大价值在于，它们是常见的现象，较易自行观察，它们不需要以病态作为前提条件。在结束前，有一个疑问我还尚未给大家答复："就像我们在这么多例子中看到的，人们其实能够理解过失，并且经常表现得好像明白了这些过失的意义，为什么他们还是普遍地认为过失是偶发的、毫无用处的、毫无意义的，并如此强烈地反对用精神分析来解释过失呢？"

You are right; that is conspicuous and demands an explanation. I shall not give this explanation to you, however, but shall guide you slowly to the connecting links from which the explanation will force itself upon you without any aid from me.

大家说得对，这问题很引人注目，需要一个解答。但我不会给大家解答，而是会慢慢地引导大家去找到一些关联之处，这样不用我帮助，你们也能自己发现答案。

[5_1].In the German Reichstag, November, 1908. "Rückhaltlos" means "unreservedly." "Rückgratlos" means "without backbone."

[5_2]."Zumvorscheinbringen," means to bring to light. "Schweinereien" means filthiness or obscurity. The telescoping of the two ideas, resulting in the word "Vorschwein," plainly reveals the speaker's opinion of the affair.

[5_3].The lady meant to say "nach Hause," "to reach home." The word "Hose" means "drawers." The preservating content of her hesitancy is hereby revealed.

[5_4].The German reads, "bei meinen Versuchen an Mausen," which, through the slip of the pen, resulted in "bei meinen Versuchen an Menschen."

[5_5]."Angenommen" is a verb, meaning "to accept."

[6_1].事情发生于1908年11月德国国会大厦。“rückhaltlos”意思是“毫无保留”，“rückgratlos”的意思是“没骨气”。

[6_2].德语“Zum Vorschein bringen”意思是曝光，“Schweinereien”意思是污秽。两个念头的叠加导致了组合词“Vorschwein”，明白无误地揭露了说话人对此事的想法。

[6_3].这位女士想说“Nach Hause”（回到屋里）。单词“Hose”意思是“内裤”，因此暴露了她犹豫的内容的语音持续。

[6_4].德语为“bei meinen Versuchen an Mausen”（我对小鼠的实验），因笔误写成了“bei meinen Versuchen an Menschen”（我对人类的实验）。

[6_5].“angenommen”是动词，意思是“接受”。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精神分析引论（中）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梦

SIGMUND FREU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UBLISHING CO.

精神分析引论（中）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卢屹 译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Fifth Lecture　Difficulties and Preliminary Approach 第五讲　难点及初步探讨
- Sixth Lecture Hypothesis and Technique of Interpretation 第六讲　梦的假说及释梦技巧
- Seventh Lecture　Manifest Dream Content and Latent Dream Thought 第七讲　梦的显意和隐意
- Eighth Lecture　Dreams of Childhood 第八讲　儿童的梦
- Ninth Lecture　Censor 第九讲　梦的审查
- Tenth Lecture　Symbolism in the Dream 第十讲　梦的象征意义
- Eleventh Lecture　Work 第十一讲　梦的工作
- Twelfth Lecture　Analysis of Sample Dreams 第十二讲　释梦示例
- Thirteenth Lecture　Archaic Remnants and Infantilism in the Dream 第十三讲　梦的原始性及幼稚性
- Fourteenth Lecture　Wish Fulfillment 第十四讲　愿望实现
- Fifteenth Lecture　Doubtful Points and Criticism 第十五讲　疑点与批评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Fifth Lecture　Difficulties and Preliminary Approach

第五讲　难点及初步探讨

One day the discovery was made that the disease symptoms of certain nervous patients have a meaning. [1_1] Thereupon the psychoanalytic method of therapy was founded. In this treatment it happened that the patients also presented dreams in place of their symptoms. Herewith originated the conjecture that these dreams also have a meaning.

有一天人们发现，某些神经症患者的病症是有意义的。[2_1] 精神分析治疗法由此得以确立。接受这种治疗的病人也把梦作为病症讲述出来。于是一个猜想应运而生，即这些梦也是有意义的。

We will not, however, pursue this historical path, but enter upon the opposite one. We wish to discover the meaning of dreams as prepar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neuroses. This inversion is justified, for the study of dreams is not only the best preparation for that of the neuroses, but the dream itself is also a neurotic symptom, and in fact one which possesses for us the incalculable advantage of occurring in all normals. Indeed, if all human beings were well and would dream, we could gain from their dreams almost all the insight to which the study of the neuroses has led.

然而，我们不会遵循这个老路子来，而是反其道行之。我们要先来发现梦的意义，为神经症研究做准备。这样反过来是合理的，因为

不仅梦的研究为神经症研究做了最好的准备工作，而且梦的本身也是一种神经症症状，实际上它发生在所有正常人身上，这个优势对我们来说是不可估量的。甚至，如果所有人类都身体健康并且会做梦，通过他们的梦我们几乎可以获得神经症研究得出的所有见解了。

Thus it is that the dream becomes the object of psychoanalytic research—again an ordinary, little-considered phenomenon, apparently of no practical value, like the errors with which, indeed, it shares the character of occurring in normals. But otherwise the conditions are rather less favorable for our work. Errors had been neglected only by science, which had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m; but at least it was no disgrace to occupy one's self with them. People said there are indeed more important things, but perhaps something may come of it. Preoccupation with the dream, however, is not merely impractical and superfluous, but actually ignominious; it carries the odium of the unscientific, awakens the suspicion of a personal leaning towards mysticism. The idea of a physician busying himself with dreams when even in neuropathology and psychiatry there are matters so much more serious—tumors the size of apples which incapacitate the organ of the psyche, hemorrhages, and chronic inflammations in which one can demonstrate changes in the tissues under the microscope! No, the dream is much too trifling an object, and unworthy of Science.

因此，梦成了精神分析研究的对象。跟过失一样，它也发生在正常人身上，也是一种普通的但却少有人问津的现象，显然没有实际意义。不过如果情况相反，它倒不利于我们的研究了。过失只是被科学界忽视，没能引起什么注意罢了，但至少研究它不丢人。人们会说，的确有其他更重要的事，不过研究过失也许能抛砖引玉。但是，一心去钻研梦，不仅不切实际、多此一举，而且其实很丢脸。它引发了不

科学的非议，招致了神秘主义倾向的嫌疑。神经病理学和神经病学有那么多更严肃的课题——令心灵器官失灵的苹果大小的肿瘤、出血症、慢性炎症（在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其组织变化），可见人们会对忙着研究梦的医生作何感想！不，梦是太卑微的对象，配不上科学。

And besides, it is a condition which in itself defies all the requirements of exact research—in dream investigation one is not even sure of one's object. A delusion, for example, presents itself in clear and definite outlines. “I am the Emperor of China,” says the patient aloud. But the dream? It generally cannot be related at all. If anyone relates a dream, has he any guarantee that he has told it correctly, and not changed it during the telling, or invented an addition which was forced by the indefiniteness of his recollection? Most dreams cannot be remembered at all, are forgotten except for small fragments. And up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uch material shall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or method of treatment for patients be based?

而且，它本身也与精确研究的全部要求背道而驰——研究梦的人，连研究对象是什么都不确定。比如妄想症，它有清晰、明确的表现形式。“我是中国皇帝。”病人大声说。但是梦呢？它一般根本无法表述。如果某人讲述一个梦境，他能否保证自己讲得准确，在讲述过程中没有篡改、没有因为回忆不清而编了一段呢？大部分梦根本不会被记得，基本会被忘掉，只剩下一些碎片。科学的心理学研究或治疗能建立在对这种素材的解释的基础上吗？

A certain excess in judgment may make us suspicious. The objections to the dream as an object of research obviously go too far. The question of insignificance we have already had to deal with

in discussing errors. We said to ourselves that important matters may manifest themselves through small signs. As concerns the indefiniteness of the dream, it is after all a characteristic like any other. One cannot pr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object. Moreover, there are clear and definite dreams. And there are other objects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which suffer from the same trait of indefiniteness, e.g., many compulsion ideas, with which even respectable and esteemed psychiatrists have occupied themselves. I might recall the last case which occurred in my practice. The patient introduced himself to me with the words, “I have a certain feeling as though I had harmed or had wished to harm some living thing—a child?—no, more probably a dog—perhaps pushed it off a bridge—or something else.” We can overcome to some degree the difficulty of uncertain recollection in the dream if we determine that exactly what the dreamer tells us is to be taken as his dream, without regard to anything which he has forgotten or may have changed in recollection. And finally, one cannot make so general an assertion as that the dream is an unimportant thing. We know from our own experience that the mood in which one wakes up after a dream may continue throughout the whole day. Cases have been observed by physicians in which a psychosis begins with a dream and holds to a delusion which originated in it. It is related of historical personages that they drew their inspiration for important deeds from dreams. So we may ask whence comes the contempt of scientific circles for the dream?

过火的批判，也许会令我们抱以怀疑眼光。反对将梦作为研究对象的意见显然过分了。我们谈论过失时，已经解释过所谓的重不重要的问题了。我们自己都说，重要的事物可以通过细微的迹象表现出来。至于担忧梦的不确定性，归根结底，其他研究对象都有这种特点。没有人可以预知一个研究对象的特点。不仅如此，清晰、确定的

梦是存在的。精神病学中也有其他同样具有不确定特点的研究对象，比如有很多强迫想法的症状，即便颇有名望的精神学家也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还记得自己从医生涯的最近一个病例。一位病人用这样的话介绍自己："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已经伤害了、或是想要伤害一个什么动物——鸟吗？——不，更像是狗之类的——大概把它推下桥了——或是其他什么的。"只要我们将做梦者告诉我们的事情当作他们的梦境，不考虑他们回忆时忘记或修改了什么，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对回忆梦的不确定性。最后，我们不能一口断定梦不重要。从自己的经历中我们知道，人在梦醒后的情绪可以延续一整天。根据医生观察到的一些病例，有的精神病是从一个梦开始，梦引发了一个妄想，妄想由此持续了下去。据说一些历史人物从梦境中汲取了重大事件的灵感。因此，我们不禁要问，科学界对梦的轻视从何而来？

I think it is the reaction to their over-estimation in former times.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is notoriously difficult, but this much we may assume with certainty—if you will permit me the jest—that our ancestors of 3000 years ago and more, dreamed much in the way we do. As far as we know, all ancient people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dreams and considered them of practical value. They drew omens for the future from dreams, sought premonitions in them. In those days, to the Greeks and all Orientals, a campaign without dream interpreters must have been as impossible as a campaign without an aviation scout today. When Alexander the Great undertook his campaign of conquests, the most famous dream interpreters were in attendance. The city of Tyrus, which was then still situated on an island, put up so fierce a resistance that Alexander considered the idea of raising the siege. Then he dreamed one night of a satyr dancing as if in triumph; and when he laid his dream before his interpreters he received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victory over the city had been announced to him. He

ordered the attack and took Tyrus. Among the Etruscans and the Romans other methods of discovering the future were in use, b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was practical and esteemed during the entire Hellenic–Roman period. Of the literature dealing with the topic at least the chief work has been preserved to us, namely, the book of Artemidoros of Daldis, who is supposed to have lived during the lifetime of the Emperor Hadrian. How it happened subsequently that the art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was lost and the dream fell into discredit, I cannot tell you. Enlightenment cannot have had much part in it, for the Dark Ages faithfully preserved things far more absurd than the ancient dream interpretation. The fact is, the interest in dreams gradually deteriorated into superstition, and could assert itself only among the ignorant. The latest misuse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in our day still tries to discover in dreams the numbers which are going to be drawn in the small lotte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act science of today has repeatedly dealt with dreams, but always only with the purpose of applying its physiological theories to the dream. By physicians, of course, the dream was considered as a non-psychic act,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somatic irritations in the psychic life. Binz (1876) pronounced the dream “a bodily process, in all cases useless, in many actually pathological, above which the world-soul and immortality are raised as high as the blue ether over the weed-grown sands of the lowest plain.” Maury compared it with the irregular twitchings of St. Vitus' Dance in contrast to the coordinated movements of the normal person. An old comparison makes the content of the dream analogous to the tones which the “ten fingers of a musically illiterate person would bring forth if they ran over the keys of the instrument.”

我想是物极必反的原因，因为过去对梦过于看重了。众所周知，

重现往日荣光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至少能确定地说——请允许我开个玩笑——我们3000年前、甚至更早以前的祖先，他们跟我们做梦的方式别无二致。据我们所知，所有古代民族都非常看重梦，认为它们有实际意义。他们从梦中获得未来的预兆，预知吉凶。在那些年代，希腊人和所有东方民族打仗时不带解梦人，等于现代战争没有侦察机一样，是几乎不可能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战各地时，随军带了最有名气的解梦人。当时推罗城还在一座岛上，城里反抗非常激烈，亚历山大一度考虑要解除围攻。然而他有一天夜里梦见了森林之神像是在跳舞庆祝胜利，于是他把这个梦告诉解梦人，得到的回答是这预示了攻城胜利。于是他下命进攻，拿下了推罗城。伊特鲁里亚人和古罗马人也使用其他预知未来的占卜术，不过在整个希腊罗马时期，解梦术都大行其道，备受推崇。在有关这个话题的文学作品中，起码有一部主要作品保存至今，那就是达尔迪斯的阿特米多勒斯写的书，作者据说生活于哈德良皇帝统治的年代。至于后来为什么解梦之术没落、梦沦落为羞耻之事，我无法回答。启蒙运动不可能起太大作用，因为在中世纪黑暗年代，比古代解梦术荒唐得多的东西都原原本本地得以保存。事实是，梦的地位逐步衰落成为迷信，只能在没文化的人群中拥有信徒。在我们这个年代，最新的解梦术错误用途是，企图从梦中发现彩票抽奖的号码。另一方面，今天的精确科学也在不停地运用到梦，但其目的一直是将生理学理论应用于梦。当然，医生把梦视作非心理行动，是躯体不适在心理生活上的表现。宾兹在1876年宣称梦是“一种生理过程，在一切情况下均是无用的，大多情况下实际上是病态的，灵魂和不朽与它之间的距离太远，正如蓝天苍穹俯瞰着最低原野上的蔓草尘沙。”莫里把它比作圣维特跳舞病，是不同于常人协调动作的怪异扭动。过去有个比方，把梦比作“一个十足音痴的十指抚过乐器时的”声音。

Interpretation means finding a hidden meaning.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of interpretation in such an estimation of the dream process. Look up the description of the dream in Wundt, Jodl and other newer philosophers. You will find an enumeration of the

deviations of dream life from waking thought, in a sense disparaging to the dream. The description points out the disintegration of association, the suspension of the critical faculty, the elimination of all knowledge, and other signs of diminished activity. The only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dream which we owe to exact science pertains to the influence of bodily stimuli, operative during sleep, on the content of the dream. There are two thick volumes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es on dreams by the recently deceased Norwegian author, J. Mourly Vold, (translated into German in 1910 and 1912), which deal almost solely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changes in the position of the limbs. They are recommended as the prototype of exact dream research. Now can you imagine what exact science would say if it discovered that we wish to attempt to find the meaning of dreams? It may be it has already said it, but we will not allow ourselves to be frightened off. If errors can have a meaning, the dream can, too, and errors in many cases have a meaning which has escaped exact science. Let us confess to sharing the prejudice of the ancients and the common people, and let us follow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ancient dream interpreters.

解释意味着要发现隐藏的意义。对于梦境过程的评估，这样的解释是毋庸置疑的。看看冯特、乔德耳以及其他更近期的哲学家们对于梦的描述，会发现他们列举了梦中生活与清醒时想法的差异，其意在于贬损梦。他们在描述中指出梦使联想不连贯、中断判断能力、清除所有认知以及减弱其他能力。关于符合精确科学要求的梦的认知，它唯一的可取之处在于睡眠过程中对梦境内容有效的生理刺激。最近去世的挪威人摩利·沃尔德写了两大卷关于梦的实验研究（1910年及1912年翻译成德语），几乎只是关于四肢姿势的变换结果。这种方法是典型的精确科学研究法。现在，大家能想象，如果精确科学界发现我们想尝试寻求梦的意义，它会作何评论呢？也许它已经作了评论，

不过我们不愿退缩。如果过失有意义，梦也可能有，而且很多案例中过失拥有的意义已经脱离了精确科学。我们承认，我们与古人和普通百姓的偏见一致，让我们循着古代解梦人的足迹前进吧。

First of all, we must orient ourselves in our task, and take a bird's eye view of our field. What is a dream? It is difficult to say in one sentence. But we do not want to attempt any definition where a reference to the material with which everyone is familiar suffices. Yet we ought to select the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dream. How can that be found? There are such monstrous differences within the boundary which encloses our province, differences in every direction. The essential thing will very probably be that which we can show to be common to all dreams.

首先，我们要明确该任务的方向，从整体上感受一下这个领域。什么是梦？这很难以一言蔽之。但我们不希望对人人皆知的素材进行定义。然而，我们需要选择梦的关键要素。如何找得到？在这一范畴界限内，有着很多巨大差异，在各个方向都有差异。关键点很可能在于所有梦的共同之处。

Well, the first thing which is common to all dreams is that we are asleep during their occurrence. The dream is apparently the psychic life during sleep, which has certain resemblances to that of the waking condi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is distinguished from it by important differences. That was noted even in Aristotle's definition. Perhaps there are other connections obtaining between the dream and sleep. One can be awakened by a dream, one frequently has a dream when he wakes spontaneously or is forcibly awakened from sleep. The dream then seems to be an intermediate

condition between sleeping and waking. Thus we are referred to the problem of sleep. What, then, is sleep?

那么，首先，所有梦的共同点是，它们发生于我们的睡眠中。梦显然是睡眠时的心理生活，睡眠与清醒状态有一些相似之处，而另一方面又因为一些重大差异而被区分开来。这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有所提及。也许梦与睡眠之间还存在其他联系。人可以被一场梦惊醒，易于惊醒或是被从睡眠中强迫唤醒的人会多梦。梦似乎成了睡觉和睡醒之间的中间状态。这样，我们就要看看睡眠的问题。那么何为睡眠？

That is a physiological or biological problem concerning which there is still much controversy. We can form no decision on the point, but I think we may attempt a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sleep. Sleep is a condition in which I wish t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external world, and have withdrawn my interest from it. I put myself to sleep by withdrawing myself from the external world and by holding off its stimuli. I also go to sleep when I am fatigued by the external world. Thus, by going to sleep, I say to the external world, “Leave me in peace, for I wish to sleep.” Conversely, the child says, “I won't go to bed yet, I am not tired, I want to have some more fun.” The biological intention of sleep thus seems to be recuperation; it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 the suspension of interest in the external world. Our relation to the world into which we came so unwillingly, seems to include the fact that we cannot endure it without interruption. For this reason we revert from time to time to the prenatal existence, that is, to the intra-uterine existence. At least we create for ourselves conditions quite similar to those obtaining at that time—warmth, darkness and the absence of stimuli. Some of us even roll ourselves into tight packages and assume in sleep a

posture very similar to the intra-uterine posture. It seems as if the world did not wholly possess us adults, it has only two-thirds of our life, we are still one-third unborn. Each awakening in the morning is then like a new birth. We also speak of the condition after sleep with the words, “I feel as though I had been born anew,” by which we probably form a very erroneous idea of the general feeling of the newly born. It may be assumed that the latter, on the contrary, feel very uncomfortable. We also speak of birth as “seeing the light of day.” If that be sleep, then the dream is not on its program at all, rather it seems an unwelcome addition. We think, too, that dreamless sleep is the best and only normal sleep. There should be no psychic activity in sleep; if the psyche stirs, then just to that extent have we failed to reduplicate the foetal condition; remainders of psychic activity could not be completely avoided. These remainders are the dream. Then it really does seem that the dream need have no meaning. It was different in the case of errors; they were activities of the waking state. But when I am asleep, have quite suspended psychic activity and have suppressed all but certain of its remainders, then it is by no means inevitable that these remainders have a meaning. In fact, I cannot make use of this meaning,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rest of my psyche is asleep. This must, of course, be a question only of twitching, like spasmodic reactions, a question only of psychic phenomena such as follow directly upon somatic stimulation. The dream, therefore, appears to be the sleep-disturbing remnant of the psychic activity of waking life, and we may make the resolution promptly to abandon a theme which is so ill-adapted to psychoanalysis.

这是一个生理学或生物学问题，目前关于它还有不少争议。我们现在无法形成结论，但是我们可以试着讨论睡眠的心理特征。睡眠的情境是，我无意与外界发生关系，并且对它失去了兴趣。我入睡，将

自己从外界抽离出来，抵抗着它的刺激。当我因外界而疲惫时，我也会入睡。这样，通过入睡，我向外界说："请不要打扰我，我想睡觉。"而小孩反而会说："我还不想睡觉，我不累，我还想多玩会儿。"睡眠的生物学动机似乎是为了恢复体力，而心理特征则是中断对外界的关注。我们如此不情愿来到这个世界，因此只有其间中断，我们才能忍受的。由此，我们要时不时地回归到出生前的生存状态，也就是子宫内生存状态。至少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与当时类似的条件：温暖、黑暗和没有外部刺激。我们有些人甚至会把自己紧紧裹好，在睡觉时保持着与在子宫内极为类似的姿势。看样子，世界并没有完全拥有我们成年人，它只占有我们生活的三分之二，有三分之一依然保持未出生状态。因而，每天早晨醒来时宛如新生。我们也这样谈论睡觉后的情况："我似乎焕然新生了。"我们普遍对新生儿的感觉持这种看法，它可能是非常不对头的。可以猜想，新生儿也许反而是感觉不舒服的。我们也把出生叫做"见了天日"。如果睡眠如此，那梦就根本不在它的计划之内，反而像一个不受欢迎的附赠品。我们也认为，无梦睡眠是最佳的、也是唯一正常的睡眠。在睡眠中不应有心理行动，如果心理不安宁，我们模仿胎儿状态的行动可以说是失败的。我们无法完全避免残余的心理行动，这些残余就是梦。这样的话，梦境似乎真的不必有意义。过失的案例不一样，它们是清醒状态时的心理活动。但当我入睡时，已经中断了心理活动，压抑了除某些残余之外的所有活动，这样，那些残余未必需要有意义。事实上，考虑到我的心灵其他部分都在沉睡，我也用不上这个意义。梦这个问题只能是关于类似抽搐的间歇反应，只能是关于类似躯体刺激直接引发的心理现象。因而，梦似乎是搅扰睡眠的苏醒时心理活动的残余物。这样一个与精神分析格格不入的主题，我们还是下决心不去碰它为妙。

However, even if the dream is superfluous, it exists nevertheless and we may try to give an account of its existence. Why does not the psyche go to sleep? Probably because there is something which gives it no rest. Stimuli act upon the psyche, and it must react to them. The dream, therefore,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psyche reacts to the stimuli acting upon it in the sleeping condition. We note here a point of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ream. We can now search through different dreams to discover what are the stimuli which seek to disturb the sleep and which are reacted to with dreams. Thus far we might be said to have discovered the first common element.

然而，即使梦是多余的，它无论如何是存在着的，我们可以试着讲讲它的存在。为什么心灵没有沉睡？也许因为有些事情无休止地纠缠着它。刺激施加于心灵，心灵必须作出反应。因而，梦是心灵在睡眠条件下对施加于它的刺激反应的方式。现在我们发现了一点理解梦境的方法。我们现在可以搜索不同梦境，以发现试图搅扰睡眠的刺激是什么，哪些刺激会让睡眠中的人以梦作为反应？到这里，可以说我们已经发现了第一个共同点。

Are there other common elements? Yes,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re are, but they are much more difficult to grasp and describe. The psychic processes of sleep, for example, have a very different character from those of waking. One experiences many things in the dream, and believes in them, while one really has experienced nothing but perhaps the one disturbing stimulus. One experiences them predominantly in visual images; feelings may also be interspersed in the dream as well as thoughts; the other senses may also have experiences, but after all the dream experiences are predominantly pictures. A part of the difficulty of dream telling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we have to transpose these pictures into words. “I could draw it,” the dreamer says frequently, “but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That is not really a case of diminished psychic activity, like that of the feeble-mind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highly gifted; it is something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but it is

difficult to say wherein the difference lies. G. T. Fechner once hazarded the conjecture that the scene in which dreams are played is a different one from that of the waking perceptual life. To be sure, we do not understand this, do not know what we are to think of it, but the impression of strangeness which most dreams make upon us does really bear this out. The comparison of the dream activity with the effects of a hand untrained in music also fails at this point. The piano, at least, will surely answer with the same tones, even if not with melodies, as soon as by accident one brushes its keys. Let us keep this second common element of all dreams carefully in mind, even though it be not understood.

还有其他共同点吗？是的，不可否认还有，不过要认识和描述它们是难上加难的。比如睡眠的心理过程，比起苏醒时的心理过程，有一个十分不同的特性。人在睡梦中会体验很多事情并会相信它们，而其实并未体验到任何事情，除了那个干扰性刺激。梦中体验的事情主要是视觉图像，也会夹杂着感觉和想法，也许还有其他感官体验，但从根本上说，梦的体验主要是以画面展现的。讲述梦境的困难，部分是因为，我们必须将这些画面转换成语言。“我也许能画出来，”经常有做梦者这么说，“但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它。”这实际上并非因为心理活动能力减弱，像弱智者与高智商的区别，而是一种质的区别，但很难判断区别在何处。费希纳曾经大胆猜想说，梦境发生的情境与有感知的清醒生活的情境是不一样的。老实说，我们不理解这个说法，不知道怎么去想它，但是梦境给予我们的陌生感确实验证了这个说法。在这一点上，将睡梦活动比喻成音痴的手，也是牵强的。至少在有人抚过钢琴琴键时，不管有无旋律，琴键肯定会发出相应的音调。我们先小心地记住梦境的第二个共同点，虽然还不能理解它。

Are there still further traits in common? I find none, and see only differences everywhere, differences indeed in the apparent

length as well as the definiteness of the activities, participation of effects, durability, etc. All this really is not what we might expect of a compulsion-driven, irresistible, convulsive defense against a stimulus. As concerns the dimensions of dreams, there are very short ones which contain only one picture or a few, one thought—yes, even one word only—others which are uncommonly rich in content, seem to dramatize whole novels and to last very long. There are dreams which are as plain as an experience itself, so plain that we do not recognize them as dreams for a long time after waking; others which are indescribably weak, shadowy and vague; indeed in one and the same dream, the overemphasized and the scarcely comprehensible, indefinite parts may alternate with each other. Dreams may be quite meaningful or at least coherent, yes, even witty, fantastically beautiful. Others, again, are confused, as if feeble-minded, absurd, often actually mad. There are dreams which leave us quite cold, others in which all the effects come to expression—pain deep enough for tears, fear strong enough to waken us, astonishment, delight, etc. Dreams are generally quickly forgotten upon waking, or they may hold over a day to such an extent as to be faintly and incompletely remembered in the evening. Others, for example, the dreams of childhood, are so well preserved that they stay in the memory thirty years later, like fresh experiences. Dreams, like individuals, may appear a single time, and never again, or they may repeat themselves unchanged in the same person, or with small variations. In short, this nightly psychic activity can avail itself of an enormous repertoire, can indeed compass everything which the psychic accomplishes by day, but yet the two are not the same.

还有其他共同特性吗？我找不到了，只在各处看到种种不同，这些梦境活动的明显长度、确定程度、感觉的参与程度、持久程度等等

都有所不同。这一切，其实不是我们所预期的一种针对刺激的强制性的、不可阻挡的、不由自主的防御行为。关于梦的规模，有的梦非常短，只有一个或几个图片、一个想法——是的，甚至会只有一个单词——有的梦则内容异常丰富，仿佛是要写小说，持续非常久。有的梦跟某种体验一样清晰，清晰到我们醒来很久后也不会意识到它们是梦境，还有一些梦不可言喻地微弱、朦胧和模糊。实际上，对于同一种梦，每个人印象强烈的、或很难理解的、或不确定的部分各有不同。梦可以是很有意义的，或至少是有条理的，嗯，甚至是有趣的、美轮美奂的。不过也有一些梦是含混的，像是愚昧的、荒谬的，实际上经常是疯狂的。有的梦会令人不寒而栗，有的会把所有的情绪体现出来——痛苦流泪，恐惧到使人惊醒，还有惊讶、愉快，等等。人一般在醒来后会很快忘记梦，或者可能一整个白天都记得，到晚上印象就变得依稀和不完整。其他的，比如说童年的梦被记得很牢，以致30年后还能留在记忆中，恍若昨日般地鲜活。梦就跟人一样，可能只出现一次后就永远消失，或是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反复出现，或是只有细微变化。简言之，这种夜间心理活动可以利用的素材有一大堆，实际上它也可以完成一切白天的心理活动，但是这两种活动并不一样。

One might try to give an account of this many-sidedness of the dream by assuming that it corresponds to different intermediate stages between sleeping and waking, different degrees of incomplete sleep. Yes, but in that case as the psyche nears the waking state, the conviction that it is a dream ought to increase along with the value, content and distinctiveness of the dream product, and it would not happen that immediately beside a distinct and sensible dream fragment a senseless and indistinct one would occur, to be followed again by a goodly piece of work. Surely the psyche could not change its degree of somnolence so quickly. This explanation thus avails us nothing; at any rate, it cannot be accepted offhand.

有人可能会为了说明梦的多面性，而假定从睡觉过渡到睡醒的不同阶段、非熟睡的程度等是梦的相关因素。对，但那种情况下，心理是接近清醒状态的，随着梦的产物的价值、内容和独特性不断提升，人们愈发知道自己在做梦；而且，不可能在一个清晰合理的梦境片段后马上出现一个无意义的、模糊的片段，跟着又出现一个好的片段。心灵肯定不可能如此快速变化自身的睡眠深浅。因而这个解释对我们无甚用处，至少，它无法轻易得到认可。

Let us, for the present, give up the idea of fi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dream and try instead to clear a path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ream by means of the elements common to all dreams. From the relation of dreams to the sleeping condition, we concluded that the dream is the reaction to a sleep-disturbing stimulus. As we have heard, this is the only point upon which exact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can come to our assistance; it gives us the information that stimuli applied during sleep appear in the dream. There have been many such investigations carried out, including that of the above mentioned Mourly Vold. Indeed, each of us must at some time have been in a position to confirm this conclusion by means of occasional personal observations. I shall choose certain older experiments for presentation. Maury had such experiments made on his own person. He was allowed to smell cologne while dreaming. He dreamed that he was in Cairo in the shop of Johann Marina Farina, and therewith were linked further extravagant adventures. Or, he was slightly pinched in the nape of the neck; he dreamed of having a mustard plaster applied, and of a doctor who had treated him in childhood. Or, a drop of water was poured on his forehead. He was then in Italy, perspired profusely, and drank the white wine of Orvieto.

我们暂时先搁置为梦寻找意义的念头，以梦的共同点为出发点，找到一条更好地理解梦的路径。由梦和睡眠状态的关系，我们得出结论，梦是对于搅扰睡眠的刺激的反应。就我们所知，这也是精确实验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的唯一一点，它告诉我们的信息是，睡眠时被施加的刺激出现在了梦中。许多有过这样的研究，包括上面提到的摩利·沃尔德。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时候，一定已经有机会通过个人偶然的观察，确认了这个结论。我会选一些较早的实验来讲解。莫里在自己身上做了这类实验。他做梦时，有人给他闻古龙水。他梦见自己在开罗的约翰·玛丽娜·法里纳香水店中，随之有了更多夸张的冒险经历。或者，他的后颈被轻轻掐了一下，他就梦见涂了芥末膏，还梦见在他童年时给他治疗过的一位医生。或者，在他额头上滴了一滴水，他就梦到自己在意大利大汗淋漓，喝了奥维多的白葡萄酒。

What strikes us about these experimentally induced dreams we may perhaps be able to comprehend still more clearly in another series of stimulated dreams. Three dreams have been recounted by a witty observer, Hildebrand, all of them reactions to the sound of the alarm clock:

听了这些实验诱导的梦境，我们突然想到，还有另一类受到刺激的梦境，对此我们也许可以理解得更为透彻。一位聪明的观察者希尔德布兰德叙述了三个梦，它们都是对闹钟声的反应。

> I go walking one spring morning and saunter through the green fields to a neighboring village. There I see the inhabitants in gala attire, their hymn books under their arms, going church-ward in great numbers. To be sure, this is Sunday, and the early morning service will soon begin. I decide

to attend, but since I am somewhat overheated, decide to cool off in the cemetery surrounding the church. While I am there reading several inscriptions, I hear the bell ringer ascend the tower, and now see the little village church bell which is to give the signal for the beginning of the service. The bell hangs a good bit longer, then it begins to swing, and suddenly its strokes sound clear and penetrating, so clear and penetrating that they make an end of—my sleep. The bell-strokes, however, come from my alarm clock.

“我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散步，悠闲地穿过绿草地，走向邻近的村子。在那里我看到盛装的居民夹着赞美诗集，成群地向教堂走去。实际上，这是礼拜天，晨祷马上要开始了。我决定参加，但是因为太热，就想在教堂周围的墓地凉快一下。当我在那里读一些碑文时，我听到敲钟人登上钟塔，现在我看到那个乡村小教堂的钟，它会在祷告前发出信号。钟悬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始摇晃，突然发出清楚、响亮的声音，太清楚太响亮了，以致它们终结了——我的睡眠。原来，敲钟的声音是从我的闹钟发出的。

A second combination. It is a clear winter day. The streets are piled high with snow. I agree to go on a sleighing party, but must wait a long time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comes that the sleigh is at the door. Then follow the preparations for getting in—the fur coat is put on, the footwarmer dragged forth—and finally I am seated in my place.

But the departure is still delayed until the reins give the waiting horses the tangible signal. Now they pull; the vigorously shaken bells begin their familiar Janizary music so powerfully that instantly the spider web of the dream is torn. Again it is nothing but the shrill tone of the alarm clock.

“第二种组合。这是一个明朗的冬日。街道上积雪很深。我答应去参加一个雪橇聚会，但是必须等很久，直到有人喊雪橇到了门口。然后我开始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穿上毛皮大衣，把暖脚包拖到前面，最后我总算就位了。但是出发时间还是延迟了会，直到待命马匹得到出发的明确信号。现在他们开始拉铃了，铃铛猛烈地摇起来，奏出熟悉的进行曲，声音非常响亮，梦网一下子就破碎了。还是一样，那不过是刺耳的闹钟声。

And still a third example. I see a kitchen maid walking along the corridor to the dining room with some dozens of plates piled high. The pillar of porcelain in her arms seems to me in danger of losing its balance. “Take care!” I warn her. “The whole load will fall to the ground.” Naturally, the inevitable retort follows: one is used to that, etc., and I still continue to follow the passing figure with apprehensive glances. Sure enough, at the threshold she stumbles—the brittle dishes fall and rattle and crash over the floor in a thousand pieces. But—the endless racket is not, as I soon notice, a real rattling, but really a ringing and with this

ringing, as the awakened subject now realizes, the alarm has performed its duty.

“还有第三个例子。我看见一个厨娘捧着高高的一摞盘子，沿着走廊去餐厅。她怀中堆成山的瓷器在我看起来摇摇欲坠。‘小心！’我警告她，‘这一摞会全掉到地上的。’当然，她不免回嘴说了“我习惯了”之类的话。我还是继续跟在她背后，不时紧张地看着。果然，她在门槛处绊了一跤，脆弱的盘子掉下来，叮铃哐啷砸成了一地的碎片。但是——我马上意识到，这个无休止的噪音并不真的是叮铃哐啷声，而实际上是铃声，这个铃声让惊醒过来的做梦人刚回过神来，闹钟已经行使了责任。”

These dreams are very pretty, quite meaningful, not at all incoherent, as dreams usually are. We will not object to them on that score. That which is common to them all is that the situation terminates each time in a noise, which one recognizes upon waking up as the sound of the alarm. Thus we see here how a dream originates, but also discover something else. The dream does not recognize the alarm—indeed the alarm does not appear in the dream—the dream replaces the alarm sound with another, it interprets the stimulus which interrupts the sleep, but interprets it each time in a different way. Why? There is no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t seems to be something arbitrary. But to understand the dream means to be able to say why it has chosen just this sound and no other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larm-clock stimulus. In quite analogous fashion, we must raise the objection to the Maury experiment that we see well enough that the stimulus appears in the dream, but that we do not discover why it appears in just this form;

and that the form taken by the dream does not seem to follow from the nature of the sleep-disturbing stimulus. Moreover, in the Maury experiments a mass of other dream material links itself to the direct stimulus product; as, for example, the extravagant adventures in the cologne dream, for which one can give no account.

这些梦境都不错，也挺有意义，不像平常那种散乱的梦。我们不否认这一点。所有这些梦的共同点在于，每一次梦境都终结于一个响声，那是做梦者醒来后意识到的闹钟声。这样，我们看到了一个梦如何产生，也发现了其他事情。人在梦中没有意识到闹钟声，实际上闹钟没有出现在梦中，梦把闹钟声替代为其他声音，它解释了打断睡眠的刺激，但每次的解释方法不一样。为什么？这个问题无从解答，它似乎是一种随机的东西。但要理解梦，意味着要知道为什么它选择这个声音而不是其他声音来解释闹钟声的刺激。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了其与莫里实验的不同之处，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那个刺激物出现在了梦中，但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只以这种形式出现，并且，被梦采用的这一形式似乎跟这个搅扰睡眠的刺激的特性对不上号。而且，在莫里的实验中，其他大量的梦境素材与这一直接的刺激产物相关，比如，在古龙水梦中的夸张冒险，对此我们也无从解释。

Now I shall ask you to consider the fact that the waking dreams offer by far the best chances for determining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sleep-disturbing stimuli. In most of the other cases it will be more difficult. One does not wake up in all dreams, and in the morning, when one remembers the dream of the night, how can one discover the disturbing stimulus which was perhaps in operation at night? I did succeed once in subsequently establishing such a sound stimulus, though naturally only in consequence of special circumstances. I woke up one morning in a place in the Tyrolese Mountains, with the certainty that I had dreamt the Pope had died.

I could not explain the dream, but then my wife asked me: “Did you hear the terrible bell ringing that broke out early this morning from all the churches and chapels?” No, I had heard nothing, my sleep is a sound one, but thanks to this information I understood my dream. How often may such stimuli incite the sleeper to dream without his knowing of them afterward? Perhaps often, perhaps infrequently; when the stimulus can no longer be traced, one cannot be convinced of its existence. Even without this fact we have given up evaluating the sleep disturbing stimuli, since we know that they can explain only a little bit of the dream, and not the whole dream reaction.

现在我请大家考虑一下这个事实：就目前看，醒来之前的梦为确定搅扰睡眠的外部刺激的影响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此外的大多案例都更难判断。人不是在所有梦中都醒来的，在早上，当人记起夜晚的梦时，怎么能知道那个发生在夜晚的刺激是什么呢？我确实有一次成功地确认了一个声音刺激，当然这只是特殊情况下的结果。一天早上我在蒂罗尔山区某处醒过来，确定自己梦到教皇去世了。我无法解释这个梦，但是接着我妻子问我：“你听到今天凌晨所有教堂和礼拜堂敲响的可怕钟声了吗？”不，我没有听到，我睡得很熟，但多亏了这个信息，我理解了我的梦。这样的刺激诱发睡眠者做梦，但他们事后意识不到这些刺激，这种情况的发生频率是怎样的？也许经常，也许不常发生。当该刺激再也无法追踪时，它的存在就无法确认了。即使没有这个事实，我们也放弃了评估搅扰睡眠的刺激，因为我们知道它们只能解释梦的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梦的反应。

But we need not give up this whole theory for that reason. In fact, it can be extended. It is clearly immaterial through what cause the sleep was disturbed and the psyche incited to dream. If the sensory stimulus is not always externally induced, it may be instead

a stimulus proceeding from the internal organs, a so-called somatic stimulus. This conjecture is obvious, and it corresponds to the most popular conception of the origin of dreams. Dreams come from the stomach, one often hears it said. Unfortunately it may be assumed here again that the cases are frequent in which the somatic stimulus which operated during the night can no longer be traced after waking, and has thus become unverifiable. But let us not overlook the fact that many recognized experiences testify to the derivation of dreams from the somatic stimulus. It is in general indubitable that the condition of the internal organs can influence the dream. The relation of many a dream content to a distention of the bladder or to an excited condition of the genital organs, is so clear that it cannot be mistaken. From these transparent cases one can proceed to others in which, from the content of the dream, at least a justifiable conjecture may be made that such somatic stimuli have been operative, inasmuch as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is content which may be conceived as elaboration, representati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imuli. The dream investigator Schirmer (1861) insisted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derivation of the dream from organic stimuli, and cited several splendid examples in proof. For example, in a dream he sees “two rows of beautiful boys with blonde hair and delicate complexions stand opposite each other in preparation for a fight, fall upon each other, seize each other, take up the old position again, and repeat the whole performance;” he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rows of boys as teeth is plausible in itself, and it seems to become convincing when after this scene the dreamer “pulls a long tooth out of his jaws.” The interpretation of “long, narrow, winding corridors” as intestinal stimuli, seems sound and confirms Schirmer's assertion that the dream above all seeks to represent the stimulus-producing organ by means of objects resembling it.

不过我们无需因此放弃整个理论。实际上，它是可以扩展的。显然，睡眠因何受到搅扰、心灵因何被诱导做梦，这些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该感官刺激不总是外部引发的，它也可以是从内部器官而来的刺激过程，即所谓躯体刺激。这种猜想显而易见，它与最大众化的梦的起源观是一致的。“梦自腹中来”，大家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不幸的是，我们也能在此推测，这些案例中经常出现的躯体刺激，它们只在夜间起作用，醒来后就不知去向了，这样的话它们就无法验证。但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许多被意识到的体验证明了梦来自躯体刺激。一般来说，毋庸置疑，内部器官的状况可以影响梦境。许多梦境内容与膀胱胀满、或是生殖器兴奋等之类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错不了。借助这些清楚的案例，我们再去看其他案例，起码能从梦的内容中得出一个合理猜想，即此类躯体刺激起了作用，因而这个梦的内容里有某些东西可以视作对刺激的详述、再现及解释。研究梦的专家席尔默在1861年特别强调了梦源自机体刺激的说法，引用了一些精彩例子做佐证。比如，他在一个梦中看见“两排金发嫩肤的美少年一对一面对站立准备搏斗，他们扑向对方，捉住对方，然后恢复原来的姿势，再重复整个表演。”这里把这两行少年解释成牙齿，本身是成立的；而这个场景接下来发生的事似乎更加有说服力，做梦者“从他的口中拔出了一颗长牙”。把“狭长弯曲的走道”解释为肠道刺激听起来很有道理，也确认了席尔默的断言，即梦归根结底是试图用形似的物体再现引发刺激的器官。

Thus we must be prepared to admit that the internal stimuli may play the same role in the dream as the external. Unfortunately, their evaluation is subject to the same difficulties as those we have already encountered. In a large number of cas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imuli as somatic remains uncertain and undemonstrable. Not all dreams, but only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m, arouse the suspicion that an internal organic stimulus was concerned in their causation. And finally, the internal stimuli will be as little able as the external sensory stimuli to explain any more of the dream than

pertains to the direct reaction to the stimuli. The origin, therefore, of the rest of the dream remains obscure.

如此，我们必须准备承认，内部刺激与外部刺激在梦中起到的作用可能是等同的。可惜的是，对它们的评价，也有着我们已经知道的同样缺陷。在大量的案例中，关于刺激是躯体性的解释仍然是不确定且无法证明的。并非所有的梦，只有某一部分梦的成因中可能涉及内部器官刺激。最后，内部刺激可能跟外部感官刺激一样，除了直接对刺激作出反应的部分之外，难以进一步解释梦的其他内容。因而，梦的其余部分的起因仍是模糊的。

Let us, however, notice a peculiarity of dream life which becomes apparent in the study of these effects of stimuli. The dream does not simply reproduce the stimulus, but it elaborates it, it plays upon it, places it in a sequence of relationships, replaces it with something else. That is a side of dream activity which must interest us because it may lead us closer to the nature of the dream. If one does something under stimulation, then this stimulation need not exhaust the act. Shakespeare's *Macbeth* , for example, is a drama creat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oronation of the King who for the first time wore upon his head the crown symbolizing the union of three countries. But does this historical occasion cover the content of the drama, does it explain its greatness and its riddle? Perhaps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stimuli, acting upon the sleeper, are only the incitors of the dream, of whose nature nothing is betrayed to us from our knowledge of that fact.

然而，我们要注意到做梦的一个特性，在研究刺激的效果时这一特性明显地表露出来。梦并非只是重现了该刺激，而是会详细描述

它、利用它、将它置于一系列关系中，以及将它替代为其他东西。我们一定会对做梦的这一面感兴趣，因为它也许会将我们引向梦的性质。人在刺激驱使下做了某事，但不意味着该刺激是该行动的全部意义。比如，莎士比亚的代表作《麦克白》是为首次统一三国并加冕的英王创作的。但这个历史事实涵盖了该剧的所有内容吗？它解释了该剧的伟大和奥妙吗？也许，施加于睡眠者的外部和内部刺激只是梦的诱导因素，从这个事实判断，我们对梦的性质一无所知。

The other element common to dreams, their psychic peculiarity, is on the one hand hard to comprehe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offers no point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 dreams we perceive a thing for the most part in visual forms. Can the stimuli furnish a solution for this fact? Is it actually the stimulus which we experience? Why, then, is the experience visual when optic stimulation incited the dream only in the rarest cases? Or can it be proved, when we dream speeches, that during sleep a conversation or sounds resembling it reached our ear? This possibility I venture decisively to reject.

梦的另一个共同点，即它们的心理特性，一方面难以理解，另一个方面没有继续深究的意义。我们在梦中的大部分时间以图像形式构想了某件事。刺激可以解释这个事实吗？它是我们体验到的刺激吗？那么，为什么这种体验是视觉性的？毕竟只有在极少的案例中，视觉刺激诱导了梦。或者，是否能够证明，我们梦见了人的言谈，是因为睡眠过程中有类似的谈话进入了我们耳中？我坚决反对这个可能性。

If, from the common elements of dreams, we get no further, then let us see what we can do with their differences. Dreams are often senseless, blurred, absurd; but there are some that are

meaningful, sober, sensible. Let us see if the latter, the sensible dreams, can give som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senseless ones. I will give you the most recent sensible dream which was told me, the dream of a young man: “I was promenading in Kärtner Street, met Mr. X. there, whom I accompanied for a bit, and then I went to a restaurant. Two ladies and a gentleman seated themselves at my table. I was annoyed at this at first, and would not look at them. Then I did look, and found that they were quite pretty.” The dreamer adds that the evening before the dream he had really been in Kärtner Street, which is his usual route, and that he had met Mr. X. there. The other portion of the dream is no direct reminiscence, but bears a certain resemblance to a previous experience. Or another meaningful dream, that of a lady. “Her husband asks, 'Doesn't the piano need tuning?' She: 'It is not worth while; it has to be newly lined.'” This dream reproduces without much alteration a conversation which took place the day before between herself and her husband.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se two sober dreams? Nothing but that you find them to be reproductions of daily life or ideas connected therewith. This would at least be something if it could be stated of all dreams. There is no question, however, that this applies to only a minority of dreams. In most dreams there is no sign of any connection with the previous day, and no light is thereby cast on the senseless and absurd dream. We know only that we have struck a new problem. We wish to know not only what it is that the dream says, but when, as in our examples, the dream speaks plainly, we also wish to know why and wherefore this recent experience is repeated in the dream.

如果我们从梦的共同点中得不到进一步的启发，就要来看看它们的不同点有何帮助。梦常常是无意义的、模糊的、荒谬的，但有些梦是有意义的、清醒的、合理的。我们来看看后者，这些合理的梦是不

是能为无意义的梦提供些线索。我举一个最近刚听到的合理的梦的例子，是一个年轻人的梦：“我在卡特纳大街兜风，在那儿遇到了X先生，跟他一起玩了一会儿，然后去了饭馆。有两位女士和一位先生坐到了我这一桌。我一开始有点生气，看都不想看他们。后来我看了看，发现他们都很漂亮。”做梦者补充说，做梦前那天晚上他确实在卡特纳大街，那是他的通常路线，他是在那儿遇到了X先生。这个梦的其他部分不是当天的事情，但与一个从前的经历类似。另一个有意义的梦，是一位女士的。“她丈夫问：‘钢琴不是要调音吗？’她说：‘不值得，必须要换新的衬皮了。’”这个梦并无过多修改地重现了前一天她与丈夫之间发生的对话。从这两个清醒的梦可以看出什么？唯一的发现是：梦是与日常生活或想法相关的重现。如果这可以用于形容所有的梦，至少有点价值。但是毫无疑问，这只适用于少数的梦。大多数梦没有与前一天经历相关的迹象，因而也无法给研究无意义和荒谬的梦带来启发。我们只知道，我们触及到了一个新问题。我们不仅想知道梦说明了什么，梦在什么时候是坦白表达的（像那些例子一样），我们还想知道，究竟为什么这个最近的经历在梦中重现了。

I believe you are as tired as I am of continuing attempts like these. We see, after all, that the greatest interest in a problem is inadequate if one does not know a path which will lead to a solution. Up to this point we have not found this path.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ave us nothing but a few very valuable pieces of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meaning of stimuli as dream incitors. We need expect nothing from philosophy except that lately it has taken haughtily to pointing out to us the intellectual inferiority of our object. Let us not apply to the occult sciences for help. History and popular tradition tell us that the dream is meaningful and significant; it sees into the future. Yet that is hard to accept and surely not demonstrable. Thus our first efforts end in entire helplessness.

要是这么无休止地追问下去，怕是大家和我都要厌倦了。毕竟我们都明白，如果不知道解决问题的路径，对一个问题兴趣再大也是不够的。我们至今没有找对路径。关于用刺激诱导梦这种行为的意义，实验心理学只给了我们几条颇有价值的信息。我们也不必对哲学有何指望，近来它很爱倨傲地指摘我们的课题是卑微的学问。我们也不要转而求助于神秘学。历史和大众风俗告诉我们，梦是有意义的、重要的，它预示了未来。但这很难令人接受，当然也无法证明。这样我们一开始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Unexpectedly we get a hint from a quarter toward which we have not yet looked. Colloquial usage—which after all is not an accidental thing but the remnant of ancient knowledge, though it should not be made use of without caution—our speech, that is to say, recognizes something which curiously enough it calls “day dreaming.” Day dreams are phantasies. They are very common phenomena, again observable in the normal as well as in the sick, and access to their study is open to everyone in his own person. The most conspicuous feature about these phantastic productions is that they have received the name “day dreams,” for they share neither of the two common elements of dreams. Their name contradicts the relation to the sleeping condition, and as regards the second common element, one does not experience or hallucinate anything, one only imagines it. One knows that it is a phantasy, that one is not seeing but thinking the thing. These day dreams appear in the period before puberty, often as early as the last years of childhood, continue into the years of maturity, are then either given up or retained through life. The content of these phantasies is dominated by very transparent motives. They are scenes and events in which the egoistic, ambitious and power-seeking desires of the individual find satisfaction. With young men the ambition phantasies generally prevail; in women, the erotic, since they have banked their

ambition on success in love. But often enough the erotic desire appears in the background with men too; all the heroic deeds and incidents are after all meant only to win the admiration and favor of women. Otherwise these day dreams are very manifold and undergo changing fates. They are either, each in turn, abandoned after a short time and replaced by a new one, or they are retained, spun out into long stories, and adapted to changes in daily circumstances. They move with the time, so to speak, and receive from it a “time mark” which testifies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situation. They are the raw material of poetic production, for out of his day dreams the poet, with certain transformations, disguises and omissions, makes the situations which he puts into his novels, romances and dramas. The hero of the day dreams, however, is always the individual himself, either directly or by means of a transparent identification with another.

意外的是，我们从一个尚未涉及的领域中得到了提示，那就是俗语用法。这到底不是个偶然事物，而是先人知识的传承，不过应该小心对待它，也就是说，我们的话语认可了某一事物，将其称为“白日梦”，这很令人称奇。白日梦是幻想。它们是常见现象，在正常人和病人身上一样都能观察到，对它们的研究是每个人自己都能做到的。这些幻想产物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之所以被称为“白日梦”是因为它们不具备梦的两个共同点。它们的名字与睡眠这个前提条件相矛盾；至于第二个共同点，白日梦不是一种体验或幻觉，而是一种想象。人们知道那是一种幻想，不是看见了、而是想象着这件事。这些白日梦出现在青春期前的阶段，也常早早出现在童年的最后几年，并延续到成年时期，然后或被放弃，或贯穿一生。这些幻想的内容受制于明显的动机。它们是一些场景和事件，用于个人私心、野心或是权利欲的自我满足。年轻男子一般盛行野心幻想，而女性则以情色幻想为主，因为她们的野心在于恋爱成功。但在男性幻想中也常常会出现情色幻想，所有英雄事迹归根到底是为了赢得女人的敬仰和青睐。另外，这

些白日梦非常多样，命运也各有不同。它们或者很快就被逐一抛弃，被新的幻想替代，或者它们得以存留，被扩充为长篇故事，而且能随着日常情况不同而改变。它们可谓是与时俱进，带有“时光印记”，印证了新情况的影响力。它们是诗意作品的原始素材，因为作家可以对他们的白日梦进行修改、润色和删减，将这些幻想写进小说、爱情故事和剧本中。不过，白日梦的主角永远是本人，或是直接出现，或是通过特征鲜明的人物指代自己。

Perhaps day dreams bear this name because of the similarity of their relation to reality, in order to indicate that their content is as little to be taken for real as that of dreams. Perhaps, however, this identity of names does nevertheless rest on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dream which is still unknown to us, perhaps even one of tho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we are seeking. It is possible, on the other hand, that we are wrong in trying to read a meaning into this similarity of designation. Yet that can only be cleared up later.

也许，白日梦有此名字是因为它们之于现实的关系与梦之于现实的关系是近似的，以此暗示它们的内容与梦一样都不能当真。不过，这种名称共性可能会指向梦的某个特点，这一点我们还不清楚，也许它甚至可以是我们寻求的特点之一。另一方面，我们刻意解读这一命名类似性的意义，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不过这就留待以后澄清吧。

[1_1].Josef Breuer, in the years 1880–1882. Cf. Also m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deliv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09.

[2_1].约瑟夫·布罗伊尔（Josef Breuer），于1880–1882年间。也参看我于1909年在美国的精神分析讲座。

Sixth Lecture　Hypothesis and Technique of Interpretation

第六讲　梦的假说及释梦技巧

We must find a new path, a new method, in order to proceed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dream. I shall now make an obvious suggestion. Let us assume as a hypothesis for everything which follows, that *the dream is not a somatic but a psychic phenomenon* . You appreci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at statement, but what justification have we for making it? None; but that alone need not deter us from making it. The matter stands thus: If the dream is a somatic phenomenon, it does not concern us. It can be of interest to us only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it is a *psychic* phenomenon. Let us therefore work upon that assumption in order to see what comes of it. The result of our labor will determine whether we are to hold to this assumption and whether we may, in fact, consider it in turn a result. What is it that we really wish to achieve, to what end are we working? It is what one usually seeks to attain in the sciences, an understanding of phenomena, the creation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and ultimately, if possible, the extension of our control over them.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研究梦的新路径、新方法。这里我明确提一个建议。设定一个假说作为一切的前提，即：梦不是躯体现象，而是心理现象。 大家明白这个说法的意义，但是我们作此判断的正当理由何在？没有，不过单单这点也无法阻止我们作出这样的假定。问题是这样：如果梦是一种躯体现象，那它就与我们无关。只有假设它是一个心理 现象，它才能成为我们的关注点。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假定，看看会有何成果。我们努力的结果，将决定我们是否需要坚持这

个假定，还是实际上转而将其视为最终结论。我们希望达成什么目标，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就像人们通常希望从各类科学中获取的东西一样，我们的目标是去理解现象、确立现象间的关系，最终，如果可能，增强我们控制现象的能力。

Let us then proceed with the work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dream is a psychic phenomenon. This makes it an achievement and expression of the dreamer, but one that tells us nothing, one that we do not understand. What do you do when I make a statement you do not understand? You ask for an explanation, do you not? Why may we not do the same thing here, *ask the dreamer to give us the meaning of his dream* ?

我们来开始研究“梦是一种心理现象”这一假设。它让梦成为了做梦者的成绩和表达，而我们却无法从中得到信息，不能理解它。当我提出一个你不理解的说法时，你会怎么做？你会要求解释，不是吗？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效仿，要求做梦者告诉我们梦的意义？

If you will remember, we were in this same situation once before. It was when we were investigating errors, a case of a slip of the tongue. Someone said: “*Da sind dinge zum vorschwein gekommen* ,” whereupon we asked—no, luckily, not we, but others, persons in no way associated with psychoanalysis—these persons asked him what he meant by this unintelligible talk. He immediately answered that he had intended to say “*Das waren schweinereien* ,” but that he had suppressed this intention, in favor of the other, more gentle “*Da sind dinge zum vorschein gekommen* .“ [2_1] I explained to you at the time that this inquiry was typical of every psychoanalytical investigation, and now you understand that psychoanalysis follows

the technique, as far as possible, of having the subjects themselves discover the solutions of their riddles. The dreamer himself, then, is to tell us the meaning of his dream.

大家可能记忆犹新，我们之前曾经经历过同样的情况。那是我们研究过失时，关于口误的一个案例。某人说：“有些事情暴废了 。”我们于是问——不，巧的是，不用我们，已经有别人，一些与精神分析完全无关的人替我们问了，这些人问他，他说的这段话让人摸不着头脑，到底是什么意思。他马上回答说他本想说“这些事很污秽 ”，可是他压抑了这个念头，换成一个语气较缓和的说法“有些事情暴露了 ”。[3_1] 我当时跟大家解释说，这种询问是精神分析研究的典型做法，现在大家理解了，精神分析要尽可能遵循这个技巧，即让当事人自己发现解谜的答案。那么，做梦者将自己讲出他们的梦的意义。

It is common knowledge, however, that this is not such an easy matter with dreams. In the case of slips, our method worked in a number of cases, but we encountered some where the subject did not wish to say anything—in fact, indignantly rejected the answer that we suggested. Instances of the first method are entirely lacking in the case of dreams; the dreamer always says he knows nothing. He cannot deny our interpretation, for we have none. Shall we then give up the attempt? Since he knows nothing and we know nothing and a third person surely knows nothing, it looks as though there were no possibility of discovering anything. If you wish, discontinue the investigation. But if you are of another mind, you can accompany me on the way. For I assure you, it is very possible, in fact, probable, that the dreamer does know what his dream means, but does *not know that he knows, and therefore believes he does not know* .

不过大家都明白，梦没有这么简单。在过失的研究中，我们的方法对很多案例都管用，但我们也遇到过当事人不愿意说话的例子（实际上是恼怒地否认了我们暗示的答案）。因为做梦者总会说自己一无所知，所以第一种方法的例子是完全没有的。他们不能否认我们的解释，因为我们没有解释。那我们是不是要放弃尝试呢？既然他们一无所知，我们也一无所知，其他第三人肯定也一无所知，似乎没有发现任何东西的可能性。大家愿意的话，可以中断这个研究。但是大家如果想法不同，可以再陪我走一程。因为我保证，做梦者很可能，事实上大有可能是知道他们的梦的意义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因而认为自己不知道。

You will point out to me that I am again making an assumption, the second in this short discourse, and that I am greatly reducing the credibility of my claim.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dream is a psychic phenomenon, on the further assumption that there are unconscious things in man which he knows without knowing that he knows, etc.—we need only realize clearly the intrinsic improbability of each of these two assumptions, and we shall calmly turn our attention from the conclusions to be derived from such premises.

大家会跟我提出来，我又在作一个假定，这么短的讲课里已经作了两个假定，我观点的可信度要大打折扣了。关于“梦是心理现象”的假设，关于“人身上有些未察觉的事情，他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进一步假设，等等，只要清楚知道这两个假设本质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就大可平静地漠视从这些前提得出的结论了。

Yet, ladies and gentlemen, I have not invited you here to delude you or to conceal anything from you. I did, indeed,

announce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 but I did not intend the title to convey that I was an oracle, who would show you a finished product with all the difficulties carefully concealed, all the gaps filled in and all the doubts glossed over, so that you might peacefully believe you had learned something new. No, precisely because you are beginners, I wanted to show you our science as it is, with all its hills and pitfalls, demand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I know that it is the same in all sciences, and must be so in their beginnings particularly. I know, too, that teaching as a rule endeavors to hide these difficulties and these incompletely developed phases from the student. But that will not do in psychoanalysis. I have, as a matter of fact, made two assumptions, one within the other, and he who finds the whole too troublesome and too uncertain or is accustomed to greater security or more elegant derivations, need go no further with us. What I mean is, he should leav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entirely alone, for it must be apprehended that he will not find the sure and safe way he is prepared to go, traversable. Then, too, it is superfluous for a science that has something to offer to plead for auditors and adherents. Its results must create its atmosphere, and it must then bide its time until these have attracted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然而，女士们、先生们，我邀请大家来此听课，并不想欺骗大家、或对大家有所隐瞒。是的，我的确宣称要讲《精神分析引论》，但我无意用此名号自诩为圣人，传授大家现成答案，而悉心隐藏所有困难，填补所有漏洞，掩饰所有疑问，这样大家就可以安然相信自己学到了新知识。不，正因为大家是初学者，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学科的真相，它所有的成败得失、要求和顾虑。因为我知道这对于所有学科都一样，尤其是在入门学习时。我也知道，一般教学课程都会试图向学生隐瞒这些困难和不成熟的阶段。但这在精神分析课上不管用。我事实上已经作了两个假设，其中一个蕴于另一个之中。如果有人认为

整个过程太麻烦、太不确定，或是习惯于更安全或更缜密的推导，那就不必继续与我们同行了。我的意思是，他们应该抛下所有心理学的问题，因为他们必须认识到，他们打算遵循的确定且安全的可行方法是找不到的。因此，一门学科如想有所成就，乞求聆听和支持实乃多此一举。它的成果必然会为自己造势，假以时日，它一定会引起关注。

I would warn those of you, however, who care to continue, that my two assumptions are not of equal worth. The first, that the dream is a psychic phenomenon, is the assumption we wish to prove by the results of our work. The other has already been proved in another field, and I take the liberty only of transferring it from that field to our problem.

不过我要提醒愿意继续的人，我的两个假设并不同等重要。第一个“梦是一种心理现象”的假设，是我们希望用研究结果证明的。另一个假设则已经在另一领域得到了证实，我只是自作主张地将它从那个领域搬到了我们的问题上。

Where, in what field of observation shall we seek the proof that there is in man a knowledge of which he is not conscious, as we here wish to assume in the case of the dreamer? That would be a remarkable, a surprising fact, one which would chang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sychic life, and which would have no need to hide itself. To name it would be to destroy it, and yet it pretends to be something real,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Nor does it hide itself. It is no result of the fact itself that we are ignorant of its existence and have not troubled sufficiently about it. That is just as little our fault as the fact that all thes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re

condemned by persons who have kept away from all observations and experiments which are decisive in this respect.

我们应从何处着手研究，去证明人拥有其未觉察的认知（正如我们希望对做梦者所做的假定）？这会是一个了不起的、惊人的事实，一个会改变我们对心理生活认知的事实，它无需遮遮掩掩。而将它指出来，又可能会毁了它，可它外表上看像个真理，总之这个说法是矛盾对立的。它也不会自己藏起来，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也没有费心去想它，这怪不了它。这也不是我们的错，因为所有这些心理问题被一些人抛弃了，因为他们不愿意从事这方面的决定性研究实验。

The proof appeared in the field of hypnotic phenomena. When, in the year 1889, I was a witness to the extraordinarily enlightening demonstrations of Siebault and Bernheim in Nancy, I witnessed also the following experiment: If one placed a man in the somnambulistic state, allowed him to have all manner of hallucinatory experience, and then woke him up, it appear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at he knew nothing about what had happened during his hypnotic sleep. Bernheim then directly invited him to relate what had happened to him during the hypnosis. He maintained he was unable to recall anything. But Bernheim insisted, he persisted, he assured him he did know, that he must recall, and, incredible though it may seem, the man wavered, began to rack his memory, recalled in a shadowy way first one of the suggested experiences, then another; the recollection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ete and finally was brought forth without a gap. The fact that he had this knowledge finally, and that he had had no experiences from any other source in the meantime, permits the conclusion that he knew of these recollections in the beginning. They were merely inaccessible, he did not know that he knew them; he believed he

did not know them. This is exactly what we suspect in the dreamer.

这一事实的证据是在催眠现象中发现的。1889年，我在法国南希市见证了西博和伯恩海姆两位的极具启发性的演示论证，也见证了以下的实验：让某人进入催眠状态，令他体验各种幻觉，然后唤醒他。刚开始他不知道自己催眠中发生了什么，接着，伯恩海姆直接请他描述催眠中发生的事情。他仍声称自己记不得任何事情。但是伯恩海姆坚持问他并坚称，他肯定是知道的，他一定会想起来。然后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人动摇了，开始用力地回忆，依稀记起被诱导体验中的第一个，然后又一个。他的回忆越来越完整，最终严丝合缝地呈现了出来。他最终有了这个认知，而且他当时没有其他渠道可以获取这些记忆，这个事实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他一开始就有这些体验的记忆。它们只是无法获取，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知道它们，他认为自己不知道它们。这也是我们对做梦者的揣测。

I trust you are taken by surprise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fact, and that you will ask me why I did not refer to this proof before in the case of the slips, where we credited the man who made a mistake in speech with intentions he knew nothing about and which he denied. “If a person believes he knows nothing concerning experiences, the memory of which, however, he retains,” you might say, “it is no longer so improbable that there are also other psychic experiences within him of whose existence he is ignorant. This argument would have impressed us and advanced u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errors.” To be sure, I might then have referred to this but I reserved it for another place, where it was more necessary. Errors have in a measure explained themselves, have, in part, furnished us with the warning that we must assume the existence of psychic processes of which we know nothing, for the sake of the connection of the phenomena. In dreams we are

compelled to look to other sources for explanations; and besides, I count on the fact that you will permit the inference I draw from hypnotism more readily in this instance. The condition in which we make mistakes most seems to you to be the normal one. It has no similarity to the hypnotic.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cl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ypnotic state and sleep, which is the essential condition of dreams. Hypnotism is known as artificial sleep; we say to the person whom we hypnotize, “Sleep,” and the suggestions which we throw out are comparable to the dreams of natural sleep. The psychical conditions are in both cases really analogous. In natural sleep we withdraw our attention from the entire outside world; in the hypnotic,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whole worl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one person who has hypnotized us, with whom we remain in touch. Furthermore, the so-called nurse's sleep in which the nurse remains in touch with the child, and can be waked only by him, is a normal counterpart of hypnotism. The transference of one of the conditions of hypnotism to natural sleep does not appear to be such a daring proceeding. The inferential assumption that there is also present in the case of the dreamer a knowledge of his dream, a knowledge which is so inaccessible that he does not believe it himself, does not seem to be made out of whole cloth. Let us note that at this point there appears a thir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dream; from the sleep-disturbing stimuli, from the day-dreams, and now in addition, from the suggested dreams of the hypnotic state.

相信大家会因这个事实而惊讶不已，会问我为什么不在以前的过失案例中指出这个证据，我们当时对一个在祝酒词中犯了口误的人指出了他自己不知道的意向，而他对此矢口否认。“如果某人认为自己对有关体验一无所知，而体验的记忆依然保留着，”大家会说，“那么他不知道自己其他心理体验也并非不可能了。这个论据会令我们印象

深刻，从而促进我们对于过失的理解。”老实说，我当时是可以提出这个证据，但是我想将它留作他用，用在更有必要的地方。某种程度上，过失已经作了自我解释，并且给了我们一个提醒：为了找到现象的联系，我们必须假定未知心理过程的存在。对于梦，我们则被迫从其他地方寻求解答，而且我觉得你们在这里的情况下，会更容易接受我引用的催眠的推论。犯错时的状态对大家而言多是正常的，它与催眠的状态毫无相似性。另一方面，催眠状态和睡眠的共同点很清楚，而睡眠是梦的必要条件。催眠状态被认为是人造睡眠，我们对被催眠者说：“睡吧。”我们抛出的暗示与自然睡眠的梦境是可比的。两种睡眠的心理条件很有可比性。在自然睡眠中，我们不再关心整个外界；而在催眠状态中，我们也不再关心整个外界，只有催眠我们的人除外，他们与我们保持联系。此外还有所谓的育儿式睡眠，育儿者与孩子保持联系，只能被孩子唤醒，这也是一种等同于催眠的正常睡眠。催眠和自然睡眠的条件是互通的，这个认定不算很鲁莽。由此推断，做梦者也有关于自己梦的认知，但他们无法获得这个认知，以至于他们自己不信有此认知，这样的假定也不像是凭空捏造的。请注意，在这里出现了研究梦的第三种方法，前两种是通过搅扰睡眠的刺激，通过白日梦，而现在是通过催眠状态中的诱导梦境。

Now we return, perhaps with increased faith, to our problem. Apparently it is very probable that the dreamer knows of his dream; the question is, how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him to discover this knowledge, and to impart it to us? We do not demand that he give us the meaning of his dream at once, but he will be able to discover its origin, the thought and sphere of interest from which it springs. In the case of the errors, you will remember, the man was asked how he happened to use the wrong word, “*vorschwein* ,” and his next idea gave us the explanation. Our dream technique is very simple, an imitation of this example. We again ask how the subject happened to have the dream, and his next statement is again to be taken as an explanation. We disregard the distinction whether the

dreamer believes or does not believe he knows, and treat both cases in the same way.

现在我们也许会更加自信地回头看我们的问题。显然，做梦者很可能了解自己的梦，问题是，如何使得他们有可能发觉自己的认知，并将它讲述给我们？我们不会要求他们立刻说明梦的意义，但他们将能够发现其根源，发现它引发的想法及关注范围。大家应该记得在过失的案例中，有个人被问到怎么说了一个错误单词“暴废 ”，他接下来的想法就给了我们解答。我们的释梦技巧很简单，就是模拟这个例子。我们也会问当事人怎么会突然做了这个梦，他接下来的说法也会被视为一个解释。我们不去考虑做梦者自认为自己知道与否，一视同仁地对待两种情况。

This technique is very simple indeed, but I am afraid it will arouse your sharpest opposition. You will say, “a new assumption. The third! And the most improbable of all! If I ask the dreamer what he considers the explanation of his dream to be, his very next association is to be the desired explanation? But it may be he thinks of nothing at all, or his next thought may be anything at all. We cannot understand upon what we can base such anticipation. This, really, is putting too much faith in a situation where a slightly more critical attitude would be more suitable. Furthermore, a dream is not an isolated error, but consists of many elements. To which idea should we pin our faith?”

这个技巧实际上很简单，但我担心会引起大家的强烈反对。大家会说：“又是一个假定。第三个了！而且还是最不靠谱的！如果我询问做梦者对自己梦的解释，他们紧接下来的联想就是理想的解释吗？可是他们也许根本想不起来，或者他们接下来想的可能是其他任何事

情。我们不能理解这种预想的理由。说真的，这种情境假设太过自信了，用稍微批判些的态度会更合适。而且，梦不同于一种孤立的过失，它包含了很多元素。我们该相信哪一种想法啊？”

You are right in all the non-essentials. A dream must indeed be distinguished from a word slip, even in the number of its elements. The technique is compelled to consider this very carefully. Let me suggest that we separate the dream into its elements, and carry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each element separately; then the analogy to the word-slip is again set up. You are also correct when you say that in answer to the separate dream elements no association may occur to the dreamer. There are cases in which we accept this answer, and later you will hear what those cases are. They are, oddly enough, cases in which we ourselves may have certain associations. But in general we shall contradict the dreamer when he maintains he has no associations. We shall insist that he must have some association and—we shall be justified. He will bring forth some association, any one,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o us. He will be especially facile with certain information which might be designated as historical. He will say, “that is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yesterday” (as in the two “prosaic” dreams with which we are acquainted); or, “that reminds me of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recently,” and in this manner we shall notice that the act of associating the dreams with recent impressions is much more frequent than we had at first supposed. Finally, the dreamer will remember occurrences more remote from the dream, and ultimately even events in the far past.

大家在一些非关键问题上都说对了。梦确实一定要与口误区分开来，甚至要区分它们所含元素的多寡。释梦技巧必须十分谨慎地考虑这一点。我建议，我们将梦细分成元素，分别对每个元素进行研究，

然后它与口误的类比才成立。大家认为，让做梦者回答梦的单一元素，他们可能不会产生联想，这也是对的。在有些案例中，我们是接受这个回答的，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案例。说来奇怪，它们正是那些我们自己可能有些联想的案例。但是，如果做梦者坚称自己没有联想，我们一般会反驳他们，我们会坚持认为他们一定有些联想，而且——我们应该是正确的。他们会提出某些联想，随便什么，这对我们没有差别。他们会特别容易想到一些可称为往昔的情况。他们会说："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两个"如实的"梦）或者："这让我想到最近发生的某件事。"如此，我们应该会注意到，将梦与近期事件的印象联想起来的行为，比我们起初预想的要频繁得多。最后，做梦者会回忆起离梦较久远的事情，甚至最终想起了发生在遥远过去的事件。

But in the essential matters you are mistaken. If you believe that we assume arbitrarily that the dreamer's next association will disclose just what we are seeking, or must lead to it, that on the contrary the association is just as likely to be entirely inconsequential, and without any connection with what we are seeking, and that it is an example of my unbounded optimism to expect anything else, then you are greatly mistaken. I have already taken the liberty of pointing out that in each one of you there is a deep-rooted belief in psychic freedom and volition, a belief which is absolutely unscientific, and which must capitulate before the claims of a determinism that controls even the psychic life. I beg of you to accept it as a fact that only this one association will occur to the person questioned. But I do not put one belief in opposition to another. It can be proved that the association, which the subject produces, is not voluntary, is not indeterminable, not unconnected with what we seek. Indeed, I discovered long ago—without, however, laying too much stress on the discovery—that eve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as brought forth this evidence.

但是大家在关键问题上的看法是错的。如果大家认为我们只是武断地假设做梦者随后的联想就会揭晓答案，或一定会引出答案，而且认为联想很可能完全不重要，与我们寻求的答案毫无关联，只是印证了我指望发现其他事情的盲目乐观，那大家就大错特错了。我已经冒昧地指出了，在座每位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心理自由和自主，这个观念是绝对不科学的，它在心理生活受控决定论的主张面前势必要缴械投降。我恳求各位接受这样的事实：被询问者只会产生这个联想。不过，我提出一个信念不是为了反对另一个信念。可以证明，当事人产生的该联想并非是随意的，并非不能确定，而且并非是跟我们寻求的答案毫无关系的。事实上，我很早就发现了，连实验心理学都提出了该证据，只不过我并没有过分强调我这个发现。

I ask you to give your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ubject. If I invite a person to tell me what occurs to him in relation to some certain element of his dream I am asking him to abandon himself to free association, *controlled by a given premise* . This demands a special delimitation of the attention, quite different from cogitation, in fact, exclusive of cogitation. Many persons put themselves into such a state easily; others show an extraordinarily high degree of clumsiness. 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free association again, where I omit this original premise and designate only the manner of the association, e.g., rule that the subject freely give a proper name or a number. Such an association would be more voluntary, more indeterminable, than the one called forth by our technique. But it can be shown that it is strongly determined each time by an important inner mental set which, at the moment at which it is active, is unknown to us, just as unknown as the disturbing tendencies in the case of errors and the provocative tendencies in the case of accidental occurrences.

我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课题的意义。如果我请一个人告诉我，有关他们梦中的某个元素他们想到了什么，我是在请他们在已知前提的限制下 ，尽情地自由联想。这需要对关注点进行特别界定，它与认真思考大不相同，实际上要排除认真思考。很多人可以轻易进入这种状态，其他人则表现得特别迟钝。不过有比这个程度更自由的联想，就是去除这个原先的前提，只要求进行联想。比如，要求实验对象随意给出一个专有名词或数字。这样的联想比起用我们的技巧诱导的联想，可能会更随意、更不确定。但事实表明，每一次联想都牢牢受制于一个重要的内在心理定势，这是一个当时活跃的、为我们所不知的心理定势，就跟在过失里的干扰性倾向和偶然现象里的刺激性倾向一样未知。

I, and many others after me, have again and again instigated such investigations for names and numbers which occur to the subject without any restraint, and have published some results. The method is the following: Proceeding from the disclosed names, we awaken continuous associations which then are no longer entirely free, but rather are limited as are the associations to the dream elements, and this is true until the impulse is exhausted. By that time, however, the motiv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ree name associations is explained. The investigations always yield the same results, the information often covers a wealth of material and necessitates lengthy elaboration. The associations to freely appearing numbers are perhaps the most significant. They follow one another so quickly and approach a hidden goal with such inconceivable certainty, that it is really startling. I want to give you an example of such a name analysis, one that, happily, involves very little material.

我和我的不少追随者，已经再三地对当事人不设限地联想名字和

数字进行了调查研究，也发布了一些结果。方法如下：从说出来的名字着手，我们进一步引导联想，这些联想不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受到限制了，就跟梦元素的相关联想一样，并且直到联想枯竭前都是如此。但是到那时候，这些自由的名字联想的动机和意义都得到了解释。这些调查研究总会得出相同结果，获得的信息常常内涵丰富，使得我们有必要进行细化分析。随意出现的数字联想也许是最有意义的。它们如此之快地相继出现，以如此不可思议的确定性接近一个隐形的目标，这实在是令人吃惊。我想给大家举一个关于这种名字分析的例子，一个侥幸没有太多内容的例子。

In the course of my treatment of a young man, I referred to this subject and mentioned the fact that despite the apparent volition it is impossible to have a name occur which does not appear to be limited by the immediate conditions,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subject, and the momentary situation. He was doubtful, and I proposed that he make such an attempt immediately. I know he has especially numerous relations of every sort with women and girls, and so am of the opinion that he will have an unusually wide choice if he happens to think of a woman's name. He agrees. To my astonishment, and perhaps even more to his, no avalanche of women's names descends upon my head, but he is silent for a time, and then admits that a single name has occurred to him—and no other: *Albino* . How extraordinary, but what associations have you with this name? How many albinoes do you know? Strangely enough, he knew no albinoes, and there were no further associations with the name. One might conclude the analysis had proved a failure; but no—it was already complete; no further association was necessary. The man himself had unusually light coloring. In our talks during the cure I had frequently called him an albino in fun. We were at the time occupied in determining the feminin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nature. He himself was the Albino,

who at that moment was to him the most interesting feminine person.

我在治疗一位年轻男子的过程中，谈到这个话题并且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尽管人有明显的意志，但不可能不受周围环境、当事人个性特点和瞬间状态的影响而随意想到一个名字。他表示怀疑，我提议他马上做一次这样的尝试。我知道他认识形形色色的女人和女孩子，因而相信他在随意想出女性名字时选择会很宽。他答应了。让我惊讶、也许他甚至更惊讶的是，我并没有被排山倒海的女人名字淹没，他沉默了一会，然后承认说他只想到了一个名字，除此无他：阿尔比诺（Albino，也有白化人之意）。这太不同寻常了，你对这个名字有什么联想？你认识多少白化人？说来也怪，他从没认识过一个白化人，而且对这个名字也没有更多联想。有人也许会下结论说，这个分析结果失败了，不是的——它已经完成了，不必进行进一步联想了。这位男子自己的肤色非常之浅。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聊天时我经常调侃地叫他做白化人。我们当时都执迷于认定他个性中沾花惹草的特点了。他自己就是阿尔比诺，对他来说这就是他当时最感兴趣的女性。

In like manner, melodies, which come for no reason, show themselves conditioned by and associated with a train of thought which has a right to occupy one, yet of whose activity one is unconscious. It is easily demonstrable that the attraction to the melody is associated with the text, or its origin. But I must take the precaution not to include in this assertion really musical people, with whom, as it happens, I have had no experience. In their cases the musical meaning of the melody may have occasioned its occurrence. More often the first reason holds. I know of a young man who for a time was actually haunted by the really charming melody of the song of Paris, from *The Beautiful Helen* , until the analysis brought to his attention the fact that at that time his

interest was divided between an Ida and a Helen.

类似的事物还有，像没来由地冒出来的旋律，表明它们受到一连串想法的制约，与它们相关联。当事人虽然有这些想法，但却对它们的存在浑然不知。引出旋律的原因与歌词或其来源相关，这易于证明。但必须警惕的是，我不能将这个论点适用于真正的音乐人，我恰好对他们没有任何经验。在他们的情况中，旋律的音乐意义可能就是引发它的原因。不过更常见的还是前面的原因。我认识一位年轻男子，有段时间，一首叫《美丽的海伦》的巴黎歌曲的迷人曲调总在他脑中挥之不去，直到他听到分析说，那段时间他正同时喜欢一位艾达和一位海伦。

If then the entirely unrestrained associations are conditioned in such a manner and are arranged in a distinct order, we are justified in concluding that associations with a single condition, that of an original premise, or starting point, may be conditioned to no less degree. The investigation does in fact show that aside from the conditioning which we have established by the premise, a second farther dependence is recognizable upon powerful affective thoughts, upon cycles of interest and complexes of whose influence we are ignorant, therefore unconscious at the time.

如果完全不设限的联想都受到这样的制约，有如此明确的排列顺序，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受限于单个条件（有着原本的前提或出发点的条件）的联想，受到的制约程度可能不亚于前述情况。这项研究实际上表明，除了我们通过前提条件认识到的制约因素，另一个更深远的依附关系也出现了，它可以经由强烈的情感思绪，经由反复出现的兴趣和情结得以辨识，而我们不清楚这些因素的影响，因而它们在当时是不为人知的。

Associations of this character have been the subject matter of very enlightening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which have played a noteworthy role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The Wundt school proposed the so-called association-experiment, wherein the subject is given the task of answering in the quickest possible time, with any desired reaction, to a given stimulus-word. It is then possible to study the interval of time that elapses between the stimulus and the reaction, the nature of the answer given as reaction, the possible mistake in a subsequent repetition of the same attempt, and similar matters. The Zurich School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Bleuler and Jung, gave the explanation of the reactions following the association-experiment, by asking the subject to explain a given reaction by means of further associations, in the cases where there was anything extraordinary in the reaction. It then became apparent that these extraordinary reactions were most sharply determined by the complexes of the subject. In this matter Bleuler and Jung built the first bridge from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to psychoanalysis.

具有这一特征的联想，是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实验性研究的主题，这些实验在精神分析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冯特学派提出了所谓的联想实验，其中实验对象接受的任务是，对一个给出的“刺激单词”尽快作出预期反应，给出回答。之后就可以研究刺激与反应间所耗的时间，反应回答的性质，随后反复尝试时可能会犯的错误，以及其他类似问题。在布洛伊勒和荣格领导下的苏黎世学派则针对有不寻常反应的案例，要求实验对象进一步联想，对已有反应进行解释，进而对联想实验中的反应给出了解释。这样就很清楚了：这些不寻常的反应强烈受制于实验对象自身的情结。布洛伊勒和荣格在这个问题上率先架设了实验心理学与精神分析之间的桥梁。

Thus instructed, you will be able to say, “We recognize now that free associations are predetermined, not voluntary, as we had believed. We admit this also as regards the associations connected with the elements of the dream, but that is not what we are concerned with. You maintain that the associations to the dream element are determined by the unknown psychic background of this very element. We do not think that this is a proven fact. We expect, to be sure, that the association to the dream element will clearly show itself through one of the complexes of the dreamer, but what good is that to us? That does not lead us to understand the dream, but rather, as in the case of the association-experiment, to a knowledge of the so-called complexes. What have these to do with the dream?”

如此受教后，大家就能说：“我们现在知道了，自由联想其实是预设的，而非我们曾认为的是随意的。关于梦元素的联想，我们也接受这种说法，不过我们并不关心这个。你一直说，梦元素的联想是由该元素本身未知的心理背景所决定的。我们不认为这个看法有依据。老实讲，我们希望看到梦元素的联想能通过做梦者的某个情结显现出来，但这对我们有什么用？这不是让我们理解了梦，而是像联想实验的情况一样，只是认识了所谓的情结。这些跟梦有何关系？”

You are right, but you overlook one point, in fact, the very point because of which I did not choose the association-experi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exposition. In this experiment the one determinate of the reaction, viz., the stimulus word, is voluntarily chosen. The reaction is then an intermediary between this stimulus word and the recently aroused complex of the subject. In the dream the stimulus word is replaced by something that itself has its origin in the psychic life of the dreamer, in sources unknown to him,

hence very likely itself a product of the complex. It is not an altogether fantastic hypothesis, then, that the more remote associations, even those that are connected with the dream element, are determined by no other complex than the one which determines the dream element itself, and will lead to the disclosure of the complex.

说得对，不过大家忽视了一点，实际上这正是因此我才没有把联想实验作为阐述的出发点。在这个实验中，反应的限定因素，即刺激单词，是随机选择的。因而该反应是该刺激单词与实验对象新近产生情结之间的调和物。在梦的情况中，刺激单词换成了源于做梦者心理生活的某样东西，它对于做梦者是未知的，因而它本身很可能就是该情结的产物。因此以下设想也并非完全异想天开：更为遥远的联想，甚至那些与梦元素相关的联想，都决定于那个特定情结，这一情结也决定了梦元素本身，因而通过这些联想将会发现这一情结。

Let me show you by another case that the situation is really as we expect it to be. Forgetting proper names is really a splendid example for the case of dream analysis; only here there is present in one person what in the dream interpretation is divided between two persons. Though I have forgotten a name temporarily I still retain the certainty that I know the name; that certainty which we could acquire for the dreamer only by way of the Bernheim experiment. The forgotten name, however, is not accessible. Cogitation, no matter how strenuous, does not help. Experience soon tells me that. But I am able each time to find one or more substitute names for the forgotten name. If such a substitute name occurs to me spontaneously the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of the dream analysis first becomes evident. Nor is the dream element the real thing, but only a substitute for something else, for

what particular thing I do not know, but am to discover by means of the dream analysis. The difference lies only in this, that in forgetting a name I recognize the substitute automatically as unsuitable, while in the dream element we must acquire this interpretation with great labor. When a name is forgotten, too, there is a way to go from the substitute to the unknown reality, to arrive at the forgotten name. If I centre my attention on the substitute name and allow further associations to accumulate, I arrive in a more or less roundabout way at the forgotten name, and discover that the spontaneous substitute names, together with those called up by me, have a certain connection with the forgotten name, were conditioned by it.

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次情况恰如我们所愿了。遗忘专有名词其实是说明梦境分析的绝好例子，只是它只发生于一个人，而释梦则需涉及两人。虽然我暂时遗忘了一个名字，我依然确定自己知道这个名字；而在做梦者身上，我们只能通过伯恩海姆实验获得这样的确定。但是被遗忘的名字是无法获得的。无论如何绞尽脑汁地回想，都无济于事。经验很快就会告诉我这点。但我每次都能想到一个或多个该遗忘名字的替代名字。如果这个替代名字是我不经意想到的，那这个状况和梦境分析状况的联系，首次变得显而易见。梦元素也不是真实的，只是其他事物的替代品，只是我不知道这个特定事物，但我要通过梦境分析去发现它。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在遗忘名字的例子中，我自动意识到该替代名字不合适，而对于梦元素我们则要花很大精力去得出解答。而且，当遗忘名字后，是有办法由替代名字向未知真相前进，最终发现所遗忘的名字的。我只需将注意力集中于替代名字上，继续深入联想，就能通过近乎迂回的方式想起遗忘的名字，并发现，我随意想到和特意回想到的替代名字，都与遗忘的名字有某种联系，都受到它的制约。

I want to show you an analysis of this type. One day I noticed that I could not recall the name of the little country in the Riviera of which Monte Carlo is the capital. It is very annoying, but it is true. I steep myself in all my knowledge about this country, think of Prince Albert, of the house of Lusignan, of his marriages, his preference for deep-sea study, and anything else I can think of, but to no avail. So I give up the thinking, and in place of the lost name allow substitute names to suggest themselves. They come quickly—Monte Carlo itself, then Piedmont, Albania, Montevideo, Colico. Albania is the first to attract my attention, it is replaced by Montenegro, probably because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Then I see that four of these substitutes contain the same syllable *mon* . I suddenly have the forgotten word, and cry aloud, "*Monaco* ." The substitutes really originated in the forgotten word, the four first from the first syllable, the last brings back the sequence of syllables and the entire final syllable. In addition, I am also able easily to discover what it was that took the name from my memory for a time. Monaco is also the Italian name of Munich; this latter town exerted the inhibiting influence.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此类解析。有一天，我发现，我记不起那个位于地中海地区的、首都为蒙特卡罗的小国国名。这很让人烦心，但这是事实。我使劲回想我关于这个国家的所有认知，想到了吕西尼昂家族的阿尔伯特亲王、他的历次婚姻、他对深海研究的偏爱，以及其他能想到的任何事情，但一无所获。所以我不再去回想，而是搁置了失踪的名字，让替代名自动浮现出来。它们来得很快：先是蒙特卡罗本身，然后是皮埃蒙特（Piedmont）、阿尔巴尼亚（Albania）、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科利科（Colico）。阿尔巴尼亚首先引起我的注意，然后它被蒙特内哥罗（Montenegro，现黑山共和国）取代，大概是因为黑白的对比（阿尔巴尼亚中含有"白色"之意）。然后我看到这些替代词中有四个词中都有"蒙 "（mon）这个音。突然我记起了

被遗忘的名字，脱口而出："摩纳哥 （Monaco）。"这些替代词实际上都源自遗忘的词，前四个替代词首先都有摩纳哥的第一个音节,最后一个词则提示了音节顺序和最后一个完整音节。另外，我还轻松发现了令我遗忘该名字的奥秘。原来摩纳哥跟慕尼黑的意大利语名称一模一样，后者的城市名的影响约束了记忆。

The example is pretty enough, but too simple. In other cases we must add to the first substitute names a long line of associations, and then the analogy to the dream interpretation becomes clearer. I have also had such experiences. Once when a stranger invited me to drink Italian wine with him, it so happened in the hostelry that he forgot the name of the wine he had intended to order just because he had retained a most pleasant memory of it. Out of a profusion of dissimilar substitute associations which came to him in the place of the forgotten name, I was able to conclude that the memory of some one named Hedwig had deprived him of the name of the wine, and he actually confirmed not only that he had first tasted this wine in the company of a Hedwig, but he also, as a result of this declaration, recollected the name again. He was at the time happily married, and this Hedwig belonged to former times, not now recalled with pleasure.

这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但还是太简单了。在其他案例中，我们必须要在首先想到的替代名字后再进行一长串的联想，这样，它与释梦的类比才能更清楚。我也有此类经历。有一次，一个陌生人邀我去共饮意大利葡萄酒，而他在酒店正要点酒时，偏偏忘记了酒名，他记忆中的那款酒极为美妙。他联想出一大堆与遗忘的酒名不相干的替代名词，我从中得出结论说，某个叫海德薇格的名字挤占了他对该酒名的记忆。果然，他不但承认自己在第一次品尝此酒时是和一个叫海德薇格的人在一起，而且他还由于这一说法，再次回忆起了那个酒名。

他当时婚姻幸福，而这位海德薇格已经成为历史，不是愉快的回忆。

What is possible in forgetting names must work also in dream interpretation, viz., making the withheld actuality accessible by means of substitutions and through connecting associations. As exemplified by name-forgetting, we may conclude that in the case of the associations to the dream element they will be determined as well by the dream element as by its unknown essential. Accordingly, we have advanced a few steps in the formulation of our dream technique.

在遗忘名字事例中可能的做法，在释梦中势必也能行得通，亦即：通过替代品以及相关联系，找到那个秘而不宣的事实。正如遗忘名字案例所示范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梦元素的联想，是由梦元素自身及其未知关键因素同时决定的。这样，我们在构思释梦技巧上又进了几步。

[2_1].The reader will recall the example: "things were refilled."

[3_1].读者应该记得“有些事暴废了”这个例子。

Seventh Lecture Manifest Dream Content and Latent Dream Thought

第七讲　梦的显意和隐意

We have not studied the problem of errors in vain. Thanks to our efforts in this field, under the conditions known to you, we have evolved two different things, a conception of the elements of the dream and a technique for dream interpretation. The conception of the dream element goes to show something unreal, a substitute for something else, unknown to the dreamer, similar to the tendency of errors, a substitute for something the dreamer knows but cannot approach. We hope to transfer the same conception to the whole dream, which consists of just such elements. Our method consists of calling up, by means of free associations, other substitute formations in addition to these elements, from which we divine what is hidden.

我们研究过失问题的功夫并未白费。多亏我们在该领域的耕耘，在大家已知的条件下，我们理顺了两个不同问题：一是梦元素的概念；二是释梦技巧。梦元素的概念要说明的是某个不真实的事情，它是做梦者未知的另一事物（这与过失的倾向类似）的替代品，或是做梦者知道但无法获取的某事的替代品。我们希望此概念同样适用于整体的梦，因为梦无非由这些元素组成。我们的方法是通过自由联想进行诱导，这些联想乃是这些元素的额外替代形式，我们再从中推导隐藏的事情。

Let me ask you to permit a slight change in our nomenclature

which will greatly increase the flexibility of our vocabulary. Instead of hidden, unapproachable, unreal, let us give a truer description and say inaccessible or unknown to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dreamer. By this we mean only what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lost word or with the interfering intention of the error can suggest to you, namely, unconscious *for the time being* . Naturally in contrast to this we may term *conscious* the elements of the dream itself and the substitute formations just gained by association. As yet there is absolutely no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mplied in this nomenclature. The use of the word unconscious as a suitable and intelligible descriptive epithet is above criticism.

请大家允许我对命名方法做些许改动，这将大大提升用词灵活性。我们不用“隐藏、不可接近、不真实”等字眼，而使用一种更准确的表述，即“做梦者意识无法获知或未知”。这样表述，只是表明，它与遗忘单词或过失的干扰性意向是相同的，给大家的提示是，它只是暂时的 潜意识。为了对比，我们自然可以将梦元素本身和通过联想获得的替代形式定义为有意识。 这些术语迄今并没有绝对的理论释义。“潜意识”作为一个适当的、易懂的描述性形容词，其用法无可非议。

If we transfer our conception from a single element to the entire dream, we find that the dream as a whole is a distorted substitute for something else, something unconscious. To discover this unconscious thing is the task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From this, three important rules, which we must observe in the work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are straightway derived:

如果将单一元素的概念扩展至整个梦，我们会发现梦作为一个整

体，是其他事物、即潜意识事物的变形替代品。发现潜意识事物，是释梦的目标任务。因此，我们直接得出了三条释梦工作中必须遵循的重要法则：

1．What the dream seems to say, whether it be sensible or absurd, clear or confused is not our concern, since it can under no condition be that unconscious content we are seeking. Later we shall have to observe an obvious limitation of this rule. 2. The awakening of substitute formations for each element shall be the sole object of our work. We shall not reflect on these, test their suitability or trouble how far they lead away from the element of the dream. 3. We shall wait until the hidden unconscious we are seeking appears of itself, as the missing word *Monaco* in the experiment which we have described.

1．梦的表象意义，无论合理或荒谬、清晰或含混，都不是我们的关注点，因为它不管怎样都不是我们要寻觅的潜意识内容。这个规则有一个明显局限，我们以后会讲到。2.我们的工作目标仅在于诱导出每个元素的替代形式，而不用去思考它们、测试它们的适宜性，或是顾虑它们与梦元素的偏离程度。3.应该等待我们寻觅的隐藏的潜意识内容自行出现，正如我之前讲过的那个遗忘的单词摩纳哥 。

Now we can understand, too, how unimportant it is how much, how little, above all, how accurately or how indifferently the dream is remembered. For the dream which is remembered is not the real one, but a distorted substitute, which is to help us approach the real dream by awakening other substitute formations and by making the unconscious in the dream conscious. Therefore if our recollection of the dream was faulty, it has simply brought about a further

distortion of this substitute, a distortion which cannot, however, be unmotivated.

现在我们也能理解了，梦被记得的内容多或寡，特别是，准确或偏离，是多么无关紧要。因为记得的梦并不是真正的梦，而是一个变形替代品，我们借助它，通过诱导其他替代形式，让梦中的潜意识内容转化为有意识内容，以此发现真正的梦。因此，如果我们对于梦的记忆是有瑕疵的，它只是制造了一个变形更厉害的替代品，而且这种变形不可能没有动机。

One can interpret one's own dreams as well as those of others. One learns even more from these, for the process yields more proof. If we try this, we observe that something impedes the work. Haphazard ideas arise, but we do not let them have their way. Tendencies to test and to choose make themselves felt. As an idea occurs, we say to ourselves “No, that does not fit, that does not belong here”; of a second “that is too senseless”; of a third, “this is entirely beside the point”; and one can easily observe how the ideas are stifled and suppressed by these objections, even before they have become entirely clear. On the one hand, therefore, too much importance is attached to the dream elements themselves; on the other, the result of free association is vitiated by the process of selection. If you are not interpreting the dream alone, if you allow someone else to interpret it for you, you will soon discover another motive which induces you to make this forbidden choice. At times you say to yourself, “No, this idea is too unpleasant, I either will not or cannot divulge this.”

释梦对象可以是自己的梦，也可以是他人的梦。从自己梦中甚至

可获知更多，因为其过程使自己更信服。若作此尝试，我们能体会工作中的障碍。念头会随意浮现出来，但我们不会听之任之，我们以权衡取舍的态度去掂量这些念头。每当一个念头出现时，我们自己说："不对，这个对不上号，这个不属于这里"；或说："这个毫无意义"；或说："这个跑题了"。可以轻易发现，这些念头因为遭受异议，甚至还没完全显现，就被遏制或压抑下去。所以，一方面梦元素本身被过分重视了；另一方面，自由联想的结果被这个拣选过程削弱了。如果你不是单独释梦，允许他人为你释梦，你很快会发现促使自己下禁止令的另一个动机。有时你会自语道："不，这想法太讨人厌了，我不会也不能说出口。"

Clearly these objections are a menace to the success of our work.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m, in our own case by the firm resolve not to give way to them; an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eams of others by making the hard and fast rule for them, never to omit any idea from their account, even if one of the following four objections should arise: that is, if it should seem too unimportant, absurd, too irrelevant or too embarrassing to relate. The dreamer promises to obey this rule, but it is annoying to see how poorly he keeps his promise at times. At first we account for this by supposing that in spite of the authoritative assurance which has been given to the dreamer, he is not impressed with the importance of free association, and plan perhaps to win his theoretic approval by giving him papers to read or by sending him to lectures which are to make him a disciple of our views concerning free association. But we are deterred from such blunders by the observation that, in one's own case, where convictions may certainly be trusted, the same critical objections arise against certain ideas, and can only be suppressed subsequently, upon second thought, as it were.

显然这些异议是我们工作成功之路上的绊脚石。我们必须抵制它们，为自己释梦时要有不向它们妥协的坚定决心，在为他人释梦时要为他们制定严格的规矩，始终不能遗漏他们叙述中的任何念头，即使下面四种异议出现，即：该念头似乎太无足轻重、太荒谬、太不相干或太羞于说出口。做梦者会答应遵守规定，但会不时地食言，这很气人。我们对此的解释是，尽管做梦者得到了权威的保证，他们还是轻视自由联想的意义；我们也许要给他们读些论文，或让他们去听听课，这样他们就能相信我们的自由联想观点，认可我们的理论了。但是我们并未如此犯蠢，因为我们注意到，连理应深信这些观点的人们，在自己的案例中，对于某些念头也会同样产生批判性异议，在某种程度上只能通过再次思考后才能予以压制。

Instead of becoming vexed at the disobedience of the dreamer, these experiences can be turned to account in teaching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which is the more important the less we are prepared for it. We understand that the task of interpreting dreams is carried on against a certain *resistance* which manifests itself by these critical objections. This resistance is independent of the theoretical conviction of the dreamer. Even more is apparent. We discover that such a critical objection is never justified. On the contrary, those ideas which we are so anxious to suppress, prove *without exception*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the most decisive, in the search for the unconscious. It is even a mark of distinction if an idea is accompanied by such an objection.

做梦者不守规矩，我们不必烦恼，这些经验反而能教会我们一些新知识。我们越没有心理准备，这些知识就越重要。我们知道，执行释梦任务有某种抗力 ，它表现为这些批判性异议。这个抗力并不受做梦者的理论立场左右。还有更多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批判性异议从来都不是有理有据的。相反，我们竭力压抑的这些念

头，无一例外地 成为寻找潜意识内容过程中最重要、最确定的念头。当一个念头伴随了异议时，它甚至是要特别标记予以关注的。

This resistance is something entirely new, a phenomenon which we have found as a result of our hypotheses although it was not originally included in them. We are not too pleasantly surprised by this new factor in our problem. We suspect that it will not make our work any easier. It might even tempt us to abandon our entire work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ream. Such an unimportant thing as the dream and in addition such difficulties instead of a smooth technique! But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these same difficulties may prove fascinating, and suggest that the work is worth the trouble. Whenever we try to penetrate to the hidden unconscious, starting out from the substitute which the dream element represents, we meet with resistance. Hence, we are justified in supposing that something of weight must be hidden behind the substitute. What other reason could there be for the difficulties which are maintained for purposes of concealment? If a child does not want to open his clenched fist, he is certainly hiding something he ought not to have.

这个抗力是一个全新事物，我们发现的这种现象，原先假说里并不包含它，但它却是这些假说的结果。可对于我们问题中出现的这个新元素，我们并不太惊喜。我们怀疑，它不会让我们的工作更轻松。它甚至会让我们萌生退意，不想继续做与梦有关的研究。梦这东西如此无足轻重，可研究手法又如此不轻松，如此困难重重！但换个思路一想，这些困难同样也可以说是很吸引人的，说明了这个研究值得劳神费力。无论何时，当我们试图刺探隐藏的潜意识时，我们从代表梦元素的替代品出发，遭遇了抗力。因此，替代品背后一定隐藏有某种有分量的东西，这是合理推测。那个为了隐瞒而设置重重障碍的其他

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孩子不想松开攥住的拳头，他们肯定是藏了他们不该有的东西。

Just as soon as we bring the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resistance into our consideration of the case, we must realize that this factor is something quantitatively variable. There may be greater or lesser resistances and we are prepared to see these differences in the course of our work. We may perhaps connect this with another experience found in the work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For sometimes only one or two ideas serve to carry us from the dream element to its unconscious aspect, while at other times long chains of association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many critical objections are necessary. We shall note that these variations are connected with the variable force of resistance. This observation is probably correct. If resistance is slight, then the substitute is not far removed from the unconscious, but strong resistance carries with it a great distortion of the unconscious and in addition a long journey back to it.

一旦我们将抗力的动态表现考虑进去，就必须明白这个因素是可变量。抗力可大可小，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准备看到这些差异。我们也许会将此与释梦工作中体会到的另一事实联系起来。有些时候，只有一两个念头可以启发我们从梦元素发现其潜意识内容，而其他一些时候则必须要有持久连续的联想及诸多批判性异议的压抑。我们会注意到，这些变量是与抗力的可变力度相关的。这个判断也许是正确的。如果抗力很轻，替代品就未远离潜意识内容，而强大的抗力会导致潜意识内容的巨大变形，更有甚者，会将替代品带去遥远的地方。

Perhaps the time has come to take a dream and try out our

method to see if our faith in it shall be confirmed. But which dream shall we choose? You cannot imagine how hard it is for me to decide, and at this point I cannot explain the source of the difficulty. Of course, there must be dreams which, as a whole, have suffered slight distortion, and it would be best to start with one of these. But which dreams are the least distorted? Those which are sensible and not confused, of which I have already given you two examples? This would be a gross misunderstanding. Testing shows that these dreams have suffered by distortion to an exceptionally high degree. But if I take the first best dream, regardless of certain necessary conditions, you would probably be very much disappointed. Perhaps we should have to note such an abundance of ideas in connection with single elements of dream that it would be absolutely impossible to review the work in perspective. If we write the dream out and confront it with the written account of all the ideas which arise in connection with it, these may easily amount to a reiteration of the text of the dream. It would therefore seem most practical to choose for analysis several short dreams of which each one can at least reveal or confirm something. This is what we shall decide upon, provided experience should not point out where we shall really find slightly distorted dreams.

也许是时候来找一个梦，试试我们的方法，验证一下我们的信念能否得以确认。但我们该选哪一个梦呢？大家想象不到，让我决定有多难，这里我还不能说出困难的缘由。当然，一定有一些整体上只有轻微变形的梦，从它们中选一个入手再好不过了。但是哪些梦是变形最轻的呢？是那些合理的、不含混的、我已经举过两个例子的梦吗？这是一个严重误解。测试显示，这些梦的变形程度是巨大的。但是如果我不考虑某些必要条件而选了第一个最佳梦境，大家可能非常失望。也许我们得去关注大量与单个梦元素有关的念头，以致我们完全不可能客观地评估整个研究。如果我们把梦境写出来，与所有记录在

案的、因它而起的相关念头对照，它们累加起来，很容易成为梦的叙述文本的一个复述。因而最务实的做法似乎是选择几个短梦作分析，至少它们每个都能揭示或是确认一些东西。既然我们尚无寻找真正轻度变形梦的经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决定使用的办法。

But I know of another way to simplify matters, one which, moreover, lies in our path. Instead of attempt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entire dreams, we shall limit ourselves to single dream elements and by observing a series of examples we shall see how these are explain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our method.

但我还知道一个简化方法，而且它也对我们的路子。我们先不尝试解释完整的梦，而是化整为零地看单一的梦元素，通过观察一系列例子，了解应用释梦法解释它们的过程。

1．A lady relates that as a child she often dreamt “*that God had a pointed paper hat on his head* .” How do you expect to understand that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dreamer? Why, it sounds quite absurd. It is no longer absurd when the lady testifies that as a child she was frequently made to wear such a hat at the table, because she could not help stealing glances at the plates of 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see if one of them had gotten more than she. The hat was therefore supposed to act as a sort of blinder. This explanation was moreover historic, and given without the least difficulty. The meaning of this fragment and of the whole brief dream, is clear with the help of a further idea of the dreamer. “Since I had heard that God was all-knowing and all-seeing,” she said, “the dream can only mean that I know everything and see everything just as God does, even when they try to prevent me.” This example is perhaps too simple.

1．一位女士讲述道，她童年时经常梦到“上帝头上戴着一个尖顶纸帽子 ”。不求助做梦者的话，大家怎么去理解呢？哎，这听起来很荒唐。但是这位女士证明，她小时候在桌边经常被迫戴上这样的帽子，因为她总忍不住偷看兄弟姊妹们的餐盘，看他们有没有人得到的食物比她多，这下就不再荒唐了。所以帽子应该是为了遮盖视线。而且这有往事的依据，解释起来毫不费力。这个片段和整个短梦的意义，通过做梦者的另一个想法显得更清晰。“我听说上帝无所无知、无所不见，”她说，“这个梦只意味着，我和上帝一样知道、看得到一切，即使他们想对我隐瞒。”这个例子也许太简单了。

2．A sceptical patient has a longer dream, in which certain people happen to tell her about my book concerning laughter and praise it highly. Then something is mentioned about a certain “'*canal,' perhaps another book in which 'canal' occurs, or something else with the word 'canal' … she doesn't know … it is all confused* .”

2．一位多疑的病人做了一个长梦，梦中某些人恰好跟她谈及我那本关于笑的书，对它大加褒奖。然后提到了某件“有关‘航道’的事，大概是另一本出现过‘航道’的书，或者是与‘航道’这个词有关的什么事情……她不知道……全搞混了。 ”

Now you will be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he element “canal” will evade interpretation because it is so vague. You are right as to the supposed difficulty, but it is not difficult because it is vague, but rather it is vague for a different reason, the same reason which also makes the interpretation difficult. The dreamer can think of nothing concerning the word canal, I naturally can think of nothing. A little while later, as a matter of fact on the next day, she tells me that

something occurred to her that *may perhaps* be related to it, a joke that she has heard. On a ship between Dover and Calais a well-known author is conversing with an Englishman, who quoted the following proverb in a certain connection: "*Du sublime au ridicule, il n'y a qu'un pas* ." [3_1] The author answers, "*Oui, le pas de Calais* ," [3_2] with which he wishes to say that he finds France sublime and England ridiculous. But the "*Pas de Calais* " is really a canal, namely, the English Channel. Do I think that this idea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dream? Certainly, I believe that it really gives the solution to the puzzling dream fragments. Or can you doubt that this joke was already present in the dream, as the unconscious factor of the element, "canal." Can you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it was subsequently added to it? The idea testifies to the scepticism which is concealed behind her obtrusive admiration, and the resistance is probably the common reason for both phenomena, for the fact that the idea came so hesitatingly and that the decisive element of the dream turned out to be so vague. Kindly observe at this point the relation of the dream element to its unconscious factor. It is like a small part of the unconscious, like an allusion to it; through its isolation it became quite unintelligible.

现在大家会倾向于认为，这个"航道"的元素太模糊，解释不了。这个难点大家说对了，但它不是难在模糊，它反倒是由于另一个原因而模糊，这个原因也是释梦困难的原因。做梦者想不起有关"航道"这个单词的任何事情，我自然也想不出什么解释。过了一小段时间后，实际上是第二天，她告诉我，她想起来自己听到的一个有可能 与之有关的笑话。在来往于英国多佛和法国加来的一条船上，一位知名作家正跟一个英国人聊天，后者引用了下面一个承接上文的俗语："*Du sublime au ridicule, il n'y a qu'un pas.* " [4_1] 作家回答："*Oui, le pas de Calais* ." [4_2] 意思是说，他觉得法国高尚，英国可笑。"*Pas de Calais* "确实是一条航道，也就是英吉利海峡。我相信这个念头与那个梦有

任何关联吗？当然，我相信它其实为那些令人困惑的梦境碎片提供了解答。或者，大家是否不相信，作为“航道”这个元素的潜意识因素，这个笑话早已出现在了梦中了呢？大家是否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后来加进去的？这个念头证实了她的怀疑，尽管这个怀疑在之前被褒奖所掩盖，这一抗力导致了以下两个现象：这个念头出现得很迟疑；梦的决定元素很模糊。在这里，要仔细观察梦元素与其潜意识因素的关系。它可能是潜意识因素中一小部分，是对其的暗喻，它因为孤立而变得非常晦涩难懂。

3．A patient dreams, in the course of a longer dream: “*Around a table of peculiar shape several members of his family are sitting, etc.* ”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table, it occurs to him that he saw such a piece of furniture during a visit to a certain family. Then his thoughts continue: In this family a peculiar relation had existed between father and son, and soon he adds to this tha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same relation exists between himself and his father. The table is therefore taken up into the dream to designate this parallel.

3．一位病人在一个长梦中梦到：“在一个形状特别的桌子旁，坐着他的几个家人，等等。 ”这个桌子让他联想到在拜访某家人时看到的一件家具。他接着联想：这家人里父子关系很特别，而且他马上补充说，实际上他自己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与之相同。因此，桌子就进入梦中，指代了这种相似关系。

This dreamer had for a long time been familiar with the claims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Otherwise he might have taken exception to the fact that so trivial a detail as the shape of a table should be taken as the ba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we judge nothing in the dream as accidental or indifferent, and we expect to

reach our conclusion by the explanation of just such trivial and unmotivated details. Perhaps you will be surprised that the dream work should arouse the thought “we are in exactly the same position as they are,” just by the choice of the table. But even this becomes clear when you learn that the name of the family in question is *Tischler* . By permitting his own family to sit at such a table, he intends to express that they too are *Tischler* . Please note how, in relating such a dream interpretation, one must of necessity become indiscreet. Here you have arrived at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choice of examples that I indicated before. I could easily have substituted another example for this one, but would probably have avoided this indiscretion at the cost of committing another one in its place.

这位做梦者对释梦的要求熟悉已久。不然，要把桌子形状这么琐碎的细节作为研究重心，他或许会不以为然。事实上，我们认为梦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偶然的、无关的，我们希望通过解释这些琐碎和动机不明的细节得出结论。大家也许会奇怪，梦境中只是选了桌子，就会勾起“我家情况跟他家一样”的想法。但要是知道这家人姓蒂施乐（Tischler，原意是家具匠）,连这个道理都很清楚了。他让自己的家人坐在这样一个桌子旁，是要表示他们也是蒂施乐 。要注意，这样的释梦叙述未免失之草率。这里，大家就碰到了我之前提过的选择案例的难点之一。我可以很容易地拿另一个例子替代这个，但是可能会避免了这个草率之过，又犯了其他过失。

The time has come to introduce two new terms, which we could have used long ago. We shall call that which the dream relates, the manifest content of the dream; that which is hidden, which we can only reach by the analysis of ideas we shall call latent dream thoughts. We may now conside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nifest dream content and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s as they are revealed in these examples. Many different connections can exist. In examples 1 and 2 the manifest content is also a constituent part of the latent thought, but only a very small part of it. A small piece of a great composite psychic structure in the unconscious dream thought has penetrated into the manifest dream, like a fragment of it, or in other cases, like an allusion to it, like a catchword or an abbreviation in the telegraphic code. The interpretation must mould this fragment, or indication, into a whole, as was done most successfully in example 2. One sort of distortion of which the dream mechanism consists is therefore substitution by means of a fragment or an allusion. In the third, moreover, we must recognize another relation which we shall see more clearly and distinctly expressed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s:

现在要介绍两个新的术语，我们早就该用了。我们将梦表现出的内容称为“梦的显意”，那些隐藏的、只能通过对联想念头分析发现的内容，则称为“梦的隐意”。我们现在可以考虑这些例子所揭示的显意和隐意之间的关系。这里存在形形色色的关系。例1和例2中，显意也是隐意的组成部分。潜意识的隐意这个大组合体中的一个小片段，已经潜入了显梦中，像它的一个碎片，或者在其他案例中是对它的暗喻，像流行语或电码简写一样。释梦必须将这个碎片或提示整合进去，例2就几乎成功地做到了。于是，梦的机制中含有的变形被碎片或暗喻所替代。而且，在例3中我们一定会发现另一种关系，它在下面例子中表现得更清楚，更明朗。

4 . The dreamer “*pulls a certain woman of his acquaintance from behind a bed* .” He finds the meaning of this dream element himself by his first association. It means: This woman “has a pull” with him. [3_3]

4．做梦者“从床后拉出某个他认识的女人 ”。他通过第一个联想就自己发现了该梦元素的意义。它的意思是：这个女人与他“有牵扯”。 [4_3]

5．Another man dreams that “*his brother is in a closet* .” The first association substitutes *clothes-press* for closet, and the second gives the meaning: his brother is *close-pressed* for money. [3_4]

5．另一个男子梦见“他哥哥在壁橱 （closet）里 ”。第一个联想用熨斗 （clothes-press）代替了壁橱，第二个联想就给出了意思：他哥哥手头紧 （close-pressed）。 [4_4]

6．The dreamer “*climbs a mountain from the top of which he has an extraordinarily distant view* .” This sounds quite sensible; perhaps there is nothing about it that needs interpretation, and it is simply necessary to find out which reminiscence this dream touches upon and why it was recalled. But you are mistaken; it is evident that this dream requires interpretation as well as any other which is confused. For no previous mountain climbing of his own occurs to the dreamer, but he remembers that an acquaintance of his is publishing a “*Rundschau* ,” which deals with our relation to the furthermost parts of the earth.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 is therefore in this case an identification of the dreamer with the “*Rundschauer* .”

6.做梦者“爬上了一座山，极目所见，一览无余 ”。这听着很合理，似乎没必要解释，只需找到该梦触及的往事和原因即可。但你错

了，很明显，这个梦跟其他一些含混的梦一样需要解释。做梦者没想起以前自己的爬山经历，但是记得他一个熟人出版了一个叫《浏览》的刊物（*Rundschau*），内容是我们与地球远方的关系。因而，这个案例中的隐意就是：做梦者认为自己是“浏览者”（Rundschauer）。

Here you find a new type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nifest content and the latent dream element. The former is not so much a distortion of the latter as a representation of it, a plastic concrete perversion that is based on the sound of the word. However, it is for this very reason again a distortion, for we have long ago forgotten from which concrete picture the word has arisen, and therefore do not recognize it by the image which is substituted for it. If you consider that the manifest dream consists most often of visual images, and less frequently of thoughts and words, you can imagine that a very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in dream formation is attached to this sort of relation. You can also see that in this manner it becomes possible to create substitute formations for a great number of abstract thoughts in the manifest dream, substitutions that serve the purpose of further concealment all the same. This is the technique of our picture puzzle. What the origin is of the semblance of wit which accompanies such representations is a particular question which we need not touch upon at this time.

这里大家发现了显意和隐意之间一个新联系。前者再现后者时，并没有过度变形，而是基于单词发音的一种灵活的具体变异。然而，正因为此，它仍是一种变形，因为我们早已忘记了诱发该单词的具体画面，所以不认得替代它的图像。如果大家认为显梦多为视觉图像，少有思想和言语，就可以想象得出，这种关系对于梦的形成是极其重要的。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抽象想法就很可能在显梦中制造替代形式，这些替代物仍然能起到继续隐瞒的作用。这就是

我们这个拼图游戏的技巧。伴随这些再现形式的是机智的表象，至于它根源何在，这个问题很特殊，现在我们不必触及。

A fourth type of relation between the manifest and the latent dream cannot be dealt with until its cue in the technique has been given. Even then I shall not have given you a complete enumeration, but it will be sufficient for our purpose.

除非在技巧中给出提示，我们现在还不能处理显梦与隐意的第四种关系。即便到时候我也不会面面俱到，足以应付研究目的即可。

Have you the courage to venture up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 entire dream? Let us see if we are well enough equipped for this undertaking. Of course, I shall not choose one of the most obscure, but one nevertheless that shows in clear outline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a dream.

大家能放胆一搏，解释一个完整的梦吗？让我们看看目前所学能否胜任此任务。当然了，我选的不会是最含糊的，而仍是在结构上清晰展现了梦的普遍特征的一个梦。

A young woman who has been married for many years dreams: “She is sitting in the theatre with her husband; one side of the orchestra is entirely unoccupied. Her husband tells her that Elise L. and her bridegroom had also wished to come, but had only been able to procure poor seats, three for 1 Fl., 50 Kr. and those of course they could not take. She thinks this is no misfortune for them.”

一位已婚多年的年轻女子梦见：“她和丈夫一起坐在剧院里，前排座位有一侧完全空着。她丈夫告诉她，伊莉斯·L和她的新婚丈夫本来也想来，可是只买得到烂座位，3张票要花1弗罗林50克朗，他们肯定不会要。她觉得这对他们而言不算倒霉 。”

The first thing that the dreamer has to testify is that the occasion for the dream is touched upon in its manifest content. Her husband had really told her that Elise L., an acquaintance of about her age, had become engaged. The dream is the reaction to this news. We already know that in the case of many dreams it is easy to trace such a cause to the preceding day, and that the dreamer often gives these deductions without any difficulty. The dreamer also places at our disposal further information for other parts of the manifest dream content. Whence the detail that one side of the orchestra is unoccupied? It is an allusion to an actual occurrence of the previous week. She had made up her mind to go to a certain performance and had procured tickets in advance, so much in advance that she had been forced to pay a preference tax. [3_5] When she arrived at the theatre, she saw how needless had been her anxiety, for *one side of the orchestra was almost empty* . She could have bought the tickets on the day of the performance itself. Her husband would not stop teasing her about her excessive haste. Whence the 1 Fl. 50 Kr.? From a very different connection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ormer, but which also alludes to an occurrence of the previous day. Her sister-in-law had received 150 florins as a present from her husband, and knew no better, the poor goose, than to hasten to the jeweler and spend the money on a piece of jewelry. Whence the number 3? She can think of noth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unless one stresses the association that the bride, Elise L., is only three months younger than she herself, who

has been married for almost ten years. And the absurdity of buying three tickets for two people? She says nothing of this, and indeed denies all further associations or information.

做梦者要证实的第一件事是做梦的场合在其显意中有所涉及。她的丈夫确实告诉过她一个跟她差不多大的熟人伊莉斯·L订婚了。这个梦就是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我们已经知道，在很多梦的案例中，这种原因很容易在前一天的经历中发现，做梦者经常不费劲地做出这些推论。在我们的支配下，做梦者就梦的其他一些显意提供了信息。前排座位一侧空着这个细节是从何而来的呢？它暗喻了前一周的一件真事。她决定去看某个演出，提前买了票，因为买得太早，她还不得不多付了预订费 [4_5] 。当她到达剧院时，她意识到自己实在没必要着急，因为前排座位一侧几乎都空着 。她只要在演出当天买票就可以了。她丈夫一直取笑她脾气太急。那1弗罗林50克朗从何而来呢？跟前面的事无关，出处十分不同，但也是暗喻前一天的一件事。她的嫂子收到丈夫送的150弗罗林，这个呆瓜很懵懂地急忙跑去珠宝店花掉了这笔钱，买了一件珠宝。那数字3怎么来的呢？关于这个她没想起什么，只是强调了与新娘伊莉斯·L有关的一个联想，此女只比自己年轻3个月，而她已经结婚10年了。那给两个人买3张票这种荒唐事呢？她对此无话可说，实际上不肯再继续联想或提供信息。

But she has given us so much material in her few associations, that it becomes possible to derive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 from it. It must strike us that in her remarks concerning the dream, time elements which constitute a common element in the various parts of this material appear at several points. She attended to the tickets *too soon* , took them *too hastily* , so that she had to pay more than usual for them; her sister-in-law likewise *hastened* to carry her money to the jeweler's to buy a piece of jewelry, just as if she might *miss* it. Let us add to the expressions “*too early* ,” “*precipitately* ,”

which are emphasized so strongly, the occasion for the dream, namely, that her friend only three months younger than herself had even now gotten a good husband, and the criticism expressed in the condemnation of her sister-in-law, that it was *foolish* to hurry so. Then the following construction of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 for which the manifest dream is a badly distorted substitute, comes to us almost spontaneously:

但是她这几个联想给的素材足够了，从中推导出隐意是可能的。我们一定会注意到，在她关于梦的叙述中，时间元素作为素材不同部分的共同元素，出现了数次。她订票太早 ，买票太急 ，以致要为它们多付钱；她的嫂子同样急着 拿钱去珠宝店买一件珠宝，生怕会错过它。要和这些用力强调的措辞“太早”、“贸然地”连起来看的事有两点：一是做梦的场合，即，只比自己年轻3个月的朋友现在倒找了个好老公；二是责怪她嫂子时的评语，就是“那么匆忙很愚蠢 ”。这样，一个严重变形的显梦所替代的隐意框架，就几乎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How *foolish* it was of me to hurry so in marrying! Elise's example shows me that I could have gotten a husband later too.” (The precipitateness is represented by her own behavior in buying the tickets, and that of her sister-in-law in purchasing jewelry. Going to the theatre was substituted for getting married. This appears to have been the main thought; and perhaps we may continue, though with less certainty, because the analysis in these parts is not supported by statements of the dreamer.) “And I would have gotten 100 times as much for my money.” (150 Fl. is 100 times as much as 1 Fl. 50 Kr.). If we might substitute the dowry for the money, then it would mean that one buys a husband with a dowry; the jewelry as well as the poor seats would represent the

husband. It would be even more desirable if the fragment “3 seats”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a husband. But our understanding does not penetrate so far. We have only guessed that the dream expresses her *disparagement* of her own husband, and her regret at having *married so early* .

“我这么急着结婚真愚蠢 ！伊莉斯的例子说明，我也可以晚点找老公。”（她自己买票的行为和她嫂子买珠宝的行为，表现了贸然行事的风格。去剧院指代了结婚。这似乎是主要想法，我们还可以继续发挥，但就不太确定了，因为这些部分的分析没有做梦者的口述材料支持。）“而且我的钱本该获益百倍。”（150弗罗林是1弗罗林50克朗的100倍。）如果我们把钱替代成嫁妆，那就意味着女人用嫁妆买了一个丈夫；珠宝和烂座位都代表丈夫。假如“3个座位”与丈夫有关，情况就更符合料想了。我们只能猜到，这个梦表明了她对丈夫的轻视，以及她对过早结婚 的后悔。

It is my opinion that we are more surprised and confused than satisfied by the result of this first dream interpretation. We are swamped by more impressions than we can master. We see that the teachings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are not easily exhausted. Let us hasten to select those points that we recognize as giving us new, sound insight.

我个人觉得，对于第一个释梦结果，我们谈不上有多满意，倒是更为惊讶和困惑。主意更多了，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明白了，完成释梦教学绝非一夕之功。我们赶紧来归纳一下，讲几个提供了全新中肯视角的观点。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remarkable that in the latent thought the main emphasis falls on the element of haste; in the manifest dream there is absolutely no mention of this to be found. Without the analysis we should not have had any idea that this element was of any importance at all. So it seems possible that just the main thing, the central point of the unconscious thoughts, may be absent in the manifest dream. Because of this, the original impression in the dream must of necessity be entirely changed. Secondly: In the dream there is a senseless combination, 3 for 1 Fl. 50 Kr.; in the dream thought we divine the sentence, “It was senseless (to marry so early).” Can one deny that this thought, “It was senseless,” was represented in the manifest dream by the introduction of an absurd element? Thirdly: Comparison will show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anifest and latent elements is not simple, certainly not of such a sort that a manifest element is always substituted for the latent. There must rather be a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which a manifest element may represent several latent ones, or a latent element represented by several manifest elements.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隐意中的主要重点落在了“匆忙”这个元素上，而这在显梦中绝对没有提及。不借助分析，我们不会意识到这个元素有何意义。所以可能的是，恰恰是主要事实，即潜意识想法的中心内容，在显梦中是缺席的。由此，梦的初始印象势必会完全改变。第二：梦中有一个无意义的组合：3个座位花1弗罗林50克朗，我们在梦的想法中猜出了这句话：“（太早结婚，）这毫无意义。”有人能否认“这毫无意义”是通过引入一个荒唐的元素而在显梦中表现出来的吗？第三：通过对比可见，显梦和隐意元素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肯定不是显梦元素总能替代隐意元素的那种关系。这两组元素间势必存在一种量化关系，一个显梦元素可以表现几个隐意元素，或几个显梦元素表现一个隐意元素。

Much that is surprising might also be said of the sense of the dream and the dreamer's reaction to it. She acknowledges the interpretation but wonders at it. She did not know that she disparaged her husband so, and she did not know why she should disparage him to such a degree. There is still much that is incomprehensible. I really believe that we are not yet fully equipped for dream interpretation, and that we must first receive further instruction and preparation.

关于梦的意义和做梦者对它的反应，也可说不乏惊人发现。她认可了这个解释，但对此很诧异。她不知道自己如此看不起丈夫，也不知道她为何如此看不起他。还有不少地方令人费解。我觉得，我们的释梦能力尚欠火候，必须先进一步接受指导，做好准备。

[3_1].From the sublime to the ridiculous is but a narrow passage.

[3_2].Yes, the passage from Calais.

[3_3]."Vorzug." "Vom bett hervorziehen."

[3_4]."Schränkt sich ein."

[3_5].In Germany tickets may be bought before the day of the performance only upon additional payment, over and above the regular cost of the ticket. This is called "Vorverkaufsgebühr."

[4_1].意为“从高尚到可笑，只一条狭窄通道之隔”。

[4_2].意为“对，就是加来出发的这条通道”。

[4_3].德语“Vorzug”（偏爱），“Vom Bett hervorziehen”（从床边拉出）。

[4_4].德语为“Schränkt sich ein”（限制）。

[4_5].在德国，在演出当天之前可以购票，但是除了正常票价还要额外支付费用，这称为“Vorverkaufsgebühr”（预订费）。

Eighth Lecture　Dreams of Childhood

第八讲　儿童的梦

We think we have advanced too rapidly. Let us go back a little. Before our last attempt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of dream distortion through our technique, we had decided that it would be best to avoid them by limiting ourselves only to those dreams in which distortion is either entirely absent or of trifling importance, if there are such. But here again we digres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our knowledge, for as a matter of fact we become aware of dreams entirely free of distortion only after the consistent application of our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 and after complete analysis of the distorted dream.

我们认为自己进展太快了。得再后退一点。上一次尝试用释梦技巧解决梦的变形难点前，我们决定，最好只看那些变形完全不存在或是意义不大的梦（前提是要有这种梦），以避开那些难点。但这样我们又偏离了认知进步的历史轨迹，因为事实上，只有在坚持使用释梦法透彻分析了变形的梦之后，我们才能认识到完全不变形的梦。

The dreams we are looking for are found in children. They are short, clear, coherent, easy to understand, unambiguous, and yet unquestionable dreams. But do not think that all children's dreams are like this. Dream distortion makes its appearance very early in childhood, and dreams of children from five to eight years of age have been recorded that showed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ter dreams. But if you will limit yourselves to the age beginning with

conscious psychic activity, up to the fourth or fifth year, you will discover a series of dreams that are of a so-called infantile character. In a later period of childhood you will be able to find some dreams of this nature occasionally. Even among adults, dreams that closely resemble the typically infantile ones occur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我们要找的梦在儿童身上。它们短暂、清晰、连贯、易懂、明朗，可毫无疑问也是梦。可不要以为所有儿童的梦都是这样。梦的变形在童年很早期的阶段就出现了，有关记载显示，5到8岁的儿童的梦已具有了后来的梦的所有特征。不过，如果只关注有意识心理活动刚开始的年龄（最多到4或5岁），会发现一系列具有所谓婴儿期特点的梦。在稍晚的童年期，大家偶尔也能看到一些这种特点的梦。即使在成年人当中，在特定情况下，与典型婴儿梦很类似的梦也会发生。

From these children's dreams we gain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dreams with great ease and certainty, and we hope it will prove decisive and of universal application.

从这些儿童的梦中，我们能很轻松、很确定地获知有关梦的性质的信息，我们希望它能起到关键提示，具有普遍应用价值。

1．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dreams we need no analysis, no technical methods. We need not question the child that is giving an account of his dream. But one must add to this a story taken from the life of the child. An experience of the previous day will always explain the dream to us. The dream is a sleep-reaction of psychic life upon these experiences of the day.

1．理解这些梦，我们无需分析，无需技术手段。我们不会质疑儿童所讲述的梦。但是，我们必须结合该儿童的生活经历来看它。白天的经历总能为我们解释这个梦。这个梦是心理生活对那天经历的睡眠反应。

We shall now consider a few examples so that we may base our further deductions upon them.

我们现在来看几个例子，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推导。

a). A boy of 22 months is to present a basket of cherries as a birthday gift. He plainly does so very unwillingly, although they promise him that he will get some of them himself. The next morning he relates as his dream, “*Hermann eat all cherries* .”

a) 一个22月大的男孩要把一篮樱桃当作生日礼物送给别人。他显然很不情愿地照做了，尽管大家答应也会分给他一些。第二天早上他讲述了自己的梦：“赫尔曼把樱桃全吃了。 ”

b). A little girl of three and a quarter years makes her first trip across a lake. At the landing she does not want to leave the boat and cries bitterly. The time of the trip seems to her to have passed entirely too rapidly. The next morning she says, “*Last night I rode on the lake* .” We may add the supplementary fact that this trip lasted longer.

b) 一个3岁零3个月大的小女孩第一次去湖上游玩。到岸时她不想下船，哭得很惨。她觉得游湖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第二天她说："昨天夜里我去游湖了 。"可知一个事实，梦里的游湖比较久。

c). A boy of five and a quarter years is taken on an excursion into the Escherntal near Hallstatt. He had heard that Hallstatt lay at the foot of the Dachstein, and had shown great interest in this mountain. From his home in Aussee there was a beautiful view of the Dachstein, and with a telescope one could discern the Simonyhütte upon it. The child had tried again and again to see it through the telescope, with what result no one knew. He started on the excursion in a joyously expectant mood. Whenever a new mountain came in sight the boy asked, "Is that the Dachstein?" The oftener this question was answered in the negative, the more moody he became; later he became entirely silent and would not take part in a small climb to a waterfall. They thought he was overtired, but the next morning, he said quite happily, "*Last night I dreamed that we were in the Simonyhütte* ." It was with this expectation, therefore, that he had taken part in the excursion. The only detail he gave was one he had heard before, "you had to climb steps for six hours."

c) 一个5岁零3个月大的男孩被带去哈尔施塔特附近的艾斯彻恩山谷玩。他听说过哈尔施塔特在达赫山脚下，他对这座山很感兴趣。从他在奥斯的家中可以看到达赫山的美丽景色，用望远镜能看清山顶的西蒙尼小屋。孩子用望远镜一次次看山，没人知道他看到没有。每当一个新的山出现在眼前时，男孩都会问："这是达赫山吗？"每次都得到否定的答案，他渐渐地郁闷起来，后来完全不吭声了，也不肯爬一个小坡去看瀑布。大家以为他太累了，但第二天早上，他很开心地说："昨天夜里我梦见我们在西蒙尼小屋啦 。"他是抱着这个期待参加旅行的。他说了一个唯一细节，是他以前听说的："必须要爬6小时的

台阶。”

These three dreams will suffice for all the information we desire.

这三个梦足以涵盖我们所有想要的信息。

2．We see that children's dreams are not meaningless; they are *intelligible, significant, psychic acts* . You will recall what I represented to you as the medical opinion concerning the dream, the simile of untrained fingers wandering aimlessly over the keys of the piano. You cannot fail to see how decidedly these dreams of childhood are opposed to this conception. But it would be strange indeed if the child brought forth complete psychic products in sleep, while the adult in the same condition contents himself with spasmodic reactions. Indeed,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attribute the more normal and deeper sleep to the child.

2．我们看到，儿童的梦不是无意义的，它们是易懂的、有意义的心理行动。大家该记得我讲过，医学界认为梦就像未经训练的手指漫无目的地抚过钢琴琴键。大家不会看不出，这些儿童的梦与这一观点是完全抵触的。不过，如果儿童在睡眠中制造了完整的心理产物，而成年人却只有区区零星反应，这似乎有些奇怪。其实，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儿童的睡眠更正常、更深。

3．Dream distortion is lacking in these dreams, therefore they need no interpretation. The manifest and latent dreams are merged.

Dream distortion is therefore not inherent in the dream. I may assume that this relieves you of a great burden. But upon closer consideration we shall have to admit of a tiny bit of distortion, a certain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manifest dream content and latent dream thought, even in these dreams.

3．这些梦并无变形，因而它们无需解释。显性和隐含的梦是合为一体的。因而，变形并非梦的固有形式。 我猜这话能让大家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过，在深究之下，我们必须承认，即便在这些梦中，也有极轻微的变形。显意和隐意间也有某种不同。

4．The child's dream is a reaction to an experience of the day, which has left behind it a regret, a longing or an unfulfilled desire. *The dream brings about the direct unconcealed fulfillment of this wish.* Now recall our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role of external or internal bodily stimuli as disturbers of sleep, or as dream producers. We learned definite facts about this, but could only explain a very small number of dreams in this way. In these children's dreams nothing points to the influence of such somatic stimuli; we cannot be mistaken, for the dreams are entirely intelligible and easy to survey. But we need not give up the theory of physical causation entirely on this account. We can only ask why at the outset we forgot that besides the physical stimuli there are also psychic sleep-disturbing stimuli. For we know that it is these stimuli that commonly cause the disturbed sleep of adults by preventing them from producing the ideal condition of sleep, the withdrawal of interest from the world. The dreamer does not wish to interrupt his life, but would rather continue his work with the things that occupy him, and for this reason he does not sleep. The unfulfilled wish, to which he reacts by means of the dream, is the

psychic sleep-disturbing stimulus for the child.

4．儿童的梦是对白天经历的反应，那些经历留下了遗憾、一种期待或有待满足的心愿。梦的内容是对该愿望直白的满足。 现在请回想一下，我们讨论过搅扰睡眠或制造了梦的外部或内部身体刺激作用的重要性。我们了解了相关的确定事实，但只能用它们解释极少数梦。在儿童的梦中没有发现这种躯体刺激的影响，我们不会搞错，因为这些梦完全可以理解，也很容易分析。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无需完全放弃生理性原因的理论。我们只会自问，为什么一开始就忘记，除了生理刺激，也有搅扰睡眠的心理刺激。因为我们知道，是这些刺激频繁搅扰了成年人的睡眠，使他们无法获得睡眠的理想条件，即暂停关注外界。做梦者不希望中断自己的生活，宁可继续正在进行的事情，因此他没有睡觉。对儿童来说，他们通过梦对未满足的愿望作出反应，这个愿望就是搅扰睡眠的心理刺激。

5．From this point we easily arrive at an explan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the dream. The dream, as a reaction to the psychic stimulus, must have the value of a release of this stimulus which results in its elimination and in the continuation of sleep. We do not know how this release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dream, but we note that *the dream is not a disturber of sleep* , as calumny says, *but a guardian of sleep, whose duty it is to quell disturbances* . It is true, we think we would have slept better if we had not dreamt, but here we are wrong; as a matter of fact, we would not have slept at all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dream. That we have slept so soundly is due to the dream alone. It could not help disturbing us slightly, just as the night watchman often cannot avoid making a little noise while he drives away the rioters who would awaken us with their noise.

5．这样，我们就能轻松地解释梦的功能了。作为对心理刺激的反应，梦的价值必须是发泄该刺激，使其消除并维持睡眠。我们不知道梦如何发泄刺激，却发现，与谣言相反的是，梦不是睡眠的搅扰者，而是睡眠的守护者，其职责就是清除搅扰因素。　确实，我们以为，如果不做梦我们的睡眠会更好，此言差矣，实际上没有梦的帮助，我们根本睡不着。我们能熟睡，完全是梦的功劳。它可能会稍微干扰到我们，这就像巡夜人在驱赶闹事分子时也会发出些许响声，不这么做，我们就会被闹事者的吵闹声惊醒。

6．On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dream is that a wish is its source, and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dream is the gratification of this wish. Another equally constant feature is that the dream does not merely express a thought, but also represents the fulfillment of this wish in the form of a hallucinatory experience. “*I should like to travel on the lake* ,” says the wish that excites the dream; the dream itself has as its content “*I travel on the lake* .” On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atent and manifest dream, a distortion of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 therefore remains even in the case of these simple children's dreams, namely,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hought into experience* .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eam it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hat this change be traced back. If this should prove to be an extremely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dream, then the above mentioned dream fragment, “*I see my brother in a closet* ” could not be translated, “*My brother is close-pressed* ,” but rather, “I wish that my brother were close-pressed, *my brother should be close-pressed* .” Of the two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eam we have cited, the second plainly has greater prospects of unconditional acknowledgment than the first. Only extensive investigation can ascertain that the cause of the dream must always be a wish, and cannot also be an anxiety, a plan or a reproach; but this does not alter the other characteristic, that the dream does not simply

reproduce the stimulus but by experiencing it anew, as it were, removes, expells and settles it.

6．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来源于一个愿望，梦的内容就是这个愿望得以满足。另一共同特征是，梦不仅表达了一个心思，而且通过幻觉体验的形式呈现了这个愿望被实现。“我好想游湖。 ”这个愿望诱发了梦，梦本身就有“我游湖”的内容。显梦和隐意的一个区别在于，即使在单纯的儿童的梦中都存在隐意的变形，即，把心思转换成了行动。 在释梦时追查到这个转换，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特点成为所有梦的共同特性，则前述梦的片段“我看到我哥在壁橱里 ”不能转换成“我哥手头紧 ”，而应该是“我希望我哥手头紧，我哥应该手头紧。 ”我们讲到的梦的普遍特性中，第二个显然比第一个更有望得到无条件认可。只有扩大研究范围才能确定，梦的成因必然总是一个愿望，而不可能也是焦虑、打算或指责，但这不会改变另一个特征：梦不仅再现了该刺激，而且重新体验它、如有可能，还要去除、驱散、解决它。

7．In connection with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eam we can again resum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ream and the error. In the case of the latter we distinguish an interfering tendency and one interfered with, and the error is the compromise between the two. The dream fits into the same scheme. The tendency interfered with, in this case, can be no other than that of sleep. For the interfering tendency we substitute the psychic stimulus, the wish which strives for its fulfillment, let us say, for thus far we are not familiar with any other sleep-disturbing psychic stimulus. In this instance also the dream is the result of compromise. We sleep, and yet we experience the removal of a wish; we gratify the wish, but at the same time continue to sleep. Both are partly carried out and partly given up.

7．有了梦的这些特征，我们又能重新对梦和过失作比较了。在过失的情况下，我们甄别出干扰倾向和被干扰倾向，而过失是两个倾向的妥协结果。梦也符合这个说法。在梦的情况下，被干扰倾向无非是睡觉倾向。而干扰倾向则成了心理刺激，即努力想实现的愿望，我们要说，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其他任何搅扰睡眠的心理刺激。在这里，梦也是妥协的结果。我们睡觉，然而体验到愿望消除的过程，我们满足了愿望，但同时继续睡觉。两者互有得失。

8．You will remember that we once hoped to gain acces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ream problem by the fact that certain very transparent phantasy formations are called *day dreams* . Now these day dreams are actual wish fulfillments, fulfillments of ambitious or erotic wishes with which we are familiar; but they are conscious, and though vividly imagined, they are never hallucinatory experiences. In this instance, therefore, the less firmly established of the two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eam holds, while the other proves itself entirely dependent upon the condition of sleep and impossible to the waking state. In colloquial usage, therefore, there is a presentment of the fact that the fulfillment of a wish is a 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dream. Furthermore, if the experience in the dream is a transformed representation only made possible by the condition of sleep—in other words, a sort of nocturnal day dream—then we can readily understand that the occurrence of phantasy formations can release the nocturnal stimulus and bring satisfaction. For day dreaming is an activity closely bound up in gratification and is, indeed, pursued only for this reason.

8．大家该记得，我们有一次想尝试通过某些非常清楚的幻觉形式，即“白日梦”去理解梦的问题。现在，这些白日梦实际上就是实现

愿望，是对我们所熟悉的雄心或情欲愿望的实现，但它们是有意识的，虽然是一种生动想象，但从来都不是幻觉体验。所以，梦的两个主要特征中那个确定性稍弱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而另一个特征则完全取决于睡眠状态，在清醒状态下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如果梦中体验是一种被改造了的再现形式，它仅依赖于睡眠状态，换句话说，它是一种夜晚的白日梦，我们就能欣然理解，形成幻想可以释放这个夜间刺激，带来满足感。因为白日梦是一种与满足感密切相关的活动，实际上它只追求这个目的。

Not only this but other colloquial usages also express the same feeling. Well-known proverbs say, “The pig dreams of acorns, the goose of maize,” or ask, “Of what does the hen dream? Of millet.” So the proverb descends even lower than we do, from the child to the animal, and maintains that the content of a dream is the satisfaction of a need. Many turns of speech seem to point to the same thing—“dreamlike beauty,” “I should never have dreamed of that,” “in my wildest dreams I hadn't imagined that.” This is open partisanship on the part of colloquial usage. For there are also dreams of fear and dreams of embarrassing or indifferent content, but they have not been drawn into common usage. It is true that common usage recognizes “bad” dreams, but still the dream plainly connotates to it only the beautiful wish fulfillment. There is indeed no proverb that tells us that the pig or the goose dreams of being slaughtered.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俗语用法也体现了同样的意思。谚语有云：“猪梦橡果，鹅梦玉米。”或作如此问答，“母鸡梦到啥？梦到谷子啦。”谚语比我们还要接地气，对象从孩子降为动物，也主张梦的内容是对需求的满足。很多惯用说法似乎也说明了同一件事——“美如幻梦”、“黄粱美梦”、“痴人说梦”。这些习惯用语态度鲜明，但并不全

面。因为还有忧虑的梦、羞于启齿或无关痛痒的梦，但它们并不为俗语所涵盖。俗语中确有“噩”梦一说，但显然梦所暗示的只能是美好愿望的实现。不会有俗语告诉我们，猪鹅会梦到任人宰杀。

Of course it is unbelievable that the wish-fulfillment characteristic has not been noted by writers on the dream. Indeed, this was very often the case, but none of them thought of acknowledging this characteristic as universal and of making it the basis of an explanation of the dream. We can easily imagine what may have deterred them and shall discuss it subsequently.

当然，不可思议的是，将梦写下来的人均未意识到这一实现愿望的特征。事实上，极有可能的是，他们无人认为这个特征是普遍适用的，也没想到将其作为释梦的基础。我们可以轻易猜到阻止他们的原因，这个以后再谈。

See what an abundance of information we have gained, with almost no effort, from the consideration of children's dreams—the function of the dream as a guardian of sleep; its origin from two rival tendencies, of which the one, the longing for sleep, remains constant, while the other tries to satisfy a psychic stimulus; the proof that the dream is a significant psychic act; its two main characteristics: wish fulfillment and hallucinatory experience. And we were almost able to forget that we are engaged in psychoanalysis. Aside from its connection with errors our work has no specific connotation. Any psychologist, who is entirely ignorant of the claims of psychoanalysis, could have given this explanation of children's dreams. Why has no one done so?

通过研究儿童的梦，我们几乎毫不费力地获得了这么丰富的信息：梦的功能是守护睡眠；它起源于两个敌对倾向，其一为睡觉的持续渴望，其二为满足一个心理刺激的意图；梦是一个有意义的心理行动；它有两大特征：实现愿望和幻觉体验。我们几乎忘记自己在从事精神分析。除了它与过失的联系之外，我们的研究并无具体含义。任何对精神分析观点一无所知的心理学者都能对儿童的梦作如此解释。那为什么没有人这么做呢？

If there were only infantile dreams, our problem would be solved, our task accomplished, and that without questioning the dreamer, or approaching the unconscious, and without taking free associ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task plainly lies in this direction. We have already repeatedly had the experience that characteristics that at first seemed universally true, have subsequently held good only for a certain kind and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dreams. It is therefore for us to decide whether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which we have gathered from children's dreams can be applied universally, whether they also hold for those dreams that are not transparent, whose manifest content shows no connection with wishes left over from the previous day. We think that these dreams have undergone considerable distortion and for this reason are not to be judged superficially. We also suspect that for the explanation of this distortion we shall need the psychoanalytic method which we could dispense with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s dreams.

如果只存在婴儿型的梦，那么，无需询问做梦者，无需探寻潜意识内容，无需考虑自由联想，我们就解决了问题，完成了任务。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显然也要向此方向努力。我们已经反复体会到，一些乍看貌似普遍适用的特征只在某一类、或某些梦上成立。因此，我们要

确定，从儿童的梦中推断出的共性特征是否普遍适用，它们是否也适用于那些含混不清的梦，那些显意看似与白天遗留愿望无关的梦。我们认为，这些梦遭遇了相当大的变形，因此不可妄断。看来，为解释这个变形，我们需要一种精神分析手法，以施用于对儿童的梦的理解。

There is at any rate a class of dreams that are undistorted, and, just like children's dreams, are easily recognizable as wish fulfillments. It is those that are called up throughout life by the imperative needs of the body—hunger, thirst, sexual desire—hence wish fulfillments in reaction to internal physical stimuli. For this reason, I have noted the dream of a young girl, that consisted of a menu following her name (Anna F……, strawberry, huckleberry, egg-dish, pap), as a reaction to an enforced day of fasting on account of a spoiled stomach, which was directly traceable to the eating of the fruits twice mentioned in the dream. At the same time, the grandmother, whose age added to that of her grandchild would make a full seventy, had to go without food for a day on account of kidney-trouble, and dreamed the same night that she had been invited out and that the finest tid-bits had been set before her. Observations with prisoners who are allowed to go hungry, or with people who suffer privations on travels or expeditions, show that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dreams regularly deal with the satisfaction of these needs. Otto Nordenskjold, in his book *Antarctic* (1904), testifies to the same thing concerning his crew, who were ice-bound with him during the winter (Vol. 1, page 336).

不过，就像儿童的梦一样，至少有一类梦是未变形的，容易理解为实现愿望。这就是那些一生都有的迫切生理需求——饥饿、口渴、性欲引发的梦，也就是作为对内部生理刺激反应的愿望实现。由此，

我注意到一个小女孩的梦，其中有一个以她名字开头的菜单（安娜·F……草莓、越橘、鸡蛋、软食），因为她吃撑了胃，不得不禁食一天，起因正是吃了两次梦中提到的水果。同时，她奶奶（她的年龄跟孙女年龄加起来整70岁），因为肾病不得不全天禁食，她在同一晚上梦到应邀外出吃饭，面前摆满了美味佳肴。观察饥饿的囚犯，或遭遇困境的旅客、探险者会发现，在这些情况下的梦常常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奥托·诺登舍尔德在他1904年出版的著作《南极》中证实了他的队员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在冬天的冰天雪地里待在一起。

Very significant in determining the trend of our inmost thoughts were our dreams, which were never more vivid and numerous than just at this time. Even those of our comrades who ordinarily dreamed but seldom, now had long stories to tell, when in the morning we exchanged our latest experiences in that realm of phantasy. All of them dealt with that outside world that now was so far away from us, but often they fitted into our present condition. Food and drink were most often the pivots about which our dreams revolved. One of us, who excelled in going to great dinners in his sleep, was most happy whenever he could tell us in the morning that he attended a dinner of three courses; another one dreamed of tobacco, whole mountains of tobacco; still another dreamed of a ship that came along on the open sea, under full sail. One other dream deserves mention: The postman comes with the mail and gives a long explanation of why it is so late; he had delivered it to the wrong address and only after great trouble on his part had succeeded in getting it back. Of course one

occupies himself with even more impossible things in sleep, but in nearly all the dreams that I myself dreamed or heard tell of, the lack of phantasy was quite striking. It would surely be of great psychological interest if all these dreams were recorded.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how we longed for sleep, since it could offer us everything for which each one of us felt the most burning desire.

“深刻反映我们内心思想动态的是我们的梦乡，它们从来没有比此时此刻更生动、更频繁。我们每天早上会交流彼此在幻想国中的最新体验，即使那些平常不太做梦的战友现在也能滔滔不绝。它们都是关于如今离我们如此遥远的外部世界，但常常又是与我们当前的状况吻合的。食物和饮料是我们的梦所围绕的常驻主角。我们当中有一位，每当早上告诉我们说他吃了一顿三道菜的正餐时总是喜形于色的；另一位则梦见了香烟，满山满谷的香烟；还有一位梦见一艘船在公海上扯满风帆破浪前进。另一个梦很值得一提：邮差带来一份邮件，解释了一大通晚到的原因，他送到错误的地址，自己颇费周折地把它要回来。人在睡梦中肯定会想些更离奇的事情，但我梦到或是听人讲述的梦都缺乏想象力，令人咋舌。如果所有的梦都能得以记录下来，肯定会引起心理学的浓厚兴趣。我们盼望睡觉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它能满足我们每个人焦灼至极的欲望。”

I quote further from Du Prel.

我再引用杜·普瑞尔的话：

> Mungo Park, who during a trip in Africa was almost exhausted, dreamed without interruption of the fertile valleys and fields of his home. Trenck, tortured by hunger in the redoubt at Magdeburg, likewise saw himself surrounded by wonderful meals, and George Back, who took part in Franklin's first expedition, dreamed regularly and consistently of luxurious meals when, as a result of terrible privations, he was nearly dead of hunger.

> “芒戈·帕克在一次非洲旅途中几乎筋疲力尽，会不断地梦到家乡的肥沃山谷和田野。特伦克在马格德堡哨所中挨饿时，也在梦里看到自己被山珍海味包围。还有乔治·巴克参加了富兰克林的首次探险，途中食物严重匮乏，几乎要饿死，他就总是频频梦见自己在饱餐美食。”

A man who feels great thirst at night after enjoying highly seasoned food for supper, often dreams that he is drinking. It is of course impossible to satisfy a rather strong desire for food or drink by means of the dream; from such a dream one awakes thirsty and must now drink real water. The effect of the dream is in this case practically trifling, but it is none the less clear that it was called up for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the sleep in spite of the urgent impulse to awake and to act. Dreams of satisfaction often overcome needs of a lesser intensity.

一个人吃了重口味的晚饭，夜里感到很口渴时，经常会梦到在喝水。当然，只靠做梦是无法满足饮食这种强烈欲望的，从这类梦中醒来觉得口渴，就非要去喝真的水不可。梦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中的实际作用很小，但事实仍很清楚：它是为了维持睡眠而产生的，是为了抵制醒来行动的冲动。满足之梦经常能够克服较弱的欲求。

In a like mann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exual stimuli, the dream brings about satisfaction that shows noteworthy peculiarities. As a result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exual urge which makes it somewhat less dependent upon its object than hunger and thirst, satisfaction in a dream of pollution may be an actual one, and as a result of difficulties to be mentioned late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bject, it happens especially often that the actual satisfaction is connected with confused or distorted dream content. This peculiarity of the dream of pollution, as O. Rank has observed, makes it a fruitful subject to pursue in the study of dream distortion. Moreover, all dreams of desire of adults usually contain something besides satisfaction, something that has its origin in the sources of the purely psychic stimuli, and which requires interpretation to render it intelligible.

类似情况还有性欲刺激的影响，这类梦引发的满足感有些特性值得注意。性渴求比起饥饿、口渴等，对于客体的依赖性较小，因而梦遗的满足感可能是真实的，而且与客体有关的困难（以后会讲到）导致了一个特别常见的情况，即：梦遗的真实满足感是与含混或变形的梦境内容有关的。兰克观察到的梦遗这一特性，使得它成为研究梦的变形的有效对象。而且，成人的所有欲求的梦中，除了满足欲求，通常还包括其他因素，它们源自纯粹心理的刺激，需要就此解释、使其易于理解。

Moreover we shall not maintain that the wish-fulfillment dreams of the infantile kind occur in adults only as reactions to the known imperative desires. We also know of short clear dreams of this sor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ominating situations that arise from unquestionably psychic sources. As, for example, in dreams of impatience, whenever a person has made preparations for a journey, for a theatrical performance, for a lecture or for a visit, and now dreams of the anticipated fulfillment of his expectations, and so arrives at his goal the night before the actual experience, in the theatre or in conversation with his host. Or the well-named dreams of comfort, when a person who likes to prolong his sleep, dreams that he is already up, is washing himself, or is already in school, while as a matter of fact he continues sleeping, hence would rather get up in a dream than in reality. The desire for sleep which we have recognized as a regular part of the dream structure becomes intense in these dreams and appears in them as the actual shaping force of the dream. The wish for sleep properly takes its place beside other great physical desires.

此外，不要再认为，满足愿望的婴儿型的梦发生在成人身上，只是因为对已知的迫切需求作出了反应。我们知道也有此类清晰的短梦，影响它的主导条件毫无疑问来自于心理因素。比如关于“急躁之梦”：某人为旅行、戏剧表演、演讲或拜访做好准备，然后梦到他们如愿实现了所有期望，在真实经历前的夜里，就出现在剧院中，或与主人家聊天，先一步达成了自己的目标。或是美其名曰的“舒适之梦”：某人喜欢睡懒觉，他们梦到自己已经起床，在洗漱、或是已经在上课，其实他们还在呼呼大睡，比起实际行动，宁愿在梦里起床。我们认为，对睡眠的渴望是梦的结构中一个常态组成部分，它在这种梦中会得到强化，成为实际操控梦的力量。睡觉的愿望在重要生理需要中占有一席之地。

At this point I refer you to a picture by Schwind, from the Schack Gallery in Munich, so that you may see how rightly the artist has conceived the origin of a dream from a dominating situation. It is the *Dream of a Prisoner* , [4_1] which can have no other subject than his release. It is a very neat stroke that the release should be effected through the window, for the ray of light that awakens the prisoner comes through the same window. The gnomes standing one above the other probably represent the successive positions which he himself had to take in climbing to the height of the window, and I do not think I am mistaken or that I attribute too much preconcerted design to the artist, by noting that the uppermost of the gnomes, who is filing the grating (and so does what the prisoner would like to do) has the features of the prisoner.

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个施温德的画作，它来自慕尼黑沙克美术馆，大家可以看到画家如何准确地构思了一个主导情境下的梦。作品名称为《囚徒之梦》 [5_1] ，主旨就是梦见自己逃狱。画面笔触清晰地表明，逃狱的出口在窗户那里，因为阳光从窗口透入，将囚徒唤醒。那些一个叠一个站着的地精大概是代表他自己爬上窗户的高度应有的接续位置，而且我不认为自己看错了或是对画家意图牵强附会：在最上面锉窗格（这也是囚徒想做的）的地精跟囚徒长相一样。

In all other dreams except those of children and those of the infantile type, distortion, as we have said, blocks our way. At the outset we cannot ascertain whether they are also wish fulfillments, as we suspect; from their manifest content we cannot determine from what psychic stimulus they derive their origin, and we cannot prove that they also are occupied in doing away with the stimulus and in satisfying it. They must probably be interpreted, that is, translated; their distortion must be annulled; their manifest content

replaced by their latent thought before we can judge whether what we have found in children's dreams may claim a universal application for all dreams.

诚如我们之前所言，在探索除儿童的梦和婴儿型的梦以外的所有梦时，是梦的变形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起初不能确定，它们是否如我们猜想的那样也是实现愿望的梦，我们从它们的显意无法判定它们来源于什么样的心理刺激，无法证实它们也在试图去除和满足该刺激。只有对这些梦进行解释或转换，去除它们的变形，用它们的隐意替代显意后，我们才能认定，儿童的梦的那些规则普遍适用于所有的梦。

[4_1].This was the frontispiece in the original print edition. ED

[5_1].这是在原著中的卷首插图。

Ninth Lecture　Censor

第九讲　梦的审查

We have learned to know the origin,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dream from the study of children's dreams. *Dreams are the removal of sleep-disturbing psychic stimuli by way of hallucinated satisfaction.* Of adults' dreams, to be sure, we could explain only one group, what we characterized as dreams of an infantile type. As to the others we know nothing as yet, nor do we understand them. For the present, however, we have obtained a result whose significance we do not wish to under-estimate. Every time a dream is completely comprehensible to us, it proves to be a hallucinated wish-fulfillment. This coincidence cannot be accidental, nor is it an unimportant matter.

通过对儿童的梦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了梦的起因、性质和功能。梦是通过幻觉性满足，对搅扰睡眠的心理刺激的去除过程。 对于成人的梦，老实讲，我们只能解释一类我们称为婴儿型的梦。至于其他的梦我们尚不清楚，也未理解。不过，我们目前所获结论的重要性不容小觑。我们能完全理解每一个梦，它们是愿望的幻觉性实现。这种巧合不可能是偶然的，也不会是不重要的现象。

We conclude, on the basis of various considerations and by analogy to the conception of mistakes, that another type of dream is a distorted substitute for an unknown content and that it must first be led back to that content. Our next task is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dream distortion.

经过多元思考，并与过失概念进行类比后，我们得出结论：梦的另一类型是一种未知内容的变形替代物，因此它首先必须要被引导向那个内容。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研究和理解这种梦的变形。

Dream distortion is the thing which makes the dream seem strange and incomprehensible to us. We want to know several things about it; firstly, whence it comes, its dynamics; secondly, what it does; and finally, how it does it. We can say at this point that dream distort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dream work, that is, of the mental functioning of which the dream itself is the conscious symptom. Let us describe the dream work and trace it back to the forces which work upon it.

梦的变形是使得梦看似奇怪和难懂的祸首。我们要了解关于它的几件事：一、它从何而来，它的动力是什么；二、它做了些什么；三、它怎么做到的。我们现在可以说，梦的变形是梦的工作的产物，所谓梦的工作即一种心理机能运行，其自觉症状就是梦本身。我们来描述梦的工作，追究一下它的制约因素。

And now I shall ask you to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dream. It was recorded by a lady of our profession, and according to her, originated with a highly cultivated and respected lady of advanced age. No analysis of this dream was made. Our informant remarks that to a psychoanalyst it needs no interpretation. The dreamer herself did not interpret it, but she judged and condemned it as if she understood its interpretation. For she said concerning it: “That a woman of fifty should dream such abominable, stupid stuff—a woman who has no other thought, day and night, than to care for

her child!”

现在请大家听听以下的梦。它由我们一位同行女士记录，据她说是来自一位德高望重的年长女士。这个梦没有被分析过。我们的知情人说，对于精神分析学者而言，它无需解读。做梦者自己没有解释，但是她对此梦又是不屑又是谴责，仿佛她对它的解释早有了答案。因为她这样评价它：“一个年届五旬的女人，一个整天心无旁骛，只想着照顾孩子的女人竟然梦到如此恶劣、愚蠢的事情！”

And now follows the dreams of the “*services of love* .”

这样就引出了“爱的服务”之梦。

> She goes into Military Hospital No. 1, and says to the sentry at the gate, that she must speak to the chief physician … (she mentions a name which is not familiar to her), as she wants to offer her service to the hospital. She stresses the word “service,” so love services. Since she is an old lady he lets her pass after some hesitation. But instead of reaching the chief physician, she finds herself in a large somber room in which there are many officers and army doctors sitting and standing around a long table. She turns with her proposal to a staff doctor who, after a few words, soon understands her. The words of her speech in the dream are, “I and numerous other women and girls of Vienna are ready for the soldiers, troops, and officers, without

distinction….” Here in the dream follows a murmuring. That the idea is, however, correctly understood by those present she sees from the semi-embarrassed, somewhat malicious expressions of the officers. The lady then continues, “I know that our decision sounds strange, but we are in bitter earnest. The soldier in the field is not asked either whether or not he wants to die.” A moment of painful silence follows. The staff doctor puts his arm around her waist and says, “Madame, let us assume that it really came to that …” (murmurs). She withdraws from his arm with the thought, “They are all alike!” and answers, “My heavens, I am an old woman, and perhaps will never be confronted with that situation; one consideration, moreover, must be kept in mind: the consideration of age, which prevents an older woman from … with a very young boy … (murmurs) … that would be horrible.” The staff doctor, “I understand perfectly.” Several officers, among them one who had paid court to her in her youth, laugh loudly, and the lady asks to be conducted to the chief physician, whom she knows, so that everything may be arranged. At this she realizes with great dismay that she does not know his name. The staff officer, nevertheless, very politely and respectfully shows her the way to the second story, up a very narrow winding iron stairway which leads to the upper story directly from the door of the room. In going up she hears an officer say, “That is a tremendous decision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a woman is young or old; all honor to her!”

“她走进第一军医院，跟大门警卫说，她必须跟主任医师谈谈……（她说了一个她不熟悉的名字），因为她想为医院提供服务。她强调了‘服务’一词，所以是爱的服务。看她年事已高，警卫犹豫片刻后放她进去了。但是她没有去主任医师那里，而是进了一间昏暗的大屋子里，那儿有不少军官和医生围着一个长桌子或站或坐着。她跟一位医生说了她的提议，只说了几句，他就明白了。她在梦里说的话是：‘我和其他很多维也纳女人和女孩都乐意为军官们效劳，而且一视同仁……’梦里此处接了一声嘀咕。不过，她知道现场的人都对这个主意心领神会，因为军官们露出半是尴尬、半是不怀好意的神情。这位女士继续道：‘我知道我们的决定听着有点怪，但我们很有诚意。咱们的士兵可不是自愿去战场送死的。’跟着出现了片刻的艰涩沉默。那位医生搂住她的腰说道：‘夫人，我们猜如果真要……（嘀咕声）’她挣脱开他，心里想：‘他们都一副德性！’但嘴上回答：‘老天，我是老太婆了，大概不会碰到这个情况。不过必须注意这一条：要注意年龄，不能让年纪较大的女人和很年轻的男孩……（嘀咕声）……那太可怕了。’医生说：‘我非常理解。’几个军官笑得很大声，其中还有一个人在她年轻时追求过她。然后该女士求见她认识的主任医师，以便安排好一切。此刻她非常沮丧地意识到，自己不知道他的名字。不过那位军官非常恭敬有礼地带她去二楼，那个房间门口有一个极弯曲狭窄的铁楼梯直通楼上。她上楼时听见一个军官说：‘不管这个女人年不年轻，这都是个重大决定，向她致敬！’

With the feeling that she is merely doing her

duty, she goes up an endless staircase.

“她一面觉得自己只是在尽义务，一面爬着没有尽头的楼梯。”

This dream she repeats twice in the course of a few weeks, with—as the lady notices—quite insignificant and very senseless changes.

她在几个星期里反复做了这个梦，而且该女士意识到,只有一些很次要、极无意义的改动。

This dream corresponds in its structure to a day dream. It has few gaps, and many of its individual points might have been elucidated as to content through inquiry, which, as you know, was omitted. The conspicuous and interesting point for us, however, is that the dream shows several gaps, gaps not of recollection, but of original content. In three places the content is apparently obliterated, the speeches in which these gaps occur are interrupted by murmurs. Since we have performed no analysis, we have, strictly speaking, also no right to make any assertion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dream. Yet there are intimations given from which something may be concluded. For example, the phrase “services of love,” and above all the bits of speech which immediately precede the murmurs, demand a completion which can have but one meaning. If we interpolate these, then the phantasy yields as its content the idea that the dreamer is ready, as an act of patriotic duty, to offer her person for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rotic desires of the army,

officers as well as troops. That certainly is exceedingly shocking, it is an impudent libidinous phantasy, but—it does not occur in the dream at all. Just at the point where consistency would demand this confession, there is a vague murmur in the manifest dream, something is lost or suppressed.

这个梦的结构与白日梦是一致的。它漏洞不多，它有很多个人话语，其内容可以通过询问予以澄清，但大家都知道，并没有所谓的询问环节。然而，我们觉得有一点很明显、也很有意思，该梦体现了几个漏洞，不是回忆漏洞，而是原始内容的缺失。内容中有三处显然被删去了，有几句话被嘀咕声打断，出现了漏洞。由于没有进行分析，严格来讲，我们也无权妄议该梦的意义。但其中的暗示也许可以说明问题。比如，“爱的服务”这个短语，还有尤其是紧邻嘀咕声前的那些话，它们必能补全，而且只有一个意思。如果补全了这些话，该幻想的内容就展现了一个念头，即：做梦者愿意以爱国义务行动之名，为满足军中官兵的性需求而献身。这当然异常惊人，是一个不知羞耻、色欲熏心的幻想，但是——这个幻想完全没有出现在梦中。话若说全就会暴露心迹，每当此时，显梦中就出现含糊的嘀咕，有什么东西丢失或被压抑了。

I hope you will recognize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conclusion that it is the shocking character of these places in the dream that was the motive for their suppression. Yet where do you find a parallel for this state of affairs? In these times you need not seek far. Take up any political paper and you will find that the text is obliterated here and there, and that in its place shimmers the white of the paper. You know that that is the work of the newspaper censor. In these blank spaces something was printed which was not to the liking of the censorship authorities, and for that reason it was crossed out. You think that it is a pity, that it probably was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 it was “the best part.”

希望大家明白一个必然的结论：梦中这些地方有使人震惊的特征，这是它们受到压抑的动机。可大家从何处能找到类似情况呢？在如今的年代，大家无需往远处找。随便拿一张政治报章，就能发现文章删减之处比比皆是，露出惨白的报纸底色。大家知道这是拜报纸审查员所赐。这些空白处原先印好的内容入不了审查机关的法眼，因此被涂掉了。大家会很惋惜，因为那可能是最有趣的部分，是“最棒的内容”。

In other places the censorship did not touch the completed sentence. The author foresaw what parts might be expected to meet with the objection of the censor, and for that reason he softened them by way of prevention, modified them slightly, or contented himself with innuendo and allusion to what really wanted to flow from his pen. Thus the sheet, it is true, has no blank spaces, but from certain circumlocutions and obscurities of expression you will be able to guess that thoughts of the censorship were the restraining motive.

在其他情况下，审查机制不会去动写好的句子。撰文作者预见到哪些内容符合审查者禁止的标准，因此他未雨绸缪，先对它们进行软化、稍作修改，或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笔法替代原先想写的内容。这样，确实纸面上没有了空白，但从措辞上的委婉和隐晦，大家还是可以猜到审查顾虑是其抑制动机。

Now let us keep to this parallel. We say that the omitted dream speeches, which were disguised by a murmuring, were also

sacrifices to a censorship. We actually speak of a *dream censor* to which we may ascribe a contributing part in the dream distortion. Wherever there are gaps in the manifest dream, it is the fault of the dream censor. Indeed, we should go further, and recognize each time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dream censor, those places at which a dream element is especially faint, indefinitely and doubtfully recalled among other, more clearly delineated portions. But it is only rarely that this censorship manifests itself so undisguisedly, so naively one may say, as in the example of the dream of the "services of love." Far more frequently the censorship manifests itself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type,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weakenings, innuendoes, allusions instead of direct truthfulness.

现在让我们保留这个类比。梦中省略的话被伪装成了嘀咕声，可以说它也是审查行为的牺牲者。实际上我们将梦的变形的制造者之一叫做梦的审查 。显梦中的那些留白就是梦的审查造成的。白实际上还可以更进一步，对于梦元素显得特别微弱、不确定、记忆迟疑（相对于其他叙述较清晰的部分而言）的那些地方，都可以将其辨识为梦的审查的表现。但像在"爱的服务"之梦这个例子里，这种审查竟会如此不加掩饰地现身，这种情况很少见。更频繁出现的情形是，这种审查以第二种方式现身，即不坦白真相，而是用软化、影射和暗喻的方法。

For a third type of dream censorship I know of no parallel in the practice of newspaper censorship, yet it is just this type that I can demonstrate by the only dream example which we have so far analyzed. You will remember the dream of the "three bad theatre tickets for one florin and a half." In the latent thoughts of this dream, the element "*precipitately, too soon* ," stood in the foreground. It means: "It was foolish to marry so *early* , it was also

foolish to buy theatre tickets so *early* , it was ridiculous of the sister-in-law to spend her money so *hastily* , merely to buy an ornament." Nothing of this central element of the dream thought was evident in the manifest dream. In the latter, going to the theatre and getting the tickets were shoved into the foreground. Through this displacement of the emphasis, this regrouping of the elements of the content, the manifest dream becomes so dissimilar from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s that no one would suspect the latter behind the former. This displacement of emphasis is a favorite device of the dream distortion and gives the dream that strangeness which makes the dreamer himself unwilling to recognize it as his own production.

还有第三种梦的审查方式，在报纸审查活动中没有找到同类，但恰是该方式可以通过我们至今唯一分析过的梦予以论证。大家记得“一个半弗罗林买三张烂戏票”那个梦吧。在这个梦的隐意中，“贸然、过快”这一元素一目了然。它的意思是：“结婚这么早 很愚蠢，这么早 买戏票也很愚蠢，嫂子这么着急 花钱只为买件首饰太可笑。”这个心思的中心元素在显梦中毫不明显。显梦中最抢眼的是去戏院和买戏票。通过重心移置，即该内容元素的重新组合，显梦与隐意变得迥然不同，以致无人猜得到显梦背后的隐意。重心移置是梦的变形的常用手段，赋予梦以怪异色彩，连做梦者都不愿承认这是自己的杰作。

Omission, modification, regrouping of the material, these, then, are the effects of the dream censor and the devices of dream distortion. The dream censorship itself is the author, or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dream distortion whose investigation now occupies us. Modification and rearrangement we are already accustomed to summarize as *displacement* .

对素材进行删减、修改、重组，于是，它们就成为梦的审查效果和梦的变形手段。梦的审查自身就是梦的变形的作者、或作者之一，我们现在就在研究这些变形。我们习惯将修改和重组概括为移置 。

After these remarks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the dream censor, let us now turn to their dynamics. I hope you will not consider the expression too anthropomorphically, and picture the dream censor as a severe little manikin who lives in a little brain chamber and there performs his duties; nor should you attempt to localize him too much, to think of a brain center from which his censoring influence emanates, and which would cease with the injury or extirpation of this center. For the present, the term “dream censor” is no more than a very convenient phrase for a dynamic relationship. This phrase does not prevent us from asking by what tendencies such influence is exerted and upon which tendencies it works; nor will we be surprised to discover that we have already encountered the dream censor before, perhaps without recognizing him.

说过梦的审查的效果后，我们再转到他们的动向上。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表述想得太拟人化，把梦的审查想象成一个凶悍的小矮人，住在大脑小屋中，行使着自己的职责；也不要太具象化地想象，他的审查影响力从大脑中枢扩散出来，当该中枢受伤或消失时才会终止。“梦的审查”这一术语目前只是为了很方便地称呼一个动态关系而已。我们不要为这个词组束了手脚，不敢去问这种倾向是从哪些方向上施加的；而且我们之前已经遇到过梦的审查了，也许只是当时没感觉到而已，我们对此也不要大惊小怪。

For such was actually the case. You will remember that we had

a surprising experience when we began to apply our technique of free association. We then began to feel that some sort of a resistance blocked our efforts to proceed from the dream element to the unconscious element for which the former is the substitute. This resistance, we said, may be of varying strength, enormous at one time, quite negligible at another. In the latter case we need cross only a few intermediate steps in our work of interpretation. But when the resistance is strong, then we must go through a long chain of associations, are taken far afield and must overcome all the difficulties which present themselves as critical objections to the association technique. What we met with in the work of interpretation, we must now bring into the dream work as the dream censor. The resistance to interpretation is nothing but the objectivation of the dream censor. The latter proves to us that the force of the censor has not spent itself in causing the dream distortion, has not since been extinguished, but that this censorship continues as a permanent institu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preserving the distortion. Moreover, just as in the interpretation the strength of the resistance varied with each element, so also the distortion produced by the censor in the same dream is of varying magnitude for each element. If one compares the manifest with the latent dream one sees that certain isolated latent elements have been practically eliminated, others more or less modified, and still others left unchanged, indeed, have perhaps been taken over into the dream content with additional strength.

因为确实如此。大家记得，我们开始运用自由联想的技巧时，曾经有一个令人称奇的体验。我们当时发现，某种抗力阻挡着我们从梦元素向潜意识元素探索，这里前者是后者的替代物。我们曾说，这种抗力的力量是可变的，时重时轻。抗力轻的情况下，我们在释梦过程中只需跨过几个过渡台阶。但当抗力强劲时，我们不得不经历连续持

久的联想，被带到遥远的地方，必须克服联想技巧的批判性异议所设置的障碍。我们在释梦工作中遭遇的困难，就是现在梦的工作中的这个梦的审查。释梦的抗力不过是客体化了的梦的审查。后者向我们证明，审查力量并未亲自引发梦的变形，也并没有自此消失，而是该审查继续作为变形的永久维护者存在。而且，正像抗力的强度随每个元素变化一样，同一个梦的审查产生的变形在每个元素上也是力度不一的。比较显梦和隐意会发现，某些孤立的隐意元素事实上已被消除，其他或多或少地被修改了，但仍有一些保持不变，而且实际很可能在梦的内容中表现得更强势。

But we wanted to discover what purposes the censorship serves and against which tendencies it acts. This question, which is fundamental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ream, indeed perhaps to human life, is easily answered if we look over a series of those dreams which have been analyzed. The tendencies which the censorship exercises are those which are recognized by the waking judgment of the dreamer, those with which he feels himself in harmony. You may rest assured that when you reject an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of a dream of your own, you do so with the same motives with which the dream censor works, the motives with which it produces the dream distortion and makes the interpretation necessary. Recall the dream of our fifty-year old lady. Without having interpreted it, she considers her dream abominable, would have been still more outraged if our informant had told her anything about the indubitable meaning; and it is just on account of this condemnation that the shocking spots in her dream were replaced by a murmur.

但我们想要发现审查的工作目的，以及它的行动所对抗的倾向。这一问题对于理解梦、甚或人类生活都十分重要，通过审视已经分析

过的一系列梦，答案不难找到。我们认为审查所修理的倾向经过了做梦者的清醒判断，是那些令他们感到舒适的想法。大家必须相信，当你不认可对自己的梦的正确解释时，你的动机与梦的审查的一样，那是它制造梦的变形的动机，也是必须释梦的原因。回想一下那位50岁的年长女士。由于没有解释，她认为她的梦很无耻，要是知情人把那个不容置疑的意思透露给她，她还会更加恼怒，而正是基于这种反感心态，她梦中那些惊人之处才被嘀咕声取代了。

The tendencies, however, against which the dream censor directs itself, must now be describ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is instance. One can say only that these tendencies are of an objectionable nature throughout, that they are shocking from an ethical, aesthetic and social point of view, that they are things one does not dare even to think, or thinks of only with abhorrence. These censored wishes which have attained to a distorted expression in the dream, are above all expressions of a boundless, reckless egoism. And indeed, the personal ego occurs in every dream to play the major part in each of them, even if it can successfully disguise itself in the manifest content. This *sacro egoismo* of the dream is surely not unconnected with the sleep-inducing cessation of psychic activity which consists, it should be noted, in the withdrawal of interest from the entire external world.

然而，按照这样的观点，现在必须对梦的审查所反对的倾向予以描述。可以说，这些倾向自始至终都是反抗性的，它们从伦理、审美或社会的角度看是惊世骇俗的，它们是一些人想都不敢想、或只能憎恶地去想的事情。这些愿望被审查后，在梦中化为变形的表达，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无底限、无节制的自我私欲的表达形式。而且实际上，个人私欲在每个梦中都有出现，都扮演了主要角色，即便它成功地隐身于显意中。这种梦的神圣个人主义 肯定与诱发睡眠的心理活动休止

（应该注意到，它主要是暂停关注整个外界）不无联系。

The ego which has been freed of all ethical restraints feels itself in accord with all the demands of the sexual striving, with those demands which have long since been condemned by our aesthetic rearing, demands of such a character that they resist all our moral demands for restraint. The pleasure-striving—the libido, as we term it—chooses its objects without inhibitions, and indeed, prefers those that are forbidden. It chooses not only the wife of another, but, above all, those incestuous objects declared sacred by the agreement of mankind—the mother and sister in the man's case, the father and brother in the woman's. Even the dream of our fifty-year old lady is an incestuous one, its libido unmistakably directed toward her son. Desires which we believe to be far from human nature show themselves strong enough to arouse dreams. Hate, too, expends itself without restraint. Revenge and murderous wishes toward those standing closest to the dreamer are not unusual, toward those best beloved in daily life, toward parents, brothers and sisters, toward one's spouse and one's own children. These censored wishes seem to arise from a veritable hell; no censorship seems too harsh to be applied against their waking interpretation.

这一自我挣脱了所有伦理束缚，融合了所有性渴望的需求、所有长期为审美教养所诟病的需求、那些本能抵制道德约束的需求。对快感的追求——我们称为“力比多”——会百无禁忌地选择对象，事实上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禁忌对象。它不仅会选择他人的妻子，而且最有可能会选择世人均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伦对象——对男子来说选择母亲和姐妹，对女子来说选择父亲和兄弟。即使是我们那位五旬老妇的梦也是乱伦的，其中的“力比多”明显指向了她的儿子。我们认为与人性相去甚远的那些欲望，强到足以引发梦境。仇恨也能无限制地扩

大。做梦者对于至亲之人的报仇和谋杀念头并不罕见，对象可以是那些平常挚爱的人，是父母、兄弟姐妹、自己的配偶或孩子。这些被审查的愿望似乎来自名副其实的地狱，清醒后若理解其意，则再严厉的审查制裁也不为过分。

But do not reproach the dream itself for this evil content. You will not, I am sure, forget that the dream is charged with the harmless, indeed the useful function of guarding sleep from disturbance. This evil content, then, does not lie in the nature of the dream. You know also that there are dreams which can be recognized as the satisfaction of justified wishes and urgent bodily needs. These, to be sure, undergo no dream distortion. They need none. They can satisfy their function without offending the ethical and aesthetic tendencies of the ego. And will you also keep in mind the fact that the amount of dream distortion is proportional to two factors. On the one hand, the worse the censorable wish, the greater the distortion;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the stricter the censor himself is at any particular time the greater the distortion will be also. A young, strictly reared and prudish girl will, by reason of those factors, disfigure with an inexorable censorship those dream impulses which we physicians, for example, and which the dreamer herself ten years later, would recognize as permissible, harmless, libidinous desires.

但请勿因为这个邪恶内涵而归咎于梦本身。我相信大家没有忘记，梦所承担的乃是驱除干扰、守护睡眠这一无害、其实有益的职责。那么这个邪恶的内涵并不属于梦的性质。大家也知道，也有些梦被定性为对正当愿望和迫切生理需求的满足。诚然，这些梦没有遭遇变形。它们不需要。它们无需违抗自我的伦理、审美倾向，便能行使职责。而且大家也要牢记这一事实：梦的变形程度与两个因素成正

比。一方面，受审查的愿望越恶劣，变形就越大；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特定时间，审查本身越严格，变形也越大。因为这些因素，一个家教严厉、个性拘谨的年轻女孩，以严苛的审查手段把她梦中的悸动修改得面目全非，而这些在我们医生看来，或是十年以后的做梦者看来，都是些可以谅解、无伤大雅的“力比多”之欲。

Besides, we are far from being at the point where we can allow ourselves to be shocked by the results of our work of interpretation. I think we are not yet quite adept at it; and above all there lies upon us the obligation to secure it against certain attacks. It is not at all difficult to “find a hitch” in it. Our dream interpretations were made on the hypotheses we accepted a little while ago, that the dream has some meaning, that from the hypnotic to the normal sleep one may carry over the idea of the existence at such times of an unconscious psychic activity, and that all associations are predetermined. If we had come to plausible resul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hypotheses, we would have been justified in concluding that the hypotheses were correct. But what is to be done when the results are what I have just pictured them to be? Then it surely is natural to say, “These results are impossible, foolish, at least very improbable, hence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hypotheses. Either the dream is no psychic phenomenon after all, o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unconscious mental activity in the normal condition, or our technique has a gap in it somewhere. Is that not a simpler and more satisfying conclusion than the abominations which we pretend to have disclosed on the basis of our suppositions?”

另外，我们还远未到被释梦工作的结果震惊的地步。我觉得我们尚未精于此道，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义务来抵御某些攻击。被人“抓

到把柄”并非难事。我们的释梦是基于不久前我们认可的假说，即：梦有某种意义；催眠状态下存在潜意识心理活动的观点也适用于正常睡眠；所有联想都预先受到了限定。如果我们在这些假说基础上得出貌似合理的结果，那么就理当可以推论假说也是正确的了。但要是结果像我刚才形容的那样，这时又该作何打算？自然应该说：“这些结果不可理喻、愚蠢到家了，至少是很不可能，因此问题一定出在假说上。要么梦根本不是心理现象，要么在正常情况下没有所谓潜意识心理活动，要么就是我们的技巧有什么漏洞。比起我们在假定的基础上自以为揭开了的那些丑恶情节，这个结论难道不是更简单、更令人心安吗？”

Both, I answer. It is a simpler as well as a more satisfying conclusion, but not necessarily more correct for that reason. Let us take our time, the matter is not yet ripe for judgment. Above all we can strengthen the criticism against our dream interpretation still further. That its conclusions are so unpleasant and unpalatable is perhaps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A stronger argument is the fact that the dreamers to whom we ascribe such wish-tendencies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dreams reject the interpretations most emphatically, and with good reason. “What,” says the one, “you want to prove to me by this dream that I begrudged the sums which I spent for my sister's trousseau and my brother's education? But indeed that can't be so. Why I work only for my sister, I have no interest in life but to fulfill my duties toward her, as being the oldest child, I promised our blessed mother I would.” Or a woman says of her dream, “You mean to say that I wish my husband were dead! Why, that is simply revolting, nonsense. It isn't only that we have the happiest possible married life, you probably won't believe me when I tell you so, but his death would deprive me of everything else that I own in the world.” Or another will tell us, “You mean that I have sensual desires toward my sister? That is

ridiculous. I am not in the least fond of her. We don't get along and I haven't exchanged a word with her in years.” We might perhaps ignore this sort of thing if the dreamers did not confirm or deny the tendencies ascribed to them; we could say that they are matters which the dreamers do not know about themselves. But that the dreamers should feel the exact opposite of the ascribed wish, and should be able to prove to us the dominance of the opposite tendency—this fact must finally disconcert us. Is it not time to lay aside the whole work of the dream interpretation as something whose results reduce it to absurdity?

我会回答：都有可能。这个结论更简单、也更令人心安，但未必由此就是正确的。我们先别急，这个问题尚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能进一步刺激人们批判我们的释梦。结论如此讨厌和恶心，这个理由也许还在其次。更强有力的论据是，我们通过释梦向做梦者指出了这些愿望倾向，他们对这些解释竭力否认，而且振振有词：“什么？”有人说，“你想用这个梦跟我证明，我心疼为妹妹结婚和弟弟上学用的钱？这真的不可能。我工作只为了弟妹，我的人生除了尽责照顾他们，没其他兴趣爱好。因为我是长子，我答应过去世的老妈。”或者一个女人这么谈论她的梦：“你想说，我宁愿我老公死掉！哎呀，这太可恶了，简直胡说八道。我们的婚姻生活很幸福，而且说了你也许不信，他一死我什么都没了。”或者另一位告诉我们：“你的意思是我对我妹妹有性方面的想法？太荒唐了。我对她全无好感。我们合不来，好几年没说过一句话。”做梦者若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些归于他们的倾向时，我们可以不去计较，这些情况或许是做梦者自己所不了解的。但如果做梦者的感觉恰好与被归属的愿望相反，而且能向我们证明，起主导作用的是相反的那个倾向——这一事实最终必然会令我们陷入窘境。既然释梦工作的结果令其空余荒谬，是不是该将其全然抛弃呢？

By no means; this stronger argument breaks down when we attack it critically. Assuming that there are unconscious tendencies in the psychic life, nothing is proved by the ability of the subject to show that their opposites dominate his conscious life. Perhaps there is room in the psychic life even for antithetical tendencies, for contradictions which exist side by side, yes, possibly it is just the dominance of the one impulse which i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unconsciousness of its opposite. The first two objections raised against our work hold merely that the results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are not simple, and very unpleasant. In answer to the first of these, one may say that for all your enthusiasm for the simple solution, you cannot thereby solve a single dream problem. To do so you must make up your mind to accept the fact of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And to the second of these objections one may say that you are obviously wrong to use a preference or a dislike as the basis for a scientific judgment.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if the results of the dream interpretation seem unpleasant, even embarrassing and disgusting to you? “That doesn't prevent them from existing,” as I used to hear my teacher Charcot say in similar cases, when I was a young doctor. One must be humble, one must keep personal preferences and antipathies in the background, if one wishes to discover the realities of the world. If a physicist can prove to you that the organic life of this planet must,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ecome completely extinct, do you also venture to say to him, “That cannot be so. This prospect is too unpleasant.” On the contrary, you will be silent until another physicist proves some error in the assumptions or calculations of the first. If you reject the unpleasant, you are repeating the mechanism of dream construction instead of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it.

绝不能放弃。这个强有力的理由，只需批判性地回击，便可瓦

解。假设心理生活中存在潜意识倾向，研究对象并不能证明他们的反对倾向主导了他们的意识生活。也许心理生活甚至会为对立的倾向、那些并存的矛盾留有余地，对，或许正是由于一种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才使得与其相反的倾向落入了潜意识的范畴。对我们的工作提出的前两个异议，只是在释梦结果不简单且很讨厌时才有成立的可能。回复第一个异议，可以这么说：如果执迷于追求简单的解决之道，那就无法解决任何梦的问题。要解决问题，则必须接受个中关系复杂的现实。回答第二个异议，可以说：用一己喜恶作为科学判断的标准，显然是错误的。即便释梦结果对你而言不太讨喜，甚至难为情、恶心，那又有何差别？“这并不代表它们不存在。”我年轻时行医，常听老师沙尔克这么说。若想发现世界的真相，就必须心怀谦卑，将个人喜恶置于脑后。假如一位物理学家可以证明这个星球的有机生命将在短时间内完全灭绝，你是不是也会冒昧地对他们说：“这不可能。这个预言太不讨喜了。”相反，你会保持沉默，直到另一位物理学家证明第一位的推测或计算有误。否定讨厌的结论，其实就是在重复梦的形成机制，而不是理解和掌握它。

Perhaps you will promise to overlook the repulsive character of the censored dream-wishes, and will take refuge in the argument that it is improbable, after all, that so wide a field be given over to the evil in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But does your own experience justify you in saying that? I will not discuss the question of how you may estimate yourselves, but have you found so much good will among your superiors and rivals, so much chivalry among your enemies, so little envy in their company, that you feel yourselves in duty bound to enter a protest against the part played by the evil of egoism in human nature? Are you ignorant of how uncontrolled and undependable the average human being is in all the affairs of sex life? Or do you not know that all the immoralities and excesses of which we dream nightly are crimes committed daily by waking persons? What else does psychoanalysis do here but confirm the old

saying of Plato, that the good people are those who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dreaming what the others, the bad people, really do?

被审查的梦的愿望所具有的可恶特点，大家也许可以释怀，却又提出另一论点，即：再怎么说，人性中恶的方面也不可能如此广泛。但以大家的个人经验看，这种说法合理吗？且不谈各人的自我评价，试问你的优胜者和对手有多少善意，你的敌人有多少风范，他们多么不善妒，以致你认为，要义不容辞地否认邪恶人性私欲的存在？大家不知道普通人在性事上是多么不节制、不靠谱吗？还有，大家不明白我们夜梦中的那些失德放纵行为，不就是清醒的人们每天都在犯的罪行吗？精神分析证明了柏拉图的一句老话，即：好人止于梦，恶人犯现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

And now turn your attention from the individual case to the great war devastating Europe. Think of the amount of brutality, the cruelty and the lies allowed to spread over the civilized world. Do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a handful of conscienceless egoists and corruptionists could have succeeded in setting free all these evil spirits, if the millions of followers did not share in the guilt? Do you dare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o break a lance for the absence of evil from the psychic constitution of mankind?

现在大家把注意力转向蹂躏欧洲的这场大战（指一战）。想想在文明世界横行的暴行、冷血和谎言。大家真的认为，仅凭一小撮没有良知的自大分子和败类就能释放所有邪恶心灵，而上百万的追随者并无过错吗？在这些情况下，大家敢争辩说，人类心理体系中不存在邪恶吗？

You will reproach me with judging the war one-sidedly, you will say that it has also brought forth all that is most beautiful and noble in mankind, its heroic courage, its self-sacrifice, its social feeling. Certainly, but do not at this point allow yourselves to become guilty of the injustice which has so often been perpetrated against psychoanalysis, of reproaching it with denying one thing because it was asserting another. It is not our intention to deny the noble strivings of human nature, nor have we ever done anything to deprecate their value. On the contrary, I show you not only the censored evil dream-wishes, but also the censor which suppresses them and renders them unrecognizable. We dwell on the evil in mankind with greater emphasis only because others deny it, a method whereby the psychic life of mankind does not become better, but merely incomprehensible. When, however, we give up this one-sided ethical estimate, we shall surely be able to find a more accurate formula for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evil to the good in human nature.

大家会埋怨我片面看待这场战争，会说它也激发了人类所有最美好、最高贵的品质，如英雄气概、自我牺牲、社会意识等。这当然不错，但大家不要因此认同精神分析常常受到的不公正评价，即由于它提出一个主张就指责它在否认其他的观点。我们无意否认人性的崇高追求，也从未试图贬损它们的意义。相反地，我不仅向大家说明了受到审查的邪恶的愿望，也说明了压抑并屏蔽它们的审查行为。我们更着重讨论人性之恶，只是因为他人予以否认，这种态度不会使人类心理生活得到改善，而只是令人费解。但是，当我们放弃片面的伦理成见时，就必然可以为人性中的恶向善转化找到一剂良方。

And thus the matter stands. We need not give up the conclusions to which our labors in dream interpretation lead us

even though we must consider those conclusions strange. Perhaps we can approach their understanding later by another path. For the present, let us repeat: dream distortion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censorship practised by accredited tendencies of the ego against those wish-impulses that are in any way shocking, impulses which stir in us nightly during sleep. Why these wish-impulses come just at night, and whence they come—these are questions which will bear considerable investigation.

这样，问题仍可成立。我们无需放弃在释梦中费尽心力达到的结论，即便我们觉得这些结论不寻常。也许我们以后可以用另一条途径去理解它们。目前，我们只需再次归纳：梦的变形是一种审查的结果，审查者是自我的可信倾向，被审查的是那些无论如何都令人震惊的愿望冲动，那些在夜晚睡眠时惊扰心灵的冲动。为什么这些愿望冲动只在夜间出现，它们从何而来，这些问题都需要缜密的研究。

It would be a mistake, however, to omit to mention, with fitting emphasis, another result of these investigations. The dream wishes which try to disturb our sleep are not known to us, in fact we learn of them first through the dream interpretation. Therefore, they may be described as “at that time” unconscious in the sense above defined. But we can go beyond this and say that they are more than merely “at that time” unconscious. The dreamer to be sure denies their validity, as we have seen in so many cases, even after he has learned of their existence by means of the interpretation. The situation is then repeated which we first encounter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ongue slip “hiccough” where the toastmaster was outraged and assured us that neither then nor ever before had he been conscious of disrespectful impulse toward his chief. This is repeated with every interpretation of a

markedly distorted dream, and for that reason attains a significance for our conception. We are now prepared to conclude that there are processes and tendencies in the psychic life of which one knows nothing at all, has known nothing for some time, might, in fact, perhaps never have known anything. The unconscious thus receives a new meaning for us; the idea of “at present” or “at a specific time” disappears from its conception, for it can also mean *permanently* unconscious, not merely *latent at the time* . Obviously we shall have to learn more of this at another session.

不过，这些研究还有一个结论，不适当地提到它是不对的。企图搅扰我们睡眠的愿望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实际上我们从释梦中才得知它们。因此，按照上述界定，它们可以被形容为“暂时”潜意识。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认为它们不只是“暂时”潜意识。正如我们在太多例子中所见到的，即便做梦者从释梦中得知它们的存在后，他们当然还是会否认它们的真实性。此情此景，又回到我们第一次在解释“干咳”那个口误时碰到的情况，那位致祝酒词者火冒三丈，一口咬定他从没对长官有过不敬的想法。这种情形在解释每个明显变形的梦时都会出现，因此对我们的观念也具有一定意义。我们现在可以下结论了，心理生活中有一些过程和倾向，本人完全不知道，或有段时间不知道，或其实也许从来都不知道。于是，潜意识于我们而言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关于“当前”或“特定时间”的说法不再适用于潜意识的观念，因为它也可能意味着永久 潜意识，不仅是暂时潜伏 。显然，我们要再花一节课讲这个。

Tenth Lecture　Symbolism in the Dream

第十讲　梦的象征意义

We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distortion of dreams, a disturbing element in our work of understanding them, is the result of a censorious activity which is directed against the unacceptable of the unconscious wish-impulses. But, of course, we have not maintained that censorship is the only factor which is to blame for the dream distortion, and we may actually make the discovery in a further study of the dream that other items play a part in this result. That is, even if the dream censorship were eliminated we might not be in a position to understand the dreams; the actual dream still might not be identical with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

我们已经知道，梦的变形是在理解梦的过程中的干扰元素，是审查活动的结果（针对那些潜意识愿望冲动中的禁忌内容）。但是，我们当然不认为审查是梦的变形的唯一原因，实际上，我们在深入研究梦之后，发现这个结果还有其他影响因素。也就是说，即使去除了梦的审查，我们也未必能够理解梦，实际上的梦可能仍然与梦的隐意不一致。

This other item which makes the dream unintelligible, this new addition to dream distortion, we discover by considering a gap in our technique. I have already admitted that for certain elements of the dream, no associations really occur to the person being analyzed. This does not happen so often as the dreamers maintain; in many cases the association can be forced by persistence. But still

there are certain instances in which no association is forthcoming, or if forced does not furnish what we expected. When this happens in the course of a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then a particular meaning may be attached thereto, with which we have nothing to do here. It also occurs, however,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eams of a normal person or in interpreting one's own dreams. Once a person is convinced that in these cases no amount of forcing of associations will avail, he will finally make the discovery that the unwished-for contingency occurs regularly in certain dream elements, and he will begin to recognize a new order of things there, where at first he believed he had come across a peculiar exception to our technique.

要发现这个使梦难解的因素、这个使梦变形的另一原因，我们要探究释梦技巧中的一个漏洞。我早已承认，对于梦的某些元素，被分析者其实没有任何联想。但这个情况并不像做梦者所认为的那样频繁地发生，在很多案例中通过分析者的坚持施压，联想仍可引发。但还是存在一些情况，联想总不出现，或是施压所获不理想。当精神分析治疗中发生这种情况，伴随而来的可能是某种特殊意义，与我们目前的研究无关。不过，在解释正常人的梦或本人的梦时也会发生此类情况。在这些案例中，如果分析者相信，即使坚持施压也产生不了任何联想，他们最终会发现这种不受欢迎的意外经常出现在某些梦元素中，他们原本以为这是释梦技巧的特例，但渐渐地发现这里有一种新规则。

In this way we are tempted to interpret these silent dream elements ourselves, to undertake their translation by the means at hand. The fact that every time we trust to this substitution we obtain a satisfactory meaning is forced upon us; until we resolve upon this decision the dream remains meaningless, its continuity is

broken. The accumulation of many similar cases tends to give the necessary certainty to our first timid attempts.

这样，我们就忍不住想自己去解释这些沉默的梦元素，用现成的方法去转换它们。每当我们坚信这个转换方法时，总能获得尽如人意的意义，这令人不得不服；要是不下定决心这么做，梦就仍是毫无意义、缺乏连贯性的。我们刚开始尝试时不免迟疑不定，在许多类似案例陆续得以确认后，心中便笃定起来。

I am expounding all this in rather a schematic manner, but this is permissible for purposes of instruction, and I am not trying to misstate, but only to simplify matters.

我现在会提纲挈领地讲解一下这一方法，这是教学目标所允许的，只是为了简化问题，但不至于引起误解。

In this manner we derive constant translations for a whole series of dream elements just as constant translations are found in our popular dream books for all the things we dream. But do not forget that in our association technique we never discover constant substitutes for the dream elements.

这一方法是，我们要像通俗的释梦书籍那样，对一整系列的梦元素作出固定解读。但别忘记，我们在联想技巧中从未发现梦元素有固定替代物。

You will say at once that this road to interpretation appears far more uncertain and open to objection than the former methods of free association. But a further fact is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fter one has gathered a sufficient number of such constant substitutes empirically, he will say that of his own knowledge he should actually have denied that these items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could really be understood without the associations of the dreamer. The facts that force us to recognize their meaning will appear in the second half of our analysis.

大家马上会说，这条释梦之路看起来比起前面的自由联想法更不确定，且更容易遭到非议。但大家要考虑另一个事实。如果有人实际上收集到了足够多的固定解读，他会惊觉，若仅凭原先的认知，他怎么也不会相信：即使没有做梦者的联想，这些释梦内容也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是什么使我们认识到其中的意义，我们下半节课再讲。

We call such a const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a dream element and its interpretation *symbolic* . The dream element is itself a *symbol* of the unconscious dream thought. You will remember that previously, when we were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eam elements and their actuality, I drew three distinctions, viz., that of the part of the whole, that of the allusion, and that of the imagery. I then announced that there was a fourth, but did not name it. This fourth is the symbolic relationship here introduced. Very interesting discussions center about this, and we will now consider them before we express our own particular observations on symbolism. Symbolism is perhaps the most noteworthy chapter of dream study.

我们把梦元素及其解释的固定关系称为象征性 。梦元素本身就是潜意识隐意的象征。大家记得以前我们研究梦元素及其实质意义的关系时，我提出了三种关系，即：部分之于整体、暗喻及意象。我还说过有第四种关系，但我没有指出来。第四个就是这里介绍的象征性关系。围绕这个话题有一些很有趣的讨论，我们现在先来看看，然后再来阐述我们自己关于象征意义的独特研究成果。象征意义大概是梦的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章。

In the first place, since symbols are permanent or constant translations, they realize, in a certain measure, the ideal of ancient as well as popular dream interpretation, an ideal which by means of our technique we had left behind. They permit us in certain cases to interpret a dream without questioning the dreamer who, aside from this, has no explanation for the symbol. If the interpreter is acquainted with the customary dream symbols and, in addition, with the dreamer himself,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latter lives and the impressions he received before having the dream, it is often possible to interpret a dream without further information—to translate it “right off the bat.” Such a trick flatters the interpreter and impresses the dreamer; it stands out as a pleasurable incident in the usual arduous course of cross-examining the dreamer. But do not be misled. It is not our function to perform tricks.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a knowledge of symbols is not a technique that can replace the associative technique, or even compare with it. It is a supplement to the associative technique, and furnishes the latter merely with transplanted, usable results. But as regards familiarity with the dreamer's psychic situation, you must consider the fact that you are not limited to interpreting the dreams of acquaintances; that as a rule you are not acquainted with the daily occurrences which act as the stimuli for the dreams, and that the associations of the subject furnish you with a knowledge of that

very thing we call the psychic situation.

首先，由于象征意义是永久或固定的解释，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古代和大众释梦的理想目标一致，是我们释梦技巧曾经遗漏的理想目标。有了它们，我们在某些案例中不用询问做梦者就可以释梦，不这样的话，做梦者不可能解释出该象征意义。如果释梦者熟悉常规的象征意义，并且熟悉做梦者本人、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做梦前给人的印象，则常有可能无需其他信息便可释梦——“立时三刻”能作出解释。这个招数让释梦者很得意，令做梦者刮目相看，比起通常对做梦者进行交叉询问的艰巨任务，这个方法很亮眼，不啻为一次意外惊喜。但别被误导了。我们的任务可不是耍花招。基于象征意义知识的释梦不能替代联想技巧，甚至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它是对联想技巧的一个补充，只是为其提供借鉴的、可用的结果。但是，有关对做梦者心理状况的熟悉程度，大家要明白，我们不只是解释熟人的梦，一般来说我们并不熟悉日常发生的梦的刺激，而研究对象的联想会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称为心理状况的东西。

Furthermore, it is very extraordinary, particularly in view of circumstances to be mentioned later, that the most vehement opposition has been voiced against the existence of the symbol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ream and the unconscious. Even persons of judgment and position, who have otherwis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psychoanalysis, have discontinued their support at this point. This is the more remarkable since, in the first place, symbolism is neither peculiar to the dream nor characteristic of it, and since in the second place, symbolism in the dream was not discovered through psychoanalysis, although the latter is not poor otherwise in making startling discoveries. The discoverer of dream symbolism, if we insist on a discovery in modern times, was the philosopher K. A. Scherner (1861). Psychoanalysis affirmed Scherner's discovery and

modified it considerably.

不仅如此，很令人咋舌的是，针对梦与潜意识之间的象征性关系，反对声音极为强烈，其原因我们后面会提到。那些有判断力、有地位的人，即使对精神分析已有相当认同，在这一点上也不再赞成。说这令人吃惊更是因为：其一，象征意义对于梦及其特征而言并不算特别；其二，尽管精神分析不乏令人愕然的发现，梦的象征意义并不是精神分析的发现。如果一定要说是现代的发现，那梦的象征意义，应是1861年哲学家施尔纳发现的。精神分析学确认了施尔纳的发现，并做了相当大的修正。

Now you will want to know something of the nature of dream symbolism, and to hear some examples. I shall gladly impart to you what I know, but I admit that our knowledge is not so complete as we could desire it to be.

现在大家想要知道梦的象征意义的本质、听一些例子。我乐意将所知传授给大家，但我要承认，我们的认识尚未达到期望。

The nature of the symbol relationship is a comparison, but not any desired comparison. One suspects a special prerequisite for this comparison, but is unable to say what it is. Not everything to which we are able to compare an object or an occurrence occurs in the dream as its symbol; on the other hand, the dream does not symbolize anything we may choose, but only specific elements of the dream thought. There are limitations on both sides.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 idea of the symbol cannot be sharply delimited at all times—it mingles with the substitution, dramatization, etc., even

approaches the allusion. In one series of symbols the basic comparison is apparent to the sense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other symbols which raise the question of where the similarity, the "something intermediate" of this suspected comparison is to be sought. We may discover it by more careful consideration, or it may remain hidden to us. Furthermore, it is extraordinary, if the symbol is a comparison, that this comparison is not revealed by the association, that the dreamer is not acquainted with the comparison, that he makes use of it without knowing of its existence. Indeed, the dreamer does not even care to admit the validity of this comparison when it is pointed out to him. So you see, a symbolic relationship is a comparison of a very special kind, the origin of which is not yet clearly understood by us. Perhaps later we may find references to this unknown factor.

象征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比较关系，但却不是任何大家所料想的比较。这个比较似乎有个特定前提，但又不知是什么。不是所有能与物品或事件对比的事物都可以在梦中成为象征意义；另一方面，梦能提供象征意义的，并不是我们选择的所有内容，而仅仅是梦的隐意的具体元素。这两个方面都有限制。必须承认，象征的观点并非总能得到清晰界定——它与替代、改编等混在一起，甚至也牵涉到暗喻。有一系列的象征意义，比较的基础是显而易见的。而另一个方面，一些其他象征意义的比较则令人茫然，不知其相似物或是"中间媒介"是从何而来。再仔细分析一下，也许能发现，但也许还是深藏不露。更绝妙的是，象征是一种比较，但这种比较未被联想揭示，做梦者不知道这种比较，而他们不知其存在却在利用着它。事实上，当我们向做梦者指出这个比较时，他们甚至不在乎它真实与否。所以，象征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比较，我们尚未搞清楚其来源。也许我们以后能为这个未知事实找些证据。

The number of things that fin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in the dream is not great—the human body as a whole, parents, children, brothers and sisters, birth, death, nakedness and a few others. The only typical, that is, regular representation of the human person as a whole is in the form of a *house* , as was recognized by Scherner who, indeed, wished to credit this symbol with an overwhelming significance which it does not deserve. It occurs in dreams that a person, now lustful, now frightened, climbs down the fronts of houses. Those with entirely smooth walls are men; but those which are provided with projections and balconies to which one can hold on, are women. Parents appear in the dream as *king* and *queen* , or other persons highly respected. The dream in this instance is very pious. It treats children,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less tenderly; they are symbolized as *little animals* or *vermin* . Birth is almost regularly represented by some reference to *water* ; either one plunges into the water or climbs out of it, or rescues someone from the water, or is himself rescued from it, i.e., there is a mother-relation to the person. Death is replaced in the dream by *taking a journey, riding in a train* ; *being dead, by various darksome, timid suggestions* ; *nakedness, by clothes* and *uniforms* . You see here how the lines between symbolic and suggestive representation merge one into another.

梦中有象征表现的事项并不多——人体全身、父母、孩子、兄弟姐妹、出生、死亡、裸体及其他少数事项。只有一个典型的、很常见的例子，即人体全身表现为一座房子　的形式。施尔纳发现了这个现象，但他赋予了这个象征符号过多的意义。在梦中，某人从房子正面向下攀爬，忽而爽快，忽而恐慌。那些墙面完全光滑的房子代表男人；那些建有可供攀附的突起和露台的房子则代表女人。父母在梦中以国王　和王后　，或是其他高贵形象出现。就此而言，梦是很恭顺的。它对待孩子和兄弟姐妹就稍欠客气，他们的象征符号成了小动物或害虫　。出生则经常被比喻成与水　有关的事情，要么有人跳进水

中，要么从水中爬出来，要么从水里救人，要么是自己被人从水里救起，这代表了一种母子关系。死亡则在梦中被代之以旅行、乘火车 ；濒死则用各种晦涩、虚弱的暗示 替代；裸体用衣服、制服 替代。由此可见，象征和暗示这两个表现形式是互相混淆的。

In contrast to the paucity of this enumeration, it is a striking fact that the objects and subject matter of another sphere are represented by an extraordinarily rich symbolism. This is the sphere of the sexual life, the genitals, the sex processes and sexual intercourse. The great majority of symbols in the dream are sex symbols. A remarkable disproportion results from this fact. The designated subject matters are few, their symbols extraordinarily profuse, so that each of these objects can be expressed by any number of symbols of almost equal value. In the interpretation something is disclosed that arouses universal objection. The symbol interpretations, in contrast to the many-sidedness of the dream representations, are very monotonous—this displeases all who deal with them; but what is one to do?

上面列举的象征少得可怜，而令人惊奇的是，相比之下，另一领域的对象和主题内容的象征意义却异常丰富。此乃性生活之领域，涵盖了生殖器、性活动、性交等。梦大部分的象征符号都是关于性的。这一事实体现了一种比例上的不协调。有名称的主题事物很少，它们的象征符号却异常之多，每个客体都可以用各种几乎同等意义的象征符号表述。在释梦中发现的这些遭致了普遍的反对。比之梦的多样化表现形式，象征的释义却显得极为单调。这让所有相关的人都很沮丧，可又有何办法？

Sinc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se lectures that we speak of the

sexual life, I must tell you the manner in which I intend to handle this theme. Psychoanalysis sees no reason for hiding matters or treating them by innuendo, finds no necessity of being ashamed of dealing with this important subject, believes it is proper and decent to call everything by its correct name, and hopes most effectively in this manner to ward off disturbing or salacious thoughts. The fact that I am talking before a mixed audience can make no difference on this point. Just as there is no special knowledge either for the Delphic oracle or for flappers, so the ladies present among you have, by their appearance in this lecture hall, made it clear that they wish to be considered on the same basis as the men.

这是我们在讲座中第一次谈到性生活，所以我必须把对待此问题的态度跟大家交个底。精神分析没有理由回避有关话题，或是顾左右而言他，没有必要羞于处理这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用正确名称称呼各类事物是恰当且得体的做法，并希望以此有效打消一些恼人或猥亵的想法。我讲课的对象男女皆有，这一点上也没有差别待遇。正如神谕或苍蝇拍无需特别知识一样，现场的女士既然来到此讲座厅，即已表明希望得到与男性一视同仁的对待。

The dream has a number of representations for the male genital that may be called symbolic, and in which the similarity of the comparison is, for the most part, very enlightening. In the first place, the holy figure 3 is a symbolical substitute for the entire male genital. The more conspicuous and more interesting part of the genital to both sexes, the male organ, has symbolical substitute in objects of like form, those which are long and upright, such as *sticks* , *umbrellas* , *poles* , *trees* , etc. It is also symbolized by objects that have the characteristic, in common with it, of penetration into the body and consequent injury, hence pointed *weapons* of every type,

knives , *daggers* , *lances* , *swords* , and in the same manner *firearms* , *guns* , *pistols* and the *revolver* , which is so suitable because of its shape. In the troubled dream of the young girl, pursuit by a man with a knife or a firearm plays a big role. This, probably the most frequent dream symbolism, is easily translatable. Easily comprehensible, too, is the substitution for the male member of objects out of which water flows: *faucets* , *water cans* , *fountains* , as well as its representation by other objects that have the power of elongation, such as *hanging lamps* , *collapsible pencils* , etc. That *pencils* , *quills* , *nail files* , *hammers* and other *instruments* are undoubtedly male symbols is a fact connected with a conception of the organ, which likewise is not far to seek.

对于男性生殖器，梦中可称为象征性的表现形式有很多，这类比较的相似性大多非常明朗化。首先，神圣的数字3是整个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性替代。对两性而言，更显著更受关注的部分——阳具，则有类似形状的象征替代物，如长而直的物体，类似木棍、雨伞、柱子、树 ，等等。它还被象征化为有另一特征相同的物体，通常是可刺入人体造成伤害的，因而包括各类尖头武器：刀、匕首、长矛、剑， 同样也包括火器：步枪、手枪 还有左轮 ，因其形似而特别适合。年轻女孩在烦恼的梦中，总是被手持利刃或火枪的男人追赶。这可能是最常见的梦的象征意义，很容易解释。同样很好理解的是，男性性器被能出水的物体替代：水龙头、水壶或喷泉， 也可表现为可伸长的物体，如吊灯、伸缩铅笔 ，等等。铅笔、羽毛笔、指甲锉、锤子 和其他器具 ，毫无疑问是男性的象征，它们与器官的关系是不难发现的。

The extraordinary characteristic of the member of being able to raise itself against the force of gravity, one of the phenomena of erection, leads to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by *balloons* , *aeroplanes* , and more recently, *Zeppelins* . The dream has another far more

expressive way of symbolizing erection. It makes the sex organ the essential part of the whole person and pictures the person himself as *flying* . Do not feel disturbed because the dreams of flying, often so beautiful, and which we all have had, must be interpreted as dreams of general sexual excitement, as erection dreams. P. Federn, among the psychoanalytical students, has confirmed this interpretation beyond any doubt, and even Mourly Vold, much praised for his sobriety, who carried on his dream experiments with artificial positions of the arms and legs, and who was really opposed to psychoanalysis—perhaps knew nothing about psychoanalysis—has co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as a result of his research. It is no objection to this conclusion that women may have the same dreams of flying. Remember that our dreams act as wish-fulfillments, and that the wish to be a man is often present in women,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And the fact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a woman to realize this wish by the same sensation as a man does, will not mislead anyone acquainted with anatomy. There is a small organ in the genitals of a woman similar to that of the male, and this small organ, the clitoris, even in childhood, and in the years before sexual intercourse, plays the same role as does the large organ of the male.

男性性器的非凡特征是能对抗地心引力自动矗立，即勃起现象，它的象征性表现有气球、飞机 ，最近还有齐柏林飞艇 。在梦中，还有一种象征勃起的方式更胜一筹。它将性器官变成整个人体的主要部位，想象着本人在飞翔 。飞翔之梦通常很美妙，而且我们都做过，它必须被普遍解释为性兴奋、勃起的梦，请不要因此烦恼。精神分析学生费德恩已经毫不犹豫地确认了这个解释，即使是摩利·沃尔德，其人因冷静饱受赞誉，曾就手臂和腿的非自然姿势开展梦的实验，本人其实还反对精神分析（他未必了解精神分析），他的研究成果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女性也可能有同样的飞翔之梦，这无可厚非。记住，我

们的梦是因实现愿望而发生的，女性常有想成为男性的愿望，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潜意识。女性可以通过与男性同样的感觉实现这个愿望，熟悉解剖学的人不会对此产生困惑。在女性生殖器中有一个类似男性阳具的迷你器官，即为阴蒂，它早在童年期和发生性交前的时期内，发挥了跟男性阳器一样的功能。

To the less comprehensible male sex-symbols belong certain *reptiles* and *fish* , notably the famous symbol of the *snake* . Why *hats* and *cloaks* should have been turned to the same use is certainly difficult to discover, but their symbolic meaning leaves no room for doubt. And finally the question may be raised whether possibly the substitution of some other member as a representation for the male organ may not be regarded as symbolic. I believe that one is forced to this conclusion by the context and by the female counterparts.

一些较难理解的男性性象征包括某些爬行动物和鱼类，尤其是有名的象征：蛇 。帽子 和斗篷 也可具有相同用意，这固然很令人不解，不过它们的象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最后的问题是，一些其他表现男性器官的替代物体是否有可能不具有象征意义。我认为，根据梦中情境和女性同类情况推断，这一结论也是必然结果。

The female genital is symbolically represented by all those objects which share its peculiarity of enclosing a space capable of being filled by something—viz., by *pits* , *caves* , and *hollows* , by *pitchers* and *bottles* , by *boxes* and *trunks* , *jars* , *cases* , *pockets* , etc. The *ship* , too, belongs in this category. Many symbols represent the womb of the mother rather than the female genital, as *wardrobes* , *stoves* , and primarily a *room* . The room-symbolism is related to the house-symbol, *doors* and *entrances* again become symbolic of the

genital opening. But materials, too, are symbols of the woman—*wood* , *paper* , and objects that are made of these materials, such as *tables* and *books* . Of animals, at least the *snail* and *mussel* are unmistakably recognizable as symbols for the female; of parts of the body the *mouth* takes the place of the genital opening, while *churches* and *chapels* are structural symbolisms. As you see, all of these symbols are not equally comprehensible.

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性表现形式是那些体现其特性的物体，即，可填塞物体的围合式空间，比如坑、穴 和洞 ，比如匣、箱、罐、盒、袋，等等 。船 也属于这一类。不少象征表现的是母亲的子宫，而不是女性生殖器，比如衣柜、炉具 ，特别是房间 。房间的象征意义与房子的象征是相关的，门 和入口 同样是生殖口的象征。但是原材料也是女性的象征，如木头 、纸张 ，以及这些材料制成的物品，比如桌子 和书本 。至于动物，起码蜗牛 和蚌类 被辨识为女性象征是明白无误的。身体部位方面，嘴 是代替了生殖口，教堂 和礼拜堂 则是象征了其构造。如大家所见，这些象征意义并非一律都易于理解。

The breasts must be included in the genitals, and like the larger hemispheres of the female body are represented by *apples* , *peaches* and *fruits* in general. The pubic hair growth of both sexes appears in the dream as *woods* and *bushes* . The complicated topography of the female genitals accounts for the fact that they are often represented as scenes with *cliffs* , *woods* and *water* , while the imposing mechanism of the male sex apparatus leads to the use of all manner of very complicated *machinery* , difficult to describe.

生殖器一定也包括乳房，和女性身体上更大的半球（指臀部）一样，代表它们的物体有苹果 、桃子 还有一般的水果 。两性都生长的

阴毛在梦中都以树林 和灌木林 出现。由于女性生殖器构造复杂，它们经常表现为有悬崖 、树林 和水流 的场景，而男性生殖器的雄伟功能则被引申为各种错综复杂的机器 ，难以描述。

A noteworthy symbol of the female genital is also the *jewel-casket* ; *jewels* and *treasure* are also representatives of the beloved person in the dream; *sweets* frequently occur as representatives of sexual delights. The satisfaction in one's own genital is suggested by all types of *play* , in which may be included *piano-playing* . Exquisit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of *onanism* are *sliding* and *coasting* as well as *tearing off a branch* . A particularly remarkable dream symbol is that of having *one's teeth fall out* , or *having them pulled* . Certainly its most immediate interpretation is castration as a punishment for onanism. Special representations for the relations of the sexes are less numerous in the dream than we might have expected from the foregoing. Rhythmic activities, such as *dancing* , *riding* and *climbing* may be mentioned, also harrowing experiences, such as *being run over* . One may include certain *manual activities* , and, of course, *being threatened with weapons* .

关于女性生殖器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象征是珠宝盒 ，珠宝 和珍宝 在梦中也代表了所爱的人，甜食 常用于形容性快感。自己的性器得到满足常常以各类娱乐 为暗示，其中或许包括钢琴弹奏 。精准表现手淫 的象征包括平滑 、下滑 和折枝 。一个特别瞩目的象征是自己掉牙齿 、或拔牙齿 。它最直接的解读当然是以阉割作为手淫的惩戒。梦中特别表现两性关系的象征比我们当初想象的要少。可能会包括节奏性的活动，比如跳舞 、骑行 和登山 ，以及悲惨经历，如遭到碾压 。可能还包括某些手工活动 ，当然还有被武器胁迫 。

You must not imagine that either the use or the translation of these symbols is entirely simple. All manner of unexpected things are continually happening. For example, it seems hardly believable that in thes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the sex differences are not always sharply distinguished. Many symbols represent a genital in general, regardless of whether male or female, e.g., the *little child* , the *small son* or *daughter* . It sometimes occurs that a predominantly male symbol is used for a female genital, or vice versa. This is not understood until one has acquired an insight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xual representations of mankind. In many instances this double meaning of symbols may be only apparent; the most striking of the symbols, such as *weapons* , *pockets* and *boxes* are excluded from this bisexual usage.

大家别以为，这些象征应用或解释起来都很简单。我们意料之外的例子会一直涌现。比如，很难相信，在这些象征性表现中，性别差异并不总是很显著。许多象征代表的是笼统的生殖器官，而不分男女，比如小孩子 ，即小儿子 或小女儿 。有时，一个主要为男性象征的符号用在了女性生殖器上，反之亦然。我们要深入了解人类性观念的发展进程后，才能理解这个现象。不过在不少情况下，这种双重象征意义可能只是表面现象，类似武器 、口袋 和盒子 这样最鲜明的象征是要排除在两性混用范围之外的。

I should now like to give a summar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ymbols rather than of the thing represented, of the field out of which the sex symbols are for the most part taken, and then to make a few remarks about the symbols which have points in common that are not understood. An obscure symbol of this type is the *hat* , perhaps headdress on the whole, and is usually employed as a male representation, though at times as a female. In the same

way the *cloak* represents a man, perhaps not always the genital aspect. You are at liberty to ask, why? The *cravat* , which is suspended and is not worn by women, is an unmistakable male symbol. *White laundry* , all *linen* , in fact, is female. *Dresses* , *uniforms* are,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substitutes for nakedness, for body-formation; the *shoe* or *slipper* is a female genital. *Tables* and *wood* have already been mentioned as puzzling but undoubtedly female symbols. *Ladders* , *ascents* , *steps* in relation to their mounting, are certainly symbols of sexual intercourse. On closer consideration we see that they have the rhythm of walking as a common characteristic; perhaps, too, the heightening of excitement and the shortening of the breath, the higher one mounts.

现在我想从象征符号的角度，而不是其代表的事物，概括一下象征意义这一领域（其中性所占比重最大），然后再讲讲大家没理解的一些象征符号的共同点。此类象征符号中有一个比较含混，是帽子 ，或者大体是头饰，它通常用于表现男性，但有时也会表现女性。同样，斗篷 表现了男性，或许并不总是指代生殖器。大家或许会问，为什么？领结 呈悬垂状，女子并不佩戴，毫无疑问是男性象征。白色衣物 、所有的日用织品 事实上代表女性。衣服 、制服 正如我们所说，是裸体或体型的替代，而鞋子 或拖鞋 则代表女性生殖器。我们说过桌子 和木头 很迷惑人，但无疑是女性象征。梯子 、坡路 、台阶 取其攀登之意，必然象征的是性交。细思一下便知，它们的共同点是有节奏的行走，或者还有登高后的兴奋增强和呼吸急促。

We have already spoken of *natural scenery*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female genitals. *Mountains* and *cliffs* are symbols of the male organ; the *garden* a frequent symbol of the female genitals. *Fruit* does not stand for the child, but for the breasts. *Wild animals* signify sensually aroused persons, or further, base impulses, passions.

Blossoms and *flowers* represent the female genitals, or more particularly, virginity. Do not forget that the blossoms are really the genitals of the plants.

我们曾说自然场景 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山脉 和悬崖 是男性器官的象征，而花园 则常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水果 不代表孩子，而代表乳房。野兽 意指性兴奋者，或进一步代表基本冲动和热情。花朵和花卉 表现了女性生殖器，更确切地讲，是处女生殖器。别忘了，花朵其实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

We already know the *room* as a symbol. The representation may be extended in that the windows, entrances and exits of the room take on the meaning of the body openings. Whether the room is *open* or *closed* is a part of this symbolism, and the *key* that opens it is an unmistakable male symbol.

我们已经知道房间 的象征意义。房间的表现可以扩展到窗户、出入口等，意味着身体的穴口。房间或开 或闭 均是此象征的体现，而打开房间的钥匙 则显然是男性的象征。

This is the material of dream symbolism. It is not complete and might be deepened as well as extended. But I am of the opinion it will seem more than enough to you, perhaps will make you reluctant. You will ask, “Do I really live in the midst of sex symbols? Are all the objects that surround me, all the clothes I put on, all the things that I touch, always sex symbols, and nothing else?” There really are sufficient grounds for such questions, and the first is, “Where, in fact, are we to find the meaning of these

dream symbols if the dreamer himself can give no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m, or at best can give only incomplete information?”

这就是梦的象征意义的素材。它并不完整，可以进一步深化和延展。不过我觉得大家似乎对此已经吃不消了，会心有不甘。大家会问：“我的生活中性象征符号真的是无所不在吗？我周围所有的物品，穿的衣服、碰过的东西，难道都是性符号，没有其他意义了吗？”这类疑问其实有着充分理由，首先：“如果做梦者自己都不能提供相关信息，或提供信息不全，我们实际上从哪里去找这些梦的象征物的意义？”

My answer is: “From many widely different sources, from fairy tales and myths, jokes and farces, from folklore, that is, the knowledge of the customs, usages, sayings and songs of peoples, from the poetic and vulgar language. Everywhere we find the same symbolism and in many of these instances we understand them without further information. If we follow up each of these sources separately we shall find so many parallels to the dream symbolism that we must believe in the correctness of our interpretations.”

我的答案是：“它们的来源非常广泛且多样化，比如童话故事和神话、笑话和滑稽剧、民间故事等，也就是关于民族习俗、口语、俗话和歌曲的知识，还有诗歌和通俗语言。我们在每处都能发现同样的象征意义，很多情况下我们无需额外信息就能领会它们。逐一跟踪每个来源，我们会找到太多与梦的象征意义相似的东西，因而我们必须坚信释梦的正确性。”

The human body, we have said, is, according to Scherner,

frequently symbolized in the dream by the house. Continuing this representation, the windows, doors and entrances are the entrances into the body cavities, the facades are smooth or provided with balconies and projections to which to hold. The same symbolism is to be found in our daily speech when we greet a good friend as “*old house* ” or when we say of someone, “We'll hit him in the *belfry* ,” or maintain of another that he's not quite right in the *upper story* . In anatomy the body openings are sometimes called the *body-portals* .

我们说过，据施尔纳说，人体在梦中常被喻为房子。继续表现的话，门窗和入口是体腔的入口，墙或表面光滑，或建有露台和突起以供攀附。在我们的日常会话中也有同样的象征意义，我们有时会称呼好友为“闺蜜 ”，或是形容某人“粉饰门面 ”，或是说其他人“不够资格再上一层楼 ”。在解剖学中，身体穴口有时被称为身体门户 （如阴户、肛门等）。

The fact that we meet our parents in the dream as imperial or royal persons is at first surprising. But it has its parallel in the fairy tale. Doesn't it begin to dawn upon us that the many fairy tales which begin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king* and a *queen* ” intend nothing else than, “Once there was a *father* and a *mother* ?” In our families we refer to our children as *princes* , the eldest as the *crown-prince* . The king usually calls himself the *father of the country* . We playfully designate little children as *worms* , and say, sympathetically, “*poor little worm* .”

我们在梦中将父母想象为皇家或王室中人，这起初会令人惊讶。但在童话中可找到它的同类。我们是否突然悟到了，很多童话故事的开头都是“从前有一位国王和一位王后”，而不是“从前有一位爸爸和一

位妈妈”。在家中，我们常常将自家孩子叫做小王子（公主） ，最大孩子的叫太子 。国王通常自称为一国之父 。我们把小娃娃戏称为虫子 ，充满怜爱地说：“可怜的小虫虫。 ”

Let us return to the symbolism of the house. When we use the projections of the house to hold ourselves on to in the dream, are we not reminded of the familiar colloquialism about persons with well-developed breasts: “She has something to *hold onto* “? The folk express this in still another way when it says, “there's lots of *wood in front of her house* “; as though it wished to come to the aid of our interpretation that wood is a feminine, maternal symbol.

我们再回到房子的象征。当我们在梦中抓牢房子上的突起时，我们会不会想起对大胸女子的戏语“她身上自带攀登抓手 ”？民间俗语则换了一种方式形容为“她家房前木头多多 ”，这像是在声援我们的解释说，木头是女性的、母性的象征。

In addition to wood there are others. We might not understand how this material has come to be a substitute for the maternal, the feminine. Here our comparison of languages may be helpful. The German word *Holz* (wood) is said to be from the same stem as the Greek word, nlê, which means stuff, raw material. This is an example of the case, not entirely unusual, where a general word for material finally is exclusively used for some special material. There is an island in the ocean, known by the name of Madeira. The Portuguese gave it this name at the time of its discovery because it was at that time entirely covered with forests, for in the language of the Portuguese, Madeira means *wood* . You will recognize, however, that Madeira, is nothing else than the slightly changed Latin word

materia which again has the general meaning of *material. M* aterial is derived from *mater* , mother. The material out of which something is made, is at the same time its mother-part. In the symbolic use of wood for woman, mother, this ancient conception still lives.

关于木头还有其他说法。我们也许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材料成了母性或女性的象征。我们做一些语言上的比较或有帮助。德语单词“Holz”（木头）据说与希腊单词“nlê”同源，后者的意思是东西、原材料。一个材料的通称最后用于特指某个材料，类似的例子并不罕见。大西洋有个岛屿名叫马德拉（Madeira）。葡萄牙人这样命名，是因为发现它的时候，岛上完全被森林覆盖，在葡萄牙语中“Madeira”的意思是树木 。不过大家应该知道，“madeira”只是拉丁文单词“materia”的轻微变体，后者又是指材料 （material）的通称。“material”一词则来源于“mater”，即母亲 。材料作为物品的制作原料，同时即为其母材。木头象征为女性、母亲，说明这一古老观念依然鲜活。

Birth is regularly expressed in dreams by some connection with water; one plunges into the water, or comes out of the water, which means one gives birth to, or is born. Now let us not forget that this symbol may refer in two ways to the truths of evolutionary history. Not alone have all land-mammals, including the ancestors of man, developed out of water animals—this is the ultimate fact—but every single mammal, every human being, lived the first part of his existence in the water—namely, lived in the body of his mother as an embryo in the amniotic fluid and came out of the water at the time of his birth. I do not wish to maintain that the dreamer knows this, on the contrary I hold that he does not have to know. The dreamer very likely knows some things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he

was told about them in his childhood, and for that very reason I maintain that this knowledge has played no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symbols. He was told in childhood that the stork brought him—but where did it get him? Out of a lake, out of the well—again, out of the water. One of my patients to whom such information had been given, a little count, disappeared for a whole afternoon. Finally he was discovered lying at the edge of the palace lake, his little face bent above the water and earnestly peering into it to see if he could not see the little children at the bottom.

出生在梦中通常表达为与水有关的事物，跳入或走出水中，意味着分娩或出生。请勿忘记，该象征可用进化史的两个特点予以佐证。不仅包括人类祖先在内的所有陆栖哺乳动物都是从水栖动物进化而来的，而且最关键的是，每个哺乳动物、每个人类最初都生活在水中，也就是胚胎在母体的羊水中生长，其出生即是离开水中。我不希望做梦者知道这个情况，相反我认为他们无需知道。做梦者童年时总会听到一些故事，他们很可能半知半解，但正因为此，我坚信这个知识对于他们的梦中象征并无帮助。童年时他们被告知，他们是被白鹳衔来的——可它从哪里把他们带来的呢？从湖水里、泉水里——又是从水中出来。我的一个病人是一位小伯爵，他知道这些情况后，整个下午都不知去向。最后有人发现他趴在府中的湖边，小脸凑到水面上，热切地盯着里面，想看看水底看不看得到小孩子。

In the myths of the birth of the hero, which O. Rank submitted to comparative examination—the oldest is that of King Sargon of Agade, about 2800 B.C.—exposure in the water and rescue from water play a predominating role. Rank has recognized that these are representations of birth, analogous to those customary in dreams. When a person in his dream rescues another from the water, the latter becomes his mother, or just plainly mother; in the myth a

person who rescues a child out of the water professes herself as the real mother of the child. In a well-known joke the intelligent Jewish boy is asked who was the mother of Moses. He answered without hesitation, the Princess. But no, he is told, she only took him out of the water. “That's what *she says* ,” is his reply, and thereby he shows that he has found the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myth.

关于英雄出生的神话故事，兰克做过比较研究，最早的是阿卡德的萨尔贡国王，出生于公元前2800年，其主要故事是婴儿被置于水中，从水中被救出。兰克注意到，这些都是出生的象征，与梦中惯见的符号类似。当某人在梦中将他人从水中救出，这人就成为他们的母亲，或仅仅是一位母亲。在神话中，救小孩出水的人自认为是孩子的亲生母亲。有一个著名的笑话：一个聪明的犹太男孩被人问，摩西的母亲是谁？他毫不犹豫地答道，是公主。但人家说不是的，她只是把他从水里拉上来。“这是她的说法 。”他回答，这表明他深谙神话的正确解读之道。

Leaving on a trip represents death in the dream. Likewise it is the custom in the nursery when a child asks where someone who has died, and whom he misses, may be, to say to him that the absent one has taken a trip. Again I should like to deny the truth of the belief that the dream symbol originates in this evasion used for the benefit of children. The poet makes use of the same symbol when he speaks of the Hereafter as “that undiscovered bourne from which no *traveler* returns.” Even in everyday speech it is customary to refer to the last journey. Every person acquainted with ancient rite knows how seriously, for example, the Egyptians considered the portrayal of a journey to the land of the dead. There still exist many copies of the “death book” which was given to the mummy for this journey as a sort of Baedeker. Since the burial places have been

separated from the living quarters, the last journey of the dead person has become a reality.

旅行在梦中表现的是死亡。同样，在幼儿园也有此惯例，如果小朋友想念一位已故之人，问起他们的去向，大家一般都会告诉他们，那位故人出门远行了。诗人也用同样的象征，将死去形容为“未知彼岸，有去无回”。即便在日常用语中，死亡也被称为最后一程。了解古代礼仪的人知道，比如，埃及人很看重对死后前往安息地之旅的描述。他们的《亡灵书》有好多本现存至今，是给木乃伊随葬的死亡旅游指南。因为死者安葬地与生者居住地是分开的，因而死者是真正地进行了最后一程旅行。

In the same manner the genital symbolism is just as little peculiar to the dream alone. Every one of you has perhaps at some time or other been so unkind as to call some woman an “*old casket* ” without perhaps being aware that he was using a genital symbol. In the New Testament one may read “Woman is a weak *vessel* .” The Holy Scriptures of the Jews, so nearly poetic in their style, are filled with sex-symbolic expressions which have not always been correctly understood, and the true construction of which, in the *Song of Songs* , for example, has led to many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later Hebraic literature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an as a house, the door taking the place of the sex opening, is very widespread. The man complains, for instance, when he discovers a lack of virginity, that he has found *the door open* . The symbol of the table for woman is also known to this literature. The woman says of her husband, “I set the table for him, *but he upset it* .” Lame children are supposed to result from the fact that the man has *overturned the table* . I take these examples from a work by L. Levy of Brünn, *The Sexual Symbolism of the Bible and the Talmud* .

同样地，生殖器的象征也不仅见于梦。我们每个人偶尔也会不太厚道地称呼某个女性“人老珠黄 ”，不知不觉间就用了一个生殖器的象征。在新约中有“女子乃脆弱的器皿 ”一说。犹太圣经的风格近乎诗歌，其中充满了性象征表述，它们并不总是得到正确理解，其真实解释引起了很多误会，比如《雅歌》。在后来的希伯来文学中，女人被喻为房子，门替代了生殖口，这个表达得以广泛流传。比如，当男人发现对方不是处女之身时，会抱怨说看到门开了 。该文学中也有桌子象征女人的例子。女人这样说她的丈夫：“我为他摆好桌子，他却弄翻了 。”据说跛脚的孩子是男人掀翻桌子 的产物。我举的这些例子来自布吕恩的利唯的著作《圣经和犹太法典中的性象征意义》。

That ships, too, represent women in dreams is a belief derived from the etymologists, who maintain “ship” was originally the name of an earthen vessel and is the same word as *Schaff* (to create). The Greek myth of Periander of Corinth and his wife Melissa is proof that the stove or oven is a woman, and a womb. When, according to Herodotus, the tyrant entreated the shade of his beloved wife, whom, however, he had murdered in a fit of jealousy, for some sign of its identity, the deceased identified herself by the reminder that he, *Periander* , *had thrust his bread into a cold oven* , as a disguise for an occurrence that could have been known to no other person. In the *Anthropophyteia* published by F. S. Krauss, an indispensable source book for everything that has to do with the sex life of nations, we read that in a certain German region it is commonly said of a woman who has just been delivered of a child, “*Her oven has caved in* .” The making of a fire and everything connected therewith is filled through and through with sex symbolism. The flame is always the male genital, the fireplace, the hearth, is the womb of the woman.

船在梦中也代表女人，这个说法从语源学上能找到根源，它认为“船”（德语为“Schiff”）原本是一种陶器的名字，与“木桶”（德语为“Schaff”）是一个单词。希腊神话中关于科林斯的佩里安德和他的妻子梅丽莎的故事说明火炉或炉灶意味着女人和子宫。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这位暴君因为一时妒忌，杀死了自己深爱的妻子，当妻子身影出现时，他恳求其证明身份，亡者则提醒道“佩里安德把自己的面包塞进了冷炉灶 ”，以此自证身份，因为此话除她本人外无人知晓。克劳斯所著《各民族的性生活》一书是全面研究各民族性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其中我们看到，在德国某个地区，人们通常会对一个刚生了孩子的女人说“她的火炉已经塌陷。 ”因此，关于生火的一切都充满了性的象征。火苗永远代表男性生殖器，而壁炉、灶膛之类则表示女性的子宫。

If you have often wondered why it is that landscapes are so often used to represent the female genitals in the dream, then let the mythologist teach you the role Mother Earth has played in the symbolisms and cults of ancient times. You may be tempted to say that a room represents a woman in the dream because of the German colloquialism which uses the term *Frauenzimmer* instead of *Frau* , in other words, it substitutes for the human person the idea of that room that is set aside for her exclusive use. In like manner we speak of the *Sublime Porte* , and mean the Sultan and his government; furthermore, the nam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ruler, Pharaoh, means nothing other than “great court room.” (In the ancient Orient the court yards between the double gates of the town were the gathering places of the people,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market place was in the classical world.) What I mean is, this derivation is far too superficial. It seems more probable to me that the room, as the space surrounding man, came to be the symbol of woman. We have seen that the house is used in such a representation; from mythology and poetry we may take the *city* ,

fortress , *palace* , *citadel* , as further symbols of woman. The question may easily be decided by the dreams of those persons who do not speak German and do not understand it. In the last few years my patients have been predominantly foreign-language speaking, and I think I can recall that in their dreams as well the room represents woman, even where they had no analogous usages in their languages. There are still other signs which show that the symbolization is not limited by the bounds of language, a fact that even the old dream investigator, Schubert (1862) maintained. Since none of my dreamers were totally ignorant of German I must leave this differentiation to those psychoanalysts who can gather examples in other lands where the people speak but one language.

如果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景色在梦中常用于表现女性生殖器，那就去看看神话中大地母亲在古时候象征图腾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大家会忍不住说，梦中的房间代表女人，是因为德语口语中把女子（Frau）改为闺中（Frauenzimmer），换句话说，用女人的专用房间指代了本人。类似的情况还有，用高门 指代苏丹及其政府；另外，古埃及统治者“法老”之意仅为“庭院大殿”（在古代东方，两重城门间的庭院广场是人流聚集地，就像西方古典时代的市场一样）。我的意思是，这个来源的说法显得过于浅显。我觉得更可能的情况是，房间作为包围男性的空间，成了女性的象征。我们知道房子用在这种表现上，从神话和诗歌看，更加可以把城市、城墙、宫殿和城堡当作女性的象征。从不说或不懂德语的人所做的梦，很容易判定这个问题。前几年我的病人主要都是说外语的人，我记得他们的梦中房间也代表女性，即使在他们的母语中没有类似用语。还有其他一些迹象能说明象征意义不受语言的束缚，连昔日研究梦的舒伯特在1862年时也是如此认为。由于我的做梦者中没有完全不会德语的人，我只好仰仗其他精神分析学家，他们若能搜集到其他国家只说本国语言的例子，就能研究其中差别了。

Among the symbol-representations of the male genital there is scarcely one that does not recur in jokes or in vulgar or poetical usage, especially among the old classical poets. Not alone do those symbols commonly met with in dreams appeal here, but also new ones, e.g., the working materials of various performances, foremost of which is the incantation. Furthermore, we approach in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male a very extended and much discussed province, which we shall avoid for economic reasons. I should like to make a few remarks, however, about one of the unclassified symbols—the figure 3. Whether or not this figure derives its holiness from its symbolic meaning may remain undecided. But it appears certain that many objects which occur in nature as three-part things derive their use as coats-of-arms and emblems from such symbolic meaning, e.g., the clover, likewise the three-part French lily (fleur-de-lys), and the extraordinary coats-of-arms of two such widely separated islands as Sicily and the Isle of Man, where the Triskeles (three partly bended knees, emerging from a central point) are merely said to be the portrayal in a different form of the male genitals. Copies of the male member were used in antiquity as the most powerful charms (*Apotropaea*) against evil influences, and this is connected with the fact that the lucky amulets of our own time may one and all be recognized as genital or sex-symbols. Let us study such a collection, worn in the form of little silver pendants: the four-leaf clover, a pig, a mushroom, a horse-shoe, a ladder, a chimney-sweep. The four-leaf clover, it seems, has usurped the place of the three-leaf clover, which is really more suitable as a symbol; the pig is an ancient symbol of fertility; the mushroom is an unquestionable penis symbol—there are mushrooms that derive their systematic names from their unmistakable similarity to the male member (Phallus impudicus); the horseshoe recalls the contour of the female genital opening; and the chimney sweep who carries a ladder belongs in

this company because he carries on that trade with which the sex-intercourse is vulgarly compared (*cf.* the *Anthropophyteia*). We have already become acquainted with his ladder as a sex symbol in the dream; the German usage is helpful here, it shows us how the verb “to mount” [6_1] is made use of in an exquisite sexual sense. We use the expressions “*to run after women* ,” which literally translated would be “*to climb after women* ,” and “*an old climber* .“ [6_2] In French, where “*step* ” is “*la marche* ” we find that the analogous expression for a man about town is “*un vieux marcheur* .” It is apparently not unknown in this connection that the sexual intercourse of many of the larger animals requires a mounting, *a climbing upon* the female.

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表现几乎没有不出现在笑话、粗话或诗歌中的，特别是在古典诗歌中。引人注目的是，不但有梦中常见的那些象征，还有一些新的象征，比如各种表演工具，最主要是咒语。而且，我们触及到了男性象征表现更广泛、谈论更多的范畴，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就略过了。不过我要稍许谈一下一个未归类的象征——数字3。这个数字的神圣性是否源自其象征意义，尚不确定。不过可以肯定，许多在自然中由三部分组成的生物，就因为这样的象征意义而被用于盾形纹章和徽章中，比如，三叶草、法国三瓣百合，还有两个相隔甚远的岛屿——西西里岛和英属马恩岛不约而同使用的奇异纹章：三腿跪像（指从一个中心点生成的三个膝盖半弯的腿），据说它只是男性生殖器的一个不同表现形式而已。男性器官的模拟物在古代是最有力的驱魔辟邪神器，这相当于现在人们佩戴的护身符一概都可以视为生殖器或性的象征符号。我们来看这么一个系列，都是银质小吊坠的模样：四叶苜蓿、猪、蘑菇、马蹄、梯子、烟囱清扫工。四叶苜蓿看样子篡了三叶草的位子，后者其实才更适合作为象征；猪在古代是人丁兴旺的象征；蘑菇则无疑是阴茎的象征——有些蘑菇的学名就是因与男性器官酷似得来的，比如白鬼笔学名为“Phallus impudicus”（意为“傲立的阴茎”）；马蹄则形似女性生殖口；带着梯子的烟囱清扫工

被归于此类，是因为他的动作与性交动作大致相似（参见《各民族的性生活》）。我们已经知道梯子在梦中的性象征意义，这里一个德语口语有助于理解，它表明了动词“攀爬”[7_1] 的应用是如何具有了强烈性意味的。我们说“追女人 ”，其实应该说“攀上女人 ”，或是“攀女老手 ”[7_2] 。在法语中，“步伐 ”是“*la marche* ”，而对一个花心大少的形容则是类似“*un vieux marcheur* ”（即道中老手之意）。这些巧合显然说明，许多大型动物的交配需要攀爬，即雄性骑在雌性身上 。

The tearing off of a branch as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onanism is not alone in keeping with the vulgar representation of the fact of onanism, but has far-reaching mythological parallels. Especially noteworthy, however,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onanism, or rather the punishment therefor, castration, by the falling out or pulling out of teeth, because there is a parallel in folk-lore which is probably known to the fewest dreamers. It does not seem at all questionable to me that the practice of circumcision common among so many peoples is an equivalent and a substitute for castration. And now we are informed that in Australia certain primitive tribes practice circumcision as a rite of puberty (the ceremony in honor of the boy's coming of age), while others, living quite near, have substituted for this act the striking out of a tooth.

象征着手淫的折树枝，不仅仅与手淫行为大体相似，而且它在神话中也有一些大有深意的相似物。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掉牙或拔牙指代手淫，或其实是之后的惩戒，即阉割，因为它在民间传说中有类似说法，这个可能很少有做梦者知道。于我而言，很多民族惯见的包皮割礼，毫无疑问是阉割的等同和替代。现在我们得知，在澳大利亚，某些原始部落将割礼当成一种青春祭礼（庆祝男孩成年的仪式），而邻近的其他部落则用拔牙来替代这个活动。

I end my exposition with these examples. They are only examples. We know more about these matters, and you may well imagine how much richer and how much more interesting such a collection would appear if made, not by amateurs like ourselves, but by real experts in mythology, anthropology, philology and folk-lore. We are compelled to draw a few conclusions which cannot be exhaustive, but which give us much food for thought.

我对这些例子的阐述到此为止。它们只是些例子。我们多了解了这些事情后，就能想象得到，如果搜集这些象征的人，不是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而是神话学、人类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的真正专家们，它们会丰富得多、也有趣得多。我们必须要做几点总结了，虽然不能全然概括，但也足够思考之用。

In the first place, we are faced by the fact that the dreamer has at his disposal a symbolic means of expression of which he is unconscious while awake, and does not recognize when he sees. That is as remarkable as if you should make the discovery that your chambermaid understands Sanskrit, although you know she was born in a Bohemian village and never learned the language. It is not easy to harmonize this fact with our psychological views. We can only say that the dreamer's knowledge of symbolism is unconscious, that it is a part of his unconscious mental life. We make no progress with this assumption. Until now it was only necessary to admit of unconscious impulses, those about which one knew nothing, either for a period of time or at all times. But now we deal with something more; indeed, with unknown knowledge, with thought relationships, comparisons between unlike objects which lead to this, that one constant may be substituted for another. These comparisons are not made anew each time, but they lie ready, they

are complete for all time. That is to be concluded from the fact of their agreement in different persons, agreement despite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首先要面对的事实是：做梦者可以任意利用的象征意义，他们在清醒时竟一无所知，而且即使见到也辨认不出。这很令人咋舌，就好像你发现女佣听得懂梵文，而你知道她生于波西米亚的一个乡村，从未学过这种语言。这个事实很难与我们的心理学观点一致起来。我们只能说，做梦者对象征意义的认知是在潜意识中的，它是他们的潜意识心理生活的一部分。但有了这个假定，我们还是一筹莫展。我们之前只需设想潜意识冲动（它们暂时或永久未知）的存在。现在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更多了，实际上，要探索未知的知识、找到各种想法的相关性，发现不同事物的可比性（它们之间常常一个被另一个替代）。这些比较不是每次都需更新，而是业已存在，已经一劳永逸地成型。这个结论，来自于不同人群的一致性，即使语言不同，但仍具有一致性。

But whence comes the knowledge of these symbol-relationships? The usages of language cover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m. The dreamer is for the most part unacquainted with the numerous parallels from other sources; we ourselves must first laboriously gather them together.

但这些象征性关系的指示从何而来呢？语言用法的原因只占了其中一小部分。做梦者大多不知道其他来源的大量同类项，我们必须自己不辞辛劳地搜集起来。

Secondly, thes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are peculiar neither to

the dreamer nor to the dream work by means of which they become expressed. We have learned that mythology and fairy-tales make use of the same symbolism, as well as do the people in their sayings and songs, the ordinary language of every day, and poetic phantasy. The field of symbolism is an extraordinarily large one, and dream symbolism is but a small part thereof. It is not even expedient to approach the whole problem from the dream side. Many of the symbols that are used in other places do not occur in the dream at all, or at best only very seldom. Many of the dream symbols are to be found in other fields only very rarely, as you have seen. One gets the impression that he is here confronted with an ancient but no longer existent method of expression, of which various phases, however, continue in different fields, one here, one there, a third, perhaps in a slightly altered form, in several fields. I am reminded of the phantasy of an interesting mental defective, who had imagined a fundamental language, of which all thes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were the remains.

其次，从表达方式看，这些象征性表现都不是做梦者或梦的工作特有的。我们已知神话和童话使用同样的象征意义，人们在谚语、歌谣、日常用语以及诗文中亦有使用。象征意义领域极其广大，梦的象征只是其一小部分。从梦的角度探索整个问题甚至并不便捷。许多应用于他处的象征符号根本没有出现在梦中，至少是很罕见。很多梦的象征符号在其他领域也非常少见，正如大家所见。有人会觉得，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古老但不复存在的表达方法，但它的一鳞半爪又在不同领域中继续存在，忽而这里，忽而那边，有些也许稍稍改换面目，就同时混迹于几个领域。我记得一个心智缺陷者的有趣遐想，其人认为以前应有一种初始语言，这些象征表现则都是它的残留。

Thirdly, you must have noticed that symbolism in these other

fields is by no means sex symbolism solely, while in the dream the symbols are used almost entirely to express sexual objects and processes. Nor is this easily explained. Is it possible that symbols originally sexual in their meaning later came to have other uses, and that this was the reason perhaps for the weakening of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to one of another nature? These questions are admittedly unanswerable if one has dealt only with dream-symbolism. One can only adhere to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re is an especially intimate connection between true symbols and things sexual.

再次，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这些其他领域里的象征意义绝不仅有性的象征，而在梦中，象征符号几乎全部用于表述与性有关的对象或过程。解释这个也非易事。是否有可能，原本有性意味的象征后来有了其他用处，可能因此也弱化了另一特性事物的象征表现？如果只考虑梦的象征意义，这些问题公认是无解的。这里能坚持的假定是，真正的象征和与性有关的事物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An important indication of this has been given us recently. A philologist, H. Sperber (Upsala) who works independently of psychoanalysis, advanced the theory that sexual needs have played the largest part i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s. The first sounds served as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called the sexual partne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roots of speech accompani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imitive man's work. This work was communal and progressed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rhythmically repeated word sounds. In that way a sexual interest was transferred to the work. The primitive man made work acceptable at the same time that he used it as an equivalent and substitute for sex-activity. The word thus called forth by the

common labor had two meanings, designating the sex-act as well as the equivalent labor-activity. In time the word became disassociated from its sexual significance and became fixed on this work. Generations later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to a new word that once had sexual significance and came to be used for a new type of work. In this manner a number of word-roots were formed, all of sexual origin, and all of which had lost their sexual significance. If the description sketched here approximates the truth, it opens up the possibility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ream symbolism. We can understand how it is that in the dream, which preserves something of these most ancient conditions, there are so extraordinarily many symbols for the sexual, and why, in general, weapons and implements always stand for the male, materials and things manufactured, for the female. Symbolic relationships would be the remnants of the old word-identity; things which once were called by the same names as the genitals can now appear in the dream as symbols for them.

最近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提示。来自瑞典乌普萨拉的语言学家斯珀波，其研究不依赖于精神分析，他提出一个理论，即：性需求在语言的起源和进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起初发出的声音是为了交流以及呼唤性伴侣，后来，原始人在劳作时进一步发展出了语言的雏形，伴随着共同劳动，进化出了有节奏的重复单词发音。这样，性的乐趣就转化为劳动的乐趣。原始人开始接受劳动，同时把它当成性活动的等同和替代。这样通过共同劳动产生的单词就有了两个意义，兼有性行为和同等劳动行为的意义。过后，这个单词逐渐脱离了性的含义，固定为该劳动含义。过了好几代之后，一个新单词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它原先的性含义变成了一项新工作的定义。如果这个粗略描述有几分真实的话，它就为理解梦的象征意义打开了一扇门。我们能理解了，梦中场景保留了远古时代的某些特点，它可以有异常繁多的性象征，而且一般来说，武器和工具总是代表男性，物料和加工品总代表

女性。象征关系可能是词语旧意的残留，那些当年曾与生殖器同名的事物现在以它们的象征符号出现在梦中。

From our parallels to dream symbolization you may also learn to appreciate what is the character of psychoanalysis which makes it a subject of general interest, which is true of neither psychology nor psychiatry. Psychoanalytic work connects with so many other scientific subjects, the investigation of which promises the most pertinent discoveries, with mythology, with folk-lore, with racial psychology and with religion. You will understand how a journal can have grown on psychoanalytic soil, the sole purpose of which is the furtherance of these relationships. This is the *Imago* founded in 1912 and edited by Hanns Sachs and Otto Rank. In all of these relations, psychoanalysis is first and foremost the giving, less often the receiving, part. Indeed it derives benefit from the fact that its unusual teachings are substantiated by their recurrence in other fields, but on the whole it is psychoanalysis that provides the technical procedure and the point of view, the use of which will prove fruitful in those other fields. The psychic life of the human individual provides us, upon psychoanalytic investigation, with explanations with which we are able to solve many riddles in the life of humanity, or at least show these riddles in their proper light.

从其他同类象征到梦的象征，大家可以体会到，精神分析的特点使其引起普遍关注，而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却并非如此。精神分析工作与诸多其他学科息息相关，其研究成果能为神话学、民俗学、民族心理学和宗教学等提供中肯结论。如果一个基于精神分析的期刊唯一目标是为了推进与这些学科的关系，那大家也大可理解了。这就是1912年创办、由汉斯·萨克斯和奥托·兰克主编的杂志《意象》。在所有这些学科中，精神分析是奉献远远大于收获的一方。实际上，它不同寻

常的学说在其他领域得到了证实，因此它也有所获益。但总的来说，精神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和观点支持，应用它们可在其他领域开花结果。通过精神分析研究，我们获得了关于个人心理生活的一些解答，借此可以解开人类生活的许多谜团，或至少为它们指明了适当方向。

Furthermore, I have not even told you under what conditions we are able to get the deepest insight into that suppositious "fundamental language," or from which field we gain the most information. So long as you do not know this you cannot appreciate the entire significance of the subject. This field is the neurotic, its materials, the symptoms and other expressions of the nervous patient, for the explanation and treatment of which psychoanalysis was devised.

而且，我甚至还未告诉大家，在何种条件下，我们可以深刻理解那个假想的"初始语言"，或者，我们可从哪个领域获取最多的信息。若大家不懂得这个，就仍不能完全理解本学科的意义所在。这就是神经症领域，研究它的资料，即神经症患者的症状和其他表现，精神分析就是要为之做出解释和治疗。

My fourth point of view returns to our premise and connects up with our prescribed course. We said, even if there were no such thing as dream censorship, the dream would still be hard to understand, for we would then be confronted with the task of translating the symbol-language of the dream into the thought of our waking hours. Symbolism is a second and independent item of dream distortion, in addition to dream censorship. It is not a far cry to suppose that it is convenient for the dream censorship to make use of symbolism since both lead to the same end, to making the

dream strange and incomprehensible.

我的第四点会回到前提上，与我们前面的课有关。我们说过，即便没有所谓梦的审查，梦依然令人不解，因为我们会面临一个艰巨任务：将梦的象征语言转换成清醒时的思路。除了审查之外，象征意义是梦的变形第二个独立因素。不难推断，既然两者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让梦变得扑朔迷离而无法理解，梦的审查也大可顺便利用象征意义。

Whether or not in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dream we shall hit upon a new item that influences dream distortion, remains to be seen. I should not like to leave the subject of dream symbolism without once more touching upon the curious fact that it arouses such strong opposition in the case of educated persons,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symbolism in myth, religion, art and speech is undoubtedly so prevalent. Is not this again because of its relationship to sexuality?

在接下来对梦的研究中，我们是否还会触及影响梦的变形的新因素，这有待观察。我想在结束梦的象征意义这一话题前，再提一件奇事：尽管象征意义在神话、宗教、艺术和话语中都不容置疑地普遍存在着，它还是在受教育人群中遭到非常强烈的反对。这难道还不是因为它与性之间的瓜葛吗？

[6_1]."steigen."

[6_2]."den Frauen nachsteigen," and "ein alter Steiger."

[7_1].德语为“steigen”（上升）。

[7_2].德语为“den Frauen nachsteigen”（爬在女人后面），“ein alter Steiger”（老爬脚手架的人，即情场老手）。

Eleventh Lecture　Work

第十一讲　梦的工作

If you have mastered dream censorship an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you are, to be sure, not yet adept in dream distortion, but you are nevertheless in a position to understand most dreams. For this you employ two mutually supplementary methods, call up the associations of the dreamer until you have penetrated from the substitute to the actual, and from your own knowledge supply the meaning for the symbol. Later we shall discuss certain uncertainties which show themselves in this process.

老实说，掌握了梦的审查和象征表现，并不等于熟谙了梦的变形，但确实已经可以理解大多数梦了。因为大家运用了两个互补的方法，先是诱导做梦者联想，通过替代物洞悉了真相，再运用自己的知识，找到象征的意义。这一过程中有些不确定因素，我们稍后再讲。

We are now in a position to resume work which we attempted, with very insufficient means at an earlier stage, when we studi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anifest dream elements and their latent actualities, and in so doing established four such main relationships: that of a part of the whole, that of approach or allusion, the symbolic relationship and plastic word representation. We shall now attempt the same on a larger scale, by comparing the manifest dream content as a whole, with the latent dream which we found by interpretation.

我们刚开始时曾经尝试研究过显梦元素和真实隐意的关系，当时研究方法还很欠缺，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了。我们当时确立了四种主要关系：一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二是接近或暗喻的关系；三是象征关系；四是语言的灵活再现（指将语言转换为图像的意向关系）。我们现在就同样的问题扩大研究范围，将梦的显意作为整体，与我们通过释梦发现的隐意做比较。

I hope you will never again confuse these two. If you have achieved this, you have probably accomplished mor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ream than the majority of the readers of my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 Let me remind you once more that this process, which changes the latent into the manifest dream, is called *dream-work* . Work which proceed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the manifest dream to the latent, is our *work of interpretation* . The work of interpretation attempts to undo the dream-work. Infantile dreams that are recognized as evident wish fulfillments nevertheless have undergone some dream-work, name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ish into reality, and generally, too, of thoughts into visual pictures. Here we need no interpretation, but only a retracing of these transformations. Whatever dream-work has been added to other dreams, we call *dream distortion* , and this can be annulled by our work of interpretation.

希望大家不会混淆这两者了。如能成功做到，大家对梦的理解，大概比我的《释梦》一书的大多数读者还要深刻。我要再次提醒各位，这个将隐意转变为显梦的过程称为梦的工作 。而与之反向的工作，即将显梦转换成隐意的过程就是我们的释梦工作 。释梦工作是力图抵消梦的工作。婴儿型的梦被视为明显的实现愿望，它们也仍然经历了一些梦的工作，即，愿望转化为现实，一般也是将想法转为可视画面。这里我们无需释梦，只需发现这些转化过程。而在其他的梦中

添加的梦的工作，我们称之为梦的变形 ，通过我们的释梦工作可以去除。

The comparison of many dream interpretations has rendered it possible for me to give you a coherent representation of what the dream-work does with the material of the latent dream. I beg of you, however, not to expect to understand too much of this. It is a piece of description that should be listened to with calm attention.

通过对不少释梦进行比较，我能给大家连贯地阐述梦的工作对于梦的隐意材料的操控。但是，我请求大家不要寄予过高期望。大家需冷静地聆听下面的描述。

The first process of the dream-work is *condensation* . By this we understand that the manifest dream has a smaller content than the latent one, that is, it is a sort of abbreviated translation of the latter. Condensation may occasionally be absent, but as a rule it is present, often to a very high degree. The opposite is never true, that is, it never occurs that the manifest dream is more extensive in scope and content than the latent. Condensation occurs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Certain latent elements are entirely omitted; 2. Only a fragment of the many complexes of the latent dream is carried over into the manifest dream; 3. Latent elements that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are collected for the manifest dream and are fused into a whole.

梦的工作第一个过程，是凝缩 。这样，我们就知道，梦的显意比隐意的内容要少，也就是说，显意是隐意简略的转换。虽然凝缩现象偶尔也会缺失，但普遍而言，它是存在的，而且参与程度通常很高。

从来没有相反的情况，也就是说，梦的显意在规模和内容上永远不会比隐意宽泛。凝缩现象发生的方式如下：1．某些隐意元素完全被删除；2．梦的隐意众多组合中只有一个片段进入了梦的显意中；3．有共同点的隐意元素被收入梦的显意中，融合为一个整体。

If you wish, you may reserve the term “condensation” for this last process alone. Its effects are particularly easy to demonstrate. From your own dreams you will doubtless recall the fusion of several persons into one. Such a compound person probably looks like A., is dressed like B., does something that one remembers of C., but in spite of this one is conscious that he is really D. By means of this compound formation something common to all four people is especially emphasized. One can make a compound formation of events and of places in the same way as of people,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single events and localities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which the latent dream emphasizes. It is a sort of new and fleeting concept of formation, with the common element as its kernel. This jumble of details that has been fused together regularly results in a vague indistinct picture, as though you had taken several pictures on the same film.

大家愿意的话，“凝缩”这个术语可单独用于上述最后一个过程。它的效应特别容易论证。大家回想自己的梦，无疑会发现有几个人合为一个人的现象。这样一个合成的人，可能相貌像A，穿着像B，行事风格像C，但尽管如此，他其实是D。通过这种合成信息，这四个人的共同点得到了强调。我们也可以像合成人物一样去合成事件和地点，前提总是，单个事件和地点有着梦的隐意所强调的共同点。这是一种新奇且不稳定的信息观念，其核心是该共性元素。这些纷乱细节混为一体后，通常会产生一个模糊不清的画面，就像在同一张胶片上叠加了几张照片似的。

The shaping of such compound formations must b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ream-work, for we can prove, (by the choice of a verbal expression for a thought, for instance) that the common elements mentioned above are purposely manufactured where they originally do not exist. We have already become acquainted with such condensation and compound formations;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origin of certain cases of slips of the tongue. You recall the young man who wished to *inscort* a woman. Furthermore, there are jokes whose technique may be traced to such a condensation. But entirely aside from this, one may maintain that this appearance of something quite unknown in the dream finds its counterpart in many of the creations of our imagination which fuse together component parts that do not belong together in experience, as for example the centaurs, and the fabulous animals of old mythology or of Boecklin's pictures. For creative imagination can invent nothing new whatsoever, it can only put together certain details normally alien to one another. The peculiar thing, however, about the procedure of the dream-work is the following: The material at the disposal of the dream-work consists of thoughts, thoughts which may be offensive and unacceptable, but which are nevertheless correctly formed and expressed. These thoughts are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else by the dream-work, and it is remarkable and incomprehensible that this translation, this rendering, as it were, into another script or language, employs the methods of condensation and combination. For a translation usually strives to respect the discriminations expressed in the text, and to differentiate similar things. The dream-work, on the contrary, tries to fuse two different thoughts by looking, just as the joke does, for an ambiguous word which shall act as a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the two thoughts. One need not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is feature of the case at once, but it may become significant for the conception

of the dream-work.

这些复合信息的形成，对于梦的工作必然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我们能证明（比如为一个想法选择口头表述），上面提到的这些共性元素本来并不存在，它们是被蓄意制造出来的。我们已经对这些凝缩和复合信息很眼熟，在某些口误案例中，它们是重要的起因之一。大家回想一下那位想要讽陪 一位女士的年轻人。而且，笑话也会使用凝缩的技巧。不过如果这都不算的话，有人仍可以坚称，梦中出现的这些未知事物，在想象力创造的许多事物中也能找到同道，我们的想象力会把现实中互不相干的元素糅合在一起，比如半人半马的怪物、古代神话和勃克林画作中的神兽。因为创造性想象并不能创造新的事物，它只能将一些他人觉得新奇的细节攒捏在一起。但是梦的工作过程有一个独特性，即为：梦的工作操控的材料由想法组成，这些想法可能是令人反感或不能接受的，但它们依然形成得很到位和并得到了表达。这些想法被梦的工作转化为其他事物，令人咋舌和难以理解的是，某种程度上，这种翻译、改写成另一个脚本或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使用了凝缩和糅合的手法。翻译通常会尽量尊重原文中表达的差异，要把相似的东西区别开来。而梦的工作则相反，它努力把两个不同的想法搅合在一起，所用方法与笑话一样，就是寻找一个一语双关的单词，使之成为两个想法的连接点。我们不用马上理解这个特点，但是它也许会对梦的工作的概念起到重要作用。

Although condensation renders the dream opaque, one does not get the impression that it is an effect of dream censorship. One prefers to trace it back to mechanical or economic conditions; but censorship undoubtedly has a share in the process.

虽然凝缩把梦模糊化了，但它貌似并不是梦的审查作用所致。它首先应该是出于机制上、或省力原则的考量，但审查无疑有份参与该

过程。

The results of condensation may be quite extraordinary. With its help, it becomes possible at times to collect quite unrelated latent thought processes into one manifest dream, so that one can arrive at an apparently adequate interpret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ceive a possible further interpretation.

凝缩的结果可以很不寻常。在它的助力下，几个不太相关的隐意过程经常可能聚集于同一显梦中，这样，我们能得出貌似充分的解释，同时也会苦思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

The consequence of condensation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latent and manifest dreams is the fact that no simple relations can exist between the elements of the one and the other. A manifest element corresponds simultaneously to several latent ones, and vice versa, a latent element may partake of several manifest ones, an interlacing, as it wer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eam it also becomes evident that the associations to a single element do not necessarily follow one another in orderly sequence. Often we must wait until the entire dream is interpreted.

凝缩对梦的显意和隐意之间关系的影响在于，两者的元素之间的关系很不简单。一个显意元素可同时与几个隐意元素相关，反之亦可，一个隐意元素可以参与几个显意元素，可以说是互相交织的。在释梦中也很显然，单个元素的联想未必按顺序一一出现。通常必须要等到整个梦解释完为止。

Dream-work therefore accomplishes a very unusual sort of transcription of dream thoughts, not a translation word for word, or sign for sign, not a selection according to a set rule, as if all the consonants of a word were given and the vowels omitted; nor is it what we might call substitution, namely, the choice of one element to take the place of several others. It is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and much more complicated.

因此，梦的工作是对梦的隐意一种非常规的誊写，不是字对字、符号对符号的翻译，其选择方法也不按常理出牌，就好比一个单词只给出所有辅音、而删去了所有元音，这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替换（用一个元素去替换其他几个）。这种情况很不同，要复杂得多。

The second process of the dream-work is *displacement* . Fortunately we are already prepared for this, since we know that it is entirely the work of dream censorship. The two evidences of this are firstly, that a latent element is not replaced by one of its constituent parts but by something further removed from it, that is, by a sort of allusion; secondly, that the psychic accent is transferred from an important element to another that is unimportant, so that the dream centers elsewhere and seems strange.

梦的工作的第二个过程是移置 。巧的是我们已经了解这一点了，因为我们知道它完全是梦的审查在起作用。原因有二：其一，一个隐意元素并未被其组成部分替代，而是被某个不相关的东西替代，也就是一种暗喻；其二，心理活动的重心从一个重要元素转移到另一个次要元素，这样梦的中心发生变动，显得怪异。

Substitution by allusion is known to our conscious thinking also, but with a difference. In conscious thinking the allusion must be easily intelligible, and the substitute must bear a relation to the actual content. Jokes, too, often make use of allusion; they let the condition of content associations slide and replace it by unusual external associations, such as resemblances in sound, ambiguity of words, etc. They retain, however, the condition of intelligibility; the joke would lose all its effect if the allusion could not be traced back to the actual without any effort whatsoever. The allusion of displacement has freed itself of both these limitations.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lement which it replaces is most external and remote, is unintelligible for this reason, and if it is retraced, its interpretation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an unsuccessful joke or of a forced, far-fetched explanation. For the dream censor has only then accomplished its purpose, when it has made the path of return from the allusion to the original undiscoverable.

暗喻的替代，在意识思维中也有发生，但情况不同。意识思维中，暗喻必须容易理解，替代必须与真实内容相关。笑话也经常使用暗喻，它们不去理会内容联想的条件，而代之以不寻常的外部联想，比如相似的发音、双关语，等等。然而，它们仍然易于理解，如果再怎么努力都无法通过暗喻找到真实意思，笑话就失去笑果了。移置的暗喻则没有这两个限制。它与被它替代的元素之间的关系极为表面化和疏远，因此无法理解，如果追究它，得到的解释给人的感觉像是不好笑的笑话，或是别扭牵强的解释。因为梦的审查当时刚完成任务，它把暗喻和原意之间的通路掩盖了。

The displacement of emphasis is unheard of as a means of expressing thoughts. In conscious thinking we occasionally admit it to gain a comic effect. I can probably give you an idea of the

confusion which this produces by reminding you of the story of the blacksmith who had committed a capital crime. The court decided that the penalty for the crime must be paid, but since he was the only blacksmith in the village and therefore indispensable, while there were three tailors, one of the latter was hung in his stead.

我们对重心的移置这一表达想法的方式闻所未闻。在意识思维中，我们偶尔承认它会有喜剧效果。大家是否记得一位犯死罪的铁匠的故事，这大概能说明移置引发的困惑。法院决定必须执行死罪，但由于他是村子里唯一的铁匠，所以缺不了他，而裁缝倒是有三个，所以其中之一就代他受死了。

The third process of the dream-work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from a psychological point of view. It consist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oughts into visual images. Let us bear in mind that by no means all dream thoughts undergo this translation; many of them retain their form and appear in the manifest dream also as thought or consciousness; moreover, visual images are not the only form into which thoughts are translated. They are, howev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dream fabric; this part of the dream work is, as we already know, the second most constant, and for single dream elements we have already learned to know “plastic word representation.”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梦的工作的第三个过程是最有趣的。它是把想法转换 成可视画面的过程。我们要记得，不是所有的梦都有这样的转换，不少的梦会保持原形，在显梦中依然作为想法或意识出现，而且，可视画面不是想法可转换的唯一形式。然而，它们是梦的构造基础，正如我们所知，这部分梦的工作是第二常见的，也是单一梦元素，我们已经了解的“语言的灵活再现”。

It is evident that this process is not simple. In order to get an idea of its difficulties you must pretend that you have undertaken the task of replacing a political editorial in a newspaper by a series of illustrations, that you have suffered an atavistic return from the use of the alphabet to ideographic writing. Whatever persons or concrete events occur in this article you will be able to replace easily by pictures, perhaps to your advantage, but you will meet with difficultie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all abstract words and all parts of speech denoting thought relationships, such as particles, conjunctions, etc. With the abstract words you could use all sorts of artifices. You will, for instance, try to change the text of the article into different words which may sound unusual, but whose components will be more concrete and more adapted to representation. You will then recall that most abstract words were concrete before their meaning paled, and will therefore go back to the original concrete significance of these words as often as possible, and so you will be glad to learn that you can represent the "possession" of an object by the actual physical straddling of it. [7_1] The dream work does the same thing.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you can hardly demand accuracy of representation. You will also have to allow the dream-work to replace an element that is as hard to depict as for instance, broken faith, by another kind of rupture, a broken leg.[1] In this way you will be able to smooth away to some extent the crudity of imagery when the latter is endeavoring to replace word expression.

这个过程显然不简单。要想了解它的难点，只要想象一下，你要用一套图表取代一篇政论，就等于陷入了从字母文字转换到原始表意书写的窘困之中。文章中的人物或具体时间容易用图片表现，而且可以充分发挥，但是要表现所有抽象单词和所有提示语义联系的词，如

关系词、连接词等，就会难上加难了。对于抽象单词，有各种计策可用。比如，试着把文本改成不同的单词，它们也许比较怪异，但其构词成分更为具象、更适于表现。然后你会想到，大部分抽象单词原先是具象的，只是后来它们的意思被抹去了，所以要尽可能地回到这些词原先的具象意义，这样你会高兴地发现，原来“拥有”一件物品，可以用真人跨于其上表示 [8_1] 。梦的工作用的是同一种计策。在这类情况下，很难指望这种表达的准确度。梦的工作也一定会替换难以描述的元素，比如把忠诚破裂替代为另一种破裂：一条断腿[1] 。用这种方法，图像替代文字表达时的粗糙感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

1: While revising these pages I chanced upon a newspaper article that I quote here as an unexpected supplement to the above lines.

1: 当我修改这几页内容时，偶然在报纸上发现了一篇文章，在此引用，对以上内容做个意料之外的补充。

"The Punishment of God

“上帝的惩戒

A Broken Arm for Broken Faith

断誓则断臂

Mrs. Anna M. The wife of a soldier in the reserve accused Mrs. Clementine C. of being untrue to her husband. The accusation reads that Mrs. C. had carried on an illicit relationship with Karl M. while her own husband was on the battlefield, from which he even sent her 70 Kronen a month. Mrs. C. had received *quite a lot of money* from the husband of the plaintiff, while she and her children had to live in *hunger* and in misery. Friends of her husband had told her that Mrs. C. had visited inns with M. and had caroused there until late at night. The accused had even asked the husband of the plaintiff before several infantrymen whether he would not soon get a divorce from his 'old woman' and live with her. Mrs. C.'s housekeeper had also repeatedly seen the husband of the plaintiff in her (Mrs. C.'s) apartment, in complete negligée.

预备役士兵之妻安娜·M女士指控克莱芒蒂娜·C女士对丈夫不忠。指控称，C女士于丈夫在前线期间与原告的丈夫卡尔·M发生不正当关系，此间被告的丈夫每月还寄给她70克朗家用。C女士从原告的丈夫处得到大笔金钱，而原告和孩子却只能在 饥饿 和痛苦中生活。她丈夫的朋友告诉她，C女士在旅店与M相会寻欢，至夜方归。被告甚至当着几个步兵的面，问原告的丈夫，何不趁早跟他那位‘黄脸婆’离婚，跟她一起生活。C女士家的寓所管理员也多次看到原告的丈夫穿着一身家常便服在C女士的公寓里。

Yesterday Mrs. C. *denied* before a judge in Leopoldstadt that she even knew M; there could be no question of intimate relation between them.

昨天，C女士在利奥波德一位法官面前否认道，她甚至不认识M，因而两人不可能有亲密关系。

The witness, Albertine M., however, testified that Mrs. C. had kissed the husband of the plaintiff and that she had surprised them at it.

但是，证人艾伯丁·M作证说，C女士亲吻过原告的丈夫，她的出现让他们吓了一跳。

When M. was called as a witness in an earlier proceeding he had denied any intimate relation to the accused. Yesterday the judge received a *letter* in which the witness retracts the statement he made in the first proceeding and *admits* that he had carried on a love affair with Mrs. C., until last June. He says that he only denied this relationship in the former proceeding for the sake of the accused because before the proceeding she had come to him and begged on her knees that he should save her and not confess. 'To-day,' wrote the witness, 'I felt impelled to make a full confession to the court, since I have *broken my left arm* and this appears to

me as the *punishment of God* for my transgression.'

M在早前作为证人出庭时，否认与被告有任何亲密关系。昨日，法官接到一份来信，其中M推翻了在首次出庭时的证词， 承认 自己与C女士发生过婚外恋，一直维持到去年6月。他说，他之所以在前次出庭时否认这段关系，是因为开庭前她去找他，跪着求他救她，不要承认。‘今天，’证人写道，‘我觉得有必要向法庭完全坦白，因为我摔断了左臂，我认为这是上帝在惩罚我的罪过。’

The judge maintained the penal offense had already become null and void, whereupon the plaintiff withdrew her accusation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accused followed."

法官宣称，该刑事犯罪已过时效，案件无效，因而原告撤回起诉，被告得以释放。”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parts of speech that denote thought relations, such as *because* , *therefore* , *but* , etc., you have no such aids; these constituent parts of the text will therefore be lost in your translation into images. In the same way, the dream-work resolves the content of the dream thought into its raw material of objects and activities. You may be satisfied if the possibility is vouchsafed you to suggest certain relations, not representable in themselves, in a more detailed elaboration of the image. In quite the same way the dream-work succeeds in expressing much of the content of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 in the formal peculiarities of the manifest dream, in its clearness or vagueness, in its division into several parts, etc. The number of fragmentary dreams into which the dream is divided corresponds as a rule to the number of main themes, of thought sequences in the latent dream; a short preliminary dream often stands as an introduction or a motivation to the complementary dream which follows; a subordinate clause in dream thought is represented in the manifest dream as an interpolated change of scene, etc. The form of the dream is itself, therefore, by no means without significance and challenges interpretation. Different dreams of the same night often have the same meaning, and testify to an increasing effort to control a stimulus of growing urgency. In a single dream a particularly troublesome element may be represented by “duplicates,” that is, by numerous symbols.

语义关系的提示词，如因为 、所以 、但是 等等的表现则无方可循，因此文本中的这些组成部分在转换为图像时是缺失的。梦的工作用同样的方式，将梦的隐意内涵处理成了物品和活动的原材料。要是有可能将原本不太好表达的某些关系用图像阐述得更精细，我们就很满足了。梦的工作也几乎一样，以显梦的特殊形式，或清晰或模糊，或分成几部分等方式，成功地表达了梦的隐意的很多内容。梦被分割片段的数量一般与主题的数量和隐意中系列隐念的数量一致，开始的短梦通常是后续长梦的引子或动机，从属性的隐意在显梦中的表现形式是编造的情景变化，等等。因此，梦的形式本身绝非毫无意义，对释梦也是有挑战的。同一夜晚的不同的梦通常有着相同的意义，证明做梦者在不断努力压制一个越来越急迫的刺激。在单一的梦中，一个特别繁杂的元素可以表现为各种“复制品”，即有很多象征符号。

By continually comparing dream thought with the manifest dream that replaces it, we learn all sorts of things for which we

were not prepared, as for instance, the fact that even the nonsense and absurdity of the dream have meaning. Yes, on this point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medical and psychoanalytic conception of the dream reaches a climax not previously achieved.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the dream is senseless because the dreaming psychic activity has lost all power of critical judgment; according to our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dream becomes senseless, whenever a critical judgment, contained in the dream thought, wishes to express the opinion: “It is nonsense.” The dream which you all know, about the visit to the theatre (three tickets 1 Fl. 50 Kr.) is a good example of this. The opinion expressed here is: “It was *nonsense* to marry so early.”

继续比较梦的隐意及替代它的显梦，我们会发现不少意外的事情，比如，即便是梦中的胡话和荒唐事都是有意义的。是的，在这里，医学界与精神分析界关于梦的观念的异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医学界认为，梦是无意义的，因为梦中的心理活动完全丧失了思辨判断力；而另一方面，根据我们的理论，只有当隐意中的思辨判断力想要表达“这是胡说”的观点时，梦才是无意义的。大家都知道的，关于去剧院的（1弗罗林50克朗买3张票）那个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这里表达的观点是：“这么早结婚毫无意义 。”

In the same way, we discover in interpretation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oubts and uncertainties so often expressed by the dreamer as to whether a certain element really occurred in the dream; whether it was this or something else. As a rule these doubts and uncertainties correspond to nothing in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 they are occasioned throughout by the working of the dream censor and are equivalent to an unsuccessful attempt at suppression.

同样，我们在释梦中发现了做梦者表述犹豫不定（比如梦中是否确有某元素，或它是此或是彼）的意义。一般而言，这些犹豫不定与梦的隐意并无对应之处，它们是整个梦的审查的后果，相当于一次失败的压抑。

One of the most surprising discoveries is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dream-work deals with those things which are opposed to one another in the latent dream. We already know that agreements in the latent material are expressed in the manifest dream by condensations. Now oppositions are treated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as agreements and are, with special preference, expressed by the same manifest element. An element in a manifest dream, capable of having an opposite, may therefore represent itself as well as its opposite, or may do both simultaneously; only the context can determine which translation is to be chosen. It must follow from this that the particle “no” cannot be represented in the dream, at least not unambiguously.

一个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梦的工作处理隐意中对抗元素的方式。我们已知，隐意的共性元素是通过凝缩方法在显梦中表达的。现在它处理对抗元素和处理共性元素的方法如出一辙，就是：由同一显梦元素按特定偏向予以表达。显梦中的一个元素能包容其反对项，因而既能代表自己，也能代表其反面，甚至可同时代表正反两面，只有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换方式。其必然结果是，在梦中否定词“不”是无法表现的，至少不能没有歧义地表现。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s furnishes us with a welcome analogy for this surprising behavior on the part of the dream work.

Many scholars who do research work in languages have maintained that in the oldest languages opposites—such as strong, weak; light, dark; big, little—were expressed by the same root word. (*The Contradictory Sense of Primitive Words.*) In old Egyptian, *ken* originally meant both strong and weak. In conversation,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use of such ambiguous words was avoided by the tone of voice and by accompanying gestures, in writing by the addition of so-called determinatives, that is, by a picture that was itself not meant to be expressed. Accordingly, if ken meant strong, the picture of an erect little man was placed after the alphabetical signs, if *ken* , *weak* , was meant, the picture of a cowering man followed. Only later, by slight modifications of the original word, were two designations developed for the opposites which it denoted. In this way, from *ken* meaning both strong and weak, there was derived a *ken* , strong, and a *ken* , weak. It is said that not only the most primitive languages in their last developmental stage, but also the more recent ones, even the living tongues of today have retained abundant remains of this primitive opposite meaning. Let me give you a few illustrations of this taken from C. Abel (1884).

语言的发展，为梦的工作这个令人惊奇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正面的类比。很多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都主张，在最古老的语言中，反义词——比如强和弱、亮和暗、大和小——是由同一个源词表达的（原始单词的矛盾语义）。在古埃及，“ken”原先兼有强和弱之意。在对话中是通过语调并伴以手势避免使用这类双关语的误会，而写作时，要添加所谓的限定符号，即以画图来区别意思。相应地，如果“ken”的意思的是强 ，就在字母符号后面画一个直立小人；如果“ken”的意思是弱 ，就在后面画一个畏缩的人。只是后来源词发生了轻微改动，才发展出两个反义的单词。这样，从强弱之意兼备的“ken”衍生出了意为强的“ken”和意为弱的“ken”。据说，不仅在最原始语言的最后发展

阶段，而且在一些较晚的，甚至今天存活的语言中仍有大量残余的原始反义。我给大家看阿伯尔在1884年的几个例证。

In Latin there are still such words of double meaning:

在拉丁语中仍存在双重意思的单词：

altus —high, deep, and *sacer* , sacred, accursed.

altus ：高、深；*sacer* ：神圣的、邪恶的。

As examples of modifications of the same root, I cite:

同一源词修改的例子有：

clamare —to scream, *clam* —quiet, still, secret;

clamare ：尖叫；*clam* ：安静、静止、秘密。

siccus —dry, *succus* —juice.

siccus ：干燥；*succus* ：汁液。

And from the German:

还有德语的例子：

Stimme —voice, *stumm* —dumb.

Stimme ：声音； *stumm* ：无声。

The comparison of related tongues yields a wealth of examples:

各语言对比，也产生了很多例子：

English: *lock* ; German: *Loch* —hole, *Lücke* —gap.

英语：*lock*（锁）；德语：*Loch*（孔）；*Lücke*（差距）。

English: *cleave* ; German: *kleben* —to stick, to adhere.

英语：*cleave*（信守）；德语：*kleben*（坚持）。

The English *without* , is today used to mean “not with”; that

“with” had the connotation of deprivation as well as that of apportioning, is apparent from the compounds: *withdraw* , *withhold* . The German *wieder* , again, closely resembles this.

英语单词*without* 现在的意思是“not with”（少了），而“with”（有了）在过去则兼有剥夺和分配之意，下面的组合词很明显：*withdraw* （收回）、*withhold* （阻止）。德语单词*wieder* （再次）与之很类似。

Another peculiarity of dream-work finds it prototyp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It occurred in ancient Egyptian as well as in other later languages that the sequence of sounds of the words was transposed to denote the same fundamental idea. The following are examples from English and German:

梦的工作另一特性在语言发展中也是既成事实。在古埃及和其他晚些的语言中，单词发音的顺序置换，指示的是同一基本意思。下面例子来自英语和德语：

Topf —*pot* ; *boat* —*tub* ; *hurry* —*Ruhe* (rest, quiet).

topf （锅）—*pot* （锅）；*boat* （船）—*tub* （缸）；*hurry* （急忙）—*Ruhe* （休息、安静）。*

Balken (beam)—*Kloben* (mallet)—*club* .

Balken（杠）— Kloben（槌）— club*（棒）。

From the Latin and the German:

下面例子来自拉丁语和德语：

capere (to seize)—*packen* (to seize, to grasp).

capere（抓住）—*packen*（抓住）

Inversions such as occur here in the single word are effected in a very different way by the dream-work. We already know the inversion of the sense, substitution by the opposite. Besides there are inversions of situations, of relations between two people, and so in dreams we are in a sort of topsy-turvy world. In a dream it is frequently the rabbit that shoots the hunter. Further inversion occurs in the sequence of events, so that in the dream the cause is placed after the effect. It is like a performance in a third-rate theatre, where the hero falls before the shot which kills him is fired from the wings. Or there are dreams in which the whole sequence of the elements is inverted, so tha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ne must take the last first, and the first last, in order to obtain a meaning. You will recall from our study of dream symbolism that to go or fall into the water means the same as to come out of it, namely, to give birth to, or to be born, and that mounting stairs or a ladder means the same as going down. The advantage that dream distortions may gain from such freedom of representation, is unmistakable.

这里在单词中出现的语音倒置，被梦的工作玩出了完全不同的花样。我们知道有颠倒意思，即用反义替代。此外，还有情境、人的关系的互换，因而梦境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在梦中，常常是小白兔开枪打猎人。事件的先后次序也会互换，以致梦中的因出现在果之后。这就像三流剧院的一场演出，舞台一侧杀人的子弹还没射出，主角就倒下了。或者，在有一些梦中，各元素的次序完全颠倒，因而释梦必须先从最后一个开始，以第一个结束，如此才能理清其中的意义。大家记得我们学习梦的象征意义时，入水或落水跟出水的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分娩或出生，从楼梯或梯子上去跟下来也是一个意思。毫无疑问，梦的变形会从这种随意表现中获益。

These features of the dream-work may be called *archaic* . They are connected with ancient systems of expression, ancient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and involve the same difficulties which we shall deal with later in a critical connection.

梦的工作的特征可谓原始 。它们与古代的表达体系，即古代语言和文学有相同之处，也具有同样的难点，我们以后会在一个重要的相关问题上讨论它们。

Now for some other aspects of the matter. In the dream-work it is plainly a question of translating the latent thoughts, expressed in words, into psychic images, in the main, of a visual kind. Now our thoughts were developed from such psychic images; their first material and the steps which led up to them were psychic impressions, or to be more exact, the memory images of these psychic impressions. Only later were words attached to these and then combined into thoughts. The dream-work therefore puts the

thoughts through a *regressive* treatment, that is, one that retraces the steps in their development. In this regression, all that has been added to the thoughts as a new contribu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mory pictures must fall away.

现在再谈其他几个方面。在梦的工作中，转换隐意显然很成问题，它以词语表述，被转化为心理图像，主要是可视图像。现在隐意是从这些心理图像发展而来的，它们的第一手材料和引向它们的步骤是心理印象，或更确切地说，是这些心理印象的记忆图像。词语只是在后来才附着上来，合并为隐意。因而，梦的工作使得隐意发生了退行性 变化，就是说，经历了逆向的发展步骤。在这种退行中，所有帮助记忆图片发展而加入隐意的新事物都必然会灰飞烟灭。

This, then, is the dream-work. In view of the processes that we have discovered about it, our interest in the manifest dream was forced into the background. I shall, however, devote a few remarks to the latter, since it is after all the only thing that is positively known to us.

这些就是梦的工作。从我们发现它的过程看，显梦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然而，关于显梦我还是会多说几句，因为我们唯一确认知道的只有它。

It is natural that the manifest dream should lose its importance for us. It must be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to us whether it is well composed or resolved into a series of disconnected single images. Even when its exterior seems to be significant, we know that it has been developed by means of dream distortion and may have as little

organic connection with the inner content of the dream as the facade of an Italian church has with its structure and ground plan. At other times this facade of the dream, too, has its significance, in that it reproduces with little or no distortion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 But we cannot know this before we have put the dream through a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and reached a decision as to what amount of distortion has taken place. A similar doubt prevails when two elements in the dream seem to have been brought into close relations to one another. This may be a valuable hint, suggesting that we may join together those manifest thoughts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elements in the latent dream; yet at other times we are convinced that what belongs together in thought has been torn apart in the dream.

自然，显梦于我们而言重要性不大。无论它是否顺理成章、或是杂乱无序，对我们来说都无关紧要。即使它表面看起来很重要，我们知道它是由梦的变形发展而来，它与梦的内涵的关系，正如意式教堂的外立面与其内部结构和布局的关系一样，相关性很小。有些时候，当它较少、或毫无变形地再现了梦的隐意一个重要部分时，这个梦的外表也是有意义的。不过，不等到我们对梦进行了完整解析，判断出变形的程度时，我们也无从知晓。当两个梦元素似乎被拉近了关系时，也会产生类似疑问。这个提示很有意义，它暗示着，虽然我们可以将这些与隐意元素相符的显意元素拼凑在一起，但有时我们必须承认，想象中属性一样的元素在梦中却会被拉得相距很远。

As a general rule we must refrain from trying to explain one part of the manifest dream by another, as if the dream were coherently conceived and pragmatically represented. At the most it is comparable to a Breccian stone, produced by the fusion of various minerals in such a way that the markings it shows are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original mineral constituents. There is actually a part of the dream-work, the so-called *secondary treatment* , whose function it is to develop something unified, something approximately coherent from the final products of the dream-work. In so doing the material is often arranged in an entirely misleading sense and insertions are made wherever it seems necessary.

普遍而言，我们不能用显梦的一部分去解释另一部分，梦并不是前后连贯、如实呈现的。它顶多可与角砾岩相比，后者由各种矿物混合而成，混杂之深，使得其呈现的各种纹路与原始矿物组成物完全不一样。其实梦的工作有一个部分，是所谓的二次加工 ,其功能为，对梦的工作的最终产物进行整合，加工成近似连贯的事物。这样做的话，通常会完全误导性地编排材料，在貌似必要处随意添加内容。

On the other hand, we must not over-estimate the dream-work, nor attribute too much to it. The processes which we have enumerated tell the full tale of its functioning; beyond condensing, displacing, representing plastically, and then subjecting the whole to a secondary treatment, it can do nothing. Whatever of judgment, of criticism, of surprise, and of deduction are to be found in the dream are not products of the dream-work and are only very seldom signs of afterthoughts about the dream, but are generally parts of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 which have passed over into the manifest dream, more or less modified and adapted to the context. In the matter of composing speeches, the dream-work can also do nothing. Except for a few examples, the speeches in the dream are imitations and combinations of speeches heard or made by oneself during the day, and which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latent thought, either as material or as stimuli for the dream. Neither can the dream pose problems; when these are found in the dream, they

are in the main combinations of numbers, semblances of examples that are quite absurd or merely copies of problems in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 Under these condition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interest which has attached itself to the dream-work is soon deflected from it to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s which are revealed in more or less distorted form in the manifest dream. It is not justifiable, however, to have this change go so far that in a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one regularly substitutes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 for the dream itself, and maintains of the latter what can hold only for the former. It is odd that the results of psychoanalysis should be misused for such an exchange. “Dream” can mean nothing but the result of the dream-work, that is, the *form* into which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s have been translated by the dream-work.

另一方面，我们一定不能高估了梦的工作，也不可过分归咎于它。我们列举的几个环节，是它完整的运行机能，除了凝缩、移置、灵活表现以及进行整体的二次加工，它没有其他作用。梦中发现的评价、批判、惊讶和推论并非梦的工作的产物，也很少是对梦的事后想法的迹象，而基本上是隐意的组成部分，它们潜入了显梦中，为了融入显梦剧情，多少都被修改、改编过了。在创作话语方面，梦的工作也没起作用。除了几个例外，梦中的话语是做梦者白天听到或说过的话语的模拟和合并，它被引入了隐意之中，成为梦的材料或刺激。梦也不会制造问题，梦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若干相似例子的混合体，这些例子要么很荒唐、要么只是对隐意中问题的抄袭。在这些情况下，无怪乎我们原本对于梦的工作的兴趣转向了梦的隐意（后者在显梦中或多或少以变形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我们在兴趣转变上不应矫枉过正，以致在理论探讨时，常用梦的隐意代替梦的本身，只采用其符合隐意的部分，这有失公允。精神分析的结论被误用在这种交流上是很怪的。“梦”的意义仅在于，它是梦的工作的结果，即，梦的隐意被梦的工作转换成了何种形式 。

Dream-work is a process of a very peculiar sort, the like of which has hitherto not been discovered in psychic life. These condensations, displacements, regressive translations of thoughts into pictures, are new discoveries which richly repay our efforts in the field of psychoanalysis. You will realize from the parallel to the dream-work, what connections psychoanalytic studies will reveal with other fields, especial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peech and thought. You can only surmise the further significance of these connections when you hear that the mechanism of the dream structure is the model for the origin of neurotic symptoms.

梦的工作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过程，在心理生活中至今尚未发现与之类似的活动。凝缩、移置、退行（将隐意逆转为图像）是全新的发现，是我们在精神分析领域耕耘的丰厚回报。通过与梦的工作平行的现象，大家可以认识到精神分析研究揭示的与其他学科的相关性，尤其与语言、思想发展的关系。只要大家知道梦的构成机制是神经症症状来源的模型参考，就更能理解这些关系的重要性了。

I know too that we cannot as yet estimate the entire contribution that this work has made to psychology. We shall only indicate the new proofs that have been given of the existence of unconscious psychic acts—for such are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s—and the unexpectedly wide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unconscious psychic life that dream interpretation opens up to us.

我同样知道，释梦对于心理学的贡献尚无法完全估量。我们只需指出：新的证据证明了潜意识心理行动（这就是梦的隐意）的存在；释梦无意间向我们打开了通往理解潜意识心理生活的康庄大道。

The time has probably come, however, to illustrate separately, by various little examples of dreams, the connected facts for which you have been prepared.

不过，我们是时候以各种简短的梦为例，来分别验证大家已经学过的相关知识点了。

[7_1]."besitzen," to straddle.

[8_1].德语“besitzen”，意为“跨”。

Twelfth Lecture　Analysis of Sample Dreams

第十二讲　释梦示例

I hope you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if I again lay before you excerpts from dream analyses instead of inviting you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beautiful long dream. You will say that after so much preparation you ought to have this right, and that after the successful interpretation of so many thousands of dreams it should long ago have become possible to assemble a collection of excellent dream samples with which we could demonstrate all our assertions concerning dream-work and dream thoughts. Yes, but the difficulties which stand in the way of the fulfillment of your wish are too many.

我所举的示例，只是一些释梦节选，而不是请大家一起分析一个精彩的长梦，希望大家不至于失望。基础打了这么久，大家总希望有所施展，成功地做了上千次释梦后，早就应该能运用梦的工作和隐意等理论来串联一系列绝妙梦境。话虽如此，但在大家实现愿望的道路上，还是铺满了荆棘。

First of all, I must confess to you that no one practices dream interpretation as his main occupation. When does one interpret dreams? Occasionally one can occupy himself with the dream of some friend, without any special purpose, or else he may work with his own dreams for a time in order to school himself in psychoanalytic method; most often, however, one deals with the dreams of nervous individuals who are undergoing analytic

treatment. These latter dreams are excellent material, and in no way inferior to those of normal persons, but one is forced by the technique of the treatment to subordinate dream analysis to therapeutic aims and to pass over a large number of dreams after having derived something from them that is of use in the treatment. Many dreams we meet with during the treatment are, as a matter of fact, impossible of complete analysis. Since they spring from the total mass of psychic material which is still unknown to us, their understanding becomes possible only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cure. Besides, to tell you such dreams would necessitate the disclosure of all the secrets concerning a neurosis. That will not do for us, since we have taken the dream as prepar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neuroses.

首先，我必须承认，没人拿释梦当主业。什么时候会释梦呢？偶尔，我们会不带特殊目的地为某个朋友效劳；或为了精神研究学习，暂时用自己的梦进行解析；但更常见的是，我们的释梦对象是接受分析治疗的神经症患者。他们的梦是很好的素材，绝不亚于正常人的梦，但出于治疗手段的要求，我们的释梦必须服从治疗目标，除了对治疗有用的释梦结论，我们不得不忽略大量的梦。事实上，我们在治疗期间碰到的许多梦不可能得到完整分析。因为它们源自我们至今未知的心理材料谜团，只有在完全治愈后，我们才有可能全然理解它们。另外，要列举这些梦，势必要先全盘托出神经症的所有奥秘。这对我们并无好处，因为释梦的目的，本就是为神经症研究做准备。

I know you would gladly leave this material, and would prefer to hear the dreams of healthy persons, or your own dreams explained. But that is impossible because of the content of these dreams. One can expose neither himself, nor another whose confidence he has won, so inconsiderately as would result from a

thorough interpretation of his dreams—which, as you already know, refer to the most intimate things of his personality. In addition to this difficulty, caused by the nature of the material, there is another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when communicating a dream. You know the dream seems strange even to the dreamer himself, let alone to one who does not know the dreamer. Our literature is not poor in good and detailed dream analyses. I myself have published some in connection with case histories. Perhaps the best example of a dream interpretation is the one published by O. Rank, being two related dreams of a young girl, covering about two pages of print, the analysis covering seventy-six pages. I would need about a whole semester in order to take you through such a task. If we select a longer or more markedly distorted dream, we have to make so many explanations, we must make use of so many free associations and recollections, must go into so many bypaths, that a lecture on the subject would be entirely unsatisfactory and inconclusive. So I must ask you to be content with what is more easily obtained, with the recital of small bits of dreams of neurotic persons, in which we may be able to recognize this or that isolated fact. Dream symbols are the most easily demonstrable, and after them, certain peculiarities of regressive dream representations. [8_1] I shall tell you why I considered each of the following dreams worthy of communication.

大家可能不乐意触碰此类素材，宁可听听对健康人或自己的梦的解释。但由于这些梦的内容，这不太可能。彻底释梦是对做梦者个人最隐私内心的无情暴露，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信任自己的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除了梦的材料本质造成的障碍之外，还必须考虑表述梦的困难。须知，梦即便对于做梦者本人而言都是奇异的，更不用说不认识他们的人了。梦的分析不乏精妙详实的文献。我本人就出版了一些与病患案例有关的著作。也许兰克的书中举的释梦例子是最好的，它

是关于一个年轻女孩的两个相关的梦，占了约两页，而分析用去了76页。要指导大家完成这样的任务，恐怕需要花上一整个学期的时间了。要是选了更长、或变形更显著的梦，我们就不得不作太多的解释，使用太多的联想和回忆，而且一定会走太多的弯路，这个主题的课程会完全无法达到满意和确定的效果。所以我请大家务必接受更简便易得的、神经症病人的梦的小片段，我们可从中发现一些孤立的特点。梦的象征是最容易示范证明的，然后是梦的退行性表现 [9_1] 的某些特性。我会讲述下列梦值得讨论的原因。

1．A dream, consisting of only two brief pictures: “*The dreamer's uncle is smoking a cigarette, although it is Saturday. A woman caresses him as though he were her child.* ”

1．一个只包含两幅简图的梦：“虽然是星期六，做梦者的叔叔在抽烟。一个女人爱抚着他，好像他是她的孩子。 ”

In commenting on the first picture, the dreamer (a Jew) remarks that his uncle is a pious man who never did, and never would do, anything so sinful as smoking on the Sabbath. As to the woman of the second picture, he has no free associations other than his mother. These two pictures or thoughts should obviously be brought into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 but how? Since he expressly rules out the reality of his uncle's action, then it is natural to interpolate an “if.” “*If* my uncle, that pious man, should smoke a cigarette on Saturday, then I could also permit my mother's caresses.” This obviously means that the mother's caresses are prohibit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is smoking on Saturday, to a pious Jew. You will recall, I told you that all relations between the dream thoughts disappear in the dream-work, that these relations

are broken up into their raw material, and that it is the task of interpretation to reinterpolate the omitted connections.

做梦者（一位犹太人）在评述第一幅画面时说，他叔叔是虔诚的教徒，也永远不可能做过在安息日吸烟这样罪恶的事。至于下一个画面中的女人，他除了自己的母亲没有其他自由联想。这两幅画面或念头显然应该联系起来看，但怎么联系呢？因为他直言叔叔的行为不真实，那么自然应该加一个“如果”。“如果我的叔叔，一个虔诚的教徒，在星期六抽了烟，那我也可以默许我妈妈的爱抚。”这显然意味着，这位妈妈的爱抚是个禁忌，跟虔诚的犹太教徒星期六抽烟是一个道理。大家记得我曾说过，梦的隐意的所有关联在梦的工作中消失了，这些关联被分解成原始材料，释梦的任务是要把删去的关联添补回来。

2．Through my publications on dreams I have become, in certain respects, the public consultant on matters pertaining to dreams, and for many years I have been receiving communications from the most varied sources, in which dreams are related to me or presented to me for my judgment. I am of course grateful to all those persons who include with the story of the dream, enough material to make an interpretation possible, or who give such an interpretation themselves. It is in this category that the following dream belongs, the dream of a Munich physician in the year 1910. I select it because it goes to show how impossible of understanding a dream generally is before the dreamer has given us what information he has about it. I suspect that at bottom you consider the ideal dream interpretation that in which one simply inserts the meaning of the symbols, and would like to lay aside the technique of free association to the dream elements. I wish to disabuse your minds of this harmful error.

2．我出版的梦的论著使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关乎梦的大众顾问，多年来我收到来源甚广的咨询，都是讲述或呈现各种梦，请求我的评判。我当然感谢所有咨询者提供梦的经历，给了释梦以充足素材，也感谢那些自己释梦的人。下面这个梦就是属于其中之一，是一位慕尼黑的医生在1910年做的梦。我选它是想说明，如果做梦者不透露梦的相关情况，一般很难理解梦。我猜想，大家心底里认为的理想释梦会是，只需简单注解象征符号的意义，无需用到针对梦元素的自由联想技巧。这个想法是有害的，大家务须戒除之。

On July 13, 1910, toward morning, I dreamed *that I was bicycling down a street in Tübingen, when a brown Dachshund tore after me and caught me by the heel. A bit further on I get off, seat myself on a step, and begin to beat the beast, which has clenched its teeth tight.* (*I feel no discomfort from the biting or the whole scene.*) *Two elderly ladies are sitting opposite me and watching me with grins on their faces. Then I wake up and, as so often happens to me, the whole dream becomes perfectly clear to me in this moment of transition to the waking state.*

“1910年7月13日凌晨时分，我梦见，我在图宾根一条大街上骑自行车，这时一条棕色腊肠犬追在我身后，并咬住我的鞋跟。稍后，我下车坐在一节台阶上，因为狗紧咬不放，我开始打它（狗咬或整个场景并未使我有任何不适）。两个老妇人坐在我对面，笑嘻嘻地看着我。然后我就醒了，一如往常，我在临近清醒状态下做的梦会非常清晰。”

Symbols are of little use in this case. The dreamer, however, informs us, “I lately fell in love with a girl, just from seeing her on the street, but had no means of becoming acquainted with her. The most pleasant means might have been the Dachshund, since I am a great lover of animals, and also felt that the girl was in sympathy with this characteristic.” He also adds that he repeatedly interfered in the fights of scuffling dogs with great dexterity and frequently to the great amazement of the spectators. Thus we learn that the girl, who pleased him, was always accompanied by this particular dog. This girl, however, was disregarded in the manifest dream, and there remained only the dog which he associates with her. Perhaps the elderly ladies who simpered at him took the place of the girl. The remainder of what he tells us is not enough to explain this point. Riding a bicycle in the dream is a direct repetition of the remembered situation. He had never met the girl with the dog except when he was on his bicycle.

这个案例中，象征的作用不大。不过做梦者告知我们：“我最近在街上看到一个女孩，对她一见钟情，但我没办法结识她。最可取的方法可能就是通过那条腊肠犬，因为我很喜欢动物，而且觉得那个女孩会喜欢我这一点。”他还补充说，他曾多次为狗儿间的撕斗轻松解围，经常赢来旁观者的惊叹。这样我们知道了，那位令他倾心的女孩总是与这条狗相伴而行。不过显梦中省略了这位女孩，只剩下与她有关的狗。大概是冲他傻笑的那两位老妇人替代了女孩。他所说的情况不足以解释这一点。梦中骑自行车是记忆场景的直接复制。他遇到女孩与狗时总是在骑自行车。

3．When anyone has lost a loved one, he produces dreams of a special sort for a long time afterward, dreams in which the knowledge of death enters into the most remarkable compromises

with the desire to have the deceased alive again. At one time the deceased is dead and yet continues to live on because he does not know that he is dead, and would die completely only if he knew it; at another time he is half dead and half alive, and each of these conditions has its particular signs. One cannot simply label these dreams nonsense, for to come to life again is no more impossible in the dream than, for example, it is in the fairy story, in which it occurs as a very frequent fate. As far as I have been able to analyze such dreams, I have always found them to be capable of a sensible solution, but that the pious wish to recall the deceased to life goes about expressing itself by the oddest methods. Let me tell you such a dream, which seems queer and senseless enough, and analysis of which will show you many of the points for which you have been prepared by our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The dream is that of a man who had lost his father many years previously.

3．当某人痛失一位挚爱之人时，他会在长时间内做一种特殊的梦，在梦中，对逝者已故的认知与希望逝者复活的心愿之间此消彼长，极令人惊叹。有时候，逝者已经亡故，但因为不知道自己已故便继续活着，只有知道后才能完全故去；有时候，他是半死半活，两个情况都有特殊迹象。大家不能简单地把这些梦贴上胡诌的标签，因为复活是童话中极为常见的结局，梦中复活并不更为荒唐。就我分析这些梦的经验而言，我总觉得它们可以有合理的解决之道，但虔心希望逝者复活的心愿，能够用最奇特的方式得到解释。我给大家举一个此类的梦，它看似十分诡异而无意义，但对它的分析可以论证大家在理论研讨时学到的很多知识点。这是一个父亲去世多年的男子所做的梦。

“*Father is dead, but has been exhumed and looks badly. He goes on living, and the dreamer does everything to prevent him from noticing*

that fact. ” Then the dream goes on to other things, apparently irrelevant.

“父亲死了，但被挖出来，样子很难看。他继续活着，做梦者千方百计不让他知道自己死去的事实。 ”之后梦到的内容显然与之无关。

The father is dead, that we know. That he was exhumed is not really true, nor is the truth of the rest of the dream important. But the dreamer tells us that when he came back from his father's funeral, one of his teeth began to ache. He wanted to treat this tooth according to the Jewish precept, “If thy tooth offend thee, pluck it out,” and betook himself to the dentist. But the latter said, “One does not simply pull a tooth out, one must have patience with it. I shall inject something to kill the nerve. Come again in three days and then I will take it out.”

我们知道该父亲已故。他被挖出来并不是事实，梦的其余部分是真是假也不重要。但做梦者告诉我们，他从父亲葬礼回来后开始牙疼。他想遵照犹太谚语“牙痛则需拔除之”对付痛牙，于是去了牙医诊所。但牙医说：“不能简单地拔牙完事，必须耐心对待。我注射一些麻醉神经的药。三天后你再来，我会把它取出来。”

“This 'taking it out',” says the dreamer suddenly, “is the exhuming.”

“这个‘把它取出来’，”做梦者突然说，“就是挖墓。”

Is the dreamer right? It does not correspond exactly, only approximately, for the tooth is not taken out, but something that has died off is taken out of it. But after our other experiences we are probably safe in believing that the dream work is capable of such inaccuracies. It appears that the dreamer condensed, fused into one, his dead father and the tooth that was killed but retained. No wonder then, that in the manifest dream something senseless results, for it is impossible for everything that is said of the tooth to fit the father. What is it that serves as something intermediate between tooth and father and makes this condensation possible?

做梦者说得对吗？它并不特别贴切，只是有些相似，因为取出的不是牙齿，而是其中坏死的部分。但其他经验告诉我们，梦的工作允许这样的不精确。做梦者似乎把亡父与坏死但残留的牙齿凝缩、混合在了一起。难怪在显梦中出现了一些无意义的东西，无法完全把牙齿和父亲挂上钩。在牙齿和父亲之间，是什么充当了媒介，使得这一凝缩成为了可能？

This interpretation must be correct, however, for the dreamer says that he is acquainted with the saying that when one dreams of losing a tooth it means that one is going to lose a member of his family.

关于媒介的解释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做梦者知道，老话说，梦中失掉牙齿，必有亲人亡故。

We know that this popular interpretation is incorrect, or at

least is correct only in a scurrilous sense. For that reason it is all the more surprising to find this theme thus touched upon in the background of other portions of the dream content.

我们知道这个通俗解释是不对的，它顶多是一种恶咒。因此，当我们从梦的其他内容的背景中发现这个主题时，实在是更令人惊奇了。

Without any further urging, the dreamer now begins to tell of his father's illness and death as well as of his relations with him. The father was sick a long time, and his care and treatment cost him, the son, much money. And yet it was never too much for him, he never grew impatient, never wished it might end soon. He boasts of his true Jewish piety toward his father, of rigid adherence to the Jewish precepts. But are you not struck by a contradiction in the thoughts of the dream? He had identified tooth with father. As to the tooth he wanted to follow the Jewish precept that carries out its own judgment, “pull it out if it causes pain and annoyance.” He had also been anxious to follow the precept of the law with regard to his father, which in this case, however, tells him to disregard trouble and expense, to take all the burdens upon himself and to let no hostile intent arise toward the object which causes the pain. Would not the agreement be far more compelling if he had really developed feelings toward his father similar to those about his sick tooth; that is, had he wished that a speedy death should put an end to that superfluous, painful and expensive existence?

未及追问，做梦者开始讲述他父亲生病和去世的过程，以及他们的父子关系。父亲生病已久，看护和治疗花了这个儿子很多钱。但他

从没有嫌花钱多，从没有不耐烦，从没有盼着早些了结。他对父亲满怀着犹太式的孝敬，恪守犹太教的训诫。但大家难道没有被梦中念头的矛盾之处惊讶吗？他把牙齿看成了父亲。对于牙齿，他希望遵循犹太教训诫的既定指示："如果它使你疼痛和苦恼，不如拔之而后快。"他也非常希望遵守孝敬父亲的训诫法令，在这个情况下，却是要让他不计代价和麻烦地担起所有责任，不要对引发痛苦者生出厌烦之心。如果他对于父亲的内心感觉真的与他对病牙的感觉很类似，也就是他希望父亲快些死去，结束这种多余、痛苦而且昂贵的生命维持，这样是不是就更有说服力了呢？

I do not doubt that this was really his attitude toward his father during the latter's extended illness, and that his boastful assurances of filial piety were intended to distract his attention from these recollection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death-wish directed toward the parent generally becomes active, and disguises itself in phrases of sympathetic consideration such as, "It would really be a blessed release for him." But note well that we have here overcome an obstacle in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s themselves. The first part of these thoughts was surely unconscious only temporarily, that is to say, during the dream-work, while the inimical feelings toward the father might have been permanently unconscious, dating perhaps from childhood, occasionally slipping into consciousness, shyly and in disguise, during his father's illness. We can assert this with even greater certainty of other latent thoughts which have made unmistak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dream content. To be sure, none of these inimical feelings toward the father can be discovered in the dream. But when we search a childhood history for the root of such enmity toward the father, we recollect that fear of the father arises because the latter, even in the earliest years, opposes the boy's sex activities, just as he is ordinarily forced to oppose them again, after puberty, for social motives. This relation to the father

applies also to our dreamer; there had been mixed with his love for him much respect and fear, having its source in early sex intimidation.

我不怀疑，这是他在父亲长期卧病期间的真实想法，他满口孝心承诺，是为了不让自己往这方面想。在这些情况下，希望父（母）亲死亡的念头一般会开始活跃，伪装成一些同情的话语，比如“这对他其实是个幸运的解脱。”但请特别注意，我们现在已经克服了梦的隐意自身的一个障碍。可以肯定，这些隐意的第一部分只是暂时地处于潜意识，就是说，对父亲的抵触情绪也许长期以来都在潜意识中（大概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在他父亲生病时，偶然之间进入了意识，在梦的工作中羞答答地自我伪装起来。对于其他一些对梦的内容无疑有帮助的隐意，我们更可确信这个说法。说实在的，这些对父亲的抵触情绪在梦中并未出现。但当我们在为这一怨父情结查找童年根源时得知，对于父亲的惧怕，源于父亲禁止儿子手淫，在年幼时便是如此，青春期时，站在社会礼教的立场，更是严令禁止。这种与父亲的关系也发生在做梦者身上，他对父亲的爱混杂着许多敬畏之情，这就是源于早期的性管束。

From the onanism complex we can now explain the other parts of the manifest dream. “*He looks badly* ” does, to be sure, allude to another remark of the dentist, that it looks badly to have a tooth missing in that place;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refers to the “looking badly” by which the young man betrayed, or feared to betray, his excessive sexual activity during puberty. It was not without lightening his own heart that the dreamer transposed the bad looks from himself to his father in the manifest content, an inversion of the dream work with which you are familiar. “*He goes on living since then* ,” disguises itself with the wish to have him alive again as well as with the promise of the dentist that the tooth will be preserved.

A very subtle phrase, however, is the following: “The dreamer does everything *to prevent him* (*the father*) *from noticing the fact* ,” a phrase calculated to lead us to conclude that he is dead. Yet the only meaningful conclusion is again drawn from the onanism complex, where it is a matter of course for the young man to do everything in order to hide his sex life from his father. Remember, in conclusion, that we were constantly forced to interpret the so-called tooth-ache dreams as dreams dealing with the subject of onanism and the punishment that is feared.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个手淫情结来解释显梦的其他部分。“他样子很难看 ”应该是暗喻了牙医的另一个说法，即在那个地方缺一颗牙齿很难看，但同时“很难看”也是指这位年轻人青春期性活动过度所暴露出（或他害怕暴露出）的病态。做梦者在显梦中把难看的面容从自身转嫁到父亲身上，这种梦的工作产生的倒置是大家熟悉的。“他随后继续活着， ”希望他复活的心愿和牙医保住牙齿的承诺一样是这样的伪装。但是请看下面一个很微妙的说法：“做梦者千方百计阻止他（父亲）知道这个事实 ”，这话是在蓄意引导我们相信他已死亡。但唯一有意义的结论还是出自手淫情结，即这位年轻人千方百计地向父亲隐瞒自己的性行为。总之要记住，我们常常必然会将所谓的牙痛之梦解释为关于手淫和害怕受罚主题的梦。

You now see how this incomprehensible dream came into being, by the creation of a remarkable and misleading condensation, by the fact that all the ideas emerge from the midst of the latent thought process, and by the creation of ambiguous substitute formations for the most hidden and, at the time, most remote of these thoughts.

大家现在知道这种令人费解的梦是如何应运而生的：一是通过绝妙而有误导性的凝缩手法，二是所有念头均源自隐意过程，三是为最深藏不露、当时亦最为疏离的隐意们创造了含混不清的替代形式。

4．We have tried repeatedly to understand those prosaic and banal dreams which have nothing foolish or repulsive about them, but which cause us to ask: “Why do we dream such unimportant stuff?” So I shall give you a new example of this kind, three dreams belonging together, all of which were dreamed in the same night by a young woman.

4．我们多次试图去理解那些简单而平庸的梦，它们虽没有愚蠢和使人反感之处，但会引我们发问道：“我们为什么会梦到这种不痛不痒的事情？”我给大家举一个此类新例子，是一位年轻女子在同一夜晚连着做的三个梦。

(*a*). “*She it going through the hall of her house and strikes her head against the low-hanging chandelier, so that her head bleeds.* ”

（a）“她穿过家中的走廊时，头撞到了低垂的吊灯，头上流血了。 ”

She has no reminiscence to contribute, nothing that really happened. The information she gives leads in quite another direction. “You know how badly my hair is falling out. Mother said to me yesterday, 'My child, if it goes on like this, you will have a head like the cheek of a buttock.'” Thus the head here stands for the

other part of the body. We can understand the chandelier symbolically without other help; all objects that can be lengthened are symbols of the male organ. Thus the dream deals with a bleeding at the lower end of the body, which results from its collision with the male organ. This might still be ambiguous; her further associations show that it has to do with her belief that menstrual bleeding results from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a man, a bit of sexual theory believed by many immature girls.

她没有想起什么往事，事情并未真的发生过。她给的信息却引向另一个方向。“你知道，我头发掉得很严重。母亲昨天对我说：‘孩子，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你的脑袋马上就跟屁股蛋一样光滑了。’”这样，头在这里就代表了身体的另一个部位。我们不借助其他方法就可以理解吊灯的象征意义：所有可以延长的物体都象征着男性器官。梦就说明了身体下围因碰撞男性器官发生出血。这也许还是有些模棱两可，她后来的联想表明，这与她的误解有关，她以为经期流血是因为与男人交媾所致，这是很多未成年女孩对性的看法。

(*b*). “*She sees a deep hole in the vineyard which she knows was made by pulling out a tree.* ” Herewith her remark that “*she misses the tree* .” She means that she did not see the tree in the dream, but the same phrase serves to express another thought which symbolic interpretation makes completely certain. The dream deals with another bit of the infantile sex theory, namely, with the belief that girls originally had the same genitals as boys and that the later conformation resulted from castration (pulling out of a tree).

（b）“她在葡萄园看见一个深坑，她知道这是拔树留下的。 ”这里她说“她错过了树 ”，她的意思是，她在梦中没有看到树，但同样这

句话却表明了另外一个念头，用象征释梦法完全能确认它。这个梦是关于幼儿的性认知，即，相信女孩原来有跟男孩一样的性器官，因为被阉割（拔树）才有后来的构造。

(*c*). “*She is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drawer of her writing table, with which she is so familiar that she knows immediately if anybody has been through it.* ” The writing-table drawer, like every drawer, chest, or box, stands for the female genital. She knows that one can recognize from the genital the signs of sexual intercourse (and, as she thinks, even of any contact at all) and she has long been afraid of such a conviction. I believe that the accent in all these dreams is to be laid upon the idea of *knowing* . She is reminded of the time of her childish sexual investigations, the results of which made her quite proud at the time.

（c）“她站在写字台的抽屉前面，她很熟悉抽屉，如果有人翻过，她马上就会知道。 ”这个写字台的抽屉，跟所有抽屉、箱子或盒子一样，都代表女性的性器官。她知道，从性器官可以看到性交（她甚至认为是任何性接触）的痕迹，而且她一直对此执念深存恐惧。我认为，这些梦的重点都在于知道 的想法。她想起了自己儿时对性的探索，当时这些结论曾令她相当自豪。

5 . Again a little bit of symbolism. But this time I must first describe the psychic situation in a short preface. A man who spent the night with a woman describes his partner as one of those motherly natures whose desire for a child irresistibly breaks through during intercourse.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meeting, however, necessitated a precaution whereby the fertilizing discharge of semen is kept away from the womb. Upon awaking

after this night, the woman tells the following dream: *“An officer with a red cap follows her on the street. She flees from him, runs up the staircase, and he follows after her. Breathlessly she reaches her apartment and slams and locks the door behind her. He remains outside and as she looks through a peephole she sees him sitting outside on a bench and weeping.“*

5．再举一个象征的例子。但这次必须先预告一下该梦的心理情境。一男一女共度春宵，男子说该女士颇具母性，在两人温存时不由地表现出生孩子的渴望。但是他们幽会的情况使得他不得不采取体外射精的措施。当晚醒来后，这位女子讲述了下面的梦：“一个头戴红帽的军官在大街上跟随她。她避开他，跑上楼梯，而他仍跟随着。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自己的公寓，把门关上锁好。他呆在外面不走，她从猫眼中看到他坐在外面的一张椅子上哭。 ”

You undoubtedly recognize in the pursuit by an officer with a red cap, and the breathless stair climb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exual act. The fact that the dreamer locks herself in against the pursuer may serve as an example of that inversion which is so frequently used in dreams, for in reality it was the man who withdrew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the act. In the same way her grief has been transposed to the partner, it is he who weeps in the dream, whereby the discharge of the semen is also indicated.

毫无疑问，大家会确定红帽子军官的追随、喘着气爬楼梯是表现了一种性行为。做梦者把追求者关在门外，可能是梦中常见的倒置现象，事实上是指那位房事未毕即抽离的男子。同理，她把自己的悲伤转移给了伴侣，梦中是他在哭泣，同时这也暗示了射精的场景。

You must surely have heard that in psychoanalysis it is always maintained that all dreams have a sexual meaning. Now you yourselves are in a position to form a judgment as to the incorrectness of this reproach. You have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he wish-fulfillment dreams, which deal with the satisfying of the plainest needs, of hunger, of thirst, of longing for freedom, the dreams of convenience and of impatience and likewise the purely covetous and egoistic dreams. But that the markedly distorted dreams preponderantly—though again not exclusively—give expression to sex wishes, is a fact you may certainly keep in mind as one of the results of psychoanalytical research.

大家肯定听说过，精神分析一直把所有的梦都赋予性意味。现在大家可以自行判断这个责难是否正确。大家已经知道了以实现愿望为主的梦，它们是为了满足最普通的需求：饥饿、口渴、渴望自由等；还有舒适之梦、焦躁之梦，还有纯粹的贪婪、自大之梦。但是显著变形的梦主要（但并非只是）表达了性的愿望，这一事实大家务必当成精神分析研究的结论之一牢记。

6 . I have a special motive for piling up examples of the use of symbols in dreams. At our first meeting I complained of how hard it is, when lecturing on psychoanalysis, to demonstrate the facts in order to awaken conviction; and you very probably have come to agree with me since then. But the various assertions of psychoanalysis are so closely linked that one's conviction can easily extend from one point to a larger part of the whole. We might say of psychoanalysis that if we give it our little finger it promptly demands the whole hand. Anyone who was convinced by the explanation of errors can no longer logically disbelieve in all the rest of psychoanalysis. A second equally accessible point of

approach is furnished by dream symbolism. I shall give you a dream, already published, of a peasant woman, whose husband is a watchman and who has certainly never heard anything about dream symbolism and psychoanalysis. You may then judge for yourselves whether its explanation with the help of sex symbols can be called arbitrary and forced.

6．出于特殊原因，我举了不少运用梦中象征的例子。在第一课时我抱怨过，在精神分析讲课时论证事实并使人信服的难度，之后大家很有可能深有同感。但是精神分析的各种主张互相联系之紧密，相信了其中一点，即可轻松地由点至面。对于精神分析可以这么形容，我们伸出一根小指，它就马上要求一整只手。只要相信关于过失的解释，逻辑上就无法不相信精神分析的其他内容。同样可以作为突破点的知识点是梦的象征意义。我给大家举一个已经出版的例子，这是一位农妇、警卫之妻的梦，她当然从未听说过梦的象征意义和精神分析。大家可以自行判断，用性的象征符号对它做出的解释是否随意和牵强。

> *Then someone broke into her house and she called in fright for a watchman. But the latter had gone companionably into a church together with two "beauties." A number of steps led up to the church. Behind the church was a hill, and on its crest a thick forest. The watchman was fitted out with a helmet, gorget and a cloak. He had a full brown beard. The two were going along peacefully with the watchman, had sack-like aprons bound around their hips. There was a path from the church to the hill. This was overgrown on both sides with grass and underbrush that kept getting thicker and that became a regular*

forest on the crest of the hill.

“接着，有人闯进她家的房子，她恐慌地呼叫警卫（她丈夫）。但是后者却和颜悦色地跟两位‘美女’进了一个教堂。教堂门前有不少台阶。教堂后有一座山，山顶上树林茂密。警卫戴着头盔、穿着护喉甲和斗篷。他有一把浓密的棕胡。两位女子平静地与警卫同行，她们腰间穿着麻布似的围裙。有一条路从教堂通往山上。路两旁荒草灌木丛生，越来越密，到山顶就成了一片树林。 ”

You will recognize the symbols without any difficulty. The male genital is represented by a trinity of persons, the female by a landscape with a chapel, hill and forest. Again you encounter steps as the symbol of the sexual act. That which is called a hill in the dream has the same name in anatomy, namely, *mons veneris* , the mount of Venus.

大家可以毫不费力地认出其中的象征符号。三个人象征了男性生殖器，教堂、山和树林的景观代表了女性生殖器。台阶又是代表了性行为。梦中称作山的象征，与一个解剖学的名词不约而同，即维纳斯之山（*mons veneri*， 指女性的阴阜）。

7 . I have another dream which can be solved by means of inserting symbols, a dream that is remarkable and convincing because the dreamer himself translated all the symbols, even though he had had no preliminary knowledge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This situation is very unusual and the conditions

essential to its occurrence are not clearly known.

7．我还有一个梦，它可以用添加象征的方式解释，它令人惊讶和佩服之处在于，做梦者自己解读了所有象征符号，而他并没有学过释梦的入门知识。这种情况很罕见，其形成的必要条件并不清晰。

> *He is going for a walk with his father in some place which must be the Prater ,* [8_2] *for one can see the rotunda and before it a smaller building to which is anchored a captive balloon, which, however, seems fairly slack. His father asks him what all that is for; he wonders at it himself but explains it to his father. Then they come to a courtyard in which there lies spread out a big sheet of metal. His father wants to break off a big piece of it for himself but first looks about him to see if anyone might see him. He says to him that all he needs to do is to tell the inspector and then he can take some without more ado. There are steps leading from this courtyard down into a pit, the walls of which are upholstered with some soft material rather like a leather arm chair. At the end of this pit is a longish platform and then a new pit begins….*

> “他跟父亲在散步，地点一定是普拉特 [9_2] 的某处，因为可以看到那个圆厅，前面有一小屋，上面系着一个系留气球，但气球看似相当松垮。他父亲问他那是干嘛用的，他感到奇怪，但还是跟父亲解释了一通。跟着，他们来到一个院子，里面铺着一大张金属薄片。他父亲想要给自己掰一大片，不过先四周张望

有没有人看到他。他跟儿子说，他只需要跟检查员说一声，就可以马上拿一片了。这个院子有一些台阶通往一个坑洞，它的四壁铺着像皮椅软包的材料。坑的顶头接着一个略长的平台，后面又接了一个坑…… ”

The dreamer himself interprets as follows: “The rotunda is my genital, the balloon in front of it is my penis, of whose slackness I have been complaining.” Thus one may translate in more detail, that the rotunda is the posterior—a part of the body which the child regularly considers as part of the genital—while the smaller building before it is the scrotum. In the dream his father asks him what all that is for; that is to say, he asks the object and function of the genitals. It is easy to turn this situation around so that the dreamer is the one who does the asking. Since no such questioning of the father ever took place in real life, we must think of the thought of this dream as a wish or consider it in the light of a supposition, “If I had asked father for sexual enlightenment.” We will fi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is idea in another place shortly.

做梦者自己这样解释：“圆厅是我的生殖器，前面的气球是我的阳具，我嫌它松垮。”这一点可以解释得更详细些，圆厅是臀部，儿童通常将其视作性器的一个部位，而其前面的小屋子是阴囊。在梦中，他父亲问他这些干嘛用，就是说，他在问生殖器的用处和功能。很简单，这是一种倒置的情况，做梦者才应是发问者。因为现实生活中父亲并未作此发问，我们势必将该梦作为一种愿望，或是根据某种假想来考虑：“我要是问了父亲关于性的问题。”我们稍后将在其他地方再看到这个念头。

The courtyard, in which the sheet metal lies spread out, is not

to be considered primarily as symbolical but refers to the father's place of business. For reasons of discretion I have substituted the “sheet metal” for another material with which the father deals, without changing anything in the literal wording of the dream. The dreamer entered his father's business and took great offense at the rather dubious practices upon which the profits depended to a large extent. For this reason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above idea of the dream might be expressed as “if I had asked him, he would only have deceived me as he deceives his customers.” The dreamer himself gives us the second meaning of “breaking off the metal,” which serves to represent the commercial dishonesty. He says it means masturbation. Not only have we long since become familiar with this symbol, but the fact also is in agreement. The secrecy of masturbation is expressed by means of its opposite—“It can be safely done openly.” Again our expectations are fulfilled by the fact that masturbatory activity is referred to as the father's, just as the questioning was in the first scene of the dream. Upon being questioned he immediately giv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it as the vagina on account of the soft upholstering of its walls. I will add arbitrarily that the “going down” like the more usual “going up” is meant to describe the sexual intercourse in the vagina.

铺着金属薄片的院子，基本不能作为象征意义，而是指父亲的工作场所。出于谨慎，我把该父工作的另一种材料换成了“金属薄片”，而没有改变梦中的任何措辞。做梦者曾为父亲工作，对于其牟利主要依赖的不正当手段大为反感。因此，梦中对上述念头的延续可解读为“如果我问了他，他只会跟欺骗客户一样欺骗我。”做梦者自己给了我们“掰开金属”的第二层意思，这本意是代表商业欺诈，他说这意味着自慰行为。我们不但早就熟知了这个象征，而且它与事实相符。偷偷自慰以其反面表达出来——“公然为之也可以很安全”。我们再次如愿证实了，该自慰行为指的是该父的行为，正如梦中第一幕的发问一

样。经询问，他马上把坑洞解释成了阴道，因其四壁有软包。我还会武断地补充“下去”跟更常见的“上去”都是在形容阴道性交。

Such details as the fact that the first pit ends in a platform and then a new one begins, he explains himself as having been taken from his own history. He practiced intercourse for a while, then gave it up on account of inhibitions, and now hopes to be able to resume it as a result of the treatment.

关于一个坑接一个平台、再接一个坑的这些细节，他是用自己的个人经历解释的。他曾经与人性交，但由于力有不逮而暂停，现在希望通过治疗重振雄风。

8 . The two following dreams are those of a foreigner, of very polygamous tendencies, and I give them to you as proof for the claim that one's ego appears in every dream, even in those in which it is disguised in the manifest content. The trunks in the dream are a symbol for woman.

8 . 以下两个梦是一位生性风流的外国人的梦，我举此例是为了证明一个说法，即：即便在显梦中被伪装，自我还是会出现于每个梦中。梦中的箱子象征了女性。

(*a*). “*He is to take a trip, his luggage is placed on a carriage to be taken to the station, and there are many trunks piled up, among which are two big black ones like sample trunks. He says, consolingly, to someone, 'Well, they are only going as far as the station with us.'* ”

（a）“他要出行，把行李放到车上，准备带到车站，车里有很多箱子，当中有两个像样品箱的黑色大箱子。他安慰某人说：‘哎，它们只跟我们到车站就行了。’”

In reality he does travel with a great deal of luggage, but he also brings many tales of women with him when he comes for treatment. The two black trunks stand for two dark women who play the chief part in his life at present. One of them wanted to travel to Vienna after him, but he telegraphed her not to, upon my advice.

现实中，他旅行时确实会带很多行李，但他治疗时也带来了不少风流韵事。两个黑色箱子代表两位肤色深的女子，目前在他生活中是主角。其中一位想要跟着他来维也纳，但他听从我的劝告，拍电报让她别来。

(*b*). A scene at the customs house: “*A fellow traveler opens his trunk and says indifferently while puffing a cigarette, 'There's nothing in here.' The customs official seems to believe him but delves into the trunk once more and finds something particularly forbidden. The traveler then says resignedly, 'Well, there's no help for it.'* ”

（b）在海关的场景：“一个旅伴打开箱子，边抽烟便无所谓地说：‘这里没什么。’海关官员似乎相信了他，但还是又翻了一遍箱子，发现了一件明令禁止的物品。旅客无奈地说：‘唉，它没什么用处。’”

He himself is the traveler, I the customs official. Though otherwise very frank in his confessions, he has on this occasion tried to conceal from me a new relationship which he had struck up with a lady whom he was justified in believing that I knew. The painful situation of being convicted of this is transposed into a strange person so that he himself apparently is not present in the dream.

他自己是这位旅客，而我是海关官员。虽说他本来很是坦诚，但当时他刻意隐瞒了跟一位女子新近的恋爱，理由是他以为我认识她。害怕因此被人责怪的心态移植到了陌生人的身上，显然他本人并未在梦中出现。

9．The following is an example of a symbol which I have not yet mentioned:

9．以下例子中的象征是我没有提到过的：

“*He meets his sister in company with two friends who are themselves sisters. He extends his hand to both of them but not to his sister.* ”

“他与妹妹和另一对姐妹见面。他向另两位、而不是自己的妹妹伸出手。 ”

This is no allusion to a real occurrence. His thoughts instead

lead him back to a time when his observations made him wonder why a girl's breasts develop so late. The two sisters, therefore, are the breasts. He would have liked to touch them if only it had not been his sister.

这个梦没有暗喻任何真实事件。他的念头源于以前某个时期，当时他对女孩的乳房发育很晚百思不得其解。因而这一对姐妹就代表了乳房。只要不是妹妹的，他就想摸摸看。

10．Let me add an example of a symbol of death in a dream:

10．再补充一个梦中死亡象征的例子：

“*He is walking with two persons whose name he knows but has forgotten. By the time he is awake, over a very high, steep iron bridge. Suddenly the two people are gone and he sees a ghostly man with a cap, and clad in white. He asks this man whether he is the telegraph messenger… No. Or is he a coachman? No. Then he goes on,* ” and even in the dream he is in great fear. After waking he continues the dream by a phantasy in which the iron bridge suddenly breaks, and he plunges into the abyss.

“他与两个人一起走在一座极高且陡峭的铁桥上，他知道两人的名字但是醒来后忘记了。突然，那两个人消失了，他看见一个戴着帽子、一身白衣、形似鬼魅的人。他问此人是不是电报邮递员……不是。是马车夫吗？不是。然后他继续向前。 ”即使在梦中他都很恐惧。他醒来后，幻想梦仍在继续，铁桥突然断开，他跌入深渊。

When the dreamer emphasizes the fact that certain individuals in a dream are unknown, that he has forgotten their names, they are generally persons standing in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to the dreamer. This dreamer has two sisters; if it be true, as his dream indicates, that he wished these two dead, then it would only be justice if the fear of death fell upon him for so do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elegraph messenger he remarks that such people always bring bad news. Judged by his uniform he might also have been the lamp-lighter, who, however, also extinguishes the lamps—in other words, as the spirit of death extinguishes the flame of life. The coachman reminds him of Uhland's poem of King Karl's ocean voyage and also of a dangerous lake trip with two companions in which he played the role of the king in the poem.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ron bridge he remembers a recent accident and the stupid saying “Life is a suspension bridge.”

如果做梦者强调自己不认识梦里的某些人，或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多半都是与做梦者关系亲近的人。这位做梦者有两位姐妹，如果他确如梦中所暗示的，希望两个姐妹死掉，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死亡的恐惧折磨着他。他评论电报邮递员时说，这些人总会带来坏消息。从他的制服判断，他也可能是灯火管理员，他能灭掉灯火——换句话说，也是象征死神熄灭了生命之火。马车夫让他想起乌兰德所写的卡尔国王航海之诗，还有他与两位同伴的一次危险的湖上之旅，他扮演的角色就是诗中的国王。他评论铁桥时说，他记得最近一次事故，还有一个愚蠢的老话“生命是一架吊桥”。

11 . The following may serve as another example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death in a dream: “*An unknown man leaves a black bordered visiting card for him.* ”

11．下面是又一例代表死亡的梦：“一个无名人士留给他一张镶黑边的名片。”

12．The following dream will interest you for several reasons, though it is one arising from a neurotic condition among other things:

12．出于一些原因，大家会对下面的梦感兴趣，虽然这个梦是在其他神经症症状下产生的：

“*He is traveling in a train. The train stops in an open field. He thinks it means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an accident, that he must save himself, and he goes through all the compartments of the train and strikes dead everyone whom he meets, conductors, engine drivers, etc.*”

“他在乘火车旅行。火车在一片开阔地带停下。他觉得这意味着要出事故，他必须要自救，因此他穿过火车所有隔间，见人就杀，包括管理员、司机等人。”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he tells a story that one of his friends told him. An insane man was being transported in a private compartment in a certain place in Italy, but through some mistake another traveler was put in the same compartment. The insane man murdered his fellow passenger. Thus he identifies himself with this insane person and bases his right so to do upon a compulsive idea which was then torturing him, namely, he must “do away with all

persons who knew of his failings.” But then he himself finds a better motivation which gave rise to the dream. The day before, in the theatre, he again saw the girl whom he had expected to marry but whom he had left because she had given him cause for jealousy. With a capacity for intense jealousy such as he has, he would really be insane if he married. In other words, he considers her so untrustworthy that out of jealousy he would have to strike dead all the persons who stood in his way. Going through a series of rooms, of compartments in this case, we have already learned to recognize as the symbol of marriage (the opposite of monogamy).

他说了一个朋友告诉他的事情，与此梦相关。在意大利某地，运送一个疯子时，他本应被关在单间中，但发生了差错，另一个旅客也进了同一个隔间。结果那个旅客被疯子给杀死了。这样，他觉得自己很像那个疯子，因为他当时有个强迫性念头折磨着他，即，他必须“把所有知道自己缺陷的人一一消灭”。但接着，他又发现了对此梦一个更好的解释。梦的前一天，他在剧院再次见到了一个女孩，她是他原先的结婚对象，但他出于嫉妒跟她分手了。鉴于他非常善妒，如果结婚他可能真会被逼疯。换言之，他觉得她实在太不忠，他出于嫉妒会把所有碍事的人都杀了。这个案例中穿过一连串的房间或隔间，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婚姻的象征（从反面形容一夫一妻制）。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rain stopping in the open country and his fear of an accident, he tells the following: Once, when he was traveling in a train and it came to a sudden stop outside of a station, a young lady in the compartment remarked that perhaps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collision, and that in that case the best precaution would be to pull one's legs up. But this “legs up” had also played a role in the many walks and excursions into the open which he had taken with the girl in that happy period in their first

love. Thus it is a new argument for the idea that he would have to be crazy in order to marry her now. But from my knowledge of the situation I can assume with certainty that the wish to be as crazy as that nevertheless exists in him.

关于火车停在空地上、以及他对于事故的恐惧，他这么说：有一次，他乘火车旅行，火车在某个车站外急停，隔间里的一位年轻姑娘说大概要撞车，最好的自救措施是抬起腿。但这种“抬腿”也是他与那个女孩初次热恋的幸福时光里，两人多次去郊外散步和游玩时常做的动作。这就从新的角度说明他要是跟她结婚必然会发疯的想法。但据我了解的情况，我可以肯定，他依然存有和她结婚的疯狂念头。

[8_1].This highly technical concept is explain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Chap. VII, Sec. (b) pp. 422 et seq.

[8_2].The principal street of Vienna.

[9_1].这一理论含量较高的概念的解释参见《释梦》（*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第7章b小节第422页起。

[9_2].维也纳的主街。

Thirteenth Lecture Archaic Remnants and Infantilism in the Dream

第十三讲　梦的原始性及幼稚性

Let us revert to our conclusion that the dream-work,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ream censorship, transforms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s into some other form of expression. The latent thoughts are no other than the conscious thoughts known to us in our waking hours; the new mode of expression is incomprehensible to us because of its many-sided features. We have said it extends back to conditions of our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which we have long progressed beyond, to the language of pictures, the symbol-representations, perhaps to those conditions which were in force b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language of thought. So we called the mode of expression of the dream-work the archaic or regressive.

我们要重温关于梦的工作的结论，即：它在梦的审查的作用下，将梦的隐意转化为其他表现形式。隐意相当于我们清醒时知道的有意识的念头，它新的表达模式因为具有多面性，所以使人费解。我们已经说过，它可以回溯到人类早已跨越了的知识发展阶段，比如象形文字、象征表现，也许还跨越到了思想语言发展前的阶段。因此我们将梦的工作这种表达模式称为原始性或退行性。

You may conclude that as a result of the deeper study of the dream-work we gain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ather unknown beginnings of our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 trust this will be true, but this work has not, up to the present time, been

undertaken. The antiquity into which the dream-work carries us back is of a double aspect, firstly, the individual antiquity, childhood; and, secondly (in so far as every individual in his childhood lives over again in some more or less abbreviated manner the entir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race), also this antiquity, the philogenetic. That we shall be able to differentiate which part of the latent psychic proceeding has its source in the individual, and which part in the philogenetic antiquity is not improbable. In this connection it appears to me, for example, that the symbolic relations which the individual has never learned are ground for the belief that they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philogenetic inheritance.

大家也许会推论，随着对梦的工作研究的深入，我们会获得关于人类知识发展未知萌芽期的有价值的信息。我相信这个说法，但这个工作目前尚未进行。梦的工作将我们带去的“早期”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个人的早期，即童年；其次是种族的早期（个人的童年约莫是全人类进化期的简略版）。把源自个人早期和种族早期的隐性心理过程区别开来，这并非没有可能。在这种联想下，比如说，在我看来，个人从未习得过的象征关系应可认为是种族的遗留。

However, this is not the only archa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dream. You probably all know from your own experiences the peculiar amnesia, that is, loss of memory, concerning childhood. I mean the fact that the first years, to the fifth, sixth or eighth, have not left the same traces in our memory as have later experiences. One meets with individual persons, to be sure, who can boast of a continuous memor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o the present day, but the other condition, that of a gap in the memory, is far more frequent. I believe we have not laid enough stress on this fact. The child is able to speak well at the age of two, it soon shows that it

can become adjusted to the most complicated psychic situations, and makes remarks which years later are retold to it, but which it has itself entirely forgotten. Besides, the memory in the early years is more facile, because it is less burdened than in later years. Nor is there any reason for considering the memory-function as a particularly high or difficult psychic performance; in fact, the contrary is true, and you can find a good memory in persons who stand very low intellectually.

然而，这并不是梦的唯一原始性特征。大家从自身经历中，大概都知道一种奇特的遗忘症，即童年记忆缺失。我是说，从出生起到5岁、6岁或是8岁时的经历，与以后的经历相比，没有留下相同的记忆痕迹。固然，有些人可以自称从出生到现在的记忆是持续不断的，但另一种情形，即记忆缺失却更为平常。我认为，我们对这一事实未给予足够重视。儿童在2岁时就能够好好说话，很快就适应了极复杂的心理状况，他们说过的话，多年后若有人再提起，他们自己却会完全忘记。况且，幼年期的记忆更容易获取，因为它没有后来的记忆负担重。也没有理由认为，记忆功能是特别高级或困难的心理机能，实际不然，那些智力很低的人可以有很好的记忆力。

As a second peculiarit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irst, I must point out that certain well-preserved memories, for the most part formatively experienced, stand forth in this memory-void which surrounds the first years of childhood and do not justify this hypothesis. Our memory deals selectively with its later materials, with impressions which come to us in later life. It retains the important and discards the unimportant. This is not true of the retained childhood memories. They do not bespeak necessarily important experiences of childhood, not even such as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child need appear of importance. They are often so

banal and intrinsically so meaningless that we ask ourselves in wonder why just these details have escaped being forgotten. I once endeavored to approach the riddle of childhood amnesia and the interrupted memory remnants with the help of analysis, and I arrived at the conclusion that in the case of the child, too, only the important has remained in the memory, except that by means of the process of condensation already known to you, and especially by means of distortion, the important is represented in the memory by something that appears unimportant. For this reason I have called these childhood memories “disguise-memories,” memories used to conceal; by means of careful analysis one is able to develop out of them everything that is forgotten.

第二个特征与第一个特征是紧密相关的，为此我必须指出，某些记忆（大部分是幼年性格塑造期的经历）得到了完好保存，与幼年期的记忆空白一说相抵触，无法证明其合理性。我们的记忆有意选择了后来的素材，选择了后来生活给我们的印象。它保留了重要的，剔除了次要的。而保留下来的童年记忆则不是如此。它们不一定代表童年的重要经历，甚至不是儿童眼中的重要经历。它们一般都很平淡无奇，本质上毫无意义，以至于我们会惊讶地自问，何以这些细节未被忘记。我有一次试图借助分析手段，研究童年遗忘症的谜团和断断续续的记忆残余，我得出的结论是，在儿童的记忆中也是重要的经历留下了，只不过经过了大家知道的凝缩过程，特别是变形后，重要经历在记忆中是以看似不重要的事情表现出来的。因为这个原因，我将这些童年记忆称为“伪装性记忆”，即用于隐瞒的记忆，通过详尽的分析，可以从中引导出一切被遗忘的记忆。

In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we are regularly called upon to fill out the infantile memory gaps, and in so far as the cure is to any degree successful, we are able again to bring to light the content of

the childhood years thus clouded in forgetfulness. These impressions have never really been forgotten, they have only been inaccessible, latent, have belonged to the unconscious. But sometimes they bob up out of the unconscious spontaneously,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this is what happens in dreams.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dream life knows how to find the entrance to these latent, infantile experiences. Beautiful examples of this occur in literature, and I myself can present such an example. I once dreamed in a certain connection of a person who must have performed some service for me, and whom I clearly saw. He was a one-eyed man, short in stature, stout, his head deeply sunk into his neck. I concluded from the content that he was a physician. Luckily I was able to ask my mother, who was still living, how the physician in my birth-place, which I left when I was three years old, looked, and I learned from her that he had one eye, was short and stout, with his head sunk into his neck, and also learned at what forgotten mishap he had been of service to me. This control over the forgotten material of childhood years is, then, a further archaic tendency of the dream.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我们常常奉命填补幼年记忆空白，如果治疗效果尚算成功，就能再次让那些被遗忘的童年记忆重见天日。这些记忆印迹其实从未被忘怀过，它们只是不可知、隐藏着，属于潜意识。但是它们有时会在不经意间从潜意识中蹦出来，这实际上就是梦中发生的事情。显然，梦的生活知道如何进入这些暗藏的幼年记忆。在文学作品中有诸多美好的例子，我自己也可以讲一个例子。我有一次梦见一个与我有某种关系的人（他一定是为我做过什么事），而且我能清楚地看见他。他是一个独眼龙，身材矮胖，头紧缩在脖子中。我从梦的内容推断他是一位医生。幸运的是，我母亲当时还健在，我可以去问她，在我三岁离开的家乡，那位医生长什么样子，我听她说，他是个独眼龙，又矮又胖，头缩在脖子里，还知道了我闯过一场祸（我

早忘记了），而他帮助了我。对于遗忘的童年记忆材料的操控，就是梦的又一个原始化倾向。

The same information may be made use of in another of the puzzles that have presented themselves to us. You will recall how astonished people were when w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timuli which gave rise to dreams were extremely bad and licentious sexual desires which have made dream-censorship and dream-distortion necessary. After we have interpreted such a dream for the dreamer and he, in the most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does not attack the interpretation itself, he almost always asks the question whence such a wish comes, since it seems foreign to him and he feels conscious of just the opposite sensations. We need not hesitate to point out this origin. These evil wish-impulses have their origin in the past, often in a past which is not too far away. It can be shown that at one time they were known and conscious, even if they no longer are so. The woman, whose dream is interpreted to mean that she would like to see her seventeen-year old daughter dead, discovers under our guidance that she in fact at one time entertained this wish. The child is the fruit of an unhappy marriage, which early ended in a separation. Once, while the child was still in the womb, and after a tense scene with her husband, she beat her body with her fists in a fit of anger, in order to kill the child. How many mothers who today love their children tenderly, perhaps too tenderly, received them unwillingly, and at the time wished that the life within them would not develop further; indeed, translated this wish into various actions, happily harmless. The later death-wish against some loved one, which seems so strange, also has its origin in early phases of the relationship to that person.

这个情况也可以用于解释另一个已经显现的谜题。大家记得我们得出的骇人结论，就是，引发梦的刺激是一些极度恶劣和淫荡的性欲求，是它们使得梦的审查和变形成为必要举措。我们为做梦者解释过这样一个梦，即便情况于他们最有利时，他们也没有否定这个释梦，几乎总在追问这一愿望从何而来，因为他们对此很陌生，而且他们的感觉正好与之相反。问题的根源是毫无疑问的。这些邪恶愿望冲动的根源在过去，通常是不久前的过去。证据表明，这些愿望在某时是已知的、有意识的，即使它们业已不再如此。一位女士做了个梦，它的解释意味着，她希望自己17岁的女儿去死，她在我们的指导下发现，她确实曾经有过这个念头。她有过一次不幸福的婚姻，很早就以离婚告终，孩子就是那次婚姻的结晶。当孩子仍在腹中时，有一次，她与丈夫发生激烈争吵后，怒火中烧地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身体，恨不得把孩子弄死。有多少母亲，现在宠爱着她们的孩子（也许过于宠爱了），当初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了他们，有时会不想继续过带孩子的生活，她们实际上会将这种愿望转换成各种举动，所幸都是无害的。而后来针对亲人的死亡愿望，看似奇怪，其实在两人的早期关系中就埋下了根源。

The fath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whose dream shows that he wishes for the death of his eldest and favorite child, must be reminded of the fact that at one time this wish was no stranger to him. While the child was still a suckling, this man, who was unhappy in his choice of a wife, often thought that if the little being that meant nothing to him would die, he would again be free, and would make better use of his freedom. A like origin may be found for a large number of similar hate impulses; they are recollections of something that belonged to the past, were once conscious and played their parts in the psychic life. You will wish to conclude therefrom that such wishes and such dreams cannot occur if such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to a person have not taken place; if such relationship was always of the same character. I am ready to admit

this, only wish to warn you that you are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not the exact terms of the dream, but the meaning thereof according to its interpretation. It may happen that the manifest dream of the death of some loved person has only made use of some frightful mask, that it really means something entirely different, or that the loved person serves as a concealing substitute for some other.

一位父亲的梦的解释说明，他希望自己最心爱的长子死掉，这必然意味着，这个愿望在某时对他并不陌生。当孩子还在襁褓之中时，这位男子因为选错妻子而闷闷不乐，经常心想，这个没用的小东西要是夭折就好了，这样他就又自由了，可以任性而为了。大量类似的仇恨冲动都有相似的根源，它们是过去某事的回忆，曾经是有意识的，在心理生活中粉墨登场过。如此，大家可能会推论说，如果与某人的关系没有改变，如果这种关系性质始终如一的话，这类愿望和梦就不可能发生。我乐于附和这个观点，但只想提醒大家，不要只考虑梦的具体内容，而要考虑根据释梦得出的意义。某个亲人死去的显梦可能只是面目可憎，它其实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或者那位亲人只是为隐瞒其他人的一个替代品。

But the same circumstances will call forth another, more difficult question. You say: “Granted this death wish was present at some time or other, and is substantiated by memory, yet this is no explanation. It is long outlived, today it can be present only in the unconscious and as an empty, emotionless memory, but not as a strong impulse. Why should it be recalled by the dream at all!” This question is justified. The attempt to answer it would lead us far afield and necessitate taking up a position i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s of dream study. But I must remain within the bounds of our discussion and practice restraint. Prepare yourselves

for the temporary abstention. Let us be satisfied with the circumstantial proof that this outlived wish can be shown to act as a dream stimulator and let us continue the investigation to see whether or not other evil wishes admit of the same derivation out of the past.

但同样的情况会引向另一个更大的难题。大家会说："假定这个死亡愿望在某时或彼时存在着，且得到了记忆的佐证，但这解释不通。它早就被消磨殆尽，只作为一种空洞而不带情绪的回忆存在于潜意识中，并不是一种强烈冲动。它怎么会在梦中重新被唤醒呢？"这个提问有其合理性。要做出回答，未免牵涉过大，而且会迫使我们必须就梦的研究中一项最重要的观点进行表态。我必须限定我们的讨论范围和操作限制。请大家暂时忍耐一下。我们需要先认可"被磨灭的愿望可以成为梦的刺激因素"的例证,继续调查其他邪恶念头是否也源于往事。

Let us continue with the removal or death-wish which most frequentl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unbounded egoism of the dreamer. Such a wish can very often be shown to be the inciting cause of the dream. As often as someone has been in our way in life—and how often must this happen in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of life—the dream is ready to do away with him, be he father, mother, brother, sister, spouse, etc. We have wondered sufficiently over this evil tendency of human nature, and certainly were not predisposed to accept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result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without question. After it has once been suggested to us to seek the origin of such wishes in the past, we disclose immediately the period of the individual past in which such egoism and such wish-impulses, even as directed against those closest to the dreamer, are no longer strangers. It is just in these first years of

childhood which later are hidden by amnesia, that this egoism frequently shows itself in most extreme form, and from which regular but clear tendencies thereto, or real remnants thereof, show themselves. For the child loves itself first, and later learns to love others, to sacrifice something of its ego for another. Even those persons whom the child seems to lov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t loves at the outset because it has need of them, cannot do without them, in others words, out of egoistical motives. Not until later does the love impulse become independent of egoism. *In brief, egoism has taught the child to love.*

我们继续讨论消灭或死亡愿望，它的起因大多是做梦者未加克制的私欲。这类愿望通常可证明是梦的诱导因素。每当有人在生活中碍手碍脚（这种情况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是很常见的），他们在梦中就会成为被消灭对象，哪怕他们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配偶等人。我们对于这一邪恶的人性倾向很是不解，当然不可能不加质疑就接受这种释梦结论的正确性。当我们知道要从往事中寻找这些愿望的根源时，会立刻发现，这样的私心和愿望冲动，甚至是直接针对做梦者最亲近者的愿望，在个人过往的一段时间内并不眼生。正是在幼年时期（后来被遗忘症隐瞒了），这种自我私欲经常明目张胆地体现出来，从而显示出频繁而清晰的倾向或是由此衍生的真实想法。因为小孩总是先喜爱自己，后来才学会喜爱别人，为他人牺牲一些自我。即使是生下来就好像很会爱人的小孩，他们爱人，是因为需要他们、离不开他们，换言之，是出于利己的动机。直到后来，这些爱的冲动才脱离了自我私欲。简言之，自私让孩子学会了爱。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instructive to compare the child's regard for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 that which he has for his parents. The little child does not necessarily love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often, obviously, he does not love them at all.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n them he hates his rivals and it is known how frequently this attitude continues for many years until maturity, and even beyond, without interruption. Often enough this attitude is superseded by a more tender feeling, or rather let us say glossed over, but the hostile feeling appears regularly to have been the earlier. It is most noticeable in children of from two and one-half to four or five years of age, when a new little brother or sister arrives. The latter is usually received in a far from friendly manner. Expressions such as “I don't want him! Let the stork take him away again,” are very usual. Subsequently every opportunity is made use of to disparage the new arrival, and even attempts to do him bodily harm, direct attacks, are not unheard of. If the difference in age is less, the child learns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rival with intense psychic activity, and accommodates himself to the new situation. If the difference in age is greater, the new child may awaken certain sympathies as an interesting object, as a sort of living doll, and if the difference is eight years or more, motherly impulse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girls, may come into play. But to be truthful, when we disclose in a dream the wish for the death of a mother or sister we need seldom find it puzzling and may trace its origin easily to early childhood, often enough, also, to the propinquity of later years.

知道了这层关系，将儿童对于兄弟姐妹的感受和他们对于父母的感受进行比较，就可获益良多。幼儿不一定爱兄弟姐妹，很显然，他们通常根本不爱他们。毫无疑问，他们仇视竞争对手，而且众所周知，这种态度会不间断地延续多年，直到成年，甚至更久。这种态度常常被一种更温和的情感所替代（或者宁可称为粉饰），但是敌对的感觉通常会更早出现。在2岁半到4岁或5岁的儿童身上，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对弟弟或妹妹降生的反应。他们的态度通常很不友好。类似“我不喜欢他！让白鹳把他再带走！”之类的话很常见。后来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作弄新生儿，甚至身体伤害和直接殴打的行为也时有耳

闻。如果年龄差距较小，孩子在认识到对手存在后，会通过强烈的心理活动，使自己适应新情况。如果年龄差距较大，新生儿会唤醒某些怜爱心理，成为有趣的玩物，类似活的玩偶，如果年龄差距达到8岁以上，尤其是在女孩身上，母性冲动会发挥作用。但老实说，当我们通过梦发现自己希望母亲或姐妹死亡时，不必大惑不解，这个念头很容易在幼年时期找到源头，也常常与随后的经历有关。

Probably no nurseries are free from mighty conflicts among the inhabitants. The motives are rivalry for the love of the parents, articles owned in common, the room itself. The hostile impulses are called forth by older as well as younger brothers and sisters. I believe it was Bernard Shaw who said: “If there is anyone who hates a young English lady more than does her mother, it is her elder sister.” There is something about this saying, however, that arouses our antipathy. We can, at a pinch, understand hatred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rivalry among them, but how may feelings of hatred force their way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ughter and mother, parents and children?

生儿育女，大多免不了子女间的纷争。其动机在于争夺父母的爱、公共物品或空间。年龄较大的孩子或年幼的弟妹都有可能引发敌视情绪。好像是萧伯纳说过：“如果有人憎恨一位英国女孩甚于憎恨母亲，此人必为其姐。”不过，这句名言的说辞颇有争议。不得已时，我们可以理解兄弟姐妹间的仇视、竞争，但同辈间的仇恨情绪何以介入了母女关系、或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了呢？

This relationship is without doubt the more favorable, even when looked at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child. This is in accord with our expectation; we find it much more offensive for love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to be lacking than for love between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have, so to speak, made something holy in the first instance which in the other case we permitted to remain profane. But daily observation can show us how frequently the feelings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grown children fail to come up to the ideal established by society, how much enmity exists and would find expression did not accumulations of piety and of tender impulse hold them back. The motives for this are everywhere known and disclose a tendency to separate those of the same sex, daughter from mother, father from son. The daughter finds in her mother the authority that hems in her will and that is entrusted with the task of causing her to carry out the abstention from sexual liberty which society demands; in certain cases also she is the rival who objects to being displaced. The same type of thing occurs in a more glaring manner between father and son. To the son the father is the embodiment of every social restriction, borne with such great opposition; the father bars the way to freedom of will, to early sexual satisfaction, and where there is family property held in common, to the enjoyment thereof. Impatient waiting for the death of the father grows to heights approximating tragedy in the case of a successor to the throne. Less strained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 and daughter, mother and son. The latter affords the purest examples of an unalterable tenderness, in no way disturbed by egoistical considerations.

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无疑是更和谐的，即便从孩子的角度看也是如此。这符合我们的期望，我们觉得，父母与孩子之间缺少爱，比之同辈间缺少爱，要可气得多。可以这么说，前一种关系于我们而言是神圣的，而其他则皆可视作世俗关系。但是，通过日常观察，我们发现，父母与成年子女间的感情常常没有社会期待的那样理想，他们彼此间敌意之深，若非受到父慈子孝观念的束缚，总会恶语相向。其原

因众所皆知，关系不合通常发生在同性亲人之间，即母女和父子。女儿觉得母亲总是在操控她的意志，用世俗观念束缚她的性自由，在某些案例中，母亲因不愿被（父亲）冷落，成为（女儿的）争宠对手。父子关系可以是更紧张的。对儿子来说，父亲是各种社会规矩的卫道士，与他处处作对：禁锢自由意志、妨碍早期性欲满足，对于家庭共同财产，也禁止分享。在继承王位的情况中，盼望父亲早死的念头发展到极点，几乎会引发悲剧。而父女和母子关系则相对柔和些。这里面有不少真情不渝的例子，它们不会受到私心的干扰。

Why do I speak of these things, so banal and so well known? Because there is an unmistakable disposition to deny their significance in life, and to set forth the ideal demanded by society as a fulfilled thing much oftener than it really is fulfilled. But it is preferable for psychology to speak the truth, rather than that this task should be left to the cynic. In any event, this denial refers only to actual life. The arts of narrative and dramatic poetry are still free to make use of the motives that result from a disturbance of this ideal.

我为什么要谈论这些平淡无奇、世人皆知的事情？因为毫无疑问，总有人想要否定它们在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把社会希望的理想亲情关系想象得比实际上多得多。不过，与其在这里招人讥笑，倒不如让心理学去讲真话吧。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否认仅仅针对现实生活。叙事和戏剧文学还是会颠覆此理想目标，随性地描写其中的种种动机。

It is not to be wondered at that in the case of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the dream discloses the wish for the removal of the parents, especially the parent of the same sex. We may conclude that it is

also present during waking hours, and that it becomes conscious even at times when it is able to mask itself behind another motive, as in the case of the dreamer's sympathy for his father's unnecessary sufferings in example 3. It is seldom that the enmity alone controls the relationship; much more often it recedes behind more tender impulses, by which it is suppressed, and must wait until a dream isolates it. That which the dream shows us in enlarged form as a result of such isolation, shrinks together again after it has been properly docketed in its relation to life as a result of our interpretation (H. Sachs). But we also find this dream wish in places where it has no connection with life, and where the adult, in his waking hours, would never recognize it.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deepest and most uniform motive for becoming unfriendly, especially between persons of the same sex, has already made its influence felt in earliest childhood.

很多人的梦表现出消灭父母，特别是同性家长的愿望，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可以推论，这种愿望在清醒时也存在着，它甚至在能用其他动机做掩护时，也是有意识的，比如例3中做梦者怜悯父亲无谓的痛苦。这种敌意很少会完全主导该亲情关系，更常见的是，它退而隐身于温情之后，被温情所压抑，一直到梦将其单独显示出来。它在梦中的独立形式是夸大的，在我们通过释梦恰当地阐述了它与生活的关系后，又收缩起来（萨克斯）。但我们也发现，有些时候，这个梦的愿望在生活中找不到关联，该成年人在清醒时也完全不认识它。原因在于，同性相斥的现象深层、普遍的动机，早在幼年时期就施加了影响。

I mean the love rivalry, with the especial emphasis of the sex character. The son, even as a small child, begins to develop an especial tenderness for his mother, whom he considers as his own

property, and feels his father to be a rival who puts into question his individual possession; and in the same manner the little daughter sees in her mother a person who is a disturbing element in her tender relationship with her father, and who occupies a position that she could very well fill herself. One learns from these observations to what early years these ideas extend back—ideas which we designate as the *Oedipus-complex* , because this myth realizes with a very slightly weakened effect the two extreme wishes which grow out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son—to kill his father and take his mother to wife. I do not wish to maintain that the Oedipus-complex covers entirely the relation of the child to its parents; this relation can be much more complicated. Furthermore, the Oedipus-complex is more or less well-developed; it may even experience a reversal, but it is a customary and very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psychic life of the child; and one tends rather to underestimate than to overestimate its influence and the developments which may follow from it. In addition, children frequently react to the Oedipus-idea through stimulation by the parents, who in the placing of their affection are often led by sex-differences, so that the father prefers the daughter, the mother the son; or again, where the marital affection has cooled, and this love is substituted for the outworn love.

我是指爱的竞争，特别是就性的特征而言。儿子即便是小孩，也开始对母亲有了一种特殊依恋，他认为母亲专属自己，感到父亲是侵犯个人所有权的对手；同样，小女孩则把母亲看成干扰父爱的因素，占据着本属于她的位置。从这些观察结果可知，这些想法可追踪到幼年时期——这些想法被命名为俄狄浦斯情结 ，因为该神话几乎不加修饰地呈现了儿子的两个最极端的愿望——弑父和娶母。我不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完全涵盖了亲子关系，这种关系要复杂得多。而且，俄狄浦斯情结可以良性发展，也可能逆向发展，但它总是儿童心理生活惯常

且极为重要的因素，我们总是对它的影响和后果估计不足。另外，儿童经常受到父母的刺激而产生俄狄浦斯情结，父母的爱常常有性别偏好，父亲喜欢女儿，而母亲喜欢儿子，或者当婚姻热情冷却后，亲子之爱就代替了被消磨的爱情。

One cannot maintain that the world was very grateful to psychoanalytic research for its discovery of the Oedipus-complex. On the contrary, it called forth the strongest resistance on the part of adults; and persons who had neglected to take part in denying this proscribed or tabooed feeling-relationship later made good the omission by taking all value from the complex through false interpretations. According to my unchanged conviction there is nothing to deny and nothing to make more palatable. One should accept the fact, recognized by the Greek myth itself, as inevitable destiny.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is Oedipus-complex, cast out of life, was yielded up to poetry and given the freest play. O. Rank has shown in a careful study how this very Oedipus-complex has supplied dramatic literature with a large number of motives in unending variations, derivations and disguises, also in distorted forms such as we recognize to be the work of a censor. We may also ascribe this Oedipus-complex to those dreamers who were so fortunate as to escape in later life these conflicts with their parents, and intimately associated therewith we find what we call the *castration complex* , the reaction to sexual intimidation or restriction, ascribed to the father, of early infantile sexuality.

世人对于精神分析研究发现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感恩戴德。相反，它遭到成人们最激烈的反对，有些人倒没否认这个被排斥或禁忌的感情关系，但后来他们所做的解释很虚假，等于否定了这一情结的价

值。我坚定地认为，事实不容否认，也无需粉饰太平。这个希腊神话认为这个情结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我们只能接受事实。另一个方面，有趣的是，俄狄浦斯情结为生活所抛弃，却在文学中开花结果，任意发挥。兰克在一项缜密研究中证明，就是这个俄狄浦斯情结为戏剧文学提供了大量的动机，它有着无穷无尽的变化、衍生和伪装，也有相当于审查后的变形。有些做梦者在成年后幸运地摆脱了与父母的矛盾，但他们仍可具有俄狄浦斯情结，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所谓阉割情结，这是对父亲恐吓或限制幼儿性活动的反应。

By applying our former resear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psychic life of the child, we may expect to find that the origin of other forbidden dream-wishes, of excessive sexual impulses, may be explained in the same manner. Thus we are moved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sex-life in the child also, and we discover the following from a number of sources: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a mistake to deny that the child has a sexual life, and to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sexuality commences with the ripening of the genitals at the time of puberty. On the contrary—the child ha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 sexual life rich in content and differing in numerous respects from that which is later considered normal. What we call “perverse” in the life of the adult, differs from the normal in the following respects: first, in disregard for the dividing line of species (the gulf between man and animal); second, being insensible to the conventional feeling of disgust; third, the incest-limitation (being prohibited from seeking sexual satisfaction with near blood-relations); fourth, homosexuality, and fifth, transferring the role of the genitals to other organs and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None of these limitations exist in the beginning, but are gradually built up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The little child is free from them. He knows no unbridgable chasm between man and animal; the arrogance with which man distinguishes himself from

the animal is a later acquisition. In the beginning he is not disgusted at the sight of excrement, but slowly learns to be so disgusted under the pressure of education; he lays no special stress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xes, rather accredits to both the same genital formation; he directs his earliest sexual desires and his curiosity toward those persons closest to him, and who are dear to him for various reasons—his parents, brothers and sisters, nurses; and finally, you may observe in him that which later breaks through again, raised now to a love attraction, viz., that he does not expect pleasure from his sexual organs alone, but that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portray the same sensitiveness, are the media of analogous sensations, and are able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genitals. The child may, then, be called "polymorphus perverse," and if he makes but slight use of all these impulses, it is, on the one hand, because of their lesser intensity as compared to later life, and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the bringing up of the child immediately and energetically suppresses all his sexual expressions. This suppression continues in theory, so to say, since the grown-ups are careful to control part of the childish sex-expressions, and to disguise another part by misrepresenting its sexual nature until they can deny the whole business. These are often the same persons who discourse violently against all the sexual faults of the child and then at the writing table defend the sexual purity of the same children. Where children are left to themselves or a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rruption, they often are capable of really conspicuous performances of perverse sexual activity. To be sure, the grown-ups are right in looking upon these things as "childish performances," as "play," for the child is not to be judged as mature and answerable either before the bar of custom or before the law, but these things do exist, they have their significance as indications of innat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causes and furtherances of later developments, they give us an insight into childhood sex-life and

thereby into the sex life of man. When we rediscover in the background of our distorted dreams all these perverse wish-impulses, it means only that the dream has in this field traveled back to the infantile condition.

如果我们将前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儿童心理生活研究上，会发现梦的其他禁忌愿望，即过旺的性冲动，也可以用同样的道理解释。这样我们也就要去研究儿童性生活的发展，从一些渠道发现了以下现象：首先，否认儿童有性生活，想当然地认为性是在青春期性器官发育成熟后才开始的，这是错误的想法。相反，儿童从一开始就有性生活，内涵很丰富，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后来所谓的正常性生活。成人生活中被称为“变态”的性行为，与正常性行为有以下不同：第一，它无视物种间的界限（人和动物的区别）；二，它对传统的厌恶之情不敏感；三，它没有伦理界限（禁止在血缘近亲中寻求性满足）；四，同性恋；五，将其他器官和身体部位等同于性器官使用。这些禁忌开始并不存在，但是在进化和文明进程中逐步建立起来。幼儿则百无禁忌。他们不知道人与动物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只是在后来才自视甚高地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一开始，他们看到粪便并不会厌恶，而是渐渐地为教育所迫学会了厌恶；他们并不特别重视两性的区别，而是认为两性的生殖器构造一样；他们将最初的性欲和好奇心指向了最亲近的人——父母、兄弟姐妹、保姆等；最后，大家可以观察到他们身上的一个特点（它以后会重新显现出来，提升为性吸引力），这就是：他们不只期望从性器官获得快感，而是身体很多其他部位也表现出同样的敏感度，是类似快感的载体，与性器官有同等作用。于是我们可把儿童形容为“多形变态”,如果他们很少实践这些冲动，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强度比之后来的性生活要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家庭教养会立刻竭力压制其所有的性表现。这么说吧，这种压制理论上一直持续着，因为成年人总是小心翼翼地克制一些幼稚的性表现，而对另一些表现，则用错误表达方式掩饰它的性意味，这样他们就等于全盘否认了。有些人常常既痛骂儿童错误的性举动，然后又在写字台上撰文为同一个儿童的性纯洁辩护。儿童独自一人时，或在

诱惑的引导下，经常能够做出十分明显的变态性行为。实话说，成人们把这些事情看成“幼稚行为”或“玩耍”是对的，因为儿童未成年，无法要求其负责，指控其伤风败俗或违反法律，但这些事情确实存在，它们具有一定的意义（既暗示了天性，又导致和推动了今后的个性发展），它们使我们见识了童年的性生活，进而见识了人类的性生活。当我们再次在变形梦的背景中发现这些变态愿望冲动时，这只是意味着此梦在这方面回归了幼儿期的状态。

Especially noteworthy among these forbidden wishes are those of incest, i.e., those directed towards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parents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You know what antipathy society feels toward such intercourse, or at least pretends to feel, and what weight is laid on the prohibitions directed against it. The most monstrous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explain this fear of incest. Some have believed that it is due to evolutionary foresight on the part of nature, which is psychically represented by this prohibition, because inbreeding would deteriorate the race-character; others maintained that because of having lived together since early childhood the sexual desire is diverted from the persons under consideration. In both cases, furthermore, the incest-avoidance would be automatically assured, and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need of strict prohibitions, which rather point to the presence of a strong desire. Psychoanalytic research has incontrovertibly shown that the incestuous love choice is rather the first and most customary choice, and that not until later is there any resistance, the source of which probably is to be found in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在这些禁忌愿望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乱伦的愿望，比如，想与父母、兄弟姐妹发生性关系的愿望。大家都明白社会对这类关系是何

其反感（或自以为反感）并严厉禁止的。对乱伦的恐惧，有一些解释极为荒唐。有人认为，这是自然进化的前瞻选择，这种禁忌便是它在心理上的体现，因为近亲通婚会恶化种族素质；有人则坚称，因为近亲们自小就生活在一起，彼此性欲已然消弭。如果这两种情况属实，则乱伦现象势必可以自动避免，如此就难以理解严厉禁止的动机，这反而说明有强烈需求存在。精神分析研究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乱伦之爱是最初和最常见的选择，直到后来反抗发生为止，这大约可以在个人心理学中找到答案。

Let us sum up what our plunge into child psychology has given us towar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ream. We found not only that the materials of forgotten childhood experiences are accessible to the dream, but we saw also that the psychic life of children, with all its peculiarities, its egoism, its incestuous love-choice, etc., continues,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dream, in the unconscious, and that the dream nightly leads us back to this infantile stage. Thus it becomes more certain *that the unconscious in our psychic life is the infantile* . The estranging impression that there is so much evil in man, begins to weaken. This frightful evil is simply the original, primitive, infantile side of psychic life, which we may find in action in children, which we overlook partly because of the slightness of its dimensions, partly because it is lightly considered, since we demand no ethical heights of the child. Since the dream regresses to this stage, it seems to have made apparent the evil that lies in us. But it is only a deceptive appearance by which we have allowed ourselves to be frightened. We are not so evil as we might suspect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我们概括一下儿童心理学研究对理解梦的启示。我们不仅发现童年遗忘的经历材料可以入梦，而且也看到儿童心理生活具有各种特

性，包括利己主义、乱伦之爱的选择等，它们为了造梦继续潜伏于潜意识中，每夜的梦会引导我们回归幼稚阶段。这样就更确定了：我们心理生活的潜意识是幼稚的　。关于“人性太邪恶”的可耻印象就减弱了。这种可怕的邪念，只是心理生活中最初的、原始的、幼稚的一面，我们在儿童身上看到了它们的体现，我们忽略它们，部分因为它们量级轻微，部分因为我们对儿童没有太高的伦理要求，因而对此不太在意。梦退回到了这个阶段，使得我们心中的邪念变得明显。但这只是一种迷惑性的表象，它使我们感到恐慌。我们可没有释梦推想的那么邪恶。

If the evil impulses of the dream are merely infantilism, a return to the beginnings of our ethic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dream simply makes children of us again in thinking and in feeling, we need not be ashamed of these evil dreams if we are reasonable. But being reasonable is only a part of psychic life. Many things are taking place there that are not reasonable, and so it happens that we are ashamed of such dreams, and unreasonably. We turn them over to the dream-censorship, are ashamed and angry if one of these dreams has in some unusual manner succeeded in penetrating into consciousness in an undistorted form, so that we must recognize it—in fact, we are at times just as ashamed of the distorted dream as we would be if we understood it. Just think of the scandalized opinion of the fine old lady about her uninterpreted dream of “services of love.” The problem is not yet solved, and it is still possible that upon further study of the evil in the dream we shall come to some other decision and arrive at another valuation of human nature.

如果梦中邪恶冲动只是幼稚性的，是伦理进化的返祖现象，既然梦只是激活了我们内心孩童般的思考和感受，理性地看，我们不必对

这些邪恶的梦感到羞耻。但是理性只是心理生活的一部分。那里也不乏许多非理性的东西，因此我们会毫无理由地对这些梦感到羞耻。我们会将它们交由梦的审查处理，要是此类的梦未经变形就异常成功地洞悉了意识，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时，我们会非常恼怒和羞愧——事实上，如果我们能理解变形梦，我们有时会同样对这种梦感到羞耻。只需想一下那位高雅的老夫人“爱的服务”之梦，该梦即便未得到解读，她仍是羞愤不已。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我们仍有可能通过深究梦中邪念而得出其他结论，对人性做出另一种评价。

As a result of the whole investigation we grasp two facts, which, however, disclose only the beginnings of new riddles, new doubts. First: the regression of dream-work is not only formal, it is also of greater import. It not only translates our thoughts into a primitive form of expression, but it reawakens the peculiarities of our primitive psychic life, the ancient predominance of the ego, the earliest impulses of our sexual life, even our o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f we may consider the symbolic relations as such. And second: We must accredit all these infantilisms which once were governing, and solely governing, to the unconscious, about which our ideas now change and are broadened. Unconscious is no longer a name for what is at that time latent, the unconscious is an especial psychic realm with wish-impulses of its own, with its own method of expression and with a psychic mechanism peculiar to itself, all of which ordinarily are not in force. But the latent dream-thoughts, which we have solved by means of the dream-interpretation, are not of this realm. They are much more nearly the same as any we may have thought in our waking hours. Still they are unconscious; how does one solve this contradiction? We begin to see that a distinction must be made. Something that originates in our conscious life, and that shares its characteristics—we call it the day-remnants—combines in the dream-fabrication with something

else out of the realm of the unconscious. Between these two parts the dream-work completes itself. The influencing of the day-remnants by the unconscious necessitates regression. This is the deepest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the dream that we are able to attain without having searched through further psychic realms. The time will soon come, however, when we shall clothe the unconscious character of the latent dream-thought with another name, which shall differentiate it from the unconscious out of the realm of the infantile.

整个问题的研究结果有两点，但它们只是新谜题、新疑问的开端。第一：梦的工作的退行，不仅是形式上的，也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它不但将我们的念头转换成一种原始的表达形式，也重新激活了原始心理生活的特性，即原始的自我意识主导、幼年的性生活冲动，甚至包括我们传承的古老文化财产（如果考虑到象征关系的话）。第二：所有这些幼稚行为曾经占主导地位，而且是唯一主导地位，它们应归功于潜意识，而我们现在对潜意识的观念已经改变和拓宽了。潜意识不再是暂时隐藏的想法，而是一个特殊的心理王国，它有其自身的愿望冲动、自身的表达方式、独有的心理机制，所有这些在平常是不活跃的。但是释梦所揭示的隐意不属于这个王国。显而易见，它们与我们清醒时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它们仍是潜意识的，我们怎么解决这种矛盾？我们要看到一个必然的区别。有些想法源于意识生活、拥有意识的特点（我们称之为白天的遗念）它们在造梦时与潜意识范畴内的某些念头结合在一起。梦的工作就是在这两个部分之间完成的。潜意识对白天遗念的影响促使退行现象应运而生。我们尚未深究其他心理王国，关于梦的本质，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能获得的最深刻见解了。不过，我们马上就能用另一个名词表达隐意的潜意识特征，这能将它与幼稚王国的潜意识区分开来。

We may, to be sure, propound the question: what forces the

psychological activity during sleep to such regression? Why do not the sleep disturbing psychic stimuli do the job without it? And if they must, because of the dream censorship, disguise themselves through old forms of expression which are no longer comprehensible, what is the use of giving new life to old, long-outgrown psychic stimuli, wishes and character types, that is, why the material regression in addition to the formal? The only satisfactory answer would be this, that only in this manner can a dream be built up, that dynamically the dream-stimulus can be satisfied only in this way. But for the time being we have no right to give such an answer.

我们要如实地提出以下问题：是什么导致了睡眠中的心理活动退行？为什么搅扰睡眠的心理刺激不能脱离它单干呢？如果因为梦的审查，它们必须用一些业已无法理解的古老表达方式伪装自己，那么激活那些古老的、早被克制的心理刺激、愿望、特性的用意何在？也就是说，除了形式退行，为什么还有内容退行的必要？对此问题的唯一满意解答可能是，只有这样，梦才能制造出来，只有这样，梦的刺激才能得到动态的满足。不过我们目前还没有如此回答的依据。

Fourteenth Lecture　Wish Fulfillment

第十四讲　愿望实现

May I bring to your attention once more the ground we have already covered? How, when we met with dream distor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our technique, we decided to leave it alone for the time being, and set out to obtain decisive information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dream by way of infantile dreams? How, then, armed with the results of this investigation, we attacked dream distortion directly and, I trust, in some measure overcame it? But we must remind ourselves that the results we found along the one way and along the other do not fit together as well as might be. It is now our task to put these two results together and balance them against one another.

我们需要再回顾一下之前学习的内容。我们在应用释梦技术时遇到了梦的变形，决定暂时不去管它，然后开始通过研究儿童的梦了解梦的本质的关键信息。然后，通过这一研究所获结论，我们直接应对了梦的变形，我相信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必须认识到，我们从两个方面发现的结论并不如愿地吻合。现在我们必须把两个结论整合在一起，使两者一致起来。

From both sources we have seen that the dream-work consists essentially in the transposition of thoughts into a hallucinatory experience. How that can take place is puzzling enough, but it is a problem of general psychology with which we shall not busy ourselves here. We have learned from the dreams of children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dream-work is the satisfaction of one of the sleep-disturbing psychic stimuli by means of a wish fulfillment. We were unable to make a similar statement concerning distorted dreams, until we knew how to interpret them. Bu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e expected to be able to bring the distorted dreams under the same viewpoint as the infantile. The earliest fulfillment of this expectation led us to believe that as a matter of fact all dreams are the dreams of children and that they all work with infantile materials, through childish psychic stimuli and mechanics. Since we consider that we have conquered dream-distortion, we must continue the investigation to see whether our hypothesis of wish-fulfillment holds good for distorted dreams also.

从这两个方面都能发现，梦的工作关键在于从想法到幻觉体验的变迁。它的发生机制相当令人费解，但这是普通心理学的问题，我们不用在这里瞎操心。我们从儿童的梦了解到，梦的工作的任务是，通过一种愿望实现，去满足一个搅扰睡眠的心理刺激。我们不能就变形梦得出类似的结论，除非我们懂得如何解释它们。但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把变形梦和儿童的梦的观点统一起来。这个期望提前实现，使得我们认识到，事实上所有的梦都是儿童的梦，它们通过儿童式的心理刺激和机制，处理着幼时的材料。既然我们自认为已经驯服了梦的变形，就必须乘胜追击，看看我们关于愿望实现的假说对于变形梦是否也站得住脚。

We very recently subjected a number of dreams to interpretation, but left wish-fulfillment entirely out of consideration.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question again and again occurred to you: “What about wish-fulfillment, which ostensibly is the goal of dream-work?” This question is important. It was, in fact, the question of our lay-critics. As you know, humanity has an

instinctive antagonism toward intellectual novelties. The expression of such a novelty should immediately be reduced to its narrowest limits, if possible, comprised in a commonplace phrase. Wish-fulfillment has become that phrase for the new dream-science. The layman asks: “Where is the wish-fulfillment?” Immediately, upon having heard that the dream is supposed to be a wish-fulfillment, and indeed, by the very asking of the question, he answers it with a denial. He is at once reminded of countless dream-experiences of his own, where his aversion to the dream was enormous, so that the proposition of psychoanalytic dream-science seems very improbable to him. It is a simple matter to answer the layman that wish-fulfillment cannot be apparent in distorted dreams, but must be sought out, so that it is not recognized until the dream is interpreted. We know, too, that the wishes in these distorted dreams are prohibited wishes, are wishes rejected by the censor and that their existence lit the very cause of the dream distortion and the reason for the intrusion of the dream censor. But it is hard to convince the lay-critic that one may not seek the wish-fulfillment in the dream before the dream has been interpreted. This is continually forgotten. His sceptical attitude toward the theory of wish-fulfillment is really nothing more than a consequence of dream-censorship, a substitute and a result of the denial of this censored dream-wish.

我们最近解释了很多梦，但完全没有考虑愿望实现的因素。我相信大家会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愿望实现表面看是梦的工作的目标，那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实际上，它曾经是外行批评家提出的问题。大家知道，人性对于知识创新有着本能的抵触。这样的创新很容易被批得体无完肤，如有可能，还会被贴上一个标签。而“愿望实现”就是新释梦学的标签词组。外行人问道：“愿望实现体现在哪儿呢？”一旦听说梦本该有愿望实现，他们马上就会这样追问，

事实上，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它的否定。他们马上想起自己无数个梦的体验，而他们对这些梦是极其反感的，因而精神分析的释梦学观点对他们来说似乎很不靠谱。要回答外行人很简单，愿望实现在变形梦中并不明显，但必须要找出来，所以非到释梦完成，无法确认。我们也知道，这些变形梦中的愿望实现是审查机制所禁止的，它们的存在就是导致梦变形的起因，也是梦的审查介入的原因。但很难说服外行批评家在释梦完成前不可以去找要实现的愿望，这个要求总是被他们忽略。他们对于愿望实现一说的怀疑态度，恰恰是梦的审查在起作用，不过是换了个形式和结果反对那个被审查的愿望罢了。

To be sure, even we shall find it necessary to explain to ourselves why there are so many dreams of painful content, and especially dreams of fear. We se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roblem of the affects in the dream, a problem worthy of separate investigation, but which unfortunately cannot be considered here. If the dream is a wish-fulfillment, painful experiences ought to be impossible in the dream; in that the lay-critics apparently are right. But three complications, not thought of by them,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说实在的，连我们都觉得有必要向自己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的梦包含有恼人的内容，特别是焦虑之梦。我们这里第一次发现关于梦中情绪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单独研究，但不巧这里无法讨论。如果梦是一种愿望实现，梦中按理不该有烦恼的感觉，这一点上外行批评家们显然没错。但我们必须考虑他们忽视了的三个难点。

First: It may be that the dream work has not been successful in creating a wish-fulfillment, so that a part of the painful effect of the dream-thought is left over for the manifest dream. Analysis should

then show that these thoughts were far more painful even than the dream which was built out of them. This much may be proved in each instance. We admit, then, that the dream work has not achieved its purpose any more than the drink-dream due to the thirst-stimulus has achieved its purpose of satisfying the thirst. One remains thirsty, and must wake up in order to drink. But it was a real dream; it sacrificed nothing of its nature. We must say: “Although strength be lacking, let us praise the will to do.” The clearly recognizable intention, at least, remains praiseworthy. Such cases of miscarriage are not unusual. A contributory cause is this, that it is so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the dream work to change affect into content in its own sense; the affects often show great resistance, and thus it happens that the dream work has worked the painful content of the dream-thoughts over into a wish-fulfillment, while the painful affect continues in its unaltered form. Hence in dreams of this type the affect does not fit the content at all, and our critics may say the dream is so little a wish-fulfillment that a harmless content may be experienced as painful. In answer to this unintelligible remark we say that the wish-fulfillment tendency in the dream-work appears most prominent, because isolated, in just such dreams. The error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he who does not know neurotics imagin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ntent and affect as all too intimate, and cannot, therefore, grasp the fact that a content may be altered without any corresponding change in the accompanying affect-expression.

第一：梦的工作也有可能并没有成功制造一个愿望实现，所以显梦中残留了一部分隐意的痛苦效应。通过分析应可证明，这些隐意比起它们制造出的梦要痛苦得多。这个结论在每个案例中都可以得到验证。我们于是承认，梦的工作没有成功完成任务，正如口渴刺激引发的饮水之梦并未满足口渴的需求。做梦者依然口渴，必须醒过来喝

水。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梦，它并没有丧失任何本质。我们必须说："虽然力量薄弱，但勇气可嘉。"这个明显可辨的意图至少值得夸赞。这类失败案例并不罕见。一个主要原因是，梦的工作以一己之力将情绪转译为梦的内容，实在是难上加难，情绪经常有巨大抗性，可能的情况是，梦的工作已经把隐意的痛苦内容转换成了愿望实现，而该痛苦情绪仍保持不变。如此，在这类梦中，情绪与内容毫不匹配，我们的批评家就会说，梦算不上什么愿望实现，即便是内容无害的梦都会使人痛苦。回答这种莫名的评论，我们只需说，正因为梦的工作中愿望实现的倾向在这些梦中是独立呈现的，所以才显得极为明显。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并不了解神经症，以为内容和情绪总是密不可分，因而不能理解，在伴随的情绪表示不变的前提下，一项内容也可以发生变动。

A second, far more important and more extensive consideration, equally disregarded by the layman, is the following: A wish-fulfillment certainly must bring pleasure—but to whom? Naturally, to him who has the wish. But we know from the dreamer that he stands in a very special relationship to his wishes. He casts them aside, censors them, he will have none of them. Their fulfillment gives him no pleasure, but only the opposite. Experience then shows that this opposite, which must still be explained, appears in the form of fear. The dreamer in his relation to his dream-wishes can be compared only to a combination of two persons bound together by some strong common quality. Instead of further explanations I shall give you a well-known fairy tale, in which you will again find the relationships I have mentioned. A good fairy promises a poor couple, husband and wife, to fulfill their first three wishes. They are overjoyed, and determine to choose their three wishes with great care. But the woman allows herself to be led astray by the odor of cooking sausages emanating from the next cottage, and wishes she had a couple of such sausages. Presto!

They are there. This is the first wish-fulfillment. Now the husband becomes angry, and in his bitterness wishes that the sausages might hang from the end of her nose. This, too, is accomplished, and the sausages cannot be removed from their new location. So this is the second wish-fulfillment, but the wish is that of the husband. The wife is very uncomfortable because of the fulfillment of this wish. You know how the fairy tale continues. Since both husband and wife are fundamentally one, the third wish must be that the sausages be removed from the nose of the wife. We could make use of this fairy tale any number of times in various connections; here it serves only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wish-fulfillment for the one personality may lead to an aversion on the part of the other, if the two do not agree with one another.

第二个远为重要和宽泛的思考要点（同样为外行人所忽略）如下：愿望实现必然会带来愉悦——但是使谁愉悦呢？论理应该是有此愿望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做梦者与自己的愿望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他们嫌弃它们、审查它们，不想拥有其中任何一个愿望。这些愿望的实现不会给他们带来愉悦，反而适得其反。经验表明，这种反面情绪（仍必须进行解释）表现为一种恐惧感。做梦者与其梦中愿望只可比喻为，被某种强大共性捆绑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我不多做解释了，先给大家讲一个著名的童话，大家也会发现我讲的这种关系。一位善良的仙子答应一对贫苦夫妻，可实现他们的前三个愿望。他们大喜过望，决定认真选择三个愿望。但是妻子被邻居家煮香肠的香味吸引了，希望自己能吃几串香肠。瞬间，香肠已经出现在面前。这是第一个愿望的实现。现在丈夫饿了，他不怀好意地希望香肠挂在老婆的鼻梁上。这个愿望也实现了，挂在新位置的香肠怎么也拿不下来。因而这是第二个愿望的实现，但这是丈夫的愿望。妻子因为这个愿望的实现感到苦恼。大家也猜得出接下来的故事了。既然夫妻本是同命鸟，第三个愿望必然是把香肠从妻子鼻子上拿下来。这个童话的寓意很多样化，可以比喻很多事物，但这里它只说明了一种可能，即：如

果两个人不合，则一个人的愿望满足，可能会引致另一人的反感。

It will not be difficult now to com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nxiety-dream. We shall make one more observation, then we shall come to a conclusion to which many things lead. The observation is that the anxiety dreams often have a content which is entirely free from distortion and in which the censorship is, so to speak, eluded. The anxiety dream is ofttimes an undisguised wish-fulfillment, not, to be sure, of an accepted, but of a discarded wish. The anxiety development has stepped into the place of the censorship. While one may assert of the infantile dream that it is the obvious fulfillment of a wish that has gained admittance, and of the distorted dream that it is the disguised fulfillment of a suppressed wish, he must say of the anxiety dream that the only suitable formula is this, that it is the obvious fulfillment of a suppressed wish. Anxiety is the mark which shows that the suppressed wish showed itself stronger than the censorship, that it put through its wish-fulfillment despite the censorship, or was about to put it through. We understand that what is wish-fulfillment for the suppressed wish is for us, who are on the side of the dream-censor, only a painful sensation and a cause for antagonism. The anxiety which occurs in dreams is, if you wish, anxiety because of the strength of these otherwise suppressed wishes. Why this antagonism arises in the form of anxiety cannot be discovered from a study of the dream alone; one must obviously study anxiety from other sources.

现在就不难对焦虑之梦做出更好的解释了。我们先提一个观察结果，然后再看一个多种事实都指向的结论。该观察结果即，焦虑之梦的内容经常完全无变形，而且可以说也逃避了梦的审查。焦虑之梦常

是一种毫无伪装的愿望实现，确切地说，这个愿望是未被承认的、被抛弃了的愿望。焦虑得寸进尺地替代了梦的审查。有人则主张，幼儿的梦明显是实现一种获得认可的愿望，而变形梦则是以伪装形式实现一种被压抑的愿望，因而焦虑之梦必然只有一种适宜的方案，即它是公然地实现一种被压抑的愿望。焦虑是一种标记，表明了受压抑的愿望比审查行为更强烈，它不顾审查而执行了愿望实现，或是准备执行。我们认识到，当我们站在梦的审查立场时，受压抑愿望的实现只能是一种痛苦的感觉和引起反感的原因。如你所想，在梦中产生的焦虑是因为本被压抑的愿望过于强大所致。这种反感如何以焦虑的形式出现，则不能单纯从梦的研究中寻找答案，显然必须要从其他角度来研究焦虑。

What holds true for the undistorted anxiety dream we may assume to be true also of those dreams which have undergone partial distortion, and of the other dreams of aversion whose painful impressions very probably denote approximations of anxiety. The anxiety dream is usually also a dream that causes waking; we habitually interrupt sleep before the suppressed wish of the dream has accomplished its entire fulfillment in opposition to the censorship. In this case the execution of the dream is unsuccessful, but this does not change its nature. We have likened the dream to the night watchman or sleep-defender who wishes to protect our sleep from being disturbed. The night watchman, too, sometimes wakes the sleeper when he feels himself too weak to drive away the disturbance or danger all by himself. Yet we are often able to remain asleep, even when the dream begins to become suspicious, and begins to assume the form of anxiety. We say to ourselves in our sleep: “It's only a dream,” and we sleep on.

在未变形的焦虑之梦中成立的，我们也可推及那些部分变形的

梦，和其他一些痛苦感非常近似于焦虑的厌恶之梦。焦虑之梦通常也是一种催人苏醒的梦，在梦中受压抑的愿望抵抗梦的审查而完全得逞前，我们习惯于中断睡眠。在这种情况下，梦的运行是失败的，但这没有改变其本质。我们曾把梦比拟为巡夜人或睡眠守护者，它意在保护我们的睡眠不受搅扰。当巡夜人觉得自己力量太弱，单凭自己无法赶走干扰或危险时，有时也会叫醒睡觉者。不过我们常常能继续睡着，即使梦开始变得可疑，开始显出焦虑。我们在睡眠中对自己说："只是一个梦而已。"然后接着睡。

When does it happen that the dream-wish is in a position to overpower this censorship? The conditions for this may be just as easily furnished by the dream-wish as by the dream-censorship. The wish may, for unknown reasons, become irresistible; but one gets the impression that more frequently the attitude of the dream censorship is to blame for this disarrangement in the relations of the forces. We have already heard that the censorship works with varying intensity in each single instance, that it handles each element with a different degree of strictness; now we should like to add the proposition that it is an extremely variable thing and does not exert equal force on every occasion against the same objectionable element. If on occasion the censorship feels itself powerless with respect to a dream-wish which threatens to override it, then, instead of distortion, it makes use of the final means at its disposal, it destroys the sleep condition by the development of anxiety.

什么时候才会发生梦中愿望强过审查作用的情况？这显然要根据梦中愿望和梦的审查两方面的情况而定。出于未知的原因，愿望会变得势不可挡，但是人们感到，梦的审查的态度更应该为这种力量关系失衡负责。我们已经听说，审查作用的力度因每个事例而异，处理每

个元素的严格程度也不同，现在我们还应该补充一个说法，即，审查极为多变，对同一令人反感的元素施加的力度也并非次次一样。偶尔地，如果审查发觉自己无力对付一个意在打败它的梦中愿望，则会放弃变形的手法，任性地绝地反击，以产生焦虑情绪来摧毁睡眠状态。

And now it occurs to us that we know absolutely nothing yet as to why these evil, depraved wishes are aroused just at night, in order that they may disturb our sleep. The answer can only be an assump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nature of the condition of sleep. During the day the heavy pressure of a censorship weighs upon these wishes, making it impossible, as a rule, for them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any manner. At night, evidently, this censorship is withdraw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single sleep-wish, in the same manner as are all the other interests of psychic life, or at least placed in a position of very minor importance. The forbidden wishes must thank this noctural deposition of the censor for being able to raise their heads again. There are nervous persons troubled with insomnia who admit that their sleeplessness was in the beginning voluntary. They did not trust themselves to fall asleep, because they were afraid of their dreams, that is, of the results due to a slackening of the censorship. So you can readily see that this withdrawal of the censor does not in itself signify rank carelessness. Sleep weakens our power to move; our evil intentions, even if they do begin to stir, can accomplish nothing but a dream, which for practical purposes is harmless, and the highly sensible remark of the sleepers, a night-time remark indeed, but not a part of the dream life, “it is only a dream,” is reminiscent of this quieting circumstance. So let us grant this, and sleep on.

现在我们意识到，关于这些邪恶堕落的愿望为何只在夜晚出没，

搅扰我们的睡眠，我们仍一无所知。答案只能是基于睡眠状态本质的设想。在白天，这些愿望被审查作用沉重地压制着，一般来说都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表现出来。显然，在晚上，就像心理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那样，这种审查因单纯的睡眠愿望而有所收敛，或是顶多被置于很次要的位置。多亏了审查作用的夜间习性，禁忌愿望才得以重新抬头。有些失眠的神经症病人承认自己一开始是主动失眠的。他们对自己入睡很不放心，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做梦，就是说，害怕审查松懈导致的后果。这样大家很容易明白了，审查的收敛本身不意味着粗心大意。睡眠减弱了我们的行动能力和邪念，即便它们开始骚动，也不过是制造了一场梦，实际上并无大碍，睡眠者们有一句很在理的话，实际上是在夜里说的，但不属于梦的生活："这不过是一场梦。"这是一种自我宽慰。所以我们就信了此话，继续睡吧。

If, thirdly, you recall the concept that the dreamer, struggling against his wishes, is to be compared to a summation of two separate persons, in some manner closely connected, you will be able to grasp the further possibility of how a thing which is highly unpleasant, namely, punishment, may be accomplished by wish-fulfillment. Here again the fairy tale of the three wishes can be of service to us: the sausages on the plate are the direct wish-fulfillment of the first person, the woman; the sausages at the end of her nose are the wish-fulfillment of the second person, the husband,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punishment for the stupid wish of the woman. Among the neurotics we find again the motivation of the third wish, which remains in fairy tales only. There are many such punishment-tendencies in the psychic life of man; they are very powerful, and we may make them responsible for some of our painful dreams. Perhaps you now say that at this rate, not very much of the famed wish-fulfillment is left. But upon closer view you will admit that you are wrong. In contrast to the many-sided to be discussed, of what the dream might be—and, according to

numerous authors, is—the solution (wish-fulfillment, anxiety-fulfillment, punishment-fulfillment) is indeed very restricted. That is why anxiety is the direct antithesis of the wish, why antitheses are so closely allied in association and why they occur together in the unconscious, as we have heard; and that is why punishment, too, is a wish-fulfillment of the other, the censoring person.

第三，大家是否记得一个说法，即做梦者与自己愿望的抗争，可以比喻为两个独立个人因某种紧密联系而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伴随愿望实现的，可能有一种很令人不快的事物，也就是惩罚。那个童话故事在这里又可以派上用场了：盘中的香肠是第一个人即妻子的直接愿望实现，而把香肠挂在她鼻子上则是第二个人即丈夫的愿望实现，但是同时，也是对妻子的愚蠢愿望的惩罚。我们在神经症病例中也发现了第三个愿望的动机，这个愿望只存在于童话之中。在人类心理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惩罚倾向，它们非常强势，可能是一些梦使人痛苦的源泉。大家在这里或许会说，既然如此，这徒有空名的愿望实现也所剩无几了。但是细究之下，大家会发现自己错了。根据很多学者的意见，与梦的多种可能性相比，梦的解决方案（如愿望实现、焦虑实现、惩罚实现）实际上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就是为什么，就我们所知，焦虑是愿望的直接对立面，对立双方总是紧密相连，它们会一起出现在潜意识中，这也是“惩罚即审查者的愿望实现”的原因。

On the whole, then, I have made no concessions to your protestation against the theory of wish-fulfillment. We are bound, however, to establish wish-fulfillment in every dream no matter how distorted, and we certainly do not wish to withdraw from this task. Let us go back to the dream, already interpreted, of the three bad theatre tickets for 1 Fl. 50 Kr. from which we have already learned so much. I hope you still remember it. A lady who tells her

husband during the day that her friend Elise, only three months younger than herself, has become engaged, dreams she is in the theatre with her husband. Half the parquet is empty. Her husband says, “Elise and her fiancé wanted to go to the theatre, too, but couldn't because they could get only poor seats, three for one gulden and a half.” She was of the opinion that that wasn't so unfortunate. We discovered that the dream-thought originated in her discontent at having married too soon, and the fact that she was dissatisfied with her husband. We may be curious as to the manner in which these thoughts have been worked over into a wish-fulfillment, and where their traces may be found in the manifest content. Now we know that the element “too soon, premature” is eliminated from the dream by the censor. The empty parquet is a reference to it. The puzzling “three for 1 Fl. 50 Kr.” is now, with the help of symbolism which we have since learned, more understandable. [10_1] The “3” really means a husband, and the manifest element is easy to translate: to buy a husband for her dowry (“I could have bought one ten times better for my dowry”). The marriage is obviously replaced by going into the theatre. “Buying the tickets too soon” directly takes the place of the premature marriage. This substitution is the work of the wish-fulfillment. Our dreamer was not always so dissatisfied with her early marriage as she was on the day she received news of the engagement of her friend. At the time she was proud of her marriage and felt herself more favored than her friend. Naive girls have frequently confided to their friends after their engagement that soon they, too, will be able to go to all the plays hitherto forbidden, and see everything. The desire to see plays, the curiosity that makes its appearance here, was certainly in the beginning directed towards sex matters, the sex-life, especially the sex-life of the parents, and then became a strong motive which impelled the girl to an early marriage. In this way the visit to the theatre

becomes an obvious representative substitute for being married. In the momentary annoyance at her early marriage she recalls the time when the early marriage was a wish-fulfillment for her, because she had satisfied her curiosity; and she now replaces the marriage, guided by the old wish-impulse, with the going to the theatre.

至此，总体而言，关于大家对愿望实现一说的异议，我并未做任何让步。不过，我们必须在每个梦中确认愿望实现，无论其变形大小，而且我们势必不能因此而退缩不前。我们回顾一下那个1个半弗罗林买3张烂戏票的梦，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梦，而且从中学到了很多。但愿大家还记得。一位女士白天告诉她丈夫，只比她小三个月的朋友伊莉斯刚刚订婚了，她梦见自己跟丈夫在戏院里，而后排有一半座位空着。她丈夫说："伊莉斯和未婚夫也想来看戏，但是因为只能买到差位子所以没能来，1个半金币买3个位子。"她觉得这并不算倒霉。（译者注：这里复述的例子与第七讲中的首次引述多有不符，第七讲中，伊莉斯是丈夫的熟人，订婚消息是丈夫告诉妻子的，而且是前排座位一半空着，特此注明。）我们发现梦的隐意源自她对过早结婚的不甘以及对丈夫的不满。我们会好奇这些隐意如何成就了一种愿望实现，以及在梦的显意中有何体现。现在我们明白了，"太快，太草率"这个元素被审查作用从梦中抹去了。空着的后排座位即是证明。现在借助我们掌握的象征意义，我们对令人费解的"1个半弗罗林买3张票"可以更好地理解了。[11_1] 数字"3"其实意味着一个丈夫，这一显梦元素很容易解释：用她的嫁妆买了一个丈夫（"我用自己的嫁妆本可以买到优秀十倍的货色"）。去戏院显然是婚姻的替代。"太早买票了"则直接代表草率的婚姻。我们的做梦者在知道好友订婚消息前，并不总是对自己早婚心有不甘。她曾为自己结婚感到骄傲，觉得比好友处境更好。常有天真的女子，在订婚后跟闺蜜聊天时说，她们马上也能去看以前不许看的戏了，可以一饱眼福。在这里出现的看戏的渴望，即好奇心，无疑从一开始就直指性事、性生活，尤其是指父母的性生活，这成了促使女孩早日结婚的强烈动机。她在对自己过早结婚的无限苦恼中回忆起，早日结婚当初是她的愿望实现，因为她满

足了自己的好奇心，现在她在旧日的愿望冲动驱使下，将婚姻替换成了去剧院。

We may say that we have not sought out the simplest example as proof of a hidden wish-fulfillment. We would have to proceed in analogous manner with other distorted dreams. I cannot do that for you, and simply wish to express the conviction that it will be successful everywhere. But I wish to continue along this theoretical line. Experience has taught me that it is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phases of the entire dream science, and that many contradic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are connected therewith. Besides, you are perhaps still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I have retracted a part of my declaration, in that I said that the dream is a fulfilled wish or its opposite, an actualized anxiety or punishment, and you will think this is the opportunity to compel further reservations of me. I have also heard complaints that I am too abrupt about things which appear evident to me, and that for that reason I do not present the thing convincingly enough.

可以说，我们尚未找到一个例子，能够简单明了地证实隐藏的愿望实现。对付其他变形梦，我们都不得不用类似的曲折方法。我不能代替大家处理此事，也不能仅仅单纯地保证这个方法是普遍适用的。但我们可以在此理论方向上继续探讨。经验告诉我，这是释梦学最危险的阶段之一，相应会有不少矛盾和误解。而且，我曾认为梦是愿望得到实现，或者相反地是焦虑或惩罚得以实施，大家仍会觉得我收回了这一部分主张，认为可以乘胜迫使我作出更多让步。我也听到抱怨说，我讲述自认为的显然事实时太武断，因而没有十足的说服力。

If a person has gone thus far with us in dream-interpretation,

and accepted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offered, it is not unusual for him to call a halt at wish-fulfillment, and say, “Granted that in every instance the dream has a meaning, and that this meaning can be disclosed by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why must this dream, despite all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always be forced into the formula of wish-fulfillment? Why might not the meaning of this nocturnal thought be as many-sided as thought is by day; why may not the dream in one case express a fulfilled wish, in another, as you yourself say, the opposite thereof, an actualized anxiety; or why may it not correspond to a resolution, a warning, a reflection with its pro's and con's, a reproach, a goad to conscience, an attempt to prepare oneself for a contemplated performance, etc? Why always nothing more than a wish, or at best, its opposite?”

倘若有人在释梦的路上已经走了这么远，并接受了所有学到的观点，他们大有可能会在愿望实现上止步，并声称：“已知每个梦都有一个意义，该意义可用精神分析技巧发现，那为什么要不顾所有相反的证据，一意将此梦纳入愿望实现的程式中呢？为什么这个夜间隐意的意义不是跟白天的想法一样具有多面性呢？为什么梦不可以在一种情况中表达了愿望的实现，而在另一种情况中，如你所言，表现出其反面，即焦虑的实现呢？或者，为什么梦就不能代表一种决心、一种警示、一种对优缺点的反思、一种谴责、一种良知的鞭策、一种准备完成既定任务的努力，等等呢？为什么总说它只是一种愿望，顶多是它的相反面呢？”

One might maintain that a difference of opinion on these points is of no great importance, so long as we are at one otherwise. We might say that it is enough to have discovered the meaning of the dream, and the way to recognize it; that it is a matter of no importance, if we have too narrowly limited this meaning. But this

is not so.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is point strikes at the nature of our knowledge of the dream, and endangers its worth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neuroses. Then, too, that method of approach which is esteemed in the business world as genteel is out of place in scientific endeavors, and harmful.

有人也许会主张，只要我们就其他观点达成一致，在这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并不要紧。我们可以说，发现梦的意义以及辨认它的方法，这就足够了，过于局限地看待这个意义也无甚大碍。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一点上产生误解，会对我们梦的认知产生实质性打击，也危及到它对理解神经症的价值。还有一点，在现实社会中所谓恭谦礼让的做法在科学研究上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

My first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y the dream may not be many-sided in its meaning is the usual one in such instances: I do not know why it should not be so. I would not be opposed to such a state of affairs.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it could well be true. Only one small matter prevents this broader and more comfortable explanation of the dream—namely, that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n't so. My second answer emphasizes the fact that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dream corresponds to numerous forms of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operations is no stranger to me. In a story about a sick person I once reported a dream that occurred three nights running and then stopped, and I explained this suppression by saying that the dream corresponded to a resolution which had no reason to recur after having been carried out. More recently I published a dream which corresponded to a confession. How is it possible for me to contradict myself, and maintain that the dream is always only a fulfilled wish?

关于梦为什么不可以具有多种意义的问题，我的第一个回答是一种常见说法：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我并不反对这种情形。就我个人而言，这很有可能是对的。只不过有一桩小事，使我们不能对梦进行像这样更宽泛、更令人心安的解释，亦即，事实上这不是真的。我的第二个回答会强调，关于“梦与许多形式的隐意和智力活动相关”的设想对我来说并不眼生。我有一次讲过一位病人的事例，一个梦连做了三晚，然后戛然而止，就这种抑制现象我解释说，梦与某个决心有关，在决心执行完后就没有理由再发生了。最近我发表过一个与坦白相关的梦。我怎么可能自相矛盾地坚持说梦只是一个实现的愿望？

I do that, because I do not wish to admit a stupid misunderstanding which might cost us the fruits of all our labors with regard to the dream, a misunderstanding which confuses the dream with the latent dream-thought and affirms of the dream something that applies specifically and solely to the latter. For it is entirely correct that the dream can represent, and be replaced by all those things we enumerated: a resolution, a warning, reflection, preparation, an attempt to solve a problem, etc.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you will recognize that all these things are true only of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s, which have been changed about in the dream. You learn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eams that the person's unconscious thinking is occupied with such resolutions, preparations, reflections, etc., out of which the dream-work then builds the dream. If you are not at the time interested in the dream-work, but are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the unconscious thought-work of man, you eliminate the dream-work, and say of the dream,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quite correctly, that it corresponds to a warning, a resolution, etc. This often happens in psychoanalytic activity. People endeavor for the most part only to destroy the dream form, and to substitute in its place in the sequence the latent thoughts out of which the dream was made.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不想认可一个愚蠢的误解，它可能会使我们在梦的研究上辛勤耕耘的所得成果化为乌有，这个误解混淆了梦与梦的隐意的概念，武断地认为梦只专门适用于隐意。因为，对于我们列举的以下内容，梦完全可能表现它们，或者被它们替代：一种决心、一种警示、一种反思、一种准备、一种解决问题的尝试等等。但如果细看，大家会认识到，这些说法只有对梦的隐意而言是正确的，而隐意在梦中已经变了模样。大家都从释梦中懂得了，人的潜意识思维充斥着这些决心、准备、反思等等，梦的工作就是根据这些制造了梦。如果大家对梦的工作暂时不加关注，却非常关注人的潜意识思维活动，大家就会撇开梦的工作不谈，认为梦与一种警示、一种决心等等有关，这实际上也并无不可。这种情况在精神分析活动中常有发生。人们颇费心思，最终竟几乎毁了梦的形式，用造梦所依据的一系列隐意替代了梦的本身。

Thus we learn, from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latent dream-thoughts, that all the highly complicated psychic acts we have enumerated can go on unconsciously, a result as wonderful as it is confusing.

这样，在领悟了梦的隐意之后可知，我们所列举的所有高度复杂的心理行动是可以在潜意识中进行的，这个结论可谓既妙不可言，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But to return, you are right only if you admit that you have made use of an abbreviated form of speech, and if you do not believe that you must connect the many-sidedness we have mentioned with the essence of the dream. When you speak of the dream you must mean either the manifest dream, i.e., the product

of the dream-work, or at most the dream-work itself—that psychic occurrence which forms the manifest dream out of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 Any other use of the word is a confusion of concept that can only cause trouble. If your assertions refer to the latent thoughts back of the dream, say so, and do not cloud the problem of the dream by using such a faulty means of expression.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s are the material which the dream-work remolds into the manifest dream. Why do you insist upon confusing the material with the work that makes use of it? Are you any better off than those who knew only the product of this work, and could explain neither where it came from nor how it was produced?

再回过头来看，大家如果承认只不过把术语简化了，同时不认为我们所谓的多面性就是梦的本质，这样大家的说法也算是对的。当大家谈梦时，指的一定是显梦，即梦的工作之产物，或顶多是梦的工作本身——通过梦的隐意形成显梦的心理活动。该词的其他用法都是混淆概念，只会招惹麻烦。如果大家的主张指的是梦背后的隐意，需要明说，不要因为词不达意而模糊了这个梦的问题。梦的隐意是梦的工作塑造显梦的素材。为什么要顽固地把素材和使用素材的工作混为一谈呢？跟那些只知这一工作的产物，解释不了它的来源和制造过程的人比起来，这又能好到哪里去？

The only essential thing in the dream is the dream-work that has had its influence upon the thought-material. We have no right to disregard it theoretically even if, in certain practical situations, we may fail to take it into account. Analytic observation, too, shows that the dream-work never limits itself to translating these thoughts in the archaic or regressive mode of expression known to you. Rather it regularly adds something which does not belong to the latent thoughts of waking, but which is the essential motive of

dream-formation. This indispensable ingredient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unconscious wish, for the fulfillment of which the dream content is rebuilt. The dream may be any conceivable thing, if you take into account only the thoughts represented by it, warning, resolution, preparation, etc.; it is also always the fulfillment of an unknown wish, and it is this only if you look upon it as the result of the dream-work. A dream is never itself a resolution, a warning, and no more—but always a resolution, etc., translated into an archaic form of express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unconscious wish, and changed about for the purpose of fulfilling this wish. The one characteristic, wish-fulfillment, is constant; the other may vary; it may itself be a wish at times, so that the dream, with the aid of an unconscious wish, presents as fulfilled a latent wish out of waking hours.

梦的唯一要件，是对隐意材料施加影响力的梦的工作。即便我们在实际情况中可能没有考虑它，但在理论上，我们没有理由忽略它。研究分析同样指出，梦的工作从未局限于将隐意转换为大家知道的原始或退行性表达模式。它反而经常会添加一些东西，它们不属于清醒时的隐意，但也是梦形成的关键动机。这个不可或缺的成分同时也是潜意识愿望，梦的重建也就是为了满足这一愿望。梦可以是任何可想象的事物，如果只考虑它所体现的隐意，就可以有警示、决心、准备等等；如果只把它看成梦的工作之结果，它也可以始终是一种未知愿望的实现。梦绝不会是一种决心、一种警示之类的——决心之类的东西总是借助于潜意识愿望，被翻译成原始的表达形式，并且为了实现此愿望而改头换面。愿望实现的特征是固定不变的，另一特征可能会变化，它有时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愿望，因而梦在一种潜意识愿望的帮助下，表现为实现了一种清醒时的隐愿。

I understand all this very well, but I do not know whether or

not I shall be successful in making you understand it as well. I have difficulties, too, in proving it to you. This cannot be done without, on the one hand, careful analysis of many dream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is most difficult and most important point of our conception of the dream cannot be set forth convincingly without reference to things to follow. Can you, in fact, believe tha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of all things, one is able to penetrate deeply into the nature of one thing without having carefully considered other things of a very similar nature? Since we know nothing as yet about the closest relatives of the dream, neurotic symptoms, we must once again content ourselves with what has already been accomplished. I want to explain one more example to you, and propose a new viewpoint.

凡此种种，我已经理解得很透彻了，但不知是否能成功地向大家说明。要向大家证明这一点也是有难度的。一方面，不对许多梦进行缜密分析，无法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这是梦的概念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它必须参考一些连带内容才能具有说服力。考虑到一切事物都有着内在联系，如果不把其他性质类似的事物考虑周全，大家真的能够自认为可以深刻洞察一个事项的性质吗？由于对与梦最相关的神经症症状仍一无所知，我们只能再一次欣然接受现成的知识。我想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提出一个新观点。

Let us again take up that dream to which we have several times recurred, the dream of the three theatre tickets for 1 Fl. 50 Kr. I can assure you that I took this example quite unpremeditatedly at first. You are acquainted with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s: annoyance, upon hearing that her friend had just now become engaged, at the thought that she herself had hurried so to be married; contempt for her husband; the idea that she might have had a better one had she

waited. We also know the wish, which made a dream out of these thoughts—it is “curiosity to see,” being permitted to go to the theatre, very likely a derivation from the old curiosity finally to know just what happens when one is married. This curiosity, as is well known, regularly directs itself in the case of children to the sex-life of the parents. It is an impulse of childhood, and in so far as it persists later, an impulse whose roots reach back into the infantile. But that day's news played no part in awaking the curiosity, it awoke only annoyance and regret. This wish impulse did not have anything to do immediately with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s, and we could fit the result of the dream interpretation into the analysi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wish impulse at all. But then, the annoyance itself was not capable of producing the dream; a dream could not be derived from the thought: “It was stupid to marry so soon,” except by reviving the old wish finally to see what happens when one is married. The wish then formed the dream content, in that it replaced marriage by going to the theatre, and gave it the form of an earlier wish-fulfillment: “so now I may go to the theatre and see all the forbidden things, and you may not. I am married and you must wait.” In such a mann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was transposed into its opposite, an old triumph put into the place of the recent defeat. Added thereto was a satisfied curiosity amalgamated with a satisfied egoistic sense of rivalry. This satisfaction determines the manifest dream content in which she really is sitting in the theatre, and her friend was unable to get tickets. Those bits of dream content are affixed to this satisfaction situation as unfitting and inexplicable modifications, behind which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s still hide. Dream interpretation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everything that serves towar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wish-fulfillment and must reconstruct from these suggestions the painful latent dream-thought.

我们还是用那个举了很多次的例子，1个半弗罗林买3张戏票的梦。我保证，起先我举这个例子并无预谋。大家已经熟悉了其中梦的隐意：当听到好友刚订婚的消息，认为自己结婚过于匆忙时，感到了羞愤；看不起她丈夫；要是再等等会有更好的归宿。我们也知道梦的愿望，正是它通过这些隐意制造了梦——它就是“见世面的好奇心”，获得去剧院的自由，很可能是源自那个想了解婚后诸事的旧日好奇心。这一众所皆知的好奇心在孩子心里通常是针对父母的性生活而言。这是儿童的一种冲动，它即便在后来也有持续，其根源也可追溯至幼年。但那一天的消息并没有唤醒这个好奇心，它只唤醒了羞愤和遗憾。这个愿望冲动不直接与隐意相关，我们在释梦分析时根本无需考虑该愿望冲动。但另一方面，羞愤心情本身并不能造出梦，梦无法源自这个念头：“太早结婚很愚蠢。”除非复活那个想了解婚后生活的旧日愿望。这个愿望于是形成了梦的内容，它在其中将婚姻替代为去剧院，赋予其一个早期的愿望实现：“现在我可开了禁，能去剧院大饱眼福，而你不能。我结婚了，你还得等等。”这样，目前的状况就转化为其反面状态，用一个以前的胜利心态替代了最近的挫败感。随之油然而生的，是一种好奇心的满足，伴随着一种胜人一筹的虚荣心满足。这种满足决定了梦的显意，在其中她确实坐在了剧院中，而她的朋友却拿不到票。有些附着于该满足情境的显意是一些不相称的、费解的变更形式，它们背后依然隐藏着梦的隐意。释梦必须考虑所有表现该愿望实现的因素，根据该苦恼的隐意的提示进行重建。

The observation I now wish to make is for the purpose of drawing your attention to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s, now pushed to the fore. I beg of you not to forget first, that the dreamer is unconscious of them, second, they are entirely logical and continuous, so that they may be understood as a comprehensible reaction to the dream occasion, third, that they may have the value of any desired psychic impulse or intellectual operation. I shall now designate these thoughts more forcibly than before as “day-remnants”; the dreamer may acknowledge them or not. I now

separate day-remnants and latent dream thoughts in accordance with our previous usage of calling everything that we discover in interpreting the dream “latent dream thoughts,” while the day-remnants are only a part of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s. Then our conception goes to show that something additional has been added to the day-remnants, something which also belonged to the unconscious, a strong but suppressed wish impulse, and it is this alone that has made possible the dream fabric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is wish impulse on the day-remnants creates the further participation of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s, thoughts which no longer appear rational and understandable in relation to waking life.

我现在要做出以下评论，目的是为了使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到梦的隐意上，它们已经被推到台前。首先，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做梦者对它们并无觉察；第二，它们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连贯的，所以可以理解为对梦境的合理反应；第三，它们的价值可以与任何理想的心理冲动或智力活动相媲美。我现在要给隐意取一个比以前更有说服力的名字，叫作“白天的遗念”，做梦者可承认也可否认它们。我现在要将白天的遗念和梦的隐意区别开来，根据以往惯例，我们把释梦所发现的一切想法都称为“梦的隐意”，而白天的遗念则仅为隐意的一部分。于是，按照我们的观点，除白天的遗念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它们也属于潜意识，是一种强烈但被压抑的愿望冲动，仅因为此，才使得造梦成为可能。这一愿望冲动对白天的遗念的影响，使得隐意进一步参与进来，这些隐意与清醒时相比，不再显得合理而易懂。

In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day-remnants to the unconscious wish I have made use of a comparison which I can only repeat here. Every undertaking requires a capitalist, who defrays the expenses, and an entrepreneur, who has the idea and

understands how to carry it out. The role of the capitalist in the dream fabrication is always played by the unconscious wish; it dispenses the psychic energy for dream-building. The actual worker is the day-remnant, which determines how the expenditure is to be made. Now the capitalist may himself have the idea and the particularized knowledge, or the entrepreneur may have the capital. This simplifies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but makes its theoretical comprehension more difficult. In economics we always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capitalist and the entrepreneur aspect in a single person, and thus we reconstruct the fundamental situation which w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our comparison. In dream-fabrication the same variations occur. I shall leave their further development to you.

为了解释白天的遗念与潜意识愿望的关系，我打过一个比方，我只可在此重复一次。每一项事业都需要一位支付开销的金主，一位有想法、有执行力的企业家。造梦中的金主角色总是由潜意识愿望扮演的，它为梦的建造分配心理能量。实干家则是白天的遗念，它决定如何开支。现在，金主自己也可能有了想法和专业知识，或是企业家也可能有了资金。这使得实际情况得以简化，但是让理论复杂化了。在经济学中即使对一个人也要区分金主和企业家的职责，这样就能体现最根本的情况，这也是我们打这个比方的出发点。在造梦过程中也有同样的变动发生。我就把进一步发挥的任务交给大家了。

We can go no further here, for you have probably long been disturbed by a reflection which deserves to be heard. Are the day-remnants, you ask, really unconscious in the same sense as the unconscious wish which is essential to making them suitable for the dream? You discern correctly. Here lies the salient point of the whole affair. They are not unconscious in the same sense. The

dream wish belongs to a different unconsciousness, that which we have recognized as of infantile origin, fitted out with special mechanisms. It is entirely appropriate to separate these two types of unconsciousness and give them different designations. But let us rather wait until we have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he field of neurotic symptoms. If people say one unconsciousness is fantastic, what will they say when we acknowledge that we arrived at our conclusions by using two kinds of unconsciousness?

我们现在不能再深入下去了，因为大家也许早已被一个问题所困扰，想要一吐为快。大家会问，潜意识愿望是让白天的遗念适合于梦的关键因素，那么白天的遗念是否与潜意识愿望一样，是真正意义上的潜意识？大家的问题一针见血。这里出现了整件事的显要之处。它们不是同等意义上的潜意识。梦的愿望属于一种不同的潜意识，我们认为它源自幼儿期，具有特殊的机制。完全有必要将这两种潜意识区分开来，给予不同的命名。不过我们得等到熟悉了神经症症状领域再说这一点。一种潜意识已经够神奇的了，我们现在用两种潜意识得出了结论，岂不更妙？

Let us stop here. Once more you have heard something incomplete; but is there not hope in the thought that this science has a continuation which will be brought to light either by ourselves or by those to follow? And have not we ourselves discovered a sufficient number of new and surprising things?

我们就此打住吧。大家又听了些不尽完善的内容，但是，通过大家乃至后继者的努力，这个学科难道没有更上一层楼的希望吗？我们自己难道不是已经发现了足够多的新知和奇观了吗？

[10_1].I do not mention another obvious interpretation of this "3" in the case of this childless woman, because it is not material to this analysis.

[11_1].这里略去了一位无子女士例子中的“3”，因为它与这个问题无关。

Fifteenth Lecture　Doubtful Points and Criticism

第十五讲　疑点与批评

Let us not leave the subject of dreams before we have touched upon the most common doubts and uncertainties which have arise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new ideas and conceptions we have discussed up to this point. The more attentive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probably have already accumulated some material bearing upon this.

至此，我们已经探讨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概念，在结束梦的课题前，我们还要提一提相关的最常见的疑问和不确定之处。听众里的有心人大概已经积累了一些这类问题了。

1．You may have received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results of our work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eam have left so much that is uncertain, despite our close adherence to technique, that a true translation of the manifest dream into the latent dream thoughts is thereby rendered impossible. In support of this you will point out that in the first place, one never knows whether a specific element of the dream is to be taken literally or symbolically, since those elements which are used symbolically do not, because of that fact, cease to be themselves. But if one has no objective standard by which to decide this, the interpretation is, as to this point,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dream interpreter. Moreover, because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dream work combines opposites, it is always uncertain whether a specific dream element is to be taken in the

positive or the negative sense, whether it is to be understood as itself or as its opposite. Hence this is another opportunity for the exercise of the interpreter's discretion. In the third place, in consequence of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every sort of inversion is practised in the dream, the dream interpreter is at liberty to assume such an inversion at any point of the dream he pleases. And finally you will say, you have heard that one is seldom sure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which is found is the only possible one. There is danger of overlooking a thoroughly admissible seco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ame dream.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you will conclude there is a scope left for the discretion of the interpreter, the breadth of which seems incompatible with the objective accuracy of the results. Or you may also conclude that the fault does not rest with the dream but that the inadequacies of our dream interpretation result from errors in our conceptions and hypotheses.

1．大家可能会感到，释梦工作结论留下了很多不确定之处，尽管我们坚持了释梦技巧，但将显梦正确转译为隐意仍然不太可能。理由是：首先，对于梦的具体元素，我们并不知道该视作本意还是象征意义，这正是因为那些元素作为象征符号的同时并没有丢失本意。但如果没有客观评判标准，释梦就此而言只能取决于释梦者的判断力。其次，因为梦的工作糅合了正反两面，就具体梦元素而言，需视作积极抑还是消极意义，需理解为其本意还是反义，总是不确定的。因此释梦者又多了一个进行主观判断的理由。第三，梦中频繁发生各种倒置，其结果是，释梦者可将梦的任何部分自由裁决为倒置现象。最后，大家会说，听说释梦结果很少是唯一可能的答案。忽视同一个梦的第二种完全可能的释梦结果，是有风险的。在此情况下，大家会断言，释梦者的主观判断余地过宽，似乎无法保证释梦结论的客观正确性。或者，大家也会由此推断，错不在梦本身，而是我们的观念与假说中的谬误导致了释梦的缺陷。

All your material is irreproachable, but I do not believe that it justifies your conclusions in two directions, namely, that dream interpretation as we practice it is sacrificed to arbitrariness and that the deficiency of our results makes the justification of our method doubtful. If you will substitute for the arbitrariness of the interpreter, his skill, his experience, his comprehension, I agree with you. We shall surely not be able to dispense with some such personal factor, particularly not in difficult tasks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But this same state of affairs exists also in other scientific occupations. There is no way in which to make sure that one man will not wield a technique less well, or utilize it more fully, than another. What might, for example, impress you as arbitrarines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ymbols, is compensated for by the fact that as a rule the connection of the dream thoughts among themselves, the connection of the dream with the life of the dreamer, and the whole psychic situation in which the dream occurs, chooses just one of the possible interpretations advanced and rejects the others as useless for its purposes. The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e inadequacies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that our hypotheses are wrong, is weakened by an observation which shows that the ambiguity and indefiniteness of the dream is rather characteristic and necessarily to be expected.

大家的论据均无可厚非，但我不认为它们能支持大家的结论，其中错误观点有二，即：一，我们实践的释梦过于武断；二，释梦结论有缺陷，就意味着释梦方法合理性存疑。如果不说释梦者武断，而说他们缺乏技能、经验、理解力，我会同意大家的说法。我们当然不可能忽略这些个人因素，尤其是在困难的释梦任务中。但是此类情况同样也存在于其他科学事业中。根本无法确定一个人比另一人的技术操作能力更逊一筹、或更娴熟。比如，大家可能觉得象征意义的解释有

些武断，但如果大家看到了隐意间的普遍关联、梦与做梦者生活经历的关联，以及通过梦发生的心理状况，发现了一种更好的释梦可能，并舍弃其他意义不符的可能性，这样大家心理就平衡了。以释梦的缺陷判断我们假说之误的论调则不够有说服力，因为歧义性和不确定性本就是、而且必然是梦的特点。

Recollect that we said that the dream work translates the dream thoughts into primitive expressions analogous to picture writing. All these primitive systems of expression are, however, subject to such indefiniteness and ambiguities, but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we are justified in doubting their usefulness. You know that the fusion of opposites by the dream-work is analogous to the so-called “antithetical meaning of primitive words,” in the oldest languages. The philologist, R. Abel (1884), whom we have to thank for this point of view, admonishes us not to believe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communication which one person made to another when using such ambiguous words was necessarily unclear. Tone and gesture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ords would have left no room for doubt as to which of the two opposites the speaker intended to communicate. In writing, where gesture is lacking, it was replaced by a supplementary picture sign not intended to be spoken, as for example by the picture of a little man squatting lazily or standing erect,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ambiguous hieroglyphic was to mean “weak” or “strong.” It was in this way that one avoided any misunderstanding despite the ambiguity of the sounds and signs.

记住，我们说过，梦的工作将梦的隐意转换成了类似图形语言的原始表达方式。然而，所有这些原始表达体系也具有不确定性和歧义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理由质疑它们的作用。大家知道，梦的工

作对正反两面的混合，与远古语言中所谓“原始单词的矛盾语义”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要感谢语言学家阿伯尔的观点，他告诫我们，人在交谈中若用了有歧义的词语，谈话的意思未必不清楚。在说话时辅以语调和手势，说话者要表达的语义就不会有疑问了。在书写时虽缺乏手势，但会附加一个无言的图标，正如用懒散蹲坐或笔直站立的小人，赋予一个正反双义的象形字以“弱”或“强”的意义。这样，即使发音和字符有歧义，也不至于产生误解。

We recognize in the ancient systems of expression, e.g., the writings of those oldest languages, a number of uncertainties which we would not tolerate in our present-day writings. Thus in many Semitic writings only the consonants of words are indicated. The reader had to supply the omitted vowels according to his knowledge and the context. Hieroglyphic writing does not proceed in exactly this way, but quite similarly, and that is why the pronunciation of old Egyptian has remained unknown to us. The holy writings of the Egyptians contain still other uncertainties. For example, it is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writer whether or not he shall arrange the pictures from right to left or from left to right. To be able to read we have to follow the rule that we must depend upon the faces of the figures, birds, and the like. The writer, however, could also arrange the picture signs in vertical rows, and in inscriptions on small objects he was guided by considerations of beauty and proportion further to change the order of the signs. Probably the most confusing feature of hieroglyphic writing is to be found in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space between words. The pictures stretch over the page at uniform distances from one another, and generally one does not know whether a sign belongs to what has gone before or 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word. Persian cuneiform writing, on the other hand, makes use of an oblique wedge sign to separate the words.

我们在古老表达体系（如远古语言的书写）中发现了很多不确定的地方，这在现代写作中是无法容忍的。闪米特族文字只提示辅音字符。读者必须通过自己的知识和上下文推测省略的元音。象形文字写作并不完全一样，但很类似，因此我们至今都不知道古埃及文字的读音。古埃及人的经文中还有其他不确定的地方。比如，作者可随意决定从左至右、还是从右至左撰写象形字。要读懂内容，必须依据人脸、禽类之类的具体情况而定。而作者还可以垂直排列图标，在小物件上题词时，出于美观和比例上的考虑，还会调整图标顺序。象形文字最令人困惑的特点大概是，单词之间没有间隔。整个页面上画满等距的图标，无从判断一个图标是前词词尾还是新词开头。波斯的楔形文字则与之不同，它在每个单词间用斜楔间隔。

The Chinese tongue and script is exceedingly old, but still used by four hundred million people. Please do not think I understand anything about it. I have only informed myself concerning it because I hoped to find analogies to the indefinite aspects of the dream. Nor was I disappointed.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filled with so many vagaries that it strikes terror into our hearts. It consists, as is well known, of a number of syllable sounds which are spoken singly or are combined in twos. One of the chief dialects has about four hundred such sounds. Now since the vocabulary of this dialect is estimated at about four thousand words, it follows that every sound has on an average of ten different meanings, some less but others, consequently, more. Hence there are a great number of ways of avoiding a multiplicity of meaning, since one cannot guess from the context alone which of the ten meanings of the syllable sound the speaker intended to convey to the hearer. Among them are the combining of two sounds into a compounded word and the use of four different “tones” with which to utter these syllables. For our purposes of comparison, it is still more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is

language has practically no grammar.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of a one-syllable word whether it is a noun, a verb, or an adjective, and we find none of those changes in the forms of the words by means of which we might recognize sex, number, ending, tense or mood. The language, therefore, might be said to consist of raw material, much in the same manner as our thought language is broken up by the dream work into its raw materials when the expressions of relationship are left out. In the Chinese, in all cases of vagueness the decision is left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earer, who is guided by the context. I have secured an example of a Chinese saying which, literally translated, reads: “Little to be seen, much to wonder at.” That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t may mean, “The less a man has seen, the more he finds to wonder at,” or, “There is much to admire for the man who has seen little.” Naturally, there is no need to choose between these two translations, which differ only in grammar. Despite these uncertainties, we are assured,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an extraordinarily excellent medium for the expression of thought. Vagueness does not, therefore, necessarily lead to ambiguity.

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极为古老，但现在仍为4亿人使用（译者注：这是当时的中国人口数）。别以为我懂中文。我只是为证明梦的不确定性找到些类比，才稍微了解了一下。我并未失望。中文之变化多端令人震惊。大家知道，中文字多发单音或双音的音节。其中一个主要方言有大约400种发音。中文约有4000个字，平均每种发音就有10种不同的意思，其中有些少点，有些则更多了。由于听者无法仅凭上下文揣测一个发音的10种意思中哪个是说话者要传达的意思，于是中文采用了不少避免歧义的做法。其中有组字成词、四声变化等。耐人寻味的是，比较而言，中文实际上无语法可言。无法判断一个单音字是名词、动词或形容词，也没有词形变化以判断性别、单复数、词尾、时态或语态。因而，中文可谓仍由原材料组成，正如我们的隐意语言

被梦的工作分解为原材料，而不体现关联性。中文所有语义模糊的情况，均由听者根据谈话内容自行理解。我发现一个中国俗语“少见多怪”。这不难理解。它的意思可以是：“见得少，则奇怪的事情多”，也可以是：“见识少者总是大惊小怪”。当然，这两种解释只是句式不同而已，无需两者必择其一。我们可以肯定，尽管中文有诸多不确定性，它仍不失为一种极为出色的思想表达工具。所以语义模糊未必会产生歧义。

Now we must certainly admit that the condition of affairs is far less favorable in the expression-system of the dream than in these ancient languages and writings. For, after all, these latter are really designed for communication, that is to say, they were always intended to be understood, no matter in what way and with what aids. But it is just this characteristic which the dream lacks. The dream does not want to tell anyone anything, it is no vehicle of communication, it is, on the contrary, constructed so as not to be understood. For that reason we must not be surprised or misled if we should discover that a number of the ambiguities and vagaries of the dream do not permit of determination. As the one specific gain of our comparison, we have only the realization that such uncertainties as people tried to make use of in objecting to the validity of our dream interpretation, are rather the invariable characteristic of all primitive systems of expression.

现在必须认识到，梦的表述方法比起古老语言文字来，情况要不利得多。因为后者毕竟是为交流而设计的，就是说，无论用何种方式方法，它们始终是为了方便理解。但这个特点恰是梦所缺乏的。梦不想告诉任何人任何事，它不是交流工具，相反地，它的本意就是使人难以理解。因此，要是发现梦的多意性和多变性使其无法得到确认，我们无需惊讶或误会。因为我们在对比之后有一具体发现，即：人们

否定释梦的有效性是因其不确定性，这其实是所有原始表达体系的固有特征。

How far the dream can really be understood can be determined only by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My opinion is, that that is very far indeed, and the comparison of results which correctly trained analysts have gathered confirms my view. The lay public, even that part of the lay public which is interested in science, likes, in the face of the difficulties and uncertainties of a scientific task, to make what I consider an unjust show of its superior scepticism. Perhaps not all of you are acquainted with the fact that a similar situation aros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ciphering of the Babylonian–Assyrian inscriptions. There was a period then when public opinion went far in declaring the decipherors of cuneiform writing to be visionaries and the whole research a “fraud.” But in the year 1857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made a decisive test. It challenged the four most distinguished decipherors of cuneiform writing, Rawlinson, Hincks, Fox Talbot and Oppert, each to send to it in a sealed envelope his independent translation of a newly discovered inscription, and the Society was then able to testify, after having made a comparison of the four readings, that their agreement was sufficiently marked to justify confidence in what already had been accomplished, and faith in further progress. At this the mockery of the learned lay world gradually came to an end and the confidence in the reading of cuneiform documents has grown appreciably since then.

对梦的理解程度只能由实践和经验决定。我的意见是，实际上可以理解得很深刻，有些释梦结果成了分析师的正确教材，将它们进行比较，也证明了我的看法。外行的公众，特别是那些爱好科学的外行公众，是愿意看到科学任务存在难点和不确定性的，这样就可以进行

我所说的不公正批判，以示其见识高深。大家大概并不都知道，在破解亚述和巴比伦碑文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有一段时间，公共舆论过度指摘楔形文字破解者胡编乱造，称整个研究是场“欺骗”。但在1857年，皇家亚洲学会进行了一次裁决测试。它向四位最优秀的楔形文字破解专家罗林森、欣克斯、福克斯·塔尔博特和奥坡特提出挑战，要求每一位以密封文件的形式提交自己对新发现碑文的独立翻译，这样该学会就能通过对比四人的解读，证实他们的一致性颇为显著，足以认可已完成的工作，也可信任后续工作开展。这一下，那些有学问的外行人渐渐地不再发出讥讽之声，楔形文字档案的解读至此得到普遍认可。

2．A second series of objections is firmly grounded in the impression from which you too probably are not free, that a number of the solutions of dream interpretations which we find it necessary to make seem forced, artificial, far-fetched, in other words, violent or even comical or jocose. These comments are so frequent that I shall choose at random the latest example which has come to my attention. Recently, in free Switzerland, the director of a boarding-school was relieved of his position on account of his active interest in psychoanalysis. He raised objections and a Berne newspaper made public the judgment of the school authorities. I quote from that article some sentences which apply to psychoanalysis: “Moreover, we are surprised at the many far-fetched and artificial examples as found in the aforementioned book of Dr. Pfister of Zurich…. Thus, it certainly is a cause of surprise when the director of a boarding-school so uncritically accepts all these assertions and apparent proofs.” These observations are offered as the decisions of “one who judges calmly.” I rather think this calm is “artificial.” Let us examine these remarks more closely in the hope that a little reflection and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can be no detriment to calm judgment.

2．第二类反对意见与某种偏见紧密相连，大家也未必没有这种怀疑，这就是，很多我们认为必要的释梦结论似乎牵强、造作和生硬，换言之，是硬凑的、甚至是滑稽可笑的。这些言论层出不穷，我可随手举出想到的最新例子。最近，在所谓自由的瑞士，一位寄宿学校的校长因为积极关注精神分析而遭到解职。他提出了异议，而伯尔尼一家报纸则发表了学校官方的意见。我从那篇文章中引用几句评论精神分析的话："而且，前述苏黎世的菲斯特博士的著作中所举例子多牵强附会与凭空捏造，令我辈殊为惊讶……因此，一位寄宿学校的校长竟如此不加批判地接受所有这些妄论与肤浅论据，不禁使人愕然。"这些观点是那些"冷静思考者"的结论。我倒认为这种冷静是"捏造的"。我们再仔细地检视一下这些言论，希望关于该话题的一点点反思与认识不会伤害到冷静思考。

It is positively refreshing to see how quickly and unerringly some individuals can judge a delicate question of abstruse psychology by first impressions. The interpretations seem to them far-fetched and forced, they do not please them, so the interpretations are wrong and the whole business of interpretation amounts to nothing. No fleeting thought ever brushes the other possibility that these interpretations must appear as they are for good reasons, which would give rise to the further question of what these good reasons might be.

有些人凭第一印象就对深奥心理学一个微妙问题迅速做出精准判词，见此情形，我们何其欢欣鼓舞。于他们而言，释梦牵强而生硬，因而厌弃它们，因而释梦是错误的，整个释梦法都是无用功。这些敏锐心灵从未想到过另一种可能，即，这些释梦如此表现是有充分理由的，而这些理由便是下一个问题。

The content thus judged generally relates to the results of displacement, with which you have become acquainted as the strongest device of the dream censor. It is with the help of displacements that the dream censor creates substitute-formations which we have designated as allusions. But they are allusions which are not easily recognized as such, and from which it is not easy to find one's way back to the original and which are connected with this original by means of the strangest, most unusual, most superficial associations. In all of these cases, however, it is a question of matters which are to be hidden, which were intended for concealment; this is what the dream censor aims to do. We must not expect to find a thing that has been concealed in its accustomed place in the spot where it belongs. In this respect the Commissions for the Surveillance of Frontiers now in office are more cunning than the Swiss school authorities. In their search for documents and maps they are not content to search through portfolios and letter cases but they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ssibility that spies and smugglers might carry such severely proscribed articles in the most concealed parts of their clothing, where they certainly do not belong, as for example between the double soles of their boots. If the concealed objects are found in such a place, they certainly are very far-fetched, but nevertheless they have been “fetched.”

批判的内容大多与移置的结果有关，大家知道它是梦的审查的最强手法。借助于倒置，梦的审查制造了替代形式，我们称为暗喻。但它们不是那么容易辨认的暗喻，它们与原意之间的关联隔着一些最奇怪、最异常、最肤浅的联想，因此通过它们是不容易发现原意的。然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关于哪些要隐藏、怎样去隐瞒的问题，这是梦的工作之目标任务。我们一定不要指望某件事就藏在常见的、本该待着的地点。在这方面，前线监察委员会就比那个瑞士学校校方明智得多。他们在搜查文件和地图时，没有满足于搜索文件夹和信件夹，

而是也考虑到间谍和走私犯会在衣物最隐秘处（比如鞋底夹层中）夹带严禁文件，它们肯定不该放在这些地方。如果隐藏的物件在这种地方查到，它们当然是生拉硬扯出来的，可它们总归是被“扯”出来了。

If we recognize that the most remote, the most extraordinary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latent dream element and its manifest substitute are possible, associations appearing ofttimes comical, ofttimes witty, we follow in so doing a wealth of experience derived from examples whose solutions we have, as a rule, not found ourselves. Often it is not possible to give such interpretations from our own examples. No sane person could guess the requisite association. The dreamer either gives us the translation with one stroke by means of his immediate association—he can do this, for this substitute formation was created by his mind—or he provides us with so much material that the solution no longer demands any special astuteness but forces itself upon us as inevitable. If the dreamer does not help us in either of these two ways, then indeed the manifest element in question remains forever incomprehensible to us. Allow me to give you one more such example of recent occurrence. One of my patients lost her father during the time that she was undergoing treatment. Since then she has made use of every opportunity to bring him back to life in her dreams. In one of her dreams her father appears in a certain connection, of no further importance here, and says, “*It is a quarter past eleven, it is half past eleven, it is quarter of twelve* .” All she can think of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urious incident is the recollection that her father liked to see his grown-up children appear punctually at the general meal hour. That very thing probably had some connection with the dream element, but permitted of no conclusion as to its source. Judging from the situation of the treatment at that time, there was a justified suspicion that a carefully suppressed critical rebellion

against her loved and respected father played its part in this dream. Continuing her associations, and apparently far afield from topics relevant to the dream, the dreamer relates that yesterday many things of a psychological nature had been discussed in her presence, and that a relative made the remark: “The cave man (*Urmensch*) continues to live in all of us.” Now we think we understand. That gave her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of picturing her father as continuing to live. So in the dream she made of him a clockman (*Uhrmensch*) by having him announce the quarter-hours at noon time.

如果我们认识到，隐梦元素及其显梦替代品之间可能存在最遥远、最不寻常的联想，是一些时而显得滑稽、时而显得诙谐的联想，我们一般无法自行找到解释的例子，要依靠大量的经验。从我们自身的例子中常常不可能得到这些解释。理智者不会去揣度这个必要的联想。做梦者要么通过即时联想一次性给予我们解释(他们能做到，因为这个替代形式是他们的大脑制造的),要么给我们提供大量素材，这样，无需特别的智慧，答案必然会显现在我们眼前。如果做梦者不提供任一种协助，我们就永远解释不了该显梦元素。我再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事例。我的一位病人在接受治疗期间失去了她的父亲。自此之后，她就在梦中尽一切可能使他复活。在她的一个梦里，她的父亲以某种形式（形式本身不重要）出现并说道：“11点一刻了，11点半了，11点三刻了。 ”她能想到与这个奇怪场景的关联是关于父亲希望他的成年孩子们准点吃饭的回忆。正是这件事与该梦元素有了关联，但从这个资料并不能得出什么结论。从当时的治疗情况判断，一个合理推测是，她对敬爱的父亲有一种小心压抑了的逆反心理，这在梦中起到了作用。做梦者继续联想，显然与梦离题太远了，她讲述道，昨天有人当着她的面讨论很多心理学问题，有位亲戚评论道：“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原始人 （Urmensch）。”这样答案就揭晓了。这话给了她一个想象父亲复活的绝佳机会。因而在梦中她把他当成了中午逢刻唱钟的报时人 （Uhrmensch）。

You may not be able to disregard the similarity which this examples bears to a pun, and it really has happened frequently that the dreamer's pun is attributed to the interpreter. There are still other examples in which it is not at all easy to decide whether one is dealing with a joke or a dream. But you will recall that the same doubt confronted us when we were dealing with slips of the tongue. A man tells us a dream of his, that his uncle, while they were sitting in the latter's *auto* mobile, gave him a kiss. He very quickly supplies the interpretation himself. It means "*auto* -eroticism," (a term taken from the study of the libido, or love impulse, and designating satisfaction of that impulse without an external object). Did this man permit himself to make fun of us and give out as a dream a pun that occurred to him? I do not believe so; he really dreamed it. Whence comes the astounding similarity? This question at one time led me quite a ways from my path, by making it necessary for me to mak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blem of humor itself. By so doing I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origin of wit lies in a foreconscious train of thought which is left for a moment to unconscious manipulation, from which it then emerges as a jok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unconscious it experiences the workings of the mechanisms there in force, namely, of condensation and displacement, that is, of the same processes which we found active in the dream work, and it is to this agreement that we are to ascrib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wit and the dream, wherever it occurs. The unintentional "dream joke" has, however, none of the pleasure-giving quality of the ordinary joke. Why that is so, greater penetration into the study of wit may teach you. The "dream joke" seems a poor joke to us, it does not make us laugh, it leaves us cold.

不可忽视这个例子中类似于双关语的现象，其实，做梦者的双关

语常常是释梦者的功劳。还有一些例子不太容易辨别是梦还是笑话。但大家记住，我们研究口误时也面临过同样疑问。一个男子告诉我们，他梦到自己坐在叔叔的汽车 （automobile）里时，叔叔亲了他一下。他马上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它意味着“自淫”（auto-eroticism，这是力比多或性冲动研究的一个术语，意为不借助外物获得性满足）。这个人是假借双关语编了个梦，存心作弄我们吗？我认为不是，他确实做过此梦。那这种惊人相似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曾经让我多费了些功夫，对幽默本身进行了透彻研究。由此我断定，诙谐源自于一系列的前意识思维（译者注：前意识是指能够提前预知他人或自己事态的发生及后果的意识），它暂时由潜意识操控，然后形成了一个笑话。被潜意识影响时，它也受到其中机制的作用，即凝缩和移置，也就是同样在梦的工作中活跃的过程，就是因为这个相同点，诙谐和梦，无论发生于何处，都是有相似性的。不过，无意造就的“梦的笑话”可没有一般笑话的那种搞笑性。为何如此，只需深入探究诙谐的原理便知。“梦的笑话”在我们看来只是个冷笑话，它不好笑，而只会让人发冷。

Here we are also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ancient dream interpretation, which has left us, in addition to much that is useless, many a good example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we ourselves cannot surpass. I am now going to tell you a dream of historical importance which Plutarch and Artemidorus of Daldis both tell concerning Alexander the Great, with certain variations. When the King was engaged in besieging the city of Tyre (322 B.C.), which was being stubbornly defended, he once dreamed that he saw a dancing satyr. Aristandros, his dream interpreter, who accompanied the army, interpreted this dream for him by making of the word *Satyros* , [Greek] sa Turos, “Thine is Tyre,” and thus promising him a triumph over the city. Alexander allowed himself to be influenced by this interpretation to continue the siege, and finally captured Tyre. The interpretation, which seems artificial enough, was

without doubt the correct one.

我们现在也正遵循着古代解梦的足迹，它们虽然有不少无用之处，但也有大量我们无法超越的优秀例子。我现在以一个历史上很重要的梦为例，它是普鲁塔克和道尔迪斯的阿尔特密多斯两人讲述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梦，两个版本有所不同。公元前322年，亚历山大攻打推罗城遭到顽强抵抗，他有一天梦见一个森林之神在跳舞。军中的释梦人阿里斯坦多拉斯把森林之神的希腊语单词“Satyros”分解成“sa Turos”，意为“推罗城是你的。”（Thine is Tyre.）这就象征了攻城的胜利。亚历山大受到释梦的鼓舞继续围城，最终攻占了推罗城。看似捏造的释梦，无疑却是正确的。

3．I can imagine that it will make a special impression on you to hear that objections to our conception of the dream have been raised also by persons who, as psychoanalysts, have themselves been interest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t would have been too extraordinary if so pregnant an opportunity for new errors had remained unutilized, and thus, owing to comprehensible confusions and unjustified generalizations, there have been assertions made which, in point of incorrectness are not far behind the medical conception of dreams. One of these you already know. It is the declaration that the dream is occupied with the dreamer's attempts at adaptation to his present environment, and attempts to solve future problems, in other words, that the dream follows a “prospective tendency” (A. Maeder). We have already shown that this assertion is based upon a confusion of the dream with the latent thoughts of the dream, that as a premise it overlooks the existence of the dream-work. In characterizing that psychic activity which is unconscious and to which the latent thoughts of the dream belong, the above assertion is no novelty, nor is it exhaustive, for this

unconscious psychic activity occupies itself with many other things besides preparation for the future. A much worse confusion seems to underlie the assurance that back of every dream one finds the “death-clause,” or death-wish. I am not quite certain what this formula is meant to indicate, but I suppose that back of it is a confusion of the dream with the whole personality of the dreamer.

3．如果大家得知，对我们释梦理论持有异议的人中也包括本身关注释梦的一些精神分析学者，可以想见大家会很意外。人是一有机会就会犯错的，这倒不足为奇，因而，由于理解混乱和归纳失准，有人提出了一些主张，其谬误性质不亚于医学界关于梦的观念。其中一点大家都知道了。该论调宣称，梦代表了做梦者力图改变现状、解决潜在问题的努力，换言之，如梅德所言，梦具有“预知倾向”。我们已经证明，这个主张混淆了梦与梦的隐意的概念，它的前提是忽略梦的工作。这种心理活动属于潜意识和梦的隐意，上述论调在对它的定性上并无新意，也没有阐述完整，因为潜意识心理活动除了预见未来之外还从事了很多其他事情。还有一种断言似乎更显混乱，据说在每个梦里都能发现“死亡条款”抑或要人死的愿望。我不太确定这个推论的意义何在，但我猜想它是把梦和做梦者的人格给混淆了。

An unjustified generalization, based on few good examples, is the pronouncement that every dream permits of two interpretations, one such as we have explained, the so-called psychoanalytic, and another, the so-called anagogical or mystical, which ignores the instinctive impulses and aims at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higher psychic functions (V. Silberer). There are such dreams, but you will try in vain to extend this conception to even a majority of the dreams. But after everything you have heard, the statement will seem very incomprehensible that all dreams can be interpreted bisexually, that is, as the concurrence of two tendencies which may

be designated as male and female (A. Adler). To be sure, there are a few such dreams, and you may learn later that these are built up in the manner of certain hysterical symptoms. I mention all these newly discovered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eam in order to warn you against them or at least in order not to leave you in doubt as to how I judge them.

有一种主张，只对少数例子进行了不合理的归纳，然后就宣称每个梦均可有两种解释，一个是我们讲的所谓精神分析的解释，而另一个是希尔贝雷所谓潜因或玄义解释，也就是不考虑本能冲动，致力于表现高级的心理机能。这种梦确实是有的，但是要把这个观点推及大多数梦，就是枉费心机。阿德勒认为所有梦都可以分别以两性解释，也就是梦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这两种倾向，这个言论就大家目前的知识而言，似乎太令人费解了。诚然，这种梦是有一些的，以后大家会知道它们是由某些癔症症状引起的。我提出这些所谓梦的基本特征的新发现，是为了提醒大家抵制它们，至少不要怀疑我对它们的判断。

4．At one time the objective value of dream research was called into question by the observation that patients undergoing analysis accommodate the content of their dreams to the favorite theories of their physicians, so that some dream predominantly of sexual impulses, others of the desire for power and still others even of rebirth (W. Stekel). The weight of this observation is diminished by the consideration that people dreamed before there was such a thing as a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to influence their dreams, and that those who are now undergoing treatment were also in the habit of dreaming before the treatment was commenced. The meaning of this novel discovery can soon be recognized as a matter of course and as of no consequence for the theory of the dream. Those day-remnants which give rise to the dream are the overflow from the

strong interest of the waking life. If the remarks of the physician and the stimuli which he gives have become significant to the patient under analysis, then they become a part of the day's remnants, can serve as psychic stimuli for the formation of a dream along with other, emotionally-charged, unsolved interests of the day, and operate much as do the somatic stimuli which act upon the sleeper during his sleep. Just like these other incitors of the dream, the sequence of ideas which the physician sets in motion may appear in the manifest content, or may be traced in the latent content of the dream. Indeed, we know that one can produce dreams experimentally, or to speak more accurately, one can insert into the dream a part of the dream material. Thus the analyst in influencing his patients, merely plays the role of an experimenter in the manner of Mourly Vold, who places the limbs of his subjects in certain positions.

4．斯特克尔曾经对释梦研究的客观价值提出质疑，因为据观察，接受分析的病人会调整梦的内容以迎合主治医生的趣味，所以有些梦主要是关于性冲动的，有的则是关于权力欲，还有一些甚至是关于重生的。这个观察结论的意义有限，原因在于：人们做梦之前并未受到所谓精神分析治疗的影响，现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仍会保持治疗前的做梦习性。这种新发现也许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它与梦的理论确实毫不相干。引发梦的那些白天的遗念是清醒生活主要关注点的残留物。如果医生的话语和他们诱发的刺激对于被分析的病患产生了重要影响，那它们就成为了白天遗念的一部分，可以和其他白天热切期待、但未获得满足的关注点一起，作为一种造梦的心理刺激，而且其作用与搅扰睡眠的刺激如出一辙。和梦的其他诱导因素一样，医生灌输的一些想法可能会出现在显梦中，或在隐意中有所流露。实际上，我们知道，梦是可以通过实验诱发的，或更确切地说，在梦中可以人为地插入一部分材料。这样，影响病患的分析师只是扮演了实验者的角色，就像莫里·沃德摆弄研究对象四肢的姿势一样。

One can often influence the dreamer as to the *subject-matter* of his dream, but one can never influence *what he will dream* about it. The mechanism of the dream-work and the unconscious wish that is hidden in the dream are beyond the reach of all foreign influences. We already realized, when we evaluated the dreams caused by bodily stimuli, that the peculiarity and self-sufficiency of the dream life shows itself in the reaction with which the dream retorts to the bodily or physical stimuli which are presented. The statement here discussed, which aims to throw doubt upon the objectivity of dream research, is again based on a confusion—this time of the whole dream with the dream material.

我们通常可以影响做梦者梦的主题事项 ，但决不会影响到他们做梦的方式 。梦的工作原理和梦中隐藏的潜意识愿望是任何外在力量都无法左右的。我们在评估身体刺激所引发的梦时已经知道，梦会对出现的身体或生理刺激进行反击，这个反应说明了梦的生活的独特性和独立性。这里讨论的观点试图质疑梦的研究的客观性，它还是一种概念混淆——这次是把整个梦和梦的材料混为一谈了。

This much,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anted to tell you concerning the problems of the dream. You will suspect that I have omitted a great deal, and have yourselves discovered that I had to be inconclusive on almost all points. But that is due to the relation which the phenomena of the dream have to those of the neuroses. We studied the dream by way of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neuroses, and that was surely more correct than the reverse would have been. But just as the dream prepares u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euroses, so in turn the correct evaluation of the dream can only be gained after a knowledge of neurotic phenomena has been

won.

女士们、先生们，关于梦的问题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大家会怀疑我略去了很多点，而且发现我对所讲的每一点几乎都是点到为止。但这是由于，梦的现象与神经症现象有相关性。我们研究梦是为了引出神经症研究，这肯定远远比两者倒换的结果更为准确。但恰恰因为梦的研究是理解神经症的准备工作，反过来，只有在获得神经症知识后，才能正确地评价梦。

I do not know what you will think about this, but I must assure you that I do not regret having taken so much of your interest and of your available time for the problems of the dream. There is no other field in which one can so quickly become convinced of the correctness of the assertions by which psychoanalysis stands or falls. It will take the strenuous labor of many months, even years, to show that the symptoms in a case of neurotic break-down have their meaning, serve a purpose, and result from the fortunes of the pati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efforts of a few hours suffice in proving the same content in a dream product which at first seems incomprehensibly confused, and thereby to confirm all the hypotheses of psychoanalysis, the unconsciousness of psychic processes, the special mechanism which they follow, and the motive forces which manifest themselves in them. And if we associate the thorough ana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ream and the neurotic symptom with the rapidity of transformation which makes of the dreamer an alert and reasonable individual, we gain the certainty that the neurosis also is based only on a change in the balance of the forces of psychic life.

不知道大家对此作何感想，但我必须保证，大家花这么多精力和时间研究梦的问题是不会有遗憾的。没有其他话题可以让我们如此快速地认识到精神分析赖以存亡的观点的正确性。要证明一个神经症的症状有其意义、目的，而且源于病者的生活经历，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艰辛努力。相反，梦的产物乍看之下似乎含混而难解，但只需花几个小时，就足以说明同样的问题，由此能确认精神分析的所有假说，即心理过程的潜意识性、它们所遵循的特殊机制、它们所显现出来的动机力量。梦的构造和神经症症状是极为相似的，我们若因此联想到，做梦者能迅速转变回敏锐而理智的个人，由此我们就能确信，神经症也仅仅是心理生活力量失衡的结果。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精神分析引论（下）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神经症通论

SIGMUND FREU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UBLISHING CO.

精神分析引论（下）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卢屹 译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Sixteenth Lecture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iatry 第十六讲　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
- Seventeenth Lecture　The Meaning of the Symptoms 第十七讲　症状的意义
- Eighteenth Lecture Traumatic Fixation—The Unconscious 第十八讲　创伤性执着——潜意识
- Nineteenth Lecture　Resistance and Suppression 第十九讲　抵抗与压抑
- Twentieth Lecture　The Sexual Life of Man 第二十讲　人类的性生活
- Twenty-First Lecture　Development of the Libido and Sexual Organizations 第二十一讲　力比多发展及性的组织
- Twenty-Second Lecture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Regression—Etiology 第二十二讲　发展与退化——病原
- Twenty-Third Lect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mptoms 第二十三讲　症状发展
- Twenty-Fourth Lecture　Ordinary Nervousness 第二十四讲　普通神经过敏
- Twenty-Fifth Lecture　Fear and Anxiety 第二十五讲　恐惧与焦虑
- Twenty-Sixth Lecture　The Libido Theory and Narcism 第二十六讲　力比多理论及自恋
- Twenty-Seventh Lecture Transference 第二十七讲　移情现象
- Twenty-Eighth Lecture Analytical Therapy 第二十八

讲　分析治疗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Sixteenth Lecture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iatry

第十六讲　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

I am very glad to welcome you back to continue our discussions. I last lectured to you on the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of errors and of the dream. Today I sh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an understanding of neurotic phenomena, which, as you soon will discover, have much in common with both of those topics. But I shall tell you in advance that I cannot leave you to take the same attitude toward me that you had before. At that time I was anxious to take no step without complete reference to your judgment. I discussed much with you, I listened to your objections, in short, I deferred to you and to your "normal common sense." That is no longer possible, and for a very simple reason. As phenomena, the dream and errors were not strange to you. One might say that you had as much experience as I, or that you could easily acquire as much. But neuroses are foreign to you; since you are not doctors yourselves you have had access to them only through what I have told you. Of what use is the best judgment if it is not supported by familiarity with the material in question?

很高兴看到大家回来继续参加我们的探讨。前面我讲了精神分析关于过失和梦的观点。现在开始，我要带领大家认识神经症现象。大家很快就会发现，它与前两个话题有很多共同点。不过我要提前声明，大家以前的听课态度需要改变。当时，我在每进一步之前总是会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经常与大家讨论，倾听异议，总之一句话，我尊重大家，并尊重各位的“普通常识”。这种情况不再可能了，原因很简单，大家对梦和过失这些现象已不再陌生。有人或许会说，大家

的经验并不比我少了，或者说这些经验可以轻易获得。但是神经症对于大家来说还是陌生的，因为大家不是医生，所以只能通过我的讲述来认识它们。如果对探讨的材料一无所知，判断力再好又有何用？

Do not, however, understand this as an announcement of dogmatic lectures which demand your unconditional belief. That would be a gross misunderstanding. I do not wish to convince you. I am out to stimulate your interest and shake your prejudices. If, in consequence of not knowing the facts, you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judge, neither should you believe nor condemn. Listen and allow yourselves to be influenced by what I tell you. One cannot be so easily convinced; at least if he comes by convictions without effort, they soon prove to be valueless and unable to hold their own. He only has a right to conviction who has handled the same material for many years and who in so doing has gone through the same new and surprising experiences again and again. Why, in matters of intellect these lightning conversions, these momentary repulsions? Do you not feel that a *coup de foudre* , that love at first sight, originates in quite a different field, namely, in that of the emotions? We do not even demand that our patients should become convinced of and predisposed to psychoanalysis. When they do, they seem suspicious to us. The attitude we prefer in them is one of benevolent scepticism. Will you not also try to let the psychoanalytic conception develop in your mind beside the popular or “psychiatric”? They will influence each other, mutually measure their strength, and some day work themselves into a decision on your part.

不过，不要以为我是在宣扬教条式授课理念，强求各位无条件地相信课堂内容。这样的话就是一大误会。我不希望大家盲从。我是想

激起大家的兴趣，摒弃成见。如果大家因不了解事实而无从判断，既不用相信，也不要加以指摘。大家只需听我讲授的内容，顺其自然地接受影响。人不可能轻易信服，至少毫不费力得到的信条很快就会被证明是毫无价值且站不住脚。只有多年研究同一课题，反复发现同样新奇现象的人，才有权利笃信某一观点。为什么在获取知识上，既有令人茅塞顿开的变化，又总是存在排斥呢？大家难道不觉得一见钟情只源于大不相同的领域，即情感世界吗？我们甚至不要求病人相信并偏爱精神分析。假使他们相信并存有偏爱，倒是值得我们怀疑了。我们提倡的态度是温和的怀疑主义。除了学习流行的、或“精神病学的”观点，大家是否也能让精神分析观在脑中顺势发展呢？它们会互相影响，互相衡量彼此的长短，总有一天会融合成你自己的观点。

On the other hand, you must not think for a moment that what I present to you as the psychoanalytic conception is a purely speculative system. Indeed, it is a sum total of experiences and observations, either their direct expression or their elaboration. Whether this elaboration is done adequately and whether the method is justifiable will be tested in the further progress of the science. After two and a half decades, now that I am fairly advanced in years, I may say that it was particularly difficult, intensive and all-absorbing work which yielded these observations. I have often had the impression that our opponents were unwilling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objective origin of our statements, as if they thought it were only a question of subjective ideas arising haphazard, ideas to which another may oppose his every passing whim. This antagonistic behavior is not entirely comprehensible to me. Perhaps the physician's habit of steering clear of his neurotic patients and listening so very casually to what they have to say allows him to lose sight of the possibility of deriving anything valuable from his patients' communications, and therefore, of making penetrating observations on them.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of

promising you that I shall carry on little controversy in the course of my lectures, least of all with individual controversialists. I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convince myself of the truth of the saying that controversy is the father of all things. I believe that it comes down to us from the Greek sophist philosophy and errs as does the latter through the overvaluation of dialectics. To me, on the contrary, it seems as if the so-called scientific criticism were on the whole unfruitful, quite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it is almost always carried on in a most personal spirit. For my part, up to a few years ago, I could even boast that I had entered into a regular scientific dispute with only one scholar (Lowenfeld, of Munich). The end of this was that we became friends and have remained friends to this day. But I did not repeat this attempt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I was not certain that the outcome would be the same.

另一方面，大家千万别以为，我跟大家所讲的精神分析观纯粹是一种推测的体系。实际上，精神分析是对实践和观察的总结，无论是直接结论，还是详细阐述，皆是如此。至于论述是否充分，方法是否得当，则要留待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予以证实。我从事研究25年之久，现在比各位虚长些年岁，我可以说，这是一项特别艰难、吃力、费神的研究，得到的就是这些观察结论。我常常感到，我们的反对者不愿意承认我们的主张有客观基础，似乎觉得它们只是些偶然冒出来的主观想法，是任何人都能随意抨击的。我觉得这种反对态度不难理解。或许，医生们习惯于冷落神经症病人，漫不经心地听他们的述说，因此目光短浅，不能利用与病人交流的机会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从他们身上获得深刻的洞察。我要借此机会承诺，我在今后的讲课中不会开展辩论，尤其是针对个人的辩论。我对“真理越辩越明”的说法向来不以为然。我觉得它的源泉是古希腊诡辩哲学，其错误就在于夸大了辩证法的作用。相反，于我而言，所谓的科学批评在整体上似乎是毫无建树的，更别说它几乎总是带有极度的个人成见。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几年之前，我还能吹嘘自己曾与慕尼黑的一位学者洛温

菲尔德进行了一场常规的科学论战。论战之后我们成了朋友，至今仍是。但我已许久不作此尝试了，因为我不确定是否会有同样的结果。

Now you will surely judge that so to reject the discussion of literature must evidence stubbornness, a very special obtuseness against objections, or, as the kindly colloquialisms of science have it, “a complete personal bias.” In answer, I would say that should you attain to a conviction by such hard labor, you would thereby derive a certain right to sustain it with some tenacity. Furthermore, I should like to emphasize the fact that I have modified my views on certain important points in the course of my researches, changed them and replaced them by new ones, and that I naturally made a public statement of that fact each time. What has been the result of this frankness? Some paid no attention at all to my self-corrections and even today criticize me for assertions which have long since ceased to have the same meaning for me. Others reproach me for just this deviation, and on account of it declare me unreliable. For is anyone who has changed his opinions several times still trustworthy; is not his latest assertion, as well, open to error? At the same time he who holds unswervingly to what he has once said, or cannot be made to give it up quickly enough, is called stubborn and biased. In the face of these contradictory criticisms, what else can one do but be himself and act according to his own dictates? That is what I have decided to do, and I will not allow myself to be restrained from modifying and adapting my theories as the progress of my experience demands. In the basic ideas I have hitherto found nothing to change, and I hope that such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case.

大家不免因为我抗拒科学探讨而怪我太顽固，听不进反对意见，

或者如一些客气的科学俗语所说，具有“彻头彻尾的个人偏见”。我会回答，如果大家通过艰苦努力获得了一种信条，你们也有权利坚决捍卫它。而且，我想强调的是，我在研究过程中已经就我的某些重要观点做了调整，对它们进行修正，代之以新的观点，而且我当然每次都会发表公开声明。这样开诚布公的结果是什么呢？有人根本无视我的自我改进，甚至今天还在指责一些我早就修改过的主张。另一些人则直接指责我朝令夕改，因此宣称我的理论很不可靠。有哪个人在数次修改观点之后还值得信任？其最新观点难道不也可能有弊端吗？与此同时，坚持己见、不轻易放弃之人，又被说成是顽固不化和偏执不公。面对这些自相矛盾的批评，除了相信自己、随心而动，还能如何？这就是我的决定，我不会让自己束手束脚，而是会随着经验积累，顺势修改、调整自己的理论。至今为止，我仍不认为基本概念有修改的必要，并希望一直如此。

Now I shall present to you the psychoanalytic conception of neurotic manifestations. The natural thing for me to do is to connect them to the phenomena we have previously treated, for the sake of their analogy as well as their contrast. I will select as symptomatic an act of frequent occurrence in my office hour. Of course, the analyst cannot do much for those who seek him in his medical capacity, and lay the woes of a lifetime before him in fifteen minutes. His deeper knowledge makes it difficult for him to deliver a snap decision as do other physicians—“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you”—and to give the advice, “Go to a watering-place for a while.” One of our colleagues, i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as to what he did with his office patients, said, shrugging his shoulders, that he simply “fines them so many kronen for their mischief-making.” So it will not surprise you to hear that even in the case of very busy analysts, the hours for consultation are not very crowded. I have had the ordinary door between my waiting room and my office doubled and strengthened by a covering of felt. The purpose

of this little arrangement cannot be doubted. Now it happens over and over again that people who are admitted from my waiting room omit to close the door behind them; in fact, they almost always leave both doors open. As soon as I have noticed this I insist rather gruffly that he or she go back in order to rectify the omission, even though it be an elegant gentleman or a lady in all her finery. This gives an impression of misapplied pedantry. I have, in fact, occasionally discredited myself by such a demand, since the individual concerned was one of those who cannot touch even a door knob, and prefer as well to have their attendants spared this contact. But most frequently I was right, for he who conducts himself in this way, and leaves the door from the waiting room into the physician's consultation room open, belongs to the rabble and deserves to be received inhospitably. Do not, I beg you, defend him until you have heard what follows. For the fact is that this negligence of the patient's only occurs when he has been alone in the waiting room and so leaves an empty room behind him, never when others, strangers, have been waiting with him. If that latter is the case, he knows very well that it is in his interest not to be listened to while he is talking to the physician, and never omits to close both the doors with care.

现在我给大家讲解精神分析学关于神经症症状的概念。顺理成章地，我要把它们跟我们以前研究过的现象进行对比，得出异同点。我举一个我工作时常见的症状性动作的例子。有些人当然是因分析师的医术慕名而来，想在15分钟内把一生苦水都倒给他们，分析师对这些病人是爱莫能助的。他们的见识更深刻，难以像其他医生那样作出轻率判断。其他医生可以说："你没什么毛病。"然后建议说："去水疗院吧。"我们的一位同事，在人家问他如何对待自己的咨询病人时，耸耸肩答道："他们做了坏事，要罚他们很多钱。"所以，即使最忙碌的精神分析师的咨询时间也不是很紧张，大家不要觉得奇怪。我的办公

室和候诊室间有两道门，铺了毛毡加固。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因为人们从候诊室走进来时会忘记关门，这事反复发生多次了，实际上他们几乎总是让两扇门都开着。一见此情景我总会不客气地请他们回去关门，不管对方是谦谦君子还是靓丽淑女。这给人以倨傲无礼的印象。其实，我有时会因为提这种要求而遭到非议，因为有些人连门把都不愿碰，甚至不乐意让佣人碰。但是我大多是对的，因为，从候诊室进医生咨询室时不关门，如此行事者是粗鄙无礼之辈，不配得到礼貌对待。大家别急着为这些人辩护，请听我往下说。因为病人的这种疏忽只会发生于候诊室中仅有其一个人的时候，本人离开后房间就空了；在候诊室中有其他陌生人时，这种情况从不会发生。如果有其他人，他们很清楚，在跟医生交流时不让旁人听到是为了自己好，所以从来不会忘记小心关上两道门。

This omission of the patient's is so predetermined that it becomes neither accidental nor meaningless, indeed, not even unimportant, for, as we shall see, it throws light upon the relation of this patient to the physician. He is one of the great number of those who seek authority, who want to be dazzled, intimidated. Perhaps he had inquired by telephone as to what time he had best call, he had prepared himself to come on a crowd of suppliants somewhat like those in front of a branch milk station. He now enters an empty waiting room which is, moreover, most modestly furnished, and he is disappointed. He must demand reparation from the physician for the wasted respect that he had tendered him, and so he omits to close the door between the reception room and the office. By this, he means to say to the physician: “Oh, well, there is no one here anyway, and probably no one will come as long as I am here.” He would also be quite unmannerly and supercilious during the consultation if his presumption were not at once restrained by a sharp reminder.

病人的疏忽是一种注定的行为，它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它甚至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它体现了病人与医生的关系。病人是那种迷信权威，希望被医生惊吓、震慑到的人。也许他们电话预约了咨询时间，做好心理准备要和一群求医者挤在一起，就像排队买牛奶的人群。现在他们却走进了一个空房间，而且里面装饰极为朴素，不免有些失望。他们对医生的仰慕之情难免受损，因而要寻求心理补偿，所以就不关上候诊室与办公室间的门。他们这么做等于是在跟医生说："哎，反正现在也没其他人，我在的时候估计也不会有人来。"除非这种想法被立刻严加遏制，他们在咨询过程时也会非常不客气、态度傲慢。

You will find nothing in the analysis of this little symptomatic act which was not previously known to you. That is to say, it asserts that this act is not accidental, but has a motive, a meaning, a purpose, that it has its assignable connections psychologically, and that it serves as a small indication of a more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process. But above all it implies that the process thus intimated is not known to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individual in whom it takes place, for none of the patients who left the two doors open would have admitted that they meant by this omission to show me their contempt. Some could probably recall a slight sense of disappointment at entering an empty waiting room, b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is impression and the symptomatic act which followed—of these, his consciousness was surely not aware.

在这个简单的症状性动作的分析中，没有什么是大家前所未闻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这种行为不是偶然的，是有动机、目的和意义的，有着不可忽视的心理原因，略微提示了一个更重要的心理过程。根本而言，它暗示着，如此隐秘的心理过程是本人未察觉的，因为无论哪个把两道门敞开着的病人都不会承认，这种疏忽显示了对我

的不屑。有些人可能会记得进入空无一人的候诊室时他们的些微失望感，但这种感觉和后来的症状性动作之间的关联，病人是肯定没有意识到的。

Now let us place, side by side with this small analysis of a symptomatic act, an observation on a pathological case. I choose one which is fresh in my mind and which can also be described with relative brevity. A certain measure of minuteness of detail is unavoidable in any such account.

现在我们把这个症状性动作分析，和一个病例放在一起做一个考察。我选了一个自己记忆犹新、也是相对简单的例子。讲述此类案例不免要考究细节。

A young officer, home on a short leave of absence, asked me to see his mother-in-law who, in spite of the happiest circumstances, was embittering her own and her people's existence by a senseless idea. I am introduced to a well preserved lady of fifty-three with pleasant, simple manners, who gives the following account without any hesitation: She is most happily married and lives in the country with her husband, who operates a large factory. She cannot say enough for the kind thoughtfulness of her husband. They had married for love thirty years ago, and since then there had never been a shadow, a quarrel or cause for jealousy. Now, even though her two children are well married, the husband and father does not yet want to retire, from a feeling of duty. A year ago there happened the incredible thing, incomprehensible to herself as well. She gave complete credence to an anonymous letter which accused her excellent husband of having an affair with a young girl—and

since then her happiness is destroyed. The more detailed circumstances were somewhat as follows: She had a chambermaid with whom she had perhaps too often discussed intimate matters. This girl pursued another young woman with positively malicious enmity because the latter had progressed so much further in life, despite the fact that she was of no better origin. Instead of going into domestic service, the girl had obtained a business training, had entered the factory and in consequence of the short-handedness due to the drafting of the clerks into the army had advanced to a good position. She now lives in the factory itself, meets all the gentlemen socially, and is even addressed as “Miss.” The girl who had remained behind in life was of course ready to speak all possible evil of her one-time schoolmate. One day our patient and her chambermaid were talking of an old gentleman who had been visiting at the house, and of whom it was known that he did not live with his wife, but kept another woman as his mistress. She does not know how it happened that she suddenly remarked, “That would be the most awful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to me, if I should ever hear that my good husband also had a mistress.” The next day she received an anonymous letter through the mail which, in a disguised handwriting, carried this very communication which she had conjured up. She concluded—it seems justifiably—that the letter was the handiwork of her malignant chambermaid, for the letter named as the husband's mistress the self-same woman whom the maid persecuted with her hatred. Our patient,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she immediately saw through the intrigue and had seen enough in her town to know how little credence such cowardly denunciations deserve, was nevertheless at once prostrated by the letter. She became dreadfully excited and promptly sent for her husband in order to heap the bitterest reproaches upon him. Her husband laughingly denied the accusation and did the best that could be done. He called in the family physician, who was as well

the doctor in attendance at the factory, and the latter added his efforts to quiet the unhappy woman. Their further procedure was also entirely reasonable. The chambermaid was dismissed, but the pretended rival was not. Since then, the patient claims she has repeatedly so far calmed herself as no longer to believe the contents of the anonymous letter, but this relief was neither thoroughgoing nor lasting. It was enough to hear the name of the young lady spoken or to meet her on the street in order to precipitate a new attack of suspicion, pain and reproach.

一位年轻军官回家短暂休假时，请我为其岳母看诊，她尽管生活美满，却有个愚蠢念头，令自己和家人不胜其烦。我见到的是位53岁的女士，保养得当，为人质朴可亲，她毫不犹豫地讲述了下面的情况：她的婚姻非常幸福，和丈夫一起生活在乡间，丈夫经营有一间大厂。她讲到丈夫的体贴疼爱很是意犹未尽。两人因相爱而结合已有30年，婚后从未有任何不快、吵闹，也未生一丝嫉妒。如今，虽说两个孩子都有了好的归宿，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他出于责任感还不想退休。一年前，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她自己对此也很困惑不解。她完全相信了一封指控她的完美老公与年轻姑娘偷情的匿名信——从此她的幸福毁于一旦。个中详情基本是这样的：她有一个女佣，两人经常无话不谈。这个女孩对另一个年轻女子心存敌意，因为后者虽然出身与她相似，生活却很是春风得意。她没有从事家政服务，而去参加了商业培训，进了工厂，后来由于职员应召入伍，工厂人手短缺，她晋升到一个待遇优良的职位。她现在住在工厂里，结识了所有男士，还被称作“小姐”。那位生活境遇落后的女孩自然会存心尽可能说她昔日同窗的坏话。一天，我们这位病人和她的女佣在聊一位曾经来访的老先生，大家知道他没有与夫人住在一起，而是包养了一位情妇。她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脱口而出道：“我要是出这种事，要是听说我的好老公也有一个情妇，就太惨了。”第二天她就收到一封邮寄来的匿名信，信中笔迹被改造过了，它就带来了她假想的那个消息。她推测——看来是合理推测——这封信是那位恶毒女佣的杰作，因为信里所

称她丈夫的情妇的名字跟这个女佣痛恨声讨的女子名字相同。我们的病人虽然一眼看出其中有诈，也因为看多了城中轶事，明白这种懦弱的检举不值得相信，但她还是当即被这封信击溃了。她大受刺激，立刻去找丈夫，对他大加责骂。她丈夫一笑置之，否认了指控，并尽力善后。他请来同时在工厂服务的家庭医生，医生也竭力平息此女的怒火。他们接下来的处理方法也很合理。他们解雇了女佣，然而却没有平息这场风波。自那以后，病人说，她已经反复令自己冷静下来，不再去相信匿名信的内容，却总也心神不宁。听到那位年轻姑娘的名字，或是在街上碰到她，就足以引发新一轮的猜忌、烦恼和责难。

This, now, is the case history of this good woman. It does not need much psychiatric experience to understand that her portrayal of her own case was, if anything, rather too mild in contrast to other nervous patients. The picture, we say, was dissimulated; in reality she had never overcome her belief in the accusation of the anonymous letter.

这就是这位好女人的病史了。不需要太多精神病学经验，便可知道，她对自己病情的讲述，可能比起其他神经症患者要轻描淡写得多。我们说，她的真实内心是被掩饰了，实际上她从不认为匿名信是捏造的。

Now what position does a psychiatrist take toward such a case? We already know what he would do in the case of the symptomatic act of the patient who does not close the doors to the waiting room. He declares it an accident without psychological interest, with which he need not concern himself. But this attitude cannot be maintained toward the pathological case of the jealous woman. The symptomatic act seems no great matter, but the symptom itself

claims attention by reason of its gravity. It is bound up with intense subjective suffering while objectively it threatens to break up a home; therefore its claim to psychiatric interest cannot be put aside. The first endeavor of the psychiatrist is to characterize the symptom by some distinctive feature. The idea with which this woman torments herself cannot in itself be called nonsensical, for it does happen that elderly married men have affairs with young girls. But there is something else about it that is nonsensical and incredible. The patient has no reason beyond the declaration in the anonymous letter to believe that her tender and faithful husband belongs to this sort of married men, otherwise not uncommon. She knows that this letter in itself carries no proof; she can satisfactorily explain its origin; therefore she ought to be able to persuade herself that she has no reason to be jealous. Indeed she does this, but in spite of it she suffers every bit as much as she would if she acknowledged this jealousy as fully justified. We are agreed to call ideas of this sort, which are inaccessible to arguments based on logic or on facts, "*obsessions* ." Thus the good lady suffers from an "*obsession of jealousy* " that is surely a distinctive characterization for this pathological case.

此时，一个精神病医生对这样的病例会采取何种态度？我们已经知道医生对待病人不随手关门的症状性动作会是什么态度。他们会觉得这是个无关心理的偶然事件，对此并不关心。但这种态度不能继续用在这位吃醋女子的病例上。症状性动作看似无关紧要，但是这个症状本身却因其严重性需要引起注意。它伴随着主观上的强烈痛楚，客观上也有导致家庭破裂的危险，所以精神病医生不得不予以关注。精神病医生的第一个措施是用显要特征对症状进行定性。此女折磨自己的念头本身不能算胡思乱想，因为年长的已婚男士与年轻女孩发生婚外情的事情确实是有的。但这个念头另有胡思乱想和不可思议之处。除了那份匿名信的指控，病人没有理由相信她温良忠实的老公也是那

种已婚出轨男，虽说此事也并不少见。她知道这封信毫无依据，不能自圆其说，因而她本该能说服自己不再起妒心。事实上她也这么做了，但无论如何，她还是满心苦恼，仿佛这种妒忌完全是合理的。对于这种无法接受有逻辑或事实依据的观点的症状，大家一致称之为“妄想症”。这位好女人的苦恼源自一种“嫉妒妄想”，在此病例中，这种妄想就是病症的显要特征。

Having reached this first certainty, our psychiatric interest will have become aroused. If we cannot do away with a delusion by taking reality into account, it can hardly have arisen from reality. But the delusion, what is its origin? There are delusions of the most widely varied content. Why is it that in our case the content should be jealousy? In what types of persons are obsessions liable to occur, and, in particular, obsessions of jealousy? We would like to turn to the psychiatrist with such questions, but here he leaves us in the lurch. There is only one of our queries which he heeds. He will examine the family history of this woman and *perhaps* will give us the answer: “The people who develop obsessions are those in whose families similar and other psychic disturbances have repeatedly occurred.” In other words, if this lady develops an obsession she does so because she was predisposed to it by reason of her heredity. That is certainly something, but is it all that we want to know? Is it all that was effective in causing this breakdown? Shall we be content to assume that it is immaterial, accidental and inexplicable why the obsession of jealousy develops rather than any other? And may we also accept this sentence about the dominance of the influence of heredity in its negative meaning, that is, that no matter what experiences came to this human being she was predestined to develop some kind of obsession? You will want to know why scientific psychiatry will give no further explanation. And I reply, “He is a rascal who gives more than he owns.” The psychiatrist does

not know of any path that leads him further in the explanation of such a case. He must content himself with the diagnosis and a prognosis which, despite a wealth of experience, is uncertain.

确认了第一点之后，精神病学的兴趣就起来了。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去除一种妄想，则该妄想不太可能源自现实生活。但是妄想的来源在哪？妄想的内容是形形色色的。为什么本病例中的内容为嫉妒？哪些人容易患有妄想症，特别是嫉妒妄想？我们可以回去问精神病医生，但对方却不置可否。他们只会留意其中一个问题。医生会调查此女的家庭历史，也许　会给我们这个答案："患有妄想症的人所在家庭常有类似和其他心理紊乱的家庭病史。"换言之，此女患妄想症的原因，是因为遗传使她天生具有这种倾向。这当然也有道理，不过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的全部了吗？这是她崩溃的全部原因吗？我们是否该欣然认为，病人患上嫉妒妄想而不是其他症状，此事无关紧要，纯属偶然，也无法捉摸？我们是否要接受"遗传是主要制约因素"的判定，也就是说，无论病人有何种经历，她天生注定要患上某种妄想症？大家一定要了解精神病学科对此不作深究的原因。我的回答是："对超越自己认知的事情妄下断言，就是自欺欺人。"对这样的病例，精神病医生是没有深入解释的途径的。他们只不过是满足于诊断结果，而且尽管经验丰富，却做出了不太确定的预判。

Yet, can psychoanalysis do more at this point? Indeed yes! I hope to show you that even in so inaccessible a case as this it can discover something which makes the further understanding possible. May I ask you first to note the apparently insignificant fact that the patient actually provoked the anonymous letter which now supports her delusion. The day before, she announces to the intriguing chambermaid that if her husband were to have an affair with a young girl it would be the worst misfortune that could befall her. By so doing she really gave the maid the idea of sending her

the anonymous letter. The obsession thus attains a certain independence from the letter; it existed in the patient beforehand—perhaps as a dread; or was it a wish? Consider, moreover, these additional details yielded by an analysis of only two hours. The patient was indeed most helpful when, after telling her story, she was urged to communicate her further thoughts, ideas and recollections. She declared that nothing came to her mind, that she had already told everything. After two hours the undertaking had really to be given up because she announced that she already felt cured and was sure that the morbid idea would not return. Of course, she said this because of this resistance and her fear of continuing the analysis. In these two hours, however, she had let fall certain remarks which made possible definite interpretation, indeed made it incontestable; and this interpretation throws a clear light on the origin of her obsession of jealousy. Namely, she herself was very much infatuated with a certain young man, the very same son-in-law upon whose urging she had come to consult me professionally. She knew nothing of this infatuation, or at least only a very little. Because of the existing relationship, it was very easy for this infatuation to masquerade under the guise of harmless tenderness. With all our further experienc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eel our wa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sychic life of this honest woman and good mother. Such an infatuation, a monstrous, impossible thing, could not be allowed to become conscious. But it continued to exist and unconsciously exerted a heavy pressure. Something had to happen, some sort of relief had to be found and the mechanism of displacement which so constantly takes part in the origin of obsessional jealousy offered the most immediate mitigation. If not only she, old woman that she was, was in love with a young man but if also her old husband had an affair with a young girl, then she would be freed from the voice of her conscience which accused her of infidelity. The phantasy of her

husband's infidelity was thus like a cooling salve on her burning wound. Of her own love she never became conscious, but the reflection of it, which would bring her such advantages, now became compulsive, obsessional and conscious. Naturally all arguments directed against the obsession were of no avail since they were directed only to the reflection, and not to the original force to which it owed its strength and which, unimpeachable, lay buried in the unconscious.

然而，精神分析可以在这方面更进一步吗？我希望向大家证明，即使像这样一个毫无头绪的病例，都有可能从中发现一些可供深入理解的端倪。首先请大家注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实际上是病人引发了那份匿名信，而这封信就成了她妄想的来源。前一天，她跟那个阴险的女佣表示，如果她丈夫跟年轻女孩搞外遇，这将是她天大的不幸。她这么一说，其实启发了那个女佣给她寄匿名信的想法。这么看，这种妄想症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于这封信，病人在事前就有了——可能是一种担心，或是愿望？而且，要考虑一下我们分析两个小时就获得的额外细节。病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后，当我们催促她讲出自己的其他想法、念头和回忆时，她其实“很有帮助”。她声称自己想不到其他事情了，已经全盘托出了。两个小时后，治疗实际上不得不终止，因为她说自己已经觉得治愈了，不会再有那种病态想法了。当然，她说这是因为她对分析治疗的抗拒和恐惧。不过，在这两个小时里，她言里言外的一些意思却可以有肯定的解释，实际上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个解释清晰地揭示了她的嫉妒妄想的缘由。其实，她自己正迷恋一个年轻男子，他正是敦促她来我这儿接受专业咨询的那位女婿。她对这种迷恋并不自知，顶多只感觉到一丁点儿。而两人现在的关系（指岳母和女婿的关系）使得这种迷恋很容易被掩盖在一种无伤大雅的慈爱假象里。根据我们进一步的认知，不难用我们的方法理解这样一位诚实女子和慈母的心理生活。此种迷恋既大逆不道又毫无可能，是不可能被允许出现在意识中的。但它继续存在着，在潜意识中施加了沉重压力。因此势必要发生一些事情来释放压力，嫉妒妄想的

起因中一个常见现象是移置机制，它使得压力得到最直接的缓释。她这么个老太婆爱上了一个小伙子，要是她老公跟年轻姑娘也搞外遇，这样她就不用受到不忠的良心谴责。于是，关于丈夫出轨的幻想好像在她火辣辣的伤口上抹了一剂清凉药膏。她从来没有觉察到自己的情愫，然而这种情愫却折射出一个倒影，这本于她有利，但却使她变得欲罢不能、强迫不已并能清楚意识到。自然，所有抵抗妄想症的努力都是无效的，因为它们指向的是这个倒影，而不是针对它的源泉，那股稳稳扎根于潜意识的力量。

Let us now piece together these fragments to see what a short and impeded psychoanalysis can nevertheless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case. It is assumed of course that our inquiries were carefully conducted, a point which I cannot at this place submit to your judgmen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obsession becomes no longer nonsensical nor incomprehensible; it is full of meaning, well-motivated and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atient's emotional experience. Secondly, it is a necessary reaction toward an unconscious psychological process, revealed in other ways, and it is to this very circumstance that it owes its obsessional nature, that is, its resistance to arguments based on logic or fact. In itself the obsession is something wished for, a kind of consolation. Finally, the experiences underlying the condition are such as unmistakably determine an obsession of jealousy and no other. You will also recognize the part played by the two important analogie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symptomatic act with reference to its meaning and intent and also to its relation to an unconscious factor in the situation.

我们将这些片段拼凑起来，看看起步较晚且举步维艰的精神分析是否能帮助理解这个病例。这里当然需要假定我们的调查都是认真进

行的，对这一点大家不必猜疑。首先，这个妄想症不再是胡思乱想，或是不可理解的，它意义丰富，动机充分，是病人情感经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次，它是对于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必要反应，以其他方式显示出来，而且正是这一特定情况，决定了它的强迫本质，也就是说，拒绝相信以逻辑或事实为依据的观点。这种妄想症本身就是某种愿望，是一种心理慰藉。最后，这种情况所依据的经历，无疑是嫉妒妄想、而不是其他病症的决定性因素。大家也能在那个症状性动作的分析中看到两个重要的类同点，即：它的意义和意图；它与该状况下某一潜意识因素的关系。

Naturally, we have not yet answered all the questions which may be put on the basis of this case. Rather the case bristles with further problems of a kind which we have not yet been able to solve in any way, and of others which could not be solved because of the disadvantage of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we were working. For example: why is this happily married woman open to an infatuation for her son-in-law, and why does the relief which could have been obtained in other ways come to her by way of this mirror-image, this projection of her own condition upon her husband? I trust you will not think that it is idle and wanton to open such problems. Already we have much material at our disposal for their possible solution. This woman is in that critical age when her sexual needs undergo a sudden and unwelcome exaggeration. This might in itself be sufficient. In addition, her good and faithful mate may for many years have been lacking in that sufficient sexual capacity which the well-preserved woman needs for her satisfaction. We have learned by experience to know that those very men whose faithfulness is thus placed beyond a doubt are most gentle in their treatment of their wives and unusually forbearing toward their nervous complaints. Furthermore, the fact that it was just the young husband of a daughter who became the object of her

abnormal infatuation is by no means insignificant. A strong erotic attachment to the daughter, which in the last analysis leads back to the mother's sexual constitution, will often find a way to live on under such a disguise. May I perhaps remind you in this connection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son-in-law has seemed particularly delicate since all time and is one which among primitive peoples gave rise to very powerful taboos and avoidances. [1_1] It often transgresses our cultural standards positively as well as negatively. I cannot tell you of course which of these three factors were at work in our case; whether two of them only, or whether all of them cooperated, for as you know I did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the analysis beyond two hours.

当然，引起该病例的所有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这个病例所承载的深层次问题，有些是我们尚且无法解决的，有些因为我们目前工作境况不利而无法解决。比如：为什么这位婚姻幸福的女子对自己的女婿暗生情愫？解压可用其他方法，为什么她偏偏选择移花接木，把自己的情况投射到丈夫身上？希望大家不要认为这些问题很无聊、很荒唐。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现成可用的材料，能给出可能的答案。这位女子正处于一个关键年龄段，该年纪女子的性需求过度旺盛却不为世俗认同。这个理由可能足以说明问题了。另外，体贴她的好老公也许多年来性能力不够充沛，无法使得这位保养得当的女士得到满足。我们凭经验知道，正是这些在忠诚度上无懈可击的男子对待妻子是最为温柔的，通常会宽容她们神经质的牢骚。况且，女儿的年轻丈夫成为她虐恋的对象也绝非偶然。很喜欢女儿的人，母亲终究也是喜欢的，这种情愫通常可借由类似伪装继续存活。由此，我或许要提醒大家，岳母和女婿的关系似乎有史以来就是特别敏感的话题，在原始部落中对此关系有着极为严厉的禁忌和避讳 [2_1] 。这种关系经常在正反两方面逾越我们的文化底线。当然，我不能说上面三个因素哪个在本病例中起了作用，或只有两个，或三个统统都有，因为大家知道，我只分析了两个小时，没有机会继续。

I realize at this point,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 I have been speaking entirely of things for which your understanding was not prepared. I did this in order to carry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psychiatry and psychoanalysis. May I now ask one thing of you? Have you noticed any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m? Psychiatry does not apply the technical methods of psychoanalysis, and neglects to look for any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nt of the obsession. Instead of first seeking out more specific and immediate causes, psychiatry refers us to the very general and remote source—heredity. But does this imply a contradiction, a conflict between them? Do they not rather supplement one another? For does the hereditary factor den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perience, is it not rather true that both operate together in the most effective way? You must admit that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nature of psychiatric work which must repudiate psychoanalytic research. Therefore, it is the psychiatrists who oppose psychoanalysis, not psychiatry itself. Psychoanalysis stands in about the same relation to psychiatry as does histology to anatomy. The one studies the outer forms of organs, the other the closer structure of tissues and cell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wo types of study, where one simplifies the other, is not easily conceivable. You know that anatomy today forms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medicine, but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 dissection of human corpses to learn the inner structure of the body was as much frowned upon as the practice of psychoanalysis, which seeks to ascertain the inner workings of the human soul, seems proscribed today. And presumably a not too distant time will bring us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a psychiatry which aspires to scientific depth is not possible without a real knowledge of the deeper unconscious processes in the psychic life.

女士们、先生们，此刻我知道，我讲的这些东西是大家不能完全理解的。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将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作一个比较。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是否注意到两者之间有任何矛盾之处？精神病学没有采纳精神分析的学术方法，没有试图在妄想症中发现任何意义。精神病学先不去查找更具体和直接的原因，而是向我们指出了一个非常笼统而关系较远的原因——遗传性。但这是否意味着矛盾，意味着两者间的冲突呢？它们是不是相辅相成的呢？遗传性因素能否定个人经历的意义吗？两者是不是一定不能很有效地结合呢？大家必须承认，精神病学工作本质上并无反对精神分析研究的必要。因而，反对精神分析的是精神病医生，而不是精神病学本身。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的关系，正如组织学与解剖学的关系一样。它们一个研究器官的外形，一个研究组织与细胞的内部构造。两种形态的研究，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简化版，实在难以看出矛盾对立之处。大家知道，解剖学如今成了医学科学的基石，而曾几何时，解剖尸体研究身体内部构造是颇受非议的，就像现在精神分析实践致力于揭示人类灵魂的内在运行方式被饱受质疑一样。可想而知，在不久的未来，我们的理想或可实现，精神病学若希望在科学上更进一步，势必要真正理解心理生活的深层次潜意识过程。

Perhaps this much-attacked psychoanalysis has now found some friends among you who are anxious to see it justify itself as well from another aspect, namely, the therapeutic side. You know that the therapy of psychiatry has hitherto not been able to influence obsessions. Can psychoanalysis perhaps do so, thanks to its insight into the mechanism of these symptoms? No,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cannot; for the present at least it is just as powerless in the face of these maladies as every other therapy. We can understand what it was that happened within the patient, but we have no means of making the patient himself understand this. In fact, I told you that I could not extend the analysis of the obsession beyond the first steps. Would you therefore assert that analysis is

objectionable in such cases because it remains without result? I think not. We have the right, indeed we have the duty to pursue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out regard to an immediate practical effect. Some day, though we do not know when or where, every little scrap of knowledge will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skill, even into therapeutic skill. If psychoanalysis were as unsuccessful in all other forms of nervous and psychological disease as it is in the case of the obsession, it would nevertheless remain fully justified as an irreplaceable metho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t is true that we would then not be in a position to practice it, for the human subjects from which we must learn, live and will in their own right; they must have motives of their own in order to assist in the work, but they would deny themselves to us. Therefore let me conclude this session by telling you that there are comprehensive groups of nervous diseases concerning which our better understanding has actually been translated into therapeutic power; moreover, that in disturbances which are most difficult to reach we can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secure results which are second to none in the field of internal therapeutics.

也许，饱受攻击的精神分析在大家当中已经有了同道中人，你们热切希望它能在另一个方面证明自己，也就是治疗方面。须知，精神病学治疗至今未能对妄想症产生效果。精神分析对于这些症状的机制有所洞察，它能发挥作用吗？不，女士们、先生们，它不能，至少就目前而言，它与其他所有治疗方法一样，对这些顽症无能为力。我们能够理解病人身上发生的情况，但在让病人理解方面是束手无策的。实际上，我说过，我都没能把这个强迫症的分析推进下去。大家是否会因为分析毫无结果，就认为这类病例分析都是不知所谓的？我不敢苟同。我们有权利、更有责任不计较直接的实际效果而进行科学研究。总有一天，虽然不知道何时何地，知识的吉光片羽最终会转化为技术，甚至是治疗技术。即使精神分析在治疗其他类型的神经和心理

疾病上和妄想症一样仍无进展，它仍旧有充分理由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科学研究方法。诚然，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便将它付诸实践，因为从研究对象的人们身上，我们势必懂得，他们是有生命和意志的个体，他们辅助研究必须要有自身的动机，而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此，我最后说几句话以结束本节课：我们对诸多类型的神经疾病理解更胜一筹，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治疗能力；而且，在最难治疗的心理紊乱方面，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成功取得了结果，这在心理治疗界是无可匹敌的。

[1_1].Compare S. Freud, *Totem and Taboo*, 1913.

[2_1].参考弗洛伊德1913年著《图腾与禁忌》。

Seventeenth Lecture　The Meaning of the Symptoms

第十七讲　症状的意义

In the last lecture I explained to you that clinical psychiatry concerns itself very little with the form under which the symptoms appear or with the burden they carry, but that it is precisely here that psychoanalysis steps in and shows that the symptom carries a meaning and is connect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tient. The meaning of neurotic symptoms was first discovered by J. Breuer in the study and felicitous cure of a case of hysteria which has since become famous (1880—82). It is true that P. Janet independently reached the same result; literary priority must in fact be accorded to the French scholar, since Breuer published his observations more than a decade later (1893—95) during his period of collaboration with me. On the whole it may be of small importance to us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discovery, for you know that every discovery is made more than once, that none is made all at once, and that success is not meted out according to deserts. America is not named after Columbus. Before Breuer and Janet, the great psychiatrist Leuret expressed the opinion that even for the deliria of the insane, if we only understood how to interpret them, a meaning could be found. I confess that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of time I was willing to estimate very highly the credit due to P. Janet in the explanation of neurotic symptoms, because he saw in them the expression of subconscious ideas (*idées inconscientes*) with which the patients were obsessed. But since then Janet has expressed himself most conservatively, as though he wanted to confess that the term “subconscious” had been for him nothing more than a mode of speech, a shift, “*une façon de parler* ,” by the use of which he had

nothing definite in mind. I now no longer understand Janet's discussions, but I believe that he has needlessly deprived himself of high credit.

在上一讲中我跟大家讲过，临床精神病学很少关注症状的表现形式或承载的内容，但这里正是精神分析大展身手的地方，它证明症状有一定意义，与病人的经历相关。布罗伊尔于1880年至1882年研究并妥善治愈了一个癔症病例，此病从此被广泛关注，神经症症状的意义首先就是他在此过程中发现的。诚然，皮埃尔·雅内也独立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理论上应该是这位法国学者为先，因为布罗伊尔在10多年以后与我合作期间（1893-1895）才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大体而言，这个成果的归属对我们并不重要，因为大家知道每个成果都不止一次地被发现，而且没有一个是同时被发现的，这种成果也不是论功行赏的。美洲并不是以其发现者哥伦布命名的。在布罗伊尔和雅内之前，杰出的精神病学者鲁莱特就表达过以下观点：即便是疯人的妄想，只要我们懂得如何解释它们，也是能发现意义的。我承认，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高度评价雅内对神经症症状的解释，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困扰病人的下意识想法（法语为*idées inconscientes* ）的表现。但此后雅内的表述极为保守，似乎想表明“下意识”一词对他来说只是种说法，一种权宜的称呼，法语叫“*une façon de parler* ”，他对其作用并不确定。我现在不再认同雅内的观点，但是我觉得他白白丢掉了一个大功劳。

The neurotic symptoms then have their meaning just like errors and the dream, and like these they are related to the lives of the persons in whom they appear. The importance of this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the symptom can best be brought home to you by way of examples. That it is borne out always and in all cases, I can only assert, not prove. He who gathers his own experience will be convinced of it. For certain reasons, however, I shall draw my

instances not from hysteria, but from another fundamentally related and very curious neurosis concerning which I wish to say a few introductory words to you. This so-called compulsion neurosis is not so popular as the widely known hysteria; it is, if I may use the expression, not so noisily ostentatious, behaves more as a private concern of the patient, renounces bodily manifestations almost entirely and creates all its symptoms psychologically. Compulsion neurosis and hysteria are those forms of neurotic disease by the study of which psychoanalysis has been built up, and in whose treatment as well the therapy celebrates its triumphs. Of these the compulsion neurosis, which does not take that mysterious leap from the psychic to the physical, has through psychoanalytic research become more intimately comprehensible and transparent to us than hysteria, and we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that it reveals far more vividly certain extre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uroses.

那么，神经症症状跟过失和梦一样也是有意义的，也是和病人的生活相关的。这一关于症状本质的重要观点，用例子来说明最好不过了。这个观点是普遍适用的，对此我只能下定论，而无法证明。只要积累一定的经验，就会信服这一点。不过，由于某些原因，我不以癔症为例，而是举另一种与之起源相似的、非常奇特的神经症，对它我要简单介绍几句。这种所谓的强迫性神经症，与癔症相比并不那么广为人知，如要形容的话，它不是太招摇和喧嚣，更像是病人隐秘的心事，几乎没有生理上的表现，症状完全是心理上的。对强迫性神经症和癔症这两种神经症疾病的研究是精神分析赖以建立的基础，我们的治疗方法也是在这两个病症上成功取得了疗效。其中的强迫性神经症因为没有从心理到生理的神秘过渡，在精神分析研究中比癔症更清晰易懂，而且我们已经认识到，它更清楚地揭示了神经症的一些极端特性。

The chief manifestations of compulsion neurosis are these: the patient is occupied by thoughts that in reality do not interest him, is moved by impulses that appear alien to him, and is impelled to actions which, to be sure, afford him no pleasure, but the performance of which he cannot possibly resist. The thoughts may be absurd in themselves or thoroughly indifferent to the individual, often they are absolutely childish and in all cases they are the result of strained thinking, which exhausts the patient, who surrenders himself to them most unwillingly. Against his will he is forced to brood and speculate as though it were a matter of life or death to him. The impulses, which the patient feels within himself, may also give a childish or ridiculous impression, but for the most part they bear the terrifying aspect of temptations to fearful crimes, so that the patient not only denies them, but flees from them in horror and protects himself from actual execution of his desires through inhibitory renunciations and restrictions upon his personal liberty. As a matter of fact, he never, not a single time, carries any of these impulses into effect; the result is always that his evasion and precaution triumph. The patient really carries out only very harmless trivial acts, so-called compulsive acts, for the most part repetitions and ceremonious additions to the occupations of everyday life, through which its necessary performances—going to bed, washing, dressing, walking—become long-winded problems of almost insuperable difficulty. The abnormal ideas, impulses and actions are in nowise equally potent in individual forms and cases of compulsion neurosis; it is the rule, rather, that one or the other of these manifestations is the dominating factor and gives the name to the disease; that all these forms, however, have a great deal in common is quite undeniable.

强迫性神经症的主要表现是：病人满脑子都是些现实生活里不感

兴趣的念头，被一些莫名的冲动所驱使，而且被迫做些毫无乐趣但不得不做的事情。这些念头本身可能很荒唐，或是与病人完全无关，往往极为幼稚，通常是病人勉强思考的结果，使病人疲惫不堪，只能不甘心地向它们缴械投降。病人违心地被迫苦思冥想，仿佛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病人内心感受到的冲动也有幼稚或荒谬之嫌，但它们大多十分可怕，诱使人做出严重的犯罪行为，因而病人不但抗拒，而且惊惶地避开它们，用克制和限制个人自由的方法避免自己去实现内心的冲动。事实上，病人从来没有一次将这些冲动付诸实施过，最后逃避和防范总是会胜出。病人其实只做出了一些无害的琐碎之举，即所谓的强迫性行为，大多是一些日常行为的重复和夸大，诸如上床、洗漱、穿戴、走路等一些必要举动，并由此成了艰难繁复的问题，几乎无法克服。这些反常的念头、冲动和举动，在强迫性神经症的个人案例和表现形式中绝不具有同样的效力。一般来说，这些表征中会有一个成为主导因素，并成为病症的名字。不过不可否认，所有这些形式都有很大的相似性。

Surely this means violent suffering. I believe that the wildest psychiatric phantasy could not have succeeded in deriving anything comparable, and if one did not actually see it every day, one could hardly bring oneself to believe it. Do not think, however, that you give the patient any help when you coax him to divert himself, to put aside these stupid ideas and to set himself to something useful in the place of his whimsical occupations. This is just what he would like of his own accord, for he possesses all his senses, shares your opinion of his compulsion symptoms, in fact volunteers it quite readily. But he cannot do otherwise; whatever activities actually released under compulsion neurosis are carried along by a driving energy, such as is probably never met with in normal psychic life. He has only one remedy—to transfer and change. In place of one stupid idea he can think of a somewhat milder absurdity, he can proceed from one precaution and prohibition to another, or carry

through another ceremonial. He may shift, but he cannot annul the compulsion. One of the chie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ckness is the instability of the symptoms; they can be shifted very far from their original form. It is moreover striking that the contrasts present in all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are so very sharply drawn in this condition. In addition to the compuls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ent, an intellectual doubt makes itself felt that gradually attacks the most ordinary and assured certainties. All these things merge into steadily increasing uncertainty, lack of energy, curtailment of personal liberty,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patient suffering from compulsion neurosis is originally a most energetic character, often of extraordinary obstinacy, as a rule intellectually gifted above the average. For the most part he has attained a desirable stage of ethical development, is overconscientious and more than usually correct. You can imagine that it takes no inconsiderable piece of work to find one's way through this maze of contradic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symptoms. Indeed, for the present our only object is to understand and to interpret some symptoms of this disease.

当然这种病症的痛苦是很强烈的。我相信，精神病学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比这个更糟糕的病了，如果不是天天看到真实的病例，几乎没有人可以相信。然而，大家不要以为，只要劝慰病人转移注意力，放下这些愚蠢的念头，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来克制怪异的举动，就能对病人有帮助。这正是病人自己希望做到的，因为他们理智清醒，同意大家对强迫症症状的判断，事实上自己也愿意主动承认。但是他们无法自制。强迫性神经症实际引发的举动是被一种驱动力所迫使，可能在正常的心理生活中从未见过。病人只有一个补救方法——转换和变化。他们可以用一个可能稍微不那么荒唐的念头，去替代原先那个愚蠢的念头；可以先从一种预防和禁止措施开始，过渡到其他措施；还可以换成另一种夸大的举动。他们可以转换，但却不能根除这种强迫

症。该病症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症状多变，这些症状可能会与原先的形式相去甚远。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这种状况非常鲜明地呈现了所有心理体验中存在的矛盾。除了强迫内容的消极和积极的对抗，还体现了一种对于理智的怀疑，并逐步祸及最普通的既定事实。所有这些累积在一起，使得病人逐渐变得反复无常、身心疲乏、束手束脚，尽管患上强迫性神经症的病人原本都精力充沛，通常十分坚强，一般来说智商水平都在平均之上。他们大多数道德水准较高，谨小慎微，比一般人要规矩得多。大家可以想象，要在这些充满对立的特征和症状谜团中发现解决之道，可一点都不轻松。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唯一目标是理解和解释该病的某些症状。

Perhaps in reference to our previous discussions, you would like to know the position of present-day psychiatry to the problems of the compulsion neurosis. This is covered in a very slim chapter. Psychiatry gives names to the various forms of compulsion, but says nothing further concerning them. Instead it emphasizes the fact that those who show these symptoms are degenerates. That yields slight satisfaction; it is an ethical judgment, a condemnation rather than an explanation. We are led to suppose that it is in the unsound that all these peculiarities may be found. Now we do believe that persons who develop such symptoms must differ fundamentally from other people. But we would like to ask, are they more “degenerate” than other nervous patients, those suffering, for instance, from hysteria or other diseases of the mind? The characterization is obviously too general. One may even doubt whether it is at all justified, when one learns that such symptoms occur in excellent men and women of especially great and universally recognized ability. In general we glean very little intimate knowledge of the great men who serve us as models. This is due both to their own discretion and to the lying propensities of their biographers. Sometimes, however, a man is a fanatic disciple

of truth, such as Emile Zola, and then we hear from him the strange compulsion habits from which he suffered all his life. [2_1]

大家也许受到前面讨论内容的启发，想知道现阶段精神病学在强迫性神经症上的认识。这个用寥寥几句即可讲完。精神病学为强迫症的各种形式命了名，但没有进一步予以解释。它反倒宣称有这些症状的人都是变态者。这可不是个满意答案，它是一种道德判断，是一种谴责，而不是解释。它使我们误以为，在怪人身上才会发现这些怪癖。现在我们确实认为，患有这些症状的人在本性上肯定不同于他人。但是我们倒要试问，比起其他神经症患者，比如癔症或其他病症患者来，他们难道更加“变态”吗？这种定性显然太泛泛而谈了。我们甚至可以质疑它是否完全合理，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症状也会发生在一些才华出众、能力公认的优秀男女身上。一般我们从堪称模范的杰出人士身上很难获得准确的一手资料。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本身谨慎，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传记作家多爱编造。但要是像埃米尔·左拉那样疯狂的真理追随者，我们就可以从他那儿得知一些他一生都有的强迫性怪习惯。 [3_1]

Psychiatry has resorted to the expedient of speaking of “superior degenerates.” Very well—but through psychoanalysis we have learned that these peculiar compulsion symptoms may be permanently removed just like any other disease of normal persons. I myself have frequently succeeded in doing this.

精神病学已经满足于“杰出的变态者”这样的权宜称呼了。很好——不过我们通过精神分析研究可知，这些特有的强迫性症状与普通人的其他疾病一样也是可以根除的。我本人就常有成功案例。

I will give you two examples only of the analysis of compulsion symptoms, one, an old observation, which cannot be replaced by anything more complete, and one a recent study. I am limiting myself to such a small number because in an account of this nature it is necessary to be very explicit and to enter into every detail.

我给大家举两个只就强迫性症状进行分析的例子，一个是旧例，没有比它更完善的例子；另一个是最近研究的病例。我将控制举例数目，因为此类病例分析必须非常清楚，且细节必究。

A lady about thirty years old suffered from the most severe compulsions. I might indeed have helped her if caprice of fortune had not destroyed my work—perhaps I will yet have occasion to tell you about it. In the course of each day the patient often executed, among others, the following strange compulsive act. She ran from her room into an adjoining one, placed herself in a definite spot beside a table which st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rang for her maid, gave her a trivial errand to do, or dismissed her without more ado, and then ran back again. This was certainly not a severe symptom of disease, but it still deserved to arouse curiosity. Its explanation was found, absolutely without any assistance on the part of the physician, in the very simplest way, a way to which no one can take exception. I hardly know how I alone could have guessed the meaning of this compulsive act, or have found any suggestion toward its interpretation. As often as I had asked the patient: “Why do you do this? Of what use is it?” She had answered, “I don't know.” But one day after I had succeeded in surmounting a grave ethical doubt of hers she suddenly saw the light and related the history of the compulsive act. More than ten years prior she had married a man far older than herself, who had proved impotent on

the bridal night. Countless times during the night he had run from his room to hers to repeat the attempt, but each time without success. In the morning he said angrily: “It is enough to make one ashamed before the maid who does the beds,” and took a bottle of red ink that happened to be in the room, and poured its contents on the sheet, but not on the place where such a stain would have been justifiable. At first I did not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is reminiscence and the compulsive act in question, for the only agreement I could find between them was in the running from one room into another—possibly also in the appearance of the maid. Then the patient led me to the table in the second room and let me discover a large spot on the cover. She explained also that she placed herself at the table in such a way that the maid could not miss seeing the stain. Now it was no longer possible to doubt the intimate relation of the scene after her bridal night and her present compulsive act, but there were still a number of things to be learned about it.

一位30岁的女士患上了极为严重的强迫症。我本来可以帮助她治疗，但我时运不济，工作遭到破坏——关于这个，有机会我也许会告诉大家。每一天当中，病人除了其他事情外，时常会做出如下奇怪的强迫性行动。她从自己房间跑进隔壁房间，站在房间当中一张桌子旁的固定一点，按铃叫女佣来，吩咐她做一件小事，或是没说什么就打发了她，然后再跑回去。这当然不算是严重的病症，但仍值得加以关注。病人没有医生方面的任何帮助就找到了原因，方法特别简单，没有人能提异议。我不知道我是否能独自猜出这个强迫性行动的意义，或是发现病因的暗示。我常问病人：“你为什么这么做？这有什么意义？”她则答道：“我不知道。”但是有一天当我成功帮她克服了对自己的严重道德质疑后，她突然灵光一闪，想起了该强迫性症状的由来。十多年前她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男人，新婚之夜他就一蹶不振。当天夜里，他数次从自己房间跑进她的房间反复尝试，但屡试

屡败。早上他恼怒地说："让铺床的女佣看到就太丢脸了。"于是他随手拿了房间里的一瓶红墨水，把墨水倒在床单上，但是没倒在此类污渍的合理位置上。起初我没明白这个往事跟该强迫性行动的关联，因为我所见到的唯一共同点就是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或许还有女佣的到来。接着，病人将我带到第二个房间的桌旁，让我看桌布上的一大块斑点。她还解释道，她这样站在桌旁，是为了让女佣清楚地看到那个污渍。现在，毫无疑问，她新婚之夜的遭遇与现在的强迫性行动是有密切关系的，但仍然还有不少事情需要了解。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patient identifies herself with her husband, she is acting his part in her imitation of his running from one room into the other. We must then admit—if she holds to this role—that she replaces the bed and sheet by table and cover. This may seem arbitrary, but we have not studied dream symbolism in vain. In dreams also a table which must be interpreted as a bed, is frequently seen. "Bed and board" together represents married life, one may therefore easily be used to represent the other.

首先，很显然，病人把自己想象成了她丈夫，她在模仿他从一个房间跑进另一房间的举动。这样，我们就必须承认(如果她坚持扮演这个角色)她用桌子和桌布取代了床和床单。这看似武断，但我们研究梦的象征意义的努力没有白费。梦中的桌子通常一定会解释成床。"吃饭与睡觉"代表了婚姻生活，所以彼此很容易互相替代。

The evidence that the compulsive act carries meaning would thus be plain; it appears as a representation, a repetition of the original significant scene. However, we are not forced to stop at this semblance of a solution; when we examine more closel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se two people, we shall probably be enlightened concerning something of wider importance, namely, the purpose of the compulsive act. The nucleus of this purpose is evidently the summoning of the maid; to her she wishes to show the stain and refute her husband's remark: “It is enough to shame one before the maid.” He—whose part she is playing—therefore feels no shame before the maid, hence the stain must be in the right place. So we see that she has not merely repeated the scene, rather she has amplified it, corrected it and “turned it to the good.” Thereby, however, she also corrects something else—the thing which was so embarrassing that night and necessitated the use of the red ink—impotence. The compulsive act then says: “No, it is not true, he did not have to be ashamed before the maid, he was not impotent.” After the manner of a dream she represents the fulfillment of this wish in an overt action, she is ruled by the desire to help her husband over that unfortunate incident.

这样，强迫性行动含有意义的证据就很清楚了，它是对原先一个重要场景的再现和重演。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获得了表面上的解答而就此打住，要是对两个当事人的关系进行更细致的审查，我们大概可以发现更重要的情况，也就是该强迫性行动的目的。这个目的的核心显然在于召唤女佣，她的愿望在于指出污渍，否认她丈夫“在佣人面前太丢脸”的话。他——指她所扮演的角色——在女佣面前应该毫无愧色，因为这里污渍出现的地方刚刚好。所以，我们明白了，她不单单是重复了那一场景，而且进行了扩充，她做了修正，把“它改成了好事”。但这样她也修改了另一件事——那晚要用到红墨水的尴尬事——性事不举。强迫性行动的意思是：“不，这不对。他在女佣前无需羞耻，他没有不举。”她用类似做梦的方法，用一个明显的行动表现了这种愿望实现，她一心想帮助丈夫忘掉那个不幸事故。

Everything else that I could tell you about this case supports this clue more specifically; all that we otherwise know about her tends to strengthen this interpretation of a compulsive act incomprehensible in itself. For years the woman has lived separated from her husband and is struggling with the intention to obtain a legal divorce. But she is by no means free from him; she forces herself to remain faithful to him, she retires from the world to avoid temptation; in her imagination she excuses and idealizes him. The deepest secret of her malady is that by means of it she shields her husband from malicious gossip, justifies her separation from him, and renders possible for him a comfortable separate life. Thus the analysis of a harmless compulsive act leads to the very heart of this case and at the same time reveals no in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e secret of the compulsion neurosis in general. I shall be glad to have you dwell upon this instance, as it combines conditions that one can scarcely demand in other cas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mptoms was discovered by the patient herself in one flash, without the suggestion or interference of the analyst. It came about by the reference to an experience, which did not, as is usually the case, belong to the half-forgotten period of childhood, but to the mature life of the patient, in whose memory it had remained unobliterated. All the objections which critics ordinarily offer to our interpretation of symptoms fail in this case. Of course, we are not always so fortunate.

我能提供的此病例的其他信息都能进一步支持这一线索，所有关于病人的情况，可更深入地解释这一本身难解的强迫性行动。此女与丈夫分居多年，一直犹豫着要申请合法离婚。但是她并没有脱离开他，她强迫自己依然忠实于他，不参加社交以免受到诱惑，她想象自己原谅了他，并把他加以美化。她的病最深层的奥秘在于，她通过这个举动保护了丈夫，使他免于流言蜚语的诋毁，使他们的分居合理

化，使他在分居后有可能安心过活。这样，对一个无害的强迫性行动的分析就发现了本病例的要害，同时也揭开了一般强迫性神经症的难解之谜。我非常希望大家细细品味这个病例，因为它综合了多种情况，其他例子很少有这么全。症状的原因是病人自己在一念之间发现的，分析师没有作任何提示或介入。症状由一个生活经历引发，这个经历不像通常那样属于淡忘了的童年，而是病人的成年生活，关于它的记忆尚未消退。批评家对于我们的症状解释通常提出的反对意见在这个病例中都不成立。当然，我们并非一直如此幸运。

And one thing more! Have you not observed how this insignificant compulsive act initiated us into the intimate life of the invalid? A woman can scarcely relate anything more intimate than the story of her bridal night, and is it without further significance that we just happened to come on the intimacies of her sexual life? It might of course be the result of the selection I have made in this instance. Let us not judge too quickly and turn our attention to the second instance, one of an entirely different kind, a sample of a frequently occurring variety, namely, the sleep ritual.

还有一件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这个小小的强迫性行动中我们竟窥见了病人最隐秘的内心？女子讲述了自己的新婚之夜，没有比这更私密的事情了，而且我们是不是借此更深地触及到了她的性生活呢？当然，或许因为我特意选择了这个例子。我们先别太急着下定论，接着看第二个病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型，是一个很常见的病症样本，即睡前仪式。

A nineteen-year old, well-developed, gifted girl, an only child, who was superior to her parents in education and intellectual activity, had been wild and mischievous in her childhood, but has

become very nervous during the last years without any apparent outward cause. She is especially irritable with her mother, always discontented, depressed, has a tendency toward indecision and doubt, and is finally forced to confess that she can no longer walk alone on public squares or wide thoroughfares. We shall not consider at length her complicated condition, which requires at least two diagnoses—agoraphobia and compulsion neurosis. We will dwell only upon the fact that this girl has also developed a sleep ritual, under which she allows her parents to suffer much discomfort. In a certain sense, we may say that every normal person has a sleep ritual, in other words that he insists on certain conditions, the absence of which hinders him from falling asleep; he has created certain observances by which he bridges the transition from waking to sleeping and these he repeats every evening in the same manner. But everything that the healthy person demands in order to obtain sleep is easily understandable and, above all, when external conditions necessitate a change, he adapts himself easily and without loss of time. But the pathological ritual is rigid, it persists by virtue of the greatest sacrifices, it also masks itself with a reasonable justification and seems, in the light of superficial observation, to differ from the normal only by exaggerated pedantry. But under closer observation we notice that the mask is transparent, for the ritual covers intentions that go far beyond this reasonable justification, and other intentions as well that are in direct contradiction to this reasonable justification. Our patient cites as the motive of her nightly precautions that she must have quiet in order to sleep; therefore she excludes all sources of noise. To accomplish this, she does two things: the large clock in her room is stopped, all other clocks are removed; not even the wrist watch on her night-table is suffered to remain. Flowerpots and vases are placed on her desk so that they cannot fall down during the night, and in breaking disturb her sleep. She knows that these precautions

are scarcely justifiable for the sake of quiet; the ticking of the small watch could not be heard even if it should remain on the night-table, and moreover we all know that the regular ticking of a clock is conducive to sleep rather than disturbing. She does admit that there is not the least probability that flowerpots and vases left in place might of their own accord fall and break during the night. She drops the pretense of quiet for the other practice of this sleep ritual. She seems on the contrary to release a source of disturbing noises by the demand that the door between her own room and that of her parents remain half open, and she insures this condition by placing various objects in front of the open door. The most important observances concern the bed itself. The large pillow at the head of the bed may not touch the wooden back of the bed. The small pillow for her head must lie on the large pillow to form a rhomb; she then places her head exactly upon the diagonal of the rhomb. Before covering herself, the featherbed must be shaken so that its foot end becomes quite flat, but she never omits to press this down and redistribute the thickness.

有一个19岁的女孩，天资聪颖，出落得亭亭玉立，她是家中独女，无论学业或智商都超过了父母，小时候性格活泼调皮，但最近几年毫无外部征兆地变得非常神经质。她特别容易跟母亲发火，一直郁郁不满，常常游移不定，后来她表示自己不能在公共广场或宽阔大街上独自行走。我们不去细究她的复杂病情，这里至少有两个病症——广场恐惧症和强迫性神经症。我们只探讨这个女孩的另一个习惯，睡前仪式，这让她父母深受其苦。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每个正常人都有睡前仪式，换言之，他们坚持创造一些条件，以去除不利入睡的因素，他们形成了一些习惯，由此能从清醒切换至睡眠状态，而且每天会重复这些动作。不过，健康人的睡前习惯是容易理解的，而且根本而言，他们能轻松、快速地适应外部情况的变化。但是病态的睡前仪式很顽固，它不惜代价地固守着，还用一个合理借口做幌子，

因而从表面看，它与正常习惯的唯一不同就是过于执拗。但是深究之下，我们会发现这个幌子很明显，因为这个仪式掩盖了一些不合理的意图，以及其他与合理借口直接相反的意图。我们的病人说到自己睡前措施的原因时说，她必须确保安静才能入睡，因此要屏蔽一些声音。为了达到此目的，她做了两件事：停掉她房里的大钟，移走其他钟表，甚至连床头柜上的腕表都不能留下。花盆和花瓶放在书桌上，防止晚上掉落并吵醒她。她明白，保持安静并不是这些措施的合理借口，手表即使放在床头柜上，它的秒针转动也是听不到声音的，更何况我们都知道，钟表的嘀嗒声反而可促进睡眠，而不是搅扰睡眠。她确实也承认，花盆和花瓶如放在合适位置，是不太可能在夜间自行掉落、摔碎的。而睡眠仪式的其他动作并不符合安静的需要。她要求把自己和父母房间的门都半开着，而且会用种种物品挡在门口，看来，她反而制造了一些吵人的噪音来源。最重要的习惯与床本身有关。床头的大枕头不能碰到木质靠板。她自己要枕的小枕头要放在大枕头上，摆成菱形，她要把头准确地枕在菱形的两角间。在盖上被子前，要抖抖羽绒被，这样另一头就会弄得很薄，但她从不忘记再压一压被子，重新把被子厚度弄匀。

Allow me to pass over the other trivial incidents of this ritual; they would teach us nothing new and cause too great digression from our purpose. Do not overlook, however, the fact that all this does not run its course quite smoothly. Everything is pervaded by the anxiety that things have not been done properly; they must be examined, repeated. Her doubts seize first on one, then on another precaution, and the result is that one or two hours elapse during which the girl cannot and the intimidated parents dare not sleep.

其他一些琐碎习惯我就不说了，它们没什么新意，与我们的研究目的也不太相关。然而，请勿忽视，这一切动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每做一件事，病人都满心焦虑，生怕事情没有做好，必须复查和重做。

她先是怀疑一个措施，接着是另一个，结果一两个小时过去了，这个女儿不能睡，担心的父母也不敢睡。

These torments were not so easily analyzed as the compulsive act of our former patient. In the working out of the interpretations I had to hint and suggest to the girl, and was met on her part either by positive denial or mocking doubt. This first reaction of denial, however, was followed by a time when she occupied herself of her own accord with the possibilities that had been suggested, noted the associations they called out, produced reminiscences, and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until through her own efforts she had reached and accepted all interpretations. In so far as she did this, she desisted as well from the performance of her compulsive rules, and even before the treatment had ended she had given up the entire ritual. You must also know that the nature of present-day analysis by no means enables us to follow out each individual symptom until its meaning becomes clear. Rather it is necessary to abandon a given theme again and again, yet with the certainty that we will be led back to it in some other connec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mptoms in this case, which I am about to give you, is a synthesis of results, which, with the interruptions of other work, needed weeks and months for their compilation.

要分析这些痛苦的病症，并没有前面那个病人的强迫性行动简单。在试图解释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向女孩暗示或提示，她这方面要么矢口否认，要么讥笑质疑。但是，这种起初否认的反应之后，她开始主动思考起我所提示的可能性，从中引发了一些联想，回忆了一些往事，并确定了关联，直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她发现并接受了所有病因。在她做这些事的过程中，也不再坚持那些强迫性习惯，甚至在治疗还没结束前就放弃了整个睡前仪式。大家也要知道，当前的分析水

平还不足以使我们单独追踪每个症状，直到搞懂其意义。我们有必要一次又一次放下正在研究的主题，但肯定会通过其他关联回到这个主题上。我会告诉大家这个病例的症状解释，它是一个复合的结论，其间数次被其他研究打断，花了数个星期和数个月才汇总完成。

Our patient gradually learns to understand that she has banished clocks and watches from her room during the night because the clock is the symbol of the female genital. The clock, which we have learned to interpret as a symbol for other things also, receives this role of the genital organ through its relation to periodic occurrences at equal intervals. A woman may for instance be found to boast that her menstruation is as regular as clockwork. The special fear of our patient, however, was that the ticking of the clock would disturb her in her sleep. The ticking of the clock may be compared to the throbbing of the clitoris during sexual excitement. Frequently she had actually been awakened by this painful sensation and now this fear of an erection of the clitoris caused her to remove all ticking clocks during the night. Flowerpots and vases are, as are all vessels, also female symbols. The precaution, therefore, that they should not fall and break at night, was not without meaning. We know the widespread custom of breaking a plate or dish when an engagement is celebrated. The fragment of which each guest possesses himself symbolizes his renunciation of his claim to the bride, a renunciation which we may assume as based on the monogamous marriage law. Furthermore, to this part of her ceremonial our patient adds a reminiscence and several associations. As a child she had slipped once and fallen with a bowl of glass or clay, had cut her finger, and bled violently. As she grew up and learned the facts of sexual intercourse, she developed the fear that she might not bleed during her bridal night and so not prove to be a virgin. Her precaution against the breaking

of vases was a rejection of the entire virginity complex, including the bleeding connected with the first cohabitation. She rejected both the fear to bleed and the contradictory fear not to bleed. Indeed her precautions had very little to do with a prevention of noise.

我们的病人逐渐认识到，她晚上把钟表从房间移走，是因为钟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我们知道钟也可以解释为其他象征，但因为它同样具有等距时长的运转周期特点，所以才象征了女性生殖器。比如女人也许可以夸口说自己的生理期准得像钟表。但是，病人的特别担忧在于，钟的嘀嗒声会打搅她的睡眠。钟的嘀嗒可比喻为阴蒂在性兴奋时的搏动。实际上，她经常从这种恼人的感觉中惊醒，因而，害怕阴蒂勃起的心理使她在晚上把一切嘀嗒运转的钟表都移走。花盆和花瓶因为都是容器，所以也象征着女性。因而，预防它们夜里摔碎的措施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知道，订婚仪式上摔盘碟的习俗在欧洲广为流传。每位男宾拿到一个碎片，以此表明他放弃对新娘的追求权，这也许是起源于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而且，对这部分的夸张举动，病人回忆起一件往事，还由此联想到其他一些事情。她在儿时有一次滑到了，当时手里拿着一个玻璃碗或是陶瓷碗，所以手指割破了，流了很多血。她长大后知道了性方面的知识，开始害怕自己新婚之夜不能流血，证明不了自己是处女。她防范花瓶摔碎的措施是在抵抗整个处女情结，包括初夜的流血。她既抵抗流血的恐惧，又抵抗不流血的恐惧。她的防范措施跟防止噪音关系真的很小。

One day she guessed the central idea of her ceremonial, when she suddenly understood her rule not to let the pillow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 bed. The pillows always had seemed a woman to her, the erect back of the bed a man. By means of magic, we may say, she wished to keep apart man and wife; it was her parents she wished to separate, so to prevent their marital intercourse. She had

sought to attain the same end by more direct methods in earlier years, before the institution of her ceremonial. She had simulated fear or exploited a genuine timidity in order to keep open the door between the parents' bedroom and the nursery. This demand had been retained in her present ceremonial. Thus she had gained the opportunity of overhearing her parents, a proceeding which at one time subjected her to months of sleeplessness. Not content with this disturbance to her parents, she was at that time occasionally able to gain her point and sleep between father and mother in their very bed. Then “pillow” and “wooden wall” could really not come in contact. Finally when she became so big that her presence between the parents could not longer be borne comfortably, she consciously simulated fear and actually succeeded in changing places with her mother and taking her place at her father's side. This situation was undoubtedly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phantasies, whose after-effects made themselves felt in her ritual.

一天，她突然明白自己不让枕头碰到床头的原因，因而猜出了自己这个仪式的中心思想。她总觉得枕头代表女人，而直立的床靠背代表男人。可以说，她是用一种奇妙的方式在表达男女授受不亲的愿望，她希望把父母分开，阻止他们的夫妻生活。在她形成睡前仪式前的早些时候，她曾经用更直接的方法企图达到同样目的。她假装害怕，或是利用自己胆小的个性，让父母和儿童房之间的门开着。这个要求在她现在的仪式中还保留着。这样，她就有机会偷听父母的动静，这个举动曾让她自己在数月内不好好睡觉。如此打搅父母，她并不知足，当时还偶尔会到父母床上，睡在他们当中。这样，“枕头”和“木靠板”就真的碰不到一起了。后来，她个头长大后，在父母当中睡不太舒服，她就假意害怕，跟母亲交换位置，睡在父亲旁边。这种状况无疑是幻想的起因，其后果在仪式中可见一斑。

If a pillow represented a woman, then the shaking of the featherbed till all the feathers were lumped at one end, rounding it into a prominence, must have its meaning also. It meant the impregnation of the wife; the ceremonial, however, never failed to provide for the annulment, of this pregnancy by the flattening down of the feathers. Indeed, for years our patient had feared that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her parents might result in another child which would be her rival. Now, where the large pillow represents a woman, the mother, then the small pillow could be nothing but the daughter. Why did this pillow have to be placed so as to form a rhomb; and why did the girl's head have to rest exactly upon the diagonal? It was easy to remind the patient that the rhomb on all walls is the rune used to represent the open female genital. She herself then played the part of the man, the father, and her head took the place of the male organ. (Cf. the symbol of beheading to represent castration.)

如果枕头代表女人，那抖羽绒被，直到所有羽绒都拱在一边，圆鼓鼓的，一定也有意义。这象征着妻子的怀孕，但这个仪式会接着把羽绒抚平，它体现了流产的意味。实际上，病人多年来担心父母的性事会造出一个新小孩与她为敌。现在，大枕头代表女人、母亲，小枕头则肯定代表女儿。为什么要把枕头摆成菱形，为什么女孩要把头正好枕在菱形中呢？病人不难想到，所有墙上画的菱形都是象征女性生殖器打开的样子。她自己则扮演了男人，即父亲的角色，她的头代表了男性器官（参考：断头象征着阉割）。

Wild ideas, you will say, to run riot in the head of a virgin girl. I admit it, but do not forget that I have not created these ideas but merely interpreted them. A sleep ritual of this kind is itself very strange, and you cannot deny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ritual and the phantasies that yielded us the interpretation. For my part I am most anxious that you observe in this connection that no single phantasy was projected in the ceremonial, but a number of them had to be integrated—they must have their nodal points somewhere in space. Observe also that the observance of the ritual reproduce the sexual desire now positively, now negatively, and serve in part as their rejection, again as their representation.

大家会觉得，一个纯洁少女的脑袋里有这些疯狂想法太不可思议了。我承认这些想法存在，不过别忘了，我并没有制造这些想法，而只是解释了它们。这种睡前仪式本身就是很奇特的，大家无法否认，这个仪式和通过解释发现的这些幻想是一脉相承的。就我而言，我特别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关系注意到，这个仪式并不反映单一的幻想，而是一系列幻想的合成——它们必然是在某几个节点上相连了。也要注意到，这个仪式的习惯动作就表现性渴望而言，时而积极，时而消极，或作为抗拒，或作为其反抗，或作为其表现。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make a better analysis of this ritual by relating it to other symptoms of the patient. But we cannot digress in that direction. Let the suggestion suffice that the girl is subject to an erotic attachment to her father, the beginning of which goes back to her earliest childhood. That perhaps is the reason for her unfriendly attitude toward her mother. Also we cannot escape the fact that the analysis of this symptom again points to the sexual life of the patient. The more we penetrate to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neurotic symptoms, the less surprising will this seem to us.

连带考虑病人的其他症状，可能得出更佳分析。不过我们不能跑偏方向。现在只需明白，女孩对于父亲有着肉体上的依恋，它起源于

幼年时期。这大概也是她对母亲不太客气的原因。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症状的分析再次指向了病人的性生活。随着我们对神经症症状意义和目的了解的加深，我们会对这一点越来越不以为怪。

By means of two selected illustrations I have demonstrated to you that neurotic symptoms carry just as much meaning as do errors and the dream, and that they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tient. Can I expect you to believe this vitally significant statement on the strength of two examples? No. But can you expect me to cite further illustrations until you declare yourself convinced? That too is impossible, since considering the explicitness with which I treat each individual case, I would require a five-hour full semester course for the explanation of this one point in the theory of the neuroses. I must content myself then with having given you one proof for my assertion and refer you for the rest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subject, above all to the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of symptoms in Breuer's first case (hysteria) as well as to the striking clarification of obscure symptoms in the so-called dementia praecox by C. G. Jung, dating from the time when this scholar was still content to be a mere psychoanalyst—and did not yet want to be a prophet; and to all the articles that have subsequently appeared in our periodicals. It is precisely investigations of this sort which are plentiful. Psychoanalysts have felt themselves so much attracted by the analysis,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neurotic symptoms, that by contrast they seem temporarily to have neglected other problems of neurosis.

我用两个精选案例向大家说明了，神经症症状与过失和梦一样拥有丰富的意义，与病人的经历紧密相关。我会觉得大家仅凭两个例子就相信这个重大观点吗？不会。但大家觉得我会继续举证直到大家表

示信服为止吗？这也不可能，因为我讲解每个病例都要极尽详细，这样的话，我单为了解释神经症理论的这一点，就得花上一整个学期，每堂课要讲5小时。所以，我只能满足于给大家提供一个支持我主张的例证，让大家去参考本学科的文献中的其他例子，主要是布罗伊尔对首例癔症病症的经典解释，以及荣格对早发性痴呆中模糊症状的精到阐明（当年这位学者尚只满足于当一名精神分析师，不想做业内先知），还可参考业内所有学术期刊里后来发表的文章。关于此类的调查研究确实很充分。精神分析学者们对分析、解释、转译神经症症状很是着迷，相对而言，他们似乎暂时忽略了其他神经症问题。

Whoever among you takes the trouble to look into the matter will undoubtedly b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wealth of evidential material. But he will also encounter difficulties. We have learned that the meaning of a symptom is found in its relation to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tient. The more highly individualized the symptom is, the sooner we may hope to establish these relations. Therefore the task resolves itself specifically into the discovery for every nonsensical idea and useless action of a past situation wherein the idea had been justified and the action purposeful. A perfect example for this kind of symptom is the compulsive act of our patient who ran to the table and rang for the maid. But there are symptoms of a very different nature which are by no means rare. They must be called typical symptoms of the disease, for they are approximately alike in all cases,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disappear or shrivel to such an extent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connect them with the specific experiences of the patient and to relate them to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s of his past. Let us again direct our attention to the compulsion neurosis. The sleep ritual of our second patient is already quite typical, but bears enough individual features to render possible what may be called an *historic* interpretation. But all compulsive patients tend to repeat, to isolate

their actions from others and to subject them to a rhythmic sequence. Most of them wash too much. Agoraphobia (topophobia, fear of spaces), a malady which is no longer grouped with the compulsion neurosis, but is now called anxiety hysteria, invariably shows the same pathological picture; it repeats with exhausting monotony the same feature, the patient's fear of closed spaces, of large open squares, of long stretched streets and parkways, and their feeling of safety when acquaintances accompany them, when a carriage drives after them, etc. On this identical groundwork, however,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tients are superimposed—moods one might almost call them, which are sharply contrasted in the various cases. The one fears only narrow streets, the other only wide ones, the one can go out walking only when there are few people abroad, the other when there are many. Hysteria also, aside from its wealth of individual features, has a superfluity of common typical symptoms that appear to resist any facile historical methods of tracing them. But do not let us forget that it is by these typical symptoms that we get our bearings in reaching a diagnosis. When, in one case of hysteria we have finally traced back a typical symptom to an experience or a series of similar experiences, for instance followed back a hysterical vomiting to its origin in a succession of disgust impressions, another case of vomiting will confuse us by revealing an entirely different chain of experiences, seemingly just as effective. It seems almost as though hysterical patients must vomit for some reason as yet unknown, and that the historic factors, revealed by analysis, are chance pretexts, seized on as opportunity best offered to serve the purposes of a deeper need.

大家当中要是有人不嫌麻烦地就此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无疑会深深感受到证据材料的丰富性。我们知道，症状的意义要从它与患者经

历的关系中去找。症状的个性特征越显著，就越能尽快发现这些关系。因而，这项任务的特别之处在于，针对每个荒谬想法和无聊动作发现它们的往日情境，有了这个情境，这个想法也就合理了，这个动作也就有了动机。这种症状的最好例证就是我们那位跑到桌边呼唤女佣的病人。但是有些症状的性质很不一样，这个特性并不少见。应该叫它们典型症状，因为它们几乎在所有病例中都很相似，这样个性差异消失了，或是缩小到一定程度，难以看清它们与病人的具体经历的联系，也无法将它们与病人的往日情境关联起来。我们再来注意一下强迫性神经症。我们第二位病人的睡前仪式已经是很典型的了，但是它的个性特性足以使我们有可能做出所谓历史的 解释。但是所有强迫症患者通常会把一些动作从其他动作中孤立出来，重复地有规律地做这些动作。他们中大多数人洗得太勤快。广场恐惧症已经不再归属于强迫性神经症，现在称为焦虑型癔症,它始终不变地显示着一种病态图景，重复着单调乏味的特征，病人对于围合空间、大型开阔广场、漫长的街道和林荫路等的恐惧，当有车开在身后时，或有熟人陪伴时，才感到安全，等等。但是，在症状一致情况下，病人的个体差异却很明显——它们大约可称为情态,在不同案例中差异鲜明。有人只害怕狭窄的街道，有人只怕宽阔的街道，有人只能在人少时出门走路，有人却是要等人多时。除了其丰富的个体特征外，癔症也有非常之多的常见典型症状，貌似无法用历史追溯法进行查究。但是别忘了，我们正是靠着这些典型症状才明确了诊断方向。我们在一个病例中终于发现了与一个症状相关的一个经历或一系列相似经历，比如发现一种神经性呕吐症状来源于一连串的恶心印象，而在另一个呕吐病例中却发现了完全不同的一系列经历，它们貌似也同样起到作用，这会令我们困惑不解。看来，癔症患者好像几乎都会因为某种原因呕吐，原因尚不清楚，而且通过分析发现的那些历史因素则是一种随机原因，是为了一种深层次需求而随意抓取的借口。

Thus we soon reach the discouraging conclusion that although we can satisfactorily explain the individual neurotic symptom by relating it to an experience, our science fails us when it comes to

the typical symptoms that occur far more frequently. In addition, remember that I am not going into all the detailed difficulties which come up in the course of resolutely hunting down an histor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mptom. I have no intention of doing this, for though I want to keep nothing from you, and so paint everything in its true colors, I still do not wish to confuse and discourage you at the very outset of our studies. It is true that we have only begun to underst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ymptoms, but we wish to hold fast to the results we have achieved, and struggle forward step by step toward the mastery of the still unintelligible data. I therefore try to cheer you with the thought that a fundamental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symptoms can scarcely be assumed. Since the individual symptoms are so obviously dependent up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tient,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the typical symptoms revert to an experience that is in itself typical and common to all humanity. Other regularly recurring features of neurosis, such as the repetition and doubt of the compulsion neurosis, may be universal reactions which are forced upon the patient by the very nature of the abnormal change. In short, we have no reason to be prematurely discouraged; we shall see what our further results will yield.

如此，我们很快就会沮丧地发现，虽然可以用相关经历解释个人的神经症症状，但对于发生率高得多的典型症状，本学科还是一筹莫展。此外，要记住，我在毅然追查症状的历史原因时发生的种种艰难险阻，我是不会一一说明的。我不想这么做是因为，虽说我不想对大家有所保留，而且希望还原事物原本的面目，但我也不希望在研究伊始就让大家困惑和泄气。确实，我们刚刚开始理解症状的原因，但我们希望坚守已经获得的成果，步步为营地攻下尚未搞懂的资料。因而，我用一个想法与大家共勉：几乎很难假定两种症状之间有着根本不同。既然个性化的症状显然是依赖于患者的个人经历，那典型症状也可能属于某个全人类的典型共有经历。神经症的其他频发性特征，

比如强迫性神经症中的重复动作与疑虑，可能是一种普遍性反应，通过不同的病态特性施加于病患身上。简言之，我们没有理由过早失去信心，让我们对下一步的研究成果拭目以待吧。

We meet a very similar difficulty in the theory of dreams, which in our previous discussion of the dream I could not go into. The manifest content of dreams is most profuse and individually varied, and I have shown very explicitly what analysis may glean from this content. But side by side with these dreams there are others which may also be termed “typical” and which occur similarly in all people. These are dreams of identical content which offer the same difficulties for their interpretation as the typical symptom. They are the dreams of falling, flying, floating, swimming, of being hemmed in, of nakedness, and various other anxiety dreams that yield first one and then another interpretation for the different patients, without resulting in an explanation of their monotonous and typical recurrence. In the matter of these dreams also, we see a fundamental groundwork enriched by individual additions. Probably they as well can be fitted into the theory of dream life, built up on the basis of other dreams—not however by straining the point, but by the gradual broadening of our views.

我们在学习梦的学说时遇到过极为相似的困难，在前面探讨梦的时候我没有深谈。梦的显意是极其丰富和个性化的，我很明确地说过，从这个显意中可以收获怎样的分析。但是除了这些梦之外还有一些可称为“典型”的梦，所有人都做过类似的梦。这是有着相同内容的梦，解释它们与解释典型症状的一样困难。它们是关于跌落、飞翔、漂浮、游泳、被包围、裸露和各种其他焦虑之梦，它们的解释因人而异，它们的发生具有一致性和典型性，原因不明。但我们在这些梦的

基本共性中也看到了丰富的个人色彩。梦的生活的理论是建立在其他梦的基础上的，也许这些梦也适用于它——不过，不是要硬去屈就这个理论，而是要逐步拓宽我们的视野。

[2_1].E. Toulouse, Emile Zola—*Enquête medico-psychologique*, Paris, 1896.

[3_1].参见图卢兹《埃米尔·左拉》——刊登于《医学心理学研究》，1896年出版于巴黎。

Eighteenth Lecture　Traumatic Fixation—The Unconscious

第十八讲　创伤性执着——潜意识

I said last time that we would not continue our work from the standpoint of our doubts, but on the basis of our results. We have not even touched upon two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conclusions, derived equally from the same two sample analyses.

上次我说过，要继续研究，我们不应该抱着怀疑态度，而是应该相信我们的结论。我们都还没有谈到两个最有意思的结论，它们从两个病例的分析中都可以得出。

In the first place, both patients give us the impression of being *fixated* upon some very definite part of their past; they are unable to free themselves therefrom, and have therefore come to be completely estranged both from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They are now isolated in their ailment, just as in earlier days people withdrew into monasteries there to carry along the burden of their unhappy fates. In the case of the first patient, it is her marriage with her husband, really abandoned, that has determined her lot. By means of her symptoms she continues to deal with her husband; we have learned to understand those voices which plead his case, which excuse him, exalt him, lament his loss. Although she is young and might be coveted by other men, she has seized upon all manner of real and imaginary (magic) precautions to safeguard her virtue for him. She will not appear before strangers, she neglects her personal appearance; furthermore, she cannot bring herself to get

up readily from any chair on which she has been seated. She refuses to give her signature, and finally, since she is motivated by her desire not to let anyone have anything of hers, she is unable to give presents.

首先，两个病人都给我们一种印象：她们对某一特定往事很执着，她们不能从中解脱出来，因而对自己的当下和未来感到茫然。现在她们在病症中与世隔绝，就像过去人们身负悲苦宿命遁入空门。在第一位病人的情况中，是她与丈夫名存实亡的婚姻决定了她的命运。她的症状使她得以继续与丈夫“相处”，我们都领会了她那些为他辩解、谅解他、美化他以及替他惋惜的心声。虽然她年纪不大，可以被其他男子追求，但她仍尽力采取各种真实或想象的（魔术化的）措施为他守住贞节。她不愿见生人，不事打扮，甚至久坐不起。由于她不想让自己的东西落入人手，所以她不愿签名，也不能送礼物。

In the case of the second patient, the young girl, it is an erotic attachment for her father that had established itself in the years prior to puberty, which plays the same role in her life. She also has arrived at the conclusion that she may not marry so long as she is sick. We may suspect she became ill in order that she need not marry, and that she might stay with her father.

就第二个病人（那位年轻女孩）的情况而言，她在青春期之前就产生了对父亲的肉体依恋，这对于她生活的影响是前后一致的。她也承认说，只要她一直病着，就不能结婚。我们会猜想，她生病的动机就是为了不结婚而仍和父亲在一起。

It is impossible to evade the question of how, in what manner,

and driven by what motives, an individual may come by such a remarkable and unprofitable attitude toward life. Granted of course that this bearing is a general characteristic of neurosis, and not a special peculiarity of these two cases, it is nevertheless a general trait in every neurosis of very great importance in practice. Breuer's first hysterical patient was fixated in the same manner upon the time when she nursed her very sick father. In spite of her recuperation she has, in certain respects, since that time, been done with life; although she remained healthy and able, she did not enter on the normal life of women. In every one of our patients we may see, by the use of analysis, that in his disease-symptoms and their results he has gone back again into a definite period of his past.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he even chooses a very early phase of his life, sometime a childhood phase, indeed, laughable as it may appear, a phase of his very suckling existence.

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采取如此反常而无益的生活态度，是如何做到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当然，要设想这种态度是神经症的一般特征，而不仅是这两个病例的特性，它是每一例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神经症的共有特征。布罗伊尔的第一位癔症病人在照顾重病的父亲时，有着同样的执着方式。虽然她已经康复，但自那以后，她在某些方面无力应付生活，尽管她仍健康能干，但却没能继续过正常女人的生活。在每位病人身上，我们通过分析看到，病人的病症和病情都将他们带回到过去的某一特定时期。在大部分病例中，病人甚至会选择非常早期的生活，有时是儿童时期，实际上，尽管看似可笑，有时甚至会是其嗷嗷待哺的时期。

The closest analogies to these conditions of our neurotics are furnished by the types of sickness which the war has just now made so frequent—the so-called traumatic neuroses. Even before the war

there were such cases after railroad collisions and other frightful occurrences which endangered life. The traumatic neuroses are, fundamentally, not the same as the spontaneous neuroses which we have been analysing and treating; moreover, we have not yet succeeded in bringing them within our hypotheses,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make clear to you wherein this limitation lies. Yet on one point we may emphasize the existence of a complet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forms. The traumatic neuroses show clear indications that they are grounded in a fixation upon the moment of the traumatic disaster. In their dreams these patients regularly live over the traumatic situation; where there are attacks of an hysterical type, which permit of an analysis, we learn that the attack approximates a complete transposition into this situation. It is as if these patients had not yet gotten through with the traumatic situation, as if it were actually before them as a task which was not yet mastered. We take this view of the matter in all seriousness; it shows the way to an *economic* view of psychic occurrences. For the expression “traumatic” has no other than an economic meaning, and the disturbance permanently attacks the management of available energy.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 is one which, in a very short space of time, is able to increase the strength of a given stimulus so enormously that its assimilation, or rather its elaboration, can no longer be effected by normal means.

与我们神经症病人的这些状况最相似的，是在战争中变得很频繁的病例——即所谓创伤性神经症。即使没有战争，在发生火车相撞或其他危及生命的可怕灾难后，也会有这样的病例。创伤性神经症与我们所分析和治疗的自发性神经症有着根本的不同，况且我们仍未能将其成功纳入我们的假设中，我希望说明这个问题的局限性。不过可以明确指出，在两种病症形式中存在一个完全的相同点。创伤性神经症清楚地提示了，它们深植于一种对创伤性灾难发生时的执着。在这些

患者的梦中，他们经常重温该创伤性情景，我们通过癔症发作的分析发现，发作就是类似于创伤情境的完全回放。这些病人仿佛仍未摆脱这一创伤性情境，仿佛这是他们仍未跨过的一道坎。我们要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一问题，因为它表明了心理事件的一种经济性 的概念。因为关于“创伤性”的说法正是含有经济性（指节约时间）意味，它对心绪管理造成了永久性扰乱。创伤性经历可在极短时间内使一种已知刺激激增，普通方法已经不能消化或是表现它。

This analogy tempts us to classify as traumatic those experiences as well upon which our neurotics appear to be fixated. Thus the possibility is held out to us of having found a simple determining factor for the neurosis. It would then be comparable to a traumatic disease, and would arise from the inability to meet an overpowering emotional experience. As a matter of fact this reads like the first formula, by which Breuer and I, in 1893–1895, accounted theoretically for our new observations. A case such as that of our first patient, the young woman separated from her husband, is very well explained by this conception. She was not able to get over the unfeasibility of her marriage, and has not been able to extricate herself from this trauma. But our very next, that of the girl attached to her father, shows us that the formula is not sufficiently comprehensive. On the one hand, such baby love of a little girl for her father is so usual, and so often outlived that the designation “traumatic” would carry no significa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story of the patient teaches us that this first erotic fixation apparently passed by harmlessly at the time, and did not again appear until many years later in the symptoms of the compulsion neurosis. We see complications before us, the existence of a greater wealth of determining factors in the disease, but we also suspect that the traumatic viewpoint will not have to be given up as wrong; rather it will have to subordinate itself when it is

fitted into a different context.

这个类比使我们将创伤性经历与神经症的执着归为一类。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找到神经症的一个单一制约因素。它与创伤性病症就有了可比性，它因无法应付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而产生。事实上，这有点像布罗伊尔和我在1893-1895年对我们的新观察成果进行理论阐述时首次提出的一个方案。我们的第一位病人，那位与丈夫分居的女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概念。她对婚姻失败无法释怀，不能从此创伤中脱身。而下一个病人，那位有恋父情结的女孩，则说明这个方案不尽完善。一方面，小女孩对父亲的幼稚依恋很寻常，通常也能得到克制，因而“创伤”一说无甚意义；另一方面，病人的过去告诉我们，她起初的肉体依恋在当时显然无疾而终，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又出现在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中。我们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在这个病症中存在着更多制约因素，但我们仍可猜想，关于创伤的观点不会被弃为谬论，它只是为了适应新情况而屈尊俯就而已。

Here again we must leave the road we have been traveling. For the time being, it leads us no further and we have many other things to find out before we can go on again. But before we leave this subject let us note that the fixation on some particular phase of the past has bearings which extend far beyond the neurosis. Every neurosis contains such a fixation, but every fixation does not lead to a neurosis, nor fall into the same class with neuroses, nor even set th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neurosis. Mourning is a type of emotional fixation on a theory of the past, which also brings with it the most complete alienation from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But mourning is sharply distinguished from neuroses that may be designated as pathological forms of mourning.

现在我们必须放弃这个研究方向。就目前而言，它已经到头，我们仍需搞懂不少事情，才能继续前进。但在离开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注意，对于过去某一特定时期的执着有着超越神经症的意义。每一个神经症都含有一种执着，但每一种执着未必指向神经症，也未必与神经症同类，甚至未必是神经症产生的条件。例如，悲伤据推测是一种对往事的情感执着，也可使患者与当下和未来完全脱节。但是悲伤与被称为病态型悲伤的神经症是有很大差异的。

It also happens that men are brought to complete deadlock by a traumatic experience that has so completely shaken the foundations on which they have built their lives that they give up all interest i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and become completely absorbed in their retrospections; but these unhappy persons are not necessarily neurotic. We must not overestimate this one feature as a diagnostic for a neurosis, no matter how invariable and potent it may be.

人也有可能被某次创伤性经历彻底击溃，而完全动摇了原本的生活根基，以致对自己的当下和未来毫不在意，只沉浸于往事回忆之中，但这些不快乐的人们未必就是神经症患者。我们一定不能将这种特征一概视为神经症的诊断依据，不论它是否一贯或明确。

Now let us turn to the second conclusion of our analysis, which however we will hardly need to limit subsequently. We have spoken of the senseless compulsive activities of our first patient, and what intimate memories she disclosed as belonging to them; later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xperience and symptom and thus discovered the purpose hidden behind the compulsive activity. But we have entirely omitted one factor that deserves our whole attention. As long as the patient kept repeating the compulsive

activity she did not know that it was in any way related with the experience in questi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was hidden from her, she truthfully answered that she did not know what compelled her to do this. Once, sudden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ure, she hit upon the connection and was able to tell it to us. But still she did not know of the end in the service of which she performed the compulsive activities, the purpose to correct a painful part of the past and to place the husband, still loved by her, upon a higher level. It took quite a long time and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for her to grasp and admit to me that such a motive alone could have been the motive force of the compulsive activity.

现在我们回到第二个分析结论，这个我们倒是不用依样进行限制。我们谈过第一个病人所做的无聊动作，她回忆起的一些隐私往事，后来我们还调查了经历和症状间的关联，就此发现了强迫性动作背后的目的。但是我们完全忽略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因素。只要病人一直重复强迫性动作，她就意识不到它与那个经历有关。两者的关系对她来说是不可见的，所以她回答说自己不知道强迫性动作的原因时说的是真心话。在治疗的影响下，有一次，她突然想到了这个关系，方能告知我们。但是她还是不知道，她这些强迫性动作的目的在于修正一桩苦恼的往事，美化她仍爱着的丈夫。她用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心思才领悟并向我承认，单单这个原因就可能是强迫性动作的动机了。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cene after the unhappy bridal night and the tender motive of the patient yield what we have called the meaning of the compulsive activity. But both the “whence” and the “why” remained hidden from her as long as she continued to carry out the compulsive act.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had been going on within her for which the compulsive act found an expression. She

could, in a normal frame of mind, observe their effect, but none of the psychological antecedents of her action had come to the knowledge of her consciousness. She had acted in just the same manner as a hypnotized person to whom Bernheim had given the injunction that five minutes after his awakening in the ward he was to open an umbrella, and he had carried out this order on awakening, but could give no motive for his so doing. We have exactly such facts in mind when we speak of the existence of *unconscious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 Let anyone in the world account for these facts in a more correct scientific manner, and we will gladly withdraw completely our assumption of unconscious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Until then, however, we shall continue to use this assumption, and when anyone wants to bring forward the objection that the unconscious can have no reality for science and is a mere makeshift, (*une façon de parler*), we must simply shrug our shoulders and reject his incomprehensible statement resignedly. A strange unreality which can call out such real and palpable effects as a compulsion symptom!

新婚之夜后的场景、病人的温情动机，从这两者的关系就得出了我们所谓的强迫性动作的意义。但只要她的强制性动作仍在继续，她还是不明白这个意义的由来与原因。她经历着一些心理过程，强迫性动作则是它们的表现。若在正常心智状态下，她可以发现它们的效应，但她一点都意识不到自己如此举动的心理历程。她的行为与伯恩海姆催眠的人一样：他得到指示，醒来后5分钟要在室内撑开一把伞，他醒来后遵命照办了，但却不知道这么做的原因。这些现象正是我们所说的潜意识心理过程 。关于这些事实，如果有更准确的科学解释，我们也乐得全然收回关于潜意识心理过程的推断。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是会坚持这一个推断，一旦有人提出异议，说潜意识于科学而言很虚幻，只是一种权宜说法，我们只得耸耸肩，和气地指责这种说辞令人费解。一种奇怪的虚幻之物，却能引起像强迫症这么真实

可见的后果呢！

In our second patient we meet with fundamentally the same thing. She had created a decree which she must follow: the pillow must not touch the head of the bed; yet she does not know how it originated, what its meaning is, nor to what motive it owes the source of its power. It is immaterial whether she looks upon it with indifference or struggles against it, storms against it, determines to overcome it. She must nevertheless follow it and carry out its ordinance, though she asks herself, in vain, why. One must admit that these symptoms of compulsion neurosis offer the clearest evidence for a special sphere of psychological activity, cut off from the rest. What else could be back of these images and impulses, which appear from one knows not where, which have such great resistance to all the influences of an otherwise normal psychic life; which give the patient himself the impression that here are super-powerful guests from another world, immortals mixing in the affairs of mortals. Neurotic symptoms lead unmistakably to a convic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an unconscious psychology, and for that very reason clinical psychiatry, which recognizes only a conscious psychology, has no explanation other than that they are present as indications of a particular kind of degeneration. To be sure, the compulsive images and impulses are not themselves unconscious—no more so than the carrying out of the compulsive-acts escapes conscious observation. They would not have been symptoms had they not penetrated through into consciousness. But their psychological antecedents as disclosed by the analysis, the associations into which we place them by our interpretations, are unconscious, at least until we have made them known to the patient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analysis.

我们在第二个病人身上看到了基本相同的特点。她自己定了一条金科玉律：枕头一定不能与床头相碰，但她不知道其由来、意义，也不知道它作用的动力。对此她是不以为意还是奋力反抗、压抑并决意克服，这并不重要。她无论如何都会遵循它、按例办事，尽管她徒劳地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必须承认，这些强迫性神经症状极为明显地体现了心理活动一个特定领域，它与其余活动截然不同。还有什么在支持着这些意念和冲动，它们不知从何而来，顽强抵抗着正常心理生活的所有影响力；对于病人自己而言，它们是超能力的天外来客，落入凡间的仙人。神经性症状使人确信潜意识心理的存在，正因为此，只认可意识心理学的临床精神病学才只能将它们解释为一种特殊变态的信号。诚然，强迫性意象和冲动本身并不是潜意识——它们与强迫性行动的实施一样，只是未被意识发现而已。它们若未侵入意识之中，就不能成为症状。但是我们通过分析揭示了它们的心理历程，通过解释得出了它们的联系，这些都是潜意识的，至少我们在分析过程中让病人认识它们之前是这样的。

Consider now, in addition, that the facts established in our two cases are confirmed in all the symptoms of all neurotic diseases, that always and everywhere the meaning of the symptoms is unknown to the sufferer, that analysis shows without fail that these symptoms are derivatives of unconscious experiences which can, under various favorable conditions, become conscious. You will understand then that in psychoanalysis we cannot do without this unconscious psyche, and are accustomed to deal with it as with something tangible. Perhaps you will also be able to understand how those who know the unconscious only as an idea, who have never analyzed, never interpreted dreams, or never translated neurotic symptoms into meaning and purpose, are most ill-suited to pass an opinion on this subject. Let us express our point of view once more. Our ability to give meaning to neurotic symptoms by means of analytic interpretation is an irrefutable indic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unconscious psychological processes—or, if you prefer, an irrefutable proof of the necessity for their assumption.

现在再思考一下，这两个病例中的既定事实在所有神经症疾病的一切症状中都得到了证实，即病者不清楚症状的意义，并且，分析毫无例外地证明了，这些症状源自一些潜意识经历，这些经历在各种有利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意识。这样大家理解了，精神分析不谈潜意识心理则寸步难行，也习惯于像有形事物一样对待它。也许大家也能理解，有些人只知道潜意识这么个想法，从来没有分析过、解释过梦，或从未诠释过神经性症状的意义和目的，他们最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了。我们再重申一下这个观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解释得出神经性症状的意义，这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存在——或者，退一步说，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假设它们存在的必要性。

But that is not all. Thanks to a second discovery of Breuer's, for which he alone deserves credit and which appears to me to be even more far-reaching, we are able to learn still more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conscious and the neurotic symptom. Not alone is the meaning of the symptoms invariably hidden in the unconscious; but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symptom is conditioned by its relation to this unconscious. You will soon understand me. With Breuer I maintain the following: Every time we hit upon a symptom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patient cherishes definite unconscious experiences which withhold the meaning of the symptoms. Vice versa, in order that the symptoms may come into being, it is also essential that this meaning be unconscious. Symptoms are not built up out of conscious experiences; as soon as the unconscious processes in question become conscious, the symptom disappears. You will at once recognize here the approach to our therapy, a way to make symptoms disappear. It was by these

means that Breuer actually achieved the recovery of his patient, that is, freed her of her symptoms; he found a technique for bringing into her consciousness the unconscious experiences that carried the meaning of her symptoms, and the symptoms disappeared.

但这还不是全部。多亏了布罗伊尔另一个发现（这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且我认为它的意义更为深远），我们可以发现潜意识和神经性症状之间的更多关联。不仅症状的意义一成不变地隐藏于潜意识之中，而且症状自身的存在也受到它与潜意识关系的影响。大家很快就能理解我的意思。我同意布罗伊尔的下列看法：每当我们发现一个症状，我们都可以断定病人有一些特定的潜意识经历，其中蕴含了症状的意义。反之亦然，症状产生的必要前提是，这种意义是潜意识的。症状不是在意识经历基础上产生的，一旦相关的潜意识过程进入了意识，症状就会消失。大家这时马上就能想到让症状消失的治疗方法。正是通过这些方法，布罗伊尔确实成功治愈了他的病人，也就是使她摆脱了症状：他发现了一个技巧，把那些含有症状意义的潜意识经历带入她的意识，这样症状就消失了。

This discovery of Breuer's was not the result of a speculation, but of a felicitous observation made possible by the cooperation of the patient. You should therefore not trouble yourself to find things you already know to which you can compare these occurrences, rather you should recognize herein a new fundamental fact which in itself is capable of much wider application. Toward this further end permit me to go over this ground again in a different way.

布罗伊尔的发现并非一种推测结论，而是病人配合进行的细致观察的结果。这样大家也不用大费周章再去找一些已知事物与这些现象

进行比较了，应该由此认识到一个全新的基本事实，它本身就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有了这个新的目标，我就能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观察这一问题。

The symptom develops as a substitution for something else that has remained suppressed. Certain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s should normally have become so far elaborated that consciousness would have attained knowledge of them. This did not take place, however, but out of these interrupted and disturbed processes, imprisoned in the unconscious, the symptom arose. That is to say, something in the nature of an interchange had been effected; as often as therapeutic measures are successful in again reversing this transpositio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solves the problem of the neurotic symptom.

症状是作为其他被压抑的事情的替代而发展起来的。一些心理经历通常应该有所表现，使得意识察觉到它们。不过这没有发生，从这些被打断和干扰的心理过程中，被禁锢在潜意识中的症状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具有互换性的事情起了作用，而通过治疗措施成功使该互换再次反转，精神分析疗法就解决了神经性症状的问题。

Accordingly, Breuer's discovery still remains the foundation of psychoanalytic therapy. The assertion that the symptoms disappear when one has made their unconscious connections conscious, has been borne out by all subsequent research, although the most extraordinary and unexpected complications have been met with in its practical execution. Our therapy does its work by means of changing the unconscious into the conscious, and is effective only in so far as it has the opportunity of bringing about this

transformation.

因而，布罗伊尔的发现至今仍是精神分析疗法的基础。关于“潜意识原因被意识察觉，症状就会消失”的主张在所有后续研究中得到证实，尽管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错综复杂和出人意料的问题。我们的疗法是设法将潜意识转变成意识，而且目前只在有机会实现这种转变时才起到疗效。

Now we shall make a hasty digression so that you do not by any chance imagine that this therapeutic work is too easy. From all we have learned so far, the neurosis would appear as the result of a sort of ignorance, the incognizance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that we should know of. We would thus very closely approximate the well-known Socratic teachings, according to which evil itself is the result of ignorance. Now the experienced physician will, as a rule, discover fairly readily what psychic impulses in his several patients have remained unconscious. Accordingly it would seem easy for him to cure the patient by imparting this knowledge to him and freeing him of his ignorance. At least the part played by the unconscious meaning of the symptoms could easily be discovered in this manner, and it would only be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ymptoms to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atient that the physician would be handicapped. In the face of these experiences, of course, he is the ignorant one of the two, for he did not go through these experiences, and must wait until the patient remembers them and tells them to him. But in many cases this difficulty could be readily overcome. One can question the relatives of the patient concerning these experiences, and they will often be in a position to point out those that carry any traumatic significance; they may even be able to inform the analyst of experiences of which the patient knows

nothing because they occurred in the very early years of his life. By a combination of such means it would seem that the pathogenic ignorance of the patient could be cleared up in a short time and without much trouble.

现在我们要说几句题外话，提醒大家不要觉得这种治疗工作太过简单。就我们至今所学而言，神经症是一种无知的结果，是对本应知晓的心理过程的忽视。正如苏格拉底的名言，邪恶是无知的结果。现在，有经验的医师一般能轻易看出，病人的哪些心理冲动处于潜意识状态。相应的，通过告知病人这一情况，使其摆脱无知状态，这样似乎就比较容易治愈病人。至少症状的潜意识意义能用这个方法轻易发现，理解症状和病人经历的关系，是医生唯一感到棘手的。就这些经历而言，医生当然是不知道的，因为他们并未经历过，必须等到病人记起并告诉他们。但是在不少病例中，这个困难可轻易克服。医生可以向病人家属打听这些经历，他们经常可以说出任何带有创伤性意义的经历，甚至可能告诉分析师一些病人不知道的事情，因为它们发生在病人的幼年时间。通过双管齐下的方法，患者不知道的病因就能在短时内被轻松消除。

If only that were all! We have made discoveries for which we were at first unprepared. Knowing and knowing is not always the same thing; there are various kinds of knowing that are psychologically by no means comparable. “*Il y a fagots et fagots* ,“ [3_1] as Molière says. The knowledge of the physician is not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patient and cannot bring about the same results. The physician can gain no results by transferring his knowledge to the patient in so many words. This is perhaps putting it incorrectly, for though the transference does not result in dissolving the symptoms, it does set the analysis in motion, and calls out an energetic denial, the first sign usually that this has taken place. The patient has

learned something that he did not know up to that time, the meaning of his symptoms, and yet he knows it as little as before. So we discover there is more than one kind of ignorance. It will require a deepening of our psychological insight to make clear to us wherein the difference lies. But our assertion nevertheless remains true that the symptoms disappear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ir meaning. For there is only one limiting condition; the knowledge must be founded on an inner change in the patient which can be attained only through psychic labors directed toward a definite end. We have here been confronted by problems which will soon lead us to the elaboration of a dynamics of symptom formation.

要是都这样就好了！我们已经获得的发现，并非我们起初的设想。所谓“知道”并不总是一回事，有很多不同的“知道”在心理学上是不可比的。“人各有不同” [4_1] ，莫里哀如是说。医生所知与病人所知不一样，不能带来同样的结果。医生费尽口舌将自己知道的东西转述给病人，也得不到什么结果。这样说大概不太准确，因为虽然这种转述不能化解症状，它确实启动了分析过程，通常最初的迹象是引起一种竭力否认。病人得知了他们之前不知道的事情，即症状的意义，但是他们对它的了解一如既往地贫乏。因而我们发现，无知的类型不止一种。要查明其中的区别，需要拓宽心理学的视界。但是我们的主张依然成立，即症状意义被认识到后，症状会随之消失。因为只有一个限制条件，这一认识必须经由病人的内心变化完成，它只能通过目的明确的心理探索获得。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问题，很快就会引领我们去诠释症状形成的动态原因。

I must stop to ask you whether this is not all too vague and too complicated? Do I not confuse you by so often retracting my words and restricting them, spinning out trains of thought and then rejecting them? I should be sorry if this were the case. However, I

strongly dislike simplification at the expense of truth, and am not averse to having you receive the full impression of how many-sided and complicated the subject is. I also think that there is no harm done if I say more on every point than you can at the moment make use of. I know that every hearer and reader arranges what is offered him in his own thoughts, shortens it, simplifies it and extracts what he wishes to retain. Within a given measure it is true that the more we begin with the more we have left. Let me hope that, despite all the by-play, you have clearly grasped the essential parts of my remarks, those about the meaning of symptoms, about the unconscious,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You probably have also understood that our further efforts are to take two directions: first, the clinical problem—to discover how persons become sick, how they later on accomplish a neurotic adaptation toward life; secondly, a problem of psychic dynamics, the evolution of the neurotic symptoms themselves from the prerequisites of the neuroses. We will undoubtedly somewhere come on a point of contact for these two problems.

我必须停住，问问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些太含糊、太复杂了？我经常收回自己的观点，加以种种限制，抛出一连串的想法然后又予以否定，这是否令大家困惑？如果是这样，我很抱歉。不过，我强烈反对将追求真理的过程简单化，所以我不介意让大家完全体会到本学科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我也认为，如果我在每一点上的阐述暂时不能全部为大家所用，这也没什么坏处。我知道，每位听众和读者都会在心中对提供的信息进行处理，缩短、简化它们，摘取希望保留的信息。从某个角度衡量，开始时接收的内容越多，能够吸收的内容就越多。我希望，尽管绕了那么多圈子，大家还是能清晰地领会我讲课的核心内容，关于症状的意义、潜意识、两者的关系。大家可能也认识到，我们接下来的努力方向有两个：第一，临床问题——发现神经症的发病机制，以及神经性症状的形成过程；第二，心理动态问题，即神经性

症状如何从神经症先兆中演化而来。我们肯定会在一些节点上接触到这两个问题。

I do not wish to go any further today, but since our time is not yet up I intend to call your attention to another characteristic of our two analyses, namely, the memory gaps or amnesias, whose full appreciation will be possible later. You have hear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express the object of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in a formula: all pathogenic unconscious experience must be transposed into consciousness. You will perhaps be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this formula can be replaced by another: all the memory gaps of the patient must be filled out, his amnesias must be abolished. Practically this amounts to the same thing. Therefore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symptoms must be accredited to the amnesias of the neurotic. The analysis of our first case, however, will hardly justify this valuation of the amnesia. The patient has not forgotten the scene from which the compulsion act derives—on the contrary, she remembers it vividly, nor is there any other forgotten factor which comes into pla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symptoms. Less clear, but entirely analogous, is the situation in the case of our second patient, the girl with the compulsive ritual. She, too, has not really forgotten the behavior of her early years, the fact that she insisted that the door between her bedroom and that of her parents be kept open, and that she banished her mother out of her place in her parents' bed. She recalls all this very clearly, although hesitatingly and unwillingly. Only one factor stands out strikingly in our first case, that though the patient carries out her compulsive act innumerable times, she is not once reminded of its similarity with the experience after the bridal-night; nor was this memory even suggested when by direct questions she was asked to search for its motivation.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girl, for in her case not only her

ritual, but the situation which provoked it, is repeated identically night after night. In neither case is there any actual amnesia, no lapse of memory, but an association is broken off which should have called out a reproduction, a revival in the memory. Such a disturbance is enough to bring on a compulsion neurosis. Hysteria, however, shows a different picture, for it is usually characterized by most grandiose amnesias. As a rule, in the analysis of each hysterical symptom, one is led back to a whole chain of impressions which, upon their recovery, are expressly designated as forgotten up to the moment. On the one hand this chain extends back to the earliest years of life, so that the hysterical amnesias may be regarded as the direct continuation of the infantile amnesias, which hides the beginnings of our psychic life from those of us who are normal. On the other hand, we discover with surprise that the most recent experiences of the patient are blurred by these losses of memory—that especially the provocations which favored or brought on the illness are, if not entirely wiped out by the amnesia, at least partially obliterated. Without fail important details have disappeared from the general picture of such a recent memory, or are placed by false memories. Indeed it happens almost regularly that just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an analysis, certain memories of recent experiences suddenly come to light. They had been held back all this time, and had left noticeable gaps in the context.

我今天不会再讲新内容了，但是时间还有些，我想提请大家注意我们这两个案例分析的另一个特点，即记忆缺失或失忆，这个问题大家以后可充分领会。大家知道，精神分析治疗也许能用一种程式表示：所有致病的潜意识经历必须转移到意识之中。大家大概会惊讶地得知，这个程式可用另一个程式替代：病人的所有记忆缺失必须得到填补，失忆的状况必须消除。实际上这是一码事。因此，神经症病人的失忆对症状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第一个病例分析却不能证

明失忆的作用。病人没有忘记强迫性行动起源的那个场景——相反，她记得非常清楚，而且在这些症状发展中也没有其他遗忘因素起作用。第二个病例，那位女孩睡前礼仪的状况，虽稍欠清晰，但也大体类似。她实际上也没有忘记自己早年的行为：硬要把自己和父母房间当中的门开着，霸占母亲在父母床上的位置。虽说有些犹豫和为难，她对所有细节记得非常清楚。第一个病例中只有一点非常醒目，病人虽然无数次地实施了强迫性行动，但她从未想到它与新婚之夜后的情景相似，当我直接要求她寻找动机时，她甚至没有提到这个往事。那个女孩也一样，因为在她的病例中，不仅她的仪式，而且引发它的情境每夜都在一成不变地重复着。两个病例中都不存在真正的失忆，记忆也没有漏洞，但是本可再现往事、唤醒记忆的联想链条断裂了。这种紊乱足以导致强迫性神经症。不过，癔症情况有所不同，因为通常它的特征是广泛失忆。一般来说，在每个癔症症状的分析中，患者有一系列的记忆印象，在其恢复后，他们会特别强调以前不记得这些事。一方面，这些记忆可回溯至幼年时期，因而癔症的失忆可看作是幼年记忆遗忘（这是正常人所遗忘的初期心理生活）的继续。另一方面，我们惊讶地发现，病人最近的经历因这些记忆缺失而变得模糊——特别是病症的诱因或成因，即使没有完全失忆，也至少是被部分淡忘了。这种最近的记忆概况中的重要细节势必消失了，或是被虚假的记忆所替代。事实上很常见的情况是，在分析即将完成之前，病人突然记起了一些最近的经历。它们一直都被隐瞒着，在病情的来龙去脉中留下了空白。

We have pointed out that such a crippling of the ability to recall is characteristic of hysteria. In hysteria symptomatic conditions also arise (hysterical attacks) which need leave no trace in the memory. If these things do not occur in compulsion-neuroses, you are justified in concluding that these amnesias exhibit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ysterical change, and not a general trait of the neuro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difference will be more closely limited by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We have

combined two things as the meaning of a symptom, its “whence,” on the one hand, and its “whither” or “why,” on the other. By these we mean to indicate the impressions and experiences whence the symptom arises, and the purpose the symptom serves. The “whence” of a symptom is traced back to impressions which have come from without, which have therefore necessarily been conscious at some time, but which may have sunk into the unconscious—that is, have been forgotten. The “why” of the symptom, its tendency, is in every case an endopsychic process, developed from within, which may or may not have become conscious at first, but could just as readily never have entered consciousness at all and have been unconscious from its inception. It is, after all, not so very significant that, as happens in the hysterias, amnesia has covered over the “whence” of the symptom, the experience upon which it is based; for it is the “why,” the tendency of the symptom, which establishes its dependence on the unconscious, and indeed no less so in the compulsion neuroses than in hysteria. In both cases the “why” may have been unconscious from the very first.

我们已经指出，缺乏回忆能力是癔症的特征。在癔症中，症状性状况显现时（癔症发作），它不会在记忆中留下痕迹。如果这些情况没有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发生，那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这些失忆体现了癔症变化的心理特征，而不是神经症的一般特征。但以下的发现却会使这个区别失去应有的意义。我们把症状的意义划分为两件事：一方面是“由来”，另一方面是“目的”或“缘由”。这是指引发症状的印象、经历和病症的诉求。症状“由来”可追溯至那些外来的印象，它们必定曾经在意识之中，但沉入了潜意识——也就是说，被遗忘了。症状的“缘由”，即它的倾向，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是一种心路历程，它们本是内心的产物，起初在意识中或有或无，但大有可能从未没进入意识，一开始就是潜意识的。毕竟，正如癔症中的情况一样，失忆掩盖

了症状的“由来”（即它源自的经历），这并不十分重要，因为是“缘由”，即症状的倾向，明确了它对潜意识的依赖，实际上强迫性神经症的情况并不亚于癔症。两种病的“缘由”可能在起初就是潜意识的。

By thus bringing into prominence the unconscious in psychic life, we have raised the most evil spirits of criticism against psychoanalysis. Do not be surprised at this, and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opposition is directed only against the difficulties offered by the conception of the unconscious or against the relative inaccessibility of the experiences which represent it. I believe it comes from another source. Humanity, in the course of time, has had to endure from the hands of science two great outrages against its naive self-love. The first was when humanity discovered that our earth was not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but only a tiny speck in a world-system hardly conceivable in its magnitude. This is associated in our minds with the name “Copernicus,” although Alexandrian science had taught much the same thing. The second occurred when biological research robbed man of his apparent superiority under special creation, and rebuked him with his descent from the animal kingdom, and his ineradicable animal nature. This revalu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arles Darwin, Wallace and their predecessors, was not accomplished without the most violent opposition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But the third and most irritating insult is flung at the human mania of greatness by present-day psychological research, which wants to prove to the “I” that it is not even master in its own home, but is dependent upon the scantiest information concerning all that goes on unconsciously in its psychic life. We psychoanalysts were neither the first, nor the only ones to announce this admonition to look within ourselves. It appears that we are fated to represent it most insistently and to confirm it by means of empirical data which are of importance to every single

person. This is the reason for the widespread revolt against our science, the omission of all considerations of academic urbanity, and emancipation of the opposition from all restraints of impartial logic. We were compelled to disturb the peace of the world, in addition, in another manner, of which you will soon come to know.

但这样突显心理生活中的潜意识后，我们就招来了对精神分析最恶毒的攻击。不要对此感到惊讶，也不要觉得，这种攻击所针对的，只是潜意识概念的难点，或体现它的那些经历的相对不可获知性。我认为，这种攻击另有他图。在时间长河中，人性的纯洁自尊经受了来自科学的两次折磨。第一次是人类发现地球并非宇宙中心，而是浩瀚无边的物质世界中的一小点。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个理论与哥白尼这个名字相连，不过亚历山大学派也有基本相似的观点。第二次是生物学研究剥夺了人类作为特殊物种的优越感，将其贬为动物世界的进化产物，因为人类具有不可磨灭的动物性。这种在达尔文、华莱士及他们的前人推动下产生的全新价值观，它的创立伴随着同代人最激烈的反对。但这第三次也是最令人恼火的打击，是现代心理学研究对人类自大迷信的讽刺，它试图证明“自我”甚至不是自己的主宰，而是依赖于心理生活中潜意识的所有微不足道的信息。告诫人类要反观自身内心，我们精神分析学者既不是第一批人、也不是唯一的一批人。看来，我们是注定要极力主张这个观点，而且要通过对每个人都有意义的实证资料予以证实。世人广泛地反抗本学科，甚至不顾应有的学术风度，不考虑公平逻辑的严谨，就是出于这个原因。由于另一个原因，我们不得不再次扰乱了世界安宁，这一点大家不久就知道了。

[3_1].There are fagots and fagots.

[4_1].原意为：柴把和柴把本不一样。

Nineteenth Lecture　Resistance and Suppression

第十九讲　抵抗与压抑

In order to progress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uroses, we need new experiences and we are about to obtain two. Both are very remarkable and were at the time of their discovery, very surprising. You are, of course, prepared for both from our discussions of the past semester.

要进一步理解神经症，我们需要新知识，接下来我们就会学到两点。这两个发现非常了不起，在当时也非常惊人。当然，得益于上学期的课程，大家对这两点已经有所准备。

In the first place: When we undertake to cure a patient, to free him from the symptoms of his malady, he confronts us with a vigorous, tenacious resistance that lasts during the whole time of the treatment. That is so peculiar a fact that we cannot expect much credence for it. The best thing is not to mention this fact to the patient's relatives, for they never think of it otherwise than as a subterfuge on our part in order to excuse the length or the failure of our treatment. The patient, moreover, produces all the phenomena of this resistance without even recognizing it as such; it is always a great advance to have brought him to the point of understanding this conception and reckoning with it. Just consider, this patient suffers from his symptoms and causes those about him to suffer with him. He is willing, moreover, to take upon himself so many sacrifices of time, money, effort and self-denial in order to be freed.

And yet he struggles, in the very interests of his malady, against one who would help him. How improbable this assertion must sound! And yet it is so, and if we are reproached with its improbability, we need only answer that this fact is not without its analogies. Whoever goes to a dentist with an unbearable toothache may very well find himself thrusting away the dentist's arm when the man makes for his sick tooth with a pair of pincers.

第一点，当我们开始治疗病人，使其摆脱病症时，在整个治疗期都会遭到病人的主动的顽强抵抗。这个情况很特殊，令人不敢相信。最好不要向病人家属提及此事，因为他们只会认为这是对治疗期拖长或治疗失败的托辞。而且病人甚至不承认自己的所有抵抗行为，要是能使他们认识并承认这一点就算是很大的进步了。想一想，病人为病症所苦，也让周围的人一起受苦。而且，他们为了摆脱病症不惜耗费时间、金钱、精力和自尊。但是，他们依然在病魔的摆布下，不由自主地反抗帮他们的人。这种说法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是确实如此，如果有人斥责此说荒谬，我们只需回答，此事并非独一无二。牙痛难忍而去看牙医的人，在医生举着钳子处理病牙时，是大有可能挣脱开医生的臂膀的。

The resistance which the patient shows is highly varied, exceedingly subtle, often difficult to recognize, Protean-like in its manifold changes of form. It means that the doctor must become suspicious and be constantly on his guard against the patient.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we make use, as you know, of that technique which is already familiar to you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We tell the patient that without further reflection he should put himself into a condition of calm self-observation and that he must then communicate whatever results this introspection gives him—feelings, thoughts, reminiscences,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appear to his mind. At the same time, we warn him expressly against yielding to any motive which would induce him to choose or exclude any of his thoughts as they arise, in whatever way the motive may be couched and however it may excuse him from telling us the thought: “that is too unpleasant,” or “too indiscreet” for him to tell; or “it is too unimportant,” or “it does not belong here,” “it is nonsensical.” We impress upon him the fact that he must skim only across the surface of his consciousness and must drop the last vestige of a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 that which he finds. We finally inform him that the result of the treatment and above all its length is dependent on the conscientiousness with which he follows this basic rule of the analytic technique. We know, in fact, from the technique of interpreting dreams, that of all the random notions which may occur, those against which such doubts are raised are invariably the ones to yield the material which leads to the uncovering of the unconscious.

病人表现出的抵抗各有不同，也极为微妙，通常难以辨识，形式变化多端。就是说，医生对病人必须时刻保持怀疑和警惕。大家知道，在精神分析疗法中，我们会用一个大家在释梦时已经熟悉的技巧。我们告诉病人，不用做深入思考，应该让自己处于一种冷静的自我观察氛围下，必须讲出畅想的结果——情感、想法、回忆，按照在脑中浮现的先后顺序讲。同时，我们要明确提醒病人，当思绪不断涌现时，一旦出现对它们进行取舍的念头，千万不要让步，无论它们如何出现，以及如何成为不如实说出想法的借口：“这太讨人厌了”，或是说了“太不慎重”，或“这太不重要了”，或“这跟它没什么关系”，或“这很胡扯”。我们跟病人强调，他们必须只在意识表层进行蜻蜓点水式搜索，对自己的发现不能有一丝挑剔。最后我们告诉他们，治疗的结果，加上治疗期长短，都取决于遵循分析技巧基本规则的诚意。我们从释梦技巧中知道，实际上，在所有随机出现的想法中，引起怀疑的那些想法无一例外是揭示潜意识的素材。

The first reaction we call out by laying down this basic technical rule is that the patient directs his entire resistance against it. The patient tries in every way to escape its requirements. First he will declare that he cannot think of anything, then, that so much comes to his mind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seize on anything definite. Then we discover with no slight displeasure that he has yielded to this or that critical objection, for he betrays himself by the long pauses which he allows to occur in his speaking. He then confesses that he really cannot bring himself to this, that he is ashamed to; he prefers to let this motive get the upper hand over his promise. He may say that he did think of something but that it concerns someone else and is for that reason exempt. Or he says that what he just thought of is really too trivial, too stupid and too foolish. I surely could not have meant that he should take such thoughts into account. Thus it goes on, with untold variations, in the face of which we continually reiterate that “telling everything” really means telling everything.

对于我们定下的这个基本技术规则，病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全力抵抗。病人会千方百计地避开规则的要求。首先他们会声称自己想不到任何事情，接着，又说脑子里想很多事，无法抓到确定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万分沮丧地发现病人对这样或那样的取舍念头让步了，因为他们讲话时出现长长的停顿，这显露了心迹。病人随后坦白说，自己实在做不到，他们太难为情，宁愿不遵守诺言也不能说。他们也许会说想到的事情与其他人有关，这样就可被规则恕免。或者，他们会说想到的事情太微不足道、太愚蠢，医生的意思当然不是让他们也把这些事考虑进去。就这样换着花样继续下去，而不顾我们反复重申，“说出一切”意思就是要把一切都说出来。

One can scarcely find a patient who does not make the attempt to reserve some province for himself against the intrusion of the analysis. One patient, whom I must reckon among the most highly intelligent, thus concealed an intimate love relation for weeks; and when he was asked to explain this infringement of our inviolable rule, he defended his action with the argument that he considered this one thing was his private affair. Naturally, analytic treatment cannot countenance such right of sanctuary. One might as well try in a city like Vienna to allow an exception to be made of great public squares like the Hohe Markt or the Stephans Platz and say that no one should be arrested in those places—and then attempt to round up some particular wrong-doer. He will be found nowhere but in those sanctuaries. I once brought myself around to permit such an exception in the case of a man on whose capacity for work a great deal depended, and who was bound by his oath of service, which forbade him to tell anyone of certain things. To be sure, h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but not I; I resolved never to repeat such an attempt under these conditions.

我们很少碰到不抗拒分析介入、对自己的情况毫无保留的病人。有一个病人，我必须说属于智商最高的人群，就是如此这般地把他的一桩亲密情事隐瞒了数个星期，当我们要求他解释为何违反我们的神圣规则时，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理由是，他觉得这件事是自己的私事。分析治疗法当然不能容许这种逃避行为。这就等于在维也纳这样的城市中，在高市场或斯蒂芬广场之类公共广场划出法外专区，禁止在这些地方逮捕人，然后又想缉拿一些要犯。犯人只会在这些避难区中呆着。有一次，我也说服自己允许了一次例外，病人是身居要职的男子，出于职业需要不能透露某些事情。事实上，他对结果很满意，而我却不满意，我决定再不做此等情况下的尝试。

Compulsion neurotics are exceedingly adept at making this technical rule almost useless by bringing to bear all their over-conscientiousness and their doubts upon it.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anxiety-hysteria sometimes succeed in reducing it to absurdity by producing only notions so remote from the thing sought for that analysis is quite unprofitable. But it is not my intention to go into the way in which thes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may be met. It is enough to know that finally, by means of resolution and perseverance, we do succeed in wresting a certain amount of obedience from the patient toward this basic rule of the technique; the resistance then makes itself felt in other ways. It appears in the form of an intellectual resistance, battles by means of arguments, and makes use of all difficulties and improbabilities which a normal yet uninstructed thinking is bound to find in the theory of analysis. Then we hear from one voice alone the same criticisms and objections which thunder about us in mighty chorus in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Therefore the critics who shout to us from outside cannot tell us anything new. It is a veritable tempest in a teapot. Still the patient can be argued with, he is anxious to persuade us to instruct him, to teach him, to lead him to the literature, so that he may continue working things out for himself. He is very ready to become an adherent of psychoanalysis on condition that analysis spare him personally. But we recognize this curiosity as a resistance, as a diversion from our special objects, and we meet it accordingly. In those patients who suffer from compulsion neuroses, we must expect the resistance to display special tactics. They frequently allow the analysis to take its way, so that it may succeed in throwing more and more light on the problems of the case, but we finally begin to wonder how it is that this clearing up brings with it no practical progress, no diminution of the symptom. Then we may discover that the resistance has entrenched itself in the doubts of the compulsion neurosis itself and in this position is able

successfully to resist our efforts. The patient has said something like this to himself: “This is all very nice and interesting. And I would be glad to continue it. It would affect my malady considerably if it were true. But I don't believe that it is true and as long as I don't believe i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y sickness.” And so it may go on for a long time until one finally has shaken this position itself; it is then that the decisive battle takes place.

强迫性神经症病人尤其擅长将这个技术规则搞得几无用处，因为他们会对此产生过度担心和百般疑虑。患有焦虑型癔症的病人则成功将其变为不经之谈，因为他们只会讲出一些无益于分析的离题念头。但我不愿多说这些技术性难题。我们只需知道，在意志与恒心的支撑下，我们与病人斗智斗勇，他们终于在一定程序上遵循了该基本技术规则，然而又换了其他方式继续负隅顽抗。这次是一种智力的抵抗，是有理有据的较量，而且会讲到所有难点和不可能性，这是思维正常但未经训练的人们对分析理论的必然看法。然后，我们会单独听到一种批评反对的声音，它与科学文献对我们的齐声抨击别无二致。所以，那些外界批评家的反对声音对我们来说并不新鲜。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茶壶里的风暴。但是病人终究是可以理喻的，他们迫切希望我们教导他们，给一些参考文献，这样自己能继续弄懂一些事。只要这个分析饶他们在外，他们很乐意拥护精神分析。但我们认为这种好奇心就是一种抵抗，它是一种转移特定目标的伎俩，对此我们要酌情处理。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必然会用一些特殊策略进行抵抗。他们经常会任由分析工作进行，以便成功揭开病情的更多问题，但我们最后不禁疑惑：怎么这些发现没有带来任何实际进展，也没有导致任何症状缓解。接着，我们可能会醒悟，这种抵抗可能就沉浸在强迫性神经症的自我怀疑之中，这样就成功地使我们的努力化为乌有。病人会对自己说这样的话：“这很不错，也很有趣。我乐意继续尝试。如果是真的，我的病情会有大有改善。但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只要我仍不相信，它就跟我的病不相干。”这种情况会持续很久，直到信心发生动摇，开始坚决反抗。

The intellectual resistances are not the worst; one can always get ahead of them. But the patient can also put up resistances,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analysis, whose conquest belongs to the most difficult tasks of our technique. Instead of recalling, he actually goes again through the attitudes and emotions of his previous life which, by means of the so-called “transference,” can be utilized as resistances to the physician and the treatment. If the patient is a man, he takes this material as a rule from his relations to his father, in whose place he now puts the physician, and in so doing constructs a resistance out of hi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of person and opinion; out of his ambition to equal or to excel his father; out of his unwillingness to assume the burden of gratitude a second time in his life. For long times at a stretch one receives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patient desires to put the physician in the wrong and to let him feel his helplessness by triumphing over him, and that this desire has completely replaced his better intention of making an end to his sickness. Women are adepts at exploiting,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resistance, a tender, erotically tinged transference to the physician. When this leaning attains a certain intensity, all interest for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treatment is lost, together with every sense of the responsibility which was assumed by undertaking it. The never-failing jealousy as well as the embitterment over the inevitable repudiation, however gently effected, all must serve to spoil the person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patient and physician and thus to throw out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propelling forces of the analysis.

智力的抵抗还不是最难处理的，对付它总是有胜算的。但是病人还有其他抵抗的招数，常常利用分析的局限性，克服它们才是治疗技术的最大挑战。病人不是去回想以前生活中的态度和情感，而是实际

上再现出这些态度和情绪，以所谓的“移情”作用构成对医生和治疗的抵抗。男性病人一般会将此情此景想象成他与父亲的关系，只是父亲在这里换成了医生，这样就能形成一种争取人格和观点独立的逆反心理，他立志赶上和超越父亲，不愿再次担负感恩的包袱。时间长了，我们会觉得，病人存心为难医生，希望占他的上风，让他无所适从，这种心机完全背离了他要治病的心愿。女性病人为达到抵抗目的，则擅长对医生卖弄些许风情。当此倾向越过雷池后，一切治疗兴趣连同责任感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病人随之醋意绵绵，对方免不了会予以回绝，尽管婉言相劝，但这势必会破坏医患之间的信任，如此分析治疗便失去了一大推动力源泉。

Resistances of this sort must not be narrow-mindedly condemned. They contain so much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terial of the patient's past and reproduce it in such a convincing manner, that they become of the greatest aid to the analysis, if a skillful technique is able to turn them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t is only remarkable that this material is at first always in the service of the resistance, for which it serves as a barrier against the treatment. One can also say that here are traits of character, adjustments of the ego which were mobilized in order to defeat the attempted change. We are thus able to learn how these traits aros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neurosis, as a reaction to its demands, and to see features more clearly in this character which could otherwise not have shown up so clearly or at least not to this extent, and which one may therefore designate as latent. You must also not get the impression that we see an unforeseen endangering of the analytic influence in the appearance of these resistances. On the contrary, we know that these resistances must come to light; we are dissatisfied only when we do not provoke them in their full strength and so make them plain to the patient Indeed, we at last understand that overcoming these resistances is the essential achievement of

analysis and is that portion of the work which alone assures us that we have accomplished something with the patient.

对这些抵抗绝不可心胸狭窄地予以谴责。它们包含了太多关于病人过去的信息，并用这样明显的方式再现出来，因而它们是分析治疗的最大利器，前提是要用娴熟的技巧把它们引向正轨。这些信息起初总起到抵抗的作用，并成为治疗的阻碍，这很令人惊叹。有人也会说，这是病人的个性特征使然，他们积极调整自我，以挫败改变现状的努力。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些个性特征是如何响应神经症的需求，在神经症状况下显现出来，我们对这个特征的各方面也看得更清楚（它本来是不可能展现得如此清晰的，起码不可能到这种程度，它可称得上是隐性的）。大家也一定不要认为，这些抵抗的出现意味着，分析治疗的影响力具有不可预见的危险。我们反而会认为这些抵抗必须显现出来，要是没有完全引蛇出洞，让病人明显感受到，我们反而会不满意。事实上，我们最后认识到，克服这些抵抗才是分析治疗的关键成果，也是治疗有所成就的唯一证明。

You mus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any accidental occurrences which arise during the treatment will be made use of by the patient as a disturbance—every diverting incident, every statement about analysis from an inimical authority in his circle, any chance illness or any organic affection which complicates the neurosis; indeed, he even uses every improvement of his condition as a motive for abating his efforts. You will then have gained an approximate, though still an incomplete picture of the forms and devices of the resistance which must be met and overcome in the course of every analysis. I have given this point such detailed consideration because I am about to inform you that our dynamic conception of the neurosis is based on this experience with the resistance of neurotic patients against the banishment of their

symptoms. Breuer and I both originally practiced psycho-therapy by means of hypnosis. Breuer's first patient was treated throughout under a condition of hypnotic suggestibility, and I at first followed his example. I admit that my work at that time progressed easily and agreeably and also took much less time. But the results were capricious and not permanent; therefore I finally gave up hypnotism. Then only did I realize that no insight into the forces which produce these diseases was possible as long as one used hypnotism. The condition of hypnosis could prevent the physician from realizing the existence of a resistance. Hypnosis drives back the resistance and frees a certain field for the work of analysis, but similarly to the doubt in the compulsion neurosis, in so doing it clogs the boundaries of this field till they become impenetrable. That is why I can say that true psychoanalysis began when the help of hypnotism was renounced.

大家必须也要考虑到，治疗过程中的任何偶然状况会被病人当成干扰加以利用——每个使人分心的事件，每次来自病人生活圈的异见权威对分析治疗的品头论足，每次足可加重神经症的疾病或机体症状，病人甚至会借口病情改善而减少努力。这样，大家对于抵抗的形式和手法有了大致但仍不完整的印象，这种抵抗在每一个治疗分析中都是必须会遇到，也必须要克服的。我这么看重这一点，是因为我要告诉大家，神经症的动态概念是建立在神经症病人抵抗治疗经历的基础上的。布罗伊尔和我原来都通过催眠进行心理治疗。布罗伊尔第一位病人的治疗始终都处于催眠暗示的情况下，我一开始也用了他的方法。我承认，当时我的研究进展轻松顺利，同时耗时较少。但是研究结果变化无常，因此我最终放弃了催眠疗法。然后，我才醒悟过来，只要用了催眠术，就不可能发现致病的原因。催眠状态使医生察觉不到抵抗的存在。催眠驱走了抵抗行为，为分析工作扫清了一些障碍，但正如强迫性神经症中的自我怀疑一样，这种做法是堵而不疏，等于阻挡了观察的视线。所以我会说，只有不借助催眠，才能开始真正的

精神分析。

But i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sistance thus becomes a matter of such importance, then surely we must give our caution full rein, and follow up any doubts as to whether we are not all too ready in our assumption of their existence. Perhaps there really are neurotic cases in which associations appear for other reasons, perhaps the arguments against our hypothesis really deserve more consideration and we are unjustified in conveniently rejecting all intellectual criticisms of analysis as a resistance. Indeed, ladies and gentlemen, but our judgment was by no means readily arrived at. We had opportunity to observe every critical patient from the first sign of the resistance till after its disappearance. In the course of the treatment, the resistance is moreover constantly changing in intensity. It is always on the increase as we approach a new theme, is strongest at the height of its elaboration, and dies down again when this theme has been abandoned. Furthermore, unless we have made some unusual and awkward technical error, we never have to deal with the full measure of resistance of which the patient is capable. We could therefore convince ourselves that the same man took up and discarded his critical attitude innumerable times in the course of the analysis. Whenever we are on the point of bringing before his consciousness some piece of unconscious material which is especially painful to him, then he is critical in the extreme. Even though he had previously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a great deal, nevertheless all record of these gains seems now to have been wiped out. He may, in his desire to resist at any cost, present a picture of veritable emotional feeblemindedness. If one succeeds in helping him to overcome this new resistance, then he regains his insight and his understanding. Thus his criticism is not an independent function to be respected as such; it plays the role of

handy-man to his emotional attitude and is guided by his resistance. If something displeases him, he can defend himself against it very ingeniously and appear most critical. But if something strikes his fancy, then he may show himself easily convinced. Perhaps none of us are very different, and the patient under analysis shows this dependence of the intellect on the emotional life so plainly only because, under the analysis, he is so hard pressed.

但是，既然抵抗的确认成了此等重要的事由，我们自然必须慎重行事，要秉持怀疑的态度，不能太过轻率地假定它的存在。也许，有一些神经症病例中的联想实际上有其他原因，也许反对我们主张的理由确实需要深入思考，我们任意将所有对分析治疗的理性批判都定性为抵抗，是不公平的。确实如此，女士们、先生们，但我们的判断能力还欠火候。我们有机会观察了每位挑剔病人的抵抗，从第一个信号直到它消失为止。在治疗过程中，抵抗的强度会不断变化。当我们触及一个新话题时，它总会增强，当话题充分展开时，它达到最强，当话题被撇开后就再次逐渐减弱。而且，只要不犯异常的低级错误，我们一般不会遭到病人能力所及的最强抵抗。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在分析治疗过程中，同一个病人的批判态度经历了无数次的取舍。每当我们让病人意识到一些令其特别苦恼的潜意识材料时，病人的反抗就会达到顶点。即便病人之前已经有相当的理解和认可，所有这些收获似乎都被一扫而空了。他们不惜代价进行抵抗，会表现出一种名副其实的情感意志薄弱。如果我们帮助病人克服了这一新的抵抗行为，他们就能获得洞察力和理解。这样，他们的批判不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独立能力，而是受到情感态度的指使，为抵抗行为支配着。如果有事令其不快，病人可十分狡黠地进行自保，并且会显得十分挑剔。但如果有事使其好奇，病人也可被轻易说服。也许人与人之间并无太大不同，接受分析的病人如此明白地显示了智力对情感生活的依赖性，这只是因为病人在被分析时压力太大。

In what way shall we now account for the observation that the patient so energetically resists our attempts to rid him of his symptoms and to make his psychic processes function in a normal way? We tell ourselves that we have here come up against strong forces which oppose any change in the condition; furthermore, that these forces must be identical with those which originally brought about the condition. Som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functional in the building up of these symptoms, a process which we can now reconstruct by means of our experiences in solving the meaning of the symptoms. We already know from Breuer's observations that the existence of a symptom presupposes that some psychic process was not carried to its normal conclusion, so that it could not become conscious. The symptom is the substitute for that which did not take place. Now we know where the forces whose existence we suspect must operate. Some violent antagonism must have been aroused to prevent the psychic process in question from reaching consciousness, and it therefore remained unconscious. As an unconscious thought it had the power to create a symptom. The same struggle during the analytic treatment opposes anew the efforts to carry this unconscious thought over into consciousness. This process we felt as a resistance. That pathogenic process which is made evident to us through the resistance, we will name *repression* .

对于我们去除病人症状、恢复其正常心理机能的努力，病人如此极力抵抗，对这一个观察结果我们作何解释呢？我们告诉自己，我们在这里遇到一股反对改变现状的力量，而且这股力量一定与当初导致该现状的力量相同。在这些症状的形成过程中，必然有某种过程起到了作用，我们可以运用解释症状意义的经验来重建这一过程。从布罗伊尔的观察结果中我们已经知道，症状的存在意味着，某一心理过程没有正常结束，因而无法进入意识。症状就是未竟之事的替代。对于

我们所猜想的那股力量，我们现在知道它活跃的必然所在了。一种强烈抵触势必会在阻止该心理过程进入意识时显现出来，使其留在潜意识中。作为一种潜意识的想法，它有能力制造出症状。在分析治疗时，把这一潜意识想法带进意识的尝试，遭到了同一股力量的反对。这一过程我们认为是抵抗。在抵抗之中明白无误显现出来的致病过程，我们命名为压抑 。

We are now ready to obtain a more definite idea of this process of repression. It is the preliminary condi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symptoms; it is also a thing for which we have no parallel. If we take as prototype an impulse, a psychological process which is striving to convert itself into action, we know that it may succumb before a rejection, which we call “repudiation” or “condemnation.” In the course of this struggle, the energy which the impulse had at its disposal was withdrawn from it, it becomes powerless; yet it may subsist in the form of a memory. The whole process of decision occurs with the full knowledge of the ego. The state of affairs is very different if we imagine that this same impulse has been subjected to repression. In that case, it would retain its energy and there would be no memory of it left; in addition, the process of repression would be carried out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ego. Through this comparison, however, we have come no nearer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repression.

现在我们来对这一压抑的过程进行更明确的定义。它是症状形成的初步条件，同时它没有类似的现象可比。比如拿冲动当例子，它是一种努力付诸行动的心理过程，我们知道它在拒绝（我们称为“否认”或“谴责”）面前会败下阵来。在这种斗争过程中，冲动丧失了本可支配的能量，变得软弱无力，但仍可在记忆中苟活。自我意识对整个决定过程是完全知晓的。假设冲动换成了压抑，情形将大为不同。在

这种情况下，压抑的能量将得到保存，不会留下记忆，而且压抑的实施过程可不用让自我知晓。不过这样比较下来，我们对压抑的本质并无更深认识。

I now go into the theoretical ideas which alone have shown themselves useful in making the conception of repression more definite. It is above all necessary that we progress from a purely descriptive meaning of the word “unconscious” to its more systematic meaning; that is, we come to a point where we must call the consciousness or unconsciousness of a psychic process only one of its attributes, an attribute which is, moreover, not necessarily unequivocal. If such a process remained unconscious, then this separation from consciousness is perhaps only an indication of the fate to which it has submitted and not this fate itself. To bring this home to us more vividly, let us assume that every psychological process—with one exception, which I will go into later—first exists in an unconscious state or phase and only goes over from this into a conscious phase, much as a photographic picture is first a negative and then becomes a picture by being printed. But not every negative need become a positive, and just as little is it necessary that every unconscious psychological process should be changed into a conscious one. We find it advantageous to express ourselves as follows: Any particular process belongs in the first place to the psychological system of the unconscious; from this system it can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go over into the system of the conscious. The crudest conception of these systems is the one which is most convenient for us, namely, a representation in space. We will compare the system of the unconscious to a large ante-chamber, in which the psychic impulses rub elbows with one another, as separate beings. There opens out of this ante-chamber another, a smaller room, a sort of parlor, which consciousness occupies. But on

the threshold between the two rooms there stands a watchman; he passes on the individual psychic impulses, censors them, and will not let them into the parlor if they do not meet with his approval. You see at once that it makes little difference whether the watchman brushes a single impulse away from the threshold, or whether he drives it out again after it has already entered the parlor. It is a question here only of the extent of his watchfulness, and the timeliness of his judgment. Still working with this simile, we proceed to a further elaboration of our nomenclature. The impulses in the ante-chamber of the unconscious cannot be seen by the conscious, which is in the other room; therefore for the time being they must remain unconscious. When they have succeeded in pressing forward to the threshold, and have been sent back by the watchman, then they are unsuitable for consciousness and we call them *suppressed* . Those impulses, however, which the watchman has permitted to cross the threshold have not necessarily become conscious; for this can happen only if they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attracting to themselves the glance of the conscious. We therefore justifiably call this second room the system of the *fore-conscious* . In this way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conscious retains its purely descriptive sense. Suppression then, for any individual impulse, consists in not being able to get past the watchman from the system of the unconscious to that of the fore-conscious. The watchman himself is long since known to us; we have met him as the resistance which opposed us when we attempted to release the suppression through analytic treatment.

我现在要讲一些理论上的看法，通过它们就能对压抑的概念做更清晰的界定。根本而言，我们有必要将“潜意识”一词从纯描述性意义改进到一种更系统化的意义，就是说，一个心理过程中的意识或潜意识，必须用其中一个属性称呼，而且这个属性不一定是明确的。如果

该心理过程仍处于潜意识状态，那它与意识的隔离也许只是意味着它屈服了一种命运，并不意识着它自身的结局。为了更生动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假设每个心理过程（有一个例外我后面再说）起初存在于潜意识状态或阶段之中，只能由此进入意识状态，就像摄影照片原先是底片，被冲印出来才成了照片。但并非每一张底片都需要印出正片，同样，未必每个潜意识心理过程都需要变成意识。这样表述更有效：任一特定的心理过程在起初都归属于潜意识的心理体系，在某些条件下它可以从此体系转入意识体系。对这两个体系最自然的形容，对我们也是最简便的形容，是空间的比喻。我们把潜意识体系比作一间宽敞的前厅，其中若干独立的心理冲动济济一堂。在前厅旁开着一个小房间，类似客厅，它正是意识的据点。但在两间屋子之间的门槛上站立着一个警卫，他挨个评判、审查这些心理冲动，一有不满意便不许其进入客厅。大家马上就明白了，这个警卫或把单个心理问题从门槛上驱走，或在它进入客厅后再把它轰出来，这是没什么差别的。这里只涉及到审查的严格程度和判断的及时程度。我们还用这个比方详细讲解我们的命名方法。在潜意识前厅中的心理冲动，在另一房间的意识是看不到的，因此它们暂时滞留在潜意识中。当它们成功挤到门槛边，但被警卫送回时，它们是不合适意识的，所以被称为被压抑。然而，那些获得警卫允许跨过门槛的心理冲动并不一定成为意识，它们只有成功吸引意识的注意后才有可能。因此，我们就顺理成章地将第二间屋子称为前意识 。这样，转变为意识的过程就仍保留了纯粹描述性意义。对任何单一冲动的压抑，就主要表现为无法通过警卫审核，不能从潜意识体系进入前意识体系的过程。这个警卫已经是我们的老熟人了，当我们试图通过分析治疗去除压抑时，跳出来反对我们的那个抵抗者就是它。

Now I know you will say that these conceptions are as crude as they are fantastic, and not at all permissible in a scientific discussion. I know they are crude—indeed, we even know that they are incorrect, and if we are not very much mistaken we have a better substitute for them in readiness. Whether they will continue

then to appear so fantastic to you I do not know. For the time being, they are useful conceptions, similar to the manikin *Ampère* who swims in the stream of the electric current. In so far as they are helpful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our observation, they are by no means to be despised. I should like to assure you that these crude assumptions go far in approximating the actual situation—the two rooms, the watchman on the threshold between the two, and consciousness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room in the role of an onlooker. I should also like to hear you admit that our designations —*unconscious* , *fore-conscious* , and *conscious* are much less likely to arouse prejudice, and are easier to justify than others that have been used or suggested—such as *sub-conscious* , *inter-conscious* , *between-conscious* , etc.

现在，我知道大家会说，这些概念固然新奇，但很粗糙，在科学探讨中也未必全部合适。我知道它们很粗糙——其实我们甚至知道它们不太准确，如果我们错得不算太离谱，倒也乐得用一个更好的概念去替代。至于大家是否依然会觉得新奇，我就不得而知了。就目前而言，它们是有益的概念，就像把安培比喻成在电流中游泳的小人。只要它们有利于理解我们的研究结论，就不能鄙视它们。我想让大家放心，这些粗糙的假设与实际情境非常接近——两间屋子、门槛上的警卫和在第二间屋子一端旁观的意识。我也希望大家认可，我们的命名——潜意识 、前意识 和意识 是不太可能导致误会的，也比其它一些使用过或提议过的术语合理，比如下意识 、交互意识 、过渡意识 ，等等。

This become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to me if you should warn me that this arrangement of the psychic apparatus, such as I have assumed in the explanation of neurotic symptoms, must be generally applicable and must hold for normal functioning as well.

In that, of course, you are right. We cannot follow this up at present, but our interest in the psycholog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mptom must be enormously increased if through the study of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we have the prospect of finding a key to the normal psychic occurrences which have been so well concealed.

大家如果跟我提议，我在神经性症状解释时假设的这一种心理结构排列必然是通用的，一定也适用于正常心理机能的运行，那么这些概念就更能显出重要意义了。大家的这种看法当然是正确的。我们现在不能展开讲，但是，如果我们能通过研究病态条件进而有希望去了解隐藏颇深的正常心理活动，对于症状发展心理学的关注必将大大增加。

You will probably recognize what it is that supports our assumptions concerning these two systems and their relation to consciousness. The watchman between the unconscious and the fore-conscious is none other than the censor under whose control we found the manifest dream to obtain its form. The residue of the day's experiences, which we found were the stimuli which set off the dream, are fore-conscious materials which at night, during sleep, had co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unconscious and suppressed wishes. Borne along by the energy of the wish, these stimuli were able to build the latent dream.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unconscious system this material was worked over, went through an elaboration and displacement such as the normal psychic life or, better said, the fore-conscious system, either does not know at all or tolerates only exceptionally. In our ey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of the two systems were betrayed by this difference in their functioning. The dependent relation between the fore-conscious and the conscious was to us only an indication that it must belong to one of the two

systems. The dream is by no means a pathological phenomenon; it may appear in every healthy pers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leep. Any assumption as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psychic apparatus which covers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the dream and the neurotic symptom has also an undeniable claim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any theory of normal psychic life.

大家大概可以看出是什么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关于两个体系和它们与意识之间的关系）。潜意识和前意识之间的警卫，无非就是我们知道的梦的审查，在它的控制下，显梦才得以成型。我们发现，白天经历的遗念是引发梦的刺激，就是前意识的材料，它在夜间睡眠过程中，在潜意识影响下出现、并压抑了愿望。正是承载了愿望的能量，这些刺激才能建立起隐梦。在潜意识体系的操控下，这个材料被重新整合，经历了凝缩和移置等过程，对此，正常心理生活，或更确切地说是前意识体系一无所知，或只是破例允许了。在我们看来，两个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的不同，显露了它们各自的特征。前意识对意识的依附关系，对我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它必须要归属两个体系之一。梦并非一种病态现象，它在每个健康人的睡眠状态下都可发生。关于心理运行结构适用于梦和神经性症状的假设，毫无疑问也是任何正常心理生活理论应该正视的主张。

So much, then, for suppression. It is, however, only a prerequisite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symptom. We know that the symptom serves as a substitute for a process kept back by suppression. Yet it is no simple matter to bridge this gap between the suppress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ubstitute. We have first to answer several questions on other aspects of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suppression and its substantiation: What kind of psychological stimuli are at the basis of the suppression; by what forces is it achieved; for what motives? On these matters we have

only one insight that we can go by. We learned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resistance that it grows out of the forces of the “I,” in other words from obvious and latent traits of character. It must be from the same traits also that suppression derived support; at least they played a part in its development. All further knowledge is still withheld from us.

关于压抑就讲到这里。不过，它只是症状演变的一个前提条件。我们知道，压抑行为隐瞒了一个心理过程，症状就是对该过程的替代。但是要搞懂压抑及替代过程之间的关系谈何容易。关于压抑及其证明的问题，我们先要回答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压抑的起源是哪种心理刺激？它通过何种力量得以实现？它有哪些动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只有一个见解可资参考。我们在研究抵抗行为时发现，抵抗诞生于“我”的力量，换言之，是来自显然和隐含的个性特征。同理，它们一定也是支持压抑行为的力量，至少对其形成起了一定作用。对其他问题的认识，我们仍理不清头绪。

A second observation, for which I have already prepared, will help us further at this point. By means of analysis we can assign one very general purpose to the neurotic symptom. This is of course nothing new to you. I have already shown it to you in the two cases of neuroses. But, to be sure,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wo cases! You have the right to demand that it be shown to you innumerable times. But I am unable to do this. Here again your own experience must step in, or your belief, which may in this matter rely upon the unanimous account of all psychoanalysts.

我还准备了另一个观察结果，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一点上加深认识。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神经性症状的一个普遍目的。这对大家

来说肯定不陌生。我在两个神经症病例中已经跟大家说明过了。但是，老实说，区区两个例子有何意义！大家有理由要求用大量病例加以验证。但是恕我不能从命。这里再一次要求大家依据自身经验作出判断，甚或要凭借信念，相信所有精神分析学者的一致结论。

You will remember that in these two cases, whose symptoms we subjected to searching investigation, the analysis introduced us to the most intimate sexual life of these patients. In the first case, moreover, we could identify with unusual clearness the purpose or tendency of the symptoms under investigation. Perhaps in the second case it was slightly covered by another factor—one we will consider later. Now, the same thing that we saw in these two examples we would see in all other cases that we subjected to analysis. Each time, through analysis, we would be introduced to the sexual wishe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patient, and every time we would have to conclude that their symptoms served the same purpose. This purpose shows itself to be the satisfaction of sexual wishes; the symptoms serve as a sexual satisfaction for the patient, they are a substitute for such satisfactions as they miss in reality.

大家记得，在这两个病例中，我们在查究它们的症状时，通过分析发现了病人最隐密的性生活。而且在第一个病例中，我们通过调查，可以异常清晰地发现症状的目的或倾向。第二个病例也许被另一个因素稍许遮掩住了——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说。现在，我们在两个病例中看到的同样事实，可以在所有纳入分析的病例中看得到。通过分析研究，我们每次都可以发现病人在性方面的愿望和经历，每次都势必推断出他们的症状有着同一目的。这个目的自身显示了对性愿望的满足，症状是满足病人的性需求，它们是病人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满足。

Recall the compulsive act of our first patient. The woman longs for her intensely beloved husband, with whom she cannot share her life because of his shortcoming and weaknesses. She feels she must remain true to him, she can give his place to no one else. Her compulsive symptom affords her that for which she pines, ennobles her husband, denies and corrects his weaknesses—above all, his impotence. This symptom is fundamentally a wish-fulfillment, exactly as is a dream; moreover, it is what a dream not always is, an erotic wish-fulfillment. In the case of our second patient you can see that one of the component purposes of her ceremonial was the prevention of the intercourse of her parents or the hindrance of the creation of a new child thereby. You have perhaps also guessed that essentially she strove to put herself in the place of her mother. Here again we find the removal of disturbances to sexual satisfaction and the fulfillment of personal sexual wishes. We shall soon turn to the complications of whose existence we have given you several indications.

回想一下第一个病人的强迫性行动。这位女子深爱自己的丈夫，思念着他，但却因为他的缺陷或弱点不能与之共度人生。她甘心为他守身如玉，芳心不愿许他人。她的强迫性症状满足了她的期许，美化了她的丈夫，改正了他的弱点——最根本的是他的不举。这个症状与梦类似，基本上是一种愿望实现，而且不是梦一直会有的，即情欲愿望的实现。在第二个病人身上，大家可以看出，她的睡前仪式的复杂目的之一是阻止父母交媾或防止由此导致的新生儿诞生。大家也许也会猜想，她根本上是在努力替代母亲的位置。我们发现，这个症状目的在于消除性满足的干扰因素、实现个人性方面的愿望。这个症状的复杂特点，我已经给过几次提示，马上来揭晓。

I do not want to make reservations as to the universal

applicability of these declarations later on, and therefore I wish to call to your attention the fact that everything that I say here about suppression, symptom-development and symptom-interpretation has been learned from three types of neuroses—anxiety-hysteria, conversion-hysteria, and compulsion-neuroses—and for the time being is relevant to these forms only. These three conditions, which we are in the habit of combining into one group under the name of "*transference neuroses* ," also limit the field open to psychoanalytic therapy. The other neuroses have not been nearly so well studied by psychoanalysis—in one group, in fact, the impossibility of therapeutic influence has been the reason for the neglect. But you must not forget that psychoanalysis is still a very young science, that it demands much time and care in preparation for it, that not long ago it was still in the cradle, so to speak. Yet at all points we are about to penetrate in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ose other conditions which are not transference neuroses. I hope I shall still be able to speak to you of the developments that our assumptions and results have undergone by being correlated with this new material, and to show you that these further studies have not led to contradictions but rather to the production of still greater uniformity. Granted that everything, then, that has been said here, holds good for the three transference neuroses, allow me to add a new bit of information to the evaluation of its symptoms.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uses of the disease discloses a result that may be confined into the formula: in some way or other these patients fell ill through *self-denial* when reality withheld from them the satisfaction of their sexual wishes. You recognize how excellently well these two results are found to agree. The symptoms must be understood, then, as a substitute satisfaction for that which is missed in life.

关于这些主张是否普遍适用，我不想在事后再开例外条件，所以我希望大家注意，这里谈到的所有关于压抑、症状发展和症状解释的内容，都是从三类神经症中发现的——焦虑型癔症、转换型癔症以及强迫性神经症，目前暂以这三类病症为限。关于这三种病症，我们习惯统称为“移情类神经症 ”，精神分析治疗也仅限于这一范围。精神分析对于其他神经症的研究并不理想——事实上，对于一大类症状，疗治无方正是我们不作研究的原因。不过大家别忘了，精神分析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可以说它不久前尚在摇篮之中，需要假以时日，加以细心培育。然而，对于非移情类神经症的其他病症，我们也即将获得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我期望未来为大家讲解我们的假说和结论在新情况下获得的发展，并证明，这些新研究不会产生矛盾，而是体现了更广泛的一致性。这样，先假定这里所讲的内容适用于这三种移情类神经症，然后容我再补充一点关于症状演变的情况。通过病症成因的对比研究发现了一个结论，可表达为下列程式：当病人的性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会产生自我剥夺 ，从而生病。大家能看出两个结论是多么契合。这样，症状必然会被理解为对生活中缺失的满足的替代。

To be sure, there are all kinds of objections possible to the declaration that neurotic symptoms are substitutes for sexual satisfaction. I shall still go into two of them today. If you yourself have analytically examined a fairly large number of neurotics you will perhaps gravely inform me that in one class of cases this is not at all applicable, the symptoms appear rather to have the opposite purpose, to exclude sexual satisfaction, or discontinue it. I shall not deny the correctness of your interpretation. The psychoanalytic content has a habit of being more complicated than we should like to have it. Had it been so simple, perhaps we should have had no need for psychoanalysis to bring it to light. As a matter of fact, some of the traits of the ceremonial of our second patient may be recognized as of this ascetic nature, inimical to sexual satisfaction;

for example, the fact that she removes the clocks, which have the magic qualities of preventing nightly erections, or that she tries to prevent the falling and breaking of vessels, which symbolizes a protection of her virginity. In other cases of bed-ceremonials which I was able to analyze, this negative character was far more evident; the ceremonial might consist throughout of protective regulations against sexual recollections and tempt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often discovered in psychoanalysis that opposites do not mean contradictions. We might extend our assertion and say the symptoms purpose either a sexual satisfaction or a guard against it; that in hysteria the positive wish-fulfillment takes precedence, while in the compulsion neuroses the negative, ascetic characteristics have the ascendancy. We have not yet been able to speak of that aspect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symptoms, their two-sidedness, or polarity, which enables them to serve this double purpose, both the sexual satisfaction and its opposite. The symptoms are, as we shall see, compromise results, arising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two opposed tendencies; they represent not only the suppressed force but also the suppressing factor, which was originally potent in bringing about the negation. The result may then favor either one side or the other, but seldom is one of the influences entirely lacking. In cases of hysteria, the meeting of the two purposes in the same symptom is most often achieved. In compulsion-neuroses, the two parts often become distinct; the symptom then has a double meaning, it consists of two actions, one following the other, one releasing the other. It will not be so easy to put aside a further misgiving. If you should look over a large number of symptom-interpretations, you would probably judge offhand that the conception of a sexual substitute-satisfaction has been stretched to its utmost limits in these cases. You will not hesitate to emphasize that these symptoms offer nothing in the way of actual satisfaction, that often enough they are limited to giving

fresh life to sensations or phantasies from some sexual complex. Further, you will declare that the apparent sexual satisfaction so often shows a childish and unworthy character, perhaps approximates an act of onanism, or is reminiscent of filthy naughtiness, habits that are already forbidden and broken in childhood. Finally, you will express your surprise that one should designate as a sexual satisfaction appetites which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horrible or ghastly, even unnatural. As to these last points, we shall come to no agreement until we have submitted man's sexual life to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thus ascertained what one is justified in calling sexual.

实际上，对于“神经症症状是性满足的替代”这一主张有各种反对意见。我今天仍会讲两条。大家要是自己分析检验了相当数量的神经症后，也许会郑重地告知我，有一类病例并不适用于此，它们的症状反而显现出相反目的，即排斥或终止性满足。我不否认这一解释的正确性。精神分析的内容常常比我们期待的更复杂。如果症状太简单，也许我们就不用靠精神分析来认识它了。实际上，我们第二位病人的睡前仪式的一些特性可以视为具有禁欲性，或对性满足的反感，比如，她移开钟表就有防止夜间性兴奋的神奇意味，或是她企图防止花瓶掉落和摔碎，也象征着对童贞的自保。在我分析到的其他睡前仪式病例中，这种消极特性更为明显，仪式内容始终是对性的回忆和诱惑的防范措施。然而，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时常会发现，对立的情形并不证明观点的矛盾。我们可以扩展我们的主张，认为症状目的是性满足或防止性满足，在癔症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是积极的愿望实现，而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则由消极的、禁欲的特性起主导作用。我们还没讲到症状机制的一个特点，即其两面性或两极性，它使得症状能够行使双重目的，即性满足和禁欲。我们应该能看出，症状是两种相反倾向纠缠后的折衷结果，它们不仅代表了被压抑的力量，也代表了压抑的因素，它是引发反对的明显根源。结果可能偏向于一方或另一方，但任何一方的影响完全缺失的情况很少见。在癔症中，同一症状中两种目

的交织的情况是极为常见的。在强迫性神经症中，两种目的通常区分明显，这样症状就具有双重意义，包括两种互相依存、互相掣肘的行为。另外，还有一个难以打消的担忧。大家查阅大量症状解释案例后，大概会不假思索地断言，性满足替代论在这些解释中被夸大到了极点。大家会毫不犹豫地强调，这些症状并没有提供任何实际满足，而通常仅止于激活感官，或重现某一性情结中的幻想。而且大家会宣称，表面上的性满足常常体现了幼稚和无聊的特性，也许类似于手淫行为，或让人联想起早在童年就终止或被禁止的下流顽皮的习惯。最后，大家会说，把一种只能称为可怕或讨厌、甚至是变态的行为称为性满足的渴望，这太令人愕然。关于这些说法我们可以求同存异，等到我们对人类性生活进行透彻研究，明确界定性生活的合理范围后再做定论。

Twentieth Lecture　The Sexual Life of Man

第二十讲　人类的性生活

One might think we could take for granted what we are to understand by the term “sexual.” Of course, the sexual is the indecent, which we must not talk about. I have been told that the pupils of a famous psychiatrist once took the trouble to convince their teacher that the symptoms of hysteria very frequently represent sexual matters. With this intention they took him to the bedside of a woman suffering from hysteria, whose attacks were unmistakable imitations of the act of delivery. He, however, threw aside their suggestion with the remark, “a delivery is nothing sexual.” Assuredly, a delivery need not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be indecent.

关于“性”的定义，人们可能是想当然地在理解。当然，性是羞耻之事，不可谈论。有人曾经告诉我，一位知名精神病学家的学生颇费心思地向老师证明，癔症大多体现了性的问题。带着这样的企图，他们把他带到一位患有癔症的女病人床前，她发病时的举动明摆着是在模仿分娩动作。然而他用一句话打发了他们的暗示：“分娩不是一种性活动。”确实，分娩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羞耻。

I see that you take it amiss that I jest about such serious matters. But this is not altogether a jest. In all seriousness, it is not altogether easy to define the concept “sexual.” Perhaps the only accurate definition would be everything that is connected wi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exes; but this you may find too general

and too colorless. If you emphasize the sexual act as the central factor, you might say that everything is sexual which seeks to obtain sensual excitement from the body and especially from the sexual organs of the opposite sex, and which aims toward the union of the genital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xual act. But then you are really very close to the comparison of sexual and indecent, and the act of delivery is not sexual. But if you think of the function of reproduction as the nucleus of sexuality you are in danger of excluding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do not aim at reproduction but are certainly sexual, such as onanism or even kissing. But we are prepared to realize that attempts at definition always lead to difficulties; let us give up the attempt to achieve the unusual in our particular case. We may suspect tha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sexual” something occurred which resulted in a false disguise. On the whole, we are quite well oriented as to what people call sexual.

大家会错以为我在如此严肃问题上开玩笑。但是这并不完全是玩笑。严肃地说，对性的概念作出定义并非易事。唯一可明确的大概是性别差异等相关事情，但是这样大家会觉得过于宽泛和毫无特色。如果将性的行动看作核心要素，就可以说，所有从身体、尤其是从异性性器官中寻求性刺激，以性器官结合和实施性行动为诉求的活动，都可以称为性活动。但这种说法几乎就是把性与羞耻之事挂钩，分娩行动也算不上是性活动了。但是，如果把生殖功能看作性的核心意义，就排除了很多不以生殖为目标但确实与性有关的活动，比如手淫、甚至接吻。不过，尝试定义某事总是困难的，对此我们早有心理准备，在性这个特殊话题上想要有所突破的尝试，放弃也罢。我们不禁觉得，在性观念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些假象。总的来说，我们对人们的性观念还是有大致认识的。

The inclusion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 in our concept “sexual” amply suffices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in ordinary life: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sexes, the attainment of sexual excitement, the function of reproducti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an indecency that must be kept concealed. But this is no longer satisfactory to science. For through careful examinations, rendered possible only by the sacrifices and the unselfishness of the subjects, we have come in contact with groups of human beings whose sexual life deviates strikingly from the average. One group among them, the “perverse,” have, as it were, crossed of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xes from their program. Only the same sex can arouse their sexual desires; the other sex, even the sexual parts, no longer serve as objects for their sexual desires, and in extreme cases, become a subject for disgust. They have to that extent, of course, foregone any participation in reproduction. We call such persons homosexual or inverted. Often, though not always, they are men and women of high physical,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who are affected only with this one portentous abnormality. Through their scientific leaders they proclaim themselves to be a special species of mankind, “a third sex,” which shares equal rights with the two other sexes. Perhaps we shall have occasion to examine their claims critically. Of course they are not, as they would like to claim, the “elect” of humanity, but comprise just as many worthless second-rate individuals as those who possess a different sexual organization.

性观念中对普通生活有实际意义的内容，包含了下列因素：两性差异、获得性刺激、生殖功能，以及羞于启齿的特征。但科学已经不再满足于此。经过缜密研究（需要研究对象的无私奉献才有可能实施），我们接触到了性生活显著异于常人的人群。其中一类是所谓“性倒错者”，他们的性生活中去除了两性因素。只有同性能引起他

们的性欲，而异性甚至异性的性器官都不再是他们的泄欲对象，在有些极端案例中，它们甚至会成为厌恶的对象。到这种程度后，他们自然就不再参与生殖活动。我们称这类人为同性恋或性倒错者。他们通常是（但不全是）一些在体格、智商和道德等方面发展水平较高的男性和女性，只有这一个重要反常之处。在他们的科学界意见领袖的影响下，他们自称为特殊人种，即“第三性”，与其他两性享有同等权利。我们有机会再来评价他们的主张。当然，他们并非自称的“人中龙凤”，跟异性恋一样，他们当中也不乏庸碌之辈。

At any rate, this type among the perverse seek to achieve the same ends with the object of their desires as do normal people. But in the same group there exists a long succession of abnormal individuals whose sexual activities are more and more alien to what seems desirable to the sensible person. In their manifold strangeness they seem comparable only to the grotesque freaks that P. Breughel painted as the temptation of Saint Anthony, or the forgotten gods and believers that G. Flaubert pictures in the long procession that passes before his pious penitent. This ill-assorted array fairly clamors for orderly classification if it is not to bewilder our senses. We first divide them, on the one hand, into those whose sexual object has changed, as is the case with homosexualists, and, on the other, those whose sexual aim has changed. Those of the first group have dispensed with the mutual union of the genital organs, and have, as one of the partners of the act, replaced the genitals by another organ or part of the body; they have thus overcome both the short-comings of organic structure and the usual disgust involved. There are others of this group who still retain the genitals as their object, but not by virtue of their sexual function; they participate for anatomic reasons or rather by reason of their proximity. By means of these individuals we realize that the functions of excretion, which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ld are

hushed away as indecent, still remain capable of drawing complete sexual interest on themselves. There are still others who have relinquished the genitals entirely as an objective, have raised another part of the body to serve as the goal of their desire; the woman's breast, the foot, the tress of hair. There are also the fetishists, to whom the body part means nothing, who are gratified by a garment, a piece of white linen, a shoe. And finally there are persons who seek the whole object but with certain peculiar or horrible demands: even those who covet a defenseless corpse for instance, which they themselves must criminally compel to satisfy their desire. But enough of these horrors.

无论如何，性倒错人群对于性欲对象的追求目标与普通人并无两样。但在这一类人中存在着各类反常人群，他们的性活动与正常人的兴趣相去甚远。他们的反常特征各不相同，只有博鲁盖尔画笔下诱惑圣安东尼的各种怪物，或是福楼拜笔下虔诚忏悔者面前走过的一长队过气神仙和信徒才可与他们相比。为不致使人混淆不清，必须厘清这一混杂人群的分类。一方面，首先要把性对象变化者归为一类，比如同性恋者；另一方面，把性诉求变化者归为一类。第一类人群已经排除了两性生殖器的交合，性活动中的一方用身体其他器官或部位代替性器官，以此克服了器官构造缺陷，也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羞耻感。这一类人群中另有一种人仍以性器官为对象，但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性机能，而是出于生理性原因，或可说是相近的功能。我们在这类人身上看到，比如排泄功能这种我们在自小教育中被斥为不雅的事情，对他们而言仍可完全引起性致。还有一些人完全舍弃以性器官为对象，而是将其他身体部位作为泄欲对象，比如女乳、脚部或发绺等。还有一些恋物癖者对肉体毫无兴趣，只迷恋一件衣服、一块白色布匹或一只鞋等物品。最后，还有一类人虽追求完整的性对象，却有一些特殊癖好或骇人需求：比如恋尸者，他们必然是在犯罪感驱使下获得满足。不提这些骇闻也罢。

Foremost in the second grouping are those perverted ones who have placed as the end of their sexual desire performances normally introductory or preparatory to it. They satisfy their desire by their eyes and hands. They watch or attempt to watch the other individual in his most intimate doings, or uncover those portions of their own bodies which they should conceal in the vague expectation of being rewarded by a similar procedure on the other person's part. Here also belong the enigmatic sadists, whose affectionate strivings know no other goal than to cause their object pain and agony, varying all the way from humiliating suggestions to the harshest physical ill-treatment. As if to balance the scale, we have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sochists, whose sole satisfaction consists in suffering every variety of humiliation and torture, symbolic and real, at the hands of the beloved one. There are still others who combine and confuse a number of these abnormal conditions. Moreover, in both these groups there are those who seek sexual satisfaction in reality, and others who are content merely to imagine such gratification, who need no actual object at all, but can supplant it by their own fantastic creations.

在第二类人群中，首先出场的性倒错者仅以普通人性生活中的预备或起始动作作为其泄欲活动的目标。他们用眼睛和手满足性欲。他们偷窥或企图偷窥他人最私密的活动，或者裸露本该遮掩的身体部位，隐隐期待对方也回报以类似动作。这里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性虐狂，他们的性欲诉求无他，只是要让性对象受苦受痛，施虐手段轻重不一，从言语辱骂一直到最严厉的体罚。另一方面，仿佛要平衡局面似的，又有一些受虐狂，他们唯一的性快乐在于经受性伴侣的各种污辱和折磨，无论是象征性的或是实际的行动。还有一些人身上并存或混合了不少反常特点。而且，在这两大类人群中，有一些人是真正追求这种性满足，而有些人只从幻想中获得满足，他们根本无需实际对象，只凭自己异想天开足以自慰。

There can be not the least doubt that the sexual activities of these individuals are actually found in the absurdities, caprices and horrors that we have examined. Not only do they themselves conceive them as adequate substitutes, but we must recognize that they take the same place in their lives that normal sex gratification occupies in ours, and for which they bring the same sacrifices, often incommensurate with their ends. It is perfectly possible to trace along broad lines as well as in detail in what way these abnormalities follow the normal procedure and how they diverge from it. You will also fi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decency which belongs to the sexual act in these vagaries, only that it is therein magnified to the disreputable.

毋庸置疑，这些人的性活动中存在着前述这些荒唐、反常和骇人的行为。不仅他们把这些行为看成是（性生活的）有效替代，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们在他们的生活中所占地位，与正常性满足在我们生活中所占地位一样，他们为此有着同样的付出，而且常常与其回报不相称。这些反常行为在哪方面与正常过程相似，何以走上歧路，无论从大方向或是细节上，都很可以一探究竟。大家在这些怪异性癖中也能发现羞耻的特征，只是它们夸张到了极不光彩的地步。

Ladies and gentlemen, what attitude are we to assume to these unusual varieties of sex gratification? Nothing at all is achieved by the mere expression of indignation and personal disgust and by the assurance that we do not share these lusts. That is not our concern. We have here a field of observation like any other. Moreover, the evasion that these persons are merely rarities, curiosities, is easily refuted. On the contrary, we are dealing with very frequent and widespread phenomena. If, however, we are told that we must not

permit them to influence our views on sexual life, since they are all aberrations of the sexual instinct, we must meet this with a serious answer. If we fail to understand these abnormal manifestations of sexuality and are unable to relate them to the normal sexual life, then we cannot understand normal sexuality. It is, in short, our unavoidable task to account theoretically for all the potentialities of the perversions we have gone over and to expla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so-called normal sexuality.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对于这些另类性癖好该持何种态度呢？我们仅仅表示愤慨与厌恶，或是断然宣称自己没有这些癖好，并没有解决问题。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而且，这些人只是少数异类的说辞是可以轻易驳斥的。相反，我们面临的是十分常见和广泛的现象。可是如果有人认为，这些性癖背离了性冲动，我们的性生活观不必受到它们的影响，对此我们倒是要郑重回答了。不能正确认识这些反常的性表现，就无法认识正常的性活动。简单讲，理论归纳前面讲到的性倒错现象的种种可能性，并解释其与所谓正常性活动的关系，是我们势在必行的任务。

A penetrating insight due to Ivan Bloch and two new experimental results will help us in this task. Bloch takes exception to the point of view which sees in a perversion a “sign of degeneration”; he proves that such deviations from the aim of the sexual instinct, such loose relations to the object of sexuality, have occurred at all times, among the most primitive and the most highly civilized peoples, and have occasionally achieved toleration and general recognition. The two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obtained in the course of psychoanalytic investigations of neurotics; they will undoubtedly exert a decided influence on our conceptions of sexual perversion.

伊万·布洛赫有一个犀利洞见，另加上我们的两项新实验成果，可以在这个任务中帮助我们。布洛赫反对将性倒错视为“变态征兆”的观点，他证实，这些背离性冲动的行为和与性对象关系松散的行为自古有之，无论在原始部落、还是高度文明的人群中都有，有时还得到了容忍和普遍认可。两项实验结果是在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研究过程中获得的，它们无疑会对我们的性倒错观念起到决定性影响。

We have stated that the neurotic symptoms are substitutions for sexual satisfactions, and I have given you to understand that the proof of this assertion by means of the analysis of symptoms encounters many difficulties. For this statement is only justifiable if, under the term “sexual satisfactions,” we include the so-called perverse sexual ends, since with surprising frequency we find symptoms which can be interpreted only in the light of their activity. The claim of rareness made by the homosexualists or the inverted immediately collapses when we learn that in the case of no single neurotic do we fail to obtain evidence of homosexual tendencies, and that in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ymptoms we find the expression of this latent inversion. Those who call themselves homosexualists are the conscious and manifest inverts, but their number is as nothing before the latent homosexualists. We are forced to regard the desire for an object of one's own sex as a universal aberration of erotic life and to cede increasing importance to it. Of cours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nifest homosexuality and the normal attitude are not thus erased; their practical importance persists, but their theoretic value is greatly decreased. Paranoia, a disturbance which cannot be counted among the transference-neuroses, must in fact be assumed as arising regularly from the attempt to ward off powerful homosexual tendencies. Perhaps you will recall that one of our patients under her compulsive symptoms

acted the part of a man, namely that of her own estranged husband; the production of such symptoms, impersonating the actions of men, is very common to neurotic women. Though this cannot be ascribed directly to homosexuality, it is certainly concerned with its prerequisites.

我们说过，神经性症状是性满足的替代，我也请大家理解，通过症状分析证明这一主张面临着诸多困难。因为，只有把所谓的性倒错行为包含在“性满足”这一术语中，我们的主张才是合理的，这是由于，我们发现一些症状只能用这些行为来解释，且发生频率很惊人。当我们发现每个神经症患者无一例外地具有同性恋倾向，而且在相当多的症状中都发现了这一潜在的性倒错的表现，那么关于同性恋者或性倒错者是少数人的论断就立刻不攻自破了。那些自称为同性恋者的人是有意识的、显性的性倒错者，但他们的数量跟隐性的同性恋者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我们不得不把追求同性对象的性欲求看成是情欲生活变异的一种普遍现象，对它不断加以重视。当然，显性的同性恋和普通的同性恋倾向之间的区别并不能就此抹杀，它们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理论价值却大为降低。实际上我们可以断定，妄想狂（一种失调症，不属于移情类神经症的范畴）常常是由企图抵制强烈的同性恋倾向而引起。大家或许记得我们那位患有强迫性症状的病人，她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男人，也就是和她分居的丈夫，模仿男子举止这一神经性症状特点，在女性神经症患者身上很常见。虽说这个现象不能说与同性恋直接相关，但它与同性恋的前提条件是相关的。

You are probably acquainted with the fact that the neurosis of hysteria may manifest its symptoms in all organic systems and may therefore disturb all functions. Analysis shows that in these symptoms there are expressed all those tendencies termed perverse, which seek to represent the genitals through other organs. These organs behave as substitute genitals; through the study of hysteric

symptoms we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side from their functional activities, the organs of the body have a sexual significance, an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functions is disturbed if the sexual factor claims too much attention. Countless sensations and innervations, which appear as symptoms of hysteria, in organs apparently not concerned with sexuality, are thus discovered as bound up with the fulfillment of perverse sexual desires through the transference of sex instincts to other organs. These symptoms bring home to u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organs used in the consumption of food and in excretion may become the bearers of sexual excitement. We see repeated here the same picture which the perversions have openly and unmistakably lain before us; in hysteria, however, we must make the detour of interpreting symptoms, and in this case the perverse sexual tendencies must be ascribed not to the conscious but to the unconscious life of the individual.

大家也许知道这个事实：癔症的神经性症状可以在全身机体系统中表现出来，从而扰乱各种生理机能。分析显示，在这些症状中，有些表现了性倒错的倾向，用其他器官体现性器官。这些器官成了替代的性器官，我们通过癔症的症状研究推断出，身体的器官除了本身的机能活动外，还被赋予了性方面的作用，而且，当其性作用被过度看重时，其机能运行就会发生紊乱。以癔症症状出现的若干感觉和快感存在于显然与性不相干的器官里，我们进而发现，与之密切相关的现象是，将本能的性需求转移到其它器官，以实现性倒错欲求的满足。这些症状使我们悟到，用来消化和排泄的器官可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性刺激的工具。在这里我们反复看到，性倒错直白无误地展示了同样的情景，不过，我们对癔症症状的解释必须要转个弯，在这种情况下，性倒错倾向一定不能归结于意识，而是本人的潜意识生活。

Among the many symptoms manifested in compulsion neurosis, the most important are those produced by too powerful sadistic tendencies, i.e., sexual tendencies with perverted aim. These sympto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ructure of compulsion neurosis, serve primarily as a rejection of these desires, or they express a struggle between satisfaction and rejection. In this struggle, the satisfaction is never excessively curtailed; it achieves its results in the patient's behavior in a roundabout way, by preference turning against his own person in self-inflicted torture. Other forms of neurosis, characterized by intensive worry, are the expression of an exaggerated sexualization of acts that are ordinarily only preparatory to sexual satisfactions; such are the desires to see, to touch, to investigate. Here is thus explained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the fear of contact and also of the compulsion to wash. An unbelievably large portion of compulsion acts may, in the form of disguised repetitions and modifications, be traced back to onanism, admittedly the only uniform action which accompanies the most varied flights of the sexual imagination.

在强迫性神经症表现的许多症状中，那些由过度强烈的虐待倾向（也就是性诉求倒错的倾向）制造的症状最为重要。这些症状符合强迫性神经症的构成，主要是为了对抗这些欲求，或是体现了满足与对抗的纠结。在这种纠结中，满足从未被过度缩减，它在病人的行为中以迂回曲折方式得逞，宁可使病人饱受自我煎熬。另一些以强烈焦虑为特征的神经症表现的则是一些通常只是预备动作却被夸大为性满足的行为，包括窥视、触摸、探索等欲望。这就解释了害怕接触和强迫性清洗等症状的重要意义。数量惊人的强迫性行动以重复和修正行为为其伪装形式，实则是变相的手淫，手淫是公认的唯一共同的性活动，它伴随着五花八门的性幻想。

It would cost me very little effort to interweave far more closely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version and neurosis, but I believe that what I have said is sufficient for our purposes. We must avoid the error of overestimating th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perverse inclinations in the light of these interpretations of symptoms. You have heard that a neurosis may develop from the denial of normal sexual satisfactions. Through this actual denial the need is forced into the abnormal paths of sex excitement. You will later obtain a better insight into the way this happens. You certainly understand, that through such "*collateral* " hindrance, the perverse tendencies must become more powerful than they would have been if no actual obstacle had been put in the way of a normal sexual satisfac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a similar influence may be recognized in manifest perversions. In many cases, they are provoked or motivated by the fact that too great difficulties stand in the way of normal sexual satisfactions, owing to temporary circumstances or to the permanent institutions of society. In other cases, to be sure, the perverse tendencies are entirely independent of such conditions; they are, as it were, the normal kind of sexual life for the individual in question.

对我来说，要进一步揭示性倒错与神经症的关系并不费功夫，但我觉得我所讲的内容已经足够说明问题。我们一定不能因为神经症的这些解释而过高估计性倒错倾向的频率和强度。大家已经知道，一种神经症可以从对正常性满足的否定中产生。由于这种实际上的否定，性需求被迫寻求反常的性刺激方式。大家以后会对这种发生方式有更深的认识。大家自然能理解，由于发生了这种"附带的 "阻碍，性倒错倾向必然变得更为强烈，如果正常的性满足没有遇到实际障碍的话，这种倾向会相对较弱。实际上，明显的性倒错行为中也有类似影响。在很多案例中，性倒错产生的动机或诱因是由于一些暂时的情况或长期以来的社会制度使得正常性满足困难重重。当然，在另一些病例

中，性倒错与这些情况完全无关，它们可以说是当事人惯常的性生活。

Perhaps you are momentarily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we have confused rather than clarified the relation between normal and perverse sexuality. But keep in mind this consideration. If it is true that a hindrance or withholding of normal sexual satisfaction will bring out perverse tendencies in persons who have not previously shown them, we must assume that these persons must have harbored tendencies akin to perversities—or, if you will, perversities in latent form. This brings us to the second experimental conclusion of which I spoke, namely, that psychoanalytic investigation found it necessary to concern itself with the sexual life of the child, since, in the analysis of symptoms, reminiscences and ideas reverted to the early years of childhood. Whatever we revealed in this manner was corroborated point by point through the direct observation of children. The result was the recognition that all inclinations to perversion have their origin in childhood, that children have tendencies toward them all and practice them in a measure corresponding to their immaturity. Perverse sexuality, in brief, is nothing more than magnified infantile sexuality divided into its separate tendencies.

大家也许暂时会觉得，对于普通和倒错的性行为这两者的关系，我们不但没有弄清楚，反而更加混淆了。但是请考虑下面的说法。如果正常的性满足受阻或被抑制使得以前没有性倒错的人显示出这种倾向，那我们势必可以推断，这些人身上一定隐藏了类似性倒错的倾向——大家如愿意也可称为隐性的性倒错。这就带出了我要讲的第二个实验结论，也就是，精神分析研究发现，有必要考虑当事人童年的性生活，因为在症状分析中的回忆和想法回溯到了幼年时期。我们以此

方式揭示的事实，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都一一得到了验证。这一结论是，我们认识到，所有性倒错行为都有其童年根源，儿童具有一切性倒错倾向，而且实施了与其幼稚程度相符的性倒错行为。总之，性倒错行为不过是幼年的性行为被分化为单独倾向、并被放大而已。

Now you will certainly see these perversions in another light and no longer ignore their relation to the sexual life of man, at the cost, I do not doubt, of surprises and incongruities painful to your emotions. At first you will undoubtedly be disposed to deny everything—the fact that children have something which may be termed sexual life, the truth of our observations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our claim to see in the behavior of children any relation to what is condemned in later years as perversity. Permit me first to explain to you the cause of your reluctance and then to present to you the sum of our observations. It is biologically improbable, even absurd, to assume that children have no sexual life—sexual excitements, desires, and some sort of satisfaction—but that they develop it suddenly between the ages of twelve and fourteen. This would be just as improbable from the viewpoint of biology as to say that they were not born with genitals but developed them only in the period of puberty. The new factor which becomes active in them at the time is the function of reproduction, which avails itself for its own purposes of all the physical and psychic material already present. You commit the error of confusing sexuality with reproduction and thereby block the roa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sexuality, and of perversions and neuroses as well. This error is a prejudice. Oddly enough its source is the fact that you yourselves were children, and as children succumbed to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ducational tasks which society must assume is the control, the restriction of the sexual instinct when it breaks forth as an impulse

toward reproduction; it must be subdued to an individual will that is identical with the mandates of society. In its own interests, accordingly, society would postpone full development until the child has reached a certain stage of intellectual maturity, for education practically ceases with the complete emergence of the sexual impulse. Otherwise the instinct would burst all bounds and the work of culture, achieved with such difficulty, would be shattered. The task of restraining this sexuality is never easy; it succeeds here too poorly and there too well. The motivating force of human society is fundamentally economic; since there is not sufficient nourishment to support its members without work on their part, the number of these members must be limited and their energies diverted from sexual activity to labor. Here, again, we have the eternal struggle for life that has persisted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

现在大家自然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待这些性倒错，不再忽视它们与人类性生活的关系，付出的代价无疑会是震惊、别扭等五味杂陈的感觉。毫无疑问，大家一开始会倾向于否认一切——否认儿童有所谓性生活的事实，否认我们正确的观察结果、否认关于“儿童性行为与日后性倒错行为存在关联”的合理主张。请先容许我解释一下大家反对的原因，然后再讲解我们的观察结果。断定儿童没有性生活（性刺激、性欲和某种满足感）而长到12 - 14岁突然就有了性生活，就生物学而言是不科学的、甚至是荒谬的。从生物学观点看，这种观点与“人出生时没长性器官，到了青春期才会长”的观点一样地不科学。青春期开始活跃的新事物是生殖功能，它会利用已有的生理和心理素材达到自己的目的。大家错误地把性与生殖混为一谈，于是就将理解性行为、性倒错甚至神经症的途径给堵上了。这种错误是一种成见。奇怪的是，它的原因在于，大家本身也曾是儿童，并屈服于教化的影响。社会必然认为，最重要的教育任务之一是对性冲动进行控制和管束，不使其向生殖冲动的方向愈演愈烈，性必须服从于遵守社会规则

的个人意志。相应地，社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延缓儿童的全面发展，直到其心智成熟达到一定程度为止，因为这种教育实际上是在性冲动最强烈时停止的。不然，性冲动会冲破一切限制，我们苦心经营的文明体系将毁于一旦。对性的限制从来都不是件易事，有时过松、有时过紧。人类社会的推动力根本上是经济，由于没有足够资源供养失业人群，必须限制失业人员数量，将他们的精力从性活动转移到劳动上。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自史前时代至今，人类始终在进行着这样的生存抉择。

Experience must have shown educators that the task of guiding the sexual will of the new generation can be solved only by influencing the early sexual life of the child, the period preparatory to puberty, not by awaiting the storm of puberty. With this intention almost all infantile sex activities are forbidden to the child or made distasteful to him; the ideal goal has been to render the life of the child asexual. In the course of time it has really come to be considered asexual, and this point of view has actually been proclaimed by science. In order not to contradict our belief and intentions, we ignore the sexual activity of the child—no slight thing, at that—or are content to interpret it differently. The child is supposed to be pure and innocent, and whoever says otherwise may be condemned as a shameless blasphemer of the tender and sacred feelings of humanity.

经验必然使教育者们懂得，引导下一代性意识的任务只能从孩子的性生活抓起，从青春期前的过渡时期抓起，而不能等到青春期的风暴来袭。有此打算后，大人就会禁止儿童几乎所有幼稚的性活动，或者设法使他们厌恶这些行为，理想目标是使儿童的生活“无性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成为了科学主张。为了不让自己的信仰和目标与事实产生矛盾，我们对儿童的性活动避而不谈——这事非同小可——或是顾

左右而言他。儿童应该是纯洁天真的，反对者就该被斥为诋毁人间慈爱圣洁情感的无耻之徒。

The children are the only ones who do not join in carrying out these conventions, who assert their animal rights, who prove again and again that the road to purity is still before them. It is strange that those who deny the sexuality of children, do not therefore slacken in their educational efforts but rather punish severely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very thing they maintain does not exist, and call it “childish naughtiness.” Theoretically it is highly interesting to observe that the period of life which offers most striking evidence against the biased conception of asexual childhood, is the time up to five or six years of age; after that everything is enveloped by a veil of amnesia, which is rent apart only by thorough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it may previously have given way partially in certain forms of dreams.

唯独儿童是不会去遵守这些规矩的，他们执拗于自己的动物本能，屡屡证明自己离纯洁很遥远。奇怪的是，否认儿童性行为的人并未因此疏于管教，他们虽认为儿童无性，却又严厉惩罚他们性的表示，斥之为“幼稚调皮”。有个观察结果可能会在理论上引起极大关注：为儿童无性论偏见提供最鲜明反面证据的年龄段在5岁或6岁之前，但后来这段往事被逐渐淡忘，只能通过科学研究加以破解，它也可能曾经部分地以一些梦的形式出现。

Now I shall present to you what is most easily recognizable in the sexual life of the child. At first, for the sake of convenience let me explain to you the conception of the libido. Libido, analogous to hunger, is the force through which the instinct, here the sex instinct

(as in the case of hunger it is the instinct to eat) expresses itself. Other conceptions, such as sexual excitement and satisfaction, require no elucidation. You will easily see that interpretation plays the greatest part in disclosing the sexuality of the suckling; in fact you will probably cite this as an objection. These interpretations proceed from a foundation of analytic investigation that trace backwards from a given symptom. The suckling reveals the first sexual impulses in connection with other functions necessary for life. His chief interest, as you know, is directed toward the taking in of food; when it has fallen asleep at its mother's breast, fully satisfied, it bears the expression of blissful content that will come back again in later life after the experience of the sexual orgasm. That of course would be too slight evidence to form the basis of a conclusion. But we observe that the suckling wishes to repeat the act of taking in food without actually demanding more food; he is therefore no longer urged by hunger. We say he is sucking, and the fact that after this he again falls asleep with a blissful expression shows us that the act of sucking in itself has yielded him satisfaction. As you know, he speedily arranges matters so that he cannot fall asleep without sucking. Dr. Lindner, an old pediatrist in Budapest, was the first one to ascertain the sexual nature of this procedure. Persons attending to the child, who surely make no pretensions to a theoretic attitude, seem to judge sucking in a similar manner. They do not doubt that it serves a pleasurable satisfaction, term it naughty, and force the child to relinquish it against his will, and if he will not do so of his own accord, through painful measures. And so we learn that the suckling performs actions that have no object save the obtaining of a sensual gratification. We believe that this gratification is first experienced during the taking in of food, but that he speedily learns to separate it from this condition. The gratification can only be attributed to the excitation of the mouth and lips, hence we call these parts of

the body *erogenous zones* and the pleasure derived from sucking, *sexual* . Probably we shall have to discuss the justification of this name.

现在我跟大家讲解儿童性生活中一些简单易辨的现象。首先，为了便利起见，我先讲一下力比多的概念。力比多与饥饿类似，是本能冲动（这里指性冲动）自我体现的动力（正如饥饿是进食本能的体现）。至于性兴奋和性满足等其他概念则无需说明。不难看出，病理解释在揭示婴儿的性活动上的贡献最大，其实大家可能会以此为由提出异议。这些解释以分析研究为基础展开，从一个已知症状向前溯源。婴儿表现了与必要生存功能相关的起初性冲动。大家知道，婴儿的主要兴趣在于进食，当他们吸完母乳，心满意足地入睡时，会表现出一种享受的状态，这与长大后获得性高潮的表现是一致的。这个证据当然远远不足以支持一个结论。但我们观察到，婴儿希望重复进食动作，却不需要实际摄取更多食物，这时他们不再受到饥饿感的驱使。我们说他们纯粹在做吮吸动作，而且事后也会带着享受的表情入睡，这表示吮吸动作本身给婴儿带来了满足感。大家知道，婴儿很快会习惯成自然，不吮吸就不能入睡。来自布达佩斯的资深儿科医生林德纳最早确认了这一过程具有性的特质。儿童的抚养者们必然没有理论修养，却对婴儿吮吸动作有着相似的看法。他们并不否认这是一种愉快的满足，称之为顽皮，并违背孩子的意愿逼其放弃这一行为，如果孩子不愿照办，就会采取严苛的措施。我们认为，这种满足感起先是在进食中体验到的，但婴儿很快就懂得将它从原先的情况中分离出来。这种满足感只能归因于口唇部的刺激，所以我们称这些身体部位为性敏感区 ，而吮吸带来的快感即为性的 活动。或许，我们应该探讨这一术语的命名理由。

If the suckling could express himself, he would probably recognize the act of sucking at his mother's breast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He is not so far wrong, for in this one act he

satisfies two great needs of life. With no small degree of surprise we learn through psychoanalysis how much of the phys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act is retained through life. The sucking at the mother's breast becomes the term of departure for all of sexual life, the unattained ideal of later sex gratification, to which the imagination often reverts in times of need. The mother's breast is the first object for the sexual instinct; I can scarcely bring home to you how significant this object is for centering on the sexual object in later life, what profound influence it exerts upon the most remote domains of psychic life through evolution and substitution. The suckling, however, soon relinquishes it and fills its place by a part of his own body. The child sucks his thumb or his own tongue. Thereby he renders himself independent of the consent of the outer world in obtaining his sensual satisfactions, and moreover increases the excitement by including a second zone of his body. The erogenous zones are not equally satisfactory; it is therefore an important experience when, as Dr. Lindner puts it, the child while touching his own body discovers the especially excitable genitals, and so finds the way from sucking to onanism.

如果婴儿能表达自己，他们大概会承认，吮吸母亲的乳头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他们并不全是错的，在这个动作中，他们生活中的两个重要需求得到了满足。通过精神分析，我们十分惊讶地发现，这个动作的心理意义在一生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延续。吮吸母亲乳头，成为全部性生活的出发点，是成年人无法企及的性满足理想，在有性需求时常会回想此情景。母亲的乳房是性冲动最初的对象，这个对象对于成人性生活以性对象为中心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它通过演变和替换，对最隐秘的心理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作用真是一言难尽。不过，婴儿不久就放弃了这个对象，用自己身体的一个部位代替。孩子会吮吸自己的手指或舌头。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不依赖于外界而满足自己的感官了，而且能够利用身体另一部位以增强刺激。性敏感

区的敏感度并不相等，因而，正如林德纳医生所言，婴儿通过抚摸自己的身体，发现性器官特别敏感，因而从吮吸转变为手淫，这是一个重要体验。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sucking we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wo decisive characteristics of infantile sexuality. It aris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tisfaction of great organic needs and behaves *auto-erotically* , that is to say, it seeks and finds it objects on its own body. What is most clearly discernible during the taking in of food is partially repeated during excretion. We conclude that the nursling experiences pleasure during the excretion of urine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intestine and that he soon strives to arrange these acts in a way to secure the greatest possible amount of satisfaction by the corresponding excitement of the erogenous membrane zones. Lou Andreas, with her delicate perceptions, has shown how at this point the outer world first intervenes as a hindrance, hostile to the child's desire for satisfaction—the first vague suggestion of outer and inner conflicts. He may not let his excretions pass from him at a moment agreeable to him, but only when other persons set the time. To induce him to renounce these sources of satisfaction, everything relating to these functions is declared indecent and must be conceale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he is to exchange pleasure for social dignity. His own relation to his excretions is originally quite different. He experiences no disgust toward his faeces, values them as a part of his body from which he does not part lightly, for he uses them as the first “present” he can give to persons he esteems particularly. Even after education has succeeded in alienating him from these tendencies, he transfers the evaluation of the faeces to the “present” and to “money.” On the other hand, he appears to regard his achievements in urination with especial pride.

通过对吮吸动作的分析，我们了解了婴儿性活动的两个决定性特征。它的发生原因与重要的生理需求有关，并且它是一种自淫　的行为，就是说，婴儿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探索并发现性的对象。这种现象在婴儿进食时最易察觉，在排泄时多少也能够看到。我们认定，婴儿在大小便时体会到了快感，很快就会使劲运用这些动作，引发性敏感区的皮膜兴奋，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感。卢·安德烈亚斯通过细致观察指出，外界在此时介入阻止，反对婴儿的满足欲求——婴儿第一次模糊地体会到自身与外界的冲突。他们不能任性随时排泄，只能按他人设定的时间行事。为了诱导婴儿放弃这类满足的来源，大人会宣称，一切与排泄功能有关的事都是羞耻的，一定不要声张。这时，婴儿第一次为了面子牺牲了快乐。婴儿自身对于排泄物的态度原本是很不一样的。他们对于自己的粪便并无厌恶感，把它们珍视为自己体内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会把它们作为第一份“礼物”送给自己特别敬爱的人。即使受到教育熏陶放弃了这些嗜好，他们仍将粪便视为“礼物”和“金钱”。另外，他们似乎认为撒尿是特别值得骄傲的成就。

I know that you have been wanting to interrupt me for a long time and to cry: “Enough of these monstrosities! Excretion a source of sexual gratification that even the suckling exploits! Faeces a valuable substance! The anus a sort of genital! We do not believe it, but we understand why children's physicians and pedagogues have decidedly rejected psychoanalysis and its results.” No, you have merely forgotten that it was my intention to present to you infantile sexualit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facts of sexual perversion. Why should you not know that in the case of many grown-ups, homosexuals as well as heterosexuals, the locus of intercourse is transferred from the normal to a more remote portion of the body. And that there are many individuals who confess to a pleasurable sensation of no slight degree in the emptying of the bowels during their entire lives! Children themselves will confirm their interest in the act of defecation and the pleasure in watching the defecation of

another, when they are a few years older and capable of giving expression to their feelings. Of course, if these children have previously been systematically intimidated, they will understand all too well the wisdom of preserving silence on the subject. As for the other things that you do not wish to believe, let me refer you to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and the direct observation of children, and you will realize that it is difficult not to see these things or to see them in a different light. I do not even object to mak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ld-sexuality and sexual perversion quite obvious to you. It is really only natural; if the child has sexual life at all, it must necessarily be perverse, because aside from a few hazy illusions, the child does not know how sexuality gives rise to reproduction.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all perversions, on the other hand, is that they have abandoned reproduction as their aim. We term sexual activity perverse when it has renounced the aim of reproduction and follows the pursuit of pleasure as an independent goal. And so you realize that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xual life lies in its subjugation to the purpose of reproduction. Everything this side of the turning point, everything that has given up this purpose and serves the pursuit of pleasure alone, must carry the term “perverse” and as such be regarded with contempt.

大家一定早就想打断我，喊道：“这些奇谈怪论够了！排泄竟是婴儿引以为乐的性满足来源！粪便竟是有价值的东西！肛门成了一种性器官！我们不相信这些，不过我们明白为什么儿医和教师决意反对精神分析及其结论了。”不是，大家只是忘记了，我的意图是为了讲解婴儿性生活与性倒错行为的关系。大家难道不知道，无论同性恋抑或异性恋，有很多成年人性交的聚焦点不是正常的性器官，而是其他某个较不相关的身体部位。还有，不少人都承认自己在排便时能够体会到不小的快感，一辈子都是！当儿童稍长几岁，能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他们自己会承认，他们喜欢拉便便的感觉，也很高兴看别人拉便

便。当然，如果这些儿童曾被严厉管教过，他们自然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至于其他一些大家不愿相信的事情，请大家去查阅分析研究结果和对儿童的直接观察结果，这样就很容易认可这些事实，或换个角度看待这些事情。我甚至不介意把儿童的性生活与性倒错之间的关系讲明白。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儿童在本质上是有性生活的，它必定是性倒错的，因为，儿童除了一些模糊印象之外，并不懂得性活动与生殖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所有性倒错的共同特征是放弃生殖的诉求。当性活动去除了生殖诉求，以追求快感为独立目标时，我们将这样的性活动定义为性倒错。这样大家认识到，性生活发展的转折点在于消除生殖目的。发生转折后的一切活动放弃了这一目的，单纯追求快感，必然会被冠以“性倒错”或其他轻蔑的称呼。

Permit me, therefore, to continue with my brief presentation of infantile sexuality. What I have told you about two organic systems I could supplement by a discussion of all the others. The sexual life of the child exhausts itself in the exercise of a series of partial instincts which seek, independently of one another, to gain satisfaction from his own body or from an external object. Among these organs the genitals speedily predominate. There are persons who continue the pursuit of satisfaction by means of their own genitals, without the aid of another genital or object, uninterruptedly from the onanism of the suckling to the onanism of necessity which arises in puberty, and even indefinitely beyond that. The theme of onanism alone would occupy u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t offers material for diverse observations.

因此，容许我继续对幼儿性活动进行简短介绍。我已经告诉大家两个器官的情况，还可以继续探讨其他所有的器官。儿童的性生活包括了对一系列的局部性冲动的探索，它们各不相干，或从自身、或从外物获得满足感。在这些器官中，性器官很快就占据了主导位置。不

少人继续通过自身的性器官获取性满足，而不借助他人性器官或其他对象，婴儿期间的手淫不间断地过渡到青春期名副其实的手淫，甚至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单单手淫的话题就够我们研究很长时间了，它为各种观察结果提供了素材。

In spite of my inclination to shorten the theme, I must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sexual curiosity of children. It is most characteristic for child sexuality and significant for the study of neurotic symptoms. The sexual curiosity of children begins very early, sometimes before the third year. It is not connected with the differences of sexes, which means nothing to the child, since the boy, at any rate, ascribes the same male genital to both sexes. When the boy first discovers the primary sexual structure of the female, he tries at first to deny the evidence of his senses, for he cannot conceive a human being who lacks the part of his body that is of such importance to him. Later he is terrified at the possibility revealed to him and he feels the influence of all the former threats, occasioned by his intensive preoccupation with his little organ. He becomes subject to the domination of the castration complex, the formation of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character, provided he remains healthy; of his neurosis, if he becomes diseased; of his resistance, if he is treated analytically. We know that the little girl feels injured on account of her lack of a large, visible penis, envies the boy his possession, and primarily from this motive desires to be a man. This wish manifests itself subsequently in neurosis, arising from some failure in her role as a woman. During childhood, the clitoris of the girl is the equivalent of the penis; it is especially excitable, the zone where auto-erotic satisfaction is achieved. In the transition to womanhood it is most important that the sensations of the clitoris are completely transferred at the right time to the entrance of the vagina. In cases

of so-called sexual anesthesia of women the clitoris has obstinately retained its excitability.

尽管我希望长话短说，但我必须跟大家解释一下儿童对性的好奇心。这是儿童的性活动最显著的特征，同时对神经性症状研究有重要意义。儿童对性的好奇心起源很早，有时在3岁前就有了。这并非是由于性别差异，儿童没有这个概念，至少小男孩觉得男性的性器官是两性都有的。当男孩首次发现女孩的基本性别构造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无法想象有人会没有他那样的器官（那个器官对自己还那样重要）。眼前的事实确认后，他大为恐慌，感到以前频繁摆弄自己的小鸡鸡非常危险。他开始被阉割情结所左右，这个情结的形成，对本人健康时的个性发展、患神经症时的病情发展，以及接受分析治疗时的抵抗行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知道，小女孩会因为没有一个显然可见的阴茎而伤心，羡慕男孩的先天资本，最初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希望成为男人。这种愿望后来会在神经症中体现出来，症状起因是患者无法行使某些女性的职责。在童年时期，女孩的阴蒂等同于阴茎，它特别敏感，是获得自淫满足的区域。在向成年女性过渡时，阴蒂敏感必须及时地完全转为阴道口敏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所谓性冷淡的女性病例中，阴蒂敏感仍顽固地保留了。

The sexual interest of children generally turns first to the mystery of birth—the same problem that is the basis of the questions asked by the sphinx of Thebes. This curiosity is for the most part aroused by the selfish fear of the arrival of a new child. The answer which the nursery has ready for the child, that the stork brings children, is doubted far more frequently than we imagine, even by very young children. The feeling that he has been cheated out of the truth by grown-ups, contributes greatly to the child's sense of solitude and to hi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But the child

is not capable of solving this problem unaided. His undeveloped sexual constitution restricts his ability to understand. At first he assumes that children are produced by a special substance in one's food and does not know that only women can bear children. Later he learns of this limitation and relinquishes the derivation of children from food—a supposition retained in the fairy-tale. The growing child soon notices that the father plays some part in reproduction, but what it is he cannot guess. If, by chance, he is witness of a sexual act, he sees in it an attempt to subjugate, a scuffle, the sadistic miscomprehension of coitus; he does not however relate this act immediately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ld. When he discovers traces of blood on the bedsheets or on the clothing of his mother, he considers them the proof of an injury inflicted by the father.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childhood, he imagines that the sexual organ of the man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evolution of children, but can ascribe only the function of urination to that part of his body.

儿童对性的关注，一般首先会指向出生之谜——这也是斯芬克斯谜题中的基本问题。这种好奇大都源自于担心弟妹出生的私心。对于大人给孩子准备好的答案，比如鹳鸟衔来了小孩，孩子的疑心要比我们想象中大得多，哪怕小小孩也是。被大人们的谎话欺骗的感觉使孩子感到孤独，并寻求独自解决问题。但孩子没有帮助是无法发现答案的。性发育不成熟，束缚了他的理解能力。起初，他会猜想，小孩是由食物中某种特殊物质制造的，不知道只有女性才能生养小孩。后来，他知道了这个限定，就打消了小孩产生于食物这个念头——童话故事里仍有这类说法。孩子年纪渐长，很快意识到父亲在生殖中起了作用，但猜不透作用是什么。如果孩子偶然看到（父母的）一次性行为，他会以为两人在互相制服和打斗，将交媾错误地理解成了虐待，但他不会立刻把这个行为与生小孩联想起来。如果孩子在床单或母亲衣物上发现血迹，他会认为这是父亲伤害母亲的铁证。在童年后期，

孩子会猜到男性的性器官对孕育小孩起了重要作用，但只能根据自己这个器官，把原因归结为排尿作用。

From the very outset children unite in believing that the birth of the child takes place through the anus; that the child therefore appears as a ball of faeces. After anal interests have been proven valueless, he abandons this theory and assumes that the navel opens or that the region between the two breasts is the birthplace of the child. In this way the curious child approaches the knowledge of sexual facts, which, clouded by his ignorance, he often fails to see. In the years prior to puberty he generally receives an incomplete, disparaging explanation which often causes traumatic consequences.

从一开始，孩子们都一致认为孩子是从肛门里生出来的，所以小孩就像一坨粪便。后来对肛门的关注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孩子就放弃了这个说法，猜想肚脐眼会打开，或胸脯中间部位是小孩的出生所在。这样，好奇的孩子就很接近性事真相了，但因为他们年幼无知，自己并不明白这一点。在青春期前的时间里，他们得到的解释一般都是些含糊的、贬低的说法，这常常是导致心理创伤的原因。

You have probably heard that the conception “sexual” is unduly expanded by psychoanalysis in order that it may maintain the hypothesis that all neuroses are due to sexual causes and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symptoms is sexual. You are now in a position to judge whether or not this expansion is unjustifiable. We have expanded the conception sexual only to include the sexual life of children and of perverse persons. That is to say, we have reestablished its proper boundaries. Outside of psychoanalysis

sexuality means only a very limited thing: normal sexual life in the service of reproduction.

大家也许听人议论说，精神分析过度拓展了性的概念，目的在于使其符合“所有神经症的病因都与性相关，症状有性的意义”这一假说。现在大家有能力判断这种拓展是否有失公允了。我们对性观念的拓展，只限于儿童和性倒错者的性生活。在精神分析之外，性的意义非常局限：服务于生殖目标的普通性生活。

Twenty-First Lecture Development of the Libido and Sexual Organizations

第二十一讲　力比多发展及性的组织

I am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I did not succeed in convincing you of the significance of perversions for our conception of sexuality. I should therefore like to clarify and add as much as I can.

我有种感觉，对于性倒错之于性观念的重要意义，大家还是半信半疑。所以，我现在要尽已所能做一些阐释和补充。

It was not only perversions that necessitated an alteration of our conception of sexuality, which aroused such vehement contradiction. The study of infantile sexuality did a great deal more along that line, and its close correspondence to the perversions became decisive for us. But the origin of the expressions of infantile sexuality, unmistakable as they are in later years of childhood, seem to be lost in obscurity. Those who disregard the history of evolution and analytic coherence will dispute the potency of the sexual factor and will infer the agency of generalized forces. Do not forget that as yet we have no generally acknowledged criterion for identifying the sexual nature of an occurrence, unless we assume that we can find it in a relation to the functions of reproduction, and this we must reject as too narrow. The biological criteria, such as the periodicities of twenty-three and twenty-eight days, suggested by W. Fliess, are by no means established; the specific chemical nature

which we can possibly assume for sexual occurrences is still to be discovered. The sexual perversions of adults, on the other hand, are tangible and unambiguous. As their generally accepted nomenclature shows, they are undoubtedly sexual in character; whether we designate them as signs of degeneration, or otherwise, no one has yet had the courage to place them outside the phenomena of sex. They alone justify the assertion that sexuality and reproduction are not coincident, for it is clear that all of them disavow the goal of reproduction.

我们修订性的概念（这引发了轩然大波）其实不仅是为了研究性倒错。儿童性生活的研究在这方面的意义要重要很多，而它与性倒错的密切相关性对我们很关键。儿童性生活在童年后期展露无疑，但婴儿的性表现这一源头却显得朦胧不清。如果不从演化的角度看问题，不在乎分析结果，就会否认儿童生活的性属性，并断定它们并无特殊意义。别忘了，关于一种活动是否具有性意味尚无公认标准，除非生殖功能也算作一种标准，但这太过狭隘了，不宜采用。弗利斯提议的生物学周期标准（23天和28天）也并不成熟；我们推测性活动可能具有特殊的化学特性，但这有待发现。另一方面，成人的性倒错活动却是昭然确证的。它们的公认命名表明它们具有毋庸置疑的性特征，尽管人们把它们称为变态征兆之类，可是没人敢说它们不是性的现象。性倒错本身就足以证明，性和生殖是可以分开的，因为很明显，性倒错行为违背了生殖的目标。

This brings me to an interesting parallel. While “conscious” and “psychic” were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identical, we had to make an essay to widen our conception of the “psychic” to recognize as psychic something that was not conscious. Analogously, when “sexual” and “related to reproduction” (or, in shorter form, “genital”) has been generally considered identical,

psychoanalysis must admit as “sexual” such things as are not “genital,” things which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reproduction. It is only a formal analogy, but it does not lack a deeper basis.

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类比。人们一般认为“意识”和“心理”是一回事，而我们则不得不撰文将“心理”的含义进行拓展，认为它也包括非意识的部分。类似地，一般也将“性”等同于“有关生殖”（或可简化为“生殖器”），而精神分析对性的定义必须包括一些与生殖器或生殖无关的活动。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对比，但其内容也颇具深意。

But if the existence of sexual perversions is such a compelling argument, why has it not long ago had its effect, and settled the question? I really am unable to say. It appears to be because the sexual perversions are subject to a peculiar ban that extends even into theory, and stands in the way of their scientific appreciation. It seems as if no one could forget that they are not only revolting, but even unnatural, dangerous; as if they had a seductive influence and that at bottom one had to stifle a secret envy of those who enjoyed them. As the count who passes judgment in the famous Tannhauser parody admits:

不过，如果性倒错的存在无可争辩，为什么不早点加以重视，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真不知从何说起。可能的原因是，性倒错是一个特殊禁区，它甚至为理论研究所排斥，从而阻碍了科学对它们的认知。看起来，似乎大家都知道性倒错行为不仅可恶，更是变态的、危险的，但它们又散发出一种诱惑力，使人不由在心底里对享受性倒错的人们暗生艳羡之情，又不得不压抑这种心态。正如瓦格纳著名歌剧《唐豪瑟》中那位爱评头论足的伯爵所言：

And in the mount of Venus, his honor slipped his mind,

“在维纳斯的山中，他忘记了礼义廉耻，

It's odd that never happens to people of our kind.

奇怪，我们这些人为何从未有这等事！”

Truthfully speaking, the perverts are rather poor devils who atone most bitterly for the satisfaction they attain with such difficulty.

老实说，性倒错者其实是一些可怜鬼，他们要获得满足很艰难，付出的代价却是极为惨重的。

What makes the perverse activity unmistakably sexual, despite all the strangeness of its object, is that the act in perverse satisfaction most frequently is accompanied by a complete orgasm, and by an ejaculation of the genital product. Of course, this is only true in the case of adults; with children orgasms and genital excretions are hardly possible; they are replaced by rudiments which, again, are not recognized as truly sexual.

虽然性倒错的对象千奇百怪，但性倒错行为无疑是一种性活动，因为性倒错欲求被满足所导致的性高潮和射精也是极为常见的。当然，这仅是成人的情况，儿童不太可能有性高潮和射精现象，只有一些雏形的表现，同样，这些表现的性意味也是不被认可的。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appreciation of sexual perversions, I have something to add. Condemned as they are, sharply as they are contrasted with the normal sexual activity, simple observation shows that rarely is normal sex-life entirely free from one or another of the perverse traits. Even the kiss can be claimed to be perverse, for it consists in the union of two erogenous mouth zones in place of the respective genitals. But no one outlaws it as perverse, it is, on the contrary, admitted in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as a modified suggestion of the sexual act. This very kissing may easily become a complete perversion if it results in such intensity that it is immediately followed by an emission and orgasm—a thing that is not at all unusual. Further, we can learn that handling and gazing upon the object becomes an essential prerequisite to sexual pleasure; that some, in the height of sexual excitation, pinch and bite, that the greatest excitation is not always called forth in lovers by the genitals, but rather by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and so forth. There is no sense in considering persons with single traits of this kind abnormal, and counting them among the perverts. Rather, we recognize more and more clearly that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perversion does not consist in overstepping the sexual aim, nor in a substitution for the genitals, not even in the variety of objects, but simply in the exclusiveness with which these deviations are carried out and by means of which the sexual act that serves reproduction is pushed aside. When the perverse activities serve to prepare or heighten the normal sexual act, they are really no longer perversions. To be sure, the chasm between normal and perverse

sexuality is practically bridged by such facts. The natural result is that normal sexuality takes its origin from something existing prior to it, since certain components of this material are thrown out and others are combined in order to make them subject to a new aim—that of reproduction.

为使大家能全面理解性倒错，我还要补充几点。性倒错虽为世人诟病，且异于普通的性活动，但稍加注意就可看出，普通的性生活中完全没有某种性倒错迹象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甚至连接吻也可视为性倒错行为，因为它是用嘴唇这一性敏感区的接触，代替了生殖器的交合。可是并没有人指责接吻是倒错行为，相反，在戏剧表演中，接吻是对性行为的一种美化的暗示。但接吻动作很容易演变为不折不扣的性倒错行为，前提是接吻强度很大，很快引致性高潮和射精——这种情况也算不得稀奇。再者，性的愉悦始于对性对象的抚摩和注视，有人会在极度性兴奋时，做出掐和咬的动作；而且最强烈的性刺激并不总是来自伴侣的生殖器，而可以是其他身体部位，诸如此类的情形。把具有单一性癖好的人们视为反常而归入性倒错者之列，这是没有道理的。其实，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性倒错的本质，不在于性诉求的背离，也不在于生殖器被取代，甚至不在于性对象的种类，而只在于它单独追求反常的性满足，排斥以生殖为目的性行为。为了准备或提升普通性行为所做的倒错动作，实际上不能称为性倒错行为。可以肯定，这一事实成了普通性行为与性倒错行为之间的联系纽带。由此自然可以推断，普通性生活的起源是其存在之前的经历（指儿童性生活），这个原材料的某些成分被删除，其余成分则被合并，服从于一个新的诉求——生殖。

Before we make use of our knowledge of perversions to concentrate anew and with clearer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infantile sexuality, I must call your attention to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erverse sexuality is as a rule

extraordinarily centralized, its whole action is directed toward one, usually an isolated, goal. A partial instinct has the upper hand. It is either the only one that can be demonstrated or it has subjected the others to its purposes. In this respec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normal and perverse sexuality other than that the ruling partial instincts, and with them the sexual goals, are different. In the one case as well as in the other there is, so to say, a well-organized tyranny, excepting that here one family and there another has appropriated all the power to itself. Infantile sexuality, on the other hand, is on the whole devoid of such centr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its individual component impulses are of equal power, and each independently goes in search of the acquisition of pleasurable excitement. The lack as well as the presence of centralization fit in well with the fact that both the perverse and the normal sexuality originated from the infantile. There are also cases of perverse sexuality that have much more similarity with the infantile, where, independently of one another, numerous partial instincts have forced their way, insisted on their aims, or rather perpetuated them. In these cases it is more correct to speak of infantilism of sexual life than of perversions.

有了性倒错的知识，继续研究婴儿的性活动就有了更清晰的视角；但在此之前，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二者的一个重要区别。一般而言，性倒错行为是非常集中化的，它的一切活动都指向一个目标，且大多为单一目标。占主导地位的只有一种局部性冲动。要么它是唯一可见的冲动，要么其他冲动都服务于它。在这方面，性倒错行为与普通性生活之间，除了主要冲动和性诉求有差异之外，其他没什么不同。打个比方说，两种情况都是组织有素的独裁体制，只是独掌大权的家族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幼儿的性生活大体上缺乏集中性和组织性，各个冲动成分效力相等，独立获取性刺激的快感。无论是缺乏还是富有集中性，都充分说明了，普通性生活和性倒错行为均起源于婴

儿时期。也有一些性倒错的情况与幼儿性生活更为类似，其中许多互相独立的局部冲动顽强地生存着，坚持甚或永远固守自己的诉求。就此而言，称呼这类性生活为性倒错行为，倒不如称为幼稚的性生活更为正确。

Thus prepared we can consider a question which we certainly shall not be spared. People will say to us: “Why are you so set on including within sexuality those manifestations of childhood, out of which the sexual later develops, but which, according to your own admission, are of uncertain origin? Why are you not satisfied rather with the physiological description, and simply say that even in the suckling one may notice activities, such as sucking objects or holding back excrements, which show us that he strives towards an *organic pleasure* ? In that way you would have avoided the estranging conception of sexual life in the tiniest child.” I have nothing to say against organic pleasure; I know that the most extreme excitement of the sexual union is only an organic pleasure derived from the activity of the genitals. But can you tell me when this organic pleasure, originally not differentiated, acquires the sexual character that it undoubtedly does possess in the later phases of development? Do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organic pleasure” than about sexuality? You will answer, the sexual character is acquired when the genitals begin to play their role; sexual means genital. You will even reject the contrary evidence of the perversions by confronting me with the statement that in most perversions it is a matter of achieving the genital orgasm, although by other means than a union of the genitals. You would really command a much better position if you did not regard 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sexual that untenable relation to reproduction seen in the perversions, if you replaced it by activity of the genitals. Then we no longer differ very widely; the genital organs merely

replace other organs. What do you make of the numerous practices which show you that the genitals may be represented by other organs in the attainment of gratification, as is the case in the normal kiss, or the perverse practices of “fast life,” or the symptoms of hysteria? In these neuroses it is quite usual for stimulations, sensations and innervations, even the process of erection, which is localized in the genitals, to be transferred to other distant parts of the body, so that you have nothing to which you can hold a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xual. You will have to decide to follow my example and expand the designation “sexual” to include the strivings of early childhood toward organic pleasure.

有了这些知识准备，我们可以讨论一些势必要面对的问题。有人对我们说：“设若成人性生活的原型是童年期的那些表现，那为什么你既承认它们具有不确定性，又坚决地将它们归类为性活动呢？为什么不只满足于描述其生理特点，就说在婴儿身上也能观察到类似吮吸或憋便等现象，说明他们在追求感官愉悦　呢？这样就可以回避‘幼童也有性生活’这个说法，不致使人反感了。”我对感官愉悦并无异议，我也知道，即便是性交的极致快感也只是生殖器运动产生的感官愉悦。但是大家能否告诉我，这个原本稀松平常的感官愉悦，在后来发育过程中何时获得了理应具备的性特征呢？“感官愉悦”除了性之外还有其他内容吗？大家会说，只有生殖器开始发挥作用时，性的特征才会体现出来，性即意味着与生殖器有关。大家甚至要否认性倒错现象这个反面教材，声称尽管性倒错行为不是借由生殖器的交合，但大多数仍获得了生殖器的高潮。假使大家认为性倒错与生殖的排斥关系不应作为衡量其性特征的标准，应用生殖器的活动取而代之，这个见地倒是有所长进了。这样，我们的分歧就没有那么大了，这不过是生殖器官和其他器官哪个引起愉悦的问题。用其他器官代替生殖器获得性满足的活动很多，例如通常的接吻、放荡的性倒错行为，或癔症的症状，大家对此作何解释呢？在这类神经症的病例中经常会看到，一些属于生殖器的刺激、感官、冲动，甚至勃起过程等，被转移到其他无

关的身体部位，这样大家所坚持的性特征要素都不复存在了。所以大家还是得遵照我的做法，对性的含义进行延展，把幼年期追求感官愉悦的活动也囊括进去。

Now, for my justification, I should like you to give me the time for two more considerations. As you know, we call the doubtful and indefinable pleasure activities of earliest childhood sexual because our analysis of the symptoms leads us to them by way of material that is undeniably sexual. We admit that it need not for that reason in itself be sexual. But take an analogous case. Suppose there were no way to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two dicotyledonous plants from their seeds—the apple tree and the bean. In both cases, however, imagine it possible to follow their evolution from the fully developed plant backwards to the first seedling with two leaf-divisions. The two little leaves are indistinguishable, in both cases they look exactly alike. Shall I conclude from this that they really are the same and that the specific differences between an apple tree and bean plant do not appear until la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plant? Or is it biologically more correct to believe that this difference is already present in the seedling, although the two little leaves show no differences? We do the same thing when we term as sexual the pleasure derived from the activities of the suckling. Whether each and every organic enjoyment may be called sexual, or if besides the sexual there is another that does not deserve this name, is a matter I cannot discuss here. I know too little about organic pleasure and its conditions, and will not be at all surprised if the retrogressive character of the analysis leads us back finally to a generalized factor.

现在，我还可举出两个理由为自己辩护。大家知道，幼儿期追求

快感的活动是可疑而不确定的，把它们定性为性活动是因为，我们的症状分析回溯到它们时，所依据的材料不可否认都与性有关。我承认，这并不能证明它们是性活动。但我们来打一个比方。假设有两种双子叶植物——苹果和豆科，我们无法从种子开始观察它们的生长过程。然而，可以想象两种植物均可从长成的植物回溯其生长演变过程，直到最初刚刚萌发双叶的种子。两片嫩芽确实不易辨别，两种双子叶植物的样子十分相像。但我是否可由此推断它们本无不同，在植物生长后期才产生差异呢？或者，这种差异虽在萌芽的双叶中看不出来，但早在种子里就存在了，这种说法在生物学上是否更准确呢？把婴儿的相关活动定义为性活动，道理是一样的。至于每种感官享受是否都可称为性活动，或者除了性活动之外是否有其他与性无关的活动，这里并无讨论的必要。我对感官愉悦及其条件所知甚少，所以如果分析回溯的结果最终并不具体，这也不足为奇。

One thing more. You have on the whole gained very little for what you are so anxious to maintain, the sexual purity of the child, even when you can convince me that the activities of the suckling had better not be called sexual. For from the third year on, there is no longer any doubt concerning the presence of a sexual life in the child. At this time the genitals already begin to become active; there is perhaps regularly a period of infantile masturbation, in other words, a gratification by means of the genitals. The psychic and social expressions of the sexual life are no longer absent; choice of an object, affectionate preference for certain persons, indeed, a leaning toward one of the two sexes, jealousy—all these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dependently by unprejudiced observation, prior to the advent of psychoanalysis, and confirmed by every careful observer. You will say that you had no doubt as to the early awakening of affection, you will take issue only with its sexual nature.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three and eight have already learned to hide these things, but if you look sharply you can always gather

sufficient evidence of the “sexual” purpose of this affection. What escapes you will be amply supplied by investigation. The sexual goals of this period of life are most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sexual theories, of which I have given you some examples. The perverse nature of some of these goals is the result of the constitutional immaturity of the child, who has not yet discovered the goal of the act of copulation.

还有一点。即使大家可以说服我婴幼儿的活动最好不要归为性活动，但总体而言，大家急于证明儿童与性无关，却苦无依据。因为儿童的性生活自3岁就开始显露无疑。此时生殖器已开始活跃，也许已经有周期性的手淫现象，或者说是用生殖器追求满足。性生活的心理和社交表现也已显现：在性对象的选择上，偏爱某些人或倾向于一个性别，有了嫉妒心——所有这些在精神分析之前已经被客观研究证实，得到所有严谨研究者的确认。大家会说，我们并不怀疑儿童的情感萌芽很早，只是对它的性意味存疑而已。3岁至8岁的儿童已经懂得隐瞒情感，但大家眼尖的话还是能收集到证明情感性意味的充分证据。而大家发现不到的东西，分析研究可给予充分支持。这一生命阶段的性活动目标，与我曾举例说明的同期性表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儿童身体发育不成熟，不懂得性交行为的目的，因而这些性活动的目标具有倒错性。

From about the sixth or the eighth year on a pause in, and reversion of, sexual development is noticeable, which in the cases that reach the highest cultural standard deserves the name of a latent period. The latent period may also fail to appear and there need not be an interruption of sexual activity and sexual interests at any period. Most of the experiences and impulses prior to the latent period then fall victim to the infantile amnesia, the forgetting we have already discussed, which cloaks our earliest childhood and

makes us strangers to it. In every psychoanalysis we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task of leading this forgotten period of life back into memory; one cannot resist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beginning of sexual life it contains furnishes the motive for this forgetting, namely, that this forgetting is a result of suppression.

从6岁或8岁开始，儿童在性方面的发展明显发生停滞或退化，这是文明教化达到峰值的结果，这一时期可称为潜隐期。潜隐期不是非出现不可，而且性活动和性兴趣在任何时期都未必会中断。潜隐期之前的所有体验和冲动烟消云散，原因是我们讨论过的幼儿期记忆丧失，幼年回忆因此被尘封，我们对它不再熟悉。每一个精神分析的任务就是激活这一被遗忘时期的记忆，这不由使人推测，这一时期含有性生活的开端，它便是遗忘的动机，换言之，遗忘是压抑的结果。

The sexual life of the child shows from the third year that it has much in common with that of the adult; it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latter, as we already know, by the lack of stable organization under the primacy of the genitals, by the unavoidable traits of perversion, and, naturally, by the far lesser intensity of the whole impulse. Theoretically the most interesting phases of the sexual development or, as we would rather say, the libido-development, so far as theory is concerned, lie back of this period. This development is so rapidly gone through that perhaps it would never have been possible for direct observation to grasp its fleeting pictures. Psycho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neuroses has for the first time made it possible to discover more remote phases of the libido-development. These are, to be sure, nothing but constructions, but if you wish to carry on psychoanalysis in a practical way you will find that they are necessary and valuable constructions. You will soon understand why pathology may disclose conditions which we would have

overlooked in the normal object.

儿童的性生活表明，3岁开始的性生活与成人的性生活已有诸多相同之处；我们已经知道，前者与后者的差异在于：以生殖器为首的器官组织能力欠稳定；不可避免的倒错特性；冲动的整体强度较弱。理论上，性的发展或力比多发展值得关注的阶段就在这一时期。力比多发展速度非常之快，直接观察不可能看清其稍纵即逝的真相。精神分析的神经症研究，第一次使我们有可能探索力比多更早期的发展阶段。它们目前固然只是一些推论，但是大家如想参与精神分析实践，会发现这些推论是必然的，而且是有意义的。大家很快会明白，为什么病态状态能够揭示一些我们在正常状态中容易忽略的情形。

We can now declare what form the sexual life of the child takes before the primacy of the genitals is established. This primacy is prepared in the first infantile epoch prior to the latent period, and is continuously organized from puberty on. There is in this early period a sort of loose organization, which we shall call *pre-genital* . In the foreground of this phase, however, the partial instincts of the genitals are not prominent, rather the *sadistic* and *anal* . The contrast between *masculine* and *feminine* plays no part as yet, its place is taken by the contrast between *active* and *passive* , which we may designate as the forerunner of sexual polarity, with which it is later fused. That which appears masculine to us in the activity of this phase, observ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later genital stage, is the expression of an instinct to mastery, which may border on cruelty. Impulses with passive goals attach themselves to the erogenous zone of the rectal opening. Most important at this time, curiosity and the instinct to watch are powerful. The genital really takes part in the sexual life only in its role as excretory organ for the bladder. Objects are not lacking to the partial impulses of this

period, but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combine into a single object. The sadistico-anal organization is the step antecedent to the phase of genital primacy. A more penetrating study furnishes proof how much of this is retained for the later and final form, and in what ways its partial instincts are forced into line under the new genital organization. Back of the sadistico-anal phase of libido-development, we get a view of an earlier, even more primitive phase of organization, in which the erogenous mouth-zone plays the chief role. You may surmise that the sexual activity of sucking belongs to it, and may wonder at the intuition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whose art characterized the child, as well as the god Horus, with the finger in his month. Abraham only recently published material concerning the traces which this primitive oral phase has left upon the sexual life of later years.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儿童性生活在生殖器优先权确立前所具有的形式了。这种优先权在潜隐期之前的幼年初期就开始酝酿，从青春期开始形成了常态的组织。它在幼年初期的组织是松散的，我们称为前生殖欲期 。在这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生殖器的局部冲动，而是虐待冲动 和肛门冲动 。阳刚 与阴柔 的差异此时尚未出现，此时起作用的是主动 与被动 的差异，我们可以称为性的两极化差异的前奏，后来这两种差异融合在了一起。从后来生殖欲期的角度看，这一时期阳刚的举动是一种占有本能的体现，很可能演变为虐待行为。目的被动的冲动与肛门的性敏感区密切相关。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好奇心和窥视的冲动很强烈。生殖器在性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只是膀胱的排泄器官。这一期间的局部冲动不乏性对象，但它们未必合为了一个对象。肛门施虐组织就是生殖欲期的先导期。进一步研究搜集到的证据说明了这一组织在后来及最后的形式中保留的程度，以及它的局部冲动是如何被纳入新的生殖器组织之中的。从力比多发展的肛门施虐期的背景中，我们发现了更早期、甚至更初级的组织，其间口腔性敏感区是主要角色。大家可能猜到，吮吸的性活动属于这一时期，古埃及人的

艺术中形容孩童和太阳神荷露斯一样，都是把手指放在嘴里，我们不禁惊叹于他们的直觉。阿伯拉罕最近才发表了关于这一早期的口腔期在后来性生活中遗留痕迹的文章。

I can surmise that these details about sexual organization have burdened your mind more than they have informed you. Perhaps I have again gone into detail too much. But be patient; what you have heard will become more valuable through the uses to which it is later put. Keep well in mind the impression that sexual life, as we call it, the function, of the libido, does not make its appearance as a completed whole, nor does it develop in its own image, but goes through a series of successive phases which are not similar to each other. In fact, it is a developmental sequence, like that from the grub to the butterfly.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development is the subordination of all sexual partial-instincts to the primacy of the genitals, and thereby the subjection of sexuality to the function of reproduction. Originally it is a diffused sexual life, one which consists of independent activities of single partial instincts which strive towards organic gratification. This anarchy is modified by approaches to pregenital organization, first of all the sadistico-anal phase, prior to this the oral phase, which is perhaps the most primitive. Added to this there are the various processes, as yet not well known, which carry over one organization level to the later and more advanced phase. The significanc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euroses, of the long evolutionary path of the libido which carries it over so many grades we shall discuss on another occasion.

可想而知，这些关于性的组织的知识更令大家费解，而不是获益了。也许我又一次讲得过细了。但是请稍安勿躁，现在大家听到的内容，在以后运用到时会更显其价值。要记住，性生活，我们称为力比

多功能，并不是以一个完善的整体出现的，也不是按既定的样貌发展的，而是经历了一系列连续而互不相似的发展阶段。事实上，它是一个发展过程，正如毛虫化蝶的过程。这一发展的转折点是所有局部性冲动从属于生殖器的统治。原本，它只是一个松散的性生活，包括了独立的单一局部冲动追求感觉满足的活动。这种混沌状态因前生殖欲期组织的形成得以改变，最重要的是肛门施虐期，它之前是口腔期，也许是最初阶段。另外还有现在尚不完全清楚的各种过渡过程，比如提升组织水平、上升到更高级阶段。力比多经历了多级变化的漫长演变过程，对于理解神经症的意义，我们将另作讲解。

Today we shall look at another angle of the development, namely the relation of the partial instinct to the object. We shall make a hurried survey of this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pend more time upon a relatively later product. Some of the components of the sex instincts have had an objec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hold fast to it; such are the instinct to mastery (sadism), curiosity, and the impulse to watch. Other impulses which are more clearly attached to specific erogenous zones of the body have this object only in the beginning, as long as they adhere to the functions which are not sexual; they release this object when they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se non-sexual functions. The first object of the oral component of the sexual impulse is the mother's breast, which satisfies the hunger of the infant. By the act of sucking, the erotic component which is also satisfied by the sucking becoming independent, it gives up the foreign object and replaces it by some part of its own body. The oral impulse becomes *auto-erotic* , just as the anal and other erogenous impulses ar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Further development, to express it most briefly, has two goals—first, to give up auto-eroticism, and, again, to substitute for the object of one's own body a foreign object; second, to unify the different objects into a single impulse, replace them by a single

object. To be sure, that can happen only if this single object is itself complete, a body similar to one's own. Nor can it be consummated without leaving behind as useless a large number of the auto-erotic instinctive impulses.

现在我们再从另一角度，即从局部冲动与对象的关系来看这个发展过程。我们先迅速了解一下这个过程，以便花更多时间讲解继它之后的情况。性的本能冲动的一些成分从一开始就有对象，比如占有冲动（虐待）、好奇心以及窥视冲动。另外有些冲动与具体性敏感区的关系更为明显，它们只有在起初具有与性无关的功能时才有对象，一旦脱离了不是性的功能后，它们就放弃了该对象。口腔性冲动的第一个对象是母亲的乳房，是用于满足婴儿的饥饿感。吮吸的动作也使得性冲动得到满足，吮吸由此独立，它放弃外物，用身体某一部分取而代之。口腔性冲动成为了自淫 行为，就像肛门和其他性敏感区一开始那样。简单讲，接下来的进展有两个目标——首先是放弃自淫行为并且用外物代替身体部位；其次是将不同对象归集到单一冲动中，用单一对象取代。确切地讲，只有该单一对象本身是完整的、与自己相似的肉体时，上面的情况才能发生。如果还留下一大批无用的自淫性本能冲动，这种情况也是不得圆满的。

The processes of finding the object are rather involved, and have as yet had no comprehensive exposition. For our purpose, let us emphasize the fact that when the process has come to a temporary cessation in the childhood years, before the latent period, the object it has found is seen to be practically identical with the first object derived from its relation to the object of the oral pleasure impulse. It is, if not the mother's breast, the mother herself. We call the mother the first *object of love* . For we speak of love when we emphasize the psychic side of sex-impulses, and disregard or for a moment wish to forget the fundamental physical

or “sensual” demands of the instincts. At the time when the mother becomes the object of love, the psychic work of suppression which withdraws the knowledge of a part of his sexual goal from his consciousness has already begun in the child. The selection of the mother as the object of love involves everything we understand by the Oedipus complex which has come to have such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psychoanalytic explanation of neuroses, and which has had no small part in arousing opposition to psychoanalysis.

寻找对象的过程可谓错综复杂，至今未获得全面阐释。从我们的研究目的出发，我们要强调一个事实，即这一过程在童年的潜隐期之前暂时休止了，它找到的对象，实际上与口腔快感冲动对象演变而来的第一个对象完全一致。它如不是母亲的乳房，就是母亲自身。因为，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我们是在强调性冲动的心理因素，而忽略或希望暂时不提本能冲动的基本生理或“感官”需求。在母亲成为爱的对象时，儿童的内心已经开始了压抑的心理作用，它把关于性目标一部分的认识从意识中去除。把母亲选择为爱的对象，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俄狄浦斯情结，它在神经症的精神分析解释中具有重大意义，也是精神分析为人诟病的重要原因。

Here is a little experience which took place during the present war: A brave young disciple of psychoanalysis is a doctor at the German front somewhere in Poland, and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his colleagues by the fact that he occasionally exercises an unexpected influence in the case of a patient. Upon being questioned he admits that he works by means of psychoanalysis and is finally induced to impart his knowledge to his colleagues. Every evening the physicians of the corps, colleagues and superiors, gather in order to listen to the inmost secrets of analysis. For a while this goes on

nicely, but after he has told his audience of the Oedipus-complex, a superior rises and says he does not believe it, that it is shameful for the lecturer to tell such things to them, brave men who are fighting for their fatherland, and who are the fathers of families, and he forbade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lectures. This was the end.

这里举一个发生在战时的小故事：一位坚定信奉精神分析的年轻人是德国在波兰某地的战地医生，他在救治病人时偶尔会有出人意料的效果，引起了同事们的注意。当被问到时，他承认自己施用了精神分析疗法，最终同意将他的知识传授给同事们。每天晚上，军队里的医生、上司和同事们都聚在一起听他讲述精神分析的奥秘。授课顺利进行了一段时间，但当他向听众讲述俄狄浦斯情结时，一位上司起立说他不相信这个，讲课人竟然恬不知耻地向他们这些为祖国勇敢战斗、同时身为人父的人们讲这种事情，他禁止讲课继续进行。故事到此为止。

Now you will be impatient to discover what this frightful Oedipus-complex consists of. The name tells you. You all know the Greek myth of King Oedipus, who is destined by the fates to kill his father, and take his mother to wife, who does everything to escape the oracle and then does penance by blinding himself when he discovers that he has, unknowingly, committed these two sins. I trust many of you have yourselves experienced the profound effect of the tragedy in which Sophocles handles this material. The work of the Attic poet presents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deed of Oedipus, long since accomplished, is finally brought to light by an artistically prolonged investigation, continuously fed with new evidence; thus far it has a certain similarity to the process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 course of the dialogue it happens that the infatuated mother-wife, Jocasta, oppose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She recalls

that many men have dreamed that they have cohabited with their mothers, but one should lay little stress on dreams. We do not lay little stress on dreams, least of all typical dreams such as occur to many men, and we do not doubt that this dream mentioned by Jocasta is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strange and frightful content of the myth.

现在大家等不及要看看这个可怕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了。大家都知道希腊神话里的俄狄浦斯国王，他命中注定会弑父娶母，想尽一切办法逃避这个神谕天命，当发现自己已在不自知地情况下犯下了这两个罪行时，他自刺双目谢罪。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根据这个素材编写了悲剧，我相信很多人亲身感受过本剧的深刻含义。这位雅典派诗人用这样的方式讲述故事：俄狄浦斯的罪行犯下许久之后，经过颇具匠心的调查询问，新证据不断浮现后，真相方得以大白，这样一个过程与精神分析过程有某种相似之处。在对话中，亦母亦妻的伊俄卡斯达迷了心窍，反对继续调查。她提醒道，许多男人都梦到与母亲结合，对梦不必大惊小怪。在我们看来梦是重要的，至少很多男子常做这些有代表性的梦，我们确信，伊俄卡斯达提到的这个梦与这个神话中怪诞可怖的内容有着密切关系。

It is surprising that Sophocles' tragedy does not call forth much greater indignation and opposition on the part of the audience, a reaction similar to, and far more justified, than the reaction to our simple military physician. For it is a fundamentally immoral play, it dispenses with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men, it portrays godlike powers as instigators of guilt, and shows the helplessness of the moral impulses of men which contend against sin. One might easily suppose that the burden of the myth purposed accusation against the gods and Fate, and in the hands of the critical Euripides, always at odds with the gods, it would probably have become such an

accusation. But there is no trace of this in the work of the believer Sophocles. A pious sophistry which asserts that the highest morality is to bow to the will of the gods, even if they command a crime, helps him over the difficulty. I do not think that this moral constitutes the power of the drama, but so far as the effect goes, that is unimportant; the listener does not react to it, but to the secret meaning and content of the myth. He reacts as though through self-analysis he had recognized in himself the Oedipus-complex, and had unmasked the will of the gods, as well as the oracle, as sublime disguises of his own unconsciousness. It is as though he remembered the wish to remove his father, and in his place to take his mother to wife, and must be horrified at his own desires. He also understands the voice of the poet as if it were telling him: “You revolt in vain against your responsibility, and proclaim in vain the efforts you have made to resist these criminal purposes. In spite of these efforts, you are guilty, for you have not been able to destroy the criminal purposes, they will persist unconsciously in you.” And in that there is psychological truth. Even if man has relegated his evil impulses to the unconscious, and would tell himself that he is no longer answerable for them, he will still be compelled to experience this responsibility as a feeling of guilt which he cannot trace to its source.

令人惊奇的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并未引起观众更多的愤怒与抵制，与那位无辜的军医相比，观众本应有此反应而且更为合情合理。因为，这根本是一个亵渎道德的戏剧，它背弃了人的道德责任感，描述了天命神授的罪恶，展现了人在与罪恶较量时道德力量的无助感。我们不难猜想该神话的核心应该在于谴责神灵和命运，在总是批判神灵的欧里庇得斯手里，这种谴责是可能的。但在笃信神灵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就不会显露这样的态度。他真诚地辩解道，道德的最高表现是俯首听命于神的意志，甚至听从他们要求犯罪的指示，这种立场

使他跨越了障碍。我不相信这个道德准则是本剧意义所在，但只要它起到了效果，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听众们在意的倒不是它，而是这个神话所隐含的意义和内涵。他的反应好像是通过自我分析认识到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揭示了所谓神灵和天命其实是他自身潜意识的神圣伪装。他好像记得自己希望除掉父亲并娶母为妻，必然因自己的愿望而惊惶不安。他也听得懂作者的声音，它似乎在告诉他："你违抗自己的使命是徒劳的，你自称曾努力克制这些犯罪念头也是徒劳的。无论你是否努力克制，你都是有罪的，因为你没能消灭这些犯罪念头，它们将在你的潜意识里阴魂不散。"这其中蕴含了一个心理真相。即使人将邪念驱入潜意识，并命令自己不再响应它们，他们依旧会体会到一种罪恶感，却对这种感觉的来由一无所知。

It is not to be doubted for a moment that one may recognize in the Oedipus-complex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for the consciousness of guilt with which neurotics are so often harassed. But furthermore, in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religion and morality of mankind which I published in 1913, under the title of *Totem and Taboo* , the idea was brought home to me that perhaps mankind as a whole has,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history, come by its consciousness of guilt, the final source of religion and morality, through the Oedipus-complex. I should like to say more on this subject, but perhaps I had better not. It is difficult to turn away from this subject now that I have begun speaking of it, but we must return to individual psychology.

毫无疑问，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中常见罪恶感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而且，我在1913年发表了关于人类宗教和道德起源的研究报告，题为《图腾与禁忌》，其中我提到一个观点，也许人类整体上就是由于俄狄浦斯情结而在历史之初就有了罪恶感，它是宗教与道德最终的来源。我很希望就此话题多讲些内容，但最好还是算了。一旦开始讲

了，就很难改换话题，但我们必须回到个人心理学上来。

What does direct observation of the child at the time of the selection of its object, before the latent period, show us concerning the Oedipus-complex? One may easily see that the little man would like to have the mother all to himself, that he finds the presence of his father disturbing, he becomes irritated when the latter permits himself to show tenderness towards the mother, and expresses his satisfaction when the father is away or on a journey. Frequently he expresses his feelings directly in words, promises the mother he will marry her. One may think this is very littl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deeds of Oedipus, but it is actually enough, for it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thing. The observation is frequently clouded by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 same child at the same time, on other occasions, gives evidence of great tenderness towards its father; it is only that such contradictory, or rather, *ambivalent* emotional attitudes as would lead to a conflict in the case of an adult readily take their place side by side in a child, just as later on they permanently exist in the unconscious. You might wish to interpose that the behavior of the child springs from egoistic motives and does not justify the setting up of an erotic complex. The mother provides for all the necessities of the child, and it is therefore to the child's advantage that she troubles herself for no one else. This, too, is correct, but it will soon be clear that in this, as in similar situations, the egoistic interest offers only the opportunity upon which the erotic impulse seizes. If the little one shows the most undisguised sexual curiosity about his mother, if he wants to sleep with her at night, insists upon being present while she is dressing, or attempts to caress her, as the mother can so often ascertain and laughingly relates, it is undoubtedly due to the erotic nature of the attachment to his mother.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the mother

shows the same care for her little daughter without achieving the same effect, and that the father often vies with her in caring for the boy without being able to win the same importance in his eyes as the mother. In short, it is clear that the factor of sex-preference cannot be eliminated from the situation by any kind of criticis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goistic interest it would merely be stupid of the little fellow not to tolerate two persons in his services rather than only one.

直接观察儿童在潜隐期之前选择性对象时期的表现，会发现它与俄狄浦斯情结存在何种联系？不难看出，小男孩希望将母亲据为已有，他为父亲的存在感到烦心，当父亲对母亲表示恩爱时，他感到恼怒，而当父亲离开或出门时，他则表现出满意。他经常直接以言语表达自己的心情，答应母亲会娶她。有人会认为这与俄狄浦斯的所作所为相比是小事一桩，但这其实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一回事。同一个小孩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场合中也对父亲百般依恋，这种情形蒙蔽了前面的结论，其唯一原因在于：在成人身上会引起冲突的矛盾或两极情感，在儿童身上可轻易地并行不悖，正如后来它们永久性地存在于潜意识中一样。大家可能会抗议说，儿童的行为有其自私动机，不能证明这种肉欲情结设定的合理性。母亲会照顾孩子的一切必要需求，从孩子自身利益出发，她不再为其他人着想。这固然是对的，不过大家很快会明白，在类似的情况中，自私的动机只是为肉欲冲动提供了机会。如果小孩毫不掩饰地对母亲显示出性方面的好奇心，晚上想跟她睡在一起，她穿衣服时他一定要在场，或是试图去抚摸她，而母亲往往明白并作为笑谈，这种情形无疑是源自恋母的情欲本质的。我们一定不要忽视，母亲常常同样尽心照顾女儿，但得到的反响并不相同，而且父亲照顾儿子并不比母亲逊色，但却得不到他对母亲的同等重视。简单而言，任何批评都无法抹杀性别偏好的事实，这是很清楚的。从自私利益的角度看，如有两个人照顾小家伙，而他却偏只要一个人，那才是太笨了呢。

I have, as you will have noticed, described only the relation of the boy to his father and mother. As far as the little girl is concerned, the process is the same with the necessary modifications. The affectionate devotion to the father, the desire to set aside the mother as superfluous and to take her place, a coquetry which already works with all the arts of later womanhood, give such a charming picture, especially in the baby girl, that we are apt to forget its seriousness, and the grave consequences which may result from this infantile situation. Let us not fail to add that frequently the parents themselves exert a decisive influence over the child in the wakening of the Oedipus attitude, in that they themselves follow a sex preference when there are a number of children. The father in the most unmistakable manner shows preference for the daughter, while the mother is most affectionate toward the son. But even this factor cannot seriously undermine the spontaneous character of the childish Oedipus-complex. The Oedipus-complex expands and becomes a family-complex when other children appear. It becomes the motive force, revived by the sense of personal injury, which causes the child to receive its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 aversion and to wish to remove them without more ado. It is much more frequent for the children to express these feelings of hatred than those arising from the parent-complex. If such a wish is fulfilled, and death takes away the undesired increase in the family, after a short while we may discover through analysis what an important experience this death was for the child, even though he had not remembered it. The child forced into second place by the birth of a little brother or sister, and for the first time practically isolated from his mother, is loath to forgive her for this; feelings which we would call extreme bitterness in an adult are aroused in him and often become the basis of a lasting estrangement. We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hat sexual curiosity with all its consequences usually grows out of these

experiences of the child. With the growing up of th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relation to them undergoes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s. The boy may take his sister as the object for his love, to replace his faithless mother; situations of dangerous rivalry, which are of vast importance for later life, arise even in the nursery among numerous brothers who court the affection of a younger sister. A little girl finds in her older brother a substitute for her father, who no longer acts towards her with the same affection as in former years, or she takes a younger sister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child that she vainly wished of her father.

大家可能看出来了，我只讲述了男孩与父母的关系。关于小女孩，除了必要变动之外，这个过程是相同的。对于父亲的依恋，视母亲为多余而希望挤走她的位置，大有成年女子风情的媚态，呈现出一幅迷人画面，特别是在小姑娘身上，这让我们容易忘记它的严肃性，以及这种孩提的情形日后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父母自己经常在唤醒孩子的俄狄浦斯情结上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他们在有多个子女时是有性别偏好的。父亲毋庸置疑地喜爱女儿，而母亲毫无疑问会偏爱儿子。但即便这个因素也无法动摇儿童俄狄浦斯情结的自发性。当新孩子陆续降生，俄狄浦斯情结会传播开来，成为一种家庭情结。由于孩子个人的受伤情感作祟，这个情结成为一种动机，使得孩子对新生的弟妹很反感，并希望立刻清除他们。孩子表达这种仇恨的情感，要比恋父恋母情结产生的类似情感频繁得多。如果这个愿望得以实现，新生儿的夭折阻止了家中不受欢迎的添丁，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通过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一夭折对于孩子是多么重要的经历，尽管他们不一定记得。由于弟妹的降生，孩子被降至次要地位，第一次被母亲真正冷落，他会因此而憎恨并不肯原谅她，他心里产生了一些情绪，在大人身上我们称为极度嫉恨，常常会演变为持久的疏远。我们已经提到过，对性的好奇心及其后果通常从儿童的这些经历中产生。随着弟弟妹妹们的长大，兄弟姐妹的关系产生了质变。男孩可能会把妹妹当作爱的对象，替代他那有二心的老

妈；在有着多个男孩的家庭中，他们争夺妹妹的爱，由此产生危险的敌对关系，对日后生活有着重大影响。当父亲不再像以前一样疼爱自己时，小女孩把哥哥当成父亲的替代，或者她会把妹妹幻想成自己与父亲所生的孩子。

Such things, and many more of a similar character, are shown by the direct observation of children and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ir vivid childish recollections, which are not influenced by the analysis. You will conclude, among other things, that the position of a child in the sequence of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for the entire course of his later life, a factor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every biography. In the face of these explanations that are found with so little effort, you will hardly recall without smiling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s for the prohibition of incest. What inventions! By living together from early childhood the sexual attraction must have been diverted from these members of the family who are of opposite sex, or a biological tendency against inbreeding finds its psychic equivalent in an innate dread of incest! In this no account is taken of the fact that there would be no need of so unrelenting a prohibition by law and morality if there were any natural reliable guards against the temptation of incest. Just the opposite is true. The first choice of an object among human beings is regularly an incestuous one, in the man directed toward the mother and sister, and the most stringent laws are necessary to prevent this persisting infantile tendency from becoming active. Among the primitive races the prohibitions against incest are much more stringent than ours, and recently Th. Reik showed in a brilliant paper that the puberty-rites of the savages, which represent a rebirth, have the significance of loosing the incestuous bonds of the boy to his mother, and of establishing the reconciliation with the father.

通过直接观察儿童和研究他们清晰的儿时记忆（未受分析的影响），可以发现这些事实和其他类似事实。大家会推断，在诸多因素之中，孩子在兄弟姐妹的地位对其今后整个人生历程都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是每个人物传记都应该考虑的因素。面对这些毫不费力获得的解释，大家不禁要会心一笑地回忆起乱伦禁忌的所谓科学解释。多妙的创造！因为自小生活在一起，异性家庭成员之间的性吸引力必然已经化解，或者，生物学上反对近亲繁殖的倾向在心理上的体现，就是对乱伦的天生恐惧感！这里根本没有考虑到，如果人们对于乱伦的诱惑有着天然的抵御能力，根本不必在法律和道德上严厉禁止。而相反的情况才是事实。人类选择的第一个性对象经常是近亲，对男性而言会选择母亲和姐妹，对此有必要用严刑峻法阻止这一顽固的幼年习性复活。原始部族对于乱伦的禁止比我们要严厉得多，最近莱克在一篇精彩文章中指出，原始部落的成人礼代表着新生，其意义是，男孩与母亲间乱伦般的爱恋已经淡化，与父亲的情谊得到重新确立。

Mythology teaches that incest, apparently so abhorred by men, is permitted to the gods without further thought, and you may learn from ancient history that incestuous marriage with his sister was holy prescript for the person of the ruler (among the ancient Pharaohs and the Incas of Peru). We have here a privilege denied the common herd.

神话告诉我们，乱伦显然为人唾弃，在神那里却是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大家可能会从古代历史中获知，在古代埃及法老和秘鲁印加国王中，统治者与姐妹成婚是一种神授的义务。普通人是不能享有这种特权的。

Incest with his mother is one of the sins of Oedipus, patricide

the other. It might also be mentioned that these are the two great sins which the first social-religious institution of mankind, totemism, abhors. Let us turn from the direct observation of the child to 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adult neurotic. What does analysis yield to the further knowledge of the Oedipus-complex? This is easily told. It shows the patient up in the light of the myth; it shows that each of these neurotics was himself an Oedipus or, what amounts to the same thing, became a Hamlet in the reaction to the complex. To be sure, the analy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Oedipus-complex enlarges upon and is a coarser edition of the infantile sketch. The hatred of the father, the death-wish with regard to him, are no longer timidly suggested, the affection for the mother recognizes the goal of possessing her for a wife. Dare we really accredit these horrible and extreme feelings to those tender childhood years, or does analysis deceive us by bringing in some new element? It is not difficult to discover this. Whenever an account of past events is given, be it written even by a historian, w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inadvertently something has been interpolated from the present and from intervening times into the past; so that the entire picture is falsified. In the case of the neurotic it is questionable whether this interpolation is entirely unintentional or not; we shall later come to learn its motives and must justify the fact of "imagining back" into the remote past. We also easily discover that hatred of the father is fortified by numerous motives which originate in later times and circumstances, since the sexual wishes for the mother are cast in forms which are necessarily foreign to the child. But it would be a vain endeavor to explain the whole of the Oedipus-complex by "imagining back," and as related to later times. The infantile nucleus and more or less of what has been added to it continues to exist and may be verified by the direct observation of the child.

与母亲的乱伦是俄狄浦斯的罪行之一，另一个是弑父。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两大罪行正是人类最初的社会宗教制度——图腾主义所深恶痛绝的。让我们从对儿童的直接观察切换到成人神经症的分析。症状分析对俄狄浦斯情结有怎样的进一步发现？这很容易说明。它将病人置身于神话情境之中，表明每一个神经症病人自身即俄狄浦斯，或殊途同归，成了对这一情结作出反应的哈姆雷特。其实，症状分析所发现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幼年版本的扩充和夸张。对父亲的憎恨、盼他死的愿望，不再表述得那么隐晦，对于母亲的迷恋证实了娶母为妻的目标。我们敢于真正将这些极端可怖的情感归结于童真年代呢，还是症状分析用一些新元素欺骗了我们？每当看到历史事件的陈述，哪怕是历史学家的作品，我们都必须考虑到：它所描写的过去无意中加入了现在或过渡时期的一些东西，所以历史是有失实之处的。在神经症的情况中，这种添加的东西是否完全无意是存疑的，我们后面会知道它的动机，从而证明“想象遥远往事”的合理性。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后来的时间和情形中产生了若干动机，进一步强化了对父亲的憎恨，对母亲有关性的愿望转化成对孩子势必陌生的形式。但用“想象往事”以及它与以后时期的关系解释整个俄狄浦斯情结是纯属枉费功夫。幼年版本的核心和此后添加的内容会继续存在下去，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可得到证实。

The clinical fact which we meet with in penetrating the form of the Oedipus-complex as established by analysis, is of the greatest practical importance. We learn that at the period of puberty, when the sexual instinct first asserts its demands in full strength, the old incestuous and familiar objects are again taken up and seized anew by the libido. The infant's choice of an object was feeble, but it nevertheless set the direction for the choice of an object in puberty. At that time very intense emotional experiences are brought into play and directed towards the Oedipus-complex, or utilized in the reaction to it. However, since their presuppositions have become unsupportable, they must in large part remain outside of

consciousness. From this time on the human individual must devote himself to the great task of freeing himself from his parents, and only after he has freed himself can he cease to be a child, and become a member of the social community. The task confronting the son consists of freeing himself from his libidinous wishes towards his mother and utilizing them in the quest for a really foreign object for his love. He must also effect a reconciliation with his father, if he has stayed hostile to him, or if in the reaction to his infantile opposition he has become subject to his domination, he must now free himself from this pressure. These tasks are set for every man; it is noteworthy how seldom their solution is ideally achieved, i.e., how seldom the solution is psychologically as well as socially correct. Neurotics, however, find no solution whatever; the son remains during his whole life subject to the authority of his father, and is not able to transfer his libido to a foreign sexual object. Barring the difference in the specific relation, the same fate may befall the daughter. In this sense the Oedipus-complex is correctly designated as the nucleus of the neurosis.

我们在研究症状分析所确定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形式时，遇到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临床事实。我们得知，在青春期，当性本能冲动处于巅峰状态时，旧有的近亲和家庭的对象又重被拾起，通过力比多获得了新生。婴幼儿选择对象并不稳定，但它还是为青春期对象的选择确立了方向。在那个时期，人会有非常强烈的情感体验，并指向了俄狄浦斯情结，或体现在对它的反应中。然而，因为对它们的推测并无实据支持，它们一定是大量地保留于意识之外了。自此开始，个人必须专心完成脱离父母的使命，只有他们自由之后，才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儿子面临的使命在于从自己对母亲的力比多愿望中解脱出来，并利用它们追寻自己的真爱对象。他必须也要实现与父亲的和解，如果他依旧敌视父亲，或是幼年反抗失败后对父亲唯唯诺诺，现在他必须卸下这个包袱。这些使命是每个男人的必修课，值

得注意的是，成功的案例寥寥无几，或者说，对心理和社会都交出满意答卷的案例寥寥无几。然而，神经症病人无论如何也无成功案例，儿子终其一生都慑于父亲的威严，不能将自己的力比多转移到其他性对象身上。除了具体关系的差异，女儿的命运也可能是相同的。按此说法，俄狄浦斯情结理所当然该称为神经症的核心。

You can imagine how rapidly I am reviewing a great number of conditions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Oedipus-complex, of practical as well as of theoretical importance. I cannot enter upon their variations or possible inversions. Of its less immediate relations I only wish to indicate the influence which the Oedipus-complex has been found to exert on literary production. In a valuable book, Otto Rank has shown that the dramatists of all times have taken their materials principally from the Oedipus-and incest-complexes, with their variations and disguises. Moreover, we will not forget to mention that the two guilty wishes of Oedipus were recognized long before the time of psychoanalysis as the tru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restrained life of impulses. Among the writings of the encyclopedist Diderot we find a famous dialogue, *The Nephew of Ramau* , which no less a person than Goethe has translated into German. In this you may read the remarkable sentence: “*If the little savage were left to himself he would preserve all his imbecility, he would unite the passions of a man of thirty to the unreasonableness of the child in the cradle; he would twist his father's neck and bed with his mother* .”

可想而知，我在快速地回顾大量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的情况，其实际和理论意义兼具。我不便讲述它们的变化形式或可能的逆反形式。对与其关系较不直接的现象，我只想就俄狄浦斯情结在文学上的影响做些提示。兰克在他的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中表明，自古至今的戏

剧家都主要从俄狄浦斯情结和乱伦情结中汲取素材，进行一些变化和修饰。而且我们别忘了，俄狄浦斯的两大罪恶愿望远在精神分析出现之前就被认为是放纵的冲动真正的体现。在百科全书编者狄德罗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著名对话《拉摩的侄子》，包括歌德在内不止一人将此翻译成了德文。在其中可以读到这句精彩话语："如果对这个小孽障听之任之，他就会保留所有的愚昧孽根，身上结合了一个激情的30岁男人的和一个无知的襁褓小儿，他会扭断父亲的脖子，和母亲同床共枕。"

There is also one other thing of which I must needs speak. The mother-wife of Oedipus shall not have reminded us of the dream in vain.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result of our dream analysis, that the wishes out of which the dream is constructed so frequently are of a perverse, incestuous nature, or disclose an enmity toward near and beloved relatives the existence of which had never been suspected? At the time we did not trace the sources of these evil impulses. Now you may see them for yourselves. They represent the disposition made in early infancy of the libidinous energy, with the objects, long since given up in conscious life, to which it had once clung, which are now shown at night to be still present and in a certain sense capable of activity. But since all people have such perverse, incestuous and murderous dreams, and not the neurotics alone, we may conclude that even those who are normal have passed through the same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perversions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libidio toward the objects of the Oedipus-complex. This, then, is the way of normal development, upon which the neurotics merely enlarge. They show in cruder form what dream analysis exposes in the healthy dreamer as well. Accordingly here is one of the motives which led us to deal with the study of the dream before we considered the neurotic symptom.

还有一事我不吐不快。俄狄浦斯的母妻不由得使我们想到了梦。大家还记得我们分析梦的一个结论吗？那就是，梦的形成所依据的愿望常常是有着倒错、乱伦的属性，或是揭示了对于挚爱亲人的敌意（这种情况从未被发现过）。当时我们并没有追究这些邪恶冲动的源头。现在大家可自行发现了。它们体现了婴儿期与性对象相关的力比多能量，它曾经依附于意识生活，如今它们早已淡出其中，只在夜间显示出其存在和某种程度的活力。但因为所有人都做过这种倒错、乱伦或谋杀之梦，而不仅是神经症病人，我们可以推断，即使正常人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变发展进程，也有倒错经历和向俄狄浦斯情结目标发展的力比多。那么这就是普通人的发展进程，神经症病人只不过是将其扩大化了。它们的形式更为自然，证实了梦的分析关于健康做梦者的阐述。因而，这就是我们在探讨神经症症状前先研究梦的原因之一。

Twenty-Second Lecture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Regression —Etiology

第二十二讲 发展与退化——病原

We have learned that the libidio goes through an extensive development before it can enter the service of reproduction in a way which may be regarded as normal. Now I wish to present to you what importance this fact possesses for the causation of neuroses.

我们已经知道，力比多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后，才开始担起了所谓正常的生殖责任。我现在想讲解这一事实对于神经症病因的重要意义。

I believe we are in harmony with the teachings of general pathology in assuming that this development involves two dangers, inhibition and regression. In other words, with the universal tendency of biological processes toward variation, it must necessarily happen that not all preparatory phases of a given function are equally well passed through or accomplished with comparable thoroughness. Certain components of a function may be permanently held back in an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omplete development is therefore retarded to a certain extent.

我相信，我们与一般病理学知识有一个共识，即推定这一发展过程有两个危险：压抑与退化。换句话说，生物过程普遍趋向于变异，

这势必会导致，一个已知功能未必会经历或彻底完成所有的准备阶段。一种功能的某些成分可能在早期发展阶段就止步不前了，所以该功能因受到一定限制而不能发展完善。

Let us seek analogies for these processes from other fields. If a whole people leaves its dwellings to seek a new home, as frequently happened in the early periods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heir entire number will certainly not reach the new destination. Setting aside other losses, small groups or associations of these wandering peoples would stop on the way, and, while the majority passes on, they would settle down at these way-stations. Or, to seek a more appropriate comparison: You know that in the most highly evolved mammals, the male seminal glands, which originally are located in the far depths of the abdominal cavity, begin to wander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of intra-uterine life until they reach a position almost immediately under the skin of the pelvic extremity. In the case of a number of male individuals, one of the paired glands may as a result of this wandering remain in the pelvic cavity, or may be permanently located in the canal through which both glands must pass in their journey, or finally the canal itself may stay open permanently instead of growing together with the seminal glands after the change of position has taken place normally. When, as a young student, I was doing my first pie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under the direction of von Brücke, I was working on the dorsal nerve-roots in the spinal cord of a small fish very archaic in form. I discovered that the nerve ganglia of these roots grow out from large cells which lie in the grey matter of the dorsal column, a condition no longer true of other vertebrates. But I soon discovered that such nerve cells are found outside the grey matter all the way to the so-called spinal ganglion of the dorsal root. From this I concluded that the cells of this group of ganglia had traveled from the spinal cord

to the roots of the nerves. This same result is attested by embryology. In this little fish, however, the entire path of the journey was traceable by the cells that had remained behind. Closer observation will easily reveal to you the weak points of these comparisons. Therefore let me simply say that with reference to every single sexual impulse, I consider it possible for several of its components to be held back in the earlier stages of development while other components have worked themselves out to completion. You will realize that we think of every such impulse as a current continuously driving o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life, and that our resolving it into individual movements which follow separately one upon the other is to a certain extent artificial. Your impression that these concepts require further clarification is correct, but an attempt would lead to too great digression. Before we pass on, however, let us agree to call this arrest of a partial impulse in an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a *fixation* of the instinct.

我们从其他领域找一些类比。如果整个民族离开居住地去寻找新的家园（这在人类早期历史中是经常发生的），他们肯定不会全数到达新目的地。先不论其他损失如何，这些迁徙民族中的一些小团体或家族会在途中停留，当大部分人继续前进时，他们会在这些驿站定居下来。或者打一个更恰当的比喻：大家知道，雄性高等哺乳动物的精腺最初位于腹腔深处，在胚胎发育的某一时期开始移动，一直到达邻近骨盆底端皮肤之下。在有些雄性的个案中，由于这种移动，一对精腺中的一个可能会滞留在腹腔中，或可能永久栖息于两个精腺的移动管道中，或者这个管道永久开放着，而不是像正常移位后那样与精腺一起生长。在我年轻求学时，我曾在冯·布鲁克的指导下进行第一次科学研究，研究对象是一种古老品种小鱼的脊髓的背脊神经根。我发现这些神经根的中枢是由背柱灰白质中的大型细胞生长而成，这种情况在其他脊椎动物中已经不见踪迹。但我很快发现，这种神经细胞也存在于灰白质之外，一直到所谓的背脊神经根的脊神经节。我由此推

断，这一组神经中枢细胞从脊髓一直移动到了神经根。同样的结论在胚胎学也得到验证。然而，在这条小鱼中，整个移动路径由于滞留在后的细胞而变得清晰可辨。这些比喻的缺陷可以靠进一步观察发现。长话短说，我认为每种单一性冲动的某些成分是有可能在早期发展阶段停滞的，其他成分则得到了完备的发展。大家要知道，我们认为每一种冲动都是一条从生命之初就奔流不息的河水，我们将它分解为互相独立且前赴后继的单独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大家觉得这些概念需要进一步澄清，这未尝不对，但是如此却是要离题很远了。不过在继续之前，我们先把一种局部冲动在早期发展阶段的滞留称为本能冲动的执着 。

Regression is the second danger of this development by stages. Even those components which have achieved a degree of progress may readily turn backward to these earlier stages. Having attained to this later and more highly developed form, the impulse is forced to a regression when it encounters great external difficulties in the exercise of its function, and accordingly cannot reach the goal which will satisfy its strivings. We can obviously assume that fixation and regression are not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The stronger the fix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prove to be, the more readily will the function evade external difficulties by a regression back to those fixations, and the less capable will the fully developed function be to withstand the hindrances that stand in the way of its exercise. Remember that if a people in its wandering has left large groups at certain way-stations, it is natural for those who have gone on to return to these stations if they are beaten or encounter a mighty foe. The more they have left on the way, however, the greater is their chance of defeat.

退化 是这个分阶段发展的另一个危险。即便是已经进化到一定程

度的成分，也很有可能退回到早期阶段的状态。一个冲动发展到一个较晚且更高级的阶段后，在功能运行时遭遇巨大外部阻碍，因此被迫退化，相应地就不能达到其工作目标。显然可以推测，执着与退化并不是互相孤立的。发展过程中的执着程度越强烈，意味着这个功能更容易为了躲避外部阻碍而退化回那些执着点，发育成熟的功能就越不能抵御对其运行的阻碍。记住，如果一个迁徙中的民族中有大队人马留在了途中的驿站，而继续前进的人若被击败或遭遇强劲对手，他们自然会回到这些驿站。但是，中途留下的人越多，整队人马就越有可能被击败。

For your comprehension of the neuroses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in mind this connection between fixation and regression. This will give you a secure hold upon the question of the cause of neuroses—of the etiology of neuroses—which we shall soon consider.

为便于理解神经症，大家有必要记住执着与退化的联系。这将使大家对神经症起因（即神经症病原）的问题有确实把握。

For the present we have still to discuss various aspects of regression. With the knowledge you have gained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unction of libido, you must expect two kinds of regression: incestuous return to the first libidinous objects and return of the entire sexual organization to an earlier stage of development. Both occur in the transference neuroses and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its mechanism. Especially is the return to the first incestuous objects of libido a feature that the neurotic exhibits with positively tiresome regularity. We could say far more about regression of libido if we took into consideration another group of neuroses: neurotic narcism. But we cannot do this now. These

conditions give us a clue to other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the function of libido, which have not been mentioned previously, and correspondingly show new kinds of regression. But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before me at this point is to warn you not to confuse *regression* and *suppression* , and aid you to see clear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processes. Suppression, as you know,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an act capable of becoming conscious, in other words, an act that belongs to the fore-conscious system, is rendered unconscious and accordingly is thrust back into the unconscious system. Similarly we speak of suppression when the unconscious psychic act never has been admitted into the adjoining fore-conscious system but is arrested by the censor at the threshold. Kindly observe that the conception of suppressi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exuality. It describes a purely psychological process, which could better be characterized by terming it *localized* . By that we mean that it is concerned with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psyche, or if we drop this crude metaphor, with building up the psychological apparatus out of separate, psychic systems.

现在我们还要探讨一下退化的各种因素。以大家所获得的力比多功能发展的知识，你们必定想到了两种退化形式：一是力比多对象退化到起初的近亲对象；二是整个性的组织退回到一个较早的发展阶段。这两种退化都发生在移情类神经症中，而且对其病症机制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退化回起初的力比多性对象，在神经症病人身上表现之频繁，到了令人厌烦的程度。要是考虑到另一类神经症：自恋型神经症，退化现象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但我们现在不能讲。这些情况给我们探寻力比多功能发展的其他阶段提供了一条线索（我们之前没有提到过），它们相应地显示了新的退化形式。但是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是提醒大家不要混淆退化 和压抑 ，并帮助大家看清这两个过程的关系。大家知道，压抑是一个可能成为意识的行动（换句话说就是属于前意识体系的行动）被转化为潜意识，从而被推回潜意识体系

的过程。类似地，当潜意识心理行动未被允许进入毗邻的前意识体系而被门槛上的审查者扣留时，这也是一种压抑。要注意，压抑的概念与性活动没有相关性。它描述的是一种纯粹的心理过程，或称为定位化 心理过程更为确切。它的意思是，它与心灵的空间关系相关，我们也可以搁置这一粗略比喻，说它是关于从各自独立的心理体系中建立一种心理体制。

Through these comparisons we observe that up to this point we have not used the word regression in its general, but in a very special sense. If you accord it the general meaning of return from a higher to a lower stage of development you must include suppression as a form of regression, for suppression may also be described as the reversion to an earlier and lower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psychic act. Only in regard to suppression, this tendency to revert is not necessarily involved, for when a psychic act is held back in the early unconscious stage we also term it suppression in a dynamic sense. Suppression is a localized and dynamic conception, regression purely descriptive. What up this point we have called regression and considered in its relation to fixation, was only the return of libido to former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 The nature of this latter conception is entirely distinct and independent of suppression. We cannot call the libido regressions purely psychical processes and do not know what localization in the psychological apparatus we should assign to them. Even though the libido exerts a most powerful influence on psychic life, its organic significance is still the most conspicuous.

通过这些对比，我们发现，我们至今并没有使用退化的一般意义，而是用了它的一个极为特殊的意义。退化的一般意义是从高级发展阶段退回到低级阶段，据此，压抑必然是一种退化形式，因为压抑

也可形容为一个心理行为的发展退回到较早和低级阶段。只考虑压抑的话，这种回归倾向未必一定发生，因为当一种心理行动停滞在早期潜意识阶段时，从动态意义上也可将其定义为压抑。压抑是一种定位化、动态化的概念，退化是一种纯描述性概念。我们在这里所指的退化及其与执着的关系，特指力比多回到以前的发展阶段。这种退化概念在本质上与压抑完全不同，而且互不依赖。我们不能把力比多的退化称为单纯的心理过程，也不知道它们属于该心理体制中的何种位置。即使力比多对心理生活产生了极有力的作用，它对器官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

Discussions of this sort, gentlemen, are bound to be somewhat dry. To render them more vivid and impressive, let us return to clinical illustrations. You know that hysteria and compulsion-neurosis are the two chief factors in the group of transference neuroses. In hysteria, libidinous return to primary, incestuous sexual objects is quite regular, but regression to a former stage of sexual organization very rare. In the mechanism of hysteria suppression plays the chief part. If you will permit me to supplement our previous positive knowledge of this neurosis by a constructive suggestion, I could describe the state of affairs in this manner: the union of the partial instincts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the genitals is accomplished, but its results encounter the opposition of the fore-conscious system which, of course, is bound up with consciousness. Genital organization, therefore, may stand for the unconscious but not for the fore-conscious. Through this rejection on the part of the fore-conscious, a situation arises which in certain aspects is similar to the condition existing before the genitals had attained their primacy. Of the two libido regressions, the regression to a former stage of sexual organization is by far the more conspicuous. Since it is lacking in hysteria and our entire conception of the neuroses is still too much dominated by the study

of hysteria which preceded it in point of time, the meaning of libido regression became clearer to us much later than that of repression. Let us be prepared to widen and change our attitude still more when we consider other narcistic neuroses besides compulsion-neurosis and hysteria in our discussion.

诸位，诸如此类的讨论注定会变得有些枯燥。为使它们更为生动、更令人印象深刻，我们要再次借助临床情况的验证。大家知道，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是移情类神经症的两个主要代表。在癔症中，力比多退化至早期近亲性对象的现象很常见，但性的组织退化至较早阶段的现象则很罕见。在癔症的机制中，压抑起着主要作用。请容许我提出一个建设性意见，以此对我们之前关于该神经症的有益知识做些补充，我可以这样来描述这种情形：在生殖器统治下，各局部本能冲动实现了融合，但其结果遭遇了与意识必然紧密相关的前意识体系的反抗。因此，生殖器的组织可以代表潜意识，但不能代表前意识。前意识的反抗，使得当前的情形在某些方面与生殖器优先权确立之前的情形类似。在两种力比多退化中，性的组织退化至早前阶段的现象尤其明显。因为它在癔症中出现得很少，而且我们神经症的整体概念过多地受到先行一步的癔症研究的影响，我们认识力比多退化的意义比认识压抑的意义要晚。我们在讨论时，如果除了强迫性神经症和癔症还要考虑自恋型神经症，就需要准备进一步拓宽、更新思路。

In contrast to this, regression of libido in compulsion-neurosis turns back most conspicuously to the earlier sadistico-anal organization, which accordingly becomes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expressed by the symptoms.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love impulse must mask itself as a sadistic impulse. The compulsion idea must therefore be reinterpreted. Isolated from other superimposed factors, which though they are not accidental are also indispensable, it no longer reads: “I want to murder you”; rather it

says “I want to enjoy you in love.” Add to this, that simultaneously regression of the object has also set in, so that this impulse is invariably directed toward the nearest and dearest persons, and you can imagine with what horror the patient thinks of these compulsion ideas and how alien they appear to his conscious perception. In the mechanism of these neuroses, suppression, too, assumes an important part, which it is not easy to explain in a superficial discussion of this sort. Regression of the libido without suppression would never result in neurosis but would finally end in perversion. This makes it obvious that suppression is the process most characteristic of neurosis, and typifies it most perfectly. Perhaps I shall at some future time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presenting to you our knowledge of the mechanism of perversions and then you will see that here also things do not work themselves out as simply as we should best like to construe them.

与之相比，在强迫性神经症中的力比多极为醒目地退化回了早前的肛门施虐组织，相应地成为症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这些情况下，爱的冲动必然伪装成虐待冲动的出现。因而强迫性念头必然会得到重新解释。它从一些叠加因素中（它们既非偶然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独立出来后，原本“我要杀了你”的意思成了“我要享受你的爱”。此外，性对象也同时发生退化，以使得这一冲动定向于最亲近的人，可以想见，病人对这些强迫性念头抱有何等恐惧的心态，它们对于他们的意识知觉是何等的陌生。在这些神经症的机制中，压抑也行使着重要职责，在这种浅尝辄止的讨论中很难说清楚。力比多发生退化但未受压抑的情况不会产生神经症，但最终会导致性倒错。这样就清楚了：压抑作用是神经症的主要特征，也是其典型体现。也许在将来我有机会讲解性倒错机制的有关知识，大家会明白，这里也有一些结论的推导过程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You will most readily reconcile yourself with these elucidations of fixation and regression, when you consider them as a preface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tiology of neuroses. Towards this I have only advanced a single fact: that people become neurotically ill when the possibility of satisfying their libido is removed, ill with “denial,” as I expressed myself, and that their symptoms are the substitutes for the denied gratification. Of course,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every denial of libidinous satisfaction makes every person neurotic, but merely that in all cases known of neurosis, the factor of denial was traceable. The syllogism therefore cannot be reversed. You also understand, I trust, that this statement is not supposed to reveal the entire secret of the etiology of neurosis, but only emphasizes an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大家要欣然接受这些关于执着与退化的阐释，前提是要把它们看作神经症病原研究的一个序曲。在这方面我只提出一个简单事实：当力比多没有被满足的可能性后，人就会患上神经症（因“剥夺”而患病，这是我的解释），而且他们的症状是被剥夺的满足的替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在力比多满足被剥夺后都会患上神经症，只是说在所有已知的神经症病例中，剥夺的事实都是有迹可循的。所以这种推论不是双向的。我相信大家也理解，这个论断不会揭开整个神经症病原的奥秘，只是强调了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Now, we do not know, in the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is statement, whether to emphasize the nature of denial or the individuality of the person affected by it. Denial is very rarely complete and absolute; to cause a pathological condition, the specific gratification desired by the particular person in question must be withheld, the certain satisfaction of which he alone is capable. On the whole there are many ways of enduring abstinence

from libidinous gratification without succumbing to a neurosis by reason thereof. Above all we know of people who are able to endure abstinence without doing themselves injury; they are not happ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y are filled with yearning, but they do not become ill. Furthermore, we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the impulses of the sex instinct are extraordinarily *plastic* , if I may use that term in this connection. One thing may take the place of the other; one may assume the other's intensity; if reality refuses the one gratification, the satisfaction of another may offer full compensation. The sexual impulses are like a network of communicating channels filled with fluids; they are this in spite of their subjugation to the primacy of the genitals, though I realize it is difficult to unite these two ideas in one conception. The component impulses of sexuality as well as the total sexual desire, which represents their aggregate, show a marked ability to change their object, to exchange it, for instance, for one more easily attainable. This displacement and the readiness to accept substitutes must exert powerful influences in opposition to the pathological effect of abstinence. Among these processes which resist the ill effects of abstinence, one in particular has won cultural significance. Sexual desire relinquishes either its goal of partial gratification of desire, or the goal of desire toward reproduction, and adopts another aim, genetically related to the abandoned one, save that it is no longer sexual but must be termed social. This process is called “sublimation,” and in adopting this process we subscribe to the general standard which places social aims above selfish sexual desires. Sublimation is, as a matter of fact, only a special case of the relation of sexual to non-sexual desires. We shall have occasion to talk more about this later in another connection.

现在，要进一步讨论这个论断，我们不知道是要强调剥夺的本质

还是受害者的个性特征。剥夺极少是完全绝对的，致病的前提是，特定当事人渴望的具体满足必然受到了抑制（这种满足是当事人有能力独立获得的）。整体而言，在力比多受到抑制的情形下，有很多忍耐的方法，可不致因此患上神经症。我们尤其知道一些人可以耐受这种抑制而不使自己受伤，他们在此情况下并不快乐，他们满心饥渴，但却不会生病。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到，性的本能冲动是极富弹性 的，请容许我用该词形容这一点。一个冲动可以代替另一个冲动，一个冲动可以搭载另一个冲动的强度；如果现实不允许一种满足，那另一种满足可给予充分补偿。性冲动很像一个互连的水网，尽管它们听命于生殖器的指挥，却也安之若素，尽管我知道很难将这两个概念合二为一。性冲动的成分以及代表性冲动集合体的整体性欲有一种可圈可点的能力，可以改变或交换性对象，比如交换到一个较易获取的对象。这种移置现象和易替代的能力必然对致病的抑制作用产生强力免疫。在这些抵御致病抑制作用的过程中，有一个过程很特别，具有了文化意义。性欲要么放弃了部分满足的目标，要么放弃了生殖需求的目标，采纳了另一个与被弃目标神似的诉求，只是它不再是性的诉求而应称为社会诉求。这个过程是所谓的“升华”，这个过程一经采纳，则意味着社会诉求高于个人性需求的普遍标准得到确认。事实上，升华只是性需求与非性需求关系的特例而已。我们今后将有机会在另一层关系中谈到这个话题。

Now your impression will be that abstinence has become an insignificant factor, since there are so many methods of enduring it. Yet this is not the case, for its pathological power is unimpaired. The remedies are generally not sufficient. The measure of unsatisfied libido which the average human being can stand is limited. The plasticity and freedom of movement of libido is by no means retained to the same extent by all individuals; sublimation can, moreover, never account for more than a certain small fraction of the libido, and finally most people possess the capacity for sublimation only to a very slight degree.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limitations clearly lies in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libido, as it renders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dependent upon the attainment of only a very few aims and objects. Kindly recall that incomplete development of the libido leaves extensive and possibly even numerous libido fixations in earlier developmental phases of the processes of sexual organization and object-finding, and that these phases are usually not capable of affording a real gratification. You will then recognize libido fixation as the second powerful factor which together with abstinence constitutes the causative factors of the illness. We may abbreviate schematically and say that libido fixation represents the internal disposing factor, abstinence the accidental external factor of the etiology of neurosis.

现在大家会觉得，既然有那么多耐受抑制的方法，抑制行为就成了一个次要因素。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抑制的致病能力并未受到削弱。那些补偿措施通常是不够的。普通人可承受的未满足力比多的尺度是有限的。力比多运动在所有个人身上的弹性和流动性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升华只是就小部分力比多而言，大部分人最终只能做到的升华是微乎其微的。最重要的缺陷显然在于力比多的适应能力，它使得个人的满足仅依赖于追求极少数目标和对象。请记住，力比多的不完全发展，在性的组织和性对象选择的早前发展阶段中遗留了多方面的、甚至是数量繁多的执着点，而且这些阶段通常无法提供真正的满足。大家就能认识到，力比多执着是与抑制作用并列的第二个致病因素。我们可以简洁明了地说，力比多执着体现了神经症病原的内部决定因素，抑制作用则是外部偶然因素。

I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warn you of taking sides in a most unnecessary conflict. In scientific affairs it is a popular proceeding to emphasize a part of the truth in place of the whole truth and to combat all the rest, which has lost none of its verity, in the name of

that fraction. In this way various factions have already separated out from the movement of psychoanalysis; one faction recognizes only the egoistic impulses and denies the sexual, another appreciates the influence of objective tasks in life, but ignores the part played by the individual past, and so on. Here is occasion for a similar antithesis and subject for dispute: are neuroses *exogenous* or *endogenous* diseases, are they the inevitable results of a special constitution or the product of certain harmful (traumatic) impressions; in particular, are they called forth by libido fixation (and the sexual constitution which goes with this) or through the pressure of forbearance? This dilemma seems to me no whit wiser than another I could present to you: is the child created through the generation of the father or the conception of the mother? Both factors are equally essential, you will answer very properly. The conditions which cause neuroses are very similar if not precisely the same.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auses of neuroses, we may arrange neurotic diseases in a series, in which two factors, sexual constitution and experience, or, if you wish, libido-fixation and self-denial, are represented in such a way that one increases as the other decreases. At one end of the series are the extreme cases, of which you can say with full conviction: These persons would have become ill because of the peculiar development of their libido, no matter what they might have experienced, no matter how gently life might have treated them. At the other end are cases which would call forth the reversed judgment, that the patients would undoubtedly have escaped illness if life had not thrust certain conditions upon them. But in the intermediate cases of the series, predisposing sexual constitution and subversive demands of life combine. Their sexual constitution would not have given rise to neurosis if the victims had not had such experiences, and their experiences would not have acted upon them traumatically if the conditions of the libido had been otherwise. Within this series I may grant a certain

preponderance to the weight carried by the predisposing factors, but this admission, too, depends upon the boundaries within which you wish to delimit nervousness.

我想乘机提醒大家，不要在一场无谓的争辩中站队表态。科学事业中常见的现象是，断章取义地强调真理的某一部分，而反对所有其他部分（它们于该部分而言仍不失合理性）。正是如此，精神分析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分裂出了各种派系，一个派系只认可自我冲动而否定性冲动，另一个派系承认客观人生使命的影响，而忽视个人经历的作用，等等。这里也存在一种类似的对立和争议话题：神经症是外因 还是内因 导致的病症？它们是一种特殊体质必然的结果，还是某些有害（创伤性）经历的产物？具体而言，引发它们的是力比多执着（及与其相匹配的性构造），还是抑制的压力？对我来说，这种非此即彼的问题丝毫不比我可以问的另一问题更聪明：孩子是父亲养的，还是母亲生的？两个因素都同等地关键，大家这个回答非常到位。神经症的形成条件即使不完全相同，也是十分相似的。从神经症的成因考虑，我们可以将神经症分成一个系列，其中两个因素，即性的构造和生活经历（如大家愿意，也可以是力比多执着和自我剥夺）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这一系列的一端是极端病例，关于它们的判断是十分肯定的：这些人生病的原因是他们的力比多发展异于常人，无论他们有怎样的经历，无论生活如何温柔对待他们。另一端的病例则可能导致相反的判断，即，如果生活没有对患者强加某些情况，他们无疑可以免于患病。但在这一系列的中间病例中，易于致病的性构造与危险的生活经历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受害人没有这些经历，他们的性构造不致引起神经症；如果力比多情况不同，他们的经历也不会造成创伤性影响。我认定这一系列中的先天倾向因素占一定优势，但这一认定也取决于大家对神经症的界定。

Allow me to suggest that you call such series *complementary series* . We shall have occasion to establish other series of this sort.

对此类系列我建议称为互补系列 。我们今后将讨论其他类似的系列。

The tenacity with which the libido clings to certain tendencies and objects, the so-called *adhesiveness* of the libido, appears to us as an independent factor, individually variable, the determining conditions of which are completely unknown to us, but the importance of which for the etiology of the neuroses we can no longer underestimate.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not overestimate the closeness of this interrelation. A similar adhesiveness of the libido occurs—for unknown reasons—in normal persons under various conditions, and is a determining factor in the perverse, who are in a certain sense the opposite of nervous. Before the period of psychoanalysis, it was known (Binet) that the anamnesia of the perverse is often traced back to an early impression—an abnormality in the tendency of the instinct or its choice of object—and it is to this that the libido of the individual has clung for life. Frequently it is hard to say how such an impression becomes capable of attracting the libido so intensively. I shall give you a case of this kind which I observed myself. A man, to whom the genital and all other sex stimuli of woman now mean nothing, who in fact can only be thrown into an irresistible sexual excitation by the sight of a shoe on a foot of a certain form, is able to recall an experience he had in his sixth year, which proved decisive for the fixation of his libido. One day he sat on a stool beside his governess, who was to give him an English lesson. She was an old, shriveled, unbeautiful girl with washed-out blue eyes and a pug nose, who on this day, because of some injury, had put a velvet slipper on her foot and stretched it out on a footstool; the leg itself she had most decorously covered. After a diffident attempt at normal sexual

activity, undertaken during puberty, such a thin sinewy foot as his governess' had become the sole object of his sexuality; and the man was irresistibly carried away if other features, reminiscent of the English governess, appear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foot. Through this fixation of the libido the man did not become neurotic but perverse, a foot fetishist, as we say. So you see that, although exaggerated and premature fixation of the libido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causation of neuroses, its sphere of action exceeds the limits of neuroses immeasurably. This condition also, taken by itself, is no more decisive than abstinence.

力比多对某些倾向和对象顽强依附，即所谓的力比多黏着 在我们看来是一种独立特性，因个人情况而异，我们对它的制约条件一无所知，但丝毫不能低估它对于神经症病原的重要作用。由于未知的原因，正常人在不同情况下也会发生类似的力比多黏着，它也是性倒错人群（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神经症患者的反义词）的决定性因素。早在精神分析出现之前，比内特就指出，性倒错者的遗忘通常起源于一种早期表现——在本能冲动倾向或对象选择上发生反常——而该个人的力比多即一生依附于此反常表现上。这种表现何以能强烈吸引力比多，这常常很难判断。我举一个自己观察到的此类例子。有一名男子对女性生殖器和其他一切性刺激毫无兴趣，但看到某种形状的脚上穿的鞋子会产生不可遏制的性兴奋，他回忆起6岁时的一次经历，事实证明这件事对他的力比多执着起到决定性作用。有一天，他坐在家庭教师身旁的高脚椅子上，准备听她上英语课。她是一个身形枯缟、面容丑陋的老妪，有一双灰暗的蓝眼睛和一只扁塌塌的鼻子，当天因为受伤，脚上套了一只紫色拖鞋，搁在脚凳上，腿被极为细致地包裹起来。他在青春期时，曾经胆怯地尝试过一次正常的性活动，之后，像他的家庭女教师一样的瘦削结实的脚部成了他唯一的性对象，而其它一些脚部特征也会使他联想起英语教师而不免意乱神迷。该男子的力比多执着并未使他患神经症，而是成了性倒错者，我们说是恋足者。所以大家明白了，尽管夸张和幼稚的力比多是神经症的必要成因，它

的活动范围大大超过了神经症的界限。执着作用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比抑制作用更起到决定性影响。

And so the problem of the cause of neuroses seems to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Psychoanalytic investigation does, in fact, acquaint us with a new factor, not considered in our etiological series, which is recognized most easily in those cases where permanent well-being is suddenly disturbed by an attack of neurosis. These individuals regularly show signs of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ir wishes, or, as we are wont to say, indication of psychic *conflict* . A part of their personality represents certain wishes, another rebels against them and resists them. A neurosis cannot come into existence without such conflict. This may seem to be of small significance. You know that our psychic life is continually agitated by conflicts for which we must find a solution. Certain conditions, therefore, must exist to make such a conflict pathological. We want to know what these conditions are, what psychic powers form the background for these pathological conflicts, what relation the conflict bears to the causative factors.

这么一来，神经症成因问题好像更为复杂化了。精神分析研究实际上让我们发现了一个新原因，它不属于病原的系列，在那些一直正常的人突然发作神经症的病例中，最容易观察到。这些个人通常表现出矛盾愿望的迹象，或者，按惯常说法叫心理冲突 的迹象。他们性格中某一点体现了某些愿望，而另一点却反对和抵制它们。没有这样的冲突，神经症是不会发生的。这看似并无太大意义。大家知道，我们的心理生活会持续受到冲突的困扰，我们必须找到解决方法。因而，冲突导致病症有一些必要条件。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条件，怎样的心理力量为这些致病冲突创造了条件，冲突与致病因素的关系是什么。

I hope I shall be able to give you satisfactory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even if I must make them schematically brief. Self-denial gives rise to conflict, for libido deprived of its gratification is forced to seek other means and ends. A pathogenic conflict arises when these other means and ends arouse the disfavor of one part of the personality, and a veto ensues which makes the new mode of gratification impossible for the time being. This i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mptoms, a process which we shall consider later. The rejected libidinous desires manage to have their own way, through circuitous byways, but not without catering to the objections through the observance of certain symptom-formation; the symptoms are the new or substitute satisfaction which the condition of self-denial has made necessary.

我希望能就这些问题给大家满意的解答，不过我必须回答得简明扼要。自我剥夺会导致冲突，因为被剥夺了性满足的力比多会被迫寻求其它途径和目标。当这些途径和目标引致个性某一点的厌恶并遭其否认，新的满足方式暂无实现的可能时，致病冲突就会产生。这是症状发展的出发点，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过程。被拒绝的力比多欲望自寻出路，经过迂回曲折的方式，但还是服从了某些症状形式，迎合了反对势力，症状是自我剥夺情况下必然出现的新的或替代的满足方式。

We can expres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sychic conflict in another way, by saying: the *outer* self-denial, in order to become pathological, must be supplemented by an *inner* self-denial. Outer denial removes one possibility of gratification, inner denial would like to exclude another possibility, and it is this second possibility which becomes the center of the ensuing conflict. I prefer this form of presentation because it possesses secret content. It implie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inner impediment found its origin in the prehistoric stage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real external hindrances.

对于心理冲突的意义，我们还可以这样表述：当外部 自我剥夺与内部 自我剥夺结合后，就具有了致病的力量。外部自我剥夺去除了一种满足的可能，内部自我剥夺则希望排除另一个可能，就是这个第二个可能，成为了继发的冲突的中心。我更重视这种表现形式，因为它具有一种神秘的内涵。它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即内部剥夺可在经历真实外界障碍的人类史前发展阶段中找到根源。

What powers are these which interpose objections to libidinous desire, who are the other parties to the pathological conflict? They are, in the widest sense, the non-sexual impulses. We call them comprehensively the “ego impulses”; psychoanalysis of transference neuroses does not grant us ready access to their further investigation, but we learn to know them, in a measure, through the resistance they offer to analysis. The pathological struggle is waged between ego-impulses and sexual impulses. In a series of cases it appears as though conflict could exist between various purely sexual desires; but that is really the same thing, for of the two sexual desires involved in the conflict, one is always considerate of the ego, while the other demands that the ego be denied, and so it remain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ego and sexuality.

在力比多欲望中置入反对因素的是什么力量？致病冲突还有哪些其他方面？广义上，它们是与性无关的冲动。我们一般叫它们作“自我冲动”，移情类精神症的精神分析对它们的研究尚不深入，但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它们在症状分析产生的抵抗了解了它们。自我冲动与性冲动之间展开致病的拉锯战。在一系列病例中，貌似冲突可能

存在于各种纯粹的性冲动之间，但这其实是一回事，其中一个冲动总是可视作自我冲动，而另一个冲动是需要否定自我的冲动，这样，冲突仍是发生在自我与性之间。

Again and again when psychoanalysis claimed that psychological event was the result of sexual impulses, indignant protest was raised that in psychic life there were other impulses and interests besides the sexual, that everything could not be derived from sexuality, etc. Well,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share for once the opinion of one's opponents. Psychoanalysis never forgot that non-sexual impulses exist. It insisted on the decided distinction between sexual and ego-impulses and maintained in the face of every objection not that neuroses arise from sexuality, but that they owe their origin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sexuality and the ego. Psychoanalysis can have no reasonable motive for denying the existence or significance of ego-impulses, even though it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sexual impulses play in illness and in life. Only it has been destined to deal primarily with sexual impulses, because transference neuroses have furnished the readiest access to their investigation, and because it had become obligatory to study what others had neglected.

每当精神分析宣称心理事件是性冲动的结果时，就会引发愤怒的抗议，说在心理生活中除了性之外还存在其他冲动和兴趣，不是每件事都与性相关，诸如此类的说法。嗯，这一次我很荣幸能与反对者意见一致了。精神分析从未忘记有非性冲动的存在。我们坚持认为性与自我冲动之间有着明确界限，面对每一种反对意见，我们的主张是，并不是神经症起源于性活动，而是其根源在于性与自我之间的冲突。精神分析没有道理否认自我冲动的存在或意义，尽管它研究的是性冲动在疾病和生活中的影响。只是它注定以性冲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因

为移情类神经症为研究它们提供了最便捷的途径，也因为它早就把捡漏拾遗的研究作为己任。

It does not follow, either, that psychoanalysis has never occupied itself at all with the non-sexual side of personality. The very distinction of the ego from sexuality has shown most clearly that the ego-impulses also pass through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which is by no means entirely independ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ido, nor does it fail to exert a reaction upon it. To be sure, we know much les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ego than about libido development, for so far only the study of narcistic neuroses has promised to throw light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ego. There is extant the notable attempt of Ferenczi to construct theoretically the stages of ego development, and furthermore we already possess two fixed points from which to proceed in our evolution of this development. We do not dream of asserting that the libidinous interests of a person are from the outset opposed to the interests of self-preservation; in every stage, rather, the ego will strive to remain in harmony with its sexual organization at that time, and accommodate itself thereto. The succession of the separate phases of development of libido probably follows a prescribed program; but we cannot deny that this sequence can be influenced by the ego, and that a certain parallelism of the phases of development of the ego and the libido may also be assumed. Indeed, the disturbance of this parallelism could become a pathological factor.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sights we have to gain is the nature of the attitude which the ego exhibits when an intensive fixation of its libido is left behind in one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It may countenance the fixation and accordingly become perverse or, what amounts to the same thing, become infantile. Or it may be averse to this attachment of the libido, the result of which is that wherever the

libido is subject to *fixation* , there the ego undergoes *suppression* .

但这也不是说精神分析从来没有研究过人格中非性的一面。自我与性的界限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自我冲动也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历程，与力比多的发展并非毫不相关，或并非未对其作出反应。老实说，我们对自我演变的认识，比力比多发展要少得多，因为到现在只有自恋型神经症有望略微揭示自我的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费伦齐尝试过在理论上构建自我发展阶段，而且我们已经确认了两点，对研究这个发展的演进提供了出发点。我们不会随意主张人的力比多兴趣从一开始就是与自我保护的利益相悖的，而是认为，在每一阶段，自我都会努力与当时的性组织保持一致，由此做到自我适应。力比多发展的一系列独立阶段可能遵循了一个预设的程序，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个系列可能被自我所影响，所以也可以推测，自我与力比多发展的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步进行的。事实上，这种同步遭到扰乱，就可能致病。当力比多存在着一种强烈执着而滞留在一个发展阶段时，自我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我们必须了解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可能会支持这一执着，会相应地变成性倒错，或者殊途同归地变得幼稚。或者它也可能反对这种力比多的依附，其结果是，凡是力比多的执着所在 之处就有压抑 的自我。

In this way we reach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hird factor of the etiology of neuroses is the tendency to *conflict* , upon which the development both of the ego and libido are dependent. Our insight into the causation of the neuroses has therefore been amplified. First, the most generalized factor, self-denial, then the fixation of the libido, by which it is forced into certain directions, and thirdly, the tendency to confli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which has rejected libidinous impulses of this kind. The state of affairs is therefore not so confused and difficult to see through, as you may have imagined it to be in the course of my explanation. But of

course we are to discover that we have not, as yet, reached the end. We must add still a new factor and further analyze one we already know.

这样，我们得出了结论：神经症病原的第三个因素是冲突　的倾向，它决定了自我与力比多两者的发展。我们关于神经症成因的见解因此得以拓宽。首先是最普通的因素，即自我剥夺；其次是力比多的执着，它驱使神经症往某些方向发展；第三是在自我发展中的冲突倾向，它拒绝了这一类的力比多冲动。因而问题的情况不难梳理和看清，大家在我的讲课过程中也体会到了。但是我们势必会发现问题并未就此结束。必须增添一个新的因素，对一个已知因素进行深入解析。

To show you the influence of ego development in the formation of a conflict, and so to give an illustration of the causation of neuroses, I should like to cite an example which, although it is entirely imaginary, is not far removed from probability in any respect. Drawing upon the title of a farce by Nestroy, I shall label this example “On the ground floor and in the first story.” The janitor lives on the ground floor, while the owner of the house, a rich, distinguished man, occupies the first story. Both have children, and we shall assume that the owner permits his little daughter to play unwatched with the child of the people. Then it may easily happen that the games of the children become “naughty,” that is, they assume a sexual character; they play “father and mother,” watch each other in the performance of intimate performances and mutually stimulate their genitals. The janitor's daughter, who, in spite of her five or six years of age, has had occasion to make observations on the sexuality of adults, probably played the part of the seducer. These experiences, even though they be of short

duration, are sufficient to set in motion certain sexual impulses in both children, which continue in the form of onanism for several years after the common games have ceased. So far the consequences are similar; the final result will be very different. The janitor's daughter will continue onanism possibly to the commencement of her periods, abandon it then without difficulty, not many years later find a lover, perhaps bear a child, choose this or that path of life, which may likely enough make of her a popular artist who ends as an aristocrat. Perhaps the outcome will be less brilliant, but at any rate she will work out her life, free from neurosis, unharmed by her premature sexual activity. Very different is the effect on the other child. Even while she is very young she will realize vaguely that she has done wrong. In a short while, perhaps only after a violent struggle, she will renounce the gratification of onanism, yet still retain an undercurrent of depression in her attitude. If, during her early childhood, she chances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sexual intercourse, she will turn away in explicable disgust and seek to remain innocent. Probably she is at the time subjected anew to an irresistible impulse to onanism, of which she does not dare to complain. When the time arrives for her to find favor in the eyes of a man, a neurosis will suddenly develop and cheat her out of marriage and the joy of life. When analysis succeeds in gaining insight into this neurosis, it will reveal that this well-bred, intelligent girl of high ideals, has completely suppressed her sexual desires, but that unconsciously they cling to the meager experiences she had with the friend of her childhood.

为了展示冲突形成中自我发展的影响，从而演示神经症的成因，我想引用一个例子，虽然它完全是虚构的，但在各方面都很接近事实。我借鉴了内斯特罗伊所著一出笑剧的题目，将此例命名为“楼上楼下”。有一栋房子，住在底楼的是看门人，而住在二楼的则是房

东，一位有名望的富人。两个人都有孩子，我们假设房东允许自己的小女儿与老百姓的孩子不受拘束地一起玩耍。接下来很可能发生的事是，孩子们的游戏开始“淘气”起来，也就是说，他们编排了性的角色，扮演“爸爸和妈妈”，她们做出亲密举动，互相观察、刺激彼此的性器官。看门人的女孩尽管才五六岁大，但有机会目睹了大人的性活动，她也许会扮演勾引的一方。这些经历即使历时短暂，但是足以在两个孩子身上植入某些性冲动，当共同游戏停止后，那些性冲动会以手淫的形式持续几年。目前结果是类似的，但最终的结果会非常不同。看门人的女儿会继续手淫，可能一直到例假来临，然后毫不费力地放弃了这个习惯，不出几年后有了爱人，也许怀了孩子，选择了这样或那样的生活之路，有可能成为一个热门的艺术家，最后成了贵妇。也许结果不会那么出彩，但是不管怎样她会过好生活，不会患上神经症，不会受到往日幼稚性活动的伤害。而另一个小孩的命运将与之大相径庭。即使她很小，她还是依稀记得自己做了错事。一小段时间过后，也许只经过一次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她就发誓与手淫的享受绝缘，但依旧隐隐流露出抑郁的神情。如果她在童年早期碰巧了解到一些性交知识，她会明显厌恶地反对，努力自保纯洁。或许她当时会再次产生不可遏制的手淫冲动，她不敢对此抱有怨言。当她到了与男子相爱的年龄时，突然患上了一种神经症，毁了她的姻缘与一生的快乐。症状分析洞察这一神经症之后发现，这位很有教养、聪明伶俐、各方面都很理想的女孩完全压抑了自己的性欲，但是在潜意识之中，她的性欲与她和童年伙伴的贫乏经验黏合在了一起。

The difference of these two destinies, arising from the same experience,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one ego has experienced development while the other has not. The janitor's daughter in later years looks upon sexual intercourse as the same natural and harmless thing it had seemed in her childhood. The owner's daughter had experienced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and had recognized its claims. Thus stimulated, her ego had forged its ideals of womanly purity and lack of desire which, however, could not

agree with any sexual activity; her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had made unworthy her interest in the woman's part she was to play. This higher moral and intellectual evolution of her ego was in conflict with the claims of her sexuality.

同样的经历导致的这两种命运，其不同之处在于，一个自我经历了发展，而另一个自我没有发展。看门人的女儿后来将性交看作一件自然无害之事，这与她儿时的看法一样。房东的女儿受到教育的影响，并认同了它的规定。在此激励之下，她形成了自己关于女子守贞和寡欲的理想，但这无法允许任何性活动，她的智力发展使其无意扮演女性应有的角色。她的自我向崇高道德和高度理性演化，与自己的性需求产生了冲突。

I should like to consider today one more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partly because it opens wide vistas, partly because it will justify the sharp, perhaps unnatural line of division we are wont to draw between sexual and ego impulses. In estimating the several developments of ego and of libido, we must emphasize an aspect which has not frequently been appreciated heretofore. Both the ego and the libido are fundamentally heritages, abbreviated repetitions of an evolution which mankind has, in the course of long periods of time, traversed from primeval ages. The libido shows its phylogenetic origin most readily, I should say. Recall, if you please, that in one class of animals the genital apparatus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mouth; that in another i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excretory apparatus, and in others it is attached to organs of locomotion. Of all these things you will find a most fascinating description in the valuable book of W. Bölsche. Animals portray, so to speak, all kinds of perversions which have become set as their permanent sexual organizations. In man this

phylogenetic aspect is partly clouded by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se activities, although fundamentally inherited, are achieved anew i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resumably because the same conditions still prevail and still continue to exert their influence on each personality. I should say that originally they served to call forth an activity, where they now serve only as a stimulus for recollectio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n additio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in each individual, which has been innately determined, may be disturbed or altered from without by recent influences. That power which has forced this development upon mankind, and which today maintains the identical pressure, is indeed known to us: it is the same self-denial enforced by the realities—or, given its big and actual name, *Necessity* ,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the [Greek] 'Ananchê. This has been a severe teacher, but under him we have become potent. The neurotics are those children upon whom this severity has had a bad effect—but there is risk in all education. This appreciation of the struggle of life as the moving force of development need not prejudice us against the importance of “innate tendencies in evolution” if their existence can be proved.

我想就自我的发展再多讲一点，一方面是因为，它拓宽了视野，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希望在性冲动与自我冲动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也许是人为的界限，而它证明了这个界限的合理性。评估自我和力比多的几种发展时，我们必须强调一个此前很少得到理解的事实。自我和力比多都是一种传承，它们都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历经漫长发展时期的进化过程的简略重复。力比多的物种根源体现得极为明显，我这么认为。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回想一下，在一类动物中，生殖器体制与口腔有关，另一类则无法脱离排泄器官，还有的与运动器官有关。关于所有这些内容，在波尔谢的宝贵著作中可找到一些极为精彩的描述。可以说，动物表现了各类倒错行为，而且它们被设定为永久的性组织。在人身上，这一物种特点因以下情形而显得有些模糊：这些活

动虽然根本上是代代相传的，但它们在个人发展中获得了更新，这也许是因为同样情况仍有力存在着，依然继续对每一个人施加影响。毫无疑问，每个人的发展历程（这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可能受到外界近期影响而被干扰或改变。促使人类如此发展并且至今仍压力不减的力量，实际上是我们知道的东西：它还是那个被现实强化的自我剥夺——或换一个更大更实际的名字，必要性，即生存斗争，希腊语为“Ananchê”。它是一个严厉的老师，但我们在其言传身教之下变得强大。神经症患者则是承担了其严厉恶果的那些孩子——但所有教育都有风险。生存斗争被理解为推动发展的力量，这一理解不应使我们小看“发展的内在动力”，假如它们的存在可以得到证实。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sexual instincts and instincts of self-preservation do not behave similarly when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necessities of actuality. It is easier to educate the instincts of self-preservation and everything that is connected with them; they speedily learn to adapt themselves to necessity and to arrange their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ndates of fact. That is easy to understand, for they cannot procure the objects they require in any other way; without these objects the individual must perish. The sex instincts are more difficult to educate because at the outset they do not suffer from the need of an object. As they are related almost parasitically to the other functions of the body and gratify themselves auto-erotically by way of their own body, they are at first withdrawn from the educational influence of real necessity. In most people, they maintain themselves in some way or other during the entire course of life as those characteristics of obstinacy and inaccessibility to influence which are generally collectively called unreasonableness. The education of youth generally comes to an end when the sexual demands are aroused to their full strength. Educators know this and act accordingly; but perhaps the results of psychoanalysis will influence them to transfer the greatest emphasis

to the education of the early years, of childhood, beginning with the suckling. The little human being is frequently a finished product in his fourth or fifth year, and only reveals gradually in later years what has long been ready within him.

值得注意的是，当性的本能冲动和自我保护本能面临各种现实必要性时，它们的反应不尽相同。自我保护本能及所有相关本能比较容易教育，它们很快学会适应现实必要性，使自己的发展与现实需要一致。这不难理解，因为它们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取所需对象，没有这些对象人就无法生存了。性的本能冲动则较难教育，因为它们起初就没有缺乏过对象。它们与身体其他功能存在着几近寄居的关系，可以在自身肉体上获得自淫式满足，它们开始不受现实必要性教育的影响。在大部分人身上，它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坚持下来，具有顽固不化的特征（大家一般都叫做蛮横无理）。当性需求最旺盛时，教育年轻人的工作一般会停止。教育者们知道这个，也采取了相应行动，但是也许精神分析的结论将促使他们将重心转移到幼年和童年的教育，从婴儿开始。小人儿们其实通常在四五岁时就已是成品了，只是他们今后会逐步显露出早已成型的各方面。

To appreciate the full significance of the aforementione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instincts, we must digress considerably and introduce a consideration which we must needs call *economic* . Thereby we enter up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ut unfortunately one of the most obscure domains of psychoanalysis. We ask ourselves whether a fundamental purpose is recognizable in the workings of our psychological apparatus, and answer immediately that this purpose is the pursuit of pleasurable excitement. It seems as if our entire psychological activity were directed toward gaining pleasurable stimulation, toward avoiding painful ones; that it is regulated automatically by the *principle of*

pleasure . Now we should like to know, above all, what conditions cause the creation of pleasure and pain, but here we fall short. We may only venture to say that pleasurable excitation *in some way* involves lessening, lowering or obliterating the amount of stimuli present in the psychic apparatus. This amount, on the other hand, is increased by pain. Examination of the most intense pleasurable excitement accessible to man, the pleasure which accompani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xual act, leaves small doubt on this point. Since such processes of pleasure are concerned with the destinies of quantities of psychic excitation or energy, we call considerations of this sort economic. It thus appears that we can describe the tasks and performances of the psychic apparatus in different and more generalized terms than by the emphasis of the pursuit of pleasure. We may say that the psychic apparatus serves the purpose of mastering and bringing to rest the mass of stimuli and the stimulating forces which approach it. The sexual instincts obviously show their aim of pleasurable excitement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ir development; they retain this original function without much change. The ego instincts strive at first for the same thing. But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their teacher, necessity, the ego instincts soon learn to adduce some qualifica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pleasure. The task of avoiding pain becomes an objective almost comparable to the gain of pleasure; the ego learns that its direct gratification is unavoidably withheld, the gain of pleasurable excitement postponed, that always a certain amount of pain must be borne and certain sources of pleasure entirely relinquished. This educated ego has become “reasonable.” It is no longer controlled by the principle of pleasure, but by the *principle of fact* , which at bottom also aims at pleasure, but pleasure which is postponed and lessened by considerations of fact.

为了充分理解前述两类冲动的差异的意义，我们势必要离题较远地介绍一种想法，它必叫做经济性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精神分析中最重要、但不幸也是最含糊的领域之一。我们问自己，在心理体制运行中能否确认一种根本目的，我们马上回答，这个目的是追寻快乐刺激。似乎我们整个心理活动都是关于获得快乐刺激、避免痛苦刺激的，它自动地遵循着快乐原则 。现在我们想了解，根本而言，何种条件引致了快乐或痛苦，但我们对此并无答案。我们只能大胆猜测，快乐刺激在某一方面意味着减少、降低、删除心理体制中现存的刺激量。这一刺激量在另一方面因痛苦而增加了。人可获得的极限快乐刺激与性行为相伴而生，对它们的检视结果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追求快乐的过程与心理刺激或能量的必然数量相关，我们就把这种现象称为经济性。这样，我们似乎可以不用强调快乐原则，而用不同的、更普遍化术语来形容心理体制的使命与表现。我们可以说，心理体制的目的是掌控和平息大部分刺激及其相邻的刺激性力量。性的本能冲动在其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明白地显示出快乐刺激的诉求，它们未作过多变化，保存了这种起初的功能。自我冲动起初努力的目标一样。但是在其教官即生存必要性的影响下，自我冲动很快学会对快乐原则进行某种限制。避免痛苦的使命几乎是与获得快乐同等重要的目的，自我知道自己的直接满足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获取快乐刺激被延后，总是要忍受一定程度的痛苦，放弃一些快乐的来源。经受教育的自我变得“理性”。它不再受到快乐原则的左右，而是服从于务实原则 ，这个原则从根本上说也以快乐为诉求，但寻求的是对现实进行考量之后被延期和缩减的快乐。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leasure principle to that of fact is the most important adv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We already know that the sexual instincts pass through this stage unwillingly and late. We shall presently learn the consequence to man of the fact that his sexuality admits of such a loose relation to the external realities of his life. Yet one more observation belongs here. Since the ego of man has, like the libido, its history of evolution, you will

not be surprised to hear that there are “ego-regressions,” and you will want to know what role this return of the ego to former phases of development plays in neurotic disease.

从快乐原则向务实原则转变是自我发展中最重大的进步。我们已经知道，性的本能冲动经历这一阶段是很不情愿并迟缓的。我们现在该知道务实者的结果是，他们的性活动可以容许自己与其外部现实生活保持这种松散关系。不过这里还有一点。既然人的自我和力比多一样有着自身的演变历史，大家听到有“自我退化”一说并不奇怪，而且会想要知道这种退回早前发展阶段的自我在神经疾病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Twenty-Third Lect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mptoms

第二十三讲　症状发展

In the layman's eyes the symptom shows the nature of the disease, and cure means removal of symptoms. The physician, however, finds it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the symptoms from the disease and recognizes that doing away with the symptoms is not necessarily curing the disease. Of course, the only tangible thing left over after the removal of the symptoms is the capacity to build new symptoms. Accordingly, for the time being, let us accept the layman's viewpoint and conside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ymptoms as equivalent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ickness.

在外行人的眼里，症状表明了疾病性质，而治愈意味着症状消除。然而医生认为，把症状与疾病区别开来很重要，而且发现，去除症状未必等于治愈疾病。当然，症状消除后只剩下一件事可以观察，即新症状发生的可能性。因而，我们暂时先采用外行人的观点，将症状的理解等同于疾病的理解。

The symptoms—of course, we are dealing here with psychic (or psychogenic) symptoms, and psychic illness—are acts which are detrimental to life as a whole, or which are at least useless; frequently they are obnoxious to the individual who performs them and are accompanied by distaste and suffering. The principal injury lies in the psychic exertion which they cost, and in the further exertion needed to combat them. The price these efforts exact may, when there is an ext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symptoms, bring

about an extraordinary impoverishment of the personality of the patient with respect to his available psychic energy, and consequently cripple him in all the important tasks of life. Since such an outcome is dependent on the amount of energy so utilized, you will readily understand that “being sick” is essentially a practical concept. But if you take a theoretical standpoint and disregard these quantitative relations, you can readily say that we are all sick, or rather neurotic, since the conditions favor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ymptoms are demonstrable also among normal persons.

症状——我们这里指的当然是心理（或称心因性）症状以及心理疾病，总体上来说是一种对生命构成危害，或至少是无意义的行动，症状患者觉得它们面目可憎，同时深为厌恶并深受其苦。症状的根本伤害在于它们耗费的心力以及对抗它们所需的进一步的心力。当症状全面发展时，这些努力所需代价会导致患者个人心理能量储备匮乏，结果使其无力应付重要的人生使命。因为这种结果取决于可利用的心理能量多寡，大家很容易理解“生病”本质上是一个实际性概念。但如果站在理论的角度，摒弃这些量化标准，大家很快会说，既然有利症状发展的条件在正常人身上也可以发现，那我们都有毛病，或可说都有神经症。

As to the neurotic symptoms, we already know that they are the result of a conflict aroused by a new form of gratifying the libido. The two forces that have contended against each other meet once more in the symptom; they become reconciled through the compromise of a symptom development. That is why the symptom is capable of such resistance; it is sustained from both sides. We also know that one of the two partners to the conflict is the unsatisfied libido, frustrated by reality, which must now seek other means for

its satisfaction. If reality remains inflexible even where the libido is prepared to take another object in place of the one denied it, the libido will then finally be compelled to resort to regression and to seek gratification in one of the earlier stages in its organizations already out-lived, or by means of one of the objects given up in the past. Along the path of regression the libido is enticed by fixations which it has left behind at these stages in its development.

关于神经性症状，我们已经知道，它们是力比多满足的新形式引起冲突的结果。两股互相对抗的力量在症状中再次狭路相逢，通过症状发展的调和达成了和解。这是症状有抵抗能力的原因，它从两方面获得了生存动力。我们也知道，冲突双方之一为未被满足的力比多，它被现实生活挫败后，现在急于寻求新的满足途径。假如，即便力比多准备用另一对象替代被否定的对象，而现实仍对此不依不饶，力比多最终会被迫走向退化，在已经过时的性组织某一早前发展阶段或通过早被放弃了的性对象之一寻求满足。在退化之路上，力比多被它在这些发展阶段抛弃了的执着点所吸引。

Here the development toward perversion branches off sharply from that of the neuroses. If the regressions do not awaken the resistance of the ego, then a neurosis does not follow and the libido arrives at some actual, even if abnormal, satisfaction. The ego, however, controls not alone consciousness, but also the approaches to motor innervation, and hence the realization of psychic impulses. If the ego then does not approve this regression, the conflict takes place. The libido is locked out, as it were, and must seek refuge in some place where it can find an outlet for its fund of energ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olling demands for pleasurable gratification. It must withdraw from the ego. Such an evasion is offered by the fixations established in the course of its evolution

and now traversed regressively, against which the ego had, at the time, protected itself by suppressions. The libido, streaming back, occupies these suppressed positions and thus withdraws from before the ego and its law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t throws off all the influences acquired under its tutelage. The libido could be guided so long as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of its being satisfied; under the double pressure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denial it becomes unruly and harks back to former and more happy times. Such is its character, fundamentally unchangeable. The ideas which the libido now takes over in order to hold its energy belong to the system of the unconscious, and are therefore subject to its peculiar processes, especially elaboration and displacement. Conditions are set up here which are entirely comparable to those of dream formation. Just as the latent dream, the fulfillment of a wish-phantasy, is first built up in the unconsciousness, but must then pass through conscious processes before, censored and approved, it can enter into the compromise construction of the manifest dream, so the ideas representing the libido in the unconscious must still contend against the power of the fore-conscious ego. The opposition that has arisen against it in the ego follows it down by a "counter-siege" and forces it to choose such an expression as will serve at the same time to express itself. Thus, then, the symptom comes into being as a much distorted offshoot from the unconscious libidinous wish-fulfillment, an artificially selected ambiguity—with two entirely contradictory meanings. In this last point alone do we realize a difference between dream and symptom development, for the only fore-conscious purpose in dream formation is the maintenance of sleep, the exclusion from consciousness of anything which may disturb sleep;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oppose the unconscious wish impulse with an insistent "No." Quite the contrary; the purpose of the dream may be more tolerant, because the situation of the sleeper is a less dangerous one. The exit to reality is closed only

through the condition of sleep.

在这里，性倒错与神经症的发展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如果退化没有激发自我的抵抗，神经症不会出现，力比多将获得某种真正的（尽管是反常的）满足。然而，自我不仅控制着意识，而且也指挥着运动神经，因而也决定了心理冲动的实现。如果自我不认可这一退化，冲突就会发生。可以说，力比多遭到驱逐，它必须寻求庇护地，找到一个发泄其能量积蓄的通道，以响应快乐原则的迫切需求。它必须从自我中撤退。这样一种逃逸，由力比多演变过程中确立而现在被反向跨越的执着点提供帮助，当时自我曾以压抑作用抑制这些执着作用。力比多回流时占领了这些被压抑的位置，这些就逃开了自我及其规则。然而，与此同时，它摒弃了在自我的教导下获得的所有影响力。只要有满足的可能性，力比多就是可以调教的，在外界和内部剥夺的双重压力下，它变得桀骜难驯，退回以前更快乐的时光。这就是它难以改变的本性。力比多现在为了保存能量而接收的念头属于潜意识体系，因而也具有其特有的过程，尤其是凝缩与移置。它们的情况与造梦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正如隐梦一样，一种愿望——幻想的实现首先在潜意识中构建起来，但接着必然要经历意识过程，直到被审查和批准后，才能进入显梦的妥协结构中，这样，在潜意识中代表力比多的念头必然仍与前意识的自我力量相抗衡。从自我中产生的对抗力量以“反围攻”之法追击力比多，迫使其选择与自己相同的表达方式。如此，力比多的潜意识的愿望实现产生了一种更为变形的衍生物，一种人为选择的歧义——具有两种完全对立的意义，这样症状就形成了。仅凭最后一点，我们就可认识到梦与症状发展的区别，因为梦唯一的前意识目的是维持睡眠，从意识中驱除任何可能搅扰睡眠的因素，但它未必会坚决地抵制潜意识的愿望实现。恰恰相反的是，梦的目的可能更为宽容，因为睡眠者的情况较为安全。通往现实的出口只在睡眠情况下被关闭。

You see, this evasion which the libido find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conflict is possible only by virtue of the existing fixations. When these fixations are taken in hand by the regression, the suppression is side-tracked and the libido, which must maintain itself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compromise, is led off or gratified. By means of such a detour by way of the unconscious and the old fixations, the libido has at last succeeded in breaking its way through to some sort of gratification, however extraordinarily limited this may seem and however unrecognizable any longer as a genuine satisfaction. Now allow me to add two further remarks concerning this final result. In the first place, I should like you to take note of the intimat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ibido and the unconsciou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of the ego, consciousness, and reality. The connection that is evidenced here, however, does not indicate that originally they in any way belong together. I should like you to bear continually in mind that everything I have said here, and all that will follow, pertains only to the symptom development of hysterical neurosis.

大家看，力比多在冲突的情况下发现的逃逸道路，可能只是借助了现有的执着点。当这些执着点被退化占据，压抑作用被转移，而在妥协情况下必须坚持自我的力比多则得到疏导或满足。通过潜意识和旧有执着点，力比多以曲折的方式最终成功突围，获得了某种满足，尽管这种满足极为有限，尽管这种满足称不上真正的满足。现在我再就最后的结论多说两点。首先，我希望大家一方面注意到力比多与潜意识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注意自我、意识与现实的关系。然而，在这里显而易见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它们当初无论如何都是相关的。希望大家一直要牢记，我在这个问题上所讲的、以及将要讲的一切内容都仅与癔症神经症的症状发展有关。

Where, now, can the libido find the fixations which it must

have in order to force its way through the suppressions? In the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s of infantile sexuality; in its abandoned component-impulses, its childish objects which have been given up. The libido again returns to them.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eriod of childhood is a double one; on the one hand, the instinctive tendencies which were congenital in the child first showed themselves at this time; secondly, at the same time,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and chance experiences were first awakening his other instincts. I believe our right to establish this bipartite division cannot be questioned. The assertion that the innate disposition plays a part is hardly open to criticism, but analytic experience actually makes it necessary for us to assume that purely accidental experiences of childhood are capable of leaving fixations of the libido. I do not see any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here. Congenital tendencies undoubtedly represent the after-effects of the experiences of an earlier ancestry; they must also have once been acquired; without such acquired characters there could be no heredity. And is it conceivable that the inheritance of such acquired characters comes to a standstill in the very generation that we have under observ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infantile experience, however, should not, as is so often done, be completely ignored as compared with ancestral experiences or those of our adult years; on the contrary, they should meet with an especial appreciation. They have such important results because they occur in the period of uncompleted development, and because of this very fact are in a position to cause a traumatic effect. The researches on the mechanics of development by Roux and others have shown us that a needle prick into an embryonic cell mass which is undergoing division results in most serious developmental disturbances. The same injury to a larva or a completed animal can be borne without injury.

现在，力比多在何处可发现其赖以突破压抑的执着点？在幼儿的性活动和经历中，在它被放弃的局部冲动和幼稚的性对象中。力比多再次回到它们身边。童年这一时期有两层意义，一方面，儿童先天具有的本能倾向首先在此时期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同时，环境影响和偶然经历也开始唤醒其他本能冲动。我认为这种双向分类是毋庸置疑的。先天倾向的作用固然无可非议，但对经历进行分析后，我们其实必然会推定，童年时纯粹偶然的经历有能力使力比多的执着滞留。这里在理论上并无障碍。先天倾向体现的无疑是祖辈经历的后果，它们必然也曾是获得的经历，没有这种获得的特征，是不可能代代相传的。这些获得的特征，有可能在我们观察的这一代突然停止遗传吗？但是，比起祖辈的经历或成年人的经历，幼儿的经历常常遭到忽略，这是不应该的，相反，我们应对它们予以特别重视。它们产生了很重要的后果，因为它们出现于不成熟的发展期，也因为这一事实有可能导致创伤性后果。鲁氏等人关于发育机制的研究表明，用针刺入一个正在分裂的胚胎细胞群，其发育将受到最严重的干扰。而昆虫或成熟动物若遭受同样伤害，是可以耐受而不致受伤的。

The libido fixation of adults, which we have referred to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nstitutional factor in the etiological comparison of the neuroses, can be thought of, so far as we are concerned, as divisible into two separate factors, the inherited disposition and the tendency acquired in early childhood. We know that a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is most acceptable to the student. Let us combine these relations as follows:

就我们而言，成人的力比多执着（我们认为它是神经症病原的性构造成因）可划分为两个独立因素，先天倾向与幼年获得的倾向。我知道学生最喜欢条理清晰的讲解。我们把这些关系综合如下：

The hereditary sexual constitution provides us with manifold tendencies, varying with the special emphasis given one or the other component of the instinct, either individually or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factor of infantile experience, there is again built up a complementary series within the sexual constitution which is perfectly comparable with our first series, namely, the gradations between disposition and the chance experiences of the adult. Here again we find the same extreme cases and similar relations in the matter of substitution. At this point the question becomes pertinent as to whether the most striking regressions of the libido, those which hark back to very early stages in sexual organization, are not essentially conditioned by the hereditary constitutional factor.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however, may best be put off until we are in a position to consider a wider range in the forms of neurotic disease.

遗传的性构造提供了多种倾向，因具体的侧重而异，有时是这一个冲动成分，有时是另一个冲动成分，有时为独立的，有时是混合的。关于幼年经历的因素，在其性的构造中又建有一种互补系列，它与第一个系列（即成人的倾向和偶然经历的互补关系）十分类似。这里我们又发现同样的极端案例以及类似的互补关系。这里有一个突出

的问题：力比多最瞩目的退化，即那些穿越回性组织的最早阶段的退化，从根本上说是否取决于遗传的性构造因素。不过，这个问题要延后回答，等到我们能够研究更多的神经症形式再说。

Let us devote a little time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fact that 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neurotics shows the libido to be bound up with the infantile sexual experiences of these persons. In this light they seem of enormous importance for both the life and health of mankind. With respect to therapeutic work their importance remains undiminished. But when we do not take this into account we can herein readily recognize the danger of being misled by the situation as it exists in neurotics into adopting a mistaken and one-sided orientation toward life. In figur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fantile experiences we must also subtract the influences arising from the fact that the libido has returned to them by regression, after having been forced out of its later positions. Thus we approach the opposite conclusion, that experiences of the libido had no importance whatever in their own time, but rather acquired it at the time of regression. You will remember that we were led to a similar alternative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Oedipus-complex.

我们花一点时间探讨一个事实：神经症患者的调查分析显示，力比多与本人的幼年性经历是紧密相关的。以此看来，它们似乎对人类的生活与健康都有着巨大作用。它们在治疗工作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但如果不考虑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发现它存在误导的危险，即因精神症患者的情况而采纳一种错误的、片面的生活态度。力比多被逼出原有位置，通过退化回归幼年经历，这种影响力减低了幼年经历的重要性。这样我们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力比多的经历在其获得时并不重要，而在退化时才变得重要。大家记得，我们在探讨俄狄浦斯情结时也曾发现了一个类似现象。

A decision on this matter will hardly be difficult for us. The statement is undoubtedly correct that the hold which the infantile experiences have on the libido—with the pathogenic influences this involves—is greatly augmented by the regression; still, to allow them to become definitive would nevertheless be misleading. Other considerations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as well. In the first place, observation shows, in a way that leaves no room for doubt, that infantile experiences have their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which is evidenced already during childhood. There are, furthermore, neuroses in children in which the factor of displacement in time is necessarily greatly minimized or is entirely lacking, since the illness follows as an immediate consequence of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 The study of these infantile neuroses keeps us from many dangerous misunderstandings of adult neuroses, just as the dreams of children similarly serve as the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reams of adult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neuroses of children are very frequent, far more frequent than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ey are often overlooked, dismissed as signs of badness or naughtiness, and often suppress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nursery; in retrospect, however, they may be easily recognized later. They occur most frequently in the form of *anxiety hysteria* . What this implies we shall learn upon another occasion. When a neurosis breaks out in later life, analysis regularly shows that it is a direct continuation of that infantile malady which had perhaps developed only obscurely and incipiently. However, there are cases, as already stated, in which this childish nervousness continues, without any interruption, as a lifelong affliction. We have been able to analyze a very few examples of such neuroses during childhood, while they were actually going on; much more often we had to be satisfied with obtaining our insight into the childhood neurosis subsequently, when the patient is already well along in life, under conditions in

which we are forced to work with certain corrections and under definite precautions.

我们不难就此问题得出结论。幼年经历对力比多的作用——它牵涉到致病性影响——被退化大大增强了，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把它们看作决定性因素仍是有误导性的。必须同时考虑其他因素。首先，观察显示，幼年经历具有无可质疑的特殊作用，早在童年就已显而易见。而且，在有些儿童的神经症中，移置作用最后势必大幅减少或完全消失，因为后来的病症是这一创伤性经历的直接后果。关于幼儿神经症的研究使我们免于对成人神经症产生若干危险的误解，就像儿童的梦同样是理解成人梦的钥匙一样。事实上，儿童神经症非常频繁，常见程度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它们常常被忽视，被当成顽劣行迹而不作处理，也常常被家长压制，但后来一经回想，它们是很容易辨识的。它们最常见的形式是焦虑型癔症 。关于它的启示，我们后面会讲到。研究分析常常表明，成年人神经症发作，是幼儿神经症（也许只略微含糊地发作过）的直接延续。然而，如我所说，在有些病例中这种幼稚神经症会毫不中断地继续下去，成为了终生困扰。我们有机会分析了极少数此类发生于童年的、实际仍在进行中的病例，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只能从成年病人反推儿童神经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进行适当的修正和采取明确应对措施。

Secondly, we must admit that the universal regression of the libido to the period of childhood would be inexplicable if there were nothing there which could exert an attraction for it. The fixation which we assume to exist towards specific developmental phases, conveys a meaning only if we think of it as stabilizing a definite amount of libidinous energy. Finally, I am able to remind you that here there exists a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nsity and the pathogenic significance of the infantile experiences to the later ones which is similar to that studied in

previous series. There are cases in which the entire causal emphasis falls upon the sexual experiences of childhood, in which these impressions take on an effect which is unmistakably traumatic and in which no other basis exists for them beyond what the average sexual constitution and its immaturity can offer. Side by side with these there are others in which the whole stress is brought to bear by the later conflicts, and the emphasis the analysis places on childhood impressions appears entirely as the work of regression. There are also extremes of “retarded development” and “regression,” and between them every combination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factors.

其次，必须承认，如果没有释放吸引力的来源，力比多回归童年期的普遍退化现象将是令人费解的。假定存在于具体发展阶段的执着点，我们只有将其视作力比多能量的稳定因素时，它才是有意义的。最后，我想提醒大家，幼年经历与成人经历在强度和致病性作用上存在着一种互补关系，与以前讲到的互补系列类似。有些病例完全偏向了童年的性经历，这些经历无疑具有创伤性，除了普通的性构造及其幼稚性之外别无其他来源。同样也有一些病例完全侧重于成年时期的冲突，对于童年见闻的分析重点完全是退化的作用。另外也有一些“发育迟钝”和“退化”的极端案例，在它们之间就是两个因素互相作用的病例。

These relations have a certain interest for that pedagogy which assumes as its object the prevention of neuroses by an early interference in the sexu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So long as we keep our attention fixed essentially on the infantile sexual experiences, we readily come to believe we have done everything for the prophylaxis of nervous afflictions when we have seen to it that this development is retarded, and that the child is spared this

type of experience. Yet we already know that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ausation of neuroses are more complicated and cannot in general be influenced through one single factor. The strict protection in childhood loses its value because it is powerless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al factor; furthermore,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carry out than the educators imagine, and it brings with it two new dangers that cannot be lightly dismissed. It accomplishes too much, for it favors a degree of sexual suppression which is harmful for later years, and it sends the child into life without the power to resist the violent onset of sexual demands that must be expected during puberty. The profit, therefore, which childhood prophylaxis can yield is most dubious; it seems, indeed, that better success in the prevention of neuroses can be gained by attacking the problem through a changed attitude toward facts.

有一种教育观念，其目标是通过对儿童性发育的早期干预以预防神经症，上述互补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给了它一个关注点。如果我们在根本上只重视幼年的性经历，就会尽力促成发育迟钝，使儿童免于性经历，这样我们很快就会认为，我们对预防神经性病症尽了一切努力。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症的成因条件较为复杂，一般不会只受一种因素的影响。对儿童的过度保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无力抵御性构造的因素。此外，它的实施远比教育者想象的困难，而且带来两个难以解决的风险：一是，它是过度的措施，因为它赞同某种程度的性压抑，对成年生活是有害的；二是，它让儿童在生活中丧失了抵抗强烈性需求（这在青春期必然会发生）的能力。因而童年预防所产生的益处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其实，转换一下看待问题的角度，也许能找到更好的预防神经症的方法。

Let us return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symptoms. They serve as substitutes for the gratification which has been forborne, by a

regression of the libido to earlier days, with a return to former development phases in their choice of object and in their organization. We learned some time ago that the neurotic is held fast somewhere in his past; we now know that it is a period of his past in which his libido did not miss the satisfaction which made him happy. He looks for such a time in his life until he has found it, even though he must hark back to his suckling days as he retains them in his memory or as he reconstructs them in the light of later influences. The symptom in some way again yields the old infantile form of satisfaction, distorted by the censoring work of the conflict. As a rule it is converted into a sensation of suffering and fused with other causal elements of the disease. The form of gratification which the symptom yields has much about it that alienates one's sympathy. In this we omit to take into account, however, the fact that the patients do not recognize the gratification as such and experience the apparent satisfaction rather as suffering, and complain of it. This transformation is part of the psychic conflict under the pressure of which the symptom must be developed. What was at one time a satisfaction for the individual must now awaken his antipathy or disgust. We know a simple but instructive example for such a change of feeling. The same child that sucked the milk with such voracity from its mother's breast is apt to show a strong antipathy for milk a few years later, which is often difficult to overcome. This antipathy increases to the point of disgust when the milk, or any substituted drink, has a little skin over it. It is rather hard to throw out the suggestion that this skin calls up the memory of the mother's breast, which was once so intensely coveted. In the meantime, to be sure,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 of weaning has intervened.

我们回到症状的讨论上来。症状是被抑制的满足的替代，方法是

力比多退化到过去，回到性对象选择和性组织的早前发展阶段中。我们不久前刚知道，神经症患者与过去某时关系密切，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其力比多得到满足使其快乐的时期。他们找寻了一段时间，然后发现了它，尽管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婴儿岁月；他们或在记忆中留有痕迹，或在日后经历的启发下重现了这些岁月。这个症状某种程度上再次产生了旧时幼稚形态的满足，而它在冲突的审查下变形了。一般来说，它会转变为一种痛苦的感觉，与其它致病元素混为一体。症状所致满足形式足以使人毫无认同感。不过，这里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病人不认同这种满足，认为自己体验的满足是一种痛苦，对之颇有怨言。这种转变是在症状必然导致的压力下产生的部分心理冲突。对个人来说曾经是满足的事物，现在必然激起了反感或厌恶。关于这种情感变化，我们知道一个简单而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曾经贪婪吸食母乳的小孩在几年后常会对奶水表现出强烈厌恶，而且通常难以克服。当牛奶或任何类似饮品表面有奶皮时，这种厌恶感会增大到恶心的程度。我们很难不揣测这个奶皮激活了对母亲乳房的回忆，它曾经是强烈渴望的目标。同时，不可否认，断奶的创伤性经历也介入其中。

There is something else that makes the symptoms appear remarkable and inexplicable as a means of libidinous satisfaction. They in no way recall anything from which we normally are in the habit of expecting satisfaction. They usually require no object, and thereby give up all connection with external reality. We understand this to be a result of turning away from fact and of returning to the predominance of pleasurable gratification. But it is also a return to a sort of amplified autoeroticism, such as was yielded the sex impulse in its earliest satisfactions. In the place of a modification in the outside world, we have a physical change, in other words, an internal reaction in place of an external one, an adjustment instead of an activity. Viewed from a phylogenetic standpoint, this expresses a very significant regression. We will grasp this better when we consider it in connection with a new factor which we are

still to discover from the 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symptom development. Further, we recall that in symptom formation the same processes of the unconscious have been at work as in dream formation—elaboration and displacement. Similarly to the dream, the symptom represents a fulfillment, a satisfaction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infantile; by the utmost elaboration this satisfaction can be compressed into a single sensation or innervation, or by extreme displacement it may be restricted to a tiny element of the entire libidinous complex. It is no wonder that we often have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in the symptom the libidinous satisfaction which we anticipate and always find verified.

关于症状作为一种力比多满足方式引人注意和令人费解的原因还有一个。它们绝非正常人惯于期待的满足。它们通常不要求对象，因此放弃了与外部现实的所有联系。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背离务实原则而回归快乐原则优先的结果。但这也是向一种扩充的自淫行为的回归，类似性冲动在最早期所获得的满足。它们不去修正外部情况，而只追求自体的改变，换言之，即以内部反应代替外部变化，只被迫调整，不积极活动。以物种的角度观察，这表示了一种非常严重的退化。我们还会从症状发展的分析研究中发现一种新的因素，与之结合就能更好地理解上述问题。况且，我们记得，在症状形成中，与梦的形成相同的潜意识过程在起作用——凝缩与移置。与梦相似，症状体现了一种实现，一种效仿幼儿的满足，通过极度凝缩，这种满足被压缩成单一的感觉或快感，或通过极端移置，被局限于整个力比多情结中一个细小元素。难怪我们经常难以在症状中辨认出我们意想之中并总能证实的力比多满足。

I have indicated that we must still become familiar with a new factor. It is something really surprising and confusing. You know that by analysis of the symptoms we arrive at a knowledge of the

infantile experiences upon which the libido is fixated and out of which the symptoms are formed. Well, the surprising thing is this, that these infantile scenes are not always true. Indeed,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they are untrue, and in some instances they are directly contrary to historical truth. You see that this discovery, as no other, serves either to discredit the analysis which has led to such a result, or to discredit the patients upon whose testimony the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whole understanding of neuroses, is built up. In addition there is something else utterly confusing about it. If the infantile experiences, revealed by analysis, were in every case real, we should have the feeling of walking on sure ground; if they were regularly falsified, disclosed themselves as inventions or phantasies of the patients, we should have to leave this uncertain ground and find a surer footing elsewhere. But it is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for when we look into the matter we find that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s which are recalled or reconstructed in the course of the analysis may in some in some instances be false, in others undeniably true, and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a mixture of truth and fiction. The symptoms then are either the representation of actual experiences to which we may ascribe an influence in the fixation of the libido, 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phantasies of the patient which, of course, can be of no etiological significance. It is hard to find one's way here. The first foothold is given perhaps by an analogous discovery, namely, that the same scattered childhood memories that individuals always have had and have been conscious of prior to an analysis may be falsified as well, or at least may contain a generous mixture of true and false. Evidence of error very seldom offers difficulties, and we at least gain the satisfaction of knowing that the blame for this unexpected disappointment is not to be laid at the door of analysis, but in some way upon the patients.

我曾经提示过，我们必须还要了解一个新的因素。这是一个令人惊奇和困惑的因素。大家知道，通过症状分析，我们获知了幼年经历，这是力比多执着的对象和症状形成的根源。可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幼年场景并非总是真实的。实际上，它们在大多数病例中都是不真实的，在有些病例中与事实完全相反。大家看，这一绝无仅有的发现，既否定了得出此结论的症状分析，又否定了病人，而且病人的证言正是症状以及神经症的整体认识赖以建立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事令人极其费解。如果被症状分析揭示的幼年经历在所有病例中都是真实的，那我们应该有脚踏实地的感觉，如果它们通常都是虚而不实的，其真面目是病人的虚构或幻想，我们只得放弃这处空虚的地基，寻找一个更坚定的立足点。但是两者都不正确，因为当我们细究此事时，会发现在症状分析过程中回忆或重建的童年经历可能在一些例子中是假的，而在另一些例子中无疑是真的，大部分例子是真假成分混杂。这样，症状或体现了真实经历，我们可认为它对力比多执着产生了作用，或体现了病人的幻想，这当然就不具有病原的意义。这里很难找到两全之法。第一个立足点也许可在一个类似发现中找到，它就是：在分析之前，个人总会在意识中存有同样残缺的童年记忆，它们也有可能是假造的，或至少是有真有假。错误的证据很容易看出来，我们至少可安慰自己，这一意外失望的责任不在症状分析，而多少在于病人自身。

After reflecting a bit we can easily understand what is so confusing in this matter. It is the slight regard for reality, the neglect to keep fact distinct from phantasy. We are apt to feel insulted that the patient has wasted our time with invented tales. There is an enormous gap in our thinking between reality and invention and we accord an entirely different valuation to reality. The patient, too, takes this same viewpoint in his normal thinking. When he offers the material which, by way of the symptom, leads back to the wish situations which are modeled upon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s, we are at first, to be sure, in doubt whether we are

dealing with reality or with phantasy. Later certain traits determine this decision; we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task of acquainting the patient with them. This can never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difficulty. If at the outset we tell him that he is going to reveal phantasies with which he has veiled his childhood history, just as every people weaves myths around its antiquity, we notice (to our comfort) that his interest in the further pursuit of the subject suddenly diminishes. He, too, wants to discover realities, and despises all “notions.” But if until this is accomplished we allow him to believe that we are investigating the actual occurrences of his childhood, we run the risk of later being charged with error and with our apparent gullibility. For a long time he is unable to reconcile himself to the idea of considering phantasy and reality on equal terms and he tends, with reference to the childish experiences to be explained, to neglect for the time be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al and the imaginary. And yet this is obviously the only correct attitude toward these psychological products because they are, in a sense, real. It is a fact that the patient is able to create such phantasies for himself, and this is of scarcely less importance for his neurosis than if he had really undergone the experience which he imagines. These phantasies possess *psychological* reality in contrast to *physical* reality, and so we gradually come to understand that *in the realm of neuroses the psychological reality is the determining factor* .

稍作思考后，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为何令人困惑了。它是对现实的轻视，事实与幻想界限不清。如果病人把我们的时间浪费在编造的故事上，我们常会怀有恨意。我们对于现实与虚构的看法有天壤之别，对于现实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病人在正常思考时也会采取这种态度。当他们提供的材料可以回溯到在童年经历基础上塑造的愿望情境时，说实话，起初我们对于该材料是现实还是幻想，是抱着怀疑

态度的。后来某些特性帮助我们作出了判断，我们面临着让病人认识它们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告诉病人，他们讲述的是一些遮盖其童年经历的幻想，正如每个民族用神话代替远古历史一样，我们（欣慰地）认识到，病人进一步探讨这一话题的兴趣锐减。病人也希望发现现实，讨厌所有“空想”。但如果我们自始至终都让病人相信我们在研究其童年的真实经历，我们就会有事后被指责失误和明显轻信的风险。病人很久以来都无法以同样条件看待要解释的童年经历的虚实与否，他们暂时忽视了现实与虚构的差别。然而很明显，它是对于这些心理产物的唯一正常态度，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事实上，病人能够为自己制造这些幻想，这对于其神经症的意义，一点都不亚于他们真实经历那些虚构事情的意义。与物质现实相比，这些幻想具有心理现实，这样我们逐渐理解了，在神经症范畴中，心理现实是决定性因素 。

Among the experiences which recur continually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neurotics and, in fact, are never lacking, some are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and accordingly I consider them worthy of special treatment. I shall enumerate a few examples of this species: observation of the parental intercourse, seduction by an adult, and the threat of castration. It would be a grievous error to assume that physical reality can never be accorded them; this may often be proved beyond doubt by the testimony of adult relatives. So, for example, it is not at all unusual if the little boy who begins to play with his penis, and does not yet know that one must conceal this, is threatened by his parents or nurse with the cutting off of the organ or the guilty hand. Parents often admit upon questioning that they thought they had done the right thing by this intimidation; many individuals retain a correct, conscious memory of these threats, especially if it has occurred in later childhood. When the mother or some other woman makes the threat she usually delegat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xecuting it to the father or to the doctor. In the

famous *Struwelpeter* by the pediatrist Hoffman, of Frankfort, rhymes which owe their popularity to his very fine understanding of the sexual and other complexes of childhood, you find a milder substitute for castration in the cutting off of the thumbs as a punishment for insistent sucking. But it is highly improbable that the threat of castration is actually made as often as it occurs in the analyses of neurotics. We are conten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child imaginatively constructs this threat for himself from suggestions, from the knowledge that auto-erotic satisfaction is forbidden, and from the impression of castration he has received in discovering the female genital. It is, moreover, in no way impossible that the little child, so long as he is not credited with any understanding or memory, will, even in families outside the proletariat, become a witness to the sexual act between his parents or some other group-ups, and it cannot be disproved that the child *subsequently* understands this impression, and may react upon it. But when this intercourse is described with minute details which could hardly have been observed, or if it turns out to be, as it so frequently does, an intercourse which was not face to face, *more ferarum* , there is no longer any doubt that this phantasy is derived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the intercourse of animals (dogs) and the unsatisfied curiosity of the child in his period of puberty. The greatest feat of the imagination is the phantasy of having witnessed the coitus of the parents while still unborn in the mother's womb. Of especial interest is the phantasy of having been seduced, because so often it is not a phantasy at all, but a real memory. But luckily it is not real so often as first appears from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Seduction by older children, or children of the same age, is much more frequent than seduction by adults, and if, in the case of little girls, the father quite regularly appears as the seducer in the occurrences which they relate, neither the fantastic nature of this accusation nor its motive can be doubted. The child as a rule covers the autoerotic

period of his sexual activity, where there has been no actual seduction, with the seduction-phantasy. He spares himself the shame of onanism by imagining the presence of an object for his desires in that early period. As a matter of fact, you must not be misled in attributing sexual misuse of the child by its nearest male relatives solely and always to phantasy. Most analysts have probably treated cases in which such relations were real and could be proved beyond doubt, with the qualification that in such cases they belong to the later years of childhood and were transposed to an earlier time.

在神经症患者早年反复发生、而且实际上从不缺乏的经历中，有些具有特殊意义，因而我认为它们值得特别对待。这里列举几个此类事例，如：看见父母的性爱、受成年人引诱以及阉割的恐吓。如果认为它们不可能与物质现实一致，那将是严重错误，病人的成人亲属的证词常可对此提供无可质疑的证明。所以，比方说，一个小男孩开始玩弄自己的阴茎，不知道必须瞒着别人，父母或保姆看见后恐吓说要割掉小鸡鸡或砍掉那只犯罪的手，这并非罕见之事。父母在被问到时，通常会表示，他们认为自己这样威胁是在理的，不少人对这些威胁留有正确、清晰的记忆，尤其是发生在童年后期时。当母亲或其他女性作此威胁时，她通常会说让爸爸或者医生动手。法兰克福的儿科医生霍夫曼写了有名的《斯图韦尔彼特》一书，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童年的性情结与其他情结的真知灼见，其中有一个阉割的委婉替代，即用砍掉大拇指惩罚顽固的吮吸行为。然而，阉割的恐吓实际上不太可能付诸实施，但在神经症病人的分析中却时而有之。我们欣然领悟到，儿童为自己虚构了这一恐吓，它的依据来自一些暗示，因为他认识到自淫满足是一种禁忌，看见女性生殖器时有阉割的观感。而且，即使儿童不谙世事或尚未记事，他们并非没有可能（即便是在非平民阶层的家庭中）目睹父母或其他成人之间的性行为，也不能证明儿童后来 不能理解这一见闻并且没有作出相关反应。但是，如果这一交媾见闻被极尽细致地描述出来，其细节几无可能是观察所得，或者这一

交媾原来并不是面对面的，而更多地是动物交配的姿势（这是被频繁提到的现象），那么确凿无疑了，这种幻想源自对动物（狗）交配的观察经历，以及孩子在青春期未被满足的好奇心。至于幻想自己尚在母亲腹中尚未出世时即见证了父母性交，这种想象力可谓登峰造极了。值得特别注意的幻想是受到引诱，因为它极可能不是一种幻想，而是一种真实的记忆。但是幸运的是，从分析结果乍看之下它像是真的，但其实未必。被年长或同龄的孩子引诱比被成人要频繁得多，而且，在小女孩的情况中，如果父亲经常成为她们所述事情中的引诱者，则这一指控的幻想实质和背后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普遍而言，儿童在其性活动的自淫期，如无真实的引诱，则用引诱幻想掩盖其自淫行为。在这一早期阶段，他们会想象一种性对象的存在，以使自己免于手淫的负疚感。事实上，大家一定不要错误地认为，儿童被男性近亲性虐待只能是、而且总是一种幻想。也许大多数分析师都诊治过这类真实病例，而且无疑可以证实，只是有一限制：在这些病例中，这些经历属于童年后期，但被挪到了早期。

We cannot avoid the impression that such experiences of childhood are in some way necessary to the neurosis, that they are claimed by its iron rule. If they exist in reality, then well and good, but if reality has withheld them they are constructed from suggestions and supplemented by the imagination. The result is the same, and to this day we have been unable to trace any difference in the results, whether fancy or fact played the larger part in these childish occurrences. Here again we encounter one of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s so frequently met with; it is, to be sure, the most estranging of all those we have become acquainted with. Whence comes the need for these phantasies, and the material for them? There can be no doubt as to the sources of the impulse, but we must explain why the same phantasies are always created with the same content. I have an answer in readiness which I know you will think very far-fetched.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these *primal*

phantasies —so I should like to term these, and certainly some others also—are a phylogenetic possession. In them the individual reaches out beyond his own life, into the experiences of antiquity, where his own experience has become all too rudimentary. It seems very possible to me that everything which is obtained during an analysis in the guise of phantasy, the seduction of children, the release of sexual excitement by watching parental intercourse, the threat of castration—or rather castration itself—were once realities in the primeval existence of mankind and that the imaginative child is merely filling in the gaps of individual truth with prehistoric truth. We have again and again suspected that the psychology of neuroses stores up more of the antiquities of human development than all other sources.

我们不免会觉得，这些童年经历在某种意义上是神经症的必要条件，它们受到神经症铁律的支配。如果它们在现实中确有其事，那自然万事大吉，但是如果它们与现实相悖，则它们是建立在暗示基础上，由想象力补充发挥的。结论是一样的，并且我们至今尚未在分析结果中发现任何不同的迹象，无论这些儿时经历的主要内容是真是幻。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频频出现的互补关系之一，可以肯定，它是我们熟悉的所有关系中最离奇的。这些幻想的需求和素材是从何而来的？冲动的由来是无可质疑的，但是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同种幻想所编造的内容总是一样的。我有一个唾手可得的答案，我知道大家会认为很牵强。我认为，这些原始幻想 ——我希望这样命名这些幻想，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幻想——是一种物种的遗传财产。这些幻想远超个人的生活经验，而涉及到远古祖先的经历，它让个人经历相形见绌。我觉得很有可能的是，所有在分析过程中以幻想形式出现的事情，如引诱儿童、通过窥视父母交媾释放性刺激、阉割的恐吓，或实则是阉割本身，在人类原始时期都曾经是事实，异想天开的儿童不过是在用史前事实填补了个人经历的欠缺。我们多次猜想过，神经症心理学比所有其他学科储存了更多远古人类发展的真相。

What we have just discussed makes it necessary for us to enter further into 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at mental activity that is called imagination. As you well know, it enjoys universal esteem, although we have never clearly understood its place in the psychic life. I have this much to say about it. As you know, the ego of man is slowly educated by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necessity to an appreciation of reality and a pursuit of the principle of reality, and must therefore renounce temporarily or permanently various objects and goals of its strivings for satisfaction, sexual and otherwise. But renunciation of gratification has always been difficult for man. He cannot accomplish it without something in the nature of compensation. Accordingly he has reserved for himself a psychological activity wherein all these abandoned sources of pleasures and means of pleasurable gratification are granted a further existence, a form of existence in which they are freed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reality and what we like to call the test of reality. Every impulse is soon transformed into the form of its own fulfillmen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dwelling on the imagined fulfillment of a given wish affords some satisfaction, although the realization that it is unreal is unobscured. In the activity of the imagination, man enjoys that freedom from external compulsion that he has long since renounced. He has made it possible to be alternately a pleasure-seeking animal and a reasoning human being. He finds that the scant satisfaction that he can force out of reality is not enough. “There is no getting along without auxiliary-constructions,” Th. Fontaine once said. The creation of the psychic realm of fancy has its complete counterpar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reserves” and “conservation projects” in those places where the demands of husbandry, traffic and industry threaten quickly to change the original face of the earth into something unrecognizable. The national reserves maintain this old condition of things, which

otherwise has everywhere been regretfully sacrificed to necessity. Everything may grow and spread there as it will, even that which is useless and harmful. The psychic realm of phantasy is such a reservation withdrawn from the principles of reality.

我们刚才探讨的内容，使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所谓想象这一精神活动的起源与作用。想必大家知道，虽然我们对其在心理生活中的地位从未有清晰的认识，但它广为世人推崇。我对它有以下看法。大家知道，人类的自我在外界现实的影响和教育下，逐渐接受了现实，并追求务实原则，而且因此必然会暂时或永久地舍弃它力求满足的对象和目标，包括性和其他满足。但是舍弃满足对人来说总是很难的。不获得一些补偿，他们是无法割爱的。因此，他们为自己保留了一种心理活动，其中所有被舍弃的快乐源泉和快乐满足方法都确保得到了继续存留，而此种存留形式使它们免于现实的索求以及我们所说的现实的考验。每一种冲动很快转化为其自身实现形式。将一种已知愿望寄托在虚拟的实现上，无疑会提供些许满足，尽管本人明白其虚幻本质。人在想象的活动中，享受着不受外界束缚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其早就舍弃了的。他们使自己兼有动物的享乐本性和人类的理性。他们发现自己能从现实中汲取的些微满足是不够的。“没有配套建设，则寸步难行。”方丹曾如是说。幻想这一心理王国的构建，与“保护区”和“保护项目”的建立是完全一致的，后者是指，在一些地方，农业、交通和工业的发展需要，使得地表原貌面临着面目全非的威胁。而国家保护区就是要维持原状，防止所有地方都沦为发展需求的牺牲品。在那里所有生物都可自由生长和扩张，甚至包括那些无用和有害的生物。幻想的心理王国就是从务实原则中收回的一块自留地。

The best known productions of phantasy are the so-called “day dreams,” which we already know, pictured satisfactions of ambitious, of covetous and erotic wishes, which flourish the more grandly the more reality admonishes them to modesty and patience.

There is unmistakably shown in them the nature of imaginative happines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pleasurable gratification from the acquiescence of reality. We know such day dreams are nuclei and models for the dreams of night. The night dream is essentially nothing but a day dream, distorted by the nocturnal forms of psychological activity, and made available by the freedom which the night gives to instinctive impulses. We have already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he idea that a day dream is not necessarily conscious, that there are also unconscious day dreams. Such unconscious day dreams are as much the source of night dreams as of neurotic symptoms.

最有名的幻想产物莫过于所谓的“白日梦”，我们已经知道它们是野心、发财、情欲等愿望图像化的满足，这些愿望被现实驯服得越平和冷静，在幻想中就越显得浓墨重彩。它们无疑彰显着，假想幸福的本质是回归不受现实约束的快乐满足。我们知道这些白日梦是夜梦的精髓和模板。夜梦实际上与白日梦无异，只是被心理活动的夜间版本变形，其存在是因为本能冲动在夜间获得了自由。我们已经熟悉了这一观点：白日梦未必是有意识的，也有一些潜意识的白日梦。这些潜意识的白日梦既是夜梦的源泉，也是神经症的肇始。

The significance of phantas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ymptoms will become clear to you by the following: We have said that in a case of renunciation, the libido occupies regressively the positions once abandoned by it, to which, nevertheless, it has clung in certain ways. We shall neither retract this statement nor correct it, but we shall insert a missing link. How does the libido find its way to these points of fixation? Well, every object and tendency of the libido that has been abandoned, is not abandoned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They, or their derivatives, are still held in presentations of the

phantasy,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intensity. The libido need only retire to the imagination in order to find from them the open road to all suppressed fixations. These phantasies were happy under a sort of tolerance, there was no conflict between them and the ego, no matter how acute the contrast, so long as a certain condition was observed—a condition *quantitative* in nature that is now disturbed by the flowing back of the libido to the phantasies. By this addition the accumulation of energy in the phantasies is heightened to such a degree that they become assertive and develop a pressure in the direction of realization. But that makes a conflict between them and the ego inevitable. Whether formerly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they now are subject to suppression by the ego and are victims to the attraction of the unconscious. The libido wanders from phantasies now unconscious to their sources in unconsciousness, and back to its own points of fixation.

关于幻想对于症状发展的作用，下列表述一清二楚：我们说过，在克制的情况下，力比多退回其原先放弃的地点，多少仍有能力依附于这些点上。我们不会撤回或修正这一论断，而要加入一种被忽略的联系。力比多是如何找到这些执着点的？其实，力比多所舍弃的每一对象和倾向，严格说来并未真的被舍弃。它们或它们的衍生物仍以一定的强度存在于幻想的表现中。力比多只需退回想象之中，通过幻想找到通往所有被压抑的执着点的坦途。这些幻想受到纵容而自得其乐，无论对比有多鲜明，只要某一条件成立，它们与自我之间就没有冲突——该条件本质上是量化 条件，但现在被力比多向幻想的回流所干扰。这一附加作用使幻想中的能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变得坚定不移，产生了实现幻想的压力。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幻想和自我之间的冲突。无论从前是意识还是潜意识，它们现在都遭到自我的压抑，被迫受到潜意识的吸引。力比多从现已变成潜意识的幻想转移到它们在潜意识中的源头，回到自己的执着点。

The return of the libido to phantasy is an intermediate step on the road to symptom development and well deserves a special designation. C. G. Jung coined for it the very appropriate name of *introversion* , but inappropriately he also lets it stand for other things. Let us therefore retain the idea that introversion signifies the turning aside of the libido from the possibilities of actual satisfaction and the excessive accumulation of the phantasies hitherto tolerated as harmless. An introvert is not yet a neurotic, but he finds himself in a labile situation; he must develop symptoms at the next dislocation of forces, if he does not find other outlets for his pent-up libido. The intangible nature of neurotic satisfaction and the neglect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are already determined by arrest in the phase of introversion.

力比多回到幻想，是症状出现前的过渡步骤，应该给予特别命名。荣格曾为其创造了一个极合适的名字：内向 ，但他却把它不适当地用在了其他事情上。因此我们要为内向一词正名，它意味着力比多离开实际满足的可能性，本来因无害得到宽容的幻想被过度累积。内向者仍不是神经症患者，但其境况不稳定，如果他们不能为被抑制的力比多找到其他出口，则在下一轮力量失衡时势必会导致症状。神经症满足的不可捉摸，对想象与现实差异的忽视，取决于力比多在内向阶段的停留。

You have certainly noticed that in the last discussions I have introduced a new factor into the structure of the etiological chain, namely, the quantity, the amount of energy that comes under consideration. We must always take this factor into account. Purely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etiological conditions is not sufficient. Or, to put it in another way, a *dynamic* conception alone of these psychic processes is not enough; there is need of an *economic*

viewpoint. We must say to ourselves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two impulses is not released before certain occupation-intensities have been reached, even though the qualitative conditions have long been potent. Similarly, the pathogenic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itutional factors is guided by how much *more* of a given component impulse is present in the predisposition over and above that of another; one can even conceive the predispositions of all men to be qualitatively the same and to be differentiated only by these quantitative conditions. The quantitative factor is no less important for the power of resistance against neurotic ailments. It depends upon *what amount* of unused libido a person can hold freely suspended, and upon *how large a fraction* of the libido he is able to direct from the sexual path to the goal of sublimation. The final goal of psychological activity, which may be described qualitatively as striving towards pleasure-acquisition and avoidance of unpleasantness, presents itself in the light of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as the task of overcoming the gigantic stimuli at work in the psychological apparatus, and to prevent those obstructions which cause unpleasantness.

大家肯定已经注意到，在前面的探讨中，我将一个新的因素引进到病原系列的体系中，即能量的数量，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须一直将此因素考虑在内。关于病原的条件，纯粹的定性分析是不够的。或也可这样说，这些心理过程只有动态性 概念是不充分的，需要补充经济性 的观点。必须认识到，两种冲动在没有达到一定的集中强度之前，即便已经有了明显的定性条件，也是不会发生冲突的。类似地，体质因素的致病作用在于：一种已知的部分冲动在先天倾向中的存量大于其它冲动，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所有人的先天倾向有着相同的质，却因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量化因素对于抵抗神经症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可以自由保存的未使用力比多的数量；二是人可从性的方向转化为升华目标的力比多的分量。心理

活动的最终目标可定性为趋乐避苦的努力，在经济性的考量下表现为克服心理体制中活跃的巨大刺激，阻止引致不快的障碍等任务。

So much I wanted to tell you about symptom development in the neuroses. Yes, but do not let me neglect to emphasize this especially: everything I have said here relates to the symptom development in hysteria. Even in compulsion neuroses, which retain the same fundamentals, much is found that is different. The counter-siege direct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the instincts, of which we have spoken in connection with hysteria, press to the fore in compulsion neuroses, and control the clinical picture by means of so-called “reaction-formations.” The same kind and more far-reaching variations are discoverable among the other neuroses, where the investigations as to the mechanism of symptom development have in no way been completed.

关于神经症的症状发展，我就想讲这些。是的，不过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我在这节课讲的所有内容都是关于癔症的症状发展。即使在有着相同根基的强迫性神经症中，也会发现许多不同之处。针对本能冲动主张的反围攻，我们讲过有关癔症的内容，但它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居于显要位置，因为所谓的“反应形式”而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在其他神经症中也可发现同类现象以及更广泛的变量，关于症状发展机制的研究是远未完善的。

Before I leave you today I should like to have your attention for a while for an aspect of imaginative life which is worthy of the most general interest. For there is a way back from imagination to reality and that is—art. The artist is an incipient introvert who is not far from being a neurotic. He is impelled by too powerful instinctive

needs. He wants to achieve honor, power, riches, fame and the love of women. But he lacks the means of achieving these satisfactions. So like any other unsatisfied person, he turns away from reality, and transfers all his interests, his libido, too, to the elaboration of his imaginary wishes, all of which might easily point the way to neurosis. A great many factors must combine to present this termination of his development; it is well known how often artists especially suffer from a partial inhibition of their capacities through neurosis. Apparently their constitutions are strongly endowed with an ability to sublimize and to shift the suppression determining their conflicts. The artist finds the way back to reality in this way. He is not the only one who has a life of imagination. The twilight-realm of phantasy is upheld by the sanction of humanity and every hungry soul looks here for help and sympathy. But for those who are not artists, the ability to obtain satisfaction from imaginative sources is very restricted. Their relentless suppressions force them to be satisfied with the sparse day dreams which may become conscious. If one is a real artist he has more at his disposal. In the first place, he understands how to elaborate his day dreams so that they lose their essentially personal element, which would repel strangers, and yield satisfaction to others as well. He also knows how to disguise them so that they do not easily disclose their origin in their despised sources. He further possesses the puzzling ability of molding a specific material into a faithful image of the creatures of his imagination, and then he is able to attach to this representation of his unconscious phantasies so much pleasurable gratification that, for a time at least, it is able to outweigh and release the suppressions. If he is able to accomplish all this, he makes it possible for others, in their return, to obtain solace and consolation from their own unconscious sources of gratification which had become inaccessible. He wins gratitude and admiration for himself and so, by means of his imagination, achieves the very

things which had at first only an imaginary existence for him: honor, power, and the love of women.

今天的课程结束前，我想请大家注意想象生活的一个最值得普遍关注的方面。因为从想象回归现实确有一条路径，它就是——艺术。艺术家就是一个初期的内向者，离神经症患者并不遥远。他们受到太多强烈本能需求的驱使。他们想获得声誉、权利、名气、金钱与爱情。但他们苦无实现这些满足的途径。因此，像任何其他失意者一样，他们逃离现实，将自己所有的兴趣，也包括力比多，转移到对他们虚幻愿望的具体表现上，所有这些愿望本可轻易使人患上神经症。他们未形成症状的原因必须是多方面的，众所周知，神经症常常会抑制艺术家的部分才华。显然，他们的体质天赋异禀，有能力使得决定内心冲突的压抑得到升华与转化。艺术家如此找到回归现实之路。他们不是唯一拥有想象生活的人。幻想的朦胧世界是人性的收容所，每一个饥渴的灵魂都在此寻求帮助与怜悯。但是对于不是艺术家的人们，他们从想象力中获取满足的能力极其有限。他们拼命压抑着自己，只得从稀疏的白日梦中寻求安慰，这些梦也可成为意识。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他们有更多可支配的才华。首先，他们懂得如何去呈现自己的白日梦，在根本上去排除令陌生人反感的个人成分，使其他人也能产生满足。他们也知道如何对它们巧加润色，可使其不轻易暴露原本的可憎面目。他们还有着眩目的技能，可将具体素材创作成忠实体现自己想象力产物的形象，然后将他们潜意识幻想表现赋予丰富的愉悦满足形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可以胜过和释放压抑作用。如果能全部实现，他们就让其他人也有可能从自己的潜意识满足来源（它们原本已经不能获取）中获得慰藉。他们为自己赢得了感激与崇拜，收获了当初只存在于想象的那些愿望：名誉、地位和爱情。

Twenty-Fourth Lecture　Ordinary Nervousness

第二十四讲　普通神经过敏

In our last discussion we accomplish a difficult task. Now I shall temporarily leave our subject and address myself to you.

在上一讲中，我们完成了一个艰巨任务。现在我要暂时打个岔，跟大家聊聊题外话。

For I know quite well that you are dissatisfied. You thought that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would be quite a different matter. You expected to hear vivid illustrations instead of theories. You will tell me that when I gave you the illustration of “on the ground floor in the first story,” you had grasped something of the causation of neurosis, only of course this should have been a real observation and not an imaginary story. Or, when in the beginning I described two symptoms (not imaginary also, let us hope) whose analysis revealed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life of the patient, you first came to grasp the meaning of the symptoms and you hoped that I would proceed in the same way. Instead I have given you theories—lengthy, difficult to see in perspective and incomplete, to which something new was constantly being added. I worked with conceptions that I had not previously presented to you, abandoned descriptive for dynamic conceptions, and these in turn for economic ones. I made it hard for you to understand how many of the artificial terms I made use of still carry the same meaning and are used interchangeably only for the sake of euphony. Finally, I

allowed broad conceptions to pass in review before you: the principles of pleasure and of fact and their phylogenetically inherited possession; and then, instead of introducing you to definite facts, I allowed them to become increasingly vague till they seemed to fade into dim distances.

因为我很清楚，大家是不太满意的。大家心目中的精神分析不是这么一回事。你们期望听一些生动实例，而不是空谈理论。那次我举了一个“楼上楼下”的例子，大家说从中对神经症的起因有所领悟，但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实例，而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再者，我在开始时讲解了两个症状（希望它们并非臆造）的分析，揭示了它们与病人生活的紧密联系，大家首次对症状的意义有所了解，并希望我用同样的方法继续讲课。没想到，我给大家讲了一套理论——冗长繁琐、晦涩难懂而且不尽完善，要不断补充新东西。我分析了一些以前没讲过的概念，把描述性概念换成了动态性概念，然后又换成经济性概念。我造出很多表达同一意思的术语，为了行文漂亮来回换着使用，搞得大家莫衷一是。最后，我还抛给大家一些宽泛的概念：快乐原则、务实原则，以及物种遗传特征等，然后又不用确切事例加以诠释，就任由它们变得越来越模糊，最终消逝在灰暗的远方。

Why did I not begin m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eurosis with the facts that you yourselves know about nervousness, with something that has always aroused your interest, with the peculiar temperament of nervous people, their incomprehensible reactions to external influences, to human intercourse, their irritability, their uselessness? Why did I not lead you step by step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simple, everyday forms to the problems of mysterious and extreme manifestations of nervousness?

我介绍神经症理论，为什么不先讲大家都知道的神经过敏，为什么不讲些大家一直关注的内容，讲神经过敏者的特殊秉性，比如他们在待人接物上令人费解的反应、他们的暴躁脾气以及他们的办事无能呢？为什么我没有引导大家从理解最简单的神经过敏形式开始，步步深入，直到神秘而极端的表现呢？

I cannot even say that you are wrong. I am not so infatuated with my art of representation as to see some special attraction in every blemish. I myself believe that I could have proceeded differently, to your better advantage, and this indeed had been my intention. But one cannot always carry out one's sensible intentions. The nature of the subject matter issues its own commands, and easily modifies our plans. Even so usual a performance as the organization of well-known material is not entirely subject to the particular purposes of the author. It forms itself as it will and later one wonders why it turned out so and not otherwise.

我甚至不能说大家错了。我对自己的讲解方法没有那么得意，不至于觉得连瑕疵都充满特殊魅力。我自己也觉得，为了大家好，我应该换个讲法，我确实曾这么想过。但是，合理的想法并非总能付诸实施。这个课题的特性有其自身的要求，容易使我们的计划有变。即便一种众所周知的常见材料，对其组织架构的表现也不完全以作者的特殊目的为转移。它按自身规律自成一体，最后大家会困惑它为何变成了这样、而不是那样。

Probably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at the title,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 no longer applies to this part, which deals with the neuroses. The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is found in the study of errors and the dream; the theory of neurosis is

psychoanalysis itself. I do not think that in so short a time I could have given you a knowledge of the theory of neurosis other than in concentrated form. It was necessary to present to you connectedly the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mptoms, their external and internal conditions and their bearing on the mechanism of symptom formation. This I have attempted to do; it is practically the nucleus of the material that modern psychoanalysis is able to offer. We had to say quite a good deal concerning the libido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something as well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The introduction had already prepared you for the presuppositions of our technique, for the large aspects of the unconscious and of suppression (resistance). In a subsequent lecture you will learn from what points psychoanalysis proceeds organically. For the present I have not sought to hide from you the fact that all our results are based on the study of a single group of nervous affections, the so-called transference neuroses. Though you have gained no positive knowledge and have not retained every detail, still I hope that you have a fair picture of the methods, the problems and the results of psychoanalysis.

也许，其中原因之一是，本书标题《精神分析引论》不再适用于神经症的这一部分。精神分析引论是建立在过失和梦的研究基础上的，神经症理论是精神分析的本论。我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家获得的神经症知识只是提纲挈领式的。我有必要把症状的意义与解释、症状的内外部条件及对于症状形成的作用等内容联系起来讲给大家。这是我所尝试的方法，它实际上是现代精神分析所能提供的材料的核心。我们不得不详细讲解了力比多及其发展，另外还有关于自我发展的内容。通过前面的介绍，大家已经对精神分析的预设前提和潜意识、压抑（抵抗）作用的要素等知识做到了心中有数。在接下来的课中，大家将了解到精神分析工作得以有机运行的立足点。当前，我无意隐瞒一个事实：我们所有的结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单类神经疾病，

即移情类神经症的研究基础上的。虽然大家仍未获得任何实用知识，也没记住所有细节，我仍希望大家对于精神分析的方法、问题和结论有了相当的认识。

I have assumed that it was your wish for me to begin my presentation of neuroses with a description of nervous behavior, the nature of neurotic suffering, and the way in which the nervous meet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illness and adapt themselves to these. Such subject matter is certainly interesting and well worth knowing. It is moreover not very hard to handle, yet it is not wise to begin with its consideration. There is danger of not discovering the unconscious, of overlooking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libido, of judging all conditions as they appear to the ego of the nervous person. It is obvious that this ego is neither a reliable nor an impartial authority. For this very ego is the force that denies and suppresses the unconscious; when the unconscious is concerned, how then could we expect justice to be done? The rejected claims of sexuality stand first in the line of these suppressions; it is natural tha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ego we can never learn their extent and significance. As soon as we attain to the point of view of suppression, we are sufficiently warned not to make one of the contending factions, above all not to make the victor judge of the struggle. We are prepared to find that the testimony of the ego may lead us astray. If one is to believe the evidence of the ego, it would appear to have been active all along, all its symptoms would have been actively willed and formed. Yet we know that it has passively allowed a great deal to occur, a fact which it subsequently seeks to conceal and to palliate. To be sure, it does not always attempt this; in the case of the symptoms of compulsion neurosis it must admit that it is being opposed by something alien, which it can resist only with difficulty.

我猜想，大家希望我在开始讲解神经症时，会描述神经症患者的行为、特点、患病过程及病中反应，等等。这些话题当然很值得关注和了解。况且掌握这些并非难事，可在一开始就考虑这些并不明智。其危险就是，我们无法了解潜意识，忽视力比多的重要意义，以病人的自我来判定所有情况。显而易见，只强调自我既不可靠、又欠公允。因为这个自我正是否定、压抑潜意识的力量，就潜意识而言，如此怎么能获得公正判断呢？遭拒绝的性需求是这些压抑作用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只从自我的角度看的话，我们当然永远无法了解它们的内容和作用。一旦我们认同了压抑的作用，我们就会保持充分警惕，使自己不要偏向冲突双方之一，根本上说，就是不能让胜方成为冲突的裁判。我们已经意识到，自我的说辞可能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如果相信自我的证词，它似乎从来都是积极有效的，所有症状都是它一手造成的。然而，我们知道，在很多事情中它都是被动者，这也是它后来努力隐瞒和掩饰的事实。确切地说，它并未一直作此尝试，在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中，它不得不承认自己被陌生事物反抗，只能进行艰难抵抗。

Whoever does not heed these warnings not to mistake the prevarications of the ego for truth, has clear sailing; he avoids all the resistances which oppose the psychoanalytic emphasis upon the unconscious, on sexuality, and on the passiveness of the ego. He will assert with Alfred Adler that the “nervous character” is the cause instead of the result of the neurosis, but he will not be able to explain a single detail of symptom formation or to interpret a single dream.

对于“不要相信自我的一面之辞”这样的警告不太在意的人会感觉一切顺利，无需面对所有反对精神分析强调潜意识、性活动以及自我的被动性的异议。他们会附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主张“神经过敏是

神经症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但是他们却不能分析症状形成的一个细节或是解释一个梦。

You will ask: Is it not possible to do justice to the part the ego plays in nervousness and in symptom formation without crudely neglecting the factors revealed by psychoanalysis? I answer you: Surely it must be possible and at some time or other it will take place; but the methods by which we organize the work of psychoanalysis do not favor our beginning with just this task. We can foresee the time when this task will claim the attention of psychoanalysis. There are forms of neuroses, the so-called narcistic neuroses, in which the ego is far more deeply involved than in anything we have studied heretofore. The 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these conditions will enable us to judge reliably and impartially the part that the ego plays in neurotic illness.

大家会问：在神经过敏与症状形成中，如果不轻易忽略掉精神分析揭示的各种事实，能否同时也重视自我的作用呢？我的回答是：这当然是可能的，而且我们总有机会这么做，但是精神分析工作的组织方式不赞成我们一开始就如此行事。我们可以预见精神分析实施这一任务的时间。在一些神经症形式，即所谓自恋型神经症中，自我在其中所起作用比在我们至今研究的其他所有病症中都重要得多。对这些情况的调查分析可使我们合理、公正地评判自我在神经症中的作用。

One of the relations which the ego bears to its neurosis is so obvious that it must be considered at the very outset. In no case does it seem to be absent, and it is most clearly recognizable in the traumatic neuroses, conditions which we do not as yet clearly understand. You must know that in the causation and mechanisms

of all possible forms of neurosis, the same factors are active again and again; it is only the emphasis that is shifted from one to the other of these factors in symptom formation. The members of a company of actors each have certain parts to play—hero, villain, confidant, etc.—yet each will select a different drama for his benefit. Thus the phantasies which undergo conversion into symptoms are especially easy to detect in hysteria; compulsion neuroses are essentially dominated by the reactionary formations, or counter-seizures of the ego; what we designate as *secondary elaboration* in dreams dominates paranoia in the form of delusions, etc.

自我之于神经症，有一个关系非常明显，必须在开始予以考虑。它似乎没有例外，而且在创伤性神经症（我们对它的条件至今尚未有清楚认识）中最可清晰辨识。须知，在所有可能形式的神经症的起因和机制中反复活跃着同样的因素，只是在症状形成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不一样。剧团中的演员们每人都扮演某一角色——主角、坏人、死党，等等——但每人都会出于自身兴趣选择不同的剧目。同理，在癔症中特别容易侦测到即将转变为症状的幻想；主导强迫性神经症则是自我的反动形式或反围攻作用；我们在释梦时称为二次加工 的现象以妄想的形式支配着妄想症，等等。

In traumatic neuroses, particularly if they are caused by the horrors of war, we are especially impressed by a selfish ego-impulse which seeks protection and personal advantage. This in itself is not a sufficient cause for illness, but it can favor its beginning and also feed its needs once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This motive serves to protect the ego from the dangers whose imminence precipitated the disease, and does not permit convalescence until the recurrence of these dangers seems impossible, or until compensation has been

obtained for the danger that has been undergone.

在创伤性神经症，尤其是战争创伤所引起的神经症中，我们能特别感知得到一种自私的自我冲动，它谋求保护和私利。它本身并不足以引致病症，但它促进了症状形成并在其确定后满足其需求。它的动机在于保护自我免受病症促成因素的危险，而且直到这些危险再无复发的可能，或是危险所致结果已获得补偿，它不允许疾病康复。

But the ego betrays similar interest in the origin and maintenance of all other neuroses. We have already said that the ego suffers the symptom to exist, because one of its phases gratifies the egoistic tendency toward suppression. Besides, the ending of the conflict by means of symptom development is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and a most convenient solution for the principle of pleasure. Through symptom formation the ego is undoubtedly spared a severe and unpleasant inner task. There are cases where even the physician must admit that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to neurosis is the most harmless outcome and one most easily tolerated by society. Do not be surprised, then, to learn that occasionally even the physician takes the part of the illness he is battling against. He does not have to restrict himself to the role of the fanatic warrior for health in all situations of life. He knows that the world contains not only neurotic misery, but also real, incurable suffering. He knows that necessity may even require a human being to sacrifice his health, and he learns that by this sacrifice on the part of one individual untold wretchedness may be spared for many others. So if we say that the neurotic escapes the conflict *by taking refuge in illness* , we must admit that in some cases this escape is justifiable, and the physician who has diagnosed the state of affairs will retire silently and tactfully.

在所有其他神经症的起源和维持中，自我显露出类似的兴趣。我们已经说过，自我为了生存而忍受症状，因为症状的某一阶段可满足自我的压抑倾向。另外，通过症状发展终结冲突，是抵抗最少的途径，对快乐原则也是最便捷的解决之道。通过症状形成，自我无疑省去了一项严苛而不讨好的内心使命。在一些病例中，连医生也不得不承认，解决心理冲突，神经症是伤害最小的结果，也是最易被社会容忍的结果。这样，如果大家知道有时连医生都会袒护他们正在与之斗争的病症，也不用大惊小怪了。医生没有必要在各种情形下都充当疯狂的健康卫士。他们知道世上的痛苦不是只有神经症，还有无药可救的真正苦难。他们明白，一个人在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健康；他们也明白，一个人的牺牲也许会使许多他人免于未知的悲惨命运。所以，如果我们说神经症病人以病为掩护 逃避冲突，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些病例中这种逃避实属情非得已，体察了个中缘由的医生会知趣地悄然离开。

But let us not consider these special cases in our further discussion. In average cases the ego, by having recourse to neurosis, obtains a certain inner *advantage from the disease* .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of life, there may also be derived a tangible external advantage, more or less valuable in reality. Let me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most frequent occurrences of this sort. Women who are brutally treated and mercilessly exploited by their husbands almost always adopt the evasion of the neurosis, provided that their predisposition permits this. This usually follows when the woman is too cowardly or too virtuous to seek secret solace in the arms of another, or when she dare not separate from her husband in the face of all opposition, when she has no prospect of maintaining herself or of finding a better husband and especially when her sexual emotions still bind her to this brutal man. Her illness becomes a weapon in her struggle with him, one that she can use

for self-protection and misuse for purposes of vengeance. She probably dare not complain of her marriage, but she can complain of her illness. The doctor becomes her assistant. She forces her inconsiderate husband to spare her, to attend to her wishes, to permit her absence from the house and thus free her from the oppressions of her married life. Wherever such external or accidental gain through illness is considerable and can find no substitute in fact, you can prophesy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influencing neurosis through therapy is very slight.

但我们不用在今后讨论中考虑这些特例。在普通病例中，自我通过求诸神经症，于内心收获了一种生病利好 。在一些生活情境中，也可能产生一种有形的外部利好，在现实生活中多少有些价值。请大家注意这类现象中发生最频繁的例子。遭到丈夫残酷无情虐待的女性，如其先天倾向允许，几乎都会采取神经症的逃避方式。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于：该女子太过怯懦或善良，不能寻求他人的私下援助；她害怕种种非议而不敢与丈夫离婚；她无法自立生活或无望找到更好的伴侣；特别是她与暴戾的丈夫仍有激情的性爱。她的病成为自己对付丈夫的武器，她用它来保护自己，也把它错当作复仇工具。她对自己的婚姻也许不敢有怨言，但她可以抱怨自己的病。医生成了她的帮手。她迫使冷血的丈夫不再招惹她，满足她的愿望，允许她离开家，这样就使她从压抑的婚姻中解脱出来。当患者通过生病获得了可观的外部或偶然好处，而且事实上没有其他选择时，我们就可以预言，通过治疗影响神经症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You will tell me that what I have said about the advantage gained from the disease speaks entirely for the hypothesis I have rejected, namely, that the ego itself wills and creates the neurosis. Just a moment! It probably does not mean more than that the ego passively suffers the neurosis to exist, which it is unable to prevent

anyway. It makes the most of the neurosis, if anything can be made of it at all. This is only one side of the question, the advantageous side. The ego is willing to endure the advantages of the neurosis, but there are not only advantages. As a rule it soon appears that the ego has made a poor deal in accepting the neurosis. It has paid too high a price for the mitigation of the conflict; and the sensations of suffering which the symptoms bring with them are perhaps every bit as bad as the agonies of conflict, usually they cause even greater discomfort. The ego wants to rid itself of the pain of the symptoms without relinquishing the gain of illness, and that is impossible. Thus the ego is discovered as by no means so active as it had thought itself to be, and this we want to keep in mind.

大家会告诉我，我所讲的关于生病的好处，可以完全证明我所反对的假设，即，自我本身促成并制造了神经症。先别急！它的意思不过是说，自我为了生存而被动地承受了神经症，反正自我也抵挡不了它。它充分利用了神经症，前提是它有利可图。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即有利的一面。自我愿意承受神经症的好处，但是它并不只有好处。一般而言，自我很快就会在接受神经症上得不偿失。它为了缓解冲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症状所带来的痛苦感一点都不亚于冲突的痛楚，通常它们甚至会导致更大的不适。自我想摆脱症状的痛苦，但又不愿放弃生病的好处，这绝无可能。这样我们就发现，自我并没有想象中那样主动，对这一点我们要牢记。

If you were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neurotics as a physician, you would soon cease to expect that those who complain most woefully of their illness are the ones who will oppose its therapy with the least resistance or who will welcome any help. On the contrary, you would readily understand that everything contributing to the advantage derived from the disease will

strengthen the resistance to the suppression and heighten the difficulty of the therapy. We must also add another and later advantage to the gain of illness which is born with the symptom. If a psychic organization, such as this illness, has persisted for a long time, it finally behaves as an independent unit, it expresses something like self-preservation, attains a kind of *modus vivendi* between itself and other parts of psychic life, even those that are fundamentally hostile to it. And occasions will probably arise where it can prove again to be both useful and valuable, by which it will attain a *secondary function* , which gives strength to its existence. Instead of an illustration from pathology take a striking example from everyday life. An efficient workman who earns his living is crippled for his occupation by some disaster; his work is over for him. After a while, however, he receives a small accident insurance, and learns to exploit his injury by begging. His new existence, though most undesirable, is based upon the very thing that robbed him of his former maintenance. If you could cure his defect, he would be without a means of subsistence, he would have no livelihood. The question would arise: Is he capable of resuming his former work? That which corresponds to such secondary exploitation of illness in neurosis we may add to the primary benefit derived therefrom and may term it a *secondary* advantage of disease.

如果大家有志成为与神经症病人打交道的医生，你们很快就会发现，对自己的病抱怨得最惨的人对治疗的抵抗并不会最轻或愿意接受一切帮助。相反，大家很容易理解，从生病获得的好处会强化对压抑的抵抗作用，增加治疗难度。关于生病的利好，必然还有另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好处，它是与症状一起出现的。如果一个像神经症这样的心理组织存在了很久，它最终会以独立单位的形式运行，会表现出类似自我保护的作用，在自身与其余心理生活（甚至包括那些根本上与其

为敌的心理活动）之间获得暂时和解 。也许它又有机会证明自己的作用和价值，这样又获得了一种二次功能 ，使其生存能力得以加强。我不从病理学举例，而从日常生活中选取一个令人咋舌的事例。一个靠手艺吃饭的熟练工干活时出了事，腿残疾了，不能再工作。但是过了一阵子他拿到一小笔事故保险金，开始学会靠伤残乞讨为生。他新的谋生方式虽说不太体面，但恰是靠着那场剥夺从前生计的事故赚取的。如果他的残疾可以治愈，那他就失去了维生的手段，就无法生存。问题来了：他能够恢复原来的工作吗？在神经症中关于对生病的二次利用，是之前生病的初始利好之后的二次 利好。

In general I should like to warn you not to underestimate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advantage from illness and yet not to be too much impressed by it theoretically. Aside from the previously recognized exceptions, I am always reminded of Oberländer's pictures on “the intelligence of animals” which appeared in the *Fliegende Blätter* . An Arab is riding a camel on a narrow path cut through a steep mountain side. At a turn of the trail he is suddenly confronted by a lion who makes ready to spring. He sees no way out, on one side the precipice, on the other the abyss; retreat and flight—both are impossible; he gives himself up as lost. Not so the camel. He leaps into the abyss with his rider—and the lion is left in the lurch. The help of neurosis is as a rule no kinder to the rider. It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settlement of the conflict through symptom development is nevertheless an automatic process, not able to meet the demands of life, and for whose sake man renounces the use of his best and loftiest powers. If it were possible to choose, it were indeed best to perish in an honorable struggle with destiny.

一般而言，我希望提醒大家既不要低估生病利好的实际意义，同时也不要过度看重其理论意义。除了前面知道的那些例外，我总想起

奥伯兰德在《布拉特的飞跃》一书中所举的关于“动物智慧”的画面。一个阿拉伯人骑着骆驼在一条陡峭而狭窄的山路上前进。在转弯处突然看到一头狮子迎面扑来。他无处可逃：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渊，进退皆无可能，只得束手待毙。可骆驼并没有放弃。它带着主人一同跳下悬崖，令狮子猝不及防。总的来说，神经症的救助未必比骆驼骑士的情况乐观。原因可能是，通过症状发展解决冲突的过程其实是自动进行的，它满足不了人生的需求，病人为了它放弃了最优秀、最高级的能力。如果可以选择，实际上最有尊严的死法是与命运进行抗争。

I still owe you further explanation as to why, in my presentation of the theory of neurosis, I did not proceed from ordinary nervousness as a starting point. You may assume that, had I done this, the proof of the sexual origin of neurosis would have been more difficult for me, and so I refrained. There you are mistaken. In transference neurosis we must work a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ymptoms to arrive at this conclusion. In the ordinary forms of the so-called true neuroses, however, the et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sexual life is a crude fact open to observation. I discovered it twenty years ago when I asked myself one day why we regularly barred out questions concerning sexual activity in examining nervous patients. At that time I sacrificed my popularity among my patients to my investigations, yet after a brief effort I could state that no neurosis, no true neurosis at least, is present with a normal sexual life. Of course, this statement passes too lightly over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t is unclear through the vagueness with which it uses the term “normal,” but even today it retains its value for purposes of rough orientation. At that time I reached the point of drawing comparisons between certain forms of nervousness and sexual abnormalities, and I do not doubt that I could repeat the same observations now, if similar material were at my disposal. I

frequently noticed that a man who contented himself with incomplete sexual gratification, with manual ononism, for instance, would suffer from a true neurosis, and that this neurosis would promptly give way to another form, if another sexual regime no less harmful were substituted. From the change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 I was able to guess the change in the mode of his sexual life. At that time I learned to hold obstinately to my conjectures until I had overcome the patient's prevarications and had forced him to confirm my suppositions. To be sure, then he preferred to consult other physicians who did not inquire so insistently into his sexual life.

我还未跟大家进一步解释我不从普通神经过敏开始讲神经症理论的原因。大家可能会猜想，要是我先讲了这个，就更难以证明神经症起源于性生活，所以我就有意保留。那么大家就想错了。在移情类神经症中，我们必须要对症状作出解释后才能得出这个判断。但是在所谓真性神经症的普通形式里，性生活的病原学意义是可以观察到的简单事实。我在20年前就发现了这个事实：有一天我问自己，我们在检查神经症患者时为什么对性活动的问题讳莫如深。当时我冒着牺牲名誉的风险在我的病人当中做调查，但稍作尝试后，我就能够推断，神经症患者、至少说真性神经症患者都没有正常的性生活。当然，这个说法过于轻视了个体差异，使用“正常”这个术语表述也有些含糊，语意不清，但至今这个说法大体仍不失其意义。当时我着手对某些形式的神经过敏和反常性活动进行比对，如果我能使用类似的材料，我毫不怀疑现在也能同样得出当时的观察结论。我频频注意到，满足于局部性活动（比如手淫）的男子有患真性神经症的可能，而且如果换了一种同样有害的性偏好，该神经症会迅速被另一种病症代替。从病人的病情变化中我可猜到其性生活模式的变化。当时，我刻意坚持自己的猜测，直到我攻破病人的防线，迫使他承认了我的假设。实际上，他情愿去其他不追问其性生活的医生处求诊。

At that time it did not escape my notice that the origin of the disease could not always be traced back to sexual life; sexual abnormality would cause the illness in one person, while another would fall ill because he had lost his fortune or had suffered an exhausting organic disease. We gained insight into this variation by means of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 ego and the libido, and the more profound our insight became, the more satisfactory were the results. A person begins to suffer from neurosis when his ego has lost the capacity of accommodating the libido. The stronger the ego, the easier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a weakening of the ego from any cause whatsoever has the same effect as a superlative increase of the claims of the libido. There are other and more intimat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go and the libido which I shall not discuss, as we are not concerned with them here. To us it is of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hat in every case, regardless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illness was caused, the symptoms of neurosis were opposed by the libido and thus gave evidence for its abnormal use.

当时我并非没有注意到，神经症的起源并不总是与性生活有关，患病的原因可以是性的反常，也可以是财产损失或长期身体不适。我们通过自我与力比多的相互关系对这种变化有了认识，而且认识越深入，结果越圆满。当自我无法适应力比多时，人就开始患上神经症。自我越强大，问题越容易解决，任何原因导致的自我弱化，与力比多需求的过度膨胀的后果是一样的。自我与力比多还有其他更紧密的联系，跟这个话题关系不大，我就暂不做讨论了。在所有情况中，无论神经症的起因为何，神经症的症状都会遭到力比多的反抗，从而证实了力比多反常的原因，这对于我们有着发人深省的意义。

Now, however, I want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ymptoms of the true neuroses and the

psychoneuroses, the first group of which, the transference neurosis, has occupied us considerably. In both cases the symptoms proceed from the libido. They are accordingly abnormal uses of it, substitutes for gratification. But the symptoms of the true neurosis—such as pressure in the head, sensations of pain, irritability of an organ, weakening or inhibition of a function—these have no meaning, no psychic significance. They are manifested not only in the body, as for instance hysteric symptoms, but are in themselves physical processes whose creation is devoid of all the complicated psychic mechanism with which we have become acquainted. They really embody the character that has so long been attributed to the psychoneurotic symptom. But how can they then correspond to uses of the libido, which we have come to know as a psychological force? That is quite simple. Let me recall one of the very first objections that was made to psychoanalysis. It was stated that psychoanalysis was concerned with a purely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neurotic manifestations; that this was a hopeless outlook since psychological theories could never explain illness. The objectors chose to forget that the sexual function is neither purely psychic nor merely somatic. It influences physical as well as psychic life. In the symptoms of the psychoneuroses we have recognized the expression of a disturbance in psychic processes. And so we shall not be surprised to discover that the true neuroses are the direct somatic consequences of sexual disturbances.

然而，现在我想请大家注意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的区别，后者的第一类即为移情类神经症，我们对此已做过相当的研究。在两种神经症中，症状都是从力比多开始的。它们是力比多相应的反常运用，是满足的替代。但是真性神经症的症状，例如脑压迫、疼痛感、器官紊乱、某种功能衰弱或停滞，是没有一般意义和心理意义的。像癔症的症状一样，它们不仅表现在身体上，而且其自身也是一些生理

过程，其产物与我们熟悉的所有复杂心理机制无关。我们原本以为精神神经症症状具有这种特征，其实这是真性神经症的特征。但是它们何以响应了已知是心理力量的力比多的运用呢？这很简单。我们回想一下最初对于精神分析的反对意见。有人说，精神分析只是关于神经症表现的纯心理学理论，因为心理学理论一直未能解释疾病，精神分析的前景无望。反对者似乎忘记了，性的功能既非纯心理也非纯机体功能。它同时影响了生理和心理两种生活。在精神神经症中，我们观察到心理过程紊乱的表现。所以，难怪我们会发现，真性神经症是性紊乱的直接躯体反应。

The medical clinic gives us a valuable suggestion (observed by many research workers) for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true neuroses. In all the details of their symptomatology, and as well in their characteristic power to influence all organic systems and all functions, the true neuroses reveal a marked similarity to the conditions of those diseases which originate through the chronic influence of foreign poisons and as well through their acute diminution; with conditions prevalent in intoxication and abstinence. The two groups of conditions are brought still closer together by the relation of intermediate conditions, which, following M. Basedowi, we have learned to attribute to the influence of toxic substances, but of toxins, however, which are not introduced into the body from without, but arise in its own metabolism. These analogies, I think, lead us directly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se neuroses as disturbances in sexual metabolism. It may be that more sexual toxins are produced than the individual can dispose of, or that inner, even psychic conditions, stand in the way of the proper elaboration of these substances. 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 has always favored such assumptions as to the nature of sexual desires. It calls love an “intoxication”; it will have love-madness aroused through potions, and thus sees the

motive force removed, as it were, to the outer world. For the rest, the phrase “sexual metabolism” or “chemism of sexuality” is a chapter-head without content. We know nothing about it and cannot even decide whether we are to assume two sexual substances, the male and the female, or, if there is only *one* sexual toxin, which to consider the carrier of all the stimulating power of the libido. The structure of psychoanalysis that we have erected is really only a superstructure which at some future time must be placed upon its organic foundation; but what this is we do not know as yet.

临床医学为真性神经症的理解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启示（由多位研究者观察所得）。真性神经症的症状学细节及其影响所有器官系统和功能的特性表明，它们与一种疾病情况有明显相似之处，这种疾病源自异质毒素的慢性作用或锐减，常见的情况是酗酒和戒酒。通过这两种状况与中间状况各自的关系，可以看清它们之间的联系，根据巴塞多威的说法，这种中间状况是毒性物质的影响，但是这些毒素不是从外部侵入身体，而是从自身新陈代谢中产生的。我认为，这些类比直接引导我们将神经症视作了性的新陈代谢紊乱。可能是性的毒素产量超过了个人消化能力，或是内部甚至心理的条件阻碍了这些物质的适当分解。大众语言一直都喜欢用这种假设形容性欲的本质。比如称爱情为一种“毒药”，饮下数剂就会爱得疯狂，可以说，动机就这样转向外界了。至于其他的，“性的新陈代谢”或“性的化学反应”只是空有其名而无实质内容。我们对它一无所知，甚至不能确定是否要假定两种性的物质，男性和女性，或是否只有一种性的毒素可视为力比多所有刺激力量的载体。我们建立起来的精神分析架构其实只是一种上层建筑，未来必须为其铺垫有机的基础，但是这个基础是什么，我们尚不得而知。

Psychoanalysis is characterized as a science, not by reas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it handles but by the technique it employs. This can be employed in dealing with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or mythology, as well as with the theory of neurosis, without altering its character. The revealing of the unconscious in psychic life is all it aims to accomplish. The problems of the true neuroses, whose symptoms probably originate in direct toxic damage, yield no point of attack to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ysis can do little for their elucidation, and must leave the task to biological-medical research. Perhaps you understand now why I did not choose to organize my material differently. If I had given to you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the Neuroses* as you wished, it would unquestionably have been correct to proceed from the simple forms of the true neuroses to those complex illnesses caused by a disturbance of the libido. In discussing the true neuroses I would have had to bring together the facts we have gleaned from various quarters and present what we think we know of them. Only later, under the psychoneuroses, would psychoanalysis have been discuss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technical aid for insight into these conditions. I had, however, intended and announced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 and it seemed to me more important to give you an idea of psychoanalysis than to present certain positive facts about neuroses; and so I could not place the true neuroses into the foreground, for they prove sterile for the purposes of psychoanalysis. I believe that I have made the wiser choice for you, since psychoanalysis deserves the interest of every educated person because of its profound hypotheses and far-reaching connections. The theory of neurosis, on the other hand, is a chapter of medicine like any other.

精神分析之所以被定性为科学，不是因为它的研究主题，而是它所运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可用于研究文明史、宗教或神话学，以及神

经症学说，而且性质不变。揭示心理生活中的潜意识，就是它要致力实现的全部任务。真性神经症（其症状也许源于直接的毒性损伤）的问题并不能对精神分析构成攻击。精神分析对阐释它们无能为力，必须把这个任务留给生物医学研究。也许大家现在能理解我为什么不用其他方法组织我的教材了。假设如大家所愿，我讲的是《神经症引论》，那么我应该从真性神经症最简单的形式开始，一直讲到由力比多紊乱引起的疑难杂症，这无疑是正确的方法。在讨论真性神经症时，我就必须把从不同领域了解的事实与目前对它们的认知结合起来探讨。只有在后来的精神神经症的研究中，我们才能把精神分析当成最重要的技术手段进行探讨，以获得对这些病症的理解。然而，我计划和讲解的是《精神分析引论》，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似乎是传递给大家一个精神分析的概念，而不是讲解神经症的某些既定事实，所以我不能把真性神经症作为讲课重点，因为它们对于精神分析并无裨益。我觉得，我为大家所做的选择是明智的，因为精神分析具有理论深度，牵涉广泛，值得每位学者的关注。与之相反，神经症理论只是医学的一个篇章。

You are, however, justified in expecting some interest on our part in the true neuroses. Because of their intimate connection with psychoneuroses we find this decidedly necessary. I shall tell you then that we distinguish three pure forms of true neuroses: *neurasthenia* , *anxiety neurosis* and *hypochondria* . Even this classification has not remained uncontradicted. The terms are all widely used, but their connotation is vague and uncertain. Besides, there are in this world of confusion physicians who object to any distinctions between manifestations, any emphasis of clinical detail, who do not even recognize the separation of true neuroses and psychoneuroses. I think they have gone too far and have not chosen the road which leads to progress. The types of neuroses we have mentioned occur occasionally in pure form; more often they are blended with one another or with a psychoneurotic condition. This

need not discourage us to the extent of abandoning the task of distinction. Think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udy of minerals and that of ores in mineralogy. Minerals are described as individuals; frequently of course they occur as crystals, separated sharply from their surroundings. Ores consist of an aggregate of minerals which have coalesced not accidentally, but as a result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origin. We understand too little of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neuroses, to create anything similar to the study of ores. But we are surely work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when we isolate the known clinical factors, comparable to the separate minerals, from the great mass.

不过，大家希望我们对真性神经症稍加关注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与精神神经症有着密切联系，我们认为绝对有必要加以关注。那么我告诉大家，真性神经症分成三种单纯的形式：神经衰弱症 、焦虑型神经症 、忧郁症 。这些术语都广为使用，含义却模糊不定。而且，在神经症的混乱世界中，有些医家反对区分病症表现，不看重任何临床细节，甚至不承认真性神经症与精神神经症的区别。我觉得他们的做法太过火，选择的道路无益于进步。我们提到的神经症种类偶尔会以单纯形式发生，但更常发生的是它们互相混合，或附加了一种精神神经症的状况。但我们不必因此放弃分类的做法。想想在矿物学中矿物质研究与矿石研究的区别。矿物可单独描述，当然它们通常以结晶形式出现，与它们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矿石包含了一个矿物的集合，它们的结合不是偶然的，而是其来源情况所致。我们对神经症发展过程所知甚少，不能与矿石研究同日而语。但我们的努力方向肯定是对的：我们将已知临床因素提取出来，正如从一大块石头里提取独立的矿物。

A noteworth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ymptoms of the true neuroses and the psychoneuroses adds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our knowledge of symptom formation in the latter. The symptom in the true neuroses is frequently the nucleus and incipient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the psychoneurotic symptom. Such a connection is most easily observed between neurasthenia and the transference neuroses, which are termed conversion hysteria, between anxiety neurosis and anxiety hysteria, but also between hypochondria and paraphrenia (dementia praecox and paranoia), forms of neuroses of which we shall speak subsequently. Let us take as an illustration the hysteric headache or backac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rough elaboration and displacement this pain has become the gratification substitute for a whole series of libidinous phantasies or reminiscences. But once upon a time this pain was real, a direct sexual toxic symptom, the physical expression of libidinous excitation. We do not wish to assert, by any means, that all hysteric symptoms can be traced to such a nucleus, but it is true that this is frequently the case, and that all influences upon the body through libidinous excitation, whether normal or pathological, are especially significant for the symptom development in hysteria. They play the part of the grain of sand which the mollusc has enveloped in mother-of-pearl. In the same way passing signs of sexual excitation, which accompany the sexual act, are used by psychoneurosis as the most convenient and appropriate material for symptom formation.

在真性神经症与精神神经症的症状之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联系，这使对于我们理解后者的症状形成是很有助益的。真性神经症的症状常常成为精神神经症症状发展的核心与初期阶段。这一联系，在神经衰弱症与移情类神经症中的转换型癔症之间、在焦虑型神经症与焦虑型癔症之间最容易观察得到，在忧郁症与妄想痴呆（包括早发性痴呆和妄想狂，这些神经症形式以后会谈到）之间也不乏这种关系。我们举癔症的头痛或背痛为例。分析表明，通过凝缩与移置作用，这种疼痛成为一整系列的力比多幻想或回忆的替代性满足。但是这种疼

痛曾经是真实的，是一种性的毒素的直接症状，是力比多刺激的生理表现。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主张所有的癔症症状都能回溯到这一核心，但这确实是常有发生的事实，所有通过力比多刺激对身体施加的影响，无论正常或病态影响，都对癔症的症状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的作用，正如蚌制造母珠时所包裹的那一粒沙子。同样，性行为所伴随的性刺激的临时迹象，都是精神神经症的症状形成最便利、最适合的利用素材。

A similar procedure is of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interest especially. Persons who are disposed to be neurotic, without suffering from a flourishing neurosis, frequently set in motion the work of symptom development as the result of an abnormal physical change—often an inflammation or an injury. This development rapidly makes the symptom given by reality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conscious phantasies that had been lurking for an opportunity to seize upon a means of expression. In such a case the physician will try different ways of therapy. Either he will try to do away with the organic basis without bothering about its noisy neurotic elaboration, or he will struggle with the neurosis brought out by the occasion, and ignore its organic cause. The result will justify now one, now the other method of procedure; no general laws can be laid down for such mixed cases.

有一个类似过程，在诊断和治疗上尤其值得关注。有些人具有神经症倾向，虽未患明显的神经症，但是他们的一种反常生理变化（通常是炎症或受伤）就常可以启动症状发展。这一现实造成的症状发展迅速成为伺机表现的潜意识幻想的代表。在这类病例中，医生会尝试不同的治疗方法。他们或试图去除它的机体根源但不打扰显眼的神经症表现，或忽视其机体根源，而与它导致的神经症作斗争。两种治疗方法都各有成功的结果，在这种混合病例中没有普遍适用的规则。

Twenty-Fifth Lecture　Fear and Anxiety

第二十五讲　恐惧与焦虑

Probably you will term what I told you about ordinary nervousness in my last lecture most fragmentary and unsatisfactory information. I know this, and I think you were probably most surprised that I did not mention fear, which most nervous people complain of and describe as their greatest source of suffering. It can attain a terrible intensity which may result in the wildest enterprises. But I do not wish to fall short of your expectations in this matter. I intend, on the contrary, to treat the problem of the fear of nervous people with great accuracy and to discuss it with you at some length.

上一讲中关于普通神经过敏的内容，或许大家会觉得太过零碎而颇不满意。我是知道的，而且我认为，大家可能很奇怪我没有提到恐惧，这可是大多数神经过敏者怨声载道的，把它说成是最大的痛苦源泉。恐惧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心绪失控。其实，我不愿在这个题目上辜负大家的希望。相反，我打算悉心对待神经过敏者的恐惧问题，并与大家进行详细讨论。

Fear itself needs no introduction; everyone has at some time or other known this sensation or, more precisely, this effect. It seems to me that we never seriously inquired why the nervous suffered so much more and so much more intensely under this condition. Perhaps it was thought a matter of course; it is usual to confuse the words “nervous” and “anxious” as though they meant the same

thing. That is unjustifiable; there are anxious people who are not nervous, and nervous people who suffer from many symptoms, but not from the tendency to anxiety.

恐惧本身无需解释，每个人在某些时候都体会过这种感觉，或更确切地说，这种心境。对我来说，我们似乎从未认真琢磨过，为什么神经过敏者的恐惧会特别严重、特别强烈。或许大家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常把“神经过敏”和“焦虑”（译者注：恐惧和焦虑在文中经常是互换的）混为一谈，好像两者是一个意思。这并不符合实情，有些焦虑的人并无神经过敏，而患有多种症状的神经过敏者也未必有焦虑倾向。

However that may be, it is certain that the problem of fear is the meeting point of many important questions, an enigma whose complete solution would cast a flood of light upon psychic life. I do not claim that I can furnish you with this complete solution, but you will certainly expect psychoanalysis to deal with this theme in a manner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schools of medicine. These schools seem to be interested primarily in the anatomical cause of the condition of fear. They say the medulla oblongata is irritated, and the patient learns that he is suffering from neurosis of the nervus vague. The medulla oblongata is a very serious and beautiful object. I remember exactly how much time and trouble I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it, years ago. But today I must say that I know of nothing more indifferent to me for the psychological comprehension of fear, than knowledge of the nerve passage through which these sensations must pass.

不管怎样，可以肯定，恐惧问题是许多重要问题的交汇点，完全

解开这一谜团，我们对心理生活的认知便能豁然开朗。我不敢说自己能给出完整解答，但确可保证用不同于医学界诸学派的精神分析来解析这一课题。医学诸学派感兴趣的似乎主要是恐惧状况的生理原因。他们认为，病人的延髓受到了刺激，患了迷走神经的神经症。延髓可是个庄严又完美的课题。我清楚地记得我自己多年前在它上面耗费了几多时间和精力。但是现在，我必须说，对于恐惧心理的认识，人体感觉必经的神经通路恐怕是最无关紧要的知识了。

One can talk about fear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even touching upon nervousness. You will understand me without more ado, when I term this fear *real* fear in contrast to *neurotic* fear. Real fear seems quite rational and comprehensible to us. We may testify that it is a reaction to the perception of external danger, viz., harm that is expected and foreseen. It is related to the flight reflex and may be regarded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instinct of self-preservation. And so the occasions, viz., the objects and situations which arouse fear, will depend largely on our knowledge of and our feeling of power over the outer world. We deem it quite a matter of course that the savage fears a cannon or an eclipse of the sun, while the white man, who can handle the instrument and prophesy the phenomenon, does not fear these things. At other times superior knowledge promulgates fear, because it recognizes the danger earlier. The savage, for instance, will recoil before a footprint in the woods, meaningless to the uninstructed, which reveals to him the proximity of an animal of prey; the experienced sailor will notice a little cloud, which tells him of a coming hurricane, with terror, while to the passenger it seems insignificant.

我们可以就恐惧谈上很久都不用触及到神经过敏。我将这种恐惧称为真实 恐惧，以区别于神经症 恐惧，无需多言，大家就一目了然

了。真实恐惧对我们来说似乎非常合理、且容易理解。我们可以证实，这是察觉到外来危险的一种反应，比如预知或预料中的伤害。它与逃逸本能反应相关，可视作是自我保护本能的表示。而问题的条件，即引起恐惧的对象和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自己掌控外界能力的认知和感受。我们认为，野人惧怕炮火或日蚀是理所当然的，而现代人可以操控大炮、预测天象，则不会惧怕这些事情。但有时熟知某些事实反而会引起恐惧，因为它能预知危险。比如，野人看见林中足迹会却步，而无此经验者却毫不在意，浑然不知捕猎的野兽近在咫尺；经验老道的水手发现一丝云彩即可预见飓风将至而心存恐慌，但乘客却对此不以为意。

After further consideration, we must say to ourselves that the verdict on real fear, whether it be rational or purposeful, must be thoroughly revised. For the only purposeful behavior in the face of imminent danger would be the cool appraisal of one's own strength in comparison with the extent of the threatening danger, and then decide which would presage a happier ending: flight, defense, or possibly even attack. Under such a proceeding fear has absolutely no place;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would be consummated just as well and better without the development of fear. You know that if fear is too strong, it proves absolutely useless and paralyzes every action, even flight. Generally the reaction against danger consists in a mixture of fear and resistance. The frightened animal is afraid and flees. But the purposeful factor in such a case is not fear but flight.

进一步深思之后，我们势必会发现，认为真实恐惧是合理或有意义的判断有彻底修正的必要。因为，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唯一有意义的举动是冷静权衡自身力量与当前危险的程度，然后决定哪种应对方式更有胜算：逃跑、自卫或甚至可能进攻。在这一过程中，恐惧毫无意义，心无恐惧不会使情况恶化，甚至会变好。大家知道，过分

恐惧绝对是毫无帮助的，反而会令各种行动陷入瘫痪，甚至连逃跑都有可能失败。通常，对危险的反应是恐惧和抵抗兼而有之。动物受到惊吓会害怕并逃跑。但在这种情况中，有意义的行动是逃跑而不是害怕。

We are therefore tempted to claim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fear is never purposeful. Perhaps closer examination will give us greater insight into the fear situation. The first factor is the expectancy of danger which expresses itself in heightened sensory attention and in motor tension. This expectancy is undoubtedly advantageous; its absence may be responsible for serious consequences. On the one hand, it gives rise to motor activity, primarily to flight, and on a higher plane to active defense; on the other hand, it gives rise to something which we consider the condition of fear. In so far as the development is still incipient, and is restricted to a mere signal, the more undisturbed the conversion of the readiness to be afraid into action the more purposeful the entire proceeding. The readiness to be afraid seems to be the purposeful aspect; evolution of fear itself, the element that defeats its own object.

因此，我们认为恐惧的发展从来都不是有意义的。深入检视后，我们或许会对恐惧的状况有更清楚的认识。它的第一个因素是对危险的预感，体现在注意敏感度提高，运动紧张度增强。这种预感无疑是有好处的，缺乏预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一方面，预感促进了运动活力，为逃跑做好准备，也提高了主动防卫的能力；另一方面，它也导致恐惧的情况出现。只要恐惧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且只发出了一种信号，害怕的心理准备到具体行动的过渡越顺利，整个过程就越有意义。害怕的心理准备似乎是有意义的一面，而恐惧本身的发展则是一种消极元素，它挫败了自己的目标。

I avoid entering upon a discussion as to whether our language means the same or distinct things by the words anxiety, fear or fright. I think that anxiety is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a condition regardless of any objective, while fear is essentially directed toward an object. Fright, on the other hand, seems really to possess a special meaning, which emphasizes the effects of a danger which is precipitated without any expectance or readiness of fear. Thus we might say that anxiety protects man from fright.

我故意没有讨论在一般语境中，焦虑、恐惧或惊恐等词语的意思是否一致或有所区别。我认为，焦虑的情况无需对象，而恐惧则本质上需指向一个对象。另一方面，惊恐似乎确有特别含义，它强调了一种没有防备、没有害怕心理准备的危险所致的后果。按此说法，我们可以说焦虑使人免于惊恐。

You have probably noticed the ambiguity and vagueness in the use of the word “anxiety.” Generally one means a subjective condition, caused by the perception that an “evolution of fear” has been consummated. Such a condition may be called an emotion. What is an emotion in the dynamic sense? Certainly something very complex. An emotion, in the first place, includes indefinite motor innervations or discharges; secondly, definite sensations which moreover are of two kinds, the perception of motor activities that have already taken place, and the direct sensations of pleasure and pain, which give the effect of what we call its feeling tone. But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true nature of the emotion has been fathomed by these enumerations. We have gained deeper insight into some emotions and realize that the thread which binds together such a complex as we have described is the repetition of a certain significant experience. This experience might be an early impression

of a very general sort, which belongs to the antecedent history of the species rather than to that of the individual. To be clearer: the emotional condition has a structure similar to that of an hysterical attack; it is the upshot of a reminiscence. The hysteric attack, then, is comparable to a newly formed individual emotion, the normal emotion to an hysteria which has become a universal heritage.

大家也许已经注意到“焦虑”一词在使用上的歧义与含糊。通常它是一种主观情况，是“恐惧发展”完成后的感觉。这种情况也可称为一种情绪。情绪在动态上有什么意义？当然是非常复杂的。首先，情绪包含了不确定的运动神经支配与释放；其次，它可分为两种确定的感觉：一是对已发生运动的感知，二是快乐和痛苦的直接感觉，是所谓情感基调的结果。但我不认为这些分类指明了情绪的真正本质。我们对一些情绪加深认识后发现，将我们所讲的这一情结串联起来的线索是某一重要经历的重复。这个经历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早期见闻，属于人类的早期历史，而非本人经历。更确切地说：情绪的条件与癔症发作原理类似，它是一种回忆的结果。所以，癔症发作与个人最近产生的情绪有可比性，正常的情绪与一种普遍遗传的癔症具有可比性。

Do not assume that what I have said here about emotions is derived from normal psychology. On the contrary, these are conceptions that have grown up with and are at home only in psychoanalysis. What psychology has to say about emotions—the James–Lange theory, for instance—is absolutely incomprehensible for us psychoanalysts, and cannot be discussed. Of course, we do not consider our knowledge about emotions very certain; it is a preliminary attempt to become oriented in this obscure region. To continue: We believe we know the early impression which the emotion of fear repeats. We think it is birth itself which combines that complex of painful feelings, of a discharge of impulses, of

physical sensations, which has become the prototype for the effect of danger to life, and is ever after repeated within us as a condition of fear. The tremendous heightening of irritability through the interruption of the circulation (internal respiration) was at the time the cause of the experience of fear; the first fear was therefore toxic. The name anxiety—angustial—narrowness, emphasizes the characteristic tightening of the breath, which was at the time a consequence of an actual situation and is henceforth repeated almost regularly in the emotion. We shall also recognize how significant it is that this first condition of fear appeared during the separation from the mother. Of course,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 tendency to repetition of the first condition of fear has been so deeply ingrained in the organism through countless generations, that not a single individual can escape the emotion of fear; not even the mythical Macduff who was “cut out of his mother's womb,” and therefore did not experience birth itself. We do not know the prototype of the condition of fear in the case of other mammals, and so we do not know the complex of emotions that in them is the equivalent of our fear.

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所说的情绪来自正常心理学。相反，它是精神分析培养并独有的概念。心理学的情绪观，比如詹姆斯 - 兰格理论，对我们精神分析研究者来说简直无法理解，也无从讨论。当然，我们并不觉得我们对情绪的认知非常确定，这只是我们在这一模糊领域摸索方向的初次尝试。我们认为，是出生经历本身将痛苦情感、冲动释放、生理感觉结合为一个情结，成为生命应对危险的样板，在我们身上以恐惧的形式一直重复下去。由于循环系统（内部呼吸系统）中断，易感性大幅提升，这是出生当时恐惧经历的起因，所以最早的恐惧是有毒害作用的。焦虑的名词“angustial”，有狭窄之意，强调了呼吸急促的特点，这是出生当时真实情况的结果，此后几乎经常在情绪中反复发作。我们发现第一次恐惧的情况发生于婴儿离开母体时，这

是很耐人寻味的。当然我们相信，对第一次恐惧情况重复的倾向，深植于若干代的有机体之中，无人可免于这种恐惧情绪，连神话故事中“从母体中挖出来”因而未亲身体验出生的麦克达夫都不例外。我们不清楚其他哺乳动物恐惧情况的模式，所以不知道它们的情结是否等同于我们的恐惧情绪。

Perhaps it will interest you to hear how the idea that birth is the source and prototype of the emotion of fear, happened to occur to me. Speculation plays the smallest part in it; I borrowed it from the native train of thought of the people. Many years ago we were sitting around the dinner table—a number of young physicians—when an assistant in the obstetrical clinic told a jolly story of what had happened in the last examination for midwives. A candidate was asked what it implied if during delivery the foeces of the newborn was present in the discharge of waters, and she answered promptly “the child is afraid.” She was laughed at and “flunked.” But I silently took her part and began to suspect that the poor woman of the people had, with sound perception, revealed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也许大家会有兴趣知道我是怎样突然想到“出生是恐惧情绪的来源及原版”这个说法的。这里面的推测成分很少，我是借鉴了人们的一些原始想法。许多年前，我们一群年轻医生围坐在餐桌旁，一位产科诊所的助理讲了一个发生在助产士期末考试中的趣闻。一位考生被问到，接生时羊水里残留有新生儿的胎粪，这提示了何种情况，她立刻回答说“胎儿受惊了”。她被嘲笑一番，并“挂了科”。但我却暗自同情她，不由地猜想，这位可怜的女士凭着敏锐直觉揭示了一个重要关系。

Proceeding now to neurotic fear, what are its manifestations and conditions? There is much to be described. In the first place we find a general condition of anxiety, a condition of free-floating fear as it were, which is ready to attach itself to any appropriate idea, to influence judgment, to give rise to expectations, in fact to seize any opportunity to make itself felt. We call this condition “expectant fear” or “anxious expectation.” Persons who suffer from this sort of fear always prophesy the most terrible of all possibilities, interpret every coincidence as an evil omen, and ascribe a dreadful meaning to all uncertainty. Many persons who cannot be termed ill show this tendency to anticipate disaster. We blame them for being over-anxious or pessimistic. A striking amount of expectant fear is characteristic of a nervous condition which I have named “anxiety neurosis,” and which I group with the true neuroses.

现在开始讲神经症恐惧，它的表现和情况是什么？这有很多内容可说。首先，我们发现它具有焦虑的普通情况，即一种所谓自由浮动焦虑，它可任意依附于任何合适的想法上，以影响判断力，引发期待，实际上会抓住一切机会表现自己。我们称此种情况为“预期性恐惧”或“焦虑性预期”。有这种恐惧的人总会猜测最糟糕的可能，把巧合都解释成恶兆，把不确定的事情都想象得很恐怖。很多不算有病的人都有这种预感灾难的倾向。我们怪他们过于焦虑或悲观。数量多得惊人的预期性恐惧具有一种神经症状况的特点，这个神经症我已命名为“焦虑性神经症”并将其归入了真性神经症之中。

A second form of fear in contrast to the one we have just described is psychologically more circumscribed and bound up with certain objects or situations. It is the fear of the manifold and frequently very peculiar phobias. Stanley Hall, the distinguished American psychologist, has recently taken the trouble to present a

whole series of these phobias in gorgeous Greek terminology. They sound like the enumeration of the ten Egyptian plagues, except that their number exceeds ten, by far. Just listen to all the things which may become the objects of contents of a phobia: Darkness, open air, open squares, cats, spiders, caterpillars, snakes, mice, thunder-storms, sharp points, blood, enclosed spaces, crowds, solitude, passing over a bridge, travel on land and sea, etc. A first attempt at orientation in this chaos leads readily to a division into three groups. Some of the fearful objects and situations have something gruesome for normal people too, a relation to danger, and so, though they are exaggerated in intensity, they do not seem incomprehensible to us. Most of us, for instance, experience a feeling of repulsion in the presence of a snake. One may say that snakephobia is common to all human beings, and Charles Darwin has described most impressively how he was unable to control his fear of a snake pointing for him, though he knew he was separated from it by a thick pane of glass. The second group consists of cases which still bear a relation to danger, but this is of a kind which we are disposed to belittle rather than to overestimate. Most of the situation-phobia belong here. We know that by taking a railroad journey we entail greater chance of disaster than by staying at home. A collision, for instance, may occur, or a ship sink, when as a rule we must drown; yet we do not think of these dangers, and free from fear we travel on train and boat. We cannot deny that if a bridge should collapse at the moment we are crossing it, we would fall into the river, but that is such a rare occurrence that we do not take the danger into account. Solitude too has its dangers and we avoid i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but it is by no means a matter of being unable to suffer it for a single moment. 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crowd, the enclosed space, the thunder-storm, etc. It is not at all the content but the intensity of these neurotic phobias that appears strange to us. The fear of the phobia cannot even be described.

Sometimes we almost recei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neurotic is not really afraid of the same things and situations that can arouse fear in us, and which he calls by the same name.

与我们刚说过的这种恐惧形式相比，第二种恐惧形式在心理学上更为局限，与特定的对象或情境紧密相连。它具有多种表现，常为十分特殊的恐惧症。美国杰出的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最近费心地将整个系列的恐惧症用漂亮的希腊语术语表述了出来。它们听起来像在列举埃及十疫，只不过它们数量远远超过了十个。听听所有可能成为恐惧症内容的对象：黑暗、露天、室外广场、猫、蜘蛛、毛虫、蛇、老鼠、雷电、尖头、血、密闭空间、人群、独处、过桥、海陆旅行，等等。首先我们需要从这些混乱事物中辨明方向，很快可把它们分为三大类。一些恐惧的对象和状况也能使正常人毛骨悚然，是与危险相关的，所以即使可怕程度被夸大了，但对我们来说不算无法理解。比如，我们大多数人看到蛇时会感到厌恶。有人说恐蛇症是人类共有的，而且查尔斯·达尔文曾非常生动地描述过，当一条蛇对着他时，他无法遏制内心的恐惧，尽管知道他与蛇之间隔着一层厚玻璃。第二类也与危险有关，但我们对这一类事物通常习惯于忽视而不会大惊小怪。大部分的情境恐惧症都属于这一类。我们知道，旅行比呆在家中出事的几率大。比如，可能会发生火车相撞，或者沉船事故（一般来说我们一定会淹死），但是我们并不在意这些危险，毫不担心地乘坐火车和船。不可否认，当我们过桥时，桥可能倒塌，我们可能会掉入河中，但这种事故太罕见了，我们不会考虑这种危险。独处也有危险，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会避免，但绝不会完全无法忍受一刻的孤独。这同样也适用于人群、密闭空间、雷电等。使我们奇怪的不全是这些内容，而是恐惧它们的程度。恐惧症的惧怕甚至是无法形容的。有时我们甚至会觉得，恐惧症患者害怕的不是那些使我们忧虑的同一事物和情境，尽管他们也以同名称呼。

There remains a third group of phobias which is entirely

unintelligible to us. When a strong, adult man is afraid to cross a street or a square of his own home town, when a healthy, well-developed woman becomes almost senseless with fear because a cat has brushed the hem of her dress or a mouse has scurried through the room—how are we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 to danger that obviously exists under the phobia? In these animal phobias it cannot possibly be a question of the heightening of common human antipathies. For,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antithesis, there are numerous persons who cannot pass a cat without calling and petting it. The mouse of which women are so much afraid, is at the same time a first class pet name. Many a girl who has been gratified to have her lover call her so, screams when she sees the cunning little creature itself. The behavior of the man who is afraid to cross the street or the square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saying that he acts like a little child. A child is really taught to avoid a situation of this sort as dangerous, and our agoraphobist is actually relieved of his fear if some one goes with him across the square or street.

还有第三类恐惧症，于我们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当一个身强力壮的成年男子害怕穿过一条街或城里一个广场，或当一个健康匀称的女子一见猫掠过她的裙边或老鼠溜过房间就大惊失色时，我们如何界定它们与危险（危险在这些恐惧症中显然是存在的）的关系呢？动物恐惧症不可能是人类共同厌恶的升级版。因为其反面表现是，有不少人看见猫都会呼唤和爱抚它。老鼠是女性非常害怕的，但同时也是一个首选昵称。许多女孩很喜欢被恋人称为小老鼠，可一旦看到真正的精灵鼠小弟又会尖叫不止。害怕穿过街道或广场的男子的行为，我们只能说他的举动像个小孩。小孩儿倒真的是被教育过，这些情况是危险的，要避免，而广场恐惧症患者如果在别人陪同下穿过广场或街道，其恐惧感实际上会缓解。

The two forms of fear that have been described, free-floating fear and the fear which is bound up with phobias, are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 The one is by no means a higher development of the other; only in exceptional cases, almost by accident, do they occur simultaneously. The strongest condition of general anxiety need not manifest itself in phobias; and persons whose entire life is hemmed in by agoraphobia can be entirely free of pessimistic expectant fear. Some phobias, such as the fear of squares or of trains, are acquired only in later life, while others, the fear of darkness, storms and animals, exis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former signify serious illness, the latter appear rather as peculiarities, moods. Yet whoever is burdened with fear of this second kind may be expected to harbor other and similar phobias. I must add that we group all these phobias under *anxiety hysteria* , and therefore regard it as a conditio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ell-known conversion hysteria.

我们已经讲过的两种形式的恐惧，即自由浮动恐惧和事物恐惧症，两者是互不相关的。其中一个并不是另一个的高级发展形式，只有在一些特例中，它们几乎巧合地同时出现。最强烈的普通焦虑情况未必在恐惧症中有所表示，而终生为广场恐惧症所困的人可以完全没有悲观的预期性恐惧。有一些恐惧症，比如广场或火车恐惧症是在成年后患上的，而另一些比如黑暗、暴风雨和动物恐惧症则从一开始就存在了。前者意味着严重的病症，而后者似乎只是一些怪癖或心态。然而，被第二种恐惧症压迫的人可能会生出其他类似恐惧症。我必须补充一点：我们把所有这些恐惧症归入了焦虑型癔症 之中，因而将其看作是与一种有名的转换型癔症紧密相关的情况。

The third form of neurotic fear confronts us with an enigma; we loose sight entirely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ear and threatening danger. This anxiety occurs in hysteria, for instance, as

the accompaniment of hysteric symptoms, or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of excitement, where we would expect an emotional manifestation, but least of all of fear, or without reference to any known circumstance, unintelligible to us and to the patient. Neither far nor near can we discover a danger or a cause which might have been exaggerated to such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se spontaneous attacks we learn that the complex which we call the condition of anxiety can be resolved into its components. The whole attack may be represented by a single intensively developed symptom, such as a trembling, dizziness, palpitation of the heart, or tightening of breath; the general undertone by which we usually recognize fear may be utterly lacking or vague. And yet these conditions, which we describe as “anxiety equivalents,” are comparable to anxiety in all its clinical and etiological relations.

第三种神经症恐惧对我们来说是个谜，我们完全看不出这种恐惧与危险威胁的联系。这种焦虑发生于癔症之中，如与癔症症状并发；或在某些刺激的情况下，我们预料有情绪的表现，但未料到是恐惧情绪；或与任何已知情况无关，我们和病人都无法理解。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发现一种被如此夸张的危险或起因。通过这些随机发作的恐惧，我们知道，所谓焦虑的复杂情况，可分解为各种因素。整个病症可体现为一种强烈发作的单一症状，比如颤抖、眩晕、心悸或呼吸急促等，我们通常所认可的恐惧的普遍心态都全然消失或模糊了。然而，这些我们称为“等同于焦虑”的情况，在所有临床和病原的关系上与焦虑都是可比的。

Two questions arise. Can we relate neurotic fear, in which danger plays so small a part or none at all, to real fear, which is always a reaction to danger? And what can we understand as the basis of neurotic fear? For the present we want to hold to our

expectations: “Wherever there is fear, there must be a cause for it.”

有两个问题出现了。在神经症恐惧中，危险的作用很小甚至完全没有，而真实恐惧则总是对危险的反应，两者之间有关系吗？我们对神经症恐惧的来源应该作何理解？目前，我们希望抱有这样的期待：“凡有恐惧，必有原因。”

Clinical observation yield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comprehension of neurotic fear, the significance of which I shall discuss with you.

临床研究为理解神经症恐惧提供了一些启示，我要跟大家讨论其中的含义。

1．It is not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at expectant fear or general anxiety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certain processes in sexual life, let us say with certain types of libido. Utilization, the simplest and most instructive case of this kind, results when persons expose themselves to frustrated excitation, viz., if their sexual excitation does not meet with sufficient relief and is not brought to a satisfactory conclusion, in men, during the time of their engagement to marry, for instance, or in women whose husbands are not sufficiently potent or who, from caution, execute the sexual act in a shortened or mutilated form.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libidinous excitement disappears and anxiety takes its place, both in the form of expectant fear and in attacks and anxiety equivalents. The cautious interruption of the sexual act, when practiced as the customary sexual regime, so frequently causes the anxiety neurosis

in men, and especially in women, that physicians are wise in such cases to examine primarily this etiology. On innumerable occasions we have learned that anxiety neurosis vanishes when the sexual misuse is abandoned.

1．不难判定，与预期性恐惧或普通的焦虑联系紧密的是性生活的某些过程，我们也可称为某些力比多的类型。可借用这一类情况最简单有效的例子说明情况，比如当人置身于无用的刺激之中，也就是说，他们的性刺激没有得到充分发泄，没有得到满足的结果，比如，男性在订婚到结婚前的期间，或丈夫性能力不足的女性，或出于避孕目的缩短或中断性行为的人们。在这些情况下，力比多刺激消失，焦虑取而代之，或是预期性恐惧的形式，或是等同于焦虑的症状形式。当中断性行为的避孕措施在性生活中成为常态时，男性经常会患上焦虑型神经症，而女性更尤为常见，医生在这些病例中主要检查这一病原才是明智的。数不清的案例告诉我们，一旦性生活的障碍去除，焦虑型神经症就会随之消失。

So far as I know,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exual restraint and conditions of anxiety is no longer questioned even by physicians wh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sychoanalysis. But I can well imagine that they do not desist from reversing the connection and saying that these persons have exhibited a tendency to anxiety from the outset and therefore practice reserve in sexual matters. The behavior of women whose sexual conduct is passive, viz., is determined by the treatment of the husband, contradicts this supposition. The more temperamental, that is, the more disposed toward sexual intercourse and capable of gratification is the woman, the more will she react to the impotence of the man, or to the *coitus interruptus* , by anxiety manifestations. In anaesthetic or only slightly libidinous women, such misuse will not carry such

consequences.

就我目前所知，性节制与焦虑状况的关系，连与精神分析无关的医生都不再质疑。但我可以想象，他们禁不住要倒换因果关系，声称这些病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焦虑的倾向，所以在性事上有所保留。性事被动（也就是听任丈夫摆布）的女性的行为与这一说法是矛盾的。越有激情、越喜欢性爱和具有满足能力的女性，对男子性能力不足或性交中断 的反应就越大，越会表现出焦虑。对于性冷淡或力比多淡薄的女性，这种性缺憾就不至于引起相同的后果。

Sexual abstinence, recommended so warmly by the physicians of today, has the same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ditions of anxiety only when the libido, to which satisfactory relief is denied, is sufficiently strong and not for the most part accounted for by sublimation. The decision whether illness is to result always depends upon the quantitative factors. Even where character formation and not disease is concerned, we easily recognize that sexual constraint goes hand in hand with a certain anxiety, a certain caution, while fearlessness and bold daring arise from free gratification of sexual desires. However much these relations are altered by various influences of civilization, for the average human being it is true that anxiety and sexual constraint belong together.

当得不到发泄满足的力比多足够强烈且大多得不到升华时，现在的医生热烈推荐的性节制做法对焦虑情况的发展也会起到相同作用。疾病的结果总是取决于量化的因素。即使在与疾病无关的性格发展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性节制会导致一定的焦虑和谨慎，而性欲可随时满足的情况则会使人勇敢无畏。虽然这些关系因不同文明的影响而

大有不同，但就人类的普遍情况而言，焦虑与性节制的确是相生相伴的。

I have by no means mentioned all the observations that speak for the genetic relation of the libido to fear. Th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urotic fear of certain phases of life, such as puberty and the period of menopause, when the production of libido is materially heightened, belongs here too. In some conditions of excitement we may observe the mixture of anxiety and libido and the final substitution of anxiety for libido. These facts give us a twofold impression, first that we are concerned with an accumulation of libido, which is diverted from its normal channel, second that we are working with somatic processes. Just how anxiety originates from the libido we do not know; we can only ascertain that the libido is in abeyance, and that we observe anxiety in its place.

关于力比多与恐惧的因果关系，我并未提及所有的观察结论。在几个人生阶段，比如青春期和更年期这些力比多大幅提升期，影响神经症恐惧发展的因素也属于这里的讨论范围。在某些刺激情况中，我们会发现焦虑与力比多并存，并且最终焦虑替代了力比多。这些现象给我们两方面的感觉：第一，我们注意到力比多从正常渠道转移过来，发生了累积；第二，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些躯体过程。焦虑如何从力比多中产生，我们尚不清楚，只能确定力比多处于停滞状态，而且观察到焦虑取代了它的位置。

2．We glean a second hint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psychoneuroses, especially of hysteria. We have hear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symptoms, fear frequently accompanies this

condition; this, however, is free floating fear, which is manifested either as an attack or becomes a permanent condition. The patients cannot tell what they are afraid of and connect their fear, through an unmistakable secondary elaboration, with phobias nearest at hand; death, insanity, paralysis. When we analyze the situation which gave rise to the anxiety or to symptoms accompanied by it, we can generally tell which normal psychologic process has been omitted and has been replaced by the phenomenon of fear. Let me express it differently: we reconstruct the unconscious process as though it had not experienced suppression and had continued its way into consciousness uninterruptedly. Under these conditions as well this process would have been accompanied by an emotion, and we now learn with surprise that when suppression has occurred the emotion accompanying the normal process has been replaced by fear, regardless of its original quality. In hysteric conditions of fear, its unconscious correlative may be either an impulse of similar character, such as fear, shame, embarrassment or positive libidinous excitation, or hostile and aggressive emotion such as fury or rage. Fear then is the common currency for which all emotional impulses can be exchanged, provided that the idea with which it has been associated has been subject to suppression.

2．我们从对精神神经症特别是癔症的分析中发现了第二个线索。我们已经得知，除了症状之外，这个情况常伴有焦虑，不过是属于自由浮动恐惧，或表现为一次性发作，或表现为永久状况。病人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也说不清恐惧的原因，但是该恐惧毫无疑问经历了二次加工，极易患上各种恐惧症，进而与发疯、瘫痪甚至死亡联系起来。分析导致焦虑或与症状伴随的状况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发现被普通心理过程忽视、并被恐惧现象替代的因素。我换个方式来表述：我们重建了潜意识过程，仿佛它没有经历过压抑，毫无中断地继续向意识前进。同样，在这些情况下，这个过程也会伴有一种情绪，现在

我们惊讶地发现，压抑作用发生时，伴随正常过程的情绪，无论其本来性质为何，都已被恐惧所替代。在恐惧的癔症情况中，其潜意识的相关因素可以是一种特征类似的冲动，比如恐惧、羞耻、尴尬或力比多的积极刺激；也可以是类似暴怒、气愤之类的敌对和攻击性情绪。恐惧是可与所有情绪冲动互换的共通情绪，前提是它所关联的想法遭到了压抑。

3．Patients suffering from compulsive acts are remarkably devoid of fear. They yield us the data for our third point. If we try to hinder them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compulsive acts, of their washing or their ceremonials, or if they themselves dare to give up one of their compulsions, they are seized with terrible fear that again exacts obedience to the compulsion. We understand that the compulsive act had veiled fear and had been performed only to avoid it. In compulsion neurosis then, fear,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present, is replaced by symptom development. Similar results are yielded by hysteria. Following the process of suppression we find the development, either of anxiety alone or of anxiety and symptom development, or finally a more complete symptom development and no anxiety. In an abstract sense, then, it would be correct to say that symptoms are formed only to evade development of fear, which otherwise could not be escaped. According to this conception, fear is seen to occupy the center of the stage in the problems of neurosis.

3．令人称奇的是，患有强迫性行动症的病人没有恐惧的困扰。如果我们试图阻止他们实施强迫性行动，比如盥洗或仪式性动作，或者他们自己敢于放弃其中一个强迫性行动，他们就会被强烈的恐惧感攫取，迫使自己再次对该强迫性行动俯首帖耳。我们认识到，强迫性行动掩盖了恐惧，实施它是为了避免恐惧。这样，在强迫型神经症中

本该存在的恐惧感被症状发展所替代。癔症也可产生类似结果。根据压抑过程，我们发现的是：焦虑单独发展，或焦虑和症状共同发展；或最终更完整的症状发展，而不含焦虑。那么，就抽象意义而言，正确的说法是，症状形成只是为了避免恐惧的发展，不然恐惧是无法避免的。根据这一概念，可知恐惧在神经症问题上占有中心地位。

Our observations on anxiety neuroses l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hen the libido was diverted from its normal use and anxiety thus released, it occurred on the basis of somatic processes. The analyses of hysteria and compulsion neuroses furnish the correlative observations that similar diversion with similar results may also be the consequence of a constraint of psychic forces. Such then is our knowledge of the origin of neurotic fear; it still sounds rather vague. But as yet I know no path that would lead us further. The second task we have set ourselves is still more difficult to accomplish. It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nnection between neurotic fear, which is misused libido, and real fear, which is a reaction to danger. You may believe that these things are quite distinct and yet we have no criterion for distinguishing the sensations of real and neurotic fear.

我们关于焦虑型神经症的观察得出一个结论：力比多的正常发泄发生偏离，由此产生了焦虑，这是发生在躯体过程基础上的。癔症和强迫型神经症的分析的相关观察结果显示，有类似结果的力比多偏离也可能是心理力量受到抑制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对神经症恐惧起源的认知，它仍然比较模糊。不过目前我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了。我们自己设定的第二个任务更难实现。它是对错误利用力比多的神经性恐惧和对危险作出反应的真实恐惧之间的关系做出确认。大家也许会觉得这些问题很明显，但我们还没有能够区分真实恐惧与神经症恐惧感觉的标准。

The desired connection is brought about by presupposing the antithesis of the ego to libido that is so frequently claimed. We kn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fear is the ego's reaction to danger, the signal for preparation for flight, and from this we are led to believe that in neurotic fear the ego attempts to escape the claims of its libido, and treats this inner danger as though it came from without. Accordingly our expectation that where there is fea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o be afraid of, is fulfilled. But the analogy admits of further application. Just as the attempt to flee external danger is relieved by standing one's ground, and by appropriate steps toward defense, so the development of neurotic fear is arrested as fast as the symptom develops, for by means of it the fear is held in check.

这一受到期待的关系的先决条件，是自我与需求频繁的力比多之间的对立。我们知道，恐惧的发展是自我对于危险的反应，是准备逃跑的信号，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神经症恐惧中，自我企图逃避力比多的需求，把这一内在危险视同外来危险。相应地，我们关于“凡有恐惧，必有原因”的猜测得到了确认。但是这一关系还有其他作用。正如逃离外来危险的努力，通过坚强意志和适当防卫措施可以得到放松，神经症恐惧与症状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因为症状抑制着恐惧。

Our difficulties in understanding now lie elsewhere. The fear, which represents flight of the ego before the libido, is supposed to have sprung from the libido itself. That is obscure and warns us not to forget that the libido of a person belongs fundamentally to him and cannot confront him as an external force. The localized dynamics of fear development are still unintelligible; we do not know what psychic energies are released or from what psychic

systems they are derived. I cannot promise to solve this problem, but we still have two trails to follow which lead us to direct observations and analytic investigation which can aid our speculations. We turn to the origin of fear in the child, and to the source of neurotic fear which attaches itself to phobias.

我们在理解上遇到了新难题。恐惧体现了自我对力比多的逃离，它按说应该从力比多自身中涌现。这种情况并不清楚，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人的力比多属于其自身，不会是与本人抗衡的外部力量。恐惧发展的动态性定位仍然无解，我们不知道其间释放了何种心理力量，或它们源于何种心理体系。我无法保证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仍可从两条途径进行直接观察和分析研究，帮助我们得出推论。我们要观察恐惧在儿童身上的起源和与事物恐惧症相关的神经症恐惧来源。

Fear in children is quite common and it is very hard to tell whether it is neurotic or real fear. Indeed, the value of this distinction is rendered questionable by the behavior of children. On the one hand we are not surprised that the child fears all strange persons, new situations and objects, and we explain this reaction very easily by his weakness and ignorance. We ascribe to the child a strong disposition to real fear and would consider it purposeful if this fear were in fact a heritage. Herein the child would only repeat the behavior of prehistoric man and of the primitive man of today who, on account of his ignorance and helplessness, fears everything that is new, and much that is familiar, all of which can no longer inspire us with fear. If the phobias of the child were at least partially such as might be attributed to that primeval period of human development, this would tally entirely with our expectations.

儿童的恐惧很常见，很难判定是神经症恐惧还是真实恐惧。实际上，儿童的行为使得这一区别的意义值得怀疑。一方面，我们不会奇怪，儿童害怕所有生人、新的环境和事物，这种反应很容易用他们的弱小和无知来解释。我们觉得儿童对真实恐惧有强烈的倾向，并且如果这种恐惧是先天的，我们会认为它是有意义的。在此情况下，儿童只会重复史前人类和现代原始人的行为，他们因为愚昧无助而恐惧所有新事物以及许多熟悉的事物，所有这些事物已不再使我们恐惧。如果儿童的事物恐惧症至少可能部分地与人类原始发展阶段有关，这就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了。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not overlook the fact that not all children are equally afraid, and that those very children who express particular timidity toward all possible objects and situations subsequently prove to be nervous. Thus the neurotic disposition reveals itself by a decided tendency to real fear; anxiety rather than nervousness appears to be primary. We therefore arrive a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hild (and later the adult) fears the power of his libido because he is anxious in the face of everything. The derivation of anxiety from the libido is hence put aside. Any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real fear consistently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onsciousness of one's own weakness and helplessness—inferiority, in the terminology of A. Adler—when it is able to persist from childhood to maturity, is the cause underlying the neuroses.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事实：并非所有儿童都一样胆怯，对所有可能对象和情境都表现出特别畏惧的那些小孩，恰恰在成年后成了神经症患者。这样，这种神经症的潜在性显示了一种明显的真实恐惧倾向，最初是焦虑，而不是神经症。因此我们推断，儿童（以及后来的成人）惧怕其自身力比多的力量，因为他们在一切情况下都会

焦虑。所以有关焦虑源于力比多的说法就可弃而不用。任何关于真实恐惧的研究都能得出一致结论：当个人对自身脆弱和无能的意识——阿德勒称为自卑感——可从童年持续到成年时，它就成为神经症的潜在起因。

This sounds so simple and convincing that it has a claim upon our attention. To be sure, it would result in our shifting the basis of nervousnes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feeling of inferiority, and its prerequisite condition of anxiety and its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symptoms, is so firmly established that it is rather the exceptional case, when health is the outcome, which requires an explanation.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careful observation of the fear of children? The little child is primarily afraid of strange people; situations wax important only because they involve people, and objects become influential much later. But the child does not fear these strange persons because he attributes evil intentions to them, because he compares his weakness with their strength or recognizes them as dangerous to his existence, his safety and freedom from pain. Such a child, suspicious, afraid of the aggressive impulse which dominates the world, would prove a sad theoretic construction. The child is afraid of a stranger because he is adjusted to a dear, beloved person, his mother. His disappointment and longing are transformed into fear, his unemployed libido, which cannot yet be held suspended, is diverted by fear. It cannot be termed a coincidence that this situation, which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all childish fear, is a repetition of the first condition of fear during birth, viz., separation from the mother.

这听起来很简单，而且有说服力，有理由获得我们的关注。确切地说，它使得我们改变了对神经过敏起因的看法。自卑感的延续，先

决条件是焦虑，后续发展是症状，它们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健康的结果倒反而是例外了，需要解释。对儿童恐惧的细致观察可说明什么？小朋友一开始是怕生人，只有在与人有关时，环境才是重要的，物品的影响更是后话了。但是儿童怕生不是因为他们觉得生人本性邪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也不是因为他们感到生人对其生存、安全和远离痛苦造成了威胁。认为儿童是在疑虑、忌惮危机重重的世界的理论是可悲的。儿童害怕生人是因为他们习惯了一位挚爱亲人，即母亲的陪伴。他们的失望与渴望转换成了恐惧，他们的力比多无从发泄，又不能暂时搁置，因而化成了恐惧。这种情况不能称为偶然现象，因为它是所有儿童恐惧的典型例子，儿童离开母体时经历第一次恐惧的情况，这是对第一次恐惧的重复。

The first situation phobias of children are darkness and solitude; the former often persists throughout life; common to both is the absence of the dear nurse, the mother. I once heard a child, who was afraid of the dark, call into an adjoining room, “Auntie, talk to me, I am afraid.” “But what good will that do you? You cannot see me!” Whereupon the child answered, “If someone speaks, it is brighter.” The yearning felt in darkness is converted into the fear of darkness. Far from saying that neurotic fear is only a secondary, a special case of real fear, we observe in little children something that resembles the behavior of real fear and has in common with neurotic fear, this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rigin from unemployed libido. The child seems to bring very little real fear into the world. In all situations which may later become the conditions of phobias, on elevations, narrow bridges across water, on railroad and boat trips, the child exhibits no fear. And the more ignorant he is, the less fear he feels. It would be most desirable to have a greater heritage of such life-preservative instincts; the task of supervision, which is to hinder him from exposing himself to one danger after another, would be lessened. In reality the child at first

overestimates his powers and behaves fearlessly because he does not recognize dangers. He will run to the water's edge, mount the window sill, play with fire or with sharp utensils, in short, he will do everything that would harm him and alarm his guardians. The awakening of real fear is the result of education, since we may not permit him to pass through the instructive experience himself.

儿童最初的事物恐惧症对象是黑暗与孤独，前者经常会延续一生，两种恐惧的共同原因是亲爱的抚育者即母亲的离开。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怕黑的小孩对隔壁房间喊：“阿姨，跟我说话吧，我害怕。”“可这对你有什么用呢？你又看不到我！”于是孩子回答：“如果有人说话，屋里就亮些了。”黑暗中的思念转化为对黑暗的恐惧。与“神经症恐惧只是附属于真实恐惧的特殊案例”的说法大为不同的是，我们观察到幼童有一些类似真实恐惧之处，它与神经症恐惧有一共同特征：源自未发泄的力比多。孩子出世时似乎并未携带什么真实恐惧。在所有可能在日后成为恐惧症的情况中，比较登高、水上窄桥、车船旅行等，儿童没有表现出恐惧。他们越无知，就越无畏。要是天生的保命本能更强大一些，情况会较为理想，监护孩子免受各种危险的责任就会减轻。在现实中，孩子起初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分乐观，因为意识不到危险，所以行动时无所畏惧。他们会跑到水边，爬上窗台，以火为乐或玩弄利器，总之他们会做一切会伤害到自己的事情，让家长们心惊胆战。真实恐惧被唤醒是教育的结果，因为我们不想让他们亲身经历那些惨痛教训。

If there are children who meet this education to fear half way, and who discover dangers of which they have not been warned, the explanation suffices that their constitution contains a greater measure of libidinous need or that they have been spoiled early through libidinous gratification. No wonder that those persons who are nervous in later life are recruited from the ranks of these

children. We know that the creation of neurosis is made easy by the inability to endure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pent-up libido for any length of time. You see that here too we must do justice to the constitutional factor, whose rights we never wish to question. We fight shy of it only when others neglect all other claims for this, and introduce the constitutional factor where it does not belong according to the combined results of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r where it must be the last consideration.

如果有一些儿童中途就学会了恐惧，同时能发现未被警告过的危险，这足以说明他们的体质含有更高的力比多需求，或者他们早期的力比多满足得到了纵容。难怪那些成年后变得神经过敏的人来自这一类儿童。我们知道，在任何时段，力比多大量遭到抑制但无力承受的人容易患神经症。大家看到，这里我们也必须正视体质因素，我们从未怀疑过它的作用。我们对它稍加反对的前提只是：别人为了它而对其他所有因素视而不见，而且每当观察和分析的共同结果显示，体质因素不成为原因或势必是最次要原因时，他们还硬强调体质原因。

Let us extract the sum of our observations on the anxiety of children: Infantile fear has very little to do with real fear, bu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eurotic fear of adults. It originates in unemployed libido and replaces the object of love that is lacking by an external object or situation.

我们总结一下对儿童的焦虑的观察结果：婴儿的恐惧与真实恐惧基本无关，但是与成人的神经症恐惧很相似。它起源于未发泄的力比多，因爱的对象缺席而改换成一个外部对象或外部情况。

Now you will be glad to hear that the analysis of phobias cannot teach much more that is new. The same thing occurs in them as in the fear of children; unemployed libido is constantly being converted into real fear and so a tiny external danger takes the place of the demands of the libido. This coincidence is not strange, for infantile phobias are not only the prototypes but the direct prerequisite and prelude to later phobias, which are grouped with the anxiety hysterias. Every hysteria phobia can be traced to childish fear of which it is a continuation, even if it has another content and must therefore receive a different nam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onditions lies in their mechanism. In the adult the fact that the libido has momentarily become useless in the form of longing, is not sufficient to effe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fear into libido. He has long since learned to maintain such libido in a suspended state or to use it differently. But when the libido is part of a psychic impulse which has experienced suppression, similar conditions to those of the child, who cannot distinguish the conscious from the unconscious, are reëstablished. The regression to infantile phobia is the bridge whe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ido into fear is conveniently effected. We have, as you know, spoken a great deal about suppression, but we have always followed the fate of the conception that was to be suppressed, because this was easier to recognize and to present. We have always omitted from our consideration what happened to the emotion that clung to the suppressed idea; and only now we learn that whatever quality this emotion might have manifested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its fate is a transformation into fear. This transformation of emotion is by far the more important part of the suppression process. It is not so easy to discuss, because we cannot assert the existence of unconscious emotions in the same sense as unconscious ideas. With one difference, an idea remains the same whether it is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we can give an account of what corresponds to an

unconscious idea. But an emotion is a release and must be judged differently from an idea. Without a deeper reflection and clarification of our hypotheses of psychic processes, we cannot tell what corresponds to its unconscious stage. We cannot undertake this here. But we want to retain the impression we have gain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nxiety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unconscious system.

现在大家将开心地得知，恐惧症的分析没什么新内容了。它们与儿童的恐惧有相同之处，未发泄的力比多不断转换成真实恐惧，因而一种极小的外来危险代替了力比多需求。这一巧合并不奇怪，因为婴儿的恐惧症不仅是成人的恐惧症（属于焦虑型癔症）的原型，也是它们的直接前提和前兆。每一种癔症型恐惧症均可追究到童年恐惧，即便后者的内容不一样，相应地必有不同命名，但前者仍是后者的延续。两种情况的差异在于两者的机制。在成年人身上，虽然力比多的渴望暂时不得满足，但这不足以促使力比多转化为恐惧。成人早已懂得这些力比多的维持之道，或可暂时搁置，或可另图他用。但是当力比多属于遭受压抑的一种心理冲动时，这就等于那些儿童分不清意识与潜意识，那么与儿童类似的情况就会再次产生。向婴儿恐惧症的退化是催化剂，它使得力比多轻易转向了恐惧。如大家所知，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压抑的内容，但我们总是关注被压抑的想法的命运，因为它更易于辨识与呈现。我们一直忽略了附着在被压抑想法之上的情绪，现在我们才知道，无论这一情绪在正常情况下表现出怎样的性质，它的命运就是转化为恐惧。这一情绪的转化目前是压抑过程更重要的环节。讨论它不太容易，因为我们不能用确认潜意识念头的同样方法确认潜意识情绪的存在。一个念头只是意识与潜意识的差别，其内容仍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描述与潜意识念头相关的内容。但是情绪是一种释放，对它的判断势必与念头不同。如果不对我们关于心理过程的假说进行深度思考和阐释，我们就不能认识关于这一潜意识环节的内容。我们现在不能做这件事。但是我们希望记得这一认识：焦虑的发展与潜意识体系是紧密相关的。

I sai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into fear, rather a discharge in the form of fear, is the immediate fate of suppressed libido. Not the only or final fate, I must add. These neuroses are accompanied by processes that strive to restrain the development of fear, and succeed in various ways. In phobias, for instance, two phases of the neurotic process can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The first effects the suppression of libido and its transition to fear, which is joined to an external danger. The second consists in building up all those precautions and safety devices which are to prevent contact with this danger which is dealt with as an external fact. Suppression corresponds to the ego's flight from the libido, which it regards dangerous. The phobia is comparable to a fortification against outer danger,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the much feared libido. The weakness of the phobias' system of defens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fort has been strengthened from without and has remained vulnerable within. The projection of peril from the libido into the environment is never very successful. In other neuroses, therefore, other systems of defense are used against the possibility of fear development. That is an interesting aspect of the psychology of neurosis. Unfortunately its study would lead us to digress too far, and presupposes a more thorough and special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I shall add only one thing more. I have already spoken to you of the counter siege by which the ego imprisons the suppression and which it must maintain permanently for the suppression to subsist. The task of this counter siege is to carry out diverse forms of defense against the fear development which follows the suppression.

我说过，向恐惧的转化其实是以恐惧的形式得到发泄，这是被压抑的力比多的直接命运。但它不是唯一或最终的命运，我必须补充。

这些神经症伴随了一些试图克制恐惧发展的过程，而且在各方面有所成功。比如在恐惧症中，神经症过程可清楚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促使力比多被压抑并转为与某种外来危险有关的恐惧。第二个阶段，设定所有安全防范措施，以防止与这个被视为外部事实的危险接触。自我认为力比多是危险的，为了逃离它而产生了压抑。恐惧症好比一个抵御外来危险的堡垒，被深深惧怕的力比多即是这个危险的体现。恐惧症的防御体系的弱点在于：堡垒外部得到巩固，内部却依然薄弱。把力比多的危险投射到外界从来都不太见效。因此，另一些神经症使用不同防御体系抵制恐惧的发展机会。这是神经症心理学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巧的是，它的研究过于离题了，而且前提是必须在这一课题上具备更透彻、更专业的知识。我只在这里补充一点。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反围攻行动，这是自我维持压抑作用的手段，它必须永久保留这一行动，才能使压抑继续发挥作用。这个反围攻的任务是要实行不同的防御方法，防止继压抑而来的恐惧发展。

To return to the phobias, I may now say that you realize how insufficient it would be to explain only their content, to be interested only in knowing that this or that object or situation is made the subject of a phobia. The content of the phobia has about the same importance for it as the manifest dream facade has for the dream. With some necessary restrictions, we admit that among the contents of the phobias are some that are especially qualified to be objects of fear through phylogenetic inheritance, as Stanley Hall has emphasized. In harmony with this is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se objects of fear can establish connections with danger only by symbolic relations.

回到恐惧症上，现在大家应该意识到，只解释恐惧症的内容，只关注其主题的对象或情况，是十分不够的。恐惧症内容的作用几乎相当于显梦外形之于梦的作用。我们承认，除了一些必然限制，恐惧症

的一些内容尤其属于物种遗传所致的恐惧对象，正如斯坦利·霍尔提到的。由此可得出相应的推论：许多恐惧的对象与危险之间，只有象征性的关系。

And so we are convinced of the central position that the problem of fear assumes in the questions of the neurotic psychology. We are deeply impressed with how closely the development of fear is interwoven with the fate of the libido and the unconscious system. There is only one disconnected point, one inconsistency in our hypothesis: the indisputable fact that real fear must be considered an expression of the ego's instincts of self-preservation.

这样我们相信了，恐惧问题在神经症心理学的诸多问题中占有中心地位。我们深深地感到恐惧的发展与力比多命运、潜意识体系的关系相互交织之紧密。在我们的假说中，只有一点出入和不连贯之处，即一个不争的事实：真实的恐惧必须被视为自我的自保本能的表现。

Twenty-Sixth Lecture　The Libido Theory and Narcism

第二十六讲　力比多理论及自恋

Repeatedly in the past and more recently we have dealt wit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ego instincts and the sexual instincts. At first, suppression taught us that the two may be flatly opposed to each other, that in the struggle the sexual instincts suffer apparent defeat and are forced to obtain satisfaction by other regressive methods, and so find the compensation for defeat in their invulnerability. After that we learned that at the outset both have a different relation to the educator, Necessity, so that they do not develop in the same manner and do not enter into the sam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ality. We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 sexual instincts are much more closely allied to the emotional condition of fear than the ego instincts. This result appears incomplete only in one respect, which, however, is most important. For further evidence we shall mention the significant fact that non-satisfaction of hunger and thirst, the two most elementary instincts of self-preservation, never result in their reversal into anxiety, whi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satisfied libido into fear is, as we have heard, one of the best known and most frequently observed phenomena.

无论以前还是最近，我们都反复讨论了自我冲动和性冲动的差异。首先，通过压抑，我们发现这两种冲动是完全相斥的，在两者的斗争中，性冲动显然是失败者，被迫通过其他退化的方式获取满足，以此弥补它们的溃败。此后，我们发现，起初这两种冲动与其教官“现实必要性”有着不同的关系，因而它们的发展方式不同，与务实

原则的关系也不同。我们开始意识到，比起自我本能，性本能与恐惧情绪之间的联系要紧密得多。这个结论只在一个方面是不完善的，但这个方面却最重要。根据新的证据，我们要指出一个重要事实，饥饿与口渴这两个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本能得不到满足从来都不会导致其逆转为焦虑，而据我们所知，得不到发泄的力比多转化为恐惧却是众所周知的最常见的现象之一。

No one can contest our perfect justification in separating the ego from sexual instincts. It is affirmed by the existence of sexual desire, which is a very special activity of the individual. The only question is, what significance shall we give to this distinction, how decisive is it? The answer will depend upon the results of our observations; on how far the sexual instincts, in their psychological and somatic manifestations, behave differently from the others that are opposed to them; on how important are the consequences which result from these differences. We have, of course, no motive whatever for insisting upon a certain intangible difference in the character of the two groups of instincts. Both are only designations of the sources of energy of the individual. The discussion as to whether they are fundamentally of the same or of a different character, and if the same, when it was that they separated from one another, cannot profit by the conceptions, but must deal rather with the underlying biological facts. At present we know very little about this, and even if we knew more it would not be relevant to our analytic task.

我们将自我与性冲动进行区分是具有充分合理性的，是无可争辩的，性欲求的存在就证实了这一点。性欲求是十分特殊的个体活动。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一区分的意义何在，它有多大的确定性？答案取决于观察研究结果，取决于性冲动的心理和躯体表现与反抗它们的其

他因素的差异程度，取决于这些差异所致结果的重要程度。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坚持认为两种冲动在特征上有某种无形的差别。两者都只是个体能量来源的不同称呼。它们的特征在根本上是一致还是不同，如果一致，两者何时互相独立开来，这种讨论不能凭借概念得出结果，而必须要结合潜在的生物学事实。我们目前对此知之甚少，即便有更多相关知识，也与分析任务无关。

Obviously, we should gain slight profit if,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Jung, we were to emphasize the original unity of all instincts, and were to call the energy expressed in all of them "libido." Since the sexual function cannot be eliminated from psychic life by any device, we are forced to speak of sexual and asexual libido. As in the past, we rightly retain the name libido for the instincts of sexual life.

显然，如果我们遵循荣格的榜样，重视所有本能冲动在起初的统一性，把所有冲动表现出的能量统称为"力比多"，我们还是能够小有收益的。既然性的功能没有办法从心理生活中去除，我们只能把力比多分为性与非性两种。在以前，我们将性生活的本能冲动命名为力比多是准确的。

I believe, therefore, that the question, how far the justifiable distinction of the instincts of sex and of self-preservation may be carried, is of little importance for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analysis is moreover not competent to deal with it. From a biological standpoint there are, to be sure, various reasons for believing that this distinction is significant. Sexuality is the only function of the living organism which extends beyond the individual and sees to his kinship with the species. It is undeniable

that its practice does not always benefit the individual as do his other performances. For the price of ecstatic pleasures it involves him in dangers which threaten his life and frequently cause death. Probably peculiar metabolic processes, different from all others, are required to maintain a part of the individual life for its progeny. The individual who places himself in the foreground and regards his sexuality as a means to his gratification is, from a biological point of view, only an episode in a series of generations, a transient appendage to a germ-plasm which is virtually endowed with immortality, just as though he were the temporary partner in a corporation which continues to persist after his death.

所以我相信，对于精神分析来说，性本能与自我保护本能的差异合理程度是无关紧要的，而且精神分析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确实有各种理由使人相信这种差异的重要性。性的功能是活的有机体唯一超越个体本身且将其与物种传承紧密联系起来的功能。不可否认，性的实践不总是像其他实践一样对个体有益。极度快感的代价会使个体生命受到威胁，常可致丧命。这种新陈代谢过程可能是特有的，与其他所有过程不同，个体生命的一部分需要为后代保留。当前活跃着的、以性活动作为满足方式的个体，从生物学观点看，只是一系列世代中的一环，只是附属于真正永恒的种质上的稍纵即逝的一点，就好比个体是一个公司的临时领头人，在其死后公司依然会生存下去。

For psychoanalytic explanation of neuroses, however, there is no need to enter upon thes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By separate observation of the sexual and the ego instincts, we have gained the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nsference-neuroses. We were able to trace them back to the fundamental situation where the sexual instinct and the instinct of self-preservation had come in conflict

with one another, or biologically although not so accurately, expressed where the part played by the ego, that of independent individuality, was opposed to the other, that of a link in a series of generations. Only human beings are capable of such conflict, and therefore, taken all in all, neurosis is the prerogative of man, and not of animals. The excessive development of his libido and the elaboration of a varied and complicated psychic life thus made possible, appear to have created the conditions prerequisite for conflict. It is clear that these conditions are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great progress that man has made beyond his kinship with animals. The capacity for neurosis is really only the reverse side of his talents and gifts. But these are only speculations, which divert us from our task.

然而，对于精神分析的神经症解释，我们没必要接触这些深奥的复杂因素。通过对性与自我冲动的分别观察，我们会找到理解移情类神经症的钥匙。我们可以将它们回溯到下面两种根本情况之一：性本能与自我保护本能开始互相冲突，或者，自我所扮演的独立个体角色与其作为一系列世代中一环的角色相矛盾（虽然这有违生物学的观点）。只有人类才有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因此，归根结底，神经症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动物则没有。力比多过度发展，使得心理生活表现出易变性和复杂性，这似乎就为冲突创造了前提条件。显而易见，正是这些情况使得人类超越了动物的层面。神经症的患病倾向其实只是人类天赋和能力中的一个消极面。但这些都只是推测，与我们的任务无关。

Until now we worked with the impulse that we can distinguish the ego and the sexual instincts from one another by their manifestations. We could do this without difficulty in the transference neuroses. We called the accumulation of energy which

the ego directed towards the object of its sexual striving libido and all others, which proceeded from the instincts of self-preservation, interest. We were able to achieve our first insight into the workings of psychic forces by observing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libido,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final destiny. The transference neuroses furnished the best material for this. But the ego, composed from various organizations, their construction and functioning, remained hidden and we were led to believe that only the analysis of other neurotic disturbances would raise the veil.

直到现在，我们的想法都是，我们可以用自我与性本能的表现将两者区分开来。我们在移情类神经症中不难做到这一点。自我向力比多的性致对象累积的能量，以及所有其他来自自我保护本能的能量，我们统称为兴趣。通过力比多的累积、变化和最终结局，我们首次能够对心理力量的作用有所认识。移情类神经症为此提供了最佳素材。但是，自我由不同组织体系构成，它们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尚不清楚，我们相信，通过其他神经紊乱的分析可一探究竟。

Very soon we began to extend these psychoanalytic conceptions to other conditions. As early as 1908, K. Abraham asserted, after a discussion with me, that the principal characteristic of dementia praecox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one of the psychoses) is *that there is no libidinous occupation of objects* (*The Psycho-sexual Differences between Hysteria and Dementia Praecox*). But then the question arose, what happens to the libido of the demented, which is diverted from its objects? Abraham did not hesitate to give the answer, “It is turned back upon the ego, and *this reflected turning back is the source of the megalomania* in dementia praecox.” This hallucination of greatness is exactly comparable to the well-known over-estimation of the objects habitual to lovers. So,

for the first time, we gained an understanding of psychotic condition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normal course of love.

这些精神分析的概念很快就在其他情况中得到了延展。早在1908年，阿伯拉罕在与我进行了一次讨论后宣称，早发性痴呆（它可视为精神病的一种）的根本特征是，力比多不占有对象（这是癔症与早发性痴呆在性心理上的区别）。但这会产生一个疑问：痴呆症患者的力比多既然已从其对象上移除，那么它发生了什么呢？阿伯拉罕毫不犹豫地答道："它被拉回了自我之上，而这种返回是 早发性痴呆中妄想自大的由来 。"自大的幻觉，与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表现是别无二致的。因此，我们第一次通过与正常恋爱现象的对比了解了精神病的情况。

These first interpretations of Abraham's have been maintained in psychoanalysis, and have become the basis of our attitude towards the psychoses. Slowly we familiarized ourselves with the idea that the libido, which we find attached to certain objects, which expresses a striving to attain gratification from these objects, may also forsake them and put in their place the person's own ego. Gradually these ideas were developed more and more consistently. The name for this placing of the libido—narcism—was borrowed from one of the perversions described by P. Naecke. In it the grown individual lavishes upon his own body all the affection usually devoted to some foreign sex object.

阿伯拉罕率先作出的这些解释，继续成为精神分析坚持的主张，成了我们精神病观的基础。我们逐渐认识到，力比多既可附着于某些对象，是致力于从这些对象获得满足的表现，但也可以放弃这些对象，以个人的自我取而代之。这些观点越来越得到了巩固。这种替代

力比多的现象被称为“自恋”，此说法借鉴于纳基所述的性倒错行为之一。自恋的原意是指，成年人把通常应用于外部性对象的爱抚滥用在自己身体上。

We reflected that if such a fixation of libido on one's own body and person instead of on some external object exists, this cannot be an exceptional or trivial occurrence. It is much more probable that this narcism is the general and original condition, out of which the love for an object later develops, without however necessarily causing narcism to disappear. From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object-libido we remembered that in the beginning many sex instincts seek auto-erotic gratification, and that this capacity for auto-eroticism forms the basis for the retardation of sexuality in its education to conformity with fact. And so, auto-eroticism was the sexual activity of the narcistic stage in the placing of the libido.

我们想到，如果力比多舍弃外物而执着于自身和自体这种情况存在的话，这不可能是罕见或次要的情况。这种自恋极有可能是最初的普遍情况，后来从中发展出有对象的爱，但未必会导致自恋消失。我们回想对象力比多的演化历史可知，许多性冲动起初是寻求自淫式满足的，这种自淫倾向是性在务实原则驱使下发生退化的原因。这样，自淫行为就是替代力比多的自恋阶段的性活动。

To be brief: We represented the relation of the ego-libido to the object-libido in a way which I can explain by an analogy from zoology. Think of the simplest forms of life, which consist of a little lump of protoplasmic substance which is only slightly differentiated. They stretch out protrusions, known as pseudopia, into which the protoplasm flows. But they can withdraw these

protrusions and assume their original shape. Now we compare the stretching out of these processes with the radiation of libido to the objects, while the central mass of libido can remain in the ego, and we assume that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ego-libido can be changed into object-libido, and this can again be taken up into the ego, without any trouble.

简单来说，自我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之间的关系可用动物学类比说明。想想最简单的生物形式，只有细微差别的小型原生质团块。它们伸出一些名为“假足”的突起物，原生质由此流入。但是它们可以缩回这些突起，回复至初始形状。这样，这些突起的伸出，好比力比多主体留在自我中，同时又向对象辐射出去，于是我们推测，自我力比多在正常情况下可转变为对象力比多，而且可以毫不费力地退回自我之中。

With the help of this representation we can now explain a great number of psychic conditions, or to express it more modestly, describe them, in the language of the libido theory; conditions that we must accredit to normal life, such as the psychic attitude during love, during organic sickness, during sleep. We assumed that the conditions of sleep rest upon withdrawal from the outer world and concentration upon the wish to sleep. The nocturnal psychic activity expressed in the dream we found in the service of a wish to sleep and, moreover, governed by wholly egoistic motives. Continuing in the sense of libido theory: sleep is a condition in which all occupations of objects, the libidinous as well as the egoistic, are given up, and are withdrawn into the ego. Does this not throw a new light upon recovery during sleep, and upon the nature of exhaustion in general? The picture of blissful isolation in the intra-uterine life, which the sleeper conjures up night after night, thus

also completes the picture from the psychic side. In the sleeper the original condition of libido division is again restored, a condition of complete narcism in which libido and ego-interest are still united and live indistinguishably in the self-sufficient ego.

通过这个说明，我们现在能用力比多理论解释很多心理状况，或谦虚点讲，可以描述它们。这些状况一定是归属于正常生活的，比如在恋爱、身体生病、睡眠期间的心理态度。我们推测，睡眠的状况依赖于逃避外界、一心入睡的愿望。梦中表现的夜间心理活动在于睡觉的愿望，而且被纯粹的自我动机控制。以力比多理论继续解释：睡眠的情况是，无论属于力比多还是属于自我的所有对象都停止了使用，并退入了自我之中。这难道没有使我们对于睡眠恢复体力和一般疲劳的性质有新的认识吗？在母体中与世隔绝的幸福场景是睡眠者每夜都梦寐以求的，这个场景从心理层面也得到了完善。在睡眠者身上，力比多分支的原始情况又得到恢复，这是完全自恋的情况，即力比多和自我的兴趣仍然是一体的，在自给自足的自我中毫无区别地并存着。

We must observe two things: First, how can the conceptions of narcism and egoism be distinguished? I believe narcism is the libidinous complement of egoism. When we speak of egoism we mean only the benefits to the individual; if we speak of narcism we also take into account his libidinous satisfaction. As practical motives the two can be followed up separately 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One can be absolutely egoistic, and still have strong libidinous occupation of objects, in so far as the libidinous gratification by way of the object serves the needs of the ego. Egoism will then take care that the striving for the object results in no harm to the ego. One can be egoistic and at the same time excessively narcistic, i.e., have very slight need of an object. This need may be for direct sexual satisfaction or even for those higher

desires, derived from need, which we are in the habit of calling love as opposed to sensuality. In all of these aspects, egoism is the self-evident, the constant, and narcism the variable element. The antithesis of egoism, *altruism* , is not the same as the conception of libidinous occupation of objects. Altruism differs from it by the absence of desire for sexual satisfaction. But in the state of being completely in love, altruism and libidinous occupation with an object clash. The sex object as a rule draws upon itself a part of the narcism of the ego. This is generally called “sexual over-estimation” of the object. If the altruistic transformation from egoism to the sex object is added, the sex object becomes all powerful; it has virtually sucked up the ego.

我们必然可观察到两点：一，自恋与利己主义这两个概念区别何在？我认为，自恋是力比多对利己主义的补充。利己主义仅指出于个人利益考虑，而自恋还需包括个人的力比多满足。以实际动机论，自恋和利己主义有相当的区别。一个人可以是绝对利己主义的，但只要通过对象获得的力比多满足符合自我的需求，他们仍可迷恋力比多的对象。利己主义会保护追求对象的行为不致伤害到自我。一个人可以是利己主义的，同时又可以是过度自恋的，就是说需求对象的程度很轻。这种需求可以是为了直接的性满足，甚至可以为了那些源自需求的更高欲求，我们习惯于称为爱情，以区别于肉欲。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利己主义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常态，而自恋则是可变元素。利己主义的反面是利他主义 ，它与力比多占有对象的概念是两回事。利他主义不存在性满足的需求，因而与之不同。但是在热恋的状态下，利他主义与力比多占有对象会发生冲突。通常，自我会将一部分自恋投射在性的对象上。这通常被称为对性对象的“高估”。如果对于性对象的利己主义态度转变为利他主义，性对象就变得无所不能，几乎将自我完全吞没。

I think you will find it a pleasant change if after the dry phantasy of science I present to you a poe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economic contrast between narcism and being in love. I take it from the *Westostliche Divans* of Goethe:

讲了这么多枯燥的科学空想，我们不妨换个轻松的话题，我用诗歌为大家讲解自恋与恋爱之间的经济性差异。诗歌节选自歌德《西东诗集》：

SULEIKA:

“素雷卡：

Conqueror and serf and nation;

统治者、民众和农奴，

They proclaim it joyously;

他们都愉快地宣告，

Mankind's loftiest elation,

人世间最大的幸福，

Shines in personality.

来自人性的荣耀。

Life's enchantment lures and lingers,

美好生活在招手在流连，

Of yourself is not afar,

与你自己并不遥远，

All may slip through passive fingers,

要是你太过迟延，

If you tarry as you are.

一切都将消逝在眼前。

HATEM:

哈特姆：

Never could I be thus ravished,

我从未如此魂不守舍，

Other thoughts are in my mind,

心中有了其他想法，

All the gladness earth has lavished

世间无尽的快乐，

In Suleika's charms I find.

都集于迷人的素雷卡。

When I cherish her, then only

只有当与她相聚，

Dearer to myself I grow,

我才会更爱自己。

If she turned to leave me lonely

要是她弃我而去，

I should lose the self I know.

我将把自我丢失。

Hatem's happiness were over—

哈特姆的幸福虽已结束，

But his changeling soul would glide

他的灵魂却在徘徊，

Into any favored lover

若见她的情郎得到她爱抚，

Whom she fondles at her side.

他只愿滑进那人的心怀。”

The second observation is supplementary to the dream theory. We cannot explain the origin of the dream unless we assume that the suppressed unconscious has achieved a certain independence of the ego. It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wish for sleep and retains its hold on the energies that have seized it, even when all the occupations with objects dependent upon the ego have been released for the benefit of sleep. Not until then can we understand how this unconscious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nocturnal discontinuance or deposition of the censor, and can seize control of fragments left over from the day to fashion a forbidden dream wish from them.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to the already existing connections with these supposed elements that these fragments owe a part of the resistance directed against the withdrawal of the libido, and controlled by the wish for sleep. We also wish to supplement our conception of dream formation with this trait of dynamic importance.

第二点观察是对释梦理论的补充。如果要解释梦的起源，我们势必要假定，被压抑的潜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已不依赖于自我。它不符合

睡眠的愿望，即使取决于自我的对象占有为了睡眠都被解除了，它对攫取它的能量依然紧抓不放。到那时，我们才能理解，这一潜意识如何利用审查作用在夜间的中断或沉淀，乘机控制了白天残留的思想片断，从中制造出一个禁忌的梦之愿望。另一方面，这些残留片段与潜意识元素已有一定的关系，因而这些片断在睡眠愿望的控制下，对力比多的撤退产生了一定的抵抗作用。我们也希望这一动态性意义特性可以完善梦的形成观念。

Organic diseases, painful irritations, inflammation of the organs create a condition which clearly results in freeing the libido of its objects. The withdrawn libido again finds itself in the ego and occupies the diseased part of the part. We may even venture to assert that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withdrawal of the libido from its objects is more conspicuous than the withdrawal of egoistic interes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This seems to open the way to an understanding of hypochondria, where an organ occupies the ego in a similar way without being diseased, according to our conception. I shall resist the temptation of continuing along this line, or of discussing other situations which we can understand or represent through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object libido travels to the ego. For I am eager to meet two objections, which I know are absorbing your attention. In the first place, you want to call me to account for my insistence upon distinguishing in sleep, in sickness and in similar situations between libido and interest, sexual instincts and ego instincts, since throughout the observations can be explained by assuming a single and uniform energy, which, freely mobile, occupies now the object, now the ego, and enters into the services of one or the other of these impulses. And, secondly, how can I venture to treat the freeing of libido from its object as the source of a pathological condition, since such transformation of object-libido into ego-libido—or more generally, ego-energy—belongs to the

normal, daily and nightly repeated occurrences of psychic dynamics?

机体疾病、痛苦的刺激、器官炎症所造成的情况，无疑导致力比多摆脱了它的对象。退却的力比多再次在自我中显现，占据了患病的部位。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断定，在这些情况下，力比多脱离其对象，比自我取消对外界的关注要更为明显。这似乎有助于对忧郁症的理解，根据我们的观点，在忧郁症中，一个器官在没有生病的情况下以相似的方法占据了自我。我该克制自己不要在这条线上继续，或不要再讨论其他一些我们可以通过“对象力比多返回自我”的假定来理解或表现的情况。因为我急于回应两种异议，大家早就为此心神不宁了。首先，大家希望我说明在睡眠、疾病及其他类似情况中坚持区分力比多与兴趣、性冲动与自我冲动的原因。既然我们可以假定一种可自由流动的一致能量，它既可占据对象，又可占据自我，然后可以为这样或那样的冲动服务，这样观察结果就完全说得通了，那为何还要作此区分？第二，既然对象力比多向自我力比多（或更普遍的自我能量）的转化属于日夜重复发生的正常心理动态事件，那我如何敢于将力比多与对象的脱离当成病态情况的来源？

The answer is: Your first objection sounds good.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sleep, of sickness and of being in love would in themselves probably never have led to a distinction between ego-libido and object-libido, or between libido and interest. But you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vestigations from which we have set out, in the light of which we now regard the psychic situations under discussion. The necessity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libido and interest, that is, between sexual instincts and those of self-preservation, is forced upon us by our insight into the conflict out of which the transference neuroses emerge. We can no longer reckon without it. The assumption that object-libido can change

into the ego-libido, in other words, that we must reckon with an ego-libido, appeared to us the only possible one wherewith to solve the riddle of the so-called narcistic neuroses—for instance, dementia praecox—or to justify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a comparison of hysteria and compulsion. We now apply to sickness, sleep and love that which we found undeniably affirmed elsewhere. We may proceed with such applications as far as they will go. The only assertion that is not a direct refutation of our analytic experience is that libido remains libido whether it is directed towards objects or toward the ego itself, and is never transferred into egoistic interest, and vice-versa. But this assertion is of equal weight with the distinction of sex and ego instincts which we have already critically appraised, and which we will maintain from methodological motives until it may possibly be disproved.

我的答案在此：大家的第一个异议听起来不错。对于睡眠、疾病和恋爱等情况的讨论，本身大约是永远区分不出自我力比多和对象力比多，或力比多与兴趣的。但是大家没有考虑过，我们曾经以现在讨论的这些情况为依据，着手进行过一些调查研究。我们了解到移情类神经症中涌现的冲突后，认识到了区分力比多与兴趣，即性本能与自我保护本能的必要性。我们再也离不开这个区分了。关于对象力比多转换为自我力比多的假定，换言之，我们必须认定自我力比多的存在，这似乎是解开所谓自恋型神经症的谜团——例如早发性痴呆或求证癔症与强迫症异同点的唯一可能途径。我们现在把在其他地方确证无疑的观点应用到了疾病、睡眠和恋爱的情况中。我们可以尽力去应用这些观点。不直接反驳我们分析经验的主张只有一个：无论指向对象或是自我，力比多依旧是力比多，从不会转换为自我的兴趣，反之亦然。但这一主张等同于性和自我本能的区分，关于这个区分，我们已经进行了分析评估，只要它未被证实为错误方法，我们就将一直坚持这一种方法。

Your second objection, too, raises a justified question, but it points in a wrong direction. To be sure the retreat of object-libido into the ego is not purely pathogenic; we see that it occurs each time before going to sleep, only to be released again upon awaking. The little protoplasmic animal draws in its protrusions, only to send them out again on a later occasion. But it is quite another matter when a specific, very energetic process compels the withdrawal of libido from the object. The libido has become narcistic and cannot find its way back to the object, and this hindrance to the mobility of the libido certainly becomes pathogenic. It appears that an accumulation of narcistic libido cannot be borne beyond a certain point. We can imagine that the reason for occupation with the object is that the ego found it necessary to send out its libido in order not to become diseased because it was pent up. If it were our plan to go further into the subject of dementia praecox, I would show you that this process which frees the libido from the objects and bars the way back to the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cess of suppression, and must be considered as its counterpart. But above all you would recognize familiar ground, for the conditions of these processes are practically identical, as far as we can now see, with those of suppression. The conflict appears to be the same, and to take place between the same forces. The reason for a result as different as, for instance, the result in hysteria, can be found only in a difference of dispositions. The vulnerable point in the libido development of these patients lies in another phase; the controlling fixation, which, as you will remember, permits the breach resul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symptoms, is in another place probably in the stage of primitive narcism, to which dementia praecox returns in its final stage. It is noteworthy that for all the narcistic neuroses, we must assume fixation points of the libido which reach back into far earlier phases of development than in cases of hysteria or compulsion neuroses. But you have heard that the conceptions

obtained in our study of transference neuroses are sufficient to orient us in the narcistic neuroses, which present far greater practical difficulties. The similarities are considerable; it is fundamentally the same field of observation. But you can easily imagine how hopeless the explanations of these conditions, which belong to psychiatry, appear to him who is not equipped for this task with an analytic knowledge of transference neuroses.

大家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合理的，但方向错了。诚然，对象力比多退回到自我并不完全是致病因素，我们发现，每当入睡后它就会发生，只有睡醒后才会消除。这个小小的原生质动物收回了它的突起，只在后来某个时刻又伸了出来。但当一种具体的、极为活跃的过程迫使力比多脱离对象时，这就另当别论了。力比多已经变得自恋，无法与对象再次相聚了，这种力比多流动性的障碍势必就成了致病因素。看来，自恋的力比多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是无法承载的。可以想见力比多占有对象的原因是，自我认为有必要送出力比多，它不想因为力比多积压过多而生病。如果我们打算深入研究早发性痴呆的课题，我可以向大家说明，使力比多脱离对象并阻止它回归的这一过程与压抑的过程关系很近，必然可视作压抑的对应版本。更重要的是，大家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就我们现在所知，这些过程的情况与压抑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冲突似乎也一样，也发生于相同的势力之间。至于其结果与癔症之类的结果不同，也只是因为倾向不同。这些病人的力比多发展中的薄弱点存在于另一阶段，起控制作用的执着（大家应该记得是它纵容冲突导致了症状形成）则在另一地方，也许是在自恋的起始阶段，这是早发性痴呆最终回归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假定，在所有自恋型神经症中，，力比多的执着点退回的阶段比在癔症或强迫型神经症中要早得多。但是大家已经听说过，在移情类神经症研究中获得的概念足以为自恋型神经症的研究指明方向，不过后者的实际困难要大得多。它们的相似点有很多，基本上属于同一类观察研究对象。大家不难想象，要让一个没有移情类神经症分析知识积累的人解释这些情况（它们属于精神病），他将会是多么地一筹

莫展。

The picture given by the symptoms of dementia praecox, which, moreover, is highly variable, is not exclusively determined by the symptoms. These result from forcing the libido away from the objects and accumulating it in the ego in the form of narcistic libido. A large space is occupied by other phenomena, which result from the impulses of the libido to regain the objects, and so show an attempt toward restitution and healing. These symptoms are in fact the more conspicuous, the more clamorous; they show an unquestionable similarity to those of hysteria, or less often to those of compulsion neurosis, and yet they are different in every respect. It appears that in dementia praecox the libido in its endeavor to return to the objects, i.e., to the images of the objects, really captures something, but only their shadows—I mean, the verbal images belonging to them. This is not the place to discuss this matter, but I believe that these reversed impulses of the libido have permitted us an insight into what really determin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conscious and an unconscious representation.

早发性痴呆症状的情形又是非常多变的，它并不完全取决于症状本身。它们的由来是，力比多被迫脱离对象，作为自恋型的力比多在自我中累积。起到重要作用的还有其他现象，它们源于力比多重新夺回对象的冲动，显示了复原和康复的努力。这些症状实际上是更为显著和活跃的：毫无疑问，它们与癔症的症状是相像的，与部分的强迫型神经症类似，但是它们在各方面仍是不同的。看来，在早发性痴呆中，试图夺回对象（即对象的表象）的力比多其实抓取到了一些东西，但只是它们的影子——我指的是属于它们的言语表象。我们在这儿不用讨论这个问题，但我相信，这些力比多的逆反冲动使我们了解了决定意识与潜意识表现之间区别的因素。

I have now brought you into the field where we may expect the further progress of analytic work. Since we can now employ the conception of ego-libido, the narcistic neuroses have become accessible to us. We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problem of finding a dynamic explanation of these condi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of enlarging our knowledge of psychic life by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go. The ego psychology, which we strive to understand, must not be founded upon introspective data, but rather, as in the libido, upon analysis of the disturbances and decompositions of the ego. When this greater task is accomplished we shall probably disparage our previous knowledge of the fate of the libido which we gained from our study of the transference neuroses. But there is still much to be said in this matter. Narcistic neuroses can scarcely be approached by the same technique which served us in the transference neuroses. Soon you will hear why. After forging ahead a little in the study of narcistic neuroses we always seem to come to a wall which impedes progress. You know that in the transference neuroses we also encountered such barriers of resistance, but we were able to break them down piece by piece. In narcistic neuroses the resistance is insuperable; at best we are permitted to cast a curious glance over the wall to spy out what is taking place on the other side. Our technical methods must be replaced by others; we do not yet know whether or not we shall be able to find such a substitute. To be sure, even these patients furnish us with ample material. They do say many things, though not in answer to our questions, and for the time being we are forced to interpret these utterances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we have gained from the symptoms of transference neuroses. The coincidence is sufficiently great to assure us a good beginning. How far this technique will go, remains to be seen.

现在我已带领大家进入了一个领域，我们的分析工作在此将有新的进展。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应用自我力比多的理念就近研究自恋型神经症了。我们面临的难题是：为自恋型神经症的情况作出动态性解释，同时要用对自我的理解拓宽心理生活知识。我们致力了解的自我心理学一定不能建立在自省资料的基础之上，而要像研究力比多那样，建立在对自我的紊乱和分裂的分析基础上。完成这个更艰巨的任务后，我们以前从移情类神经症研究中获得的对力比多命运的认识可能会得到改观。但这个话题仍有好多内容可讲。对移情类神经症管用的同一方法很少能适用于自恋型神经症。大家马上就知道原因了。在自恋型神经症研究中稍有收获后，我们似乎总能碰上阻碍进步的壁垒。大家知道，我们在移情类神经症研究中也曾经遭遇过这类阻力，但我们对它们进行了各个击破。自恋型神经症的阻力是不可克服的，我们只能往壁垒之上投去好奇一瞥，窥探一下那边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改用其他技术方法，但还不知道能否找到新的方法。其实，病人都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们确实说了不少事情，但答非所问，目前我们只能用从移情类神经症症状获得的认知来解释这些现象。两者的共通之处足以使我们有个良好开始。这种方法有多管用还有待观察。

There are additional difficulties that impede our progress. The narcistic conditions and the psychoses related to them can only be solved by observers who have schooled themselves in analytic study of transference neuroses. But our psychiatrists do not study psychoanalysis and we psychoanalysts see too few psychiatric cases. A race of psychiatrists that has gone through the school of psychoanalysis as a preparatory science most first grow up. The beginnings of this are now being made in America, where many leading psychiatrists explain the teachings of psychoanalysis to their students, and where many owners of sanatoriums and directors of institutes for the insane take pains to observe their patients in the light of these teachings. But even here we have occasionally been

successful in casting a glance over the narcistic wall and I shall tell you a few things that we think we have discovered.

阻碍进步的还有其他困难。能够处理自恋性情况和与之相关的精神病的人只有受过移情类神经症分析研究培训的研究者。但是，精神病医生们不研究精神分析，而精神分析学者们见到的精神病病例又很少。一批以精神分析作为预备课程学习的精神病学者的成长是最快的。美国已经率先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许多权威的精神病学者向学生讲解精神分析的学说，许多精神病疗养院和研究院的负责人依据这些学说悉心观察病人。不过即使这样，我们偶尔也成功窥探到了自恋性神经症的一些内情，我跟大家说几点我们的发现。

The disease of paranoia, chronic systematic insanity, is given a very uncertain position by the attempts at classification of present-day psychiatry. There is no doubt of its close relationship to dementia praecox. I once was so bold as to propose that paranoia and dementia praecox could be classed together under the common name of paraphrenia. The types of paranoia are described according to their content as: megalomania, the mania of persecution, eroto mania, mania of jealousy, etc. From psychiatry we do not expect attempts at explanation. As an example of such an attempt, to be sure an antiquated and not entirely valid example, I might mention the attempt to develop one symptom directly out of another by means of an intellectual rationalization, as: the patient who primarily believes he is being persecuted draws the conclusion from this persecution that he must be an extraordinarily important personality and thus develops megalomania. In our analytical conception megalomania is the immediate outcome of exaggeration of the ego, which results from the drawing-in of libidinous occupation with objects, a secondary narcism as a recurrence of the

originally early infantile form. In cases of the mania of persecution we have noticed a few things that lead us to follow a definite track. In the first place, we observed that in the great majority of cases the persecutor was of the same sex as the persecuted. This could still be explained in a harmless way, but in a few carefully studied cases it was clearly shown that the person of the same sex, who was most loved in normal times, became the persecutor after the malady set in. A further development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fact that one loved person is replaced by another, according to familiar affinities, e.g., the father by the teacher or the superior. We concluded from such ever-increasing experiences, that paranoia persecutoria is the form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guards himself against a homosexual tendency that has become too powerful. The change from affection to hate, which notoriously may take the form of serious threats against the life of the loved and hated person, expre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idinous impulse into fear, which is a regularly recurring result of the process of suppression. As an illustration I shall cite the last case in which I made observations on this subject. A young physician had to be sent away from his home town because he had threatened the life of the son of a university professor, who up to that time had been his best friend. He ascribed truly devilish intentions to his erstwhile friend and credited him with power of a demon. He was to blame for all the misfortunes that had in recent years befallen the family of the patient, for all his personal and social ill-luck. But this was not enough. The wicked friend, and his father the professor, had been the cause of the war and had called the Russians into the land. He had forfeited his life a thousand times and our patient was convinced that with the death of the culprit all misfortune would come to an end. And yet his old affection for his friend was so great that it had paralyzed his hand when he had had the opportunity of shooting down the enemy at close quarters. In my short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atient, I

discovered that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dated back to early school-life. Once at least the bonds of friendship had been over-stepped; a night spent together had been the occasion for complete sexual intercourse. Our patient never felt attracted to women, as would have been natural to his age or his charming personality. At one time he was engaged to a beautiful and distinguished young girl, but she broke off the engagement because she found so little affection in her fiancé. Years later his malady broke out just at that moment when for the first time he had succeeded in giving complete gratification to a woman. When this woman embraced him, full of gratitude and devotion, he suddenly felt a strange pain which cut around his skull like a sharp incision. His later interpretation of this sensation was that an incision such as is used to expose a part of the brain had been performed upon him, and since his friend had become a pathological anatomist, he gradually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he alone could have sent him this last woman as a temptation. From that time on his eyes were also opened to the other persecutions in which he was to be the victim of the intrigues of his former friend.

妄想狂，即一种慢性系统性精神错乱，现代精神病学对其分类有不明确之处。它与早发性痴呆的相近关系是毋庸置疑的。我曾经大胆提议，妄想狂和早发性痴呆可共用妄想痴呆这一名称。妄想狂的类别根据其内容表述为：妄想自大狂、被害妄想狂、被爱妄想狂）、嫉妒妄想狂等等。我们不要指望精神病学尝试解释这些情况。有一个尝试的例子，说实话，已经过时而且不全有效，它试图通过理性推导，证明一个症状直接发展自另一个症状：一个病人起初有被害妄想，由此断定自己身份重要，从而发展出了妄想自大狂。我们精神分析则认为妄想自大狂是自我膨胀的直接后果，它源于力比多从占有对象的撤离，是一种二次自恋，即对最初婴儿型自恋形式的重复。我们在被害妄想病例中有一些发现，这些发现使我们有了一个明确方向。首先，

我们观察到，大部分病例中妄想的加害人与被害人的性别相同。这个现象仍有可能是不相关的情况，但仔细观察一些病例可以清楚地发现，病人在正常时最爱这位同性的对象，在发病时就会将其想象成加害者。当病人所爱戴的人改变后，病症也会相应地发展，这是基于熟悉的亲近关系，比如父亲被老师或上司代替。我们不断发现这种现象，由此推断，被害妄想是病人用以抵御一种过于强烈的同性恋倾向的方式。众所周知，由爱转恨的变化体现为，病人对其又爱又恨的对象构成严重的生命威胁，这说明了力比多冲动向恐惧的转化，这也是压抑过程经常发生的结果。为了用事实说话，我举一个我最近在这个问题上观察到的病例。一位年轻医生因为威胁一位大学教授儿子的生命，而不得不被送出家乡，而在这之前，两人曾是最要好的朋友。这位年轻的医生认为这个昔日好友对他居心险恶，说他拥有恶魔的力量。他是自己最近几年家庭不幸以及个人和社交厄运的罪魁祸首。但这还不够。是这位恶魔朋友和他父亲挑起了现在这场大战，招惹了俄国人的进犯。这个朋友屡屡破坏他的生活，病人觉得只有消灭这个奸人才能天下太平。但是他对朋友旧情不忘，当有机会就近射杀仇人时却手软了。我与病人进行了几次短暂交流，发现两人的友情可追溯到早年的学生时代。他们之间的友谊至少有一次越界，他们曾共度一晚并发生了完整的性交。我们的病人从未喜欢过女性，而以他的年纪和迷人个性，这本该是自然而然的事。他曾经与一位漂亮聪颖的年轻女孩订了婚，但对方取消了婚约，因为她觉得未婚夫对她很冷淡。几年以后，正当他成功地满足了一位女子之后，他的病发作了。当这位女子感激而深情地拥抱他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一阵奇怪的疼痛，就像利刃划开了头颅一样。他后来形容这种感觉时说，他被施行了切颅手术以暴露他的一部分大脑，而且由于他朋友已成为一位病理解剖学者，他渐渐开始相信，最近的这位女子就是他的朋友派来勾引他的。从那时起，他就认为自己在其他地方也受到了迫害，成了前好友各种阴谋的受害者。

But how about those cases where the persecutor is not of the same sex as the persecuted, where our explanation of a guard

against homosexual libido is apparently contradicted? A short time ago I had occasion to investigate such a case and was able to glean corroboration from this apparent contradiction. A young girl thought she was followed by a man, with whom she had twice had intimate relations. She had, as a matter of fact, first laid these maniacal imputations at the door of a woman, whom we may consider as having played the part of a mother-substitute in her psychic life. Only after the second meeting did she progress to the point of diverting this maniacal idea from the woman and of transferring it to the ma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ersecutor must be of the same sex was also originally maintained in this instance. In her claim before the lawyer and the physician, this patient did not mention this first stage of her mania, and this caused the appearance of a contradiction to our theory of paranoia.

但是在有些病例中，妄想的加害者与被害者并不是同性，那是不是与我们关于抑制同性恋力比多的说法明显是矛盾的呢？不久前我有机会研究了这样一个病例，因而发现可解释这一表面矛盾的证据。一个年轻女孩认为她被一个男人跟踪，她与他曾有过两次亲密接触。事实上，她一开始曾对一个女子做过这种妄想指控，这位女子可视作她心理生活中母亲般的人物。只有在与那位男子第二次见面后，她才把这个妄想念头转移到了他身上。关于妄想的加害者必然是同性的情形在这个例子中原本也是成立的。她在律师与医生面前陈述时，没有提到这个妄想的起初阶段，这就造成与我们妄想理论表面上的矛盾。

Homosexual choice of object is originally more natural to narcism than the heterosexual. If it is a matter of thwarting a strong and undesirable homosexual impulse, the way back to narcism is made especially easy. Until now I have had very little opportunity of speaking to you about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s of love-life, so

far as we know them, and now I cannot make up for lost time. I only want to point out that the choice of an object, that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ido which comes after the narcistic stage, can proceed according to two different types—either according to the *narcistic* type, which puts a very similar personality in the place of the personal ego, or according to the *dependent* type, which chooses those persons who have become valuable by satisfying needs of life other than as objects of the libido. We also accredit a strong fixation of the libido to the narcistic type of object-choice when there is a disposition toward manifest homosexuality.

对于自恋症而言，选择同性恋的对象比选择异性恋对象要更为自然。如果一种强烈的、不情愿的同性恋冲动被阻挠了，这种情况是特别容易回到自恋状态的。直到现在，我都很少有机会跟大家介绍我们目前了解的爱情生活的基本情况，现在我也没机会亡羊补牢了。我只想指出一点：对一种对象的选择，这种发生在自恋阶段之后的力比多发展过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一个是自恋型 ，即选择了一个非常相似的人格来代替个人的自我；另一个是依赖型 ，即选择了那些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而又不是力比多对象的重要人物。我们同样认为，力比多对自恋型对象选择的强烈执着，造成了明显的同性恋倾向。

You will recall that in our first meeting of this semester I told you about the case of a woman who suffered from the mania of jealousy. Since we are so near the end you certainly will be glad to hear the psychoanalytic explanation of a maniacal idea. But I have less to say about it than you expect. The maniacal idea as well as the compulsion idea cannot be assailed by logical arguments or actual experience. This is explained by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the maniacal idea or the

compulsion idea, and held down by whichever is effectiv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s based upon respective localization and dynamic relations of the two conditions.

大家记得，在本学期第一节课，我举过一个患有嫉妒妄想女子的病例。由于我们的课即将结束，大家当然很愿望听到精神分析对妄想念头的解释。但是我要讲的并不如大家所期待的多。妄想念头与强迫念头一样都不能用逻辑推论或实际经验来理解。这是由于它们与潜意识的关系，这种关系既通过妄想念头或强迫念头体现出来，又被两者中的强者所压制。两者的差异是基于这两种情况各自的定位化与动态性关系。

As in paranoia, so also in melancholia, of which, moreover, very different clinical forms are described. We have discovered a point of vantage which will yield us an insight into the inner structure of the condition. We realize that the self-accusations with which these melancholic patients torture themselves in the most pitiless way, really apply to another person, namely, the sex object which they have lost, or which through some fault has lost value for them. From this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melancholic has withdrawn his libido from the object. Through a process which we designate as “narcistic identification” the object is built up within the ego itself, is, so to say, projected upon the ego. Here I can give you only a 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 as yet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topical and dynamic relations. The personal ego is now treat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abandoned object, and suffers all the aggression and expressions of revenge which were planned for the object. Even the suicidal tendencies of melancholia are more comprehensible when we consider that this bitterness of the patient falls alike on the ego itself and on the object of its love and hate. In

melancholia as well as in other narcistic conditions a feature of emotional life is strikingly shown which, since the time of Bleuler, we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designate as *ambivalence* . By this we mean that hostile and affectionate feelings are directed against one and the same person. I have, in the course of these discussions, unfortunately not been in a position to tell you more about this emotional ambivalence.

精神忧郁症与妄想狂的情况相同，但在临床上有着更多分类。我们发现了一点有利之处，可帮助我们认识这一情况的内部结构。我们发现，忧郁症患者用自我谴责极为无情地折腾自己，这种谴责实际上是指向另一个人的，也就是他们所丢失了的、或因为某些错误对他们失去价值的性对象。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抑郁者将其力比多从对象上撤走了。通过一种所谓“自恋性认同”的过程，这个对象在自我本体之中建立起来，可以说是投射在自我之上。我这里给大家的讲解只是描述性的，尚没有参考其局部及动态关系。个人的自我现在遭到了与被遗弃对象一样的对待，承受了本该在对象上发泄的所有侮辱与仇恨。甚至抑郁者的自杀倾向都更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知道，病人对自我的憎恶与对其爱恨交加的对象的憎恶一样强烈。忧郁症和其他一些自恋性情况显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情绪生活特征，我们习惯以布洛伊勒的命名称之为矛盾情绪 。它是指在同一个人身上投射了仇视和热爱的感情。很不凑巧，在我们的课程里，我无法多讲这一矛盾情绪的内容。

We have, in addition to narcistic identification, an hysterical identification as well, which moreover has been known to us for a much longer time. I wish it were possible to determine clear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Of the periodic and cyclic forms of melancholia I can tell you something that you will certainly be glad to hear, for it is possible, under favorable circumstances—I have twice had the experience—to prevent these emotional conditions

(or their antitheses) by means of analytic treatment in the free intervals between the attacks. We learn that in melancholia as well as in mania, it is a matter of finding a special way for solving the conflict, the prerequisites for which entirely coincide with those of other neuroses. You can imagine how much there still is for psychoanalysis to learn in this field.

除了自恋性认同，还有一种癔症性认同，而且我们对它的认识要早很多。我希望能明确两者的区别。关于忧郁症的周期和循环形式，我可以讲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因为，如果情况允许——我已经历过两次——是有可能通过病情发作的有效间歇期分析治疗以阻止这些情绪状况（或其反面状况）的。我们知道，治疗忧郁症和妄想症都在于发现解决冲突的特殊方法，冲突的前提条件与其他神经症是完全一致的。可以想见，精神分析在此领域中仍大有探索的空间。

I told you, too, that we hoped to gain a knowledge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ego, and of the separate factors out of which it is built by means of the analysis of narcistic conditions. In one place we have already made a beginn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maniacal delusion of being watched we concluded that in the ego there is really an agent which continually watches, criticizes and compares the other part of the ego and thus opposes it. We believe that the patient imparts to us a truth that is not yet sufficiently appreciated, when he complains that all his actions are spied upon and watched, all his thoughts recorded and criticized. He errs only in transferring this distressing force to something alien, outside of himself. He feels the dominance of a factor in his ego, which compares his actual ego and all of its activities to an *ideal ego* that he has created in the course of his development. We also believe that the creation of this ideal ego took place with the purpose of

again establishing that self-satisfaction which is bound up with the original infantile narcism, but which since then has experienced so many disturbances and disparagements. In this self-observing agent we recognize the ego-censor, the conscience; it is the same factor which at night exercises dream-censorship, and which creates the suppressions against inadmissible wish-impulses. Under analysis in the maniacal delusion of being watched it reveals its origin in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tutor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go with certain of these model individuals.

我还告诉过大家，我们希望通过对自恋性情况的分析，来认识自我的结构及其赖以形成的各个独立因素。我们已经在某处起步了。通过对窥视妄想的分析，我们推断，其实在自我之中有一股力量始终在监视、批评和比较着自我的其余部分，以此反抗着自我。我们认为，当病人抱怨说自己的一切行动都遭到窥探和监视，一切想法都遭到记录与批评时，他们传达的真相未得到充分理解。他们只是错误地把这个烦人的势力转移到了自己身外的陌生事物上。他们感觉到自我中一种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它把真实的自我及其所有活动与本人在成长过程中创造的理想自我 相比。我们还认为，与最初的婴儿型自恋紧密相关的自我满足在此后经历了种种干扰与贬抑，为了再次实现这种自我满足，这种理想的自我便应运而生。在这种监视自我的力量中，我们发现了自我的审查者，或称良知，它也是在夜晚实施梦境审查、针对禁忌的愿望冲动制造压抑的同一因素。分析窥视妄想可以发现，它的起源在于父母、老师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对一些榜样的自我认同感。

These are some of the conclusions which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analysis to narcistic conditions has yielded us. They are certainly all too few, and they often lack that accuracy which can only be acquired in a new field with the attainment of absolute

familiarity. We owe them all to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ego-libido or narcistic libido, by the aid of which we have extended to narcistic neuroses those observations which were confirmed in the transference neuroses. But now you will ask, is it possible for us to succeed in subordinating all the disturbances of narcistic conditions and the psychoses to the libido theory in such a way that in every case we recognize the libidinous factor of psychic life as the cause of the malady, and never make an abnormality i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instincts of self-preservation answerable?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conclusion does not seem urgent to me, and above all not ripe for decision. We can best leave it calmly to the progress of the science. I should not b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the power to exert a pathogenic influence is really an exclusive prerogative of the libidinous impulses, and that the libido theory will celebrate its triumphs along the whole line from the simplest true neurosis to the most difficult psychotic derangement of the individual. For we know it to be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libido that it is continually struggling against subordinating itself to the realities of the world. But I consider it most probable that the ego instincts are indirectly swept along by the pathogenic excitations of the libido and forced into a functional disturbance. Moreover, I cannot see any defeat for our trend of investigation when we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admission that in difficult psychoses the ego impulses themselves are fundamentally led astray; the future will teach us—or at least it will teach you. Let me return for one moment more to fear, in order to eliminate one last ambiguity that we have left. We have said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fear and the libido, which in other respects seems clearly defined, does not fit in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in the face of danger real fear should become the expression of the instinct of self-preservation. This, however, can hardly be doubted. But suppose the emotion of fear is not contested by the egoistic ego impulse, but rather by the ego-

libido? The condition of fear is in all cases purposeless and its lack of purpose is obvious when it reaches a higher level. It then disturbs the action, be it flight or defense, which alone is purposeful, and which serves the ends of self-preservation. If we accredit the emotional component of actual fear to the ego-libido, and the accompanying activity to the egoistic instinct to self-preservation, we have overcome every theoretical difficulty. Furthermore, you do not really believe that we flee *because* we experience fear? On the contrary, we first are afraid *and then* take to flight from the same motive that is awakened by the realization of danger. Men who have survived the endangering of their lives tell us that they were not at all afraid, they only acted. They turned the weapon against the wild animal, and that was in fact the most purposeful thing to do.

这就是精神分析应用于自恋性情况的几个结论。它们当然并不丰富，也常有失精确，这只有在完全熟悉一个新领域之后才有可能补足。我们都将希望寄托在自我力比多或自恋性力比多观念的应用上，在这些观念的帮助下，我们把在移情类神经症中确认的观察结果拓展到了自恋型神经症中。但现在大家会问，我们是否有可能做到：将所有自恋性情况和心理失调都归结在力比多理论之下，这样每个病例的起因都可以认定为心理生活的力比多因素，而不是自我保护本能运行的反常？女士们、先生们，依我看，不用急着下这个结论，更重要的是，确定它的时机还不成熟。我们最好静待科学的进步来加以完善。要是发现致病的影响力专属于力比多冲动，或者，从最简单的真性神经症一直到最复杂的个人精神错乱，力比多理论要是最终全面获胜的话，我是不以为奇的。因为我们知道力比多的一个特征是，它永远都在抗拒着现实生活的支配。但是我觉得，自我本能极有可能也被力比多的致病性刺激间接影响，被迫陷入了功能紊乱。而且，要是我们承认在精神病重症中自我冲动本身识入歧途了，我也不觉得我们的研究方向有什么错误，未来对我们（至少对你们）将做出交待。我回头再

讲一下恐惧的问题，消除最后残余的一个误区。我们说过，恐惧与力比多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方面似乎很明确，但却不符合“面对危险时，真实恐惧应为自保本能的表示”这一假定。但是，这是无可非议的。设若与恐惧情绪抵触的，不是自我冲动，而是自我力比多呢？恐惧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没有意义的，当它升级后，其无意义性更为显见。如果我们将真实恐惧的情绪成分归因于自我——力比多，将其伴随的活动归因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那么一切理论难题都迎刃而解了。再有，大家不会真的相信逃跑是因为　恐惧吧？相反，我们先是害怕，然后逃跑，两者的动机都是意识到了危险。大难不死的人们会告诉我们，他们从未害怕过，只是采取行动。他们用武器向野兽瞄准，这实际上是最有意义的行动。

Twenty-Seventh Lecture Transference

第二十七讲 移情现象

We are nearing the close of our discussions, and you probably cherish certain expectations, which shall not be disappointed. You think, I suppose, that I have not guided you through thick and thin of psychoanalytic subject matter to dismiss you without a word about therapy, which furnishes the only possibility of carrying on psychoanalysis. I cannot possibly omit this subject, for the observation of some of its aspects will teach you a new fact, without wh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s we have examined would be most incomplete.

我们的课程不久就要结束了，大家也许会有一些期待，而且应该不至于失望。我猜想，大家觉得我带领大家概览了精神分析学，最后却对治疗只字不提，而治疗是精神分析实践的唯一可能途径。我不可能忘记这个问题，因为研究其中一些方面会教会大家一个新的事实，对神经症疾病的理解缺了它是不完整的。

I know that you do not expect any guidance in the technique of practising analysis for therapeutic purposes. You wish to know only along what general lines psychoanalytic therapy works and approximately what it accomplishes. And you have an undeniable right to know this. I shall not actually tell you, however, but shall insist that you guess it yourselves.

我知道，大家并不奢望在治疗方法上获得实用分析技术的指导。大家只是希望了解精神分析治疗的基本实践规则，以及它的大致成果。不可否认，大家有权知道这一点。不过，其实我不会告诉大家，而会坚持让大家自行猜想。

Only think! You know everything essential, from the conditions which precipitate the illness to all the factors at work within. Where is there room for therapeutic influence?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is hereditary disposition; we do not speak of it often because it is strongly emphasized from another quarter, and we have nothing new to say about it. But do not think that we underestimate it. Just because we are therapeutists, we feel its power distinctly. At any rate, we cannot change it; it is a given fact which erects a barrier to our efforts. In the second place, there is the influence of the early experiences of childhood, which are in the habit of becoming sharply emphasized under analysis; they belong to the past and we cannot undo them. And then everything that we include in the term “actual forbearance”—misfortunes of life out of which privations of love arise, poverty, family discord, unfortunate choice in marriage, unfavorable social conditions and the severity of moral claims. These would certainly offer a foothold for very effectual therapy. But it would have to be the kind of therapy which, according to the Viennese folk-tale, Emperor Joseph practiced: the beneficial interference of a potentate, before whose will men bow and difficulties vanish. But who are we, to include such charity in the methods of our therapy? Poor as we are, powerless in society, forced to earn our living by practicing medicine, we are not even in a position to treat free of charge those patients who are unable to pay, as physicians who employ other methods of treatment can do. Our therapy is too long drawn-out, too extended for that. But perhaps you are still holding to one of the factors already

mentioned, and think that you have found a factor through which our influence may be effective. If the restrictions of morality which are imposed by society have a share in the privation forced upon the patient, treatment might give him the courage, or possibly even the prescription itself, to cross these barriers, might tell him how gratification and health can be secured in the renunciation of that ideal which society has held up to us but often disregards. One grows healthy then, by giving one's sexuality full reign. Such analytic treatment, however, would be darkened by a shadow; it does not serve our recognized morality. The gain to the individual is a loss to society.

只要想一想！从致病条件到所有相关因素，大家已经掌握了所有关键知识。治疗可影响的范围在哪里？首先，关于遗传倾向，我们不常提到它是因为其他学科领域已对它强调得够多了，我们的说法并无新意。但不要以为我们不重视它。只因为我们是分析治疗师，我们对它的作用有不同的感受。无论如何，我们无法改变它，它是妨碍我们努力的一个既定事实。其次，关于童年早期经历的作用，精神分析常对它们高度重视，它们属于过去，而我们无法改变往事。还有，所有被称为“现实压抑”的事情——生活的不幸所导致的缺爱、贫困、家庭失和、婚姻不幸、社交失利以及道德重压。这些肯定是高效治疗的依据。但是这样的治疗只能是像维也纳民间故事中约瑟夫大帝实施的治疗：在君主的仁慈关怀下，所有人都感恩戴德，遇难呈祥。但是我们算什么，我们的治疗方法中如何能有此种慈悲？我们清贫而卑微，迫于生计而行医，我们甚至不能为无钱看病的病人免费治疗，而施用其他疗法的医生则有能力行善。我们的疗程耗时过长，牵涉面太广，无法免费。但是大家或许还会坚信前面提到的某一因素，认为我们通过这个因素能对病人起一定的疗效。如果社会施行的道德规范是病人痛苦的源泉之一，治疗可给予其克服障碍的勇气，甚至可能提供治病良方，使其认识到，若能放下社会强加于我们而人们又时常漠视的那些理想要求，病人将获得怎样的满足与健康。只有完全的性自由，才能

有健康的人生。然而，这种分析治疗却会蒙上阴影，它不符合社会认可的道德准则。病人获益，则社会受害。

But, ladies and gentlemen, who has misinformed you to this degree?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the advice to give one's sexuality full reign can play a part in analytic therapy, if only from the circumstance we have ourselves described, that there is going on within the patient a bitter conflict between libidinous impulse and sexual suppression, between sensual and ascetic tendencies. This conflict is not abolished by giving one of these tendencies the victory over its opponent. We see that in the case of the nervous, asceticism has retained the upper hand.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is that the suppressed sexual desire gains breathing space by the development of symptoms. If, on the other hand, we were to give the victory to sexuality, symptoms would have to replace the sexual suppression, which has been pushed aside. Neither of the two decisions can end the inner conflict, one part always remains unsatisfied. There are only a few cases wherein the conflict is so labile, that a factor such as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physician could be decisive, and these cases really require no analytic treatment. Persons who can be so much influenced by a physician would have found some solution without him. You know that when an abstinent young man decides upon illegitimate sex-intercourse, or when an unsatisfied woman seeks compensation from another man, they have generally not waited for the permission of a physician, far less of an analyst, to do this.

但是，女士们、先生们，是谁误导各位到这步田地？无法想象，只要出现我们提过的情况，即病人的力比多冲动与性压抑、性欲与禁欲之间存在着激烈冲突，分析治疗就可以鼓励病人追求完全的性自

由。帮助冲突中的一种倾向胜过其对立方，冲突并不会消失。我们看到，在神经症的情况中，禁欲倾向占了上风。其结果是，被压抑的性欲通过症状发展获得了喘息空间。另一方面，如果让性冲动获胜，则被忽略的性压抑必然被症状取代。这两种结局都不能使病人内心的冲突终结，总有一方是仍然得不到满足的。只有少数病例中的冲突极不稳定，类似医生介入的影响因素可以起到决定作用，这些病例其实用不着分析治疗。容易深受医生影响的人，不靠医生也能找到解决之道。大家知道，要是一个清心寡欲的男青年决定寻花问柳，一个性事不足的女子决定红杏出墙，他们一般都不用等到医生批准，更不用说分析治疗师了。

In studying the situation, one essential point is generally overlooked, that the pathogenic conflict of the neurotic must not be confused with normal struggles between psychic impulses of which all have their root in the same psychological soil. The neurotic struggle is a strife of forces, one of which has attained the level of the fore-conscious and the conscious, while the other has been held back in the unconscious stage. That is why the conflict can have no outcome; the struggling parties approach each other as little as in the well-known instance of the polar-bear and the whale. A real decision can be reached only if both meet on the same ground. To accomplish this is, I believe, the sole task of therapy.

在研究这种情况时，有一个要点被普遍忽略了：神经症病人的致病冲突，一定不能与植根于同一心理土壤的心理冲动之间的一般斗争混为一谈。神经症的冲突是两大势力的纷争，其中一个已经到达前意识和意识领域，另一个还滞留在潜意识阶段。这就导致该冲突永无宁日，冲突双方正如世人皆知的北极熊与鲸鱼之间一样遥不可及。只有两者进入相同区间，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我相信这就是治疗的唯一使命。

Moreover, I assure you that you are misinformed if you assume that advice and guidance in the affairs of lif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analytic influence. On the contrary, we reject this role of the mentor as far as possible. Above all, we wish to attain independent decisions on the part of the patient. With this intention in mind, we require him to postpone all vital resolutions such as choice of a career, marriage or divorce, until the close of the treatment. You must confess that this is not what you had imagined. It is only in the case of certain very young or entirely helpless persons that we cannot insist upon the desired limitation. Here we must combine the function of physician and educator; we are well aware of the responsibility and behave with the necessary precaution.

而且，如果大家以为分析治疗必须包括生活建议和指南，我肯定大家想错了。相反，我们要尽可能拒绝担当人生导师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病人能独立作出决定。有此意图在心，我们会要求病人在治疗结束之后，再做出所有重要决定，比如职业选择、结婚抑或离婚。大家必须承认，这与你们原先的想象不符。只有对一些年纪极轻或完全无力自主的病人，我们才不能按照预想坚持设限。这时我们必须身兼医教两职，我们完全明白自身责任重大，必然要慎重行事。

Judging from the zeal with which I defend myself against the accusation that analytic treatment urges the nervous person to give his sexuality full reign, you must not gather that we influence him for the benefit of conventional morality. We are just as far removed from that. We are no reformers, it is true, only observers, but we cannot help observing with critical eyes, and we have found it impossible to take the part of conventional sex morality, or to estimate highly the way in which society has tried to regulate the

problems of sexual life in practice. We can prove to society mathematically that its code of ethics has exacted more sacrifices than is its worth, and that its procedure rests neither on veracity nor wisdom. We cannot spare our patients the task of listening to this criticism. We accustom them to weigh sexual matters, as well as others, without prejudice; and wh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cure, they have become independent and choose some intermediate course between unrestrained sexuality and asceticism, our conscience is not burdened by the consequences. We tell ourselves: whoever has been successfully educated in being true to himself is permanently protected against the danger of immorality, even if his moral standard diverges from that of society. Let us, moreover, be careful not to ov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oblem of abstinence with respect to its influence on neuroses. Only the minority of pathogenic situations of forbearance, with a subsequent condition of pent-up libido, can be resolved without more ado by such sexual intercourse as can be procured with little trouble.

大家不要因为我极力反对“分析治疗鼓励神经症患者追求完全的性自由”的误解，就误认为我们希望病人恪守传统道德规范。我们同样也不赞成这样的做法。诚然，我们是研究者而不是改革派，但我们禁不住会带着批判目光去研究，我们反对固守传统性道德，也反对过度重视社会约束性生活问题的实际意义。只要计算一下，我们就能向社会证明，它的道德规范造成的牺牲大于其价值，而且其实施方法既无诚意，又不灵活。对于病人，了解这一弊端是他们不能省掉的功课。我们要使他们习惯于在衡量性的问题上与其他问题一视同仁，当病人治愈后独立自主地选择了既不纵欲也不禁欲的中间道路，我们对这些后果就不会有良心上的不安。我们告诉自己：成功受教而懂得真实面对自我的人，永远不会为道德禁锢所害，即便他们的个人道德标准与社会标准有异。而且，我们不要过于看重禁欲问题对于神经症的影响作用。只有少数因剥夺（即生活不幸）和相应的力比多积压等致

病的情况，才能通过不难获得的性爱轻松解决问题。

And so you cannot explain the therapeutic influence of psychoanalysis by saying that it simply recommends giving full sway to sexuality. You must seek another solution. I think that while I was refuting this supposition of yours, one of my remarks put you on the right track. Our usefulness consists in replacing the unconscious by the conscious, in translating the unconscious into the conscious. You are right; that is exactly it. By projecting the unconscious into the conscious, we do away with suppressions, we remove conditions of symptom formation and transform a pathogenic into a normal conflict which can be decided in some way or other. This is the only psychic change we produce in our patients; its extent is the extent of our helpfulness. Wherever no suppression and no analogous psychic process can be undone, there is no place for our therapy.

所以，大家在解释精神分析的治疗作用时，不可以说它只是提倡性的充分放纵。我们必须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在我回应大家的这一假定时，其中一句话已经为大家指明了道路。我们的作用在于用意识替代潜意识，在于将潜意识转换成意识。没错，这就是关键。通过将潜意识投射到意识之中，我们就消除了压抑作用，移除了症状形成的条件，将致病的冲突转变为总能解决的一般冲突。这就是我们使病人完成的唯一心理变化，至于它的效果就看我们的能力了。如果没有可以消除的压抑作用或类似的心理过程，我们的治疗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We can express the aim of our efforts by various formulae of rendering the unconscious conscious, removing suppressions, filling

out amnestic gaps—it all amounts to the same thing. But perhaps this admission does not satisfy you. You imagined that when a nervous person became cured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happened, that after having been subjected to the laborious process of psychoanalysis, he was transformed into a different human being. And now I tell you that the entire result is only that he has a little less of the unconscious, a little more of the conscious within him. Well, you probably und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such an inner change. The person cured of neurosis has really become another human being. Fundamentally, of course, he has remained the same. That is to say, he has only become what he might have been under the most favorable conditions. But that is saying a great deal. When you learn all that has to be done, the effort required to effect apparently so slight a change in psychic life, the significance of such a difference in the psychic realm will be credible to you.

我们的努力目标可用各种程式表示：潜意识转为意识、移除压抑作用、填补记忆空缺，它们都殊途同归。不过这一说法未必会使大家满意。大家想象着，当神经症患者病情痊愈时会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情：在经历了劳心劳力的精神分析过程之后，病人被改造成了另一个人。现在我告诉大家，整个治疗结果只是患者的潜意识减少而意识增多了。是的，也许大家会小看这种内心转变的重要意义。神经症治愈后的人实际上是焕然一新了。当然，他们本质上还是同一个人。这就是说，他们只是成为了最好情况下的自己。但这已经相当成功了。当大家了解了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引起心理生活中的这一个细微变化，那么大家对心理王国中这一改变的意义就深信不疑了。

I shall digress for a moment to ask whether you know what is meant by a causal therapy? This name is given to the procedure which does not take the manifestations of disease for its point of

departure, but seeks to remove the causes of disease. Is our psychoanalytical therapy causal or not? The answer is not simple, but perhaps it will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of convincing ourselves that this point of departure is comparatively fruitless. In so far as analytical therapy does not concern itself immediately with the removal of symptoms, it may be termed causal. Yet in another respect, you might say this would hardly follow. For we have followed the causal chain back far beyond the suppressions to the instinctive tendencies and their relative intensity as given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atient, and finally the nature of the digression in the abnormal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Assume for a moment that it were possible to influence these functions chemically, to increase or to decrease the quantity of the libido that happens to be present, to strengthen one impulse at the expense of another. This would be causal therapy in its true sense and our analysis would have furnished the indispensable preparatory work of reconnaissance. You know that there is as yet no possibility of so influencing the processes of the libido. Our psychic therapy interposes elsewhere, not exactly at those sources of the phenomena which have been disclosed to us, but sufficiently far beyond the symptoms, at an opening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disease which has become accessible to us by means of peculiar conditions.

我稍微打个岔，问一下大家是否知道病因治疗法是什么意思？这个名称指的是不以病症表现为出发点，而寻求去除病因的治疗过程。我们精神分析治疗属于病因治疗吗？答案一言难尽，但它或可使我们有机会相信，这种问题的出发点是毫无意义的。只要分析治疗不涉及直接去除症状，它都可称为病因治疗。但在其他方面这也许很难吻合。因为，我们在病因链条上进行追踪，我们的发现远超压抑，直至本能倾向及病人体质赋予的本能强度，最终发现了这一反常发展过程的退化本质。我们暂时假设可以用化学方法影响这些功能，增加或减

少现存力比多的量，损失一个冲动以增强另一个冲动。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病因治疗，我们的精神分析就能为原因侦察提供必不可少的预备工作了。大家知道，现在还没有这样影响力比多进程的可能。我们的心理治疗适用在其他地方，并不是那些已知现象的来源，而是远在症状之外，在病症结构的某一缺口上，我们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接近它。

What must we do in order to replace the unconscious by the conscious in our patient? At one time we thought this was quite simple, that all we had to do was to reconstruct the unconscious and then tell the patient about it. But we already know this was a shortsighted error. Our knowledge of the unconscious has not the same value as his; if we communicate our knowledge to him it will not stand *in place of* the unconscious within him, but will exist *beside* it, and only a very small change will have been effected. We must rather think of the unconscious as *localized* , and must seek it in memory at the point where it came into existence by means of a suppression. This suppression must be removed before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conscious for the unconscious can be successfully effected. How can such a suppression be removed? Here our task enters a second phase. First to find the suppression, then to remove the resistance by which this suppression is maintained.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把病人的潜意识替换为意识？我们一度以为很简单，只需重建这一潜意识，然后把它传达给病人即可。但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错误。我们与病人关于潜意识的认知并不具有等同作用，如果我们用自己的认知告知病人，它并不会代替 他们心中的潜意识，而只会与之共存 ，只能产生极小的变化。我们必须要把潜意识看成是被定位的 ，必须在病人记忆中寻找它在压抑作用下出现的位置。这一压抑必须被移除，潜意识才有可能成功被意识取代。

如何移除这种压抑？这是我们分析任务的第二阶段。先是要发现压抑作用，然后要消除该压抑赖以存续的抗力。

How can we do away with resistance? In the same way—by reconstructing it and confronting the patient with it. For resistance arises from suppression, from the very suppression which we are trying to break up, or from an earlier one.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counter-attack that was instigated to suppress the offensive impulse. And so now we do the very thing we intended at the outset: interpret, reconstruct, communicate—but now we do it in the right place. The counter-seizure of the idea or resistance is not part of the unconscious but of the ego, which is our fellow-worker. This holds true even if resistance is not conscious. We know that the difficulty arises from the ambiguity of the word “unconscious,” which may connote either a phenomenon or a system. That seems very difficult, but it is only a repetition, isn't it? We were prepared for it a long time ago. We expect resistance to be relinquished, the counter-siege to collapse, when our interpretation has enabled the ego to recognize it. With what impulses are we able to work in such a case? In the first place, the patient's desire to become well, which has led him to accommodate himself to cooperate with us in the task of the cure;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help of his intelligence,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interpretation we offer him. There is no doubt that after we have made clear to him what he may expect, the patient's intelligence can identify resistances, and find their translation into the suppressions more readily. If I say to you, “Look up into the sky, you can see a balloon there,” you will find it more readily than if I had just asked you to look up to see whether you could discover anything. And unless the student who for the first time works with a microscope is told by his teacher what he may look for, he will not see anything, even if it is present and quite

visible.

我们如果去除抵抗力？方法是一样的——重建它，并使病人面对它。因为抵抗始于压抑，或正是我们试图破除的压抑，或是早前的压抑。它在一种反攻行动（被调动来压抑唐突的冲动）中得到确立。所以现在我们要做最初打算的工作：解释、重建、沟通——但我们现在做的时机是对的。对念头的反攻或抵抗不属于潜意识而属于自我，它是我们的工作伙伴。即便抵抗不是有意识的，这也是可行的。我们知道，“潜意识”一词既可表达一种现象、又可表达一种体系，它的歧义会导致麻烦。这看似很困难，但是只是旧话重提，不是吗？我们在很久前就有准备了。当我们的解释使得自我有所觉悟时，抵抗消除、反攻溃败就指日可待了。我们在这种病例中要利用什么样的冲动？首先是病人希望康复的意愿，这使得他们能进行自我调适以配合我们的治疗任务；其次是病人理智的帮助，它通过我们提供给他们的解释得到支持。毫无疑问，当我们清楚地告知病人可能的结果，他们的理智能够辨别出抵抗，更容易将它们解译为压抑。如果我跟大家说：“抬头看天，你会看到那儿有一个气球”，比起我让大家抬头看看有何发现，大家会更容易找到气球。对于首次使用望远镜的学生，除非老师告诉他们要找的东西，即使它就在眼前而且相当显眼，他们也看不出任何东西。

And now for the fact! In a large number of forms of nervous illness, in hysteria, conditions of anxiety and compulsion neuroses, one hypothesis is correct. By finding the suppression, revealing resistance, interpreting the thing suppressed, we really succeed in solving the problem, in overcoming resistance, in removing suppression, in transforming the unconscious into the conscious. While doing this we gain the clearest impression of the violent struggle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patient's soul for the subjugation of resistance—a normal psychological struggle, in one psychic sphere

between the motives that wish to maintain the counter-siege and those which are willing to give it up. The former are the old motives that at one time effected suppression; among the latter are those that have recently entered the conflict, to decide it, we trust, in the sense we favor. We have succeeded in reviving the old conflict of the suppression, in reopening the case that had already been decided. The new material we contribute consists in the first place of the warning, that the former 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had led to illness, and the promise that another will pave the way to health; secondly, the powerful change of all conditions since the time of that first rejection. At that time the ego had been weak, infantile and may have had reason to denounce the claims of the libido as if they were dangerous. Today it is strong, experienced and is supported by the assistance of the physician. And so we may expect to guide the revived conflict to a better issue than a suppression, and in hysteria, fear and compulsion neuroses, as I have said before, success justifies our claims.

现在讲讲事实吧！在许多种神经症中，如癔症、焦虑状况和强迫型神经症中，有一个假说是正确的。通过发现压抑作用，揭露出抵抗力并解释被压抑的因素，我们其实就成功地解决了问题：克服了抵抗，去除了压抑，将潜意识转变成意识了。我们在如此进行的同时，十分清楚地感觉到患者为了压制抵抗而发生激烈的内心交战——这是一种普通的心理斗争，双方是属于同一心理领域的两种动机，一种是维持反攻行动的愿望，一种是放弃它的愿望。前者是曾经引发压抑的那些旧动机，后者是那些新加入战斗的动机，我们相信，它们将以我们乐见的方式解决这个冲突。我们成功复活了以往压抑的冲突，重启了已被解决的矛盾。我们贡献的新情况，首先是提示以前解决冲突的方式导致了病症，并承诺新的解决方案将是康复之道；其次是，使第一次压抑以来的所有情况大有改观。当时自我薄弱而幼稚，理所当然会将力比多的需求视为危险而贬斥。而现在它已经强大且经验老道，

同时得到医生的助力支持。这样我们就可望将复活的冲突引导到比压抑作用更为理想的方向，而且我以前说过，在癔症、恐惧以及强迫型神经症中的成功案例证实了我们的主张。

There are other forms of illness, however, in which our therapeutic procedure never is successful, even though the causal conditions are similar. Though this may be characterized topically in a different way, in them there was also an original conflict between the ego and libido, which led to suppression. Here, too, it is possible to discover the occasions when suppressions occurred in the life of the patient. We employ the same procedure, are prepared to furnish the same promises, give the same kind of help. We again present to the patient the connections we expect him to discover, and we have in our favor the same interval in time between the treatment and these suppressions favoring a 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yet in spite of these conditions,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he resistance, or to remove the suppression. These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paranoia, melancholia, and dementia praecox, remain untouched on the whole, and proof against psychoanalytic therapy. What is the reason for this? It is not lack of intelligence; we require, of course, a certain amount of intellectual ability in our patients; but those suffering from paranoia, for instance, who effect such subtle combinations of facts, certainly are not in want of it. Nor can we say that other motive forces are lacking.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melancholia, in contrast to those afflicted with paranoia, are profoundly conscious of being ill, of suffering greatly, but they are not more accessible. Here we are confronted with a fact we do not understand, which bids us doubt if we have really understood all the conditions of success in other neuroses.

然而，在其他类型的神经症中，尽管其病因情况类似，但我们的治疗方法从未成功过。虽说这可归为另一类话题，但在它们之中也有一个自我与力比多之间的原始冲突，从而导致了压抑。这里也可能会发现患者生活中发生压抑的时间点。我们使用相同的手法，准备作出相同的承诺，给予相同的帮助。我们也告知病人我们希望其发现怎样的联系，同时在压抑与治疗之间同样设置着有效间歇，有助于我们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没能够克服抵抗，或去除压抑。这些妄想狂、忧郁症和早发性痴呆患者，整体而言仍无法医治，证明精神分析疗法对他们是无效的。这是为什么？不是因为病人有智力缺陷，我们对病人的智力肯定是有一定要求的；但是，比如那些妄想狂患者，他们能将事实作出如此绝妙联想，当然是不乏智力的。我们也不能说其他动机力量有所欠缺。与妄想狂患者相比，忧郁症患者对自己的病有深刻察觉，也非常痛苦，但是他们并非更加容易理解。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也使我们怀疑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其他神经症治疗成功的条件。

In the further consideration of our dealings with hysterical and compulsion neurotics we soon meet with a second fact, for which we were not at all prepared. After a while we notice that these patients behave toward us in a very peculiar way. We thought that we had accounted for all the motive forces that could come into play, that we had rationaliz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atient and ourselves until it could be as readily surveyed as an example in arithmetic, and yet some force begins to make itself felt that we had not considered in our calculations. This unexpected something is highly variable. I shall first describe those of its manifestations which occur frequently and are easy to understand.

进一步考虑我们处理癔症和强迫型神经症的情况之后，我们又毫无防备地碰到了另一个事实。治疗开始不久，我们就注意到这些病人

对我们的反应很特别。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考虑了所有发挥作用的动机力量，恰当处理了病人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使其像算术例题一样经得起推敲，但仍有一些我们预料之外的力量显现了出来。这一意外事物变化多端。我先描述其中一个频繁发生的现象：

We see our patient, who should be occupying himself only with finding a way out of his painful conflicts, becom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the person of the physician. Everything connected with this person is more important to him than his own affairs and diverts him from his illness. Dealings with him are very pleasant for the time being. He is especially cordial, seeks to show his gratitude wherever he can, and manifests refinements and merits of character that we hardly had expected to find. The physician forms a very favorable opinion of the patient and praises the happy chance that permitted him to render assistance to so admirable a personality. If the physician has the opportunity of speaking to the relatives of the patient he hears with pleasure that this esteem is returned. At home the patient never tires of praising the physician, of prizing advantages which he constantly discovers. “He adores you, he trusts you blindly, everything you say is a revelation to him,” the relatives say. Here and there one of the chorus observes more keenly and remarks, “It is a positive bore to hear him talk, he speaks only of you; you are his only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我们发现，本该想方设法结束自身痛苦冲突的病人开始对医生本人产生特别的兴趣。与医生个人有关的一切事情比自己的事还重要，对自己的病情却心不在焉。这个时期与病人打交道很愉快。他们非常和气，总是抱有感恩之情，意外表现出彬彬有礼的风格。医生对病人大有好感，对他们突然如此可亲赞赏有加。如果医生有机会与病人家属交谈，会高兴地得知病人对医生同样非常称许。病人在家中对医生

赞不绝口，对不断发现的优点赞叹不已。“他钦佩您，对您信任之至，您的每句话都使他茅塞顿开。”家属说道。附和者之中总有明眼人会说：“听他说话实在会生厌，他的口中只有您，您是他谈话的唯一主题。”

Let us hope that the physician is modest enough to ascribe the patient's estimation of his personality to the encouragement that has been offered him and to the widening of his intellectual horizon through the astounding and liberating revelations which the cure entails. Under these conditions analysis progressed splendidly. The patient understands every suggestion, he concentrates on the problems that the treatment requires him to solve, reminiscences and ideas flood his mind. The physician is surprised by the certainty and depth of these interpretations and notices with satisfaction how willingly the sick man receives the new psychological facts which are so hotly contested by the healthy persons in the world outside. An objective improvement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 universally admitted, goes hand in hand with this harmonious relation of the physician to the patient under analysis.

我们希望，医生比较谦逊，而将病人对其人品的激赏归因于，他们给了病人鼓励，以及病人接受治疗之后恍然大悟，心智因此豁然开朗。如果是这些情况，则分析治疗的进展是非常理想的。病人对所有提示都心领神会，全力对付治疗要求解决的问题，心中的回忆和念头层出不穷。医生既对这些解释和信息的确定和深刻感到惊讶，又对病人心悦诚服接受外界健康人强烈谴责的心理学新知感到满意。普遍的的看法是，病人情况的客观改善，与分析治疗中的和谐医患关系是须臾不可分的。

But we cannot always expect to have fair weather. There comes a day when the storm breaks. Difficulties turn up in the treatment. The patient asserts that he can think of nothing more. We are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he is no longer interested in the work, that he lightly passes over the injunction that, heedless of any critical impulse, he must say everything that comes to his mind. He behaves as though he were not under treatment, as though he had closed no agreement with the physician; he is clearly obsessed by something he does not wish to divulge. This is a situation which endangers the success of the treatment. We are distinctly confronted with a tremendous resistance. What can have happened?

但天气并不总是尽如人意。或有一天，暴风雨终将来临。治疗会发生困难。病人坚称再想不出任何事情。我们感到他们对分析工作不再感兴趣，对于“克制任何批判冲动，说出心里冒出的任何念头”的告诫，他们也轻飘飘地不予理睬。病人的举动不像是在接受治疗，好像从未与医生有过约定，明显心思重重却又不愿坦白。我们遭遇了一种强力抵抗。可能发生了什么？

Provided we are able once more to clarify the situation, we recognize the cause of the disturbance to have been intense affectionate emotions, which the patient has transferred to the physician. This is certainly not justified either by the behavior of the physician or by the relations the treatment has created. The way in which this affection is manifested and the goals it strives for will depend on the personal affiliations of the two parties involved. When we have here a young girl and a man who is still young we receive the impression of normal love. We find it quite natural that a girl should fall in love with a man with whom she is alone a great deal, with whom she discusses intimate matters, who appears to her

in the advantageous light of a beneficent adviser. In this we probably overlook the fact that in a neurotic girl we should rather presuppose a derangement in her capacity to love. The more the personal relations of physician and patient diverge from this hypothetical case, the more are we puzzled to find the same emotional relation over and over again. We can understand that a young woman, unhappy in her marriage, develops a serious passion for her physician, who is still free; that she is ready to seek divorce in order to belong to him, or even does not hesitate to enter into a secret love affair, in case the conventional obstacles loom too large. Similar things are known to occur outside of psychoanalysi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however, we are surprised to hear women and girls make remarks that reveal a certain attitude toward the problems of the cure. They always knew that love alone could cure them, an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ir treatment they anticipated that this relationship would yield them what life had denied. This hope alone has spurred them on to exert themselves during the treatments, to overcome all the difficulties in communicating their disclosures. We add on our own account —“and to understand so easily everything that is generally most difficult to believe.” But we are amazed by such a confession; it upsets our calculations completely. Can it be that we have omitted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rom our hypothesis?

假设我们能再次搞清状况，我们会发现这次干扰的原因是病人已经转移到医生身上的强烈情愫。无论是医生的行为，还是治疗导致的医患关系，都不是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这种情感的表达方式和努力方向取决于双方的个人关系。如果一方是妙龄女子，一方是少壮青年，我们则会嗅出正常恋爱的味道。我们觉得，如果一男一女经常共处一室，且她与他谈论体己私事，视他为助人为乐的善人，那她会爱上他也属自然。在这里，我们大概忽略了一个事实：患神经症的女

子，恋爱行为能力是错乱的。医患个人关系与这一设定情况越不相同，则反复出现的同样情愫就越是令人困惑不解。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婚姻不幸的年轻女子会对她的单身男医生产生迷恋，为了跟他在一起愿意离婚，或者如果传统观念阻碍过大，她也会毫不犹疑地与他发生地下婚外情。我们知道在精神分析之外也有类似现象发生。但是，在这些情况中，我们从女患者的话中惊讶地获知她们对于治愈问题的某种态度。她们一直知道，单凭爱就能够治愈她们，所以从治疗一开始就期待与医生的关系有所发展，弥补自己生活中的缺憾。这种期待足以促使她们积极投入治疗，克服障碍，吐露心思。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对一般很难理解的事情都能轻易理解”。但这种坦白令我们讶异，我们的算盘全被打乱了。我们的理论假说是不是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And really, the more experience we gain, the less we can deny this correction, which shames our knowledge. The first few times we could still believe that the analytic cure had met with an accidental interruption, not inherent to its purpose. But when this affectionate relation between physician and patient occurs regularly in every new case, under the most un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even under grotesque circumstances; when it occurs in the case of the elderly woman, and is directed toward the grey-beard, or to one in whom, according to our judgment, no seductive attractions exist, we must abandon the idea of an accidental interruption, and realize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a phenomenon which is closely interwoven with the nature of the illness.

事实上，我们的经验越丰富，就越不能否认这种令我们的知识蒙羞的偏差。刚开始几次，我们还能以为是分析治疗遭遇了与目标不符的暂时阻碍。但是在每一个新病例中，即使在极为不利乃至怪异的情况下，这种医患恋情都频频发生，比如年长女士恋上胡须花白的长

者，甚至爱上按照常理无任何魅力可言的人。这样我们只得放弃偶然阻碍的判断，并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是与病症本质密切相关的现象。

The new fact which we recognize unwillingly is termed *transference* . We mean a transference of emotions to the person of the physician, because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situation of the cure justifies the genesis of such feelings. We rather surmise that this readiness toward emotion originated elsewhere, that it was prepared within the patient, and that the opportunity given by analytic treatment caused it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person of the physician. Transference may occur as a stormy demand for love or in a more moderate form; in place of the desire to be his mistress, the young girl may wish to be adopted as the favored daughter of the old man, the libidinous desire may be toned down to a proposal of inseparable but ideal and platonic friendship. Some women understand how to sublimate the transference, how to modify it until it attains a kind of fitness for existence; others manifest it in its original, crude and generally impossible form. But fundamentally it is always the same and can never conceal that its origin is derived from the same source.

我们不甘心承认的新事实被称为“移情”。我们指的是一种对于医生个人的移情，因为我们不认为治疗情况是这类情愫的起因。我们宁可推测这种易感性源于他处，是病人早有心理准备，而借分析治疗之机转移到了医生本人身上。这种移情可能是暴风雨式的爱欲，也可能是和风细雨式的：渴望委身于医生的女孩，在对方是长者的情况中，可能希望被他认作最疼爱的义女，力比多的渴望可以缓解成一种不可分离但却是理想柏拉图式关系的提议。有些女病人懂得如何升华这种移情，如何将其调适为可合理存在的方式，而有些人则不加修饰、简单粗暴地表达出一种一般不可能实现的诉求。

Before we ask ourselves how we can accommodate this new fact, we must first complete its description. What happens in the case of male patients? Here we might hope to escape the troublesome infusion of sex difference and sex attraction. But the answer is pretty much the same as with women patients. The same relation to the physician, the same over-estimation of his qualities, the same abandon of interest toward his affairs, the same jealousy toward all those who are close to him. The sublimated forms of transference are more frequent in men, the direct sexual demand is rarer to the extent to which manifest homosexuality retreats before the methods by which these instinct components may be utilized. In his male patients more often than in his women patients, the physician observes a manifestation of transference which at first sight seems to contradict everything previously described: a hostile or *negative* transference.

要知道如何适应这一新情况，我们必须先要完整地描述它。男性患者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们大概希望这里没有性别差异产生的恼人性吸引力。但是答案与女患者的情况几乎一样。与医生的关系一样，对医生的好评一样，一样对自己的事情失去兴趣，一样对他周围的人心生嫉妒。男性患者中，移情的升华更为常见，明显的同性恋倾向望而却步，这些本能成分不会以惯常的方式表达出来，因而直接的性需求较为罕见。医生在男病人身上比女病人更常体会到一种移情的表示，乍看之下似乎与前面描述的情形全然相反：是一种敌对或消极的　移情。

In the first place, let us realize that the transference occurs in the patient at the very outset of the treatment and is, for a time, the strongest impetus to work. We do not feel it and need not heed it as

long as it acts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analysis we are working out together. When it turns into resistance, however,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it. Then we discover that two contrasting conditions have changed their relation to the treatment.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is the development of an affectionate inclination, clearly revealing the signs of its origin in sexual desire which becomes so strong as to awaken an inner resistance against it. Secondly, there are the hostile instead of the tender impulses. The hostile feelings generally appear later than the affectionate impulses or succeed them. When they occur simultaneously they exemplify the ambivalence of emotions which exists in most of the intimate relations between all persons. The hostile feelings connote an emotional attachment just as do the affectionate impulses, just as defiance signifies dependence as well as does obedience, although the activities they call out are opposed. We cannot doubt but that the hostile feelings toward the physician deserve the name of transference, since the situation which the treatment creates certainly could not give sufficient cause for their origin. This necessary interpretation of negative transference assures us that we have not mistaken the positive or affectionate emotions that we have similarly named.

首先，我们要知道，患者在治疗起初时就产生了移情，而且它在一段时间内曾是治疗的最大激励。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不过只要它有利于双方合作进行的分析，我们不会加以阻止。不过，当它变成抵抗，我们就必须要当心了。然后，我们发现两种不同情况之于治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首先，一种迷恋倾向产生，暴露了源于性欲的迹象，此种性欲太过强烈，引发了内心的抵抗。其次，敌视替代了柔情。敌对情绪一般出现于迷恋倾向之后，或是对它直接承继。当它们同时出现时，就体现了大多数恋爱伴侣之间都会有的矛盾情绪。这种敌视情绪与热恋倾向同样暗示了一种情感依恋，正如抗拒与服从同样意味着依赖，尽管它们相应的行动是截然相反的。我们不用怀疑这种

针对医生的敌对情绪足可称为移情，因为治疗产生的情况肯定不足以导致移情。对于消极移情的这种必然的解释使我们相信，我们没有误读积极或热恋情感这一相似的移情。

The origin of this transference, the difficulties it causes us, the means of overcoming it, the use we finally extract from it—these matters must be dealt with in the technical instruction of psychoanalysis, and can only be touched upon here. It is out of the question to yield to those demands of the patient which take root from the transference, while it would be unkind to reject them brusquely or even indignantly. We overcome transference by proving to the patient that his feelings do not originate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are not intended for the person of the physician, but merely repeat what happened to him at some former time. In this way we force him to transform his repetition into a recollection. And so transference, which whether it be hostile or affectionate, seems in every case to be the greatest menace of the cure, really becomes its most effectual tool, which aids in opening the locked compartments of the psychic life. But I should like to tell you something which will help you to overcome the astonishment you must feel at this unexpected phenomenon.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this illness of the patient which we have undertaken to analyze is not consummated or, as it were, congealed; rather it is something that continues its development like a living be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treatment does not end this development. When the cure, however, first has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atient,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illness in this new phase is concentrated entirely on one aspect: the relation of the patient to the physician. And so transference may be compared to the cambrium layer between the wood and the bark of a tree, from which the formation of new tissues and the growth of the trunk proceed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transference has once attained this significance the work upon the recollections of the patient recedes into the background. At that point it is correct to say that we are no longer concerned with the patient's former illness, but with a newly created, transformed neurosis, in place of the former. We followed up this new edition of an old conditio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e saw it originate and grow; hence we understand it especially well, because we ourselves are the center of it, its object. All the symptoms of the patient have lost their original meaning and have adapted themselves to a new meaning, which is determined by its relation to transference. Or, only such symptoms as are capabl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have persisted. The control of this new, artificial neurosis coincides with the removal of the illness for which treatment was sought in the first place, namely, with the solution of our therapeutic problem. The human being who, by means of his relations to the physician, has freed himself from the influences of suppressed impulses, becomes and stays free in his individual life, when the influence of the physician is subsequently removed.

这一移情现象的起源、它引起的麻烦、克服它的方法、从中最终的获益——这些问题必须在讲解精神分析技术时加以解决，在这里只能稍加涉及。对于病人因移情产生的需求，我们无疑要予以关照，如果断然甚或愤怒地拒绝未免不近人情。要克服移情作用，我们就要向病人证明，他们的情感不是源自目前的状况，原本也不是针对医生，而只是重现了过去某时的往事。这样，我们就迫使病人从往事重现转变为往事重提。这样，无论是敌视或热爱，在所有病例中都对治疗构成最大障碍的移情，实际上成为最有成效的工具，它帮助病人打开了心理生活中尘封的往事。我要告诉大家一些情况，帮助大家打消对移情这一意外现象的讶异。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要分析的患者病情尚未结束，或者可以说尚未冻结，它其实还在像生物一样不断发展着。治疗开始，病症并未停止发展。然而，当治疗开始影响患者后，

病症在这一新阶段的发展便完全集中于一个方面：病人与医生的关系。移情作用就好比树干与树皮之间的形成层，新生组织形成和树干生长都从这里同步进行。当移情达到了这样的作用，患者回忆的效力就会消退。从这一点看，准确地说，患者以前的病症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兴的、改造过的神经症。我们从一开始就见证了一个旧病的新症，我们看到它产生和发展，所以对它理解得特别充分，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它的中心、它的对象。患者的所有症状都失掉了原有的意义，调换成一种新意义，它取决于症状和移情的关系。或者，只有能够适应变化的症状才能保存下来。控制了这个人为的新版神经症，就等于去除了病症，这就是治疗的初衷，也就是我们治疗问题的解决方案。病人通过与医生的关系，摆脱了被压抑冲动的影响，当医生的影响继而消除后，他们的个人生活就会变得轻松，而且会保持下去。

Transference has attained extraordinary significance, has become the centre of the cure, in the conditions of hysteria, anxiety and compulsion neuroses. Their conditions therefore are properly included under the term transference neuroses. Whoever in his analytic experience has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existence of transference can no longer doubt the character of those suppressed impulses that express themselves in the symptoms of these neuroses and requires no stronger proof of their libidinous character. We may say that our conviction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symptoms is substituted libidinous gratification was finally confirmed by this explanation of transference.

在癔症、焦虑和强迫型神经症等情况中，移情现象已经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成为治疗的中心要素。所以它们的情况可恰如其分地统称为移情类精神症。在分析治疗经验中体会到移情存在的分析师不再怀疑在这些神经症中出现的被压抑冲动的特性，没有比移情现象更能

说明其力比多特征的有力证据了。我们可以说，通过移情的分析，我们确证了症状的意义是被替代的力比多的满足。

Now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correct our former dynamic conception of the healing process, and to bring it into harmony with our new discernment. If the patient is to fight the normal conflict that our analysis has revealed against the suppressions, he requires a tremendous impetus to influence the desirable decision which will lead him back to health. Otherwise he might decide for a repetition of the former issue and allow those factors which have been admitted to consciousness to slip back again into suppression. The deciding vote in this conflict is not given by his intellectual penetration—which is neither strong nor free enough for such an achievement—but only by his relation to the physician. Inasmuch as his transference carries a positive sign, it invests the physician with authority and is converted into faith for his communications and conceptions. Without transference of this sort, or without a negative transfer, he would not even listen to the physician and to his arguments. Faith repeats the history of its own origin; it is a derivative of love and at first requires no arguments. When they are offered by a beloved person, arguments may later be admitted and subjected to critical reflection. Arguments without such support avail nothing, and never mean anything in life to most persons. Man's intellect is accessible only in so far as he is capable of libidinous occupation with an object, and accordingly we have good ground to recognize and to fear the limit of the patient's capacity for being influenced by even the best analytical technique, namely, the extent of his narcism.

现在，我们有充分理由修改前面关于治疗过程的动态概念，使其

适应我们的新认识。我们通过分析揭示了对抗压抑的普通冲突，患者要解决这一冲突，则需要一种巨大推动力，以获得理想解决方法，从而帮助其恢复健康。否则病人也许会重蹈覆辙，让已经为意识所容的因素再次被压抑俘虏。影响冲突的决胜因素，不是病人的理性洞察力——它既不够强大也不够自由，不足以担此重任——而只是病人与医生的关系。如果病人的移情现象有积极的一面，它使病人敬重医生的权威，对医生的嘱咐和观点笃信不疑。如果没有这种移情，或只有消极移情，病人甚至不会听医生的话和他们的理论。信任总是在重演历史，它是爱的附属品，起初是无需任何理由。纵然被爱者提出了理由，对方只是在事后进行确认和检查回顾。没有爱的支持，再多理由也无济于事，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毫无意义。人的理智，只有在自身力比多被某个对象占据时才有可能受到影响，因而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并担心，即使最出色的分析技术也敌不过病人的自恋，因为病人受到影响的程度是有限的。

The capacity for directing libidinous occupation with objects towards persons as well must also be accorded to all normal persons. The inclination to transference on the part of the neurotic we have mentioned, is only an extraordinary heightening of this common characteristic. It would be strange indeed if a human trait so wide-spread and significant had never been noticed and turned to account. But that has been done. Bernheim, with unerring perspicacity, based his theory of hypnotic manifestations on the statement that all persons are open to suggestion in some way or other. Suggestibility in his sense is nothing more than an inclination to transference, bounded so narrowly that there is no room for any negative transfer. But Bernheim could never define suggestion or its origin. For him it was a fundamental fact, and he could never tell us anything regarding its origin. He did not recognize the dependence of suggestibility upon sexuality and the activity of the libido. We, on the other hand, must realize that we have excluded hypnosis

from our technique of neurosis only to rediscover suggestion in the shape of transference.

将力比多占有的对象指向他人的能力，一定也是所有普通人都具备的。我们所提到的神经症病人的移情倾向，只是共同特征的异样放大罢了。一个如此广泛而重要的人性特征要是从未得到关注和利用，实际上是很奇怪的。但是已经有人做了。伯恩海姆以精准敏锐的观察，建立了自己关于催眠表现的理论，指出每个人在某些方面都可以受到暗示。他所指的暗示感应性，不过就是移情的倾向，但其意义非常狭窄，不包含任何消极移情。但是伯恩海姆从未能够定义出暗示或其起源。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他从没讲过关于其起源的任何内容。他不承认暗示感应性对于性与力比多活动的依赖性。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神经症分析技术中已经排除了催眠疗法，只是希望在移情现象中再度发现暗示的特征。

But now I shall pause and let you put in a word. I see that an objection is looming so large within you that if it were not voiced you would be unable to listen to me. “So at last you confess that like the hypnotists, you work with the aid of suggestion. That is what we have been thinking for a long time. But why choose the detour over reminiscences of the past, revealing of the unconscious, interpretation and retranslation of distortions, the tremendous expenditure of time and money, if the only efficacious thing is suggestion? Why do you not use suggestion directly against symptoms, as the others do, the honest hypnotists? And if, furthermore, you offer the excuse that by going your way you have made numerous psychological discoveries which are not revealed by direct suggestion, who shall vouch for their accuracy? Are not they, too, a result of suggestion, that is to say, of unintentional suggestion? Can you not, in this realm also, thrust upon the patient

whatever you wish and whatever you think is so?”

但现在我要暂停一下，让大家发表意见。我看到大家的异议非常之强烈，要是不一吐为快的话，就不能认真听讲了。“所以你终于承认了，你像催眠师一样，也是靠暗示工作的。这一点我们早就料到了。但是，如果唯一起效的方法是暗示作用，那何必要走弯路，又是回首往事，又是揭示潜意识，又是解释和转换变形内容，还耗费了巨大精力和金钱呢？为什么不学习其他那些人，比如那些诚实的催眠师，就直接采用暗示来对付症状呢？况且，如果你的托词是，你的方法产生了直接暗示无法揭示的大量心理学发现，那谁可以担保它们的准确性？难道它们不也是暗示或是无意暗示的结果？用这个方法，你不也能迫使病人接受你的任何希望和想法吗？”

Your objections are uncommonly interesting, and must be answered. But I cannot do it now for lack of time. Till the next time, then. You shall see, I shall be accountable to you. Today I shall only end what I have begun. I promised to explain, with the aid of the factor of transference, why our therapeutic efforts have not met with success in narcistic neuroses.

大家的反对意见非常有趣，我必须回应。但由于时间限制我现在回答不了。等下一节课再说。大家看吧，我会对此作出解释。现在我只能把今天的内容讲完。我答应过要解释，为什么有移情作用这一因素的帮助，我们的治疗在自恋型神经症中却没有收到效果。

This I can do in a few words and you will see how simply the riddle can be solved, how well everything harmonizes. Observation shows that persons suffering from narcistic neuroses have no

capacity for transference, or only insufficient remains of it. They reject the physician not with hostility, but with indifference. That is why he cannot influence them. His words leave them cold, make no impression, and so the mechanism of the healing process, which we are able to set in motion elsewhere, the renewal of the pathogenic conflict and the overcoming of the resistance to the suppression, cannot be reproduced in them. They remain as they are. Frequently they are known to attempt a cure on their own account, and pathological results have ensued. We are powerless before them.

对此我只需用寥寥数语，就能使大家明白，这道谜题非常容易解开，前因后果非常清楚。观察显示，自恋型神经症患者没有、或仅有些微的移情倾向。他们拒绝医生的方式不是敌视，而是漠视。因而医生无法影响他们。他们对医生的话无动于衷、毫不在意，所以我们能在其他地方收效的治疗原理，即：重现致病冲突，克服对压抑的抵抗，在他们身上不起作用。他们依然故我。我们知道他们经常尝试自行治疗，由此导致病灶又起。对于他们，我们无能为力。

On the basis of our clinical impressions of these patients, we asserted that in their case libidinous occupation with objects must have been abandoned, and object-libido must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ego-libido. On the strength of this characteristic we had separated it from the first group of neurotics (hysteria, anxiety and compulsion neuroses). Their behavior under attempts at therapy confirms this supposition. They show no neurosis. They, therefore, are inaccessible to our efforts and we cannot cure them.

根据我们对这些患者的临床观察，我们认为，在他们的情况中，力比多的占据对象必然被丢弃了，对象力比多必然是转换成了自我力

比多。根据这一特征的强烈程度，我们把它从第一类神经症（癔症、焦虑性和强迫型神经症）中剥离出来。他们对治疗尝试的反应也确认了这种设想。综上所述，我们的努力对他们无济于事，我们无法治愈他们。

Twenty-Eighth　Lecture Analytical Therapy

第二十八讲　分析治疗

You know our subject for today. You asked me why we do not make use of direct suggestion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when we admit that our influence depends substantially upon transference, i.e., suggestion, for you have come to doubt whether or not we can answer for the objectivity of our psych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face of such a predominance of suggestion. I promised to give you a comprehensive answer.

大家知道今天的主题了。大家问过我，既然我们承认精神分析的疗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移情作用，也就是暗示作用，那为什么我们的治疗不可以运用直接暗示？暗示的作用这么大，以致大家已经开始怀疑我们心理学发现的客观性了。我答应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解释。

Direct suggestion is suggestion directed against the expression of the symptoms, a struggle between your authority and the motives of the disease. You pay no attention during this process to the motives, but only demand of the patient that he suppress their expression in symptoms. So it makes no difference in principle whether you hypnotize the patient or not. Bernheim, with his usual perspicacity, asserted that suggestion is the essential phenomenon underlying hypnotism, that hypnotism itself is already a result of suggestion, is a suggested condition. Bernheim was especially fond of practising suggestion upon a person in the waking state, and could achieve the same results as with suggestion under hypnosis.

直接暗示是针对症状表现的暗示，它是你的权威顾问与病症动机之间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大家忽略了病症动机，而只要求病人压抑症状表现。所以做不做催眠原则上没有差别。伯恩海姆一贯观察敏锐，他主张暗示是构成催眠术的关键现象，催眠本身已经是一种暗示，一种受暗示的情境。伯恩海姆特别喜欢先在一个人清醒状态下对其进行暗示，然后在催眠时再暗示，结果是一样的。

What shall I deal with first, 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 or theoretic considerations?

实际经验证据和理论分析，我先从哪一方面讲起呢？

Let us begin with our experiences. I was a pupil of Bernheim's, whom I sought out in Nancy in 1889, and whose book on suggestion I translated into German. For years I practised hypnotic treatment, at first by means of prohibitory suggestions alone, and later by this method in combination with investigation of the patient after the manner of Breuer. So I can speak from experience about the results of hypnotic or suggestive therapy. If we judge Bernheim's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old doctor's password that an ideal therapy must be rapid, reliable and not unpleasant for the patient, we find it fulfills at least two of these requirements. It can be carried out much more rapidly, indescribably more rapidly than the analytic method, and it brings the patient neither trouble nor discomfort. In the long run it becomes monotonous for the physician, since each case is exactly the same; continually forbidd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most diverse symptoms under the same ceremonial, without being able to grasp anything of their

meaning or their significance. It is second-rate work, not scientific activity, and reminiscent of magic, conjuring and hocus-pocus; yet in the face of the interest of the patient this cannot be considered. The third requisite, however, was lacking. The procedure was in no way reliable. It might succeed in one case, and fail with the next; sometimes much was accomplished, at other times little, one knew not why. Worse than this capriciousness of the technique was the lack of permanency of the results. After a short time, when the patient was again heard from, the old malady had reappeared, or it had been replaced by a new malady. We could start in again to hypnotize. At the same time we had been warned by those who were experienced that by frequent repetitions of hypnotism we would deprive the patient of his self-reliance and accustom him to this therapy as though it were a narcotic. Granted that we did occasionally succeed as well as one could wish; with slight trouble we achieved complete and permanent results. But the conditions for such a favorable outcome remained unknown. I have had it happen that an aggravated condition which I had succeeded in clearing up completely by a short hypnotic treatment returned unchanged when the patient became angry and arbitrarily developed ill feeling against me. After a reconciliation I was able to remove the malady anew and with even greater thoroughness, yet when she became hostile to me a second time it returned again. Another time a patient whom I had repeatedly helped through nervous conditions by hypnosis,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an especially stubborn attack, suddenly threw her arms around my neck. This made it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whether one wanted to or not, of the nature and source of the suggestive authority.

我们先从实际经验开始吧。1889年我前往南锡追随伯恩海姆为师，我已将他关于暗示的著作翻成了德文。我实践了多年的催眠治

疗，一开始只采用禁止性暗示法，后来将布洛伊尔的患者研究法与此法结合。所以我有资格讲述催眠或暗示治疗结果的实际经验。按旧时医生的秘诀，理想疗法的标准有三：快速、可靠、病人无不适。以此判断，伯恩海姆的疗法起码符合两点要求。它实施起来可以快速很多，比之分析治疗法更是快速得无法形容，也不会给患者带来麻烦与不适。长期来看，它对医生而言会变得乏味，因为每个病例的治疗模式都一模一样，总是用千篇一律的程序禁止各种不同症状存在，而不去了解它们的意义或作用。这是一种二流工作，而不是科学活动，让人联想到幻术、臆想和骗术，但只要病人高兴，这也不值一提。然而，还有一个标准是缺失的。这个疗法绝不可靠。它可能在一个病例中有效，在下一个病例中就失败了，有时收效颇丰，有时收效甚微，原因不得而知。比起疗效的不稳，治疗结果的持久性更糟糕。治疗后不久又会传来病人的消息，或旧病复发，或添了新病。我们又要重新开始使用催眠疗法。与此同时，经验丰富者告诫我们，反复实施催眠将使病人丧失自控力，对催眠产生毒品般的依赖性。事实上我们偶尔可以如愿成功，不费工夫地取得满意和永久疗效。但是我们对这种有效结果的条件仍不知晓。我有一次切身经历，我用短期催眠疗法完全医好了一个严重病症，但病人开始恼火，对我横加责难，然后便原病复发。我们达成和解后，我又治好了她的病，而且效果更彻底，但病人开始敌视我，然后再次发病。还有一次，我用催眠疗法多次帮一个病人治好神经症状况，但在治疗一个特别顽固的病情时，她突然用双臂搂住我的脖子。无论是不是情愿，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个问题，即有关暗示威力的本质和来源。

So much for experience. It shows us that in renouncing direct suggestion we have given up nothing that is not replaceable. Now let us add a few further considerations. The practice of hypnotic therapy demands only a slight amount of work of the patient as well as of the physician. This therapy fits in perfectly with the estimation of neuroses to which the majority of physicians subscribe. The physician says to the neurotic, “There is nothing the

matter with you; you are only nervous, and so I can blow away all your difficulties with a few words in a few minutes." But it is contrary to our *dynamic* conceptions that we should be able to move a great weight by an inconsiderable force, by attacking it directly and without the aid of appropriate preparations. So far as conditions are comparable, experience shows us that this performance does not succeed with the neurotic. But I know this argument is not unassailable; there are also "redeeming features."

实际经验到此为止。它告诉我们，我们取消直接暗示法，并没有放弃任何无法取代的东西。我们现在再来补充几点思考。催眠疗法实践要求患者和医生做的事情都很少。这种疗法十分符合大多数医生对神经症的评价。医生对神经症患者说："你没有要紧的毛病，你只是神经过敏，我只要几句话几分钟保你手到病除。"但是，不做适当准备便直接攻击病症，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卸除重负，这违背了我们的动态性 理念。比较了各种相关情况后，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对神经症患者不奏效。但我知道这个理由并非毫无漏洞，它也有一些"可取之处"。

In the light of the knowledge we have gained from psychoanalysis we can descri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ypnotic and psychoanalytic suggestion as follows: Hypnotic therapy seeks to hide something in psychic life, and to gloss it over; analytic therapy seeks to lay it bare and to remove it. The first method works cosmetically, the other surgically. The first uses sugges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appearance of the symptoms, it strengthens suppression, but leaves unchanged all other processes that have led to symptom development. Analytic therapy attacks the illness closer to its sources, namely in the conflicts out of which the symptoms have emerged, it makes use of suggestion to change the solution of

these conflicts. Hypnotic therapy leaves the patient inactive and unchanged, and therefore without resistance to every new occasion for disease. Analytic treatment places upon the physician, as well as upon the patient, a difficult responsibility; the inner resistance of the patient must be abolished. The psychic life of the patient is permanently changed by overcoming these resistances, it is lifted upon a higher plane of development and remains protected against new possibilities of disease. The work of overcoming resistance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the analytic cure. The patient, however, must take it on himself to accomplish this, while the physician, with the aid of suggestion, makes it possible for him to do so. The suggestion works in the nature of an *education* . We are therefore justified in saying that analytic treatment is a sort of *after-education* .

根据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得到的认识，催眠疗法的暗示和精神分析疗法的差别可以表述为：催眠疗法倾向于隐藏和掩饰心理生活中的某一方面，而分析疗法倾向于暴露并去除之。前者治表而后者治根。前者运用暗示法是为了防止症状出现，它强化了压抑作用，没有改变其余导致症状发展的过程。分析疗法则在更深的源头上解决病症，也就是要解决刺激症状出现的冲突，它运用暗示法是为了改变冲突的决定方式。催眠疗法中的病人是被动的，而且没有改变，所以无法抵御病症的各种新情况。分析治疗使医生和病人都承担了重要责任，病人的内心抵抗必须去除。克服了这些抵抗，病人的心理生活就能得到永久改善，它的水平得到提升，并能一直抵抗新的疾病风险。克服抵抗的工作是分析治疗的根本任务。而患者必须靠自身努力完成这个任务，而医生则借助暗示法帮助患者完成。暗示作用本质上是一种教育 。因此可顺理成章地称呼分析治疗为再教育 。

I hope I have made it clear to you wherein our technique of

using suggestion differs therapeutically from the only use possible in hypnotic therapy. With your knowledg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uggestion and transference you will readily understand the capriciousness of hypnotic therapy which attracted our attention, and you will see why, on the other hand, analytic suggestion can be relied upon to its limits. In hypnosis we depend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s capacity for transference, yet we are unable to exert any influence on this capacity. The transference of the subject may be negative, or, as is most frequent, ambivalent; the patient may have protected himself against suggestion by very special adjustments, yet we are unable to learn anything concerning them. In psychoanalysis we work with the transference itself, we do away with the forces opposing it, prepare the instrument with which we are to work. So it becomes possible to derive entirely new uses from the power of suggestion; we are able to control it, the patient does not work himself into any state of mind he pleases, but in so far as we are able to influence him at all, we can guide the suggestion.

暗示是我们分析治疗的一种选择，却是催眠疗法中的唯一可能的选择，两者的差别希望大家已经了然。大家已经了解了暗示与移情的关系，不难理解催眠疗法引人注意的不稳定性，而且大家会发现分析治疗的暗示何以是最可靠的。在催眠疗法中，我们依赖于病人的移情倾向情况，却无法对这个倾向施加任何影响。患者的移情可能是消极的，多数情况下是矛盾的，为了抵制暗示作用，病人可能发生特别改变，而我们却无从知道改变的情况。在精神分析中我们直接应对移情作用本身，消除与之抗衡的力量，准备分析工作的工具。所以暗示的作用有可能产生全新用途，我们可以掌控它，病人并不心甘情愿，但至少我们能影响他们，能够引导暗示作用。

Now you will say, regardless of whether we call the driving

force of our analysis transference or suggestion, there is still the danger that through our influence on the patient the objective certainty of our discoveries becomes doubtful. That which becomes a benefit to therapy works harm to the investigation. This objection is most often raised against psychoanalysis, and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even if it does not hit the mark, it cannot be waved aside as stupid. But if it were justified, psychoanalysis would be nothing more than an extraordinarily well disguised and especially workable kind of treatment by suggestion, and we may lay little weight upon all its assertions concerning the influences of life, psychic dynamics, and the unconscious. This is in fact the opinion held by our opponents; we are supposed especially to have "balked into" the patients everything that supports the importance of sexual experiences, and often the experiences themselves, after the combinations themselves have grown up in our degenerate imaginations. We can refute these attacks most easily by calling on 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 rather than by resorting to theory. Anyone who has himself performed a psychoanalysis has been able to convince himself innumerable time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hus to suggest anything to the patient. There is no difficulty, of course, in making the patient a disciple of any one theory, and thus causing him to share the possible error of the physician. With respect to this he behaves just like any other person, like a student, but he has influenced only his intelligence, not his disease. The solving of his conflicts and the overcoming of his resistances succeeds only if we have aroused in him representations of such expectations as can agree with reality. What was inapplicable in the assumptions of the physician falls away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analysis; it must be withdrawn and replaced by something more nearly correct. By employing a careful technique we seek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temporary results arising out of suggestion, yet there is no harm if such temporary results occur, for we are never satisfied with early

successes. We do not consider the analysis finished until all the obscurities of the case are cleared up, all amnestic gaps filled out and the occasions which originally called out the suppressions discovered. We see in results that are achieved too quickly a hindrance rather than a furtherance of analytic work and repeatedly we undo these results again by purposely breaking up the transference upon which they rest. Fundamentally it is this feature which distinguishes analytical treatment from the purely suggestive technique and frees analytic results from the suspicion of having been suggested. Under every other suggestive treatment the transference itself is most carefully upheld and the influence left unquestioned; in analytic treatment, however, the transference becomes the subject of treatment and is subject to criticism in whatever form it may appear. At the end of an analytic cure the transference itself must be abolished; therefore the effect of the treatment, whe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must be founded not upon suggestion but upon the overcoming of inner resistances, upon the inner change achieved in the patient, which the aid of suggestion has made possible.

现在大家会说，不管我们分析治疗主要作用力是移情还是暗示，由于我们对病人的影响，我们的发现在客观确定性上仍有被质疑的风险。对治疗有益的事情有可能对研究不利。这种质疑是精神分析最常受到的攻击，必须承认，虽然它没有命中要害，但也不能当成蠢话一笑置之。但是如果它有其合理性，则精神分析只不过是暗示治疗的一种华丽伪装和可行方法罢了，我们就不必在意关于生活经历、心理过程及潜意识的影响这些论调了。这确也是我们反对者的观点，据说，我们先堕落地想象出一些关联，然后将证明性经验重要性的所有信息，甚而常是性经验本身，“灌输”到病人心中。反驳这些攻击非常简单，我们只需拿出实际证据，而不用求诸理论。亲身实践过精神分析的人可屡屡确信，对病人作这类暗示是不可能的。当然，要让病人笃

信某个理念，从而与医生共同为错误负责，这并不难做到。在这方面病人的行为与学生之类无异，但他们只是影响了自己的理智，而不是自己的病。只有当我们激发了病人，使其对这种期望的呈现与实际相符，我们才能顺利解决其冲突、克服其抵抗。医生行不通的猜想在分析过程中会渐渐消失，必然会被弃而不用，被更接近真相的内容取代。我们的分析非常谨慎，是要避免从暗示中产生暂时结果，但是即使有了这些暂时结果也无妨，因为我们从不满足于初步的胜利。直到病情的所有模糊点得到澄清，所有失忆缺口得到填补，原本引发压抑作用的情况得以显现，我们才会认为分析完成了。我们反而会把过早的结果视为分析工作的障碍，而不是进展，我们会刻意打破这些结果赖以成立的移情作用，而不断地放弃这些结果。根本而言，是这个特性将分析治疗与纯粹暗示疗法区别开来，使分析结果不再被怀疑已经受到了暗示。在其他暗示治疗中，移情本身被悉心保存了下来，其影响力不受质疑；而分析治疗将移情作为治疗对象，并且对其各种形式进行评估。在分析治疗末期，移情本身必然已经消除，因而治疗效果的好坏一定不能以暗示为依据，而必须以内心抵抗的克服以及病人在暗示助力下发生的心理转变为依据。

Presumably the creation of the separate suggestions is counteracted, in the course of the cure, by our being continually forced to attack resistances which have the ability to change themselves into negative (hostile) transferences. Furthermore, let me call your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a large number of results of analysis, otherwise perhaps subject to the suspicion that they are products of suggestion, can be confirmed from other unquestionable sources. As authoritative witnesses in this case we refer to the testimony of dements and paranoiacs, who are, naturally far removed from any suspicion of suggestive influence. Whatever these patients can tell us about symbolic translations and phantasies which have forced their way into their consciousness agrees faithfully with the results of our investigations upon the

unconscious of transference-neurotics, and this gives added weight to the objective correctness of our interpretations which are so often doubted. I believe you will not go wrong if you give your confidence to analysis with reference to these factors.

想来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被迫不断与抵抗（它们能够自行改变为消极或敌对的移情）作斗争，因而单独暗示作用被抵消了。因而，我提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大量分析结果原本可能被疑为暗示作用，却在其他毋庸置疑的源头中得到确认。这一情况中的权威证据是痴呆者和妄想狂患者的证词，他们当然不可能受到任何暗示的影响。这些病人向我们讲述了强行进入他们意识的象征意义和幻想，而它们与我们关于移情类神经症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常被质疑的解释具有客观准确性。如果大家因为这些原因信任分析研究，我认为大家不会出错。

We now want to complete our statement concerning the mechanism of healing, by including it within the formulae of the libido theory. The neurotic is incapable both of enjoyment and work; first, because his libido is not directed toward any real object, and second because he must use up a great deal of his former energy to keep his libido suppressed and to arm himself against its attacks. He would become well if there could be an end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his ego and his libido, and if his ego could again have the libido at its disposal. The task of therapy, therefore, consists of freeing the libido from its present bonds, which have estranged it from the ego, and furthermore to bring it once more into the service of the ego. Where is the libido of the neurotics? It is easy to find; it is bound to the symptoms which at that time furnish it with the only available substitute satisfaction. We have to become master of the symptoms, and abolish them, which is of course

exactly what the patient asks us to do. To abolish the symptoms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go back to their origin, to renew the conflict out of which they emerged, but this time with the help of motive forces that were originally not available, to guide it toward a new solution. This revision of the process of suppression can be accomplished only in part by following the traces in memory of the occurrences which led to the suppression. The decisive part of the cure is accomplished by means of the relationship to the physician, the transference, by means of which new editions of the old conflict are created. Under this situation the patient would like to behave as he had behaved originally, but by summoning all his available psychic power we compel him to reach a different decision. Transference, then, becomes the battlefield on which all the contending forces are to meet.

现在我们要完善关于治疗机制的陈述，将它纳入力比多理论的程式之中。神经症患者既无法享乐，又无法工作：首先，因为他们的力比多未指向任何实际对象；其次，因为他们必须消耗掉大量从前的能量，确保力比多处于被压抑状态并保护自己免其攻击。如果自我与力比多间的冲突可以消停，而且自我能够重新掌控力比多，他们才有可能康复。因而，治疗的任务在于：使力比多摆脱现有的束缚（它们使力比多远离了自我），而且要使力比多再次服从于自我。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在哪里？它不难找到，它与那些症状捆绑在一起，正是它们在当时给了力比多唯一可用的替代满足。我们必须掌控住症状，并消除它们，这当然也是患者对我们的要求。要消除症状，我们必须回到它们的源头，将它们赖以形成的冲突重新激活，但这一次要借助于原来不可用的动机力量，引导我们发现这一冲突的全新解决方案。这种对于压抑过程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只能通过追查压抑发生的回忆线索才能够完成。完成治疗的关键内容，需要通过病人与医生的关系即移情，也是通过移情，旧冲突的新版本被创造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只希望自己能恢复原来的行为，但我们会唤出他们所有的心

理力量，迫使其做出不同的抉择。这样，移情成为了所有力量博弈的战场。

The full strength of the libido, as well as the entire resistance against it, is concentrated in this relationship to the physician; so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symptoms of the libido should be laid bare. In place of his original disturbance the patient manifests the artificially constructed disturbance of transference; in place of heterogeneous unreal objects for the libido you now have only the person of the physician, a single object, which, however, is also fantastic. The new struggle over this object is, however, raised to the highest psychic level with the aid of the physician's suggestions, and proceeds as a normal psychic conflict. By avoiding a new suppression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 ego and the libido comes to an end, the psychic unity of the personality is restored. When the libido again becomes detached from the temporary object of the physician it cannot return to its former objects, but is now at the disposal of the ego. The forces we have overcome in the task of therapy are on the one hand the aversion of the ego for certain directions of the libido, which had expressed itself as a tendency to suppress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tenacity of the libido, which is loathe to leave an object which it has once occupied.

力比多的全部力量以及反对它的全部抗力，都集中在这一医患关系上了，所以力比多的症状不免暴露无遗。病人隐去原先的心理紊乱，表现出移情这种人为的紊乱，清除了芜杂的虚幻对象，现在只剩下医生这个单一对象，但医生也是幻想的对象。不过，在医生的暗示的推波助澜之下，关于该对象的思想斗争升为最高级的心理活动，转化成了普通的心理冲突。为了避免新的压抑，自我与力比多之间的疏远告一段落，个人的心理恢复了一致性。当力比多再次脱开医生这一

暂时对象后，它无法回到从前的对象，但是现在为自我所掌控。我们在治疗任务中克服的心理力量，一方面是自我对力比多某些方面的反感，它通过压抑倾向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是力比多的固执，它讨厌离开曾经占有过的对象。

Accordingly the work of therapy falls into two phases: first, all the libido is forced from the symptoms into the transference, and concentrated there; secondly, the struggle over this new object is carried on and the libido set free. The decisive change for the better in this renewed conflict is the throwing out of the suppression, so that the libido cannot this time again escape the ego by fleeing into the unconscious. This is accomplished by the change in the ego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hysician's sugges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work of interpretation, which translates unconscious into conscious, the ego grows at the expense of the unconscious; it learns forgiveness toward the libido, and becomes inclined to permit some sort of satisfaction for it. The ego's timidity in the face of the demands of the libido is now lessened by the prospect of occupying some of the libido through sublimation. The more the processes of the treatment correspond to this theoretic description the greater will be the success of psychoanalytic therapy. It is limited by the lack of mobility of the libido, which can stand in the way of releasing its objects, and by the obstinate narcism which will not permit the object-transference to effect more than just so much. Perhaps we shall obtain further light on the dynamics of the healing process by the remark that we are able to gather up the entire libido which has become withdrawn from the control of the ego by drawing a part of it to ourselv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erence.

相应地，治疗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力比多被全部从症状

驱至移情作用上并集中于此；其次，关于新对象的心理斗争得以延续，力比多从而得到解脱。在更新的冲突中决定性的好转，在于压抑被抛开，这样力比多这次就不能再次通过遁入潜意识而逃开自我了。这是通过自我在医生暗示影响下发生改变从而得以实现的。在将潜意识转化为意识的解释工作过程中，自我因潜意识消失而得到成长，懂得了原谅力比多，开始愿意容许力比多获得一定满足。自我在面对力比多欲求时曾经很胆怯，如今因有望通过升华并占有一些力比多而有所缓解。治疗的过程越接近这一理论描述，精神分析疗法的效果就越好。它的局限性因素有两个：一是力比多欠缺活力，这有可能会妨碍其对象进行释放；二是顽固的自恋倾向，它不允许对象移情发挥应有作用。我们可以说，我们通过移情过程将病人自我的一部分吸引到我们身上，因而能够收集起所有撤出自我控制的力比多，这样我们对治疗过程动态的认识或许就更为深刻了。

It is to be remembered that we cannot reach a direct conclusion as to the disposition of the libido during the disease from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libido which are effected during and because of the treatment. Assuming that we have succeeded in curing the case by means of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a strong father-transference to the physician, it would be wrong to conclude that the patient had previously suffered from a similar and unconscious attachment of his libido to his father. The father-transference is merely the battlefield upon which we were able to overcome the libido; the patient's libido had been concentrated here from its other positions. The battlefield need not necessarily have coincided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fortresses of the enemy. Defense of the hostile capital need not take place before its very gates. Not until we have again destroyed the transference can we begin to reconstruc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ibido that existed during the illness.

要记得，在治疗期间，力比多因为治疗而获得分配，但我们无法以此直接判断力比多在疾病期间的倾向。假定我们通过制造和摧毁一种强烈的恋父式移情治愈了病例，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推断，病人以前对其父亲有着相似的力比多依恋。恋父式移情只是我们为了征服力比多而创造的战场，病人的力比多由他处而来、被集中在这里。这个战场不一定要与敌人的关键堡垒一致。敌方的首都保卫战也不一定就要在城门口进行。我们只有等再次解除移情作用后，才可以重现病时的力比多分配。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libido theory we might say a last word in regard to the dream. The dreams of neurotics, as well as their errors and haphazard thoughts, help us in fi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symptoms and in discovering the disposition of the libido. In the form of the wish fulfillment they show us what wish impulses have been suppressed, and to what objects the libido, withdrawn from the ego, has been attached. That is why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plays a large role in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and is in many cases, for a long time,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with which we work. We already know that the condition of sleep itself carries with it a certain abatement of suppressions. Because of this lessening of the pressure upon it, it becomes possible for the suppressed impulse to create in the dream a much clearer expression than the symptom can furnish during the day. So dream-study is the easiest approach to a knowledge of the libidinous suppressed unconscious which has been withdrawn from the ego.

从力比多理论的角度，我们或许能为梦补充最后一点内容。神经症患者的梦和他们的过失及随机想法一样，能帮助我们发现症状的意义，揭示力比多的倾向。它们以愿望实现的形式表明了愿望冲动所压抑的事情，以及撤出自我的力比多被何种对象所吸引。这是释梦在精

神分析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也是它长期成为最重要治疗手段的原因。我们已经知道，睡眠本身的情况使压抑有所放松。因为压力减轻，被压抑的冲动就有可能在梦中有所表示，这比症状在白天的表示要清楚得多。所以对梦进行研究是认识被压抑后撤出自我的力比多潜意识的最简便的方法。

Dreams of neurotics differ in no essential point from the dreams of normal persons; you might even say they cannot be distinguished. It would be unreasonable to explain the dreams of the nervous in any way which could not be applied to the dreams of the normal. So we must sa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urosis and health applies only during the day, and does not continue in dream life. We find it necessary to attribute to the healthy numerous assumptions which have grown out of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dreams and the symptoms of the neurotic.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deny that even a healthy man possesses those factors in his psychic life which alone make possib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ream and of the symptom as well. We must conclude, therefore, that the healthy have also made use of suppressions and are put to a certain amount of trouble to keep those impulses under control; the system of their unconscious, too, conceals impulses which are suppressed, yet are still possessed of energy, and *a part of their libido is also withdrawn from the control of their ego* . So the healthy man is virtually a neurotic, but dreams are apparently the only symptoms which he can manifest. Yet if we subject our waking hours to a more penetrating analysis we discover, of course, that they refute this appearance and that this seemingly healthy life is shot through with a number of trivial, practically unimportant symptom formations.

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的梦并无实质区别，甚至可以说无法区分。对神经症患者的梦的解释方法，如不能适用于正常人的梦，是不合情理的。所以，我们必须说神经症患者与健康人的差别只体现在白天，没有延续到梦的生活中。我们觉得，从神经症患者的症状和梦之间的联系得出的种种推论，也必然适用于健康人。不可否认，即便在健康人的心理生活中也有那些可以形成梦及症状的因素。因而，我们势必可以得出结论：正常人同样也会利用压抑作用，在控制冲动方面也颇伤脑筋，他们的潜意识体系同样隐藏着被压抑的冲动，但仍在心理能量的掌握之中，而且他们的部分力比多同样撤出了自我的控制 。所以健康人其实也是神经症患者，但表现出的唯一症状就是梦。然而，我们如果对我们的清醒时间进行深入观察，必然会发现这种表象也存在问题，表面健康的生命也是漏洞百出，存在大量细微的、实际意义不大的症状形式。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rvous health and neurosis is entirely a practical one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available capacity for enjoyment and accomplishment retained by the individual. It varies presumably with the relative proportion of the energy totals which have remained free and those which have been bound by suppressions, and is quantitative rather than qualitative. I do not have to remind you that this conception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ertainty that neuroses can be cured, despite their foundation in constitutional disposition.

健康人的神经问题与神经症的区别完全是一个实际性问题，它取决于个人现有的实际享受能力和实现能力。仍然自由的能量总量与被压抑束缚的能量的相对份额不同，这种能力就有所不同，它是量化标准而不是定性标准。不用我提醒，想必大家明白，这一概念证明了，无论先天体质基础如何，神经症确实可以治愈。

This is accordingly what we may make out of the identity between the dreams of the healthy and those of the neurotic for the definition of health. As regards the dream itself, we must note further that we cannot separate it from its relation to neurotic symptoms. We must recognize that it is not completely defined as a translation of thoughts into an archaic form of expression, that is, we must assume it discloses a disposition of libido and of object-occupations which have actually taken place.

相应地，这也是从健康人和神经症患者的梦的一致性中得出的结论，由此可以界定健康的含义。就梦本身而言，我们必会进而注意到，它与神经症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必须意识到，梦并不能完全定义为“将想法转换为远古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它一定揭示了实际存在的力比多倾向和对象占有倾向。

We have about come to the end. Perhaps you are disappointed that I have dealt only with theory in this chapter o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and have said nothing concerning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cure is undertaken, or of the successes which it achieves. But I shall omit both. I shall omit the first because I had intended no practical training in the practice of psychoanalysis, and I shall neglect the second for numerous reasons. At the beginning of our talks I emphasized the fact that under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we attain results which can be favorably compared with the happies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l therapy, and, I may add, these results could not have been otherwise achieved. If I were to say more I might be suspected of wishing to drown the voices of disparagement, which have become so loud, by advertising our claims. We psychoanalysts have repeatedly been threatened by our medical colleagues, even in open congresses, that the eyes of the

suffering public must be opened to the worthlessness of this method of treatment by a statistical collection of analytic failures and injuries. But such a collection, aside from the biased, denunciatory character of its purpose, would hardly be able to give a correct picture of the therapeutic values of analysis. Analytic therapy is, as you know, still young; it took a long time to establish the technique, and this could be done only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work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ccumulating experience. As a result of the difficulties of instruction the physician who begins the practice of psychoanalysis is more dependent upon his capacity to develop on his own account than is the ordinary specialist, and the results he achieves in his first years can never be taken as indicative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analytic therapy.

我们的课程快要结束了。我在这一讲中只讲了精神分析治疗的理论，没有谈到治疗的实施条件或是成功条件，大家也许会失望。不过这两个我都要略过不讲了。我不讲第一个是因为我不打算进行精神分析的操作实训，不说第二个有很多原因。我在讲课开始时强调过，我们在有利条件下的治疗结果堪与心理治疗界最佳成就媲美，而且还有一点，这些结果在其他条件下是不可能得到的。如果我再多说的话，有人就要怀疑我通过宣扬我们的主张有意打压强大的反对声浪。我们精神分析者不断遭到医学界同仁们（甚至在公开研讨会上）的非议，他们声称，受病痛困扰的民众必须擦亮眼睛，从精神分析治疗一系列失败和伤害的数据统计中认清这一疗法的无效。但这种数据统计，除去偏见和抹黑的用意不谈，难以体现精神分析的真正治疗价值。分析疗法如大家所知仍很年轻，它花了很长时间才确立了分析技术，这只能是在工作过程中，在经验不断积累中完成的。精神分析的培训非常困难，结果是，开始从事精神分析实践的医生比一般医生更要依靠自我培养能力，他们从医最初几年的结果从不应作为分析治疗法可行性的判断依据。

Many attempts at treatment fail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analysis because they were made on cases that were not at all suited to the procedure, and which today we exclude by our classification of symptoms. But this classification could be made only after practice. In the beginning we did not know that paranoia and dementia praecox are, in their fully developed phases, inaccessible, and we were justified in trying out our method on all kinds of conditions. Besides, the greatest number of failures in those first years were not due to the fault of the physician or because of unsuitable choice of subjects, but rather to the unpropitiousness of external conditions. We have hitherto spoken only of internal resistances, those of the patient, which are necessary and may be overcome. External resistances to psychoanalysis, due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patient and his environment, have little theoretical interest, but are of great practical importance.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may be compared to a surgical operation, and has the right to be undertaken under circumstances favorable to its success. You know what precautions the surgeon is accustomed to take: a suitable room, good light, assistance, exclusion of relatives, etc. How many operations would be successful, do you think, if they had to be performed in the presence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family, who would put their fingers into the field of operation and cry aloud at every cut of the knife? The interference of relatives in psychoanalytical treatment is a very great danger, a danger one does not know how to meet. We are armed against the internal resistances of the patient which we recognize as necessary, but how are we to protect ourselves against external resistance? It is impossible to approach the relatives of the patient with any sort of explanation, one cannot influence them to hold aloof from the whole affair, and one cannot get into league with them because we then run the danger of losing the confidence of the patient, who rightly demands that we in whom he confides take his part. Besides,

those who know the rifts that are often formed in family life will not be surprised as analysts when they discover that the patient's nearest relatives are less interested in seeing him cured than in having him remain as he is. Where, as is so often the case, the neurosis is connected with conflicts with members of the family, the healthy member does not hesitate long in the choice between his own interest and that of the cure of the patient. It is not surprising if a husband looks with disfavor upon a treatment in which, as he may correctly suspect, the register of his sins is unrolled; nor are we surprised, and surely we cannot take the blame, when our efforts remain fruitless and are prematurely broken off because the resistance of the husband is added to that of the sick wife. We had only undertaken something which, under the existing circumstance, it was impossible to carry out.

在分析治疗的初期阶段，很多治疗尝试是失败的，因为尝试治疗的病例不完全适合这个疗法，现在我们已经通过症状分类将它们排除。但这种分类只能通过实践完成。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处于完全成熟期的妄想狂和早发性痴呆是不可分析的，我们在各种情况中试用这个疗法也无可厚非。再者，初期阶段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医生的过失，或者对象选择有误，而更多地是因为外部条件恶劣。我们以前只谈过病人的内部抵抗，这是必然的并是可以克服的。由于病人的情况和环境引起的精神分析的外来阻力，在理论上不至于引发关注，却有重大的实际影响。精神分析就好比一次外科手术，它有权在有利于成功的情况下实施。大家都知道外科医生习惯采取的准备措施：合适的手术室、适宜的灯光、手术助理、请家属离开，等等。大家想想，如果手术必须当着所有家属的面进行，他们染指手术区，对每一刀都大叫不已，这样有多少手术能成功呢？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家属干涉是一个极大的危险，我们不知如何应付这个风险。对病人的内部抵抗，我们认为是必然的而且有所准备，但我们如何免受外来阻力？跟病人家属是无法作任何解释的，我们没办法让他们超脱于整个事态之外，也不

能与他们串通一气，因为这样我们有可能失去病人的信任，他们希望医生站在自己这边的要求是正当的。另外，但凡了解常见的家庭不和的人比分析师更明白，病人的近亲与其希望看到病人治愈，可能更希望他们保持现状。常有的情况是，要是神经症与家庭成员的冲突有关，则健康家人在其自身利益和病人康复间做出选择是不会犹豫太久的。一个丈夫对治疗反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大多会有准确的直觉，这个治疗或将暴露他的丑恶面，而且要是我们的努力毫无效果，我们不会惊讶，当然也不能为之负责，因为丈夫的阻力与病妻自身的抵抗加在一起，使我们的努力过早地付之东流。在当时的环境中，我们只是在做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Instead of many cases, I shall tell you of just one in which, because of professional precautions, I was destined to play a sad role. Many years ago I treated a young girl who for a long time was afraid to go on the street, or to remain at home alone. The patient hesitatingly admitted that her phantasy had been caused by accidentally observing affectionate relations between her mother and a well-to-do friend of the family. But she was so clumsy—or perhaps so sly—as to give her mother a hint of what had been discussed during the analysis, and changed her behavior toward her mother, insisting that no one but her mother should protect her against the fear of being alone, and anxiously barring the way when her mother wished to leave the house. The mother had previously been very nervous herself, but had been cured years before in a hydropathic sanatorium. Let us say, in that institution she made the acquaintance of the man with whom she was to enter upon the relationship which was able to satisfy her in every respect. Becoming suspicious of the stormy demands of the girl, the mother *suddenly* realized the meaning of her daughter's fear. She must have made herself sick to imprison her mother and to rob her of the freedom she needed to maintain relations with her lover.

Immediately the mother made an end to the harmful treatment. The girl was put into a sanatorium for the nervous and exhibited for many years as “a poor victim of psychoanalysis.” For just as long a period I was pursued by evil slander, due to the unfavorable outcome of this case. I maintained silence because I thought myself bound by the rules of professional discretion. Years later I learned from a colleague who had visited the institution, and had seen the agoraphobic girl ther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ther and the wealthy friend of the family was known all over town, and apparently connived at by the husband and father. It was to this “secret” that our treatment had been sacrificed.

我在众多病例中只选一例说明，在其中，出于职业准则的考虑，我不得不忍气吞声。许多年之前，我治疗了一位年轻女孩，她已有很长时间不敢上街或独自在家。病人迟疑地承认，她因为偶然看到她母亲与一位有钱的家中友人发生亲密关系才开始胡思乱想。但是她笨拙地——也许是狡猾地——将她在分析时透露的这件事给了母亲一点暗示，并且改变了她对于母亲的行为：坚称只有母亲才能帮助她消除孤独恐惧，当母亲离家时她会焦躁地挡住去路。她母亲自己以前也有神经过敏的毛病，但在水疗院（指精神疗养院）治愈后已有多年。这么说吧，她在疗养院与这位男士相熟并且相好，使她在各方面都很满足。她开始怀疑女儿的迫切要求，并猛然 意识到了她女儿恐惧的意义。女儿肯定是故意生病以控制住母亲，剥夺她与情人维持关系的自由。这位母亲马上结束了这次痛苦的治疗。女孩被送进了神经病人疗养院，多年来都作为“可怜的精神分析受害者”的样板。由于这一病例的不幸结局，我在同一段时间中饱受诟污。出于职业道德的责任感，我保持着缄默。几年后，我的一位同事参观了这个疗养院，还见到了那位患有广场恐惧症的女孩，事后他告诉我，女孩的母亲与那位有钱朋友的关系已经全城皆知，貌似还得到了她的丈夫，即女孩父亲的默许。因为这个“秘密”，我们的治疗被牺牲了。

In the years before the war, when the influx of patients from all parts made me independent of the favor or disfavor of my native city, I followed the rule of not treating anyone who was not *sui juris* , was not independent of all other persons in his essential relations of life. Every psychoanalyst cannot do this. You may conclude from my warning against the relatives of patients that for purposes of psychoanalysis we should take the patients away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should limit this therapy to the inmates of sanatoriums. I should not agree with you in this; it is much more beneficial for the patients, if they are not in a stage of great exhaustion, to continue in the sam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y must master the tasks set for them during the treatment. But the relatives ought not to counteract this advantage by their behavior, and above all, they should not antagonize and oppose the endeavors of the physician. But how are we to contend against these influences which are so inaccessible to us! You see how much the prospects of a treatment are determined by the social surroundings and the cultural conditions of a family.

在战前，各地病人纷至沓来，使我免受在家乡城市受到的毁誉的牵连，我定了一个规矩：对于没有完全行为能力、无法独立行事受至亲监护而的病人，一律不予收治。不是每一个精神分析师都要这么做。从我关于病人家属的告诫中，大家可能会推断，我们应该将病人与家人隔离，只在疗养院与其他病患同处。我不同意这种做法，病人没到撑不下去的时候，在相同环境中继续生活对他们有好处，在此情况下他们才能完成治疗为其设定的任务。但是病人家属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而不至于使好事变坏，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应该抵制或反对医生的治疗措施。但我们对家人的影响并不了解，又怎么能抵抗得了它们！大家看到了，一个家庭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程度是怎样地决定了治疗的前景。

This offers a sad outlook indeed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psychoanalysis as a therapy, even if we can explain the great majority of our failures by putting the blame on such disturbing external factors! Friends of analysis have advised us to counterbalance such a collection of failures by means of a statistical compilation on our part of our successful cases. Yet I could not try myself to do this. I tried to explain that statistics would be worthless if the collected cases were not comparable, and in fact, the various neuroses which we have undertaken to treat could, as a matter of fact, hardly be compared on the same basis, since they differed in many fundamental respects. Besides, the period of time over which we could report was too short to permit us to judge the permanency of our cures, and concerning certain cases we could not have given any information whatever. They related to persons who had kept their ailments, as well as their treatment, secret, and whose cure must necessarily be kept secret as well. The strongest hindrance, however, lay in the knowledge that men behave most irrationally in matters of therapy, and that we have no prospect of attaining anything by an appeal to reason. A therapeutic novelty is received either with frenzied enthusiasm, as was the case when Koch first made public his tuberculin against tuberculosis, or it is treated with abysmal distrust, as was the really blessed vaccination of Jenner, which even today retains implacable opponents. There was a very obvious prejudice against psychoanalysis. When we had cured a very difficult case we would hear it said: “That is no proof, he would have become well by himself in all this time.” Yet when a patient who had already gone through four cycles of depression and mania came into my care during a temporary cessation in the melancholia, and three weeks later found herself in the beginnings of a new attack, all the members of the family as well as the high medical authorities called into consultation, were convinced that the new attack could only be the result of the attempted analysis.

Against prejudice we are powerless; you see it again in the prejudices that one group of warring nations has developed against the other. The most sensible thing for us to do is to wait and allow time to wear it away. Some day the same persons think quite differently about the same things than before. Why they formerly thought otherwise remains the dark secret.

精神分析的疗效因此不容乐观，即使我们能将大部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外来因素的干扰。精神分析的友好人士建议我们这一方用大量成功案例的数据来稀释这一系列的败果。不过我不能尝试此事。我试着解释说，如果选择的病例没有可比性，那么数据并无意义，而且事实上，我们负责治疗的各种神经症其实不能在同一基准上比较，因为它们的许多基本面都不太相同。而且，我们的研究报告期太短，不能判定疗效的持久性，而且对有些病例我们不能透露任何情况。这些病人的病情与治疗都是保密的，因此他们的治愈情况也必然要保密。不过，最强大的障碍在于一个认识，即：人们在治疗问题上的表现极不理性，合理论证并不能说明问题。创新的治疗手段要么受到疯狂追捧，比如科赫首次发布治疗肺结核的结核菌素；要么遭到深切质疑，比如詹纳的种痘法虽堪称福音，但至今仍不乏忿恨的反对者。关于精神分析的偏见非常明显。当我们治愈了一个重症病例后，有人会说："这不能证明什么，这么长时间他自己都可以康复了。"可是，一个已反复发作过四次忧郁症和躁狂症的病人在其忧郁症短暂间歇期开始接受我的治疗，她于三周后病情再次发作，所有家庭成员谘问了一些医学专家后认为，新发作的病只能是这次分析治疗尝试的后果。我们对于偏见是无能为力的，大家也看到了，在两大参战阵营中，双方国家对彼此都有着偏见。对我们来说，最理智的事莫过于静候时光冲淡偏见。终有一天，同批人对同件事的想法会比从前大有不同。他们之前反对的原因仍是神秘莫测。

It may be possible that the prejudice against psychoanalysis is

already on the wane. The continual spread of psychoanalytic doctrine,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physicians in many lands who treat analytically, seems to vouch for it. When I was a young physician I was caught in just such a storm of outraged feeling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toward hypnosis, treatment by suggestion, which today is contrasted with psychoanalysis by “sober” men. Hypnotism did not, however, as a therapeutic agent, live up to its promises; we psychoanalysts may call ourselves its rightful heirs, and we have not forgotten the large amount of encouragement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we owe to it. The injuries blamed upon psychoanalysis are limited essentially to temporary aggravation of the conflict when the analysis is clumsily handled, or when it is broken off unfinished. You have heard our justification for our form of treatment, and you can form your own opinion as to whether or not our endeavors are likely to lead to lasting injury. Misuse of psychoanalysis is possible in various ways; above all, transference is a dangerous remedy in the hands of an unconscientious physician. But no professional method of procedure is protected from misuse; a knife that is not sharp is of no use in effecting a cure.

也有可能，对于精神分析的偏见已经在淡化。精神分析学说的持续传播，不少国家分析治疗师队伍不断壮大，似乎验证了这一点。我在青年从医时期，曾被医学界对催眠疗法或暗示治疗法的怒涛狂潮殃及一时，而现在它倒是被一些“理智”人士拿来与精神分析作比较。然而，催眠疗法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并未实践其承诺，我们精神分析师可自称为其正当继承者，不会忘记从它那里获得的大量启发和理论阐释。人们指责精神分析造成的伤害，实质上只是因为分析手法不当或治疗被迫中止造成的病人心理冲突暂时加剧。大家已经知道我们治疗方法的合理性，关于我们的措施是否可能导致永久伤害，大家可自行作出判断。精神分析在很多方面都可能被错误使用，更有甚者，在不负责的医生手中，移情成了一种危险的治疗手法。但是任何专业的流

程方法都免不了会被用错，手术刀不锋利，也不能用于手术治疗。

I have thus reached the end,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more than the customary formal speech when I admit that I am myself keenly depressed over the many faults in the lectures I have just delivered. First of all, I am sorry that I have so often promised to return to a subject only slightly touched upon at the time, and then found that the context has not made it possible to keep my word. I have undertaken to inform you concerning an unfinished thing,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my brief exposition itself was an incomplete thing. Often I presented the evidence and then did not myself draw the conclusion. But I could not endeavor to make you masters of the subject. I tried only to give you some explanation and stimulation.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课已经全部讲完了。我承认对自己讲课的诸多失误由衷地感到愧疚，这并不是在说例行的客套话。关键是，对一些当时只能几句带过的问题，我经常承诺另作详细讲解，但是又因为内容局限而无法兑现承诺，对此我很抱歉。我曾答应要告诉大家某个尚未成熟的问题，它仍处于研究过程中，因而我的扼要陈述也不见得完善。我常常提出证据，但自己却没有得出结论。只是，我无意将大家培养成精通本学科的专家。我只是给大家作了一些解释、给了一些鼓励罢了。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Read to Kno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GUSTAVE LE BON

古斯塔夫·勒庞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乌合之众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古斯塔夫·勒庞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目 录

- Preface 前言
- Introduction: The Era of Crowds 序言：群体时代
- Book I The Mind of Crowds 第一卷　群体心理
- Book II The Opinions and Beliefs of Crowds 第二卷　群体意见和群体信仰
- Book III The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the Different Kinds of Crowds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描述
- 版权页

- 返回总目录

Preface

前言

The following work is devoted to an accoun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owds.

这部作品旨在说明群体的特征。

The whole of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with which heredity endows the individuals of a race constitute the genius of the race. When, however, a certain number of these individuals are gathered together in a crowd for purposes of action, observation proves that, from the mere fact of their being assembled, there result certain new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added to the ra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 from them at times to a very considerable degree.

一个种族的成员经由遗传而获得的所有共同特征组成了该种族的气质。但是，当一定数量的个人为了某项行动而聚集成群体时，仅仅从他们构成群体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他们会产生某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补充了种族特征，有时还会表现出与种族特征的极大差别。

Organised crowds have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life of peoples, but this part has never been of such moment as at

present.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unconscious action of crowds for the conscious activity of individuals is one of the princip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sent age.

有组织的群体总是在各个民族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今它们的重要性更是前所未有。当今时代的一个首要特征，就是以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个人的有意识行为。

I have endeavoured to examine the difficult problem presented by crowds in a purely scientific manner—that is, by making an effort to proceed with method, and without being influenced by opinions, theories, and doctrines. This, I believe, is the only mode of arriving at the discovery of some few particles of truth, especially when dealing, as is the case here, with a question that is the subject of impassioned controversy. A man of science bent on verifying a phenomenon is not called upon to concern himself with the interests his verifications may hurt. In a recent publication an eminent thinker, M. Goblet d'Alviela, made the remark that, belonging to none of the contemporary schools, I am occasionally found in opposition of sundry of the conclusions of all of them. I hope this new work will merit a similar observation. To belong to a school is necessarily to espouse its prejudices and preconceived opinions.

我曾试图以一种纯科学的方式来考察群体带来的难题，这种方式意味着努力通过研究方法来取得进展，而不受种种观点、理论和教条的影响。我认为，只有这种方式能使我们发现点滴真相，尤其在处理类似这种易引起激烈争议的问题时，更是如此。当科学家决心要证实某种现象时，他不该去担忧这一证明将伤害哪一方的利益。著名的思

想家阿尔维耶拉先生在最近的一部著作中称："我并不属于任何一种当代的流派，有时我发现自己与所有流派所给出的各类结论均相违背"。我希望这本书也能有此效果，因为一旦属于某一流派，那就必须拥护其偏见与成见。

Still I should explain to the reader why he will find me draw conclusions from my investigations which it might be thought at first sight they do not bear; why, for instance, after noting the extreme mental inferiority of crowds, picked assemblies included, I yet affirm it would be dangerous to meddle with their organisation, notwithstanding this inferiority.

但是，我还是希望向我的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我调查得出的结论乍看之下似乎难以成立。比如说，他们也许会觉得费解：为什么我分明已经指出了包括精锐团体在内的所有群体所具有的极端精神劣性，却还是认定干涉群体的组织将极为危险？

The reason is, that the most attentive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 of history has invariably demonstrated to me that social organisms being every whit as complicated as those of all beings, it is in no wise in our power to force them to undergo on a sudden far-reaching transformations. Nature has recourse at times to radical measures, but never after our fashion, which explains how it is that nothing is more fatal to a people than the mania for great reforms, however excellent these reforms may appear theoretically. They would only be useful were it possible to change instantaneously the genius of nations. This power, however, is only possessed by time. Men are ruled by ideas, sentiments, and customs—matters which are of the essence of ourselves. Institutions and laws are the

outward manifestation of our character, the expression of its needs. Being its outcome, institutions and laws cannot change this character.

理由就是，通过对历史事实最仔细的观察，我发现，社会组织和一切生命体一样复杂，我们绝对无法迫使它们骤然产生深刻变革。有时候自然界会借助一些激烈的手段，但和我们的方式大有不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对重大变革的狂热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最为致命，无论这些变革在理论上显得多么出色。如果其能立刻改变该民族的气质，才算得上有用。但是，只有时间拥有这一力量。人们被自己的思想、情感和习惯左右，这都出于我们的本性。制度和法律是我们性格的外在表现形式，反映其需求。但是，制度和法律作为其产物，是无法改变这一性格的。

The study of social phenomena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at of the peoples among whom they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From the philosophic point of view these phenomena may have an absolute value; in practice they have only a relative value.

要想研究社会现象，必须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些现象可能具有绝对价值；但是实际上，它们只有相对价值。

It is necessary, in consequence, when studying a social phenomenon, to consider it successively under two very different aspects. It will then be seen that the teachings of pure reason are very often contrary to those of practical reason. There are scarcely any data, even physical, to which this distinction is not applicabl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bsolute truth a cube or a circle are invariable geometrical figures, rigorously defined by certain formula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impression they make on our eye these geometrical figures may assume very varied shapes. By perspective the cube may be transformed into a pyramid or a square, the circle into an ellipse or a straight line. Moreove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se fictitious shapes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of the real shapes, for it is they and they alone that we see and that can be reproduced by photography or in pictures. In certain cases there is more truth in the unreal than in the real. To present objects with their exact geometrical forms would be to distort nature and render it unrecognisable. If we imagine a world whose inhabitants could only copy or photograph objects, but were unable to touch them,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for such persons to attain to an exact idea of their form. Moreover, the knowledge of this form, accessible only to a small number of learned men, would present but a very minor interest.

因此，当研究社会现象时，必须从先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样，我们往往会发现，纯理性的教学与实践理性的教学是截然相反的。这一点适用于几乎所有数据，即便自然科学方面也概莫能外。从绝对真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立方体或者圆形都是不变的几何图形，这都是由某些公式所明确规定的。但是从它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来看，这些图形或许形状各异。从透视角度来说，立方体可能会变成锥形或方形，圆形可能会变成椭圆形或直线。更何况，考虑这些设想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的真实形状更为重要，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和通过照片、影片重现出的正是这些设想的形状，再无其他。在某些情况下，不真实的事物所包含的真理远比真实事物要多。试图呈现出这些图形的几何形态，会扭曲自然，使之变得难以辨认。不妨来想象一下，假如这个世界上的人只会复制或翻拍物体，但无法触碰它们，他们将很难获知这些物体的实际形态。更何况，如果只有少数博学之士能了解这一

形态，那这样的知识也就无甚大用了。

The philosopher who studies social phenomena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side by side with their theoretical value they possess a practical value, and that this latter, so far as the evolution of civilisation is concerned, is alone of importance. The recognition of this fact should render him very circumspect with regard to the conclusions that logic would seem at first to enforce upon him.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该牢记，要把实用价值与理论价值放在同等位置，并且就文明的进化而言，只有前者是重要的。承认上述事实之后，当他面对逻辑最初强加于他的结论时，就会变得极为谨慎了。

There are other motives that dictate to him a like reserve.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facts is such,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grasp them as a whole and to foresee the effects of their reciprocal influence. It seems, too, that behind the visible facts are hidden at times thousands of invisible causes. Visible social phenomena appear to be the result of an immense, unconscious working, that as a rule is beyond the reach of our analysis. Perceptible phenomena may be compared to the waves, which are the expression on the surface of the ocean of deep-lying disturbances of which we know nothing. So far as the majority of their acts are considered, crowds display a singularly inferior mentality; yet there are other acts in which they appear to be guided by those mysterious forces which the ancients denominated destiny, nature, or providence, which we call the voices of the dead, and whose power it is impossible to overlook, although we ignore their essence. It would seem, at times, as if

there were latent forces in the inner being of nations which serve to guide them. What, for instance, can be more complicated, more logical, more marvellous than a language? Yet whence can this admirably organised production have arisen, except it be the outcome of the unconscious genius of crowds? The most learned academics, the most esteemed grammarians can do no more than note down the laws that govern languages; they would be utterly incapable of creating them. Even with respect to the ideas of great men are we certain that they are exclusively the offspring of their brains? No doubt such ideas are always created by solitary minds, but is it not the genius of crowds that has furnished the thousands of grains of dust forming the soil in which they have sprung up?

还有一些其他动机使他持保留态度。社会事实如此复杂，要想将它们全部掌握并预见它们相互影响的后果是不可能的。并且，在可见的事实之下有时埋藏着数以千计的不可见成因。可见的社会现象是一个巨大的、无意识的机制作用的结果，而这样的机制往往是我们所无法分析领会的。我们可以把可察觉的现象比作波浪，它们只是大海深处的暗流呈现在海面上的表象。考虑到群体的大多数行为，它们往往在精神上的表现极为低劣；但是，它们的某些行为似乎又受到神秘力量的指引，这种神秘力量被古人称作命运、自然或者天意，我们往往称其为“前人之声”，尽管我们并不了解其本质，却无法忽视其力量。有时，民族的内在中似乎潜藏着某种指引它们的力量。比如说，还有什么能比语言更复杂、更具逻辑性、更美妙呢？但是，这种组织精妙的产物，若非来自群体无意识的禀赋，又是从何而起呢？最渊博的学者、最顶尖的语法学家，也只能记下支配语言的规律，却完全无法创造它们。说到伟人们的想法，我们又如何能确定这些想法完全是他们大脑的产物呢？毫无疑问，这些想法是由单独的头脑创造的，但是，滋养出这些想法的土壤，不正是群体的禀赋所带来的无数沙土汇聚而成的吗？

Crowds, doubtless, are always unconscious, but this very unconsciousness is perhaps one of the secrets of their strength. In the natural world beings exclusively governed by instinct accomplish acts whose marvellous complexity astounds us. Reason is an attribute of humanity of too recent date and still too imperfect to reveal to us the laws of the unconscious, and still more to take its place. The part played by the unconscious in all our acts is immense, and that played by reason very small. The unconscious acts like a force still unknown.

毫无疑问，群体往往是无意识的，但这种无意识或许就是群体力量的秘密来源之一。在自然世界中，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物会做出一些行为，其中精妙的复杂性令人震惊。理性是人性中最近才产生的特质，它还不足以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要想站稳脚跟，尚需一些时日。我们的所有行为中，无意识行为占了极大比重，而理性成分少得可怜。无意识就像是一种未知力量，发挥着作用。

If we wish, then, to remain within the narrow but safe limits within which science can attain to knowledge, and not to wander in the domain of vague conjecture and vain hypothesis, all we must do is simply to take note of such phenomena as are accessible to us, and confine ourselves to their consideration. Every conclusion drawn from our observation is, as a rule, premature, for behind the phenomena which we see clearly are other phenomena that we see indistinctly, and perhaps behind these latter, yet others which we do not see at all.

如果我们想要待在狭小的安全区内通过科学获取知识，而不涉足模糊的猜想和徒劳的假设，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注意我们所接触

到的现象，且仅仅对此展开思索。我们通过观察所作的结论通常不够成熟，因为在清晰可见的现象背后，往往是若隐若现的其他现象，而或许在那之后还会有我们全然不知的现象。

Introduction: The Era of Crowds

序言：群体时代

The evolution of the present age—The great changes in civilisation are the consequence of changes in National thought—Modern belief in the power of crowds—It transforms the traditional policy of the European states—How the rise of the popular classes comes about,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they exercise their power—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s of the power of the crowd—Crowds unable to play a part other than destructive—The dissolution of worn-out civilisations is the work of the crowd—General ignorance of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Importance of the study of crowds for legislators and statesmen.

提要：当代的变革 / 文明的巨大变革是民族思想变化的结果 / 现代人对于群体力量的确信 / 它改变了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 / 大众如何崛起，又如何使用权力 / 群体力量的必然结果 / 群体别无它用，只会破坏 / 衰败文明的消亡是群体作用的结果 / 对于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 / 立法者与政治家研究群体的重要性

The great upheavals which precede changes of civilisations such as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Arabian Empire, seem at first sight determined more especially by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foreign invasion, or the overthrow of dynasties. But a more attentive study of these events shows that behind their apparent causes the real cause is generally seen to be a profound modification in the ideas of the peoples. The true historical upheavals are not those which astonish us by their

grandeur and violence. The only important changes whence the renewal of civilisations results, affect ideas, conceptions, and beliefs. The memorable events of history are the visible effects of the invisible changes of human thought. The reason these great events are so rare is that there is nothing so stable in a race as the inherited groundwork of its thoughts.

先于文明变革的剧变，诸如罗马帝国的灭亡与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一看，似乎都是由政治变革、外族入侵和朝代倾覆决定的。然而，若对这些事件做更为细致的研究便会发现，在这些表因背后隐藏着一个真正的普遍原因，即人们思想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历史剧变，并不是那些以宏伟暴力的场面震慑我们的事件。文明变革带来的惟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都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产生的可见效果。这些伟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稀少，是因为一个民族最稳定的因素便是其代代相传的思想基础。

The present epoch is one of these critical moments in which the thought of mankind is undergoing a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当今的时代是人类思想经历转型的关键时期之一。

Two fundamental factors are at the bas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first is the destruction of those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social beliefs in which all the elements of our civilisation are rooted. The second is the creation of entirely new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and thought as the result of modern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discoveries.

构成这一转型基础的有两个基本因素。首先是宗教、政治与社会信仰的破灭，而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植根于这些信仰之中。其次是生存和思想的全新条件的产生，而这是现代科学与工业发现的结果。

The ideas of the past, although half destroyed, being still very powerful, and the ideas which are to replace them being still in process of formation, the modern age represents a period of transition and anarchy.

过去的观点，虽已残缺不全，但仍力量强大，取而代之的观点仍在形成之中，而当前的时代正处于一种混沌的转型时期。

It is not easy to say as yet what will one day be evolved from this necessarily somewhat chaotic period. What will be the fundamental ideas on which the societies that are to succeed our own will be built up? We do not at present know. Still it is already clear that on whatever lines the societies of the future are organised, they will have to count with a new power, with the last surviving sovereign force of modern times, the power of crowds. On the ruins of so many ideas formerly considered beyond discussion, and to-day decayed or decaying, of so many sources of authority that successive revolutions have destroyed, this power, which alone has arisen in their stead, seems soon destined to absorb the others. While all our ancient beliefs are tottering and disappearing, while the old pillars of society are giving way one by one, the power of the crowd is the only force that nothing menaces, and of which the prestige is continually on the increase. The age we are about to enter will in truth be the ERA OF CROWDS.

这个所谓的混沌时期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现在还难下结语。而什么样的基本观念将会构成我们之后社会的建设基础？亦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未来社会无论以何种路线建立，都必须考虑一种新的力量，一种持久而至高无上的当代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如此之多曾经毋庸置疑而今已然或正在衰落的观念，如此之多为接连着的革命所摧毁的权威资源，在它们的废墟之上，这种力量代之雄起，注定将其他力量收入麾下。当所有旧时的信仰崩塌殆尽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支柱逐个倾倒之时，唯有群体的力量不为所动，且声势逐渐浩大。我们即将步入的时代的的确确就是群体时代。

Scarcely a century ago the traditional policy of European states and the rivalries of sovereigns were the principal factors that shaped events. The opinion of the masses scarcely counted, and most frequently indeed did not count at all. To-day it is the traditions which used to obtain in politics, and the individual tendencies and rivalries of rulers which do not count; while, on the contrary, the voice of the masses has become preponderant. It is this voice that dictates their conduct to kings, whose endeavour is to take note of its utterances. The destinies of nations are elaborated at present in the heart of the masses, and no longer in the councils of princes.

就在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与君主间的敌对，是引发争端的主要因素。群众的意见极少起到作用，大多数时候甚至毫无作用。而如今，在政治领域中曾有所运用的各类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倾向以及互相对抗已不起作用，反倒是群众之声占据了优势。正是这些声音向国王表明了他们的举动，使得国王必须注意这些声音的内容。如今，国家的命运由群众的心意决定，而不再是君王的政务委员会独裁。

The entry of the popular classes into political life—that is to say, in reality, their progressive transformation into governing classes—is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characteristics of our epoch of transi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which exercised for a long time but little influence, is not, as might be thought,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this transference of political power. The progressive growth of the power of the masses took place at first by the propagation of certain ideas, which have slowly implanted themselves in men's minds, and afterwards by the gradual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s bent on bringing about the realisation of theoretical conceptions. It is by association that crowds have come to procure ideas with respect to their interests which are very clearly defined if not particularly just, and have arrived at a consciousness of their strength. The masses are founding syndicates before which the authorities capitulate one after the other; they are also founding labour unions, which in spite of all economic laws tend to regulate the conditions of labour and wages. They return to assemblies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is vested, representatives utterly lacking initiative and independence, and reduced most often to nothing else than the spokesmen of the committees that have chosen them.

我们所处的过渡时代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那便是大众逐渐介入政治生活，实际上也就是他们向着统治阶层不断转化。政治权力的转移最明显的特点，或许有人认为是，但实际上并不是普选的产生，在予以施行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都影响甚微。群众力量最初的壮大，源于某种观念的传播，而后慢慢在人们头脑中扎根发芽，之后的再次壮大得益于个人为将理念化为现实而相互逐渐产生联系。通过联系，群体才了解了有关自身利益的一些观念，即便这些利益不是特别正当，但却非常明确，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群众正在成

立联合会，而政府接连向他们投降，此外他们还在成立工会，旨在超越经济规律，对劳动条件和薪酬进行调控。他们转向支配政府的议会，那里议员们丧失了主动权和独立性，全然沦为那些将他们选举出来的委员会的传声筒。

To-day the claims of the mass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harply defined, and amount to nothing less than a determination to utterly destroy society as it now exists, with a view to making it hark back to that primitive communism which was the normal condition of all human groups before the dawn of civilisation. Limitations of the hours of labour, the nationalisation of mines, railways, factories, and the soil,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all products, the elimination of all the upper class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opular classes, such are these claims.

如今，群众的诉求愈发明确，已呈现出彻底解构现有社会之势，意图恢复文明诞生之前所有人类群体表现出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常态。这些诉求包括：限制劳动时间、将矿产、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均分配所有产品以及为维护大众利益而消灭上层阶级等等。

Little adapted to reasoning, crowds, on the contrary, are quick to act. As the result of their present organisation their strength has become immense. The dogmas whose birth we are witnessing will soon have the force of the old dogmas; that is to say, the tyrannical and sovereign force of being above discussion. The divine right of the masses is about to replace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群体不善理论，而急于行动。得益于已有的组织成果，他们的力

量已变得十分强大。那些产生过程为人所目睹的教条，不久便会拥有旧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专制力量。群众神圣的权利即将取代国王神圣的权利。

The writers who enjoy the favour of our middle classes, those who best represent their rather narrow ideas, their somewhat prescribed views, their rather superficial scepticism, and their at times somewhat excessive egoism, display profound alarm at this new power which they see growing; and to combat the disorder in men's minds they are addressing despairing appeals to those moral forces of the Church for which they formerly professed so much disdain. They talk to us of the bankruptcy of science, go back in penitence to Rome, and remind us of the teachings of revealed truth. These new converts forget that it is too late. Had they been really touched by grace, a like operation could not have the same influence on minds less concerned with the preoccupations which beset these recent adherents to religion. The masses repudiate to-day the gods which their admonishers repudiated yesterday and helped to destroy. There is no power, Divine or human, that can oblige a stream to flow back to its source.

那些与中产阶级趣味相投的作家们，最能反映他们狭隘的思想、陈腐的观念、肤浅的怀疑主义和有时稍显过分的自负感。眼见这种新力量不断壮大，他们感到非常惊恐，为了纠正人们的混乱头脑，他们开始竭力号召过去曾嗤之以鼻的教会道德势力。他们向我们谈及科学的破产，心怀忏悔地回归罗马教廷的怀抱，提醒着我们启示性真理的教诲。这些新的皈依者忘记了，如今为时已晚。即便他们真的为天恩所动，类似的活动也不会对群众的头脑再产生同样的影响。因为他们不太关注使这些新皈依者们忧心忡忡的事情。如今，群众拒绝接受他们的劝诫者早已摒弃且力图毁灭的诸神。没有任何一种力量，神力也

好，人力也罢，可以让河流倒流至其源头。

There has been no bankruptcy of science, and science has had no share in the present intellectual anarchy, nor in the making of the new power which is springing up in the midst of this anarchy. Science promised us truth, or at least a knowledge of such relations as our intelligence can seize: it never promised us peace or happiness. Sovereignly indifferent to our feelings, it is deaf to our lamentations. It is for us to endeavour to live with science, since nothing can bring back the illusions it has destroyed.

科学从未破产，与当今知识界的混沌状态毫不相关，在这混沌之中雄起的新力量亦不是由它造成。科学给予我们真相，至少是我们的才智所能掌握的此类关系的知识，而科学从未向我们承诺过和平或幸福。对于我们的感情，它冷漠至极，对于我们的哀伤，它充耳不闻。鉴于被科学打破的幻想无可恢复，我们要努力在科学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Universal symptoms, visible in all nations, show us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power of crowds, and do not admit of our supposing that it is destined to cease growing at an early date. Whatever fate it may reserve for us, we shall have to submit to it. All reasoning against it is a mere vain war of words. Certainly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advent to power of the masses marks one of the last stage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a complete return to those periods of confused anarchy which seem always destined to precede the birth of every new society. But may this result be prevented?

群体力量飞速壮大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所体现，这些表现打破了我们认为群体力量注定不会长久的猜测。无论未来它会如何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们都要向之臣服。任何反抗它的理论都只是纸上谈兵，徒劳无功。诚然，群众力量的出现很有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开化的最后阶段之一，完全倒退到每一个新社会诞生前必定出现的混沌时期。但是这种结果可以阻止吗？

Up to now these thoroughgoing destructions of a worn-out civilisation have constituted the most obvious task of the masses. It is not indeed to-day merely that this can be traced. History tells us, that from the moment when the moral forces on which a civilisation rested have lost their strength, its final dissolution is brought about by those unconscious and brutal crowds known, justifiably enough, as barbarians. Civilisations as yet have only been created and directed by a small intellectual aristocracy, never by crowds. Crowds are only powerful for destruction. Their rule is always tantamount to a barbarian phase. A civilisation involves fixed rules, discipline, a passing from the instinctive to the rational state, forethought for the future, an elevated degree of culture—all of them conditions that crowds, left to themselves, have invariably shown themselves incapable of realising. In consequence of the purely destructive nature of their power crowds act like those microbes which hasten the dissolution of enfeebled or dead bodies. When the structure of a civilisation is rotten, it is always the masses that bring about its downfall. It is at such a juncture that their chief mission is plainly visible, and that for a while the philosophy of number seems the only philosophy of history.

迄今为止，彻底击垮衰落了的文明一直是群众最为明确的任务。这当然不是只在今天可以找到迹象。历史告诉我们，从文明所依靠的

道德势力丧失力量的那一刻起，该文明衰落的结局就已由其无知残忍的群众决定，毫不过分地说，这些群众就是野蛮人。文明向来由小部分有才智的上层阶级创造和领导，而不是群众。群众的力量只能用来搞破坏。他们的准则与野蛮阶段一致。那些拥有固定准则和纪律，从本能状态发展至理性状态且能够未雨绸缪的文明，拥有高级的文化层次。群众全部都已证明，所有的这些，仅靠他们自己是无法达成的。由于其力量具有纯粹的破坏天性，群体如同微生物一般加速了衰弱者或死尸的分解。文明的框架解构时，总是民众将其彻底摧毁。只有在这种转折时期，民众的主要使命才会凸显，这时，人多势众的理论似乎成为了惟一的历史法则。

Is the same fate in store for our civilisation? There is ground to fear that this is the case, but we are not as yet in a position to be certain of it.

我们的文明是否亦将面临如此的命运？这种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但我们仍然不能肯定。

However this may be, we are bound to resign ourselves to the reign of the masses, since want of foresight has in succession overthrown all the barriers that might have kept the crowd in check.

无论结果如何，我们终将顺从于群众，群众短浅的目光已清除了能控制他们的所有障碍。

We have a very slight knowledge of these crowds which are

beginning to be the object of so much discussion. Professional students of psychology, having lived far from them, have always ignored them, and when, as of late, they have turned their attention in this direction it has only been to consider the crimes crowds are capable of committing. Without a doubt criminal crowds exist, but virtuous and heroic crowds, and crowds of many other kinds, are also to be met with. The crimes of crowds only constitute a particular phase of their psychology. The mental constitution of crowds is not to be learnt merely by a study of their crimes, any more than that of an individual by a mere description of his vices.

对于这些逐渐开始成为热点话题的群体，我们知之甚少。因为与这些群体的生活交集甚少，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常常将其忽略，而当他们终于开始关注这个方向时，又仅仅考虑到了群体可能实施的犯罪。毫无疑问，犯罪群体的确存在，但是具有善良英勇或其他特点的群体同样存在。群体性犯罪仅仅是他们某个特定的心理阶段。对于群体的精神构成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他们的犯罪，这就好比描述一个人却只看到其恶行。

However, in point of fact, all the world's masters, all the founders of religions or empires, the apostles of all beliefs, eminent statesmen, and, in a more modest sphere, the mere chiefs of small groups of men have always been unconscious psychologists, possessed of an instinctive and often very sure knowledge of the character of crowds, and it is their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is character that has enabled them to so easily establish their mastery. Napoleon had a marvellous insight into the psychology of the masses of the country over which he reigned, but he, at times, completely misunderstood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belonging to other races [2_1] and it is because he thus misunderstood it that he

engaged in Spain, and notably in Russia, in conflicts in which his power received blows which were destined within a brief space of time to ruin it. A knowledge of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is to-day the last resource of the statesman who wishes not to govern them—that is becoming a very difficult matter—but at any rate not to be too much governed by them.

然而，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大师、宗教和王国的开创者、各类信仰的信徒、杰出的政治家，甚至从平凡一点的层面来说，小团体的领袖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拥有某种出于本能但通常十分可靠的了解。而往往正是因为这种了解，他们才能轻而易举地确立其领导地位。拿破仑对于其统治的群众的心理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但对于其他民族有时则是完全误解[3_1]，因此，在征战西班牙尤其是俄罗斯的时候，他遭受到了致命打击，这一打击注定在短期内将其置于死地。如今，那些不愿再统治群众（这正在演变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只想不太接受他们统治的政客们，将群体心理学的知识作为他们最后的资源。

It is only by obtaining some sort of insight into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that it can be understood how slight is the action upon them of laws and institutions, how powerless they are to hold any opinions other than those which are imposed upon them, and that it is not with rules based on theories of pure equity that they are to be led, but by seeking what produces an impression on them and what seduces them. For instance, should a legislator, wishing to impose a new tax, choose that which would be theoretically the most just? By no means. In practice the most unjust may be the best for the masses. Should it at the same time be the least obvious, and apparently the least burdensome, it will be the most easily tolerated.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an indirect tax, however

exorbitant it be, will always be accepted by the crowd, because, being paid daily in fractions of a farthing on objects of consumption, it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the habits of the crowd, and will pass unperceived. Replace it by a proportional tax on wages or income of any other kind, to be paid in a lump sum, and were this new imposition theoretically ten times less burdensome than the other, it would give rise to unanimous protest. This arises from the fact that a sum relatively high, which will appear immense, and will in consequence strike the imagination, has been substituted for the unperceived fractions of a farthing. The new tax would only appear light had it been saved farthing by farthing, but this economic proceeding involves an amount of foresight of which the masses are incapable.

只有对于群体的心理拥有一些洞察力，才会理解，法律和制度对于他们来说作用多么微弱，才会理解除了别人强加的观念，他们是多么没有主见。以纯粹平等理论为基础的准则是无法领导他们的，而要去寻找那些能让他们印象深刻、能诱惑他们的东西。比如说，一位希望实行新税制的立法者，是否应该选择理论上最公平的方式？他绝不会这样做。实际上，对于群众来说，最不公平的可能才是最好的。那些最不明确且负担最小的，才最容易被他们所容忍。正因如此，群众总能接受间接税，无论它有多高。因为每天为日常消费品支付少量税金，并不会影响群众的习惯，所以能够在不知不觉间得以进行。假如换作是一种从工资或其他收入中收取的比例税，即一次性付出一大笔钱，就算其理论上比间接税造成的负担小十倍，也会引起群众一致的抗议。这是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那些高额的钱款看起来数量巨大，总让人心惊，如今它们早已为让人难以察觉的零星钱款所取代。新税收看起来不重，是因为其是一点点收取的，但这种经济手段需要具备一定群众所没有的远见。

The example which precedes is of the simplest. Its appositeness will be easily perceived. It did not escape the attention of such a psychologist as Napoleon, but our modern legislators, ignorant as they ar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rowd, are unable to appreciate it. Experience has not taught them as yet to a sufficient degree that men never shape their conduct upon the teaching of pure reason.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其适用性极易理解。拿破仑这样的心理学家对其有所关注，但当今社会，对于群体性格一无所知的立法者们却不甚了解。经验至今还未让他们充分明白，人们从不根据纯粹理性的教导来采取行动。

Many othe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might be made of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A knowledge of this science throws the most vivid light on a great number of historical and economic phenomena totally incomprehensible without it. I shall have occasion to show that the reason why the most remarkable of modern historians, Taine, has at times so imperfectly understood the events of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is, that it never occurred to him to study the genius of crowds. He took as his guide in the study of this complicated period the descriptive method resorted to by naturalists; but the moral forces are almost absent in the case of the phenomena which naturalists have to study. Yet it is precisely these forces that constitute the true mainsprings of history.

群体心理学在其他诸多方面都有所应用。掌握这类科学知识，能对许多历史现象和经济现象都作出最生动的解释，若没有它们，这些现象便显得完全不可思议。我将找机会说明为什么最著名的现代历史学家伊波利特·丹纳有时不能够准确地理解法国大革命，那是因为他从

未想过要研究群体的特征。他在研究这个复杂的时期时是以自然学家的描述方法为指导的，然而自然学家研究的现象中，几乎都缺失道德势力这一因素。但是，正是这些势力塑造了历史真正的主体部分。

In consequence, merely looked at from its practical side, the study of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deserved to be attempted. Were its interest that resulting from pure curiosity only, it would still merit attention. It is as interesting to decipher the motives of the actions of men as to deter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mineral or a plant. Our study of the genius of crowds can merely be a brief synthesis, a simple summary of our investigations. Nothing more must be demanded of it than a few suggestive views. Others will work the ground more thoroughly. To-day we only touch the surface of a still almost virgin soil.

所以，单从实际的角度来看，群体心理学很值得研究。就算是纯粹出于好奇，群体心理学也很值得关注。破译人类行为的动因，和研究一种矿石或植物的特性一样有趣。我们对于群体特征的研究，只能算是一个简短的概括，对我们的调查的一个简单总结。除了一点建议性的想法之外，对此研究不必抱有太多要求。后人会在此领域研究得更加透彻。如今我们仅仅触及到了一片未经开垦之地的表层而已。

[2_1].His most subtle advisers, moreover, did not understand this psychology any better. Talleyrand wrote him that "Spain would receive his soldiers as liberators." It received them as beasts of prey. A psychologist acquainted with the hereditary instincts of the Spanish race would have easily foreseen this reception.

[3_1].甚至连他最机智的顾问对这一心理都不甚了解。塔列朗给他写道：“西班牙会以解放者的名义接纳他的士兵。”但事实上西班牙将他们视作洪水猛兽。一位心理学家认为从西班牙民族代代相传的天性里便能预见这一结果。

Book I The Mind of Crowds

第一卷　群体心理

Chapter I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Crowds—Psychological Law of Their Mental Unity.

第一章　群体的普遍特征／群体精神统一律的心理学法则

What constitutes a crowd from the psychological point of view—A numerically strong agglomeration of individuals does not suffice to form a crowd—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crowds—The turning in a fixed direction of the ideas and sentiments of individuals composing such a crowd,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ir personality—The crowd is always dominated by considerations of which it is unconscious—The disappearance of brain activity and the predominance of medullar activity—The lowering of the intelligence and the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ntiments—The transformed sentiments may be better or worse than those of the individuals of which the crowd is composed—A crowd is as easily heroic as criminal.

提要：从心理学角度看群体的构成／许多个人的聚集并不足以构成群体／群体心理的特征／群体中个人的固有观念与情感的转变以及他们个性的丧失／群体总受无意识的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的消失及脊髓活动的主导地位／智力下降及情感的完全转变／转变后的情感可能会比群体中个人的情感更好或更坏／群体容易变得英勇，也容易犯罪

In its ordinary sense the word “crowd” means a gathering of

individuals of whatever nationality, profession, or sex, and whatever be the chances that have brought them together. From the psychological point of view the expression “crowd” assumes quite a different signification. Under certain given circumstances, and only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an agglomeration of men presents new characteristics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individuals composing it. The sentiments and ideas of all the persons in the gathering take one and the same direction, and their conscious personality vanishes. A collective mind is formed, doubtless transitory, but presenting very clearly defined characteristics. The gathering has thus become what, in the absence of a better expression, I will call an organised crowd, or, if the term is considered preferable, a psychological crowd. It forms a single being, and is subjected to the 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

从平常的角度来看，“群体”一词的意思是许多个人的聚集，无论他们的国籍、职业、性别和聚集的原因是什么。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在特定的环境下，且仅在这些环境下，聚集在一起时，群体会呈现出个人原来没有的特征。群体中各人的情感和观念会相一致，而个人有意识的人格则会消失。集体思维因而形成，这一过程无疑是短暂的，但会表现出明确的特征。这一集体便进入了一种状态，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称之为组织化的群体，或者换个更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它会形成一种独立的存在，这种存在遵循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法则。

It is evident that it is not by the mere fact of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finding themselves accidentally side by side that they acquire the character of an organised crowd. A thousand individuals accidentally gathered in a public place without any determined

object in no way constitute a crowd from the psychological point of view. To acquire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a crowd, the influence is necessary of certain predisposing causes of which we shall have to determine the nature.

有一点非常明确，一群人仅仅因为偶然聚集在一起，这并不能使他们拥有有机群体的特点。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一千个偶然在公共场合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没有任何既定目标，是绝不可能形成群体的。要想拥有群体的特征，得有某些特定的前提条件起作用，我们必须对这些条件的性质加以确定。

The disappearance of conscious personality and the turning of feelings and thoughts in a definite direction, which are the primary characteristics of a crowd about to become organised, do not always involve the simultaneous presence of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on one spot. Thousands of isolated individuals may acquire at certain moments,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ertain violent emotions—such, for example, as a great national event—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psychological crowd. It will be sufficient in that case that a mere chance should bring them together for their acts to at once assume the characteristics peculiar to the acts of a crowd. At certain moments half a dozen men might constitute a psychological crowd, which may not happen in the case of hundreds of men gathered together by accident. On the other hand, an entire nation, though there may be no visible agglomeration, may become a crowd under the action of certain influences.

即将形成的群体的主要特征，包括有意识的人格的消失以及情感与想法向某一特定方向的转变，但这些特征不一定需要一群人在同一

地点同时出现。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体，可能会在某些特定时刻，在激动情绪的作用下，比如在国家大事发生之时，产生群体性的心理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一个偶然事件就能将他们迅速聚集起来，形成群体行为独有的特征。有些时候，五六个人也能组成一个心理群体，这是成百上千的人偶然聚集时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另一方面，整个民族在特定影响的作用下，能形成一个群体，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没人看见。

A psychological crowd once constituted, it acquires certain provisional but determinabl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To thes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there are adjoined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which vary according to the elements of which the crowd is composed, and may modify its mental constitution. Psychological crowds, then, are susceptible of classification; and when we come to occupy ourselves with this matter, we shall see that a heterogeneous crowd—that is, a crowd composed of dissimilar elements—presents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in common with homogeneous crowds—that is, with crowds composed of elements more or less akin (sects, castes, and classes)—and side by side with thes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particularities which permit of the two kinds of crowds being differentiated.

一个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就会表现出某些特定的普遍特征，这些特征是暂时的，但却很明确。除去这些普遍特征之外，群体还有一些附带的特征，这些特征随群体组成要素的不同而变化，其精神结构也可能会发生改变。因此，对心理群体很容易分类，我们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一个异质性群体（即由不同要素构成的群体）会表现出和同质性群体（即构成要素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的群体，如派别、身份和阶级）相同的特征，与此同时，它们还具备一些能用以相互区分的特征。

But before occupying ourselves with th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crowds, we must first of all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common to them all. We shall set to work like the naturalist, who begins by describing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common to all the members of a family before concerning himself with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which allow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genera and species that the family includes.

但在深入研究不同类别的群体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考察一下它们的共同特征。我们应该像自然学家那样开展这项工作，他们总是从描述家族成员的共同特征开始，而后关注使这个家族与其他家族区分开来的类别特征。

It is not easy to describe the mind of crowds with exactness, because its organisation varies not only according to race and composition, but also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and intensity of the exciting causes to which crowds are subjected. The same difficulty, however, presents itself in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an individual. It is only in novels that individuals are found to traverse their whole life with an unvarying character. It is only the uniformity of the environment that creates the apparent uniformity of characters. I have shown elsewhere that all mental constitutions contain possibilities of character which may be manifested in consequence of a sudden change of environment. This explains how it was that among the most savage members of the French Convention were to be found inoffensive citizens who, under ordinary circumstances, would have been peaceable notaries or virtuous magistrates. The storm past, they resumed their normal character of quiet, law-abiding citizens. Napoleon found amongst them his most docile

servants.

精确描述群体思维并不容易，因为群体思维不仅随种族和构成因素而变化，而且还受性质与强度不同的刺激因素控制。对于个人的心理学研究，则面临相同的难题。只有在小说中，个人的性格才会一成不变。环境的单一性才会造就个人性格的明显单一性。我在其他的著作中指出过，所有的精神结构都包含着性格的多种可能性，而环境的突变则会使其表现出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公民会中最野蛮的成员原来都是最无害的公民，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温和的公证员或品行端正的地方执法官。风暴过后，他们又会重新变回安静、守法的普通公民。拿破仑在他们之中找到了最恭顺的佣仆。

It being impossible to study here all the successive degrees of organisation of crowds, we shall concern ourselves more especially with such crowds as have attained to the phase of complete organisation. In this way we shall see what crowds may become, but not what they invariably are. It is only in this advanced phase of organisation that certain new and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re superposed on the unvarying and dominant character of the race; then takes place that turning already alluded to of all the feelings and thoughts of the collectivity in an identical direction. It is onl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oo, that what I have called above the PSYCHOLOGICAL 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 comes into play.

在这里，研究所有不同组织程度的群体是不可能的，我们将着重研究那些组织程度已经达到完善阶段的群体。由此，我们将会看到群体会变成什么样子，而非他们一成不变的样子。只有达到这种先进的组织阶段，种族不变的主要特征才会显现出特定的新特征，这时，影

射在集体感情和思想中的转变会转为同一个明确的方向。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到过的群体精神统一律的心理学法则才开始起效。

Among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rowds there are some that they may present in common with isolated individuals, and others, on the contrary, which are absolutely peculiar to them and are only to be met with in collectivities. It is thes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we shall study, first of all, in order to show their importance.

群体的诸多心理学特征中，有一些可能与孤立的个人相同，而其余的则为群体特有，且仅在群体中体现。我们首先要研究的就是这些独特的特征，以显示其重要性。

The most striking peculiarity presented by a psychological crowd is the following: Whoever be the individuals that compose it, however like or unlike be their mode of life, their occupations, their character, or their intelligence,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crowd puts them in possession of a sort of collective mind which makes them feel, think, and act in a manner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which each individual of them would feel, think, and act were he in a state of isolation. There are certain ideas and feelings which do not come into being, or do not transform themselves into acts except in the case of individuals forming a crowd. The psychological crowd is a provisional being formed of heterogeneous elements, which for a moment are combined, exactly as the cells which constitute a living body form by their reunion a new being which displays characteristics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possessed by each of the cells singly.

心理群体最显著的特征如下：无论构成群体的个人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才智如何，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群体的事实使其拥有一种集体思维，这种集体思维会让他们用一种与作为孤立的个人时截然不同的方式感受、思考和行动。若个人没有组成群体，那么有一些特定的观念和感情就不会形成或转变为行动。心理群体是异质性要素在某一时刻集合在一起的短暂存在形式，恰如细胞通过结合形成一个生物体，这种新的存在形式会表现出与每个细胞孤立存在时不一样的特征。

Contrary to an opinion which one is astonished to find coming from the pen of so acute a philosopher as Herbert Spencer, in the aggregate which constitutes a crowd there is in no sort a summing-up of or an average struck between its elements. What really takes place is a combination followed by the creation of new characteristics, just as in chemistry certain elements, when brought into contact—bases and acids, for example—combine to form a new body possessing propertie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bodies that have served to form it.

与敏锐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所持的观点不同，人们认为，在构成群体的过程中，不存在其构成要素的总和或平均值。真正发生的是产生新特征后的结合过程，好比某些特定的化学元素，例如碱和酸，结合后会形成新物质，而这种新物质具有与构成元素截然不同的特征。

It is easy to prove how much the individual forming part of a crowd differs from the isolated individual, but it is less easy to discover the causes of this difference.

要证明群体与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差异有多大，是很简单的，但要探究差异背后的原因，则没那么容易。

To obtain at any rate a glimpse of them it is necessary in the first place to call to mind the truth established by modern psychology, that unconscious phenomena play an altogether preponderating part not only in organic life, but also in the operations of the intelligence. The conscious life of the mind is of small importance in comparison with its unconscious life. The most subtle analyst, the most acute observer, is scarcely successful in discovering more than a very small number of the unconscious motives that determine his conduct. Our conscious acts are the outcome of an unconscious substratum created in the mind in the main by hereditary influences. This substratum consists of the innumerabl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hich constitute the genius of a race. Behind the avowed causes of our acts there undoubtedly lie secret causes that we do not avow, but behind these secret causes there are many others more secret still which we ourselves ignore. The greater part of our daily actions are the result of hidden motives which escape our observation.

想要多少了解一点原因，首先必须得记住现代心理学确立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在有机活动和智力活动中都起发挥着压倒性的作用。与无意识的生活相比，思维的有意识生活重要性很小。即使是最机智的分析家、最敏锐的观察家，也只能找到很少的支配自己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我们的有意识行为，是一种无意识深层结构的产物，这种深层结构产生于主要受遗传因素影响的脑中。这种深层结构由无数的共同特征组成，这些特征世代相传，构成了一个种族的天性。在我

们行为的公开性原因的背后，无疑有一些无法说明的原因，但在这些原因背后，还有着许多被我们忽视的原因。我们大部分的日常行为都源于我们没有观察到的隐藏动机。

It is more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ose unconscious elements which constitute the genius of a race that all the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it resemble each other, while it is principally in respect to the conscious elements of their character—the fruit of education, and yet more of exceptional hereditary conditions—that the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Men the most unlike in the matter of their intelligence possess instincts, passions, and feelings that are very similar. In the case of every thing that belongs to the realm of sentiment—religion, politics, morality, the affections and antipathies—the most eminent men seldom surpass the standard of the most ordinary individuals. From the intellectual point of view an abyss may exist between a great mathematician and his boot maker,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haracter the difference is most often slight or non-existent.

尤其在无意识要素构成种族天性这一方面，构成同一种族的所有个人都很相似，他们互不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他们性格的有意识要素上，这是教育的结果，但更多的是因为独特的遗传条件。人在智力方面相差最大，但却拥有极其相近的本能、情感和感受。情感领域的所有事物，宗教、政治、道德与爱憎等等，即使是最杰出的人也很少能超越普通人的标准。从智力的角度来看，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与他的鞋匠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从性格上来看，两者间的差异则常常十分微小，甚至没有。

It is precisely these general qualities of character, governed by

forces of which we are unconscious, and possessed by the majority of the normal individuals of a race in much the same degree—it is precisely these qualities, I say, that in crowds become common property. In the collective mind the intellectual aptitudes of the individuals, and in consequence their individuality, are weakened. The heterogeneous is swamped by the homogeneous, and the unconscious qualities obtain the upper hand.

这些普遍的性格特征，由我们无意识的力量掌控，一个民族大多数的普通个人都具备相同程度的此类特征。我认为，正是这些特征构成了群体的共同属性。在群体思维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因而个性也受到削弱。同质性掩盖了异质性，无意识的品质占据上风。

This very fact that crowds possess in common ordinary qualities explains why they can never accomplish acts demanding a high degree of intelligence. The decisions affecting matters of general interest come to by an assembly of men of distinction, but specialists in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are not sensibly superior to the decisions that would be adopted by a gathering of imbeciles. The truth is, they can only bring to bear in common on the work in hand those mediocre qualities which are the birthright of every average individual. In crowds it is stupidity and not mother-wit that is accumulated. It is not all the world, as is so often repeated, that has more wit than Voltaire, but assuredly Voltaire that has more wit than all the world, if by “all the world” crowds are to be understood.

群体所共有的品质十分普通，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群体从来都不能完成需要高智力的工作。涉及全体利益的决定，由优秀人士组成

的议会做出，但各行各业的专家并不比一群庸才做出的决定更高明。真相是，他们只能以人们与生俱来的普通才智完成手头的工作。在群体中，愚蠢会累加，而天生的才智并不会。并不像人们重复的那样，整个世界加起来要比伏尔泰更有智慧，应当是伏尔泰肯定比整个世界都足智多谋，当然，前提是“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

If the individuals of a crowd confined themselves to putting in common the ordinary qualities of which each of them has his share, there would merely result the striking of an average, and not, as we have said is actually the case, the creation of new characteristics. How is it that these new characteristics are created? This is what we are now to investigate.

如果群体中的个人仅仅是把他们共同的普通品质聚集在一起，那得到的仍是明显的平庸，而不会像我们曾提到过的实际情况那样，创造出新的特征。那这些新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便是我们现在要探究的问题。

Different causes determine the appearance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peculiar to crowds, and not possessed by isolated individuals. The first is that the individual forming part of a crowd acquires, solely from numerical considerations, a sentiment of invincible power which allows him to yield to instincts which, had he been alone, he would perforce have kept under restraint. He will be the less disposed to check himself from the consideration that, a crowd being anonymous, and in consequence irresponsible, the sentiment of responsibility which always controls individuals disappears entirely.

由于不同的原因，会形成为群体所独有、而孤立的个人却没有的特征。首先，从数量上考虑，群体中的个人在一种不可抗拒力的驱使下顺从了本能，如果他独自一人的话，这种本能必然要加以压制。他很难不让自己产生这样的想法：群体具有匿名性，所以可以不用承担责任。因此，一直控制着他的责任感就会全部消失。

The second cause, which is contagion, also intervenes to determine the manifestation in crowds of their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trend they are to take. Contagion is a phenomenon of which it is easy to establish the presence, but that it is not easy to explain. It must be classed among those phenomena of a hypnotic order, which we shall shortly study. In a crowd every sentiment and act is contagious, and contagious to such a degree that an individual readily sacrifices his personal interest to the collective interest. This is an aptitude very contrary to his nature, and of which a man is scarcely capable, except when he makes part of a crowd.

第二个原因是传染，这一现象也会影响群体特征的表现形式以及这些特征的发展趋势。传染现象容易形成，但不易解释。其必定属于某种催眠指令下达后会出现的现象之一，下面我们关于这点做些研究。群体中，每一种感情和行为都是具有传染性的，这种传染性的程度之高，足以让个人心甘情愿地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这种品质和他的天性相悖。除非是在群体中，否则极少有人能够做到这样。

A third cause, and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determines in the individuals of a crowd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quite contrary at times to those presented by the isolated individual. I allude to that suggestibility of which, moreover, the contagion

mentioned above is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an effect.

第三个原因，也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了群体中的个人的特征，这些特征有时与个人处于孤立状态时所表现出来的截然相反。我所指的是，上面提到的传染现象是暗示的结果。

To understand this phenomenon it is necessary to bear in mind certain recent physiological discoveries. We know to-day that by various processes an individual may be brought into such a condition that, having entirely lost his conscious personality, he obeys all the suggestions of the operator who has deprived him of it, and commits acts in utter contradiction with his character and habits. The most careful observations seem to prove that an individual immerged for some length of time in a crowd in action soon finds himself—either in consequence of the magnetic influence given out by the crowd, or from some other cause of which we are ignorant—in a special state, which much resembles the state of fascination in which the hypnotised individual finds himself in the hands of the hypnotiser. The activity of the brain being paralysed in the case of the hypnotised subject, the latter becomes the slave of all the unconscious activities of his spinal cord, which the hypnotiser directs at will. The conscious personality has entirely vanished; will and discernment are lost. All feelings and thoughts are bent in the direction determined by the hypnotiser.

要想理解这一现象，必须记住最近的几个心理学发现。今天，我们知道，通过各种途径，个人可能会进入一种状态：完全失去意识人格，对操纵他的人唯命是从，并且做出与他的性格和习惯截然相反的行为。最细致的观察似乎证明，个人参与群体行为一段时间后，很快

就会发现，自己受群体的磁性影响或是由于一些我们不了解的原因，会进入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与被催眠师催眠后进入的奇妙状态非常相似。受到催眠时，个人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会成为自己脊髓无意识活动的奴隶，受到催眠师的任意控制。意识人格全部丧失，意志和洞察力也不复存在。所有的感情和思想都被催眠师所控制。

Such also is approximately the state of the individual forming part of a psychological crowd. He is no longer conscious of his acts. In his case, as in the case of the hypnotised subject, at the same time that certain faculties are destroyed, others may be brought to a high degree of exalt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suggestion, he will undertake the accomplishment of certain acts with irresistible impetuosity. This impetuosity is the more irresistible in the case of crowds than in that of the hypnotised subject, from the fact that, the suggestion being the same for all the individuals of the crowd, it gains in strength by reciprocity. The individualities in the crowd who might possess a personality sufficiently strong to resist the suggestion are too few in number to struggle against the current. At the utmost, they may be able to attempt a diversion by means of different suggestions. It is in this way, for instance, that a happy expression, an image opportunely evoked, have occasionally deterred crowds from the most bloodthirsty acts.

大体来说，这与构成心理群体的个人状态很相似。他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所有被催眠的人一样，他的一些能力会丧失，其余的则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某种暗示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做出某些行动。这种冲动在群体中比在催眠中更难以抗拒，这是因为群体中的所有个人受到了相同的暗示，冲动在相互作用中得到了强化。在群体中，人格强大到足以抗拒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并不能抵抗大流。他们顶多也只能因为不同的暗示而改变决定。例如，通过愉

悦的话语或恰好被唤醒的图像，偶尔可以阻止群体进行最残暴的行为。

We see, then, that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conscious personality, the predominance of the unconscious personality, the turning by means of suggestion and contagion of feelings and ideas in an identical direction, the tendency to immediately transform the suggested ideas into acts; these, we see, are the princip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vidual forming part of a crowd. He is no longer himself, but has become an automaton who has ceased to be guided by his will.

因此，我们知道，意识人格消失，无意识人格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暗示或相同感情和思想的感染而变化以及立即将暗示转化为行动，这些是群体中个人的主要特征。他不再是他，而变成了不再受自己意志控制的机器。

Moreover, by the mere fact that he forms part of an organised crowd, a man descends several rungs in the ladder of civilisation. Isolated, he may be a cultivated individual; in a crowd, he is a barbarian—that is, a creature acting by instinct. He possesses the spontaneity, the violence, the ferocity, and also the enthusiasm and heroism of primitive beings, whom he further tends to resemble by the facility with which he allows himself to be impressed by words and images—which would be entirely without action on each of the isolated individuals composing the crowd—and to be induced to commit acts contrary to his most obvious interests and his best-known habits. An individual in a crowd is a grain of sand amid other grains of sand, which the wind stirs up at will.

此外，单单因为他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成员这一事实，他在文明的阶梯上下降了好几层。处于孤立状态时，他可能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在群体中时，他就是个野蛮人，即一个凭直觉行动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凶猛、带有原始人普遍的热情和英雄主义。之后，他甘愿被言语和图像打动，和原始人又更近一步，但当群体中的个人处于孤立状态时，这些言语和图像完全起不到作用。他会情不自禁地做出有悖于自己最明显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的行为。群体中的个人是广袤沙漠中的一粒，能被风随意吹散。

It is for these reasons that juries are seen to deliver verdicts of which each individual juror would disapprove, that parliamentary assemblies adopt laws and measures of which each of their members would disapprove in his own person. Taken separately, the men of the Convention were enlightened citizens of peaceful habits. United in a crowd, they did not hesitate to give their adhesion to the most savage proposals, to guillotine individuals most clearly innocent, and, contrary to their interests, to renounce their inviolability and to decimate themselves.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陪审团会做出每个陪审员都不赞成的裁决，议会会实行每个议员都不赞成的法律和措施。把公民委员会的成员们分开来看，他们都是开明而温和的公民。但当他们联合在一起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支持最野蛮的提议，将最无辜的人民送上断头台，并且违背他们的利益，放弃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利，自相残杀。

It is not only by his acts that the individual in a crowd differs essentially from himself. Even before he has entirely lost his independence, his ideas and feelings have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is so profound as to change the miser into a spendthrift, the sceptic into a believer, the honest man into a criminal, and the coward into a hero. The renunciation of all its privileges which the nobility voted in a moment of enthusiasm during the celebrated night of August 4, 1789, would certainly never have been consented to by any of its members taken singly.

群体中的个人，不仅仅在行为上与真实的自己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甚至在他完全丧失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经历了转变，而这种转变相当深刻，以至于能将一个守财奴变成败家子，将怀疑论者变成信徒，将老实人变成罪犯，将懦夫变成英雄。在1789年8月4日那个有着重要意义的夜晚，贵族们一时兴起，投票决定放弃所有的特权，但要是将他们分开来，他们绝不会同意这个决定。

The conclusion to be drawn from what precedes is, that the crowd is always intellectually inferior to the isolated individual, but tha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feelings and of the acts these feelings provoke, the crowd may,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be better or worse than the individual. All depends on the nature of the suggestion to which the crowd is exposed. This is the point that has been completely misunderstood by writers who have only studied crowds from the criminal point of view. Doubtless a crowd is often criminal, but also it is often heroic. It is crowds rather than isolated individuals that may be induced to run the risk of death to secure the triumph of a creed or an idea, that may be fired with enthusiasm for glory and honour, that are led on—almost without bread and without arms, as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to deliver the tomb of Christ from the infidel, or, as in '93, to defend the fatherland. Such heroism is without doubt somewhat unconscious,

but it is of such heroism that history is made. Were peoples only to be credited with the great actions performed in cold blood, the annals of the world would register but few of them.

以上可以表明，群体总是比孤立的个人更愚笨一些，但从感情以及感情引发的行为来看，群体可能会比个人更优秀或更差劲，这视情况而定。一切完全取决于群体所受暗示的性质。在这一点上，那些只从犯罪角度研究过群体的人完全地误解了。毋庸置疑，群体常常会变成犯罪群体，但也常常会变成英雄群体。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受到鼓励而冒着生命危险去保证教义或观念的胜利，会满腔热情地为荣誉而战，会像“十字军东征”时那样，在几乎没有粮食和武器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时一样捍卫祖国。毫无疑问，这种英雄主义是无意识的，但正因为这样的英雄主义，人们才能创造历史。如果人们只以冷漠的方式做伟大的举动，那么世界的历史便不会留下多少记录。

Chapter II The Sentiments and Morality of Crowds

第二章　群体的情感和道德

1. IMPULSIVENESS, MOBILITY, AND IRRITABILITY OF CROWDS. The crowd is at the mercy of all exterior exciting causes, and reflects their incessant variations—The impulses which the crowd obeys are so imperious as to annihilate the feeling of personal interest—Premeditation is absent from crowds—Racial influence. 2. CROWDS ARE CREDULOUS AND READILY INFLUENCED BY SUGGESTION. The obedience of crowds to suggestions—The images evoked in the mind of crowds are accepted by them as realities—Why these images are identical for all the individuals composing a crowd—The equality of the educated and the ignorant man in a crowd—Various examples of the

illusions to which the individuals in a crowd are subject—The impossibility of according belief to the testimony of crowds—The unanimity of numerous witnesses is one of the worst proofs that can be invoked to establish a fact—The slight value of works of history. 3. THE EXAGGERATION AND INGENUOUSNESS OF THE SENTIMENTS OF CROWDS. Crowds do not admit doubt or uncertainty, and always go to extremes—Their sentiments always excessive. 4. THE INTOLERANCE, DICTATORIALNESS, AND CONSERVATISM OF CROWDS. The reasons of these sentiments—The servility of crowds in the face of a strong authority—The momentary revolutionary instincts of crowds do not prevent them from being extremely conservative—Crowds instinctively hostile to changes and progress. 5. THE MORALITY OF CROWDS. The morality of crowds, according to the suggestions under which they act, may be much lower or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individuals composing them—Explanation and examples—Crowds rarely guided by those considerations of interest which are most often the exclusive motives of the isolated individual—The moralising role of crowds.

提要：（1）群体的冲动、善变和易怒。群体易受外界刺激因素的影响，且他们的反应会不断变化／群体所顺从的冲动太过强烈以至于消除了关乎个人利益的感情／群体不会预先规划／种族因素的影响。（2）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对于暗示的服从／群体将脑中形成的图像认作现实／为什么群体中所有个体所产生的图像是一样的／群体中智者愚者都一样／群体个人受幻觉支配的各种例子／不可能使群体的信仰与他们的证词相一致／最不能够证明事实的证据之一便是无数个说辞一致的目击者／历史著作的价值微乎其微。（3）群体情感的夸张和坦率。群体不承认怀疑和不确定性，总会陷入极端／群体总是情感过盛。（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这些情感的原因／群体在面对权威时的恭顺／一时的革命本能并不会削弱他们的极端保守／群体对于改变和进步的本能敌意。（5）群体的道德。群体的道德会根据他们的行为所受到的暗示，比群体中的个人的道德高尚或

低劣／解释和举例／群体极少被出于利益的考虑左右，这种考虑常常是孤立的个人所特有的动力／群体在道德说教方面的作用。

Having indicated in a general way the principal characteristics of crowds, it remains to study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detail.

之前已经从宏观的角度讲到过群体的主要特征，但还需要细致地研究一下这些特征。

It will be remarked that among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crowds there are several—such as impulsiveness, irritability, incapacity to reason, the absence of judgment and of the critical spirit, the exaggeration of the sentiments, and others besides—which are almost always observed in beings belonging to inferior forms of evolution—in women, savages, and children, for instance. However, I merely indicate this analogy in passing; its demonstration i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is work. It would, moreover, be useless for persons acquainted with the psychology of primitive beings, and would scarcely carry conviction to those in ignorance of this matter.

群体的诸多特征中有一些比较显著，如冲动、易怒、缺乏理智、缺乏判断能力和批判精神、情感夸张等等，这些特征总是常见于较为低等的进化形式，像女人、野蛮人和孩子。然而，我仅仅想顺便提一下这个类比，关于这一点的证明则不属于本书要探讨的范围。再者，这对于了解原始人心理的人毫无用处，对于完全不了解这些知识的人来说，则不具有任何信服力。

I now proceed to the succes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at may be observed in the majority of crowds.

现在，我继续谈谈群体中大多数人身上所体现的不同特征。

1．Impulsiveness, Mobility, and Irritability of Crowds.

1．群体的冲动、善变和易怒

When studying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a crowd we stated that it is guided almost exclusively by unconscious motives. Its acts are far mo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pinal cord than of the brain. In this respect a crowd is closely akin to quite primitive beings. The acts performed may be perfect so far as their execution is concerned, but as they are not directed by the brain, the individual conducts himself according as the exciting causes to which he is submitted may happen to decide. A crowd is at the mercy of all external exciting causes, and reflects their incessant variations. It is the slave of the impulses which it receives. The isolated individual may be submitted to the same exciting causes as the man in a crowd, but as his brain shows him the inadvisability of yielding to them, he refrains from yielding. This truth may be physiologically expressed by saying that the isolated individual possesses the capacity of dominating his reflex actions, while a crowd is devoid of this capacity.

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征时，我们曾说，它几乎完全受无意识动因

支配。它的行为受脊髓影响，而不是大脑。在这个方面，群体与原始人十分相似。就他们的执行过程而言，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完美的，但由于这些行为不是由大脑控制的，个人可能是根据其所受的刺激因素而作出行动决定的。群体受外界刺激因素的影响，且他们的反应会不断变化。群体是其冲动的奴隶。孤立的个人可能受到和群体一样的刺激因素，但由于大脑告诉他不要顺从于它们，所以他便会约束自己。用心理学的行话来说，这个道理便是：孤立的个人拥有主导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然而群体没有这个能力。

The varying impulses to which crowds obey may be, according to their exciting causes, generous or cruel, heroic or cowardly, but they will always be so imperious that the interest of the individual, even the interest of self-preservation, will not dominate them. The exciting causes that may act on crowds being so varied, and crowds always obeying them, crowds are in consequence extremely mobile. This explains how it is that we see them pass in a moment from the most bloodthirsty ferocity to the most extreme generosity and heroism. A crowd may easily enact the part of an executioner, but not less easily that of a martyr. It is crowds that have furnished the torrents of blood requisite for the triumph of every belief. It is not necessary to go back to the heroic ages to see what crowds are capable of in this latter direction. They are never sparing of their life in an insurrection, and not long since a general, [3_1] becoming suddenly popular, might easily have found a hundred thousand men ready to sacrifice their lives for his cause had he demanded it.

根据刺激因素的不同，群体所顺从的各种冲动，或宽厚或残忍，或英勇或懦弱，但这些冲动总是太过强烈，以至于个人利益，甚至自我保全的利益也不能撼动它们。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群体常屈从于这些刺激因素，因此变得极度善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看

到，群体瞬间由最血腥的狂热状态转变成极度慷慨且怀有英雄主义的状态。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行为，但同时也很容易表现得像位烈士。正是群体，为了每一个信仰的胜利不惜血流成河。想要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做什么事情，无须回到英雄时代。他们在起义中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不久之前，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 [4_1] ，可能会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的人愿意在他一声令下为他的事业牺牲生命。

Any display of premeditation by crowds is in consequence out of the question. They may be animated in succession by the most contrary sentiments, but they will always b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xciting causes of the moment. They are like the leaves which a tempest whirls up and scatters in every direction and then allows to fall. When studying later on certain revolutionary crowds we shall give some examples of the variability of their sentiments.

因此，毫无疑问，群体不会做任何预先策划。他们可能会接连被最矛盾的情感触动，但他们总是受当下刺激因素的影响。就像被风吹起的叶子，他们向各个方向飘散，然后又落下。之后，在研究某些特定的革命群体时，我们会举出一些他们感情多变的例子。

This mobility of crowds renders them very difficult to govern, especially when a measure of public authority has fallen into their hands. Did not the necessities of everyday life constitute a sort of invisible regulator of existence, it would scarcely be possible for democracies to last. Still, though the wishes of crowds are frenzied they are not durable. Crowds are as incapable of willing as of thinking for any length of time.

群体的这种善变使他们难以统治别人，尤其是当一项公共权力落在他们手里的时候。一旦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物对生活不再构成无形的约束，民主便几乎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此外，尽管群体的愿望很疯狂，但它们并不持久。群体不能长久地思考，亦没有长久的决心。

A crowd is not merely impulsive and mobile. Like a savage, it is not prepared to admit that anything can come between its desire and the realisation of its desire. It is the less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such an intervention, in consequence of the feeling of irresistible power given it by its numerical strength. The notion of impossibility disappears for the individual in a crowd. An isolated individual knows well enough that alone he cannot set fire to a palace or loot a shop, and should he be tempted to do so, he will easily resist the temptation. Making part of a crowd, he is conscious of the power given him by number, and it is sufficient to suggest to him ideas of murder or pillage for him to yield immediately to temptation. An unexpected obstacle will be destroyed with frenzied rage. Did the human organism allow of the perpetuity of furious passion, it might be said that the normal condition of a crowd baulked in its wishes is just such a state of furious passion.

群体不仅仅是冲动和善变的。他们就像野蛮人一样，不准备承认在自己的愿望与实现愿望之间会出现障碍。他们无法理解这种障碍，因为数量上的强大使他们感觉自己势不可挡。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只身一人是不可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的，即使是受到某种诱惑，他也会很容易地抑制住。但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给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萌生谋杀或抢劫的念头，并且立即屈从于这种诱惑。意料之外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人类的机体如果能够长时间保持狂热的激

情，群体愿望受阻的正常情形便只不过是这种激情状态的一种。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ce, which constitute the unvarying source from which all our sentiments spring, always exert an influence on the irritability of crowds, their impulsiveness and their mobility, as on all the popular sentiments we shall have to study. All crowds are doubtless always irritable and impulsive, but with great variations of degree. For insta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Latin and an Anglo-Saxon crowd is striking. The most recent facts in French history throw a vivid light on this point. The mere publication, twenty-five years ago, of a telegram, relating an insult supposed to have been offered an ambassador, was sufficient to determine an explosion of fury, whence followed immediately a terrible war. Some years later the telegraphic announcement of an insignificant reverse at Langson provoked a fresh explosion which brought about the instantaneous overthrow of the government. At the same moment a much more serious reverse undergone by the English expedition to Khartoum produced only a slight emotion in England, and no ministry was overturned. Crowds are everywhere distinguished by feminine characteristics, but Latin crowds are the most feminine of all. Whoever trusts in them may rapidly attain a lofty destiny, but to do so is to be perpetually skirting the brink of a Tarpeian rock, with the certainty of one day being precipitated from it.

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一切感情的恒定来源，它常常会对群体的易怒、冲动和善变产生影响，就像它会影响之后我们会研究到的其他所有大众情感一样。所有群体无疑都是易怒而冲动的，但程度不一。比如，拉丁裔群体和英裔群体之间的差异就大得惊人。法国历史上最近的一个事件便能为这一点提供生动的说明。25年前，仅仅是一封侮

辱某位大使的电报被公开，就足以激起众怒，结果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几年后，兰森一封无足轻重的失败电文再次激起人们的怒火，结果导致政府立刻垮台。与此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犯下更为严重的错误，却只在国内引起了一丝丝情绪，甚至没有大臣被解职。所有地方的群体都有些阴柔，拉丁裔群体最甚。凡是信任他们的人，命运都会迅速变得高贵起来。但这样做等于是要永远走在塔尔皮亚悬崖边，指不定哪天便会跌入深渊。

2．The Suggestibility and Credulity of Crowds.

2．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

When defining crowds, we said that one of their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was an excessive suggestibility, and we have shown to what an extent suggestions are contagious in every human agglomeration; a fact which explains the rapid turning of the sentiments of a crowd in a definite direction. However indifferent it may be supposed, a crowd, as a rule, is in a state of expectant attention, which renders suggestion easy. The first suggestion formulated which arises implants itself immediately by a process of contagion in the brains of all assembled, and the identical bent of the sentiments of the crowd is immediately an accomplished fact.

我们在定义群体时曾说过，他们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易受暗示，我们还指出了所有人类集体中暗示所能达到的传染程度，这一事实解释了群体感情向着某个特定方向的迅速转变。无论人们觉得群体有多冷漠，群体通常处于一种期待关注的状态中，因而易受暗示。最初的暗示，经过传染，很快植根于群体所有人的脑中，群体的感情很快便会

倾向一致，这成为一个既定事实。

As is the case with all pers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ggestion, the idea which has entered the brain tends to transform itself into an act. Whether the act is that of setting fire to a palace, or involves self-sacrifice, a crowd lends itself to it with equal facility. All will depend on the nature of the exciting cause, and no longer, as in the case of the isolated individual, on the relations existing between the act suggested and the sum total of the reasons which may be urged against its realisation.

正如所有受暗示影响的个人所示，进入脑中的观念会转变成为行动。无论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都会在所不辞。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取决于受到暗示的行为和全部的理由之间的关系，后者可能与采取行动相对立。

In consequence, a crowd perpetually hovering on the borderland of unconsciousness, readily yielding to all suggestions, having all the violence of feeling peculiar to beings who cannot appeal to the influence of reason, deprived of all critical faculty, cannot be otherwise than excessively credulous. The improbable does not exist for a crow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bear this circumstance well in mind to understand the facility with which are created and propagated the most improbable legends and stories. [3_2]

于是，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随时服从一切暗示，拥有不受理性影响的生物所特有的狂躁感情，缺乏一切判断能力，只会极

度轻信。对于群体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想要理解那种编造和传播子虚乌有的神话和故事的能力，必须牢记这一点 [4_2] 。

The creation of the legends which so easily obtain circulation in crowds is not solely the consequence of their extreme credulity. It is also the result of the prodigious perversions that events undergo in the imagination of a throng. The simplest event that comes under the observation of a crowd is soon totally transformed. A crowd thinks in images, and the image itself immediately calls up a series of other images, having no logical connection with the first. We can easily conceive this state by thinking of the fantastic succession of ideas to which we are sometimes led by calling up in our minds any fact. Our reason shows us the incoherence there is in these images, but a crowd is almost blind to this truth, and confuses with the real event what the deforming action of its imagination has superimposed thereon. A crowd scarcely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subjective and the objective. It accepts as real the images evoked in its mind, though they most often have only a very distant relation with the observed fact.

神话能够轻易地在群体中流传，不仅仅是因为群体极端轻信，还因为事件在群体的想象中经历了大幅度的歪曲。即使是最简单的事情，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会立刻变得面目全非。群体善用形象思维，形象本身能立刻引起一系列其他的形象，且这些形象与最初的形象毫无关联。我们只要想想，有时我们会因想到某个事实而引起一连串的奇妙想法，便能理解这种状态。理性告诉我们，这些形象之间没有关联，但群体对这一事实熟视无睹，把被自己想象歪曲了的幻觉与事实混为一谈。群体很少对主观与客观进行区分。他们将脑中出现的形象当作是真实的，尽管这些形象与观察到的事实相去甚远。

The ways in which a crowd perverts any event of which it is a witness ought, it would seem, to be innumerable and unlike each other, since the individuals composing the gathering are of very different temperaments.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As the result of contagion the perversions are of the same kind, and take the same shape in the case of all the assembled individuals.

群体将自己看到的事情进行歪曲的方式，看似有无数种且互不相同，原因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取向。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传染的缘故，事情受到相同的歪曲，在群体中的个人身上表现出相同的形式。

The first perversion of the truth effected by one of the individuals of the gathering is the starting-point of the contagious suggestion. Before St. George appeared on the walls of Jerusalem to all the Crusaders he was certainly perceiv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one of those present. By dint of suggestion and contagion the miracle signalised by a single person was immediately accepted by all.

群体中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的起点。在圣乔治出现在耶路撒冷墙上面向所有十字军官兵之前，在场一定有人首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会立刻被所有人接受。

Such is always the mechanism of the collective hallucinations so frequent in history—hallucinations which seem to have all the recognised characteristics of authenticity, since they are phenomena

observed by thousands of persons.

历史中常常出现这种集体幻觉的机制就是如此。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特性，因为它们是被成千上万人观察到的现象。

To combat what precedes, the mental quality of the individuals composing a crowd must not be brought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quality is without importance. From the moment that they form part of a crowd the learned man and the ignoramus are equally incapable of observation.

想要反驳上述的内容，没有必要考虑组成群体的个人智力水平如何。这种品质是无足轻重的。从他们组成群体的那一刻起，博学之士与无知之人便同时失去了观察的能力。

This thesis may seem paradoxical. To demonstrate it beyond doubt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a great number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several volumes would be insufficient for the purpose.

这个论点可能看起来有些矛盾。为了证明这一点，必须研究大量的史实，哪怕著有好几本书，也不足以达到目的。

Still, as I do not wish to leave the reader under the impression of unproved assertions, I shall give him some examples taken at hazard from the immense number of those that might be quoted.

但我不想让读者觉得这是没有得到证实的主张，因此要为之举出几个实例，这些实例都是紧急从大量可引用的实例中随机挑选出来的。

The following fact i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because chosen from among collective hallucinations of which a crowd is the victim, in which are to be found individuals of every kind, from the most ignorant to the most highly educated. It is related incidentally by Julian Felix, a naval lieutenant, in his book on “Sea Currents,” and has been previously cited by the Revue Scientifique.

下面是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它来自让群体成为牺牲者的集体幻觉。这些群体中的个人各有特点，既有最无知的，也有最博学的。一位名叫朱利安·费利克斯的海军上尉，偶然在自己名为《海流》的书中提到了这件事，在这之前，《科学杂志》也加以引用过。

The frigate, the Belle Poule, was cruising in the open sea for the purpose of finding the cruiser Le Berceau, from which she had been separated by a violent storm. It was broad daylight and in full sunshine. Suddenly the watch signalled a disabled vessel; the crew looked in the direction signalled, and every one, officers and sailors, clearly perceived a raft covered with men towed by boats which were displaying signals of distress. Yet this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collective hallucination. Admiral Desfosses lowered a boat to go to the rescue of the wrecked sailors. On nearing the object sighted, the sailors and officers on board the boat saw “masses of men in motion, stretching out their hands, and heard the dull and confused noise of a great number of voices.” When the object was reached

those in the boat found themselves simply and solely in the presence of a few branches of trees covered with leaves that had been swept out from the neighbouring coast. Before evidence so palpable the hallucination vanished.

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在公海上搜寻风暴中与之失散的“波索”号。当时正是阳光灿烂的白天，值勤兵突然发现了一艘残破的船只，船员看向船只的方向，所有人，包括官兵和水手，都清楚地看到发出遇难信号的船只正拖着一个满载着人的木筏。然而，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只船去营救遇难者。在接近目标时，船上的水手和官兵看到“许多活着的人伸出手来，听到众多混乱的哀嚎声”。但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发现，他们面前不过是几根从附近海岸飘过来的树枝，上面长满了树叶。直到真相显而易见，幻觉才消失。

The mechanism of a collective hallucination of the kind we have explained is clearly seen at work in this example. On the one hand we have a crowd in a state of expectant attention, on the other a suggestion made by the watch signalling a disabled vessel at sea, a suggestion which, by a process of contagion, was accepted by all those present, both officers and sailors.

我们之前解释过的群体幻觉机制在这一事件中发挥了作用。一方面，群体处于期待关注的状态，另一方面，值勤兵在海上发现残破船只起到了暗示作用，这一暗示通过传染，被在场的所有人所接受，包括官兵和水手。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a crowd should be numerous for the faculty of seeing what is taking place before its eyes to be destroyed

and for the real facts to be replaced by hallucinations unrelated to them. As soon as a few individuals are gathered together they constitute a crowd, and, though they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men of learning, they assume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owds with regard to matters outside their speciality. The faculty of observation and the critical spirit possessed by each of them individually at once disappears. An ingenious psychologist, Mr. Davey, supplies us with a very curious example in point, recently cited in the Annales des Sciences Psychiques, and deserving of relation here. Mr. Davey, having convoked a gathering of distinguished observers, among them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of English scientific men, Mr. Wallace, executed in their presence, and after having allowed them to examine the objects and to place seals where they wished, all the regulation spiritualistic phenomena, the materialisation of spirits, writing on slates. Having subsequently obtained from these distinguished observers written reports admitting that the phenomena observed could only have been obtained by supernatural means, he revealed to them that they were the result of very simple tricks. “The most astonishing feature of Monsieur Davey's investigation,” writes the author of this account, “is not the marvellousness of the tricks themselves, but the extreme weakness of the reports made with respect to them by the noninitiated witnesses. It is clear, then,” he says, “that witnesses even in number may give circumstantial relations which are completely erroneous, but whose result is THAT, IF THEIR DESCRIPTIONS ARE ACCEPTED AS EXACT, the phenomena they describe are inexplicable by trickery. The methods invented by Mr. Davey were so simple that one is astonished that he should have had the boldness to employ them; but he had such a power over the mind of the crowd that he could persuade it that it saw what it did not see.” Here, as always, we have the power of the hypnotiser over the hypnotised. Moreover, when this power is seen in action on minds

of a superior order and previously invited to be suspicious, it is understandable how easy it is to deceive ordinary crowds.

使亲眼所见的事情被歪曲、事实被与之无关的幻觉取代，这些并不一定需要人数众多才可以在群体中实现。只要少数个人聚集起来，形成一个集体，就算他们全都是博学之人，他们也会表现出专长之外的群体特性。他们每个人的观察能力和批判精神立刻便会消失。机敏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就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例子，最近的《心理学年鉴》提到了这个例子，在这里很值得一说。达维先生将一群杰出的观察家聚集在一起，其中有一位是极负盛名的英国科学家华莱士先生。达维先生让他们检查了物体，并按他们的意愿做上记号，接着当着他们的面按规定展现了唯心论现象，即灵魂现形的过程，并让他们记录下来。这些杰出的观察者得到的报告一致认同，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能力实现。达维先生告诉他们，这不过是非常简单的伎俩。这份文献的作者写道："达维先生的研究最惊人的一点，并不在于骗术本身有多神奇，而是在于外行目击者提供的报告中的致命弱点。"他还说："显然，即使是目击者人数众多，他们也会给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但结论是，假如他们的描述被认作是准确的，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难以用骗术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这些方法太过简单，人们难以置信他竟有如此胆量采用它们。但他拥有支配群体思维的能力，能让他们看见自己并未见到的东西。"这里，我们遇到的仍是催眠师对于被催眠者实用的能力。此外，对于头脑严谨且事先便被要求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这种能力依然奏效，我们便可理解用这种能力来欺骗普通的群体有多容易。

Analogous examples are innumerable. As I write these lines the papers are full of the story of two little girls found drowned in the Seine. These children, to begin with, were recognised in the most unmistakable manner by half a dozen witnesses. All the affirmations were in such entire concordance that no doubt remained in the

mind of the juge d'instruction. He had the certificate of death drawn up, but just as the burial of the children was to have been proceeded with, a mere chance brought about the discovery that the supposed victims were alive, and had, moreover, but a remote resemblance to the drowned girls. As in several of the examples previously cited, the affirmation of the first witness, himself a victim of illusion, had sufficed to influence the other witnesses.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报纸上充斥着两个女孩在塞纳河中溺亡的报道。起初，有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地说认得这两个女孩。所有的证词都如出一辙，因而法官没有任何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快要为孩子们举行葬礼的时候，人们偶然发觉孩子们可能还活着，并且她们与溺亡的人相差甚大。正如前面提到的几个例子一样，第一位目击者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足以影响其他目击者。

In parallel cases the starting-point of the suggestion is always the illusion produced in an individual by more or less vague reminiscences, contagion following as the result of the affirmation of this initial illusion. If the first observer be very impressionable, it will often be sufficient that the corpse he believes he recognises should present—apart from all real resemblance—some peculiarity, a scar, or some detail of toilet which may evoke the idea of another person. The idea evoked may then become the nucleus of a sort of crystallisation which invades the understanding and paralyses all critical faculty. What the observer then sees is no longer the object itself, but the image evoked in his mind. In this way are to be explained erroneous recognitions of the dead bodies of children by their own mother, as occurred in the following case, already old, but which has been recently recalled by the newspapers. In it are to

be traced precisely the two kinds of suggestion of which I have just pointed out the mechanism.

在类似的事件中，暗示常由某个记忆模糊的人产生的幻觉引起，在这一最初的幻觉得到证实后，传染便会随之而来。如果第一位观察者很没有主见，他以为，除去所有真实的相似之处以外，自己认得的尸体应该会呈现出一些特征，比如一个伤疤或可能会引起其他人同感的穿着上的细节。由此产生的想法可能会成为某种具体化过程的核心，它会征服理解力，麻痹一切判断力。观察者之后的所见便不再是目标本身，而是自己头脑中产生的形象。由此，被报纸最近旧事重提的孩子尸体被自己妈妈误认的事情，便可以得到解释。在这一事件中，一定能找到我刚刚指出的两种暗示机制。

> The child was recognised by another child, who was mistaken. The series of unwarranted recognitions then began.
>
> “另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他搞错了。接着便开始了一系列缺乏依据的辨认过程。
>
> An extraordinary thing occurred. The day after a schoolboy had recognised the corpse a woman exclaimed, “Good Heavens, it is my child!”
>
> 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一个男孩儿认出了尸体之后，一位妇女喊道：‘天呐，这是我的孩子！’

She was taken up to the corpse; she examined the clothing, and noted a scar on the forehead. “It is certainly,” she said, “my son who disappeared last July. He has been stolen from me and murdered.”

她被带到尸体面前，检查了衣服，在额头上发现了一个伤疤。她说：‘绝对是的，我的儿子在去年七月失踪了。他被拐走杀害了。’

The woman was concierge in the Rue du Four; her name was Chavandret. Her brother-in-law was summoned, and when questioned he said, “That is the little Filibert.” Several persons living in the street recognised the child found at La Villette as Filibert Chavandret, among them being the boy's schoolmaster, who based his opinion on a medal worn by the lad.

这位妇女是福尔街的门卫，名字叫做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叫了来。当问他时，他说：‘那是小费利贝。’好几个住在街上的人都指认在拉弗特找到的孩子是费利贝·夏凡德雷，这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同学，他的根据是夏凡德雷带着的奖牌。

Nevertheless, the neighbours, the brother-in-law, the schoolmaster, and the mother were

mistaken. Six weeks later the identity of the child was established. The boy, belonging to Bordeaux, had been murdered there and brought by a carrying company to Paris. [3_3]

但是，邻居们、表弟、同学还有那位妈妈都认错了。六周之后，孩子的身份被查明了。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杀害之后，被一伙人带到了巴黎 [4_3] 。”

It will be remarked that these recognitions are most often made by women and children—that is to say, by precisely the most impressionable persons. They show us at the same time what is the worth in law courts of such witnesses. As far as children, more especially, are concerned, their statements ought never to be invoked. Magistrates are in the habit of repeating that children do not lie. Did they possess a psychological culture a little less rudimentary than is the case they would know that, on the contrary, children invariably lie; the lie is doubtless innocent, but it is none the less a lie. It would be better to decide the fate of an accused person by the toss of a coin than, as has been so often done, by the evidence of a child.

应当指出的是，这种误认最常是由女性和孩子做出，也就是最没有主见的人。同时，他们也向我们表明了，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有着怎样的价值。尤其是孩子，他们的证词绝不能被援用。地方法官习惯说童言无忌。如果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他们就会知道，事实恰恰相反，孩子总是撒谎。当然，他们的谎言是无辜的，但仍是一种谎言。甚至用掷硬币的方式来决定被告人的生死，都比用孩子的证词更

好，而我们常常选择后者。

To return to the faculty of observation possessed by crowds, our conclusion is that their collective observations are as erroneous as possible, and that most often they merely represent the illusion of an individual who, by a process of contagion, has suggestioned his fellows. Facts proving that the most utter mistrust of the evidence of crowds is advisable might be multiplied to any extent. Thousands of men were present twenty-five years ago at the celebrated cavalry charge during the battle of Sedan, and yet it is impossible, in the face of the most contradictory ocular testimony, to decide by whom it was commanded. The English general, Lord Wolseley, has proved in a recent book that up to now the gravest errors of fact have been committed with regard to the most important incidents of the battle of Waterloo—facts that hundreds of witnesses had nevertheless attested. [3_4]

回到群体的观察能力上面，我们得出结论，他们的集体观察极易出错，他们大多时候代表以传染的方式暗示着同伴的个人幻觉。事实证明，任何情况下，认为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的都是非常明智的。25年前的色当战役中，有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攻击，但是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根本不可能确定谁在指挥这场战役。英国的沃尔斯利将军，在他最近一本书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仍有人犯下最严重的事实错误，尽管这是数百位目击者证明过的事实 [4_4] 。

Such facts show us what is the value of the testimony of crowds. Treatises on logic include the unanimity of numerous witnesses in the category of the strongest proofs that can be

invoked in support of the exactness of a fact. Yet what we know of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shows that treatises on logic need on this point to be rewritten. The events with regard to which there exists the most doubt are certainly those which have been observed by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ersons. To say that a fact has been simultaneously verified by thousands of witnesses is to say, as a rule, that the real fac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accepted account of it.

这些事实向我们展现了群体证词的价值。关于逻辑学的论文包含了无数目击者的一致同意，因此是支持事实准确性最强有力的证明。然而，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这一点上，逻辑学的论文需要重写。受到最严重怀疑的事件，一定是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说某个事实被数千目击者一致证实，这通常也就是说，真相与为人们所接受的描述相去甚远。

It clearly results from what precedes that works of history must be considered as works of pure imagination. They are fanciful accounts of ill-observed facts, accompanied by explanations the result of reflection. To write such books is the most absolute waste of time. Had not the past left us its literary, artistic, and monumental works, we should know absolutely nothing in reality with regard to bygone times. Are we in possession of a single word of truth concerning the lives of the great men who have played preponderating part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ity—men such as Hercules, Buddha, or Mahomet? In all probability we are not. In point of fact, moreover, their real lives are of slight importance to us. Our interest is to know what our great men were as they are presented by popular legend. It is legendary heroes, and not for a moment real heroes, who have impressed the minds of crowds.

从上述情况中，我们能得出结论，必须把历史著作当作纯粹想象力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不足的事实所做的空想型记述，并且混杂着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种书籍完全是浪费时间。假如历史没有为我们留下文学、艺术及不朽的作品，那么我们对于过往的真相便一无所知。我们对于在人性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人们的生平，比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有过哪怕一个字的真实记录么？没有。说实话，他们的真实人生对于我们无足轻重。我们的兴趣在于，知道我们的伟人们在广为流传的传说中是什么样子的。真正打动群体心灵的，是传说中的英雄，而不是真实的英雄。

Unfortunately, legends—even although they have been definitely put on record by books—have in themselves no stability.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rowd continually transforms them as the result of the lapse of time and especially in consequence of racial causes. There is a great gulf fixed between the sanguinary Jehovah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God of Love of Sainte Therese, and the Buddha worshipped in China has no traits in common with that venerated in India.

不幸的是，尽管它们已被清楚地记录在书上，传说本身却无稳定性可言。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体的想象力会不断地改变它们。《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爱的上帝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在中国受到崇拜的佛祖与在印度受到崇敬的佛祖之间亦是如此。

It is not even necessary that heroes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us by centuries for their legend to be transformed by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rowd. The transformation occasionally takes place within a

few years. In our own day we have seen the legend of one of the greatest heroes of history modified several times in less than fifty years. Under the Bourbons Napoleon became a sort of idyllic and liberal philanthropist, a friend of the humble who, according to the poets, was destined to be long remembered in the cottage. Thirty years afterwards this easy-going hero had become a sanguinary despot, who, after having usurped power and destroyed liberty, caused the slaughter of three million men solely to satisfy his ambition. At present we are witnessing a fresh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gend. When it has undergone the influence of some dozens of centuries the learned men of the future, face to face with these contradictory accounts, will perhaps doubt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hero, as some of them now doubt that of Buddha, and will see in him nothing more than a solar myth or a development of the legend of Hercules. They will doubtless console themselves easily for this uncertainty, for, better initiated than we are to-day i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sychology of crowds, they will know that history is scarcely capable of preserving the memory of anything except myths.

英雄因其传说被群体的想象力改变而远离我们，无须花费几个世纪的时间。这一过程有时就发生在数载之间。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见到过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的传说在50年内被改编了数次。在波旁家族的统治下，拿破仑变成了一个田园派的自由主义慈善家，一个卑贱小卒的朋友。在诗人眼里，他注定会被乡村人民长久铭记。30年过去了，这位随和的英雄变成了一个杀人如麻的暴君，在篡夺大权之后摧毁了自由，仅仅为满足自己的野心便杀死300万人。如今，我们看到的传说是经过改编后的新版本。当传说经历几个世纪的打磨，未来的博学之士在面对这些充满着矛盾的描述时，可能会怀疑英雄是否真实存在，正如现在有些博学之人在怀疑佛祖一样，他们在他身上只会看到流光溢彩的传说或赫拉克利特传说的演变。对于这种不确定

性，他们无疑会轻易感到心安理得。因为，和今天相比，他们对于群体的特性和心理有着更深的了解，他们明白，除了神话故事，历史留不下什么其他的记忆。

3．The Exaggeration and Ingenuousness of the Sentiments of Crowds.

3．群体情感的夸张和坦率

Whether the feelings exhibited by a crowd be good or bad, they present the double character of being very simple and very exaggerated. On this point, as on so many others, an individual in a crowd resembles primitive beings. Inaccessible to fine distinctions, he sees things as a whole, and is blind to their intermediate phases. The exaggeration of the sentiments of a crowd is heightened by the fact that any feeling when once it is exhibited communicating itself very quickly by a process of suggestion and contagion, the evident approbation of which it is the object considerably increases its force.

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无论好坏，都代表着非常简单或夸张的特性。在这一方面上，与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就像原始人一样，没有很好的鉴别力，将所有事物都视作一个整体，无视其中的过渡阶段。群体感情的夸张受到一个事实的强化，那就是任何情感，一旦表现出来，并通过暗示和传染迅速传播，它所明确赞颂的目标便会力量大增。

The simplicity and exaggeration of the sentiments of crowds have for result that a throng knows neither doubt nor uncertainty. Like women, it goes at once to extremes. A suspicion transforms itself as soon as announced into incontrovertible evidence. A commencement of antipathy or disapprobation, which in the case of an isolated individual would not gain strength, becomes at once furious hatred in the case of an individual in a crowd.

群体感情的简单与夸张，会造成一群人既不知道怀疑又不知道不确定性。就像女人一样，一下子便会陷入极端。怀疑在脱口而出的瞬间便会变成毋庸置疑的证据。心生厌恶或责难，若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便不会有多么强大，若发生在群体中的个人身上，便会立刻变成勃然大怒。

The violence of the feelings of crowds is also increased, especially in heterogeneous crowds, by the absence of all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e certainty of impunity, a certainty the stronger as the crowd is more numerous, and the notion of a considerable momentary force due to number, make possible in the case of crowds sentiments and acts impossible for the isolated individual. In crowds the foolish, ignorant, and envious persons are freed from the sense of their insignificance and powerlessness, and are possessed instead by the notion of brutal and temporary but immense strength.

群体狂躁感情也会增强，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这种狂躁会因责任感的丧失而强化。对于不会受罚的确信——这种确信会随群体人数增多而增强，还有因为人数众多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感情和行为。在群体中，愚昧无知以及心

怀妒忌的人都摆脱掉自己卑微弱小的感觉，转而觉得自己拥有残忍、短暂却巨大无比的力量。

Unfortunately, this tendency of crowds towards exaggeration is often brought to bear upon bad sentiments. These sentiments are atavistic residuum of the instincts of the primitive man, which the fear of punishment obliges the isolated and responsible individual to curb. Thus it is that crowds are so easily led into the worst excesses.

但不幸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趋势常常作用于恶劣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原始人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孤立且可靠的个人，会因害怕受罚而不得不抑制这种感情。因此，群体很容易做出极其恶劣的行为。

Still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crowds, skilfully influenced, are not capable of heroism and devotion and of evincing the loftiest virtues; they are even more capable of showing these qualities than the isolated individual. We shall soon have occasion to revert to this point when we come to study the morality of crowds.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群体在受到巧妙的影响后不能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高尚的品德，他们甚至能够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之后我们研究群体的道德时，便会回到这一点上来。

Given to exaggeration in its feelings, a crowd is only impressed by excessive sentiments. An orator wishing to move a crowd must make an abusive use of violent affirmations. To exaggerate, to

affirm, to resort to repetitions, and never to attempt to prove anything by reasoning are methods of argument well known to speakers at public meetings.

因为夸张自己的感情，群体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打动。想要打动群体，演说家必须要出言不逊且信誓旦旦。夸大其词、言之凿凿、反反复复且绝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共集会上的演讲者们熟知的演讲方法。

Moreover, a crowd exacts a like exaggeration in the sentiments of its heroes. Their apparent qualities and virtues must always be amplified. It has been justly remarked that on the stage a crowd demands from the hero of the piece a degree of courage, morality, and virtue that is never to be found in real life.

除此以外，群体对于自己的英雄也会表现出类似的夸张感情。他们身上明显的品质和美德肯定常被夸大。之前便有人正确地指出，观众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有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德。

Quite rightly importance has been laid on the special standpoint from which matters are viewed in the theatre. Such a standpoint exists no doubt, but its rules for the most par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common sense and logic. The art of appealing to crowds is no doubt of an inferior order, but it demands quite special aptitudes. It is often impossible on reading plays to explain their success. Managers of theatres when accepting pieces are themselves, as a rule, very uncertain of their success, because to judge the matter it would be necessary tha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transform

themselves into a crowd. [3_5]

在剧场里观察事物的特殊立场，其重要性早已受到正确的认识。毫无疑问，这种立场是存在的，但它的大部分原则都不具备常识和逻辑。打动观众的艺术，无疑品味低下，但这也需要一些特殊的才能。通过阅读剧本来解释一出戏的成功，这通常是不可能的。剧院经理在接戏的时候，通常不能确定其是否会大获成功，因为想要对此作出判断，他们必须能把自己转化为观众 [4_5] 。

“Charley's Aunt,” refused at every theatre, and finally staged at the expense of a stockbroker, has had two hundred representations in France, and more than a thousand in London. Without the explanation given above of the impossibility for theatrical managers to mentally substitute themselves for a crowd, such mistakes in judgment on the part of competent individuals, who are most interested not to commit such grave blunders, would be inexplicable. This is a subject that I cannot deal with here, but it might worthily tempt the pen of a writer acquainted with theatrical matt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a subtle psychologist—of such a writer, for instance, as M. Francisque Sarcey.

《查利的姑妈》屡次被拒，最后由一位股票经纪人出资上演，这部剧已经在法国演了200场，在伦敦演了超过1000场。上面解释了剧院经理不可能转换成观众的心理来进行判断，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能干之人，尽管尽力避免严重的错误，但仍然判断失误了。关于这一问题，我没办法在这里解决，但这很值得与熟悉剧院事务、同时又是一位聪明的心理学家的作家讨论一番，比如弗朗西斯·沙赛先生。

Here, once more, were we able to embark on more extensive explanations, we should show the preponderating influence of racial considerations. A play which provokes the enthusiasm of the crowd in one country has sometimes no success in another, or has only a partial and conventional success, because it does not put in operation influences capable of working on an altered public.

这里我们可以再做一次广泛的解释，我们会说明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一部在某个国家受到观众热捧的戏剧，在另一个国家却未获成功，或者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它未能对另一些公众产生影响。

I need not add that the tendency to exaggeration in crowds is only present in the case of sentiments and not at all in the matter of intelligence. I have already shown that, by the mere fact that an individual forms part of a crowd, his intellectual standard is immediately and considerably lowered. A learned magistrate, M. Tarde, has also verified this fact in his researches on the crimes of crowds. It is only, then, with respect to sentiment that crowds can rise to a very high or, on the contrary, descend to a very low level.

我无须再做补充，群体的夸张倾向只作用于感情，而对智力起不到一点作用。我已经说明过，个人在组成群体后，智力水平会骤降。一位博学的地方官塔尔德先生在调查群体犯罪时也证明了这一事实。群体只能将感情提升到极高或极低的程度。

4．The Intolerance, Dictatorialness and Conservatism of Crowds.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Crowds are only cognisant of simple and extreme sentiments; the opinions, ideas, and beliefs suggested to them are accepted or rejected as a whole, and considered as absolute truths or as not less absolute errors. This is always the case with beliefs induced by a process of suggestion instead of engendered by reasoning. Every one is aware of the intolerance that accompanies religious beliefs, and of the despotic empire they exercise on men's minds.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向他们提供意见、观点和信念，他们会全盘接受或拒绝，并且将其视作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对于用暗示来诱导、而不是说理的信念，常常就是这样。每个人都知道，偏执与宗教信仰相伴以及它对人们的头脑实行专制统治。

Being in doubt as to what constitutes truth or error, and having, on the other hand, a clear notion of its strength, a crowd is as disposed to give authoritative effect to its inspirations as it is intolerant. An individual may accept contradiction and discussion; a crowd will never do so. At public meetings the slightest contradiction on the part of an orator is immediately received with howls of fury and violent invective, soon followed by blows, and expulsion should the orator stick to his point. Without the restraining presenc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uthority the contradictor, indeed, would often be done to death.

群体对于何为真理、何为谬误持有怀疑，但另一方面，又非常清楚自己的力量，因此群体为自己的抱负和偏执赋予了专横的效果。个

人可能会接受矛盾、进行讨论，但群体绝对不会。在公众集会上，演讲者表现出一点点相反的倾向，便会立即招来怒吼和辱骂。如果坚持己见，演讲者很快就会在一片嘘声中被轰下台。如果没有当权者的代表在现场制约，意见相悖者常常真的会被置之死地。

Dictatorialness and intolerance are common to all categories of crowds, but they are met with in a varying degree of intensity. Here, once more, reappears that fundamental notion of race which dominates all the feelings and all the thoughts of men. It is more especially in Latin crowds that authoritativeness and intolerance are found developed in the highest measure. In fact, their development is such in crowds of Latin origin that they have entirely destroyed that sentiment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individual so powerful in the Anglo-Saxon. Latin crowds are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collective independence of the sect to which they belo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their conception of independence is the need they experience of bringing those who are in disagreement with themselves into immediate and violent subjection to their beliefs. Among the Latin races the Jacobins of every epoch, from those of the Inquisition downwards,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attain to a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liberty.

专横和偏执是所有类型群体的共性，但程度不尽相同。在这一点上，那些支配着人们所有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种族观念再次表现了出来。尤其在拉丁裔的群体中，可以看到专横和偏执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实际上，它们在拉丁裔群体中的发展已经彻底摧毁了盎格鲁·萨克逊人身上强烈的个人独立情感。拉丁裔群体只关心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于独立有着独特的见解，即让那些与他们意见相悖的人立即决绝地背叛自己的信仰。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各个时期、各拉丁民族中雅各宾党人对于自由的看法一直保持不变。

Authoritativeness and intolerance are sentiments of which crowds have a very clear notion, which they easily conceive and which they entertain as readily as they put them in practice when once they are imposed upon them. Crowds exhibit a docile respect for force, and are but slightly impressed by kindness, which for them is scarcely other than a form of weakness. Their sympathies have never been bestowed on easy-going masters, but on tyrants who vigorously oppressed them. It is to these latter that they always erect the loftiest statues. It is true that they willingly trample on the despot whom they have stripped of his power, but it is because, having lost his strength, he has resumed his place among the feeble, who are to be despised because they are not to be feared. The type of hero dear to crowds will always have the semblance of a Caesar. His insignia attracts them, his authority overawes them, and his sword instils them with fear.

群体对于专横和偏执有着非常明确的认知，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情，一旦有人开始煽动这种感情，他们很快便会将其付诸实践。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却极少被善良打动，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的另一种形式。他们从不对懒散的主子感到同情，但会同情那些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他们总为后者竖起高大的雕像。他们愿意践踏那些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暴君，但这是因为暴君在丧失了权力之后变成了一介布衣，人们不再惧怕他，因而会蔑视他。群体喜爱的英雄总是很像恺撒。恺撒的肩章吸引着他们，权势震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感到恐惧。

A crowd is always ready to revolt against a feeble, and to bow down servilely before a strong authority. Should the strength of an authority be intermittent, the crowd, always obedient to its extreme

sentiments, passes alternately from anarchy to servitude, and from servitude to anarchy.

群体随时会对弱者反击，向强权低头。如果当权者的权势断断续续，群体便会常常顺从自己的极端感情，表现得反复无常，一会儿天不怕地不怕，一会儿又低三下四。

However, to believe in the predominance among crowds of revolutionary instincts would be to entirely misconstrue their psychology. It is merely their tendency to violence that deceives us on this point. Their rebellious and destructive outbursts are always very transitory. Crowds are too much governed by unconscious considerations, and too much subject in consequence to secular hereditary influences not to be extremely conservative. Abandoned to themselves, they soon weary of disorder, and instinctively turn to servitude. It was the proudest and most untractable of the Jacobins who acclaimed Bonaparte with greatest energy when he suppressed all liberty and made his hand of iron severely felt.

然而，要是认为革命本能在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那就是完全误读了他们的心理。让我们误解这一点的原因，只不过是他们的暴力倾向。他们爆发反叛和破坏行为的时间常常很是短暂。受着无意识因素的过分控制，因此群体很容易受世俗的等级制的影响，不会非常保守。如果放手不管，他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隶。当波拿巴凭强大的力量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所有人切身感受到他的铁腕时，最自豪的是雅各宾党人。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history, and popular revolutions in

particular, if one does not take sufficiently into account the profoundly conservative instincts of crowds. They may be desirous, it is true, of changing the names of their institutions, and to obtain these changes they accomplish at times even violent revolutions, but the essence of these institutions is too much the expression of the hereditary needs of the race for them not invariably to abide by it. Their incessant mobility only exerts its influence on quite superficial matters. In fact they possess conservative instincts as indestructible as those of all primitive beings. Their fetish-like respect for all traditions is absolute; their unconscious horror of all novelty capable of changing the essential conditions of their existence is very deeply rooted. Had democracies possessed the power they wield to-day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mechanical looms or of the introduction of steam-power and of railways, the realisation of these inventions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or would have been achieved at the cost of revolutions and repeated massacres. It is fortunate for the progress of civilisation that the power of crowds only began to exist when the great discoveries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had already been effected.

如果不充分了解群体深刻的保守本能，就很难理解历史，尤其是民众的革命。诚然，他们渴望改朝换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有时甚至会发动暴力革命，但当前制度的本质反映着种族对等级制度的需要，因此所有种族都无一例外地遵守着当前的制度。群体持续不断的多变性只会影响到非常表面的事情。实际上，他们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他们对于一切传统的狂热是绝对的；他们对一切能够改变他们基本生存状态的新鲜事物有着无意识的惧怕，这种惧怕是根深蒂固的。在纺织机、蒸汽机或铁路出现的年代，如果民主派掌握着他们今天拥有的权力，这些发明就会变得不可能，或者至少要以革命和不断的杀戮为代价。群体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厂出现后才开始掌权，这对文明的进步来说是值得庆幸的。

5．The Morality of Crowds.

5．群体的道德

Taking the word “morality” to mean constant respect for certain social conventions, and the permanent repression of selfish impulses, it is quite evident that crowds are too impulsive and too mobile to be moral. If, however, we include in the term morality the transitory display of certain qualities such as abnegation, self-sacrifice, disinterestedness, devotion, and the need of equity, we may say, on the contrary, that crowds may exhibit at times a very lofty morality.

如果“道德”一词是指尊重特定社会习俗、长期抑制自私的冲动，那么很显然，群体太过冲动、善变，是不道德的。然而，如果我们将道德理解成一时的品质，比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公正无私、献身精神和追求平等，那我们可以说，群体有时会表现出非常高尚的品德。

The few psychologists who have studied crowds have only considered the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ir criminal acts, and noticing how frequent these acts are, they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moral standard of crowds is very low.

少数对群体有过研究的心理学家，只着眼于犯罪行为的角度，注意到这种行为发生得非常频繁之后，他们得出结论，群体的道德水平

非常低。

Doubtless this is often the case; but why? Simply because our savage, destructive instincts are the inheritance left dormant in all of us from the primitive ages. In the life of the isolated individual it would be dangerous for him to gratify these instincts, while his absorption in an irresponsible crowd, in which in consequence he is assured of impunity, gives him entire liberty to follow them. Being unable,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events, to exercise these destructive instincts on our fellow-men, we confine ourselves to exercising them on animals. The passion, so widespread, for the chase and the acts of ferocity of crowds proceed from one and the same source. A crowd which slowly slaughters a defenceless victim displays a very cowardly ferocity; but for the philosopher this ferocity is very closely related to that of the huntsmen who gather in dozens for the pleasure of taking part in the pursuit and killing of a luckless stag by their hounds.

这无疑是常态，但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不过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破坏的本能。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当他融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中后，他很清楚不会受罚，于是便会自由地释放这种本能。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向同胞们释放这种本能，于是便将其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对捕猎的广泛热情与残暴的行径有着同一根源。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猎物，表现出一种十分懦弱的残暴；但对于哲学家来说，这种残暴与几十个猎人一起用猎犬捕杀一只可怜的鹿时表现出的残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A crowd may be guilty of murder, incendiarism, and every kind

of crime, but it is also capable of very lofty acts of devotion, sacrifice, and disinterestedness, of acts much loftier indeed than those of which the isolated individual is capable. Appeals to sentiments of glory, honour, and patriotism are particularly likely to influence the individual forming part of a crowd, and often to the extent of obtaining from him the sacrifice of his life. History is rich in examples analogous to those furnished by the Crusaders and the volunteers of 1793. Collectivities alone are capable of great disinterestedness and great devotion. How numerous are the crowds that have heroically faced death for beliefs, ideas, and phrases that they scarcely understood! The crowds that go on strike do so far more in obedience to an order than to obtain an increase of the slender salary with which they make shift. Personal interest is very rarely a powerful motive force with crowds, while it is almost the exclusive motive of the conduct of the isolated individual. It is assuredly not self-interest that has guided crowds in so many wars, incomprehensible as a rule to their intelligence—wars in which they have allowed themselves to be massacred as easily as the larks hypnotised by the mirror of the hunter.

群体可能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他们也会表现出高尚的举动，比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和公正无私，甚至是更为高尚且孤立的个人无法做到的行为。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为号召，最有可能会影响到群体中的个人，且常常到能让他们牺牲生命的地步。诸如“十字军东征”和1793年志愿者这样的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只有集体能表现出公正无私、舍己为人的伟大精神。群体为了自己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话语而英勇赴死的例子数不胜数。群体进行游行示威，可能是在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本就少得可怜的收入。一己私利很少是群体行为的强大动机，但它几乎是孤立的个人惟一的行为动机。在许多凭借群体的智力无法理解的战争中，并不是一己私利引导着群体，让他们像被施了催眠术的云雀一样甘愿被屠杀。

Even in the case of absolute scoundrels it often happens that the mere fact of their being in a crowd endows them for the moment with very strict principles of morality. Taine calls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 perpetrators of the September massacres deposited on the table of the committees the pocket-books and jewels they had found on their victims, and with which they could easily have been able to make away. The howling, swarming, ragged crowd which invaded the Tuileries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848 did not lay hands on any of the objects that excited its astonishment, and one of which would have meant bread for many days.

即使在一群罪不可赦的坏蛋中，这种事情也常常发生，仅仅因为是群体的一员，他们便会暂时表现出严格的道德纪律。泰纳让人们注意一个事实，“九月惨案”的罪犯们把从受害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钻石放在会议桌上，但他们本可以很容易地将其占为己有。1848年革命期间，占领杜伊勒里宫群众呼号着蜂拥而至，却一点也没有触碰那些让他们激动不已的物件，而其中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好几天的伙食费。

This moralisation of the individual by the crowd is not certainly a constant rule, but it is a rule frequently observed. It is even observed in circumstances much less grave than those I have just cited. I have remarked that in the theatre a crowd exacts from the hero of the piece exaggerated virtues, and it is a commonplace observation that an assembly, even though composed of inferior elements, shows itself as a rule very prudish. The debauchee, the souteneur, the rough often break out into murmurs at a slightly risky scene or expression, though they be very harmless in comparison with their customary conversation.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常规，但却是一种常能见到的常态。甚至在没我刚刚说的那么严重的情形下，这会看到这种情况。我前面提到过，剧院的观众要求作品里的英雄拥有夸张的美德，我们一般也能见到，即使是成员品质恶劣的集会，也会表现得一本正经。放荡不羁的人、拉皮条的人和粗鄙的人，常常会突然变得细声细语，尽管与他们习惯的谈话方式相比，这更加无害。

If, then, crowds often abandon themselves to low instincts, they also set the example at times of acts of lofty morality. If disinterestedness, resignation, and absolute devotion to a real or chimerical ideal are moral virtues, it may be said that crowds often possess these virtues to a degree rarely attained by the wisest philosophers. Doubtless they practice them unconsciously, but that is of small import. We should not complain too much that crowds are more especially guided by unconscious considerations and are not given to reasoning. Had they, in certain cases, reasoned and consulted their immediate interests, it is possible that no civilisation would have grown up on our planet and humanity would have had no history.

就算群体经常释放自己的低劣本能，他们有时也会树立起高尚道德的行为模范。如果公正无私、言听计从和绝对献身于真正或虚假的理想都是美德，那么可以说，群体常常具备这种这种美德，而且达到了智慧的哲学界也无法企及的程度。他们无疑是在无意识地践行这些美德，但这无伤大雅。我们不应该对群体苛责，觉得他们经常受无意识因素引导，而缺乏理性。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具备理性、考虑眼前利益的话，我们这个星球上可能就不会出现文明，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Chapter III The Ideas, Reasoning Power, and Imagination of Crowds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推理能力和想象力

1．THE IDEAS OF CROWDS. Fundamental and accessory ideas—How contradictory ideas may exist simultaneously—The transformation that must be undergone by lofty ideas before they are accessible to crowds—The social influence of ideas is independent of the degree of truth they may contain. 2. THE REASONING POWER OF CROWDS. Crowds are not to be influenced by reasoning—The reasoning of crowds is always of a very inferior order—There is only the appearance of analogy or succession in the ideas they associate. 3. THE IMAGINATION OF CROWDS. Strength of the imagination of crowds—Crowds think in images, and these images succeed each other without any connecting link—Crowds are especially impressed by the marvellous—Legends and the marvellous are the real pillars of civilisation—The popular imagin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basis of the power of statesmen—The manner in which facts capable of striking the imagination of crowds present themselves for observation.

提要：（1）群体的观念。基本观念和附加观念／相互矛盾的观念如何共存／高深的观念在被群体接受前必须经过改造／观念的社会影响与其真实程度无关。（2）群体的推理能力。群体不受理性观念的影响／群体的推理能力通常十分低下／他们所赞成的观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和连贯性。（3）群体的想象力。群体想象力的力量／群体只会形象思维，这些形象之间没有关联但依次连接／群体易受神奇事物感动／神奇事物是文明的真正支柱／民众的想象力通常是政客权力的基础／通过事实来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方式。

1．The Ideas of Crowds

1．群体的观念

When studying in a preceding work the part played by ideas in the evolution of nations, we showed that every civilisation is the outcome of a small number of fundamental ideas that are very rarely renewed. We showed how these ideas are implanted in the minds of crowds, with what difficulty the process is effected, and the power possessed by the ideas in question when once it has been accomplished. Finally we saw that great historical perturbations are the result, as a rule, of changes in these fundamental ideas.

在前一部著作中，我们研究了观念在国家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提到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少数基本观念的产物，这些观念极少革新。我们论述了这些观念是如何扎根于群体脑中的，其过程受到了哪些困难的影响以及这些观念一旦形成会具备怎样的力量。最后我们知道，巨大的历史动荡都是这些基本观念受到革新的结果，这成了一个定律。

Having treated this subject at sufficient length, I shall not return to it now, but shall confine myself to saying a few words on the subject of such ideas as are accessible to crowds, and of the forms under which they conceive them.

我已经针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因此就不再赘述了，但我想简单谈谈群体接受这些观念以及接受方式的问题。

They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In one we shall place accidental and passing ideas created by the influences of the moment: infatuation for an individual or a doctrine, for instance. In the other will be classed the fundamental ideas, to which the environment, the laws of heredity and public opinion give a very great stability; such ideas are the religious beliefs of the past and the social and democratic ideas of to-day.

这些观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某一时刻的影响所产生的偶然、暂时的观念，比如对于某一个人或准则的着迷。另一种则是基本观念，它们因环境、遗传规律和公众意见而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过去的宗教信仰以及现在的社会观念和民主观念都属于这一类。

These fundamental ideas resemble the volume of the water of a stream slowly pursuing its course; the transitory ideas are like the small waves, for ever changing, which agitate its surface, and are more visible than the progress of the stream itself although without real importance.

这些基本观念好比缓慢流淌的小溪，而暂时的观念则像是微小的波浪，波动不停，搅动着溪流水面，尽管它们并不真正重要，但比溪流本身要更显眼。

At the present day the great fundamental ideas which were the mainstay of our fathers are tottering more and more. They have lost all solid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institutions resting upon them are severely shaken. Every day there are formed a great many of

those transitory minor ideas of which I have just been speaking; but very few of them to all appearance seem endowed with vitality and destined to acquire a preponderating influence.

曾经是我们父辈的支柱的伟大基本观念，如今越来越摇摇欲坠。它们的稳定性已丧失殆尽，与此同时，建立于其上的制度也受到了严重动摇。每一天，暂时性的次要观念大量形成，这个我已经提到过。但它们当中极少数具有生命力，也只有极少数能够发挥持久的影响力。

Whatever be the ideas suggested to crowds they can only exercise effective influence on condition that they assume a very absolute, uncompromising, and simple shape. They present themselves then in the guise of images, and are only accessible to the masses under this form. These imagelike ideas are not connected by any logical bond of analogy or succession, and may take each other's place like the slides of a magic-lantern which the operator withdraws from the groove in which they were placed one above the other. This explains how it is that the most contradictory ideas may be seen to be simultaneously current in crowds. According to the chances of the moment, a crowd will co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ne of the various ideas stored up in its understanding, and is capable, in consequence, of committing the most dissimilar acts. Its complete lack of the critical spirit does not allow of its perceiving these contradictions.

无论群体接触到的观念如何，只有这些观念本身非常明确、强硬和简洁才能行之有效。然后这些观念便以形象化的伪装为大众所接受，并且这种情况仅仅发生在这种伪装下。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没

有任何相似性和连贯性的逻辑关联，它们可以相互替代，就如同操作者从幻灯机中取出的一张又一张相叠的幻灯片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完全不同的观念在群体中看上去同时流行。依据不同时机，群体会受其所储备的各种不同观念的影响，并由此出现大相径庭的行为。群体完全缺乏批判精神，且对此毫无察觉。

This phenomenon is not peculiar to crowds. It is to be observed in many isolated individuals, not only among primitive beings, but in the case of all those—the fervent sectaries of a religious faith, for instance—who by one side or another of their intelligence are akin to primitive beings. I have observed its presence to a curious extent in the case of educated Hindoos brought up at our European universities and having taken their degree. A number of Western ideas had been superposed on their unchangeable and fundamental hereditary or social ideas. According to the chances of the moment, the one or the other set of ideas showed themselves each with their special accompaniment of acts or utterances, the same individual presenting in this way the most flagrant contradictions. These contradictions are more apparent than real, for it is only hereditary ideas that have sufficient influence over the isolated individual to become motives of conduct. It is only when, a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mingling of different races, a man is placed between different hereditary tendencies that his acts from one moment to another may be really entirely contradictory. It would be useless to insist here on these phenomena, although their psychological importance is capital. I am of opinion that at least ten years of travel and observation would be necessary to arrive at a comprehension of them.

这一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群体中。它同样存在于许多孤立的个人身

上，这不仅仅包括原始人，还包括那些在智力上或多或少类似于原始人的人，比如信仰某一宗教的狂热教徒。在那些在欧洲的大学受到良好教育且获得学位的印度人身上，我很少看到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机，这些观念的确会或多或少地通过特殊的言行体现出来，使得个人显得自相矛盾。与其说这些矛盾真实存在，不如说浮于表面。只有那些流传下来的观念，才足以成为孤立个人的行为动机。只有当一个人因身上流着不同种族的血液而处于不同的传统趋势下时，他的行为才可能时不时地显得自相矛盾。尽管这些现象的心理学意义重大，但在此过多谈论并无用处。我认为想要完全理解这些现象至少需要十年时间的旅行和观察。

Ideas being only accessible to crowds after having assumed a very simple shape must often undergo the most thoroughgoing transformations to become popular. It is especially when we are dealing with somewhat lofty philosophic or scientific ideas that we see how far-reaching are the modifications they require in order to lower them to the level of the intelligence of crowds. These modifications are dependent on the nature of the crowds, or of the race to which the crowds belong, but their tendency is always belittling and in the direction of simplification. This explains the fact that, from the social point of view, there is in reality scarcely any such thing as a hierarchy of ideas—that is to say, as ideas of greater or less elevation. However great or true an idea may have been to begin with, it is deprived of almost all that which constituted its elevation and its greatness by the mere fact that it has come within the intellectual range of crowds and exerts an influence upon them.

那些以简洁的形式为群体接受的观念，一定经历过彻底的转型。这一点在我们处理较为高深的哲学和科学观念时尤为明显，我们会发

现，这些观念在达到能为大众智力水平所接受的程度前经历过极其重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取决于群体的天性或是群体所属种族的天性，但它们常常是趋向低俗化和简单化的。这便解释了一个事实，即从社会的角度看，现实生活中极少存在观念的等级制，换句话说就是观念的高下之分。一个观念无论一开始多么伟大或真实，自其进入群体智力所能接受的范围并对群体施加影响开始，它高深与伟大的部分便被剥夺了。

Moreover, from the social point of view the hierarchical value of an idea, its intrinsic worth, is without importance. The necessary point to consider is the effects it produces. The Christian ideas of the Middle Ages, the democratic ideas of the last century, or the social ideas of to-day are assuredly not very elevated. Philosophically considered, they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somewhat sorry errors, and yet their power has been and will be immense, and they will count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mong the most essential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conduct of States.

此外，从社会的角度看，观念的等级价值，也就是它固有的价值，并不重要。惟一值得考虑的，是它所产生的影响。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上个世纪的民主观念以及当今的社会观念都算不上绝对的高明。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能将它们视作遗憾的错误，尽管它们的力量曾经或将要变得巨大，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

Even when an idea has undergone the transformations which render it accessible to crowds, it only exerts influence when, by various processes which we shall examine elsewhere, it has entered the domain of the unconscious, when indeed it has become a

sentiment, for which much time is required.

就算一个观念通过改变能为群体所接受，只有在它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一种实在的情感后才会产生影响，这必定需要很长时间，其中涉及的各种过程，我们会另作分析。

For it must not be supposed that merely because the justness of an idea has been proved it can be productive of effective action even on cultivated minds. This fact may be quickly appreciated by noting how slight is the influence of the clearest demonstration on the majority of men. Evidence, if it be very plain, may be accepted by an educated person, but the convert will be quickly brought back by his unconscious self to his original conceptions. See him again after the lapse of a few days and he will put forward afresh his old arguments in exactly the same terms. He is in real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terior ideas, that have become sentiments, and it is such ideas alone that influence the more recondite motives of our acts and utterances. It cannot be otherwise in the case of crowds.

不要以为一个观念仅仅因为正确性得到了证实就可以产生巨大影响，有教养的人也时常因此马失前蹄。只要看到最明晰的证据对大多数人的影响微乎其微，便能很快理解这一点。一个证据如果十分明显，有教养的人可能会接受，但这位信徒立刻便会被自己无意识的自我带回至原来的观念。你将会看到，过不了几天，他便会再次用同样的语言提出以前的论点。实际上，他仍处于以前观念的影响下，这些观念已经成为了情感。这些观念便是我们行为和言语最深层次的动机。对于群体而言，也不例外。

When by various processes an idea has ended by penetrating into the minds of crowds, it possesses an irresistible power, and brings about a series of effects, opposition to which is bootless.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which resulte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ok nearly a century to implant themselves in the mind of the crowd. Their irresistible force, when once they had taken root, is known. The striving of an entire nation towards the conquest of social equality, and the realisation of abstract rights and ideal liberties, caused the tottering of all thrones and profoundly disturbed the Western world. During twenty years the nations were engaged in internecine conflict, and Europe witnessed hecatombs that would have terrified Ghengis Khan and Tamerlane. The world had never seen on such a scale what may result from the promulgation of an idea.

当一个观念经历各种过程为群体所接受时，它便具备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能力，并产生一系列的效果，与之对抗是徒劳的。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哲学理念，在深入群体思维之前花费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一旦生根发芽，它们的力量便无法抗拒，这是举世皆知的。整个国家争取社会平等、实现具体权利和理想自由的过程，导致所有权力摇摇欲坠、西方世界动荡不安。在二十年中，各国陷入内战，欧洲经历了连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看了也会恐惧的大屠杀。世界从未经历过由观念传播而导致的如此大规模的事件。

A long time is necessary for ideas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in the minds of crowds, but just as long a time is needed for them to be eradicated. For this reason crowds, as far as ideas are concerned, are always several generations behind learned men and philosophers. All statesmen are well aware to-day of the admixture of error contained in the fundamental ideas I referred to a short

while back, but as the influence of these ideas is still very powerful they are obliged to govern in accordance with principles in the truth of which they have ceased to believe.

观念在群体中根深蒂固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剔除这些观念同样也需要如此长的时间。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常落后于博学之人及哲学家好几代人。如我所提到的那样，如今所有的政客都熟知的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但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仍十分巨大，他们不得不依据自己已不再相信的原则进行统治。

2．The Reasoning Power of Crowds

2．群体的推理能力

It cannot absolutely be said that crowds do not reason and are not to be influenced by reasoning.

不能绝对地说，群体不做推理且不受推理的影响。

However, the arguments they employ and those which are capable of influencing them are,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of such an inferior kind that it is only by way of analogy that they can be described as reasoning.

然而，从逻辑的角度看，他们持有的论点和影响着他们的观念属

于十分拙劣的一类，因此它们能被称作推理，只是一种比喻。

The inferior reasoning of crowds is based, just as is reasoning of a high order, on the association of ideas, but between the ideas associated by crowds there are only apparent bonds of analogy or succession. The mode of reasoning of crowds resembles that of the Esquimaux who, knowing from experience that ice, a transparent body, melts in the mouth, concludes that glass, also a transparent body, should also melt in the mouth; or that of the savage who imagines that by eating the heart of a courageous foe he acquires his bravery; or of the workman who, having been exploited by one employer of labour, immediately concludes that all employers exploit their men.

群体的拙劣推理与高明推理一样，是基于观念的相互联系，但群体的各种观念之间只存在着表面的相似性和连贯性。群体的推理模式与爱斯基摩人相似，爱斯基摩人由于经验知道冰这个透明的物体在嘴巴里会融化，因而推导出同是透明物的玻璃在嘴巴里也会融化。群体的推理模式与野蛮人也雷同，野蛮人相信吞下骁勇对手的心脏便能增加胆量。群体的推理模式还与劳工类似，因为被一个雇主剥削，所以劳工推导出所有的雇主都剥削劳工。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asoning of crowds are the association of dissimilar things possessing a merely apparent connection between each other, and the immediate generalisation of particular cases. It is arguments of this kind that are always presented to crowds by those who know how to manage them. They are the only arguments by which crowds are to be influenced. A chain of logical argumentation is totally incomprehensible to

crowds, and for this reason it is permissible to say that they do not reason or that they reason falsely and are not to be influenced by reasoning. Astonishment is felt at times on reading certain speeches at their weakness, and yet they had an enormous influence on the crowds which listened to them, but it is forgotten that they were intended to persuade collectivities and not to be read by philosophers. An orator in intimate communication with a crowd can evoke images by which it will be seduced. If he is successful his object has been attained, and twenty volumes of harangues—always the outcome of reflection—are not worth the few phrases which appealed to the brains it was required to convince.

群体推理的特征是将截然不同、仅在表面上有关联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并立即将具体的事物普遍化。那些知道如何操控群体的人常常向群体提供这种论点。群体只受这些论点的影响。一系列逻辑论证对于群体来说都不可理喻，因此，可以断定，群体不推理，或者说他们推理的方式是错误的，且不受推理的影响。听演说时，我们常常会被演讲中的弱点所震惊，然而这些演说对于群体听众影响巨大。人们忘记了一点，那就是这些演说并不是说给哲学家听的，而是为了说服集体。与群体有亲密联系的演说家能够激发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形象。如果成功了，他的目的便达成了。二十卷长篇演讲——常常是反思的产物，比不上几句对这些人有号召力的话。

It would be superfluous to add that the powerlessness of crowds to reason aright prevents them displaying any trace of the critical spirit, prevents them, that is, from being capable of discerning truth from error, or of forming a precise judgment on any matter. Judgments accepted by crowds are merely judgments forced upon them and never judgments adopted after discussion. In regard to this matter the individuals who do not rise above the level

of a crowd are numerous. The ease with which certain opinions obtain general acceptance results more especially from the impossibility experienced by the majority of men of forming an opinion peculiar to themselves and based on reasoning of their own.

不言而喻，群体无法推理，因而无法展现批判精神，也无法辨别是非，更无法对任何事情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接受的判断只不过是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判断，绝不是经过讨论之后得出的判断。在这方面，能够超越群体的个人寥寥无几。有些意见轻而易举地得到普遍赞成，更多是因为大多数人知道他们不可能在自己推理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见解。

3．The Imagination of Crowds

3．群体的想象力

Just as is the case with respect to persons in whom the reasoning power is absent, the figurative imagination of crowds is very powerful, very active and very susceptible of being keenly impressed. The images evoked in their mind by a personage, an event, an accident, are almost as lifelike as the reality. Crowds are to some extent in the position of the sleeper whose reason, suspended for the time being, allows the arousing in his mind of images of extreme intensity which would quickly be dissipated could they be submitted to the action of reflection. Crowds, being incapable both of reflection and of reasoning, are devoid of the notion of improbability; and it is to be noted that in a general way it is the most improbable things that are the most striking.

与缺乏推理的人一样，群体形象化的想象力强大、活跃而又敏感。某个人和事在他们脑海中激起的形象全都栩栩如生。某种程度上来说，群体如同睡眠中的人，推理被暂停，因而脑中形成极其鲜明的形象，但一旦他们开始反思，这些形象便会迅速消失。由于群体不会反思也不会推理，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一般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是最惊人的事。

This is why it happens that it is always the marvellous and legendary side of events that more specially strike crowds. When a civilisation is analysed it is seen that, in reality, it is the marvellous and the legendary that are its true supports. Appearances have always played a much more important part than reality in history, where the unreal is always of greater moment than the real.

这便是为什么常常是一个事件中惊人、传奇的一面更加震惊群体。分析一个文明时会发现，实际上，它们真正的支柱是那些惊人、传奇的部分。在历史上，表象常比真相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不现实的因素也常比现实的因素更重要。

Crowds being only capable of thinking in images are only to be impressed by images. It is only images that terrify or attract them and become motives of action.

只会形象思维的群体也只会被形象打动。只有形象会吓住或吸引群体，且成为他们行为的动力。

For this reason theatrical representations, in which the image is shown in its most clearly visible shape, always have an enormous influence on crowds. Bread and spectacular shows constituted for the plebeians of ancient Rome the ideal of happiness, and they asked for nothing more. Throughout the successive ages this ideal has scarcely varied. Nothing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imagination of crowds of every category than theatrical representations. The entire audience experiences at the same time the same emotions, and if these emotions are not at once transformed into acts, it is because the most unconscious spectator cannot ignore that he is the victim of illusions, and that he has laughed or wept over imaginary adventures. Sometimes, however, the sentiments suggested by the images are so strong that they tend, like habitual suggestions, to transform themselves into acts. The story has often been told of the manager of a popular theatre who, in consequence of his only playing sombre dramas, was obliged to have the actor who took the part of the traitor protected on his leaving the theatre, to defend him against the violence of the spectators, indignant at the crimes, imaginary though they were, which the traitor had committed. We have here, in my opinion,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indications of the mental state of crowds, and especially of the facility with which they are suggestioned. The unreal has almost as much influence on them as the real. They have an evident tendency no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wo.

因此，蕴含着最清晰可见的形象的戏剧表演常常对于群体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于古罗马人民来说，面包和壮观的表演构成了幸福的理想，除此以外，他们别无所求。之后的所有时代中，这种理想很少改变。戏剧表演对于每一种群体的想象力都有着最深刻的影响。所有观众同时体验着同样的情绪，如果这些情绪某一次没有立刻转化为行动，那是因为连最无意识的观众也无法忽视自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

的笑容和泪水都是为了幻想出的冒险故事。然而，有时候形象表现出的感情非常强烈，就像习惯的暗示作用一样，转变为行为。有一个故事常常会被人讲到，因为上演了一部阴暗的戏剧，一个大众剧院的经理不得不在饰演叛徒的演员离开剧院时为其提供保护，以免受到观众的暴力攻击，这些观众因叛徒在戏中的犯罪行为而感到愤怒，尽管这些并不是真实的。在我看来，我们这里谈论的是群体精神状态最为显著的表现，尤其是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技巧的最显著表现。不真实的事物对他们的影响与真实的几乎相当。他们对于两者有着不加区分的明显倾向。

The power of conquerors and the strength of States is based on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It is more particularly by working upon this imagination that crowds are led. All great historical facts, the rise of Buddhism, of Christianity, of Islamism, the Reformati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in our own time, the threatening invasion of Socialism are the direct or indirect consequences of strong impressions produced o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rowd.

侵略者的势力和国家的威力都基于大众想象。在领导群体时，对于这种想象要更加用心。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发生于我们这一时代的社会主义崛起，都是对群体想象力产生巨大影响后直接或间接的结果。

Moreover, all the great statesmen of every age and every country, including the most absolute despots, have regarded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as the basis of their power, and they have never attempted to govern in opposition to it “It was by becoming a Catholic,” said Napoleon to the Council of State, “that I terminated the Vendeen war. By becoming a Mussulman that I obtained a

footing in Egypt. By becoming an Ultramontane that I won over the Italian priests, and had I to govern a nation of Jews I would rebuild Solomon's temple." Never perhaps since Alexander and Caesar has any great man better understood how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rowd should be impressed. His constant preoccupation was to strike it. He bore it in mind in his victories, in his harangues, in his speeches, in all his acts. On his deathbed it was still in his thoughts.

不仅如此，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所有伟大的政客，包括最不受约束的暴君，都将群众的想象力视作他们权力的基础，并且从未想要用与之忤逆的方式统治国家。拿破仑曾对国会说："通过成为天主教徒，才结束了旺代战争。通过成为穆斯林，才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信奉教皇至上的人，才会统治犹太世界，并修建所罗门神庙。"自亚历山大和恺撒之后，可能再也没有哪一个伟人知道该如何影响群众的想象力。他一直以来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对群众的想象力形成巨大的影响。无论在胜利、屠杀、演说还是行动时，他都对此牢记于心。即使在临终时，他仍念念不忘。

How is the imagination of crowds to be impressed? We shall soon see. Let us confine ourselves for the moment to saying that the feat is never to be achieved by attempting to work upon the intelligence or reasoning faculty, that is to say, by way of demonstration. It was not by means of cunning rhetoric that Antony succeeded in making the populace rise against the murderers of Caesar; it was by reading his will to the multitude and pointing to his corpse.

群体的想象力是如何被影响的？我们不久之后便会知道。我们只需说，想要获得这项技能，不能依靠智力或推理能力，换句话说，不

能靠论证。安东尼让民众反对恺撒的人，采用的方法不是投机取巧地说理，而是让民众意识到他的意志，用手指向他的尸体。

Whatever strikes the imagination of crowds presents itself under the shape of a startling and very clear image, freed from all accessory explanation, or merely having as accompaniment a few marvellous or mysterious facts: examples in point are a great victory, a great miracle, a great crime, or a great hope. Things must be laid before the crowd as a whole, and their genesis must never be indicated. A hundred petty crimes or petty accidents will not strike the imagination of crowds in the least, whereas a single great crime or a single great accident will profoundly impress them, even though the results be infinitely less disastrous than those of the hundred small accidents put together. The epidemic of influenza, which caused the death but a few years ago of five thousand persons in Paris alone, made very little impression on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The reason was that this veritable hecatomb was not embodied in any visible image, but was only learnt from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furnished weekly. An accident which should have caused the death of only five hundred instead of five thousand persons, but on the same day and in public, as the outcome of an accident appealing strongly to the eye, by the fall, for instance, of the Eiffel Tower, would have produced, on the contrary, an immense impression o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rowd. The probable loss of a transatlantic steamer that was supposed, in the absence of news, to have gone down in mid-ocean profoundly impresse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rowd for a whole week. Yet official statistics show that 850 sailing vessels and 203 steamers were lost in the year 1894 alone. The crowd, however, was never for a moment concerned by these successive losses, much more important though they were as far as regards the destruction of life and property, than

the loss of the Atlantic liner in question could possibly have been.

对群体想象力造成巨大影响的事物都有着惊人的清晰形象，不带任何赘述，或者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秘的事实：相关事例是伟大的胜利，巨大的奇迹，惊人的犯罪或极大的希望。摆在群体面前时，事物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其来源必须不为人知。成百上千次的小罪过或小事件，丝毫不会影响群体的想象力，但某一个特大性的犯罪或事件会彻底影响他们，尽管其造成的危害比成百上千次小事件加在一起要微弱得多。几年前的流行性感冒造成了巴黎一个地区5000人死亡，但对群体的想象力影响甚微。原因是这一实实在在的死亡事件没有形成任何具体的形象，仅仅是通过每周发布的统计数据得知的。一个本应造成五百人死亡却造成了五千人死亡的事件，但在当天公之于众，且极其吸引眼球的事件，比如说埃菲尔铁塔倒塌，反而会对群体的想象力造成巨大的影响。因看不到新闻，人们以为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轮已经在大洋中沉没了，这件事对于群体想象力的影响会持续一整周。然而，官方数据显示，1894年一年里有850条船和203艘汽轮沉没。但是群体从来没有哪一刻关注过这些连续的失事，尽管这些事故中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比大西洋汽轮严重得多。

It is not, then, the facts in themselves that strike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but the way in which they take place and are brought under notice. It is necessary that by their condensation, if I may thus express myself, they should produce a startling image which fills and besets the mind. To know the art of impressing the imagination of crowds is to know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 of governing them.

影响群体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及为人知晓的方式。如果要我说说自己的想法的话，我认为必须对他们进行浓

缩，以展现出一副惊人的形象。知道了如何影响群体的想象力，同时也就知道了如何统治他们。

Chapter IV A Religious Shape Assumed by All the Convictions of Crowds

第四章　群体信仰所采用的宗教形式

What is meant by the religious sentiment—It is independent of the worship of a divinity—Its characteristics—The strength of convictions assuming a religious shape—Various examples—Popular gods have never disappeared—New forms under which they are revived—Religious forms of atheism—Importance of these notions from the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The Reformation, Saint Bartholomew, the Terror, and all analogous events are the result of the religious sentiments of crowds and not of the will of isolated individuals.

提要：宗教情感的含义 / 它与对上帝的崇拜无关 / 它的特征 / 信仰所采用的宗教形式的力量 / 各类例子 / 大众之神从未消失 / 它们重生的新形式 / 无神论的宗教形式 / 从历史角度看这些概念的重要性 / 宗教改革、圣巴托罗缪、恐怖时期以及所有的类似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情感而非个人意志的结果。

We have shown that crowds do not reason, that they accept or reject ideas as a whole, that they tolerate neither discussion nor contradiction, and that the suggestions brought to bear on them invade the entire field of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tend at once to transform themselves into acts. We have shown that crowds suitably influenced are ready to sacrifice themselves for the ideal with

which they have been inspired. We have also seen that they only entertain violent and extreme sentiments, that in their case sympathy quickly becomes adoration, and antipathy almost as soon as it is aroused is transformed into hatred. These general indications furnish us already with a presentiment of the nature of the convictions of crowds.

我们已经说过，群体不会推理，他们只会集体地赞成或否定，绝不容忍讨论或反对。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征服他们的理解力，且立即将其转化为行动。我们还提过，群体受到恰当的影响后会愿意为启迪自己的力量作出牺牲。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只拥有粗暴和极端的情感，对他们来说，同情很快便会成为崇拜，反感几乎在产生的瞬间就转变成为仇恨。这些普遍的暗示已经向我们预示了群体信仰的天性。

When these convictions are closely examined, whether at epochs marked by fervent religious faith, or by great political upheavals such as those of the last century, it is apparent that they always assume a peculiar form which I cannot better define than by giving it the name of a religious sentiment.

经过缜密的考察之后，无论是在充满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有着巨大政治动荡的时代，比如上个世纪，这些信仰总明显表现出特殊的形式，称之为宗教情感最好不过。

This sentiment has very simpl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worship of a being supposed superior, fear of the power with which the being is credited, blind submission to its commands, inability to

discuss its dogmas, the desire to spread them, and a tendency to consider as enemies all by whom they are not accepted. Whether such a sentiment apply to an invisible God, to a wooden or stone idol, to a hero or to a political conception, provided that it presents the preceding characteristics, its essence always remains religious. The supernatural and the miraculous are found to be present to the same extent. Crowds unconsciously accord a mysterious power to the political formula or the victorious leader that for the moment arouses their enthusiasm.

这种情感有着非常简单的特征，比如：对想象中至高无上者的崇拜，对人赖以生存力量的恐惧，对其命令的盲目顺从，对其信条无法进行讨论，想要散播这些信条的欲望，将所有不接受的人视作敌人的倾向。无论这种情感适用于看不见的上帝、一具木头或石头偶像、一个英雄或是政治观念，只有表现出上述特征，它的本质总是宗教的。它们还会表现出同等程度的超自然和奇迹般的特征。群体在不知不觉中将某种神秘力量与激发他们热情的政治信条或获选领袖等同起来。

A person is not religious solely when he worships a divinity, but when he puts all the resources of his mind, the complete submission of his will, and the whole-souled ardour of fanaticism at the service of a cause or an individual who becomes the goal and guide of his thoughts and actions.

一个人，不仅在信仰上帝时是虔诚的，当其将脑中所有资源，包括对一致的绝对顺从、全心全意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某个事业或个人，这一事业或个人成为了其思想和行动的目标和指导时，他也是虔诚的。

Intolerance and fanaticism are the necessary accompaniments of the religious sentiment. They are inevitably displayed by those who believe themselves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secret of earthly or eternal happiness. These two characteristics are to be found in all men grouped together when they are inspired by a conviction of any kind. The Jacobins of the Reign of Terror were at bottom as religious as the Catholics of the Inquisition, and their cruel ardour proceeded from the same source.

狭隘和幻想是宗教情感必不可少的伴侣。凡是相信自己掌握了世俗和永恒幸福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展现出这些特征。所有因受某种信仰激励而聚在一起的人，身上都有这两个特征。统治恐怖时代的雅各宾党人和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热情有着相同的来源。

The convictions of crowds assume those characteristics of blind submission, fierce intolerance, and the need of violent propaganda which are inherent in the religious sentiment, and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it may be said that all their beliefs have a religious form. The hero acclaimed by a crowd is a veritable god for that crowd. Napoleon was such a god for fifteen years, and a divinity never had more fervent worshippers or sent men to their death with greater ease. The Christian and Pagan Gods never exercised a more absolute empire over the minds that had fallen under their sway.

群体的信仰有着诸如盲目顺从、极度狭隘和需要粗暴宣传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宗教情感中固有的部分，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他们所有的信仰都有着宗教的形式。群体所称赞的英雄是他们名副其实的神明。拿破仑就是这样，在十五年里都被视作神明，比任何神受到

的崇拜都热烈，也能更轻易地置人于死地。基督教和异教徒的神对他们控制的头脑也未曾有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All founders of religious or political creeds have established them solely because they were successful in inspiring crowds with those fanatical sentiments which have as result that men find their happiness in worship and obedience and are ready to lay down their lives for their idol. This has been the case at all epochs. Fustel de Coulanges, in his excellent work on Roman Gaul, justly remarks that the Roman Empire was in no wise maintained by force, but by the religious admiration it inspired. “It would be without a parallel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he observes rightly, “that a form of government held in popular detestation should have lasted for five centuries… It would be inexplicable that the thirty legions of the Empire should have constrained a hundred million men to obedience.” The reason of their obedience was that the Emperor, who personified the greatness of Rome, was worshipped like a divinity by unanimous consent. There were altars in honour of the Emperor in the smallest townships of his realm. “From one end of the Empire to the other a new religion was seen to arise in those days which had for its divinities the emperors themselves. Some years before the Christian era the whole of Gaul, represented by sixty cities, built in common a temple near the town of Lyons in honour of Augustus… Its priests, elected by the united Gallic cities, were the principal personages in their country… It is impossible to attribute all this to fear and servility. Whole nations are not servile, and especially for three centuries. It was not the courtiers who worshipped the prince, it was Rome, and it was not Rome merely, but it was Gaul, it was Spain, it was Greece and Asia.”

所有宗教和政治信条的创立者，创立这些信条是因为他们成功地用幻想的情感启迪着群体，他们使人们在崇拜和顺从中找到自己的幸福，且随时准备为他们的偶像赴汤蹈火。所有时代都是这样。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在其关于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正确地指出，罗马帝国得以稳固根基并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其激发出的宗教崇拜。他正确地写道，“一种受人厌恶的统治形式竟能持续五个世纪之久，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帝国的三十个军团竟让一百万人俯首帖耳，这实在不可思议。”让他们俯首帖耳的原因是，皇帝是罗马伟业个人化的体现，因此大家一致将其敬奉为神明。在他的疆域里，即使是最小的城镇也设有供奉皇帝的祭坛。“当时，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新宗教的诞生随处可见，这个宗教的神明就是皇帝自己。基督教时代之前的一些年里，以六十个城市组建而成的高卢地区，为了纪念奥古斯都，在里昂镇附近建立了庙宇。庙宇的祭祀由高卢的城市统一选出，是他们国家的首要人物。把这些都归功于畏惧和奴性是不太可能的。整个国家不可能都是奴隶，尤其是三个世纪以来都是奴隶。崇拜君主的并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罗马，并不仅限罗马，还有高卢、西班牙、希腊和整个亚洲。”

To-day the majority of the great men who have swayed men's minds no longer have altars, but they have statues, or their portraits are in the hands of their admirers, and the cult of which they are the object is not notably different from that accorded to their predecessor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s only to be got by a thorough appreciation of this fundamental point of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The crowd demands a god before everything else.

如今，大多数支配着群众思想的伟人已不再设立祭坛，但其崇拜者有他们的雕像或画像，以他们为对象的崇拜行为与前辈相比毫不逊色。想要了解历史的哲理，只需全面探究群体心理的这一基本特点。

群体最需要的便是神明。

It must not be supposed that these are the superstitions of a bygone age which reason has definitely banished. Sentiment has never been vanquished in its eternal conflict with reason. Crowds will hear no more of the words divinity and religion, in whose name they were so long enslaved; but they have never possessed so many fetishes as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and the old divinities have never had so many statues and altars raised in their honour. Those who in recent years have studied the popular movement known under the name of Boulangism have been able to see with what ease the religious instincts of crowds are ready to revive. There was not a country inn that did not possess the hero's portrait. He was credited with the power of remedying all injustices and all evils, and thousands of men would have given their lives for him. Great might have been his place in history had his character been at all on a level with his legendary reputation.

万万不可认为，这些都是过去时代的迷信，早已被理性根除。情感与理性的永恒斗争从未停止过。群体不再听到诸如神明、宗教之类的词眼，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群众都受着它们的奴役。但是，他们从未像过去的一百年里那样，拥有如此之多的崇拜对象，那些古老的神明从未拥有过如此之多的纪念雕像和祭坛。近些年来研究大众运动的人都知道，在布朗热主义下，那些释放了群体宗教本能的东西非常容易复兴起来。所有的乡间酒馆都悬挂着英雄的画像。他被赋予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力量，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为他舍弃生命。如果他的个性可以与其传奇名声媲美，那么他将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It is thus a very useless commonplace to assert that a religion is

necessary for the masses, because all political, divine, and social creeds only take root among them on the condition of always assuming the religious shape—a shape which obviates the danger of discussion. Were it possible to induce the masses to adopt atheism, this belief would exhibit all the intolerant ardour of a religious sentiment, and in its exterior forms would soon become a cult. The evolution of the small Positivist sect furnishes us a curious proof in point. What happened to the Nihilist whose story is related by that profound thinker Dostoiewsky has quickly happened to the Positivists. Illumined one day by the light of reason he broke the images of divinities and saints that adorned the altar of a chapel, extinguished the candles, and, without losing a moment, replaced the destroyed objects by the works of atheistic philosophers such as Buchner and Moleschott, after which he piously relighted the candles. The object of his religious beliefs had been transformed, but can it be truthfully said that his religious sentiments had changed?

由此可见，群众需要宗教这一论断实在是老生常谈，因为所有政治、神圣和社会的信条只有在采取宗教形式时才会在群众中生根发芽，宗教形式消除了讨论的危险。即使诱导群众信仰无神论是可能的，这一信仰也会呈现出宗教情感的狭隘狂热，其外在形式也会很快变成一种崇拜。实证主义者这一小宗派为我们提供了非同寻常的论证。发生在虚无主义者——他们的故事与大思想家杜斯托耶夫斯基有着关联——身上的故事，很快也会发生在实证主义者身上。他在某一天受到理性之光的启发，而后撕碎教堂祭坛上供奉着的神明和圣人的画像，吹熄蜡烛，不由分说地将毁坏的物品换成无神论哲学家的作品，比如毕希纳和莫勒斯霍特，然后再虔诚地点起蜡烛。他宗教信仰的目标变了，但是否真的可以说他的宗教情感也变了？

Certain historical events—and they are precisely the most important—I again repeat, are not to be understood unless one has attained to an appreciation of the religious form which the convictions of crowds always assume in the long run. There are social phenomena that need to be studied far mor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sychologist than from that of the naturalist. The great historian Taine has only studied the Revolution as a naturalist, and on this account the real genesis of events has often escaped him. He has perfectly observed the facts, but from want of having studied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he has not always been able to trace their causes. The facts having appalled him by their bloodthirsty, anarchic, and ferocious side, he has scarcely seen in the heroes of the great drama anything more than a horde of epileptic savages abandoning themselves without restraint to their instincts. The violence of the Revolution, its massacres, its need of propaganda, its declarations of war upon all things, are only to be properly explained by reflecting that the Revolution was merel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religious belief in the mind of the masses. The Reformation, the massacre of Saint Bartholomew, the French religious wars, the Inquisition, the Reign of Terror are phenomena of an identical kind, brought about by crowds animated by those religious sentiments which necessarily lead those imbued with them to pitilessly extirpate by fire and sword whoever is oppos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faith. The methods of the Inquisition are those of all whose convictions are genuine and sturdy. Their convictions would not deserve these epithets did they resort to other methods.

我再重申一次，除非研究群体信仰长期以来总是采用的宗教形式，否则我们绝不可能理解某些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有一些社会现象，需要从心理学的角度而非自然主义的角度进行研究。伟大的历史

学家泰纳，只从自然主义的角度研究过大革命，据他所说，他经常无法找到事件的真实起源。他对事实已经作了充分的探讨，但从研究群体心理的要求来看，他常常未能找出事件的起因。事实以其血腥、混乱和残忍的一面震惊了他，他在那部伟大戏剧的英雄身上看到的全是疯狂的野蛮人对自己本能不加约束、肆意妄为的行径。大革命的残暴、屠杀、对宣传的需要和对一切事物进行宣战的行为，只要能合理地解释为是在群众脑中植入新宗教信仰就可以。宗教改革、圣巴托罗缪的屠杀、法国宗教战争、宗教法庭及恐怖时期的统治都属于同类现象，都是受宗教情感驱动的群体行为，这些宗教情感必然导致怀有它们的人残忍地用火和剑消灭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宗教法庭采取的方法，是所有怀有真诚而坚定的信仰的人采取的方法。如果他们采取了其他方法，也就不值得这样的评语了。

Upheavals analogous to those I have just cited are only possible when it is the soul of the masses that brings them about. The most absolute despots could not cause them. When historians tell us that the massacre of Saint Bartholomew was the work of a king, they show themselves as ignorant of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as of that of sovereigns. Manifestations of this order can only proceed from the soul of crowds. The most absolute power of the most despotic monarch can scarcely do more than hasten or retard the moment of their apparition. The massacre of Saint Bartholomew or the religious wars were no more the work of kings than the Reign of Terror was the work of Robespierre, Danton, or Saint Just. At the bottom of such events is always to be found the working of the soul of the masses, and never the power of potentates.

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大事件，只有在群众的灵魂让其发生时才有可能发生。即使是最最权威的专制者也不能让其发生。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罗缪的屠杀是某位国王所为时，他们像君王一样对群体心

理一无所知。这种命令只能由群体的灵魂来推动执行。最专制的君主，其最至高无上的权力仅能加速或减缓其显灵的步伐。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或宗教战争并不仅仅是国王所为，就像恐怖时期的统治并不仅仅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茹斯特所为一样。我们能发现，这些事件的基础总出于群众灵魂的运作，而绝非君主的权力。

[3_1].General Boulanger.

[3_2].Persons who went through the siege of Paris saw numerous examples of this credulity of crowds. A candle alight in an upper story was immediately looked upon as a signal given the besiegers, although it was evident, after a moment of reflection, that it was utterly impossible to catch sight of the light of the candle at a distance of several miles.

[3_3].L'Eclair, April 21, 1895.

[3_4].Do we know in the case of one single battle exactly how it took place? I am very doubtful on the point. We know who were the conquerors and the conquered, but this is probably all. What M. D'Harcourt has said with respect to the battle of Solferino, which he witnessed and in which he was personally engaged, may be applied to all battles—"The generals (informed, of course, by the evidence of hundreds of witnesses) forward their official reports; the orderly officers modify these documents and draw up a definite narrative; the chief of the staff raises objections and re-writes the whole on a fresh basis. It is carried to the Marshal, who exclaims, 'You are entirely in error,' and he substitutes a fresh edition. Scarcely anything remains of the original report." M. D'Harcourt relates this fact as proof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the truth in connection with the most striking, the best observed events.

[3_5].It is understandable for this reason why it sometimes happens that pieces refused by all theatrical managers obtain a prodigious success when by a stroke of chance they are put on the stage. The recent success of Francois Coppee's play "Pour la Couronne" is well known, and yet, in spite of the name of its author, it was refused during ten years by the managers of the principal Parisian theatres.

[4_1].博兰格尔将军。

[4_2].经历过巴黎之围的人见过太多群体容易轻信的例子。高楼上点燃的蜡烛立即

被视作是给围攻者的信号，尽管思考片刻便能明白，很显然，数里之外是不可能看见蜡烛的。

[4_3].闪电报，1985年4月21日

[4_4].我们是否准确知道某个战役如何发生的？对此我很怀疑。我们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但也仅此而已。哈考特先生曾亲身参与过索尔费里诺战役，在提及这场战役时，他说："将军们（当然，是数百位目击者证明的）上交了他们的公务报告后，当班官员们修改了这些文件，定了稿，接着首长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在新的基础上重写了一份。这份报告被送至元帅手中，元帅说：'你们简直大错特错。'然后写了个新版本。这一版中几乎没有任何初稿的影子。"哈考特拿这一事实来证明，我们不可能会查实那件最惊人、最壮观事件的真相。

[4_5].由此，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一些被所有剧院经理拒绝的戏剧因偶然的机会上演后能够大获成功。近来，弗朗索瓦·戈贝的诗剧《为了王冠》名声大噪，但是除去作者的名头，在过去的十年间，这部剧一直被巴黎大剧院的经理们拒绝。

Book II The Opinions and Beliefs of Crowds

第二卷　群体意见和群体信仰

Chapter I Remote Factors of the Opinions and Beliefs of Crowds

第一章　群体意见和群体信仰中的间接因素

Preparatory factors of the beliefs of crowds—The origin of the beliefs of crowds is the consequence of a preliminary process of elaboration—Study of the different factors of these beliefs. 1. RACE. The predominating influence it exercises—It represents the suggestions of ancestors. 2. TRADITIONS. They are the synthesis of the soul of the race—Social importance of traditions—How, after having been necessary they become harmful—Crowds are the most obstinate maintainers of traditional ideas. 3. TIME. It prepares in success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beliefs and then their destruction. It is by the aid of this factor that order may proceed from chaos. 4. POLITIC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Erroneous idea of their part—Their influence extremely weak—They are effects, not causes—Nations are incapable of choosing what appear to them the best institutions—Institutions are labels which shelter the most dissimilar things under the same title—How institutions may come to be created—Certain institutions theoretically bad, such as centralisation obligatory for certain nations. 5. INSTITUTIONS AND EDUCATION. Falsity of prevalent ideas as to the influence of instruction on crowds—Statistical indications—Demoralising effect of Latin system of education—Part instruction might play—Examples furnished by various peoples.

提要：群体信仰的准备因素，即群体信仰的来源是展开论述的准

备过程。研究影响群体信仰的主要因素：（1）民族。民族最主要的影响是它显示了祖先的意见（2）传统。传统是民族灵魂的综合体／传统的重要性／然而传统既具有必要性也具有破坏性／群体是传统观念最顽固的支持者。（3）时间。信仰的建立和破坏都是接连进行的。时间流逝之中，混乱才能孕育秩序。（4）政治、社会制度。一些错误的观点／它们的影响力极小／它们是效果，并非原因／国家无法自行选择最合适的社会制度／制度让最不统一的观点冠以统一名称／制度如何建立的／某些制度对于部分国家有不良影响，例如中央集权制。（5）教育。当今盛行的教育影响人民这一理论的错误性／数据分析／拉丁教育系统的弊端／教育的作用／部分事例。

Having studied the mental constitution of crowds and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heir modes of feeling, thinking, and reasoning, we shall now proceed to examine how their opinions and beliefs arise and become established.

在了解了群众心理的构成和群众感受、思考、质询的方式后，我们现在将研究群众意见和信仰是如何建立的。

The factors which determine these opinions and beliefs are of two kinds: remote factors and immediate factors.

决定群众意见和信仰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间接因素，其二是直接因素。

The remote factors are those which render crowds capable of adopting certain convictions and absolutely refractory to the

acceptance of others. These factors prepare the ground in which are suddenly seen to germinate certain new ideas whose force and consequences are a cause of astonishment, though they are only spontaneous in appearance. The outburst and putting in practice of certain ideas among crowds present at times a startling suddenness. This is only a superficial effect, behind which must be sought a preliminary and preparatory action of long duration.

间接因素是使群众接受某一特定理念，同时使其排斥其他理念的因素。间接因素营造出有利于新观念萌芽的氛围，这种新观念产生的原因和结果都令人惊讶，然而这仅仅是表象。当时看来，一些新观念的爆发与实践十分突兀。在这些表面结果的背后必定有长期的准备过程。

The immediate factors are those which, coming on the top of this long, preparatory working, in whose absence they would remain without effect, serve as the source of active persuasion on crowds; that is, they are the factors which cause the idea to take shape and set it loose with all its consequences. The resolutions by which collectivities are suddenly carried away arise out of these immediate factors; it is due to them that a riot breaks out or a strike is decided upon, and to them that enormous majorities invest one man with power to overthrow a government.

直接因素是在长期准备过程中积极说服群众的因素，然而若没有准备过程，直接因素也无法发挥作用；直接因素促进新观念成型，并使其产生一定的结果。直接因素促进集体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直接因素促使爆发暴乱或决定罢工，也使绝大多数人选出领袖，推翻政府。

The successive action of these two kinds of factors is to be traced in all great historical events. The French Revolution—to cite but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of such events—had among its remote factors the writings of the philosophers, the exactions of the nobility,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tific thought. The mind of the masses, thus prepared, was then easily roused by such immediate factors as the speeches of orators, and the resistance of the court party to insignificant reforms.

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历史事件的发生。引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事件，法国大革命，其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著作、贵族的苛捐杂税以及科学观念的进步。所以群众心里有所准备，并会轻易被诸如演说家的演讲以及对朝廷无关紧要的改革的抵抗等直接因素激怒。

Among the remote factors there are some of a general nature, which are found to underlie all the beliefs and opinions of crowds. They are race, traditions, time, institutions, and education.

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是一切群体信仰和观念的基础。它们是种族、传统、时间、制度和教育。

We now proceed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se different factors.

我们现在来研究这些不同的间接因素。

1．Race

1．种族

This factor, race, must be placed in the first rank, for in itself it far surpasses in importance all the others. We have sufficiently studied it in another work; it is therefore needless to deal with it again. We showed, in a previous volume, what an historical race is, and how, its character once formed, it possesses, as the result of the laws of heredity such power that its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arts—in a word, all the elements of its civilisation—are merely the outward expression of its genius. We showed that the power of the race is such that no element can pass from one people to another without undergoing the most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4_1]

种族这一间接因素必须放在第一位，因为它的重要性远超其他因素。我们在其他著作里曾全面研究过它，所以无需多言。我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历史种族以及其性格一旦形成，便将以信仰、制度和艺术的形式传承下去，换句话说，所有文明的组成部分都仅仅是种族的外在表达形式。某种观念从一个种族传播到另一种族时，总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5_1] 。

Environment, circumstances, and events represent the social suggestions of the moment. They may have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but this influence is always momentary if it be contrary to the suggestions of the race; that is, to those which are inherited by a nation from the entire series of its ancestors.

环境、境遇和事件体现了社会暗示。它们可能有强大的影响，但若这种影响力与种族性格相反，或是民族遗传下的因素对立，那么这种影响只能是暂时的。

We shall have occasion in several of the chapters of this work to touch again upon racial influence, and to show that this influence is so great that it domin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peculiar to the genius of crowds. It follows from this fact that the crowd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offer very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of beliefs and conduct and are not to be influenced in the same manner.

我们还会在后续章节里讨论种族因素的影响，并展示其对各民族群体气质特征的影响。事实上，不同国家的民众在信仰和举止方面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

2．Traditions

2．传统

Traditions represent the ideas, the needs, and the sentiments of the past. They are the synthesis of the race, and weigh upon us with immense force.

传统体现了过去的思想、需求和情感。它们是民族的综合，对我们有深远的影响。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since embryology has shown the immense influence of the past on the evolution of living beings; and the historical sciences will not undergo a less change when this conception has become more widespread. As yet it is not sufficiently general, and many statesmen are still no further advanced than the theorists of the last century, who believed that a society could break off with its past and be entirely recast on lines suggested solely by the light of reason.

这好比从胚胎学的角度，可以证明过去对生物进化有重大影响，这一发现也改变了生物学的进程；当对这种理论的接受更为广泛时，历史科学也将经历巨变。但是过去的重要性还未成为共识，许多政治家仍然和上世纪的理论家一样，认为社会能和过去完全分离，仅仅依靠理性之光便可重铸新的世纪。

A people is an organism created by the past, and, like every other organism, it can only be modified by slow hereditary accumulations.

人类和其他有机体一样，是由过去创造，也只能通过缓慢累计的遗传过程发生变化。

It is tradition that guides men, and more especially so when they are in a crowd. The changes they can effect in their traditions with any ease, merely bear, as I have often repeated, upon names and outward forms.

传统引导人类，尤其是引导集体前进。正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除了一些名字和外在形式，人们难以改变传统。

This circumstance is not to be regretted. Neither a national genius nor civilisation would be possible without traditions. In consequence man's two great concerns since he has existed have been to create a network of traditions which he afterwards endeavours to destroy when their beneficial effects have worn themselves out. Civilisation is impossible without traditions, and progress impossible without the destruction of those traditions. The difficulty, and it is an immense difficulty, is to find a proper equilibrium between stability and variability. Should a people allow its customs to become too firmly rooted, it can no longer change, and becomes, like China, incapable of improvement. Violent revolutions are in this case of no avail; for what happens is that either the broken fragments of the chain are pieced together again and the past resumes its empire without change, or the fragments remain apart and decadence soon succeeds anarchy.

无需为这种情形感到可惜。无论是民族精神或是民族文化都无法脱离传统而存在。所以人类自诞生以来的两大努力是：（1）建立传统。（2）当传统变得不再有益，甚至有害时，他们便破坏传统。没有传统，文明便不曾存在；没有对传统的破坏，进步便不会出现。永恒的难题是在变与不变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如果一个民族使传统习俗过分根深蒂固并难以改变，那么它就像中国一样死气沉沉，难以进步。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不再有用；因为被革命打破的锁链会被积重难返的传统重新拼在一起，或者让被打破的部分自生自灭，最终由无政府主义代替衰败。

The ideal for a people is in consequence to preserve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past, merely changing them insensibly and little by little. This ideal is difficult to realise. The Romans in ancient and the English in modern times are almost alone in having realised it.

最理想的情况是保留过去的制度，仅仅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改变传统。这种理想难以实现。古罗马帝国和近代英国几乎是仅有的实现这种理想变革的国家。

It is precisely crowds that cling the most tenaciously to traditional ideas and oppose their being changed with the most obstinacy. This is notably the case with the category of crowds constituting castes. I have already insisted upon the conservative spirit of crowds, and shown that the most violent rebellions merely end in a changing of words and terms.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in the presence of destroyed churches, of priests expelled the country or guillotined, it might have been thought that the old religious ideas had lost all their strength, and yet a few years had barely lapsed before the abolished system of public worship had to be re-established in deference to universal demands. [4_2]

群体正是传统观念最顽固的支持者，是改变最坚决的反对者。种姓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刚刚提到过民族的保守特性，并表示即使最暴力的叛乱，也仅能改变一些词语和习语。上世纪末期，人们毁坏教堂，驱逐神父，宗教好似威风不再；但没过几年，被废除的公开礼拜制度卷土重来，与过去无异 [5_2] 。

Blotted out for a moment, the old traditions had resumed their

sway.

消失片刻后，传统观念东山再起。

No example could better display the power of tradition on the mind of crowds. The most redoubtable idols do not dwell in temples, nor the most despotic tyrants in palaces; both the one and the other can be broken in an instant. But the invisible masters that reign in our innermost selves are safe from every effort at revolt, and only yield to the slow wearing away of centuries.

没有任何一个例子比群体观念更能说明传统的重要性了。最令人生畏的偶像并不是庙堂里的僧侣，也不是宫廷之中的暴君，因为他们都可以在片刻之间灰飞烟灭。是看不见的力量支配着我们内心，它们阻隔反叛的力量，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消失。

3．Time

3．时间

In social as in biological problems time is one of the most energetic factors. It is the sole real creator and the sole great destroyer. It is time that has made mountains with grains of sand and raised the obscure cell of geological eras to human dignity. The action of centuries is sufficient to transform any given phenomenon. It has been justly observed that an ant with enough time at its

disposal could level Mount Blanc. A being possessed of the magical force of varying time at his will would have the power attributed by believers to God.

无论是在生物学还是社会学中，时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时间是万物惟一的创造者，也是惟一毁灭者。时间磨平山头，使其变成沙丘；时间改变原始细胞，使之成为人类。数百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任何现象。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蚂蚁也能磨平勃朗峰。能随意更改时间之人就是上帝。

In this place, however, we have only to concern ourselves with the influence of time on the genesis of the opinions of crowds. Its action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s still immense. Dependent upon it are the great forces such as race, which cannot form themselves without it. It causes the birth, the growth, and the death of all beliefs. It is by the aid of time that they acquire their strength and also by its aid that they lose it.

然而在这里，我们只需考虑时间对群体观念起源的影响。时间的影响力至今仍然十分巨大。诸如民族这样强大的力量也只得依赖时间来形成。时间引起所有的诞生、成长和死亡。它们因时间而壮大，也因时间而消亡。

It is time in particular that prepares the opinions and beliefs of crowds, or at least the soil on which they will germinate. This is why certain ideas are realisable at one epoch and not at another. It is time that accumulates that immense detritus of beliefs and thoughts on which the ideas of a given period spring up. They do

not grow at hazard and by chance; the roots of each of them strike down into a long past. When they blossom it is time that has prepared their blooming; and to arrive at a notion of their genesis it is always back in the pas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earch. They are the daughters of the past and the mothers of the future, but throughout the slaves of time.

正是时间给群体观念和群体信仰提供了准备条件，或至少给它们提供了萌芽的土壤。这是为何有些观念发源于某个特定时代而非另外一个。时间将某一时代涌现的观念和信仰之碎屑堆积起来。这些观念并非碰巧出现；它们的根源藏在久远的过去。它们兴盛时，是它们应当兴盛之时；若要追寻起源，则必须追溯历史。群体观念和群体信仰是过去之女，未来之母，但却是时间之奴。

Time, in consequence, is our veritable master, and it suffices to leave it free to act to see all things transformed. At the present day we are very uneasy with regard to the threatening aspirations of the masses and the destructions and upheavals foreboded thereby. Time, without other aid, will see to the restoration of equilibrium. “No form of government,” M. Lavisse very properly writes, “was founded in a day. Political and social organisations are works that demand centuries. The feudal system existed for centuries in a shapeless, chaotic state before it found its laws; absolute monarchy also existed for centuries before arriving at regular methods of government, and these periods of expectancy were extremely troubled.”

所以，时间是我们真正的主人，只需让它自由发挥作用便可观察万物的变化。我们当下并不愿意看到群体危险的抱负和其所预示的毁

灭和剧变。仅仅凭借时间，社会的平衡又将得以重建。拉维斯先生非常恰当地指出："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可能在瞬间形成。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形成通常需要几个世纪。在找到发展规律前，封建制度在其存在之初的好几个世纪都处于混乱、无形的状态；绝对君权也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统治的正确方法。这些等待时期是极为动荡的。"

4．Politic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4．政治、社会制度

The idea that institutions can remedy the defects of societies, that national progress i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improvement of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s, and that social changes can be effected by decrees—this idea, I say, is still generally accepted. It was the starting-poin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ent day are based upon it.

制度可以纠正社会弊病，制度的进步带来国家进步，法令可以促成社会变化，我敢说这一观念仍被广泛接受。这一观念是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也是当今社会理论的根基。

The most continuous experience has been unsuccessful in shaking this grave delusion. Philosophers and historians have endeavoured in vain to prove its absurdity, but yet they have had no difficulty in demonstrating that institutions are the outcome of ideas, sentiments, and customs, and that ideas, sentiments, and customs are not to be recast by recasting legislative codes. A nation

does not choose its institutions at will any more than it chooses the colour of its hair or its eyes.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s are the product of the race. They are not the creators of an epoch, but are created by it. Peoples are not gover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caprices of the moment, but as their character determines that they shall be governed. Centuries are required to form a political system and centuries needed to change it. Institutions have no intrinsic virtue: in themselves they are neither good nor bad. Those which are good at a given moment for a given people may be harmful in the extreme for another nation.

任何经验都未能撼动这一严重的谬论。尽管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能毫不费力地证明制度是理念、情感和习俗的产物，而理念、情感和习俗不会随着法律制度的改变而重铸，它们仍然无法纠正广为流传的谬论。一个民族无法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正如一个人无法随意选择自己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制度和政府是种族的产物。它们不是时代的创造者，而是被时代所创造的。民族性格，而非某一时刻的奇思怪想，决定了他们要被如何统治。政治制度的建立抑或改变均需要上百年。制度无法从道德方面定性，因为制度间并无好坏之分。那些在某个时刻对特定群众有益的制度，对另一群体可能极为有害。

Moreover, it is in no way in the power of a people to really change its institutions. Undoubtedly, at the cost of violent revolutions, it can change their name, but in their essence they remain unmodified. The names are mere futile labels with which an historian who goes to the bottom of things need scarcely concern himself. It is in this way, for instance, that England, [4_3] the most democratic country in the world, lives, nevertheless, under a monarchical regime, whereas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 most oppressive despotism is rampant are the Spanish-American

Republics, in spite of their republican constitutions. The destinies of peoples are determined by their character and not by their government. I have endeavoured to establish this view in my previous volume by setting forth categorical examples.

并且，一个群体并没有改变制度的能力。尽管毫无疑问的是，暴力革命可以改变某一制度的名称，但并未改变它的本质。名称只是无用的标签，只是历史学家无用的研究。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5_3] ，采取的是君主制，然而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比如拉美国家，却采取了共和制。人民的命运由他们的性格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决定。我试图通过四类模型来说明这一观点。

To lose time in the manufacture of cut-and-dried constitutions is, in consequence, a puerile task, the useless labour of an ignorant rhetorician. Necessity and time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elaborating constitutions when we are wise enough to allow these two factors to act. This is the plan the Anglo-Saxons have adopted, as their great historian, Macaulay, teaches us in a passage that the politicians of all Latin countries ought to learn by heart. After having shown all the good that can be accomplished by laws which appea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ure reason a chaos of absurd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he compares the scores of constitutions that have been engulfed in the convulsions of the Latin peoples with that of England,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latter has only been very slowly changed part by par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mmediate necessities and never of speculative reasoning.

所以，把时间浪费在老生常谈的宪法上，是一件幼稚的事情，如果我们足够明智，让必要性和时间发挥作用，那么它们将会修缮宪

法。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就是这么做的，正如伟大的历史学家麦考莱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这是所有的拉美政治人士都应该遵循的。在展示了理性的、混乱的和冲突的法律后，他对比了拉美混乱的法律制度和英国的法律制度，并指出后者只会缓慢地、局部地因为突然而又必要的因素改变，不会因为随即的因素改变。

> To think nothing of symmetry and much of convenience; never to remove an anomaly merely because it is an anomaly; never to innovate except when some grievance is felt; never to innovate except so far as to get rid of the grievance; never to lay down any proposition of wider extent than the particular case for which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these are the rules which have, from the age of John to the age of Victoria, generally guided the deliberations of our two hundred and fifty Parliaments.

> “法律的可行性比严谨对称重要；不要因为某条法规看似反常就改变它；除非感到不满，否则不要变革；除非可以解决不满，否则不要变革；除了针对某些特定情况必须制定的条款外，绝不制定范围更大的条款。从约翰国王到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这些原则支配着议会和250余名议员。”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take one by one the laws and institutions of each people to show to what extent they are the expression of the needs of each race and are incapable, for that reason, of being violently transformed. It is possible, for, instance,

to indulge in philosophical dissertations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entralisation; but when we see a people composed of very different races devote a thousand years of efforts to attaining to this centralisation; when we observe that a great revolution, having for object the destruction of all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past, has been forced to respect this centralisation, and has even strengthened i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we should admit that it is the outcome of imperious needs, that it is a condi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nation in question, and we should pity the poor mental range of politicians who talk of destroying it. Could they by chance succeed in this attempt, their success would at once be the signal for a frightful civil war, [4_4] which, moreover, would immediately bring back a new system of centralisation much more oppressive than the old.

所以必须向人民依次展示每条法律法规，解释我们的法律如何满足不同种族人民的需求，并且因此，无法以暴力方式进行改变。谈起集权制的优缺点，我们可以滔滔不绝；但当看到法国不同种族的人民数千年来一直为维护集权制而奋斗；看到摧毁了过去所有制度的法国大革命反而维护、强化了集权制，我们必须得承认，集权制是法兰西民族迫切需求的结果、必要的生存条件，而那些说要毁灭它的政客们则犯了原则性错误。如果那些政客们将其想法付诸实践并碰巧成功了，那将会引发可怕的内战 [5_4] ，并且建立起新的、更具压迫性的集权制度。

The conclusion to be drawn from what precedes is, that it is not in institutions that the means is to be sought of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genius of the masses. When we see certai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reach a high degree of prosperity unde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while others, such as the

Spanish-American Republics, are found existing in a pitiable state of anarchy under absolutely similar institutions, we should admit that these institutions are as foreign to the greatness of the one as to the decadence of the others. Peoples are governed by their character, and all institutions which are not intimately modelled on that character merely represent a borrowed garment, a transitory disguise. No doubt sanguinary wars and violent revolutions have been undertaken,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undertaken, to impose institutions to which is attributed, as to the relics of saints, the supernatural power of creating welfare. It may be said, then, in one sense, that institutions react on the mind of the crowd inasmuch as they engender such upheavals. But in reality it is not the institutions that react in this manner, since we know that, whether triumphant or vanquished, they possess in themselves no virtue. It is illusions and words that have influenced the mind of the crowd, and especially words—words which are as powerful as they are chimerical, and whose astonishing sway we shall shortly demonstrate.

综上所述，变革制度并不能深刻影响群体特质。某些国家，例如美国，在民主制度的引导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比如拉美共和国，在同样的民主制度下却形成了可悲的混乱。所以我们需要承认，制度在某一民族可能带来伟大，在另一民族可能带来衰败。群众被群众性格所支配，凡是与群众性格冲突的制度都只是借来的外套、短暂的伪装。毫无疑问，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仍会发生，并将持续发生以强行建立某些制度。群众如同对待圣人遗骨一般，寄希望于这些制度能具有创造幸福的超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制度对群体心理产生的影响，和群体造成的剧变一样强大。但实际上并非制度在发挥作用。无论是征服者的制度还是被征服者的制度，它们都是制度而非美德。幻想和辞藻影响着群众心理，其中以辞藻的作用更大，它们有多荒诞，就有多强大。我们随后便会证明它强大的力量。

5．Instruction and Education

五、教育

Foremost among the dominant ideas of the present epoch is to be found the notion that instruction is capable of considerably changing men, and has for its unfailing consequence to improve them and even to make them equal. By the mere fact of its being constantly repeated, this assertion has ended by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steadfast democratic dogmas. It would be as difficult now to attack it as it would have been formerly to have attacked the dogmas of the Church.

现在最为主流的观点便是教育能大大改变一个人，并总能万无一失地使人类进步，甚至使人类平等。这一观点被口口相传，使其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时至今日，想反驳这种观点就和反驳教堂的教条一样艰难。

On this point, however, as on many others, democratic ideas are in profound disagreement with the results of psychology and experience. Many eminent philosophers, among them Herbert Spencer, have had no difficulty in showing that instruction neither renders a man more moral nor happier, that it changes neither his instincts nor his hereditary passions, and that at times—for this to happen it need only be badly directed—it is much more pernicious than useful. Statisticians have brought confirmation of these views by telling us that criminality increases with the generalisation of

instruction, or at any rate of a certain kind of instruction, and that the worst enemies of society, the anarchists, are recruited among the prize-winners of schools; while in a recent work a distinguished magistrate, M. Adolphe Guillot, made the observation that at present 3,000 educated criminals are met with for every 1,000 illiterate delinquents, and that in fifty years the criminal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has passed from 227 to 552 for every 100,000 inhabitants, an increase of 133 per cent. He has also noted in common with his colleagues that criminality is particularly on the increase among young persons, for whom, as is known, gratuitous and obligatory schooling has—in France—replaced apprenticeship.

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群众观点和心理学结果以及以往经验是相违背的。很多杰出的哲学家，例如赫伯特·斯宾塞轻而易举地论证了教育既不能使人变得更有道德或更开心，也不能改变人的内在或天生的热情；甚至在有些时候，不良教育的坏处大于好处。在统计学家们看来，犯罪率随着教育或某种教育的普及率而增加。社会的头号公敌——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是奖学金名单上的那些人。一位杰出的治安法官阿道夫·吉略特发现，4000名罪犯中有3000人都受过教育，只有1000人是文盲。近50年来，每十万人中的犯罪人数从227增加到522人，增长率是133%。他和同事们也发现法国年轻人的犯罪率陡然攀升，而他们正是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而非付费教育的一代。

It is not assuredly—and nobody has ever maintained this proposition—that well-directed instruction may not give very useful practical results, if not in the sense of raising the standard of morality, at least in that of developing professional capacity. Unfortunately the Latin peoples, especially in the last twenty-five years, have based their systems of instruction on very erroneous

principles, and in spite of the observations of the most eminent minds, such as Breal, Fustel de Coulanges, Taine, and many others, they persist in their lamentable mistakes. I have myself shown, in a work published some time ago, that the French system of education transforms the majority of those who have undergone it into enemies of society, and recruits numerous disciples for the worst forms of socialism.

尽管没人如此声称过，有可能规划良好的教育不会带来实际的效用，它既不会提升个人的道德水平，也不会发展其专业能力。然而拉丁人却将教育系统建立在错误的原则上，近二十五年更甚。尽管诸如布雷亚尔、德库朗日、伊波利特·丹纳等伟人的发现证明他们是错的，拉丁人仍在南辕北辙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在我另一本已出版的著作里，我阐述了法国的教育制度使人变成社会敌人，招募无数的门徒子弟建造最坏形式的社会主义。

The primary danger of this system of education—very properly qualified as Latin—consists in the fact that it i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sychological error that the intelligence is developed by the learning by heart of text-books. Adopting this view, the endeavour has been made to enforce a knowledge of as many hand-books as possible. From the primary school till he leaves the university a young man does nothing but acquire books by heart without his judgment or personal initiative being ever called into play. Education consists for him in reciting by heart and obeying.

这种教育制度的主要危险，在拉丁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是建立在错误的心理基础上的。这种心理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用心研读教科书而提高的。基于这种观点，人们开始学习尽可能多的教科书。从

小学到大学，年轻人不过是死记硬背，而失去了判断意识和个人意识。教育仅仅是背诵和服从。

“Learning lessons, knowing by heart a grammar or a compendium, repeating well and imitating well—that,” writes a former Minister of Public Instruction, M. Jules Simon, “is a ludicrous form of education whose every effort is an act of faith tacitly admitting the infallibility of the master, and whose only results are a belittling of ourselves and a rendering of us impotent.”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尔·西蒙说道：“学习知识，熟记语法或纲要，擅长背诵和模仿，是滑稽的教育。这种教育的惟一理念就是小心翼翼地认同上级的权威，惟一结果是使我们变得更渺小和无力。”

Were this education merely useless, one might confine one's self to expressing compassion for the unhappy children who, instead of making needful studies at the primary school, are instructed in the genealogy of the sons of Clotaire, the conflicts between Neustria and Austrasia, or zoological classifications. But the system presents a far more serious danger. It gives those who have been submitted to it a violent dislike to the state of life in which they were born, and an intense desire to escape from it. The working man no longer wishes to remain a working man, or the peasant to continue a peasant, while the most humble members of the middle classes admit of no possible career for their sons except that of State-paid functionaries. Instead of preparing men for life French schools solely prepare them to occupy public functions, in which success can be attained without any necessity for self-direction or the exhibition of the least glimmer of personal initiative.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al ladder the system creates an army of proletarians discontented with their lot and always ready to revolt, while at the summit it brings into being a frivolous bourgeoisie, at once sceptical and credulous, having a superstitious confidence in the State, whom it regards as a sort of Providence, but without forgetting to display towards it a ceaseless hostility, always laying its own faults to the door of the Government, and incapable of the least enterprise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authorities.

如果这种教育仅仅是无用的，人们还可以同情这些可怜的孩子。尽管孩子们没在小学里学到该学的东西，但至少学会了克洛泰尔后裔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等繁琐知识。但这种教育系统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接受教育的人们强烈厌恶着自己的生活，并极其渴望逃离它。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做农民，大多数平庸的中产阶级家庭只想让自己的后代当公务员，吃国家口粮。在法国学校中，学习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获得不需要任何主观性和自我性的铁饭碗。这样的教育在社会底层创造了一大批无产阶级，他们不满意自己的生活，随时想要造反；在社会顶层则诞生了一群轻浮的贵族，他们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持有谜一般的信任，视其为天道，但也不忘敌视国家。他们总是把过错推给政府，然而离开了政府干涉，他们却又一事无成。

The State, which manufactures by dint of textbooks all these persons possessing diplomas, can only utilise a small number of them, and is forced to leave the others without employment. It is obliged in consequence to resign itself to feeding the first mentioned and to having the others as its enemies.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of the social pyramid, from the humblest clerk to the professor and the prefect, the immense mass of persons boasting diplomas besiege the professions. While a business man has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in finding an agent to represent him in the colonies, thousands of candidates solicit the most modest official posts. There are 20,000 schoolmasters and mistresses without employm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Seine alone, all of them persons who, disdaining the fields or the workshops, look to the State for their livelihood. The number of the chosen being restricted, that of the discontented is perforce immense. The latter are ready for any revolution, whoever be its chiefs and whatever the goal they aim at.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for which no use can be found is a sure method of driving a man to revolt. [4_5]

尽管一国之内有如此多的人苦读教科书，获得文凭，但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发挥作用，另一些人则无事可做。所以只有先到的人能得到利益，后来的人则成为敌人。从社会的最高层到最底层，从最不起眼的小职员到教授到警察局局长，大量的人群凭借文凭争抢职位。商人难以找到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代理商，而数千名合格人选却谋求最平庸的差事。在塞纳，两千多男女教师失业。他们全部鄙视农场或工厂，只想在政府机关工作。被选中的人是有限的，所以会有大量不满的人。后者随时准备着参加革命，无论革命的领导和目标是怎样的。没有用处的知识是民众造反的确定因素之一 [5_5] 。

It is evidently too late to retrace our steps. Experience alone, that supreme educator of peoples, will be at pains to show us our mistake. It alone will be powerful enough to prove the necessity of replacing our odious text-books and our pitiable examinations by industrial instruction capable of inducing our young men to return to the fields, to the workshop, and to the colonial enterprise which they avoid to-day at all costs.

想重来显然已经太迟了。只有经验，这位群众最好的老师，会尽心设法揭示出我们的错误。经验能确切地证明，我们必须废除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勉的教育，引导年轻人回到农场和工厂，回到他们不顾一切都要逃避的殖民地企业中去。

The professional instruction which all enlightened minds are now demanding was the instruction received in the past by our forefathers. It is still in vigour at the present day among the nations who rule the world by their force of will, their initiative, and their spirit of enterprise. In a series of remarkable pages, whose principal passages I reproduce further on, a great thinker, M. Taine, has clearly shown that our former system of education was approximately that in vogue to-da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and in a remarkable parallel between the Latin and Anglo-Saxon systems he has plainly pointed ou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two methods.

现在，一切智慧心灵需要的专业教育，是我们父辈所理解的教育。在注重以意志、能动性和进取心统治的国家中，这种教育依旧充满活力。伟大的思想家伊波利特·丹纳，在一系列优秀的作品中，我下面还会引用其中重要的段落，清楚地揭示出，我们曾经的教育制度在当今英美国家盛行，并通过比较英美教育和拉美教育，指出这两种教育的不同后果。

One might consent, perhaps, at a pinch, to continue to accept all the disadvantages of our classical education, although it produced nothing but discontented men, and men unfitted for their station in life, did the superficial acquisition of so much knowledge, the faultless repeating by heart of so many text-books, raise the level of intelligence. But does it really raise this level? Alas, no! The

conditions of success in life are the possession of judgment, experience, initiative, and character—qualities which are not bestowed by books. Books are dictionaries, which it is useful to consult, but of which it is perfectly useless to have lengthy portions in one's head.

人们可能会勉强赞成，我们需要接受旧教育制度的缺陷，尽管它只能培养出不满和受困于个人身份的人，而且是以最肤浅的方式、以正确重复教科书来学习知识，但是毕竟提高了知识水平。但这样真的会增长知识吗？当然不会！使人成功的特质——判断力、经历、能动性和性格，不存在于书本中。书就像词典，有益于查询，但长期放在脑子里却毫无意义。

How is it possible for professional instruction to develop the intelligence in a measure quite beyond the reach of classical instruction? This has been well shown by M. Taine.

那么我们如何让孩子们接受比传统教育更好的专业教育呢？伊波利特·丹纳解答了这个问题。

> Ideas, he says, are only formed in their natural and normal surroundings; the promotion of the growth is effected by the innumerable impressions appealing to the senses which a young man receives daily in the workshop, the mine, the law court, the study, the builder's yard, the hospital; at the sight of tools, materials, and operations; in the presence of customers, workers, and labour, of

work well or ill done, costly or lucrative. In such a way are obtained those trifling perceptions of detail of the eyes, the ear, the hands, and even the sense of smell, which, picked up involuntarily, and silently elaborated, take shape within the learner, and suggest to him sooner or, later this or that new combination, simplification, economy, improvement, or invention. The young Frenchman is deprived, and precisely at the age when they are most fruitful, of all these precious contacts, of all these indispensable elements of assimilation. For seven or eight years on end he is shut up in a school, and is cut off from that direct personal experience which would give him a keen and exact notion of men and things and of the various ways of handling them.

“观念只能在自然且正常的环境中形成。当年轻人在工厂、矿井、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医院等地时，他们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这促进成长的过程。他们能亲眼看到工具、材料和操作，他们与顾客、工人和劳动者打交道。他们可能做得有好有坏，最后可能有赚有赔。这样一来，他们便能逐渐理解五官四肢、甚至嗅觉中的各种细节。不知不觉地，他们学习这些细节，默默推敲成型，并迟早会着手创造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发明。我国的年轻人，却恰恰在最适合学习的年龄被剥夺了这些珍贵的接触，这些成长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被关在学校的时间长达七八年，从未有任何亲身体验的机会，因而失去了对人或事准确的观察和理解，也失去了多样化处理事务的能力。

… At least nine out of ten have wasted their time and pains during several years of their life—telling, important, even decisive years. Among such are to be counted, first of all, the half or two-thirds of those who present themselves for examination—I refer to those who are rejected; and then among those who are successful, who obtain a degree, a certificate, a diploma, there is still a half or two-thirds—I refer to the overworked. Too much has been demanded of them by exacting that on a given day, on a chair or before a board, they should, for two hours in succession, and with respect to a group of sciences, be living repertories of all human knowledge. In point of fact they were that, or nearly so, for two hours on that particular day, but a month later they are so no longer. They could not go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again. Their too numerous and too burdensome acquisitions slip incessantly from their mind, and are not replaced. Their mental vigour has declined, their fertile capacity for growth has dried up, the fully-developed man appears, and he is often a used-up man. Settled down, married, resigned to turning in a circle, and indefinitely in the same circle, he shuts himself up in his confined function, which he fulfils adequately, but nothing more. Such is the average yield: assuredly the receipts do not balance the expenditure. In England or America, where, as in France previous to 1789, the contrary proceeding is adopted, the outcome obtained is equal or superior.

……至少九分之十的年轻人浪费着生命，用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几年来忍受痛苦。他们中的一半或三分之二人，时刻为考试准备着，并最终失败；另外的人成功地拿到了学位证书或一纸证明，但他们中的一半或三分之二都过度劳累。他们要做到的实在太多了。在特定的某一点，这些学习中的优胜者们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董事会，连续两小时解释科学及相关事务，成为活生生的百科全书。即使两小时后他们还算是优胜者，用不了一个月他们就会被打败。他们无法再次通过考试。他们曾经汲取的知识过于繁多，成为累赘，现在正逐渐流失且没有新的知识替代。他们不再神思敏捷，成长的动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完全开发的人通常也筋疲力竭。然后他们安定下来，结婚，过上循环往复的生活，并将自己永远封闭在狭隘的工作中。他们精通本分，但也仅此而已。这就是普通人的挣扎，收益与成本不成正比。英国或美国和1789年前的法兰西不同，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确是相似或更好的。”

The illustrious psychologist subsequently shows u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ur system and that of the Anglo-Saxons. The latter do not possess our innumerable special schools. With them instruction is not based on book-learning, but on object lessons. The engineer, for example, is trained in a workshop, and never at a school; a method which allows of each individual reaching the level his intelligence permits of. He becomes a workman or a foreman if he can get no further, an engineer if his aptitudes take him as far. This manner of proceeding is much more democratic and of much greater benefit to society than that of making the whole career of an individual depend on an examination, lasting a few hours, and

undergone at the age of nineteen or twenty.

杰出的心理学家向我们展示了英美教育制度与法国制度的不同之处。英美没有如此多的专业院校。英美的教育不是基于学习课本，而是基于实物教学。比如工程师是在车间而不是在学校里训练出来的。这样每个人都能达到他应有的智力水平。如果就此作罢，他将成为工人或包工头。如果天资聪颖，他则会成为工程师。比起将个人前途与十九或二十岁的一场几小时考试挂钩的教育制度，这种制度更民主，并对社会有更大效益。

> In the hospital, the mine, the factory, in the architect's or the lawyer's office, the student, who makes a start while very young, goes through his apprenticeship, stage by stage, much as does with us a law clerk in his office, or an artist in his studio. Previously, and before making a practical beginning, he has had an opportunity of following some general and summary course of instruction, so as to have a framework ready prepared in which to store the observations he is shortly to make. Furthermore he is able, as a rule, to avail himself of sundry technical courses which he can follow in his leisure hours, so as to co-ordinate step by step the daily experience he is gathering. Under such a system the practical capabilities increase and develop of themselves in exact proportion to the faculties of the student, and in the direction requisite for his future task and the special work for which from now onwards he desires to fit himself. By this means in England or the United States a

young man is quickly in a position to develop his capacity to the utmost. At twenty-five years of age, and much sooner if the material and the parts are there, he is not merely a useful performer, he is capable also of spontaneous enterprise; he is not only a part of a machine, but also a motor. In France, where the contrary system prevails—in France, which with each succeeding generation is falling more and more into line with China—the sum total of the wasted forces is enormous.

“在医院、矿井、工厂、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这些十分年轻却已开始工作的学生们，一步一步开启了他们的学徒生涯，就像办公室里的法律职员或工作室里的艺术家一样。在投入实战前，他们将有机会学习通识与梗概课程，以帮助他们建立观察记录事物的模型。更有能力时，他们会在空闲时间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并逐渐将技能与经验相结合。这样的制度下，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发展，并与个人才能相辅相成。他们向着今后要从事的工作发展，能力与未来工作或特殊职业相吻合；因此，英美的年轻人能快速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能力。大约二十五岁或更小的年纪时，他们不仅仅是有用的工人，还会具备创业意识；他们不仅是机器的一部分，而是变成了发动机。与此相反，法国和浪费了大量人才的中国越来越像。”

The great philosopher arrives a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with respect to the growing incongruity between our Latin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practical life:—

在分析拉丁教育体系和实际生活要求的冲突后，伊波利特·丹纳得出以下结论：

> In the three stages of instruction, those of childhood, adolescence and youth, the theoretical and pedagogic preparation by books on the school benches has lengthened out and become overcharged in view of the examination, the degree, the diploma, and the certificate, and solely in this view, and by the worst methods, by the application of an unnatural and anti-social regime, by the excessive postponement of the practical apprenticeship, by our boarding-school system, by artificial training and mechanical cramming, by overwork, without thought for the time that is to follow, for the adult age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man, without regard for the real world on which the young man will shortly be thrown, for the society in which we move and to which he must be adapted or be taught to resign himself in advance, for the struggle in which humanity is engaged, and in which to defend himself and to keep his footing he ought previously to have been equipped, armed, trained, and hardened. This indispensable equipment, this acquisition of more importance than any other, this sturdy common sense and nerve and will-power our schools do not procure the young Frenchman; on the contrary, far from qualifying him for his approaching and definite state, they disqualify him. In consequence, his entry

into the world and his first steps in the field of action are most often merely a succession of painful falls, whose effect is that he long remains wounded and bruised, and sometimes disabled for life. The test is severe and dangerous. In the course of it the mental and moral equilibrium is affected, and runs the risk of not being re-established. Too sudden and complete disillusion has supervened. The deceptions have been too great, the disappointments too keen.[1]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儿童、青年和成年时期，坐在学校板凳死读书的时间太长了。过度重视考试、成绩、学位、证书，教育方法也极其糟糕，甚至违反自然，与社会对立。被过度延后的学徒机会、寄宿制、人为训练和填鸭式教学、过度工作，目光短浅、对年轻人即将要步入的社会生活毫无安排，而且不考虑如何适应社会、如何奋斗、如何自我保护、如何处理他们本应具备、掌握并强化的社会关系。获得这些不可或缺的技能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它们给人以坚韧的意志、精神和斗志，然而学生在学校无法学到这些。相反，学校不但没让学生提升素质，反而让他们变得更不合格。所以，当踏入社会接触实际生活时，他们通常只会接连失败，受到长久的创伤和打击，甚至失去生活的能力。生活的考验严肃且残酷。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和道德都会受到影响，并可能无法恢复。一瞬间所有的幻觉都破灭了。学校的欺骗有多深，发现真相后就有多绝望[1] 。

1: Taine, "Le Regime moderne," vol. ii., 1894. These

pages are almost the last that Taine wrote. They resume admirably the results of the great philosopher's long experience. Unfortunately they are in my opinion totally incomprehensible for such of our university professors who have not lived abroad. Education is the only means at our disposal of influencing to some extent the mind of a nation, and it is profoundly saddening to have to think that there is scarcely any one in France who can arrive at understanding that our present system of teaching is a grave cause of rapid decadence, which instead of elevating our youth, lowers and perverts it.

1: 摘自丹纳《现代政体》，1894年版，第二卷。这一部分几乎是丹纳最后的著作，它蕴含了这位伟大哲学家漫长的人生经历。很遗憾，我认为对于从未出过国的法国大学教授完全无法理解这些观念。教育是一种我们可以操控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群众心理的惟一手段，但同时无比可悲的是，没什么法国人意识到当下的教育制度将招致民族快速毁灭。法国教育没能提升青年的能力，反倒是使他们堕落。

A useful comparison may be made between Taine's pages and the observations on American education recently made by M. Paul Bourget in his excellent book, "Outre-Mer." He, too, after having noted that our education merely produces narrow-minded

bourgeois, lacking in initiative and will-power, or anarchists—"those two equally harmful types of the civilised man, who degenerates into impotent platitude or insane destructiveness"—he too, I say, draws a comparison that cannot be the object of too much reflection between our French lycees (public schools), those factories of degeneration, and the American schools, which prepare a man admirably for life. The gulf existing between truly democratic nations and those who have democracy in their speeches, but in no wise in their thoughts, is clearly brought out in this comparison.

可以把泰纳的这些见解和保罗·布尔热在其《海外》这本著作中就美国教育发表的评论进行对比，也十分有用。他同样指出，我们的教育仅仅培养没个性没毅力的中产阶级或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两种文化人都对社会无益，他们要么碌碌无为，要么具有强大的破坏性。”我认为他同样比较了法国的公立学校对学生造成的破坏和美国学校对学生素质的提升。他清晰地指出了真正的民主国家与仅仅是口头民主、思想保守的国家的差别。

Have we digressed in what precedes from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Assuredly not. If we desire to understand the ideas and beliefs that are germinating to-day in the masses, and will spring up to-morrow,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how the ground has been prepared. The instruction given the youth of a country allows of a knowledge of what that country will one day be. The education

accorded the present generation justifies the most gloomy previsions. It is in part by instruction and education that the mind of the masses is improved or deteriorated. It was necessary in consequence to show how this mind has been fashioned by the system in vogue, and how the mass of the indifferent and the neutral has become progressively an army of the discontented ready to obey all the suggestions of utopians and rhetoricians. It is in the schoolroom that socialists and anarchists are found nowadays, and that the way is being paved for the approaching period of decadence for the Latin peoples.

我们谈论的东西偏离了群体心理吗？当然没有。如果我们想理解群体当今和以后的想法与信仰，我们必须了解群体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教育预示着一个国家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而当今一代接受的教育预示着惨淡的衰败。教育能提改善群众心理，也能毁灭群众心理。所以我们亟需弄明白群众心理是如何被当下制度所影响，漠然和中立的人们又是如何变成一支心怀不满的军队，随时准备听从乌托邦分子和花言巧语者的调遣。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从教室走出来的，这就是拉丁国家衰落的原因。

Chapter II The Immediate Factors of the Opinions of Crowds

第二章　影响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1. IMAGES, WORDS AND FORMULAE. The magical power of words and formulae—The power of words bound up with the images they evoke, and independent of their real sense—These images vary from age to age, and from race to race—The wear and tear of words—Examples of the considerable variations of sense of much-used words—The political utility of baptizing old things with new names when the

words by which they were designated produced an unfavourable impression on the masses—variations of the sense of words in consequence of race differences—The different meanings of the word "democracy" in Europe and America. 2. ILLUSIONS. Their importance—They are to be found at the root of all civilisations—The social necessity of illusions—Crowds always prefer them to truths. 3. EXPERIENCE. Experience alone can fix in the mind of crowds truths become necessary and destroy illusions grown dangerous—Experience is only effective on the condition that it be frequently repeated—The cost of the experiences requisite to persuade crowds. 4. REASON. The nullity of its influence on crowds—Crowds only to be influenced by their unconscious sentiments—The role of logic in history—The secret causes of improbable events.

提要：（1）形象、辞藻和信条。辞藻和信条的魔力／辞藻的力量与其激发的形象共同作用，不同于它们的真正含义／形象因时间、受众的不同而不同／它们改变、塑造词语／一些常用词含义改变之例／一种政治手段：给旧事物冠以新名字以避免在群体中产生负面影响／不同民族对词语的理解不尽相同／欧洲与美洲对于"民主"一词的不同理解。（2）幻想。幻想的重要性／它们是一切文明的根源／幻想的社会必需性／比起真相，群体更喜欢幻觉。（3）经验。经验是惟一使群体意识到真相的必要性并让幻觉破灭的有效手法／经验的力量仅在被不断重复时才能发挥／为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说服群众。（4）理性。理性对于群体是无效的／群体只会被无意识的感情所影响／逻辑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可信之事的神秘原因。

We have just investigated the remote and preparatory factors which give the mind of crowds a special receptivity, and make possible therein the growth of certain sentiments and certain ideas. It now remains for us to study the factors capable of acting in a

direct manner. We shall see in a forthcoming chapter how these factors should be put in force in order that they may produce their full effect.

我们刚才说过，间接准备因素赋予群体一定的接受能力，使得某些感情与观念得以发展。那么直接因素又是什么呢？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我们会讨论如何运用这两种因素，让它们充分发挥作用。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work we studied the sentiments, ideas, and methods of reasoning of collective bodies, and from the knowledge thus acquired it would evidently be possible to deduce in a general way the means of making an impression on their mind. We already know what strikes the imagination of crowds, and are acquainted with the power and contagiousness of suggestions, of those especially that are presented under the form of images. However, as suggestions may proceed from very different sources, the factors capable of acting on the minds of crowds may differ considerably. It is necessary, then, to study them separately. This is not a useless study. Crowds are somewhat like the sphinx of ancient fable: it is necessary to arrive at a solution of the problems offered by their psychology or to resign ourselves to being devoured by them.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研究了集体的感情、思想和推断方式。显然，从影响群体心理的手段中，我们可以推理出一些普遍规律。我们已经知道什么会激发群体的想象力，也知道暗示的力量和传染性，尤其是在与形象的共同作用下。但由于暗示的来源相差很大，所以影响群体心理的因素也各有不同。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分类研究。这种研究不是无用功。群体就像古代神话里的斯芬克斯：要么提出符合他

们心理的解决方法，要么被他们消灭。

1．Images, Words, and Formulas

1．形象、词语和信条

When studying the imagination of crowds we saw that it is particularly open to the impressions produced by images. These images do not always lie ready to hand, but it is possible to evoke them by the judicious employment of words and formulas. Handled with art, they possess in sober truth the mysterious power formerly attributed to them by the adepts of magic. They cause the birth in the minds of crowds of the most formidable tempests, which in turn they are capable of stilling. A pyramid far loftier than that of old Cheops could be raised merely with the bones of men who have been victims of the power of words and formulas.

在此前的学习中，我们发现群体想象极易受到形象的影响。这些形象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被词语和信条巧妙地唤醒起来的。经过艺术地处理，它们无疑具有了魔术般的力量。它们既能引起集体骚乱，又能让群众平静下来。受到词语和准则迫害而死的人们的尸骨，甚至可以高过胡夫金字塔。

The power of words is bound up with the images they evoke, and is quite independent of their real significance. Words whose sense is the most ill-defined are sometimes those that possess the most influence. Such, for example, are the terms democracy,

socialism, equality, liberty, whose meaning is so vague that bulky volumes do not suffice to precisely fix it. Yet it is certain that a truly magical power is attached to those short syllables, as if they contained the solution of all problems. They synthesise the most diverse unconscious aspirations and the hope of their realisation.

词语的力量和衍生的形象一起，形成巨大的作用。最难以解释的词语，往往有最强大的影响力。比如说，即使是大量的词汇也无法确切解释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这些意义模糊的术语。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短小的音节里蕴含着巨大、看似能解决一切问题的魔力。它们综合了最广泛的、无意识的愿望以及实现这些愿望的期许。

Reason and arguments are incapable of combatting certain words and formulas. They are uttered with solemnity in the presence of crowds, and as soon as they have been pronounced an expression of respect is visible on every countenance, and all heads are bowed. By many they are considered as natural forces, as supernatural powers. They evoke grandiose and vague images in men's minds, but this very vagueness that wraps them in obscurity augments their mysterious power. They are the mysterious divinities hidden behind the tabernacle, which the devout only approach in fear and trembling.

说理议论无法战胜某些词语和信条的作用。群体庄重地宣读着词语和信条。只要一听到它们，群体就立刻肃然起敬，低头臣服。它们被视作是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越自然的力量。它们唤起人们内心模糊而宏伟的形象。这种模糊不清使词语和信条具备了神秘的力量。它们是神坛背后的神，虔诚的人们只能恐惧颤抖。

The images evoked by words being independent of their sense, they vary from age to age and from people to people, the formulas remaining identical. Certain transitory images are attached to certain words: the word is merely as it were the button of an electric bell that calls them up.

被词语激发的幻象并不等同于它们的实际意义，随着时代、受众的变迁，它们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套话不会改变。词语的含义变动不定：它们就像唤醒含义的电铃按钮。

All words and all formulas do not possess the power of evoking images, while there are some which have once had this power, but lose it in the course of use, and cease to waken any response in the mind. They then become vain sounds, whose principal utility is to relieve the person who employs them of the obligation of thinking. Armed with a small stock of formulas and commonplaces learnt while we are young, we possess all that is needed to traverse life without the tiring necessity of having to reflect on anything whatever.

并非所有的词语和信条都能激起形象，有些词语在某段时间内有这种能力，但使用过程中却逐渐消失，头脑对其不再有任何反应。它们成了空洞的声音，主要意义是让使用者无需思考。倘若我们年轻时用一部分词语套话来武装自己，我们的一生中便不再需要思考。

If any particular language be studied, it is seen that the words of which it is composed change rather slowly in the course of ages, while the images these words evoke or the meaning attached to

them changes ceaselessly.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n another work, I have arrived a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bsolute translation of a language, especially of a dead language, is totally impossible. What do we do in reality when we substitute a French for a Latin, Greek, or Sanscrit expression, or even when we endeavour to understand a book written in our own tongue two or three centuries back? We merely put the images and ideas with which modern life has endowed our intelligence in the place of absolutely distinct notions and images which ancient life had brought into being in the mind of races submitted to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having no analogy with our own. When the men of the Revolution imagined they were copying the Greeks and Romans, what were they doing except giving to ancient words a sense the latter had never had? What resemblance can possibly exist between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Greeks and those designated to-day by corresponding words? A republic at that epoch was an essentially aristocratic institution, formed of a reunion of petty despots ruling over a crowd of slaves kept in the most absolute subjection. These communal aristocracies, based on slavery, could not have existed for a moment without it.

只要研究某一门语言，不难发现，尽管岁月流失，词汇本身演变较慢，但它们的意义却变化无穷、永无止息。这是为何我在另一本著作里总结道，彻底翻译某种语言，尤其是已经消亡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尝试用拉丁语、德语或梵语的表达翻译法语，或是阅读三百年前的法语书时，我们是在做什么呢？我们只是将该词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与图像代入到完全不同的古代词语中。大革命的发动者们，认为自己弘扬了古希腊罗马精神，然而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给古老的词汇强加它们从未有过的含义。除了名称一致，我们现在的制度与古希腊制度有任何的相同之处吗？那个年代的共和基本上是贵族制度，是目光短浅的暴君统治着绝对服从的奴隶。这种少数人掌权的贵族制，离开了奴隶制变无法存活。

The word “liberty,” again, what signification could it have in any way resembling that we attribute to it to-day at a period when the possibility of the liberty of thought was not even suspected, and when there was no greater and more exceptional crime than that of discussing the gods, the laws and the customs of the city? What did such a word as “fatherland” signify to an Athenian or Spartan unless it were the cult of Athens or Sparta, and in no wise that of Greece, composed of rival cities always at war with each other? What meaning had the same word “fatherland” among the ancient Gauls, divided into rival tribes and races, and possessing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religions, and who were easily vanquished by Caesar because he always found allies among them? It was Rome that made a country of Gaul by endowing it with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unity. Without going back so far, scarcely two centuries ago, is it to be believed that this same notion of a fatherland was conceived to have the same meaning as at present by French princes like the great Conde, who allied themselves with the foreigner against their sovereign? And yet again, the same word had it not a sens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for the French royalist emigrants, who thought they obeyed the laws of honour in fighting against France, and who from their point of view did indeed obey them, since the feudal law bound the vassal to the lord and not to the soil, so that where the sovereign was there was the true fatherland?

再比如说“自由”这个词。尽管同样发源于古希腊，但它曾经的意义却大不相同。在那时，人们从未思考过思想的自由。最大的罪名不过是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它和我们今天赋予“自由”的含义有何相似之处？“祖国”一词也是一样。除了指古希腊的雅典人或斯巴达人仅崇拜自己的城邦之外，它还会有其他含义吗？它当然不可能指由互相仇视的城邦组成的整个希腊。在古代高卢，“祖国”一词又能有

什么含义？互相敌视的部落和种族组成了高卢，所以高卢人说着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神。恺撒能轻易征服它们，因为他总能从高卢各邦中找到自己的盟友。是罗马人最终缔造了一个政治、信仰统一的高卢。不用看这么久远的例子，让我们看下近代的事例吧。就在两百年前，法国人对“祖国”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孔代亲王们和外国势力联盟攻打自己的国土；保皇党人认为反对法国是一种荣耀，因为诸侯需向君主而非领地效忠。可见，他们理解的“祖国”和现在的“祖国”不也是大不相同吗？

Numerous are the words whose meaning has thus profoundly changed from age to age—words which we can only arrive at understanding in the sense in which they were formerly understood after a long effort. It has been said with truth that much study is necessary merely to arrive at conceiving what was signified to our great grandfathers by such words as the “king” and the “royal family.” What, then, is likely to be the case with terms still more complex?

随着时间变化，词语含义发生深刻改变的例子实在数不胜数。我们需要经过长久的努力才能知道它们曾经的含义。比如说，探究我们的祖先所用的“国王”、“贵族”等词的指示含义需要大量的研究。那么怎样处理更为复杂的词语呢？

Words, then, have only mobile and transitory significations which change from age to age and people to people; and when we desire to exert an influence by their means on the crowd what it is requisite to know is the meaning given them by the crowd at a given moment, and not the meaning which they formerly had or may yet have for individuals of a different mental constitution.

所以，词语的含义会随时代变迁、受众变化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想要以它们为手段影响群体，就必须搞明白群体赋予词语的特殊含义，而不是采用它们过去的含义或精神状态不同的人赋予它们的含义。

Thus, when crowds have come, as the result of political upheavals or changes of belief, to acquire a profound antipathy for the images evoked by certain words, the first duty of the true statesman is to change the words without, of course, laying hands on the things themselves, the latter being too intimately bound up with the inherited constitution to be transformed. The judicious Tocqueville long ago made the remark that the work of the consulate and the empire consisted more particularly in the clothing with new word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past—that is to say, in replacing words evoking disagreeable images i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rowd by other words of which the novelty prevented such evocations. The “taille” or tallage has become the land tax; the “gabelle,” the tax on salt; the “aids,” the indirect contributions and the consolidated duties; the tax on trade companies and guilds, the license.

当群体因政治剧变或信仰变动而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产生厌恶时，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不是改革事物本身，而是在不带来伤害的前提下，给旧制度套上新名字，因为世代流传下来的制度难以改变。明智的托克维尔曾发表评论，称执政和治国常常需要用新名称将旧制度包装一遍，用新鲜的词语冲淡旧词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地租”改成了“土地税”，“盐务税”改成了“盐税”，“徭役”改成了间接分配和统一工作；商店应缴税款也有了新名字。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functions of statesmen consists, then, in baptizing with popular or, at any rate, indifferent words things the crowd cannot endure under their old names. The power of words is so great that it suffices to designate in well-chosen terms the most odious things to make them acceptable to crowds. Taine justly observes that it was by invoking liberty and fraternity—words very popular at the time—that the Jacobins were able “to install a despotism worthy of Dahomey, a tribunal similar to that of the Inquisition, and to accomplish human hecatombs akin to those of ancient Mexico.” The art of those who govern, as is the case with the art of advocates, consists above all in the science of employing words. One of the greatest difficulties of this art is, that in one and the same society the same words most often have very different meanings for the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who employ in appearance the same words, but never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政客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用流行用语替换民众不再感兴趣且无法忍受旧名称的事物。词语的威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选择得当，就可以让群体接受他们曾憎恶的事情。丹纳发现，雅各宾党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样的流行说法，“才建立起达荷美一般的暴政，宗教审讯一样的法庭，发动和古墨西哥一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无论是执政还是拥护，其精髓都在于巧妙地运用词汇。而最难做到的一点是，即使在同一社会中，同一词汇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也有不同含义。虽然写法类似，但含义相差甚远。

In the preceding examples it is especially time that has been made to intervene as the principal factor in the changing of the meaning of words. If, however, we also make race intervene, we shall then see that, at the same period, among peoples equally civilised but of different race, the same words very often correspond

to extremely dissimilar ideas. It is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ese differences without having travelled much, and for this reason I shall not insist upon them. I shall confine myself to observing that it is precisely the words most often employed by the masses which among different peoples possess the most different meanings. Such is the case, for instance, with the words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in such frequent use nowadays.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时间是词义变化的主要因素。种族差异也是词义变化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时期，教育水平同等而种族不同的人们对相同词语的理解也千差万别。要弄清这些差异，我们需要游历研究。我个人认为，正是最常用的词汇反而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含义。比如今天常见的“民主”和“社会主义”。

In reality they correspond to quite contrary ideas and images in the Latin and Anglo-Saxon mind. For the Latin peoples the word “democracy” signifies more especially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will and the initiative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will and the initiative of the community represented by the State. It is the State that is charged, to a greater and greater degree, with the direction of everything, the centralisation, the monopolisation, and the manufacture of everything. To the State it is that all parties without exception, radicals, socialists, or monarchists, constantly appeal. Among the Anglo-Saxons and notably in America this same word “democracy” signifies, on the contrary, the intense development of the will of the individual, and as complete a subordination as possible of the State, which,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police, the army,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is not allowed the direction of anything, not even of public instruction. It is seen, then, that the same word which signifies for one people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will and the initiative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preponderance of the State, signifies for another the excessive development of the will and the initiative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plete subordination of the State. [4_6]

这两个词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有不同的含义和感情。拉丁民族认为“民主”表示个人意愿和主权绝对服从国家意志和主权。日复一日，他们的国家支配、控制、垄断、制造一切。国家面前无党派，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或者保皇派都要服从国家。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尤其是美国人，理解的民主则意义相反。他们认为民主是个人意志的发展。国家需要服从个人意志的发展，所以除了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外，国家不得干预任何事，包括公共教育。所以相同的词在部分人眼里是个人意志的服从和国家的优胜，在另一些人眼里是个人意志的绝对发展和国家的完全服从 [5_6] 。

2．Illusions

2．幻觉

From the dawn of civilisation onwards crowds have always undergone the influence of illusions. It is to the creators of illusions that they have raised more temples, statues, and altars than to any other class of men. Whether it be the religious illusions of the past or the philosophic and social illusions of the present, these formidable sovereign powers are always found at the head of all the civilisations that have successively flourished on our planet. It is in their name that were built the temples of Chaldea and Egypt and the religious edifices of the Middle Ages, and that a vast upheaval

shook the whole of Europe a century ago, and there is not one of our political, artistic, or social conceptions that is free from their powerful impress. Occasionally, at the cost of terrible disturbances, man overthrows them, but he seems condemned to always set them up again. Without them he would never have emerged from his primitive barbarian state, and without them again he would soon return to it. Doubtless they are futile shadows; but these children of our dreams have forced the nations to create whatever the arts may boast of splendour or civilisation of greatness.

自从文明出现，群体便常常处于幻觉之下。人们为幻觉中的神灵造出了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的神庙、雕塑和祭坛。无论是过去的宗教幻觉还是现在的哲学和社会幻觉，我们都可以在任何持续发展的文明的灵魂中发现它们坚不可摧的力量。古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为它们而建；一百年前震撼全欧洲的一场剧变起因也是幻想；我们所有的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幻想的影响。偶尔，人们付出可怕的代价来消除幻觉，但它们似乎永远都会死而复生。没有幻觉，人类将保持原始野蛮的状态；消除它们，人类将很快回到野蛮状态。毫无疑问，它们只是无用的幽灵；但这些梦想的产物却促使民族创造出宏伟的艺术和伟大的文明。

> If one destroyed in museums and libraries, if one hurled down on the flagstones before the churches all the works and all the monuments of art that religions have inspired, what would remain of the great dreams of humanity? To give to men that portion of hope and illusion without which they cannot live, such is the reason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s, heroes, and poets. During fifty years science appeared to undertake this task. But

> science has been compromised in hearts hungering after the ideal, because it does not dare to be lavish enough of promises, because it cannot lie. [4_7]

> “如果有人毁掉博物馆和图书馆，如果有人推倒教堂前石板路上和艺术纪念碑里的所有宗教作品，人类伟大的梦想还会留下些什么呢？让人们怀抱着那些希望和幻想吧，不然他们是活不下去的。这就是神灵、英雄和诗人们存在的理由。近五十年来，科学担起了这一任务。但是在理想主义的人们眼里，科学并不是一个好选择，因为科学无法给予足够的承诺，因为科学不会撒谎。 [5_7] ”

The philosophers of the last century devoted themselves with fervour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social illusions on which our forefathers had lived for a long tale of centuries. By destroying them they have dried up the springs of hope and resignation. Behind the immolated chimeras they came face to face with the blind and silent forces of nature, which are inexorable to weakness and ignore pity.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们，迫切地希望毁灭他们的祖先曾世代赖以生存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幻觉。毁灭幻觉的同时，他们也扼杀了希望和顺从的源泉。在幻想消逝后，他们直面盲目而沉默的自然力量，而自然对软弱和同情无动于衷。

Notwithstanding all its progress, philosophy has been unable as yet to offer the masses any ideal that can charm them; but, as they

must have their illusions at all cost, they turn instinctively, as the insect seeks the light, to the rhetoricians who accord them what they want. Not truth, but error has always been the chief factor in the evolution of nations, and the reason why socialism is so powerful to-day is that it constitutes the last illusion that is still vital. In spite of all scientific demonstrations it continues on the increase. Its principal strength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is championed by minds sufficiently ignorant of things as they are in reality to venture boldly to promise mankind happiness. The social illusion reigns to-day upon all the heaped-up ruins of the past, and to it belongs the future. The masses have never thirsted after truth. They turn aside from evidence that is not to their taste, preferring to deify error, if error seduce them. Whoever can supply them with illusions is easily their master; whoever attempts to destroy their illusions is always their victim.

尽管哲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它迄今仍没有给群众提供任何足够吸引人的理想。然而无论代价多大，群众必须拥有自己的幻想，于是他们便像飞蛾扑火一般，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自己需要的雄辩家们。谬误，而非真理，推动民族的演变；社会主义今日如此强大的原因，在于它是富有生机的最后幻想。尽管科学证据显示了社会主义的荒谬，但它仍然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它的支持者无视实际，鼓吹人类幸福。如今的社会主义幻想立于过去的废墟之上，并向未来进军。群众从未渴望真理。他们舍弃不合口味的证据，转而支持更具诱惑的谬论。凡是能为他们制造幻觉的，就能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幻觉破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3．Experience

3．经验

Experience constitutes almost the only effective process by which a truth may be solidly established in the mind of the masses, and illusions grown too dangerous be destroyed. To this end,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experience should take place on a very large scale, and be very frequently repeated. The experiences undergone by one generation are useless, as a rule, for the generation that follows, which is the reason why historical facts, cited with a view to demonstration, serve no purpose. Their only utility is to prove to what an extent experiences need to be repeated from age to age to exert any influence, or to be successful in merely shaking an erroneous opinion when it is solidly implanted in the mind of the masses.

经验几乎是惟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让过于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经验必须有大规模的受众，并能得到验证。一代人的经验通常没太大用处，这就是为何作为证据引用的史实达不到目的的原因。它们的惟一作用就是证明了无论怎样的经验都需一代代重复验证才能对群众产生影响或动摇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

Our century and that which preceded it will doubtless be alluded to by historians as an era of curious experiments, which in no other age have been tried in such number.

毫无疑问，史学家会认为，19世纪或以前的年代是一个充满实验的奇妙纪元，从未有其他哪个年代经历过这样多的验证。

The most gigantic of these experiments was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find out that a society is not to be refashioned from top to botto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ctates of pure reason, it was necessary that several millions of men should be massacred and that Europe should be profoundly disturbed for a period of twenty years. To prove to us experimentally that dictators cost the nations who acclaim them dear, two ruinous experiences have been required in fifty years, and in spite of their clearness they do not seem to have been sufficiently convincing. The first, nevertheless, cost three millions of men and an invasion, the second involved a loss of territory, and carried in its wake the necessity for permanent armies. A third was almost attempted not long since, and will assuredly be attempted one day. To bring an entire nation to admit that the huge German army was not, as was currently alleged thirty years ago, a sort of harmless national guard, [4_8] the terrible war which cost us so dear had to take place. To bring about the recognition that Protection ruins the nations who adopt it, at least twenty years of disastrous experience will be needful. These examples might be indefinitely multiplied.

其中最著名的实验就是法国大革命了。从这次试验中，我们知道了，一个社会若是从上到下变革一遍而缺乏理性的指导，那么成千上万的人会死于非命，欧洲会陷入至少二十年的动乱。五十年间的两场破坏性实验证明了独裁者会使拥护他的民众损失惨重，即使结论清晰可靠，民众却依然不会信服。在第一场试验中，三百万民众死去，法国被敌国入侵；第二场试验的代价是割让领土，这证明了拥有一支常备军的重要性。第三场试验正在酝酿中，并肯定会在未来的某天发生。为了让法兰西民族看清，强大的德国军队并不像三十年前我们认为的那样，只是一支无害的国民护卫队 [5_8] ，我们还得经历一场损失惨重的战役。再比如为了证明贸易保护会毁掉一个民族，就需要至少

经历二十年的国家灾难。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4．Reason

4．理性

In enumerating the factors capable of making an impression on the minds of crowds all mention of reason might be dispensed with, were it not necessary to point out the negative value of its influence.

在列举影响群众心理的因素时，完全可以忽略理性这一因素，只有在提到负面影响时才会提到它。

We have already shown that crowds are not to be influenced by reasoning, and can only comprehend rough-and-ready associations of ideas. The orators who know how to make an impression upon them always appeal in consequence to their sentiments and never to their reason. The laws of logic have no action on crowds.[2] To bring home conviction to crowds it is necessary first of all to thoroughly comprehend the sentiments by which they are animated, to pretend to share these sentiments, then to endeavour to modify them by calling up, by means of rudimentary associations, certain eminently suggestive notions, to be capable, if need be, of going back to the point of view from which a start was made, and, above all, to divine from instant to instant the sentiments to which one's discourse is giving birth. This necessity of ceaselessly varying one's langua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ffect produced at the moment of speaking deprives from the outset a prepared and studied harangue of all efficaciousness. In such a speech the orator follows his own line of thought, not that of his hearers, and from this fact alone his influence is annihilated.

我们已经知道了群体不受理性影响，他们只能理解粗糙拼接的观念。所以了解如何影响群众的演说家们，通常在演讲中运用感情，而非理性。逻辑规律对群体不起作用[2] 。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得理解能鼓舞他们的情感，并且装出自己也受到同样情感的振奋，然后以简单的组合方式和某些明显的暗示去修饰它们。只有这样做，如果有必要的话，才能带领群众回到最初的观点上来。因为演讲必须要根据受众的反应来调整措辞，所以难以进行事先准备和研究。如果演讲者根据自己而不是受众的逻辑来演讲，那么他的论证是无效的。

blockquote＞2: My first observ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art of impressing crowds and touching the slight assistance to be derived in this connection from the rules of logic date back to the seige of Paris, to the day when I saw conducted to the Louvre, where the Government was then sitting, Marshal V—, whom a furious crowd asserted they had surprised in the act of taking the plans of the fortifications to sell them to the Prussians. A member of the Government (G. P—), a very celebrated orator, came out to harangue the crowd, which was demanding the immediate execution of the prisoner. I had expected that the speaker would point out the absurdity of the accusation by remarking that the accused Marshal was positively one of those who had constructed the fortifications, the plan of which, moreover, was on sale at every booksellers. To my immense stupefaction—I was very young then—the speech was on quite different lines. “Justice shall be done,”

exclaimed the orator, advancing towards the prisoner, “and pitiless justice. Let the Government of the National Defence conclude your inquiry. In the meantime we will keep the prisoner in custody.” At once calmed by this apparent concession, the crowd broke up, and a quarter of an hour later the Marshal was able to return home. He would infallibly have been torn in pieces had the speaker treated the infuriated crowd to the logical arguments that my extreme youth induced me to consider as very convincing.

2: 影响并打动群体的技艺，就这一点而言从逻辑法则那里能够得到的帮助微乎其微，我最早对这一现象的观察，可以追溯到巴黎围城时期。某一天，我看到一群愤怒的人把一位元帅带到当时的政府所在地卢浮宫，他们声称怀疑这位元帅拿走了防御工事的平面图，把它们卖给了普鲁士人。一位政府官员，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演说家，走出来对要求处死该犯的人群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我以为，这位演说者会指出这一指控的荒谬，告诉人们，这位受到指控的元帅确实是修筑防御工事的人之一，而且，防御工事的设计图在每一家书店里都能买到。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当时我很年轻——他的演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正义必将得到伸张，”这位演说家大喊，说着走向那位俘虏，“正义铁面无情。让国防政府来决定你们的请求吧。在此期间，我们会把该犯监禁起来。”这一明显的妥协立即使场面平静下来，人群散去，一刻钟之后，元帅便回到了自己家里。假如演说者用逻辑论证去对付愤怒的人群，元帅必定会被人撕成碎片，年幼无知的我认为这样的论证很有说服力。

Logical minds, accustomed to be convinced by a chain of somewhat close reasoning, cannot avoid having recourse to this mode of persuasion when addressing crowds, and the inability of their arguments always surprises them. “The usual mathematical consequences based on the syllogism—that is, on associations of identities—are imperative…” writes a logician. “This imperativeness would enforce the assent even of an inorganic mass were it capable of following associations of identities.” This is doubtless true, but a crowd is no more capable than an inorganic mass of following such associations, nor even of understanding them. If the attempt be made to convince by reasoning primitive minds—savages or children, for instance—the slight value possessed by this method of arguing will be understood.

那些逻辑严密的人在劝说时习惯于借助精妙的逻辑，而他们的手法失去效用时，他们会觉得十分困惑。一位逻辑学家写到：“建立在三段论上——即建立在某种公式上——的数学结果是恒等式，是不可更改的。就算是无机物，若它能演算正确，也不得不同意。”这话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群体并不比无机物更能演算公式。群体甚至没有无机物理智。若尝试依靠理性说服一个原始人，比如野蛮人或婴孩，你马上就会知道这是在对牛弹琴。

It is not even necessary to descend so low as primitive beings to obtain an insight into the utter powerlessness of reasoning when it has to fight against sentiment. Let us merely call to mind how tenacious, for centuries long, have been religious superstitions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e simplest logic. For nearly two thousand years the most luminous geniuses have bowed before their laws, and modern times have to be reached for their veracity to be merely contested.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possessed many

enlightened men, but not a single man who attained by reasoning to an appreciation of the childish side of his superstitions, or who promulgated even a slight doubt as to the misdeeds of the devil or the necessity of burning sorcerers.

对抗情感时，理性是多么无力，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大可不必以原始人为例。只需想想几百年前用逻辑说服那些宗教狂人分子有多么困难。整整两千年的时间里，最清醒的天才，也不得不在它们的规矩面前俯首称臣。直到现代，它们的真实性才受到些许挑战。就算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也有不少开明之人，但没有任何一人理性地认识到自己迷信中幼稚的一面，或对必须烧死巫师一类魔鬼般的罪行的必要性表示过丝毫的怀疑。

Should it be regretted that crowds are never guided by reason? We would not venture to affirm it. Without a doubt human reason would not have availed to spur humanity along the path of civilisation with the ardour and hardihood its illusions have done. These illusions, the offspring of those unconscious forces by which we are led, were doubtless necessary. Every race carries in its mental constitution the laws of its destiny, and it is, perhaps, these laws that it obeys with a resistless impulse, even in the case of those of its impulses which apparently are the most unreasoned. It seems at times as if nations were submitted to secret forces analogous to those which compel the acorn to transform itself into an oak or a comet to follow its orbit.

群体缺乏理性，这是一件憾事吗？我们不必贸然同意。是幻觉激发了激情和愚顽，鞭策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理性反而没起效用。幻觉是不可或缺的，作为无意识力量的产物，它引导着我们前进。每

个种族的民族精神预示了它的命运，即使毫不合理，这些精神规律也是难以抑制的冲动，必须服从。这种精神规律使得民族被神秘力量指引着，就像橡果长在橡树上，行星在轨道上运行一样自然。

What little insight we can get into these forces must be sought for in the general course of the evolution of a people, and not in the isolated facts from which this evolution appears at times to proceed. Were these facts alone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history would seem to be the result of a series of improbable chances. It was improbable that a Galilean carpenter should become for two thousand years an all-powerful God in whose name the most important civilisations were founded; improbable, too, that a few bands of Arabs, emerging from their deserts, should conque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old Graco-Roman world, and establish an empire greater than that of Alexander; improbable, again, that in Europe, at an advanced period of its development, and when authority throughout it had been systematically hierarchised, an obscure lieutenant of artillery should have succeeded in reigning over a multitude of peoples and kings.

我们若想对这些力量有所了解，就必须研究一个民族的整个进化过程，而不是研究进化过程中时不时出现的孤立事实。如果只考虑孤立的事实，历史就像随机产生的结果。一个加利利的木匠不可能变成一个统治两千年之久的全能的神，以他之名形成了最重要的文明；一小股从沙漠里冒出来的阿拉伯人也不可能征服希腊罗马的重要地区并建立起比亚历山大的领土更广阔的帝国；在已经十分发达、各地政权等级森严的欧洲，一个炮兵中尉也不可能征服众多的民族和国家。

Let us leave reason, then, to philosophers, and not insist too

strongly on its intervention in the governing of men. It is not by reason, but most often in spite of it, that are created those sentiments that are the mainsprings of all civilisation—sentiments such as honour, self-sacrifice, religious faith, patriotism, and the love of glory.

让哲学家们遵守理性吧，不要让理性干预治理民众。并非理性，或者说即使理性存在，也是其他感性因素创造了文明，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耀的爱

Chapter III The Leaders of Crowds and Their Means of Persuasion

第三章　群众领袖以及他们说服群体的手段

1．THE LEADERS OF CROWDS. The instinctive need of all beings forming a crowd to obey a leader—The psychology of the leaders of crowds—They alone can endow crowds with faith and organise them—The leaders forcibly despotic—Classification of the leaders—The part played by the will. 2. THE MEANS OF ACTION OF THE LEADERS. Affirmation, repetition, contagion—The respective part of these different factors—The way in which contagion may spread from the lower to the upper classes in a society—A popular opinion soon becomes a general opinion. 3. PRESTIGE. Definition of prestige and classification of its different kinds—Acquired prestige and personal prestige—Various examples—The way in which prestige is destroyed.

提要：（1）群体领袖。服从于领袖是群体的本能／群体领袖的心理特征／只有领袖能赋予群体信仰，把他们组织起来／领袖的强制与暴政／领袖的分类／意志力的作用。（2）群体领袖的行动方式：

断言、重复和传染效应／三种手段的分析／传染效应从社会底层扩散到社会上层的方法／流行观点很快会变成普世信仰。（3）威望。名望的定义和不同名望的分类／先天名望和个人名望／例子／毁灭名望的途径。

We are now acquainted with the mental constitution of crowds, and we also know what are the motives capable of making an impression on their mind. It remains to investigate how these motives may be set in action, and by whom they may usefully be turned to practical account.

我们已经了解了群体的心理素质和影响群体心理的方法。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方法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是谁将它们付诸实践。

1．The Leaders of Crowds.

1．群体领袖

As soon as a certain number of living beings are gathered together, whether they be animals or men, they place themselves instinctively under the authority of a chief.

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只要是一定数量的生物聚集在一起，它们便会本能地服从于权威之下。

In the case of human crowds the chief is often nothing more than a ringleader or agitator, but as such he plays a considerable part. His will is the nucleus around which the opinions of the crowd are grouped and attain to identity. He constitutes the first element towards the organisation of heterogeneous crowds, and paves the way for their organisation in sects; in the meantime he directs them. A crowd is a servile flock that is incapable of ever doing without a master.

人类群体中的领袖，往往就是罪犯头子或者煽动者，但他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意愿是群体意志的形成与维持的核心。领袖是群体划分为三教九流的第一要素，也为他们形成组织铺平道路。同时领袖领导着他们。羊群无首时便会不知所措，群体也是一个道理。

The leader has most often started as one of the led. He has himself been hypnotised by the idea, whose apostle he has since become. It has taken possession of him to such a degree that everything outside it vanishes, and that every contrary opinion appears to him an error or a superstition. An example in point is Robespierre, hypnotised by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of Rousseau, and employing the methods of the Inquisition to propagate them.

领袖最初往往是被领导者。他被一些观点迷惑，并成为他人的信徒。他是如此虔诚，以至于无视信仰之外的任何事，并认为相异的观点是错误的或是迷信的。罗伯斯庇尔就是一例。他深信卢梭的哲学观点，甚至用宗教法庭的手段来传播它们。

The leaders we speak of are more frequently men of action

than thinkers. They are not gifted with keen foresight, nor could they be, as this quality generally conduces to doubt and inactivity. They are especially recruited from the ranks of those morbidly nervous, excitable, half-deranged persons who are bordering on madness. However absurd may be the idea they uphold or the goal they pursue, their convictions are so strong that all reasoning is lost upon them. Contempt and persecution do not affect them, or only serve to excite them the more. They sacrifice their personal interest, their family—everything. The very instinct of self-preservation is entirely obliterated in them, and so much so that often the only recompense they solicit is that of martyrdom. The intensity of their faith gives great power of suggestion to their words. The multitude is always ready to listen to the strong-willed man, who knows how to impose himself upon it. Men gathered in a crowd lose all force of will, and turn instinctively to the person who possesses the quality they lack.

我们所说的领袖更多是指行动家而非思考家。他们并非，也无法生来就高瞻远瞩，因为这种品质会使人犹豫不决。领袖常常产生于神经质的、过分激进的、疯疯癫癫的人中。无论他们持有的观点或追求的理想是多么荒谬，他们的信念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所有的理论对他们都不再奏效。蔑视和迫害阻止不了他们，反而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为了理想牺牲了个人利益、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不再具有人类最本能的私欲，他们所求的惟一回报就是殉难。强烈的信仰使他们的话语极具说服力。民众乐于听从坚强的人，因为坚强的人知道如何前行。群体中的个人丧失了个体意志，并本能地服从于具备他们所缺少的品质的人。

Nations have never lacked leaders, but all of the latter have by no means been animated by those strong convictions proper to

apostles. These leaders are often subtle rhetoricians, seeking only their own personal interest, and endeavouring to persuade by flattering base instincts. The influence they can assert in this manner may be very great, but it is always ephemeral. The men of ardent convictions who have stirred the soul of crowds, the Peter the Hermits, the Luthers, the Savonarolas, the me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ave only exercised their fascination after having been themselves fascinated first of all by a creed. They are then able to call up in the souls of their fellows that formidable force known as faith, which renders a man the absolute slave of his dream.

一个民族从来不缺乏领袖，但不是每个领袖都会被信徒式的狂热所鼓舞。这些领袖常常巧于辞令，擅长通过阿谀奉承来求得一己之利。他们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强烈的反响，但那终究是昙花一现。拥有狂热信徒的、能直击心灵的领袖，譬如隐士彼得、路德、萨伏那罗拉以及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等，都是用信条说服了自己之后，才说服别人。所以他们能够在同伴的灵魂中激发无穷的力量与信仰，从而将人变为理想的信徒。

The arousing of faith—whether religious, political, or social, whether faith in a work, in a person, or an idea—has always been the function of the great leaders of crowds, and it is on this account that their influence is always very great. Of all the forces at the disposal of humanity, faith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ost tremendous, and the gospel rightly attributes to it the power of moving mountains. To endow a man with faith is to multiply his strength tenfold. The great events of history have been brought about by obscure believers, who have had little beyond their faith in their favour. It is not by the aid of the learned or of philosophers, and still less of sceptics, that have been built up the great religions

which have swayed the world, or the vast empires which have spread from one hemisphere to the other.

信仰的产生，无论是宗教、政治或社会信仰，无论是工作信仰、个人信仰还是单纯的一个理念，它们都是领袖统治群体的基本手段，其影响也因此强大。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是作用最大的一个。福音书说，信仰可以移山倒海，此话不假。一个人若有信仰，他就能强大十倍。芸芸信徒造就了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无名之辈除了自己的信仰外一无所有。统治世界的伟大宗教或者横跨半球的宏伟帝国，并非由学者和哲学家建造，更不是怀疑者的功劳。

In the cases just cited, however, we are dealing with great leaders, and they are so few in number that history can easily reckon them up. They form the summit of a continuous series, which extends from these powerful masters of men down to the workman who, in the smoky atmosphere of an inn, slowly fascinates his comrades by ceaselessly drumming into their ears a few set phrases, whose purport he scarcely comprehends, but the application of which, according to him, must surely bring about the realisation of all dreams and of every hope.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的都是伟大领袖的例子，他们数量极少，历史学家可一一数清。他们站在信徒顶端，下一级的是些工人，在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滔滔不绝地向同志们灌输只言片语。尽管他们自己也一知半解，但他们坚信，这信仰能实现所有的梦想。

In every social sphere, from the highest to the lowest, as soon as a man ceases to be isolated he speedily fall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leader. The majority of men, especially among the masses, do not possess clear and reasoned ideas on any subject whatever outside their own speciality. The leader serves them as guide. It is just possible that he may be replaced, though very inefficiently, by the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which manufacture opinions for their readers and supply them with ready-made phrases which dispense them of the trouble of reasoning.

在社会领域最高到最低的每个阶层，个人要么服从于领袖的管理，要么被群体孤立。大多数人，尤其是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事根本没有任何清晰合理的看法。领袖就像他们的向导。尽管不太有效，但领袖也有可能被期刊取代，因为期刊给群体提供现成的观点和词汇，所以他们不用费劲去理解。

The leaders of crowds wield a very despotic authority, and this despotism indeed is a condition of their obtaining a following. It has often been remarked how easily they extort obedience, although without any means of backing up their authority, from the most turbulent sec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They fix the hours of labour and the rate of wages, and they decree strikes, which are begun and ended at the hour they ordain.

群众领袖享有绝对权威，这种权威也是他们统治群体的条件。众所周知，他们无需任何权利援助，便轻易使民众甚至是工人阶级中最暴动的人听命于自己。领袖修订劳动时间和工资比例，他们决定罢工的开始和结束。

At the present day these leaders and agitators tend more and

more to usurp the place of the public authorities in proportion as the latter allow themselves to be called in question and shorn of their strength. The tyranny of these new masters has for result that the crowds obey them much more docilely than they have obeyed any government. If in consequence of some accident or other the leaders sh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scene the crowd returns to its original state of a collectivity without cohesion or force of resistance. During the last strike of the Parisian omnibus employes the arrest of the two leaders who were directing it was at once sufficient to bring it to an end. It is the need not of liberty but of servitude that is always predominant in the soul of crowds. They are so bent on obedience that they instinctively submit to whoever declares himself their master.

如今，这些领袖和煽动者们正一步步地篡夺政府权力，因为后者对怀疑的言论和力量的减损无动于衷。这些新的领袖施行暴政，因此比起服从政府，服从他们时，群众更为温顺。如果出于某些原因，领袖从历史舞台上退下，群众将回归无组织、无纪律的原始状态。在巴黎公汽员工罢工事件中，一旦两名领袖被捕，罢工立刻结束。比起对自由的需求，奴性在群体中更占上风。他们是如此容易被驯服，所以无论有谁声称是领导者，群体便本能地听命于他。

These ringleaders and agitators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clearly defined classes. The one includes the men who are energetic and possess, but only intermittently, much strength of will, the other the men, far rarer than the preceding, whose strength of will is enduring. The first mentioned are violent, brave, and audacious. They are more especially useful to direct a violent enterprise suddenly decided on, to carry the masses with them in spite of danger, and to transform into heroes the men who but yesterday

were recruits. Men of this kind were Ney and Murat under the First Empire, and such a man in our own time was Garibaldi, a talentless but energetic adventurer who succeeded with a handful of men in laying hands o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Naples, defended though it was by a disciplined army.

这些领导者和煽动者可被分为两类。一类领袖充满活力，但却只有一时的坚定意志。另一类人相对来说十分少见，他们的意志更为持久。第一类人暴力、勇武、鲁莽。他们更适合领导突发的暴动，带领群众冲锋陷阵，让新兵一夜之间成为英雄。第一帝国时代的内伊和缪拉就是这种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加里波第也算得上一个，尽管没什么天赋，他却精力充沛，乐于冒险。他只带领一小撮人，就能攻破纪律严明的军队，拿下古老的那不勒斯王国。

Still, though the energy of leaders of this class is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it is transitory, and scarcely outlasts the exciting cause that has brought it into play. When they have returned to their ordinary course of life the heroes animated by energy of this description often evince, as was the case with those I have just cited, the most astonishing weakness of character. They seem incapable of reflection and of conducting themselves under the simplest circumstances, although they had been able to lead others. These men are leaders who cannot exercise their function except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y be led themselves and continually stimulated, that they have always as their beacon a man or an idea, that they follow a line of conduct clearly traced. The second category of leaders, that of men of enduring strength of will, have, in spite of a less brilliant aspect, a much more considerable influence. In this category are to be found the true founders of religions and great undertakings: St. Paul, Mahomet,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de Lesseps, for example. Whether they be intelligent or narrow-minded is of no importance: the world belongs to them. The persistent will-force they possess is an immensely rare and immensely powerful faculty to which everything yields. What a strong and continuous will is capable of is not always properly appreciated. Nothing resists it; neither nature, gods, nor man.

不过，尽管此类领袖的能量有其用处，这种能量却是暂时的。它激发了导火索的出现，但很难一直延续。当这些逞一时之勇的英雄回到日常生活中，就像我刚提到的那样，他们往往暴露出致命的性格弱点。尽管擅长领导他人，他们却似乎无法在最简单的环境下思考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只有当他们也被别人领导，不断被人或观念刺激，有明确的行动规划时，他们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第二种类型的领袖意志力持久，尽管不如第一类人那样光彩夺目，却有更大的影响。这些人是宗教和各项伟大事业的真正鼻祖，例如圣保罗，哥伦布和德·雷赛布等。他们是否智慧、是否狭隘已不重要，因为世界属于他们。他们拥有的持久意志力能征服一切，是一种极为罕见但极为强大的能力。我们无法笃定地说强大持久的意志力能成就什么。这股意志力锐不可当，无论是自然、神灵还是人类都无法阻止。

The most recent example of what can be effected by a strong and continuous will is afforded us by the illustrious man who separated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worlds, and accomplished a task that during three thousand years had been attempted in vain by the greatest sovereigns. He failed later in an identical enterprise, but then had intervened old age, to which everything, even the will, succumbs.

德·雷赛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近的例子，很好地阐释了强大持久

的意志力能有怎样的影响。这个杰出的男人开凿苏伊士运河，将世界分成东西两半。他只身一人便完成了三千年来伟大的君主们屡试无果的任务。他后来败在同一事业上，但那时他年岁已高。在年龄面前，即使是最坚强的意志也败下阵来。

When it is desired to show what may be done by mere strength of will, all that is necessary is to relate in detail the history of the difficulties that had to be surmount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utting of the Suez Canal. An ocular witness, Dr. Cazalis, has summed up in a few striking lines the entire story of this great work, recounted by its immortal author.

如想说明单凭意志的力量能够完成什么事业，只须仔细想一下与开凿苏伊士运河时必须克服的困难有关的历史记载即可。见证人卡萨利斯博士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寥寥数语，记录下了这项伟大工程的作者所讲述的整个故事：

> From day to day, episode by episode, he told the stupendous story of the canal. He told of all he had had to vanquish, of the impossible he had made possible, of all the opposition he encountered, of the coalition against him, and the disappointments, the reverses, the defeats which had been unavailing to discourage or depress him. He recalled how England had combatted him, attacking him without cessation, how Egypt and France had hesitated, how the French Consul had been foremost in his opposition to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work, and the nature of the opposition he

had met with, the attempt to force his workmen to desert from thirst by refusing them fresh water; how the Minister of Marine and the engineers, all responsible men of experienced and scientific training, had naturally all been hostile, were all certain on scientific grounds that disaster was at hand, had calculated its coming, foretelling it for such a day and hour as an eclipse is foretold.

“日复一日，他都说着着建造运河的宏伟故事。他讲他克服的困难，创造的奇迹。也有人反对他，甚至有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和他作对。他经历过失望、逆境和失败，但无一能动摇他，打垮他。他回忆英国是怎样无休止地打击他，埃及和法国是怎样地犹豫不决以及法国领事在工程最初阶段是多么强烈地反对。他遇到各种各样的抵制，譬如拒绝提供干净水源而使工人因口渴逃离工地。海军部长和工程师，包括一切责任心强的、富有经验、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全都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他的敌人，他们声称科学证明灾难在即，就像推算日蚀一样，把灾难日期精确到具体的天数和小时。”

The book which relates the lives of all these great leaders would not contain many names, but these names have been bound up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civilisation.

这些伟大领袖的传记不会含有太多人名，但这些名字却与文明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2．The Means of Action of the Leaders: Affirmation, Repetition, Contagion

2．领袖的说服手法：断言、重复及传染效应

When it is wanted to stir up a crowd for a short space of time, to induce it to commit an act of any nature—to pillage a palace, or to die in defence of a stronghold or a barricade, for instance—the crowd must be acted upon by rapid suggestion, among which example is the most powerful in its effect. To attain this end,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crowd should have been previously prepared by certain circumstances, and, above all, that he who wishes to work upon it should possess the quality to be studied farther on, to which I give the name of prestige.

若想在短时间内激发起群体的热情，诱使群体采取任何性质的行动，譬如掠夺宫殿、誓死捍卫要塞或防御等，那么群体必须对暗示产生快速反应，其中效果最佳的就是树立榜样。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群体应当就某些特定环境做预先准备，当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领袖应具备某种品质，我称之为名望。这种品质有待做深入研究。

When, however, it is proposed to imbue the mind of a crowd with ideas and beliefs—with modern social theories, for instance—the leaders have recourse to different expedients. The principal of them are three in number and clearly defined—affirmation, repetition, and contagion. Their action is somewhat slow, but its effects, once produced, are very lasting.

但是，当领袖们打算用观念和信念，例如利用现代社会学说，影响群体思想时，他们所借助的手段各有不同。其中最为重要、清晰明了的是断言、重复及传染效应。这三种手段见效缓慢，但却影响持久。

Affirmation pure and simple, kept free of all reasoning and all proof, is one of the surest means of making an idea enter the mind of crowds. The conciser an affirmation is, the more destitute of every appearance of proof and demonstration, the more weight it carries. The religious books and the legal codes of all ages have always resorted to simple affirmation. Statesmen called upon to defend a political cause, and commercial men pushing the sale of their products by means of advertising are acquainted with the value of affirmation.

单纯简洁的断言无需任何说理和证明，是让群众接受某种观点的可靠方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精炼，越是缺乏证据，它就越有威力。任何时代的宗教书籍和法典都是简练的断言。捍卫政治立场的政客和运用广告推销产品的商人都十分熟悉断言的价值。

Affirmation, however, has no real influence unless it be constantly repeated, and so far as possible in the same terms. It was Napoleon, I believe, who said that there is only one figure in rhetoric of serious importance, namely, repetition. The thing affirmed comes by repetition to fix itself in the mind in such a way that it is accepted in the end as a demonstrated truth.

但是，如果不被一直重复，而且尽量使用相同的措辞，那么断言

就失去了价值。我相信，是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手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断言通过重复在头脑中生根，最终人们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

The influence of repetition on crowds is comprehensible when the power is seen which it exercises on the most enlightened minds. This power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repeated statement is embedded in the long run in those profound regions of our unconscious selves in which the motives of our actions are forged. At the end of a certain time we have forgotten who is the author of the repeated assertion, and we finish by believing it. To this circumstance is due the astonishing power of advertisements. When we have read a hundred, a thousand, times that X's chocolate is the best, we imagine we have heard it said in many quarters, and we end by acquiring the certitude that such is the fact. When we have read a thousand times that Y's flour has cured the most illustrious persons of the most obstinate maladies, we are tempted at last to try it when suffering from an illness of a similar kind. If we always read in the same papers that A is an arrant scamp and B a most honest man we finish by being convinced that this is the truth, unless, indeed, we are given to reading another paper of the contrary opinion, in which the two qualifications are reversed. Affirmation and repetition are alone powerful enough to combat each other.

若想理解重复对群体的影响，不妨看看重复在最开明的人身上所展现的力量。这是因为事实证明，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概念会进入我们潜意识的深层区域，而那里恰恰是我们行为动机形成的地方。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忘记了是谁说的话，但却深信了那些断言。广告蕴含的惊人力量便是一例。当我们千百遍地读到X牌巧克力是最棒的巧克力，我们便相信周围人也这么认为，最终我们会确信事实就是如

此。当我们千百遍地读到Y牌药粉治好了身患顽症的知名人士，一旦患上了类似的疾病，我们也忍不住去试用一下。如果老是在同一家报纸上读到A是个臭名昭著的流氓，B是最老实本分的好人，我们会相信这就是真相，除非我们再去读一家观点相反的、把他们的品质颠倒过来的报纸。若将断言和重复对立使用，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When an affirmation has been sufficiently repeated and there is unanimity in this repetition—as has occurred in the case of certain famous financial undertakings rich enough to purchase every assistance—what is called a current of opinion is formed and the powerful mechanism of contagion intervenes. Ideas, sentiments, emotions, and beliefs possess in crowds a contagious power as intense as that of microbes. This phenomenon is very natural, since it is observed even in animals when they are together in number. Should a horse in a stable take to biting his manger the other horses in the stable will imitate him. A panic that has seized on a few sheep will soon extend to the whole flock. In the case of men collected in a crowd all emotions are very rapidly contagious, which explains the suddenness of panics. Brain disorders, like madness, are themselves contagious. The frequency of madness among doctors who are specialists for the mad is notorious. Indeed, forms of madness have recently been cited—agoraphobia, for instance—which are communicable from men to animals.

如果一个断言重复次数够多，重复中过程中也没有异议，就像在一些著名的金融项目中，企业富有到可以收购所有援助方一样，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效应就此形成。群体拥有的观念、感情、情绪和信仰等都具有病菌一样的极强感染力。这种现象十分自然，在动物种群中也有这种现象。一匹马踢打它的饲养员，马厩中的其他马也会有样学样。如果几只羊感到恐慌，一会儿后整个羊群

就都慌乱了起来。在人类群体中，所有情绪也会迅速传染，所以恐慌是突发的。头脑混乱就像陷入精神混乱，其本身也具有传染性。众所周知，精神专家很有可能变成疯子。有些疯狂，比如广场恐怖症，也可以在人与动物间传播。

For individuals to succumb to contagion their simultaneous presence on the same spot is not indispensable. The action of contagion may be felt from a dista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vents which give all minds an individual tren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peculiar to crowds.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when men's minds have been prepared to undergo the influence in question by those remote factors of which I have made a study above. An example in point is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of 1848, which, after breaking out in Paris, spread rapidly over a great part of Europe and shook a number of thrones.

不同个体受到的传染，并不一定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传染力可能来自于千里之外，因为有些事件能形成独特的趋势，在群体中形成特有性格。尤其当人们在心理上已经对前文提到的间接因素有所准备，这种传染力更能发挥作用。1848年大革命时期，巴黎打响第一枪后，革命之火迅速传到欧洲各国，数位君主的地位被动摇。

Imitation, to which so much influence is attributed in social phenomena, is in reality a mere effect of contagion. Having shown its influence elsewhere, I shall confine myself to reproducing what I said on the subject fifteen years ago. My remarks have since been developed by other writers in recent publications.

很多社会现象被归因于模仿，其实不过是传染效应造成的。我在另一本著作中对它的影响已经做过说明，因此这里我只想引用一段15年前我就这一问题说过的话。我的观点已在其他作者的最新出版物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

> Man, like animals, has a natural tendency to imitation. Imitation is a necessity for him,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imitation is quite easy. It is this necessity that makes the influence of what is called fashion so powerful. Whether in the matter of opinions, ideas, literary manifestations, or merely of dress, how many persons are bold enough to run counter to the fashion? It is by examples not by arguments that crowds are guided. At every period there exists a small number of individualities which react upon the remainder and are imitated by the unconscious mass. It is needful however, that these individualities should not be in too pronounced disagreement with received ideas. Were they so, to imitate them would be too difficult and their influence would be nil. For this very reason men who are too superior to their epoch are generally without influence upon it. The line of separation is too strongly marked. For the same reason too Europeans, in spite of all the advantages of their civilisation, have so insignificant an influence on Eastern people; they differ from them to too great an extent.

人就像动物一样，有模仿他人的本能。模仿十分

容易，因此模仿也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模仿是必要的，所以潮流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无论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甚至服装，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潮流作对？引导大众的不是论据，而是榜样。每个时代都有一小部分人影响他人，被无意识的大众模仿。但这些个体无法明目张胆地反对普遍接受的认知。如果他们这样做了，群体将会很难模仿他们，他们也失去了影响力。因此，过分新潮的人总是无法影响其所处的时代。两者界限非常分明。所以尽管欧洲文明十分卓越，他们对东方民族的影响却微不足道，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The dual action of the past and of reciprocal imitation renders, in the long run, all the men of the same country and the same period so alike that even in the case of individuals who would seem destined to escape this double influence, such as philosophers, learned men, and men of letters, thought and style have a family air which enables the age to which they belong to be immediately recognised. It is not necessary to talk for long with an individual to attain to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what he reads, of his habitual occupations, and of the surroundings amid which he lives. [4_9]

长此以往，历史与模仿的相互作用会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一切变得十分相似，甚至那些看似坚决不会受到影响的个体，如哲学家、博学之士和文人，他们的思想和风格也会有相同之处，所以后人能立刻辨认出他们所属的时代。如果想全面了解一个人

读什么书，习惯做些什么，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并不需要同他长时间地交谈 [5_9] 。

Contagion is so powerful that it forces upon individuals not only certain opinions, but certain modes of feeling as well. Contagion is the cause of the contempt in which, at a given period, certain works are held—the example of “Tannhauser” may be cited—which, a few years later, for the same reason are admired by those who were foremost in criticising them.

传染是如此有力，以至于不仅是某些观念，甚至某些感情也可以传染。传染使得一些著作，例如《唐豪塞》，在某个时期受到蔑视，但几年后，同样由于传染效应，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又会对它们大加赞赏。

The opinions and beliefs of crowds are specially propagated by contagion, but never by reasoning. The conceptions at present rife among the working classes have been acquired at the public-house as the result of affirmation, repetition, and contagion, and indeed the mode of creation of the beliefs of crowds of every age has scarcely been different. Renan justly institut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irst founders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ist working men spreading their ideas from public-house to public-house”; while Voltaire had already observ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hat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it was only embraced by the vilest riff-raff.”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的普及，一定是因为传染效应而不是说理论

证。工人阶级在公共场合了解当下流行的观念，这是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成果。的确，任何年代的群体信仰都源于相似的原因。勒南正确地把基督教最早的创立者比作“从一个公共场合到另一个公共场合传播观念的社会党工人”；伏尔泰又称，“在一百多年里，信仰基督教的只有一些最卑鄙的乌合之众。”

It will be noted that in cases analogous to those I have just cited, contagion, after having been at work among the popular classes, has spread to the higher classes of society. This is what we see happening at the present day with regard to the socialist doctrines which are beginning to be held by those who will yet be their first victims. Contagion is so powerful a force that even the sentiment of personal interest disappears under its action.

正如我刚刚所言，传染效应先作用于普通群众，然后再作用于社会上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批接受社会主义信条的人，也是第一批牺牲者。传染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个人利益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This i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fact that every opinion adopted by the populace always ends in implanting itself with great vigour in the highest social strata, however obvious be the absurdity of the triumphant opinion. This reaction of the lower upon the higher social classes is the more curious, owing to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 beliefs of the crowd always have their origin to a greater or less extent in some higher idea, which has often remained without influence in the sphere in which it was evolved. Leaders and agitators, subjugated by this higher idea, take hold of it, distort it and create a sect which distorts it afresh, and then propagates it amongst the masses, who carry the process of deformation still

further. Become a popular truth the idea returns, as it were, to its source and exerts an influence on the upper classes of a nation. In the long run it is intelligence that shapes the destiny of the world, but very indirectly. The philosophers who evolve ideas have long since returned to dust, when, as the result of the process I have just described, the fruit of their reflection ends by triumphing.

所以被大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无论是多么荒谬，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被上流社会所认可。上流社会对下层社会的反作用是更为奇特的现象，因为群众信仰总是多多少少起源于一种更高深的观念，这种高深的观念往往在其发源地惊不起什么波澜。领导者和煽动家被更高深的观念吸引后，就会占有它，曲解它，组织起歪曲它的宗派，然后在群众中加以传播，然后群众进一步地使其歪曲。变成普世真理后，观念会重新作用于它的发源地——上流社会。从长远来看，智慧掌控着世界的命运，但这种作用十分间接。开创观念的哲学家早已归为尘土，但经由我所说的过程，他们的思想硕果累累。

3．Prestige

3．名望

Great power is given to ideas propagated by affirmation, repetition, and contagion by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y acquire in time that mysterious force known as prestige.

经由断言、重复和传染效应得以传播的观念是强有力的，因为在日积月累之中，它们获得了一种称为名望的神秘力量。

Whatever has been a ruling power in the world, whether it be ideas or men, has in the main enforced its authority by means of that irresistible force expressed by the word “prestige.” The term is one whose meaning is grasped by everybody, but the word is employed in ways too different for it to be easy to define it. Prestige may involve such sentiments as admiration or fear. Occasionally even these sentiments are its basis, but it can perfectly well exist without them. The greatest measure of prestige is possessed by the dead, by beings, that is, of whom we do not stand in fear—by Alexander, Caesar, Mahomet, and Buddha, for exampl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fictive beings whom we do not admire—the monstrous divinities of the subterranean temples of India, for instance—but who strike us nevertheless as endowed with a great prestige.

世界上无论什么统治力量，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人，基本上都是通过“名望”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来强化其权威。每个人都熟知这个词，但是用法却各不相同，因此也就难以对其定义。名望可能包含着赞赏或畏惧的感情。有时这些感情只是它的基础，名望可以完全独立于它们而存在。已故之人，亦即那些我们不再畏惧的人，最具名望，例如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佛祖。此外还有一些我们并不赞赏的虚构的存在，比如印度地下神庙的可怕神灵，我们却依旧害怕它们的威望。

Prestige in reality is a sort of domination exercised on our mind by an individual, a work, or an idea. This domination entirely paralyses our critical faculty, and fills our soul with astonishment and respect. The sentiment provoked is inexplicable, like all sentiments, but it would appear to be of the same kind as the

fascination to which a magnetised person is subjected. Prestige is the mainspring of all authority. Neither gods, kings, nor women have ever reigned without it.

现实中的名望是一种由某个人、某部著作或某种思想对我们精神的驾驭力。这种驾驭会让我们完全丧失批判能力，让我们的心灵充满震惊与敬畏。就像其他所有情感一样，这种情感是难以解释的，但是它似乎与具有魅力的人所引起的令人迷恋的感觉很相似。名望是权力的主要原因。无论是上帝、国王还是女人，没有名望都不可能实现驾驭。

The various kinds of prestige may be grouped under two principal heads: acquired prestige and personal prestige. Acquired prestige is that resulting from name, fortune, and reputation. It may be independent of personal prestige. Personal prestige, on the contrary, is something essentially peculiar to the individual; it may coexist with reputation, glory, and fortune, or be strengthened by them, but it is perfectly capable of existing in their absence.

不同种类的名望可以被分为两个类别：获得性名望和个人名望。获得性名望来自称号、财富和名誉。它可以和个人名望独立存在。相反，个人名望是某个人所特有的东西，它可以和名誉、荣耀、财富同时存在，或者因此而得到强化，但也可以完全独立于它们而存在。

Acquired or artificial prestige is much the most common. The mere fact that an individual occupies a certain position, possesses a certain fortune, or bears certain titles, endows him with prestige, however slight his own personal worth. A soldier in uniform, a

judge in his robes, always enjoys prestige. Pascal has very properly noted the necessity for judges of robes and wigs. Without them they would be stripped of half their authority. The most unbending socialist is always somewhat impressed by the sight of a prince or a marquis; and the assumption of such titles makes the robbing of tradesmen an easy matter.[3]

获得性的或人为的名望更为常见。仅仅是占据了某个职位，拥有了一定财富或是获得了某些头衔，就能使一个人获得名望，不论他的个人价值是多么轻微。穿着制服的军人和穿着长袍的法官总有赫赫威望。帕斯卡尔曾十分正确地指出，人靠衣装，长袍和假发对于法官而言是必需的。没有它们，法官的名望将被大打折扣。即使是最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也总是多多少少被王子侯爵的形象触动着，而拥有这种头衔会让压榨商人的过程变得轻而易举[3] 。

3: The influence of titles, decorations, and uniforms on crowds is to be traced in all countries, even in those in which the sentiment of personal independence is the most strongly developed. I quote in this connection a curious passage from a recent book of travel, on the prestige enjoyed in England by great persons.

3: 在任何国家，即使是那些人格独立性发展得最为完备的国家，个人头衔、奖章和制服都对群体有所影响。就此，我引述一本关于旅游的新书中的一篇趣文，这篇文章论述了英国伟人的名望。

"I had observed, under various circumstances, the peculiar sort of intoxication produced in the most reasonable Englishmen by the contact or sight of an English peer. Provided his fortune enables him to keep up his rank, he is sure of their affection in advance, and brought into contact with him they are so enchanted as to put up with anything at his hands. They may be seen to redden with pleasure at his approach, and if he speaks to them their suppressed joy increases their redness, and causes their eyes to gleam with unusual brilliance. Respect for nobility is in their blood, so to speak, as with Spaniards the love of dancing, with Germans that of music, and with Frenchmen the liking for revolutions. Their passion for horses and Shakespeare is less violent, the satisfaction and pride they derive from these sources a less integral part of their being.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sale for books dealing with the peerage, and go where one will they are to be found, like the Bible, in all hands."

“我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即便是最理智的英国人，也会对富有的同僚陷入极端崇拜。”如果他的财富足以使他保持自己的地位，他就可以提前肯定人们会爱戴他；只要能与他交往，人们会把手中的一切交给他。人们会因为接近他而感到高兴和脸红，如果他们能和他说上话，那么抑制不住的欣喜会让他们脸红得更加厉害，让他们眼中闪烁出不同寻常的光彩。就像西班

牙人对舞蹈的热爱，德国人对音乐的钟情，以及法国人对革命的热衷，人们对贵族的崇敬是深入骨髓的。他们对骏马和莎士比亚的热情则不那么强烈，他们从这些方面所获得的骄傲和满足感并不是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于贵族们的书销量很好，就像《圣经》一样，人手一本。”

The prestige of which I have just spoken is exercised by persons; side by side with it may be placed that exercised by opinions,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Prestige of the latter kind is most often merely the result of accumulated repetitions. History, literary and artistic history especially, being nothing more than the repetition of identical judgments, which nobody endeavours to verify, every one ends by repeating what he learnt at school, till there come to be names and things which nobody would venture to meddle with. For a modern reader the perusal of Homer results incontestably in immense boredom; but who would venture to say so? The Parthenon, in its present state, is a wretched ruin, utterly destitute of interest, but it is endowed with such prestige that it does not appear to us as it really is, but with all its accompaniment of historic memories.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prestige is to prevent us seeing things as they are and to entirely paralyse our judgment. Crowds always, and individuals as a rule, stand in need of ready-made opinions on all subjects. The popularity of these opinions is independent of the measure of truth or error they contain, and is solely regulated by their prestige.

以上所说的名望是通过人来体现的，此外还有一些则是通过观念、文学和艺术作品等体现的。后者往往只是长时间重复的结果。历史，尤其是文学史和艺术史，只不过是一些相同判断的重复，而没有

人会殚精竭虑地证实它，每个人都只是在重复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直到出现一些没有人再会质疑的名号与事物。对于一个现代读者而言，精读荷马的作品无疑会让人感到非常厌倦，但是谁胆敢这样说呢？现在的帕特农神庙只是一片可怜的、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的废墟，但是它被赋予了如此的名望，以至于我们看到的是关于它的所有赞誉和历史记忆，而不是它看起来的样子。名望的特殊性质让我们丧失判断力，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无论群体亦或个体，都需要依附已经存在的观念。这类观点的流行，靠的不是它正确与否，而是全凭它的名望。

I now come to personal prestige. Its natur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rtificial or acquired prestige, with which I have just been concerned. It is a faculty independent of all titles, of all authority, and possessed by a small number of persons whom it enables to exercise a veritably magnetic fascination on those around them, although they are socially their equals, and lack all ordinary means of domination. They force the acceptance of their ideas and sentiments on those about them, and they are obeyed as is the tamer of wild beasts by the animal that could easily devour him.

现在我来谈谈个人名望。它与前述的获得性或者人为的名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个人名望是一种独立于所有头衔和权威、只被少数人所拥有的品质，它能让这些人对周围的人具有真正的吸引力，尽管他们处于完全相等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任何通常见到的支配关系。他们强迫周围的人接受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众人对他们的服从，就如同凶猛的野兽对驯兽师的服从一样。

The great leaders of crowds, such as Buddha, Jesus, Mahomet, Joan of Arc, and Napoleon, have possessed this form of prestige in a

high degree, and to this endowment is more particularly due the position they attained. Gods, heroes, and dogmas win their way in the world of their own inward strength. They are not to be discussed: they disappear, indeed, as soon as discussed.

伟大的群众领袖，如佛祖、耶稣、穆罕默德、圣女贞德和拿破仑，都拥有极高的个人名望，他们所拥有的地位与个人名望有极大的关系。各路神灵、英雄以及宗教教条等，能在世上大行其道，都是因为它们有其内在的力量。它们是不可以被探讨的，一旦被探讨，它们便会消失不见。

The great personages I have just cited were in possession of their power of fascination long before they became illustrious, and would never have become so without it. It is evident, for instance, that Napoleon at the zenith of his glory enjoyed an immense prestige by the mere fact of his power, but he was already endowed in part with this prestige when he was without power and completely unknown. When, an obscure general, he was sent, thanks to influential protection, to command the army of Italy, he found himself among rough generals who were of a mind to give a hostile reception to the young intruder dispatched them by the Director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from the first interview, without the aid of speeches, gestures, or threats, at the first sight of the man who was to become great they were vanquished. Taine furnishes a curious account of this interview taken from contemporary memoirs.

以上我提到的这些伟大人物，在成名之前，就早已具有强大的魅力，没有这种魅力，他们也不可能成名。例如，在其荣耀鼎盛时期，

仅仅因为权力，拿破仑便拥有了巨大的名望，但是在他名不见经传的时候，他已经部分地享有了这些名望。当他还是一个无名将军的时候，多亏了要保护那些有势力的人，拿破仑被派去指挥意大利的军队。他发现自己身处一群愤怒的将军之中，他们想要给这个总督派来的新人一点颜色瞧瞧。从最开始的会面起，他没有借助任何演讲、姿态或威胁，其他人就被这个将要成为大人物的人征服了。泰纳从当时的回忆录中整理得到了一份关于这次会面的精彩描述。

> The generals of division, amongst others Augereau, a sort of swashbuckler, uncouth and heroic, proud of his height and his bravery, arrive at the staff quarters very badly disposed towards the little upstart dispatched them from Paris. On the strength of the description of him that has been given them, Augereau is inclined to be insolent and insubordinate; a favourite of Barras, a general who owes his rank to the events of Vendemiaire who has won his grade by street-fighting, who is looked upon as bearish, because he is always thinking in solitude, of poor aspect, and with the reputation of a mathematician and dreamer. They are introduced, and Bonaparte keeps them waiting. At last he appears, girt with his sword; he puts on his hat, explains the measures he has taken, gives his orders, and dismisses them. Augereau has remained silent; it is only when he is outside that he regains his self-possession and is able to deliver himself of his customary oaths. He admits with Massena that this little devil of a general has inspired him with awe; he cannot understand the ascendency by which from the very first he has felt himself

overwhelmed.

“部门将军们，包括奥热罗这样一个粗野、英雄主义、对自己的高大勇猛感到骄傲的武夫，来到军营，对巴黎派来的这个暴发户感到非常不满。奥热罗对关于拿破仑多么强大的描述表现得很傲慢无礼：一个巴拉斯的宠儿，一个因旺代叛乱而得到将军头衔的人，他在学校里成天斗殴，五大三粗，性格孤僻，有着数学家和梦想家的美名。他们被带过来了，波拿巴让他们等着。最终，他带着佩剑出现了。他戴上帽子，讲述了所采取的措施，并下达命令，然后让他们解散了。奥热罗保持沉默，直到出了门，他才重新找回自信，回到平时那种骂骂咧咧的状态。他同意马塞纳的看法，这个小个子魔鬼将军让他感到敬畏，那种从一开始就把他压倒的气场，他难以理解。”

Become a great man, his prestige increased in proportion as his glory grew, and came to be at least equal to that of a divinity in the eyes of those devoted to him. General Vandamme, a rough, typical soldier of the Revolution, even more brutal and energetic than Augereau, said of him to Marshal d'Arnano in 1815, as on one occasion they mounted together the stairs of the Tuileries: “That devil of a man exercises a fascination on me that I cannot explain even to myself, and in such a degree that, though I fear neither God nor devil, when I am in his presence I am ready to tremble like a child, and he could make me go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to throw myself into the fire.”

成为伟人之后，他的名望随着荣誉而增加，在追随者的眼中，他

至少已经和神灵一般了。旺达姆将军是一个粗野的、大革命时代的典型军人，甚至比奥热罗更加野蛮和积极，1815年，有一次他和阿纳诺元帅一起登上杜伊勒里宫的楼梯时，提到了拿破仑："这个像魔鬼一样的人，有着一种我自己都难以解释的魅力，这种吸引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我虽然不害怕上帝和魔鬼，但当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变得像个孩子一样开始发抖，他甚至能够让我去钻针眼、跳火海。"

Napoleon exercised a like fascination on all who came into contact with him. [4_10]

所有和拿破仑接触的人都被他的魅力征服 [5_10] 。

Davoust used to say, talking of Maret's devotion and of his own: "Had the Emperor said to us, 'It is important in the interest of my policy that Paris should be destroyed without a single person leaving it or escaping,' Maret I am sure would have kept the secret, but he could not have abstained from compromising himself by seeing that his family got clear of the city. On the other hand, I, for fear of letting the truth leak out, would have let my wife and children stay."

达武在谈到马雷和他自己的奉献精神的时候，曾说："如果皇帝对我们说，'出于我在政治方面的考虑，必须毁灭巴黎，不能有一个人离开或逃跑，这十分重要'，我确信马雷会为他保守这个秘密，但是他还是无法克制会向自己妥协，让自己的妻儿离开这座城市。但是我会因为害怕泄露真相，而让自己的妻儿留下来。"

It is necessary to bear in mind the astounding power exerted by fascination of this order to understand that marvellous return from the Isle of Elba, that lightning-like conquest of France by an isolated man confronted by all the organised forces of a great country that might have been supposed weary of his tyranny. He had merely to cast a look at the generals sent to lay hands on him, and who had sworn to accomplish their mission. All of them submitted without discussion.

牢牢记住，正是靠着这种魅力产生的惊人力量，拿破仑才能只身一人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法国可能已对这个流放之人的专政感到厌倦，但拿破仑却闪电般地击败了法国有组织的军队。他只需看一眼奉命阻拦他的将领，无论他们曾许过怎样的豪言壮志，他们都毫无怨言地投降了。

“Napoleon,” writes the English General Wolseley, “lands in France almost alone, a fugitive from the small island of Elba which was his kingdom, and succeeded in a few weeks, without bloodshed, in upsetting all organised authority in France under its legitimate king; is it possible for the personal ascendency of a man to affirm itself in a more astonishing manner? But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is campaign, which was his last, how remarkable too is the ascendency he exercised over the Allies, obliging them to follow his initiative, and how near he came to crushing them!”

英国将军沃尔斯利写道：“拿破仑曾是他的王国厄尔巴岛的逃犯，他几乎是独自一人登陆法国的，然后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成功地推翻了法国所有合法国王所统治的政权组织。一个人还能以更令人震惊

的方式来证明他的权势吗？但是纵观这场战役，也是他最后一场战役，他对同盟们所施加的权势是多么令人叹为观止！迫使他们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差点被他打败！”

His prestige outlived him and continued to grow. It is his prestige that made an emperor of his obscure nephew. How powerful is his memory still is seen in the resurrection of his legend in progress at the present day. Ill-treat men as you will, massacre them by millions, be the cause of invasion upon invasion, all is permitted you if you possess prestige in a sufficient degree and the talent necessary to uphold it.

他的名望比寿命更长，并且在持续增长。凭借他的名望，他的一个无名的侄子成为了皇帝。关于他的怀念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直到今天，关于他的传说仍在流传。随心所欲地虐待人，数以百万计地进行屠杀，实现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所有这些事情是被允许的，只要你拥有足够高的名望以及必要的才能去支撑它。

I have invoked, no doubt, in this case a quite exceptional example of prestige, but one it was useful to cite to make clear the genesis of great religions, great doctrines, and great empires. Were it not for the power exerted on the crowd by prestige, such growths would be incomprehensible.

毫无疑问，我在这里引用的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例子，但引用它，可以很好地阐释伟大的宗教、教条和帝王统治的起源。要是不考虑名望在大众身上所施加的影响，这些发展将变得难以理解。

Prestige, however, is not based solely on personal ascendency, military glory, and religious terror; it may have a more modest origin and still be considerable. Our century furnishes several examples.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ones that posterity will recall from age to age will be supplied by the history of the illustrious man who modified the face of the globe and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the nations by separating two continents. He succeeded in his enterprise owing to his immense strength of will, but also owing to the fascination he exercised on those surrounding him. To overcome the unanimous opposition he met with, he had only to show himself. He would speak briefly, and in face of the charm he exerted his opponents became his friends. The English in particular strenuously opposed his scheme; he had only to put in an appearance in England to rally all suffrages. In later years, when he passed Southampton, the bells were rung on his passage; and at the present day a movement is on foot in England to raise a statue in his honour.

但是，名望并非完全基于个人权势、军事业绩或宗教敬畏。一个人出身平凡，但仍值得敬畏。我们这个年代便有好几个例子。流芳百世的惊人事例之一，是德·雷赛布——他把大陆一分为二，改变了地球的地表形态和各大洲的商业联系。他的成功是因为强大的意志，也因为他那使周围人着迷的魅力。他只需展示自己便可克服一致的反对。他言语简洁，施展魅力便能化敌为友。英国人尤其反对他的计划；但他一出现在英国，便争取到了所有选票。后来，当他路过南安普顿时，所过之处钟声不断；如今英国又展开要为他塑像的运动。

“Having vanquished whatever there is to vanquish, men and things, marshes, rocks, and sandy wastes,” he had ceased to believe in obstacles, and wished to begin Suez over again at Panama. He

began again with the same methods as of old; but he had aged, and, besides, the faith that moves mountains does not move them if they are too lofty. The mountains resisted, and the catastrophe that ensued destroyed the glittering aureole of glory that enveloped the hero. His life teaches how prestige can grow and how it can vanish. After rivalling in greatness the most famous heroes of history, he was lowered by the magistrates of his country to the ranks of the vilest criminals. When he died his coffin, unattended, traversed an indifferent crowd. Foreign sovereigns are alone in rendering homage to his memory as to that of one of the greatest men that history has known.[4]

征服了人、事、沼泽、岩石、沙地等必须征服的一切后，他不再相信还有什么困难，于是他想在巴拿马再挖一条苏伊士运河。他像先前一样开始了工程；但他上了年纪。而且，碰上泰山一样的高山，愚公移山的信念也是没有法子的。山挖不掉，随后发生的灾难也黯淡了这位英雄身上的光环。他的一生验证了名望的降临和消失。他曾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但后来却被自己的家乡烙上卑鄙下流之徒的称号。无人留意他的逝去，他的灵柩在冷漠的人群中孤单穿过。只有别国以历史上英雄的礼节与尊重悼念他[4] 。

4: An Austrian paper, the Neue Freie Presse, of Vienna, has indulged on the subject of the destiny of de Lesseps in reflections marked by a most judicious psychological insight. I therefore reproduce them here:—

4: 奥地利的一家报纸，维也纳的《新自由报》，洋洋洒洒地描绘了雷赛布的命运，其深刻的反思显示出

了最卓越的心理学洞察。因此我把它转引如下：

"After the condemnation of Ferdinand de Lesseps one has no longer the right to be astonished at the sad end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If Ferdinand de Lesseps were a rogue every noble illusion is a crime. Antiquity would have crowned the memory of de Lesseps with an aureole of glory, and would have made him drink from the bowl of nectar in the midst of Olympus, for he has altered the face of the earth and accomplished works which make the creation more perfect.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rt of Appeal has immortalised himself by condemning Ferdinand de Lesseps, for the nations will always demand the name of the man who was not afraid to debase his century by investing with the convict's cap an aged man, whose life redounded to the glory of his contemporaries.

“在费迪南·德·雷赛布被定罪之后，我们无权再对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悲惨结局表示惊讶了。如果雷赛布是个恶棍，那么一切高贵的幻想都是犯罪。古人会用荣誉的光环来纪念雷赛布，会让他畅饮奥林匹斯山的琼浆玉露，因为他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完成了让造物更完美的工作。上诉法院的审判长因为给雷赛布定罪而使自己名垂青史，因为各民族一直会打听这个人的名字，正是他，胆敢把罪犯的帽子戴在了一个一辈子都在为同时代人增光的老人的头上，从而使自己的时

代蒙羞。

"Let there be no more talk in the future of inflexible justice, there where reigns a bureaucratic hatred of audacious feats. The nations have need of audacious men who believe in themselves and overcome every obstacle without concern for their personal safety. Genius cannot be prudent; by dint of prudence it could never enlarge the sphere of human activity.

在官僚阶层憎恨大胆壮举的地方，别再奢谈不可动摇的正义的未来。各民族都需要敢于冒险的勇猛之士，他们相信自己，不顾个人安危克服每一个障碍。天才不可能谨小慎微，借助谨小慎微决不可能扩大人类活动的范围。

"...Ferdinand de Lesseps has known the intoxication of triumph and the bitterness of disappointment—Suez and Panama. At this point the heart revolts at the morality of success. When de Lesseps had succeeded in joining two seas princes and nations rendered him their homage; to-day, when he meets with failure among the rocks of the Cordilleras, he is nothing but a vulgar rogue... In this result we see a war between the classes of society, the discontent of bureaucrats and employes, who take their revenge with the aid of the criminal code on those

> who would raise themselves above their fellows... Modern legislators are filled with embarrassment when confronted by the lofty ideas due to human genius; the public comprehends such ideas still less, and it is easy for an advocate-general to prove that Stanley is a murderer and de Lesseps a deceiver."

> ……费迪南·德·雷赛布品尝过胜利的狂喜和失望的痛苦——苏伊士和巴拿马。在这一点上，心灵憎恶成功的道德。当雷赛布成功地把两个海洋连接起来的时候，国王和人民都向他致敬；而今天，当他在安第斯山脉的嶙峋乱石中间遭遇失败的时候，他不过是粗鄙下流的恶棍。……在这个结果中，我们看到了社会阶层之间的一场战争，看到了官僚与雇主的不满，他们借助于刑法，报复了那些在同胞当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在面对那些归功于人类天才的崇高观念时，现代立法者的内心里充满了窘迫，公众对这些观念也不大理解，一位检察官很容易证明：斯坦利是个谋杀犯，雷赛布是个骗子。

Still, the various examples that have just been cited represent extreme cases. To fix in detail the psychology of prestige,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place them at the extremity of a series, which would range from the founders of religions and empires to the private individual who endeavours to dazzle his neighbours by a new coat or a decoration.

上述例子代表了极端情况。要想对名望心理学有详细的了解，就

有必要把它们放置于一系列的极端事例中，从国家和帝国的创立者，到给邻居炫耀一顶新帽子或者一枚奖章的人。

Between the extreme limits of this series would find a place all the forms of prestige resulting from the different elements composing a civilisation—sciences, arts, literature—and it would be seen that prestige constitutes the fundamental element of persuasion. Consciously or not, the being, the idea, or the thing possessing prestige is immediately imitated in consequence of contagion, and forces an entire generation to adopt certain modes of feeling and of giving expression to its thought. This imitation, moreover, is, as a rule, unconscious, which accounts for the fact that it is perfect. The modern painters who copy the pale colouring and the stiff attitudes of some of the Primitives are scarcely alive to the source of their inspiration. They believe in their own sincerity, whereas, if an eminent master had not revived this form of art, people would have continued blind to all but its naive and inferior sides. Those artists who, after the manner of another illustrious master, inundate their canvasses with violet shades do not see in nature more violet than was detected there fifty years ago; but they are influenced, “suggestioned,” by the personal and special impressions of a painter who, in spite of this eccentricity, was successful in acquiring great prestige. Similar examples might be brought forward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e elements of civilisation.

在这系列极端事件的两极中，都能在文明各种不同的元素里——科学，艺术，文学等，找到名望的一席之地，也能发现名望是劝说的基本要素。有名望的人、思想或物品，如同传染病一样，会立刻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模仿，使得整个时代的人都接受某些感受或表达思想的模式。此外，这种潜意识的模仿也是彻底的。临摹原始人单调色彩和

僵硬姿态的现代画家，很少能比他们的灵感源泉更有活力。他们相信自己的真诚，然而，如果没有哪个大师复兴了这种艺术形式，人们将只能看见他们幼稚低级的一面。模仿另一位艺术大师的艺术家们，则淹没在他们充斥着紫罗兰色暗影的画面里，却没在自然界中见过比50年前更多的紫罗兰。他们受到了另一位画家的“暗示”，即个性和特殊印象的影响。尽管这位画家颇为古怪，却成功地获得了巨大的名望。文明的每个因素中，都有相似的例子。

It is seen from what precedes that a number of factors may be concerned in the genesis of prestige; among them success was alway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ry successful man, every idea that forces itself into recognition, ceases, ipso facto, to be called in question. The proof that success is one of the principal stepping-stones to prestige is that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one is almost always followed by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other. The hero whom the crowd acclaimed yesterday is insulted to-day should he have been overtaken by failure. The reaction, indeed, will be the stronger in proportion as the prestige has been great. The crowd in this case considers the fallen hero as an equal, and takes its revenge for having bowed to a superiority whose existence it no longer admits. While Robespierre was causing the execution of his colleagues and of a great number of his contemporaries, he possessed an immense prestige. When the transposition of a few votes deprived him of power, he immediately lost his prestige, and the crowd followed him to the guillotine with the self-same imprecations with which shortly before it had pursued his victims. Believers always break the statues of their former gods with every symptom of fury.

由以上论述可知，名望的产生与许多因素有关。而成功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每一个成功人士、每一个得到承认的思想，都因为他们

成功的事实而免遭怀疑。成功是名望的奠基石，其证据是成功一旦消失，名望几乎也随之消失。昨日英雄一旦失败，今天就会受到侮辱。名望越高，反应就越激烈。此时，人们把失落的英雄当做自己的同类，并因自己曾向一个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对曾经的英雄进行报复。当处死自己的同伙和许多同时代的人时，罗伯斯庇尔享有巨大的名望。而当几张转移的选票剥夺了他的权力时，他立刻失去了名望，群众咒骂着把他送上了断头台，正像不久前对待他的牺牲品一样。信徒们总是穷凶极恶地打碎他们从前神灵的雕像。

Prestige lost by want of success disappears in a brief space of time. It can also be worn away, but more slowly by being subjected to discussion. This latter power, however, is exceedingly sure. From the moment prestige is called in question it ceases to be prestige. The gods and men who have kept their prestige for long have never tolerated discussion. For the crowd to admire, it must be kept at a distance.

缺乏成功，名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会消失。它也可能在议论中变得破旧不堪，只是时间要更长一些。语言的力量是极为可靠的。从名望成为一个问题时，它将不再被当作名望。能长期拥有名望的神和人，从来都不容许议论。要想得到人群的敬重，就必须与他们保持距离。

Chapter IV Limitations of the Variability of the Beliefs and Opinions of Crowds

第四章　群体信念和群体意见的可变性范围

1 . FIXED BELIEFS. The invariability of certain general beliefs—

They shape the course of a civilisation—The difficulty of uprooting them—In what respect intolerance is a virtue in a people—The philosophic absurdity of a belief cannot interfere with its spreading. 2. THE CHANGEABLE OPINIONS OF CROWDS. The extreme mobility of opinions which do not arise from general beliefs—Apparent variations of ideas and beliefs in less than a century—The real limits of these variations—The matters effected by the variation—The disappearance at present in progress of general beliefs, and the extreme diffusion of the newspaper press, have for result that opinions are nowadays more and more changeable—Why the opinions of crowds tend on the majority of subjects towards indifference—Governments now powerless to direct opinion as they formerly did—Opinions prevented to-day from being tyrannical on account of their exceeding divergency.

提要：（1）坚定的信念。某些普世信仰的不变性／普世信仰塑造文明／根除它们十分困难／在何种情况下偏执是一种个人美德／即使从哲学角度而言某种观念是荒谬的，这也并不阻碍它的传播。（2）群体意见的多变性。由普世信仰以外的信仰衍生的观念极其多变／观念和信仰在近百年的明显多样化／多样化的缺点／多样化的后果／当今普世信仰的缺失和新闻业的普遍无力导致公众舆论趋向混乱／为何群体对大部分观念无动于衷／政府不再能起到舆论导向的作用／百家争鸣的局面阻止了一家独大的情况。

1．Fixed Beliefs

1．坚定的信念

A close parallel exists between the anatom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iving beings. In these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certain invariable, or slightly variable, elements are met with, to change which the lapse is necessary of geological ages. Side by side with these fixed, indestructible features are to be found others extremely changeable, which the art of the breeder or horticulturist may easily modify, and at times to such an extent as to conceal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from an observer at all inattentive.

生物的结构特征和心理特征有着密切联系。结构特征是恒定的或基本恒定，改变它们需要极长时间。除了这些稳定不变的特征外，也有些极易变化的特征，有些通过畜牧和园艺技术就能改变，只要观察者一有疏忽，就可能忽略了它的原本特征。

The same phenomenon is observed in the case of moral characteristics. Alongside the unalterable psychological elements of a race, mobile and changeable elements are to be encountered. For this reason, in studying the beliefs and opinions of a people, the presence is always detected of a fixed groundwork on which are engrafted opinions as changing as the surface sand on a rock.

心理特征也是如此。除了不变的心理特征，例如种族，也有可变的心理特征。因此在研究某个群体的信仰和观念时，我们可以发现，现存的心理特征都是固定基础衍生而来的嫁接意见，如岩石上的流沙一般。

The opinions and beliefs of crowds may be divided, then, into two very distinct classes. On the one hand we have great permanent

beliefs, which endure for several centuries, and on which an entire civilisation may rest. Such, for instance, in the past were feudalism, Christianity, and Protestantism; and such, in our own time, are the nationalist principle and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and social ideas. In the second place, there are the transitory, changing opinions, the outcome, as a rule, of general conceptions, of which every age sees the birth and disappearance; examples in point are the theories which mould literature and the arts—those, for instance, which produced romanticism, naturalism, mysticism. Opinions of this order are as superficial, as a rule, as fashion, and as changeable. They may be compared to the ripples which ceaselessly arise and vanish on the surface of a deep lake.

群体意见和信念可明显分为两类。一方面我们有长久的信仰。依靠这种百年不变的信仰，我们建造了文明。例如，过去有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在现在这个年代，则有民族主义原则和当代的“民主”和“社会”观念。还有一些转瞬即逝的信仰，它们是每个时代普遍观念的结晶，时刻诞生，时刻消亡，例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理论等文艺学说。这些浅显的意见就像规则和潮流一样多变。池水表层的涟漪有多么稍纵即逝，这些学说就有多么昙花一现。

The great generalised beliefs are very restricted in number. Their rise and fall form the culminating points of the history of every historic race. They constitute the real framework of civilisation.

伟大的普遍信仰数量有限。它们的兴衰是任何种族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组成了文明的真正构架。

It is easy to imbue the mind of crowds with a passing opinion, but very difficult to implant therein a lasting belief. However, a belief of this latter description once established, it is equally difficult to uproot it. It is usually only to be changed at the cost of violent revolutions. Even revolutions can only avail when the belief has almost entirely lost its sway over men's minds. In that case revolutions serve to finally sweep away what had already been almost cast aside, though the force of habit prevented its complete abandonment. The beginning of a revolution is in reality the end of a belief.

一时的观点很容易蛊惑人心，但很难给民众灌输隽永的观念。但一旦信念长久地扎根于心，便很难清除它。一般来说，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改变持久的信念。即使人们不再相信此种信念，也需要革命来帮助根除它。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做的仅仅是清扫人们丢弃的残渣，因为人们不习惯完全放弃它们。一场革命的开始是一种信念的末日。

The precise moment at which a great belief is doomed is easily recognisable; it is the moment when its value begins to be called in question. Every general belief being little else than a fiction, it can only survive on the condition that it be not subjected to examination.

如果一种信念的价值开始被怀疑，那么它便走到末路。一切普世信念均是虚构的，只是因为信念不会被审阅，所以才得以流传。

But even when a belief is severely shaken, the institutions to which it has given rise retain their strength and disappear but

slowly. Finally, when the belief has completely lost its force, all that rested upon it is soon involved in ruin. As yet a nation has never been able to change its beliefs without being condemned at the same time to transform all the elements of its civilisation. The nation continues this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until it has alighted on and accepted a new general belief: until this juncture it is perforce in a state of anarchy. General beliefs are the indispensable pillars of civilisations; they determine the trend of ideas. They alone are capable of inspiring faith and creating a sense of duty.

但即使一种信念已经被严重动摇，根据它建立起的制度却依旧力量不减，只会缓慢灭亡。最后，当这种信念彻底失势时，以其为基础的一切都将化为灰烬。迄今为止，只要某个民族想改变信念，它就要做好毁灭所有文明的准备。在持续转变的过程中，这个民族将经历无政府的混乱，直到它最终找到新的普世信念为止。普世信念决定了思想趋势，是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它们才能激发信仰和责任心。

Nations have always been conscious of the utility of acquiring general beliefs, and have instinctively understood that their disappearance would be the signal for their own decline. In the case of the Romans, the fanatical cult of Rome was the belief that made them masters of the world, and when the belief had died out Rome was doomed to die. As for the barbarians who destroyed the Roman civilisation, it was only when they had acquired certain commonly accepted beliefs that they attained a measure of cohesion and emerged from anarchy.

各民族一直清楚拥有普世信念的益处，它们知道，这种信念的消

失会导致民族衰败。以罗马为例，罗马人征服世界靠的是对罗马的狂热崇拜。当这种狂热不再时，罗马也注定衰败。至于毁灭了罗马文明的那群野蛮人，只有当他们接受了某种共同意见并达成团结一致的协定，摆脱了无政府状态时，才能打败罗马帝国。

Plainly it is not for nothing that nations have always displayed intolerance in the defence of their opinions. This intolerance, open as it is to criticism from the philosophic standpoint, represents in the life of a people the most necessary of virtues. It was to found or uphold general beliefs that so many victims were sent to the stake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at so many inventors and innovators have died in despair even if they have escaped martyrdom. It is in defence, too, of such beliefs that the world has been so often the scene of the direst disorder, and that so many millions of men have died on the battlefield, and will yet die there.

各民族在捍卫民族信念时总是毫不退让，这显然是有原因的。这种态度，譬如在批判哲学观念时体现出的不宽容，象征了一个民族必不可少的品质。在中世纪，无数的人因为坚持普遍真理被送上了火刑架，那些逃过一劫的也难免死于绝望。同样，因为捍卫民族信念，无数的人战死沙场，国际局势动荡不安。

There are great difficulties in the way of establishing a general belief, but when it is definitely implanted its power is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invincible, and however false it be philosophically it imposes itself upon the most luminous intelligence. Have not the European peoples regarded as incontrovertible for more than fifteen centuries religious legends which, closely examined, are as barbarous [4_11] as those of Moloch? The frightful absurdity of the

legend of a God who revenges himself for the disobedience of one of his creatures by inflicting horrible tortures on his son remained unperceived during many centuries. Such potent geniuses as a Galileo, a Newton, and a Leibnitz never supposed for an instant that the truth of such dogmas could be called in question. Nothing can be more typical than this fact of the hypnotising effect of general beliefs, but at the same time nothing can mark more decisively the humiliating limitations of our intelligence.

树立普遍信念虽不甚容易，但一旦信念深深嵌入人脑，便具有不可置信的威力。无论从哲学上看起来多么荒谬，智者也会相信它。1500年来，欧洲各民族不是一直认为，那些如今被证明是野蛮的[5_11]、类似莫洛克神的宗教神话是不容争辩的吗？在这个神话里，上帝因为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动物不听话，便报复自己，给亲儿子施以酷刑。长达十多个世纪的时间内，居然一直没人认识到这种神话荒谬至极。即使是像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一样的天才，也从没怀疑这种说教的真实性。这个案例最为典型地说明了普遍信仰的催眠作用，也确切地表明，我们的理智有着令人羞愧的局限性。

As soon as a new dogma is implanted in the mind of crowds it becomes the source of inspiration whence are evolved its institutions, arts, and mode of existence. The sway it exerts over men's mind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s absolute. Men of action have no thought beyond realising the accepted belief, legislators beyond applying it, while philosophers, artists, and men of letters are solely preoccupied with its expression under various shapes.

新的教条一旦在植入群众大脑，就会催人创新，发展出各种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它们能影响绝对清醒之人的头脑。实干家只想

让普世信仰变为现实，立法者想把它编成法典，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全都一心想着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它。

From the fundamental belief transient accessory ideas may arise, but they always bear the impress of the belief from which they have sprung. The Egyptian civilisation, the European civilisation of the Middle Ages, the Mussulman civilisation of the Arabs are all the outcome of a small number of religious beliefs which have left their mark on the least important elements of these civilisations and allow of their immediate recognition.

基本信念可能衍生短暂的、附属的信念，后者总带有前者的影子。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以及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少数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即使再微不足道，宗教信仰也在这些文明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Thus it is that, thanks to general beliefs, the men of every age are enveloped in a network of traditions, opinions, and customs which render them all alike, and from whose yoke they cannot extricate themselves. Men are guided in their conduct above all by their beliefs and by the customs that are the consequence of those beliefs. These beliefs and customs regulate the smallest acts of our existence, and the most independent spirit cannot escape their influence. The tyranny exercised unconsciously on men's minds is the only real tyranny, because it cannot be fought against. Tiberius, Ghengis Khan, and Napoleon were assuredly redoubtable tyrants, but from the depth of their graves Moses, Buddha, Jesus, and Mahomet have exerted on the human soul a far profounder despotism. A conspiracy may overthrow a tyrant, but what can it

avail against a firmly established belief? In its violent struggle with Roman Catholicism it is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at has been vanquished, and this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sympathy of the crowd was apparently on its side, and in spite of recourse to destructive measures as pitiless as those of the Inquisition. The only real tyrants that humanity has known have always been the memories of its dead or the illusions it has forged itself.

因此，幸亏有这些普遍信念，每个时代的人都被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网络包围，他们无法挣脱这些束缚。首先是信念，其次是由信念形成的习俗支配人类的行动。这些信念和习俗规划着我们生活中微笑的行为，最独立的灵魂也受到它的影响。不知不觉地支配着我们头脑的信念习俗才是惟一真正的暴政，因为我们无法与它们为敌。诚然，提比略、成吉思汗和拿破仑都是暴君，但坟墓之下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却对人类灵魂施行更专制的统治。人可以密谋推翻暴君，但反对牢固的信念又有何利可图？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对抗中，尽管民众显然同情革命派，尽管革命派采取了像宗教法庭一样具有破坏性的无情手段，但革命派最终落败于主教势力。人性中惟一的暴政，就是对死者的怀念或自造的幻梦。

The philosophic absurdity that often marks general beliefs has never been an obstacle to their triumph. Indeed the triumph of such beliefs would seem impossible unless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y offer some mysterious absurdity. In consequence, the evident weakness of the socialist beliefs of to-day will not prevent them triumphing among the masses. Their real inferiority to all religious beliefs is solely the result of this consideration, that the ideal of happiness offered by the latter being realisable only in a future life, it was beyond the power of anybody to contest it. The socialist ideal of happiness being intended to be realised on earth, the vanity of its

promises will at once appear as soon as the first efforts towards their realisation are made, and simultaneously the new belief will entirely lose its prestige. Its strength, in consequence, will only increase until the day when, having triumphed, its practical realisation shall commence. For this reason, while the new religion exerts to begin with, like all those that have preceded it, a destructive influence, it will be unable, in the future, to play a creative part.

尽管从哲学上看，普遍信念十分荒谬，但这从不会阻碍它们取得胜利。如果不是一些奇妙又荒谬的悖论，这些信念也不可能成功。因此，尽管现在社会主义有着明显的弱点，它仍赢得了大量民众。社会主义不如其他宗教的一点，在于宗教许诺后世幸福，没人能真正享受到来生。而社会主义许诺现世幸福。当社会主义逐步实现时，它曾许下的美好诺言便依次破灭，而社会主义也会失去拥趸。总之，社会主义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实现前都将有增无减。因此，这种新宗教虽然能像所有旧宗教一样，在一开始产生毁灭性力量，但却无法创造未来。

2．The Changeable Opinions of Crowds

2．群体意见的多变性

Above the substratum of fixed beliefs, whose power we have just demonstrated, is found an overlying growth of opinions, ideas, and thoughts which are incessantly springing up and dying out. Some of them exist but for a day, and the more important scarcely outlive a generation. We have already noted that the changes which

supervene in opinions of this order are at times far more superficial than real, and that they are always affected by racial considerations. When examining, for instance,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France we showed that parties to all appearance utterly distinct—royalists, radicals, imperialists, socialists—have an ideal absolutely identical, and that this ideal is solely dependent on the mental structure of the French race, since a quite contrary ideal is found under analogous names among other races. Neither the name given to opinions nor deceptive adaptations alter the essence of things. The men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saturated with Latin literature, who (their eyes fixed on the Roman Republic), adopted its laws, its fasces, and its togas, did not become Romans because they were under the empire of a powerful historical suggestion. The task of the philosopher is to investigate what it is which subsists of ancient beliefs beneath their apparent changes, and to identify amid the moving flux of opinions the part determined by general beliefs and the genius of the race.

一些不断生生灭灭的意见、观念和思想，是以长久稳定的信念为基础的。有些只能存在数日，即使更为重要的，也难以持续百年。这些意见的变化，大都是受到民族因素影响的表面变化。例如考察法国政治制度时，我们发现各政党——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看似差异极大，但他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因为这个目标完全是由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决定的。但另一些民族中，有些目标名字相同，实质却不同。观念名称的差异或扭曲都不会改变其实质。大革命时代的人们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一心只关注罗马共和国，效仿罗马法律、权标、官制，但他们并没因此变成罗马人，因为他们身处一个强大的、跨历史的帝国。哲学家的工作，是探寻古代信仰的表面变化背后的深意，在千变万化的意见中，判断决定普遍信仰以及民族精神的因素。

In the absence of this philosophic test it might be supposed that crowds change their political or religious beliefs frequently and at will. All history, whether political, religious, artistic, or literary, seems to prove that such is the case.

若没有这种哲学探究，人们可能会认为群体随意变换他们的政治宗教信仰。所有的历史证据，无论是政治、宗教、艺术还是文学，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

As an example, let us take a very short period of French history, merely that from 1790 to 1820, a period of thirty years' duration, that of a generation. In the course of it we see the crowd at first monarchical become very revolutionary, then very imperialist, and again very monarchical. In the matter of religion it gravitates in the same lapse of time from Catholicism to atheism, then towards deism, and then returns to the most pronounced forms of Catholicism. These changes take place not only amongst the masses, but also amongst those who direct them. We observe with astonishment the prominent men of the Convention, the sworn enemies of kings, men who would have neither gods nor masters, become the humble servants of Napoleon, and afterwards, under Louis XVIII., piously carry candles in religious processions.

以法国历史上的1790到1820年为例，这三十年恰好是一代人。这一代人最初是保皇派，后来变成了革命派，然后成为帝国主义者，最后又转而支持君主制。在宗教信仰上，他们先是信仰天主教，然后倒向无神论，随后信仰自然论，结果最后又回过头来，坚定地信仰天主教。这样的变化不仅发生在群体中，也发生在群体的领导者中。令人惊讶的是，国会中身居高位的人、誓死反对国王的人、无神论和无

帝制论的人，都温顺地服从拿破仑。随后，他们又拿着蜡烛虔诚地走在宗教队伍中间，宣誓效忠路易十八。

Numerous, too, are the changes in the opinions of the crowd in the course of the following seventy years. The “Perfidious Albion” of the opening of the century is the ally of France under Napoleon's heir; Russia, twice invaded by France, which looked on with satisfaction at French reverses, becomes its friend.

此后的70年间，群众的意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纪初还是背信弃义的“英国叛徒们”，与拿破仑继承者统治的法国结盟。两次被法国入侵的俄国，对法国政权的颠覆十分满意，也成了法国的盟友。

In literature, art, and philosophy the successive evolutions of opinion are more rapid still. Romanticism, naturalism, mysticism, spring up and die out in turn. The artist and the writer applauded yesterday are treated on the morrow with profound contempt.

文学、艺术和哲学中，接踵而至的观念变化更为激进。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等依次兴起，再相继退出历史舞台。昨天还受到追捧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就可能被深深鄙视。

When, however, we analyse all these changes in appearance so far reaching, what do we find? All those that are in opposition with the general beliefs and sentiments of the race are of transient duration, and the diverted stream soon resumes its course. The

opinions which are not linked to any general belief or sentiment of the race, and which in consequence cannot possess stability, are at the mercy of every chance, or, if the expression be preferred, of every change in the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Formed by suggestion and contagion, they are always momentary; they crop up and disappear as rapidly on occasion as the sandhills formed by the wind on the sea-coast.

但当我们分析这些表象变化时，我们发现了什么？一切与民族的普世信仰和情感相违背的事情，都无法持续存在，走上歧路不久后就会回归正轨。与民族的普世信念或情感毫无干系的观点，将无法稳定，它们会随意改变。如果这些观点有可取之处，它们也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它们不过是暗示和传染效应作用下形成的短暂观念。它们匆匆出现又消失，就像海岸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At the present day the changeable opinions of crowds are greater in number than they ever were, and for three different reasons.

如今，群体意见的变化之大远超从前，主要原因有三。

The first is that as the old beliefs are losing their influence to a greater and greater extent, they are ceasing to shape the ephemeral opinions of the moment as they did in the past. The weakening of general beliefs clears the ground for a crop of haphazard opinions without a past or a future.

第一，陈旧观念在逐渐失去影响力，所以它们不再能像以前一样改造短暂观念。普世信仰的衰落也为没有历史依据和发展前途的偶然思想提供生存的土壤。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the power of crowds being on the increase, and this power being less and less counterbalanced, the extreme mobility of ideas, which we have seen to be a peculiarity of crowds, can manifest itself without let or hindrance.

第二，群众的力量正在增强，越来越没有什么能制衡这种力量。群体观念是极其多变的，对此我们已经有所了解，正毫无阻碍地得以展现。

Finally, the third reason is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newspaper press, by whose agency the most contrary opinions are being continually brought before the attention of crowds. The suggestions that might result from each individual opinion are soon destroyed by suggestions of an opposite character.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no opinion succeeds in becoming widespread, and that the existence of all of them is ephemeral. An opinion nowadays dies out before it has found a sufficiently wide acceptance to become general.

第三，近来报纸的发展，不断将对立观点呈现给群众。一种个人观点引发的暗示可能迅速被相反观点的暗示所压倒。结果没有任何一种观念能得到广泛支持，存在的全是短暂观念。还没能被普遍接受，一种观念就被淘汰了。

A phenomenon quite new in the world's history, and most characteristic of the present age, has resulted from these different causes; I allude to the powerlessness of governments to direct opinion.

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一种世界历史上的从未出现的现象，也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政府无法引导舆论。

In the past, and in no very distant past, the action of governme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a few writers and a very small number of newspapers constituted the real reflectors of public opinion. To-day the writers have lost all influence, and the newspapers only reflect opinion. As for statesmen, far from directing opinion, their only endeavour is to follow it. They have a dread of opinion, which amounts at times to terror, and causes them to adopt an utterly unstable line of conduct.

过去，就在不久以前，政府措施、几位作家和少数报纸便能真正反映民众舆论。现在作家毫无影响力，报纸也仅仅能反映部分观念。政客非但不能引导舆论，反而只能追寻它们。他们害怕舆论，有时甚至恐惧舆论，因此他们难以有稳定的行动路线。

The opinion of crowds tends, then, more and more to become the supreme guiding principle in politics. It goes so far to-day as to force on alliances, as has been seen recently in the case of the Franco-Russian alliance, which is solely the outcome of a popular movement. A curious symptom of the present time is to observe popes, kings, and emperors consent to be interviewed as a means of

submitting their views on a given subject to the judgment of crowds. Formerly it might have been correct to say that politics were not a matter of sentiment. Can the same be said to-day, when politics are more and more swayed by the impulse of changeable crowds, who are uninfluenced by reason and can only be guided by sentiment?

因此群众意见逐步变成了政治的指导原则。如今，群众意见竟能促成国家联盟，比如最近的法俄联盟，就完全是民众运动的产物。奇怪的是，教皇、国王和皇帝们同意接受采访，表示愿意让群众来评判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我们可以说，曾经政治是不掺杂感情的。但在去理性化、强感情化的当下，政治越来越被群众一时的观念所引导，我们还能说政治不掺杂感情吗？

As to the press, which formerly directed opinion, it has had, like governments, to humble itself before the power of crowds. It wields, no doubt,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but only because it is exclusively the reflection of the opinions of crowds and of their incessant variations. Become a mere agency for the supply of information, the press has renounced all endeavour to enforce an idea or a doctrine. It follows all the changes of public thought, obliged to do so by the necessities of competition under pain of losing its readers. The old staid and influential organs of the past, such as the Constitutionnel, the Debats, or the Siecle, which were accepted as oracles by the preceding generation, have disappeared or have become typical modern papers, in which a maximum of news is sandwiched in between light articles, society gossip, and financial puffs.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to-day of a paper rich enough to allow its contributors to air their personal opinions, and such opinions would be of slight weight with readers who only ask

to be kept informed or to be amused, and who suspect every affirmation of being prompted by motives of speculation. Even the critics have ceased to be able to assure the success of a book or a play. They are capable of doing harm, but not of doing a service. The papers are so conscious of the uselessness of everything in the shape of criticism or personal opinion, that they have reached the point of suppressing literary criticism, confining themselves to citing the title of a book, and appending a “puff” of two or three lines. [4_12] In twenty years' time the same fate will probably have overtaken theatrical criticism.

过去，新闻业就像政府一样引导舆论，而如今也只能臣服于强大的群体力量。它们无疑仍拥有可观的力量，但不过是因为它们如鹦鹉般重复着群众观念和其永无休止的变式。新闻业仅仅起到提供信息的作用，它不再能灌输观念或教条。出于对保持竞争力的考量和对失去读者的恐惧，新闻业也只能一味反应舆论变化。《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这类曾经稳定、有影响力的传统报纸，是老一辈的知识来源。如今它们不是消失，就是变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将大量严肃新闻夹杂在故事、绯闻和夸张的金融评论中。的确，没有哪家报社能富到让自己的编辑发表个人意见，因为对读者而言，得到消息或消遣才是重要的。他们对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表示怀疑，因而编辑的个人意见无足轻重。甚至批评家也无法肯定哪本书或哪部戏获得了成功。他们可以做到刁钻刻薄，却无法付诸行动。报社十分清楚评论和个人意见是没用的，所以他们压缩了文学批评板块。如今的文学批评只是提一下书名，再吹捧个两三句 [5_12] 。再过个二三十年，戏剧批评可能也不过如此。

The close watching of the course of opinion has become to-day the principal preoccupation of the press and of governments. The effect produced by an event, a legislative proposal, a speech, is

without intermission what they require to know, and the task is not easy, for nothing is more mobile and changeable than the thought of crowds, and nothing more frequent than to see them execrate today what they applauded yesterday.

密切关注各方意见已成了新闻业和政府的头等要务。他们需要第一时间了解一件事、一条法令或一次演讲造成了怎样的效果。这不是个容易活，因为没什么比群众意见更多变了。群众痛斥自己昨天还在赞扬的事物，这实在是太常见了。

This total absence of any sort of direction of opin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destruction of general beliefs, have had for final result an extreme divergency of convictions of every order, and a growing indifference on the part of crowds to everything that does not plainly touch their immediate interests. Questions of doctrine, such as socialism, only recruit champions boasting genuine convictions among the quite illiterate classes, among the workers in mines and factories, for instance. Members of the lower middle class, and working men possessing some degree of instruction, have either become utterly sceptical or extremely unstable in their opinions.

观念引导的缺乏和普世信仰的毁灭，最终造成了对一切秩序的怀疑，民众也对无关当下个人利益的事漠不关心。类似社会主义的信条，只能在目不识丁的阶层，例如矿山或工厂里的工人群体里，赢得支持。中低产阶级群体或受过教育的工人群体，要么怀疑一切，要么极不稳定。

The evolution which has been effected in this direction in the last twenty-five years is striking. During the preceding period, comparatively near us though it is, opinions still had a certain general trend; they had their origin in the acceptance of some fundamental belief. By the mere fact that an individual was a monarchist he possessed inevitably certain clearly defined ideas in history as well as in science, while by the mere fact that he was a republican, his ideas were quite contrary. A monarchist was well aware that men are not descended from monkeys, and a republican was not less well aware that such is in truth their descent. It was the duty of the monarchist to speak with horror, and of the republican to speak with veneration,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There were certain names, such as those of Robespierre and Marat, that had to be uttered with an air of religious devotion, and other names, such as those of Caesar, Augustus, or Napoleon, that ought never to be mentioned unaccompanied by a torrent of invective. Even in the French Sorbonne this ingenuous fashion of conceiving history was general. [4_13]

过去的25年里，我们惊人地向这个方向发展着。此前不久，虽然与我们相距不远，群体观念仍是有一定趋势的，这些趋势源于基本信仰。某人支持君主制，便可据此判断他有清晰明确的历史观和科学观；某人支持共和制，则他有与前者完全相反的观念。前者明确认为人不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后者却坚定认为人就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前者惧怕大革命，后者拥戴大革命。共和党人在提到一些名字，例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时，带着宗教式的虔诚，但提到恺撒、奥古斯都或拿破仑之流的名字时，则必会予以痛斥。甚至在法国的索邦，这种理解历史的愚昧潮流也普遍存在 [5_13] 。

At the present day, as the result of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all

opinions are losing their prestige; their distinctive features are rapidly worn away, and few survive capable of arousing our enthusiasm. The man of modern times is more and more a prey to indifference.

如今，因为大量的讨论和分析，所有的观念都失去了权威性；它们不再与众不同，存活时间之短，以至于没几个能唤起民众的热情。现代人越来越冷漠了。

The general wearing away of opinions should not be too greatly deplored. That it is a symptom of decadence in the life of a people cannot be contested. It is certain that men of immense, of almost supernatural insight, that apostles, leaders of crowds—men, in a word, of genuine and strong convictions—exert a far greater force than men who deny, who criticise, or who are indifferent, but it must not be forgotten that, given the power possessed at present by crowds, were a single opinion to acquire sufficient prestige to enforce its general acceptance, it would soon be endowed with so tyrannical a strength that everything would have to bend before it, and the era of free discussion would be closed for a long time. Crowds are occasionally easy-going masters, as were Heliogabalus and Tiberius, but they are also violently capricious. A civilisation, when the moment has come for crowds to acquire a high hand over it, is at the mercy of too many chances to endure for long. Could anything postpone for a while the hour of its ruin, it would be precisely the extreme instability of the opinions of crowds and their growing indifference with respect to all general beliefs.

观念消失是种普遍趋势，不必因此感到过于悲伤。毫无疑问，这

是一个民族衰败的象征。可以肯定的是，伟大的人、深思远虑的人、使徒、群众领袖，一言以蔽之，那些真诚又坚定的人，比卑鄙之徒、斤斤计较者、冷眼旁观者，要发挥大得多的影响。但我们仍需记住，群众拥有强大的力量。如果某种单一观点有足够的名望，能被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会拥有专制的权力。所有事物都会臣服于这种观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也就此结束。群众偶尔像赫利奥加巴勒和梯比留斯一样十分随和，但他们血液中也流淌着狂暴的因子。如果一种文明让群体夺去了风头，那它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推迟这种毁灭的话，那就是群体观念的极度动荡和对普世信仰的漠视。

[4_1].The novelty of this proposition being still considerable and history being quite unintelligible without it, I devoted four chapters to its demonstration in my last book ("The Psychological Laws of the Evolution of Peoples"). From it the reader will see that, in spite of fallacious appearances, neither language, religion, arts, or, in a word, any element of civilisation, can pass, intact, from one people to another.

[4_2].The report of the ex-Conventionist, Fourcroy, quoted by Taine, is very clear on this point.
"What is everywhere seen with respect to the keeping of Sunday and attendance at the churches proves that the majority of Frenchmen desire to return to their old usages and that it is no longer opportune to resist this natural tendency... The great majority of men stand in need of religion, public worship, and priests. IT IS AN ERROR OF SOME MODERN PHILOSOPHERS, BY WHICH I MYSELF HAVE BEEN LED AWAY, to believe in the possibility of instruction being so general as to destroy religious prejudices, which for a great number of unfortunate persons are a source of consolation... The mass of the people, then, must be allowed its priests, its altars, and its public worship."

[4_3].The most advanced republicans, even of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se this fact. The American magazine, The Forum, recently gave categorical expression to the opinion in terms which I reproduce here from the Review of Reviews for December, 1894:—"It should never be forgotten, even by the most ardent enemies of an aristocracy, that England is to-day the most democratic country of the universe,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are most respected, and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possesses the most liberty."

[4_4].If a comparison be made between the profound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dissensions which separate the various parties in France, and are more especially the result of social questions, and the separatist tendencies which were manifested at the time of the Revolution, and began to again display themselves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Franco-German war,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different races represented in France are still far from being completely blended. The vigorous centralisation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rtificial departments destined to bring about the fusion of the ancient provinces was certainly its most useful work. Were it possible to bring about the decentralisation which is to-day preoccupying minds lacking in foresight, the achievement would promptly have for consequence the most sanguinary disorders. To overlook this fact is to leave out of account the entire history of France.

[4_5].This phenomenon, moreover, is not peculiar to the Latin peoples. It is also to be observed in China, which is also a country in the hands of a solid hierarchy of mandarins or functionaries, and where a function is obtained, as in France, by competitive examination, in which the only test is the imperturbable recitation of bulky manuals. The army of educated persons without employment is considered in China at the present day as a veritable national calamity. It is the same in India where, since the English have opened schools, not for educating purposes, as is the case in England itself, but simply to furnish the indigenous inhabitants with instruction, there has been formed a special class of educated persons, the Baboos, who, when they do not obtain employment, become the irreconcilable enemies of the English rule. In the case of all the Baboos, whether provided with employment or not, the first effect of their instruction has been to lower their standard of morality. This is a fact on which I have insisted at length in my book, "The Civilisations of India"—a fact, too, which has been observed by all authors who have visited the great peninsula.

[4_6].In my book, "The Psychological Laws of the Evolution of Peoples," I have insisted at length on the differences which distinguish the Latin democratic ideal from the Anglo-Saxon democratic ideal. Independently, and as the result of his travels, M. Paul Bourget has arrived, in his quite recent book, "Outre-Mer," at conclusions almost identical with mine.

[4_7].Daniel Lesueur.

[4_8].The opinion of the crowd was formed in this case by those rough-and-ready associations of dissimilar things, the mechanism of which I have previously explained. The French national guard of that period, being composed of peaceable

shopkeepers, utterly lacking in discipline and quite incapable of being taken seriously, whatever bore a similar name, evoked the same conception and was considered in consequence as harmless. The error of the crowd was shared at the time by its leaders, as happens so often in connection with opinions dealing with generalisations. In a speech made in the Chamber on the 31st of December, 1867, and quoted in a book by M. E. Ollivier that has appeared recently, a statesman who often followed the opinion of the crowd but was never in advance of it—I allude to M. Thiers—declared that Prussia only possessed a national guard analogous to that of France, and in consequence without importance, in addition to a regular army about equal to the French regular army; assertions about as accurate as the predictions of the same statesman as to the insignificant future reserved for railways.

[4_9].Gustave le Bon, "L'Homme et les Societes," vol. ii. p. 116. 1881.

[4_10].Thoroughly conscious of his prestige, Napoleon was aware that he added to it by treating rather worse than stable lads the great personages around him, and among whom figured some of those celebrated men of the Convention of whom Europe had stood in dread. The gossip of the period abounds in illustrations of this fact. One day, in the midst of a Council of State, Napoleon grossly insults Beugnot, treating him as one might an unmannerly valet. The effect produced, he goes up to him and says, "Well, stupid, have you found your head again?" Whereupon Beugnot, tall as a drum-major, bows very low, and the little man raising his hand, takes the tall one by the ear, "an intoxicating sign of favour," writes Beugnot, "the familiar gesture of the master who waxes gracious." Such examples give a clear idea of the degree of base platitude that prestige can provoke. They enable us to understand the immense contempt of the great despot for the men surrounding him—men whom he merely looked upon as "food for powder."

[4_11].Barbarous, philosophically speaking, I mean. In practice they have created an entirely new civilisation, and for fifteen centuries have given mankind a glimpse of those enchanted realms of generous dreams and of hope which he will know no more.

[4_12].These remarks refer to the French newspaper press.—Note of the Translator.

[4_13].There are pages in the books of the French official professors of history that are very curiou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y prove too how little the critical spirit is developed by the system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vogue in France. I cite as an example the following extracts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M. Rambaud,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Sorbonne:
"The taking of the Bastille was a culminating event in the history not only of France, but of all Europe; and inaugurated a new epoch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ith respect to Robespierre, we learn with stupefaction that "his dictatorship was based more especially on opinion, persuasion, and moral authority; it was a sort of pontificate in the hands of a virtuous man!" (pp. 91 and 220.)

[5_1].这一论点依然相当新颖，如果没有它，历史就完全不可理解，我在上一本书《民族进化的心理规律》中用了四章的篇幅来证明它。从那本书中，读者会看到，尽管有着虚妄的外表，但语言、宗教、艺术，或者说文明的任何成分，都不可能毫发无损地从一个种族传递到另一个种族。

[5_2].丹纳引用的是富克鲁瓦对前保守主义所做的报告，在这一点上立场十分清晰：
“随处可见的保留礼拜日和上教堂，说明了大部分法国人希望重拾他们过去的习俗，因此很难抵抗这种自然倾向。绝大多数人需要宗教、公共信仰和神职人员。某些近代哲学家错误地认为教导的力量强大到可以毁灭宗教，我本人也曾经受到这样的误导，而宗教是不幸者的精神安慰。所以应当准许人民拥有神父、祭坛和公共信仰。”

[5_3].最先进的共和主义者，甚至是美国人，都认可这个事实。美国杂志《论坛》近日做出明确表态，我在此复述1894年12月份的评论：“即使是贵族制最坚定的敌人，也永不能忘如今的英国，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国家，最尊重人权的国家，人民享有最多自由的国家。

[5_4].让我们比较一下导致法国各政党分崩离析的宗教纷争和党派纷争，它们大多由社会问题引起，这种分裂倾向在大革命时期显现出来，又出现在德法战争结束时。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各民族远未完全融合。大革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人为的部门分工，注定导致古老省份的合并，这是其最有益的成就。如果这能引起那些没远见的人们着迷的地方分权，则可能引起最为血腥的混乱。如果忽视这个事实，则是忽略法兰西的全部历史。

[5_5].同样的情形不仅发生在拉美人民身上。中国，这个在稳固的官僚政权统治下的国家，获得一个官职就和在法国一样，仅需单纯背诵大量手册。中国认为受教育的失业者组成的队伍是名副其实的民族灾难。印度也是一样。英国人在那里建了学校，但并非是像在本国一样为了教育而建，而只是为了指导印度的英国人。所以印度受过教育的群体——巴布，组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一旦失业，他们便与英国统治势不两立。对于所有的巴布，无论有没有工作，教育都会第一时间降低他们的道德标准。关于这一点，我曾在自己的著作《印度文明》里做过详细解释，其他造访过这个半岛的作者也同样关注到这个事实。

[5_6].在《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一书中，我曾详尽地讨论了拉丁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主理想之间的差别。保罗·布尔热先生在旅行结束后，在新近出版的《海外》一书中独立地得出了几乎跟我一样的结论。

[5_8].丹尼尔·勒絮尔。

[5_8].在此例中，民众的意见是通过对不同事物的胡乱联想而形成的，其机制我在前面解释过。那一时期法国的国民警卫队是由平和温顺的小店主组成，毫无纪律，大可不必认真对待，凡是被冠以同样名称的军队都会唤起同样联想，因此被认为是无害的。当时，民众的的领导人也持有这样的错误观点，这种情况在涉及一般化的观点时也经常出现。奥利弗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引用了一位政治家1867年12月31日在议会里发表的一次演说，这位政治家经常附和群众的意见，从不比他们超前，这里指的是梯也尔先生，他宣称，普鲁士除了一支与法国正规军旗鼓相当的正规军之外，仅有一支国民警卫队，类似于法国的国民警卫队，因此无足轻重。这个说法的准确性，跟同一位政治家后来预言铁路毫无价值时的准确性大致相当。

[5_9].古斯塔夫·勒庞《人类与社会》，1881年版，第二卷，第116页。

[5_10].拿破仑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威望，他知道，要是把他身边的那些大人物看得连马夫都不如，就会增加这种威望，这些人当中包括国民议会中一些让整个欧洲心惊胆寒的著名人物。那一时期有大量流言蜚语生动地说明了这一事实。有一天，在国务委员会上，拿破仑粗暴地羞辱了伯尼奥，像对待一个贴身男仆一样粗鲁无礼地对待他。效果产生后，他站起身来，走到伯尼奥的面前说："喂，笨蛋，找回你的脑袋没有？"对此，像鼓手长一般高大的伯尼奥深深地弯下了腰，那个小个子男人揪住大个子的耳朵，把他提了起来。伯尼奥写道："这是令人陶醉的宠信的表示，是越来越仁慈的主人所表现出的亲密姿态。"这样的事例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威望能够激起多么卑贱的陈词滥调。它们使我们能够理解大暴君对身边追随者的极大轻蔑，他仅仅把他们看做是"炮灰"。

[5_11].这里所说的野蛮是哲学意义上的野蛮。实际上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明。1500年来，使人类得以窥见那些充满令人心醉神迷的梦想和希望的国度，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5_12].这些评论来自于法国纸媒——译者注

[5_13].从这个观点看，法国官方历史教授的书中有一些篇章非常古怪。它们也证明了法国盛行大学教育体系所发展出来的批评精神多么缺乏。我不妨引用巴黎大学历史学教授朗博先生的《法国大革命》中的两段话作为例证："攻占巴士底狱，不仅是法国历史上而且是整个欧洲历史上的一次高潮事件，它开创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谈到罗伯斯庇尔，我们万分震惊地读到："他的独裁统治尤其是建立在民意、信念

和道德权威基础之上的统治，是一种掌握在品德高尚者手里的教皇权位。”

Book III The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the Different Kinds of Crowds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描述

Chapter I The Classification of Crowds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The general divisions of crowds—Their classification. 1. HETEROGENEOUS CROWDS. Different varieties of them—The influence of race—The spirit of the crowd is weak in proportion as the spirit of the race is strong—The spirit of the race represents the civilised state and the spirit of the crowd the barbarian state. 2. HOMOGENEOUS CROWDS. Their different varieties—Sects, castes, and classes.

提要：群体的大致区分。他们的分类：（1）异质性群体。异质性群体的不同类型／种族的影响／当一个种族的精神强大时，其群体的精神相应软弱／种族精神代表文明状态，群体精神代表野蛮状态。（2）同质性群体。同质性群体的不同类型／派别，身份与阶级。

We have sketched in this work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common to psychological crowds. It remains to point out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which accompany those of a general order in th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collectivities, when they are transformed into a crowd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the proper exciting causes. We will, first of all, set forth in a few words a classification of crowds.

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简述了群体的一般特征。有待说明的是，受一定刺激因素的影响，不同集体转化为群体时所各自具有的特殊特征。那么，我们首先简单谈谈群体的分类。

Our starting-point will be the simple multitude. Its most inferior form is met with when the multitude is composed of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races. In this case its only common bond of union is the will, more or less respected of a chief. The barbarians of very diverse origin who during several centuries invaded the Roman Empire, may be cited as a specimen of multitudes of this kind.

我们从简单的人群谈起。当人群中的成员来自不同种族时，我们就看到了其最初级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惟一维系团结的纽带，就是首领本人或多或少得到尊重的意志。在几个世纪间侵略了罗马帝国的野蛮人，来源极其复杂，正是这类人群的典型。

On a higher level than these multitudes composed of different races are those which under certain influences have acquired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have ended by forming a single race. They present at times characteristics peculiar to crowds, but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overruled to a greater or less extent by racial considerations.

比不同种族构成的人群层次更高的，就是由于受到某些影响而具有共同特征并最终形成一个种族的人群。他们有时会表现出某些群体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敌不过种族的因素。

These two kinds of multitudes may, under certain influences investigated in this work, be transformed into organised or psychological crowds. We shall break up these organised crowds into the following divisions:—

在本书之前阐述过的某些因素影响下，这两种人群可以被转化为有机的或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我们可以将这些有机的群体作如下区分：

A．Heterogeneous crowds

1．异质性群体

1．Anonymous crowds (street crowds, for example).

（1）无名称的群体（例如：街上的人群）。

2．Crowds not anonymous crowds. (juries, parliamentary assemblies).

（2）有名称的群体（陪审团、议会等）。

B．Homogeneous crowds

2．同质性群体

1．Sects (political sects, religious sects).

（1）派别（政治派别、宗教派别等）。

2．Castes (the military caste, the priestly caste, the crowds, the working caste).

（2）身份（军衔、宗教圣职、工作职位等）。

3．Classes (the middle classes, the peasant classes).

（3）阶级（中产阶级、农民阶级等）。

We will point out briefly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crowds.

我们将会简要指出这些不同群体的特征。

1．Heterogeneous Crowds

1．异质性群体

It is these collectivities whose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studied in this volume. They are composed of individuals of any description, of any profession, and any degree of intelligence.

本书讨论的正是这些人群的特征。这些人群是由各种特点、各种职业、各种智力水平的人共同构成的。

We are now aware that by the mere fact that men form part of a crowd engaged in action, their collective psychology differs essentially from their 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their intelligence is affected by this differentiation. We have seen that intelligence is without influence in collectivities, they being solely under the sway of unconscious sentiments.

我们已经认识到，作为行动中的群体的成员，人们的集体心理与个人心理有着本质差别，而他们的智力水平也会受到这种差别的影响。我们已经发现，在集体中，智力往往受到无意识的情感的支配，发挥不了作用。

A fundamental factor, that of race, allows of a tolerably thorough differentiation of the various heterogeneous crowds.

一个基本的因素，也就是种族的因素，使得不同的异质性群体之间完全不同。

We have often referred already to the part played by race, and have shown it to be the most powerful of the factors capable of determining men's actions. Its action is also to be traced in the character of crowds. A crowd composed of individuals assembled at haphazard, but all of them Englishmen or Chinamen, will differ widely from another crowd also composed of individuals of any and every description, but of other races—Russians, Frenchmen, or Spaniards, for example.

我们已经多次提及种族这一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并且已经证实其为决定人们行动的最有力因素之一。其作用在群体的性格中也有迹可循。一个偶然形成的群体，假如都是英国人或中国人，那么该群体和另外一个成员有着不同特征、但属于同一个种族——例如俄罗斯人、法国人或西班牙人——的群体将截然不同。

The wide divergencies which their inherited mental constitution creates in men's modes of feeling and thinking at once come into prominence when, which rarely happens, circumstances gather together in the same crowd and in fairly equal proportions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y, and this occurs, however identical in appearance be the interests which provoked the gathering.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socialists to assemble in great congresse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orking-class population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always ended in the most pronounced discord. A Latin crowd, however revolutionary or however conservative it be supposed, will invariably appeal to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tate to realise its demands. It is always distinguished by a marked tendency towards centralisation and by a leaning, more or less pronounced, in favour of a dictatorship. An

English or an American crowd, on the contrary, sets no store on the State, and only appeals to private initiative. A French crowd lays particular weight on equality and an English crowd on liberty. These differences of race explain how it is that there are almost as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as there are nations.

当环境形成了一个群体，虽然这一情况很少发生，但假若其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比例相当，那么无论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利益看上去多么一致，他们继承来的心理因素在情感与思维方式上导致的巨大差异将会凸显出来。社会主义者竭力将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代表聚集到大型的集会中，但最终总以明显的分歧收尾。拉丁民族的群体，无论多么激进或保守，总是倾向于要求国家干预以满足其要求。该群体明显倾向于中央集权，并或明或暗地表现出对独裁的赞同。相反，英国或美国人构成的群体，对国家毫不指望，只寄希望于个人的主动精神。法国群体尤其重视平等，英国群体则重视自由。种族的差异就解释了为什么有多少个的国家就几乎有多少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和民主。

The genius of the race, then, exerts a paramount influence upon the dispositions of a crowd. It is the powerful underlying force that limits its changes of humour.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essential law that THE INFERIOR CHARACTERISTICS OF CROWDS ARE THE LESS ACCENTUATED IN PROPORTION AS THE SPIRIT OF THE RACE IS STRONG. The crowd state and the domination of crowds is equivalent to the barbarian state, or to a return to it. It is by the acquisition of a solidly constituted collective spirit that the race frees itself to a greater and greater extent from the unreflecting power of crowds, and emerges from the barbarian state. The only important classification to be made of heterogeneous crowds, apart

from that based on racial considerations, is to separate them into anonymous crowds, such as street crowds, and crowds not anonymous—deliberative assemblies and juries, for example. The sentiment of responsibility absent from crowds of the first description and developed in those of the second often gives a very different tendency to their respective acts.

因而，一个种族的精神对于一个群体的性情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才是限制一个群体性格变化的根本力量。由此，可以形成一条基本定律，那就是：种族精神的强大，使得次要的群体特征在相较之下显得不太重要。群体的状态以及统治力量，类似于野蛮人的状态，或者说类似于野蛮人状态的回归。当一个种族获得了稳定的集体精神之后，才会更大程度地将自身从缺乏思索的群体力量中解脱出来，摆脱野蛮状态。对于异质性群体来说，惟一重要的分类标准，除去种族，就是无名称的群体（例如街道上聚集的人群）以及有名称的群体（例如特意组织的议会和陪审团）。前者往往缺乏责任感，后者会形成责任感，这一区别将使两者的行动十分不同。

2．Homogeneous Crowds

2．同质性群体

Homogeneous crowds include: 1. Sects; 2. Castes; 3. Classes.

同质性群体包括：（1）派别；（2）身份；（3）阶级。

The SECT represents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organisation of homogeneous crowds. A sect includes individuals differing greatly as to their education, their professions, and the class of society to which they belong, and with their common beliefs as the connecting link. Examples in point ar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sects.

派别代表了同质性群体形成过程的第一步。一个派别包含着在教育程度、职业、社会阶级方面差异甚巨的个人，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信仰。相应的例子就是宗教派别和政治派别。

The CASTE represents the highest degree of organisation of which the crowd is susceptible. While the sect includes individuals of very different professions, degrees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surrounding, who are only linked together by the beliefs they hold in common, the caste is composed of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profession, and in consequence similarly educated and of much the same social status. Examples in point are the military and priestly castes.

身份代表了最易形成群体的层次。派别包含了在教育程度、职业、社会阶级方面差异甚巨的个人，并且将共同的信仰作为联系的惟一纽带；而身份却是由同一职业的个人构成的，因而成员所受教育和社会阶级也相似。相应的例子就是军衔和宗教圣职。

The CLASS is formed of individuals of diverse origin, linked together not by a community of beliefs, as are the members of a sect, or by common professional occupations, as are the members of a caste, but by certain interests and certain habits of life and

education almost identical.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agricultural class are examples.

阶级由不同来源的个人构成，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既不是像派别那样的共同信仰，也不是像身份那样的共同职业，而是相似的利益、生活习惯以及几乎相同的教育。相应的例子就是农民阶级。

Being only concerned in this work with heterogeneous crowds, and reserving the study of homogeneous crowds (sects, castes, and classes) for another volume, I shall not insist her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owds of this latter kind. I shall conclude this study of heterogeneous crowds by the examination of a few typical and distinct categories of crowds.

鉴于本书主要关注异质性群体，同时将在另一本书中对同质性群体（派别、身份、阶级）进行研究，我在此处将不会对后者的特征展开论述。在结束对异质性群体的研究时，我将仔细考察几种典型的特殊群体。

Chapter II Crowds Termed Criminal Crowds

第二章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Crowds termed criminal crowds—A crowd may be legally yet not psychologically criminal—The absolute unconsciousness of the acts of crowds—Various examples—Psychology of the authors of the September massacres—Their reasoning, their sensibility, their ferocity, and their morality.

提要：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一个群体可能犯法，但在心理上不属于犯罪／群体行动是完全无意识的／数个例证／九月大屠杀制造者们的心理／他们的逻辑、情感、残暴与道德。

Owing to the fact that crowds, after a period of excitement, enter upon a purely automatic and unconscious state, in which they are guided by suggestion, it seems difficult to qualify them in any case as criminal. I only retain this erroneous qualification because it has been definitely brought into vogue by recent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s. Certain acts of crowds are assuredly criminal, if considered merely in themselves, but criminal in that case in the same way as the act of a tiger devouring a Hindoo, after allowing its young to maul him for their amusement.

事实是，经历一段兴奋期后，群体会进入一种全然自动的无知觉状态，此时他们受暗示支配。因而，似乎很难就此将他们定义为犯罪群体。我之所以保留这一错误定义，只是因为这一定义因为近来的心理学研究而颇为盛行。当然，就其本身而言，群体的一些行为的确是犯罪行为，但在有些情况下，这样的犯罪行为，和一只老虎为了消遣而让幼虎撕扯一个印度人最后吞食入腹的行为，没有什么差别。

The usual motive of the crimes of crowds is a powerful suggestion, and the individuals who take part in such crimes are afterwards convinced that they have acted in obedience to duty, which is far from being the case with the ordinary criminal.

强大的暗示往往驱使了群体进行犯罪。而那些参与到犯罪行为中

的个人，事后总是坚信自己只是履行了职责。这一点和一般的犯罪行为截然不同。

The history of the crimes committed by crowds illustrates what precedes.

群体犯罪的历史说明了真相。

The murder of M. de Launay, the governor of the Bastille, may be cited as a typical example. After the taking of the fortress the governor, surrounded by a very excited crowd, was dealt blows from every direction. It was proposed to hang him, to cut off his head, to tie him to a horse's tail. While struggling, he accidently kicked one of those present. Some one proposed, and his suggestion was at once received with acclamation by the crowd, that the individual who had been kicked should cut the governor's throat.

巴士底狱监狱长德劳内先生的遇害事件，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堡垒被攻破后，这位监狱长被激动的人群所包围，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拳脚袭击。有人提议对他执行绞刑，有人提议砍头，有人提议将他拴在马尾巴上。当监狱长挣扎时，他不小心踢中了其中一人。于是有人建议让这位被踢中的人割断监狱长的喉咙。这一建议立刻被人群采纳。

> The individual in question, a cook out of work, whose chief reason for being at the Bastille was idle curiosity as to what was going on, esteems, that

since such is the general opinion, the action is patriotic and even believes he deserves a medal for having destroyed a monster. With a sword that is lent him he strikes the bared neck, but the weapon being somewhat blunt and not cutting, he takes from his pocket a small black-handled knife and (in his capacity of cook he would be experienced in cutting up meat) successfully effects the operation.

这个被踢中的人，其实是一位刚下班的厨子。他不过是因为好奇巴士底狱发生了什么事儿而闲逛过来看看的。但鉴于大家的普遍意见如此，他也就认为这一行动是爱国的，甚至觉得自己应当为诛杀了一个恶徒而受颁一枚奖章。他拿着别人借的剑去砍监狱长裸露的脖子，但剑似乎有些钝了，没能砍断。于是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黑柄的小刀（鉴于他是厨师，在切肉上应该是经验丰富），最后成功完成了使命。

The working of the process indicated above is clearly seen in this example. We have obedience to a suggestion, which is all the stronger because of its collective origin, and the murderer's conviction that he has committed a very meritorious act, a conviction the more natural seeing that he enjoys the unanimous approval of his fellow-citizens. An act of this kind may be considered crime legally but not psychologically.

上述的例子清楚地反映了之前指出的过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往往屈从于别人的暗示，而当这一暗示来自集体时，就显得更为强

大。杀人者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值得嘉奖的。当同胞对他的行为一致表示赞同时，他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可称之为犯罪，但在心理上不算犯罪。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criminal crowds are precisely the same as those we have met with in all crowds: openness to suggestion, credulity, mobility, the exaggeration of the sentiments good or bad, the manifestation of certain forms of morality.

犯罪群体的普遍特征和我们在所有群体身上看见的无甚不同：易受怂恿、轻信、善变、对好坏情绪的过度夸张、对某些道德品质的展现等等。

We shall find all these characteristics present in a crowd which has left behind it in French history the most sinister memories—the crowd which perpetrated the September massacres. In point of fact it offers much similarity with the crowd that committed the Saint Bartholomew massacres. I borrow the details from the narration of M. Taine, who took them from contemporary sources.

我们可以发现，在法国历史上留下最血腥记忆的群体，也就是制造了九月大屠杀的群体，他们身上就体现出以上的所有特点。事实上，这和制造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群体非常相似。根据当时的文献，伊波利特·丹纳做了详细的叙述，我借用了其中的一些细节。

It is not known exactly who gave the order or made the suggestion to empty the prisons by massacring the prisoners.

Whether it was Danton, as is probable, or another does not matter; the one interesting fact for us is the powerful suggestion received by the crowd charged with the massacre.

如今，究竟是谁下令或做出暗示屠杀所有囚犯以清空监狱，已不可考。究竟那个人是丹东还是其他人并不重要。我们在意的是屠杀的参与者们受到的强烈怂恿。

The crowd of murderers numbered some three hundred persons, and was a perfectly typical heterogeneous crowd.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very small number of professional scoundrels, it was composed in the main of shopkeepers and artisans of every trade: bootmakers, locksmiths, hairdressers, masons, clerks, messenge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uggestion received they are perfectly convinced, as was the cook referred to above, that they are accomplishing a patriotic duty. They fill a double office, being at once judge and executioner, but they do not for a moment regard themselves as criminals.

参与了谋杀的群体人数多达三百人，是典型的异质性群体。除去极小部分的职业无赖，人群主要是由各行各业的店主和工匠构成：鞋匠、锁匠、理发师、石匠、文书、邮差等等。正如之前的厨子那样，他们受到怂恿，坚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主义的使命。他们拥有了另一层身份，立刻就成了法官和行刑者，但他们从未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Deeply consciou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duty, they begin by forming a sort of tribunal, and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ct the

ingenuousness of crowds and their rudimentary conception of justice are seen immediately.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large number of the accused, it is decided that, to begin with, the nobles, priests, officers, and members of the king's household—in a word, all the individuals whose mere profession is proof of their guilt in the eyes of a good patriot—shall be slaughtered in a body, there being no need for a special decision in their case. The remainder shall be judged on their personal appearance and their reputation. In this way the rudimentary conscience of the crowd is satisfied. It will now be able to proceed legally with the massacre, and to give free scope to those instincts of ferocity whose genesis I have set forth elsewhere, they being instincts which collectivities always have it in them to develop to a high degree. These instincts, however—as is regularly the case in crowds—will not prevent the manifestation of other and contrary sentiments, such as a tenderheartedness often as extreme as the ferocity.

他们深信自己肩负重责，于是着手设立某种特别法庭。从这一行为，便可即刻洞悉群体的率直以及他们对正义的粗浅理解。鉴于被告人数众多，他们决定，一开始就将所有的贵族、神父、官员以及皇室成员全部杀死，无需单独审判，总之，在爱国者的眼中，这些人的职业就足以证明其有罪。其余人则根据他们的个人表现与声望进行判决。群体粗浅的正义感由此得到满足。现在，屠杀得以合法地进行，残忍的本能也得以尽情释放。我在别处已经提过这样的本能，它在集体中往往被发挥的更为彻底。但是，就像在群体中常见的情况那样，这样的本能并不会妨碍其他甚至是相反的情感的展露，例如，他们的善良往往和残暴一样极端。

“They have the expansive sympathy and prompt sensibility of the Parisian working man. At the Abbaye, one of the federates,

learning that the prisoners had been left without water for twenty-six hours, was bent on putting the gaoler to death, and would have done so but for the prayers of the prisoners themselves. When a prisoner is acquitted (by the improvised tribunal) every one, guards and slaughterers included, embraces him with transports of joy and applauds frantically," after which the wholesale massacre is recommenced. During its progress a pleasant gaiety never ceases to reign. There is dancing and singing around the corpses, and benches are arranged "for the ladies," delighted to witness the killing of aristocrats. The exhibition continues, moreover, of a special description of justice.

"他们身上有着巴黎工人高贵的同情心和情感。在修道院监狱，他们中有个人得知囚犯们已经26个小时没喝水了，便决意要将监狱看守处死。要不是囚犯们求情，监狱看守在劫难逃。当一名囚犯被（临时的特别法庭）赦免无罪时，所有人，包括守卫和刽子手，都会与他快乐地拥抱，疯狂鼓掌庆贺。"随后，大规模的屠杀继续进行。在这一过程中，愉快的情绪从未消散。人们就绕着尸体载歌载舞，还为女士们布置了长凳，以便她们观赏处死贵族这一乐事。这样的表演持续进行，带着特殊的正义气氛。

A slaughterer at the Abbaye having complained that the ladies placed at a little distance saw badly, and that only a few of those present had the pleasure of striking the aristocrats, the justice of the observation is admitted, and it is decided that the victims shall be made to pass slowly between two rows of slaughterers, who shall be under the obligation to strike with the back of the sword only so as to prolong the agony. At the prison de la Force the victims are stripped stark naked and literally "carved" for half an hour, after which, when every one has had a good view, they are finished off

by a blow that lays bare their entrails.

修道院监狱里的一位刽子手抱怨道，有一些女士坐得远了视野不好，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享受到殴打贵族的乐趣。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最终决定强迫受害者们在两行刽子手之间缓慢通行，以便刽子手们尽责地用刀背抽打他们以延长他们的痛苦。在福斯监狱，受害者们被扒得精光，受半小时的“凌迟”之刑，等所有人都能大饱眼福之后，再一刀将他们开膛破肚。

The slaughterers, too, have their scruples and exhibit that moral sense whose existence in crowds we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They refuse to appropriate the money and jewels of the victims, taking them to the table of the committees.

这些刽子手们也有自己的顾虑，也展现出了道德感，这一点我们已经指出过了。他们拒绝私藏受害者们的钱财和珠宝，将这些东西都送到了委员们的桌上。

Those rudimentary forms of reaso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mind of crowds, are always to be traced in all their acts. Thus, after the slaughter of the 1,200 or 1,500 enemies of the nation, some one makes the remark, and his suggestion is at once adopted, that the other prisons, those containing aged beggars, vagabonds, and young prisoners, hold in reality useless mouths, of which it would be well on that account to get rid. Besides, among them there should certainly be enemies of the people, a woman of the name of Delarue, for instance, the widow of a poisoner: “She must be furious at being in prison, if she could she would set fire to Paris: she must

have said so, she has said so. Another good riddance.” The demonstration appears convincing, and the prisoners are massacred without exception, included in the number being some fifty children of from twelve to seventeen years of age, who, of course, might themselves have become enemies of the nation, and of whom in consequence it was clearly well to be rid.

在他们的行为中，完全可以找到群体思维特征中那种粗浅的逻辑思考。因此，在屠杀了1200或1500个国家的敌人之后，有人认为其他一些关押着老乞丐、流浪汉和年轻囚犯的监狱实际上就是养着没用的人，应当将他们也一并清除，这一建议迅速得到采纳。此外，这些人中一定也有人民的敌人，例如一个叫德拉吕的女人。她是一个下毒者的妻子，“她一定对坐牢感到非常愤怒，只要有可能，她一定会纵火烧掉巴黎。她一定说过这话，她说过这话。总算除掉她了。”这样的陈述看似令人信服，囚犯们都被杀死，无人幸免。其中包括大约50个12至17岁的孩子，他们当然也有可能是人民的敌人，于是也被悉数杀死了。

At the end of a week's work, all these operations being brought to an end, the slaughterers can think of reposing themselves. Profoundly convinced that they have deserved well of their country, they went to the authorities and demanded a recompense. The most zealous went so far as to claim a medal.

一周的工作之后，所有的处决也将要结束，这些刽子手们终于能想想休息的事儿了。他们自豪地感到，自己对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于是到政府机构去要求得到酬谢。其中最为狂热的人甚至要求得到奖章。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e of 1871 affords several facts analogous to those which precede. Given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rowds and the successive capitulations before them of those in authority, we are destined to witness many others of a like nature.

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鉴于群体的影响日益增长，而政府的力量在他们面前节节败退，我们注定还将见证更多类似的事情发生。

Chapter III Criminal Juries

第三章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Criminal juries—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juries—statistics show that their decisions are independent of their composition—The manner in which an impression may be made on juries—The style and influence of argument—The methods of persuasion of celebrated counsel—The nature of those crimes for which juries are respectively indulgent or severe—The utility of the jury as an institution, and the danger that would result from its place being taken by magistrates.

提要：刑事案件的陪审团／陪审团的普遍特征／数据显示陪审团的决定与其构成无关／影响评审团印象的方式／辩论的形式与方法／说服关键人物的方法／令评审团纵容或严厉的罪行的本质／陪审团制度的益处以及由地方治安官代司其职的危险性。

Being unable to study here every category of jury, I shall only examine the most important—that of the juries of the Court of

Assize. These juries afford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the heterogeneous crowd that is not anonymous. We shall find them display suggestibility and but slight capacity for reasoning, while they are open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leaders of crowds, and they are guided in the main by unconscious sentiments. In the course of this investigation we shall have occasion to observe some interesting examples of the errors that may be made by persons not versed in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在此，我不可能研究每一种评审团，因而只考察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也就是法国的刑事法庭陪审团。这些陪审团就是典型的、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我们会发现，他们表现出易受暗示和缺乏推理能力的特点，同时，他们易受到群体领袖的意见影响，基本上任由无意识的情绪支配。在进行这一研究的时候，我们还将看到，一些取材于不懂群体心理的人所犯错误的有趣例子。

Juries, in the first place, furnish us a good example of the slight importance of the mental level of the different elements composing a crowd, so far as the decisions it comes to are concerned. We have seen that when a deliberative assembly is called upon to give its opinion on a question of a character not entirely technical, intelligence stands for nothing. For instance, a gathering of scientific men or of artists, owing to the mere fact that they form an assemblage, will not deliver judgments on general subjects sensibly different from those rendered by a gathering of masons or grocers. At various periods, and in particular previous to 1848, the French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d a careful choice among the persons summoned to form a jury, picking the jurors from among the enlightened classes; choosing professors, functionaries, men of letters. At the present day jurors are recruited for the most part

from among small tradesmen, petty capitalists, and employes. Yet, to the great astonishment of specialist writers, whatever the composition of the jury has been, its decisions have been identical. Even the magistrates, hostile as they are to the institution of the jury, have had to recognise the exactness of the assertion. M. Berard des Glajeux, a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ourt of Assizes, expresses himself on the subject in his “Memoirs” in the following terms:—

首先，陪审团向我们证明，无论组成群体的成员们的智力水平如何层次不齐，对其所做决定影响不大。我们已经见过这样的情况：当要求一个审议会就某个并非完全技术性的问题发表意见时，智力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例如，一群科学家或艺术家聚集在一起时，他们针对一般性问题所做的判断和一群石匠或杂货商所做的判断也无甚区别。在不同的时期，尤其是在1848年之前，法国政府总是精心挑选陪审团的成员，从开明有识的阶层选取陪审员，也就是选择教授、公职人员和学者等。如今，陪审员们大多是小商贩、小资本家和雇员等。但是，令该领域的研究者们大吃一惊的是，无论陪审团的组成如何，其所做的决定是相同的。即便是对陪审团制度充满敌意的地方治安官们，也不得不承认陪审团所作判决的准确性。贝拉尔·德·格拉热先生是刑事法庭的前任庭长，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下面这番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 The selection of jurymen is to-day in reality in the hands of the municipal councillors, who put people down on the list or eliminate them from 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tical and electoral preoccupations inherent in their situation. The majority of the jurors chosen are persons engaged in trade, but persons of less importance than formerly, and employes belonging to certain

branches of the administration. Both opinions and professions counting for nothing once the role of judge assumed, many of the jurymen having the ardour of neophytes, and men of the best intentions being similarly disposed in humble situations, the spirit of the jury has not changed: ITS VERDICTS HAVE REMAINED THE SAME.

“事实上，如今选择陪审员的权力在市议员们的手上。他们以自身的政治和选举需要为先决条件，选择将人们列入名单或从名单上去掉。被选中的大多数陪审员都是商人，但他们的重要性要大不如前。还有就是某些政府部门的雇员们。一旦扮演起法官的角色，他们的意见和职业就不再重要。很多陪审员充满新手的热情，有着做好事的意愿，他们都被同样地置于谦恭的处境之下，陪审团的精神不曾改变：它的判决依旧如故。”

Of the passage just cited the conclusions, which are just, are to be borne in mind and not the explanations, which are weak. Too much astonishment should not be felt at this weakness, for, as a rule, counsel equally with magistrates seem to be ignorant of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and, in consequence, of juries. I find a proof of this statement in a fact related by the author just quoted. He remarks that Lachaud, one of the most illustrious barristers practising in the Court of Assize, made systematic use of his right to object to a juror in the case of all individuals of intelligence on the list. Yet experience—and experience alone—has ended by acquainting us with the utter uselessness of these objections. This is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at the present day public prosecutors and

barristers, at any rate those belonging to the Parisian bar, have entirely renounced their right to object to a juror; still, as M. des Glajeux remarks, the verdicts have not changed, “they are neither better nor worse.”

对于这段话，我们应当记住的是其正确的结论而非苍白无力的解释。对于这种苍白无力，我们不应该太过震惊，毕竟通常情况下，辩护律师和地方治安官一样，对于群体心理毫无了解，因而也对陪审团毫无了解。对于这一结论，我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恰好与我刚引用的这位作者有关。他注意到，刑事法庭最为知名的辩护律师之一，拉绍先生，非常善于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反对任何一位聪明人出现在陪审团名单中。但是经验本身就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反对是毫无用处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说明：如今所有的原告律师和出庭律师以及所有被关押在巴黎监狱的犯人们，都已经完全放弃了反对某位陪审员的权利，因为，正如格拉热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判决依然如故，“它们既没变好，也没变糟。”

Like all crowds, juries are very strongly impressed by sentimental considerations, and very slightly by argument. “They cannot resist the sight,” writes a barrister, “of a mother giving its child the breast, or of orphans.” “It is sufficient that a woman should be of agreeable appearance,” says M. des Glajeux, “to win the benevolence of the jury.”

正如所有的群体那样，陪审团极易受到情感的动摇，却很难被论证打动。一位出庭律师写道：“他们无法抗拒母亲为自己的孩子或者孤儿喂奶的感人画面。”格拉热先生则说：“一位妇女只要表现出楚楚可怜的样子，就足以令陪审团大发慈悲。”

Without pity for crimes of which it appears possible they might themselves be the victims—such crimes, moreover, are the most dangerous for society—juries, on the contrary, are very indulgent in the case of breaches of the law whose motive is passion. They are rarely severe on infanticide by girl-mothers, or hard on the young woman who throws vitriol at the man who has seduced and deserted her, for the reason that they feel instinctively that society runs but slight danger from such crimes,[1] and that in a country in which the law does not protect deserted girls the crime of the girl who avenges herself is rather useful than harmful, inasmuch as it frightens future seducers in advance.

陪审团对于那些自己可能成为其受害者的罪行最为严厉，当然，这罪行也是对社会危害最大的。相反，对于因情感因素而触犯法律的情况，他们往往非常宽容。对未婚妈妈的杀婴罪、年轻女孩将硫酸泼到始乱终弃的负心汉身上之类的罪行，他们很少表现得非常严厉。因为他们直觉地意识到这样的罪行对社会危害不大[1]，并且鉴于这个国家对于被抛弃的女孩不加保护，女孩们为自己复仇有益无害，因为这能事先警示未来的诱奸者。

1: It is to be remarked, in passing, that this division of crimes into those dangerous and those not dangerous for society, which is well and instinctively made by juries is far from being unjust. The object of criminal laws is evidently to protect society against dangerous criminals and not to avenge it. On the other hand, the French code, and above all the minds of the French magistrates, are still deeply imbued with the spirit of vengeance

characteristic of the old primitive law, and the term "vindicte"(prosecution, from the Latin vindicta, vengeance) is still in daily use. A proof of this tendency on the part of the magistrates is found in the refusal by many of them to apply Berenger's law, which allows of a condemned person not undergoing his sentence unless he repeats his crime. Yet no magistrate can be ignorant, for the fact is proved by statistic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a punishment inflic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fallibly leads to further crime on the part of the person punished. When judges set free a sentenced person it always seems to them that society has not been avenged. Rather than not avenge it they prefer to create a dangerous, confirmed criminal.

1: 顺便一提，陪审团往往依照直觉，将犯罪行为分两种类型，即为对社会危险与否，而我要说的是这远远不会有失公正。刑法的目的显然是保护社会免受危险犯罪分子的危害，而非向社会复仇。另一方面，法国的法典，尤其是法国的地方治安官们的思维，仍然深受原始法律中复仇精神的影响，而“vindicte”一词（意为“检举”，词源为拉丁语“vindicta”，意为“复仇”）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在治安官方面，该趋势的证据之一，就是许多治安官拒绝应用贝朗热法律，因为除非罪犯再次犯罪，否则该法律允许其不受判罚。但是治安官们都知道，有数据证明，首次受罚之后的罪犯会不可避免地犯下更大的罪行。当法官们将犯人释放时，这些治安官们总觉得似乎并没

有为社会报仇。比起不为社会报仇，这些治安官们更倾向于创造“确证为危险的犯罪分子”。

Juries, like all crowds, are profoundly impressed by prestige, and President des Glajeux very properly remarks that, very democratic as juries are in their composition, they are very aristocratic in their likes and dislikes: “Name, birth, great wealth, celebrity, the assistance of an illustrious counsel, everything in the nature of distinction or that lends brilliancy to the accused, stands him in extremely good stead.”

陪审团就像所有的群体一样，深受名望影响。前庭长德·格拉热对此有非常准确的认识：尽管陪审团的构成非常民主，他们在好恶方面却显得非常贵族化，“姓名，出身、财富、名望或获得一位知名律师的帮助，所有与众不同的事或能给被告增光的事，都能使其处于有利处境。”

The chief concern of a good counsel should be to work upon the feelings of the jury, and, as with all crowds, to argue but little, or only to employ rudimentary modes of reasoning. An English barrister, famous for his successes in the assize courts, has well set forth the line of action to be followed:—

一位出色律师重中之重的任务，应当是打动陪审团的情感，就像与所有群体相处那样，少做论证或仅进行最初级的逻辑推论。一位在刑事法庭上胜诉而名声大噪的英国大律师，确立了正确的行动守则：

> While pleading he would attentively observe the jury. The most favourable opportunity has been reached. By dint of insight and experience the counsel reads the effect of each phrase on the faces of the jurymen, and draws his conclusions in consequence. His first step is to be sure which members of the jury are already favourable to his cause. It is short work to definitely gain their adhesion, and having done so he turns his attention to the members who seem, on the contrary, ill-disposed, and endeavours to discover why they are hostile to the accused. This is the delicate part of his task, for there may be an infinity of reasons for condemning a man, apart from the sentiment of justice.

> “当他进行辩护时，应当仔细观察陪审团。最有利的机会到来了。律师要凭借其洞察力和经验来观察自己的每句话在陪审员们脸上产生的效果，并据此得出相应结论。他的第一步就是确认陪审团的哪些成员已经被他的理由打动。要获取这些人的支持并非难事，在实现目标之后，他就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似乎不太赞同的陪审员身上，努力去了解是什么使他们对被告充满敌意。这就是他工作的微妙之处，因为除了正义感之外，还能有无数的理由来谴责一个人。”

These few lines resume the entire mechanism of the art of oratory, and we see why the speech prepared in advance has so slight an effect, it being necessary to be able to modify the terms employed from moment to mo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pression produced.

这几句话就揭示了演讲术的奥妙。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事先准备好的演讲收效甚微，因为演讲者需要不时地依照语言产生的效果来调整自己的措辞。

The orator does not require to convert to his views all the members of a jury, but only the leading spirits among it who will determine the general opinion. As in all crowds, so in juries there are a small number of individuals who serve as guides to the rest. “I have found by experience,” says the counsel cited above, “that one or two energetic men suffice to carry the rest of the jury with them.” It is those two or three whom it is necessary to convince by skilful suggestions. First of all, and above all, it is necessary to please them. The man forming part of a crowd whom one has succeeded in pleasing is on the point of being convinced, and is quite disposed to accept as excellent any arguments that may be offered him. I detach the following anecdote from an interesting account of M. Lachaud, alluded to above:—

演讲者不需要说服陪审团的所有成员都认同他的观点，需要争取的其实是能够影响普遍观点的少数领袖人物。和所有群体一样，在评审团中也有一小部分的个人扮演着领导其他人的角色。前面提过的这位律师说道：“我通过经验发现，一两个积极的人就足以使陪审团的其他人被带着走了。”律师需要通过有技巧的暗示来说服的，正是这两三个人。首先，最为重要的就是，必须取悦他们。当群体中的一个人被取悦之后，他处于将被说服的状态，这时候无论向他提出什么论证，他可能都会十分信服。从有关拉绍先生的描述中，我选取了一段与上述内容有关的奇闻轶事：

It is well known that during all the speeches he would deliver in the course of an assize sessions, Lachaud never lost sight of the two or three jurymen whom he knew or felt to be influential but obstinate. As a rule he was successful in winning over these refractory jurors. On one occasion, however, in the provinces, he had to deal with a juryman whom he plied in vain for three-quarters of an hour with his most cunning arguments; the man was the seventh juryman, the first on the second bench. The case was desperate. Suddenly, in the middle of a passionate demonstration, Lachaud stopped short, and address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rt said: “Would you give instructions for the curtain there in front to be drawn? The seventh juryman is blinded by the sun.” The juryman in question reddened, smiled, and expressed his thanks. He was won over for the defence.

“众所周知，在法庭审判过程的所有演讲中，拉绍都紧紧盯着陪审团中两三个他知道或感到极具影响力却相当固执的陪审员。通常情况下，他能成功赢得这些执拗的陪审员的赞同。但是，有一次在外省的庭审上，他不得不对付一位陪审员。以最为狡猾的论证，他花了45分钟试图说服此人，却徒劳无功。那个人是第七评审员，坐在第二排的第一个位置。场面令人绝望。突然，拉绍在激烈的论证过程中停了一会，并对庭长先生说：‘你能否下令将前面的窗帘放下来？第七评审员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了。’这位陪审员脸红了，随后微笑并表达了感谢之情。他就此被

争取到了辩护一方。”

Many writers, some of them most distinguished, have started of late a strong campaign against the institution of the jury, although it is the only protection we have against the errors, really very frequent, of a caste that is under no control.[2] A portion of these writers advocate a jury recruited solely from the ranks of the enlightened classes; but we have already proved that even in this case the verdicts would be identical with those returned under the present system. Other writers, taking their stand on the errors committed by juries, would abolish the jury and replace it by judges.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these would-be reformers can forget that the errors for which the jury is blamed were committ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judges, and that when the accused person comes before a jury he has already been held to be guilty by several magistrates, by the juge d'instruction, the public prosecutor, and the Court of Arraignment. It should thus be clear that were the accused to be definitely judged by magistrates instead of by jurymen, he would lose his only chance of being admitted innocent. The errors of juries have always been first of all the errors of magistrates. It is solely the magistrates, then, who should be blamed when particularly monstrous judicial errors crop up, such, for instance, as the quite recent condemnation of Dr. L—who, prosecuted by a juge d'instruction, of excessive stupidity, on the strength of the denunciation of a half-idiot girl, who accused the doctor of having performed an illegal operation upon her for thirty francs, would have been sent to penal servitude but for an explosion of public indignation, which had for result that he was immediately set at liberty by the Chief of the State. The honourable character given the condemned man by all his fellow-citizens made the grossness of the blunder self-evident. The magistrates themselves admitted it, and

yet out of caste considerations they did all they could to prevent the pardon being signed. In all similar affairs the jury, confronted with technical details it is unable to understand, naturally hearkens to the public prosecutor, arguing that, after all, the affair has been investigated by magistrates trained to unravel the most intricate situations. Who, then, are the real authors of the error—the jurymen or the magistrates? We should cling vigorously to the jury. It constitutes, perhaps, the only category of crowd that cannot be replaced by any individuality. It alone can temper the severity of the law, which, equal for all, ought in principle to be blind and to take no cognisance of particular cases. Inaccessible to pity, and heeding nothing but the text of the law, the judge in his professional severity would visit with the same penalty the burglar guilty of murder and the wretched girl whom poverty and her abandonment by her seducer have driven to infanticide. The jury, on the other hand, instinctively feels that the seduced girl is much less guilty than the seducer, who, however, is not touched by the law, and that she deserves every indulgence.

近来，为了反对陪审团制度，许多作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其中不乏一些最为出众的作家。法官们大权在握，却时常犯错，而陪审团制度是保护我们免受其害的惟一制度[2]。一部分的作家倡导所有的陪审团成员均应来自有教养的阶层；但是我们已经证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所做的判决与现行制度下的依然别无二致。其他作家则以陪审团们所承认的错误为据，要求废除陪审团，用法官来代替。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自以为是的改革家们怎么会忘记，他们认为是陪审团所犯的那些错，首先是法官犯的错。而当被告被带到陪审团面前时，就意味着他之前就已经被几个地方治安官、督查官、公诉人和初审法庭判定有罪了。因而，我们必须清楚，如果被告是否有罪完全由地方治安官而非陪审团决定的话，被告将失去他惟一一次被判无罪的机会。陪审团所犯的错，首先必定是地方治安官所犯的错。

因而，当出现了特别严重的司法错误时，首先应当受谴责的就是地方治安官。例如，一位半痴呆的女孩控诉L医生收取了30法郎为她做了非法手术，一位愚蠢透顶的督查官据此对L医生提起诉讼。若不是民怨沸腾，最终使得最高法院院长当即判他无罪，这位医生必定会被判服苦役。这位被指控的医生，自身的可敬品质为同胞所知，因而这一错误不言自明。这些地方治安官也承认犯了错，但为了维护身份，他们依然竭力阻挠发出赦免令。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当陪审团遇到自己无法理解的技术性细节时，自然会选择倾听公诉人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在解决错综复杂的案件方面训练有素的地方治安官们已经对事件进行了调查。那么，究竟谁是错误的制造者呢？陪审员们还是地方治安官？我们应当大力支持陪审团。因为陪审团是惟一一个无法由任何个人替代的群体。陪审团能够中和法律的严厉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原则上应当一视同仁，不承认任何特殊情况。法官们没有怜悯之心，除了法律条文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出于职业的严厉性，法官们认为一个犯了谋杀罪的乞丐和一个被负心汉抛弃并且贫困潦倒不得不犯下杀婴罪的不幸少女应当受到同样的惩罚。另一方面，陪审团会本能地认为，比起诱奸者，这个被诱奸的女孩罪行要小得多，却没得到法律的垂怜，因而理当对她更为宽容。

2: The magistracy is, in point of fact, the only administration whose acts are under no control. In spite of all its revolutions, democratic France does not possess that right of habeas corpus of which England is so proud. We have banished all the tyrants, but have set up a magistrate in each city who disposes at will of the honour and liberty of the citizens. An insignificant juge d'instruction (an examining magistrate who has no exact counterpart in England.—Trans.), fresh from the university, possesses the revolting power of sending to prison

at will persons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standing, on a simple supposition on his part of their guilt, and without being obliged to justify his act to any one. Under the pretext of pursuing his investigation he can keep these persons in prison for six months or even a year, and free them at last without owing them either an indemnity or excuses. The warrant in France is the exact equivalent of the lettre de cachet, with this difference, that the latter, with the use of which the monarchy was so justly reproached, could only be resorted to by persons occupying a very high position, while the warrant is an instrument in the hands of a whole class of citizens which is far from passing for being very enlightened or very independent.

2: 实际上，惟一行动不受约束的行政职位就是地方法官。尽管法国作为民主国家大有进步，但是它至今仍不具有英国引以为傲的人身保护权利。我们已经处决了所有的暴君，但却在每一个城市中设立一位地方治安官，而此人可以任意处置市民的荣誉与自由。一个无关紧要的督察官（负责审查的法官，在英国没有对应的职位——译者注），刚从大学毕业，却拥有随意将最为显赫的人物送进监狱的巨大权力，他可以仅仅依据自己的臆测认定对方有罪，甚至不需向他人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出于进行调查这一借口，他可以让这些大人物在监狱里待上半年甚至一年，最后释放他们时也不需要向他们进行解释或补偿。在法国，司法许可证就等同于国王赦令，区别在于后者的使用

往往使君主备受诟病，并且只有身处高位者可以采取这一手段；而司法许可证却是掌握在一个公民阶层里所有人手里的工具，这些人远算不上开明或独立。

Being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psychology of castes, and also with the psychology of other categories of crowds, I do not perceive a single case in which, wrongly accused of a crime, I should not prefer to have to deal with a jury rather than with magistrates. I should have some chance that my innocence would be recognised by the former and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at it would be admitted by the latter. The power of crowds is to be dreaded, but the power of certain castes is to be dreaded yet more. Crowds are open to conviction; castes never are.

在熟知身份心理和其他类型的群体心理之后，假如遇到被诬告的情况，我一定更倾向于和陪审团而非地方治安官打交道。在前者那里，我应该还有机会证明清白，而后者承认错误的机会却极其渺茫。群体的力量令人生畏，而某些身份团体的力量却更令人生畏。群体乐于接受不同意见，身份团体却绝不可能。

Chapter IV Electoral Crowds

第四章　选民群体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oral crowds—The manner of persuading them—The qualities that should be possessed by a candidate—Necessity of prestige—Why working men and peasants so rarely choose candidates from their own class—The influence of words and formulas on the elector—The general aspect of election oratory—How

the opinions of the elector are formed—The power of political committees—They represent the most redoubtable form of tyranny—The committees of the Revolution—Universal suffrage cannot be replaced in spite of its slight psychological value—Why it is that the votes recorded would remain the same even if the right of voting were restricted to a limited class of citizens—What universal suffrage expresses in all countries.

提要：选民群体的普遍特征／说服选民的方式／候选人应具有的品质／名望的必要性／为何工人与农民甚少选举自己的同胞为候选人／措辞和套话对选民的影响／竞选演说的一般特点／选民的意见如何形成／政治委员会的权力／政治委员会就是最令人畏惧的暴政形式／大革命时期的委员会／普选制虽然在心理学上意义有限，但绝不能被取代／为何即便只有某些阶层能享有选举权，选举结果仍然相同／普选制在所有国家代表什么。

Electoral crowds—that is to say, collectivities invested with the power of electing the holders of certain functions—constitute heterogeneous crowds, but as their action is confined to a single clearly determined matter, namely, to choosing between different candidates, they present only a f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previously described. Of the characteristics peculiar to crowds, they display in particular but slight aptitude for reasoning, the absence of the critical spirit, irritability, credulity, and simplicity. In their decision, moreover, is to be traced the influence of the leaders of crowds and the part played by the factors we have enumerated: affirmation, repetition, prestige, and contagion.

选民群体，也就是有权选择将某些权力赋予给谁的集体，属于异

质性群体，但鉴于他们的行动是清楚规定好的同一件事，也就是在不同的候选人间做出选择，他们只会表现出前面提及的部分特点。在群体的特征中，他们着重表现出了推理能力的欠缺、批判精神的不足以及易怒、轻信和头脑简单等特点。此外，在他们所做的决定中，可以明显看出群体中领导人物的影响和我们之前列举过的断言、重复、名望和传染等因素所产生的作用。

Let us examine by what methods electoral crowds are to be persuaded. It will be easy to deduce their psychology from the methods that are most successful.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说服选民群体的方式。从那些最为成功的方法中，我们可以轻易地推断出选民群体的心理。

It is of primary importance that the candidate should possess prestige. Personal prestige can only be replaced by that resulting from wealth. Talent and even genius are not elements of success of serious importance.

最重要的是，候选人要德高望重。只有财富才能取代个人名望的重要影响。才干乃至出众天赋都不是成功的必要因素。

Of capital importance,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necessity for the candidate of possessing prestige, of being able, that is, to force himself upon the electorate without discussion. The reason why the electors, of whom a majority are working men or peasants, so rarely choose a man from their own ranks to represent them is that such a

person enjoys no prestige among them. When, by chance, they do elect a man who is their equal, it is as a rule for subsidiary reasons—for instance, to spite an eminent man, or an influential employer of labour on whom the elector is in daily dependence, and whose master he has the illusion he becomes in this way for a moment.

另一方面，极为重要的是，那些拥有名望和才能的候选者必须能够使选民不加讨论就支持自己。选民大多是工人或农民，他们往往不选择自己群体中的一员，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在他们之间往往无甚名望。而当他们偶然选择与自己相同的人时，通常是为了一些次要的原因。例如，为了刁难一位极富声望的人或者极具影响力的雇主，而平常选民往往要依靠这些人生活，或是因为他们借此产生了幻觉，认为自己成了这些人的主宰。

The possession of prestige does not suffice, however, to assure the success of a candidate. The elector stickles in particular for the flattery of his greed and vanity. He must be overwhelmed with the most extravagant blandishments, and there must be no hesitation in making him the most fantastic promises. If he is a working man it is impossible to go too far in insulting and stigmatising employers of labour. As for the rival candidate, an effort must be made to destroy his chance by establishing by dint of affirmation, repetition, and contagion that he is an arrant scoundrel, and that it is a matter of common knowledge that he has been guilty of several crimes. It is, of course, useless to trouble about any semblance of proof. Should the adversary be ill-acquainted with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he will try to justify himself by arguments instead of confining himself to replying to one set of affirmations by another; and he will have no chance whatever of being successful.

但是，拥有名望还不足以确保一位候选人获胜。选民更想看到他表现出自己的贪婪与虚荣。他必须对选民极尽奉承，要毫不犹豫地做出最为华丽的承诺。而假如候选者是个工人，那么他无论如何指责或侮辱自己的雇主都不算过分。而面对竞争对手时，必须要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来让人确信对方是个臭名昭著的无赖，还犯下过不少人尽皆知的罪行，以此扼杀对方的机会。当然，为搜集证据而劳心劳力是没用的。而对手如果不知晓群体心理，就会努力地通过论证为自己平反，而非通过断言来对付断言，这样一来，他就失去了一切能赢的机会。

The candidate's written programme should not be too categorical, since later on his adversaries might bring it up against him; in his verbal programme, however, there cannot be too much exagger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reforms may be fearlessly promised. At the moment they are made these exaggerations produce a great effect, and they are not binding for the future, it being a matter of constant observation that the elector never troubles himself to know how far the candidate he has returned has followed out the electoral programme he applauded, and in virtue of which the election was supposed to have been secured.

候选人的书面纲领不要做得太过绝对，因为对手之后或许会借此对付你；但在口头表达时，再夸张也无所谓。甚至可以勇敢地做出关于最重要的变革的承诺。做出承诺的当下，这种夸张会产生极大的作用，也不会在未来产生任何约束力，因为通过不断观察，我们发现选民并不关心候选人之后是否实现了他参选时提出的纲领，尽管选民当时正是因为这份纲领而认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In what precedes, all the factors of persuasion which we have

described are to be recognised. We shall come across them again in the action exerted by words and formulas, whose magical sway we have already insisted upon. An orator who knows how to make use of these means of persuasion can do what he will with a crowd. Expressions such as infamous capital, vile exploiters, the admirable working man, the socialisation of wealth, always produce the same effect, although already somewhat worn by use. But the candidate who hits on a new formula as devoid as possible of precise meaning, and apt in consequence to flatter the most varied aspirations, infallibly obtains a success. The sanguinary Spanish revolution of 1873 was brought about by one of these magical phrases of complex meaning on which everybody can put his own interpretation. A contemporary writer has described the launching of this phrase in terms that deserve to be quoted:—

在以上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所描述过的所有说服因素。在措辞和套话所发挥的作用中，我们还会再次看到这些因素，对它们奇妙的影响力，我们已经有所讨论。一个通晓如何运用这些说服手段的演讲者，可以做到他想让群体做的一切事情。不义之财、残忍的剥削者、可敬的工人、财富的社会主义化等说法，尽管已经有些陈旧，却总能产生相同的效果。但是，假如候选人能够运用意义模糊的新语言，以便迎合更多的人各不相同的意愿，那他无疑会取得成功。1873年血腥的西班牙革命，正是由这样的说法挑起，它意义复杂，因而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解读。一位当代作家曾描述了这种说法的出现，在这里值得一引：

> The radicals have made the discovery that a centralised republic is a monarchy in disguise, and to humour them the Cortes had unanimously proclaimed a FEDERAL REPUBLIC, though none of

the voters could have explained what it was he had just voted for. This formula, however, delighted everybody; the joy was intoxicating, delirious. The reign of virtue and happiness had just been inaugurated on earth. A republican whose opponent refused him the title of federalist considered himself to be mortally insulted. People addressed each other in the streets with the words: "Long live the federal republic!" After which the praises were sung of the mystic virtue of the absence of discipline in the army, and of the autonomy of the soldiers. What was understood by the "federal republic?" There were those who took it to mean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vinces, institutions akin to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sation; others had in view the abolition of all authority and the speedy commencement of the great social liquidation. The socialists of Barcelona and Andalusia stood out for the absolute sovereignty of the communes; they proposed to endow Spain with ten thousand independent municipalities, to legislate on their own account, and their creation to be accompanied by the suppression of the police and the army.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the insurrection was soon seen to spread from town to town and village to village. Directly a village had made its pronunciamento its first care was to destroy the telegraph wires and the railway lines so as to cut off all communication with its neighbours and Madrid. The sorriest hamlet was determined to stand on its own bottom. Federation had given

place to cantonalism, marked by massacres, incendiarism, and every description of brutality, and bloody saturnalia were celebrated throughout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e land.

“激进分子们发现中央集权制的共和国不过是伪装下的君主制，为迎合他们，西班牙议会一致通过宣布建立一个‘联邦制共和国’，虽然投了赞成票，但是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赞成了什么。但是这样的语言却能取悦每个人，这种愉悦感令人沉迷、欣喜若狂。从此美德与幸福统治了地球。假如对手拒绝授予一位共和主义者联邦主义者的称号，他就感到自己受到了致命侮辱。人们在街上彼此问候，‘联邦共和国万岁！’然后就为军队松散无纪律这样无理的美德和士兵的自治而大唱赞歌。他们对‘联邦共和国’是怎么理解的？有些人认为这意味着各省的解放，即采用类似美国和地方分权制的行政制度；其他人认为这意味着废除所有权威并迅速开展伟大的社会整肃。巴塞罗那和安达卢西亚的社会主义者们要求实现公社权力至上；他们提议将西班牙分为一万个独立的市，按照各自情况独立立法，同时禁止警察和军队存在。而在南部各省，暴动在各城镇村庄间迅速蔓延。一个村庄直接发布声明，宣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电报线和铁路，以此切断与邻近村庄和马德里的所有联系。即便处境最糟的村庄，也决心独立自主。联邦制成了州郡行政制，杀人放火等种种野蛮兽行肆虐，整片大陆陷入血腥的纵情狂欢。”

With respect to the influence that may be exerted by reasoning on the minds of electors, to harbour the least doubt on this subject

can only be the result of never having read the reports of an electioneering meeting. In such a gathering affirmations, invectives, and sometimes blows are exchanged, but never arguments. Should silence be established for a moment it is because some one present, having the reputation of a “tough customer,” has announced that he is about to heckle the candidate by putting him one of those embarrassing questions which are always the joy of the audience. The satisfaction, however,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shortlived, for the voice of the questioner is soon drowned in the uproar made by his adversaries. The following reports of public meetings, chosen from hundreds of similar examples, and taken from the daily papers, may be considered as typical:—

至于理性对选民的想法可能产生什么影响，要想对此不存疑心，最好别读那些关于竞选集会的报道。在那些集会上，人们可能会交换自己的断言、咒骂甚至拳脚相对，但绝不可能会有观点的碰撞。要是有了片刻的沉默，那一定是有“难对付”之称的一些人登场了。他宣称自己要提出令候选者尴尬的问题来难倒对方，而这往往是观众们喜闻乐见的。但是，这种反对派的满足感是短暂的，因为提问者的声音很快就被对手的抗议所淹没。而以下关于公众集会的报道可以作为这种事例的典型，它是从许多类似的例子中选取的，就来自我们每天读的报纸：

> One of the organisers of the meeting having asked the assembly to elect a president, the storm bursts. The anarchists leap on to the platform to take the committee table by storm. The socialists make an energetic defence; blows are exchanged, and each party accuses the other of being spies in the pay of the Government… A citizen leaves the

hall with a black eye.

“大会组织者中的一员要求大会选出一个主席，随后场面大乱。无政府主义者跳上台，怒而占据了组委会的桌子。社会主义者作出严正抗议。人们扭打在一起，每一派都指责对方是受雇于政府的间谍等等。一个市民眼睛被打肿了，离开了会场。

The committee is at length installed as best it may be in the midst of the tumult, and the right to speak devolves upon “Comrade” X.

最终大会陷入一片骚乱，说话的权力被交给了‘X同志’。

The orator starts a vigorous attack on the socialists, who interrupt him with shouts of “Idiot, scoundrel, blackguard!“, epithets to which Comrade X. replies by setting forth a theory according to which the socialists are “idiots” or “jokers.”

这位演讲者对社会主义者大加抨击，后者不断以‘蠢货、无赖、恶棍！’的吼叫声打断他的话。而作为回敬，X同志则根据这些贬义词提出理论，指责社会主义者都是‘蠢货’或‘小丑’。

The Allemanist party had organised yesterday evening, in the Hall of Commerce, in the Rue du Faubourg-du-Temple, a great meeting, preliminary to the workers' fete of the 1st of May. The watchword of the meeting was “Calm and Tranquillity!”

昨晚，在圣殿郊街区的商会大厅，阿勒曼派为五一劳动节的盛宴预演组织了一场大会。大会的口号就是‘沉着冷静！’

Comrade G—alludes to the socialists as “idiots” and “humbugs.”

G同志影射社会主义者是‘蠢货’和‘骗子’。

At these words there is an exchange of invectives and orators and audience come to blows. Chairs, tables, and benches are converted into weapons.

这些话一出，场上迅速充斥着各色咒骂。演讲者和观众大打出手。桌椅都成了武器。”

It is not to be imagined for a moment that this description of discussion is peculiar to a determined class of electors and

dependent on their social position. In every anonymous assembly whatever, though it be composed exclusively of highly educated persons, discussion always assumes the same shape. I have shown that when men are collected in a crowd there is a tendency towards their mental levelling at work, and proof of this is to be found at every turn. Take,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extract from a report of a meeting composed exclusively of students, which I borrow from the Temps of 13th of February, 1895:—

千万不要以为上述的情况只会在某个阶层的选民身上发生，或者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关。在任何无名称的集会上，即便其参与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争论的场面也大致如是。我已经阐述过，聚集成人群时，人们有一种智商水平普遍下降的趋势，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对这种趋势的证明。例如，以下报道来自1895年2月13日的《时报》，是从一场学生集会的报道中摘录下来的：

> The tumult only increased as the evening went on; I do not believe that a single orator succeeded in uttering two sentences without being interrupted. At every instant there came shouts from this or that direction or from every direction at once. Applause was intermingled with hissing, violent discussions were in progress between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sticks were brandished threateningly, others beat a tattoo on the floor, and the interrupters were greeted with yells of “Put him out!” or “Let him speak!”

> “随着夜色渐深，骚乱更甚；我觉得好像没有任

何一个演讲者能说上两句话而不被人打断的。每时每刻都有来自这个或那个方向的喊叫声响起，要么就是从四面八方同时爆发。掌声中夹杂着嘘声，观众中的个别人员也在进行激烈的争论。人们将棍子挥舞得叫人心惊，还有人不断击打地面。那些打断演讲的人迎来了‘把他赶出去！’或‘让他说！’的吼声。

M. C—lavished such epithets as odious and cowardly, monstrous, vile, venal and vindictive, on the Association, which he declared he wanted to destroy.

C先生不断用丑恶、懦弱、极端错误、令人作呕、贪污腐败、充满恶意等词语评价该协会，并声称自己要摧毁它等等。”

How, it may be asked, can an elector form an opinion under such conditions? To put such a question is to harbour a strange delusion as to the measure of liberty that may be enjoyed by a collectivity. Crowds have opinions that have been imposed upon them, but they never boast reasoned opinions. In the case under consideration the opinions and votes of the electors are in the hands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s, whose leading spirits are, as a rule, publicans, their influence over the working men, to whom they allow credit, being great. “Do you know what an election committee is?” writes M. Scherer, one of the most valiant champions of present-day democracy. “It is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the corner-stone of our institutions, the masterpiece of the political machine. France is governed to-day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s.“ [5_1]

那么，或许有人会问，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选民能够产生自己的意见吗？而提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对集体中自由的尺度抱持一种奇怪的错觉。群体有着别人给予的观点，但是他们绝不敢说自己的观点是理性的。在我们所考虑的这个问题中，选民的意见和票数都掌握在选举委员会的手中。委员会的领导人物往往是酒馆老板们，因为他们允许工人们赊账，所以在他们中间享有极大的影响力。希尔先生是当今民主政治最勇敢的拥护者之一，他写道：“你知道一个选举委员会是什么样的吗？”“它恰好是我们的各项体制的奠基石，是我们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法国如今是被选举委员会所统治的 [6_1] 。”

To exert an influence over them is not difficult, provided the candidate be in himself acceptable and possess adequate financia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admissions of the donors, three millions of francs sufficed to secure the repeated elections of General Boulanger.

只要候选人本身能让人接受，同时拥有充足的经济实力，那么对选民施加影响并非难事。据捐款人的供词，花上三百万法郎就足以确保布朗热将军再次当选。

Such is the psychology of electoral crowds. It is identical with that of other crowds: neither better nor worse.

这就是选民群体的心理。这和其他群体一样：既不更好，又不更糟。

In consequence I draw no conclusion against universal suffrage from what precedes. Had I to settle its fate, I should preserve it as it is for practical reasons, which are to be deduced in point of fact from our investigation of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On this account I shall proceed to set them forth.

因而，我从以上分析中并没有得出反对普选制的结论。如果必须要决定其命运的话，我会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将其保留，这个决定是根据我们对群体心理的研究推断出来的。我将对这一点进一步展开阐释。

No doubt the weak side of universal suffrage is too obvious to be overlooked. It cannot be gainsaid that civilisation has been the work of a small minority of superior intelligences constituting the culminating point of a pyramid, whose stages, widening in proportion to the decrease of mental power, represent the masses of a nation. The greatness of a civilisation cannot assuredly depend upon the votes given by inferior elements boasting solely numerical strength. Doubtless, too, the votes recorded by crowds are often very dangerous. They have already cost us several invasions, and in view of the triumph of socialism, for which they are preparing the way,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vagaries of popular sovereignty will cost us still more dearly.

毫无疑问，普选制的弊端显而易见，无法忽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人类文明是由少数智力非凡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构成了金字塔的顶端，而随着下面各层的加宽，智慧也相应减少，这也代表了一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一个文明的伟大，不能只依靠在数量上占优势的

低等成员的选票。更何况，群体投票的结果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已经让我们经历了数次侵略，并且其正为之铺路的社会主义也即将胜利，异想天开的人民主权论或许将让我们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

Excellent, however, as these objections are in theory, in practice they lose all force, as will be admitted if the invincible strength be remembered of ideas transformed into dogmas. The dogma of the sovereignty of crowds is as little defensible, from the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as the religious dogmas of the Middle Ages, but it enjoys at present the same absolute power they formerly enjoyed. It is as unattackable in consequence as in the past were our religious ideas. Imagine a modern freethinker miraculously transported into the midst of the Middle Ages. Do you suppose that, after having ascertained the sovereign power of the religious ideas that were then in force, he would have been tempted to attack them?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a judge disposed to send him to the stake, under the imputation of having concluded a pact with the devil, or of having been present at the witches sabbath, would it have occurred to him to call in question the existence of the devil or of the sabbath? It were as wise to oppose cyclones with discussion as the beliefs of crowds. The dogma of universal suffrage possesses to-day the power the Christian dogmas formerly possessed. Orators and writers allude to it with a respect and adulation that never fell to the share of Louis XIV. In consequence the same position must be taken up with regard to it as with regard to all religious dogmas. Time alone can act upon them.

然而，这些反对意见理论看上去似乎令人信服，实际上却毫无效力。看看想法被转化成教条后产生的无敌力量，你就会承认这一点

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群体统治的教条就和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不堪一击，但是这一观念如今就享有如同昔日中世纪那样的绝对权力。所以它就和我们过去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想象一下，假如一位现代的自由思想者被奇迹般地传送到了中世纪。那你认为他会不会在已经知晓宗教观念占据统治地位的前提下，仍然尝试攻击这样的宗教观念呢？当他落入了一位誓要将他送上火刑柱的法官手中，背负着与魔鬼交易或参与了女巫集会的罪名，他还会不会想到要去质疑恶魔或安息日的存在呢？群体信仰的愚蠢，大致与试图以争论动摇飓风相似。如今的普选制教条，拥有过去基督教教条同样的力量。如今的演说家和作家们提起它时充满了敬重与恭维，即便是当初的路易十四也不曾享受过这等殊荣。所以，我们对待它的立场必须和对待所有宗教教条一样。能对它生效的只有时间。

Besides, it would be the more useless to attempt to undermine this dogma, inasmuch as it has an appearance of reasonableness in its favour. “In an era of equality,” Tocqueville justly remarks, “men have no faith in each other on account of their being all alike; yet this same similitude gives them an almost limitless confidence in the judgment of the public, the reason being that it does not appear probable that, all men being equally enlightened, truth and numerical superiority should not go hand in hand.”

此外，试图诋毁这一教条更是无用，因为它看上去非常合理。托克维尔准确地指出：“在一个平等的时代，由于每个人都大致相同，因而人们对彼此毫无信心。但这种相似性使得他们对于公众所做的判断充满无限的信心，因为他们觉得所有人都接受同样的教育，那么数量上占多数的一方一定手握真理。”

Must it be believed that with a restricted suffrage—a suffrage

restricted to those intellectually capable if it be desired—an improvement would be effected in the votes of crowds? I cannot admit for a moment that this would be the case, and that for the reasons I have already given touching the mental inferiority of all collectivities, whatever their composition. In a crowd men always tend to the same level, and, on general questions, a vote, recorded by forty academicians is no better than that of forty water-carriers. I do not in the least believe that any of the votes for which universal suffrage is blamed—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Empire, for instance—would have fallen out differently had the voters been exclusively recruited among learned and liberally educated men. It does not follow because an individual knows Greek or mathematics, is an architect, a veterinary surgeon, a doctor, or a barrister, that he is endowed with a special intelligence of social questions. All our political economists are highly educated, being for the most part professors or academicians, yet is there a single general question—protection, bimetallism—on which they have succeeded in agreeing? The explanation is that their science is only a very attenuated form of our universal ignorance. With regard to social problems, owing to the number of unknown quantities they offer, men are substantially, equally ignorant.

如果将投票权限制在某个群体内，如果希望如此，可以是智力水平更高的人群内，那么群体的投票结果就会有所改善吗？对此我一点也无法赞同，原因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无论群体的组成如何，其智力水平上的限制都同样客观存在。在同一个群体中，所有人都会倾向于相同的智力水平。一般来说，40个学者的投票结果也并不会比40个送水工的更高明。对于那些使得人们对普选制持有怀疑的投票结果，例如重立帝国等，我从不觉得，经由重新选择的具有教养和学识的公民来重新投票，会使结果有任何不同。一个人并不会因为他通晓希腊语或数学，因为是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律师，就具有解决社会问题

的特殊才能。我们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大多数是教授或学者，但是，他们能就任何一个普遍性问题，例如贸易保护或复本位制达成一致吗？原因就是，他们的学问不过是我们普遍的无知被稀释后的形式罢了。而谈到社会问题，鉴于未知的实在太多，所有人实际上都同样无知。

In consequence, were the electorate solely composed of persons stuffed with sciences their votes would be no better than those emitted at present. They would be guided in the main by their sentiments and by party spirit. We should be spared none of the difficulties we now have to contend with, and we should certainly be subjected to the oppressive tyranny of castes.

因此，如果全体选民都是由知识丰富的人构成，那他们的投票结果也不会比现状更好。引导他们的仍将是自己的情感和党派精神。我们终将面对如今要对付的种种难题，也必将遭受身份制度带来的暴政压迫。

Whether the suffrage of crowds be restricted or general, whether it be exercised under a republic or a monarchy, in France, in Belgium, in Greece, in Portugal, or in Spain, it is everywhere identical; and,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it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unconscious aspirations and needs of the race. In each country the average opinions of those elected represent the genius of the race, and they will be found not to alter sensibly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无论选举制是受到限制还是普遍公允，是在共和国还是帝国实

施，是在法国、比利时、希腊、葡萄牙还是西班牙，结果都是一样的。无论怎么说，那其实就是一个种族无意识的渴望和需要。在每一个国家，那些获选人的普遍意见都代表着这个民族的特征，它们不会随着一代代的更迭而改变。

It is seen, then, that we are confronted once more by the fundamental notion of race, which we have come across so often, and on this other notion, which is the outcome of the first, that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s play but a small part in the life of a people. Peoples are guided in the main by the genius of their race, that is, by that inherited residue of qualities of which the genius is the sum total. Race and the slavery of our daily necessities are the mysterious master-causes that rule our destiny.

由此可见，我们再次碰到了种族这个基本概念。我们时常遇到它，并由此产生了另一种观念，那就是：政治制度和政府在人们的生活中只能发挥极小的作用。人们主要受到自己种族特征的支配，也就是某些代代遗传后残余的品质。而这种特征，就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为满足日常所需而受的束缚才是主宰我们命运的神秘因素。

Chapter V Parliamentary Assemblies

第五章　议会

Parliamentary crowds present mos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common to heterogeneous crowds that are not anonymous—The simplicity of their opinions—Their suggestibility and its limits—Their indestructible, fixed opinions and their changed opinions—The reason of the

predominance of indecision—The role of the leaders—The reason of their prestige—They are the true masters of an assembly whose votes, on that account, are merely those of a small minority—The absolute power they exercise—The elements of their oratorical art—Phrases and images—The psychological necessity the leaders are under of being in a general way of stubborn convictions and narrow-minded—It is impossible for a speaker without prestige to obtain recognition for his arguments—The exaggeration of the sentiments, whether good or bad, of assemblies—At certain moments they become automatic—The sittings of the Convention—Cases in which an assembly lo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owds—The influence of specialists when technical questions arise—The advantages and dangers of a parliamentary system in all countries—It is adapted to modern needs; but it involves financial waste and the progressive curtailment of all liberty—Conclusion.

议会群体表现出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共有的大多数特征／他们意见的简单性／他们易受暗示及其局限性／他们坚不可摧、绝不动摇的意见和易变的意见／议会通常难做决定的原因／领袖人物的作用／他们名望的来源／他们是议会真正的主人，因而议会的投票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少数群体的决定／他们所操纵的绝对权力／他们演讲术的组成部分／措辞与形象／领袖人物在精神上必定是固执、心胸狭窄的／没有名望的演讲者，其论证无法获得认同／议会成员对于好坏情绪的过度夸张／某些时刻，他们是完全自觉的／议会开会／议会失去了群体特征的个别情况／专家在技术性问题出现时具有的影响／所有国家中议会制度的优缺点／议会制度适应当代需求，但浪费金钱、限制自由／结论。

In parliamentary assemblies we have an example of heterogeneous crowds that are not anonymous. Although the mode of election of their members varies from epoch to epoch, and from

nation to nation, they present very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case the influence of the race makes itself felt to weaken or exagge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common to crowds, but not to prevent their manifestation. The parliamentary assemblies of the most widely different countries, of Greece, Italy, Portugal, Spain, France, and America present great analogies in their debates and votes, and leave the respective governments face to face with identical difficulties.

我们可以发现议会就是一个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的实例。尽管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因时代和国家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却具有非常相似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种族的影响会削弱或加强群体的特征，但不会妨碍他们的表现。在众多差别甚大的国家中，例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他们的议会在辩论和投票上都表现出相似的特点，同时也给这些国家的政府留下了相似的问题。

Moreover, the parliamentary system represents the ideal of all modern civilised peoples. The system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idea, psychologically erroneous, but generally admitted, that a large gathering of men is much more capable than a small number of coming to a wise and independent decision on a given subject.

此外，议会制度代表了所有当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一制度实际上反映了一种观点，那就是需要对某一个问题作出独立、智慧的决断时，人数越多越有利，从心理学上来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却被广泛认可。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crowds are to be met with in

parliamentary assemblies: intellectual simplicity, irritability, suggestibility, the exaggeration of the sentiments and the preponderating influence of a few leaders. In consequence, however, of their special composition parliamentary crowds offer s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which we shall point out shortly.

议会也体现出群体的一般性特征：头脑简单、易怒、情绪夸张以及少数领袖人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但是，鉴于议会独特的构成情况，它也具有独特的特征，我们在此简单说明。

Simplicity in their opinions is one of their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ase of all parties, and more especially so far as the Latin peoples are concerned, an invariable tendency is met with in crowds of this kind to solve the most complicated social problems by the simplest abstract principles and general laws applicable to all cases. Naturally the principles vary with the party; but owing to the mere fact that the individual members are a part of a crowd, they are always inclined to exaggerate the worth of their principles, and to push them to their extreme consequences. In consequence parliaments are more especially representative of extreme opinions.

他们的意见简单化是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所有党派中，尤其是拉丁民族，都存在一种倾向，那就是用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适用一切情况的普遍法则来解决最为复杂的社会问题。自然，这些原则随党派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鉴于所有的个人都是群体的一部分，他们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原则的价值并将其彻底贯彻。所以，议会常常成为极端意见的代表。

The most perfect example of the ingenuous simplification of opinions peculiar to assemblies is offered by the Jacob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ogmatic and logical to a man, and their brains full of vague generalities, they busied themselve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fixed-principles without concerning themselves with events. It has been said of them, with reason, that they went through the Revolution without witnessing it. With the aid of the very simple dogmas that served them as guide, they imagined they could recast society from top to bottom, and cause a highly refined civilisation to return to a very anterior phase of the social evolution. The methods they resorted to realise their dream wore the same stamp of absolute ingenuousness. They confined themselves, in reality, to destroying what stood in their way. All of them, moreover—Girondists, the Men of the Mountain, the Thermidorians—were alike animated by the same spirit.

议会的意见往往简单化，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党人就是最佳的例子。他们对人只讲逻辑和教条，脑子里充斥着模糊笼统的观点，忙于对固定的教条展开应用，却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谈到他们时，可以说，他们只经历了革命却并没见证革命。他们将非常简单的教条作为自己的指导，设想自己可以从上至下彻底改造社会，却使得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退回到社会进化的早期阶段。他们用来实现梦想的手段同样极端幼稚。事实上，他们只是在摧毁一切前进道路上的阻碍。他们所有人，还有吉伦特派、山岳派、热月派等等，都被同样的精神激励着。

Parliamentary crowds are very open to suggestion; and, as in the case of all crowds, the suggestion comes from leaders possessing prestige; but the suggestibility of parliamentary assemblies has very clearly defined limits, which it is important to point out.

议会群体极易受到暗示的影响，就像所有的群体一样，暗示来自具有名望的的领袖们。但是这种易受暗示性又有极为清楚的界限，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On all questions of local or regional interest every member of an assembly has fixed, unalterable opinions, which no amount of argument can shake. The talent of a Demosthenes would be powerless to change the vote of a Deputy on such questions as protection or the privilege of distilling alcohol, questions in which the interests of influential electors are involved. The suggestion emanating from these electors and undergone before the time to vote arrives, sufficiently outweighs suggestions from any other source to annul them and to maintain an absolute fixity of opinion. [5_2]

对于所有地方或地区性的问题，议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会产生难以动摇的看法，是无论如何论证也难以改变的。对于那些和有影响力的选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贸易保护或者酿酒业特权等，即便是狄摩西尼的雄辩之才也无法动摇一位众议员的看法。选民们在投票前就发出的暗示足以击败所有与之对抗的其他暗示，维持了意见的绝对稳定 [6_2] 。

On general questions—the overthrow of a Cabinet, the imposition of a tax—there is no longer any fixity of opinion, and the suggestions of leaders can exert an influence, though not in quite the same way as in an ordinary crowd. Every party has its leaders, who possess occasionally an equal influence. The result is that the Deputy finds himself placed between two contrary

suggestions, and is inevitably made to hesitate. This explains how it is that he is often seen to vote in contrary fashion in an interval of a quarter of an hour or to add to a law an article which nullifies it; for instance, to withdraw from employers of labour the right of choosing and dismissing their workmen, and then to very nearly annul this measure by an amendment.

在一般问题上，例如推翻内阁、开征新税等，意见就不那么固定了，来自领袖的暗示也能发挥作用，尽管和它在一般性群体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太一样。每个党派都有领袖，有时他们的影响力势均力敌。结果往往是众议员发现自己被夹在两种相反的暗示之间，因此难免感到犹豫。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常看到众议员在一刻钟之内作出相反的表决或者为某项法律加上使之无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们挑拣或解雇员工的权力，却又以修改案几乎完全废除这一措施。

It is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every Chamber that is returned has some very stable opinions, and other opinions that are very shifting. On the whole, the general questions being the more numerous, indecision is predominant in the Chamber—the indecision which results from the ever-present fear of the elector, the suggestion received from whom is always latent, and tends to counterbalance the influence of the leaders.

出于同样的理由，每一届议会都有一些非常稳定和非常善变的意见。总的来说，因为一般性问题的数量较多，议会中悬而未决的的情况也就更常见，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总是害怕选民，而来自选民的潜在暗示，往往与领袖人物们的影响相冲突。

Still, it is the leaders who are definitely the masters in those numerous discussions, with regard to the subject-matter of which the members of an assembly are without strong preconceived opinions.

但是，在许多讨论中，议会成员们并没有强烈的先入之见，主导者们仍然是这些领袖人物。

The necessity for these leaders is evident, since, under the name of heads of groups, they are met with in the assemblies of every country. They are the real rulers of an assembly. Men forming a crowd cannot do without a master, whence it results that the votes of an assembly only represent, as a rule, the opinions of a small minority.

这些领导者存在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因为他们以团体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之中。他们是议会真正的统治者。没有头领，群体难以成事。由此可见，议会的表决结果通常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意见。

The influence of the leaders is due in very small measure to the arguments they employ, but in a large degree to their prestige. The best proof of this is that, should they by any circumstance lose their prestige, their influence disappears.

领袖人物们的影响力有一小部分是来自于他们的论证，大部分取决于他们的名望。最好的证据就是，一旦他们声名扫地，影响力就随

之消失。

The prestige of these political leaders is individual, and independent of name or celebrity: a fact of which M. Jules Simon gives us some very curious examples in his remarks on the prominent men of the Assembly of 1848, of which he was a member:—

政治领袖们的名望是个人的，和其头衔或名誉无关。朱尔·西蒙先生对1848年议会中几个重要人物的评论，其中包括他本人，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趣的例子：

> Two months before he was all-powerful, Louis Napoleon was entirely without the least importance.
>
> “两个月前路易斯·拿破仑还无所不能，如今他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
>
> Victor Hugo mounted the tribune. He failed to achieve success. He was listened to as Felix Pyat was listened to, but he did not obtain as much applause. “I don't like his ideas,” Vaulabelle said to me, speaking of Felix Pyat, “but he is one of the greatest writers and the greatest orator of France.” Edgar Quinet, in spite of his exceptional and powerful intelligence, was held in no esteem

whatever. He had been popular for awhile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Assembly; in the Assembly he had no popularity.

维克多·雨果登上了讲台。他没能成功。人们听他说话，就像听菲利克斯·皮亚说话一样。雨果没得到多少掌声。‘我不喜欢他的观点，’谈起菲利克斯·皮亚时，沃拉贝尔对我说，‘但他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和演说家之一。’埃德加·基内尽管智慧超凡，却丝毫不受尊敬。在议会召开前，他曾受人欢迎；在议会里却无人问津。

The splendour of genius makes itself less felt in political assemblies than anywhere else. They only give heed to eloquence appropriate to the time and place and to party services, not to services rendered the country. For homage to be rendered Lamartine in 1848 and Thiers in 1871, the stimulant was needed of urgent, inexorable interest. As soon as the danger was passed the parliamentary world forgot in the same instant its gratitude and its fright.

天才的卓越之处，在政治集会中最为无关紧要。他们只关注有利于党派利益、适宜当下时间地点的出众口才，而不是其对国家是否有益。要想获得1848年拉马丁和1871年梯也尔所享受的崇敬，必须得有紧迫而不可阻挡的利益来刺激。而一旦危机解除，整个议会瞬间就将其感激和恐惧抛在脑后。”

I have quoted the preceding passage for the sake of the facts it contains, not of the explanations it offers, their psychology being somewhat poor. A crowd would at once lose its character of a crowd were it to credit its leaders with their services, whether of a party nature or rendered their country. The crowd that obeys a leader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s prestige, and its submission is not dictated by any sentiment of interest or gratitude.

我引用前文，只是为了其中讲述的事实而非它提供的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在心理学上来讲实在牵强。无论是出于党派本质还是为了国家，一旦效忠于领袖，一个群体就会失去性格。一个群体服从领袖是因为其名望的影响力，且不受任何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In consequence the leader endowed with sufficient prestige wields almost absolute power. The immense influence exerted during a long series of years, thanks to his prestige, by a celebrated Deputy, [5_3] beaten at the last general election in consequence of certain financial events, is well known. He had only to give the signal and Cabinets were overthrown. A writer has clearly indicated the scope of his action in the following lines:—

因此，拥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拥有绝对权力。由于富有名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 [6_3] 多年来极具影响力，但由于一些金融问题在上次大选中落败，此事十分出名。他只是打了个手势，就推翻了内阁。一位作家用以下文字来说明其影响力：

It is due, in the main, to M. X—that we paid

> three times as dearly as we should have done for Tonkin, that we remained so long on a precarious footing in Madagascar, that we were defrauded of an empire in the region of the Lower Niger, a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preponderating situation we used to occupy in Egypt. The theories of M. X— have cost us more territories than the disasters of Napoleon I.

> “主要是因为X先生，我们为东京湾付出了三倍的代价，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岌岌可危，我们在南尼日尔地区的一个王国也被骗走，我们还失去了之前在埃及所占据的有利形势。M先生的理论给我国领土所造成的损失更甚于当年的拿破仑一世。”

We must not harbour too bitter a grudge against the leader in question. It is plain that he has cost us very dear; but a great part of his influence was due to the fact that he followed public opinion, which, in colonial matters, was far from being at the time what it has since become. A leader is seldom in advance of public opinion; almost always all he does is to follow it and to espouse all its errors.

我们对上述的领袖不该太过苛责。毫无疑问他使我们付出了高昂代价，但是他能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听从了公众的意见，而公众对于殖民地事务的意见还未达到应有的水平。领袖人物的意见很少能比公众意见超前，他所做的不过是顺应公众的意见并支持其中所有的错误。

The means of persuasion of the leaders we are dealing with, apart from their prestige, consist in the factors we have already enumerated several times. To make a skilful use of these resources a leader must have arrived at a comprehension, at least in an unconscious manner, of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and must know how to address them. He should be aware, in particular, of the fascinating influence of words, phrases, and images. He should possess a special description of eloquence, composed of energetic affirmations—unburdened with proofs—and impressive images, accompanied by very summary arguments. This is a kind of eloquence that is met with in all assemblies, the English Parliament included, the most serious though it is of all.

我们所讨论的领袖们在说服上的手段，除了名望之外，还包含了一些我们已经列举过数次的因素。要想熟练地运用这些手段，一个领袖必须要了解群体的心理，至少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能够对其了如指掌。他还要知道如何对他们发言。尤其是，他必须认识到词汇、套话和形象所具有的奇妙影响力。他应当具有特殊的雄辩才能，包括积极有力的断言——而不必包含证据——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并伴随以简要的论证。这样的雄辩在各色议会中都有出现，英国议会也不例外，尽管英国议会可称得上是其中最为严肃的一种。

“Debates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says the English philosopher Maine, “may be constantly read in which the entire discussion is confined to an exchange of rather weak generalities and rather violent personalities. General formulas of this description exercise a prodigious influence on the imagination of a pure democracy. It will always be easy to make a crowd accept general assertions, presented in striking terms, although they have never been verified, and are perhaps not susceptible of verification.”

英国哲学家梅因说道："下院的辩论，常常让人感到整场讨论不过是在交换一些薄弱无力的泛泛而谈和激烈狂暴的人身攻击。这样的描述通式对纯粹民主的想象产生了巨大影响。要让一个群体接受一般性的主张往往并非难事，只要使用引人注目的词汇就可以了，尽管这些主张从未被证实或可能根本无法证实。"

Too much importance cannot be attached to the "striking terms" alluded to in the above quotation. We have already insisted, on several occasions, on the special power of words and formulas. They must be chosen in such a way as to evoke very vivid images. The following phrase, taken from a speech by one of the leaders of our assemblies, affords an excellent example:—

将上述引言中"引人注目的词汇"看得多么重要都不为过。我们已经多次提及语言和套话所具有的特殊力量。要使用能够产生鲜明形象的措辞。下面的话来自我们议会中一位领袖的演讲，可作为典型案例：

> When the same vessel shall bear away to the fever-haunted lands of our penitentiary settlements the politician of shady reputation and the anarchist guilty of murder, the pair will be able to converse together, and they will appear to each other as the two complementary aspects of one and the same state of society.

> "当船只驶向那片被热病席卷的土地，那里是我

们监狱的所在地。声名狼藉的政客和犯有谋杀的无政府主义者，将在那里相对畅谈，他们将彼此视作处于同一社会状态下互补的两派。”

The image thus evoked is very vivid, and all the adversaries of the speaker felt themselves threatened by it. They conjured up a double vision of the fever-haunted country and the vessel that may carry them away; for is it not possible that they are included in the somewhat ill-defined category of the politicians menaced? They experienced the lurking fear that the men of the Convention must have felt whom the vague speeches of Robespierre threatened with the guillotine, and who,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fear, invariably yielded to him.

这话将唤起极为鲜明的形象，演讲者的所有对手都会感到自己深受其威胁。他们的脑海中产生了两个画面：热病肆虐的土地和带走他们的船只，他们不是也有可能被归入了可憎的政客一列吗？他们所感受到的恐惧，可能和罗伯斯庇尔以断头台相威胁的那些议员们所体会到的一样。受这样的恐惧影响，他们无疑会选择屈服于他。

It is all to the interest of the leaders to indulge in the most improbable exaggerations. The speaker of whom I have just cited a sentence was able to affirm, without arousing violent protestations, that bankers and priests had subsidised the throwers of bombs, and that the directors of the great financial companies deserve the same punishment as anarchists. Affirmations of this kind are always effective with crowds. The affirmation is never too violent, the declamation never too threatening. Nothing intimidates the audience more than this sort of eloquence. Those present are afraid

that if they protest they will be put down as traitors or accomplices.

领袖们说些不着边际的夸大之词，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刚引用过的那位演讲者可以断言，银行家们和神父们曾资助那些扔炸弹的人，而那些大型金融公司的总裁们，也应受到和无政府主义者们一样的惩罚。这话甚至不会引起激烈的抗议。这样的断言永远会在人群中发挥作用。断言再激烈、演说再具威胁性也不过分。最能威胁到观众的莫过于这类雄辩。在场的人，害怕自己一旦抗议就会被视为叛徒或同谋。

As I have said, this peculiar style of eloquence has ever been of sovereign effect in all assemblies. In times of crisis its power is still further accentuated. The speeches of the great orators of the assembli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re very interesting reading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At every instant they thought themselves obliged to pause in order to denounce crime and exalt virtue, after which they would burst forth into imprecations against tyrants, and swear to live free men or perish. Those present rose to their feet, applauded furiously, and then, calmed, took their seats again.

如我所说，这类雄辩在所有的议会中都极富效力。在危急时刻其效力更是显著。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期间，议会中那些大演讲家们的演说都非常有趣。他们在演讲中时刻感到必须稍作停顿以谴责罪恶、弘扬美德，随后又破口大骂那些暴君，并发誓不自由毋宁死。观众们纷纷起立，掌声雷动。最后大家冷静下来，坐回原位。

On occasion, the leader may be intelligent and highly educated, but the possession of these qualities does him, as a rule, more harm

than good. By showing how complex things are, by allowing of explanation and promoting comprehension, intelligence always renders its owner indulgent, and blunts, in a large measure, that intensity and violence of conviction needful for apostles. The great leaders of crowds of all ages, and those of the Revolution in particular, have been of lamentably narrow intellect; while it is precisely those whose intelligence has been the most restricted who have exercise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有时候，领袖也许非常聪慧也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对他而言，这些品质往往弊大于利。他的智慧会展示事情的复杂性，会允许人们进行解释，会促进理解，但这会使得领袖看起来太过宽容，大大削减他的信徒们所需信念的强度与力度。所有时代的伟大领袖们，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往往都是头脑简单之辈，并且一般情况下，都是那些头脑最为简单的人拥有最强大的影响力。

The speeches of the most celebrated of them, of Robespierre, frequently astound one by their incoherence: by merely reading them no plausible explanation is to be found of the great part played by the powerful dictator:—

那些最为知名的领袖们所做的演讲，以罗伯斯庇尔为例，常常前后不连贯，这令人吃惊。仅看这些演讲，完全无法理解为何这个极富权势的独裁者能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 The commonplaces and redundancies of pedagogic eloquence and Latin culture at the service of a mind childish rather than

undistinguished, and limited in its notions of attack and defence to the defiant attitude of schoolboys. Not an idea, not a happy turn of phrase, or a telling hit: a storm of declamation that leaves us bored. After a dose of this unexhilarating reading one is attempted to exclaim “Oh!” with the amiable Camille Desmoulins.

“教学式的陈词滥调和冗余的话语，拉丁文化使头脑幼稚傻气，攻击与辩护所用的观点就和小男孩们的挑衅态度毫无两样。没有思想、没有措辞上的巧妙转换，也没有一击即中的警句妙语。他狂风骤雨似的一番雄辩只让我们觉得无聊透顶。经历一次这样无趣的阅读之后，每个人都想与和蔼的德穆兰一起长叹一声：‘唉！’”

It is terrible at times to think of the power that strong conviction combined with extreme narrowness of mind gives a man possessing prestige. It is none the less necessary that these conditions should be satisfied for a man to ignore obstacles and display strength of will in a high measure. Crowds instinctively recognise in men of energy and conviction the masters they are always in need of.

想到执著的信念和狭隘的头脑将给予一个有名望的人怎样的权力，这实在令人忧心。而这些条件都是一个人忽视阻碍、展现出高度的意志力所必需的。群体直觉地将精力旺盛意志坚定的人视为主宰，这是其一直以来所需要的。

In a parliamentary assembly the success of a speech depends almost solely on the prestige possessed by the speaker, and not at all on the arguments he brings forward. The best proof of this is that when for one cause or another a speaker loses his prestige, he loses simultaneously all his influence, that is, his power of influencing votes at will.

在一个议会中，演讲能否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演讲者所拥有的名望而非他所提出的论证。对于这一点的最佳证明就是，假如演讲者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失去了其名望，那他也就会随之失去他的影响力，也就是他依据自身意志影响投票结果的能力。

When an unknown speaker comes forward with a speech containing good arguments, but only arguments, the chances are that he will only obtain a hearing. A Deputy who is a psychologist of insight, M. Desaubes, has recently traced in the following lines the portrait of the Deputy who lacks prestige:—

当一位籍籍无名的演讲者拿着一篇论证出色的演讲出场时，如果他只有论证，那么人们也只是听听而已。一位叫做德索比的议员先生，同时也是一位有见识的心理学家，最近在下面的这段文字中描述了缺乏名望的议员的情形：

> When he takes his place in the tribune he draws a document from his portfolio, spreads it out methodically before him, and makes a start with assurance.

“站到讲台上，他从文件夹中取出一份文件，细细地展开，自信地开口了。

He flatters himself that he will implant in the minds of his audience the conviction by which he is himself animated. He has weighed and reweighed his arguments; he is well primed with figures and proofs; he is certain he will convince his hearers. In the face of the evidence he is to adduce all resistance would be futile. He begins, confident in the justice of his cause, and relying upon the attention of his colleagues, whose only anxiety, of course, is to subscribe to the truth.

他自鸣得意，觉得一定能将激励自己的信念也植入观众们的脑海里。他反复斟酌了自己的论证，仔细准备了数据和证据；他确信自己一定可以说服在座的听众。在他所援引的证据面前，所有的抵抗都将是徒劳的。他开始了，对于自己的论断的合理性深信不疑，相信自己的同事具有判断力并且只会为真理所折服。

He speaks, and is at once surprised at the restlessness of the House, and a little annoyed by the noise that is being made.

他一开始演讲，就注意到议会大厅中并不安定，对于这样的噪音，他感到有些恼怒。

How is it silence is not kept? Why this general inattention? What are those Deputies thinking about who are engaged in conversation? What urgent motive has induced this or that Deputy to quit his seat?

为什么不保持安静？为什么不注意听？那些私下交谈的议员们在想什么呢？是什么要紧事让这位或那位议员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An expression of uneasiness crosses his face; he frowns and stops. Encouraged by the President, he begins again, raising his voice. He is only listened to all the less. He lends emphasis to his words, and gesticulates: the noise around him increases. He can no longer hear himself, and again stops; finally, afraid that his silence may provoke the dreaded cry, “The Closure!” he starts off again. The clamour becomes unbearable.

他的脸上闪过了不安的神情，他皱眉并停了下来。他受到了议长的鼓励，又再次开始，还提高了嗓音。但听他说话的人更少了。他在发言中增强语气，还做出手势。他周围的噪音更响了。他甚至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了，于是他又停了下来。最后，他担心自己的沉默会招致可怕的喊声‘停止辩论！’，他只好再次开口。吵嚷声令人难以忍受。”

When parliamentary assemblies reach a certain pitch of excitement they become identical with ordinary heterogeneous crowds, and their sentiments in consequence present the peculiarity of being always extreme. They will be seen to commit acts of the greatest heroism or the worst excesses. The individual is no longer himself, and so entirely is this the case that he will vote measures most adverse to his personal interests.

当议会群体变得兴奋时，他们和一般的异质性群体也就没什么两样了。因此，他们的情绪更倾向于极端。他们将会表现出最伟大的英雄气概或最糟糕的不知节制。此时群体中的个人再也不是他自己了，他甚至会为与自身利益完全相反的措施投赞成票。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shows to what an extent assemblies are capable of losing their self-consciousness, and of obeying suggestions most contrary to their interests. It was an enormous sacrifice for the nobility to renounce its privileges, yet it did so without hesitation on a famous night during the sittings of the Constituant Assembly. By renouncing their inviolability the men of the Convention placed themselves under a perpetual menace of death and yet they took this step, and were not afraid to decimate their own ranks, though perfectly aware that the scaffold to which they were sending their colleagues to-day might be their own fate to-morrow. The truth is they had attained to that completely automatic state which I have described elsewhere, and no consideration would hinder them from yielding to the suggestions by which they were hypnotised.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the memoirs of one of them, Billaud-Varennes, is absolutely typical on this score: “The decisions with which we have been so reproached,” he says, “WERE NOT DESIRED BY US TWO DAYS, A SINGLE DAY

BEFORE THEY WERE TAKEN: IT WAS THE CRISIS AND NOTHING ELSE THAT GAVE RISE TO THEM.” Nothing can be more accurate.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已经展示了议会群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失去自我意识，并遵从那些与他们的利益相违背的暗示。贵族们放弃自己的利益是一种巨大的牺牲，但是在国民公会召开的那个著名夜晚，贵族们毫无犹豫地照做了。议员们放弃了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利，使自己陷入一种永久的死亡威胁之中，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迈出了这一步。对于要在自己的阶层中大开杀戒一事，他们并不害怕，尽管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也许今天自己将同僚送上了绞刑架，明天站上去的就是自己。事实就是，他们早就进入到我描述过的不由自主的状态，再也没有任何考量可以阻止他们听从那些使他们恍惚陶醉的建议。下文引用自当时的议员之一比约·瓦莱纳先生的回忆录，可以看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说：“这个我们一直拒绝的决定，在最终通过的前两天乃至前一天都还为我们所抗拒：是当时的危机促使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别无其他原因。”这话再准确不过。

The same phenomena of unconsciousness were to be witnessed during all the stormy sittings of the Convention.

在所有情绪激烈的议会场面上，你都可以见证相同的不由自主的现象。

“They approved and decreed measures,” says Taine, “which they held in horror—measures which were not only stupid and foolish, but measures that were crimes—the murder of innocent men, the murder of their friends. The Left, supported by the Right, unanimously and amid loud applause, sent to the scaffold Danton,

its natural chief, and the great promoter and leader of the Revolution. Unanimously and amid the greatest applause the Right, supported by the Left, votes the worst decrees of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Unanimously and amid cries of admiration and enthusiasm, amid demonstrations of passionate sympathy for Collot d'Herbois, Couthon, and Robespierre, the Convention by spontaneous and repeated re-elections keeps in office the homicidal government which the Plain detests because it is homicidal, and the Mountain detests because it is decimated by it. The Plain and the Mountain, the majority and the minority, finish by consenting to help on their own suicide. The 22 Prairial the entire Convention offered itself to the executioner; the 8 Thermidor,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of an hour that followed Robespierre's speech, it did the same thing again.”

“他们赞同并发布了措施，”伊波利特·丹纳说，“他们对这些措施引以为傲，但是实际上，这些措施不仅愚蠢透顶，简直就是犯罪，这是在谋杀无辜者，是在谋杀他们的朋友。”在右派的支持下，伴随着如雷的掌声，左派一致通过决定，将他们的天然领袖、大革命的伟大推动者和领导者丹东送上了绞刑架。右派，则在左派的支持下，伴随着最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了革命政府最为恶劣的法令。在狂热而充满崇敬的高呼中，在对德布瓦、库东和罗伯斯庇尔的热烈赞同中，议会出奇一致地一再改选，将嗜杀成性的政府保留下来。而平民派一直因其杀人如麻而强烈反对，山岳派也抗议其草菅人命。然而，平民派和山岳派，作为多数派和少数派，最终都同意并促成了政府对他们赶尽杀绝的决定。5月22日，整个议会将自己交到了刽子手的手中；8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结束演讲的15分钟内，他们又做出了相同的决定。”

This picture may appear sombre. Yet it is accurate.

Parliamentary assemblies, sufficiently excited and hypnotised, offer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They become an unstable flock, obedient to every impulsion.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 of the Assembly of 1848 is due to M. Spuller, a parliamentarian whose faith in democracy is above suspicion. I reproduce it from the Revue litteraire, and it is thoroughly typical. It offers an example of all the exaggerated sentiments which I have described as characteristic of crowds, and of that excessive changeableness which permits of assemblies passing, from moment to moment, from one set of sentiments to another entirely opposite.

他的描述也许令人沉重。但这话非常准确。议会群体，一旦完全陷入激动的情绪、万分沉醉，也会表现出同样的特征。他们成为了不稳定的人群，受任何冲动的支配。以下对于1848年议会的描述，来自斯普勒先生，他是一位对民主坚信不疑的议员。我把来自《文学报》的这篇非常典型的文章转引如下。我之前曾描述过，夸张的情感是群体的特征。过度的易变性会使得议会转瞬之间就从某种情感状态转移到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而这段文字为上述的夸张情感和过度易变性提供了典型的例子。

> The Republican party was brought to its perdition by its divisions, its jealousies, its suspicions, and, in turn, its blind confidence and its limitless hopes. Its ingenuousness and candour were only equalled by its universal mistrust. An absence of all sense of legality, of all comprehension of discipline, together with boundless terrors and illusions; the peasant and the child are on a level in these respects. Their calm is as great as their impatience; their ferocity is equal

to their docility. This condition is the natural consequence of a temperament that is not formed and of the lack of education. Nothing astonishes such persons, and everything disconcerts them. Trembling with fear or brave to the point of heroism, they would go through fire and water or fly from a shadow.

“共和党由于四分五裂、相互妒忌猜疑、盲目自信以及无节制的希望而行将毁灭。其坦率质朴和普遍怀疑不相上下。他们没有法律意识、缺乏纪律性、同时充满恐惧和幻想。在这些方面，就是农夫和孩子们也比他们强上一些。他们的冷静和缺乏耐心一样严重，他们的驯良和残暴一般无二。这样的情况是性格不成熟和缺乏教育的自然结果。没什么事情能使这些人吃惊，但每一件事都能使他们仓皇失措。他们要么胆小如鼠，连影子也能将他们吓得抖如筛糠；要么大无畏到充满英雄期待，甘愿赴汤蹈火。

They are ignorant of cause and effect and of the connecting links between events. They are as promptly discouraged as they are exalted, they are subject to every description of panic, they are always either too highly strung or too downcast, but never in the mood or the measure the situation would require. More fluid than water they reflect every line and assume every shape. What sort of a foundation for a government can they be expected to supply?

他们对于事情的成因、结果和事件间的联系一无所知。他们忽而沮丧或忽而振奋，他们时常感到恐慌，他们要么是过于紧张，要么是过于哀伤，却从未处于当下情境所要求的情绪或状态之中。他们比流水更善变。我们又能指望他们为政府提供什么样的基础呢？”

Fortunately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just described as to be met with in parliamentary assemblies are in no wise constantly displayed. Such assemblies only constitute crowds at certain moments. The individuals composing them retain their individuality in a great number of cases, which explains how it is that an assembly is able to turn out excellent technical laws. It is true that the author of these laws is a specialist who has prepared them in the quiet of his study, and that in reality the law voted is the work of an individual and not of an assembly. These laws are naturally the best. They are only liable to have disastrous results when a series of amendments has converted them into the outcome of a collective effort. The work of a crowd is always inferior, whatever its nature, to that of an isolated individual. It is specialists who safeguard assemblies from passing ill-advised or unworkable measures. The specialist in this case is a temporary leader of crowds. The Assembly is without influence on him, but he has influence over the Assembly.

幸运的是，上述的议会群体的特征并非时常出现。议会只在某些时刻成为群体。在很多情况下，组成群体的个人仍保留个人的特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议会能够制订出相当出色的技术性法律。事实是，那些法律的制订者都是专家，他们在自己的书房中静心拟定这些法律，所以那些被表决的法律实际上是个人的作品而非集体的产物。这

些法律自然是最好的。当一系列修改案把这些法律转化为集体思考的产物之后，它们才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无论性质如何，集体的产物总是逊于孤立个人的作品。正是那些专家，使得议会避免通过一些考虑不周或无法施行的措施。此时，专家可称得上是群体暂时的领导者。议会对其毫无影响，而他却能影响议会。

In spite of all the difficulties attending their working, parliamentary assemblies are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mankind has discovered as yet, and more especially the best means it has found to escape the yoke of personal tyrannies. They constitute assuredly the ideal government at any rate for philosophers, thinkers, writers, artists, and learned men—in a word, for all those who form the cream of a civilisation.

尽管议会在运作中存在各类困难，它仍然算得上是人类至今为止发现的最好的政府形式，尤其是人类所找到的最好的规避个人暴政的方式。无论是对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还是学问家，总而言之，对于所有人类文明的精华阶层而言，议会都无疑是最理想的政体。

Moreover, in reality they only present two serious dangers, one being inevitable financial waste, and the other the progressive restriction of the liberty of the individual.

不过实际上，议会也造成了两种严重后果，其一就是难以避免的资金浪费，其二就是不断加剧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The first of these dangers is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the exigencies and want of foresight of electoral crowds. Should a member of an assembly propose a measure giving apparent satisfaction to democratic ideas, should he bring in a Bill, for instance, to assure old-age pensions to all workers, and to increase the wages of any class of State employes, the other Deputies, victims of suggestion in their dread of their electors, will not venture to seem to disregard the interests of the latter by rejecting the proposed measure, although well aware they are imposing a fresh strain on the Budget and necessitating the creation of new taxes.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hesitate to give their vote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crease of expenditure are remote and will not entail disagreeable consequences for them personally, while the consequences of a negative vote might clearly come to light when they next present themselves for re-election.

第一个后果是选民群体缺乏先见之明和应急措施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假如一名议会中的议员倡议一项极其符合民主理念的措施，比如，他提议为所有工人提供养老金以及为所有的政府公务人员提高薪资，那么因为畏惧自己的选民，其他的众议员就成了暗示的受害者，他们生怕表现出对选民利益的不尊重因而不敢拒绝这一提议，尽管他们心里很清楚，这么做无异于增加财政预算的负担，并且必然会导致新税种的设立。但他们不可能在表决时犹豫不决。增加财政支出这一后果尚且遥远，对于他们个人也不会产生不利，但是假如投了反对票，他们争取连任时就得直面其后果。

In addition to this first cause of an exaggerated expenditure there is another not less imperative—the necessity of voting all grants for local purposes. A Deputy is unable to oppose grants of this kind because they represent once more the exigencies of the

electors, and because each individual Deputy can only obtain what he requires for his own constituency on the condition of acceding to similar demands on the part of his colleagues.[3]

除了第一个原因，会导致支出增加的，还有另一个同样难以抗拒的原因，那就是必须为所有当地性的补助金投赞成票。一个众议员不能反对这种补助金项目，因为它代表了选民们的需求。另一个原因是只有每一个众议员都赞成自己的同僚所提的类似补助要求，他将来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到这样的补助金[3]。

3: In its issue of April 6, 1895, the Economiste published a curious review of the figures that may be reached by expenditure caused solely by electoral considerations, and notably of the outlay on railways. To put Langayes (a town of 3,000 inhabitants, situated on a mountain) in communication with Puy, a railway is voted that will cost 15 millions of francs. Seven millions are to be spent to put Beaumont (3,500 inhabitants) in communication with Castel-Sarrazin; 7 millions to put Oust (a village of 523 inhabitants) in communication with Seix (1,200 inhabitants); 6 millions to put Prade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amlet of Olette (747 inhabitants). In 1895 alone 90 millions of francs were voted for railways of only local utility. There is other no less important expenditure necessitated also by electioneering considerations. The law instituting workingmen's

pensions will soon involve a minimum annual outlay of 165 millions, according to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and of 800 millions according to the academician M. Leroy-Beaulieu.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ontinued growth of expenditure of this kind must end in bankruptcy. Many European countries—Portugal, Greece, Spain, Turkey—have reached this stage, and others, such as Italy, will soon be reduced to the same extremity. Still too much alarm need not be felt at this state of things, since the public has successively consented to put up with the reduction of four-fifths in the payment of their coupons by these different countries. Bankruptcy under these ingenious conditions allows the equilibrium of Budgets difficult to balance to be instantly restored. Moreover, wars, socialism, and economic conflicts hold in store for us a profusion of other catastrophes in the period of universal disintegration we are traversing, and it is necessary to be resigned to living from hand to mouth without too much concern for a future we cannot control.

3: 1895年4月6日发行的《经济学人》杂志中，有一篇针对数字展开的非同寻常的评论。这些数字是出于选举考虑的开支，最特别的就是在铁路上的花销。通过投票，决定建设一条造价为1500万法郎的铁路以连接朗格耶（一个居民数为3000左右的山里小城）和普伊。为连接博芒特（居民数为3500）及卡斯特

尔萨拉金要花七百万；为连接奥斯特（居民数为523的村落）及塞村（居民数为1200）要花七百万；为连接普瑞德及奥莱特（居民数为747）要花六百万等等。仅在1895年这一年中，被表决通过花在地方铁路上的总额就达到9000万法郎之多。还有一些出于竞选考虑的重要开支也被囊括其间。依照法国总理的意思，规定工人津贴的法律条款，不久就将把最小年支出定为一亿六千五百万，而按照法国院士勒鲁瓦·布罗的意见，这一数字应当为八亿。显然，放纵这样的支出计划继续发展下去，必将导致破产。很多欧洲国家，例如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和土耳其，都到达了这一阶段，而其他一些国家，例如意大利，很快也将面临同样的绝境。但是这方面的警告实在太多，人们不应该毫无察觉，因为不同国家内的公众都日益无法忍受使用配给券进行支付的份额缩减五分之四这一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破产使得原本难以平衡的政府预算迅速得到平衡。此外，在如今这个分裂的时期里，战争、社会主义和经济纠纷，都为我们埋下了其他灾难的隐患。当我们仅是勉强糊口，对于无法控制的未来不再多加忧虑时，我们只能选择顺从。

The second of the dangers referred to above—the inevitable restrictions on liberty consummated by parliamentary assemblies—is apparently less obvious, but is, nevertheless, very real.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innumerable laws—having always a restrictive action—which parliaments consider themselves obliged to vote and to whose consequences, owing to their shortsightedness, they are in a great measure blind.

之前提到的第二种后果，也就是议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看上去似乎不太明显，但却真实存在。这是无数法律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其中许多是限制性的措施。议会常感到自己必须通过这些法律，但由于眼光短浅，他们对于这样的法律带来的结果几乎一无所知。

The danger must indeed be most inevitable, since even England itself, which assuredly offers the most popular type of the parliamentary regime, the type in which the representative is most independent of his elector, has been unable to escape it. Herbert Spencer has shown, in a work already old, that the increase of apparent liberty must needs be followed by the decrease of real liberty. Returning to this contention in his recent book, “The Individual versus the State,” he thus expresses himself with regard to the English Parliament:—

这一后果的确难以避免，因为即便是英国这样提供了最受欢迎的议会体制、议会代表最大程度上独立于选民的国家，也无法摆脱这一问题。赫伯特·斯宾塞在很久以前的一部著作中就曾表示，表面自由的增加必定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人对国家》中，他再次提及这一主张，就英国议会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 Legislation since this period has followed the course, I pointed out. Rapidly multiplying dictatorial measures have continually tended to restrict individual liberties, and this in two ways. Regulations have been established every year in greater number, imposing a constraint on the citizen in matters in which his acts were formerly completely free, and forcing him to accomplish acts

> which he was formerly at liberty to accomplish or not to accomplish at will. At the same time heavier and heavier public, and especially local, burdens have still further restricted his liberty by diminishing the portion of his profits he can spend as he chooses, and by augmenting the portion which is taken from him to be spent according to the good pleasure of the public authorities.

> “从这个时期开始，立法就一直依照着我指出的路线发展。独裁性的措施，其数目成倍增加，不断加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并且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每一年都会出台更多的规定，对公民们原本可以自由从事的事情多加限制，又强迫他们去做本来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要做的事。同时，公民要承担更为沉重的公共费用，尤其是当地的公共财政负担，这进一步压榨了原本可以由公民本人自由支配的财富份额，加大了从公民手中取得并上缴本可以由其根据喜好花销的财富份额，这使得公民自由更加受限。”

This progressive restriction of liberties shows itself in every country in a special shape which Herbert Spencer has not pointed out; it is that the passing of these innumerable series of legislative measures, all of them in a general way of a restrictive order, conduces necessarily to augment the number, the power,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functionaries charged with their application. These functionaries tend in this way to become the veritable masters of civilised countries. Their power is all the greater owing to the fact that, amidst the incessant transfer of authority, the administrative caste is alone in being untouched by these changes, is alone in

possessing irresponsibility, impersonality, and perpetuity. There is no more oppressive despotism than that which presents itself under this triple form.

而这种对个人自由不断加强的限制，还以一种赫伯特·斯宾塞并未提及的特殊形式，存在于每一个国家之中，那就是无数限制性的立法措施的通过，这必然会增加负责落实它们的公务人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公务人员或将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宰。尽管政府不断更迭，这些行政人员却不会因此变动，也只有他们能够不负责任、不具个性、长久存在。这使得他们的权力更大。最具压迫性的专制，莫过于这三种表现形式。

This incessant creation of restrictive laws and regulations, surrounding the pettiest actions of existence with the most complicated formalities, inevitably has for its result the confining within narrower and narrower limits of the sphere in which the citizen may move freely. Victims of the delusion that equality and liberty are the better assured by the multiplication of laws, nations daily consent to put up with trammels increasingly burdensome. They do not accept this legislation with impunity. Accustomed to put up with every yoke, they soon end by desiring servitude, and lose all spontaneousness and energy. They are then no more than vain shadows, passive, unresisting and powerless automata.

不断创造限制性的法律和规定，将生活中最无关紧要的事情用复杂繁琐的程序包裹起来，这不可避免地使得公民能够自由活动的范围越来越窄。国家常受一种错觉的欺瞒，认为通过诸多法律可以更好地保障平等和自由，因而他们每天都得承受更沉重的束缚。他们不得不为这些立法付出代价。他们惯于忍受束缚，很快就变得需要他人奴役

并失去了所有的自发性和活力。他们就此成了虚幻的人影，成了消极无力、逆来顺受的行尸走肉。

Arrived at this point, the individual is bound to seek outside himself the forces he no longer finds within him.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s necessarily increase in proportion as the indifference and helplessness of the citizens grow. They it is who must necessarily exhibit the initiative, enterprising, and guiding spirit in which private persons are lacking. It falls on them to undertake everything, direct everything, and take everything under their protection. The State becomes an all-powerful god. Still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power of such gods was never either very durable or very strong.

当到达这个地步，个人就不得不到外界去寻找自己本身不再拥有的力量。鉴于公民的麻木、无望不断加剧，政府的功能必然要相应增加。因此，政府必须展现出私人所缺乏的主动性、事业心和领导力。政府必须要接手一切、领导一切、将一切置于自己的保护范围之内。国家成了万能的神。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类神的力量往往不太持久，也不够强大。

This progressive restriction of all liberties in the case of certain peoples, in spite of an outward license that gives them the illusion that these liberties are still in their possession, seems at least as much a consequence of their old age as of any particular system. It constitutes one of the precursory symptoms of that decadent phase which up to now no civilisation has escaped.

对于某些民族而言，所有的自由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但是表面的许可使他们产生了错觉，认为自己仍然拥有自由。而他们的衰老在限制自由上所发挥的作用，丝毫不亚于任何具体的政治体制。这一点可算得上所有人类文明都无法逃避的衰退期的预兆之一。

Judging by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and by the symptoms that strike the attention on every side, several of our modern civilisations have reached that phase of extreme old age which precedes decadence. It seems inevitable that all peoples should pass through identical phases of existence, since history is so often seen to repeat its course.

根据过去的教训和各方面都令人触目惊心的征兆，我们可以判断，现代文明中有一些已经到达了衰败前的老年期。历史的进程不断重复，所有的民族似乎也不得不经历同样的生存阶段。

It is easy to note briefly these common phases of the evolution of civilisations, and I shall terminate this work with a summary of them. This rapid sketch will perhaps throw some gleams of light on the causes of the power at present wielded by crowds.

很容易注意到，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有这些共同的阶段，我将对此进行概括，为本书作结。这个概略的说明也许能够让大家对于目前群体拥有权力的原因有一些了解。

If we examine in their main lines the genesis of the greatness and of the fall of the civilisations that preceded our own, what do

we see?

如果我们依据主要线索来审视那些更早期的文明的起源与终结，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At the dawn of civilisation a swarm of men of various origin, brought together by the chances of migrations, invasions, and conquests. Of different blood, and of equally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beliefs, the only common bond of union between these men is the half-recognised law of a chief.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rowds are present in an eminent degree in these confused agglomerations. They have the transient cohesion of crowds, their heroism, their weaknesses, their impulsiveness, and their violence. Nothing is stable in connection with them. They are barbarians.

在文明的诞生时期，由于移民、入侵、征战等原因，不同来源的人们汇聚在一起。他们血脉不同，宗教信仰和语言也不相同，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惟一纽带，就是其首领并未完全承认的法律。在这些混乱的人群之中，群体的心理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有短暂的团结和英雄主义，也有其弱点，冲动而暴力。他们从不会稳定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就是野蛮人。

At length time accomplishes its work. The identity of surroundings, the repeated intermingling of races,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in common exert their influence. The assemblage of dissimilar units begins to blend into a whole, to form a race; that is, an aggregate possessing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sentiments to which heredity will give greater and greater fixity. The crowd has

become a people, and this people is able to emerge from its barbarous state. However, it will only entirely emerge therefrom when, after long efforts, struggles necessarily repeated, and innumerable recommencements, it shall have acquired an ideal. The nature of this ideal is of slight importance; whether it be the cult of Rome, the might of Athens, or the triumph of Allah, it will suffice to endow all the individuals of the race that is forming with perfect unity of sentiment and thought.

最后，时间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生活环境的一致、各种族间的不断交流以及共同生活的必要性产生了影响。不同的小群体开始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种族。这个整体拥有相同的特征和情感，而遗传使之愈发稳定。这个群体成为了民族，这个民族能够从原来的野蛮状态中成长起来。但是，只有在经历长期的努力、反复的抗争和无数次重新来过之后，这个民族才会获得某种理想，使之完全摆脱野蛮状态。这种理想的本质并不重要，无论它是对罗马的崇敬、雅典的强大还是真主安拉的胜利，它都足以使一个种族中的每个人实现情感和思想的完美统一。

At this stage a new civilisation, with its institutions, its beliefs, and its arts, may be born. In pursuit of its ideal, the race will acquire in succession the qualities necessary to give it splendour, vigour, and grandeur. At times no doubt it will still be a crowd, but henceforth, beneath the mobile and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crowds, is found a solid substratum, the genius of the race which confines within narrow limit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a nation and overrules the play of chance.

在这个阶段，一种新的文明，伴随着其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艺

术文化，真正地诞生了。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这一种族会逐步获得使其辉煌、茁壮和强大的必需品质。有时候，它仍会是个乌合之众，具有群体易变、不定的特点；但是在这一表象背后，这个种族就有了坚实的基础，那就是一个种族自身的特性，它能将一个国家的转变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还能支配机遇的作用。

After having exerted its creative action, time begins that work of destruction from which neither gods nor men escape. Having reached a certain level of strength and complexity a civilisation ceases to grow, and having ceased to grow it is condemned to a speedy decline. The hour of its old age has struck.

在完成了其创造性的工作之后，时间又开始了毁灭的工作，无论是神还是人，都无法跳过这一进程。当某种文明的力量和复杂性达到某种程度之后，它就会停止发展，而一旦发展的脚步停了下来，它就会快速走向衰落。它的老年期就在此时降临。

This inevitable hour is always marked by the weakening of the ideal that was the mainstay of the race. In proportion as this ideal pales all the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inspired by it begin to be shaken.

这是个难以避免的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一度成为该种族精神支柱的那个理想渐趋衰弱。随着这一理想的褪色，受其启发而产生的所有宗教、政治和社会体制也相应地开始动摇。

With the progressive perishing of its ideal the race loses more

and more the qualities that lent it its cohesion, its unity, and its strength. The personality and intelligence of the individual may increas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is collective egoism of the race is replaced by an excessive development of the egoism of the individual, accompanied by a weakening of character and a lessening of the capacity for action. What constituted a people, a unity, a whole, becomes in the end an agglomeration of individualities lacking cohesion, and artificially held together for a time by its traditions and institutions. It is at this stage that men, divided by their interests and aspirations, and incapable any longer of self-government, require directing in their pettiest acts, and that the State exerts an absorbing influence.

随着理想逐渐消失，这个种族逐渐失去了曾使之强盛团结的品质。个人的个性和智力或许会继续发展，但与此同时，种族的自我意识却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取代，同时还将伴随着种族个性的衰弱和行动能力的降低。曾经的民族、集体和整体，就此成为了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人，仅仅是在一段时期内，被传统和制度人为地聚集在一起。正是在这个阶段，人们因不同的利益和个人愿望而四分五裂，再也无力实现自治，因而他们在最琐碎的事情上也需要别人的领导，国家就此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

With the definite loss of its old ideal the genius of the race entirely disappears; it is a mere swarm of isolated individuals and returns to its original state—that of a crowd. Without consistency and without a future, it has all the transitory characteristics of crowds. Its civilisation is now without stability, and at the mercy of every chance. The populace is sovereign, and the tide of barbarism mounts. The civilisation may still seem brilliant because it possesses an outward front, the work of a long past, but it is in reality an

edifice crumbling to ruin, which nothing supports, and destined to fall in at the first storm.

当彻底失去理想的时候，一个种族的特性也完全消失了，种族就此沦落为一群独立的个人，并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即一群乌合之众。这样的群体既没有统一性，也没有未来，但有着所有乌合之众具有的那些短暂性的特征。如今，其文明已经失去稳定性，随时可能生变。民众就是主宰，野蛮风气渐长。它的文明看上去或许灿烂依旧，但那不过是因为过去的悠久历史使它的外表保持华丽，但实际上，它不过是一幢摇摇欲坠的建筑，没有支柱，注定将在第一场暴风雨来临之时轰然倒塌。

To pass in pursuit of an ideal from the barbarous to the civilised state, and then, when this ideal has lost its virtue, to decline and die, such is the cycle of the life of a people.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迈入文明状态；而当理想失去闪光点的时候，又走向衰败、灭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

[5_1].Committees under whatever name, clubs, syndicates, constitute perhaps the most redoubtable danger resulting from the power of crowds. They represent in reality the most impersonal and, in consequence, the most oppressive form of tyranny. The leaders who direct the committees being supposed to speak and act in the name of a collectivity, are freed from all responsibility, and are in a position to do just as they choose. The most savage tyrant has never ventured even to dream of such proscriptions as those ordained by the committees of the Revolution. Barras has declared that they decimated the convention, picking off its members at their pleasure. So long as he was able to speak in their name, Robespierre wielded absolute power. The moment this frightful dictator separated himself from them, for reasons of personal pride, he was lost. The reign of crowds is the reign of

committees, that is, of the leaders of crowds. A severer despotism cannot be imagined.

[5_2].The following reflection of an English parliamentarian of long experience doubtless applies to these opinions, fixed beforehand, and rendered unalterable by electioneering necessities: "During the fifty years that I have sat at Westminster, I have listened to thousands of speeches; but few of them have changed my opinion, not one of them has changed my vote."

[5_3].M. Clemenceau.—Note of the Translator.

[6_1].无论名头是俱乐部、企业联合组织或其他，委员会或许就是群体力量作用下最为可怕的危险因素。实际上，他们代表了暴政中最为冷漠，因而也是最为残酷的形式。直接领导委员会的领袖们以集体的名义发言或行动，却不受责任约束，地位崇高而随意妄为。大革命中那些委员会剥夺人权的程度，即便是最为野蛮的暴君也不敢想象。巴拉斯声称他们大量地消灭那些大会代表，从中随意选出几个成员。只要以他们的名义发言，罗伯斯庇尔就获得了绝对权利。而当这位可怕的独裁者因为个人的自傲而与人群分离时，他就失去了一切。一旦统治了群体就等于统治了委员会，因为这代表统治了群体的领袖。再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暴政了。

[6_2].下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国会议员的见解，无疑适用于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所有的意见都是事先确定的，不因拉票活动而改变：“坐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50年间，我听了上千场演说；只有少数能动摇我的观点，无一能改变我的投票。”

[6_3].克列孟梭——译者注

版权页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